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编委会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编委会

凡　例

一、本书以编年体例记述了本世纪中国从1900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九十七年历史。

二、台湾、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为了方便行文，除有重要影响的两岸关系以及与香港、澳门关系的内容外，有关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人物、事件与资料一般不再论及与收录。

三、本书对二十世纪历史不作任何阶段划分，而以年份为唯一划分基准，按照公历纪年顺序，分六卷依次编写内容。

四、本书每一年份均按以下栏目顺序行文："世纪热点"、"历史内幕"、"历史考证"、"风云人物"、"珍闻轶事"、"流行风"、"历史档案"与"在当年的日历上"。

1. 世纪热点。本栏目概要记述对二十世纪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各种事件的全过程。全书共记述了766件事件，其表现形式为当事人、当时人或后人对该事件具体、生动、可信的记述性文字或评论报道。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在1949年之前，有关中国共产党内容置于栏目前半部，而其他内容置于栏目后半部；这一处理原则也为其他各栏目所遵循。1949年之后，则全部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建设内容。

2. 历史内幕。本栏目主要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详尽的披露，介绍事件的经过及来龙去脉，揭示事件的内幕，[illegible]澄清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全书共披露了282项历史内幕。

3. 历史考证。本栏目主要是对有争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研究、考证。全书共考证了174个重大问题。每一篇考证文章均标明争论各方之观点，满足读者的探求、研究的要求。

4. 风云人物。本栏目主要介绍对二十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生平。全书共记载了548位人物，其中包括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人物出现年份以其产生重大历史影响、个人经历发生重大变动或其去世之年。

5. 珍闻轶事。本栏目主要收录著名人物的珍闻轶事、当年流行的故事、趣事与掌故等。

6. 流行风。本栏目主要选取二十世纪每一年份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歌曲等文艺作品及当年流行的口号、服饰等，力图反映当年的社会时尚与历史风貌。

7. 历史档案。本栏目主要选取对二十世纪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报刊社论、报告、决议、讲话、文章、通知、信件等历史文献及某些重要统计数据。全书共收录了585件珍贵的历史文献。文献收录的年份，选自报刊杂志的，多以发表时间为准；决议、通知多以通过时间为准。

8. 在当年的日历上。本栏目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及社会生活的顺序分类，然后再在每一类中按时间先后编排内容。

必须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年份都同时具有以上八个栏目，由于内容原因，有的年份并未设齐上述栏目。

五、本书每篇文章或资料均在文后标明出处，以方便读者查阅其他相关资料。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第一卷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0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1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2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3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4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5 年

实录一卷2正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8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9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0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1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2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3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4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5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7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8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19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0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1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2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第二卷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3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4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5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8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29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0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1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2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3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第三卷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4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5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8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39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0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1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2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3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第四卷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4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5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8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49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0 年

珍闻轶事

流行风

历史档案

在当年的日历上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1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2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3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4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5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第五卷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6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8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9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0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1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2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3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4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5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8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69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0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1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2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3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4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5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8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79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第六卷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0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1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2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3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4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5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6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7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8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89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0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1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2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3 年

世纪热点 ………………………………………………………… (5778)

风云人物 ………………………………………………………… (5814)

珍闻轶事 ………………………………………………………… (5823)

流行风 ………………………………………………………… (5825)

历史档案 ………………………………………………………… (5827)

在当年的日历上 ………………………………………………………… (5833)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4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5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96 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0年

导　言

当二十世纪的钟声在全世界敲响的时候,中国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欢欣。在一九〇〇年,也就是刚刚迈入二十世纪,中国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临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政府不是没做过挣扎,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很快变得只剩唯一一条道路——灭亡,而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只是它最后的苟延残喘。

首先呼啸而来的是义和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揭竿而起,成立了自己颇有特色的组织,甚至一度被清廷用来抵抗洋人。经过英勇的战斗,义和团终究成为了历史的余响。

一九〇〇年一月至三月,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得到了迅猛发展。义和团源于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其成员都是些乡间农民和手工业者。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些组织改称"义和团"。为减轻来自清政府的弹压,兼之清廷一度实行了"招抚"策略,山东义和团首先提出"扶清灭洋",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接受。此后京、津也成为义和团的天下。义和团的兴起,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惧和仇恨。从一九〇〇年四月,英、德、美、法等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剿除义和团。六月间,组成八国联军出面镇压。义和团在大沽、天津、北京、东北三省等地,与入侵者展开英勇搏斗,后终因力量悬殊及清廷破坏而失败。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为镇压义和团运动正式组成联军侵入中国。两千一百名联军首先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统帅,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因在廊坊一带受到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狙击,伤亡惨重,狼狈撤回天津租界。六月十七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七月十四日,又攻陷天津;八月四日,两万多名联军分两路沿运河两岸直逼北京。同月十四日北京陷落,联军在皇宫、颐和园、三海及民会中大肆烧掠。慈禧太后在联军入城前携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西逃。九月,新任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率军十万,北犯张家口,东到山海关,南侵保定、正定。与此同时,沙俄单独出兵十七万,占领东三省。十二日,清政府接受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成为《辛丑条约》的基础。

一九〇〇年六月间,当京津义和团进入高潮时,英美等帝国主义操纵中国东南各省督抚制定《中外互保章程》,以实现其对南方的控制。当时,英国指使驻沪代理总领事华伦策动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从中牵线,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实行"互保"。通过电文磋商,六月二十六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代表刘、张与各国驻沪领事制定了《中外互保章程》。于是,各国借口保护,其军舰纷纷驶向长江各口岸。接着,两广总督李鸿章、浙江巡抚刘树鉴以及四川、广西、山东、福建等省也相继表示支持和赞同。后来,虽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章程》没有正式签订,但却阻止、破坏了义和团在江南的发展。

一九〇〇年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令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唐才常徘徊于保皇和革命之间,一方面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的"极峰"。后来,鉴于"自立会"名称"近于激烈",便约请文廷式、容闳、严复、章太炎、沈荩等人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中国国会",提出"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他们还组建"自立军",筹划武装"勤王"。后张之洞串通英国领事于八月二十一日将自立军总机关破获,自立军趋于瓦解。

总之,迈入一九〇〇年,中国的变化更深、更大了,从而使这一年成为影响极大、问题极多的一年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义和团运动
-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 ●东南互保
- ●自立军事件

义和团运动

背景介绍

义和拳和大刀会一样，都是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原是一个古老的拳种和拳会，其武术技艺渊源于康熙年间创立的梅花拳。传至乾隆、嘉庆年间，曾被秘密教门清水教、八卦教吸收和利用，赋予宗教的神秘色彩，在山东、直隶一些地区流传。义和拳有自己的独特的活动仪式：练拳时须拜师叩头，朝南盟誓；还要念咒、运气，以求“刀枪不入”。拜师、盟誓，原是表现练拳者尊崇师法、恪守训戒的仪式，也是中国术士们的传统作法。“中国术士，每演术时，必潜心默念传法之人，以致其诚，然后乃能著效”。起初，练拳者为表现其虔诚而拜师、盟誓的活动本无宗教迷信的成份，但在清水教和八卦教等教门的影响下逐渐披上了宗教的神秘色彩，遂使“潜心默念传法之人”的仪式变成了“念咒”以求神灵庇护的迷信活动。道光以后，义和拳这种宗教化的武术结社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除一部分继续作为八卦教外围的武术结社而保持着“传授咒语拳棒”的特点而秘密流传外，其余一大部分义和拳会则鉴于教门屡遭镇压，便自动摆脱了秘密宗教的活动方式，而和历来关系密切的民间武术团体“梅花拳会”合二而一。并在“各保身家、守望相助”的旗号下公开活动，获得较大发展。正如山东巡抚张汝梅所说：“东直交界各州县地处边疆，民强好武，平民多习为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传习既众，流播遂远，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其势力大大超过乾嘉时期。及至一八九八年，威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和冠县习红拳的阎书勤等人共同领导冠县梨园屯反洋教起义时，将他们的团体重新改名为“义和拳”，并竖起了“助清灭洋”的大旗，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端。一八九九年十月，朱红灯在平原、茌平一带大张“天下义和拳”的旗帜后，义和拳已被中外所瞩目。

清政府为了摆脱统治危机，便在十一月饬令各州县举办团练以资自卫。“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团练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同年，山东相继爆发了朱红灯领导的反洋教起义和赵三多、阎书琴领导的冠县梨园屯起义。新任山东巡抚毓贤一向憎恶教会势力，且目睹义和拳起事皆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而引起的事实，转而对义和拳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便由一味镇压转向剿抚兼施，或先抚后剿的策略对待义和拳。并于一八九九年初夏承认义和拳为民间团练，改称“义和团”，以图控制和利用。从此，“义和团”的名称不胫而走。

一九〇〇年一月，清政府发布上谕承认：“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并饬令地方官不要良莠不分。实际上已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当时，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何天爵评论说，义和团运动“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期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

材料：

- ·义和团在京津
- ·扶清灭洋
- ·抗击西摩尔

材料一　义和团在京津

一九〇〇年春，北京开始有义和团的活动，“有拳民入京授人以艺者，初在僻处，继则城厢内外街巷中，时见率领十五六岁之俊童，授以艺。”他们每日下午必有一二十孩童及少年人若干在煤山对面宫墙下操演。在顺治门外南下洼地方，也经常有许多儿童练拳，“自称扶清灭洋之大会”。义和团在北京，“凡遇教堂，则遍贴揭贴谓三月杪当与教民为难云云。”至五月间，义和团已“布满京内外，惟黄村镇及庞谷(各)庄等处，尤聚散无常”，成为北京地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之一。他们假借在温泉山煤洞中掘出刘伯温预言碑，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碑文指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它号召人民起来把外国侵略者及清朝贪官污吏来个“剪草

自除根。"六月初，北京附近的义和团陆续开进北京，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他们"俱在庙宇空阁客店内设坛居住"。各种揭帖、黄单，到处粘贴传送。参加义和团的人数日益增多。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又是外国侵略者的据点。据调查，天津西郊和南郊的一些村镇，至迟在一八九九年春天已开始组织义和团了。一九〇〇年二月，义和团已"流入天津县，每日有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宽阔地方习练，河北一带亦有之。"三、四月间，因天旱无雨，瘟疫流行，人心浮动，义和团趁势宣传"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人多信之，于是习拳者日益增多。拳民王荫荣在天津西郊建立坎字团总坛口；刘呈祥在天津西郊高家庄建立乾团总坛口，在津郊最有影响。与此同时，义和团还开始在天津、河北、河东城内外先后立坛，"其坛多立于庙宇中"。及至五月，坛口多至数十处，众至数百人；习拳者多为童子；拳师多来自河间、深州和冀州等地，或从山东而来。他们广泛散发揭帖、告白之类的传单，号召人们参加义和团"杀洋灭教"的斗争，并以"刀枪不入"、"神灵保佑"鼓舞人们的斗争勇气，于是信者日众，"上至老，下至幼，皆争相学习"、"争购刀矛等器械"。五、六月间，天津已是"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续"；县令出示禁止冶铁铸刀、枪，拳民愤怒，"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

天津义和团以"灭洋"为己任，提出了"先练义和拳，后练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斗争目标，期望："鬼子逃，洋奴敛，五谷丰登太平年"的太平世界的到来。他们再三号召焚毁教堂，杀逐教士教民，就连"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

在义和团"灭洋"声威的震慑下，"租界戒严，教堂尤汲汲。"外国侵略者则以租界为据点，伺机向义和团反扑。六月中旬，强行开进天津租界的联军已达三千多人，其中俄军居半数以上。他们还驱迫逃入天津租界的教民构筑工事，在沿河一带筑一道长二里的防线。并利用有利的地形袭击义和团和射杀中国平民百姓。帝国主义列强还在大沽口外集结三十八艘军舰，作好了大举入侵的准备。义和团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挑衅，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并为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准备了条件。

（摘自《义和团档案史料》）

材料二　扶清灭洋

清朝封建地主阶级和那些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对洋人更为疑惧，于是仇洋的情绪遍及朝野，出现了"普天率土，谁不恨外侮之强横"的局面，遂使之旗不胫而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义和团各坛场，均门前树立大旗，上书'保清灭洋'等字，人皆耀武扬威。"有的则大书"奉旨义民保清灭洋，更有书写替天行道、保国为民等字样。"这说明，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扶清灭洋"的口号成为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和旗帜。义和团提出这一口号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清朝统治者的支持，而集中力量打击外国侵略势力。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时代的要求。

所谓"扶清"、"助清"之类的提法，其本身恰恰说明义和团与清政府是联盟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因为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事。所以袁昶恼羞成怒地说："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犹可诛。"就一部分团、坛来说，其"扶清"，只是迫于斗争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他们在揭帖中所说："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明确地表示了灭了洋人再反大清，而"扶清"只是暂时的现象。

当义和团兴起后，不少封建官绅士人对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在奏章中为义和团鸣不平。有的说："臣闻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有的说，拳民"结会之由，实因各处教民欺侮过甚，地方官又复一味袒庇，不足以服其心，乃借会以资保护，并无与官为仇之意。"有的地方官因不满于教士挟制，"亦思藉民力以报复"，"或对众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曾经镇压过义和团的山东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也都是中途改变了主意，转而支持义和团的"杀洋灭教"的斗争。就连清廷统治集团，也在外侮紧逼的情况下，曾于一八九八年冬谕令各省督办团练，并令沿海督抚整饬防务以御外侮。

（摘自《义和团史话》山东出版社）

材料三　抗击西摩尔

英国水师提督西摩，抵至天津时，原欲将所统带之兵，联合各国原在天津之兵，内计英兵九百十五人，德兵四百十五人，俄兵三百十五人，法兵一百五十八人，美兵一百十二人，日兵五十二人，意兵四十人，奥兵二十五人，共计两千零六十四人，以便择要驻扎，夺据天津城垣，并

击；联军立即还攻，击死拳匪约八十人。有意兵四人，距排车在百里之外，遇拳匪围攻，亦被害。是日晚间，闻悉留在后面保护劳发〔落垡〕车站之支队，为华兵数百人向之攻击；……

十五号（十九日），拟派一排车前往天津，以便寻觅军械粮饷等物，……待至晚间，闻悉各车不能行至所欲至之处，因杨村以南之铁路，又被拳匪毁坏故也。当此之时，联军进退两难，屈指行程，虽不过数日可抵北京，而前行之铁路，以被拳匪毁坏，竟不能越雷池一步；所携带之军火粮饷，并未预为足备，以防淹滞多时。至天津一带之消息，已隔绝不通，救援亦复无望，知困苦之状，匪言可宣。……

十八号（二十二日），……有一队中国马兵，进攻廊坊，又有一大排步兵随之，人数约有二千，大都董军为多，拳匪亦间有之。联军当派一千人与之接战，两造相距不远，彼此抵御，均异常奋勇。……

二十号（二十四日）清晨六点钟，联军向天津退去。九点钟，遇一大队华军，迎头截击，经联军陆续暴袭，并毁去沿河一带各村庄，华军稍沮；乃行至前途，又遇聂军拦阻，中杂拳匪甚多，炮火之声，络绎不绝。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背景介绍

帝国主义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感到惊恐不安，一方面却认为是入侵中国的好机会。于是列强纷纷制造出兵镇压义和团和瓜分中国的舆论。英国侵略者公然叫喊：要象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样用“铁手钢肠”向义和团兴师“问罪”。沙俄侵略者连篇累牍地攻击义和团，“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成为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还一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义和团。一九〇〇年一日月英、法、德、美公使分别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公开发布上谕，严禁义和团活动。四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五月二十一月，英、俄、法等驻京外交团集会，并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惩办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官员。他们还联名向清政府发出通牒，要求：1. 严禁团民练拳纠党，传布揭帖；2. 团民聚会之区，无论寺庙民居，将其住持屋主，一并收监；3. 将拘办拳民不力之员，概行惩办；4. 将为首焚杀之“匪”，一并正法；5. 将纵“匪”助“匪”之人，尽数诛戮；6. 直隶与邻省，有团民之处，地方官出文严禁。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各国公使几经磋商，一致决定联合出兵共同镇压义和团。他们一面调集在华武装组成所谓特遣卫队前来北京“保护使馆；一面电请各国政府增兵扩大侵略；并警告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在各国的压力下，西太后竟然批准了洋兵进京。于是，俄、英、美、日、德、法、意等国侵略军四百余名，于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分两批乘清政府所提供的火车侵入北京。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也纷纷开到大沽口外示威。德国公使克林德毫不隐讳地声称：“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端”。

但是，当时英俄在华争夺激烈，矛盾很深。它们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自的伙伴，在分割中国的角逐中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英国为了乘机独占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极力拉拢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绞杀义和团，抵制沙俄势力向南扩张。英国外交大臣在给日本外务省的备忘录中，请求日本多多出兵，并表示英国“乐于”提供“财政援助”。日本陆军大臣桂太郎认为日本参加这次战争，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第一步”。因此，日本积极赞助英国的主张，它派出的兵力占八国联军总数的五分之二。美国也同英国相勾结，表示要“最积极地参加军事行动，永远站在最前哨”。

沙俄为了控制清政府，独霸东北和抵制英、日扩张势力，则利用与中国接壤之便，“调兵独多”，却又不“公开领导对中国作敌对行动”。德国支持沙俄，抵制英、日，并把这次侵华战争看作为德国“扩充”在华的“占有权利”和“发展东亚商业之最大的希望”。帝国主义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弹压‘匪’类，救护使臣”的旗号下，结成了“对中国的同盟”。

材料：

- 迎头一棒
- 夺取大沽炮台
- 津京陷落
- 八国联军暴行

材料一　迎头一棒

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接着，俄、英、美、法、意等国军舰陆续开到大沽口，声称要派兵进驻北京，保护使馆。

5月31日到6月2日，各国侵略军四百余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进北京，进驻东交民巷，还有二千多名侵略军开进了天津租界。

6月9日，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发一份电报给英国

驻大沽口海军司令西摩中将，让他立即带领部队进入北京增援先遣部队。西摩收到电报后，在两小时之内便率领军队从大沽乘船向天津进犯，并“要求各国军官给予合作”。根据事先一致行动的协议，其他各国侵略军也连夜先后开往天津。同日，即在天津召开了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司令官联席会议，讨论夺取天津城，并由铁路侵入北京。在会上，俄、法领事强调铁路不通、兵力不足，要求暂缓进京。其真实目的是企图等大队俄军到来，要充当这次进犯北京的主力。最后在美国领事的撺掇下，各领事决定就八国现有兵力联合进军北京，并由英国的西摩担任统帅，美国的麦卡加拉上校担任副统帅，俄国上校沃嘎克任参谋长，组成联军于 6 月 10 日凌晨由天津向北京进发。

出发前，列强威逼直隶总督裕禄修路备车，裕禄回复领事们，在未得到朝廷许可之前，他无法同意外国军队前往。由于铁路局不肯调拨火车，英国人和德国人就自己跑进车库，强占了机车。上午 9 点 30 分，西摩带领英、美、奥、意的 500 名侵略军乘第一列专车，冲往北京。上午 11 点，由英、德、日、法、俄等国侵略军组成的第二批队伍约 600 人又乘专列侵向北京。这天共开出 3 列火车，共运载侵略军 2053 名。此后一二天内，侵略军和大炮仍有增加，但总数不会超过 2300 人。西摩联军傲慢自大，以为西方军队即使人少，也能轻易地把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打败，至多两天，就可以顺利到达北京。因此，各陆战队没带什么辎重，只带了二三天粮食，每人只发了 200 到 250 发子弹。然而，后来的事实与他们的如意算盘相去甚远。

西摩联军出动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了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的强烈愤慨。董福祥的甘军迅速地控制了北京车站，准备迎头痛击侵略者，并杀死了前来车站迎接援军的日本书记生杉山彬。

由于沿途路轨被义和团毁坏，枕木被搬走，迫使西摩乘坐的第一列火车只能边修路边前进。他们在 24 小时之内才前进了 3 英里。6 月 12 日下午，侵略者才挣扎到廊坊车站。正当侵略军在赶修铁路的时候，义和团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几百名头扎红头巾，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的义和团，其中有好些还是小孩子，向修路的侵略军冲杀过来。“没有一点害怕和犹豫”，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精神。侵略军们措手不及，仓慌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跟踪追击。这时恰有一队美军从后面赶到，架起大炮进行轰击。在侵略军的枪炮之下，义和团伤亡很大。许多义和团民转身冲向美军，只见一个身着白袍，腰系红带的团民冲到这支联军副统帅麦卡加拉跟前，用长矛向他的咽喉猛刺时，麦卡加拉的手枪响了，这个义和团勇士当即英勇牺牲。附近村庄的义和团闻讯赶来参加战斗，把这批联军紧紧地围困在车站一带。他们时而冲上前袭击联军，时而后撤拆毁铁路，持续两天，战斗不断。以刀剑对枪炮，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义和团始终奋不顾身，斗志不减。他们这种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慨甚至连自己的敌人都为之惊叹。一个亲身参加过这次战役的侵略者事后颇为感叹地说：义和团“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

西摩联军并不死心，于 14 日清晨开动火车继续北上。列车勉强开出离廊坊车站 3 英里半的地方，便寸步难行了。由此往前，铁路已全遭破坏。义和团始终监视着列车，但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发现 5 名意大利侵略军脱离了联军队伍时，一队义和团战士马上冲上去，使其立即丧命。

联军在义和团的连日阻击下，直到 16 日还困在廊坊。弹尽粮缺，西摩只得派出一列火车返回天津搬运给养。但这列火车开到杨村时，就因刚刚修复的铁路又被义和团拆毁而无法前进。西摩看到无法再利用京津铁路进犯北京，决定全军退回杨村，企图从北运河乘船北上。西摩集中炮火轰击义和团，终算杀出一条血路，逃出了廊坊车站，保住了一条狗命。但是，留下来继续后撤的两列火车，却于 18 日遭到了 2 千多名义和团和来自北京的 3 千多名甘军的联合袭击。经激烈战斗，有 6 名侵略军被击毙，48 人受伤。义和团和清军有四五百人牺牲在反侵略战场上。当晚，这两列火车才勉强开到杨村与西摩会合。义和团和甘军紧追不放，又于当天深夜把杨村车站包围起来，侵略军又死伤近 40 人。

6 月 19 日，西摩联军与天津失去联系整整 6 天了，而且给养到这天已完全断绝。西摩看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决定乘驳船从北运河撤退。他们把伤员和供应装在先后抢来的 9 只木船上，其余的人沿海岸步行。由于那年大旱，运河水浅，一天走不了 20 里路；加上食品吃光了，不得不宰杀军马和沿途抢劫老百姓度日，还经常遇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惶惶不可终日，致使西摩联军白天不敢行动，只好夜间逃窜。

23 日凌晨，西摩联军逃至位于天津城北 8 公里的西沽，偷袭并夺取了清军的武器库。清军为了夺回武器库，与联军展开激战，附近的义和团民也都赶来助战，将联军紧紧地围困在武器库内。西摩被困在库内一整天，几次派人跟天津租界取得联系都被截住，甚至近百人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带信突围也遭到失败。24 日，担任西摩联军上校情报官的壁阁衔派遣 1 名中国奸细，蒙混过关，将求救信送到天津租界。由于联军在库内得到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和充足的粮食补给，进行负隅顽抗，使西沽之围持续了整整 3 天。

25 日，天津租界的联军组成了一支以俄军为主的约 2500 多人的混合救援部队，在俄国希斯基上校的指挥下从天津出发，由送信的奸细引路，于当天上午到达西沽并将西摩联军解围。次日，侵略军炸毁了武器库，沿铁路向

天津租界逃命。这时曹福田率义和团埋伏在租界附近迎击侵略者，敌人被打得丢枪弃械，狼狈窜回租界。

西摩联军离开租界整整 17 天，其中 14 天是与义和团和中国驻军激烈对垒中度过的，共死亡 62 人，受伤 232 人。义和团和清军阵亡者约计三四百人。西摩事后心有余悸地承认："如果义和团所用的武器是近代枪炮的话，那么我所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灭。"

中国军民抗击西摩联军的胜利，揭开了天津爱国军民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序幕，大大增长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信心，粉碎了帝国主义分子经常吹嘘的"只要一小队组织好了并武器齐备的外国军队，就可以在中国从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而遇不到有效反抗"的狂言。同时，各国列强对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不仅同情义和团，甚至还和义和团一起，挺身于反帝斗争第一线表示十分不满，当得知甘军开往廊坊阻击西摩联军后，这种不满就发展为恶毒的诅咒。从此以后，列强完全打消了依靠清军镇压义和团的想法，而且认为"来自清军的危险，较来自义和拳的危险更为严重"。他们决心增派大量军队联合起来自己要直接血腥镇压义和团了。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材料二　夺取大沽炮台

正当西摩联军被围困在廊坊的时候，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帝国主义联合舰队发动了对大沽口炮台的进攻，目的是为入侵天津、北京建立一个滩头阵地。

大沽口位于天津东南、海河入海口的南岸，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北京通向海洋的东大门，又是天津的海防前哨，是华北及几辅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军舰曾三次入侵大沽口，都曾在这里发生激烈的战斗。八国联军进犯之前，大沽口驻守清军约 2 千多人。有 4 座炮台，南、北岸各两座。南岸的主炮台（也叫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 56 门，并在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 20 门。北岸的主炮台（也叫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 74 门，并在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 20 门。守卫大沽海口的，还有向外国新购置的 3 千吨位的"海容"号巡洋舰和"海龙"、"海犀"、"海青"、"海华"4 艘鱼雷艇。镇守大沽炮台的将领叫罗荣光，他的官衔是天津镇总兵，1900 年刚任命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还未走马上任，就遇到了八国联军舰队的攻击。罗荣光看到这些天敌人蠢蠢欲动，企图闯入大沽口，义愤填膺，他除了率领士兵加强炮台的守备外，并开始在海河口布雷，准备与侵略军决一死战。

当时，在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司令官为夺占大沽多次进行商谈，在"速夺"与"缓夺"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分歧。各国领事担心立即夺占大沽将会激起义和团和中国官兵更加激烈的反抗，使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然而，绝大多数海军将领充满杀气，都强调要迅速夺占大沽。八国联军舰队为决心攻下大沽炮台，先后集中了 30 多艘军舰，还配置了几十只运兵船和医船、救护艇，载有数千名侵略军。联军在大沽口外加紧部署，虎视眈眈，以求一逞。

6 月 15 日，各国海军头目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原来，在八个国家中，以英、俄两国势力最大，矛盾也最尖锐。俄国看到英国西摩成为进犯北京的统帅，十分想抢夺侵占大沽的海军统帅权。前不久，就是这位中将在沙皇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从旅顺口又抽调了 1600 多名军队作为进犯大沽的主力俄国鬼子在会上极力煽动各国立即攻占大沽口，并讨论了攻占的军事部署。会后立即派出 300 多名日本兵到塘沽，占领了塘沽火车站；250 名俄、法军偷偷登陆占领了炮台后方的重要据点军粮城。。

6 月 16 日上午，联军海军头目又在"俄罗斯"号巡洋舰上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向直隶总督裕禄和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威逼中国守军于 17 日凌晨两点交出炮台，并详细讨论了夺取炮台的具体作战方案。方案决定于当天下午派出 935 名侵略联军偷偷登岸，埋伏在炮台的后侧。因大沽口内积沙太多，吃水深的巨舰不能靠近，当时联军有 22 艘大型巡洋舰，被命令开至港湾外侧停泊待命。10 艘可以进港的炮艇在天黑以后开进炮台的内侧。它们的作战任务是：日本炮舰"亚打告"号、美舰"毛拿加西"号，驶靠在塘沽火车站附近的海河左岸，保护塘沽车站不受轰击，并负责收容当地外国侨民和运送伤员；法国炮舰"里昂"号、德国炮舰"倚而的"号，全力保护海关，并设法营救和协助受伤船舰作战；英国"声誉"、"鳕鱼"两舰负责监视停泊在港内的中国 4 艘鱼雷艇；俄国巡洋舰"基立亚克"号、炮舰"海龙"号和"朝鲜人"号、英国舰"亚尔舍林"号配合已潜登的陆战队合力攻击中国炮台。

傍晚 6 时，联军传令，凡在大沽附近的外国人，限一小时之内都到停泊于火车站旁边的美舰"毛拿加西"号上躲避，以免为炮火所伤。

当晚 8 时，侵略者向大沽炮台守军提出最后通牒，蛮横宣称：大沽炮台"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限定第二天凌晨 2 时前让出南北两岸炮台营垒，交各团接管，否则到时以武力夺取。

对于列强的最后通牒，罗荣光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广大守军将士，愤慨无比，表示要坚决抗击。当时，对于联军的非常行动，前两天罗荣光已有察觉，曾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了军情，表示如果敌军攻击炮台，当竭力抵御，并请求裕禄速派援军。与此同时，罗荣光还派专差通知驻守大沽的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请其命令海军作好准备，在海上配合炮台两面夹击来犯之敌。但叶祖珪贪生怕死，明

知敌人即将来攻，惊慌失措，不作任何准备。

天渐渐暗了下来，夏天的闷热实在难熬，守军将士们伏在炮台里，汗下如雨，脊梁上已结满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港口外海浪咆哮，预示着这场战斗将十分激烈。17 日零点 50 分，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 70 分钟，炮台守军瞪大眼睛等着最后的战斗命令。但就在这时，泊于海河中的联军舰艇首先开炮，向大沽炮台发动猛攻，流弹像万条火龙似的直扑守军。守备在南炮台上的罗荣光立即下达战令，炮台副将韩照琦密切配合督军迎战。只见炮台上沉闷许久的炮口喷射出仇恨的炮弹。第一排炮就击中英国的“阿尔及林”号，把它的电灯打碎，船体受伤，立即冒出一股股浓烟。紧接着，沙俄的“朝鲜人”号、“海龙”号、“基立亚克”号也先后被打伤。

敌人，是十分凶残狡猾的。当前面几艘炮舰挨打后，立即变换队形，德国“倚而的”号和法国“里昂”号，立即回舵下行，与“朝鲜人”、“海龙”、“阿尔及林”等舰合力炮击南北炮台。埋伏在炮台后侧的联军，则以德军打先锋，分成左、中、右三路，向西北炮台猛扑。形势万分危急，但广大爱国官兵在前后受敌的不利情况下，却临危不惧，坚守炮位，在逍烟烈火中奋不顾身地用重炮猛轰侵略者。

河中敌舰，虽大部中弹起火，但仍拚死进攻，炮弹如雨。由于防御工事不坚固，炮台为硬土建造，经不住猛烈的炮火轰击，清军各营，损伤严重。特别是西北炮台，腹背受敌，伤亡大半。后来，侵略军逐步向炮台逼近，各炮台的弹药库完全暴露在敌舰的射程内，被击中起火。这时，陆上的敌人乘势向炮台猛扑过来，蜂涌而上，破门越墙。就在炮台失陷的最后一刻，不屈的兵勇们依然尽力尽职，坚持御敌。日军冲在最前面，其指挥官服部大佐在只差几步就靠近炮台大门时，被击毙身亡。日军白石大尉想把日本太阳旗升上中国旗杆，也被击毙。尽管炮台守军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但终因无有援兵，而挽救不了炮台的最后失陷。17 日早晨 5 时半，西北炮台首先弹药告匮，陷落了。西北炮台被占后，北炮台陷于孤立，很快也被联军攻下。侵略军又占用北炮台上的 12 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由于地势高，目标准，虽经激烈搏斗，但守军大部分壮烈牺牲，南炮台也被敌人夺去。

大沽之战，中国失掉了炮台，可是广大守台将士却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勇气概。主将罗荣光身先士卒，副将韩照琦挂花负伤，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有 90 多人，负伤者有上千人。罗荣光在炮台失陷后，退至天津。在天津城陷落的前 3 天，即 1900 年 7 月 11 日，他看到京津难保，国土沦丧，拖着沉重的身体吞下毒药，悲壮地殉国了。侵略者自供，“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发现断手、断脚、断头的英勇捍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陆敌人被打死打伤 136 名；在兵舰上的敌人被打死打伤 119 名，是进攻大沽口全部联国的百分之二十八。打伤敌舰 6 艘、俄国“基立亚克”号中弹 4 次，药舱爆炸，烟筒打烂，不能开动；“朝鲜人”号被击 5 弹，打了 5 个洞，同时被火烧得面目全非；“海龙”号被打中一弹；德国“倚而的”号中弹 8 颗；法国“里昂”号中炮一次。敌人惊呼：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至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又说：如果战斗在白天进行，中国的大炮就一定打得更准，各兵舰必受全伤。

在此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大沽炮台失守以后过了二三个小时，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代表各侵略国送交给裕禄一个照会，内容和 16 日送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相同。照会日期标为 16 日，实际送交时间是 17 日 10 点以后。很明显，这是侵略者耍的卑鄙伎俩，目的是为了防止裕禄从天津派兵救援大沽而有意拖延时间。这再次有力地证明，大沽之战是列强经过精心策划的。

大沽上空的浓烟烈火还未消散，占领大沽炮台的八国联军便分兵向新河、北塘、塘沽等村镇进犯。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侵略军一踏上大沽的土地，到处放火，并把抓住的逃难百姓驱赶到一起，用大炮、排枪轰死。大沽炮台陷落后，没有商船进入海口，造成 300 多名码头工人没有工作，迫不得已上岸去寻找活路，当他们走到沙俄所占领的炮台附近时，侵略者立即向这 300 多名工人开炮，顿时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打死在炮台前。联军在塘沽，兽性大发，一连烧了三天三夜，他们逢人便杀，杀完了人又放火烧所有的住宅，使这个拥有 5 万多居民的繁华城镇变成找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废墟。一千多户的新河大村，被侵略军烧的只剩下 300 来户，甚至灭绝人性地把刺死的婴儿挑在刀尖上玩耍取乐。

大沽炮台陷落，门户洞开，使列强获得重要的滩头阵地，源源而至的联军可任便登岸，畅通无阻，凶焰愈涨，由此，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侵华开始向高潮发展。到 6 月底，在大沽登陆的联军便增到 14000 人，抵达天津租界者由大沽之役前的 2400 人增至 8000 到 10000 人。津郡撼扰，京几震惊，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迫在眉睫了！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材料三　津京陷落

六月三十日，从大沽登陆的八国联军已达一万四千多人，“带有野战大炮五十三尊，霰弹炮三十六尊；然驻扎于天津者只有八千人至一万人之谱。”其中以俄、日军队居多，成为进攻天津的主力。义和团英勇杀敌，战斗中竟

卫天津的主力部队。

聂士成所部北洋武卫前军近万人，马玉昆部六七千人。聂部“所带军械均系极佳之毛瑟快枪，并有极好炮队。”聂士成治军严整，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一有战事，辄赴各营亲授机宜，抚慰将弁，战斗中身先士卒，具有中国传统的正直武人的特点。义和团运动中，聂士成奉命镇压义和团不遗余力，被义和团称作“聂鬼子”。当西摩尔率联军北犯时，他请求直隶总督裕禄把他从镇压义和团前线调回芦台抗击侵略，并在津郊丁字沽等地狙击和牵制西摩尔。聂部奉调回天津后，奉命“攻击天津租界甚力，恶战十数次，相持八日，炮声不绝。西人谓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七月九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总攻。他一马当先，督军躬冒炮火猛进，部下死伤惨重。聂士成的坐骑中弹，他一连换乘四匹战马，皆被敌人炮火伤毙。聂本成也受重伤，但仍督军苦战。营官宋占标几次哭求聂士成暂退，均被拒绝。联军集中火力猛扑，聂士成“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其死状为最惨”。

这时，北京耶稣教美以美会派往天津递送情报的汉奸郑殿芳，将天津南面一段城墙曾经倒过很不坚固的详情密报日军。十四日晨，日军伪装成团民模样，混到城根，炸开那段城墙，侵略军蜂踊而入，攻占了南门。但他们被击毙击伤者达七百五十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上校团长、法军司令等高级军官数人。这时坚守在东北角一带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腹背受敌，在歼灭沙俄侵略军二百多人以后，被迫撤离。天津终于陷入敌手。

八月三日，联军各统领会议，决定进攻北京。四日，八国联军出动一万八千三百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其中日军九千人、俄军三千五百人、英军二千五百人、美军二千人、法军一千人、德军二百人、奥意军一百人。联军兵分左右两路，进逼北仓。五日，马玉昆督军与联军血战，军败溃退，北仓失守。六日，联军进攻杨村，裕禄兵败自杀，杨村被联军占据，宋庆率部退往蔡村。

八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俄军与各军公同约定于十四日休息一天，十五日会攻北京。但俄军为抢攻陷北京之“首功”而背约，骤然进攻北京东便门，遭守城清军猛烈抵抗，被阻于东便门外。日军见俄军已发起进攻，亦于十四日晨进攻齐化门，清军奋起抵抗，日军攻势被阻。英、美各军也相继进攻北京。英军乘虚攻破广渠门，抄小道进入使馆区。日、俄侵略军于当晚九时亦攻入城内。清军大都溃逃，但仍有部分爱国清军与义和团坚守不退，与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在北京保卫战中，共毙伤侵略军四百余人，清军也有六百四十多人战死。

八月十五日凌晨，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载澜驰入宫内告急。西太后闻讯惊骇至极，急忙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太监李莲英、大阿哥等从西华门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出逃。随从仅有载漪、载澜、奕劻、载勋、刚毅、赵舒翘、英年等少数王公大臣。临行前，慈禧太后命太监将珍妃“推堕井死。”他们经怀来、宣化、大同，奔太原，后逃亡西安。自怀来令吴永以“馈献”博太后喜而升官之后，“所过郡县括民财，治供具，惟恐不及矣。贻遗左右，动至千金，……”随扈的武卫军更是沿途肆意抢掠，甚至公然把大批妇女掠入军中，扰害人民，不可言状。

八国联军在北京仿效天津的殖民地统治办法，各国划分地界，实行军事占领。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占管，以西归美国占管；前门内的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归英国占管；以西至西单牌楼，归美国占管；崇文门以东归法国占管；宣武门以西归英国占管；东单牌楼至东四牌楼归俄国占管，东华门外归意大利占管，西华门外归法国占管；西单牌楼至西四牌楼归意大利占管，东四牌楼以北归日本占管。外城大部分归美国占管，一部分归德国占管。联军还在北京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进行殖民统治。

（摘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材料四　八国联军暴行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国之手。此外该国更于前此一日，已将位在城北十五基罗米突〔约合中国三十里〕遥远之夏宫〔按即颐和园〕占据。

有所谓“禁城”者，系一种高墙围绕之长方形，位在皇都中央，为前此皇帝所居。因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只准各国军队得有通过该城之权而已。四门均被占守；直至今日，三门犹为日本所占，一门则为美国所占。余以为此种议决，实属极为有损之举，而且此中主使之人，似为〔俄国公使〕格尔思先生。此种规定谨能使华人得着联军虚弱之印象而已，余将设法使此种规定加以废除。因城内连日战争之故，所有全体市区，多被毁坏，但该城大部分，却尚能保存。……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于阳历 8 月 14 日至 16 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 8 月 16 日至 18 日（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为止。至于德国军队则系 8 月 18 日及 21 日始到北京云云。——译者按：此段文字，系译自瓦氏笔记之旁批，当为印行该书之人所添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关于夏宫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之事，余从前曾向陛下报告。倘若当初报告之中，余曾提及俄国曾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物亦复运往旅顺而去云云，则现在余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上确曾预将各物准备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少将 Hoepfner 之严重抗议，业已将该物等交与 Hoepfner，现在存于德国使馆之中。当俄军撤去〔按俄军系自 8 月 31 日（八月初七日）起，由北京开始撤退。〕以后，英国续将夏宫占据，并详细查点宫中一切余存之物。〔按瓦氏 10 月 19 日（闰八月二十六日）之日记有云："各处买卖所抢之物，异常热闹。在各物之中，有（德国）金钢石黑鹰章一，现已落在第四人手中，最初系为俄人所得。"〕

至于冬宫，则系由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当该宫在太后已逃及俄军未占之数日间，其中各物或曾由仆役偷取，亦为事实之可能者，但其数当不甚大。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宫内。但俄国却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不过随时皆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而已。所有宫中一部分建筑物，曾贴有印鉴封锁者，每值此种参观之时，则暂行撕去。……

就宫内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除少数例外，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至于皇室所居之房子——因其狭小之故，不应以"宫"字名之。——未尝受着损害。反之，其余附属宫中之各处房屋，如戏园、庙宇、吏室、仓库等等之曾经封锁者，均被横加劈毁，所有其中存物，凡认为没有价值者，皆抛置地下以及院落之内。……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摘自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东南互保

背景介绍

随着清廷"宣战"上谕的颁布，统治集团在朝廷上的激烈争吵表面上趋于平息，但这不是他们认识上取得了一致，而是慈禧太后专横独断的结果。以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光绪皇帝、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势力，被西太后强行压制下去；而盲目仇外、并企图把义和团运动引入歧途的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封建顽固派，却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暂时得势了，他们控制了朝廷。

但是，前者得到多数地方督抚们的坚决支持，而后者却除了直隶、山西等极少数督抚支持外，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因此，端、刚顽固派集团控制朝廷后，必然引起地方与中央（清廷）的公开对抗与分裂。在地方督抚大员中，除袁世凯之外，地处要津、实力雄厚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公开反对端、刚顽固集团的声势宣赫的地方实力派。当义和团运动在直隶高涨时，张之洞曾于五月三十一日电奏总署说："义和团'断非良民'、'法所当诛'；刘坤一也在六月八日致电总署说："应一意主剿，痛剿一二股则余股自灭"。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光绪皇帝和许景澄等一派人的主剿意见，也强烈地影响着西太后的最后决策。西太后长时期举棋不定，不敢明确地作出"招抚"的决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顾忌这帮强硬的地方实力派的反对。

当西摩尔率领联军北犯后，刘、张鉴于形势的严重恶化，曾在六月十五日会衔致电总署，要求"速剿"义和团以杜外人口实，"转危为安"。六月二十日，刘、张联合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湖北巡抚于荫霖、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等会衔致电总署和荣禄，要求：（一）"速剿"义和团；（二）饬令驻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三）"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各国"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这两次电奏，实际上是地方督抚联合向端、刚顽固势力的政治示威，也是对西太后"招抚"政策的公开对抗。可见，在"宣战"之前，南方督抚（实际上山东的袁世凯、河南的裕长、陕西的端方等北方巡抚也包括在内）已公开和清廷相对立了。清廷颁布"宣战"上谕后，曾饬令各省督抚

将义务"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除少数督抚外却很少有人奉行。刘坤一、张之洞还以"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为词，抗旨不遵，而谋求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互相谅解"，以维护东南现状。事实上，这种与虎谋皮的妥协活动，在"宣战"之前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材料：

· 东南互保及其章程

材料　东南互保及其章程

早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四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仑（一译霍必澜）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萨利斯布里（一译索尔兹伯里）侯爵，催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他建议"派遣一艘大军舰前往南京，并向总督保证，他在维护秩序时将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支持。"第二天，萨利斯布里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华仑的建议，并说："我们正与海军部进行联系，派遣一艘军舰前往南京，并向驻南京和汉口的总督送交您所建议的函件。"六月十六日，英国海军部命令上海的海军将领，派"仙女"号开往南京；派"红雀"号开往汉口；"无畏"号由香港驶往吴淞。其目的是要加强控制长江流域，切实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英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但是，刘、张两人对英舰驶入长江问题的看法上一度发生分歧。刘坤一表示"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技持"，"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什么都肯做。"张之洞则认为，目前局势复杂，"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因此反对任何军舰驶入长江。

恰在此时，长江流域的形势紧张、复杂起来：六月十七日，有俄国兵队一百五十人，乘俄国运茶船潜入武汉江面，企图登岸以建立插足于长江流域的军事据点。但"为英人所阻，故同"。英国政府深恐俄国势力打入它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遂于六月十七日再次令其领事同张之洞交涉，"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但被张之洞婉言谢绝。张答称："鄂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岘帅（坤一）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若臣他国占先，吴淞外英舰甚多，英舰不进，他国不敢，似以此镇静密防，最为上策，我于刘岘帅，皆极愿与英联络等语。"张之洞将这段答话函告了刘坤一，刘则接受了张之洞的劝告，两人一致"反对英国海军部队方面的任何鲁莽的示威。"

当时正在上海的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也发现英人声称"保护"，实则要出兵加强对长江的控制。因此，他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致电刘坤一说："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他建议"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刘在当天立即复电盛宣怀，表示同意。并说："就在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刘、张两总督还一再向英国领事表示，他们有能力镇压人民的反抗，切实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愿意和英国谋求妥协之策。英国也急需得到刘、张的谅解，确保英国的权益。于是，由盛宣怀在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往返交涉，开始了所谓"东南互保"的密谋活动。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亦闻风而动，各自为了本国的利益也都插手进来了。

但是，这项活动刚刚开始，清廷"宣战"的上谕发布了。盛宣怀深怕"互保"夭折，便即刻"飞饬各电局，但密呈督抚勿声张"；六月二十四日分别致电粤督李鸿章和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建议他们"万勿声张"，"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可见，盛宣怀对局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互保"的内容，均与张之洞同英领事开始交涉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刘坤一经过一番犹豫后表示同意，张之洞则因与他的本意相吻合便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让盛宣怀与各领事订立"互保"条约，并派道员陶森甲为鄂方代表，赴沪参加谈判。李鸿章复电表示支持，并在复电中说："二十五日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于是，盛宣怀会同上海道余联沅在六月二十六日于上海会审公廨和各国领事举行会议，协议制订了由盛宣怀草拟的《东南保护约款》，又称《中外互保章程》，共九款：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任）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

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以上事实说明，不论是张之洞同英领事的交涉，或是刘、张、盛三人之间的往返电报，以及互保条约的全文，都贯穿着严防人民反抗和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意图。但从"互保章程"的第四、五、六、八等条款的规定来看，也确实束约着外国兵轮、水手、教士和商人不得肆意侵扰。可见，"东南互保"是中外反动势力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前提下，互相妥协的产物。

《中外互保章程》草约出笼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立即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说明"互保"本是"委曲求全之策"，"似可一律照办"，以顾全大局。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复电刘坤一，表示全力支持，"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袁世凯表示要"仿照"刘、张实行"互保"；浙江巡抚刘树棠表示参加"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表示"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并于七月十四日与俄、英、美、日等六国按照《东南保护章程》，订立《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切实"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侵害"。接着，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也宣布支持和赞同"互保"。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中外互保章程》并未正式签订，但有关条款在实际中都得到了执行。刘坤一、张之洞命令兵勇日夜巡逻，严防义和团入境；并广泛张贴"互保"告示，声称："如有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及聚众扰及租界和教堂者"，要"严密查拿"，"立行痛剿"，严重地阻止和破坏了义和团在江南地区的发展。

（摘自《有关东南互保资料》）

自立军事件

背景介绍

周旋于革命与保皇两派之间的唐才常，于一八九九年夏秋之间，在日本东京与梁启超、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人开会商拟在长江流域发动会党武装起义的计划。拟派与会党关系密切的林圭回国与各会党联络。同行者有秦力山、蔡松坡等人。"临行，孙中山并指示机宜"。唐才常、林圭先至上海，并于一九〇〇年七月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对外则以日人田野橘次的名义组织"东文学社"为掩护"，唐才常为正气会制订章二十余条，其序文中有"非我种族，其心必异"及"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自相矛盾的词句，遭到毕永年、章太炎的强烈反对。毕永年劝唐断绝与康有为的关系；唐才常则因利用保皇会款密谋起义，坚不肯从。两人辩论一日夜，毕永年失望而去。随后，唐才常将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其骨干力量以时务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和国内青年学生居多。又派林圭在汉口秘密设立军事机关，聚集会党力量。自立会刊布会章，"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自立会员称"会友"，并仿照会党颁发票布的办法，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作为会员凭证。

一九〇〇年七月间，唐才常认为"自立会"的名称"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便以挽救时局，约请维新志士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到会者有文廷式、容闳、严复、章太炎、沈荩等数百人，"公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沈荩为干事，声势日炽，为清吏所侧目。""中国国会"宣布三条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使光绪帝复辟。他还借助兴中会的帮助去联络长江流域的数十万会党群众，筹划武装"勤王"。他们打出"讨贼勤王"的旗号，声言要"清君侧"以"谢万国"。他们把镇压义和团摆在首位，企图以此博得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达到拥戴光绪复位的目的。

唐才常洞悉在长江流域活动的数十万会党成员中，"各以一票为凭信，其中要义即为'扫清灭洋'四字"。这使他"筹思多日，谓此'灭洋'二字足亡中国而有余，一旦国中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矣。如是不但国亡，种亦且灭乎。于是创自立会富有票名义，乃得将旧有之票一概收而毁之，其'扫清灭洋'四字，改为'救民保国'四字。且布告各处，谆谆告诫第一要义，即为不可伤害洋人"。因此，"当时北方义和团蜂拥而起杀他国之领事、参赞，全国响应矣。而长江上下游会党中人不下数十万，所以安守不发，而又不伤一外人者，皆佛尘(唐才常之号)一人之力焉。盖因各会党之宗旨既已改易，一切听自立会之指挥故也。"

唐才常将自立军分为七军，自任诸军督办，总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决定于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各路同时起兵"勤王"。后因经费缺乏(六十万美元的巨款被康、梁私吞)而起兵一再延期。八月二十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驻汉口领事把唐才常等人逮捕，二十二日处死。自立军"勤王"的活动完全破灭。他们"勤王"的目的没有达到却利用了会党势力有效地排斥和阻止了义和团向江南地区发展势力，在抵制义和团运动方面起到了封建统治者所起不到的作用。

材料：

· 自立会始末记

材料　自立会始末记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被戮，康南海先生有为与梁任公先生启超，先后出亡日本，广结志士，谋再起。

先是，湘人唐才常、林圭与嗣同有旧谊。闻嗣同冤死，用是颇思复仇，遂以革命实行家自任。唐、林先后由日返国，组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又创自立军，以推翻清室为职志。康、梁之主张虽与唐、林有所不同，然虑势分益孤，遂与合作。才常更联合各党会，开富有堂，举康先生为正龙头，梁启超副之，谋先纵火于长沙，沿江而下，以图大举。时为湘中旧党所扼，终不果行。庚子七月，复谋在汉首义，事泄，为鄂张之洞侦知，派兵围捕，唐、林诸志士就义者二十余人，世论惜之。

唐才常，浏阳人。与谭嗣同、毕永年同佐湘抚陈宝箴，办时务学堂，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谭嗣同死难，学堂亦被封。唐才常愤甚，思有以颠覆满清。时毕永年已东渡，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以毕永年熟于会党，遂被重视。自是，毕永年凡数度往来于湘省，联络哥老会。闻唐才常将赴日本，遂介见孙中山。唐才常之东渡，意在与康先生暨梁启超等相见，有所计划。时康先生方在海外大倡保皇会，建议募款，招兵勤王，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而唐才常亦思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虽与中山相见，不便与兴中会积极合作，只订殊途同归之约。良以光复与勤王本质不同，唐才常以周旋于革命与保皇两派之间，不得不兼筹并顾，为敷衍之计。因是为毕永年及章炳麟所反对，遂相率脱离。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夏秋之间，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秦鼎彝（力山）、吴禄贞等会于日本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藉以夺取武汉以为基地；乃推林圭为首，回国与各会党联系，因林圭与哥老会中人多所素习，易于结纳故也。同行者有秦鼎彝、蔡艮寅（松坡）、田邦璇、傅慈祥、黎科、郑保晟、蔡承煜等人。梁启超、沈翔云约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祖筵于红叶馆。临行，孙中山并指示机宜。此以唐、林为首之革命机构之所胚胎也。唐、林先至上海，以日人田野橘次之名义，设东文学社，以为掩蔽；又成立正气会，暗中进行革命事业。

唐才常旋将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继以会名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乃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以挽救时局为名，约请上海维新志士开国会于张园。到会者有文廷式、容闳、严复、章炳麟、吴葆初、沈荩、龙泽厚等数百人，公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沈荩为干事，声势日炽，为清吏所侧目。又派林圭在汉口设立军事机关；更仿会党颁布票布办法，散放富有票。分地区设立招待所：在汉口曰宾贤公，在襄阳曰庆贤公，在沙市曰制贤公，在岳州曰益贤公，在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

先是，秦鼎彝、林圭说孙道毅担任池州大通等地发难之责。孙道毅固安徽抚署卫队管带，暗中进行工作，不致使官方生疑，且密助军机，得力甚多，水师营弁亦多来投效。又由皖省哥老会头目符焕章在大通、芜湖、太平、裕溪、和岳〔悦〕州各地散放富有票，招人入会。大通居民附从者络绎不绝。秦鼎彝本定于庚子七月十五日举义，不意为大通保甲局各地戒严，秦鼎彝知事已泄，遂决心密令全市党人于十五日揭竿起事，以大炮轰督销局，纵火围攻，蜂拥冲入据之。王之春所派管带傅永贵见党人势盛，不敢渡江。复派省防营管带邱显荣及芜湖防营管带李本钦率兵会攻，仍不得力。被党会大军以大炮击沉炮艇八艘，小火轮一艘。十七日，芜湖道吴某续派衡字军三营应援，清军势顿加。秦鼎彝挥兵搏斗，率（卒）以兵力不敌，余众遁向九龙山一路而去，秦鼎彝仅以身免。

唐才常、林圭计划，分自立军为七军：以大通为前军，秦鼎彝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璇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沈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统之；另置“总会龙军”及“先锋军”。唐自为诸军督办，分途招募兵勇数十营。上游至于宜昌，下游至于武穴，南至湖北之荆州，北至鄂北之襄阳、随州、当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通山、监利，皆其势力所及。自毕永年脱离后，哥老会众亦多松懈，渐趋于分散之势，虽有唐才常、林圭之极力联络，亦不复如初时之团结。此其失败之主因也。

唐才常、林圭等所发富有票，藉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綦伙，势力日渐膨胀。林圭认为机不可失，促唐才常赴汉口谋速发难。唐才常至汉时，值北方义和团事起，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以）北方无政府为词，藉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犹疑莫决，同时对会党之运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压抑，似非全无好意者。唐才常多方设法促张之洞自决，张无所表示。唐才常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之洞闻而深根之，乃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适七月二十七日，汉口泉陆巷某剃发匠，侦悉同街唐姓形迹可疑，遽向都司陈告变。陈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始悉党人有大举动。张之洞闻报，即照会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凌晨往围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林圭、黎科等。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讯，唐供词谓：“由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

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余人群呼速杀。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浏〔滋〕阳湖畔加害。一时骈首就义者达十一人。

沈荩，长沙人，自立军右军统领，所担任者为新堤发难之责。闻汉口失败，思有以拯之，急率所部发难。湖北之崇阳、监利，湖南之临湘、沅州、湘潭，纷纷响应。时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师遂溃。沈荩遁武昌，旋复北走至京，欲在北京有所活动。居二年，因在报上揭发清廷与俄人私订密约事，为李连英、庆宽告密被逮，以非刑杖死狱中，中外哗然。时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八日也。

自唐才常、沈荩先后为满清虏廷所杀，于是自立会、哥老会党徒深恨清廷之暴，遂结不解之仇，结束前期维新勤王之旧局面，开启后期华兴会革命运动之新局面。盖自立会乃承谭嗣同之维新勤王系统，自唐、沈之死，乃转入种族革命之新运动，即华兴会运动也。

（摘自《自立会史料集》）

历史内幕

杉山彬事件

袁世凯任山东省抚台以来，对义和拳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毓贤的态度，实行严酷的剿杀。短短几个月，数万人被害，致令人人自危，齐鲁大地一片腥风血雨。山东百姓切齿痛骂，“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部分义和拳民被迫北上直隶、湖北、京畿，袭扰当地，焚掠教堂，京师也为之震动。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署质询督剿事宜，声言如清政府无力弹压，各国可派兵协助入剿；大沽口外连日来并有多艘英、日、德等国的军舰游弋示警，英国公使连续照会总署催作答复，慈禧只好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力主招抚义和拳众。光绪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始终浓眉紧锁，缄口不语。慈禧的心情则很矛盾。一方面她很想利用义和拳煞煞外国的威风，出出她的怨气，另一方面她对义和拳倒底心中无数，只在宫里由李连英帮着设坛摆法，讲经布道，练了几天气功，对义和拳缺乏除传闻、传奇、传说之外的足够的了解。她考虑了半天，终于还是决定由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赴义和拳营，探听虚实。

五月，刚毅一行到涿州，很快就与义和拳民进行了接触，并与义和拳首领打成一片，亲自参加拳教的祭典仪式，跪香礼拜，心悦诚服。

几天后，赵舒翘先期回京复命。慈禧当即传见。在朝堂上，赵舒翘详述他与刚毅一路所见，极言义和拳忠义报国，神法无边，并津津乐道地描述所见的奇人异士，祥瑞附会，有鼻有眼。慈禧听得将信将疑，虽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开始授意载漪、载勋加紧招抚义和拳民，为防事变预做了准备。

载漪职掌神虎营兵旅；载勋为步军统领，两人都是近支王公。既获慈禧授意，两人欣然照办，半个月之内，京师里汇集了各地涌入的义和拳民几万人。载勋并通令，凡拳民入京赴庄王府挂号，即为义民。官军与拳民一改过去互相仇杀的局面，相与出入京师烟馆、春巷和酒馆，成为京师的一大奇观。部分拳民头戴醒目的红巾，腰佩短刀，招摇过市，并开始有失控的举动，打着灭洋的旗号，滋扰使馆和信洋教的人的民宅，甚至参与官军杀掠之事，昼夜喧嚣，民生难安。

驻京各外国公使有感于京师秩序大乱，教民人人自危，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始终没有结果，遂各自从天津调来军队，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东、西巷口设卡，与拳民和官军对峙，形势一触即发。慈禧以总署大臣廖寿恒办事不果断为名，免去他在总署行走，而以载漪接管总署，启秀、溥兴、那桐为行走，摆开了与洋人决裂的阵式。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出使馆区迎接由天津入京的日本卫队，被董福祥部武卫后军拦截。董福祥归荣禄节制，本是奉命在护卫使馆的外国军队和拳民之间隔为屏障的，荣禄曾多次严令戒饬，战衅不可轻开，但实际上董福祥早已与载漪暗中结纳，董福祥也慨然以灭洋为己任。

杉山彬过卡，董军一部卒拉开枪栓，大声喝问：“什么人？”

杉山彬打着个日本旗，掀开轿帘走下来，拱手作揖说：“鄙人是日本使馆书记官。”

董军小校斥声说：“书记官怎么敢坐四品轩轿？”上前一把揪住杉山彬的衣领。杉山知道官兵不可理喻，只好陪笑说：“出来得匆忙，未及细辨，是鄙人的过失，请让鄙人面见大帅当面谢罪。”

董军小校翻了翻眼：“你还不配。”说着挺刃拔刀。

杉山摆手后退，急声道：“请官校不要动怒，将来一定请贵军大帅至敝国使馆，敝公使会当面恕罪……”

话未说完，董部营兵已围聚上来，杉山告饶不及，当即被砍杀。事发后，日本公使忍气吞声请把尸体运入使馆成殓，董军不许，互经双方扯皮，这才答应由日方派人把

尸体运入。当天载漪亲自走访董福祥，见面高竖拇指，对董福祥说："星伍真是条好汉！"董福祥心里悬着块石头，听载漪这么说，才落了地。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克林德事件

由于中外矛盾的加剧，到6月上旬导致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态度、政策向更加对立的方向转化。一方面，列强驻华公使们提出的联合武装侵华政策得到了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并组织西摩联军向北京进犯。另一方面，西太后的态度急速向主抚派倾斜，主抚派的行动则达到了默许义和团存在的程度。清政府的"宽容"态度促使义和团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增强了部分清军的抗敌意识。义和团不仅拆毁铁路、成功地阻击了西摩联军，而且成群结队地涌入京师。6月9日，北京西郊一外人修建的跑马场被烧。10日，京津间电报中断，西山英国公使馆别墅遭焚。援军受阻、形势恶化的势态，使京内列强公使的恼怒之情大为增加。他们撕下道貌岸然的伪装，亲自赤膊上阵，采取极端敌对的手段，把早已超越自卫性质的肆虐挑衅行为推向更高阶段。

在列强公使的指挥和带领下，各国"使馆卫队"横行京都街衢闾巷，血腥屠杀中国军民。其罪恶行径有的是在使馆区内干的，而更大量的则远远超越了使馆区的范围。6月12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使馆区马路上发现一位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的人仅仅从其装束上产生怀疑，便大打出手，擒拿交付"卫队"。同日，一伙"使馆卫队"的兵弁闯入王府井大街，发现一小庙中有义和团民在练拳习武，便破门而进，准备屠杀。由于庙中的团民在混乱中迅速转移，才幸免于难。13日，克林德又带领德军在美国使馆门前拦击两位过路团民，并将其中一位抓进使馆。附近的群众闻讯赶来营救，遭到美国自动机关枪的连续扫射。这件事"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民已表现出来的激昂情绪"，城内各处团民于当日下午"又集合起来"，冲向美国使馆，被美国"使馆卫队"用枪和刺刀"驱散"。是夜，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民经崇文门涌进内城，经过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使馆时，分别遭到两国"使馆卫队"的枪击。子弹密集，"如骤雨之至"。奥国侵略军并向王府井大街的密集人群立炮轰击，"一分钟间，约发三百弹"，炮弹"所到之处，爆烈之音，如烈火之着干叶，续续不已，"死伤民众无法计算。随后，列强又组织"使馆卫队"追杀团民，"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14日，比利时公使姚士登也向团民开枪，在东单牌楼以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一队义和团民向东交民巷进发，"为西兵枪毙八人"。下午，德使克林德又率领"使馆卫队"外出寻衅，行于内城之上，发现下面沙地上有团民习武，"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打死"约二十人"。同日，联军"使馆卫队"得知团民正在某庙内审讯教民，便派兵赶去"围而捉之"，此处团民"无一得脱"，被杀死者"至少有三十人"。15日，联军"使馆卫队"，在东交民巷逮捕4名过路团民，"当即以枪轰毙"。法国侵略军在宣武门内城根一带"开枪打死骡马，看热闹之人及行路官员车，伤者甚重。"美国上校迈猷率军在东单帅府园包围一大庙，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是夜，比国使馆开放炸炮，炸死义和团民六七十人。16日，联军在一座庙宇中枪毙义和团民达40人以上。英国外交官朴笛南姆·威尔与一个法兵在东堂附近共同刺杀一名团民，竟坦然宣称："此等杀人小事"根本无人顾及。

列强的"使馆卫队"，不仅肆意屠杀义和团民和北京市民，甚至枪杀京内清军。他们对同情、支持义和团的清军非常不满，通常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随意枪杀和无故打伤执行正常勤务的清军。为了限制义和团进城，他们严令守城清军关闭城门或抢走城门的钥匙，"稍有不从，即以枪向之"。

从6月10日西摩联军从天津向北京侵犯开始到19日清政府决定宣战之前，掌握清廷实权的西太后在战、和问题上一直动摇不定。虽然在主战派的影响下做了一些抗侮御敌的安排，但是通过外交途径乞求列强息兵的妥协措施从未中断，先后派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王文韶等主和派大臣4次前往使馆，劝阻免增"使馆卫队"，并谕令荣禄派得力部队保护使馆。然而，列强公使们坚决拒绝清政府不要增派部队进京的乞求，并多次书面抗议和口头警告清政府对义和团镇压不力，对清军管束不严，扬言"如果中国军队也被发现从事战斗，那就将是另一回事了。"增兵扩大侵略是列强公使们威逼清政府的明显特点。

各国侵略者不仅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对中国官员进行随意侮辱。随着中外矛盾的加剧和列强决定亲自动手镇压义和团格局的形成，各国公使不仅对与他们进行接触的中国官员的态度极其傲慢，而且对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主和派代表人物袁昶、许景澄、立山等人的建议也一概拒绝。至于对支持义和团的排外大臣则更是百般仇恨，咒骂他们"厚颜无耻"、"臭名昭著"，甚至想把身居高位的大学士徐桐"执以为质"，必要时予以枪杀，"使中国政府惊觉，知将来报复之极速也"。后因列强的意见不一，虽未将徐桐拘捕，却对其人格和自由施以侮辱和干涉。徐桐的住宅位于东交民巷入东巷口不远处，本来可以自由通行，但到6月中旬，列强"使馆卫队"不准其出入，"并派人看守其家"。后来徐桐在法国使馆内办理了通行证，但"使馆卫队"仍然鸣枪阻行，让乘轿通行的徐桐出轿、坐地，并作为"战争之俘虏"押送使馆。徐桐实在不堪忍受其刁难和侮辱，被迫搬出东交民巷。

当时使馆区设在东交民巷一带。该使馆区东起哈德门(即崇文门),西至正阳门(即前门),南到内城墙,北邻东长安街。其间除了各国驻华公使品馆外,还有海关、邮局、银行、外国俱乐部以及中国的一些官宅、民房和店铺。该区以御河为界可分为东、西两个小区。东小区的东北角是奥匈帝国使馆、东部是意大利使馆,住西分别是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等使馆和肃王府。西小区的最西端是荷兰使馆,往东是华俄道胜银行和美国使馆,转北依次是俄国使馆、英国使馆和清政府的翰林院。各国"使馆卫队"在四出肆虐的同时,又在使馆区筑垒备战。这件事情从6月13日开始时是由奥国"岑塔号"巡洋舰舰长托曼中校任总指挥,到6月20日改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侵略者们强占了肃王府和翰林院,将整个使馆区封锁起来,不准中国军民通行。当时,清政府为了保证使馆的安全,征得了公使们的同意拨派清军保护使馆。列强们为了防止义和团逼近使馆,只允许清军的岗哨设在自己岗哨的外围,并要相隔若干距离。列强的岗哨分段把守,断绝路口交通,将使馆区宣布为"禁区",并在四周张贴"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的告示。因"违反"禁令而饮弹身亡的义和团和北京居民不乏其人,甚至连奉命去保护使馆的清军也惨遭杀害。

列强在京内肆虐挑衅行为的升级,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强烈愤怒和反击。从6月12日起,义和团开始焚烧外国教堂和部分洋行。从15日下午开始,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又向樊国梁所主持的西什库教堂发动了攻击。16日,义和团焚毁前门大街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义和团此次大规模"焚洋",确系因侵略者之暴行所激起,此点即一贯力主剿团之袁昶,亦有明确说明。袁昶在致奕劻的一封书信中说,"十七日,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畔。不意德克使闻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

应当指出,在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之前,中国军民对京内列强的疯狂挑衅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反击,但并没有把目标指向使馆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虽然对战、和问题还拿不定主意,但对涌进京师的义和团仍采取压制、约束的政策,对使馆则一直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和措施。至于克林德被杀以及清政府下令攻打那都是大沽炮台陷落之后的事情了。

6月19日,当慈禧太后接到列强对大沽炮台发出使馆区的最后通牒后,才决定对外宣战并攻打使馆。当天下午3时,总理衙门奉命照会各国公使,指出八国联军强令中国交出大沽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为了保护使臣及其眷属安全起见,请于24小时之内由清军护送前往天津,"以免疏虞"。当晚,九国公使联名复函总署,请求展期赴津,并要求于次日上午9点答复。20日,总署照复,"稍缓日期,尚可通融,现团匪塞满街市,止各使勿来署。"但一贯盛气凌人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尚未见到总署复照并拒绝别国公使劝阻的前提下,单独与其中文秘书柯达士径往总署抗议。当克林德行经东单牌楼时,适值虎神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队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亟让在北首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敌弹,即发一枪",击毙克林德。当克林德被杀的消息传到东交民巷后,各国公使和"使馆卫队"纷纷出来借机寻衅。他们把克林德的死亡归咎于清政府的指示和怂恿,并以赴津路上安全无保障为由拒绝出京。当天(20日)下午,义和团和清军奉命开始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列强的"先礼后兵"

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对京、直大地漫天燃烧的反帝怒火,除继续威逼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外,开始准备亲自出马,进行武装干涉。

帝国主义要武装镇压义和团的叫嚣,虽然早在义和团兴起不久就已开始,但那时主要用来作为恐吓和要挟清政府的手段。它正式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是各国驻华公使在5月20日召开的公使团会议。

法国是在中国传教势力最大的国家,当时受义和团的直接冲击最厉害,并且法国担负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因此,对武装干涉叫得最凶。5月17日,法国公使毕盛向公使们报告,说义和团在离北京90英里保定府附近的某处,毁坏了3个村庄,杀死61名天主教徒。5月19日,担任列强驻华公使首席代表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把法国主教樊国梁刚刚写给本国公使毕盛的一封信在公使中传阅。在这封信中,樊国梁叫嚷:局势已变得日益严重和危险。北京四周已受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不过是一种掩饰,义和团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这种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樊国梁在中国"传教"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交游广博,信息灵通。因此,这封信给毕盛以很大的震动,对列强动议武装干涉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1900年5月20日,葛络干召集有英、法、德、意、美、俄、奥、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日本等11国使节,他建议直接调兵前来保护使馆和教堂,并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对义和团采取有力的屠杀政策。法国公使毕盛煽动各国立即调兵前来直接镇压义和团。英国公使窦纳乐提出更为狡猾的"先礼后兵"的方案,即各国联合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让清政府去镇压义和团,如果清政府不同意这样做,再行大兵压境。经过一翻讨论,各国公使同意了窦纳

乐的意见，拟定了联合照会，给清政府5天期限，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便提请各国政府派兵来华。

总理衙门接到列强的联合照会以后十分惊慌，在限期的最后一天答复公使说，他们正在奏请朝廷发布一道更严厉的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与各国没有分歧。列强公使对这个答复很不满意，纷纷指责清政府既没有把马上可能发布的上谕告诉他们，又没有讲清楚自己在过去所采取的措施中有哪些不足之处，应承担哪些责任？以后各国公使天天去总理衙门大吵大闹，慈禧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屈膝退让，同意各国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每国所调军队不得超过30名，而且一旦恢复平静之后立即撤退。

保护各国使馆的安全，这本是驻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军队根本无权调兵自行保护，更何况各国驻华使馆此时并未受到冲击。但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主权早在1898年9月底就已遭到破坏。那时正值戊戌维新刚刚失败，列强借口驻京清军(特别是驻扎在南苑的董福祥的甘军)曾与他们发生过冲突，逼迫清政府允许他们调派一支海军卫队(每国不超过30人)前来保护使馆，但时间长了，各使馆卫队的人数已逐渐减少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如今，列强又要求调遣大批军队进京"保卫使馆"，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破坏，也是对清政府的极大蔑视。

各国公使根本没有理会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于是，由英、俄、美、日、法、意等国组成的356名侵略军，乘坐从天津开出的专车在5月31日下午7时左右侵入北京。其中有英国军官3名，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兵71名；"均随带枪械"。6月2日，50名德国侵略军和30名奥地利侵略军也随后侵入北京。开进北京的这八国军队，实际上就是八国联军的先遣队。

此后数日，列强军队不断来华，集中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队已达2千多人。其中英军最多，将近占各国军队总数的一半。到6月2日，麇集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共达25艘，其中英、德、日各3艘，美、法、意各2艘，沙俄为9艘。同日，奥匈帝国的："岑塔"号巡洋舰也由日本佐世保港驶抵大沽。德国公使克林德毫不隐讳地声称："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端。"这样，八国联军与义和团的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使馆卫队"侵入北京

依据国际公法和惯例，保护使馆的安全，这本是驻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军队调兵自卫是对驻在国主权的侵犯。但是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主权早在建立使馆之初就遭到破坏。当列强根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在北京设立使馆时，每个使馆都有卫队。但是时间长了，这些卫队减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后来，每当中国政局动荡时，他们就增派使馆卫队。最后一次是1898年9月底，那时正值戊戌维新刚刚失败，列强借口驻京清军(特别是驻扎在南苑的董福祥的甘军)曾与他们发生冲突，迫使清政府允许他们调派一支海军卫队(每国不超过30人)前来保护使馆，日久之后各使馆卫队的人数已逐渐减少。如今，列强又要求调遣大批军队进京"保护使馆"，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再次破坏，也是对清政府的极大蔑视。

5月29日，列强开始由大沽向天津派遣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麦克加拉上校带领一名军官和62名水兵在大沽登陆，霍尔上校、迈猷上校分别带领24和28陆战队士兵，在塘沽加入麦克加拉领导的部队。由于中国铁路上的官员没得到上级的指示是不准许把武装人员运往天津的，因此，除麦克加拉乘火车前去外，这支部队只得乘船。他们于下午10点30分左右到达天津，除了25名已驻防天津数月之久的英国海军陆战队以外，他们是到达天津外国租界的第一批侵略军。英国于30日早晨派遣25名海军陆战队驶往天津，下午4点，海力德上校又带领50名海军陆战队登轮赴津。与此同时，还命令25名水兵准备在第二天早晨4点登陆。但是，到了9点30分，一艘拖轮带来一封窦纳乐的电报，说"英国人的生命财产正在危险中，进驻北京的先头部队不得少于500人"。于是，在11点30分，又凑集5名军官带领75名水兵启程，在深夜2点钟，他们趁月色通过大沽炮台。随后，日、意、俄、法等国也都派出陆战队陆续赶赴天津。

同一天(29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代表各国领事致函直隶总督裕禄，说英、法、德、俄、美、意、日驻京公使鉴于目前的形势，共同议定，各抽调兵丁百名登岸，遣赴北京。为此，各领事请速饬所属，协助兵丁登岸并备火车运送赴京。清政府大为惊恐，不敢贸然承诺。30日，总理衙门在答复列强外交团首领西班牙公使的照会中再一次申述了对列强的保护措施和决心，让他们稍缓几日调兵。直隶总督裕禄也秉旨传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

各国公使很不满意总理衙门的答复，于当日中午又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英国公使窦纳乐指出，来自清军的危险比来自义和拳的危险更为严重。法国公使毕盛证实了窦纳乐的看法，他说，在前一天一伙法国人由长辛店来京，该车站于27日被焚。中国士兵被派去保护他们，但直到法国人离去之后他们才露面，当时有人看见他们放火烧毁欧洲人的房屋。他还说，正是这些士兵，即董福祥的甘军，1898年危害外交团安全的也是他们。各国公使一

致同意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的主张：如果总理衙门坚持反对意见，则必须使用武力调来特遣部队。英、俄、法、美四国公使被委派为代表团，会后即赴总理衙门，正式宣布外交团的意图。他们威胁清政府说：列强调兵进京的决心已定，如果中国政府善意地答应，外军只留驻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如果坚持反对，那么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他们竟勒令总理衙门必须于当晚把答应他们调兵进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

也就是在30日这一天，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又亲自跑到直隶总督衙门胁迫裕禄，声言："此事系各国公使主意已定，万无改移，各兵今日均已到津，无论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若火车不载，亦自行起早前往。"

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西太后屈膝退让。总理衙门受命于31日黎明前致函英、俄、美、法四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但指出各国所调军队人员必须以1898年的数目（30名）为限，而且一旦恢复平静之后即应撤退；同日上午，总理衙门电告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把同情义和团并声言要阻击侵略军进京的清军，从北京车站附近撤走，以防冲突。

在接到总理衙门的信后，各国公使立刻开会。他们根本没有理会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原则上决定把在天津已准备就绪的军队立即开进北京。实际上为了平衡兵力，规定各国最高限额为75人。31日下午7时左右，列强的第一批"使馆卫队"由天津乘火车气热汹汹地冲入北京。其中英国军官3名，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兵24日；法国军官3名，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兵71名。共计356名。"均随带枪械"。其中英军带1挺"努登费尔"式机松；美军带1挺"柯尔特"式枪；意军带1门一磅炮。这批侵略军是由沙俄驻天津军事代表沃加克上校带领的。但他在完成送兵任务后，立即又返回了天津。50名德国侵略军和30名奥匈侵略军迟到了，他们于6月1日和3日援例侵入北京。6月6日，日军又增派30名入京。各国仍不断增兵，至6月8日，进京的侵略军已将近1000人。这一批"使馆卫队"实际上就是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

此后数日，列强军队不断来华，集中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队已达2000多人。其中英军最多，将近占各国军队总数的50%。到6月2日，麇集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共达25艘，其中英、德、日各三艘，美、法、意各2艘，沙俄为9艘。同日，奥匈帝国的"岑塔"号巡洋舰也由日本佐世保港驻抵大沽。

沙俄军舰遥领首位，一方面是利用了占有旅顺口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早有准备。还在5月中旬，沙俄就开始把在国内各军区征调的兵力，分别从黑海的敖德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运往旅顺口。所以，当俄国公使于5月28日晚电请沙俄驻旅顺口的太平洋海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迅速派兵进京时，以"大西索"号为首的6艘军舰很快就装备完毕，载着海军陆战队于第二天早晨在魏谢拉果海军少将的率领下，驶离旅顺开往大沽。几天以后，又有3艘军舰到达大沽。在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上，沙俄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变幻手法。在酝酿出兵之初，迟迟没有参与列强的抗议行列，并表示"因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愿意设法阻止各国"，目的是为了讨好清政府，以便从中渔利。当列强调兵之势已定，却又打着"如各国不从，则俄必调得力之兵入京，以相抵制"的幌子，抢派重兵，旨在提高它在列强中的威望，使之处于与其他列强在华争夺的有利地位。

当时列强舰队首脑分别是：英国的西摩中将、俄国的基利杰勃兰特中将、美国的开姆夫少将、法国的库尔诺利准将、德国的裴德满上校、日本的永峰大佐、意大利的卡泽拉上校、奥匈帝国的托曼中校。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李鸿章成为议和大臣内幕

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与一八九八年曾两次为沙俄重金收买，同沙俄签订了卖国的"中俄密约"与《旅大租地条约》，成为清政府中的亲俄派首领。因此，还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初，沙俄就企图利用李鸿章，多次点名要他到北京来进行谈判。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面告中国驻俄公使杨儒说："已电格使（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请太后召公（李鸿章）回京定乱。"两天后，清政府急召李鸿章"迅速来京"。与此同时，乌赫托姆斯基向杨儒表示，维特对中国"颇思相助"。李鸿章闻讯，即于六月二十六日从广州电请维特"提出高明的建议"，"以便帮助（清政府）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维特立即回电称，俄国政府与俄国军队可全力进行"帮助"。沙俄还决定派乌赫托姆斯基来华与李鸿章谈判。七月八日，清廷发布上谕，调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八月七日，又接受沙俄建议，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俄国的愿望得到满足。

沙俄本想利用自己在联军中的重要地位，赶在联军统帅瓦德西率军到达中国之前，同中国单独议和，取得有利于己的结果。但是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仓惶西逃，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不过，沙俄仍想尽快通过李鸿章同清政府进行议和谈判。

慈禧等人出逃后，八月十八日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向帝国主义乞和。不久，俄国驻北京财政代表璞科第、公使格尔思便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电催李鸿章来

京，准备用俄国军舰护送他北上。维特也通过杨儒电告李鸿章："俄国他日之护助贵国，请中堂勿疑。"八月二十五日，沙皇政府又佯示对华友好，通告列强，表示"拯救"使臣的目的已经达到，提议从北京撤离外国军队和公使，以便清廷早日返回北京，尽快开始议和。

但是，由于李鸿章"倾向"俄国，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拒绝承认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资格，提出要同与英、日交往较密切的庆亲王奕劻"商议和局"，并要奕劻"急速回京"，璞科第在给维特的电报中说："英、美、日公使都竭力谋划反对李鸿章，不愿承认他的全权，并说他是逃亡政府的代表，他们不愿意同他打任何交道，意图建立一个新的开明政府，并和这个政府谈判。我们极不愿意李鸿章管事。"由于意见对立，英、德两国甚至想把李鸿章抓起来作为人质，使俄国人"不能与他交涉。"在大沽口的英、德、日、法等国的海军将领也作出决定：如果李鸿章北上抵达大沽，便不准他与陆上取得任何联系。对此，沙俄提出了抗议。

九月十五日，沙皇政府发出通告，询问列强：1. 是否准备在军队留驻北京时将使馆人员迁移至天津；2. 是否承认中国皇帝给予庆亲王与李鸿章的全权为有效；3. 如果认为有效的话，是否愿意训令驻北京代表立刻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这是沙俄为博取清政府好感，实现独占东三省的野心，继八月二十五日发布"通告"之后采取的又一外交步骤。各国从各自的侵略利益出发，都表示了否定性意见。因这时联军统帅瓦德西尚在来华途中，德皇威廉二世对俄国的提议尤为反感，他在一封电文上批示道：俄国急于同李鸿章举行"和谈"，是要"使外国人不要进行报复，并离开北京"，以便通过李鸿章攫取满洲。"既然'和平提案'事实上只标志变相地把满洲送给俄国，使其他国家吃亏，我们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提案。"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也说："拖延谈判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他坚决反对从北京撤离使馆及军队，要求英国政府尽快从印度调派大军，并"坚决抗议接受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面对英、日、德的抵制，沙俄极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向它保证自牛庄(营口)撤退军队，并表示对中国无领土野心。这时，美国为增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已提出名为"保全中国"、实为列强共管的口号，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并把它变成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因此，同意承认李鸿章为"全权"。英、日等国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坚强反抗，也认识到为了维护列强对中国的控制，还是保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较为有利，因而也承认这个政府所指派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但是，英、日向清政府要求加派与它们关系较密的刘坤一、张之洞参加和议，以为牵制。清政府不好违抗，同意"派刘坤一、张之洞函电会商议和事宜。"不久，谣传清政府要撤换刘、张，英、日对此甚不放心，提出警告说："易此二督，则和议难望有成。"德国公使穆默也对奕劻、李鸿章说：各国将来意欲议和，则江督、楚(鄂)督万不可动。九月下旬，瓦德西率军抵华，德国的目的已达，不愿再在李鸿章的全权问题上与俄国对立。这样，列强终于都同意和李鸿章进行谈判。

以上事实表明，沙俄与英、日、德等国围绕着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问题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对清政府控制权的反映。

九月十八日，李鸿章北上抵达大沽口，直隶地区俄军司令利涅维奇立即给以隆重接待，并派武装哥萨克三十余人"接护前进"，把他送到北京。途经大沽、天津时，李鸿章曾分别同沙俄的军政官员廓索维慈(时任阿列克谢耶夫的外交专员)、璞科第(沙俄驻京财政代表)、阿列克谢耶夫，以及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十月十一日，他一到朝阳门，又"由俄统帅派骑兵数十名护卫，……安抵贤良寺行台，寺门外复有俄兵以鼓龠相迎，颇极恭敬。"沙俄的这番作态，表面上是为了显示对中国的友谊和支持，实质上只是为了加强对李鸿章的笼络和控制，难怪当时外交界把李鸿章视作"俄国的俘虏"了。

(摘自《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

东北大屠杀

沙俄侵略军在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奸淫烧杀，到处抢劫，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

海兰泡(哈喇泊)，原名孟家村，位于黑河镇的对岸。此地原为中国的一个居民村镇，在 1858 年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后，俄国侵略者把它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义和团运动时期，已是阿穆尔州的首府所在地，拥有居民 3 万 8 千多人，其中五分之三是中国人，有小商号 500 多家，其余多数是木工、瓦工和商贩。中国人民自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用世世代代辛苦的汗水使海兰泡由一个居民小村变成一座街道宽敞的城市。

屠杀前，阿穆尔军区司令官格里布斯基向侵略者下达命令说，要"坚决地、迅速地以哥萨克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地区的中国人。根据这个命令，7 月 15 日下午，沙俄军队封锁了黑龙江，当晚，侵略军冲进城市和附近村庄内，去驱赶和逮捕所有的中国人。顿时，海兰泡城内外一片恐怖，强盗们手持长斧闯进中国人的家里，残酷地殴打他们，把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如有抗拒者立即惨遭杀害。次日，俄国兵警强行把数千中国人不分男女驱入警察署。警察署容纳不了，又被驱赶到精奇里江畔的一个木材厂的院子里。17 日，在沙俄阿穆尔地区的军事总督和政府头目指挥下，一百多名武装军警，以押送这批中国人回国为名，把他们押到黑龙江边，途中凡摔倒或走不动的，

都被砍死或枪杀。过了10个月以后，有人走过这条押送中国人的道路，仍然可以看到各色各样中国服装、辫子，带肉的骨头和肢体。

到了江边，沙俄侵略军又用鞭抽、刀刺、斧砍、枪击等残暴手段，将中国人赶进浪大流急的滔滔江水里。先下水的溺死，不敢下水和奋起反抗的人遭到俄军的射击和砍杀。甚至母亲怀抱的婴儿也无一幸免。经过半小时，江边积尸成堆，余下的又被哥萨克用马刀和大斧砍死，或扯着他们的衣襟抛向江里去。据当时目击者叙说：沙俄兵警还把中国人的头发结在一起，五六个一串，推到江水里，而沙俄兵随后举枪向江里凫水的群众扫射。于是，江畔的血水殷红殷红。《瑷珲县志》根据目击者记录当时的屠杀场景是："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死，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只有80多名中国人经奋力游水，到达黑龙江对岸，一个个也都或伤或残。从7月17日到21日，沙俄强盗进行了4次这样的大屠杀，夺去了六七千中国同胞的生命。一份俄国官方笔录供认："目击者的全部供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当时，日本在海兰泡的一个谍报人员写道："中国同胞的生命就被残酷地葬送在染满鲜血的黑龙江岸，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杀的尸体，像木筏一样为黑龙江的洪流所吞没。这是自从阿穆尔河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悲剧、大罪行。"俄国军警还以同样的手段屠杀世代居住在伯力、海参崴、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等地区的中国同胞，大约有2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惨死在俄国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俄国侵略者在海兰泡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挥舞着屠刀杀向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它的范围是从瑷珲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起，南至孙兵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的一片地方，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历来属瑷珲副都管辖；就连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也明文规定："俄人不得侵犯"。但是，沙俄侵略者为了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大片神圣领土，竟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下了毒手。1900年7月17日至21日，沙俄军警和匪徒侵入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抢掠，驱赶中国居民。他们惨无人道地把中国人集中到房子里活活烧死，或投入江中淹死，或枪击刀砍，无所不用其极。在短短的几天里，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中竟有7千多人惨死在沙俄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损失财产合300多万元。8月初，俄国侵略者又放火烧毁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瑷珲古城。8月12日，俄国阿穆尔州军事当局竟无耻地说："我宣布：其居民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理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之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方，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供其专用。"从此，江东六十四屯这块由历代中国劳动人民用汗水浇灌起来的腴田乐土，被俄国侵略者蛮横、凶狠地霸占了。

沙俄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人的暴行，遭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为了掩人耳目，沙俄装模作样地进行了罪证调查，并于1902年假惺惺地在当地军事法庭审讯。军事法庭判决阿尔地区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中将应对这次事件负责，但鉴于其以往的"功绩"不予追究，调往总参谋部任职。海兰泡城军事长官判处3个月监禁后解职，副警察长判处3个月监禁。这个震骇世界的大屠杀案就这样草草了结。

沙俄侵略军还制造了其他一系列惨案。在瑷珲，沙俄侵略军屠杀了1500人，又纵火焚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熄。这座具有200多年的历史古城，几天内就成了一片废墟。在哈尔滨，沙俄侵略军见村放火，见人屠杀，城内居民数千人死于屠刀之下，葬身于火海之中，得以逃生者不过几百人。在阿城，被杀千余人，1900多间房舍被烧。在双城，有14个村子被夷为平地，仅薛家屯一处，就有30余人被杀。在牛庄，侵略军挥舞马刀在逃难的人群中来回砍杀，直至昏暗的夕阳西下，才丢下几千具无辜百姓的尸体回营。据不完全统计，仅入侵瑷珲、珲春等黑龙江、吉林两省重要城镇的沙俄侵略军，就屠戮了数万名中国百姓。到1900年10月初旬，东北三省基本上被沙俄攻遍，主要城镇为沙俄控制，沙俄6路进攻我国东三省的军事计划基本得以实现。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当时曾愤慨地痛斥沙俄的暴行，揭露侵略军"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在这群魔肆虐，疯狂吞噬中国人民的严重关头，伟大的列宁挺身而出，严正申讨帝国主义强盗，特别是沙皇政府不宣而战大举入侵中国的罪行；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赞扬和声援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愤然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正义斗争。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历史考证

那拉氏对外宣战原因探秘

1900年6月18日，义和团已大批涌入北京，一个一直积极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强硬分子太常寺卿袁昶，上清廷《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里指出清朝政策失误时说：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公元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

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主剿，1898年至1899年曾由于他的主剿政策使直东交界的义和团，在直隶一边处于消沉而在山东一边得以兴起。后来袁世凯到山东，一反张汝梅、毓贤的主抚政策，对义和团实力镇压，致使义和团在山东不能驻足，"流入直隶"。这时适值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有了转变。1900年1月11日清廷颁诏公开承认义和团的拳会地位。该诏说：今后遇有民教冲突，地方官"祗问其为匪与否，不问其会不会、教不教"。裕禄身为满员，与在京权贵关系密切，他"希合中旨"，不敢如袁世凯那样对义和团"实力禁止"而"观望迁延"。因此，义和团在直隶得以继起。及5月22日"涞水戕官"、27日"涿州踞城"后，义和团在直隶"叛迹昭著"的时候，裕禄才"力请剿办"。6月2日，他提出一个全面镇压方案："厚集兵力"，"三路兜截"，他感到所辖的直隶练军不足，又奏调聂士成、宋庆所部武卫前、左二军"前往查办"。这个方案如被那拉氏采纳，义和团在直隶也将如在山东一样，被"渐次肃清"。但这时清廷内部主抚思想占了上风，在6月4日内廷会议上，著名的主抚派人物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坚持抚议。会议"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好操演，即可成为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裕禄"力清剿办"的方案，就这样地被搁置了。这时那拉氏对义和团是否能练成劲旅"抵御洋人"还不放心，因此，会后才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视察，看义和团是否可靠，再定进止。那拉氏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覆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这你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那拉氏这时一方面受刚、赵等的煽惑和愚弄，另方面又受近支王公如载勋、载澜、载濂等的要挟，遂坚定了"抚议"。6月16日，那拉氏发布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在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召募成军"意见于煌煌上谕。那拉氏在主抚思想影响下，和主抚派的默许和召引，义和团从6月中旬开始，便不分昼夜陆续结队入京。至20日宣战前夕已"不下数万"了。

从6月16日那拉氏谕令刚毅、董福祥召募年力精壮义和团成军起至25日大约十天内，那拉氏"借拳剿洋"思想发展到高峰的时期，从那以后她的思想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大概有二：(一)25日前她接到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督抚电报，告诫她"中外强弱情形"悬殊，不宜"衅自我开"。南方督抚的话，使她"中了魔毒"(吴永语)的现象有些清醒。(二)25日，载漪、载濂等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詈上以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载漪的"狂悖"行动，使她觉察到他们的"狼子野心"，因此，如梦方醒。25日那拉氏思想转变的突出标志，是"允从荣禄所请，准其前往使馆慰问各使，并欲立刻停战归好。"当日晚荣禄派人把写有停战护卫使馆懿旨的木牌立于使馆附近的北御河桥上。这不啻说是停止了对外作战。自25日以后那拉氏"借拳剿洋"思想有了很大的动摇。由于她当时已处于骑虎之势，又兼直隶总督裕禄不时以捷报传来，使她对"剿洋"前途仍存几分幻想。但她思想开始倾向南方督抚，承认他们是"老成谋国"。所以此后在行动上更加处处"留有余地"，总的来说就是不把使馆攻毁。而这是她宣战前一心想作到的，甚至连亲信如荣禄那样的心腹近臣，也曾因劝阻她进攻使馆遭到她的申斥。

那拉氏深居宫中，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摆脱不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因此，说义和团能打"神拳"、"能避枪炮"，她至少是有几分相信的。当时近支王公如载漪、载濂、载澜、载滢、载勋等，自立大阿哥以后，权势日增，炙手可热，宫廷内外无不仰其颜色。这些人狂热地宣传义和团的神奇，认为是"天降神兵"。载濂盛赞"拳民能避火器"，刚毅说义和团"能避刀避枪"，则公开见于奏牍。其他御史或大臣奏报鼓吹义和团神奇的更举不胜举。有一个小京官叫左绍

佐的，著有《悟沏源头》一书，在理论上阐述“怪力乱神”。左绍佐与起草宣战诏书的军机章京连文冲相友善，可见有些汉族小京官当是迷信理论的鼓吹者和制造者，他们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王公贵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拉氏身居最高统治地位，素以所谓“神道设教”欺骗国人，她自幼受传统封建教育，因此对封建迷信思想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她逃到西安后曾与吴永述说往事，吴永闻后评论说：“试想彼（指那拉氏）深居宫闱，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让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总有一段时间，已经中了魔毒，若谓‘始终明白’，殆亦未必然耳。”那拉氏虽未公开在臣民面前宣传义和团的“神奇”，但她强调“人心可恃”。在6月10日御前会议上，有人举出例证说明义和团“法术不可恃”，她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她在宣战上谕里也说：“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事实上，“人心”和“法术”是无法区分的。义和团人心之剂，固然由于“灭洋”的爱国义愤，但与相信大师兄能使洋人兵船“在海中自焚”、“能避住彼之枪炮”也是分不开的。

那拉氏逃到西安对吴永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国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可见宣战是对外而非对内。那拉氏自辛酉政变上台四十年来，对外一直执行“屈从”政策，可是自戊戌政变以来，列强袒护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在先，又阻挠废立计划于后，她便表现了有些不能忍让。当1900年5月末到6月初，列强要求派兵进京护卫使馆，她一再阻挠，对洋人的疑忌逐渐增加。但当时她还能克制，仍允许各国派兵进京，只给一些限制。直至6月17日黎明荣禄代呈所谓洋人“假照会”四条，其中之一是勒令皇太后归政，给她的刺激是很大的，有人记载说：“未曾见慈颜如此之怒容，康党之变，虽大发雷霆，尚不如此之甚也。”“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可见“假照会”，是她对外宣战的最大激因。也是她由“自治乱民”以阻洋兵到“借拳剿洋”的转捩点。正如那拉氏自己所说：“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她当日在御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并“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那拉氏简直是在下赌注。19日午刻，裕禄奏报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的消息到京，当日午后（未刻）御前会议便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公使，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20日晨，军机大臣启秀把章京连文冲草拟多日的宣战上谕底稿“由靴里呈出”，那拉氏“览后，慈颜甚善”。第二天，以内阁明谕形式正式发表了。

20日宣战诏，最足以说明她的宣战动机和目的，无待赘言。其中假照会因后经查明无据，“故二十五日（即公历21日）宣战诏，不及此事。”因此，只以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为词。宣战前清廷仅得到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的消息，并不知道各国海军已开炮轰击，这从清朝多年对外惯例来说并不构成“衅自彼开”，而那拉氏为何急不可耐地掀起战端呢？恐还是假照会的作用。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虽然已属侵犯主权，但在清政府眼里恐还不到火候。所以后来她对南方督抚和驻外使节极力辩解此事。说：二十日（16日）各国兵舰已在大沽，力索炮台，限二十一日二点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得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却非衅自我开。”问题是：二十一日宣战时尚未接到各国“开炮轰击”大沽炮台之事。从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历次对外宣战情形来看，清廷是谨守所谓“不可衅自我开”的惯例的，而这次对外宣战竟在各国“开炮轰击”大沽炮台之前，这实际是违反惯例，“衅自我开”了。这充分说明那拉氏为首的一些人由于与列强矛盾的增长，急于想利用义和团对外一战以泄私愤的实情。

（摘自《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风云人物

那 拉 氏

那拉氏(1835.11.29～1908.11.15)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1852年,那拉氏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54年,晋封懿嫔。1856年4月27日,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1857年,又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的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的宠幸,"时时批览各省章奏",开始干预朝廷政事。1860年9月,咸丰挈皇后,逃往热河。

当咸丰即将出发的时候,那拉氏极力谏阻,她和咸丰之间感情上出现裂痕。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像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那样杀掉那拉氏。咸丰"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但是,那拉氏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

1861年8月22日,咸丰病死,载淳即位。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慈安和慈禧。慈安居钟粹宫,称东太后,慈禧居储秀宫,称西太后。同年十一月,与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杀辅政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改年号同治,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

慈禧登上最高统治者地位后,采用奕䜣的"借洋兵助剿"政策,依靠外国侵略者支援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人民起义。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方针,支持洋务运动,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统治。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死。策立其五岁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仍垂帘听政,继续推行对外妥协政策,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1881年4月,慈安太后突然死去。1883年,慈禧解除奕䜣一切职务,进一步加强了权力。

1889年名义上"撤帘归政"于光绪帝,但仍控制军政实权。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废除新政。1900年1月与荣禄等策划,立溥仪为大阿哥,谋废光绪帝。同年对义和团采用"剿抚兼施"之策;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8月八国联军陷北京城,携光绪帝出逃西安,途中下令屠杀义和团。

命奕劻、李鸿章等与侵略者议和。12月颁布实行新政上谕。1901年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卖国政策,同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以缓和矛盾,抵制革命。1908年11月15日病死。

(摘自《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 德 成

张德成,直隶新城县白沟人,自幼当船夫,常往来于独流、杨柳青、胜芳、王家口、天津等地。一八九九年,他在家乡组织义和团,被推为领袖。一九〇〇年四月,他到独流镇设立拳坛,徒众红巾包头,红布带系腰、缠腿,人多势众,号称"天下第一坛"。联军攻陷大沽后,张德成率众五千人于六月二十八日进入天津城,设坛于北门里小宜门,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直隶总督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他与义和团另一首领曹福田配合进攻紫竹林租界,老龙头火车站等,天津失陷时仍在城内与八国联军巷战。后突围至独流镇,准备再起,旋在静海王家口被地主诱杀。

(摘自《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著)

聂 士 诚

聂士诚(?～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袁甲三部与捻军作战。1862年,改隶淮军,从刘铭传部于江、浙、闽、皖一带抗击捻军,同年9月擢把总,1863年擢守备,赏戴蓝翎。1864年升都司加游击衔,赏换花翎。1865年论功超迁参将,次年以副将补用。1868年6月,诏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一品封典,同年8月以提督记名。1900年卒。

1884年,法人袭据台湾基隆。当时,驻守台湾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兵单粮匮,形势危急,屡次电请救援。淮军将领均畏葸不前,唯士诚主动"请行",直抵台北,"每战辄胜"。1885年,台防解严,率部驻防旅顺口。1891年,赏加头品顶戴,调统芦台淮、练诸军。次年6月,实授太原镇总兵。1893年,率领了3名武备堂学生和1名翻译,不辞辛劳,巡防了东北三省及中俄、中朝边境,历时8个月,行程二万三千里。他根据实地勘测和亲自见闻,写成《东游纪程》一书,呈送清政府。该书包括《日历》(日记)两卷、《东省全图》、《图说》、《东三省韩俄交界道路表》各一卷,共10余万字,地图32幅。书内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

许多颇有价值的建议，且断言日本是“心腹之忧”，应当“因时制宜”，早作准备。书中对中俄边界防务形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1894年，不出士诚所料，“心腹之忧”的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士诚奉命赴援朝鲜，屡败日军。同年10月，补直隶提督。1995年1月，日兵乘除夕潜袭聂军，士诚设伏以待，大败日军，并斩日将富刚三造。自此，日军龟缩凤凰城内，不敢出。1895年4月和议成。士诚撤兵回驻芦台。撰有《东征日记》，记录了这次亲历的战争实况。

1898年，北洋创立武卫军，诏改士诚所部三十营为武卫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称武卫四军。聂士诚半仿德式练军。1900年5月，八国联军入侵前夕，士诚一再向当局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整军备战，以防外来侵略。同年7月9日，八国联军犯津沽。士诚兵分三路，回师天津，抗击联军。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被联军包围，敌来益众，力量悬殊。士诚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踰此一步非夫矣！”恶战七小时之久，身受七伤，不幸中炮，腹破肠出，悲壮殉国。

（摘自《中国近代史》彭德才）

唐才常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亟，亦字佛尘，湖南浏阳人。少好读书，潜心实学，不为章句所拘。至1891年止，先后肄业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旋应四川学政瞿鸿之聘，入川课其子女。

1894年，肄业武昌两湖书院。会中日甲午战起，李鸿章奉命赴日乞和。才常忧心如焚，深感惟变法方可图强。不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维新变法，才常倾心拥护。1897年《湘学报》创办，他任撰述。时务学堂成立时，又兼中文分教习。次年春主编《湘报》，带头撰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民主学说和变法主张，提出“公天下者，受力天下；私天下者，仅狄天下。扃镐天下者，天下盗之矣；愚罔天下者，天下暴之矣”。对于湖南新设学堂、学会、矿场、工厂、课吏馆、保卫局等项措施，他拍手称好。在对外关系上，他主张以通学者通日，通日者通英。合中日英之力，纵横海上”。1898年6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告变法，才常为之感奋。是年9月，谭嗣同电召才常进京，参与京师政事，甫抵汉口，传来政变消息，谭嗣同等殉难，康、梁相继亡命日本。才常辄转道上海，同游香港、新加坡等地。1899年返上海，主持《亚东时报》，继续倡导改革。

是年冬，唐才常在沪组织正气会，宣告“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时又强调“日有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盘根所由别利器，板荡始以识忠臣”。他把操纵朝廷实权的慈禧太后与热衷变法图强的光绪帝区别开来，拟推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者，拥护光绪帝继续变法。适逢北方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唐才常改正气会为自立会，且以会党为基础组织自立军，计划举兵勤王。部分离日归国的兴中会员也纷纷加入。

1900年8月，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上海名流召开“国会”，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才常自任总干事。国会乃公开组织，自立军活动却是秘密进行。

国会既开，唐才常赴汉口召集会党，联络武备学堂学生，运动新军及绿营、巡防营士兵，正式组成自立军，分前、后、左、中、右五路，唐自任总司令，定于是年8月9日于湖北武汉、新堤，湖南常德，安徽大通、安庆等地同时起兵。只因经费和军械无着落，起义日期被迫推迟。然安徽大通一路自立军以事机外露，被迫如期发难。终因兵力不及，仅坚持两日。唐才常拟于8月23日发难于武汉，事前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捕捉，全军不战即溃。是月22日，唐才常等20余人于武昌瀏阳湖畔英勇就义。

（郭世佑）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　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又字香严，号无竟居士，又别号壶公抱冰。历任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督办商务大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1909年病逝。

初时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纠弹时政，号为清流。光绪七年（1881）授山西巡抚，十年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中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镇南关击败法军。

中法战后十年间，张之洞的主要政绩，是开始了大规模的洋务活动。战后不久，张之洞上了《筹议海防要策折》，详细陈述了他反思中法战争所得到的启示以及他的思想主张。他说：“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尤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发出了“仰人鼻息实非策”的呼吁，强调“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之不穷为贵”。他向清廷提出救时三策：首曰储人材，次曰制器械，次曰开地利。奏请设立水师学堂，创办枪厂雷厂。他开始在省城成立矿务局，招商试办。

1889年，张之洞向清廷正式奏请筹建枪炮厂、织布局、炼铁厂。

同年，围绕海军衙门请修津通铁路问题，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引起一场激裂争论。张之洞力排众议，于4月上《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从开发中原经济和

军事意义两个方面阐述修筑腹省干路的必要性。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为修筑芦汉路，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该路虽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施工，但在张之洞极力呼吁下，于 1897 年动工，1905 年 11 月 15 日全线竣工，正式通车。

在甲午战前，因芦汉铁路缓建，张之洞的主要精力用于兴办近代工矿事业。他先后办起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四局以及造纸厂、针钉厂、制皮厂、毡呢厂、印刷厂、砖厂、武昌兰陵模范工厂、汉口桥口贫民大工厂等等，并创办两湖劝业场，推广茶树、桑苗种植，引进美国棉花良种；对于修堤、敷设电线、安装电灯、电活、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积极给予支持。而且每到一地，他都很注意整顿税收，铸造铜币、银币、纸币。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焦灼痛愤"，多次致电清政府，指出"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割占数地而已"。他警告清廷："若照倭索诸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虽欲求目前旦夕之安亦不可得"。他在分析中日双方形势之后三次电奏，力阻和议，坚主抗战。

1896 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铁路投资权、修筑权等"郡尤争食"的严重危机。他对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野心，深有察觉。他曾慨叹"英国视长江为囊中物"，"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入者"。

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对光绪帝颁布的变法上谕，基本上是支持的。在经济方面，他对光绪的"振兴商务"、"讲求工艺"的经济政策是执行了的。

在政治方面，他支持光绪帝的官制改革，推荐维新人士参与新政。他举荐了陈宝琛、黄遵宪、郑孝胥等五人为"使才"，还托陈宝箴保荐杨锐、刘光第，参与军机。

1900 年春夏之交，面对北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帝国主义八国侵略联军的武装进犯，张之洞力主对内痛剿义和团，对外妥协议和，抗拒清廷对外宣战的上谕，并与刘坤一等督抚联合，搞了"东南互保"。

1905 年，湘、粤、鄂三省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将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里夺回，自行修筑。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群众反帝国运动的推动下，也是主张"赎路自办的"，并为收回粤汉铁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08 年，清廷著派张之洞兼充督办铁路大臣，旋命兼充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1909 年 10 月 4 日，张之洞卒。他在口授遗折中道："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藉为利用厚生之资"。粤汉铁路是他弥留之际仍为悬念的未竟事业。

（摘自《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

珍闻轶事

议和大臣与瓦统帅问答记

昨日德文报载西十一月十五号即九月二十四日庆王、李相与瓦德西统帅接谈各言，照录如下：李相云：贵统帅体气甚好。统帅又云：吾体气托庇甚好，中国天气与吾极为相宜，贵大臣与：吾前数年在德国曾晤后，目下贵大臣体气亦好，吾甚喜悦。李相云吾前任德国时，因事忙不获与贵统帅畅谈，今日得见甚为欣喜。统帅云：贵大臣在中国声望甚著吾已早闻，今日得以复见，保幸如之。李相云：贵统帅今年若干岁，谅已七十。统帅云：吾年六十八岁。李相云：贵统帅年高，尚能来至中国，真可异也。统帅云：吾闻中国已久，深愿来华一游以增长见识。李相云：不幸华民，均不愿远游者，与贵统师所言，殊觉相反。统帅云：贵大臣尽可劝令华民，以后宜至他国游历。李相云：吾在欧洲时，见各国殷富，甚为骇愕。统帅云：英人韦礼逊所著之书，有道及贵大臣事者，吾曾读及。韦礼逊言，设使贵大臣能如前劝令贵国人民，则贵大臣将有益国家不浅。李相云：不幸中国居高位者，知识甚浅，致中国大为所害，华民亦不愿有铁路电线等物。瓦帅云：从前德民亦然，当铁路新出时，德民均不愿有之，经久亦知其有用，为有国者所不可不有之物。李相云：和议成后，中国自当即行开办铁路，瓦帅云：如和议一成，欧洲各国即将以重款借与中国，以为建造铁路之用。李相云：吾甚望中国民智渐开。瓦帅云：吾深知中国极富，但须设法以变之耳，铁路后来更大有用处。李相云：中国刻下仍贫。瓦帅云：欧美各处吾殆已行遍，深知铁路之有用。贵大臣在德国时，曾谈及毛奇将军，毛将军即吾帅也。渠亦深知铁路之有用者。李相云：吾在德时，毛将军已故数年，独幸与卑士麦克王爵，谈有数点钟之久。瓦帅云：吾亦深知此事。李相云：贵统帅彼时在汉勃克聆近某处为统带官，卑士麦克王爵宅第，去汉勃克并不遥远。瓦帅云：约一点钟时可至。李相云：贵统帅大约与卑士麦克王爵为良友？瓦帅云：然，吾二人友谊始终

无渝。李相云：刻下和偷洛熙王爵，是否为德国宰相？瓦帅云：否，近已告退。李相云：继为德相者何人？瓦帅云：乃哀洛乎伯爵也，该伯爵年岁尚未甚老。李相云：和伦洛熙王爵已逾八旬否？瓦帅云：已逾八旬。李相云：刻下是否褒洛夫伯爵为德国首相？瓦帅云：然。李相云：毛奇将军有子否？瓦帅云：毛将军无子，其侄甚多。瓦帅云：北京气候颇冷。李相云：贵统帅置有火炉否？瓦帅云：有，此间天气与吾颇相宜，德国秋冬之间，雨水颇多，北京则否。李相云：刻下望雪甚殷。李相又云：德皇刻在柏林否？瓦帅云：德皇刻在柏林，体气极好，共有皇子七人。李相云：吾在柏林时，皇子尚无如此之多。李相又云：德皇后近体如何？瓦帅云：皇后体气亦好。李相云：吾在柏林时，曾蒙皇后赐宴，吾亦曾见过皇子。贵统帅共有几子？瓦帅云：无。李相云：贵统帅成婚否？瓦帅云：业已娶亲。李相云：贵统帅自一千八百七十年起，是否一向带兵？瓦帅云：然，中间有时参办交涉事宜。瓦帅又云：贵大臣在此，颇无所扰否？李相云：然。瓦帅云：兵争一事，无论何人殊形不便。李相云：孟（穆）公使暨立侧尔副将近状如何？瓦帅云：孟（穆）公使等体气甚好；立侧尔副将刻下回保定府，渠素来钦佩贵大臣。李相云：立侧尔副将暨希立克新，乃上等之陆军教习。瓦帅云：吾极望以后中国，再聘用德国教习。李相云：联军以德国为首，德国所出之主意，他国自必乐从。瓦帅云：吾亦望如此，但贵大臣必须与吾会同办理，则事自无难办者。李相云：吾闻联军将往张家口？瓦帅云：不过至长城为止，该处闻有华兵。李相云：该处如有华兵，无非为弹压地方起见。瓦帅云：保定府附近各处，亦有华兵，不幸该兵并不剿除团匪。李相云：北方华军专为弹压地方起见，并不与西人为难。瓦帅云：此间有华军，无纪律者颇多，北省人民颇不愿有之。李相云：吾意此系道路之言，并不确鉴。瓦帅云：如贵大臣能保华军不与联军相扰则吾必不遣兵前往各处。李相云：联军所占各处，吾不甚详悉。瓦帅云：吾将示贵大臣以图。李相云：谢谢。

李相又云：联军将往张家口否？瓦帅云：如华军与之抗拒，则德军必往；又闻该处有某教会在彼，为百姓所虐待。李相云：吾想该处教会，断不至有险，况吾已到京，当更无是事。瓦帅云：此军不可不发。李相云：保定府乃拳匪渊薮，刻下当甚安静。瓦帅云：贵大臣近得两宫消息否？李相云：两宫情形大略同前。瓦帅云：北京与两宫如何通电？李相云：此间电至上海，再转汉口而入西安。贵国大皇帝曾劝皇上返跸北京，皇上胆怯。

时庆王已到，即经李相引进。庆王云：吾久望与贵统帅缔交。瓦师云：今日得见王爷，吾心甚喜。庆王云：吾愿来已久。瓦师云：吾亦久欲来中国，今日幸得如愿。中国情形，吾前虽未来，然得之书中者颇多，特不幸此来为兵争事起见耳。庆王云：亨利亲王吾曾见之。瓦帅云：亨利亲王曾告吾云，北京人民待之甚厚。庆王云：吾与亨利亲王亦曾叙谈多次。庆王即言及德使被戕，两宫暨中国人民，均为惋惜抱歉之意。继云：贵统帅觉北京寒冷否？瓦帅云：吾刻已按照中国例以皮衣御寒，北京有皮货，实为天下所仅见。庆王云：德国气候与北京相同否？瓦帅云：大约相同，惟冬日较北京更短，北京似觉较好。庆王云：贵统帅今年若干岁？瓦帅云：六十八。想王爷比吾至少小十岁。庆王云：六十三岁矣。瓦帅云：王爷有宫在北京否？庆王云：有，不过甚小，与此间相距甚近。瓦帅云：有避署宫否？庆王云：有，亨利亲王来华，曾在该处早膳。瓦帅云：是否与皇上避署宫相近？庆王云：然。贵统帅带有马车来华否？瓦帅云：然，惟此间人民见之甚为骇异。庆王云：此间此物极为罕见。瓦帅云：欧洲马车甚有用，中国亦宜用之，其有用处与铁路相等。庆王云：贵统帅带来者，是否驾以两马？瓦帅云：然，如行远，则驾四马。庆王云：此间道路崎岖，马车殊形不便。瓦帅云：如系良马即可无虞。此间城内布置甚好，皇宫尤妙。庆王云：惜刻下只余废址颓垣。瓦帅云：甚望两宫早日回京。庆王云：如欲北京一切复旧，此系最难之事。瓦帅云：吾适间与李相接谈，以王爷来而止，吾曾问中国皇上能早日回京否？

庆王云：吾望皇上早日东归，惟刻下难于布置，请贵统帅转请各公使，早将和议条款议定。瓦帅云：约数日内即可照办。庆王云：甚望如此。近日皇上有谕云：和议一有头绪，即将返跸，况贵国大皇帝亦请皇上回京。统帅云：王爷须知吾已奉令以皇帝礼接待皇上。庆王云：甚善。又云二年前，亨利亲王来时，敝国亦以礼接待。统帅云：彼时德皇闻之甚喜，吾德皇亦甚愿与中国共守和局。方中东构时，德皇即有此言。庆王云：吾知德皇待中国极好。贵统帅在贵国何为？统帅云：吾充查阅德国陆军之职。言及此，即顾其审译官云：请将此职说明，俾王爷详知。庆王云：此位甚高，惟须勤劳。贵统帅常见亨利亲王否？统帅云：在克伊尔地方时常与之相见。庆王云：亨利亲王刻管何营？统帅云：亨利亲王现正休息，明春即当复出。李相云：德皇太子，刻下是否尚在学堂读书？瓦帅云：否，已入军营，一二年内再入大学堂附学，其所占地步甚好。庆王云：今年若干岁矣？瓦帅云，十八。李相云：吾亦见过。瓦帅云：为太子者，必至陆军学堂学习方可，盖陆军乃有国者之基。

庆王云：诚如贵统帅所言，吾亦充过武官。瓦帅顾阴午楼副都统言，云：足下德语极佳，在敝国究有若干年之久？阴云：自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吾在德奥两国。瓦帅云：彼时足下若干岁？阴云：廿七岁。瓦帅云：柏林较维也纳好否？阴云：各有好处。李相又言及联军所据地方之图。瓦帅云：联军刻修杨村北京铁路，不日即可开用，铁路邻近各处居民，必须安静方可，吾望该处已无拳匪，以后此线，亦可为百姓转运之用。李相云：俄军修理铁路工程，并无停止。庆王云：拳匪前将该处拆毁。李相云：拳匪已死，无须再言。惟北京至杨村铁路能复旧否？

瓦帅云：吾意自能复旧，惟邻近人民均须安静，否则当以枪毙，设有事起，该处人民不能辞其责。李相云：如有兵保护，则必无其事，盖该处人民畏兵如虎也。瓦帅云：北京居民未归者尚多否？庆王云：归者约有大半，铺户以无本钱，故未开者尚多。瓦帅云：居民在京者，其产业或可保全，此间华民偷窃他人物件者颇多。庆王云：贵统帅所言甚是。瓦帅云：吾之阅历，亦自几经战阵而来，兵争之时，居民有财产者，不宜他往。如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吾心更喜。庆王云：谢谢！吾深望以后中外成为一家。瓦帅微笑。李相云：深望和局即可开议。瓦帅云：约日内即可开办，但和议即开，亦须早有归结，不过中国须吃亏耳！如早日归结，吃亏处略可较少。李相云：现欲与华军通信，以无电报，故殊形不易，请贵统帅给与护照。

瓦帅云：此非必需之物，况贵国送信章程已极好，不必再多此周折。李相云：如贵统帅给与护照，较为便益。瓦帅云：如华军不在联军所占处驻扎，则吾能设法，令人帮同信差通信。李相云：护照不但作送信之用，即派员他往亦可用之。瓦帅云：如信中所言，能使吾知，即可照办。庆王云：所通各信，自与兵事无干。瓦帅云：既与兵事无干，即可由吾处代寄。李相云：如有上谕前来，亦须护照。瓦帅云：容吾思之。吾望自此以后，常与贵大臣相见。庆王云：刻下各信俱已扣留。瓦帅云：吾想并无此事；惟刻下万不能以护照相与，必须容吾三思。

庆王云：如所送之信业经延搁，信差当可放行矣。李相云：既无护照，则吾岂能发遣信差。瓦帅云：必须容吾三思后再奉覆。华军在直隶省尚多，必须遣往他处。其余办事各员，如与联军有益者，自可容之。李相云：然则贵统帅于直隶办事各华官，并无阻难之意。庆王李相即行告别。

（摘自《拳匪记事》）

名妓赛金花与瓦德西

那时在北京住着，天天总是耽惊害怕。这时候街上紊乱极了，枪声炮声不断的响，站在院里看见那四外被烧房屋所升起的烟火，浓烟如云，火光满天，令人不忍卒视。我们用木杠撑住了大门。天刚亮，便爬上房藏在垄沟里，傍晚才下来，在屋内地下铺一领席，夜间就倒在上面睡。

后来洋兵进城了，西太后同皇上都逃出京去，人心惶惶，谣啄四起，有的说："洋人要坐皇上啊！"有的说："洋人要从新再扶保一位有福的出来坐皇上啊！"

过了些天，稍见平静，我因在那里生活没有办法，就想着往南城搬。这时街上全是洋兵布岗，盘查行人严极了。我挺着胆子带了我母亲，还有孙三爷向前疾走，一路上遇到几次拦问，幸亏全是德国兵，我会说他们的话，占了许多便宜，不然，便要吃苦了。

到南城，房子很不容易找，就暂住在李铁拐斜街一家熟识下处的门房里。这时南城的洋兵很多，最无纪律，整日价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有一天晚上，听见外面一阵格登登的皮鞋响声，一直往里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来，站在我们房前敲门，我怎敢给开呀？他们见不开门，就用脚猛踹，我看这情形不好，不开门是不行，便忙着答了声，把洋蜡点着，开开门让他们进来。原来是几个德国的小军官，他们的举动先是很不礼貌，后来见我能说德国话，又向他们问德国的某官某先生，他们不知我有多大来历，便对我显出了很恭敬的样。坐了一人儿，他们要走，对我说："回去一定报告元帅，明天派人来接，请在家等候，千万不要躲开。"

翌晨，果然派了两个护兵，套着一辆轿车来接我。到了他们兵营里，见着他们元帅瓦德西，——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他问我："到过德国吗？"我说："小时同洪钦差去过。"又问："洪钦差是你什么人？"这时候我却撒了一句谎，说："是我的姊丈。"他一听，喜欢极了。我们越谈越高兴。很觉投缘，当下就留我一同吃饭。吃饭时，我乘便就把我怎样从上海到的天津，因闹义和团又逃来北京，途中狼狈情形及到京后生活的困难，对他诉说了一遍。他听了很表同情，只见他同傍的军官低声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了些什么，随着便拿出来两套夹衣服，都是青缎绣花的；又取出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千块钱，都是现洋，对我说："东西很少，请先拿去用吧。"我正在这穷愁交错的时候，遇到这样优待，心里着实感激，忙着谢了谢，便收下。

一直待到天黑，我要回家了，瓦德西很舍不得叫走，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能常常来他营里，又亲自把我送出来多远，我俩才握手而别。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接我，到他营里一待就是多半天，很少有间断的日子。

我初次见瓦德西时，他对我说，他们乍到北京，人地生疏，种种军需，都还没有办法，请我帮助办一办。我听了这话，很觉为难，无论如何我总是个女子，粮台大事，那有经验？便竭力的推辞，怎奈他一味的不允。过几天，我到他营里，他又对我说，请帮助办办，叫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了，才骑着马，——这不似在通州郊外了，也有胆骑了——有几个小军官陪着，到街上去找各商户。这时候，谁还敢出来？只见两旁的铺户住家都紧闭着门，路静人稀，荒堆破壁，呈出来一种凄惨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叫我怎么着去找呢？想了半天，只好挨着户去敲门罢。结果有几家出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讲道理不过，公买公卖，不欺不瞒，现在要办粮台，由我主持。你们谁愿意承办，就请到琉璃厂罗家大门去找我，——这时我已搬在此处——有赛二爷给你们作担保。"经我这样一说，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来找我，表示愿意承办。我见一有人敢承办，心里很是

欢喜，立刻就带着他们到了德国兵营，把一切承办的手续全商议好，又给了每家一面德国旗子，叫插在门首，为的来回搬运，不受人欺扰。这些承办人后来差不多都发了财，至少的也赚得几万。他们的货物定价太贵了，一个鸡蛋卖五分银洋，比较平日增高了好几十倍。

洋兵才进城时，一点纪律也没有，任着意儿奸淫抢掠，京城妇女因之戕生者，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最大的仇敌就是义和团了，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究竟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这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吧，在一个月以前义和团也正在这样的杀他们呢！我每次出去，只要碰着了这样事，就急忙跑过去，说："他不是义和团，我敢担保，我敢担保。"这时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认得我，见我一说话，他们就放开了。就这么着，很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待后，我乘机向瓦德西说："义和团一听你们要来，早逃窜得远远的了，现在京城里剩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民人，他们已经受了不少义和团的害了，现在又被误指是义和团，岂不太冤枉？"瓦听了我这话，便信以为实，随着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们再在外边随便杀人，洋兵见到这道命令，行动才稍稍敛迹。其实，那时北京城里当过义和团的人还多着哩！

这时候，洋兵对待中国人不论你是官是民，是年迈，是幼小，只要用着了，就随便拉去充苦力。你的力量若薄弱，不能胜任，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顿。在街上，常常看见一个弱不胜衣的白面书生，或皓首龙钟的老头儿，拚着死替他们扛东西，叫人看着心里实在难过！有一天，作过都御史的陈壁也被洋兵抓了苦力，我一见真急了，我同陈是很要好的朋友啊，赶紧着跑了过去，对他们说了说，才解脱下来，咳！这时候简直成了亡国的状态了。

因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了害，德国兵也就最恨中国，尤其恨慈禧太后。他们一到北京，就在各处里找她，打听她的踪迹。他们常气愤愤地对我说："中德两国的邦交，素来很和睦，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把我们公使给害了？那都是这个老女人的意思，非得把她的肉剐成一块一块，晒成了乾子带回国去，方能消恨！。我总是劝解他们，说："害死你们公使的，不是太后，是义和团。她整天价住在宫里，又不常出来，怎么能晓得外边的事？"他们又问："她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去了？"我说："谁也不知道她躲在什么地方去了。"

庚子和议和时候，瓦德西经几度解释，倒似乎已明了中国的内情。但克林德公使夫人态度"却是强硬得很，她提出很多苛厉的条件，要西太后偿命，又要皇上道歉赔罪，那些都是办不到的。那时主持和议的全权大臣是李鸿章，他也没有办法。我看如此情形，势必造成僵局，便自告奋勇，托瓦德西介绍，去劝说克林德夫人。克林德夫人年纪已五十多岁，穿着一身黑衣黑裙的丧服，态度很和蔼而有礼貌，但当谈到杀死克林德公使时，她却辞严色厉，似乎很坚决表示：不依她的苛厉条件是誓死不饶的。我向她劝解说：'中德两国邦交，是素来和睦的，朝廷上对于克林德公使也是极尊重的。这次事变，实起自无知妄行的义和团，如今人死已不能复生，夫人倘若能让步，中德之间，还可以恢复邦交。'克林德夫人的态度虽然稍为和缓，但她仍以为未足以雪杀夫的恨。她说：'话虽如此说，但我丈夫平素和中国感情很好，我却不能由他平白地给中国人杀死，我一定要报仇。'

我说：'夫人所指的仇人，不是那些无知妄行的拳匪吗？现在拳匪眼见闯下了祸，早就跑的跑了，杀的杀了，我国的王公大臣，地方有司，赐死的赐死了，问斩的问斩了，还有什么仇没有报呢？夫人，你在中国多年，一定可以知道中国表扬忠孝节义的办法，最光荣是立牌坊，犹如你们贵国在大城里铸立铜像或树立碑铭一样，同是纪念一个人建绩的表示。如今我国为克林德公使建立一座大牌坊，用皇上的名义刻些牌文，树立在克林德公使遇害的地方，以纪念克林德公使，这样，公使的生平，远使万里，受命缔结邦交的伟绩，和拳匪起事，遇害情形，便可以同碑铭永传不朽，这无异是当今皇上与公使赔罪了。'克公使夫人听到我提起公使遇害的事，不由得泪盈于睫，心头一软，大概细想过于奢求，也是无益，便低头悲咽了许久，终于微微点头，答应了和议。当时我觉得大功已告成，自己对于国家总算是效了一点功劳了，不由得暗自欢喜，倘若不是在泪涟涟下的克林德公使夫人的面前，我必定跳跃起来。

和议因此便打开了僵局，妥协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公使建立牌坊。这牌坊树立在东单牌楼，克林德公使罹难的地方。牌坊建成时，还开过一个追悼克林德公使的纪念大会，开会情形，非常热闹，有段祺瑞的演说，会后还摄影以留纪念。我和牌坊有相当关系，故也被请参加，相片里立在前排的一个中国小女子，便是当日名满九城的赛金花。这个牌坊在民国六年阳历十一月欧战停战后，便移到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如今还巍然存在。

事情平靖后，太后皇上都回到京中，西太后问朝里大臣，知道了联军屠杀京民及和议之中，有个赛金花，故也曾宣我入宫一次，但文武官员极多，也没有说什么话。后来魏(斯炅)先生的亲戚告诉我，光绪皇帝曾亲笔写了一篇文章议论我的，但我自己却未见过。我当时也实在没有开心来理会这个。"

一些从洋人跟洋人走狗巴结到功名的官儿，都升了官了，大家忘记赛金花的功劳，而且妒恨她。赛金花呢，瓦德西去了以后，她没有受到西太后的酬谢，依旧开着妓院。为了妓院出了一件人命案，那些妒恨她的官儿趁此加以"伤风败俗，虐待人命"的罪名，把赛金花的家产归公发卖，押解回籍，不许再住北京。赛金花恨极了，说："看你们威风到几时？"后来还住在北平。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珍妃之死

七月以后，事态日趋严重，局面大有全面失控的危险，七月二十日，联军攻破通州，一路烧杀抢掠向京师逼近。

慈禧取出这两天赶做好的农妇装束，穿戴好，仓皇收拾行李，掩埋贵重宝器财物，准备出逃动身前，慈禧派人到北三所提出已在那里关押了近两年的珍妃，吩咐她速去收拾行李。珍妃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眼圈发青，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她似乎连意识也退化了，呆呆地不吭声傻站在那儿。

一颗炮弹呼啸着从头顶掠过，不知落在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震得地皮直颤。众人赶紧趴在地上，许久才小心翼翼地爬起来。

珍妃掸去腿上的灰尘，仍然什么话也没有。慈禧从石阶下战战兢兢直起腰，推开防护她的太监，大声向珍妃喝斥：

“你这小蹄子还傻愣个什么？难道还想留下来狐媚洋人不成？”

珍妃异常从容地用纤细的手指把垂在额前的一缕头发挽到耳后。

“万岁爷呢？”她终于有气无力地问。“万岁爷也走吗？”

“混帐话！”慈禧心急如焚，也顾不得斟酌词句了，“万岁爷是社稷之主，怎么能留下来！”

珍妃缓缓地跪下，哽声道：“臣妾有一言禀告太后。皇上身系社稷安危，正宜以此为重留下与洋人交涉，陈说厉害，晓以大义，或者可使大清免受过多的损失。臣妾愿伺候皇上留下，等到兵乱稍事平息，即接太后回来秉政。”

慈禧勉强耐着性子和怒气，听珍妃哭诉完，冷冷一笑，咬牙说：“珍主儿倒是一副古道热肠，忠心可鉴。珍主儿自己愿留下，老身一定勉力承全。只是皇上乃一国之主，决不可留下受训于人。玉贵呀，”她叫过内务府二总管崔玉贵，耳语了几句，马上又和颜悦色地说：“领珍主儿到个好去处去，不可慢待。”

崔玉贵毫无表情走上前向珍妃深施一礼，“珍主儿请随奴才来。”

珍妃预感到会有什么不对，长跪在地不起，慈禧不耐烦地朝崔玉贵挥了挥手，崔玉贵道了声恕罪，挥手又叫上两个太监，上去一起架起珍妃，朝宁寿宫方向走。才走了几步，珍妃突然明白了什么，奋力挣脱崔玉贵等人，想回身去追慈禧，她早已率众宫监、宫女携大包小包向神武门方向急急去了。崔玉贵追上来，一把扯住珍妃的胳膊，硬往回拖，另两个太监也上来抓住另一条胳膊，一起向后生拽。珍妃呼天抢地，崔玉贵置若罔闻。

来到宁寿宫，崔玉贵把珍妃径拖到后门那口井前，崔玉贵一脚揣开井盖，一股冷气冲额而上。珍妃一路反抗早已精疲力尽，但三个人刚一松手，珍妃还是硬挺着往外爬。恐惧已让珍妃忘了哭泣，求生的欲望使她不顾一切想爬离井台远一些。

崔玉贵仍是面无表情，走上前挡住珍妃，珍妃又急又怕，说不出话来，只是两手频频向崔玉贵无力地作揖。崔玉贵冷冷地说：“珍主儿是自己跳呢，还是容奴才帮上一把？”

珍妃攒足了浑身的劲对崔玉贵说：“请崔爷容奴婢再见老爷一面，死而无憾。”

崔玉贵道：“没那些说的。”他示意站在旁边的两个太监上来拉珍妃，两太监于心不忍，两眼含泪，竟站着没动。

崔玉贵骂了句：“都是尿小子嗨。”他抓住珍妃的衣领把珍妃拖到井旁，任珍妃怎样疯狂地抓他、挠他、咬他，全然不顾，硬把珍妃的手先塞入井内，然后提起珍妃的腿一下子按下去。珍妃惨叫一声，立时没了踪影。

崔玉贵喘着粗气，又搬起井盖，吃力地压上井口。两手还掸了掸，似乎想掸掉什么灰尘。两个小太监看得目瞪口呆。

崔玉贵缓缓转过身，脸色白得发青，嘴唇黑紫，两太监不知为什么两腿一软，瘫在地上。崔玉贵稳了稳神，上前去一人一个耳光，把二人打清醒，三人一起出宫门，追慈禧一行去了。

珍妃遇害时，光绪还在忙着处理政务，但已不是召对大臣，而是受慈禧之命加紧掩埋宫藏珍宝古玩。慈禧急急进院，拉上光绪的手就往外走，光绪特意向慈禧身边看了看，没有珍妃。他没敢立刻发问，慈禧的脸色十分不好。

光绪站住，对慈禧说：“请皇太后考虑子臣的吁请。子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公使当面解释，一定无事。”

慈禧的脑袋摇了摇，一副老于世故的模样，她说：“皇帝又说痴话，焉有一国之主向公使谢罪的道理。事有紧急，还是随我出外躲上些时日再说。”

光绪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慈禧随便问了句：“皇帝想说什么？”

光绪怯生生地问：“既如此，太后何不带上珍妃一块走？珍妃戴罪已有两年，请太后宽宏大度不念前嫌，提携她这一回。子臣平生所慕，仅珍妃一人，还望太后垂怜，体谅子臣。”

慈禧远远看见崔玉贵走过来，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但又不敢实话知告诉光绪，只好敷衍说珍妃还在收拾东西，马上就到。

崔玉贵上前回话：“禀万岁爷、老佛爷，珍主儿不忍看国破家亡的惨祸，一时想不过来，已经沉井自裁了。”

光绪的脑子嗡地一炸。他站起来一把抓住崔玉贵,照脸上就是一拳,崔玉贵捂着流血的鼻子赶紧跑到慈禧身后。慈禧老脸一沉。光绪一跺脚,转身往回跑去,慈禧叫了两声没叫住,赶紧叫李连英带人随后跟去,叮嘱要寸步不离左右。

光绪回到北三所,那里早已空无一人,只好咬牙又回到养心殿,搜出已在箱底压了有些日子的朝服,自己笨拙地穿戴整齐。李连英等人半天才找到光绪,见他如此打扮都吓了一跳。

"万岁爷这是要去哪?"

"朕留下来亲赴使馆交涉,李谙达可速去追上太后扈驾西行。珍妃的事朕也实在放心不下,崔玉贵的话朕一点也不能信。"

李连英苦笑一下:"万岁爷是急晕了。就依老佛爷的脾气,她会让你出宫去会洋人?至于珍主儿,奴才明告皇上,此时早已魂游西天了,万岁爷不必再费心去找了。"

光绪一时悲愤交集,觉得胸口似塞了块破棉絮,憋闷得难受,想咳又咳不出来,弄得满脸青筋暴露。李连英赶紧过来给光绪捶背拿胸,半晌,光绪才缓过劲来。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流 行 风

义和团文学

义和团文献数量浩繁,形式多样,体裁各异,文字不拘一格。其中有所谓"词皆鄙俚不文"的通俗说帖,"亦有长篇巨论、套袭名家古文"的典雅之作,还有大量"怪诞不经"、充斥宗教迷信色彩的乩语、碑文和神咒。大致上,可以把它们分成揭帖告白、书信、乩语、碑文、诗歌、咒语和其他杂件等几个大的类别。义和团的宣传攻势,以极其广泛地刊刻、传播和张贴各种揭帖为主要特色。由于义和团和在北中国长期活动的会道门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揭帖、告白中加进了不少宗教迷信的内容,而语多隐讳,词句费解。

义和团失败以后,曾有人作《义和团与中国之关系》一文,指出义和团的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收在当时秘密发行的册子《黄帝魂》里,说明义和团的产生,实为各国及教民在中国横行的反应。他们不断的欺压,使"有国民之责任者,莫不勃然奋发,攘臂兴起,思建独立旗而击自由钟"。是在这样的动机下结合起来。他们"唱灭洋之议,率无学之徒,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虽巨炮如雨,坚船如云,而犹苦战经时,前仆后继。直至满酋走,政府倾,北京破,然亦稚不欲罢,出死力以持之。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无可忍,故悍然冒万死,出万难,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的一日耳。而谓二三民贼,假神托鬼,所能使之履险如夷,置生死于不顾乎?"这是当时对义和团最进步的理解,是革命党人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义和团运动的意义,诚是"虽未达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奇观。"

记庚子事变的小说,最主要的有忧患余生《邻女语》。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引《清代轶闻》语云:"《邻女语》一书,记庚子国变事颇详确,文笔清隽可喜,实近日历史小说之别开生面者。惟十数回后久未续成,坊间亦未易寻觅,询之书贾,多不知是书名矣。"按此书最初载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癸卯(1903)卷与甲辰(1904)卷,刊十二回即中断,民国二年(1913)由商务印行单本,亦已绝版。书中记两宫西巡后北上沿途情形,可与吴趼人《恨海》记南下作一对比,文字确是"清隽"。

吴趼人小说写庚子事变的有《恨海》,部分涉及的有《新石头记》。《恨海》是写两性关系的"写情小说",以自北而南的逃难出京,作为了故事的背景。写从北京到达天津途中的混乱,其情况有如《邻女语》中之清江浦。

林纾(琴南)关于庚子事变的著作,《蜀鹃啼传奇》外,有小说《京华碧血录》。这是以叙述庚子事变为主,用两性关系贯串全部事实的小说。

又有署艮庐居士的,在《杭州白话报》上作《救劫传》十六回,演述义和团事,从和海外通商,一直写到《辛丑条约》完成。对义和团责难备至。对帝国主义所施与民众之残暴,则一笔不及。文笔也很拙劣。此外涉及此番事变,见到的还有《宦海升沉录》(黄小配作,香港《实报》刊)、《冷眼观》、《铸错记》(伤心人)等。入民国后,吴公雄作《义和团演义》十六回,徐哲身作《红灯罩》三十二回,所搜材料,虽较前此各种丰富,但并无特殊成就,见解亦甚反动。

北京西城义和团揭帖

在北京某一条街上,有义和团团民在半夜看见一位天神突然降临到他们面前,天神默立了许久,全区团民俯伏祷求,然后才听见一种震人的声音说道:

"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下凡。知汝辈虔心信神.

特降凡颁旨，今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日夜熟思，本想命令天兵天将下降凡尘，但又想到他们也无力挽回天运，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

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二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

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善行必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我今明白示汝，汝辈可将天意传播各处。”

这是我亲眼所见，因此大胆执笔记下来，凡信这个揭帖所说的人，将有善报，不信的人，将有恶报。上天愠怒，皆因毁了玉皇庙。玉皇大帝看出只有义和团虔诚信天，向天祈求。

如果以上我所说的是故意假造的，五雷将霹了我。

（阴历）四月一日（1900年4月29日）

（摘自《义和团资料》）

警告《国闻报》之二（天津泥城）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到处有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其余驱逐回国去，免来中华逞奇能。《国闻报》上多妄语，乱语胡言日日登，该馆只因日本保，大胆造言毁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此等语，焚烧馆屋不容情。众家兄弟休害怕，北京尚有十万兵；等待杀尽洋人后，快快回转旧山林。

焚坏《国闻报》（天津梁园门）

馆檄文七绝四首

我皇悔过弱转强，御封长老坐帅堂。
东西不下三元日，扫画中华黄晴（睛）郎。

册年太梦以觉先，丹襟皮履搅人间。
分界布教遭众怒，寰海督起义和团。

国闻报馆言语狂，戊亥（戌）年中归东洋。
此后何人匪各论，天谴难容灰烬亡。

商农无惧各自安，北阙江山有万年。
但待泰西远剿后，昆弟飘然归于山。

（义和团）

小说《邻女语》

作者连梦青，主要内容如下：

作品是写一个有志青年，愤于联军入京，北方大局糜烂，想努力于救济。变卖了家产，偕一仆由陆路北上，书中即写其沿途见闻。很遗憾，当写到快抵天津时，竟捺下少年，用六回书，连写两个官僚在事变期间的“话柄”，破坏了全书统一性。可以用一个实证，即是此书前六回，用的是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作方法，用“我”作了线索，处处与主人公有不可分的联系。后面是另起炉灶，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的手法，完全排开主人公，各自起迄地写“话柄”，因此形成了绝对的不调和。如果能不中途变更计划，依照前六回的方法写下去，那真将成为一部优秀的著作。

《邻女语》除后六回后叙的两上“话柄”外，其精彩优胜处在于写清江浦的情形，写旅店关于赈灾的哀诉，写山东民间的痛苦，都极真实，笔力亦清隽动人。描摹北方人物，则以第三回写王家营一个卖马的为最好，写出了一种强悍的英雄的性格，写清江浦老尼亦不差。书名所以叫做《邻女语》，是除不磨所目见的事实外，大都出自各地女性的报告，如听隔板尼姑谈话，隔壁女性悲唱，邻店女东怕赈灾大员的小语等等。

小说《恨海》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如下：

作品故事是：“一个广东的京官陈戟临，有两个儿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张家的女儿棣华；小的仲蔼，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儿娟娟。后来义和团起，陈戟临一家被杀；伯和因护送张氏母女出京，中途冲散；仲蔼逃难出京。伯和在路上发了一笔横财，就狂嫖阔赌，吃上了鸦片烟，后来沦落做了乞丐。张家把他访着，领回家养活；伯和不肯戒烟，负气出门，仍病死在一个小烟馆里。伯和死后，棣华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蔼到南方，访寻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后来在席上遇见娟娟，原来她已成了妓女了。”

书中主要的，是写伯和与棣华母女冲散，棣华一路奉母南下，经过种种的艰苦，母亲因惊吓致病，死在途中的情形。就在这过程中，吴趼人不断地写了在庚子事变联军

入京后的南来途中状况。最显出混乱情景的，是写棣华母女和李富(仆人)雇船到山东德州，路经天津附近的时候。

是夜就在西大湾子停泊过宿，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船户百般为难，在船缝里钻行，从日出时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这还是幸得船小，才有缝可钻，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难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涨了，船户又起来觅缝钻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续被大船挡住，只得泊了。如此一连三天，不得过去"(第六回)

后来到了静海，情形是更甚于此："谁知避难的船，比西大湾子更多，一望无际，都是帆樯，仍旧在船缝里钻过去。无奈此处河道甚窄，竟有终日不能移动一步的时候。"水路上的混乱与难行，可以想见。在西大湾子的第三天，作者又写了天津的大火：

"棣华出到船头，站起来，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远远的起了六七个火头，照得满天通红，直逼到船上的人脸上也有火光影子。人声嘈杂之中，还隐隐听得远远哭喊之声，不由得心头小鹿乱撞。忙问李富：'是那里走水?'李富道：'还不得确消息，听说是七八处教堂同时起火，都是义和团干的事。'棣华再抬头望时，只见岸上树林中的鸦鹊之类，都被火光惊起，满天飞舞，火光之中，历历可数。天上月亮，映的也变了殷红之色。"(第六回)

至于一路上的虚惊，谣言，恐怖，枪声，外国兵，也都是应写尽写了。无往而不反映了一种乱世状态。又借伯和在天津候棣华，写了一些天津城破后的情形；借仲蔼写了北京。因为《恨海》不是正面的写庚子事变，所有的只是这样的鸟瞰，在素材方面是没有《邻女语》丰富，然而，也尽够看到当时情形的一斑了。

小说《京华碧血录》

作者林琴南，主要内容如下：

该书以叙述庚子事变为主要素材，用写两主人公的恋爱经过贯穿全部史实的小说。书中男主人公邴仲光，自幼聪颖异常。他出去游玩在水边偶然看见一个打渔人，打捞出一柄碧色锋利的古剑。渔人认为是不祥之物，要投回潭中，被邴仲光以重金收买。得剑数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小西湖开化寺遇到了一个名叫僧履的老僧，甚通剑术，于是便拜他为师。后来从老僧那里得知杭州祖塔院有个名叫僧蠲的僧人剑术甚精。浙西的公书高铸龙，相约仲光入都时去杭州看超山梅和宋梅。仲光借去杭州之机在僧蠲处学艺四个月。书中女主人公刘丽琼是一个能书善画，贤淑貌美的女郎。仲光在去超山观梅的途中，二人偶然相遇，一见钟情。当时"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正在兴起，社会上正在发生庚子事变，到处一片混乱。几经磨难，事变后二人终于在溏西小村完婚。小说中史料殊多，对于义和团的本体，事变的全部经过，生灵的涂炭，联军的残酷，无一不涉及，并且叙述详细。在言情、写景上较委婉曲折，极尽其妙。

诗歌《记外国联军入犯京师》

压城云黑饿鸱鸣，
齐作吹唇沸地声。
莫问空拳驱市战，
余闻扈跸六军惊。
波臣守辙还无恙，
日驭挥戈岂有名。
闻道重臣方受节，
料应城下再寻盟。

(黄遵宪)

历史档案

宣战上谕

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鸱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钉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教民、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

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作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而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摘自《清德宗实录》）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

（一）

阁下：

过去几个月中，山东省北部遭到许多和各种秘密结社有联系的暴徒的骚扰，他们反抗官府，劫掠人民。一个称为“义和拳”的组织特别著名，他们的暴行最近已扩展到直隶南部的大片地区，由于这些匪徒的不法活动，看来该地区的中国基督教徒较其他居民甚至受害更重。因此，外国教会组织在这两省中所面临的危险，已成为其他各国使节——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公使——和我本人向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的主题。

上月初，山东巡抚毓贤奉命离职，前来北京觐见；袁世凯将军被任命为署理巡抚，接替毓贤的职位。

在直隶南部，处理骚乱的任务已交给驻天津的总督。女王陛下驻天津领事曾向总督反复申诉：在受叛乱影响的地区，对英国人生命财产所提供的保护不够充分。由于这些申诉和我本人致函总理衙门的结果，他们已派驻卫队，专保护遭受危险的教会房屋。上月29日，我乘机写信警告总理衙门说：如果不有力地平息骚乱，很可能将引起国际纠纷。

因此，由于很了解山东北部的情况，我于本月2日极为不安地收到鲁北平阴教会通过此地英国国教会史嘉乐主教送来的一份电报，报告说：12月30日，该教会的卜克斯先生在肥城县遭到“义和拳”三十人的袭击、伤害和逮捕。

我立即派助理中文秘书柯韪良先生将该电报内容通知总理衙门，并且要求向山东巡抚发出紧急电令，指示他采取措施对付暴徒，特别是使传教士获得释放。

总理衙门章京们说：该衙门已经得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消息，并且已向山东发出电报询问详细情况。他们答应将我的电报报告给大臣们，并发出另一份电报。他们说：新任巡抚袁世凯已经到达省城，并接印视事。

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当我询问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巡抚已迅速采取措施，以便使卜克斯先生获得释放。可是，总理衙门感到非常遗憾，他们于当天早晨收到巡抚的一份电报，该电报告说：奉派赶往肇事地点的候补知府到达后，才发现卜克斯先生已于12月31日（即被捕的第二天）遭到杀害。他们当时正准备发一封公函，将此不幸消息通知我，并表示中国政府的深切惋惜。

我荣幸地将这封公函的副本随信送呈阁下。除了该公函中所谈到的详细情况外，我后来获悉，这位不幸的人系被暴徒斩首，而且他的尸体被扔入沟中。

我在会晤时告知总理衙们大臣们，我已了解他们所表示的歉意，同时强调：重要的是应当采取有力的行动处理这个案件，并防止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以证明他们的歉意是真诚的。

昨天，当总理衙门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们前来使馆进行每年一度的新年正式拜访时，大学士王文韶告诉我，皇帝和慈禧太后特别授权他，向我表示朝廷听到这个暴行时所感到的深切忧虑。他说：正颁发一道上谕，下令立即捕获凶手，并惩罚失职官员。

大学士所说的那道上谕，已于今晨在官报上发表，我荣幸地将其译文随信附上。

昨天，我曾将卜克斯先生被杀的消息，以及我从朝廷得到的关于此事的通知的主要内容，荣幸地电告阁下。

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

在今晨向总理衙门提出的一件照会中，我乘机提醒大臣们，在卜克斯先生被杀的那个地区，还居住着其他的英国传教士；同时使大臣们记住，必须使这些传教士得到有效的保护。然而，关于他们的安全，我并不抱有严重的顾虑，因为不久以前已经派驻卫队，保护各传教士的住

宅。那个不幸被杀的传教士，是当他乘坐手推车旅行，无人护送，穿过暴徒横行的乡村时被捉住的。

窦纳乐谨上(签字)1900年1月5日于北京

（二）

阁下：

我在1月31日的信中，荣幸地将我本人和我的美、法、德、意等国同事们于1月27日向总理衙门提出的一件同文照会的副本送呈阁下。在该照会中，我们要求发布一道上谕，明确取缔山东和直隶的反对基督教的结社。

由于没有得到回答，我们于2月21日又写信催促答复。2月25日，我们各自收到照会，我把照会的副本随信附上。阁下将看到，在这个照会中，总理衙门错误地引用了它所答复的那个照会，没有提及我们要求镇压的两个结社中的任何一个，而且仅说明已经发布一道上谕，命令各该省巡抚制止骚乱。

我本人和其他四国使节认为这个照会是很不满意的，所以我们决定要求同总理衙门会晤，届时庆亲王必须出席，同时我们准备了会晤时递交的一件同文照会，我把该照会的副本附上。在照会中，我们重述了已经提出过的要求，附加的条件是：我们所要求的上谕，必须按照1月11日那道有害的上谕所采用的方式一样，在官方公报上发表。

会晤安排在本月2日。本月1日晚上，我们各自收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和附件，我荣幸地将其译文随信送呈。附件中有直隶总督的一个布告，其中包括一道上谕，该上谕用明确的词句取缔"义和拳"。

如果这件照会最初就送来作为对同文照会的答复，那么，如同我后来对总理衙门所说的那样，它大概已被有关五国使节满意地接受。可是，鉴于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迟缓，以及对该上谕关于结社的意图抱有严重疑虑，这个疑虑是2月24日总理衙门照会的闪烁其词所引起的，所以在我们赴总理衙门之前所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已经拟就的同文照会中所制订的要求。

美国公使康格先生、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候爵、法国代办唐端男爵和我本人，在总理衙门受到了庆亲王和几乎所有大臣的接见。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扼要说明了上面已经详述的情况，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现在提出要求。我的同事们都向庆亲王和大臣们表示他们完全同意我所说的话。康格先生促使总理衙门回忆三个多月前他们听到他谈及这些骚乱时所抱的怀疑态度，以及他们从那时候起作的诺言，这些诺言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克林德男爵特别强调这个事实：在刚刚送来的那道上谕中没有提及"大刀会"，而对该会的取缔，同对"义和拳"的取缔一样，我们已经提出要求。

庆亲王和大臣们着重申明：朝廷对于制止这些结社所犯暴行的决定是严肃认真的。他们认为：传播上谕所采用的方法，即把上谕送交有关各省巡抚，将它包含在一个告示中并照此办事，比我们所建议的在《京报》上发表上谕的方法，要更迅速和更有效得多。关于上谕中没有提及"大刀会"这个名称的问题，他们声称：该会与"义和拳"现在是一回事。

虽然我们承认该上谕以及通过告示传播该上谕所表现出来的诚意，但是，总理衙门所用的一切论据都不能使我们相信：对于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在公报上发表上谕一事，除了不喜欢听从外国人的旨意之外，他们具有任何真正的反对理由。因此，我们递交了已经拟就的同文照会。

总理衙门答应考虑这个问题并提出答复。

窦纳乐谨上(签字)1900年3月5日于北京

（摘自《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原近时守旧之祸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二十一日

支那内政之变态，始于戊戌一岁。戊戌四月恭王薨。恭王薨而后废立之谋急；废立之谋急，而后有皇上之革政；有皇上之革政，而后有八月初六日之变；有八月初六日之变，训政政府集数十顽固党徒，行至愚极谬之计，而后有庚子义和团之事；此贯言之也。若析言之，可约分为三期：一、戊戌四月，恭王未薨以前，苟安姑息，沈酣泄沓，既不致治，也未召乱，可称之为因循期，则恭王当国为之也。一、戊戌四月以后，皇上盛精图治，卓厉奋发，箴砭锢废，改易观听，新机芽萌，日长炎炎，可称之为刷新期，则皇上变政为之也。一、戊戌八月以后，太后训政，旧党用事，其时政策，期废立之必成，一也。重用满人，疑忌汉人，二也。疾恶新法，仇恨西人，三也。搜捕志士，四也。纵用匪党，五也。用自昏之政，而自谓至明，行极妄之策，而自谓极当，可称之为顽固期，则训政政府为之也。

当训政之时，大小臣工，颂声洋溢，曰重见天日，曰昌明正学，曰四夷宾服，曰我辈纵不敢自夸，足致三十年太平。乃曾几何时，所谓重见天日者，而干戈扰攘，海内惨淡矣。所谓昌明正学者，而书符念咒，神仙降世矣。所谓四夷宾服者，而隆准碧眼，长躯直入矣。所谓足致三十年太平者，不二年而九庙震惊；两宫蒙尘，万姓涂炭矣。

嗟乎！日暮途穷，人间何世！中光道销，穷于戊戌，每论及此，未尝不叹息痛恨于祸首也。虽然，事之穷也，则必变，物之极也，则必反。今夫国家外交之政，开国与锁国而已，内治之政，维新与守旧而已。锁国之不足以自立，守旧

之不足以致治，一二贤者，涤知其故，而数年来水火之攻，冰炭之投，正由争此理，而未有定，今且无论其理，而认其效为断，如欲锁国，必其力足以抵御外人，使之不入一口，不登一岸而后可。而今者，数十万之武卫军，数百万之义和团，自倾岁以来，朝廷宗旨，日以练兵筹饷为事，朔方五军，号称劲旅，远在昔日湘淮诸军之上，而又购储枪药，足备开战半年，一年之用，其谋深矣。义和国之根诛，北及长城，南至大江，齐鲁燕赵合并而起，其人众矣。犹且号之日，有神术，为天兵，乃一战而败，再战而败，曾犗捂数月之不能，又何灭洋之足云。是则锁国之政，不可行于今日者，审也。

至于守旧维新，即与开国锁国相表里。当锁国之时，无各国强弱之比，智愚之比，我用我法，犹无害耳。而今者大地交通，国与国相见，种与种相见，见而其民之智者胜，愚者败；其民之有学者胜，无学者败；其政之善者胜，若者败；其兵之精者胜，劣者败；其商之通者胜，塞者败。所谓维新者无他，开其民智，使其学术政治兵商诸事，去己之短，取人之长，改良而适于用，臻于上等之谓也。使学而有进步，则新矣。政而有进步，则新矣。兵商而有进步，则亦新矣。

今必画守故武，惟守旧之为善。则夫徐桐之每见西人，以扇掩面；刚毅之目学堂为养汉奸；崇绮之一生未尝见报；赵舒翘之约同乡，使其本省永无开矿之事；李秉衡之见洋操衣服，故作惊视之状，而东南立约，诋为病狂；端王之于言和之臣则杀之，家家之开明者则杀之，此数人者，固已极中国之造，而济济一堂，赞襄密易，中国再欲见此众正盈廷之象，而不可得，使盛气而可以御夷耆而可以却敌，度此数人者，其效方可见矣，而何以联军鸱张、筹策毫无、窜者窜、死者死、至于今日，欲战而不能，求和而不得，何畴昔之气雄，而今兹之志馁也？是则守旧之不足用于今日者，又审也。

自十九周以来，地球各国，无不以维新而兴，守旧而弱，试读各国之史，彰彰具在。特各国维新，多在十九周之初，而合运交通，及乎中国，乃在十九周之末。迟速悬以百年，所谓文明殆亦有岁差耶！今既不能闭关谢客，守老死不相往来之俗，即不能不交通，并立收进化改步之效，日本其前事矣。尚维新，主开国，日本之所以兴盛也；重守旧，期锁国，中国之所以衰颓也。此亦当世得失之林，成学治国，开者可以鉴焉。

（摘自《中外日报》）

刘坤一、张之洞会衔电奏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奉廿四日寄谕，饮遵续准袁世凯密电。奉二十五日寄谕，拳会在津助官军获胜，降旨嘉奖，饬各省招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办法迅奏，沿江海尤宜急等因钦此。窃谓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目下大沽已失，京都危急。拳会仅持邪术，各国非比流寇，虽幸获胜仗，各国断不甘心，势必增调重兵报复，俄日两国陆兵最多，其来最速，现俄用装茶轮船改赴旅大装兵，英调印度兵，法国西贡兵，美调小吕宋兵，日本调广岛兵，连德国陆兵当不下八九万，断非董宋聂诸军所能抵御。拳会无纪律，可胜不可败，败则四散，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岂有拳会可操常胜而无一败之理，鏖战旬日，药弹必竭，接济无从，更何能以血肉之躯与炮火相搏，一旦兵败会散，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家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极思变计者也。沿江一带会匪盐枭安庆道友甚多，与拳匪各自为党，平时专以抢劫为事，口号悖逆之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臣等已将防务密为筹备，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江宁汉口英国领事迭来臣等署中面商，欲派兵舰多艘入江保卫商教，臣等以力任保护，坚辞阻之，该领事已允不再派舰。上海各领事处并经饬令江海关道密为转商，亦各允许。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名国觊觎已久，惧英国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现在尚属安静，自可暂与周旋，仍一面严密筹备，惟沿江防军甚单，精械不能一律，虽酌量增募，利钝向无把握，一经宣战，各国封我海口，沪局军火不能运出，将士战守奋勇，亦无弹药接济，沿海各省纷扰可虑，防不胜防。闽浙广东兵力亦薄，甲午以后存械无多，从前法越之战，日本之战，开衅皆止一国，军械弹药尚可设法分购密运，勉支半年，故一国尚可力战，若谓可以抵拒各国。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外衅一开，内匪四起，更难措手。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事机甚紧，所关甚巨，谨披沥上陈。再出使各国大

臣，此时勿遽行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合并沥陈。臣坤一、之洞。

（摘自《清德宗实录》）

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通牒

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自宜就目前环境许可范围内，表明其态度。我国坚守一八五七年所创的政策，即对中国保持和平促进合法商业及用国际公法与条约上的治外法权所保证之一切方法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如有伤害我国公民情事，我们应使行为者负最大的责任，我们认为北京政府情形无异无政府状态，因之权力与责任实际上已落在省当局身上，只要他们不公然与叛徒合流，并运用其权利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我们就认定他们便是我们所要保持和平及友好的中国人民代表，总统的目的仍旧是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第一打开北京的通路，解救美国官员、教士及其他陷入危害的美国人民；第二尽力保护在中国各地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防护一切美国合法利益；第四协助防止骚乱蔓延中国其他省份，并防止其再发生。目下预料达成上述结果之方法自属过早，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

（摘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1日　清政府发布上谕，指示要在习武者中区分良莠。

1月12日　清廷令“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党”，命各省督抚严拿惩办。

1月24日　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立嘉庆皇帝的曾孙、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以取代拟废的光绪皇帝。因这一年按旧历是己亥年，故又称“己亥建储”。还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不久，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就几欲废黜被幽禁的光绪皇帝。1899年10月，军机大臣荣禄向慈禧献密计说：“上春秋已盛，无皇嗣，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即同治皇帝)，育之宫中，徐篡大统。”慈禧采纳此计，遂立溥仪为大为阿哥。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慈禧太后除派李鸿章探听各国公使的态度外，还亲自设宴请各国驻北京公使的夫人们。但因英、日等国公使以及上海绅商和维新人士的反对，慈禧的废立计划终成泡影。

首任会长杨衢云请辞兴中会会长职。

1月27日　英、美、法、德、意公使照会总署，以12日诏文含浑，再请严禁大刀会、义和团等。

2月8日　先是知府经元善联名千二百三十人上书谏立嗣，至是下诏严捕治罪。寻籍其家。

2月14日　清廷又命闽、浙、粤各省悬赏十万两，严拿康有为、梁启超，并命毁其所著书籍，购阅其报章者并罪之。

2月21—22日　山东滨州张肯堂地方河水漫口，夺溜直趋东北，历滨州、惠民、阳信、利津、沾化等境，由泽河入海。4月合龙。

3月2日　清廷命地方官捕拿严办设厂练拳棒者。

3月7日　清政府拒绝在京报上刊登镇压义和拳的上谕。

3月14日　清廷以毓贤为山西巡抚，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

3月27日　天津城南义和团击败清军。

4月2日　任邱团民击败清军。

4月26日　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议谋广东起义。

4月29日　广西西隆州会党入州城，旋即退出。

4月30日　涞水县高洛村民建立拳厂。5月12日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

5月20日　义和团歼灭副将杨副同部清军于涞水。

5月23日　保定南姜家庄义和团与天主教不法教民作战，清军帮助不法教民镇压义和团。

5月24日　清廷实授李鸿章为粤督。

5月25日　北京步军统领、五城监察院和顺天府等衙门联合发布《禁拳章程》和《告示》。

5月27日　直隶义和团占据涿州城。团民焚烧琉璃河车站，阻止清军进攻。

5月28日　团民袭击长辛店芦沟桥车站，芦保京津铁路中断。

5月29日　团民烧毁丰台车站。

清廷命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严拿匪首”解散胁从”。

5月30日　清廷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直

隶总督严饬地方官并统带各员合力镇压义和团。

6月2日　团民抵抗在大沽登陆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

6月4日　清廷派赵舒翘、何乃莹去涿州察看义和团,6日加派刚毅前往察看。

6月6日　团民与外国侵略军战于津郊。

清廷令教民拳民,不准相仇,并于此谕后饬直隶各军实力镇压义和团。

6月8日　义和团在北京外城示威,高呼"杀洋鬼子"。

6月9日　清政府下旨招抚义和团。

6月10日　清廷派端王载漪管理总署,礼部尚书啟秀、礼部侍郎那桐、工部侍郎溥兴在总署行走。

英海军中将西摩尔 E. H. Seymour 率二千余名各国混合军,离津开始向北京进犯。

6月11日　日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接应外国侵略军,被甘军杀于永定门外。

6月12日　西摩尔军抵廊坊。

6月13日　义和团开始在京焚烧教堂。

清廷命宋庆饬马玉崑克日带兵驰赴近几一带,沿途实力镇压义和团,仍著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又调聂士成军禁阻外国侵略军北上。

天津租界外国侵略军炮击车站团民,团民出动大队进攻租界。

6月14日　天津义和团焚毁城内教堂。

云南昆明人民反对法领事违约运械及开枪伤人,焚毁天主教教堂。

北京公使馆外国侵略军放枪巡街挑衅。

6月15日　清廷命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并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镇压京城内持械喊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之爱国人民。

召李鸿章、袁世凯入卫。

各帝国主义国家舰队司令会议大沽口,议决出兵,发表宣言,助清"剿匪",以屠杀中国人民,扩大侵略。

6月16日　北京团民进攻北堂。

清廷命刚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壮者成军,其余遣散。

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

召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来京。

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

6月17日　清廷命荣禄派武卫中军前往东交民巷一带,保卫各国使馆

清廷令以"民教寻仇,京城内外,扰乱已极",命各省督抚迅速派队伍,星夜驰赴来京。

下午再召大臣会议,太后、载漪意见主战,遣徐用仪、立山、联元至使馆,劝下旗归国。

英、俄、德、法、美、意、奥、日本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英驻汉口领事与湖广总督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

6月18日　董福祥军与团民败西摩尔军于廊房。西摩尔军退守落垡。

太常寺袁昶奏局势危迫亟图补救。

朝旨再传大臣入见,仍议和战。

清廷电令李鸿章迅速来京。

6月19日　大沽之战报到,午后三点再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告各国公使二十四小时内出京。

6月20日　清廷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共挽全局"。

虎神营击毙德使克林德。

公使馆开枪启衅,义和团开始攻打公使馆。

6月21日　宣布宣战谕旨。

清廷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

俄将率帝国主义侵略军进犯天津。

西摩尔军退据天津城外之机器局。

6月22日　清廷发给义和团二万石粳米。

6月23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天津车站。

清廷命将"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节,谕知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并命遵旨相机极力办理。

6月25日　清廷赏虎神营、义和团各十万两,甘军武卫军亦有赏。

载漪率众进宫,谋杀光绪帝载湉,被慈禧太后阻止。

6月26日　清廷命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

刘坤一、张之洞派上海道余联沅与上海各国领事商定中外互保条约,另订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

西摩尔尽毁机器局,退回天津租界。

6月27日　刘坤一、张之洞等会奏"无拳匪可招"。

清廷命江苏巡抚鹿传霖迅速来京。

6月28日　张德成率团民五千人到津应援。

6月29日　清廷命将朝廷严饬带兵官保护使馆相机惩办拳民照知各国外部。谕准李鸿章等奏请照成案按期解还洋款。

6月30日　荣禄拒借武卫军大炮。

7月3日　清廷电命驻日、英、俄三国公使呈递国书,请设法"挽回时局"。

以时机紧迫仍命李鸿章迅速来京。

7月6日　聂士成军在天津小西门击退外国侵略军,乘胜进至跑马厂、八里台。

7月7日　清廷杀张荫桓于戍所。

命李鸿章迅速来京,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

7月8日　清廷授李鸿章为直督兼北洋大臣。

7月9日　清廷授李鸿章以全权名义,与各国协商。

山西巡抚毓贤,传集外人于巡抚衙门尽杀之。

清廷再令李鸿章无分水陆兼程来京。

清军与帝国主义侵略军激战于天津南门外八里台，聂士成阵亡。

7月12日　袁昶奏请保护使馆，维持大局。

7月13日　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下令军中大量杀害拳民。

7月14日　宋庆、裕禄、马玉崑退守北仓，天津失陷。

7月17日　孙中山在香港舟中召集会议，决定郑士良起义惠州。

李鸿章离粤北上。

清廷致法、德、美三国电，请挽时局。

电谕保护各国商民，命各省督抚及统兵大员镇压“各处土匪乱民”。

俄舰行驶于黑龙江，清军自瑷珲击之。俄军屠杀华人数千。

7月18日　清廷再令各省督抚，“敌兵来犯，当同心御侮，以保疆土”，“和之一字，万不可存于胸中”。

7月21日　李鸿章到上海观望，暂不北进。

7月23日　清廷电令李鸿章迭次电召兼程来京，迄今并无起程确期电奏，命接旨后，无论水陆，即刻起程。

7月26日　维新派在上海组建政治团体——中国国会。是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爆发。7月，唐才常拟用国会名义，在上海召集维新人士开会于张园(原设于今北京西路泰兴路口)，称“中国国会”。会议推选容闳、严复任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林圭、沈荩等任干事。会议提出三个主张：(1)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2)决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3)请光绪帝复辟。毕永年劝唐才常断绝与康有为来往，未果。章炳麟反对“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矛盾主张。自立军在汉口举事失败后，国会首要成员被清政府通缉，中国国会遂造解散。

清廷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诸军并听节制。

7月28日　清廷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8月2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自天津向北京大举进犯。

8月4日　中丹英订立沪沽水线合同。

北仓失守，马裕崑军败，裕禄走杨村。

俄军数路向东北进犯。

8月6日　浙江江山县会党吴癞头集合闽省浦城县刘加幅竖旗起义，连占江山、常山二县，清廷命刘树棠进攻。

杨村失守，裕禄自杀，宋庆退守蔡村。

8月7日　李秉衡率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陈泽霖四军出阻帝国主义侵略军。

清廷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妥商议结事宜。

8月8日　李秉衡战败于蔡村。

北京清军马队残杀拳民。

8月9日　大通秦力山自立军起义，21日失败。

张春发、万本华等军败于河西坞。

8月10日　西太后议西行。

8月11日　清廷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李秉衡战败于张家湾，死之。

8月12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通州。

8月13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与甘军战于北京广渠门。

8月14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入北京。

8月15日　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皇后、大阿哥、李连英以及载漪、刚毅等少数大臣着微服仓皇逃离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于是慈禧太后仓皇逃离北京。行前，慈禧命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慈禧一行出德胜门经怀来、宣化、大同、太原，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在西行路上，慈禧太后于8月24日任命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9月7日，发布“上谕”，宣布痛剿义和团。

8月17日　太后等逃至怀来县。

8月18日　清廷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

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

8月20日　下诏罪己。

8月21日　唐才常自立军汉口事泄失败，次日唐才常等就义。

8月24日　清廷命李鸿章“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

8月25日　黑龙江将军寿山，派营务处程德全与俄议定停战，允俄兵至省城。

8月26日　太后等逃至怀安。

俄军陷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

8月27日　诏奕劻还京，会同李鸿章议和。

毓贤开晋抚缺。

8月30日　太后等逃至山西大同府。

8月31日　清廷派刘坤一、张之洞随时函电会商和议。

9月3日　日军护卫奕劻回京。

9月4日　清廷以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并赏给头品顶带。

9月7日　清廷令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授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刘坤一、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均准便宜行事。

上谕“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

巢除不可"，命直隶地方官大力镇压。

9月10日　太后等至太原。

9月18日　李鸿章自沪抵津。

9月23日　俄军侵入吉林。

9月25日　清廷令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差停俸交宗人府严议，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交各该衙门严议，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

9月26日　俄军侵占沈阳，东北尽入俄手。

10月8日　郑士良和黄福奉孙中山之命在惠州归善三洲田集合三合会党80人，猛袭安沙湾。驻守清军溃逃后，旋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新安县城。15日与清军战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俘敌数十名。继又在镇隆大败清军，生擒管带杜凤梧。其后，在永湖、崩岗再败清军。21日，经龙冈、淡水进至三多祝，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孙中山拟亲自从台湾内渡指挥全军，后因日本台湾总督不准他登陆，只好派人传其指示，请郑士良自决行止。郑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解散起义队伍。

10月11日　李鸿章抵京议和。

盛京将军增祺派周冕与俄订立奉天交地暂且条约。

10月13日　法军侵入保定，18日德军侵入保定。

10月16日　英德协约议定。

10月17日　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使臣，和议开始。

10月22日　惠州起义军至三多祝，接孙中山电，外援难期，郑士良宣布解散。

10月26日　太后等逃至西安。

中丹英订立沪沽新水线及京津沽陆线暂行合同。

10月28日　史坚如响应惠州起义，炸总督衙门，次日被捕，11月9日死难。

11月13日　清廷令削载漪王爵，载勋、载滢、溥静交宗人府圈禁，载濂著闭门思过，载澜停全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已故免议，赵舒翘革职，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

11月17日　团民袭击津沽间护路兵。

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总司令瓦德西抵京。

11月29日　清廷允张之洞奏请武昌北门外十里地方自开商埠。

12月2日　拳民二人炸毁联军占据之天津东局火药库。

12月3日　清廷命董福祥革职留任，带领亲军数营，回甘肃扼要设防。

12月10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设立管理北京委员会，由俄、英、日、美、法各派一人组成。该委员会把搜捕、镇压义和团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还向北京居民收缴军器、强派劳役、苛敛捐税、横施淫威。

12月24日　议和大纲十二条成。

12月27日　上谕以"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屈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一概照允。

12月28日　清平地方苗民起义，旋败。

军　事

3月13日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

4月11日　黑龙江抗俄武装攻入巴彦城，袭击俄兵营。

4月19日　清廷命袁世凯集新兵二十营，增立一军，为武卫右军先锋军。

6月1日　50名德军由津乘火车抵京。

进京的法、意军40人前往西什库教堂"护卫"。

6月2日　奥国第一艘军舰"岑塔"号驶抵大沽。

6月3日　30日奥军由津乘火车抵京。

6月9日　清廷调董福祥甘军入京，驻扎天坛。

6月11日　甘军在北京永定门击毙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

西摩联军抵达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

总署派许景澄、袁昶前往使馆劝阻各国调兵进京。

6月12日　俄国东西伯利亚第十二团在大沽登陆。

总署再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恳大沽示威。

6月13日　西摩联军仍困于廊坊。

各使馆卫队不断在京挑衅。

6月15日　俄国基利杰勃兰特海军中将在大沽邀集各国海军将领策划进攻大沽炮台，并派兵占领塘沽和军粮城火车站。

驻津俄军抢占天津老龙头火车站。

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来京觐见。

聂士成率部抵津御敌。

义和团开始攻打北京西什库教堂。

6月16日　各国舰队司令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令其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

西摩联军决定退回杨村，改由水路北犯。

日军服部雄吉中佐率330名水兵驶抵大沽。

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商讨招抚、宣战事宜。

6月17日　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紫竹林租界联军进攻天津武备学堂。

俄国确定不公开领导对中国作战的总政策。

天津军民开始围攻紫竹林租界和火车站的联军。

清政府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进京勤王，并再次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宣战事宜。

6月18日　西摩联军在廊坊遭到甘军和义和团的猛烈阻击，于次日开始了向天津的总撤退。

俄国东西伯利亚第九团及哥萨克骑兵共2000余人抵大沽。

天津军民堵截由紫竹林分路出扰的联军。

6月19日　紫竹林界内的联军派窝次一行到大沽求援。

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宣战、攻打使馆区和招抚义和团。

6月20日　虎神营章京恩海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

驻京清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各国使馆。

6月21日　清廷发布宣战和招抚上谕。

6月22日　西摩联军在败退途中占领西沽武库，并派人前往紫竹林求援。

法国增派两营海军部队来华。

6月23日　西沽武库守军与西摩联军争夺武库。

联军进攻天津机器局。

英军攻占并焚毁天津陆师学堂。

大沽援军进驻紫竹林。

清政府任命载勋、刚毅统率北京天津义和团。

6月24日　紫竹林界内俄军出击天津城东大直沽村。

6月25日　紫竹林的救援部队到达西沽武库。

清政府在使馆附近竖起"钦奉懿旨，保护使馆"的木牌。

6月26日　西摩联军被救援部队救回紫竹林租界。

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

6月27日　俄国等侵略军攻占天津东机器局。

曹福田给驻津联军下战书。

6月29日　阿列克谢耶夫由旅顺驶抵大沽。

天津军民再次攻打火车站。

马玉昆率武卫前军7营到达天津参战。

6月30日　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提出"对华行动"的基本政治原则。

7月3日　美国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

清政府向俄、日、英三国发出求和国书。

7月4日　威廉二世为来华德军送行。

7月8日　清政府调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7月9日　日军血洗天津城南纪家庄。

聂士成壮烈牺牲于天津八里台战场。

7月10日　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抵津。

俄、法等国军队由大沽增援紫竹林。紫竹林联军布防准备攻打天津城。

7月11日　天津军民攻打紫竹林租界和火车站。

宋庆命令所部"痛杀拳匪"。

7月12日　紫竹林联军举行司令官会议，决定次日分两路攻打天津城。

7月13日　联军按计划向天津城发动总攻。宋庆、裕禄、马玉昆率部退到北仓。

7月14日　联军攻占天津城。

7月15日　联军对天津城实行分区占领。

7月16日　各国驻大沽舰队司令开会，将天津至大沽的铁路交由俄军管理。

阿列克谢耶夫在津邀集各国指挥官讨论成立天津临时政府事宜。

7月17日　清政府向美、德、法三国发出求和国书。

7月18日　天津各国指挥官同意由俄、英、日3国各委派1名具有同等权力的成员组成临时政府。

清军停攻使馆。

7月19日　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到达天津。

7月21日　李鸿章由广州抵达上海。

7月24日　法军前期司令官福里少将由越南驶抵大沽。

7月25日　英军司令官盖斯里少将到达天津。

各国驻大沽舰队司令开会，拒绝李鸿章来大沽，作出他若来大沽不许他与岸上联系和向清政府请示的决定。

7月26日　慈禧召见李秉衡，令其帮办武卫军事务。

7月27日　威廉二世为侵华德军送行，发布屠杀令。

7月28日　清政府处死主和大臣许景澄、袁昶。

7月30日　"天津都统衙门"成立。

美军司令官沙飞少将到达天津。

7月31日　俄军北直隶部队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到达天津。

8月1日　利涅维奇在津召开各国司令官会议，决定8月4日开始进犯北京。

8月初　俄军在天津老龙头车站东、西沿海河向南地带插上"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字牌。

8月3日　德外交大臣布洛夫支持德皇力争由德国军官担任八国联军统帅。

8月4日　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

慈禧命李秉衡即刻出京御敌。

8月5日　联军攻占北仓。裕禄率军退守杨村。

8月6日　联军攻占杨村。裕禄退到蔡村自杀。

8月7日　德皇任命瓦德西为侵华德军总司令。

清廷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

李秉衡行抵马头，在河西务一带布防。

8月8日　法军留住杨村；德、奥、意军回天津保护沿途运输；日、俄、美、英四国军队由杨村北犯，攻占蔡村，并派侦察骑兵窥伺河西务。

8月9日　联军攻占河西务。李秉衡退驻马头。

8月10日　联军攻占马头。李秉衡退驻张家湾。

8月11日　联军攻占张家湾。李秉衡自尽殉国。

清政府处死主和大臣徐用仪、联元、立山。

8月12日　联军攻占通州。

“天津都统衙门”把天津城区分为8段管辖。

清政府向各国公使和联军统领乞求停战。

8月13日　俄军违约提前向北京进军，各国军队闻讯后亦争先开拔。

8月14日　联军对北京城发动总攻，英、美、俄、日4国军队先后进入使馆区。列强最后同意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统帅。

8月15日　联军向北京内城及紫禁城进攻。京师沦陷。

慈禧携光绪、溥仪等人出京西逃。

8月16日　联军解西什库教堂之围，并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

8月17日　俄国电求各国命令驻大沽的舰队司令撤回阻止李鸿章上岸的决定。

8月18日　800名德军开进北京。

威廉二世接见即将赴华上任的瓦德西及其司令部全体人员。

8月19日　俄军抢占颐和园。

俄国政府命令俄军将主要战场从北直隶转向东三省。

瓦德西由柏林启程来华。

8月20日　日本山县有朋首相提出“北守南进”的侵华方针。

清政府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

8月21日　德皇不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

美国表示支持正在逃亡的清政府。

8月22日　瓦德西在罗马拜谒意王。

英王储访德，与德皇就拒绝李鸿章的代表资格和开放长江流域取得一致意见。

8月24日　俄国向北直隶战场投入最后的两团步兵、三连炮兵和半连工兵。

清政府在太原特授李鸿章“便宜行事”大权。

8月25日　俄国向各国声明，拟将其驻华使团及驻京军队撤往天津。

8月27日　俄国政府令俄军护送俄公使团撤至天津，并令北京、杨村一带俄军也撤至天津。

清政府授奕劻“便宜行事”大权，令其返京议和。

8月28日　联军在紫禁城阅兵、游行。

俄陆军部下达俄军在直隶接受瓦德西指挥的原则。

8月31日　美国声明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大臣。

9月3日　奕劻从宣化返回北京。

9月4日　奕劻拜会赫德，商讨和谈问题。

9月5日　德国提出以“惩凶”为主要内容的对华议和条件。

9月6日　美国威尔逊准将到达北京，任驻京美军司令官。

9月7日　奥匈帝国的蒙泰库科列海军少将率两艘军舰驶抵大沽。

日本声明打算召回超过实际需要的部队。

清政府发布“剿团”谕旨。

清政府加派荣禄为议和大臣，因遭列强反对作罢。

9月8日　驻津联军前往独流镇镇压义和团。

9月10日　法国声明支持俄国自北京撤军的建议。

9月11日　1700名德军攻打良乡县。

9月13日　俄国开始从北京陆续撤军。

9月14日　美军骑兵到京郊沙河镇压义和团。

李鸿章自沪启程北上。

9月16日　联军到八大处镇压义和团，焚戮3日。

9月17日　俄国就撤使、议和代表和开议3问题征询各国意向。

德国提出以“惩凶”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

9月18日　瓦德西抵达香港。

9月19日　联军到京郊西山观音村镇压义和团。

李鸿章抵达塘沽。

9月20日　俄、德、法、奥、意、英6国侵略军攻占北塘炮台。

9月21日　俄军侵占芦台。

瓦德西到达吴淞口。

9月22日　德国向英国提出对华政策三原则意见。

法军后期司令官华伦少将到达天津并接任。

9月24日　“天津都统衙门”开始向居民征收税捐。

9月25日　瓦德西抵达大沽口，并与各国舰队司令策划攻占山海关和秦皇岛。

9月26日　清政府免去毓贤山西巡抚。

9月27日　瓦德西自大沽移驻天津。

俄军焚毁唐山火车站。

9月28日　俄军强占开平、古冶煤场。

俄军沿津榆线进军山海关，在滦州诱逼锦州知府订立《免战保民》章程六条。

美军提出不参加对山海关和秦皇岛的军事占领。

9月29日　俄国公使馆人员撤至天津。俄军大部撤离北京。

西摩与各国舰队司令在大沽部署攻占山海关事宜，会后立即派禧在明等人前去山海关劝降。

9月30日　禧在明劝降成功，英军不攻而占山海关。

10月1日　沿津榆线进军的俄军先头部队赶到山海关。

慈禧一行离太原奔西安。

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

10月2日　英、法、俄、德、日、意、奥7国侵略军划界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俄军继向山海关增兵3000多人。

俄军撤离颐和园。

10月初　美军开始撤军。

10月3日　英、意军进驻颐和园。

英国向山海关和秦皇岛增兵1200人。

10月4日　法国提出议和六项条件。

驻京日军撤走2000人。2000名德军和500名意军抵京。

10月5日　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离津抵京。

500名意军抵京。

10月6日　清政府命荣禄前赴行在"入直办事"。

10月8日　驻津法军前往献县镇压义和团和反教群众。

10月9日　法军侵保先遣队由霸州向保定进发。

德国承认了李鸿章代表资格，并令瓦德西接见他。

10月10日　驻京公使团基本同意了法国提出的六项议和条件。

10月11日　"天津都统衙门"新增3名委员，由德、美、法各出1人。

德皇指示瓦德西尽量迁就英国在铁路上的合理愿望。

10月12日　德、法、英、意四国联军分别从天津、北京出发南侵保定。

10月14日　清政府再向英、法、美3国发出求和国书。

10月15日　奕劻、李鸿章向各国公使分送议和建议五条，被驳回。

10月16日　英、德订立关于中国问题的《英德协定》。

10月17日　瓦德西抵京。

10月18日　法军侵扰直隶正定府。

10月19日　俄国训令格尔思由津返京参加谈判。

法国又提出修改后的六条谈判意见。

南侵四国联军齐抵保定城郊。

10月20日　廷雍率文武官员出保定城迎接联军。

德军侵扰直隶青县。

10月24日　四国南侵联军侵入直隶易州，骚掠清西陵。

10月25日　德军侵入直隶完县。

10月26日　列强驻京公使要求对"祸首"加重处分。

慈禧逃抵西安。

10月29日　四国南侵联军攻打紫荆关。

列强声明支持"英德协定"。

10月31日　英军侵扰直隶永清县。

11月6日　四国南侵联军在保定设"国际军事法庭"，审讯并处死廷雍等中国官员。

11月7日　联军侵扰遵化州马兰峪清东陵。

德、英、意三国军队撤离清西陵，法军留驻未撤。

11月8日　联军侵扰直隶迁安县。

俄国向英国表明了对关内外铁路的新态度。

11月9日　联军出击并焚毁津郊王庆坨村。

11月12日　德、意、奥三国侵略军由北京向张家口进犯。

11月13日　清政府颁布加重惩处"祸首"上谕。

11月15日　瓦德西首次会见奕劻、李鸿章。

11月17日　德、意、奥三国侵略军侵入宣化。

11月18日　德、意、奥三国侵略军的先头部队抵张家口。

11月19日　德、意、奥三国侵略军侵占张家口。

11月20日　法军进驻获鹿。

法国驻津领事擅自发出扩展法租界的通告。

11月21日　德军窥伺安子岭和龙泉关。

11月23日　德、意、奥三国侵略军从张家口撤军返京。

11月24日　德、法侵略军在保定设立"权理司"。

12月4日　德军侵占沧州。继而南下侵扰南皮、盐山、庆云、吴桥等县及东光、泊头等镇。

12月5日　德军出击直隶容城县。

12月7日　"天津都统衙门"将直隶候补道谭文焕处死。

12月10日　八国联军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

驻获鹿法军进犯井陉东天门。

12月15日　法军侵扰直隶束鹿县。

12月16日　法军占领束鹿城。

12月18日　法军侵扰深州。

12月24日　各国公使将议和大纲草案递交奕劻。

联军出击直隶满城县。

12月27日　清政府命奕劻、李鸿章对议和大纲"应即照允"。

12月30日　俄国逼签《天津俄租界条约》。

12月31日　德军在京击毙枪杀克林德的海恩。

外　交

1月5日　中法签订租借广州湾条约。

3月2日　英、德、法、美、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要挟

清政府在京报上发布镇压义和拳、大刀会上谕。

3月10日　五国公使分别建议本国政府派海军到中国北方海域举行联合示威。

3月20日　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已得各国圆满答复。

3月21日　中德订立胶济铁路章程。

中德订立胶澳交涉章程及德华矿务章程。

3月23日　窦纳乐请求外交部派遣两艘军舰到大沽。

4月6日　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总署，要清政府两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代为剿平"。

4月12日　俄、英、美、法军舰在大沽口示威："若两月之内，不能镇抚（义和团），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

4月15日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劝告"清政府要不失时机地镇压义和团。

5月15日　格尔思再次告诫清政府要严厉镇压义和团。

5月19日　法国主教樊国梁向法国驻华公使毕盛送来了呼救信。

5月20日　各驻华公使开会讨论樊氏信件，并分析中国局势。

5月21日　各国公使照会总署，要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

5月24日　各国公使照会总署请使馆驻军。

5月28日　各国公使议定调兵来京，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借此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5月29日　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奉命向天津派遣海军陆战队，驻津领事要求直隶总督裕禄备车送行。

5月30日　英、美、法、俄向总署提出"各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直隶总督裕禄传会不准乘火车进京。

5月31日　裕禄奉命备车放行，英、美、意、日、法、俄六国侵略军356人当晚抵京。

6月6～7日　各国驻华公使和军事司令官先后被本国政府授予便宜行事的侵华大权。

6月9日　西摩联军奉命抵津。

6月10日　西摩联军分批乘火车由津进犯北京，在落垡遭到义和团拦截。

俄国东西伯利亚第十二团1600多人奉命由旅顺前往天津。

6月10日　清军虎神营击毙克林德，形成克林德事件。克林德1881年来华，自1883年起历任驻广州领事馆翻译、使馆参赞、使馆代办，后一度改任驻墨西哥使馆参赞。1889年，克林德再度来华任公使。当1900年5月28日，英、美等八国提出调兵进京"保护使馆"时，克林德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端"。6月14日，他带领一队德国水兵外出巡逻，命令士兵开枪打死路过使馆旁的义和团民约20人。6月19日，清政府照会各国公使，说明八国联军强令中国交出大沽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为保护使臣及其家眷安全起见，请于24小时之内由清军护送前往天津，"以免疏虞"。当晚，公使们联名函复总理衙门，请求展期赴津，并要求次日9点前签复。20日9点前，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未见复文，便乘轿前往总理衙门抗议。当行至东单时，适遇虎神营章京恩海率队巡街，克林德首先开枪，未中，恩海还击，将其击毙。这一事件后来成为德国向清政府进行威胁勒索的借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赴德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在东单立碑。

6月21日　清政府正式向入侵的英、俄、法、美、日、德、意、奥等国宣战。此前，八国联军已攻陷大沽炮台，并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在大沽、廊坊一带与入侵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直到6月20日，深居皇宫仪銮殿里的慈禧太后仍举棋不定，声言义和团"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恰在此时，荣禄给慈禧太后送来一份所谓外国"勒令"她"归政"的"照会"（其实是伪品），面对这件伪品，权欲熏心的慈禧太后，竟信以为真，在御前会议上，她时而怒不可遏，时而沧然泪下，她的心腹大臣们也嚎啕大哭，发誓要与洋人"决一死战"。于是，在6月21日正式发布了"宣战"谕旨，声言要对侵略者"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其实，慈禧一伙的"宣战"乃是一个骗局。因为"宣战"后，她一面派清军"帮"义和团攻打使馆和西什库教堂，一面又密令清军攻打时"炮要开空炮，枪要朝天开"，同时还派人给使馆送去面粉、牛肉、鸡蛋、瓜果、蔬菜和天然冰以示慰问。正是由于慈禧一伙对外频送秋波，致使拳民围攻使馆56天，围攻西什库教堂63天，都未能得手。

6月26日　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制定了《中外互保章程》（也称《东南保护约款》）。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沙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于是，各国借口保护，其军舰纷纷驶向长江各口岸。接着，两广总督李鸿章、浙江巡抚刘树棠以及四川、广西、山东、福建等省也相继表示支持和赞同"互保"。后来，虽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外互保章程》没有正式签订，但却起到了阻止、破坏义和团在江南发展的作用。

7月3日　美国政府通过其国务卿海约翰，发表对华宣言，即继1899年9月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第二次重申这一侵略中国的政策。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的主要内容为：坚守1857年所创的政策，即对中国保持和平促进合法商业及用国际公法与条约上的治外法权所保证之一切方法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目

的仍旧是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第一打开北京的通路,解救美国官员、教士及其他陷入危害的美国人民;第二尽力保护在中国各地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防护一切美国合法利益;第四协助防止骚乱蔓延中国其他省份,并防止其再发生。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在此,美国政府特别强调了三点:第一,强调保护美国的侵华利益;强调维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其在华的侵略权益;第二,镇压和防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三,主张"以华治华",为维护清朝政权,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通过"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之一切权利",巩固和扩张各国尤其是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美国两次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侵略中国,并维护各国在华侵略特权,缓和列强在华激烈争夺的矛盾的侵略政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来成为列强在北京进行分赃谈判的基本原则。

7月14日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驻守天津的清军是聂士成所部近万人和马玉昆所部6000余人。7月9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总攻。聂士成一马当先,督军躬冒炮火猛进,部下死伤惨重,聂士成"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聂殉国后,所部由马玉昆节制。7月10日,义和团和马玉昆部进攻天津,中敌人埋伏,记名总兵李大川、营官守备孙祥云、游击苏豁然等阵亡。7月12日,联军"各路增兵,均已到来"。13日清晨,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三岔河阵地;一路在日本军官福岛指挥下的日、美、英、法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其余驻扎租界和车站为后援。在紧急关头,直隶总督裕禄和守卫天津城的清军宋庆、马玉昆率部逃跑。所剩部分爱国官兵和义和团虽奋力抵抗,但到14日早晨,天津终于沦入敌手。入侵者一进城,就开始任意烧杀抢劫。鼓楼的南、北、西三面以及北门之北的房屋尽行焚毁,全城到处是断壁残垣,尸体遍地。一个入侵者曾这样自供道:"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然出现于世。"

7月17日　本日起,沙俄侵略军对中国江东64屯平民进行疯狂的屠杀。江东64屯位于黑龙江东岸。这里聚住着1万多汉、满、达斡尔等族居民。7月17日至21日,沙俄军警和匪徒闯到这里进行大肆烧杀抢掠。他们惨无人道地把中国人集中到房子里活活烧死,或投入江中淹死,或枪击刀砍。在短短5天的疯狂的血洗中,64屯有7000多平民惨遭杀害,财产损失达300多万银元。8月中旬,沙俄侵略者悍然宣布江东64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于是,这块肥沃的土地,被沙俄霸占了。

7月22日　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全称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此前,入侵者于7月14日早晨攻陷天津,8天后便成立这一机构。俄国沃加克上校、英国鲍维尔中校、日本青木中佐组成三人委员会,均称都统。同年11月,又增加德、法、美军官各一名,扩大为六人委员会,下设巡捕处、卫生局、财务处、发审处等八个部门和由900名侵略军组成的"巡罗队"。都统衙门除了残酷镇压义和团外,还不断派兵搜缴民间的枪支弹药,并对天津地区人民发号施令、征税、判刑、罚劳役等。该机构直至1902年8月才撤销。

8月14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此前,入侵者于8月4日出动1.83万人沿天津向北京进犯。8月13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俄军曾与各军约定15日会攻北京,但为抢"首功",背约先从东便门发起进攻,日军见俄军已动手,也于14日早晨开始进攻。随后,英、美各军也相继发起攻击。英军首先攻破广渠门,抄小道进入使馆区。日、俄也于当晚9时攻入城内。据统计,在进攻北京时,入侵者有400余人被毙伤,清军有640多人战死。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开始了疯狂的洗劫。联军司令部公然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于是,堆满金银翡翠和历朝文物的宫室、颐和园、三海被盗掠一空。法军统帅佛尔雷一人就劫掠珍宝40箱;天主教北京大主教樊国梁自己承认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日本侵略者掠取户部所存之银"其数在百万镑以上"。伴随着抢掠焚杀而来的是以奸淫妇女为乐,如稍有不从,便行杀戮或投入火中烧死。经过洗劫的北京,"腐肉白骨纵横","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自国家奇珍,扫地逐尽",所失"数十万万不止"。

11月9日　沙俄强迫盛京(即奉天)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此前,沙俄于当年10月占领了我国东三省的主要城市。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黄俄罗斯"计划即将实现,遂与弃城逃跑又被他们拿获的盛京将军增祺"谈判",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按照该章程,奉天(今辽宁)虽交还中国,但条件是:(1)俄国驻兵省城及其他各地。(2)驻在奉天省的中国军队"一律撤散",境内所存军装、枪炮全部交俄武军处。(3)奉天各地未被俄军占领的炮台、营垒、火药库一律折毁。(4)中国供给俄国奉天驻军住房和粮食。(5)俄国在盛京设总管一人,"预闻要公"(即沙俄总管有权预闻盛京将军办理的一切重要事件)等。这样一来,奉天省无异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次年1月,清政府获悉增祺与沙俄擅定的这个章程,将其革职,并宣布《章程》无效。

12月24日　英、法、美、德、意、俄、日、西、比、荷等国驻华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中国全权议和大臣奕劻,要求他把这份大纲"送交皇帝,并努力获得对它的迅速答

复”。该大纲由12条组成，其要点是“克林德被害一事，由中国钦派亲王赴德谢罪，并在遇害之所，树立铭志之碑；严惩祸首，戕害凌虐外人之城镇停止科考5年；因杉山彬被害，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国政府；中国须在各国人民坟茔曾遭汙渎发掘之处，建立碣碑；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不准运入中国；公平赔补外国人身家财产损失；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削平大沽等炮台；由京师至海边的定数处，各国留兵驻守；永远禁止军民人等加入仇视各国各会；修改通商行船条约；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负责议和的奕劻、李鸿章接到《议和大纲》后，立即将其电告清廷，要求慈禧和光绪“迅速乾断，电示遵行”。本来，逃至西安的慈禧一直担心列强会把自己列为“祸首”加以惩办。但当发现严惩条中没有自己的名字，不禁大喜过望，遂于12月27日电复奕劻、李鸿章，宣布“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待《议和大纲》确定后，列强间又就如何勒索中国人民，如何分赃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八九个月的争吵。

12月30日　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和李鸿章签订了《天津俄租界议定书》。这份议定书，仍是强迫的结果。原来，加盟八国联军的沙俄侵略者于7月14日攻陷天津后，立即用武力强占了老龙头车站迤西以及车站迤东沿海河向南的大片土地。为了“更牢固地在该城站稳脚跟”，沙俄政府明确提出：俄军打过仗的地段，都应划入租界范围。于是，迫于压力，李鸿章与格尔思在12月30日签订了《天津俄租界议定书》。这样一来，俄租界的面积达5971亩，超过了当时英、法、美、德、日五个租界的总面积(5500亩)；而且占据着火车站，又控制着七里多长的海河沿岸，在各国租界中占有最有利的地势。这就引起了英国等列强的嫉妒和不满。它们一方面向沙俄提出抗议和警告，一方面又争着扩大地盘。法国也发了一个通告，说凡是在法租界外沿范围内的土地统统并入租界的地段。英、日也照此办理。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趁火打劫，各自独占了一块地方，树立界碑，建立“租界”。

经　济

1月15日　张謇总办之南通大生纱厂全机二万零三百余锭开齐出纱。

7月30日　德璀琳代表张翼，马英商订立开平矿私卖合同。

本年，由侨资经营的最早的大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在香港设总公司。1911年和1917年先后在广州、上海设分公司，经营百货，同时兼营旅馆、酒楼、游乐场等。广州百货门市部在抗日战争中被毁，旅馆解放后公私合营。上海百货门市部于1954年停业，旅馆于1956年公私合营。

文　化

1月22日　《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报名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它的筹办工作始于上年秋天，到1905年成为同盟会的报纸。该报始由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撰稿者有洪孝元、陆伯周、杨肖欧、陈春生等。起初，因不了解港英当局的对华政策，不敢公开大登革命言论，半年后竭力提倡民族主义，激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革命党人的活动，介绍西欧、美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同香港保皇派报纸《商报》进行论战。到1906年7月该报曾进行了一次改组，由冯自由任社长兼总编辑。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

11月29日，我国国人自办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亚泉学馆发行，杜亚泉主编兼主要撰稿人。以图谋祖国富强和为祖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为宗旨。次年6月9日停刊，共出10期。

本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藏经洞”，洞内储存有大量古代写经、文书和其他文物共计4万多件。“藏经洞”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使敦煌莫高窟更为世人注目。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1年

导 言

带着庚子年的破碎之感迈入了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仍然不敢回到被联军占据的北京城，而在西安坐镇，遥控全国政局，可以说是"陪都议事"。

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已取得了圆满成功，剩下的任务便是如何分赃。为了抢在其他国家之前确定自己的既得利益，沙俄政府急于同中国签订正式的关于东三省条约。然而由于驻俄大使杨儒的骨气铮铮和李鸿章的病故，沙俄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中国历史上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于本年签订，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只不过是列强的一个傀儡，中国赔出巨款，还不能向列强表示反抗，这个天文数字压得中国人民永远也直不起身来。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维持自己的生路，清廷下令开始"新政"，虽不能说一事无成，但慈禧的用心不言自明，她何以又拾维新的牙慧呢？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但"新政"的开始也就意味着清廷走向了最后的崩溃。

广大人民并不以清廷和列强的命令以为然，就在沙俄通签条约的时候，东北"忠义军"自发行动起来，打击侵略者，为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留下了光辉一笔。

一九〇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作用都是负面的，虽然也确实孕育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来临。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

●《辛丑条约》签订

●清廷"新政"

●忠义军抗俄

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

背景介绍

为了抢在其他列强之前迫使中国政府与沙俄签订关于东三省问题的正式条约，沙俄通过驻华公使格尔思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授予驻俄公使杨儒以全权大臣资格，在彼得堡进行关于单独协定谈判。1901年1月2日，清政府答应了沙俄这个要求。

中俄谈判从1901年1月4日开始，到1902年4月结束，历时一年有余，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1)从开始到3月24日，中国拒签和约；(2)8月2日重开谈判，到11月7日李鸿章去世，停止谈判；(3)西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后，以王文韶为代表，继续谈判，到条约签字。

材料：

- 中俄彼得堡谈判
- 中俄北京谈判
- "局外人"的反应

材料一　中俄彼得堡谈判

1月4日　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开始。1月，沙俄要求与清政府进行单独协定的谈判。2日，清廷授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李鸿章为了取得沙俄的支持，力主出卖东三省。4日，谈判开始。17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向杨儒口头提出约稿十三条。2月16日，俄方正式向杨儒提出议款十二条，不经讨论，便要画押。内容有东三省由俄国"设兵保路"；"禁中国设兵"，只准设"马步巡捕"，亦必须"与俄商定数目"，"禁运入军火"；凡中国"将军大员经俄声诉，即予革职"；"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处矿产、铁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予他国；不准中国在上述各处自行造路"等。杨儒打算驳改俄方约稿，收回东北。表示条款须无损我主权，方可签字。27日，清廷命奕劻、李鸿章商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各国不愿沙俄独吞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力主拒绝签字，并劝朝廷联英、日拒俄。李鸿章力主签约。杨儒与俄财政大臣维特谈判七次，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十四次，没有结果。2月下旬，俄国再一次出重金收买李鸿章，"如能签约，立即可给五十万卢布，以后还可多给"，同时又威胁说："逾期即决裂"。3月12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压迫杨儒，限26日画押，不能更改一字。被沙俄收买的李鸿章，与奕劻电令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沙俄提出最后约稿后，不再会见杨儒。杨儒要求继续谈判，遭到拒绝，甚至对中国皇帝国书、外交文件，俄政府也一概不收。3月22日，清廷电令出使各国大臣，请各国代请展限订俄约，以筹妥协。24日，即满限前两天，维特约见杨儒，催促签字。杨儒坚持未奉"确旨"不画押。维特说："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严正回答："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个头颅耳！"维特保证，日后"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严词驳斥："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25日，拉姆斯道夫又约杨儒签字，杨再度拒绝逼签。同日，各国公使向清廷声明，公约（指《辛丑条约》）未定之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清廷在北京外交团压力下，通知各国公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29日，清廷命李鸿章向俄使婉商，先订公约，再议专约。

（摘自《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

材料二　中俄北京谈判

中俄彼得堡谈判中止后，围绕着"满洲问题"，沙皇政府面临抉择：或者开始无条件地从满洲撤兵，或者试图与日本谈判划分势力范围，或者对照3月28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俄国提出的要求，宣布对各国工商业实行"门户开放"，同时继续占领满洲。

彼得堡当局的内部讨论迅即开始。财政大臣维特在6月6日和10日给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信中认为，为避免对日作战，最可靠的办法是"放弃俄国对满洲的政治控制"，"取消俄国的军事管制"，把俄国在那里的作用限

于保护被视为“私营企业”的东省铁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撤出俄国正规军，结束军事占领状态，然后在“护路”的名义下，由“护路军”保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关于朝鲜问题，他认为如果日本要求得到朝鲜，那么，可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讨论；但是，即使日本占领了朝鲜，俄国也不认为这是对日“宣战的理由”。简言之，维特主张对满洲实行“和平”征服；朝鲜则必要时可交给日本。这是维特又一次改变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根据上述原则，他于6月24日拟就了从东三省撤军的第一个具体方案，随后又于七月间向日本驻俄公使珍田提议协商朝鲜问题。前者规定：将山海关—营口—新民屯铁路立即归还中国。作为“补偿”，中国政府应保证：1. 赔偿俄国经营管理该铁路的费用；2. 按1899年英俄协定和中英借款合同的规定，经营上述铁路；3. 未经俄国同意，不得敷设支线，不得在营口修建横跨辽河的大桥；4. 该铁路不得由外国人守卫。同时，维特重新提出了二月间已被中国拒绝的一项“政治性要求”，即中国应允许东省铁路公司修筑从干线到长城的通往北京方向的支线，其目的依然是排除东三省南部的以英国为主的他国势力，从而把本国的影响扩大到直隶省。这一建议经7月11日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于18日获得了沙皇认可。

正当彼得堡当局就撤军问题进行紧张的秘密磋商时，李鸿章于8月2日向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波兹德涅耶夫(宝至德)表示，希望俄军尽快撤出满洲，中国愿重新考虑“满洲协定”问题，并请他以此征求维特的意见。这时，拉姆斯多夫感到《辛丑条约》行将签订，如简单拒绝中方建议，李鸿章有可能转而请求英、日等国干预“满洲未来的命运”，迫使俄国外交界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他赞成同中国立即恢复谈判，并着手拟订新的协定草案。九日，维特经尼古拉二世批准，对李鸿章作如下答复：如中国政府能向道胜银行担保，“满洲的任何铁路与工业租让权，在向道胜银行提供之前，不让与任何人”，“则将大有助于”俄国从满洲撤军。同时，拉姆斯多夫通过格尔思，要求李鸿章“严守秘密”。为取得预期效果，维特等许诺事成后给李鸿章三十万卢布“酬金”。由于这时杨儒抱病俄都，中俄谈判地点由彼得堡改为北京。

鉴于彼得堡谈判失败的教训，维特与拉姆斯多夫决定在谈判中采取分别商订“政府间协定”与“私人合同”的策略，前者由驻华公使经办，只涉及从满洲撤兵问题(用以公诸于世)，后者由道胜银行出面，专注于攫取东三省的经济实利(秘而不宣)，并要求先签订“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然后再签署政府间的撤军协定。维特的主旨是以降低撤军条件为饵，诱使清政府同意将原约稿中规定给予俄国政府的那些经济权益给予道胜银行，而道胜银行在这项协定中只“是俄国财政部的替身”。由道胜银行董事会作为缔约一方以代替俄国政府，则是为了“保持俄国政府的清白”，争取法国资本的支持，并“杜绝足资他国抗议的任何借口”，防止他国或他国人依据利益均沾的原则，打进满洲。“这样一来，整个满洲就会落入沙皇政府之手。”这就是说，沙俄想“不受占据之虚名，隐收囊括之实利”。事实上，维特在彼得堡谈判之初，就已有了双重谈判的计划，并为此拟制了两份各自独立、形式完备的协定草案，一为两国政府关于撤军的协定，一为中国政府和东省铁路公司之间的合同(它规定由东省铁路公司独揽东三省关税、路矿和其他工商业的租让权)，只是由于当时日本已向俄国表示在满洲恢复战前状态前不与俄国谈判，美国积极鼓吹实行“门户开放”，拉姆斯多夫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说服”维特将后一个草案暂时收起。尽管如此，在2月间递交杨儒的约稿第十一款中，仍保留着维特的租让计划的痕迹。现在，维特决定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所不同的是那时要求先签两国政府间的单独协定，后签“银行合同”；另外，原拟把东三省全部资源的租让权集中在官办的东省铁路公司，现改归“私营”的道胜银行了。

清政府在3月下旬拒签俄约时，曾谕令李鸿章“俟公约(指《辛丑条约》)定后，即议专约”，仍幻想通过对俄单独谈判，规复东三省主权。但李鸿章执意媚俄，竟未经清廷同意，于3月底致电乌赫托姆斯基，乞其“密劝大皇帝宽宏大度，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意即准备不经谈判径直在俄方准备的协定草案上签字。李鸿章的这一行动，遭到一些廷臣的责难。直督袁世凯也认为“俄约夺我权利，妨碍全局，无论公约前后，皆万不可允”。刘坤一、张之洞乘机鼓吹东三省事“愿听(各国)公断”，仍以依恃英日为拒俄的唯一手段。由于两派廷臣意见对立，争论不休，清廷举棋不定。7月，各国公使共同炮制的《辛丑条约》稿大体完成。29日，清政府遂发布谕旨，一面说“俄约自难全废，终当设法改订”，要求奕劻、李鸿章“乘公约既成之后，向俄使反复筹商，将前约婉与磋磨”，同时又说可“将东三省许各国通商，互相牵制，庶根本之地可保，全局亦安”。这就是李鸿章在谈判中应遵循的方针。

8月12日　中俄关于撤军问题的谈判重新开始。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俄国公使格尔思首先要求李鸿章给俄国办一“机密照会”，内容包括：“议定画押之先，不得使他国人预知此事”；“两国定约均系甘心自愿，所商量所答应之事，不听他国指使。”格尔思意在防止第三国主要是日本的干预，以便向中国任意勒索。李鸿章居然准备同意。清政府认为如照允俄使所索，未经开议，先立一甘心自愿凭据，其后果不堪设想，责问李鸿章开议后“万一有断不能允之事，何以处之”。格尔思未遂所欲，便对李鸿章软硬兼施，忽而甘言相诱，说什么“若俯允前约补画，则交收(东三省)以后，可遇事商办，只要中朝诚心和好，勿听外人谣惑，两国睦谊尚可重联”；忽而怒目相对，威胁说：

"东约必须及早画押，否则生变；……若置不理，东三省无交收之日矣"。李鸿章为得重贿，多次请求清政府接受俄方约稿。清政府认为，如照允"前约十一条，我主权、利权、兵权全失，是(东省)名还而实同不还"，加以"前约于东三省铁路矿产商务利益，有不得再允他国之语"，清政府怕他国效尤，所以不仅未允所求，而且谕令李鸿章继续与俄使"极力磋磨，总期于我兵权、利权及自主之权无损。"由于格尔思坚持"维持三月约款"，谈判毫无进展。

9月4日，即《辛丑条约》订签前三天，拉姆斯多夫将新约稿电告格尔思，令其以此为基础与李鸿章继续会谈。因李鸿章卧病，告假两旬，延到十月五日，该约稿才由俄国新任驻华公使雷萨尔送交李鸿章。李喜出望外，立即奏报西安行站，表示除第三款需与东三省各将军"电商再定"外，余款均极满意，他说："四条似于国家自主权利尚无所损"，"较前议十一条更为大方。向京造路一节竟不再提，尤免后患"。10月6日，李鸿章就新约稿提出了四点纯属文字上的修改意见，俄方立即表示接受。这时，《辛丑条约》已以签订，列强正着手从北京撤军。彼得堡当局为避免发生变故，想"尽快解决满洲的未来命运问题"。10月13日，拉姆斯多夫电令雷萨尔"与李鸿章就满洲问题进行最后会谈"。李鸿章获悉后毫不迟疑，于15日通知雷萨尔，他本人正准备启奏皇上速下签约上谕。但军机处于19日对俄约稿提出两项修改意见，要求李鸿章与俄使商议：1."将吉、江两省与盛京全省俄军及早一并撤退。；2.东三省中国驻军数额、地点与巡捕不准用炮一节，只适用于与俄境接界的若干里内，东省腹地则不在此限。对此起码要求，雷萨尔竟坚拒不允。此后，中俄撤军谈判停滞不前。出现这种"波折"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协定的内容本身，而在于与此同时举行的关于"银行合同的谈判已因俄方索价太高而搁浅"。

10月6日，李鸿章与雷萨尔就撤军协定达成初步谅解，次日即要求波兹德涅耶夫提出"银行合同"草案。10月10日，波兹德涅耶夫将"合同"草案递交中方，内规定：中国政府应优先向道胜银行提供满洲全境铁路和一切工业的租让权；如该行自行放弃某一租让权，则中国可以同样条件将其提供他人承办。这种近乎吞并的要求，连李鸿章也为吃惊，忙对波兹德涅耶夫说："合同把整个满洲都交给道胜银行了"，这"必然会引起外国人的抗议"，他"无论如何没有胆量对这项合同担负责任"，并说他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进行谈判。在10月15日的会晤中，李鸿章又说："皇上不会批准这种合同"。这时，维特风闻日本已预闻其事，急不可耐，于27日电告波兹德涅耶夫，如果"在最近数日内"李鸿章不签订'合同'，就分文不给他"！李鸿章既怕得罪维特，坐失贿款，又怕冒犯朝廷，乌纱难保，于是托词说：庆亲王奕劻已经同意"银行合同"，他已去河南请旨，俟其两周后返回再议。于是，"银行合同"谈判也陷入僵局。

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不敢遽允李鸿章签约要求，于10月29日途经洛阳发布诏谕说："俄约定后，倘日本各国起而相难，缠绕不休，有何应付之策"？"此事关系甚重，急切尚难定夺"。由于清政府不同意签约，李鸿章的处境十分狼狈。这时，俄使雷萨尔仍不断对他施加压力，威胁说："满洲是俄国战胜而得，交还与否，全凭俄国定夺；中国一天不签约，俄国一天不交还，……缔约推迟一天，中国多损失一天，俄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一天重于一天。"11月初，李鸿章已卧床不起，但雷萨尔仍不放弃最后勒索的机会。在李鸿章临终前数小时，他又亲赴北京帅府园贤良寺李寓，当着李鸿章的面，逼其秘书在条约草案上画押用印，但没有得逞。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中俄北京秘密谈判的第一阶段到此落幕。

（摘自《近代耻辱史》）

材料三　"局外人"的反应

女王陛下驻彼得堡大使关于中俄满洲协定的函件：中国第二号(1901年)

史科特爵士致兰士敦侯爵函

1901年2月1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我今天找到一个机会，在避免看来好象是要求俄国对它在满洲的行动作出解释的同时，向拉姆斯多夫伯爵打听清楚，如果议会中对女王陛下政府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质询，我们对于所谓的中俄南满协定的真实情况究竟可以说些什么。

拉姆斯多夫伯爵毫不犹豫地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

他说：就他所读到的报纸上的那些报导来说，大概将在议会中引起质询，因为它们断言俄国同中国已经缔订或正着手缔订一项暂定条约或永久的协定，而该项暂定条约或协定将给予俄国新的权利以及对南满的事实上的保护权。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人谣言的唯一根据必定是由于这个事实：已对该省进行临时占领并平定骚乱之俄国军方，当他们使中国官员恢复其原来职务的时候，奉命同地方民政当局商定关于俄中两国官员同时驻在南满洲期间的一项暂订条约的条款，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在俄国边界附近重新发生骚乱，并保护自俄国边界通往旅顺口的铁路。

他们拟订的暂订条约的某些细节已送至彼得堡方面进行考虑，但是，同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缔订任何关于满洲的暂定条约或具有永久性质的协定，俄皇也绝对没有任何意图背弃他公开作出的保证，即一旦情况许可，满洲便

将完全恢复它以前在中华帝国的状态。

俄国关于确定撤出满洲的最后日期所处的地位，同联军关于撤出北京和北直隶省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

到了最后完全撤出满洲的时候，俄国政府将不得不从中国中央政府获得一项有效的保证，以防止重新发生最近对它的边界的攻击以及对它的铁路的破坏，但是，它无意通过获得领土或获得对满洲实际上或事实上的保护权而得到这个保证，因为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担保中国将来忠实地遵守协定的条款，而那些条款是它在骚乱期间所不能履行的。

这项保证的条款或许可能成为拉姆斯多夫伯爵与中国公使在此地会谈的题目，或者是留待在北京讨论。

同时，他私下可以说：可能引起报纸上报导的任何协议，纯粹是俄国军方与南满地方民政当局之间具有临时性质的暂订条约，同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签订任何企图改变该省以前的国际地位的暂定条约或协定。当俄国军方停止采取一切临时措施，而且牛庄和其他地方的一切情况恢复原状的时候，该省将归还中国。

史科特谨上(签字)1901年2月6日于彼得堡

(摘自《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

辛丑条约签订

背景介绍

一九〇〇年七月初。当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清政府向俄、日、英三国政府致书乞和，乞求三国出面，“排难解纷”。使联军停止进攻。但是，一心要攻占天津、北京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当然不予理睬。七月八日联军大举进攻天津，形势十分危急，清政府急忙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他立即北上，准备同帝国主义妥协乞和。李鸿章却坚持要清政府“先清内匪(即剿灭义和团)再退洋兵”，并以“海道梗阻”，“广东绅民又因人心惊惶，纷禀暂留镇抚”，“各国领事来函，亦以臣在任则中外相安，臣去粤当自筹保卫为请”等为理由，迟迟不肯北上。八月四日，联军从天津出发大举进犯北京，清政府于八月七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两日后，李鸿章在上海致电各国，接洽议和谈判事宜。但遭日、美、德等国的奚落和粗暴拒绝。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发布上谕，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劻，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九月十七日，那拉氏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县)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剿除不可。”通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公然要用屠杀义和团作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晋见礼。并且指使清军配合侵略军奢杀义和团。

八个帝国主义为了共同的侵略目标曾暂时地联合起来，但在攻陷北京后，却各自为了不同的目的自行其事了。于是他们在议和谈判中，处处勾心斗角，激烈争吵，曾几度使他们为分赃问题的商谈濒于破裂。就连是否承认李鸿章为清政府的议和全权代表问题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俄国认为李鸿章是亲俄派，立即承认了他的代表资格，企图以此博得清政府的好感，以换取俄国独占东北的“自由行动权”。英、日、德等国害怕俄国通过李鸿章与清政府作秘密交易而与已不利，则极力反对李鸿章作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使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商谈陷入僵局。他们对李鸿章代表问题争议的实质，是在各自挑选自己的傀儡。八月三十一日，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议和事宜，以缓和列强对议和代表的争议；并再次命令李鸿章迅速到京议和。英、日向俄、法作了妥协，承认“皇太后为合例”，并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交换条件是清政府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

材料：

- 列强的争吵
- 条约签订

材料一　列强的争吵

十月一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在天津曾两次要求会见瓦德西，瓦德西则说：“吾统兵主战，君主和，职事不同”，拒不见。十月十日，李鸿章以俄兵百人作护卫，到达北京。十六日，他向各国代表提出议和草案，但遭拒绝。

八月底，俄国为了吞并中国的东北，故意耍了个“和平”花招，提议联军撤离北京。但它实际上已出动了十七万之多的军队占领了东北，俄国的阴谋为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所识破，立即遭到了除法国之外的其他列强的反对。十月四日，法国提出关于议和的六项条件：

一，惩办由各国驻京公使指定的祸首；

二，禁止输入军火；

三，对各国政府、团体及个人合理地付给赔款；

四，北京使馆永久驻兵；

五，拆毁大沽炮台；

六，在天津大沽之间选择两三个军事据点派兵驻守。

法国的建议为其他帝国主义所接受。日本还提出了补充意见：凡对中国政府提出可以作为议和基础的一切要求，在开议之前，预先提交在北京的各国代表审查。各国一致同意日本提出的补充意见。从十月下旬开始，各国驻京公使以法国建议的基本内容和日本建议的讨论方

式，正式开始研究它们将要提出的和谈的主要条件。他们经过磋商与争吵，又增添了一些内容，如 1. 处斩指使围攻使馆的和杀戮教士的罪魁。2. 将发生排外纠纷的地区的地方官员，立即革职。3. 提议建立使馆区，区内不准中国人居住，等等。最后归纳成《议和大纲》十二条，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美、英、俄、日、德、意、奥、西班牙、比、荷十一国联合照会清政府。西太后收到大纲，见大纲没有把她列为罪魁祸首，仍愿保持她的地位，"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三天后又在上谕中表示："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立即照允。于是，清政府一字不改地将"议和大纲"全部接受下来。《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包括了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

《议和大纲》确定后，接着便是各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之间就如何勒索中国人民，它们如何分赃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大吵大闹。清政府一边等待正式条约的签字画押，一边则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惩办那些表面上"支持"过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廷发布上谕，第一次惩处"肇祸诸王大臣"。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分别给予革去爵职等轻重不同的处分。但是帝国主义借口处理太轻，受处分的王公大臣太少，而百般要挟，提出要对这些人都处以死刑。清政府被迫于十一月十三日第二次惩处"肇祸诸王大臣"。帝国主义仍然大为不满，坚持加重加多惩处，死了的也要严惩。清政府被迫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和二月二十一日进行第三、第四次惩办"肇祸诸王大臣"，除令载勋、英年、赵舒翘自尽和将毓贤处死外，还将载漪、载澜定为监斩候的罪名，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将已身死的徐桐、刚毅、李秉衡革职，将董福祥革职，将启秀、徐承煜（徐桐之子）定为死刑。列强还逼迫清政府前后两次惩处一百多名地方军政官员，打击了各级官吏中的仇洋情绪，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洋主子的压力下，清政府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将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五人开复原官，恢复其名誉。

（摘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

材料二　条约签订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长达八个月的争吵，除"惩凶"问题外，主要集中在赔款数目和赔款偿还方式和提高海关税等问题上，他们都想借此机会狠狠地敲诈清政府，捞取巨额赔款。德、俄两国更是贪得无厌。德皇威廉指令瓦德西说："要求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因为德国急切获得大量赔款去扩充海军舰队，以便争霸世界。俄国急切夺取大量赔款去加速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以便加紧侵略中国和朝鲜，于是列强们经过一番争吵，各自提出了自己索取赔款的数目，各国总计为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即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但是，如此巨额的赔款，清政府究竟怎样偿还呢？它每年收入的总数不过八千八百多万两！俄国索款心切，提出让清政府向国际金融资本家大借款，实现一次付清赔款的方案。英、美两国害怕由此引起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局面而不利于他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则坚决反对俄国提案。英国在美国支持下，提出了由清政府发行债券，分三十九年清还，年息四厘的赔款办法。列强们争吵了三个多月，俄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提案。列强在赔款偿还方式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提高海关税率问题上吵吵嚷嚷了很久，决定税率要切实作到值百抽五，并将海关周围五十里内的常关并入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海关抽税。他们前后经过一年多激烈的争吵，终于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达成了残酷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协议，强迫清政府签字画押。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的又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帝国主义通过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严酷的控制和勒索，使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这个条约也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给自己立下的空前的卖身契，标志着清朝统治阶段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清政府彻底变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西太后还明确表示：此后要"量中华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死心塌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

巨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一两白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大规模的勒索。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清政府除了田赋以外，几乎别无财政来源。于是清政府便强迫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作为赔款之用，这就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外债永无还清之日。

使馆界的设立，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干涉内政的反动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大沽等炮台的拆除，京榆铁路驻扎外国军队，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外国军队可以随时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按照条约的规定，他们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

总之《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陆续撤离北京。躲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的心中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九〇一年十

月六日，她同光绪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自西安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供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车辆竟多达三千多乘。他们途经洛阳、开封，由正定改乘火车，于次年一月七日回到北京。沿途各州县，无不抢修道路，"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万人，费亦各数十巨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这群卖国贼几乎是赤身出城逃命；如今却又要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并极尽其搜刮、作践之能事了。

（摘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清廷"新政"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本来是反对一切改革的，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然而，事隔两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他们迫于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侈谈起变法来。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还在西安的时候，就下变法诏说：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在这个上谕中，西太后还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谋求富强。并要求各、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照中西政治"，对有关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军制、财政等各抒所见，详尽议论，在两个月内提出意见，以便次第兴革。

同年4月21日，清政府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李鸿章、宋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来还有袁世凯等)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政务处并无实权，只不过是军机处的骈枝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参酌中外的政治情况，列成条文，汇编成"政典"供西太后参考。在举办"新政"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还是各省督抚，主要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这三个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于1901年5月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7、8月间，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著名的变法奏议三折。第一折兴学四端，讲设立各类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端，讲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实官，取消书吏，改进刑狱，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端，讲怎样吸收西法来补充中法的不足，如广派官员出洋考察，编练新军，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和货币制度，多译外国书籍等。这些提议，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派的变革主张。9月，清政府下诏批准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奏议，命各省督抚"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同时，重申实行新政的决心说："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从上述新政奏折的表面内容看，清政府似乎是要完成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实质上这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上洋务派"自强"的老调重弹。新政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洋务派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太后的变法诏中公然说维新派"妄分新旧"，"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而她的新政是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并特别强调要在"三纲五常"之下实行改革。由此可见新政与洋务运动一脉相承，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

从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连串的上谕，陆续推行"新政"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停止捐纳实官，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废弃旧式武科，建立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开经济特科，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考，广设学堂，奖励工商业，准满汉通婚，以至酝酿实行立宪等等。

材料：

- 筹饷练兵
- 设立商部
- 改革教育

材料一　筹饷练兵

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筹饷练兵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从1901年起，清政府屡次颁发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严行裁汰旧军，挑选精壮，创建新军。在清政府的催促下，各省相继筹饷练兵。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参谋部，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接着，练兵处制定了一系列练兵规章和法令，在各省设立了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新军。

清政府把筹饷练兵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那拉氏本人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曾"因筹款事，几至寝食皆废"。经她批准，练兵处成立后，立即向各省摊派了九百余万两的练兵费。1904年8月她又派铁良视察江南防务，乘机从各省搜括大量财富充作练兵经费。又饬令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均归户部另存，作为练兵费。1906年11月，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以铁良为尚书。次年8月，清政府制定了全国编练陆军三十六个镇的庞大计划，并限期建成，不得延误。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夕仅编练

新军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另一支禁卫军（两协），兵力共达十五、六万。分述如下：

北洋六镇，1905年已编成，后划为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1907年以后六镇陆续改归陆军部直辖。直隶又重新编成一混成协。

山东一镇，名义上编成一协（第47协），实际仅成一标（第93标）。

江苏两镇，编成第9镇及23混成协一协。

江北一镇，编成第13混成协一协。

江西一镇，编成第27混成协一协。

安徽一镇，编成第31混成协一协。

河南一镇，编成第29混成协一协。

湖南一镇，编成第25混成协一协。

湖北两镇，编成第8镇及第21混成协一协。

浙江一镇，编成第21镇。

福建一镇，编成第10镇。

广东两镇，名义上成立了第25镇，实际仅编成第49混成协一协。

广西一镇，仅编成两标，另桂林一标。

云南两镇，仅编成第19镇一镇。

贵州一镇，仅成步队一标，炮队一队。

四川三镇，仅成第17镇一镇。

山西一镇，仅成第43混成协一协。

陕西一镇，仅成一混成协。

甘肃两镇，名为练成一协，实际只成一标。

新疆一镇，编成第35协一协及伊犁一协。

热河一镇，只编成步队一标及炮队一队。

奉天一镇，编成第20镇。

吉林一镇，编成第23镇。

黑龙江一镇，名义上成立混成协一协，实际仅步马各三营，炮队一队。

上述新军表面上是为"巩固国防"而建立的，实际上它并不真正用于防御外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为了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奕劻曾说："北洋练军为拱卫畿疆，弹压余匪，更无他意。"1903年，户部在练兵筹饷折中也说：当前"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非练兵无以保民"。那拉氏曾密谕军机处：整顿练兵"以防内乱是为主要"。事实上，在新军编练和成军过程中，从没有与外敌打仗的纪录；相反，全国几次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都是被新军残酷镇压下去的。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了巡警。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袁世凯将保定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其中著名的头目就是赵秉钧和杨以德，他们"广购眼线，多派探访"，极力破坏反清的秘密，屠杀无辜，得到清政府的赏识。这两人在民国以后仍盘踞警务部门，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鹰犬。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制订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各省中，直隶、四川、江苏、云南等省办警务成效"显著"。江苏巡抚陈夔龙在1907年的一份奏折中承认，江苏创办警政三年，"形式虽存，精神未具"，"卫民之政，转以扰民"，说明了举办警务的真象。四川在岑春煊、锡良任内，委派留日学生周善培为巡警总办，因使用侦探手法强化法安，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赞扬。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各县设立巡警教练所，加紧推行保甲和户籍措施。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二　设立商部

清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于1903年9月设立商部，所有铁路矿务诸要政皆归其办理。商部的政策主要是倡导官商创办企业。该部成立后，陆续颁行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钦定大清商法、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及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等等。因此，国内工商企业一时均呈现发展的气象。以矿业为例，1904年向商部呈请办矿务的仅五宗，次年增至三十余宗。同时，商会迅速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如，1903年仅上海、天津、开封、芜湖等几个城市组织了商会，1904年1月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城镇商会纷纷成立，次年就发展到六十多个，1908年更增至近三百个，全国重要城镇几乎都有了商会。商会对推动资产阶级的实业和政治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政府推行鼓励工商业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微弱的发展，获利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上层。清政府对张謇、祝大椿、庞元济、许鼎霖、张振勋等大资本家和买办商人，给予各种特权，使他们取得了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1904年，以张謇等倡办工商实业卓著成效，奏准赏给商部头等顾问官。张振勋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但是，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们政治实权，掌握商部大权的都是封建大官僚，如尚书载振，左右侍郎伍廷芳、陈璧，左右丞徐世昌、唐文治等。

（摘自《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改革教育

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又批准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以此为依据。这个学制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如蒙养院四年不计在内，修业期限还长达二十五年。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以赴日本者为最多，1901年二百八十人，至1905年已达八千人。次年更增至二万三千。其后因学生风潮迭起，数目略减，但在这一年底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尚有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这些学生当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心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他们或为官费，或为自费，以前者为多。

当时科举考试已经改八股为策论（1901年），但尚未宣布废除。由于科举是利禄所在，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因此学校的发展遇到很大阻力。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1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些，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除。同年12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

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学堂，另一方面又接连颁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学堂管理通则》、《钦定教育宗旨》等，企图把学生束缚在对封建统治有利的范围内。《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这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兴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科举的废除和学校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据学部奏报教育图表：至1907年全国各类学校共三万七千八百余所，在校学生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余人，教员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人，职员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九人；次年学校激增至四万七千九百余所，学生达一百三十万零七百余人。这些学生和留学生以及职员的大多数是与封建士大夫不相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大加强了新型知识阶层的政治力量。

（摘自《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

忠义军抗俄

背景介绍

俄军和形形色色的沙俄殖民者用最野蛮的方式推行殖民统治，哪里出现反抗，他们就“剿洗”哪里的百姓，即使邻近村镇也难于幸免。俄军所到之处，所用车马、粮草、牛酒等项，均就地取给，“供亿之繁，需索之多，悉由公款开支”。仅呼兰一地，在半年时间里用于应酬就花费“数千金”。各地所存银两，早被俄军抢劫一空，这笔巨额开支只有向居民搜刮。东三省人民饱经战乱，秋禾无收，已经到了“无衣无食”的地步，加上这笔摊派，更加难以维持生计。特别是俄军长期驻扎之后，“其兵散出各屯，劫掠淫乱，不堪言状”，使东北三省几乎没有一块净土让居民得以安生，士农工商，相率奔逃，百业凋零，惨不忍睹。正是俄军的这些暴行，逼迫东北人民继续拿起武器，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材料：

·黑龙江将军增祺奏“忠义军”折

材料 黑龙江将军增祺奏“忠义军”折

奴才增祺、玉恒跪奏，为详陈俄军屡次与股匪刘弹子等接仗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前因股匪刘弹子、杨玉麟分踞通化、海龙等处，暨俄军在兴京一带将该匪击散，陵寝无扰情形，业经随时电陈在案。查刘弹子即刘永和，杨玉麟绰号十四阎王，皆吉林马贼中巨魁也。杨玉麟先经宁古塔垦局招抚，派为唐殿荣帮带。刘永和曾从事于珲春副都统英联营中，因亦自称统领，并各其军曰“忠义”。自俄人入吉，该等各率溃勇，辗转南下。上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初间，刘永和由吉林官街窜到奉省海龙厅属朝阳镇，复为俄兵逼入通化县界，遣人赴县假道，意在乞一容身之地。知县陈璋遽将其所遣三人杀之，致激其怒，遂率众进攻，乡屯被焚者数十里，十一月初十日（12月21日）入县城踞焉。时裹胁日众，匪徒望风趋附，又有王和达、董老道各大匪为之援应，由是号为总统，声势始大振。而海龙厅自刘永和去后，十一月初二日（12月23日）杨玉麟又踵至。是时，刘股寝至两万余人，杨亦五六千人。收聚既多，其党各不相下，颇肆抢掠，并责商民供应食用。乡团有与之抗拒者，辄焚击之。且扬言俗攻省城。于是谣诼纷起，有谓晋昌与刘有夹攻之约，俄乃益调兵警备。我之通化，海龙诸文武，亦各遣人来告急。值省城地面尚未交还，剿抚均无所措手。而人

心惶惶，一日数警，有不可旦夕之势。不得已，奴才增祺始赴旅顺，与俄提督面议接收事宜。一面派员持谕赴通化，善言开导。一面咨行吉林将军，将杨玉麟调回。

迨奴才增祺回省后，刘永和即遣其统领马逢春等，随署怀仁县知县张兆骏来谒。据称，情愿投顺，恳留四十营。因思彼既无所归属，若不即为收抚，铤而走险，则东边各县，恐将遍受其殃。是以允留三十营，暂由地方官筹给食粮，不支饷项，余令妥为遣散。彼亦欣然乐从。嗣俄员以招兵与和议不符，复改令在于通化、海龙境内开矿垦荒，不得西越雷池一步。议甫定，而俄员又以该匪等既愿投诚，须先缴枪械。正在商酌间，俄将藉邀张兆骏、马逢春等议事，拘之营中，随大集师徒，一由辽阳趋怀、通，一由吉林伊通州趋海龙，其都统柴尔必思克自统大队，由省城趋兴京，索知县陈璋等为前导。奴才等察其万难中止，因商其保护陵寝，毋扰百姓，幸皆应允。

然柴既东逼通化，刘永和忽出西路，据新宾堡。是时，俄军留兴京护永陵者不过千人，分兵迎战，不利。刘永和随焚同知署，盖疑俄军之来，为地方官所邀请也。新宾堡距兴京只四十里，副都统灵熙以陵寝关重，羽檄告急，请照 会俄将添兵，以免疏虞。并由奴才增祺刻即添调营官刘振发所部，速往协护。三月初一、二等日(4月19、20日)刘果分兵逼兴京，未至者三四里，与俄军战两日夜，刘股为炮轰毙者甚多，而俄军闻亦伤亡不少。适柴由东路回中击，匪股军火复不继，始溃散而去。陵寝遂无惊扰。其杨玉麟一股，先经长顺遣人谕抚，不听。及闻北路俄军南下，随趋大围场，据城基。经我军营官蒲步瀛等，会俄军击败之。乃西窜昌图。又为俄军蹙之姚家窝铺。始率余党窜蒙古界。此俄军与刘、杨两股匪交战之大略情形也。

惟柴以是役亡兵士稍多，无可藉口，遂谓将军、府尹与刘弹子勾合，并暗中接济军火。又谓日本由朝鲜助其子药。屡经譬喻，犹在将信将疑之间。然自是防闲我军，更日加严密矣。初刘、杨两股被击分窜，俄大队亦撤回，仅留千余人驻兴京。既而又准其武廓米萨尔照会，请我速派三营赴通化，彼队驻兴京者即日撤回旅顺。而刘党李贵春、董老道等股闻之，复率其众二千余人，出犯山城子，肆其杀掠。又图占海龙厅，旋为总管依浚阿等遣练勇冯佩均等击破之，歼其徒四百余人。而张桂林一股已由南路据新宾堡。兴京副都统灵熙以俄兵骤撤，无御侮资，遣人拊循之，招四五营。而张桂林等亦愿赴东山，诛其党恶。时奴才增祺由沿边札调翼长瑞禄所带马步三营已至省城，而俄都统柴尔必思克忽又翻悔，不令我军前往，仍电其旅顺提督，自往剿办，以为报复之计。虽奴才等剀切照会，以五不便说之。终莫能止其行。月之十九日(6月5日)业已分起开拔去讫。此俄军复往剿匪。尚未接战之大略情形也。

(摘自《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历史内幕

庚子赔款——强盗分赃图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虽然清朝政府早在8月7日发表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但帝国主义并不立刻承认李鸿章的代表资格，也没有打算马上与清朝政府议和。帝国主义不愿立刻议和的态度，英公使窦纳乐给外交部的报告上表示得很清楚。他告诉外相沙斯伯理说："在我看来，延缓和议，对英国并无损失，而且达成一般性的协议，短期内不甚可能"，他建议英国政府，"毋须严重考虑与中国政府议和的问题"。窦纳乐不主张立刻议和的理由：第一、是帝国主义占领北京后，他们对于采取怎样的方式议和，以及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在意见上和步调上是颇有出入的。因此他们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来统一内部的分歧现象；第二、他们更可以用延缓和议来威胁清朝政府，使它接受帝国主义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这样他们的侵略目的，也就更容易实现。

可是联军入京以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和以沙俄为首的俄、法集团互相对立的形势，迅速地形成了。沙俄为了达到并吞已经在它控制下的我国东北领土的目的，故意示好清朝政府，提出撤退北京占领军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以后，立刻遭到法国以外的全体帝国主义的反对。虽然沙俄撤走了它在北京的军队，但其他国家仍然按兵不动，因此沙俄的计划失败了。继沙俄之后，德国帝国主义在9月中提出：清朝政府必须交出赞成义和团的首要人物，交由帝国主义来处分，作为和议的先决条件。这个主张也因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不赞成而遭否决，因为这样激烈的办法，不仅对那拉氏不利，对他们也是同样不利的。而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推翻，而是要维持那拉氏的反动统治。

9月中旬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斗争不但更加激烈，而且因为各国士兵间常有集体和个别互斗的事件发生，随时有引起武装冲突的危险。他们为了避免自己内部可能发生的火并，急于想找出一个能够共同同意的侵略方案来，早日与清朝政府议和，解除他们面临的威

庚子一卷6正

胁。

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帝国主义在10月4日向各国政府发出了下面的通牒。这个通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不但议和的方式是根据这个通牒，后来的辛丑条约也是从这次提出的基点上扩充出来的。下面就是法国通牒的内容：

列强派遣军队来华，营救公使为其首要任务，幸赖各国合作无间，将士忠勇用命，使此项目的顺利完成 目前问题在向任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之中国政府追索以往合理赔偿，取得未来切实保证。共和国政府总结各国对此问题之意见为下列各点，如经各国认可，即以此为和谈基础，与中国政府立即开议。

一、严惩由各国在北京代表指定之祸首。

二、禁止军火输华。

三、国家社团及个人之合理赔偿。

四、北京使馆永久驻兵。

五、拆毁大沽炮台。

六、天津大沽间择二、三处驻兵，使有事时使馆人员能安全抵达沿海地区，畅通无阻。外国军队亦可由沿海开赴北京。

共和国政府认为此种合法要求，由列强集体提出，又得国际占领军的支持，中国政府不得不迅予接受。

法国帝国主义的建议，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赞同。10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针对法国的建议，提出补充意见。它向各国政府表示：北京外交团除讨论六点基点，并对这些基点提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外，还可以提出法国通牒上没有列举的内容，共同加以讨论和审查。这样“各国代表有用性的范围，更可以大为增加”。日本帝国主义的建议，迅速得到各国的支持。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从此更积极地负起侵略中国的使命。从10月中旬以后，以拟订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辛丑条约为其目的的公使会议，依照法国提出的基本内容和日本建议的讨论方式，开始正式会商了。

在10月和11月的公使会议上，对于赔款问题，作出了两项原则性的决定。第一、他们把赔款的范围扩大了。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中国人中少数的坏分子，甘心充当他们的忠实奴才，规定在义和团时期，凡替外国服务的中国人而受到损失的，也予以“合理”的赔款，由其所服务的国家代为提出。第二、他们为了使赔款能如期到手，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决定“中国政府应采取列强可以接受的财政改革，以保证偿付本项赔款的本息”。下面就是草约上(议和大纲)关于赔款问题的规定：

凡有各国各会各人等当肇乱时被害亏累，中国咸宜从公赔偿，华人员从事他国之故，身躯家产殃及者同。中国务须筹出以上偿款及分还各欠之来源，适诸大国之意，斟酌允行。

公使会议讨论调查报告书后，5月7日决议照会清朝政府，截止至7月1日的赔款总数为四万五千万两，如7月1日以后继续占领北京，必须另加军事费用。德国公使一再威胁利诱李鸿章说，如果清朝政府答应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加息四厘，德国必先撤兵，其他各国亦必随即照撤。现在正是撤兵时节，如错过机会，必须在9、10月才能撤兵，赔款势必增加。逃亡在西安的满族皇室和官僚，平日习惯了养尊处优的腐化生活，到了西安以后，起居排场大不如前，巴不得赔款核定，外兵早日撤走，他们就可以回到北京来，重过享乐的日子。至于赔款，既然用不着他们来负担，自然也不值得多加顾惜了。这样清朝政府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又一次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5月16日(四月初九)清朝政府下谕称：

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着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惟中国财力仅有此数，务须将本利核定总数，宽展年限，力与磋磨。

赔款总数和利息决定后，帝国主义的外交斗争环绕着赔偿方式问题和提高关税问题激烈地展开了。在赔款偿还方式问题上，俄、法主张帝国主义共同联合作保，替清政府筹集外债，以便达到一次取得全部赔款的目的。德国最初也同意俄、法的主张，曾经劝诱中国驻德公使吕海寰一次付清赔款，以为这样“一了百了”，免得以后永远纠缠不清。可是这样的赔偿方式，对英、美帝国主义是不利的。英国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并最后商得德国的同意，提出了分年摊还的办法。沙俄为了缓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对，把帝国主义联合共同作保改为每一国家仅仅担保它所取得部分的数额。英国也不赞成沙俄修正以后的办法。下面是英国政府给驻俄大使的训令：

我们对俄国建议的反对态度，仍然不变。各国以从十六分之一起至四分之一止的不同比额，来担保63,000,000镑(即四万五千万两)的贷款，不是一个行得通的办法。没有一家银行愿决定贷款的开价(Quotation)。万一中国不能付款，派定及征集应交付的款项。会引起不堪忍受的纠纷。按照我们建议的办法，如果每一国家自愿，可以自行担保发行它从中国政府得到的债券，或者发行它自定的证券，以中国债券作为担保品。

同时英帝国主义坚决声明，仅仅为了其他国家取得一个赔款的方便，便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国际共同联合担保贷款，是不能想象的。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的态度，沙俄终于收回原先的主张。下面是英国拟定的分年摊还的具体办法：

一、中国发行总数四万五千万两的债券，按票面所开的价值分给各国。各国所得的部分与其赔款要求是数额相等。每两折合英币三先令。

二、债券发行后最初三年，年息三厘，每两年增加半厘以后永远定为四厘。

三、债券还本减息基金(Amatization)在债券发行后五年实行,每年归还本金百分之一。

四、中国政府指定特种财政收入作为偿付债务之用。

五、成立由各国政府指定之银行代表组成之委员会,负责收受及分配债券本息之工作。中国应将赔款按一定时限交与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按比例分配。

赔款作抵的财源问题确定后,这幅帝国主义强盗分赃图也大体构成了。辛丑条约终于在1901年9月7日签字。除使馆驻军外,北京的外国侵略军9月17日起撤退,直隶除规定的十二处驻兵地区外,也从9月22日起陆续撤军。10月6日那拉氏由西安出发回京,继续它腐败而丑恶的统治。从辛丑条约以后,清朝政府不但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忠实工具,同时也是他们剥削中国人民的有利武器。早在条约签字以前,清朝政府的上谕里,说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决心搜刮中国人民的脂膏,来填充帝国主义的欲望。清朝政府于条约签字之后,深恐赔款到期而不能照付,得罪了外国主子,失去他们的宠信,强迫各省每年分摊二千三百余万两的赔款。户部向各省建议,为了解交赔款,地方督抚可以开办新税,如广东的房捐,山东的"地丁收钱,酌提盈余"。另外又建议各省食盐每斤加税四文,鸦片、茶、糖、烟、酒再抽厘金三成。同时表示如果户部所建议的办法,各省认为"窒碍难行,未能相宜",地方督抚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尽可自行设法筹款,只要到期如数照解就可以了。若"期限已届,而短欠尚多,则惟各该督抚是问?"在这样的命令下,中国人民因庚子赔款所受到的额外的经济剥削,自然是日益沉重了。

(摘自《进步日报》1951年11月25日丁名楠)

关于惩办主战大臣的压力

萨道义致兰士敦

我荣幸地报告:昨天早晨,在女王陛下使馆举行了各国使节与庆亲王、李鸿章等两位中国全权大臣的会议。

会议开始时,外交团首席公使用法文宣读了对那些罪犯的控告书。然后,该控告书又有人用中文宣读,但是,按照事前的安排,该文件的副本不交给中国全权大臣。

庆亲王和李鸿章答复说,控告是公正的,但他们指出:遵照 列强所规定的条件,对罪犯的惩罚应与所犯罪行的轻重程度成比例。

首席公使回答说:各国使节已经说明,对他们的惩罚是处以死刑。当中国全权大臣询问按照他们的罪行区别轻重不同的惩罚应采取什么方法时,我说:根据我所收到的我国政府的训令,对控告书内所包括的那些罪行最轻的人,适当的刑罚是死刑;由于我们不知道有更重的刑罚,所以我们不能指出对那些罪行最重的人施以任何更严重的刑罚;因此,在他们之间不能有所区别。

法国公使补充说:各国使节已仔细地审查了控告书内所指名的那些人的罪行,并得出结论说,他们都应处死。

中国全权大臣说,他们已收到朝廷的谕旨,尽可能详细地指出了对某些人所判处的刑罚。

各国使节回答说:他们现在希望知道究竟打算给予什么惩罚,以便他们可以对这些建议予以考虑。

庆亲王说:联合照会第二款中特别指出的那些人,已经证明他们自己对中国犯有罪行,对各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全权大臣本身无权同意我们所建议的对他们判处死刑。他询问说:我们是否打算立即执行这些惩罚,还是晚些时候执行。

法国公使坚决主张,中国人应说明关于惩罚的建议

中国全权大臣的答复简单地说来如下:

庄亲王应赐令自尽。

端王应流放新疆,永远监禁。

当法国公使询问这个判决是否包含没收其财产时,中国全权大臣答复说:他没有可没收的财产,因为他的财产都已被毁坏。

关于澜公(载澜),中国全权大臣说:他是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的副统领,遵照他所得到的该衙门统领庄亲王的命令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罪行比其他某些人的罪行较轻。他应被撤职和流放,流放的地点尚未决定——或许是满洲的黑龙江省。

由于他是皇室的近亲,对他处以死刑是不能执行的。

关于刚毅,中国全权大臣说:由于他已死亡,所以不必进行更多的讨论。法国公使要求对他施行死后的惩罚。中国全权大臣答复说:肯定可以将他撤职。首席公使再三询问:这种撤职所具有的作用和法律上的后果,是否同刚毅被判处死刑所产生的作用和后果相同。

李鸿章回答说:后果将是一样的;他将丧失一切。

关于赵舒翘,他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惩罚与澜公的情况是相同的。(首席公使说:各国使节认为他们都犯有最严重的罪行,应受到尽可能最严厉的惩罚。)

关于英年,其地位同澜公和赵舒翘一样,因为他充任一名僚属。因此,中国全权大臣建议,对他的惩罚应与对澜公的惩罚相同。

法国公使说,各国使节一致要求对英年处以死刑,对此中国全权大臣答复说:对相同的罪行不能施以不同的惩罚。

当中国全权大臣谈到所拟议的惩罚对赵舒翘太严厉的时候,我提出了庄亲王、澜公、英年和刚毅所发布的一道命令,它表明这四个人对于他们作为义和拳首领的行为负有同样的责任,同时我还提出了应由前三人负责的

另一道告示,它对俘获欧洲人者给予奖赏,并宣布对保护欧洲人的任何中国人处以死刑。

中国全权大臣回答说:他们的法律区分首犯和从犯。我答复说:他们所犯罪行不是违犯了中国的法律,而是违犯了国际法和人道的准则。我们对中国的法律不能予以考虑。

中国全权大臣又说:该被告英年和载澜是遵照他们的首领的命令行事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副统领和僚属而已。

德国公使询问,关于英年,他被放逐是不是长期性质的,对此中国全权大臣答复说:如果希望如此办理,他们准备补充,不许召还端王、赵舒翘、载澜和英年。

然后,德国公使询问说:中国全权大臣为什么不能建议对端王处以死刑,端王是公认的首领,因此犯有最严重的罪行。有什么理由区别端王和庄亲王?

中国全权大臣答复说:端王是皇帝的近亲,而且被认为同皇帝和太后的关系最为密切。建议对他予以放逐,实际上是等于死刑。

德国公使提醒中国全权大臣:1861年,皇帝的一位近亲被判处了死刑。

庆亲王答复说:那个亲王是一名叛逆,而且是叛乱的教唆犯,因此他应当受到比端王更严重的惩罚。

德国公使问道:中国政府不是始终告诉我们端王是一名叛逆吗?

庆亲王说:他必须请求各国体谅中国。他曾经说过,端王是皇帝和太后的亲人。端王确实给他的国家带来了灾难,但是,如果把他处死,将对皇室产生悲惨的后果;所拟议的那种流放是一种缓慢的死刑。

我问道:端王究竟是不是应对他的行动负责的一名叛逆,或是他们认为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对于这个意见,庆亲王答复说:端王对他的国家或政府并未图谋反叛,虽然他曾提出过坏意见。我进一步询问说:他提出这些意见后,是否根据他的政府的命令执行这些意见。庆亲王回答说:全权大臣只不过是提出他们的想法而已。他们并不想保护那些犯罪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探明各国使节关于应施刑罚的意见。

关于毓贤,可施行死刑。

关于董福祥,中国全权大臣争辩说:他统率着军队,而且在回民中间享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们抱有一切希望。以后将对他进行惩罚。

法国公使说:中国全权大臣了解,董福祥是最恶劣的罪犯之一,他曾率领军队,而且当其他将领松劲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不懈。各国使节不能容许他免除死刑。

关于李秉衡,将剥夺他死后的一切荣誉。当首席公使询问这是否将产生同刚毅的情况一样的后果时,中国全权大臣作了肯定的答复。

关于徐桐,对他处以同刚毅和李秉衡一样的刑罚。

关于徐桐的儿子(徐承煜),中国全权大臣说,以前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他们说:他的地位使他不能提出任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

法国公使说:袁昶(上折反对攻击各国使馆者之一)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发觉徐桐的儿子在场,向他预示以后将轮到他被处死,这意味着他应对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徐承煜已落入外国人手中,可以交给中国人处死。

李鸿章答复说:可对他处以死刑之外的任何刑罚,但不能处以死刑,因为他仅是一名僚属,特别是因为他们未能提出关于他犯有罪行的证据。

法国公使说:中国全权大臣的论点是对僚属不能处以死刑,而与此同时,他们却拒绝建议对那些首领判处死刑。各国全权代表掌握了这个人物所犯罪行的确切情报,因此要求将他处死。

意大利公使用尖锐的态度说:他对李鸿章不愿意接受各国使节对这个问题的要求感到惊讶,因为李鸿章本人在一次私下的会晤中曾表示徐桐的儿子应当处死,而且还补充说明他已经落入外国人手中。

李鸿章在被迫对徐桐的儿子表示他的意见时说:他们建议将他监禁,并请求撤除他的职务。关于启秀,他们将提出类似的建议(徐承煜和启秀两人现在都在日本警察手中。)

关于中国全权大臣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即上述两人的名字现在都是第一次提出来,我说:12月22日的联合照会曾经说明,9月25日上谕中所提及的人物,以及各国使节日后将指名的那些人,都应予以惩罚。我又说:各国使节还必须提出一份各省官员的名单,因为那些官员对两百名以上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负有负任;同时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全权大臣提出任何名单。法国公使支持我的意见。

庆亲王答应把我所说的话上奏朝廷,虽然他不能够建议对他们处以死刑。

李鸿章同意庆亲王的意见,表示希望各国使节不坚持较中国全权大臣现在所建议的更为严厉的刑罚。

德国公使警告中国全权大臣说"拖延谈判将对中国产生更严重的祸害,因为直隶驻军的费用将显著地增加军费支出,而这些支出将包括在赔款之内。

然后,法国公使对中国全权大臣说:如果他们认为各国全权代表会同意接受中国提出的那些建议,那他们便错了。各国将不会满足于那些人犯了许多罪行之后仅有两人处以死刑,那些罪行所表现的形式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继续不断地攻击各国使馆,杀害一位外国使节,以及杀死许多保卫各国使馆的守军。

那时,我提出了在被围困期间英国使馆曾经收到的某些信件,上面写着庆亲王及其他大臣的名字;我询问这

些信件是不是在他的许可下发出的。

庆亲王查阅这些信件后答复说：这些信件不是按照总理衙门过去所采用的形式，因为那个机构由于北京发生的骚乱而解体。总理衙门的某些成员也是军机处的成员。这些人中间有端王和赵舒翘，他认为他们在军机处起草了这些信件，并利用他的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名义发出这些信件。

然后，接着进行了一些闲谈：各国公使认为列强将不满足于中国政府采取这一微不足道的措施抵偿所犯的罪行；中国全权大臣声称，他们不能给予更多的东西。我提出继续谈下去是无益的；会议在持续三个小时之后宣告结束。

（摘自《英国蓝皮书有关中国资料》）

赫德爵士关于中国应付赔款的备忘录

（一）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不能支付现金。

（二）因此，所需要的款额必须取自人民的积蓄或政府当前的岁入。

（三）没有统计数字表明人民的财富；但是，即使承认有可能从他们手中找到所需要的款项并一次偿清全部赔款，但企图收集这笔款项却将扰乱各省，而且以失败告终。

（四）从户部现存档案编制的最近收支报告书表明，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费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

事实上，为现有借款拨出这么多的岁入，是造成亏空的原因，因为所有这些借款的偿付，扣用了政府为满足地方和首都行政费用所依靠的资金。没有开辟新的岁入以满足的支出，因些，从岁入中进一步提取任何款项，便意味着增加亏空，于是总亏空必定成为一笔愈益增大的债务，结果造成国家破产，或是由增加税课来弥补，或是由增加税课与节约用款共同来弥补。节约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至于新税，它们很难课征，而且不足以马上支付征收的费用。官吏、官方机构和政府工作都将被仓促的或考虑不周的节约企图而普遍受到干扰。新税是从来不得人心的，并且给那些僚属提供敲诈勒索的机会。官方的节约将危及国家行政的效率，而税课将削弱人民的生产能力或消费能力，它们都同样是要受到谴责的。

（五）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即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款时候，是不能不考虑这些情况的，因为目前的岁入既然不足以满足政府日常工作的需要，所以必须课征新税以弥补新的赔款所提取的那部分岁入。

（六）每年支出的项目大致上可以分类如下：

项目	金额
各省	20,000,000两
陆军	30,000,000两
海军	5,000,000两
京城	10,000,000两
八旗	1,380,000两
宫廷	1,100,000两
海关	3,600,000两
驻外使馆	1,000,000两
河道工程	940,000两
铁路	800,000两
借款	24,000,000两
备用金	3,300,000两
总计	101,120,000两

（七）岁入进款可排列如下：

项目	金额
田赋	24,000,000两
田赋	2,500,000两
地方杂税	1,600,000两
地方各种进款	1,000,000两
漕粮折色	1,300,000两
漕粮折色	1,800,000两
盐税	13,500,000两
厘金	16,000,000两
常关	2,700,000两
海关：	
一般货物	17,000,000两
外国鸦片	5,000,000两
本国鸦片	1,800,000两
总计	88,200,000两

（八）假定中国有四亿人口。征收和消费的岁入为一亿两，可以说政府每年使每人担负0.25两。如果这些款额被认为是净值，关于征税和敲诈勒索的费用应考虑增加一笔同样的款数（增加的款数或许太多），结果仍然是每人仅负担半两的税课。日本人支付七银元，而美国人支付十五金元，因此，可以说：无论存在着什么弊病，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比中国人负担的税课更轻，但这是孔夫子的教导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必须记住：虽然生活费用便宜，但工资很低；除了发生灾害之外，虽然人民到处有够吃（刚刚够吃）的东西，但全国通行的铜币（一千文铜币折合一银元）很适合中国的环境，所以在每个市场上一枚铜币能够买到一点东西。因此，虽然生活便宜而且税课轻，但如果认为新税不会遭到反对并造成损害，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这也是一个事实，既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比较沉重的税课是令人厌烦的，因为它首先是同全国的思想感情对立的，而且也给那些无耻的征税者提供了干扰生产事业的机会。

（九）由于考虑到这些理由，而且记住这个事实，即现在的经验表明，中国政府虽然处于困境，但还勉强能够维持现有贷款所造成的亏空，因此可想而知：偿付增加的赔款既然要由增税来弥补，那就不应超过目前的负担，既应尽量在每年二千万两以下，而且不应超过那个款额。这就是我对第一个问题——中国能够支付多少钱？——所作的回答。

（摘自《赫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由瓜分到“以华治华”

与中国备受列强侵略的同时，非洲大陆成了西欧国家的俎上肉，英、法、意侵入较早，德较迟，西、葡、比几个小国也趁大船，乘机捞一把。残酷的掠夺激起黑人的反抗，尼罗河上游苏丹一次起义，把六十年代曾经称雄中国江南的英国将军戈登打死了。这一年中国正遭遇法国的侵略。欧洲国家为分割非洲在刚果发生矛盾，由德国主持召开柏林会议，达成分赃妥协，从此黑非洲陆续支解瓜分，到世纪末全部有了新来的白种主人。

分割非洲期间，瓜分中国之议由德皇威廉首先提出，一时在西欧社会上层当作时髦话题。甲午战败后，各国纷纷指定自己的所谓“势力范围”，好此定货一般，瓜分意图越来越露骨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因自己落后一步，分不到肥肉，就另换一个口号，叫做“门户开放”，要在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与列强实行“共管中国”。

八国联军一动手，瓜分之局更似箭在弦上。分割殖民地尝到过甜头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几个小国，来不及出动军队，连忙派使节跟屁般赶来，也想要分尝一杯羹。

英国首先成立“瓜分中国和平会”，公开发展章程。它以英国是侵华老前辈，贸易关系最大作为理由，声言瓜分中应独得三分之二的权益。沙俄不尚空谈，全凭实际行动，先囊括了东北三省，续派大军入关，还想分割华北。德王威廉是瓜分中国首倡者，大将瓦德西出师前两星期，为要使“皇上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具体化”，他搜集大量资料，悉心研究中国情况，随带军舰八万吨，陆军二万二千人出发，满想攫夺巨额赃物。英国在南方的积极活动不落沙俄之后，但它兵力不足，阴图巧取。它利用刘坤一、张之洞搞“东南互保”，并向两广的李鸿章游说，更与兴中会、自立军联系，妄想把中国分裂为几个小朝廷，充当它的傀儡。它公然宣称要独占长江流域利益，对于法、德、日、俄分别占领云南、山东、福建、东三省都有意见，这就展开了因为分赃不均而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德国军队尚未完全到达中国时，原联军统帅英国将军西摩尔惨遭挫败。德皇威廉二世闻讯，不得不惊叹这一战役失利，“使欧洲人在亚洲大丢颜面，已是毫无疑义的了”。战前西方人流行一种议论：“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得好，武器齐全，就可以在整个中国到处畅通无阻地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联军屡遭挫折，这一神话迅速破产，并遭受了广泛的非难。西摩尔下台，瓦德西继任八国联军统帅，他惊异地看到了义和团那种不怕牺牲，顽强英勇，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他具有非洲殖民的丰富经验，这种坚强的抵抗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他看明白了一个问题，写在他的《拳乱笔记》上。他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有足够估计；但是，他说：“吾人在此不能忘却一个事，即：中国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有异而分裂，并有神圣华胄的自尊心充满脑中。更有一事不可忘却，中国群众并非已成衰弱或已失去德性之人，他们仍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具有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以及守法易治等特点”。最后，说到主要问题：“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至少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因武装不良，大部分甚至连火器也没有。”除了把勇于卫国诬指“好战”之外，瓦德西是有见解的，他慑于预想不到的反抗力量，主张加强经济侵略，实行以华治华，避免因瓜分而招惹麻烦。

当然，实行瓜分还有另一麻烦，就是这块肉太肥了，彼此攘夺的矛盾日益激化。美国有“利益均沾”这个法宝，落得坐山看虎斗，自居举足重轻的优势地位。法国胃口大而势力单薄，因此首先成了瓜分的反对派，甚至制造舆论，小心因瓜分中国而酿成欧洲的战争。法国一位有声望的议员发表演说，赞扬中国“民气坚劲，非印度南洋可比。……谁敢谓亚洲堂堂之大国，无华盛顿其人者起”，结论是：“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英国因贪欲大而陷于孤立，国内舆论也变了，认为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在这种复杂的明争暗斗背景下，英德两国首先达成协议，相约不在中国获得领土利益。两个实力派表了态，其他各国没有二话。惟独沙俄仍想死赖在东三省不走，为四年后日俄火并埋下了火种。此后，西方报纸上议论瓜分的题材逐渐成了冷门。

瓦德西以联军统帅的身份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他的见解当时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

义和团运动在军事上遭受惨重的失败，但同时显示了四万五千万生灵“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义和团的余波在四川等省持续了好几年，而瓦德西所看到的，还有自立军和惠州起义等许多局部斗争，这就使得帝国主义者本来伸得长长的瓜分之手，不得不缩了回去。

（摘自《清王朝的覆灭》钱谷风）

历史考证

慈禧何以不曾垮台

慈禧狼狈出走，她的政权面临危机。由于从宣战到回銮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她的权术和机巧，及至最后终于保住了她的政治生命。许多重要情况不见于正史，甚至被窜改和歪曲了。为了保持历史真实，需要从正史以外搜寻可靠性较强的材料，综合考查，以明真相。本文所引重要论证，特为注明出处，借供共同研究。

决定宣战的多次御前会议，慈禧把早已撂在一边的光绪推出来亮相。有关这个场面的记述，各家之说不一，《景善日记》说，当太后"询皇上圣意如何"时，光绪"圣颜悲戚，默然颇久，似乎欲言而不敢言。后云，应请太后从荣禄所请，使馆不可攻，洋人亦应送津，惟是否有当，出于太后圣裁，非朕所敢作主者也"。《拳事杂记》说，光绪提出"为今之计，惟有停战议和为上策，其次则迁都"，载漪指责为"畏敌出逃"。光绪申辩："朕岂惜一身，自古未有京城糜烂如此，尚能布置一切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则说，当太后"决定宣战"时，光绪拉住了反对派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太后厉声斥责："放手，毋误事。"

德龄《瀛治泣血记》说，光绪在非会议场合当众向太后说："将来一旦闹出什么乱子来，要他们上前去抵挡既不能，要把一切罪过都委在他们身上又不可，到那时候，孩子恐怕祖宗的基业就保不住了。"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点，都说明了后、帝作过思想交锋，最后太后独裁。至于为什么把帝请出来，无非预计到日后万一发生三长两短，责任至少也得两人分摊。太后确实是条老狐狸。

光绪久已成为太后拔不掉的眼中钉，可是在发现宣战失策以后，太后对这个反对派非但不乘机泄愤，反而费尽心机保护他，为什么？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处处留着余地。"据《景善日记》说，载漪在拳民中煽动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随即亲自动手，带领拳民数十人闯至皇极殿外，大声鼓噪，要见皇上。"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老佛爷大发雷霆，词气极为激烈"，痛斥载漪"实谋不轨，自取屠戮"，责令他们一帮人"向皇上叩首，求恩恕罪"。慈禧已经发现大事不好，决定对外求和了，她知道一部分西方国家对光绪抱有幻想，把这个法宝留在身边自有用处。而且还必须随身带走！光绪本来想要留下的，但慈禧意识到"帝留之不为己利"，非要他一起走不可。于是一场惨剧发生。《景善日记》："珍妃素不孝老佛爷，现在胆敢跪请于老佛之前，有皇上不必西幸，应请圣驾在京裁度义和各事等语。老佛大发雷霆，立时命该班之太监将此忤逆之女推倒井内。……皇上跪求施恩贷其一死，乃慈颜颇不悦……嗣由李、宋二太监，将珍妃推倒宁寿宫外之大井也。"如果让光绪留京，自己不就白费四十年心血了吗？这一层老佛爷看得太清楚了。

逃难的狼狈情况，不用多说了，开始几天流出了她毕生以来可能是最多的泪水。可是南方的勤王兵一到，各地的供奉纷至沓来，她惊魂甫定，立即着手做一件头等的重要工作，就是赖掉宣战的责任。她把一度供其利用的义和团和主战大臣作为替罪羊，向洋人摇尾乞怜。九月七日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九月二十日再次上谕："此次事变实由拳匪肇衅，以至酿成巨祸。"下文都是向洋人表示"认真剿办，……痛加铲除"的决心。她还逢人制造舆论，巧舌如簧，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她对吴永娓娓而谈道："……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大段地制住他们，更不知闹出什么乱子。"她把不同时间做的不同目的的事搅拌一起，突出前、后两段事来赖掉中间五天的一段事。到年底，她下谕内阁，把中间一段事中所颁谕旨指为"首祸诸人……乘间矫擅，非出朝廷本意"，要"提出消除"。因此《清实录》里连宣战诏也不见了，有些诏书的语句作了窜改。

西狩途中，最使慈禧心头感到沉重的，是惟恐和议中追究"首祸"要落到她的头上来。她先关照过荣禄：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后又屡问奕劻，和议中有无"万不能行之事"，这里讲的是什么"事"，不言自明。据《庚子国变记》载，联军代表瓦德西曾暗示过要追究这个"事"，都被忠实奴才李鸿章、奕劻关了门，他俩都表示什么都可以，惟独这个"事"绝对不能谈。于是在讨论次要罪首时，李鸿章又有所辩解，瓦德西傲然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犹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和约草案电呈西安，慈禧看过，心上一块石头这才落下。《庚子纪事》也说："和议成，罪魁之死者死，流者流，免者免，太后因谓德宗曰，洋人欲索此次祸难之唯一为首者，意盖指我，今幸未提出，不能不感祖宗之默佑也。"《庚子国变记》说："太后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惴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李鸿章，尽如约。"

为逃避追究祸首，她做了许多工作。有一道谕旨说："当使馆被围之际，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仰体慈怀（这是借光绪

口气为太后抹粉)。惟我与国,应识此衷。"又一次谕旨:"凡我友邦,当共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为求自己幸免于祸首,先要另行"钦定"祸首。

联军明知宣战的责任是谁而不追究,是由于慈禧的狡赖和频频暗送秋波?是由于议和代表抵死给她挡住了?这些因素不能完全排除,然而都不是主要的。且看瓦德西写给德皇的报告中对清廷的分析:"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生振作有为之人物。"既然瓜分不成,慈禧在殖民者眼中仍不失为一个最为合适的傀儡玩具。

于是帝、后回銮,慈禧政权原封不动。到京后十天,她第一次撤帘公开露面,举行了盛大宴会,热情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庚子纪事》说:从此,"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预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尤融洽。内监李莲英最用事……"《庚子国变记》记载:太后藏金宫中三千余万,"及还宫,金无恙,则大喜"。西狩期间多次下诏罪己,都已成了过去,"渐益奢恣,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数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尽忘丧乱矣"。

(摘自《清朝史话》学林出版社)

论瓜分中国事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现在所欲问者,只是各国对此问题,究取何种态度。俄国方面,因占领满洲之故,在最近期间,当可心满意足。假如现在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域一部分,德国占据山东,则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因此,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十分注意,倘或一旦列强对于瓜分之事,果有妥协之望。

但余对于此事,却认为绝对不能实现。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于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洲,毫不加以阻扰,则该国对于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对于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

据余在此所能推断者,则几乎所有列强,皆欲借建设铁路、开采矿山之事,在华直接生利以自肥。其结果则各种间接利益,亦将渐渐随之而生。譬如中国重大未辟之财源,势将由此日益发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亦将由此益增,对于各国商业工业,更将从此辟一广大活动区域。因此之故,预料各国前此参预经营之铁路事业,不久即将从新着手。此项铁路事业,在乱事以前,即已一部分实行开工建筑,一部分业经计划妥贴。

最近余所新悉者,只有俄国对华策略一事。俄国最初用尽方法,谋得山海关、北京间之铁路,彼曾先将彼之天津租界大为扩充,直与车站地址相接,妥为之备。假如争有山海关、天津、北京间铁路之举,系英国方面获得最后胜利,则俄国势将另自新筑一条山海关至北京之铁路。此外俄国尚欲再筑一条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并拟将来再为引长,直穿过蒙古,以达 Kiachta。至于北京、保定、正定间之铁路,其延长路线系拟直达汉口,该路直到现在,系由法、比公司所建筑;惟俄国方面,现刻竭力设法收买该路股票,以便由此获得监督该路之权,并得循此轨线,以达各国商业利益要点之长江。在其他方面,则英国拟由缅甸出发,法国拟由东京出发,各建铁路,以达该处。据余观察,俄国之意系欲使中国永在衰弱状态之中,常受俄国羁绊支配。因此之故,若谓俄国之使中国经济发达,其意系在助强中国,实为最不合理之谈。——但在他方面,余实未敢遽信,中国现在已到甘受俄国保护而不辞之衰弱地步。所以余料,假如俄国永远据有满洲,其势将使中国皇室取消北京首都资格,另建国都于他处,实属极为可能之事。

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是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未有外敌严重压迫,以致养成一种不能战争之民族。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出振作有为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闻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吾人若一观察日本维新之迅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倘若中国一旦强盛,则受其影响者,实以俄国为最。

俄国将于距其中央政府甚远之数千基罗米突遥长界上，行见一个含有危险甚或势均力敌之对手产生。

若此种观察不错，则无论为德国或英国利益计，皆宜以此之故，扶助中国，使其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吾人商业关系，当然亦将随之而进步。至于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盖余之意，以为德国若以胶州为根据，实能享用山东利源，而且由此更将获得一个较大活动区域，假如铁路建筑，不仅天津、Funan〔译者按：此字似为济南府之误〕一段，而以直达南京为其终点。

假如现在俄国果真努力，以助中国发达，则该国之政策，可谓完全错误。近来有一中国老人，曾宣言曰："我们自四百年以来，皆在睡梦之中，但其间我们深觉安适无已。你们白人，必欲促使我们醒觉，则将来终有一日，你们对于此举深为扼腕之时"云云。

关于德国在山东方面并吞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种困难，即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是也。就该地大抵贫乏之居民中，欲得多数税收，可谓希望甚少；其中尤为重要者，则该地距德太为遥远。假如中国一旦复欲夺回山东，则德国方面——除开列强特为德国而设之各种困难不计外——对于此种战事，非至财政破产不可。

（摘自《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

风云人物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字少荃。1844年中乡榜。1845年进京会试，受业于曾国藩门下。1847年，中二甲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累充武英殿编修、国史馆协修。1853年，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1857年，为安徽巡抚福济排挤。1859年，37岁的李鸿章入曾国藩幕，颇受青睐，行军大计，无不参与，被誉为"才大心细，堪膺封疆重寄"的人才。1861年，奉命筹建淮军，第二年率部赴上海，得实授江苏巡抚。1853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1864年，因扑灭太平天国有功，赐封一等侯爵，号曰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1867年，授湖广总督，负镇压捻军的责任。同年，消灭东捻，加赏一骑都尉世职。1868年，平西捻，积功授为协办大学士，1870年，48岁的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4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汉官之首。1894年，得赏三眼花翎，旋因甲午战败，被拔去三眼花翎，革职留任。第二年，赏还花翎，黄马褂，开复革职处分，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6年，赴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游历英、法、德、美各国，回国后，在总理衙门行走。1899年，署理两广总督。1900，赏方龙补服，补授两广总督，旋改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1年，78岁的李鸿章奉命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改任督办政务大臣，署总理外交部事务。同年11月7日卒，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李鸿章登上清朝政治舞台之际，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破门而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时。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暴发，使本来已经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面对国内和世界的局势，李鸿章并没有象倭仁等顽固派那样，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变局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是从放眼世界的高度来观察中国面临的局势的，认为这些强敌已大大超过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中国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我们仍拘泥成法，固守旧章，前途将不堪设想。他浅层地比较了彼己之长短，认为西方诸国船坚炮利，工商发达，国力强大，而清王朝则军事窳败，财政枯渴，国力疲弱，"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均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不敌彼后门进子之来复枪炮，向用之帆篷舟辑，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因此要转弱为强，必须在"变"中求出路。他援引中国传统的变易之说为根据，阐述变革的必要："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他反对泥古不变的停滞观念，说"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李鸿章认为要摆脱危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就得变革。那么，怎么变呢？李鸿章认为首先要学习外国的长处，丢弃固步自封的陋习。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就惊异于洋枪洋炮的威力，主张将士学习使用。推而广之，他认为可以广泛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自强。

六、七十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向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化外蛮荒之国学习其所长，学习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曾多次表述："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取彼之长，益我之短，自强这基，莫大于是。"师夷长技落实于国策，便是大办洋务。他坚持以洋务自救，即使受到顽固派的攻讦，守旧习惯势力的阻挠均所不计。带头兴办了大批洋务企业。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他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而洋务事业的成败，则系乎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的新式人才。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因此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从70年代末期开始，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逐渐有所加强。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1878年2月李鸿章致郭嵩焘说："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伦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但李鸿章并不敢倡言废科举，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同时李鸿章也很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并效法西方建立了一批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

材料二

对外交涉，在李鸿章的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后，身当外交要冲。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李鸿章评价的最大分歧也就在其对外交涉上。因此"欲断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作为当时一个很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意识。但由于李鸿章办外交基本上是以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因此就使得媚外的舆论完全掩盖了他排外御侮、争取民族主权的实质。早在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来到上海，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由于当时清政府已制订了"外敦和睦"的基本国策，所以李鸿章也是以"和好"为方针与洋人往来的。但是他所谓的"和好"与朝廷及上海官绅的"和好"有所不同。他对总理衙门对外太"柔和"，苏松太道吴煦等人"过趋卑谄"，"媚洋人无微不至"，颇为不满。他认为这样作"既输（中国人）下气，且长（外国人）骄志"。他采取的措施是"可从则存"，"其不可行者，亦未便曲从"，或婉言相劝，或以"忍默静镇"相对待，不致于使矛盾激发而失和。在军事方面，李鸿章决不同意外国军队深入中国内地作战，但欢迎他们在上海及周围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并且他始终与外国军队保持界限，"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对淮军的指挥权，他更是不放手，声称中国军队只服从中国政府命令，不难看出，李鸿章一开始与洋人打交道，就比较注意维护中国的自主权。

当然李鸿章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更多的场合表现为主和。如由日本侵台而引起的中日交涉中，在由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交涉中，在中俄关于伊黎的交涉中以及中法战争的前期，他都是主和的。并且由于他的主和，丧失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损害了一定的权益。但李鸿章的主和与崇厚琦善之流有根本的区别。琦善之流为了主和，不惜撤防驰备以媚敌，和议成后苟且酣嬉如故。而李鸿章的主和是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他清楚如果一味讲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因此应"刻刻自强"。而洋务运动是一项全面地学习西方长技的运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整天陷于战争之中，哪有精力去求富呢？所以维持和局是不得已的妥协，是中国推行近代化所需要的。另外求和是为了中国的自强运动争取时间，"为后日张本"。因此，即使暂时"稍损团体，渐长寇志"，也是值得的。每次和议成后，他不仅没有松口气，而是大声呼吁："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并且带头兴办洋务运动，练兵、制器，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样的求和，无疑是从维护民族利益这个大局出发而进行的，同样是具有民族意识的表现，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并非只有战之一策，通过外交谈判，利用侵略者这间的矛盾都是对敌斗争的必要手段和策略。

在谈到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及活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经他手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进行回避。如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重大条约有《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这些条约的签订"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但我们对这些条约也应当具体分析，将其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待。拿《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来说，中国被侵略者打败，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谁去谈判结果都会一样，逃不脱割地赔款的下场。事实上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电告了清政府，他完全是奉清政府之命进行谈判、签字的。一个烂摊子摆在那里，无法收拾的时候把李鸿章推出来，最后又把罪名归到他的身上，这公平吗？我们不应当只看谁签订了条约，谁就是

卖国贼，而应当分析这个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如果是处在不可抗拒之中，是非签不可的条约，我们就应当看谈判者是否尽量争取一些权利。如果尽量周旋，尽量为减少损失而作出了极大努力，最终仍然摆脱不了割地赔款、辱国丧权的命运，还是应当看作有民族意识的表现，还是不应受谴责的。事实上李鸿章在每次谈判中，总是本着"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宗旨，充分利用自己的外交才能，多方周旋，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减少一些损失。这些都是可贵的。

（摘自《近代史人物传》文史出版社）

奕劻

奕劻（1838～1917年）爱新觉罗氏，乾隆帝十七子永璘孙，辅国公绵性子。后奉旨为绵繁嗣，袭辅国将军。他是清朝末年以贪庸恋权、结党营私而闻名的皇族当权派。

奕劻虽系远支皇族，但因为人善于钻营，故得以飞黄腾达。自同治六年（1867年）起，历任镶红、镶白、镶黄旗蒙古都统，镶白、镶黄、正蓝、正黄各旗满洲都统，镶黄、镶蓝各旗汉军都统，宗人府左、右宗正及宗正，崇文门正监督。1872年同治帝大婚时晋郡王衔。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不久又封为庆郡王。次年，会同醇亲王奕劻谡理海军事务。1894年，慈禧万筹，懿旨封为庆亲王。

奕劻真正在朝中独揽大权，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当时，慈禧太后因妄图利用义和团教训洋人，结果一败涂地，弄得声名狼藉不堪。为了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慈禧太后不得不重用皇室中辈分最高的奕劻，让他与李鸿章一起参加签订《辛丑和约》的谈判。根据这一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901年，改为外务部，由奕劻出任总理大臣。1903年。授奕劻为军机大臣，寻命总理财务处、练兵处。1907年。又兼营陆军部事务。1908年。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这在远支皇室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奕劻在官场中一向以贪劣著称。1904年，御史蒋式理揭发说："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120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钜款。"1897年御史赵启霖揭发直隶后补道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奕劻子）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署理黑龙江巡抚）。"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后，奕劻为巩固自己的权位，援引手握兵权的袁世凯为靠山，并在朝中结纳铁良、端方等满族实力派人物做奥援。所以在清末的预备立宪过程中，奕劻又成为首任的内阁总理大臣。对于奕劻的种种不法行为，群众恨之入骨，当时有民谣说："杀端方，宰铁良，贪脏枉法庆亲王，里勾外连袁世凯，剉骨扬灰徐世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奕劻的请求，从新起用退居河南的袁世凯。因为此时的奕劻，早已被袁世凯用重金买通，所以竭力为袁世凯掌权鸣锣开道。他甚至用帝国主义的威胁来恫吓清廷，说什么"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最后他把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而自任弼德院总裁。在尔后的南北和谈中，奕劻又勾结袁世凯，设法压迫清廷逊国退位。

辛亥革命后，奕劻携巨款隐匿于天津英租界，1917年病死。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杨儒

杨儒（？—1902年）字子通，号讷庵。汉军正红旗人。同治举人。曾任道员。1892年2月，出任驻美公使，兼西班牙、秘鲁公使。1895年任太常寺少卿。1896年，任驻俄、奥、荷公使。1898年任工部右侍郎。1900年，沙俄强占东三省。1901年1月，被任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交收东三省。1月4日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开始。1月，沙俄要求与清政府进行单独协定的谈判。2日，清廷授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李鸿章为了取得沙俄的支持，力主出卖东三省。4日，谈判开始。17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向杨儒口头提出约稿十三条。2月16日，俄方正式向杨儒提出议款十二条，不经讨论，便要画押，内容有东三省由俄国"设兵保路"；"禁中国设兵"，只准设"马步巡捕"，亦必须"与俄商定数目"，"禁运入军火"；凡中国"将军大员经俄声诉，即予革职"；"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处矿产、铁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予他国；不准中国在上述各处自行造路"等。杨儒打算驳改俄方约稿，收回东北。表示条款须无损我主权，方可签字。27日，清廷命奕劻、李鸿章商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各国不愿沙俄独吞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力主拒绝签字，并劝朝廷联英、日拒俄。李鸿章力主签约。杨儒与俄财政大臣维特谈判七次，与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十四次，没有结果。2月下旬，俄国再一次出重金收买李鸿章。"如能签约，立即可给五十万卢布，以后还可多给"，同时又威胁说："逾期即决裂"。3月12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压迫杨儒，限26日画押，不能更改一字。被沙俄收买的李鸿章，与奕劻电令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沙俄提出最后约稿后，不再会见杨儒，杨儒要求继续谈判，遭到拒绝，甚至对中国皇帝国书、外交文件，俄政府也一概不收。3月22日，清廷电令出使各国大臣，请各国代请

展限订俄约，以筹妥协。24日，即满限前两天，维特约见杨儒，催促签字。杨儒坚持未奉"确旨"不画押。维特说："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严正回答："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个头颅耳！"维特保证，日后"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严词驳斥："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25日，拉姆期道夫又约杨儒签字，杨再度拒绝逼签。同日，各国公使向清廷声明，公约(即《辛丑条约》)未定之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清廷在北京外交团压力下，通知各国公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29日，清廷命李鸿章向俄使婉商，先订公约，再议专约。

3月25日，杨儒拒绝俄外交大臣逼签后，忧愤填膺，回使馆时，患中风下车跌伤。1902年2月17日，客死俄京任所，不愧是一位爱国外交家。

（摘自《中国近代史大典》中央党校出版社）

张謇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1885年中举人，1894年中状元，不久即创办纱厂，学校，历任教育会长、农工总长等职，1926年逝世。

甲午战前，他基本上属于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封建士大夫，尽前半生之力，追求科举功名。因出身寒微，四试状元而不中，只得远游入幕谋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他随淮军吴长庆赴朝，因办事干练受到重视，并代吴长庆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和《陈中俄战局疏》。他的才华得到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龢等达官贵人的赏识。1894年，42岁的张謇赴京会试，中了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张謇受两江总督委命，招商集股，筹建通州大生纱厂，经历几番艰难竭蹶的周折，终于在1899年开工生产。由于张謇充分利用了家乡农村手工纺织业优越的棉纱市场和棉花产区丰富的原料供应，比较注意科学的经营管理，又得到官府准予减免税厘和二十年内通州百里之区不准他人设厂的优待，大生纱厂成为"欧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厂"。1906～1925年间，先后增设大生二厂、三厂、八厂。从1899～1924年20余年中，资本额以不足45万两增至3，694，390两，增长7倍，盈利13481700余两。纱绽数以24000枚增至125，380枚，增长5倍。同年，全国华厂纱绽总数为1，866，232，大生纱厂占6.7%。全国华厂布机总数为11，121，大生纱厂布机为920，占8.2%。张謇为发展近代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解决纱厂原料，他不畏艰难险阻，于1901年首创中国第一个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由于他的示范、号召和推动，在淮南苏北沿海荒滩，先后建立数十个盐垦公司。各公司都大量投资兴修水利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并重视土壤改良和科学种田，逐步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生产方式，"变斥卤为沃壤，垦荒滩为棉田"，解决了近百万人的生计，使淮南"不毛之地"成为年产40万担的近代商品棉基地。这不仅促进了苏北地区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而且在我国盐业史上也是一次改革。由于张謇在淮南盐场废灶兴垦，解放了大批工奴性质的在籍"灶民"使他们成为各盐垦公司的自由佃工。同时引进日本制盐良法，促使淮南地区原来传统落后的"煎盐"得以改进，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的盐垦事业和农业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在短短的30年间，他兴办大小企业达38个，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据统计，1921年资本总额共3400多万元。这样一个自成体系的企业群和经济区，成为我国民族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改变了通州地区的经济面貌，为发展地方民族工业，建树了功绩，而且为中国的经济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路先锋"。这些经济实体又是作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对立物而崛起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它对于抵制外国在南通地区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特别是日本布在东三省的销售，起了积极作用。

张謇又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从实业发展的需要出发，不仅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而且敏锐地看到当时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学问之争"。因此，他明确提出："以教育改良实业"，深刻理解教育对于发展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大力创办职业教育，提倡"教育产生结合"，"教育为社会服务"。其创办职业教育的重点，是以纺织技术教育为中心，包括纺织、农业、医学等专科学校，农林、测绘、蚕桑、商业、刺绣、女工传习所等技工、职业学校。此后，他又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此外，他还办起了通俗教育社、商业讲演社、测量讲习所、法政讲习所等群众通俗教育场所，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和图书馆、体育场、气象台、更俗剧场、俭工学社、盲哑学校、贫民学校等等，肩负起社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义务。

这样，在他的家乡南通，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普及教育到职业教育到社会教育、特殊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文化教育体系。此外，他还支持外地兴办学校。他敦促东台、淮阴、扬州等地办师范学校，主持创办上海工程学校，支持"复旦大学"以及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苏州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的创办。这些不仅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开通了社会风气，为大生企业系统，也为社会培

养和输送了大批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促进了张謇所兴办企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科技封锁。大生三厂建厂时，原聘英人安装机器，后因洋楼没盖好，他们拂袖由去。结果 30，300 纱锭，422 台布机，全部由纺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设计排车，一举安装成功，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辛丑条约》签订后，张謇目睹朝政腐败，民族危难更加深重，于 1901 年写了《变法平议》一文，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变法改革主张。1903 年，他东渡日本参观劝业博览会，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大变化，受到极大启示，他得出结论：“日本行立宪而强，中国行专制而弱”。中国“非实行立宪 ，无以救危亡”。于是，张謇便集会结社，组织请愿，以改变清政府的“主政宗旨”而奔走呼号，成为君主立宪运动的领袖。1904 年，他为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代撰《拟请立宪奏稿》，并组织编译刊行《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达官贵人以至北京内廷，希望清政府以日本为榜样，速下立宪决心。1906 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张謇立即响应，他联络江、浙、闽三省立宪派和实业界代表人物，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07～1908 年间，各省代表上书请开国会，“预备立宪公会”电请清政府以两年为限，并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联络各省立宪派齐集北京，上书请愿。要求速开国会，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中心。

1909 年，张謇当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立即以议长的身份通电各省谘议局，力陈“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并派得力骨干前往各省游说。张謇特地写了《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提出了“秩序秉礼，输城而请”的请愿方针。在张謇的推动下，立宪派在北京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袁世凯“反正来归”之前，立宪派、对清廷的失望各派同意由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是借孙中山的名望收拢南方各地各派政治势力，为袁世凯统一全国作准备，也想暂时依靠这个临时政权稳定南方秩序，维护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免遭战乱的破坏。因此，张謇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委任，并以大生纱厂作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五十万元，以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后来，由于军情紧急，孙中山、黄兴为解燃眉之急，听信盛宣怀的蛊惑，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向日本提款，张謇力劝孙、黄勿以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因“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可是他的建议一时未被采纳，愤然辞去总长的职务。此时，清帝退位诏书已经颁布，“非袁莫属”已成定局。

袁世凯窃国后，张謇以统一党和民社为基础，联合国民协进会等政团，组成共和党，支持袁世凯政府。随后共和党又与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对峙。“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张謇出任进步党人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后改为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书”，大力提倡奖励兴办实业，并着手编订保护农工商矿等各项条例法规。

张謇晚年思想“极度悲观”，日趋保守，认为革命“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反对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提倡尊孔，敌视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对国家的责任。1915 年以后直至去世 10 年间，他一直在家乡经营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实业是教育的基础，实业、教育是自治的基础，自治是立宪的基础。经过三十年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奋斗，他终于建成了“南通模式”。张謇将这个小型社会看做是“新世界雏型”。其实质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实行地区性的资本主义改造，并希望逐步推广到全国，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此外，张謇对南通的城市建设、公路交通、警政治安、监狱改良等，也作出了贡献。他不仅为南通构思了将工业区、港口区和住宅、风景区分开的城镇分布新格局，而且整治河道，修桥铺路，到 1921 年，全县公路达五百余里，汽车一百多辆，成为“苏省公路之嚆矢”，在全国亦属先进。

（摘自《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

杨衢云

兴中会最初发起人为孙总理，人皆知之，而其第一任会长则为杨衢云。杨名飞鸿，原名合吉，字肇春，又号衢云，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乡人。少在香港国家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断右手中三指，乃改习英文。毕业后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旋充招商局总书记，及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初与谢缵泰等创设辅仁文社于香港，以开通民智为务。乙未春孙总理自檀岛返，衢云与之志同道合，遂加入兴中会，设总机关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时为乙未正月二十七日。未几孙杨共募集兵士及筹划饷糈。是年秋事机渐成熟，众议选举会长为建国时合众政府大总统之预备，衢云素有大志，坚欲得总统，谢缵泰等复拥戴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谦退，衢云由是当选。及重阳发难之役既败，衢云及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以南非尊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二处为成绩最优。丙申（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闻总理从欧洲至日本，乃东归访之。总理自乙未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乃闻衢云抵横滨，乃约至山下町修竹寄庐相见。是处为同志温炳臣、梁麒生等所设之俱乐部，总理少白常假之作会客所。时总理对杨责难备至，衢云俯首

无辞，遂相好如初。自是衢云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已亥(清光绪二十五年)，湘人毕永年与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辜天祐诸人有联合全国各秘密会党，奉总理为首领之议。衢云于是辞退兴中会会长职，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同举总理为总会长。乃己亥岁杪，总理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衢云亦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庚子八日，惠州革命军起义于三洲田，连战俱捷，清吏震恐，南海县裴景福乃派属员植槐轩偕旧日党人陈延威到港谒衢云，提出和议三事：一、招降党人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五千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衢云以为有机可乘，乃以函电报告总理，谓此乃吾党莫大良机。如接纳清吏所求，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等语。时总理驻台湾，复电拒绝此议。无何革命军败退，将领多匿居香港，清吏乃集矢于衢云，侦知衢云设帐于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乃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暗买凶徒陈林刺杀之于教授室。先是粤督德寿尝出示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同志多劝衢云出洋暂避，衢云慨然曰：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吾宁授徒以养妻子，不忍虚縻公款，俾立一好模范为同人先云云。卒罹于难。诸同志葬其遗体于香港公共坟场第六千三百四十八号，遗一子二女。总理在横滨闻之，异常哀恸，乃于十二月初七日召集同志开追悼于永采楼，并募集捐款千余元，以恤其遗族。

(摘自《革命通史》冯自由中华书局)

珍 闻 轶 事

各国司令官事略

瓦德西于一八三二年四月八日生于普鲁士的波茨坦。一八五〇年他加入了普鲁士防卫炮兵队，一八六六年升陆军少校。波希米亚战争时，他在总司令部任职，战后任第十兵团参谋。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开始，他以战功升为陆军上校。一八八二年任参谋长，一八八八年任骑兵司令官之职。毛奇退职后，他继任总参谋长。一般人认为他要继俾士麦之后任德国宰相，但是并未成功。一八九一年他任第九兵团司令官，一八九八年任视察司令官。一九〇〇年就任德国帝国陆军元帅，是年与纽约女子李女士结婚。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被派为远征中国的德军司令官，从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〇一年六月四日担任联军统帅。一九〇四年死于汉诺威。

盖斯里是八国联军时英军司令官，一八四四年七月生于费尔汉姆，一八六三年派入第九十三团参加侵略印度西北部的战争，从一八九一年一直到一九〇〇年以前，他差不多全是从事征服印度人民的事业，在征服印度的战争中屡得战功。一九〇〇年夏中国发生义和团事变，他被任为英帝国侵略中国的远征军司令官，来中国后由于各国之间矛盾甚多，以致行动迟缓，但由于英方态度坚决，而得以立即开始行动。英军首先攻入了北京城，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到达了使馆，以后联军彼此间矛盾很多，由于他的调处得以在侵略中国的共同目的上，获得妥协。因为他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有功，英政府升他为陆军少将。以后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又担任英国侵略印度北部的指挥官，一九一八年三月死于基尔福特。他镇压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人民最有经验。

沙飞是美军司令，一八四二年生于俄亥俄州，一八六一年七月参加骑兵第六团，在该团任职达二十七年之久，南北战争时充任陆军少尉，在盖提堡受伤被俘，以后被释放，一八六五年二月任陆军中尉，战事结束后骑兵第六团派往得克萨斯州，一八六七年他从军队里退职，准备从事私人事业，但是被人劝说又回到美国西南部军队中任职。以后他升为陆军中校，时间不久，又任古巴总督的参谋长直到一九〇〇年五月为止。一八九九升为陆军上校。义和团事爆发，他领导美国侵略中国的军队来到中国作战。以功升任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后升为陆军中将。他在一九〇六年退休，一九一四年死于加利福尼亚的芬斯安极司。

福里是法军远征军司令，一八四七年生于法国的考斯，一九三三年死于蒙顿地方。在一九〇〇年他带着一部分贵族团军队来侵略中国，回国以后升任驻巴黎的军长。

山口素臣是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当义和团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先派一个曾经参加过中日战争的福岛安正少将来到中国，但不久又派他来中国，当时他的职位已经是陆军中将，第五师团长。他带的日本侵略军数目最多，一共是八千人。战事结束后，他以功晋封男爵，陆军大将，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年)死，年五十九。

附记：八月四日下午三点由天津进攻北京的各国侵略军数目：

日军：八千人

俄军：四千八百人

英军：三千人(大部份是印度兵士)

美军：二千一百人

法军：八百人(大部份是越南人)

奥军：五十八人

意军：五十三人

（摘自《义和团》文史资料出版社）

“废黜出宫”以后的大阿哥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失败后，西太后逃往西安避难。她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一面派李鸿章等向八国纳款求和；一面把曾主张对八国联军作战的端王载漪“发往新疆，永远监禁”，以讨好帝国主义。次年，她又把被立为大阿哥的端王第二子溥儁“废黜出宫”。

当时，因端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烧毁，端王一系及大阿哥等无处居住，西太后遂又下诏让端王这一系“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府本支。端王原系惇亲王奕誴第二子。西太后因看到他自幼好武，在率领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时显示了一定的“才干”，不象当时一般亲、郡王那样都钻营文职。她为了培养一个掌握兵权的贵族作为自己的心腹，于是就看中了载漪，并想早点把他封王。但是，由于载漪之父——惇亲王奕誴仍然在世，一个王府不能同时策封两个王爵，而此时适值瑞怀亲王之子瑞敏郡王奕读殁后无嗣，西太后遂降旨让载漪过继给瑞敏郡王为子，以后晋封端郡王。庚子以后，西太后之所以又让端王一系仍回惇亲王府本支，据我父亲溥僎说，她有两个意图：第一，是表示她惩办端王实为联军所迫，以后如形势许可，仍可以惇亲王的名义恢复端王的王爵；第二，端王一系回归本府后，可以有权分得惇新王府的财产，以维持其家族以后的生活。

大阿哥被废黜出宫以后，便按照西太后的旨意，由皇宫迁到了东四北小街的惇新王府。这时，我的曾祖父惇亲王奕誴已经死去，所遗五子除二子端王戴漪已发配新疆外，长子载濂、三子载澜都以庚子事件革爵；四子载瀛因以上三个哥哥都以罪革职，西太后让他降袭贝勒继承了惇亲王府；五子载津死去。这样，载瀛便成了惇亲王府的继承人，占有了府内的八大殿堂和绝大部分地产；并且非常骄横自恃，常向亲友们夸口，说他的贝勒相当于三等王爵，将来的郡王、亲王爵位，十拿九稳会落到他的头上。因此，大阿哥迁来后，载瀛并没有按端王一系平均分配给他财产，只是在王府的东跨院拨了二、三十间房子让他居住；并且不给办理契税手续。王府的地租收入每年只给大阿哥分几百两银子，要比他们兄弟分得的少几十倍。载瀛不给大阿哥办理契税手续，表面上是说等端王的长子溥僎回来，不能单独分给大阿哥一房，实际上他是要独占王府的祖产而已。载瀛还说大阿哥“最懒于攻读”。他说，曾给大阿哥当过老师的崇绮向他说过，溥儁自光绪二十三年被嗣为同治皇帝的皇子后，每日总是与宫监们玩耍，常常用泥捏成许多小人，并给这些小泥人起名为李鸿章、庆王（奕劻）等，然后命太监用绳子绑起来，砍去头颅。

大阿哥回到惇亲王府住了一个时期，忽接端王从内蒙古阿拉善旗罗王府差人送来的信。信中说，经西太后默许，自己已投亲（端王的福晋是罗王的妹妹）于罗王府，生活很安定，希望大阿哥来罗王府看看自己。大阿哥由于在惇王府生活得很不愉快，便带了两个家人到罗王府省亲。

祖父端王对大阿哥一直非常关心。当年，溥儁被立为皇子，他不仅不准家里人再以家庭名分对待他，就是自己提到他也总称呼大阿哥，而且态度严肃，俨然有君臣之分。他于发配新疆的途中，听说大阿哥被废，迁居于惇亲王府，就决定自己一系回去分得的财产，全由大阿哥使用，不但不让长子溥僎继承，自己也分文不取。及到自己在罗王府定居下来，便叫大阿哥来省亲。

大阿哥到了内蒙古，罗王大摆筵宴，为他们举行会亲仪式。席间大阿哥见到了罗王的女儿穿着与北京王府的格格完全一样，人长得也很漂亮，便产生了好感。大阿哥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端王，端王也很赞成。那时，恰值甘军统领董福祥也在罗王府客居，端王便托董福祥向罗王夫妇去提亲。罗王的福晋与女儿因见大阿哥相貌平常，都不十分满意，但罗王由于与端王感情很好，便一口应承了下来；并很快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端王的福晋本是罗王的妹妹，如今大阿哥又与罗王的女儿结了婚，两个王府便更亲上加亲了。

大阿哥于罗王府结婚后，端王本想让他常住在这里。这样，既可以使他们父子团聚，又可使罗夫妇与女儿朝夕相处，以享天伦之乐。但是由于大阿哥不习惯于内蒙古草原那种荒凉寂寞的生活，同时考虑到回北京可以分到惇亲王府的部分祖产，以便过安逸的生活。因此未听端王和罗王的一再劝阻，便决定携带妻子回返北京。端、罗二王见他主意已定，便也不再勉强。临行前，端王把平日积蓄下来的钱给了他一部分；罗王夫妇也准备了一部分钱，作为给女儿到北京置办妆奁的费用。

大阿哥夫妇到了北京，先住在三座桥的罗王府，罗王驻北京王府的上下人等，对大阿哥夫妇象对待贵宾一样进行接待。但大阿哥住了几个月，又搬到惇亲王府住了下来。辛亥革命后，大阿哥曾到历届总统府以自己曾为“大阿哥”的这块牌子，先后都当上了挂名参议。当时总统府的这些所谓参议，每年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再加上他从惇亲王府分到的地租，以及从内蒙古带来的钱，生活便也富裕了起来。

大阿哥夫妇婚后感情并不是很好，而且经常闹意见。由于这个原因，大阿哥逐渐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到戏园、酒馆去鬼混。不久又捧上了几个唱大鼓的女艺人。听载瀛说，自大阿哥当上了总统府的参议，便任意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还订制了一辆相当漂亮的洋包车，每天吃过晚饭，便坐上车去前门外看戏、听大鼓。以后又抽

起鸦片来，并且雇了一个绰号叫“小媳妇”的女人，专门伺候他抽大烟。

大阿哥生有二子。长子毓兰峰，生性愚拙；二子自幼聪颖，为他所万分疼爱，但是突然在五岁那年患暴病死去。这突然的不幸，给大阿哥以极大的刺激，他亲自守在死孩子身旁，不吃不喝，整整哭了三、四天，还不许掩埋。经过家人和亲友们百般劝说，才总算把孩子装殓起来，他还挑选了上等木材，做了一口象成人一样的大棺材，并请和尚做了道场。由于大阿哥经常做出这样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因此在一般亲友当中，引起了不少非议。

（摘自《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李鸿章拥有多大家私

十月革命后清理冬宫档案，李鸿章受贿事件真相大白。就在中俄密约签订的下一天，由道胜银行负责人等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先经钦差大臣过目后，即由俄国财政部长签字同意，送秘密档案库封存。

议定书说明：如果中东铁路修筑成功，道胜银行允许拨出三百万卢布给李鸿章作为酬谢。具体规定分三期付款，第一期一百万在清朝皇帝正式批准条约之后；第二期一百万在全线测量完竣，筑路合同签订之时；第三期一百万在铁路全部完成后付清。当年八月，由道胜银行的中国分行负责人把第一期付款一百万卢布亲自交给了李鸿章。

还有两期付款是怎样付给的？查得道胜分行帐册里有一个“李鸿章基金”帐户，从1897年起先后支付五次，总数达一百七十万卢布。其中最大一笔，是支给旅顺口谈判中的中方代表李鸿章、张荫桓各五十万。另外查得两份“绝密”文件，是经办人璞科第发给沙皇的电报。其一：“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李甚为满意(1898.3.28)”。其二：“我和张荫桓机密谈判关于付他五十万两之事。……据说，关于他的受贿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后。我告诉他所允许款项无论如何是归他支配的。”李鸿章受贿卖国是查有实据的了，但他虽然捞到了一大票，同时却给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道枷锁，临死时也摆脱不掉。

在谈判《辛丑条约》时，沙皇逼着中国先签订出卖东三省的条约。李鸿章取得慈禧同意，电令驻俄公使杨儒“全权定计，朝廷不为遥制”。杨儒踌躇，一定要得到朝廷明白指示才肯这么做。杨儒的强硬精神是可贵的，他若随和一下，后果就不可设想了。不久因列强纷起干涉，没有让沙俄独吞这块肥肉。被搞得昏头转向的李鸿章病倒了，在内外交迫中，“忧郁焦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俄国公使因有“小辫子”在手，扭住不放，据说当他“吐血大渐”时，俄使还曾闯入他的病房，催他在条约上画押。三百万卢布一笔老帐成了催命符，八十大庆尚差两年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李二先生是汉奸”。他最后所签订的两项条约的赔款，先一个是按四万万人口每人半两计算的，给日本人拿走了两万万两(利息在外)。后一个据说人口增加了，是按四万五千万计算的，人均加倍为一两，又给八国拿走了四亿五千万两。(辛丑条约未及签字，李二先生就死了。但他议定的草约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据说这是帝国主义者对李二先生表示的尊敬。)

“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拥有的财产数字虽然比上列数字小得多，用百分比计算起来也并不是一个较低的比率。

李鸿章家私到底有多少，恐怕他自己也无法说出一个如实的数目，外边的人自然只能作个约摸估计。据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西方人有同样的估计，两说孰先孰后，待考。他聚敛的来源主要当然不仅那笔三百万卢布，而是通过手下的经纪人，在制造局、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许许多多洋务事业中捞来的。据梁启超说：在这些官办企业里，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余万元。”梁说可能不包括土地资本，因李氏家族拥有土地数千顷，各地还设有当铺银号。李鸿章在洋务事业中捞油水，不需要自己伸手，自有吃饱了的手下人送上门来。他的主要经纪人是盛宣怀，这个奴才的资产大大超过了他的主子，因为他是直接伸手捞的。

早在甲午战争那年，就有四川举子张罗澄上书“李中堂”诘责说：“夏五月六日，澄于永和栈(天津)门首，见公家眷相率乘舆去，其后无数箱箧，上贴爵阁部堂封条，下贴红签‘少荃记’，一号二号以至数十百号，排比而发。咸耳而目之曰：‘中堂大人家眷由轮船赴香港矣！’……况人言啧啧，公以五百万金买倭茶商，开设有三大洋行，公子又为倭驸马……。”

这位举人大概不至于无中生有的吧，于此可见，李二先生不仅以卖国见长，而且理财有术。

（摘自《清王朝的覆灭》钱谷风）

流 行 风

小说《黑奴吁天录》

译者林纾，又名林琴南。该书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国史拖活夫人著。主要内容是揭露美国南部奴隶制的黑暗，抨击了蓄奴政策。林纾是一怪才，他本人不通外文，靠别人口译，

他加工做成小说，凭此方法先后翻译了一百六十余种。《黑奴吁天录》即其著名者之一。该书由吴芝瑛圈点，廉泉校阅，魏易口译。后于1907年被欧阳予倩等改编为话剧，但未予公开出演。

弹词《庚子国变弹词》

作者李金嘉，字伯元。

本文最早发表于《海上繁华报》，全书共四十回。

主要以庚子国变为线索，表达忧国之情。全书充满了对八国联军的愤恨，但对义和团也有很多错误的评论。该书是当时弹词话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诗《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观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宠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梁启超）

诗《宝刀歌》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作奴耻。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魂。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挥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怨。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州。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年数百年国耻之奇羞！

（秋瑾）

诗《京师》

郁郁千年王令盛，
中间鼎盛数乾嘉。
可怜一炬成焦土，
留与东京说繁华。
鹳鸽来巢公在野，
鸱鸮毁室我无家。
登城不见黄旗影，
独有斜阳咽暮笳。

（黄遵宪）

诗《夜起》

千声檐铁百淋铃，
雨横风狂暂一停。
正望鸡鸣天下白，
又惊鹅击海东青。
沉阴噎噎何多日，
残月晖晖尚几星。
斗室苍茫吾独立，
万家酣梦几人醒。

（黄遵宪）

历史档案

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通谕天下旨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内阁奉上谕: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义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或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扶掖而出,于枪林弹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险,宗社阽危,阛阓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护庇耶!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召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拳匪乘机,寝成大衅。良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骤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四十年,朕躬仰承慈海,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huī,灰)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寝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然当使馆被围之际,累次谕令总理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使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竭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

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著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

(摘自《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辛丑条约签字国公使表

国别	姓名	任期
德	穆默	1900～1906
奥	齐干	1896～1905
比	姚士登	1900～1904
西	葛络干	1895～1902
美	柔克义	1900～1901
法	鲍渥	1901～1902
英	萨道义	1900～1906
意	萨瓦尔葛	1899～1901
日	小村寿太郎	1901
荷	克罗伯	1895～1901
俄	格尔思	1897～1901

中国驻外公使表

俄　国：　杨儒

英　国：　罗丰禄　(1900年10月后张德彝)

法　国：　裕庚

美　国：　伍廷芳

德　国：　吕海寰　（1900年6月后荫昌）

荷　兰：　吕海寰

西班牙：　伍廷芳

比利时：　罗丰禄

意大利：　罗丰禄

奥地利：　杨儒

日　本：　李盛铎

（摘自《清史稿》赵尔巽编中华书局）

惩办战犯

阁下：

在我刚刚发出的那封信中所报告的同中国全权大臣的会谈之后，各国使节举行了一次会议，考虑关于他们要求对控告书中所说的那些人进行的惩罚究竟最后应采取什么形式。

关于庄亲王，大家决定接受中国全权大臣的建议，即允许他按照中国习惯所承认的礼仪自尽。

关于对端王和澜公应要求如何惩罚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已经出现分歧意见。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日、俄、美等三国公使曾经说过，虽然他们认为对这些皇室成员应处以死刑，但他们不准备坚持这个意见；而其他五国使节，包括我本人在内，无任何保留地赞成处以死刑。

法国公使通知我们说，自那次会议以来，他已收到他本国政府的训令，要他不坚持该意见。因此，有四国使节不能继续坚持，而另一方面仍有奥匈、德、意三国公使和我本人。由于显然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一致意见，所以毕盛先生认为，我们应当谋求一项中间条款，从而使我们能够采取共同行动。

我说：英王陛下政府从开始以来便认为，关于端王和澜公这两个人的案件，死刑是适当的刑罚；我的训令对我所作的指示，就是我每次所说的那些话。因此，如果我将要提出的那个建议没有被普遍接受。当我为自己保留继续坚持处以死刑的同时，我认为有一个摆脱困难的方法。中国人的惯例规定了一个宣判死刑而有减免余地的办法。因此，我建议我们可获得一项措词如下的判决：

"端王应予斩首。但如果日后作为一项恩典予以减刑，那他应流放新疆监禁，绝不许放回"。

俄国公使反对实际使用"斩首"字样。他认为，使用控告书中"应予处死"等字，便可达到目的。我说：我不打算同意削弱我所建议的那种形式，我认为该形式大概不会遭到中国全权大臣的反对。

法国公使建议说：我们可以派遣我们中间的两个人立即前往庆亲王官邸，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但德国公使很公正地回答说：这个行动的结果肯定是得到否定的答复。

美国公使从中国全权大臣在那天上午所说的话中推断说：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想避免必须处以死刑。如果有此明确谅解，即给皇帝保留减刑的权力，那么，他准备接受我的建议。

奥匈、德、意等国公使也赞成我所建议的解决办法。

日本公使认为皇帝很难对这两个案件宣判任何死刑，但是，他将接受这个方案，如果其中加入"立即"字样，从而给予皇帝立即进行减刑的权力。

当我同意这项修改之后，俄国公使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大家一致采纳下述形式的判决：

"关于端王，应判为斩监候。如果作了这个判决之后，皇帝立即认为应赦免他的性命，端王应遣往新疆，永远在该处监禁，以后无任何可能减免对他的这项判决。"

对于澜公，大家采纳了相同的判决。

对于英年和赵舒翘，我们坚持控告书中我们所提出的斩首的要求。

关于太原府惨案的凶手毓贤，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中国全权大臣已同意将他斩首。

关于李秉衡、刚毅和徐桐。他们都已死去，我们同意要求采取这些措施，其效果将使人们对他们的回忆好象他们是根据上谕被实际处决的。虽然这一行动是我们的法律中所没有的，但它有些类似法国的"缺席裁判"。

在讨论董福祥的情况时，中国全权大臣曾经向我们提出关于最后对他进行惩罚的口头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看来不可能希望立即惩罚他，所以我建议我们应通知中国全权大臣说，我们希望履行他们的保证；大家同意了下列的方案：

"各国全权代表注意到中国全权大臣对他们提出的关于对董福祥施以刑罚的保证；他们表示意见说：为了执行这项判决，有理由尽快地剥夺他的指挥权。"

关于徐承煜和启秀，我们作了许多讨论，因为他们的名字只是在最近才加入名单上的。

日本公使主张对徐承煜处以死刑，但满足于对启秀判处流放或终身监禁。可是，美国公使说：他有情报使他深信，他们两人对攻击使馆同样负有责任；他认为，对他们两人处以死刑是适当的。当这个问题付诸表决的时候，一致赞成对徐承煜处以死刑，而对启秀有五票赞成死刑。俄国公使同日本公使一样，投票赞成监禁，但日本公使说，他将同意多数人的意见。我没有掌握关于他所犯罪行的任何情报，所以拒绝表示意见。

接着，我们讨论了能使我们确信这些惩罚已实际执行的方式。俄国公使说：如果上谕说明他们已按照命令施

加惩罚，他将感到满意，但我的德国同事和我本人认为，宁可保留派遣正式代表观看执行的权利。从这封信的第一号附件中将可看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该附件是外交团首席公使致中国全权大臣的照会底稿。我们在照会中说明：应立即颁布宣告施行惩罚的上谕；关于实际执行判决的问题，我们为自己保留派遣代表出席的权利，无论判决是在北京或在各省执行。我自己的意见是，就其切实可行而言，为了这个目的应把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押至北京。

各国使节还决定坚决要求发布一道上谕，为总理衙门的四位成员及户部尚书恢复名誉，像我在 1 月 24 日信中所报告的那样，他们因为勇敢地反对攻击各国使馆，被端王及其同伙残酷处死。我附上外交团首席公使关于这个问题致中国全权大臣的照会底稿。

由于不可能说服我的同事们坚持对端王和澜公实际处以死刑，同时由于董福祥提督的特殊地位，我相信阁下将批准我关于要求判决前两人所采取的行动，而且同意目前暂缓对后者进行惩罚。

萨道义谨上(签字)

1901 年 2 月 6 日于北京

(摘自《英国蓝皮书档案资料》)

辛丑条约

大德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奥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大比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大日国钦差驻扎中国全权大臣葛络干、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大法国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大英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大义国钦差驻扎中国世袭侯爵萨尔瓦格、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大和国钦差驻扎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大俄国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大清国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大清国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二十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六月初三、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初六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

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六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一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国三先零，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付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

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

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关新管理。

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前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定办改税一层如后：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即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近由诸国派员重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以养其工。

二、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营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

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原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

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请中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定立

（《海关中外条约》卷1）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召开新年庆祝会于东京，尤烈和菲律宾代表鹏西等人参加。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春，其宗旨原为联络感情，策励志节，由于负责人热心政治，会员得以交流政见。其活跃人物有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等激进分子。

1月2日　清政府授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议接收东北三省事宜。

1月10日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人刺杀身亡。杨衢云原名飞鸿，字肇春。曾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招商局总书记，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1892年与谢缵泰等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以“尽忠报国”、“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1895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同年筹划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划饷械。事败转徙南洋、印度及南非洲各地，遍设兴中会分会。1898年11月携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1899年毕永年等有联合全国会党推举孙中山为首领之议，遂辞会长职，荐孙中山自代。次年惠州起义失败后，谢绝党人要他出洋暂避的劝告，在香港被署两广总督德寿派人刺死。

1月29日　清廷发布“变法”上谕，推行“新政”上谕要求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事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等问题详细复奏。4月21日成立督办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其后，所推行的“新政”主要包括：(1)裁并机构，整顿吏治。裁撤詹事府、通政使司、东河河道总督及云南、湖北、广州巡抚、粤海关、淮安关、江宁织造衙门，并将直隶州州同、州判、把总等缺一并裁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裁汰各部书吏及州县衙门差役，停止捐纳实官。(2)改良刑律。曾派员参酌各国法律，考订现行律例。宣布废止苛刑，凡死罪至斩决为止，凌迟、枭首和戮尸永远删除，废止刺字、笞杖等以罚款代替。成立罪犯习艺所，改造盗窃等犯。(3)编练新军。诏停武科，裁汰绿营防勇，于各营挑练勇丁改练新军，一律使用新式枪炮，新军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各省成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并成立练兵处，练兵处与兵部会同奏定新军各项章制、制订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规划。成立巡警部，督办全国警政。(4)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如成立商部，并颁发《商部章程》等一系列振兴实业的章程。同时奏设路矿农务工业各项公司，提出振兴农业，发展畜牧业，设立农务学堂及农事试验场等措施。还在京师设立铸造银钱总厂，在天津试办户部银行。(5)停废科举，兴办学堂。先是下诏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接着废除科举，通令兴办新式学堂，各省、府、州、县书院一律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医、师范各类专业学堂，颁行各级各类学堂章程；随后成立学部，督办全国教育，并派遣留学生出洋，奖励自费留学和学成回国，考核后给以进士出身。自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变法上谕起，其“新政”共推行了五年。

2月1日　清廷严禁仇教集会，地方官不立行惩办的，一概革职，永不叙用。

2月13日　清廷赐令载勋自尽，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毓贤着即正法，已故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着即革职，英年，赵舒翘革阵定为斩监候罪名，已故徐桐、

李秉衡革职，并撤销恤典。

徐用仪、立山、联元、许景澄、袁昶开复原官。

2月14日　清廷发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

2月19日　励志会在东京召开春节庆祝会，菲律宾代表彭西应邀参加。

2月20　清廷以署归绥道郑交钦杀害过境英官，命立即正法，将军奎顺先行革职，听候查办。

2月21日　载勋自尽。

2月21日　清廷斩毓贤。

2月24日　英年、赵舒翘自尽。

2月26日　清廷斩启秀、徐承煜。

3月15日　上海爱国人士集会张园，谴责沙俄，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

3月22日　清政府电令出使各国大臣，请各国代请展限订俄约，以筹妥协。

4月21日　清廷设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崐冈、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等遥为参预。

4月29日　清廷宣布惩办未尽力保护教士、教民之地方官五十六人。

6月11日　清廷停止反帝斗争地方文武考试五年，命各省督抚遵照办理，出示晓谕。

6月15日　忠义军攻克桓仁县。忠义军出现于1900年7月底，其首领刘永和，枪法百发百中，有“刘单子”之称。沙俄入侵东北，他率良骑千匹的队伍抗敌。后来与其他几支武装联合，以“御俄寇、复国土”为宗旨，先后攻占数个州县。后被清军和俄军联合镇压。

6月20日　忠义军攻克凤城。

6月21日　忠义军攻克安东。

6月25日　秦力山、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提倡革命仇满。

6月中旬　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大雨成灾。在湖北，被淹的地方有黄梅、江复、武昌、咸宁等二十几个州县。在湖南，“长沙府属之益阳、湘潭、攸县、醴陵、长沙、善化、浏阳、湘阴；岳州府属之平江、巴陵、华容；常德府属之武陵、龙阳、远江、桃源等县，傍山沿溪田地多被水冲沙压……房屋或经冲激，或因有济渡不及，竟至溺没之事”。在安徽，沿江两岸州县水灾甚重，遭水灾民不下数十万。在江苏，沿江、沿海地区大雨风潮成灾，各县圩埂冲决千余处，灾情甚重。在江西，被淹40余州县，伤人近5000人，至于“田畴、房屋、货物之遭漂没者，殆难更仆”。浙江和福建，不仅大雨成灾，沿海地区还遭到飓风袭击。

7月6日　直隶深州联庄会首先竖起“扫清灭洋”的义旗。当地有人叫田燮经的武举联合该州七、八十个村庄，聚合2万余众起事，“其器械旗帜甚伙……旗上书‘扫清灭洋’字样”。几乎此同时，四川义和团在川东也竖起“灭清、剿洋、兴汉”的义旗。

7月9日　御史吴煦奏言顺直各州县，教案赔款分派民间，为数甚巨，民不堪命，深州等处聚众二十万人，抗不承捐。

7月12日　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通政治，应先兴学育才。

7月13日　清廷发布上谕规定银元重量为库平银七钱二分，银元银两并用。。

7月19日　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筹议变法，整顿中法十二条，次日会奏采用西法十一条。

7月24日　清廷设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派奕劻总理事务，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凯为尚书，徐寿朋、联芳为左右侍郎。

8月1日　山东即墨人民抗税斗争，万余人围攻县城。

8月8日　山东黄河在章丘县、惠民县决口。是年入夏以来，山东连降暴雨，黄河之水不断上涨。8月8日，黄河南岸章丘县陈家窑大堤漫溢，决口数十丈，北岸惠民县境内五杨家大堤也漫决成口。此次决口被淹甚广，章丘、惠民、滨州、邹平、蒲台、青城、济阳等州县被淹村庄不计其数，灾民叫苦不已。

8月15日　北京城中外国侵略军，除留护使馆外，余皆撤除。

8月19日　清廷再令宣示惩办保护教士教民不力的地方官。

8月29日　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试中国政治事论，废武科。此前，清廷于1月29日发布“变法”上谕，要求督抚以上大臣就如何推行“新政”提出意见。具体复奏中，不少内外大臣言及培养人才、改变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于是清廷在8月间宣布：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义。同时命令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各省遂普遍兴办学堂，留学人数也激增。到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以科举阻碍办学，请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三科减尽，旨允依议。1905年9月，袁、张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两广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要求从次年丙午科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为清政府批准。至此，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废止。

9月7日　清廷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

9月11日　清廷令捐纳实官永远停止。清廷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

9月12日　清政府命各省裁汰绿营，精选若干营，

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

10月1日　清廷派盛宣怀为办理商税事务大臣，议办通商行船条约及改定进口税则一切事宜。

10月2日　慈禧太后命刘坤一、张之洞按会奏所陈，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大要。

10月6日　西太后等自西安启程回京。

10月31日　清廷命大学士王文韶、外务部尚书瞿鸿玑督办关内外京榆铁路一切事宜，仍著张翼会同办理。

11月7日　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李鸿章于1823年2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一个"耕读之家"。1847年中进士。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他曾残酷镇压过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曾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烟台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曾主持创办了北洋海军以及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重要的近代新式企业。对于他的去世，慈禧"震悼失次"，清廷特旨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原籍及"立功"省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伊子李经述承袭一等侯爵。

清廷命王文韶署理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2月5日　政务处，礼部会同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

12月8日　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加官保衔。

12月11日　盛宣怀、赫德均加官保衔。

外　交

1月10日　辛丑议和条款草约订立。

1月12日　中俄订立天津俄租界条款。

1月18日　清廷发表上谕否定《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并以"擅立约章"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

2月14日　各国公使对清廷处置主战大臣表示满意。

2月16日　沙俄向杨儒提出议款十二条。

2月27日　清廷命奕劻、李鸿章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

3月12日　沙俄再向杨儒提出十一款，限26日画押。

3月25日　各国公使向清政府声明，公约未定之前，不得与他国议定专约。

3月29日　李鸿章向俄使婉商，先订公约，再议专约。

4月3日　俄使声明东三省仍照旧例。

5月30日　增改扩充北京各国使馆界址章程订立。

俄国驻津领事波佩与天津河间道张莲芬、直隶候补道钱镓签订协定，正式规定俄租界。划定后的俄租界原来包括天津火车站在内，因为与英国的铁路冲突，经过谈判，俄国将火车站及通往车站的大道让出去，使俄租界分成东、西两区。"俄租界西区位于海河北岸，西南毗邻意大利租界（今五经路），东至火车站西侧（今二经路），北至铁道；东区从海河转弯处向南，北起车站，西临海河，东沿铁路，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经路）。"东、西两区的总面积为5474亩。俄国抢占的这片租界不仅面积大，而且地理位置最为有利，它既临海河又靠近火车站，水陆交通俱佳，隔河对面是商贸繁荣的英、法租界。

6月4日　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德国，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随同前往。

6月16日　清廷命那桐加头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大臣。

7月18日　中俄订立《增改吉林铁路交涉总局章程》。

7月20日　德国驻津领事秦莫漫也与张莲芬、钱镓签订协议，将原租界向海大道以西扩充。新扩充的德租界占地将近3200亩，连同原来租界在内总面积已达4200亩。德国租界东临海河，南自小刘庄之北沿小路（今琼州道）至海大道，向南过东楼到崇德堂砖窑（今围提道附近）；西起马场道沿李家花园（今人民公园）西墙，过西楼到荣德堂砖窑；北沿马场道与英租界接壤。

9月7日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日、意、荷、俄十一国公使签订《议和条约》十二条（即"辛丑条约"），主要内容为：(1)勒索中国款银4.5亿两，分30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9.8亿两，以海关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2)将东郊民巷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居住。(3)"削平"清军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到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驻扎军队。(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对所属境内发生的"伤害诸国人民"事件，"必须立时镇压惩办。"(5)外国认为各个通商章程中应修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概允商议。(6)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7)清政府惩办"纵信"义和团、开罪各国的首祸诸臣，并分派五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9月24日　日本设定重庆日租界。

10月5日　俄国公使向清政府新提出关于归还东

北条件 。

11 月 7 日　因李鸿章死，中俄交涉停顿。

军　事

1 月 7 日　德军再次骚扰鸡鸣驿、宣化。

1 月 15 日　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1 月 17 日　俄、德签订移交杨村到山海关铁路的协定。

1 月 21 日　"天津都统衙门"下令将天津城墙"全行拆尽"。

1 月 26 日　法军窥伺广昌。

1 月 27 日　日军在京拘捕工部右侍郎徐承煜。

1 月 28 日　驻获鹿的法军到井陉虎头山挑衅。

1 月 29 日　清政府颁布推行"新政"的上谕。

2 月 13 日　"天津都统衙门"发布扩大管辖范围的告谕。

德军侵扰直隶永清县城，后来又连续六次来此勒索。

清政府再次发布加重惩处"祸首"的上谕。

2 月 14 日　清廷发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

2 月 19 日　德军由沧州侵入青县。

2 月 20 日　德军进犯广昌。

2 月 21 日　德军进犯安子岭。

2 月 22 日　德军前往京北延庆州镇压团民。

2 月 23 日　列强成立由美、德、荷、比四国公使组成的赔款委员会。

2 月 24 日　清政府在兰州处死毓贤，在西安将英年、赵舒翘赐死。

2 月 26 日　联军在北京菜市口处决启秀、徐承煜。

2 月 27 日　英国从德国手中接管了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

3 月 1 日　各国公使提出扩大使馆区的要求。

3 月 8 日　德军攻占山西五台山城岭和铜钱沟。

3 月 14 日　德军进犯山西五台横岭，并窜扰五台山。

3 月 16 日　瓦德西到青岛视察。

3 月 18 日　瓦德西转赴烟台，经大沽返京。

3 月 19 日　宋庆派员与入侵长城岭的德军订约，划界驻军。

3 月 22 日　列强成立由英、德、日、法 4 国公使组成的赔款偿付委员会。

3 月 24 日　法国公使毕盛要求清军全部自直隶撤入山西。

3 月 29 日　各公使要求将 8 省 70 城镇的科举考试停止 5 年。

4 月 4 日　各公使要求严惩 142 名各省地方官。

4 月 6 日　瓦德西与各国司令官讨论议和大纲八、九两款的具体实施办法。

4 月 15 日　"天津都统衙门"增添 1 名意大利委员。

4 月 17 日　瓦德西居住的仪鸾殿起火。

德、法侵略军向西进犯，迫使清军退入山西。

4 月 23　德、法侵略军侵入山西，攻打娘子关和固关。

4 月 24 日　德军进攻山西六岭关。

4 月 25 日　侵入山西的德军撤回保定，法军撤回获鹿。

4 月 29 日　清政府发布惩处 56 名地方官的上谕。

5 月 3 日　德军骑兵侵扰山西天镇县，此后又到大同、怀仁、代州、山阴、繁峙、五台等地进行窥伺。

另一队德军骑兵侵扰山西阳高县、丰镇厅等地。

5 月 4 日　各驻华公使发布扩大使馆区界址告示。

5 月 10 日　德军又一次到张家口骚扰。

5 月 13 月　德军焚毁张家口营房

5 月 14 日　各公使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5 月 18 日　德军侵扰直隶宛平县。

5 月 21 日　德军侵扰直隶固安县，持续六七天。

5 月 23 日　德皇电令瓦德西召回侵华德军，并转告各国政府拟取消瓦德西的联军统帅职务。

5 月 26 日　清政府同意赔款 4.5 亿万两。

5 月 30 日　清政府同意列强扩充使馆区。

6 月 1 日　列强宣布解除瓦德西联军统帅职务。

6 月　3 日　瓦德西离京赴津，后转赴日本回国。

清政府又发布惩处 11 名地方官员的上谕。

6 月 4 日　清政府派出头等专使前往德国谢罪。

6 月 7 日　清军撤离保定，"权理司"瓦解。

6 月 16　清政府派出传使前往日本谢罪。

7 月 16 日　联军允许 3000 名清军进驻北京。

7 月 20 日　德国逼签扩充德租界协议。

7 月 24 日　清政府同意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7 月 28 日　法军自保定撤军。

8 月 19 日　清政府再发布惩处 64 名地方官员和增停 4 处科考的上谕。

8 月 27 日　英、意军交还颐和园。

清政府全部接受列强的最后议定书。

8 月 29 日　日、美军交还紫禁城。

9 月 7 日　《辛丑条约》签订。

9 月 17 日　列强移交紫禁城。

驻津联军开始撤退。

经 济

7 月 5 日　哈尔滨，旅顺间铁路通车。

7 月 13 日　上谕规定银元重量为库平银七钱二分，银元银两并用。

7 月 19 日　清廷准御史陈秉崧请复开经济特科。

7 月 22 日　清政府批准开平矿务局中外合办。

11 月 11 日　洋货进口税值百抽五，内地关税划归税务司签理。

12 日 9 日　华商王承尧及翁寿获抚顺千台山等处煤矿开采权，开采抚顺千金寨煤矿。

矿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是中国东北最大的煤矿。1905 年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强占，组设抚顺采炭所进行采矿。1907 年改归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附有电力、制钢、机械、练油、化学等工业企业。抗战胜利后，因破坏严重，生产停顿。1948 年 11 月矿区解放后，煤矿收归人民所有。

本年荣多兄弟（宗敬、德生）与朱仲甫合股，在无锡创建机制面粉厂，初名"保兴粉厂"，总经理朱仲甫。后朱见经营无大利，退股。1903 年祝兰舫入股，改名为"茂新面粉公司"。以后逐渐发展，与福新面粉公司共同构成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经营的面粉企业集团。1954 年公私合营。

本年张謇创立通海垦牧公司，位于南通、海门沿海一带，拥有土地 12 万亩。筑堤、开河、建闸等工程都由公司统一施工。耕地分佃给农民耕种，进行封建式的地租剥削。垦区以棉花种值业为主，所产棉花供给大生纱厂。1946 年土地改革时，该公司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分配，企业终止经营。

文 教

4 月 7 日　《世界繁华报》在上海创刊。主编李伯元。

5 日 25 日　《国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杂志由秦立山任总编辑，撰搞人有沈翔云、戢翼翚、杨廷栋、王宠惠等。它分社说、时论、丛谈、纪事、来文、外论、答问等栏，篇末附有英文论说。它以"唤起国民精神"为宗旨，重在宣传反清思想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以及人权学说。在第四期上曾刊有章炳麟驳斥改良派的著名文章《正仇满论》。可惜的是，这个留日学生中最早宣传革命的刊物，在当年 8 月就停刊了。

5 月　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在上海创刊。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半月刊。该刊致力于教育改革，重视介绍外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到 1908 年 1 月共出 166 期。在 1907 年以前私人创办的教育杂志中，它是发行量最大、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较大的一种。

8 月 29 日　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试中国政治事论。废武科。

9 月 11 日　清政府命各省建立武备学堂。

9 月 14 日　清政府下诏，令书院改为学堂。1884 年，郑观应在《考试》中主张将设于各州县、府省会及京师的书院，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分别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1898 年，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奏请将各省清府州县之书院改为学校。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为中学西学之学校。后因戊戌变法失败，书院改学堂被迫中止。1901 年，刘坤一、张之洞又提出书院改学堂。同年八月二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书院改学堂遂在全国普遍展开。1905 年废科举，加速了书院改学堂的进程。

9 月 17 日　清廷命各省选派留学生，如果学成，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

本年秋，中国留学生会馆在日本东京成立。会馆设于东京神田骏河台。发起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为了加强各省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吴禄贞把它比喻为"美国费城之独立厅"。到 1905 年，留学生会馆改为留学生总会。这样一来，留日学生得以"常常聚会，纵谈政治"，并创刊《醒狮》作为总会机关报。这一组织遂成为留日学生的领导机关。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2年

导　言

一九〇二年是一个较为平淡的年份。但是并不是说这时是天下太平，歌舞升平的景象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正是在这一年，许多力量在分化、组合，默默地为以后的惊人之举埋下伏笔。

从上年末开始的英日秘密外交在本年终于开花结果，英日同盟的签订使双方皆大欢喜，英国在远东有了盟友，日本在西方有了后台，沙俄的日子便一天天不好过了起来。

当英、日、俄正在忙于外交的时刻，中国为了自己的主权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由于李鸿章去世导致的中俄中止谈判，在今年又重新拾了回来，通过一系列的退让和妥协，终于使沙俄签署了这份《交收东三省条约》的撤军协定。然而，事隔两月，反复无常的沙俄又出尔反尔了。

自从清政府下诏将各省书院改成学堂，中国十年的教育终于有了转变。然而这个转变来得太快，以至于中国教育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支持一场突如其来的学潮，首先发动和影响最大的便是南洋公学。

本年度还有一个重大事件是北洋集团悄然崛起。随着袁世凯的跃升，他拉起了一支唯他之命而从的北洋军队，成为日后争霸天下的工具，尤其是军队中的大小头目，都是日后左右中国的大腕。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民永远不许反抗，事实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在本年，就在清政府统治中心地区，就爆发了景廷宾起义，成为反抗列强和清廷的有力回击。

总之，本年从表面上看来，微风不起，水波不兴。然而，地火在奔涌翻腾，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悄悄地增长，当时代赋于它一个突破口的时侯，它就会喷薄而出，新的风暴也就开始了。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英日同盟
- ●《交收东三省条约》
- ●南洋公学学潮
- ●北洋集团的崛起
- ●景廷宾起义
- ●纪念明亡大会

英日同盟

背景介绍

伊藤博文去彼得堡谈判，是日、俄两国在远东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内部对俄协商论和英日同盟论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表现。如前所述，在俄国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围绕着重新划分远东势力范围问题，以英俄对立为背景，日俄双方开始调整自己的远东政策，谋求组合新的国际力量，以便在竞争中压倒对手，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这样，和中俄北京谈判同时，英日、日俄、英俄之间的秘密交涉也在进行；它们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英日谈判对远东国际事态的发展和中俄谈判的进程影响至深。

先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为缓和同日本的矛盾，于1901年7月中旬主动向珍田公使表示，愿恢复1月间为日本所拒绝的对话，在承认朝鲜中立、日本有权在朝鲜政府中派驻财政、行政顾问和高级警官的基础上就朝鲜问题达成协议，条件是日本正式承认俄国在满洲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沙皇政府为迎合日本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向东京表示，它随时准备在巴黎为日本政府筹措大宗借款。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更迭，伊藤下台，维特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1901年6月，桂太郎组成新的内阁。他认为当前形势表明：俄国的政策不以占领满洲为满足；获得满洲后它必然会立即向朝鲜伸手；"不到使我（日本）无还手之力，其侵略将不会终止"。因此，他主张联英制俄，一上台就提出强硬的对外纲领，计划扩充海军舰艇八万吨位，相机和"欧洲某一国"（指英国）缔结协定，把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

正在这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由于担心日俄联合，于7月15日向日本驻英公使林董表示，愿与日本政府携手。同月31日，外相兰斯敦又向林董指出："为了在远东维护英日两国的利益，进行某种商谈的时机已到。"林董以倡导英日联盟闻名，早在1895年就已撰文鼓吹"如果英日结盟，远东问题即可解决"，所以对兰斯敦的提议，欣然表示同意。他说俄国占据满洲后会侵入朝鲜，"这是日本不能不极力反对的"。因此，日本希望：第一，"尽可能使俄国远离满洲"；第二，"一旦日俄开战，最紧要的是使俄国得不到第三国的援助"。兰斯敦说："英国在朝鲜没有利害关系，但也不能让它落入另一大国（指俄国）之手。"8月初，日本内阁由曾祢代理外务大臣电告林董，对英日同盟会谈的精神表示赞成，并说："使朝鲜不受外国扩张政策的影响"，是日本帝国政府"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俄国控制满洲，将"构成对朝鲜独立的威胁"，这是"使日本焦虑不安的根源"；俄国在领土、工商利益方面对整个中国北部的排他性扩张，都和"门户开放"和"保全中国"的原则相冲突，"而这两项正是日本和大英帝国共同奉行的政策。"林董旋即于8月14日将日本意图转告兰斯敦，要求英国提出协商的具体条件。但兰斯敦认为日本比英国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催促日本政府首先提出建议。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联英、联俄问题上意见不一，日本政府迟迟未能作出答复。

然而，英国政府当时既想在远东和日本合作以抵制俄国，又想在划分近东和中亚势力范围方面同俄国进行交易，以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的竞争。为此，从4月到10月，兰斯敦多次向俄国暗示英、俄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就在他与林董交谈后不久，即10月22日和24日，又接连两次与俄国驻英大使斯塔尔交谈，希望俄方保证在新的中俄协定中能尊重英国在中国的"条约权利"。10月28日，英国内阁通过了兰斯敦起草的英日条约草案，同时批准了外交部给驻俄大使的训令，正式建议俄国就解决双方在中国、波斯（今伊朗）的矛盾以及其他利害攸关的广泛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互惠协议。但彼得堡当局"深恐英国会提出某种建议来建立一种多少作了伪装的共同统治"，加以拒绝。英国内阁感到对俄协商无望，而日俄妥协又并非绝无可能，这才下定了与日本联合的决心，于11月5日决定中止同俄国的外交试探；次日，兰斯敦即向林董面交了经内阁重新审议的关于英日同盟的草案。在此期间，林董利用英国政府害怕日俄结盟的心理，作出"如果英日同盟没有希望，日俄就可能联合"的姿态，使英

国政府不断受到刺激；而伊藤赴俄谈判的消息，又增加了英国对日俄联合的疑虑，成了英国内阁作出上述决断的重要推动力。这是小村对英外交的成功之处。然而，迟至12月12日，即时隔三十多天之后，日本才对英方草案作出答复，这是因为外务省拟定的对案，需要征求包括业已出访的伊藤在内的元老们的意见的缘故。

材料：

·同盟条约

材料　同盟条约

12月4日，伊藤应拉姆斯多夫的要求，向他递交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定草案六款。除双方保证不在朝鲜沿海进行可能威胁朝鲜海峡通航自由的军事活动一款外，拉姆斯多夫对伊藤的方案都不满意。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互惠的协定，因为根据草案第四款，日本有权从政治上统治朝鲜。伊藤希望拉姆斯多夫提出具体条件，以作为日本在朝鲜取得特权的"补偿"。但是，由于头天林董派人送来了日本内阁关于英日同盟的对应案，获悉英日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伊藤决定中止与俄国的协商，并于次日匆匆离开俄都前往柏林，在那里直到12月17日才收到俄方的复文。

日俄双方草案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伊藤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及工商业方面的行动自由，承认日本为"改革"朝鲜行政享有向其提出"建议"和进行"帮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和"专有权"(第四款)。俄方则把日本希望获得的行动自由局限于工商业方面，同时规定日本虽有向朝鲜提供援助的"优先权"，但事先应取得俄国的同意(第四款)。第二，俄方补充要求，根据前述条款开入朝鲜的日本军队，不得进入预先确定的毗连俄国边界的特定区域，并规定事毕后即行撤回(第五款)，意即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自由，在地域上也应受到限制。第三，俄方增加了新条款即第六款，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与其毗邻的中国各地享有优先权，并承担义务不妨碍俄国在上述地区的行动自由"。这不仅表明俄国没有放弃它在中俄彼得堡谈判中提出的侵略纲领，而且证明它正试图事先取得第三国即日本的认可，然后再逼中国承认。这一条与日本的侵华方针也是完全对立的。总之，伊藤在这里是按"朝鲜归日，满洲基本归俄"的公式行事，而维特等人的公式则是"满洲(不只满洲)完全归俄，朝鲜不完全归日"。伊藤对俄方的答复感到十分失望，于23日给拉姆斯多夫复信说，他对俄国的方案是否适宜作为两国"进一步协商的基础"递交东京政府，深为怀疑。

这时，英日谈判已进入决定性阶段。12月7日，日本首相桂太郎邀集诸元老，就英日同盟的日方对案进行协商。外相小村向会议递交了长篇意见书，分析比较了英日联盟与日俄协商的利弊得失。他认为，第一，只要俄国以护路为名，获得在东三省的驻军权，早晚将对朝鲜构成威胁，妨碍日本牢固地、永久地独占朝鲜；第二，联俄不能阻止俄国向整个中国的扩张，却会增加中国对日本的恶感，不利于日本在中国从事的各种"事业"，并损害同英国的良好关系；第三，与英国联盟，可以扼制俄国的野心，增进日本在华势力，确立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并在财政、通商方面得到英国的援助；第四，在交涉中"提出保全中国和朝鲜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可无开罪列强之虞。"日本元老和政府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意见趋于一致。会议责成林董将日本对应案交给英国外交大臣，从而完成了与英国结盟的重大决策。12月19日，英国内阁决定与日本缔结盟约。接着双方进入对约文的实质性讨论。伊藤虽认为日俄协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已改变了先前对英日同盟所持的态度。事实表明日本的联英、联俄两派，彼此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彼得堡当局昧于事态的发展，一直等待伊藤返日后的下文，并且一厢情愿地认定以俄国对日的不完全让步可以换取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当然，这一回沙皇政府失算了。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是1月30日签订、2月11日在伦敦和东京同时公布的。在英日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在同盟条约适用范围(英国希望将条约涉及的地理范围从远东扩展到印度；日本坚持一旦同法俄交战，它只能承担在长江流域支援英国的义务)、英国对由于第三国在朝鲜限制日本的利益而引起战争时应承担的义务(日本希望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行动自由，英国不愿为此承担与第三国作战的风险)、两国海军力量在远东的协调与配置(日本不愿把自己的海军力量调离本国附近水域，建议缔约双方在日本海保持一定的海军力量，英国不愿受此约束)等方面存在分歧。但英国为了防止日俄达成谅解，最后对日本一一作了让步。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的矛头是针对沙俄的，同时也是指向中国和朝鲜的。前者属于英日和沙俄在远东争霸范畴，后者则是帝国主义大国欺凌弱小国家的问题。该约冠冕堂皇地声称"尊重"中国与朝鲜的独立，但两国背着中国和朝鲜签订涉及中、朝两国主权的条约，这一行为本身就揭穿了这一声明的欺骗性。条约规定：1. 缔约双方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因他国的侵略行动或因中国和朝鲜发生内乱而遭损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第一款)，这不啻宣布英、日两国有干涉中、朝两国内政的权利。2. 缔约一方为维护上述利益同第三国开战时，缔约另一方应严守中立，并努力阻止他国参加反对其同盟国的敌对行动(第二款)；如他国(一国或数国)帮助第三国同缔约一方作战，则缔约另一方应援助共同盟共同作战，媾和时亦应协商一致行动(第三款)。这就保证日

本一旦对俄作战，不致有单独同法、俄两国对抗的危险。3. 缔约中的任一方，未经与对方协议，不得径直同他国另订有损于本约的协定(第四款)，这样英国事实上承担了不组织反日联盟的义务，同时也消除了因日俄可能接近而在远东陷于孤立的顾虑。此外，双方在签约时还互换秘密照会，规定两国海军在平时将采取联合行动，双方港口为对方战舰提供使用船坞和加煤站的方便，相互保证在远东维持优于任何第三国的海军力量。显然，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大大增强了与沙俄争夺满洲和朝鲜的力量和勇气，这是桂内阁为准备对俄作战在外交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也是日本政府进一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前提。同时，该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放弃了在国际竞争中所持的“光荣孤立”的立场，实现了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变；它使日本在英国远东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旦日俄开战，不论胜负谁属，都能削弱俄国在欧亚的力量，使英国得到好处。

美国国务院赞同英日同盟，认为它是“美国商业和工业在远东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在该约签订后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上面提到的备忘录，表明“美国实际上参与了英日同盟”。至此，一个主要与沙俄相抗衡、以争夺中国为中心目的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远东已初步形成。

2 月 12 日，沙皇政府接获《英日同盟条约》的副本，无异遭到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拉姆斯多夫立即指示驻法大使同法国政府磋商，将法俄联盟关系扩大到远东，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3 月 16 日发表的法俄宣言说：如果第三国的行动或中国发生的骚动威胁法俄两国的特殊利益，两国保留会商的权利，但宣言并没有规定双方应承担的义务。为与英日同盟抗衡，沙皇政府试图拉拢德国参加某种形式的联盟，但遭到拒绝。俄国在远东的外交陷于孤立。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交收东三省条约》

背景介绍

当英日和日俄就划分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在伦敦和彼得堡分别进行秘密协商时，奕劻于 11 月 29 日返回北京。不久，中俄谈判恢复。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职务由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接替。全权大臣奕劻成为对俄谈判的主持人。他认为：“东三省为俄人兵力所得”，“事实如此，让与若干利益，在所难免”。这与李鸿章的论调“东省系俄力战而得，铁路矿产利益，似应允为专利”如出一辙。他力主“将俄约允许”，因而在谈判开始前即已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激烈反对。

英、日驻华使节对中俄谈判仍处处防范。11 月下旬，他们通过那桐，先后向奕劻发出警告说，中俄签约“必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后果”。萨道义还前往镇江、武昌、鼓动刘坤一、张之洞反对订约。内田甚至在奕劻返京当日，就来探询东三省的矿山利权问题，要求中方提供约稿，“以便日本政府进一步考虑向中国献言”。美国驻华公使随后也向奕劻提出了警告。

为取得英、日、美三国的谅解，从 12 月 3 日起，奕劻分别向萨道义、内田、康格通报了俄方的撤军协定草案和中国的对案，以及李鸿章与波兹德涅耶夫会谈“银行合同”的情节和中国的对案，征求意见，并向英使保证在订约前将和英国商议。内田以“合同”旨在排斥他国，有违“利益均沾”原则，当即表示反对。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答复也说：“美国不希望中国和任何一国作出“永久损害中国领土完整、有碍美国合法权利及削弱中国恪守国际义务的能力”的安排，从而再次表明了英、日、美决定直接干预中俄谈判的意向。

这时，沙皇政府对于英日协商联合反俄的情况茫无所知，不仅寄希望于伊藤，而且利用清政府的软弱地位，坚持“银行合同在先、撤军协定在后”，“不让任何外国人(资本)到满洲来”的方针。12 月 12 日，奕劻与波兹德涅耶夫就“银行合同”问题进行商谈。他仍持对俄妥协的立场，但也想迎合英、日、美的某些要求，以便借他国之力换回部分权利，于是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1. 自今以后中国政府或自行用自己资本创办、或准华公司用自己资本开办各种矿路生业，应由中国国家批准。”道胜银行既系两国资本所开，可“尽先承办，若银行自行辞谢，亦可任听别人或别公司承办”。2. 此项合同“与他国别项通商口岸商务无涉，且与约准客商买货卖货，毫无妨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合同”的垄断性质，保护了有约国家在东三省的“条约权利”，为他国资本进入该地区开了一扇小门。但是，维特特别担心“外国人将打着中国政府或中国租让家的旗号”进入满洲，因此拒绝了中国的上述建议。

材料：

- 意外之喜

材料　意外之喜

继“银行合同”对应案之后，12 月 28 日奕劻向雷萨尔提出了对俄方撤军草案的修正意见：1. 从缔约之日起，至 1902 年底前，分三期撤出俄军，每期四个月；2. 东三省的中国驻军“须敷剿办匪贼及弹压地方之用”；中国驻军数额及驻扎地点，在俄军撤出前，由双方议定。撤军以后，由中方自行确定，“及时知照”俄方，毋需再议；3.

取消“中国巡捕不准用炮”的限制；4. 撤出“他国军队不得占据”俄军所还铁路地区的条款，代之以中国“不允许列强占有”上述地区的规定；5. 中国“补偿”俄国用于所还铁路的款额，不能单凭俄方所说，而应由两国政府商定。

但是，维特拒不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项修改。在12月30日给外交大臣的信中，他针对中方对案，申述己见：1. 全面撤军须待东省铁路建筑工程全部竣工，反对缩短撤军期限，因为到1902年底来不及把东省铁路“装备齐全”，其巨大的战略作用不能发挥；在此期限内，外阿穆尔军区（即“护路军”）也无法扩充至预定的二万五千人，不能取代撤出的正规军。2. 限制中国在东三省的驻军，削弱其防卫能力，是俄国撤军的重要条件，现在没有理由予以放弃。3. 如不禁用大炮，中国巡捕就会变成炮兵部队，构成对俄国的“威胁”。4. 赔款（总额约为一百二十万卢布）应在铁路移交之前交付，无须经过任何协商。由于维特的上述主张，雷萨尔经俄国外交部同意，决定在奕劻同意就“银行合同”重开谈判之前，对清政府的修改意见不予答复。中俄北京谈判再次陷于停顿。

1902年1月上旬，久离北京的道胜银行中国分行经理璞科第返回任所后，立即通过原李鸿章的幕僚杨廉甫和外务部官员塔克什纳等人进行活动，想方设法诱奕劻按俄方草案签订“合同”。1月12日，他欺哄奕劻说，“从速签订（银行）‘合同’对中国比对俄国关系更为重大。”与此同时，雷萨尔向奕劻示意，清政府要求撤销对东三省中国驻军人数及武器的限制，这一条容易照办，但撤军期限一年，实行时有困难，须待俄国政府指示。这一切似乎暗示，撤军协定大体可按清政府的要求办，但“银行合同”则无讨论余地。

奕劻身受俄国和英、日、美两面夹击，感到“为难之至”。他权衡利弊，觉得英、日、美公使“但有阻缓之言，并无切实相助办法”，而“合同一日不定，俄约一日虚悬，东三省即一日不能交还，……若再延宕一年半载，局势已成，既返璧之无期，更转寰之乏术，后患何堪设想”，于是准备继续对沙俄退让，撤回“合同”修正案中“立约各国仍可自由贸易”一节，并把中国政府“用己资本”创办各种工矿事业，更明确地规定为“只用己资本”，以迎合沙俄的“不准他国人来满营生”的要求。同时，他亲自向英、日、美驻华使节诉说清政府的艰难处境和签约苦衷，以平息他们的不满之火，并请赫德帮助说情。

然而，奕劻的行动既没有换来俄方的任何让步，也未赢得他国的谅解与同情。日使内田表示，“银行合同”侵害中国主权、利权，“妨碍东方大局”，中国政府必须“断然废弃”。萨道义说，如中俄缔结“银行合同”，英国“必向中国索偿”。康格也警告说：中国政府愿以权利让与俄国，可悉听尊便，但必须以不损害他国的“条约权利”为前提！

英、日、美各国政府得到本国驻华使节的报告后，对俄国政府作出了进一步的反应。美国由于担心它在东三省的重要贸易利益受到俄国的威胁，于2月1日首先向中、俄、英、日、法、德等国发表备忘录，指责道胜银行企图垄断东三省的各种权利，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影响了美国公民的权利。尽管海约翰随后向俄国驻美公使喀西尼承认“俄国对满洲具有性质十分特殊的关系”，只要“门户开放”政策得到维护，在满洲建立起足以防止义和团事件重演的行政机构，美国将不反对俄国长期占领满洲，但美国公开表示不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这是美国标榜“门户开放”、助日制俄的重要标志。

继美国之后，日本政府于2月3日通知奕劻，中俄撤军协定可以签订，“银行合同”则应搁在一边。“如果俄国拒绝这项建议，迁延不肯撤兵，日本将采取措施，就履行满州撤军的诺言一事，向俄国交涉。”如果中国同意签订“合同”，则日本不得不考虑向清政府提出某种要求。日本态度强硬，一方面可能是受到美国抗议的鼓舞，但更重要的是《英日同盟条约》这时已在伦敦签订的缘故。

清政府对英日结盟惊喜参半，心情复杂。一面觉得“东三省撤军谈判从此大为方便了”，表示欣慰；一面又担心一旦日本把沙俄逐出东三省，会不会前门驱熊，后门进狼；连向来主张倚日拒俄的鄂督张之洞，也感到该约“含有经常干涉中国事务之意”，为此表示不安。奕劻以怀疑的心情询问萨道义，如俄国不按中国的要求签约，结果又将如何？萨道义回答说，“英日协定决不是无谓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奕劻对俄交涉的态度转趋强硬，于2月11日通知璞科第，中国拒绝就“银行合同”继续进行谈判。从这时起，中俄谈判实际上已被置于日、英的监督之下了。

面对上述国际局势，沙皇政府意识到通过同清政府签订“银行合同”以杜绝外国资本输入满洲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但它并不打算就此轻易地退却。就在彼得堡当局获悉中国拒签“银行合同”的当天，即2月12日，维特便决定采取迂回转进的办法，即通过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逐个签订“合同”的途径，来实现“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原定目标，而在撤军问题上，则继续与清政府讨价还价。拉姆斯多夫对此表示同意。据此，璞科第不再谋求恢复关于“银行合同”的谈判；雷萨尔则主动要求奕劻立即签订撤军条约，条件是：1. 撤军期限定为三年；2. 按俄方原拟要求，限制东三省驻军人数；3. 赔偿修理所交铁路的费用。奕劻表示撤军日期可比中国原拟推迟两三个月，其余不予考虑。日本对俄国在满洲驻军和扩展东省铁路问题特别敏感，力促奕劻坚持在中方对案的基础上缔结交收东三省的条约，不要向俄国示弱，并希望牛庄（营口）于第一期撤军期内交还，以恢复和发展南满地区的中外贸易。美国也有同样的要求。英国着眼于维护其在长江

流域的利益，对“满洲问题”的态度不甚急切。在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下，奕劻于25日要求雷萨尔“全盘接受”中国关于撤军的修正案，并暗示如不迅速订约，列强将乘机进行干涉。

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人民反抗沙俄暴虐统治的斗争，也使彼得堡当局坐卧不安。他们惊呼：东三省局势严重，俄军无力对付神出鬼没的“红胡子”，“必须尽快解决满洲未来的命运问题”。

1902年3月5日，维特终于建议拉姆斯多夫接受中方对案，签署撤军协定。拉姆斯多夫表示同意，并接受将牛庄(营口)的民政管理事宜于10月8日前移交中国的补充要求。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中国将撤军期限由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清政府征求内田意见，内田起初仍要奕劻坚持以一年为期，到3月17日才同意改为一年半。中俄双方于是就撤军期限达成协议。29日，俄方同意清政府提出的其余条款，但坚持在协定中加入“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一语，作为撤军的附加条件。中方认为这项条件可能“使撤军的诺言变成一句空话”，要求删去，双方相持不下。延至3月底，璞科第向王文韶等行贿银三万两，俄国才如愿以偿。

4月8日，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北京签字。该约有汉、俄、法三种文本，以法文为准。日本参与了法文本的准备、校订等工作。这不仅表明日本对清政府的影响力已空前加强，而且意味着中俄交涉正在变为日俄交涉的一部分。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共四款，内规定，从订约之日起，俄军分三期撤出东三省，每期六个月。第一期俄军撤出盛京省西南段辽河以西，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之间的铁路；第二期撤出盛京省其余各地及吉林省；第三期撤出黑龙江省(第二款)。值得指出的是：1. 一年半的撤军期限与维特原拟的东省铁路全部竣工的日期大体吻合；而一旦该路全线通车，撤出的俄军可在一两昼夜内从赤塔、海参崴及旅大租借地进入东三省的任何战略要地，因而即使俄国如约撤军，东三省仍处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之下。2. 从东三省撤出的俄军，仅指俄国陆军部统辖的正规军，不包括所有其他武装力量，也不包括旅大租借地的驻军。事实上，俄国着手扩编的大批“护路军”——外阿穆尔边防军将取代正规军，驻守东省铁路沿线地段。所以，撤军后虽抹去了占领者的恶名，却保留着占据的实惠。另外，牛庄(营口)本应如约于第一期交还，但雷萨尔节外生枝，于缔约当天致函奕劻，单方面宣布此事“须待天津地方行政权归还中国当局一事完全商定后方可实行”，蓄意把“联军”交还天津作为俄国交还牛庄(营口)的前提，使问题复杂化。

该约还规定，俄军撤出之前，东三省中国驻军数量和驻军地点，需由中、俄两国商定；撤军以后，中国可自行核定，但需将增减情况知照俄国(第三款)。这一款直接损害中国的自保权。

该约又规定，由中国马、步巡捕负责“绥靖(东三省)地方等事”，但东省铁路界内例外(第三款)，这就为沙俄日后在东省铁路车站及附属地段内擅设警察、篡夺警权提供了新的条约根据。

该约另规定，中国日后在东三省南部续修铁路或敷设支线，必须与俄国商定(第四款)，这就限制了中国筑路自主权。

尤为严重的是，该约以“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为撤军的附带条件，从而使沙俄日后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延期撤军有所借口。条约签订后，俄使雷萨尔发表附带宣言，重申如中国政府违反上述条件，俄国政府即不再受该协定的约束，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也不负责任。这表明沙皇政府仍保留着在它认为需要时继续占领东三省的“权利”，而这种占领拖延得愈久，“满洲问题”就愈容易成为远东国际冲突的主题。正如苏联学者罗曼诺夫所说：“将中俄《满洲撤兵协定》加以公布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俄国外交当局这一次仍然试图用某种方法将满洲的‘门户关闭’，迄今尚无反证可以证明沙俄在满洲的全部行为确有明显的根本改变。远东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因为三月二十六日(公历4月8日)协定的签订而有丝毫的缓和。”由于沙俄坚持独占满洲的政策和英日同盟的成立，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南洋公学学潮

背景介绍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私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书商也竞相印行新书，但适用者不多。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智由)等议定，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编订教科书。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蒯寿枢等被举为干事。蔡元培字鹤庼，号鹤卿，倾向革命后易号民友、孑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中。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他在戊戌政变后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南返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冬，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分任撰述。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暑假，偕高梦旦

赴日本游历，适成城入学事件发生，吴稚晖、孙揆均被勒令回国。为了防止吴等回国遭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承担护送的责任。8月13日抵沪，教育会发起了欢迎吴等的大会。8月22日，又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支持自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的要求。会上，叶瀚提出了教育会自办学堂的建议。陆续加入中国教育会的还有吴稚晖、黄宗仰、钟宪鬯、王季同、汪德渊、林獬、陈竞全、章炳麟、金天翮、屠寄、丁祖荫、龙泽厚、徐敬吾、吴葆初、敖嘉熊、蒋维乔、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人。他们大都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教育会成立之前，除戢翼翚、章炳麟、马君武、张继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致力反清革命外，其他都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新派人士。但随着教育会政治活动的开展，除了龙泽厚那样个别的人还坚持保皇主张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这里，除"恢复国权"所指的内容不甚清楚外，意思是很明确的：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青年以改造祖国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政策思想。这是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个目的，会中的激进分子稍后有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说："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明确地说，就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会。"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指出"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中国教育会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教育会计划认真地从事造就"共和的国民"这一工作。它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但是，时局的急速变化使它没有来得及从容地进行教育的改造，甚至一本教科书都没有编成，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材料：

- 忆墨水瓶风潮

材料　忆墨水瓶风潮

伍特公：我那年考进南洋公学，是张菊生做总办。到第二年从六班升到五班，那时一班最高。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而我们那时候并不十分清楚，只是要求了解些新东西、新思想。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

我们那班有两门功课，大家都很感头痛，一门是《大清会典》，一门是《圣武记》。既不许我们看新书、新报，又要我们读这种旧的东西，同学们都很不满意。这是学生们反对国文先生的一个原因。

墨水瓶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当时公学里装着铃，铃一响就上课了。下午头一堂是中文课，中文先生是郭镇瀛。(张大椿：他是举人出身，是当地的土豪劣绅，他有个弟弟叫郭镇清，兄弟两个都很厉害。)有一次他走进课室，一看，椅子上有个墨水瓶，瓶子洗得干干净净的，里面装着清水。我们那时候写毛笔字，许多同学都用墨水瓶做水盂用，也许是有人忘记拿掉了。他看见了，就大发雷霆："这个不敬师长，太岂有此理！"把墨水瓶往案子上一摆！我坐得离他最近——他是如皋人，我是南京人，他有个侄儿跟我学英文的——他就问我："伍某人，你看见哪个摆的？"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和您同时进来的。"他说："你替我查！"我说："这怎么查得出来？"他说："无头案都要查出来的，何况一件小事情，限你三天！"他一定要我查出来。三天以后，他又追问这件事情。我说："确实查不出了。"他又说："反正这是你们这一群学生摆的，你代替他们记大过一次！"我也很清楚，那时几个小过拼成一个大过，三个大过就要开除，既然大家没受处分，我个人记大过一次也就算了。又过了几天，他说："有人告诉我了！"他说是我摆的。我旁边坐着的两个同学，一个姓贝，一个姓陈。他说："他们也晓得，两个人知情隐瞒，我一定请总办办你们，请总办开除你们。"我一听"开除"，傻了，下了班出来一看，条子已经贴出来了，"三个人不敬师长，开除！"(张季源：姓贝的是谁？)贝季眉的侄儿，贝均；另一个福建人叫陈承修。三个人都开除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见了《新民丛报》以后，有个"宿舍会"，每星期六开会，搞"团结"，大家演讲。那时候大家崇拜梁任公，所以写了许多字阄，各人抓一个，抓出一个什么字，就叫什么公，我抓了一个特别的"特"字，所以直到今天还叫特公。我学名本来叫伍正钧，过去登了许多稿子，都是署名伍正钧的。

开除三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平。以前也开除过几个人。那时候吃饭每个桌子上有个教员一起吃，有个同学吃饭的时候稍微有点不礼貌，同桌的先生就把他开除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那时候压迫得很厉害，黑袜子也不许穿，说是"流氓"！白鞋子又说走起路来没声音，"好象是扒儿手"。总之先生对学生常用种种的压迫手段。

学生当晚就开会，大家认为不该如此，要同总办去办

交涉。会还没开完，总办的条子又出来了！"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我们五十几个人，那时总算团结的，大家说："开除，就走吧！"就到卧室（一班一齐住在一个大卧室里），大家把行李整理停当以后，预备要走了。别一班的同学跑到卧室里来说："你们慢一步，不要走，让我们同总办去办交涉去。"第二天早晨大家就罢课了。（张季源：有一个人顶起劲，他叫钱伯圭。）

第二天早晨我们派了几个代表，总办坐在签押房里，谈了好久，总办不答应，说："教员叫我开除，我只好开除。"那时总办是汪凤藻，副校长（当时称提调）是伍昭扆，就是伍光建，是现在复旦大学伍蠡甫先生的父亲。交涉没有结果，就到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决定全体学生在当天下午一班一班地排队到督办家里去请愿（督办是当时高级学校的行政首脑，总办是只管日常行政的，要受督办指挥。——编者注）。到了之后，大家派代表进去，督办推说丁忧不见客，就派了一个人出来，安慰一下，说："你们好好回去，明天总有办法。"代表说："明天十点钟等你们的代表来，十点钟过后就不等了。"到明天十点钟，督办的代表也没来，十一点钟也没来。下午大家就开始一齐走了。路上和督办的代表张让三（美翊）碰着了。（舒新城：就是第五班你们这一班决定走了？）全体决定走了，小班先走，大班后走。我们已经发动了，他派人来也来不及了。

六个班一齐出来。当然，有些人中途不走了，回去了。蔡元培先生在旁边也鼓励我们。同时他自己也带着特班生出来了。特班里有邵力子、黄炎培这许多人。后来不到几天，中国教育会找我们去组织爱国学社。爱国学社也上课，但是课上得很少，活动比较多，还办了个儿童报，总是谈时事、讲革命。大概是这个样子。

舒新城：当初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墨水瓶风潮，没有什么最后的宗旨，可能是个自发的运动；后来到了开除学生的时候，才有蔡元培出来的。

伍特公：蔡元培也是自发的。后来已经成功了，火是已经着了，那时他走上来了。送火不是他送的，是自发的。

张季源：我来讲讲墨水瓶事件。照我个人的意见，伍老说是"无意"的，我看当时是有人有意同郭镇瀛寻事。郭经常坐那个位子，并且他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把位子摆在正中，稍微歪一点就要骂："又歪了，谁摆的，不行！"这样子不止一次了。谁知以后这个凳子歪得更厉害了。这样几次下来，郭倒反而不响了。所以，我总想是有人有意那样做。伍老说：郭先生当时疑心他，我也不晓得究竟是谁？但照这情况来讲可能是有意的。

平海兰：恐怕这位郭先生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从前睡觉，在一个大房间里，中间一个空着的地方，放一只床铺，准备先生来睡的。先生他们轮流来睡，叫"监卧室"。有一天晚上，我们学生睡了，电灯也熄了。只听一位先生也来睡觉了。那位先生恐怕就是郭吧？（伍：不是郭。是胡文甫，胡诒谷，后来做高等法院的秘书长，再后做院长的。）不知道谁在他的被窝里浇了一壶水！（伍：不是一壶水，一个痰盂。）一个痰盂，冷天呀，他一睡进去，呀！哇哒一声！学生都惊起了。现在照这一桩事情看，恐怕墨水瓶也是有意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当局和先生压迫学生太厉害引起了反感。

张季源：不能说是个个都压迫，不过象郭老先生是有这种情况的。

平海兰：我当时是受过些的。

伍特公：那个郭先生是不好的，讲书讲到"里"字，他讲："'里'么，譬如说那个南方里。"上海打狗桥有个南方里，是花烟间的弄堂，他会把"里名圣德"的里，说是"南方里"的"里"，上海里多得很，他却偏要提出那么一个里出来，所以我们都看不起他。

张季源：他讲《纲鉴易知录》，考起书来出的题目，往往是某一战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发动的？这种问题很生疏，一般同学都很不容易回答出来。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北洋集团的崛起

背景介绍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订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

李鸿章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就继承其衣钵，于1901年11月7日署理清政府中最显赫的职务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8日实授）。自此以后，他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务大臣，督办津镇路、京汉路大臣以及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清末权倾一时的重臣。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北洋集团得以形成并迅速扩张，不仅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势，而且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等一大片地盘，连京师也在他的势力笼罩之下。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材料：

· 编练新军

· 后台老板
· 与盛宣怀争利

材料一　编练新军

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北洋六镇新军。在他升任直隶总督后，与铁良一起挑选八旗兵丁三千人，另派王英楷、王士珍在正定一带招募壮丁六千人，并改编保阳练军和裁汰淮军归并成步队、炮队等十六营，马队一标，先后成立京旗常备军和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两镇。1904 年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以"保卫疆畿"为名，奏请扩充新军三万。先募一万，成立了第三镇。以后又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先后并入由江南调防来的自强军和扩大武卫右军先锋队，新编成四、五两镇常备军。到 1905 年春，清政府统一陆军番号，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常备军也改称为陆军：即京旗常备军编为陆军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称陆军第二镇，驻迁安；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称陆军第四镇，驻马厂；北洋常备军第三镇仍称陆军第三镇，驻保定；新编的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驻南苑；新编的第五镇仍称陆军第五镇，驻山东济南、潍县。到此，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正式编成，共约七万余人。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1902 年 6 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省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进行训练。同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次年 10 月，又创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来这所学堂由练兵处接办，每年招收各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六百名，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此外，1903 年至 1906 年间，还先后开办了保定陆军小学堂、姚村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医学堂、陆军马医学堂、陆军军械学堂、陆军经理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北洋讲武堂以及著名的保定军官学堂等。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培养了一大批沾染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建军的骨干力量。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大都是他在小站练习兵时的亲信和追随者。如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六镇新军虽都用洋枪，练洋操，并抄袭西方的营制，但内部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李鸿章淮军的旧传统，固守"兵为将有"的旧习。北洋集团自成一个封建的派系。其中武人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田中玉、姜桂题、孟恩远、王占元、雷震春等；文人有徐世昌、唐绍仪、杨士琦、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梁士诒等。这些人物在清廷灭亡以后，又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他们篡夺政权长达十六年之久。

材料二　后台老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特别与英、德、日、美等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袁世凯着力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始受到洋人的重视。美国人在 1902 年初就称许说：袁是未经科举而跻入高位的"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继李鸿章之后，列强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拥有实力的野心家身上。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E. M. Satow）、朱尔典（J. N. Jordan），德使穆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等人，都与他过从甚密。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透露："袁世凯与我们的关系，比过去几年中任何官员还要密切，我们采用了骚乱（指义和团运动）前未有的办法进行磋商。"自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它也企盼袁世凯做其利益的赞助者。因此，往北洋地区派出大批顾问、教习，支持袁世凯的"新政"。如 1904 年，在直隶一省的日本顾问、教习有八十五人，1908 年增至一百七十五人。在北洋军中，日本的军事顾问和教习占有重要地位。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都先后在北洋督练公所和北洋各学堂任过顾问或教官，控制了参谋和训练大权。

北洋系的另一个重要后台是庆亲王奕劻。奕劻（1838—1917），是清朝获得世袭罔替封号的少数亲王之一，享有特殊的恩宠。他从 1884 年（光绪十年）起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辛丑和约后，外务部成立，他是管部大臣，1903 年 3 月又入值军机处，继荣禄以后成为最有实权的领班军机大臣。在这期间，他还身兼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练兵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等要职。奕劻的昏庸和含婪是中外闻名的，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而他却自诩为"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又取名"乐有余堂"，说是"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袁世凯正是利用他爱财如命这一点，极力向他行贿，并和他结成一伙，把持朝政。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袁世凯无论是扩大军事实力，还是夺取路矿和财政权力，都得到了奕劻的支持和默许。对一切重大问题，奕劻总是"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梁鼎芬在弹劾奕劻袁世凯的奏折上说，当今朝廷"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这话说得并不过份。

材料三　与盛宣怀争利

袁世凯在办“新政”过程中，不仅扩大军事实力，而且极力插手路矿、通商事务，以便获得扩大军力所需要的财源。这使他与另一个买办官僚盛宣怀之间发生日益严重的权力之争。盛宣怀，江苏武进人，与袁世凯一样，都以投靠李鸿章起家。1886年，他在山东登莱青道任内，主持李鸿章淮军的粮饷供应，靠经办李鸿章的洋务企业而发迹，控制了全国最大的近代企业招商局和电报局，并在以后发展成为拥有轮船、矿业、棉纺等庞大企业体系的盛氏官僚资本集团。1896年，他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不惜出卖权益，一手经办了大量的铁路借款。在矿务上，他主张“以开为守”，于1902年10月，成立上海勘矿总公司，独揽各省矿藏普查，以备日后招徕华洋商人进行开发。

袁世凯早就对盛宣怀独揽路矿财源表示不满。他任直隶总督后不久，首先接管了关内外铁路，并兼任督办大臣。1902年底，他借口招商局和电报局附属北洋，首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1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接管了电报局，派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使盛宣怀顿时失掉了两大企业的控制权。盛宣怀的失败，与英国的反对有直接关系。英国中英银行公司总办濮兰德与盛宣怀打过多次交道。他认为：“盛是公开的亲比派（也就是亲俄法派——引者），是反英的。”据他的观察，盛宣怀“唯一有力的支持者是王文韶”。显然，在袁、盛的斗争中，还包含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俄法与英德的矛盾。1903年商部成立时，铁路和矿务统归商部经办。这个部的尚书载振是奕劻的儿子，侍郎胡燏芬、伍廷芳、陈壁等，都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濮兰德听到成立商部的消息后很高兴，认为“这将把盛宣怀和他的同伙，排斥于该部之外。”事实也是这样，原督办路矿大臣王文韶、瞿鸿禨，铁路总公司总办盛宣怀，都没有参与商部事务。英国对袁世凯的支持，是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1905年11月，清政府再派袁的亲信唐绍仪接办沪宁路，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完全成了空架子，不得不奏请辞职。不久，盛宣怀又自动奏请撤消上海勘矿总公司，到此，盛的势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景廷宾起义

背景介绍

帝国主义列强借《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清政府秉承列强的旨意，也多次颁发“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是，由于产生反帝斗争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不管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清政府的三令五申，都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事实上，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针对摊派赔款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于1902年就掀起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给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反教会压迫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前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地群众不仅把反对教会压迫和抗捐抗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往往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有些地方更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一类的战斗口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直隶省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直隶省惨遭八国联军蹂躏，人民的苦难特别深重。1902年，全省除摊派大赔款银八十万两外，还缴纳上百万两的地方赔款。广宗县知县和法国传教士议定广宗地方赔款为京钱两万串，折合纹银万余两，强迫各村农户按地亩摊派，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每亩地要缴纳“赔款捐”京钱四十文。这种作法不仅使广大贫苦农民极为愤慨，就是中小地主也怨声载道。广宗一带各村庄本来有联庄会的组织。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遂传帖聚众，联络各村联庄会，首先倡议抗捐，声明“中国人不拿洋差”。景廷宾（1861—1902），是一个有百余亩土地的小地主，武举人，为人慷慨好义，喜打抱不平。他的抗捐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邻近各县如邢台、钜鹿、南宫、内丘、平乡的人民，纷纷响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立即命令大名镇总兵何永盛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统率练军前往广宗县镇压。3月3日清军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领群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自从清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东召村被血洗之后，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就促使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在这个客观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鼓舞下，义军迅速扩大，“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基本群众是广宗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起义军攻战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以泄愤，随后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广宗数万农民揭竿而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设法尽快扑灭起义。袁世凯一面宣布将广宗及其附近各县“所摊捐款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一面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改派自己的心腹段祺瑞、倪嗣冲指挥新编成的北洋军（当时称新练军）马步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统

率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两股清军大张旗鼓地合围广宗。各村庄农民沿村筑垒，英勇抵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使用刀矛土炮和持有快枪利炮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战，遭到重大伤亡。景廷宾见势不敌，遂率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乘机焚烧抢掠，惨杀村民数百人，附近村庄俱遭劫难。景廷宾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不幸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众四散，起义终于失败。

材料：

· 袁世凯奏剿办景廷宾

材料　袁世凯奏剿办景廷宾

太子少保·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南境土匪作乱，戕杀兵弁、委员及教士、教民，遵旨遣兵剿办各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直隶广宗县属东召村匪首景廷宾，聚众倡乱，迎击官军，前经正定镇总兵董履高、大顺广道庞鸿书等督队击散，臣于本年二月初八日，业将缉办情形专折具奏；并饬该镇、道等转饬营、县查拿首犯，解散余党；一面遴派道员晏振恪、知府梁丹铭驰往筹办善后，分别赈抚。旋据禀称：半月以来，谣言渐息，地方渐次安贴。

嗣臣扈跸团诃，叠于差次接据大名镇道、正定镇、顺德、广平两府，及广宗、巨鹿等县，先后禀称：景廷宾自东召村溃亡后，潜匿纠合，在巨鹿境厦头寺聚党屯踞，谋为不轨。适有新练左军营官参将鲍贵卿带同招募新兵，由威县路经巨邑，竟被匪众围困，抢劫银钞，剥取衣服，戕害新兵五十余人，并哨官尽先千总吕孝申、季员丁忧广昌县典史钱德葆、附生刘炳勋、护勇五名。该营官亦受刀伤，夺围逸出。目下匪焰甚炽，请速派兵剿办等情。并据南宫、新河、威县、任县、隆平、柏乡等邑纷纷告警前来。当即飞饬大名、正定练军，并驻扎深州之新盛军就近拔队前往；仍饬大顺广道驰赴前敌，会合两镇，筹商查办。分饬邻近各属严防窜扰，妥护教堂。

三月二十三日，臣陛辞回省，复派干员确探匪情。据报：该逆景廷宾，以广宗县属之件只村为老巢，传送柬贴，布散符咒，诳诱乡愚，招纳盗匪，分遣死党，四出裹胁，勒索供给，聚众已至二万余人。该逆伪号大元帅，以文生刘永清即刘泗海为之副，竖立帅旗，文帖悖谬，身穿黄马褂。匪党有功者，辄予五品奖札，盖用紫花伪印，披金、木、水、火、土、中等字，编列营伍，以黑旗队为先锋。附匪各村相率演放枪炮，按期会众誓师，谋扰广宗、威县两城，并攻各处教堂。威县边界之张家庄教堂围攻数日未下。其军寨村小教堂已被拆掠，戕害教民四名。又据威县禀称：法国教士罗泽浦，于十九日行经县境苏庄、刘庄之间，遇匪被害等情。臣以事关教案，当即据情电奏，恭奉谕旨：饬迅即添派警队，从速剿灭，务绝根株等因。钦此。遵即分别规划。

适省城驻兵无多，不敷调遣，仅就现有各营抽拨凑集，派武卫右军统带·知府段祺瑞、自强军统带·总兵张腾蛟、新军马队管带副将吴凤岭、右军马队管带·都司王开福、练军马队管带·都司张廷献等，率领炮马队共二千人，由省开往。右军右翼第二营步队，自山东撤调来直，甫抵沧海，因电令该统带游击马龙标，抽集所部七百人，取道畿南，会同进剿。除自强军外，各营均归统带段祺瑞节制调遣，并加派营务处道员倪嗣冲会同布置。臣于队伍开拔后，复分派署清河道袁大化踵往滋扰各地方，体查民情，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预筹善后办法。

时景廷宾闻大军已发，先由厦头寺趋回件只老巢，预备抵御。二十九日，张廷献马队先至古城集，距逆巢十八里，与大名练军犄角扎营。匪众突出扑犯马队，张廷献等麾军奋击，毙匪百余。适正定练军暨新盛军亦闻警来援，匪遂不支，退入巢内，传贴各邑聚图再举。比因大队未集，未敢进逼。四月初一日，各营齐集南廷宫。段祺瑞、倪嗣冲等会商，以该逆距守老巢，意在负隅自固，以逸待劳。其死党咸萃于北，而附近村庄多其援应，攻之未免顿兵旷日，且多株连残伤，不如捣穴擒渠，馀自瓦解，遂定直捣件只之计；并飞函密约正定镇董履高、大名镇何永盛等，分兵保护教堂；并分布扼要驻扎，断贼外援，堵贼旁窜。段祺瑞等以二千数百人分三路进攻，张腾蛟步队居东，马龙标步队居西，炮队居中，而分伏马队于左右两翼以便包抄。部署略定，夜半疾趋，黎明距贼约数里许，瞭见贼巢树林深密，四面坚筑寨墙，高及一丈五尺，濠亦深宽，墙垛列排旗帜，寨门牢闭，密布枪炮。我军先使马队当贼，更番诱敌，匪不为动，但凭高以枪炮俯击，各营亦枪炮互施。相持数时之久，匪仍坚壁不出，而环寨各村，间有悬旗应贼者。时各营深入，既虑腹背受敌，又恐兵力渐疲，易为匪乘，乃察知贼之寨墙东面稍瑕，因悉移师而东，并力猛攻。马龙标挟旗先登，自强军亦奋勇夺隘，蜂拥直上，吴凤岭等亦令马队分兵下马攀堞而入。匪犹拼死抵拒，用刀矛据墙下击，伤我弁兵。各军士无不一〔以〕当百，前者负创，后者继进。匪众披靡，死亡相枕。其四散逃窜者，或由西墙缒下，或由南门逸出，经马队各伏兵截击追杀，强悍者殄除略尽，老弱者网开一面，其凶顽剽悍抵死不去者，犹复持械巷战，短兵格斗，又历一时许而后定之。

是役也，我军阵亡二人，伤十数人，殪匪二千余名。匪首伪都督、伪领队、先锋赵洛贵、张学逊、祝洛超、孙洛法、吕洛修、祝小杰等均经歼毙。阵擒各犯，讯据供认听从景廷宾谋叛不讳，均即就地正法。内有该逆堂兄景得章暨为该逆司帐之赵书生二名，亦经收禁备质。搜获该逆伪印一颗，伪造令旗、令箭、文檄、传帖及枪炮、子药、刀械甚夥，并起获教士罗泽浦洋书等件。至该逆下落，据景得章供

称，已为官兵所杀，并指东围门外一尸为该逆正身，而该逆近邻东召村民朱三元亦供此尸实系该逆。惟肢骸残破，辨识难真。姑据族邻指认，先行戮尸枭示。一面仍确切访查，觅线分捕。

其刘泗海一名，督率匪首和尚老慈即郝振邦、高祥元等，先于初一日出外纠党，闻件只已破，遂率匪数百窜至巨鹿、任县、南和等境，沿途焚烧抢掠，经正定练军拦截堵遏，乃于初五日回窜至平乡、曲周之间，仅存百余人，复经大名练军营官杜万宏、马振武等巢洗净尽。刘泗海同被击毙。高祥元逃后被获，亦即正法。和尚老慈中途潜逃，仍在严缉。

巨鹿、广宗一带大致平定，而被害教士罗泽浦之尸首，亦先后觅获，其首埋在件只村南，系由景得章供出，尸系都司张廷献等在威县荣家庄访询得之，迭经张庄、赵庄各教堂教民验明无讹者，即交赵庄教堂妥为殡敛。至附近件只各村民，虽于交仗时竖旗助势，然皆未出而拒战，且多迫于威胁，未必甘心从逆，自应一律宽免。现已分遣耆老绅董挨赴各村，谆详开导，令其献缴枪炮，解散归业。各父老莫不欢欣感涕，踊跃自新。一节善后事宜，似尚不难措手。惟探闻威县李村地方，密迩山东邱县，有匪徒剽劫行人，已由营、县会往搜捕。据该镇道印委各员缮具文电，先后禀报前来。

臣查直隶南境各属，民情强悍，盗贼素藩。巨鹿昔为黄巾起事之区，威县又为拳匪啃聚之薮，近自兵燹以后，民心浮动，更易纠约。而景廷宾者，以桀骜之资，挟叵测之志，行险侥幸，屡蹈大戮。自东召漏网后，乃复不知畏罪悔祸，匿迹销声，辄复号召党徒，煽乱构衅。若不亟加殄灭，势必祸尽苍生。然时艰方殷，屏藩尽撤，内讧不息，外侮易生，庚子之变，足为前鉴。此次进剿各军，深入贼巢，直捣其穴，诚不免于涉险，然凭恃天威，得以一鼓聚歼。此外各村并未波及，保全之多，实难数计。臣已饬袁大化、庞鸿书等妥等应办善后各事，现复添派道员孙多祺携款二万两驰往该处，会同查明被匪扰害各村，分别散放，妥为赈抚，其被戕教民及焚掠各家，并饬从优抚恤，仰副圣朝子惠元元、视民如饬至意。至此次扫荡匪巢，办理尚为迅速，其在事出力各员，可否准其择尤请奖之处，出自鸿施逾格。

（摘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纪念明亡大会

背景介绍

1902年4月，章炳麟联合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在东京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均为学生；除冯自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他们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同缅怀明末抗清斗争：“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会期前一日，日本政府应清朝公使蔡钧之请，命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警视厅传询了纪念会发起人。章炳麟长衣宽袖，侃侃而谈，回答了日本警长的询问：

“诸君是清国何省人?”

“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

“士族，抑平民?”

“遗民。”

简短的回答表露出强烈的反满情绪。次日，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赴会，均被日警阻止。孙中山是纪念会的赞成人，他率领十多名华侨由横滨赶来，得知情由后回横滨补行了纪念式，章炳麟等发起人均应邀参加。梁启超本来也是赞成人，但他于会前即致函章炳麟表示：只可心照，不必具名。梁此时在办《新民丛报》，仍然和革命党人往来。东京之外，香港《中国日报》先期刊登了宣言书，届期，陈少白、郑贯一等举行了纪念式。

《国民报》、国民会的发轫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抛弃了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得来的惨痛教训，往往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了倡导革命并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材料：

· 支那亡国纪念会

材料　支那亡国纪念会

庚子七月汉口唐才常一役失败后，自立军诸将领湘人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等先后避地日本。章太炎因列名上海张园国会，被清吏悬赏通缉，初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继以苏抚恩寿指名逮捕，因亦亡命东京。时湘人周宏业（号伯勋）、王思诚、浙人王家驹（号伟人）、及余同寓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榎木町。菱溪、犹龙、（号桃痴，后易姓名曰左仲远）莅东后，与周王等有同乡关系，亦移民榎木町周寓。力山与王龙惠同居。太炎则居某旅馆为广智书局修订译文。众以周寓为谈话机关，每日恒

在此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众赞成之,即推太炎任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其文曰: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萃者,去之占也。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盅,未堕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回望皋渎,云物如故,维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自顷邦人诸友,愸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宪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讦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毋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维建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疆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烟煴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且曼珠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丸之烈。而蓟丘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辫发,坐论易以长跽。茸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析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恬为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多有也。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生长,瞻梨州之所乞师,颖然不怡。永怀畴昔。盖望神业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恩王父之义息矣。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婵嫣相属,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缗,人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耶。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馀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宣言书既成,留学界初署名发起者十数人。有署名后中悔者数人,故仅得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彬四湖南人)王思诚等是也。定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式。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太炎更征求孙总理、梁启超为赞成人,并将宣言书邮寄横滨清议报,托梁启超代派送当地华侨,藉广宣传。孙、梁均复书赞成,惟梁于数日后再函太炎,谓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请将彼之赞成人名义取消云。会期原定三月十九日,讵清公使蔡钧据使馆学生报告,知留学界有此举动,极形恐慌,乃持此会宣言书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以全清日二国友谊。日政府竟徇其请,特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太炎等十人于开会前一日各接到牛达区警察署通知书,谓有要事待商,请于是日某时至该署一谈。太炎等如约偕行,时衣华服者只太炎及陈桃痴二人。太炎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既至神乐坂警察署,警长首问各人籍贯为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遗民”。警长摇首者再,乃以严厉之态度发言曰:“诸君近在敝国设立支那亡国纪念会,大伤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余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开会。明日精养轩之会,“应即解散”云云。太炎等以争之无益,无方而退。翌日,留学界多未知开会被阻事,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宾等数百人。然是早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无数警吏监视,声言禁止中国人开会。学生到轩门者均被日警劝告而散。孙总理亦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会,及询知清使馆借外力干涉情事,乃在精养轩聚餐,以避日警耳目。是日归抵横滨,即邀集同志多人在永乐楼开会补行纪念式。香港中国日报得宣言书即载诸报端,大事宣传。及期,陈少白、郑贯公等举行纪念式于永乐街报社,同志莅会者极形踊跃。香港、澳门、广州各地人士闻之,颇为感奋云。

(摘自《革命逸史初集》 冯自由)

历史内幕

沙俄决定签约前后

二月十二日，沙皇政府接获《英日同盟条约》的副本，无异遭到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拉姆斯多夫立即指示驻法大使同法国政府磋商，将法俄联盟关系扩大到远东，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法俄宣言说：如果第三国的行动或中国发生的骚动威胁法俄两国的特殊利益，两国保留会商的权利，但宣言并没有规定双方应承担的义务。为与英日同盟抗衡，沙皇政府试图拉拢德国参加某种形式的联盟，但遭到拒绝。俄国在远东的外交陷于孤立。

清政府对英日结盟惊喜参半，心情复杂。一面觉得"东三省撤军谈判从此大为方便了"，表示欣慰；一面又担心一旦日本把沙俄逐出东三省，会不会前门驱熊，后门进狼；连向来主张倚日拒俄的鄂督张之洞，也感到该约"含有经常干涉中国事务之意"，为此表示不安。奕劻以怀疑的心情询问萨道义，如俄国不按中国的要求签约，结果又将如何？萨道义回答说，"英日协定决不是无谓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奕劻对俄交涉的态度转趋强硬，于二月十一日通知璞科第，中国拒绝就"银行合同"继续进行谈判。从这时起，中俄谈判实际上已被置于日、英的监督之下了。

面对上述国际局势，沙皇政府意识到通过同清政府签订"银行合同"以杜绝外国资本输入满洲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但它并不打算就此轻易地退却。就在彼得堡当局获悉中国拒签"银行合同"的当天，即二月十二日，维特便决定采取迂回转进的办法，即通过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逐个签订"合同"的途径，来实现"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原定目标，而在撤军问题上，则继续与清政府讨价还价。拉姆斯多夫对此表示同意。据此，璞科第不再谋求恢复关于"银行合同"的谈判；雷萨尔则主动要求奕劻立即签订撤军条约，条件是：1. 撤军期限定为三年；2. 按俄方原拟要求，限制东三省驻军人数；3. 赔偿修理所交铁路的费用。奕劻表示撤军日期可比中国原拟推迟两三个月，其余不予考虑。日本对俄国在满洲驻军和扩展东省铁路问题特别敏感，力促奕劻坚持在中方对案的基础上缔结交收东三省的条约，不要向俄国示弱，并希望牛庄（营口）于第一期撤军期内交还，以恢复和发展南满地区的中外贸易。美国也有同样的要求。英国着眼于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对"满洲问题"的态度不甚急切。在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下，奕劻于二十五日要求雷萨尔"全盘接受"中国关于撤军的修正案，并暗示如不迅速订约，列强将乘机进行干涉。

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人民反抗沙俄暴虐统治的斗争，也使彼得堡当局坐卧不安。他们惊呼：东三省局势严重，俄军无力对付神出鬼没的"红胡子"，"必须尽快解决满洲未来的命运问题"。

一九〇二年三月五日，维特终于建议拉姆斯多夫接受中方对案，签署撤军协定。

（摘自《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

两宫回銮

当和约之将成也，各国公使与奕劻曰："必待两宫回京，而后和约可定。"奕劻曾以此意电告行在，西后犹豫未决。及王公大臣既渐趋行在，其留京者合词请回銮，疆臣复连名力请，乃下诏还都。命都御史张百熙为跸路大臣，先驰还。逮跸路成，乃于辛丑十月，自西安启驾。是时陕西耆老，多有执香跪送者。西后及光绪帝暨帝后等，皆揭轿帘以俟士女之瞻仰。凡跪送者均奖给银牌。欢呼之声，几如雷动。盖以小惠结民心也。车驾既发，乃取道河南，开驰道，置行宫。至十一月始达开封府。以隆冬不能除道，遂驻跸焉。

壬寅二月，春和景明，气候渐暖，乃复行。渡河，至直隶正定，驾汽车入京。是役也，行在所费，达一千数百万之巨。扈从之人，虽力戒婪索，而仍不能止，以宦官为尤甚。陕西河南两省之官民，几不聊生。最可笑者，自潼关以东之行宫内，凡有器皿为西后所用者，皆以银制之。器皿上皆镌"臣盛宣怀恭呈。"河南知府文悌，日著厚底方头之缎靴，步送銮舆，自洛阳至祥符，几四五百里，直待西后令其免送，始行止步焉。

皇嗣溥儁，端郡王载漪之子也。载漪以首肇义和团之祸，已废锢，而溥儁在西安时，日私与宦官等出外作邪游，大失体制。即其在行在宫中，乘帝后膳时，竟至拔其簪珥，以为戏乐。嗣为光绪帝所见，乃告明西后，杖之。溥儁愤谓光绪帝曰：汝知帝位之将属于我耶？而犹岸然自大若此。其失德之处，大率类此。迨驻跸开封时，西后以特旨废之，而后还京师。

初，西后藏金宫中，数达三千余万。当出走时，纤悉未

携，中途颇懊丧，以为联军破京师，必取去矣。嗣知联军仅为护存，尚疑信参半。及还宫，竟全数无恙，乃大喜。自经巨变后，西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之言新政者，多采纳之。故在行在时，下罪己诏，闻者感动。实则荣禄幕宾樊增祥之手笔也。他如开经济特科，诏天下兴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瞿鸿禨为尚书，俨然有舍旧谋新之象。及还都，中外渐安辑，心志渐奢恣，于是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惟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情尤浓洽。内监李莲英尤用事，与白云观高道士拜盟。而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缘结于莲英，多所密议，故于外交尤有力焉。光绪帝既久失爱于西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以王文韶之调和，遇事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如土木偶而已。凡朝廷有大举措，大赏罚，帝皆不得问。例摺则令其自批之。世皆称光绪帝素无主权，观于回銮之后，当益见矣。

（摘自《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袁世凯巧据兵权

曹州是拳民较早根据地之一。曹州知府毓贤恣意杀戮，有"屠户"之称，因功升任巡抚。可是反洋乃人心所向，拳民越杀反而越多，毓贤无法应付，改变方式，派人同拳民打交道，要他们不闹得太凶，官军也就不管。于是拳民改称"义和团"，取得了半合法地位，毓贤随即谎报朝廷"匪患已全部肃清"。但这套把戏瞒了清廷，瞒不过各国使馆，他们联合要求撤换毓贤，继任人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小站练兵已有多年，他随带新军开入山东，展开了血腥的屠杀，使得清廷和帝国主义者双方满意。他由此积聚了第一笔政治资本，崭露头角。义和团感到这个刽子手的威胁，逐渐向北方转移；而直隶省的官绅富户，则是南下山东逃难来了。李鸿章在广东听到他的学生有此能耐，得意地宣称："幽燕风云险恶，齐鲁浪静风平，袁家子真不简单。"

团众进入直隶，西路占领涿州，东路过德州直趋天津。直隶总督裕禄是个吃惯太平饭的，对此毫无办法，义和团势成燎原，整个京津陷入包围圈。此时各地教案迭起，外国使馆逼令清廷了限期澄清局面，扬言否则就要派兵自卫。清廷很自然地命令早有经验的刽子手袁世凯率领新建陆军入都，这时已是五月下旬了。

袁世凯毕竟是个反革命能量较高的人，为他自己的权势利禄足智多谋，戊戌那年不为光绪恩赐"侍郎"所动，断然决定效死西太后与荣禄，这是他一生政治投机的第一个关节。现在，第二个关节严峻地放在他面前。他对义和团是力主镇压的，但现在已敏感到政治行市在发生变化。拳势已大，要镇压须花大气力，弄不好自己的本钱会拚光的。这还事小。京中载漪炙手可热，正在左右政局，甚至影响到几位老资格大臣，如徐桐、刚毅，都在动"借拳灭洋"的脑筋。他看得清，太后为废立事痛恨外国干预，前途变化未可知。他通盘筹算，这一变化事关重大，如果立即投入这个游涡，将来万一发生意外，必将无法脱身。他打定主意，在局势未见明朗前，务要保全实力，于是下令全军稳扎稳打，缓步前进。

果然，他的前锋刚逼近京师，接到了对外宣战的诏书。这个得到曾国藩、李鸿章衣钵真传的人，此时不觉额手称庆。幸而慢了一步，否则就将站上第一线同洋人开仗了。他继续缓步前进，主要接火的仍是义和团。据说，大家一同奉诏宣战，义和团地处前线，理当打头阵。

变化是那末快，不过几天，混沌的局面很快明朗。他庆幸并未损伤实力，再无顾虑地把枪头直指义和团。这一手既为慈禧政权建立了殊勋，又得到了洋大人的谅解和赞赏；此后无论对内对外，他的发言权都加倍地提高了。

庸懦的裕禄死于战争中；为要李鸿章主持和议，重又把他从两广调回恢复原职。可是《辛丑条约》签订不久，这个一生中签订和约不计其数的李二先生就死去了，受谥为文忠公。李死前一天，在病床上口授遗疏，保荐袁世凯继任他的直隶总督。疏中恳切地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此时太后尚在归途中，立即发出任命。

早在太后西逃期间，袁世凯就派遣差官吴长纯，采办大宗衣著用品和食物，中途上贡，又带了白银二十万两，分送各大臣。他很懂得"烧冷灶膛"的路道，讨得了许多人的喜欢。太后回銮，他驰往顺德府迎候，望见御辇到来，匍伏左首路旁，磕头请安，随即失声涕泣，说是看到慈容"清减"，感有彻心之痛，不觉"失礼"了。原来照规矩对皇上是不能下泪的，这一次却博得了太后的分外欢喜。太后回京，即赏以双眼花翎，加宫保衔。他年仅四十三岁，这样的年纪享受这样的殊勋是少有前例的。

小站练兵，本属北洋大臣管辖，现在袁既照例兼任北洋大臣，于是建督练公所于保定，扩大范围，改称"北洋新军"。手下三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三人又有"王龙、段虎、冯狗"的混号，据说这套混号并非论其才干的高下，而是就他们的形象来说的。其中段祺瑞的父亲在淮军中当过管带，自命为将门之子。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当过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所以他手下拥有了一帮人，民国后成为皖系军阀的头头。他还到德国镀过金，因此更自命不凡，言必称德国，说它武备如何精良，产品如何之好。他生了病也要请德国医生，吃德国药品。

袁世凯很懂得免遭清廷疑忌的手法，他师承祖师曾

国藩重用塔齐布为湘军大将的故事，在山东巡抚任上力保荫昌为他“赞助戎机”。此时中央成立练兵处，因荣禄刚死，他推举奕劻主持，自己退为协办大臣，以心腹人徐世昌为总提调。他明明知道，这个奕劻除了捞钱以外，是什么也不懂的。

袁氏部属很快就爬得很高的有两个典型人物：曹锟和张怀芝。新军三十六镇中，有段芝贵、王占元、卢永祥、田中玉、陈光远等新人，还有张勋、倪嗣冲、姜桂题、赵倜等行伍出身的。后来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袁世凯依靠这付军事班子窃占民国大权，上述人物都成为北洋军阀的主要分子。他们相互杀伐，祸国殃民，历时达十余年之久，这是后话。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申君）

各国对慈禧的看法

我亲爱的莫理循：

多谢你1日的来信。希望你能找到理想的房子，这不能说不是一项好的投资。北京虽然发展缓慢，但大有前途。

我大概不能象你那样豁达，轻易地让过去的事就过去。中庸忍让的说法好，在矢志复仇和阿谀奉迎之间，我想是可以找到令人满意的中庸之道的。我认为使馆的夫人们接受礼物既不体面、也不必要。毫无疑问，不论慈禧太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义和团事件，也不管此事件的结局对我们多么有利，以及对中国最终有多大好处(?)，有一点对所有各国都不会有害处，那就是：应该让慈禧太后“以更悲哀而不是更愤怒的态度”，看到拳乱的事实仍在我们的记忆中，而只有她今后拿出好的行动来才能消除这些记忆。这是我的体会。康格夫人宣读的不适宜的致词，象是对低能儿的愚昧头脑浇了一瓢凉水。当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夫人们不该去参加这次接见，但是从任何方面说，她们在那里的表现都应与西方文明的代表相称，而这种文明直到最近还遭到清朝朝廷和政府的嘲弄和攻击！在外交使团中休想看到联合行动和常理，其原因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来的和无知的人（只就中国事务而言）。但是康格老妈妈这样做是不能原谅的。我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是，正如你所说的，对荣禄或对义和团骚乱负有重大责任的其他官员表示公开敌视态度，那是不策略的（注意，自从基督教军队在北方所作所为之后，我不再将基督精神引入我们的政治之中）；那样只能是帮助我们（欧洲）大陆的朋友们。但另一方面，我们无须接受他们的慷慨赠礼，也不必说我们知道他们是无罪的。至于说到华北所有的人都是拳民，或多或少确实如此，但对骚乱中执行命令的暴民和给他们下命令的人要加以区分。

我们的公使和清朝显要官员们来往密切，这很高兴，但我确信这对我们的正义事业或“了解”情况固然作用非小，但对中国人掌握风向作用更大！那些忏悔的官员们愿参加一些宴会，那当然很好；如果掌握适当，他们或许是有用处的；但我怀疑中国人是否象往常一样，想利用一个强国反对另一个强国，以便从中渔利。梅尔思和甘伯乐在那里负责照看，免得我们被愚弄。但愿他们能看到一些苗头。

〔・・・〕据说比利时人企图通过谈判取得南京铁路，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消息？这里听到一些风声，但我听不到任何肯定的消息。怡和洋行占着茅坑不拉屎，快要失去这笔生意了。〔・・・〕

至于日本人，我前两天发给《泰晤士报》的电讯中说：

“李鸿章死后，中日友好关系有显著发展，这种亲善关系从直隶总督和长江两总督的态度中看得特别明显。他们在改组和改革的各种问题上都尽量按照日本建议办事。刘坤一最近命令南京军校校长带领三十名学生访问日本，考察那里的教育制度。在领事和其他代理人的推动下日本在华利益增长的趋势，尚未引起欧洲人多大注意，然而结果是不会错的。如果在明智的政策指引下，不能不使两国都受到极大益处。”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上帝保佑你，说的够多了。我妻子明天参加舞会，现在我想的更多的是舞会，而不是欧亚两洲事务。

你真挚的

约・奥・珀・濮兰德

（摘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

南洋公学

平海兰：南洋公学初开，总办是何梅笙。总办就是校长。他是常州人，盛宣怀的表兄弟。他是一个没有功名的人，但文章很好，字也写得很好，是一笔苏字。他常在午饭以后坐着马车来校，在房间里一坐，写写苏字，替人们写写对联。（舒新城：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办起来的，所以有那么一个何梅笙。）盛宣怀奏明光绪皇帝，办两个学堂；一个北洋，一个南洋。后来何梅笙故世了，接手的就是张元济（菊生）先生。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学生读新书的。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头昏脑胀，并且讲的先生也是外行，讲国学是好的，讲《原富》就不行了，《原富》是经济学。后来他自己教我们，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问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我记得那时候看张之

洞的《劝学篇》,还有《盛世危言》。张菊生先生那时候就有个新作风,就是找一个一个学生去见他,去谈。有一回他找到我们班里头了,我也在内。他问我:"近来看什么新书没有?"我瞎说一套,我说《盛世危言》,实际我借是借来了,还没有看。他就问我:"《盛世危言》讲些什么?"我就脸胀通红,一语不发。足见他是很讲维新的。他晚上时常拿了一盏油灯,四处去看看。

福开森那时候是监院,同张先生不大对头。福开森初来,我看见他是很穷的,一部东洋车,一个车夫替他拉。监院其实不是校长,而他却在自己的信纸上就写PRESIDENT,PRESIDENT就是校长了。就从这一种神气也可以看到他的野心了。总之他处处都要管,学生替张先生抱不平,反抗外国人,所以就有一个学生被外国人开除。外国人开除了他,张先生就暗地把他送到东洋去。

那时南洋公学初开,房子还没有造好。后来造了一个中院,一个上院。造好以后,我们这般中学生搬到中院。记得我第一年进南洋,还住在外头,在一家丝厂里租屋居住,呆了三四个月丝厂关掉了,就搬到中院去了。为什么叫中院、上院呢?我们一班到六班叫中院。还有一班叫特班,为什么叫特班呢?那时总办是何梅笙还是张菊生,我忘记了。他以为你们小孩子太幸福了,来到学校里念书,什么都念到,但是已经进了学的秀才、中了举人的这般人却吃苦了。因为讲新学,讲维新,所以这般旧日读八股文的就没有用了,秀才、举人有什么用处呢?他于是乎招了个特班,特班里的学生是秀才、举人居多。我记得他那天戴了大帽子,戴了顶子,自己点名,一个一个特班生都上去了。考完了,组织起来,就叫特班,住在上院——经济特科,经济特班。我们中学班里头顶高的还有一班,升上去也住在上院。上院后来就是经济班、铁路班。当时黄炎培、邵力子,还有以后曾经做过北大校长的胡仁源,都在特班里。当时我的脑筋以为学生都是秀才、举人,那怎么搞呢?秀才、举人是不是还学"国学"呢?请谁来教呢?后来就请了个蔡元培,他是翰林。还有一个学监先生呢,我记得请到一个江西人,叫赵从蕃,是个进士。那么举人也不要紧了,压倒了。所以翰林当国文先生,进士当学监先生。学生有会英语的就插到我们班里头,有的插在别的班里;不会英语的,读日文,预备到东洋去。他那时候是想把这般老学究救出来,给他们一个进步的机会,这个意思是很好的。

何梅笙故世,张菊生就来了。后来张先生受了福开森的欺侮,退出了。来了个沈子培,叫沈曾植,当时也是一个文学很好的名人,他做得也不久,换了一个汪子芳,叫汪凤藻,那时候墨水瓶风潮就发生了。

我们这般小孩子们没进去以前,他先招了一班师范生,王培孙就是师范生。这班师范生读了几个月,就教我们这班学生。我们进学校只十三、四岁。王培孙后来从南洋公学出来,就办南洋中学。沈叔逵办那个模范中学。(伍:他是教音乐的。当时南洋中学还有个小学。)小学是林康侯当校长。

这几个总办中,何梅笙是通州张謇的好朋友。张謇给他的信,还有别的文学好的给他的信,他统统刻出来给我们念,这是一种老的尺牍。何梅笙他常自称布衣(舒:因为他没有功名)。福开森,他在里头抓权,看着他慢慢地慢慢地阔气起来了。所有公学旁边的几幢小洋房,统统是造给外国人住的。福开森自己住一幢。还有请来的外国教师,两个人一宅,三个人一宅,住在里头。后来黄包车不坐了坐马车(伍:后来外国人每人都有马车),最后恐怕是坐汽车了。他有一股飞扬跋扈之气。我倒不懂,我们自己有校长,为什么还要一个提调?当时公学里还有两个很好的人,一个是伍光建,一个是李一琴。(伍:就是那个做和尚后来成了高僧的。舒:李是常州人。这个人不错,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这个人到过德国,当时是有一些影响的,在西洋美术、西洋音乐方面有些影响的。他同苏曼殊往来比较多。伍:他那时候很风流。舒:他做和尚是因风流而来的。)

舒新城: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南洋公学对社会上旧的东西是主张尽量抛弃的。现在是不是谈谈这个问题?

张秀源:当时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舒新城:这是受了张之洞《劝学篇》的影响。

张季源:起初我们还希望清廷可以做到富国强兵,后来经过戊戌政变,屡次在外交上失败,觉得这个政府不行,非搞垮它自己来干不可。但是究竟怎么样做法,也都心中无数。总之推翻清朝,自己来干,这个风气是有的,我那时候很小,就晓得了。而在学术方面总是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那么一种不三不四的谬论出来。在戊戌政变以后,学生们一步一步的觉得必须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认为凡是孙中山说的就可以推行起来,我个人当时就是这样子看法。

(摘自《上海文史》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

历史考证

蔡元培与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

蔡元培先生等人于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是辛亥革命前夕的重要反清革命活动。这两个团体又是二十世纪初，我国民主革命派最早组织的团体，是把教育实践和革命活动紧密相联系的创举，对推翻清政府腐败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起了教育群众和培养人材的作用。在它们的活动下，涌现了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为辛亥革命输送了干部，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简略地论述蔡先生在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一些反清革命活动的片断。

早在清末，他虽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翰林，但敢于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广泛吸收具有民主主义的中外学说，主张革新。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先生认为康党变法维新的失败，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他用自己在北京数年的观察和体验，深感清廷"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封建主义"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而"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主张"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基于这些认识，他弃官南下，在上海等地兴办学校，把教育与革命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民主共和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蔡先生于一九〇一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注意对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科学知识，指导学生阅读政治、法律、外交、教育、哲学、科学、经济、文学等书籍，要求学生每日写札记，他亲自批改，有时找学生谈话，让其自述读书心得或时事感想。在爱国思想教育方面，他曾出了《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加以评论》等作文题目，启发引导学生用新思想来认清形势，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达到培养革命人才的目的。象我们近代有名望的教育家黄炎培、爱国人士邵力子等，都是蔡先生在南洋公学时的学生。

蔡先生在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教员的同时，于一九〇三年三月八日同叶瀚、蒋智由等发起创立了中国教育会，被推选为会长。这个组织是我国最早的一个"表面上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的"上海之革命团"。这个民间革命社团，拟定了章程。章程总则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会员人数不多，经济尤为竭蹶，因此着重从文字上宣传革命，对办学尚无具体计划。不久，蔡先生游历日本。这时适逢吴稚晖率领的中国赴日留学生也在日本，部分学生为了振兴衰败的祖国，要求学习陆军知识，吴为此事向清廷驻日公使蔡钧交涉，但蔡钧不答应，双方发生了冲突，被日方警察强令驱逐回国。一同被勒令回国的陆世芬等人商议，如果轮船直驶天津，即将受到清廷逮捕惩治，蔡先生得此消息，慨然承担护送吴等回国的责任，于同年七月间伴同吴等由日返沪。

返沪后不久，这年夏天南洋公学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反对学校迫害学生的罢课大风潮。其起因是第五班学生因误置墨水瓶于课桌上，被教员斥责，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要求校方辞退这个教员，校方非但不允，反欲惩戒学生，激起学生公愤，纷纷要求退学。这一风潮得到了许多班级学生的支持。蔡先生十分同情学生，曾向公学当局据理力争，要求考虑学生的合理要求，但未能奏效，他便愤然辞职，率领退学学生一百多人离校。

中国教育会本拟自办学校，而离开南洋公学后的学生无力自行筹组学校，蔡先生就与章太炎等组织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援。教育会开会讨论，决定接受学生们的请求，募款建校，由黄宗仰商得犹太人哈同之妻罗迦陵赞助，借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房屋为校舍，在这年十月十七日创立了爱国学社。

学社成立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成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爱国团体"。中国教育会每周率领爱国学社社员在张园举行演说会，"公言革命无所忌"，在学生中和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九〇三年春，抗法拒俄运动展开，东京留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规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不久，秦毓鎏以宗旨不明，主张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会中还有一些人秘密组织暗杀团，黄兴、陈天华、龚宝铨等都是当时的团员。爱国学社为了响应留日学生的抗俄行动，组织了义勇队(后改名中国军国民教育会)，以抗拒外侮为目的，同时在张园开会。据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二日《苏报》译载西报所记张园演说消息一则说："《字林西报》云：日前张园连日开会讨论国事，颇足发人爱国之诚。上礼拜四所开者，乃得东京留学生电述广西警报而起，到者千二百人……先由蔡君某(即蔡元培先生——笔者注)演说：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继乃分派在座者章程各一纸。

次由马君某请在座诸君同唱爱国歌……忽得东京来电云：俄祸日亟，留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组义勇队，愿赴前敌……龙君某乃对众宣言曰：'吾辈非中国人耶？闻留学生如此举动而忍坐视以放弃天职耶？有表同情者，请从吾坐草地向东鞠躬，以致留学生之爱国心。'言毕，乃首出向东立，从之者几罄座，乃成列相行礼……议编义勇队，以应留学生。临时签名者甚众。乃复电东京，表爱国之忱，始散。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张园会议，初议拒法，再议拒俄，三拟联合成立中国国民总会。出席三次会议者均有数百人。义勇队成立后，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由何海樵、何山渔二人负责任教。后来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退学学生章士钊等到上海，亦加入爱国学社为学生，并协助何海樵教授兵式体操。学社中的师生关系很密切，程度高的学生一面受教，一面担任低年级学生的教员，教员中一面授课，一面与学生一起接受军训。蔡先生也剪短头发，穿着短装，与师生同受军训。在这样的教育下，学生中涌现了"不少的革命青年"。

不久，中国教育会因经济上无大宗款项继续资助学社，使学生发生误会，脱离中国教育会而独立。教育会负责人中对学社是否应独立，意见不一，争执甚烈。蔡先生没有坚持己见，辞去教育会负责人之职，不参与爱国学社之事。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惊恐，连忙勾结帝国主义，通过上海外国租界当局，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蔡先生也在预定逮捕之列，经亲友规劝，暂去青岛避难，邹容自投入狱。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苏报》案。爱国学社独立不到两周，因《苏报》案发生，随之停办。

蔡元培先生在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十分注意在妇女中培养革命人才，主张"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因此，从这一目的出发，组织了爱国女学校，培养了不少女革命家，为辛亥革命输送了人才，同时把女校作为革命秘密联络地点。诚如蔡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于南京之役者，不可谓非教育会之成效也"。

蔡先生为了深入推动反清革命运动，除了在爱国学社、爱国女校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外，还邀集革新人士组织光复会。一九〇四年光复会成立，极力主张民族革命，反映了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反对清政府的要求，在长江中下游和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实际上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摘自《辛亥革命七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风 云 人 物

袁 世 凯

北洋军阀头子。字慰亭、号容庵。河南省项城县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捐得同知衔，任驻朝鲜通商大臣。一八九五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并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一批人，做他的爪牙。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期间，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却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杀害，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一八九九年连升为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扩充了"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按兵不动。他一面与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勾结，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并派兵保护各帝国主义的教堂；另一面，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后处进贡些饷银、缎匹，落得两面讨好。一九〇一年卖国贼李鸿章死后，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到直隶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把这个淮系军阀的班底也接收下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一九〇二年初，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教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负责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把清朝京畿的警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一九〇三年十二月，由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请由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退居为会办大臣，而掌握练兵处实权。一九〇五年，以实行"新政"为名，扩编北洋军为六镇（每镇官兵定额为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人），实额共六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五镇都是他的嫡系，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出身。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一九〇七年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九〇九年初被摄政王载沣罢免，

但通过他的旧部下，继续操纵分布于华北和东北的北洋军，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反动派所重视的实力人物。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一九一三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害怕国民党分他的权力，暗中派人于上海刺杀了宋。同年四月，他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充做军费，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后又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实行独裁专制。于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二十五日蔡锷等在云南首先发动护国讨袁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接连响应，护国讨袁声势大振。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

材料一　接李鸿章遗钵

西太后和荣禄看到袁氏既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赖，又有魄力，对起义人民毫不手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材"，早已准备给他加官进爵。而且，他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李临终又有口授遗疏附片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当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9日实授），不久又加赏太子少保衔。从此袁宫保替代了李中堂。

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凛凛地离开济南北上，26日抵高阳。同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次日，袁摆设香案，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直隶总督的驻地本来应在天津，由于当时天津仍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袁即决定把他的大本营暂时设在保定。当天，他到达保定，正式履任视事。

在内外政策上，袁世凯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袁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当然，他们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故称"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们的本意。袁世凯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八条章程，增订为十一条，张贴于直隶各州县，并派兵对坚持反帝斗争的义和团进行野蛮扫荡。对外，他继续推行李鸿章所执行的卖国政策，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自《袁世凯传》李余一）

材料二　袁世凯东山再起

袁世凯自北洋练兵，分为六镇，散布畿辅，将卒多为袁之死党，故虽退居林下而隐若敌国。监国（摄政王载沣）忌之，不敢起用。庆邸常以起用为言，颇受呵斥。

迨武昌变起，清廷用荫昌、冯国璋为正、副统帅，率禁卫军二万赴汉。荫、冯二人即以起复袁世凯为要挟，庆邸复力言世凯之忠，监国遂下诏起复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敌督师。袁托以足疾不奉诏。盖袁被罢免时，诏书固以袁病足甚剧，回籍疗养为词也。

袁既不就鄂督，复密怂恿庆邸力陈：须畀袁内阁总理大臣，以专政权，然后诸镇听命，革党不难速灭。监国茫然许之。

袁自任责任内阁后，迫庆邸及那桐、徐世昌退职，并奏撤协理大臣。袁复夤缘小德张约为兄弟，入白隆裕太后，有机密面陈。及见太后，垂涕而言：监国庸懦无能，任用亲贵误事，非请太后垂帘，不足以挽回大局。是时小德张专权，亦欲袭李莲英之故智，固早进言于太后矣。太后竟为所动，下懿诏切责监国，撤归藩邸。于是，军国大权全入袁之掌握。

至太后垂帘之事，既不能自行下诏，必待群臣环请。袁亦不再提倡，其事遂寝。以后派代表义和，清帝退位，袁为总统，不过指掌间事耳。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申君）

盛　宣　怀

盛宣怀（1844～1916年）　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又号止叟。江苏武进人。其父盛康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任湖北粮道，与李鸿章交往深，这为以后盛宣怀依托北洋而平步青云筑下阶基。

1866年，盛宣怀由其父湖北任所回籍应童试，考取秀才，补县学生员。以后屡试落第，遂失科举求仕之念，专意办"大事"——创办企业，以求"兼作高官"。此时，洋务运动正处于由求强向求富转变之时，盛宣怀紧紧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参与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工作。1870年春，盛宣怀由杨宗濂推荐给李鸿章，遂入李鸿章幕，随李进陕镇压回民起义，充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盛宣怀精明能干，深得李鸿章及清廷的信任，以后不断受到提拔并被委以要职。1879年，盛宣怀被任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补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直至

1898 年。以后历任清朝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1901 年 1 月，由于他首议“东南互保”，为清廷摆脱了政治困境，也深得列强支持，升任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是年 10 月，又任办理商税事务大臣；1907 年奉召进京，次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 年 1 月，升任邮传部尚书直至辛亥革命爆发。

1872 年 4 月，盛宣怀见“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遂生“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之念，向李鸿章建议创办轮船航运企业，拟《轮船章程》，提出“试办招商”。在其他参与者的共同筹划下，近代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于该年底诞生。1873 年，李鸿章札委盛为招商局会办，命其“往来察查”。招商局开办之初，经营有效，打破由英、美轮船公司垄断中国长江和沿海航运的局面，并迫使当时中国水域最大的外国资本企业—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将企业全部盘出。1876 年底，经盛宣怀等人积极活动，轮船招商局买下旗昌的全部财产，从而使招商局跃为中国水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盘进旗昌也带来财政上的一些困难，触发了淮系和湘系之间的矛盾冲突。1881 年，盛宣怀遭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参，李鸿章让盛宣怀暂离招商局。1883 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数以百计的行号倒闭，招商局会办徐润在此风潮中破产。盛宣怀乘势重新入局，排挤徐润出局。1885 年，盛由李鸿章札委为招商局督办，控制了该局。是年 7 月，盛以局产抵押，向英国资本汇丰银行借贷三十万英磅，用以维持运营资本周转。从 1886 年直到清朝结束，招商局在盛宣怀主持下，又与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五次订立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轮运的“齐价合同”，以维持和推动招商局的生存和发展。

盛宣怀也是由中国自设电报以保利权的积极倡导者，继设轮船招商局之后，盛宣怀于 1880 年又建议招集商股筹办电报局。他说：“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条，而基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中国近代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于该年成立。1881 年，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任电报局总办。盛主管电报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电信业务，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分别签订条约，只允其在中国沿海铺设电报线，维护了中国电线交通主权。在他的主持下，电报局日趋发展，担负着清朝的军、民通讯重任。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被清廷撤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调往两广。盛宣怀因此暂时失去官场上的依托，离津返沪，打算以十里洋场为基地，一展经商才干。1896 年 5 月，盛宣怀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委托，接办了亏损严重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从而又找到以官经商的依托。该年 10 月，经张之洞、直督王文韶的奏荐和其亲自活动，清政府委派他经办芦汉铁路和东南地区铁路，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允准开设中国通商银行。他认为“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故他努力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以适应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止的 15 年间，共创设 17 家银行。

盛宣怀同帝国主义国家关系密切，在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局中，是中外之间利益调节“不可缺少之人”。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他力主镇压。并迎合外国意志，四处穿针引线，推动“东南互保”，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同各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使义和团运动未能延伸至长江流域，维持了外国资本和清朝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利益稳定，从而深得西太后的青睐。因此于义和团运动平息的 1901 年连续两次得到提升，奉命以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助吕海寰与各国谈判，以开放内河航行权、增开口岸和裁散厘金为条件，要求各国增加关税。几经谈判，未果。

1902 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控制轮船、电报，袁与盛发生激烈冲突。结果，袁世凯凭借权势接管了轮、电两局，盛挤出电报局，仅在招商局保存了力量。接着，盛宣怀又与李鸿章之后的支持者张之洞不和。1905 年，张之洞在湘粤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同意废除与美国的粤汉铁路合同，盛宣怀则极力反对。由此，盛失去了新的官场支持。随之，江浙资产阶级也要求废除与英国的沪宁铁路合同、苏杭甬铁路草约。面对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盛宣怀口头支持，暗中破坏，引起公愤。袁世凯乘机插手铁路，于 11 月 17 日，由商部奏准委派其亲信唐绍仪接管沪宁铁路。尔后又撤销盛掌握的铁路总公司。

黯然下台的盛宣怀，并未放弃同袁世凯的争夺。1907 年底乘奉召进京之机，他在西太后面前攻击袁世凯的铁路政策朝令夕改，失信中外，鼓吹自己办厂经商有方。故盛于次年得到升任，以邮传部右侍郎奏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借此摆脱袁世凯官势的影响和牵制。是年 3 月 26 日，该公司正式在农工商部注册，盛宣怀出任公司总理。至此，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正式宣告诞生。

辛亥革命以后，盛宣怀仍企图走托官经商、发展实业的老路。他继续在政府中寻找依托。袁世凯掌权，即以赈灾捐了一百万银元；以报效水利经费，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捐赠二十万银元，盛由此收回了革命期间被没收的全部财产；在“二次革命”期间，他又积极用招商局的轮船替袁世凯运兵运粮，镇压革命。然而，袁世凯并不信任盛宣怀，仍施展各种手段排挤盛宣怀的力量，盛宣怀在政治上屡屡受挫。

尽管盛宣怀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失势，但由于通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他个人已积累巨富，在工商企业界拥

有庞大的经济实力和行政势力，仍以最大股东的身份，遥控着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等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革命政府在财政上甚至有求于盛宣怀的力量。大资本家的地位帮助他在1913年3月以后，又稳稳当当地坐上了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的交椅。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

（摘自《中国近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秦力山

秦力山初名鼎彝，字力山，故江苏吴人。父文丙，客食湖南，遂寄籍为长沙人。力山少慧，为文数千言立就。尝师浏阳谭嗣同，入南学会。未弱冠，补县学生，督学徐仁铸奇其才，遣游学日本。八国联军陷京师之岁，唐才常谋起兵汉上，力山与同学林圭、蔡钟浩、毕永年归，赴之。被推安徽前军统领，将缉私、水师、巡防诸营，据大通盐局，与芜湖防军相持七昼夜。兵败，走免，督部营务处陶森甲独保持之，得返日本，而才常与圭等皆死武昌。力山日呕血数升，虽病，志未尝挫。才常者，本与梁启超合谋，启超时在日本横滨，军兴馈饷，皆关其手。力山亡命贫困，求假贷不与，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号，名义不顺，欲力振刷之，遂与启超绝。自作《少年日报》，道汉族自主义。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交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余与力山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和者虽不广，亦不怪也。沧州张溥，时年二十，游学，与力山同舍。力山独伟视溥，为余言状，合因得与溥交，溥即今张继云。自是力山或在日本，或微行入皖南，谋再举数年。孙公以黄兴等集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以力山主安徽事。力山至安庆，与巡抚卫队营管带孙道毅结谋，自安庆下薄江宁，据形便为根本，事泄，亡奔香港。复以言撄主者怒，西去，与胡汉民之仰光。而腾越张成清，自密只那来会，为序其《缅甸亡国史》。力山既遭名捕，不得返中国，业避地仰光，乃客干崖土司刀安仁所。时往来野人山，短衣负铳，为其民道汉族光复事，冀藉边裔为窟宅，因以倡义。安仁故夷种，亦本离中国自立，力山数诮之。然终知其不为己用，时作乐府道悲愤，往往若自嘲者。久之，果为安仁所害。及武昌倡义，云南应之，而力山不逮见矣。安仁集诸土司揭旗，称兴夷灭汉，师长李根源自腾越遣使莅问。安仁窘，诣南都自归。云南发其叛迹及杀力山状，及錮之陆军狱，数月，传至京师，病死。根源已定干崖，求力山尸不得，为之立祠，腾越与云南死难者并祀焉。无子，以弟钧彝之子修竹为嗣。

（章太炎）

章太炎

章太炎（1868—1936）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1868年生，1903年在上海因"苏报案"下狱，1904年参与创建光复会。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后被任命为袁世凯总统府最高顾问。1913年参与讨袁，被袁禁闭。1917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1924年脱离国民党，晚年在苏州以讲学为业，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病故，终年67岁。

章太炎很早就不满于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早年赞助维新变法运动，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变法失败，被通缉，先流亡台湾，后到日本认识了孙中山。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同年8月，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失败，章太炎又被通缉，逃回老家。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替邹容《革命军》作序，盛赞革命，大诋清帝，触怒清廷，在上海租界被捕下狱，是为有名的"苏报案"。1904年，在狱中与蔡元培等联系，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同盟会派人将他接到日本，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民报》主编，与改良派展开论战，系统地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办报之余，举办国学讲习会。讲学期间，著有学术专著《小学答问》、《新方言》、《齐物论释》、《庄子解诂》、《国故论衡》多种，在语言、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曾谈到："中国学术，自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因此，主张提倡自由研究的风气。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章太炎回国，曾受张謇拉拢，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言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枢密顾问。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自任会长；后改为统一党，任理事。支持袁世凯统一中国，成为袁氏总统府的高级顾问和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宋案"发生，他才看穿袁氏的野心，参加讨袁。后被袁软禁三年，曾到总统府大骂袁世凯。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到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的秘书长，为护法四处奔走。但很快看出"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便离职到上海，转而提倡"联省自治"，被一些地方军阀所利用，与革命斗争隔膜起来。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1926年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府建立后，因指斥蒋介石而被呈请通缉，便退居宁静的书斋，以"中华民国遗民"自称。晚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目的在于"甄明学术，发扬国光"。

"9·18"事变及"1·28"抗战、"12·9"运动时，章太

炎都投袂而起。数次通电全国，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力主抗战，对一切抗日救亡活动都热烈支持，把中国共产党也看成为抗日的力量。这些说明，他保持了爱国主义的晚节。

（摘自《光复会二三事》中国史学会编）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二岁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人。1890年入京会试，下第归道上海，接触并开始追求西学。同年秋拜康有为为师。在万木草堂，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和政治沿革得失；帮助乃师校勘《新学伪经考》，分撰《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1895年赴京会试，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次年在沪与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1897年受聘为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898年春入京，联络公车百余人上书请废科举，并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7月，受光绪召见，赐六品衔，专办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旋即创办《清议报》(旬刊)，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特色。1902年2月又在横滨办起了当时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刊物《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倡导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推陈出新，鼓吹排满、革命、破坏主义等，在当时知识界中造成巨大影响。1906年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同革命党人的《民报》就要不要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等问题展开论战，随后即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实际的立宪运动。1907年在日本东京组织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先后创办《政论》杂志和《国风报》，以宣传君主立宪思想，为国会请愿运动提供理论指导。1912年9月，梁启超自日本归国，与汤化龙等组织民主党，不久又加入以黎元洪、张謇为首的共和党。1913年5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出任理事。9月，加入熊希龄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1914年2月辞职，改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阴谋显露，梁启超劝阻无效，遂策动蔡锷和云贵两广军阀组织护国军反袁，先后出任两广都司令总都参谋和护国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袁世凯死后，他又参与讨伐张勋复辟之役，1917年7月出任段琪瑞内阁财政总长，11月辞职家居，一意著述。1918年底，偕蒋方震、丁文江等去欧洲游历，1920年3月回国，从此放弃上层政治活动，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当年即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主编《改造杂志》。1921年起，先后应聘担任南开大学和清华学校教授，并在全国各地讲学。1923年在天津发起创办文化学院，1925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次年又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在这期间，他还被授予万国著作家俱乐部名誉会员和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梁启超一生手不释卷，勤于笔耕，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会通中外，参驳古今。著作宏富，计有一千四百多万字，并世学人，实无其比。最后几年，病魔缠身，仍致力于《中国图书大辞典》等书的编纂。1929年1月19日赉志以没，终年57岁。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坚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长期致力于改革事业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领袖群伦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学者，在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艰苦里程中，他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产生过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抛开了梁启超，一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将会变得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

追求西学、传播西学，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以新知识、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启蒙工作，影响及于几代人，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巨大贡献。

梁启超的启蒙宣传适应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受到广泛的欢迎，清廷虽严禁不能遏。1902年底有人写信告诉他：“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这种情况表明，梁启超已成为领袖群伦的言论骄子。诚如亲身感受其影响的郭沫若所说，那时的梁启超“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而青年学子们，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正所谓“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兴民权、行宪政，在现存“国体”下谋求“政体”的改良，是梁启超一贯的政治主张，戊戌维新、立宪运动、反袁护国是梁氏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三次重大实践。

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是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崭露头角的。1895年，梁启超入京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愤激不已。于是奔走呼号，联络广东190多名举人与湖南举人一起率先上书都察院，力言不可割让台湾。为了开风气，联人才，梁启超在北京强学会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之后，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担任该报主笔。当时他才23岁，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在《时务报》上，他发表了《变法通议》、《论君

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著作，以通俗流畅的文字，揭示亡国灭种的危险、因循守旧的祸害，宣传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阐明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等重大问题，并时发民权论，抨击君主专制，“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名重一时，成为维新派的巨擘，时人并称“康梁”。1898年，鉴于列强欲瓜分中国，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梁多所奔走赞画，于会中发表演说，呼吁国人群策群力，救亡图存。梁还先后联合在京公车上书都察院，前者以德人毁山东即墨文庙敦请政府严重交涉，后者为育人才请废八股而推行经济六科。百日维新中，他请废八股取士旧制，改试策论，又拟定京师大学堂规则和译书局章程，均奉旨允行。

1901～1902年间，梁启超广泛评介了英、德、日本等国的立宪理论与实践，并依据日本的模式具体规划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次第。“预备立宪”开始以后，梁组织了政闻社，先后创办《政论》杂志和《国风报》，并支持徐佛苏在京发刊《国民公报》作为立宪运动的舆论阵地。在这些报刊上，他发表有关立宪的论著数十万言，为立宪运动规定了任务、纲领、动力与方针。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明确宣布拥护民国，在共和“国体”下争取立宪“政体”的进化，以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为前提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奖励国产政策，以振兴实业交通和普及教育，建设法制国家。为实现其政治主张，他组织了进步党，一方面在议会斗争中对抗国民党，反对他所谓的“暴民集团”，另一方面又反对“腐败官僚”，企图监督和引导袁世凯，使之走上立宪政治的轨道。但是，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并没有接受梁的引导和监督。他为复辟帝制，先搞垮国民党，后踢开进步党。对于袁氏帝制自为的野心，梁启超早就有所觉察。1915年8月，梁启超招弟子蔡锷在津秘议讨袁，相约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战。为夺舆论先声，他写了传颂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给予袁世凯和帝制以辛辣的嘲笑。事前，袁贿以二十万元，令其不要发表，继又危词胁迫，要其再吃亡命之苦，梁都不为所动。此文发表，中外震惊。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梁还事先给护国军准备好了各种重要文电，为发动护国运动殚智竭虑、运筹擘划。他明确宣布讨袁的宗旨是“与全国人民戮力拥护共和政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建设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护国战争开始后，梁启超不避艰险，间关南下，策动两广独立，并多方筹措，组成了护国军政府，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外交上支持了蔡锷等的军事斗争。在军书旁午之中，他还写了《军中敬告国人》、《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淋漓痛快的文章，把袁世凯窃国大盗的本来面目揭露得体无完肤。袁死后，梁坚持以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处赞助帝制的祸首等作为解决时局的原则。护国运动推倒了洪宪帝制，恢复了中华民国，作为这一运动的灵魂的梁启超，其名字很自然地刻上了历史的丰碑。蔡元培说他“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太炎誉其“再创共和赖斯人”，均非虚语。护国运动结束后一年，又发生了张勋、康有为扶植清废帝宣统复辟的事件，梁启超即日发表反复辟通电，“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禅而安于缄默。”他这种维护共和、反对帝制复辟的严正立场，直至晚年都不曾改变。在最后的十年中，虽然他不断揭露民国政治的黑暗，但都坚信中华民国的成立和存在不失为人类进化史上的奇迹，它使人们意识到，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随着这种观念的增长，不管什么人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为使民国名符其实，他仍主张向多数国民灌输宪法观念，以期革新政治，实行宪政。

此外，梁启超在财政、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以及图书馆事业等方面都有不少论述和建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近代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梁启超的名字相关连。尽管梁启超一再批评自己治学“务广而荒”，甚至自认对晚清思想界的“粗率浅薄”负有罪责，但是，公正地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演化的过程中，梁启超“从事于先辈所不敢从事者”，在许多领域披荆斩棘，除旧布新，那筚路蓝楼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梁逝世后，有人说他“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可谓盖棺定论。

景廷宾

在一九〇二年四月，直隶广宗县景廷宾领导当地义和团和农民群众发动起义，并旗鲜明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

景廷宾是广宗县东召村的武举人，地主家庭出身。他在民族苦难深重、贪官污吏横行乡里的岁月里，同情人民、愤恨侵略者以及那些为非作歹的赃官。一九〇一年春，广宗知县魏祖德和洋教士议定广宗县承担地方赔款一万多两，还要按地亩加派各种浮收和杂差，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愤怒的人民称赔款为洋差，并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人不纳洋差”。他们自动聚集在东召村地区的“联庄会”的周围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景廷宾在抗洋差斗争中表现积极，被当地群众推举为东召村一带联庄会总团头，领导群众抗洋差斗争。

一九〇一年底，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将魏祖德撤职，改派赵锷为广宗知县，以缓和矛盾，瓦解抗洋差群众的斗志。景廷宾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继续领导群众斗争。

一九〇二年三月，袁世凯派重兵向东召村进犯。景廷宾率众奋起抵抗，但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四月在钜鹿厦头寺与赵三多所率领的义和团余部相汇合，并在寺前竖起两面大旗，上书："扫清灭洋"和"官逼民反"字样，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赵三多被推为主将。他的起义队伍的骨干分子，有不少义和团著名首领，如威县的赵三多、广宗的郑安治等人。

景廷宾率众进入威县，围攻张家庄天主教堂，焚毁教堂，并在威县鱼堤村外杀死血债累累的法国天主教神甫罗泽溥。景廷宾"扫清灭洋"的活动"颇得人心"，因而各县商民竭力供应粮饷。他率众转战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广宗县件只村坚持斗争，远近为之震动。直隶南部的刑台、内丘、平乡、南和、任县、曲周、肥乡、柏乡、南宫、清河、永年等地的农民群众，以及河南、山东边境的义和团余部，纷起响应，并在直、鲁、豫三省交界的二十四个县的区域内，广泛掀起了"扫清灭洋"的群众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袁世凯急派其心腹段祺瑞、倪嗣冲率新军前往镇压；德、日、法三国侵略军六千多人前往"助剿"。五月八日，清军围攻件只村。景廷宾率众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清军冲进村内，起义军与敌肉搏，战斗十分酷烈。景廷宾率众突围后，转战到靠近河南的成安县坚持斗争。袁世凯立即调集重兵围剿。景廷宾率余众转战河南临漳(今属河北省)，敌军属随而至，激战失利后被捕。七月二十五日，景廷宾被押至威县英勇就义。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珍 闻 轶 事

荣禄与袁世凯轶事

甲午战役之后，袁世凯以曾为吴长庆僚佐，且在朝鲜尝为其国王练兵，欲以治军自见，遂以训练新军事宜说督办军务处，李鸿藻、荣禄辈为所动，因奏准以浙江温处道督练新军于小站，号曰新建陆军，凡七千人，后卒藉是大显。汲引而而扶持之者，荣禄之力为尤多，世凯之谨事荣禄，实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民国初元，世凯在大总统任，沈祖宪、吴闿生二人，为编《容庵弟子记》，述其在清之事迹，卷二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奉派练兵小站云：

……二十一年……四月……因督办军务王大臣保留，复由津入都。时军机大臣为翁相同和、李相鸿藻、荣相禄，而李相尤激赏公，以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相亦右其议，嘱公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公手缮数千言，其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十月，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派员督练，折称："查欧洲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帧，精益求顿，水师固其所长，陆军亦称骁勇。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练重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去岁冬月军事方殷之际，曾请速练洋队，蒙派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嗣以该洋员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参用西法，步伐号令，均极整齐，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令胡燏棻派造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为根本，再加募步马各队，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余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由臣等咨会德驻使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等语，当日奉旨允准。……公部署一切，即日出都。定武军本驻距津七十里之新农镇，津沽间所称为小站者也。……

后来袁世凯暨北洋派之称雄，甚于此矣；微荣禄等，岂易得此好机会乎？(时翁同和、荣禄均尚未入阁，不得称相，李鸿藻自甲申罢协揆后，亦尚未再入，《容庵弟子记》非以当时之官称之，惟书中言及他人，则率按当时官秩相称。又，军机大臣其时为恭王奕䜣礼王世铎及翁同和、李鸿藻、刚毅等，荣禄在督办军务处，尚未入军机也。醇王载沣时年尚稚，未用事，据言与庆王云云，疑亦有误，容更考之。

关于世凯之受知荣禄，王伯恭《蜷庐随笔》云：

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曰："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默然而罢。是时项城在京，虽有温处道之实缺，万无赴任之理，设从此挂误，心实不甘。忆昔在吴武壮朝鲜军中，以帅意不合，借题为朝鲜练兵，因祸为福，此次师故智，正合时机，乃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书成，无术进献，念当时朝贵中，惟相国荣

禄，深结主知，言听计从，顾素昧生平，无梯为接，侦知八旗老辈有豫师者，最为荣所信仰，又侦知豫公独与阎相国敬铭相得，阎为路闰生入室弟子，又申以婚姻，非路氏之言不足以动之，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家于淮安，而项城之妹夫张香谷，系汉仙中丞之子，亦家淮安，必与路氏相稔，遂手香谷以卑礼厚币请路辛甫北来，居其幕中为上客。由辛甫以见阎文介，由文介以见豫师，由豫师以见荣文忠，层递纳交，果为荣文忠所赏。项城遂执贽为荣相之门生。而新建陆军以成，驻于小站周刚敏盛波之旧垒。但项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练之名，虽广用教习，终虑军心不服，于是访求赋闲之老将，聘为全军翼长，庶可以镇慑军队。适淮军旧部姜桂题，以失守旅顺革职永不叙用者，正无处投效，闻小站新军成立，径谒军门，项城见而大喜，遽以翼长畀之。桂题亦不知兵，惟资格尚深耳。项城更说荣相，以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则荣相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荣相乐其推戴，且可弋取统属文武之名也，德项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复用项城之策，令诸军各选四将，送总统差遣，比至，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品服，乘马在舆前引导。荣相顾盼自喜，以为人生之荣，无过于此。吁，何异儿童之见哉！

《蜷庐随笔》对世凯多贬词，此处于世凯进身荣门暨练兵事，言之历历，然其中有一大误。大学士阎敬铭，光绪十四年戊子以病免，十八年壬辰卒于家，何能于甲午（二十年）战役之后犹在人间，而为世凯介见豫师乎？武卫五军之名目，始于戊戌政变后，除中军由荣禄另编外，余四军，世凯以所部用西法训练，自负非宋庆等部所及，庆等则自负百战宿将，不特以徒壮观瞻未经战阵轻世凯，即对荣禄，亦轻其不娴军旅，未能倾心事之，独世凯事荣禄最谨，其得抚鲁督直，均荣禄之力为多。荣禄帘眷最隆，而胸无城府，工策划，富权谋，世凯对之犹心存畏惮；迨荣禄卒，庆王奕劻以枢垣领袖当国，贪梦外无所知，世凯遂玩之于股掌之上矣。

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由鲁抚擢直督，盖得荣禄在枢垣主张之力，而世颇传由于李鸿章遗折保荐，如汤用彬《新谈往》云："和议将告成，合肥屡电请回銮，并陈述外人善意。两宫信其忠诚，遂启銮。至郑州，合肥薨耗至。孝钦携德宗登行宫后楼，北向而泣。越日启銮至开封，止不进。合肥遗折至，力保袁世凯才略堪任艰巨，请以继任直督，并请速回銮，以慰中外之望。诏并从之。"此说颇流行，且有谓鸿章遗折原稿系保周馥，幕僚杨士骧辈善袁，为私易袁名者。而证之所递遗折，其全文云：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零涕。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上圣鉴。谨奏。

内容若是，并无保荐何人继任等语，外传种种，实不足信。世凯虽资格尚浅，而以戊戌告变，帘眷已隆拳乱保障地方，声誉亦著，兼有荣禄为奥援，其擢督畿辅，固不必有鸿章遗折之保荐也。（或谓外人方面之推重，亦为一重要原因。）馥虽久为鸿章所重，其时官仅直隶布政使，只能循例护理，若云遗折保其越次超擢，尤于事理为远矣。九月二十六日后帝由巩县抵汜水，接鸿章电奏，谓："臣病十分危笃，……现已电令藩司周馥来京交代一切矣。"亦就其藩司职分而言耳。（二十七日后帝抵荥阳，枢廷接馥电禀鸿章出缺，即奉旨以世凯署直督，未到任前馥暂护，张人骏补鲁抚。十月初二日后帝由中牟抵开封驻跸，翌日始接到馥代递鸿章遗折。）

（摘自《清代稗海》荣孟源编）

"北洋三杰"称号的由来

"北洋三杰"乃是指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三根台柱，他们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出身于北洋武备学堂。王士珍是旗籍道员荫昌介绍给袁世凯的，而段祺瑞、冯国璋则是袁世凯亲自从武备学堂中物色到的。王、段、冯有"北洋三杰"之称，系出自德国教官的一言之赐。那位教官有一天来到北洋军营观操，曾用马鞭子摇指他们的背影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随后有人又把"三杰"形象化，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之说。又有人解释道："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段祺瑞常发虎威，比之为虎；而冯国璋生得狗头狗脑，喻之为犬。后来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分别任过副总统和代总统、总理和执政、总长等重要职位。

慈禧不愿坐汽车

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东华门，杀入紫禁城。西太后挟光绪帝变服出逃，乘骡车经"兰州官路"向西安方向奔去。同年10月下旬抵西安。延宕至次年10月6日"回銮"。

回京时，西太后一行仍沿"兰州官路"而行。这条"官路"，照例应当宽阔、坦荡，何况又是"皇太后"、"皇上""两宫"巡视。但情况却大出乎西太后意料。

刚上路时，仪仗尚称严整，队伍尚且齐整。走着走着，车马便争先恐后。官员们也顾不得"两宫"的威严和臣下的名分，居然跟西太后、皇帝争道，以致不时地把"两宫"的轿子堵住。西太后派御前大臣弹压也无济于事，只能徒呼奈何。

踏上归途的第12天，10月17日(阴历九月初六)的上谕说："连日皆行夹沟中。悬崖绝巘间，羊肠一线，逶迤屈曲，其间仅容一车行。而随扈诸人，均喜疾驰争先，乃至数十百辆衔尾接轴，莫能进退。

经过新安县时，连日阴雨，泥泞数尺，骡马负重不胜，纷纷倒毙道路，以致尸体狼藉。

兰州官路由北京至西安的一段路况如此，其他官路也可想见。

提起官路，这里有必要把清代陆路交通干道作一大致介绍。

清代陆路交通主要靠"驿道"。驿道以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通至各个省。在驿道上，每隔80或100华里设一驿站。运输工具，以马为主，其次为牛、驴、羊，也有用轿等。清代驿道的主要干路，系以北京为中心，向四方分达各省省会，名曰"官马大路"，简称"官路"。至由各省省会通达地方重要都市之路，名曰"官路支路"，简称"大路"。市区内之街道曰"马路"。

清末，由于封建王朝的没落，吏治的腐败及经济的凋零，连结北京及全国各省会的驿道年久失修，渐趋废驰。道旁农户为扩充耕地，不断侵蚀驿道，使得它越来越狭窄，车马难以通行。雨水成年累月的冲刷，又使得路面坑坑洼洼，车行其上，颠簸极是厉害。由于这些缘故，才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述西太后、光绪帝"銮舆"在"官路"不时被阻的那一幕。

至清末，主要交通工具仍为轿车、大车、骆驼车、骡驮轿、辆子、骆驼轿、轿子、牛车、窝车、小车等。这些运输工具中，大车、牛车一般用于运送货物；窝车、小车、手推车、既可运货又可运客；各类轿车、轿子用于载人。通常轿车用骡、马、驴拉、近距离用一头牲畜拉，远距离用两头牲畜拉。除驾车者外，可乘旅客2人，通常可携带货物100斤。日行八、九十里路。

晚清，人力车开始流行，北方欲称"东洋车"或"洋车"，南方称"黄包车"。1902年，上海进口汽车2辆，是为我国行驶汽车之开始。而后，袁世凯为了取悦西太后，进贡一辆德国杜尔依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袁世凯进献的那辆汽车功率约为2.94千瓦(4马力)，外形保留着18世纪欧洲马车的痕迹，双排座，带顶蓬，车身为木质敞开式。大臣们生怕西太后乘坐汽车中了"邪气"，纷纷上奏章，说什么："伏念中国自尧舜以来，历朝帝王，未闻有轻以万乘之尊，托诸于彼风驰电闪之汽车者……"意思是，帝后坐汽车这"洋玩意"，古来无有，有违"祖制"。西太后为了取乐，不听劝阻，坐了上去。可是，她认为，司机坐在前面开车，屁股对着她，冒犯了她的尊严，她要司机跪着开车。后因司机跪着无法驾车，只好弃之不用。西太后仍乘用那16人抬的黄色大轿。

太保墩风波

甲午战争以后，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根据这项条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西方资产阶级为顺应新的需要，在通商城市大量开矿设厂。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藏富于民"，发展民间工商业，与西方"争利权"的主张，此后，朝野人士痛感外资输华，民族危亡的现实，纷纷要求设厂自救。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华设厂制造，自然没有理由反对民间设厂制造，况且洋务运动彻底破产，政府财政万分困难，罗掘已空、挪无可挪，形势所迫，也不得不暂顺民意，放松对新式工业的控制。1895年，清廷终于下令，各省设立商务局，"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总理衙门随即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三条。清政府"振兴工艺"的措施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但是，它鼓励推动一部分地主、官僚、大商人投资新式企业，客观上给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维新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刺激下，很快掀起了一个设厂的高潮。

1901年，新世纪发端之始，荣氏兄弟看准无锡地界发展轻工业的巨大潜力，抓住时机，迈出了开创实业的决定性步伐。他们选择了称作"洋人食品"，每年大量进口，规定可以免税的面粉业，决心在外国资本侵略的夹缝中，生根开花，立足国内冲向世界。

年前，荣德生经实地考察，反复比较，选定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环境优

美的地方，四周三面环水，通过水路，原料产地的小麦可以直输而入，与此同时，江浙市场面粉走俏，通过水路，工厂的产品也能及时销出。荣氏兄弟看中这儿交通便利的优势，以高田每亩100元，低田每亩60元的价格买下了17亩土地，同时，委托洋行设计制图，引荐工程队承担建造。阴历二月初八，工厂破土动工，无锡历史第一家近代化面粉企业应运诞生了。

然而，创业艰难百战多，新事物的建立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立案、招股、定机逐一办妥，厂房建筑顺利进行之际，无锡知县孙襄臣突然发出了一纸谕单，这张谕单勒令工厂立即停建，迁移他处。怎么回事呢？原来以"图董"江导山为首的封建乡绅勾结一帮地方恶势力告了荣氏兄弟一状。所谓"图董"亦即地方上的收税官。清时，南方各省县以下分设若干图，图设"图董"，也叫"图正"，这些人核收全图田赋，负责总交县府，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常与地方豪绅勾结，盘剥欺压农民，形成封建势力的地方支柱。原告指责荣氏兄弟私圈公地，破坏地方安定；并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学前街的大世殿和学宫，破坏风水，今后地方会少出当官的人，因此，万万不得在太保墩建厂。出师不利，面粉厂工程被迫停顿下来，6月，江南进入梅雨季节，大雨频降，连日不停，暴雨使河道水位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成为一片泽国。

挫折考验每一个人，意志与策略决定事业最后的成败。多数股东退缩了，他们劝告：还是另择厂址吧，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得罪了地方绅士，即使胜诉，将来日子也不好过。也有人不甘认输，恳切地表示：希望地方兴旺发达，工厂林立，学校林立，若有用到之处，一定鼎力相助。荣氏兄弟在暗礁恶流中苦苦思索着棘手的问题，他们回到了诞辰出生的老房。烛光里，两张严峻的面孔相对凝视着，荣宗敬豁达豪放，雄心勃勃；荣德生则端庄敦厚，稳健踏实。德生的思绪飞到了遥远的南方。那是1900年6月，正值入夏第一次热浪袭击，香港岛烈焰似火，酷暑炎蒸。荣德生自广东经香港准备回乡，候船室闷得待不下去，便到码头上散步。只见内外贸易异常繁忙，港湾里群轮密集，装卸频繁，一艘满载面粉的巨轮正在卸货，米字旗在蓝天上飘扬，鲜艳的英文字母清楚地显示着它的国籍——英国。卸下的面粉已在码头上堆成了一座座小山，绵延几百米，仿佛一条曲曲弯弯的白色长蛇。这是运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堂堂大国，有几亿农民劳作，有无际无涯的农田，有不计其数的稻麦，食之面粉居然要从国外输入，德生感到沉重压抑。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窒息难忍。他环视屋宇，揭开母亲生前用过的纺纱机，突然讲了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姓荣的读书人得罪了朝廷，皇帝将他发配充军，解差押送途中路过无锡，只见地丰物饶、山明水秀，两人再也不愿离去，就在惠山脚下的梁溪河畔定居下来。解差姓张择地上游，读书人就建宅下游，最初衣食具缺日子很苦，但是，他们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很多年后，繁华的家园终于开发出来了，上游成了今天的张巷，下游则成了荣姓人聚居的荣巷。传说是母亲生前讲述的，它不真实，但却寓含一个深刻的道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怎么行动呢？兄弟俩协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活动官府，哪怕抵押进去的东西再多，付出的代价再大也在所不惜。合伙人朱仲甫是官厅里出来的人，路子多，关系熟，兄弟俩请他担任疏导工作。2月讼事开始，荣德生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一一核查对照，指出：工厂施工并未占用公地，乡绅们所谓"私圈公地"的指责毫无道理；至于工厂和学宫，它们不光有护城河之隔，而且还有城墙之隔，破坏风水之说也属无稽之谈。这同时，荣氏兄弟从县到府，从府到省，往返奔走10个月，先后耗资800元，疏通上方。问题终于解决了。官方派出一个姓温的人前来调解，提出条件：第一、不许将驳岸伸出；第二、不许将煤灰抛入河中；第三、不许放回声。这些条件给了乡绅们一个下台的台阶，随即11月，两江总督第八次批文裁定，荣氏兄弟胜诉。

1902年3月，面粉厂正式投入生产，它取了一个吉祥如意的名字"保兴面粉厂"。开机这一天，前来祝贺、参观的宾客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有荣氏兄弟和股东们的亲朋好友，也有在诉讼中表现犹豫最后被摘去了顶戴的知县孙襄臣，对那些曾阻挠办厂的地方乡绅，胸怀宽宏的荣氏兄弟也发出了邀请，但他们自感羞愧终究没有到场。

工厂投产了，面临的新问题是销售，荣氏兄弟一开始就将厂名定为"保兴"，寓意就是"保证兴隆"，可是实际上，"保兴"产品并不象它的名字那样兴隆走俏。原因何在呢？经调查，滞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江南主食大米，面粉需要量不大；第二、当地人思想守旧，不愿改变食用土制面粉的习惯；此外，乡绅们不甘心失败，四处散布奇谈怪论，败坏了面粉厂的声誉。

无锡城市有许多吃食店，崇安寺里的拱北楼面店远近闻名，顾客盈门，这是乡绅们常去的地方，他们借吃面之机，喊喊喳喳，大放厥词。有人说，保兴面粉厂试机没有成功，后来用一对童男童女活祭后才成。又说，"机制面粉不如土面"，"没有营养"，"吃了不消化"；甚至说，"保兴面粉有毒，某某家姑娘已中毒身亡"。一时各点心店闻风附和，工厂不数日就积压面粉数千袋。

荣氏兄弟迎难而上，他们坚信，货真自有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再加上各种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解除群众顾虑，使恶语谣言不攻自破；二是把土粉掺在机制面粉内，以低于土粉的价格出售。北方是面粉的最大市场，几乎家家户户都以麦粉做饼饵食用。针对江南、江北面粉销量上的差别，荣德生又通知在上海的

哥哥不惜重金物色聘请能打开销路的行商，将产品推销到北方去。无锡城里开麻油食锅店的王尧臣、王禹卿兄弟正是合适的人选，他们不仅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而且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座庄也有交情，荣宗敬以厚礼相聘，不多久，保兴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终于打开了。年底，保兴厂结帐，除收支相抵外，获得了创业以来第一次的赢利。

保兴面粉厂是我国最早的机器面粉厂之一，它共计集股3.9万元，实际耗资4.3万元，其中2万元用于购地和厂房建筑，2.3万元购买机器设备。1902年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民族资本开办的8家，"保兴"属规模较小的一个厂，它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一昼夜生产面粉300包。但是，这个小厂却奠定了荣氏万丈高楼的基石。若干年后，荣氏兄弟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建成了拥有16个分厂的面粉工业集团。

(摘自《民国春秋》)

流行风

出军歌(八首)

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种，今有亿万众。地球蹴踏六种动，勇勇勇！

南蛮北狄复西戎，泱泱大国风。蜿蜒海水环其东，拱护中央中。称天可汗万国雄，同同同！

绵绵翼翼万里城，中有五岳撑。黄河浩浩流水声，能令海若惊。东西禹步横庚庚，行行行！

怒搅海翻喜山撼，万鬼同一胆。弱肉磨牙争欲啖，四邻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险，敢敢敢！

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贡献。计口缗钱四万万，民实何仇怨！国势衰微人种贱，战战战！

国轨海王权尽失，无地画禹迹。病夫睡汉不成国，却要供奴役。雪耻报仇在今日，必必必！

一战再战曳兵遁，三战无余烬。八国旗飏笳鼓竞，张拳空昌刃。打破天荒决人胜，胜胜胜！

(黄遵宪)

小说《扫迷帚》

作者壮者，主要内容如下：

在第一回《挈领提纲全书大旨，开宗明义箴世名言》中，揭示"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指出历代帝皇实是假借神权以"检束民志"，陷人们于蔽聪塞敏的愚昧境地。作者认为，当今已"地球大通，科学发达"，要"存立于天演物竞之新世界"，就首先要破除几千年相沿的迷信习俗。他吁求中国"四万万同胞，人人鼓勇直前，从实理阐起，实事作起"，通过"实践"来认清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诸说实是"陷害人群进化的蟊贼"。

作者本着这个观点出发，虚构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江苏吴江县的布衣卞资生，此人"少承父师教训，长受朋友切磋，上下纵横，学兼新旧，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生平专讲实践"；另一个是卞的表弟镇江杨心斋，此人"八股以外，绝无事业，是一个顽固不通、充数儿的秀才"。小说让这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人物同游各地，接触种种迷信的事实，逐件以科学的态度去剖析，从反复辩论和验证中破除迷信。

作者借书中人物口吻愤然指出，这种骗钱妙法与官场的得钱讼刑、会匪的掳人勒赎何异？认为我国梵刹重重，不过供那些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人享受而已，还不如改寺观为学堂，化无用为有用，岂不更好。看来，作者是把破除迷信与自己的济世理想合而为一，撰写这部破迷小说的意图是颇显进取的。

这些观点固然未脱改良主义桎梏，然而单就破除迷信痼疾这个角度而言，确如警钟木铎，大有启蒙作用。《扫迷帚》的问世，当是科学国民思潮输入中国的一种折射反映。可惜的是，这部小说的说理部分较多，而叙事并不见佳，从小说的写作艺术而言，它是逊色于当时另一部破迷信小说《玉佛缘》的。

小说《东欧女豪杰》

作者羽衣女士，主要内容如下：

这部小说从一个在瑞士读书的中国女学生华明卿写起。她结识了许多俄国虚无党女学生，从而了解了该党的革命活动及其英雄人物苏菲亚的故事，由此展开了情节的铺陈和人物描写。

苏菲亚冲破贵族家庭的束缚，四出奔波联盟结会，组成"革命团"。她深入矿工区、乡村多次演说，鼓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继而描写虚无党人谋

划营救及展开种种革命活动。描写艺术平平，人物对话冗长，杂以较长议论，惟煽动力极强。

小说主旨一在于伸张女权，更主要的是宣扬平民主义，以破坏手段，推翻强权专制统治，作者借书中人物口吻说：

今日世界上只有强权者得占权利罢了！……试看今日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生计上，凡关于人群的一切制度，认真说来，哪有一处不与大同条理相背而驰的？……若不用破坏手段，把从来旧制一切打破，断难造出世界的真正的文明。

作者宣传的终极目的是，"要把人为的阶级平了去，弄来一个平等自由的世界"。小说写的是俄国虚无党人的活动，但也连系到中国的现状，如华明卿说道："……在本国的时候，见我政府严办会党，查禁报章，压制学生，牵连家属，凡有谈维新说自由的，都被杀逐。奸贼当朝，正人避地，弄得国势危弱，民不聊生。"作者对专制腐败的清廷显然是不满的，他在第一回里大声疾呼曰："凡世界越发野蛮，那强权便越发恣虐，强权盛行，平等权自然是没有了。所以君主便压制百姓，贵族便压制平民，男子便压制妇女，压制久了，便做奴隶也够不上……好在那时势是不许永远恁么着的，他偏要造了一番又一番，你看地球上那君主贵族的孽苗，不是已经被许多英雄划除了八八九九吗？往后民贼净尽，便是咱们要和那女贼（按，指慈禧太后）宣战的时候了。"

小说《轰天雷》

作者孙希孟，主要内容如下：

这是一部纪实体小说，其中人物、情节皆影射实有人事。主人公荀北山，即常熟名士沈鹏北山，他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敢于冒大不韪向清廷上万言书，吁请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皇帝，并要求诛杀三凶——荣禄、刚毅、李莲英。奏稿写成后，无人敢为代奏。在京同乡怕惹出大祸，派人送他回南，可是途经天津，他竟把奏稿交给《国闻报》发表了，遂轰动于世。沈鹏随即被逮入狱，四年后大赦出狱，已得狂疾，回籍三年后病故。小说即以这一政治事件为主干情节，其中人物如甄君才即影射曾朴之父曾君表，庆仲玉即隐射张鸿（隐南），汪鹣斋即影射黄谦斋，荀北山岳父贝季瑰即隐射沈鹏岳父费屺怀。

当然，在清廷淫威之下，作者还不是毫无顾忌的，署名"藤谷古香"，表明小说为日本人所著，显为避祸。此外，小说过分渲染了荀北山的神经质，并描绘他为受婚姻刺激而作愤世嫉俗之举，这也损害了人物形象。

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作者梁启超，主要内容：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理想的立宪运动小说。虽系寓言，而文中所演绎指当时事。是反映当时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之作。小说以二千零六十二年全国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为背景，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老先生——孔丘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讲演"中国近六十年代史"为开场，前四回以黄克强、李去病两个"宪政党"的创始人的辩论为主要内容，以立宪派的胜利而告终，在新补进的第五回中，作者对革命进行抨击，发泄对革命的强烈不满，表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这部书也可以说是改良主义者在当时的代表作品。由于本书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商榷国针"书中"多载法律、章程、论文"等，故从小说艺术上讲价值不高，作者自己也认为"连篇累牍，毫无趣味"，但小说中的政治论辩写得十分精彩，如第三回，全文约二万言，其中论辩竟多至一万六千言，双方以一个问题互驳四十四次，绝无枝蔓，可谓妙笔。曾有人评曰："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凿，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以游奇山水一般，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犹不足喻其万一矣。"此言虽有夸大之嫌，然后者也确是着力于此。除政论以外，小说也有一些地方写得别有一番清峻刚健的调子，像第四回"旅顺鸣琴名士合并，榆关题壁美人远游"就写得比较可称。据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诗《读史记刺客传》

封狼当道狐凭社，竟卖中原起沸波。迁史愤心尊聂政，泉明诗咏慕荆轲。要离土冢谁能近，博浪无椎可奈何。甚羞苍生四百兆，岂闻一客剑横磨。

（康有为）

历史档案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萃者，去之占也。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蛊，未坠厥宗。

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回望皋渎，云物如故，维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

自顷邦人诸友，愁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宪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讦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毋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维建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细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

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且曼珠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九之烈。而蓟丘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辫发，坐论易以长跽。茸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棰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晰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恬为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多有也。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生长，瞻梨州之所乞师，颖然不怡，永怀畴昔。盖望神丛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恩王父之义息矣。

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婵嫣相属，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告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耶。

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余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发起人：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王家驹、陈犹龙、周宠业、李群、王思诚。

赞成人：孙中山、梁启超。

（摘自《秦力山集》中华书局）

拟定募练新章程请敕部立案折

奏：为北洋募练新军，谨将拟定募兵章程缮单呈览，吁恳敕部查照立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上年十二月间，业将直境亟应募练新军情形，并拟在顺直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暂作新军饷需等因，附片具奏，恭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在案。自应钦遵拣派得力员弁，迅速分投选募。而招募之始，又必先须妥订章程。查从前湘淮各军创募之初，其选择亦倍极慎重，所有格式、保结等类，非不条理精详，厥后日久弊生，乃浸失其本意。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杂，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大率就地取材，滥竽充数，非市井游惰，即革勇逃卒混迹其中。操防稍严，辄不耐勤劬远飏潜遁，而为之官长者，复漫焉不加顾惜，或缺额不补，或补不及时，若视兵丁之去留有无为无关轻重也。往往成军数年，而经练习之熟手十无二三，无异新集之师，几类乌合之众。一旦有警，仓卒出征，兵刃未交，望风先靡，兽骇鸟散，不可收拾。又其甚者，失伍而后，恃众结伙，挟械持枪，到处扰民，乘便滋事，剽掠焚杀，无所不为，恣意横行，莫敢阻诘。近年用兵各役，复辙相属，历历可征。国家岁糜巨饷，乃不获一兵一卒之用，转使闾阎受逃兵溃卒之害。臣诚私心痛之。此无他，由选与练之皆失其方，而未尝立法以预防其弊也。考古昔盛时，兵民合一，聚则为兵，散则为民，不待征发，而师徒之数，按册可稽，故无游民，亦无冗卒。方今泰西各国兵制，犹为近古，又其风气右武，虽以王公子弟之贵，亦必身入行间，而闾左齐民，一隶军籍，即克与贵游子弟编伍同列。故人人以当兵为荣，而兵亦皆人人自重。现值中国贫弱之际，纵不能追踪隆古，抗衡泰西，亦宜略师其意，参用其法，以力挽晚近军营积弊，冀可逐渐整顿，化冗弱而为精强。

臣受恩至深，任寄至重，军符忝握，责有攸归。谨就愚

虑所及，厘订募兵章程十九条。遴委臣部武卫右军营务处候选道王英楷、王士珍等，分赴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各属，会同各该地方官，按属匀派精选壮丁六千人。即令该道等分别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其有入伍尝试私自脱逃者，则责成地方官分行查缉，倘承缉不力，即按军政缉拿逃兵则例，分别参处，庶兵少逃亡，技皆娴熟，不致虚耗训练之日力，不致空糜国家之饷糈，实于经武整军，不无裨益。俟试行有效，再当渐次推广。总期日新月异，仰副圣主振兴戎备，力图自强至意。

谨将拟定募兵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敕部查照立案。除分别咨行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附件一〕谨将募练新军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兵丁捍卫国家，保护四民，前程未可限量，断不可以游惰之人滥竽充数。此次招募，应参仿各国征兵章程及汉代调兵、唐代府兵规制，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各州县查明所辖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该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酌量公举乡民数人。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属，方准举充。倘或滥保溃勇游民，查出重究。

一、应募之兵，须由庄长人等向该州县报名。在城居者，由首事地保报名。报名之后，该兵丁仍在家守候。俟收足一哨人数，委员到境，再按格点验收取，注册编伍，并照抄一册，移交地方官存案。

一、募兵之时，各守令先期出示晓谕，附列募章，定期报名。必须严禁吏胥及庄长、地保等藉端需索，违者重惩。

一、人数收足一哨，尚未成营，暂住候调者，每名每日发给小口粮大钱一百文。募文开差时，发给一百五十文。

一、兵丁到营，头目每月饷银五两，正兵四两二钱。应募之后，即各给其家属执据一纸，盖用营务处关防。入伍三个月后，头目每月扣银一两五钱，正兵扣银一两，由饷局按六个月一次，派员会同原籍地方官牌示定期，饬各该家属持据亲身赴领，该委员即当面发给，并于该执据注明何年何次领讫字样。倘将此执据遗失，必于发饷前一二日，由庄长人等向地方官及发饷委员报明缘由。如查明实系遗失，再行补发饷银并补给执据，以免误领。如承发委员有克扣短少情弊，准由该家属函知各兵，在营呈诉，定当尽法究治。

一、该兵丁宣力行间，以身卫国，必无内顾之忧，方可专心操练。其家属人等，原籍地方官自应妥为爱护，毋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倘该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援照生衿，一律遣抱以示优异。其革退长假者，仍以平民论。

一、各该兵丁入伍三个月后，查明堪胜操练，即饬知各该州县，照绿营马兵例，每名准免差徭三十亩以示体恤。倘该兵丁有包揽情弊，查出严惩。

一、此次所募之兵，嗣后请假、斥革、离营者，由各该营管带发给假单，盖用关防，登明长假、短假及永革字样，按月呈报营务处行知各该管地方官注册。如有永革字样者，以后不准回营再补，即再遇招募，庄长人等亦不得再行举送。凡永革及请长假兵丁，差徭仍照旧征派，领饷执据，由地方官追缴。

一、兵丁潜逃回籍，除各营认真查拿外，并由营务处行知该原籍地方官，督饬各庄长、地保并家属人等严密查拿。倘该庄长、地保等隐匿不报，查明一体惩办。如查拿一个月仍无下落，即由营务处饬各该州县，将该家属分别究追。

一、潜逃兵丁，如该管地方官查缉不力，即将该地方官照军政缉拿逃兵则例，分别参处。

一、兵丁有选升官长者，由营务处和会该原籍地方官填注原册以便查考。

〔附件二〕募兵格式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

一、力大限平举一百斤以外。

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

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

一、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

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

一、素不安分有事案者不收。

一、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

（摘自《袁世凯奏折》天津人民出版社）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虽然，未足以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

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鞫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也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从生亦有之，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继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偌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以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

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摘自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交收东三省条约

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俄历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

大清国大皇帝与大俄国大皇帝，愿将于华历光绪二十六年，即俄历一千九百年，在中国生出之变乱所伤邦交，复行敦固，兹为商议东三省各事，大清国大皇帝特派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大俄国大皇帝特派驻华全权大臣正参政大臣雷萨尔，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谕旨查核，均属妥协，会同议订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条　大俄国大皇帝愿彰明与大清国大皇帝和睦及交谊之新证据，而不顾由东三省与俄国交界各处开仗攻打俄国安分乡民各情，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

第二条　大清国国家今自接收东三省自行治理之际，申明与华俄银行于华历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立合同年限及各条款，实力遵守，并按照该合同第五款，承认极为保护铁路暨在该铁路职事各人，并分应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大俄国国家因有大清国国家所认以上各情，允认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即将东三省俄国所驻各军陆续撤退，其如何撤退，开列于后：

由签字画押后，限六个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

再六个月，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官军暨吉林省内官军；

再六个月，撤退其余之黑龙江省所驻俄国各官军。

第三条　大清国国家暨大俄国国家，为免华历光绪二十六年，即俄历一千九百年，变乱后来再行复炽，且此变乱皆属中国驻札于俄国交界各省之官兵所为，今令各将军与俄国兵官会同筹定，俄兵未退之际，驻扎东三省中国兵队之数目及驻扎处所；中国允认除将军与俄国兵官筹定必须敷剿办贼匪弹压地方之用兵数，中国不另添练兵。惟在俄国各军全行撤退后，仍由中国酌核东三省所驻兵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盖因中国如在各该省多养兵队，俄国在交界各处亦自不免加添兵队，以致两国无益而加增养兵各费也。至于东三省安设巡捕及绥靖地方等事，除指给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各地段外，各省将军教练，专用中国马步捕队，以充巡捕之职。

第四条　大俄国国家允准将自俄历一千九百年九月底，即华历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间起，被俄兵所占据并保护之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交还本主。大清国国家允许：

一、设有应行保护该铁路情节，则专责成中国保护，毋庸请他国保护、修养，并不可准他国占据俄国所退各地段；

二、修完并养各该铁路各节，必确照俄国与英国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即华历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所定和约，及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华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与公司所立修该铁路借款合同办理，且该公司应遵照所出各结，不得占踞，或藉端经理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

三、至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支路，并或在营口建造桥梁、迁移铁路尽头等事，应彼此商办；

四、应将大俄国国家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所有重修及养路各费，由中国国家与俄国国家商酌赔偿，俄国因此项未入大赔款内。

两国从前所定条约未经此约更改之款，应仍旧照行。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签押盖印之日起施行，并御笔批准之本限三个月内在森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汉、俄、法三国文字各二分，画押盖印，以昭信守。三国文字校对相符，惟辩解之时，以法文为本。订于北京，缮就二分。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俄历一千九百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摘自《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

爱国学社章程*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

一、宗旨　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二、学级　本校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各以两年为卒业限。

三、教科　寻常集〔级〕教科之目,第一学年: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地理,历史,英文,体操。第二学年同第一学年。

高等级教科之目,第一学年:伦理,算学,物理,国文,心理,论理,日文,英文,体操。第二学年:算学,化学,国文,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英文,体操。

四、职员　本社公举总理一人,干事一人,学监一人,会计一人,教师若干人。

寻常级教师,于高等生中公举任之。

高等级教师,于教育会会员中公举,及延名誉教师任之。

五、停课日　年假,自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廿日止。

署假,自六月初十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清明、端午、中秋三节,各放假三日。

万寿、孔子生日,各放假一日。

每星期(日)休息。

六、规则　讲堂之规则,由干事管理之。

社友寄宿舍之规则,用自己治制,由学监提调之。

七、经费　讲堂、体育场、社友之寄宿舍,皆由体〔教〕育会预备。

非社友而愿学者,谓之附课生,每月缴学费银三元。其由社中代理膳宿者,增缴膳宿费银五元,月初预缴。

八、考校　本社月终由各教习核稽分数,送于学监。每秀、每年,统计分数最殿高下,出给分数单,以便学者父母稽考。

学生入寻常级满二学年,超〔高〕等级又满二学年,于各学科均已通彻者,由本社给予卒业证书。

(摘自《蔡元培全集》)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3日　太后自正定府乘火车至保定省城。8日自保定乘火车至马家堡,午刻入京还宫。

1月10日　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理大学堂一切事宜,京师大学堂正式恢复。次日,命将京师同文馆归并于京师大学堂。

1月11日　清廷命王文韶仍充督办路矿大臣,加派瞿鸿玑充会办大臣,张翼帮同办理。关内外铁路事宜改派袁世凯接收督办,胡阪芬会同办理。

1月19日　清廷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预政务处。

2月1日　清廷准满汉通婚,然入选宫女仍严格限于满人,并选派八旗子弟出外留学。

美国发出通牒,将"门户开放"政策适用范围推广到矿山、铁路建设等方面,以扩大侵略。

2月8日　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

2月13日　清廷命直隶冀州知州吴汝纶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

2月24日　清廷裁撤东河总督。

3月6日　清廷罢詹事府、通政使司。

3月11日　清廷命各省亟立学堂及武备学堂。

3月12日　日本在台湾总督府宣布延长"六三法"有效期至1905年。此后,又有延期,遂导致台湾发起"六三法"撤废运动。

4月26日　章炳麟、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召开"支那亡国纪念会",被日警阻止。是日,孙中山、章炳麟等改在横滨举行。

直隶广宗景廷宾于威县毙杀法教士。

5月11日　上海耶松船厂木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

5月13日　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参订现行法律。

5月30日　日本在台殖民当局突然袭击凤山后壁林庄,抗日义军首领林少猫等死难。

6月9日　清廷实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6月12日　广西人民起义,起义军占广南之皈朝。

7月27日　清廷命湖广总督张之洞充督办通商大臣。

8月3日　山东利津县冯家庄黄河决口。

8月15日　清廷颁行学堂章程。

8月16日　各国议定中国关税税率。

8月21日　上海电车敷设合同订立。

8月28日　清廷派袁世凯为津镇铁路督办大臣。

9月12日　彭世凯请整顿吏治，将各项陋费一律酌改公费，得旨准行并命他省仿行。

9月15日　谢赞泰、洪全福、李纪堂议定是年除夕广州起义。

9月17日　山东惠民县刘旺庄黄河决口。

9月24日　广西起义军与清军战于罗伞岭。

10月3日　粤边群众万余起事，进攻兴义，7日占领兴义。

10月5日　清廷命各督抚选派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

10月7日　刘坤一死。清廷命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端方署理湖广总督。

10月17日　清廷命各省仿袁世凯定警务章程，办理巡警。

10月26日　清廷命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与张之洞会同办理，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

10月27日　奕劻与俄使订中俄陆路电线展限续约四条。

10月31日　清廷派外务部员外郎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所有游学生皆归管辖。

11月16日　北洋铸造银元总局开铸。

上海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

12月1清廷命自明年会试始，凡原职为修撰、编修、改用庶吉士及部属中书者，皆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

12月2日　粤督陶模死。

经　济

1月11日　清廷命王文韶仍充督办路矿大臣，关内外铁路事实改派袁世凯接收督办。

5月1日　清廷自开福建鼓浪屿为商埠。

5月8日　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总公司建筑开土。

5月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改为上海总商会)成立。

7月16日　英、美、日、德、奥等国在上海同清政府议定中国关税税率。如何征收进出口关税，这完全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而中国的关税却是1858年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税率为“值百抽五”。这个关税税率本应10年修订一次，但西方列强为推销商品，获取高额利润，却以多种借口进行阻挠，使这个税率固定在极低的水平上，实行了40多年而未能修改。1901年，清政府为了筹措《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同西方列强进行交涉，提出对原有的税则和税率进行调整。英、美、日、德、奥、比、荷、西等国组成了以马凯为主席的国际委员会，从1902年5月起与清政府代表盛宣怀、吕海寰等在上海共同着手修改旧税则。8月29日正式签订新税则，规定10月31日开始生效。这是自1858年订立海关税则以来的第一次修改，新税则规定，进口税率由原来的“值百抽五”提高到12.5%。经过修订，海关税收有所增加。但这笔巨额进款都以支付赔款、偿债形式，通过海关流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库和外国资本家的口袋，小部分“关余”支持了腐败的清政府苟延残喘。

9月2日　武昌官办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概归粤商应昌公司集股承租接办。

9月13日　日本设立湖南汽船会社。

本年，旧中国民族机器制造业创办最早的机器制造厂家之一——大隆机器厂在上海创建，创办人严裕棠。初期为来华外轮和外国厂商修配机件，后发展到为国内纺织厂家修配机器零件、制造纺织机器，并能生产成套纺织设备。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军侵占并将之交给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接管，改名内外铁厂，后又改为大隆铁厂，专门为日军生产军火。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大隆机器厂顺利恢复生产，发展较快。在1954年公私合营。

本年，朱志尧在上海创立求新机器轮船公司，制造轮船及各种机器。

9月29日　英商的英美烟公司在英国设立，以后在我国上海、汉口、沈阳等地设立烟厂。

本年，旧中国较大的民族资本经营的造船厂——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在上海建立，创办人朱志尧。至1910年(宣统二年)共造轮船20余艘。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业务发展较快，曾造出3000吨海轮两艘，并承造铁路货车、桥梁、锅炉、柴油机以及碾米、抽水、榨油等机器。但后因大战期间进口原料涨价，亏损严重，负债甚多，无法维持。1918年6月由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估价将其拍卖给法国企业。1919年6月改为中法合办，但实权仍在法国金融资本手中。抗日战争初期，为法国金融资本吞并。1945年被日军征用。解放后，回到人民手中。

本年，美国在上海设立花旗银行分行。美国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总行设在纽约。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在中国开设银行。上海花旗银行就是美国对近代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它除经营一般的金融业务外，还采取各种手段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它利用中国金融机构不健全和信用不发达的机会，擅

自从1907年起在中国发行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钞票，以上海为流通中心，在中国市场上自由流通。后因中国人民拒用，被迫于1934年陆续收回，停止流通。花旗银行除在上海设立分行外，以后又相继在天津、汉口、北京、哈尔滨、大连、广州等地设立分行。抗日战争初期，花旗银行在敌占区与日伪勾结，照常营业。1941年后被日军接管。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发还。

12月　日商收买上海兴泰纱厂。

外　交

3月16日　俄法发表共同宣言。

4月8日　中俄两国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又称《俄国撤兵条约》）。1900年，沙俄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乘机出兵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未能实现。由于中国东北军民的武装抗俄斗争，以及英、美、日等国以利害冲突出面干涉，要俄国从中国东北撤兵。1902年4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与清政府外务部大臣奕劻、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共4款。主要内容有：(1)东三省归还中国。(2)俄军在18个月内分三期(每6个月为一期)全部撤回俄国。(3)俄军撤退前，清政府在东北“不另添练兵”；撤军后，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4)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清政府“赔偿”俄国重修及养路各费。

4月29日　中英订立交收关内铁路及关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

6月22日　中英签订《上海会审公廨合同》。由于上海租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华洋分居”逐渐变为“华洋杂居”，为处理租界内华人罪犯，便产生了会审公廨。这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租界内强行设立的审判机关，是帝国主义国家公然侵犯中国主权、迫害中国人民的一种工具。合同规定，纯属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法官只能“观审”；其余案件，名义上由外国领事和中国会审官“会审”，但实权仍操在外国领事手里。1912年以后，法官改由领事团委任，即使纯属中国人之间的民事诉讼，也由外国人陪审；重大刑事案件不再移交中国政府办理，而由会审公廨包办，适用法律全凭陪审领事随意决定，根本不承认中国法律。在中国人民的不断斗争下，1926年8月，江苏省政府同驻沪领事团经过多次交涉谈判以后，终于签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规定1927年1月1日，领事团将窃夺了25年之久的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政府，由江苏省政府重新组织临时法院。

7月31日　中英改订芜湖租界章程。

8月15日　清政府收回天津都统衙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7月14日攻陷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联合军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都统衙门，全称“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由联军司令部任命俄国沃加克上校、英国鲍维尔中校、日本青木中佐组成三人委员会，均称都统，后又增加德、法、美、意代表各1人。下设8个部门和由900名侵略军组成的“巡罗队”，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广大地区实行军事统治。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陆续撤出北京和天津城区，驻扎到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1902年5月8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各国驻天津都统会商收回天津都统衙门。帝国主义各国通过《辛丑条约》，侵华目的已经达到，因而同意在8月15日撤销天津都统衙门。但仍以清军只能在距天津20里处驻扎为条件，将天津的行政、警察管理权交还清政府。

9月5日　中英订立增改通商行船条约及中英续订内港行轮修改章程。

10月7日　中俄订立交收关外铁路条约。

10月14日　中俄订立正太铁路借款行车合同。

10月22日　中俄修订电报局与大北公司津沽京沽借线合同。

中英订立电报局与大东公司借用京沽借线合同。

10月23日　中英订立川石山至南台借线合同。

文　教

2月8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保皇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半月刊。由梁启超负责主编，冯紫珊负责编辑兼发行。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吴仲遥、康有为、章炳麟、蒋方震、冯邦干、麦孟华、徐勤、欧榘甲、汤浚、梁启勋、杨度、徐佛苏、熊知白、黄国康等，黄遵宪、严复等也经常寄诗文、书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该报32开本，每期120页，内容分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新知识之杂货店等栏目。初期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欧美资产阶级各派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积极鼓吹和推进新文体。语言流畅，文笔生动犀利，深受读者欢迎。畅销时，一期售至1.3万余份。1903年后，在革命形势高涨下，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与《民报》就革命与保皇、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土

地国有等问题展开论战，遭到革命派的严正驳斥。1907年，因论战失败而于11月20日出最后一号后而停刊，前后历时近6年，共出版96期。

4月　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20世纪初，留学生热心翻译西书和提倡革新教育的风气传到上海。国内一些爱国志士，如蔡元培、章炳麟、黄宗仰、蒋智由等，既迫切希望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又感到"要改进中华，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及注灌新教育入手不可"。于是在1902年4月，以国内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需要重新编订为由，倡议组织"中国教育会"，发行《教育杂志》。是年冬，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会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会员100余人，推举蔡元培为会长。中国教育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以"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宗旨。曾设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收容南洋公学退学青年，并办有科学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除进行教育外，同时参与革命活动，如组织张园演说，为《苏报》撰稿，开展革命宣传等。"苏报案"发生后，爱国学社解散，该会也于1907年停止活动。

6月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写成《东游丛录》一书，说细介绍日本学制。

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后迁至日租界)创办保皇派报约《大公报》。书版式，直排，日出8页16面，除报头、广告占3面外，刊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路透电报、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译件、附件等各种消息、文章1万多字。它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报纸。辛亥革命时期，宣传保皇立宪、崇洋媚外，攻击和反对革命。1916年9月，因营业不振，英华将其售于皖系政客王郅隆，由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1926年9月，王郅隆的遗族将其转让给吴鼎昌、故政之、张季鸾的新纪公司。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版。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继续出版；1956年10月1日迁北京，以报道财政经济为主，1966年9月10日终刊。天津版于1949年2月27日改名《进步日报》。只有香港《大公报》一直办到现在。

11月14日　晚清首创的文艺杂志《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影响颇大。月刊。编辑兼发行者署名赵毓林，实为梁启超主编。新小说社发行，第二卷起迁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所刊以小说为主，间有诗歌、传奇、班本、笔记、歌谣、图画等。曾发表吴沃尧(趼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著名长篇小说。所刊作品多与当时社会政治有关。1906年1月停刊，共出24期。

11月16日　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有200余人退学。南洋公学是清朝官吏盛宣怀在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材的学校，因经费充足，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较好，出路优越而颇著名声。1902年，该校有6个普通班和1个培养高材生的特班。其中，五班文课、学课教习郭镇瀛是一个学识浅陋而又顽固守旧的人，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为了箝制学生思想，平时只准学生读《大清会典》、《圣武记》，严禁阅读新书新报，更不得集会和议论时政。五班学生对之深恶痛绝。11月5日，学生故意将一只墨水瓶放在他的座椅上。郭镇瀛认定是有意侮辱他，勃然大怒，严词诘问，交串通学生总办进行诬陷迫害，11月11日，校方应郭镇瀛的要求，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等3人，全班大哗。14日，决定全班退学，举行告别演说会。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师生同情，15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允，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16日上午10时，学生们高呼"祖国万岁"口号，整队离校。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学堂中封建压迫的结果，又是青年学生中民主主义思想滋长的结果。

11月16日　中国教育会在上海设立爱国学社。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学生沈联、胡炳生、俞子夷等200余人，因抗议校方压制言论自由而退学，要求中国教育会办学。中国教育会遂于11月16日在泥城桥福源里设立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吴敬恒(稚晖)为学监，章炳麟(太炎)、黄炎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任义务教员。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皆以两年为毕业期限。寻常级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学、理科、历史、地理、英文、体操等；高等级的课程有：伦理、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心理、论理、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日文、英文、体操，并进行军事训练。学务由学生联合会自治。编印《童子世界》、《翻译世界》。以"国民公会"名义，常在张园集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当时的拒法、拒俄运动。并利用《苏报》发表师生言论。1903年，又接受南京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杭州陆师等风潮中退学学生章士钊等40余人。7月，因苏报案发，章炳麟被捕，蔡元培出走青岛，学社被迫解散。

11月　中国教育会在上海登贤里创办爱国女学校。经费由黄宗仰介绍罗迦陵独任。首任经理蒋观云(智由)，后由蔡元培接任。初期学生即发起人之妻女，仅约10人。1903年迁校舍至福源里，由爱国学社社员劝其姐妹入学，学社教员兼义务教员，校务开始发展。学校分预科、本科。预科分两级，初级授修身、算学、国文、习字、手工、体操、音乐，2年毕业；二级授修身、算学、国文、历史、地理、理科、家事、裁缝、手工、体操、音乐、图画，1年毕业。本科分文科、质科两部，一重历史、地理、法制、经济，一重博物、物理、化学。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摒弃"贤妻

良母主义"。在校园里，学生们"高谈革命，放言无忌"，纵情议论时政。学校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历史课讲授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党的故事，理化课讲授制造炸弹的方法，并一度成为革命秘密机关。1909年蒋维乔任校长，重订课程，修建校舍，组织校董会，复为纯粹教育机构。1914年向江苏省教育厅立案后改名爱国女子中学，设初中、高中及高中师范科、体育师范科、附属小学。

12月17日　京师大学堂复校开学。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时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主张于1898年7月在北京开办的我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校舍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旧公主府)。1899年6月11日，光绪帝在诏令中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严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迅速议奏京师大学堂开办章程，命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开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筹拨。原设之官书局和新设之设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西并用"；宗旨是"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京师大学堂开始议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10科，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过10余人。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停办。1902年11月25日再次招生。12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复校开学后，增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1910年(清宣统二年)，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5月改称北京大学。

本年　文明书局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俞复、廉泉等，俞复任经理。初出版新式教科书《蒙学读本》数十种。后延聘赵鸿雪入馆主持碑贴书画，如徐熙《百花图长卷》、《碑帖大观》等，脍炙人口，行销国内外。刊行大量笔记为其最大贡献。著名的有《说库》、《清代笔记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在学术与史料方面均有参考价值。也用进步书局名义出版书籍，由王均卿主持，实为一家。1932年并入中华书局。

军　事

年初　北洋军阀集团正式形成。1895年10月，袁世凯被清政府派至天津小站督练新军，他将1894年冬成立的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并扩编为7000人，归北洋大臣节制。1898年10月，新编陆军改称武卫右军，编制也扩至万人，仍驻小站。1901年11月，李鸿章死，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年初，他又将武卫右军改称北洋常备军，"北洋军"之名自此开始。北洋常备军由袁世凯统帅，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分任总办。1905年，北洋常备军有6镇、兵力达7万多人，形成了以袁世凯为总头目的北洋军阀集团。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威逼孙中山退让。1912年3月，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北洋军阀的统治正式开始。1913年10月成为正式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小头目分据全国各地，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人们称之为"北洋军阀"。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三系之间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皖系被直系打败，直系被奉系击败。1928年年初，蒋介石新军阀集团发动第二次北伐，奉军、直鲁联军被击败，东北举行易帜，宣布加入南京国民党政府，奉军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至此，统治中国17年的北洋军阀归于灭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3年

导　言

在经历过一段平静后，突如其来的一九〇三年打破了太平迷梦，从此开始，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动荡，事件的发端便是年初的洪全福起义。

孙中山指导下的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时又陷入迷惘之中，大约对自己的自信已丧失得差不多了，随着保皇会的大肆活动，孙中山的据点一个个减少。但是澳洲华侨谢缵泰并没有灰心，在他的主持下，由洪全福挂帅举行了由兴中会发动的最后一次广州起义。

随着清廷“新政”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出国享受新鲜气息，也不断将自由思潮带回国内。由于久已对腐朽的清王朝心怀不满，从本年起，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大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排满思想，尤以邹容、陈天华、章炳麟为代表，并因而诱发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在“苏报”案之前不久，由于沙俄的进一步侵略，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立刻举行了拒俄运动，《苏报》成了宣传喉舌。这次大规模的抗议在后来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义勇军运动。

就在沙俄侵略东北的同时，英国久窥西藏的耐心终于失去。自以为时机已到，便悍然出兵，企图一举将西藏变为自己直接的殖民地，却未料由此陷入了深深的泥坑，只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才使它又捞到了一笔买卖。

一九〇三年是革命发轫的一年，首先是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即将开始的革命风潮奠定了心理准备。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洪全福起义
- 拒法、拒俄运动
- 《苏报》案
- 华兴会成立
- 英国人侵西藏
- 沈荩案

洪全福起义

背景介绍

在兴中会会员所组织的历次起义中，洪全福起义是一次和总会没有联系的独立行动。起义的发动人是谢缵泰。谢缵泰(1872－1937)，字圣字，号康如，广东开平人。出生于澳大利亚。父亲谢日昌，是雪梨泰益出口商店的老板，哥老会的前辈。在谢缵泰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谢日昌就向他灌输了强烈的反清思想。1892年谢缵泰在香港参加辅仁文社。1895年加入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任英商祺昌洋行买办。1899年结识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原名春魁，1863年生，随洪秀全转战各地，被封为瑛王。太平王国失败后逃亡香港，在洋船上当厨工多年，后悬壶行医。谢缵泰结识洪全福后，企图借助于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组织力量，第二次攻夺广州，以"执政"的名义建立"联邦"式的政府。他认为，"共和国政体"对中国来说太先进了。1900年初，兴汉会成立，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谢缵泰认为孙中山"篡夺"了杨的职务，拒绝参加孙中山正在日本酝酿的一个革命组织，决定独立行动。同年2月9日，在广州散发"解放、自由与维新"的传单，作为攻夺广州之前的一次试探性行动。

这年3月末，容闳路过香港。谢缵泰、容闳及杨衢云之间进行了几次密谈，讨论联合与合作问题，容闳也认为孙中山"太轻率了"。4月初，容闳乘船赴美，谢缵泰写信劝孙中山在日本会见容闳。其后，他并向杨衢云建议，推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901年9月，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洪全福主张筹款五十万，召集广东、香港的洪门兄弟起义。李纪堂刚接受了父亲的百万巨额遗产，慷慨承担了全部军费。他并提议，事成后推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计划确定，谢缵泰、洪全福分头准备。谢的主要工作为争取国际援助和进行舆论宣传。他先后联系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香港日报》编辑肯宁汉、《德臣西报》编辑黎德、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保证。莫里逊表示："我的支持就意味着《泰晤士报》的支持，而《泰晤士报》的支持则意味着英国人的支持"。1902年6月9日，在肯宁汉帮助下，谢缵泰起草了宣言和向列强的呼吁书。

材料：

·洪全福始末

材料　洪全福始末

谢缵泰起草的宣言和呼吁书至今尚未发现，但是，流传下来的几个文件却揭示了谢的部分主张和观点。这就是《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申明纪律告示》、《安民告示》、《四言安民告示》等。为了发动会党，谢缵泰打出了"大明顺天国"的旗号。文件揭露了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指斥了辛丑和约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赔款交通，民悲避债无台。"文件也包含着旧式会党所不可能具有的民主主义内容，如《申明纪律告示》称："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谢缵泰这时的思想介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这一点，使谢缵泰区别于孙中山，而接近维新派；但是，"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这一点，又使他区别于维新派。

洪全福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进行军事准备。他于这年夏天在香港、广州设立了革命机关。香港机关托名和记栈，广州机关则以洋货店、肥料厂、信义公司等名目为掩护。向例，每逢夏历元旦天未明时，广州文武官吏都要齐集万寿宫行礼。洪全福即准备于此时军分五路，纵火为号，炸毁万寿宫，焚烧火药库，占领军械局及各衙署，宣传推翻满清的革命目的。同时，发动惠州会党响应。

10月16日，谢缵泰和父亲讨论了洪全福的起义筹备情况，认为基本就绪。19日，谢缵泰通知《德臣西报》编辑黎德和肯宁汉二人，要他们准备"革命的来临"。11月2日，谢缵泰在香港各报发表文章，主张消灭中国的"奴隶制"。6日，收到容闳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一方面，我

自己作好准备;另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容闳要求将暗号和密码寄给他。12月24日,肯宁汉为谢缵泰秘密印刷了"独立宣言"。27日,洪全福和谢缵泰的弟弟谢缵叶进入广州,八个有关的军事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议。随后,洪全福回港报告了拟于除夕(1月28日)发动的具体计划。1903年1月25日,洪全福、谢子修再次进入广州,准备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清政府广东当局勾结香港殖民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

起义所需枪械是由李纪堂出面向广州陶德洋行定购的,预交订款十数万元。洋行方面企图吞灭枪款,便向粤吏告密。洪全福等动身不久,广州方面便派人引导港警搜查和记栈,拘捕留守人员,并搜出军械、旗帜、会党册籍多件。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洪全福仍然企图补救,他命在澳门的同志装载枪械,以煤炭掩盖,火速运往广州。驶至香山时,即被拦截。同时,梁慕光向沙面洋行密购的快枪二百杆也被清兵发现。粤吏搜索起义军设在广州的机关,逮捕二十余人。洪全福剪掉胡子,化装逃走。

事后,梁慕信等十余人被害。谢缵泰父子因失去信心,解散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国内力量。3月11日,谢日昌因忧愤逝世。4月,谢缵泰决定听任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自由行动",自己则创办《南华早报》,不再致力于武装斗争。

导致洪全福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还是军械问题。李纪堂等寄希望于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开办的洋行,以为它会恪守贸易原则。他们不懂得,此类洋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据点,是完全不能信赖的。

洪全福起义是兴中会会员组织的最后一次起义。直到同盟会成立后,由于萍、浏、醴之役的带动,才出现新的武装起义高潮。

(摘自《中国民国革命秘史》)

拒法、拒俄运动

背景介绍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还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应在事平之后,用全省路矿等权作酬劳。这一消息震动了留日学生和国内士商。

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和各省同乡会干事齐集会馆商讨对策。干事们手持报纸,相对流泪。他们决定电争,分别致电政务处、两广总督德寿、尚未到任的新粤督岑春煊,指出"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立可动摇",请他们立即代奏,要求清廷拒绝法人,将王之春撤职治罪。同时,电告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并用外文写稿寄登欧洲各大报,揭露这一事件。这一天,在上海的广西、广东绅商也举行了集会,决定发电力争。

4月25日,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在锦辉馆开会,报告对付此事办法。与会者五百余人,一致拥护干事们的措施。会后,又向政务处发出详函,说明借兵借款的利害关系。同日,龙泽厚(广西人)等发起在上海张园开拒法会,中国教育会在沪会员、爱国学社全体学生参加,与会绅商四百人。马君武发言说:"必须合成一有势力之自立会,能与外人及顽固者争衡。"吴稚晖建议:"无论工商人等,均宜罢市。"蔡元培提出:"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会议决定发电阻止借兵借款。当天,签名愿入阻法会者三百余人。同日,爱国商董二人为阻法会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愿意召开商会,一同拒法,结果被广帮一些商董阻止。

4月26日,在沪两广人士再次集议于广肇公所。顽固士绅拒绝与会,公所首事还贴出告白,说什么"公所当议商务,不当谈国是"。当即遭到众人痛斥,"无不欲赠以老拳"。这次会议展开了爱国募捐活动,顷刻间就募得一千余元。

拒法的抗争还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响应。例如杭州的杭州府学堂、钱塘县学堂、励志学社、安定学堂等九校联名电争;广州时敏学堂也发电力争。

1902年10月,即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后的六个月,沙俄如期执行了第一期撤兵计划,将辽西的驻军撤出。山海关营口间和山海关新民间的铁路也交还中国。但从1902年末到1903初,在俄国第二期撤兵之前,俄国掀起了一股反对继续撤兵的逆流,公然叫嚣"在撤净其余兵力之先,必须获得中国对于我们在满洲的权益的一系列保证。"沙俄政府在1902年11月9日召开的有内务、财政、陆军和外交大臣参加的特别会议上确认,"毋庸置疑,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或完全从属于俄国。"而当时沙俄在东北的"全部事业"还有一种"不牢靠性质。如果没有军队,如果政府今后不再进一步干些什么",那么一切企业就要垮台。"为了使俄国企业家能够在满洲开展他们的活动,就必须保护他们免受一切外国的竞争,必须不准外国人接近,并用关税保护把这块地方包围起来。……要做到这一切,只有满洲全都成为俄国人所有才行。"沙俄拒不撤兵,意在坚持把中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1903年2月7日,沙俄政府在彼得堡召开了由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尔夫主持的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财政、陆军大臣和海军部的负责人之外,还有俄国驻中国、日本、朝鲜的公使。会议认为"可以把撤军拖延到中国答应对于俄国在满洲的权利和安全给予确实保证的时候",并通过了驻华公使雷萨尔提出的对中国的七条要求。沙俄政府经过上

述会议制定了“一拖（撤兵时间）二要（要中国提供保证条件）”的政策。“拖”是为了“要”，“要”不成就不撤军。

4 月 18 日沙俄驻北京代办柏兰孙把沙俄的七条要求交给中国外交部，作为俄军从奉天及吉林省南部撤军的条件。七条要求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俄国撤出的地方，不得以割让、租借、让与或其他方式转让他国。（二）中国未经俄国同意，将不在满洲任何地方开辟新商埠，并不允许他国领事驻扎。（三）中国如聘用外国人管理任何行政部门，这些外国人的权限不得涉及俄国利益占优势的中国北方事务，而这些事务应划归完全单独的机构，并委托俄国人管理。（四）蒙古现行行政组织不得搅乱。（五）俄军撤退后，俄国人在俄军占领期间所取得的一切权利继续有效。（六）牛庄交还中国以后，华俄银行牛庄分行将同目前一样，继续行使海关银行的职能。（七）在北京营口间电报运行的整个期间，俄国将继续保有旅顺、营口、沈阳的现有电报线路。这七条要求表明，沙俄企图把同中国东北有关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日、英、美势力从东北排挤出去，而独占东北。沙俄的七条要求一经传出，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材料：

- 张园集会
- 拒俄义勇队

材料一　张园集会

1903 年 4 月 27 日，上海群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这些群众包括了十八个省籍的人。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会上还有数十人即席演说。同样是张园拒俄会，这次和 1901 年的会议不同，显示出一种不顾清政府的傲岸独立的态度。这次会议是由汪康年发起并主持的，电争也是由他提出的。汪在教育会中的友人参加了集会。

留日学生的行动与上海群众声声相应。4 月 29 日上午，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集会。汤槱建议先致电南北洋大臣。请他们主战。钮永建指出：“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为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大家都赞成。下午，在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五百人，推汤槱为临时议长。汤槱、钮永建、王璟芳、叶澜、蒯寿枢、周宏业、张肇桐、汪荣宝、程家柽、李书城、翁浩、张允斌等相继演说。汤槱的演说慷慨激昂。他说：

“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想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的好机会么？”（众皆拍掌）

他还批评那种空谈爱国的倾向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咄！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他提议“今日有不怕死的，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有人反驳说：“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虽举全体学生驱而死之，亦不足当俄人之铁骑。故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不取。”汤槱回答说：

“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

讲到这里，他厉声大呼：

“死生一发之际，犹想层层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么?!”

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言毕，“众皆愤发，多涕不能仰者”。

材料二　拒俄义勇队

各省留学生会一致赞成成立义勇队。福建同乡开会时，十五岁的方声煊要求签名入伍，翁浩抱着他哭道：“方君，我北征且歼，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日言报国，今予为势所迫，仅一死以塞责，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此，胡为者？”满座闻言皆哭。浙江同乡会上，十六岁的矮小少年潘国寿也要求入队。同乡劝他留下，又劝他改归本部或往内地游说。潘都不肯，大哭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决定加入赤十字社，随同义勇队北征。日本女界名流下田歌子急来劝止，她们回答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加入者，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人。其中，方君笄就是方声煊的妹妹，当时只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姑娘。他们的堂兄方声涛、方声洞（十七岁）也入了义勇队。不少人都是兄弟姐妹一同加入的。留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不同意组织义勇队，但他的妹妹曹汝锦却毅然加入了赤十字社。至次日止，自愿签名入军队者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留日学生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中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5 月 2 日，签名入义勇队、本部者集会于锦辉馆，改义勇队为学生军。次日，在留学生会馆编队，将 121 名队员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

方出面干预，5月11日，再度在锦辉馆开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蓝天蔚等士官生被强令退出，但会员仍达208人之多。会上，公推叶澜、林长民、蔡文森为书记，陈福颐、张肇桐、蹇念益为会计，王璟芳、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为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为执法；叶澜被职员们推为职员长。黄兴、杨毓麟等被推为运动员。此前一日，汤槱、钮永建被推为特派员，归国去与袁世凯谈判。5月14日，二人出发。5月、6月间，运动员除程家柽、陈天华外，陆续首途。黄兴于5月31日成行。5月中旬起，军国民教育会的射击班、讲习科、体操科陆续开始活动。

上海方面，4月30日再次在张园开拒俄会，讨论设立四民公会事。与会者一千二百余人。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赴会，爱国女学、务本女学、育才学堂学生也同时出席。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马君武演说后，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

"吁嗟美哉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茶桑满园郁相植，青青芬芬烂其色。纠结恰是同气脉，夏禹域兮我祖国。

"吁嗟美兮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小川悦流不肯逆，大川似骄势湍渤。大川小川争相怿，大支那兮我祖国。""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会议决定改四民公会为中国国民总会，当场签名入会者六百人，会后签名者千余人。

正在会议高潮期间，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龙泽厚率全体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留学生的敬意。随后，入场商议签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复电东京。会后，教育会派汪德渊为代表赴日。当时，正值义勇队受到干涉，汪向留学生表示："无论俄事如何，军队暂不可解散，务望同志竭力维持。"后来，上海义勇队也相应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也在上海设立了通信机关。爱国学社入会者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早晚操演。

东京留学生和上海各界的拒俄呼号得到了国内各地爱国者的热烈响应。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苏报》案

背景介绍

为了遏制民主革命的发展，清政府于一九〇三年夏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最初于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内，"本为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后因不善经营，大为折阅。一九〇〇年湖南衡山人陈范（字梦坡）"以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落职，退居上海，有倾覆满清之志"，时《苏报》出让，遂由陈范承办。

一九〇二年东南各省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一方面开辟"学校风潮栏"，专门刊载南洋公学等校退学事件的消息，鼓励学生起来造反，"所载文章，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另一方面又与爱国学社相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七人轮流担任撰著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

一九〇三年五月底，《苏报》正式聘请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之领导人章行严为主笔。"行严就任第一日，首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以耸动当世观听。"接着《苏报》陆续刊出《康有为》（即《驳康有为革命书》），《祝北京大学堂学生》、《驳〈革命驳议〉》、《〈革命军〉序》、《介绍〈革命军〉》、《客民篇》、《杀人主义》等"旗言革命"的文章，其中有的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反动本质；有的对改良派散布的教育救国论、变法维新论等阻挠革命的谬说进行批驳；有的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共同革命。如《杀人主义》写道：清朝统治者"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即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这里虽然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那种与清朝政府势不两立、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赞扬的。《苏报》的不少文章一经刊出，香港《中国日报》、厦门《鹭江报》等便纷纷转载。凡此种种，使清朝统治者极为震惊，决心把《苏报》置之死地而后快。

材料：

- 被捕
- 审判
- 引渡
- 尾声

材料一　被捕

等到《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于世，以及《苏报》介绍文章发表以后，清政府严斥两江总督魏光焘："上海爱国党倡言革命如此猖獗，而该督不知所措"，"形同聋聩"。于是魏光焘一面电禀清政府，"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一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密拿"；一面致函上海道袁树勋，以"《苏报》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的《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

肆无忌惮”为理由，命令一并“查禁密拿”；并授意袁树勋依据担文律师办法，以政府名义，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还派候补道俞明震来沪，协同上海道办理，嘱令“设法妥商，使外人允我查拿，不致使其远扬”。

六月二十六日（农历闰五月初二日），俞明震从南京赶到上海，会同袁树勋向驻沪领事署交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租界定罪，在租界受刑。二十九日（农历初五日），驻沪领事团同意签票。当日下午，中西捕探在苏报馆将司帐程吉甫捕获。早在二十六日俞明震来沪捕人时，风声已很紧，章士钊、汪文溥、黄宗仰、蔡元培先后离沪躲避，也有人劝说章太炎“舍走无他法”，章太炎毫不畏惧，表示“坐待捕”，还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三十日（农历初六日），工部局发出牌告“奉道宪密札，奉苏抚宪札，钦奉电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形同叛逆，着严密查拿等因，钦此，札道拿办。并先奉南洋大臣谕：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犯分别严拿，务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免脱。一面签差协捕，立将苏报馆严行封闭等因。奉此，除另单发封苏报馆外，合饬密拿，仰即协捕立提役开人等，限即日解候讯究。钱允生、陈（程）吉甫、陈叔畴（即陈范），以上苏报馆主笔。章炳麟、邹谷、龙积之，以上伪作《革命军》匪人。陈范，即陈梦坡，苏报馆主，以上七名，〔注〕该差不动声色，即行按名拿获解究，勿延。”当分派中西捕探至爱国学社捕人时，章即起立，自指鼻端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随即英勇就逮。当日，捕探从女学报馆中，还捕去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及钱宝仁。龙积之当晚自投捕房。邹容原先住爱国学社，学社与教育会分裂后，搬出学社，与张继同住虹口，听到章太炎被捕，表示不愿置身事外，要与章生死相共，次日自动赴捕房投案。

章、邹被捕后，《苏报》继续出版，宣扬革命。七月一日（农历闰五月初七日），发表《哀心死》，二日（农历初八日），发表《新无锡会之缘起》，四至五日（农历初十至十一日），又选登了香港《中国日报・周云祥》，六日（农历十二日）即《苏报》被封的前一天，还刊登了章太炎写的《狱中答新闻报》，深刻揭露清政府镇压革命的罪行，表示“矢志斗争”的决心，“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捕人之后，清政府又密谋封禁《苏报》。七月四日（农历闰五月初十日），魏光焘电嘱《新闻报》美董福开森，“切商各领事，务将该馆立即封闭”。同日，袁树勋又亲访美、英领事。美领事献策，该案“唯有公廨正式指令，方可封闭”。六日（农历十二日），清政府当局所请律师怀特及古柏至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说是《苏报》仍然：妄登悖逆不道之说”，请求“会审公廨临时发布禁令，禁止《苏报》发行”。美领事古纳表示同意，由谳员孙建臣签发封条，英陪审官迪比南副署，并由美、英总领事联署，交工部局执行，工部局未即执行。七日（农历十三日），袁树勋以工部局“蔑视公廨”，“不从堂谕”，饬令会审停堂，勿讯别案，逼使工部局改变主张。当日上午，公廨未开庭，近中午，工部局只好遣捕探封闭苏报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摘自《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二　审判

章炳麟、邹容就捕是英勇的。由于捕房和上海当局暗中做有文章，诸如错开人名、见人不捕、分日行动等，他们完全可以象陈范一样从容逃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表现了高尚的献身精神。章炳麟深明这场斗争的意义，立下了牺牲的决心。他进捕房不久，就写了一篇《狱中答新闻报》，反驳政敌的污蔑。他指出，此案乃是“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的“大讼”，“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坚定地表示：“逆胡挑衅，兴此大狱，盗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他们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向社会宣示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这正是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革命手段登上历史舞台所需要的英雄行为。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革命者还必须善于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把不愿束手就缚的人笼统地诋通斥为胆怯或动摇，是不切实际的。

《苏报》也不甘屈服，继续疾呼“革命排满”。《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便揭载于7月6日的报上。清朝当局一心要拔掉这眼中钉。7月6日，古柏向公廨要求封报，这本是串通好的事，审官当即允准，英领事签字。但工部局拒不执行，清方便用不派人会审他案相抵制，这样，苏报馆才于7月7日被封。名震一世的革命报纸就这样被扼杀了。

章、邹一案，若按袁树勋与领事的协定，很快可决，不外禁监数年，但这样做达不到清廷置革命党人于死地的目的。7月2日，端方飞电魏光焘、恩寿、袁树勋，主张以“设法解宁为第一义”要将章炳麟等人弄到清朝政府手里杀掉。端对张之洞说：“此事关系太臣，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他还指责“宁沪办法似嫌太松，仅予监禁，终当出而作乱。”端方心狠手辣，他的办法很合清廷意旨，经过张之洞的活动，军机处于7月4日、8日两次责令魏等按此“尽法惩办，勿稍疏纵。”7月8日的电令还命魏“仍随时电商端署督”，正式给予端方干预此案的权力。端随即派湖北巡警局总办金鼎赴沪。

魏光焘并不以端方的主意和军机处的命令为然，他相信要改变洋人的主意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和袁树勋、福开森提出了一个拖延的办法，美其名曰“步步紧

逼”。他要求北京外务部出面同各国公使交涉，让他们先去碰钉子，而在上海则只催会讯，绝口不提解宁问题。魏、袁以操之过急会促使工部局放人相要胁，福开森、金鼎也跟着帮腔，逼得端方只好承认“以速行会讯，俾早定案为要义。”

7月15日，在租界会审公廨进行第一次会讯。章炳麟、邹容等在森严的戒备下被提上公堂。古柏代表清朝政府指控《苏报》和章、邹“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他摘引了《康有为》等八篇文章和《革命军》一书中激烈的词句作为“罪证”。章炳麟非常藐视这种审讯，他说：“噫嘻！彼自称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面对审官，他坦然承认：《序革命军》是我所作，同时，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清朝，便作书驳斥。律师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章答：我只知道载湉是满清人，不知所谓“圣讳”。邹容也自认：“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因为章等的律师来不及准备辩护词，公廨宣布了7月21日续讯。当章炳麟、邹容等被用马车送回巡捕房时，观者填巷。章炳麟在车上看到这种情景，即将两句古诗改了几个字，风趣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会讯之前，7月11日，魏光焘、端方、恩寿会奏办案情况，申明“拟俟会讯后，设法解宁审办”。7月13日，清廷电旨：“仍著严饬速筹解宁惩办，勿任狡脱，以儆狂悖。”这道“圣旨”否定了“步步紧逼”办法，魏光焘不得不改弦易辙，认真地从事解宁交涉。当时，第一次会讯日期已定，只好照常。讯后，魏撤回俞明震，并给袁树勋一道命令，如果袁不能将章等交涉引渡，押往苏州惩办，便要降职问罪。7月20日，袁与美领事古纳约定次日同各领事会商。7月21日的会讯因此已无必要，所以第二次会讯一开堂，古柏即以案外另有交涉为由，请求改期会讯。会讯因此中断。

法庭上的胜利者是章炳麟、邹容。他们毫无畏惧之心，对簿归来，吟哦唱和，赋诗见志。7月22日，章炳麟赠诗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曰：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两诗豪情横溢，表示出他们在囹圄之中，梦寐以求的，仍然是兴革命之军以扫“妖氛”。对于早已准备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的革命者，敌人的一切迫害阴谋，只能是枉然的。

（摘自《中国近代史纲》社科文献出版社）

材料三　引渡

7月21日，袁树勋持南洋大臣魏光焘照会同各国驻沪领事谈判。英领事康格滑头地告诉他，这件事本可商量，但你们既找了公使，我还得向公使请示。与此同时，英、日、美三国公使也向清外务部推托说，说等待驻沪领事报告。京、沪两地的谈判都陷于扯皮。

为了说服洋人交出“钦犯”，金鼎想了一条理由，说“革命”“是明明欲在租界外犯叛逆之罪，租界内无命可革，则此案与租界内何涉？”这种拙笨的理由当然难不住洋人。张之洞比他的亲信要高明得多，他指责租界当局侵犯中国主权，要求收回这些权利。7月21日，张之洞电端方，指示谈判要领。他说：“在中国境内，虽系租界，其中国人民仍应归中国管辖，故遍查条约并无租界交犯章程。……而工部局硬欲干预此案，竟欲以上海租界作为外国之地，显系有意占权，万难迁就。”在张的启发下，魏、袁也寻章摘句予以补充。他们企图居高临下，靠提出主权要求摆脱洋人的刁难，一举达到引渡的目的。

张之洞指责租界当局占权是符合事实的，只是说得不全面。各国使领、工部局干预“《苏报》案”，无论是参与镇压，或是拒绝引渡，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帝国主义者这样做，为的是维护他们靠侵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得来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帝国主义者在这一案件中，与封建统治者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局面。为了维持其走狗的统治，使自身利益不因这种统治被推翻而遭受损失，他们同意清朝政府镇压在租界内活动的革命党人，并直接参预镇压。同时，为了不使清朝走狗染指自己的既得权益，他们又要求把这种镇压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拒绝引渡，主要是从后一目的出发的。张之洞指责的，也仅仅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帝国主义者拒绝交人“系争界内之权，非实惜各犯之命”，所以他们想争一争。因为所需维护的政益不同，也产生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美国在中国势力较小，为便于今后扩大在华利益，它乐于示好于清朝政府。其驻沪总领事古纳秉承本国侵华方针，就利用领袖领事地位积极支持清朝对革命的镇压，极力赞成引渡。英国领事康格的态度就和古纳不一样，他始终反对引渡。康格的态度则是由于英国有其在长江中下游和上海租界的权益需加保护而产生的。工部局直接控制着租界，所以它处处与清朝当局为难，不让清朝当局插手界内之事。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了哪种态度，侵占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一样的。

清朝政府与各国使领的谈判迄无成效。在北京，法、俄、德、美等国公使赞成引渡，但意大利公使反对。英国代办对引渡模棱两可，其驻沪领事却坚决反对。正当交涉紧张之际，在北京发生了政治犯沈荩被害的事。沈荩当过自

立军右军统领，7月19日在京被捕，因西太后授意，7月31日在刑部被杖毙。8月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各国使领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为挽回局面，张之洞又出主意，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的条件同使领们交涉，但已毫无用途。英、美政府先后训令其驻华使节不得同意交人。清廷迫于形势，只好放弃引渡的要求，于11月间由外务部与英使萨道义约定，将章、邹"免除"死罪，仍在租界会讯定判。

为此，会审公廨设立额外公堂，魏光焘派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为主审官，于12月3、4、5日连续会审。为了集中迫害章炳麟和邹容，额外公堂于3日当堂释放了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岐、龙泽厚则于17日分别交保、具结释放。12月24日宣判，汪声称应判章、邹永远监禁。但是，英方不同意，判决不生效。后来，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不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也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要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1904年5月21日，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作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摘自《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

材料四　尾声

清政府兴师动众镇压新兴的革命运动，制造了"《苏报》案"。可是，比较起它为制造此案而付的政治代价来说，囚禁章、邹的"胜利"简直微不足道。封建统治者为此案竟一连发了两道"圣旨"，还以政府名义去控告几个普通百姓，一开始就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为反清革命做了义务宣传。《苏报》的主张通过清方的控状公布于全国，章炳麟、邹容成了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作品不胫而走。政治上敏锐的人们都由此感到，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经是难以阻遏的潮流，镇压只会产生和锻炼更多的革命者。

清朝统治的腐朽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它为镇压革命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但事事须按帝国主义者的意旨办，否则就行不通。奴才的嘴脸更加暴露。它的官吏们对"圣旨"可以阳奉阴违，对"钦犯"可以私纵暗放，相互间明枪暗剑，但在洋人面前却都望而生畏。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又怎么能长期统治中国呢？

章炳麟、邹容在判决之后被囚在提篮桥租界监狱里，分居斗室，每天作工八小时，缝衣、烧饭，吃着恶劣的饭食。他们抽空吟持、写作，还读些旧籍、佛典，但最关心的还是狱外的政治动向。每逢探监时间，蔡元培等轮流给他们带来新的消息，许多不相识的革命志士，如禹之谟、卡鼐、吴樾等也前来探望或寄信慰问。章炳麟在狱中还参预了光复会的创立。统治者的监狱关住了一些革命者，却无法关住革命。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离出狱之期仅七十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人们都怀疑他的死是中外反动派下的毒手，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为此特派张继回沪调查。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了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着危险将灵柩运到上海县华泾乡，葬在自己的地里，人们称誉刘为"义士"。1906年7月3日，在邹容墓前建成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人们对他的怀念。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刑满出狱。在沪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候门欢迎，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人来迎接他东渡。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报馆都发电慰问、致敬。当晚，章炳麟登轮赴日。

(摘自《辛亥革命》知识出版社)

华兴会成立

背景介绍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从1894年开端，到1903年发展成为比较广泛的社会运动。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用暴力手段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中国教育会在会内革命分子的推动下，为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并未脱离群众性社会团体的规模，没有将暴力行动列入议程。改组后的军国民教育会虽然将"起义"、"暗杀"列为进行方法，并派有归国运动员，但它还是一个成员流动性很大的松散的组织，并且设在国外。两会都不能完全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从1903年末到1904年初，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自然发展，国内出现了一批新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分布于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这些革命小团体中的一部分把发动武装起义或组织暗杀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它们的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反映了反清革命运动的普及和深入。

材料：

· 华兴公司

材料　华兴公司

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是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东乡凉塘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中。黄兴九岁入塾，十五岁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补县学生员，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这一年，光绪下诏变法，他极为关心政治的改革，同情维新运动。1900年，在武昌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密谋。1901年夏，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6月，被派赴日本，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爱好军事，课余聘请日本军官教授军事学，努力学习各种军事技能，准备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运用。1902年11月，他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笃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杂志，开始宣传反满和建立民主政治。不久，又设立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黄兴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是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的领袖。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中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预备往湖南、湖北和南京一带活动。

1903年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月底，离日归国。他先到上海和当地的革命分子计议革命活动的开展。这时，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在沪招聘教师，黄兴应邀回乡任教。途经武昌，他返回母校两湖书院演说，号召以改革政体来维护国家生存。知府梁鼎芬闻讯大怒，悬牌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坦然地将随身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等宣传品散发给当地军学两界，然后从容登舟。

1903年11月4日(夏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友人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洵、翁巩、柳聘农、周震鳞、胡宗畹等设觞为他祝寿。在宴席上，他们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了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华兴会的，还有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刘道一、叶澜、吴禄贞、李书城、易本羲、陈方度、李燮和等人。华兴会的骨干几乎全部都是在长沙及湖南、湖北一些地方的新式学堂的师生。胡元倓、龙璋等都支持华兴会的活动。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的文件。

华兴会的著名人物大半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的注意力侧重于研究夺取胜利的策略。黄兴根据他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不赞成模仿英法资产阶级从首都发难的办法——他称之为“中央革命”。他主张从一省首先发动，各省响应，最后推翻满清。他对华兴会成员们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合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黄兴提出的这种策略，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情势，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实际上都是采取的这种策略，只是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直捣幽燕”。

(摘自《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

英国人侵西藏

背景介绍

自从一八九四年三月亚东正式开为商埠以来，英国同西藏地方之间的贸易急剧增加。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贸易额，为一，一四九、一五〇卢比，比一八九〇年增加了四倍还多。这种形势极大地增大了英国垄断资本家们的奢望。当时西藏地方同祖国内地的贸易仍然占着主要地位，英国侵略者企图把这些贸易也争取到自己手中，以赚取高额利润。当然，英国侵略者不是单纯地考虑对西藏输出商品的多少，而是着眼于如何扩充整个对华贸易问题。由于列强在中国竞争加剧，英国对中国的总输出额已经开始相对减少。因此，英国侵略者妄图在西藏市场上得到补偿，即彻底打开西藏市场，不仅在西藏增加销售额，还想通过西藏把货物东销四川，北销新疆、蒙古等地。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业品既可从东南沿海流入中国内地，又可从西藏高原销售到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去。为了实现这个如意算盘，英国资本家们“急切地盼望大英帝国政府竭尽全力，或者与中国皇帝缔约，或者与大喇叭缔约，或者采取任何政府认为适当的其他方法，务期打开西藏的门户”。

列强在对外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总是并行的。英国资本家们在觊觎西藏市场的同时，对于西藏的物产更是垂涎三尺。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商会就毫不隐讳地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西藏的山羊毛和松软羊毛，主张把这种羊毛列为英国的主要进口项目，甚至建议其政府修筑以大吉岭为起点的铁路，以便把西藏的羊毛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英国侵略分子贺尔启迪在谈到西藏的金矿时曾说：“西藏的黄金不是‘丰富’的普通

字义可以形容的，它是特大的丰富——有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还要丰富。"正如列宁指出的："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来源，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几块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经分割了的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英国政府是英国垄断资本家的总代表，而垄断资本家们的利益正是英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英国政府基于英国垄断资本家的要求，制定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西藏的计划。

材料：

- 拉拢失败
- 边界文章
- 悍然入侵

材料一　拉拢失败

英国侵略者效法沙俄，企图用抛开清政府直接拉拢十三世达赖的办法，把西藏从自己的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据荣赫鹏供认，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英国侵略分子就大造舆论，胡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殊无异徒有虚名"，"实际上已不存在"。从一八九九年秋开始，英印总督寇松勋爵"以不断之尝试，谋与藏人直接交往"。他们首先利用不丹驻大吉岭代表乌金噶箕"当为经商事游历西藏"之便，带去英印总督致十三世达赖的信，要达赖派高级藏官到印度谈判。一九○○年秋，英印政府又委派克什米尔官员与后藏噶大克噶本联系，通过噶本再次致书达赖。但"耽搁六个月之久，噶本把信退还"，原因是西藏地方"有条例禁止外国人闯入西藏，噶本不敢把信送去拉萨"。英印政府仍不甘心，特再派乌金噶箕致书达赖，"强调申明英国政府在对西藏关系中所表现的容忍"，"如果他们依然漠视我们关于建立友好关系的提议，则我们保留权利采取必要和正当的措施"。但是，尽管英国侵略者百般威胁，均未达到目的。十三世达赖接此信后，未经拆阅就原封退回，甚至"封面戳记，宛然尚存"。达赖申明不接受此信的理由是："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

拉拢达赖喇嘛的阴谋遭到失败之后，英国就清楚地认识到阻挡自己向西藏地方扩张，是作为中央政府和控制十三世达赖的沙俄。因此，英国就一面设法破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一面加紧同沙俄争夺西藏。正如后来荣赫鹏所追述的："倘于此时我人尚怡然不加抗议，而一任俄人在西藏建树其势力，则凡毗连藏境英属诸小邦，将以俄为亚洲真正强国，因而亦认为所当尊崇之国"。在英国看来，沙俄在西藏的扩张不仅会直接影响英国在西藏的利益，而且会使英国已经控制的喜马拉雅山诸国产生离心力。所以当一九○一年七月德尔智再次出现于俄国时，英国就向俄国提出质问。沙俄为了掩饰自己的侵略行径，曾虚伪地宣称：德尔智的"出使"俄国，纯属宗教性的，没有任何政治意义。虽然如此，英国仍然向沙俄提出了措词强硬的照会，声称"若发生任何可改变或扰乱西藏现状的活动，都是英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摘自《中国近代史简编》）

材料二　边界文章

从一九○二年开始，英印政府在中哲边界问题上大作文章。因为在一八九○年的《藏印条约》中对中国与锡金边界作了含混的规定，所以从一八九四年起，英国政府就曾多次照会驻藏大臣，提出勘查边界问题，妄图混水摸鱼，侵占中国领土。但是，经过几年的交涉，并无任何结果。一九○二年六月，英印政府竟派英国驻哲孟雄专员惠德，率军一百五十人，侵入西藏地方的甲冈地区，赶走当地的藏民，并擅自拆毁了一些地区的鄂博，另立界址。这一肆意吞噬中国领土的行径，引起西藏人民的极大愤慨，清政府也专门派员同惠德进行交涉。由于清政府软弱无力以致未能制止英国的侵略活动。

就在惠德率兵侵入西藏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年七月，上海出版的《中国时报》刊载了一则所谓中俄签订《西藏密约》的消息。尽管中俄两国政府都声明并无此事，但英国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对沙俄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力，必厚于俄之兵力"。沙俄也不示弱，指责英国在西藏所作所为是肆意侵略，并警告说："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变化，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英俄两国的这种唇枪舌剑，反映了它们对西藏的争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一九○二年初英日同盟的缔结，日俄在中国东北的争夺日趋激化，致使沙俄对西藏的侵略活动受到一定牵制。于是，英国决心武装入侵西藏。

英国在和沙俄进行宣传战的同时，积极炮制新的侵略西藏的计划。一九○三年一月八日，英印政府外务部向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写道："我们希望派一个英国代表团赴拉萨而不必征求中国的许可或请领中国护照"。这个代表团"应配备以武装护送队，足可以吓退旅途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反抗，并以保证代表团在拉萨的安全"。关于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报告中说："谈判不应仅涉及锡金边界的小问题，而应包括我们将来和西藏在商务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的全部问题"，其中也包括"英国派领事或外交代表常驻拉萨"。显然，英印政府在这里已经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再次武装进攻西藏的设想，企图用武力把西藏变为英国的殖民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报告中，以寇松为首的英印政府竟杜撰了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谬论，诡称达赖喇嘛"是西藏

事实上的以及合法的国主”；胡说“所谓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主张签订一个“以西藏为突出的缔约一方”的条件。这种任意捏造的“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奇谈怪论，是英国侵略者蓄意破坏中国主权，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举世皆知的事实，从而为它们武装侵略西藏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制造借口。

（摘自《英俄争霸西藏》世界知识出版社）

材料三　悍然入侵

早在一九〇三年四月英国已经窥见到沙俄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已无力过多地过问西藏问题。到这年的九月以后，沙俄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角逐已逐渐白热化，日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英国感到武装入侵西藏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就悍然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

荣赫鹏回到西姆拉后不久，一支强大的侵略军便正式组成，其中包括陆、骑正规军两千多人，工兵、民伕七千余人，配备了新式来复枪两千八百支，另外还配备有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开始，这支侵略军在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少将的指挥下，沿着从亚东通往江孜的大道，对我国西藏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由于英国侵略军的不宣而战和突然袭击，致使春丕、帕里等地相继失守。面对英军的野蛮进攻，藏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为保卫祖国和家乡而战斗。西藏地方政府也坚决表示反对英国侵略，一面发布征兵命令，一面急速调兵遣将和准备军火物资。一九〇四年一月四日英军攻陷堆拉后，遭到早已集结在骨鲁一带的两千名西藏地方军的阻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荣赫鹏伪装同意谈判，但当西藏地方军遵守协议，就地停火，并将用来点燃土枪的火绳熄灭后，英军却在麦克唐纳的亲自指挥下对驻扎曲眉仙角一带的西藏地方军发动突然袭击。西藏地方军仓促应战，“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伤亡达一千五百余人。在战斗结束时，英军“已不再是打仗，只是屠杀无力的人而已”。英国侵略者的狡诈和残暴在这次战斗中完全暴露无遗。

然而，西藏人民并未被英国强盗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对侵略军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战斗。在英军向江孜进攻的途中，沿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例如，当四月初英军占领康马后，当地人民利用黑夜，手持大刀英勇机智地袭击敌营，消灭了不少敌人。英国侵略军的铁蹄所到之处，几乎都会遇到人民的自发反抗。敌人承认这是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得上他们的例子”；“几十个人奋起猛攻比他们强大得使他们的斗争绝望的敌人，拼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一小部分被强征的农民，就会为保卫一个村庄全体战死，像古罗马的爱国者那样”。

（摘自《外国在西藏的扩张》中央编译出版社）

沈荩案

背景介绍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残酷杀戮。沈荩曾在刘锷所设的瘗埋局中主持工作，以掩埋无主尸骸。以后他作为《天津日日新闻》的访事居住京师。这家报纸托庇于日人，故敢登重要新闻。沈荩在京多方运动达官贵胄子弟，打探清政府的机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沙俄违背前一年同清政府签订的《东三省交收条约》，不仅拒绝按约撤兵，而且向清政府秘密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一）清国不可将东三省之地卖与或租赁于列国；（二）沿营口至北京之电线铁路，俄国可于其旁另自架设别线；（三）不论何事，清国于北清苟有建设，不得雇佣他国人；（四）营口海关税务，当使中俄银行管理，税关长必用俄国人，且令税关兼理检疫事务；（五）东三省地除营口外，不得开放为通商市场；（六）蒙古之行政组织不得有所变更；（七）拳匪乱事以前，俄国所得之权利，不得有所损害。”妄图永远霸占满蒙。沈荩使用侦探手段取得密约内容，知告《天津日日新闻》主笔方若，方若将其揭诸报端。于是激起全国爱国之士，特别是留日学生的强烈义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西太后严究泄密者，“群言沈荩之所为”。

沈荩在京期间，曾与已革翰林吴式钊、内务府员司庆宽有所结交。吴失职无聊，图谋开复，便乘机通过庆宽向西太后告密，说沈荩是谭嗣同的密友，有新党之目。在此前后，慈禧还收到密陈说贴一件，说沈即是庚子自立军起义的“富有票首逆沈克诚”，“潜隐京师……必有密谋”，请“设法诱拿”。慈禧闻之大怒，立命捕沈下狱，并欲将其处死。这年闰五月二十五日（1903年7月19日）沈荩在京被捕，下刑部狱中。

刑部审讯时，沈“自称系江苏人，名沈荩”，“坚称并非沈克诚”。为了得到质证，六月初五日（7月28日）张之洞致电署湖广总督端方，要其迅速资遣确实认识沈克诚之人赴京辨认，“以别真伪”。次日端方即特派主簿彭庆瑞，将弁学生守备马廷襄携带沈荩照片两幅即刻北上。但慈禧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处死沈荩了，为了不以显诛新党招致非议，六月初八日（7月31日）“夜出片纸，命杖毙，实暗杀耳”。刑部不敢违旨，将沈荩“就狱中杖毙，令狱卒以病死报”。《黄帝魂》的编者当年记述说：“君之死也，备极五刑，先以八人轮殴，至二时许，血肉狼藉，气濒绝矣，乃以帛勒之，既死而复刃其颈。”沈死后，“血肉狼藉于地，狱卒牵苏元春入，苏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

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故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

这一事件使得在华外国人极为震惊，当“苏报”案发后，他们以此为证说服在京各国公使拒绝清政府所提引渡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章炳麟、邹容的要求。

材料：

· 辜鸿铭为清廷的辩护

材料　辜鸿铭为清廷的辩护

先生：

鉴于不久前曾因北京处决一名革命领袖，而在外国人士当中引起了异常情绪和过激言词，我认为有必要以中国人的观点就这个案件作一自我克制的阐述。

在我看来，公众就这一案件对中华帝国政府的指控，可以分成三点：

第一，司法程序不正当；

第二，判刑过严；

第三，处决过分残酷。

现在，为了断定司法程序是否不正当，有必要了解案情的真相。真实情况是：沈克诚其人被控不仅犯了写文章进行诽谤和煽动叛乱的罪行，而且确系一个旨在推翻帝国政府的革命社团的领导成员，上述社团的成员确曾企图在1900年纵火焚烧武昌和汉口两座城市，为此，许多成员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阁下处死。沈克诚被捕后，在受刑部委任的法官提审时，不仅对其全部罪状供认不讳，而且公然扬言引以为荣。刑部据此判以死刑，并以全部提审过程奏请皇上降旨处决。但是刑部收到的不是通常的硃批处决谕旨，而是一道由军机处封交的廷寄，钦命将囚犯不是一般地公开处决斩首，而是立毙杖下。这道敕令就那样执行了。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我的一个能讲英语的学生告诉我的可靠消息，他是刑部郎中，是目击最后行刑过程的见证人。据他说，杖毙的敕令只在名义上执行了，实际上这个人是在挨了几棍子以后被用一条带子勒死的。

目前，按照中国的国法，皇上未经咨询皇家司法官员是不准下令把一个人处死的。未经咨询皇家司法官员，只凭皇上的专横意旨去惩处一个人，中国话叫做诏狱，相当于革命前法国统治者发出的拘票。中国这种诏狱治罪事属非法、违法，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专门阻止此类事情。当前所涉及的这一案件中，这种不通过内阁直接颁发廷寄敕令的干预行动，按照正常司法程序可以看作是皇上不当地行使其君权。但是，必须记住，在中国，皇上可以以一国之主的身份或别的理由驳回皇家司法官员所作的定谳，因为皇上的裁决是最高的法律。

由此可见，指责中华帝国政府司法程序不正常的鼓噪是十分荒谬的。人们记得在不久前的布尔战争中，一位被指控为倾向布尔人的英国妇女据说被非法逐出了非洲。当此案提交英国法律当局时，颁布了一项未经议会同意的敕令，支持放逐令的合法性。当时弗雷德里克·哈里逊先生以漫无节制的措词谴责英国内阁大臣们的违宪行为。但是我不认为柏林是哪一个德国国务大臣会想到要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总之，我并未听说英国政府因为英国内阁的这一违宪行为而被谴责为野蛮的政府。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对政治犯和犯煽动罪者判刑过严的问题。让我提出下列需要考虑的情况：

尽人皆知，香港和东京对鼠疫的预防措施之一是，把整个区域的建筑物，不管多么有价值，全部夷为平地，如有必要则全部用火焚烧。我想任何人对于采取这样严峻的预防鼠疫的措施也不会提出疑问的。现在按照中国人的看法，无政府主义是同鼠疫一样的坏，而中国这个国家把所有对正统权威的公然违抗看作是最危险的瘟疫，或者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病菌。因此，为了消灭一切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病菌，采取最强有力的严厉措施是必要的。中国的君主是最高正统权威的象征，而对于公然违抗最高正统权威者的惩治就是处死。中国宋代的伟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著中国史是一部关于中国合法政府历史的最伟大的标本著作，然而他在谈到审判一个政治犯的案例时写道：一家（即罪犯的家庭）哭何如一路哭（就是说遭受未惩办罪犯的后果之苦）。事实上，对罪犯实行不适当的和欠考虑的宽大，实际上就是对于吃这些罪行后果之苦的人们的残忍。

关于严厉惩办政治犯的问题，人们应该记得，布尔战争之后不久，有一个爱尔兰人，竟然由于犯了法律上认为的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还有，在辛丑条约中，列强要求对任何参加排外社团的中国人均应定罪处以死刑。因此，面对这些事实，我认为让外国政府出面干涉，以减轻对那些公开宣称要推翻中国现政府并谋杀所有满族的中国人的惩治，是荒谬而不合逻辑的。

最后，谈一谈处决残酷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指出两件事。第一件，根据中国人的观点，认为用棍子打死的严峻和残酷程度比砍头处死要轻，因为前一种惩处不会造成中国人感觉特别可怕的身首异处。但是为了免得中国人对事情的这一颠倒看法，被认为是荒谬可笑和难以置信的，让我再举一个看起来更为荒谬可笑和难以置信的外国人对惩治观点的例子。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个英国军官被作为间谍逮捕，判处绞刑。这个可怜的人苦苦哀求不要把他吊死，他宁愿听任一排士兵同时把他们枪筒内的子弹对准他的身体射击。的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欧洲式的军法处决是那样的野蛮而可怕，正如在欧洲人心

目中把中国式的乱棍打死的处决看得非常野蛮而可怕一样。

关于残酷处死的问题，我想提醒注意的另一点是，如果认为过于残酷和野蛮的指责只是就现在的这一案件而言，那么，这一指责不应直接针对中国现政府，而应指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法律是中国人民文化的产物，现政府不能对此负责。如果人们认为中国的法律残酷而野蛮，也不应该归咎于中国现政府，而应归咎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因此，在我看来，当前这种直接针对中华帝国政府的愤怒呼声，是反常而不公平的。

用现代欧美人民的道德观念来判断中国的法律，它无疑象是残酷的和野蛮的。但是在对有关中国人和他们的文明与刑罚的残酷性作出最后判断之前，我愿提出两点重要考虑。

第一点，中国刑事裁判制度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欧洲的裁判制度的基础，从杰里米・本瑟姆(边沁)以来，便单纯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即仔细盘算其利益和损失。用简单的话来说，现代欧洲惩办罪犯的动机，仅仅是希望阻止犯罪、保障社会安全使之不受伤害和损失。但是在中国，惩办罪犯的动机是对犯罪的憎恶。简言之，欧洲国家惩办罪犯是为了保护钱袋。在中国，国家惩办罪犯是为了满足国家正义的道德情感。欧洲法理学家全然不以道德上的是非感来看待犯罪份子，只是把这些人看作是社会上应被遣责的份子，必须采取对社会和国家损害最小而获益最大的方法予以铲除。与此相反，中国的法理学家把罪犯看作是应该被人憎恨的恶根，在制定惩办他们的法律时，以憎恨犯罪的道德感为指导，而这种道德感是必须满足的。在中国道德主义者看来，某些罪行是特别令人憎恨和骇人听闻的。所有具有健康道德感的人，都应该具有反对这种罪行的感情，因此，为了表现对这种罪行憎恨和恐惧的道德感，在中国有必要用残酷和野蛮的手段来惩处这种犯罪行为，否则那是不符合并非残酷的中国人的精神，而且也不符合并非不人道的中国文化的主旨的。

关于这一点，我想再进一步讲一讲。如果一种文化是否残酷和不人道，要以人类遭受的痛苦后果去判断，我认为，没有偏见又善于思考的欧洲人，在确定其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之前，当他睁开眼睛看一看现代欧洲的毁灭性战争机器给人类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时，就很可能迟疑不决是否使用强烈谴责的语言了。的确，象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讲的那样，当你考虑进口的鸦片使中国人民蒙受的痛苦时——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和挣钱养家的成员吸食鸦片，使他的妻子儿女所受的饥寒之苦——倘如你们考虑到这一切，那么据最近路透社报道，英国下院开始对于所谓中国残酷可怕地处决政治罪犯的歇斯底里叫嚷，就变成极端不合逻辑和荒谬可笑了。

最后，我想说明我不嫌麻烦地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不完全是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辩护，而是向外国人说明：他们错误地同情所谓上海的维新派是很愚蠢的。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中国真正的改革只能出自品学兼优的中国好人之手。但是这些被无知的外国人设法使他们成为英雄的所谓维新派，从道德上和智力上说都是病态的人。这些人正象我上面说过的那样，是受鼠疫或无政府主义细菌感染的人。必须承认，空口说说怎样处理这些被鼠疫和无政府主义感染的人最好，那是很容易的事。我个人并不认为目前当政者对这些维新派采取的措施，在现在情况下是最明智的。不过，这些措施是否最明智，那是留待这个国家的好政府的负责人去解决的问题。外国政府或外国人干涉这个问题，只能是有害的，而且会使事态恶化。我经常反复说过，指导外国人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一个原则是，如果外国人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尽到一个好政府的职责，那么外国人的一个简单的责任就是，允许中华帝国政府有充分自由和权限，去采取它认为是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最好的措施。比康斯菲尔德勋爵说过：除非一个国家现实有效的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个国家是不可能治理好的。外国人在中国应该支持的事业不是改革和维新派的事业，而是支持好政府的事业。支持好政府的事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各种可能的办法维护正统权威的权力。

(辜鸿铭)

历史内幕

"苏报"案爆发原因

"苏报案"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和刊登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重要章节。

这年六月，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出版。五月二十七日(农历五月初一日)，《苏报》发表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六月九日(农历十四日)，刊登了署名"爱读《革命军》者"(一说系章士钊的化名)所写的《读〈革命军〉》一文，并在《新书介绍栏》刊登了《革命军》广告。《读〈革命军〉》一文，热情赞颂《革命军》

"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儒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胀，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推荐此书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介绍〈革命军〉》说《革命军》"文极犀利，语极沉痛"，读了没有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号召四万万人都读《革命军》。六月十日(农历十五日)，《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所写的《序〈革命军〉》，热情赞扬《革命军》通俗易懂，说："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发其慚恚，虽嚚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指出革命"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二十日(农历二十五日)，《苏报》《新书介绍》栏刊登章太炎著的《驳康有为书》广告，指出康有为《最近政见书》主张立宪，议论荒谬，赞誉章氏《驳康有为书》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号召"凡我汉种，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二十九日(农历闰五月初五日)，《苏报》又摘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论说》栏刊布。

《革命军》原由柳亚子、蔡元培、张继，以及黄宗仰等人筹资，请大同书局出版。全书两万多字，分七章。在书中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强烈指出"中国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已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说："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之名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并以满腔的革命激情颂扬革命，称赞革命是神圣的宝物，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从而大声疾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号召人民要"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剑，建吾杵，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效法人三次、美洲七年"，与"爱新觉罗氏(清皇朝)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建立自由强盛的中华共和国。书的最后，充满信心地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是针对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新民丛报》)称《辨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二文所写，对康有为宣扬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皇上圣明"，"满汉同化"，"革命要流血"，"革命会遭致外国干涉"，等种种谬论，逐条予以驳斥，指出要挽救中国，"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必须进行流血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太炎在文中，还把康有为等尊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旗帜鲜明，措辞激烈，有力地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就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主要部分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了。

(摘自《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国侵藏战争内幕

一九〇二年一月英日同盟的订立，加强了日本与沙俄抗衡的力量，也为英国武装入侵西藏准备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英日结盟后不久，寇松就驰书伦敦，重申利用边界问题对西藏进行武装挑衅的建议。同年五月底，英国与布尔共和国签订和约，得以从南非腾出手来，把注意力转向亚洲。六月下旬，寇松遂命驻哲孟雄政治专员惠德带领英军百余人侵占西藏的甲岗。

在此前后，国际间出现了俄国与清政府订有密约，俄国在西藏获得了种种权利的流言。关于俄国遣人运送枪枝弹药来到拉萨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英印当局乘机制造印度面临北方威胁的舆论。在防俄保印的烟幕下，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寇松又上书英国政府，建议派代表团在武装护卫下强行进入拉萨，和西藏当局直接举行谈判，进行勒索。消息传出后，二月二日俄国驻英大使本肯道夫照会英国外交部，声称：俄国政府认为英国"远征西藏，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局势，从而促使帝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护俄国在该处的利益"。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于同月十八日面告本肯道夫："如果俄国派遣使团或远征队入藏，英国必定仿效，但它的实力肯定超过俄国。"尽管如此，英国内阁并未立即批准寇松的请求，原因在于英国这时还摸不透俄国对此举可能作出何等反应。害怕俄国在亚洲其他地方实行报复，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正如二月二十七日汉弥尔顿复函所说："在接到俄国政府的说明之后，英王政府才能更适当地决定和中国谈判的范围，以及有关保护印度抗拒外国势力在西藏所造成的任何危险的步骤。"沙俄方面，这时为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正积极备战，增兵远东，这就不可避免地牵制了与英国在中亚角逐的力量；另外，由于它公然违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停止从中国东三省撤军，不断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与国际舆论的遣责，在外交方面也陷于孤立，所以准备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与英国妥协。为此，本肯道夫于四月八日向兰斯敦保证：俄国没有同中国或西藏或任何别的方面订立关于西藏的条约，也没有派任何代表团去西藏，并且也无意派代表或代表团前往该地。同时，他表示俄国

"不以西藏为目标",但希望"维持西藏现状";如果西藏现状遭到重大扰乱,俄国必将起而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不是在西藏而是"在亚洲大陆其他适当的地方"有所行动。接着,本肯道夫表示赞同兰斯敦的下述意见:如果"藏人不履行条约义务",英国有"绝对必要"坚持自己的权利。这就是说,俄国不反对英国为维护"条约权利"在西藏采取"必要"的行动,但如果英国进而改变西藏地位,则俄国将在西藏以外的地方谋取某种"补偿"! 这是此后十余年间俄国对西藏问题的基本态度。

由于弄清了俄国政府的意图,英国政府于四月二十九日授权英印当局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并单方面指定西藏境内的干坝宗为谈判地点。据此,寇松于六月间派出荣赫鹏为首的代表团,率领武装卫队三百余名强行越界前往干坝宗。英国当局见俄国政府对此并无反应,又于十一月六日批准英印武装"使团"可进占西藏的江孜,并诡称英国此举将不导致"占领或以任何方式长期干涉西藏事务","一俟获得补偿,使团立即撤退"。次日,兰斯敦将上述决定通知本肯道夫。又过了十天,本肯道夫才奉命"提醒"兰斯敦,"英军侵入西藏领土,势将引起中央亚细亚局势的严重扰乱",俄国政府对此表示关切。兰斯敦对俄国大使避而不谈本国对满洲的真实意图,却高谈西藏不可侵犯的原则感到"惊讶不止",并反唇相讥说:"如果俄国政府有权指责我们为了取得西藏人的赔偿而采取进入西藏领土的步骤,难道我们无权针对俄国对满洲、土尔克斯坦(此处专指新疆。——引者)、波斯和别处的侵犯,而使用某种语言吗?"本肯道夫无言以对。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向哈丁表示:"俄国政府准备考虑把阿富汗、西藏以及与印度接邻的所有地区视为英国的完整的势力范围",并提议双方就利害攸关的各项问题认真进行协商。十一月二十五日,兰斯敦表示同意,但要求俄国承认阿富汗、西藏、锡斯坦和波斯南部属于英国的"利益范围",并保证不向西藏派遣自己的代理人;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认俄国在波斯北部占有"一定的优势",并"承认俄国作为与满洲为邻的大国,有理由在满洲享有优越利益",但俄国应履行自满洲撤军的诺言。事实表明,英、俄两国正打算就共同瓜分中国、波斯、阿富汗,开始进行一揽子肮脏交易。

英、俄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与同年八月间开始的日俄关于划分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的势力范围的谈判几乎是平行进行的。俄国的西藏问题上对英国表示"让步",实际上企图拉拢英国,孤立日本。但英国却决定继续支持日本,认为它自己"可以悄悄地远征西藏,而不必对俄国有太大的顾虑"。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中旬,英国当局在确信日俄战争已经逼近,料定英军入藏不会遭到俄国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悍然下令英军越过中印边境向江孜推进,挑起了大规模的第二次侵藏战争。

(摘自《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

关于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是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的许多革命团体之一。这个会的组织很简单,人数也不多,成立的期间又很短,容易被人遗忘,但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有的也起过相当作用。现在尽我所知,追述如下。

当一九〇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依照条约的规定,除在京津等处留驻部分军队外,其余大军都已撤退,惟有帝俄进驻我东北的军队,借口地方事件,尚未退出。国人深为愤慨,纷纷提出撤兵要求,其中尤以留日学生的运动声势最猛。他们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了一个对俄同志会,始而要求政府对俄提出抗议,要求政府对俄绝交;继而又要求出兵东北,同时表示要组织义勇队,全体会员一律参加。上海进步报纸对此大加鼓励。同时,日本报纸也企图利用中国民间的反俄情绪,以造成它们的有利局面,因此对这种运动,也从旁大力鼓吹。清廷驻日使节不知怎样弄到一张名单,就说这都是革命党,将要报告政府严办,以图吓唬学生,平息风潮。那知青年人的爱国情绪不但压制不住,反而越是压制越加高涨。有些激烈分子丢开了同志会,暗中结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取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这个会的会章的文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用的是黄帝纪元。那时我们年纪很轻(我参加时未满二十岁),没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大家一致的认识仅仅是:非打倒清朝政府不能救中国。至于打倒清朝政府之后,需要一个什么形式的国家,在谈论中虽然不无涉及,但都没有过深入的讨论。那时有的同志说:这时候只能讲破坏,不能讲建设;讲到建设,问题太多,不易一致,也就不易团结发展了。有一次黄克强先生到了日本,我们邀他到会为会员们主盟,公同歃了一次血。他除了一些鼓励的言语之外,也未谈到什么将来的建设问题。

会员们在日本时,曾有过三方面的活动。首先是学习射击。会员中的一些青年人,相约每星期同到东京九段坂的体育会去学习步枪射击一次,后来因纷纷投入陆军学校,只得停止了。其次是学造火药。一部分会员凑了少数的钱,在横滨租了一处山顶上空阔僻静的房屋,由一个略懂化学的胡晴崖同志,弄到了些原料和器具,几个同志就在那里试造棉花火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些门径,忽然轰的一声,杨笃生和苏凤雏二人的双目都被火药气熏伤,不得不潜回东京医治。学造火药的尝试也就此停止。再其次是宣传活动。会里没钱办刊物,会员们就利用当时各省留学生同乡会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之类,来从事宣传活动。我记得杨笃生在《新湖南》,董鸿祎在

《浙江潮》这两个杂志上都作了一些文章。另外还有过一个时间很短的《江西白话报》,是少数人主办的,会员张世膺就是主要的执笔人。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历史考证

关于苏报案的论争

苏报案结束后数年,章炳麟、吴稚晖等当事人,又为此事展开了一场论战,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由于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无法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以致苏报案的发生经过蒙上了一层曲折神秘的色彩,使后人对此案的真相,反而增加了疑惑及误解,甚或偏重于一方的意见,而忽略了较客观的证据。为了对苏报案能有进一步的了解,现将论争的经过,略予介绍,以资参考。

案发前夕,章炳麟及吴稚晖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冲突而互闹意见。而笔战的开始,乃源于1907年间章炳麟在日本印行的《革命评论》第10号上发表《邹容传》,对吴稚晖颇多微词,又于吴氏会晤俞明震一事,作如下的叙述:

明震故爱朓〔吴稚晖〕,召朓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书》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

意谓章、邹二人入狱,实为吴氏所陷害。是时吴在法国,蔡元培在德国,见到章氏的文章,颇为愤慨。蔡乃撰《读章氏所作邹容传》,为吴剖白,谓章氏的疑惑,不过是他本身的神经作用而已。但吴氏不拟拖累他人为这场笔墨官司费神,未将蔡文刊出(现收入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中),自己于1908年1月1日写了一封短信去质问章氏,谓《邹容传》中所云如有所本,请将出诸何人之口,明白见告,以便直接与其人交涉,若为想当然语,亦请明言,即不再追究。这信刊于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周刊第28号。章氏回复,谓吴氏献策一事,系张鲁望所言,"鲁语不知得自传闻,抑亲闻诸俞明震者",但以诸事引证,足见其不虚。此外,又讥吴氏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此信刊于《民报》第19号。吴乃于4月17日撰文反驳,追问"张鲁望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屡询留欧同人,无知之者,新从东方来之人,亦不之知;请再明示。并请问明张君彼又闻诸何人?"还指责章炳麟被拘后在捕房内作书招邹容、龙积之二人,始赫然留苏报案于人间,刊于《新世纪》第44号。至5月29日,章再复信辨驳,说"张鲁望乃一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至其语所从来,仆何必问。"又说"《革命军》为慰丹所著,仆实叙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刊《民报》第22号。吴再于7月23日驳斥,信刊《新世纪》第63号,章复于8月13日致吴一信,全文见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笔战至此,始告一段落。

综括二人往来信件,吴氏苦苦追问证人何在,希望章氏所说是"想当然",而章氏则往往不作正面答复,因此辩论终无结论,加之双方态度愈来愈偏激,甚至语出谩骂,长此下去,亦无了结之时。章所主编的《民报》与吴所主编的《新世纪》,同是当时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竟因苏报旧事,导致内部攻讦,诚为革命人士之中一件不愉快的事。章士钊曾是苏报主笔,于吴、章二人均有交谊,又以为民党应当一致对外,乃于1913年6月26日晚上请吴、章等至沧洲别墅二号寓所晚餐,希望为此事释嫌。当时大家俱客客气气,心照不宣。此后,吴以为章氏的《邹容传》必已改作,不料1923年在北京见《章氏丛书》内所收《邹容传》原文依然存在,极为愤恨,决意替他编"集外文",又在次年1月11日《民国日报》上刊出一文,自明了一下。章士钊也在《新闻报》上说了几句较为公道的话,谓《革命军》与《驳康有为书》"时已流布江湖间,并非奇谋阴计,何待有人密陈,俞始晓洽。吾兄(章)身在狱中,张琴饮醪,不无闷悒,言偶不检,本可相原。先生(吴)旷达,早未介意。不谓吾兄不检之文字,弟子辑《章氏丛书》,未即削去,致先生疑其故相刍狗,意大不甘。"又鉴于"阋墙之迹,丑诋之词,张之只益吾羞",最后劝吴,章太炎文集由他去好了。事件始再度平息。

不料1935年间,蒋维乔写了一篇《中国教育会之回忆》,送《东方杂志》发表,提及苏报案旧事,引述章炳麟的见解,并伤"稚晖至今,莫能自明"。吴稚晖因而写成《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长达五、六万字,详细说明苏报案始末、他会晤俞明震的情形、他与章炳麟交恶的原因及论争的经过等,亦送交《东方杂志》,两篇文章同时刊于第33卷第1号。吴文刊出后,直至翌年6月间章炳麟病逝为止,未再见有答辩之文。

1943年吴稚晖有《上海苏报案纪事》之作,文中有若干误记,如俞明震为"明夷"等。十数年后,章士钊《疏黄帝魂》一文,指责其"装模作样,丑形毕露"。虽则非议吴氏为

人，但对其“横被叛党卖友嫌疑”略予开脱：“平心而论，太炎辱骂稚晖，有其过当处，例如请安吃面，吃面稚晖自道，请安则谁见之？吾料稚晖行为卑下，应犹不至如是。”这是当事诸人中所写关于“苏报案”的最后一段文字。而今，他们都已过世，所撰文字虽不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都成为研究苏报案的珍贵资料。

(〔原载《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10月版，有删节〕周佳荣)

风 云 人 物

洪 全 福

洪全福(1836－1904)广东花县人，原名春魁，字其元，又号梅生，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侄。自幼跟秀全到广西，金田起义后随军转战湘、鄂、皖、浙、晋，封左天将、瑛王、人呼为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当厨师，后在广东东莞洪屋围村安家，晚年隐居香港，行医为生。

洪全福年事虽高，雄风犹在，遇有知己，辄畅谈天国遗事，人所钦佩。他曾挂名于香港义和堂行船馆，在广东、香港的会党中颇有声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结识了从澳洲回港居住的侨胞谢日昌，时相过从，成为挚友。日昌是老资格的三合会会员，他的儿子谢缵泰是香港兴中会的重要成员之一。缵泰从其父口中得知洪全福“昔日在太平天国时之战功”及其在会党中的势力，也与洪相结纳，并决定由洪出面组织力量，夺取广州。因缺乏经费，一时未能着手。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洪全福与谢缵泰讨论攻夺广州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香港兴中会员，富商李纪堂的支持，李愿意承担全部经费。全福“喜跃异常”，并言能召集洪门兄弟一致奋斗。此后，洪、谢、李三人便分头着手准备。

洪全福在香港德忌笠街设总机关，委兴中会员梁慕光、李植生在广州设立机关，其中重要的有三处：即同兴街的信义洋货店，花埭的信义公司，芳村的和记公司。芳村有德国教堂作掩护，是广州的总机关和总仓库，洪全福等在这里贮备了大批军装、食品、刀斧等物资。另遣人四出招募队伍，所委人之中，有檀香山老兴中会会员宋居仁，他以传教为掩护，在江北一带组织队伍。此外，洪全福还联络了惠州、东莞、香山等地的会党、绿林及著名“盗魁”刘大彪等武装力量。

在香港，李纪堂负责购置武器，谢缵泰则向中外名流寻求支持，其中有维新名士容闳、《泰晤士报》记者摩利逊(G. E. Morrisan)、《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 H. Prid)。但没有同孙中山及在港的兴中会负责人陈少白联系。谢的朋友，曾任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主笔的洪孝聪，协助洪全福起草起义文告。

腊月二十三日(1月25日)洪全福和谢缵叶再次离港，经澳门前往广州组织起义。后入香山布置一切。就在洪全福离港的同一天，因沙面陶德洋行的奸商告密，港英当局搜查了洪全福的德忌笠总机关，查获了起义告示，往来信件及所谓“会党簿据”等物。两天后，广州当局根据香港方面提供的线索，查抄了芳村等处的机关，查出大批军用物资及起义者收藏在城外各处的武器。洪全福、梁慕光从澳门、沙面购买的武器也在运送途中被截走，还有梁慕义、李伟兹、梁慕信等十余人被捕。起义遂告流产。

事败后，洪全福剃去胡须，化装逃走，隐于九龙。因遭粤督悬赏通缉，乃改名浮萍，走避新加坡。后因喉病返香港就医，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病逝，终年69年。

(摘自罗明主编《清代人物传稿》)

谢 缵 泰

谢缵泰(1872—1937)，字圣安，号康如。原籍为广东开平，生于澳大利亚悉尼。父亲谢日昌“在澳洲经商数十年，有商店曰泰益号，营出口货贸易。少属洪门党籍，夙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谢缵泰则“幼承家训，恒以继述父志为务”。他本人后来记述：“我父亲是澳洲中华独立党领袖。当我约十二岁时，他对我讲述满洲鞑虏残暴征服中国的故事，于是我就发誓长大以后回国，决心将满洲鞑虏驱除出去。”

16岁时随家迁居香港。在域多利书院读书期间，谢缵泰开始思考和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并结识了不少书院内外年轻有为的爱国者。这使他“认识到时机已经成熟，正可谋划和组织一场中国大众的革新和驱除……满洲鞑虏的运动”。毕业后于港英政府公务局和洋行任职，进一步展开了社会政治活动。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他与杨衢云等十余人组建爱国进步团体辅仁文社，成员大都为受过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杨衢云被推为会长。救亡和变革是他们的宗旨，“尽心爱国”则是他们的座右铭。

辅仁文社的成员很快就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另一批居留香港的青年志士相结识。谢缵泰对孙中山的印象一开始就不太好，但是，“宗旨相同”还是把他们维系在一起。二十一年(1895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遄返香港与辅仁文社成员商讨合作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事宜。“缵泰与杨衢云首赞其议”。于是组建了包括部分辅仁文社成员的兴中会总机关，就近策划在广州发难。谢缵泰承担了对外宣传事务，他取得了港英政府议事局局员何启的支持，及香港《德臣西报》编辑英人黎德、《士蔑西报》编辑英人邓勤允诺赞助，刊登宣传性文字，争取外界的同情。谢缵泰自己也发表了致光绪皇帝的公开信，并参与了兴中会对外宣言的修订。对于革命党人筹划的首次起义，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只是比较突出的宗派倾向已经在他的活动中显示，而且有所滋长。在推举兴中会会长职务时，谢缵泰极力拥杨反孙，使得争论激化。由于事机不密和部署失误，广州起义流产。孙中山、杨衢云等逃亡海外，“缵泰留港办理善后”。

谢缵泰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关系密切。广州起义失败后，谢缵泰在光绪二十二、三年(1896－1897年)间多次与康有为、康广仁商议合作问题。这种预拟中的携手显然排除了孙中山等，而只限于原辅仁文社成员与维新派之间。康广仁在讨论中公然指责孙中山“铤而走险”、“轻举妄动”，断然表示不能与孙“合作”。待到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等逃亡国外后，谢缵泰依然同他们保持联系，并告知远在南非的杨衢云，促其东返时到日本会见梁启超。直到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后，谢缵泰才予以谴责并中止了联系。此后，他又酝酿组织统一维新党，藉以网罗革命党人和维新派，协调分歧和矛盾。二十五、六年(1899—1900年)间，杨衢云将兴中会会长职务推让给孙中山，谢缵泰则主张由维新名士容闳出任会长，“谓以老成硕望如容者，出而领导群伦，可免各种纠纷”。只是由于自立军失败，事遂作罢。在这期间，他还援救过原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后者因与蔡元培等通电反对西太后的废立阴谋，被迫逃至澳门，复被清廷诬陷而囚于葡狱。他继续进行宣传工作，曾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形象地展示出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影响颇大。稍后，谢缵泰又参与了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的准备活动。出席过孙中山在香港海面舟中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但他没有停止过“单独干事”，他的分裂倾向在惠州之役失败后更为严重。

谢缵泰决意再次发动武装反清斗争。事实上，他在惠州起义发动前就已准备“第二次夺取广州”，并与洪全福——他与会党关系密切，兼有军事经验——开始筹划。二十七年(1901年)秋，谢缵泰等制订了斗争方案，决定事成后由容闳担任临时政府总统，洪全福负责军事方面，李纪堂担任筹款，谢缵泰和谢日昌居中协调。以大明顺天国为名的这次起义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会党习气，但在《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申明纪律告示》、《安民告示》等主要文件中，仍含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如宣布起义“系专为新造世界”，“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经过二、三年的准备，大体就绪，他们遂定于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在广州发难，乘清吏齐集万寿宫庆祝时，聚而歼之，然后夺取省城，北江等处响应。由于消息泄露，港穗所设立的机关遭到破获，举义流产。

起义失败后，谢缵泰深受刺激，从此脱离了实际政治活动，既不愿协同孙中山等继续战斗，而自身又缺乏足够的力量。他同英人克银汉等合办《南华早报》，进行宣传。1924年他追述生平，用英文写成《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刊于《南华早报》，提供了有关兴中会的宝贵资料。晚年经营实业，因缺乏资金而无甚发展。1937年4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6岁。

（摘自罗明主编《清代人物传稿》）

邹　容

邹容(1885～1905年)　邹容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

邹容出身富商家庭，6岁进私塾，少年时爱读史籍、小说，从中吸取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营养，并由前人的反清兴汉斗争史迹中，萌发其反满为主的民族主义思想。他12岁参加县童子试时，即有拒考的反抗行动。维新运动时，阅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书报，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极敬佩谭嗣同，曾作诗悼念其被害，还以继其志自勉。就读重庆经学院时，因“指天划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而被开除。

1902年，邹容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认真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较系统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之影响。

邹容积极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活动，并拟建中国协会。1903年，他在东京留日学生春节团拜大会上，作“大倡排满主义”之演说。这是他明确选定走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标志。此后，他是有会必到，到会必演说。1903年3月31日夜，邹容还邀约同学，痛打破坏留学生革命活动的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并剪其发辫，以示惩罚。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他还参照西方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着手编写《革命军》。

1903年4月，邹容回上海不久，即加入“爱国学生会”。4月27日，在张园拒俄大会上，他慷慨演说，反对沙

俄侵略中国东三省。对保皇派组织“国民议政会”，进行了坚决斗争。还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此时，他撰成两万余字的《革命军》，揭露清政府反动卖国罪恶，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该书由章炳麟作序，柳亚子等筹资于1903年5月末在上海正式出版。《苏报》曾刊文介绍。这本书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它为孙中山制订同盟会纲领作了理论准备。这是邹容为创立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巨大贡献。

《革命军》的问世，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取代改良思想而成为时代主流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高涨的重要标志。中外反动派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而惊惶万分，因此，制造了“苏报案件”，章炳麟被捕，邹容自到巡捕房投案，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二年。1905年4月，这位仅20岁的青年革命家，死于狱中。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而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曾印数达百万册以上，确实发挥了“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沈沦”的作用。

（摘自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

冯子材

冯子材(1818～1903)　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字南干。小商家庭。幼年失父母，习武闯江湖。1850年，冯子材聚众于博白县起事。第二年受清廷招抚，先后隶属于向荣、张梁麾下，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历任副将、甘肃西宁镇总兵、广西提督。1864年清廷赏给穿黄马褂，后又赏给骑都尉世职。1861至1878年，冯子材三次应越南政府邀请出关作战。1882年受刘坤一等排挤，解甲归田。1884年为抗法敌举办钦州地区团练，后为广东省高、雷、廉、琼团练督办。1885年守镇南关，大败法军，并乘胜出关追击，扭转了中法战争的战局。清廷晋升冯子材为太子少保。1887年冯子材受命镇压黎族人民起义，任云南提督。1894年清廷赏尚书衔。冯子材顾募旧部2万，北上抗日。八国联军向津京进犯期间，冯子材多次奏“请募劲旅入卫”，清廷未许。1901年转任贵州提督。1903年病死于镇压会党起义的南宁军营中。

冯子材的历史功绩在于镇南关大捷。冯子材是在谅山弃守、潘鼎新率部退到镇南关时，赶到镇南关与潘鼎新共商战守的。但潘鼎新认为广西军足以守关，叫冯子材另守东路。1885年2月23日法军来犯，广西军溃败，镇南关一度失守。25日，法军在当地军民重击下退出镇南关。冯子材又与潘鼎新商议战守。这时潘鼎新才同意冯子材的建议，于关内10里的关前隘设置防御工事，筑长墙3里余，墙外掘堑沟。在关前隘东岭、西岭各筑炮台多座。3月23日法军又进犯镇南关，冯子材率萃军英勇反击。冯子材以帕裹首，短衣草履，手持大刀，于阵前高呼：“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随及令守军打开栅门，身先士卒杀出长墙。其子相荣、相华也随父冲锋陷阵，杀得法军狼狈逃窜。冯子材乘胜追击，在几日之内收复了文渊州、谅山、长庆、观言桥等地，推进200多里，“擒斩法酋六画至一画数十，法提督尼格里重伤，法之精锐尽歼”。黄遵宪作《冯将军歌》曰：“马江一败军心慑，龙州压地贼氛压！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镇南关——谅山大捷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拒力，使侵略者大为震惊。法国茹弗里内阁因此垮台。“自此以后，中国在外交场中将不再被认为‘不足道’了。”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岑春煊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1861年3月2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生于广西西林县。其父是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岑幼时随父在昆明；1879年入居北京，与瑞澂、劳子乔有“京师三少”之称，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1885年中举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

1894年中日战争发生，岑被派至钦差大臣刘坤一处差遣委用，时刘坤一在山海关督师，不久岑被派驻扎山东黄县。次年因病开缺回广西。1898年因送幼弟赴礼部试到北京，受光绪召见一次。当时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岑迎合光绪的心理，说了些“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的话，受到激赏。8月特授岑为广东布政使。两个月以后，又调任甘肃布政使。

1900年6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时岑正在兰州，闻讯后亲率马步兵二千余人，长途奔驰，赶到北京“勤王”。7月抵北京。不久通州失陷，慈禧、光绪仓惶西逃，岑率所部赶到南口“护驾”，慈禧派他为前路粮台督办。由于这番“勋劳”，岑升任陕西巡抚。

1901年3月，正当八国联军侵入山西边境时，岑春煊被调任山西巡抚。岑上任伊始，即下令撤走娘子关、固关守军，“以示讲和诚意”。为了讨好侵略者，他迅速“清理”教案，预拨银两发给教堂教士，并以此配合主和派奕劻、李鸿章在北京的乞降活动。

翌年，慈禧、光绪自西安回北京途中，特命岑春煊随同回京。7月岑奉调任广东巡抚，未及成行，又调署四川总督。他9月到成都，血腥镇压了四川义和团余部及哥老会会众。

时广西官逼民反，群众纷起反抗贪官污吏，全省动荡。岑于1903年4月改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督师

梧州，前后三年，屠杀了大批反抗群众。后来成为两广军阀的龙济光、陆荣廷就是岑此时提拔起来的。次年，慈禧命岑兼任粤海关监督，他派员“认真整理”，一年中征得税银六百六十万两，超过户部规定每年五百万两的定额。

岑深得慈禧信任，比较“敢于言事和参劾官吏”，为当权的庆亲王奕劻所忌。时袁世凯正与奕劻结纳，力助奕劻排斥岑。奕劻与袁合谋，于1906年10月调岑为云贵总督，以便攫取两广财富之区。岑知其谋，乞假往上海就医，延不赴任。1907年3月岑忽奉旨改调为四川总督，他知仍系奕劻与袁图谋，乃径入京，面见慈禧，密陈奕劻贪庸误国，自称愿为慈禧“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命岑为邮传部尚书，留京办事。

奕劻与袁必欲设法离间慈禧对岑的信任。1907年5月以钦州地方的“扰乱”，广东请兵，再外调岑任两广总督。岑甫抵上海，即闻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政治上益感孤立，正在南下途中，奕劻与袁又伪造岑与梁启超合照，称岑与康、梁勾结，，欲谋归政光绪，慈禧信以为实，遂将岑开缺。

1908年，慈禧、光绪同时死去，岑在上海私寓闻讯，“举哀成服”。不久，他的政敌袁世凯也被罢斥，于是岑乃暂居上海，以观时局变化。

1911年，革命形势高涨。四川掀起保路风潮。清廷令岑立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他正准备前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又任他为四川总督。他还打算“征兵选将，筹集饷械”，取道陕西入川，对抗革命。但是眼见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于是见风转舵，电请清廷“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1912年任岑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袁又任岑为汉粤川铁路总办。“二次革命”发生前，岑适在上海，曾和王芝祥等人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遭到袁世凯拒绝。于是，他便与黄兴、陈其美、章士钊等联系，随即加入到倒袁行列，被推为大元帅。袁世凯把岑的汉粤川铁路总办免职。接着岑到广东去活动龙济光倒袁，无结果。国民党人反袁失败后，岑亦被袁通缉，乃逃亡南洋。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非常国会推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但陆、唐都没有宣誓就职。陆荣延和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分子相勾结，把岑春煊抬出来与孙中山对抗。

在桂系陆荣延以武力作后盾的情况下，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政客们就着手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把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借此排挤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于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8月21日经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为主席总裁。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沈荩

沈荩（1872—1903），原名克诚，字愚溪、渔溪、禹希、愚公，潇湘渔太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廷玠，父允镇，世居江苏吴县洞庭西山，咸丰年间，入湖南经商，遂落籍善化。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沈荩与长沙志士舒闰祥“纵谈天下事，常镇日不休”。舒闰祷，字菩生，优廪生，与唐才常为至交，后随父宦游湖北。不久，沈荩也到了湖北，结识了当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嗣同对他特别器重，向父亲推荐，“使任抚辕文巡捕”，还充任“候补县丞”，因而居鄂多年，“于鄂中绅官士庶，以及兵勇下流之人，皆能通其声气”。

光绪二十三、四年（1897—1898）间，维新运动逐渐走向高潮，湖南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一个省份，沈荩和谭嗣同、唐才常往来密切，与他们“间有所规划”。但他认为只靠文字鼓吹不解决什么问题，“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显示出更为激进的色彩。他向南学会捐赠了一批书，都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诸如《营工要览》、《前敌须知》、《开地道轰药法》、《克虏伯炮弹图》、《克虏伯炮弹造法》、《行军测绘》、《营城揭要》、《营垒图说》、《临阵伤科捷要》等，表明他对军事知识的关注。

戊戌政变，谭嗣同血染京师菜市口，唐才常与沈荩誓为之复仇。只因时机未熟，无所凭藉，遂东渡日本就商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唐才常还通过湖南志士毕永年，认识了孙中山。当时康、梁正力谋起兵勤王，把唐才常视为徐敬业，答应在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孙中山也支持唐才常的起义计划，并把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联络的会党势力介绍给他。在日本的许多维新志士也都踊跃回国参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沈荩与唐才常、毕永年等以上海东文学社为掩护秘密组织正气会。该会以“忠君爱国”相标榜，又宣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了激进的维新志士们既要反满又要勤王的矛盾态度。不久，正气会因“正气二字，含义狭隘”而改名为自立会，“用以联络沪上一班维新志士”。时值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华北兴起，帝国主义各国以“代戡拳乱”为由组织侵华联军，大局岌岌可危。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为词，约请上海维新志士百余人开国会于张园，公推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副之，唐才常为总干事。沈荩参与其事，并被推为干事。七月初一（7月26日）中国国会在上海愚园正式成立，自立会并于国会，自立会所联络的会党武装自立军也属国会统带。国会“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其条规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沈荩闻组织新政府之言，“以为天下事大有可为”，故“主持一切交通之力甚大”。

上海国会召开之后，唐才常、林圭在汉口设立军事机

关，将自立军分为七军：大通为前军，秦力山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璇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沈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统之；另设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自任诸军督办，定于七月十五日（8月13日）各路同时大举。后因准备不周，款项不济，推迟于二十九日起义。但大通前军未得展期军报，如期发难，无援而败。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晨张之洞在汉口包围起义军机关部，逮捕唐、林等二十余人，并于当晚将他们杀害于滋阳湖畔。沈荩闻讯，"亟起发难于新堤，而崇阳、监利与湖南临、沅、潭等邑，群起响应。时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师遂溃"。于是沈荩冒险返回武昌。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张之洞大肆搜捕党人。沈荩因平时不喜为文，没留下什么证据，匿于友人舒闰祥家中，得无恙。数日之后，潜行上海，旋即北上。当时八国联军已占据京津，西太后挟光绪西逃。沈荩"杖马箠走天津，与联军诸将士往来"，谋借洋人之力消灭满洲顽固派，"假太阿于暂人兮，烹千胡而啖其肺"，据说庄王载勋、启秀之流，皆死于沈荩笔札之间，"其志将除满人，使无遗育，以建设支那政府"。当时的反清革命家章炳麟评论说"功不卒就，其过勤王什伯，荩之进化，速乎哉！"

对于沈荩之死，上海西报舆论"皆言满政府之惨虐"，影响很大的《浙江潮》发表专论，指斥杖毙沈荩是清政府"极惨礅不仁之暴政"，"血肉横飞，哀呼宛转于槌杖之下，又满政府待我汉族之方法"，号召全国同胞"秣马厉兵，以与满政府宣战"。因"苏报案"正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慨然赋诗云："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英雄出隐沦。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七月初一日（8月23日）上海革命派人与爱国志士数百人在愚园召开追悼大会，宣读了章太炎的《祭沈荩文》，该文并以《上海公祭沈愚溪国士文》为题发表在《国民日日报汇编》上，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应，"于是舆论愈激昂，而热血愈腾涌，几若全国一致，以奔满洲，势汹汹骤不可禾阏。西人至谓：'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日俄开战尤当。'"

（摘自罗明主编《清代人物传稿》）

珍闻轶事

章太炎、邹容为何没被清廷判刑

在"苏报案"整个审讯过程中，清政府一直密谋移送案犯。原先，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处置，曾设想"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但当时上海道袁树勋与候补道俞明震向领事团请求签票协捕时，发生了周折，后经交涉，"苏报案"犯虽经捕获，但只能在租界审办。所以在章、邹等捕获后，清政府又提出移送案犯问题。七月四日（农历闰五月初十日），内阁大学士张之洞致电湖广总督端方，指示"飞电福开森，务须设法即日将五人点交上海道解宁，勿稍迟缓，致令狡脱，并缉两魁。"十三日（农历十九日）清政府又颁发上谕："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仍须设法押南京，毋任狡脱。"十六日（农历廿二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再次派遣候补道俞明震来沪，与上海道袁树勋协商移送办法。上海道袁树勋于二十日（农历廿六日）带着两江总督魏光焘书信，拜访驻沪美领事，陈述了自己受总督"不能立即将六犯移送，押解苏州惩办，则以撤职问罪"的严责，乞求美总领事应允。次日，袁树勋又在领事团会议上，诉说了政府勒令两江总督将案犯移送南京的训令，要求领事团给予支持。英、美领事表示："如清朝方面必须移交，则诸人当送往处决"，但是，工部局为维护"租界治权"，坚持"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这样，移送问题在地方交涉未能成功，转入清政府与公使团直接交涉。

各国公使对待移送，意见各不相同。法国公使杜卑尔表示"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帝俄钦使拉萨氏认为《苏报》"诸人者，欲在中国举革命之事，废去满洲王室，实为大逆不道"；比国公使更主张"应交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曾拘人时，既订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英国参赞为维护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及在上海租界的独特地位，坚持"诸人不应交于华官"。美国钦使康格为取得更多的在华特权，持折衷态度，认为"法公使谓应将《苏报》诸人交于华官，甚为合理"，但又主张"现在各领事既与上海道立约，将苏报馆诸人在租界审明施罚，则应照约办理"。由于意见不统一，最后，仍然委责上海领事团处理。

在清政府与公使团交涉移送的同时，上海道袁树勋企图采用武力劫持，派遣清兵五百，解去号衣，潜伏新衙门后，伺机劫以入城。因捕房戒备森严，押送途中，每人又有英捕陪坐，前后还有全身武装的英捕护卫，街巷隘口有巡捕守卫，致使上海道劫人计划无法下手。上海道还曾用银十万两行贿美领事，三百元贿赂工部局，企图求得移送案犯，但均遭拒绝。

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的移送阴谋，立即遭到国内革

命舆论的猛烈抨击，《中国日报》严正宣布："外交团若决定将罪犯引渡，应予以反抗。"当时，上海街头谣言纷纭，亦暗示如外交团决定移送，六犯将逃逸等等。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移送"阴谋终未得逞。

复旦大学前身——震旦学院开办记

震旦学院本来是中国人所办，由于与天主教法国耶稣会有一些关系，后来被法国传教士霸占；当中国人退出后，就变为法国耶稣会所办的震旦大学。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提倡新学。梁启超为了办一所译学馆，通过法国驻华使馆介绍，请中国天主教徒马相伯主持其事。后因慈禧复政，办译学馆一事遂告中止。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制以后，社会办学的风气盛行。马相伯建议蔡元培从南洋公学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学习拉丁文，共20多人。2月底学院成立，定名"震旦学院"("震旦"二字取东方光明及前途无量的意思)。3月1日正式开学。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为校舍。马相伯自任院长，手订章程，实行学生自治。项微尘为总干事，郑子渔为会计干事，各科教授则由教会诸长老义务担任。所定课目有：语文学、象数学、格物学、致知学。1904年春，学生增加4倍，马相伯就请耶稣会会长协助，会长乃命调在安徽传教的传教士南从周到上海担任该院总教习。1905年春，南从周乘马相伯病假期间，大变其办学方针，另订一套极端专制的管理办法，并把学校大权抓住自己手中。学生们大为愤怒，拒不从命，相率离校。马相伯也愤而辞职，率领全体爱国师生在江湾另立新校，定名"夏旦公学"(含"光复震旦"之意)。1905年9月13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开学，马相伯自任校长，李登辉任总教习。1917年改名复旦大学。原震旦学院则于1932年定名震旦大学，1952年并入他校。

(摘自《中国大博览》北京出版社)

流　行　风

杂文《革命军》

作者邹容，主要内容如下：

《革命军》共分七章，两万余字。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了清政府，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清朝是一个卖国政府，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清朝统治者"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压榨我，""若昭信票，推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为何？轻税之为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因此，只有打倒卖国残民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可能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而要打倒清政府，就必须革命。他指出"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号召人们要奋起革命，"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剑，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同清政府"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他主张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反复强调对人民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之教育"，使之懂得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懂得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合理性，懂得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念，通过"文明之革命"，"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由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书的末尾，邹容激情满怀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

小说《官场现形记》

作者李伯元，主要内容如下：《官场现形记》五编十六回，写于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这部小说一问世，即风行全国，影响极大，鲁迅分析其原因是："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骤享大名"。这就是说，李伯元对清朝官场的龌龊卑鄙作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正好宣泄了人民群众对统治集团的切齿痛恨，所以激起了千百万人心弦的共鸣。

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是卓越的。它站得高，看得深，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把当时官场群丑的丑态，照得纤微毕露，无所遁形。所以此书一出，时人被誉之为"照妖镜"，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切的。

这部小说不仅给官场"现形"，更深一层的是揭示官僚群的丑恶灵魂。高标程朱理学的巡抚傅理堂竟结识妓女，养了私生子又不认帐；炮船管带冒得官为保官位则假

装寻死胁逼亲生女儿献出肉身供上司淫乐；何藩台卖缺得贿，与胞弟分赃不匀竟至耍赖打架；纨袴尹子崇为盗卖安徽全省矿产，居然串通和尚，欺骗岳丈徐大军机会见洋商签订契约；知州王柏臣为多捞一季钱粮漕米外快而匿瞒父丧；俨然武将的张国柱为谋遗产竟冒认毫无瓜葛的死人为亲老子……总之，一切亲属关系也变成了交易买卖的肮脏关系，森严的封建道德观念在铜臭熏蒸下碎成齑粉。讽刺文学家以极大的注意力去观察了这种污秽的心灵世界，并且形象地再现出来，揭发了这个统治集团不仅政治腐败，而且道德情操也极端堕落，也就明示出：这个末代王朝实实在在是一个破烂得不堪收拾的废墟。

《官场现形场》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漫画笔法来刻划官僚群的各种形象，藉强烈的夸张来凸现其本质性的丑恶，这等于撕开其翎顶辉煌的外衣，豁露其狼心狗肺。它让畅快的笑声来煽动广大读者否定现实、力求变革现实的激情。

这部小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

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如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官场”与“洋场”两个角度反映现实，描绘的生活面极广，在读者中影响之大竟到“妇孺能道之”。

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写他帮助一个厌恶仕途终于弃官经商的朋友吴继之从事商业，将他在各处所见所闻的“怪现状”贯串成书，小说最后以商业大失败终局。

这部小说描写主要人物吴继之的弃官经商，从另一特异角度表现了封建统治的衰落，也颇有典型意味。在当时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乃是天经地义，晚清官场更视作官为一本万利的买卖。吴继之不仅内有奥援，而且家财丰盈，富有钻营升迁的资本，但他却“永远避开仕路”，去大规模经营商业，他的看法就是：“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吴趼人笔下出现这个新鲜的人物形象，比之李伯元的只以夸张的讽刺笔墨来暴露官场黑暗，更富有批判意义，因为它表示了对统治机构更大的失望和鄙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要求，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一翼，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它是作为改良派要求变革社会的希望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吴继之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就折射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意识的某些变化，官场里已发生了新的离心力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吴继之惨淡经营的商业竟以大失败告终，这个悲剧性结尾也饶有深刻的意味：在封建势力笼罩下，要发展资本主义，终于会成泡影，零散的资本主义微弱势力是挡不住封建僵尸的重压的。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特色是暴露了洋场众生相。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一角，这是个糜烂得疮痍满目的一角，蕴伏着社会的深重危机。展开小说里描绘洋场的部分，犹如看到了魍魉世界，这个世界里呈现了那些善棍、赌徒、骗子、掮客、瘟官、强盗、惯窃、斗方名士、小报文氓、江湖劣医、洋办买办、外国冒险家的种种丑态，他们为所欲为，如同毒菌无孔不入。作家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群魔乱舞的怪现状，也就本质地揭示了那个社会的垂死状貌，客观上提示了变革的迫切性。

小说《老残游记》

作者刘鹗，主要内容如下：

《老残游记》描绘的生活画面是：一场水灾，两个酷吏。虽则触及的社会生活面不广，但开掘极深。刘鹗以亲身治河的经历，逼真地描绘出了黄河决口吞噬几十万百姓的惨绝人寰的图景；十几万户家破人亡，侥幸未死的也是流离失所。作者塑造了沦为妓女的一对异姓姊妹作为典型，对这场天灾人祸作了血泪斑斑的控诉：这场灾祸大半是人为的啊！河政腐败，“三年两头的倒口子”，光绪己丑年(1899)这次“治”河，就是那些“总办候补道王八旦大人们”、“不通世故之君子”以及那貌似慈祥心实乖谬的庄抚台暗中议定了“废民埝，退守大堤”，狠心举起了“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几十万人埋葬在洪水里，活着的妇女则被推进了“一天没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的妓家火坑里。这场水灾的描写可说是极富典型意义的，也是开掘到了相当深度的。刘鹗陈说其塑造两个自命清廉的酷吏形象的主观意图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这样的立意，对暴露与抨击清廷统治机构是极其有力的。刘鹗刻划两个酷吏的艺术手法是别致而深刻的。因为这种酷吏既然披着“清官”外衣，显然不宜采用夸张的漫画笔法去勾描的，刘鹗重在写实：一是侧面烘托，二是正面揭发。他一方面细致描写民间的恐惧，渲染“苛政猛于虎”的气氛；另一方面是精选典型的细节，暴露两个酷吏罗织罪名的恶毒和滥施极刑的残忍。这样侧面与正面相结合的精雕细刻，所谓“清官”的本质就豁显无遗了。

此外，刘鹗写景状物的艺术技巧也颇卓越，如“明湖居听书”、“黄河打冰”、“大明湖”、“桃花山月下遇虎”几个

片断，历来脍炙人口。阿英认为《老残游记》在晚清小说中是最能写实的，他说刘鹗所以能有此种成就，当是比较接近西洋科学故，或说乃其头脑科学化的结果。

小说《孽海花》

作者曾朴，主要内容如下：

这部小说的情节超越了中国现实生活的领域，描写了德国、俄国和日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以热情赞颂的态度描写了日本革命者和俄国"虚无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一些章节。小说中也出现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名字，并且述说了他们与俄国初期革命运动的关系；也借小说中人物毕叶的话，宣扬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如此广博的见闻与敏锐的眼光，在当时小说中实为罕见。虽则曾朴正面肯定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和虚无党的恐怖刺杀手段，现在看来并非正确的理解，但在二十世纪开初几年，刚刚传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对鼓舞推翻清王朝是起过积极作用的。曾朴能够把这些人物和思想作为正面形象传之于国人，启示当时读者睁眼看世界，可谓极显惊人的胆识，也说明他是勇于汲取异域新思潮，这个成就是超越当时小说家的水平的。

更值得彰扬的是，在二十世纪开头的谴责小说中，《孽海花》是第一部以同情态度来描写民主革命的作品。曾朴警辟地提醒大家正视中国的现状，"看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并表示痛恨这个"专制政体"。他又写史事来呼吁国人警觉："只要看元世祖原是个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长的国度，一朝霸占了中国，我们同胞也自帖耳摇尾的顺服了九十余年，你们想想如今五洲万国，那里有这种好说话的百姓，本国人不管，倒教外国人来耀武扬威；多数人退后，倒被少数人把持宰割。"这还只是以"蒙古"影射清王朝，接着在第四回里干脆公然叙说"满洲入关之始，亡国遗民起兵抗拒"的史事，甚至在描写革命党人演说的情节中更露骨地提出"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国政府"的召唤。在清廷淫威之下，竟公开宣扬如此强烈的种族革命主张，这实在是不寻常的。《孽海花》还塑造了孙中山、陈千秋等革命者的形象，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活动，尽管写得还不够血肉丰满，但这在晚清小说中实是个大胆的创举。

小说《负曝闲谈》

作者欧阳钜源，主要内容如下：

这是一部广泛暴露晚清社会的小说，空间的跨度极大，描写了江、浙、广东三省以及北京、上海等地许多生活的横断面，而以揭示官场昏庸与假维新人物丑行为中心铺陈情节，若断若续，实际上是由许多短篇联缀而成长卷。作者描写手腕不弱，诸如武官怕强盗、知县枉断案、西崽敲竹杠、纨袴斗鹌鹑、科场烧猪头、妓院讲哲学、庸医弄花巧、祝万寿骗钱、流氓讹路人、旗人摆架子、穷御史借债等各种有趣的情节，虽则着笔不多，却刻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描写假意鼓吹维新以招摇撞骗的黄子文，最显刻划入微，写他吹牛、嫖妓、碰和、偷窃无所不为，后来以办书局译新书为名，骗取了厦门富翁田雁门几千洋钱，却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置老母于不顾，被妓女亦讥讽为畜牲，终于钱财挥霍尽净，负债累累，只得逃之夭夭。这样从一个人物开掘，刻露其形相，颇类似对人物典型化的初步尝试。看来，作者对当时一批假维新人物是深恶痛绝的，不过，他并未能把这些人物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考察其本质，只是单纯地形容其丑行，见识似比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略逊一筹。此外，值得一提的，如描写清廷军机处内幕、广东花艇的风味、北京相公堂子的格局、保和殿殿试的情景，笔致都颇生动，足见作者才调不弱。

诗《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

诗《爱国歌四章（选一）》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
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
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
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梁启超）

诗《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章炳麟）

目瞑负多疚，长歌招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

（邹容）

诗《和西狩》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论。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历史档案

洪全福讨清檄文

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天赐为声罪致讨事：

案查满清者，乃西胡之鄙族，而东辽之小邦也，政等虎苛，性同狠毒。当多尔衮渡江之后，乘吴三桂战疲之余，顺踞京城，逆戕明裔，托词讨贼，恣志杀民。嘉定则屠戮全城，稂苗尽剃；扬州则惨杀十日，玉石俱焚。迨耿、尚之南征，成桂、粤之奇祸：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脉渠中，四万众残生莫保；君臣无罪，骈首受剥洗之刑；妇孺何辜，坦胸任干戈之刺。呜（呜）呼惨已！能勿凄然?！乃复外托仁慈，阴恣狼毒，藉口轻徭簿（薄）赋，肆意吸髓敲膏。汉民则尺布寸丝，既征厘复征税；满人则暖衣饱食，女不织男不耕。晋爵则汉卑而满高，授官则满多而汉少。凡此多偏之政，应为不平之鸣。况今日者：义和拳之乱，乃满官酿之，非我汉人之咎也。而割地尽属汉土，赔款征自汉民；颐和园之建，乃清廷所居，非我汉人所到也。而初筑八百万，复修六百万，款项不足，税厘重征。货物之价既昂，田房之捐继起。民不堪命，已同涸辙之鱼，君尚晏安，安异怡常之燕。明颁节用之诏，暗恣挥霍之豪。西陕回銮，东陵谒驾，耗费者数百万；北京修殿，南海葺园，拨款者千余万。呜（呜）呼！赔款交逼，民悲避债无台；浪费任性，君喜宴游有所。良心何在，苛政频加。是以民怨繁兴，群思拨乱反正；用能天心感应，迭生水旱瘟蝗。此正天亡满清之时，即为天兴我汉之候。

本将军应天顺人，吊民伐罪，邀集豪杰之士，爰举义旗，务灭满清之政，重兴汉室。为此，檄饬军民人等：须知天命攸归，可见人心所向，无失风云际遇，各秉精忠，伫看日月之重光，务清妖孽。其各知之。

须至檄者。

大明国元年　月　日

（摘自《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德寿等为已将洪全福格毙等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三十日

省港会匪勾结谋逆，先将访查破案，起获军装、粮食各情形，于正月初四日电奏。奉旨：仍著严密访拿匪首洪春魁、梁慕光，务获惩办；至私藏军火之和记公司，著一并查明究办。等因钦此。

二月初七日，续奉电旨：梁慕信系梁慕光胞兄，如果知情同谋，应与监禁之伙犯多名，速即讯明正法。等因钦此。

查去年腊月搜获逆信内，有赴惠州路程单，各匪亦惠州人居多，诚恐由港赴惠，踞省上游，先经电告惠州文武严查防堵。讵本年元旦，博罗县南门外贴有伪示，与查获刊就伪示相同。数日间，惠城各乡匪徒麇集，焚杀抢掳，势甚披猖。当经严饬各营分路防剿。获匪供称：均由香港潜来，本与省城各匪约期并举等语。复经添调总兵孔祥达一营赴惠，以厚兵力。先后拿获逆党头目黄谭福、李锦华、林富传、陈东生、钟亚冠、陈亚晚、邱亚发等及伙匪四十余名惩办，匪势略靖。省城先获匪党梁匝、苏亚居等十余人，又获梁慕光胞兄梁慕信，隔别研讯。其谋叛逆首为洪春魁，即洪全福，伪号三千岁，寄迹香港，富有资财。在省招人运械，系梁慕光。纠党办事各匪，为刘玉歧等十余人，各招匪党数百人、数十人不等。约定腊月三十夜，在城内放火为号，齐攻省城。其附省北路之大头目为刘大彪，允招三千人，先攻城外制造局，抢取军火。嗣以逆谋败露，遂各逃窜。当饬司道督同印委各员，覆提现获各犯逐一勘讯。据匪兄梁慕信及匪党刘玉歧、苏亚居、叶亚幅、陈学林、何亚萌，均各供认听从纠党谋逆不讳。禀经批饬正法枭示。余匪或须研鞫，或讯未同谋，分别监候待质，惩办发落。刘大彪系著名剧盗，曾悬赏银三千圆，久未弋获，因饬营员、团绅设法觅线，将刘大彪枪毙，由县验明戮尸枭示，余党亦即解散。

首逆洪春魁等逋逃洋界，前经电致驻英钦使张德彝，商之英外部转达港督，设法处治，毋任容留。现准复电，英

外部已允照办。正在密饬水陆各营购线访拿间，适该逆首洪春魁即洪全福，于本月二十六日潜回内地。经营员访明，跟踪围捕，当场格毙，搜获全福之宝金牌一面。将尸身运省，由县提犯指证确实，戮尸枭示。

至私藏军火之和记公司，乃梁慕光所开之信义店，均已由县查封，惟前起军装数千件，粮食千余箱，独无枪枝、子码。迭饬营县严查，仅于番禺县大墩头乡起获洋枪百余枝，增城县属新塘河面截获枪码万余粒。讯据匪供：港、澳禁运军火，付银定购，一时不能交足。现将起获军装发局存储，干粮等件给营犒赏。仍饬各营、县严拿梁慕光及各伙匪等，务获惩办，并将详细情形另行具折奏报外，所有惩办逆匪，地方安靖缘由，陈乞代奏。德寿、李兴锐谨肃。三十。

（摘自《清德宗实录》）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

长素足下：

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nìng，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在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冠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棣附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藉言天然，则禘祫海藻，享祧暖蛙，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殽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后，彼"圣主"所长虑郤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祇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借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百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

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为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曏(xiàng，向)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章炳麟白。

(摘自《章氏丛氏・太炎文录初编》)

革命军(节选)

不文以生，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游海外，留经年。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及思想间所不平者，列为编次，以报我同胞。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欤？虽然，中国人，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晒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生于地下有灵，必笑曰："后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

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三月，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第一章　绪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乾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魂，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掏摝，过昨日，历今日，以象现于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合汇，以同归于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宝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痒痒。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百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乎！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siá，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旙，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勗，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摘自《革命军》邹容著)

警世钟(节选)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份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州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欢喜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的，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步田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把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儿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真呀！真呀！真呀！中国要瓜分了！瓜分的话，不从今日才有的。康熙年间，俄罗斯已侵入黑龙江的边界；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吉利领兵三千六百人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许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才讲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岛[属广东省]，又前后赔他银子二千一百万两。从此那传教的禁条也解了，鸦片烟也任他卖了。照万国公法，外国人在此国，必依此国的法律。那时中国和英国所订的条约，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官员不能惩办他；就是中国人的租界，也不归中国管束，名为租界，其实是英国的地方了。又各国于外国进口的货物，抽税很重，极少值百抽二十，极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只由本国做主，外国不能阻他。独有英国在中国通商，值百抽五，订明在条约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国允许了不可。并且条约中还有利益各国均沾的话，所以源源而来的共有十六国，都照英国的办法。从此中国交涉的事，日难一日，一切利权都任洋人夺去。亡国灭种的祸根，早已埋伏在这个条约里了，可怜中国人好象死人一般，分的奴隶还不算，还要做他们的牛马；做了他们的牛马还不算，还要灭种，连牛马都做不着。世间可耻可羞的事，那有比这个还重些的吗？我们于这等事还不知耻，也就无可耻的事了。唉！伤心呀！

杀呀！杀呀！杀呀！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

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俗语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人，连狗都不如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快呀！快呀！快呀！我这人人笑骂个个欺凌将要亡的中国，一朝把国势弄得蒸蒸日上起来，使他一班势利鬼，不敢轻视，倒要恭维起来。见了中国的国旗，莫不肃然起敬，中国讲一句话，各国就奉为金科玉律。无论什么国，都要赞叹我中国，畏服我中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我这全无知识全无气力要死不死的人，一朝把体操操得好好儿的，身子活活泼泼，路也跑得，马也骑得，枪也打得，同着无数万相亲相爱的同胞，到了两军阵前，一字儿排儿，炮声隆隆，角声呜呜，旌旗飘扬，鼓声雷动，一声喊起，如山崩潮涌一般，冲入敌阵，把敌人乱杀乱砍，割了头颅，回转营来，沽酒痛饮，岂非可快到极处吗？就是不幸受伤身死，众口交传，全国哀痛，还要铸几个铜象，立几个石碑，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世间万事，惟有从军最好，我劝有血性的男儿不可错过这个时代。………

（摘自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

西方公使对"苏报"案的看法

我亲爱的莫理循：

关于昨天我写给你的信中所谈的《苏报》案一事，我后来见到满思礼，他告诉我庆亲王已拍电报给南京总督，大意是外务部注意到了道台建议的安排（即上海地方行政长官应就地审理此案），批准此事按所拟办法处理。满思礼的意见是，如果我们现在设法使此案从这一点重新开始，会拖长时间而不利于整个案件，此外，也将触怒萨道义。我从满思礼的意见中推测，他所以提出这样蹩脚的程序，是为了避免使他同道台坐在一起，因为严格说来他必须那样做。然而在现在情况下，接受这个建设程序要比惹出新纠纷和谈判好一些，因此我正要电告你"不要做任何事情"。我已经得到满思礼的承诺，利用此案力争向会审公廨派去较高一级和负有较大责任的地方行政官。我务必使他们明白地记录下来，此案的确构成在租界召来县地方行政官，或承认县地方行政官在租界有裁判权的先例。就我猜想到的而言，由满思礼提出这一程序，一定是已得到萨道义的同意并为各国公使所接受。所以满思礼说他们可能对现在又提出质问感到恼怒。因此，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尽量让我们的代表们一无所知。除了蠢驴以外没有人会拥护象这样的倒退措施，但是我们或许能够防止它造成更大的损害。中国人的策略是很清楚的：使人看起来对人犯的审讯和惩罚好象不是出自会审公廨长官之手。如果他们不把这种做法作为明显可借以损害租界的方式的先例，那么让他们用这种办法保全他们的面子也不会有多大害处。

霍必澜到这里来，我真衷心感到高兴。同满思礼打交道就好象同爆炸物住在一起，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做出愚蠢透顶的事情来。

法国政府现在为了文明的惯例和人权，采取了大胆的立场，已指示它的代表们不要交出《苏报》案的人犯！如果个人总是象国家愚弄他们那样愚弄他们自己，他们将为此吃更大的苦头。

你真挚的

约·奥·珀·濮兰德

（摘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

答和事人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日）

顷有自署和事人者，颇以近日《新民丛报》主义相诘责，兹录而答之。

阅《新民丛报》三十八、九号，得读大作，知从美洲回来，宗旨顿改，标明保王，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吾知足下素来强辩，未易与言，但欲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于心有所不安耳。（中略）足下力辟革命，亦自成其说，吾不能与之深辩，但试问命则不能革，而王则可以保乎？大抵保王与革命，两党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尝有异也。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国来也。痛宗国之沦丧，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势必有谓为无父无君之邪说，以摇惑人心，中立者必将解体，盖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也。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于建立也。而足下力辟其非，天下之人，将尽信其非矣，于足下有济乎，抑无济乎？古来英雄办事，未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更无有剔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况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

骂，互相攻讦，则旧人得所借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今日者祸机愈迫矣，瓜分荐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两党人合力而思挽回之术，亦不可得矣。必有彷徨瞻顾，痛哭流泪，归咎于今日兴讼者，悔之无及矣。子其思之，忍以天下为儿戏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为何许人，读其言，则必为一热诚爱国之士，无可疑也。其所谓命则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诚今日我四万万人最盘根错节之大问题也。此问题甚长，非此短篇所能毕其词，愿以异日。至其末节所云云，谓强人使与己意相同，谓剔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实非鄙人所敢受也。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已同者。吾尝论中国人之性质，最易为一议论所转移，有百犬吠声之观，有水母目虾之性，虽其所论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谓奴隶之本质终不免。吾方以是为一大缺点而深疾之，而岂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谓剔人之非，是固然也。顾所剔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岂敢隐？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

至云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云云，此诚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此亦当为一国所共谅者。试观去年春夏间，报界之所以相诬攻者若何，吾党曾一置辩否？又如香港某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认列强为第三敌，认满洲政府为第二敌，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矣。夫使以笔墨挑战也，则吾辈亦何患无辞？试观鄙人及我亲友，曾有一应敌之师否？非直不屑为，亦以义固不可也。且如顷者章、邹最后之供词，各报馆之啧有言者亦众矣，而本报并其原语亦不肯录入，诚以敬其初志也。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已，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者，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惧。

（梁启超）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留日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演说，到会千余人，刘成禺、马君武等演讲，宣传反清。

1月5日　清廷派溥伦为正监督，布置中国博览会，准备参加 1904 年美国博览会。

1月15日　清廷命袁世凯充督办电务大臣，至是盛宣怀把持之电报局为袁世凯夺得。

1月18日　前德使克林德纪念碑坊成，命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

1月28日　洪全福、谢赞泰等谋广州举事，事泄失败。

2月7日　北京旗兵千余名，交由袁世凯督练。

2月8日　清廷命荣庆、张百熙管大学堂事务。

2月17日　广西起义军延及湖南，湘抚调兵防堵。

3月13日　张之洞、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命政务处会同礼部议奏。

3月　营口夹皮沟六合拳，浙江衢州、广西宣化群众起义。

4月8日　俄国交还营口到期，及期违约。

中国留日女学生胡彬夏等“愤女学之衰败，慨女权之摧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共爱会”。它是中国争取男女平权的第一个爱国妇女团体，其章程规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充分体现出中国妇女同胞“兴我国于已亡，拯斯民于涂炭”的爱国精神。中国妇女界的爱国活动，自此也日渐活跃起来。

4月11日　大学士荣禄死。

4月22日　清廷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参订商律。

4月25日　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法斗争，亦称拒法运动。1902年，广西人民不断举行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广西人民起义，请求驻谅山法军协助镇压；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许以“平乱”后以广西全省路、矿权益作报酬。这一消息使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绅商极为震动。4月25日，留日学生举行大会，并致电清朝政务处和两广总督，声讨王之春“借法款、法兵”的卖国罪行，要求将其撤职治罪；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同时致电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同日，中国教育会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张园举行集会，反对借款、借兵。这一斗争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响应，形成国内拒法运动。迫于全国舆论压力，清政府将王之春撤职。

4月27日　寓沪各界绅商以东三省新约事，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俄国改约。

4月29日　广西南丹地方陆亚发起义军占土州，清廷命桂军与黔军进攻。

由留日学生秦毓鎏、叶澜等发起，在东京召开大会，到会者4500余人，决定组成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占领军作战。当场有200余人报名参加，女留学生则组成赤十字会，参加随军看护工作。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制订了《学生军规则》，正式编成队伍，公推蓝天蔚为队长，黄兴为副队长，下设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设四个分队。天天进行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抗俄。清政府获悉后，勾结日本政府于5月8日勒令解散义勇队。5月11日，一部分较激进的留日学生，不顾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将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反清革命。

4月30日　京师大学堂学生会议，疏争俄约。

5月11日　留日学生钮永建、秦毓鎏等通过会则，正式成立军国民教育会。

5月12日　清廷命王之春督办广西边防。

5月14日　军国民教育会派钮永建等由日本回国。

5月21日　云南个旧地方人民阻止法国修滇越铁路，官军前往镇压。是日，蒙自锡矿主周云祥率众起义，占临安、石屏州。

5月　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革命军》由章炳麟作序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全书2万余字，分为7章。作者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调，通俗易懂的文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问题。作者从革命的正义性谈起，对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方法和革命的前途，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它揭出革命大旗，说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进行武装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新的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革命军》虽是一本小册子，但它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革命名著。刊行后，辗转翻印20余版，流传很广，销数逾100万册。教育了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5月　湖北革命党人、兴中会会员吴禄贞等人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相互联络，开展革命活动。一批初具进步思想的青年经常来此聚谈。虽无正式组织形式，但已隐然形成一个革命团体。其主要成员曹亚伯、冯特民、李书城、蓝天蔚、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时功璧、周维桢等人，在湖北以及其他省份的革命运动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聚会虽仅短短几个月，但在湖北军学两界均造成相当大影响。亦引起清政府警惕。由于清政府采取釜底抽薪办法，将聚会成员陆续遣调各处，至1904年春，花园山聚会的骨干大都离鄂，聚会也随之解体。

6月4日　清廷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

6月9日　“苏报”刊登章士钊所作“读革命军”一文。

6月10日　俄使见庆亲王、要索新约七条，庆亲王拒绝。

6月25日　广西起义军占东兰州。

广西起义声势愈来愈大，清廷命前贵州提督冯子材，会同岑春煊办理广西军务。

6月27日　清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再行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

6月29日　上海“苏报”登载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6月30日　因苏报案章炳麟等人被捕下狱。7月1日邹容自投入狱。

清军占广西南丹土州。

7月1日　清军占临安府城，周云祥起义军失败。

上海英领事遣译员会讯苏报案。

7月7日　苏报馆被封闭。

清廷以广西军事失利，将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革职。

7月10日　经济特科保荐人员在保和殿考试。

7月14日　是日起，连日大雨，各河同时盛涨，东平

州、费县、平阳、东阿、阳谷等州县遭水灾。

7月19日　沈荩(沈克诚)在京被拘。31日被清政府杖死于刑部。

8月2日　考取经济特科者,一等为袁嘉谷等九名,二等为冯善徵等十八名。是日清廷予考取者"升叙有差"。

9月3日　浙江宁海县王锡彤聚众焚毁教堂,杀教士及教民。

9月7日　清廷设立商部,以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

10月6日　清廷准张之洞奏拟定出洋学生约束章程一款,奖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

10月8日　是日为驻东三省俄军退兵第三期,俄军不如约退兵。

10月9日　清政府因上海爱国学社宣传革命,命各沿海沿江督抚严拿并认真整顿学堂条规。

10月28日　俄军复据奉天省城,清朝将军增祺被锢。

11月3日　奕劻、袁世凯、张之洞会议拒俄策。

11月4日　黄兴等成立华兴公司。

11月6日　会办广西防务前贵州提督冯子材死。

12月5日　驻藏大臣电告俄在西藏某镇筑炮台。

12月11日　江西峡山县李有棠著辽金二史纪事本末一书,赏给内阁中书衔。

12月12日　商部代侨商张煜南奏准举办潮汕铁路。

清廷命岑春煊总统广西诸军。

12月20日　袁世凯劾张翼擅售开平煤矿及秦皇岛口岸于外人,清廷命将张翼先行革职,仍勒限收回。

12月24日　上海会审公廨宣判章炳麟、邹容永远监禁。

12月30日　电告各省,如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

文　教

1月29日　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办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用省区命名并由同乡会主编以它为首创。该杂志为月刊,32开本,四号字排印,每期100余页,共出版8期。自第6期起改名为《汉声》,另外还出版了一期增刊《旧学》。其栏目有论说、学说、政法、教育、军事、经济、实业(农学、工学、商学)、理科、医学、史学、地理、小说、词薮、杂俎、时评、外事、国闻和留学纪录等。编辑及发行者有王璟芳、尹援一和窦燕石。编辑者还有刘成禺、蓝天蔚、张维煦、李廉方、但焘、程明超、李书诚、李步青、李熙、金华祝、范腾霄、周维桢、左德明、卢慎之、余德元、王式玉、周龙骧、刘道仁、张鸣藻等。这个刊物除在武昌、上海和日本横滨分别设立总发行所外,还在湖北、上海、北京、天津、湖南、浙江、江西、四川、江苏、广东、山西等地设立了30多个代派处,销路很广。《湖北学生界》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宣传民族独立,抨击君主专制制度,鼓吹民族民主主义、思想激进,观点鲜明,文字浅显,笔峰犀利。它对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湖北的学界和军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2月17日　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浙江潮》杂志,它是一个革命倾向较为显著的刊物。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主要撰稿人除上述5人外,还有陈槐、陈威、何燏时、沈沂、鲁迅等。刊物定期于旧历每月二十日发行,至1903年12月8日,共出10期。内容分社说、论说、学术、大势、时评、杂录、文苑等栏目。刊名《浙江潮》,是用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后来的事实证明,它的气魄和声誉确实无愧于它的名称,积极宣传民族革命思想,是留日学界积极鼓吹革命,反对保皇邪说的重要刊物之一,在当时的影响较大。杂志发刊后,很快风行国内外,每期都印5000册,而且有几期还重印过多次。

3月1日　法传教士创办的震旦大学成立。由马相伯发起,自任总教习。预科一年,本科两年卒业。

3月29日　江苏留日学生创《江苏》杂志于日本。

4月27日　天津北洋大学正式开学。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创设天津中西学堂,又名北洋西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校。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头等学堂设有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5科,学制4年,性质属于专科学校,毕业后可升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为普通中学性制,学制也是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停办。1903年4月复校,改称北洋大学,设有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课程,成为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辛亥革命后校名曾多次改变,如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改为北洋工学院。抗日战争初期并入西北联合大学,迁往陕西。1946年迁回天津,恢复北洋大学校名,设有理工两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天津大学。

4月27日　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张謇创设的通州师范学校,在江苏南通开学。张謇自任总理,制定了"艰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分设本科(四年)、简易科(二年)和讲习所(一年)。课程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手工、体操等。王国维曾任该校教师,并聘日籍教师多人。先后附设测绘、农、土木工程和蚕科等专科。校名屡有更改,1953年取名为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

5月　《绣像小说》在上海创刊,李宝嘉任主编。

8月7日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国民日日报》在上

海创刊。由江西谢晓石出资，章士钊、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主办，公开宣告愿作国民之“公仆”，“为警钟木铎”，企望“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攻击清廷不遗余力，被誉为“《苏报》第二”。撰文者有张继、苏曼殊、陈独秀、金天翮、柳亚子、高旭、刘师培等人。该报内容丰富多彩，有社说、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评、世界要事、地方新闻、新书评骘、南鸿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个人行为、谈苑、文苑、小说、本埠日记等栏，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由连横编辑，专揭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腐朽黑暗。清政府曾以“昌言无忌”，“怂人视听”，“扰害大局”等罪名，通令长江流域各省严禁售阅。1903年12月1日停刊，共出117号。1904年10月，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将《国民日日报》的内容分类编辑，出版了《国民日日报汇编》，共4集。

12月19日　《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创刊。林獬（白水）主编。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以“鼓吹爱国救亡”为宗旨，宣传反清民族革命思想，主要内容有论说、新闻、历史、小说等。1904年10月8日停刊，共出24期。为当时白话文刊物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

12月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在《檀香山新报》上发表。该文主要向广大侨胞指出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文章批驳了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指出：“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号召人们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大倡革命，毋惑保皇”。这篇文章是孙中山声讨保皇派的第一篇战斗檄文。

本年　陈天华撰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相继在上海出版。这两本书，是作者受邹容《革命军》的影响，于1903年夏秋连续写成的。在《猛回头》中，作者以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通俗流畅的文笔，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弹词形式，写下了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清政府的警世之作，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随后，作者又用流畅的白话文写下了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帝国主义的《警世钟》，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当时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下，已处于被瓜分的危险境地。首次指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呼吁人们警醒起来，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共同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两本书一问世，就立刻风靡全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后多次重印，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两湖各学堂和新军军营中传播更广，影响很大，对宣传反清革命，促进武昌新军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天华也被时人公认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本年　刘鹗（铁云）编纂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编者刘鹗为早期甲骨收藏者之一，该书系就所藏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1058片辑印而成。其后，就刘氏旧藏甲骨辑印成书的还有罗振玉的《铁云藏龟之余》、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李旦丘的《铁云藏龟零拾》三书。1914年孙诒让据《铁云藏龟》作《契文举例》一书，将甲骨分为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类，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专书，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于1898年，第一个发现和认识甲骨文的学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这些书的出版，虽论断不尽精确，但其首创之功不可埋没。

经　济

4月18日　赫德提出币制改革案。

4月22日　清廷命奕劻、瞿鸿玑会户部，整理财政，立银钱铸造总厂于京师。

7月1日　中东铁路通车。

9月7日　清政府设立商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实行了一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措施，并倡导官商创办企业。1903年4月22日，清廷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行议订商律。9月7日成立商部后，将以前路矿总局主管的路矿事务并入商部，使商部成为掌管振兴商务及铁路、矿务等事宜的行政机构。商部主官为尚书，左、右侍郎；另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下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律学馆、商报馆各一所。9月26日，命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1905年1月25日在商部成立商标注册总局。商部先后颁布了《商律》9条、《公司律》113条、《商会简明章程》26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还规定了若干保护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措施，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商部的成立及其采取的措施，客观上有利于人们投资工商业，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06年，清政府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

9月26日　清廷命路矿事务归并商部办理。

11月19日　清廷命各省振兴农务，于省城设立农务学堂。

11月　清政府颁布奖励公司章程，提倡和奖励私人工商业。章程共20条。规定凡能集股50万元至5000万元经营工商业者，分别奖以议员或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位，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1907年改订为凡集股20万元至2000万元以上即予奖励。并规定自四等顾问官以上由商部专折奏请给奖，自头等议员以下，由商部直接给奖，如果商人原有职衔在年定等第之上者，准其递加一等；已有职衔的，可移奖兄弟子侄；合股经营的，亦得该奖；办理无效果的，不予给奖。《章程》的实行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也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供了根据和条件。

12 月 2 日　清廷准商部订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

12 月 12 日　商部代侨商张煜南奏准举办潮汕铁路。

外　交

1 月 27 日　中葡订立增改通商条约及分关章程。

4 月 18 日　沙俄提出七项新要求作为撤兵条件。

4 月 22 日　沙俄照会外务部索要密约七条，清政府拒绝。

4 月 30 日　日本照会外务部，劝拒俄国密约。

5 月 20 日　尼古拉二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

6 月 10 日　俄使见庆亲王，要索新约七条，庆亲王拒绝。

7 月 9 日　盛宣怀与英国中英公司订立《沪宁铁路借款合同》。

8 月 12 日　俄国新设远东总督府。

9 月 6 日　沙俄撤回交还东北七项要求，又提出五项要求，被清政府拒绝。

10 月 8 日　中美订立《通商行船条约》。

中日订立《通商行船条约》。

10 月 28 日　中法订立《滇越铁路章程》。

12 月 10 日　麦克唐纳准将统带英军越过咱里拉，大举入侵，开始了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一直是英、俄两国互相争夺的一个焦点。1888 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以后，西藏各阶层对英国侵略者恨之入骨，西藏地方的统治者产生亲俄倾向。俄国抓紧时机行事，在西藏伸展其侵略势力。英国为了实现其侵占中国西藏的狂妄野心，选择了日俄战争一触即发的有利时机。1903 年 11 月 6 日，英国政府批准英印武装使团通过春丕河谷前往江孜，英国侵藏的闸门由此打开。英印侵略军集结了 2000 余人，准备新式步枪、机枪、火炮，附工兵队、后勤队并民夫7000 余人，由麦克唐纳准将统带，12 月 10 日越过咱里拉，大举入侵，开始了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13 日，侵略军占领亚东。20 日，英军占领帕里。1904 年 1 月 8 日，英军越过唐拉岭，到达吐纳，荣赫鹏率领一部分英军在此结营过冬，麦克唐纳带领大部分英军退回帕里。3 月底，英军经休整补充后，继续北犯。4 月 11 日，英军到达江孜。8 月 3 日，英军侵占了西藏地方的首府拉萨。荣赫鹏胁迫西藏地方官员于 9 月 7 日签订了他一手炮制的《拉萨条约》。

12 月 20 日　俄使照会外务部，全力拒英人入藏。

军　事

2 月 7 日　北京旗兵千余名，交由袁世凯督练。

8 月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青山军事学校，亦称“东京革命军事学校”。1903 年 7 月底，孙中山从越南抵日本横滨。在同留学生的接触中，看到有志于学习军事的人越来越多，而清政府又串通日本政府不准自费生学习陆军，孙中山便在东京郊区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革命军事学校，招收中国私费留学生中有志于军事者李自重、黎勇锡等 14 人为学员，聘日本人野熊藏为校长，并聘日本退役军人任教官。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和制造盒子炮、大炮以及各种火药；尤注重学习南非德兰斯瓦波尔人在散兵战术和以寡敌众的夜袭法等。定期 8 个月毕业。学生入学时，须向孙中山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样，就把留学生从较笼统的“革命排满”提高到旧三民主义的水平，也为以后的武装起义培训了骨干。但不久孙中山离日赴檀岛，该校学生内部意见分歧，不到半年就停办了。

10 月　直隶总督袁世凯于保定开办北洋陆军速成学堂。

12 月 4 日　清廷置练兵处，以奕劻为练兵大臣，袁世凯充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4年

导　言

一九〇四年是一个具有耻辱意义的年代，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为无耻和屈辱的一幕。日俄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百般调解重告无效，终于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尽管两国之间交战，但战场既非俄国，亦非日本，而是在中国大地上。两国竟然劝告清政府“严守中立”，而清廷也眼巴巴地只能“中立”。

本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增强，中国的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崛起了一股革命力量，其最初的代表便是刘静庵等人组织的科学补习所。经过踏实工作，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相当一批力量，而这些力量正是几年后那冲天一击的最初基础。

另一个大的革命组织也在上海成立，这就是兴复会。蔡元培和陶成章等人致力于反满运动，使得兴复会组织扩大很快，并且通过各种联系，与会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为自己的武装起义争取了相当群众。兴复会组织力量较强，秋瑾、鲁迅等后来都成为它的会员。

趁日、俄争霸东北、英国合力侵略西藏，终于在本年攻占了江孜，迫使西藏三大寺签订《英藏条约》，然而于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和条件的苛刻，使清廷不敢签订该条约。通过反复谈判，最终于一九〇六年签订了《续约》，清廷收回了部分权力，但英国终于打进了西藏腹地。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本年的许多结果都对后来的事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日俄战争为最，对清廷以后的立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日俄战争
- ●科学补习所
- ●光复会
- ●藏英之战

日俄战争

背景介绍

1903年7月下旬至1904年2月初历时半年余的日俄谈判，是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沙俄妄图独占东三省，日本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双方相持不下，是导致这次谈判最终破裂的主要原因。

1904年4月21日，即沙俄向中国提出“七条”要求后的第三天，日本元老和军政各界首脑人物伊藤、山县、桂、小村等在京都的山县别墅无邻庵举行秘密会谈，商定了四项对俄方针，决心利用“满洲问题”迫使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并表示为此将“不惜使用武力”。27日，小村打出“安全防卫”的旗号，对英使窦讷乐说：“俄国永久占领满洲，意味着俄国将永远占领朝鲜”，从而势必“构成对日本生存的威胁”，日本对此不能保持沉默。日本军方普遍主战；总参谋部甚至得出结论：由于俄国拒不撤军，对俄战争必不可免，早开战比晚开战于日本更有利，政府应立即作出最后决断。5月，总参谋长大山岩向天皇奏陈《关于朝鲜问题之意见书》，进一步强调目前正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良机；日本军备现在能与俄国对抗，越往后，形势越可能逆转，所以，外交谈判也将无望。在官方的操纵和影响下，日本舆论界纷纷散播“对俄强硬”论，军国主义气氛弥漫全国。受日本浪人团体黑龙会和玄洋社支持的“对外强硬同志会”(8月9日，即日俄谈判开始前三天，该会改称“对俄同志会”)，以及东京帝国大学所谓“开战七博士”，要求日本政府实行对俄“强硬外交”，煽动战争不遗余力。

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主动。6月23日，元老及内阁举行御前会议，一致认为：日本对华有南进福建、北进朝鲜两途；由于俄占满洲已成事实，“朝鲜问题”的解决已成当前急务，否则日本将丧失在朝鲜的地位，且将危及帝国自身的“安全”。为日本的利益计，对俄交涉势在必行。会议为此决定开始对俄谈判，并在无邻庵会议协商的基础上议定了《日俄协商纲要》八条，作为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1. 互相尊重中朝两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保持各国在该两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2. 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方面有特殊利益。3. 两国不得干涉日本在朝鲜、俄国在满洲各自开展的工商业活动。4. 俄国不阻挠朝鲜铁路延伸至满洲南部，与东省铁路、营榆铁路相接。5. 为维护上述第二项规定的权利并平息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的暴乱，日本可出兵朝鲜，俄国可出兵满洲，事毕撤兵。6. 日本有帮助朝鲜“改善行政及军务”的专权。会议预感到俄国不会轻易接受上述要求，因此强调：“一旦提出建议，即须排除万难，坚持贯彻”。“纲要”表明，日本要求在朝鲜获得行动自由权，并伸手东三省，而俄国在东三省的特权则仅限于铁路方面。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云云，意思是俄国必须严格履行撤兵义务，尊重他国(其中包括日本)在东北的“条约权利”，不得实行兼并，从而为日本开放东三省的大门！日本驻华公使内田曾向英使萨道义承认：“日本是为着满洲发起这次谈判的。”这与前年冬伊藤在彼得堡鼓吹的日俄妥协、“满韩交换”的方针大不相同，说明日本政府已把谈判的重点由“朝鲜问题”转移到“满洲问题”上了。

7月3日、13日，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先后将上述谈判意图和主要条款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指出俄国如拒绝日本提议，就要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他援引英日同盟条约，建议两国就共同利益受俄国威胁一事交换意见，并希望英国政府赞同日本预定的行动方式。16日，英国内阁正式表示同意。接着，小村于28日训令驻俄公使栗野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议两国举行直接谈判，以期“划定两国于远东各自之特殊利益”(意即会谈内容不限于朝鲜问题。经俄方同意，8月12日栗野受权向拉姆斯多夫提出了日本政府依据前述《协商纲要》拟就的协定草案六款，并要求从速开始谈判。

材料：

- 日俄谈判
- 战争爆发
- 奉天会战
- 屈辱中立
- 朴资茅斯条约

材料一　日俄谈判

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决定和沙俄政府直接谈判。八月十二日日本驻俄公使栗野向沙俄外交部提出开议提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约定尊重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各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二)“双方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和俄国在满洲铁路企业方面的特殊利益”。(三)“相互约定不妨碍日本在朝鲜和俄国在满洲的工商业发展”，“俄国方面同意不妨碍朝鲜铁路(指日本修筑的汉城——釜山铁路)最后延长到满洲境内，以便同中东铁路和山海关——牛庄铁路接轨”，(四)互相约定“日本有必要派兵到朝鲜，俄国有必要派兵到满洲”，“务使所派军队无论如何不超过实际需要的人数，任务一经完成即将军队撤出。”(五)俄国方面承认日本为了朝鲜提出的改革及其管理的改善拥有向朝鲜提出意见和提供援助，包括必要的军事援助的独占权。(六)以此协定代替以前日俄间关于朝鲜的一切其他协定。这个提案表明，日本企图以承认俄国在东北铁路企业方面的特殊利益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已经取得的各种特权，并允许日本将在朝鲜修筑的铁路延长到中国境内。

日本的提案和沙俄的远东“新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新上任的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在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协定的唯一基础只能是日本承认满洲完全‘在它的利益范围之外’，……只有让我国公使明确告诉日本政府，俄国准备用持剑之手来保卫自己在满洲的权益，当前同日本的谈判才会取得成果。”十月三日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森将阿列克塞耶夫制定的反提案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互相尊重朝鲜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二)“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承认日本有“辅助朝鲜改良民政的权利”。(三)俄国不阻碍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业及保护工商业的措施。(四)日本派兵到朝鲜，“须于知照俄国之后”。(五)日俄两国互约，不把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战略目的，并不得设兵备于朝鲜海岸，妨害朝鲜海峡的航行自由。(六)互相约定把北纬三十九度以北的朝鲜领土作为中立地带，两国均不应该派兵进入该地带。(七)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岸一带，完全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八)本协定应代替日俄两国前此缔结的一切有关朝鲜的协定。

沙俄和日本分歧很大，无法达成协议，因而双方战意日增。主持远东外交大权的阿历克塞耶夫在给俄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日本坚持要求俄国承认它对朝鲜的全面保护关系；同时却丝毫不放弃插手满洲问题。日本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加紧备战，甚至已着手在朝鲜建立基地。他指出：“应该深刻认识到导致我们同日本关系恶化的那种争吵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日本想在远东建立优势和霸权，朝鲜问题和满洲问题只不过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手段。因此，在这块土地上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也公然声称：日本不仅打算占领朝鲜，而且还要占领沙俄尚未来得及据为己有的满洲。因此日本和俄国都“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加紧备战”。

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四日日本向俄国提出最后一次建议。日本仍然坚持原来立场，只在东北问题上“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海地区不属于日本的利益范围”，但要求俄国必须“尊重中国在满洲的领土完整”，并“不得妨碍日本及他国在满洲区域内享有的条约利益及特权。”要求俄国在二月二日前答复。

一月二十八日俄国政府举行会议，尼古拉二世决定不允许再谈“中国在满洲的领土完整”问题。据此，俄国向日本提交一份备忘录。直到二月五日日本政府才收到这份备忘录。但日本政府在二月四日已经决定对俄开战，并在当天夜里下达了在朝鲜登陆和进攻旅顺俄国舰队的命令。紧接着日本舰队在二月八日夜间袭击了停泊在旅顺港外的俄国分舰队。

(摘自《1904—1905的俄日战争》中国史学会编)

材料二　战争爆发

日俄战前，俄国和日本的军事指挥当局都制定了作战计划。

一九〇三年十月沙俄在统一阿穆军区司令部和关东区部队司令部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最新的对日战争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把俄军主力集结在辽阳、海城地区，实行防御作战，直到那里有足够的兵力转入反攻时为止，通过反攻，将日军赶出东北和朝鲜，进而在日本列岛登陆，粉碎日本武装部队。据此计划，沙俄以陆军两个师团约四万多人固守旅顺要塞；以陆军两个师三万人布防在鸭绿江一线阻止日军渡江。俄军主力则编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集结在海城、辽阳、沈阳一带，等待援军，迎击日军主力。第二军团布署在哈尔滨一带作为后卫。俄国陆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逸待劳，等待时机，在辽阳、沈阳一带作战略决战。

开战之初，日本陆军现役军官为七千五百人，下士官和士兵为十九万人，另有预备役三万五千人，后备兵二十万人。沙俄在贝加尔湖以东的陆军有十三万五千人，陆军部又决定给远东总督增派十一万人。俄国在欧洲的后备兵力很雄厚(约五百万人)，但由于地域远隔，交通不便(西伯利亚大铁道环绕贝加尔湖的一段和东省铁路的一部分，要到1904年12月才能竣工)，调运迟缓，补给困难，短期内难以发挥其优势。海军方面，力量对比于日本不利。但俄国舰队分布于波罗的海、黑海、日本海和黄海、

日本则集中于本土附近海域，在这里，反比俄方稍胜一筹，然而，每调来一批新的俄舰，这种差距就会变小一点。因此，俄军利于持久，日军利于速胜。1903年6月，日本总参谋部即已确认："只以朝鲜和满洲为战场，可以确保优势，胜利即已确定；如战争拖长，则地位逆转，俄国将渐占优势。"

日、俄宣战后，两军各按既定的方针对垒。日本海军力争在短时间内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夺取制海权，为陆军在辽东半岛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有利条件；陆军则兵分四路，从陆上、海上进袭东三省南部。大本营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完全占领朝鲜，进军鸭绿江右岸，同时进攻旅大地区，歼灭旅顺口的俄国海军，预定在秋季完成本阶段的战斗任务。第二阶段的主要战斗在南满展开，打击俄军主力，时间预定在来春进行。为统一指挥陆上各军，1904年6月20日组成满洲军总司令部，大山岩任总司令，儿玉源太郎为总参谋长。日本海军则由东乡率领。

俄军前线最高指挥官阿列克谢耶夫因欧洲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并进入战斗，首先指望海军获胜，以阻止日军在朝鲜北部登陆，并预计以四个西伯利亚军战胜日本。这一预想落空后，沙俄改采库罗巴特金的方案，即在欧洲俄国增援部队到达前，避免和日军接仗，以便厚集兵力，把日军引向奉天或哈尔滨一带决战；海上也取消极防御战略，坐等波罗的海舰队的援军到来。因此，俄军始终未能改变被动的局面。

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是进攻的一方。2月，日第一军在仁川顺利登陆后即挥戈北上，于4月底5月初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境内，接着连陷九连城、凤凰城，取得了陆上对俄作战的首次胜利。五、六月间，日第二、第四军在辽东半岛盐大澳和大孤山等地相继登陆，然后北上，直扑辽阳。6月初，日本组成了第三军，准备攻打旅顺。7月，日军侵占营口。8月，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在旅顺港附近被摧毁，黄海、日本海的制海权一时属于日本，旅顺陷入重围。之后，日军继续取胜，经辽阳战役（8月30日至9月4日）、沙河战役（10月7日至16日），于年末逼近奉天。1905年元旦，旅顺俄军投降。2、3月间，双方共约六十万人在奉天举行会战。3月10日，日军占领奉天，乘胜进据铁岭、开原，俄军向哈尔滨方向败退。5月27日至28日，经对马海峡海战，远道东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葬身日本海域。至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告结束，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形成了僵持的局面。由于俄军连遭败绩，俄国陆军最高指挥部在历时十九个月的战争过程中曾三易其帅：从战争开始至1904年10月为阿列克谢耶夫，其后由库罗巴特金继任，1905年3月奉天战役后又改由第一军团司令利涅维奇接替，直至战争结束。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材料三 奉天会战

奉天（沈阳）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大一次战役，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陆战。俄军投入兵力三十万，日军投入二十七万人。但是俄军由于接连失败，士气沮丧。《俄国论坛》记者从沈阳报道说："部队意志消沉，官兵士气低落，对将领们完全失去了信任。灰心丧气、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日俱增，部队消极厌战，各级司令部、后勤机关腐败堕落，酗酒成风。"

库罗巴特金宣称：这次进攻"比其它进攻都重要，我们可以缴获一些火炮，同时可以宽慰沙皇陛下。"一月二十五日俄军开始反攻，经过四天的激烈争夺战，俄军伤亡军官三百六十八名，士兵一万一千多人，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奉天战役的一个前哨战。

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国把全部兵力部署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纵深达十五公里的战线上，目的在于将日军逼至太子河对岸。

日军指挥部的计划是猛攻俄军侧翼，将其围歼于奉天地区。二月二十三日日军赶在俄军发动进攻之前，从左翼发起进攻，使俄军从清河城败退到北方的孤家子。俄军将预备队调来增援。此后日俄两军多次争夺，日军虽未前进多少，但却完成了将俄军预备队引离日军主攻方向的任务。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大举进攻俄军右翼，向四方台与辽河之间一带挺进。由于库罗巴特金误以为日军主攻方向在左翼，因而将大部分兵力调至左翼，致使右翼空虚，日军得以顺利地向奉天迂回。三月二日大山岩总司令重申：第五军在左翼迂回；第二军在右翼迂回；第四军正面进攻；第三军继续向俄军后方交通枢纽挺进。三月四日日本第三军已逼近奉天以北的铁路线，第二军抵达距奉天只有十二公里的地方。三月九日日第一军突破俄军奉天以东防线。十日，库罗巴特金下令全军撤向铁岭。奉天会战结束。

奉天之战，俄军伤亡、被俘九万人，日军损失七万一千人。日军虽然占领奉天，但未能全歼俄军。因此双方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只得在昌图和四平一带对峙。库罗巴特金以战败而被免职，由利涅维奇接替他的职务。

（摘自《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中国史学会编）

材料四 屈辱中立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中国东三省沦为战场，首遭其殃。如何消弥战祸、恢复失地？还在战争爆发之前，朝野即已议论纷纷。亲英亲日官僚倡言倚日御俄。粤督岑春煊主张乘敌寇交战之机，"奋然一战"，收回东北主权。1903年末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说，中国兵少、饷绌、械乏，无力参战；"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

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都对中国不利；只有谨守局外，才是可取之道。这一主张与奕劻不谋而合，得到后者的支持和采纳。

1904年1月初，清政府试探日本的态度。日本自恃拥有训练有素、数量可观的军队，又有英日同盟作后盾，可以单独对俄作战，并取得胜利，因此，反对中国参战。1月7日，日驻华公使内田将日本愿中国中立之意通知奕劻，并望中国给予“秘密援助”。日本外务省向中国驻日公使杨枢作了同样表示。日本不愿清政府与之“协同”拒俄，主要是怕中国参战会妨碍它实现对俄作战的目的。如前所述，1903年12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曾众口一词，要求中国“保持中立”，反对中国参战，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日本“单独作战，战胜的结果将由我国（日本）任意处理。如与中国联合，则善后处理势将感到种种不便。”日本内阁还认为，1. 中国如参战，可能“见洋人即加迫害，重演义和团事件”，列强乘机争夺，日本可能丧失华南据点；2. 如中国中立，则中国与其他中立国的贸易不受影响，从而可维持他国对日本的同情，防止其进行干涉；3. 中国如中立，交战限于日、俄两国，不致因国际关系复杂化导致战争扩大化；4. 中国如参战，大量财力投入战争，会影响中国清还庚子赔款；5. 中日联合对俄作战，可能使“黄祸论”再起，便于他国干涉。日本提倡中国中立的侵略本意，由此可见。所以，日本政府于对俄宣战次日，便将上述见解告诉列强驻日公使，要求各国共同承认中国的中立地位，使战争局限于日、俄两国。

2月13日，外务部通电各国宣告：“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旧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该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辽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及沿边内外蒙古均按照局外中立例办理。”同时，颁布《中立条规》三十五条，划定了日、俄两国在奉天省内的“局外境”（中立区）和“局内境”（战区），要求交战双方不得逾越指定的战地，并保障战区内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中国地方官守卫领土、履行行政职责。清政府认侵略者为友邦，以神圣国土供他国作战场，自以为这种屈己从人、消极无为的态度能得到交战双方的谅解和尊重，结果适得其反。2月14日，沙皇政府复照清政府，佯称“中国恪守局外，俄决不侵越”，但“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隅铁路所经，为运兵用兵要地，势难认为局外。”不仅如此，沙俄外交部并照会中国驻俄公使胡惟德，悍然宣布：“辽西亦满洲境，难认局外。至东省疆土不得占据一节，目下不能谈论，应俟事后承前议续商。俄日用兵，华守局外为一事，东省交地是另一事，故不允商议。”清政府原拟由关内派兵赴辽西一带加强防务，维持“中立”，但是由于沙俄不承认该地区为“局外境”，并反对清军进入而作罢。无怪乎胡惟德慨叹：“战局无论胜败，归地日益难望”了。

（摘自《中华民族耻辱史》）

材料五　朴资茅斯条约

奉天会战之后，日俄双方都无力再战，议和势在必行。早在一九〇四年六月和十月美国曾两次建议日俄双方议和。因为美国的工业品在东北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九〇三年俄国确定并实行的远东“新方针”，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美国和英国一样积极支持日本打破俄国垄断东北的局面，以便利用门户开放政策，把侵略势力伸进东北。美国总统曾说：“日本打的是我们的仗”。当然，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大获全胜，以免影响美国未来的发展。这就是美国建议日俄双方议和的重要原因。但当时日本和俄国都认为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拒绝接受美国的调停。

奉天会战结束后，日本为了用和约来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便于一九〇五年四月由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出面非正式地请求罗斯福出面调停。沙俄在对马海战失败之后，被迫接受美国的调停。

六月初美国向日俄双方提出议和建议，日俄双方直到八月才在美国朴资茅斯开始议和。这除了因为日俄双方各自需要作必要的议和准备之外，还由于日、美、英三国之间进行了讨价还价的可耻交易。经过谈判，日本以承认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承认英国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为条件，换取美、英同意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

日本提出的讲和条件，主要有三个部分：（一）必保的条件：朝鲜完全归日本处理，沙俄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哈尔滨旅顺间的铁路让与日本。（二）争取的条件：要求沙俄赔偿军费，将在中立国的俄国军舰交付给日本，把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三）讨价还价的条件：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海参崴撤销军备，作为商港。

尼古拉二世的俄国议和条件：“不会允许付出一个戈比的赔款，也不会允许让出一寸土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对维特说：“不妨把我们自己在顺利的时候夺来的一部分领土让出”。

从双方提出的议和条件来看，日俄两国企图主要利用中国和朝鲜的领土和主权进行可耻的交易。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和日本全权代表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开始议和谈判。日本首先提出包括前述全部内容的十二条款。经过十次会议的讨价还价，以及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撮合”，终于达成协议。九月五日，日俄全权代表在《朴资茅斯条约》上签字。条约正文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一）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上均享有卓绝的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的权利。凡是日本认为必要的措置，俄国“不得阻碍干涉”（第二条）。（二）“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

将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均转让给日本(第五条)。(三)俄国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第六条)。(四)日俄两国"以保护铁路"为名,在各自霸占的铁路沿线,平均每一公里设置十五名"守备队"。(五)俄国声明:"在满洲之领土利益,或优先的让与、或专属的让与",有违机会均等主义者,"一概无之"(第三条)。(六)俄国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并该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之主权,永远让与日本(第九条)。

这是一个日俄两帝国主义强盗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而签订的分赃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中国东北南部成了日本势力范围,俄国则继续保有东北北部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科学补习所

背景介绍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爱国志士发起创建的革命组织。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较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汉口、宜昌、沙市相继开埠和设立租界,帝国主义对湖北的侵略日益加深。二十世纪初年,湖北已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后起的日、美、德等帝国主义也竭力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掠夺。大批外轮满载商品来往于武汉江面,使湖北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帝国主义在湖北又加紧兴办工矿交通企业,逐步控制了全省的财政金融。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刺激下,湖北成了"洋务新政"的重要基地。张之洞从一八八九年督鄂以来,大力兴办实业,并先后设立了商务公所、商务局、商务学堂和两湖劝业场等提倡和奖励实业的机构,使湖北地区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全国占有显著的地位。在兴学育才、派遣游学方面,湖北也是首开风气之先,远较附近省分发达。

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开展较早的地区。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长期任湖广总督,在鄂办工厂、练新军、设学堂、派游学,造成了庞大的洋务系统。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活动刺激了当地民族资本的发展。官办学堂里的部分青年蔑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纷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初,他们拥护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在自立军失败后,其中许多人迅速地倾向革命。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武汉的爱国活动在国内处于醒目地位,1903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璧、时功玖、张荣楣、吴柄枞、李书城等经常在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集会,宣传排满,并介绍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还与会党有了联系。他们实际上成了一个革命团体,但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巧妙的对付办法,派他们出国游学以分散他们的力量,激烈者派往欧洲,纯谨者派往日本。1904年初,朱和中等相继离鄂,吴禄贞被调往北京,他们那无形的革命团体便解体了。不过,就在这时,由于华兴会的影响,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发生了转机。

材料:

- 补习所的活动
- 日知会

材料一 补习所的活动

一九〇四年五月张难先、胡瑛与工程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以及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康建唐等发起组织机关,在武昌同庆酒楼召开筹备会,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七月三日武汉军、学两界的革命者三十余人集会,正式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所址设于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军营及各学堂均置干事。补习所对外以补习科学为名,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但内部却是"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完全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反清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一般在未入伍之前,必须接受补习所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补习所的成员迅速扩大。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在内里,它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胡宗琬被推为该所经理,吕大森为干事,分任干事者,尚有曹亚伯、时功璧、宋教仁、张难先、康建唐等人。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者,还有朱子洵、陈从新、雷天壮、毛复旦、李胜美、欧阳瑞骅、王汉、易本羲、

田桐、余诚、季雨霖、孙武等人。其中有些人同时还是华兴会的会员。由于科学补习所表面是一所补习学校，它的师生并非全部都是革命党人，但不少人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的。

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营管带黎元洪处当书记，了解招兵情况。科学补习所便大量介绍知识分子从军。胡宗琬还招来会党分子，介绍入伍。会党分子入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密约中的排满革命说教，虽然简单狭隘，但它体现了联络会党的一种新方式：革命党人突破会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直接进行初步教育和约束，并送至新军中去接受训练。

胡宗琬派易本羲回湘筹措经费，因而得知黄兴正在组织起义，胡、吕赴长沙联络。洞庭舟中，吕大森赋诗曰："此行好借春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他们住在黄兴家中，商量起义大计。胡宗琬被推为华兴会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施南及四川分部总理，负责组织响应。当时，已经是 7 月，离长沙起义时间不远，吕便偕康建唐赴施南。胡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派何自新赴荆宜，周维桢、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武汉的军队和学堂都派有专人负责运动。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宗琬、王汉去江西湖口运来。胡与刘静庵等集议：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汉任刺张之洞，易本羲任刺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

响应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长沙华兴会机关被查抄，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暴露。科学补习所得到长沙方面的密电，急忙布置隐蔽。胡宗琬、王汉将枪械埋藏在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张难先通知成员躲避。10 月 28 日，张之洞得湘抚电报，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结果一无所获，仅探听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当时，梁鼎芬仍然主持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二人开除了事。

材料二　日知会

科学补习所虽然自行解散，但是隐蔽下来的成员却没有停止革命工作。所员胡瑛、王汉从湖口起运军械，得知起义计划失败后，便将枪械密藏于汉阳南郊鹦鹉洲。他们后来探悉清廷派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刮民财，正由江、浙、皖、赣抵鄂，便与刘静庵商议，决定以暗杀手段除掉这一清廷大吏。他们携带所藏手枪前往汉口大智门车站狙击。但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行。他们又尾追到河南彰德，王汉在车站向铁良连发数枪不中。清吏全力搜捕，王自行投井而死，"年二十二，结婚仅月余"。与此同时，所员刘静庵则开展了较为踏实的革命工作。静庵原是新军马队营管带黎元洪手下的文书，科学补习所遭破坏，借故请假离营暂避。等到风声稍缓，他又回到马队营。不料黄兴化名"张守正"写给他的密信被黎元洪发现，结果在黎的示意下，他再次请病假出营，应美教堂圣公会的约请，担任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的司理。"日知会"原已订购各种新书新报，任人阅览，静庵接任后，"整理书报，详订章则，对阅书报者，招待极周，迎机启示"，不数月，会务大进。后来他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商议，拟以"日知会"名义办补习班，开讲演会，"谋革命以救国"，得到胡的许诺。于是，"日知会"便以合法的形式，公开陈列革命书报，每星期开会演说，宣传革命宗旨。这些活动，促使一大批湖北青年转向革命，为以后革命组织"日知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科学补习所虽然仅仅存在数月，但它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亲历辛亥革命的李春萱指出：科学补习所对湖北革命，"撒播了许多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以后运动新军革命打下了基础。第二，联合湘、鄂两省，易使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武昌长沙交通便利，武昌又为两省文化中心；'科学补习所'与湘省联合，为两省以后开辟了联合的道路。第三，会党不受约束，容易坏事，湖南'华兴会'失败，给予革命党人以极大的警惕，以后湖北革命得到教训。"总之，从科学补习所开始，直接投身新军下层做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成了湖北革命党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摘自《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

光复会

背景介绍

在两湖相继建立革命组织的同时，东南地区特别是浙江的爱国志士也积极开展了筹建革命团体的活动。

二十世纪初，浙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革命化，会党群众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浙江历来是东南人文荟萃之区，文化素称发达。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知识分子迫切地要求新的出路，爱国救亡活动普遍展开。在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教育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具有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首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随着清政府卖国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革命派的队伍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一九〇〇年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就组织了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名为"浙会"。翌年夏,求是书院四、五两班学生合组作文会,国文教员孙翼中出一题为《罪辫文》,"示意汉装束发,满清垂辫,被发左衽,实一辫之罪也"。因学生中"已多印有民族革命思想,对此课题,正好发挥",于是有一篇作文内的"本朝"字样,即被另一学生改为"贼清",后又传为翼中所改,由此引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罪辫文案",促进了反清革命思想的传播。此后,孙翼中以及"浙会"的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一九〇三年"拒俄运动"和"苏报案"在浙江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更多的人关心全国的形势,研究革命的问题;浙江地区的反清革命思想更加广泛传播。这年十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浙江留日学生认为战争一经发生,势必延长,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于是,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等十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祎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会后,他们与东京清华学校学生陶成章、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魏兰、龚宝铨和弘文学院学生周树人(即鲁迅)等浙江籍留学生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十一月在王嘉祎寓所举行了有陶成章等人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为了在国内建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根据地,会上决定派陶成章、魏兰回浙江、安徽,已受军国民教育会派遣的龚宝铨往上海,沈瓞民去湖南,进行联络组织工作。

为了在浙江建立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从日本归国的革命者,积极开展了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材料:

- 暗杀团
- "万福华案"
- 杨笃生与"中央革命"

材料一　暗杀团

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是东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因受"苏报案"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暂时无法继续向群众性斗争的方向发展,但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即于1903年8月7日发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由己、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子谷(曼殊)等主持,号称"苏报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作秘密联络机关。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础是良好的,但当地的革命党人,一时还没有考虑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这个组织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的前身。暗杀团的组织极为严密,最初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凤初)、周咏曾(来苏)、何士准(海樵)、胡镇超(晴崖)、汤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药的行家。暗杀团决心刺杀清廷首要,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目标。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捞到一笔钱,便和苏鹏、周来苏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海樵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作准备。暗杀团抵沪后,即住入新闸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光汉(师培)、陈由己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当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联络东南志士作响应准备。暗杀团、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不久,长沙起义流产,爱国协会解体,但暗杀团仍在继续活动。

材料二　"万福华案"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揭载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言论的消息,惹起社会公愤。11月19日,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体。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曾为粤闽大吏董理钱财,日俄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心而辞职。万得知王之春的卖国言行后,即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行刺,经刘光汉、林獬设计,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他们伪造吴葆初的亲笔信,请王到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至时登楼,见情景不对,急忙退出。

万在店门口持枪迎击，可是他没有打开保险栓，弹不出膛，当即被扭送捕房。万福华被会审公厅判处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复后方才出狱。

“万福华案”造成的局部破坏，并未严重妨碍上海地方革命活动的开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被华兴会、暗杀团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轨道，但是暗杀团的铁小圈子无法独立领导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斗争。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争存会、暗杀团等组织都归并于光复会，但暗杀团名义并没有立即取消。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钧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人权（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光复会和东南各地的革命小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光复会的成员却发表了大量的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劳绩，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里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份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不过，在各种成份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材料三　杨笃生与“中央革命”

杨笃生在万福华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 年回沪，继续与蔡元培等研制炸弹。为了搞所谓“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动，以译学馆教习身份作掩护。杨笃生在京得到赵声的信，催他去保定，原来，赵声在保定与安徽人吴樾等相结纳，因故离保，便要杨去从事组织。杨笃生为吴樾等主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杀团）。这个组织，被光复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1905 年 8 月，吴樾赴京，恰逢清廷实行立宪骗局，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的发展，想以刺杀五大臣来阻止这一行动。9 月 24 日，五大臣启程，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身携炸弹前往车站行刺。在挤入车厢时，炸弹受震爆炸，吴樾当即牺牲，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轻伤。刺五大臣一案，震动全国。

暗杀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因对反动统治者极端仇恨而产生的这种暴烈行动，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根本弱点。由于中国历史上把仗义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用以惩凶除顽，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是可以起到与战场杀伤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党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可以阻止和改变敌人的政策。他们无法认识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对立；而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是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只有用革命消灭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过于相信个人英雄的作用。由于这种弱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经常不表现为革命进攻中的辅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动，甚至是绝望的拼命。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赞成这种办法，孙中山就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不过，光复会始终坚持这一办法。1905 年春《警钟日报》被封后，刘师培逃往芜湖公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暗杀，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

（摘自《光复会二三事》，《近代史资料丛书》）

藏英之战

背景介绍

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一日英军侵占了西藏的重镇江

孜。面对敌军深入国土的严峻形势，西藏地方政府一面请求清政府"调汉兵，资助军饷"；一面在西藏各地抽调军队，决心夺回江孜并把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外。西藏地方政府这种积极抵抗侵略的态度，是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然而，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政府，对于英国武力侵略西藏的行径，却始终采取妥协的政策。一九〇四年一月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到达拉萨。他下车伊始就遵照清政府"切实开导藏番，听候开议，毋梗顽生事，致酿巨衅"的指示，千方百计地阻止噶厦调兵抵抗。当阻止无效时，他就指斥西藏地方政府"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并向清政府奏报说："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也就是说，对西藏地方的抵抗，不予援助，俟其战败之后，再设法妥协投降。不仅如此，当英军占领江孜后，有泰于四月十八日曾照会荣赫鹏，奴颜媚骨地向侵略者表示："前藏代本，不遵约束，竟在骨鲁地面，始祸称戈，大国之威，败其徒众，厥咎虽由自取，实以本大臣开导之无方，三复来文，悲惭交集。"他把反击侵略诬蔑为"始祸"，把西藏军民惨遭屠杀竟然说成"咎由自取"。由于有泰采取了一系列的妥协投降的措施，进一步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骄横气焰，严重地影响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抗战部署。虽然如此，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决心收复江孜。截止到一九〇四年五月初，噶厦调往江孜、日喀则地区的军队已达万余人。于是一场为夺回江孜的血战正式开始。

材料：

- 江孜血战
- 拉萨条约
- 修改条约

材料一　江孜血战

经过数日的战斗，西藏地方军把江孜的英军全部包围起来。英军为了冲破包围，也曾在白居寺一带进行反扑，但遭到藏族军民的阻击。对于藏族军民在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敢精神，就连参加这次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也不能否认。他们承认藏族军民的"勇敢是超等的"，"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们的勇敢"。五月下旬侵略者虽然调来部分援军，但在西藏军民的打击下，仍然一筹莫展，无法扭转被动局面。这时，英国侵略军只好龟缩在战壕里，继续坐守待援，士气极为低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荣赫鹏本人只好于六月五日率一队骑兵冲出重围，逃往春丕调兵。在他途经康马时，又遭到数百名藏族群众的包围，几乎丧命。六月二十六日荣赫鹏和麦克唐纳率领大批侵略军进至江孜。英军首先进攻乃尼寺。他们凭借强大的火力疯狂进攻，藏族军民利用简陋的武器据险固守。当乃尼寺的围墙被大炮轰塌，英军蜂拥而入的紧张时刻，西藏守军则临危不惧，同敌人展开肉搏，特别是来自工布地区的一支群众武装，善于大刀战，许多英军成了他们的刀下鬼。由于西藏军民的浴血奋战，英军以二百多人的伤亡为代价才侵占乃尼寺。为了报复，英军将乃尼寺抢劫一空，并且放火烧了乃尼寺的大经堂。

英军经过数天的休整之后，于七月五日大举进犯江孜宗政府所在地宗山。英军炮火猛烈，进攻时猖狂至极；藏族军民虽然武装简陋，但英勇顽强，冒死固守，故宗山之战是英国侵略西藏以来最激烈的一战，也是西藏人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最艰苦的一战。据亲自参加过江孜争夺战的老人们回忆：英军"从东北和东南向宗政府进行攻击，首先用炮火轰击山顶，然后再掩护步兵向山上冲锋。藏军守住山，敌人不攻就不开枪，等敌人进攻的时候就用火绳枪、抛子和石头一起向敌人打。这样敌人围攻了几天仍然打不上去。藏军在山上毫不动摇地进行防守，而且还有时下山摸敌人的营房。山上的水喝完了，即在晚上将人用绳子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守卫宗山的西藏军民就是在弹尽粮绝甚至连水也断绝的困境下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并消灭了许多敌人。英国参战的军官描述说："西藏人民的英勇是无可争辩的，当我们的榴霰弹在他们头上爆发时，他们勇敢地守住阵地，沉着地向我们的大炮一枪又一枪地还击，一点钟又一点钟地支持下去……"。他们的视死如归、同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永远崇敬的。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由于驻藏大臣有泰一直奉行妥协投降政策，致使英军最后侵占了江孜。

材料二　拉萨条约

五月十五日英印政府批准了荣赫鹏拟订的进兵拉萨的计划。七月十四日当江孜战事结束之后，英军集结四千余人，携大炮八门，开始进犯拉萨。十九日侵占朗格子，三十一日渡过雅鲁藏布江。在此期间，沿途的藏族人民曾进行过英勇阻击，如朗格子一带的人民群众就曾自发地组织起来，凭险据守，用大刀、土枪袭击敌人。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军进入拉萨前，三次派代表赶赴前敌，要求英军退回江孜进行谈判，荣赫鹏为攫取更大权益，竟不予理睬。一九〇四年八月三日英军悍然侵占拉萨。

英军进入拉萨后，荣赫鹏便急忙地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此时达赖十三世已经逃走，其他僧俗官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无开始谈判的表示"。不仅如此，拉萨东部有藏军数千人重新聚结的消息不断传来，著名寺院色拉寺、哲蚌寺的喇嘛们仍然保持着武装戒备，随时都可能起来反抗英军。八月十八日有一个"拿着刀和匕首、内着铠甲、外复红色僧袍"的喇嘛，去刺杀荣赫鹏，结果却刺伤了两名英军军医官。当英军逼迫哲蚌寺缴纳

粮食时,该寺的喇嘛们“声势汹汹地向他们投石块,表示准备战斗”。总之,拉萨人民表现的高昂反抗情绪,对荣赫鹏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另外西藏的气候条件也对英国侵略者极为不利,因为九月中旬以后,大雪就会封住山川道路。荣赫鹏非常焦急,他自己承认是“内慌怯而外镇定”。然而,就在荣赫鹏和英军已经陷入窘境的时候,昏聩无能、媚外乞怜的驻藏大臣有泰却帮了他的忙。有泰在荣赫鹏进入拉萨的第二天,“当即往拜,并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他还向荣赫鹏表示:愿“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在有泰等人的竭力撮合下,达赖的摄政噶丹池巴和噶厦的代表,终于在八月底同荣赫鹏开始谈判。在谈判中,荣赫鹏对西藏地方代表百般威胁,声言“惟有接受我方之条件,否则惟有听我继续武力压迫,……倘再迫令吾人采用军事行动,则异日所提条件当更苛刻”。在九月一日的会谈中,荣赫鹏还进一步恫吓说:如果再延迟签订条约,每延迟一天将增加五万卢比的赔款。由于荣赫鹏的威逼和有泰妥协思想的影响,西藏地方代表被迫于九月七日在《拉萨条约》上签字。条约的签字仪式是荣赫鹏强行在布达拉宫举行的。在他看来,在布达拉宫举行签字仪式同“条约本身同一重要”,因为这是藏人被迫就范之明确表现。《拉萨条约》共十款,其主要内容有:(一)除亚东开埠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商埠派驻官员;(二)赔偿英国军费五十万镑,在赔款未偿清前,英军仍驻春丕;(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须“一律削平”;(四)条约第九条规定,非经英国同意,西藏地方的土地不得出让给外国,西藏地方的一切事宜不准外国干涉,不准外国在西藏取得铁路、电线、矿业等权利。通过《拉萨条约》,英国侵略者又在中国西藏攫取了大批权益,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款,暴露了英国妄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变为自己殖民地的野心。这一条约是在英国武力压迫之下签订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侵略者未经清政府同意而径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条约,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

九月下旬英军开始从西藏撤退。据麦克唐纳供认:英军抢走大批文物,“件数之多,须有四百骡子才能驮运,里边包括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书、瓷皿等物”。

材料三　修改条约

《拉萨条约》签字后,清政府外务部发电示驻藏大臣有泰说:“英约十条,有损主权。……不应经由英与藏番立约,嘱尊处切勿画押”。表明了中国中央政府对《拉萨条约》的态度。接着清政府再次电示有泰,指出条约有损中国主权,“第九条尤为窒碍”,令其立即与荣赫鹏“坚决磋商”。有泰根据清政府的指示,当即照会荣赫鹏,要求修改条约,但荣赫鹏以其使命已告结束为由,把问题推给英国外交部。从此之后,中英两国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和谈判。从一九〇五年一月起中英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会谈。清政府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张荫棠、梁士诒为参赞。谈判一开始,英国代表就抢先要求唐绍仪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绍仪据理反驳,指出:“西藏主权在中国”,英国强迫西藏地方订立条约是侵犯中国主权,《拉萨条约》根本无效,应由中英两国政府重新订约。经过反复辩论,英国代表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以重新定约为会议的先决条件,但又故意节外生枝,重新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谬论。唐绍仪等对此曾严加驳斥,“以达赖班禅签掣册封、番缺请旨简放、番兵由驻藏大臣岁操各凭据”,申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可侵犯。英国代表见其阴谋未能得逞,便故意拖延时间,致使谈判长达十个月之久,未能取得进展。十月英国索性无理中断谈判,唐绍仪等亦愤然回国,会议遂告破裂。及至一九〇六年由于英俄两国为争夺西藏而进行的角逐日趋激化,英国为防止沙俄利用中英纠纷而进一步插足西藏,便于四月同意在北京重开谈判。恢复谈判后,中国代表唐绍仪仍然坚持清政府不予批准《拉萨条约》的立场,而且态度比较坚决。英国为了维护《拉萨条约》的主要部分,最后只得稍作让步。四月二十七日双方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共六款,其主要内容有:(一)《拉萨条约》作为本条约的附约;(二)“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三)《拉萨条约》中第九款所声明的各项权利,“除中国所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并未能使中国收回在《拉萨条约》中所丧失的权益,但却迫使英国同意修改《拉萨条约》第九款,使之事实上确认中国在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

(摘自《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历史内幕

策动马福益起义经过

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余因唐才常所组织的"富有票"一案被逮,幸得王必石年伯之力获免,遂往洪江避风头。一九〇四年,黄克强、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诸君在长江准备起义,公推余与刘道一往湘潭策动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图大业。我同刘道一由长沙小西门外搭了夜船到湘潭,找了一个姓苏的"圣贤"(哥老会里办文件的称圣贤二爷)引路,步行四十余里,才会见了大名鼎鼎的马福益。他大概有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年纪,身材魁伟,面带忠厚,那时他算是独一无二的正龙头大爷。他在永州、长沙、衡阳三府地区活动,官兵莫奈伊何。若说他的为人,刚愎自用是他的短处;赏罚严明,重义轻财,则是他的长处。他专与官兵为难,决不扰害地方,所以官厅总捉他不着。他又是"科班"出身(会中有以金钱开山自称大哥的,名之曰玩票或捐班,赤手空拳由老么升到大哥的叫科班),所以能为一方宗仰。若是得到他的"柳叶子"(名片的别称),在某些地区,可以得到会里人的供养。

我们见了马福益之后,将克强的信交他看了。他当时颇轻视我们。也难怪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更不知道黄轸为何许人(克强原名轸,后改名兴)。那时,刘道一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打起行话的调子,开言道:"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除了信上的话以外,我尚有几句言语,要在大哥台前领教,请你容许说完,如果不以为然,我们马上就走。我今天要请教的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我们闻大哥之名久矣,知道大哥是个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所以,我们黄先生才特地派兄弟们来,同马大哥谈谈。信上所不能说的,由兄弟口述。"

说到此处,马福益就肃然起敬地道:"两位先生,恕兄弟是个村野之夫,一切不懂,请多多原谅。因为先父在会中颇有地位,兄弟在童年,常常听先父说:清朝入关的时候,所杀死的汉人,已不下好几百万,光说扬州一处,关起城来杀了十天才封刀。我当时一想,既是要死,何不团结起来反抗呢?所以,我今天才干这营生,也是为了要团结一致,来做灭清复明的事。现在只能说有了一点点小基础,只是我常常感到我的部下读书人太少了,虽然有几个办笔墨的,无非是似通未通的落魄江湖的子弟。所以,我每每有才难之叹。现今听了先生一番言语,令我茅塞顿开,古人有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今天可以说是读了十年书了,望继续不客气地谈下去。先生来意我大概晓得了一些,最好是告诉我将来要我如何进行的办法,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说罢抱拳一拱。

在刘道一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在旁替他捏着一把汗,诚恐将那"龙头大爷"弄翻了,我辈生命难保。不料马福益反被刘道一的一席话所折服,真不愧是一个负一时盛名的草泽英雄。我两人见他如此诚恳,也就向他道了歉。那时候正到了开夜饭的时候,马福益吩咐摆饭,刘道一又向马福益说道:"先前冒昧得很,大哥不降罪已属万幸,更蒙推诚相待,足见名不虚传。我辈革命的宗旨,第一是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债,也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因为马大哥是当今的豪杰,所以黄先生派兄弟前来领教。若能得马大哥的赞助,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有一大半把握了。"说完之后,就指着我向马说:"这位万先生,我们还要请他去柳州去见陆亚发大哥呢。"经此一谈之后,主客之间遂成一家人了。我同刘道一在马福益处住了约有十天左右,关于发动起义的事情,都由刘道一和马商量办理。我因另有使命,遂由马福益派了一个心腹叫王桂林的拿了马的名片,一路护送我到了柳州。

在我动身去柳州的前两天,马福益有一个结义兄弟叫马龙标的,少年英俊,办事能干,颇得马福益的宠信。因他生得漂亮,会中一个弟兄的妻子和他勾搭上了。按照洪门规律,对于穿红鞋(即指与会中弟兄的妻通奸)是杀无赦的。那件事给马福益知道了,就将他交刑堂提讯。讯问明白,判了死刑。到了执行日期(就是我动身去柳州的前两天),马龙标当面托马福益照顾他的母亲,然后慨慷自赴刑场。我还记得那天夜晚是苦雨凄风,送他的人约有六、七个,我与道一也一同前往。马福益依依不舍地对他说:"兄弟呀,你不该生得太体面了,所以送了你的性命!"说罢之后,就向刑场走去,龙标在前,马福益第二,第三是我与道一并肩而行,一行七八人,鸦雀无声,气象惨淡。正走时,忽闻马龙标用极悲惨的声调叫了一声:"大哥,地下

滑得很，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你留心点啊！”大家听了都不觉泪下。尤其是马福益，忍不住泪流满面，叫了一声：“兄弟，谢谢你。祝你十八年后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说话之间已经到了刑场。我留心看那刑场如何布置，原来一无所有，只见前无去路，对着我们的，是浩浩荡荡的大江。那时马龙标高叫了一声：“各位兄弟们，一齐少陪！”说毕，只听得咚的一声，人已不见，但见水波荡漾而已。马福益默祷了半晌，才率领一行人回到家中。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西藏人民在江孜的抗英斗争

〔英军第一次占领江孜宗政府之后〕荣赫鹏在他的印发的公文中说，“在(1904年)4月15日(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在这部分西藏地区〔指江孜〕的一切抵抗完全终止了”，又说，“无论是代本，或是士兵，或是人民都不愿意打仗了”。

我们很快地从这种自信中猛醒过来。迄今为止，喇嘛们只是反抗我们的前进；现在，他们却是决计以众击寡，向我们采取进攻了。……

喇嘛们的情报组一定是非常精细的。我们一分兵去攻打噶惹拉，他们的骑马专差立即把我们力量薄弱的情况飞报日喀则，这是在山谷下面五十英里之外。同一天晚上，就从日喀则调派一千六百名战士来向我们进攻。他们日夜兼程前进。……

果然，就在当夜〔5月5日(三月二十日)〕，更确些是在黎明，我们被袭击了。……我们突然被西藏人的奇怪的战斗喊声所惊醒，几百个西藏人的粗暴而尖锐的声音，“基、呼、呼、呜、呜！基、呼、呼、呜、呜”，这样的喊叫，就在几码的距离，在我们的矮墙外面，接着就是几百枝短枪的爆裂声，子弹从四面八方呼呼飞来，他们的枪炮喷出长条的火舌。

我们是如此之完全出乎意料，几乎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的哨兵才上阵还击。……当我走到外边的过道时，我遇到一群没有武器的仆人，惊慌失措地拥挤上来，互相碰撞，挤到一个角隅，说西藏人已经越墙进来，正在跟着他们上来。就在这时，跑来一个印度兵，后面跟着莱德尔上尉，赤着双脚，也没有穿上外套。其实我们全是这种光景。……

天亮了，我们看见几百个西藏人从墙外、树后和附近的地方向我们放枪。有几个人顽强地抢着我们的士兵从墙孔穿出去的枪口，企图把枪枝拔走。我们的狙击队从“卫城”的屋顶还击，把他们大多数人打死了。……但我军遇到了自〔江孜宗政府〕炮台的强烈炮火，被迫转回来。宗政府被敌人占领去了。

…………

5月26日(四月十二日)黎明之前，我们进攻〔宗政府〕，经过了十一小时的决死战，我们才把敌人逐出。……西藏人所表现的坚决、机智和英勇，对我们这些曾经亲眼看见他们袭击我们营地的人们说来，完全不足为怪。那种认为西藏人不能战斗的荒谬想法，应当消除净尽。他们的勇敢是超等的。虽然他们一般地只有古老的武装，他们也有一点儿现代武器，而且熟悉如何使用。……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们的个人的勇敢，例如，十五个骑黑骡子的战士和四十名步兵，冒着我们的暴风雨般的火力，从江孜宗政府猛冲而出，想去救援他们认为是遭遇到强烈压迫的在帕拉的战友们，结果这支援军全部中弹死亡，无一生还。

……我们对江孜的占领，仅是更加刺激藏民的反抗。……他们从全西藏各地征募军队。……

6月28(五月十五日)清晨，将军准备夺取〔江孜〕宗，……他们拚死命抵抗，疯狂地向我们放排枪，抛下大批的石块，……

7月5日(五月二十二日)……麦克唐纳将军从帕拉村荒废房屋的屋顶上指挥攻击。……敌人在房屋上和炮台上，全是警醒的。他们立即从建筑物的每个罅隙发出强烈的火力，炮台的枪炮朝向黑暗各处射出炮弹，喷出一条条的火光。……

西藏人的英勇是无可争辩的。当我们的榴霰弹在他们头顶上爆炸时，他们勇敢地守住阵地，沉着地向我们的大炮一枪又一枪地进行还击，一点钟又一点钟地支持下去，尽管他们的子弹是射击不远的，……

……即使到现在，在我们攻占了江孜宗之后，西藏人仍然没有派代表来求和，……

（摘自华达尔：《拉萨和它的神秘》）

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

光复会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而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则是支那亡国纪念会，这个会是在日本的章太炎、冯自由等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组织的。后因日本政府不许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它的国土上进行政治活动，军国民教育会就迁来上海。适值蔡元培先生来沪，闻有这个组织，即来参加入会。后经商讨，改名为光复会，蔡被选为光复会会长。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友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会员入会时，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记得我入会时，曾对天发誓说过这样四句话：“光复汉族，

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蔡元培任光复会会长后，诸会友虽敬重其为人，但因他对联系内地各党会非其所长，发展会务成绩欠佳，因而会友对他微有不满。而徐烈士锡麟为人目光远大，热心公益，克己从人，对待会友亲如家人手足，为众望所归。会友们都叫他“伯荪哥”(徐烈士号伯荪)，以表示敬重和亲暱。徐烈士是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兼算学教员。他当时奔走于绍兴府属和邻近的其他府属各县，积极进行联系党会的工作，很少离绍他往。因此上海和其他各处的革命党人，都来绍兴同他联系。于是绍兴便成为会友集中之地了。

大通学堂

在绍兴协助徐烈士工作的有陶烈士成章、龚宝铨、吕熊祥、赵卓等人。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他对史学很有研究，但他度量欠广，对待会友不能象徐烈士那样亲如手足，因而威望亦不及徐烈士。当时集中在绍兴的会友在徐烈士领导之下拟订计划，进行军事训练，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和团结其他党会的工作。适是时清政府废止科举、办学堂，除各省置有提学使外，省有高等学堂，县有县学堂。因此，光复会总部就利用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活动。绍兴城西有一大通寺，交通便利，房屋宽敞，并有空地堪充训练场所。徐烈士商得该寺方丈同意，借用空屋办学。正在筹备期中，不料事为徐烈士之父徐鸣凤先生所知，出而阻挠。鸣凤先生是商界人士，性情顽固，过去在东浦开办热诚学堂，他就曾竭力反对，但因为那是县学堂的预备学堂，他亦无法阻止。此时他又闻有此事，自然更加反对，他不许大通寺方丈把房屋借给他的儿子。总部原想尽快把学堂筹设起来，不料受此拦阻，一时计无所出。事为城内豫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贻孙所知。他想从中得到提倡学务的好评，即与徐烈士说：“你要办学，我可以将豫仓空屋借你办学。”徐烈士为了早日实现原定计划，所以就骑马寻马，先行假豫仓把学堂开办起来。学堂仍照原拟名称，冠以“大通”二字；又因实施军事训练易启人疑，故又加上“体操”二字，称为“大通体操学堂”。这样，大通学堂就在豫仓仓库诞生了；豫仓仓库也因大通学堂而留迹于历史，现在已作为纪念场所了。

筹集会款和购买武器

会款的筹集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最初由陈志军出款维持(如热诚学堂经费)。后有许仲卿自愿出款，如购买步枪费用、大通学堂用款、捐官费用、出洋留学费用，都是他负担的。由于筹款困难，上海会友蔡元康(蔡元培的胞弟)来绍时，曾主张抢钱庄的运款。陶烈士竭力反对这样做，认为不能因筹款而损害全局。以后陶烈士在日本，将去南洋筹款时，还提及这事。他说，如果照蔡元康的办法做，恐怕光复会现在难以存在了。武器的购买，除零星的无法估计外，有一批九弹步枪共五十支，是徐烈士用团练的名义，领得绍兴府的护照，亲自在上海购买的。这批枪支经过杭州运来绍兴，先存放在府学堂，后于大通学堂开办时交到大通学堂。

捐官去日本留学

当时各省新兵日见增多，装备极精，又是新法训练，我们人员虽多，但实力远不能同他们相比。因此陶烈士说，我们这样的训练教育是不够的了，必须改订计划。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可以做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于是，在原有计划中，增加了“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一项。捐官去日本学陆军的共五人，其姓名和兵科如下：徐烈士锡麟捐的是道台，填的是步兵科；陶烈士成章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陈志军捐的是知府，填的是炮兵科；陈魏捐的是同知，填的是骑兵科；龚宝铨捐的是同知，填的是工兵科。以上五人在办妥捐官和留学手续后，即于同年(大概是一九〇四年)冬季，由徐烈士率领去日本。

当时清政府的驻日本公使是汪大燮，陆军留学生监督是王克敏；日本政府为中国人学陆军所设的预备学校名为振武学校。当我们报到时，王克敏对我们就有怀疑，因为我们一举一动都象学生，使他看不入眼。他对我们说：“根据规定，不是官费生是不能进振武学校的。你们是自费生，可以进其他学校。如要进其他学校，我可以立即送你们入学。”我们回到寓所后，就拍电报给浙省。不久即由浙省巡抚致电驻日本公使，说明我们五人是浙江官费生，要他照例送学。但王克敏说，五个人不能开一班，要等奉天学生到后一起送学。后来与奉天学生同去检查身体，又说我们身体都不及格，不能入学。经向振武学校校长福岛联系，他说：“这是你们监督处的意见。”我们大失所望，惟有另想别的办法。这时我们五个人除徐烈士外，其余四个人都剪去了辫发。当时议定，一部分人仍留在日本学习，陈志军学法政，陈魏进警监学校警务科学警政，这方面由陶烈士主持。徐烈士以所捐道台回国去谋分发安徽，因为安徽省份小，又是南京的门户，在军事上很重要。至于大通学堂方面，则由徐烈士另选他人主持。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历史考证

日俄战争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

1904年2月，日本与沙俄开始了争夺朝鲜及中国东北霸权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双方以中国的辽东地区为战场，倾全国兵力疯狂拼杀，而腐朽的清政府却慑于列强的胁迫而严守所谓“局外中立”，任凭大好山河被帝国主义军队践踏。战争以俄国的陆海军惨败和日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在美国调停下，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重新分割了在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

对于这场战争，立宪派人极为关注。他们的报刊连篇累牍地报导战争的经过，探索胜负的原由，评论中外的对策，阐发自己的观点。他们重视这场战争有两大原因，其一，提心战争改变远东时局，使中国东三省的主权沦丧。还在战争之初，他们即忧心忡忡地预见：“将来无论俄日孰胜孰负，吾敢谓战局既定以后，东西之情景必为之一变，我中国必因之受大影响，其暗中之亏损较之亲构战祸者为尤烈”。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令他们对于战后中国“重则召瓜分之祸、轻则遭凌辱之殃”的惨黯前景不容坐视，时刻警惕着日俄双方及其他列强的一举一动，并且亟谋解救危亡的有效办法。其二，认为战争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及宪政改革的前途。日俄交战在立宪派眼里绝非寻常战争，而是黄种与白种、亚洲与欧洲、小国与大国、立宪与专制之间的抗争，此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意义殊甚。在此基点上，他们对清朝政府的中立政策不以为然，时时流露出“亲日疏俄”、“联日拒俄”的对外倾向，并期望日本能够打败俄国，给予中国是否应当立宪的问题一个侧面的肯定答案。

日胜俄负的战争结局让立宪派人如愿以偿。他们似乎为自己一贯主张的正确性找到了铁的证据，于是，倍感欢欣鼓舞，立宪的信念益坚，并利用这场战争大造舆论。

立宪派认为，雄跨欧亚的世界强国沙俄，竟败在扶桑岛国日本的手里，这不能用国家的大小、兵力的强弱以及种族的优劣去解释，而必须从政体的异同上找原因，“彼俄之见衅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考求中外史实，他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历观全地球近五十年来之兵事，其在两专制国或两自由国相遇，则胜负之数，盖未可定。若夫专制国与自由国相遇，则专制国未有能支者。其一验诸普法之役，其二验诸美西之役，其三验诸中日之役，并此而四矣”。有鉴于此，立宪派断然宣称：“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为何立宪国必胜专制国呢？立宪派自有一套巧妙的解释，他们说：“立宪之国，国家为君民所共有，打起仗来，全国人皆为自己而战；专制之国，国家为君主及其少数私人所专有，发生战争，只有君主及其私人为自己而战，而人民则是为他人而战，“夫以一君主与百数十私人而与彼全国之亿兆众相遇，则孰为众而孰为寡、孰为强而孰为弱耶？战争是评价不同政治制度的标尺，“自波罗舰队之毕潛，而立宪专制之优劣以定”，立宪派借此时机，极大夸张君主立宪制度的优越性，而把封建专制说成是辱国殃民的祸由。

中国与俄国同为封建专制主义大国，俄国在战争中屡战皆北，暴露出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立宪派由此联想到中国近代遭受的外侮及政治现状的腐败黑暗，愈觉专制政体是民族强盛和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们将日俄战争与十年前的甲午战争联系起来考察，发觉中俄两国在昧于形势、虚骄自大、外交之漫无布置、军队之颓坏怯斗等方面不谋而合，虽“俄之种类宗教地形历史、军队之多寡，名誉之盛衰，无不与我异，而惟专制之政乃与我同，此其所以见败于日本亦与我国同也”。正是专制政体导致了两国均蒙受战败之辱。战争本是窥视交战国政治的窗口，从两次战争的比较中，立宪派很容易地看到中俄两国在政治上的共性，“同具自大之性质，同具虚浮之习气，同具好货利蔑道德之人心”。试以中国目前之象言之，其黑暗面与俄国无不酷肖”。既然连强大的俄国也因受专制之累而战败，那么，“其有俄之专制而种族不如俄地形不如俄威望武备不如俄者，其亦可以惧矣”。因此，立宪派呼吁国人，必须从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以求朝野人心猛醒，奋起改革专制政体。

日俄战争发生，朝中立宪的呼声，也随之兴起。第一个公开呼吁立宪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他在1904年2月《上政务处王大臣书》中，描绘了“外侮迭乘、内忧间作”的险恶处境，告诫朝廷改革已成民心所向，“莫之能遏”，若想避免“倡论自下”的“酿祸之阶”，就必须“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并建议改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处为下议院。他这套见解，本为拾立宪派报刊的牙慧，不仅对西方宪政认识肤浅，而且关于议院的建议也不伦不类，但由于领先潮流，代表民望，故颇受立宪派嘉许，社会影响

很大。三月，又有滇督丁振铎、黔抚林绍年电奏清廷，鉴于日本变法三十年，竟敢与强俄相抗的事实，请朝廷“急宣上谕，誓改前非，……饬出使各国大臣迅告各国政府，以中国自今以后一切即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虽未言明立宪，但其“尽行改革”实寓变更政体之意。随后，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粤督岑春煊也以立宪为请。

在赞成立宪的朝臣当中，袁世凯与端方二人态度最为激进。袁世凯当上直督后，握北洋重兵，兼多种要衔，权倾朝野，俨然以维新领袖自命。1905 年 7 月，他奏请朝廷，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简派亲贵大臣为赴各国考察政治。据载：

“世凯知党援不尽可恃，而孝钦年逾七旬，衰病日增，有耄期倦勤之态，恐皇上亲政后修戊戌前怨，日夕焦思，反谋益急，遂倡议立宪，冀新内阁主权归总理，天子不得有为。私拟一奏，使载振上之，大旨言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朝廷不悟其奸，立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

尽管袁氏的立宪动机主要是出于政治野心及对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但他能识时务，敢担风险，比起那些昏聩陋劣的王公大臣来说，不可不谓是佼佼者。时慈禧等人正为排满革命的风潮所苦，无计可施，袁氏则趁机以立宪可以抵制革命为说辞，“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显见慈禧听从了袁氏的忠告。除了袁世凯，另一个能够打动慈禧的人就是两江总督端方。端方为清室中的开明分子，戊戌时代即支持维新，其后经常与梁启超有书信往还。日俄战后，梁氏为端代草请立宪及赦党人密奏，上之清廷，遂有解戊戌党禁事。1905 年，慈禧召见端方，问道：“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对曰：“尚未立宪。”慈禧又问：“立宪如何?。端答：“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闻之大为动心，旋决定派员出洋。

7 月 6 日，清廷下旨，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27 日，又续派绍英会同前往。9 月 24 日，五大臣离京启行，在火车站遇革命党人吴樾谋刺，弹发，戴、绍二人负轻伤，出洋行期因此耽搁。张謇日记中有“立宪近况纪略”，一则，载清廷派员考政一事的内中曲折甚详，可增加我们对内幕的了解。他记道：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两可，会七月二十六日车驾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五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覆延宕三月之久”。

适时，日胜俄败已成定局，国内外舆论一致认定这是立宪不立宪的结果，清廷态度的游疑不决，激起朝野的普遍不满和巨大反响。其间，孙宝琦再电外务部，坚请朝廷“饬该大臣等专心考察各国宪法，期在必行”。驻俄大臣胡惟德电奏：“俄国现已公布宪法，……今我国处孤立之地位，日英同盟本不足恃，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此外，驻英使臣汪大燮、驻美使臣梁诚，学部尚书张百熙、礼部侍郎唐景崇及端方、载泽、袁世凯、岑春煊、赵尔巽、周馥等一班大员均以立宪为言，“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在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改派李盛铎、尚其亨顶替徐世昌、绍英，合同载、戴、端三人，仍分两路，于 12 月首途，前往各国考察。

1906 年夏秋之间，载泽等人陆续归国。他们经过半年考察，耳濡目染，十分膺服日、英、德等国的君主以立宪来缓和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保持自身统治的长久，甚至借立宪为名，行皇室集权之实的办法，成为立宪的热衷者。他们于两宫召见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两宫动容，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四大臣中，以载泽和端方最具说服力。载、端均为满族大员，慈眷正隆，前者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立宪具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后者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今日欲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这些说法，尤中慈禧窍要，使她感到立宪不仅可以保住祖宗三百年基业，免除自己的大权旁落之虞，并且能够消除革命威胁，增强自己在列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览奏后“大为感动”。

1906 年 8 月 27、28 日两天，清廷召开了有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督袁世凯等人参加的重要会议，决定是否改行立宪的国策。奕劻赞成考政大臣的立宪主张，徐世昌、袁世凯、张百熙等助之，孙家鼐坚决反对，荣庆、铁良、载沣亦颇持异议，经过激烈辩论，立宪一方占上风，最后议决以开启民智、讲求吏治为当前急务。遂于九月一日面奏两宫，请行宪 政。九月三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之诏。当时舆论一致肯定，清廷这次变更国体是统治阶级立宪派直接促成的结果。

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不仅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也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大开了绿灯。后者在欢呼庆祝之余，积极展开诸如联络同志、结合团体、办报演说、请愿集会等旨在参予国家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他们斗争的侧重点，更多地放在批评、监督、敦促清政府的筹备立宪问题上，因而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无庸多言，日俄战争通过立宪派——清政府——立宪派这样的连锁环节而给予立宪运动的巨大促进作用，以及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摘自《清史研究集》光明日报出版社）

风云人物

黄兴

黄兴(1874～1916) 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原名轸，字廑午，又作庆武，后改名兴，字克强。曾化名李寿芝、张守正、李经田、今村长藏、冈本。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198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去日本留学。1904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任会长。1905年，在日本拥护孙中山、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居协理地位。1911年与赵声领导广州起义；武昌起义时来到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后到上海，被推为副元帅。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本部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任南京留守。1913年，"二次革命"中，在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兵败后亡命日本和美国。1916年应邀归国，参加和领导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10月31日病逝。

黄兴的父亲黄筱村，秀才，在本地有文名。黄兴5岁时随父发蒙读书，9岁进附近的私塾，读书勤奋。他自幼接受"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特别是明末王船山反满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又喜欢看太平天国杂史。后来他谈到："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19岁进长沙城南书院。22岁被录为县学生。1897年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在湖南特别活跃，风气大开。青年黄兴深受影响开始关心祖国的命运。1898年，以优异的成绩由城南书院选调湘水校经堂，复被保送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举办的新式学堂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在校期间，长于文艺，尤工书法，并爱好地理和兵操。课余，"悉购西洋革命史和卢梭的《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1910年从两湖书院肄业，1902年春，被张之洞选派去日本学习。6月，抵达东京，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黄兴的革命思想形成于留日期间。1898年的变法维新和1900年的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使他看到改良主义的道路行不通，思想趋向激进。在武昌，他协助过唐才常、林圭，运动清军中的湖南籍军官保持中立。在秘密饯送杨毓麟、秦力山出亡日本时，劝告他们只有革命，才能救亡图存、为死难烈士报仇。到日本后，和杨毓麟(杨笃生)、樊锥、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史，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思想。后来，又和许直、陈范、张孝准等湘籍留日学生将该杂志社扩大为"湖南编译社"。杂志共出12期，黄兴任教育栏译员，译《学校行政法论》一文，连载于第二、三期，较早地宣传了军国民教育思想。还与湖南同学组织"土曜会"，鼓励大家"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自己主动登门造访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民间志士，很快与他们成为知心朋友。

1903年夏，受军国民教育会派遣，黄兴回国策动革命。他经上海到达湖北，在武昌两湖书院等处演说，宣传反清革命，散发进步书刊，被当局出牌驱逐出境。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教书。借教书为掩护，鼓吹民族、民主观念，并暗中联络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筹建一个反清革命团体。11月4日，黄兴以庆贺自己三十岁生月为名，与刘揆一、周震鳞、章士钊、宋教仁等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秘密集会，决定成立华兴会，被推为会长。对外名义为"华兴公司"，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先后有四、五百人入会，后又成立同仇会、黄汉会二个小团体作外围组织，以联络会党，运动军队。

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黄兴变卖祖产近三百石作为经费，印发抨击了清朝腐败的宣传品，购置武器，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定于1904年11月16日西太后70岁生辰在长沙起事，省城外组织岳、衡、宝、浏、常五路响应。由于会党活动频繁，事机不密，在起义前二十多天即被清地方当局探知，黄兴被迫逃离长沙转赴上海。到沪不久，因为安徽人万福华行刺刚下台的广西巡抚王之春案件，被牵连入狱。后得朋友营救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又被悬赏缉拿，避走日本。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黄兴第一次会见孙中山，积极支持孙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倡议，主张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人物。在辛亥革命中，人们把他俩并称为"孙黄"。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单独发展一批革命分子，并逃选一些坚贞可靠分子组成一个秘密的"丈夫团"，准备回国后打入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以掌握军事力量。这些会员平时不与同盟会总部联系，以防暴露。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多是黄兴指挥发动的。1906年，他派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会党、军队，于12月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坚持斗争一个多月。1907年

夏，到达河内，会同孙中山共谋在南方起义。9月，钦州、防城起义爆发，黄兴策动清军郭人漳部响应未成。12月，在镇南关起义中，他曾随孙中山一起亲赴炮台督战。1908年3月，又率二百多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转战钦州、廉城、上思一带，历时月余，数次战败清军。后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黄兴因此威名大震，其革命毅力和军事才能，得到许多革命党人的敬佩。4月，云南河口起义爆发，黄兴被孙中山委任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前往督战。因会党队伍不听指挥，返回河内，准备另集人马再赴前敌，但被法国殖民当局扣留、驱逐出境。

1910年初，黄兴到香港，在同盟会南方支部主持广州新军起义的筹备工作。2月，新军因故仓促发难失败。11月，和孙中山、赵声等集会于南洋槟榔屿，决定筹集巨款、集中全党力量，再一次在广州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会师长江，然后继续北伐。会后，孙中山在海外各地华侨中筹款，黄兴也在南洋一带向华侨劝募。1911年初，黄兴到香港，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4月23日，写了绝笔书："本日当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然后赴广州设立起义总指挥部。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百余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在与清军决战中，右手断二指。由于清军预有防备，起义仍归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一度产生了悲观急躁情绪，想冒险去暗杀清朝反动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同志所劝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2月25日孙中山归抵上海，黄兴实际成为同盟会指导革命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早在筹备广州起义时，他即派谭人凤携款赴湘鄂联络，策动响应；湖北革命党人也派人到香港请黄兴前往武汉主持。起义爆发后，黄兴于10月28日到达武昌，时值汉口战局紧急，被推为湖北民军总司令，当晚渡江指挥战斗。11月2日，汉口失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设坛举行拜将仪式，黄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率军坚守汉阳20多天，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27日汉阳失陷，28日辞职乘轮回沪。29日，江浙联军攻下南京。黄兴被独立各省代表先后举为大元帅或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他都坚辞不就。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黄兴被任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实际上，由于孙中山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黄兴几乎成了国务总理。陆军部成立后，制订出五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南京临时政府管辖下的十多万军队，军饷没有着落，连吃饭都难以解决，黄兴急得吐血。4月，临时政府北迁后，南京设立留守府，黄兴任留守。经过二个多月的整顿，裁撤大量南方军队，留守府于6月间撤消。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舆论哗然，国民党大愤。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等多数党人认为条件不够成熟，仍主张以法律解决，借以揭露袁氏面目，同时又着手准备力量，暗中派人赴武汉等地联络。袁世凯为干扰法庭审理宋案，指使北京总检察厅反诬黄兴组织从事暗杀的"血光团"，还致电上海法庭票传黄兴到案。黄兴按时向法庭报到候审，原告反而缺席，袁氏的诡计未能得逞。这是黄兴充分利用近代法律武器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光明磊落的风度。但袁世凯在积极准备对南方用兵，国民党人不得不起而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4日，黄兴到南京，迫使江苏总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自己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不久，讨袁军失败，黄兴和孙中山等再度流亡日本。

7月，黄兴到达美国。旅美期间，向世界揭露袁世凯专制独裁祸国殃民的罪恶，在华侨、留学生中作反袁宣传，但又表示"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1915年袁世凯策划复辟帝制，黄兴派人协助蔡锷组织云南护国战争，并为护国筹饷。1916年5月回到日本，受孙中山之托，为借款和购买军械事奔走。不久，袁世凯毙命。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

在黄兴一生最后的三个多月内，他为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了大量工作。7月下旬，湖南省议会电请他归湘任都督，黄兴谦辞不就，表示今后将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他认为教育为立国第一要着，应官办私办同时进行；铁路、建筑、冶金等于国计民生"功用大矣"，都应大力发展。这种为祖国近代化建设效力的思想，是他久所怀抱的志愿。他曾说："吾人夙所主张者，则民生政策，即国家社会政策是也"。

（摘自《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刘揆一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亦称林生，祖籍湖南衡山，光绪四年十一月十日（1878年12月3日）出生于湘潭。父刘方尧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参加过湘军，后充湘潭县知事公署刑房差役，因职业关系，常与会党接触。其时，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活动在湘、赣一带，清廷密令湘潭县署派弁役前往围捕，刘揆一奉父命向马报信，马得以免死，对揆一遂以"恩哥"相称。刘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崇尚侠客，爱打抱不平，"平日在言谈中，对《史记》中荆轲、聂政以及朱家、郭解这类人物的豪侠精神，津津乐道，极为倾慕。"

刘揆一幼年入私塾，先就读于王闿运，"处王翁门下数岁"之久，后改治新学，"喜欢看梁启超写的文章"，同情

维新运动。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他又寄希望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勤王"事甫发而败，揆一不得行其志，遂怀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望，自备资斧，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与同学黄兴结为密友，一道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清政府镇压反帝爱国的拒俄运动，促使刘揆一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刘揆一毕业归国后，即参与筹组华兴会的工作，被举为副会长。"会中一切之计"大都由刘揆一经手擘划，"实心任事，不计劳怨"，为了联络会党，又在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黄兴任大将兼会长职权，刘揆一任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春，刘揆一偕黄兴冒风雪与马福益会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一岩洞中，秘密制定十月十日(11月16日)发动长沙起义的总计划。随后，揆一应聘任醴陵渌江中学堂监督，以办学为掩护，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力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为筹措军费，"揆一破产并告贷筹集约四千余金"。加上黄兴、龙璋等人变卖家产，共筹款约四万元，并由华兴会通过驻沪机关向国外定购武器，"计可集长枪五百杆、手枪两百枝，以资分配"。

起义总计划确立后不久，揆一受黄兴之托，乘马至湘潭雷打石，与马福益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要他从速将会众编练成为作战部队，并尽可能使会党成员参加各正规军队，准备时机成熟之时，候令发动起义。"

由于事机不密，华兴会的预谋终因先期事泄而归于流产，湘抚陆元鼎下令通缉黄兴、刘揆一等人，黄、刘先后逃抵上海，重新聚会于英租界余庆里十二号，共谋再举。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刘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得偕黄兴亡命日本。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陶成章又因经费问题，联合李燮和等起草了一份"公函"，提出所谓"孙文罪状十四条，善后办法五条"，要求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这一行动得到章太炎等人支持，章公开散发攻击孙中山的《伪〈民报〉检举状》，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亲自去陶成章处劝解，三人联合致函李燮和，逐条为孙中山辩白。黄兴又以同盟会庶务名义，发表致各报社通函，否认陶等所谓"公函"的效力，终于使陶、章等人的分裂行径没有产生大的危害。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从日本归国，九月七日(10月28日)偕黄兴、宋教仁抵汉。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赴汉口督师，刘揆一驻武昌任调发，以为黄兴后援。汉口既陷，又专程返湖南促出师援鄂。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刘揆一对袁的本质逐渐有所认识，5月提出辞呈。旋以吊丧为名南下，在沪与黄兴会面，商量对策。黄兴命其北上，借款以资反袁之用，遂冒险入京，仍以工商总长名义向美国雪佛洋行借款一百万美元。"袁氏嗾《亚细亚报》揭发，指刘利用政府名义，借债为推翻政府之用，并由众议院议员籍忠寅等提出质问案一连五起，其势在迫刘去职。揆一见事机紧迫，遂于五月初辞职赴津，袁世凯假意慰留，部务派次长向瑞琨代理。"同年7月，袁世凯正式批准他辞去工商总长职，此后他避居天津租界。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一出任国会议员，直至民国七年(1918年)国会解散为止。五四运动前后，刘揆一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曾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北伐战争时期，他曾赴广州投身革命行列；大革命失败后，思想徬徨，闭门著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版《黄兴传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到南京，受聘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修。翌年，受聘为行政院顾问。后由于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的政策，常写诗词加以讽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蒋介石所忌，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从此他隐居家园，不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活动。

解放后，刘揆一曾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11月1日，在湘潭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马 福 益

马福益原名福一，又名乾，生于1866年，长黄兴8岁，他原籍湘潭南乡，世代佃农，他父亲马大良因被退佃，生活异常艰窘，遂举家迁至醴陵西乡瓦子坪，仍以租佃过活。马福益是长子，幼时读了几年书，粗通文墨。长大后，"形甚魁梧，且有胆略，擅口辩，性明决，遇邻里有争端及不平事，辄出而干预，处断公平，众畏而敬之。"他这时已加入会党，"且为首领"。由于经常有人来他这里报告，应接不暇，以致荒废农事，家人怨怒，福益遂与父亲、兄弟分家，迁居附近的渌口。渌口是一个大市镇，会党活动频繁，镇内赌窟多为会党首领所设，而且流氓、地痞、盗贼群集，作案累累，商民惴惴不安。因马福益为人正直，且在会党中有一定地位，商会便请他协助维持，福益慨然允诺。他邀集各会党首领，商订秘密条规，禁止做假行诈，行凶打架、抢劫拐骗以及盗窃，遇有争端，公平处理等。这些条规实行后，渌口市面安然无事，马福益的声誉也因而大著。于是，马福益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逐渐扩大，遍布醴陵、湘潭、浏阳等县，并及于江西、湖北等省，徒众有一万多人。1891年，他创立回仑山，分派四路头目，自称四路

总统，并订立堂、香、水名号。

随着势力的扩大，马福益渐渐萌发了反清思想。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他曾参与其事。自立军失败，哥老会正龙头王濑芳(即王四脚猪，又号王四爵主)死难，马福益承袭其位，“影响及于闽、赣、湘、鄂四省”，成为哥老会的著名首领。

华兴会成立后，联络马福益，发动武装起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黄兴与马福益素不相识，与他联络还得借助刘揆一，于是1904年春初便派刘揆一之弟刘道一与万武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接洽。两人将黄兴的信给马看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更不知道黄兴为何许人?因此颇有点轻视这两位年轻人。刘道一见状，便激以民族大义，说道：“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我今天要请教的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我们闻大哥之名久矣，知道大哥是个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所以，我们黄先生才特地派兄弟们来，同马大哥谈谈。”听到这里，马福益不禁肃然起敬。刘道一的这番话，使他感到茅塞顿开，前景豁然明朗起来。

刘道一完成使命后，黄兴与马福益便建立了直接联系，接着不久，黄兴便约马福益会面。这是两位豪杰第一次会晤。为避清吏耳目，黄兴和随行者刘揆一“各自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步行三十里”，来到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一个岩洞，与马福益相见。为了保障安全，马福益事先也作了妥善布置，“矿山各路，早已有哥老会分子严密防守”。两位豪杰终于坐到了一起。晤谈时，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柴火熊熊，三人席地促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马福益命徒众挖了一个地坑，埋着几只雄鸡，上面用柴火煨烤。他们边谈边吃，代替会党喝血酒的仪式，这样“各自痛饮狂餐，乐至天晓”。

就在雪夜岩洞的第一次会晤中，两人商定了举义大计：(一)决定11月6日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将其炸毙，乘机发动起义。(二)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会党为辅。(三)省城外分五路响应，以会党为基干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

由于缺乏经验，更由于会党组织方式的陈旧落后，加上叛徒的告密，黄兴和马福益等筹划的起义因在临近举义时事泄流产。据周震鳞回忆：“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马福益、游得胜等在浏、醴一带的旧军中出入频繁，人多口杂，以致风声透露，被反动当局侦悉底蕴。”10月中旬，肖桂生、游得胜等会党头目被捕，起义的机密因而尽泄。黄兴和马福益等在10月下旬被湘抚行文通缉，在党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黄兴和刘揆一等化装逃往上湖，马福益则逃往广西。

但是，还未等到黄兴和马福益会面，重新起义的计划又再次夭折。去洪江之前，黄兴和刘揆一先赴汉阳鹦鹉洲取回埋藏在那里的枪械。他们雇一“心腹民船”，将枪械密藏船座，不料船行至沅陵，被厘卡查获，经过一番搏斗后，只得弃枪脱险。马福益已潜往湘东联络旧部，发动徒众准备举事，但由于清军缉查甚严，不幸于4月12日在萍乡车站被捕。

马福益被捕时，“用铁练锁其肩骨，俗名强盗骨，以刀洞穿肩骨，系之以练”，解至长沙，刑讯残酷。但马福益坚贞不屈，“声言革异族命，为汉族复仇，死何所憾。”他除了承认自己与华兴会首领有关系之外，“虽已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仍挣扎着力辩那些被囚禁的同志与华兴会的无涉，因而解救了一些同志出狱。”4月20日，马福益在长沙浏阳门外被清政府杀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

（摘自《领袖与群伦》武汉大学出版社）

陶成章

陶成章(1878～1912) 浙江绍兴人。字焕卿。15岁为塾师，喜读新书，“思想渐有转变”；又常见驻防旗人凌辱居民，“极为愤恨，遂萌种族革命之念”。1900年北上，“谋刺杀西太后”，苦无下手机会，便出关游历辽沈、蒙古，观察形势。1902年赴日本，先后入清华、成城两校肄习。清吏不准其学陆军，多方阻挠，迫令退学。不久返国，教授于云和先志学堂，积极联络浙江会党，密谋响应黄兴等将在长沙发动的起义，后知湖南事败，乃隐蔽精干，等待时机。1904年冬，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与兴中、华兴二会鼎足而立，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之一。次年，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集金、处、绍各府会党人，为大通学堂学生，设体操专修课，朝夕训练”，为反清革命积蓄力量。为了打入清政府内部以掌握兵权，“乃入资为官”，得知府。再入日本，求入陆军联队学军事，以身体不合格被拒，又图入振武学校及陆军经理学校，亦未成功。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民报》编辑。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端方通电饬缉成章等，由是革命党之名大著”。第二年赴南洋各地筹措革命经费，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记者和仰光《光华日报》主笔，“将浙江各同志革命始末，勒为一编，曰《浙案纪略》”，影响颇大。

陶成章与孙中山意见不洽，“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特民生之说殊耳”，因而时起磨擦，即有别树党帜之心。1910年在日本重建光复会总会，推章炳麟为会长，自为副会长，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作为通讯机关。

他虽与同盟会分裂，仍坚持反清革命立场，为发动革命，推翻清廷而四处奔波。1911年回上海，谋响应广州起义。广州事败，与尹锐志、尹维俊等组织“锐进学社”，发行《女界杂志》，筹划上海起义。夏，再往南洋，“赴各岛组织光复分会”，并募捐筹款。武昌起义爆发，陶成章一面发动江、浙、沪等地光复军起兵响应，一面“遍电南洋各埠光复会筹集巨款济军。镇江之章梓、申江之李燮和诸人起义之费，多为爪哇、泗水光复会所筹寄”。陶成章赶回浙江，被革命党人推为总参谋，“又奔走各处，联络同志，助浙江军攻取南京。设筹饷局于上海，竭精尽虑，寝食皆废”；旋又“扶病而起，……共谋北伐”。1912年1月，不幸被陈其美串通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年仅34岁。

陶成章虽因意见相左与同盟会分裂，但其“奔走革命十二年”，矢志不移，曾“四至杭州而不归”家一省，公而忘私，在江浙一带播下了革命火种。辛亥年“东南各省，义旗一举，四方响应，两三月间，奄有半壁河山……要皆成章前数年绸缪筹画之所贻也”，“非成章十数年来奔走东南，苦心经营，安能至此哉?”

（摘自《光复会二三事》中国史学会编）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孑民。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补编修。辛亥革命后，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监察院长、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等职，1940年病逝。

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惊涛骇浪，把他从科举功名的仕途，推上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开始涉猎西学。马关约定，他“痛哭流涕长太息”；德略胶州，他怒斥清廷“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在翰林院“诋贵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满之论，声至激烈”。戊戌变法时，他同情维新派，却不满其做法，逐渐倾向反清革命。1898年弃官南下，兴办教育。先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后任上海南洋公学教习，提倡民权学说，灌输爱国思想，1902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被举为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又创刊《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公言革命无所忌”。他致力教育，目的在于培养革命骨干，曾说：“革命者，即治病之良方也。……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被委为上海分会长和主盟人。

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编著《中国伦理学史》，这是清末最早用新体裁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著作。武昌起义爆发，蔡元培赶回国内，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筹建中华民国。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将清末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提出今后的新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为宗旨。此外还作了许多除旧布新的改革工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体制。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化教育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次革命”期间，蔡元培初则试图“调和南北感情”，继则激励民军奋起“讨袁”，不久又去法国，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7年1月，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使学风丕振，声誉日隆”。他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倡科学、民主，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力主文理沟通，实行男女同校。成为新文化运动“首屈一指的卫兵和褓母”，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开了良好的风气。五四运动中，他支持学生“救国之行动”，反对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1923年，为抗议清政府非法逮捕北大教授，他愤而辞职赴欧。1927年后，蔡元培参加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任大学院长、中央研究院长、监察院长等职。“4·12”政变后，他曾一度附和“反共”，但其毕竟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时，他又拍案而起，组织民权同盟，坚持抗日御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真诚朋友。

刘静庵

刘静庵(1875—1911)，又作敬庵或敬安，名贞一，从军时名大雄，后皈依基督教时道号保罗。湖北潜江人。兄弟四人，静庵居长。少时随父淇读书，“纵观六经诸子，并究心闽洛姚江，旁逮内典道藏，罔不学，学俱有心得”。其为人沉默寡言，不慕名利，而待人诚挚，处事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武昌求学，“热心新学，尤热心救世”，又以“国事日非，决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乃投入新军马队第一营黎元洪部下当兵。在军营宣传“种族大义”，物色同志，结识两湖部分革命志士，又勤于操练，恪守军礼，甚得同营士兵爱戴。次年夏，被派帮理文件。黄兴自长沙写给他的信，误入文案刘某手。刘将信呈交管带黎元洪，黎不欲声张，即令他以病辞差出营。

是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时华兴会联络会党，密谋大举。黄兴自沪回湘途经武汉时告以湘省起义计划，科学补习所成员积极响应，开会议决：由吕大森赴施南

(今湖北恩施)、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宋教仁与华兴会联络;武汉方面,则由刘熙卿负责武高等学堂,欧阳瑞骅负责文普通学堂,刘静庵负责马队,张难先负责工程营。正分途进行,不期长沙事泄,起义流产,黄兴急告刘静庵与胡瑛将机关撤销,刘即与同志销毁文件册据,各自避匿。他匿居于武昌圣公会。嗣科学补习所为清吏查封,但损失不大。

当年夏天,清廷曾派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刮东南各省钱财,刺探南方虚实。刘静庵与胡瑛、王汉密议:"此国贼也,弗除,民力竭矣,宜狙击之。"胡、王慨然请行,行刺未成,王汉投井自杀。

武昌美教堂圣公会设有书报阅览室名日知会,刘静庵原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相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日知会正需要人司理其事,胡兰亭邀他担任。他即以工作之便,暗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原科学补习所成员散而复聚。他曾与胡兰亭商议:"国势诚岌岌矣:公中国人,当不忍其沦胥。下走愚妄,窃愿借此谋革命以救国,公能许我乎?"胡表示:"愿与君共为其难,即如君言,第好为筹画也。"为掩护革命活动,他接受教会洗礼,兼任文华书院神学系汉文教习。

日知会在刘静庵接办后虽然仍挂书报阅览室的招牌,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置备书报,任人阅览,实际借教会特权公开传播《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孔孟心肝》及《民报》、《湖北学生界》等革命书刊。他又指派同志将这些书刊送进军营,乘夜间或士兵外出之机秘置其铺盖内,各兵士读到这些书刊,"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谕"。又定期讲演时事,痛陈中国危亡之状,以灌输革命意识。他"勤奋宣传,不遗余力,血诚所感,有情皆应",捐资及入会者日众,逐渐把日知会由一个教会阅览室改造成为革命团体。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开成立大会,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干事部下又设总务、经理、文书、交际四科。他被举为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朱子龙、范腾霄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又在黄冈、长沙、九江等地设立分会,还有明新公学、群治社、安郡公益社、集成学校、集贤学社、团风阅报社等均为其外围组织。在一次集会上,他向会员大声疾呼:"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

同盟会成立后,总部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余于是年春回鄂,以日知会为活动场所。刘静庵积极与余诚配合,使会务迅速发展,不少日知会员参加了同盟会。又筹办东游预备科和江汉公学以储备人材,转发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日知会几成同盟会分部。

五月八日(6月29日),孙中山派法人欧几罗赴内地考察,到达汉口。刘静庵率日知会干部迎接,次日在日知会开会欢迎,会上欧几罗演说世界大势,倡言革命。听众数百,极受鼓舞。适座中有清方巡警道冯启钧所派密探,故此后清吏对日知会十分注意。

是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特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至武汉策动日知会起义响应。十一月十一日(12月26日)刘静庵在伯牙台召集会议,分析形势,决定全体同志入新军当兵,运动军队,准备革命。未几,萍浏醴起义失败,清政府大肆缉拿起义人员,悬赏万金捕捉"湖北全省会首"刘家运,形势危急。他避走黄陂,藏某学生家。叛徒郭尧阶为乞赏还债,向官方告密,捏称刘静庵即刘家运。巡警道冯启钧派兵至黄陂将他捕获,前后被捕的还有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吴贡三、殷子衡、李亚东、张难先等九人。

在提讯会审时,清吏对刘静庵特别注意,迫其承认为刘家运,并迫供同党。先以利诱,继施毒刑,用藤条鞭其背,至"血肉横飞,肉尽骨见"。"自首至踵趾无寸肤完,濒死者数,稍苏,仍戟手骂不绝"。他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但决非刘家运。冯启钧邀功心切,捏造供词,以判处死刑上报,拟于年底执行。当时革命同志奔走营救,教会方面亦怂动美籍教士吴德施、孟良佐、穆德等出面交涉,吴禄贞、程家柽等也向清朝当局力陈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同时被捕的殷子衡等人也坚决否认其为刘家运。清廷无奈,只得电告鄂督张之洞从缓办理此案。宣统元年(1909年)改判他永远监禁,后刘家运被捕,清吏仍拒绝释放他。当时报纸抨击说:"观于刘静庵之误捕,既知其非刘家运,仍监禁弗释,可知官府之意,惟知有诛而已,不问其真与假也。"

刘静庵在狱中备受摧残,治学仍不稍怠,又赋诗言志,"金以炼益精,水以澄益清",充满了革命斗争精神。因信教日笃,每日祈祷,连同室难友及狱卒均受感化。他曾对人说:"维摩诘病在斗室,佛法及于三千大千世界;耶稣降生马槽,福音遍于南北二极。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绁,心在天堂。"言谈中流露出借宗教求得精神上解脱的情绪。他伤病交加,难友恳请移至病槛就医,不允,且不许送入食物营养品。稍愈后与胡瑛等联络同志,扶助难友。终以伤重病发,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1911年6月12日)卒于武昌模范监狱,年仅37岁。难友狱吏无不抚尸痛哭。他骨瘦如柴,须发皆白,其母见尸几不识为其子。刘以身许国,终生未娶。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实录一卷14丘

珍闻轶事

孙中山入洪门

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总理少在檀岛基督教学校肄业，同学及故旧至众。己亥冬，梁启超奉康有为命赴檀岛开办保皇会，时总理与梁方谋改组新党，友谊至笃。梁矢言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新党事大有裨益，特求总理作函介绍其兄德彰及兴中会同志。总理坦然不疑，竟从所请。梁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谒李昌、何宽、黄亮、邓金、卓海、钟木贤诸人，颇受欢迎。梁是时有书致总理云："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邓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证，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一月十一日。"云云。梁复赴茂宜岛访孙德彰及总理母舅杨文炳。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昌执弟子礼。梁至檀数月，即提议组织保皇会，因对兴中会员不易措辞，乃诿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李昌等以彼为总理介绍，不知其诈，竟为所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先是檀埠疫疠盛行，美国官吏纵火大焚疫区，以杜传染，华人财产损失不赀，因而仇恨外人之观念日炽。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绪复辟，始能拒御外侮，侨商信之，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梁居檀半载有余，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至七月十八日始启程返日本。总理初闻梁专心组织保皇会，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辞以答。及孙眉使其子昌随梁至日留学，总理惟有深悔无知人之明耳。甲辰(1904年)春，总理自日本渡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保皇会有机关新闻曰《新中国报》，主笔政者为前澳门《知新报》记者陈继俨，攻击革命，不遗余力。同时该埠有一旧式报馆曰《檀山新报》，又号"隆记报"，为总理戚属程蔚南所主办。总理感于势孤寡助，乃自撰论文，与陈继俨大开笔战，尝为《驳保皇报》一文以警告保皇会员，并助程将隆记报重新改组，特函托冯自由介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至檀担任笔政。适陈诗仲已就新加坡《图南日报》之聘，乃改延张泽黎(号孺伯)任之。总理以将赴美国，虑为保皇会作梗，妨碍入境，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颇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洪门老叔父钟水养斥之曰："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总理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致贻违反宗旨之诮乎？"反对者不能对，总理遂获入闱(洪门称加盟曰入闱)，由主盟员封为洪棍(洪门称首领曰洪棍)。其后总理自檀赴美，保皇会竟勾结关员阻其登陆，羁留木屋者数日，赖旧金山致公堂设法营救，始获入境，则洪门会员患难相扶之力也。总理此次到檀，复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西廿纪〇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字样。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理计矣。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

在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年)慈禧太后办七十正寿时，我曾被召入宫中"会亲"留宿约一个月。那时我所亲眼看到的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的每天生活，概略是这样的：

每晨按定时起床(宫中叫做"请驾")，起床后为梳洗时间，这时各处的供差太监等，皆鹄候着太后梳洗。梳洗完毕后，室内太监喊"打帘子"，专供开帘的"殿上太监"便应声将帘子打开。这时鹄立等候的太监等跪满殿内和庭中，同时高呼"老祖宗吉祥"，真是一呼百应，大有声震屋瓦之概。太后走出外屋，先披阅各处的奏折，看完即到仁寿殿传见臣工，当时叫做"见起"，又称为"叫军机"。接见之后回到乐寿堂住处"传膳"(吃饭)，吃饭后照例要"进果盒"，即吃干鲜水果、点心之类。吃完果盒照例出去散步一次，经常好在长廊上漫步，由宫眷、太监、宫女等簇拥跟随，准备太后随时乘坐的小轿等也在后随行。散步后回寝宫歇午觉，睡醒有时到听鹂馆绘画消遣。这时，由"如意馆"(宫中画苑)的人跪地手托颜料碟等伺候着，照例还有一位云南女画家缪嘉惠在旁"指点"。所谓"指点"，如太后说："这仙鹤腿画不好。"缪嘉惠便须恭恭敬敬地画出仙鹤腿的样子来。有时不画画，命把太医院的大夫叫来，但这

并非为看病，而是唤他们来跪在地上朗读四书——如《论语》之类，太后在旁听着。还有时一高兴，命把"咱们本家儿的叫来"(当时呼宫中太监戏班之语)，于是太监便开始"髦儿排"，即不上装的清唱。照例还有"内廷供奉"(即当时有名演员如谭鑫培、王愣仙、杨小楼、大李七、陈德霖、龚云甫、十三旦、王瑶卿、王凤卿、朱素云、钱金福、王长林……等，皆经常召入宫中供差)当场指导。观剧后"进晚膳"，用饭毕还要摆上果桌、果盒等。太后这时不一定吃，身旁的宫眷等却要随着大吃一顿。晚饭后到仁寿殿写大字，如四尺的福寿字等。写完几幅之后，照例还有一顿夜宵(宫中叫做"灯果")。如酱肉、小肚、烧饼、粥之类。有时还令太医院作灯谜。有一次，太后对于太医院所作的"踏雪寻梅"打药品"款冬花"的灯谜，大加赞赏。

非等太后入了"寝宫"，宫中是不能静下来的。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概况就是这样。

(摘自《晚清见闻琐记》文史资料出版社)

溥雪斋述溥杰记

流 行 风

小说《中国现在记》

作者李宝嘉，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是对"维新"以后的官场的揭露，写守旧派朱紫桂等人维新以后，依然顽固不堪，和维新党的满口新名词形成鲜明对照；各地的贪官污吏依旧肆无忌惮地行贿受贿，贪脏枉法，中饱私囊，借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之便大发其财。书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像朱侍郎的顽愚不化；劳薪的所谓维新；姬中堂的虚伪狡诈，都刻画得很生动。如第一回"朱侍郎热心旧科举，劳副贡弹力新名词"写朱看到劳剪掉辫子，头戴草帽，便大为不快，仍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训之，反而遭到奚落。而所谓维新党的劳薪，形象更是可笑，"弄得和尚不像和尚，外国人不像外国人。"李伯元用讽刺的手法，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丑恶。李伯元把"旨微而语婉"的讽刺，变成直接的谴责，虽然有一定的鞭鞑力量，但有时也显得"辞令浮露，笔无藏锋。"此书可能是作者的最后一部作品。

小说《九命奇冤》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

小说写的是清雍正年间发生在广东的一件著名公案。作者是根据嘉庆年间安和所作《梁天来警富新书》改写的，而前书则是以乾隆末欧苏《蔼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条为蓝本写成。故事写本是亲戚的梁、凌两家，因风水之故，受人挑拨，渐至成仇。梁家宽厚，一再退让，而凌家依钱仗势，不肯罢休，纵徒放火烧死梁家八口人。逃避在外的梁天来愤而起诉，乞丐张凤仗义作证，但因凌家用钱贿赂官府，不仅梁家上告失败，证人张凤还被打死，成为九命奇冤。梁家向上控告，仍因凌家买通官府而失败。最后，梁天来逃过凌家的追杀，上京城告御状，由雍正皇帝派钦差大臣明查暗访，澄清事实，终于使梁家之冤得以昭雪。作品通过描写这一冤案的起落因果，反映了迷信对人的毒害和世事人情的险诈，借历史上的冤案，表现了对当时晚清社会中贪官污吏肆虐的愤慨之情。全书结构严谨，脉络分明，情节紧张而精彩，详细裁剪得当，动用了倒叙等表现手法，达到集中突出的效果。语言描写细腻酣畅，人物形象生动具体、富于个性。写作手法上明显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艺术上十分成熟。

小说《新舞台鸿雪记》

作者陶根癖，主要内容：

第一回写"我"做了一个梦，被梦中的"老大国之老大"领至一座大植物园游览。那植物园中有六个园子，分别栽有文明菜、自由果、平等草、独立树、革命花、国粹药，各具妙用。在这里，"我"遇到了过去在"新舞台胡闹"时的熟人，于是在老大的纵容下，将这帮"吃维新饭的朋友"，和他们自私自利愚弄别人的举动，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编成此书。第二回写维新变法后，到处都在极力讲求实学，"我"也与几个朋友一道，办起了一个体操研究会。从第一回看，作者对当时社会引进西方的"文明"、"自由"、"平等"、"独立"、"革命"很有看法，认为它们虽各有可取之处，却又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尤其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还不如中国独有的"国粹"。小说大概表现这些看法，可惜只写了个开头，载《月月小说》。有台湾《晚清小说大系》本。

歌曲《黄河》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
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
生成河干
独立堤上
心思旷然
长城外
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
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
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
观我凯旋

（杨度）

诗《感时二首（选一）》

忍把光阴付逝波，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对无聊报，樽酒悲歌泪涕多。祖国河山频入梦，中原名士孰挥戈？雄心壮志销难尽，惹得旁人笑热魔。

（秋瑾）

诗《题张苍水集》

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
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

（柳亚子）

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三首）

阴风飒然来，君提君头颅。自言逆旅中，倏遇狙击狙。闪电刃一挥，忽如绛市苏。道逢两神人，排云上天衢。此挹蹇民袖，彼褰烈士襦。邂逅器复歌，互讯今何如。君言今少年，大骂余非夫。当服九世雠，折箠笞东胡。逐逐挥日戈，弯弯射天弧。孰能张网罗，尽杀革命徒？汝辈主立宪，宁非愚欲迂。我方欹枕听，鸣鸡乱惊呼。残日挂危檐，犹照君眉须。遥知白日光，明明耀子躯。子魂渡海来，道有风波无？蛟螭日攫人，子行犹坦途。悬金购君头，彼又安蔽辜。在在神护持，天固弗忍诛。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

我生托此国，举国重科第。记昔持墨卷，出应群儿试；梦谒文宣王，旁立朱衣吏，手指平头宪 ，云是汝名字。尔时意气盛，年少矜爪嘴，谓彼牛医儿，徒一唐名士；不如《党锢传》，人人主清议。汪汪千顷波，陋比涔蹄水。捧龟诉天呼，区区竟余界。乌知当是时，东海波腾沸，攘夷复尊王，佥议以法治。立宪定公名，君民同一体。果遵此道行，日儿太平世。我随使槎来，见此发深喟。呜呼专制国，今既曰千岁，岂谓及余身，竟能见国会。以此名我名，苍苍果何意！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

子今归自美，云梦俄罗斯。愤作颠倒想，故非痴人痴。中原今逐鹿，此角复彼犄；此鹿竟谁得，梦境犹迷离。辽东百万家，战黄血淋漓，不特薄福龙，重重围铁围，哀彼金翅鸟，毛羽咸离披。方图食小龙，展翼漫天池。鼓衰气三竭，遍体成疮痍。吁嗟自专主，天鉴明在兹。人人自为战，人人公忘私，人人心头血，濡染红日旗。我今托中立，竟忘当局危。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睡狮果惊起，牙爪将何为？将下布宪诏，太阿知在谁？我惭嘉富洱，子慕玛志尼，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

（黄遵宪）

历史档案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

公等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大误也。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常人置产立业，其约章契券，犹不能借他人之名，况以康、梁之智而谋军国大事、民族前途，岂有故为名实不符而犯先圣之遗训者乎？其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雷动天下。此谁令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则康、梁者尚得处于人类乎？直禽兽不若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可无疑义矣。如有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何不一察实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诬妄康、梁一至于是耶？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得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汉仇耶？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其恩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又如本埠《保皇报》之副主笔陈某者，康趋亦趋，康步亦步，既当《保皇报》主笔，而又口谈革命，身入洪门，其混乱是非、颠倒黑白者如此，无怪公等向之以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据可以证明彼虽口谈革命，身入洪门，而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彼口谈革命者，欲笼络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门者，欲利用洪门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说之后，彼之诈伪已无地可藏，图穷而匕首见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声应气求，两心相印，何致有攻击不留余地。始则于报上肆情诬谤，竭力訾毁，竟敢不顾报律，伤及名誉，若讼之公堂，彼必难逃国法。继则大露其满奴之本来面目，演说保皇立宪之旨，大张满人之毒焰，而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其尊外族、抑同种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已也。满、汉之间，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从违，必能审定。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汉族其有豸乎！书不尽意，余详演说笔记中，容出版当另行呈政。

（摘自《孙中山选集》）

新大陆游记（节录）

（一九〇四年二月）

综观以上所列，则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

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此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而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吾闻卢斯福之演说，谓今日之美国民最急者，宜脱去村落思想，其意盖指各省、各市人之爱省心、爱市心而言也。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尽非也。虽然，其发达太过度，又为建国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确之权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颇用赵，子房思韩，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则欲成一巩固之帝国，盖亦难矣。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此实刍狗万物之言也，虽然，其奈实情如此，即欲掩讳，其可得耶？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

有乡人为余言，旧金山华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最为安谧，人无敢挟刃寻仇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行者，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夜户无惊，民孜孜务就职业。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及左氏去后，而故态依然。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驰，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某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

难者将曰，此不过旧金山一市之现象而已，以汝粤山谷犷顽之民俗，律我全国，恶乎可？虽然，吾平心论之，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吾反见其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问全国中有能以二三万人之市，容六家报馆者乎？无有也。问全国中之团体，有能草定如八大会馆章程之美备者乎？无有也。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夫岂无一二聪伟之士，其理想，其行谊，不让欧美之上流社会者？然仅恃此千万人中之一二人，遂可以立国乎？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可以自由，不可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以上三条，皆说明无政治能力之事。其保守心太重一端，人人共知，无俟再陈。)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均是国民也，或为大国民、强国民，或为小国民、弱国民，何也？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堕落而已。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欧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测之，其最重要者，则好美心其一也，(希腊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为究竟。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孟子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皆两者对举，此外言

者甚希。以比较的论之，虽谓中国为不好美之国民可也。）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全国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论及之。此其理颇长，非今日所能毕其词也。

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余偶有所触辄记之，或过而忘之。今将所记者数条，丛录于下，不复伦次也：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试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弱优劣可见。

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盖以华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借口于吾人之不洁也。使馆参赞某君尝语余曰，宜发论使华人自迁之。今夫华埠之商业，非能与西人争利也，所招徕者皆华人耳，自迁他处，其招徕如故也。迁后而大加整顿之，使耳目一新，风气或可稍变。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为其眼中钉，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迁，彼必有迁我之一日，及其迁而华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说也。虽然，试问能办得到否？不过一空言耳。

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中央行车），不许吐唾，不许抛弃腐纸杂物等，犯者罚银五元；纽约电车不许吐唾，犯者罚银五百元。其贵洁如是，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而华人以如彼凌乱秽浊之国民，毋怪为彼等所厌。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

（梁启超）

续订藏印条约

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北京。

正　约

案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切实遵办，英国政府惟有设法保卫该两约所享利权；旋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拉萨定立英藏条约十款，嗣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五日由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将该约批准，并将当日所声明之条款更订之文据附入，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大英国大皇帝特派钦差驻劄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各将所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敕谕互相较阅，俱属妥善，现议定各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第二款　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

第三款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第四款　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第五款　此约分缮英文、中文，业已细校相符，惟辩解之时，仍以英文为准。

第六款　此约须由两国大皇帝批准画押，自两国全权大臣画押之日起，限三个月在伦敦互换。此约中文、英文各缮四分，共八分，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为凭。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

大英国钦差驻劄中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立于北京）

附　约

案查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英藏条约，因其意义并切实施行均有疑难之处；又查英藏历年和好，近因事故，情意未洽；今欲重修旧好，将所有疑难之事全行解定。兹大英国政府特派边务全权大臣荣赫鹏，与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

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　西藏应允遵照光绪十六年中英所立之约而行，亦允认该约第一款所定哲孟雄与西藏之边界，并允按此款建立界石。

第二款　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通商之埠，以便英藏商民任便往来、贸易。所有光绪十九年中国与英国订立条约内，凡关涉亚东各款，亦应在江孜、噶大克一律施行，惟嗣后如英藏彼此允改则该三处应从改定章程办理。除在该处设立商埠外，西藏应允所有现行通道之贸易一概不准有所阻滞，将来如商务兴旺，并允斟酌另设通商之埠，亦按以上所述之章一律办理。

第三款　光绪十九年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西藏允派掌权之员与英国政府之员会议详细酌改。

第四款　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第五款　西藏应允，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稍有阻碍，且应随时修理，以副贸易之用，并于亚东、江孜、噶大克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各派藏员居住，英国亦派员监管各该处英国商务，如欲赍送公文、信函于藏官或住藏各华官，均责成商埠居住之各该藏员接收转送。复文、回信亦一律责成此员妥送。

第六款　因藏违约，英国派兵前往拉萨责问，又因英国边务大臣暨其随员、护兵等被侮、被攻，是以西藏允兑给英国政府英金五十万磅，合卢比银七百五十万元，以赔补兵费及无礼侮攻各情。此赔款应在英国政府随时所定之处，或于藏境内，或于英境大吉岭、扎拉白古里等地面内清缴，每年西历正月初一日兑银十万卢比，七十五年缴清，应于何处收兑，英国政府预先知照，第一期应在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正月缴一日照数兑交。

第七款　俟以上所述之赔款照数缴清后，并第二、三、四、五等款内所称商埠切实开办三年后，英国政府于未办之先，仍于春丕驻兵，暂守作质，至赔款清缴或商埠妥立三年后最晚之日为止。

第八款　西藏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

第九款　西藏允定，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得举办：

一、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二、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三、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四、无论何项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项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之利权一律给与英国政府享受；五、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与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

第十款　此约共缮五分，由商定之员在拉萨，于光绪甲辰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画押盖印为凭。

大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噶布伦、别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西藏首领

英、藏各员现行声明：今日所立之约，以英文为凭。

大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

达赖喇嘛（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钦）、噶布伦、别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西藏首领

印度总督庵士尔签押

印度总督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所立英藏条约之内。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英国所派边务大臣荣赫鹏，代英国政府，与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嘎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所立之约，现经印度总督批准，并惠允饬将该约第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入兵费，由原定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又复声明，该约所定之赔款初缴三年三期之后，英国所派占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惟该约第二款所立之商埠，西藏须按照第七款开妥三年，并须按照该约内各节，一一认真遵办。

印度总督庵士尔签押

此款于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印度总督当堂签押。

印度政府外部大臣费礼夏

（摘自《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

恳恩开去会办练兵差使折

奏：为沥陈下悃，吁恳恩准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以免贻误，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谕：袁世凯奏，差务太繁，请酌量开去各项兼差一折。前因庶务殷繁，以该督向来办事认真，特加倚任，先后派充商务、铁路、电政大臣，并会订商约、商律各事宜，及督修正阳门工程。兹据奏称，兼差太繁，力难兼顾，自属实情。除商约尚须续议，铁路时有交涉事件，均关系重要，著毋庸开去。电政甫归官办，一切正资整顿，仍著该督督办。至商务、商律现已设有商部，即著责成该部详议妥订。正阳门工程，著陈璧就近督修，俾该督于应办各事，专心经

理，以示体恤，将此传谕知之。钦此。仰蒙宸训周详，嘉矜备至，跪聆之下，感悚万分。

查商约、铁路、电政三项差使，未蒙允开去，臣姑不敢以此烦渎宸听。但臣近日体察情形，会办练兵一差，事寄繁重，更有非臣所能兼顾者，反复审计，深虞陨越，不得不沥陈于圣明之前。伏维臣才庸识暗，资浅望轻，粗读父书，未娴韬略，渥蒙殊遇，谬领兼圻，顾分循涯，已觉难于胜任，徒以遭时多故，受恩至深，明知弗克负荷，不敢意存规避，而过多功少，夙夜惭惶。乃者，朝廷念时局之阽危，图自强之至计，特于京师设立练兵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各直省军制、操法悉归一律，仰见皇太后、皇上惩毖多难，锐意振兴，国势安危，在此一举，薄海钦仰，罔不感奋。而臣猥以驽下，奉命授为会办大臣，敢不殚竭血诚，勉思报称于万一。第念责任重大，才力实有所不胜；头绪纷繁，智虑亦莫能遍及。事属创举，为向来所未有，则物情易骇；势处积重，欲认真以整顿，则窒碍多端。且疆臣本为统辖营伍之人，而练兵处实有纠查军政之责，以统辖与纠查而并诸一身，则又未免易启嫌疑。纵使悉泯偏私，一秉大公而任怨任劳，亦岂能尽如人意。毁誉之来，固不必计，措注之难，讵弗自知。况臣以北洋冲要，常居天津，既不能分身驻京，又不能专心经理，而兹事体大，不容膜视。使因循以贻误，臣何以对朝廷；使粉饰以塞责，臣何以对清夜。臣非不知现在时势为危急存亡之秋，整顿练兵，为固圉保邦之计。及今为之，已嫌补牢之较晚。受恩如臣，曷容卸责而不为，而无如称职甚难，求效匪易，縻躯原所不惜，复悚何以自安。即谓圣明在上，格外优容，而扪心内省，讵敢欺饰。臣并非矜辞让之小节，博谦退之美名，实因力薄材轻，责艰任巨，深恐丝毫无补，转令丛脞滋多，与其偾误于将来，曷若陈明于此日。合无吁恳天恩俞允，将臣会办练兵大臣一差，先行开去，俾臣之事权稍轻，免臣之愆尤日集，是朝廷之保全臣者愈大，而臣之誓心努力，勉期上报朝廷者亦愈不敢自宽，感戴慈施，永永无极。

所有微臣沥陈下悃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袁世凯）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1日　孙中山为争取侨胞支持革命，于檀香山加入致公堂。

1月13日　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奏订学堂章程。

1月14日　清廷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命大学士孙家鼐充学务大臣。

1月　孙中山《驳保皇报》在《檀山新报》上发表。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发表后，檀香山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主笔陈仪侃，于1903年12月29日也抛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攻。为此，孙中山又发表此文，予以逐条驳斥，“以塞毒焰，而辟谬论”。这篇文章将陈仪侃文章中自相矛盾、立论荒谬、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处揭露无遗，从而宣传了革命救国的道理。

1月　孙中山在檀香山（火奴鲁鲁）重建革命组织，取名“中华革命军”。1903年10月5日，孙中山由日本抵檀香山。为了扫除保皇派势力，从11月13日起，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几个戏院中连续演说3天，批驳保皇谬论，演说时，座无虚席，听者动容。随后，又应邀到奥华湖岛的希炉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孙中山见华侨迅速转变，人心归向，就着手恢复和发展革命组织。1904年1月，在火奴鲁鲁温逸街3号建立革命团体，取名“中华革命军”，以“记邹容之功”。会上，孙中山亲自立盟，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听众处罚。”加入者很快就有近千人，檀香山又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2月1日　袁世凯奏请开去练兵差使，清廷不允。

2月6日　日俄战争爆发。

2月8日　清廷命袁世凯迅速调齐各营严防沿海及关外一带，赴榆关居中调度。

2月12日　外务部宣布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中立。

2月15日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1903年11月11日（旧历九月十六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约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翁巩、周震鳞、陈方度、柳聘农、柳继宗等10多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则声称系集股筹组“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清王朝之意。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100余人。会上一致推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会员500余人（有姓名可查者90余人），

多属知识分子。华兴会没有留存任何正式的纲领和章程，只在策划长沙起义时提出过“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

2月19日　山东利津县北岸王庄黄河决口。4月2日合龙。

2月20日　直隶提督马玉昆统兵出关，驻扎辽西。

2月25日　广州商家以拟行统捐，皆罢市。

3月24日　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张德彝、梁诚等联名电请变法。

3月31日　孙中山由檀香山抵美，保皇党运动关吏禁孙于木屋，寻为致公堂黄三德保出。

4月16日　清廷准商部奏保江苏在籍绅士张謇以创设商业公司卓著成效，请作为头等顾问官加三品衔。

4月20日　俄军侵犯辽西中立。

4月29日　日军渡鸭绿江。5月1日陷九连城。

5月15日　外务部请准自开济南城外、潍县及周村三处为商埠。

5月21日　上海会审公廨改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两年。

6月16日　清廷依孙家鼐等奏，皖省矿务自行筹款兴办，派道员袁大化办理全省矿务。

6月21日　清廷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梁外，戊戌案内各员均宽免。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一律开释。

7月1日　长沙开埠。

7月3日　刘静庵、曹亚伯等于武昌组成科学补习所。

7月6日　英军攻陷西藏江孜。

7月10日　清廷罢粤海、淮安海关监督及江宁织造。

7月16日　署粤督岑春煊统军赴广西镇压起义军。

7月19日　湖北恩施县属沙子地地方杀毙外国主教及毁教民房屋多间。

7月21日　清廷命铁良赴江苏等省清理藩库及各厂局。

7月30日　清廷公布西江通商章程。

7月31日　广西起义军攻占庆远，清廷饬两广、云、贵、湖南各督抚调兵合击。

8月1日　永定河南四工决口。11月5日合拢。

8月4日　英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奔走库伦。

8月10日　山东利津县薄庄黄河决口。

8月24日　湘粤各军败广西起义军于庆远。29日再败广西起义军于四十八峒。

9月7日　英军强迫西藏订立英藏拉萨条约。

9月10日　四川苗民起义军进至云南边境。

9月18日　法国修筑之越南铁路，已逾蒙自而达云南昆明。

9月21日　英国声明旅顺非俄退让，英国所租威海卫不能遵约交还，继续进行强占。

9月23日　广西起义军欧四、白毛七等率众攻入罗城县城。10月5日败于龙济光军。

9月25日　成都兵工厂全部工人六百名罢工，抗议工头克扣工资。

9月26日　清廷赏直隶津海关道唐绍仪三品京堂候补副都统，前往西藏查办事件。

10月1日　英国侵略军退出西藏。

9月11日　（九·三戊寅）

广西起义军退入钦廉十万大山。

张之洞扩充湖北汉阳枪炮厂，改名为湖北兵工厂。

俄使向外务部要索库伦新伦。

10月19日　重庆全城罢市，反对厘金局苛索，残酷压榨人民。

10月23日　华兴会黄兴、马福益等谋于湖南起义，事泄失败。

10月26日　宁沪铁路开工。

清廷命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为考察商务大臣，并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务。

10月27日　直隶之大名、顺德，河南之彰德等府，山东之东阿县一带，会党集聚，以仇教为名，准备起事，清廷命袁世凯、周馥、陈夔龙督饬地方官严拿。

11月12日　户部为搜括钱财，上条陈请兴官捐、商捐及妇女首饰捐。

11月16日　湖北以有乘太后“万寿”日起事之信，下令戒严。

11月19日　万福华在上海枪击已革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逮。

清廷赏已革侍郎张翼三品顶戴，派赴英国对质开平煤矿局讼事。

11月　江浙地区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1903年秋，陶成章与龚宝铨、魏兰等积极联络会党，进行革命宣传，为光复会的成立提供了群众基础。1904年冬，龚宝铨在上海建立暗杀团。这时，蔡元培已从青岛回到上海，并与黄兴、陶成章等有所策划。蔡元培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参加。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蔡元培任会长，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

12月9日　清廷电令驻日公使杨枢密查留东学生设立同仇会事。

12月12日　清廷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湖广总督、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次年七月裁撤广东巡抚）。

清廷定新军官职，区分为三等九级

12月20日　清廷以俄波罗的海舰队东来，饬沿海各省戒严。

外　交

1月6日　日本内田公使会见庆亲王，劝告日俄开战保持中立。

1月12日　刑部侍郎胡熵芬奉密旨，赴旅顺见关东总督阿力喀塞克夫，议无所成。

2月8日　日本突然袭击沙俄在旅顺口的舰队，一场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地区权利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中国领土上正式爆发。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由来已久。沙俄自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后，就一步步地向中国的东北伸张势力，强租了旅大，并在旅顺建立了海军基地，使日本大为恼火。1901年《辛丑条约》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一系列旁若无人的侵略行动，更使日本忍无可忍，决心从俄国手中抢夺侵略权益。英、美等国从各自的侵略权益出发，也对企图独霸中国东北的沙俄深感不满，因而公开支持日本与俄国抗衡。日本仗着英、美的支持，决定同俄国"一决胜负"。2月10日，日俄双方同时宣战，并无理要求中国严守"中立"。清政府完全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的生死与灾难，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无耻地宣布严守"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听任侵略军的蹂躏。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均为近代战争史上所罕见。仅日本一国所耗战费即达15亿日元，动员的兵力近110万。奉天(今沈阳)一战，日军伤亡即达7万人。至于俄国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均不在日本之下。蒙受战争灾难最大的还是中国东北的人民，战场所在地乃东北人口最稠密地区。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于1905年5月结束。

5月13日　驻英公使张德彝与英外部会商保工条约十五条成。

5月15日　清廷命外务部照会瑞士，声明愿入红十字会联约。

6月13日　北京公使团设定使馆区。

7月6日　英国侵略军攻陷西藏江孜。1903年12月，英国侵略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军民奋起反抗。1904年4月11日，英军到达江孜，当地军民顽强阻击，展开了英勇的反抗斗争。特别壮烈的是5月到7月初的保卫江孜的战斗。5月初，藏军1000余人在江孜等地僧俗的配合下，以低劣的武器战胜了优势装备的英国侵略军，克复了江孜宗政府，占领了宗山、白居寺等重要据点。然后分兵攻袭英军大本营，陷英军于被动达1个多月，沉重地打击了英军的嚣张气焰。但由于西藏封建农奴主的腐败，广大人民无法充分发挥抗敌的才能。这些统治者目光短浅，战略战术刻板僵化，又不利用有利的地形，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切断英军的通讯和补给。6月23日，英军在得到补给和增援后，再次进攻江孜。终于在7月6日攻陷了江孜。

9月7日　英国强迫西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包拉寺代表罗桑坚赞签署不平等条约《拉萨条约》。1903年12月10日，英军准将麦克唐纳率领侵略军越过咱里拉入侵中国西藏，并于1904年8月3日占领西藏地方首府拉萨。由于达赖十三世已于前几天出逃，西藏地方群龙无首。英军在拉萨大肆劫掠，抢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但找不到逼和对象。8月12日，英军上校荣赫鹏向清朝驻藏大臣有泰提出8项议和条件。有泰向西藏地方官员一再施加压力，罗桑坚赞等仍不允从。9月1日，荣赫鹏又提出约款，声称如不允从，每日增加赔款5万卢比，进行恫吓。罗桑坚赞等西藏地方官员被迫于9月7日与荣赫鹏在布达拉宫签署《拉萨条约》。共10款，主要内容有：(1)除亚东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2)向英国赔款50万镑，分75年付清；(3)拆除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4)非英国事先同意，不得将西藏土地让卖、租典予外国；(5)不许将西藏进款、货物、金银钱币等给予外国抵押拨兑；(6)外国不许享受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它利权，不得派员入藏和干涉西藏一切事务。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西藏人民的利益，西藏军民拒不承认，清政府也始终不在条约上签字。直到1906年4月27日，英国只得在北京签订新约。

9月13日　法驻沪点领事向浙江巡抚要求沪绍航权。

11月11日　中葡订立广澳铁路合同及中葡通商条约。

11月17日　清廷准张之洞奏请，照会美使废除合兴公司铁路合同。

经　济

1月11日　商部订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并先在京师设立商会。

1月15日　中日订立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合同。

1月21日　商部修成商律卷首之商人通例九条，公司例一三一条，颁行之。

2月29日　川督锡良奏设川汉铁路公司。

3月17日　商部奏颁路矿暂行章程三十八条。

6月5日　中英订立安徽铜安山开矿合同

6月　胶济铁路成。

8月17日　开洛铁路兴工。

9月7日　美使照会外务部索办陕西榆林延安两府

煤矿。

9月14日　英商请承筑山西太原至蒲州铁路。

9月17日　华侨张煌南修筑的潮汕铁路兴工。

10月26日　宁沪铁路开工。

清廷命候补三品京鉴张振勋为考察商务大臣，并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务。

文　教

1月12日　清廷修建京师观象台。

1月17日　我国已知最早的国人自办的通讯社——中兴通讯社在广州创建并首次发稿。发行人及编辑为骆侠挺。主要是向广州、香港两地报纸发稿。

1月　丁初我等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月刊。主编丁初我，自第6期起改为陈志群主编。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妇女刊物之一。1906年初停刊，出了17期。1907年2月，秋瑾又续办过1期，总计18期。该刊为24开本。内容分社说、演坛、科学、实业、教育、史传、译林、专件、纪事、文艺等栏，以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女权和爱国精神为宗旨。载有《女魂篇》、《女界革命》、《女权说》、《女雄谈屑》、《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革命与女权》等文，鼓动和激发妇女从事革命，宣传男女平等，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编辑和主要撰稿者有柳亚子、徐觉我、沈同午、蒋维乔、丁慕卢等。《女子世界》是当时以妇女为对象的刊物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月刊，在激发妇女的革命精神方面有一定影响。

1月　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个正式实行的学制——“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1903年(癸卯)7月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奉命拟订的。包括《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及《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学习年限小学9年，分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3年，大学堂3年至4年，通儒院5年。入学年龄为7岁。施行至辛亥革命为止。

2月26日　《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俄事警闻》是继《苏报》、《国民日日报》之后在上海出版的又一份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创刊于1903年12月1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由蔡元培、叶瀚、王季同、陈竟泉等主办，撰稿人有刘师培、陈去病等。内容分社说、要闻、外论、专件、时评等栏，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三省问题上的角逐，抨击清朝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群众对局势日益关切。《俄事警闻》遂决定增加篇幅，改名《警钟日报》，仍由蔡元培等主编。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撰稿者有刘师培、陶成章、林獬、添保、杜课园、高旭、陈去病、陈独秀、邹容等。内容除原有栏目外，增加了殖民消息、世界纪闻、外国纪闻、国内警闻、极东警闻、极东战局详记等专栏。从1904年2月26日改名至1905年1月28日，共出338期。报纸销路除本埠外，国内近30个城市尚有分售、派售。

3月11日　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月刊(1920年至1947年6月改为半月刊)，每年12期为一卷。1—8卷为大32开本，以后为16开本。徐珂、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等先后担任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除本社自撰社说外，经常选载官民各种报刊的言论、记事、要闻和奏章、文牍等。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很像一本“杂志的杂志”。几十年间，经过多次大改良，内容、篇幅、栏目等经常有变动，如开始为文摘性的，1910年始刊载译文和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入长沙、香港、重庆出版。1947年迁回上海。1948年12月停刊。历时45年，中间曾三度停刊，共出版了44卷。

6月12日　上海著名日报《时报》创刊。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狄葆贤创办并主持报务，延请陈冷(景韩)为主笔。在内容与体例上均有所革新。分正刊、副刊，并有插图。设有时评、教育、国粹等专栏，其中“时评”栏为该报所创设，短小隽永，为当时新闻界所推崇。1911年创办《滑稽时报》。1921年该报编辑戈公振主编《时报图画周刊》，为国内新闻界首创。同年冬黄伯惠接办该报，着重刊登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1927年首创我国套色印报。后期主笔为蔡行素。政治倾向一贯保守。1939年9月1日自行终刊。

7月28日　大清官报设立。

10月　我国最早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在上海创刊。半月刊。上海大舞台丛报社出版，陈去病主办，柳亚子等为主要撰稿人。提倡民族主义，抨击清朝统治。设有论说、传说、小说、班本、丛谭、文苑等栏目。分文言与白话两种文体。次年被清政府封禁。共出4期。

10月　近代中国最早的师范学院之一，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杨锡侯任监督，聘日本人菊池镰二郎为总教习。学生选自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分本科(三年毕业)、速成科(二年)、最速成科(一年)。设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农学、博物、手工、图画、体操等。1905年更名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时停办，1915年在原址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5年

导　言

一九〇五年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反美爱国运动。原来美国为开发西部从中国掠去数十万华工去美国做工，美国西部的繁荣，浸透着华工的血汗。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资本家为转移工人斗争视线，便别有用心地捏造华工抢饭碗之说，公然用排华作为竞选时的口号。在这股逆流下，在美中国人遭到十分屈辱的对待。为美国的暴行，中国人民极大愤怒，以《中美会订华工条约》到期为引子，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反美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看到"新政"只是统治集团的弥缝之计，不能挽救危机，因而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尤其是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更加刺激了相当一部分朝廷重臣，使他们逐渐也倾向于立宪。精明的慈禧顺水推舟，又演出了"预备立宪"的唬人一幕，五大臣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就在清政府处心积虑为自己的统治危机而费心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局面业已形成。组建全国性政党已成为当务之急。一九〇五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各个革命派别从此有了自己的统一旗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革命派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是不屑一顾的，为了揭穿这一阴谋，志士们甘洒热血，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给予清廷沉重打击。吴樾虽然壮烈牺牲，但正阳门爆炸声也惊醒了麻木的看客。

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被西方掠夺的地位，尤以铁路权益为最。本年，终于有一条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正式开工。总工程师是名垂青史的詹天佑。在克服种种困难，顶住内外压力之后，终于在一九〇九年建成并全线通车，取得了中国人的骄傲。

一九〇五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还有那些永远闪光的名字：孙中山、詹天佑。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抵制美货运动
- ●“预备立宪”
- ●中国同盟会成立
- ●吴樾炸五大臣
- ●京张铁路

抵制美货运动

背景介绍

一九〇五年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反美爱国运动。原来美国为开发西部的金、银、煤、铁等矿，十分缺乏劳动力。因而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资本家曾用各种手段诱骗几十万中国劳动人民去美国做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参加了开矿山、修铁路、垦荒田、筑道路、开果园以及织布、洗衣、畜牧等等劳动。美国西部的繁荣，倾注着华工的血汗。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接连发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批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或工资下降，工人到处举行大罢工。美国资本家一方面血腥地镇压本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方面使用阴谋诡计，欺骗工人，转移工人斗争视线，胡说美国工人之所以失业，是华工抢夺他们的饭碗，借以煽动排华。一些资产阶级流氓政客到处演说，公然用排华来作竞选的口号，鼓动群众抢劫华工金钱、烧毁华人房屋，殴打屠杀华侨，一九〇〇年甚至把檀香山的唐人街烧个干净，使华桥损失财产二百六十余万。不仅如此，凡是经过美国境的中国人都遭到非人待遇。美国海关常以检疫为名，对抵美的中国人横加凌辱，连清政府的外交官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政客们还制定了限制华人、虐待华工的各种条例，迫害华工。

美国政府的这些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通过国内外各种报刊和发行若干书籍提出强烈抗议并揭发其罪行。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清政府与美国政府于一八九四年订立的《中美会订华工条约》期满，中国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海外华侨报刊和国内报刊不断发表要求废约的言论。是年底，旅美华侨致电清政府，要求废约。“华工禁约由出使大臣梁诚与美政府磋商数月，美政府一意坚执，无所通融。”美国不仅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和清政府交涉，“盖欲以恐吓手段，催我迁就订约”；而且继续残杀华工。美国长期对华工的残虐和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使充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怒火迸发出来，形成了一九〇五年的反美爱国运动。

材料：

- ·抵制美货运动始末
- ·一九〇五年的反美爱国运动

材料一　抵制美货运动始末

一九〇五年五月十日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登坛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继即提议抵制之法，大旨谓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暂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曾铸在演说中提出抵制美货的办法五条：“一、美来各货一概不用，机器等一应在内。二、美船揽载，华人不应装货，各埠一律。三、美人所设学堂华人子弟不应入堂读书。四、美人所开之行，华人不应应聘为买办及通译等事。五、美人住宅所雇用工劝令停歇，庖御等人一概在内”。大会致电各省商会传谕各商界共同进行抵制。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以抵制销用美货为主要办法的反美爱国运动开始后，迅即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国内各城市工商界以及海外华侨相继召开大会，议定不用美货并印发传单广泛宣传，国内和华侨报刊纷纷发表抵制美约、不用美货的言论。七月二十八日抵制美货正式开始，反美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商人及一些爱国资本家、甚至儿童都热烈响应，踊跃参加，立即展开抵制美货活动。上海缝纫工人不作美国布料衣服，刻字工人不刻美货商标，上海漆业工人公议办法六条，规定除不买美货外，还不用美国木材作招牌，不给美国公司作招牌，不用美国颜料作活。南京下关“文明拒约社”的工人公立誓书，除不买美货外，还规定不进口美国货，扛帮(搬运工人)不运美货，驳船不装美货。下关的洗衣业工人也“一律不洗美兵轮衣服”。广州食品工人不用美国面粉，汉口、镇江、营口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运美货。江苏嘉定等县农民群众将美货统统烧毁。在北京，“京师各学堂接得上海商会公电，大动公愤，所有学堂均议决不用美货，以示抵制。且连盟檄示各省学堂，一气联络，不买美货，以期共达目的。”香港大书院学生拒绝使用美国来的书籍。甚至连南洋、日本、美洲、欧洲各地的华侨也行动起来，不用美

货。当时祖国各地反美集会轰轰烈烈，演说之举激浪滚滚，电报传单频传交飞，形成了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反美运动。

反美爱国运动的猛列开展，使美国政府十分恐慌，急忙进行外交恫吓，胁迫清政府禁止运动发展。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于五月二十九日到北京，“当即照会外交部，请电致各省督抚，一体禁阻”。清朝政府急忙下令查禁各地的爱国运动。八月三十一日清廷竟然公布谕旨说：“所有从前之约，业经美国政府久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迭经外务部电行该省督抚，晓谕商民，剀切开导，务令照常贸易，共保安全，着再责成该督抚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总期安居乐业，毋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地督抚遵旨下令查禁爱国集会演说，逮捕参加运动的爱国人士。一部分贩卖美货的买办资产阶级亦从中破坏，主张把美货贴印花后出售，并对以曾铸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资产阶级表现了先天的软弱性，逐渐退缩下来。八月十一日曾铸发表了悲壮动人的《留别天下同胞书》以后，却不再有什么壮烈活动了。这样，反美爱国运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中华书局）

材料二　一九〇五年的反美爱国运动

【上海】上海报关行工人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1905年7月28日）为抵制美约开特别大会。议定办法如下：

一、凡我工人誓不吸用美国所售之烟及用各物。

二、各商所定之货，证明其在六月十八日（7月20日）以前所定者，我等方为装运，否则一概不代装运。

【上海学童】因闻商学界抵制美约之事，亦大动公愤，爰即组织一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公定章程，相约严守：一议日夕所用读书文具概不用美货；一议由开会日起，所穿衣裳及食物玩器各等概不用美货；一议同志每日互相调查美货牌号，登诸会内，供众知晓；一议我等父兄及亲戚朋友间有用美货者，必须劝谏，以尽公愤之义务；一议每礼拜开会，发明禁工苦况，订商抵制修理，惟吾等系幼稚时代，议论恐有未妥，拟请品学兼优者监会公断；一议若禁约不废，此会不散，禁约已废，此会改为童子讲学会，惟同志于未废约时须宜坚持到底。

【留日学生华商】留学日本东京之四川同乡会，曾在上野公园开会筹议抵制方法，各职员评议员及会员七百数十人，均先决定四川全省学界不用美货，一面公函旅沪蜀商，并分布重庆商界，请即联□一气。……

旅居长崎之华人，定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日（1905年8月1日）起实行不用美货。

（摘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预备立宪”

背景介绍

资产阶级改良派看出“新政”只是统治集团的弥缝之计，不能挽救严重的危机。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认为“专制政体之不能存于今世界”是“理势所必至”；“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这种议论，从1902年就开始出现，不但有梁启超等人在《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鼓吹，而且还有人上书提出要求。比如美洲华侨叶恩，1902年曾向清政府的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同年，侍讲学士朱福诜曾上书朝廷，也提出立宪的建议。

这种立宪要求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把东三省的土地人民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蹂躏，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这种耻辱给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更给资产阶级和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俄国是个非常凶横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曾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却因畏惧而长期屈膝投靠于它。可是在这次战争中，它被小小的日本打得惨败。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启示。立宪派便利用这一事实大力宣扬：日本不过“蕞尔岛国”，它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一向被视为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立宪派因而断言，立宪则强胜，专制则败亡。这成了他们要求立宪的最根本的理由。《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大公报》也载文宣称，立宪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

材料：

- 立宪派崛起
- 五大臣出洋

材料一　立宪派崛起

这年，有两家重要的立宪派报刊在上海出版，一个是《时报》，是梁启超协助狄楚青创办的；一个《东方杂志》，是由出版业资本家、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创办的。夏也是立宪派，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这两家报刊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东方杂志》除了本身发表鼓吹立宪的言论外，还经常汇登其他报刊，如《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大公报》等宣传宪政的文章。当时立宪派控制的报刊几乎都以鼓吹立宪为中心。要求立宪的呼声遍于国中。《时报》评论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起而为之所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趋向。

立宪派一面大力制造舆论，一面展开实际活动。最著名的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在这年5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圆滑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但当时袁世凯还没有看准风向，回信答称："尚须缓以旋时"。是年7月，张謇与赵凤昌合刻《日本宪法》送达朝廷；9月，又刊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送给满族权贵铁良等。

在日本的梁启超，自从1903年游美归来，完全放弃了他的所谓"革命"、"破坏"之说。他和其他立宪派一样，感受到日俄战争的震动，认为"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因而更集中致力于立宪的鼓吹。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讨论俄国立宪问题的文章。1905年，国内政界某些官员开始注意立宪问题。这时，梁启超极力加以联络，先后"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这年夏天，侍讲学士朱福诜曾连次上书清政府，要求早决大计，宣布立宪。

材料二　五大臣出洋

立宪派急切要求立宪，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他们不相信革命能够成功，以为革命会遭致无休止的破坏和动乱，那就不但争不到新的利益，连现有的利益也难保住了。所以他们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并认为，只要实行立宪，革命自然可以消灭于无形。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立宪派同统治集团有一致性，所以他们奔走呼号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春，驻外使臣孙宝琦等上折奏请立宪。这一举动受到立宪派的普遍赞誉，许多报纸专门发了社评。至1905年，官吏奏请立宪的便渐渐多起来。重要督臣张之洞、周馥、岑春煊都曾以立宪的建议奏闻朝廷。一年前还持观望态度的袁世凯，这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实行立宪的准备。朝廷居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这时连满族亲贵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做些较大的改革，来挽救内外危机。西太后本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她最关心的是紧紧掌握最高的权力。而她周围的一些较倾向于变革的大臣，都以日本为例说服西太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而且可保"君权永固"。立宪派虽然渴望通过立宪分享政权，但起初也着重于立宪有利于皇室的一面加以鼓吹。因为这个缘故，一向顽固的西太后，这时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大权，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觉得不妨再作一次改革的尝试。

1905年7月16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在火车站遇炸，载泽、绍英受伤，未能成行。革命党人吴樾则以身殉。嗣后，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随同载泽、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迟至12月2日才得以成行。

立宪派对派遣五大臣出洋一举，感到非常振奋，以为这是"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宣布天下"。其实这时清政府仍未定下准备立宪的决心，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第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中国同盟会成立

背景介绍

二十世纪初年，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各地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给孙中山以极大鼓舞。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明确地指出："全国民之革命已熟，如千九百年惠州之举事，千九百二年广州之暗潮，其影响皆不细；而广西之运动者，尤日增势力。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大抵支那人之持革命观念者，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占最多数，而不能过露宗旨，惧罹官吏之毒害；第二种以种族之思想，欲起而反抗满人；第三种则为有特别高尚之思想者。此三种人之手段不同，而渐次求达其目的，必得异日最良结果，是知满洲政府之推倒不过时日之问题而已。"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在一

九〇三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斗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第二，"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扫除保皇邪说，发展革命力量；第三，"联合大群，团集大力"，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美国访问，并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应中国留欧学生邀请赶往欧洲。原来在这一年初，署湖广总督端方为了破坏武昌学生的革命活动，将主张激烈的学生派出留学，其中朱和中等被派往欧洲。"当时夜半下公文，限令次晨谒端督，午后四时上船"。不少人不赞成朱和中等立即离开湖北。朱和中说："事已至此，岂得由己？然我辈至今群龙无首，如此伟大之种族革命，岂等夷辈所能领导？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乘机觅孙逸仙，是于此间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也"。朱和中等从武汉登舟路过上海时，恰遇准备赴美接任《大同日报》主笔的刘成禺，于是便请刘成禺代向孙中山致意。朱和中等到达欧洲后，得知孙中山仍在美国，便致函邀请孙中山游历欧洲。一九〇五年初孙中山抵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留欧学生就革命应该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朱和中等认为，革命进行方法应"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必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孙中山认为"藉会党暴动为可靠"。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吾辈以后，当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使分途作领导人，则会党之流弊，可减少也。"辩论结束后，孙中山提议举行宣誓，建立革命团体。于是留学生们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次宣誓加入革命组织的共三十多人。接着，孙中山前往柏林、巴黎，相继发展三十余人参加革命组织，虽然在参加革命组织的成员中有些并非坚定的革命者，但上述事实说明：在留欧学生中毕竟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布鲁塞尔期间，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表示了中国革命党人对西方工人运动的关切和同情。不久，孙中山得悉东京留学生运动情况，决计东归，"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经过革命党人的多年努力，到一九〇五年建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材料：

- 起草章程
- 成立组织

材料一　起草章程

1905年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宋教仁、田桐、黎勇锡、朱少穆、马君武、邓家彦、但焘、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李仲揆（四光）等七十余人，除孙中山、黄兴等已经成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都还是在校的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国内的十个省。其中，曾经参加过小团体者：兴中会二人，军国民教育会八人，青山军事学校三人，华兴会九人，科学补习所四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二人，光复会一人。此外，日本人富崎寅藏、末永节也参加了会议。

孙中山首先向大家作了长篇讲话，演说革命形势和实行方法。他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有人提议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以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人们认为，使用"革命"字样，对未来这个秘密组织的活动不利，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大家还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于是，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孙品山起草了盟书，内容如下：

联盟人　××省××府××县×××　当天

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

主盟人　×××

介绍人　×××

与会者纷纷缮写签署盟书，再进入另一小房间内，由孙中山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然后教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又推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程家柽、汪兆铭、蒋尊簋等起草会章，待成立会时提出讨论。人们正要离开会场时，室内后部的木板忽然坍倒，声如裂帛。孙中山诙谐地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大家兴奋地鼓掌欢呼。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就出现了。

材料二　成立组织

孙中山到东京后，广大留学生都想一睹这位革命伟人的丰采。在黄兴的推动下，留学生决定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8月11日，清国留学生会馆门前贴出开会告示，学生们争相传告，相约与会。此前，横滨保皇党听说孙中山在东京顺利组党的消息，派了徐勤到东京，发起组织"青年同学会"，企图以此抵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影响。但是，

经过几个党徒千方百计的活动，一无成就。这时，徐见到学生们的情绪已无法挽回，只好在8月12日下午悄悄地跑回横滨。

八月十三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到会者一千三百多人，盛况空前。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中国文明悠久，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如果能"发愤为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取法于上"，中国的建设将"有异常之速度"，"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他号召大家一定要"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抛弃保皇党所宣扬的君主立宪的邪说，为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孙中山这种明确的民主革命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后必将出现一个大跃进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同盟会的行列中来。

八月二十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一百余人，包括了十四个省籍的人士。这天，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了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黄兴等起草的会章。会章共三十余条，以后（1906年5月6日）经过修改，成为二十四条，这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章对会名、会址、宗旨、会员、本部机构和职员、分支机构、会费、会章的修改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都在总章中得到了反映。当天，还选举了总部的主要干部 。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

同盟会成立后，首先建立宣传阵地，于十一月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一九〇六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又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有些则作为文告供各地起义时发布 。其中有《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在组织方面，总部所委派之主盟人，于同盟会成立后，相继分赴国内外各地，吸收会员，建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同盟会成了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摘自《辛亥革命》中华书局）

吴樾炸五大臣

背景介绍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酝酿假立宪，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日俄战争结束后，原来比较弱小而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一举战胜了号称强大而顽固实行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这给清王朝中一些有识者以强烈的震动。他们纷纷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清廷从速实行君主立宪。一来可以抵制革命，麻痹群众，"永绝乱萌"；二来可以增强国力，加强统治。1904年，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上书清廷，要求仿效西方立宪政府，"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1905年夏天湖南巡抚端方入京陛见，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实行立宪改革，认为这样可确保皇上"世袭罔替"；接着，在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行宪政，并要求派遣新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在这种政治气氛的促使下，慈禧太后于1905年7月16日终于发布上谕，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四位王公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摆出一副预备立宪的样子。7月27日，又下令加派绍英随同前往，成为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准备，五大臣择定9月24日为离开北京的日期。

为了揭穿清政府的假立宪骗局，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一方面发表大量文章对其揭露批判；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但也有位反清革命志士认为上述二法实行起来太远太难，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施行暗杀方法，在五大臣出国之前消灭他们，才能粉碎清廷的假立宪阴谋。此人就是年方27岁的吴樾。

材料：

- 暗杀时代
- 正阳门爆炸案

材料一　暗杀时代

吴樾，原名越，字梦霞，一字孟侠。安徽桐城人。生于1878年。父吴尔康先官后商，常年在外。吴樾7岁丧母，靠二哥抚养长大。在戊戌变法前，他走的是当时一般旧式文人的道路：先进私塾读书。从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废弃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萌生了最初的民族思想。1900年他22岁那年，先到上海，试图进广方言馆，未成，遂北游直隶保定。1902年他在乡前辈、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帮助下，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这时他所追求的目标仍然只是"得出身，派教习"，平素在学校中"寡言论，乏交游"，专心读书。但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逐步惊醒了他，"知国家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但他这时所追求的是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的君主立宪主张，他"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

宪”。可是，全国的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当吴樾读到《黄帝魂》、《警世钟》、《孙逸仙》等反清革命书籍，特别是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鼓吹革命排满的文章后，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与影响，“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康梁之说几误我矣”。确立起反清革命思想。1903 年暑假，吴樾特地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到上海，去狱中看望因“苏报案”被关押的邹容与章太炎，并结识了陈独秀、张继等人，阅读了许多反清革命书报。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与深入。

当时，在革命阵营中，暗杀之风大盛。此风也感染了吴樾。1904 年夏，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由朋友介绍，来到保定结识了吴樾。二人“倾谈数昼夜，志同道合”。赵声介绍吴樾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少年中国强学会”，策划暗杀行动。一次，他们在保定酒楼上谈论反清革命行动时，谈到军事行动与暗杀行动的难易问题，吴樾认为暗杀行动较为容易，且心向往之，他问赵声：“舍生一拚与艰难缔造，哪个难易?”赵声答：“当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便说：“即然如此，兵革之事，请你担任。你为其难，我为其易。”慨然以暗杀自任，并表示了牺牲自己的决心。他对赵声说：“我为暗杀死去。希望你们将来率领革命大军北上灭清，为我兴问罪之师。”

赵声离去后，非常惦念吴樾，深知吴樾将为暗杀献身，特寄赠绝句四首，其中写道：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

大好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吴樾收到赵声赠诗后，反复朗诵，感动不已。他复信赵声，写道：“每诵之，则心为之一酸，泪为之一出。今在某为其易，君为其难，……一日不达目的，即一日不得言其难。”

赵声又介绍湖南[illegible]著名的革命党人杨笃生到保定来与吴樾联[illegible]。杨笃生是《新湖南》一书的作者，这时表面上在北京武学官书局工作，实际上正在秘密从事暗杀活动的准备工作。他来保定后，与吴樾等革命同志刺血订盟，成立暗杀团体，筹划暗杀行动。杨笃生问吴樾有什么武器，吴樾示之以手枪，杨笃生笑着摇摇头说：“这种东洋货，击狗都不中，何况刺人！我有一种新式武器，威力胜过手枪百倍。”杨拿出他新研制成功的撞针式炸弹，只要将此种炸弹扔出去，撞针与硬物接触，就会接触火线而爆炸，既易于使用，又体积小而威力强大。吴樾与杨笃生曾到北京郊区八大处的荒山中试验此炸弹，果然声如巨雷，灵验无比。

吴樾一边学习爆炸技术，一边寻找暗杀目标。1904 年，清廷兵部侍郎铁良奉旨到南方各省巡视，革命党人章士钊、万福华、王汉、胡瑛曾计划在南京与武昌刺杀他，均未成功。吴樾开始也将铁良作为自己的暗杀目标，特地走访胡瑛，了解情况，学习经验，并慨然以后继者自任。他发誓：不杀铁良，不足以言革命。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暗杀时代》，说明暗杀铁良的意义与决心，以备自己牺牲后留给后人。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经盛鸿）

材料二　正阳门爆炸案

1905 年夏天，吴樾在保定高等师范学校临近毕业时，未参加考试即离校去东三省，将欲有所作为。7 月，他突然听说清政府将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康梁保皇党人兴高采烈，宣布宪政时代即将到来，对革命党人大肆攻击。吴樾闻此十分气愤。他在暗杀前 10 天写了一篇《意见书》，表示他的态度和见解。

吴樾下定必死决心以与出洋五大臣拼命。他以所抱愿望详告其未婚妻，希望未婚妻继承己志，继续投身反清革命，他日成为中国的罗兰夫人。然后他慷慨登车，潜赴北京，寄居前门外桐城会馆，多方侦探五大臣的出国日期，并写好给章太炎与致未婚妻的遗书数封，待机而动。

1905 年 9 月 24 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清廷慈禧太后亲自选派出洋考察西方国家宪政的五位大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将于这天乘火车离北京去上海，然后乘船出国。上午 10 时，五大臣带着大量随从与侍卫登上了火车包厢。来送行的朝官显贵挤满了站台，四周军警林立，岗哨密布。

正在这时，一位穿戴着无顶红缨官服的年轻仆从挤上了五大臣所在的包厢。站在包厢门口的卫兵询问他是哪位大人的随从，此人回答说泽公爷府里的。卫兵觉得此人面生，说：“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啊?”此人说：“新进府的。”说着就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因车上这样穿戴的人太多，因此多未加以注意。谁也想不到此人竟是一名身怀炸弹的刺客。

此刺客在车厢夹道中发现了出洋五大臣的座位后，正准备掏出炸弹投掷，没想到此时火车的机车与列车接轴，车身猝然被撞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刺客所用炸弹为撞针式，其针受到撞击，未及抛掷，已自动爆裂，轰然一声，铁片四散。刺客的下半身炸烂，肠腹崩裂，手足皆断，面孔血网模糊，难以辩认。除刺客外，还炸死三名侍役。五大臣因相距较远，仅绍英与载泽受轻伤，徐世昌的官帽及袍带被弹片炸破。来送行的清廷官吏亦有人被炸伤。

狙击五大臣案发生后，清廷大为震恐，慈禧太后急忙下诏令京城巡警查究刺客究系何人，主使人是谁。京城戒严，巡警四出。五大臣出洋日期被迫推迟，王公贵族与达官贵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吴樾死后，因面目血污，模糊难辨，陈骨骸数日，也无

人认领。后来清廷的侦探史某到桐城会馆，才查清这件震动全国的刺杀案的发难者是吴樾。

吴樾的壮列牺牲极大地激励了革命党人。女革命志士秋瑾写道："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势。……爆血同拚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吴樾牺牲后一年多，1907 年 4 月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刊载了吴樾的遗文与纪念吴樾的文章。辛亥革命后，国人寻获到吴樾的遗骨，安葬于安庆平头山。

（摘自《革命逸史》冯自由）

京张铁路

背景介绍

1905 年，詹天佑被派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总办为官僚陈昭常。一年后陈调任吉林殖边督办，詹天佑升任总办。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首先致力于测线与选线的工作。为了寻找一条比较理想的线路，詹天佑亲自背着标杆和经纬仪，在峭壁上精心测量，定点制图。他还时常骑着小毛驴四处访问老农，征求他们对线路的意见。他白天翻山越岭，晚上住在老乡家里，伏在油盏下绘图设计。他勉励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员，一定要认真对待选线工作，不能丝毫马虎。他们一共测了三条线，最后选定了通过关沟的这条线路。它比外国工程师所选路线在隧道工程上可减少二千多公尺。

詹天佑把全路工程分为三段。1906 年 1 月 6 日，开始从丰台铺轨。事先有人认为京张铁路要通过关沟，以铺用窄轨为宜。詹天佑不同意，坚持使用 1.435 公尺的标准轨距。他说："中国真正统一要从铁路的轨距划一开始。"在丰台铺轨的第一天，工程列车中两节车厢间的车钩链子突然折断，造成事故。这次事故提醒了詹天佑：不仅要有坚固的路基和标准的轨距，还要使列车的各车厢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特别是爬向高地或自高地下降，都必须十分安全。他引进和使用了自动挂钩，使十几节车厢牢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自动挂钩有效地保证了行车安全，被人们称之为"詹天佑钩"。第一段工程不到一年就竣工通车了。

第二段工程是京张铁路中最艰巨的一段工程，其中主要是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詹天佑根据两个隧道不同的地层结构和长度，决定对较短的居庸关隧道，采用两端对凿的方法，对长达一千零九十一公尺的八达岭隧道，除两端对凿以外，在中间开一竖井，向两头开凿，均获得成功。由于八达岭附近地势险、坡度大，詹天佑决定不采用通常的螺旋式的线路，而是从青龙桥起，依着山腰作"之"字形的线路。列车到了这里，改用大马力机车从后面推列车前进；到"之"字的交叉点时，再加用一台机车在前面把列车往上拉。车厢原在前头的，换方向后就改在后尾，不用调拨，比较方便。同时，每节车厢之间都改用自动挂钩，十几节车厢连结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在大马力机车的牵引下，列车就可以顺利地爬上八达岭的岭巅。这是詹天佑在铁路工程上一个创造性的设计。

京张铁路在 1909 年 7 月 4 日完成全线铺轨工程，9 月 24 日全线通车。10 月 2 日，在南口举行盛大通车典礼，庆祝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的胜利通车。这条原来计划需要四年才能修成的铁路，提前四个月就完工了，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三十五万多两银子。京张路建成使詹天佑名噪中外。为表彰他的功绩，清政府授以工科进士衔。

材料：

- 对京张铁路臆测
-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

材料一　对京张铁路的臆测

我亲爱的濮兰德：

〔···〕我已经同金达一起到张家口匆匆地视察了计划中的铁路路线。〔···〕

金达认为那条铁路线上只存在一个困难，然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那就是横穿南口这个关隘。〔···〕中国只有一位工程师，一个姓詹的广东人，他已经被任命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任何一件工程，他在外国人监工下所修筑的北方几条铁路都必须彻底返工。我们在南口遇到了他和他的随从人员，詹骑着一头骡子，他的两个助手骑着[illegible]苦力们携带着经纬仪和水平仪。没有打算勘查测量。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让大批装着货物的大车免税通过厘卡到张家口出售赚取大利。〔···〕

没有一条铁路比这一条更有发展前途了。如果把这样的宝贵财产委托给中国人处理真是万分可惜。不管怎么说还是有机会的，目前在华英商福公司（北京辛迪加）铁路工作的班德瑞，一位领事的兄弟，将被任命为顾问。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认为金达不应该被雇用，派给中英银公司的会计师也不应该被雇用。他认为那样可能会和俄国引起问题。其实，即使引起问题又有什么关系？他所处的地位是为英国人战斗；他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寻找借口来应付我们的对手们。

谨致最好的祝愿。

永远忠实于你的

〔乔·厄·莫理循〕

材料二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

詹天佑的名字和京张铁路分不开。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民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下，用自己的钱（关内外铁路的盈利），依靠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工人建筑的第一条铁路。筑路的总工程师就是詹天佑。

铁路工程是十分艰巨的。从南口经关沟到岔道城一段，计长三十三里，要开凿四个山洞，其中最长的八达岭山洞长达一千零九十一公尺余。八达岭山洞打开以后，詹天佑邀请外国工程界人士参观，他们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也不得不极表敬佩。全部铁路工程原订四年完成，实际上提前四个半月竣工。在经费方面，原预算为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实际支出银为六百九十三万五千零八十六两，节省了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七十四两。在当时，与其他铁路线相比，造价是相当低的。例如，每公里平均建筑经费，沪宁线为十二万二千九百元；津浦线为十一万九千元，京汉线为九万五千六百元；而京张线只有四万八千六百元，每公尺山洞平均所化费，粤汉南段为四百元；京汉线为三百五十八元；京张线仅为三百一十九元。

詹天佑之所以值得我们怀念，不仅由于他精通技术，还在于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他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变革，希望祖国富强。他埋头于祖国铁路建设，目的是希望祖国实现近代化。当他担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以后，他非常高兴，认为“中国已渐觉醒”，欢呼“中国快要进入铁路时代”。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这是一次科举制度的改革。考试的科目不是八股旧学，而是西方新学。按照各个留学生在外国所学的内容，考试外国语文和科学。按考试成绩授予功名。这次考试的主试官是唐绍仪，副试官是詹天佑和严复。詹天佑热忱地欢呼这一个改革，认为“这在中国考试制度上开辟了新纪元”，“八股文的考试终于被废除了”，“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詹天佑希望这次改革会给祖国带来新生”。

在工作中，詹天佑非常注意维护祖国的尊严，对外国干涉分子的阴谋、攻击和污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京张铁路是我国自己建筑的，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外国干涉者和外国资本家仍想插手。他们或是想包揽工程，或是想兜售器材。詹天佑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1905年5月20日，在居庸关遇到金达先生（英国工程师——本文引者）……他说，中国不能担负开凿山洞的工程，因为中国没有通风机和抽水机，势必雇佣外国包商。他建议雇佣日本包商，日本包商不但有通风机和抽水机，而且价格比其他外商都便宜，他可以找他们来承揽这一工程。……我告诉他说，袁总督在奏折中并已呈明不雇一个外国人。”

日记中又记：

“1905年8月26日，天津奥地利领使鲁德毓格来访，问我要不要从匈牙利工厂购买京张铁路的车辆。他说：‘我知道唐山厂不能制造车辆，故前来介绍’。我和陈昭常郑重地答复他说：‘如果中国唐山厂不能替京张路制造车辆，我们将到天津各厂家去买。……我们绝不会找你，也不会找其他的厂家，唯一的办法是去找我们自己的工厂去买。”

1912年9月，詹天佑派出中国工程师随湘鄂线英籍总工程师格林森出发对衡州至宜章一段线路进行复测。在规定工程师等级时，格林森要把外国人和中国人分开来，而外国工程师又高于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坚决反对，并予驳斥。他坚持但论学问，不分华洋，最后，格林森被迫收回原议。

1913年，詹天佑担任汉粤川路会办时，德国人雷讷任总工程师。有一天雷讷致书铁路督办冯升元说：“中国工程师能力不能胜任”，要求全部撤换，雇佣德国工程师代替。詹天佑得知此事以后，深恐此例一开，其他借款铁路将纷纷效尤，中国工程师将陆续被排挤。他立即写信给在北京的冯升元，要冯升元千万不要答应。冯升元不愿得罪洋人，复信给雷讷说：此等事已授权会办詹天佑决定，要雷讷找詹天佑去解决。詹天佑把雷讷召到办公室，先问他：“这封信在文字上有无错误？”雷讷茫然不解，说：“并无错误。”詹天佑又问：“所谓中国工程师能力不能胜任，指的是什么？”雷讷说：“系指被派在汉宜段中之若干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不够标准。”詹天佑听了雷讷的话，立即把原信退还给雷讷，说：“你在这封信中批评的是中国工程师不能胜任，和你所指的汉宜段若干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不够标准是不一致的。这封信，你写错了，必须重写。”接着詹天佑又对雷讷说：“今后如查清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不够标准，当另选派够标准者代替。但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出缺，必须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补充。”

在工作中，詹天佑非常注意培养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京张铁路施工过程中，詹天佑制订了工程练习生（分六级）及工程毕业生（分六级）的制度。凡未受工科教育而进入铁路工作的优秀青年派为工程练习生，一面在工地学习，一面给予基本工程教育。6年以后为毕业生，再按其品行资历授以帮工程师、副工程师等职。在国内大学未有工科毕业生以前，早年铁路人材多数是詹天佑培养出来的。

（摘自《晚清史论》茅家琦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清廷调查吴樾案侧记

一九〇五年，我由天津府中学堂毕业升入保定西关外直隶高等学堂肄业。是年秋季，清廷派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启程之日，他们正要步入车站，站上忽然一声霹雳，炸弹爆炸，站内秩序，立即大乱。爆炸的结果，仅炸死两人，一为五大臣的仆从，一为放炸弹的本人。放炸弹的人，虽然肠腹崩裂，手足皆断，但面部尚可辨认，军警当局即摄成照片，行文各省警察局饬令严加侦察，迅予破案。此项公文递到保定警察局，该局局长即召集全局人员会商破案办法。局员中有一王缙者，系绍兴人，他将照片携回寓中给家属观看。其胞弟王景福系直隶高等学堂学生，一见照片，即大声说："此为我校学生吴樾。"王缙即回警察局将情形报告局长。局长当派王缙到保定西关外高等学堂谒见该堂监督王景熙，秘密调查。王景熙即令该堂学监查明吴樾最近行动。学监回报说："吴樾已在一个月以前请假，迄今尚未反校。"王景熙又召来与吴樾同室的学生，询问吴樾平时行动以及往来朋友等情况。该生谓："吴樾平时静默寡言，只知读书，亦无朋友往来；惟每星期日必进城去看其未婚妻。其未婚妻是何姓名，住在何处，均不知道。"有一次，吴樾与某同学以细故发生口角，互相争论，气势汹汹，各不相让。后由第三者出面劝解，对方提出，要吴樾头顶便壶在院中走一圈，吴樾说，"好办"，即拿便壶顶在头上在院中走了一圈，面不改色。一场风波，即告结束。当时大家议论说，吴樾这一举动，与韩信胯下之辱如出一辙，足见他不是一个平常人。

此案根据王景福的认照片、监学的报告行踪和同学的补充，三方面综合起来，认为前门车站炸弹必系吴樾所为，毫无疑问。从此政府当局便认为直隶高等学堂系革命党的巢穴，每个学生都有嫌疑，一举一动都受到暗探监视。学堂方面对学生更是严加管束，加紧门禁，不能随便出入。将要放假以前，直隶布政使毛庆蕃、按察使增韫和本堂监督王景熙三人会同检查全堂学生。其检查办法，由上述三人到教室，高坐讲台之上，好似三堂会审，对全班学生挨次个别询问，首先看其汉文试卷，其中有无"不法"语气；然后询问姓名、籍贯和社会关系，同时观察其行动和态度。问至我时，知为绍兴人，毛即曰："绍兴人大都是读书不成，改习申韩，以维生计，此系正当途径。你的同乡名幕娄椒生、章介眉等品学兼优，我是很钦佩的。你不妨拜他们为师学幕，何以要进学堂读洋书，是何道理？"余即答曰："人各有志，我要学形而下者的学问。"伊点首不语，似有默许意，即令余归坐。

毛等检查至某班，他们一入教室，全班学生肃立欢迎，以示敬意。不料有一学生名冯汝骥，系陕西布政使冯汝骙之弟，并未起立，仍凭靠课桌而坐，且衣冠不整，傲不为礼。毛见之大怒，即饬监学出示开除。后查知为冯汝骙之弟，但已"言出法随"，无可挽回，只好说："世家子弟应该懂得礼貌，岂可如此放肆乎"。

次年开学，监督王景熙撤职，改派张鸣珂为监督。

（屠季和《辛亥革命回忆录》）

袁世凯依附奕劻

前清末年，政治上腐败，都说是奕劻的贪污造成的。光绪三十年，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载振）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云云。据一般人说，他的私产一百二十万，尚不止此数。至所谓细大不捐，则诚合乎事实。当时京官穷苦，凡是外官普通的馈送，有所谓三节两寿。三节者，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寿者，王爷及其福晋寿（即本人及其妻寿）。有所谓一年两敬者，夏天曰冰敬，冬天曰炭敬。大都少则数金（那时候银以两计），多则十数金，这样的馈送算是照例。到了后来，增加到百金、千金、万金，最多几万金了。奕劻对于馈送者，数金、十数金固要，万金、几万金也要，少亦不嫌，多则更好，所以说细大不捐。但是这时候的馈送没有到达十万金的。在光绪二十九年，荣禄死了，奕劻进了军机，袁世凯去掉荣禄的庇护，就对奕劻下功夫，真是金钱万能，一拍即合。据刘垣《张謇传记》有一段记载说，袁世凯谄事荣禄，对奕劻也一直是按时馈赠的，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奕劻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世凯）只认得荣仲华（禄），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西后不准。照病势推测，恐不久于人世，于是有庆王入军机说消息。袁世凯立即派杨士琦赍银十万两送往庆府，并向庆王说："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在老佛爷左右的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

些微数目不过作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劻从来未得过一次十万金的，当即笑嘻嘻的接受了。奕劻入军机，无论庆府的年节、生日、请客、婚嫁、子孙弥月周岁一切费用，都由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因此深得王爷的欢心。所以荣禄死后，袁世凯便投靠了奕劻。

我们再说明奕劻凭借的地位所以贪污的缘由。前清中枢的军政大权原在内阁。自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十年改军机处。咸丰十年，因北京条约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其重要等于军机处。奕劻自光绪十年继恭亲王奕䜣后管理总理衙门。二十七年改外务部，仍总理部事。二十九年，授军机大臣。到宣统三年改内阁，仍为内阁总理。至袁世凯内阁，始改任弼德院总裁。在此三十八年间，奕劻总揽军政大权，所以他气焰薰赫，趋附者众，一时贪污风气，便由秘密而公开了。

袁世凯联络庆王，为什么要派杨士琦呢?原来甲午以前，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做两广总督有好几年，他是有名的贪官，广东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做"李大荷包"。杨士骧、士琦兄弟两人都在瀚章幕府，甚得瀚章信任。自甲午战败，鸿章失势，瀚章亦就开缺了。等到庚子年，鸿章做了两广总督，鸿章以前的幕友多半星散，知道杨士骧兄弟熟悉广东情形，就携他两人到广东。后来奉命议和，仍回北洋任，他兄弟俩就同到北京参预机密。士骧出身翰林，小楷颇工，所有重要奏章都由他誊写，而士琦则奔走于庆王与鸿章之间。原来在议和时，外国人以庆王头脑不清，什么大小的事都由李鸿章面谈。鸿章遇到必须与庆王面商的时候，因自己精力不支，懒得与庆王麻烦，都派士琦通知庆王。所以士琦与床王差不多天天见面，混得极熟。后被袁世凯知各，就把他兄弟仍留在北洋幕府。士骧不过是一个普通官僚而已，士琦则机械变诈，可算是一个大阴谋家。他自己把庆、袁两人拉在一起之后，得到袁世凯的非常信任。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启超"借尸还魂"

自从同盟会成立以来，清政府开始感觉到民主革命运动对它的危害性最大，君主立宪运动对它的危害性较小。而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以一个君主立宪的小国，接连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中俄两个大国，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决定于国土的大小，而决定于政治的良窳，这就使留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和新政的同情者振振有词地鼓吹立宪足以救亡。连清朝的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等也都奏请立宪以顺人心，各省督抚和社会上层人士纷纷通电响应。清政府不能深闭固拒，它就戴上假面具，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个"考察政治馆"，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各国政治，借以和缓国内的革命危机。

五大臣带了一批随员到海外走马看花，自然考察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而清政府卖的是宪政的假膏药，也不需要他们认真去考察。随员中有个有新党嫌疑的熊希龄。他认为当世精通宪法的人物，要推流亡在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他知道梁启超的声名太大，西太后对他的仇恨心太深，此时还不可能让他公开活动。杨度是他的同乡和老朋友，而又不是清政府所注意的危险人物。因此，他向五大臣建议，请杨度写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将来就根据这篇文章作为奏报清政府的"考察"材料。五大臣只要自己不动笔，自然不会不同意这个意见，就派他到东京和杨度碰头。

他到东京向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这是两得其所的事情。当他们在轮船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和赛狗的时候，就是你摇笔行文的时候。你的卷子必须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交到。"

杨度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他自己很了解，他对各国宪政并不怎样精通，便又转而求教于梁启超。梁自然也不肯放弃这个"借尸还魂"的机会。

当五大臣考察完毕回到上海的时候，这篇"考察各国宪政"的稿子还没有寄到。又是熊希龄出主意，叫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求名流意见"为借口，暂时留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专人到东京催促杨度交卷。五大臣自然不能不同意这个意见。随后从东京带回来三篇有关宪政的文章，梁启超写的是《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写的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九月一日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当权的西太后是宁死也不愿意看见"宪政"这个怪物出现的，所以她在"立宪"之上加了"预备"两个字，这样，就把这个诺言变成为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

（摘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

历史考证

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一种看法，即同盟会是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小团体联合而成的。许多近代史论著、词典和大中学教材都沿用这一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兹作史实考订，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团体联合说”由来考

“团体联合说”是如何形成的呢？

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作为秘密革命团体很少见诸文字记载，甚至连宋教仁的日记也都是用□□□□□□暗指中国同盟会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政治局面为之一变，昔日谈政治革命者，“一时皆屏迹卷舌，不复敢吐气，独言种族革命者暴称焉，而同盟、光复二会最名于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批热衷于阐扬功烈的作品。1913年龚翼星所撰《光复军志》就是这样的著作之一。该书最先提出团体联合的观点：“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与合为一”。这里提到的只是“最名于世”的“同盟、光复二会”，并未涉及兴中会与华兴会等团体。到了1932年的7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邢鹏举著）首次提出了三个团体联合的说法。该书写道：“中国的真正的革命团体，最早的要算兴中会，中国的真正革命领导，最早的要算孙文。”“黄兴和宋教仁组织华兴会，谋长沙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与孙中山结识。”“这时孙文、黄兴两个革命领袖，互相携手；还有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等所创的光复会，也前来参加。各方面会议结果，组织中国同盟会。”这里，把吴敬恒、邹容说成是光复会的创建者，已属无中生有，把同盟会的组织说成兴中、华兴、光复三会的“会议结果”更是无稽之谈。

上述错误记载，在当时的影响似乎不大，1934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左舜生著）就没有沿袭这种说法。该书谈及同盟会时写道：“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孙文由美（应为欧洲）赴日本……默察革命潮流，虽已至为澎湃，但无统一机关，前途亦甚危险，于是与黄兴携手，谋将革命势力集合为一，乃约各省革命分子，先开一筹备会议……革命势力的大团结遂告成立。”这里谈的是“各省革命分子”、“革命势力”的集结，并未涉及各种团体。在团体联合的说法产生之后，左氏的持论显然是比较严谨的。

影响最大的还是冯自由的说法，冯氏1939年发表《革命逸史》初集，他以同盟会发起人的资格在《自序》中写道：“乙巳（1905年）七月，中山先生联合全国革命党各派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这里除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外，又多出了一个日知会。过了几年，1945年他在《兴中会组织史》中又提出“兴中会改组同盟会”的观点，并罗列了发起同盟会诸人：“属于兴中会者有总理及冯自由、梁慕先、黎勇锡、胡毅生等，属湖北日知会者有曹亚伯、时功玖等。属湖南华兴会者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属光复会者有吴春旸等，属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者有田桐、鲁鱼等”。于是人们辗转引用，同盟会为“团体联合说”，几成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看法不是基于可靠的历史事实，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自30年代以后蒋介石集团建立起了全国统治，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基本上被纳入了国民党党史的范畴。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嫡派自命，国民党的党史为标榜正统也就把兴中会抬到“正统”、“大宗”的地位。诚如有人当时就指出那样：“现在谈中国革命史的，多数是从兴中会起，而普遍的又多由兴中会而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相连结。这种弊端体现在同盟会的产生上，就是突出兴中会的作用，提出“兴中会改组”说、“兴中会扩大”说、“兴中会中心”说等等，1938年福建省警官训练所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韩逋仙编），描述同盟会的成立过程，在照抄孙中山《革命原起》中的说法之后，加上“于是扩大兴中会组织，成立中华（按：原文如此）革命同盟会”，杜撰出了“兴中会扩大说”。再如，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开国战史》将同盟会的筹建描述为：“国父乃以横滨兴中会为中心，与湖南留学生华兴会首领黄兴、宋教仁，浙江光复会领袖章炳麟、徐锡麟，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各首脑联合扩大组织，遂于六月二十九日（应为二十八日）开第四次会于日本东京”。所谓第四次会，即孙中山于东京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是按孙中山的说法排列的。但是，当这次会议召开时，章炳麟还在上海租界狱中服役，徐锡麟正在浙东一带联络会党，而且后来一直未曾加入同盟会。把章、徐说成是“联合扩大组织”的参与者，并且这种联合还是“以横滨兴中会为中心”，完全是在伪造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轨道。但由于这种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尚处于拓荒阶段，所依据的大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未经详加考订的资

料，一些著述在论及同盟会成立时不免沿袭旧说。在整整三十年中，没有人对"团体联合说"提出过疑义，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发行量很大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词典和教科书，仍然是沿用"团体联合说"观点的。

可见，"团体联合说"由来已久，它在民国初年已依稀出现，国民党时代渐成定论，冯自由的记述最有影响，解放后的一些论著和教科书、辞书大都不过辗转相引罢了。

近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兴中会中心说"、"兴中会改组说"、"兴中会扩大说"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人们对"团体联合"的论点也渐渐提出了一些质疑。不过，有的文章在否定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同时，却认为同盟会是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而成的；在否定兴中会中心说的同时，却又过份强调华兴会的作用，把华兴会说成是联合的中坚力量，这仍然是 有悖于史实或有失于偏颇的。

（二）同盟会成立前夕各团体状况考

同盟会究竟是不是各个革命小团体的联合，首先要考察同盟会成立前夕各团体的状况，考察这些团体是否存在，是否仍有活动，是否决定过与其他团体实行联合？如果这些团体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早已名存而实亡，或者即使仍有活动而未决定与其他团体实行联合，则所谓"团体联合"的说法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在持"团体联合说"的著述中，曾被提到的革命团体一共有六个，即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这些小团体在同盟会成立前夕的状况如何呢？

首先看兴中会。兴中会本来只是一个偏隅海外的地域性很强的秘密小团体。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它的会员星散。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亡命日本，在横滨组织兴中会分会，仅得冯镜如等二十余人。两三年间，"党势毫无进展"。杨衢云流亡南非建立兴中会分会，入会者有黎民占等十余人，但自杨离开后，"党员皆寂然无闻"。陈少白到台湾建立分会，会员仅有数人，"对于祖国无所表见"。庚子惠州之役后，兴中会骨干人物杨衢云遭清方暗杀，郑士良暴死香港，史坚如被捕遇难，设在广州的机关也"不复存在"了，而用为大本营的香港兴中会，亦"元气大伤，党务殆陷于完全停顿"。

跨入20世纪之后，兴中会的组织几乎没有什么恢复。孙中山自己曾对冯自由说过，"兴中会自惠州起义失败后，极少收揽党员。"孙中山"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

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开始广泛结交中国留学生，对前往拜访的进步青年，并没有劝他们加入兴中会，就是证明。这年冬孙中山前往河内识得爱国侨胞黄隆生、杨寿等数人，冯自由说是"越南创立兴中会之嚆矢"，但实际上打的却是致公堂的旗号。孙中山自己只是说同他们"结为同志"，并未涉及兴中会。190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创办革命军事学校，1903年冬在火奴鲁鲁创立中华革命军，接着在美欧改组致公堂，一律"未用兴中会字样"。1905年春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但这个团体也未确定名目，更未曾提及兴中会的名字。

上述史实表明，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不再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兴中会，到了1903年兴中会的名字也弃之不用了。孙中山本人在组织新的革命团体过程中，也不再以兴中会负责人的身份联络，而是公开以全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进行活动的。兴中会的历史至此应算终结了，它比同盟会的创立至少要早出一年多。

其次看华兴会。华兴会长沙起义谋泄失败后，其骨干成员于1904年12月到1905年春，先后流亡到日本东京。他们在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广事联络，影响颇大。但是，他们多是利用个人影响而不是以团体的名义从事活动的。作为一个团体，人们很少发现华兴会在日本有过什么活动，也未再吸收新成员以扩大自己的组织。从宋教仁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在同盟会成立前的七个月中，原华兴会骨干的"集议"只有两次。一次在1905年1月底，是为阻挠陈天华北上请愿立宪。另一次在7月29日，讨论与孙中山合组革命团体的问题。

这两次集议，涉及黄廑午（兴）、宋教仁、陈天华（星台）、刘霖生（揆一）、章行严（士钊）、彭希明（渊恂）、徐运奎（佛苏）都是原华兴会的骨士分子，黄、宋、刘、章、彭、徐且是华兴会的发起者。他们开会"议决"问题，又有"湖南团体"和"吾团体"之说，所以史学界一般都公认这是华兴会的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赴日以后的日记再未出现过"华兴会"的字样，反复提到的倒是"湘西学会"、"西路会"、"湖南同乡会"、"湖南代议士会"等。黄兴1912年9月12日在旅京善化同乡会欢迎会上谈自己的革命略历时说："兴在长沙与刘霖生、徐佛苏共谋起事，会事失败，死者数人，逃至上海，与杨笃生、杨皙子组织爱国协社，会万福华刺王之春案起，兴及同志多被捕，赖江西巡抚夏时电致工部局，同获放。遂至日本，思结合革命团体。适孙中山自美洲来京，因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见，谈论设合，始立同盟会，"如果说，宋教仁当时写日记时尚有疑虑的话，那么黄兴到后来以民国元勋之身份畅谈光荣历史时就应无所顾忌了。他们两人都是公认的华兴会的领导者，却连"华兴会"三字都不曾提及，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黄兴与陈天华所说的"吾团体"是否等于华兴会，还是值得研究的。

退一步说，前述两度集议都是华兴会的活动，华兴会对与孙中山联合一事也未形成一致的决议。诚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宋教仁7月29日记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注

意的："第一，这里所说的'孙逸仙会'，不是指的兴中会，而是指孙中山将要成立的新团体而言；第二，陈天华的确提出过以华兴会这个团体与'孙逸仙会'联合的主张，但因无人响应，并没有获得通过；第二，既然听凭'个人自由'，那就表示在对待'孙逸仙会'问题上，华兴会不再作一个组织要求其会员保持一致，加入与否，完全由个人作主，与华兴会团体本身无涉。"

再次，看光复会。光复会是1904年冬由蔡元培、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不久，陶成章、徐锡麟由蔡元培介绍入会，章太炎在狱中也经由蔡元培介绍入会并筹商会务。入会者多为浙皖两省志士，会长蔡元培虽然闻望素隆，好学深思，但短于策略，又不耐人事烦扰，"故经数月，会务无大进展。"不过，光复会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浙江、安徽、上海等地，主要成员"都没有与闻其事"。

那末，同盟会成立前在东京有没有一个光复会分部呢？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一文中说："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首先必须与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议，遂于是年12月偕魏兰赴东京，与王嘉祎等筹商。光复会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推王嘉祎负责，入会者有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炜（按：应为董鸿祎）、许寿裳、周树人等人。"但是，这个"光复会分部"在当事人陶成章的《浙案记略》和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却只字未提，有人已作过考证，沈瓞民（即沈祖绵）早在1903年11月即卒业于东京速成师范，此时不在东京，所谓"光复会东京分部"成立一事，并非沈氏所"亲历"；而且沈文所举东京分部成立初期的六名成员中，董鸿祎、蒋尊簋、孙翼中和周树人当时都不在东京，在东京的许寿裳则始终没有说过自己是在1904年加入光复会的，只剩下一个王嘉祎是决不能"正式成立"一个"东京分部"。可见，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与光复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再次，看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科学补习所1904年6月成立于武昌，谋 在湖北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同年10月长沙起义谋泄失败，科学补习所也被迫解散。日知会是科学补习所解散之后由其成员刘静庵组织建立的，它作为湖北革命团体筹备于1905年冬，正式成立在1906年2月，同盟会的成立还比它早出半年，"彼此尚未发生关系"。

最后，看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出版于东京，是同盟会成立前夕革命派在日本创办的唯一刊物，它标榜"爱国主义"，其创刊号使用黄帝纪年，隐约地表现了它的反清革命立场。主持者宋教仁、程家柽，参与编辑和发行工作的田桐、张炳标、白逾桓、鲁鱼、黄逸侯、吴绍先、李书城、黄益庵、雷光宇等数十人，多为两湖志士。杂志社中确实不乏革命分子，除宋教仁外，主编程家柽就是最早结识孙中山并倾心革命的留学生之一。他们通过这个杂志广泛联系留学生中的革命志士，并使之成为勾通孙中山与留学生之间联系的一道桥梁。孙中山在筹组同盟会的过程中，曾亲自到这个杂志社同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长谈，争取他们的支持。不久，杂志社同仁中就有半数以上宣誓加入同盟会，并自愿将这个刊物贡献出来，为同盟会提供一个现成的机关报，著名的《民报》就是在这个杂志的基础上改办而成的，可见，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志士们确实为同盟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严格说起来，《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只是一个公开的编辑与发行刊物的机构，并不是一个革命团体。

综上所述，同盟会成立前夕，兴中会早已名实俱亡了；华兴会即使依然存在，也很少有什么活动，且未议决以团体名义参与联合；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筹备毫无关系；科学补习所早已解散；日知会则尚未成立；创办《二十世纪这支那》杂志诸人虽大有功于同盟会的建立，但杂志社却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因此，很难谈得上同盟会是由上述团体联合而成的。

（三）同盟会从筹备到成立之人员考

为了确切说明同盟会非团体的联合，有必要对参与同盟会筹备活动的人员，包括出席筹备会和正式成立之前入盟人员以及同盟会本部职员的情况进行一番考查。

关于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人数和成员，各家记述不一，田桐的《同盟会成立记》、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记为四十余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为50余人或60余人，宋教仁日记和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为70余人。依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以下简称《名册》）并参照其他著述，可列出乙巳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参加筹备会的人员名单如下：

湖南20人：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黄兴、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宋教仁、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奇、柳扬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风游、郭家伟。

湖北19人：时功玖、耿觐文、余诚、周斌、陶凤集、蒋作宾、涂宗武、曹亚伯、叶佩熏、李仲逵、刘通、李叶乾、范熙绩、许伟、刘树湘、匡一、田桐、但焘、陶德瑶。

广东16人：孙中山、汪兆铭、朱少穆、谢良牧、黄超如、冯自由、姚东若、金章、古应芬、杜之秋、李文范、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枬、何天炯、黎勇锡。

广西7人：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德中、曾龙章、马同、邓家彦。

安徽4人：程家柽、吴春阳、王善达、吴春生。

江西2人：张华飞、陈荣恪。

四川2人：吴鼎昌、陈道循。

浙江、陕西、福建、直隶、河南、山东各一人：蒋尊簋、康宝忠、王孝缜、张继、章炳麟、徐镜心。

日本大陆浪人3个：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

以上共79人，中国志士76人。原属兴中会的只有孙中山、冯自由2人，属华兴会的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刘道一、柳杨谷等6人，属光复会的实无一人。近90%的人员与各团体没有组织关系。即使曾隶属某个团体的人参加筹备同盟会，也是出自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由于团体的委派。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筹备会之后正式成立之前的情况。根据《名册》乙巳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日（1905年7月31日—8月20日）入盟的人员有浙江愈为民、湖北张仲文、周尚、吴昆、吕嘉荣、邱晦奇、姜飞龙、马伯援、张光英；湖南成巍、熊兆周、杨杰、胡瑛、直隶孙松龄；广东刘思复、何香凝、梁揆通、张舒夏、李君举、何铁群、刘越杭、张傅霖、肖楚碧、梁慕光；山西谷思慎；四川黄树中、童宪章、蓝永章、吴洪思、肖达皆、瞿凤仪、李鸿逵、陈崇功、刘紫骏、许行怿、熊克武、但懋辛、董修武等38人。只有梁慕光、胡瑛曾隶兴中会和华兴会及科学补习所，其他三十六人均与团体无涉。

最后，同盟会正式成立时的人事安排也可以说明，所谓"团体联合说"和"兴中会中心说"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同盟会东京本部就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总理以下设评议、司法和执行三部，执行部的事权最重，下分六科。据《宋教仁日记》记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选出总理1人，评议部议员20人，司法部职员8人，指任执行部职员8人，共计37人。有些人员因缺乏资料已无从考究，目前可以确定的有28人，即总理孙中山，评议部议长汪兆铭、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范治境、张树枬、朱大符、吴昆、康宝忠、吴鼎昌、梁慕光、胡瑛、熊克武、但懋辛、董修武；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翰，检事长宋教仁；执行部部长兼庶务科黄兴，内务科章炳麟、外务科程家柽、书记科马君武（不就）改田桐，会计科刘维焘（不就）改谢延誉，调查科谷思慎。原来隶属过革命小团体的只有8人，占1/4强。他们之中，原属兴中会者3人（孙中山、冯自由、梁慕光），原属华兴会者4人（黄兴、宋教仁、胡瑛、张继），原属科学补习所者1人（曹亚伯），而光复会成员则连1人也没有。若是各团体的联合，在各部职员的分配上自然会有所权衡。这里的人事安排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先前革命小团体的因素。孙中山出任总理，首先是黄兴提议的。"黄公提议察同人之意，总理一席，属意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众如议。"黄兴之所以提议，会员之所以拥戴，决不是由于孙中山拥有兴中会会长的桂冠，而是由于他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党领袖。执行部庶务仅次于总理，"实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权主持"。这一职务是由孙中山"指任"黄兴担负的。孙中山之所以如此信任黄兴，恐怕也不是后者系华兴会会长，而是由于看重他经过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如同宫崎寅藏所说是"一个非常的人物"。至于其他被选举和指任的职员更不是由于他们代表什么组织或团体，而是由于他们获得会员的拥护，由于他们在革命活动中包括筹组同盟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

总之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有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们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

（摘自《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

同盟会成立地点考

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关于该会成立的地点及该地点主人的名字在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记载颇多不一致之处。如台湾吴相湘先生的《孙逸仙先生传》中记为："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珍弥寓邸瘵行成立会"。大陆邵传烈先生的《孙中山》，亦记为"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召开成立大会"。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的《宋教仁日记》也是"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本珍弥邸"。其它如《中国国民党大事记》、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均作如是说，这类记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按日本地名大多数有"坂"的习惯，如"大坂"、推断同盟会成立是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地方一个名叫"本珍弥"或"本金弥"的日本人家里举行的。另一种理解则是在灵南地方一个叫"坂本珍弥"的日本人家里举行的。

可是另一些书的记载却有所不同。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记为："在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了成立会。"在这里"灵南坂"变成了"霞关"，"本金弥"变成了"木金弥。而台湾出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则记为"地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坂本金弥的住宅"。"坂"字从灵南后面移到了"本珍弥"的前面，明白表示该宅主人各字是"坂本珍弥"而不是"本珍弥"，更不是"木珍弥"。有的书籍则记为"赤坂区灵南坂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如邹鲁的《中国同盟会》。这说明"坂"既可以是"地点"或地名的概念，又可以是人的名字。但也有明确用"坂"表示地名，"阪"表示人名的。如章开源、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表述：同盟会人的东京赤坂区灵坂，借日本人阪本金弥住宅，正式举行成立会议。以这种方式表述的还有金冲及胡绳武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稿》，苑书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等。因此，关于同盟会成立地点及主人名字就有以下5种表述方法：

地名	人名
1．赤坂区灵南坂	本珍弥或本金弥
2．赤坂区灵南	坂本珍弥
3．赤坂区灵南坂	坂本珍弥
4．赤坂区霞关	阪木珍弥
5．赤坂区灵南坂	阪木珍弥

到底哪一种表述正确呢？笔者经过查考大量资料，认为第三、第五种是正确的。理由如次：

第一、按日本汉字的使用习惯，"坂"为"土坡"、"坡道"的意思。既可用作地名后缀词，亦可用作姓氏，如"大坂""坂东太郎"。一般地名如处于坡地则后缀词加"坂"字表示。"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珍弥"中，因灵南地区是坡地，故此"坂"字为"灵南"的后缀词。除在上述有关同盟会成立地点的记载中如此，其它诸多记载亦可证实。如台湾出版的《华侨革命史》中，有《漱岩枕流录》的日本作者在记叙中国革命见闻时回忆道："当时我的日本作者在记叙中国革命见闻时回忆道："当时我的家住在灵南坡，我在我借住在寒村的一个小别庄里，由已故的伊藤博文介绍翻译某某外交上的英文书信。"另外，孙中山致荷马里信，其中有一封信发自灵南坂，信封上的发信地址即为东京灵南坂26号，由此可见第一类将"坂"字缀于"灵南"后，是正确的，反之第二类"灵南"后少缀一"坂"字则错了，如我国东北许多地方名后缀"沟"字：夹皮沟、中道沟、大通沟等，少去后缀"沟"字，则让人读后莫明其妙。

第二、一些较可靠的材料证明，开会宅邸主人公的名字应为"坂本珍弥"，如国民党元老邹鲁记载"中国同盟会乃假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宅邸开成立大会"。同盟会的元老冯自由在有关的记载中亦明白标示该主人的名字为坂本珍弥。至于"坂"与"阪"，在日本使用习惯上为异形同义字。

第三、所谓成立地点为霞关说，这一问题早已解决。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2页注中披露，日本京都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狭间直树教授为此专门作过调查，说明霞关并非灵南坂，"显系刊误"。

所以，同盟会成立地点及宅主人名字的正确表述方法应为"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人阪本珍弥"。

（摘自《民国春秋》）

风云人物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1886改号逸仙（粤语"日新"的谐音）。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后又化名高野长雄。在欧美及南洋各地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偌等，并曾自署载之、公武。辛亥革命后，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孙中山。

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和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读书。1883年离檀香山归国，不久，到香港，先后入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均中等学校）读书。1886年夏毕业，进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1887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推选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1921年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1923年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1924年，主持对中国国民党的彻底改组。1925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

孙中山很早就开始产生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在香港读书期间，他将香港与内地比较，发现新辟的香港的市政建设比古老的香山县城远为先进，萌发了改革中国的想法。1894年夏，孙中山和战友陆皓东来到天津，向当时清政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富民治国建议，并认为："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须加欧洲而上之。"1900年冬，他在横滨与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谈到日本明治维新三十年来的进步时，预言说："日本人需要三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我们顶多不会超过十五年。"1905年8月，他在东京向1800多名留日学生发表演说，认为只要我们很好地利用中国固有的优越条件，"取法乎上"，我们就能以异常的速度，完成突飞猛进之进步，二十年后，我国的国力就能凌驾全球。周恩来曾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革命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了扫除中国近代化的障碍，他历尽艰

辛，坚持不懈，奋战了近四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00 年，继杨衢云接任兴中会会长，又策划和领导了惠州起义，失败后，继续在海外活动。为了与保皇派划清界限和争取广大华侨群众，孙中山担负了“扫除保皇邪说”的任务，展开了“大击保皇毒焰”的战斗。1905 年以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为基本阵地，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使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又领导和发动过 1907 年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 年的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 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 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屡败屡起、愈挫愈奋。

孙中山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近代化的推动者和英勇卫士。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近代化的根本标志。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改革方案受阻，但那时开始出现的一些资产阶级团体则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孙中山称美国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决心在中国建立美利坚式的合众国政府。1905 年 8 月，孙中山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的总理，主持制订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领导同盟会员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后来又赶到英国、法国，为国内革命政府从事外交活动。12 月 25 日，回到上海；29 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月 1 日就职南京。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构想了一套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分立的“五权宪法”的政府组织原则；他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提议载入“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关键性条文；他领导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革命的政策、法令，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愿望。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设计者。1912 年 4 月，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他提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从 1912 年 4 月到 1913 年初，孙中山共发表 58 次演讲，专讲民生主义或涉及的就有 33 次。他还担任全国铁路协会会长，并接受了袁世凯授给的督办全国铁路的任命，准备 10 年内修铁路 20 万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等强国。

1918 年，孙中山进一步预料中国将有一个高速度的近代化建设。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之广、物产之饶，宝藏之富、人民之聪明才智、古代文明之灿烂，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近代中国的贫弱完全是由于官吏贪污、政府腐败所造成的。只要“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是中国今日欲富强则富强矣，儿有不待一跃之功也”。“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事情的发展当然比孙中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但孙中山期待中国近代化早日实现，“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安乐之天也”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还是我国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倡者。1912 年 9 月，他在济南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然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后来，他在《建国方略》之一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中，更明确地谈到：“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他所说的“心性文明”，就是精神文明。在他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缺一不可的，他明确主张从心理、物质、社会三个方面加强建设。他这么早就注意到了近代化是个多层次的立体的概念，实在是可贵的。20 年代，他还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役”的新道德，自己成为实践这一新道德的典范。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干扰，于 1924 年 1 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大会决定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了具有鲜明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它重要决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从而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明确宣布：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以人民的民主为主要内容，民生主义以“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新三民主义大致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情，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从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4 年 11 月，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孙中山离粤北上讨论国是。在行前发表的《时局宣言》及沿途的演说中，反复强调要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作了坚决的斗争。1925 年 3 月 12 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他在《遗嘱》中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发出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的战斗号召。

孙中山的个人品德和生活作风是非常高尚的，具有革命领袖的伟大人格。他日夜萦怀的是民族的独立自由、国家的统一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乐，没有计较个人的权势和享受。他廉洁奉公，不讲排场。临时大总统府设在旧两江总督衙门，他就在西边一座平房内办公，一座简陋的小楼内居住，穿的是一件极粗劣的呢大衣。孙中山用人

"唯才能是称"。章炳麟曾恶毒攻击孙中山，并散布过取消革命党的言论。孙中山批评了他的错误，但认为不能把他置入反对民国者之列，仍聘请他当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他"不治家产"，也不为家人谋取特权，终生都保持这种崇高的品质。他前后当过两任大总统和两任大元帅，未曾带过一位兄弟姐妹做官，也未曾在翠亨村购置过一点家业；上海莫利爱路一栋小楼住宅，是华侨集资购赠的。为了革命，孙中山还曾将它两度抵押借款。

戴　鸿　慈

戴鸿慈(1856—1910)，字光孺，号少怀，晚号毅庵。广东南海县人。"幼聪颖，年十五补县学生，旋由廪生选同治十三年拔贡，领乡举皆第一"。光绪二年(1876 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翌年散馆授编修。

光绪五年外放提督山东学政，寻丁父忧返回广东。此时，法国企图吞并越南进而打开中国西南边疆门户，中法关系紧张，开战在即。广东地处海防前线，戴鸿慈也在籍倡办团练，以为御敌之计。十一年督学云南。二十年(1894年)大考翰詹列一等，擢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同年，中日战争爆发。戴鸿慈坚决主张武力抵抗，"不避权要"，屡屡"抗疏论列"，弹劾李鸿章等人，并积极为朝廷献计献策。九月，平壤失守，清军退入中国东北境内。戴鸿慈认为，此役失败，乃李鸿章等人"迁延贻误，调遣乖方"所致，他提出三条具体建议，一、筹进取，化"呆兵"为"活兵"，辽东清军应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进攻；二、侦言情，广开言路，听取臣下意见；三、严督责，整顿军纪，严明赏罚。疏入不报。十月，日军分两路侵入中国境内，清廷对日态度趋向主和；十二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人赴日议和。戴鸿慈上书反对割地赔款。

二十一年(1895 年)正月，日军攻陷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覆没，朝野震动，戴鸿慈上陈有关应京津防御之策若干条，同时弹劾李鸿章。四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激起朝野人士反对，戴鸿慈与文廷式率先上书反对和约，"俄而御史争之……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是为"公车上书"之引。戴氏还上善后十二策，希望朝廷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良政治，增强国力。同年七月迁翰林院侍讲学士。

庚子(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偕光绪帝逃往西安，时戴鸿慈已擢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他于次年赴西安行在，上《敬陈治本疏》，条举八事：一、矢忧危以习勤俭；二、审号令以维国柄；三、容真言以伸士气；四、节财用以恤民穷；五、改捐例以清治道；六、设考课以育人才；七、存科目以系士心；八、平民教以弭祸患。同年冬，随西太后等还京。转户部右侍郎。针对当时全国教案纷繁，奏请设立宣谕化守使专门处理民教纠纷，并请编辑中外交涉成案，广为颁发宣讲。戴鸿慈认为，"开民智者，莫切于报纸"，请求在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设官报，录载"新法美政"及"盗贼水旱"等情，各抒所见，著为议论，以"宣上德抒下情为宗旨"，但"格部议不行。"

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1905 年 12 月 2 日)，作为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与端方一道自北京启程，先赴日本。"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越四大洲、三大洋，所经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经济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戴鸿慈的思想有所触动，自称："于西国政俗之真相"，"非身亲而目击者不知也"。并认为，一切政治，非躬至其地，假之时日，一一取而抽绎之，比较之，斟酌选列之，则其精细未由见也。每考察一国，均专折向朝廷汇报。他们还大购西方政治书籍，组织人员编译成册，供清廷"立宪"参考。正式刊行的有《列国政要》132 卷(另卷首 1 卷)，分宪法、官制、教育等 11 类；《欧美政治要义》18 章，汇编欧美诸国政治制度要点，书中对中西政体优劣多有比较。戴鸿慈且撰有《出使九国日记》，述其考察途中见闻。在外考察期间，擢升礼部尚书。

出国考察前，戴鸿慈在上海曾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领袖有过接触，"晤谈竟夜"。次年六月，归国抵天津，曾专程拜访当时主张实行宪政的袁世凯，两人"坐谈良久，谈及筹立宪准备及改官制，命意略皆符合"。同月，戴鸿慈回京覆命，向朝廷"详言立宪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上之权柄"，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后来又称"窃臣等使事所及，历查各国政治，以为中国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其国力充溢者，必其为立宪政体者也。盖立宪政体，其臣民有参与国政之权，而其国力之充溢即视乎此，故可尚也"，为了实行宪政，即使有"大创巨痛"，也要"不惮艰难，而造于成"。戴鸿慈为此设计了实施方案，即先定"国是"，诸事明降谕旨宣示天下，"约于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戴鸿慈提出实行立宪要先从官制改革入手，在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由首相及各部国务大臣组成，代君主负责；同时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他积极主张进行法律改革，"凡事必以法律为基础，苟无法律，则事无可为者矣"。并建议设立修订法律馆，编纂法典，翻译各国法律条文及案例。他主张改革军事制度，"以德国为首，以其他各国为辅，"并认为教育是富强之本。

归国后，戴鸿慈又充厘订官制大臣、玉牒馆副总裁、法部尚书，参与政务大臣。法部尚书任内，申明法部权限，厘订职掌，并"采英美改良监狱之制，于京师筹办模范监狱。"

宣统元年(1909 年)，被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

国专使大臣，经东北赴俄。他一路悉心考察东北地区政事，返回后向清廷提出了一份开发建设东北、加强边防以抵制日、俄侵略的报告，主要集中于二方面：一是发展垦植，主张“取泰西小农地、大农地之法变通而并行之”，小农地法，即就本地蒙民编制户籍，计口授地，贷给种籽，给以资粮，宽其赋税，免去徭役，让其发展；大农地法，则是由直省大资本家集股组织移民开垦公司，划给大段荒地，徙民垦植，官府予以保护并提供优惠条件加以扶植。二是振兴林业，官民共举，大力开发东北林业资源，官设森林局，绅商兴办林业公司。清廷将此奏下东三省总督、农工商部、邮传部筹议施行。

同年八月，戴鸿慈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一月擢协办大学士。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病卒，终年55岁，谥文诚。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詹天佑

詹天佑，字眷诚，原籍安徽省婺源县(今属江西省)，1861年4月26日(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没落的世家。他的曾祖詹万榜是清乾隆间太学生。因经销茶叶来到广州，遂在广州落籍。到他父亲詹兴洪时，詹家开设的茶行因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倒闭了。由于家境中落，詹兴洪把家搬到南海，务农为生。

詹天佑在七八岁时，进塾读书。这时，广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洋货源源从香港输入广东。这使詹天佑有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和机器。他喜欢玩弄机件，几次把家里的自鸣钟偷偷地拆开来又装上，留心观察机器的构造和各个零部件之间的关系。

1871年年底，清政府派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次年初，詹天佑到香港参加考试，被录取。8月11日，詹天佑等第一批留美幼童，自上海启程赴美。詹天佑在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毕业后，于1878年6月，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以雪费尔命名的科学学堂，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

詹天佑在大学肄业期间，刻苦钻研，成绩优异。他在数学方面是一个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曾获得数学奖金。在毕业考试中，他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1881年6月，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这一年，由于清政府内顽固派对留学生计划的攻讦与破坏，清政府命令容闳把前后派送出洋肄业的四批幼童共一百二十名全部撤回，其中仅有詹天佑与欧阳庚二人得到了学士学位。

同年11月，詹天佑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在福州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82年9月，他以一等第一名在水师学堂毕业。12月，被派往“扬武”兵轮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4年6月，中法战争爆发。8月23日，法国海军在马尾向福建水师发动袭击，中国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在半小时内均被击毁。詹天佑在“扬武”兵轮上，和他的战友们奋不顾身与敌作战，表现了无比的沉着与英勇。詹天佑嗣即调任福州船政局后学堂教习，教授英文和驾驶等课程。不久，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他去广州，任博学馆洋文教习，并兼任测绘海图的工作。在一年内，他用西洋测绘方法绘成了一幅中国沿海形势图。后来，博学馆改为水陆师学堂，詹天佑在水陆师学堂继续任洋文教习。

1888年，詹天佑通过他的留美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这才开始献身于中国的铁路事业。这时，帝国主义国家贪婪地掠夺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其中包括铁道的筑路权。中国铁路公司是在外国殖民者控制下的“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之一，公司里的外国工程师不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放在眼里。詹天佑愤愤不平，他决心要用中国人的技术力量来修建中国的铁路。他先是参加修建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当工程进展到滦河时，需要架一座横跨滦河的大铁桥。英、日、德三国的工程师打桩都失败了。詹天佑认真分析了外国工程师用过的各种打桩方法，仔细研究了滦河河床的地质土壤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调查，决定改变桥桩的地点，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配合机器进行打桩，终于顺利地奠定了稳固的桥基，完成了滦河铁桥的全部工程。

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通知詹天何，他被选为该会会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詹天佑多年努力修建的山海关外铁路工程被迫停工，他被调任萍(乡)醴(陵)铁路的工程师。一年后，又调回参加收回被美、俄两国侵占的关内外铁路的工作。詹天佑“胼手胝足，沐风栉雨”，“在事异常出力”。

1902年秋，詹天佑被派任新易铁路的总工程师。这是袁世凯献媚于西太后，为便利她去西陵祭祀而决定修建的。该线从高碑店至西陵，是京汉铁路支线，总长四十五公里，限于六个月内完工，不能贻误第二年春天祭陵的日期。这是中国工程师自修铁路的开端。詹天佑接受了这项工程任务后，经过周密计划，率领全体工程人员努力修建。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有时通宵工作，结果提前两个月便全线完工通车，曾受到西太后和袁世凯的赏识。

京张铁路通车以后，詹天佑曾计划将京张路向西延展至绥远(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以沟通西北。可是库藏空虚，于是发行张绥铁路公债券，以募集路款。詹天佑把他自己连同他子女的积蓄，带头购买了张绥路公债券，渴望我国铁道事业能日益发展。

1909年秋，詹天佑去宜昌任商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之川路宜万工程总工程师，主持路线的勘定工作。1910年，詹天佑应商办广东省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就任粤路总理。这时，川、湘、鄂、粤等省发生保路运动，他对此是大力支持的。他到粤路后，几个月内，就将行车、购地、储料及筑路等事项逐一整理，有条不紊。辛亥革命期间，他努力使列车照常运行，保护铁路财产不受损失。1912年5月，他到汉口就任粤汉铁路会办。

这时，孙中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他宣言要在十年内建筑十万公里大铁路，袁世凯虚伪表示"推诚接受"，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特任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被任为该路会办。孙中山邀约詹天佑协助他制订修建十万公里大铁路的计划。不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亡命日本。1914年，詹天佑继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詹天佑在任汉粤川铁路督办期间，因用人权、财产权及经营管理权都受制于帝国主义银行团派来的外国工程师，但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1918年9月16日建成了全线中的武(昌)长(沙)段并通了车。

1919年，詹天佑以交通部技监与汉粤川铁路督办的身份，被北洋政府派往哈尔滨，任美、英、法、日等国组成的所谓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特别委员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参加技术部会议。4月15日詹因病请假回汉口治疗，24日病逝。

詹天佑在1912年夏曾将年初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华铁路工同人共济会"与"中华工程师会"三个团体合并组成"中华工程师会"，设事务所于汉口。詹天佑被选为会长。1913年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该会在团结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该会刊行《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以交流技术经验，并出版了詹天佑所编《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与《华英工学字汇》等书。1916年9月，詹天佑捐资在北京西单报子街购买该会永久会所，该会遂从汉口迁至北京。

詹天佑逝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为表彰他修建京张铁路的功绩，捐资在青龙桥车站建立詹天佑的铜像，以志纪念。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吴樾

吴樾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县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父亲吴尔康，先官后商，经常在外。吴樾七岁丧母，靠二哥抚养。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二十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十九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从此，他放弃了由科举进身的道路。1900年到上海，打算进"广方言馆"，因其过份偏重外语，自己不喜欢，便离开上海北上，到了直隶(河北)保定。1902年，经乡前辈吴汝纶(时长莲池书院)指点后，在清苑县报名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这时他所抱的志愿，还只是将来获得"出身"，当一名教习。入校后，交游渐广，眼界日开，在当时革命思潮影响下，他更加喜欢议论时政，思想上在起着变化。

1903年是吴樾政治认识上起伏激荡的一年。据他自己回忆说，这年他先从朋友那里得到《革命军》一书，反复阅读，受到启发，"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警传，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但是，他不久又受到《清议报》宣传的影响，反而一度推崇起改良主义者的康、梁来，曾说，若"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又过了不久，他接连阅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及《中国白话报》等革命报刊，思想上又起了变化，"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是年暑假，吴樾与同学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相偕南旋省亲，道出沪上，探西牢访问章炳麟、邹容，会晤陈仲甫、张继，并购读上海所出版的《仁学》、《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进一步发展，从此毅然与改良派决裂，斥康梁等为"半睡半醒之满州走狗"，认定他们是些"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之公敌"的人。他反对康、梁的"立宪"主张，痛恨保皇党人，"念念欲杀尽此辈"。

从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起到1905年离校前，在四年中间，吴樾还和当时一些爱国志士有直接交往或通信联系。他和在南方的陈天华、蔡元培曾通过消息；和杨守仁(笃生)共同推进过军国民教育会的工作，吴负责该会保定支部；和赵声在保定相识，并结为好友；还到上海和秋瑾接洽过。他怀着满腔的热忱，日益关怀国家民族的安危，每与友人"谈及国亡种削之势，辄饮泣不止"。为了宣传反清排满，他在保定创立过两江公学，自兼教师，并办过《直隶白话报》。

当时，一些犯急性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策动起义迭遭挫折之后，转而接受虚无党的思想，热衷于搞个人恐怖活动。他们幻想杀几个、几十个满族权贵，使反动统治者畏惧走避而取得反清的成功。有些革命派报刊也不断倡导冒险暗杀，宣扬暗杀活动的"神妙"作用。暗杀之风一时大盛。吴樾耳濡目染，也笃信此说，并成为这种冒险事业的一个积极鼓吹者与实践者。清户部侍郎铁良是个为人们所痛恨的满族亲贵，遂成为暗杀猎手们共同追踪的对象。1904年一年内，有在南京下关和河南顺德两起谋划狙击铁良的案件发生，但都没有成功。吴樾也把铁良作为自己暗杀的目标，他特为走访曾参与暗杀铁良的胡

瑛，慨然以后继自任，倡言：不杀铁良，不足以言革命！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暗杀时代》，说明要杀铁良的意义与决心，以备自己牺牲后留传给后人。同年，吴樾与赵声在保定酒楼谈论反清革命行动时，还谈到军事行动与暗杀活动的难易问题，他对赵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又说："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者，必吾子也。"

1905年，吴樾在保定师范学堂临近毕业时，未参加考试即离校去东三省，将欲有所作为。7月，他听说清政府将派载泽、绍英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认为这是清政府欺骗人民的手段，如果得逞，会麻痹人民的反清情绪，延长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于是他决定把暗杀铁良改为暗杀载泽等人，借以揭露清政府的阴谋。为此，吴樾从东北潜入北京，寄居前门外桐城会馆，多方侦探五大臣的出国日期，并写好绝命书数封，待机行动。9月24日，考察宪政五大臣在前门车站登车，准备出发。吴樾怀揣炸弹，赶往车站，但站上戒备森严，不能靠近。他急忙买了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乔装官方仆从，登上五大臣的专车，正准备投掷炸弹时，机车与列车接轴，车身突然震动，炸弹引发，五大臣仅绍英与载泽受轻伤，而他本人反不幸肢断腹裂，以身殉难。

吴樾牺牲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陈骨骸数日，也没有人认领。后侦缉员史某到桐城会馆，才查清这桩震动一时的刺杀案的发难者是吴樾。一年多后，1907年4月，《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在刊载吴樾的《暗杀时代》时，将他在死难前致章炳麟与致其未婚妻的信件同时收入。这几封信，明白地表露了吴樾自我牺牲、以身报国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国人寻获吴樾遗骨营葬于安庆平头山。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陈天华

清朝末年，浙江金华一个叫曹阿狗的农民，因当众演唱《猛回头》，被清政府惨杀。金华知府为此"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

《猛回头》作者姓陈，名天华，湖南新化县人。

陈天华（1875—1905年），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天华五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的境况，经常激起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为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据此，则相传天华曾在路亭书写"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联语以述志，是可信的。

一九〇〇年春，天华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次年，"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旦："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一九〇三年初，获调入省城师范馆，三月得资送赴日本留学，月杪抵东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陈天华到日本后不满一个月，声讨沙皇俄国妄图霸占我东北领土的拒俄运动大举爆发。天华立刻投身其中，积极出席留日爱国学生召开的拒俄大会，参加"拒俄义勇队"（嗣改称学生军），加紧操练，决心开赴东北前线，把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境。同时，他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抗俄救亡。五月中旬，学生军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自认充"运动员"，自备资斧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旋因故未成行。

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的野蛮镇压，天华越发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从当年初夏至仲秋，挥毫撰写《猛回头》、《警世钟》，以冀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排满革命"。十月，沙俄大量增调军队侵入我东北，国难日亟。天华闻讯，"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备述亡国惨祸，寄回国内，"读者无不堕泪"。

再至日本后，陈天华因图谋反清屡遭挫折，心情抑郁。经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罗杰介绍，与梁启超有所往来。因此，他一度受梁的影响，于一九〇五年初，在留学界散发《救亡意见书》，建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清廷请愿，要求立即颁行立宪，以救危亡。当他正准备返国上书时，事为宋教仁所悉，宋于是约同黄兴，恳切劝告陈天华摆脱保皇派的诱惑，对清政府勿存幻想。天华这才消释了请愿的念头，同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疏远起来。

一九〇五年夏，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日本，在留学生当中积极展开建立联合革命团体的活动。七月二十八日，经程家柽介绍，宋教仁、陈天华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孙中山会面。陈天华回顾了华兴会起事的大略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明了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联合一致的必要性。次日、华兴会的领导聚谈于黄兴寓所，商决是否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主张不加入。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作结。三十日，陈天华出席了同盟会的筹备会，被推举偕同黄兴、马君武等八人起草会章。九月，同盟会接收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自己

的机关报。陈天华积极撰稿，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等论文和时评。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励奋发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

先是，七、八月间日本报纸就披露过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把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之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问。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这是杨枢和日本外务省官员扮演的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个骗局。实际上，清政府此时正指令杨枢乞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取缔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所以，到十一月间，就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一项"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分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留学生不胜其辱，奔走呼号，相约举行罢课，以示抗议。日本各报竟肆意嘲讪，讥为"乌合之众"，《朝日新闻》更公然丑诋为"放纵卑劣"。留学生万分恼恨，酝酿全体罢学回国。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悲愤，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有些犹豫。及至见八千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且日本报章却肆意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怕：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齐心抗争；怕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章上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恙难消，遂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七日写一份《绝命辞》，用蹈海一死来激励留学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要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写完《绝命辞》，陈天华于八日在大森町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绝命辞》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宣读时，"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

(摘自《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端　方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世居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后，当过几任小官。甲午战争以后，曾参加变法维新的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直隶霸昌道。百日维新中设立农工商局，端方奉旨督理。政变后几乎被治罪，据说由于贿赂了荣禄、李莲英，得到二人的袒护，又作了一千余字的歌颂慈禧功德的《劝善歌》进呈，并刊于《国闻报》上，才免被追究。十月，任陕西按察使，翌年护理巡抚并改任陕西布政使。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端方正护理陕西巡抚。他参与"东南互保"，严禁义和团在陕西活动，并将外国传教士护送到安全地区。二十六年(1900年)夏，陕西哥老会、义和团、红灯照联成一气，密谋起事，由于端方严密防范，坚持用武力镇压，所以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因此，他引起群众的憎恨，有人在抚院的三堂和照壁上贴出许多紫色匿名揭贴："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杀端方。"山西、陕西仅隔一河，义和团活动情况却大不相同。九月，慈禧与光绪逃到西安，端方护卫有功，从此得到"两宫"的重视和信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端方升任湖北巡抚。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到三十年(1904年)三月间署理湖广总督。当时，清政府推行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著名的倡导新政的大员。端方擢升湖北巡抚，也致力于新政。他认为"中国积弱已非一日，惟赖尽人知学，始能养成智力，与外洋竞存取胜"。因此，他把兴学作为最急之务。及至署理湖广总督，更在省城城关内外设立了六十所小学，各道府设立了师范学堂。他又创立了一个图书馆，是为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因此，中外人士对于湖北的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端方还派出大批的留学生，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北派赴日本的官费生就达八十一人，居全国首位。同年，又聘日本保姆三人，筹办湖北幼稚园于武昌，是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幼儿园。

三十年四月，端方奉命赴苏州署理江苏巡抚。下车伊始，即下令革除已成惯例的、各州县送巡抚衙门的门包，命每州县以此费送留学生两人。嗣又在苏州设立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也派出大批留学生。在江苏半年，他结识了张謇、汤寿潜等江浙人士，从此时相往来，受到他们一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奉召入京，与袁世凯发电约请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广兴学堂。故端方在湘半年多，颇得湖南开明绅士的称许。

日俄战争期间，端方开始注意和研究宪政问题。战争前夕，他在谈论日俄双方的情况时写道："就目前论之，一则民心固结，一则民志乖离，未尝不叹立宪专制之不同，其收效大为异也。"署江苏巡抚期间，端方曾让人把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领导人板垣退助等人的《请设议院建白》译出阅读，还和自由民权运动温和派领导人大隈重信建立了联系，多次书信往还。这时，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处请定立宪政体，并致函端方，请端方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立宪。日俄战争后，端方更力主实行宪政。据《坚冰志》所记："乙巳召见端方，孝钦知其为戊戌党，因

问曰：'新政皆已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对曰：'尚未立宪。'孝钦素闻立宪为民主之义，遽变色曰：'立宪如何?'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孝钦哂曰：'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者。'乃命泽公、端方、……五大臣出使考察宪政。端方等回国，乃议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5 年 12 月 18 日)，端方与另一个考察大臣戴鸿慈一起从上海出发，赴欧美考察政治。所带随员有熊希龄等人。他们到了美、德、奥、俄、意等十五个国家，进行了八个月的考察。端方亲眼看见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和繁荣，观察西方的政治制度，受到很大启发。他认为："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因此回国后成为清政府中力主宪政的重要人物之一，与袁世凯同被顽固派攻击为鼓动宪政的"两奸"。

三十四年冬，端方奏请开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这是近代以来我国首届大规模商品展销会，全国大多数省均筹划参加。端方自任正会长，郑孝胥任副会长。宣统二年(1910 年)五月正式开会，除每省各设一馆外，还设置教育、武备、工艺美术、农业、机器、卫生、电学等馆，一直开到九月才结束。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不久，袁世凯被开缺回籍，端方亦被人弹劾。宣统元年五月，继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死，清廷调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北洋不到半年，适逢慈禧安葬，端方学欧美的习惯派人沿途照相，又在风水墙内的树上安设电灯电线，结果以"大不敬"的罪名被免职。

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最初对保路运动采取较温和的态度。端方有意觊觎四川总督的位置，就和盛宣怀、湖广总督奏劾赵尔丰庸劣无能，请简派重臣入川。七月十日(9 月 2 日)，清廷命端方前往四川查办路事。

九月二十八日(11 月 18 日)，端方行抵资州(今资中)，已陷入四川同志军的包围之中，不敢再前进。十月七日(11 月 27 日)，成都光复的同一天，端方所带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同时被杀死。终年五十一岁。

端方与荣庆、那桐被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诗文，爱好收藏金石书画。有《端忠敏公奏稿》、《陶斋吉金录》等。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杨毓麟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又名叔壬，改名守仁，在报章杂志上又常署名椎印寒灰。同治十一年十月(1872 年 11 月)生于湖南长沙高桥。

毓麟"性笃厚聪颖，少好学问"，七岁能文，十五岁中秀才，"精研佛老及经史百家，手不释卷"，后肄业长沙岳麓、城南等书院，留意于经世致用之学。甲午之战时，作《江防海防策》，抨击庸臣误国。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中进士，以县知事分发广西。当时，维新运动正在高涨，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也在锐意革新，创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著名维新志士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一起倡言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被杀，梁启超亡命日本，毓麟也逃离长沙，"避乡数月乃免。"随后，应江苏学政瞿鸿禨之聘，入幕襄校，目击宦途污浊，不久即辞去，到湘绅龙湛霖家教馆。两年之中，常私购"禁书"，深夜偷看，产生了追求'世界之知识"的强烈愿望。

光绪三十四年(1902 年)，在龙湛霖资助下，杨毓麟东渡日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继进早稻田大学。正当民主革命思潮渐趋高涨的时候，他读了卢骚的《民约论》以及《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等书，深受启发，尤醉心于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加上交游渐广，眼界日开，遂产生强烈的革命思想。这年冬，他撰写出版《新湖南》一书，署名"湖南之湖南人"，以"湖南人道湖南事"，揭露英美列强"绝我湖南人之命脉"，论定丧权辱国"皆爱新觉罗之罪状"，批驳康有为保皇臣清、反对革命自立的论调，倡言反满独立，"存湖南以存中国"，呼吁湖南中等社会肩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以"铁血"铸造新湖南，"建天心阁为独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扩张独立之主权"，并号召湘人"一致合力，以御外侮。"此书广为流传，对有志青年起了很大的惊醒和鼓舞作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14 日)，杨毓麟与黄兴、杨度、樊锥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月刊)，并担任主编，先后出版十二期，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开各省留学生自办革命刊物之先河。

为抗议沙俄霸占我东三省，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留日学生掀起浩大的拒俄运动，杨毓麟先后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自认充江南一带的"运动员"，负责联络同志和筹集经费。他还同苏鹏、何海樵、周来苏、胡镇超、汤重希等六人组成暗杀团，"以谋刺那拉氏为第一对象。"为此，他们到日本横滨密赁一屋研究和试制炸药。有一次因失慎爆炸，杨、苏二人各伤一目，以致失明。毓麟并不气馁，持之不懈，还将制药之法"编辑成书数十页"，以供同志参考。"党人能自制炸弹，自守仁始。"第二年夏天，杨毓麟、何海樵、张继、周来苏等人到达天津，秘密筹备就绪之后即潜赴北京，于草头胡同租赁一屋，计划在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炸毙西太后。不料西太后深居简出，他们蛰居都门荏苒五个月之久，未能得手，费用却

早已告罄，不得已郁郁离京赴沪。

杨毓麟到沪后，和蔡元培、章士钊、钟宪鬯、刘光汉等设立秘密机关，继续研制炸药。还在新闸路余庆里建立爱国协会，杨毓麟任会长，章士钊副之，广泛联络沪、宁、江浙一带的革命志士，策应华兴会在长沙发动的起义。不久，长沙起义事泄失败，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被破获，杨毓麟遭追捕，幸走脱得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毓麟谋得随员厕身其间，策应吴樾借机行事。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吴樾乔装官方仆从，登上五大臣专车，谋炸未遂，壮烈牺牲。清政府大肆搜捕，却未怀疑到杨毓麟。十一月（12月）五大臣启程出洋，杨随行到日本，会见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等，筹商巩固和发展革命团体，遂辞去随员职务返回上海，设立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1906年6月25日）加入中国同盟会。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杨毓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并担任总主笔，所发稿件，隐寓影射，旁敲侧击，字里行间，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思想的火花。“直诛政府之专制，痛陈种族之灭亡，不啻暮鼓晨钟，冀国魂有以复活”，于右任称杨毓麟的文章“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不料该报出版才三十七天，邻居失火，报馆遭焚，杨从楼上缘电杆而下，幸免于难。

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党人“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同盟会骨干丧失七十多人，中外报刊又作了夸大宣传。杨毓麟从报上得知消息，以为黄兴也已殉难，痛感个人丧失知己，国家丧失精华，忧伤过度，夜不成寐。他原已患病，经此打击，更是身心交瘁，头痛浮肿，时哭时歌。曾致书曹亚伯，谓数月以来，精神痛苦，如火中烧。后得知黄兴仅伤指无恙，稍得安慰。然仍伤同志之遭害，感亡国之悲痛，愤异族之猖獗，五中皆为之不宁。不久，闻清政府将各省铁路收归国有，正迎合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加上此时又与同乡、同学、故交章士钊因政治见解发生冲突，以致关系破裂，精神上更受到极大的刺激，病情因而加剧，头肿更大，愈不成眠。又苦于重洋远隔，不能返国寻民贼报仇，以“有生无乐，得死为佳”，遂决定以身殉国。同年闰六月十三日（1911年8月7日）杨毓麟留下遗书寄交石瑛和吴敬恒，托他们将自己历年所积一百三十英镑转寄黄兴百镑捐为革命经费，其余转寄老母以报答养育之恩，即乘车奔赴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而死。次日，石瑛、吴敬恒、曹亚伯及旅居利物浦华侨开会隆重追悼，将其遗体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死年三十九岁。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珍闻轶事

孙黄会面记

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自法国马赛登舟东返。他一路经过新加坡、西贡、香港，略事停留，于7月19日抵横滨。行前，孙中山将归讯告诉了冯自由等。湖北、四川等省留欧学生也将此讯转告留日的同乡。孙中山即将前来的消息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他在横滨上岸时，受到了程家柽等一百余名留学生代表以及兴中会员、广东同乡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这次重回日本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有组织一个新联合的革命团体。他很快前往东京，紧张地和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两位反清革命的著名领袖会面了。孙、黄的会晤是极富情趣的。宫崎寅藏回忆说：“我当时住在新宿，孙来到我的住处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留学生，有否我党之士？’我说：‘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他听了名字便马上去找。我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他不允许这样，说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前去拜访他。’当时黄兴在神乐阪的边上租房住着。我带着孙到了那里，打开窗子往里一看，见地上有一大堆拖鞋，一大帮学生围坐成一圈。我看到人太多了，便让孙在外边等着。我向里边喊道：‘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我手指着孙让他看，他一看便认出了是谁。”黄兴与张继、宋教仁请孙中山在神乐阪凤乐园饭馆入宴，畅谈革命的形势和办法，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革命，得到黄兴的赞同。

随后，程家柽又邀集陈天华、张继、宋教仁、吴春阳、但焘等在北辰社自己的住所里与孙中山会商组织革命团体问题。

（摘自《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　日本平凡社出版）

端方之滑稽

端方之抵美也，船傍岸，即为人用汽车迎入三藩息旅馆，美洲之大旅馆。其门大都为旋叶，凡旅客出入，侍者必推动旋叶，以随旅客之意。端方降汽车后，旅馆侍者亦照例推动旋叶，以待端之入门。端进叶中后，忽见四叶同时推动，目眩头晕，随叶环转二周，依旧旋至门外。端不敢再入，摇手曰："我不图无锡人之江尖嘴上团团转，今于外洋身临之。"《秋星阁笔记》云："端午桥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犹忆有上海某中书者，发起一拒赌会，网罗名人不鲜，而尤企大力者为之作登高呼。时端正开府两江，某中书趋谒节辕，痛陈赌害。端太息曰：'诚如君言，此花骨头亦唐丧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兹事废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闻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书向于各种赌经，均未入其藩篱，殊为门外汉也。'端曰：'我犹仿佛忆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则五。'某君急辩曰：'大帅误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视某中书半晌。笑曰：'咦，足下亦个中人也，能正我之误，大佳。'又周视在座诸僚曰：'君辈皆亦深知白板之数非五也。'语已大笑，端茶送客矣。"

（摘自《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赤坂区红叶馆的一次宴会

一九〇七年，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正在举行毕业考试的时候，有一天去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关照我明天下午到这里来。我不知什么事，第二天准时去了，已经有不少人会齐在那里。中山率领大家到赤坂区红叶馆。这比芝区的红叶馆规模小得多了，但排设还是很丰盛。日本式的宴会，照例有许多"艺伎"侍酒歌舞。舞衣歌扇和舞的姿态，以及旁边配奏的乐器，都和所见唐画差不多，送茶的人只能跪在房门口，一一由艺伎接过，亲手分送到各人面前。那天除主人及特客中山先生而外，同座的有黄厘午、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刘申叔、宋遁初、田梓琴、张溥泉、山西乔君（名字记不起了）和宫崎寅藏，还有一位日本人士，不认识，说是在东三省秘密工作的，倒留着一条辫子盘在顶上，我看了很奇怪。有人说他是头山满，不知是不是。当时我年纪最轻（十八岁）宫崎寅藏开玩笑，教艺伎们围着我输流灌酒，我大醉了，被扶上车送回下宿（即旅舍）。第二天的学校考试，几乎耽误了。我心里疑惑，不知为什么有这次宴会，急欲知道究竟。等几天全部考毕，再去看中山先生，寓舍已经易主了，转赴民报社打听，据闻这次宴会是由日本外务省次官内田康哉出名请的，其原因是清政府秘密交涉，要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出境，日本政府也不喜欢中山在那里搞革命，但对于政治犯是不能加以驱逐的，便劝中山先生暂时避到别处去。中山先生不得已应允了。这席酒等于暗中饯行，并传说还送了三千块钱作旅费。中山先生便带同汉民、精卫一起到南洋各处展开活动去了。同盟会一部分人对此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说这等于受贿，损失了同盟会的威信，要提议另推黄兴为领袖。当然，孙、黄并没有分裂，但革命行动是多方面的，有时也各行所事。而太炎先生对中山一时的误会，恐怕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袁世凯供奉西太后及其太监李莲英

袁世凯在北洋对于宫廷供奉，是无微不至的。但是人言啧啧，并未举出事实。有农商部主事于守仁曾说颐和园打井故事，可以看出不少的秘密，如下：

光绪末年，西太后、光绪帝及后驻颐和园歇夏。园中虽有昆明池，却无井，太后忽想用新法开井。这是农工商部承办的。当时杨士琦为农工商部侍郎，系袁的嫡系旧部，凡涉及宫廷的事，无大无小，皆替袁氏关心。袁的长子克定任该部右丞，士琦与克定商派主事于守仁前去监工。此人系士琦亲信的人。派定后，克定即备酒招请守仁。守仁去到袁家，克定说："家严平日对宫中一切举动，皆注意小心，这回开井监工，杨侍郎与寿翁（守仁字寿伯，清江浦人）亲密，才烦寿翁前去，兄弟特请寿翁饮酒，即是嘱托寿翁进去，一切谨慎。重要的是对李总管（即李莲英，又称皮小李），兄弟已有信绍介。我们对于他家生 朝满月都须应酬，寿翁在监工期间内如有要应酬的事，兄弟即以寿翁名义备帖代送礼物。如果遇有此事，他必声谢，一声谢，寿翁即知我已代送礼物了"果然守仁一到园中，先见李，一见面，不须问，李即以寿翁称守仁矣（自然是克定预先绍介）。到了开工的第二天（时系夏日），太后、帝、后皆来看开井，守仁跪下请安。太后叫他起来，问了些话。太后命随从的人说："赏他一封。"当时随从者即置一个黄封于地，守仁叩头谢恩。太后、帝、后走后，守仁细看所赏系一银封，封长可三寸，长方形，黄绫纸壳糊成，旁用楷书工写"直隶总督臣袁世凯恭进"十个字。及带回家拆看，系十个圆形小银锭，每个一两，共十两。太后、帝、后二次来看，太后又赏一黄和糕点六件。及第三次来看，再赏一黄封和宁绸袍褂料一套、糕点又六件。在监工期间，有一天李总管来请，及见面，李称谢云："舍内些微小事，竟承厚赐，大不敢当。"留坐送茶谈一会而散。李且问："克定到衙门还勤吗？"守仁以"极勤"答之。李云："也罢。"守仁暗想："袁大爷系本部丞参，堂堂大官，李胡有此问？"其后探得袁与李系干亲家，□□其"寄儿"也，才知道前清阔人做官，真有

不少的方法。其后守仁将赏银事告士琦，士琦曰："此项用款皆李文忠所遗，备北洋正用，宫保得借作宫廷应酬。从前如曾文正、李文忠辈，对宫廷即不必如此。如宫保对宫适不如此，即不能行，因为起家的资格不同。那手法也不能一样，这是无可如何的。"此改革后守仁在农商部对其司长田步蟾所说的(以上漆运钧述。漆前农商部佥事)。

据龚怡轩说，袁世凯在北洋对于西太后的供奉，李莲英而外以内务府堂郎中白敦甫者为之牵线。白有女，常入宫，因入侍之际知后嗜好，及有所需，辄走告其父转达袁，无不及时备办。李于事后，每为展转陈明。又有王桂岩者，理藩院尚书绫昌管事人，与李通好，亦向袁传达内府消息而兼采办者。一日，后偶然说翠饰以菠菜绿镯最佳，李以示王，遂为购进一副，色泽甚嘉。后知为袁献，偶于召对之余提及，颇加奖许。李并告以此镯良好，惜圈口稍大，能再有圈口合适者更美。因再嘱王某觅购，遍寻京市内外，急切不可得。嗣洞知庆宽存有圈口合适的，庆知为袁购，索价十万，虽婉商再四，竟未肯贬值如愿以献。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流 行 风

小说《黄绣球》

作者颐琐，作品主要内容：

开卷第一回"论房屋寓民族主义，叙天伦动巾帼感情"，所叙故事发生地——位于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的"自由村"，乃隐喻中国，村中聚族而居的，黄姓大族实指炎黄子孙。作者感慨地说：

……觉得自家村上各种风物，无一不比外面强，却无一能及外面光彩，想来想去，不懂什么原故。要讲读书人少，眼见秀才举人比村上的狗子还多，要讲做官人少，眼见红顶子蓝顶子用巴斗箩担也就量不清挑不完，要讲种田经商的人少，眼见佃户完粮，却为皇家一宗大大出息，生意买卖，差不多都是累万盈千，怎么问起来，总说是十室九空，只剩得一个外面子的好看。……天数何尝能弄到如此？总要出些人力斡旋，才可挽回造化。

这显然是借题发挥，抨击现实。而女主人公黄绣球所倡扬的妇女改造运动，正是在这呼吁变革社会、振兴民族的广阔背景下展开的，这就加强了主题的深刻性。

黄绣球出身于破落 书香门第，父母早亡，从小备受饥寒、缠足之苦，及长知人事，便怀疑三从四德"这些旧规范，"男女是一样的人，怎么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后来嫁了思想开明的丈夫黄通理，便日益通达事理，渐知"世界上的男女本来各有天赋之权"，于是渴望女子也有所作为。她的名字黄绣球，就寓有锦绣地球之意。以后，她又受了法国罗兰夫人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就谋冲破旧传统束缚，从事妇女改造运动，为女界光明而奋斗。

小说《瞎骗奇闻》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

《瞎骗奇闻》是一部反定命主义的小说。内容是叙一个土财主赵泽长非常相信算命瞎子的话，而弄得家破人亡，一败涂地，又一个寒士洪士仁，也是极相信瞎子之言，最后也弄得身败名裂，小说藉此使大家觉悟，了解"这些瞎子，本说的是瞎话，万万靠不住的"。告诫人们要破除迷信，在艺术上，书中塑造的人物性格很有特色。尤其是算命先生周瞎子，作者通过周瞎子的语言、行动等等的描绘，把他的狡黠、诡诈、圆滑和小聪明刻画得生动异常 。例如 当洪士仁穷得没有办法，跑去向他借债时，瞎子却巧妙地答他："不是我不借给你，怕耽误了你的发财机会。"既使他不食前言，又没有把钱借给洪，从中对周瞎子可略见一斑。小说在语言上，顺达流畅，且由于作者对星相了解甚多，写瞎子的语言多用"行话"，更为小说凭添一层气氛。如第一回"负螟蛉中年得子，谈理数信口开河"中，赵泽长找到周瞎子让其算命，周马上正襟危坐的道："尊造是个癸水日元、地支上有一派正财，财源茂的很，地纲上是个辛金，金能生水，既主身旺，又能得上人的馀荫……"由于用词帖切准确，进一步把瞎子骗人把戏揭示出来。

小说《洪秀全演义》

作者黄小配，主要内容：

首先是表现了鲜明的种族革命倾向。黄小配在《自序》中表明，这部小说"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这个立场，是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振大汉之天声"的观点是一致的，此书初版时标明为"民族小说"也即

是揭示主旨。旨在反满而不反封建，固然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思想上的缺陷，也确实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局限，但作为一部描写历史的小说，此亦无可非议。所云"实录"实不完全，因为小说从清廷日趋窳(yǔ羽)败的政治背景中发生金田起义开始，写到攻破曾国藩江南大营即戛然而止，对以后太平天国逐渐走向衰败的悲剧结局未曾反映出来，看来，黄小配创作这部小说并非旨在写史，而是借歌颂太平天国以鼓动反清革命，所以不愿去描写其最终的败局了。

其次是正面讴歌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一是写义军所至，深得民心，如叙述大将林启容在九江驻屯的时开明措施云：

林启容最得人心，自镇守九江以来，初则与地方缙绅款洽，不计尊卑，不拘形迹，以次及于居民，如同一家；于贫民，尤时有赈恤。在九江数年，设立义学以教贫家子弟；设保婴局，以扶养无靠之孩童；又立义仓，积容防饥，随时赈济；并立善堂，以赠医施药，居民无不歌功颂德。又设宣讲所，劝民以大义，人民多受感化；积五六年，无有构讼者。……林启容又能敬老爱幼，每届冬至前后，必预期布告置酒款等乡老，……又设恤孀局，凡妇人夫死无依，一届岁暮，即按名赈给。

这部小说也以大量笔墨描绘了太平军起义后历次气势浩荡的战役，渲染了洪秀全的雄才大略，军师钱江的足智多谋，林凤翔、陈玉成、林启容、李秀成等将领的英勇善战。这样以充沛的热情正面歌颂英雄形象，在一般侧重于暴露黑暗、缺乏正面人物描写的晚清小说中，分外显得突出可贵。

小说《苦社会》

作者不详，作品主要内容：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李心纯、鲁光国、阮通甫三个在国内趋于究途末路的知识分子，被迫到国外谋生，历经坎苛苦难，结果是一人惨死异域，两人不堪虐待最终潦倒逃回祖国。小说就是以这三人经历为线索，分写在美华工、华商受凌辱、被压迫了痛苦生活。

当时的华工都是在名为"招请"实则"招骗"的情况下去美的，一上轮船，就被视同囚犯，套上锁链，关入阴冷污臭的底舱，失去自由。

华工到达工区后的生活也是牛马不如，他们在寒风烈日下开河筑路，伐木开垦，每日作工十二小时，饮食粗劣，住的工房"立着招不起头，睡着伸不直脚"，还要用铁索将人们连续锁起，屋外有马队巡行监视，捆绑鞭打更属常事。天长日久，忍无可忍，遂爆发反抗斗争。写大岑山的一回，充分体现了华工积郁已久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以石块工具为武器，英勇斗争。最后，斗争虽仍被美国军队血腥镇压下去了，却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颂扬了中国工人的顽强斗争精神。

三十五年回以后，着重描绘华商遭受无理欺压的情景，唐人街上风声鹤唳，美国巡警搜家捕人，阴森可怖，人权毫无保障。

在当时的同类题材小说中《苦社会》是一部比较突出的代表作，因为，不仅描写的笔致真实生动，而且渗透了强烈的反帝意识，在当时，警醒民族奋起自强，确有发聩振聋的作用。

小说《市声》

作者姬文，作品主要内容：

《市声》是一部描写晚清时期上海工商界实况的小说，它反映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和中国封建统治的摧残之下，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的景象。

作者笔下的商人有两种。一种是写钱伯廉、汪步青那些奸商，他们巧取豪夺，狂嫖滥赌，实是商界的蛀虫，给予暴露并加抨击，固为警世，但对他们的丑行写得太多，未免冲淡了主题的严肃性。另一种是头脑清醒、有志兴革的商人，如热衷于振兴茶业的欧戴山，他看到中国茶的出口事业由兴旺趋向衰落，十分忧虑，就主张改善种茶、制茶的管理，消除弄虚作假的弊病，购买机器以科学方法焙制茶叶，他拟定的办法是：

我们收了青叶，晒得棉软，把来倒入机器，每两刻时搓得匀净圆紧，然后作机器烘焙。这机器名为"押皮杜拉符"有抽气管，叫茶味不散，从前用炉火烘焙，那烟气都贯入茶里，如今用这机器，安好烟囱，烘焙起来，免了许多弊病。烘焙好了，筛来长短整齐。那装箱又是件要紧的事。我们把制好的熟茶，用竹管盛着，外面裹了铅皮，再钉入箱里，闭得极严。随他阁到许久，开出来香味扑鼻，再不散的。我们公司里，派人出去，到各处出茶的山上，安放机件，随收随制。

如此精明干练者，在晚清时期可说是新型的商人了。姬文将两种商人妍丑对比的构思，当然意在揭示革新商业之道，可惜他对正面的典型人物写得太少了。

小说《狮子吼》

作者陈天华，主要内容：

书名"狮子吼"象征民族的觉醒与中国的前途、开篇"楔子"以第一人称写"小子"读"混沌国史"，史载"混沌国"被东北"野蛮人"占领了二百多年，如今又来了"蚕食

国"、"鲸吞国"、"狐猸国"狠毒无比，混沌人种遂归乌有。"小子"读罢悲从中来。沉沉睡去。梦中忽见洋兵，官兵驱杀百姓，又见虎狼无数，骇得"小子"一声长号，惊醒沉睡的雄狮，也大吼一声，虎狼纷纷逃窜，于是"小子"在黄帝子孙的国土上看到共和国的新都会，走进图书馆阅览封面画吼狮的《光复纪事本末》，醒后便将该书用白话演出，正文第一、二回讲人类的进化、种族的斗争、日俄的阴谋和汉人天下沦为满清统治的经过。第三回始述故事。讲舟山岛有个民权村，村中总教习文明种讲授新学，学生中以孙念祖、孙绳祖、孙肖祖、狄必攘最为得意，毕业后，念祖、肖祖去美国、德国留学，绳祖留内地办报纸开民智，必攘在汉口创立"强中会"、联络四川的"岳王会"。其间藉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和上海"破迷报馆"事件，揭露以西太后为首的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罪行，讴歌以审血诚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必攘自四川又去陕西、湖北活动，在襄阳遇文明种，同到汉口办厂、开报馆、设学校，联系各地会党，并与东西洋的留学生联成一片。彼时留学生，美洲以念祖为领袖，欧洲以肖祖为领袖，他们空有思想没有势力，因此都注目在必攘身上。小说到此便中止了。《狮子吼》表现了作者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但也反映出他的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忽视民众的思想倾向。语言精炼隽美，极富热情，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是晚清小说中一部宣传民主革命的重要作品。

电影《定军山》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在1905年秋天，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戏曲片《定军山》。

丰泰照相馆创办于1892年，在琉璃厂土地祠，即现在的南新华街小学原址。它的老板任景丰，是沈阳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学习过照 相技术。他开办的照相馆，不仅为北京仅有，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所以，生意兴隆，规模不断扩大，拥有照相技师和学徒达10余人之多。任景丰除经 营照 相馆外，还经营中、西药店，桌椅店和汽水厂等。后来，他又投资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大观楼戏园，并放映电影，颇受观众欢迎。但他感于当时在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不足，影响生意，便产生了自己拍电影的念头。于是，他从东交民巷一家德国人开办的祁罗孚洋行里，购得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胶片14卷，开始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定军山》是我国京剧传统剧目，它由著名演员、"谭派"艺术创始人讲谭鑫培主演，丰泰照相馆的技师刘仲伦摄影。它表现的是三国名将黄忠，攻打曹军重镇定军山的故事。由于初次尝试和无声片的限制，影片只拍了其中的"请缨"、舞刀"和"交锋"等几个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强的片断。《定军山》是在丰泰照 相馆院中的露天广场上拍摄的，完全利用日光摄影，摄影机摆好不动，演员在摄影机前自管表演，没有景别，没有导演，拍完一卷胶片时，让演员停在原地不动，摄影师装上新的胶片后，再接着表演和拍摄。

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 》等戏曲片段，都是京剧中武打和舞蹈场面，动作多于表情，以适应无声片特点。他们把外来的电影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戏曲艺术相结合，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因而，也受到当时观众的欢迎。

诗《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

诗《题太平天国战史》

旗翻光复照神州，虎踞龙蟠拥石头。
但使江东王气在，共和民政自千秋。

（柳亚子）

历史档案

同盟会誓言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国民军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shān，山)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zhǐ，止)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已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

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上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始终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chuō，戳）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hùn，混）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摘自《孙中山选集》）

《民报》发刊词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伙矣。姱（kuā，夸）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坛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驰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

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摘自《孙中山选集》）

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

美设苛例，名为限制华工，实则禁绝一切华人入境，今举其苛例之重要者如左：

一　往美经商，初时原属不禁，乃美国近日立例："惟店铺之股东始得谓之商，其余店中所雇用之人，若总办若管帐若司买卖人等，又凡开酒楼饭馆、开雪茄烟香烟工厂、开制靴帽厂、开裁缝店者，均不得有商人资格。"是名不禁商而实则禁矣。

一　往美游学，初时亦属不禁，乃美国近日立例："惟学习高等或专门学业，因在故国无从学习者，又必能缴验学至卒业回国之费用者，方为合格。"是名不禁游学而实则禁矣。

一　据梁震东（梁诚）星使驳黑脱所定苛例第五款有云："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所拟续禁华人例第二款，准中国官员教习游学经商游历五项人来美例内，声明与条约并行，其余各例未见言及教习游历两项之人，而一千九百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定例，并未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定例第二款包入，将来教习游历必均入禁例之内。"云云，是并教习游历而亦禁矣。

按定约本载明：唯准官员教习游学经商游历五项人入美，其范围本已极窄，今据上交所述，则并此五项人而去其四，所余者唯官员一项耳。况于此外又复有下文所列之种种苛例以为不禁之禁乎。

（甲）虽携有合式之护照，尚填写稍有不合即不准入境。

（乙）护照合式矣，倘必须关吏反复盘诘，倘有一语不合即不准入境。

（丙）甲乙两项均合式矣，而医生若指为有病即不准入境。此外倘有不著于法律之苛例：

（子）华人到美者，无论合例不合例，一概先行拘入木屋候审。

（丑）未审问以前不许亲友探问，虐待甚于囚徒。

（寅）入木屋者常候至数十日，始行开审。

（卯）审问时，无陪审之人，又不许旁听，又不许将口供录布，其审判一任关吏之意。

（辰）既经注册及假道之华工，须用机器量身，此法系欧洲用以待囚犯者，无罪受辱，可恨至极。

（巳）如遇香港等处有时疫症，华人欲往美者均须到一痘房裸体用硫磺水熏浴。张荫桓贺英皇加冕时，一切参赞随员曾受此辱。

其他种种苛刻烦扰之处不胜枚举。又彼从前禁例上载有："期与定约不相违背"一语，于其续增苛例犹不无有所限制，乃至去年美议院并将此语删去，以为将来愈禁愈严之地步。总而言之，此等苛例实皆缘约而行，盖因禁约第二款有"遵现时之例及嗣后所定之例"一语，第三款有"遵守美国政府随时酌定章程"一语，以阶之厉。故无论彼设何等苛例待我，而我不得不受也。夫约当以彼此合意见而成，今我不肯画押，而彼欲迫我，则此约之有利于彼而有害于我可知，是此约我国万无可画押之理。今请言此约之有害于我者：

一、损害国家之尊荣　古今各国均无此等禁约……辱国莫甚焉。

二、玷（diàn，电）辱国民之人格　种种横逆，几不以人类待我，我岂能堪！

三、失两独立国彼此同等相待之权利，彼来，受我保护；我往，乃受彼苛禁虐待；天下不平事孰有逾此！

四、失万国通商应享之利益　据美人加孙氏调查谓：华人于四年半之间，以美金五千余万（合华银一万万有奇）寄回中国，若禁例行，则我国失此一大利源矣。

由上所志，此约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国理当拒而弗纳，而今美政府既强我政府画押矣，危机一发，稍纵即逝；急则治标，徐图善后，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是所望于爱国诸公。

（摘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日军攻陷旅顺口。

1月19日　留美学生电鄂督张之洞谓赎路废约合万国公例，23日湖北留日学生亦电请坚持废约。

1月21日　江苏丹徒县加征漕粮，激成民变。

1月27日　清廷裁漕运总督，改设江淮巡抚。

1月30日　陆亚发、欧四等柳州起义军败。

2月1日　修四川都江堰。

2月15日　许雪秋等谋于四月十九日潮州府城起义，事泄未成。

3月10日　日军占领沈阳城，俄军全数退出。

3月25日　上海"警钟日报"被封。

3月28日　清廷专为王公大臣子弟设立贵胄学堂。

4月3日　邹容死于狱中。

4月16日　上海新华纱厂工人发起反对裁减工人运动。

4月21日　清廷裁撤新置江淮巡抚，改淮扬镇总兵为江北提督。

4月24日　清廷允修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之请，删除刑法中凌迟、枭首、戮尸等项。

4月29日　上海集成纱厂四千六百名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并捣毁工厂门窗机器。

5月8日　军机处命查禁"浙江潮"、"新民丛报"、"新小说"、"中国自由书"等书刊。

5月10日　上海各帮商董召开商务总会议决，两月内美国不改虐待华侨苛例，即行抵制美货。

5月21日　美商培次拟承办浙赣铁路，浙省士绅集议拒绝。

5月22日　上海清心书院学生因抵制美国禁约事，一律退学。

5月23日　清廷准张謇招集商股，用新法捕鱼，设立渔业总局上海设分局处。

5月25日　清廷赏承办京师劝业银行前太仆寺卿林维源侍郎衔。

5月　许雪秋策动余继成、陈涌波等在潮州黄冈举事，以械劣失败。

6月3日　广州士商会议抵制美约。

6月6日　苏州士商会议抵制美约。

6月11日　芦汉路南北两线皆竣工，合力修建黄河铁桥。

6月18日新加坡、天津、南京、汕头、潮州、杭州等地绅商集议抵制美约。

福建士商倡立保工会以抵制美约。

7月1日　清廷命铁良、徐世昌会办练习兵事宜。又命徐世昌充政务处大臣。

直督袁世凯、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联衔请自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

7月3日　练兵处奏各省新军皆名陆军，按省份先后编排数目，以保定所练习京旗常备军为陆军第一镇。

7月4日　清廷在保和殿考试出洋毕业学生。

7月5日　驻杭美领事照会浙省商务总会，代培次指索承办浙赣铁路。

7月16日　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7月18日　清廷裁盛京户、礼、兵、刑、工五部侍郎。

7月19日　上海绅商集议抵制美国工约，议决不定美货，由各商领袖签允。次日各帮商董签允并电三十五埠照行。

7月24日　浙江绅商在上海集议抵制美商要索铁路，自造浙江铁路，公举汤寿潜为总理。

7月30日　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召开于东京，十七省代表参加，通过党名、誓词并宣誓。

8月1日　李登辉等发起组织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上海成立。

8月2日　袁世凯议举行立宪政体，御史赵炳麟亦电奏请立宪。

8月3日　沪绅采取地方自治之制，设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

8月5日　所有京师五城练勇皆改巡捕。

8月13日　留日学生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于东京富士见楼。

8月14日　清廷续派商部右丞绍英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7月30日，孙中山曾约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领袖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曹亚伯、吴春阳等六十余人，在东京赤坂区霞关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议通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经过反复讨论通过孙中山提出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

权”十六字为会纲，旋即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是日，又在东京赤坂区灵南阪本金弥宅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者百余人，通过会章三十条，公推孙中山为总理，并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机关报。

8月21日　广州人民为抵制美货，揭露美国迫害华工情况，由黄晦闻等创刊《拒约报》。出至第九期，被迫停刊。

清廷命各省督抚“晓谕商民”，勿再抵制美货。

8月22日　清政府设置户部造币总厂（即天津银钱总厂）。

8月26日　清廷谕禁抵制美货后、张謇、汤寿潜、周廷弼、汪康年同上海商会总理，借口“抵制美货仅是不用而不是不购”，议定六月十八日（7月20日）前存定之美货，由商会发给印花，照常销售（9月2日《时报》刊登上海商务总会紧要广告，公布这项办法），公开破坏反美爱国运动。

8月28日　《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二号因载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内务省以“妨害安宁秩序”为名禁止发行，并将印就之杂志全部没收。

8月29日　梁诚与美国合兴公司议订赎回粤汉铁路合同。9月6日，赎回合同在华盛顿签字。

廖仲恺、胡汉民等六人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8月30日　厦门商民因抗议海关敲诈勒索，举行罢市，聚众千余人捣毁海关，被枪杀七人。

8月31日　梁诚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赎回粤汉铁路合同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议决自办铁路，并奏明修路公共条款十四则。

上海公忠演说会召开千人大会，抵制美货，反对张謇等人破坏反美爱国运动。

清廷命各省督抚认真晓谕工商，勿再抵制美货。

9月1日　江苏川沙、宝山、南汇、崇明风潮为灾，淹毙数千人。上海马路水深盈尺，货物损失值千余万

清廷命各省督抚再多派学生游学欧美，并命出使大臣监督考查。

9月2日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清廷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省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9月4日　清政府命各省学堂事务，均归学政专司。

9月8日　孙中山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广州、澳门等处联络同志，主盟接收会员。11月，将香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陈少白任会长。

9月9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香港英政府订立赎回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总数为一百十万英镑。

9月16日　清廷谕称：东三省“风气未开”，亟应指定地界，多开商埠，推广通商。

9月23日　光复会员徐锡麟创立之绍兴大通学堂开学。

清廷命盛宣怀将前与英商所订苏杭甬铁路草合同撤废，由浙江绅民自办。

9月24日　爱国志士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向出洋考察政治之五大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兵部侍郎徐世昌及绍英等投掷炸弹。伤载泽、绍英（吴樾死难，五大臣出洋改期）。

9月25日　商部顾问张謇、四品卿衔汤寿潜、候补道许鼎霖等奏准创设上海大连轮船有限公司。

福建省绅商奏准铁路自办，命前内阁学士陈宝琛为总办。

10月2日　中国第一条自修铁路——京张铁路开工。

10月7日　孙中山自日本横滨乘法邮船赴安南（越南）筹款。经吴淞时，天津法国驻军参谋长布加卑奉本国陆军部长之命，登轮求见声称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之意，愿先派数名军官协同到内地调查革命实力。孙中山同意进行调查，不久即派出一些同盟会员与法国军官一起分赴两广、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进行此项工作（旋经香港去西贡）。

10月8日　清廷设巡警部，以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为尚书。

10月19日　岑春煊因镇压广西人民起义加封太子少保衔。

10月26日　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赴各国考察政治（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遇炸受伤，均不成行）。

上海工界和平社开会，到者五百余人，议决坚持抵制美货办法：“凡卖美货之门，宜足不入其门。”11月26日，再次开会，表示华工禁约“一日不废，彼美货当一日不用”。

10月28日　广东连州二千多群众烧毁城西美国教堂、医院、死美教士五人。

10月　孙中山抵西贡后一、二日，应邀参加旅越华侨在提岸举行之欢迎会，并成立同盟会分会。

11月12日　汉口各码头工人相约不运美货。

浙江台州府台州县法国教堂被毁。

11月13日　芦汉铁路举行落成典礼。

11月18日　清廷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

11月19日　订铸造银币 及行用章程。

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辞职，由唐绍仪继任。

11月24日　山西士绅解荣略、梁善济等三百余人，学生张宝麟等一千余人公请废止英商福公司办矿合同。

11月25日　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各国政治”。

清廷命各省严禁革命排满之说。

11月26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每月一期，以宣传同盟会之革命纲领为宗旨，并与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进行激烈论战。孙中山于发刊词中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编辑及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朱执信、章炳麟、胡汉民、汪兆铭等(按《民报》创刊月日，有10月20日、11月17日、11月26日各说，以11月26日较为可信)。

11月　同盟会员余切在四川彭县石洞堰组织大同军，提出“驱逐鞑虏，创立民国”之口号，聚众一千七百余人起事，遭清军镇压，失败。

12月2日　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自北京启程(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于11日启程)。

12月4日　中国留日学生八千余人，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实行总罢课，二百余名回国。陈天华愤于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之诋毁，作绝命书劝留日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于8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以示抗议。

清廷命各省仿照直隶设立法律学堂仕学速成馆。

12月6日　清廷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国子监归并学部。

12月11日　孙中山与西贡侨商磋商后，成立广东募债总局，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发行千元票面债券二千张(每券实收二百五十元，革命成功还足本利千元)，拟向南洋富有侨商募集革命经费。

12月8日　上海商民因会审公堂审案不法，罢市，毁虹口老闸捕房，外兵登岸，枪杀华人十一名。21日罢市终止。

12月20—31日　浙江仁和、宁波、余杭、桐庐等地商民，因反对将铜元改当九文，先后罢市。

12月　黄兴离日本香港，取道入桂林，即在广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所办随营学堂内发起组织同盟会分会，加盟者有郭人漳等八十余人。

是年秋　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安南爱国志士潘佩珠会晤两次，就两国革命之互相支持问题进行笔谈。

是年　同盟会本部派荣炳回山西太原建立山西同盟会分会。1906年—1907年同盟会员续桐溪、王建基等在五台、崞县、忻县、定襄、宁武、繁峙、大同一带倡办学校，发展会员。辛亥革命时组织“忻宁代公团”革命武装，活动于晋北，与清军在雁门关大同一带作战。

外　交

1月13日　美国第三次以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照会各国。

2月10日　中国会同十五国续修通商进口税善后章程。

2月　俄军侵占新疆巴尔鲁克山地方，继续进兵喀什噶尔。

4月6日　中德订立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条款。

俄兵入踞吉林长春。

5月17日　中比订立直隶临城矿务局借款合同。

6月　俄军侵入伊犁，踰塔尔巴哈台岭，自科布多抵札萨克图与贝加尔湖侵入之另路俄军相合。驻俄使胡维德向俄交涉。

7月3日　中英订立河南道(口)清(代)铁路借款合同。

7月11日　外务部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如有关涉中国事件，须经中国应约方足为凭。

8月27日　外务部电出使美国大臣梁诚，通告美国政府，已禁止排斥美货，请速订华工条约。

8月　美国照会清政府商部，要求严禁抵制美货。

9月5日　日俄和约于美国朴茨茅斯签字，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之保护国，割库页岛之南半部，旅顺大连转租与日本，南满铁路并同地方附属一切权益，均无条件让与日本。

9月26日　外务部对日俄和约提出抗议(为满洲撤兵期限太长及沿路驻兵护路事)。

9月27日　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对华交涉(即迫清政府与之订立出卖东北权利条约)，决派小村寿太郎为全权大使。

9月28日　日、俄驻京公使照会外务部，声明两国业已签订和约，并定期从东三省撤兵。清廷宣布开放东三省。

10月12日　日本首相桂太郎与美国大资本家铁路大王哈利曼订立美日共同经营南满铁路草合同，日本允许哈利曼根据日本法律组织一银团，出资购买南满铁路及其附属设备(关于煤矿开采则另外组织一公司，亦由美日共同经营)。铁路经营权，由美日两国各享一半。(1906年1月15日，日政府恐美国因此取代日本在满洲地位，又电告哈里曼声明该草合同无效。)

11月2日　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即留学生取缔规则)。

11月7日，清廷命奕劻、瞿鸿禨、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日俄两国商议东三省条约。12日，日本全权大使小村寿太郎到京。17日，奕劻、瞿鸿禨、袁世凯与小村寿太郎

及日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北京开始会议东三省事宜条款。

11 月 13 日　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协约”，在朝鲜设置统监府。

11 月 23 日　日本宣布朝鲜受其保护。

11 月 28 日　中德胶高撤兵善后条款成立，德国将 1900 年派驻胶州高密军队撤回青岛。

12 月 1 日　中德青岛海关协定成立，德国交还海关。

12 月 3 日　清撤驻韩使臣，改置总领事。

12 月 22 日　《中日会谈东三省事宜条约》在北京签字。清政府承认俄国让与日本在南满之各项权利，开奉天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之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州里等十六处为商埠，安奉铁路仍由日本管理，以十五年为限，南满铁路护路军队将来日俄同时撤退。

12 月　日商大仓组与奉天官方订立合同，成立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资本四百万元(1913 年增加至七百万元)。

日本擅自建成安(丹东)奉(沈阳)军用轻便铁路。

经　济

7 月　姚京受等在大通创立之开源织布公司开机纺织。

9 月 25 日　第一家略具规模的华商近代航运企业大达轮船公司在上海开业。1904 年，张謇、汤寿潜、许鼎霖、刘锦藻、李厚祐等一批江浙著名士绅奏准创设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公司最初规划颇大，原议招集股本 100 万两，由创办人及认股股东分认 50 万两，再招募 50 万两，除在上海十六铺自设码头，购置轮船以外，并在南通天生港和海州设立商埠码头。但实际上仅招得 250 股，只有 2.5 万两。所有建筑码头、趸船等费用，主要靠从通崇海实业公司挪移，合计也只有 13 万余两。所用轮船开始只有“大生”一轮。直到 1907 年才在求新造船厂建造了一艘 204 吨的“大新”轮船。1908 年再添购 795 吨的“大安”和 549 吨的“大和”两艘轮船。4 艘轮船共计 1634 吨，航线由原来的上海到南通延长到扬州，略具一个中型轮船企业的规模。

10 月　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成立。由浙江全省铁路公司附设的银行独立而成。总行初设于杭州，1914 年迁至上海。主要经营工商业存放款、发行银行券、储蓄、外汇、仓库等业务。1935 年国民党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其发行银行券权被取消，改为向中国银行订立领券合同，实力大削。1952 年底与其他行庄合并改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10 月　株(州)萍(乡)铁路建成通车。

本年　清政府商部创设劝工陈列所，附设劝工场，亦称“劝业场”或“劝商场”，旧时陈列并且推销商品的一种百货商场。由政府或工商企业团体联合举办。此后全国各大城市大都设有此类商场。

本年　江浙绅商集议自办沪杭甬铁路。1898 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由英商承修包括沪杭甬铁路在内的 5 条中国铁路。同年 10 月，英国银公司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规定苏杭甬铁路由英国银公司修建。这个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没有报请清政府批准。江苏、浙江两省人民立即掀起了要求废除草约，集资商办的斗争。1903 年，浙江绅商即酝酿设立商办铁路公司。1905 年，他们在上海集议自办浙江全省铁路。1906 年 5 月，浙江集资已达 400 余万，并开工修筑杭州至嘉兴段铁路。江苏绅商亦于 1906 年 6 月组成以王清穆、张謇为首的江苏商办铁路公司。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大闹清外务部，要求下令停工。清政府采取妥协办法，将修路与借款分开，跟归江浙两省自建，款由英国贷给，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实际上路权仍归英国控制。江浙两省绅商学各界群起“力拒外款”，认捐集股自建。四川、陕西、广东、湖北、安徽、江西、云南、福建等省一致声援江浙两省人民的斗争，迫使盛宣怀将 150 万英镑借款，转归修筑开封至徐州铁路之用。沪杭甬铁路终于争得了商办。

本年　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创办了渔业公司、轮船有限公司等一批新企业。张謇是清末状元，但他没有沿着封建官僚的阶梯往上爬，而是弃官就商，走上了兴办实业的道路，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1895 年，张謇得到大封建官僚张之洞的支持，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1899 年开工生产，资本 70 万元。1901 年，为了扩大纱厂原料来源，他又创办了江苏通海垦牧公司，开垦海滩 12 万亩，广植棉花。1902 年，开办了南通广生油厂和大兴面粉厂。为了利用油厂的下脚料，1903 年创办了南通大隆油皂公司。为了解决运输问题，1904 年创办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为解决机器设备维修问题，又创办了南通资生铁冶厂。1905 年 5 月，集商股创办渔业公司，用新法捕鱼。同年 9 月 25 日，同汤寿潜等奏准创办上海、大连轮船有限公司。1907 年，在崇明北沙(今启东)创办大生纱厂二厂。此后，他以棉纺织为中心又创办了一些企业，到 1911 年，张謇创办的企业有 18 家，参加投资的企业有 9 家，共 27 家，这些企业的资本共 900 多万元。

本年　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在香港创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6 年在上海设厂，1919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有资本 1500 万元，分支机构遍设国内及东南亚各

大城市。1926年后，因受英美烟草公司压迫，业务衰退。1937年宋子文以广东银行透支买下该公司20万股股票。官僚资本趁机渗入，控制该企业。1951年国内各厂公私合营，1966年国营。

本年　户部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清政府最早设立的官办银行。1904年，户部参照各国银行章程，试办银行，作为统一币制的机关。由户部奏定《试办银行章程》32条。最初准备资本库平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每股库平银100两，户部认购一半，其余准官民认购。1905年由户部拨出库银50万两正式成立。1906年底，国股、商股相继缴足。总行设在北京。到光绪末年，在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张家口、奉天(今沈阳)、营口、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重庆设立9处分行。该行名为股份制，实际上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二重性质，既可经营收存出放款项，又可承领铸币、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为了扩大经营，又在南昌、杭州、开封、太原、长春、福州、广州、芜湖、长沙、西安、云南、南京等地增设分行。辛亥革命后，停业清理。1912年，北洋政府将其改组成中国银行。

文　教

2月23日　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该刊由邓实主编。旧历每月二十日发行，连续刊行7年，从未间断，从创刊到1912年初停刊，总计出82期，《国粹学报》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起过一定革命宣传作用的权威性国学刊物。它自始至终坚持以国学为阵地，宣传爱国、保种、存学。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陈去病、黄节、黄侃、马叙伦等，内容分社说、政篇、史篇、丛谈、撰录等栏目。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反对"醉心欧化"，载有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学等学术论文，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和图片，宣传反清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份具有进步意义的刊物。汇编本曾多次印行。

3月25日　《警钟日报》被查封。封禁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揭露德国侵略山东事件以及铁良南下的阴谋所致。《警钟日报》的前身是创刊于1903年12月15日的《俄事警闻》，由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对俄同志会创办，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抨击清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俄事警闻》于2月26日改名《警钟日报》，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除继续揭露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外，对英、法、德侵凌我国主权也同时抨击，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的不满。1905年，因该报载文揭露德国人在山东的密谋，德国领事与上海道袁树勋突然出票拘人，封禁了《警钟日报》。

3月28日　贵胄学堂开学。该学堂是清政府专门为宗室王公大臣满汉世爵等贵族子弟学习普通科学而开设的。1905年，练兵处兵部出使大臣梁诚奏请设贵胄学堂一所，令王公大臣子弟投考，入学习武，以振兴武备。学堂设于京师，隶于练兵处，称陆军贵胄学堂。学习课目有普通学术和陆军初级军事学，并组织到军队观览，学制5年。1907年，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奏设贵胄法政学堂，以造就贵胄法政通才。令宗室蒙古王公满汉世爵子弟曾习汉文者入学，亦准闲散宗室觉罗满汉二品以上大员子弟考取肄业。分正科和简易科，学制分别为4年和2年，先学习普通学，后专门学习法政。学堂还为已从仕之贵胄及满汉四品以上官员另设听讲科一班，专门讲授法政大义，一年半毕业。该学堂于辛亥革命后停办。

6月3日　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宣传"爱国主义"、"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主旨。由宋教仁主持，程家柽任总编辑。编辑和撰稿人有田桐、宋教仁、黄兴、白逾桓，陈天华、鲁鱼、仇式匡等。内容分图画、论说、学说、政治、历史、军事、理科、实业、丛录、文苑、时事、时评等栏。宣传爱国主义，鼓吹革命，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清思想。8月26日，第2期因登载蔡序东的《日本政客的支那经营谈》一文，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尚未发行即遭日本内务省没收，并加以"妨害安宁秩序"的罪名，勒令杂志停刊。同盟会成立后，在该杂志的基础上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

9月23日　大通学堂开学。1904年，军国民教育会暗杀部成员龚宝铨在上海组织暗杀团。后来蔡元培也参加，并在此基础上于同年11月成立光复会，主张以暗杀、暴动为手段进行革命。为了培训其成员，1905年9月，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城内创办大通学堂，全称"大通师范学堂"，推徐锡麟为监督，黄怡为校长。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进行短期的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培训革命骨干，内设体育、师范两科。设有国文、英文、日文、历史、舆地、理化等课程。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革命机关，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1907年2月，大通学堂改名大通体育学堂，举秋瑾为监督，成为浙江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主要中心。同年7月由秋瑾主持的浙江光复军起义失败后，遭清政府破坏，被迫停办。

9月27日　复旦大学在上海江湾设立。

11月26日　《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著名的刊物，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展开了论战，批驳改良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传播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对辛亥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民报》初定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第1斯以孙中山的名义发表的《发刊词》，

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发行后立即风行国内外，创刊号初印6000册，7次重版，以后各期也常常印四五版，销数达四五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最有影响的杂志。最初5期的主编为张继，实际上是胡汉民。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和宋教仁等；第6期起，主编为章炳麟；后来有几期因章炳麟有病，由张继、陶成章主编。1908年10月，出至第24期，被清政府通过日本政府下令禁止。1910年2月1日，汪精卫和胡汉民又在日本秘密印行了第25、26期合刊后停止，共出26期。《民报》为中国同盟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

11月　日本在大连创办《满洲日报》。

本年　由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在江苏通州（今南通）落成。它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附属于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目的在使学生"睹器而识其名，考文而知其物"，"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南通博物苑占地40亩，包括植物园和动物园，主要建筑有博物楼（即南馆）、测候所（即中馆）、化石馆（即北馆）。把博物馆办成普及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1914年，该苑编出《南通博物苑品目》，分天产、历史、美术、教育4部，共录品物2973号。天产部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历史部主要陈列文物；美术部收藏书画和绣品；教育部陈列"工业教育用具"的模型，有轮船、火车、蒸汽机、发电机、各种车床及农业机械等。

本年　美国教会之上海圣约翰大学正式成立。

军　事

5月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兵额近7万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聘德国人为教官，有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12月8日，荣禄决定改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接任后，将"定武军"进行扩编，加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凑足7000人；并陆续加聘德国译员至10余人。这支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袁世凯的新军扩充到1.7万人，成为清政府拱卫京城和支撑其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1901年11月，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又乘机将新军大加扩充。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以边防吃紧为由，建议在全国成立新军36镇。清廷同意后，他首先将原来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兵员，正式成立北洋军第一镇、第二镇，派王英楷、吴长纯（后由吴凤岭继任）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巡警营扩编为第三镇，派段祺瑞统制。1905年2—5月，袁世凯又将原来的武卫右军、南洋自强军编成北洋第四镇、第五镇，派王士珍、吴长纯分任统制。5月，"京旗常备军"也扩编成镇，以凤山为统制。至此，北洋新军六镇全部练成。

10月8日　清政府以举办巡警（警察）而设立巡警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于1902年5月在保定创办了警务学堂，训练巡警。1905年，在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的口号下，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调整，于10月8日设立了巡警部。置尚书及左、右侍郎各1人；左、右丞各1员；左、右参议各1员；巡警部分警政、警法、警保、警学、警务5个司，下设16科。凡京城内外工巡事务，皆归其管理。各省巡警亦归该部督办。1906年初，巡警部奏准将全国绿营一律改为巡警。同年11月7日，在清政府进行中央行政机构裁并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分设民政、警政、疆里、营缮、卫生5个司，直辖内外城巡警总厅、教养局、习艺所、巡警学堂、消防队等单位。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6年

导　言

一九〇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平静的年份，既没有太大的风潮，也没有过大的政争，一切都掩盖在一幅平静的状态下面，殊不知，在这难得的平静中，一股巨大的洪流始终在暗暗流动着……

打破这平静的气氛的，是萍、浏、醴大起义，这是依靠会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起义，事先同盟会虽有活动，但起事时并不是同盟会员首先发动的。同数次同盟会起义一样，又是因计划不周，仓促举义，最后自我先乱了阵脚，以至于溃散而终。

清政府还在变着法儿耍花招，继五大臣欧美归来，象模象样地上了一道"奏请立宪"的奏折，大谈君主立宪的好处。慈禧听说不触动皇权的威严，又可借一名头唬人，立刻颁布宣誓预备立宪诏，但预备期为九年，即终她之世是不会有政体改革了。

自从一八四〇年以来，鸦片二字即为国人之大不满的东西，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为了防止鸦片走私，清廷居然以毒攻毒，自己种起了鸦片，而这也可以堂而皇之地颁布《禁烟章程》，来和西方各国谈判禁止进口鸦片的问题了。英法等国的鸦片从此是越来越少了，中国自己的鸦片是越来越多了。

总之，一九〇六年不是一个被忽略的年代，尽管不是那种暴雨骤风般的洪流，但本年是清廷和革命派共同积蓄力量的时期，只是清廷没有料到，它所积聚的力量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萍、浏、醴起义

●预备立宪

●禁烟法令颁布

萍、浏、醴起义

背景介绍

1906 年春，长江流域洪水成灾，米价大涨，不少地区处于饥馑状态。因之，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作起义的准备。到长沙后，刘道一等数十人在水陆洲畔的船上集议。刘传达了黄兴的意见，主张“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为响应之”。他建议首先到萍乡、安源等地利用矿场组织机关，集合会党，同时，运动新军和巡防营。会后，与会者分头进行：刘道一留驻长沙，负责和总部联系，蔡绍南则前往江西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到达目的地后，蔡绍南得到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头目龚春台等取得了联系。龚春台，浏阳西北乡百家山人，农民成份，爆竹工人出身。“少不学，能以死生许人”。在清军中当过兵，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浏阳帮零工为生。经过龚春台、蔡绍南等的联系奔走，哥老会与另一个会党——武教师会决定联合，成立洪江会，公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在“大哥命令”之上，冠以“中华民国宗旨”，表明哥老会这一传统的帮会组织被灌输进了新的内容。忠孝仁义堂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等，称为内八堂，又设一至八路码头官，负责发展会员、联络、侦察等事，称外八堂。

洪江会成立后，贫苦农民和附近的安源矿工纷纷加入，组织迅速壮大。于是，龚春台、蔡绍南等开始策划起义。

材料：

- 起义爆发
- 起义失败

材料一　起义爆发

1906 年 7 月，蔡绍南在桐木、上栗市一带发表演说，动员革命，得到群众热烈响应。清朝官吏惊呼：“民心被惑，蚁附甚众。”同月，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距上栗市二十里的慧历寺密议，决定一面密造军火，一面联络洪福会的姜守旦，同时派蔡绍南、魏宗铨往日本，请示孙中山，要求接济军械，确定起义日期。

由于会员日众，人言庞杂，10 月 2 日（八月中秋）麻石酬神演戏，聚众万人，传说洪江会即将起义，引起清朝官吏警觉。10 月 7 日，清军突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追踪，投水而死。这时，蔡、魏二人行至上海，正拟东渡，听说麻石之变，立即赶回，决议于年底清吏封印时分三路起事。21 日，深受安源矿工拥戴的会党头目张折卿被捕，不久被杀。此后，萍乡东北萍实里，浏阳上东张陈坊一带，先后有会党聚集，准备开山祭旗，约期起义，均被清军驱散，首领被捕。12 月 3 日，当醴陵会众正在板杉铺、邓家渡赶制旗帜、号衣、刀矛的时候，清兵又前往捕拿了一人。

形势紧迫，当晚，龚春台、蔡绍南等在萍乡高家台集会，讨论起义问题。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认为军械不足，主张稍缓，码头官廖淑保等则认为会党有十余万人，完全可以和清军一决胜负。双方争论了一夜，没有结果，廖淑保便独自跑到麻石，召集二、三千人，举起“汉”字白旗，宣布起义。这样，就迫使龚春台、蔡绍南不得不通知各路同时发动。12 月 4 日，起义全面爆发。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人，龚春台为教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列举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称要“破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声言：未来社会的“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这一檄文表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部纲领，使起义具有和旧式农民起义截然不同的新色彩。

材料二　起义失败

十二月三日洪江会首领廖淑保在麻石集众二、三千人，高扬“汉”字旗帜，首先发难。四日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占领浏阳高家头、金刚头、萍乡县属高家台，十二月六日集合在麻石的义军二万余人向上栗市进发，清军望风而逃，慈化、桐木等处会党积极响应。起义军占领上栗市后，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魏宗铨任左右统领，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王朝卖国残民，“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并使“政治紊乱，民生涂炭”等十大罪状，主张“破除数千年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贫苦农民、安源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致使革命军“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蔓延数县之地。”在浏阳，起义军先后占领南街市、西乡、潭塘、高址等地；醴陵县的义军分三支，约有三千余人，声势浩大；萍乡安源煤矿工人约五千人积极响应起义，奔赴义旗之下。

清政府得到消息后，极为震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派出精锐军队镇压。

12月9日，张之洞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说：“萍矿及路已值银数百万。若成燎原，为患更大，不止矿路而已。”次日，军机处电饬张之洞、岑春蓂、吴重熹等，“赶紧分头剿捕”，迅速扑灭，毋任蔓延，致贻后患”。13日，端方派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步、炮、马、辎重各队新军二千余人赴赣。前后，清政府共派出五万余人。

起义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慌惧。德国、日本政府先后向清政府“问讯”，并派出军舰上驶岳州。据有关资料，当时在长江流域观察“动静”的英、美、俄、法、德、意各国军舰在二十三艘以上。。

面对全副新式武装的敌人，起义军英勇奋战。他们除从团防局夺获二、三千支枪以外，大多数用鸟枪、抬炮、木竿及旧式刀枪为武器。12月9日，起义军数十人手持扁担击败了清军百余人，夺获枪械多支。有个青年妇女名秀姑娘，甚至以空拳迎敌清兵。但是，由于仓促起事，缺乏统一领导，枪械又少，又始终困守萍、浏、醴三县，被清军四面围攻，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2月8日、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扑浏阳，均未得胜。12月10日，清军进攻上栗。起义军多以徒手肉搏，或以土枪射击。沈益古左手执锅盖，右手执大刀，在锋镝丛中出入冲杀，连斩清军十余名，终因没有应援，鏖战半日后 不支，上栗失守。12日，醴陵方面西路总统谭石基部被清军巡防营击败。同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往投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请援。中途，蔡绍南被捕，旋遇害。龚春台到达普迹市，冯乃古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不得已潜往长沙。1[illegible]之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illegible]入江西义宁。25日，清朝官吏捕杀了安源矿工首领萧克昌，在矿区设立巡警局，实行清查和连环保。1907年1月，姜守旦部被堵击，姜守旦逃亡。

萍、浏、醴起义失败了。

（摘自《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

预备立宪

背景介绍

1904年2月起，日俄战争爆发。在我国东北展开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灾祸，对当时政局，产生很大影响。改良派借此大做文章，宣传立宪致强，专制必亡。战争的每一重大演变，都曾成为改良派呼吁立宪 的现实鉴诫。

当战事发生不久日本即明显地占了上风的时候，保皇派的《中外日报》就发表论说，推测这场战争将是导致中国转向立宪的一大转机。它在1904年春发表的一篇题为《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的文章里指出：

“此战(指日俄战争——编者)之后，则天下之局殆将全改，数十年中，东西人士之所思议者，皆成往事，又有一新世界出矣。然此新世界必须日胜俄败，而后出现，若俄胜日败，则世界不能更新。今则日俄之胜败，其象渐分，而吾人之拟议，亦稍有起点矣。案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

这时，俄海陆军继续溃败，日本幸胜已成定局，国内外舆论一致地肯定这是立宪与不立宪的结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瞶矣。舆论既盛，朝议亦不能不与为转移。”

尤其是因沙皇政府专制暴戾、穷兵黩武而引起的1905年俄国革命，更让改良派借以编造了一套立宪已是刻不容缓的理论。他们说：“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改，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请，主者日多。”他们曲解俄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宣扬那是“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劝告朝廷上的王公大臣，要以俄国革命为鉴诫，如不及早立宪，就势必招致革命的危机。如同当时的一份报纸在《立宪法议》中大声疾呼地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 一日不息’。旨哉言乎！诚救时之良箴而渡世之宝筏也。”

正当俄国革命的消息频频传来之际，空前广阔的抵

制美货运动，在好些大中城市如火如荼地兴起；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越发迤逦起伏；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形活跃。于是，要求立宪的呼声，更显得普遍和迫切。如同当时一些报刊所形容的："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

材料：

- 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 五大臣出洋
- 仿行立宪
- 官制改革
- 回光返照

材料一　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日俄战争谁胜谁负，当时的人谁也料不准。结果小小日本战胜了庞然大物的沙俄，这个事在上层社会中间引起了莫大的研究兴趣。不少人认为这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工商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无不为此议论纷纷。政界人士在 1905 年谈立宪，就象十年前谈维新那样地兴致勃勃。看风使舵惯的，经历戊戌风浪"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现在却又换了一番言论。

立宪作为时髦名词在外使和藩臣中间也强烈地引起连锁反应。最先有驻法公使孙宝琦上本建议：利用日俄战争的机会，仿照英、德、日立宪政体之制，以团结民心，否则"外侮日逼，民心惊惧相顾，自铤而走险。危机一发，恐非宗社之福"。他还提出具体方案，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搞个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南方各总督中也有以立宪入奏的。慈禧面临这种局势，瞻前顾后，颇觉难堪。

湖南巡抚端方，原为"满洲三才子"之一，颇受太后赏识，此时来京述职。慈禧召见，得意地先问他："新政都一一举办了吧，再没有什么可办的了吧！"

"禀太后，还有一件。"端方跪着磕头。

"你且说来！"

"尚未立宪，下臣冒死上奏。"端方连连磕头。

西太后缺乏思想准备，勃然变色说："你怎么也说这个，嗯。"

"立宪能够永保我朝万代相传。"端方回答。

满员与汉员唱出了同一个调门，不能不引起老狐狸的重视，于是召见直隶总督袁世凯。

先是，张謇这个立宪派的积极活动家向张之洞游说，劝他出来首倡，并且愿意为他做起草工作。张之洞不敢轻率冒尖，要张謇"先商北洋"。张謇立即写信给袁，大做文章说："日本伊藤、坂垣（日本立宪党派的创始人）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王庇民之大绩。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这个激将法，据说颇起作用，袁世凯这个野心家，也许当个中国的伊藤博文还不顶过瘾吧！他给张的答复是："尚须缓以俟时。"过不多久，就发生了慈禧召见的事，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了，于是他把时下一般的看法，即"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的看法，先向太后反映；然后建议先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再看情况而定。

慈禧心动，即行召开御前会议，以日本宪法当样板来讨论。有位大臣忽然发现奇迹：日本宪法里只提府县，不象我国有督、抚这个名堂。于是大家着实热烈讨论了一阵，认为将来可以保留本国原有督、抚制写进宪法，但必须把督、抚职权缩小到与县府知事相仿，借以适应世界潮流云云。因为这一设想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西太后对此大感兴趣。消息透露后，本在观望中的张之洞、岑春煊纷纷上奏，统一口径，促致慈禧很快作出了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决定。对此最感兴奋的张謇，他写信向袁祝贺："自朝廷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维新主要功臣之一）。不用说，实际上这是在祝贺他自己的成功。

五大臣以载泽为首，包括端方。吴樾的一颗炸弹，把五大臣炸伤了两个，这样的欢送方式着实令人扫兴。慈禧惊魂甫定，把伤员徐世昌、绍英留下来，换上了李盛铎、尚其亨，按原计划分路出洋。

戏中有戏，骗剧中还有闹剧。五大臣尚未回国，即在中途分别奏报：立宪是"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保人民"的大好事。风声露布，引起了一帮人的反对，反对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民主革命派。有一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历数五大臣有六大错，并比拟"指鹿为马"的赵高欺蒙君上。一位御史指出立宪"有百害而无一利"。五大臣回国后一度几乎陷于孤立，闹腾了一个月，骗剧才正式开场。

台下的捧场人物资产阶级右翼张謇等人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一个个准备好袍笏登场。流亡日本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尤其兴高采烈，拥护谁，排斥谁，大政方针怎么定，闹做一堆。

1906 年以后，清廷全部政治设施，都在"预备立宪"的轨道上运行。不久前对康、梁的君主立宪还在屡屡斥为"肆其簧鼓"、"布散邪说"，是大逆不道的，现在却又捡起那些破烂货，唱起了"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的赞歌。这样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清廷自有一番苦衷，因为民主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扬，它不得不做一笔抛空买卖。

在海外奔走呼号了八年之久的保皇会人欢腾喜跃，康有为在报上发表文告，形容他们"从心所欲，天从人愿，大喜欲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他们猴急已

久,现在踌躇满志,眼巴巴等待着"弹冠相庆"了。这其实是一种不幸的误会,时髦差使有的是,可那来他们的分儿?能够分尝甜头的只有国内的立宪派。

(摘自《清王朝的覆灭》钱谷风)

材料二　五大臣出洋

出洋五大臣分成两伙,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伙,赴英、法、日、比诸国;戴鸿慈、端方为一伙,赴美、德、义(意)、奥诸国。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乘火车离京启行。

启程的那天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车水马龙,岗哨密布,朝官贵戚,前来送别。满腔仇愤的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炸毙五大臣,揭穿清廷立宪骗局。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突然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时死难;五大臣中载泽、绍英受轻伤。吴樾的炸弹,犹如春雷乍震,响起了人民抵制立宪丑剧的信号。

正阳门的炸弹,不啻是人民对清王朝假饰立宪骗局所发出的抗议。亲贵大臣惊魂略定,即改由李盛铎、尚其亨顶替徐世昌、绍英,仍凑足五人,分两伙于12月11日启行。

出洋的载泽等,纨袴子弟,庸碌官僚,懂得什么立宪。参赞随员,也多数是钻营得来,无非借此游览异国风光,并没把宪政放在心上。所以,当他们奉到出洋的谕旨后,一方面是张罗启行,一方面则暗中请几个擅长西学,通晓宪政的名流大家当枪手,撰拟各项立宪的奏议。梁启超就是出力最多的大枪手。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先生在给徐佛苏的一封信里,曾略言其事。"

当然,五大臣在国外跑了半年多,也并非全无收获,只是他们的收获不是如何切实施行宪政,而是怎样借立宪之名来稳定自身的统治。载泽等过日本时,伊藤博文亲自向他们讲演宪法,用日本的经验传授说:"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万不可旁落于臣民。"在谈到给予人民自由权利时,伊藤说:"此自由乃法律所定,出于政府之畀与,而非人民之可随意自由也。"这实际是教唆载泽等,完全可以假立宪之名去加强专制主义的统治。戴鸿慈、端方等到德国,于拜访亨利亲王时,亲王和王妃"因设宴府中,席次,亨利亲王为言:中国今日当注重练兵,尤在由皇帝以身倡之。练兵之道,不在于务远略,而在于保太平也。与前见德皇所言同意。"这番话说得很清楚:清王朝当务之急,还是练兵;而练兵又不是对外,而在于加强对内镇压,保所谓"太平"的局面。到俄国,沙皇前首相维特于会晤戴鸿慈、端方时,谈到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谓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戴鸿慈虽认为维特所说五十年准备为期太长,但对这位俄国前首相的见解仍表示佩服。后来,清统治者在立宪预备过程中是那样的拖沓敷衍,多少同维特这种不怀好意的捉弄有关。

1906年夏秋之交,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先后回国(李盛铎留欧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带着枪手们给他们拟好的答卷,上朝复命,向那拉氏、载湉奏请立宪。而载泽所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所举的三大利,可说是和盘托出了清统治集团内部那些主张立宪的王公大臣的心思。他在密折里写道: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另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仿行立宪

1906年8月27、28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八、九日)王公大臣们集会商议立宪。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出席了会议。会上,统治集团中的"立宪派"同守旧派展开了论争。守旧派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学部尚书荣庆、大学士孙家鼐,对立宪提出非难和怀疑。据《东方杂志》,《立宪纪闻》报道:"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有知也。故说者谓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等为首功,而庆王、袁制军等实左右之。"会后,诸王大臣于29日上殿面奏,请行宪政。

9月1日(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的要旨: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

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这道上谕发出后，在贵族官僚和立宪派人之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最为顽固腐朽的贵族官僚发表他们读了这道上谕的感想说：“此言也，此义也，实足令全国四万万人同声感泣者也！”在他们看来，这样一道没有期限，空泛无物的上谕，已经是朝廷对臣民的大恩大德，全国四万万人除了“同声感泣”而外，是决不应再有若何要求的。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四　官制改革

发布“仿行宪政”谕旨的次日，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的原则，颁出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并着除袁世凯之外的各总督派司道大员至京随同参议，而由奕劻、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于是，围绕这次改革，内外亲贵权臣展开了激烈的倾轧，而所谓“立宪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火并，尤为尖锐。

此时，得到那拉氏宠幸，买通了自总管太监李莲英以下的那拉氏亲随左右，买得了庆亲王奕劻信赖的袁世凯，野心勃勃，多方贿赂钻营，拉拢一些编纂大臣，把亲信党羽塞进为改革官制而设置的编制馆，并同外放两江总督的端方拉得很紧，企图通过此番改革，废去军机处，仿效君主立宪各国的体制，设立内阁，拥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而他则当上副总理大臣，一举取得左右朝政的大权。奕劻本是倾向于守旧的，但考虑到从首席军机大臣改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权势上并没多大变化；而且逢年过节，生日喜庆，得到袁世凯孝敬最多。因此，在编制改革方案时，他支持了袁世凯。

经过一个多月的编制、评议，官制改革的方案拟订出来。嗣由编纂大臣署名画押，送交总司核定的奕劻等人审核。经奕劻等核定上奏的方案，京朝官制的设置如下：

内阁　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

外务部　吏部　民政部　度支部　礼部　学部　陆海军部　法部　农工商部　邮传部　理藩部　各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不分满汉，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　大理寺改为大理院，都察院仍旧　增设资政院　审计院　军谘府

袁世凯在那拉氏面前得宠，本已招惹了不少王公贵戚的妒嫉，他那日见增长的权势，也已引起一些满族贵族的猜忌。而守旧派也不甘心袁世凯的计谋得逞。因此，与他竭尽全办从事钻营策划的同时，他的那些政敌也加紧活动。军机大臣瞿鸿禨，机诈权变，很能博取那拉氏的欢心，在军机处，奕劻都得让他三分，是袁世凯最难对付的敌手。此人早就同一部分亲贵声气相通，在那拉氏面前奏陈设立内阁的坏处，但外表却不露声色，跟着奕劻在奏折上署名签押。守旧派还怂恿御史赵炳麟上奏，称不制定宪法，不设置议院，而先组织内阁，其权限过重，易产生弊端。那拉氏压根儿没有一星半点立宪的诚意，自然对瞿鸿禨、赵炳麟等人的话听来很顺耳。11月6日（九月二十日）下道上谕说：“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这一来，袁世凯的算计落了空。

改革京朝官制后，又编制外省官制的改革。编制馆于外省官制改革提出了两层办法：第一层办法变动较大，寓有削减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第二层变动较小，着重在明定权限，以专责成。编纂大臣们将这两层办法电达各省后，陆续收到了复电。据当时人报道：“综各电观之，大抵主第二层办法者，多于第一层；主第二层办法而请缓行者，多于速行；以编制局两层办法为是，而以财力不足，程度未及为言者，尤居多数。”也就是说，它遭到了大多数督抚的消极抵制。因此，所谓外省官制，除了稍稍改变几个名称，裁并、增设几个机构，并在新设的东三省试行和直隶、江苏部分试行外，实际上是履行纸面上的例行公事而已。

（摘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

材料五　回光返照

油灯将尽时，有较强的火星一闪现，太阳在地平线下将要看不到时，天空中往往突然发亮；清廷将近灭亡的几年也发生类似回光反照的一刹那。革命人民一片“驱逐鞑虏”声中，清廷全不识得厉害，相反地在上层格外强烈地排斥和歧视汉籍官员，这是更加表演了它的愚蠢，加速其末日的降临。当然并不是说，它不这样做就能免于灭亡。

五大臣回国后，慈禧逼于形势，只好进行立宪的骗局，交付政务处会议。会议决定先成立资政院，再准备召开国会，行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一经内阁建成，军机处和原来大学士内阁一律裁撤。这个方案主要点之一，是取消军机处，代以责任内阁。

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是贪囊饭袋，办事全靠有“活档案”之称的瞿鸿禨。瞿为人机灵，此时单独求见太后，说：根据政务处这项拟议，“老佛爷从此不必为军国大事多操

心了”。为什么这样说，因军机处与内阁制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讨论问题，事先必须请旨定夺；后者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太后一听，猛吃一惊，立即令瞿拟旨，把政务处所议根本推翻。政务处一时弄得摸不着头脑。

太后越想越不对头，决定动手术。原来满汉官员分配名额，多数场合平分秋色，清初即成惯例。这番公布军机和各部尚书名单十三人，精神是“满汉不分”，消除界限，而具体人是“满八汉五”，名单中没有袁世凯，陆军尚书是铁良，徐世昌的军机大臣也开去了。

军机处拟出了一份《钦定宪法大纲》。大纲第一条这样写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死日临头，还没有忘掉“万世一系”那些调调儿。第二条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借立宪做个招牌，把绝对君权合法化、固定化了。这个大纲仅是预约，立宪要成为现实，时间定在九年以后。太后也想好了，自己已经七十四岁这样的规定，立宪 已是她身后事，好歹管不着，也就让它去了。她机关算尽，没算到几个月后她就永远失去了她的一切。

这里插一段关于瞿鸿禨的去处。由于上述出卖汉员的一幕戏，临死前的太后对瞿极度信任，某次太后谈话中表示对奕劻不满，有黜退意。瞿归而告其夫人，夫人告瞿的门生汪康年，汪办《京报》，转辗为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所知，当作事实在报上发表消息。后来追查出根子，太后责瞿泄密，下谕把这个军机处唯一的汉员开缺回籍。

太后临死前一天弄死了光绪，一手扶出了又一个儿皇帝溥仪。摄政王载沣是排汉的急先锋，为清亡前夕的回光返照添加了不少色彩。

载沣上台不到一个月，突然发表上谕：“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疴。”载沣要为亲兄弟（异母）光绪复仇，为什么不动手杀了他，据说因袁赖有后台英国公使朱尔典保镳。帝、后一死，袁自知大事不妙，即避往天津，托庇租界。经朱尔典来京斡旋，袁才敢返京收拾行装，谢恩辞行。载沣随即由三兄弟分掌军事大权，自己代理大元帅，载涛任训练大臣（还有铁良），载洵任筹办海军大臣。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一把抓，为他的儿子巩固君主政权，好不称心如意。

可是革命人民忍无可忍，国内立宪派也不答应这样的死硬做法。宣统元年，摄政王按照规定硬撑场面，下令中央成立资政院，各地成立谘议局，成员无非是当地士绅、富商和官吏，也有个把留学生参加。江苏谘议局议长即南通状元兼实业家张謇。他们不要革命，却要国会，而且不愿长时日地“拖”下去。张謇号召各省派代表集会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翌年有十六个省的请愿代表三次轰到北京，声言请愿不成，就要永远叩头上书请求，“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他们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革命力量的友军。谘议局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具有消失资产阶级革命性并加深妥协性的一面，也具有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

对那张远期支票也作了讨价还价，九年减为五年，从宣布预备立宪之日算起，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允许国会未成立前先厘订官制，设立内阁。

辛亥三月颁布官制，设立新闪阁，裁撤军机处和会议政务处。内阁总理大臣是前军机大臣奕劻，国务大臣共十三名，除徐世昌、梁敦彦、唐星崇、盛宣怀四人外，满籍达九人。历史上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继续反对，请求重新组阁。上谕斥责说：“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这是回光返照最强烈的一刹那。

（摘自《清朝史话》学林出版社）

禁烟法令颁布

背景介绍

禁烟运动可能是晚清改革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这场运动始于 1906 年底，到 1908 年底已见成效：国内鸦片的种植和消费量大幅度减少，并且获得英国逐渐停止进口鸦片的正式担保。考虑到其发生背景时，这些惊人成就就显得更加伟大。

1906 年 9 月禁烟法令颁布之前，中国对鸦片问题显然采取姑息态度，只是尽量减少它带来的麻烦。允许外国人向华输入鸦片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排除了北京禁毒的一切机会。就在 10 年前，一个英国皇家委员会批准继续这种贸易，这使得外国人主动放弃鸦片贸易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了。同时，中国的鸦片生产正方兴未艾。

1901 至 1906 年，满清政府通过与几个西方国家议定条约，进一步限制鸦片和吗啡的进口。这使得毒品贸易问题成为热点。然而，这些限制只是象征性的并不意味着外国对于鸦片贸易采取新的态度。如果清政府对鸦片贸易不加限制，它可以和地方督抚及各类要员一样从国内外鸦片生产的巨额税收中得到好处。确实，直到 1906 年，清政府不禁注意到，相对于暗淡的、赤字累累的财政预算而言，鸦片成为其少有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当禁毒的时机成熟时，清政府甘愿放弃鸦片带来的经济利益。1905 年，清廷得知英国正在考虑终止其日趋衰落的对华鸦片贸易，于是很快行动起来排除一切可能给禁烟造成障碍的因素。实际上，由于印度鸦片从中国市场退出，土烟很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英国要求中国对其根除鸦片的切实努力作出某些担保。为了减少英国人的担心，慈禧太后颁布了后世著名的法令，要求在 10 年之内禁绝鸦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一个多世纪的事情加以

反对最终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欧、美的禁烟倡导者动员舆论工具，宣传鸦片贸易是不人道的。其后果是有害的、倒退的。他们的主张在伦敦、华盛顿等决策中心博得了同情。此外，印度鸦片贸易中经济利润的减少加快了中国实禁烟改革的步伐，当局以此炫耀它所允诺的"进步"。更明确地说，这场运动为北京控制国内鸦片税收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在此之前，那些地方税收官吏从中大捞油水。继续进一步控制土烟生产是减少洋烟进口的保证。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1907 年，英国同意根据中国禁绝国内鸦片的相应情况至 1917 年逐步停止鸦片贸易。

禁烟章程阐述了清朝对生产和吸食鸦片的道德义愤，详细说明了处置这个问题的办法，要求人们严格遵守。为限制鸦片种植，未曾种植鸦片的土地今后不得种植；现已种植鸦片的土地必须如实登记。种植田亩每年得减少 1/9，并委派地方官巡查，如有违犯者则将土地充公以示惩罚。在规定的期限前停止种植鸦片者将给予特殊奖励。

另外，对已注册烟民建立牌照制度，以杜绝新的烟民出现。地方官负责查清管区内烟民的情况，备有表格，让烟民自行填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和每日吸烟数量"。这些资料将呈送省级官员，然后发给牌照，允许烟民购买鸦片。无牌照购买鸦片者予以惩罚。60 岁以下的烟民应领取乙号牌照，迫使他们的"吸食数量应每年递减二三成，几年内一律戒断"。

戒断鸦片的人，取具族邻保结，由地方官署呈明，他们的姓名即从所在区烟民册内注销。对于没有按年减少吸食的烟民，将有以下处罚：

平民均注名烟籍，由该州县分别各立一册，仍申报上司衙门存案，并将姓名年岁榜示通衢及此项吸户人等所居之城乡市镇，俾众周知。凡该处绅耆岁时会集及一切名誉之事均不准与，示不齿于齐民之列。

章程的最后部分注意到停止洋烟进口问题。已饬令外务部"与英国使臣妥商办法，总期数年内洋药与土药逐年递减，届期同时禁绝"(按照中国法令)。同时，外务部将与有权向华输出鸦片的其它各国商定类似条约。这可使英国的市场免遭其它列强侵占。至于不享有条约权利的主要进口国之一的波斯，中国"可施行我国自治法权严禁进口"。

禁烟法令和章程中包含的国内改革和民族主义二重主题很快引起其他上层官僚的反响。云贵总督锡良就是这样的例子。云贵两省鸦片的种植之广，产量之多仅次于四川。在 1907 年 3 月的一份奏折中，他向皇帝提出，除非铲除烟祸，中国社会不可能复兴，国家不可能摆脱外人的束缚。他说："窃以为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烈火……其危害之悲惨超过战争……"他继续指出，鸦片毁坏无数国人的身体，其势终将败坏国家：

数十年来国家日形衰弱，洋人无礼益甚，其因在于民气未起；而民气和民力转弱无非在于鸦片之害。

新兴的禁烟运动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已使整个西方，尤其是英国相信中国真诚地打算禁止国内的鸦片生产。正如《字林星期周刊》的一篇重要文章所指出的："尽管对发布严厉的禁烟章程有种种怀疑，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全国反对鸦片的情绪正在增长，禁烟运动具有爱国特征。"义和团运动和最近的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都使列强注意到中国不再是一个驯服的、笨拙的巨人。鸦片问题是否会激起中国爆发另一场排外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英开始协商减少直至最终停止中印鸦片贸易的问题。

(摘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

历史内幕

陆军部收回六镇内幕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回国，主张立宪，首先厘定官制，在海淀朗润园编纂。是时外省督抚到京参与者，惟袁世凯一人。那些充编纂的大臣，多守沉默，惟袁独有主张，他最坚持废除军机处，改组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一般人揣摩说：他的用意，此总理一席自属奕劻，他就可以凭借奕劻势力，为所欲为，异日奕劻去位，似乎也留下自己的地步)。北京亲贵骤然看见袁这样作风，便以为他的气焰凌人。据袁与兄世勋书云："本月初六奉诏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闪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王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弟云：'此乃君主立宪国之法制，非余信心妄议也。'振贝子亦云，他曾出洋考察立宪国，政治井然，皆由内阁负责任所致。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云(载沣不配有此作风，或是故甚其词)。就此罢议而散，弟即匆匆反津"(《项城书札择抄》)。此时亲贵对袁都侧目而视，所以他不等官制拟完，就被排挤回天津

去了，连他带来的随员如张一麟、金邦平等也站不住，不由得不悄悄的跑走了。袁出京后，官制草案，军机处改内阁，总理大臣一人，添副大臣二人，交到考察政治馆总司核定的王大臣审核。其时馆中设有提调为宝熙、刘若曾，军机大臣不常来馆，提调主持馆务。我是该馆馆员，这项官制草案，叫我整理并拟折稿，由瞿鸿禨改定具奏。大家都以军机处要废止，总理和副大臣要设立了。九月二十日谕："军机处为行政总汇……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据说，这是鸿瞿鸿禨揣测西太后意旨于独对时决定的。军机处只留奕劻、瞿鸿禨，袁党的荣庆、徐世昌等均出军机。瞿又援引林绍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可说是这时枢要的势力在瞿鸿禨，而袁世凯势力顿减。

官制宣布，与袁世凯有重大关系的为北洋六镇。其时兵部改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所有他在练兵处招致士官学生，纷纷带到陆军部。铁良虽曾经袁奏保他为京旗翼长（第一镇），他们的满汉界限，不是一个保奏就能消除的，而且他是拿士官派做班底，那能与北洋的武备派相容？于是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来收回北洋六镇。那些年轻的亲贵们，都以为时机到了。袁世凯亦自惴惴，所以有陆军各镇分别归部归直的陈奏，现摘录如下：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袁世凯奏：

查陆军第一镇，系臣会同尚书臣铁良督率训练，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镇，系专由臣督练。现铁良已补授陆军部尚书，第一镇本系京旗兵丁，应归部臣专管。第三镇驻扎保定府暨奉天锦州府一带，第五镇驻扎山东济南府暨潍县一带，第六镇宿卫宫门并驻扎南苑、海淀一带，现在未设统制，各该镇均拟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无庸由臣督练。第二镇驻扎永平府暨附近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府附近之马厂小站一带，值此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

得旨：所有第二、第四两镇，着暂由该督调遣训练（宣统二年十月，直督陈夔龙奏：二、四两镇移交陆军部）。

同时又奏：

臣所兼各差，如参预政务，为新定各部尚书之职衔，与各国之国务大臣居中任事者相类，臣忝为外僚，未宜兼任。如会办练兵事务，及办理京旗练兵等差，现在陆军部业经设立，以练兵处并入，军政所汇，责有攸归，臣可毋庸分任。如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各差，现在邮传部亦经建设，电务路务，均应隶属该部，自无须臣督率经理。如会议商约一差，现在英美日本等国商约，均已议定，嗣后有辙可循，亦无须臣再参末议。以上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以上《养寿园奏议辑要》四十二页）。

得旨：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

三十三年三月谕："奕劻着管理陆军部事务。"人多不解其原因何在。据军机处领班章京华世奎言："自陆军部成立，收回北洋军队，部省摩擦日甚。袁督虽出第一、三、五、六四镇，而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自非旧派所能甘服。事为宫禁所闻，故有此谕。谕中并有'徇私偏执，一并严惩'之语。太后于袁督本来倚重，其命庆邸管理陆军部者，盖以调处两者之间，不致酿成事故也。"

（张国淦《北洋军阀之盛衰及消灭》）

赫德的不满

亲爱的莫理循：

希望你作到未雨绸缪。

那一道敕令是令人沮丧的，但是处在这种场合，需要冷静而不是发火。有些人说我应该反对它，另一些人劝我辞职立刻离开，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应该拒绝去拜访铁良。但是在我这方面，我认为最好是先考虑一下我处于什么地位，我采取什么立场以及〔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或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或是根据形势作出特殊安排。如果事情还是照老样子进行，只是多了两个新上司，那还不至于马上出现什么害处，尽管事实上最后它可能是一些新秩序的开端，然而这是早晚一定会来到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希望这种外国监督制度永久继续下去。中国报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件事。我刚才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收回或恢复比较周密的管理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也会引起忧虑，因为它会使关税收入一直增加的地方变得减少，结果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岁入等等。

这道敕令在多大程度上不符合以前的承诺：海关总税务司必须是英国人，保持关税不变作为借款担保，或和平议定书上所列各项条款——那是由旁人去决定或采取行动的事。此外，同意在九龙、拱北和胶州由总税务司监督设立海关的那些人，也许对敕令中提出的这样的变动有些反对意见。

我写这封信时，恰好外务部送来公文急件转达敕令对我海关工作的指导和通知，但是没有细节、解释和指示。

至于贷款偿还问题等等，只是税收减少可能会使他们遇到困难，或者造成拖欠和延期付款。税款向中国人办的海关银行交纳，这你是知道的，虽然在租借地上征收各种货物税，数字准确，按时征收，但税款不由租借地银库保管，最后交给外国银行偿还借款等等，这全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诚实可信，这种诚实可信从来没有被怀疑过。而且在偿还债款问题上，由赫德另加铁（良）和唐（绍仪）两

人，或者只有赫德一人没有其他两人，工作都做得一样好。这一新闻大概会使中国的股票下跌，但这不会是、也不可能一直跌下去。总之，不制造这样一场危机，也许会更尽善尽美。从当前情况看，这道敕令也许是无关痛痒的，也许是有害的。

我希望这一解释对你观察形势将会有些帮助。至于示威行动眼下并无可能，过一段时间再示威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在本来靠武力能够顺利推行很多不合意的事情的地方，还会激起反示威行动。有这样一道敕令作铁、唐两人的后盾，他们确实可以完全放手去干，但是公使馆的干涉，无论是抗议还是劝告，可以让外务部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在他们的路上还有他们没有估计到的困难。

你诚挚的罗·赫德

附言：由于列强的政策不同，采取联合行动大概不大可能，而任何国家单独表示不满，又显得软弱无力。我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于今天的会见。不过，敕令如今已经公布了，我总会赞同有朝一日平静地对待这种不可避免的调整和安排。但是这个机构当然是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我对于在改变了前景的机构中服务的每个成员的被伤害感情，表示同情。

（摘自《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

历 史 考 证

同盟会和萍、浏、醴起义军关系考证

这次起义的主要队伍虽然是民间的秘密结社——会党，但作为这次起义的思想、政治指导者却是同盟会会员，首先是刘道一和蔡绍南。他们两人不只是积极地策划和参与起义的实际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向起义群众宣传了同盟会的政纲，灌输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刘道一与蔡绍南回国时，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实际负责人黄兴曾经指示他们说："今日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因此，当他们回湖南后，便"向会党反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还得念诵下列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入会后则发票布作为会员凭证，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书"忠孝仁义堂"，右注第×路第×号，中书会员姓名。票底另有七绝诗一首："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举义以后，部众所执的旗帜也并不是统一的，有的书"汉命"，有的则书"洪命"。龚春台在其檄文中虽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但对内部，却又往往采用"洪命督办民主自志社会总统全军谢"（按：龚春台本名谢再兴）的衔号。所有这些，均表明洪江会起义军虽然受着同盟会的思想、政治影响，但这种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同盟会对这次起义的影响的有限性，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军身上。洪福会军在所发布的起义檄文中，表示拥护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建立新中华大帝国，并将起义军定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檄文明白宣布："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报酬。"并且强调说："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犹当仰天三呼万岁"。这些，充分表明了他们没有接受同盟会的纲领，而只是一种单纯的种族复仇主义与旧式的农民起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同盟会所给与的复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王争帝"。结果，"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

最集中、最鲜明地表现同盟会对这次起义的思想、政治影响的，是洪江会军事领袖龚春台发布的起义檄文。在檄文中，龚春台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并指出这次"兴师"是"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以表明他们愿意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檄文的内容，除了强调反满以外，特别明确宣布："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在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显而易见，檄文所表述的斗争纲领，在思想内容上，是与同盟会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完全一致的。这正表明了同盟会对起义军的思想、政治领导。

洪江会军是这次起义的首义军与主力军，它的檄文

既然在思想上、纲领上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就决定了这次起义已不同于一般的单纯的农民起义与会党暴动，它带有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成了同盟会领导下的全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但是必须指出，这支起义军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传习已深的封建观念（特别是忠孝观念）与落后的组织形式。入会者须饮雄鸡血酒宣誓，虽然这次起义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思想、政治影响和同盟会会员参加领导，使得这次起义带有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成为同盟会所领导的全国资产阶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同盟会的政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并没有被所有的起义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又使这次起义队伍不能统一和组织形式落后。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革命发动所必然带来的特点。

这次起义表明，在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对下层群众首先是农民的思想政治影响开始加强，农民开始被卷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漩涡，充当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备军。从此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愈益迅速地向前发展起来。

在这次起义中引人注意的是，萍乡地区数千矿工的参加起义与安源矿工援救袁兰亭的斗争。矿工的群众性发动，给予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年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斗争性与巨大威力。虽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中国工人的武装发动并不是从这次起义开始的，然而，作为有组织的，有纲领的、政治斗争的武装发动来说，这次起义却还是第一次。

萍、浏、醴起义虽然在清廷的镇压下失败了，然而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在萍、浏、醴起义以后，同盟会更加强了在国内的活动，接二连三地掀起革命大起义；而萍、浏、醴地区则一直成为湖南、江西革命的温床，该地区的会党与矿工群众也一直是湖南、江西革命党人活动的主要群众基础。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留下了深厚的革命影响，大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年以后，清朝统治者终于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覆灭了。萍、浏、醴地区革命群众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

风云人物

禹之谟

禹之谟，字稽亭，1867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青树坪。“少任侠，工书法，能文章”。喜爱研读王船山遗著和流览各种小说。

禹20岁，投奔南京某军作文书，不久提任运动粮秩事务。甲午中日之役，“君愤土气之役，投笔从戎”，襄办由山东、天津等地向辽东转途粮秩弹药，“经敌垒，冒重围，卒完所事”。以县主薄候选，然禹见“国事日非”坚辞不受，回归上海，专究新猷，学习实业。百日维新前夕，禹回长沙与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等接触，“力图革命”，同情变法。六君子遇难时，禹甚感悲愤，并认识到“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

庚子秋，禹参加唐才常在汉口的自立军活动，事败，被迫东渡日本。在日本结识了许多留日爱国学生。曾在大板千代田各工场学习纺织。1902年春，接父病危电回湘乡省亲。丧事毕，于湘潭设毛巾厂，后迁移长沙，附设工校。禹与生徒同甘苦，整理机织，谋求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理想。

1904年，禹加入华兴会，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禹是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之一，并介绍许多人入会。

禹通过湖南商会积极推动了抵制美货运动。领导了湘铁路废约改归商办的运动。创办了“湘乡旅省中学堂“和”唯一学堂”被湖南教育会和商会公举为会长。

1906年夏，殉国烈士陈天华、姚宏业归榇湖南，禹主张公葬于岳麓，“以表崇报”，禹视清吏禁令于不顾，“约全体学生衣白色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一时“民气伸张，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禹为营救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学生，利用俞诰庆（长善学务处总督）狎妓嫖娼之事，迫使俞答应释放被捕学生，因而开罪于俞，俞怀恨，寻机报复。

不久，湘乡土子反对盐商浮收，禹认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额，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额，移充办学，免入私囊。”湘乡知事陶福据此上报，清抚为报私怨，以“哄堂塞署”之罪捕禹，有人曾劝之躲避，禹执不可，“吾辈作事，死，义也。列邦改政，孰不流血，吾当为先道”。终于8月10日被捕入狱。

禹被捕入狱消息传出，湖南商、学界纷纷营救，为禹申辨者，日数十起。庞鸿书、庄赓良“格于清议”，将禹监至常德，判处永远监禁，后又移至靖州，湖南巡抚借杀禹立威，酷吏清州知州金蓉镜欲杀禹以媚上官，对禹用尽极刑，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未能使禹屈服。他在致同胞

遗书中说："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其毋奴隶其心而生！"不久，萍浏醴起义，岑、庄急电金将禹处决，1907年1月5日，禹之谟被绞死。

（摘自《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蔡 绍 南

蔡绍南(1875——1907)，谱名蔡源俊。江西萍乡鸡冠山高田人。父蔡永泉以务农为业。绍南幼年入私塾，天资聪颖，少时应考为该地童生。稍长，身强体健，多才善辩，与同乡魏宗铨极相友善，两人经常在一起"盱衡当时，探讨时务"，思想为之一变，遂弃科举仕途，赴湘入新式学堂。嗣又毅然东渡日本，结识黄兴等人，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蔡绍南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翌年夏，受本部派遣，偕刘道一、彭邦栋、覃振、彭邦杰等人回国策动反清革命。蔡绍南与刘道一回长沙途次，曾化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栗市一带调查哥老会情况，"并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返长沙后，蔡绍南又积极协助刘道一开展革命活动，曾约集革命志士蒋翊武、龚春台、刘承烈等三十八人在长沙水陆洲秘密聚会。会上，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并根据他和蔡绍南调查的情况，确定了萍浏醴起义的策略方针和具体步骤，约定旧历年底乘清吏封印时举义，与会者咸表赞同。随即进行了具体分工，蔡绍南分回萍乡原籍继续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其时，蔡绍南的小同乡，老朋友魏宗铨已先期因父丧从明德学堂返回故里，与友人许学生等在上栗市一带开展活动，蔡绍南便与魏宗铨取得联系，并以魏宗铨之兄魏宗铭在上栗市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据萍乡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军管带胡应龙向赣抚吴重熹报称：蔡在上栗市、桐木市一带"到处演说"革命，"蚁附甚众"，"作用非常"。他并在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一带策动过当地会众起事，被该州当局"拿获，押赴湘省"，途中逃逸。旋潜返上栗市，时胡友棠在上栗市设馆授徒，相与叙谈，甚相契合，遂"结为挚友"。原来，萍浏醴一带会党各派山堂林立，互不统属，蔡绍南便与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共同商议，在萍乡蕉园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以延道士替亡故友人作冥寿为名，约集各处哥老会首领肖克昌、沈益古、邓廷保和武教师会首领龙人杰、饶有寿、万木匠等共百余人，举行开山堂大典，即以湘、鄂、赣、闽几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派系和武教师会等并入，歃血拜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机关，以备驱策"，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分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号召同志入会。另在麻石设立活动机关，"全胜纸笔店"为接待会友和筹划经济之所。布置就绪，各路码头官分境开堂散票，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蕉园会议是继长沙水陆洲会议之后一次重要的组织工作会议，大体上使得分立的会党各派，开始趋于统一，基本上纳入同盟会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范畴。自此，洪江会"发展之速，一日千里，不数月间，已蔓延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数县"。常驻麻石大本营的会友就达二三千人。同年六月(7月)，蔡绍南又与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在萍乡弹子坑慧历寺召开会议，着重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决定，由蔡绍南、魏宗铨往沪、港、粤联合各地革命机关，"并往日本谒中山先生，报告经过，要求接济新式军械，请示举义日期"。会后，蔡绍南和魏宗铨遂将公务交龚春台、李金奇、许学生代理，旋由湘转沪。甫至沪上，适遇宁调元、李发根(即李发群)等，蔡绍南即详述萍浏醴会党情形，并告拟由港、粤再渡东京之意。正整装待发，忽闻麻石事变发生，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清军追捕至醴陵白兔潭殉难，龚春台急电蔡、魏，促返湘商议。蔡绍南即将前往东京联络的任务交李发根办理，遂偕宁调元结伴折返，商议各负一方责任，仍相约旧历年底举事。军分三路，一据浏阳，醴陵攻略长沙；一路取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据万载、宜春东出瑞州(今高安县)、南昌进取江南。布置就绪后，蔡、魏、宁三人分头联络。九月重阳节(10月26日)会众千余人在上栗市栗江书院为李金奇建醮慰灵，会党头目许学生被清兵拿去解往萍城杀害，慧历寺总机关亦被查抄，形势急转直下，武装起义已如箭在弦。

十月二十三日(12月8日)，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率起义大军攻占浏阳文家市，并在文家市团防局整军誓师，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向浏阳县城进发。左路军由蔡绍南统率，经澄潭江到达枫林铺，长驱直入；右路军由龚、魏等人率领，经大圣庙，由吾田市，至枫林铺，与蔡绍南统率的左路军会师，向浏阳城逼进，在牛石岭、南流桥与清军大战，沿途来归者颇众。大军直抵浏阳城南的南市街，与清军巡防队梁国桢部相遇，交战失利，义军退走牛石岭，梁军复追至枫林铺。因天色已晚，梁军回驻浏城市南市街，义军乘机尾追，将梁部包围并重创之。梁军得徐振岱军增援才得以退回浏阳城内，义军遂复踞南市街。十月二十六日(12月11日)，清军乘夜突袭，义军猝未及备，再次退走牛石岭，以致败绩，邓廷保等人死难。蔡绍南、龚春台遁走，往投尚未发动的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不料，冯乃古却甫遭清军诱杀。清吏正悬重赏缉捕义军首领，风声吃紧。为避清吏耳目，蔡绍南化名蔡立山，只身逃往长沙，经湖南至广西昭平避难，以教书、看相、测地理风

水为掩护，栖息昭平，力图再起；曾收叶万芬为徒。旋病故，葬昭平牛形山。

（摘自罗明主编《清代人物传稿》）

龚春台

龚春台（？—1912），原名谢再兴，亦作醉英，又名章年、张章年，号月楼。湖南浏阳人（亦说湘潭人）。爆竹工人出身。"少不学，能以死生许人"。"曾为清弁，向志革命"。由于平时"好气使酒"，"轻财喜交游"，遂入哥老会，逐渐成为当地哥老会首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事，龚春台曾帮助唐发放"富有票"，湘省的会党首领，多被其"招致入党"。起事失败，龚春台的活动因未被当局发觉而幸免于难，遂继续潜伏在浏阳一带，以做零工为生。马福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遭杀害后，龚春台承袭其位，被萍、浏、醴一带的会众推为洪江会首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刘道一约集同志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秘密集会，策划起义。龚春台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委派担任"布署会党"的工作。会后，龚春台来到萍乡上栗市，在蔡绍南、魏宗铨的帮助下，约集萍、浏、醴一带哥老会首领肖克昌、李金奇和武教师会首领廖叔保、龙人杰、万木匠、饶有寿等百余人，在萍乡蕉园秘密集会，以延道士替亡故的友人作冥寿为名，举行开山堂大典、歃血拜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使会党各派统一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六龙山洪江会"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分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　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各司职务。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号召同志入会。下则红旗、跑风各职"。另在萍、浏、醴毗连的麻石设活动机关，以魏宗铨原在上栗市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接待会友和筹划经费的机构。布置就绪，各路码头官分境开堂散票。入会者先由红旗介绍，告码头官许可，再由码头官监视行入会礼，即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云："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自此，洪江会"发展之速，一日千里。不数月间，已蔓延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数县"。该会设在萍乡麻石的机关，"为会党之大本营，常驻会友二、三千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龚春台与蔡绍南、魏宗铨等在萍乡上栗市附近的慧历寺召集各路码头官会议，筹划起义事项，并以慧历寺为活动总机关。由此，山深箐密、古老幽静的慧历寺立刻变得沸腾起来，"每晚集合会友数千人，日间散去，所有会内事务及会友犯罪惩处，均就内处理。每夜传堂，常有会友自百余里外来者"。这次会议决定，命余为璜、邓坤在高家台密造火药、军械；魏宗铨司钱库，与其兄宗铭急筹备五千金，以备购买军械火药原料；胡友堂、邓廷保联络浏阳哥老会首领冯乃古以及洪福会首姜守旦等；又议派魏宗铨、蔡绍南往沪、港、粤联合各地革命机关，"并往日本谒中山先生，报告经过，要求接济新式军械，请示举义日期。"

龚春台在占领上栗市以后，命沈益古、龙人杰等部留守，于十月二十二日（12月7日）深夜偕蔡绍南、魏宗铨率领起义主力从上栗市出发，挺进浏阳县城。翌日，义军在浏阳县城南十余里与清军接仗，打得敌人疲于奔命，清军增援后，双方又激战三小时，仍不分胜负。入夜时分，义军又往攻城，因武器窳劣而未能取胜。二十五日（12月10日），清军攻陷上栗市，沈益古、龙人杰等战死，大股清军进入萍乡。二十六日（12月11日），龚春台再攻浏阳失利，加以起义军火药库中弹爆炸，弹尽粮绝，卒至溃败。龚春台"乃乘肩舆，障以绣幕遁去"，潜往长沙，"清军大索而不得，人莫知所往"。蔡绍南被捕殉难，魏宗铨潜往上栗市，后亦被害，刘道一在长沙慨就义，起义群众被杀者逾万人。至此，轰轰烈烈的萍、浏、醴起义因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告失败。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首先响应。"龚春台率死士数百人从，自称北伐义军……至江宁，南北议和成，春台归自汉口，疾作，，呕血数升死"。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魏宗铨

魏宗铨（？—1907），字月辉，江西萍乡人。世居萍乡上栗市桦溪，因继承先人遗产，富甲一乡。宗铨五岁丧父，"随母依世父德照"。稍长，"性喜研究新学，年十九，世父命应试，不欲。"其时，湖南开风气之先，他屡"请赴湘求学，世父不允"，遂负气离家，"日与蔡绍南、邓坤、李金奇等盱衡当世，探讨时务。"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魏宗铨得到母亲的支持，赴湘求学，入长沙明德学堂，结识黄兴、宁调元、禹之谟等，由于醉心革命。华兴会筹划长沙起义时，魏宗铨曾请命回原籍响应，因事泄未果。

翌年（1905年）春，魏宗铨因父丧返里，邀其友许学生、龚春台同往萍乡，并出资三千元在上栗市开设"全胜纸笔店"，由其兄魏宗铭出面主持，借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湖南之醴陵、浏阳，江西之萍乡、万载等县向为湘赣两省哥老会党聚会之渊薮"，适马福益方遇害于长沙，"其属誓复仇，益倾向革命党，继续图大举"但是，会党各派山堂林立，互不统属，无法联合。当时，萍、浏、醴一带会

党有三股较大的势力：一是以龚春台、李金奇、肖克昌为首的洪江会，各拥众数千人；二是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有徒众数千人；三是以龙人杰、廖叔保、饶有寿、万木匠、沈益古为首的武教师会，各拥众数百人。但这三派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魏宗铨与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蔡绍南一道，协助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在萍乡蕉园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以延道士替亡故的友人作冥寿为掩饰，约集萍浏醴一带哥老会首领和武教师会首领共百余人，举行开山堂大典，即以在湘、鄂、赣、闽几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派系和武教师会等并入，统称六龙山洪江会，“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推龚春台为“大哥”，在麻石设活动机关，以魏宗铨原在上栗市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招待会友及筹划经济之所。编就各项组织机构，分头开堂散票入会者极踊跃。

十月二十二日（12月7日）深夜，魏宗铨随龚春台、蔡绍南率起义主力攻打浏阳县城。清军乘虚来袭，据守上栗市的沈益古、龙人杰等战死。浏阳义军初战告捷，但终因军械窳劣，面对不断增援的清军，“除鼓噪外，别无防堵之方”，卒至溃败。龚春台乘隙出走，蔡绍南被俘牺牲。魏宗铨仍合各路中坚廖叔保、胡友堂、饶有寿等“设法保持过去之组织，以图后效，仍潜返上栗市”。时清廷已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兵力分驻萍、浏、醴各城镇乡村，合力围剿。各处会党在魏宗铨等人的领导下，先后“与密集的清军战斗四十余次”，廖叔保、胡友堂及大小会党头目数十人英勇牺牲。魏宗铨不得不与其兄宗铭藏匿于萍乡大凹口姨母家的土室中。

清廷为了扑灭起义余众，恢复其统治秩序，又颁布清乡章程，谕令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等县，“同时并举，各清各乡”，“历三阅月，而清乡始竣”。其间，悬赏五百金购宗铨首级。清军统领袁坦以巡防勇二哨突然包围魏宗铨住宅，将其财物洗劫一空，并命人将其族长捆绑，逼令交出宗铨兄弟。族长无奈，只得将宗铨母魏刘氏交出，母被逼气绝。宗铨兄弟闻母死家破，决计出走，遂星夜离开姨母家，沿山路道出醴陵，拟赴湘、鄂，嗣转沪、港，不幸在醴陵西乡之邓家店为清军捕获，转解萍乡县署，严刑拷打，皮肉俱裂。宗铨坚贞不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1907年3月7日）英勇就义于萍乡县城大西门外。宗铨妻刘氏闻夫被执，即奔赴县署求见，不许，嗣于宗铨就义时，呕血数升，死于宗铨尸旁，惨不忍睹。魏宗铭被判处终身禁锢，辛亥光复时，始得出狱。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道一

刘道一（1884—1906），字炳生。祖籍湖南衡山，父刘方尧迁居湘潭。刘道一聪慧异常，五、六岁读孟子，就能朗朗成诵。稍长，“入美人凌霄志学校，习英语”。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并受其兄揆一的影响，逐步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尝读《汉书·朱虚候传》，读至“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二语，遂以“锄非子”为号。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正式成立华兴会，刘道一随兄加入，“以秘密结社为着手之方法，浪迹江湖，物色豪杰”。并受黄兴派遣，偕会党成员万武前往湘潭，激劝马福益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其时，马福益拥众逾万，雄据一方，见到刘、万二人，“深表轻慢”。刘道一不亢不卑，晓以革命大义，向他尖锐提出：“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集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集点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的招抚，别开一条门径，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接着，道一侃侃而谈，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宗旨：“第一是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由于他能言善辩，且熟悉会党中人的行话，使马福益为之折服，慨然相许投身革命，从而完成了黄兴交给他的艰巨使命，为黄兴、刘揆一、马福益在湘潭会晤，共谋反清革命做了疏通撮合的工作。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纷纷奉命潜行回国，着手准备武装起义。刘道一兼因父亲年迈多病，遂自请回湘从事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刘道一受黄兴委派，与蔡绍南、彭邦栋等人回湖南“运动新军，重振会党”。返国之前，黄兴特别嘱咐他：“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会党分为五路，势远力漠，遣调不灵，疏忽致败。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

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长沙运动新军。由于义师提前发难，新军中经疏通届时反戈的官佐请假或出差离省的不少，刘道一“一面使同志促其急归，一面希望义军来攻长沙，先筹开城响应之策。”他用密码电报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告急，不料密电“为鄂省电局扣留”。等到同盟会得到消息派员回国时，起义已归失败。刘道一先在长沙运筹策划，随后又往衡山进行联络，“日夜忙迫，乃为侦

者注目。"当他由衡阳返回长沙途中，为虎标右营游击游得胜捕获，解送臬司督同长沙府审讯。刘道一在狱中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受之躯，为毒刑所坏，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吾志决矣。"清吏最初疑他就是揆一，侦察后始知其非。"欲得其情实以兴大狱，道一坚不肯吐，法司严刑拷问，至肤肌尽裂，流血遍地。"面对酷吏，道一大呼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敌人因搜集不到他的"罪证"，便以从他身上搜出的"锄非"两字印章定谳。同年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将道一诱骗至长沙浏阳门外，"仓卒未及反缚，魁刽举刀斫之，四击乃断其头。"就义时年仅二十二岁。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道一牺牲后，其未婚妻曹庄时在长沙周氏家塾（后改名周南女校）读书，闻讯，即自缢于该校宿舍。其父刘方尧因受刺激，仆地中风，月余病逝。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宁调元

宁调元（1883—1913年），字太一，一字仙霞，湖南醴陵县人，光绪九年七月二十日（1883年8月27日）出生于一个小土地经营者的家庭。其父宁子承，"积学笃行，恂恂儒者"，终生以教书为业。调元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以前秉承父教，后受业于同县刘师陶，稍后入渌江书院，师承吴德襄山长治朴学。十九岁时，在新学影响下，考入长沙明德学堂。时值黄兴、陆鸿逵、周震麟、苏曼殊等充任该校教员，相偕借学堂以鼓吹民权，启发学生反清意识。宁调元耳目为之一新。他追求进步，学业优异，工诗文，有辩才，为学生中出类拔萃者，深受教员们器重，更为黄兴所赏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调元参与了华兴会长沙起义的筹划，并负责明德、经正两校的宣传活动。起义因事泄失败，黄兴、宋教仁等相继离湘走避，宁调元幸免于害，入经正学堂肄业。第二年，由学堂保送获公费出洋，留学日本。当他们一行数十人至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特设宴饯行，惟要留学生行跪见之礼。宁调元首表反对，他说："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他的意见，为多数留学生们所赞同，曲顺权贵之举遂作罢。

三十二年（1906年）春，宁调元回到上海，先在虹口协助姚宏业创设"中国公学"，接纳退学回国的志士。旋回醴陵，主持渌江中学，暗中联络龚春台、姜守旦、宋飏裘等洪江会首领，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嗣被告发，遭县署缉捕，只得又一次离家出走，至长沙，住天心阁。仍与陈家鼎、李洞天时相过从，鼓吹反清革命；又和禹之谟、邹价人同组"湘学会"，撰文、集会、演讲，宣传反清，使同盟会湘支部的革命斗争日趋活跃。同年夏，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遗骸运抵长沙。禹之谟、宁调元等首倡公葬二烈士于岳麓山，以彰义烈。他们冲破重重阻挠，于闰四月初七日（5月29日）发动全城男女学生和各界群众一万余人，白衣素缟，分两队渡河送葬。宁短衣宽帽、腰挂长刀指挥队伍，围观者倾城塞路。稍后，又发生长善学务处监督俞诰庆宿娼被学生捉获，禹之谟在濂溪阁痛斥俞诰庆无耻秽行的事件。进步人士无不称快，反动官绅气焰大挫。湖南地方当局于是多方罗织，于六月将禹之谟逮捕。七月，宁调元再次遭侦缉，幸得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帮助，逃往上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萍浏醴起义爆发。东京同盟会本部闻讯，派宁调元、胡瑛、杨卓林等回国，还责成宁重组同盟会湘支部。他兼程至沪，与陈其美、秋瑾等磋商，决定分头运动长江一带会党，相机响应。胡瑛赴鄂，杨卓林去宁，秋瑾至浙，他则化装返湘。刚抵长沙，适逢起义新败，刘道一等死难，龚春台、姜守旦失踪。宁调元愤极，遂冒着生命危险回醴陵，觅寻龚、姜等人下落，讵料踪影全无。他只得于次年初起程返沪，船至岳州（今岳阳），不幸被水师营缉捕，押往长沙。庭讯多次，他临危不惧，侃侃抗辩，清吏无法将他置之死地，只好判处监禁。

身陷囹圄期间，宁调元鉴于萍浏醴起义惨败的教训，感到重建湘支部已刻不容缓，遂委托同乡好友刘谦领头，联络在湘的李剑农、彭一湖等同志，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在长沙妙高峰重建湘支部。此后，回湘活动的文斐、焦达峰、曾杰等都参加进来，组织得以扩充，力量大为增强。与此同时，他还得知章太炎与《民报》同人大闹矛盾，愤而辞职，致使报社将有不支之势，深为忧虑。恰逢章太炎有信给他，也言及社中近况和自己处境。宁当即挥笔复书："……惟闻萋斐成锦，内讧用兴，昔者蔺、廉结好，赵家受福，平、勃交欢，汉祚用宁，谅吾公早及见之。海天万里，意顾何报？"他用历史人物顾大局，重团结的感人事例，规劝同志。

宣统元年（1909年）末，宁调元几经磨难，终于由谭延闿、龙璋等人联保出狱。旋被他的老师陆鸿逵聘为《帝国日报》总编。次年初入京任职。铁窗生活的洗礼，使他壮志益坚，笔耕更勤，利用报纸发表许多抨击时政、痛悼先烈、鼓吹革命的诗文。还在副刊上连载了自己在狱中所著的《碧血痕》。这本书以明末殉国人士的绝命词、小传及少量愤时之作为内容，经过精心编辑，用以教育人们不忘反清革命，抵制清廷玩弄的伪立宪阴谋。

武昌起义后，他心情振奋，立即去两湖。偶阅《大陆报》，见一则外电披露：清廷用伪装招商局的船只，运粮南下，接济在鄂被围断炊的舰只。他即译成中文，飞送九江军政分府。九江民军遂截获伪粮船三艘，迫使在汉清舰因

粮断援绝而乞降。稍后，他回到湖南，任谭延闿都督府秘书。

袁世凯窃夺民国临时大总统权位后，不遗余力地蹂躏民主制度，加速恢复专制独裁统治。宁调元痛心疾首，曾说："国事至此，而犹苟且偷一日之安，吾党罪恶其何时可以洗濯？"遂辞去总办职，于民国元年末由粤至沪见陈其美，赴皖会柏文蔚，去赣找李烈钧，春节后回湘与谭延闿等洽谈，积极联名东南诸省反袁力量，密商武力讨袁大计。他的奔走呼号，早已为袁的爪牙所侦查。据说，袁的黑名单上，宁调元的名字紧列在宋教仁之后。

9月25日，宁调元被害于武昌，时年三十岁，两年后，柳亚子将其诗文编辑成《太一遗书》。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珍闻轶事

瞿鸿机与袁世凯

"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光绪末年清廷"预备立宪诏"中人所共知的"名句"，对反对立宪而又不得不抬出立宪幌子骗人的顽固派来说，确是匠心经营的得意杰作。这一谕旨出自当时军机大臣瞿鸿机的手笔，而在这后面还有一段瞿与袁世凯相互倾轧的故事。

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清廷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一向怕立宪如虎的慈禧太后，派出载泽、载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企图缓和民情。对宪政一窍不通的五大臣，带了一批随员在国外逛了一圈，派人找在日本的杨度写了几篇有关宪政的报告，回京交差。最妙的是：这几篇报告其实主要由戊戌变法的主角、这时还被清廷目为"乱臣贼子"的梁启超起草。这本是一件历史上变幻莫测的事，而更令人莫测的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了康、梁的袁世凯，这时也想投立宪的机，一方面为了讨好舆论，一方面想通过立宪达到取清廷而代之的目的。于是，这个本来与君主立宪派为敌的人，也居然摇身一变，成为热心推进宪政的人。派遣五大臣出洋，应当是出于他的建议。

这幕立宪趣剧在这些角色的扮演下演出，它的上演情形，各种记载中已经描写得很详细。但是，其中有个小插曲，即袁、瞿的倾轧，却很少有人道及。

五大臣回国后，太后命令一群亲王、大臣开会讨论立宪问题。会上，满族的亲贵如荣禄、铁良等人，对立宪百般阻难，与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形成对立。瞿鸿机依违于两派之间，不反对立宪，但主张只提出准备立宪。这一缓兵之计，比直接反对立宪来得高明，迎合了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的意图，却触怒了志在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会后，袁、瞿两人环绕与奕劻的关系，展开了明争暗斗。关于这场斗争的内幕，在清末邮传部左参议陈毅的诗稿中，曾有较详尽的记述。陈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写有题作《送瞿止庵相国回籍》的五律三首。第一首有一联是："离骚传古恨，造宪予谗缘。"诗后，陈自注云："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七月，考察政治大臣回京，命醇亲王、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北洋大臣袁世凯同阅务陈，请旨办理。后降谕旨有'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云云。一时朝野传颂，即公所草也。先是，袁大臣私拟一诏草，……袖入，首示庆亲王。王不谓可。袁大臣盛气迫之，意在必行。王益持勿许，乃属公创草。既就，王大赞美，诏遂定。袁大臣怫然迳去。其党至目公为王之左右手。于是，日夕群谋所以间公于王矣。然公自是眷倚益隆，而缺望者忌公亦日益恚。"

这是"预备立宪诏"颁布前后的事。这时，瞿与奕劻连成一气，召来了袁的不满和攻击，可以说是袁、瞿之争的第一个回合。后来，在讨论改订官制前后，两人的斗争又进入第二回合。结果，瞿终于不是袁的对手，被排挤去职。在陈毅送瞿回乡诗的第二首里，首联是："相业曾求阙，遭逢恨不时。"陈自注云："袁大臣改官制，欲以内阁废军机，其志固在倾公。乃改制事起，太后颇觉袁大臣之跋扈，又以庆邸贪庸而猝无以代也，益倚畀公。于是，庆、瞿之交渐疏，而袁、庆之交遂日益密。公之罢相，虽发自庆，而袁实成之。是日，太后为辍朝，勿怡者累日。"

这是第二年的事，以袁世凯把奕劻拉了过去并把瞿逼走 而告一段落。但是，袁、瞿间的倾轧还有后文。陈毅在一九二四年曾写了一首赠曹广祯的祝寿诗。广祯，字梅访，长沙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后外放为吉林提学使。对这一迁调，陈在诗后加以说明："提学子侄为其征文启谓'……戊申（一九〇八年）五月，因与乡人共同挽回株韶铁路事，忤当道，未及年例即授吉林提学使'云云。毅谓此饰词也。瞿文慎罢相，袁世凯恶提学为其乡人，特斥出之。时陈昭常为吉林巡抚，世凯本拟密令摭劾其过。会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疾大渐，今上（指溥仪）入宫抚养，而道路传闻失实，提学误谓将蹈大阿哥复辙，商同巡抚 致电总督力争，而主草焉。后世凯闻其主谋，将

以罪之。……会世凯败，遂获免。暨世凯再起为总理，摄政王归藩，提学又与巡抚力争之。世凯益疑其交厚，前策竟未行。逊政（指溥仪退位）后，提学乃自劾免。”这可以说是袁、瞿倾轧的余波。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申君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知会在黄冈

日知会原是圣公会内一个阅览室，是牧师黄吉亭所主办的，一九〇五年夏始由原科学补习所革命党人刘静庵管理，从此就成为革命党人利用教堂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革命机关。为了进一步鼓吹革命，唤醒民众，于一九〇六年三月重订章程，才正式开会成立日知会。一九〇七年一月（丙午年十一月）间，刘静庵等被捕（即丙午之狱），自此日知会也无形解散了。

当武昌日知会活动期间，吴贡三、殷子衡等人会同留日学生夏占奎、冯维周、邹翼之、吴昆等在闭风创办坪江阅报馆，从上海、汉口订购各种报纸杂志，如《新民丛报》等以及其他新书，供人阅读，以开民智。同时殷子衡还办了一个半日学堂，对失学的民众宣传时事以及提倡和劝导妇女放足，编写禁止缠足歌，张贴传唱。那时武昌与黄冈、团风取得联系的是何季达，黄冈、团风与武昌取得联系的是吴昆和殷子衡。丙午年春，吴贡三、梁耀汉、殷子衡等在黄州 办了“鸠译书舍”，专门印刷鼓吹革命的书籍。最初印的是由吴贡三、梁耀汉等反复讨论在石介所作《孔夫子心肝》一书的基础上扩充了的《孔子心肝》一书，阐述春秋大义、辩论种族关系，凡谈到满州二字的为了避免纠纷，皆以黑点代之。《孔子心肝》印了一万多册，由黄楚玉、张佩绅、吴安吉等人，用竹箱装好，先后挑运到省城，秘密分发军学两界，大力宣传。以后又有李在良在英山翻印了万余册，运往两广散发。当时又有武昌南路、西路高小学生周海珊、黄桐生、熊礼方等常常购买《孔孟心肝》，每次三、五十册不等，分赠同学。由此革命宣传工作，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当年暑假梁耀汉自日本回国后，又到黄州与吴贡三、吴昆、刘昊等翻印《猛回头》、《做新民》、《警世钟》、《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德占辽东》、《黑龙江》、《训兵谈》、《革命军》、《太平天国史》等，由殷子衡密送武昌日知会交刘静庵再散发军学两界。这些宣传品对鼓动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殷子衡曾以三年苦功，刻了《六洲与图》，并预见巴拿马必有开通运河的可能。当时殷子衡积极宣传革命，想谋刺铁良的王怒涛就趁殷到黄冈县城活动的机会到孝介祠会殷，他们便积极筹划。湖北巨富刘石清，得知梁耀汉到了黄州，即在扬鹰岭开欢迎会，到会的有百多人，并设盛宴招待。当梁耀汉临行时又赠厚礼五百元帮助进行革命。从此黄冈革命更加活跃了。

吴贡三、殷子衡等还经常携带鼓吹革命的书籍和传单到黄冈乡间，有时也到大冶、鄂城去宣传散发。他们随时演说清朝如何专制残暴，腐化无能，对汉人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汉族必须起来革命，把清朝统治者推翻，才能把四万万同胞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为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革命，殷子衡有声有色地向群众们宣讲“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故事。在坪江阅报馆里，殷子衡与河季达共同拟了一付对联：“满地烟弥痴虎豹，汉江春暖跃鱼龙”，贴在阅报馆的大门上。在阅报馆的墙上还贴着殷子衡用楷书写的宣传革命的诗：“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年事，同种何人雪此仇”。吴贡三当时在黄冈城内教书，殷子衡在团风公立小学教书。他们在课堂上随时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殷子衡尤其注意身教，平日言行一丝不苟，对学生态度温柔和蔼，从无疾言厉色。他经常对学生讲：“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启发学生的新思想，还作了诗歌要学生背诵。事已隔五十年，我仅能记得以下两首：“新少年别怀抱，新世界赖尔造。伤哉帝国老老老，妙哉学生小小小，勖哉前途好好好。自治乃文明之母，独立乃国民之宝，新少年姑且去探讨。”还有一首是：“黑奴红种相继尽，唯我黄人睡未醒。亚洲大陆将沉没，一典歌词君且听。人生为学须及时，艳李浓桃面目姿。蹉跎莫遣韶光老，老大年华徒自悲。近追日本远欧美，世界文明次第开。少年努力宜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为了启发学生对清朝的仇恨，殷子衡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编成算术题要学生演算，如清军在扬州屠杀，一次杀若干人，一天三次共杀若干人？一年杀多少人？二百年的时间该有多少人遭到杀害？使学生脑海中更具体地刻印了对清朝的仇恨。殷在地理课程教学中，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如此可爱的祖国被清朝统治，受列强的压迫，能不痛心吗？以此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吴贡三、殷子衡的革命言行，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他们的学生如詹振华、王鸿麟、秦镜青、方凤鸣、程起陆等都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实际行动。

一九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丙午年腊月十八日）晚间，殷子衡在团风公立小学被捕，吴贡三也在黄州城里被捕。在殷子衡被捕的夜晚，殷的学生程起陆即将殷的住处未发散完的两箱子《孔子的心肝》等各种革命宣传品，尽一夜的时间焚毁尽净。吴贡三、殷子衡二人自一九〇七年一月被捕，一直到辛亥武昌首义时才出狱。被捕后吴在武昌候审所，每隔三五天必提到武昌巡警道的衙门里审讯一次，经常是由巡警道冯启钧亲自审讯。那时受刑最重的是同时被捕的刘静庵，死去活来好几次，最后终被杀害。其次受刑重的即是殷子衡了，他坚决不承认刘静庵就是刘家运，不暴露自己是革命党，也不肯招出谁是和他一起搞革命的同志。虽然正当严冬时期，刑讯时竟将殷上身的

衣服脱光，仅留一条单裤，双腿跪在铁链子上，两手上在弸子上，两个衙役用一把细竹条轮流抽打殷的背后和腰部。有时因殷子衡在供词中讽刺子官府，触动了冯的怒气，冯即亲自对殷毒打，打得他血肉横飞，鲜血溅到同时被审的梁耀汉等的脸上(这是梁老亲自对程起陆讲的)。当时有人咒骂冯启钧："矮子矮，一肚子拐。矮子矮，剁八块"。也有人说：冯矮子这样残酷的刑讯，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戴红顶子(当时清廷官制，巡警道是蓝顶子)。

当时被捕的革命党人在狱中虽然受尽了各种折磨，但都表现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程起陆《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流行风

小说《痛史》

作者吴沃尧，主要内容：

小说写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下令南进，南宋度宗皇帝荒淫酒色，任用贾似道。贾似道欺君误国，暗结蒙古，隐瞒军情，扣压各地告急文书，致使襄阳、樊城、鄂州、江州相继失守，作战江州的张世杰差人到临安告急，适值奸相丧母居家，度宗看到表章方知战况，惊悸之下吐血而亡。谢太后遵度宗遗旨，令贾似道御敌，不料奸相临阵弃甲逃往扬州。朝中百官纷纷上本奏参，太后降旨将其革职解京。押解途中、奸相被会稽县尉郑虎臣踢入粪缸溺死。太后诏令天下勤王，江西提刑使文天祥奉诏率兵入卫，拜为丞相。及临安陷，宋室三宫被俘，文天祥奔走福州，路遇张世杰及益王母子，同至福州奉益王为帝。不久，元兵分两路南下，文、张分别率兵御敌，并派宗仁、胡仇往燕京探望德祐帝祖孙三人。张世杰、陆秀夫奉御驾退守有虙山，整饬武备以图恢复。时文天祥兵败空阬，转战潮州，降将张弘范引元军追至，文天祥部将多战死，天祥被俘。元军取广州后夹攻虙山，杀入中军。陆秀夫见势危急，督妻自尽，随即负小皇帝跳海殉国。张世杰奋战之后也率余众跃海自沉。文天祥被押送大都囚于兵马司，元主百般威胁利诱，天祥长吟《正气歌》，宁死不从。郑虎臣、胡仇计议起事援救，叛臣留梦炎奏告元主，忽必烈大惊，遂将德祐帝剃发送吐蕃为僧，斩文天祥于柴市口。胡仇等人收敛了天祥回吉州安葬，继续展开抗元斗争，义兵四起。小说至此便中止了。全书写异族入侵，南宋灭亡的史实，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作者痛斥贾似道等奸佞卖国求荣的罪行，谴责度宗沉湎酒色导致亡国的罪愆，一反过去对帝王歌功颂德的俗套，并用浓墨重彩颂扬了为国捐躯的文天祥等忠臣义士，表彰了宋亡后坚持斗争的胡仇等草莽英雄。小说结构严谨，头绪虽多却条理清晰，通过对话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刻画较为鲜明，是晚清小说中的优秀之作。

小说《枯树花》

作者山外山人，主要内容：

书叙清末江南通州如皋县郑成德，终日醉梦昏昏，置诸事于不问，迨至祸患临身，呼吁莫应。痛定思痛，醉梦俱醒，前后判若两人。其后代又能奋发上进，日振家声。男主人郑成德，自幼读书，性情迂缓、喜杯中物。祖上向开药店，到他手里，店事日坏，岌岌可危。一次，因店伙计殴人至死，成德被诬入狱。经过这次挫折，他决心振作精神，做一番事业，以报国恩。于是和其妻商议，捐了个同知。因为他为官清正，振躬率属，体察民情，平冤申屈，深得上峰的尝识，官职升至道台。告老还乡后，凡有善举，莫不资助，其济困扶危的行为，博得家乡人们的称道，甚至感动鬼神，使家中免遭横祸。所生六子，除文豹等尚年幼外，文麟、文凤、文鸾皆栋梁之材。他们留学国外，后又分别出使美英法诸国，对外维护清王朝主权；对内力主立宪。长媳巧姑才智过人，品德又出众裙钗之上，被官绅推举为县女学堂总教习。该书虽然围绕郑家三代人之事展开，实则提倡革弊兴利，宣扬忠君爱国和因果报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对国弱民穷的担心以及清王朝回天乏术。从内容情节上看，是一部极为平庸失落之作。庞杂散乱的家庭琐事充斥其间，直接冲淡小说的主题。纵有涉及国家民族大事，也显得极其肤浅。且作品多处荒诞不经，鬼使神差事累见不鲜，甚至公正廉明的郑成德也迷信星相占卜。这些均直接影响作品的效果。

小说《孤儿记》

作者平云，主要内容：

小说写苍木山黯澹村孤儿阿番，未及十岁，父母双亡，依赖其叔父。其叔天良丧尽，以奴仆待之。他劳役繁重，食不饱穿不暖，并日日受其叔父的打骂。一日叔父喝醉，将其打昏、扔在院外，他醒后爬至深山中，与狼虫为

伍，苦不堪言。后又四处流浪，到处乞讨，为社会所不容，复又至深山，过野人般的生活。偶然机会，他与几个强盗相遇，强盗与之饭食，并引之一起偷盗，久之，被捕入狱。狱中有一人称笛夫，与阿番相友善，常将饭分与阿番。后狱吏知此，遂将笛夫调离，阿番几次请狱吏将之调回，但遭拒绝和辱骂，阿番愤怒已极，用利斧将该狱吏杀死，又自杀不成，最后以杀人罪处死刑。作者在《凡例》中称"感于嚣俄《哀史》而作，借设孤儿以甚言之"，实则借此以批判社会之黑暗，正所谓"或有不平于人间，因托事稗官以舒吾愤"。阿番由一聪明可爱之儿童变为一杀人犯，正是当时社会使之然，诚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第予胡至于窃，胡至于杀，望陪审诸君一解此问题而已。"小说发挥了文言文善于铺叙，渲染的特点，写情写景都具体入微，毫发毕现，特别是孤儿所受之苦难，从各个角度反复渲染、强化，使人不忍卒读，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小说《文明小史》

作者李伯元，重要内容：

小说从僻处湘西、封闭的永顺府写起，写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清朝政治中心北京，东南数省的大州小县，山城水村，以及日本、美国。作者在广阔场景上，描写了上自出洋中丞、封疆大吏，下至乡民小二、水手船夫的各种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新旧思想的冲突和人民对妥协媚外的清朝统治的反抗。全书没有贯串到底的故事和人物，采用《儒林外史》式的连环短篇的结构方法，由许多各自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这使小说具有新闻色彩，虽不乏精采片断，但无法形成宏伟博大的气象。作者显示出运用讽刺和夸张的娴熟技巧，但由于观察不深，急就成章，又加作者思想偏于保守，所以描写难免失实与欠深刻。本书原刊于《绣像小说》杂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小说《活地狱》

作者李伯元，主要内容：

全书共十五个故事，集中揭露了清末封建衙门里种种罪恶的勾当。书中有荒淫无度腐朽昏庸的县官，有诡计多端的讼师，有横行无忌，敲诈勒索的差役、稿案、书办，有自命"一清如水"的酷吏，他们串通一气，为所欲为，干尽了坏事。有的差役肆意横行，借在乡间敲诈之机，图奸妇女，被拒绝后，便生恶计报复。有的县令自称清官，但惯用酷刑，每遇讼案，不问清红皂白一律上酷刑。此书还专门叙述了各地衙门的黑暗和所施用的一些想入非非的刑具。有能把犯人眼睛爆出来的"铁打锤"，有能使五脏俱裂的"五子登科"，有能打破肚皮的"三仙进洞"，有把铁鞋烧红穿在犯人脚上的"红绣鞋"，以及"烧肉香"、"奶头熨斗"、"过山龙"、"跪铁链"等。那种恶毒而惊心动魄的场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就是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林刀山。"该书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和惨酷毒刑的第一部书。作者的文笔犀利辛辣，全书仅用了十五个具体事实便全般的暴露了晚清衙门里的种种黑暗以及刑罚的残酷。故事最长的八回，短的一回，书中的描写虽不多，但监狱中暗无天日，惨不忍睹的情景便跃然纸上。

小说《海天鸿雪记》

作者李伯元　主要内容：

本书写清末上海妓院的生活，细致地描述了一些文人阔少，官员名士出入妓院，与妓女的交往和纠葛。书中主要描写了颜华生等人出入妓院烟馆、茶坊酒肆与妓女私混的生活、余钧伯与妓女沈宝林的往来和感情发展及妓女高湘兰与嫖客的种种关系和妓女间的明争暗斗。全书情节平淡无奇，近乎自然，没有什么戏剧性，大多写嫖客出入妓院的行踪和其间的言谈举止等琐碎之事。虽然写的是妓院生活，但很少猥亵露骨的情节，主要写嫖客与妓女的交往，重点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社会活动，反映这一特殊社会角落中的各种阴暗，书中刻画了许多真实生动，富于个性的男女人物，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不同于当时其它写嫖客妓女的狭邪小说。本书基本上以吴语为主写成，使用方言使人物形象和环境更加生动逼真，但因语言不规范，不懂吴语的人看比较吃力。全书结构安排上很类似《儒林外史》的写法，由几部分独立的人物和情节组成，没有贯彻始终的人物和统一的故事情节，而是由几个有关相类的故事联接而成，讲完一段，再讲一段，故事之间无必然联系，只是性质类似，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这样写所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宽，但也使全书的整体结构显得松散，首尾不连贯，缺乏引人入胜的魔力。本书有民国年间世界繁华报馆印本。

诗《挽刘道一》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孙文）

诗《感怀四首》（选一）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血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

（宁调元）

历史档案

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

外务部致英使禁烟节略

禁鸦片烟事，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钦此。"兹由政务处筹议办法十条，于本年十月初六日覆奏，奉旨依议，钦此。查第十条内称："洋药来自外洋，事关交涉，应请饬外务部与英国使臣妥商办法，总期数年内洋药与土药逐年递减，届时同时禁绝。又查有吗啡及刺入肌肤之吗啡针，其损体伤生较之鸦片尤甚，应查照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切实申明，分饬各税关，如查有不因医治使用贩运来华者，一概不准进口。"等语。由军机处抄交前来，本爵大臣等查禁止鸦片烟一事，夙知贵国政府早有同情，中英睦谊最深，自无不赞成美举。兹又钦奉谕旨妥商办法，用特开具节略，与贵大臣面商，并希转达贵国政府，是为至要。

计　开

一、土药既限十年断净，洋药亦应以十年为期，方可同时禁绝，则惟有洋药进口数目，分年递减，庶几逐渐减除。现拟以一千九百一年起，至一千九百五年止，此五年内核详洋药进口总数，折中定额，请贵国允自一千九百七年以后，年减一成，十年净尽。

一、印度之加尔各搭为洋药总汇之地，现议每年减成进口，拟由中国派员前往加尔各搭监视拍卖打包，使发运之洋药知有实数，请贵国并允照办。

一、洋药之力量本倍于土药。查从前土药税，每担岁抽银，小则六十两，至多不过九十两，现在已加至每担一律抽银一百十五两，而洋药之厘税并征，每担只抽银一百十两，是洋药之力既厚，而所征之税实较土药为轻，深恐吸烟者趋买洋药，而烟瘾反大，甚非实行减除之法。在中国亦并非计较税项可以多征，实无非以征为禁，使吸烟者逐渐减除。请贵国允嗣后洋药厘税照原定之数加收一倍，每担征银二百二十两。

一、香港向为洋药熬膏之地，运销中国境内者，实属不少。若示禁之后，任其熬膏，运入中国内地，则洋药、土药即逐渐减除，而熬膏反增，办法实非妥善。今拟办法两端：一则请港督协助严禁洋药熬膏不得运入中国境内；一则凡有洋药熬膏由中国概行收买，亦以征为禁，请贵国允照办理。

一、租界内烟店、烟馆多有开设，其饭馆、酒肆、茶室、妓寮亦为开灯吸烟之所，且各行店售卖烟枪、烟斗、烟灯、烟具者更多，请贵国允为提倡，饬各租界以内所有清查及筹禁之法，照中国地方官办法一律办理。

一、吗啡及吗啡针之害设法禁止，已载在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惟须有约各国应允照行，方可举办。本部于本年三月间，照会未经新订商约各国，一律请允禁止吗啡及药针贩运来华，现各国已大半应允，只有数国未覆，亦已照催。此事系属善举，请贵国即允举办，切实施行。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

载泽

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末或七月初

窃奴才前次回京,曾具一折,吁恳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仰蒙两次召见,垂询本末,并谕以朝廷原无成见,至诚择善,大知用中,奴才不胜欣感。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yíng,营)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这私利而已。顾其立言,则必曰防损主权。不知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以日本宪法考之,证以伊藤侯爵之所指陈,穗积博士之所讲说,君主统治大权,凡十七条:

一曰,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一曰,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一曰,以紧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一曰,发布命令由君主。

一曰,任官免官由君主。

一曰,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一曰,编制海陆军常备兵额由君主。

一曰,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一曰,宣告戒严由君主。

一曰,授与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一曰,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一曰,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一曰,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一曰,议会展期由君主。

一曰,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一曰,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一曰,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

以此言之,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

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既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hé,核),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

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立宪之利如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而或有谓程度不足者。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光绪七年,1881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且中国必待有完全之程度,而后颁布立宪明诏。窃恐于预备期内,其知识未完者固待陶镕,其知识已启者先生觖(jué,决)望,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盖人民之进于高尚,其涨率不能同时一致,惟先宣布立宪明文,树之风声,庶心思可以定一,耳目无或他歧,即有以维系望治之人心,即所以养成受治之人格。是今日宣布立宪明诏,不可以程度不到为之阻挠他。

又或有为满、汉之说者,以为宪政既行,于满人利益有损耳。奴才至愚,以为今日之情形,与国初入关时有异,当时官缺分立满、汉,各省置设驻防者,以中原时有反侧,故驾驭亦用微权。今寰宇涵濡(ré,儒)圣泽近三百年,从前粤、捻、回之乱,戡定之功,将帅兵卒皆汉人居多,更无界限之可言。近年以来,皇太后、皇上迭布纶音,谕满汉联姻,裁海关,裁织造,副都统并用汉人,普天之下,歌颂同声,在圣德如地如天,安有私覆私载?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于计较满、汉之差缺,竞争权力之多寡,则所见甚卑,不知大体者也。夫择贤而任,择能而使,古今中外,此理大同。使满人果贤,何患推选之不至,登进之无门?如其不肖,则亦宜在屏弃之列。且官无幸进,正可激励人才,使之向上,获益更多。此举为盛衰兴废所关,若守一隅之见,为拘挛(luán,峦)之语,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身一家之私,则亦不权轻重,不审大小之甚矣。在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

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卤莽陈言,诚以篇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伏乞圣明独断,决于几先,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实宗社无疆之休,天下生民之幸。事关大计,可否一由宸衷,乞无露奴才此奏,奴才不胜忧懑迫切。谨奏。

(《宪政初纲·奏议》第4—7页,商务印书馆光绪32年(1906年)版)

开明专制论

既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国家又非可以专制终也,则所余者惟有君主立宪之一途。君主立宪,固吾党所标政纲,蕲必得之而后已者也。然谓其今日尚未能行者何也?请就两方面说明之。

(甲)人民程度未及格

立宪制之纲领不一端,而议院之开设,当其最重要之一也。问者曰:议院不能不立于指挥主动之地位,国民程度幼稚者,不足以语此。既闻命矣,其在立宪君主国,议院可以立于监督补助之地位,然则何时而不可?且如今日,国中未尝无舆论,就中发表舆论之报馆,亦对于政府而立于监督补助之地位者也,国民程度既可以有报馆,曷为不可以有议院?应之曰:不然。舆论者无责任之监督,而议院者有责任之监督也。申言之,则舆论非为国家之一机关,而议院则为国家之一机关也。既为国家之一机关,而有法律上应享之权利,随即有法律上应尽之义务,苟不完此义务,而权利或将以消极的而澌亡。申言之,则议院若不能行完全正当的监督,则其地位将下坠,而影响且及于宪法之全部也。请言其故。

夫中国他日果制定何种类之宪法,今莫或知,即应制定何种之宪法,今亦未易言。要之,既名曰宪法,则凡各国宪法之共通原则,如国务大臣对于议会而负责任,议会有协赞法律预算权,议院院内之自治,人民之选举权等,殆必其不能缺者也。即以此诸端论之,国务大臣对于议会而负责任,非必议会能进退之也,而可以质问焉,可以弹劾焉。但使所质问者洞中症结,政府(即国务大臣也,以行文之便,代以此)若有隐慝,能觉察之,政府若有失策能指摘之;政府乃重其言而不敢藐,有所惮而不敢恣,则质问为有效矣。反是,若无鉴别政治得失之识力,所质者皆薄物细故,或于其极正当之行动而故为责备,而其有干法越权及其他失政,或反熟视无睹,不予纠正,则政府视议会易与,谓其言一无价值,生轻蔑心,而议会之神圣损矣。此虽不至摇动及宪法,然养成此习惯,非立宪国之福也。又弹劾当如善养蒙者,不轻施夏楚,若有过举,确认为不可恕者,痛惩一次,则常收莫大之效。议会之弹劾权不滥用,用之,必有其正当不容已之理由,则就法律上虽未必以弹劾而定黜政府也,而事实上令君主感动,察民言之有因、令政府悚惶,识舆论之真价,则无论或黜或留,而弹劾皆有效。反是,若弹劾之无价值,与前所举质问同,则元首厌之,政府侮之矣。不宁惟是,弹劾无效,则议院势不得不被解散,屡滥用弹劾,则重解散以解散,而议院将虽有若无。万一国民厌于选举,或君主怠于召集,则宪法根本为之摇动矣。夫学识幼稚之民,往往沐猴而冠,沾沾自喜,有权而滥用焉,其常态矣。故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民,非稍经训练后,其必不免此弊也。

(乙)施政机关未整备

前所言,犹其理论也,而今日于实际上,有未能行立宪政治者,则施政机关之未整备是也。试略论之。如议会选举人,被选举人,必当有资格,其最重要者,则必其人为中国人也。而(1)今者国籍法尚未编定,"中国人"之界说且未分明也。又初立宪时,殆万不能用普通选举,必出于制限选举。各国通行之制限,大率以所受教育之程度,或所有财产之税率为衡。而(2)今者学校尚未遍立,义务教育尚未厉行,教育程度于何测之?然此犹较易。若夫(3)税率之多寡,则今者租税法尚未备,征收之方亦不正确,于何定之?(4)选举必有选举区,而我今未划定,何由施行?且选举区非可漫然划定也,必比例于人口之多寡与道里之远近。而(5)今者户口之统计,地图之测量,均不确实,即以制定选举区一事,已非数年不能为功也。各国选举,率以乡官、市官主之,中国地大人众,选举区万不能太大,如欲以一县为一区,则乡僻之民,何从至县城投票?且使悉至,而城亦不能容也。故以鄙见度之,大约今之一县,其为区者当数十。而(6)今者地方自治制度未颁,乡官、市官、乡会、市会未立,然则选举其谁司之?选举竞争,最易骚扰,各国普通之现象也。维持秩序,端赖警察。而(7)今者警察未普及,能保不害及治安乎?果尔,恐民将谈选举而色变也。竞争之结果,往往起诉讼。而(8)今者诉讼法未定,能息争乎?各国能例,议会大率年开一次,而选举后最迟不过一两月即开会。而(9)今者铁路未多,交通不便,蜀、凉、滇、黔,或半岁乃达京师,然则开会延至何时?而一岁往返,岂不疲奔命于道路耶!立宪精神不一端,而保护人民权利,其最重要之一也,故常以条文规定之。宪法一经实施,则必为绝对的保障乃可以信于民。而(10)今者民法未制定,权利以何者为标准而能确实耶?民非犯法网,不得擅逮捕,此保障自由之一要件,而各国率皆规定之于条文者也。而(11)今者刑法未制定,以何者为法网乎?有司能无上下其手乎?苟有之,则宪法无效也。且人民之护符恃法律,而法律之执行者惟法官,无良法官,则民终不能完其权利。而(12)今者行政、司法,混为一炉,绝未尝为养成裁判官之预备,民果能食宪法之赐乎?对于行政处分之不当者而得起诉讼,又人民所以自全其权利之一要件也。而(13)今者行政法未颁,行政裁判所未构成,有见屈者,将何所控诉乎?而宪法又无效矣。夫诸法固可与宪法同时颁行,吾非谓必当先有诸法而后有宪法,然诸法之条理,恒千端万绪,非绩学不能运施,故欲使宪法一经布告实施以后,而国家诸机关先自保无违宪之举动以示信于民,则必当先颁诸法,且预养成用法之人才,亦理论上之

次第所宜尔也。

以上所举，随念所及，拉杂举之，若悉数者，恐数十条不能尽也。但即就此诸端观之，已可见宪法者，决非一纸空文所能立；朝欲之而夕致之也。夫人民程度之一问题，各人有各人之主观的判断。吾以为未可，人以为已可，是非终未易决也。若夫机关整备与否，则全属客观的事实，虽好立异，宁能否认焉！吾以为但就以上所举诸端，苟欲其规模粗具者，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而彼持极端破坏论者，乃谓于干戈倥偬、血肉狼籍、生计憔悴、神魂骇丧之余，不数年而可以跻于完全优美之共和，一何不思之甚！呜呼！我青年之眩于空华、困于噩梦者，其醒耶未耶？而附和君主立宪者，亦一若于数条宪法正文之外，更无余事，其可怜而可笑，亦正与彼破坏论者相类。使如彼等政策，抄译一二国成文宪法而布之也，则一二小时可了耳，何难之与有？且就令能制定极完美而适于我国之宪法，未及其时而贸贸然布之，顾以种种障碍，一切不能实行，而徒使天下失望，则虽谓为立宪主义之罪人可也。真诚有忠于立宪主义者乎？则必当知今日未能实行；既忠而又知其未能实行，则必知所以待之者矣！

（梁启超）

《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近日《新民丛报》将本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诸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辨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兹先将辨论之纲领，开列于下，以告读者：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一〇、《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一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一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

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五号以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

《民报》第3号号外(1906年4月18日)，科学出版社影印。

孙中山《军政府宣言》

孙中山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

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已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　今之满州，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

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州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右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色。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受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下略）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孙中山

诸君：

今天诸君踊跃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徒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元节。《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诸君今天到来，一定是人人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要趁这会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一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那里？政权在那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地球上人数不过一千几百兆，我们汉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为亡国之民，这不是大可怪的吗？那非洲杜国不二十多万人，英国去灭他，尚且相争至三年之久；菲律宾岛不过数百万人，美国去灭他，尚且相持数岁：难道我们汉人，就甘心于亡国！想起我汉族亡国时代，我们祖宗是不肯服从满洲的。闭眼想想历史上我们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们祖宗很对得住子孙，所难过的，就是我们做子孙的人。再想想亡国以后满洲政府愚民时代，我们汉人面子上从他，心里还是不愿的，所以有几回的起义。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那满洲人也倡排汉主义，他们的口头话是说他的祖宗有团结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汉人；他们要长保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们这几句话本是不错，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汉人无团体。我们汉人有了团体，这力量定比他大几千万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

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尽力惩治,不能与他并立。照现在看起来,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权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汉人要剿绝他,故此骑虎难下。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要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想来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

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费经营。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佛兰西民主政治〔体〕已经成立,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这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

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象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他。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于今先说民生主义所以要发生的原故。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于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这个道理,很觉费解,却可以拿浅近的事情来作譬喻。大凡文明进步,个人用体力的时候少,用天然力的时候多,那电力、汽力比起人的体力要快千倍。举一例来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去帮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农工,因他的生产刚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专注重生产。近代却是两样。农工所生产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余,故此更重商业,要将货物输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照这样说来,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古代农工诸业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现时天然力发达,人力万万不能追及,因此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之地了。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凡有识见的入〔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这真是前车可鉴,将来中国要到这步田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迟了。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虽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举一例来说,今日中国贫民,还有砍柴割禾去谋生活的,欧美却早已绝迹。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就算得些蝇头微利,也决不能生存。故此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得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

所不能及的。

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譬如英国一百年前，人数已有一千余万，本地之粮供给有余；到了今日，人数不过加三倍，粮米已不够二月之用，民食专靠外国之粟。故英国要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因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算计，每年冬间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

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象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亦是如此。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筹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方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湾、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 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漫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尚有一问题，我们应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那中华民国的宪法，更是要讲求的，不用说了。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那五权除刚才所说三权之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是迭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这样看来，都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原故。考选本是中国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美国也渐取法，大凡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于下级官吏，并且考选之权仍然有行政部之下，虽少有补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于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

方可任用。但是这考选权如果属于行政部，那权限未免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成了独立机关才得妥当。

一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中国从古以来，本有御史台主持风宪，然亦不过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威等，才能达行政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论理上说不下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

合上四权，共成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至于那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要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举，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据《民报》第十号东京一九〇六年十二月）

张之洞等奏为萍浏醴起事办理清乡折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1907年5月24日）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湖广总督普管湖北巡抚臣张之洞、湖南巡抚臣岑春蓂跪奏，为浏阳、醴陵二县办理清乡一律完竣，地方安静如常，并添募勇丁，驻扎巡防，以资镇慑，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照浏阳、醴陵二县，上年十月间，会匪姜守旦等与江西萍乡县匪倡乱，众号数万，攻扑县城，到处焚掠。经臣等先后派营剿办，旋将大股匪徒次第击散。迭次奏奉谕旨严拿，各军乘势合力搜剿，一律荡平，毋留余孽，并各清各乡，安良除暴，以靖地方。等因。钦此，仰见圣谟广运，敉安黎庶之至意。臣等跪诵之下，钦悚莫名。遵即督饬各军将匪众一律扑灭，而余党多窜乡间，亟应乘此两省兵队驻扎之时，举办团练保甲，清查户口，将在逃各头目匪党，县赏购线，搜捕尽净，庶足以戢奸宄而正人心。当即饬司分派委员前往浏阳、醴陵二县，会同各地方官及各营管带员弁，分赴各乡，督饬团绅，按照向办编联保甲章程，认真清查。平江等县，饬令一体遵办，暨令道员俞明颐、知府王寓生就近督率办理。并因各该县文报向系铺司递送，每多稽延，一有匪徒滋事，军报紧要，由司饬令一律设立步拨，添雇健夫，以免迟误。兹据该道等暨印委各员先后禀称浏阳县属西北两乡，地本不宽，匪踪尚少。东乡分永和、古巷、高坪、上东、达浒湾、陈坊六大团，共辖八十八小团。南乡分枫林、大瑶、文市、金刚四大团，亦共辖六十余小团。其地多与醴陵、萍乡、万载等县毗连，山深箐密，为匪徒出没之区，受害最甚，伏莽亦以该二乡为较多。团绅李德钟、刘松山、王显桃等均被匪杀害，房屋亦多遭焚毁。团丁徐焕升等均因御匪身受重伤。经该印委各员查明被焚各户，分别轻重，禀经臣等批饬善后局发钱文，给予抚恤，俾免失所。此次办理清乡，以选派团绅为最要。惟匪徒起事初，首先被害者即向来认真办事之团总，皆引为前车之鉴，率多畏缩不前，当责以大义，晓以利害，始各随同稽查。醴陵东、西、北三乡，亦多系被匪滋扰之区。然较之浏阳东南二乡，情形尚轻。所有派往各军，将股匪击散后，因在逃著名匪党尚多，协同清乡委员督率弁勇，带同眼线团绅，严密搜捕，陆续共获匪目匪党五百余名，均解交浏、醴、平〔萍〕三县，会同委员审明，分别正法监禁。经臣等另折奏报。若查系被诱入会，被掳胁从，有团绅为之具保，取具连环保结，予以自新，并准编入保甲户口册，另立自新一本，用备查考。其长沙、善化并茶陵州、攸县与浏、醴毗连各乡，亦饬各该州县督率团绅，一体认真清查，以免隐匿。当匪乱时，各处多练团自卫。现在地方既已肃清，所练团勇自应酌量情形，分别裁减，俾纾民力。浏阳视团之大小酌留练勇，多者数十名，少亦数名，按段巡防，如有盗劫，立即驰报邻团，协同围捕，以靖地方。醴陵除酌留团勇，分东西两乡，并由绅士就地筹款，募勇一百二十名，分布巡缉，目下清乡一律完竣，由俞明颐等分赴各乡，逐一复查。各委员编查门牌户口清册，均属切实，闾阎安靖如常，禀复前来。臣等伏查浏阳、醴陵二县地方，虽已靖谧，惟乱之后，人心初定，与连界之茶陵州、攸县等处，必须有防营分别驻扎，以资镇慑。所有前派常备巡防各营队，除赵春廷一队原驻醴陵外，其余均须调回省城训练并派赴原防，兵力殊形单薄。业经臣春蓂督饬司局，设法筹备饷项，札饬巡防队管带吴廷瑞、梁国桢、徐振岱、越春廷，于前次剿匪出力各弁勇内选派哨弁，各添募丁三哨，均于二月十九日点验成军，即令徐振岱所部新旧六哨，驻扎浏阳，赵春廷仍醴陵，其余分扎茶、攸各境，认真巡缉，以靖地方。至前次浏、醴二县会匪倡乱，团绅李德钟等御匪被害，情殊可悯，自应查明照例议恤。现在办理善后清乡事宜，一律完竣。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暨绅士团丁，或捕获要匪，或协同防剿，均不无微劳足录，容臣等查明，分别保奖，奏乞恩施，以昭激劝。除饬各该县会同营弁，购觅眼线，分途严拿在逃首要各匪，务获惩办外，所有浏、醴二县办理清乡，现已完竣，并添募勇丁巡防缘由，谨

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四月十三日。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奉硃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钦此。

清帝厘订官制谕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宣示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特派载泽等公同编纂，悉心妥订，并派庆亲王奕劻等总司核定，候旨遵行。兹据该王大臣等将编纂原案详核定拟，一并缮单具奏。披览之余，权衡裁择，用特明白宣谕：仰惟列圣成宪昭垂，法良意美，设官分职，莫不因时制宜。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自应变通尽利。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期于厘百工而熙庶绩。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著仍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户部著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礼部著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著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名为邮传部。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本纠察行政之官，职在指陈阙失，伸理冤滞，著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著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均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原拟各部院等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各缺，仍著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此次斟酌损益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如有未尽合宜之处，仍著体察情形，随时修改，循序渐进，以臻至善。总之，时局艰危，事机迫切，非定上下共守之法不足以起衰颓，非通君民一体之情不足以伸疾苦。所有新简及原派各大臣，责无旁贷。惟当顾名思义，协力同心，尽去偏私，真任劳怨。务使志无不通，政无不举，庶几他日颁行宪法，成效可期。倘仍视为具文，因循不振，则是上负朝廷，下负国民，不能为尔等宽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知照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

宣誓预备立宪谕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着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护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钦此。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2日　清廷赏道员冯国璋副都统衔，充贵胄学堂总办。

1月23日　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与俄使璞科第开议中俄新约。

1月25日　清政府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到东京，日警为防革命党人，严予卫护。

1月　广东新宁（台山）绅商陈宜禧等奏请创办新宁至广州铁路，声称"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由陈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回国之留日学生，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

2月6日　福建漳浦县教堂被毁，死教士五人。

2月13日　孙中山自西贡赴新加坡。抵新后不久，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分会，以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此后，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之中心。

广西容县、藤县一带群众和防营交战。

2月22日　法教士王安之迫南昌知县江召棠接受其扩大传教特权，未遑，竟凶杀江召棠（一说江召棠愤而自刎）。25日，南昌人民因知县被杀，愤毁法教堂，杀法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教士三人。26日，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进行威吓。

2月23日　清廷驻日使臣杨枢奏请严定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章程。

2月27日　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奏准改各省绿营为巡警。

2月29日　广西平乐、梧州二府属发生暴动。

2月　刘敬安（静庵）在湖北武昌正式成立日知会，孙武、张难先、曹亚伯等百余人入会。该会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3月5日　清廷以各地群众反洋教斗争迭起，命各省文武各官，切实保护外国人财产及教堂。

3月14日　河南、山西、陕西留日学生电请撤销福公司办矿合同。

3月16日　浙江镇海英国教堂被毁。

3月25日　清廷从学部奏，宣示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全国教育宗旨。4月25日学部奉谕公布。

3月27日　河南西平县苗金声等反抗官吏勾结教会欺压平民，在八里庄率众起义。5月25日失败。

4月4日　山东济南、潍县、周村开为商埠。

四川巴州民变。

4月12日　江苏通州开为商埠。

4月14日　上海华新纱厂工人罢工，反对将该厂售予日商。

4月15日　江西巡抚胡廷干以办理南昌教案"贻误"撤任（江西布政使周浩按察使余肇康亦议处）。

4月16日　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定名为京汉铁路。

4月19日　湖南平江县民变。

4月21日　贵州独山，都匀乡民攻破都匀府署，释放囚犯，并发布揭帖，反抗洋教。

4月25日　清廷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归督抚节制。

4月28日　《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从此，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激烈论战，一直延续到1907年。

4月　孙中山自新加坡返抵日本东京。

5月6日　日本关东总督府自辽阳移旅顺。

5月7日　浙江仙居县贫民聚众抢米。

5月　同盟会本部派余诚回鄂组织同盟会湖北分会。刘静庵遂借"日知会"全体会员加盟，即以"日知会"旧址为会所，举刘静庵为总务干事。党务从此日益发展。旋派吴昆赴香港访黄兴磋商起兵计划，黄兴以军饷未备，嘱吴昆返鄂静候。

湘乡禹之谟受黄兴委托在长沙设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各界人士由其介绍入会者颇众，并代推销东京《民报》。

《复报》在东京出版，每月一期，田桐、柳亚子主编。该刊与《民报》相呼应，同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中国新报》论战。

6月5日　江苏东台学堂被捣毁。

6月7日　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资本初建时为二亿日元，总社设于东京，支社设于大连。

6月12日　杭州机匠反对"整规"罢工。

6月13日　北京贵胄学堂开学。该学堂章程规定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而将来之高级军官，亦必由此校派出。

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

6月17日　汴郑铁路竣工通车。

6月20日　中法议结南昌教案，订立善后合同，清政府赔款二十五万两。

6月23日　江西建昌府各地群众抢米。

6月28日　浙江省新城县聚贤堂黄道士集二百余人攻县城，焚教堂。

6月29日　因“苏报案”被囚于上海西牢之章炳麟，服刑期满出狱。当由同盟会迎往东京，旋主编《民报》。

6月　孙中山离日本再抵新加坡。命偕行之胡汉民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起草会章，扩充组织，入会者甚众。不久，到吉隆坡建立同盟会分会。

7月4日　江西瑞昌乡民因反对捐局委员苛勒，捣毁捐局。

7月5日　湖北罗田人张正金聚众焚毁安徽霍山教堂。7月19日，又率众攻城，揭“辅清灭洋”旗帜，遭清军镇压。

7月6日　江西吉安府乡民因反对清赋局苛征起事。次日，有数千人进城，要求减征，并捣毁火药库，割断电线。

学部咨各省添设法政学堂。12日，又咨各省举办实业学堂。

7月12日　考察各国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回抵上海(7月23日到北京)。

7月14日　江苏泰州饥民抢官盐栈。

7月15日　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欢迎章炳麟。

扬州饥民抢米。

7月17日　孙中山自吉隆坡抵芙蓉，与当地华侨座谈，对清政府之假维新予以揭露，指出它是由于“不能与(革命)风潮相抗拒……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并就中国革命是否会招致列强瓜分作了说明，指出：“瓜分之原因”是“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旋赴槟榔屿(庇能)，建立同盟会分会。又折回新加坡，稍后前往西贡。

7月20日　江苏扬州仙女庙镇饥民抢米。

7月21日　考察各国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回抵上海(8月10日到北京)。

7月26日　两广总督岑春煊扎拏时敏及亚东两报主笔(时敏报罚款，亚东报被封)。

武昌县乡民反抗苛征，殴伤知县。

湖北蕲州民变。

江苏新阳乡民结队报荒，有二、三千人捣毁县署。

7月28日　学部奏颁教育会章程十五条。

7月　同盟会员蔡绍南与会党首领魏宗铨等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交界之麻石开秘密会议，计划择期举义。

8月1日　豫、鄂、皖三省清军会剿霍山县张正金会党(时正围困霍山县教堂)。

8月7日　学部以留日学生已达万二三千人，通电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学生。

8月9日　贵州毕节红灯教冲入县城，攻打道署。

8月10日　同盟会湖南分会(本年五月在长沙成立)会长禹之谟被捕。原因是他率民众万余人安葬革命烈士陈天华、姚宏业，并领导湘乡学界抗争盐商浮税。被捕后惨遭酷刑。次年1月5日就义于长沙。

出使大臣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抗议设置关东都督府。8月19日、9月7日又两次抗议。

8月12日　袁世凯奏陈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8月18日　山西左云县乡民为抗议不法教民为非作歹，聚众冲入县城。次日，“传教士”与知县勾结镇压群众。群众被杀害十二人。

8月19日　端方、戴鸿慈面奏，宪法请仿日本，兵农工商请仿日德两国。

8月21京师大学堂行开学礼。

8月22日　清廷增置川滇边务大臣，派赵尔丰充任。

8月23日　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奏陈立宪，请先除满汉界限。

8月28日　清廷为立宪事特召开御前会议。

8月　同盟会员李实谋在四川江油起义。事泄，李率众退剑州，后为清军所败，李实牺牲。

9月1日　清廷颁诏预备立宪，声明俟数年后察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

上海煤气公司技工因要求提高工资罢工。

9月2日　清廷谕立宪之预备先行更定官制，派载泽等编纂，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

9月15日　以陆军会操于彰德，派铁良袁世凯为阅兵大臣。

9月18日　编纂官制大臣上厘定官制宗旨折。拟以内阁制代军机处旧制。

浙江乌程、武康、德清等县水灾，饥民抢粮。

9月29日　北京《中华新报》被禁封(因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干事彭诒孙主笔杭慎修递解回籍。

9月30日　铁良反对改官制，与袁世凯冲突，载泽劾之。

10月2日　学部奏颁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于每年八月举行，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

10月3日　岑春煊奏，“孙汶(文)在南洋各岛敛财煽乱”，定期举事。诏命各省督抚严防，随时查缉(另由外

务部电出使英荷大臣切商两国外部设法禁止解放)。

10月5日　学部定外人在内设立学堂,无庸立案(按:外人在国内设立学堂,本无条约根据,因有学部此文,外国教会学校以后遍布全国)。

10月7日　清军袭击萍乡、浏阳交界之麻石,会党首领李金奇死难,在沪之魏宗铨等闻讯返回湖南,密议于农历腊月底起义。

10月9日　孙中山自西贡抵日本。

10月13日　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军政、教育宜择要取法他国。

袁世凯编刊《立宪纲要》。

10月15日　云南留日学生创办之《云南》杂志在东京刊行,每月一期,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中间曾几次被迫停刊,共出二十三期)。

10月18日　日本关东总督改为关东都督府,本日成立。

10月21日　美洲"保皇会"宣布自丁未元旦起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帝国立宪会"(12月8日在《中国新报》上发布公告)。

10月22日　阅兵大臣袁世凯、铁良于河南彰德府检阅陆军秋操,10月25日阅毕。

10月27日　清廷从戴鸿慈等奏,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

10月28日　陕甘总督升允与德商订立建造兰州铁桥合同。

10月29日　清廷赐游学毕业生陈锦涛等三十一人进士、举人有差。

10月31日　留日湖南学生刊物《洞庭波》在东京刊行(1907年1月改组为《汉帜》。

11月6日　清廷厘定中央官制,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仍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立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增设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外,各部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改为给事中,并著以次设立资政院及审计院。各部尚书俱充参预政务处大臣。

11月7日　清廷命鹿传霖为吏部尚书,溥颋为度支部尚书,溥良为礼部尚书,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尚书,张百熙为邮传部尚书,寿耆为理藩部尚书,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荣庆仍为学部尚书,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

贵州贵定苗民罗法先等反对洋教,率一百三十二寨群众起义。

11月9日　清廷改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11月17日　练兵处议定先派陆军学生七十人赴日本游学(自后每年派百人)。

11月21日　清廷准袁世凯请开去电政铁路八项兼差,并收第一、三、五、六四镇陆军归陆军部统辖,第二、四两镇暂由袁世凯调遣训练。

11月23日　汉口江报馆被封。

11月25日　潮(州)汕(头)铁路通车,全长四十公里。

11月26日　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开成立会。

11月27日　江西萍乡县安源巡防营诱杀会党首领萧克昌,并封闭麻石起义总机关。

11月30日　清廷颁行禁烟章程十条,定期十年禁绝。

12月2日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民报》周年纪念会,到会数千人。章炳麟在会上读庆祝词,孙中山作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演说。

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各路会党首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起义事宜。

12月4日　同盟会员蔡绍南联合洪江会龚春台、魏宗铨等举事于江西萍乡、湖南醴陵龚。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名义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状,宣布革命宗旨:"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起义军很快增至三万人左右,一度控制四、五个县。起义消息传至东京,同盟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战斗,孙中山即派一些会员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策应起义。

12月6日　萍、浏、醴起义军攻克萍乡上栗市。

日本交还营口。

12月7日　浏阳洪福齐天会姜守旦举事,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恢复军"。宣称不受龚春台所部洪江会起义军之约束,并另发布起义檄文,号召四万万同胞"共复中原",完成"新中华大帝国。"

12月8日　龚春台率浏阳会党万人攻克浏阳南市街、西乡等地。旋进兵衡山、宜春、万载等城,屡败清军。清廷调大军五万围攻,起义军奋勇迎战。

12月9日　寓沪学界报界设立宪政研究会。

12月10日　清军攻陷萍乡上栗市。

12月11日　萍、浏、醴起义军攻打浏城,清军顽抗。

12月12日　清廷命江西臬司秦炳直节制三省军队,围剿萍、浏、醴起义军。

清军围攻浏阳南市街,萍、浏、醴起义军失败。龚春台、刘道一、王永求、蔡绍南等先后殉难,朱尔龙、刘家运

等被捕入狱。

12月15日　清廷命各省所练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

12月16日　萍、浏、醴起义军余部在文家市、黄沙坪等处为清军所败，起义群众逐渐解散。

上海绅商设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

12月17日　袁世凯派周学熙筹办滦州煤矿。

12月24日　安徽宣城饥民暴动，被知县屠杀二十余人。

12月25日　江苏昆山南翔饥民暴动，死伤多人。

是年春　四川同盟会分会在成都成立。初由同盟会总部派邓家彦来川建立组织，后由黄树中(黄复生)任会长。1907年前后又成立重庆分会，最初入会者有杨庶堪、石青阳　向楚等人。另在綦江、长寿、广安、井研、永宁等县均有同盟会组织和活动。

是年冬　孙中山与黄兴、章炳麟等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八个文件，备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

同盟会员李伯东与许佰昌、杨洛图于云南昆明创立兴汉会。

是年　同盟会本部派高剑父为江苏分会会长，合上海为一机关。由陈陶遗、陈去病、朱葆康、柳弃疾等主其事。设健行公学，进行革命活动。同时吴淞公学亦设有同盟会机关，由马君武等主持。1907年上海租界当局大索革命党人，同盟会活动被迫停止。1910年陈其美在上海重新整顿，又复开展活动。

胡鄂公、熊得山等二十余人于湖北荆州创立辅仁社。1910年改为共和会湖北荆州支部。

同盟会员吴春阳于安徽合肥建立同盟会组织，并创立“合肥学会”、“武毅会”等团体，开展革命活动。

同盟会员张汇滔、管鹏等在安徽寿州建立信义会，入会誓词与同盟会同，实为同盟会之别名。辛亥革命时，组织淮上军领导寿州起义，并光复皖北各县。

同盟会员程思普于安徽阜阳建立安仁会，入会誓词与同盟会同。辛亥革命时领导阜阳光复。

同盟会本部派黄光弼回闽组织同盟会分会，推郑祖荫为分会长。闽省会员于三月广州之役闻名牺牲者四十余人。

广州巡防营士兵谭馥(原为会党后参加同盟会)以反清为号召在营内成立保亚会，士兵多人参加。

陈炯明等在广东海丰创立五坡会，为同盟会外围群众组织。

同盟会员刘古香于广西柳州创办“龙城求是学会”进行革命宣传，嗣后在教育知识界发展会员，建立同盟会组织。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柳州同盟会负责人先后有王冠三、刘震寰等人。

同盟会员杨振鸿由日本回国于云南昆明建立同盟会组织。

同盟会浙江分会在杭州成立，夏超、顾乃斌任正副会长。

四川大足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萧德明、陈凤石、邹畏之等设立大竹书报社，实为同盟会革命机关。革命党人联络当地会党孝义会，并介绍该会首领李绍伊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孝 义会成员在垫江、大足等地组织同志军攻占大足、垫江、达县、巴中等地，建立革命政权。

同盟会本部派陈幼云在直隶保定组织同盟会河北支部，加盟者多为中学堂、陆军学堂学生和教育界人士。又成立“实行社”，后改名为“共和会”作为外围组织，以便开展活动。

四川留日学生主办之《鹃声》月刊在东主京出版。

河北省留日志士杜羲在东京创办《直言》月刊，内容与《洞庭波》略同。

外　交

2月12日　中日订立奉新电线借用合同。

2月25日　江西南昌发生民众因反抗法国传教士行凶杀人而毁教堂、杀教士案件。2月22日，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在天主堂宴请南昌知县江召棠，强求推翻前年了结的新昌棠浦旧案，以扩大传教特权。江召棠坚拒不允。王安之竟用餐刀、利剪将江召棠刺死。消息传出后，南昌全城顿时鼎沸，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2月25日，南昌附近各县民众数万人集合于百花洲畔，愤然反抗，连毁法、英教堂和学堂4处。击毙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等传教士6人、英国传教士3人。2月26日，英、法两国军舰驶入鄱阳湖，进行武力威胁。与此同时，法国派驻华使馆参赞，英国派驻九江领事到南昌进行“调查”，英、法驻北京公使也多次向清政府处务部提出无理要求。清政府媚外求和，竟于6月20日同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江西南昌教案善后合同》。根据这个“善后合同”，清政府处死民众龚栋等10人，分别判处徒刑27人，江西巡抚胡廷干、臬司余肇康、布政使周浩等人被革职，还赔偿法国传教士“恤银”5万两、教堂银25万两、医院银10万两。

4月22日　广九路议定中英合办。

4月27日　中英在北京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续订藏印条约》。

7月1日　中日订立鸭浑两江军用木植合同。

7月31日　日皇令设立关东都督府。日本改旅顺大连“租界地”为“关东州”。奉天日本军政署撤。

12月4日　中日订立交收营口条款。

军　事

1月19日　清廷置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署工巡局。

4月9日　巡警部奏准将绿营一律改为巡警。

10月2日　练兵处每年派学生百人入日本士官学堂。

10月20日　阅兵大臣袁世凯、铁良于河南彰德检阅陆军秋操。

11月21日　清廷准袁世凯请开去各项兼差，及收第一、三、五、六四镇归陆军部直辖。

经　济

4月28日　周廷弼发起的信成储蓄银行在上海开张。

4月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收买大纯纱厂。

5月27日　苏绅商议办苏省铁路，公举王清穆、张謇为总协理。

5月　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成立，9月广州（黄沙）至韶关干线动工（1907年7月通至江村，1908年9月通至银盏坳，1913年通至英德，1916年6月广韶段全线通车，长224公里）。

6月7日　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6月17日　汴郑铁路竣工通车。

9月10日　盛京铁岭、新民屯、通江子、法库门开埠。

12月17日　袁世凯命招股筹办滦州煤矿。

文　教

本年初　李伯元（宝嘉）著《官场现形记》一书30册在上海出版。《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1905年，全书共60回。1903—1905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同时由该报馆分5编于1903—1906年初相继出版，每编线装6册12回，共30册。作品以谴责晚清官场的黑暗为主题，描写了当时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他们有文有武，从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知县直至典史，虽然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而共同的特点就是见钱眼开，嗜钱如命。书中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贪赃枉法，对内残害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卑污灵魂，表现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勇气，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曾风行一时，影响甚大。全书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缺乏中心人物和情节；有些描写流于庸俗。书中对社会矛盾有所反映，表现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2月　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入学严加限制。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罢课抗议。一时通学返抵上海者达3000余人。为使回国留学生不致失学，留学生中的姚宏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实际由王抟沙主持。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等任教员。1906年4月10日正式开学，共招学生318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1907年，经各方呼吁，清政府拨给吴淞炮台公地200余亩，户部银行借银10万余两，浙江、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也给予捐助，兴建了新校舍。1908年组成校董会，弃民主管理办法，引起学潮。退学学生组成新中国公学，设于爱而近路（今安庆路）祥庆里。历两年，复归为一。辛亥革命后得孙中山、黄兴扶持。1915年商得河南福中公司年拨经费2万元。梁启超任董事长。1916年停办。1919年复校，设商科及中学，王家襄任校长。1921年张东荪为教务长，1928年设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院、预科。1932年淞沪战役后停办。1933年租赁临时校舍重新开学，熊克武任校长。后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逐年结束”。

4月　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下，《云南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当时在日本的云南留学生有200多人，大多倾向革命，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1月，孙中山为了扩大宣传革命的阵地，特地召见了云南留日学生吕志伊、杨振鸿、赵伸、李根源、罗佩金，提出要他们筹办《云南杂志》。初创时办事人员很少，张耀曾、席聘臣为总编辑，先后担任撰述的有三四十人。1908年，杂志社的规模空前扩大，在北京、贵阳、云南的9个县城以及缅甸的瓦城都设有分社，在全国39个城市派有杂志社代表。《云南杂志》自1906年创刊至1911年武昌起义结束，共发行23期，另外附刊《滇粹》1册、《云南杂志》是清末以省区命名的配合刊物中历史最长的一种。它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为主要宗旨，旗帜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分图画、专论、时评、译述、通讯来稿、调查、杂纂、文苑、小说、纪事等栏，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5月8日　资产阶级革命派刊物《复报》在日本东京

创刊。由柳亚子、田桐主编，撰稿人有陈去病、金松岑等。《复报》为月刊，大32开本，每期60页左右，约3万字。栏目有社说、政法、传记、历史、演坛、小说、文苑、音乐、歌谣、批评、谭丛、来稿等。其中文学作品占的比重很大。《复报》坚决维护《民报》的立场观点，积极宣传革命排满，猛烈抨击君主立宪，如《立宪驳议》、《驳梁启超书》、《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之驳议》等文章均登载此月刊。因此，享有《民报》"小卫星"的称誉。《复报》的前身叫《自治报》，用钢笔蜡纸刻印，每同一期，刊行了67期，改出铅印版，改名《复报》，刊行11期，1907年10月2日停刊。

本年　吴沃尧(趼人)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册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吴沃尧的这部暴露封建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小说，写于1903—1909年。1903年开始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发表，至1905年，连载至第45回。1906年开始印为单行本发行。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出版第8册，共108回。该书标为社会小说，署名我佛山人撰。书中以自名"九死一生"的人为线索，用第一人称历记1884年中法战争到20世纪初的20年中的所见所闻，对当时中国官场的封建官吏、"洋场"才子，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均有所暴露，书中人物亦间有实指，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品。

本年　清政府在学部设立编译图书局，专门从事编辑出版各类学堂教科书的工作。1907年春，编译图书局印行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修身教科书》第1册、《教授法》第1册，后来又出版多种。这些教科书，大半仿照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的教科书体例，但加入了许多不合儿童心理的古董教材，因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同时，编译图书局因管理不善，所出版的图书质量较差。

7月　英、美两国的5个教会团体在北京开办协和医学校。该校先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北京创办，后又有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内地会、伦敦教会医学会、英格兰教会参加合办。1915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新办，定名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为美国人马克麟。医学院的教师由外国专家担任，用英语教学，素以严格训练，高标准、高质量著称。学生须先修毕3年的医学预科课程，成绩优良并经入学考试，方能进入5年制的医本科，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协和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为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协和医学院1932年停办，1947年复校。1951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更名中国协和医学院。1958年并入中国医学科学院。1959年以原中国协和医学院为基础，建立中国医科大学。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7 年

导　言

一九〇七年因为两个人物而成为悲壮的一年，其实，准确地说是“二合一”的人物震动了相当一批有思想的进步人们，这确是得力于鲁迅先生的犀利之笔，但这两个人长期以来也确实成了某一时期的象征。这就是秋瑾和徐锡麟。

徐锡麟和秋瑾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先后举行的起义，但因为这次起义是光复会作为中坚力量而领导的在长江下游一带进行的起义，更由于徐、秋同属一个系统，互通声令，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称之为“秋瑾、徐锡麟起义”。这两次在当时并不成功，但这两个人的死确实震惊了一大批麻木的人们。

从一九〇七年开始，革命派同保皇派进行了大规模的论争。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双方往往因为一字一句而上公堂对簿。《新民丛报》和《民报》相互视之若寇仇。梁启超本不把一帮毛头小子放在眼里，未料甫一交手即觉大事不好，终于抵挡不住，偃旗息鼓。

孙中山依然在南部地区游荡，这次是会党首领首先找上门来要求合作起义，孙中山自然大喜过望，即刻筹款筹划黄冈起义。未料这些会党依然是散漫成性，以至于有把“四”误听为“十”的事情，结果大败而返，孙中山又一次在失望中叹息而返。

同盟会自成立后，由于孙中山注力于发动武装起义，使得会员之间联络并不十分紧密，尤其是孙中山主要在南部沿海活动，长江中游地域的会员们颇有微词，经过讨论，他们在东京又组织了共进会，但这并不是分裂。他们后来又在湖北建立了共进会，成为日后组织新军的重要组织。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革命、保皇之争**
- **●黄冈起义**
- **●秋瑾、徐锡麟起义**
- **●共进会**

革命、保皇之争

背景介绍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进一步开展起来。革命派十分重视舆论准备，认为这是促使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创刊时就发出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杂志。

但是，《民报》创刊以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内外的知识分子中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始终顽固地坚持早已破产了的改良主义路线，宣扬保皇，反对革命。同盟会成立后，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他们更是恐惧万分。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诋毁同盟会的政纲。康梁在通信中公然宣称："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与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故"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仇视革命的真面目。

保皇派的反动活动，成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孙中山明确地认识到：保皇党人"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他站在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立即组织革命派，对保皇派的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革命派和保皇派在国内外的二十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围绕同盟会的政纲进行的，其中论争最激烈的问题则是：推翻还是维护反动卖国的清政府的问题。

材料：

- ·论战
- ·种族革命
- ·政治革命
- ·社会革命
- ·革命利弊

材料一　论战

《民报》与《新民日报》是论战的主要对手，在南洋，则在《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展开。《总汇报》原是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报纸。1905年冬发刊，由陈楚楠、张永福主持。1906年春，转入改良派之手，改名《南洋总汇新报》。为了与之对抗，革命派于1907年8月20日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主持。这一时期，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锣鼓已经敲响，潦倒在海外的保皇派感到了希望，国内新出现的立宪派更加兴致冲冲，于是，海内外呼应，共同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6月，《总汇新报》发表《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一文，以向清政府要求召开国会为最高目的。同月，田桐向《总汇新报》发出进行"文战"的通知，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纷纷赶来参加，保皇派则从美洲请来了其地位仅次于康、梁的徐勤，双方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内容的许多部分和东京相同，不同点是：关于民生主义的争辩沉寂了，而"国会"、"立宪"则成为引人注意的新论题。

在其他地区展开论战，形成对垒的报纸为：

《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檀香山)

《光华报》与《商务报》(仰光)

《美洲少年报》与《世界报》(旧金山)

上述地区论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东京和南洋。据有关记载，由1907年至1911年的四五年内，檀香山的《自由新报》几乎无日不与《新中国报》展开辩论，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涉讼法庭：《大汉日报》和《日新报》之间的驳论竟发展至二百余续，形成马拉松式的笔战。

(选自《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

材料二　种族革命

保皇派否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康有为狂热地歌颂清朝统治

者的"功德",称颂康熙的"薄税"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梁启超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他要革命派"多从政治上立论,而少从种族上立论"。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问道:"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他一再声称,汉人满人都有好有坏,例如对"立宪",汉人有赞成的,作梗的,满人也有赞成的,作梗的,赞成、作梗,都与种族毫无关系。又说:满洲是中国国土,不是异国;满族二百多年来早已同化于汉人,满清入关是中国统治者的更迭,是爱新觉罗氏取代了朱氏,建州卫人取代了安徽人,不是中国的灭亡。梁启超批评革命派的排满论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愚不可及!

保皇派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欢呼。梁启超吹捧光绪皇帝说:"天相中国,诞膺我德宗景皇帝,滂沛德音,布立宪之政,以垂诸无穷。"在他看来,清朝统治者做到了这一步,就克服了任何种族或阶级的偏私,"若夫公天下之盛心,与夫规模措施之宏远,则未闻有圣圣相继如今日者也"。徐佛苏保证,只要有了一部宪法,满汉之间的不平等事实,都可以根据法律条文"消化"掉。《总汇新报》也连连许愿,立宪之后,就满汉平等,不会有什么"种族之嫌贰"了。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保皇派的攻击。他们指出,清政府是中国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罪恶渊薮。在清政府统治下,满洲贵族享有一切特权,而广大人民无丝毫权利之可言。士、农、工、商以至清军士兵,无一不受到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奴叱娼畜"、"厘金赔款"、"重征浮收"、"滥刑苛法","敲骨吸髓,十室九空,来日方长,其曷堪此"。对外,清政府则又奴颜卑膝,唯命是从,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驯服工具;督抚抑外人鼻息,利权任外人掌取,赔款代外人搜刮,教案听外人裁决,中国的利权、财权、兵权、交通权等全受外人控制。中国本似一完美之人,由于清政府的出卖,结果被帝国主义"东割一肺肠,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可见,以载湉为头子的清政府,"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鬻权所也"。这样反动卖国的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场汤止沸,抱薪救火",实际是向操刀者摇尾乞怜,决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保皇派把推翻清政府的民族革命说成是"民族复仇主义",这完全是歪曲和污蔑。

材料三　政治革命

保皇派认为,中国万不能建立共和政体。理由是:国家是平衡正义、调和利害冲突的团体。若在君主国,君主超然于人民利害之外,所以能调和人民的利害冲突。若在共和国,人民之上没有超然于利害关系以外的人,因此,除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富于自治性质,可以采取这一制度外,长期处于专制政体下的人民一旦采取这种制度,必然导致"下等社会;"猖獗,各持"个人主义"以营其私,形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最后,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专制制度因而复活。梁启超把这种情况叫做"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梁启超宣扬民族自卑观念,大肆诬蔑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不是顽固的老辈,就是一知半解的新进,"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要想追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难矣哉!结论是:中国国民没有实行议院政治的能力,中国政治不能采用共和立宪制。不仅如此,他甚至表示,当时中国人民连实行君主立宪的程度也没有,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即赋予一个拿破仑式的"开明"圣君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辅以管子、商君或俾斯麦、加富尔式的贤相,用专断的方式规定国家机关的行动。他说:"专制而为开明,开明而能专制,则其国家机关之行动,极自由,极迅速,而影响于国利民福者极大。"

针对保皇派否定暴力革命的谬论,革命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革命派质问道:"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反动势力每天都在采用各种手段杀人,"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与其为野蛮异族政府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他们明确指出,现今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乞望它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而人民动手改革,它又必然以"极其残暴之手段",予以镇压,因此,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证明,无论求共和,还是求君主立宪,都只有通过流血斗争才能达到。保皇派一贯以英、日两国的君主立宪制作为榜样,认为是无血之革命。然而,"试一翻两国之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于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可见,不采取铁血之革命,决"无以争权利,捍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而犹断断于杀人流血之惨怵焉不敢为,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据此,他们强调指出:"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终古成长夜矣"。"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保皇派反对暴力革命,实际就是妄图阻止"吾民方张锐进之气",使中国人民永远陷于痛苦的深渊。

材料四　社会革命

保皇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梁启超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欧美不同。欧美贫富悬隔,已经陷于不能不革命的穷境,中国则中产之家多,特别豪富之家少,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行平均相续法,赋税极轻,因此,只须实行社会改良主义,"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

以发达进化”。

为了反对“平均地权”，梁启超竭力美化封建土地所有制。他胡说什么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它一无贵族压制，二土地极为平均，三“赋税极轻”。在这种制度下，“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几无土地兼并之患；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他又为地主占有土地进行辩护，说地主之所以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的，他们的地租剥削，乃“我或我祖、父勤劳之结果”，完全是“正义之权利”。况且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不仅在历史上有其理由，不能“蔑弃”，而且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革命派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取现今经济组织之基础，破坏其重要之一角。”因此，他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

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并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但是他们却以鲜明的态度，回击了保皇派的攻击，维护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正是由于地主垄断土地，才造成“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的惨况。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当时的中国，“核民之数，富者寡，而困苦者不可亿计也。相民之财，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众者，什一而已矣”。那些大地主，“高语仁义，哗言功利”，残酷地掠夺人民，劳苦人民终年耕作，“汗被体，泥涂足，岁云秋矣，主田者坐而视仓箱之盈”，像中国北方的农村，实际上还是“农奴制度”。农民不仅每年拿出十分之七的东西奉献给地主，而且像终身奴隶一样，“生杀予夺”之权都操在地主手里。据此，他们严正指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劳动之人，义务既重，权利转轻，徒手坐食之人，义务既薄，权利转优，而劳动之人，转制于徒手坐食者之下，是为人权之失平。”所以，“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

材料五　革命利弊

革命派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改良派则认为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必然要导致亡国；只有请愿、要求、劝告才是正当的手段。

保皇派说：民气如火，善用之可以克敌，不善用之可以自焚，一暴动起来，不管发动者如何文明，各地难免没有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列强就会以之为借口，假定乱之名，行瓜分之实。

革命派说：这完全是杞人之忧。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列强是有借口的，但是并没有实行瓜分。其原因在于列强之间形成了一种“均势”，“互相牵制而莫或敢先发”，正如投骨于地，众犬相争一样，“其究必至于相噑相扑而反置所争之骨于不顾。”

革命派又说：倘若革命象义和团那样“高揭扶清灭洋之帜”，搞“野蛮排外”、“不正当之排外”，使用“国际法”所不许可的手段，那列强是会干涉的；但是，如果革命仅限于单纯的国内问题，排满而不排外，或者是一种“正当之排外”，与各国政策无妨，于外人物业无扰，“又善守国际法”，那么，列强是会保持局外中立的。他们甚至表示，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革命“以维持世界平和为义务”，黜专制、申民权是各国通则，列强怎么会干涉呢？

保皇派是软骨头，他们被帝国主义的武力吓住了。康有为说：法国 1789 年革命时，欧洲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白人纷纷，虎视逐逐”，“兵舰炮队，皆经百练”，中国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帝国主义呢？其结果必然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使有人幸存，也要成为白人的奴隶牛马，“此则吾国革命后之效果矣，然则呶呶言革命何为哉！”

革命派感到背后有人民支持，因此有些胆量，说是：“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他们认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因此，只有排满，只有革命，才能免除瓜分之祸。

保皇派又说，革命还会引起内乱。他们竭力丑化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革命，认为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蒙革命之害者动辄百数十年。康有为并以法国革命为例，说当时人们都如同野兽，结果是流血百二十九万，大乱八十余年。他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康有为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改良派仇视人民、害怕人民，竭力反对人民起来革命。

革命派则认为，革命决不会引起内乱。他们自信可以掌握局势，天真地说：现在革命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帝制自为，而是为了建设民族的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因此，可以尽除历史上群雄相争、相夺、相戕的陈迹，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而避其轧轹，为中国革命史开一新纪元。

保皇派竭力渲染革命过程中的流血现象，说是将会出现“杀人盈野”、“以血为渠”、“全国糜烂”的局面，甚至造谣说：孙中山讲过，大革命后，四万万人会死掉一半，至

少也要死掉三分之一。

革命派说：没有那么严重。革命的目的在保国而存种，这是"至仁之事，何嗜于杀"？他们指出，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也在数百万以上，其他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等原因者更不可胜计。据此，他们有力地质问改良派道："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保皇派说：最正当的斗争武器是请愿、劝告、要求、不纳税，顶多，不得已时，采用暗杀。梁启超声言："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而俄人虚无党故事，抑亦济变之手段，最后之武器也。"

革命派说：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不纳税与暗杀不过是革命实力的一端，革命必须有全副事业。他们指出：革命必然要遭到统治者极其残暴的压抑，因而，就必须以"相当之能力"反抗。急病不能缓治，英国立宪，日本维新，都免不了要杀人流血，免不了有"恐怖时期"。离开了"黑铁"和"赤血"，就不会有革命的成果。

（摘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国史学会编）

黄冈起义

背景介绍

一九〇六年，孙中山自日本至新加坡。通过张永福介绍，许雪湫和孙中山相识，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同年冬，许偕余丑、余通、陈涌波等到香港，向冯自由表示，筹划已渐次成熟，要求致电东京，请孙中山派人回国协助。孙中山接电后，派乔义山及日人萱野长知等到港，就近协助。

许雪湫即在宏安乡自宅召开会议，定期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九日分头大举。由于饶平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只得命令各部分散待命。五月下旬，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有会党二人为清廷捕去，当地同志极为愤激，要求立即举事营救。冯自由、胡汉民均劝静候孙中山命令但五月二十二日，起义提前爆发了。

材料：

- 黄冈之役

材料　黄冈之役

黄冈是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的一个大镇，地处岭东，市况繁荣，为闽、粤两省交通孔道。当地三合会势力很盛，其重要头目为许雪湫。

萍、浏、醴事起，许雪湫跃跃欲试。他到香港见冯自由，介绍余丑、余通加入同盟会，要求电告孙中山，起义条件已渐次成熟，请派人协助。孙中山接电后，派出了廖仲恺、方瑞麟、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起义订于1907年2月19日（正月初七）分头大举，聚集饶平、揭阳等处会党合攻潮州。届期，浮山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其他各路也因之未能发动。数日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金福等被清吏捕杀。许雪湫到香港，通过冯自由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复电：此后起事，必须与惠州及钦、廉等地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雪湫便留驻香港，等候消息。

此后，许雪湫得到新加坡张永福、陈楚楠等人所捐巨资，孙中山又计划派萱野长知运械至黄冈附近的汫洲港，便订于5月25日再次起事。不久，风声渐露，清黄冈都司隆启发现会党数十人形迹可疑，要求潮州镇总兵黄金福派兵缉捕。5月初，清吏捕去会党二名，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要求举事，为胡汉民、冯自由劝阻。同月21日，黄金福派守备蔡河宗带防兵二十名进驻黄冈，适值当晚商民演戏，防兵在台前调戏妇女，捕去出面干涉的党人二名，并拟搜查余通所开设的泰兴杂货店总机关。因此，矛盾激化，余丑、陈通波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主张先发制人。

5月22日晚，余丑聚集七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誓师起义。陈涌波为前锋，由北门攻入，围攻都司衙门。战斗中，忽降阵雨，义军所用多为旧式鸟枪，弹药尽湿，陈涌波便改用火攻。在熊熊烈焰中，陈涌波叱咤冲突，冒着枪弹指挥，血战一夜，攻克黄冈，生擒都司隆启等。次日，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以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文告，宣称"为官府苛税，民甚难堪，专欲除暴安良"，并颁发纪律十余款，大体仿照《革命方略》。内有"私藏口粮者罚"一款，显然是下层贫民极端平均思想的反映。军政府通令各商店照常营业，无须惊扰。由于当地米价昂贵，每升售钱八十文，军政府限令以五十文出粜，不得多取，因此，"附近贫民从之者甚众"，并有滨海渔民乘船前来参加，起义军迅速发展至五六千人。此外，军政府并要求地方殷富交献银米，据报道："富室均被勒提军费，为数甚巨"，"一廖姓者二次被勒，至有三四千元之多"。

由于余丑等并不了解通盘计划，攻克黄冈后，革命党人或主速攻潮城，或主进攻诏安，久未决定，这就给了清军以从容备战的机会。粤督周馥一面电责黄金福，令其立功自赎；一面派水师提督李准率水陆队伍继进；同时要求闽浙总督松寿拨队防堵。25日，许雪湫的助手陈宏生赶到，被推为临时司令长。当夜，陈涌波出击进驻汫洲港的黄金福军。黄军据垒顽抗。起义军所用土炮，威力不大，至第二日午，死伤数十，命人向黄冈乞援。于是，余丑披发痛哭，动员群众，义军大受感动，身带双刀，背着湿被棉胎，

准备肉搏。战斗中，人人奋勇争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清军援兵赶到，起义军腹背受敌，加以弹药告罄，不得不下令退却。

5月27日晨，经陈涌波、余丑等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解散义军。余丑等由海道逃往香港。

当起义军发动之际，许雪湫于25日赶到汕头，与萱野长知等计议发动丰顺、揭阳、惠来、澄海各地会党响应。27日，得悉起义失败，便计议炸毁李准所乘运兵轮船，以图再举。因防范严密，未能得手。

5月28日，清军进入黄冈，搜获余丑等遗落的党人名册，按名逮捕，惨杀二百余人。东灶乡民因曾为起义军煮粥，被黄金福用炮轰击，"惨毙多命"，事后，黄竟以"攻破匪乡，击毙匪党，尽获全胜"上报。29日，李准率军赶到黄冈，下令"追剿"，又捕杀起义军多人。

（摘自冯自由《革命逸史》）

秋瑾、徐锡麟起义

背景介绍

萍、浏、醴起义也鼓舞了在长江下游活动的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光复会员和归国的胡瑛、宁调元、杨卓林等同盟会员集会，计议协同动作，秋瑾承担了在浙江方面发动起义的任务。

秋瑾回到绍兴，住大通学堂，和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约定，在湖南革命党人起事后即出为应援。2月1日，秋瑾亲至金华，联络会党首领。不久，回到绍兴，获悉刘道一及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先后失败的消息，决计独力行事。

3月（正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开学之际，为了表示自己开明，绍兴知府贵福及山阴、会稽两邑县令均到堂祝贺，贵福并赠"竞争世界、雄冠地球"一联。以此为掩护，秋瑾畅所欲为。她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军队和浙江武备、陆师、弁目等学堂学生，介绍朱瑞等参加了光复会。4月间，再次游历金华、处州。回绍兴后，函招金华、处州一带会党首领到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到者约百余人。她将职员分为十六级，用七绝诗"黄河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作标志，黄字为首领，徐锡麟等五人担任；河字为协领，秋瑾自任；源字为分统，会党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分任；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5月中旬，秋瑾编各地会党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她和大家商定，7月6日金华首先起义，然后处州响应，趁杭州清军出攻之际，以绍兴义军奔袭杭州，军、学界中的同志为内应；如果杭州不能拿下，就返军绍兴，由金华、处州进入江西以通安庆，和徐锡麟呼应。未几，秋瑾将起义日期更改为7月19日。

材料：

- 刺杀恩铭
- 大通之役

材料一　刺杀恩铭

1907年7月6日。安徽省城正是炎热的夏日。这天是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学堂内外，装点得焕然一新，喜气洋洋。省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堂长徐锡麟身穿黑羽警官制服，腰佩军刀，带着陈伯平、马宗汉二人，一早就在学校各处巡视察看。此刻，他心事沉重。因为他今天不仅要装模作样地迎接省里各大员，主持学堂毕业典礼，更重要的是他要借此机会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然后发动武装起义，占领安庆，联络浙江同志，形成浙皖同时起事的形势。成败在此一举，岂能不使他格外的感到责任重大。

为了动员巡警学堂的学生参加革命起义。徐锡麟先召集全体学生到大操场上集合，然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含意深刻的讲话。他说："我这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大家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都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接着，他向大家暗示，他今天将要采取救国的特别行动，说："我为了救国二字，不敢自处于安全的地位，所以有特别意见，再有特别办法，打算从今天起开始实行。"徐锡麟的这些话，深深感动了许多学生，但只有那些已秘密参加革命的同志才更深切地了解其中的深刻含意。

上午8点，安徽巡抚恩铭最先来到学堂。恩铭平时多在午后才到，今天却来得这么早，不由不使徐锡麟感到吃惊。恩铭含笑对他说："徐道台今日戎装，更有气概。"徐锡麟道："今天是学生毕业大典，大帅又亲自驾临，应该这样穿着，以示隆重。"说完，他高度警惕地引导恩铭去检阅学生操练。

九时，典礼开始。恩铭等刚就坐，收支委员顾松急步趋前，竟欲告密。徐锡麟见事急，向前行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愕间，徐锡麟已从靴统内拔出手枪两支，以左右手同时向恩铭施放。因为近视，不知道是否命中，便连续发枪。恩铭身中七弹，被侍从匆匆背走。徐锡麟等处死了顾松，拔刀而出，走到礼堂，拍案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抓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不知所为。徐、陈、马三人执刀、持枪，挟持着学生进至军械所，取出枪炮，多不能使用。这时，清兵已将军械所包围，冯煦等悬赏七千金捕拿徐锡麟。自十二点钟激战至下午四时，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俘。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的，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等骗以仅受微伤，徐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听到这句话，徐锡麟忽然领悟，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下。接着，徐锡麟执笔自书供词，指斥清政府立宪其名，而集权、专制其实，声言“专为排满而来”，“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供词中，徐锡麟也暴露了他和孙中山的矛盾，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行前，先拍小影，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死后，清吏竟把徐锡麟的心挖出来，祭礼恩铭，肝则被恩铭卫队炒食，表现了无比的野蛮。

8 月 24 日，马宗汉被杀。

（摘自经盛鸿《民国暗杀要案》）

材料二　大通之役

一九〇七年农历正月，绍兴大通学堂师生一致邀请秋瑾主持校务。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等于一九〇五年农历八月创办的，以提倡军式体操为由，请准绍兴官吏，募款购买后膛九响枪五十支，子弹二万发；一面密告龙华平阳首领，选派干部，到大通学习军事，并聘武备学生张健、魏励劲二人为军事教员，以等待发难时机。自从徐锡麟留日以后，堂内继任的余静夫、曹钦熙等不了解会党秘密，致引起风潮。等到秋瑾来校主持后，同学师生间的矛盾渐渐解决，学习情绪也安定下来了。

秋瑾一面尽量维持大通，一面与平阳龙华首领联系。义乌吴谦林、金华徐顺达、武义周华昌等亲受感化，自愿服从领导。同时，她又运动军队、浙江武备学生、陆师学生及弁目学堂师生。于是周凤岐、俞炜、朱瑞、许耀、叶颂清、徐士镳、魏励劲、张健、傅孟、周亚卫、徐光等浙江军队干部参加了光复会，组织逐渐扩大，声势也随之雄厚了。

为了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秋瑾就编制光复军制，并铸成金指约，上面分刻文字，颁给干部，其文字为一首七绝：

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

金指约上所铸的字，都是干部的代名词，例如“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推秋瑾担任；“源”字为分统，推王季高（名逸，乳名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分任；“溯”字为参谋，等等；但分统以下，一职不止一人，就在源字傍加 A、B、C、D……符号，因此分统指约，有源 A、源 B、源 C、源 D。在秋宗章的《秋侠史实考证》里，这首诗第二句第四字为“原”字，第三句第一字为“不”字，第三第四字为“胡”“奴”，第四句第三字为“华”字、其他书籍，更有不同。我是根据当时参加这个组织而得到“辕”字标记金指约的吴惠秋老同学所回忆而写上的。吴当时掌理机密，是不会错的。

秋瑾同时编龙华、平阳兄弟为光复军，并手订了军制军规。

在光复军制颁布的同时，秋瑾复亲撰了一篇论文。

军制既定，枪支弹药，大通已储积一部分，杭州军界方面，与绍属、金属、温属会党方面，都诸事齐备，秋瑾以万分热情，写了一篇《告同胞檄》，另外还准备了“告示”。这三篇重要革命文件，准备在起义前夕秘密铅印，分发张贴，以发动广大群众，推进革命浪潮。

光复军组织既已就绪，积极训练，战士们反满清绪高涨，技术进步也很快。秋瑾频到杭州，有时住过军桥荣庆堂客栈，有时寓西湖岳坟街“刘果敏公”祠内镜清楼（光复后，秋社同志改名“秋心楼”，抗日战争时坍毁），邀集同志会议（有时在白云庵、紫阳山顶或将台山顶，有时也在西湖船中，更有时借我家开设在大井巷口的悦济衣庄内）。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王金发、竺绍康等均在座，我家姐妹也有几次参与。决定浙江由金华会党首先起义，北与安庆徐锡麟，南与惠州邓存瑜遥相呼应。约期一九〇七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后改二十六日），浙皖同时进军。刚过端阳节，秋瑾到我家乡崇德，与家姐商筹军饷。姊氏倾全部首饰，约值黄金三十多两相助。

秋瑾回绍兴，转金华、武义，发布五月二十八日起义命令，通知巡风聂李唐作准备。聂在无意中泄漏机密，传至武义县城，知县钱宝镕急报浙江巡抚求援，就派兵在聂家搜出会党名册，牵连大通学堂。金华、兰溪的会堂也遭波及，革命计划完全泄露了。徐锡麟于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在安庆刺死巡抚恩铭被捕后，浙江巡抚张曾敭及绍兴知府贵福得绍兴劣绅而素为秋瑾鄙弃的吴道南等的密报说，秋瑾与徐锡麟、竺绍康同谋。张曾敭就定于农历六月初二密谕浙江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之率领士兵三百多人，向绍兴进发。李益之怕新军与光复军有联系，出发前严密检查士兵，造成营中纷扰。事为武备学堂学生探知，即赴绍密报。秋瑾初三得讯，就指挥大通同志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然后回家，将和畅堂保存之文卷、信札及书籍尽付一炬。

农历六月初四上午，王金发从嵊县来，协商善后。午后知清兵已入绍兴，大通学生劝秋瑾离堂暂避，但秋已决心殉难，即遣散最后一批同志，而程毅等数人坚不肯去，甘同进退。这时内奸蒋纪（又名纪云）忽从兰溪来，纠缠索费。贵福及李益之即率领新军，包围大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闯入学堂。两位同学英勇抵抗，终至牺牲。而秋瑾与程毅（教师）、徐颂扬（学生）、钱应仁（学生，浙江人民出版

社的《秋瑾》，误作应饯仁)、吕松植(学生)、王植槐(学生)、石宝熙(学生)、蒋纪(职员，内奸，后亦判刑一年)都被捆绑，解入绍兴府衙门。秋瑾拘在卧龙山女狱内，未几被贵福提去审问，百问不答。最后讯以朋友姓名，就答："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贵福遂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语。贵福以李钟岳不肯逼供，势难深文周讷，逮捕党人，乃改派幕友余某严讯。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的豪语，咬牙闭目，忍受酷刑。余某得不到革命秘密，只得用伪造供词，强捺指印结案。

贵福就令会稽知县李瑞年，在六月初六日(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一早，向监狱提人。秋瑾见灯烛辉煌，士兵成群，就向李瑞年说："我有三个要求：一、写信给家人亲戚朋友；二、临刑不能脱去衣服；三、不要以首级示众。"李答允二、三项要求。秋瑾乃于是日上午四点钟在轩亭口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三岁。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共进会

背景介绍

共进会在一九〇七年八月成立于日本东京的清风亭。"'共进会'三字是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的道路。"参加共进会的多是和会党联系较密切的同盟会员，他们不赞成同盟会总部注重在华南沿海起义的战略，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他们不满意同盟会组织涣散、行动迟缓的局面，主张建立一秘密机构，突飞猛进。共进会的主要宗旨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对于"平均地权"不仅不关心，而且还以会党群众不易理解为借口，把它改为含糊不清的"平均人权"。共进会的组织也很严密，设有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各部，分工负责，开展工作。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为张伯祥。一九〇八年后，共进会员纷纷由东京回国，运动会党，准备起义。他们将长江一带的会党改为统一的中华山，并把共进会的仪式定为山水堂香。他们还推定了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苏、河南等省指挥革命的都督，并制定了自己的军旗。但是各地共进会组织成效甚少，只有共进会湖北分会工作扎实、领导有力，取得了较大进展。他们联络武汉一带会党，组成五路大军，密谋起义。但由于指挥不一，行动错乱，几次起义均遭失败，致使会务一度停顿。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刘公等人并未因此而灰心，他们认真总结失败原因，感到单纯依靠会党不行，"只有从运动新军入手，利用敌人的实力，转而为革命的劲旅，这样借矛夺盾的方法，确是上策。"于是将发展革命组织的对象转为新军。一九一〇年冬，孙武为了响应黄兴等在广州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将武汉的许多小团体如德育会、忠汉团、竞存社、将校研究团等并入共进会，成立共进会鄂部总会，由刘公、孙武等领导，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成为与文学社并驾齐驱的主要革命团体。

共进会成立后，黄兴曾认为是分裂，责问焦达峰何故立异。"达峰曰：'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兴曰：'如是革命有二统，将谁为正？'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们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兴爽然无以难也。"这显然是要和黄兴比赛一下，含有独树一帜的意思。但就当时具体背景而论，同盟会总部无力指挥全局，在东京的许多同盟会员"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共进会，不从同盟会游离出去，不能称为分裂。共进会的人回忆说："共进会谓为同盟会内部的行动队也，谓为同盟会的实行者可也。"至于文学社，本来就是由湖北的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许多人原来是同盟会员，只能说其是同盟会内部的一个小团体。应该说，在同盟会指挥全局不灵的情况下，出现文学社与共进会全力去推进革命，这促进了同盟会工作的展开。

材料：

- 东京共进会
- 共进会宣言
- 湖北共进会

材料一　东京共进会

清廷在同盟会成立后，大为震惊，令驻日使馆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严加注意；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协助取缔，和迅速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本政府便突然办了丰盛的酒宴，为孙中山"饯行"，借以迫使他离日。孙中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再在日本居留下去，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将同盟会会务交给黄兴、胡汉民等继续进行，自己就到广州和南洋各地活动。

当时革命运动的开展，偏重在华南方面，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并且是用和缓手段，希望侨胞捐纳经费，维持会务，逐渐推动形势，稳步前进。因此，一般急进的党人对于这种情况，颇有不甘忍耐下去之势。这样，在同盟会内部就无形中埋下了分立门户的根子。自从孙中山先生离日以后，同盟会内缓进和急进两种主张的不同，很快呈现为组织上分化的趋势。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学生李书城、朱绶光、耿伯钊、张华甫、范绩熙、何成濬、李烈均、阎锡山、黄郛、张凤翔等十人组织"丈夫团"。又有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等拟将同盟会本部改组，联合各省忠实同志

先组织“联合会”，集中人力分途进行，但名称尚未决定。至一九〇七年三月，由刘揆一邀集各省同志开谈话会，征求意见，当时一致赞同，公推云南吕志伊为临时主席，素有声誉于会党的张伯祥为副主席，约定五天后正式开会。及期、吕志伊忽躲避不到，到会的会员以吕失信，会议遂告流产，内中张伯群更是愤愤不平。在散会的归途中张与邓文翚、彭汉遗商量另行结合同志，别图进展，就于某日会于神田区四川舒祖勋寓处。这天到会的有湖南焦达峰、陈作新，江西邓文翚，安徽方潜等数十人，都一致赞成采用“共进会”名义，建立革命机构，公推舒祖勋、邓文翚两人起草宣言和章程。数天后，在清风亭开成立大会，凡是中国留日学生赞成这个组织的均可随时参加，参加的计有湖北刘公、居正、杨时杰、刘英、刘铁、宋镇华、彭汉遗、袁麟阁、冯振冀、郑江灏、冯亚佛、李基鸿、张次青、李国骥、张公道、许汉武、彭惠群、王炳楚、向寿荫、李寿泉、罗杰、董祖椿，四川吴永杩、吴文叔、何枢垣、王正雅、张知竞、翟蓬仙、雷桂臣、熊克武、秦蓬生、贯晓辉、何其义、晏祥五、陈宗棠、周滔荪、李香山、胡香白、刘锡华、李策安、佘竟成、李肇甫、薛晋贤、唐敖、谭毅公、张治祥、喻培伦、郑襄臣，湖南覃振、杨晋康、潘鼎新、钟剑秋、黄小山，江西彭素民、黄格鸥、汤增璧、曾小岩、邹怀渊、卢式楷、文群，浙江傅亦僧、陶成章、张恭、龚味莼、金鼎、王军，广东聂荆、熊越山、陈兆民、夏重民、孙光庭、黄霄九，广西谭嗣黄、刘玉山、黄镕、邓鸥肇，云南王五、赵声、张大义、乔宜斋、杨鸿昌、杜恒甫，安徽孙作舟、方汉臣等共计百余人，公推张伯祥为会长，其他职务，各推会员担任。

共进会的会址，先在居正、罗杰寓所，后又迁至青山区华群学会。工作先从团结会党入手，再联合军学各界，以厚声势。会章宗旨一如同盟会，惟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二　共进会宣言

共进会成立时发表了两个宣言。白话宣言的原文如下：

“我们这个会，为什么叫共进会？——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单就我们这个团体说，就是在会的人，个个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一个事业，不可一人别怀他样的异心；就本会以外说，凡是我们同样的，不论他叫什么会名，我们总要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共同去做事业。所以这共字，就是和我们全中国各种会一同去做的意思。至于这个进字，就是要增进我们会员的知识，把从前那些做偏了、做小了的事丢开，再寻一个正正大大的题目去做；我们知识，就是要认清这个题目，把题目认清了，就赶紧去做。但是要有进无退，而不许有一丝毫的懈怠心。那题目好比射箭的垛子，我们眼睛把垛子认准了，把我们的身子就当作一根箭，如飞一般，务要钉在那垛子上，若是稍有一点躲闪，就半路落将下来。所以我们起这个进字，前一层是进我们心中知识，后一层是进我们的身子去做那知识上认定的事，这是我们取共进二字的意思了。

“我们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到了明朝崇祯的时候，那东边的夷狄满洲的满种，忽然强起来，趁我们中国有难，就乘虚杀进来，把我们汉种人杀得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就是由那时，做了中国的皇帝，把杀不完的汉人，当作他们的奴隶，随便虐待。——若是守我们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驱逐满人，世界上就称我们为革命的英雄。

“有些人说：这人虽是鞑子，但他已经在中国做了二百多年的皇帝，只要相安无事，又何必定要排他呢？这句话实在大错，怎样说呢？满人进关的时候，杀我们的祖宗，奸淫我们的祖姑，占了我们汉族的江山，把他那些贱种当作贵种，世代封王，又派一贼种分住各省要地，叫作驻防，防着我们汉族，好象防贼一般，这就是已经可恶了。他还要吃着穿着我们的哩。又放些贪官污吏替他来收粮征税，我们辛辛苦苦赚点儿钱，白白送给了他，还是不够，或者加一个罪名，还要断送我们的性命哩。这样看来，满人到相安，可是汉人一日也不得安呵！况且他们到如今朝纲紊乱，只有奉承洋人，跟洋人作奴隶，拿我们给洋人做第三层奴隶；又把我们的土地，今天割一块来送这个，明天割一块来送那个，若百姓和洋人闹起来，他不但不替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到[倒]要对洋人杀些百姓出气。动不动就要讲赔款多少；铁路也送给洋人，矿产也送给洋人，关税也送给洋人。你看近来各项东西都越过越贵，生活一天难似一天，不是一些财产都被洋人搬穷了吗？这满人，他只顾请洋人来保护他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只可怜我们汉人，白白替别人做世界，做也做不了啊！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最后落到洋人手中，那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们受当得住么？还能够把中国拿回么？请看现在洋人对中国人就是这样利害，将来若让满人把中国送给他，难道不把汉人斩尽杀绝吗？

“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

“我所以要劝告我们同胞同党，不可分门别户。须要晓得我们是汉人，同是轩辕黄帝子孙，全中国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象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哥弟知识，共拼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

“还有一句要紧的话，我们革命，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本来这外国人到了中国，没有好心，但是我们只要把满人杀尽，把中国整顿好了，那时他也就不敢欺凌我

们了！

“革命本是英雄事业，应该要守着大家公订定的公法，才算是英雄的本领。

“以上所宣说的这些话——就是要大家赶快去做，再等些时候，就恐怕来不及了。”

文言宣言原文如下：

“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百兆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当奋起，以雪累世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

“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吾同胞甘心恭顺，愿认仇贼作父，则亦已矣；若不然者，当应抚胸自问，犹有热血，则杀我祖宗者，即在眼前，当必愤火中烧，应该挥刀直前，以图报复。昔时有齐桓公复百世之仇，宿恨方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气，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无论男女老幼，不论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太平天国讨满檄文有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何其壮也。功虽未竟，亦其杰矣。我共进会当继承其志，以竟其未竟之功，然后可以上对祖宗，下垂后人，以齿于圆颅方趾之俦，皇天后土，实鉴斯言，弟兄袍泽，有如此约。”

（摘自《辛亥首义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三　湖北共进会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东京共进会会长邓文翚因事回国，通过大会决议，公推刘公继任第三届会长。同年冬天，孙武、焦达峰、彭汉遗亦先后回国，根据东京共进会决议的革命运动方略和多头进展的方针，各归本省秘密活动。

孙武等到达汉口后，湖北的同志如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刘英、宋镇华、袁菊山、郑江灏、钟雨亭、李白贞、刘燮卿、吴肖韩、汪性唐、刘玉堂等，集会欢迎，详询东京共进会组织和经过情况及现在进行活动的方针任务，都一致热心拥护，志愿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止。最后决定先行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以便号召，共策进行，积极准备，筹划经费。这时同志们都以为革命运动已经有了基础，精神愉快万分，分头联络长江南北会党，以充实革命力量。

同时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学会会员张翚飞、吴祉贞、任本昭、蒋作宾、刘一清、黎本唐、石星川、姜明经、杜锡钧、夏占奎、王占海等人皆表同情于共进会，约定先后回国，协助进行。他们本来都是同盟会会员，希望湖北共进会早日成立，共襄大举。这时焦达峰以湖北方面已有头绪，就回到长沙进行组织湖南共进会，和湖北共进会互相策应，携手并进。

湖北共进会在未经正式成立以前，先建立下列四个通讯机关：（一）汉口河街新大方栈，派刘玉堂负责；（二）汉口一码头湖北日报馆，派郑江灏负责；（三）汉口汉兴里七十三号，由刘燮卿负责；（四）武昌磨子桥，由吴肖韩、潘善伯负责。

又假汉口新大方栈，召集会员刘铁、邓玉麟、彭汉遗、江树之、谢石钦、丁立中、李白贞、潘行一、潘公复、黄申芗、郭抚宸、方建霏、刘明华、牛权、涂耀枢、姜明经、黄元诰、叶于兰、李德安、周复生、吕惠群、李复权、汪钰等会议，决议各自负责，分途联络群众，征求会员，为湖北共进会打好基础。

又派黄申芗、刘玉堂等吸收会党组织，秘密编成五镇军队，每镇以一副都督统率之。兹将副都督及驻扎地点列下：第一镇副都督袁菊山，驻扎襄、樊一带；第二镇副都督刘英，驻扎德安、安陆一带；第三镇副都督刘玉堂，驻扎汉口；第四镇副都督黄申芗，驻扎兴国、大冶一带；第五镇副都督刘汉一，驻黄州。以上五镇军队，内部编制，由副督统各自处理，正督统一职由孙武担任，总部设在汉口鸿顺里三十四号，不过武器暂时不能完全配备，只好待将来陆续设法补充。

（摘自《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历　史　内　幕

安庆起义内幕

徐锡麟一九〇五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拟进日本陆军联队学习，未得许可，继又投考振武学校，因患眼近视不及格，最后乃改投警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即积极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为了从统治阶级内部取得政权以加速革命进程，烈士于一九〇六年向清廷出资捐得道员，分发安徽试用。同时，并利用人事关系请他的表叔俞廉三写信给安徽巡抚恩铭，托他加以照顾（俞廉三曾做过山西巡抚，恩铭当时在山西任知府，和俞廉三有师生关系）。徐

锡麟来到安徽后，一方面由于有俞廉三介绍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精明干练，因而深得恩铭信任。

徐锡麟分发到安庆之初，恩铭委任为陆军小学堂会办的职务。但是，这个学堂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十几岁的青年，一时不易策动，因此，他考虑如果要在安徽建立革命活动基地，必须设法掌握安徽巡警学堂。因为这个学堂已经有少数思想进步的学生在内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配备的武器也比较好，每个学生都发有九响毛瑟枪一支，这些条件对于将来进行武装起义是极为有利的。因此他就极力与恩铭周旋，并从其它方面积极活动。他表叔俞廉三这时又写了一封信给恩铭，嘱托他对烈士“务加重用”。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并兼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因而他的由清廷统治者内部掌握武装力量的计划，取得初步成功。

他就任巡警学堂会办后，就积极向学生开展宣传革命工作，同时联系和培养倾向革命的进步学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找学生谈话，采取三五人谈心或个别交谈方式，向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前途等等问题，启发学生，使他们认识到推倒清朝统治的必要。他的救国热情使学生们深受感动，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日渐亲切了。

他在巡警学堂期间，最厌恶臬台世善（旗人）。世善兼任巡警学堂总办和巡警处总办，为人阴险恶毒，对烈士非常歧视，遇事掣肘刁难，是他在安庆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大障碍。不久，世善得暴病死了，他积极活动，企图取得臬台职务，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扩大革命运动；但是，恩铭没有同意，而奏调另一个旗人首道毓秀升任了臬台。

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捕获了一个革命党人，这个党人被端方利诱后变节，并受命来安徽秘密刺探革命活动。他向端方报告说：安庆有个革命党首领，姓徐，是浙江人，但没有说明所担任的职务。端方得到这个情报后，就电告恩铭注意防拿。当时恩铭并不怀疑端方电报中所指的徐某就是徐锡麟，还把端方的电报交给他，要他注意。徐见到电报后，怀疑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已被泄露，感到处境危险，回到学堂后就决定提前起义，先发制人，同时秘密写信给在日本的革命机关，请求速派熟练的炮科人员和政治宣传人员来安徽协助。大约在一个月后，就由日本派来陈伯平、马子畦两人，他们到安庆后都住在他家里，共同策划起义工作。除此以外，他还考虑到一旦起义，如果仅仅依靠巡警学堂二百多师生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争取驻在安庆由汉人领导的军队起来参加，才能摧毁清政府抚、道各级统治机构并镇压少数军队反抗。当时驻在安庆的军队计有陆军第六十一标，标统为汉人；第六十二标，标统为旗人。六十一标经过他的宣传、联络，标统已同意参加革命起义，所有管带也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我还记得有一天晚间，他邀请这个标的许多军官到安庆对江大渡口芦苇滩里秘密集会，歃血为盟，齐喝雄鸡血酒，誓愿同心同德推翻清朝，参加起义，永不背叛。

五月二十五日，起义的那一天，他召集了少数学生讲话，我还记得他讲话的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因为他说的是浙江土话，许多学生都没有全部听懂。二十六日上午五点钟，他吹哨子召集全体学生在雨操场集合（雨操场是用瓦在操场上盖的一个棚子，阴雨天可以出操），并向学生们作了简单训话。上午八点钟左右，清政府大员如抚、藩、臬、道以及陆军第六十一标、第六十二标标统和其他机关的观礼来宾陆续来到，他身穿黑羽纱警官制服，在学堂大门口迎接。当恩铭到达时，还含笑向他说：“徐道台今日戎装，颇有气概。”他当即回答说：“今天是甲班学生毕业大典，大帅又亲自莅临阅操，应该这样穿着，以示隆重。”一面他就陪着恩铭等人进入学堂内休息。

他发难的步骤，原来准备先请恩铭吃酒，然后阅操，即乘间起义，将反动官吏一网打尽。不料巡警处的收支员顾松（旗人）暗地里报告臬台毓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转禀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毓秀就立即密报了恩铭，恩铭听了不敢在学堂内久留，就对徐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酒不吃了。”他当即机警地意识到起义机密可能被泄漏，但仍然不动声色地向恩铭说：“大帅既然不吃酒，那就请到礼堂行过毕业典礼再走吧！”恩铭当时也就答应了。

这时学生已经齐集在雨操场，他引导着恩铭和藩、臬、道等官员来到雨操场礼堂，按阶级顺序站在上面东边。操场上教员发出口令，学生队伍向前走，准备进入礼堂向抚台行礼。正当队伍开步走的时候，我看见陈伯平忽然从礼堂窗内抛出一个东西，当时没有看清是什么。紧接着他一低头在靴统内取出手枪，左右手各拿一支，对准恩铭射击。恩铭身上中弹很多，倒在地上，但还没有死，由他的侍从文武巡捕把他抢救出来，抬上轿子走了。藩台冯煦没有行动，还呆呆地站在礼堂上不知所措，他当即把他推开说：“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这才若有所悟地急急忙忙地跑出了礼堂。他提着手枪又去追寻臬台毓秀，不想毓秀已乘礼堂混乱时逃走了。这时他已经知道旗人顾松破坏了起义，气愤已极，就对学生说：“既没有捉到毓秀，必须杀死顾松！”正好顾松还在学堂前厅没有逃脱，被他抓住，问他：“是怎样探听得革命党人的秘密的？”顾松这时已吓得面如土色，回答说：“日本方面平日给会办来的信都是用胶水封口的，有几次来信因胶水受潮退性，封口裂开了，我就偷偷地看了，因而知道会办是革命党，但我并没有报告过抚台和臬台。今天因为我看到会办气势严肃，有些不对，为了防备出事，才向臬台报告会办不

是好人，请抚台注意。”他听了，长叹一声，随即举枪打死了顾松，同时吹哨子集合学生，发给子弹后，亲自率领前往军械所，并向学生们指示说：“军械所里面有弹药，首先要占领它。”

大家到达军械所不久，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来了，但他没有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答应着走了。同时，徐并派学生蓝昆林送信给六十一标标统，请他把队伍带进城来领子弹，共同起义。当刘利贞走后不久，驻在城内的第六十一标管带丁忽清率领一个营部队到了军械所，因为清政府怕新军倾向革命，士兵背的都是空枪，没有配发子弹。他当即指示丁忽清说：“你们稍等一下，马上发给子弹。”但是向军械所取子弹却遇到了困难，原来军械所的总办看见他带着队伍来到，就悄悄地把库房钥匙带着从后门溜走了。由于弹药库都是地下室，进口的上面盖着很厚的钢板，并且用大洋锁锁着，异常坚固，仓卒间无法打开，只有西边的库房还没有锁，里面放有大炮六门，炮弹若干箱。当由陈伯平和几个学生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因为这个后厅地势比较高，可以观察到抚台衙门和北门城楼。陈伯平随手取了一发炮弹先装进炮膛，向徐说：“现在形势危急，我们要用炮弹把抚台衙门打掉，摧毁了敌人发号施令的机关，然后再轰击北门城楼，把楼墙打开缺口，使我们的军队可以进出。”徐马上加以制止，并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合，我们纵能成功，老百姓必然要糜烂不堪。”因而坚决不准开炮。这时外面已枪声大作，巡防营统领刘利贞这个坏蛋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出卖了革命，带领着部队包围了军械所，向他率领的学生队伍猛烈进攻。他当即指挥学生向外还击，坚持了五个小时，子弹已经打光，陈伯平又在奋勇击敌中首先中弹牺牲。原先派往六十一标联络的蓝昆林由于反动统治者紧闭各城门，并断绝交通，禁止行人往来，以致无法把信送出去。所外敌人刘利贞所率领的巡防营发觉了起义军已经弹尽援绝，就乘机上刺刀发起冲锋，冲进了军械所。徐和马子畦以及参加起义的学生都被反动军队俘虏，并立即押送到督练公所审讯。震动大江南北的安庆第一次起义就这样被反动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徐等被押送到督练公所后，安徽反动大员立即组织军法会审，主持审讯的是冯煦（恩铭被杀后，由冯煦代理巡抚职务）。烈士受审时侃侃而谈，供词很长，其中有很多为当时安徽各界人士所传诵，例如冯煦问徐说：“恩抚台待你很好，你为什么要谋害他？”他说：“恩铭待我很好，这只是个人私恩，而我杀恩铭是排满公理”；又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即视死如归，今天之死，只是我徐锡麟一个人，以后还有千百个徐锡麟起来革命。”供毕，即趋赴抚台衙门东辕门（即现在安庆新光电影院大门前坡子下面）从容就义。他被害前，恩铭的儿子曾要求冯煦援张文祥刺马新贻例子，先将烈士剜心而后斩首。冯煦内心感激徐把他放走没有杀他，同时也感到革命势力日益扩大，有所顾忌，因此，他暗示监斩者先将徐杀死，以后才剜心。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马子畦烈士。

（摘自凌孔彰《辛亥革命回忆录》）

大通师范学堂

我年青时，常与表兄王秉彝通讯，或者到他家住几天，看看民族英雄葛云飞坟墓，谈谈求学志愿。他是已解散的绍兴府中学堂第九期学生。从他的谈话中，知道徐锡麟之为人。据秉彝说：锡麟鉴于甲午以后国势日蹙，赴日求入联队，不许，投考振武学校，又因目短视，未录取。归国后蓄意仿照“振武”办一个学堂，定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他邀集同志，筹集经费，订定章程，呈请立案，并拨到山会豫仓为校舍。到了房屋修竣，校具齐备，教师聘定，登报招生，开学典礼告成的那一天，他想洗足了，不料皮鞋已不能脱下，因为他一意办学，各处奔走，两个月中没有很好地睡觉，两足肿溃流脓也不知道。又说：锡麟刻苦勤学，自制浑天仪，又绘制绍兴地势图，他还画了一个侵略我国的外国人的形象，作为练习射击的枪靶。他对待学生像亲生子女一样，往往在夜阑人静时，轻轻地走到学生宿舍，见有手脚外露的，为之盖好被褥；蚊子相扰，为之掩好床帐。又说：锡麟常于假期中率领同志旅行奉、嵊、新、台、金、衢、严、处等地方，结识了不少拳师和有影响的人物，并将不见记载的深山峻岭中的捷径要道一一记录下来。他曾出山海关至奉天、吉林，再经西北诸省边疆而归，与杀人不眨眼的冯麟阁一见如旧相识。我听了有关徐锡麟的这些故事，对他非常景仰和羡慕。

我入校时，徐锡麟已赴安徽，对于大通师范学堂势不能事事遥制。校中有一个董事会，其中有名誉董事、常务董事及董事等名目。在董事会里最重要的人物是秋瑾，她是同盟会会员，在反清活动及学校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孙俭卿，绍兴孙端镇人，是个当商，据说他是一个捐班官，学堂经费由他负责。姚定生、黄怡、竺绍康、王金发等，都曾为徐锡麟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出过大力。姚勇忱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员。

同学中水乡人少，山乡人多。奉、诸、新、嵊的同学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大有“瘠土之民好义”的风气。起床、息灯、上课、下课都用步号，清越可听。催起号角一鸣，立即把被褥捆好。鞋子一律放在门外，不得在室穿脱。除星期日外，每天第一课起，三课兵式体操，要跑到几里路外的大校场去操练。有时朝露未干，青草没胫，教师喊五百、六

百米达卧倒、预备放，学生们不问马尿牛粪，毫不犹豫地卧倒下去，并假想敌人在前，眼亮手准地动作起来。遇到大雨就在饭厅上操击枪柔软或在走廊四周做跑步。我们所用的枪，是从俄国买来的老毛瑟后膛枪，分量是很重的，所以操击枪柔软最累人，左手把枪托在手上，伸直作瞄准状，教师不喊放，当然不许缩转来，手臂痛得不得了。还有跑步，开步大不行，小也不行；慢不行，快也不行。教师说一句钟走多少步等于几里，要这样作战时才有用，这两项课程最吃不消。此外，还有星期一、三、五的一时小器械体操，有很高的天桥，极长的溜木和平台、铁杠、木马、秋千、铁环、跳远等种种设备，应有尽有。我从小多病，这样一二个月以后，身体反而练得强壮起来了。教师很认真严厉，譬如开步走走得不好，他就用指挥刀(未开刃的)敲你的腿。夜间打行军，你爬不上山，他就把你一推；泅河，你不敢下水，他也把你一推。由此可见，大通在那时已经军事化了。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

历　史　考　证

秋瑾绝命词考

《秋瑾集》中收有一件绝命词，即断句“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近来，好多同志对这件绝命词的真伪及至有无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对于研究秋瑾就义前的思想是有很大益处的。

要弄清：“秋雨秋风愁煞人”这七字的真伪有无，首先得弄清它的来历：是谁首先揭出这七字的。这一点，目前争论的各方面是都有忽略的。

据现在所见的最早的材料是《中外日报》，在秋瑾被杀的次日，即刊出秋瑾被杀消息的当天，该报在《事迹》栏里刊出了一组消息，题为《搜捕大通学堂情形》，共 10 则，所记都是关于秋案发生前绍兴的情形，其中第 5 则中记云：

秋女士临刑之前，求官许其通书信于家族，官坚不许……并逼令其写字，秋言：余不识字，仅书西文数字，又坚逼之，乃仅书一“秋”字；官再三逼之，乃始书诗一句“秋雨秋风愁煞人”……

同日，《时报》也有一项记载，大致相同：

此次秋瑾始终无口供，山阴令问：“女子何以要革命？秋瑾答：“是男女的革命，非政治的革命。”又令其将平日作为用笔书写，秋瑾但书一“秋”字。又诘之，又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云。

此后，一些书籍中例如《徐锡麟》、《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等书中，所辑当时报刊新闻，都是这样记载的。这条记载很有价值。它说明了秋瑾的被杀没有供词亦即没有证据，仅凭七字定谳，因而是一大冤案。这充分暴露了官场的黑暗。这些报刊言论，使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扬颇为恼火，在杀害秋瑾的第二天，即电询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当即复电，声称：“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于是这七字就被送到贵福手中，转交浙抚。后来一直藏在浙江巡抚衙门。此后不复现于世，那是因为辛亥革命光复杭州之役，巡抚衙门大火，连同其他一些档案一齐烧掉了。

怀疑绝命词的人是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有句话是：“‘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不知是何人造作，登之报上。”不过现在看到的仅只陶成章而已。其他怀疑的人则不多见。近几年有些同志才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七字不应出于伟大的革命家之手，因为它太萧瑟了，太悲凉了，和革命家的思想品格很不相类等等。其实这些都不能做为原因来否定这七字的存在。原因是这些同志并不了解当时历史的情况，仅凭今天的认识和直观感觉来推测当时秋瑾的心情，这在历史研究上是不可取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否定这七字存在的另外的一个根据，就是认为当时正值六月，是盛夏，不是秋令，因而写不出秋季的景象。以此来证明并非秋瑾所作。这一点倒还可以解释一下，实际上这七字的写出，并非如电影所描绘的那样，是擘窠大字(电影是把这一细节艺术化形象化了)，而是断断续续地写的，因“清吏逼之”或“再三逼之”，秋瑾只是写了一个“秋”字，然后又写了六个字，足成七字句，犹如七言诗的一句。这说明秋瑾写此七字时，是临时现想的，而并非一下子就托出来的，可能是她选了一个“秋”字，下边欲写自己的名字，可是后来她突然转变，从时令上着眼，改写了“秋雨秋风”几个字，又续写了“愁煞人”三字，而后掷笔不书。

另当说明的是，有些同志依据郑逸梅先生提供的线索，说这句诗是袭用了娄江人陶澹人的《秋暮遣怀》诗中的一句。我们不知道陶澹人的诗集刊刻的情况与流传情况，以及秋瑾是否读到过那本诗集，因而受到陶的影响，被审时，信口吟出。其实在中国古诗中，早就有“白杨萧萧愁煞人”之句，这并不是什么僻典，秋瑾不会不知道。而且早年秋瑾还写过“秋风愁煞人，秋雨愁煞人”这样的诗句，

根据种种情况，捏合为一句，应该是不困难的，而不必祖述什么陶澹人。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过，说是“名句偶同”，如此而已。

最后说一句，有些同志把这七字当作绝命词，很可能是受了《秋瑾集》的影响。应当指出的是，这七字，实际上不应当叫做绝命词。按历史上的说法，绝命词是烈士、义士作于毕命之前的诗、词或偈语之类。秋瑾这七字不属于这类情况。秋瑾写这七字时，是在六月五日李钟岳审她时所写，她当时并不知自己即将被害，焉能把这七字作绝命词对待（当时，李钟岳也不知她在第二天即将被处死刑），只是因为这是她的文字留存在世上的最后几笔。按例，这样的文字，后人把它叫做绝笔，似乎更恰当一些。如果说，解放前王灿芝编《秋瑾女侠遗集》时，首开这样的先例，那么编于解放后的《秋瑾集》，应当审慎考察，于王灿芝之误处，尽量作订正。也许如此，今天这场争议就不会发生了。

（摘自郭长海、李亚彬编《秋瑾事迹研究》
东北师大出版社）

《新民丛报》停刊考析

1907年11月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停刊，是辛亥革命史上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迄今学术界大都认为，《丛报》是与《民报》论战彻底失败而被迫停刊的。其主要论据有二：一，1906年11月《丛报》刊登署名“与之”的文章内称：“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士人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的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钳。”二，梁启超在1907年7月致蒋智由、徐佛苏的信中说：“《丛报》（第四年）二十一号之文，尚无只字。此报定期出版之信用已久失，……故欲公等为助此一期之稿，俾速印成。但终须有一两篇为论著者，若全属译述，未免太难看了。”“弟一人之力不能兼顾此报，以余力办之，若赘旒然，无复精神，亦复何取。……出报既屡愆期，则阅者生厌，销数亦窒，而经济不能支。……故办之而反为私人经济之累。”

笔者认为，根据这两条材料，并不能完全说明《丛报》是因为论战彻底失败而停刊的。

首先，我们考究第一个论据——与之的文章。诚然，与之的文章承认了革命派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的事实。但作者并不认为立宪运动已经破产。相反，作者认为，革命潮流之所以不可阻遏，立宪之所以不被人们所称道，其原因一是“固由于数千年来专制之淫威，有以激之使然”，二是由于人们对立宪不理解，“立宪之果为何物，立宪之后而果有何影响，使不立宪而果受何弊害，恐中国虽大，其能理解之者，寥寥无几。”作者虽认为革命派的宣传一呼百应，可以“煽起其蓄积已久之恶感”，但却认为这是“举国人丧失辩理心”所致，“感情所蔽，真理为蒙”。因此，作者不仅不赞成革命，反而仍旧坚持认为“今日中国之时势，宜于立宪，而不宜于革命”。由此可见，与之的文章，决不是改良派无可奈何承认其失败的自供状，而是再一次表白了他们坚执其君主立宪方案的决心。以此作为《丛报》自认论战失败的根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我们再考究第二个论据——梁启超致同党的信。1907年6月，梁为组织政闻社回到上海。致蒋、徐的信就是此时由上海寄往日本的。信中说：“党事本欲俟相会时乃详商，今既有二十余日之久，故有一事宜先陈者，即正式结党之迟早问题是也。”所谓“结党”，即组织政闻社。对此，梁全力以赴，而对《丛报》已不再顾及。因此，梁在信中虽看到《丛报》稿件缺乏、屡次愆期、经济因窘等问题，但却认为此“固不足惜”，只是“虚悬此印刷所而无报出，每月费千金，于私人经济亦甚不利”，因此，他才请求“助此一期之稿”。稍后，他在给徐的信中则明确指出：“弟前此所以欲停《新民丛报》者，则一因党报（按：指《政论》）将出，弟一人之力，不能兼顾此报。”显而易见，《政论》的问世是和《丛报》的停刊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梁不再顾惜《丛报》的原因。我们翻开《丛报》可以发现，从1906年12月梁开始预建政闻社之日起，他就很少发表论战性的文章。就当时梁致同党的信来看，他既没有承认论战失败，又不是没有能力再写论战文章，而是由于他热衷于组建政闻社、筹办《政论》，不能“兼顾”《丛报》的缘故，致使《丛报》稿件缺乏，屡屡愆期。因此，引用梁致同党的信来证明他自认论战失败，从而导致《丛报》停刊，是缺乏说服力的，也是不符合梁启超本人的真意的。

笔者认为考究《丛报》的停刊问题，还不能忽略当时论战中两派内部的实际情况。

早在论战之前，梁启超就准备停办《丛报》而出游欧洲，1906年春他在给徐佛苏的信中说：“弟顷有游学欧洲之意，……惟方今与彼党争舆论之动力，故《丛报》不能不办（本欲今年停报而出游）。”同时还说：“以现在（第五、六号）论，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可见，当时梁之所以没有停办《丛报》和出游欧洲，主要是为了同革命派“争舆论之动力”。

正当梁不遗余力与革命派论战之时，清政府宣布要“预备立宪”。对此，梁是十分赞成并寄予厚望的。在此之前，他就代为到日本考察的端方拟考察宪政、奏请立宪等奏折，此时他更认为，前此所希望所要求者，现在政府已着手进行了，“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者何如。”“对于政府举措，常为批评训导，如此乃尽我辈之责任。”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梁启超的主要精力由在《丛报》上宣传预备立宪

转向"批评训导"政府(即促使清政府早日实行立宪)的实际活动。

为了"批评训导"政府,梁认为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当初曾对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梁启超,稍后便隐隐约约地感到"预备立宪"是一个骗局。他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上谕,"即未指定立宪之期限,又未明言预备之条理",宣布以后,无一实施可见。所谓的官制改革,实为"挤排异己,争权夺位","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因此,他主张应立即组织一个政治团体,促使清政府早日实行立宪。为此,他奔走海内外,几经曲折,于1907年10月组建政闻社于日本,发刊《政论》,大肆鼓吹"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次年2月迁总部于上海,发起国会请愿运动。

为了"批评训导"政府,梁更想同革命派调停讲和。早在1906年春论战刚开始不久,梁就很赞成徐佛苏的停战主张,他在给徐的复信中说:"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同年7月,徐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在《丛报》上问世,倡议双方停止论战,共同促使清政府实行立宪。1907年1月,徐佛苏对宋教仁说,梁愿面见宋,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与此同时,梁还亲自出马"私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劝之"。尽管这些主张遭到孙中山、汪精卫的拒绝,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梁之所以提出这些调停主张,决不是自认失败,而是另有所图。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这是梁1907年7月为其党规定的主要任务。对于同革命派论战,以"争舆论之动力"的成果,梁启超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估计。他十分得意地对历时一年多的论战总结说:"自去年《新民丛报》与彼血战,前后殆将百万言,复有《中国新报》(哲子所办)、《大同报》(旗人所办)助我张目,故其势全熄,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已往,决不复能为患矣,……不必复有后顾之忧。"显然,梁启超根本不是由于感到自己在论战中被击败,而是由于其注意力此时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转向"批评训导"、"全力对待政府"的缘故。所以他组建了政闻社,创刊了《政论》,同时将旨在宣传"预备立宪"的《丛报》收歇。

再从当时革命派内部的情况来看,还在两派激烈论战之时,孙中山就已着手筹划武装起义,并耗用了大部分经费。1907年3月,由于孙中山在离日前仅为《民报》留两千元维持费而遭到章太炎的非议。此后《民报》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继,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以致向孙发起进攻,声称要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在日本同盟会本部,组织也很涣散,孙、黄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而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胡汉民、汪精卫等驳斥梁启超的言论早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辞近诟谇"。因此在1907年1月,宋教仁与章商讨停止与改良派论战问题时,他欣然表示"可以许其调和"。尽管孙、胡对此"皆不以为然",但因章一派在《民报》社占居上风地位,所以此后的《民报》"持论稍平"。从1907年2月以后,《民报》驳斥《丛报》的言词较前大为减少。如果以为革命派仍坚持论战到底,致使《丛报》不得不停刊,那也是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在两派激烈论战之时,由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被广泛宣传,《民报》发行数额的猛增,导致了《丛报》销路的骤减。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丛报》停刊这个具体问题。由于改良派的政治热情由宣传预备立宪转向了促使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实际政治活动,加之革命派的主要精力也转向了筹备和发动武装起义等实际革命活动,双方的论战遂逐渐平息下来。这就是《丛报》停刊的具体原因。如果认为改良派的宣传被革命派所彻底战败,那么,我们将很难解释《丛报》停刊后立即出现的改良派创办的《政论》以及稍后的《国风报》等宣传阵地。

(摘自张瑛《近代史研究》)

徐锡麟为何不加入同盟会

作为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锡麟,在日本亲眼看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并知道光复会与同盟会将进行合作,那么他为什么没加入同盟会呢?有三种不同说法。

【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作祟】徐和雍持此说。徐和雍认为,徐锡麟不入同盟会,"主要是他'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祟"。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当时革命党人中几乎普遍存在,"不过在徐锡麟身上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而已。"

【宗旨不合和对同盟会涣散现象反感】林金树持此说。林金树认为:"徐锡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始终拒绝加入同盟会,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宗旨存在着严重的原则分歧"。"徐锡麟是'蓄志排满',从思想到行动都是为了'排满革命',驱除异族统治","只是'一民主义'者"。"而同盟会是提倡'民族、民权、民生并重',""这个宗旨上的分歧,主义上的不一,就是徐锡麟拒绝加入同盟会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他的思想根源"。"此外,从客观上看同盟会的严重涣散现象,也势必会影响到徐锡麟对它的态度","必然会加深徐锡麟对同盟会的反感。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他不参加同盟会的立场"。

【宗旨不合和徐锡麟个人政治野心作怪】罗耀九持此说。罗耀九认为:"徐锡麟领导的光复会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宗旨不同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徐锡麟个人的政治野心使他不能与同盟会合作,而要独树一

帜。”

（宗成康）

风云人物

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　徐锡麟字伯荪，亦字伯圣，号光汉子，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其父曾充山阴县吏，中年弃职经商，置田产百余亩。锡麟自幼熟读经书，爱好天文算学，常自制望远镜、浑天仪等。尤喜读历史书籍，颇受明末以来当地反清民族主义思想之影响。1893年录为县学附生，旋就学蕺山书院。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锡麟每日进县城了解前线战况。结果中国大败，锡麟认为“中国之科学不足恃”，希望清政府“扫弃粉饰，力图自强”。

1901年绍兴府学堂建立，锡麟应聘为经学兼算学教习，颇得知府熊起蟠赏识。1903年春，升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在此前后，锡麟还开设“特别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又与王子余等人兴办绍兴第一所女校——明道女校，以为开风气，育人才。旋东渡日本，参观大阪国际博览会。适逢东京留日中国学生的反清革命思想萌发在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中。徐锡麟转道东京，经陶成章介绍，结识拒俄义勇队负责人钮永建，“相谈宇内大势，锡麟大悦，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

锡麟购图书刀剑若干以归，与挚友陈志军在家乡东浦创办热诚学堂，锡麟等“于一班之普通学科均不甚研究，特注重于兵式体操”，教习军乐。1904年冬，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不久，徐锡麟路过上海，欣然入会。次年春，他率弟子数人步行至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等县，“几及二月，多交其地方奇才力士”。归绍兴不久，与陶成章商议自建学堂，培养革命人才。

1905年秋，徐锡麟得光复会员许克丞支助，购回枪弹若干，与陶成章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学生以反清革命为职志，入学即为光复会员，毕业后仍受光复会节制。是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离沪出国，大通学堂逐渐成为光复会活动中心，徐锡麟乃光复会在国内的实际领袖。

与此同时，陶成章提议打入官场谋取军权，“行中央革命或袭取重镇，实行捣巢覆穴的计划”。锡麟复由许克丞资助，入赀捐道员，获准赴日本学习军事，因日方拒纳，谋学不果。他又返回国内，延请女光复会员秋瑾主持大通学堂，自己则由表叔俞廉三(曾任湘抚)引荐，赴安庆出任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谋求在安徽军界发动革命。为取得皖抚恩铭的信任，他不露声色，办事勤奋认真。越二月，升任安徽巡警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

1907年春，秋瑾专程潜赴安庆，与锡麟密商“光复军”起义计划，拟由浙江发难，安徽响应。秋瑾回浙后，加紧联络浙省各路会党骨干，推徐锡麟为“大首领”，定7月6日为发难日期。徐锡麟则拟借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捕杀恩铭等省中军政要员，响应秋瑾。然因浙省风声甚紧，秋瑾决定延期起义，徐锡麟事先不知，仍按原计划布置。安徽巡抚恩铭以7月8日有寿宴，临时决定提前两日举行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徐锡麟无奈，于5日晚加紧与陈伯平、马宗汉商订次日发难步骤。

7月6日清晨，巡警学堂学生二百余人提前集合，徐锡麟登台演讲，告诫学生勿忘救国二字，“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上午八时，巡抚恩铭率省、府、县各级官员三十余人鱼贯而至。阅操毕，徐锡麟向恩铭呈上学生名册。不待恩铭开册点名，徐锡麟借给恩铭说话发出起义信号：“回大帅，今日有革命起事”！恩铭急询：“徐会办从何得此信？”话音未落，陈伯平向恩铭抛炸弹一枚，但未爆炸，恩铭等文武官员却已惊慌失措。马宗汉用短铳向恩铭射击，未中要害。徐锡麟忙从靴中取出手枪两枝，左右连射，恩铭身中七弹。待随侍巡捕将恩铭背出大堂，陈伯平补射一枪，击中恩铭要害。紧接着，徐锡麟率学生三十余人，先是直奔抚署，遭到抵抗；继而占领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四小时，因寡不敌众，陈伯平中弹牺牲，徐锡麟等二十余人弹尽被捕。审讯中，藩司冯煦问他：“恩铭待你不薄，你何以忘义？”徐锡麟答曰：“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次日晨英勇就义，时年34岁。

（徐泰来摘自《中国近代史记》）

秋瑾

秋瑾(1875～1907)　秋瑾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生于福建厦门，祖籍浙江绍兴。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在浙江筹划“光复军”起义，事泄被害，时年33岁。其诗文编为《秋瑾集》。

秋瑾生长于一个封建仕宦家庭，少年时代就读了不少经史书籍，能作诗填词，会骑马击剑。“天资颖慧，过目成诵，为先君所钟爱，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喜。”1892年，秋瑾因父亲在湖南做官，相随入湘。1896年，依

父母之命与湘潭王廷钧结婚，王廷钧是富绅的儿子，只知吃喝玩乐、升官发财，与秋瑾性情不合，婚后家庭生活不和。1902年，王花钱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夫去北京居住。

入京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秋瑾更加认清了民族危机的深重，曾作《宝刀歌》，曰："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她还对人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住京期间，看了一些进步书报，如《新民丛报》、《苏报》、《罗兰夫人传》、《东欧豪杰》等等，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对其思想的变化有较大的影响。

1904年3月，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变卖首饰自筹资金，准备渡海到日本求学。当她得知直隶宁河人王照因戊戌变法牵连入狱、需要巨款得以获释时，即将变卖首饰所得旅费的大部分赠与素未相识的维新青年王照，作为运动释放之费用，但并未告其姓名。五月，秋瑾渡海到达日本，初抵东京，住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在会馆附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同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与革命志士王时泽、刘道一等人，组成了反清和恢复中华为旨宗的"十人会"；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参加了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结识了因事去日本的浙江革命活动家陶成章，请陶为她介绍国内革命同志；还组织演说练习会，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朝，提倡男女平权。

1905年秋，秋瑾回国筹措经费，由于陶成章的介绍，在上海访问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又在绍兴见到了光复会骨干徐锡麟，由徐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秋瑾返回日本，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师范班。不久，见到孙中山，参加刚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盟员中的唯一女盟员，并且是浙江省籍的第二名会员，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

这时的秋瑾，摆脱了中国妇女的柔弱气息，平时穿日本和服，有时着男装，经常佩着倭刀。她改名"竞雄"，自号"鉴湖女侠"，并写出了表达豪情壮志的诗句："拼将头颅十万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漫言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秋瑾的行动表明：她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勇敢的实践者。她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不但自己与王廷钧进行了长期的离婚斗争，而且为别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她力劝因"苏报案"逃到日本的陈范的二个妾相芬、信芳与陈离婚，并资助她们学费，以求学为门径而谋求自立。她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

秋瑾在日期间，已成为一个很有声誉的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她善于演说，"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魄。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在留日学生中，她广结革命志士，凡是反对清政府的人都引为同志，而对那些专讲吃喝玩乐的学生则深恶痛绝，不相往来。当时有许多中国革命家在日本活动，清政府认为这是对它的严重威胁，于是串通日本政府在1905年底公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当时留学生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求学，一部分主张罢课归国。秋瑾极力主张回国革命。在浙江同乡会演说时，她从靴筒里抽出一把倭刀往讲台上一插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有个浙江留学生胡道南一心想升官发财，曾和秋瑾辩论，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

1906年初，秋瑾自日本回国。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当教员。暑假辞职赴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以安置归国留日学生，与同盟会员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络各省同志，运动长江一带以及浙江各地会党。曾在寓所里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伤手臂。当年冬天，光复会成员议决，派秋瑾在浙江联络会党，准备响应湖南萍、浏、醴起义，后因起义失败，浙江方面暂未发动，秋瑾等决心独立举事。

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刊行，共出二期，因经济困难停办。秋瑾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伴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秋瑾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确、炽烈。早在留日期间，她就开始写作长篇弹词《精卫石》，宣传男女平等倡导独立自由。离日前夕她表示，为了光复中华，愿与男子诸君共勉。回国后在续作弹词时，写下了"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的唱词。她不仅主张妇女在政治上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而且强调妇女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重要性。在《中国女报》第一期的《敬告姐妹们》一文中，她写道："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可以说，秋瑾代表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

1907年春，秋瑾到绍兴主持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校。她以学校为据点，吸收光复会会员，联络会党，培养军事骨干。秋瑾亲自拟定并和其它领导人讨论通过了《光复军军制》和《光复军起义檄稿》，规定军级为十六级，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起义队伍编为八个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序分别表记，称为"光复军"。他们还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约定于7月19日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六月，绍兴会党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接着武义、金华等地会党又相继败露，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

党人，起义准备受阻。徐锡麟得讯，知事情紧急，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自己被捕遇害，起义失败。秋瑾闻知极为悲痛，学生和会党首领曾劝她走避，她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坚持留在学校。7月13日被捕，15日凌晨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下，遗骸由友人收埋于杭州西冷桥畔。

秋瑾是中国近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而献身的第一个女英雄。

（摘自《西湖人物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恩 铭

恩铭（？～1907），字新甫，满洲镶白旗人，于库里氏。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光绪四年（1878）纳赀授知县。九年山东河决，巡抚陈士杰调恩铭办理河工。十一年，权知兖州，晋道员。十二年，办理皖省宿州督销事务。十六年，以知府尽先补用。翌年，因在河工抢险出力，被保加三品衔。十八年，署兖州府知府，并加三品顶戴。二十一年，改太原知府。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署山西按察使。是年义和团运动高涨，京津被八国联军攻占，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离京西逃。山西巡抚毓贤率师守固关，命恩铭兼摄山西巡抚、布政使。同年十一月，补授归绥道。翌年正月抵任，清理教案，严厉镇压反洋教斗争。五月，亲率包头镇马队驰赴三道河平息教案，“保护教堂”。

二十八年三月，调直隶口北道。到任后，“日以调和民教为务”。十一月，擢江苏按察使，但仍以督办两淮盐务为主。任职期间，“杜私贩，恤煎丁，故两淮引盐行销遂畅，岁增国课至三十万两”。时论“欲改营场为公司……创为煤煎轮运”，并有旨下盐运使筹议。恩铭力陈其弊，遂作罢论。三十一年八月，授江宁布政使。同年十月，以山西协饷功，赏头品顶戴。三十二年正月，补授安徽巡抚。在任期间，曾为解皖北水患，保安徽稻谷产区，复修广济圩锦瓦数十里。

同年，红莲教徒自江西省鄱阳湖进入安徽，“扰及皖南之建德县境”，并接连焚毁该县内多处教堂。恩铭派兵剿杀，惩办反洋教民众，而对被焚毁的洋人教堂，皆“抚恤修复”。同年七月，缉捕弥陀教首陈永清，立时就地正法，时值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恩铭奉旨推行“新政”，整顿巡警学堂，开办巡警处，并委任留日归来的光复会会员徐锡麟为武备学堂会办。

徐锡麟早已接受革命思想，立志反清，正谋求深入清朝官场，从内部策划发动反清起义，后经过他的姻亲、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得到了恩铭的信任，被提升为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时徐锡麟与秋瑾正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设想：只要杀死恩铭等高级官员，就能掌握安徽的政权。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巡警学堂甲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恩铭亲临校场检阅。徐锡麟趁学生向恩铭行礼之时，从靴中掏出双枪，左右开弓连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数枪，被救回署，旋因伤重而死。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邓 子 瑜

邓子瑜（生卒年月不详），惠州归善（今广东惠阳）人，自幼行侠好义，与归善、博罗、惠阳等州县的三合会众有广泛的联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受孙中山指示，协助郑士良筹划惠州起义。他联络惠阳、博罗、新安、河源等处会党，拟及期响应。起义因援绝而失败，邓遂偕黄福、黄耀庭等避往新加坡，以开设旅店为生，并借以招待惠属各地到南洋的革命党人。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1906年2月），孙中山由日本至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子瑜与尤列、陈楚楠、黄耀庭等加盟。翌年，孙中山决计在广东东江各属分途大举，先后派许雪秋、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回国，分别筹划在潮州、两阳（阳春、阳山）及惠州起事。余绍卿返国后不知去向。黄耀庭则招港英警方注意，不便入境，折回新加坡。只有邓子瑜留港奔走运筹，议与许雪秋各当一面，约期并举。

先是，邓子瑜与国内会党联系，得力于在香港经营旅馆业的陈佐平、温子纯二人。归善、博罗二处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等人尤听命于子瑜，允随时在东江各州县发难。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许雪秋部余既成等在黄冈起事，子瑜在港得讯，即向香港同盟会支部冯自由处领取一千二百元，使陈纯等人赴归善、博罗、龙门三处分路举事。

陈纯等入惠州境，号召百数十人集中于离府城二十里的七女湖，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起事。起义军发布檄文，内称：“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命天子，立转明朝。”上述檄文虽然表现了反对列强侵略的主张，但所反映的是狭隘的种族主义与反清复明的传统思想，并未体现同盟会纲领的精神。

起义军夺取防营枪械，连克泰尾、柏圹、杨村、三达等墟，接着分攻八子爷、公庄等处。各乡会党纷纷来投，声势大振。护两广总督广东布政使胡湘林急调水师提督李准移攻黄冈之师至惠州。义军拒战十余日，来去飘忽，使清军疲于奔命。邓子瑜在香港购置弹药，原拟亲自押送入

惠，及闻黄冈起义已败，迅即派人通知林旺等相机解散。起义军于是拔队至梁化墟附近，掩埋枪弹，分途撤往香港，转赴南洋谋生。

广东当局以此次起事系邓子瑜主谋，乃向港英当局要求引渡。子瑜被港英当局勒令离境，仍赴新加坡经营旅馆业，协助开展同盟会工作。在镇南关及河口起义时，子瑜曾奉派到英属南洋各埠募集军费。

民国成立后，子瑜仍操旧业。他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之筹措讨袁军饷。民国六年(1917年)秋，孙中山南下护法，子瑜返粤。曾任海山盐场知事，以盐政腐败，无从改革，乃离去。莫荣新破坏广东护法政府，子瑜曾组织讨莫军东江别动队。后居乡数年，病故。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许雪湫

许雪湫(一作雪秋)，原名有若，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潮安)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为新加坡华侨富商。雪湫年轻时，随父住在新加坡。其父死后，获得大量遗产，曾出钱向清朝政府捐过一个候补道的官衔。他懂武术，精技击，丈把高的墙可以一跃而上；又任侠好客，挥金如土，和江湖会党广有联系，因此被称为"小孟尝"。1902年—1903年期间，结识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福州人黄乃裳，非常倾倒，立志"逐满兴华"。1904年秋，邀黄乃裳、陈宏生等归国。10月27日，与黄、陈及吴金铭、李杏坡等在宏安乡故宅集会，立坛歃血，相约召集同志，筹饷举事。经过几个月的经营，结识潮州府属各县三合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数十人。1905年2月15日晚议定，以许雪湫为革命军司令，陈宏生为闽粤度支部长，吴金铭为参谋长，同时议定了联络学界、会党和各省同志的人选，并议派陈宏生赴福州，联络黄乃裳，发动闽省响应。当时，潮汕铁路正在修筑中，许雪湫以承办铁路工程为名，派余丑、余通、陈涌波为工头，召集会党七百名为工人；又由吴金铭以绅士名义呈请清朝政府地方当局，在海阳上七都祠召募团练四百名，均以会党充任；约定4月19日同时举事。但因李杏坡用人不慎，走漏消息，李被捕牺牲。不久，又有人告发许雪湫为革命党首领，清吏派员密查。在这一危急情况下，许雪湫身怀手枪，单身到潮州衙门，侃侃自辩。清吏和许是旧识，又因他是地方大绅，没有深究。

初次举事失败后，许雪湫重赴南洋，准备筹款再举。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至新加坡。通过张永福介绍，许和孙中山相识，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不久，许即回到国内，散发以鹰球为图案的票布，招揽会党。同年冬，偕余丑、余通、陈涌波等到香港，向冯自由表示，筹划已渐次成熟，要求致电东京，请孙中山派人回国相助。孙中山接电，派出了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到港，就近协助。其后，许雪湫即在宏安乡自宅召集会议，定期1907年2月19日(正月初七日)分头大举。一路由薛金福偕乔义生、李思唐等往饶平县浮山墟布置，进攻潮州；一路由方汉成、方次石等往黄冈发动，拟攻汕头；许雪湫则偕方瑞麟、谢良牧等三百人埋伏于潮州城边；另有六十人预伏城内，以为内应。届期，饶平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许在潮州东门外一直等到天亮，不见队伍开到，只得命令各部分散待命。数日后，薛金福等被捕杀。许雪湫即委托陈宏生处理善后，自己赶赴香港，向冯自由等报告起事中变情形。冯自由电告孙中山后，孙中山复电称：此后起义须与惠州及钦州、廉州义师同时并举，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即留在香港等侯信息。

为了了解黄冈起义的有关情况，孙中山电召许雪湫到河内报告。在见到孙中山的时候，许表示，土炮不敌洋枪，因此失败。如能从外国购买新式军械，运至惠州汕尾洋面，他可以预雇大船数十艘在彼接应，随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孙中山赞同许雪湫的主张，即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械。10月8日，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得到萱野的电报：船械五日可到。许遂于9日赴汕尾。但在登轮时，发现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的侦探在船，许登岸折回，因此，延误了一日。10月13日，萱野的运械船幸运丸驶抵汕尾洋面，未见接应船只。等待多时，许才乘一小船前来探问。萱野责备许筹备不善，许答应数小时后大船必来，匆匆离去。由于准备起义，汕尾附近聚集了大量会党，早已风声四播，又由于日轮停泊时，沿岸观者无数，这样，就使得清兵加强了戒备。吴祥达派所属兵轮驶近日轮侦查。幸运丸原是三井洋行包租的运煤船，船主遂不听萱野将船暂移别处的建议，径自将船开往香港。不久，粤督又照会香港政府，要求扣留该轮。日本领事得讯后，命该轮启碇返日。

此次事败，许雪湫受到各方责备。胡汉民曾将当时布置计划详情写了一份万余言的报告书，指责许"妄言无实，不负责任"。从此，胡汉民对许的印象就一直很坏。雪湫初住香港，后来流亡南洋。因家产被清政府抄没，靠卖药为生。当时，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重点已转向广东西部的钦廉地区和广西、云南等地，无力协助许雪湫再举。黄冈起义失败后，有二三百人随许逃亡，同盟会在安排这些人的生活出路上也发生困难。这一切，使得许逐渐对孙中山和同盟会产生失望情绪。

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雪湫偕陈宏生、陈涌波等回到潮州，招兵数百人，组织南路进行军，收复饶平、海阳、惠来诸县。当时，广东各地类似的民军很多，它们大都各树一帜，派捐派饷，不相统属。仅潮汕地区就有十三个司

令，雪湫是其中之一。1912年初，驻守惠州的岭东镇守府司令林激真觊觎富饶的汕头地区，以“就饷”为名，企图率兵入汕，受到汕头商会会长赖礼园等人的反对。3月，林军攻占汕头，纵兵抢掠。许雪湫支持林激真，曾带兵抄抢赖礼园家，勒索兵饷。事后，赖向广东省方提出控告。同时，士绅巨贾等亦以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为名，向各方奔走呼吁。4月，广东都督陈炯明派清降将吴祥达率兵进驻汕头。5月初，新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下令遣散广东各地民军。同月，吴祥达于深夜包围许雪湫设在汕头道署的司令部，将许部缴械，并逮捕许雪湫。12日，奉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令，将许雪湫枪杀。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同盟会与保皇党在日本的争斗

一九〇七年，江浙两省人民因反对向英国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引起了上海的排英运动，抵制英货非常激烈。太湖的盐枭，亦拟联络帮会以武力支援这一运动。清廷大恐，欲令提督姜桂题率兵赴浙，相机镇压。东京留日学生会为了声援江浙人民，由总干事召集全体留日学生在锦辉馆开大会。会上，总干事说明江浙两省及上海争路排英的情况后，即拟分别打电报回国，表示东京留学界全体拥护争路斗争。保皇党方面有人上台发言，提议暂缓发电，理由是要看借款修路条约对主权有无损害；如无损于主权而对国家又有利益的话，即不宜反对。登时会场中有人大呼：“这是亡国奴的声音！”那位先生不服，反而说这是朝廷的主张。于是有人喊道：“这是保皇党，该打！”的确，此人下台站在他同来的一群人中，便显露出是个保皇党了。他还说：“要打就打！”那时与会者多系革命党人，一时拳打脚踢，大打出手。会场立刻大乱，干事们招呼不了，直到日本警察赶来，才停止了殴斗。

不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他的主张胜利了，可望将来被召回国，参预新政。他因组织政闻社而到东京来，在锦辉馆召开筹备会。那天是星期日，同盟会有一些同志到民报社去玩，有的下围棋，有的看书报。一位同志说，他路过锦辉馆，看见门口竖立着一块又大又长的牌子，上面写着“政闻社开筹备会”，下面还有“准十时开会，凡愿赞同者请签名入会”等字样，并闻此会系梁启超由横滨亲来主持。张继就说：“梁文妖要在东京兜售保皇主义，不行！我们赶快去闹他的会场！”登时就率领了十多个同志赶到锦辉馆。开会时，梁启超在开场白中说：“现在我国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可见我们早年主张变法维新，并没有错。既是君主立宪，目前的资政院、咨议局，将来必改为议院和议会，那就是代议士制度的政党政治。我组织这个社的意义，就是预备将来回国，由议会而掌握政权。现在有些人主张革命，要民主共和，这违背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况且列强正协以谋我，如果革命，立即可以召瓜分之祸，很危险！……”张继立即起来说：“你胡说八道，东京是什么地方？岂容你这妖怪来出卖风云雷雨！”接着大呼“打！打！打！”一时台下有人将所坐的棉垫子，有人将草屐，纷纷向台上扔去。跟着双方的人就互相殴打起来。有人喊了一声：“把后门关上，不让妖怪逃跑了”梁见事情不妙，马上从大门溜了。等到警察一来，大家趁势一哄而散。以后凡是遇到国内发生什么政治问题，留学生总会不得已而召开全体学生会议时，总是以打架告终；各省同乡会开会，也很难避免殴斗，而且越打越厉害，甚至开会之前暗带短棒铁尺之类进入会场，准备打架。有一次四川同乡会开会，为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双方打了起来。保皇党的白坚（四川南充县人）和同盟会的雷某，都打得头破血流。日本警察来把打架的人抓去坐了一日一夜的黑屋子。

大致是一九〇七年（丁未）间，还发生了李肇甫率领留学生队伍大闹驻日公使馆一回事。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但此事的起因已忘。只记得在留学生总会馆开会后，即由肇甫领队向公使馆进发，队伍很大，且很整齐。公使馆大门外虽有日本警察警卫着，但毕竟是一个使馆，我们进入了大门之后，日警便无权干涉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能够长时间在馆内大闹特闹，上下楼房遍搜公使胡惟德未获。后经公使馆的馆员说了许多好话，才散去。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秋瑾和鲁迅

1902年，鲁迅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两年以后，秋瑾也来到日本东京。这两位绍兴同乡，一个来自南京，一个来自北京。这两位后来各以自己的成就而享名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人物，过去没有，也无必要见面。而从此后，历史却提供给他们有可能见面的机会是太多了，可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却是太少了！

秋瑾初到东京，住在服部繁子家中。不久，应留日学生的邀请，迁到了外边去住。秋瑾热情奔放，喜群好动，尤

其爱参加各种活动，留学生会馆的集会，浙江同乡会，湖南同乡会，她都是座上客，而且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都激动万分，留给了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出头露面的机会很多，诸如，演说练习会，实行共爱会等组织的活动都能见到她的身影。鲁迅却是一个冷静的青年，沉默寡言，好学深思，正埋头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之中。但他对留学生一切活动也很感兴趣，常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1904年的7月初，秋瑾来到日本东京，鲁迅却在9月中旬去仙台，这中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完全有可能见面，可是历史上却没有一些的记载！

这一年的寒假，鲁迅从仙台赴东京。当时秋瑾还在东京，可是，他们又没有见面的机会。原因是，鲁迅中途在水户下车，瞻仰了朱舜水先生之墓。待到了东京后，又立即和许寿裳去箱根旅行去了。等回到东京，秋瑾已经回国探亲去了。待到秋瑾从国内归来，鲁迅则早回仙台去听讲了。

1905年的初冬，他们又有了可能见面的机会。这次，浙江来了一批人，就是徐锡麟一行13人。他们从上海起程时，已经给在日本的陈子英打电报。要他们去横滨车站迎接。陈子英便约了当时还在仙台读书的鲁迅一齐去横滨车站迎接。出人意料的是，徐锡麟一行人是分两路走的。徐锡麟偕同夫人王振汉一路在神户下了轮船，改乘火车去东京，在新桥火车站，受到了秋瑾的热情接待；剩下一路，仍坐轮船到横滨，鲁迅和陈子英迎接的是这一路。由神户到东京新桥的火车，要两天，而由神户到横滨的轮船，则需要3天。因此，秋瑾先已见到了徐锡麟夫妇，而在一天之后，鲁迅才接到范爱农他们。就这样，又一次机会错过了。

大约半个月以后，形势迅速起了变化。

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11月末，留学生闻知此事，群起反对。12月4日开始罢课。当时，东京留学生有8000人，一齐卷入了这次斗争的漩涡。

正在实践女校读书的秋瑾，4日听说了各校罢课的消息之后，就要求参加罢课活动，结果为校方所阻。她非常气愤，在校园内，她指着学校，极为不满地发表议论。学校规定，要停课外出，必须迁出学校宿舍。于是秋瑾便领导一些女学生离开学校，在市内找了下宿屋，加入了罢课行列。5日，她们赶到了富士见楼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当讲到学校如何阻挠她们参加大会的情景时，便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在座诸人无不为之感动。会上，她和吴弱男一起担任了联合会的女生代表，并被选入纠察队，担任一个分区的小队长职务。罢课活动因为陈天华的蹈海自杀，很快便推向罢学归国的高潮。不论是罢课还是纠察，以及罢学归国，秋瑾始终都是主张最激烈的一位。

鲁迅和秋瑾的情况完全相反！

正当罢课斗争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一部分人正在思考另外的问题。他们不愿意罢课，这主要是一些老留学生和官费生，他们受驻日公使馆辖下留学生监督处的管理，没有公使和留学生监督处的指示，不能随便参加这类活动。另外，不同人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这“取缔”二字的内容，不过是管理的意思，原来没有什么不好；有人认为，从法律上讲，日本政府的法令，留学生不该、也无权过问；有人认为，到日本来留学，就是来学知识，要忍辱求学；现在知识未学成，就回国，有何面目见乡亲父老！有人认为（主要是法政速成科学生），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不能放弃这最后一个机会。另外，最后一些人认为，这样回去未免太丢人！因为考试留学生的时间还未到，这样回去，洋举人、洋进士的出身，就要捞不到了。于是，这几部分人，就在利害共同的情况下，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东京维持会界同志会（当然，后来得知，这个组织的成立，是梁启超、杨度的插手和杨枢、汪大燮等人的幕后操纵的结果），主要人物有陈榥、何燏时、蹇念益、江庸、许寿裳、陈叔通、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蒋尊簋等人。

鲁迅是官费生，他就不同意留学生的罢课，也不同意罢学，更不同意归国。他赞成维持学界同志会的主张和作法，并支持他们的活动。他拿出一元钱交给许寿裳，做为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表示自己对他们的赞助。

随着形势的变化，两派对立情绪日益严重，不久发展为行动上的对立。

归国设学派（即联合会派）对忍辱求学派（即维持学派）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们缺乏爱国热情，缺乏政治头恼，缺乏民族自尊心，认为他们对日本政府歧视中国人民的做法竟然无动于衷，漠不关心，认为这些人无心无肝，形同死人。这种看法在公开场合，在一些人的讲演中，在某些文章中，都有所流露和表示。有些联合会派的人更激愤地表示，维持会派一些人的生命等于被判了“死刑”。被做出这样结论的人有一大批，胡汉民就是一个。秋瑾对他的行动非常不满，曾当面质问过他。鲁迅也是属于维持会派的，当然也属于被判处了“死刑”的人。难怪后来鲁迅向周作人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慨乎言之的呢！

12月中旬开始，归国设学派开始大批归国，秋瑾义不受辱，于年底愤然返国。归国前，浙江留学生同乡会送行，她在台上高声说道：“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说话时，从靴筒中抽出一把短刀，插在桌上。无疑，这又是一个示威！鲁迅先生当时参加了这个会，他亲眼看到了这一番举动，后来，他向周作人描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周作人也很清楚地记得，并把它记在自己的书中。

1907年夏，秋瑾在绍兴英勇就义，消息传到日本，鲁迅愤怒异常，他立即和浙江同乡一道，为秋瑾和徐锡麟开

了追悼会，并且商议打电报到北京，抗议清政府的惨无人道。

1911年11月，绍兴光复，鲁迅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他看到章介眉被诱捕后，在大街上示众的丑态。次年年初，在绍兴大善寺为秋瑾举行了追悼大会，鲁迅当然是一位参加者。他对秋案的告密人之一的前府中学堂校长杜海生甚为不满，曾支持过学生的“拒杜风潮”。

他为秋瑾的战友王金发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复仇，而感到高兴；他因为王金发主张不修旧怨而将章介眉释放而表示不满。

秋瑾的英雄形象和动人的事迹，深深地印在鲁迅的脑海里。他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不断思考、探求，他想彻底弄清秋瑾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他也想弄清秋瑾的革命英雄主义给后人的影响，他更想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1918年，他终于构思成熟了，这便是《药》。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塑造了夏瑜这一个革命党人的英雄形象。在他身上十分明显地有秋瑾的影子，但又不是秋瑾的简化的化身。鲁迅从秋瑾一生的战斗生活中，发现、开掘、概括、提炼，终于铸成了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鲁迅对秋瑾的了解是很深的，观察也是很细的。评价非常中肯、对她的人格也很尊重。鲁迅对许钦文说过：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欢喜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都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

但鲁迅对秋瑾身上一些不足之处，也不是一味歌颂。例如，鲁迅曾说过，秋瑾姑娘就是死于噼噼啪啪的掌声的。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秋瑾一生行事，胸怀磊落，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性格。秋瑾在东京留学时，经常参加留学生会馆的活动，而且，还组织过演说练习会。经常登台演说，徐自华云：

东国留学慕君者众，每际大会。辄以君一得临莅为荣。而君亦负奇磊落，往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

秋瑾的演说具有如此魅力，因而受到很多的赞扬，欢迎者也多起来了。这种场合，如果不能冷静，说不定一些人用掌声来捧杀人，而被捧者还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鲁迅看到了这种情况。

秋瑾从事革命活动，尽有一股子热情，而有时缺乏一种冷静的思考与谋略。例如，在她危急时刻，有人劝她出走，她无所动。她哥哥也劝她出走，她说，“躲何为！”王金发也劝她离开绍兴，她声色俱厉地命令王金发“速离”。这些虽然说明她临危不惧，但未必为策略，她没有冷静地思考与分析，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消长变化，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所以，徐自华说她“锋棱未敛，畏忌者半。”陈去病说她“顾瑾卒死者，非以其锋芒有未敛欤！”结合鲁迅的看法，这些言论就不为过了。

（摘自《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

宋教仁与间岛问题

宋教仁和白逾桓往东三省进行革命活动时，正值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张小甫、陈树藩（均湘人）在该处做官。赵闻知宋、白到，欲捕之。张、陈从督署获悉，密谋救之，乃侦得宋、白住址。封银三百两送宋，嘱远遁。宋与白不愿离去，决定迁居暂避。

逾时，宋思及延吉长白山下，有一姓韩名登举者在该处开矿，有护矿武装数千人，拟往运动其加入革命。先是，清政府曾派人往说韩，令其接受管辖，并许成立两镇兵驻守。日本政府亦曾派人往说，欲令其归顺日本。韩均不从。宋往见韩，韩待之颇殷勤。宋于韩处获悉，日本政府因见该地住朝鲜人甚多，欲将该地变为间岛，并入日本领土，乃由参谋部组织三个团体，以谋我东三省：一为长白山会，一为黑龙江会，一为南满株式会社。其中长白山会专司造假证据以证明延吉为间岛者，收罗浪人颇多。宋从此事关系国家领土主权，深以为虑，拟亲往长白山会一探究竟。时有日人片山泉（潜）者来延吉，宋与之原在日本相识，得其函介，易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该会不加疑焉。宋因而尽悉该会所造将延吉变为间岛之假证据，并拍照携归。随又赴汉城图书馆翻阅有关图籍，将证明延吉并非间岛之一切资料录出。复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图籍，核对自汉城图书馆所获之资料。旋著成一书，名曰《间岛问题》，以确凿之证据，证明延吉为我国领土，对日人之侵略阴谋，为有力之揭露。书成之后，宋为穷困所迫，将原稿请由覃理鸣介绍求售于某学社，未被接受。有翰林某见此稿，颇赏识，原出百元购之，宋不允，遂搁置。宋以此益穷困，生活更无法维持，乃迁住于青山医院。该院系专为留日学生而设，住院费用全由公使馆负担。宋迁此后，食宿暂可无虑矣。

是时袁世凯在京，因欲查明延吉一带情况，令驻日公使杨枢物色留日吉林学生二人担任此项工作。适某翰林至，谈及此事，告以曾见有《间岛问题》一书。杨枢随令从覃处取出原稿，将内容用二千字电报摘要告袁。袁复电极为赞许，并令赠洋千元与著者（款由覃、宋按四六开分了）。宋得此款，即迁居某高等妓院。袁得书后，欲与日人会商解决此一问题，须得著者出面作证，遂电驻日公使令宋回国。公使馆命覃觅宋，告以此事。宋谓：“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归国？”公使馆据以告袁，袁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职。宋乃就商于孙（中山）、黄

(克强)及同盟会诸同志,得孙同意。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宋阅后痛哭流涕,遂决计不回国。

后袁以吴禄贞担任与日谈判之职,与日人会议于滦州,双方提出有关证件,而日方所造假证,在宋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中已悉予揭穿,日人阴谋未得逞,逃会而去。袁以此颇重视宋。后来宋到北京,袁多方笼络,曾送二十万金,一为交通银行存折,一为中国银行存折,并说明如不足尚可增加。宋出京时,将存折原封退还。袁知宋革命意志坚持,不可以金钱收买,终竟以卑鄙手段暗杀之。

敦煌珍宝流失记

奥利尔·斯坦因(1862-1943)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世居匈牙利的犹太人。他父母有一女二男,斯坦因是小儿子,。他从小就受洗为基督徒,他父母认为,这样会使他前途光明。珍妮特·米尔斯基为斯氏作传,说"在斯坦因的长辈来说,洗礼是打开犹太人居住区的一把钥匙并提供接近财富的机会"。他没有使他的父母失望,他一生一直坚守着他的宗教信仰。斯坦因个头不高,只有1.6米,但聪明机智,精力充沛。据说,他60多岁时还能在崎岖的山地上步履矫捷地行走,为年轻士兵所不及。斯坦因富有语言天才,会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梵文等语言,又学过克什米尔语和突厥语,对于中文则不甚精通。

在匈牙利人是匈奴人后裔这种古朴信念的吸引下,斯坦因在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主修印度、波斯和中亚的历史。从师两人,其中维也纳大学的印度语言和古物专家布勒(1837-1898)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做为布勒的门徒,斯坦因有志从事其师的毕生事业。那时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赴印之道在英国,因此在1884年毕业后,他就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研究东方语言和考古学。一年后回国服役,在测量学校学习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于1886年再回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和阿希摩兰博物馆研究古代钱币。同时,他获得了一份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主任兼东方语言学校校长的工作,这年底乘船到了印度。

在印度期间,他利用假期在克什米尔作考古旅行,继续其师的事业,但他对自己的职位和待遇都不满意,曾申请回国任教。当1897年布达佩斯大学接受他的申请时,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的导师布勒认为,就他的研究而言,他不应该离开印度。1898年9月他向印度政府提出去和阗发掘遗址的计划,英国殖民当局从实际利益出发,同年底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因俄国介入并未公开。因为他还肩负着测绘地形绘制地图的任务,那些测量人员是以他的仆从名义申请签证的。于是,1900年5月31日,37岁的斯坦因开始了越过喀喇昆仑山,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首次远征。

斯坦因第一次考古发现,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此前,考古学家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古埃及和见诸于《圣经》的那些遗址的发掘,斯氏对中亚的考古还是第一次。第二年即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第十三届国际会议上通过了一个特殊的决议,庆贺斯坦因的伟大发现,斯坦因也因此而获得了第二次远征的许可和经费。接着他又出版了《古代和阗》一书,1903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巴克格兰勋章,他立即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1907年2月,他来到了敦煌县城,从一个商人口中得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人,在多年前极其偶然地发现了一间藏有大量古代手写文稿的密室。他闻讯后立即前往,但不巧王道士出去化缘了。他在一个小和尚的帮助下,看到了一本手稿,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写道:"那是一件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纸卷,高约一尺,长可能是十五码。"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万里长城向西延伸的部分和玉门关遗址。

1907年5月21日,他再次来到石窟,见到了王道人。这时斯坦因听说,甘肃学政叶昌炽曾建议甘肃政府把王道士发现的东西全部运往兰州,但运费一时无法筹措,所以1904年命敦煌县府先行检封,由王道士就地保管。斯坦因意识到这些东西是王道士的最大骄傲,因此,就要求道人允许他参观一下,并表示要资助他兴修石窟寺。在建立了初步的交情后,他被允许进入石窟看书,并自作主张地进行了挑选,并把挑选物搬进了自己的帐篷,进行"仔细研究",王道士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不久,斯坦因得寸进尺地提出"购买",面对这个被斯坦因称作"古怪的、一身兼有宗教的热情、天真的愚昧以及对于自己的目的采取各种聪明手段坚持不放的道人。"斯坦因决定以护法圣徒的名义,带一些经卷回佛教的老家去,以期光耀佛祖的圣名。这一着果然触动了王道士的某种感情,他欣然同意出卖,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斯坦因在停留中国期间,对这笔交易必须严守秘密,斯坦因对此当然是乐于接受的。于是斯坦因在付了4块马蹄银(一块马蹄银约50两银子)之后,拿走了10000卷珍贵的文稿。平均每卷只付了两分银子,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一个低得近乎荒谬的价钱。问题的关键是王道士根本无权去"卖",他只是奉命看管而已。斯坦因很清楚这一点,他后来写道:"约在十六个月后,当所有24只满装手稿的箱子和五只装有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和类似的艺术古物,已经平安地堆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我才真正宽慰地舒了一口

气。”这是斯坦因作贼心虚的最明显的表白。离开敦煌后，他又陆续去了几个地方，在返印途中，他忠实而得力的助手莱姆辛得了青光眼，在沙漠的强光刺激下终于失明，后经斯坦因施加压力，印度政府才给了他一笔养老金，可是不到4个月他就死去了。而带着“宝贝”返回伦敦的斯坦因，从此获得了更高的荣誉：英王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以金质奖章，牛津和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他自己利用两年3个月的假期，编辑“个人叙述”，1911年出版了《契丹沙漠废迹》一书。蒋孝琬也因“有功”，而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汉文秘书一职。

1912年民国成立后，别的国家的探险队不敢再来中国，但年已半百的斯坦因却提出了第三次到中国活动的计划，第二年成行。这次活动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盗掘了阿斯塔那的大批唐初古墓并窃取了伯孜克里克人大量的古代壁画。他的行径引起了中国新疆当局的不满，因此，禁止他再借考古的名义作任何发掘。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停止了活动。大战结束后，他计划去阿富汗考古，也遭到阿方的拒绝。

1929年年底，67岁的斯坦因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就他3次中国之行，作了6次演讲。这就是后来向达所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书的底稿。在美国演讲期间，他接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2万英镑的资助，决定再次组队前往中国新疆考古。1930年4月底，他到达南京，通过英、美两国外交人员向中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但那时中国政府已规定：外国考古队来华活动必须有中国考古学家共同领队，还必须有中国雇员，所获文物不可携带出境。他自恃有英、美作后盾，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拿到通行证后，就擅自回印度组队了。不久，他就开始了第4次中国之行，由中亚进入新疆，到达疏勒后，新疆当局对他一直很冷淡，只同意他取道和阗，前往尼雅，然后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就是这样一条路线，斯坦因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获批准的。一路上，他想发掘一些遗址，但由于地方官员的监视和无法雇到大规模发掘所需的工人，所以只好沿途偷偷挖掘一点，这样走了5个多月还未到达迪化。他的行径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愤慨。1930年11月7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致电甘肃省政府，说前次盗取敦煌文物的英国人斯坦因，反复游历西北，行迹可疑，当有所防范，倘有盗窃文物之事，尽可扣留，驱逐出境。敦煌县政府令公安局严密注意。终于，中国政府取消了他的通行证，并且禁止他有任何挖掘活动。他只好半路折返疏勒，被迫将掘取的文物留交中国政府处理，然而，他还是狡猾地携走了全部照片和记录。至此，斯坦因的第4次中国之行告终。

1943年，81岁的斯坦因受一位美国外交官友人之助，意外地被邀请访问阿富汗，这就是他24年前想去而被拒绝的地方。10月19日达到喀布尔，10天后就病逝于此，就地安葬，从而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对于斯坦因的一生，中外学者褒贬不一。如果孤立地就他个人而言，斯坦因确实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吃苦耐劳，无惮于翻山越岭和跋涉沙漠的种种艰苦，博学机智，凡事筹划详细周全。斯坦因考古的区域，包括一个很大的长方形，东西约长1500公里，西起帕米尔，北至天山，东抵南山，南达西藏与新疆的分界线之昆仑雪岭。西方许多国家给了他许多奖励和荣誉，有人称他为那一代最惊人的学者、探索者、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综合体。然而这些颂扬者恰恰漠视了中国人民正当的民族感情。漫漫西域古道湮没了千年的古物，中国灿烂文物的遗存，理应得到中国人的妥善保管和发掘。被西方列强盗走的文物，许多毁于战火，有的因保管不善而失去价值，永远地剥夺了中国人民应享有这些遗产的权利。因此我们称他们为文化强盗。半个世纪前，在中国西部大地上慢慢蠕动的黑点，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阴影。

（摘自《民国春秋》）

流 行 风

小说《廿载繁华梦》

作者黄小配，主要内容：

该书写广东南海县光棍周庸祐不好读书，善弄功名取富贵，父母死后，到广州找在海关当库书的舅父傅成，后成傅的代理人，上司要查办海关漏洞，傅逃走，周做库书。从此周从中贪污，每年收入二十万两银子，成巨富。携银至京，为穷京官谋取粤海关督办职务，然后沆瀣一气，大发横财，周在广州、香港置有巨大家产，娶十妾；屡出钱捐官，并曾任驻英使馆头等参赞，又被委任为驻某国大使。由于仇人告发，两广总督下令抄周家，周妻妾离散，各怀鬼胎；他自己也逃往海外，廿年繁华梦烟消云散。小说以严重半殖民地化的通商口岸广州和殖民地香港为主要背景，按时间顺序写出主人公从发迹到败落的全过程，揭

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与官场腐朽、丑恶。书中一个骤起骤灭的暴发户光棍的形象刻画得还算深刻，和其他谴责小说相比，结构也比较紧凑，但由于仓猝成篇，作者笔力平均使用，重点部分没有洒墨如泼，使全书缺少起伏，也无精彩段落，影响了小说文学价值。

小说《冷眼观》

作者王濬卿，主要内容：

写"旧社会的怪事"，主要是暴露官场的黑暗腐朽。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写了官僚的贪污受贿，地方豪绅的横行霸道，中间涉及到了许多史实，像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平天国运动等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晚清的政治、社会生活，对维新运动的经过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暴露封建官僚上，作者不仅写了官场上的，而且进一步写了一些大官僚的家属如何横行乡里，谁要主持正义，为百姓伸冤，则无立锥之地，轻则丢官，重则丧命，作者在书中敢于直言，本质地指出政府里有些人："将计就计的，拿着立宪两个字来做楚歌用，想去吹散了革命的意思。"痛快地揭穿了清廷之所谓"准备立宪"的内幕，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所到的地域，扬子江、珠江、京、津一带的所见所闻，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上至太后皇帝，下至百姓、妓女，把当时社会上的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写到了，其中不乏生动、出色的描写，尤其是所勾勒的一些贪官污吏的嘴脸更是维妙维肖，有一些场面，事件也写得十分精彩，如写维新党活动，得宠眷，被捕杀，出亡等，读来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所暴露之丑态如烛照鬼计，无所遁形。全书场面阔大，但稍有过繁之嫌，作者对社会现象深致不满，又没有说出如何救治，但作者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来暴露当时腐败的社会现实是值得肯定的。

小说《女子权》

作者思绮斋，主要内容：

本书描写了清末年间女主人公袁贞娘开展女权运动的故事，以改良主义思想提出妇女解放，女子参政问题，指出妇女要有学术以自治，有工艺以自养两条理想道路，主人公袁贞娘就是作者这一观念的化身，她中学成绩优异，在一次运动会上与军校学生邓述禹相遇，彼此倾心，但没有机会诉说，后贞娘的父亲发现了贞娘在黄鹤楼拾到的邓述禹名片，误以为女儿行为不端，不准她上北京就读高等学府，贞娘忧愤投江，又恰为邓述禹所在的兵轮所救，二人在礼教的束缚下仍不能表白自己的心意。船到天津，贞娘受津报馆主的夫人黄之懿之托，撰写《女权论》一时轰动，贞娘从此为开展女权运动而奔走，在北京就学期间办国民报，又到各地活动，以后又赴美。回国后任清宫廷翻译官，对太后颇有影响，这时各地女权运动也有所发展，朝廷终于下诏，提倡女子受教育等自由权利，贞娘也奉太后之命与邓述禹完婚，全书以大团圆结局，作品以袁贞娘和邓述禹的婚姻为线索，叙述了他们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即使面对面也不能诉说心中的爱慕之情，从而提出妇女解放的迫切性，但故事情节安排过于巧合，有时不近情理，人物形象刻画也很苍白。

小说《最近社会龌龊史》

作者吴沃尧，主要内容：

书中所讲故事的一个中心内容是"骗钱"。为了钱，伊紫旒不仅不还欠款，还把朋友余有声拉进一个骗局，当骗局要暴露时，还想拿朋友作挡箭牌，自己则逃之夭夭；为了钱，贫困潦倒的陈雨堂在丈母死后，竟对人谎称自己老婆死了，以此来谋取一笔吊丧费；为了钱，鲁薇园拐走了朋友二万多银子，改名换姓，最后却又被别人骗得不名一文，总之，全书围绕一个"钱"字，作者以犀利的笔，塑造了伊紫旒、鲁薇园、陈雨堂等一系列丑恶形象，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小说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指出金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而那个表面上轰轰烈烈，花天酒地的社会实际上是个肮脏的金钱社会，是个尔虞我诈的虚伪社会，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旧官场的腐败和旧政府的无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小说《官场维新记》

作者无名氏，主要内容：

书中主人公袁伯珍是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自幼拜名师，学成一种无投不利的八股文。他挖空心思拚命往上爬，到了三十岁便青云直上，考中了举人，成了绅士，颇有些名气。他起初并不佩服新法新政，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他有一个做京官的嫡堂兄弟回家探亲，把洋人洋枪洋炮的厉害述说了一番，于是他便一反常态"维新"起来了。他利欲熏心，不惜用重金由绅士进入官场，借开矿、买机器之机，贪赃枉法，大发横财，将他花钱买官的钱全部赚回来了。于是便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上海大摆阔气，吃花酒，抽大烟，嫖妓女，找小老婆，极尽花天酒地之能事，腐化到了极点。为保住官位，不择手段，溜须拍马。作者用犀利嘲骂的笔调，把袁伯珍这个假维新人物的官场之秘，鱼肉百姓，敲诈勒索的种种罪恶活动，及其丑恶面目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品的结构较严谨。对清末官场的腐败和丑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揭发了假冒“维新”，以求升官发财的官僚们的丑态。书中人物不多，主人公袁伯珍性格的发展变化是清晰的，但作者只是抨击了维新的流弊，他希望真正的维新。

小说《苦学生》

作者无名氏，主要内容：

该小说叙述了立志求学的黄孙在美半工半读的艰难历程。黄孙系湖南湘潭人，自幼嗜学，长成后，变卖田产宅舍东渡扶桑半工半读，在日本学成之后，转赴美国继续求学。到美国的第一年，他际遇乖蹇，屡遭波折，几穷途末路，登岸时遇海关阻遏，以其有“病”为由，拒绝他入美，与中国公使交涉，公使却因其非官费生而置之弗顾，后经日本领事襄助方始入境。。之后，由寓主人介绍进缝衣厂做工，开始了“朝晚做工，中午读书”的半工半读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同学轻其贫寒，妒其才智，进谗言工商部，工商部借口在美学生不应再做工，勒令厂方辞退他，校方开除他。因校方努力，他始能继续求学。然没有了做工的收入，渐渐陷入困顿，与乞丐无贰。同学见状变本加厉地排挤他，逼使校方将其除名，不得已，他又求助于中国公使，公使不但见死不救，反斥其在美做工，丢了中国人的脸，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与老华侨华盛老人的奇遇，使之否极泰来。老华侨身在异乡，心居祖国，为帮助黄孙完成学业，特设夜校，聘他为教师，专教华侨子弟，并尽揽其在美的一切费用。黄孙因此始得继续学业。在黄孙学成归国之际，华盛老人又出资两万美金，托他回国兴学，黄孙归国后，便潜心致力于国民教育。在晚清小说中，反映教育与学生的大都质量不高，这是其中较好的一部。该小说通过黄孙的求学“实录”，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海外学子的艰辛和抱负，谴责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宣扬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塑造了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侨形象，同时也揭露了清廷驻外官员的昏愦、无能及部分官费生名为求学，实为游乐的丑恶嘴脸，小说言辞讲究，情节跌宕起伏，然又过于奇巧，颇有志怪、志异之嫌，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

历史档案

周馥等奏报镇压潮州黄岗起事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6月)

(1)袁世凯、周馥电　四月十八日(5月29日)

收北洋大臣两广总督致军机处请代奏电　四月十九日

十八日早，馥奉电旨一道，即转电提督李准潮道沈传义等钦遵。十七日夜，据潮州镇黄金福由汕来电：职镇四月十三日，率勇两哨由汕航海迅赴井洲，距黄岗二十里，便于相机并待调勇军械。布置未定，十四日夜，土匪二三十来扑，接仗鏖战至黎明，往还数次，斩首数级，悍贼未退。正在督队力战，适第九营赵管带祖泽率队五棚继至迎敌。是日，从辰至戌连接七仗，贼始退散，分入各村，约计毙贼五十余名，伤者一百数十名。先后斩首级十三颗，并毙匪首余单眼二，并获匪党余保之父来钱，夺得土枪、旗帜十余杆。该匪虽器械不精，乌合甚众，非再添勇，不能剿灭。十六日早十点，乘势追搜，并将窝匪村名东亀折〔拆〕烧。现候军火及第七营方国桢带勇百名到齐，即使督队进剿。职镇金福。铣。等因。又据沈传义电：匪踞黄岗，战败缺粮，枪械无多，如急追四窜，转扰他处。樟林浮山，为澄海、饶平屏蔽，已分致各营力守黄镇勿动，日内严督两营先行与嘉军分路剿办。等语。查此匪全是乌合，闻出伪示，禁扰百姓，诱送银米，大有诡谋，已嘱李准相机围剿，勿使窜逸，并饬黄金福稳守勿浪战。惟闻此匪多由闽省渔船载来。近又闻有洋商私运军火之谣。必须断其接济，清查海面。广东兵轮，机旧行迟。适北洋派游南洋海筹、海容两快兵轮过港，因电商凯留两兵轮，暂听李准调遣。除已由馥迳电闽督派漳州镇道堵剿，并暂禁民船不得在闽、粤交界停泊外，馥与凯往返电商，意见相同。请代奏。凯、馥。十八日。

(2)周馥电　四月十九日(5月30日)

据李准电，按潮镇黄金福函：黄岗土匪，迭次战败，匪村已被官兵焚毁。十六日夜，匪尽逃散，兵队直抵匪寨，已无匪踪。等语。惟此匪现逃何处，匪首尤须严拿。现饬李准分兵追搜，并饬兵轮清查海面。俟得详细情形再电。除电闽督外，乞先代奏。馥。皓，巳。

(3)周馥电　四月二十二(6月2日)

收开缺粤督周致军机处请代奏电　四月二十三日

接署潮州镇黄金福二十一日电：今早往分水关与闽省军官见面，诏安县并无股匪窜入，居民安靖。惟在同山拿获巨匪张春为正法。此次土匪，经井洲一败，胆落星散。查询乡民均云：三五仓皇逃避，不及成股。分派队伍四路

搜捕,连日已获巨匪多名,匪首已得主名,现正密拿,俟拿获讯实再禀。等语。现与提督李准电商,黄岗匪散,应搜拿首要,妥办善后,并与闽省妥订民船来往章程。署潮州道沈传义知兵有谋,暂饬该道带队驻守黄岗,事权较一,搜捕得力。汕头华洋杂处,不可无兵,拟饬黄金福俟沈传义到后,带一营回汕驻守,以资镇慑。馥已分饬照办。至黄岗匪徒,皆言假托孙汶〔文〕党羽,惟闽、粤向多会匪,馥现分饬严拿,不问会不会,只问匪不匪,总以密缉首犯为要。黄岗一带,大致虽已平靖,近来谣传洋商私运军火,信息颇多,业已派员在香港、澳门侦察,并饬李准俟黄金福抵汕后,即酌带队伍,乘轮船清查沿海一带,消患未萌,并到廉、钦察看情形,会督镇道,相机办理。其黄岗善后及应参劾、请恤、请奖等事,俟镇道查复到日,缮折具奏。至前查无下落之黄岗同知谢兰馨、黄岗都司隆熙,被掳未戕,匪窜得脱,并以附陈。再北洋两快兵轮现在汕头一带,亦即嘱其遵袁世凯令南行。除电闽督,仍会同防御外,请代奏。馥。(二十二日巳)。

张鸣岐等关于镇压镇南关起事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

收广西巡抚致军机处外务部电　十一月初二日

初一日电敬悉。此事二十八日戌刻,接龙济光沁电,当拟电奏稿电粤,请张督核定会衔译发。二十九日复有电奏两稿,亦电粤核发。顷计次第可达。军事、外交本总督主政,且边事动须与法人交涉,桂林无领事,是以均先电粤。边军新旧共廿营,而沿边千九百里,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南关向只一营,驻守右军山炮台者,在南关外右偏三里许。二十七日黎明,匪千余来扑,众寡不敌遂失守。惟该台既失,南关可危。自闻有越匪来犯之谣,早经迭饬严防,竟致失守,实属异常疏忽,已饬查明失守弁兵军前正法,并添调营队,勒限即日克复。现据报:我军已围攻右军山三面,其一面系越境,难合围。昨电请张督照会法领,转致越督,准我军过界五里,否则,由越督严断接济。我军既能围攻右军三面,南关似尚未失,迭电询问。现查据复:归顺、油隘、巴口、涉口、下石等处。并据探报:匪将分股来犯,已饬一律严防,日内有无战事亦未据报。龙济光现驻龙州,边军分统陆参将荣廷已亲往前敌督饬。龙道、陆参将均向得兵心,当不至有他变。三次电奏,如尚未到,可否先将此电进呈,伏候钧裁。岐肃。东,亥。

收粤督桂抚致军机处请代奏电　十一月初五日

越匪图扑南关情形,业于朔日电奏。续据龙州道龙济光电禀:匪众围攻南关对汛石山顶炮台,当派李福南率队驰救。因守台兵少,被匪将营员兵勇杀毙,一拥而入,遂将在山顶南北中三炮台占据。二十八日我军与匪鏖战,自辰至申互有伤亡。经龙济光派出济军两营,左营取道连城、凭祥,援应南关,后营驰往大塘城、鸭水滩、岗龙隩、座石关等处,以防另股窜入。等语。鸣岐接报后当即电:在越界难以合围,且股匪聚集越边,革党勾串煽惑,蓄谋已久。此次攻台匪党,查有剪发留学生多人,可为明证。中越沿边,千九百里,本已防不胜防。我军又难越境剿拿,办理实形棘手。当由人骏派员面商广州法领,切电越督,断匪接济,并照对汛章程,遇有败匪回窜,即由法军接追。其在越境余党,不许再令窜入我境。法领虽允转电越督,惟匪党在越聚谋,已非一日。夏间迭电外部,商请法使驱逐。今该匪仍由越起,饬边防分统陆荣廷督率各营,在于龙州、容明〔宁〕、连城三处,扼要严堵。此外,沿边要隘,亦饬各营分布严防,并商由人骏会电广西提督丁槐,将驻防广东灵山之西军调回防堵,并思腾出荣济各军拨应前敌,以厚兵力。一面迭饬龙济光将龙州、连城等处军械局认真防守,查明失守炮台弁兵,严加惩处,激厉将士,克日将台夺回。惟查该炮台山顶,界连越边,有小路可通,匪即由此袭入。现我军齐集,攻其三面。一面系大股窜入,其为越督并未据实照办可知。应请饬下外部及驻法使臣,分别切商法使及法外部,转致越督,按照对汛章程,饬令法军堵截缉拿,严断接济,以尽睦谊。除电饬龙济光等迅督各军认真防剿,并饬查明占据炮台匪首及失事详细情形,另行奏报。如果事机紧急,鸣岐当亲赴南宁督师,以资策应。谨请代奏。人骏、鸣岐。支。

郑孝胥张謇等为上海设预备立宪公会致民政部禀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1907年10月16日)

王爷、大人钧座:敬禀者:窃孝胥等寄居沪上交通四达之区,商工辐集,时受外界之激刺,悲忧日积,群相晤晤,每至流涕。愚者千虑,皆谓非实行立宪,无以救危亡。爰于光绪三十一年,集合同志,讲求宪法。三十二年七月,奉上谕: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及今惟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等因。钦此。益用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旬月之间,薄海内外,欢呼庆祝之声动天地。孝胥等上承诏旨,下察舆情,感动奋发,不能自已。伏念立宪之恩命必出自宫廷,立宪之实力必望之政府,立宪之智识必责之人民。人民之智识,何由而进,则非得士农工商四民之中,撮集几许有智识之民,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之旨,为之提倡,无以答宫廷宵旰之忧劳,无以承内外官司之训令。爰将此意,转相传播,闻者感奋,争愿为中国立宪国民

之前导，因即名斯会曰预备立宪公会。期年之间，入会者计一百五十三人，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较有智识，有志倡导国民以仰承朝廷德意者也。前者组织未备，此百数十人，果能实力倡导与否及如何倡导之法，皆未有成规，故未敢轻渎大部，率请立案。近数月来，倡导之法渐可推行，并闻革命风声远近哄起。孝胥等愚昧，以为天下希望立宪之良民多于鼓吹革命之乱党，何啻千倍。但希望立宪者多和平，和平故隐没而不彰。鼓吹革命者多暴烈，暴烈故喧嚣而易动。流风所煽，世患方滋。故为大局计，正宜利用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阴消少数革命之患气。重以王爷、大人仁慈闳达，爱国则思立亿万年有道之基，布政则思饮亿万众和平之福。区区愚忠，益思自效。旋又伏读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饬令臣工，亟筹教育普及地方自治并申明君主立宪政体。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孜孜求治，实行立宪之至意。用敢渎陈钧座，仰恳察核奏明立案，俾希望立宪之人心迎机而大畅，鼓吹革命之患气不遏而自熸，似于立宪前途，不无小补。敬将会中所编地方自治应用各书及本会章程等汇呈钧鉴，伏希察核立案施行，不胜屏息待命之至。肃禀。恭请钧安，伏维垂鉴。

敬再禀者：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着学部通筹教育普及善法编辑精要课本，以便通行。并着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务使议号资格，日进高明，庶议院早日成立，宪政可期实行。等因。钦此。窃维预备立宪公会所编书籍三种：一曰地方行政制度。一曰地方自治纲要。皆取之日本，可为中国试办自治之根据者。一曰公民必读。则依据法理参以中国惯习及现行制度，以便各地方宣讲之用者。似尚切于时用，拟恳大部审定。如蒙甄录，即祈饬发通行，为增进人民智识之一助。是否有当，仍候钧酌。伏希察夺。再请钧安。环叩崇闳，诸维垂鉴。

政闻社宣言书

（一九〇七年十月七日）

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之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诊疠，举国相视，咸汯然若不可终日。志行薄弱者，袖手待尽，脑识单简者，铤而走险，自余一二热诚沈毅之士，亦彷徨歧路，莫审所适。问中国当由何道而可以必免于亡，遍国中几罔知所以为对也。夫此问题亦何难解决之与有。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虽然，于此而第二之问题生焉，则政府当由何道而能改造是也。曰：斯则在国民也已矣。夫既曰改造政府，则现政府之不能自改造也甚明。何也？方将以现政府为被改造之客体，则不能同时认之为能改造之主体；使彼而可以为能改造之主体，则亦无复改造之必要焉矣。然则孰能改造之？曰：惟立于现政府之外者能改造之。立于现政府之外者为谁？其一曰君主，其他曰国民。而当其著手于改造事业，此两方面孰为有力，此不可不深察也。今之谭政治者，类无不知改造政府之为急，然叩其改造下手之次第，则率皆钦假途于君主，而不知任责于国民。于是乎有一派之心理焉，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或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启沃君主，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此二说者虽有直接间接之异，而其究竟责望于君主则同。吾以为持此心理者，其于改造政府之精神，抑先已大刺缪也。何也？改造政府者，亦曰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云尔。所谓有责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对君主负责任言之，乃以其对国民负责任言之。苟以对君主负责任而即为有责任，则我中国自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其政府固无时不对君主而负责任，而安用复改造为？夫谓为君主者，必愿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天下决无是人情。然则今之君主，其热望得良政府之心，应亦与吾侪不甚相远。然而不能得者，则以无论何国之政府，非日有人焉监督于其旁者，则不能以进于良。而对君主负责任之政府，其监督之者惟有一君主，君主之监督万不能周，则政府惟有日逃责任以自固。非惟逃之而已，又且卸责任于君主，使君主代己受过，而因以自谢于国民政府腐败之总根原，实起于是。故立宪政治，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君主纯超然于政府之外，然后政府乃无复可逃责任之余地。今方将改造政府，而还以此事责诸君主，是先与此原则相冲突，而结果必无可望。然则此种心理之不能实现也明甚。同时复有一派反对之心理焉，谓现在政府之腐败，实由现在之君主卵翼之，欲改造政府，必以颠覆君统为之前驱。而此派中复分两小派：其一则绝对的不承认有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其他则以种族问题搀入其间，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决无术以得良政府。此说与希望君主之改造政府者，虽若为正反对，要之认政府之能改造与否，枢机全系于君主，则其谬见亦正与彼同。夫绝对不认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者，以英、德、日本之现状反诘之，则其说且立破，故不必复深辩。至搀入种族问题，而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必无术以得良政府者，则不可无一言以解之。夫为君主者，必无欲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之理，此为人之恒情，吾固言之矣，此恒情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今之君主，谓其欲保持皇位于永久，吾固信之；谓其必坐视人民之涂炭以为快，虽重有憾者，固不能以此相诬也。夫正以欲保持皇位之故，而得良政府即为保持皇位之不二法门，吾是以益信其急欲得良政府之心，不让于吾辈也。而惜也，彼方苦于不识所以得良政府之途。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于政治上减

杀君权之一部而以公诸民，为君主计，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征诸欧、美、日本历史，确然可为保证者矣。然人情狃于所习，而骇于所未经，故久惯专制之君主，骤闻此义，辄皇然谓将大不利于己，沈吟焉而忍不能与，必待人民汹汹要挟，不应之则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后乃肯降心相就。降心相就以后，见夫缘是所得之幸福，乃反逾于其前，还想前此之出全力以相抵抗，度未有不哑然失笑。盖先见之难彻，而当局之易迷，大抵如是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其始也必有迷见，其究也，此迷见终不能久持，此盖凡过渡时代之君主所同然，亦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而彼持此派心理者，徒著眼于种族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为后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毋惑夫汹汹数载，而政治现象迄无寸进也。由后之说，则君主苟非当国民运动敬盛之际，断未有肯毅然改造政府者，夫故不必以此业责望于君主。由前之说，则虽君主毅然欲改造政府，然必有待于国民，然后改造之实乃可期，夫故不能以此业责望于君主。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梁启超）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广西南宁开埠。

1月4日　黄兴愤于萍、浏、醴之役失败，离东京赴香港筹划再次起义。在港活动月余，难以立足，于2月中旬复折回东京。

1月6日　清廷命张之洞筹办曲阜学堂（应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之请）。

1月8日　武汉“日知会”遭破坏，刘敬安（静庵）、朱子龙、胡瑛、李亚东、季雨霖、张难先等九人被捕。（日知会被破坏后，湖北革命党人为了继续团聚力量，并避免清吏注意与压迫，采取化整为零办法，先后组织起二十多个小团体。其中有：种族研究会、将校研究团、安郡公益社、黄冈讲习社、文学研究社、武德自治社、数学研究馆、振武尊心会、黄汉光复堂〔竞存社附〕、柳营诗社、集贤学社、神州学社、兰友社、群治社、益智社、义谱社、铁血军、自治团、德育会、辅仁会、忠汉团、群英会。到1911年夏，湖北革命党人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始将上述小团体重新统一起来，或归并于文学社，或归并于共进会。迨起义前，文学社与共进会又实行联合，成为湖北地区起义之重要领导力量。）

江南新军统制徐绍桢抵江西萍乡，会同江西按察使秦炳直镇压湘赣间之洪江会。

1月11日　宋教仁就徐应奎（佛苏）代表改良派提出《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之要求，同孙中山商谈，孙中山“不以为然”，坚持论战。

1月14日　清廷重新申明教育宗旨（即1906年3月25日所颁教育宗旨），并命学部会同张之洞议定曲阜学堂规则：“慎选师儒，注重行谊”。

1月19日　学部奏请“宣谕华侨，务以忠君尊孔为宗旨”。

1月21日　河南卫辉府乡民联合会党聚众毁学，波及教堂。

1月23日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派员分往各校侦察革命党学生活动。

2月6日　日本宣布中国留日学生共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

2月8日　袁世凯奏陈防制革命党。清廷诏命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

学部咨各省于选派出洋学生，须选择有中国学问根底者。

2月17日　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中央大学以清使杨枢要求，开除与革命党有关之留学生三十九人。

2月19日　孙中山派许雪秋等，第二次发动攻打广东之潮州，受挫。

流落扬州之饥民，不服遣散，聚众殴官。

2月25日　张荫棠电外务部，条陈管理西藏刍议十九条：改定官制，扩展军事，建设交通，推广学校，整理财政、振兴商务等。旋设置交涉、督练、财政、农工商、盐茶、学务、路矿巡警、裁判等九局。

2月26日　江苏如皋县石庄镇民变。群众攻打盐厂，抢当铺，砸学堂。

扬州饥民暴动，焚劫米店。

2月28日　轮船招商局股东议照商律，改归商办。

河南修武绅民抵制福公司开办铁矿。

2月　光复会员徐锡麟得湖南巡抚俞廉三之助，捐为道员，谋在清朝官府及军队中进行革命活动。

3月4日　日政府徇清使杨枢之请，迫孙中山出境。孙中山旋偕胡汉民、汪兆铭往星洲，旋赴河内。因离日前得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债金一万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经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炳麟等人之非议。

东北凤凰厅鲍化南等率众反抗清吏丈量土地。

3月6日　江苏高邮饥民数万人抢米，并捣毁囤谷富绅多家。

3月7日　唐绍仪与英国中英公司订立广九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一百五十万镑。

浙江余杭贫民以米价昂贵，捣毁米店。

3月8日　学部拟定女子师范学堂三十六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

3月9日　广东东莞饥民数千人聚众抢米，为警兵枪杀二人，伤十余人，全城罢市。

浙江绍兴乡民因米价昂贵捣毁米店。

3月11日　江苏甘泉(今属江都县)、阜宁连日饥民抢米。

3月13日　浙江杭州、萧山饥民抢米。

3月14日　孙中山抵香港。旋赴新加坡作数日逗留，然后赴西贡，与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会见，吸收王为同盟会员，并偕同经海防抵河内。孙中山在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之总机关，河内、海防、南圻等地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他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并派邓子瑜到惠州组织起义。

3月16日　江苏如皋、安徽太平府贫民抢米。

浙江余姚沙民聚众求赈，并准备攻城。

3月17日　江苏清浦、娄县(今属松江)、昭文(今属常熟)贫民抢米。

3月18日　直隶静海县抽牛马捐，激成民变，数万人进城示威。

3月19日　上海连日贫民抢米。

3月21日　江苏江都、浙江仁和贫民抢米。

3月23日　宋教仁自东京赴辽东。4月3日抵达安东，不久即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联络当地反清武装“马侠”准备起义，事泄，仍返东京。

3月24日　浙江长兴、江苏如皋贫民抢米。

3月26日　前在江宁被捕之革命党人孙毓筠定罪，监禁五年。

3月27日　安徽芜湖饥民抢米。

3月29日　清廷应山东、江苏、直隶三省京官要求将津镇铁路改为官商合办，命袁世凯、张之洞妥商办理。

3月　安徽巡抚恩铭委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

4月2日　浙江奉化贫民抢米。

安徽繁昌贫民抢米。

4月3日　江苏如皋、武进贫民抢米。

4月6日　浙江富阳贫民抢米。

4月10日　川汉铁路改归商办，乔树枏为总办。

安徽当涂贫民抢米。

4月12日　江宁、宝山贫民抢米。

4月19日　长春、哈尔滨开为商埠。

4月20日　清政府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任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设巡抚。以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任巡抚。

邮传部以汴洛铁路建筑经费不足，奏准续借比利时款一千六百万法郎。

4月23日　清政府设置官报局。

4月25日　东京《民报》出版临时增刊——《天讨》一书，其中包括由“中华国民军政府”署名之《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等革命文件多篇。

4月29日　清廷命陆军第三镇及两混成旅移驻东三省。

广东钦州三那(那彭、那黎、那思)人民为反抗征收糖捐，聚众二三千人起事。推举刘恩裕为首领，组织“万人会”。

4月　孙中山为准备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起义，派胡汉民往香港做策应工作。又函召黄兴离日南来，嘱其潜入广东肇庆运动郭人漳所部新军反正。黄兴至港后，以郭部移驻钦州而未成行。孙中山旋派人进入钦、廉，联络抗捐起义军共同反清，得到刘恩裕赞同；派人运动郭人漳、赵声所部清军反正，但未接上关系。

5月14日　粤军统领郭人漳、赵声会同总兵何长清镇压钦州那彭、那黎、那思起事，首领刘恩禄牺牲，起事失败。

5月22日　因广东潮州清军到饶平县黄冈搜捕革命党，党人仓促举事，黄冈之役爆发。次日占领黄冈，推举同盟会员(原三合会首领)陈涌波、余既成为革命军正副司令，发布檄文，免除苛捐。

清廷更定东三省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

5月23日　潮州镇黄金福率清军攻黄冈，陈涌波、余既成等决定分两路迎战，一路乘虚攻潮州，一路截击黄金福所率清军。

5月24日　是晚，陈涌波、余既成分头向潮州与井洲进军。翌日，余既成一路在井洲为清军所败，陈涌波一路在往潮州途中，得井洲败讯，转援井洲，复为清军所败。

5月27日　黄冈起义军战败，决定暂时解散，俟机再举。是役党人战死九十四人，事后被捕牺牲六十余人。

5月　孙中山又派黄兴、胡毅生两人分赴郭人漳、赵

声营中鼓吹革命，争取所部新军反正。并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联络会党及领导钦、廉地区起义之军事行动。

6月2日　惠州同盟会员邓子瑜等闻黄冈之役已发动，便领导一部分会党武装在归善县七女湖举事响应。粤督急调驻惠州各路营勇合拒，复调驻新会中路营勇赴援，均为革命军击败。

6月11日　为配合武装起义，同盟会香港分会派刘思复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弹在寓所不慎爆炸，刘被捕入狱。

6月13日　黄冈革命军失败后，粤督调出发黄冈之清军往援惠州，惠州革命军与清军激战十余日。是日，邓子瑜知黄冈事败，惠州势难持久，遂解散队伍，将枪械埋于地下。

6月14日　山东济宁州官吏收粮时苛索铜元折价，乡民万余人反抗。

6月16日　黔、桂两省交界处苗民数万人起事。

6月22日　吴敬恒、李煜瀛、张人杰筹办之《新世纪》在巴黎创刊，每周一期，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实行"倾复一切强权"之"社会主义革命"。共出一百二十一期，1910年5月停刊。

奉天辽阳征税过重，乡民二千余人（一说三万多人）捣毁县署，商店罢市。

6月25日　浙江绍兴贫民抢米。

6月29日　京奉铁路全线通车，全线计长六百五十六公里。支线长一百零八公里（该路修筑共历二十余年）。

6月　"女子复权会"之机关报《天义报》在东京创刊（半月刊），何震主编。标榜"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第十五期有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译版序言之译文，并预告第十六期刊登《共产党宣言》全文，未见。

是月　章炳麟等在东京就潮、惠起义失败及孙中山离日前分配馈款事，发起攻击，要罢免孙中山之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遭到黄兴、刘揆一等反对，未果。

7月6日　光复会员徐锡麟（安庆巡警学堂会办）率巡警学堂学生举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占领军械局。旋被清军所败，徐被捕就义（徐原与秋瑾约定皖、浙二省同时发难，事泄，徐遂乘巡警学校毕业典礼时机发动）。

7月7日　清廷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择地试办。各省分年分地办理，限十五年一律通行。

7月8日　清廷重申实行预备立宪。

7月9日　安徽涡阳会党谋起事，号称革命军，未成。

7月12日　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

7月13日　同盟会员（兼为光复会员）秋瑾（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准备响应徐锡麟之起义计划，为清政府侦知，在绍兴大通学校被捕。15日，壮烈牺牲于绍兴轩亭口。

7月21日　清廷设立军咨处，以冯国璋为正使，哈汉章为副使。

7月30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设立存古学堂，设经学、史学、词章、博贤四门课程，大倡尊古读经。

8月2日　清廷谕各省将军督抚振兴实业，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予从优奖励。

8月3日　袁世凯以《日法协约》成立，事机危迫，奏请实行预备立宪。

8月10日　清廷诏命化除满汉畛域，勿存成见，自相纷扰，命内外各官条陈办法（8月8日张之洞曾奏请特颁谕旨，化除满汉成见）。

清廷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来京陛见（9月12日到京）。

8月13日　清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归并会议政务处于内阁。

8月17日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奉省孤立无助，难与图存，宜速行开放政策，使成为各国通商重镇，并大借外债，为银行、铁路、开矿、垦荒之用。

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之《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出版，成为南洋革命党人反对改良派和宣传革命之主要阵地。

8月21日　外务部以日本驻韩统监府拟派员至间岛保护朝民，促徐世昌迅即派员前往布置（徐已派道员王崇文、监督吴禄贞前往查勘）。

8月22日　中德签订山东华德采矿公司勘办山东五处矿务章程。

清廷命各省督抚设法解散革命党，严密查拿。

8月24日　清廷电召直隶总督袁世凯来京陛见（8月30日到京）。

8月25日　汪康年之北京京报馆被封。

8月31日　留日学生张继、刘光汉（刘师培）在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

8月　会党首领张百祥和与会党有联系之同盟会员焦达峰等近百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推张百祥为会长。该会仍保持同盟会之革命宗旨，但将同盟会誓词"平均地权"一语，改为"平均人权"，谋策动长江流域起义。嗣后于湖北、湖南、江西相继建立共进会组织。辛亥革命时成为三省起义之主要领导力量。

陶成章与樊光结及印度、越南、缅甸等地华侨在东京设立东亚亡国同盟会，举章炳麟为会长。

9月1日　同盟会员王和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率革命军三百人于广东钦州起事。

9月3日　王和顺等攻占廉州府属之防城,杀县令。发布起义文告《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三种,申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除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4日,以军火接济不至,乃率众转迫钦州,冀郭人漳响应。

9月4日　袁世凯补授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张之洞、袁世凯入京补授军机大臣。

9月5日　袁世凯请收回成命。命毋庸议。

清廷任杨士骧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9月9日　清廷再派外务部侍郎汪大燮、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学部侍郎达寿,分充出使英德日考察宪政。

9月10日　王和顺率起义军向钦州进发。讵郭人漳见革命军势弱,又受他军牵制,不肯内应。不得已又率军直趋灵山,冀赵声率军响应。

9月12日　王和顺率部攻灵山,遭清军夹击,伤亡颇众。王乃率二十余人入越南境,余众向廉州境三那退却。

革命党人破广西横州(次日破永淳)。

9月13日　留日学生总会电军机处外务部,日俄法协约成立,将有瓜分之祸,日本强争间岛,实其先导,请万勿让步。

9月16日　浙江淳安因抽收学捐,群众捣毁学堂,聚围县署。

9月17日　王和顺余部退至三那后,即宣布解散。由梁建癸率精锐数百人,退入十万大山,徐图再举。

9月18日　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创设国会。

9月20日　清廷诏设资政院,以溥伦、孙家鼐为该院总裁,命会同军机大臣拟订详细院章,请旨施行。

9月21日　清廷命大学士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

9月22日　浙江秀水乡民万余人,进城向府县报荒。

9月25日　南康赣州因反对传教士欺诈举行暴动。杀教士江笃力及教民多人。至10月6日,聚众数万人围攻赣州府城。清政府急调广东、湖南军队前往镇压。10月27日起义失败。

9月27日　浙江於潜县营勇捣毁教堂。

9月28日　龙华会首领朱宝卿(朱鸿钧)等拟定在河南新野、湖北襄阳起义,事泄,失败。

10月7日　南洋华侨联名上书,吁请加速立宪。

10月9日　清廷命礼部及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宗室除外)。

命农工商部会同度支部限六个月内考定度量衡划一制度。

10月10日　正(定)太(原)铁路工竣通车,长二百四十三公里,由铁路提调梁士诒验收。

10月12日　许雪秋组织海丰会党,准备在县属汕尾发动起义。是日,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在日本所购之军械,由日轮"幸运丸"运抵汕尾,因许雪秋准备不足,临事仓促,被清巡舰发现,卸械未成,起义流产。

10月17日　梁启超、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及留日学生张嘉森(君励)等三百余人组织之"政闻社"在东京开成立大会,张继、陶成章等人闻讯到场轰散之,并痛殴梁启超。

10月19日　清廷命各省督抚均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

10月20日　清廷命外务部派员与英人商订苏杭甬铁路借款详细章程,苏浙人民群起反对,组织"拒款会"。

10月24日　江浙铁路公司咨呈两江总督端方,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

10月26日　考察商务大臣杨士琦乘"海圻"、"海容"军舰自上海赴南洋(历经菲律宾、西贡、曼谷、爪哇、马来)。

11月3日　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开苏浙铁路拒款大会(响应浙江国民拒款会)。

太原绅民大会,决议撤废福公司办矿章程。

11月6日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英国保龄公司订立建筑新(新民)法(法库门)铁路草合同,借款五十万镑,因日本抗议,英即废约。

11月10日　上海苏浙士绅开苏浙铁路拒款大会,并公举代表赴外务部继续议拒英款。

11月11日　安徽铁路公司召开大会,反对江浙铁路借款,并力争自办浦信铁路。

11月13日　江苏铁路公司召开特别会议,力主自办铁路,反对借款。

11月14日　以江浙绅民纷起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清廷命两江总督端方等严防革命党从中"煽惑"。

11月15日　江浙铁路股东开拒款会于上海。

11月16日　苏州、常州妇女组织"女界保路会"。

11月18日　南京学生召开"学界拒款大会"。

11月20日　清廷命学部晓谕学堂学生专心向学,不应干预政事。

11月25日　杭州举行"国民拒款大会"。

11月26日　浙江嵊县会党起事,转向兰溪县马铃山一带,围攻邻县。浦江、金华、兰溪同时戒严。

督办吉林边务陈昭常派兵至天宝山,禁止日人中野私开银矿(12月4日日使向外务部无理抗议)。

11月28日　四川铁路股东邓代聪等请另派重臣督办川汉铁路,并将汉口宜昌一段招股与川省合办。清廷不允。

11月　四川同盟会党人密议于阴历十月初九日夜，乘成都清吏集会举行祝贺慈禧寿诞之际，于城内起义，造成全省革命声势。未发事泄，清政府闭城搜捕党人，同盟会员黄方等六人被捕。

四川同盟会员谢奉琦、佘竟成、熊克武联络会党谋于四川江安、泸州发动起义，事泄，清政府大肆搜捕，党人十余人死难。

四川留日学生创办之《四川》杂志在东京刊行，每月一期，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清和争取铁路主权为主要内容。出至第三期即遭日本政府封禁，第四期被没收。

12月1日　东京中国留学生二千余人举行苏浙铁路拒款大会。

12月2日　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爆发。是日黎明，同盟会员黄明堂率广西游勇八十余人攻关，占领炮台三座。4日，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阵地参战，并为革命军战士裹伤。革命军以寡敌众，血战七昼夜后，于9日撤出。

12月8日　广东学界反对英国侵略，抗议清政府出卖西江缉捕权，组织"国权挽救会"，出版"国权挽救报"，并致电外务部和两广总督张人骏，要求英军撤出西江流域。

邮传部奏准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五百万两(商六官四)，派四川建昌道李经楚为总理，山西道员周克昌为协理，候补五品京堂梁士诒为帮理，所有轮路电邮各局存款，改由该行经理。

12月11日　徐世昌至吉林处理间岛及天宝山案。

12月15日　《政闻社》梁启超、徐勤等在东京开会欢迎该社总务员马良，决定将本部迁设上海。

12月22日　邮传部设立铁路总局(裁撤铁路提调处)，以梁士诒为局长。

12月23日　同盟会员谢奉琦、曾省斋等谋于四川宜宾发动起义，事泄失败。次年二月谢奉琦被捕牺牲。

清廷严禁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政事，命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拟定关于政事结社条规。

12月25日　清廷诏"整顿"士风，命学部严申学堂禁令定章，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聚众立会演说等事，否则教员、管理员、督抚、提学使等一并惩处。

12月26日　清廷诏禁京师聚众开会演说等事。

12月　贵州张百麟在贵阳发起成立自治学社，后经同盟会本部承认为同盟会贵州分会，同盟会员亦参与该社活动。1909年7月创办《西南日报》为机关报，至1911年自治学社分社遍及全省四十七个州县，社员约一万四千余人。对会党、新军、防营均有专人分工负责进行工作。辛亥革命时，领导贵州宣布独立。

是年　同盟会员李伯东于云南昆明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敢死队，其中坚分子均为同盟会员。

外　交

2月9日　中日订立扩张汉口租界专约。

3月7日　中英订立广九铁路借款合同。

4月15日　中日订立新奉及吉长铁路协约。

5月30日　中日订立大连海关试办章程征税办法及附件。

6月10日　《日法协约》在巴黎签订。协约规定双方为"维持两缔约国在亚洲大陆各自之地位与权利"，"约定互相协助"。另有秘密换文，两国相互承认：法国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日本在福建、南满，各享有特权利益与势力范围。

7月8日　中俄订立北满洲关税章程。

7月30日　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密约》。为了掩人耳目，同时还签订了《日俄协定》二款，宣布两缔约国承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之机会均等。可是，在密约里却重新划分了日俄两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商定了两国对满洲的垄断，而且商定了日本支持俄国对外蒙古的侵略、俄国支持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由于日、俄两国共同垄断满洲，此后中国政府一切整顿开发满洲的计划，都受到阻挠，不得实行。1910年7月4日，日、俄两国又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密约》和《日俄协定》，不仅公开宣布维持满洲的现状，而且约定日、俄两国共同防卫满洲的"特殊利益"不受第三国威胁。1912年7月8日，日、俄利用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把侵略中国的范围从东北三省扩大到蒙古。1916年7月3日，日俄签订了第四次《日俄密约》和第三次《日俄协定》，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宰割中国，其侵略范围也从满蒙扩大到整个远东。从1907年到1916年的10年间，日俄先后订立了三次协定和四次密约，它们的勾结越来越紧，对中国的侵略也越来越甚。

8月7日　美驻奉天总领事戴德与唐绍仪成立修筑法新路及东三省银行备忘录。

8月14日　日俄二使臣以日俄协约成立事告知外务部。

8月19日　日军借口"间岛"问题侵入中国吉林省延吉地区。日本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当时朝鲜称中国图们江北岸的江东滩为"间岛")，蓄意侵占中国吉林省延吉地区。8月19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清朝外务部，借口"间岛"主权未定，拟由驻朝统监派员前往保护朝民。同日，日本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根据驻朝统监伊藤博文的命令，率领事先已集结于会宁的日军及朝鲜

巡警向延吉进发，由此揭开了所谓间岛问题的序幕。8月23日，日本公然在六道沟设立"驻朝统监府派出所"。8月27日，清外务部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要求撤回入侵延吉日军。由于日本意在制造事端，而不是解决问题，使间岛问题形成僵持局面。经过多次交涉，直到1909年9月4日，才由清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同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亦称"间岛协约")了结了此案。

8月22日　中德改订山东采矿公司合同。

8月30日　中俄订立吉林黑龙江两省东清铁路煤矿合同、吉林木植合同及黑龙江铁路公司购地合同。

8月31日　英俄订立波斯、阿富汗、西藏协定。关于西藏双方"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此后不与西藏直接交涉"，"尊重西藏土地之保全，并不干涉西藏之内政"等(实际是承认彼此在西藏既得利益，宣布维持西藏之现状)。

经　济

1月14日　长春、吉林、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开埠。

2月28日　轮船招商局股东议照商律，改归商办。

3月1日　安东大东沟开埠。

3月25日　日本政府递信省下令"大阪"、"日邮"、"大东"和"湖南"四家在中国经营航运的日商轮船公司合并组成"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总公司设在日本东京，在中国的上海、汉口设立分公司。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侵略工具。

4月9日　六河沟煤矿公司正式设立。

4月12日　川汉铁路改归商办。

5月27日　浙江铁路公司附设兴业银行于杭州。

5月28日　齐齐哈尔、凤凰城、辽阳、瑷珲开埠。

8月31日　汉口扬子机器厂成立。

11月25日　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它是清末由袁世凯主持兴办的煤矿公司。为解决北洋海军的煤炭供应，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令天津官银号出面筹资，兴办滦州煤矿。从1906年开始，在马家沟、陈家岭等处圈购地亩划为矿区。次年正式开采，名为"北洋滦州官矿公司"。1908年开办马家沟总矿，开始用西法开采。此后西法逐渐推广至各矿。该公司名为商办，实际股份多出官方，带有浓厚的官办性质。1912年1月，与开平煤矿合并。

12月8日　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

12月10日　侨商林焕章等设立平海福惠玻璃公司。

本年　官商集股设立"个旧锡厂官商有限公司"。它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锡矿。矿区位于云南个旧，该地因锡矿储量丰富，故称"锡都"。公司贷款给私商，收购其产品，运往香港获取暴利。1909年改名为"个旧锡务公司"，在矿区内设冶炼厂，开始用机器生产。1933年，国民党政府云南省实业厅将冶炼厂改名为"云南炼锡公司"，专业收购锡砂并加工精练。1937年又将实业厅所属锡矿工程处与个旧锡务公司、云南炼锡公司合并，成立云南锡业公司。1940年在昆明成立总公司，在个旧设厂矿管理处。1950年云南解放，收归人民所有。

本年　旧中国较大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制药、制皂企业——五洲大药房创建于上海。初期经营进口西药和制销一般常用成药。1921年接收固本肥皂厂，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分制药制皂两部分。1934年又增设五洲第二、第三制药厂，规模不断扩大。抗日战争前，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分支店约20处，逐步形成一个较大的制造兼销售的全国性大企业。抗日战争期间，皂厂被日军侵占，战后恢复。1954年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

本年　旧中国华侨资本经营的最大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在香港组建。创始人是华侨郭乐、郭泉兄弟，初设于澳大利亚悉尼。1918年又在上海设立公司，经营百货，并附设旅馆、酒楼、茶室、游乐场以及银业部，经营储蓄业务等。以后陆续在英、美、日等国设办庄采办百货，组织土特产品出口。它同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等共同构成永安资本集团。1956年上海分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国营。

本年　山西人民为收回被英国福公司侵占的山西矿权，成立了保晋矿务公司。1898年山西商务局同英国福公司订立借款开矿合同，出让山西省潞安、泽州、平定、孟县、平阳等地煤铁各矿开采权。1900年后，英国福公司前往勘探，要求封闭当地原已开采各矿。山西人民群起反对，集资创设保晋矿务公司。该公司股本162万两白银，绝大部分是通过山西各县政权募集而来，此外还领取亩捐银20万两。1908年赎回被英国福公司攫取的矿权。该公司有权控制山西全省的矿山，还有减免税厘的特权，保卫了山西丰富的矿藏资源。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解放后，归人民所有。

文　教

1月14日　《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它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妇女刊物，由秋瑾主办。月刊。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3月4日停刊，共出2期。

1月　改良派刊物《中国新报》在东京创刊(月刊)，

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杨度主编，撰稿人有熊范舆、胡茂如、薛大可等。

2月　清末著名文艺月刊《小说林》在上海创刊。黄摩西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曾朴、吴梅、包天笑等。该刊以"输进欧美文学精神，提高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为主旨。内容有图画、论说、小说、戏曲、杂著等，编译小说较多。曾发表曾朴的《孽海花》部分章节等。1908年9月停刊，共发行12期。

2月　《中国新女界杂志》在东京创刊(月刊)，留日河南女学生燕斌主编，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出至第六期，以论文有"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等标题，被日警禁止出版。

4月2日　于右任(伯循)、杨守仁(笃生)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于右任任社长，报端不刊清朝年号，而用旧历干支"丁未"纪年。该报刊行后，销路日广。刊行未及一年即毁于火。

5月　南京设立暨南学堂。

8月20日　《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创刊。它是清末海外同盟会会员创办的革命报纸。由陈楚楠、张永福等主办，先后任主笔的有田桐、居正、陶成章、林时塽、胡汉民、汪精卫等。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与当地保皇派报纸《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孙中山亦曾以"南洋小学生"署名，为该报撰稿驳斥"革命足以召瓜分"的说法。日销达4000余份，在海外影响很大。1910年春停刊。

10月　"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在上海创刊(月刊)，蒋智由主编，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与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为宗旨，共出七期。

11月3日　满铁创刊《满洲日日新闻》。

12月5日　《时事报》在上海创刊。它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汪剑秋任主编。提倡保皇立宪；传播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1910年与《舆论日报》合并，改称《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又改名《时事新报》。

本年　《尼生日报》在檀香山创刊。它是清末美洲同盟会支部的机关报。其前身为《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日报》)。由曾长福主持，张泽黎、卢信先后任主编。该报从事反清革命宣传，并与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进行论战。同年冬，内部改组，更名为《自由新报》，改为隔日刊，由卢信任总编辑。停办日不详。

本年　英国人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24箱和绘、绣的佛画5箱。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万件文物。1911年，日本人桔瑞超等从敦煌掠走经卷600件。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二六三窟的壁画。同年，英国人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5箱写本，连同前次，共掠走遗书、文物1万多件。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胶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劫掠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

本年　集成图书公司在上海创建。它是由集成图书局、点石斋石印局、申昌书局和开明书店(与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无关系)等合并组成，发起人为席裕福等。夏清贻为编辑长。编印初小教科书，因取材不精，未能畅销。大力刊印古藉，皆石印线装，如《二十四史》、《九通》、《政典类纂》、《光绪东华录》等。1912年黎元洪、刘成禺等出资接办，改组为民国第一书局。1914年迁武汉，旋停业。

军　事

1月18日　清政府在保定设武备学堂，附属陆军部，令每省保送学生百名肄业。

1月23日　清廷准陆军部请，第一、三、五、六四镇陆军归第一镇统制官凤山统带。

8月29日　清廷定分省限年编练陆军三十六镇：近畿四镇，四川三镇，直隶、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各二镇，山东、山西、陕西、新疆、江北、安徽、江西、湖南、河南、热河、广西、贵州、浙江、福建、奉天、吉林、黑龙江各一镇。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8年

导 言

如果不是因为内忧外患过于严重的话，本年可说是有极大震撼的一年，然而，因为这远比不上统治危机的加深，所以只有草草收场了。

一九〇八年，经过长达十年之久囚禁和折磨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终于可以不用再听命于那个他久已厌倦的老太婆，他终于可以和心爱的珍妃相会诉衷情了。作为一个被看管三十四年的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的傀儡，或许这个死的来到是光绪帝的最好解脱。

相反，那个紧紧抓住权力不放的慈禧太后，她四十八年的统治也宣告结束，而且只比光绪晚死一个晚上，成为永远不解的一个谜，是否在另外的彼岸中，她还是不想放过光绪吗？无论如何，二日之内，帝、后驾崩，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中国一下进入了漩涡之中。

皇权的空缺使得革命党人大喜过望，他们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全国要大乱了，何不趁机举事，或可一战而平天下？熊成基在安庆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起事，但这时并不是最佳时机，对付这类事件，一省之兵力还是绰绰有余的。熊成基只得亡命天涯。

孙中山曾自述“十举事而不成”，从一九〇七年末到本年，他就经历了五次。既不得不叹服其坚韧，又不得不说是蛮干主义过于严重。然而正是惠州、钦防廉、镇南关、防城和河口历次失败，磨练于他百折不挠的意志，赢得了广大同志的尊重。黄兴则成了纯粹的军事指挥者。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光绪、慈禧相继去世

●马炮营起义

●孙中山连续起义

光绪、慈禧相继去世

背影介绍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光绪帝名爱新觉罗·载湉，生于一八七一年，醇亲王奕譞之子，满族。一八七五年即皇帝位，在位三十四年，庙号德宗。他在位期间，长期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即叶赫那拉氏，生于一八三五年，满洲正黄旗人，咸丰帝宠妃，同治帝生母，是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统治者。她从一八六一年开始听政到一九〇八年逝世，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化的象征。临死前下旨，以载沣之子溥仪继帝位，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材料：

·最后的日子

·最后一次下跪

材料一　最后的日子

自是光绪帝不复视朝，太后亦休养宫中，未曾御殿。御医报告两宫病象，均非佳兆，请另延高医诊视。军机处特派员请庆王速回，一面增兵卫宫，稽查出入，伺察非常。庆王接信，兼程入京，一到都下，闻光绪帝病重，太后已拟立醇王子溥仪为嗣，当下入宫谒见太后。太后即向庆王道："皇上病重，看来要不起了。我意已决，立醇五子溥仪。"庆王道："就支派上立嗣，溥伦是第一个应继，其次还是恭王溥伟："太后道："我意已定，不必异议。从前我将荣禄的女儿，与醇王配婚，便等他生下儿子，立为嗣君，报荣禄一生的忠心。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全仗彼力。今年三月，曾加殊恩与荣禄妻室，现已饬迎醇王子溥仪入宫，授醇王为监国摄政王了。"庆王闻言，暗想木已成舟，无可再说，便道："太后明见，想亦不错。"太后又道："皇上终日昏睡，清醒时很少，你去看他一看，倘或醒着，可将此意传知。"

庆王便转至瀛台，到光绪帝寝榻前，但见光绪帝双目睁着，气喘吁吁，瘦骨不盈一束。榻下只有一两个老太监，充当服役，连皇后瑾妃都不在侧，未免触景生悲，暗暗堕泪。当时请过了安，光绪帝亦两泪含眶，便有气无气的向庆王道："你来得很好！我已令皇后往禀太后，恐不能长侍慈躬，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庆王便婉述太后旨意，光绪帝半晌才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见，不敢有违。"庆王道："醇王载沣已授为监国摄政王，嗣君虽幼，可以无虑。"光绪帝道："这且很好，但我，……"说到我字，喉中竟哽咽起来。庆王连忙劝慰，便道："皇上不必怆怀，如有谕旨，奴才当竭力遵办。"光绪帝道："你是我的叔父行，不妨直告。我自即位以来，名目上亦有三十多年，现在溥仪入嗣，还是承继何人？"庆王闻了此语，倒也踌躇了一会；想定计划，才道："承继穆宗，兼祧皇上。"光绪帝道："恐怕太后未允。"庆王道："这在奴才身上。"言未毕，太监报称御医入诊，当由庆王替光绪帝传入。医官行过了礼，方诊御脉，诊罢辞退，庆王亦随了出来，问御医道："脉象如何？"御医道："龙鼻已经煽动，胃中又是隆起，都非佳兆。"庆王问尚有几日可过？御医只是摇头。

庆王料是不久，便别了御医，径禀太后。太后道："各省不知有无良医，应速征入都方好。"庆王道："恐来不及了。"太后道："你却去叫军机拟旨，如有良医，速遣入诊，我也病重得很。"庆王退出，还有宫监们旁构谗言，说皇帝前数日，闻太后病，尚有喜色。太后发怒道："我不能先他死。"是日下午，太后闻报帝疾大渐，便亲至瀛台视疾，光绪帝已昏迷不省，太后命宫监取出长寿礼服，替帝穿着，帝似乎少醒，用手阻挡，不肯即穿。向例皇上弥留，须着此礼服，若崩后再穿，便以为不祥。太后见帝不愿穿上，便令从缓，延至五句钟驾崩，是日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及太监数人在侧。太后见帝已崩逝。匆匆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喜诏。庆王闻耗，争趋入宫，见遗诏已经誊清，忙走前瞧阅。

庆王瞧毕，便禀太后道："新皇入嗣，是否承继穆宗？"太后道："这个自然。吴可读曾至尸谏，难道竟忘记么？"庆王道："承继穆宗，原应该的，但大行皇帝，亦不可无后，应由嗣皇兼祧。"太后不应，庆王再请，太后且有怒容。庆王叩头道："从前穆宗大行，未曾立嗣，因有吴可读尸谏。现今皇上大行，若非筹一兼顾的法子，仍如穆宗无嗣，安得

没有第二个吴可读，仍行尸谏故事？将来应如何对待，还乞太后圣裁。”太后被他驳住，才忍着性子道：“你去拟旨来，待我一阅”。庆王即起，取纸笔，草拟遗诏道：

钦承慈禧端祐康颐照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皇帝生有皇子，应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兼祧之制已定，光绪帝才算有嗣。最感激的，乃是光绪皇后。庆王等退出，时已夜半，太后才得安寝。次日尚召见军机与皇后摄政王，及摄政王福晋，谈论多时。复用新皇帝名目，颁一上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后，其时尚谈及庆祝尊号，及监国授职的礼节。到了午膳，太后方饭，忽然间一阵头晕，猝倒椅上。李莲英等忙扶太后入寝宫，睡了好一歇，方才醒转，令召光绪皇后、摄政王戴沣及军机大臣等齐集，咐吩各事，从容清晰，并云：“病将不起，此后国政应归摄政王办理。”随令军机大臣拟旨，大略如下：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看这道上谕，可见慈禧后爱怜侄女，与待同治皇后，大不相同。不但爱怜侄女，且暗蓄那拉族势力。慈禧后叮嘱既毕，喉中顿时痰壅，咯了几口，休养了好一会。军机大臣尚未趋退，当下命草遗诏。军机拟诏毕，呈慈禧后，慈禧后还能凝神细阅，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命军机加入数语，才算定稿。到了傍晚，渐渐昏沉，忽又神气清醒，谕王大臣道：“我临朝数次，实为时势所迫，不得不然。此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须严加限制，格外防范！尤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故事，可为殷鉴。”说到末句，已是不大清楚。临终时偏有此遗嘱，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喉中的痰，又壅塞起来。面色微红，目神渐散，随即逝世。时仅两日，遭了两重国丧，宫廷内外，镇定如常，这还是慈禧一人的手段。

（摘自《清宫外史》春风出版社）

材料二　最后一次下跪

没过多久，也就是1908年9月，西藏的活佛接到了北京活佛的邀请，从五台山到了北京。两尊活佛同时驾临北京，极一时之盛。可惜好景不长，在达赖到达北京后不到一个星期，两尊活佛中便只剩下达赖这一尊了。慈禧的去世，使得京城里的老百姓纷纷传言，两尊活佛不能同在一域，否则会相克。还说，一个活佛死了，将召另一个活佛跟着去。后来，达赖并没有跟慈禧而去，辛亥革命倒是接踵爆发了。

我们再来看看慈禧与光绪的关系。据许多老太监说，母子交恶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间。我还听老太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不了解中国古代习俗的人不容易理解的故事。很多中国人都相信，老人病了，只要吃了他的儿女或最亲近的人的股肉就能恢复健康。这种割股疗疾的传说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的孝道已经被附着上一层令人厌恶的神秘色彩，它要求人们付出极其痛苦的代价来尽孝。这个故事讲的是，日俄战争后不久，慈禧病了。一天，光绪去请安探视，当时有3个人在场，慈禧、光绪、李莲英。慈禧用自我怜悯的口气缓缓地说：“我知道我活不长了，因为没有人想为我做出牺牲，现在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治好我的病。”慈禧边说边盯着光绪，然后又看着李莲英。光绪和李莲英都知道慈禧指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就是他们身上的股肉。但他们俩都默不作声。

没过几天，“老佛爷”便很快康复。此后，李莲英有一段时间很不受宠。后来，李莲英病了，他手下的一个小太监把他的病因报告了慈禧：李莲英从自己股上割下了一块肉。他把它烹熟，送去给他的太后陛下吃了。据这个故事说，李莲英很快又重获宠幸。而光绪皇帝，作为慈禧的儿子，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慈禧认为这是对她的大不孝，使她丢了脸。光绪因而成为慈禧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一位皇室成员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件轶事，即光绪作为一名囚徒，同慈禧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光绪被关押后，每天仍需要向慈禧请安，这既是一种例行规矩，也是慈禧为了不时地从她那可怜的囚徒身上得到某种邪恶的满足。1908年秋天某日，光绪到宁寿宫给慈禧请安。这时光绪自己也病得很厉害。在太监的搀扶下，他步履踉跄，头颅低垂。光绪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捱不过这场大病了。他支撑着来到慈禧的寝宫，双膝跪下向慈禧磕头。当他抬起头时，大吃一惊，见慈禧是那样的虚弱和憔悴，脸上挂有泪珠，太监正忙不迭地给她拭去。双方对视沉默着，不发一言，空落落的宫殿里悄无声息，死一般地寂静。忽然，慈禧打破沉静，命令光绪，“继续跪着，不准起来！”生命垂危的光绪拼尽全力硬撑着继续跪着，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自语地说：“我是要跪着，这是最后一次了”。的的确确，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几天以后，光绪、慈禧先后在北京驾崩，一个在三海中间的瀛台，另一个在宁寿宫。“老佛爷”肯定曾预感到，他们俩人会同时进入坟墓，也许在那里相互间的仇恨才会熄灭。也许，她曾忽然记起，自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而光阴向她表明，慈悲只是一种品质，但与她的天性完全不相容。

皇太后的死期是1908年11月15日，光绪皇帝死于前一天。事情蹊跷，难免引起许多对“老佛爷”的谣传。有的说，慈禧看到自己快不行了，决心不让大权落到光绪手

里，所以先把光绪害死了。还有的说，宫里的太监，先前仗着慈禧的支持，虐待过光绪，害怕光绪一旦接管权力后惩办他们，于是，毒死了光绪。我不相信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虽有可能，但是没有证据。我认识一位消息灵通的英国医生，他曾从宫里的太医那儿得到不少情报。他私下告诉我，光绪最后的日子里身体很差，病魔缠身，属于自然死亡。不过可以断定，长达10年的囚禁折磨加速了光绪的死。即使光绪是自然死亡，也不能使我们对慈禧的评价有什么改变。对光绪之死，慈禧难辞其咎，她本可以在10分钟之内就把光绪处死的，但她却以长期的折磨来执行死刑。慈禧至死也不会承认她是一个杀人犯，对此，我们无须苛求。

光绪皇帝，生于1870年。他5岁继承帝位，直到1889年大婚后亲政时为止，大权一直掌握在皇太后手中。此后，他当了10年掌握实权的皇帝。不过，这点实权也很有限。太后仍然不断干政。尤其是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干预。甲午战败使中国的虚弱不堪，完全暴露在了世界面前。慈禧对此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898年，28岁的光绪连这点可怜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一直到1908年死去，整整10个年头，他再次扮演了挂名皇上的角色。如果他现在(1934年)还活的话，也还不到64岁。甲午战败对光绪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愈挫愈奋，发动了戊戌变法。如果这场变法不被慈禧镇压，很可能作为促使清朝复兴和中国昌盛的契机载入史册，光绪很可能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样名垂青史。明治时期，日本实行了改革，获得了发展；明治执政在光绪继承同治帝位前7年，明治的死也只比可怜的光绪的死晚4年。

清王朝灭亡前的一个世纪中，屡遭打击，险象环生，影响和威望大受损伤，有好几次面临着灭顶之灾。人们曾对它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多次提出疑问。但是，王朝屡仆屡起，大厦未倒。即使在1900年的义和团大难中，王朝也还是大难不死，居然又苟活了12年。这种顽强的再生力使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都大惑不解。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外国人预言：清朝行将完结，但它却没有完。要不是1898年光绪的戊戌变法被镇压，很可能，清朝将活得更长久，它将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来，步入繁荣振兴之途。可惜，变法悲惨地夭折了，最终未能制止住王朝的腐朽与死亡。

(摘自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马炮营起义

背景介绍

1905年，安徽开始筹办新军，岳王会成员范传甲等继续在新军中活动，组织“维新会”。同年，安徽督练习公所成立步、马、炮、工、辎五种弁目训练所。岳王会便确定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加紧发展会员，这安庆新军起义打下了基础，并领导了马炮营起义。

安庆马炮营起义的全军指挥是熊成基。他在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学习期间，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革命小团体岳王会，在士兵和军事学堂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停办。熊成基到南京进入炮兵速成学堂。在校时间，“勤业尤苦，学术优异”，“恒以复国仇，建民国相斯许”。毕业后，被任为炮兵排长，后因安徽练新军，被调回安庆，任新军三十一混成协炮兵队官。熊成基见皖省新军内“同志中之为军官佐者亦伙。”遂加紧奔走联络，谋划反清起义。1908年秋，熊成基等曾计议乘湖北、江苏、安徽新军太湖秋操时在安庆发难，“以为一经举发，长江中断，淮上应之，北道援绝，上与鄂军合，然后光复南京，东西并进北面而争中原”。他们在安庆设立机关，专事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因范传甲去南京联络第九镇新军时，泄漏了风声，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城内严密防范，起义未成。

材料：

- 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

材料　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

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一九〇八年)阴历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烈士在安庆领导新军马炮两营起义，到现在已经五十三年了。那时熊任新军炮营右队队官，我是炮队中一个班长，跟着他参加了起义。因为时间过久，起义经过，已记忆不清，现在只就想得起来的谈一谈。

丁未(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枪杀安徽抚台恩铭，事前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因为临时改期。新军来不及响应，以致失败。熊与范传甲等非常愤慨，决心要继承死难烈士遗志，在安庆再次起义。这时革命党人倪映典正从南京调来安庆担任骑兵营管带，由于他掌握了一个营兵力，并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大家就公推他为首领，策划于是年阴历除夕发难，占领安庆。不料机事不密，为安徽抚台朱家宝所侦知，倪以嫌疑被撤职，起义计划没有实现。

次年秋，清政府下令南洋各镇新军于十月间在安徽太湖举行会操，预定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朱家宝亦率领安徽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得知这一情况后，遂集议于三祖寺杨氏试馆(党人设秘密机关于试馆内，由范传甲主持)，决定在太湖秋操时，发动起义。当即推定熊成基为总指挥，又推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姓名已忘)指挥全协，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为副指挥，工程营以范传甲任指挥，炮营则由熊负责。他们议定在太湖起义后，即将端方、朱家宝等拘禁起来，然后全军攻打安庆，夺取火药库，再进兵皖北各县，与当地的革命党人配合，这样便有较大的力量直捣清廷巢穴北京。他们事先对太湖秋操的军队也作了估计，认为人数虽有数万，但大都有枪无弹，只要革命党人枪声一响，就会纷纷归顺。因此，他们一方面派范传甲往南京，与第九镇官兵预先联络，一方面指定人员与参加会操的新军中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策动起义。但是，这时安庆新军不稳情况，清政府陆军部已有所闻，遂电知皖抚说，新军三十一混成协新近成立，训练没有纯熟，不必开赴太湖会操，并一律禁发枪械。这样，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就未能前去太湖，秋操起义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

虽然如此，革命党人起义决心并未消失，因即必变计划，以熊成基等所掌握的马炮营为主力，在安庆首先发难，俟攻下安庆后，再协助在太湖的同志策动参加会操的新军响应。正当此时，清光绪皇帝和西太后那拉氏先后逝世，人心惶惶，熊成基、范传甲等认为时机很好，分头与新军中的同志联系，告以起义打算，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于十月二十六日邀集起义部队代表在杨氏试馆举行会议，制定起义计划。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薛子祥、田激扬、廖盘贞、洪承点、程芸萱、李朝栋等十余人，会上公推熊为起义军总司令，并决定于是日晚间由马炮营千余人在城外起事，薛哲等在城内率队接应。熊根据会上决议，发布了作战密令十三条。散会后，大家即分别回营，按照计划进行布置。晚间九时，驻在玉虹门外和北门外的马营(骑兵营)举火为号，同时发动。马营的革命党人张烈、田激扬、周正锋等将马营管带李玉青包围于楼上，劝其投降，李不从，张烈等冲到楼上，用马刀砍去，李因善于拳术，虽然受伤，仍在张烈的刀下越窗逃走。张烈等遂率领马营全体人马离营，开往城北。与此同时，炮营在熊成基的直接发动下，正目张鸿尧、士兵黄节等，用炮闩击毙管带陈昌镛，也率领全营官兵开赴城北。马营和炮营会师后，即驰赴菱湖嘴(离北门里)子弹库。守库正目范传国系范传甲的胞弟，见起义军来到，开门迎入。起义军取得子弹后，遂折回北门，放火烧了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营房，该营士兵平时已接受了革命宣传，也就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至此，城外已无敌军，熊便督率所有兵力攻城。炮兵据原有炮兵营阵地及迎江寺高地发炮轰击抚署和督练公所，步兵攻击城东北角，骑兵与辎重队则攻击城西北角，预备爬城而入。

安徽抚台朱家宝本已前去太湖，得到光绪帝和那拉氏死讯后，立即返回省城，加强对革命党人的防范。熊成基等在炮营开始行动的时候，该营左队队官徐召伯秘密逃入城内报告，朱就严令紧闭各城门，调兵防守。新军二标二营管带薛哲所部驻在北城脚下百花亭，按照发难计划，他是负责开门迎接城外起义军的。不意薛哲临阵畏缩，动作迟缓，未能按时发动，执行任务。等到他听见城外枪声密集，才带领部下百余人冲至北门时，朱家宝已派巡防营加强防守。薛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更踌躇不前。这时朱家宝又率队来到，薛就率部回营，不敢向朱开火。范传甲的任务系率领工程队在城内接应，因为该队官长监视极严，营房关帝庙的大门被封锁，他们又有枪无弹，冲不出来。范无奈，准备在营房放火，以便乘机冲出，但是点火多次，均为反动的队官发觉扑灭。直到次日下午二时，他才乘隙逃出营外，赶到杨氏试馆机关部，向同志黄如波探听消息。黄告以起义军伤亡很重，难以攻入城内，劝他易服出走，免生意外。范悲愤交集，坚不同意，他对黄说："我已准备牺牲，要革命就不怕流血。"随即转回关帝庙营房，打算发动部分同志接应起义军攻城。清军协统余大鸿此时已侦知范传甲系革命党首脑之一，密谋内应，但以起义军攻城甚急，不敢轻易杀害。为了便于监视范的行动，立即下令调他到协本部充任卫队。范在此孤掌难鸣的形势下，仍未稍退缩，当天下午跟随余大鸿出巡，行至饮马塘附近时，他认为机会不可错过，举枪向余袭击，不幸被余的卫队发觉，枪声未响，即被拘捕。此外，讲武堂内的革命党人张劲夫当起义军攻城时，准备率领一批同志冲出接应，由于没有武器，在军官的监视下，也未能冲出来。

城内接应失败，城外起义军虽奋勇攻城，终以弹药不足，炮弹又无引火线，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屡次猛扑，均被击退。碇泊江心的清军兵舰又发炮轰击，起义军阵地被摧毁，伤亡很重，并且朱家宝所调援军已迫城郊。起义军内外受敌，难以支持，迫不得已，于次日下午十时分兵两路，突围出走。一路由熊成基率领，经集贤关向北，准备进抵合肥一带，联合淮颍之间同志，再图大举。途中他们与清军姜桂题所部打了几仗，部队颇有死伤，冲到合肥城时，检点人数已不足一百人。这时，起义军中不断出现叛徒，难以维持，成基乃潜离队伍，辗转逃往日本。他走后，部队也就自行解散了。另一路由程芸萱率领，也是由安庆直奔合肥，与清军江防营混战结果，所剩不足四十人，几天后也星散了。

我省连续两次举义，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这时就指使皖省疆吏进行了大搜捕、大屠杀，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李朝栋、周正举、胡文彬、张星五、张志功、刘志贤、易桂安等均遭杀戮；即临阵畏缩、没有参加实际

战斗的薛哲，也被枭首示众。此外，被牵连受害的党人、士兵以及进步学生等，全省达三百人之多，我是当时侥幸漏网者之一。

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光复，皖人搜集范传甲、张劲夫、李朝栋、薛哲、张星五、胡文彬、周正举、刘志贤等八人遗骸与暗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烈士灵柩，同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九烈士墓碑"，张云屏为作墓表，柏文蔚书石，纪其事。九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

（杨士道《辛亥革命回忆录》）

孙中山连续起义

背景介绍

两广和云南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地区，会党势力深厚，人民富于反抗精神。1903 年的云南周云祥起义、1904 年的广西陆亚发起义，都曾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这一地区距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遥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国境线，便于从国外输入饷械和人员。因此，孙中山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起点之地"。但是，他没有看到，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形势到 1907 年前后已经转为低潮。加上革命派又不善于发动群众，未能把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和当地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起义就只可能在个别地方突破而不可能有大片区域的发展，必然无力抵御清军的四面围攻，也应付不了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

孙中山在南部地区发动的多次起义，既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清政府的生存，也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加深了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材料：

- 惠州起义
- 防城起义
- 镇南关起义
- 钦、廉、上思起义
- 河口起义

材料一　惠州起义

为了分散清军注意，孙中山派出许雪湫筹划潮州起义之后，又派邓子瑜等在惠州地区发动。

邓子瑜，惠州归善人，在香港、新加坡经营旅馆业，惠州会党逃到南洋时大都投靠于他。1907 年 4 月，邓子瑜从南洋到香港，委派陈纯、林旺、孙称等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事。6 月 2 日，陈纯等在距惠州二十里的七女湖集众竖旗，劫夺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檄文云："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封建意识都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显然，这一支会党队伍还不曾受到同盟会多少革命思想的影响。5 日，起义军进攻泰尾。7 日，克杨村。8 日至柏塘，计划攻取博罗县城。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吓得归善、博罗的清朝官吏只能紧闭城门。义军来去飘忽，所向披靡，多次击败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后因接济军械不到，李准又率领进攻黄冈的清军来攻，不得已埋枪解散。

一支无后方的军队是不能持久作战的。惠州地区的会党以强悍著称，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派在该地发动起义，每次都取得相当的胜利，但结果都不得不以"散伙"告终。

除归善一路外，其他两路因为清吏发觉，戒备严密，未能发动。

陈纯于失败后逃亡香港，转赴南洋；邓子瑜则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孙称于 1909 年被香港当局引渡给清政府广东当局杀害。

材料二　防城起义

1907 年 4 月下旬，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要求减免糖捐，推派代表十余人见钦州府吏，被囚。三墟人民大愤，组织万人会，聚众抗捐，推豪富刘思裕为首，入城抢出代表。同时"乡民停耕，钦商罢市"。钦廉道王秉恩派兵镇压，周馥也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新军标统赵声率兵驰往围剿。孙中山认为，郭、赵都是自己的同志，便派同盟会员邝敬川潜入钦州，游说刘思裕，同时派胡毅生进入赵声营中，约郭、赵同时起义。

邝敬川到钦州后，与刘思裕接谈，刘等欣然同意。当即推举刘思裕为元帅，黄世钦为副元帅，邝敬川为参军，择其举事。孙中山随即派人带信给胡毅生，要胡转告郭、赵，抗捐民团已与吾党联合，勿加攻剿。因带信人延误，此信郭人漳等未收到。5 月 12 日，郭部攻下那思。14 日，以炮队猛攻那彭、那黎，击毙刘思裕及乡民无数，血洗村庄。同时，清军进犯良屋村，黄世钦、梁少廷、邝敬川率兵迎拒，鏖战多日，因缺乏弹药，退入山中。其后，邝敬川、胡毅生先后返回安南，向孙中山汇报了有关情况，孙即派萱野长知赴日购械，同时派黄兴、王和顺随胡毅生归国，准备再次发动。

8月13日，为了配合王和顺，关仁甫奉孙中山之命转攻广西上思，未能得手。9月1日，王和顺率领二百余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3日，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王”的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其中，王和顺叙述了自己从“奋入洪门”，“以反清复明为职”到接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过程。他说：“及从孙先生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他号召粤省同胞“共矢忠贞，以图大业。”4日，攻防城。次日，得到清军刘辉廷、李耀堂的内应，入城，擒杀知县宋鼎元等，发布《告海外同胞文》，宣称“誓使五岭以南，无复胡马之迹，进而与长江之中军，燕蓟之北军会合”。

起义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当地群众用烧猪、爆竹来欢迎义军。

攻克防城的当日，王和顺率部五百人进攻钦州。9日晨四时，起义军抵达城下，但郭人漳已经变卦。起义军不得入城，改攻灵山，取道入桂。沿途地方民团投入者三、四千人。9月8日，起义军在通向灵山的云秀桥与清军发生战斗。至第二日，仍不能下。其后，又在狮子口与清军宋安枢部激战一日夜。至9月13日、14日，饷械均缺。王和顺声称向孙中山请示，率二十人退回安南。团民也渐渐散去。余众一部由刘瑞阳、梁少廷率领，另行屯扎；一部由刘辉廷、李耀堂率领，退入那琴、大绿，在十万大山中隐蔽起来。

郭人漳原是华兴会会员，1905年12月任桂林巡防营统领时，黄兴曾专程自日本赶来动员他起事，并发展其为同盟会员，但郭一直首鼠两端，存心投机。这次起义，革命党人寄希望于他 开始就走错了棋子。

材料三　镇南关起义

9月，孙中山命王和顺负责镇南关军事。10月26日，王和顺致书清广东水师提督秦炳直，要他“立功赎罪”。11月6日，又致书清广西边防统领陆荣廷，劝其反正。其后，王和顺前赴那模与凭祥土司李祐卿联系，订于11月18日率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届期，因广西绿林、游勇本分两派，王出身绿林，李祐卿所部游勇与王发生意见分歧，不听调动。王和顺无奈，折返河内。孙中山改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以李祐卿为副。

黄明堂，广东钦州人，僮族，排行第八，人称为八哥。因愤于清政府腐败，投身会党，曾聚游勇数百人，呼啸山林，多次击败清兵。八哥之名不胫而走。被委任为镇南关都督后，进行顺利，迅速与镇南关炮台守兵联络成熟。12月2日，黄明堂、关仁甫率乡勇八十人，携带快枪四十二杆，潜袭镇南关。起义军披蒙茸，拨钩藤，跨越断涧危崖，直进右辅山第三炮台，呐喊而入。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接着，第二炮台、第一炮台相继夺得。

12月3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等至关，登上炮台，全军鼓舞，黄明堂奏乐欢迎。

次日，清军援兵开到，发起攻击，起义军发炮反击。经试发后，击中敌方阵地。孙中山也发了炮。并且打得很准。他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其时，有一炮台尚未攻克，清兵恃险向起义军炮位射击，击中一人。孙中山亲自为之裹伤，并命人抬他下山。

当日，孙中山又和黄兴一起来到山下的弄尧村，访问僮族同胞。据当时人回忆，孙中山非常和蔼可亲，对人们说：“炮台现在是我们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负了。”

同日下午，清军参将陆荣廷派一樵妇持函登台，表示愿以所率六百余人投入麾下，并告以次日有清军五百自凭祥来，后日有清军二千自龙州来，事急万分。祈自重。孙中山读函后和黄明堂等讨论，认为山上大炮虽多，但只有一个炮可以打，枪只有七十多支，都已老旧，难于进取，决定回河内筹款筹械，命黄明堂坚守五日，一俟饷械运到，即便进取龙州。决定后即复函陆荣廷，使为内应。当晚，孙中山、黄兴等下山回安南。

12月7日，清政府军机处指责张鸣岐失去重隘，“交部义处”，责令他督饬各路将官，“优悬赏格，严申纪律，协力进攻，即日克复。”其时，清军丁槐、龙济光等各路援军齐集，以四千人的优势兵力四面围攻。当夜，陆荣廷等在大炮配合下向北台猛扑，黄明堂等悉力抵拒，由于枪弹告罄，不得已于8日夜弃台，退至安南燕子大山。

孙中山回安南后，曾与一法国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国代募军债二千万元，于占领龙州之日交付第一批款项。正在协商条件时，9日晚，得悉炮台失守，谈判遂即停顿。

材料四　钦、廉、上思起义

防城之役中，郭人漳的投机面目已经暴露，但是，黄兴对他仍有幻想。回安南后，再次归国进入郭营，郭人漳阳为应酬，阴怀歹意，被黄兴察觉，借故脱身。其后，谭人凤赶到，黄兴正为缺少弹药焦灼。因谭与郭有旧，便派谭于1908年1月28日往郭处求接济，几经反复，郭人漳表示应允，但以后并未践约。

同年3月，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为了向华南地区扩张势力，安南法国殖民当局

曾经和孙中山拉过关系，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这种关系危及法帝国主义的利益。1908 年春，安南中部发生大规模抗税运动。法国殖民当局担心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会促进越南人民的斗争，因此，方针逐渐发生变化。2 月 12 日，鲍何向法国殖民部报告说："革命党人在我们的领地里进进出出，在中国境内彼伏此起的起义，会激起不幸的趋向，同样会在我们治下的人们中引起骚乱。"驱逐孙中山出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孙中山临行前，命胡汉民留守河内机关部，同时命黄兴为总司令，再次在钦廉地区发动，并命黄明堂规划进取云南河口。

黄兴奉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炮百数十杆，组织云南旅越青年二百余人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于 3 月 27 日向钦州进发。

29 日至小峰，清军管带杨某以为郭人漳至，派兵出迎，黄兴发动攻击，毙五人，逃三人，其余均降。杨某得报，倾营而出，依山布阵。黄兴乃率部佯退，诱清军离山，然后分一路兵从正面攻击，一路埋伏田间，一路兵出清军背后暗袭。清军只顾正面迎敌，没有顾及身后，猝不及防，经顷刻溃，杨某仅以身免。30 日、31 日，又先后击溃清军三营。4 月 2 日，黄兴列阵于马笃山。郭人漳派最骁勇的管带龙某率三营兵来攻，黄兴发枪遥射，龙中弹落马，起义军欢声雷动，黄兴挥军进攻，清军营官带头逃跑，三营全溃。

由于连战皆捷，起义军发展至六百余人。正准备取道那楼、大绿，向广西边境移动的时候，郭人漳合兵尾追，以数千人包围起义军。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黄兴募敢死队夜袭清营，清兵自相惊扰，不战而溃。黄兴率部追击，清军几乎全部覆没，郭人漳的军旗和战马均被起义军缴获。自此，起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迫使敌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不得不频电告急。

由于转战四十余日，缺乏后援，弹药告罄；广西边防营勇虽允投降，但未行动；龙济光所部分统黎天才亦曾准备归顺，但因起义军方面无力交付奖赏花红，事亦未成。因此，黄兴下令解散起义军，除率少数人回安南外，其余退入十万大山。

此次起义，黄兴率数百人转战月余，所向皆捷，但因是一支游离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孤军，最后还是失败了。

材料五　河口起义

1908 年，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筹划云南起义事宜，以王和顺、关仁甫为辅。事先，关仁甫 潜入境内，与清军防营约定，凡携械投降者，给银一元。29 日夜二时，黄明堂等率所部二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五百人，向河口进攻。四时，占领河口。城内警兵相率反正，清军管带岑得贵等逃入半山炮台，与防务处督办王镇邦合力死守。4 月 30 日，起义军奋力攻山，管带黄元桢投降，王镇邦也诈称愿降，暗命亲随射杀上山说降的党人黄华廷。起义军大愤，全力进攻。清军守备熊通用枪押着王镇邦，率部反正，清军全部投降，河口四座炮台均为起义军占领，得枪千余，子弹七万发。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成立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声称：'本军政府因义讨暴，为民请命"，宣布军律若干条，同时向各国发表宣言，声称"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其条文主要有：

军政府占领地内之外国人民财产一体保护；

军政府占领地内，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皆得继续有效力；

外国人若直接援助清政府妨害国民军者，国民军即将其认作敌国；

外国人若以战争用品接济清政府，则国民军立即没收之。

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河口于 1895 年后辟为通商口岸，法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副领事署。革命军所颁布的条文注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勾结，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承认"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则是对帝国主义过分的让步。

河口起义过程中，清政府曾多次向法国外务部交涉。5 月 6 日，法国政府表示，"自当竭力相助"。21 日，法国驻蒙自代领事罗何(R. Reau)声称："尽快结束目前 的骚乱实为至要，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祥的后果。"这一时期，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26 日，在清军白金柱部进攻下，河口失守，黄明堂率六百余名战士突围撤入安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摘自冯自由《革命逸史》）

历 史 内 幕

袁世凯被罢秘史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死于瀛台，二十二日，西太后亦死于仪銮殿。光绪先死，距太后死时约早大半日。当时太后病重，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等入内，请立嗣继承帝位，太后似无若何表示。退而奕劻与世继、张之洞、袁世凯等共同讨论，复相偕入内，于是以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摄政王载沣监国。当时在京有地位的人，都如此说。

据《光绪德宗实录》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壬申（二十日），上不豫。

同日，谕："朕奉皇太后懿旨：'醇新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又谕："朕奉皇太后懿旨：'醇新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癸酉（二十一日）上疾增剧。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

同日，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又，皇太后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甲戌（二十二日），太皇太后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此皇太后指隆裕）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同日，太皇太后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銮殿。

以上光绪帝、西太后先后死及溥仪嗣位，《实录》按日排载，系根据内阁发抄谕旨及军机处档案，证诸恽录，日期决无舛误，与袁信说二十一日半夜入宫亲受懿旨，二者迥不相同。且以时考之，奕劻二十日尚未返京，则二十日之谕旨当然是张之洞、袁世凯榻前承命，而奕劻并不在侧。恽录亦有内阉昌言驾崩之语，或光绪帝实已于二十日死去，因继承未定，秘不发丧，至二十一日始正式以帝崩布告中外。一时任说，太后病危，一切朝旨均径由军机处拟发，甚而言西太后死后追发者。此时太后病虽沉重，对于继承大事，当然尚要主持，其谓径由军机处拟发者，似不尽然。其癸酉（当在二十一日半夜后）懿旨，预留西太后训政地步，还是秉承或仰窥西太后意旨；甲戌（当在二十二日早）懿旨，则是秉承隆裕意旨，若死后追发，亦无庸如此措词矣。因此事于清廷与袁世凯大有关系，故详纪之。

西太后死了，摄政王载沣监国，党于袁者，都为袁危。果然，十二月十八日（距西后死五十七日）谴斥之谕下矣。如下：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此段公案言人人殊，有谓是日隆裕太后面谕监国叫"杀"的，有谓亲贵 们主张"拿交法部治罪"的，经张之洞再三乞恩，始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张乞恩理由，以为"袁在直多年，握在庞大的军力，如果严惩，恐生他变"（其实，袁的军力在北洋六镇：京旗第一镇何宗莲，迁安第二镇马龙标，吉林第三镇曹锟，山东第五镇张永成，南苑第六镇赵国贤。我们想想，这一般人均是旧日提镇，拜爵公朝，亦不过感恩私室，若为着袁个人的进退，有那一个敢于拥兵发难拼着头颅公开的说一"不"字呢？在帝威高压之下，若因拥护私人而酿出变故，这是不容易而且不可能的事情）。当日经过是否如此，外人不知也。有询张者，张亦不明言（以上杨熊祥述。杨，清学问总务司司长，是时常在白米斜街张处）。

据穆瀛（铁良子）说："项城放归事，闻诸吾父云，隆裕召军机领班独对，摄政在侧，庆邸入，后出'先帝手敕办袁世凯'，庆伏地无言，后怒甚，问：'汝何意？'庆回奏请'召汉大臣议'，并陈'张之洞在值未退'。后即斥退庆，召张入，示以此旨，张回奏大意：'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后默许。遂有回籍养疴乙谕。袁在枢垣，起坐不宁，张下，迎询上意，张谓'回去休息良佳'，袁谢'世叔成全'，匆遽退值，即日赴津。"

袁由内廷返锡拉胡同寓所，已备悉谴斥经过，异常惊惶，惟恐尚有后命，遂匆遽微服赴津，暂憩于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杨拜门称受业，故毓瑛称太老师）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觉，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彷徨无微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

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车站(即津东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留”。袁遂于次晨由西车站仓皇登车，时到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熙、严修及端绪(礼部郎中，端方之弟)、继光(端方之子)数人而已。是日适学部值日，严修抗疏请收回成命，监国面嘱张之洞转告严：“此旨已属从宽，不必再有渎请。”遂未明发谕旨。严旋即奏请开缺，得谕旨即返津云(以上津幕亲与其事者云)。

据徐一士题《项城致浭阳手札·庐江刘氏纪》：戊申项城放归，是日，枢臣散直，摄政王复召世、张二相，出谕旨，初更严峻，经世相力争，仅得开缺回籍。项城奉诏面赤，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时孝钦显皇后之丧仍在宫中，先帝奉移观德殿，项城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当直，奈何？”世相曰：“吾为子往。”项城半跪谢之。乃出为归计。闻其家人恐有后患，力劝为国外之行，项城意不之动，家人长跪许久，号泣随之。乃以电话召张镇芳都转至京议之，为筹资斧计也。语至经夜，翌日(袁于罢职当日赴津，即夜返京，次晨即由西车站出京。此记云翌日赴津者误)，与乘京奉车至天津，都围在一等车，至城站下；项城微服在三等车，至老龙头车站下，寓利顺德饭店。旋得赵智庵(秉钧)、杨杏城(士琦)两侍郎电话，促其速返，乃还京就道。一说，项城之免罹重辟，南皮之力为多，谓惧监国手滑也。戊申严旨朱笔，有“居心叵测，着拿交法部严讯”语。其以足疾放归，盖从南皮墨笔帝注。胡晴初(嗣瑗)曾见之内阁旧档中，云云。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似乎他的政治生命暂时作一结束了，但是他的旧部仍然布满各地，北洋各镇统制等，仍是他提拔之人。这些人心目中本来只知有他们的宫保，一时迫于朝命，虽都不敢说什么，而无不期待他的东山再起。袁自回到彰德，以至再出督师，为时将及三载，他的潜势力依然存在。等到他重执朝权，仍是大大的得力于北洋六镇。

(张国淦《北洋军阀盛衰及消灭》)

一件清宫疑案

慈禧太后死于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而前一日光绪皇帝载湉也驾崩了。这两件大事突然发生在一两天之内，一时引起朝野震动，招来中外猜疑，在历史上始终是个难解的谜。

远在戊戌政变前，从清宫里曾一再别有用心地散出了光绪皇帝病重的传说。政变那天，后党甚至宣称：康有为进红丸谋弑，光绪皇帝已经驾崩。其话离奇，其心可知。政变后，慈禧太后除了将光绪皇帝监禁在南海瀛台岛上，使与外界完全隔绝外，又以帝病重为名，命各省保荐名医，并令太医伪造脉案传示内外官署。严复(字又陵)有诗云：“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又云：“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哀。”正是戊戌政变后针对时事所作。

当时，不但把脉案传示本国衙门，而且还把脉案送到了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在后党是为了遮盖耳目，预为后步。谁知反而给了各国公使出面干涉的机会，建议推荐西医进宫诊治。这使后党为之手足失措，深悔弄巧成拙。后来王照(字小航)有一首记事诗：“扬言不预盖欲彰，和缓邻医竞荐良。更有谠言塞逆耳，恶声中外口难防。”正是指这件事而言。

诗中末句是引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话。因为一时间废立之说甚嚣尘上，也引起了一些封疆大臣的关心。政变后，刘坤一特地上奏叩问光绪皇帝病情，并对荣禄表示反对废立，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等语，成为传播于士大夫间的名句。

在这样的中外双重压力下，后党才有所顾忌，没有轻易下手，但两宫水火之势既成，宫内阴谋还在酝酿。据当时接近后党的人说，在后党中间，朝夕担心的是：太后年事已高，一旦殂谢，光绪皇帝必将重新亲政。

清末湖北名医吕用宾曾追述一件有关的事。据吕谈，当时太后视光绪皇帝为眼中钉，而又难以下手，遂以皇帝有病为名，想借医生之手，用误药致帝于死，然后嫁祸于人，但太医善于规避责任，一向用药和平，积习成风，所开药方既不能治好病，也不会治死人，使其无隙可乘。因而，太后就责令各省督、抚推荐医生，指望对帝杂投以虎狼之药。吕被湖北省保举进京，入宫仔细诊察光绪皇帝并无大病，不过饮食劳伤，拟用轻药调治，而太后不准，说过去太医所开轻药不中用，非开重药不可。在严威之下，吕震恐失次，竟然因此得了咽膈病。

从吕所谈的这件事看，后来关于光绪皇帝死因的各种流言，实在并非事出无因。在封建帝王宫闱内，骨肉惯自相残。“烛影摇红”之类的疑案，自来史不绝书。尽管事出深宫，隐约幽晦，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摘自申君《清末民初云南烟录》)

钦防之役失败内幕

郭人漳镇压三那反抗糖捐斗争后，得到清政府的奖励，升任钦防边防督办。清光绪三十四年，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革命党人认为争取钦防地方为革命根据地，已有必要和可能。黄兴与郭人漳有同乡之谊，又平素相稔，便由越南冒险到钦城访郭，晓以大义，劝他投身革命，共同推倒清政府。郭人漳表面上似大为感动，并立誓革命军一

到，即行响应。黄兴以为郭人漳真诚投靠革命，即回越南带领党人，由芒街渡北仑河过东兴，分驻竹山、江平、企沙一带，乘夜直扑防城。县兵略作抵抗，不支而退。党人攻占县署将县知事宋渐元及其家人杀死。党人略事部署，即由防城分为大直、金鸡塘两路进军，会合于钦县西部傍城乡，直扑钦县县城西部，满以为郭人漳必居中响应，唾手可占据钦防地方为革命根据地；加上郭人漳所部千余兵力，挥军北上占据灵山、横县、贵县，掌握西江的上游，再顺流东下，则革命前途大有可为。可是当黄兴率领队伍由防城进军至钦县城西一带的时候，郭人漳在城中毫无举动，便屯兵于老虎山，以观动静。

郭人漳对黄兴的誓言，实非出自本心，不过为一时权宜之计，并不是真诚投靠革命。当革命党军进驻老虎山后，郭人漳即派人往见黄兴，劝阻革命军进城，以免发生冲突，并献计进攻灵山。黄兴不知是计，便挥军北上进攻灵山。正当革命军围困灵山县城，即将攻陷的时候，郭人漳得悉革命军兵力单薄，且孤军深入，便背信弃义，由钦县调兵会同灵山清军夹攻革命军。革命军内外受敌，终于惨败，只得退入十万大山，间关走回越南。

当事人座谈镇南关起义

陆有堂：革命军是由黄明堂、何伍、李祐卿三人率领，从越南同登、那模各处带队前来，进占了镇南关炮台，队伍约有三、四百人。他们来到炮台附近，就有内应接他们上去，没有经过什么开火打仗。革命军经过我们弄尧村边时，高声叫喊：“你们不要走，不要怕！”革命军的纪律很好，没有半点骚扰。他们讲什么话的人都有，土话、白话、客话……，以讲客话的最多。大概是攻占炮台的第二天，孙中山也来了。孙中山在炮台没有住多久，听说只住一、两天就回去了。

黄廷章：一九〇七年旧历十月二十七日，革命党黄明堂、何伍、李祐卿等带领二、三百人由越南的溪卜、经国境弄怀和弄尧的小路进攻镇南关右边石山顶镇北炮台。守炮台的是李哨官的兵，李哨官和士兵都老早和革命党有联络，愿做革命军的内应，所以革命军一到，他们就反正，欢迎革命军进占炮台。离镇北炮台不远的镇中炮台和镇南炮台也是李哨官的兵驻守，革命军跟着分兵前去占领。这样，镇南关的三个炮台就完全落在革命军手上了。

三个炮台的位置在石山顶三个最高的峰峦上。炮台东面的山腰是镇南关。当时驻守镇南关本营的是管带黄福廷，他本来和革命党事前联络好了的，约定革命军一到他就竖旗反正。革命军占领炮台后，派一个军官带十多名士兵拿一幅革命旗帜送交黄福廷在镇南关升起，作为革命军占领了镇南关的标志。谁知黄福廷当时见革命军人数不多，以为革命军力量薄弱，未必能成大事，自己背叛清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于是就临时改变主意。当送旗的革命军将要到关时，他便开城将军官击毙，并打死士兵两、三人，坚守镇南关本营，等待援军。

革命军占领炮台不久，孙中山和黄兴就赶到了。孙中山在河内各处演讲宣传清朝腐败，压迫汉人；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听讲的华侨非常感动，捐助革命军费非常踊跃。孙中山买了驳壳枪数十支，分配给黄明堂、何伍的部队使用，另外建立手枪兵一小队，由黄明堂率领。孙中山对反正的李哨官和士兵极为嘉奖，一次奖给李哨官三百元，士兵们都得到奖金。

梁振升：占领炮台的革命军约有四、五百人，他们行军的路线是由越南的那模、那浪入国境的弄怀、弄尧而上炮台。驻守炮台的是清朝哨官李福南和他的一哨士兵，革命党早就和他们联络好了，约定革命军一到，他们就反正立功。炮台的官兵时常到那模那边玩耍，每个士兵事前已领了革命党发给的三个月饷金的奖赏。这样，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天险要塞的炮台。

革命军占领炮台后一、两天，孙中山和黄兴就来到炮台指挥。孙中山到炮台的第二天，从山上落到我们弄尧屯，坐在我家对面的木棚下面。我们屯里的人多数不在家，只有我和少数人和一些小孩子在家。小孩子见孙中山服装整齐，以为是外国人，就大声叫：“老番来咯，老番来咯！”孙中山马上说：“我是中国人，不要怕，不要怕！”和孙中山同来的还有一个人，后来我们同他们上炮台，才知这人就是黄兴。孙中山在我们屯里休息一、二十分钟，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地问我屯里的人哪里去了，我照实答复了他。孙中山又说：“炮台现在是我们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负了。”在场的人和小孩子们也和孙中山谈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跟他上炮台去。

我的父亲原是炮台的炮手，在这不久之前因年老退休回家。炮台上的官兵我都认识，平日常常上炮台去和官兵玩耍。我跟孙中山上了炮台，看见黄明堂及其他军官正在中台、南台、北台来往巡视。忽然镇南关方面打来一个炮弹，伤了一个士兵。孙中山立即叫人负去好好医治，又问哪一个开炮还击。有一个姓龙的炮手走过来上弹还炮，孙中山很高兴，立即赏他四个光洋，后来又赏他一床洋毡。

孙中山对士兵说：“满清太腐败，太可恶，我们一定要将它推翻，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大家努力吧！”士兵们听了他的话，都非常感动。

革命军的武器很复杂，各种枪支都有，还有一小部分人用马刀。孙中山发给革命军的武器，听说有驳壳四十支，每支配子弹六百发，这是革命军中最好的武器，黄明堂分得较多。黄明堂和何伍都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

言语相通，我和他们很谈得来。

革命军纪律严明，对群众态度和气，买卖公平，群众非常欢迎他们。

孙中山来炮台的路线和革命军来炮台的路线一样，都是由那模经国境的弄怀、弄尧而到炮台。孙中山在炮台大约住了两天，又由原路回越南去了。

黄廷章：清军黄福廷管带的部队驻镇南关，陈炳焜的营务处驻隘口，陆荣廷的统领部驻凭祥，龙济光当道台，驻龙州。这几部分军队都向镇南关一带集中，包围三个炮台，又在凤尾山、大青山、小青山、带骝山各处架大炮向炮台轰击。听说当时调到镇南关一带的清兵有八个营之多。

清朝限期要龙济光、陆荣廷夺回炮台，过限就严厉办罪。黄福廷因部下反正，致炮台失守，罪责更大。龙济光、陆荣廷责成黄福廷打先锋，将功折罪。黄福廷攻打炮台时腿部受重伤，连攻数日还是攻不下。后来革命军见清军越来越多，自己的武器弹药接济不上，日少一日，并且知道从越南运来接济的枪支、粮饷被法国鬼阻挠，不得通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作无谓牺牲，就自动放弃三个炮台，从小路退入越南。

陆荣廷围攻炮台的兵很多。革命军守了几天，外面的接济没有来到，就由小路退入越南去了。革命军失败后，法国鬼在那模各处清乡，被捉去屠杀的人不少，那模村的人都逃到别处去了。隘口附近参加起义或替革命党通讯的人，怕被清军捉去屠杀，也逃到别处，或者迁入越南落业，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潘岐记：镇南关起义时，陆荣廷曾经有意归附孙中山，后来见清朝势大，革命军势弱，害怕反清站不住脚，就不敢反了。陆荣廷攻打石山顶炮台，战事并不剧烈，这是陆荣廷留有余地，准备将来有需要参加革命党时，得到革命党的谅解。

陆荣廷带兵赴前线经过凭祥时，我在街上见到他。他叫我去看打仗，我说我刚从别处回来，没有空。这时陆荣廷还是分统，打下炮台后，不久就升统领了。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

历 史 考 证

光绪帝死于何因

1908 年 11 月 14 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廷突然宣布光绪皇帝载湉于当日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时隔不到 20 小时，慈禧皇太后那拉氏也于次日未刻“崩于中南海之仪鸾殿”。对于 74 岁的慈禧之死，人们尚无疑议，但对 38 岁的光绪竟死于慈禧之前，则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有关光绪的死因，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时，深怕自己死后，被她废黜的光绪重新当政，继续推行维新变法，所以指使太监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以绝后患。如《清室外记》中曾谓“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惟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关于太后、皇帝同时而崩，北京城中，言人人殊，然欲查其原因，则实毫无线索。但日处忧城之中之帝，一旦再操大柄，自为李莲英辈之不利。”认为光绪帝很可能是被李莲英谋害致死的。

《清稗类钞·迷信类》的记载，也认为光绪是被亲信太监害死的，说“因谓孝钦（指慈禧）病革，不愿先帝（光绪）升遐，授命新信太监扼毙之者”。

以上都是市井传闻，当然不足为信。但当时尚有一些接近宫禁、颇知内情之人，甚至有自称亲见亲闻者，后来亦撰文著书，认为光绪帝之死，值得怀疑。例如曾任 19 年御史及起居注官、较为接近光绪帝的恽毓鼎，在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写道：西太后病重时，有人告诉她，说光绪帝很高兴，于是慈禧大怒曰：“我不能先你死”，光绪遂死。清朝末年曾在宫中担任过两年女官的德龄女士，在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一书中，更十分肯定是“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帐，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据德龄的记载，光绪帝之死，系李莲英下毒手所致。更有一位曾给光绪帝治过病的名医名叫屈桂庭的，于所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载《逸经》第 29 期）一文中说，当他在光绪帝死去的前三天再次前去医病时，发现光绪帝突然腹部剧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并且“面黑、舌黄黑”，他认为“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他见到这种情况后，竟然出宫溜走了。

另一种说法则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才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遂先与庆亲王奕劻勾结，准备废光绪立奕劻之子，事不成，乃下此毒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他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

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上述各说，虽然出自太监、内务府官员或御医之口，不容忽视，但都缺乏直接根据，当时有不少史籍或接近宫禁者对光绪之死持不同的议论。如《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等所谓正史或官修史籍内，均载光绪帝系正常病死；再如：《苌楚斋三笔》郑六则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日膏肓，是时肝气大发，以手扭太监顶戴，以足踢翻电灯，情势日亟"。又光绪临终前一段时间，一直为其治病的六位名医之一的杜鍾骏所著《德宗请脉记》一书，对光绪帝的病状，叙述颇详，证明光绪帝确是正常死亡。

第三种说法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的朱金甫同志从馆藏的光绪脉案中考证出，光绪是由于长期患多系统的慢性消耗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并非他人所毒毙。其主要依据是：

（一）从光绪早年的脉案及其自述之"病原"得知，他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极差。如光绪二十三年载湉自书之"病原"中称"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几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仍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年方弱冠即患遗精，且在大婚之前，至二十七八岁时又患耳鸣脑响，并渐次加重。其腰腿肩背酸深亦随之而发，可谓多病多灾者。另据光绪十年、十二年之脉案，知其经常患感冒及脾、胃病，汤药、丸药鲜有不用之时。

（二）戊戌变法，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大变故，其病情也开始加重，出现多种病症，血气双亏，每况愈下。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光绪此时可能又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或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疾病。总之，均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当然，载湉病重，决非偶然，乃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八月的戊戌变法运动，使光绪帝与西太后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公开化、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与镇压之下，变法最终失败，结果是光绪本人失去自由，身遭软禁，精神几近崩溃，而病状纷来沓至，此时精神痛苦更促进病情加剧。其后虽经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时轻时重，缠绵不已。身体的慢性消耗、精神的长期抑郁、慈禧的淫威、形势的险恶等，是光绪帝病情加重的原因。

（三）临终前半年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此时光绪帝之病复杂多变，日趋恶化，辗转床褥，行动艰难。其病状表明，光绪帝的心、肝、脾、肺、肾皆有亏损，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两虚，阴阳俱衰，病入膏肓。医案中经常有"心烦躁汗，夜寐不实"，"气短懒言，饮食减少"的记载。在他亲笔写的一次《起居注》中说："腰胯左边疼痛甚重，稍一动转即牵制满腹，极痛难忍。"所以诊治无从下手，补之不可，泻之不行，寒凉之品不能用，湿势之剂不宜服。御医们无可奈何，仅对症施方，聊以敷衍。

（四）从其死前三四日内及其临终前病情看，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受其它伤害的现象。光绪死前的脉案记载："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 已将脱，谨勉以生脉饮以尽血忱。"由此可结论为：光绪帝之死，乃虚痨之病日久，最终五脏六腑无处不病，阳散阴涸，阴阳离决。以现代医学而论，由于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导致了抵抗力的下降，出现了多系统的疾病。其直接的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致。总之，从光绪亲书病原及其脉案所载的病因、病状来分析，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受其它伤害的征象。何况证诸文献记载，清廷对于筹备光绪帝丧事的措施，早在西太后患病之前就有所准备，并非因西太后自知不起，必欲先制光绪于死命而临时仓猝之所为。另外《起居注》中还记载光绪因长期服药无效而斥责太医无能的话。可见，光绪确实死于病魔。

有些学者不同意以上的说法，认为仅据脉案、药方尚难揭破内幕。因为在西太后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太医的脉案可以受命"捏造"；在当时，给光绪帝治病的主持者是西太后的得力亲信奕劻，名医屈桂庭就是在奕劻授意下由袁世凯推荐进宫的。

总之，光绪"驾崩"之谜，目前还未真正解开。进一步的证据，还有待于对清西陵光绪帝头骨、头发的化验检查。

（摘自《历史之谜》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云人物

载湉

载湉(即光绪帝 1871～1908) 满洲皇族,姓爱新觉罗,1871年8月14日生于北京。

载湉的父亲是清朝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母亲是西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无子,清王朝要从皇族近支里选个晚辈的人来继承皇位。但如出现这种局面,西太后将因小辈为帝被尊为太皇太后。而太皇太后"虽尊而疏",就不能继续干预朝政了。因此,同治帝之死,却给西太后带来了专权危机。于是,西太后便"因揽权之一念",无视清廷的惯例,在同治帝死去的当日便亲自出面,排除众议,强行将与同治帝同辈的载湉立为帝。遂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年仅4岁的载湉接入清宫,宣布改旧历明年为光绪元年,并于1875年2月25日为光绪帝举行了登基典礼。小载湉便在清廷的矛盾旋涡中被卷上皇帝宝座。因此,光绪帝从进入清宫之日起,就体现着西太后的政治需要,并按照西太后需要的傀儡皇帝的模式,经受着严格的训育和精心塑造。从而,使光绪帝逐渐形成了矛盾的性格。

进入19世纪80年代,已是10多岁的光绪帝,在思想见识方面正处于发轫时期。在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又使中国受到强烈的外来冲击。对此,光绪帝也产生了"(忧)虑"的心情。在清朝统治集团主和与主战的争论中,光绪倾向主战,对主战官员、将领的呼声"意以为然",表示支持;对法国侵略者提出的无理要求,他甚为气愤,当即"令总署坚持不许"。

在中法战急期间,光绪帝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毓庆宫学习,尚未理政。因此,他在当时还不可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这种风云变幻的现实和战争的不利,却使正在成长中的光绪帝激起了对朝政的关切。一切政治抱负的幼芽开始萌发在这个小皇帝的心中。

1887年,光绪帝17岁,选后配偶。1889年2月,光绪帝举行了"大婚"典礼。随后,按照清王朝的新帝婚后即应亲政的传统,于当年3月4日,清廷宣布,光绪帝实行"亲政"。从此,西太后便常驻颐和园,以示"归政"。

光绪帝的"亲政"只是一种形式。《慈禧外纪》的作者说,西太后"归政"以后,她在"表面上虽然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因此,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于西后之手",就是"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颐和)园中",由西太后裁决。故"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禀白而后行"。所以光绪帝亲政后,他虽然可以参预朝政,但在清廷的最高统治层中,光绪帝仍然没有独立的决策权。

光绪帝亲政后,对西太后结党(史称"后党")操纵朝政越发"愤懑"。光绪帝为了改变受制于人的地位,除了对其师傅、户部尚书翁同和"眷依尤重"之外,于1892年把瑾、珍二妃的堂兄志锐提为礼部侍郎;后又于1894年5月利用"大考翰詹"的机会,将与翁同和、志锐等有交的翰林院编修文廷式擢为侍读学士,从而志锐和文廷式成为光绪帝的积极支持者(逐渐形成"帝党")。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风风雨雨及其惨痛的结局,对光绪帝的触动与刺激是强烈而深重的。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既痛感"耻辱"又鉴于"强邻狡焉思起",遂产生了"忧危之心"。光绪帝"日夜忧愤",恐"社稷难资保守"。为了寻求出路,光绪帝开始了新的探索,从而萌发了"革新庶政致富强"的念头。恰当此时(1895年6月上旬),光绪帝得到康有为要求变法图强的《上清帝第三书》,他"览而喜之",激起了共鸣。在此期间,同样受到甲午战败之辱的刺激也有了图强之念的翁同和,较早地接触了康有为,则时而以"康之言达皇上"。在帝、康之间架起了一座秘密的桥梁。

到1897年冬,以德国侵略胶州湾为起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惊涛骇浪。在此紧急时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加紧了推进变法救亡的步伐。光绪帝对此危局也"举忧惧"进而感到"事机日迫",觉得不能坐守待毙了。1897年12月22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公开推荐康有为并请召见。翁同和也"在上前力称之".于是,进一步引起了光绪帝对康有为的重视,当即指令总理衙门"办理",准备召见康有为。可是,顽臣许应骙却教促恭亲王奕䜣出面阻挠。光绪帝只得命总理衙门王大臣接见康有为。这件事,在1898年1月24日实现了。通过王大臣的接见,康有为不仅向清廷上层当权者宣传了必须变法的道理,有利于促进清廷统治集团的分化;还使他取得了"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的权力。这对加速维新派与光绪帝的结合以推进变法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1898年春,光绪帝的思想变化发生了飞跃。他越发偏离了封建传统观念,与封建顽固派坚持的"祖宗成法

不可改，夷法不足效"的守旧立场对立起来。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严峻现实，衰弱的中国"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光绪帝决心要"效法"外洋强国，来"革旧图新"了。大致于当年4、5月间，光绪帝通过奕劻转告西太后："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至此，光绪帝为变法革新，竟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西太后公开要权了。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人的强烈要求和竭力促使下，光绪帝终于冲破种种阻力，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把以"博采西学"为中心的变法革新定为基本国策；以创办新式的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之倡"。从此，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组织，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开始进入实际推行阶段。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他对康有为当面力陈的变法之紧迫性和提出解除"八股之害"等建议，均一一称是。关于变法的方针，起初康有为主张必须"全变"，但当他看到光绪帝鉴于守旧势力而所有为难的表现时，便改变了主意，只提出"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在策略方面，康有为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同时康又要求光绪帝，"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采取公开推行的方式。对于康有为的上述主张，光绪帝亦均"然其言"。

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之后的当天，即颁谕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授予六品卿衔，许其有"专折奏事"权。

光绪帝从颁诏定国是和召见康有为以来，国内的政治生活便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光绪帝在文化教育、选拔人才、政治社会规制、交通邮传、吏治民生和军事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发布诏令的方式，雷励风行地向全国贯彻。这些改革措施，基本都贯穿了向"西国"学习的线索。

正当光绪帝在大刀阔斧地把变法革新向纵深推进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便按捺不住了。西太后认为，光绪帝的变法已经越轨，到了非出来收拾局面不可的时候了。从光绪帝罢掉礼部六堂官开始，在西太后的主使下，北京的一些顽固派官僚便勾结在一起，并与控制京、津兵权的直隶总督荣禄进行串通，加紧了"谋变"活动。

这时，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都把希望寄托在荣禄的属下袁世凯身上，不料袁世凯反而出卖了他们。9月17日，光绪帝见大势已去，便降谕以命康有为"督办官报局"的名义，促其离京"迅速前往上海"。当时，康不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为了营救光绪帝挽救变法新政，曾竭尽全力。然而，均已无济于事(康有为于9月20日离京出走；梁启超也随后离京)。9月19日，西太后突然返回清宫，把光绪帝置于她的直接监视下。大致就在这时，光绪帝仍对枢臣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他正是具有这种心情，仍按原计划，在9月20日接见了来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还想寻求些维新的借鉴。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以光绪帝的名义颁谕，自"今日始"仍由西太后"训政"；谕令将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捉拿维新人士。随着，谭嗣同、林旭等戊戌六君子倒在血泊之中。西太后又下令，恢复被光绪帝裁撤的清廷各衙门；严禁"士民上书"；停办报刊。光绪帝为革新祖国所做出的努力付之东流。

此后，光绪帝在清廷犹如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光绪帝存在的价值，仅仅取决于西太后的政治需要，为她"作样子"。罢了。不过在此后的十年间，光绪帝虽一直处于逆境中，直到20世纪初年，他仍在念念"振兴中国"，并"留意"西书及西国情况，坚持"学习英文"，还在为"振兴中国"而追求。但是，这时期的光绪帝，更无力再扬起政治上的风帆了。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壮志未酬，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终年38岁。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赫　德

赫德(1835—1911)　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阿尔马郡的波塔当镇。他的父亲是当地的酒商，母亲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他家经几度搬迁来到希尔斯堡，赫德在这里的乡镇小学接受教育，十岁时，进入陶顿的卫期里安预科学校。第二年夏天，转入都柏林卫斯理安联合学校。1850年，赫德考进爱尔兰女王大学所属的贝尔斯皇后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留下来继续攻读哲学和法律的硕士课程。1854年春天，英国外交部在他所在学院招收到中国领事馆工作的人员，由于该学院的推荐，他被破格免试录用，十九岁的赫德从此走向新的生涯。

同年7月，赫德乘船抵达香港，在香港殖民政府充当见习翻译官。10月，他被任为宁波英国领事馆的额外翻译。在宁波，赫德花了大量的精力潜心学习汉文，研究儒家经典。1855年6月，赫德被提升为助理翻译，但他并未把自己囿于领事馆的圈子里，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当时的中外贸易，以及英、法、美在上海侵夺中国海关行政的活动方面。"在宁波的三年半期间，赫德获得了在华贸易进行情况的第一手知识，而且由于临近上海，他得以密切地观察李泰国及其同事当时正在进行的置外贸于海关控制的试验。"赫德开始为长期在华经营作准备。

1858年3月，赫德奉调前往广州领事馆任二等副翻译。是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4月，他被派担任联军特派专员的秘书。10月后又回领事馆供职，升任翻译官，虽然职位低微，但凭借着娴熟的汉语以及待人处世的圆滑，赫德开始广泛接触清朝官员，先后与两广总督劳崇光、海关监督恒祺等人建立私谊。通过这些关系，他常常能收集到许多别人无法获得的秘密情报。他逐渐显露出来的才能也得到英国驻华官员的赏识，这为其在华职位的升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59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祺为了制止江轮走私增加关税收，决计邀请赫德，"仿照上海李泰国所主持的那个海关的办法，在广州设立一个同样的海关"。5月27日，赫德向英领事馆提交辞呈，并请着手建立广州海关的工作。10月，粤海新关建立，赫德被任命为副税务司，虽为副，但他却掌握了该关的实权，亲自制定了粤海关章程以及规划管制江轮走私办法和鸦片征税等问题。1861年4月，李泰国借口健康问题告假回国，推荐赫德会同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署理总税务司职务。

6月，赫德应英驻华公使卜鲁斯之邀到达北京，在卜鲁斯的策划安排下，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和文祥会见了赫德。赫德就当时中国的税务等问题与奕䜣等人进行了广泛的商谈，并呈递了事先准备好的七件清单、两禀呈，为清政府策划筹款置洋船镇压太平天国提出了具体办法，取得了清朝权贵们的信任和赏识。奕䜣后来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赫德虽系在国外，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钜，是以尚肯从中助力。"6月30日，总理衙门正式札委赫德会同费士来署理海关总税务司。

在北京一段短短的经历对赫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成功地获得了中英双方的赞许，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逐渐成为清政府与西方各国间进行联系的重要人物。凭借着总理衙门对他的信任和卜鲁斯的支持，虽然费士来和他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但他一开始便"居于领导地位"。总税务司1861年第1号通札就是由他单独署名发出的。

赫德经营的海关，绝不是限于办理税务的机关。为了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他通过海关举办了许多与海关业务不相关的事务。1865年起，他便着手改进同文馆，引进新的学科和科学教育，并为之延聘教习，使同文馆由一个培养外语人材的机构，发展"成为一个介绍近代思想进入中国教育制度的先驱"。1868年，在总税务司的管辖下，设立了一个和征税部门完全无关、具有独立性质的船钞部门，负责港务、助航设备、引水、气象、检疫等工作。海关在引进海务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中国海务由落后跃至近代化。海务工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从1867年起，赫德主持下的海关还兼办了中国参加国际赛奇会(即博览会)的展出事宜，至1905年海关主办展出的次数有27次。1866年，海关开办北方口岸书信馆，经过30年之经营，1896年3月，清政府决定由海关正式办理邮政，创办了中国近代官方邮政机构——大清邮政官局，赫德兼任总邮政司。邮政成为海关职务外的一项最大业务。海关邮政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邮政制度，组织严密、管理科学，把中国的通讯业务推向近代化。1873年日本侵略台湾，赫德利用此机会劝说清政府购置船舰，加强海防，清政府便由赫德通过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承办购置船炮事宜。自1875年到1880年，先后购置两批炮艇，这成了北洋海军的起源，这对加强中国海防起了一定的作用。

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对中国旧式海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使之成了近代化海关，还搞了许多和海关业务无关的近代化设施，这对于一些行业的近代化起了促进作用，使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些近代化气象。

赫德从署理总税务司起，就一再争取改变清政府拒绝接受外来事物、闭关自守的态度，"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个全面改革内政外交的方案——《局外旁观论》，以所谓"旁观者"身份，敦促甚至胁制清政府在切实遵守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就财政、吏治、武备、洋务、学习外国善法以及皇帝召见各国公使、委派驻外使节等事宜进行整顿和改革。赫德文中所表述的思想及所提建议，引起了清朝统治者阶级的格外重视，许多意见为洋务派所接受，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60年代末起，民族矛盾上升，赫德越来越多地干预中国的外交事务，他把这些活动称为"业余外交"或"秘密外交"。1868年，他为"天津条约》修约谈判奔走于英国公使和总理衙门之间，而且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并获采纳。1873年赫德以中国海关的名义在伦敦开设办事处，派他的亲信金登干主持其事，该机构成为赫德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了解列强对华政策，干涉中国外交的一条重要的秘密渠道。

1875年，在处理马嘉理事件中，赫德借口调停，斡旋于中英谈判代表之间，他利用总理衙门对谈判中"改善商务"问题渴求咨询的机会，呈递了题为《关于改善商务关系的建议》长篇节略，从商务、司法、行政三大方面进行论述，还提供采择的建议。其中许多部分成为后来签订《烟台条约》内容的基础。

赫德与中国的维新运动也有一定的联系。他是清末由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洋商组成出版机构"广学会"的最初发起人之一。自1888年该会董事会成立起，赫德一直任董事会总理。该会曾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社会、文化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为近代中国培养维新人才起过一些作用。赫德还和主张推进维新的翁同和等人

有一定的交往，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清政府，促使清朝当权者“理解”并接受西方事物，进行某些符合他的愿望的改革。同时还想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抗衡国内亲俄派的势力。

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赫德慌忙避入使馆区，海关总税务司署被焚烧。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赫德宣布复职。面对咄咄逼人的侵略联军，清政府一再恳请赫德出面“挽救”，赫德完全掌握了和议全权，一手操纵了《辛丑条约》的签订。通过条约，海关接管了各口五十里内常关等一系列新的特权，赫德的权力达到顶峰。

1908年1月，赫德因疾病缠身，精神不支，向清政府告假回家休养，同时推荐他的亲戚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署理总税务司。赫德回国后，虽然一直没有放弃重返中国的念头，无奈健康状况日坏，不得不一再续假，1911年9月20日赫德死于英国白金汉郡的麻洛，终年七十七岁。在他死后，清政府追授他太子太保衔。

（摘自徐泰来《中国近代史纪》）

熊成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原籍江苏省扬州府甘泉县（今江都县）。祖父瑞生，当过安徽繁昌县知县。父存仁，是个候补通判。成基小时，随祖父寓居芜湖，读过私塾，又曾学医。嗣因祖父、父亲早故，家道中落，谋生艰难，目睹国弱民贫社会现实。渐萌奋发救国之思。曾对别人说：“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是很可耻的。于今国势衰弱，受列强欺侮，只有从军学武才能强国雪耻。”光绪三年（1904年）夏天，遂决然离开芜湖，赶到安庆，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当时，民主革命思潮正在高涨，学兵营里，不少学员暗暗传阅《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熊成基把《扬州十日记》和《革命军》对照起来读，“乃至流泪不止”。深感“中国之所以弱者，由于政治之不良故也”。从而确定了“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权，均贫富”的“革命宗旨”。这种远大的政治抱负，促使他注意在安庆扩大社会联系，与同学柏文蔚、倪映典、郑赞丞，以及在籍陆军常备营排长范传甲等革命志士深相结纳，并参加了这些人所集结的反清秘密小团体岳王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天，安庆武备学堂练军班结束，熊成基到南京新军当副目。他勤奋好学，才干出众，不久，被本营管带保送南洋炮兵速成学堂学习。在那里，他与同学倪映典“恒以复国仇，建民国相期许”。第二年，熊成基以“勤业尤苦，学术优异”的成绩毕业，分派南京新军第九镇炮队第九标当炮兵排长。这时他刚二十岁，英俊倜傥，常常向士兵公开宣讲《民报》的政治主张，很受士兵拥护。熊成基因而增添了反清革命的信心。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熊成基从南京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后转炮队队官。他看到安徽新军内“同志中之为军官佐者亦伙”，遂加紧联络。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枪杀恩铭，率领巡警学员起义失败，秋瑾在浙谋响应，被杀害。熊成基不胜悲愤，更增添了反抗意志，发誓“为徐复仇”，准备继起。

这年冬天，岳王会骨干、同学倪映典由南京来安庆，任新军马营管带。熊成基和他密议，试图利用影响下的新军力量，在安庆发动除夕起义。事前消息走漏，倪映典被撤职，致使计划流产。成基毫不灰心，接替倪映典被举为岳王会安庆分部的主持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调湖北、江苏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熊成基计划利用秋操组织兵变，宣布独立，预计“天下可唾手而得”。事为安徽巡抚朱家宝侦知，严令本省新军只拨少数参加太湖秋操，凡被疑为革命党或平日同情革命的人，都要留在原地军营里。根据新的情况，熊成基和岳王会骨干、工程队正目范传甲密约改变计划，将起义地点移向安庆：以城外新军炮、马营为主力，会合城外六十一标和六十二标第三营，首先发难，驻城内六十二标第三营和工程队即亟起响应。占领安庆后，起义军再开赴太湖，会合秋操部队，转攻南京、武汉。

十月二十三日（11月16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的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认为：“那拉母子命终之日，人心骚动，我处先发，他处必相继而起。”于是和范传甲、张劲夫等人分头到各标、营、队联络，部署起义。二十六日（19日）下午，召集各营（队）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起义计划。当场议决：晚上发难；熊成基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四点钟散会时，他即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作战密令十三条。

二十七日（20日）下午四点，熊成基指挥革命军分两路撤围安庆，向庐州府进发，力图攻占合肥为根据地，联络凤阳、颍州一带会党，坚持斗争。沿途同清军激战多次，曾重创清军姜桂题部，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遭到敌军的堵截追击，冲到合肥一带只剩下三十余人，被迫解散。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重赏通缉各起义首领。熊成基乔装僧人，投宿寺庙，间关跋涉，由河南到烟台至大连，然后乘船东渡，于宣统元年正月（1909年2月）流亡日本。在东京他化名龙潜，与革命党人孙铭、肖翼鲲等交往，并经肖介绍加入同盟会。

这年八月中秋节后，熊成基酒醉失言，偶向臧贯三透露了真实姓名。为此熊成基追悔莫及，遂转赴哈尔滨，寓居宾如栈，以学习俄文为名，交接俄人，寻求售书筹款的门路；并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十一月二十日（1910年1月1日）后，熊成基从哈尔滨回到长春，住四道街裕丰泰客栈，探听风声。这时，臧贯三已经勾结“从前在府署

充当代书"的董冠三访查熊成基，准备告发。熊成基十二月初一日(1910年1月11日)，最后一次去哈尔滨时，臧贯三偷偷尾随，暗中"查看他的动静"。半个月后，臧贯三赶回长春，伙同董冠三，向前来迎护贝勒载洵的吉林巡抚陈昭常告密。十二月二十日(1月30日)，熊成基在哈尔滨宾如栈被捕。

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31日)，熊成基被送往长春监狱。吉林西路道颜世清亲自审讯，"手脚镣铐，较之众囚徒尤苦"。熊成基坚贞不屈，慷慨陈词，洋洋二千余言，痛斥清政府腐败，宣扬革命宗旨，指出："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呜呼政府，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两天后，熊成基被转送吉林监狱。当他离开长春时，向沿街百姓"一一致谢，并言'敝人情愿以一腔热血灌中国自由之花，诸君高谊，来生再报！'谈笑自若。"他还坚定地表示："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十天之后，在吉林监狱，他奋笔写下《熊成基自书供词》，磊磊落落，倾吐胸怀。并以"革命"二字代替手押。凛然正气，敌人闻之丧胆。

宣统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7日)，熊成基在吉林巴尔虎门外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犹高声宣布其革命宗旨，刽手使之跪，熊不屈！"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坚贞气节。烈士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和顺

王和顺(1868—1934)，字德卿，号寿山，壮族。同治七年(1868年)出生于广西邕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即以豪侠仗义闻名乡里。十四、五岁加入黑旗军跟随刘永福参加抗法斗争，担任哨官。中法战后，清政府大批裁减抗法部队，引起王和顺的不满，遂弃官返乡，加入秘密会党三合会，以豪爽仗义和勇敢博得了会众的拥戴，名声大振。

19世纪末，广西天灾频仍，疾病流行，各族人民处在饥饿和死亡边缘。王和顺有五个兄弟均因抗税惨遭杀害。这时王和顺正在宣化县(今邕宁县及南宁市的一部分)衙当差，他利用担任县衙差役负责"捕盗"职务的方便，暗中联络了许多穷苦的汉、壮群众和散兵游勇，设台拜会，组织抗清队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和顺被捕入狱，翌年8月，越狱成功，召集下属"聚众拜台"，公开举起反清大旗。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南宁府属的邕宁、横县、隆安、武鸣等地，先后发生多次会党武装反清的斗争。

二十八、九年间(1902—1903年)，王和顺与广西游勇著名首领陆亚发约定，乘清军兵力空虚时，分头举事。陆亚发在桂北发动，一举攻陷柳州，庆远、思恩、郁林各属起而应之；王和顺在桂南起事，占据南宁、梧州等属多县，与陆亚发结成犄角之势。

为镇压广西壮汉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特命清军广西提督苏元春兼任广西边防督办。苏元春旋命总兵马盛治率部前往镇压，王和顺率领会党武装，将马盛治部围困在隆安县马鞍山峡。马盛治率部突围，被王和顺开枪击毙，所部几乎被全歼。苏元春在陆亚发和王和顺的联合打击下，十分狼狈。清政府以"疏防失职"罪名将其革职。任命岑春煊为两广总督，统率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7省兵力共十多万人，向王和顺和陆亚发两支起义军进攻。同时悬赏10万两购买陆亚发、王和顺二人的首级，另一方面又派人到起义军中招降，并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但这一切对王和顺、陆亚发并未产生作用。

由广东调来的清军称为"安勇"，由陆爵率领，装备精良。王和顺在南宁石埠布阵诱敌，将义军主力埋伏在隆安县境内的梅龟山。陆爵不知是计，驱兵急进，在梅龟山陷入埋伏，结果伤亡过半。这支有"天上雷公，地上安勇"之称的清军主力，被王和顺用计一仗即打垮了。

王和顺于是声名大振，许多分散的会党武装，纷纷投其麾下。然而，由于会党武装散漫不羁，过了两年，起义暂趋低潮。王和顺见局势无可挽回，只好解散部众，经香港出走越南西贡。

三十一年(1905年)冬，王和顺在西贡拜访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后随孙中山到达河内。孙对王"解衣推食，礼遇至优"。当时革命者的生活条件不好，王对此有所怨言，当有人谈及此事并希望加以制止时，孙中山表示："和顺出身行伍，举止粗鲁豪爽一些，自所不免。我们为国家收纳贤士，怎能因为一些细节小事而去责难他呢？"此事传到王和顺的耳朵里，王十分感动，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

三十三年(1907年)春夏之交，钦州三那地区农民刘思裕等人，为反抗清政府的糖捐，聚众起事。两广总督周馥派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各率本部兵马前往镇压。黄兴"因与郭有旧"，亲往钦州郭人漳军中活动，而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钦廉军事行动，让胡毅生陪同王和顺到廉州住同盟会员赵声军中。王和顺在赵声处住了十几天，与之商量行动方案，并接受赵声委任，以军事委员张德馨的名字公开活动，到三那组织民军。开始时，王和顺与赵声约定，由其先率民军会党武装进取南宁，赵声率所部在后佯作尾追，相机暗助，如果南宁得手、又可用这个办法攻取其他地方。后来因运动南宁清军的打算没有实现，只得变更计划，留在三那一带活动。数月之后，王得知驻扎防城的清军连长刘永德、李之琨有意反

正，乃决定在防城起事。这一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七月下旬(9月上旬)，王和顺率众200余人，从三那地区的王光山出发袭取防城。七月二十六日(9月3日)，王和顺以南军都督名义，发表《告粤省同胞文》、《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文告，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清军驻防衡字营官兵响应，王和顺率民军入城，杀死知县宋鼎元等。接着率领队伍进攻钦州府城。得知城中清军已加强了戒备，乃转攻灵山，激战数日，终因枪械不足，伤亡过重而退回三那。王和顺见一时无力进取，乃下令解散部队，自己则折回河内，向孙中山报告。

孙中山勉励王和顺不要泄气，同时要他负责组织镇南、水口、平宜三关的军事活动。十月初五，王与伍海荣到那模村动员凭祥土司李祐卿夺取镇南关。途中被法国兵疑为日探，两次被捕，再三解说，才得脱身。因李祐卿的部下拒绝合作，孙中山改派黄明堂主持镇南关军事，以王和顺谋取水口关作为声援。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戊申(1908年)3月，孙中山令王和顺、黄明堂筹划云南河口起义。三月廿九日(4月29日)，王和顺等率百余人进攻河口，血战一日，占领山上炮台，杀死清防务处督办王镇邦，清兵六营全部投降。四月初五，王率部沿铁路线北进。下旬，清政府调集西南诸省数万兵力包围河口地区，王和顺在泥巴黑地区附近与清军相持20多天，因子弹匮乏，不得已向河口撤退，粮道又被法人断绝，只好解散部众，留一部分精锐进十万大山，自己与黄明堂率600余人退入越南，法人将其送往新加坡。

三年(1911年)春，王和顺回到香港。武昌起义爆发，王和顺急谋响应，于九月初发动惠州起义，在飞蛾岭与清军激战7天，光复惠州。广东独立后，遂率所部十七营进入广州，当时各路民军中，“以王和顺惠军势力最雄厚，又颇有纪律”。

1912年春，陈炯明督粤，裁撤民军，王和顺抵制不果，弃职南返。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王和顺又组织义军参加护国运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王和顺赴梧州，与滇军将领张开儒等兴师讨逆。翌年初，滇桂军入粤，大元帅府重建后，王和顺离开军界，隐居广州。1934年因病逝世，终年66岁。

(摘自罗明主编《清代人物传稿》)

珍　闻　轶　事

溥仪继位秘闻

清德宗(光绪皇帝载湉)大渐时，慈禧太后亦猝发风疾，寝以不起。时庆邸(庆亲王奕劻)，密与袁世凯勾结，拟立其长子载振。振为人极无赖，声名狼籍，多蓄武士打手。有南皮人其，张之洞之乡人也，亦阑其中，得闻其密谋，以告张。张得知此事后，连夜往见醇邸(醇新王载沣)。醇邸因兼内大臣，出入宫门无阻，二人遂夤夜入宫面帝。

帝大恨，索笔书遗诏，传位胞侄，并命二人以告太后，太后亦首肯。即下谕劻、袁二人同为东、西陵视察万年吉地大臣，以支其外出；复以金 盒赐醇、张二人，嘱必要时同皇后开读，并命闭宫门，无论何人均不许入内。庆邸知有变，求入内不果。后二日，两宫相继驾崩。醇、张等启视金盒，内贮遗诏云：皇太后垂帘，非国家之福，以醇邸为摄政王，张之洞为辅政大臣，二人同心辅政。张读诏，惶恐力辞，故当时只发表醇邸为摄政王。

德宗临殁时，大声言：“杀袁世凯！”隆裕太后固力主杀之。张之洞以新丧不宜诛大臣，并恐北洋六镇有变，力劝而止。时许宝蘅为军机章京，亲见袁退出时面色灰白。隆裕并欲谴责庆邸，又为醇邸所阻。后庆邸固宠逢恶。摄政滥用乳臭亲贵，皆庆邸促成之；又起用袁世凯，亦庆邸之力。

(摘自《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记安庆岳王会

一九〇三年，桐城李光炯在湖南创办旅湘公学，借以掩护革命工作；后来因环境恶劣，在湘呆不下去，乃于一九〇四年搬回芜湖，改称安徽公学。当时所聘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算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因为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由柏烈武、陈独秀等发起组织“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陈独秀原留学日本，回来后除教书外，还办有一种旬刊名叫《俗话报》，用语体文鼓吹革命运动。

我那时是该校师范班学生，而且年龄比较大，因此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当时参加组织的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

不外为反清。我们将章则拟好后，字句中还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进去，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用烧香宣读誓约的形式，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据点。我们在通信的时候，都用假名字，例如当时有个姓孙的叫孙天一，刘光汉改名叫金少甫。刘当时不过二十岁左右，他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还参加《国粹学报》。到了寒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推举我留在芜湖负责。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校，要我到那里去担任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我到安庆去是负有发展革命组织使命的。这时第一期武备学校训练已结束，第二期又在乡里招了一批兵，各县也有许多读书人都参加了，其中还有许多熟人。他们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教职员中有些都是从日本学师范学体育回来的，也在我们那里教书，于是我们成立了岳王会安庆分部。这时柏烈武在南京也联络了一些人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岳王会总会仍设在芜湖，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柏烈武为分部长，安庆分部长就是我。安庆仅有二三十人，我们感到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年秋天，清政府决定在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由于干部不够，乃在安庆举办干部训练班，人员由绿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军的干部。我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想进去。但是我不是绿营里的人，没有被挑选资格，因此找了督练公所中有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教练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宝塔里和大观亭后面松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

丁未年下学期，我们毕业了。我考第二，照规定前三名都可以当排长，我也就当上了排长。我们成立的是骑兵营。当时骑兵比步兵要难，因为要负前线侦探等责任，所以我们里面的骑兵，都是从步兵里挑选好的来充任的。那时军队不准住民房，所以我们只得住在安庆东门外殷公祠。

当时有浙江人徐锡麟任警察训练所所长，岳王会里有个石人俊，和徐相识，被徐请去任教。石人俊的武术很好，听说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有个大力士，在日本国内几乎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次与石比武，居然为石所败，石的声誉因此益高。那时我们的军队，共有步、炮、骑三营，徐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思是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有一个星期日，警察学校行毕业典礼。我刚走到街上，就听说警察学校放了炸弹，抚台受了伤。我知道这事发生以后，政府一定要搜查的，我赶快跑到尚志去打招呼，要那里的同志好作准备。这样一来，耽误了时间，城门闭了，不能出城。这时徐带了学生到军械局去抢子弹，但因为不能开锁，弄了多半天，被巡防队包围上了。他的两个学生，一个当时被打死，另一个和徐一齐被捕了。徐被挖心惨死。这天大雨，我因没有便衣，不能出城。后来借到了布鞋便衣，才由北门溜出去，回到本队。

我们队里有位孙师武，与我曾在训练班同学。他因不满杜春林，想偷枪杀他，但没有成功。后来他想个点子，说是恩铭托梦给他，要是替他复仇，非杀杜春林不可。他又造了一封假信，扮着卖鸡蛋的样子，混进了抚台衙门，因为举止慌张被捕，假辫子也弄掉了。他见了恩铭的夫人，恩铭夫人听说他想为恩铭复仇，便说这是好人，要优待，只把他关起来，未杀他。这样一来，我队里的人都害怕要受牵连。因此我便辞了职，因为我走了，要是出了任何事，大家便可以向我头上推，不会再连累别人。这时是暑天，我就跑到怀远去，在粹华学校当教员。下半年薛哲被派到炮兵当管带，写信要我回省会，我未答应。

第二年沿江一带新军在太湖会操，同志们认为机会到了，又计划要干。但是新军中我们的同志职务都很低，最大的也只是个营长。薛哲也是个营长，而且同志们认为他胆子小，不能够领导，乃推熊成基为总司令。起义发动以后，没有子弹。原商议好举火为号，可是城防队先把守了城门，薛哲到时不能打开城门。城内的同志都被捕了。熊成基跑到怀远。在这期间，安庆方面并无其它组织。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我也得到一个亲戚的帮助，赴日本留学。自从我离开了安庆以后，岳王会也就关了门，只有维新会还活动。陈独秀在恩铭被刺事件发生后，也跑到日本去了。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

孙中山受骗

孙公平生恒受骗。一日闲谈，余问孙公曰："人谓先生不明，多受人骗，何以故？"孙公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子产且然。投其所好，不易察也。昔者广州之役，事先结纳三点会头目，余亲在香港切实调查。余问甲头目曰：'尔有若干人？'曰：'有若干人。'曰：'何以证明？'曰：'任凭先点名而后领饷。'问乙头目，答如前。曰：'香港之地，安可以任我点名耶？'曰：'可以约定钟点在茶居饮茶，公入茶居，我延之，以起立为号，起立者同志，不起立者他人也。'余心喜，以为苟如此，则大事成矣。约定日期赴茶居点名，各头目如命。届期前往，头目引余前为礼，茶客起立者百数十人，余尤喜出望外。如是以此往十数处，皆如之。及至起事之日，所到之人，不如点名之数远甚。防城之役，事先结纳钦廉民团头领。原钦廉之人从事中法战事者不少。余少时崇拜刘永福，刘永福作战用黑旗，故边防人称为刘黑旗，是时黑旗部将尚可为用。广惠失败之后，专注于此，得钦

康数人类似游勇者介绍之。来报曰：'若某乡团，有枪若干枝；若某乡团，又有若干枝。'共计之，不下万余。余问之曰：'可往观乎？'曰：'非但往观，且可以点枪。'于是派人至钦廉往观。至各乡，各乡团总欢迎之入。所说枪枝之数，不爽毫发。余真喜出望外。及起事之日，而响应者寥寥也。原来二者皆骗局也。事后始知之，香港之点名，非点名也，事先头目告工人曰：'明日我请到茶居饮茶，尔等去若干人。'工人如期而往，至后复曰：'我有好友，来时请起立为礼。'钦廉之点枪，非点枪也，介绍人与团总曰：'我有好友，有名之士也，闻公办团有名，欲来观光，作为师资，其可乎？'团总喜曰：'善。'届时延为上宾。如此受欺，不亦宜乎？"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流行风

小说《大骗》

作者黄小配，主要内容：

小说写康有为自幼读书毫无长进，屡试不中。便表面装作鄙视功名，暗中却借银偷偷入京赴应北闱，又名落孙山。央人介绍，去拜望翰林院大文豪缪寄萍，骗得缪写的《新学伪经辨》原稿。回到广东，改书名为《新学伪经考》，以已之名付梓出版，并在城中开设"康馆"笼络了梁启超等一班学生。不久，用重金行贿，以监生遗才之名进入乡闱，藉《公羊》之说投主考所好，中了第八名举人，孙文成立兴中会后，康觉得民主立宪的宗旨奇货可居，派梁启超往澳门联络，孙文因知康非肯流血救国之人而拒绝合作。转年康入京会试，时值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清廷厄运当头，康欲乘机邀帝宠，显名声，便联合一班举人"公车上书"，所言不过是些废科举、兴学堂之类套话，那时官场中人个个不通外情，便视康为天人，康又拼命读了几遍《公羊》，竟侥幸中了第五名进士，点得一名工部主事，又骗取翁同禾等人的信任，做了总理衙门章京，行起了变法。裁冗员后又要撤八旗及绿营，惹动太后责问，康便立意除掉太后。以联络革命党起事为名，诓谭嗣同人京："谎报太后有废立之心，离间帝后；骗得光绪帝"善保朕躬，毋伤慈意"之诏，散布皇上密诏除太后，求袁世凯举兵。谭嗣同到京后，发觉康言词有异，责其说袁之事实属荒唐危险。果然袁世凯告密，太后着人捉拿维新党，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独自逃离京城，为孙文友人宫崎寅藏救往日本。康又因欺骗日本朝野、调戏侍酒女童，终被驱逐出境，小说至此中断。作品的主题是批判康有为的变法活动，作者主张种族革命，反对立宪，因而侧重攻击康梁，把康有为描绘为一个大马扁。表面清高，实则官迷心窍，光天之下粗衣布履，以圣人自居，暗里却窃取他人著述，宿柳眠花，全然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无赖。这显然未必真实，但在某些方面和康有为成为保皇党后吹捧孔子，以"圣之时者"自居的表演，不乏一致之处。反映了作者对保皇派深刻的憎恶。小说多有夸张失实之处，个别地方流于庸俗化。把变法的失败归罪于康的狡诈行为，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作者通过对话刻画人物，形象颇为传神。

小说《学究新谈》

作者吴蒙，主要内容：

废黜八股，名满西子湖的夏仰西因对论策经义丝毫不通而无人聘请就馆，生活日渐艰涩，以致靠卖书及旧日学生的施舍度日，如此亦不得长久，遂生轻生之念。此时，恰遇西学有成的表弟沈逢时，经其抚掖，经三年勤奋自修粗通新学，并在上海"强华学堂"办起了蒙学堂。杭州城顾玉泉，毕重光等几位秀才吵嚷着要办学堂，学堂未办成，却敲榨了和尚几千两银子。官绅柳仲时欲办学堂，请了位曾在天津北洋学堂任教的鲁子输在杭州办学，几经周折，采纳夏仰西的建议，终于办起了学区。办学区的事传到杭州乡下，一位退隐官绅的遗孀为了补赎丈夫的罪恶，出资办了个义学，聘了四位先生教书，这四位中只一位还有点责任心，其余均是"混饭吃"的。后四人均被辞退，谁想另请的四人仍是用"旧法教书"的腹中空空者，竟被学生诘问得张口结舌。其中一位胡子春只得辞馆转赴上海投奔母舅杜鹿笙。杜鹿笙原是经商的，亏了本，便找到在高等学堂做监督的表兄朱鸿儒，在学校里挂了个学监的名，偶尔到学校露一下面。朱鸿儒任人唯亲，聘用了一帮腹中无物的庸才，把个好端端的高等学堂变成结党营私的名利场。在这里胡子春屡被学生嘲讽，意欲辞馆别就，恰遇好友尹子奇帮人筹办复古学堂，便与之同往。尹子奇是一位大烟鬼，戴着维新的面具，四处招摇。复古学堂未办成，却蒙几位艺人的资助办起了个混混噩噩的"优立公堂"。南京士绅沈凤林发起捐办的昌明私立学校同样的混乱不堪。倒是一群妓女捐办的女学还有点特色。小说通过一系列闹哄哄办学堂的故事，抨击了在维新运动中一群披着

维新外衣的所谓教员钻取名利的卑劣行径，反映了维新运动中教育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混乱现状，宣传了在接受教育上人人平等及普及教育的办学理想。小说线索凌乱，缺乏一贯穿始终的情节，主题亏于提炼，这与作者旨在揭示较为全面的社会现象的创作思想有关。然该篇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小说《发财秘诀》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

小说以一个叫区丙的广东穷汉为开端。他穷得没有办法，看见别人纷纷去香港，也跑到香港去卖料泡、卖窑货小人儿。外国人觉得好玩，便争相购买。三个多月中，赚得五万多两银，变为一个富翁。于是，他便在香港开铺设店，广交朋友，内中就有许多在广东犯案不能回去的亡命之徒。其间有个叫关阿巨的，介绍他替英国人当侦探，为英国攻占广州卖力。区丙见有利可图，便回到省城，专意与衙门人交往，打听海防的情况。衙门里的人，一向认为他老实，便时常和他聊天，告诉他一些军事机密，他便将所得的情报换得银子。阿巨也利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好佛，替人定计，以迷信传说使叶疏于防范，被英国人一举得城。接着吴趼人又写了几个民族败类和无耻之徒陶庆花雪畦、舒云旃、端木子镜、陶秀乾、蔡以善、魏又园等。其中有的人是猪仔贩子，骗中国人到外国做苦工。也有当外国洋行大班的。后来这些人辗转到了上海，有的投靠外国人，做了洋行的买办，利用外国的势力，为虎作伥；有的依靠权术，霸占别人的财产。吴趼人恨透这些人，尽情刻画他们丑恶的嘴脸。正如这帮人说的："外国人是好人，断不欺你。""情愿做外国人的狗，不愿做中国人。""不独中国文字没有一毫用处，便连中国话也无须说得。"诸如此类的语文，不胜枚举，活生生的描绘一群卖国洋奴丑恶的灵魂。最后，吴趼人用卜卦人知微子点破发财秘诀："把你本有的心挖出，换上一个兽心。"艺术上该书不能算是成功之作。显得比较粗糙，缺乏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书的后半部分也缺少洋奴的事实佐证。为此，吴趼人也承认"未尽描摹之技"。虽然如此，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及每一回末的作者评论，足见他心怀正义，嫉恶如仇。

小说《新纪元》

作者碧荷馆主人，主要内容：

故事发生在假想的 1999 年。中国早已收回列强霸占的领土，国富兵强，为世界各国所惧怕。此时，中国皇帝通电黄种人诸国及各贡献国，改用黄帝纪元做统一年号。独、弗两国借机联合五大洲白种人诸国进行抵制。欧洲匈耶律国中，黄与白两种族实力相当，各有所向，时有冲突发生。白种诸国出兵干涉，匈国王请求中国保护。中国皇帝派黄之盛为水陆诸军兵马大元帅，率部救援。"黄白"双方皆利用声、光、电等科学武器，在海陆空三线进行激烈战斗。世界各地黄种人国家陆续参战，全力支援。最后大败白种人联军，解匈之围。本书针对满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的现实，演出了虚构的"黄白"大战。以中国为首的黄种人终于报仇雪耻，称雄世界，有一定的反帝意义。作者开篇点明，这部小说不是科学讲义。撰出了许多实际不存在的武器，和他们的发明年代、发明者、用法效果。纵观两军作战场面的描写，沿袭了中国神魔小说中斗法的表现方式，惟所使用武器与法宝不同而已。上海小说林社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版。

小说《玉佛缘》

作者嘿生，主要内容：

故事是讲杭州的一个寺院主持，用计谋使一个官员出巨资建庙迎佛，以供其任意挥霍，为非作歹，后事发，和尚用钱疏通而安然如故继续作恶下去。《玉佛缘》是晚清反对封建迷信的小说之一。主旨是告诫人们封建迷信害人之深，要打破宿命论观点。其中涉及看相、算命、测字、风水等很多方面，以僧尼为主体，暴露迷信之害。作者在书中表现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如第二回"试相法状元改扮，释疑团名士谈天"借胡子偃之语，反话正说，点名江湖伎俩都是骗人的东西，休要去信。作者对种种迷信风习痛恨之至，在第五回中写道："现在财政困难办学堂没经费，造兵船没经费，……倒是造佛寺有经费，斋和尚有经费，讽经礼忏有经费。"其满腹愤慨，可以想见。同时作者也认识到封建迷信在社会上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虽主人公钱子玉最后也认识到迷信的危害，喊出"玉佛害我"，而他的家人、仆婢，乃至社会上的许多人，还依然沉迷其中，不知自拔。本书的结局是发人深思的。书中有关一些风俗场面，作者用清丽的笔姿加以描绘，写得别开生面，如第五回"看出会大开眼界，读碑文独创新谈"，把上海出会的情形叙述得精彩十分。

诗《吊刘烈士炳生》

张楚相以大泽乡，为忧时局刳肝肠。凤麟在野终罹网，燕雀何心尚处堂。未报秦庭人下殿。愁闻梁苑狱飞霜。何时北伐陈师旅，拨尽阴霾见太阳。

（柳亚子）

诗《自题磨剑室诗词后》

剑态萧心不可羁，已教终古负初期。能为顽石方除恨，便作词人亦大痴。但觉高歌动神鬼，不妨人世任妍媸。只惭洛下书生咏，洒泪新亭又一时。

（柳亚子）

诗《访安如》

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祇尔论。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陈去病）

历 史 档 案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

一九〇八年三月六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北京。

此合同系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三月六号，在北京订立，其订立合同之人：一系外务部与邮传部，已奉旨允准订立合同；一系中英公司（下文即称为公司）。兹议订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中国国家准公司办五厘利息金磅借款，数目系英金一百五十万磅。此借款自出售债票之日起算，名为：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

第二款　此借款指明系为建造沪杭甬铁路之资本（下文即称为此路），此路系由上海或附近上海接连沪宁铁路至杭州、宁波两城。此路线须由上海经过枫泾镇、嘉兴府、别墅、杭州府、江干至宁波，惟此路有数段工程经中国国家允准，已由本处地方建筑。将来勘量路线须由邮传部核定。

第三款　中国国家担保此次所备之资本专为建造此路，连购办车辆及一切应配物料并造路期内经营行车在内，其购买地段及造路期内付还借款利息均不得提用此项借款，应由中国国家另行筹备。此路自本合同签押之日起三年造竣，公司于此合同画押后六个月期内，知会邮传部，已代预备一十万磅，听候提用，作为出售债票第一次进款。或存欧洲，或汇至中国，均听该部命令。此一十万磅全数，或无论实垫若干，并其利息，均由出售债票进款内扣除，其利息不得过常年六厘。

第四款　此借款利息自出售债票之日起算，按虚数常年五厘，每半年交付一次。造路期内，由中国国家自行筹备，嗣后先由所收此路进款交付。倘若不足，则由关内外铁路（新奉至辽河以东一段不在其内）余利项下拨付；如仍不足，可由中国国家以视为合宜之别项进款交付；以出售债票之日，按西历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按照此合同附表数目，于十四日前交款。

第五款　此借款以三十年为期。除后开之第六款详载办法外，自借款之日起十年后，即按年还本，由年收此路进项交付。倘若不足，则由关内外铁路（新奉至辽河以东一段不在其内）余利项下拨付；如仍不足，可由中国国家以视为合宜之别项进款交付；以出售债票之日，按西历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按照此合同附表数目，于十四目前交付汇丰银行。

第六款　由借款之日起十年后，无论何时，若中国国家欲将合同附表所载未到期之借款全数还清，或欲还无论若干，均可照办。惟在第二十年以前，须照债票上数目加价二磅半，即系每一百磅债票一张还一百零二磅半，第二十年后，无须加价；惟每次预还若干，若逾于附表原列之数，则中国国家应于六个月之前，用公文知会公司，将此数照借款招贴内载拈阄日期多加拈阄次数。

第七款　汇丰银行既经中英公司派为经理借款代表，其第四款、第五款所载每半年应还本利，须照此合同附表数目，由邮传部或其所派之人，按该两款所定日期，于十四日前在上海以上海纹银交付该银行，足敷在伦敦交还金磅，其磅价与该银行订定，然亦可于还本利期前六个月内，无论何时，皆可向银行订定；若中国国家遇有金款实在存在欧洲，并非由中国为此汇去者，欲用以付还本利，亦可用金款交付。每年付还借款本利，邮传部按每百磅给与汇丰银行五先令用银，作为经理费用。

第八款　此借款本利中国国家承认全还。若所收此路进款并关内外铁路（新奉至辽河以东一段不在其内）余利不敷全还本利之数，邮传部奏明，由中国国家设法以别项款项补足，按期交付银行，清还本利。

第九款　此借款以关内外铁路（新奉至辽河以东一段不在其内）余利作保，此项余利内先提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十月十号）所订借款合同内载应还本利之数，次即用以付还此次借款本利；除付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西历一千八百九十

八年十月十号)借款本利外,须俟提出若干拨付汇丰银行。足敷此次借款下期付还半年本利之用,始准将此项余利提作他用。

第十款　此借款全数,准公司印发债票,其数目由公司酌定。其式样由公司商邮传部,或其所委之人,或中国驻英出使大臣酌定。债票用中英文刊雕;邮传部所派之人所签之押及其关防均摹刻于其上,以省其逐张亲自画押之烦。惟中国驻英出使大臣于债票发售之前,须逐张盖印,并将其所签之押摹刊于其上,以示中国国家允准及承认发售此项债票。该公司驻伦敦代表人亦在债票上签押,作为发售债票经理人。如债票遗失,或被损坏,即按照原数补发,惟须先由失票人向公司或中国驻英出使大臣证明立案,并须由公司向失票人取具切实担保。凡补发债票之费,均由请补发票者付给。如中国国家及、或公司因补发债票受损,请发票者须按照保结,即行赔补。

第十一款　所有此借款之债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在借款期内不纳中国各样厘税。

第十二款　所有借款招贴以及付利还本一切详细办法,未经本合同详载者,由公司会商中国驻伦敦出使大臣酌定。俟此合同签字后,即准公司出此借款招贴,中国国家饬知驻伦敦出使大臣,遇有应会同办理之事,与公司协同酌办,并将此借款招贴签字。

第十三款　此借款作一次出售债票,俟此合同签字后从速出售,不得延过十二个月外。其价值系按照虚数九三折(即每百磅实交九十三磅)交付中国国家。此项债票由公司在英国及在中国招人购买,中国与欧洲人一律办理,若中国国家定购,自应尽先照给,但须于未发出借款招贴之前定购。

第十四款　借款进项,或在中国、或在伦敦、交付汇丰银行,归入邮传部存款项下。至交付此款,系按照购票章程内所载购票人交付银数日期办理。其在伦敦所存之款,按常年四厘给发利息;在中国所存之款,按照该银行之息率给息,或作来往,或作定期嗣后酌定。银行将借款所进净数暨生发之利息存放,听候邮传部或其所派之人提用,凡提用款项若过二万磅之数,应于用款前十日知照银行。借款进项按照建造铁路工程所需,随时提用,由邮传部或其所派之人出支取凭单,向汇丰银行支取,并须将所提用之款另单声明缘由,及给发工程所需之价值。在中国所需款项开支费用,可由邮传部自定,饬向汇丰银行由伦敦汇至上海,所汇之款存放该银行,听候为铁路事提用。每年年终结账后,邮传部将铁路支收帐目及行车进款,用中英文刊印,以便任人取阅。

第十五款　设若建造铁路时借款所进净数并生发之利息不敷造至完备以及装配所需,其不敷之数先由中国可提之款提付,以免延误建造工程、如仍有不敷之处,则向公司续借洋款,其利息并条款仍照现时之合同办理。公司由售出债票实价内扣留五厘半售票费用(即每百磅扣留五磅十先令),其余尽数交与中国国家。若铁路造成后,借款项下尚有余存,此项未用之款听候邮传部提用,或用以付还此借款之利息,或用以装配此路,或用以建造并装配于此路有益之支路均可。

第十六款　此借款出售债票招贴未经刊发之先,如有关政治或银行意外之事,中国国家现在市面之债票价值因之有碍,以致此次借款未能按章办理,准公司展期缓办,惟所展之期由立此合同之日起不得过十八个月。若在限内,债票仍未售完,即将此合同作废,所有按照第三款内载公司后垫之款并其利息,由中国国家付还,但概不给别项补费、酬金。

第十七款　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建造工程之时,邮传部,或令此路总办选派英总工程师一人,此人须素有名望之工程专家,或在英国选择,或在中国铁路之工程人员选择。该总工程师须听命于总办,或总办他往所派之代办。其平日行为须敬重总办。其聘用该总工程师合同条款,由邮传部或令此路总办订定。至铁路上派用专门人员,分派各该员应办各事,以及辞退各该员,应由总办或总办他往时所派之代办,与总工程师商酌办理。遇有彼此意见不合,由邮传部判断,判定后,彼此均不得异言。工程造竣后,中国国家用一总工程师料理,此总工程师在借款期内须为英国籍之人。

第十八款　造路期内,公司作为此铁路经理购买须由外洋运来各材料、机器、什物之人。所有购买此项紧要材料,由总办招人投票;若所购之材料、货物系来自外洋者,无论或投票、或定单,该经理人须以铁路最相宜之价购买。惟定购材料及支取费用,非经总办核准,不能照行。造路期内,公司既为此路经理之人,应得三万五千磅作为酬劳,此路造成一半时付给一半,惟自签押之日起,不得逾十八个月之期,其余一半俟全路告竣即行付给。按照此借款公司及其经理人所有应当代此路尽力各事,如建造此路、装配此路所办各种物件应得一切用银,均包括此项酬费之内;倘按照第十五款续办借款,仍应按续借之数目,比照上列办法,另给公司用银,以为料理造路一切酬费。公司即得此项用银,自应代为监购铁路所需建造、装配各外洋材料,此等材料须在于公共市场择其价值最廉、质料佳善合用者购买。英国所制货物,若质料及价值与他国所制者相同,应先尽由英国购买。总办如欲在中国或在外国招他人经理购买各项外洋材料,以为更觉合宜者,可以有权照办,惟用银仍照上文所详回用给该经理人。所有买货单及验单均呈总办查核;所有各项回用、扣头均归还入铁路项下;所有该经理人购买各材料,须有制造厂原卖单并验单为据。该经理人,除得上文所详用银,不再给用银;惟遇有雇用工程顾问人员备代顾问或在外洋考验材料之时,邮传部或其所委之人须由铁路项下提给薪水。中

国货物及经在中国制造之材料，若质料价值与英国或他国材料相同，自应先尽购买，以鼓励中国工艺。购买中国材料、货物，不给用银。全路造竣后，借款未还清之前，如购买外洋材料，应先尽向公司经理购买，其办法章程嗣后彼此商酌办理。

第十九款　本合同内所言之铁路，将来或以为有益，或以为必需建造支路，由中国国家以中国款项自行修造，如须用外国资本，则先尽公司商办。

第二十款　按照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十月十五号)订立之草合同内载，提余利十分之二给公司作担任酬劳。今免提给余利，改由发售此借款债票项内提留六万七千五百磅给公司以代之，其提留之法，按照借款招贴所登买票人交付银数日期，照摊核算办理。如续办借款，即不再给抵换余利之款。

第二十一款　每年除付借款本利外，邮传部将本年所收铁路净进款盈余足敷交付来年到期借款利息之数，在上海存放汇丰银行，所存放之款，按照市面情形，随时与银行商定利息。

第二十二款　公司可将本合同应有之权利及责任全行或分别交与他英国公司、或总办、或代理人接办，或再转交代办，其接办、代办均须邮传部核准。

第二十三款　本合同系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上谕签定，已由外务部用公文照会英国驻北京出使大臣。

第二十四款　本合同缮写华、英文各三分，中国国家存二分，公司存一分；如有翻译文字可疑之处，以英文为准。

云南临安开广道前外务部右参议高而谦
外务部右丞胡惟德
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候补五品京堂梁士诒
中英公司代表人濮兰德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三月六号

锡良等关于镇压河口起事电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

收滇督致军机处请代奏电　四月二十五日

昨承准电寄二十二日谕旨，仰蒙训示殷殷，于策励备至之中，仍勖以战守兼筹之义。敬谨跪诵，感悚莫名。遵即恭录传示白金柱暨前敌各军，务须迅赴戎机，同心敌忾，将所陷地方，克期规复，以稍纾朝廷南顾之忧。其责在力守要隘者，亦经申儆再三，许以事平，一体论赏，违则按律治罪，俾咸知感奋，早奏肤功。至白金柱所部，前因兵力未集，先主堵遏。现该镇已亲赴古林箐防次督师，力图进取。昨据电禀，定先兜剿中路之匪，再行会攻南溪、河口，业经奏陈在案。一得续禀，即当电闻。再奉饬查明大碓湾、大木湾、老范寨三处接仗情形。查前据白金柱电报：大碓湾之战胡得胜营当敌，而赛家斌营为之援应。自十四午前交绥，至申刻匪始败退。大木湾之战系胡兴安、荣林两营，进扼险隘联扎，俯瞰南溪匪营，匪出大股来争，势甚凶悍，为该两营击退。该处山沟复杳，跬步崎岖，轰毙之匪，无从夺级夺械，计其成数，其中路追匪至老范寨之战，匪凭地险力抗，轰击历十四五两日。又经东路白金柱派马发材、白映庚两营越山横出助战，击毙不少。匪党抢尸护伤，是其惯技，未夺级械，亦成数难举。惟遗弃牲畜粮食多起，不能复顾，受创甚巨。是役我军弁目受伤一人，兵丁伤亡各一人，合并据实陈明。谨乞代奏。锡良谨叩。二十四日。

端方等为设局筹办江南地方自治折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1908年2月10日)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端方、江苏巡抚臣陈启泰跪奏，为地方自治事宜，先就省城遴委官绅商设局筹办，恭折仰祈圣鉴事：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钦奉皇太后懿旨：上年降旨宣布宪政，业经明白申谕，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久〔之〕远近。朝廷廑怀宪政，盼望至殷。近已降旨：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顾议院言论之得失，全视议员程度之高下，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非地方自治，则人才无从历练。等因。钦此。仰见朝廷讲求宪政，锐意图强，凡在臣民，同深感奋。臣等伏念地方自治之制，其名词译自日本，其经画始于欧美。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本，而疑中国数千年来，有官制而无自治。臣等以为周之闾胥比长与汉之三老啬夫，虽命自国家，事殊团体，然其受任自选举而来，其用人不出本郡，揆诸自治之义，不啻导以椎轮。必谓中外治术不同，犹非新旧沟通之论。江南地方，交通最早，士绅智识开明。自奉明诏预备立宪，群情鼓舞，望治尤殷。诚如慈谕亟宜择地试办地方自治，以为人才历练之地，以速实行立宪之期。惟是规画自治，按之法理，宜从下级入手。中国乡遂之制既已名存实亡，人民程度又复秀野不齐，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议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即于江宁省城设立筹办地方自治总局，檄委调补奉锦山海道朱恩绂、盐巡道荣恒、浙江补用道宗舜年、署江宁府知府许星璧为局长，前浙江候补知府伍元芝、七品小京官善溥、署上元县知县田宝荣、署江宁县知县龙曜枢、候补知县罗良鉴为参事。拟定开办简章，分设法制、调查、文牍、庶务四课，并于总局内，附设自治研究所及实地调查所。研究所为预备之始，先檄江宁一府之士绅，入所授课，而递及于他府县。调查所为实行之始，先从上元、江宁两

邑试办，而次及于他属。一面开办宣讲以晓颛愚，画定区域以行选举。选举既定，议事会与董事会，乃得次第徂〔组〕织。町村置长，近采邻邦经野之规。王道观乡，远稽三代大同之治。臣等忝为行政长官，幸际昌期，不敢不勉力倡导。仍俟民政部颁发自治章程，再行察酌地方情形，依次筹办。其办事经费本应由地方公众担任，惟目前局由官立，性质既微有不同，且就地筹款，亦非俟自治规模大备，未能遽责以义务。现在该局逐月支销之款，暂饬财政局垫拨，俟地方筹款有著，再议归偿。除开办简章分别咨送宪政编查馆、民政部外，所有江南筹办地方自治缘由，谨会同署江北提督臣王士珍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以后）

哀启者：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山陵崩溃，薄海号痛，南洋商民感思圣德，罢市致哀。我会同志仗义有年，应更悲痛。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吾谬承衣带，不能竭力上保圣躬，罪大辜重，万死莫赎，泣血呼踊，号于昊天。盖自戊戌变法大行皇帝舍身救国，贼党即谋篡弑。大行皇帝擢袁世凯于末僚，超授侍郎，授以密诏，令当保护之任。乃袁贼不感非常之遇，反告荣禄，遂起戊戌幽废之大变，并成已、庚废立通拳之事。凡弥天大事，中国几危，皆袁世凯为之也。于是权宠益重，手拥重兵，遥领朝权，分布腹心，内参帷幄，大植私党，外领封圻。已而西后老病渐危，袁世凯惧皇上一旦复权，己将不利，乃亲入军机，躬当外部，以淅路辰丸取媚而深结外交，以重金厚贿买医而阴谋毒弑，群医惧祸，皆拒不受，或预走避。义士程家柽走东洋而登报，楚臬梁鼎芬上劾章而投官，甚至其胞弟袁世彤忧覆宗而与绝书，逆迹昭著，行路皆知矣。及今年西后老病日笃，袁世凯毒谋益甚，日伪传上病征医进药，上常覆药曰："朕躬无病"，及西后弥留，袁世凯遂亲入宫以为大事，于是舍身救国之圣主，遂毒弑于袁世凯之手矣。袁贼乃亲草遣诏以俙揄天下，又借拥立醇邸以思免罪，不意古权奸篡弑之祸，遂皆见于今日。人神之所同怒，天地之所不容，方当中国危弱之时，有变法之圣主而弑之，乃别立幼君孺子，委裘再生，大祸滔天，横流未知所届。夫方当立宪之时，匹夫犹当保其身命，况三十四年御宇之圣主乎？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为舍身救中国之圣主乎？此而忍之，孰不可忍？夫乱臣贼子，人得而诛，讨贼复仇，天不共戴，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凡我同志，哀痛愤怒，除前连电布告并令举哀外，宜各埠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而谢天下，不胜哀愤之至。为此布告，并分寄出责各督抚。

（康有为）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3日　学部奏，日本文部省允于十五年内于官立高等学校内收容中国学生，每年一百名，由中国给以经费补助(时留日学生仍逾万)。

1月5日　浙江海宁州漕折苛刻，激起民变，波及硖石，捣毁教堂、学堂及警察、邮政、厘卡、铁路等局。

1月8日　浙江桐乡县乡民联合海宁州乡民六七千人，攻打桐乡县城，毁学堂，烧教堂，拆毁县署，释放监犯。

1月11日　新加坡华侨举行革命演说大会。

清廷以庞元济创办机器造纸公司，赏给正二品封典。

1月13日　清廷从张之洞奏，改津镇铁路为津浦铁路，与英德两国公司订立借款合同，自行修建。

1月25日　清廷以祝大椿兴办实业，赏给二品顶带(按：祝大椿二品顶带系由他谎报"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五十万元，凑足实业总额二百万元，骗取得来)。许鼎霖、刘世珩、程恩培、程祖福创办公司，均赏给正二品封典，加赏庞元济正一品封典。

1月27日　度支部奏准旗地可以自由买卖。

1月30日　河南商城龙华会起义，旋败。

1月　河南省人民设立保路会。

2月17日　清廷颁布银行通行则例二十四条及储蓄银行则例十三条。

2月20日　《汉报》被封。

3月15日　清政府施行矿律。

上海粤人为"第二辰丸"案开会，倡导抵制日货，政闻社社员徐勤、徐佛苏、伍宪子主持。

3月18日　直隶隆平人民抗粮，攻入县城，捣毁巡警局。

3月19日　广东各地愤"第二辰丸"案，群起抵制日

货。粤商自治会集众数万人，定是日为国耻纪念日，并调查日本运入货物，不与贸易。接着上海、广西、香港等地亦发生抵制日货运动。是为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

3月上、中旬　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徇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乃离开河内，经西贡往新加坡筹款。

3月22日　新疆回民二万余人暴动。

3月27日　黄兴根据孙中山指示，以越南华侨中之同盟会员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开入钦州起义。经过数次战斗，队伍增加到六百余人。

3月　光复会员王金发、竺绍康于浙江嵊县西乡发动会党起义，事败，退入东阳。

4月1日　孙中山派人在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到年底，分会遍布缅甸各埠。

沪宁铁路工竣通车，计长三百零五公里。

4月8日　株萍铁路收归国有。

4月11日　广东抵制日货运动扩大，南海县搬运工人数百人拒绝装卸日本运来煤船。

4月29日　黄明堂、王和顺等按照孙中山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之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河口之役。警察闻讯立即响应，并毙其管带蔡正钧。

4月30日　黄明堂、王和顺等攻占河口，毙清边防督办兼南防营务处王镇邦，所部全降。起义军逐渐扩充至千余人。

5月3日　黄明堂等率部连克云南南溪、新街，直逼蛮耗、蒙自。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兵，队伍从三百人左右扩展到三千余人，声威大振。

黄兴在钦、廉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四十余日，屡败清军，声威大振。至是以弹尽援绝，不得已退至越南。

5月5日　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命即赴前线督师。黄兴赶抵河口后，因投诚清军不听调度，黄明堂、王和顺等又指挥不灵，不得已于9日折回河内，拟另组敢死军为主力，投入战斗。11日，黄兴被越南法国当局扣押，旋即驱逐出境。法帝国主义又徇清政府要求，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并迫害、驱逐大批旅越革命党人，使云南革命军逐渐陷入困境。

5月11日　黄兴在越南老街为法警截留，照国际法例，被解出境(往新加坡)。

5月13日　汉口警察局禁止设摊，小贩万余人，毁巡警局，全镇罢市。

5月26日　清军攻陷河口，革命军相持战斗近一个月后终于失败。黄明堂率余部六百余人退入越南境内，又被法国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遣散。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之武装斗争，完全失败。

5月30日　福建厦门抽捐苛刻，各商店一律罢市。

6月6日　粤省士绅派代表至京递递国会请愿书。

6月中旬　广东连日大雨，东、西、北三江同时涨发，冲决围堤，南海、三水、清远、高要、明鹤山、四会等县共决八十余处，为数十年未有之巨灾。

6月25日　清廷命邮传部派员确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工程，限期办竣，否则另筹办理。

6月30日　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7月1日　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进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赏内阁学士衔。

7月2日　外务部照会日使，重申延吉(间岛)确为中国领土。

7月3日　政闻社电宪政编查馆，以“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

7月4日　学部奏准设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设立女子师范学堂。

7月8日　资政院奏拟院章，共十章。

7月11日　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再电请于二年内召开国会。

7月12日　河南代表胡汝霖、杨懋源呈递国会请愿书。

7月14日　吉林公民保路会成立，反对中日合办吉长铁路。

7月15日　直隶蠡县因官款苛刻，激起民变，群众遍发传单，三日内聚集万余人，捣毁县署。

7月18日　清廷命军机大臣张之洞兼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会商邮传部及三省督抚，筹办所有铁路事务大端。

7月20日　清廷命唐绍仪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分赴各国相机提议商订免厘加税条约。

外务部奏：以美国“减少”赔款，每年遣派赴美学生百名(第五年起，改为五十名)。

7月21日　江苏国会请愿代表雷奋、孟昭常，安徽许承尧、方皋等到北京。29日呈递请愿书。

7月22日　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各省谘议局章程。

清廷谕各省督抚迅速设立谘议局，限一年内一律办齐。

7月23日　清廷实授杨士骧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7月25日　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并革侍郎于式枚职以谢天下。清廷诏命革职看管。

7月26日　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等，以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诸役，屡起屡蹶，不关清廷要害，仍思就武汉腹地，实行起义。为此，遂联络“日知会”旧友，决定发起“湖北军队同盟会”，由任重远分途联络，一时和者达四

百余人。是日开成立大会于武昌洪山罗公祠。

湖南国会请愿代表陆鸿第等到北京，8月2日呈递请愿书。

8月1日　出使考察政治大臣达寿奏请改立宪政体，钦定宪法。国会年限，无妨预定，宪政预备，不可过迟。并请先立内阁，统一中央行政机关。

8月8日　八旗士民恒福等，吉林士民松毓等，山东绅商于洪起等呈递国会请愿书。

8月10日　候补四品京堂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五种。

8月11日　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组织，选派代表到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

8月12日　山西国会请愿代表常松寿等到京，18日呈递请愿书，签名者二万余人。

8月13日　清廷命各省查禁“政闻社”，严拿社员。

8月15日　学部奏准，明年开办分科大学设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二百万两。

汉口《当汉日报》因登载华侨国会请愿书被封（因请愿有归政迁都之说）。

8月20日　浙江代表叶景莱等呈递国会请愿书。

8月27日　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等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奏谕颁发，依限举办，限九年筹备完竣。

9月6日　福建建阳县乡民立五谷会（神农会），聚集三四千人树“农务分会”大旗，向县署提出四项要求：一、蠲免各项苛捐，二、减盐价，三、释放监犯，四、拆毁学堂。当地会党数万人响应。

9月12日　浙江归安县城厢内外各机户克扣工人工资，机工七余人罢工。

9月21日　清廷命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为秋操阅大臣。

9月24日　徐世昌电外务部，延吉日人拟增派宪兵，设立分遣所已由吴禄贞于百草沟、绥芬甸子设派办所，严行抵制。

9月27日　清廷命停止刑讯。

9月28日　达赖喇嘛抵北京。

9—10月　孙中山给新加坡《中兴日报》屡次撰文，驳斥保皇党人谬论。

10月8日　邮传部与英国汇丰、法国汇理银行订立“振兴实业借款合同”，款额五百万镑，实收四百七十万镑，用以赎回京汉铁路。

奉天市商民抗捐罢市。次日，市民聚众抢米。

10月14日　达赖喇嘛于仁寿殿觐见。

10月19日　日本东京警视厅封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民报》自创刊至此，共出二十四期（1910年2月《民报》用法国巴黎濮侣街4号总发行所名义，继续出版，实仍在日本秘密印刷，仅出版两期，至第二十六期停刊）。

10月20日　英使朱尔典晤达赖喇嘛。

10月23日　清政府以檀香山所出《自由新报》倡言革命，命沿江沿海各处严禁行销。

10月24日　台湾全岛铁路告成，在台中举行通车典礼。

10月25日　清政府以张继、吴敬恒等之《新世纪》“语多悖逆，倡言革命”，命沿海沿江各处严禁行销。

10月28日—11月8日　孙中山为加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之领导及筹办军饷，偕胡汉民等自新加坡赴各埠活动。28日抵关苓，29日抵吉隆坡，11月2日抵巴罗，5日抵槟榔屿，8月返新加坡。

清廷以粤汉铁路事权分歧，议论淆杂，命督办大臣张之洞通筹全局，严定限期，并命邮传部及湖北、湖南、广东督抚实力协助，各省原派之总理协理，均听节制。

10月31日　清廷以赵尔丰连电藏乱情形紧急，命妥慎布置，并命理藩部转商达赖，速电藏僧等解散乱党。

11月2日　香港华人以抵制日货与日人冲突，被捕数十人。

11月3日　清廷诏加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命即回西藏（11月21日离京回藏）。

11月12日　邮传部铁路总局长梁士诒与日使馆书记官阿部订立新奉、吉长铁路借款续约，款额日金二百三十七万元。

11月13日　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其子溥仪送入宫内读书。

11月14日　清光绪帝载湉死于瀛台，以载沣子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

11月15日　慈禧太后那拉氏死。

11月18日　安徽太湖秋操，26日完毕。

11月19日　光复会员、新军队官熊成基，在安庆城郊率马、炮两营士兵千余人起义。翌晨拂晓，发炮攻城。皖抚朱家宝闻变闭城戎守，并分电秋操军队和长江水师求援。熊因攻城不下，率部退往集贤关、庐州，旋赴日本。

11月20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赴暹罗首都曼谷。旋密设同盟会暹罗分会，举萧佛成为会长。因暹罗当局勒令离境，乃于12月14日返回新加坡。

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各省督抚严密访拿内渡“构乱不逞之徒”。

11月21日　摄政王接见各国公使，奕劻、那桐、袁世凯均参加。

12月2日　宣统帝溥仪即位，定明年为宣统元年。

四川设全省矿务总公司，凡川省未开矿产，概归总公司承办经理。

12月3日　清廷下诏重申于宣统八年（1916年）颁布宪法，召集议会。

12月7日　同盟会员赵声、朱执信等策划在广州起义，事泄流产。

同盟会员谭馥、葛谦等在广州巡防营中组织“保亚会”，运动革命，事泄，葛谦死难，谭馥逃走。

12月13日　同盟会员杨王鹏等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是日，于武昌开成立会。该社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在新军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12月25日　清廷设立禁卫军，由摄政王亲统，派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12月28日　清廷派大学士张之洞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

12月31日　云南革命党人杨振鸿等在孙中山支持和鼓励下，于滇西地区组织起义，失败。

秋　孙中山以南洋英、荷所属各埠已纷纷成立同盟会分会及通信处，为统一领导起见，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另订章程及通信办法，函告各下属组织遵行。

新加坡《中兴日报》与保皇党之《南洋总汇报》论战日趋激烈，孙中山亲自领导此项斗争，并撰文批判改良主义。同盟会重要成员黄兴、胡汉民、田桐、林时爽、陶成章、汪兆铭等亦先后抵新，撰文参加论战。

本年　同盟会员张文光于云南腾越创立自治同志会。辛亥革命时为腾冲起义光复领导力量。

本年　同盟会员井勿幕于陕西西安建立同盟会陕西分会，以李仲特为分会长（1909年为郭希仁）。该会一面利用合法形式展开活动，如创办学堂、书局报刊等传播革命思想。一面联络陕西哥老会、慕亲会、刀客等会党组织，建立同盟堂，并在新军中发展组织。

本年　陕西西安郭希仁、王铭丹等组织丽泽馆发行《丽泽随笔》半月刊。

本年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成立同盟会分会。

经　济

1月20日　山西商务局与英商福公司订立购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

2月　盛宣怀合并大冶铁山、汉阳制铁厂、萍乡煤矿，组织汉冶萍煤矿公司。

3月26日　汉冶萍铁厂矿股分有限公司在农工商部注册。

4月28日　农工商部奏，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

5月28日　清廷自开云南昆明为商埠。

5月　杨度在长沙创设华昌公司，试办纯锑。

7月1日　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资本金由最初四百万两增至一千万两，其增加之六百万两，分为万股，由官民各购其半。

9月25日　中日鸭绿江采木公司建立。

11月5日　华侨胡国廉、区昭仁于广州创办侨兴总公司。

本年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开业。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是中国近代主要的商业银行。总行设上海，南京、汉口、宁波等地设有分行。资本总额150万两规银，实收75万两。由度支部特许发行兑换券。1927年收足资本150万两。1931年总资本折合银币225万元。又在历年公积金项下划拨50万元，增设四明储蓄部。1935年因滥发银行券，陷入金融危机，被迫接受官股，遂为官僚资本所控制。是小四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股由人民政府接收，其余1952年12月同其他私营行庄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本年　交通银行在北京开业。它是当时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资本为库平银1000万两，经营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事业的收付，官商合办。总行设北京，全国各地设分支机构。1914年改定章程，进而担负代理国库，经负公债本息、代收税款、办理国内外汇兑等业务，成为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1928年总行迁上海，国民政府以其发行的债券抵充官股，逐渐渗入。中央银行成立后，该行被指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

本年　陕西制革厂成立。它是北洋政府时期官商合办的制革企业，原系陕西第一牧场手工作坊，由该场经理高幼庄、协理郑吉安集资4000元创办，厂址西安。产品多系民用物件。

外　交

1月13日中英德在北京签订《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英、德两国为攫取津浦铁路修筑权，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该借款合同。该合同由清政府署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同英德银行团（上海德华银行和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代表签订，共二十四款。主要内容为：借款金额为980万英镑，以9折扣交付，年息5厘，偿还期限30年，以本路收入及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江宁厘金作担保；本路所需外国材料，均由英德银团代办；将来修筑支路需用外国资本时，英德银团有权优先借款。英、德两国借此合同，长期控制了津浦铁路。

2月5日　日本轮船“第二辰丸”私运军火，在广东九洲洋面为广东炮舰捕获，并将日本国旗卸下。

2月8日　中俄订立吉林森林条约。

2月14日　日驻京公使林权助向外务部“抗议”广东扣留“第二辰丸”轮船。

3月1日　各国驻京公使反对新定矿律，要求缓行。

3月3日　外务部复照日使，允释放"第二辰丸"，扣存军械，对下日旗事道歉，并提议由英人公断（日本拒绝）。

3月6日　外务部邮传部与英国中英公司订立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一百五十万镑，实收一百三十九万五千镑。

3月13日　日驻京公使为"第二辰丸"案向外务部提出五项要求：道歉，赔款，惩官，释船，收买被扣军械。15日，外务部接受日使所提五项要求。

3月20日　日驻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外务部，要清政府不准人民抵制日货。

3月22日　日驻京公使强迫外务部领粤督严禁粤商抵制日货。

4月14日　直隶井陉矿务总局与德商汉纳根签订中德合办井陉矿务合同。

4月20日　查办西藏事件大臣张荫棠在印度与英代表订立"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5月4日张离印回国，该约于10月14日在北京互换）。

5月8日　日驻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为广东排斥日货事再向外务部抗议。

5月14日　中日订立鸭绿江右岸采木公司合同于北京。

6月23日　美国会通过以一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案，阴谋以此款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7月2日　中瑞修订通商条约。

7月20日　清廷竟以美国"减收"庚款（作为文化侵略之用），派奉天巡抚唐绍仪充专使前往"致谢"。

10月8日　中美订立公断专约。

10月12日　中日订立电约。

11月7日　中日订立关东至烟台水线及南满陆线条款。

11月12日　中日订立新奉吉长路借款续约及细目合同。

11月30日　美国务卿罗脱与日驻美使高平关于维持"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机会均等"原则互换照会。

12月27日　邮传部奏派员与日本拟订新奉吉长铁路借款续约。

文教

1月16日　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由商部、民政部、法部共同起草，参考当时日本报纸法而制定。共42条。后增为45条。规定报纸创刊前须向政府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地方行政机关或审查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廷"、"混乱政体"、"扰害公安"的言论，违者予以处罚。这一法律限制了报刊出版事业的发展。

6月　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24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8月　同盟会员卢信在美国檀香山出版《自由新报》。

10月　《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于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1908年10月，当该报出了24期后，被日本政府封禁。后来虽秘密印行了两期，但还是被迫停刊。民报被封的原因是它积极宣传孙中山和同盟会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来的。它是当时最有代表性、影响最为广泛的革命刊物。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重要文章，大都发表于此。先后担任主编的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

11月7日　《新民丛报》停刊，共出九十六期。

是年　同盟会员陈去病（南社成员）于浙江绍兴创立越社，鲁迅为该社成员，成员多为绍兴府中学堂学生。

皖人韩衍于安庆创立"读书会"，出版《通俗报》。安庆革命党人设立外围组织岳王会支部（该会系1904年陈仲甫〔陈独秀〕创立于芜湖，并于南京、安庆设有支部）和维新会。

军事

5月6日　清廷准陆军部设立陆军警察。

6月21日　清廷允徐世昌设东三省讲武堂、宪兵学堂。

11月18—19日　湖北两江陆军会操于安徽太湖县地。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09年

导　言

一九〇九年，在一个小孩子的啼哭声中，清王朝也逐渐向自己最后的死亡逼进。就在即位仪式上，摄政王不经意地说出“马上就完了，就回家”，似乎已在有所暗示似的。未料果真成了谶言。

野心勃勃的东邻日本依然想在中国攫取更多的权利。尤其是在东北三省一带，历来是日本人所瞩目的势力范围。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一直在梦想将东北划入自己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从一九〇七年的“间岛事件”开始，到一九〇八年底光绪、慈禧去世，日本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彻底清算了，于是有了这么一个“东三省五案”，中国又一次被欺凌而退。

在载沣监国后，他声称遵从已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的决定，表示一定要使宪政成立。但是，漫漫九年，何时能使国民真正有宪政权力？这种办法根本无济于事。然而，清廷终于准许了各地建谘议局，面子上总有了一丝转机，立宪派人立刻忙碌起来。

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保路、保矿权的斗争，广大人民全然不顾清廷的卖国政策，坚决要求收回主权。安徽铜官山矿权的收回便是这些斗争中最成功的一个代表。

革命派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宣传文化的作用。一部分同盟会员在苏州成立了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发起。他们用笔作武器，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上的发展，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发挥了喉舌作用。

这是希望和失望并存的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衰朽的清政府已越来越应付不了这种局面了。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东三省交涉六案
- ●建谘议局
- ●收回安徽铜官山矿权
- ●南社成立

东三省交涉六案

背景介绍

日本独享中国东三省南部利权的狂妄企图，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更为加剧，它借助日俄协约成立的有利时机，开始向我国吉林省延吉一带展开攻势制造所谓"间岛"问题。

"间岛"系指吉林省所属延吉、汪清、和龙、珲春4县地区，位于图们江北岸的江东滩，清初属于宁苦塔辖地，光绪年间并入吉林省延吉厅。早在19世纪60—70年代，朝鲜北部发生饥荒，灾民纷纷私渡图们江至北岸垦荒度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者增多，垦区扩大。朝鲜政府曾请求清政府将这些流民"刷还"，但未实行。1890年清政府决定这一带的朝鲜人民领照纳租，承认其为中国公民，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部分。1907年日本插手此地便打破了以往的平静。日本为实现扩充东三省南部的野心，随心所欲地将"间岛"解释为延吉一带的广阔地区，谎称这一带边界尚未划定。

材料：

- ·间岛事件
- ·东三省交涉六案会商

材料一　间岛事件

1907年8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照会清政府外交部："间岛究为清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此事悬案已久，迄未解决。然韩国人民之住于该处者不下10万余，往往受马贼及无赖之凌虐。……现韩国对外关系及保护韩民之责既归日本，……日本政府受韩国之恳请，自不能默然置之不理，拟由统监府迅速派员至间岛，专以保护韩国居民为事，希……速电驻扎间岛之清国官员，免生误会。"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根据驻朝统监伊藤博文的命令，率令事先已集结在会宁地区的日兵40余人及朝鲜巡警20余人，向我国吉林省延吉地区进犯。由此揭开了所谓间岛问题的序幕。

斋藤率日兵侵入延吉地区后，在六道沟强行设立所谓统监府派出所；它们强占民地、乱伐树木，兴工建造公署铺户，并相继在一些地方设立宪兵分遣所，驻扎宪兵巡警；不仅如此，它们还置原中国地方官本已选派的朝鲜族乡约于不顾，另行添设社长、村长，企图自建一套行政系统；千方百计地胁迫、诱骗朝鲜族居民不受中国地方官吏的管理，并以保护朝鲜族居民为由，肆意干预中国的司法权。更有甚者，它们把朝鲜亲日组织一进会移置于延吉一带，在六道沟设立本部及在各处设立分会，利用这些奸民到处散布谣言，挑拨朝鲜族和满、汉各族居民间的关系。一时间，延吉地区的各族人民之间关系异常紧张。

日本早已对这块地位重要、物质丰富的宝地垂涎三尺，其觊觎之心，也早已被清政府察觉。徐世昌接任东三省总督后，立即派吴禄贞赴当地调查。自斋藤入侵后，清政府在北京积极向日本代理公使进行交涉，由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交涉，而且由驻朝鲜总领事向日本统监交涉，强调延吉为中国领土。1907年9月，徐世昌自奉天、吉林两省调派警官、警兵前往，并任命陈昭常为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为帮办。他们在局子街设立边务公署，在"边防重要及韩民繁盛之地"设立派办处10余处。为增强当地的实力，阻止日本势力的扩张，他们想方设法做了许多工作。遭到清政府抵制的日本，嚣张的气焰暂时被打了下去，间岛问题也随之搁浅。

但日本没有就此停止它侵略中国的步伐，而是一步紧接一步地按照撤军期间已完成的侵略部署积极行动起来，以阻挠中国的建设来加强它自身的侵夺。而且时隔不久，从1908年起，日本更加强了对延吉地区居民的勒索、侵扰。它们在图们江北岸至六道沟之间90余里的地段内更改地名，沿途钉立木桩；在图们江沿岸多处添设渡口；向延吉地区添派宪兵、巡警，并掩饰不住它们将朝鲜境内的清津—会宁铁路展造到延吉地区的图谋。更为震惊的是，10月在火狐狸沟茂功社地方发生日本宪兵击毙、击伤中国巡兵、巡长多人的事件，以及发生在局子街的日宪兵枪杀中国工兵的事件，这是日本企图通过延吉一带局势的紧张，增加对清政府压力而制造的新事端的升级。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政局也发生了急剧变化。11

月14日—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继位，他的生父、光绪的弟弟载沣主持朝政任摄政王。日本抓住中国政局动荡之际，大打出手，在东三省南部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攻势，目的是对1907年后半年它蓄意制造的一系列争端以及自日俄战争以来所谓遗留的各种问题来一次总清算。

材料二　东三省交涉六案会商

1908年12月下旬，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要求清政府就东三省交涉六案进行会商，从速 议结。六案为：(1)新法铁路问题；(2)大石桥—营口铁路问题；(3)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问题；(4)抚顺、烟台煤矿问题；(5)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6)“间岛”问题。其实质是日本企图通过扩展路、矿权利来增强其在东北的势力，而在此重提延吉地区的分界及归属问题，显然是在谋求侵略该地区的合法化。2月9日，清政府外务部侍郎梁敦彦与伊集院开始谈判日本提出的六项交涉。日方声称，此次交涉与日本“国防”、商务、军务均关重要，清政府必须“全行允诺”。

清政府在六案中最为关注的是有关领土权的“间岛”问题。为使日本能够认清延吉是中国领土、由中国管辖，清政府已做出牺牲抚顺煤矿对日让步的准备。但觊觎之心到了极点的日本绝非一个抚顺煤 矿所能解决问题的。日本声称：中国如能于他项问题和商通融办法，日本能将延吉地方认明中国有此领土权，但对该地朝鲜居民的裁判之权，应归日本。3月18日，清政府就六案正式照复日本，指出：中国政府视延吉一案至为重要，日本既承认中国于该地有领土权，却又不予中国裁判权，岂不是“于中国领土内限制中国主权”，中国对此不能同意。加之双方在新法铁路问题上也有争议，清政府建议将案件交送海牙和平会公断。日方看到国际干涉的形势将于己不利，仍坚持由双方谈判，以实现其胁迫的目的。

在4—7月期间，日本千方百计地向中国施加压力：日驻朝统监府修订“监时间岛派出所官制，增设事务官、技师等官；日本宪兵在三道沟骨牌地区强占民房用做宪兵遣所；在百草沟、六道沟持械闯入民宅、轮奸妇女、擅修拓建警楼……。日兵在六道沟任意殴打中国官警、包围派办处竟达3次之多。7月底，日方捏造“延吉马贼欲将蠢动”的事件，增派官兵由会宁渡江越境，直往六道沟。与此同时，它们还威胁清政府如不将与它们针锋相对的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加以撤换，日方将“采用适当之措置以为抵制，则两国难保不陷于不快之局”。形势咄咄逼人，清政府认为，东北铁路矿权“彼已据为战胜所得之品”，势实不能归还，即使无可挟之端，亦恐难于终拒”。又唯 恐因延吉事而掣动大局，因此不敢再对六案拖延，遂决定对日妥协。8月7日，清政府照会日使，宣布如日方在延吉一案能满足中国之希望，则愿在新法铁路等各案上对日让步。9月14日，中日就东三省六案签订了两个条约：《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用于解决延吉问题；《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用于解决其余5个问题。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日本统监府派出所及文武人员，在缔约后两个月内亦即从速撤尽；中国开放龙井村(即六道沟)、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4处为商埠，缔约后两个月内日本即可在各商埠设立领事馆；在图们江北垦地居住的朝鲜族居民，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但在审判关涉到这些居民的民、刑案件时，日方“可任便到堂听审，”，“惟人命重案则须先行知照 日本国领事官到堂听审”，如日方“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断之处，可请中国另派员复审”；中国将按吉长铁路办法将该路展造至延吉南边界，在会宁与朝鲜铁路连接，何时开办，由中国酌情，“再与日本国政府商定”。

《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主要内容有：新法铁路修筑时须先与日本商议；中国准许日本修筑大石桥—营口铁路；日本有权开采抚顺、烟台煤矿，该矿向中国缴纳的各种税率，应按中国地处煤 税最惠之例征收；日本取得安奉铁路沿线及南满洲铁路干线矿务的开采权；日本同意延展京奉铁路至奉天城根一节铁路。

这两个条约的签订，把日本前一阶段所谋求的侵略利权巩固了下来，成为它继续扩充利权及势力的依据。同时，延吉一带对日本开放，又给了它以干预当地司法、筑路等事务的“条约权利”。从这两个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在实现其阴险图谋时，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了它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

（摘自《勿忘百年国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建谘议局

背景介绍

载沣监国摄政后，即发出谕旨，声称必遵循已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的决定，“理无反汗，期在必行，”申令“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事机”，表示一定要“使宪政成立”。

清朝的王公权贵们在用作幌子的《宪法大纲》上也毫不掩饰他们企图强化专制主义的心思，因此，在实行这种企图的过程中，就更表现得尖刻露骨。愈是希冀专制，其内部攘权揽势的倾轧就愈激烈。由于附和立宪的多为汉族大臣，请求立宪的绝大部分是汉族官绅，少数满族亲贵就越发增添了猜忌心理。那拉氏死后，载沣庸懦无能，他

们更怀着大权旁落的忧虑。特别是对那个坐拥重兵，勾通宫闱的袁世凯，尤其放心不下。多数守旧的王公大臣固然早有锄去袁世凯的意图，就是“立宪派”的善耆、载泽等，为了集权，也对袁的权势深感不安，觊觎已久。于是，产生了罢黜袁世凯的事件。

清王朝倒行逆施，集权皇室；用漫长的九年为期来拖延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巩固专制主义的君权；种种举措，引起了立宪派人的极大不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要求遭到漠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按清政府的这些作法，不但不能抵制革命，反而足以激起革命风潮的加速上涨。但是，由于在宣布九年为期的前一个多月（1908年7月22日，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清廷批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即着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因此，自1909年年初起，各省立宪派人逐渐地转到去张罗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活动，暂时把请开国会的事搁置下来。

材料：

- 各省督办谘议局
- 西方人观感

材料一　各省督办谘议局

《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规定：“谘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第一章第一条）。它所通过的议案，得报请该省督抚认可，才能生效。如被认为“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二、有妨碍国家治安者；……”该省督抚有权“奏请解散”谘议局（第八章第四十八条）。从章程条文来看，清王朝命各省设置谘议局，无非是让它作为装饰立宪新政的点景，并没有赐予它牵制和削减督抚权力的职能。

但尽管如此，各省督抚还是没有一个真正地去“实力奉行”。象当时报刊所描写的，“自六月二十四日颁发谘议局章程，七月初驰播报章，海内快睹而督抚寂然。……”两江总督端方，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近几年曾上过几次奏请立宪的折子，是贵族大臣里很露脸的“立宪派”人物，而当筹办谘议局的“谕旨”发下后，“于此事寂寂不一动”。昏庸无知，随声附和立宪的湖广总督陈夔龙，虽然动了起来，但给属员下个札子说：“原设谘议局，朝廷以人民程度不及，而改为筹备处云。报章传以为笑”。后来，“既设筹备处，一切委官，士绅置之膜外，不复有知其所办何事者。”至于那些在立宪问题上模棱观望的督抚，就更加拖沓敷衍。江西巡抚冯汝骙圈占洋务局，给他的小老婆住，另将谘议局筹备处变作接待洋人的寓所。类似这种虚应故事的例子，可以说遍及各省。

到一年期限届满时，除新疆省外，各省督抚终于按照走过场，应时景的官场惯例，委派几个官吏同豪门势要的士绅会商办理，先后完成了选举的程序。其间，得有选举权的选民，数量极少；而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事例，更不胜缕记。

《谘议局章程》第二章三条规定：“凡属本省籍贯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谘议局议员之权：一、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参加选举的人数既少，而且还有各式各样舞弊作假的情事。如安徽怀宁县被选时，“票柜未开，即知有西门宋姓票数多寡”。又有望江县，“办理调查，任意延宕，及奉文饬催，遂草率造册，册内所列被选人，竟有久经病故者。”还有英山县，“办里初选，更属儿戏。当其初选，届期各绅多未到局，遂各传递填名，或以一人代数人填名。’

玩弄假立宪阴谋的王公亲贵们当然不愿谘议局真正能发挥它的作用。各省谘议局开会前一日，清王朝下谕告诫议员说：各议员“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该督、抚尤宜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谘议局还刚呱呱堕地，朝廷就给它劳叨起长篇大套的紧箍咒，不许它真正发挥地方议会的职能。

材料二　西方人观感

我亲爱的姬乐尔：

〔···〕

我返回北京安排一下家务之后就忙于撰写这次旅行的报告。人人都对我非常友善。人民极为友好。象多数记者那样，我高度评价在太原府和西安府看到的省咨议局。那里的会开得斯文有礼，大有可为。这是前进中的重要步骤，我曾经希望《泰晤士报》对此给予鼓励，因为这是各省的创举，从此有机会在公开的议会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谈论本省各种需要。而我从11月24日路透社电讯中看到《泰晤士报》对此表示怀疑，它听到“在高声反对朝廷的浪潮中风暴即将来临的第一个信息”。我认为，把平静的议会里进行的评议描绘成“高声反对”是十分不妥的。然而，我在濮兰德在寄给你的那份通信中（他同时也给了我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抄件），看到他对咨议局持有非常悲观

的看法，他说，那种激励他们的精神就其斥责一切外来事物这种意义来说，是爱国主义的，他并且引用了位本地记者的话，说"由如此无能的老朽们来掌管帝国，极少有希望长治久安"。这句话说得好，但却是他自己的话——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任何一位当地记者从未说过这句话。

有关湖北咨议局"誓死"反对的说法，是一位当地作家用东方人特有的夸张手法写成的，它把一个英国读者引入歧途。

我认为，由于濮兰德和我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根本分歧，反而给《泰晤士报》带来了好处，使它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以便由一位毫无偏见的象洛瓦特·弗雷泽那样的第三者对此提出新的见解。因为我认为：现代中国最引入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财富越来越有保障，经济日趋繁荣，人民对于外国方式和事物日渐抱有好感。然而，濮兰德却认为中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并且说美国在此地行将见到的只能是已被列强瓜分了的中国残骸。我认为，立宪政府对这个国家非常合适；同时，试办省咨议局显然是个成功。因为中国成立了省咨议局而谴责她，认为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旗人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士大夫无意改变"现行制度"，在我看来是极不公正的。

大多数省咨议局都选举了士大夫为议长。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每个谘议局都为记者准备了席位，为他们提供的议程表详细得令人吃惊。

永远忠实于你的

乔·厄·莫理循

（摘自《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

收回安徽铜官山矿权

背景介绍

1902年安徽巡抚聂辑规同英国华伦公司订立合同，出卖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等州县煤铁矿开采权，引起安徽绅民和留日学生的反对。安徽籍京官与留日学生同乡会呼吁各地绅士及皖省京内外各官员出来主持争矿废约。1904年，经多次光涉后矿区限于铜陵县铜官山一处。但华伦公司在该处霸占矿地达400方里，界连三县。公司职员仗势欺压中国民众，致群情愤激。1905年，安徽绅民以华伦公司屡次逾限，自背约期，宣布原订合同作废。次年，即成立安徽全省矿务公所，决定自办矿务。华伦公司托词要挟，英国矿师麦奎在矿在"强占发地，挖坟筑路"，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妄图久踞。1908年，华伦公司忽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勾结，伙同日本合办铜官山矿。英、日两国公使竟分别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迫令承认。皖省绅民坚决反对英、日两国公司私相授受，"竭力与争，誓不相让"，"逾限应废之说，始终不移。"

材料：

·收回安徽铜官山矿权

材料　收回安徽铜官山矿权

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二日安徽商务局与英商"伦华公司"（代表为凯约翰）订立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等处勘验矿务合同二十三条，以八个月为限。以后连展四限，每限三个月，直至一九〇四年一月期满，凯约翰始终没有勘矿。一九〇三年上海报纸披露了此事，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抗议。皖籍留日学生派代表回国力争收回，绅商和一些皖籍京官也表示反对。安徽巡抚既怕舆论指责又无法应付侵略者，于是推凯约翰到外务部交涉。

一九〇四年六月五日，由外务部（伍延芳代表）与英商"安裕公司"（仍以凯约翰为总董）签订新的安徽开矿合同二十三条，规定由"安裕公司"开采铜陵县属铜官山各矿，资金一万一千镑，期限一年，逾期不开采则合同作废。一九〇五年五月安徽学商各界人士以凯约翰并未在限期内购地开办为由，要求外务部按期满未办的有关规定，声明合同作废。而凯约翰虽然没有招足资金无力开采，但仍谋霸占开矿权，急派麦奎前往铜官山勘矿。安徽巡抚致函英驻芜湖领事，以合同应废为由阻止麦奎前往。英领事与凯约翰则诡称合同未废，无理取闹。英国侵略者蛮横行径，激起了安徽各界人士的反抗。一九〇八年七月六日安徽省各界组成"路矿公会"，"坚持废约自办"，指出侵略者"以一万二千镑之资本，乃要索人赔至四十万镑，借端射利，其居心险诈盖不可问矣！"路矿公会并推举方皋进京与皖籍京官共商收回办法。有关资产阶级人士还提出向英国裁判所控告凯约翰的主张。清政府命李经方与凯约翰谈判解决。一九〇九年初，安徽省学界、绅商和路矿公会集议，公电外务部，声明铜官山矿合同逾期应废，已成铁案，反对所谓"合办"、"赎回"，主张此案不必由李经方转议，以免周折而顺舆情。是时凯约翰派出的侵略分子麦奎在铜官山欺压群众，奸污民女，枪伤群众三人，引起群众公愤。一九〇九年四月清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将原由李经方与凯约翰进行的谈判，改为凯约翰与外务部在北京直接谈判。外务部电令安徽派官绅代表入京"备议"。安徽旅沪路矿公会开会，致电外务部要求"坚持废约"驱逐麦奎；同时举派代表到安庆参加安徽路矿公会大会，会商争矿宗旨及进京代表问题。安徽旅宁（南京）人士二百四十余人也召开大会，主张"废约自办"，并提议进京代表权限只应限于"废约"。四月三十日安徽省路矿公会正式

召开大会，到会的有学商各界及旅居南京、上海、芜湖、江西的皖籍人士的代表，由会长洪思亮、吴传琦主持。大会决定争矿"应守之宗旨，除废约以外无它办法，"并推选方履中等代表与凯约翰谈判。大会致电外务部，强调"如能主持废约，代表即行入都"，"若更议他说，皖人誓不承认，代表亦不能往"。五月五日方履中等代表启程赴京，同日路矿公会又召开特别大会，到会千余人，商议筹股集资自办矿务问题。同月八日芜湖商务总会、皖南教育会及各学堂又召开大会，坚决要求废约，有人主张先议废约，再议自办，如果凯约翰拒绝废约，则"必当联合沿江各省实行文明抵制之策"。安徽争矿斗争进入高潮。五月底六月初安徽各地学商各界纷纷致电外务部，要求废约。五月三十日安徽省城成立"抵制会"，六月六日上海的安徽路矿公会邀请各省旅沪有关团体，召开特别大会，组成"铜官山矿共济会"，以期团结奋斗废约自办。

面对安徽各界掀起的争矿浪潮，凯约翰感到形势不妙，便转而进行讹诈，要胁清政府以五万二千镑"赎回"。一九一一年二月外务部奏准"赎回"，四月初由李经方交付"赎款"，五月初收回矿山。安徽各界成立"泾铜矿务公司"筹资自办。

（摘自苑书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

南社成立

背景介绍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成立的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团体，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等发起。为显示该社反对清政府统治的思想，取名"南社"。以所创作的诗文，进行民主爱国思想的宣传，反对异族统治。建立之初有会员十七人，后扩展到千余人。辛亥革命后，部分成员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因内部分化而停止活动。社员所作诗文，辑为《南社》，共二十二集。

材料：

· 南社成立记

材料　南社成立记

南社于1909年11月在苏州成立，它的筹备和组织活动是两年前在上海开始的。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记载着，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先后殉难，巢南要在上海替秋瑾开追悼会，没有成功，却在旧历七月七日开了一次神交会，隐然是南社的楔子"。

神交会的活动是由陈去病独自发起的，1907年7月29日，他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刊登了《神交社雅集小启》和《神交社例言》，例言中说到："本社之设，原以上海内外多士炳蔚，往往有读其名著至繁夥，或彼此闻声相思，与为神交者有年而觌面不相识，时负失于交臂之憾。……故特座名园，订期小集，世君子当有惠然肯顾者，不胜跂予望之。"神交会于8月15日在上海愚园举行，出席者有陈去病、吴梅、刘季平、黄节、邓实、沈昌直、冯治清、祝心渊等11人。受到邀请而没有出席聚会的有高旭、柳亚子等人。高旭事后有《海上神交社集，以事不得往，陈佩忍书来索诗，且约再游吴门，邮此代简》：

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
自笑摧列遽如许，只看箫瑟欲何之。
青山似梦生秋鬓，红豆相思付酒厄。
怕听夜鸟啼不了，治吴陈迹泪丝丝。

柳亚子也有《神交社雅集图记》一文记其事："嗟呼！今之时，何如时乎？《小雅》废，夷狄横；《诗》、《书》烬，微言绝。礼乐崩坏，欲敝风颓。士生斯世，辄瞿然有所不自得，而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以贸一日之荣者。夫既不得志于世俗，则必益求其同调之朋而与之为么弦之和。"

仅从《神交社雅集小启》和社例的内容看，神交会不过是一次文人骚客酬唱聚会活动。但是被邀和出席者都是具有反清思想，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爱国诗人，其中多数为同盟会的宣传骨干。其中有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有《国粹丛报》、《复报》等进步杂志的主编，神交会的政治倾向不言而明。正如高旭、柳亚子在诗文中隐指的，是要继承明末几社、复社倡导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社团。他们想要抒发的是在清王朝统治下的痛苦、愤懑的情感和希望能够起来拯救世界的气概。陈去病曾作《有怀刘三、钝剑、亚子并苦念西狩、无畏》，其中说到：

其二有渐离，生来耻帝秦。
报仇志不遂，往往多哀呻。
要我结南社，谓可张一军。

便显示出这种心态与打算。

1908年5月，陈去病起草了南社宣言，分别寄给与会者，同时，发展社员的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但在7月里，局势突然发生变化。月初，陈去病在杭州发起祭奠秋瑾遇难周年的活动，并以此作为南社的一次活动。但他的行动引起清朝官府注意，派出警探进行监视。为避免官府发现南社的组织活动，实施破坏，7月下旬，陈去病离开上海到广东汕头避祸，南社的一切筹备活动也暂时停止了。

1909年初，陈去病因病从广东回上海，卧病达半年之久。病愈后到苏州任家塾教师，重新着手南社的筹备工作。10月7日，高天梅先在上海《民吁报》上发表《南社启》："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以亡矣。""然

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或谓国学固不宜缓，然奚必社为？曰：一国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为，赖多士以赞襄之。华盛顿之倡新国，非一华盛顿之力，乃众华盛顿之力也。社又乌可已哉？""今者不揣鄙陋，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这篇宣言把结社与兴国联系在一起，又借华盛顿的比喻，暗指南社有倡新国的志愿，已将反清革命的主题点出。同时又宣称要作海内文学的导师，无疑是提倡爱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学、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把组织南社作为推动革命的手段。但是，南社的文学观念仍然局限在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之内。并没有像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那样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这在《南社启》中也已显示出来。这就决定了他们有虽做海内文学之导师的愿望，而在事实上却很难担起导师的重任。这种将文学与政治连在一起的做法导致南社的某些领导人常常从政治出发来观照文学创作，将文学创作与政治拉在一起。这种观念最终造成了南社的分裂。

南社成立时虽然声称是文学团体，但在创建初期，入社者多数是同盟会成员和具有革命倾向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除了举办雅集、出版社刊以外，经常在国内外进步的报纸杂志上撰写鼓吹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文章，发表的诗词文学作品，也以宣传革命为主。

（摘自《上海近代文学史》）

历史内幕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

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

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大意就是说袁心存叛逆）。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遂同意善耆等的做法，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作，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个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词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这从袁的方面来讲，就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等一看，奕劻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地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乃将原谕一再修改，措词前紧后松，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亦只有付之浩叹而已。

我在此尚要补充几句话。清朝家法最严，尤其是近支王公更过，如过去历史上各个朝代所发生的那种变故。当辛亥年冬，丁工源曾问过善耆："王爷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时候，为什么不帮助摄政王将袁除掉？"善耆说："你不知道，我们宗族王公，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我虽是御前大臣，怎么敢在宫内乱来。"这段问答，曾见丁自著笔记。这是实在情形。载沣究竟不是皇帝，其不能作断然的处置，此亦原因之一。

袁住在彰德洹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

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这种报告，善耆曾经给我看过。当辛亥年四月，新组成之内阁（将军机处归并内阁）受各省谘议局的攻击说："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请另行组织。"于是总协理大臣均奏请辞职。奕劻、那桐、徐世昌的原奏，均在政治官报上发表。所最不可解者，那、徐两人均说，自己才力短绌，从前罢免之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云云（大意如此）。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不足深论；那桐是一个著名圆滑的官僚，何以亦有这样说词？况且其时各省并无特别事故，必须袁出来收拾。他们两人既敢如此说，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

到了武昌首义，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野心，待时而动。冯国璋、段祺瑞是袁的嫡系心腹大将，亦认为"非宫保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其实，彼时除近畿陆军以外，禁卫军是一支新练成的精锐之师，未尝不可一试。但是冯、段已先任第一、二两军总统，担任前线军事，此两军已为袁所能直接操纵。于是将禁卫军编列第三军，专负保卫京畿之责。我自永平秋操营地赶回北京，内阁总协理大臣已决定如此主张，我亦不便再持异义。及听到前线作战缺乏炮弹应用，我立即派遣禁卫军炮标统带吴金声带领炮队一营，配带应需实弹，专车抢先开往。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过彰德时曾与袁会晤。至于外间传说，徐世昌曾秘密赴彰，往来磋商条件，据我想，袁、徐两人早有默契，似不必再作形式上之会见，且当时亦未听说徐有赴彰之事。

袁世凯既出任内阁总理，于十月十五日（旧历，下同）奉皇太后懿旨，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预政事。袁于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婪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其来源固无从深悉，恐亦不是随便捏造。平日蓄积有如是之巨，真是骇人听闻。又据人说，吴禄贞之得第六镇统制，亦曾化了运动费二万两，其过付为谁，现尚有人能指实。吴是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轻放过，则其他更可想而知。那桐亦是著名大贪污者，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在当时的朝局，已成公开之秘密。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

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平日宠信太监张兰德，言听计从。张亦居然以李莲英自居，器小易盈，惟知聚敛货财。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后来他三人皆如愿以偿，各自在家纳福去了。奕劻在天津所买大楼房，即是张兰德的产业。王闿运所著《祺祥纪事》末段说："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禅让亦以贿成，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无怍"。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沣对于皇帝退位，是始终不赞成的，但他无权无力，在袁世凯看来，已在无足重轻之列。但因他优柔寡断已贻误于前，到此也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摘自《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四川谘议局的活动

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情势，笼络人心，于一九〇九年十月（宣统元年己酉、九月）令各省成立谘议局。四川总督赵尔巽奉命后，即组织宪政筹备处，拨筹备费一万五千四百余两，进行筹备工作，并委在籍士绅四品衔候选员外郎马良卿、同知衔拣选知县李念祖督工监修会址，拨银二万七千九百余两，在成都纯化街新修了一座局所（即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旧址，现在的红照壁招待所后院）。谘议局议员的选举章程规定：男子须年满二十五岁（无女）、曾办学务公益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中学或同等学堂以上毕业者；举贡生员出身者；文官七品、武官五品以上者；有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始有选举权。具有上述资格而又年满三十岁者，始有被选举权。以县为初选区，府为复选区。当时四川人民对这种选举并不热心，当然也还有些人由于怕露富，怕官府加派捐税，虽有资格也不愿去登记的。在这些资格的限制下，四川全省人口七千余万，登记有选举资格的，只有一十九万一千五百余人。

议员共一二七名，但额定为一〇五名，多者是递补出缺的人。在一二七名中，有进士二人，举人三十一人，秀才、廪生五十五人；还有道员一人，拥有各种官衔者二十七人，著名富翁、典商九人。这些议员，大多数都是立宪派或与立宪 派有联系的人；同盟会会员只有四人，未暴露身份。有的材料把张澜（廪生）、蔡镇藩（进士）列为谘议局

议员，查档案及口头资料，当时张为南充县初选所所长，蔡为度支部主事，均非议员。

一九○九年十月十四日(清宣统元年九月一日)，四川谘议局在成都开成立大会。除全体议员出席外，总督赵尔巽及提督、都统、司道、府县均到场参加。上午十时起，选举正副议长，蒲殿俊以七十六票当选为正议长；萧湘以五十八票当为第一副议长；罗纶与吴季昌竞选第二副议长，罗得四十七票，吴得二十六票，均未超过半数，指名罗纶再选，结果以五十五票当选为第二副议长。议长及副议长全为立宪派人。嗣由总督赵尔巽致训词，提出"融畛域、明权限、图公益、谋远大、务实际、循次序"六条，对议员加以申诫；并谓："谘议局成立皆出于孝钦显皇后(慈禧)，德宗景皇帝念时事艰难，开千古未有之举，今日开局而先后先帝已不及见，实为臣民憾事。"言至于此，泪随声下，有些议员，亦引袖揩泪，为慈禧、光绪不及亲见这种"盛世"伤起心来。赵尔巽训话毕，将谘议局关防及交议事件亲手授与议长蒲殿俊承领；旋由蒲致答词，摄影散会。

四川在筹备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并开展了所谓"自治"的准备工作。一九○八年夏间，赵尔丰护院时，曾设立"成都自治局"一所，举办首郡"自治"事宜。嗣赵尔巽调任来川，复仿照湖北省法，增大局的规模，重订规划，改名为"四川全省地方自治局"。局内设法制、调查、文牍、庶务四科，多延揽立宪派搞政法研究的人充任，而以藩、学、臬三司为总办，巡警、劝业、盐业三道为会办。并在原成都自治局开办的"自治研究所"的基础上，于一九○九年二月扩大为"通省自治研究所"，增加学绅名额四百余人，令各属保送二人入所肄业，八个月毕业。所内研习的科目，计有：一、奏定宪法纲要；二、法学通论；三、现行法制大意；四、谘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五、城乡地方自治章程等。后又通令所属各设一自治研究所，选绅授课，还添设啼听席，以广招纳。计各府厅州县先后成立自治研究所达一百二十七所，肄业的人不下数千人。此外，又在成都设立"宪政会"及"法学研究会"，网罗了各州县在省的若干名士。一时研习法政之风盛行，在成都设立的公私法政学堂，曾达十三所之多，谘议局的成立，使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及一些地方官僚中要求政治改良的人，抱有一种希望，因而直接间接与谘议局发生了相当联系。这样就使立宪派人凭借着谘议局的合法地位，在当时成为一种显著的政治力量。

一九一○年十月十七日谘议局开正式会议，会议厅委员、道员饶凤璪随赵尔巽到局参加。当议至第三条——询问学务事件，各议员次第发言之后，议长认为讨论已毕，宣布停止发言，复有议员欲发言，当经议长制止，议员并无异议。饶凤璪忽于旁坐起立发言，谓："议长制止议员发言，系剥夺他人言论自由，殊属不合。"当与议长发生争辩，并称他系代表总督发言纠正，引起议员愤而驳斥。饶气势汹汹，经赵尔巽一再制止，犹复未已，至议长宣告散会，事始得罢。次日，谘议局全体议员认为饶凤璪干涉谘议局内部议事，实系对谘议局的一种侮辱，特呈请总督赵尔巽查办，谓："委员饶凤璪非分干涉，且复自称代督部堂发言纠正，实属不合。如委员可干涉谘议局内部之事，则议长可以撤，而议场可以同于市井；如监督权可以委员代行，则督部堂委员不止一人，谘议局当受无数重重监督，而监督权可以分及于巡典；委员代行监督权可干涉及于谘议局内部，则委员之权可以大于督部堂；督部堂临会在座，而委员可自称代理，则委员可以人人独立，而一省可无行政最高之长官。若皆不然，则该委员实盗督部堂之监督权，以侵夺谘议局权限、违法越权，无可解免，应请裁夺核办。"赵尔巽仍不加理会，谘议局自亦无可如何。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言》文史资料出版社)

隆裕与载沣之矛盾

隆裕皇后，姓叶赫那拉氏，桂祥之女，亦即慈禧之内侄女。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为皇后。因她与慈禧之关系，故不为光绪所喜爱；终光绪一生，与隆裕皇后迄未和好相处。

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较之慈禧，则远远不如。例如慈禧对于政治虽然残暴自私，但尚有个人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亦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则一切皆为其宠监张兰德所操纵，个人毫无主见。

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龃龉。

宣统既立，隆裕皇后自然抑郁不乐，后受太监张兰德的怂勇，在宫中东部大兴土木，修建"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按清代制度，在"国服"期间，不得兴修宫殿(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然而隆裕对此并不顾忌；尤其当时清廷正在兴建新军(海、陆军)，所需甚钜，国库本已空虚，建军之用尚感不足，而隆裕乃不计及此，竟命由度支部拨出钜款来兴修宫殿，以为个人娱乐之举。后虽因革命军起而不得不停止，然此亦可见其无识之一斑。

宣统二年五月，载沣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裕始无可如何。其对载沣无理取闹，颇多类此。

隆裕闻革命军起，惟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

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载沣无可奈何，只好辞职，故逊位诏书不是由监国摄政王出名，而由隆裕下的诏书。其实，隆裕对共和之意义并不了解，只不过认为是把载沣之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而已，而在逊位诏中仍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语。其后发现民国优待条件与张兰德所言完全不符，遂终日抑郁，逾年而歿。

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其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边常有隆裕掣肘，外边又受奕劻、那桐等人挟制，他的地位虽为监国摄政王，然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即如对隆裕之兴建"水晶宫"事，本可以既"违反祖制"，又影响建军之正当理由，进行拦阻，但由于其怯懦怕事，不敢多言，也就不加可否任凭兴建。至于当时用人行政之实权，也等于完全操在奕劻、那桐之手；他个人并无一定的见解和主张。

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载沣处理。载沣犹豫不能决，乃商之于奕劻、那桐等人；而奕劻、那等则力主保全，让袁世凯自行称疾辞职，袁乃有辞职之举。迨袁辞职后，载沣又不留其在京，反命回籍养病，把袁放走了。当时，清政府官僚中之有识者，多认为这无异是"纵虎归山，养痈成患"。其巧黠者则暗与袁通。这事是载沣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的表现。

载沣对于共和，本无定见，但由于内有隆裕赞同，外有奕、那挟制，个人又无良策以应付时局，惟坚决表示自己决不下此诏书而已。故其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而由隆裕出名下逊位诏书者，乃实不得已也。

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和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即在袁辞去军机大臣，而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一切。及革命军起，清廷复起用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乃认为时机已至，遂利用革命声势，对清廷进行威胁，而自己乘机窃取国政。由上观之，由于袁世凯之阴谋及隆裕、载沣等之庸懦无识，遂造成清末民初未能真正建成一个共和国家，徒供军阀数十年之混战而已。

（摘自《清代秘史》百花出版社）

历 史 考 证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桩轰动一时的公案，即章太炎与清朝两江总督端方的关系问题。

1909年冬到1910年初，在陶成章、李燮和、章太炎等发动对孙中山的攻击之后，香港《中国日报》、巴黎《新世纪》等报刊先后公布过章太炎给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五封信。据此，《新世纪》断言章太炎已经被端方收买："此即太炎先生得金之清单。玩'摊年过久'一语，指十年八年而言，又玩'岁不过千余元'一语，即可推其总数，大约万金。万金出卖一革命，至为便宜，"《中国日报》则进一步宣称："据最近布告，言章与直督（按：端方后由两江调直隶）幕员刘光汉和好如初，且受端方委任，担任解散革命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到清朝灭亡后的1912年，章太炎倒向袁世凯方面，同盟会会员主持的上海《民权报》便重新发表了这五封信中的四封，认为是"以万金出卖革命党之一篇大罪案。"该报说："本报攻击章者，在昔日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黄，排斥同盟会。"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呢？搞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章太炎、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以至辛亥革命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那么，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上述五函真伪问题的考证中实际上已可窥见其大概：章太炎确曾通过刘师培、何震夫妇跟端方联系，联系的中心问题是要端方给章太炎以去印度做和尚的经费，而章将从此脱离革命。刘师培在叛降端方时，向端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章、端之间联络交涉。章氏致刘氏夫妇的信，就是这种活动的记录。

在脱离革命去印度为僧的背后是否还有更隐秘的政治交易，譬如当侦探之类？作这种指责的人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笔者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从章太炎的思想和性格看，他也不会干这种事。但是，没有这点，并不能否定章太炎主动向端方运动经费是一个难辞其咎的错误。端方是镇压革命最力的满洲贵族之一，革命派恨之入骨。章太炎在和孙中山闹翻之后，去和这样一个人物发生关系。当然成为政治上的污渍，无怪乎事实公开后舆论大哗。他对刘师培同端方联系，不但知情不举，反而托其作中间人与端方作交易，交易的条件还是不再从事革命！这种举动，比起高歌"临危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的当年，简

直判若二人！

这里，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章、端之间关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

1912年9月8日，北京《民主报》刊出该社职员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与章太炎很熟的革命党人，文中说：章“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运动，每月得其乾肴二百两。”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前文提到，端方“资助”章太炎赴印度为僧的钱应怎样付给，刘师培提出的方案是“按月支给”，而章太炎不同意，认为按月支给不可靠，钱也太少，必须先在总数中“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这条材料所说的每月二百两银子，显然是一种折衷方案，它既维持了“按月支给”的付款原则，又将实数提高到章氏所不愿意的“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的一倍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章太炎曾否接受了这分“乾修”，按作者文意，章太炎是接受了的，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著文揭露这一事实。每月二百两银子，为数不少，但还不符合章所提出的要求；得不到足够的经费，章太炎自然不会轻易离开日本去印度。

此后，这种关系有无进展？因为得不到直接材料，只能从别的方面考查。章、端之间以刘师培作中间人，章、刘关系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1908年2月，即章太炎写了第五函的次月，刘师培、何震即回到东京。刘师培返日后，一面继续以“革命”的高姿态大唱无政府主义“高调”，一面暗中作侦探，向端方密报革命党人动态。这时，章太炎与刘、何关系很好，与两人同住于麹田区饭田町。同在名为研究“社会主义”，而实为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作演说。但是，不过两个月，章就与两人大吵特吵起来，只好搬回民报社，自此，刘、何与章反目成仇，何震表弟汪公权甚至宣布要和章太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们之间为什么突然决裂呢？双方事后都没说明其真实原因和细节，我们不能妄测这次冲突与章、端关系有关，但可以肯定，处于这种境况，由于失去中间人，章、端关系也就无法继续和发展下去了。

不过，事态并不到此为止。1908年4月27日，广州《国民报》刊出一则题为《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中云：

“（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因此上，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毂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这篇戏文的史料价值，在于它反映出章氏出家消息传播之广。及革命党人对此的态度。戏文批评章“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态度是善意的，诚恳的。对此，章太炎没有反应。紧接着，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又刊出了一则《炳麟启事》：

“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此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章炳麟白。”

这里，除了去印度一节外，脱离革命和出家似乎都将实行了。但是，章太炎却在6月9日出版的《民报》第21期刊登《特别广告》，予以否认：

“仆于阳历五月二十四日赴云南独立大会，仆归后即不见印章一方，篆书，章炳麟印。知是侦探乘间窃去，以后得仆书者，当审视笔迹，方可作准。

再，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伪造仆与锡良之电报，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报》登《炳麟启事》一则。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宁武县人。其冒名告白，尚待调查，合并声明。”

这则《广告》戳穿了前述《启事》是伪造的。它的伪造者是谁呢？《广告》中，提到了“散布匿名揭帖”的是“山西宁武县人”。当时，在东京的“山西宁武县人”中，确有人信奉无政府主义，与章太炎不睦，并与刘师培关系密切。章太炎声明已经“查得”，但没有点名。至于“冒名告白”的作者，章氏只表示“尚待调查”，没有公布结果。实际上，也只有刘师培一伙才会干这种勾当。

这是因为：章太炎找刘、何替他跟端方拉关系，使刘师培、端方都觉得有油水可捞，因而刘替章打了保票，狡猾的端方虽不肯将巨款轻易付人，也还是出了高价，可是，章太炎居然食言——虽然在那里醉心佛学，梦想“扶掖圣教”，请了一个名叫密尸逻的印度人在那里教梵文，但是，并没有去印度，而且，仍然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倡导“排满”。这样，刘师培当然无法向他的主子交代了。情急无奈，只有不择手段，伪造一个启事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来，好让端方看到，说明他刘师培已经完成了任务。

总之，在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关系破裂以后，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也就无法存在了。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在封禁《民报》的同时，也封禁了刘师培的《天义报》和《衡报》。11月，刘师培回国，继续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上海招摇撞骗。此后不久，他即将章氏五函由何震加注说明后寄给黄兴等人。这一事实，说明端、刘的策反计划已经彻底破产，只能利用这五封信搞臭章太炎，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猜疑和矛盾。

章、端关系曾达到何种程度，如何结局，至此已比较了然了。前引《民声报》的文章承认章太炎“以术取清吏之财诚有之”，这话并不排斥说章太炎收过端方的银子。该文又说：“端方知章不可引诱，其事遂寝”，这应该也是可信的。

末了，附带谈一谈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情况的形成当然与章太炎此举本身的严重性分不开，同时，也和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加剧有关。

在刘师培回国后不久，民报社发生纵火案。紧接着，又发生毒茶案。纵火、放毒的主犯都是刘师培的同伙汪公权。1908年12月，江、浙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划起义，刘师培将这一情况密报端方，党人张恭被捕，刘师培一伙的叛徒身份因而逐渐暴露。此后，刘即投入端方幕中任"文案"。1909年8月，端方调赴直隶，上海报纸发表了随员名单，其中就有刘师培。这样，刘师培的叛徒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在此之后一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联络少数人，发布了一份所谓《七省同盟会意见书》，诬陷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藉革命肥家，陶并亲自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同年10月，《民报》秘密在日本筹备复刊，章太炎又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陶、章一伙肆意破坏团结，声势咄咄逼人，迫使孙中山、黄兴等不得不回击，以挽回影响。尽管陶成章是组织和发动这场攻击的祸首，章太炎却因旧日声名及其同孙中山的长期矛盾而风头最健。于是，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被正式提出来了。

双方的激烈情绪是可以想见的。在抨击章太炎时，象吴稚晖那样断言章已经出卖革命，显然夹有个人恩怨；他人断言章背离革命，沦为侦探，不是意气用事，便是由于情况不明。章太炎和刘师培有过那样一段极为密切的关系，又有这样五封信，当时，人们无法弄清全部情况，把章、端关系估计得更复杂些并不奇怪。在我们考察这桩历史公案时，对于双方过头的话，都应根据可靠史实予以订正。

关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须要提出的是，同盟会内部日常事务和人事上的冲突是由于在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而引起的。但是在斗争开展之时，这种分歧并没有被提出来展开应有的思想斗争，反而被个人的攻击所掩盖。这种现象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们在观察同盟会内部的斗争时，不应被一些热闹事件所迷惑，忽略了背后的主要分歧，也不能认为这些事件都不值一提，把它与背后的分歧看成截然两回事。这样，都无法掌握同盟会内部斗争的全貌。

（摘自杨天石　王学庄《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风　云　人　物

溥　仪

溥仪(1905～1967)　清朝末代皇帝，字浩然。年号宣统，醇贤亲王奕𫍽之孙，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子，光绪帝载湉之侄。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均处于病势重危之中，慈禧太后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光绪帝死后，溥仪继位，时年仅三岁，由其父载沣摄政，年号宣统。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乘机取得清廷军政大权。在袁世凯的胁迫下，载沣退归藩邸，隆裕太后下诏书宣布清帝逊位，从而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根据"优待清室条件"，溥仪仍可"暂居宫禁"。

但居于紫禁城内的溥仪，一直是清朝遗老的拥戴目标。1917年坐镇徐州的"辫帅"张勋带兵进京，扶持溥仪复辟，但仅仅维持了七天的时间，这出复辟丑剧便在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中，草草收场。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军从宫禁内驱逐出去，先居于"北府"(醇亲王府)，后逃至东交民巷使馆界。1925年化妆至天津。居于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从此，溥仪便在一批前清遗老的包围下，日夜策划，图谋复辟。溥仪在天津的复辟活动。很快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密谋策划下，溥仪被挟持到东北。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炮制了一伪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从1934年起，溥仪又爬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

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派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溥仪也宣布"退位"，但很快就被红军俘虏，送到远东的伯力囚居。1946年，溥仪去东京，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的侵略罪行出庭作证。1950年溥仪由苏联押解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9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命令，溥仪被特赦。从1961年起，被安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1967年因肾癌逝于北京。

溥仪生前写有《我的前半生》，回忆了他自己的家庭以及从进宫至特赦释放五十余年的生活道路，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先后发行数十万部，并被译成英、日、德等文字出版。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载　沣

载沣(1883～1951)　载沣字亦云，爱新觉罗氏。醇亲王奕谖子，光绪帝载湉之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他是清末皇族贵胄中，一度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显赫人物，但同时又是一名畏葸无能、懦弱平庸的历史过客。

载沣7岁封为镇国公，8岁时奕谖死，承袭了醇亲王爵，从19岁起，先后任阅兵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等职。1901年，因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事件，清廷命载沣为赴德头等专使大臣，前去"谢罪"，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同往。同年，由慈禧太后"指婚"，娶大学士荣禄女为福晋。1908年，光绪帝病死，慈禧太后领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慈禧太后死后，朝中大权便由载沣与光绪后隆裕（慈禧太后的姪女）共同掌握。

宣统帝继位后，清王朝已面临着行将崩溃的局面，以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为主旨的革命爆动此起彼伏，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因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而失去重心。载沣在重重矛盾中，为稳定清王朝的统治，错误地采取了把军政大权集中于皇族的办法，首先借端解除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的一切职务，并要袁"回籍养疴"。不久，又宣布由他自己暂行代理大元帅。同时设立军谘处，由贝勒毓朗、载涛管理；由贝子载洵任筹办海军大臣。然后，载沣又以"筹办宪政"为名，于1911年5月颁布了内阁官制，由庆亲王奕劻出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做的结果，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使掌权的皇族完全孤立起来，载沣在对外政策方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铁路国有"的幌子下，大肆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结果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使革命形势日趋成熟。载沣执政期间的种种倒行逆施，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灭亡。在反对皇族内阁和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武昌起义爆发了，并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

面对着"四面楚歌"的现实，懦弱无能的载沣束手无策，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袁世凯大权在握之后，立即逼载沣下台，在袁世凯的压迫之下，载沣于宣统三年十月(1911年12月)行咎辞职，以醇亲王退归藩邸。

辛亥革命后，依"优待清室条件"，载沣仍居于旧府邸内（俗称北府，在北京后海北河沿）。及至溥仪去天津定居后，载沣又经常往来于京、津之间。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后，载沣还一度去东北。全国解放后，载沣于1951年病死于北京。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载　涛

载涛((1887年—1970年，爱新觉罗氏，醇亲王奕谖第七子，光绪皇帝和摄政王载沣之弟，宣统皇帝溥仪的叔父。

载涛幼时，奉慈禧太后之旨，先后过继给贝子奕谟和钟端郡王奕洽，并承袭奕洽为贝勒。光绪三十年到三十二年(1904—1906年)，载涛 在贵胄学堂学习。喜骑马，精骑术。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当时清廷内部以载沣、载泽等为首的少壮亲贵和以奕劻、袁世凯为首的元老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载沣罢免袁世凯，排挤奕劻，集中权力到少壮亲贵手中。载涛遂成为载沣集中军权的助手。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岁的载涛被任命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与毓朗、铁良训练禁卫军。自清朝入关以来，宫延的保卫一直由满族的八旗兵担任，但是庚子八国联军事变以后，满族士兵已无力承担此任，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由北洋军担任禁城 周围的巡逻和护卫任务。至此，清廷决定编练一支主要由满族士兵组成的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谕旨所派训练禁卫军大臣虽有三个，但实际负责的是载涛。载涛 得到曾留学日本的良弼（任步队第一协协统）等人的辅助，从各旗营中抽调精壮兵丁，又从山东、直隶挑选农民壮丁入伍，从第一镇抽调军官，用了二年多时间，编练成主要由满人组成的一镇禁卫军。禁卫军较其他新军装备更为精良，待遇更为优厚。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接替陆军第一镇守卫宫禁。七月二十五日(9月17日)由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校阅，颁发标旗，正式成军。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载涛受命管理军谘处事务。军谘处最初设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陆军部管辖，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部。此时军谘处正式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其意义在于以摄政王的亲信掌握陆军。据载涛等人制定的军谘处暂行章程，军谘处的权限和管辖范围非常广泛，"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胥由本处拟案，奏请亲裁之后，饬下陆海军部钦遵办理"，军谘处还统辖军事学堂、驻各国使馆的武官、海陆军的参谋官等，其权力几乎与陆军部相等。宣统三年四月，军谘处改为军谘府，重新隶于陆军部，载涛和毓朗同为军谘大臣。

由于争夺军权，载涛与陆军部尚书铁良发生了矛盾，终于使铁良借病乞休（后任江宁将军）。在政治、军事活动中，良弼是载涛最重要的谋士，有人说禁卫军"一切章制计划，悉出其手，而全国重要军职之进退，亦多待其一言而决"。

载沣罢免袁世凯后，北洋派的势力仍然很大。载涛改变了铁良只用满人抵制袁世凯的办法，重用非北洋系的留日优秀军事学生吴禄贞、张绍曾等，让他们担任镇统一级的高级将领，但这样做却使革命党人在北方发展了势力。

与袁世凯、铁良对抗的同时，载涛还努力削减地方督抚的军权，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宣统二年（1910年）军谘处奏："各省将军督抚调任他省，不准将原省各项军官率行奏调，亦不得将前任所派之员无故撤换。"这种做法遭到了督抚的反对和抵制，但载涛等人仍然坚持。

另一方面，载涛也致力早已开始的军队近代化工作。宣统二年，载涛请求到欧美日考察军事，二月十日（3月20日）从北京出发，偕同良弼、李经迈先后到了日、美、法、英、德、意、奥、俄八国，历时四个月，于六月底（8月）回到北京。载涛在德、法等国曾认真考察陆军。并参观军事学校、兵工厂等。他对新式军事器械很感兴趣，还购置了小型飞机，并命一些军官学习航空。

面对气息奄奄的大清王朝，年轻的载涛想有所振作。在满洲贵族中他最先剪了发，平时总是穿军服，长靴佩刀，亲贵中人多嗤之经鼻。在良弼的劝说下，他力图收揽人心。据说清末王公不收贿赂的，只有载涛和善耆两人。但是载涛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和才干，他对政治的理解也是浮浅的。国外考察归来，他提出的意见只是立即设立责任内阁，令全国断发易服以一新耳目，实行征兵制度等。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载涛正在永平负责秋操，得知消息后赶回北京。为应付事变，清廷编成三军，第三军由禁卫军和第一镇组成，由载涛率领保卫北京。不久形势急转直下，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袁世凯担任总理大臣，载涛解军谘大臣职。十月十九日（12月9日）又解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职，由冯国璋任禁卫军总统官，载涛一手训练的禁卫军也落入北洋系手中。十二月，清廷会议讨论议和问题，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主战，太后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回答"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军队能够效忠清廷。当日会议遂无结果而散。

1932年，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载涛的二儿子溥佳也当上了伪满宫内府的侍卫处长。当时载涛负责管理在关内的清朝各帝陵寝，在北平设有"两陵承办事务所"，经费是由溥仪供给的。因有关陵寝的事务，载涛曾多次到伪都长春，但未任伪职。

全国解放后，由于载涛在马政方面颇有研究和经验，1950年8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曾多次到青海、甘肃、新疆等省视察指导，为解放军的马政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一些回忆录，为研究晚清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他的子女、孙子、孙女等都由人民政府安排了工作，脱离了旧时代的寄生生活。

1954年，载涛以满族代表身分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同时又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民族组副组长。1956年，由李济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摘自罗明主编《清代人物传稿》）

谭延闿

谭延闿（1880～1930）　谭延闿字祖安，组庵，湖南茶陵石林乡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谭钟麟官至陕西巡抚，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加太子太保。谭延闿1892年入府学，1897年为优贡，接着，连科皆捷，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回归湖南，与一些开明官绅兴办学堂，初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后任明德学堂总办。因此而广交湖南上层官绅和商界人物，为以后数次持掌湘省政权奠定了基础。

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不久在京开始筹设咨政院，在各省会筹设咨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谭积极参与，首先与一些立宪派分子组成"湖南宪政公会"。1908年12月，被湖南巡抚岑春蓂委任为筹办省谘议局的会办之一。1909年10月，湖南谘议局成立，谭为谘议局议员，并推之为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

由于谘议局的有名无实，加之屡受督抚的肆意轻侮，谭逐渐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1910年冬，谭至京参加全国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未能允准。1911年5月，谭再至北京参加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决定成立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为政纲的"宪友会"，谭被推举为湖南支部的发起人。他们以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先后两次上书清廷，对建立责任内阁、对关于借债、禁烟、铁路公有等问题，提出了与清廷不同的看法，结果受到清廷严词申斥。谭看到湖南、四川为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兴起的群众保路运动已渐展开，预感时局的急剧变化，于是离京回省。

1911月10月10，武昌起义爆发后，22日，湖南首先响应。起义军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二人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然而，以谭为首的湖南立宪派有相当力量，他们一面制造谣言，攻击焦、陈、挑拨绅商、新军与都督府的关系；一面又借口"提倡民治"，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一

个"湖南参议院",谭被推举为院长,议员几乎全都是原谘议局议员。这样以谭为首的参议院,便成为凌驾都督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接着,又借口"军民分治",设立了军政、民政两部,谭又担任了民政部长,总揽了一切民政事务。这样,焦、陈二人便被架空,以谭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

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争夺权力,谭召集立宪派秘密集会,制定了由新军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杀害焦、陈的阴谋计划。10月31日,立宪派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谘议局推举谭继任都督。不久,他们已夺得湖南各级政权。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谭首先致电以示拥护,7月,袁亦任命谭为湖南都督。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旧官僚政客。谭也加入了国民党,并被推为湖南支部支部长。谭对革命党人施展了一套逢迎笼络的惯用手腕,同时,又与立宪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既注意联络国民党,也同袁世凯拉关系,对湖北的黎元洪、广西的陆荣廷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极尽拉拢之能事,有"八面玲珑"之称。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谭迫于形势,得黎元洪所授机宜,于7月25日宣布湖南"独立",但暗中仍与袁世凯保持联系,还故造事故,致使革命党人在独立后无军械子弹,而且按兵不动,静观时变。二次革命失败,谭立即于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他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然而,谭并没有得到袁世凯的谅解,虽表面说谭"素明大义,谅非本心",然视谭为异己,为了进攻西南敌对势力,便于10月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驱谭下台,将湖南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中。此后,谭先后寓居青岛、上海。

1915年,,湖南人民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谭便提出"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赵恒惕、曾继梧、陈复初、陈嘉祐四人回长沙,为汤"赞襄大计"。此时,孙中山亦命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率军讨袁驱汤,进迫长沙,汤 芗铭仓皇出逃。但赵恒惕、陈复初又乘机拥谭回湘,1916年8月,北洋军政府任谭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程潜愤然离长沙至上海,谭第二次掌握湖南政权。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谭二次督湘,并不符合段祺端政府要由北洋军阀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计划,8月6日,下令改派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谭失却军权,成为空头省长,于是,谭于9月辞职离湘,前往上海。

1917年8月,孙中山于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在湖南爆发了湘南战争,11月14日,傅良佐兵败,弃职逃回北京。1918年6月,谭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由上海重返湖南,在零陵重任湖南都督,第三次持掌湖南大权,不久又兼任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

谭为首的湘省军阀官绅政客,打着"湘事湘人自决","还政于民"的幌子,于1920年7月22日向全国发出"祃电",宣布"湖南自治",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地方军阀的割据,由于权力分配上的分歧,湘省统治集团中矛盾日趋尖锐,谭在程潜、赵恒惕的逼迫下不得不辞职,于11月27日第三次离湘赴沪。

谭在上海走投无路,于1922年投奔孙中山,重新加入国民党。6月,北洋政府任命谭为内务总长。但未去就职。1923年2月,跟随孙中山回广州,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和建设部长。逐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7月,谭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北伐讨贼湘军"入湘讨赵,谭赵战争爆发,不久,谭被赵击败。孙中山亦急电谭回师救粤,解陈炯明围攻广州之急。此时,谭手中已有一支一万余人的队伍作资本,更加见重于孙中山。被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

1924年1月,谭被孙中山指派为湖南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孙中山派兵入赣北伐。10月,谭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统辖湘、滇、豫、闽等各军十万之众,进入江西,为方本仁击败,退驻北江。1925年6月谭指挥湘军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谭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并兼任军长。

谭在国民党第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3月曾代理过国民政府主席。4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政治会议主席。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召集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谭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是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对立,谭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但却代表官僚、地主的利益,攻击农民运动过火。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1927年9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被推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和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1月,蒋重新上台,谭任国民政府主席,甘做蒋的傀儡。同年,蒋形式上统一全国,改组国民党政府,谭居行政院院长。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9月22日,谭因脑溢血症死于南京。

(摘自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

汤化龙

字济武，湖北省蕲水县人，1874年生。1902年中壬寅科举人，1904年中甲辰科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入日本法政大学。1909年任湖北省谘议局局长，并加入宪友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湖北都督府民政总长、编制部长。1912年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长、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并组织中华民国联谊会、统一共和党、民主党，1913年并入进步党，任该党理事，同年任众议院议长。1914年5月至1915年9月任教育总长，1917年7月至11月任内务总长。1918年3月经日本至欧美游历，于9月在加拿大被中华革命党人刺杀。著有《违警律释义》、《游美日记》等。

柳亚子

柳亚子(1887～1958)　爱国民主人士、诗人、初名慰高，后更名弃疾，字安如，改字亚庐、亚子，江苏吴江人。早年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为南社创始人之一。后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诗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早期作品鼓吹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后期作品，表现了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有歌颂新社会的作品。著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孙洪伊

孙洪伊(1870—1936)

字伯兰，天津人，1870年生。1906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是宪友会的主要成员，1909年因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行君主立宪而闻名。1913年为众议院议员、共和统一党理事长，后并入梁启超的民主党，不久又并为进步党，任该党党务部副部长。1916年脱离进步党，成为宪政商榷会中之"韬园派"头面人物，后与丙辰俱乐部合并，组成民友社。1916年6月任段祺瑞内阁的教育总长，7月改任内务总长。因与徐树铮发生争执，11月段迫黎元洪将其免职。1917年参加广东护法国会，成为护法国会中民友社"小孙派"的主要人物，同时任护法政府内政部长，后赴上海任孙中山的代表。1922年6月旧国会在北京复会后，以众议员身份回京，1923年后退出政界，居于天津。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代表。1936年故于上海。

佘英

佘英(1874—1910)　原名佘俊英，字竟成，四川泸州(今泸州市)人，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四日(1874年11月12日)出生于泸州对江小市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在他不到十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又无力医治而死去，一家生计全靠母亲针黹浆洗所得来维持。这样，佘英不得不中断就读私塾的学业，从十二、三岁起就学铜匠，继而租种田地，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工余喜爱弄刀舞棒以求自卫。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慷慨任侠的性格，"尝为乡人及地方公益争不平"。

同、光年间，泸州及金川秘密会党哥老会的势力十分活跃，会众之间常能相互扶持周济，佘英因此加入了泸州小市哥老会义字旗公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拜武举人李孝恩为师，入棚习武，"娴剑击骑射，应试，得游武庠"。于是声誉隆起，被会众推为舵把子。"泸州牧以其为地方所重，擢领卫队，缉搏匪盗，捍御桑梓，屡获保奖武职"。但是，佘英"目击清政不纲"，官场腐败，遂于二十七年(1901年)后弃职回家，开牛肉馆以结纳四方豪杰。

二十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界蓬勃高涨。泸州是川东南交通要道，新思潮也渐次上溯而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佘英从朋友处得到《革命军》和《警世钟》等书，细读之后"民族大义因之而生"。他"愤慨于汉族沉沦，国势危殆，时思奋起有为"，深感"如不起来革命，推倒满清无能为的政府，除去一般贪官污吏，恐怕不能救四百兆同胞出于水火"，并决心效法邹容、陈天华，"唤醒汉人起来革命"。于是，佘英"时以其书播讲于市，听者动容。州牧示禁，复驰乡宣传，不稍畏避；而更结客，以待有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力谋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黄复生早已闻知佘英的名声，"乃致函邀其东渡"，佘英得函，喜出望外，遂于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上旬到达东京，受到同盟会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民报》社，宋教仁同佘英亲切会谈达四小时。佘英陈述自己"欲做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的志向和"联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的建议，宋教仁力赞其说，并说四川形势分析利弊得失，授以方略，佘英深以为然。不久，由黄复生、熊克武介绍，佘英受到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接见，经孙中山谆谆诱导，"对革命主义极至倾折"。同年八月十九日(1906年10月6日)，佘英由范金介绍、黄复生主盟加入同盟会。从此，他改名为佘英，"表示与满清政府脱离关系"，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年底，孙中山委任佘英为西南大都督，"命佘英归，喻会党以大义，为种族效命。且告谢奉琦、熊克武曰："汝二人其与佘英共肩

斯任。吾国用兵当在扬子江流域，四川乃其上流，宜急图之”。于是，余偕熊、谢二人回川。

余英回川后，与熊克武、谢奉琦设立同盟会秘密机关于泸州，并四处奔走，八方联络，结纳会党与清军中的志士，发展会员数以百计。四川会党内部素分子仁、义、礼、智、信五堂，仁字辈最大，信字辈最小。余英对会党各公口晓以大义，调解矛盾，“倡导仁义不分上下”，把川东南各会党组织“假万国青年会名义，和合为一”，积极筹备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余英以母病回泸，几为知州杨兆霖所诱捕，只好蛰伏城中，望江涕泣。母亲逝世后，他不能归营丧葬，悲愤填膺，对同志发誓说：“今后惟有以死报国，藉赎不孝之罪而已。”遂与熊克武、杨兆蓉等密谋起事，定期十月初九日(11月14日)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成都、叙府、泸州同时发难，并约江安县防军哨官杨安邦、鲍九成先一日袭取县城，然后率军顺流而下，余英在泸城策应，召集会党三千人设伏于城内外，期深夜举火袭据州城，邀约刘天成率所部作为外援，杨兆蓉率众在石棚响应。筹备期间，会党成员住满客栈旅馆，彼此随意谈笑，致消息泄漏。一时流言四起，清吏因而戒备。余英等人恐日久生变，遂匆匆议决提前于十月初一(11月6日)发难，密电各方同时行动。讵料江安县令先期得到密告，命防营统领阻截杨、鲍二部，并亲率衙役搜捕，起义者十多人死难。江安事发，泸州即闭城戒严，清吏大肆捕捉革命党人，外援刘天成又未及时赶到，起义夭折。接着，革命党人又计划于十二月二十三日(1908年1月26日)在叙府再次发难。为此，余英偕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县，号召同志参加。但是，届时起义又因风声外泄，清吏先行捕人而未能发动。

为了向同盟会汇报几次起义失败的经过和寻求武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余英偕熊克武再次前往东京。旅日同盟会同志集资购买手枪三十余支，子弹二千多发，交余英、熊克武等秘密运回重庆，计划在川北广安州(今广安县)举义。这年十月，光绪和西太后先后死去，余英等认为时机大好，遂加紧准备，遣人往石笋河、岳门铺、花桥场、三溪河，鲜渡河一带招集党人，于宣统元年二月初十日(1909年3月1日)夜发动广安起义。临发难时，余英所率一路数百会党群众因要饷钱而大肆哗闹，未能及时发动。熊克武、秦炳等率数十人从东门外伪装团队押解“匪犯”，袭击州署衙门，冲进二堂，不见清吏，遂转攻保安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广安起义失败后，余英仍不稍懈，继续聚积力量，又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一日(1909年12月13日)发动嘉定起义，袭击了童家场、白马梗、土主场、板桥溪等处的团练局和水师，得步枪、快枪一百数十支，子弹无数，炮船八艘。起义军曾“遍张文告，晓喻居民，公然以汉军政府著称”。不幸此时余英突患疟疾，只好暂停进攻。清吏乘机派遣重兵沿江把守，起义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嘉定城转而合力围攻屏山，旋遭嘉定、马边及雷波数路清军的夹击。余英带病指挥部众南下叙州，谋在边隅待期发难。叙州知府宋联奎得悉，立命记名提督董尚薰率重兵堵截并包围义军于叙属豆沙关断蛇坡。余英被包围时，以蛇、佘偕音，犯了忌讳，是天命所归，“应该死在此地，没有前进”，就束手被擒了。

余英被捕后，囚于叙州(今宜宾)狱中。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在狱中慷慨赋诗：“牡丹将放身先残，未饮黄龙酒不甘。若有同志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间，余英英勇就义于叙州，时年三十六岁。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放逐袁世凯

一九〇八年，作为新政偶像的光绪帝和保守派巨魁西太后一同死了，继承帝位的两岁婴儿溥仪是光绪帝的同父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载沣晋号为监国摄政王，做了清朝末一代的统治者。

袁从来没有象这天一样吓得魂不附体。他匆匆地逃到天津躲在他的亲戚盐商何颐臣的家里。这是他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因戊戌告密取得西太后的信任，但正是由于他的告密，害得光绪帝终身被软禁并且受到西太后的百般虐待。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绪帝还活着，这个仇能够不报吗?

光绪帝死得突然是历史上的一件疑案。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咽气之前把他毒死了的，也有人说是袁下手毒死的。两说均未证实。袁生平惯于用毒药杀人，所以当时发生了后一种揣测之词。

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兄弟，仍然可以替哥哥报仇，所以袁不能不感到生命的严重威胁。事实上，载沣的确想替哥哥报仇，而更为重要的是要除掉清政府的这个心腹之患。他不是不忍下手而是不敢下手，因为他知道袁

的势力和奥援已经布置到各方面。他知道张之洞是袁的一个政敌，曾与张密商杀袁的事，可是张跪在地上连连碰头说："国有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又曾密电征求北洋军某些统制的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回答，都请求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这样，载沣就不敢下袁的手了。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袁继续留在朝廷里。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十二月十一日)他以皇帝名义下诏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位。袁世凯着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其实，袁根本没有什么足疾。

袁不仅拥有军事上的潜势力，而且拥有外交上的奥援。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早已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关系。他在天津接到"回籍养疴"的诏旨后，还取得了朱尔典担保他生命安全的诺言，才敢回到北京向皇帝"谢恩辞行"。由此可见，他对个人安全布置得十分周到，即使载沣敢下他的手，也是办不到的。

袁离开北京的时候，把他以前用三十万元的代价买下来的府学胡同住宅赠与了段祺瑞。

载沣放逐袁的计划是和排斥汉族的计划分不开的，他首先要在军事上排斥汉族的力量，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的手里。他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的武力，用以控制各军，要用满族为各军高级军官以加强其统治力。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月)首先成立禁卫军，由他亲自统率。并由贵胄学堂培养满族的高级军事人才。一九〇九年，宣布统一全国军政，他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陆海军联合机构"军谘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一九一〇年，调铁良为江宁将军，凤山为荆州将军(不久又调凤山为广州将军)，以加强满族对地方的控制力。以荫昌为陆军部大臣。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一九一一年，军谘处扩大为军谘府(其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府大臣。宣布举行永平秋操。

根据载沣等的建军计划，全国第一步拟成立新军三十六镇，其高级将领均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旧军、绿营、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这是他加强军事统治并用以镇压全国人民的初步作法。

以上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力量比前加强了，而只是表现它的根基比前更脆弱。载沣把军权集中在两个人的手上，载洵管理海军，载涛管理陆军。这两个人都是前清末年全国闻名的贝勒，也都是载沣的亲兄弟。载洵是个使人难于想象到的大贪污分子。他曾经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车到了，他不肯下车，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车。关外虽是盛产貂皮的地方，但是一口气拿出三千套是办不到的，而钦差大臣不下车，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吊胆地担负很大的责任，因此他们派专人携带巨款到北京加紧采办，凑足了三千套貂皮献给载洵。这是当时流传全国的一件大丑事。载涛虽没有贪污的名气，但又是一个著名胆小的纨袴子弟。用这样两个人来主持军事，就可以知道作不出任何成绩来，而清政府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人材来。

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沣亲自统率，他把责任推在载涛的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实际负责人就是回国不久的士官毕业生良弼。开始良弼还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随后又被派为军谘府谘使。他在少年亲贵中是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除了良弼而外，其余主持军事的皇族，就都碌碌不足数了。

(摘自陶菊隐《北洋军阀史话》三联书店)

汤化龙入主谘议局

1909年，汤化龙学成归国。此时正值清末"立宪"闹剧粉墨登场之日，风云际会，如鱼得水，用资产阶级法政学说武装起来的汤化龙，感到自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能够施展所学来推进宪政。恰巧，时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需要一个懂得宪政的人为自己出谋划策，装潢门面。汤化龙既是留日学生，又是湖北省籍，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便上奏将汤调回湖北，充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负责湖北的宪政事宜。由此，汤化龙成为立宪派的主要领袖和国内立宪派的著名人物。

入主谘议局　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资产阶级立宪团体纷纷成立，讲求宪政成为一时风气。湖北也于1909年5月成立了宪政筹备会，挂名会长姚晋圻是一个素著声望的绅士，汤化龙当选为书记，实际上成为该会的灵魂。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宪政筹备会产生了较大影响，立宪派因而在湖北取得了相当有力的地位，并进而掌握了湖北省谘议局。

湖北谘议局的选举颇带戏剧性。首任议长吴长焘是个绅士，汤化龙当选为副议长。吴庆焘虽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但对于宪政这一新玩意毕竟比较陌生，而且也缺乏以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在谘议局第一届会议刚刚开过就要求辞职，副议长汤化龙也就当仁不让，接任议长。从这时开始到武昌起义爆发，大约两年多时间里，汤化龙一直活跃在清末宪政运动的政治舞台上，而湖北谘议局则是他的基本阵地。他不顾清政府把谘议局作为地方督抚谘询机关的硬性规定，根

据自己的愿望，把谘议局当成参政议政、分享政权的一步阶梯，在这块“民主”屏风下，编织着种种美妙的幻想和憧憬，倾吐着他实行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满腔热忱。

汤化龙主持了湖北谘议局的两次常会，共议决湖广督抚交议案11件，谘议局议员提议案42件和人民陈请建议案17件。这清楚地表明：一方面，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种改良产物，湖北谘议局无法摆脱官方的牵制，不能完全独立议事；另一方面，议员自动提交议案数量远远超过官府交议案，说明谘议局也并非完全遵命议事，反映了汤化龙等立宪派议员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请议案17件，说明谘议局多少也代表了一些民意。这些议案中的《禁止洋商在租界以外违约经商案》、《禁种洋烟案》，表现了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制与反抗；《整顿湖北吏治案》、《禁止缠足案》、《关于地方自治案》，则传出一些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其他大量的要求兴办民营工矿铁路，裁撤税卡，减少税额，兴革文教方面的议案，更是直接地表达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摘自《民国春秋》）

流　行　风

小说《宦海》

作者张春帆，主要内容：

《宦海》写的是“广东的官场，几十年来变易改革的事实”，先后写了臬台金翼（后为藩台）、军庄岩、章凤鸣、方少渊、宣尧阶、邹福山六位大员。故事从新任臬台翼禁赌开始。书中说广东虽是富庶之地，百姓开通，市面兴旺，但赌风、盗匪多。城里赌馆如林，人人嗜赌如命，赌输的剥衣再赌，赌到无可时便作起强盗来，赌馆就如同制造强盗的机器厂。赌馆虽然犯禁，却能按日按月送规矩银子。上至督抚，下及差役，没一个不吃足了贿赂，上上下下勾连成一气。金翼一到任，就决心禁赌，亲自带兵逮住最大的赌头王维，不防差役们在回衙途中，将王放走，换了一个卢孝廉。孝廉聚赌，大人更难容情，欲回明督抚两宪，归案奏办。那知制台推说感冒不予理、抚台却让他“通融些儿”，金翼硬是不买帐。王维逼急了，便用一万银子贿赂金少爷，让他写了收据并盖上藩台官印，然后拿着告至抚台，于是把金大人活活气死。禁赌失败，赌棍照样横行，官员照常吃贿。接下写其他几人的吏治，写他们和幕僚的龌龊、倾轧与草菅人命的残暴，也写乡绅的跋扈，外国领事的横行以及民族资本家想为中国人争口气的愿望，涉及警政、匪患、学校、堤工等多方面的问题。小说着重在暴露与谴责。缺少情节上的变化。自第三回后，铺展的面过宽，人物也不固定。整体结构显得十分松散，但由于地点不变，尚能连成一体。

小说《东京梦》

作者覆冰，主要内容：

该书主要记述留日学生众生相。其中有：士官生大闹公使馆，被参赞诬告为革命党。出国考察官员贪恋女色，游山玩水，看戏参观，出尽洋相。进修政法学生组织“政党养成会”，向各省当道上政见书，竭力拉拢到日本考察官员，籍此扩充势力，铺垫回国后的进身之路。师范生过着放荡生活。记录了日本改良新剧“不如归”的故事梗概及其在东京座戏院演出实况。还有留学生闹赌案、强奸案、和奸案和吸鸦片案等。书中的几首“东京杂事诗”，形象地描绘了游历官员、法政工商、陆军学士等的心理活动和生活表现。本书是第一部专写留日学生生活的小说，主要目的在于暴露这些学生和满清官员的丑态。书写得很一般，采用了晚清小说流行的写作手法—没有固定的主人公，为松散故事集成。事件叙述平平，一带而过，人物性格亦不够鲜明。但值得提出的是，全书大部依据真实材料写成。如记述了在话剧“不如归”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公演自己改编新戏“黑奴吁天录”的热烈场面，这是中国新剧史的开端。另外还有公使监督横暴，对陆军学堂毕业生抽刀相向，在振武学堂演出了一场“全武行”等。这些都是较珍贵的史科。

小说《惨女界》

作者吕侠人，主要内容：

书中叙述杭州的一个“奇女子”黄逸闯荡江湖、打抱不平的故事。黄逸自小立志“愿救天下受苦的女人”。全书以黄逸的游历足迹为线索，串连了一个个女子悲惨命运的故事：或是父亲为了自己吃喝嫖赌，把女儿卖与恶霸为妾；或是兄弟为了钱财，把妹妹骗嫁给恶人为妻；或是仆人倚仗主人势力欺人，如此等等。其中有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故事：某地一恶霸，人称十恶魔王，娶了何小姐为妻，

不久便把她折磨死。何小姐的妹妹何三姐是当地有名的美女，当地还有一个绝色的烈女尤劲保。十恶魔王垂涎于二人的美色，一边去勾引何三姐，一面又想霸占尤劲保。二人便将计就计。正当十恶魔王得意洋洋准备进入洞房时，被尤劲保杀死。为何小姐报了仇，也为当地除了一霸。小说描写了当时女子不幸与痛苦的生活，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天下人的苦处，没有再比女人更甚的。男人的苦都说得出的，女人的苦有些是说不出的。"对女子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书中还提倡一夫一妻制，表现了一定的男女平等的民主意识，有积极的意义。但书中人物众多，结构混乱，有的故事有头无尾，或人物出场忽隐忽现，没有任何交待。叙述手段又夹杂了侦探、武侠等各种手法，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

小说《上海游骖录》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

书中描写湖南乡村一个儒生辜望延，因说了一句反对军队骚扰百姓的话，被当做革命党拘捕，老家人设法让两个妓女灌醉守兵，放走了他，后老家人被杀，全村遭洗劫，他悲愤已极，逃到上海，想投革命党，遇到与革命党颇有来往的李若愚和四个所谓党人，但这些人都是色鬼、烟鬼、招摇撞骗无所不为，使他很是失望，这时故乡又来信，说要通缉他，他无可奈何，决定东走日本。作品通过写辜望延的经历，暴露晚清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但书中部分章节说教气味较浓，政论内容过多，影响了作为小说的整体艺术性。

小说《黄金世界》

作者碧荷馆主人，主要内容：

该书背景写光绪乙巳年间(1905)，清政府和外国通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故事开始发生在广东，有美殖民者勃来格，乘船来此招华工，去古巴开矿、垦荒，那时古巴为美属地。在汉奸、洋奴贝茀仁等大小工头的谋助下，并与赌馆主相互勾结，四处招摇撞骗，诱迫穷苦的中国人上船，飘洋过海去外国当劳工。当地船工朱阿金因好赌欠帐，其妻陈氏也被逼骗应招。在船上华工们受到残酷地虐待，方知上当，进退两难。勃来格查检人数时，乘机调戏陈氏，被拒绝，由此激起华工的反抗，勃来格强行镇压，将打死的华工尸首抛入大海，其中也有陈氏。阿金等华工被掠到古巴当矿工，过着非人的生活。陈氏原被打昏，海水将她冲到螺岛附近遇救，热诚的岛长朱怀祖、妻张氏协助陈氏一起到古巴寻夫不见，就以私费生名义到伦敦求学，又一同返国到广东查寻阿金下落。在船上，结识了在美华侨巨商夏建威，还有广州的富户何图南、何去非父子，并成为好朋友，船到新加坡，陈氏于新上船的乘客群中发现了丈夫。原来阿金不堪劳工之苦，从古巴潜逃至此作买卖，这是回国扫墓，生离死别多年的夫妻竟巧遇团圆，诸人同船回到广州。夏建威回国的目的是到上海了解和联络抵制美货、反对美对华禁约的活动，以改变华工、侨民在国外的卑劣处境，怀祖夫妇志愿同往。他们在上海奔走呼吁，但由于满清政府软弱无能，官吏贪赃枉法，商界营利自私，又与学界、女界主张不一，因而致使抵约运动没有成功。最后，朱怀祖邀请夏建威、何图南父子、陈氏夫妇等人回到螺岛进行开发，以实现他们"实业救国"的理想。《黄金世界》是指当时经济、文明较发达的美国，作者用此书名意在讽喻并揭露美国利用不平等条约迫害去美华工和居美华侨的罪恶，同时谴责满清政府丧权辱国，媚外虐民的腐败，歌颂以夏建威、朱怀祖等人为代表的有志之士为反对外侮，争取世界平等待我民族，振兴工业而奋斗的爱国精神。反映这样思想内容的作品，在晚清小说中还是鲜见的，然而本书表现了作者改良主义的立场，且失于结构松散，情节杂沓，全书虽以描写华工的苦难生活较为成功，可惜分量不重，却用大部分篇幅正面叙述国内抵约活动，又多是通过人物间的议论、说教，显得空泛、平淡。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评价此书说"《黄金世界》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都有若干的缺点。但这仍不愧为一部相当好的书。这里面有着非常真实的华工生活史。"

小说《黑籍冤魂》

作者彭养鸥，作品主要内容：

《黑籍冤魂》描写一个吸鸦片世家的故事。广东富户吴廉初以鸦片为健身补剂，吞吸成瘾，结果误食生烟过多而死。儿子吴慕慈继承父业，发明烟枪、烟灯、烟匣、烟扦并煎熬方法，以至贩卖鸦片，流毒害人，形成烟鬼满天下，到道光年间严厉禁烟之际，服生烟自杀。孙子吴春霖变本加利，串通洋商大贩鸦片，积得家资数十万，结果被林则徐捕获正法。第四代吴瑞庵也是个大烟鬼，借贩烟洋商势力开设土栈，被亲友邻里唾弃，遂动了弃商做官的念头，化了造孽钱捐了个道台，居然出任浙江的宁绍台道和温处道。自己嗜好过深，上行下效，衙役皂隶都是一榻烟霞，将衙门弄得像个烟馆。后来吴瑞庵懒于世务，罢官家居，终日吞云吐雾，女儿都成烟鬼，出嫁后夫妇两人都沉溺于嗜好。吴瑞庵三个儿子，两个吸毒，小儿子阿荫才七岁，也误食生烟致死。大儿子伯和因吸毒结识匪人，瘐死狱中；次子仲勋藉岳家之助到上海开设纱厂，终因嗜好过深而

破产，将亲生女儿典押给妓院，自己沦为乞丐，冻饿而死。作者通过叙述这个鸦片世家五代人的遭遇，揭示鸦片之害导致家破人亡，祸延子孙，意在警醒世人，坚决摒绝烟毒。

这部小说写来笔墨流畅，可读性较强，结构也紧凑，无一般谴责小说松散之弊。结尾以假想之阴曹地府严惩烟犯作结，指出"公堂悬禁，私室开灯者，皆官也；明奉禁令，暗索漏规者，皆吏役也；溺于厚利，违禁私开者，皆积年开烟肆者也"，这三种人罪重难赦，必须打入"阿皮地狱"。嘻笑怒骂，但不流于妄诞，讽刺现实的意味极强，可谓别开生面也。

历史档案

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

一九〇九年九月四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四日，北京。

大清国政府及大日本国政府，兹将在东三省地方彼此有所关涉五事定明，以免将来误会，俾两国邻交益加巩固，议订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政府如筑造新民屯至法库门铁路时，允与日本国政府先行商议。

第二款　中国政府认将大石桥至营口支路为南满洲铁路支路，俟南满洲铁路期满，一律交还中国，并允将该支路末端展至营口。

第三款　抚顺、烟台两处煤矿现经中、日两国政府和平商定如左：

甲、中国政府认日本国政府开采上开两处煤矿之权。

乙、日本政府尊重中国一切主权，并承允上开两处煤矿开采煤觔向中国政府应纳各项，惟该税率应按中国他处煤税最惠之例另行协定。

丙、中国政府承允上开两处煤矿开采煤觔出口外运时，其税率应按他处煤觔最惠之例征收。

丁、所有矿界及一切详细章程另行派员协定。

第四款　安奉铁路沿线及南满洲铁路干线矿务，除抚顺、烟台外，即应按照光绪三十三年，即明治四十年，东省督抚与日本国总领事议定大纲，由中、日两国人合办，所有细则届时仍由督抚与日本国总领事商定。

第五款　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一节，日本国政府允无异议；其应如何办法，可由该两国官宪及专门技师妥为商定。

为此两国大臣各奉本国政府合宜委任，缮备汉文、日本文各二本，即于此约内签名盖印，以昭信守。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

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四日立于北京

大清国钦命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

大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

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

一九〇九年六月六日，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北京。

此合同系宣统元年四月某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六月某号，在北京订立。其订立合同之人：一系钦命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大学士张，已奉旨允准订立合同，一系上海德华银行、伦敦汇丰银行会同巴黎东方汇理银行（此后名为银行等），兹议订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中国国家准银行等办五厘利息金镑借款，数目系英金五百五十万镑。此借款系宣统元年四月某某日订定，名为：中国国家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五厘利息借款。

第二款　此借款指明系为筹备资本，一为将比国现存前购合兴公司为中国国家所出虚价小票，计美金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及此票应付之利息，又每一百金圆加二圆半，全数赎回；一为建造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干线、鄂境川汉铁路干支两线官铁路之资本。其数目系粤汉路用二百五十万镑，川汉路用二百五十万镑，收回比国金圆小票用五十万镑。如收买比国票价不及五十万镑，所余之数全拨归粤汉借用。其粤汉路干线系由武昌至岳州，由岳州经长沙至郴州属境湖南南界接连广东省所造之粤汉路线止，共长约一千八百里，约合九百启罗迈当，此后条约均称：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其川汉铁路干线，系由宜昌经荆门州达襄阳，至广水或附近广水之处接连京汉干路止，支线，系由荆门州经沙市至汉阳止，此干、支两线共长约一千六百里，约合八百启罗迈当，此后条款均称：鄂境川汉铁路。其勘量路线均由督办大臣核定。其赎回比票办法应由中国国家将此情由传知持票人，由银行等以预备赎票之款照数交付。该票一经赎回，立即作废，呈交与中国国家。该金圆小票交还之后，由督办大臣行文外务部、邮传部暨鄂、湘、粤三省，将从前盛大臣与合

兴公司所订以粤汉铁路作抵押之语全行注销，俟注销后，仍函知银行等。

第三款　所备之资本，除第二款内载赎回金圆小票所需用款外，其余借款进项专为建造以上指明各铁路购办地段、车辆及一切应配物料，并经营行车，又于造路期内付还借款利息，均在其内。其建造工程，自实在开工之日起，估计约需四年造竣。其开工日期，于此合同画押后，不得延至六个月外。该银行等亦于尚未出售债票之前，预备五十一万镑，知会督办大臣，如有需用款项之时，或测量路线，或建造工程，或订购材料，听其或在欧洲或在中国提用，作为银行等代垫出售债票进款。此五十一万镑全数，或经实在提用之数，并其利息，均由出售债票进款尽先扣除。其利息常年不得过六厘。如督办大臣不需用此款，即可不提用，亦不给利息。

第四款　此借款利息按虚数常年五厘，由中国国家交付，或由借款进项，或由别款交付。嗣后先由各该铁路进款交付，次由中国国家以为合宜之别项进款交付。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数目、日期，于十四日前交付一次。

第五款　此借款除后开之第六款详载外，以二十五年为期，自订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一年起还本。每年应付还银数，由各该铁路进项，或由中国国家以为合宜之别项进款支付。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数目、日期，于十四日前交付银行等一次。

……（下略）

第十九款　本合同第二款内所言之铁路，将来或以为有益，或以为必需建造支路，由中国国家以中国款项自行修造，如须用外国资本，则先尽银行等商办。

第二十款　历年除付借款本利外，铁路总局将本年铁路净进款盈余足敷交付来年到期借款利息之数，在汉口或在上海存放银行等。所存放之款，按照市面情形，给发最优之利息。

第二十一款　所有经理此项借款之费用，如分给外国各行经纪费、分售费、分售经用电报、告白、邮票、刊印、招贴、债票各费、印花税、律师酬费等一切用项，概由承办银行在所得折扣内认出。所有此次中国经手官员，言明不取丝毫费用。

第二十二款　德华、汇丰、汇理银行等办此借款，应各分三分之一，彼此不得牵连。

第二十三款　德华、汇丰、汇理银行等可将本合同应有之权利及责任，全行或分别交与他德国公司，或他英国公司，或他法国公司接办，或再交代理人代办。其接办、代办，应商请督办大臣核准。

第二十四款　本合同系遵宣统元年　月　日上论签谕，已由外务部用公文照会英、德、法驻北京出使大臣。

第二十五款　本合同缮写华、英文各七分，中国国家存四分，银行等存三分。如有翻译文字可疑之处，以英文为准。

此合同条款并另函现经派议借款委员与银行代表人商妥，禀奉督办大臣允准，由派议借款委员与银行代表人先将此合同暂行签押，俟督办大臣奏奉谕旨交度支部核准后，再签立正合同。如度支部有驳改之处，即再另商办法，合预声明。

钦命督办粤汉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大学士张委派湖北提学使高凌霨，湖北施鹤道曾广镕。

汇丰银行代表人熙礼尔

东方汇理银行代表人贾思纳

德华银行代表人柯达士

安徽铜陵县矿改定合同章程

一九〇八年六月五日，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

安徽商务总局前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间与英人凯约翰代伦华公司议订勘验矿务合同，指明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等六处准凯约翰派人前往勘验。现经勘明，愿将歙县、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等五处删除，专办铜陵县属铜官山一处，彼此改订开办合同，开列于后：

一、此次所开铜官山之矿，名为安裕公司，该公司公举凯约翰为总董，经理其事。

二、合同议订后，如奉旨批准，即按第五条知照安徽巡抚，准凯约翰于铜官山之矿派人前往开办。

三、安裕公司前经先纠资本英金六千镑，经已用去。现再行纠集资本英金六千镑，此资本随后酌加，以不出七百万两为额，约合英金一百万镑，照开矿应需银两之数而定。所纠之股，俟议定每股若干，登列报章，华、洋兼收。公司应设华总办一员，英总办一员，互相稽查账目。凡与中国官、绅、商、民交涉，归华总办管理。凡开矿工程、银钱进出，归英总办管理。厂内除管理机器或须聘用洋人外，其一切工作执事人等均应多用华人，该公司从优给予工价。矿厂相近，应设华分局，派华人勘租地亩，随时稽查完纳税饷等事。各员薪水开支均由该公司按月支送。

四、开矿地段，应于未动工以前，详备图说，将开洞、盖厂、挖沟处所，逐一标注明白，知照商务总局，派员会同地方官，查明果无窒碍，即向民间议购或租，俟有成说，该公司即备款交商务总局购、租承受，或交地方官核实发给，不得私相接受。如地面上有房屋、树木、水井、池、墙，凡以人工成本造成产业，无论拆毁留存，均应于地价外，照市价酌加。其他地段画定界址，以足敷造厂、挖洞各项矿工所需为限，不得任意多占。该公司厂洞外之余地未经租购者，与公司无涉，仍由原业主造屋、种植，作各项正用。惟除已开在先之矿外，不准再在界址内开采矿质。

五、此合同自奏准签字后，即由外务部知照商部，发给开矿执照，并知照安徽巡抚，按照第三、第四两条，派员会同办理一切。凯约翰代伦华公司，接到准办执照，即将报效银两，限一礼拜内，照数交付现银。此报效银两，照目下已纠集之资本英金一万二千镑百分之一计算。俟此本随后增加，则随时仍按所加之数呈缴报效银百分之一。倘资本陆续增添过一百万镑，报效之款亦应陆续添缴。其开办限期，自奏准签字之日起，限十二个月。如逾期不开，即将合同作废，报效银两亦不得索还。

六、该处矿质一经出洞，按卖价照以下抽税：煤觔、铁、锑砂、白矾、硼砂等类，值百抽五；煤油、硫磺、朱砂暨铜、铅、锡等类，值百抽十；金、银、白铅、水银等类，值百抽十五；钻石、水晶等类，值百抽二十五，均作为落地税。其余出口销售，经过洋关、应遵章纳税，不在此例。至落地税一项，如将来改订新章有增减之处，他处公司均照新章完纳，该公司亦一律照办。

七、倘须筑造铁路以便转运矿产，应准造至最近水口为止。所造之铁路，不准载客、运货。

八、附近开矿处应设矿务学堂，一切薪水、经费均由公司筹给。

九、凡开办所需机器、材料等件，除运自外洋照章归海关收税外，内地厘金概不重徵。如在内地采买材料，经过关卡，停船听候查验。如查明实系运往开矿处所，准给执照，免厘放行。如有夹带别货走漏，一经查出，照章罚办。

十、该公司开办之后，每年除支销各项费用并纳完租税外，所获净利，照公司成本实数，先提出股利一成，即值百抽十。倘除外仍有余利，再以二成五报效中国国家，解交安徽藩库。

十一、所指矿地界内，如有华民已开之矿，该业主自愿或租或卖，请将已用成本换给股票，作为股本，各听其便，惟须由商务总局三面商允，不得私相授受，该公司亦不得勉强侵夺。至定界之后敢有在界内私挖者，应即由地方官禁止。所有雇工、夫役人等，倘有损伤致命，由该公司给资，从优抚恤。

十二、该公司所开矿场，地方官应保护。如有需兵力弹压者，中国只代就地招募华兵，其饷械各费均由该公司自认，不得藉端自行请本国兵或请别国兵挟制。

十三、该矿以六十年为限，限满之后，即将所有矿厂、房屋、基地、机器、料件一切，全行报效中国，交商务总局管理。如六十年期满时，彼此情愿展限，则可展限，惟所展之限，不得逾二十五年之久。至开办以后，每年进出帐目，须于年终缮写四季清册四分，先经华、英总办核明画押一分，送交商务总局三分，由安徽巡抚分咨商、外、户三部备核。中国国家祇按所出矿产征收租税，该公司如有亏折，与中国国家及商务总局无涉。

十四、该矿所需地亩，如系民地，则照市值购买，官地则备价承租。惟民地虽购买，过户、执业，仍须照中国所定田则，完纳钱粮。

十五、公司所应用地亩，或租或购，自愿公平给价，不得强占抑勒，地主亦不得抬价居奇，并不准以有碍风水，藉词挠阻。如实有关碍，该公司应和平妥商，优给迁移资费，或设法绕越，以期融洽，不得勉强。如该地主不愿领价，愿入股分，即按照原值，给予股票为凭。

十六、如将来安徽巡抚在皖省给予别商采矿利益，所订合同不得优于此合同。至定限交款、开办日期，已于第五条内言明，一经逾限，即作废纸无用。

十七、此合同订立，系遵照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十七号，外部奏奉旨批准矿务新章酌定。倘有未尽事宜合同内未及备载者，亦均遵此项奏定矿务章程办理。

十八、该公司承办矿务，总期于居民利便，愿报效现银一万元，交地方官作为本地善举、义举之用，以便惬洽舆情，并遵照凯爵约翰代伦华公司与安徽商务总局于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三十一号签订合同，呈缴勘矿展限报效银四万元。

十九、该公司专办铜官山一处矿产，其地下矿路，四面边线各二十华里，应于图内画定界线，附此合同存案。无论界内开挖洞若干处，所用矿路总不得逾此图画定界线之外，其地面上余地仍照第四条准原业主作别项正用。惟原业主及他人均不得在界内开采别矿，致碍该公司矿利。倘该公司开挖矿路，损伤地面，以致坍塌房屋，压毙人口、牲畜，该公司均应从优偿恤。

二十、该公司在该矿所获利益，愿以除去股息并报效中国国家二成五外之余利，每年酌助该处学堂积榖经费，交地方官转给，以聊情谊。但此项经费，须视余利之多寡，由公司酌定，地方官绅不得勉强。

二十一、该公司既在中国境内开矿，如有华人犯事，应交地方官照中国律办理，该公司毋得干预。倘有与外国人交涉事，照约章办理。

二十二、此合同自奏准签字后，发给执照，即作为批准开办之据。所有光绪二十八年该公司与安徽商务总局议订勘验合同并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三十一号之续合同，一并即行作废。

二十三、此项合同，分缮华、英文各五分，一存安徽巡抚衙门，一交该公司收执，三分存商、外、户部衙门备案。

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年六月五号

（摘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致吴稚晖函

孙中山

（一九〇九年十月下旬）

吴先生鉴：

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然此适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气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则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于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无此疑惑，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无几，无甚可对人报销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则零星合集数万金，当为千数百人之所出也，弟此处未有详细数目。然各款收入与支出，弟在安南时多自经手，弟离安南后则汉民经手。而受款分给各处用者，则河内之五家字号经手，以用于钦廉、广西、云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则由香港同志经手；日本办械、租船之款，则由日本殷实商人经手：皆有数目列明。除所入各款，尚支长万余元(即河内之欠债)。弟所开各处之入款是大约之数，因不记详细，所报皆过多面〔而〕从无报少也。收款多由精卫，支款则我与汉民也。此事弄清，则可破疑惑矣。除三人经手之外，知各款之来路去路者尚有多数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张骥先亦其一也。请先生为长文一编，加以公道之评判，则各地新开通之人心自然释疑，而弟从事于运动乃有成效也。

所言事实皆当作第三者之言，则较弟自言者更为有力也。留此以作面谈，今晚有暇请到寓一叙为望。

弟文字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

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故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助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桓〔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桓〔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买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怆悴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入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陆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所共知共

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以东京同志以官费折作按贷钱，责我不代筹，此诚我罪矣。然家兄亦因以家产作按而致今日之破产，亦我罪也。河内五家作保之万余元至今犹未还，亦同为我之罪也。然此时则无知之何之际，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捡〔敛〕钱亦为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捡〔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据胡编《总理全集》第四集影印原函）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邮传部注销京汉铁路借款行车合同，并自比国收回铁路管理权。

清廷颁布调查户口章程十一章四十条，普查全国人口。

1月2日　清廷诏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现患足疾（袁当时并无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命其"回籍养疴"。

湖南会党首领杨弦德在湘、黔、两广拥有会员二万余人，拟在广西柳州起事。事泄被捕。

1月6日　邮传部奏，沪宁铁路全路工程完竣。

1月11日　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按：将国家一切收入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揽取各督抚财权）。

1月18日　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迅即筹办。

1月31日　奉天人民为反对日本修筑安（东）奉（天）铁路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1月　孙武、焦达峰在湖北武昌建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组织中华山，统一行动。同年焦达峰在湖南长沙建立共进会组织，邓文翚在江西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

孙中山往来于新加坡及南洋各埠之间，积极筹募经费，准备起义。

孙中山在新加坡接见同盟会西贡分会派来之代表陆兰清，就旅越华侨开展革命活动问题给予指示。陆兰清返西贡后，当地革命党人即大力联络会党。洪门人士纷纷加入同盟会，革命力量得到发展。

2月1日　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两江总督端方代表中国莅会（2月26日闭幕）。

2月5日　各省谘议局举行初选。

2月6日　清廷诏禁置买奴婢。

2月17日　清廷命各省于本年内成立谘议局，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依限开办资政院。

3月1日　同盟会员佘竟成、熊克武、秦柄利用会党关系，联络哥老会，在四川广安发动起义，为清军所败，党人走散。

3月5日　杭州拘捕革命党人关玉琪等。

3月6日　清廷诏谕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

3月14日　清廷准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等奏拟禁烟办法十条。

3月19日　广东铁路公司股东董事大会反对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派设驻粤分局总办，坚持商办。

3月24日　翰林院侍读吴士鉴进西洋通史讲义。

4月　从东京回国之孙武、焦达峰等，在汉口租界设立共进会总机关，积极从事联络长江流域会党等活动。

4月8日　清廷设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宗室外藩王公满汉世爵，派贝勒毓朗为总理。

4月11日　上海绅民会议反对英人推广租界（3月22日租界纳税外人议决推广租界）。

4月19日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陈东三省危迫情形，主张开放东三省。

4月30日　安徽路矿会全体大会，力争铜官山矿案。

5月1日　英兵舰三艘到九江。

5月4日　命招商局改归邮传部管辖。

5月7日　上海裕慎丝厂女工数百人拥至公堂，要求向资方追还所欠工资。

5月9日　清廷以东三省地方紧要，应办要政甚多，命军机处及外务、度支、陆军、邮传各部随时会商总督锡良通筹，妥定办法。

5月上旬　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建议自新加坡迁至槟榔屿。不久胡汉民赴香港，支部事务由邓泽如等主持。

5月15日　学部奏准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 实

科。

学部奏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初等小学为三种：一为五年毕业之完全科，二为四年毕业之简易科，三为三年毕业之简易科。

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正式发刊。发刊前十天，在各报登载广告，其第一条即说明“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

5月17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等，告以即将赴欧，此行任务：“以财政、外交为两江大注意问题”。

5月19日　孙中山自新加坡启程赴欧洲。行前，将国内革命运动与同盟会一切事务，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

6月13日　江苏开谘议局研究会，张謇为会长。

6月20日　孙中山抵法国马赛，旋赴巴黎活动筹款。

6月23日　清廷以陕甘总督升允奏阻立宪开缺。

6月28日　因直隶总督杨士骧卒，清廷命两江总督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到任以前那桐署理；命粤督张人骏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命鲁抚袁树勋为两广总督。

6月30日　直隶临榆、昌黎、抚宁等县盐价腾贵，激起民变。是日，三县乡民鸣锣聚集数千人或数百人等十余起，将三县盐店同时抢空。

7月7日　清廷予故革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开复原官。

7月10日　外务部、学部奏，以美国“减收”庚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本年派四十七人)，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

7月14日　江西崇仁乡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捣毁统计处，夺回调查册籍。江西各州县：南昌、丰城、高安、泸溪、都昌、安义、临川、临江、新昌、石城、安福、乐平、新淦等均先后有相同事件发生。

7月15日　清廷诏谕：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师，未亲政以前，暂由摄政王代理，并先行专设军谘处，以贝勒毓朗管理军谘处事务。

清廷命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

浙江省德清县乡民聚众进城告荒，捣毁吞没历年积谷之绅董多家住宅(长兴归安亦发生同类事件)。

7月22日　孙中山由巴黎抵比国布鲁塞尔。

7月27日　日人向延吉添兵运械，进行侵略活动。

7月31日　学部奏订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

甘肃安定灾民要求赈恤，聚众围困陕甘总督升允等。

8月3日　上海《民呼报》因揭载陕甘吏治腐败，创办人于右任、主笔陈非卿为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拘捕。

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电奏：日人向延吉添兵运械势将破坏和平，请严与日使交涉。

8月6日　北京、天津及东三省等处为安奉铁路交涉，开始抵制日货。

上海勤昌丝厂女工百余人，反对延长工时罢工。

8月7日　孙中山抵伦敦(活动借款)。

8月9日　外务部电出使各大臣将安奉铁路交涉实情布告各国。

8月14日　《民呼报》被迫自行停刊，计时共九十二天。

8月21日　江苏丹阳以征收粮米、抑勒洋价，激起民变。乡民三千余人冲入县城，捣毁县署(坚持至8月29日)。

8月22日　日本侵略军向吉林延吉清军挑衅，双方互有死伤。

8月23日　清廷颁行资政院章程五十三条。

8月　同盟会员黄伯群在广东化州高等小学堂组织学生革命团体拜兰团。同年8月以拜兰团为核心建立同盟会组织。

湖南谭延闿等为拒借外债、自办铁路，成立“湘省集股会”。

直隶迁安以官绅勒派捐款，发生民变，聚众数万。

9月6日　吉林绅民电请外务部勿允日人修筑吉会铁路，以救危亡。

9月9日　学部奏建京师图书馆，并给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

9月15日　清廷以登载交涉机密，有碍交涉，命民政部将《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馆即行封禁。

9月16日　江西宜春乡民因反对抽学捐，聚众千余人围攻府城，死伤多人。9月23日始散。

9月25日　邮传部奏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全路告成，请优奖总办道员詹天佑、工程司颜德庆等。10月2日，行正式开车礼。

9月28日　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即清华大学前身)。

直隶遵化、丰润因反抗抽收席捐，合三十二庄四千余人起事，死伤多人，捣毁学堂警局，围困丰润县署。

9月　陶成章、章炳麟等在南洋和日本对孙中山进行攻击。陶成章等自1908年在南洋募款受到同盟会阻止后，即用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陶成章等又不满于孙中山侧重华南武装斗争，主张“中央革命”，即在江浙或华北地区起义。

10月3日　于右任改《民呼报》为《民吁报》，继续在上海发刊。

10月4日　清军机大臣张之洞卒。

10月7日　清廷命将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事宜均归邮传部接办(按：此路前由张之洞督办，张之洞死，改归邮传部接办)。

10月8日　湖南铁路公司电邮传部，反对湘路借款。

10月12日　游美学务处选派之第一批留学生梅贻琦、秉志等五十名放洋。

10月13日　清廷告诫各省议员"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侵越"。又谕各省督抚"尤应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实际是限制谘议局，视谘议局为督抚之隶属机关)。

10月14日　各省谘议局开第一届会议。

10月16日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自上海启程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事务。

10月26日　清廷颁布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议员共二百人，钦定一百人，民选一百人。

前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死(伊藤来哈准备与俄国财政大臣商谈满洲铁路问题)。

10月30日　孙中山自伦敦赴美国。于11月8日抵纽约。

10月　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黄泥涌道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负责华南各省军事和党务活动。南方支部成立后，即着手准备在广州起义，计划以新军为主力，由倪映典负责发动；另派朱执信等分头运动防营、巡警及广州邻近之会党、绿林等。

11月19日　《民吁报》因日本驻沪领事之胁迫，判令永久停刊。计前后出版仅四十八天(其时，日本侵略朝鲜及我东三省益亟，《民吁报》对此报道多用惊心怵目之标题，并发表评论，以引起国人注意。驻沪领事以此要求上海地方当局惩究)。

11月21日　保定、北京各学堂学生胡荣铭(鄂公)熊得山等组织"共和会"，以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民国，融合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为宗旨。

11月23日　清廷以直隶总督端方"恣意任性，不知大体"革职，调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1月27日　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正式大会，到会者十六省，决定组织代表团进京请愿，要求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召开国会和组织内阁(11月29日推直隶代表孙洪伊、王法勤等为进京请愿代表)。

11月28日　《神京白话报》因刊载宫廷新闻被封。

12月8日　直隶抚宁县盐局售盐掺砂短秤，激起乡民三四千人反抗，长城外有万人响应，创立"连庄会"。官军武力镇压，死伤百余人。

12月10日　奉天前路统领冯麟阁六、七千人哗变。

12月13日　同盟会员佘竟成、秦柄、程德藩等率众在四川嘉定县童家场，夺团练枪支起义，原拟攻县城，为清军所阻，转至屏山为清军包围，失败。佘竟成牺牲。是役前后牺牲者二百余人。

12月16日　孙中山自纽约抵波士顿，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和筹款，至21日离开波士顿。

12月19日　民政部奏订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九十条及选举章程七十八条。

12月21日　达赖喇嘛抵拉萨。

12月24日　湖北铁路协会会长刘心源等自鄂进京，力争废止粤汉铁路借款草约。

孙中山返抵纽约。次日，召集热心革命侨商集议，成立同盟会纽约分会。

12月28日　候补四品京堂劳乃宣奏请推行官话字母。

是年　汉口阜昌、顺丰、兴泰等砖茶厂九千余工人，反对工头压迫和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同盟会本部派杜潜等回豫，建立河南分会于开封，陆续入会者二百余人，并于各县发展组织。1911年在开封创办《国是日报》进行革命宣传。

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后，为加强活动，在广州建立分会，由高剑父、徐忠汉负责。会员姚雨平、赵声、倪映典分别在新军、巡防营中进行宣传活动与发展组织，先后加盟者二千余人。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会务由邹鲁负责。

同盟会员钱鼎、党自新、张伯英等在陕西西安新军中组织武学研究社，以研究军事为名，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

同盟会员郭希仁、王铭丹在西安组织声铎社。

柏筱余、高文明等于陕西三原创立勤公社为陕西同盟会外围组织，后相继在富平、蒲城、醴泉、乾州、鄠县、兴平、武功、泾阳、耀县、白水等县成立分会，会员逾千。

同盟会员陈子臣、林格兰等在海南岛海口建立同盟会组织，参加者多为青年学生和商人。

外　交

1月4日　中法订立中越交界禁匪章程(防制革命党)。

2月6日　日驻京公使伊集院向外务部提出东三省六悬案：一、新法铁路，二、大营支路，三、京奉路车站，四、抚顺、烟台煤矿，五、安奉路沿线矿务，六、所谓"间岛"问题，要求解决。

3月18日　外务部复2月6日日使所提东三省六悬案要求。

3月19日　两广总督张人骏要求日领事饬日人西泽吉次自东沙岛撤退。

4月23日　邮传部与巴黎银行公司订立正太铁路垫款合同，款额一百五十万法郎。

6月6日　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代表订立

湘、鄂境内粤汉铁路与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五百五十万镑。

6 月 7 日　美国要求参加英、法、德三国对华铁路（湖广路）借款。

8 月 4 日　外务部为延吉日人调兵运械，向日使抗议，并电胡惟德要求日外部撤回日兵。

8 月 6 日　日使伊集院照会外务部，声称安奉铁路清政府借词延宕，日政府决定自行改筑线路。

8 月 18 日　邮传部与南满铁道会社订立吉长新奉铁路借款细目合同。

日本设立东亚兴业会社于东京，作为对华投资机构。

8 月 19 日　中日关于改建安奉铁路事宜，交涉经年，是日订立"中日安奉铁路节略"五条，承认日本所勘查之安奉铁路新路线。

9 月 4 日　中日订立《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新法铁路允与日本先行商议；大营支路作为南满铁路支路；允日本开采抚顺、烟台煤矿；允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根；中日合办安奉铁路及南满铁路沿线矿务。

中日订立"间岛协约"（即《图门江中朝界务条款》）。

10 月 2 日　沈阳美国领事司戴德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订立锦（锦州）瑷（瑷珲）铁路借款草约，后因日俄两国反对，此项借款未能实现。

10 月 5 日　两广总督袁树勋与日领事订立东沙岛协定，日本承认该岛为中国领土。

11 月 6 日　美国务卿诺克斯令伦敦美使向英外部致备忘录，建议满洲铁路中立（11 月 9 日美使向英外部提出）。

11 月 25 日　英外相格雷复美国备忘录，赞成满洲铁路中立原则。惟英国不愿参与，并建议日本加入锦州瑷珲铁路建筑。

12 月 31 日　中德签订"山东收回德商五矿合同"。

经　济

5 月 30 日　商办江苏铁路沪嘉线告成，是日行开车礼。

6 月 3 日　广东商办新宁铁路全线建成。

8 月 13 日　商办浙江铁路杭嘉线告成。

8 月 26 日　湘路株长线开工。

10 月 2 日　京张铁路建成通车。京张铁路是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主持修建者为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1905 年，清政府决定自己修京张铁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嘲笑中国说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人还没有诞生。詹天佑决心用事实粉碎这些无耻谰言。根据当时筑路经费和限度，在实际勘测的基础上，他选定了从丰台、经西直门、清河、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到张家口的路线，全长 380 华里。其中南口至八达岭的关沟地带，地势险峻，坡度很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差为 180 丈，而且是悬崖峭壁，工程十分艰巨，为全线关键地段。居庸关、八达岭两个隧道难度尤其大，前者长 400 米，后者长 1145 米。1909 年 9 月 24 日，京张铁路全线完工，工期 4 年，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年。京张铁路的建成是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光辉的一页。

11 月 5 日　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及谘议局议员等组织"湖北商办铁路协会"。

本年　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成立。由浙江官钱局改组而成，初名"浙江银行"，官商合办，资本总额 100 万两。总行设在杭州，分行设在上海。

本年　官商合办的机器毛纺织厂—清河制呢厂开工。1907 年清政府陆军部奏准在北京清河镇筹设。初名"溥利呢革公司"，设备规模在当时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3 年停产。1916 年北洋政府将之改为陆军织呢厂，1924 年停工。

文　教

1 月　广东医界人士陈子光、梁培基、郑豪等人，发起组织光华医社以及光华医校、医院，取"光我华夏"之意，以"争国权"、"争医权"及"争医学教育权"，得到各地同行响应。

5 月　北京铁道管理学校成立。它是由清政府邮传部设立的，前身为铁道管理传习所。1910 年，学校增设邮电班，合称交通传习所。1916 年 12 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将该校分为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1921 年改为交通大学北京分校。1923 年改为北京交通大学。1928 年改为北平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学院，1929 年又改为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31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先迁湖南湘潭。1928 年冬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合并继迁贵州平越（今福泉），改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4 年冬迁四川璧山。1946 年迁回北平原址，改称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设运输、业务、经济、材料四系。1949 年 6 月，该校与唐山工学院和华北交通大学合并为中国交通大学。1950 年 9 月改名北方交通大学。1952 年又独立为北京铁道学院。1970 年改称北方交通大学。

5 月　《民呼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由于右任创办。以范光启（鸿仙）、戴天仇、景耀月任主笔。该报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揭露其媚外卖国政策，指出其实行预备立宪实为骗局，并报道全国各地的灾荒情况。由于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发表的作品言论甚为激烈。引起读者注

目，行销很广，影响较大。因而，出版仅93天，即被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其封闭。

9月1日 《香港日报》在香港创刊。它是日本人在香港出版的日文报纸。日刊。由松岛宗卫创办。至1945年7月停刊。历时36年。

10月 清政府的游美学务处北京西郊清华园旧址建肄业馆，建成后改名清华学校。

10月《民吁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于右任、谈善吾继《民呼日报》被封闭后创办的又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以当时"民不能呼而至于吁"而得名。范光启为主笔，主要撰稿人有于右任、景耀月等。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兼而抨击清政府的媚外卖国，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嫉视，日本驻沪总领事照会上海苏淞太道，要求禁止。是年底，该报被封闭，发行仅48天。

11月13日 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成立的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团体，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旭)等发起。为显示该社反对清政府统治的思想，取名为"南社"。以所创作的诗文，进行民主爱国思想的宣传，反对异族统治。建立之初，有会员17人，后扩展至千余人。辛亥革命后，部分成员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23年，因内部分化而停止活动。社员所作诗文，辑为《南社》，共22集。

12月 美教会"圣公会"于武昌设立文华大学(1924年与武昌博文书院、汉口博学书院合并，改称华中大学)。

本年 近代中国历史最长的中文日报—《申报》，经正式签约，主权移归中国人。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英商安纳斯脱·美查等集资创办。初为双日刊，旋改为日刊，1906年席子佩购进该报全部产业，1909年正式签约。1911年8月24日改革编辑方针，创副刊《自由谈》。1913年史量才接办，聘陈冷(景韩)任主笔，厉行改革，取重新闻轻言论的编辑方针，标榜不偏不倚。1919年8月31日创办《申报星期增刊》，加强国际时事报道。1920年创办《常识》增刊，介绍新知识。"九·一八"事变后，政治上倾向进步。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后立场复趋保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伪控制。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成为CC系的报纸。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25600号。

军 事

2月19日 清廷重整海军。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筹划，庆亲王亦劻总核确查。

5月9日 派陆军协都统吴禄贞充吉林边务督办，以两协之兵，归其节制。

9月28日 云南讲武堂成立，胡景伊为总办，李根源为监督，罗佩金、李烈钧、唐继尧、刘存厚、顾品珍、方声涛等先后任教官。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0年

导　言

在经过了立宪派人千呼万唤和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起义后，清廷显贵们终于不得不走上了立宪的舞台，然而，那小心谨慎的一步步挪动，终于不能令广大立宪人士满意，在一批诚心诚意维护大清朝的人们策划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召开国会请愿。然而，无数的请求只是石沉大海，清政府权力收回来还来不及，哪里有工夫去搞什么“宪政”！

同盟会几次运动会党起义失败，使一部分会员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指挥，战斗力不强，于是他们转而以运动新军为主，争取掌握新式武器，有作战能力的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骨干力量。在赵声和朱执信的积极推动下，由倪映典负责指挥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革命党人又开始了新的进攻。

面对武装起义的屡次失败，年轻的会员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失望和怒火，暗杀活动又随之而现。谋刺摄政王成了一些革命党人的大病，为了鼓舞斗志，汪精卫、黄复生、喻天纪等潜入北京，准备刺巨酋以震天下，可是甫一出手即为所擒，但也震惊了天下。

在清廷的统治下，广大人民已是没有更多的活路了，在接踵而至的灾荒之后，还有无尽的交粮交租，可是自己的温饱尚无法解决，又何以面对催粮催税！在米价飞涨的时候，全国饥民终于酿成大规模抢米风潮，尤以湖南长沙这鱼米之乡最为严重。

帝国主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压榨，而且谁都想大捞一把，四国银行团在这种背景下问世。以清政府整理币制为契机，四国银行团又开始了对中国金融的控制。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立宪运动
- ●广州新军起义
- ●谋刺摄政王
- ●湖南抢米风潮
- ●四国银行团对金融的控制

立宪运动

背景介绍

立宪派人千呼万唤，清王朝的亲贵大臣们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登上了立宪丑剧的舞台。为了催促统治集团加速并切实推行宪政，立宪派发动了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的请愿运动。

立宪派是19世纪维新派的继续和发展。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分化为上层和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官绅，成为立宪派的社会基础。

1907年秋，湖南绅士熊范舆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随后，雷光宇以全湘士民的名义上书，预备立宪公会在京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专折上奏，竭力陈述开国会的必要。一时，在野在朝的官绅们就纷纷趋时应景，窥伺风向，大谈其国会问题，立宪派人多主张速开，要求两三年内召开国会。另一些人则借此逢迎亲贵大臣们搪塞拖沓的手法，主张缓开、或反对召开。《东方杂志》的《宪政篇》是如此评述的："其中集议各员，敢于主张五、六年以后者，大不理于清议，尤以闽人高种独主二十年，为国民之大辱。最奇者则为考察宪政大臣吏部侍郎于式枚，一再阻挠，痛诋各国立宪，并有宪法当求之中国等语。国民丑之，多欲讼言其辜恩溺职安危利灾状。"

1908年7月，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等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称："窃谓念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若限期太远，则中间之变态百出，万一为时势所阻，未能践行，是转因慎重而致机轭……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

政闻社总务员马良，也致电宪政编查馆，"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

在此前后，湖南绅、商、学界代表到京，催问都察院何以不将雷光宇的请愿书递上去。没多久，湖南经二次请愿代表又到北京，河南、江苏、安徽的请愿代表联翩而至，把一封一封的请愿书投进了都察院。

鉴于全国各省立宪派人都动了起来，川流不息地要求加快立宪步伐；内外臣僚也以"人心浮动，匪党蔓延"，应速定消弭大计入奏，清王朝于1908年8月27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

颁布了九年预备的期限后，朝廷上的王公大臣即着手封闭请愿的门户。他们先朝着管辖最近的旗人下手，以"浮嚣无序"的罪名，解散吉林旗人松毓等设立的"自治会"，查禁其《公民报》。这是用"杀鸡给猴看"的伎俩，告诫那些立宪派人，别再讨没趣。

立宪派人对那九年漫长的期限是极不满意的，但因为接着就是光绪帝载湉和西太后那拉氏两日内先后死去，朝廷发生重大变故，不能不把请愿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材料：

- ·第一、二次国会请愿
- ·第三次国会请愿

材料一　第一、二次国会请愿

国会请愿首由江苏谘议局发难。它派人或致函各省谘议局，请推派代表齐集上海，洽商进京请愿的问题。1909年11月中，先后有苏、直（隶）、奉（天）、吉、黑、晋、鲁、豫、鄂、湘、赣、皖、浙、闽、粤、桂等十六省谘议局代表55人到达上海，聚于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推福建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连日磋商请愿有关 事项，决定组成33人的代表团，举方还（苏）、罗杰（湘）、刘兴甲（奉）、刘崇佑（闽）四人为干事，决议即时进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

在此前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常寄函上海"，指使他的密友、原政闻社常务员徐佛苏"注意联络资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1909年冬，徐佛苏到北京。梁启超听到消息，"欣慰无极"，连续不断地写信给徐。"约计三日必有一通"，策

划参与请愿活动的谋略。这样，梁启超同在野的立宪派分子、在朝的达官贵人更扩大了联系。1910年春，梁又创办《国风报》(旬刊)，同国内国会请愿运动相呼应。

1910年1月16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六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由直隶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并遍谒亲贵大臣，进行游说。请愿书无非仍按抵制革命的老谱，陈述立宪预备期限太长，“若更徘徊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设使雄猜者得遂其进步，且恐和平者亦易其方针，外交必更颠危，民怨必更剧烈。万一有愤车之群蠢，得无惧覆辙之蹈前”。请愿书强调，为了避免倾覆的危机，速开国会，才是根本大计。要求“期以一年之 内，召集国会。”

请愿书递上十多天后，发下“谕旨”，说了一句“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之后，即断然拒绝了代表团的请求，坚持照原定九年期限，循次筹备。

“谕旨”发下后，代表团连续商议发动第二次请愿的有关事项：

(一)扩大请愿运动的声势，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联合绅、商、学各界，“凡赞成请愿者，均得入会为会员”，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各省绅商学界各团体及一般人民，凡加入同志会者，期以明年(宣统二年)四月间，一面上书督抚，请其代奏，一面各举代表来京”。

(二)依在沪的决议，草拟谘议局联合会章程，定每年六月召开会议。

(三)设报馆刊行日报(8月，创办《国民公报》(推徐佛苏主编)。

同时，有民政部六品警官黎宗岳等在京师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于1910年2月4日宣布成立。嗣即致书各省谘议局，“略言国会之迟早，关系国家之存亡。国家之存，关系国民之生死。”希望各省谘议局联合各地方自治宪政等会，设立“国会期成分会”，举代表入京请愿。为此，“会中人至有割臂缮写血书者”。此外，各省学会、商会与京中国会请愿会遥相应和，或即开会，或拟上书，或任运动同志，或拟公举代表以接续请求者，不一而足。”

1910年6月16日(宣统二年五月初十日)各省请开国会代表发动第二次请愿，计有十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各团体和领衔代表如下：

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　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　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　南洋雪兰峨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陆乃翔　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　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　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枬　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　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　文耀　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

第二次请愿，号称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二十余万，看来阵营很大，气派很盛。但实际上有很多虚假的成分在内。有些团体，无非是为数不多的立宪派人和企图沽取利禄的官绅，搜集几本《缙绅录》、《乡会试同年录》，和一些商会、公司、学会、学生的名册，把名字照抄上去，“故三五日间全省之绅商学界中人皆网罗无遗，固不患人不盈万。”有些团体，燕不曾派出代表，而是由在京请愿者兼任或径自冒充。如所称东三省绅民代表，基本上就是直省谘议局内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议员代表；而这三省代表，又在直省绅民代表及旗籍绅民代表的请愿书上署名；部分代表，更兼充教育会、商会的代表。象国会期成会的发起人黎宗岳，是民政部的现任六品警官，在请愿书上，他兼充安徽绅民代表、教育会代表和商会代表，集绅、商、学各界代表于一身。所以，请愿书上开列的团体很周全，但架空虚设的并不少。当然，比起第一次仅有直省谘议局代表来说，第二次的规模和影响是大很多了。

请愿书上后，都察院于21日入奏。27日，发下“谕旨”称：“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尔等忠爱之忱，朕所深悉。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续请。”第二次请愿，仍旧是碰了一鼻子灰。

立宪派人很不甘心，得到“谕旨”后，即举行会议：决定扩大请愿代表团的组织，打破原以谘议局议员为限的界线，吸收各界各团体代表参加，选举孙洪伊、方还、陈登山、黎宗岳、周树标、吴赐龄、邓孝可、文耀、李素、郭卫村等十人为职员；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下到府厅州县发动；第三次请愿定明年(宣统三年)二月举行，每省签名人数至少须百万以上，到京代表近的百人以上，远的至少五十人；在此之前，还应对资政院上书和请督抚代奏。

8月15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决10月间向资政院上书，函催各团体的代表至迟9月来京。又向谘议局联合会提交两项议案：

(一)限制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新租税，以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也。

(二)拟请本年谘议局常年会，即以请愿速开国会为第一议案，呈请督抚代奏。若不允代奏，全团议员同时辞职，以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也。

立宪派人攘拳捋袖，拉开架势，在清朝毂辇之地大骂政府之假立宪，表示不达到目的决不善罢甘休。

(摘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二　第三次国会请愿

资政院于1910年9月23日(八月二十日)开议。按照《资政院院章》，资政院议员分“钦选”、“民选”两类，各占一百议席。

“钦选”议员名额的分配是：宗室王公世爵16名，满汉世爵12名，外藩王公世爵14名，宗室觉罗6名，各部院官员32名，硕学通儒10名，纳税多者10名。1910年5月，清廷分两批颁布“钦选”议员名单，其中多数是庸碌无

能不知道立宪是什么一回事，或是顽固地反对立宪的。因为是指定议员，不是赐给官爵，所以在发布名单的"谕旨"上曾着令各"钦选"议员都不必向皇帝谢恩，以示立宪之意。许多议员就很不是滋味，总感到欠缺一项什么似的；有的则认为，不叫谢恩，实在有些不光彩。不难想象，这样一批不向皇帝磕头谢恩就很不舒服的"钦选"议员，除了替专制主义的君主当应声虫外，还能做别的什么呢？

"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除新疆因谘议局缓办而未选出外，经各省按分配名额选出的资政院议员计 98 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官绅。但他们也不是旧式纯封建性的官绅，而是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上层代表或与之有联系的立宪派分子；其中留学日本或日本考察过的达 24 人之多（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 15 人）。他们在资政院里很活跃，举凡议案及对政府官吏的纠弹，大多数是他们提出来的。

资政院由皇帝"钦派"贝子溥伦、侍朗沈家本为正、副议长。会议期间，"钦选"议员总是给朝廷当盾牌，作辩护。"民选"议员则经常慷慨陈词，据理抗争，很想让资政院做出点议会的样子。议了三个月，除了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稍大的问题都是徒费唇舌。最可笑的是，资政院议决奏请速开国会，而朝廷发下缩短立宪预备期限，提前召开议会的"谕旨"却只提"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对资政院的议案，表示不屑理睬。资政院上奏弹劾军机大臣，朝廷立刻下"谕"申斥，说什么"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参资政院，却奉"旨"发交宪政编查馆处理，似乎这个编查馆又是资政院的上司衙门。凡此种种，这哪里象个立宪。正象立宪派人所曾预计的，资政院是一个非驴非马的议会。无怪乎他们针对上述情景颇有点气愤地说："此朝廷第一次对待资政院之隆礼也。"

1910 年 10 月，国会请愿代表团迭向资政院和监国摄政王载沣上书，请求速开国会。向资政院呈递的请代奏的请愿书上说：

"……国家危急存，实迫眉睫。今日事势，已迥异数月以前。更阅岁时，安知所届。……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则日俄缔结新约，英法夙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肘我背后；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工事急于星火；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现。内之则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长沙、莱阳，几酿大变，虽幸获戡定，而善后之策，一筹莫展，乱源不拔，为患方滋。此外各地，无不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侥然，不可终日……火即燃矣，则将燎原矣……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末将安所丽。两年以来，所以筹备一无成绩，而宪政二字，几于为世诟病者，皆坐是也。……"

请愿者认为，要挽救这种急转直下的危机，只有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余外就别无出路了。在对载沣的上书里，则着重提出日俄分割东北的危机希望他注意到，"东三省有变，则全局瓦解，宗社人民，将置何地？虽欲从容立宪，不可得矣！"与此同时，请愿代表还遍谒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和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亲贵大臣，陈述国会必须速开的理由。迫近眉睫的革命风暴，闹得立宪派人如坐针毡，只盼着清王朝立即祭起那件称作国会的法宝，把革命风暴收拾干净。

资政院于 10 月 22 日一致议决将请愿书转奏上去，并通过一个专折，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的要求。25 日，又送来了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计有 18 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的奏折，呈请即时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这些督抚所以如此，一则是受本省立宪派官绅的怂恿，并借此见好于谘议局；再则是希图摆脱一些朝廷亲贵集权的束缚，争得较多的地方权力。当然，也怀有加速立宪步伐以抵制革命的愿望。

朝廷上的王公大臣们奉旨商讨对策，他们感到，全国革命风声日紧，危机四伏；各省谘议局和绅、商、学界再三请愿；一些督抚也联名电奏，如果仍胶执于九年预备的成见，势必陷入被动。商议结果，决定奏请缩短立宪期限。11 月 4 日（十月初三日）发出"谕旨"，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定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同日另一份"谕旨"则称："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12 月下旬，东三省代表十余人来到京师，呈递请愿书，要求明年召开国会。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并威胁说，如果再搞什么请愿，就是"聚众滋闹"，各督抚即应"查拿严办，毋稍纵容"。"直隶总督陈夔龙奉到上谕后，连夜出示，宣布谕旨"。天津各学堂学生代表"齐集自治研究总所，会议进行方法。陈总督大怒，立派天津镇调练军二百名，巡警道拨警兵百名，又派督辕卫队管带带卫队百名，会同前往，赶速解散。"事后，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长温世霖"创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直督乃饬巡警道拿办，并电请惩儆。奉旨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立宪派奔走呼号，一而再，再而三地伏阙上书，到头来落得个被赶走的下场。如果没有 18 个督抚们的电奏，只怕连改九年为五年预备的虚假诺言，也不能从王公亲贵们的牙缝里挤出来。请愿者虽极其不满，但也认为"朝

命既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复非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既奉朝命，劝谕解散，自不能再行存在，致招干涉”。于是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在被迫解散前，代表团发出了一份《通向各省同志书》里面说：“某等承全国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专磬哀，一年于今，三次上书，幸值各省督抚联翩之电奏，力争于外，资政院全体之通过，主持于中。王大臣乃始临朝震悚，翻然改图，会议数四，顾犹回翔容与，疏慢不促，定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昨奉上谕，已宣示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三年遥遥，夜长梦多。诸父老与有兴亡之责，有国忧勤，其何以图之？……”表现了对清王朝假立宪的愤恨和对革命危机的无比忧惧。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广州新军起义

背景介绍

同盟会几次运动会党起义失败，使一部分会员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指挥，战斗力不强，而且起义地点又过于偏僻，接济困难，影响不大。于是，他们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争取掌握新式武器、有一定作战训练的新军作发动起义的基本力量。1909年10月，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由胡汉民任支部长，分设筹饷、军事、民军、宣传等组，另设实行委员若干人。南方支部成立后，即着手准备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起义，企图把君主的军队转变为人民的军队，实现推翻清朝的新的武装斗争。

清政府为在广东建立新军培养官弁，1901年在黄埔开办武备学堂。以后又办了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1906年改陆军中学为陆军速成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多派任下级官佐。广东革命党人姚雨平、张醁村等在1907年春加入同盟会后，即深入各军事学校和军队，尤其着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同年，革命党人赵声到广东，任新军第二标二营管带，不久升任标统，从而更有助于同盟会扩大在广东新军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8年，广东革命党人曾密谋与安庆马炮营同时举义，决定由巡防营发难，赵声率新军、朱执信率民军响应。当革命党人谭馥、葛谦等在巡防营创设“保亚会”，宣传反清，入会的兵弁已不少。临到起义前不久，在营中散发“保亚票”，作为会员凭证。另一党人严国丰不慎失落一张。水师提督李准派兵逮捕严、葛、谭等，起义未成。严、葛当即就义，谭次年死难。

1908年，倪映典由皖至粤。同盟会南方支部责成他负责运动新军，继续准备起义。

材料：

· 意外的起义

材料　意外的起义

赵声正与朱执信等人积极策动新军起义，推荐倪映典任广州新军炮兵排长。倪映典“长于煽动，又精力殊绝。”他在广州设立机关部，“专以运动军队为事”，拟订《军事章程十条》，“专门运动省城新军水陆防营及各局所，以急进实行为目的。”他向士兵演说三民主义，揭露清廷暴政，情绪激昂，往往声泪俱下。在他的教育下，许多新军士兵争相要求加入同盟会，奉倪映典为“革命大师”。

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到了1909年冬，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盟会的已达三千余人（约占广州新军总数一半以上），各级革命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营、队（连）都有代表，有的排也有代表，负责联络指挥。朱执信运动南海、番禺、顺德各县民军也大体就绪。革命党人认定由新军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同盟会南方支部决定在庚戌年正月元宵节后举行起义。

清朝广东当局察觉新军日趋革命化，便竭力加以防范，偷偷将各标、营所有弹药运进城内军械局贮存。赵声、倪映典见清政府已有了镇压起义的准备，遂赶赴香港与同盟会南方支部商议对策，准备改期起义。但是，由于广州新军深恨警兵平日强横，发生军警冲突，导致了广州新军起义仓促爆发。

1910年2月9日（春节前夕），新军第二标第三营士兵因事与商店老板发生争执。巡警前往干涉，压制新军，激发军警宿怨，双方聚众斗殴。第二天，新军第二标士兵，各执木棍，拥入城内，声称向警局报仇，打伤警兵、警官数人，打毁巡警分局。两广总督袁树勋派兵弹压，如临大敌。新军群情激动，要求立即起义。

广州军警冲突事件，打乱了同盟会预定起义计划。此时，倪映典还在香港。鉴于起义已难以抑制，他建议提前发难。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商定将起义日期改为2月15日。倪映典于2月12日晨赶回广州，去燕塘炮兵第一营驻地，发现士兵已纷纷作好了战斗准备，不得不又改变已商定的日期，即时当机立断，枪杀炮兵第一营管带齐汝汉，带领士兵“夺枪出营”，宣布起义。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推倪映典为司令，集义军约三千人，宣誓“愿为革命战死”，冲毁协司令部，夺取讲武堂枪械，分三路进攻广州城，占据东明寺、茶亭等地。

清防营统领吴宗禹奉命率军二千余人出城镇压，与义军相遇于牛王庙地方。水师提督李准派人前往诱降，“宣布朝廷优待军人德意。”“缴械投诚免死”。但是，起义军

"睨视不理"。"倪映典驰马摇手,以示拒绝,且鼓励其众",并乘机向清军"晓以大义",谓"今日乃独立机会,正革命军出世之日"。号召清巡防军掉转枪口,响应革命,并指挥起义军分路向清军进攻,"遍山围攻,率众开炮"。清军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新军伤亡颇重。这时,李准又命水陆缉捕处帮统李景濂指使巡防营军官唐维炯、童常标,以曾经加入同盟会又系同乡的关系,出面约倪映典洽商起义问题,倪误中诡计,遭到杀害。起义军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深夜,因弹尽援绝、无力继续作战,乃向石牌、东圃、白云山一带败走。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谋刺摄政王

背景介绍

1908年11月,清廷的两位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内相继死去。按照慈禧死前的安排,由醇亲王载沣三岁的儿子溥仪入继大统,是为宣统皇帝。国家大政由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掌管,称监国摄政王。

载沣掌权后,为维持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一面继续残酷地镇压革命党人,一面欺骗与弹压立宪派人,妄图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自从1905年9月24日吴樾在前门车站炸出洋五大臣后,北京城内王公贵族、文武百官,无不人心惶惶,无时不严加防范。载沣当上摄政王后,更是严密布置自己的护卫工作。坐落在北京城北什刹海边的摄政王府内外,有王府护卫、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及京师警察厅层层保护。每日上朝,摄政王的白色双马四轮轿顶车以大批的步兵与马队护卫,并由上朝路过的两个区的署长亲自负责警卫。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从王府出发,经甘水桥胡同,转鼓楼西斜街,至鼓楼,再转入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直达紫禁城。1910年年初,因鼓楼西斜街改筑马路,不能行走,摄政王上朝的路线暂时改为由王府跨一座小石桥,穿鸦儿胡同、烟袋斜街,再转入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到达紫禁城。

1910年4月2日,摄政王忽然听到下面秉报:有刺客在他王府近旁的那座无名桥下埋设重磅炸弹,试图在他上朝路过那里时将他炸死。摄政王听了大吃一惊,又怕又恨,严令限期破案。不几天警察捕捉到两名刺客,为首的竟是一名文质彬彬的年轻书生,名叫汪精卫。

材料:

- "刺巨酋以震天下"

材料 "刺巨酋以震天下"

汪精卫等暗杀团成员进入北京后,先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设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点;又在东北园租房作为住宿与活动场所。随后,他们便开始物色暗杀目标。他们先打算炸死清廷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但奕劻侍从如云,警戒森严,难以下手;恰在这时,贝勒载涛、载洵从欧洲考察陆海军归国,乘火车到达北京,汪精卫与黄复生暗携炸弹赶到前门东车站,试图谋刺,但因天黑人挤,目标看不清,只得废然而归。最后,他们决定擒贼先擒王,暗杀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等人侦察了摄政王府,考察了摄政王每天上朝的路线,决定在其必经之路的一座无名小石桥下埋设重磅炸药,以电线引爆的方法实施暗杀。这小桥由几块大石板架成,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小水潭,"仅一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经之路"。桥北有一阴沟。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点。他们计划在小石板桥下埋设炸药罐,安装上雷管,接出一根电线,人躲在北边阴沟里引爆。等载沣的马车过桥时,用电发火,电流一通,炸药罐爆炸,顷刻就可将载沣炸得血肉横飞。

计划既定,暗杀团立即紧张地行动起来。黄复生、喻云纪早已掌握制造炸弹的技术,他们找了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到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进一步加工成一个外形不象炸弹的弹壳。喻云纪把从日本带来的50磅炸药装进去,安上引爆机构,精心制成一个大型的效能极好的炸弹。汪精卫等人又到旧鼓楼大街清虚观内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腾挪的地方。商定先由黄复生与喻云纪去安放炸药,汪精卫在清虚观静候,到时负责引爆。

1910年3月31日夜,黄复生与喻云纪二人来到小石桥下挖坑,忽听犬声四起,只好折回。次日深夜,他们挖好坑。埋好炸药罐,不料因事前目测不准,敷设的电线太短,不够用,只好隔晚再来。4月2日晚,黄、喻二人第三次来到桥下敷设电线,忽发现桥上有人偷看,两人大吃一惊,赶紧避开,由喻云纪去清虚观通知汪精卫,黄复生躲到一棵树后监视。初见一人手持灯笼到桥下察看一回就走了,黄忙到桥下想取走炸药罐,但太重,只好草草用泥土盖上。待他听见人声再次躲开时,就见警察来桥下搜寻了。暗杀计划完全暴露。

当夜,暗杀团成员在东北园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筹划行动,决定由喻云纪去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汪精卫与黄树中留京,图谋再举。

清廷大员们获悉革命党人用炸药谋刺摄政王的消息后,大为惶恐。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为怕引起京城混乱,严令各报不得宣泄消息,并令警方尽快破案。

汪精卫等被解送到内城巡警总厅,由厅丞章宗祥审讯。清精卫与黄复生坦然承认谋炸事实。汪精卫在数千言

的供词中，大书革命要义，痛斥清廷骗局，指出"今虽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如此的立宪，只能是"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汪精卫宣称："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汪精卫的这篇供词，连清廷民政部尚书善耆看后也暗叹不止。

按清廷刑律，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是要被凌迟处死的。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人心浮动，清廷为标榜预备立宪，拉拢人心，又经善耆幕僚、革命党人程家柽鼎力周旋，最后只将汪精卫与黄复生判为永远监禁。1910年5月1日，汪精卫被移入监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几首五言古诗《被逮口占》，其中尤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更为脍炙人口。汪精卫也因这次震动全国的谋杀摄政王事件而名闻遐迩，为他日后多年在中国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活动争取到了资本。

谋刺摄政王事败后，喻云纪到南方参加革命活动，1911年3月29日参加广州起义，英勇牺牲，成为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在辛亥革命后获释。

（摘自经盛鸿《民国暗杀要案》）

湖南抢米风潮

背景介绍

抗粮抗租是广大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形式，清朝末年，这种斗争仍很激烈。然而，临近清朝覆亡前夕，席卷中国大地的还是因灾荒踵接而来所引发的"抢米"风潮。仅一九一〇年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发生的"抢米"事件，即有五十余次之多。湖南长沙"抢米"风潮，是震动全国的重大斗争。

材料：

· 湖南"抢米"事件

材料　湖南"抢米"事件

【湖南长沙等地，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至初四日（4月13日），省城南门外，忽有多人滋闹。其缘因说者不一，而以米价骤增，群向米肆诘问，勒令减价，米肆坚执不从，即时聚集多人，强抢米肆之说为近是。要之穷民过多，本已伏酿祸之机，适以米价日贵，触发其怨恨，遂使杵愿者不期而暴动，以求泄忿，狡黠者亦将乘机以行劫，而乱事遂莫之能御也。岑巡抚闻警，急派巡警道赖承裕出城弹压。赖警道出大言相恐吓，并拘获数人。赖亦被众殴辱，大受夷伤，奔回城中。滋事之人亦随入，沿途从之入者无算，遂群集巡抚衙门，要求平粜。岑巡抚急出示以慰之。米价初定每升六十，继减至五十，众尚不满意，告示随出随毁。众既久聚不散，拆毁辕门，卫队出为弹压，木石交下，互伤数十人。岑巡抚急召新军入卫，从人群中冲入，亦伤数十人。围署之人，亦被刺刀戳毙数人，生擒五人，喧聚竟夜不散。而城内之米肆数十家，亦被众抢劫殆尽，教堂亦有被焚劫者。

初五日（14日）众人之围困巡抚衙门者，无虑万人，以惧新军不敢入；新军以人众故，亦不敢出。岑巡抚发令开枪，毙数人，众仍不散。会有献议者，谓宜遣退新军，以平众怒，众必自散。及新军退出，众遂一涌而入，焚毁头门二门，及大堂二堂。岑巡抚见事急，即避入臬署，称疾不视事，以巡抚关防交布政司庄赓良护理。庄布政既接受关防，即以署理巡抚部院衔名出示，严禁军士开枪。又出示安民，谓即日开办平粜，米每升四十文。昨晚被拘之五人已释放；被枪毙者，官给恤银二百两，伤者四十两，将以拊循民人，然乱事仍未已也。

是时，以众人围困巡抚衙门，而巡抚衙门复被焚，故官吏及军队咸以保护官署为事，不及兼顾地方。且巡警岗位早被打毁，巡士悉数避匿，无人出而弹压。于是众人恣横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火起，竟夜焚掠，城内外之学堂教堂及外人商店居宅咸被焚劫。惟侨居之外人则以官场宣布乱事，请为暂离长沙，于是有即日乘轮避往汉口者，亦有避居轮船中，以观动静者，故尚无伤害生命之事。

初六日（15日），庄布政始出严厉之告示，禁止暴动，许居民格杀勿论，官军亦擒斩数人。会湖北派往之军队亦到省。当事急时，英、美、德、法、日本诸国咸调兵舰至省保护，是日亦有到者。众始慑伏不敢动。惟谣言尚多，居民惶恐如故，咸纷纷迁往他处。次日，复有湖北军队二千名到省，民心大定，商民始照常开市。

事后，官吏出示严禁米肆涨价，复设平粜局四处，米价每升四十文。三四日间，集款至百万以供购米平粜之用。……

附记　省城平静后，滋事者窜往他处。且风声四播，乱者群起。于是省外各州县又纷纷告警。初八日（17日），宁乡县〔长沙府属〕有外来匪徒二十余人，立时啸众三百余人，将警察局捣毁，焚教堂两所，学堂三处。益阳是〔亦长沙府属〕因有人运米出口，被众抢尽，官钱分局亦被劫，教堂幸无恙。平江县教堂亦被焚毁，经巡防局拘获滋事者三人正法。安乡县〔属澧州〕衙门被众围困，茶厂被劫。湘潭、浏阳、醴陵到〔均属长沙府〕，岳州、澧州、宝庆、衡州、常德等府州颇不平靖。岳州教士及西人妇孺已避往汉口，宝应府之教士已奉命离去内地。

（《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中国大事记》）

四国银行团对金融的控制

背景介绍

日俄战争后，在对华的争夺战中，日本的势力急遽膨胀，同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企图进一步分享各国在华的权益。这样，各国争夺对华垄断权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和复杂化。竞争的加剧，列强之间的牵制，使攫取对华权益受到一定限制。因此，用国际垄断来代替各国竞争，就被认为是避免相互削弱的唯一办法。20世纪初期出现的，由几家实力雄厚的帝国主义在华财团联合组成的国际银行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金融垄断组织。

最早由英、法、德3国组成的银行团是1909年7月6日在伦敦成立的。其成员是英国方面的中英公司、汇丰银行和华中铁路公司，以东方汇理银行为代表的法国财团，以德华铁路公司和德华银行为代表的德国财团。3国银行团是英、法、德3国的金融资本所结成的国际联合体。一方面它是非官方性质的以承揽铁路借款而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企业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各自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因而具有政治的含义。此联合体的形成，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尤其是一上台就推行“金元外交”政策的塔夫特美国政府，将中国作为它所瞩目的主要目标。美国提出以“充分而坦率的合作”来“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完整”，“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美、英、法、德财团间达成谅解将会创造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因此，美国摩根银行、坤洛公司、第一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于6月间组成银行团。7月7日，美国银行团代表与英、法、德3国财团的代表会谈，企图加入3国银行团以取得在铁路借款问题上的平等权益，为日益增长的美国金融资本在华取得投资场所。但会谈结果没能使美方如愿以偿。

材料：

- 《国币则例》
- 《币制实业借款合同》

材料一 《国币则例》

1910年，清政府决定对极度混乱的货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于5月24日公布了《国币则例》。但整理币制需要大量款项，而清政府又没有能力筹措这笔资金。因此度支部尚书载泽面奉谕旨，由度支部向美国借一笔巨款来办理这件事。清政府机密地向美国提出了币制实业借款的要求。当美国务院获悉清政府希望得到美资本家提供5 000万两借款的消息时，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币制实业借款将给美国提供一个新的机会，不仅可使美国进步加强对中国的金融控制，同时还可帮助其他侵略计划的实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首先表示希望此事能很快定议。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锡良奏折，要求借外债兴办东三省的实业。锡良本打算由东三省自行筹借，并已同汇丰银行初订了一个借款的协议，只等清政府的承认，但北京政府决定将此项借款与币制实业借款合在一起，共同由美国银行团承担。10月2日，清政府向驻华公使嘉乐恒提出将借款额增为5 000万美元(约合银8 000万两)，并强调这笔借款只与美国商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银行团也表示要独自承担这笔借款，并委托北京花旗银行总办梅诺克为代表，与清政府开始谈判。梅诺克提出了苛刻的借款条件，使得清政府进退两难。但最终作了让步，于10月27日，双方签订了5 000万美元的币制实业借款草合同。其中只规定利息为5厘，95折，其余细则留待签订正式合同时商订。

消息传出后，法德两国银行家提出要英、法、德、美4国财团一起参加；而美国银行团在接受借款之后，正苦于无力承受这笔巨额借款，便在11月8日的伦敦会议上，提出邀请英、法、德3国财团给予协助。一来，3国财团提出的必须同美国一起参加签订合同的要求得到了实现。美国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无暇顾及清政府对它的信赖，擅自决定将这笔借款由3国财团与它平等分享，并要求清政府接受这一事实。就这样，币制实业借款草合同签字不到两周，就由1国转为4国。从此英、法、德、美4国的金融资本结成了对华的联合阵线，开始共同对中国实行金融控制。

材料二 《币制实业借款合同》

4国银行团为尽快实现这一借款，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在伦敦会议之后马上来中国与清政府谈判签订正式合同。清政府看到事情有所变化，担心参与签订合同的国家增多，而对中国的要挟就会加大，从而引起人民更大的反对，因此，坚持只同美一方打交道。四个国家的金融资本由激烈争夺走向妥协、结成同盟，使得清政府更加难于对付。美国银行团借助中俄修约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致使清政府身不由已地向帝国主义国际金融资本靠拢。经过一番恫吓、欺骗、胁诱，清政府只好同意英、法、德财团同美国银行团共同承担币制实业借款。

由币制改革引发的聘用外国货币顾问一事随之而来。从清政府同美国商议借款时开始，美方就一再主张把中国的币制改革置于外国顾问的监督下，否则不放心。清

政府居然同意美方意见聘用一位美国专家。但事情有了变化，参加进来的3国财团不允许美国一方垄断中国币制改革的监督权，主张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应当具有国际色彩。为使合同尽快签订，美国国务院找到了一个协调方法，即任命一位非借款参加国的人为顾问（推荐荷兰人卫斯林为中国币制改革顾问）。

在扫除谈判中的各种障碍之后，于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团签订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数为1 000万英镑（合银8 000万两）利息5厘，95折，期限45年。

在这笔条件苛刻的借款合同中规定：以东三省烟酒税每年共库平银100万两、东三省出产税每年共库平银70万两、东三省销场税每年共库平银80万两以及各省盐斤新加价每年共库平银250万两等饷源为借款的头次抵押，"倘若以上所载之饷源届期不敷交付到期之利及应还之本，则大清政府先将东三省他项饷源补足应付之数，如有不敷，再用他项补交"。在第五款第五条中规定："此项借款未还清以前，倘再有将以上饷源作他项借款抵押或作质保等用，总须先仅此项借款还清，更不得有他项借款抵押或征纳各事，加乎此次借款之上，或与平行，无论如何，不能损害该饷源担保此借款之权利。"合同还规定了4国银行团对清政府使用借款的监督办法：即在签订此合同的当天，清政府应向4国银行团交出有关改革币制及兴办东三省实业的文件和用款清单，包括奏定画一银本位币制章程、币制用款单、东三省用款单；规定每一季度清政府应将用款情况向4国银行团提出报告，还应将向资政院的年度报告抄送4国银行团；4国银行团在6个月内就有关上述币制章程及两个用款单各事加以考虑、筹划，在同意以此为发行债券的基础后，须尽快将此项债券发行。

尽管《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的签订几经周折，条件苛刻，然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合同第十六条保证给予4国今后借款的优先权，并规定以东北税款担保，这样就触动了日、俄两国财团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因而引起它们的抗议，致使这笔借款的债券始终未能发行。清政府在签订该合同后得到的第一笔，也是唯一的一笔款项是应东三省防疫及办若干工农事业之急需请求银行团先垫付的40万英镑。

从《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的签订，我们清楚地看到：垄断是4国银行团的基本特征，这种国际垄断协调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步调，加重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1910年11月伦敦会议上，4国银行团就规定了在对华借款中的利权机会和承担义务上的合伙办法，通过垄断借款攫取各种保证、监督和优先权，从此剥夺了中国的借款自由权，形成了4国银行团对华借款的垄断时期。而这种帝国主义强权外交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已不是单纯的牟利单位，而成为列强手中的侵略工具，它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财政的愈加紊乱，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政局带来更大的动荡。

（摘自《勿忘百年国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史内幕

米价飞涨逼死人

"抢米"风潮是从南门外发生的一起悲剧事件开始的。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一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了八千大关。南门外有个叫黄贵荪的贫民，靠挑卖沙水营生，是日，其妻以他一日所得的八十文钱前往社坛街碓坊买米，店主以其中有几文不通行的制钱，挑剔不收。黄妻回家凑足了通行制钱，傍晚再去碓坊，不料米价已由每升八十文涨至八十五文，还是买不到一升米。她在极其愤慨的情况下，溺水而死。黄贵荪痛不欲生，便带着两个小孩含恨投水自尽。这一惨闻，飞快传遍全城，在群众中激起了无比的义愤。

四月十二日，在南门外碧湘街 邹姓碓坊，又发生类此事件。是日上午，米价曾一度下降至每升七十文，可是下午却又回升。有一老妪持钱七十四文前往邹姓碓坊买米，米价已涨至七十六文。待老妪回家凑足七十六文再往碓坊时，米价又上涨了两文，老妪斥其无理，店主反唇辱骂，邻众为老妪抱不平。适时附近正在演皮影戏，看戏的群众闻声赶来，"相率助势"。他们看到眼前的事情，立刻联想起先晚发生的惨象，一怒之下，便将碓坊捣毁。店主报巡警干涉无效，又移请巡防队前往弹压，要捕率众动手的木业工人刘永福。群众"仍不惧，拼命抵抗"。接着，群众数百人围聚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人多口杂，拥挤喧哗"。善化县知县郭中广闻讯，驰往弹压，即被群众包围。郭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婉言开导，坦认平粜，约以翌午为期"，以为脱身之计。群众认为既已获得郭中广许诺，而且时已深夜四更，才自行散去。

郭中广脱身后，即于十三日清晨随巡警道赖承裕往

谒岑春蓂面陈先晚情况，请示对付办法。岑春蓂以“愚民聚众，必有匪徒喜煽，何以巡警局不早拿访，当将巡警道赖承裕申饬”，并责令其对“滋事”群众，“务必严拿”。赖承裕退出抚署，立即派消防所长龚培林，带领缉勇出城巡罗拿人，在南门外将刘永福逮送巡警公所收押。群众以当局不但不办平粜反而拿人，更加激愤，于是又至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放人，“势甚汹汹”。长沙协副将杨明远、长沙县知县余屏垣、善化县知县郭中广闻报，先后出城弹压。群众诘以“请求平粜，并未犯法，何致遽出捕人？”要求当场释放刘永福。余屏垣、郭中广在群众的包围下，不得不派人入城，请示赖承裕。赖承裕本“江西巨商，入赀得官，罔知民瘼”，他和岑春蓂一样，一味主张采用严厉手段对付群众，坚决不允放人。时已傍晚，聚者益众，“人情汹汹，拥入局内”。这时，赖承裕亲自率队前往镇压，刚入庙门，就被群众喝令下轿。赖承裕辱骂群众“胡闹”，扬言要“拿几个宰了他”，并训斥群众：“吾闻茶寮碗百钱不为贵，岂升米八十文为贵乎？”还威胁说：“如不解散，当照乱民惩办。”群众更怒不可遏，蜂拥向前，摘去赖的翎顶官帽，将他捆吊在庙侧的柳树上，饱以老拳。副将杨明远上前救护，也被殴伤，乘机溜走，所带差勇，亦被吓散。后来，赖承裕的一个亲兵见事危急，便脱去号衣，混入人丛，诡称殴之无益，不如扭送抚院，找岑春蓂论理，随即背起赖承裕，疾驰入城。时已昏黑，群众不知是诈，便也跟着入城，直趋巡抚衙门。沿途贫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在长沙的省内外饥民，以及其他下层群众，皆“闻风麇至，愈聚愈多”。顷刻间，聚集在巡抚衙门前面的群众不下万人。

一向虚骄自矜的岑春蓂，没想到群众竟会闹到自己的衙门来。开始，他发出告示：“痞匪煽惑愚民暴动，平粜尚须时日，若不速散，格杀勿论”，企图将群众吓跑。然而，饥饿和愤怒的群众毫不畏惧，衙门前象暴雷似地响着：“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杀死！”

此时，岑春蓂不得不改换手法，急悬牌示：“五日后开仓平粜，价六十钱一升”。群众以岑春蓂信誉扫地，不肯相信，立即将牌打毁。岑旋又改出牌示：“明日平粜，五十钱一升”，又被打毁。“复牌示许放所拿之人”，但又称人“已由警务公所带至南门城楼，一时无 人可放”。群众见岑春蓂继续玩弄花招，感到忍无可忍，便立即采取行动，涌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还有 一部分群众，则直向内堂冲去。抚署卫队拼命抵御，被群众以瓦石掷伤。岑春蓂即电调常备巡防队入署，开枪射击，当场打死饥民十多人，伤数十人。群众愈益愤恨，仍坚持斗争，不稍退却。岑春蓂黔驴技穷，“一筹莫展，只望更深人倦，自然转回。”三更以后，一部分群众转向街头，“争向各碓坊，以官平粜价，强粜谷米，霎时间各碓坊存米，被抢一空。”警兵站岗的木棚，也被“打毁净尽”。继又相约分头至各街道鸣锣，着各家铺户门首悬灯，以便往来，并约次次日一律罢市停业。

四月十四日，风潮更形高涨。城厢内外各铺店一律罢市。“满街巡警躲尽，不见一人”。各区巡警分局，有的“改贴客栈招牌”，有的紧闭大门，贴上“公馆出租”字样，以逃避群众的惩罚。

岑春蓂感到事态严重，令长沙知府、善化、长沙二县知县，邀集郡绅于席氏家祠，商讨应付办法。湖南豪绅势力素横，岑春蓂平日办事孤傲独断，与诸绅积不相能，官绅矛盾颇深。在会上，孔宪教、杨巩等借机要挟岑春蓂停办一切“新政”，要求停修铁路，停办学堂，撤警察，复保甲，平粜，开皇仓，撤常备军等，以此作为息事解围的条件。

当官绅们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抚院门前又沸腾起来。围聚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拥入抚署大堂。岑春蓂令军队开枪射击，打死二十多人。面对岑春蓂的血腥屠杀，人们决定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来进行回击。他们说：“上官不悉民情，无异官逼民变，只有烧尽而已”。恰好这时有人搬来了一些煤油，于是便群起拆墙毁屋，浇油纵火。抚署内的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顿时浓烟翻滚，烈火燎天。一直延烧到下午，余烬犹炽。

（摘自《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清末亲贵攘夺兵权的一场内哄

清末满族亲贵与袁世凯争夺兵权一事是人所共知的。在这场斗争中，其实还穿插有一出满族亲贵的内哄，只因纠纷内结，迹象不著，洞悉内幕的人不多，一般记载也很少涉及。

这场内哄，发生在铁良与良弼间。铁良在光绪年间任陆军部（原称兵部）尚书，在满族将领中有一定资望；良弼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是满族少壮派军人的代表人物。两人一方面在反袁活动中有共同利益，都是反袁的要角；一方面又互不相下，互不相容。在他们彼此倾轧的过程中，站在良弼背后，为良弼撑腰的是贝勒载涛，而实际在暗中推波助澜，从而坐收渔人之利的是袁世凯。

在一九〇六年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清廷摆出来与袁世凯对抗的两颗棋子就是铁良和良弼。当时，铁良和袁世凯一同受命为阅兵大臣，良弼和冯国璋分别担任北军和南军的审判长，两军相对，阵势分明。会操后，善于见机行事的袁世凯，采以退为进的策略，自动请求交出北洋六镇新军中的四镇归陆军部直辖。铁良就乘机把四镇接收过来，推荐第一镇统制官凤山统带。次年，清廷又以明升暗降手段，内调袁为军机大臣，完全解除了他的兵权。这样，满族亲贵的反袁斗争，在第一回合中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在这同时，铁良与良弼间也就产生了矛盾。

良弼在满族亲贵中是一个新进的人物，较有 现代军事知识，年少气锐，目无余子，不把铁良放在眼里，而铁良看良弼是后生小辈，瞧不起他的资历。对一些问题，两人的意见也往往相左。在这情况下，升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曾想供良弼的手先打倒资望较高的铁良，但因为铁良正得到慈禧太后的倚任，没有达到目的。

到一九〇八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摄政后，迫使袁世凯解职归里，并进一步推行了把兵权集中在皇室手里的计划，首先成立禁卫军，派载涛、毓朗、铁良担任训练大臣，企图以这支兵力来控制全国的新军。这支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沣亲自统领，实际上交给载涛，而载涛是一个毫无军事常识的纨袴子弟，在他下面争逐实权的还是铁良和良弼。良弼雄心勃勃，想把禁卫军一把抓在手里。可是，他起初只被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位远在铁良之下。为了搬除横在前进路上的障碍，他时时在载涛面前鄙薄铁良。两人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这时，袁世凯虽然退居林下，自称过“洹上钓游”生活，实际在朝廷上仍旧遍布耳目，又利用这一机会来进一步离间铁良与载涛的关系。由于铁良只是京旗旗人，并非皇族，最初系以道员身分经袁保荐参加训练新军。惯用阴谋诡计的袁就巧妙地师法陈平离间项羽与范增的故事，派人在满族亲贵中散布流言，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铁良尽管在表面上反袁，实际与袁暗通声气，合谋夺取载涛的兵权。载涛本来对资望在他之上的铁良心怀妒忌。于是极力支持良弼来排挤铁良，一手把良弼破格提拔为禁卫军训练大臣，一手把铁良外调为江宁将军，同时把接近铁良的凤山调为荆州将军。这是一九一〇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的事。对这次调动，外间都看成是亲贵干政局面下对地方加强控制的措施之一，当时很少有人了解个中的曲折。

清亡后，铁良携宦囊寄居天津，筑广厦于旧英租界的墙子河左近，安度寓公生活。一九二二年旧历二月十八日他的六十寿辰，津门遗老纷纷赋诗撰文，为他祝寿。在丁巳复辟时一度官拜邮传部右侍郎的湘乡陈毅，曾写《铁将军歌》一首，内有“无端阴谋发肘腋，自坏长城不知惜”两句，就是指上述亲贵内哄一事而言。陈在诗后自注云：“袁世凯欲夺公兵权久矣，以两宫倚眷甚隆，不遂。宣统初年，贝勒载涛与公同领禁卫军，恶公资威出已上，又事多龃龉。会宗室良弼官陆军部军政司，久不得迁，亦畏恶之，而谗间于贝勒。世凯利而用之，益肆其飞谤。于是，将军不得安于其位，而世凯为所欲为矣。”

（摘自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

倪映典遇害真相

一九一〇年庚戌之役，有关记载皆云倪映典中弹阵亡，惟据我所闻，倪并非阵亡，实被人诱杀。这是诱杀倪的李景廉亲口说给我听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李又为革命同志所诱杀，这也是我所知道的。兹将此事始末叙述出来，以备修史者采择。

一九〇九年（已酉）我赴省城考拔贡，与丘兆琦、梁泽文等旅居书坊街。在虎门陆军速成学校毕业的惠州同乡李景廉与陆军各同学常来晤谈。其时陆军同学毕业后，多居见习教练之职，惟景廉已升营长。我问他因何升迁如此之速？他说，因带队往容奇缉捕，深入匪巢，与匪搏斗，一人枪杀四匪，水提李准大为嘉奖，因授彼为亲军营长。我因说：“现在革命潮流日渐高涨，草泽英雄类多参加革命，似不宜太过摧残。”他说：“我们陆军同学多数暗入同盟会，时机成熟自当联合反正，但此等劫匪为害行旅，是不能不杀的。”

庚戌旧历新年，我居惠州，闻得广州新军起义消息。那时我正准备赴京朝考，须往各乡向同宗筹款，对 于此次事变实情无暇探问。是年旧历九月朝考已毕，我回到广州，各戚友多来问讯。景廉那时已升为水陆捕缉处帮统，来访时似有忧色。他对我说道：“我已违背初心。博得目前荣显，但恐后祸将不旋踵呢！”我闻此语，颇为惊讶。他即说：“我本是倾向革命的，倪映典平日亦认我为同志。新军事变时，水提李准着我统两营人防守东门外。我想交战起来，胜负尚无把握，他们未必能成事，我如归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且不忍有负李水提，自已又建功心急，于是商准李水提，谋诱杀倪映典。某日，我单人匹马跑至燕塘面见倪映典，问他：‘你此次起事有何把握？’倪说：‘朱执信运动各方会党都已成熟，我一起事，各方立即响应，省城将唾手可得。’我即说：我所部多欲附从，只恐不能成事。你既有把握，可否到我处演讲，说明情况，我部必多数附从。’倪应允。旧历正月初三早，双方列队相见。我方占领牛王庙教会山，利用铁丝网掩护，阵地较优。我嘱唐维炯、童常标两营长（俱安徽人，与倪同乡）请倪打话。倪出到阵前，我即与唐、童二人请其入营磋商条件。条件当然不能谈妥，倪便退出。我方即用乱枪将倪击毙，并进攻新军。新军大败，缴械解散。对外宣传所说在阵上杀倪，是为了防革命党对我施行报复的。现已铸成大错了。”言毕愀然。此后，我与景廉即未再谋面。

辛亥秋惠州反正后，留守惠州第二旅旅长陈月桥邀我主办军中文书及计划训练民军事宜。次年春，广东都督陈炯明要解散民军，我劝月桥将所部自动解散。月桥因须为部下请领抚恤费和遣散费，邀我同往省城见陈炯明磋商，遂同赴省城。抵省后，景廉之兄景戴忽来旅馆见我，说

道：："我弟景廉性命危在旦夕了。"我问何事？他说："景廉在新军事变时曾诱杀倪映典，此事谅你也知道。辛亥反正后，他逃往香港，初不敢回来。后以在港生活难以维持，又接了许多军中旧友来信，说朱执信任广阳绥靖处督办，正欲召集军界旧人，举办清乡，对他已允不究既往，如回来，当有位置。景廉遂贸然回来。我见了大惊对他说：'你曾诱杀倪某，安知此次不是诱你回来，为倪报仇？'我当劝其赶速赴港，以免危险。景廉正欲今晚赴港，不料今午已被广阳绥靖处捕去了。此事要求陈月桥先生往见陈都督请贷其一死着在军前效力以图将功赎罪。"月桥夤夜往见陈炯明，炯明亦以景廉罪在不赦，但认为此案应提来都督府处办，当即亲笔作函致朱执信。闻朱亦虑到陈炯明将为景廉说情，即先将景廉枪毙，然后方始拆阅陈炯明来函。

（摘自陈景吕《辛亥革命回忆录》）

历史考证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地点考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汪精卫等革命党人谋炸监国摄政王载沣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严嘱报馆不宜传播"，但是依然满城风雨。由于辗转传闻，形成"人各一说，不能详也"，至于发事地点，更是众说纷纭。历来有说是银锭桥，有说是甘水桥或甘水桥南小石板桥，甚或说是后门桥、甘石桥或德胜门等等。究竟何者为是，这就不能不对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有关情况作一番细致的考察。

1907—1908年间，中国同盟会多次起义失败，形势的险恶使一部分成员情绪沮丧。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决意"杀一虏首"，"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他在日本同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等人组成一个小暗杀团，来往于日本、香港等地，秘密地作了各种准备。1909年10月，黄复生先到北京筹置暗杀机关。年底，暗杀团成员分批潜入北京。

到京后，汪精卫一行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设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点，又在东北园租房作为住宿和活动场所。随后，他们便开始物色暗杀目标。先是汪精卫与黄复生携带炸弹到前门东车站，试图炸赴欧洲考察陆海军回国的载洵、载涛两贝勒，但苦于天黑人挤，无法下手。接着又打算炸庆王奕劻，亦机会难寻。最后，暗杀团决定以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载沣为暗杀对象。

1905年吴樾在前门车站炸出洋五大臣后，摄政王与京中其他要员一样，日夜惶惶，无时不严加防范。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等人对行炸的地点和方法作了一番精心选择。摄政王府（醇王府）坐落在后海北岸西端，座北朝南，载沣每日到紫禁城上朝，一般是出南大门走宅东的甘水桥胡同（今甘露胡同）转鼓楼西斜街（今鼓楼西大街），至鼓楼前再转入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直达紫禁城。因此，暗杀团成员准备将鼓楼前面的一道短墙作为隐身处，伺载沣经过时投掷炸药罐。不巧，那时鼓楼西斜街工始改筑马路，不能行走。当时沿后海边虽较空旷，但坑洼不平，加以银锭桥北的路口很窄，马车难以通行。所以，载沣上朝的路线只能暂改为穿鸦儿胡同、烟袋斜街，再转入鼓楼大街。汪精卫等人"调查其路线必取道烟袋斜街"，就想在烟袋斜街动手，从房子里头出其不意投出炸弹，可偏偏一时又无房可租。后来汪精卫、黄复生等再经"多方调查"，发现摄政王从王府到鸦儿胡同的中间，必须走过一座小桥，那桥由几块大石板架成，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小水潭，"仅一面（北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卷154页）。桥北有一阴沟，直通到甘露胡同口的甘水桥下。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最后"择定"在这个小桥下埋炸弹。（《黄复生供述》，同上书，167页）计划将炸药罐埋在小石板桥下，安装上雷管，炸药罐"旁边有一罗丝，拧着一根电线往北通"，人躲在北边的阴沟内引爆。等载沣的马车过桥时，用电发火引爆。

他们立即按计划行动。黄复生、喻云纪早已掌握制造炸弹的技术，向铁铺定做了一个可以装四五十磅炸药的大铁罐，填好炸药，又在旧鼓楼大街清虚观内租了一间房子。商定由黄复生、喻云纪负责埋炸药，由汪精卫负责引爆。

1910年3月31日夜，黄复生、喻云纪二人来到小石桥下挖坑，刚掘一会儿，就听犬吠声四起，因耽心发生意外，便回去了。第二天午夜，夜深人静，两人再次前往，挖好了坑，把大铁罐放入。偶然间，黄复生发现桥上有人在朝下窥视，一闪又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赶紧分头行动。喻云纪赶到清虚观去通知汪精卫。黄复生避到一棵大树后观查，只见一个人手持灯笼到桥边照了一下，又走掉了。黄复生急忙再到桥下，想取走东西，由于炸药罐太重，一个人无法取出，只好用泥土草草盖上。待他又一次躲到树后，便看到刚才那个人已带着一个警察、一个宪兵搜查来了。

当夜，暗杀团成员在东北园召开了紧急会议，重新筹划行动。会议决定由喻云纪到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

璧君到南洋筹款，汪精卫与黄复生留守北京。第二天，黄、喻装作过路人再次到小石桥边察看，桥边已有持枪警察来往巡逻，两人只得离去。没想到他俩的服饰、行止已引起桥边暗探的注意，当下便有人盯梢，一直盯到琉璃厂守真相馆。

埋在桥下的炸药罐被警察发现后，没有一个警察敢上前挪动，最后还是到日本使馆请来一名技正，才将铁罐连同雷管电线拔了出来。事发后，朝中大员更加惶恐，全城警探"极形骚扰"。官方严嘱各报不准宣泄消息，并责令警方尽快破案。

守真照相馆被密探监视后，警察根据铁罐的形状，派人到京城铁匠铺挨户清查，查出是螺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所造。店主又供出，铁罐是琉璃厂守真相馆订做的。二月二十七日(4月6日)上午，警察在守真照相馆拘捕了黄复生和相馆司事罗召勋。

清廷判处汪精卫、黄复生永远监禁。辛亥革命后，汪、黄才获释。

第二年2月下旬，汪精卫作为迎袁世凯南下的南京临时政府专使之一，再度北上。故地重游，又一次来到那紧挨着醇王府的小石板桥上。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以抒情怀。

从上述汪精卫谋炸载沣的过程，可知谋炸地点是摄政王府和鸦儿胡同之间的一座无名小石板桥。曾任摄政王马队卫士、参与侦破谋炸案的金祥瑞准确地指出："发生炸弹案的桥是在载沣府之迤东、鸦儿胡同迤西"的"一小型石桥(无名，往北通甘水桥)"。(金祥瑞：《我是怎样侦破谋炸摄政王一案的》，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之八，第469页)挖炸药罐的目击者右翼统带吉兰亭也说是在"甘水桥迤南之小石桥"。(《中华周报》1944年第1卷，第10期，第14页)其位置在醇王府车马号门外之东南角。我们又可以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宣统三年军咨府测地局绘制的《监国摄政王校阅图》中看到那座无名小石板桥。它的位置南近后海，东、西是两个小水潭，正是摄政王府到鸦儿胡同所必经之路。鼓楼西大街、甘水桥一带的老住户中至今还有人记得：在摄政王府和鸦儿胡同之间，即今后海北沿31至32号之间的丁字街街口，早先确实有那座石板桥。但因为当时这座小桥地处偏僻，极少行人，少为人知，以至连个名字都没有。所以不知情的人听说有人在什刹海附近的桥下谋炸要去上朝的摄政王，自然不会想到是在那座没有名称的小桥下。

(摘自《民国春秋》)

风云人物

倪映典

倪映典字炳章，安徽合肥人，1885年9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玉泉，是个乡村医生；映典自幼随父亲学医。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和约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年青的倪映典，他不愿再伏处乡里，想出外寻找报国的机会。

1904年，倪映典考入安庆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在学兵营里，爱读欧美革命史和宣传革命的书籍，与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学柏文蔚、孙棨等接近，加入了革命团体岳王会。1906年，他以术科优异成绩毕业，入军见习，因遭排挤，弃差至江宁，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将校科，结业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倪在江宁与赵声、吴春阳、柏文蔚、冷遹、龚镇鹏等相往还，经常在鸡鸣寺聚议革命进行方法。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第九镇被派往萍乡镇压，倪随队出发。他与赵声等密谋寻机响应起义，不果。次年返宁后，应同学邀，往安庆任新军炮队教练。两江总督端方、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以其私自离职，追回禁闭一月，事后又改授马队队官，加以怀柔。同年，经皖抚冯煦请调，倪映典始得回皖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他与该队官熊成基、步队管带冷遹、薛哲等联络，共谋于次年春间发动起义。1908年2月11日，倪等正在薛哲营中议事，冷遹匆忙来告事泄，当局下令捕人，倪只得将后事托付给熊成基等，秘密逃往芜湖、合肥。由于端方严令通缉，他又偕方楚乔去沪，然后同舟赴粤，投奔赵声。

1909年春，广东新军步、炮、工、辎各营次第建立，成为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军队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夏，他们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会议，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工。倪是干事员之一，他发给每人二百张同盟会盟票，在军队中扩张组织。当时，他任炮一营右队二排长，旋调任左队二排长。该营管带齐汝汉是安徽人，知道倪一点底细，见倪行动可疑，便借故将其斥革，倪只得在军外继续活动。赵声也因此受当局怀疑。

同年10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等报告运动军队情况。南方支部决定次年发动起义，将决定电告孙中山，并电请黄兴、赵声、谭人凤等来港主持。南方支部还发布了倪手订的《运动军事章程十条》，

指导活动。在南方支部主持下，起义准备作了明确的分工，倪映典负责新军，张醁村、姚雨平运动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会党，陈炯明、邹鲁、林云陔、莫纪彭、郑赞丞、方楚乔等都参加了活动，筹款、筹械、调查、通信、宣传、联络，均有专人负责。不久，赵声回到广州，住华宁里遇兴隆客栈，主持全部军事。为使赵声无后顾之忧，倪映典与胡汉民相商，将赵声家属从镇江接到香港。起义正在积极准备中，12月28日发生了突然变故。一标长官发现了同盟会盟票，为此，排长巴泽宪逃亡。这件事虽没酿成大案，却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于是倪映典赶赴香港，将起义时间定为庚戌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元宵节。为避免遭受敌人破坏，起义机关又增加了雅荷塘、清水濠等九处，贮藏枪枝、弹药、旗帜、文件。有的机关由妇女驻守，以掩人耳目。

1910年2月7日(己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借迎接赵声父亲抵港的机会，赵声、倪映典等领导者均赴香港会议起义军事。行后，广州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2月9日(己酉除夕)傍晚，新军二标士兵因细故与店家争执，警察上前干涉，相互交哄，新军包围警局。消息传至香港，倪映典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紧急磋商，认为新军可能因此被遣散，那样就将失去基本队伍，不如孤注一掷。于是，决定正月初六日(2月15日)起义。倪迅即于2月11日(正月初二日)晚赶回到广州。

这时，广州形势更加紧张，庚戌元旦(2月10日)二标士兵结队入城，捣毁警局多处。粤督一面布置镇压，一面派人安抚、压制。新军协统张哲培到二标训话，并将枪枝、弹药运进城，宣布全协初二日不放假，初三阅操。初二日，驻北教场的二、三标已被防营监视，驻燕塘的一标因不放假大哗，又因传有兵来攻，纷纷夺械出防。谭瀛、黄洪昆等乘机鼓动士兵到各处夺取枪械子弹，协统、标统均逃逸。当晚，奉命安抚士兵的军官黄士龙回城时又被旗兵打伤，新军群情更加激愤，跃跃欲试。

该晚，倪映典了解到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次日起义。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上午，倪映典来到燕塘炮一营，这时，齐汝汉正集合士兵训话，倪用枪将齐击倒，号召士兵们起义，炮工辎四营响应，推倪为总司令。倪率队到一标，击毙队官胡思深，士兵响应。倪分兵攻城，自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清军早有防备，水师提督李准坐镇东门，派统领吴宗禹率二千余人分路进攻。下午，两军相遇，吴部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新军进入阵地。清军管带童常标(倪旧部、同乡)、李景濂(同盟会员)心怀不良，施毒计谋害倪映典。他们伪装调停，诱使倪上前会面，倪未加怀疑当面晓以大义，以争取防营一同行动。童等佯装赞同，推此事须请示统领，驰回阵地即下令开枪。倪还在巡视战场，受伤堕马，被清兵抢去，砍头而死。

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奋起猛攻，激战一小时有余，终因伤亡惨重、弹药不继而退却。延至次晚，起义军的反抗全为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倪映典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过去习惯称之为“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曲诗文

曲诗文，亦作士文(1843—1914)。山东莱阳县旌旗乡柏林庄人。父曲老五，曾充太平社社长，乡望素孚。曲诗文家境贫寒，仅有十亩山地，三间房舍。“身短目圆，皮微红，而左目斜，善走，颇富记忆性”。虽目不识丁，但阅历深，见识广，能言善辩，喜为人排难解纷，深受邻里敬重，人称“曲大爷”，是宣统二年(1910年)莱阳人民抗捐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莱阳社仓是光绪六年(1880年)经各乡社议决创办的，常年积谷，以备荒歉。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共积谷一万余石。劣绅于赞扬、张相谟等怂恿当时的县令傅锟，以“红朽不堪”为由将积谷变卖(变卖中有私吞)，所得钱一万三千余吊，以年息一分存入天福当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圻、于赞扬又将这笔谷款提出，分别存在自己开设的钱庄中，蚕食鲸吞，中饱私囊。至宣统二年(1910年)劣绅们宣称“只存(钱)四千吊，余皆无有”。乡民忍无可忍，纷纷就近向各乡、社长索要。某些家资颇饶的乡、社长愿出谷赈灾或垫付捐税。曲诗文与其弟曲桂舟邀集各村代表二十余人，在城西北二十余里的北镇口唐家庵集会，筹划成立联庄会向劣绅讨还积谷。三月十八日(4月27日)，西北乡三十多个村的五、六十名代表再次集会于唐家庵，议决联庄会以曲诗文为总指挥，另一著名抗捐者、永庄社社长于祝三负责联络。并规定以“转牌”传达命令，“转牌”所至，户出一丁，集合待命。

四月十三日(5月12日)，西北乡数千饥民应“转牌”之召，人持口袋一条到河头店集合，要求进城索谷。曲诗文恐人多滋事，仅率代表三十余人进城与绅董谈判。由于厕身代表之列而实则劣绅走卒的高西峰告密，各绅董闻讯避匿。代表们转至县署求见知县，为门丁所阻。城外误传曲诗文被拘押，饥民蜂拥而至，索谷之声惊天动地。知县朱槐之张惶失措，被迫答应群众以下几项要求：一、免收人口捐；二、减收戏捐；三、征收钱粮专用铜元，不折不扣；四、不肖门丁、各班衙役及绅董乡长，有鱼肉乡里者，即速撤换；五、往年积谷无论何人侵吞，非从速垫出不可。乡民退出县城后，又在西关药王庙会集，重申盟誓：如果官府背信失义逮捕请愿代表，各村以鸣钟为号，互相救援。

继乡民围署索谷之后，又有僧道数百人进城要求停止提庙产协新政，并追回前此已被提取之庙产。朱槐之"外宽而内忮，才庸而心狠"，阳为允诺，将僧道解散，暗中飞调古砚村水师营兵四十名赶至莱阳，逮捕为首请愿僧道二十八名，尼姑五名，严刑拷掠，当场刑毙僧人一名。并指令城内各铁铺赶制镣铐百副备用，扬言捕捉曲诗文等人。

二十七日，曲诗文由北而南"转牌"告急。翌日，数万乡民集合于南岚镇西沽河岸。适接于祝三秘函，要求迅速包围县城。曲率众东行，沿途群众络绎加入，声势愈加壮大。大队驻扎于马山埠一带，设大营于柏林庄庙内，曲任总指挥，于祝三、李寿山等分任各路指挥。各村严密设卡，层层包围县城。曲诗文又发布兴义师檄文，谴责莱阳官绅"假新法之名，增加赋税，不务实际。行苛政阴险惨毒，不可端倪"，致使"民生日艰，民命日蹙"，"如坐水火，救援无路"，声称"今天赐我以济民之任，吾必杀尽贪官污吏与诸绅士，斩草除根"。这支抗捐税的农民军武器十分落后，主要是木棒、铁叉、铁锨、鸟枪和少数土炮，木棍上绑上稻草当大旗，但士气十分旺盛。乡民各家自备食物，"提壶挈榼者来自各村，运送炮药者达于周道"，虽大雨荷蓑笠不复散"。农民军纪律良好，"不践田禾，不宿民居，无灶无帐，昼夜露宿于河壖之上"。

六月初四日（7月10日），农民军开始进攻。曲诗文首先从城北亭山发炮轰城，群众蜂拥而上，但城防甚严，未能攻破。旋又从城东北、西北及东南各个方位发起攻击，均未奏效。初六日（7月12日）曲诗文横刀跃马，身先士卒，不幸在攻城时坠马伤额，只得暂时收兵。

莱阳人民的斗争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奎保、杨耀琳据守孤城，惊恐万状，连连告急。军机处电令孙宝琦"督饬各队赶紧扑灭，毋任蔓延"，"以解散胁从，密拿首要为主义"。孙宝琦遵照朝廷意旨，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一方面利用农民军组织不严、成份不纯的弱点，派人劝谕招抚，瓦解了水沟头李寿山部二万多人。另方面又派遣省巡防队协统叶长安、登莱青镇总兵李安堂率大军前往镇压，甚至勾结侵据胶州湾的德帝国主义 出动兵舰和军队围困农民军。初七日（7月13日），叶、李两军炮击九里河农民军阵地，杨耀琳亦驱使兵弁由城内出击，夹攻农民军。曲诗文率队退守柏林庄。嗣又经柏林庄、马连庄等数次战斗，乡民们虽然英勇抗击，终因力量悬殊，死伤惨重，战斗遂告失败。官兵兽性发作，大肆奸淫杀戮，莱阳人民遭此洗劫，居民被杀一千六百余人，房舍被毁千余户。

其后，曲诗文辗转匿藏，受到群众的保护。所到之处，"乡民义之，供给钱饭如故"。官府悬赏通缉，而"无肯出首之者。以为曲大爷总为我等抗税，义不可负"。宣统三年（1911年）秋，曲诗文曾联合招远县郭福年准备再次攻打莱阳，不久失败，曲再度流亡他乡。民国三年（1914年）9月，由于莱阳劣绅告密，曲诗文为县令周大封捕获，解往烟台，惨遭杀害，享年七十二岁。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珍闻轶事

同盟会与保皇党在日本的争斗

一九一〇年（庚戌）秋，留日中国学生为英军侵入片马事，开大会于东京锦辉馆，赴会者千余人，宋教仁担任主席。正当与会者争先发言猛烈抨击清朝政府时，保皇党分子白坚起立发言，婆婆妈妈地劝大家不要对政府过激，要放和平些。白坚的这些话，惹起了大众的愤怒，纷纷以盛纸烟灰的竹筒向他掷去。童显汉在人丛中喊了一声"打"，跟着李功照就以手杖击中白坚的头部，打得他血流被面。日本警视厅早已派出"刑事"（侦探）数人站在楼梯旁监视会场的行动，这时就蜂拥而上，捉住了功照。川籍同盟会会员多人见同志被捉，都奋不顾身，向日本刑事手中夺人，于是便互相搏斗起来，拳脚并用，打得异常厉害，终因我们人多，把功照夺下来了。由于会场乱成一片，日本刑事已不容易把功照认出来。趁这当口，宋教仁就与日本刑事办交涉说："今天开会是为我们的国家大事，必须让我们把会开完。至于什么人违犯警章，会毕依法处理好了。"日本刑事表示同意（主要是因为这次会是对付英帝国主义的），我们即继续开会。到会的一个广东同志就住在锦辉馆附近，我们要他去取一套和服给功照换上（功照穿的羽沙洋服上装已于打架时撕破）。这位同志的日语流利，形态也象日人，虽然大门外已布下警视网，但他仍能混过，把和服取了回来。我们多人故意起立争吵，把日本刑事的注意引向台上，掩护功照换了衣服。会开完后，日本刑事大声地说："今天动手的凶犯，我们已认识清楚，逃脱不了！"出大门时，确有多人被捕。被捕者由两日警左右挟持，进入神田警视厅。被捕的人悉属四川同志，有吴景英、喻培棣、张懋隆、曾宝森、张冲、余际唐、王子骞七人。大家见功照不在内，都放了心。他们在警视厅待讯时，只见与我们搏斗过的刑事数人神色仓皇，三番五次地进进

出出，把我们的人数点了又点，最后威胁地说：'最主要的犯人已在逃，他当然是你们的同党，赶快说出他的姓名和住址，还可望从宽发落，否则就要严办。"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地拍手大笑，并以日语答道："堂堂日本帝国的侦探，连真实要犯都捉不到，却把我们这些无辜者捉来逼供，未免可笑！未免可笑！"这些话已把刑事气得满脸通红，加上培棣又骂了几声"马鹿，滚出去！"刑事便把怒气发泄在培棣身上，将他关入黑屋。川省和外省的同志纷纷派代表持送点心、面包、汽水、水果等物前来慰问，并传来消息说，此事已由教仁向日本民党议员疏通，事态不至严重。到黄昏时，坐在张冲、王子骞中间的吴景英忽然叫了一声"哎哟！"问他何事，他说功照的破衣被他带进来了。张冲骂他胡涂，便趁着天色昏暗，把破衣丢入厕所。审问是个别进行的，事后彼此对证，问官说得都是一样的话，说什么"学生贵在读书，不应干预国家的事；这次从宽，以后不可再犯"，等等。张懋隆还把问官戏弄了一番。当庭上问话时，懋隆总是摇头答称不懂。庭上的翻译拿中国语问他，他又答以："你是说的哪国话？又象中国话，又不象中国话，我一点也听不懂。"问官听了他的话后，便提笔写了一行大字："学生应好好读书，以后不可如此。"懋隆拖过笔去，以草书写下"小生这次并未如此"数字。问官气极，连声大骂："马鹿，马鹿，滚出去！"

懋隆、宝森、子骞先后回到贷屋(租佃的屋子)，见功照在家，心乃大慰；但为预防日警的调查，翌日即把功照送到千驮谷四川同志胡国梁住所住了两周，终于平静无事，结束了这一桩公案。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国会请愿中的汤化龙

1910年，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加紧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立宪派也加快了他们推动清政府早日实行宪政的步伐。当年1月、6月和10月，发动了三次叩头请愿，乞求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迅速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各省代表齐集北京，露宿宫门，断指割臂，血泪陈辞，力图感化清室，实行宪政。一时间，汤化龙出入北京，八方联络，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充当了一名激进的角色。

前两次请愿，都在清政府的敷衍延宕和威胁利诱下归于失败，忧愤交加的立宪派并不屈服于清政府的压力，第三次请愿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7月12日，湖北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举行集会，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强硬口号。8月9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许多省的议长和副议长都赶到北京参加会议，汤化龙被推为会长，主持讨论各省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速开国会案》，汤化龙是其中"持议最恳挚者"。这对国会请愿代表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与鼓舞。很快，请愿运动就进入到高潮，各省也都出现了异常热烈的群众运动场面，迫使清政府于11月4日颁发上谕，把原定宣统九年(1917)开设宪院改为宣统五年。从表面上看，这是清政府对立宪派的一个重大让步，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主张，引起了汤化龙等人的极度失望。所以，当11月7日，国会请愿运动中的温和派江浙两省谘议局通电祝贺国会缩期召开之时，湖北、直隶等省立宪派仍然坚持至迟宣统三年即开国会的主张。汤化龙在湖北，"鼓吹国会益力，舆论愈激昂"。他联合39个团体的2000多名代表，在武汉举行大会，要求湖广总督瑞澂代表，力促朝廷提前开设国会，并函电交驰，"与各省呼应"。1911年6月，汤化龙再度赴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行前，汉口33个商团保安会和88个商业行帮共1万多人，在汉口跑马集会为汤送行。汤化龙在会上发表演讲，激烈抨击清廷"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筹备宪政，毫无诚意，内阁大权，悉授亲贵，以致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维新绝望，大陆将沉"。他表示此番北上为完成三大要事："一为简贤任能，组织完全内阁；二为提前实现宪政；三为早日召开国会"。他宣誓说："务达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即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均所不惜！"表现出犯阙直陈的决心和虽死不辞的气概。然而，任你把头叩得头破血流，把口说得舌敝唇焦，也不能使冥顽不灵的清政府回心转意。

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了，但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反动而愚蠢的清政府以暴力镇压了这次爱国运动，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也把立宪派逼上了赞助革命的道路，使他们认清了清政府"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真面目。汤化龙在北京亲眼看到，举朝亲贵，不是迂腐老朽，就是纨绔子弟，根本不知宪政为何物，"早知清廷之亡不远矣！"当时与汤化龙交往密切的徐佛苏曾回忆说：国会请愿失败后，"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无情的事实使汤化龙对清政府完全绝望，他之所以在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打响、胜负未卜之时就站在革命的湖北军政府一边，"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

（摘自《民国春秋》）

流行风

小说《新孽海花》

作者陆士谔,主要内容:

描写江苏昆山县一才貌出众的女子苏慧儿,从小父母双亡,在伯父家长大,伯母的内侄李墨迂愚蠢俗气,想娶苏慧儿为妻,慧儿对伯父发誓宁可终身不嫁。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朱其昌,英俊潇洒,一日和朋友去赏梅花,遇到苏慧儿,归途中有一伙强盗要劫持慧儿,朱其昌奋力相救,后两人倾心相爱。但朱其昌父母从小为他订了亲事,他不敢违抗父命,所以心情矛盾。回家途中,他又遇到那伙强盗并被他们扣压,强盗头领声称要抢苏慧儿做压寨夫人。后朱其昌被救出,并设法送苏慧儿去上海就学避难,他和友人则一起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汇试。其间李墨迂又向慧儿伯父正式提亲,慧儿伯父贪图钱财答应下来,苏慧儿听说后转至它处躲避。此时朱其昌在京应试得中,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他父母原给他定的女子也因病而死。朱其昌南下找到苏慧儿,两人终于幸福结合。全书描写细腻,但语言缺乏个性,人物刻画不够生动,书中有些爱国主义思想,但流于说教,不太真实。此书被很多人误为《孽海花》的续书,其实内容与《孽海花》毫不相干,水平也相差甚远。

小说《十年游学记》

作者红叶,主要内容:

该书系作者根据十年中的经历及见闻,回忆整理而写成的。作者自从十二岁进了女子学堂,随她的父亲,宦游各省,差不多把全国繁盛的地方走过了一大半,到过的学堂也不知有多少,一直到二十二岁,才结束了东奔西走的游学生活,这当中耳闻目见了许多新闻奇事。作者在书中,通过所见所闻之事,揭露了当时晚清女子学堂里面的黑幕,痛斥了学堂的腐败和堕落。首先,办学的人本身就不正派,不学无术,他们以办学为名,实际上不是敛钱肥己,就是满足私欲,赌钱、看戏,有的甚至直接去干那些败坏学校风气的勾当。在这样的学校里,很多学生沾染了恶习,沉溺于邪说,也做出了种种伤风败俗的丑事。作者在书中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学堂的腐败,直接反映出了社会的腐败,指出:"这就像传染病的病菌一般,到处传播开来,全国将受其毒害,一时溃发起来,就有极灵的消毒剂,也挽救不及了。"从学堂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晚清社会日渐衰败的现状,切中了时弊。作者在书中指出:"一国的强弱,在乎政府;政府的优劣,在乎人材;人材的得失,在乎教育。"这种认识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在书中作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妇女问题,由衷地发出感叹:"一个人做了弱国的百姓,是生趣毫无,何况又做了一个弱国里面的女子,更有什么希望?"作者在书中边叙事边议论,语言流畅,叙事清楚,是一本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书。但作者毕竟生长在清代官吏家庭,虽然书中揭示了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仍是改良主义的办法,书中对革命志士及革命行动显然是持不支持态度的。

小说《劫馀灰》

作者吴趼人,主要内容:

该书叙述因丈夫被诱卖作猪仔以后的一个女性的悲剧。书中男主人公陈耕伯,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就到省城大书馆去读书,由于用功上进,学问与年俱进。十六岁去省赶考得中,家里十分欢喜,不料他的叔叔仲晦,竟趁他在省的时候把他串卖去做猪仔。女主人公朱婉贞,自幼丧母,在父亲的教育下,知书达理,自幼与陈耕伯订婚。在她外祖母七十寿辰时,父女同去祝寿,并顺便寻访陈耕伯的下落。去的途中,仲晦把她的父亲骗上岸,将婉贞骗到香港,卖到妓院,婉贞不从,被禁锢毒打。后来婉贞骗了鸨儿,并设法借烧香之机,向正在进香的地方官伸冤递状。正巧此官是他父亲的朋友,因而得救。并派人雇船送她回去。不幸当船行至肇庆峡时,因水流过急船翻了,别人都被救起,唯独她被冲走。漂流了很久,被一官舟救起。此官想收她为妾,她竭力反抗,被殴打至死。于是官家用一薄棺木,草率装殓。让佣人抬到郊外埋葬,路遇狂风暴雨,抬棺人将棺木搁在旷野。实际上婉贞并未死,只是暂时气绝,过了一段时间便苏醒过来,踢棺而出。正值她走投无路时,看见一个尼庵,泣告遭遇后被收留。由于种种磨难使得她在庵里一病不起。庵主找了个医生给她治病。医生非常豪爽,不但医好了婉贞的病,而且还亲自送她回家。后来有人在长沙遇到仲晦,耕伯父急欲得知儿子的消息,便与此人同去湖南。不料仲晦已因犯罪入狱,几经寻问,终不吐口,最后说耕伯已在香港病死了。耕伯父信以为

真。回家后，婉贞得知此讯悲痛万分，故立志守节，照例抱木成亲。意想不到，几年后耕伯竟生还，并且早已在外娶妻生子。经过全家议定两人平等，不分妻妾，姐妹相称，一家人幸福的团聚。

历史档案

本溪湖煤矿合同

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奉天。

奉天交涉司使现奉东三省总督派委，督办本溪煤矿一切事宜，兹特与日商大仓喜八郎订立合同如左：

第一款　此合同订定得中国政府批准后，本溪湖煤矿即作为中、日两国商人合办事业，定名为：本溪湖商办煤矿有限公司。以下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称为公司，大仓喜八郎称为大仓。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兹允将本溪湖煤矿作权利股本银北洋大龙元三十五万元，准公司开采，经此合同批准开办之日，公司即须将此项矿股三十五万元之股票呈交中国政府，收执管业。

第三款　公司办理本溪湖煤矿，其股本限定二百万元，以北洋大银元为准，中、日商人各出其半。中国商人现已有中国政府所出之矿股银三十五万元，应再出股本银元六十五万元，其余一百万元归大仓担任。所有矿股及股本之利息由开办及交股银之日起算。

第四款　本溪湖煤矿开办后，每年所得余利照后开章程办理：

甲、先付二百万股本之利息，按常年八厘计算，即每百元付利息洋八元，每年一付。如公司所得盈余不足付八厘利息之时，可付八厘以下之利息。

乙、即支利息之后，所余之款分作十份，以一份提作公积，以二份五提交中国政府，作为公司报效中国国家之款，其余六份五归中、日股东平分。此项公积金，将来由股东察核情形，如认为十分充足时，可即停止，惟此项公积不能分得利息。

第五款　公司总办，中、日各任一员，其他各员由两总办协商，务期平均委派。所有该矿各项新旧工程以及支付款项须由两总办商妥签字后，方可举行，并须随时报告督办。各项账目以及一切证据书类须用合格中、日公司员工照至善方法办理，以中、日两文缮写，俾两总办易于核阅。凡有应行事务均由中、日两总办办理，或委员代理，由公司出名，公司署押。公司计算帐目以及分配利益，一切均按中历办理。

第六款　公司开办日期即以奉到中国政府批准合办之日为始。

第七款　公司开办以后，如必须添加股本或借债时，由两总办协商后，再商允两国股东，方可举办。其款，中、日两国各任一半，惟不得借用中、日两国以外之款。至公司除必须借债时外，所有一切财产不得抵押与人，股东亦不得将股票任意售卖。所用开矿工人以雇用中国人民为主。

第八款　此合同以三十年为限，由奉到中国政府批准之日起算，计至第三十年底止，即此合同满了之期，至期即行解散，中国政府即将所得矿股之股票交还公司，将矿区收回。所有公司之一切动产、铁轨、坑木及建筑物应从速公平估价折售，将售得款项以及公积之款，中、日股东各得一半，即将本合同作废。所有公司发给股东之股票均应于合同满了时缴消作废。

但本合同满期之后，中、日股东皆愿续约，则可商议展长期限。惟本合同满期之后，无论何时，中国政府如愿自办，其矿区即由中国收回。公司所有之动产、铁轨、坑木及建筑物由中国国家按照公平估价收买，公司即行解散。

第九款　公司应纳之税，每出煤一英吨，纳厘金库平宝银六分，又税银库平宝银一钱。所有公司使用之官有地面，每亩每年纳库平银二钱。公司如将煤运输出口，每一英吨应纳海关税库平银一钱。以后如中国各省准予中外合办之煤矿其纳税银有较以上更低者，公司亦可禀请援照完纳。将来农工商部矿务新章宣布实行后，此合同如有应行增改之处，经东三省总督饬知即当遵照办理。

第十款　公司应用之材料、物件除须完纳海关例税之外，其余厘金一概豁免。

第十一款　本溪湖煤矿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元年闰二月底止，经大仓独立开采，所有投入之一切款项，中国政府准予作股本银北洋银元一百万元，即作为大仓名下交付公司之股本。所有一切机器、房屋、工程、仓库、物料等件，即于此合同批准之日由大仓切实点交与公司收管，公司即将此项股本一百万元之股票交与大仓收执。此期间内，大仓所投入之一切款项即经中国政府准予作为股本，则大仓在此期内所有售得之煤价应由中国政府派员协同大仓详细切实调查清楚，即由大仓尽数交付与公司。自宣统元年三月以后，至公司开采之日止，大仓添置机器及其他必需之工程等项投入之各款，应由公司确实

查明认为正当之款者，即由公司付给，此种机器、工程等项即归公司收管。大仓并应将三月以后历来售得之煤价，协同公司详细结算清楚，由大仓尽数交付与公司。其现存矿地之煤斤亦应如数交与公司管理，不得索取价值。

第十二款　公司开采煤矿之区域应于此合同批准后，由督宪派员详细丈量，绘定四至详图，交给公司，遵照采办。倘公司于工作时寻获古物，应归中国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公司开采煤矿，其区域内所用之土地应出公平之租价。如遇必需拆房及迁移坟墓等事，应禀饬地方官转饬该业主办理，公司当出公平之赔补费及迁移费。

第十四款　此合同签印后，由督办委派妥员，会同大仓之代表人预备一切开办事宜，并限于三个月内订立营业详章，呈候督办核定，报明督宪批准照办。

第十五款　此合同以中、日两国文字缮写五分，以一分督宪存案，以一分呈交涉司，一分交大仓，一分交公司，一分交日本总领事馆。遇有误解时，专以中文字意为凭。

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奉天交涉司使韩国钧

总领事小池张造、大仓喜八郎

国会请愿书

请愿国会咨议局代表孙洪伊、绅民代表李长生、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旗籍代表文耀、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会代表姚文枬、商会代表沈懋昭、上海苏州商会代表杭祖良、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南洋暨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等谨上书。

敬肃者：窃中国今日之国势，其忧患危迫可谓极矣。政府棼乱于上，士民怨渎于下，各国协商协约于外。以国内之棼乱怨渎言之，则无时无事不可以亡国。以各国之协商协约言之，则无时无事不可促我以亡国。譬如孤舟遇风，生死呼吸，同舟者既束手待毙，而四面又皆敌人，安有幸存之理。观近来外人之评论吾国也，曰财政紊乱，可以亡国，吾侪当监督其财政。饥民流寇，可以亡国，吾侪当派遣舰队，以资镇压。夫外国人谓吾国之必亡，犹可言也。乃吾国人士，亦终日惶骇，奔走呼吁，若皆有汲汲顾影不可终日之概。懦者明知国之将亡，而始终存一灰冷之心，健者日求所以救亡，而遇事挫折，不获一逞，亦时萌灰冷之念。哀莫大于心死，今吾国人之于国事，其心未死者有几。呜呼。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此代表等今日所以万难含默，而披鳞触忌、剖心泣血，欲与我执政诸公一痛陈之也。窃谓吾国致亡之途虽多，然其总因则首在国家政体不定。代表等所谓政体者维何，即立宪政体也。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区别，即首在宪法之有无，而国会者又为宪法上之最重要机关。无国会即无宪政之可言，此非代表等之私言，实世界各国极平常之见解也。此中理论，万言难宣。代表等昨呈都察院代奏之请愿书，已将吾国速开国会之利益与吾国有决可速开国会之理由，一一论列，兹更无烦复述。代表等今只就政府一面之危急情形，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者略言两事可也。

一曰：吾国若不速开国会，则一切现行法律皆无根据不能推行也。夫国家所恃以存立者，在有法律以维系一切秩序。各立宪国之所以尊重国会，与国会之所以能维持国家者，首在国会之握有立法权以编纂一切法律法规也。今吾国无此立法机关，故政务日益紊乱，官民毫无遵守。近来宪政编查馆与各部院所颁布之现行法律规章非无妥惬者，司员中非无明达者，然颁布之后，不独无甚效力，且多置若罔闻。若因此即谓人民无研究法律之程度耶，则民间号称法政淹通之士，平日素喜研求各国法律者，今对于国中之现行法，亦多不经意。且非独在野者如此也，即主持立法之各部院与各省行政官吏，又何尝有信奉此种法律之心乎。甚成〔或〕本身行事显犯本身所订之法律，亦悍然不顾。推此原因，则由于此种法律非协赞于国会之中，无论其优劣不足以耸朝野之观听，人民必鄙屑之。此世界人类普通之性情，非独吾国为然。倘非人民所信仰之法律，而可使人民尊重耶。则欧美各国又何不召集国中人才于行政部院之中，命其编纂法律，而必斤斤设立国会畀以立法之全权耶。此其故可深长思矣。夫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立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若人民所要求者在立法权，而政府则曰：我亦能立法。是人民所要求之物在此，政府所畀与之物在彼，所答非所问，其根本上已与人民之心理相反。人民走于狂热，其物之美恶不暇辨，必不任受，无怪其然。况国会既开之后，经多数之讨论，其编纂之法律，必与少数司员之讨论者较为详备乎。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则国家可谓为无法律之国家，官吏为无法律之官吏，人民为无法律之人民。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国家安得不亡。此最可痛心者。故吾国今日人民只知要求国会，对于一切不完善之法律皆可视若弁髦。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虽然，谁无祖宗庐墓，谁无室家，岂有不思患预防之理。

此代表等今日要求速开国会之一大理由也。

一曰：吾国若不速开国会，则政府一切政策皆不能确定也。夫国家之所以能日即于强盛者，其行政上一时有一时之政策。若政策不确定，则政务不能酌别先后缓急之序，虽如何励精图治，必无裨于国福民利。甚或求治日殷，反以益国政之棼乱，促国运于危亡。此各国政府所以必有

一定之政策以为行政之纲领也。政策既决定之后，则内阁各部大臣皆加入此连带责任之中，兼程并进，故百政具举，国势日隆。今吾国则不然，事事无一定之政策。全国官吏，西突东奔，渺无意识。军机按日入值，不知所值者为何事。各部堂宪、各省大吏，掌握行政，不知所行者为何事。其因循苟且不负责任者，因为溺职殃民，即恪恭尽瘁夙夜勤劳者，亦无一政绩可睹。均之无益于救亡也。此非苛论，按之现在事实，即可瞭然。例如枢府欲取中央集权政策，则各省督抚联衔电争以挠之。督抚欲取地方分权政策，则枢府可奏陈圣听以扼之。海陆军大臣欲取扩张军备政策，则度支部与各督抚皆不协筹军需。农工商部欲取整顿实业政策，则度支部既不拨给经费，而海军处又到处争拨巨款，致无余力可以经营实业。度支部欲取财政统一政策，则地方长官暗中梗议，虽清理财政一事，亦受把持。他如筹一的款，拟办一事，则各部或奏请拨充，各省或奏请截留，函电纷驰，辗转请托，竞争国帑，如攘私利，令人骇然。全国政务如乱麻，全国政策如飘蓬，扰扰纷纷，徒以召乱。夫吾国何以毫无政策一至此耶，则亦因无国会之故。盖无国会，其始也，则责任内阁无所倚重，不能成立，各部政务无连带责任之关系，故行政上各不相谋，必至各部有各部之政策，或各部均无所谓政策。其继也，因无国会以公共讨论，则所谓政策者必系政府一面之理想，不能惬于国势民情，合于世界大势。其终也，则所取之政策，无论是否，不能得全国人之信用而遇事阻挠，甚或惹起民间之激争，足以隳非常之大业，灰当国者之热心，此祸之最显著者。若既经开会之后，而共同讨论其政策，则朝野联为一气，政府始能贯彻其主张。虽一时国会程度或有不逮，然政府与国会常相接洽，出以大公，则议员亦不至轻于反对，可提携牖导，以跻于中正。且政府之苦心，亦可邀人民之共谅。国家者，为全国人之国家，其政治又何不可与国人共之也。乃吾国执政诸公，因近来国中舆论混淆，以为纵开国会恐亦无裨于国家大政，殊不知吾国今日何尝有正当之舆论乎。凡国中一大事之发生也，则民间所倡之言论，不过少数人之意见，一时一事之感触，故甲说与乙说相反，前说与后说相违，是非难于决择。盖吾国宪政未成，既无国会，复无政党，不能集合数百千人讨论国事，其舆论原难悉当，无足深怪。而国中人才虽有卓识远见者，不能遽显其清议于社会，故其理终湮，国事易败耳。若速开国会之后，则必有伟大稳健之舆论腾布国中，而异说必见渐消，纳于一轨，政府乃可借重此等舆论，以为施政之方针。夫国会既赞成之于前，自能协助之于后。考各国历史，当未开国会之时，则舆论散布社会，辄与政府为敌，既开国会之后，则舆论集中于国会，遇事可资协赞。故代表等窃计此时若能上下一心，共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纵议论或有参差，情势并无隔膜，亦正不难调和之也。此代表等今日要求速开国会之一大理由也。

以上所论，吾国若不速开国会，其害之大，至易明瞭。代表等深察国中情形，朝不保夕，觉即从速召集国会尚恐不能救亡，况并此国会亦靳而不予。窃恐人心一散，危局更难支持。观近来各省兵变民变之事，数月之间，已数十起，为前此所未闻。虽幸扑灭，未即蔓延，而祸机隐伏，有触必发。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盗贼蜂起，人民涂炭，宗社邱墟，思之良可寒心。何则，各省民穷财尽，今已无可为讳，况复加之以饥馑，激之以外患，煽之以革党，而政令纷歧，官吏贪婪，又无时无事不可以速乱乎。代表等鳃鳃过计，与其俟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此非代表等丧心病狂，故作危耸之词，以荧执政诸公之听也。诚上迫宗社之危，下逼人民之委托，惶恐陈情，势难中止，故语无忌讳，不及选择。惟原其心而宽其罪，幸甚。除胪列情形，呈由都察院代奏外，合再泣陈愚悃，仰候钧裁，不胜悲悚待命之至。

张永成报告山东莱阳反绅抗粮致军部呈

宣统二年五月——六月(1910年6月—8月)

署理近畿陆军第五镇统制官张永成为呈报事：窃照山东登州府属莱阳县有绅民聚众入城，硬将仓米变价公用，业经列折呈报在案。兹查五月初间，该县复有乡民二次聚众，并查海阳县亦有乡民聚众情事。又闻曹州府属曹县以南现有匪徒聚居，除已派弁分投密探，乃俟探报确实，详情再行呈报外，理合先将大概情形缮开清折，具文呈报钧部鉴核。为此具呈，伏乞照验施行。须至呈者。详呈清折一扣。

右呈

陆军部

宣统二年五月十九日

清折

署理近畿陆军第五镇统制官张永成谨将山东登州、曹州等府属乡民聚众滋事及土匪聚居大概情形，缮开清折，恭呈钧鉴。

计开：

一、闻登州府莱阳县民二次聚众，向绅追索前二十年所卖仓谷，有旌旗乡土棍曲士文、曲贵舟与王景岳挟嫌，藉势结党执械，于五月初四日，勒胁至二千余人，将王景岳住房拆毁，物件焚烧。初六日，将高丹斋住房拆毁，逼勒各户管饭，已在城西截劫来往行人，又烧毁陈姓两家住房。

现查登州府知府于五月十四日电禀抚台云：抚宪鉴：元秘电谨遵。今杜弁来禀：朱令委王把总凤袍、富户姜尔寿与各乡社长见曲士文婉说，邀求各款，朱令均允，已出

示晓谕。初九日，乡民解散。文祺寒禀。又莱阳县知县朱槐之电禀抚台云：乡民二次聚众，并未进城，现已妥为解散，安谧如常，堪纾宪廑。一切情形，容另禀详陈。

一、登州府海阳县有土棍宋煊文父子，纠民抗粮，经县先后拿办，禀请监禁。该县乡民亦聚众，于四月廿九日有拆毁县署情事。现查登州府知府于五月十五日电抚台云：抚宪鉴：适得委员禀：海阳聚众，虽已解散，现向四乡富户索赴县川费。方令畏葸无能，难善其后，请速饬殷令来任。仍请拨登州镇兵八棚驻扎县境，以为声势。文祺禀。删。

一、闻曹州府有一匪目朱姓，据称系前明之后，拥多数军火，现据山东、河南交界曹县之南约八九十里，地名老君寨，聚有二三百人。该处地方绅董百姓致贺该匪目，演剧八日。并闻系由攻打河南归德府不成而归，聚于此，未知确否。

宣统二年五月　　　日

袁树勋报告镇压广州新军起事电

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3月)

民政部钧鉴：申密。粤省筹办新军，本极困难。去腊拿获三点会革命党孽供，有散票牵涉梧军情事。密饬该将领查拿，旋在标营起出票纸数张，正在审讯。除夕，二标兵与警兵冲突滋事，当经解散。元旦，二标兵又结党寻仇，拆毁警局，殴伤警兵，亦经弹压息事。乃凌晨，炮工辎各营及一标全营，藉报复警兵，同时谋变，炮营管带齐汝汉不从，立为排长倪映典枪毙。复逼二标全营、三标一营，幸各枪械全缴，不致从变。协标统不能压制，经树勋持令示谕，各叛兵口出逆言，不肯回营缴械，负隅抗拒，不得已于江辰派吴道和禹督防营进剿。叛兵分路来扑，我兵枪炮齐施，当场杀毙叛兵百余名，并阵斩骑勇头目五人，生擒叛兵黄洪昆等四十余人，夺回快枪千余枝，军械子弹无算。各叛兵纷纷逃窜，复遗火焚烧一标营房，我军正在追捕，不及救护，追至狗头山一带，时已昏黑，始行收队。星夜飞檄水陆各路，四面先后拿获三百余人，复有陆续缴械来投者六百余人，余已星散。据黄洪昆供称：头目倪映典即在阵斩五人之内。现仍分饬各路搜捕余党，地方安静如常，中外商民及各国教堂，均无损害。各段巡警，亦得照常出勤。惟初一日二标营兵拆毁老新城一局、五局，并滋扰 六局及东南关一局。又初三日战事方殷，竟被匪徒乘间焚毁西关六局。统计损失甚巨，刻正分别除办，料理善后，合并声明。树勋。鱼。

岑春蓂等关于镇压长沙等地饥民暴动电

宣统二年三月(1910年4月)

外务部、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民政部、瑞制台钧鉴：申。初九日，鄂、湘会衔电奏，文曰：初五日电、初六日电计邀钧览。湘省痞徒滋事，烧拆教堂、学堂，春蓂歌、鱼两电已约略陈明。先后饬派鄂军赴湘弹压，亦经激陈请代奏在案。兹据布政使庄赓良等查得城内北门正街圣公会、道门口信义会、北门外两天主堂、大西门外太古码头趸船、傍栈、怡和趸船均被焚毁。城区西长街东牌楼两福音堂、黎家坡女医院、日本领事住屋、学院街内地会、北门外湘春街南门外社坛街两福音堂各被拆毁。西长街教堂木料被拆后，连他件一并焚毁。大西门外长沙新关蒙养院、城内府中学、南门外中路师范及铁道各学堂亦被烧毁。西门街大清银行门扇玻璃窗格打坏，银钱并无损失。美商美孚、英商怡和、德商瑞记、日本商东信三井各洋行、日本邮便局、长沙关官银号、工程巡捕各局，皆被打毁。各洋行什物，多有抢失。宝剂街、福庆街、天心阁各教堂并西牌楼玺礼学堂医院、南正街雅礼医院、晏家塘医院均经弁兵竭力保护，并无损伤，各国官商教士眷属共六十余人，一律保护上轮，乘坐民船赴汉。伏查此次该痞等怀挟私忿，胆敢藉口米贵饥荒，聚众殴官焚署，烧毁各教堂学堂，实属不法已极。亟应严拿首要，尽数惩办，以照炯戒。先是该痞等日夜间在善化县南门外鳌山庙警察分局围闹。经该局警察官周腾开导，旋聚旋散。初三日下午，复聚千余人，地方营县标消防所长闻信驰往，在当场拿获刘永福一名送巡警公所审讯。巡警道赖承裕前往解散，该痞等不服理论，逞凶将该道殴伤，遂与城内各匪，合通一气，分至抚臬各署前滋闹。先行焚毁各教堂，致成交涉巨案，实堪痛恨。刘永福素在群匪徒中构煽，已于初六日正法。善化县郭中广、警察委员知县周腾于该痞等初闹时，但称业已解散，并将凶狠情形，切实禀报预防。郭中广及长沙县余屏垣于平粜事宜毫无筹划，迨至初四日，聚人愈多，而临时又不能善为开导解散，均属咎无可辞。相应请旨将郭中广、余屏垣、周腾、长沙协都司贵龄、抚标左营守备周赞泰、消防所所长游击龚培林一并革职。巡警道赖承裕、长沙关道朱延熙、长沙府汪凤瀛均有地方之责，不能先事预防，应请分别交部议处。署长沙协副将杨明远缉捕向称认真，此次保护各国官商，异常出力，功过尚足相抵。抚标中军参将连升先期即赴岳州查禁米谷出口，均请免议。仍责令杨明远赶紧拿获惩办，以策后效。赖承裕先行撤任，委试用道张鸿年署理。除檄饬遵照并仍督饬文武各员严拿首要各犯，务获惩办，并派员将各教堂洋行毁拆房屋，损失财物，详细查勘估计，以备议偿外，谨乞代奏。再英国现到小兵轮一艘前来保护商务，闻尚有兵舰续来，已饬长沙关道朱

延熙与候补道胡得立、卢守孟往拜英国兵船管带，慰劳道歉。一面出示晓谕居民，告以新兵轮专为保护洋商财产而来，毋庸惊慌疑惑。衡州、湘潭等处痞徒，狃因米谷价贵，打毁砻坊生事，诚恐各属闻风滋生事端，迭经电饬各属严密防范，将教堂及游历洋人切实保护，合并声明。等语。谨电达。瑞澂、岑春蓂叩。初九日。

复孙中山书

黄兴

（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

中山先生鉴：三月十四号之电及廿八号之详函均前后收到。各同志读之，有此极大希望，靡不欢跃之至。兹委任状已办妥，同日由邮挂号寄上，乞查察施行为是。再将弟与伯先兄之意见略陈之，以备采择焉。

（一）先生与军人所议之方略，与此间所已得手运动之情形略有不同。弟与伯先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辎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现虽有议移高州之说，恐一时尚不能实行。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反正者甚众。现总督水陆提皆以巡防队可靠，（可断定多会党，运动必易，以湘人运动尤易）闻往招湘人约千人。北江一带约数百人，将来专为省防之用。李准原有之亲兵队约千余人（内同志甚多）。总共巡防计有三千之谱。若此兵数一能运动，则外无反对者。其方法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使其部下将校自相混乱（因皆李私人，多不得兵心，若易统领，则必更换其管带哨弁等，而兵卒之心更离矣）。变更于此变更之时，广用金钱（兵卒皆不丰足，负债者甚多，益以嫖赌，其势更岌岌），不一月可悉收其众。前次之失，立可恢复。省城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至广西一隅，同志之在陆军者约数千人（李书城、孙启、杨源浚均在此），以刻尚未招兵训练，无可假手。至秋期则兵数想亦可招足，此方面不必顾虑，自能联合也。外会党一面，刻虽清乡，其人众稍为所慑，然兵去则聚，自成常例，至时亦可号召之。前所运动之基础固未摧坏，再扩张之，自易易也。总之，广东之事，视款为难易。以普通一般之军队多贪鄙嗜利，况有义字以激发之，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此！此弟与伯先兄观察广东巡防军队之心理而可以断定者也。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此次新军之败，乃在例外）。倘先生与军人已决议择一点，为训练兵卒、接收器械之处，亦不难图之，而为省城之外援。现广州湾已查得一地（此李应生与甄吉亭到该处查获者），可向法人批租。其地为旧公园。目下有一法人垦之不利，该处之公使亟欲弃之，价不过三千余金，又有房屋多间（有一大洋楼），另给千余元均可得。又李应生亦有地在该处，伊祖父给之使其自营者，亦可为之开辟。又张静皆兄亦有意在该处垦地。如一得款，可由李、张、甄等出名至该处领地，藏数千人，势亦不难。且新军中之高州人散归者，颇能团结一气，不为少馁。其该处之来联盟者日进无已（前新军之头目为之主盟，巡防会党皆有），若二标移往该处，则势更好（闻五月间其在茂名、化州之营房可起）。此处可决定为之，一便于接械，二便于出西江，扼上游（南宁）之冲，收服巡防各队。略定西省南服，将来其有助于省军必大也。郭人漳处，自弟出后，弟曾通信一次，乃言王德润事，未见其复。今袁督之子与伊至交，且兼有戚谊，若与商约，恐必举发其阴谋。惟有至时降服之，否亦杀之不足惜。至其所部之众，其新军一营驻廉州者为伯先旧部，今正闻广州之事，已跃跃欲试。余一营为湖南老营，多不满意于伊。他则皆巡防耳。一朝有变，反侧随之，无他虑也。然弟当试以他术，嗜利之徒或能可动，亦未可知，当总以不告以秘密为是。

（一）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今满洲之马杰及渤海之海贼，去岁萱野返日已带有二三人来，均有势力者。伊等只要求费用，即可活动。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众，扰乱满洲方面，趋近杀虎口、张家口一带（口外无兵，可随意越过），以惊撼北京，此则为出奇者也。势虽不成，牵制北清之兵力有余。又北清之新军，同志在其间者亦不少。前岁西那拉氏之变，伊等欲乘机运动，虽无大效力，然种子已播，兹更图之，亦不难也。长江一带之会党，久已倾心于吾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王金发君等可得主动之。至三江之陆军，其将校半多同志，今岁闻伯先兄在粤举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势，若事前与之联络，择其缜密者为之枢纽，势不难与两粤并。湖北之陆军虽腐败，然开通者亦不少。去岁有孙武者（湖北人）竭力运动，闻成绩亦好。湘中之新军虽不及万人，然有数同志为管带队官等，又督练公所及参谋等多同志人，较他处亦不弱。云南同志亦多得力，其经营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此次巨款若成，择其紧要、办其缓急以图之，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而吾党散漫之态，亦从而精神活动可无疑也。

（一）军人拟聘武员及各种技师前来，预备充组织及教练之用。此事弟等思之，颇有难处。无论难得地点，即有地点（譬如已得广州湾言），恐集合多人，耳目众多，流言四起，外人或不注意，满吏则必为之枕席不安也。况多数外人来此，尤易招目，此事可否婉曲商之，云吾党初期之预备，虽稍宽以时日，然后招聘人员（俟初期预备完全，由此间报告后，然后招聘方为妥当）。在伊等视之，以为此事必非速速可成，而吾等于稍宽之时日中得完全成功，出伊

意外，想伊亦不见忌，必乐为我用也。我等于事起后，伊等之来，自是有益，此两无妨害之事，伊亦必允从。否则伊来，如事前败坏或放逐之类，皆于大局有关，且于教练实际上断不能施行。此种情形，想先生亦知之深矣。

(一)组组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一有款，弟拟去日本招求已归内地之同志(有胆识者)来日会议后，分遣担任赴内地运动各事。其智识卓绝或不能回内地者，则留驻日本，或招来港中，为组织总机关之人员。但目今不能详举其人名，以近二三年来未与共办一事，而为外间浮言所中者居多。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如孙少侯君其人也。杨笃生君在英专志科学，有款先生必要之归。此人思想缜密，有类精卫，文采、人品亦如之，美材也。蔡子民君在德，此人虽无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亦难得多。吴稚晖君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他如在东山西之景定成君，湖北之黄运甓君，四川之李肇甫，湖南之左仲远、龚超(已出狱)、张百莼(三君皆有才，可办事，惟宜一方面)、刘揆一、宋教仁，山东之商启予、丁惟汾，陕西之于右任，江苏之章樟等，皆能办事。此不过举其一二，至其能在内地实行运动者亦不乏人，想可招之使来。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赵伯先兄于军事甚踊跃担任，此次款项若成，可委广东发难之军事于伊，命弟为之参谋以补其短，庶于事有济。伯先兄刻虽不能入内地，以军界多属望于伊，为之自亦易易。若能得一次大会议，分担责任，各尽其才，事无不成矣。

以上所述意见，弟与伯先兄相同，可作两人函视也。

弟自去腊来港，省事败后，郁郁居此，一筹莫展。二月十八与展兄、伯先同赴新加坡，欲运动小款以接济港中目前之危困。适先生此函至，毅生兄电弟等返港。弟与伯先兄先后返港，展兄稍留，少得款后，亦当归也。现港中穷乏已极，势将不支。先生处如可筹得二三千元电来，以解眉急，尤为盼切。

再要者：该军人及资家如不能运动，此刻想先生处已得实答，此委任状亦不必给之。以其中人名与省分不同者多，倘后日发见，必传为笑柄也。至要，至要！又弟在新加坡时，宫崎由日来电约弟来港相晤。及弟来港，伊偕儿玉右二来，此人与寺内正毅有关系，大约日政府见满洲交涉无大进步，而清军队之表同情于吾党者日多，或一旦吾党势力可成，伊既无要求于满政府，而又不见好于吾党，两无所据；又恐他国与吾党密近，将来排斥已国，于东亚殊难立足。有此隐情，故宫崎乘间运动长谷川大将名好道者，由长谷川将宫崎所铺张吾党之势力绍介于寺内，故寺内密派儿玉与宫崎来调查吾党势力，不过证实宫崎之前言耳。在港不过一礼拜，弟稍夸张出之，略言法、美国民皆表同情，或能怂恿之，亦未可知也。

精卫兄事详毅、实两兄函，不另。手此，即请筹安。弟黄兴顿首，四月初五日。

据黄一欧影印件，现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选自《黄兴集》第17—2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0日　学部奏，京师大学筹设经、法政、文、格致、农、工、商、医八科。

1月11日　浙江乌程、归安人民抗漕起事。

1月17日　清廷赏给游学专门列入一等之詹天佑等工科进士，严复、伍光建等文科进士，张康仁法科进士，列入二等之刘冠雄等工科举人。

浙江德清县农民聚众抗漕。

1月21日　孙中山由纽约赴旧金山。途经芝加哥，出席欢迎大会发表革命演说，并成立同盟会分会。又在当地华侨中募款，连同纽约、波士顿两地所得共八千元，先后电汇给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充作起义经费。

1月23日　黄兴自日本抵香港，加强对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领导，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

1月24日　各省谘议局代表通告各省谘议局，已在京组织“速开国会同志会”，盼联络同志，同时并进。

1月25日　浙江桐乡农民抗漕，数千人冲入县城，捣毁“便民仓”及县署。

1月26日　各省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向都察院请愿速开国会。

1月30日　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贝勒载洵，事泄被捕。2月27日在吉林省城就义。

清廷以各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等请速开国会，命仍俟九年预备完全再行降旨(议员等不满，即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于北京，推孙洪伊等六人为常驻委员)。

清廷从宪政编查馆之请，命京外各衙门一律设宪政筹备处。

清廷诏准黎大钧等呈请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

1月31日　清廷颁行禁买卖人口条款。

2月6日　上海瑞顺丝厂女工数千人反对资方积欠工资，罢工获胜。

浙江仙居盐商横暴，激起民变，乡民千余人捣毁盐店，反动官兵大肆残杀，至2月11日乡民被杀者三十四人。

浙江太平、仙居两县农民，因查禁烟苗，聚众万余人进城反抗。

浙江宁海苛罚种烟户，二十余村农民联合反抗。

2月7日　国会速开同志会电各省绅商学团体请赶设分会，暂以京师代表团为开会总部(并派员赴各省游说)。

2月9日　广州新军二标士兵胡英元，因购名片细故，与警察冲突，被捕。次日二标士兵数百人，愤同事被捕，执械捣毁警察局，遂成军警冲突大风潮。

2月10日　孙中山自纽约抵旧金山。到达后即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款项，积极筹建革命组织。

达赖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商妥川军入藏问题。

2月11日　广州新军事变扩大。一标士兵与二标士兵取一致行动，并击伤标统刘雨哲。新军革命党人杨风岐等派人报省、港统筹部，请赵声、倪映典等速来指挥。

2月12日　倪映典由香港回广州，号召新军立即举义。倪映典被举为司令，率新军二千余人向省城进攻。行至横枝冈，为清水师提督李准部截击，倪映典头部中弹而死。余众虽奋勇对敌，终以寡不敌众溃败。此役计阵亡者百余人。

川军进入西藏拉萨，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2月15日　清廷以广东新军与会党联合，进行革命活动，命军谘处、陆军部、南北洋大臣、新旧诸军，严密稽查，并严查聚众开会演说。

2月16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立同盟会分会，加盟侨胞十余人。孙中山亲自主盟，在誓词中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更改为"驱逐鞑虏清朝，创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十八字，将中国同盟会会员署称"中华革命党党员"。

2月19日　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在上海出版。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

2月25日　清廷革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名号，令驻藏大臣别立达赖喇嘛。

2月27日清廷命军谘大臣载涛赴日美英德意奥俄考察陆军事宜。

2月28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论述革命之必要时指出：清朝政府之腐朽已不可救药，"正如破屋漏舟，必难补治，必当破除，而从新建设也"。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

2月　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推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南洋英、荷所属各埠亦设分会。其在南洋之势力"骎骎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3月8日　江苏省宜兴县调查户口，每户索钱二十文，激起民愤，群众打毁绅董住宅，焚毁学堂。

浙江温州因禁烟，乡民发生暴动。

3月10日　清廷命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勿称奴才。

3月11日　山西交城、文水两县二十三村乡民万余人反抗禁种烟苗。13日，清军突然袭击，乡民被杀害四五十人。

3月12日　外务部电东三省总督锡良等，锦瑷铁路日俄要求甚多，其他各国意见尚未得实，合同应从缓议。

湖南巡抚岑春煊宣布自4月7日起禁止米谷出口，在此期间奸商与外国洋行纷纷抢购，米谷大量外流，米价暴涨。

3月24日　邮传部批准湖北设立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4月22日英、法、德使向外务部抗议，美使亦要求参加借款。

杭州城内居民抗议日商违约营业。

3月28日　孙中山自旧金山抵达檀香山。4月4日，在自由新报社召集会议，将檀香山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加盟者二十余人。以后又有许多进步华侨竞相到报社要求加盟。

安徽南陵县人民与奸商展开斗争，反对稻米出口，逼令开市，打毁商店。

3月31日　南京城内饥民聚众抢米。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

3月　继旧金山之后，美国西部一些城市亦陆续建立同盟会。孙中山为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之统一领导，成立"美洲三藩市(即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总会"(通称美洲同盟总会)。

孙中山致函黄兴(时在香港)，提出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之计划。

4月2日　黄复生(树中)、喻培伦、汪兆铭等谋炸摄政王载沣，未成(镇南关、河口失败后，黄兴、赵声等加紧在广州新军中积蓄力量，汪兆铭、黄复生等则加紧酝酿个人暗杀活动)。

4月5日　湖北石首县附近三县饥民暴动。天门、潜山等县亦发生类似事件。

4月9日　江苏吴县乡民因反抗调查户口，捣毁自治分局。

4月10日　浙江武康乡民因反对抽收警捐，发生暴动，毁县署，殴知县。

4月12日　湖南长沙南城外群众一二百人，到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开粜坊救济乡民，次日官府捕人，群情大愤。

4月13日湖南长沙饥民两万余人到巡抚衙门要求“减价粜米”。围巡抚衙门，殴巡警道赖承裕，抢米店。

河南密县人民抗捐，毁县署。

4月14日　长沙饥民捣毁巡抚衙门，纵火焚烧，波及教堂、学堂、洋行，巡抚岑春煊走避，官军开枪镇压，死伤多人。

江苏泰州乡民捣毁户口调查员住宅一百六十余家，殴伤绅董。

4月15日　代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到职。

浙江嘉兴王店肉商抗捐罢市，豆腐业罢工，捣毁警局。

4月16日　江苏东台乡民捣毁学堂。

谋刺清摄政王之黄复生、汪兆铭、罗世勋在北京被捕(20日判黄、汪永远监禁，罗监禁十年)。

4月17日　江苏清江饥民二万余人抢大丰面厂。

4月19日　浙江慈谿人民反抗征捐办学，聚众焚毁学堂(4月25日始息。4月24日上虞学堂亦被捣毁)。

4月21日　浙江长兴县人民聚众捣毁厘局(4月25日又打毁警局)。

江苏阜宁商民罢市，拘囚知县李绍卿(李旋被撤职)。

4月22日　江苏海州新浦饥民焚劫海丰面粉厂。

江苏震泽乡民捣毁调查户口之绅董房屋及调查员住宅。

浙江遂安人民捣毁学堂。

4月27日　江苏宿迁饥民连日抢粮。是日聚众万余人抢永丰面粉厂。宝应饥民亦有围困县署索粮之事。

江西抚州万余人因要求禁运米粮出境，围困县署，抢米店。

5月1日　湖北武穴饥民连日抢米。

5月3日　湖南宁乡乡民聚众焚毁警局、教堂、学堂多处。

5月4日　江苏盐城人民反抗调查户口，殴打调查员，捣毁绅董住宅、劝学所学堂、教育会等。江苏各州县；上元、泰州、吴江、常熟、通州、兴化、高邮、武进、阳湖、丹徒、金坛、太仓、镇泽均先后发生相同事件(据《东方杂志》称：江苏省各州县，反对调查户口事件，“几乎无地不有，无时不有”)。

5月4日　孙中山致函芝加哥同盟会员梅培，勉励革命党人“各竭其能力，从种种方面以助革命之进行”；并告以檀香山加盟者已达八百余人。

学部奏报第一次教育统计表(光绪三十三年度)，各省学校数为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八所，学生数为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又《辞书》教育统计表三为八十八万三千二百十八人)。

5月9日　清廷命资政院于本年9月1日(10月3日)开院，并公布钦定宗室王公世爵各部院官及硕学通儒议员八十八人名单。

浙江德清新市人民反对勒派警捐，捣毁警察局。

5月11日　江西临江、新喻、湖口三县乡民抢米，吉安府居民聚众禁阻米谷外运。

5月13日　黄兴自香港复函孙中山，谓各同志对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计划，“靡不欢跃之至”。并汇报国内革命运动情况，陈述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等项意见。

5月15日　清廷颁布现行刑律。

5月16日　保定学生胡荣铭(鄂公)等在保定正式成立“共和会”，到会者有天津、北京、通州等地代表，举胡鄂公、林伯衡、熊得山等七人为干事，胡为干事长。

5月18日　江苏太仓乡民聚众索还户口册，捣毁学堂、店铺。

5月19日　江苏东台人民捣毁学堂及平粜米分处。泰兴县亦发生相同事件。

安徽南陵人民聚众殴伤户口调查员。

5月21日　山东莱阳县农民曲诗文等五六千人集会要求减免捐税钱粮等项，各乡僧道闻讯亦前往县署要求免征庙产。次日县令朱槐之调兵镇压，群情大愤。

5月24日　奉天、安东(丹东)、凤凰、宽甸连日发生抢粮风潮(7月1日再起)。

5月25日　各省谘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一律选定。

5月30日　孙中山因接同志函催，决定东返就近领导国内革命运动。是日离开檀香山。

6月5日　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

6月6日　山东海阳人民抗拒苛捐，聚众攻入县城，并向知县提出减免捐税钱粮及开放粮仓以济贫民等项要求(6月8日知县被迫应允人民要求，事始息)。

安徽和州饥民千余人抢粮，并捣毁自治公所。

6月7日　奉天各地普遍发生抢米风潮。

6月12日　山东莱阳农民万余，再度进城包围县署。次日增至三、四万人，到处捣毁富户，并再次提出减免税捐钱粮等项要求。县令朱槐之被迫应允“减免各项杂捐及巡警不得下乡”等项。朱旋被撤职，奎保继任，完全推翻前项协议，拘拿首领曲诗文等。

广东香山僧道抗捐，捣毁捐局(事起于6月7日)。

6月14日　湖南常德大水成灾。

6月15日　孙中山自檀香山抵日本横滨。登岸后即被当地警署着令离境，遂于次日化名潜往东京。在东京与黄兴、赵声等会见，并谋设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行动。

6月16日　各省请愿速开国会，代表孙洪伊等二次向都察院递呈(6月21日都察院入奏)。

6月20日　湖北房县饥民捣毁县署。

河南长葛人民五六千人反对增税，捣毁县署。

6月21日　湖北沔阳县饥民抢米。

广东新安县数千妇女抗钉门牌(至7月20日始停)。

湖南巴陵、临湘交界处长乐街地方饥民联合会党暴动。

6月23日　广东罗定人民反抗调查户口，殴打户口调查员。

6月25日　孙中山因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不准居留东京，乃于是日离开日本，经香港前往南洋。

6月27日　谘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并各省商会、教育会、华侨及直省绅民旗籍代表，二次请求速开国会。清廷谕“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定期召集议院，不得再行续请”。请愿代表即变更组织，扩大范围，改名为“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定明年二月三次请愿。

6月28日　浙江奉化乡民捣毁学堂。

6月30日　四川夔州府商民罢市，反对加收厘金。

7月1日　东京留学生会议，援助北京国会请愿团。

浙江会稽、上虞、景宁三县乡民均发生捣毁学堂、教育会事件。

7月2日　山东候补道杨耀琳率兵到莱阳，肆行焚杀，镇压人民抗捐抗税斗争。

广西归顺(今靖西)、镇边(今睦边)人民抗钉门牌，围攻城厢(经月始息)。

7月3日　安徽芜湖、宁国大水成灾。

7月4日　山东莱阳农民愤官府食言，官兵杀伤乡民，聚众五六万人，围困县城。

安徽宣城饥民聚众抢米。

7月8日　广西南宁乡民六万余人反抗新捐。

7月9日　陕西同盟会、哥老会、新军等各界代表井勿幕、钱鼎、张云山、胡景翼等三十余人，于大雁塔开联席会议，“歃水为盟，共图大举”。

7月11日　孙中山自日本抵新加坡。随后即函约各地革命党人前来会商，以便决定今后革命方针。

7月12日　山东烟台道派何锡、修振邦等前往莱阳“招抚”抗捐抗税群众，诱骗农民，停止反抗。14日，山东官兵第五镇统领叶长盛等部乘群众不备炮轰莱阳，肆行屠杀，死者四五百人，伤者千余。

外务部电出使德、美、英、比、荷大臣，密探各国对日俄协约意见。

湖南沅江饥民数千人起事。

贵州古泥人民要求免征人头税，数千人焚毁学堂、公所、教民住宅等。

7月15日　出使英、日、比等大臣电外务部：日俄协约，英法欢迎，美德奥反对。

贵州王有义聚数万人拟起事，省城戒严。

7月19日　孙中山由新加坡抵槟榔屿。从新整顿会务，照美洲、檀岛之例，重订新章自后庇能为南洋革命之总机关。

浙江余姚乡民暴动，捣毁学堂。

7月21日　河南长葛乡民反对加征地丁，聚众捣毁县署。

江苏桃源(今泗阳)乡民暴动，殴伤知县。

7月22日　上海正元、兆康、谦会三钱庄倒闭，市面大震。

7月27日　直隶易州人民反抗加捐，聚众四、五千人，焚毁自治局、中学堂，并向知县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派敛钱文”等八项条件。

8月6日　福建诏安数千人起事，树“奉天命明朝军”大旗，与官兵接仗。

8月10日　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防军与贫民联合暴动，攻毁衙署及各衙署局所。

广西全州因清乡引起民变。12日聚众万余人，捆清乡员，游行示威，焚劣绅二十六家。

8月14日　江苏如皋人民反对调查户口，聚众起事。

浙江天台会党何无旺、嵊县会党竺绍康联合起事。

8月15日　清政府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借款日金二百二十万元，实收二百十四万五千元，用以收赎京汉铁路。

国会请愿代表团议决于资政院开会时上书请愿，另通告各省谘议局，如不达目的，即不承认新租税，各局同时解散。

8月18日　载洵、萨镇冰离北京赴上海，转往美国、日本考察海军(24日离上海，随员为周自齐、郑汝成等)。11月3日离日回国。

广东大埔乡民因反抗调查户口，反抗钉门牌，被官兵击毙多人。

8月19日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日俄协约成立，东北大局益危，请设立垦务局，特简大员督办其事，招垦内地移民，分段垦辟，按年进行。并借外债三千万两，以半数设立东三省实业银行，半数移民开垦，开矿筑路。

8月22日　日韩合邦条约成立。

浙江长兴乡民反抗调查户口，聚众捣毁学堂，围困知县，旋波及教堂(事起于8月17日，至8月28日始停)。

8月23日　清政府将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令其不准干预路事。

8月25日　清廷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

8月27日　浙江新昌学堂被焚毁。

8月29日　日本宣布合并韩国(朝鲜)，封韩皇为李王。

8月29日　广西思恩府都阳土司辖境乡民数万人

起事，冲进土司衙门，杀死土官。

8月　广西同盟会支部在桂林成立，支部长耿毅，先后加盟者二百多人，主要为新军士兵和陆军小学堂学员。并出版“南报”(后改名“南风报”作为宣传机关)。辛亥革命时领导广西独立。

孙中山发函南洋各地，指导同盟会组织整顿工作：为便于开展活动，推广在盟书上改署“中华革命党党员”之做法；为扩充组织，取消新会员缴纳入会费之规定；对各分会主要干部发薪等。

9月5日　清廷从度支部外务部奏，即照锡良所请(见8月19日)，准由东省商借外债。设立垦务局一节，俟借款定议，再请旨办理。

安徽涡阳、蒙城、凤台李大志、张学廉等联合饥民起事。初仅三千余人，至12日增至四万余人。

9月6日　“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

9月13日　浙江铁路胶东连次大会，坚留总理汤寿潜，即请巡抚增韫奏恳销去“不准干预路事”字样。

9月15日　广东连州乡民反抗调查户口，反抗钉门牌，聚众起事，焚毁学堂，并攻破连州城附近之三江城，焚毁美国教堂。两广总督增祺派官兵驰往连州镇压，大肆杀戮。事经两月余始停。

9月18日　湖北新军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在武昌新军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部召开成立会，推杨王鹏为社长，为避免军政当局干涉，在其新订章程中佯称：“本社专以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为宗旨。新军士兵入社者十分踊跃。

9月22日　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各省督抚，主先设内阁国会，再行借款筑路。9月27日及10月4日再电申此义，各督抚均电复赞同，推李经羲主稿，联衔上奏。

9月23日　清廷召集资政院议员。

9月26日　清廷命近畿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镇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裁撤近畿督练公所。第二、第四两镇仍在直隶驻扎，第三、第五两镇仍在东三省山东驻扎。

9月29日　广东罗定州军队数千哗变。

10月1日　广九铁路通车。

10月3日　资政院开院，监国摄政王载沣临院宣布训辞。

各省谘议局第二届会议(浙江谘议局为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事请巡抚代奏，收回成命停议待旨)。

10月5日　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

10月6日　清廷命所有东三省借款仍由度支部与美使议借。

10月8日　上海源丰银号倒闭(该银号在各省设分号十七处)。

10月11日　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之《民立报》正式发刊，同盟会员来往日本、南洋、香港、广州及汉口等地者，多以该报为联络中心。

“振武学社”在武昌黄鹤楼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由杨王鹏任主席，讨论扩充社务等问题。时共有社员二百四十余人。

10月14日　清政府以上海市面吃紧，允张人骏即借洋款酌剂，并借拨运库银五十万两。

10月18日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开幕。10月24日闭幕。

10月19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速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20日及21日京津学生响应)。

10月20日　广西泗城一带哥老会活动，有号称明永历王后裔者，聚众六千余人起事。

10月22日　资政院接受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要求决议上奏清廷，请速开国会。

10月24日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设责任内阁。

10月25日　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电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时事艰难，请先行组织责任内阁。

10月26日　资政院通过奏请速开国会。

10月27日　陕西巡抚恩寿奏，请先立责任内阁，再定期召集国会。

10月28日　以顺直各省谘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锡良等电奏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开设议院，命将原折电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共同阅看，预备召见。

10月30日　河南巡抚宝棻奏请赶前颁命钦定宪法。

10月—11月上旬　孙中山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分析形势并提出重新组织起义之任务。指出：“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捐，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而要发动起义，“自当多赖新军之助，此事非有小款，无从布置联络各省为一气。故今日之急，以在外洋运动款项为第一要义。”他号召革命党人以募集十万元为目标，努力进行。

11月2日　顺直谘议局议决，开平矿产亟宜完全收回，以保利权。

11月3日　清廷以各省督抚及资政院奏请钦颁宪法，组织内阁，速开国会，召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等，“垂询”讨论。

11月4日　清廷诏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

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预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并命各省代表即日散归(国会请愿同志会中之“预备立宪公会派”以有相当结果，不再进行，但其他各派，如湖北之汤化龙、湖南之谭延闿、四川之蒲殿俊等，仍坚持速开国会之议，与公会派分离，仍留北京活动，谋为第四次请愿)。

浙江遂昌乡民反抗勒派杂捐学租，捣毁学堂、监狱、巡警总局、自治事务所，围住衙署。

11月5日　清廷命资政院总裁溥伦、度支部尚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

11月上旬　同盟会员邓佐治在旧金山谋刺考察宪政之清海军大臣载洵，被捕下狱。

11月11日　云南全省学堂罢课，反对政府出卖矿产。

11月13日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会议总结了过去屡遭失败之经验教训，分析了“革命之风潮已盛”之形势，号召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会议经过统一思想，决定积极筹集巨款，准备再于广州举行起义，并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择革命党人五百名为“先锋”。计划占领广州后，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11月16日　河南长葛乡民反对加税，聚众捣毁县署。

11月中旬　孙中山又召集槟榔屿同盟会员开会，动员募款。会议即席认捐达八千余元。

11月25日　河南叶县乡民反对新捐，聚众二万人进城请愿，要求免办“自治”。

11月27日　云南大姚会党邓良臣、阿可培等攻占县城，称大元帅，清廷命滇督李经羲严拿首要。

11月29日　清廷谕称河南“盗风增剧，将酿巨乱”，拿宝棻严督所属进行镇压。

11月中、下旬　孙中山派赵声往香港联络广州新军，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孙中山因各地殖民当局禁止他入境，便在槟榔屿以通信方式运动筹款。

11月　湖北新军队官施化龙向清军协统黎元洪密告“振武学社”杨王鹏等密谋革命，黎元洪遂将杨王鹏等撤职逼走。“振武学社”社务由蒋翊武继续主持。

12月2日　广西贵县、武宣、雒容、柳城等地灾荒严重，饥民频起暴动。

资政院奏请速裁厘加税。

资政院议决地方学务章程，会同学部具奏。

俄政府讨论兼并北满问题，决暂从缓，但须保持北满权利。

12月4日　奉天各界人民万余人集会，要求速开国会。

12月6日　南洋英殖民当局以孙中山活动“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出境。孙中山于是日离槟榔屿赴欧美筹款。

12月18日　资政院奏劾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迅即组织责任内阁。诏以朝廷自有权衡，非院臣所得擅预，斥之。次日、资政院决定再劾军机大臣。

12月21日　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顺直谘议局议长等呈请于明年即开国会。清廷不准。

12月24日　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要求速开国会代表，送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弹压拿办。

12月28日　孙中山抵巴黎。

12月29日　四川全省学界罢课，要求速开国会。

12月30日　资政院请明谕剪发易服，命毋庸议。

资政院议事未竣，延长会期十日(1911年1月11日闭会)。

12月　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受同盟会革命影响于四川黔江创立铁血英雄会，印《铁卷》、《革命军》等革命书刊，广为宣传。附近彭水、酉阳及湖北省荔川、咸丰先后入会者万余人。是年于彭水起义，1911年1月7日攻占黔江，后为清军所败。

《商务报》被封后，詹大悲、查光佛等复措资创办《大江报》，是月在汉口刊行。

是年春　新军第二十镇(时驻奉天新民府)军官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发起组织革命团体武学研究会。辛亥革命时该会成员为发动直隶滦州起义主要领导力量。

是年冬　同盟会员刘思复、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等于香港创立支那暗杀团。1911年8月党人林冠慈、陈敬岳谋刺清水师提督李准即为该团所策划。

同盟会在柬埔寨成立分会。

外　交

1月6日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照会中、日、英、法、俄、德各国，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因日、俄两国反对，未能实现)。

1月21日　日本声明反对美国满洲铁路中立之提议。

俄国声明反对美国满洲铁路中立之提议。

1月24日　英、美、法、德各使照会外务部，以鄂境粤汉、川汉铁路中国资本家请准商办，有碍借款合同。

1月31日　日使伊集院抗议中美锦瑷铁路借款，威胁外务部，审慎从事，先听日本核准。

2月2日　俄使廓索维慈“抗议”中美锦瑷铁路借款，声明在未与俄国商酌以前，不得订定(次日再致书外

部尚书梁敦彦）。

2月5日　外部奏准以五万二千镑向英商赎回安徽铜官山矿地，原订合同作废。

2月8日　俄使照会外务部，凡在满洲中国欲借款造路，应先商之俄国。

2月12日　英、法、德公使照会外务部，无理抗议中国商办湖广境内川汉、粤汉铁路。

2月26日　驻京英使朱尔典向外务部无理抗议清军进入西藏。

3月26日　英、美、法、德代表到外务部抗议湖北铁路商办。

4月4日　中日订立"鸭绿江架设铁桥协定"（该桥建成后，日本便可从朝鲜直接经安奉路运兵东北）。

4月22日　英、法、德公使向外务部无理抗议设立湖北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美使亦函请参与两湖铁路借款。

5月23日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在巴黎成立。

7月4日　日俄签订《第二次协定》及《第二次密约》。《协定》规定日俄两国维持"满洲现状"，"若有侵害上述现状性质之事件发生时，两缔约国为协商于维持现状认为必要之措置，应随时互相商议之"。《密约》除重新肯定第一次日俄密约所规定之南北势力范围外，还规定"必要时采取保护此种利益之措置"，若两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受威胁时，两缔约国同意采取防卫此种利益之办法"。

7月21日　外务部照会日俄两使并通知各国，声明中国政府仍按日俄和约（1905年9月5日）之宗旨，实行中日东三省条约（1905年12月22日）之主义，凡关于中国主权内之行动，各国之机会均等，及开发东三省之工商实业等事宜，当切实维持。

7月25日　英代理公使致函外务部，谓中国驻藏军队过多，英国决增兵驻郎塘地方，如西藏发生变乱，即入藏"保护英人"。

8月1日　清政府与英国伦敦菲色尔公司订立借款四十五万镑（实收四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镑），用以收赎京汉铁路。

英、美、德、法照会外务部，催请批准1908年6月6日所订湖广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8月8日　外务部与俄国驻京公使订立松花江航行贸易新条约，清政府允将松花江开放，任各国商船自由航行（照1858年瑷珲条约，该江只准中俄两国轮船航行）。

9月28日　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徐世昌与上海德华银行及英法华中铁路公司订立津浦铁路五厘利息续借款合同，总额四百八十万镑（津浦铁路第二次借款，实交三百万镑）。

10月22日　英、美、德、法公使照会外务部，请按照1909年6月6日张之洞原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办理（11月26日再催）。

11月10日　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伦敦协定成立，英、德、法加入币制实业借款。

经　济

3月24日　邮传部批准湖北设立商办粤汉川铁路公司。

5月22日　清政府将本溪湖煤矿改为中日商人合办，并在奉天订立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

5月24日　清廷颁行币制规例，单位定名为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一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

9月　天津官银号改组成直隶省银行。

10月27日　度支部与美国摩根公司订立整顿财政及办理东三省实业借款草合同，款额五千万美金。

军　事

12月4日　清廷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以贝勒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

裁撤陆军部尚书侍郎等缺，设陆军大臣副大臣各一员，以荫昌为陆军大臣，寿勋为副大臣。

12月6日　清廷以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

文　教

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创刊。它是于右任继《民吁报》被封闭后，创办的又一张报纸。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报纸。于右任担任社长，主要撰稿人有宋教仁、吕志伊、王印川、章士钊等。该报以"唤起国民责任心"为宗旨，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刻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朽。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等栏目。所刊登宋教仁署名"渔文"所写的时评，深受读者欢迎。该报在国内外知识界影响颇大。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共出1036号。

10月17日，全国第一次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运动会。项目有男子田径、篮球、足球、网球等。最后，上海获得了团体总分第

一名，华北获第二名。以后，全国运动会又举行过六次，分别为：第二届，1914年5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第三届，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昌举行；第四届，1930年4月1日至11日，在杭州举行；第五届1933年10月10月至20日，在南京举行；第六届，1935年10月10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第七届，1948年5月5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

11月4日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成立。1910年，清朝政府颁布"京师图书馆及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并宣布京师图书馆成立。1912年10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馆址在什刹海的广化寺，1917年1月26日，蔡元培、鲁迅曾参加开幕式。1925年11月4日，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成立，委员为范源廉、周贻春、任鸿隽、陈任中、高步云、徐鸿宝、胡适、翁文灏、马君武等。1928年底，又从方家胡同迁到中南海居仁堂，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4月和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新馆大楼落成，并于7月1日正式开放，接待读者。解放后，更名北京图书馆。

《小说月报》在上海创刊。它是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编为恽铁樵。1918年由王蕴章接办。"五四"运动前是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以刊载小说、图画为多，兼及译丛、笔民、文苑、谐文、"风丝雨片"等。1921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改由文学研究会主办，沈雁冰、郑振铎主编，改革办刊方针，以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和论文为主，"于评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改进的方法。"成为"五四"以来第一家大型的新文学期刊。曾出专号和增刊，如《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和《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等。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1932年1月停刊，先后共出22卷，258期。

本年华西协合大学在四川成都建校。其前身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设立的华西协合中学，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公谊会、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和加拿大循道会合办。1910年成立大学部，改名华西协合大学，又名华西大学，美籍传教士毕启任校长，设文、理、教育三科。1913年设医科，1914年改牙科。1933年改设文、理、医三学院，以医、牙著称。1950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人民华西大学。1951年分别并入他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1年

导 言

一九一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年，这个企望许久的日子终于来临！刹那间的辉煌长留在人们永久的记忆中，骤然而起的风潮瞬间卷动了神州大地。

严重的危机使得清王朝越来越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孙中山感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便命赵声、黄兴等潜回广州，蓄谋再度举事。这就是震惊天下的黄花岗起义。此一战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虽然终于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但大大鼓舞了人心，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而七十二烈士恰如地煞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清王朝还在卖国，又抛出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全国人民的保路热情一压到底，无数民众彻底失望了。这种国有既非自强，也非自亡，只不过换得帝国主义支持，以挽救即将破碎的河山。但是广大人民何以自处？对待这种开门揖盗、祸国殃民的罪行，保路运动倏然而起，席卷了长江中游，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立宪派请愿越迫切，清廷就害怕权力分流。在崩溃的前夕，往往是收缩得厉害，同时，也为了消解革命，欺骗天下视听，清政府终于制造出一个“皇族内阁”，企图以此换回和平。然而，一切都太迟了，这已永远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和笑料。

无数次的呕心沥血，无数的鲜血和头颅，终于酿成了这惊天一枪的震撼。十月十日，这个永远光辉的日子，长久地回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武昌起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由于广大士兵的勇敢和机智，更得力于长久的革命准备工作，终于结成了丰硕的果实。历经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无奈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却束手无策，听任全国陷于一片独立之中。

革命党人胜利来得太突然了，领导人物太没有政治经验了。历史无奈地把接力棒交到立宪人士手中。随着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南北议和已成为大势所趋，所有的胜利在刹那间只有一块招牌仅存。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黄花岗起义
- ●保路运动
- ●皇族内阁
- ●武昌起义
- ●南北和谈

黄花岗起义

背景介绍

1910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以及南洋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秘密会议，布置广州起义的工作。孙中山强调，所以要尽快继续起义，“乃因日俄协约，时势甚急，汲汲不可终日。而内地革命风潮，亦已普及，军心民心，皆同归向。加以吾党久困奇穷，不能稍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他“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①，为实现新的起义计划而奋斗。槟榔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决定筹集巨款，在广州再次发难。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凤、焦达峰等率兵响应，会师南京，即行北伐。同盟会鉴于过去多次起义，因事前无充分准备，每有临渴掘井之患的教训，决定加强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全党之力举事”，“集海内外同志作全国之计划”。

1911 年 1 月底，同盟会在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成立了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负责领导广州起义。统筹部下设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并陆续在广州设立办事、联络、藏军械、制炸药的秘密据点，执行各项任务。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选锋队”陆续至香港集中，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据点已达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大致联络就绪。1911 年 4 月 8 日，统筹部在香港会议，预定 4 月 13 日在广州起义，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由赵声、黄兴担任革命军正副总指挥。革命党人为即将届临的战斗厉兵秣马，跃跃欲试。

材料：

- ·三·二九广州之役
- ·广州起义亲历记
- ·陈其尤追忆
- ·黄兴在起义中

材料一　三·二九广州之役

4 月 23 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因为内奸告密，清政府在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同盟会起义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锐减。黄兴临时将原定十路进兵的计划改为四路：(1)黄兴率一路集中力量攻打总督衙门；(2)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3)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4)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决定于 4 月 27 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起义。事前，黄兴写了《致南洋同志书》，其中有：“本日驰赴陈(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示了誓死疆场的革命决心，并在出发前集“选锋队”，“激昂陈词”，砥励斗志。

19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 5 时 30 分，以黄兴为首的“选锋队”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勇敢进攻督署。“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而前。”①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清军“退守两庑及大堂，或凭于栏，或倚于柱，以狙击我。我军则挺胸昂首，向中道疾驰。”②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放火焚烧督署后，又冲杀出来，与李准卫队发生激烈的遭遇战。革命党人林时爽等饮弹阵亡。黄兴伤右手，断两指，坚持指挥，“且战且前”，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朱执信本有其他任务，临时要求参加战斗。旁人见他穿的是长衫，劝阻说：“看你穿着长衫，怎能冲锋陷阵？”他立刻取刀把长衫的下半截掉，双手拿着两个炸弹，随同黄兴进攻督署。在战斗中，朱执信“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胸腿受伤，血透外衣”。但他仍和黄兴转战至双门底，从牺牲的战士手中拾起一支枪，继续战斗，直至子弹打光，队伍被冲散，才避入友人家，第二天转赴香港。喻云纪在发难之前三日夜未睡，忙于制造炸弹。起义时随黄兴进攻督署，“身上负炸弹一大束，左手持号筒，右手拿手枪，额间尽染灰土，容貌威猛，好象要尽杀清吏才泄心头

之恨似的。"后转攻督练公所，"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终因寡不敌众，全身被创，率众退至高阳里源盛米店内，借米包作垒，与清军力战数小时后突围被捕。方声洞自督署冲出至双底门，"孤身被围，容无惧色，犹挥弹突击，计杀哨弁兵勇等二十余人。背血叉，身中枪，血流遍体而气不衰，弹尽力竭而死。"他在起义前夕给家人的绝笔书中说："夫男儿存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还有不少革命党人受伤被俘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从容就义。林觉民起义前致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表示了他为祖国、为同胞奋斗牺牲的伟大襟怀。他在临刑时，"俯仰自如，色不少变"。李德山临刑时大骂清吏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喻云纪在清吏严讯时，声色俱厉地说："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种种英烈情操，反映了起义烈士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此役牺牲的烈士遗骸，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因此后来就称此役为黄花岗起义。

（摘自《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广州起义亲历记

一九一〇年——辛亥前一年的秋天，吴玉章、但懋辛、井勿幕和我由上海同伴到香港，与港、粤同志共同策划广州起义问题。我们得知一切都在积极准备，正等待海外筹款的最后结果，以便具体规划购械多少和召集骨干的确实人数，就可决定起义规模的大小。以各有新任务，吴玉章、但懋辛、井勿幕和我分别先后回东京或上海。临行前，黄兴问我们，四川可以出多少人。我们计算了之后说：四川几次起义失败，不少同志逃往云南，交通又不便，如果时间长的话，两百人没有问题；时间若短，大约可以凑四五十人。我到上海后，即函告川、滇同志积极准备，款到就动身来沪集中；要是能够自筹路费先来，那就更好。事务安排妥当，我和但懋辛又由上海来到香港，负责联络各地往来香港同志的工作。我们和黄兴住跑马地三十五号，后来主持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就设在这里。辛亥革命成功后，广东省政府曾与香港政府交涉，保留这所有革命历史的房子以为纪念，结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那时候的革命，主要是靠炸弹作武器，因为枪弹只能向国外购买，困难甚多，运输危险，价钱又贵；而炸弹杀伤力大，运带方便，造价也便宜。喻培伦（云纪）是日本千叶医学校的学生，对于制造炸弹已有相当经验，总部就将这个重任交给他。喻培伦不幸在广州起义中英勇地牺牲了，他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关于喻烈士在广州起义前的革命活动，吴玉章同志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已有较详的记载，并称誉他为民族英雄。在广州起义中，我和喻烈士始终在一起工作，应该补述他这一段的革命事迹，以尽战友的责任。尤其是当他因身受重伤、弹尽力竭而被俘后，在清吏严讯口供时，他声色俱厉地说："要杀就杀，科学是杀不绝的，革命党是杀不尽的！"这是何等壮烈的英雄气概！

由于在东京不可能进行爆炸试验，喻培伦特地来到香港，在当时还没有开发的九龙海边的荒滩上，找到个试验的地点。喻这次试验的成绩很好，特别值得介绍的，就是他想出了用安全火柴做炸弹导火绳头子的办法，克服了过去不易燃着的大缺点。因此，在这次广州的武装斗争中，几乎个个炸弹都发挥了作用，给怕死的清军以很大的威胁。

统筹部于辛亥一月成立于香港，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总揽全局，下设八课，分工负责办事。一月底，黄兴派李文甫、林直勉、喻培伦、但懋辛和我上广州，调查城内外地形、交通路线和重要机关地址，画成一个简图。李、林是广东人，道路熟悉，但和我学过军事，喻则因广州房顶有可通行的走道，要勘定狙击清军的投弹地点，所以我们五人便被派去担任这个临时任务。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是个极顽固凶恶的家伙，他是四川人，他的部下四川人很多。我们就抓住这一线索，通过同志同乡李天钧（广州东一区警察局巡官）、邹有章（河南警察局巡官）的关系，认识了水师营同乡王书记，探听了一些水师布防的情形。王书记又告诉我们，观音山炮台是旗人把守的，他们唯利是图，在炮台里卖茶，聚赌抽头。他便邀请我们去喝茶，看看广州市的风景。我们就利用游览的时机，分别检查了几门炮，发现炮虽然是旧式的，倒还可以射击。假使后来不改变作战计划，象这样腐败的守卫旗兵，实不堪一击，而我们如果能迅速把炮台夺取过来，那将有多大的用处！

我们回香港报告情况后，我和喻培伦又来到广州，由于邹有章的帮忙，选租了一幢合用的民房，挂起但公馆的牌子，作为交通站和制造炸弹的地方；我们另外住在市内莲塘街吴公馆。喻开始日夜辛劳地制造炸弹，我有空就帮助碾炸药。个把月工夫，总计做了半磅、一磅、两磅重的炸弹三百多个，分批偷运至吴公馆储藏。

三月十日开"发难会议"，议决三月十五日举事，施以款械不能如期到达，改为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到省，设立指挥部，进行作战布置。二十七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调回巡防二营驻扎城外，胡毅生（负责购买和运送枪械的储备课课长）、陈炯明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黄兴无可如何，下令除负责的基干外，其余"选锋"约三百人全部撤回港九。同志们闻讯，均甚愤慨。喻培伦、林时爽即往见黄兴，痛陈利害说："花了海外

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喻培伦且坚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听了大为激动，决定集合同志数十人，杀张鸣岐以谢国人。二十八日，姚雨平(调度课长，负责运动新旧军)、陈炯明报告，新调来的顺德三营，哨官中十之八系同志。于是决乘机起事，黄兴又最后确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发难，并电报通知香港。香港方面，以时间来不及，留港的三百余同志实难于二十九日的早班船全部赶到，电请推迟一天。这样一再改期，一切部署都打乱了，更重要的是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八路进兵的计划，改为集中力量专打总督署，由黄兴亲率百余人攻督署前门，莲塘街的十八人袭击督署后门。这也是擒贼先擒王之计。

二十九日早，黄兴因为还没有得到香港同志晚来一天的消息，派我和方声洞、林时爽去接船，把他们分批带进城内安顿。可是船到了，人却没有来，我就要方、林先进城报告情况。我怀着万一的希望，一直等到下午四时，才失望地赶回指挥部。进南门时，碰着林直勉戴黑眼镜坐着轿子出城，我想他这个时候这种打扮去干什么？接着又遇见陈炯明，因时间紧迫，要他带我走捷径去指挥部，他给我指点方向后又匆匆地出城了。当时我还以为林、陈二人另有特别任务，后来知道他们都做了逃兵。指挥部的同志看见我，几乎众口齐声地问：“到了没有？”我看见同志们已全副武装，正在吃面包，候令出发，不能浇冷水，便简单地回答：“我刚进城。”黄兴心里明白，便催我赶紧回吴公馆，准时出动。本来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这对革命大有好处。但是无论谁劝他，他总是这几句话：“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同志还说：“不少你一个人啊！”他却回答：“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的确，论抛炸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他比谁都高一着。既然大家怎样也说服不了他，只好依他了。

我们正在准备时，忽然听到枪声响了。同志们一手拿短枪，一手拿大刀，炸弹装满了口袋，有的人脖子上还挂一筐子，飞步前进。喻培伦只用了两颗炸弹，就把督署后墙炸开一个大洞口。但懋辛首先冲进去，右臂中了一枪，但还是随着大家蜂拥而入。枪子与炸弹齐飞，杀得警卫清兵四散逃命。我们一直打到前门，黄兴的大队不见了，我们就和还没有走的广东同志数十人合为一队，直奔督练公所。

当我们一队行进到莲塘街北口，即与水师发生遭遇战。我们即分散于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阻击敌人。负伤的和不会开枪的就搬送炸弹，或代装子弹。喻培伦一个人攀登屋檐，等清军冲过来时，就猛投炸弹，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敌死伤不少，再也不敢凶了。就这样在原阵地上彼此相持至半夜。因为众寡悬殊，看形势是不能再蛮打下去了，我们就商定分批退却，且战且走。原来约定用小喇叭通消息的暗号，因怕被敌人发现目标，不敢随便使用，因此同志间失去了联络，只有张梅生、饶国梁、秦炳、但懋辛、罗允、莫纪彭和我七人还在一起。我们一度商量，决计越城。在半路上遇着巡警队，打了一小仗。待到城墙边芦苇丛中摸索前进时，我们七个人又分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和但，发现城上也有兵防守，不时打冷枪，看来越城也不行了。我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又值深更半夜，只有坐待天明，再想办法。天快亮时，我们二人躲进了公共厕所里商量。我要但在厕所里等候，由我一个人出去看看情形，再打主意。不料我一走出去，就被往来不绝的巡逻队隔断，回不去了，因此又与但拆开了。我在极度疲劳与饥饿中，走进一家老百姓家。老乡当然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他幸好能说普通话，让我坐下休息，叫我刷去满身的泥土，还弄些东西给我吃，至今我没有忘记他对我的热情。后来知道，黄兴等不少人都是在老百姓掩护下脱险的。

当天，我找到了李天钧巡官，请他派人送我到河南，邹有章巡官代我买好船票，我才回到香港。

此外，尚有可记的：黄兴曾报告说，广州起义共用银十七万余元；其实这只是统筹部直接开支的数字，而其他方面直接间接用于起义的款项，也大有可观。据我所知，福建同志数十人的公私费用完全是自己筹措的，四川同志的一部分用款是上海同志资助的，其他各省的情形亦大抵如此。又在东京购买的军火，留日学生出钱不少；尤其难得的是，东京同志有人拿官费折子去押款，有人向一个日本老太婆借高利贷，几年之后才还清。这些都表现了同志们对革命的高度热情。

在起义的准备期中，没有任务的同志多在家里下棋，练大刀。大家还想出了一个玩法，就是在墙上挂个小竹囊，用铜板投入，借此来练习投掷炸弹的准确，谁一次不中，就给他脸上画一笔，以资笑乐。尽管武装斗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可是谁也不把死当回事，泰然自得，生活很愉快，这种革命的乐观精神是值得敬仰的。

(摘自熊克武《辛亥革命回忆记》)

材料三　陈其尤追忆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难

(实际不止此数,后经陆续查明补入史册的尚有多人),合葬于黄花岗,故亦称黄花岗之役。兹役是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以说是后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的前奏。此次惊天动地、英勇壮烈的起义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从此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促进了我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义失败后,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审讯这次起义攻打总督署被捕的革命党人的时候,看见他们临难不屈、戟指骂贼的革命精神,为之惊惶丧胆。故他在奏报清廷的所谓"广州乱党起事经过情况"的电文中,悲叹"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此电在民国成立后从清廷广州总督署档案中发出)。由此可见,此次起义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我在辛亥前一年加入同盟会,暗号为恢字辈。革命党指派给我的任务,是与同乡陈潮(七十二烈士之一)等住在旗下街,担负在起义时放火焚烧旗人聚居的旗下街以扰乱敌人军心的任务。后来因清廷驻广州将军孚琦被暗杀,敌人加强戒备,我们因无眷属掩护,被巡警迫令迁出。组织上遂派我住到当时的总督署右旁、现在的中山纪念堂左边的莲塘街一处准备进攻总督署的据点。我和胡佩嫄、何少卿两位女同志同住那里,以姊弟关系作为掩护。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前数天,组织又调我到仙湖街始平书院看管一个秘密储藏军械炸弹的机关。当时因革命党准备起义风声泄露,甚至"乱党准备起事"的消息报纸亦有登载,情势甚紧,仙湖街始平书院一带突然有巡警日夜巡逻。始平书院是我们储藏军械的重要机关,我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到司后街陈炯明公馆向他报告。那天刚巧黄兴早上从香港秘密抵广州到炯明处,正在商谈起义之事,他们一起听到我的报告。我说现在起义尚无确期,万一巡警闯入书院搜查,不但事机泄露,全部军械被破获,整个起义亦将受到破坏,建议组织发给我处守卫人员(均为海陆丰的同乡,精壮的农民兄弟)利刃数柄,以便输流在内门防守,如果巡警闯入搜查,则以利刃对付,把他们解决,不必开枪,以免惊动敌人。黄、陈二人同意我的建议。黄说他在小东营的公馆藏有利刃,嘱我待他回去后,随却去取。我们在陈炯明处同进早餐。黄离开不久,我即如约前往,黄兴嘱徐宗汉(当时黄兴的亲信助手,后来与黄结婚)从床底下检出利刃八柄交给我。

广州起义原来预定在三月二十五、二十八日或四月一日或更迟一些时间发难,后来临时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事,是因为当时情势突然变化,革命党准备起义的风声已传遍广州,我们的一些组织已被敌人破获;又因为当时策动省内驻军及巡警教练所学员到时反正响应起义的事机又被泄露,水师提督李准将他亲信的巡防营急从外地调回省垣加强防御,以致原来答应到时响应起义的驻军和巡警教练所的学员发生动摇。由于上述情势的突变,同盟会就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虽然还有一些订购的军械及华侨捐款尚未到齐,但此时革命行动已到了如箭在弦、非发不可之势。黄兴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提前起义,所以临时决定起义提前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实行。

当时起义队伍原拟分十路发动,在这十路之中,黄兴率领的主要一路担任攻总督署;陈炯明率领的一路担任攻存储大量枪械的巡警教练所,准备夺取枪械,并争取教练所学员反正,响应起义。我们这一路队伍多住在仙湖街始平书院。我和几个在广州读书的同乡同志因懂广州话并熟悉路径,故被选派为陈率领的这一路的先锋督队。起义前夕,发给我们到时缠在手臂作为标志的白毛巾一条,对时间用的钢壳手表一只,并决定在陈公馆出发时每一督队再发给手枪一枝。三月二十九日清晨,我们督队的人到司后街陈公馆,听取最后指示。当时陈炯明宣布当天下午四点钟再到此处集合,带领队伍出发。我和另外两位督队的同志遂到总督署前卫边街一家饭馆吃午饭,在饭馆故意拖延时间。直到下午快到四点钟,才同往陈公馆。岂料到达时,门户洞开,屋内空无一人;再进内宅,则见蚊帐被盖书报等狼籍满地。我们初时以为机关被破获,急急走出,打算由双门底逃出城外。出门后,即听到稀疏的枪声,我们不知底细,匆匆走到双门底转永汉路。此时城门关闭,不能出去,幸我平日熟悉路径,乃拐入广府中学宿舍青云书屋找姓卓的同乡处暂避,适卓外出,我也只得留下来。此时,旗下街已报火警(这是前面所说的我们所布置下的行动),火警钟声大作,全城行人绝迹,铺户都关上了门。翌日清晨,一队巡警来到青云书屋搜查,才知道从昨晚起,他们即挨户搜查革命党人。巡警把我揪起搜查和盘问。我因留有辫子,同时白毛巾我早收藏起来,他们又不懂得我所佩戴的钢壳手表的用处,幸而得免于难。及至近午,我偷偷出外打探情况,看见永汉路城门半开,已有行人走动,守军对出城的人搜查盘问后可以放行。我在广州已失掉与陈炯明的联系,只得乘机出城,搭佛山夜船往香港,与同盟会领导机关联系。在船上,我遇到同盟会一位负责人姚雨平同志(现在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他也是从广州逃出准备前往香港的。姚在我看管始平书院军械储藏所时,曾持黄兴的亲笔信向我提取军械,是我认识的人中之一。我和姚在船上密谈后,才得悉昨天下午起义的一些情况。

原来,事前商定的十路同时起义,有的因为对起义时间有误会,未及时发难;有的因交通问题,未能及时赶到广州。而陈炯明临时没有率领队伍参加起义的原因,是陈认为事机既然泄露,情势突变,提前起义,不但攻打教练所必然失败,即全局亦无获得成功的希望,不如改期发难,以保全实力,乃于起义前刻派马育航到黄兴处主张改期。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并留下绝命书,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他当时推开马育航,径自率领队伍向

总督府进攻。陈炯明见改期不成，既逃出城外，躲藏于河南尾珠江水面一个同乡亚弁的盐船里。如上所说，我们在起义当天下午四点钟到陈公馆时，他已离开，原来是他临阵脱逃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和胡汉民曾联名致南洋的同盟会机构报告起义经过，函中对陈炯明等在起义中表现不力的一些负责人，曾有所指责。

（摘自陈其尤《革命逸史》）

材料四　黄兴在起义中

一九一一年一月，先君由南洋到了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我于先君到香港后，也由日本来到香港。这次，我冒宫崎龙介之名，穿和服，讲日语，将由宫崎寅藏介绍向日本人仓地购买的驳壳枪五十支、勃郎宁二十支和子弹一万余发，分装四口皮箱，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

这年二月，党人龚敬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练所有学员四百余人，枪支二百支，如能掌握在我们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同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学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人同往应考。我们都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我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君嘱咐我两桩事：一是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不要各搞一套。我们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结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别担保，入所受训。我们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学员四百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五发。自温生才炸孚琦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怕学员出问题，把子弹都收去了。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先君由港到省，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并将原来决定的十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四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由我们作内应。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许，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见该所所长夏寿华（益阳人）。陈方度对夏谈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统筹部发给我们每人手枪一支）对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对我们说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话，并坚留我们喝一杯酒。我们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飞奔到小东营五号机关里。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们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弃大南门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

（摘自杨不如《辛亥革命先驱记》）

保路运动

背景介绍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次日，就抛出了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以"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故应将"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这就以法令的形式剥夺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首先劫夺粤汉、川汉两大干线。20日，即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600万英镑，年息五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如果清政府真是为了"国家收回，赶紧修筑"，以加快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那末，实行铁道干线国有的政策，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清政府能拒绝任何奴役性的条件，在确保无损于独立和主权的情况下利用外国资金，以扩大国家的经济建设，那末，举借外债也是不应指责的。问题在于这个反动政府的当权集团不是这样想的，也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无非是假"国有"之名，将已允准各省集股商办的干路收了回来，接受奴役性的外债，将路权出卖，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借以挽救那行将土崩河溃的封建政权。还在1908年，《东方杂志》刊载《论官办铁路之恶果忠告邮传部警醒国民》一文，对"官办"铁路发表评论说："故综观已往，默计将来，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与其为官办铁路，毋宁谓官卖铁路之为当也。"这种评论，大体上是接触到了清政府"铁道国有"政策的实质问题。事件确乎应当如此看待：所谓"官办"既不啻是官卖，则所谓"国有"，何尝不可以说是帝国主义所有呢？无怪乎当时就有人指出："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清王朝改变原已宣布的铁路允归商办的政策，将干路收归"国有"，压根儿不是为了加快交通事业的建设，而是为了借到外债。

既然是为了借债以挽救自身的覆亡，以乞求帝国主义的扶持，因而清王朝对于四国银行团所贷给的债款附

有多少奴役性的条件，也就不去细加计较了。还在“湖广铁路借款”正式合同签订之前，就有人上奏，指出托名“国有”以抵借外债的危害说：“近十余年来，各国以铁路政策攘我主权，朝野惊动。于是有粤汉铁路赎回自办之举。既悟外债之危，遂定自办之计。三省民心，本甚踊跃，徒以赎回后疆臣主持失当，摧抑商力，以塞股款之源。重举借债之议论者，遂谓商办无效，不如收归国有。臣则以为国家出此垄断之计，实阻人民企业之心。况值司农仰屋之时，而行借财异国之策，名为国有，实则授权于外人，国事莫危于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更直截了当地承认，此次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

濒于覆亡的清王朝，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劫取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夺之所亲而予其敌”，“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其开门揖盗，祸国殃民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恨。于是，保路风潮倏忽间就席卷了长江中游。

材料：

- 四川保路运动
- 成都血案
- 批注布告
- 保路军起义

材料一　四川保路运动

四川的保路运动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广泛持久深入。六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亲眼目睹会场情形的郭沫若回忆说：“会议一开始，邓孝可作了‘带有批评带有反抗意味的报告’。接着罗纶登台，“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的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这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是可忍，孰不可忍！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台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台下哭，连公司里边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是在哭的。”当罗纶提出成立保路同志会时，大家一致赞成，“声震瓦屋”。大会还发表宣言，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听一人之私言，置全国以孤注，朝廷为亿万众集怨之府，而悍不一顾；夺商民数千万血资之产，而不许一呻。”对于这样“古今中外”少有的野蛮政府，“惟据死力争”。紧接着，各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甚至广大妇女也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决心“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当此大厦将倾，千钧一发之际”为国立功。保路的漫天烽火迅速烧遍了全川。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发展到十万多人，全省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至僧道人士也都参加到斗争行列里来。四川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群起响应，投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劳动群众表现得尤为坚决。时人记载说：“最足动人者，则下等社会贫若人，发言之精当，忠悃之纯挚，有为士大夫所不到。”“忠愤所播，小民尤易入脑，愤不欲生。”

四川保路运动急风暴雨般的展开，使清朝官吏惊慌失措。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看到民情激愤，担心危及反动统治，奏报清廷暂缓接收铁路。清政府申斥他对群众镇压不力，下令将他撤职，改派刽子手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八月间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消息传到成都，正在开会的成都铁路公司立刻大哗。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马上召开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赵尔丰的劫掠罪行。会场上怒吼声、责骂声、口号声、号哭声响彻云天。商人提出罢市，教师、学生提出罢课。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会还没散完，全城一半的商店已关了大门。本来“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成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街的叫卖声，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无论甚么场合，每一个人视听言动所接触的，完全集中于保路斗争这一问题”。

成都罢市、罢课的消息象闪电般传遍了全省。四川“南站邛雅，西迄锦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各报刊天天登载着灾民暴动，捣毁自治局、经征局，批毁外国教堂，与巡警械斗的消息。清朝官吏向清政府报告说：“此间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余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会者近万人，誓与路共存亡。”四川保路运动已开始向武装暴动发展。

（摘自《四川保路运动史料》）

材料二　成都血案

清王朝的高压政策，把四川保路运动推向抗捐抗粮的新阶段。这一行动由成都开始，全川响应，给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加深了财政危机，使其“二千数百万之岁入，顿归无着，四川一切行政因而束手，而京部洋偿、解、协等款，全无所出，……滇、黔、新、甘、边藏，向皆仰给于川者，

亦将坐困”。人民群众的斗争越发显示出深厚无比的威力。

列宁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利，一面急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严令川督赵尔丰“切实镇压”，“迅速解散”。反动派磨刀霍霍，妄图用反革命暴力遏止保路运动的发展。

1911 年 9 月 6 日，在四川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上，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个《商榷书》明白地申言要“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它显然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君主立宪色彩的宣传品。但是，赵尔丰却捕风捉影，指鹿为马，捏称《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于 9 月 7 日，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伦、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并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赵尔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四川立宪派首脑的作用，以为抓了这几个为头的，就会是群龙无首，使人民“畏缩不前”，从而将保路风潮镇压下去。然而，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激起了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

赵尔丰逮捕蒲、罗等人的消息传出去，成都全城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街比户，号泣呼冤。数万人不约而同，手握香、头顶光绪牌位，齐奔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诸人。受着立宪派思想束缚的群众，当时还不懂得胜利不可能用向清朝请愿的方法获得，而是要拿起武器去夺取。

反动统治阶级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的。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竟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一时枪声大作，群众纷纷倒入血泊之中，“督署院坝，陈尸累累。”受伤者则匍匐载途，光绪牌位拉杂乱抛。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横冲直撞、践踏群众，死伤的更不可胜计。城外群众闻讯前来请愿的亦被惨杀数十人。清朝统治者在四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批注布告

“成都血案”没几天，赵尔丰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洗刷自己的罪行，到处张贴布告，民众当即在布告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以下是其中的几段：

布告：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

批驳：既是好百姓，为什么七月十五日（即九月七日）打死了许多百姓。

布告：争路是极正当的，并不犯罪。

批驳：既是正当的，为什么拿办并抄夺铁路公司一切之簿据、银钱？朝廷及督宪明明是大大之强盗也。

布告：他（指保路运动的领导者）并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起事。

批驳：七月十五日打死纯善良民，哄去正经绅士，遂百姓不服，十六日即有此举动。至今已将旬日，百姓纷纷而来为之不平，岂乡间尽是匪人乎？实因官派兵剿良民，且官兵到处枪杀良民，不得不争斗也。

布告：本督堂念其皆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

批驳：既知百姓是朝廷赤子，不应派兵出城争剿耳。……此系官逼民反实在情形也。

民众在这里公开声明要对赵尔丰的反革命暴行进行武装反抗。“成都血案”没过多久，四川各地哥老会的揭杆起义，农民的抗捐抗税暴动，市民群众的反清集会游行，连接不断地展开。立宪派“虽欲操纵而不可得。”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起初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始终坚持武装保路，坚持把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反清。保路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明确指出：“不建铁路固死，建铁路亦死；铁路成固死，铁路不成亦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是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保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以后，他们深为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一面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一面从中因势利导，希望通过保路运动来“激扬民气，导以革命。”五月下旬后，四川革命党人便“集合同志，开会于成都，决议借名保路，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他们积极参加“保路会”的活动，“以保路为推倒满清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开会”。一些同盟会员还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八月初，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夫杰等与四川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等在资州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九月七日即“成都血案”的当天，他们又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速起救援”的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顺流而下，这些被革命党人称作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九月八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总数不下二十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清朝官吏惊呼：“川亡固在旦暮。”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永珊（吴玉章）、王天杰等首先在荣县建立革命政权。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虽然没能长期坚持下来，但对周围的影响很大。清政府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和岑春煊入川，加紧镇压四川人民起义。但是，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却造成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摘自苑书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

材料四　保路军起义

"水电报"传警，华阳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秦载赓，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立时分别发檄起义。秦载赓于9月8日晨，率同志军千余人进抵成都东门外，一面发出鸡毛文书，派人四出号召，一面向成都城内进攻。9月10日，"四方应召者万余人"，与清军大战于城郊琉璃厂一带，"大张旗帜军械，围攻省城"。次日，大队攻城未下，退至借用铺，设东路民团总机关。"各属来会，未几众逾二十余万"。

与此同时，侯宝斋所率同志军和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部会合，挺进至成都南郊，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乘胜进抵成都城下。温江罗守经召集民军冒雨进至草堂寺与巡防军作战。吴庆熙率千余人称"四川同志军"与清军激战于文家场。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张捷先等领导的西路同志军，由郫县分五路向成都进军。以同盟会员蒋淳风为大队长的学生军五百余人担任西路军前卫，行至犀浦附近与清巡防军展开遭遇战，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冲杀数小时。蒋淳风壮烈牺牲，学生军大半阵亡。清军因伤亡惨重而畏缩不前。

成都血案发生后一、二日间，云集成都城下的同志军，"计西有温江、郫县、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分多起"，"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威远、荣县、峨边等地同志军正兼程赶来增援。各处同志军在成都城外，奋勇战斗，重创清军。又将各路电杆全部砍断，截阻驿递文报，使清朝统治者音讯不通，耳目失灵。更设伏守险、扼东西要道，陷赵尔丰于坐困之地。附近群众热烈支援同志军，赵尔丰又急又恨地叫嚷："愚民无知，竟认匪为义愤，见匪则助粮助饷，见兵则视为仇雠，甚至水火而不与"。

在成都城内，反动当局虽设了"筹防处"，预防群众与同志军里应外合，但是，据赵尔丰称，"人心助乱，闻兵胜则怒，闻匪胜则喜"。另据当时人报导，"许多人是期待民军进城的"。赵尔丰成了瓮中之鳖，"心力交瘁"，"通宵不寐"，以防"奸宄"。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清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迅速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

同志军猛攻成都，使清廷预感大祸临头，惊惶失措。先是三令五申催端方带鄂军兼程入川，"督兵镇慑，除暴安良。首以解散匪党，为弭乱之方"。并急调湘、陕、黔、滇等省军队援川，后又加派镇压四川义和团的刽子手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可是，赵尔丰坐困省城，捉襟见肘。岑春煊见势不妙，畏缩不前。端方野心勃勃，趁机要高价，夺大权。统治者之间猜忌更甚，矛盾重重，互相推诿，彼此詈骂，事实上已不能扑灭四川人民的革命烈火了。

同志军围攻成都的战斗历时十余天，不啻是在清朝控制四川的中心爆破，有力地杀下了反动统治者的气焰，长了人民的威风。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作战经验也不足，加以武器窳劣（绝大多数同志军使用的是刀矛棍棒等陈旧武器），因此，未能攻下省城，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把武装斗争的战旗插遍全川。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皇族内阁

背景介绍

立宪派人的上书请愿，是旨在催促清王朝亟起革新图强，稳定统治，起到消弭革命的作用。而当权的王公大臣则认为，革命危机越逼近，就越要把政权、军权、财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深恐大权旁落，一旦有事就呼救不灵，无法自保。所以，立宪派请愿愈勤，活动愈力，反而愈加增添亲贵们的疑虑，愈益加紧集权中央。有些守旧大臣，竟把立宪当作造成自身统治动摇解体的因素，纷纷上疏，奏请对立宪和立宪派的危害予以足够的注意。

1910年秋，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上疏称："立宪之法，以位于君，以权予内阁，君不负责任，责任总理大臣。又设国会以监督之。会党寻隙相攻，总理辄引身而退，国本摇矣，事何能济？臣见君子而充议员，党孤力怯，将屏息不敢出声；小人而充议员，上藉抵抗官长之势，即下可欺压善良。总理大臣而贤，牵掣多而一事无成，将有席不暇暖之势；不贤则勾通政党，且潜生睥睨神器之思。其谋甚拙，其势甚险。"在他看来，要求立宪，就无异是企图篡位夺权。所以，他向皇帝提出的上策是："取消九年筹备清单，停办新政，宽一切无艺之征，下诏罪己，收回各部用人行政之权，悉由宸断，访贤才，广言路，整军政，裁冗官，杜幸进，复科举，黜陟群吏，不职者降罚有差，贪黩者杀无赦，明降谕旨，宣明国会以下劫上，长奸堕威，礼义教化之国无所用此。"朝廷上的王公亲贵还不敢彰明昭著地把那张应允立宪的空头支票遽尔收回，因此，胡思敬的奏章"凡数十上，皆不报，遂弃官归。"

按照缩短立宪期限修订的筹备事宜，宣统三年应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1911年春，此项筹备事宜正在进行时，不少大臣都为之忧心忡忡。学部丞参上行走柯绍忞上奏称："筹备立案，更张太骤，用人行政，虑患宜深：一、宜防内阁大臣代负责任之弊。君主立宪虽有命令之权，政柄既已下移，将并其命令之权而亦移之，莽、卓、操、懿，皆其前鉴。今使内阁大臣代负责任，万一主权稍替，有鹰扬跋扈之臣专吾政柄，密布腹心于各部大臣，广树党援于上下议院，履霜之渐，此私忧过计者一。二、宜防国会既开，奸民暴动之弊。去冬天津各处要求速开国会，几酿大变。

况上下议院成立之后，设有不安本分者羼入其中，借口公义，簧鼓愚民，祸机猝发，恐有出寻常意计之外者。近日本以日俄战事，议院与政府牯牾，聚众焚烧官廨，君臣莫敢谁何。中国创办，尤易滋生事端，此私忧过计者二。……"类似这种忧虑内阁一设就会导致政柄下移，权臣篡窃的祸患的奏章和言论，颇为不少。曾经参劾资政院的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把立宪派的活动描绘得尤为可怕，他在一封奏折上写道："盖新党虽不乏热心之徒，而心术倾险者，染民约之邪说，挟种族之谬见，乃欲借立宪倾陷朝廷以阴行革命也。臣留心访察革命有二派：主激烈者显背朝廷，昌言叛乱，纠合亡命之侣，公为犯顺之图，此一派也；主和平者以立宪为名，以攘权为实，使朝廷势成孤立，自可遂其阴谋，此又一派也。故改新律以破伦常，则君纲废，订阁制以专政柄，则君权替。昔之倡平等自由者，皆斥为邪说，今实行于政事矣。昔之倡革命排满者，潜伏于海外，今公行于朝右牟。去年资政院议员妄更国制，请赦逆党，事事把持，必使政府俯首听命，其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他的笔下，立宪派竟比革命派的危险性还要大些。这些言论，反映朝廷亲贵、守旧大臣同立宪派之间的嫌隙，已经接近公开爆发的地步。

王公亲贵一直是借立宪之名以行集权之实，临到设立责任内阁时，守旧大臣上述那些忧虑"权臣窃柄"，"鼎祚潜移"的危言，当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加倾全力去加以防范。所谓"皇族内阁"，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出笼的。

材料：

· 皇族内阁

材料　皇族内阁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

总理大臣　庆亲王奕劻(宗室)
协理大臣　大学士徐世昌(汉)　大学士那桐(满)
外务大臣　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　隶亲王善耆(宗室)
度支大臣　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
学务大臣　唐景崇(汉)
陆军大臣　荫昌(满)
海军大臣　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
司法大臣　绍昌(觉罗)
农工商大臣　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
邮传大臣　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　寿耆(宗室)

内阁13人里，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奕劻组阁的"谕旨"一发表，全国为之哗然。立宪派人感到很气愤，他们奔走呼号，磕头上奏，最后却请出了这样一个集权皇族、极端专制的内阁来了。于是，一个以要求撤销皇族内阁为主题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

鉴于以往请愿的失败，清王朝又居然以近乎嘲弄的姿态，抛出一个贻笑中外的皇族内阁来敷衍行骗，立宪派人相约提前到京举行谘议局联合会的第二次会议，商讨对策。

1911年6月10日，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

清廷王公大臣正是为了防范"权臣窃柄"，"鼎祚潜移"的祸患，所以要让皇室亲贵掌握住内阁的大权，不容他人染指。立宪派却援引公例，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织内阁。这不但不能使王公大臣表示接受，而且更遭到他们的疑忌。疏上以后，没有答复。

联合会的代表很气愤，立即发表一通《宣告全国书》，揭露王公亲贵们所作所为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随后，又发出一个《通告各团体书》，公开对"上谕"逐条批驳，指出"上谕"避开皇族不宜组织内阁的主题，所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并声明，定于阴历八月间再聚北京"续行请愿，尤冀我海内外各团体同时派员来京，伏质帝阍，竭力呼吁。"但到续行请愿还没来得及进行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局势急剧变化，立宪派人多数另有他图，对清廷是否撤销皇族内阁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基于平息革命风潮，稳定自身统治的需要，清廷不得不遵循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屈从袁世凯集团的压力，把皇族内阁加以解散。

(摘自《中国宪政运动史》中华书局)

武昌起义

背景介绍

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多数是新军士兵，在新军中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则很多是留日学生，而且本身就是同盟会员，并与会党有较多联系。两个团体虽然由于领导成员和会员群众的状况略有差别而产生某些政治歧异，但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两者的联合，则使湖北的新军士兵运动与革命的领导者——同盟会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更加增添了湖北革命党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

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他们消除成见，携起手来，而他们的纲领、组织形式、奋斗目标的一致则使他

们具有联合的基础。尤其是一九一一年四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随着铁路风潮的汹涌澎湃，文学社和共进会都积极策划在武昌起义，“虽黄花岗前，死气沉沉，而黄鹤楼头，又生气勃勃了”。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彼此统一力量、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盟会中部总会也积极建议二者联合起来。而广大的文学社社员和共进会会员更强烈要求联合，认为“我们两个团体都是以排除满人为革命宗旨的，本来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分，譬如风雨同舟，大家能和衷共济，就能达到目的地”。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也逐步认识到：“只有两个团体合成一气，集中力量，同向敌人进攻，才能得到胜利。如果甲方进攻，乙方袖手不动，乙方进攻，甲方观望不前，这样就不独不能成功，必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经过协商很快地达成了联合的协议。在九月十四日的联席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打破原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界限，重新成立统一的领导机关，迅速筹划起义的各项工作。二十四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有群众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参加者一百多人，会上详细研究、热烈讨论了发动起义的时间、组织、军事计划及领导人选。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未来的军政府部理；决定在武昌小朝街设军事指挥部，负责有关武装起义事宜，在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设政治筹备处，负责将来建立革命政权的各项工作；并决定十月十一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会后，革命党人立即拟定文告，绘制旗帜，制造炸弹，配制弹药，印刷钞票，购置手枪，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9月下旬，起义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发难时机已经成熟，向机关部催促起义的人到了“户为之穿”的地步，斗争极为旺盛。但黄兴、宋教仁等来汉的信息，杳若黄鹤。面临着如箭在弦的紧急情况，24日，文学社、共进会又联合举行会议。经到会的60多名代表讨论，确定起义总动员：中秋节(10月6日)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分配各标、营、学堂的任务是：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于塘角放火为号；混成协炮队，分头占领凤凰山、青山；第八镇工程营攻占楚望台；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及时响应，会合工程营进攻督署；南湖第八镇炮八标入城后亦会攻督署；马队一部分警戒城郊，一部分入城任传骑队；三十一标、四十标留守部队掩护炮队攻占蛇山；驻汉阳四十二标的一部占领兵工厂及龟山；驻汉口四十二标一部占领汉口并进占武胜关。另又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照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这个总动员计划的制定和随后之被贯彻执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材料：

- “南湖炮队”失事
- 宝善里总部败露
- 起义命令
- 武昌首义
- 军政府成立
- 武汉保卫战

材料一 “南湖炮队”失事

一九一一年旧历七月间，湖北革命党人以为发难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公推杨玉如、居正带款一千元到上海，托陈英士购买手枪，备起义时应用，并且函约黄兴、宋教仁来汉协助。两同志到达上海，在民立报馆晤陈英士、宋教仁，报告湖北进行革命运动情况极为顺利，并托代购手枪。陈英士欣然答应即为代办。次日在陈英士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南京、山西、陕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的驻上海代表都来参加。他们听到居正报告湖北革命运动进行经过及长江一带形势，都精神振奋，对湖北同志的工作稳着先鞭，表示钦敬。并派吕天民同志持函赴香港向黄兴劝驾，促他早日起程到汉口，共襄大举。宋教仁也表示愿与居、杨同来。

不料此时陷在武昌狱中的同盟会负责人胡瑛因为一贯主张要在广州发难，不愿意湖北走在他的前头，托岑楼送一信致宋教仁，极力说湖北不能起义，亦无力起义，竭力破坏。因此陈、宋对居、杨二人发生怀疑，购买手枪亦迟迟不办，使居、杨二人滞留上海，不得返汉。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胡瑛对湖北革命的进展迅速而发生嫉妒、从中破坏的一段内幕。

同时，武昌地方又发生了一个不幸事件。在旧历八月初三日(阳历九月二十四日)，南湖炮队八标三营左队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锡久请假离营，孟华臣、赵梦屏等设馔饯行，由于饮酒过多，乘着醉意，狂呼怒吼；有某排长出而干涉，激动众怒，陡起冲突。孟、赵诸人拖炮轰击，想乘此机会起义，不料炮针早卸，弹库封锁，又因事先未经联络，毫无准备，无人附和，不能成事。管带姜明经见事态严重，电告司令部飞调马队前来弹压。孟华臣等见事已不济，就四散脱逃。

这时孙武等正在胭脂巷和各标营代表开会决定旧历中秋发难，闻此消息，会后即嘱炮队代表徐万年、蔡汉卿回营妥为处理。幸张彪未予深究，仅归罪于肇事诸人中的霍殿臣一人，用酗酒滋事罪名，开除军籍了事。

孟华臣在暴动时手臂受伤，事败后来汉口见邓玉麟、胡玉斋，责备共进会进行迟缓，不早日定期发难，徒然迁延时日，致南湖发动遭到失败，言下忿忿不平。邓玉麟等只得用婉言劝慰，告以居、杨赴上海购枪未回，以致延期，好在现已决定在中秋起义，为日无多，希望暂时忍耐。孟华臣才怏怏而去。这次南湖炮队事件的失败，当然不能归

罪于总部；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到革命党人渴望起义的热潮确已高到不可遏止的程度了。

南湖炮队暴动后，总督瑞澂知道武汉革命运动已经波及新军，防范更加严密，下令全城分段搜查，企图一网打尽。刘公看到情势日益紧张，而杨玉如等因购枪逗留上海，久久未回，又不能提前发难；加以南湖炮队暴动更是不可掩饰的事实。设若秘密全部泄漏，闭城搜索，革命党人将都成为釜底游鱼；于是就化装携眷秘密渡江，迁入汉口歆生路荣昌照相馆内，作为临时办公处，继续筹划发难前应有的准备工作。

十三日，果然有军警突入雄楚楼十号捕捉刘公。这时仅杨玉如的妻子吴静玉一人在家，知道事关革命，恐难逃生命，一面勉强出来应付军警，一面暗服硝镪水自尽。军警虽扑了个空，毫无所得，而吴静玉却牺牲了。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二　宝善里总部败露

八月十三日夜，汉口狂风骤雨，歆生路荣昌照相馆楼上有窃贼从窗口潜入，进各房间搜索。李白贞从睡梦中惊醒大呼"捉贼"，起身出追，窃贼仓皇从隔壁晒台逃去。大家亦同时起身，燃灯检查。除丁立中卧房外，其他各房间都箱翻柜倒，衣物散乱满地，而一无损失。大家怀疑这窃贼另有目的，所欲得的并不在衣物资财，当是敌人派来的密探，不是寻常的窃贼。回忆前一日《夏报》曾载"汉口某某照相馆是革命党的巢穴"一段新闻，可称暗暗相合。丁立中、邓玉麟等都以为然。这次虽没有受祸，但都感到此处决不能再继续居住，最好迁往租界，较为安全。天亮后各人就分途出发向租界寻找房屋。

午后二时，丁立中回来说：俄租界宝善里有十四号和一号两栋空房，很是合用，租金不贵，但必须要殷实铺保，才肯出租。孙武和刘公商议，铺保一节，只有李白贞最为适宜，他开设照相馆，又是本会同志。大众一致同意，交丁立中和李白贞两人负责办理。当时李白贞明知作保是一件危险事情，然而义不容辞，就满口答应下来。八月十五日，就把总部从歆生路迁到宝善里十四号，刘公夫妇迁入一号屋内。从此各处党代表都到宝善里十四号来接洽工作或领受命令。

十八日上午，孙武在楼上后面小房内装制炸弹。他手拿一个才装上药的炸弹，对大家说："用这个炸弹把瑞澂、张彪、铁忠三个王八蛋一起炸死就好了。"说完随手向桌上一放，不料用力过重，炸弹立即爆发，楼窗玻璃都被震破，浓烟弥漫全楼。多数人夺门逃避。李春萱急奔上楼，见孙武满面流血，昏倒在地，立即脱下长衫把了头脸裹住，扶出后门，车送同仁医院徐凤梧处救治。丁立中和未走的同志急将制炸弹的各种药料运出，并将室内硝烟消灭，惟锁在柜内的旗帜、印铃、名册、文件、财物，因时间仓卒，不及携走。当时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俄捕四处奔集，夺门而入，即将前后门监守，向楼上下各处搜查，更用斧把大柜砍开，所有各物，搜洗一空，并将未逃出的刘燮卿带走。又因同里一号刘公住所同为丁立中承租，李白贞作保，且系同日迁来，所以刘公妾刘一和弟刘同亦被捕去，由俄捕房转洋务公所候审，再引渡武昌。这时俄租界即宣布戒严，不许行人往来，一般好事者都被阻在街边路口，探听消息。

丁立中从宝善里逃出，就急奔至歆生路见李白贞，连喘带说，告以宝善里败露经过，并说："现在俄捕正在捉拿承租人和担保人，你赶快逃避，免遭毒手。"说毕，即将他的行李衣物催车送往中西旅馆去了。

李白贞闻讯后，为了要看个究竟，便化装到宝善里总部门口探看，见有俄捕监守，禁止出入，并听说捉去十余人，内中还有一个女人，其他都无从探悉。又到洋务公所和夏口厅两处，也得不到确实消息，只好转回家中。李料知此事总是凶多吉少，就收拾细软，全家从后门走出，到亲戚家躲避。李自己则转到鸿顺里孙武寓处探视，知道孙武伤势虽重，尚无生命之忧，但旗帜等件还须负责赶紧重做，以备起义应用。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三　起义命令

宝善里事故发生的那天上午，蒋翊武恰从岳州防次回武昌，和刘复基、彭楚藩、张廷辅、杨宏胜、蔡大辅、陈磊等在武昌小朝街 85 号机关部聚议发难日期。刘复基等感到官方进逼太甚，已不容再事延宕，主张及时发动。蒋翊武以黄兴未到，且来信嘱咐要格外慎重，因而主张暂时忍耐。上午没有作出决定。

下午，蒋翊武、刘复基等继续聚谈，邢伯谦、邓玉麟先后赶到，报告宝善里出事的消息。邓玉麟并转达孙武入医院后的意见："宝善里总机关被抄，我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事到而今，起义日期万难再延，我希望今晚便发动。"严重的意外变故，迫使革命党人立刻要作出抉择：是犹豫后退，还是犯难前进？刘复基奋然倡议："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上午还有所踌躇的蒋翊武也毅然决定："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于是，参照 9 月 24 日议定的计划，蒋翊武提笔草拟了一道"命令"，派人分送各标、营，内容如下：

命令

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发于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部

(一)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虏。

(二)本军无论战守，均宜恪遵纪律，不准扰害同胞及外人。

(三)凡步、马、工、辎等军，闻中和门外炮声，即由各原驻地拔队，依左之命令进攻：

甲、工程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

乙、二十九标二营，由保安门向伪督署分前后进攻；一营前队，出中和门迎接炮队，左队防守中和门，右队防守通湘门，后队助工程营占领楚望台。(三营出防郧阳，不列)

丙、三十标扑灭旗兵后，即向各要地分兵驻守。

丁、三十一标留守兵分驻各城门防守。

戊、四十一标留守兵进攻伪藩署及保守官钱、善后、电报各局。

己、三十二标留守兵由保安门进城，助二十九标二营攻击伪督署。

庚、马队八标一营进城后，分配各处搜索；二营向各城门外搜索，以四十里为止。(三营及混成协马队十一营出防襄阳，故略)。

辛、塘角辎重队于本夜十二时在原驻地放火助威，借寒敌胆。

壬、塘角工程队掩护炮十一营由武胜门进城，占领凤凰山。

癸、卫生队于天明时往各处收殓阵亡尸首。汽球队于十二时在谘议局听遣。(辎重第八营在伪督署守卫，谅不可靠)。

(四)炮队第八标于十一时半即拔队由中和门进城，以一营占楚望台，向伪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猛烈射击；以二营左右队占蛇山，向伪藩署猛烈射击，中队留守原驻地；三营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防守江中兵舰。(我军占领时，均即停射)。

(五)四十二标一营左队进攻汉阳城，前、右、后三队占领大别山及兵工厂，以后队为援队。

(六)四十二标二营占领汉口大智门、硚口一带。

(七)四十二标三营右、后两队堵塞武胜关，前、左两队防守花园、祁家湾一带。

(八)武昌弹药枪支，暂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阳夏暂由兵工厂接济。

(九)凡各军于十九日七时均至谘议局前集合，但须留少数军队防守已占领地点。(阳夏驻军不在此例)。

(十)余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

注意：本军均以白布系左膀为标识。

总司令　蒋翊武

命令由陈宏诰、牟鸿勋等复写二十份，分头派人传送。送往南湖炮队的命令，事关全局，由素与各营联络的邓玉麟负责传递。杨宏胜则担任向工程营等部运送起义用的炸弹、子弹的任务。

这样一个相当周详细密的命令的制定和下达，对于起义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各支起义部队明确各自的目标和任务，即使在机关部遭到破坏，领导人死、伤、捕、逃的情况下仍然能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夺取战斗的胜利。

夜深，在小朝街机关部，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等焦急地等候着南湖响起那划破长空的炮声。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四　武昌首义

首先举起义旗的是工程第八营。

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驻在中和门内，紫阳湖旁。楚望台军械库在它的东侧偏南，其防卫任务正由该营左队担任。工兵营东北角驻防着第八镇三十一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十一标大部已开赴四川，只有少数人员留守；四十一标也有两个营开往宜昌和岳州，只有一个营留守。混成协司令部设于此地。工程营东侧紧邻是第八镇二十九标与三十标。二十九标已有一个营开往郧阳，三十标的第二营也正调驻汉口。测绘学堂与工程营隔墙相望。这是湖北新军的集中驻地，也是革命党人汇萃之区。

工程营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党人占该营士兵的四成，秘密组织较为健全。熊秉坤是工程营革命党人总代表，共进会员，在士兵中素有威信。10月9日下午，邓玉麟与杨宏胜同至工程营，向徐少斌、熊秉坤等传达当晚起义的命令，并一起拟定了起义办法。但午夜因南湖毫无动静，料想事机不顺，也就不敢轻率发动。次日清晨，工程营士兵李泽乾探得三烈士死难确讯，熊秉坤即召集各队代表，布置起义。并到三十标与方维、谢涌泉洽商了发难计划。又至二十九标与蔡济民约定晚间点二道名时，由工程营鸣枪三发为号，立即起义。

10月10日，夜幕降临，阴晦的天气显得格外灰暗。第二排排长陶启胜率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推弹上膛，持枪而待。这个素来仇视革命的排长，斥问金兆龙想干什么？金兆龙语带双关地回答道："准备不测"。陶怒不可遏，狂叫道："你想造反吗？""反就反！你能怎样？"陶上前扼住金的手腕，呼令护兵"逮捕"。金大声呼喊："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当即举枪，猛击陶首，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砰然一声，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枪声！革命士兵盼待已久的枪声！枪声就是命令！全营立即哗然而起，纷纷持枪，呼啸出棚。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闻声持枪前来弹压，当即被吕中秋、程正瀛击毙。熊秉坤即刻鸣笛集合。一时枪声大作，军官们均抱头鼠窜，相率逃匿，革命士兵很快控制了

全营。熊立即命令整队猛扑楚望台军械库，以求一举夺取军械库。当部队到达千家街时，已遥见城北灰黑的天空被焱焱的火光映红——这是塘角辎重队已经发难的信号。

清晨，武昌城里自藩署以下各官署、各城门，都由革命军占领。一面红地十八星大旗，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接着，隔江汉阳的革命党人亟起响应。原来，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一营驻汉阳，二营驻汉口，三营驻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因此，文学社在该标的机构称阳夏支部，由标代表胡玉珍兼支部长，邱文斌为副标代表，王缵承任书记。10月10日，胡玉珍因采买到汉口，在革命党人交通机关范明山寓所遇到小朝街机关部破坏后逃来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当即商定了在汉阳响应发难的安排。是夜，胡玉珍与王缵承又作了具体磋商。因为长江的阻隔，他们还不知道武昌已经发动。11日下午，任文学社联络的袁金声过江到武昌，回来后即将武昌"光复"和看到了由黎元洪署名的军政府布告等情事向大伙传播。胡玉珍遂决定当晚10时发难。他们到汉口与四十二标二营赵承武等约定响应，并邀约王宪章来汉阳指挥起义，又通知驻兵工厂的左队及钢药厂的前队闻枪声集合，届时举义。

11日入夜以后，胡玉珍鸣枪为号，前、左两队即如约集合，入子弹库夺取弹药。管带汪炳山逃窜。队官宋锡全企图制止士兵行动，革命党人黄家麟即将白布系其左臂，对宋说："你不要糊涂"。宋本是日知会员，闻言省悟，即抽出指挥刀示意反正，遂被推为指挥官。这时邱文斌也率队占领龟山，拖大炮三尊上阵。旋与由龙灯堤前来的队伍一起，将先天窜到龟山脚下的辎重营残部击溃，残敌逃往汉口刘家庙。

与此同时，起义枪声也响彻了汉口的夜空。赵承武首先率队在居仁门发难。汉阳的革命军在起义胜利后，又如约派曾汉臣等率兵到汉口与赵承武等汇合，迅即占领了全城。经过两天的战斗，继武昌之后，崭新的十八星旗在灿烂的阳光下，相继飘扬在龟山顶上和汉口上空。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五　军政府成立

11日，武昌城里的战斗刚刚结束，通宵苦战的部队稍得休整，蔡济民、高尚志、陈磊、李翊东、张振武等十余人，就聚集到谘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问题。其时，汉口、汉阳还在敌人手中，受伤后匿居在汉口的孙武、刘公，先在汉口后去汉阳指挥发难的王宪章，逃亡新沟的蒋翊武等，都未能及时联络。而临时推出担任军事指挥官的吴兆麟，自日知会破坏后即同革命党没有联系，在新军里也只是一个队官，资历不足。蔡济民等都认为谘议局是一个"民意机关"，"所有议员都是湖北各县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合作，好让革命事业早日得到胜利"。为此，他们向驻局议员沈维周提议召集在省议员商讨组织起义政权机构的问题。沈即偕同陈磊、赵师梅往访议长汤化龙，又分别召集议员来局聚会。

约在攻克督署后不久，担任巡查的马荣、程正瀛截获了替黎元洪搬运行李的伙夫，得知黎藏匿在黄土坡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里。吴兆麟即命马、程带领一排人到黄土坡谢家，将黎元洪搜出，拥至楚望台。其时，因为黄兴、宋教仁未到，文学社、共进会的首领或伤，或死，或避匿，起义的士兵正为此踌躇焦虑。黎元洪一出现，原先有过的举黎为都督以资号召的拟议，立即成为多数人的愿望。由于黎固执地拒绝士兵们的拥戴，马荣竟拔刀相向，逼他非"革命"不可。

在谘议局，立宪派人也看中了黎元洪。议员刘赓藻说："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导觅之。"在场的起义者咸无异词，即由蔡济民等随同刘赓藻前往黄土坡。

革命党人由于自身的软弱，认识上的局限，和当时处境的困难，选择了黎元洪。立宪派人出于攘夺政权的企图，也举荐黎元洪。黎既成了两方面瞩意的对象，出任都督就势在必行了。

当蔡济民等偕刘赓藻离开谘议局不久，黎元洪也就由吴兆麟、邓玉麟等簇拥着来到谘议局。"甫入门，即有人高呼曰：'都督到了！'黎竟默然。"

约莫晌午刚过，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沈维周等先后到来。起义的各标、营、队的代表也多数出席。当推举汤化龙任主席。汤首先发言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澂自逋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吴兆麟接着发言，表示同意汤化龙的看法，声称"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黎元洪固辞，坚不允在布告上签署。李翊东持长铳迫黎应允，"黎益瑟缩不语。翊东乃援笔代书一黎字，众鼓掌称善。遂置黎于楼上室内，以戈守之。"

当时，武汉三镇盛传黎元洪与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等曾密电清廷，请速派大军南下镇压革命，任黎为统制，"事成则柯等为黎缓颊，事败，则黎为柯等庇护。"11日晚，革命党人得悉黎安排将其家眷送往上海，张振武于是倡议："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神威。"陈磊、李春萱也表示赞成，但吴兆麟竭力反对，主张将黎"派兵看守"，"即彼不作一事，亦无妨碍。"事实上，"革命党人的真

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一切事情。”所以，他们另行组织一个真正的掌权机构——谋略处，裁决和处理一切大事。

谋略处以蔡济民为首，有邓玉麟、吴醒汉、张廷辅、高尚志、徐达民、王宪章、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等十五人组成。当由谋略处议定：以谘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府；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改纪元，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用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通电全国；在军政府下设立参谋、军务、政务和外交四个部。旋推定参谋部由杨开甲任部长，张景良任副部长；军务部由孙武任部长，蒋翊武任副部长；政务部由汤化龙任部长，张知本任副部长；外交部由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时在上海）。另设招贤馆，以吸收各方面人才。

（摘自《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材料六　武汉保卫战

武昌首义的炮声，对清廷无异是晴天霹雳。控扼九省、南北通衢的武汉的失去，使它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立即集中水陆兵力，企图尽快夺回武汉，扑灭革命。10月12日，清廷谕令将瑞澂革职，停止刚刚开始的永平秋操，着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南下，并令萨镇冰率领海军溯江而上，令程允和率长江水师赴援。因恐缓不济急，又令河南巡抚宝棻就近调派第五十二标张锡元部前赴汉口，与张彪的残部汇合。14日，谕令作好南下军旅的编配与守卫京畿的部署。除任荫昌为第一军军统，率所辖之第四镇吴凤岑部、第二镇混成第三协王珐元部、第六镇混成第十一协李纯部先赴湖北外；又命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辖第五镇张永成部、第三镇混成第五协卢永祥部、第二十镇混成第三十九协伍祥祯部为预备队，“听候调用”；又任载涛为第三军军统，辖禁卫军第一步兵协良弼部，第二步兵协应龙翔部及第一镇何宗莲部，“驻守京畿，专司巡护”。为了“剿灭”武汉“革匪”，清廷正在调配其全部反革命武装。

武汉保卫战的战幕于10月18日正式揭开。整个保卫战是由汉口战役（10月18日至11月1日）与汉阳战役（11月2日至11月20日）组成，一般称之为“阳夏战争”。

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至武昌与黎元洪见面以后，当晚即赶到汉口，在满春茶园组织了司令部，部署汉口的防务。革命元勋、屡建战功的黄兴的到来，给正在市区抗敌的士兵和市民以巨大的鼓舞。两面丈二长的“黄”字大旗飘扬在汉口上空，使敌人见而胆落。由于连日恶战，革命军中受过训练的老兵减员甚多，只得将刚刚募编而成的第六协杨载雄所部调往汉口，同时将汉阳第一协宋锡全所部，调七成到汉口前线。革命军虽然多为新兵，装备较差，训练不足，许多人“连射击还未学会”，然而全军上下充满革命朝气；且军官多由原革命士兵提升，他们“对新兵照顾无微不至，夜间也抓紧时机训练，鼓舞和加强了新兵的作战精神”。湖南、九江、陕西、山西等省区“光复”的捷报又频频传来，更给将士们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黄兴的指挥下，人人磨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醉心于“扩充势力，植营私党”，不惜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竟至“拥黎以自重”，与汤化龙“一文一武，同恶相济”，为首义成功而作出很大贡献的文学社受到了歧视和排挤。许多“意志极为纯洁，不识权利为何物”的文学社社员和共进会会员，这时大都充任中下级军官，日夜在前线与敌人“拼生死”，目睹军政府中黎、汤和孙武等“只知争权位”的情况，内心十分不满。加上黎元洪一伙配合中外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又极力在革命军内部散布北洋军队“非我军所能敌”的失败主义情绪，甚至以清廷颁布“宪法十九信条”为由“意欲罢兵”。这些都不能不给前线各军的士气以至指挥带来不利影响。

反攻分两路进行：一路是主攻，由汉阳渡汉水攻汉口的硚口一带，计划在渡河以后，分兵三路，集中力量歼灭玉带门之敌；另一种是牵制，由武昌青山渡江攻汉口的刘家庙一带的敌人。

11月16日下午5时，架桥完毕。入夜以后，各路军均经由浮桥潜到对岸，按照原计划展开：以湘军王隆中第一协为右翼，湘军甘兴典第二协居中，鄂军第五协熊秉坤为左翼，统向博学书院敌阵进攻。开始时，右翼进展迅速，抵达博学书院附近，与敌接火。这支湖南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新军，相互协调，行动一致，一进再进，迫使敌人退至韩家墩，大有将敌军逐出汉口市区之势。可是，左翼却进展迟滞，次日上午，遭敌方机枪、火炮猛烈攻击，缺乏作战经验的新兵慌乱溃退，致令左翼全线动摇，官兵纷纷退渡汉阳。居中的甘兴典所部也临阵慌乱，甘本人乘马疾走，更使所部相率退却。这样，右翼便成为孤军，突出在敌人阵地之前。好在敌人不知虚实，未敢进逼。而原受命率部于汉水与长江汇口之处强渡，另由武昌青山渡江击汉口刘家庙之敌的杨选青，是日未赴前线，贻误了军机，所部未能发挥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攻部队的作用。黄兴见此情形，乃命王隆中率部撤退。王与将士对左翼与甘兴典不战自溃的卑怯行为深感气愤，坚不后退，仍然奋勇抗击清军，直到夜晚，才整军退返汉阳。黄兴组织的反攻汉口之战于是失败。

为了挽救危局，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铺一线，并逐日在前线坐镇指挥。“每见敌炮落在咫尺，总司令不为动，随从人员强扶以避，其英勇如此”。在他的指挥下，各军与敌人展开了山头争夺战。

11月26日夜晚，敌人在汉口水电公司附近架桥多座从汉水潜渡，拊革命军赫山阵地之背，夹击、攻占十里

铺。27日上午，敌占龟山。下午，汉阳城失陷。

（摘自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

南北和谈

背景介绍

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原先对此估计不足的帝国主义很快就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10月16日还带着侥幸心情向英国政府报称“皆以此次乱事可定”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11月6日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就中国面临的局势作出了新的判断：“这个运动（革命）的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使得任何想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成为泡影。”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也报告本国，谓“清廷绝无保全之望”。那么，该怎么办呢？英国殖民者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供出了帝国主义的盘算：“武力做不到的事情，用计谋却能做到。”而早在10月26日，汇丰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也曾建议英国调停以缔结停战协定，理由是“目前的混乱情况使对外贸易陷于停滞。”为此，帝国主义各国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共同出来“调停”南北两方，诱胁革命党人中止革命战争，与袁世凯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和解”。因为他们断定，“除非能够实现调解，否则将出现帝国立即分裂或清朝完全覆灭的结局。”这自然是不符合帝国主义的意愿和利益的。

擅长反革命两手的袁世凯很懂得此中奥妙。他“出山”之初，就向清廷提出，对武汉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仅是“剿”，同时还要“抚”。清廷因此改变了原定“一致主剿”的方针，责成袁世凯“督办剿抚事宜”。袁随即奏准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添募反革命武装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营，以增加“剿”的实力，从而“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用武力威胁为手段，达到政治诱降的目的。为此，10月30日袁亲自南下督师，下令冯国璋指挥的清军猛攻汉口。冯攻据汉口后正想乘势渡江，袁却“亲以长途电话勒止之”。并以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副署了一纸“上谕”，要革命人民“无偏无倚”，放下武器，来致力于所谓“新治”。

早在袁世凯出山之前，就酝酿以和平攻势消弭革命的阴谋。攻陷汉口以后，更加紧了诱降活动，多次令其幕僚刘承恩致书并会见黎元洪，设置“和平了结”的圈套，被革命党人所拒绝。然而，被革命洪流卷进来的旧官僚、立宪派却产生动摇，主张妥协。黎元洪在致袁世凯的复信中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材料：

- 谁主和，谁吃刀
- 朱尔典斡旋
- 南北和谈

材料一　谁主和，谁吃刀

袁世凯东山再起，首先对武昌革命军以武力威胁，令冯国璋率军猛攻汉口，同时派黎元洪的同乡刘承恩与湖北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被武昌军政府拒绝。十一月二日，清军攻陷了汉口，袁世凯又一次令刘承恩写信给黎元洪，要求立即进行和谈。黎元洪召集军政府会议，讨论如何回答，当场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他打了个胜仗，就劝我们投降吗？”《民立报》也在十一月二日发表了一篇《议和驳谬》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和与专制之战争”，“其势不两立也”，“西文各报近日宣传议和之事满纸皆是”，这是“摇惑人心”，如果听他们的话，就要“误大事”。六日《民立报》又发表《和平解决之殷鉴》的社论，指出：“如有主张议和者，即为黄帝之罪人，凡我同胞各其思之。”其后革命党人纷纷向《民立报》投稿反对议和，“驳和之议投诸本报者，日有数起。”在革命党人的抗争和反议和舆论的压力下，黎元洪不敢答应袁世凯的要求。但袁世凯并不死心，十一月十一日又特派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带上自己的亲笔信，由英国驻汉口领事从中介绍，前往武昌军政府，要求开始议和谈判。这一次由于有了“洋人”从中作媒，革命党人不便公开违抗帝国主义的“建议”，军政府接待了这两位使者。刘、蔡提出：只要革命党承认君主立宪，即可立即停战，否则要继续进攻。这种苛刻的条件和威吓的口气，立刻遭到在场的革命党人张振武、甘绩熙等人的反对，他们抽出指挥刀，大叫“谁主和，谁吃刀！”同时又有“民众团体，在都督府门前作示威活动，刘、蔡败兴而去。”接着，袁世凯又密派长子袁克定潜赴汉阳，找当时的战时总司令黄兴，建议联合行动。黄兴虽然曾致电袁世凯希望他反正，作第一任总统，但前提是建立共和国，于是严词拒绝了袁克定的君主立宪要求。同时，黄兴怕和谈扰乱军心，特发出密告同胞书，指出：“现袁已派心腹多人，分途驰往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冀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我已成之志。设心之诡，用计之毒，诚堪痛恨。……故此密谕同胞，……查拿前项演说之人，销灭传单。”这对袁世凯的和谈骗局是一个迎头痛击。

但是，黄兴等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想利用袁与满族亲贵之间的矛盾说其“归顺”革命，通过这条“捷径”尽快赢取革命的成功。早在袁世凯刚被清廷任命为湖广总督时，湖北就出现了一份以“鄂人”名义写给袁世凯的信，说：“阁下诚能因时势

所趋，体士民之意，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庭扫虏，为汉族争百尺光，我等全鄂士民当肩耰手锄，甘冒矢石，为阁下作前趋。"这封以后被广泛传播的信，可能出自黎元洪和汤化龙等示意，也可能与当时在军政府中掌握实权的孙武等人有更多的关联。这是革命一方首次主动表示的在袁世凯"犁庭扫虏"的前提下拥袁为"汉族之华盛顿"（总统）的意向。11月初，湖北军政府在以黎元洪名义写给袁世凯的复函中，再次表示了这样的意向。

材料二　朱尔典斡旋

11月16日袁氏内阁组成。袁在施政纲领中进一步散布和谈空气，他说："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但袁深深懂得"非假外力则和局不易而成"，于是拜会了所有的驻京公使，希望公使们出面促成和谈。从十四日开始帝国主义驻汉口领事积极为促成和谈奔波。沙俄驻汉口领事敖康夫极为卖命，促武昌军政府和袁世凯的代表举行了两次谈判，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破裂。22日敖康夫再次提议双方停战，举行谈判，亦无结果。袁克定致电袁世凯，让他请在汉口影响较大的英国领事出面调停，电报说："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东南各省代表已集该处，即兵力能达，而东南人心恐失，不如暂留以为政治发达之具。如武昌停战，我可停放，英使调停其间，必得好果，但停战须合武汉、金陵论之，使英使说合，或可办到"。于是袁世凯和朱尔典密商，决定由朱尔典致电英驻汉领事葛福，让他促成和谈。同时袁克定又密派同盟会的叛徒朱芾煌带上汪精卫的密函潜往武昌去见黎元洪，要求南北和谈，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恰在此时，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然后又在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

12月1日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吓得魂不附体，逃往离武昌九十里的葛店。武昌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军政府的首脑人物也束手无策，举棋不定。朱尔典看到这是促成南北议和的最好时机，他一面劝告袁世凯只管令清军在龟山放炮，不要渡江进攻武昌，一面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马上出面调停，提议双方停战。武昌军政府接受了葛福的建议，开始停战三天。三天期满后，英国领事又通知双方继续停战三天。这时袁世凯从北京拍来电报，要派唐绍仪等人前往武昌和黎元洪商讨大局，要求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继续停战十五天。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筹组中央政府的各省代表，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并提出议和纲要四条：一、推翻清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还决定汉口为议和地点，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

12月1日，在英国领事馆盘恩的撮合下，双方宣布停战三日，并一再拖延，扩大到全国。最后，在12月9日双方分别派遣伍廷芳和唐绍仪为代表在武汉正式议和，18日改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进行谈判。

材料三　南北和谈

经过朱尔典的居间撮合，戈飞的疏通奔走，南北两方达成议和协议。12月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命其委派代表驰赴南方讨论大局。次日，袁世凯根据事先与张謇、赵凤昌等商定方案，命唐绍仪为他的全权代表，带同参赞杨士琦和他所挑选的各省在京官绅代表许鼎霖、严复、张国淦、侯延爽等，迅即南下武汉议和。9日，反正各省也接受苏、浙、沪都督府的推荐，确定以旧官僚伍廷芳为南方议和全权代表。"南北和谈"于是正式开始。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13日入武昌与黎元洪等晤谈。本来，汉口的各省代表会在12月5日议定的"对北使开议各条"中，头两条就是"推倒满洲政府"和"主张共和政体"。但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中却抽掉了实质性的"主张共和政体"，只以"推翻清朝"为满足。因此，袁世凯"一直希望在汉口开会"，以便在黎元洪等人的配合和协助下，通过"和谈"而窃取革命成果。但是，张謇、赵凤昌等东南立宪派为了便于操纵，却坚持"和谈"地点应改在上海，并各自致电唐绍仪，咸以不能赴汉为由，要唐径来上海开议。12月10日，伍廷芳复电黎元洪，要黎即派专轮送唐来沪。第二天，伍又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E. D. H. Fraser)说："由于目前的形势，以上海为开会地点，实较汉口更为适宜。"请法磊士通过驻京英使，让袁世凯改命唐绍仪来沪会谈。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的除南北双方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李德立。

为了使"和谈"能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进行，英、美、德、日、法各国驻京公使采纳了沙俄公使的建议，于12月15日一致决定向各自政府请求，准予通过各国驻沪总领事，同时向南北双方致送照会，对中国内政进行公开的干涉。20日，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公然要胁说："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因此告诫南北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表面上看，照会对南北双方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完全是针对革命党人的：不准他们把"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持续下去，压迫他们依据袁世凯的条件"尽速达成协议"。为此，朱尔典又指示其驻沪总领事法磊士，"要其尽可能同唐绍仪保持密切的接触"，"尽其力之所及，帮助双方达成一种协议。"

在市政厅举行的公开和谈，从18—31日一共进行了五次。第一次主要讨论停战问题，第二次主要讨论所谓

"国体"问题，后三次主要讨论所谓"国民会议"的召开问题。

至此，议和谈判似乎即将告成，再加上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已作出暂时不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决定，虚位以待袁世凯，袁世凯深表满意，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

历史内幕

有关奕劻见闻

奕劻自道光三十年三月袭封辅国将军后，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晋封固山贝子、贝勒、庆郡王、亲王以及亲王世袭罔替。其任差，较重要者为管理海军衙门、管理外务部事务、庚子议和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常闻人云，奕劻为贝勒时，家道甚窘，至光绪三十三年，我守护西陵任满回京，见其邸第扩充三倍，焕然一新。至次年二月二十九日伊作寿时，近支晚辈王公和蒙古在京王公暨各部大臣等无不前往祝寿，我亦前去。伊设宴、演戏，大事铺张，其子载搜夸耀于人曰：此一日用费不下万金。按其当时的豪奢举动，绝非亲王之所能办到者，事虽小节，亦足以为其平日贪污受贿之一证也。至于伊之招揽大权，我不能尽知，仅列举数事以说明之。

清宣统二年九月，资政院开会，我当时为本院议员。十一月间，议员吴赐龄（广西人）等提出弹劾军机大臣奕劻案，内有奕劻昏庸贪墨，声闻四国，内政外交，著著失败，请即罢斥，改组内阁之语。经三十人以上之赞成，成为议案。旋由议长溥伦照章提出大会讨论，当时议员除在宪政编查馆兼职者数人略为辩护反对外，其他如宗室王公及蒙古王公各议员均无不赞成，于是以大多数通过。例由议长溥伦具折上奏，折上后，奕劻见之怒甚，竟将溥伦叫至板房（军机大臣每日起坐之处）痛加申斥，嗔其不将此案压置。溥伦亦无法申辩而退，回至南书房太监屋内。其时在座者有蒙古亲王那彦图、公爵博迪苏（此二人均是御前大臣兼议员者），我亦在座，此外尚有二、三人记不清是谁了。溥伦对我辈言方才曾受奕劻申饬之事，众人默然无一语，独那彦图哈哈一笑而已。那虽为奕劻之婿，亦不满奕劻所为也。奕劻也不知立法机关程序，提议既经多数议员赞成，即成定案，议长无权可否，非比行政机关也。其恃权压制若此。

至宣统三年三月间准备成立内阁，奕劻以溥伦若仍为资政院议长，决不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之职，面请摄政王载沣开去溥伦议长职务。而摄政王以溥伦在议长职任并无过失，未即应允；而奕劻则以去就力争。旋由那桐调停其间，适有热河都统出缺，即以农工商部大臣溥颋外调，而以此缺畀溥伦。溥伦既任行政大臣，即不能兼任立法机关，其资政院议长当然开去，改派大学士世续（内务府旗人）接充。世续昏庸顽固，于立法毫无常识，任事未及数月即行辞职，改由副议长李家驹（汉军旗人）代理牟。迨是年九月又届资政院开大会之期，时值武汉起义，军事紧急，十一月间全院议员陈请内阁总、协理大臣到会质问施政方针。是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均到院列席，当有议员质问数件，其中重要者有二事：一为议员于邦华质问政府是否赞成速开国会，亦劻答以现正预备，明年或可召开。一为议员易宗夔（湖北人）质问现在武汉军事，朝廷是否有用德国军队协同作战之事，奕劻亟力否认，言"革命党系中国百姓，那能招外人打自己国人，决无此事。这是听谁说的?"当即追究该议员系听何人谣言，声色俱厉。结果不得要领而罢。

奕劻内阁总辞职后，袁世凯内阁成立，将与革命军议和。时奕劻家居托病不出。载沣曾多次派王公、贝勒至其家敦请（我亦被派），始勉强进内应隆裕之召对。进内时即对大众声言："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复申前言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战。"当时那颜图闻而嘲笑之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队又增加了一万人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当时隆裕经奕劻如此说法，遂亦表示倾向议和。斯时载沣已辞去监国摄政，退归藩邸，不久，隆裕即下共和诏矣。后闻人云，奕劻曾受袁世凯数十万之贿，故为此语，并非认识到共和对国家有何好处而有此主张。此我听之传言，不能臆断。

以上所述，除亲知目睹者外，其中关于溥伦开去议长事，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那晋（系那桐之堂弟）和我闲谈时所说；关于奕劻应隆裕召对事，系蒙古公爵博迪苏对我所说。

（载涛《晚清宫廷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荫昌督师南下之内幕

八月二十日早晨，忽然接到军谘府秘书科科长的电话，说："接到湖北的电报，昨晚九时，武昌兵变，湖广总督瑞澂和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都已弃城逃往汉口。"我就

回问他："滦州涛贝勒处发出电报没有？有没有打电话给朗贝勒？"他说："电报、电话都已打过，朗贝勒就要到衙门来了。"我立即乘车到西城西长安街军谘府去。

进门不久，毓朗也到了，我就问他："您看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办？"看他的神色好象是对这件事还没有拿定主意，迟疑了一会儿才说："这是内阁的事，我们不用管，还是让内阁去办吧。"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调遣军队的大权，是我们军谘府和内阁所应该争执的问题，岂肯多让，但是今天却为什么反而推出不管了呢？正在这个时候，庆王府有电话来请朗贝勒立即前往开会。毓朗就要走，我问他："您到王府去开会，倘若问起您来，您预备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还是听候王爷的意见。"

毓朗走后，我心里很不以为然，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这样不负责呢？当时府里的空气虽然很沉寂，但是我心里却很焦躁。湖北、滦州等地也没有什么电报来，府里又没有什么事做。等了一个多钟头，毓朗回来了。我急忙问他："到底怎么样？"他说："庆王的意思要派陆军大臣荫昌到湖北去督师。"我问："带哪些队伍去呢？"他说："还是等涛贝勒回来再决定吧。"如此，又等了一个多钟头才接到载涛从滦州拍来的一封急电，说他就要回京，一切事都等他回来再决定。

夜里十点多钟，铁路局摇来电话说："涛贝勒的专车就要到了。"当时衙门里部曹一空，我就一个人立刻到站里去迎接。到了车站，不久专车就进站了。只见载涛仅仅带了几个高级人员回来，行装也很简单。再看那列专车，只有一个火车头挂着两辆客车。我很纳闷，因此我随口问载涛："为什么您的专车这样简单？"他说："情形紧急，我们几个人是从操地上飞马赶到车站的。到了车站以后，仅仅找到一个车头、两辆客车，来的时候连路签也没有来得及办，就冒着险开出来了。"载涛尽管这样说，但他还是做出精神抖擞、很镇静的样子，下车以后就对我们说："到我府里来吧。"我就和跟他同来的李经迈、良弼、哈汉章等几个人，到载涛家里去了。

落座以后，我就向载涛说："听说上头已有意要派荫午楼前往湖北督师了。"载涛就随手把地图拿出来看着说："现在的兵力已经都开到滦州去了，从滦州到武昌有很长的路线，调兵遣将可就很费事。"他象很着急的样子，又自己叨念着说："别处又无兵可派。"

后来我听说，武昌失陷以后，内阁集议，一致主剿，并主张由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赴鄂剿办。但拟议的时候，协理那桐说："武昌兵变是一隅之蠢动，何必陆军大臣亲临督剿呢？"因此才再行考虑。当时也颇有人主张从河南和京畿附近调派国防军去应变，总比从滦州调派开拔近一些，快一些。却不料庆王奕劻对于载涛久存戒心，惟恐载涛趁武昌起义调拨军队的机会利用禁卫军来对付自己。所以奕劻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首先把姜桂题的武卫军调到城里，分驻在九门要冲和庆王府的周围，进行了切实的防范。这说明在当时不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就是清皇室亲贵内部的互相疑忌也很深刻。所以载涛当晚的自言自语，也自有他难言之隐了。

载涛说完这话，随着就拟了几道旨意，都是准备在第二天应用的。等了一会儿，他说："好吧，夜深了，我们憩息一会，明天早晨朝房里见面吧。"当天我们都是穿着军服出来的，所以载涛说完这话，我们就各自告辞回寓，调换冠服。虽说是"回去憩息一会"，实际上谁也来不及睡觉了。

那时摄政王在南海办公，军谘处虽然已经改组为军谘府，掌握军政大权的军机处改为内阁了，但人们都没有改口，仍旧称为"军机处"。"军机处"就在西苑门内近门口靠左手的三间小房子里。"军机处"旁边有个候旨室，是前军机处拨给军谘府的。

第二天，天才刚亮，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聚齐在候旨室里。大家坐坐谈谈，不多时就有人传话，说庆王奕劻、徐世昌、那桐已经到了，请载涛过去谈话。载涛去了不到半个钟头，随着就回来了。他说："王爷已经决定了，由荫昌督师，抽调滦州两镇向武汉出发。"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洵贝勒要调海军提督萨镇冰抽调海军的'四海'驶进长江，以壮声势。"大家听了以后，颇为惊异，认为载洵这样提，无非是表示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自己不要落后，但他却未曾虑到海军舰只在江面作战行驶，因吃水很深，不大灵活，调进长江，深入武汉，助威无补于大事，一旦失利，损失可就不小。况万一沿海有事，则又将用什么力量来镇压呢？但我又想这一决定既是载洵完全为个人面子出发，又出自载涛之口，我虽然左右思考，话到唇边，最后一想，事已成局，何必自找麻烦，谅来即使我有所表示，他们也未必采纳，因此我始终未谈。

载涛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褂，脚下却登着一双长统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得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实在使在座的人们有些忍俊不禁。他平时虽然一贯如此，但在这样的紧张局面之下，他竟还是"故我依然"，却是人们所料想不到的。

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作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我看到当时的情况，认为他这样轻率，担当湖北督师的重任，恐怕要贻误前线军机的。

这时就听到里面叫荫昌，荫昌就到隔壁内阁去了。继而又听到苏拉（满语，是当时宫廷各部差役的通称）的声音传叫说："叫荫昌！"，这样直呼其名，我们就知道这是摄

政王召见荫昌了。

我看到宫门抄，才知道当天上谕："湖广总督瑞澂，毫无防范，祸发失城，辜恩溺职；罪无可逭，应即行革职，带罪图功。着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并着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海军部加派兵输，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迅即督兵赴鄂，节制调遣前防各军。"

听说武昌兵变、瑞澂逃走的电报到京以后，庆王是主张从严究办的。当时就查阅以前封疆大臣弃城逃走处分的成案，拟旨将瑞澂交法部惩办。谁知瑞澂与镇国公载泽和隆裕太后都是近亲，载泽就在事先运动隆裕太后，由隆裕从中示意，才改为革职戴罪图功。载泽和瑞澂是儿女亲家，素来遇事相互袒护，这次他通过隆裕的关系为瑞澂缓颊，庆王也只好依了他。而瑞澂则偏不争气，后来竟潜赴九江转逃上海。所以到九月初八那天，还是下了一道上谕："着两江总督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我当时认为：未能重办瑞澂，为其后地方大员开了一条恶例，因之弃城逃走的屡见不鲜，若早把瑞澂治罪，情形或当不同，"泽公之罪，难逃公论"。

（冯耿光《辛亥革命回忆记》）

南京光复见闻琐忆

我在南京前后共住了三年，看到当时清朝一班官僚真是腐败到了极点。他们白天在公馆里赌博，晚上跑到秦淮河妓馆里或花船上去嫖妓。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日日麻将窝，夜夜秦淮河。"那些候补官员把李宝嘉著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当作做官的秘诀，夤缘贿赂，无所不至。大部分官员都吸鸦片烟，不过只是偷偷地在公馆里吸或者在妓馆里吸，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罢了。南京三牌楼一带本来是一片荒地，江北难民都在那里搭了草房子住。有时涨了水，他们都浸在水里。官僚们对于这种情况，不闻不问。后来因为办南洋劝业会，要盖许多展览馆，那些草房子都被拆掉，难民只好另迁到荒僻的地方去了。

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时候，南京带领新军的是徐绍桢（固卿），住在南京城里；带领防军的是铁良，住在旗城内（明故宫）。铁良的八旗子弟兵除了每月领几两饷银以外，平常只知道吃鸦片烟，坐茶坊，说大话，没有什么用处，实力全在新军和防军手里。张人骏晓得新军是靠不住的，就把徐绍桢的军队调到离南京城一百二十里的秣陵关去，只给每个士兵三颗子弹；同时把张勋的防军调到城内来。张勋住在城北的一枝园，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上海革命党方面曾派了许多人到南京来策动起义，已和新军联系，要他们在起义这一夜把新军调进南京城；铁良的旗营没有实力，想胁迫他离开南京；同时对于张勋的部队，则打算运动其开出南京城，回到长江北岸去，估计给他几十万军饷就可以了。同时争取南京大官僚中思想比较新的人反正，预备推举张人骏做都督，藩司樊增祥（樊山）做民政长，李哲浚等也都担任职务，听说那些司道都答应了，就是张人骏不肯。他是进士出身，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说："我世代受清朝的厚恩，怎么可以反叛？"经过司道再三劝告，张人骏哭着说："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让我回到故乡去！"本来司道们定第二日在制台衙门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张勋因有几十万军饷可以进账，也有允许之意，但后来听说袁世凯打电话给张勋，叫他固守南京，他就变卦了。

那天会议时，张人骏和一班司道都在座，已经议决推樊增祥做都督，突然张勋跑进来对张人骏说："别的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帅也可以背叛朝廷吗？"把桌子一拍就跑出去了。司道们知道张勋一反脸，是决不可能和平解决的了，所以都纷纷散去。那时我在中正街王府园电话局里，接到李公馆打给我的电话，叫我赶快到他的公馆去。我到了那里，他们说："革命的事情糟了，我们预备到下关去住，如果情形不对，就趁火车到上海，你可以同我们一道去。"我那时想看看情形究竟怎样变化，便对他们说："我又没有家眷在南京，孑然一身，不愁走不脱的，打算看看情形再走。"李哲浚的一位幕友景学铃（本白）对我说："你不走也好，我的任务请你替我代办。"他原来是替革命党担任通讯的，这时他把一本电报密码交给我说："你得到秘密消息，就打电报给上海《时事新报》汪彭年。你在电话局，我在电报局，可能得到秘密消息的。"我想也好，就把密码本接过来了。

阴历九月十八夜里，革命党突然起义了。有人带领着一批预先召集来的人，各发给一支手枪，叫他们冲到模范监狱去。在三更时分，我在电话总机间听到警察向警察局里报告各处起火，警察局总监随即报告给张勋。张勋回答说："随他去，不要去理他！"不久，模范监狱被革命党攻开了，把里面几百个犯人都放了出来，发给武器，叫他们一道参加起义。革命党冲到一枝园张勋司令部附近时，马路两旁突然射出密集的枪弹，把起义的人和犯人都打死了。张勋派出防军把守南京十三道城门，又将储藏在制造局里的枪炮子弹都发给守城的防军。这些都是我在电话局里听到的。

到了第二天，张勋派了大刀队去搜捕革命党，杀了许多臂缠白布的革命党人，自然也杀了一些老百姓。直到那天晚上，徐绍桢才带领部队开到南京城南雨花台下。张勋防军从城楼上向他们开炮。新军每人只有三颗子弹，子弹放完都溃散了。张勋部队继续任意施放大炮，打毁了许多建筑物。等到半夜后，枪炮声才停止。王府园电话局靠近城南，所以听得很清楚。后来听说原来约定在阴历九月十九日夜里起义，后来临时决定提前一天，在十八日夜里起义，可是徐绍桢并不知道这个变更，到十九日夜里才把部

队开到，所以失败了。徐绍桢遭到这次失败，就跑到上海去联合苏、沪、浙的革命军部队来攻打南京。

那时南京城里所有衙门、机关、学校、商店，都已关了门，除了留下几个人看守房屋以外，其余都跑了。大官僚从张人骏、樊增祥以下也都逃跑了。有钱的居民纷纷到上海去避难。电报早已不通，只有我们电话局还照常工作。职员除我以外，只有一个电话领班生，其余都是接线生和工人。这时接线生和工人也不肯放我走了，因为我们电话局本来是藩司管的，要由职员去接洽，方才领得到经费材料；如果我一走，他们连饭都没有吃的了。

第二天中午，我就带了些钱出城去了。因为到了下关去乘火车，要通过仪凤门。这时张勋限定十点钟到十二点开放城门，运进柴草菜蔬，趁此机会才可以出入。沿路我看见许多防军站岗，逃难的人很多，个个要被搜查，有时还要遭到枪柄敲打。有几个外国人却在旁边观看，看到张勋部队所背的步枪，都摇摇头。那时下关有一处我们的电话分局，我出城后就在分局宿了一夜。次日跑到龙潭去乘沪宁火车，因为那时火车只开到龙潭，不到下关了。到了上海，我即去时事新报馆把南京的详细情况告诉汪彭年，第二天《时事新报》上就登载了这方面的部分消息。

过了一个星期，我同《天铎报》经理沈椿年（任夫）回到南京。我是去取行李和办交卸的。那时，江浙联军已经攻克南京城，我们在下关下火车后，住在大观楼旅馆。当时下关很热闹，进进出出都是军人。他们手臂上缠了白布，写着××司令"、"××参谋"、"××师××连"等字样。大观楼旅馆里有很多官员在赌博。我在大观楼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搭小火车到电话局去。车上有许多军人，很是拥挤。车行驶不多久，有一军人在路旁举手招呼停车，便让他上了车。铁路两旁有许多士兵在开枪射击路灯电泡。车开到制台衙门口时，有部队在那里开枪互射，听说一边是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部队，一边是黄兴的部队。沿路还看到许多尸首摊在地上，也有已经用白木棺材装起来的。由于不断有部队中途搭车，所以从早上八点钟动身，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到王府园。

我进了电话局，看到接线生和工人大多数是旧人，职员倒都是新人。每一种职务都有三副人马，这是因为江苏、上海、浙江各个方面都派了自己的人。情况这样混乱，我也无从办交代。接线生还告诉我："你走后，张勋的侦探队长米占元带了武装人员到电话局来搜查，你住的房间连地板都撬起来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上海《时事新报》登了些南京的消息，他们就怀疑到我身上来了。幸亏我在几天前跑了，总算逃出了一条性命。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

辛亥秋，光复会上海总干事李燮和（号柱中，湖南人）与中部同盟会主持人陈其美协商，定于九月初二分路进攻江南制造局。又因上海新军都是湖南人，两会为了便于策反新军，推定李燮和主持起义，并约定起义成功后，由李出任沪军都督。自辛亥四月到八月，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都已做好，驻沪新军亦已运动成熟，起义日期亦已决定。我接连接到上海同志们六七封电报及快信，于八月二十七日离开临海，自椒江趁轮船赴上海。到达上海是九月初一拂晓，距离预定的起义日期还有一天，可是轮船刚到十六铺码头，就看见许多伤兵，有的坐在黄包车上、有的躺在担架上，不断地运送过去。我很奇怪，起义日期还没有到，为什么就有战事呢？上岸一问，说是陈其美败了，我更觉奇怪，新军都已联络好，难道又发生变卦？立即赶到锐进学社，其他同志都不在，尹锐志、尹维俊姊妹神色很紧张。她们告诉我说："陈其美败下来了。我们（指光复军）刚刚接上去。"

我刚到上海，情况还不了解，就暂在锐进学社等待消息。大约到了上午十二时光景，捷报就传来了。我急忙到制造局，制造局已经竖起光复军的旗帜，同志们臂缠白布，起义的新军亦都臂缠白布，来来往往，制造局已经被我们拿下来了。我和同志们互相执手道贺，同志们也告诉我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况。据李燮和告诉我说，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以为陈其美是自己人，就将联系新军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谁知他别有心肠，满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制造局可以不攻自下，所以他事先不和我们联系，就在八月三十的深夜，即九月初一的一二点钟时候，冒冒失失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之外，大多数是上海流氓，还有几个是"小连生"（潘月樵）戏班的演员，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可是他们不懂得我们和新军联络好的口号，一闯进去，就被打垮，陈其美被擒。李燮和闻讯之下，觉得不能坐视不救，就急速动员全体同志和一部分起义的新军，组成光复军全力赴援。光复军一到，一部分新军即起而内应。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搏斗，制造局官兵全部投降，清朝的苏松太兵备道也已经逃跑。光复军就这样光复了上海。同志们进攻制造局，是为了光复上海，同时也是为了救出陈其美，可是攻下制造局之后，到处都找不到他。后来据起义人员报告，才在厕所旁边的一个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发现，只见他手足带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靠着板壁，默然不动，一看，原来他的发辫从新的壁孔拉出房外，房外梁上挂着一个铁钩，，发辫就紧紧缚在上面，所以他一动也不能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

放下发辫，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路。李燮和传令扶着他走几步舒舒筋骨，然后叫他回去休息。

这时制造局的办公室挤满了人，有领枪支弹药的，有领粮饷的，有刻字的。起义前没有准备关防，这时临时雇刻字铺的人来赶制“光复军北伐总司令”的关防。

李燮和因为筹备起义，寝食俱废者旬余，又加仓卒动员，进行激烈战斗之后，体力不能支持，就将新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关防”连他自己的私章统统交代，要我便宜行事，他就回到锐进学社休息去了。

此刻我以参谋长身份代行总司令职权，一切外行，一切生疏，骤然当此繁剧，实有不胜应付之感。因为李燮和不是军人出身，我也是个书生，本来不懂得军事，在起义前，策划部署，还觉得头头是道，可是起义成功之后，反而忙忙乱乱，不知所措了。在忙乱之中，我们在制造局内所设的临时办公地点门禁是松驰的，同志们和起义新军各不相识，也没有规定的符号可资识别，只凭缠白布，就可自由进出。记得当天傍晚，闯进来一个臂缠白布的日本浪人（名字记不起）。我们盘问他要做什么，他说：“向总司令献宝剑，表示对贵国革命成功的祝贺。”我们回说总司令不在，他就扬长而去，以后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日本浪人可能是来探探虚实，看看情况的。

攻下制造局，上海就告光复了，当天夜里，我想起要用“沪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的时候，可是心思不定，怎么也写不出来，换了三次稿，看看措辞总不大妥当。当夜我就没有息，躺在床上想着想着，打算天一明，再动手拟稿。可是第二天一早，同志们报告说，陈其美已经自称“沪军都督”，到处张贴布告了。

这时李燮和已经回到制造局。有人主张由李燮和出面，变更布告。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让。但是光复军所部多不愿隶属“冒牌都督”陈其美之下，吴淞炮台官兵（原系新军）主张尤其激烈。李燮和乃于九月中旬（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率领所部到吴淞去，在中国公学内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改用“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关防，李燮和任总司令，我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顾问长，黄汉湘、陈强、邹序彬、周德厚等，都是总司令部主要职员。总司令部官兵刻苦自励，每月一律领津贴六元，虽然生活艰苦，革命意志仍然极其昂扬。不过同志们出生入死，光复上海，而“沪军都督”名义被人篡窃，大家心里总觉得怏怏不平。光复会所以不与之较者，不忍因小忿而乱大谋故也。有人谓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功者，乌知当时之真相，争字根本安不上。陈其美冒功可以惑当时，不能惑后世也。此段史实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是非颠倒，真相淹没了几十年，特表而出之，以存史实。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忆声洞

王　颖

声洞在一九一一年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为革命牺牲，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来，声洞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和声洞只在一起度过二年多的共同生活，就生离死别，永隔人天；然而他那种献身革命的耿耿忠诚和对我的真挚的伉俪之情，却使我毕生难忘。我现在年逾七十，鬓发已霜，每当回忆往事，犹觉仿佛置身五十年前，内心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二十岁那年（一九〇八年）和声洞结婚的。声洞比我长三岁，那时正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的父亲在汉口经营转运公司，家居汉口。我家因我的大哥景岐在京汉铁路供职，原住在郑州。先一年暑假，声洞回汉省亲，在亲戚家中看到我和家人合摄的照片，非常中意，就托人说媒。恰巧我大哥因公到汉，在亲友撮合之下，他就应允了这门亲事。次年，我家因大哥调汉口工作，也迁居汉口。暑假期中，声洞回国，我们就在汉口举行婚礼，婚后十天相偕东渡。声洞继续在千叶学医。我起先和声洞的七姊君英、四嫂曾醒同住东京。第二年暑假，我因怀孕，身体有病，声洞把我接到千叶居住，以便就近照料。我小产后，也入千叶学校学习产科。

声洞襟怀磊落，肝胆照人，处世接物，极富热情。他一面在千叶学习，用功甚勤，对病理学钻研尤精；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且屡屡托词向学校请假，回国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人，往返奔波，非常辛劳。我到日不久，他为了便于进行革命工作，便介绍我加入同盟会，这时我才知道他十七岁东渡日本后，同盟会一成立他就参加了。他常常把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以及革命救国的道理讲给我听，并且说，我们的小家庭虽然很美满，但是有国才能有家，我们不起来救国，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我从小因为父母非常钟爱，娇生惯养，根本不懂得世事的艰难，对国家大事更是茫无所知。结婚后，在声洞朝夕熏陶之下，我才明白了许多事情和一些革命道理，旧有的闺阁习气也逐渐改掉了。

声洞走后，我只身留在千叶，处境孤寂，心头悬悬，寝食不安。夜深时听到街头醉汉狂啸，声音凄厉，更使我胆战心惊。三月二十九日以后，日本报载广州起义失败消息，并说死难者多数是华侨和留日学生。我见报，既疑心声洞殉难，又觉得他如此活力充盈，不敢相信他会死去，内心焦虑，徬徨无主。几天后，君英姊来日接我回国。我问她，声洞现在何处。她说，起义失败后，声洞已去南洋暂

避，一时不能回来，说时神色泰然，一如平日。我旋又接到广州四月一日寄来一信，宛然声洞笔迹，内容大体如君英所说。我虽不敢遽断以为假，但未见到声洞，疑虑终难消释。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只得携着贤旭随君英回国。

我于端午节到汉。方、王两家家人见我回来，都强作欢颜相迎，但神情之间总觉得异于往昔。我因娩期将临，住母家待产。家人对我守护甚严，既不让我看报，三妹芝青日夜同我作伴，以防我探知声洞死耗，致生短见。我日日夜夜盼声洞消息，往往在睡梦中仿佛听得打门声，便猛然惊醒，蹶起探看，以为是他回来了。以声洞和我情感之笃，即使他在天涯海角，也绝不会不设法给我片言只字。我料想声洞十有八九已经不在人世，日夜苦苦思念，竟至昏厥。医生警告我说，长此下去，腹中胎儿将难保全。我转念声洞如果已牺牲，则应替他多留下一块血肉。因此，我乃竭力克制，强作镇定，静待分娩。

七月间，我产一女。产期中我回想当初贤旭出世时声洞伴我三昼夜的种种情景，更觉伤心万分，我母亲也不知陪我流了多少眼泪。八月十二日满月，我把两家长辈都请来，恳求他们说，现在我已替声洞多留了一个后代，声洞是生是死，请明白告诉我；如果他确已殉难，我不论如何艰难困苦，一定要活下去，把子女抚养成人。我刚说完，满屋子的两家男女老少都一齐放声痛哭，我也顿时昏了过去。

（摘自《辛亥革命》中华书局）

鄂军兵变内幕

原来端方奉命是“剿办”四川保路同志会，而一入川境，闻湖北革命声势浩大，川省保路同志会又遍地皆是，故见风转舵。变“剿”为“抚”。每过一州县，即搭台讲话，遍贴大字布告，以图收拾人心。并说：“逮捕下狱之川绅蒲殿俊、罗纶等，已电请释放矣。”

端方由宜西上之前，清廷曾密论岑春煊督川。岑见武昌革命风声吃紧，知难而退。端方由宜西进后，清廷又密论授端方四川总督。端方始终未奉到督川密谕，赵尔丰已先和之，乃对端暗布天罗地网。

八月二十六日，路过奉节县，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士兵听得武昌起义传闻，抗命不进。端方被迫，乃于防范之中施以笼络。当即集合随行队伍，阅兵讲话，许以每士兵奖给功牌及银质奖章，并电请嘉奖，以鼓士气。九月二十三日，各部队齐集重庆。端方令各部队散驻于郊外无人之区，严禁士兵进入城市，以防泄露武昌革命消息。

入川各部队自由宜昌西上以来，无论水路旱路，均是随到随走，不许逗留。尤其在奉节以上，防范更为严密。先到重庆之各部队，在沿途风闻湖北革命消息，将信将疑。至后愈传愈真，众料武昌定有来电，必为端方扣留。各部队代表暗开会议，众以不敢妄动为戒。我军是跟随端方入川部队，诚恐川省同志会同志与我军发生误会，致起冲突，我军亟应先杀端方以表明态度和立场，一面再去电报响应武昌。准备杀端方之动机即从此时始，然无整个计划及进行方针。不但在未入川前无此计划，即既入川后亦无坚定决心。陈镇藩为人忠厚有余，能力不足，加以旧官长如普民康、查瑜等代陈镇藩参谋一切，所以弄得军纪废弛，谁也不能统御。

九月二十九日黎明，曾统带率队正在与威远民兵相持不下之际，忽奉统领邓承拔鸡毛急信云：“端钦差有意勤王，请贵统带迅将所属各部队，克日调回资州集合。”同日下午，第三十一标之一、三两营及标本部，均奉令赶到资州集合。至夜间，端方号令官长集合，即与下级军官拈香拜盟，以联情感。未开言以前，先痛哭一场，即出武昌来电相告。电文是“城陷督毙”。念毕泪如雨下。接云：“我们大家今日无家可归，只有率带全军，取道川北广元，由陕西过河南，连合袁世凯以壮声威。且我与袁世凯有儿女姻娅关系。”并云：“我本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辈人于清初投旗”等语。当向各部队遍送陶方名刺，以资慰问，用此笼络诡计，迷惑军心，实际是欲带走鄂军，绕道陕、豫，联合北洋军队，夹攻武昌义军。端方在资州已下行军命令，发表行军站口里程表，准备轻装向川北出发。此事关系入川鄂军生死存亡问题，急如星火，各部队代表甚为焦急。

十月初一日，入川鄂军中各同志知道武昌首义确实消息。因为鄂军跟随端方入川弹压，同志军恨之刺骨。武昌首义后形势转变，南北异势，夏之时、张培爵独立于重庆，踞关自守，我军回援武汉，势不可能。进取成都，又为赵尔丰所拒。同志军布满川境，我鄂军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若以端方勤王计划，率我鄂军夹击武昌义军，入川鄂军虽愚，绝不会俯首听命。我军各部队代表于深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誓不承认端方在资州所召开的军官独立会议。即在资州公举步队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陈镇藩就职后，树立大汉国民革命军旗帜，乃誓师曰：“恪遵孙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达到排满目的。”并约法三章：一、誓杀满奴端方；二、剪除发辫；三、回援武汉。事前已密令钦差行辕护卫官杨毓林与卫队董卓泉所部紧密连系，以便届时响应。斯时曾统带知事已突变，密送端方路费银五百两，示意逃走。而各部队代表以时不可失，先下手为强，一致决心先杀端方以响应武昌。此为临时措施，事前并无此计划。

十月初二日，陈镇藩命令王占林、田长炘、李绍白、王志祥、卢保汉、孙世栋、任永森、邹世忠、陈宜亭、王龙标、马名扬、谷玉亭、张鸿基、马骧良、刘承儒、姚鸿圣等三十余人为护令员，全副武装，执令旗，整队到天后宫行辕请

出端方，当解至天上宫（第十六协司令部），端方坐在丹墀中间，端锦侍其旁，端方见形势不好，哀告曰："我们都是同胞，素极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的四十万两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国家定有相当办法。"各武装同志当答曰："您今天之所以有此遭遇者，是您先辈人种下祸根，投入旗籍，残杀汉人。你可知道对汉人之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剃发令、文字狱，摧残我汉族无所不至。这些血债，你是偿还的负责人。"端方俯首无言，连喊两声"福田救我（福田是曾统带的字）"。这时，经事前公推之正法执行人卢保汉、任永森、孙世栋、陈宜亭、欲玉亭等六同志即用指挥刀将端方斩首。贾智刚同志复杀端锦。

杀端方后，陈镇藩即通电响应武昌，张贴大汉国民革命军布告，改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川省军民，夹道欢呼，人心大快。我军旧官长中之统领、统带、管带、队官、排长以及军佐多缒城而逃。端方弟兄之尸身当即厚予装殓，并将端方弟兄之首级两颗，函于木匣内，以备押回武昌献缴鄂军都督府。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工程营发难经过

当三烈士就义之先一日，即十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时，邓玉麟偕杨洪胜匆卒到工程营前队第三棚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曰："今日汉口炸弹失慎，孙武受伤入院医治。清吏恐慌，大事搜捕。我等决定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发难后各营需要子弹，此点甚为重要。旗帜、符号，今日已被搜去。少数子弹、炸药由杨洪胜随后送来，作为响应之用。"熊与邓、杨、余等当拟定简单办法如下：（一）肩章反扣，白绷带缠右臂以代符号，俾易识别；（二）军队出动时，全付武装，去其背囊减轻累赘；（三）工程营进据楚望台后，立派兵一部出城迎接南湖炮队进城，占领阵地；（四）今夜口号："同心协力"。邓、杨旋即辞去，即将此办法分别通知各标、营同志。

一面又由熊秉坤令支队长郑挺军速通知驻楚望台军械所同志，妥为准备，届时内应勿误。嗣杨洪胜复到工程营，密交枪弹两盒于熊秉坤曰："少顷再送炸药来。"同志见了子弹，极为兴奋，几有抢夺之势。熊秉坤棚与排长哨棚毗连，恐生事端，急示意于杨，杨会意而去，复曰："汝营门卫兵须换一同志，免生阻碍。"时营门卫舍长系右队代表杨金龙，当由熊介绍见面，如言照办。杨洪胜去后，熊将子弹自留六粒，各队代表各三粒，平时胆大与长官有恶感者各发两粒。发动时向操场发三响，以为信号，其余留作必要之用。又嘱诸同志，如官长不加反对，决不故意残杀。分布已毕，静候炮队动静。

以后杨洪胜又送炸弹到营，适与本营右队队官黄坤荣（系卫兵司令官）遇，虽有杨金龙在场，仍无法掩护，炸弹因以落空。杨金龙事后谈及，杨洪胜携酒瓶式之炸弹一束到营，当时黄坤荣监视甚严，守卫兵不敢启门。杨扣之急，卫兵佯问："是谁？"杨答以"我"。卫兵不得已再问："汝姓什么？此时戒严，不能会客。"黄知有异，即呼："捉歹徒。"杨闻不妙，即返身遁。迨门启，杨已远逸，黄与卫兵亦未追。

杨返寓喘息未定，而捕杨之军警至（杨洪胜住第十五协西营门左侧第一家，房主系李襄麟之差弁，平时见杨形迹可疑，料杨是革命重要分子，遂告发）。杨见捕者多人，即投以炸弹，未发，返身而逃。军警尾追，杨再以第二弹投之，爆力极弱，未能伤人。追者不舍，杨又投第三弹，亦未伤人。杨力促气败，匿于工程营前伏龙寺后之菜园内，军警搜捕得之，送与督署，此十月九日夜十一时也。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寝，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炮队本为军中骨干，行动须得步兵掩护，始能发生作用，各方戒备森严，其不果行，亦意中事也。

是日夜间工程营戒严，官长均领弹携枪守各排出口，并武装巡查各棚，嘱各安心睡觉，且曰："革命不能成事。某时某处杀多少革命党徒。何必拖累家庭。"云云。士兵大小便者，即令以痰盂盛之，防范之严，可想而知。左队支队长任振纲平时勤慎奉公，颇得排长信任，此次戒严令下，即唤任携枪领子弹。但任早受总代表熊指示，右臂已缠有白布，排长一见，即夺任手中枪，枪内且装有子弹两粒，因是被其看管。熊秉坤闻讯，愈加不安，辗转床褥，一夜未曾合眼。翌日，熊派李泽乾出营探听消息，李回告机关均闭门，彭、刘、杨已遇害，城门未开，右路巡防营放哨已自第十五协至我营左右各街。早操毕，熊令李泽乾通知各队代表，饭后不要分散，有话相商。会餐时，官长到者极少，熊谎于众曰："今日奉总机关令，责工程营首先发难。因军械所为我营所守，如各营响应，亦必先到军械所领取子弹，如我营不先动，别营必不敢有所举动。"当约定下午三时晚操发动，众以无子弹对。熊问昨日所发子弹，则以昨夜未用，置之身边恐有危险，已弃置矣。熊亦无可如何，其余均照昨议，并派人送信至军械所。此时安排虽定，其实毫无把握，正忐忑间，工程营后队传达兵送信来云，今日由熊秉坤棚接守卫班，嘱预备一切。熊闻之喜极，盖工程营守卫向由前、后、左、右四队轮值，一天一换；今日轮班，应归后队第三排，因昨夜附属右队去军械所挖掘战沟（专以供守卫兵抗御革命力量者），辛苦一夜，不能接班，故轮到第一排。守卫班长名曰卫舍长，虽在卫兵司令指挥之下，而换班接哨，均由班长指挥，无形之中增加许多便利。所虑者厥惟子弹。忽本排第二棚同志吕功超向熊言其家有子弹，问其故，则答："余兄昔充吴元恺营马弁，恺字营由北通州回鄂解散，余兄携回子弹交余嫂存放楼上箱内，并

嘱好好保存，将来有大用。余兄现去川……”，话犹未已，该排排长亲信于郁文、章盛恺两同志接言曰：“排长有子弹，如熊总代表要用，我俩负责盗取。”熊即令吕、于、章三人分途去取，各得两盒。当令金兆龙分发给各同志，时已十二点矣。熊嘱副班长陶启元在营督率造饭，监视官长，严防匪徒乘机抢劫；又令于郁文盗取腰牌两面，一交李泽乾，一自佩，相偕外出。入第十五协南营门，先至第三十标第三营前队；同志方维、谢涌泉正言今日在操场捕去张廷辅事，见熊至，急问曰：“怎么样？”熊答曰：“干！特来请你标响应。”方等要熊上楼与王文锦商议。王为该队司书，居队官室，熊告以发难事，王曰：“你如何办就如何好，这边不成问题。”旋至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二排，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并询以炮队发难计划。蔡曰：“哪里有计划？他们都跑了，摇清（即孙武）面部炸伤，只有叫炳三（即邓玉麟）再去炮队试他一试。”熊曰：“我营决定今日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能响应？”蔡曰：“现只有望老可干一干，我决带队响应。”并约定，发难后带队过第十五协西营门，以放枪三响为信号，直趋军械所会合。蔡允诺，熊辞返营。

下午三时许，谢涌泉来工程营问晚操动静，并谓该标已布置响应。熊以晚操未下，必是汉奸走漏消息，乃另约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其余仍如前约；并请转知第二十九标。谢去，熊复通知各队及守卫同志，小操场发枪三响，一齐动手，先杀与我等对抗之官长，即鸣警笛集合，并再次通知军械所。至此，营中排长方定国、队官罗子清均向熊表示不加干涉；熊亦说明革命旨在反清，只要不妨害革命行动，绝不杀害汉人。方、罗均先行离去。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第一排第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棠、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为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曰：“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云云。熊等见此情景，即将痰盂、花盆、瓦钵、板凳诸物，弃作兵器，向下抛击，诸逆仍不退阵。同志吕中秋向阮击一枪，阮带伤返身向前队穿堂入丛中开枪数响，毙同志冯某。同志徐少斌还击，毙阮于水沟内。熊与诸同志见阮返身向前队奔去，即一拥下楼，程定国一枪打死黄、张两逆，其余官佐有越墙者，有匿于厕所者，均未究。熊即鸣警笛集合，惟以人声嘈杂，应者甚少。撬开军械库，得开口军刀二十四柄，当分发各代表佩用。熊与杨金龙领队头，金兆龙等押队后，率队出营。向左转湾，遇前队队官李占魁，李向队头连发三枪，未伤人，杨还击，李即逸去。过第十五协西营门，熊向内放三枪，以践前约。此时随行者，不过四十人，其余仍在营内吆喝。少间罗炳顺、马荣等亦举兵响应，派人送信与熊代表。同志们闻军械所得手，一个呼哨，即抵军械所目的地矣。

（摘自《武昌首义亲历记》熊秉坤）

历　史　考　证

李莲英为何不得善终

李莲英是清末赫赫有名的太监，慈禧太后的宠臣，同治、光绪两朝的太监大总管。其权势之大，就是后宫宠妃也不敢与他相匹敌。

李莲英死后葬于何处？有的说李的墓在北京永定门外大红门；有的说李葬在清东陵慈禧陵之侧；有的说李墓就在北京海淀。5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李莲英的真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李莲英墓之谜底揭开了。曾经在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六一学校中学部任教师的赵广志在“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同该校校长、书记一起进入劳改队监督劳动，并被强迫掘挖坐落在六一学校园内的李莲英墓。赵广志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李墓挖开，结果发现了李莲英真墓，墓中除了李的一颗头颅和大量的陪葬珍宝外，其余尸骸一无所存。显然，李莲英死时是身首异地分开的。那么，李莲英是怎样死的呢？

据有关史料记载，李莲英是病死的。《清稗类钞·阉寺类》记云：李莲英在“孝钦后（即慈禧太后）殂后，不意又为隆裕后所庇”，“追其病卒”，隆裕后“特赏银二千两”。李莲英的后裔说得更明白：“我祖父是善终。享年六十四岁。”又云：“我祖父因得急性痢疾，医治无效而病故。由得病到病终仅仅四天的时间。”连记载李莲英生平的《李莲英墓葬碑文》也说，李“退居之时，年已衰老。公殁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近来一些出版物，也往往认为李莲英

是“病死于宣统年间”。

过去，李莲英“病死说”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随着李莲英墓的掘开，李莲英身首异处的事实说明李莲英是没有善终的。佟洵在《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书中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李莲英虽是死于衰老之年，但他是被人暗中割下脑袋的，其结局是不得善终。

佟洵是根据“文革”初北京六一学校赵广志等掘开李莲英墓发现墓中只存一颗李的头颅来论证的。佟洵针对一些人的疑问，指出李莲英墓并未被人盗过，因为在赵广志等挖掘之前，李莲英墓穴的石墙、石门、宝顶等都完好无损，没有被人挖掘过的痕迹；其次，据赵广志说，李莲英棺椁开启时“看见‘一个人’盖着被子在那儿躺着，被子平平展展，没有被人翻过的一点痕迹。”这里的“一个人”不是一具完整的尸骸，而是一个用衣服装殓的“人形”；再次，当时赵广志等人从李莲英墓中取出的珍宝有钻石帽子、花宝石镶钻石戒指、镇棺珠等等50余件。这都证明李莲英墓从未被人盗过，墓中仅存的一颗李的头颅是事实。是不是因埋葬年代久远，其余的尸骨已经腐烂无存了呢？佟洵又指出，李莲英从1911年入葬到1966年挖墓时仅仅55年时间，头颅尚且完好无损，其余的躯干骨骸也不可能全部化为乌有。所以，这个假设也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李莲英既然没有善终，杀身之祸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关于李莲英之死，官方没有记载，但是，民间却有李莲英被砍头的传说。原来曾为李莲英的三弟李宝泰看墓的何氏后裔讲：“李莲英不是善终。”恩济庄一带也有关于“李莲英被人暗杀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处”的传说。并且有人说：“李莲英是因为讨债被人暗杀”的等等。这些传说虽不足为据，但是它却为人们探索“李莲英死因”提供某些线索。

据李莲英的后裔讲“李莲英生前常说‘财大祸也大’”。从他常提起的这句话可以推测：李莲英生前似乎就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因财产之巨会招来大祸，也许在他生前，就已因财产与他人发生了纠纷。《清朝野史大观》里有一段记载，李莲英死后，“群阉瞰其私蓄累累，筹思篡取，各遣心腹，四出调查，闻除大城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其储于宫内者，尚有现银300余万之多。因共谋瓜分，较量锱铢，遽起争斗。小德张大受夷伤，面奏隆裕太后，交内务府大臣查办。”这说明众阉在李莲英死后，曾因谋其财产而发生过争斗。李莲英生前因为勒索太多，早就引起他人的侧目，再加上他与慈禧太后狼狈为奸，干了不少坏事，伤害了许多人，树敌太多，人为之切齿。所以，一旦其靠山慈禧太后死后，便遭到人们的暗算。他的子侄虽然知其被杀，寻回他的头颅，但不知凶手是谁，无从查起，为保全他的名声，只好将他的人头暗中收殓了事。至于《李莲英墓葬碑文》中关于李莲英之死的措词含糊不清也是为了保全李莲英的名声。

最近阅读了《纵横》杂志(1990年第2期)《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作者颜仪民披露了埋藏在心底60多年的线索。他说，慈禧死后，李莲英即出宫，赶紧由御赐的位于北长街的住宅搬至自购的位于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住宅内，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来访者。其时，宣统登基，光绪遗孀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小德张面奏太后下手谕，命清宫内务府查办李莲英。李闻讯胆战心惊，赶紧派管家秘密到南池子南湾子迪威上将军江朝宗府上求救。

江是清末第一号实权派人物袁世凯亲信。慈禧在世时，李莲英和江朝宗互相利用，成莫逆之交。此时，李将家中财宝源源送往江府。果然钱能通神，江便把小德张召至宅中，叫他转告隆裕太后，对李莲英不要斩尽杀绝。隆裕太后无奈于袁世凯势力，只好放松对李的追查。小德张见李莲英手眼通天，为了与李莲英抗衡，也把珍宝源源送入江府。江朝宗来者不拒，他见李已成一只困虎，而小德张正年轻有为，又是隆裕亲信，故乐于和他交往。

作者说他经常听到江朝宗谈及李莲英和小德张之事，但闭口不谈李莲英被杀之原因和经过。有一次听江之子江宝仓透露：“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有一天，老爷子(指江朝宗)下请贴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晚饭，一向不出门的李莲英准时到了会贤堂，他万分感谢老爷子救了他一家。席散之后，李莲英路经后海遇到土匪被暗杀了。在后海河沿，只找到了李莲英的人头。”江宝仓还谈到李死后的一些情况，但避不谈与其父之关系。作者说，“李莲英之死，我不敢武断地说是江朝宗和小德张所为，但江朝宗、小德张了解内情却是真实可信的。”

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已被揭开，但他究竟死于何因，为何人所杀？还需要人们继续提供线索。不过，李莲英之死距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相信这些问题会被弄清的。

(摘自《历史之谜》人民日报出版社)

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吗

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在近30年的中外史学论著中，几乎众口一词，肯定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有的论著甚至认为：“和历次革命起事后，一到失败，他就脱身而去，如出一辙”，这是黄兴的特点。个别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不论黄兴还是别的革命领导人，当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湖北某些军阀政客“蓄意捏造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退回武昌，与黎元洪等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旋即乘轮东下，离汉赴沪。汉阳失守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27日的会议

上，黄兴是否提出放弃武昌进取南京的主张？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毛注青的《黄兴年谱》、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等中外历史著作，都说黄兴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只有《黄兴与中国革命》的作者薛君度，认为黄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样不合符军事常识的主张。两种意见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各自所根据的资料不同。

前一种意见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有胡祖舜的《武昌开国实录》、张知本的《黄克强先生二三强》、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王树楠的《武汉战纪》、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叙录》、甘绩熙的《阳夏鏖兵实录》、范腾霄的《辛亥首义前后》、王振民的《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以及汉口汉康书局出版的《张振武之革命战史》等；后一种意见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纪》。

1912年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告以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情况，促黄北上共商国事。6日晨，黄兴乘轮离沪北上，11日抵京，偕陈其美往见袁世凯。晚上，与孙中山出席前清皇族欢迎会。12日，应邀出席旅京善化同乡会的欢迎会，到会者50余人，首由会长刘颂虞致欢迎词，继由黄兴发表演说。28日，上海《申报》以《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为题，整理发表了这篇演说词。

黄兴的这篇演说词，无论是1914年和1916年美国旧金山大埠华侨团先后编辑出版的《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和《伟人黄兴政见书》，1918年长沙出版的《黄克强先生荣哀录》这些早期印行本，还是1968年和1973年台北出版的《黄克强先生全集》，以及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兴集》，均未收录。中外各种有关历史著述，对此亦未提及。这是黄兴的一篇重要遗文。演说词不长，只有约600字，为了便于讨论，特先全文引述如下：

昔在日京将往南洋，同县留学诸君开会欢送，是时，亦刘君为会长。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兴在长沙与刘霖生、徐佛苏共谋起事，会事失败，死者数人。逃至上海，与杨笃生、杨哲子组织爱国协社，会万福利刺王之春案起，兴及同志多被捕。赖江西巡抚夏时电致工部局，获放，遂致日本，思结合革命团体，适孙中山自美洲（按：应为欧洲）来日京，因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见，谈论极合，始立同盟会，用文字鼓吹，一面着手运动军队。陆军学生回国带兵者日多，南军中已伏有势力，兴遂谋起事，镇南关略为试验。后钦廉官民因捐交斗，郭人漳电询，遂往访之，留其营中三月，鼓吹革命，后又别去。前年（按：应为1911年）广州之役，原定正月，于时，长沙则焦达峰，武昌则居正、孙武，上海则陈英士。布置略定，会购械愆期，乃于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午后起事，同志千余人分作数部，兴率百二十人攻督署。事败，同志死者七十二人，葬于黄花岗。兴及赵声逃至香港，谋再举。去岁，武汉事已破获，名册尽失，乃于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起义，推举黎君为都督。越数日，兴始至汉，与清军鏖战。其时，各省已先后响应，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世或以此议咎兴，传闻之误也。兴至上海时，两方已有和议，曾具电致汪精卫，略谓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遂有今日共和之局侥幸成功。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但天下无难事，惟坚忍二字为成功之要诀。

同前述众多的史料和史学著作的意见相反，黄兴在这篇演说词中，明确指出汉阳失守以后，他提出了严守武昌的主张，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是日本某一参谋。黄兴的这一说法究竟可信不可信呢？我认为是完全可信的。

首先，黄兴发表这一演说时，距离汉阳失守还不到10个月，对于这样一件当时轰动武汉三镇的大事，回忆不会有错，且当时听众50余人，内容又在当时各地的报纸上公开发表，参加11月27日都督府军事会议的人也多还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绝对不会是虚构。

其次，在这篇演说词中，黄兴依次谈了他筹组长沙起义，上海入狱、逃亡日本、结识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参加镇南关起义、赴广西劝说郭人漳反正、到南洋开展活动、指挥黄花岗之役、参与武汉战事以及关于南北议和等十多件大事，经查对，均与史实完全相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主张严守武昌之说竟会失实。

第三，在黄兴十余年的革命活动中，尽管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有隐讳错误或诿过于人的表现，如果他确曾提出过"放弃武昌"这样一个遭到众人反对的错误主张，他决不会推给日本参谋。而且就在这次演说中，他还勇敢地承认自己"军事上实多败北"，怎么会对那个实际上没有造成恶果的主张就不敢承认乃至推给别人呢？

由此观之，黄兴在演说词中说："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相。

既然汉阳失守后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是日本参谋而不是黄兴，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资料说是黄兴呢？其根本原因，正如黄兴所说，是"传闻之误也"。

首先，黄兴当时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全国性著名革命领袖，他到达武汉，确是"全局中心，皆集于彼一人之身"，人们把他看作是"天将下凡"，对革命党人和军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可是，随着汉口的失守，黄兴与黎元洪谁主谁次的争论，以及所谓黄兴蓄意把作战重负交给湖北军队而不交给湖南援军的流言的出现，在一部分人中便产生了对黄兴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反攻汉口的失败和汉阳失守，这种不满和不信任情绪进一步增长、扩大，这是流言得以传播的基础。其次，"放弃武昌"的主张恰恰是出自黄兴总司令部的归本参谋之口，而且这些日本参谋

又是黄兴带来的，所以人们也就容易误认为这一主张是黄兴的意见，结果是张冠李戴，传了开去。第三，汉阳失守以后的当天晚上，黄兴就匆匆离开武昌，次日早晨便乘轮东下，离汉赴沪，这一行动，自然又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和误解。第四，当时湖北政界军界比较复杂，矛盾很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有意乘机借此扩大谣传的传播，从而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这也是不应排除的。

基于上述情况，"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谣传，也就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了。从后来参与写这方面的回忆录的人员分析，当时这一谣传不仅在政界军界传播，也在民间传播；不仅在领导层传播，也在普通士兵中传播；不仅在革命阵营中传播，也在敌人营垒里传播。因此，民国时期的许多回忆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在记述此事时，也就以讹传讹，错把日本参谋的主张说成是黄兴的主张，原因就在于此。

（摘自《黄兴新论》薛君度・萧致汾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谋略处考

在关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论著中，"谋略处"一直被认为是在首义后的最初几天里行使过最高权力的重要机构。这些论著认为，(一)它是在黎元洪不肯视事的情况下发生的；(二)它是由蔡济民提议或以他为首成立的；(三)它是由革命骨干分子组成的；(四)它是临时性的革命最高政权机关，负责裁决和处理一切军政事务等等。但是，人们对"谋略处"所知也仅限于此。至于它究竟由哪几种人和由哪些人所组成，它是采取何种方式行使最高权力，裁决和处理了哪些军政大事，它最后是被撤消了或改组了，则言人人殊或语焉不祥，或失之笼统，或互相牴牾。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论者所依据的某些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本身，便是既不明确又不具体。并且大有杜撰因袭，层层加码之嫌。

(一)最早见诸记载的"谋略处"

从现有资料看，最早忆及"谋略处"的是居正。1929年，他据日记残稿写成《辛亥札记》，两次提到"谋略处"。但于谋略处如何产生由何人组成等等，并未言及。第二年，吴醒汉在《建国月刊》上发表《武昌起义三日记》一文。谈到谋略处的缘起和组织时说：

"至(10月11日)下午一时，正与黎午餐，忽外面突放一下排枪，守卫学生退去。余与幼香(蔡济民字)亦即邀黎暂避蛇山，一面派人调查是何处队伍放枪。一面与蔡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协筹防守事宜。……至晚，即召集会议，共有十五人，同志中有蔡幼香、邓玉麟、高尚志、李春萱、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黄元吉、吴醒汉、胡瑛；临时加入者：吴兆麟、杨开甲、王安澜、马祖全。翌日即由谋略处商议都督府及军务、内务、财政外交各部之组织……布告安民，事乃大定"，又说："二十日黎出任都督，大家同志因人才太少，其目的只是在推倒满清，对于汉人，完全视为同胞，无丝毫歧视(失败原因在此)，凡稍有能力者，即一律引用。计二十日成立谋略处，新加入者，有吴兆麟、杨开甲、王安澜，二十一日有杜锡钧、张景良、汤化龙、胡子笏等。"

吴醒汉是在武昌首义中与蔡济民等齐名的"四大金刚"之一，撰写此文时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从他的上述回忆看，"谋略处"并不具备前文所指出的那些性质。第一，它是在革命党人与黎"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并协筹防守事宜"的合作气氛中，而不是在黎不肯视事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参加当晚"合议"即"谋略处"首次会议的"共为十五人"。但作者所列名单却有17人，第二天又新添四人，共有21人。这21人中，有党人骨干分子13人，附从起义的旧军官6人，立宪派2人。这表明"谋略处并非由清一色的革命党人代表所组成；第三，从"由谋略处商议都督府及军务、内务、财政、外交各部之组织"推断，它只是会商、协调的某种形式，并非具有最高革命权威的政权机关。这是迄今所见关于"谋略处"的组成和性质的最初记载。

(二)"谋略处"怎样被加工成为"临时最高政权机关"

不管吴醒汉的上述回忆的真实程度如何，由于他的经历和地位使得他的"谋略处"说具有了某种权威的性质，从此被人们辗转称引。继他之后，李翊东撰《武昌首义纪事》说："自黎元洪举出后，即以咨议局为都督府。当时党人多亡匿在外。草创之际，急不暇组织，亦不暇因事择人。就其在场者，各尽其能，互相推举，以张景良为参谋长，杨开甲副之，方定国为司令官。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明、王宪章、王文锦、陈宏诰等任谋略，李翊东为叙赏长……。其余分隶各部任事，盖无一不得其用者。"在此之前，李曾撰《书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后》一文，对吴文中的若干史实提出异议。但在"谋略处"问题上，基本沿袭了吴说，同吴醒汉在忆及"谋略处"时所说召集各人员"合议"与"稍有能力者即一律引用"的精神是一致的。

1944年，居正将他的旧著《辛亥札记》修订后易名《梅川日记》，增加了原著中未详的有关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及谋略处的内容："拥(黎)至咨议局，高呼举为都督。黎噤不作声。有一同志持一布告请于都督下署黎名，黎犹迟

疑未决。蔡济民以手枪拟之曰:'事急矣,公若不为都督,则我等愿死于公前',言时声泪俱下,黎颇感动。同志复有胁之者,乃举笔书之。众大喜,拥至楼上,辟一室以居之,而众推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等十五人组织一谋略处,以夹辅之。"在这里,"谋略"被赋予了"辅佐"黎元洪的性质,但仍然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所以需要设谋略处"以夹辅之",是因为黎元洪始则"噤不作声",继则"迟疑未决";后来虽然"颇感动",但态度仍然暧昧。到1946年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谋略处"才被赋予了最高政权机关的性质:

"黎至咨议局,众高呼举为督,……黎坚不承认,……众见黎态度如此,恐误事机,蔡济民提议:一面派人向黎劝驾,一面组织谋略处,以为处理当时急要机关。众同意,当推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明、王宪章、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等十五人任谋略。下设秘书、参谋两厅。以张景良为参谋长,杨开甲、吴兆麟副之,大事皆决于谋略处。……议定事项如左: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府;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四(阙);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六、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七、军政府暂设四部:甲军务部、乙军务部、丙政务部、丁外交部;八、设立招贤馆。此时因都督尚未决心,诸事由谋略处负责处理,分别进行"。

解放后,李春萱撰《辛亥革命纪事本末》,专列"黎元洪的顽固与谋略处的工作"一节,对"谋略处"再加发挥:"大家看到黎的态度如此固执。认为对革命前途大有影响。即由蔡济民提议,一面派人坚请黎回咨议局坐镇,一面组织谋略处,处理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事件。当晚(八月二十日)谋略处即在都督府开始办公,并议决下列各点:(一)都督府(一称鄂军政府)设在武昌咨议局;(二)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三)用都督府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四)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这时黎仅有都督空名,革命党人的真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何责任和过问一切事情。"

以上我们较多地摘引了有关"谋略处"的几段主要记载,虽然繁琐,但却能给读者提供一条"谋略处"说发展变化的明显线索。这就是:(一)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黎元洪的态度越来越顽固:由"连日劳顿,说话过多,喉咽不能出声"(1929年居正语),到与革命党人"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并协筹防守事宜"(1930年吴醒汉语),到"噤不作声"、"迟疑未决"与"颇感动"(1944年居正语),到"屹不为动"、"尚未决心"(1946年张难先语),到与汤化龙等合谋将谋略处撤销(1956年李春萱语);(二)"谋略处"的组成人员越来越单纯:由最初参加"合议"并组成"谋略处"包括革命党人和旧军官、立宪派在内的20余人(1930年吴醒汉记),到由当时在场的各类人员互推蔡济民等15名革命党人任谋略,旧军官张景良、杨开甲任参谋长(1944年前李翊东记),到将参谋长隶属于由革命党人组成的谋略处之下(1946年张难先记);(三)"谋略处"的职权越来越大:由最初的"合议"、"商议"(1930年吴醒汉语),到"夹辅"都督黎元洪(1944年居正语),到"大事皆决于谋略处","处理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事件"(1946年张难先及1956年李春萱语)。如果这一切是建立在回忆录作者对第一手材料的不断深入发现的基础上,那么,这种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而使"谋略处"说不断"完善"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前进,但可惜不是这样。上述记载使我们不难看出,后续的各种回忆实质上都不过是对吴醒汉有关"谋略处"最初记载的转述或因袭,然后加上作者个人当时的认识。或者将某些本来不是谋略处的活动硬加在它身上。如张难先、李春萱所谓谋略处"议决事项"云云,源本于1927年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而曹书并没有提及"谋略处",只说"……吴兆麟复派人分途敦请各机关之热心革命同志,及城中之绅耆父老,齐集咨议局开会,讨论进行一切紧急应办各事宜";"于是大众在咨议局商议进行各事宜。兹将是日进行之事,揭示如左: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六、当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十三、军政府督设机关四部;……十四、设立招贤馆"。即使攻许《真史》之激烈如吴醒汉者,也没有否认曹书上列事项系由各类人等合议而后决定的事实,只不过提出一个包容各类人员的"谋略处"概念,但尚未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后来张难先等硬把本来由各类人员合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套在由革命党人组成的"谋略处"身上,这显然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杜撰。

(三)作为临时最高政权机关的"谋略处"是不存在的

"谋略处"就是这样在沿袭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加工"而被赋予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的,这个事实本身便促使我们对它的性质以至存在进而发生疑问。

首先,如果"谋略处"确如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由革命党人组成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并且曾经在它的存废问题上与立宪派旧军官发生过严重的斗争,那么,它无疑是当时湖北革命者的光荣,理当留下深刻的记忆。它的存在就不应该在事过十余年甚至更晚的年代才被回忆起,而应该在更早的记载和原始档案中得到反映和印证。但迄今所见史料表明,我们得不到这样的反映和印证。《湖北革命实见记》成于1912年3月,系迄今所见关于武

昌首义的最早著作，作者胡石庵于武昌首义前即在汉口创设大成印刷公司秘密印行革命书报，与孙武、詹大悲等人交游甚密，虽未列名党籍，但为武汉各派革命者所推重。在《实见记》中，他依据参与首义及组织军政府活动的朱思武、陈瑞兰、邢子文等人的口述和函告，记述了首义后组织军政府的情况。全书数万言，无片语只字议及“谋略处”。同年稍晚署名民史氏者撰《革命家张振武》在谈到首义后人员的组织时，同样未及“谋略处”。更发人深思的是：1981年由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整理出版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凡三卷，百余万言，均系前湖北实录馆于1913年8月以前征集调查所得的文书档案，内容涉及首义经过、军政府组织建设及重要党人事绩等。在所有这些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当时有所谓曾经行使过临时最高权力的“谋略处”。邓玉麟被后来的回忆录作者一致认定是谋略处的核心成员，但1912年10月根据邓本人口述整理的《邓玉麟革命小史》中却无此经历。后来他撰《辛亥武昌起义经过》一文仍未言及“谋略处”。甘绩熙也被有的回忆录作者列名谋略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就说他“先任职谋略处”。但甘绩熙本人在1913年8月撰写的长达两万余言的《自述》中，只说他首义后先率测绘学堂等校学生守卫咨议局。“第二日，予遂改充参谋，在参谋部办事。”由湖北实录馆根据当时的“公私书报函牍由文”及调查报告纂辑的武昌起义历史《长编》，也没有关于“谋略处”的记载。当时任实录馆长的谢石钦，也是被各种回忆录作者一致认定的“谋略处”成员。如果确曾存在过如后来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的“谋略处”，又是在首义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作为主持实录馆工作的谢石钦绝不可能在《长编》中毫无涉及。同样，邓玉麟、甘绩熙以及其他众多以“攘臂言功”为特色的党人“自述”也决不会忽略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

其次，如果确有“谋略处”的存在，那么，在同一回忆者，不应该在早年的记忆中忘却或淡漠，而在后期的回忆中反而清晰和详尽。这显然有乖常理。前文已经提及，居正在1944年的《梅川日记》中对“谋略处”的产生、成员和作用有系统的描述，然而他在1929年的《辛亥札记》中仅仅只是提及“谋略处”字样，并说是刘公而不是蔡济民是谋略处的主持人，居正自称与谋略处打过多次交道，包括“与谋略处商请都督祭黄帝誓师”这样重大的行动，对谋略处及其组成自应有充分的了解。既然如此，他对“谋略处”的记忆应当时间愈早愈真切，何以到后来才据李翊东的记载再加敷陈?最能说明此点的是熊秉坤。熊是工程营首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任革命军第五协协统，是躬与其役的少数作者之一。他曾多次撰写有关武昌起义及军政府组织的实录史料，并且前后大体保持一致。惟在“谋略处”问题却前后相左。如他在1913年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并未言及有所谓“谋略处”的组织。1918年所撰《武昌起义谈》亦仍未言及“谋略处”。但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辛亥首义后的两件事》一文中，不仅提及谋略处，而且他自己也是谋略处成员：“十三日(二十二日)。我把队伍完全编好，到都督府复命，同志们留我在谋略处任参谋。谋略处参谋长为杨开甲、副参谋长为吴兆麟、杨玺章，蒋翊武因不愿出来组织军务部，也在谋略处。其他有蔡济民、邓炳三、熊秉坤、徐万年、李春萱、黄元吉、曾省三、胡祖舜、査光佛、李西屏、丁景良、陈磊、谢复、雷洪、高尚志、马骥云、甘辑熙等不下三十余人，这些人都是首义前后的革命核心分子。军政府一切大小事务，多取之于谋略处。谋略处负责人有的是为保产、保身而参加的，有的又是观看风向，随机转舵而来的，其实际负责人当推日夜奔劳的蔡济民，因而无形之中，蔡便成了我们这些人的领袖。”作者既是谋略处成员，谋略处又是一个决策“军政府大小一切事务”的重要机构，竟然在事隔数十年后才回忆起，而在早年的记载中却不露痕迹，实在令人费解。而且从上述引文看，作者显然是把参谋部误认为“谋略处”了，这种混同，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第三，如果“谋略处”确曾是一个决策一切大小事务的权力机关，并且与临时加入或附从革命的旧军官和立宪派进行过权力之争，那么，它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后者留下记忆并见诸文字记载。但是，不论在有关黎元洪、汤化龙、吴兆麟等重要人物的著作中，还是在某些旧军官、立宪派人物在当时的回忆中，都不曾见有这样的记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载有何锡番《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与《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两篇，分别写于1912年9月和10月，何、蔡都是首义时附从革命的旧军人，后担任革命军协统、军务部副部长等要职，他们都不曾提及当时存在一个单纯由革命党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谋略处；相反，他们所列举的参加事务所“办事”和“会议战守方略”的各类人员，倒是与吴醒汉所说“稍有能力者即一律引用”的精神相吻合。黄中垲是《湖北军政府组织条例》的起草者，根据这个《条例》而正式成立了军政府各部，被认为是向“谋略处”夺权的严重步骤。1922年黄中垲在《辛亥闻见录》中谈到该《条例》的起草动因时说：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他与汤化龙、胡瑞霖等讨论时局，认为刻下急不可缓者有三事：扣留汉口车站的火车“以免资敌”；置兵布炮于武胜关“以遏北军南下”；“规复建制以便约束”游散士兵。如果当时确实存在一个“裁决和处理一切大事”的权力机构“谋略处”，而《条例》的目的又是向“谋略处”夺权，加之又有被认为是“谋略处”成员的甘绩熙等“时来遏谈”，黄中垲决不会在自己的记忆中毫无痕迹。

(四)余论

以上考察表明，一个由革命骨干组成的，作为临时最

高权力机构的所谓"谋略处"的存在是令人置疑的。但是，这样一个本来并不存在的"谋略处"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在回忆录中，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呢？我以为原因之一，是当时曾有过"谋略处"的设置，不过它隶属于参谋部，更不是一种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据《参谋部沿革及事实》载：湖北军政府参谋部编制几经变更，至1912年元月初旬改组时，曾于参谋部"内分六处：一谋略、二谍报、三交通、四编制、五考功、六经理；外设庶务、调查、稽查、侦探、收发五科"。显然谋略处在参谋部内处于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它虽然不同于后来被描绘成最高权力机构的所谓"谋略处"，但却很可能给某些回忆者以朦胧的记忆和现成的名词。不仅如此，参谋部所属的谋略处又显系由首义初期的兵谋科演变而来，而有的革命党人如邓玉麟、高尚志等曾经是兵谋科的创始者。据蔡绍忠在1912年记载，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成立兵谋科时，"开军事秘密会议，计来议者，共约十五人，即蔡绍忠、纪光汉、高曾介、童序鹏、蒋荫曾、叶秉甲、马祖全、姚家振、成炳荣、何锡蕃、邓玉麟、高尚志、杜锡钧等"。根据这次秘密会议的决定，军政府遂派兵渡江，"先攻刘家庙之敌"。看来兵谋科是当时参谋部乃至军政府内决策军事行动的枢要机构。12月初汉阳失守，兵谋科更名为作战科，旋改称谋略处，仍隶参谋部。上列"十五人"中，除邓、高外，大约都是附从革命的原新军中级军官，主要由他们来决策军事问题，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和革命党人心理的。邓玉麟是秘密会议的参加者，他在早年和后来的回忆中都不曾道及有所谓全由革命党人组成的权力机构"谋略处"，也许是他有比较清晰的深刻记忆，而对于局外人，却可能成为附会的一各根据。原因之二，是有的回忆录作者似乎误认参谋部为谋略处，将二者混同了。关于首义后最初几天的政权组织和权力行使，当今一般论者都认为在推举都督黎元洪的同时，成立了四个部，而由"谋略处"行使临时军政府权力(见本文开篇的几段引文)。这种认识主要依据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及某些当时人的回忆，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单纯。根据民国元年湖北革命实录馆提供的原始资料，似可断定在首义后最初几天里行使军政权力的机关是参谋部而不是所谓"谋略处"。如谓：首义成功后，"以黄帝纪元组织鄂军政府，成立军令部与参谋部两机关，于时规模草创，条理纷然，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是时共和初建，政务丛集，凡招兵、筹饷、内政、外交以及军政、军制、军情，俱属之参谋部"。甘绩熙在《自述》中也谈到他当初与蒋翊武、蔡济民、邓玉麟等人反对对参谋长、军令部长及科长、科员(未言及有其他各部)实行等级薪水制，并"日坐参谋部办公"的事实。当时的参谋长为杨开甲(原清军第30标标统)，副参谋长为张景良(原清军第29标标统)和杨玺章(原清军第21混成协司令部军官)。参谋官二十余人，由著名首义党人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熊秉坤、甘绩熙等及若干旧军官充任。这样一个由附从起义的旧军官为首领，包容革命党骨干分子和其他旧军官在内的参谋部，乃是直至10月17日根据《军政府组织条例》组成正式政府以前行使军政权力的中枢机构。尽管革命党人蔡济民在参谋部中曾经起着中坚的核心作用，但并不存在一个以他为首的，纯粹由革命骨干分子组成的谋略处。后来革命悲惨地失败了，许许多多革命者都是死在曾经被自己抬出的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势力的屠刀下，这个事实使幸存者痛定思痛，不断地反思，他们既不能忘怀那些纷乱的惊心动魄的短暂时光，又不堪回首那些与旧势力为伍从而导致大权旁落的伤心往事，在这各情感和心理的支配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记忆的朦胧，由旧军官担任首长的真正的临时权力机关参谋部被逐渐淡化，一个并不存在但确曾设置过的谋略处则被逐渐加工成为临时权力机关。既然如此，就免不了互相混淆和抵牾，为什么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回忆中的"谋略处"的成员越来越单纯，权力越来越大，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回忆者能够准确地说清楚"谋略处"究竟如何组成，由哪几种人、哪些人组成，行使过哪些权力，决定过哪些重大事项？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摘自《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

风云人物

赵　声

赵声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江苏丹徒县大港镇人。生于1881年3月16日(清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其父赵蓉是个廪生，在家乡教学。赵声幼年从父读书，又练武艺。稍长，魁梧多力，曾入狱救人，被视为"豪侠少年"。十九岁考中秀才。

1901年初，赵声到南京教家馆。时值义和团革命运动失败后，目睹国势危急，他感叹地说："有文事必有武备，吾当为班定远，岂能于墨汁中求生活？"遂辞馆职，以第一名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入校以后日渐倾向反清革命，为学堂监督所不容。数月后他自动退学，寄居和尚庙读

书。庙旁为江南陆师学堂，一次偶代某生作文，得到该校监督俞明震的赏识，特许其入学，至1902年底结业。在此期间，他进一步受到国内革命思潮推动，认真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学说，并决心从事革命活动。

1903年2月，赵声东渡日本考察，在船中对友人说："生平最佩服孙文。"到日本见到黄兴等革命志士，大受鼓舞。不久赵由日本回国，先在本乡创办阅书报社、小学堂、体育会，积极宣传革命。后去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任教，内结员生，外联同志，秘草"七字唱本"，号《保国歌》，大量印刷，广为散发传播。

1905年秋，北洋陆军将在河间举行秋操，赵声乘机潜入某镇为队官，谋相机策动革命，筹划未成，不久失望南归。当时江南初创新军，他到南京入督练公所任参谋官，旋至江阴教练新军。有道员郭人漳以新学自诩，好与革命党人往来，与赵也结成朋友。后郭调赴广西任巡防营统领，赵随同前去，任管带。在广西期间，赵不时向士兵灌输反清革命思想，还常借太平天国故事，激励本地人士，原想就此发动革命，因广西清吏防范严密，一直无从下手。于是，他应友人约，回到南京任暂编南洋陆军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二营管带，半年后被统制徐绍桢擢升为标统。其间他先后援引冷遹、柏文蔚、林之夏、倪映典、熊成基等革命青年入九镇，任官佐。

1906年春，赵声在南京加入同盟会，更加注意扩大革命行动。于营内设阅书报社，加紧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曾带士兵游明孝陵，借元、明故事启发他们的民族革命意识，士兵深受感动。所部博士因闻太平军故事，恨曾国藩，火毁其后湖神庙。江督端方得知，想借此事兴大狱，加赵以罪，得徐绍桢力保，才以免职了事。先是，孙中山派党人到南京与赵声接洽，谋划革命。到这年12月，江西及湖南爆发了萍、浏、醴起义。端方奉清廷电饬，派徐绍桢带兵前往"会剿"，徐绍桢欲赵回原任，端方不许；末后，赵以其他名义随徐往江西，准备相机行事。但到萍乡时，起义已经失败。徐军返防后，端方对赵猜疑更甚，随时准备加害。因此，他被迫离开南京。

1907年春，赵声至广东，任新军二标三营管带，不久升第二标标统。这时粤省新军中已布满了革命种子；而廉州团绅刘思裕统率万人会(地方团兵)发动抗捐斗争，孙中山又曾派人打入，有所接洽。粤督周馥急派赵声和防军统领郭人漳前往镇压。赵原准备相机举事，因联系失时，致刘思裕已先为郭部管带林虎所杀。但钦、廉两府的群众抗捐斗争，在同盟会员王和顺的联络和策动下继续发展，并请援于同盟会南京总部。7月张人骏督粤，续派赵声及郭人漳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前往镇压。孙中山前此已派黄兴等与赵、郭联系，赵、郭皆表示要反戈相应。于是王和顺率起义军进克防城并转至钦州城下。不料先入驻钦州的郭人漳动摇变节，对起义军不予响应。钦州不能下，起义军乃再进围灵山，受损失而败退。赵军在合浦，原定俟钦州一下，即举兵响应，及见此情况，遂无所作为。钦廉之役至此宣告失败。赵声经此两役，内心深为痛苦，率部回廉州后曾赋诗道："八百健儿齐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

赵声离粤前，倪映典已来广州，由赵荐任新军炮队营军官。赵声去后，新军中的革命力量，仍继续发展。1909年秋，孙中山派党人在香港设同盟会南方支部，谋划发动新军起义。其后，支部又暗设机关于广州城内，积极经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各方联系稍有头绪，倪映典请香港支部电赵声南来主持发动。赵得讯到来，群情振奋。于是议定于1910年元旦发难，由党人率会党攻城，倪映典率新军夹击。但因新军士兵先一日与警兵发生冲突，打乱了起义计划。倪映典仓卒入营指挥，亲率一部从沙河攻广州，至横枝冈被敌截击，不幸中弹死。军中无主，起义遭到失败。当时赵在城内，以事变猝起，与各方无法联络，后始脱险出城。

广州新军之役，清吏侦知主谋者为赵声，乃悬赏缉捕。赵声逃至香港乡间。居数月，闻孙中山自美抵日，就专诚到东京去谒见，深受器重。在全国革命形势鼓舞下，孙中山于11月间在南洋庇能(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共商大计，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又因广州熟识赵的人多，决由黄兴于23日率党人先入，赵续至。起义日期几经变动，到4月27日，由于情况紧急，黄兴被迫发动，于当日下午五时亲率党人攻入总督衙门，各路队伍和清兵巷战了一日夜，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赵等28日晨赶到广州，已无法参加战斗，只好撤退。这次起义伤亡很大，后得遗体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由于连遭挫折，特别是两次广州起义失败，赵声忧愤成疾，于1911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了表彰他的功业，追赠他为上将军。

(黄德昭《民国人物传》)

吴禄贞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生于1880年3月6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其父吴利彬是秀才，在武昌教书，1898年病死。

1897年，吴禄贞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为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在校期间，与第二期学生清室贵族良弼交谊甚厚。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学生参加革命。吴禄贞虽然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不同意反满学说。同时，他和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也保持友好关

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改良派认为推翻西太后使光绪当权的机会到来。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兵"勤王"，吴禄贞秘密回国参加。"自立军"以汉口为中心，分立五军，吴禄贞和秦力山等率领大通前军，于8月仓促起事，与清军巷战数日，因寡不敌众，终于失败。吴禄贞逃到上海，不久返回日本士官学校。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他更加倾向民主革命。

1902年4月，他毕业回国，在武昌一普通中学堂担任教习，暗中向学生宣传革命主张，在他鼓励之下，后来参加革命团体的青年有刘静庵、胡瑛等三十多人。1903年冬，他应黄兴邀请，同李书城、耿觐光等赴长沙，筹划在湖南发难。这时，适逢清廷在北京创设练兵处，编练新军。经良弼推荐，练兵处调他入京。他"初不欲往，同志中谓君为当道注目，与其在外无所建树，不若投身中央，何隙而动"。吴禄贞接受了劝告，于次年4月抵北京。

1904年5月，吴禄贞被派署理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即科长），次年8月实授。在京时，他仍与湖北革命志士暗中保持联系。刘静庵被捕后，他通过良弼（军学司副使）和铁良（练兵处会办）向庆亲王奕劻说情，竭力挽救。1906年10月，他被派赴新疆伊犁考察新军。11月抵兰州，身穿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辞气之间未能谦和逊顺"，升允大怒，当即将他扣留，并诬奏他"冒充钦差"、沿途"需索供应"。铁良奉旨查办，一面派员前往兰州调查，一面致电升允释放他。年底他回到北京。次年6月，铁良查办结案，复奏他"并未冒充钦差"，但"往谒督臣升允，便服请见，亦与体制未协，此实因该员游学外洋多年，于中国礼节律例均未深加考究所致，其轻率疏忽之处自应量予薄惩，俾资儆惕"。为此，将其监督差使立即撤去。7月，他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充军事参议。

吉林省延吉厅与朝鲜接壤，以图们江为界。日本侵占朝鲜后，即觊觎延吉地方，并于1907年秋制造借口，派兵渡江，侵占延吉厅所属龙峪、光霁峪等地，强立"间岛"名目，妄图吞并。吴禄贞奉命"密往确查"，于9月担任延吉边务帮办，常驻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他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和文献记录，提出《延吉边务报告书》三册，证明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逐条驳斥了日本制造的"间岛"谬论。经他据理交涉，终于迫使日军退出侵占地方，因此得到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的赏识。1909年4月，他升任延吉边务督办，授以陆军协都统，仍驻延吉。

1908年底，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和少壮亲贵铁良、良弼等人，企图重用留日陆军学生，以削弱袁世凯北洋派的军权。载沣罢免了袁世凯以后，于1910年初调吴禄贞回北京，授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派赴德、法两国阅操。吴禄贞回国后，向黄恺元（同盟会员）借了二万两银子，馈送庆亲王奕劻，谋出任一省巡抚。结果于12月23日被任命为陆军第六镇统制。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原由段祺瑞担任统制，协统李纯、周符麟及各标统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小站旧人。他们对非北洋派的吴禄贞自然心怀不满。加上吴禄贞又过于操切，一上任就试图通过人事调换，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先任命同盟会会员、留日士官张世膺为参谋官，又以"烟瘾甚重，行同盗贼"为理由，将周符麟撤职。因此，各级军官"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不久，他又呈请任命李书城为标统，但陆军大臣荫昌不予批准。为此他写信指责荫昌"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语气十分凌厉。荫昌怀恨在心，派陆军部检查官到第六镇秘密查访，罗织罪名，企图将他撤任。他"觉得第六镇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遂萌退志"。从此常住北京，与蒋方震、李书城等饮酒赋诗，"借以消胸中的积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他一方面庆幸革命终于发生，另一方面又为未能控制第六镇而担忧。10月14日，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赴湖北，镇压革命。他曾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于是他便前往保定，掌握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倚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秘密会商，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与此同时，山西也爆发革命，清廷急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开赴石家庄，进攻山西。吴禄贞又由滦州赶赴石家庄，令第十二协停战，并亲自赴娘子关，一面与山西军密商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以山西军已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他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下令停战，北洋军退出汉口，严惩纵兵焚烧汉口的军官。清廷大惊，疑心他是革命党，但又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以假言假语嘉奖他，并于4日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已经出山，由彰德到达湖北孝感，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身份指挥北洋军对革命军作战。他侦悉吴禄贞的密谋后，立即派在湖北军中的周符麟携带巨款至石家庄，以两万元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字惠田）刺吴。

吴禄贞平生志大气豪，错误地认为警备是怯懦的表现，得知周符麟至石家庄谋害他，仍不加戒备。11月16日深夜，他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至次日凌晨，马步周率领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下令对吴禄贞以大将军例赐恤。1913年11月7日，遗体安葬于石家庄。

（李宗一《民国人物传》）

蒋翊武

蒋翊武(1885～1913)　蒋翊武原名保襄，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其父在州城以经营豆腐店为主。1890年，翊武方5岁，即入私塾就读。1903年，入澧州高等小学，次年升湖南西路师范。适会党头目刘复基奉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之命，在常德联络会党与学界，密谋响应长沙起义，翊武积极参加，旋长沙起义失败，翊武被开除学籍。他又襄助刘复基，另设机关，专事会党联络。1905年，翊武拟留学日本，乘舟至上海，因病辍行。次年春，就读于湘籍同盟会员姚宏业等创办的中国公学。旋经离日归来的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襄助杨卓林创刊《竞业旬报》，以白话文宣传民族革命。刘道一潜赴长沙策划萍浏醴起义时，翊武亦曾参与谋议。

1909年秋，诩翊随刘复基赴鄂，先是襄办汉口《商务报》，继而化名伯夔，投入湖北新军41标3营当兵，参加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次年，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被社长杨王鹏倚为骨干。该社成立一月后，翊武受杨王鹏委托，约集社员代表20余人秘密集会，制定标营队代表负责规章。旋杨王鹏等人的活动为官方侦知，杨王鹏被迫离营，社务即委诩武主持。

1911年1月30日，蒋诩武邀刘复基等十余人秘密聚会武昌奥略楼，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公举蒋诩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在刘复基等人的大力协助下，蒋翊武坚持和完善振武学社遗留下来的标营代表制，将组织发动与舆论宣传相结合，使文学社的队伍不断扩大。一些新军中的革命小团体都纷纷并入文学社。不过半年，社员多达3000余人。

是年9月，蒋翊武被迫随队赴防湖南岳州(今岳阳市)，社务交刘复基等主持。刘复基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等达成合作的协议，共举蒋诩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以原文学社机关部为总指挥部。10月9日晨，诩武赶回总指挥部，了解起义准备情况。下午，传来孙武等人在汉口机关制弹失事的消息，他便采纳刘复基的建议，命令于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发炮为号，全城起义。傍晚，总指挥部突遭军警包围，翊武乘间走逸。然因南湖炮队未接到起义命令，是晚起义不果。次日晚，革命士兵再次发动，一举成功。翊武于逃亡安陆途中闻讯，折返武昌，出任军务部副部长。他提议设立汉口军政分府，派员赴湘策动响应事宜，且亲临作战前线，“往各军视察，并计划一切”。10月28日，黄兴抵鄂督战，翊武率队欢迎，且曾主张黄的地位应高于黎元洪，因孙武等人反对不果。黄兴由黎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翊武以经理部长身份，全力赞助。及至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黄兴离鄂，翊武知难而进，以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独支危局，矢志死守”。

旋南北议和告成，蒋翊武出资创办《民心报》，与黎元洪和孙武为首的派性势力作斗争。1912年4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授勋二位，又授中将加上将衔，翊武均峻拒不受。是年夏秋间，袁世凯电邀翊武入京，委以总统府高等顾问。他以在鄂受黎元洪等人排挤，权为应聘。适国民党在京成立，被选为总部参议兼汉口交通部部长。他回鄂组织机关，积极响应宋教仁的议会斗争主张。

1913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翊武奉宋教仁之命，走访长江中下游各埠有关国民党议员，磋商建国大计，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旋宋案发生，翊武先是在鄂运动反袁受挫，继而回到湖南，以鄂豫招抚使名义誓师岳州，拟取道鄂、豫，直捣幽燕。还来不及出师，二次革命即告失败。翊武于逃往广西桂林途中被捕，9月9日从容就义。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时，特于其就义处竖立纪念碑一座，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摘自《中国近代史纪》徐泰来)

唐绍仪

唐绍仪字少川(1869～1938)　广东香山(中山)县人。早年到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后从事翻译和税务工作。民国成立后，唐充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奔走于南北议和。抗日战争期间，唐因与汉奸温宋尧过从甚密，1938年9月30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上海。

唐绍仪的政治生涯始于与袁世凯的交往。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唐曾在朝鲜协助袁世凯办理通商事宜，受到袁的赏识。后又随袁至小站练兵。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唐被荐为津海关道。1904年英国加紧侵略西藏，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办理与英国的交涉。经过两年时间的谈判，1906年4月，与英国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英国确认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但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

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内阁全权代表，与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谈判中，面对南方代表坚持必须承认共和的主张，他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折衷方案，并达成了关于湖北、江苏、安徽、陕西等省停战的协定。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打破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唐绍仪受命辞去全权代表职务，但仍与伍廷芳秘密谈判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

1912年3月，袁世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提任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在袁看来，由唐出任内阁总理既可保障北洋军阀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

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此时唐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与同盟会合作"。经孙中山同意,他参入了同盟会,并推举同盟会干部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等出任教育、农林等部总长。因此,唐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由于唐坚持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了尖锐冲突。1912年5月,唐内阁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苛刻条件,被唐绍仪断然拒绝。由此引起袁世凯的忌恨,6月15日袁世凯不顾《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擅自取消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成命。唐对此感到极为难堪,愤然提出辞职。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洪宪"帝制发生时,唐表示反对,并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应邀南下,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部长。次年5月,桂系军阀为排斥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唐为七总裁之一,专任南方军政府总代表与北京政府代表朱启钤在上海议和。五四运动后,南北议和无结果而终,唐绍仪自此也消极沉默,不闻政事。

(摘自《中国近代史纪》徐泰来)

林觉民

林觉民(1887~1911)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

林觉民少年时就有反封建意识。13岁那年,嗣父要他考童生,到了考场,他逍遥自在,等到试卷发下来,他挥笔在卷上题了"少年不忘万户侯"七个大字,头一个交卷出场。

1900年,林觉民考入全闽大学堂读书,校中闹过数起风潮,班上同学都推他出来领导。他善言谈,学堂总教习叶肖韩特别爱他,曾对他的嗣父说过:"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

其晚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演说,题为"挽救垂亡之中国",说至沉痛时,痛哭流涕,拍案捶胸,刚好其校某学监也在场窃听,回到宿舍时对人说:"亡清者,必此辈也。"

1905年,19岁的林觉民,在嗣父的要求下,与陈意映结了婚,夫妻两人感情很好。

林觉民在家庭内,也坚决反对封建思想对妇女的束缚,为了使妇女思想觉醒,他与堂哥在自己的租厝大院里办起一所家庭妇女学校,动员妻子带头,堂嫂谦修、堂妹孟瑜以及亲友家属等入学,他亲自讲课,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他说:妇女要解放就必须走出家门,在林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秀琼、秀慧两个妹妹没有缠足。

1907年,他自费到日本留学,一年后,官费生丁某,踏海死亡,林觉民就补其缺,入庆应大学文科学哲学,还兼学英语和德语。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爱国留学生常常聚集在一起,相向涕哭,林觉民悲愤地说:"中国危殆至此,大丈夫只有一死报国,哭有什么用呢?吾辈既然以壮士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推翻清朝政府。这样,危如累卵局面,或许可以挽救。凡有血气的人,宁忍坐视第二次亡国之惨状吗?"

林觉民受孙中山学说的影响很深,主张武装革命,他在日本同君主立宪派梁启超一伙常展开论战。他还发表《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文章,提倡革命救国。

1911年春,孙中山将再次领导广州起义(第十次起义),在日本的爱国学生林觉民等得知此消息,都很高兴。林觉民回福建策划响应,过香港时遇黄兴,黄兴见林觉民到来,高兴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4月上旬,林觉民又受林文派遣回福建联络爱国志士赴广州参加起义,他一到福州,先到桥南社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机关部。找总干事林斯琛及《建言报》总编刘通等人,传达孙中山关于起义的决定,并加紧联络福州、连江等地的爱国志士,布置当地的革命组织做好响应准备。

林觉民突然回家,他的嗣父惊异地追问原因,他只得托词说:"学校放樱花假,陪几位日本朋友去江浙一带参观游览。"在福州只停十天,于4月17日率领刘元栋、冯超骧、刘六符等十余人为第一批先行,从马尾乘轮船赴香港,他联络的第二批二十三人由吴适率领于4月23日由连江出发,也是从马尾搭船赴香港,是日晚,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等人先入广州,与黄兴一起布置武装起义,4月24日晚又与陈更新至香港迎接林尹民等人,同宿在江滨楼。当林尹民、陈更新等人都入睡时,林觉民独自挑灯写绝笔书,直至破晓才停笔。他在给嗣父的信中说:"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反映他一心为祖国、为人民着想的高尚情操。在给妻子陈意映的信中,他既深情地倾诉了对妻子的真挚的爱,更抒发了自己高尚而远大的革命抱负。他说:"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他"不忍独善其身",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并勉励妻子"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翌晨,他拿着所写的这些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幸为转达",便偕林尹民等人入广州,在舟上,他对好友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宁有憾哉!"。4月27日,来自福建的四

十余位爱国志士编入了黄兴领导的由同盟会会员组成的第一路选锋队。起义前，发现有人泄密，有人主张取消起义，林觉民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会失信于全力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侨和国内同胞。他说："论家境，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妻怀八月身孕，但革命前赴后继，断无退却之理！"有力地驳斥了主张退却的一部分人。

下午五时半，林觉民偕林文、方声洞、陈更新、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等人在黄兴的率领下，直冲督署，挥弹光先，不见两广总督张鸣岐，林觉民及出署遇清军防营，怒目奋击，杀敌多人，后受伤力尽被执，当时报载："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之美少年"。指的就是林觉民。

林觉民在战场上是英雄，在监牢里、刑场上与清军的斗争也是非常坚决、令人钦佩的。当两广总督张鸣岐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他时，他"侃侃而谈，综述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当张鸣岐和李准要他笔写时，他"纵笔一挥，立尽两纸，洋洋数千言，……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痛斥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在公堂上，他还发表演说，宣传革命，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张鸣岐、李准为之咋舌。几天后，清军向这位优秀的革命战士下毒手。他从容就义，时年二十五岁。5月2日，他的遗体安葬在黄花岗，为七十二烈士之一。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清季民初著名的外交、政治活动家。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新加坡。

伍廷芳幼年进私塾读书，13岁入香港皇仁书院，1861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同时与友人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介绍中外新闻，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第一份近代化的日报"。1874年，他自费留学英国，就读于林肯法学院，三年毕业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受聘为"香港华民裁判官"。1882年，应李鸿章招入直隶总督幕府，协助办理洋务达十四年之久。1896年，由李鸿章奏请，清政府任命他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大臣（即公使）。甲午战争后，美国为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要求在"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前提下，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同其他列强一样在华享有特权。伍廷芳认为，这是"使中国避免瓜分的好办法"。1902年，伍廷芳应召回国，清政府授予他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等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伍廷芳此时正在上海。他宣布赞成共和，并出任上海军政府外交部长。他签发的《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表示，要"争回目下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司法权，并在革命后收回租界的行政、警察等主权。"是年底，南方独立各省推伍廷芳为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伍廷芳坚持必须以承认民主共和为前提，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他又暗示只要袁世凯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革命党人方面愿以大总统相让。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伍任司法总长兼议和全权代表。他协助孙中山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律和政令。与此同时，他仍与唐绍仪进行秘密谈判，达成了清帝逊位等重要协议，并对袁世凯的篡权阴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袁世凯窃夺总统职务后，伍廷芳表示消极，退居上海历时五年，埋头攻读儒佛道诸书。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伍廷芳表示坚决反对。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伍廷芳应邀北上出任外交总长。临行前他表示："北京满城龌龊气，人去了最易被感染，幸亏我是个吃素的，去也不怕。然而这一去最少也要少活十年。"1917年5月因"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伍坚决站在黎元洪一边，代理总理协助黎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其后，张勋入京"调停"，迫使黎元洪于6月12日下令解散国会，伍坚决反对，拒不副署。由此，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伍廷芳追随南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次年5月，军政府为西南军阀所把持，改设七总裁，孙中山愤然辞职离广州赴沪。伍仍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长和财长。不久，由于不满军阀专横，乃脱离军政府，携印信、税款离广州到上海。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伍廷芳加深了同孙中山的友谊，日渐采取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态度。1920年冬，伍廷芳随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军政府，被任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曾一度代理总统职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在遭受叛兵围困的情况下，伍坚决拥护孙中山，并通告各国领事馆，劝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正当此时，伍廷芳突然发病，6月23日在广州逝世。

（摘自《民国人物志》中华文库）

熊秉坤

熊秉坤（1885～1969），原名祥元，又名炳忠，字戴乾，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清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1885年9月30日）出生于商人家庭。因家道中落，他很早便充当商店学徒。三十一年（1904年）弃商投军，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营管带李克果以秉坤勤学苦练，升任他为正目。

在湖北新军里，工程营成军较早，是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较集中的军营。日知会因拟响应萍浏醴起义失密事败，被捕九人中的七名军人，就有朱子龙、张难先和胡瑛等三人是曾经和正在工程营当兵的。因此，该营革命力量虽"瓦解数年，旋踵而起者渐不乏人"。这使秉坤得以产生反清革命的意念。但迟到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通过田智亮引见孙武，才"加盟于革命"，成为共进会会员，并被指派为营代表。在他的领导下，全营的共进会员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并以二十人为一支队，编为十一支队两正队一大队，秉坤自任大队长，以备随时赴敌；他还向孙武上书，回顾各地起义失败的教训，对举义前后应注意事项，提出具体建议："先宜调查各省情形，再定起义计划，起事时宜令第四十二标代表断黄河铁桥，据武胜关以守；起事宜于夜间出其不意，袭取各重要机关；然后以炮兵占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处。若白日起事，必多观望，广州、安庆是其前鉴。财政机关宜重兵看守，诚恐匪徒乘机抢劫。起义后立即榜示安民，分檄各省和各府州县反正。与地方绅商订约，保商保民。与驻汉各国领事订约，严守中立。"八月三日(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联合会议通过的起义计划，大体上与秉坤建议相符合。按照计划，秉坤负责指挥工程营占领楚望台。

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民军扩编，秉坤受任为新建第五协统领。并于九月初率师渡江，与清军激战于刘家庙、大智门一带，旋奉命防守汉阳十里铺和参加反攻汉口的战斗。停战期间，他坚决反对议和，上书都督黎元洪称："吾人以革除满廷恶劣政府，改建共和为宗旨，有何和之可议乎？今以江浙皖之兵由海道向伪京，江西湖广两粤之师由京汉路北上，两路夹攻，不旬日而大局定矣，又何和之可议乎？"国民元年(1912年)1月，所部第五协编入第三镇，驻防云梦。10月，袁世凯授以陆军少将；次年1月，又授以勋五位。但秉坤不为袁氏利禄所动，"宋案"发生后，便奋起参加二次革命，被黎元洪悬赏通缉，所部遭黎解散，秉坤被迫转入秘密活动，为反袁而奔走于鄂、赣、苏诸省。民国三年(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入秋，经孙中山委任为鄂中司令，潜回湖北组织讨袁军。后来当过广州大元帅府参军、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一直在国民政府任职。但以孙中山遗愿未偿，多年抑郁。1949年，秉坤热烈欢迎武汉解放，此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和省政府委员等职，于1969年5月31日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杨宏胜

杨宏胜(1875—1911)，因开"杨洪胜杂货店"，时人也以洪胜相称。字益三，清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湖北谷城人。

宏胜少时曾入塾读书，因家贫失学，随兄辈从事耕种。及长，他为谋求生计，出游武昌，决心弃农投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绿营当兵。时值张之洞裁汰防营，扩编新军，几经改编，宏胜以条件具备，被选编入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三十标，旋由列兵升为正目。新军士兵多会党成员，且不乏革命志士，而宏胜好任侠，爱交游，日益接受了反清思潮的侵润，渐次萌发革命意识；嗣又得到刘复基等人的启发引导，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得到同志的普遍信赖。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5月)，加入文学社，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年前，共进会孙武命邓玉麟在黄土坡开设的同兴酒楼，曾在联络新军士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得共进会的队伍迅速扩大。文学社领导人也拟仿照类似办法发展会务，惟苦于缺乏经费和难有适当人选。宏胜于是主动承担专司联络的重任。他请假离营，尽出多年微薄的积蓄，在中和门正街右旗与楚望台附近开设"杨洪胜杂货店"，名为维持生计，实则专为文学社联络新军士兵。及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联合，这个小店便成为起义指挥部的交通站。

起义前，省城风声鹤唳，清吏为防不测，将新军士兵的弹药均予收缴，给起义发动带来了巨大困难。于是，宏胜从邓玉麟手中领得现洋二百元，专事暗地从楚望台库房的军械工人手中购买枪弹，再冒险转交军营各同志手中。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指挥部决定即晚起义。当日下午，宏胜乔装提篮小卖，密送子弹两盒交工程营营代表熊秉坤。当他再次送炸弹到营时，被军官察觉，便急走回店，但喘息未定，搜捕的军警已至。宏胜迅即携炸弹奔出后门，敌人紧追不舍。他数次投弹自卫，惜因气促力竭，炸弹投掷距离太近，反被弹伤，在工程营前伏龙寺后菜园内被捕。待押进监狱时，肢体和面部已是血肉模糊。

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湖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人于提审彭楚藩、刘复基两烈士之后，传讯杨宏胜。不待主审官讯问，宏胜睁目怒骂道："老子革命党，杀便杀，胡问为？""你们只管杀，总有一天要轮到你们的。"他备受拷掠酷刑，坚贞不屈。晨七时，继彭、刘之后慷慨就义。时年三十六岁。

(摘自《清氏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彭楚藩

彭楚藩(1884—1911)原名谭藩，又名先栋、家栋，小名和尚，字青云，光绪十年(1884年)出生于小书吏之家，

湖北武昌(今鄂城)彭家湾人。

谭藩少时读书，不乐于末世科名。二十九年(1903年)，他在县城得到郑姓友人所赠的《革命军》、《猛回头》诸书，脑际开始燃起了革命的火花。翌年，为了生计，他在乡里附近的广福寺教私塾。三十二年(1906年)，湖北新军炮兵标统万廷献回籍招兵，谭藩为了摆脱僻居乡隅的处境，毅然辞教投军，被编入二十一混成协炮兵十一营左队充当兵士。入伍不久，结识了倡组日知会的刘静庵等革命志士，因得以列名会籍，并担任评议员，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是年冬，日知会以拟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败，刘静庵等被捕下狱。谭藩也因官长见疑而被开除出炮队。第二年，他改名楚藩。考入宪兵学堂。毕业后被分发宪兵营充当宪兵。经过日知会失败后严峻生活磨炼，他变得果敢沉毅、不露锋芒，渐渐积累些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宪兵营管带旗人果清阿还以他恪守军纪、勤于职守，以学、术两科均优而升任为正目。

宣统三年(1911年)春，楚藩加入文学社，任交通。为了推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亟图大举，又加入共进会，任调查部副部长。他利用宪兵特殊身份之便，对武昌清军的兵力部署、城防设施、军械储备、指挥机构作了实地的周密侦察，为制订起义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还借助担任两革命团体重要职务的有利条件，为促进双方联合作了卓著成效的工作，因而被举为起义的军事筹备员之一。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午后，指挥部下达即晚发难的命令之后，楚藩与诸人枵腹坚守岗位，监测动静，并将身上现款分赠各人以备急需。不意军警突然破门而入。楚藩身着宪兵制服，既已逾墙而出，在相邻的院舍内遭到包围军警的搜索，遂与刘复基等人同时被捕。

清吏对被捕诸人连夜进行审讯。主审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见彭是宪兵，属他的妹婿果清阿管辖，深恐连带受过，意存开脱。他问彭："你这个宪兵本是捕革命党的，怎么错抓了你来?"楚藩笑答道："我就是革命党，怎么会为别人去捕革命党呢?"忠叱道："你不是奉命去抓革命党的吗?"楚藩怒吼道："我是黄帝子孙，怎么会接受满虏的命令!"他索笔书供，历数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罪行，伸张"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革命大义，慷慨声明"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铁忠等惊恐万状，立命将他杀害。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三时，楚藩从容就义于督署衙门外，时年才二十七岁。烈士遗体在首义胜利后经缝合身首运回鄂城，葬于西山。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孙　武

孙武(1880－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或作尧钦，间署摇清，号梦飞。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于中级军官家庭，湖北夏口(今汉口)人。

孙武自幼好武，读书但观大略，肆力弓马技击。十八岁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同学吴禄贞、傅慈祥愤时忧国，意气相投。次年，以母爱难舍，未能随同吴、傅游学日本。毕业后，历充湖南新军教练、岳州(今岳阳)威武营哨官及管带。

义和团运动高涨，吴、傅自日归鄂，同唐才常等密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经吴介绍，孙武被举为岳州司令。自立军失败，孙武虽未暴露，但仍恐不免，便借故离营，改姓金，流亡两广。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武力主乘保路运动高涨之机，在武昌发难。为此，他主动与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联合，顾全大局，将起义总指挥逊让给蒋而自己屈任参谋长。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参谋总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为首义赶配炸药时，失慎燃爆负伤，经同志送入法租界同仁医院治疗。十九日(10日)武昌起义告成，他被举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于九月五日(10月26日)为疾视事。

南北"议和"开始后，湖北革命党领袖妥协倾向日益显露，并自相争权夺利，有的俨然新贵。孙武恃功傲视同僚，在谋取临时政府陆军次长职位时，遭到孙中山和黄兴冷遇，便发起组织民社与同盟会立异，这引起不少革命党人的不满。武昌毕血会、教导团、将校补充团中的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分子，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宣称孙武、张振武、蒋翊武等"植党营私、专制把持"，于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二十日夜举行暴动。因孙武去汉口，便将他家抄捣。黎元洪利用这一事件串通袁世凯授孙武以大总统顾问、勋二位、中将、上将等虚衔，形同软禁。孙武虽多次剀切辞呈，却又不敢冒死决裂，"悲痛所极，念虑俱灰"，从此转入颓唐。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1日病逝于北京拈花寺。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　复　基

刘复基(1883－1991)曾改名汝夔，字尧澂，也作瑶臣，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湖南武陵县(今常德)人。"目光炯炯，性刚毅，发声甚宏，喜纵酒，自号武陵哭生"。

复基少时曾读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人的著作，

深受感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又接受了近代民族意识的熏陶。当年,黄兴自日本归国,宣传革命,筹组华兴会,并着手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准备发动长沙起义。复基闻讯即加入华兴会,协助宋教仁联络常德一路会党,筹措起义经费。起义谋泄失败,官府大肆搜捕,宋教仁亡命日本,刘复基匿于常德柳叶湖。三十一年(1905年)春,马福益图再次举义,复基联络湘西会党亟谋响应。不幸马福益被捕殉难,复基乃东渡日本留学,继续探寻革命道路。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

三十二年(1906年)春,复基归国驻长沙,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于后街五堆子,运销革命书刊,并积极参加禹之谟等发动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学潮。禹之谟被捕后,他独任艰巨,回常德设湘西革命机关于祇园寺。萍浏醴义师起,全湘戒备,机关暴露,复基间道走上海,协助同盟会员杨卓林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次年三月,杨卓林因谋刺江督端方被杀,《兢业旬报》被迫停刊。

三十四年(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星泼函召到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他利用工作之便,与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使该报发挥了革命舆论阵地的作用。

宣统二年(1910年)春,杨度迎合清廷,主张借外债筑路,引起湘人公愤。复基获悉杨避居汉口,住在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便集合同志多人,拟强力挟持杨至旅鄂湖南会馆问罪。他扭住杨的辫子,将其拽出大门,被英租界巡捕干涉,致被拘八小时始获开释。《商务报》也因披露此项新闻被迫停刊。这年四月,长沙爆发抢米风潮,鄂督派兵入湘镇压,群治学社图谋乘机起义,事未果而风声外露,不少成员出逃。随后,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杨王鹏任社长,建立标营代表制,在新军中秘密发展组织。刘复基改名为汝夔,投笔从军,入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他不顾体弱,刻苦自励,表示:"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遑恤若为!"甚为侪辈所倚重。刘密切联系士兵,积极发展社务。但不久,振武学社被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社长杨王鹏等走避。

振武学社被破坏后,刘复基会同蒋翊武、詹大悲等约信原振武学社各标代表,以辛亥年元旦团拜为名,集会于黄鹤楼,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刘复基被推选为评议部长。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清吏严加防范,不少革命党人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刘复基毅然离开部队,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往来各标营,加强联络。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文学社在小朝街85号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常驻办公。他一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文学社,另一方面竭力推动同共进会的联合,并在磋商联合中充任文学社首席代表。七月二十二日(9月14日),两团体代表在楚雄楼十号召开联席会议,刘复基慷慨陈词:"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分""群策群力,冒险以赴","和满清拼个死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联合。八月三日(9月24日)两团体召开联合大会,共商首义计划,组成起义总指挥部,刘复基被举为常驻军事筹备员之一。

就在联合会议召开的当天,南湖炮队革命士兵因反抗长官压迫,拖炮出垒,欲兴暴动。孙武闻讯大惊,主张一走了之;有的人又建议不计成败,于当晚发动起义。刘复基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及事件的可能结局,反对仓促举义。并建议为麻痹敌人计,决定让为首士兵潜逃,其余仍归营"听点"。这样,遂得以弭患于无形,没有打乱原定的起义计划。

十八日(10月9日)中午,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清吏肆行搜捕。刘复基闻讯,奋然倡议:"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当天上午才从岳州(今岳阳)赶回武昌的总指挥蒋翊武遂根据刘复基准备的地图和方略,草拟了当晚起义的命令。晚上十时,小朝街指挥部正等待起义的炮声,而军警突至。刘复基挺身而出,投弹拒敌,受伤被捕。清吏问他"何故造反",复基厉声骂道:"吾矢志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复扬州十日仇,雪嘉定三屠恨,何为造反。今既被执,夫复何言,请速予死。"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五时,刘复基连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时年二十八岁,与杨宏胜、彭楚藩并列为武昌首义三烈士。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温 生 才

温生才(1870—1911),字练生,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丙村人,同治九年(1870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六岁失怙,家贫常为小贩资母",十四岁被骗卖到南洋荷属殖民地种烟草,三年后又被转卖到霹雳埠锡矿当苦力。休工时曾入公益学堂学习国文和英语,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因不愿忍受矿主的虐待,逃回国内,受雇充仆役,曾随沈宗济到连州(今连县)当差,得沈欢心,由沈赏给一个婢女为妻。后改随善后局委员荣勋及张之洞幕僚魏邦瀚为仆。又曾投身行伍,到宁波给提督张其光当亲兵,嗣又改投冯子材营,"执旗牌役,终落拓无所遇"。"半生奔走,饱历风霜","目击政界之腐败,乃洁身引退返香港,而改习机器"。

大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前后,温生才因在香港与同业不合,再次到南洋霹雳埠锡矿做工。后来在当地同

盟会员所办的书报社中读到《扬州十日记》,“种族思想勃然发生”,又听过孙中山“演说革命宗旨,甚为信服,情愿牺牲性命”,“身充革命党”,于是加入了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秋,温生才与同业诸人在咖啡山开设广益学堂,大家白天劳动,晚上聚首一堂议论国事,谋求改革办法。在虚无党个人恐怖主义思潮影响下,温生才与华侨李佐汉等组织暗杀团,决心从暗杀清朝亲贵入手,“誓除民贼”。

宣统二年(1910年)初,温生才就打算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拟掷土药包,又恐不能成功,反为所获,故未动手。”汪精卫刺载沣失败入狱,温“恨火焚心,时刻不忍”,在写给友人的绝命书中表示要继汪而起,只待弄到武器,“一定有好戏看”。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下旬,温生才从香港购得五响手枪一支,再次到广州,在东市街赁得一间小屋居住,伺机谋刺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三月十日(4月8日)他探知孚琦前往燕塘观看冯如的飞机表演,即在东门外一家满人所开的茶馆中等候到傍晚。下午六点一刻,孚琦在卫队前呼后拥之下乘轿来到省谘议局前麒麟阁门口。温从茶馆冲出,闯到轿前,手持短枪,向轿内连发四弹,皆中要害,卫队、轿夫,仓惶逃散。温生才见状,满心欢喜,从容逸去。不幸途中被巡警捕获。

孚琦猝被击毙,当局惊恐万状,随即“通电各路警区,所有员兵人等,不得擅离区所,以备差遣”;“四城门皆紧闭”,并“运炮上城,如临大敌”;武装旗人,背负长枪,在市内“严行梭巡”;“省河一带,是夕亦防备颇严。”同盟会香港统筹部于当天议定的广州起义计划不得不因此而展期。

温生才被捕后,当晚即押往番禺县署审问。县令要他招供,他若无其事地说:“腹中饥饿,未用晚膳,懒讲说话。”清吏弄来饭菜,他边吃边谈,声明“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伸气。”三月十一日(4月9日)巡警道会同各方复审,温对行刺经过供认不讳,重申杀孚琦只是“为四万万同胞雪愤”。清吏诘以同党,他说:“此系一人所造之事,并无同党。”清吏以严刑酷法相威胁,他毫不在乎地说:“何不将来试耶?”十三日(11日)水师提督李准提讯,问到行刺情况,温生才“眉飞色舞,扬扬得意,双手拍腿而言,谓放头一枪,见各卫队走散,时心甚快畅,后连放四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并与李准大谈为将之道,该当如何。李准再讯同党及主谋姓名,并施以严刑逼供,“亦不吐实”。十四日(12日)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提审,欲得主谋及同党,借以镇压革命,温生才“侃侃而谈,词气镇定”,断然否认有主谋与同党之人。

温生才在行刺之前,早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死之日即生之年”。所以,被捕后清吏为拍照时,他笑着说:“吾今日出世矣!”“整衣拍毕,仍谈笑不已。”十七日(15日)在赴刑场途中,他神色自若,毫无怯色,行至惠爱街一带,面对人山人海的观众,大声喊道:“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二岁。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瑞澂

瑞澂(1864—1912),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博尔吉特氏。同治三年正月十七日1864年2月24日)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父亲恭镗在黑龙江将军任内曾疏请举办漠河金矿,屯田实边,杜绝沙俄觊觎。祖父乃道光朝直隶总督、大学士琦善。瑞澂少时居北京七条胡同,浪荡无行,与岑春煊、劳子乔合称“京师三恶少”。

瑞澂识字不多,以贡生官刑部笔贴式、升主事,调户部员外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瑞澂在京,盛情款待路经他家的外国人,被推为临时地方审判官。两宫“回銮”之后,他冒留守功,不久,擢九江道。三十年(1904年)夏,江西乐平县靛农在会党首领夏廷义率领下展开反“靛捐”斗争,再次攻入县城。瑞澂奉命带兵千余人,对抗捐农民实行残酷镇压。官军沿途掳掠,所过之处“居民铺户,十空其五”。

翌年,瑞澂调任上海道,与外国冒险家哈同、名流张謇等人过从甚密。尝将搜刮到的庚子赔款利息托哈同经营盘剥,获利一百多万两。上海中外交涉频繁,爱国风潮勃兴。瑞澂全力办警政,建总局,廓分区,设学堂,练马巡;又时常听任儿子在妓寮设宴,招待新闻记者,于是报纸纷纷对他加以吹捧,外国人对他也有好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瑞澂出任江西按察使,不久,又升任江苏布政使。当时,苏、浙交界处民变蜂起,夏竹、林声为率众盐贩出没于沪杭孔道,与官府对抗。瑞澂受命主持苏州、松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等六州的清乡事宜。他添募水师,购置兵轮,仿照各国海军制编成联队,严饬六属文武,不遗余力地镇压群众斗争。因此,朝廷赏给他正一品封典。

瑞澂担任江苏巡抚不到半年,十月十一日(11月23日)又署理湖广总督,宣统二年五月六日(1910年6月12日)实授。上任伊始,劾罢巡警道冯启钧、劝业道邹履和等不法官吏;凡置警、兴学、设厂等新政事宜,均大力治办,博得“偾弊剔蠹有能”的社会声誉。这年春,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瑞澂急忙调遣湖北新军、巡防营及水师入湘镇压,复纠弹湘省顽固官绅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囤积谷米,教唆风潮,阻挠新政。王、叶等旋即奉旨分别惩革。这时的

瑞澂，内有妻兄镇国公载泽为奥援，外结张謇、郑孝胥等名流，声势煊赫，大有凌驾南北洋大臣之势。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瑞澂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卖国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此时，保路风潮席卷川、鄂、湘、粤等省，湖北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新军中有了很大发展，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主旨的武装起义计划正在加紧酝酿之中。六月(7月)，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连续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瑞澂阅报大怒，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于闰六月七日(8月1日)查封报馆，并将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逮捕入狱，炮制了震动全国的"大江报案"。

八月初，"中秋起义"的传说遍及武汉三镇，官方非常恐慌。八月十二日(10月3日)瑞澂召集首县、管带以上文武官吏，举行防务会议，决定调集兵员，加强督署防卫，收缴新军士兵的弹药，在全城实行戒严。又命楚豫、建威等军舰升火，严密梭巡长江。八月十八日(10月9日)汉口宝善里革命机关因赶配炸药，不慎发生爆炸，起义秘密暴露。瑞澂闻讯下令紧闭四城，飞调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布街巷，侦骑四出，大事搜捕党人。当晚，武昌小朝街革命机关部被清兵破获。瑞澂漏夜饬令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督署参议官陈树屏等提审被捕的革命党人，残酷杀害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三人，并立即通告全城说："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又连电清廷，吹嘘自己"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正当瑞澂自以为得计之时，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军在夺取了楚望台、蛇山高地之后，立即连续三次向总督衙门发动了猛烈进攻。瑞澂惊恐万状，一面责成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率兵固守，一面吩咐差弁将署后围墙凿穿一洞逃跑。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珍闻轶事

武昌起义前的一本名册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机关曾被清方破获，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遇害。当时，清方搜出名册一本，新军多列名其中。在湖北总督瑞澂处理这一案件时，左右有人默计道："这类事情，在香帅(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时候，常常发生。张的方法是，将名单当众烧掉，可以安定军心。"瑞澂道："那么，我也把这份名册当众烧毁，可是要抄录一份保存起来。"这席话，不久传播开来，新军更为不安。据说，这也是加速武昌起义的原因之一。

辛亥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因变起仓猝，来不及逃避，被起义军从床后搜出，拥为都督。从此，黎竟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平步青云，后来攀登总统宝座。在黎说来，实在是始料所不及。

当年，黎在武昌只是一名副将，主将是张彪。起义军发难时，张得讯较早，一得讯，立刻弃军而走，仓皇渡江，躲进日本领事馆，做了一名临阵脱逃的将军，而从此就默默无闻。一般记载里对他大都一笔带过，在历史上是一个来历不清、下落不明的人物。

据考，这位逃将字虎臣，原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从小就跟随张之洞，是大帅身边的一个小跟班，因为比较伶俐，不但得到大帅的喜爱，也得到帅夫人的欢心，被赏以宠爱的婢女一名，结为夫妇。有了这样的内线关系，他从此步步高升，最初由大帅保以军功，一再受到破格提拔，最后竟高踞诸军之上。武昌起义后，他已经官居陆军第八镇统制，俨然是镇守武汉的主将。

武昌起义时，张在日本领事馆里藏匿了一个时期，后来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面团团为富家翁，以宦囊的一小部分筑园林一所，名为"张园"，在十里洋场中颇具花木之胜。最有趣的是：一九二四年，溥仪被逐出宫，在日本军阀别有用心的卵翼下，逃进天津日租界，竟租用"张园"，建立了一个小朝廷。这位逃亡将军竟藉此对逃亡皇帝大献殷勤，重叙君臣之礼。

在当时追随溥仪的一位遗老的信札中，曾有两则有关的记述。

一则是：

居停(指溥仪)至津后，日本领事、副领事、陆军长官、警察长六七人以汽车接，即到"张园"(前一日已租好)。当夜因无行李，遂至大和馆住。张虎臣供张极周到，每日清早即去伺候。其夫人率其女往伺候后妃，夜并下榻园中。亦可谓难得矣。

另一则是：

日来是非愈多。江东(指罗振玉)与两师傅(指陈宝琛、朱益藩)已成不两立之局，而板桥(指郑孝胥)为其劲敌。渠自己所为亦实有不可对人者。租"张园"为朱汝珍经手，张虎臣只得五千元，朱诡言八千，外加五千建筑费。上

边已付万元，渠等尚催付三千之数。丧心昧良，一至于此。……有与张虎臣接近者，属其四姨太向皇后言之。上知后大为不满，而外面仍能包涵不露声色。江东因此大受影响。

这位辛亥革命当年带头逃命的将军，这个时候居然又成了这位末代皇帝患难中难得的臣仆。旧日的臣属变成了今日的房东。他不但为"张园"找来了好房客，而且为自己重新找到了主子。其一家老少奔走于皇帝后妃前朝夕伺候的表现，正是不失"跟班"本色；其利用四姨太向皇后进言，从而帮助郑孝胥打倒了罗振玉的做法，依然又是"内线"作风。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申君）

清亡前颁定的"国歌"

武昌首义前六天，1911 年 10 月 4 日，清廷谕令内阁：典礼院会同礼部各衙门创作、呈览的"国乐"，"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

这首"国歌"的歌词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大意是：保牢疆土，靠老天庇佑。百姓欢欣鼓舞，庆幸生于清平盛世。真是幸福吉祥、心情舒畅。大清帝国有上苍保护，象天不会塌下，象海不会枯干。当时百姓倒悬，歌词却说其乐融融；天下已经大乱，歌词却说歌舞升平；清廷覆亡在即，歌词却说固若金汤。清廷行将就木而不自知，真是可笑。

这首"国歌"唱了没有多久，清朝就灭亡了。清朝的"国歌"，变成了它的挽歌。今天读来，倒不失为一段笑料。

（摘自《民国春秋》）

瑞澂借刀杀端方

辛亥革命时，署理四川总督端方在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为起义军所戕杀。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已有记述。实际，端方之死还有内部倾轧的原因。

端方喜欢结交汉族名士，而性格轻佻，往往对人漫加凌辱。端方本人是满族，却自恃才气，鄙视满人，因此为满族的王公大臣所忌。光绪帝大丧时，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派天津摄影师往摄照片，被李国杰发现，弹劾其犯大不敬罪；平日对端不满的王公大臣也藉此落井下石。端方因而去官。后来他多面运动，才东山再起，奉命入川。

端方过武昌时，瑞澂正节制武汉。瑞澂也是满人，以钻营贪贿起家，胸无点墨而又夜郎自大。端方来，瑞澂以方镇自居，不亲自迎接。端方对瑞澂本来就看不见，见瑞澂如此相待，勃然大怒。当面加以责备，并责成瑞澂拨兵两旅护送入川。这时，鄂兵已经欠饷两月。瑞澂因为对端方怀恨在心，就选择情绪不稳的新兵两旅，更派遣一向不易驯服的军官统带，并谎言"端大人从北京带有恩饷来"云云。瑞澂的这一借刀杀人之计极为狠毒，用意在唆使士兵半途向端方索饷，使端方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端方不知道自己钻进了瑞澂所设下的圈套中，意气扬扬，拥兵而去。一路上，士兵逐渐流露出不满情绪，而端方身边携款有限，无以应付。抵达四川资州时，兵士索饷更急，其势汹汹，不可控制。这时，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军中本有革命党人，乘机说动兵士起义。端方遂为军官刘怡凤所手戕。

在这以前，端方感到情形不妙，曾派遣心腹到湖南筹借十万元开发军饷。款已经借到手，但借款人在归途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置端方于不顾，卷款潜逃。端方死后，这件事成了无头案。此人竟逍遥法外，成为富翁。

端方之死，本来也死有余辜。其平生罪恶不胜枚举，特别是吞没淮北赈款一事，更令人发指。端方生前又有收集古董僻，因掠夺古玩而致人死命者也有几起。端方死后，从他家中流出大批古物珍宝，一度成为古玩商角逐的对象。

（摘自《一士类稿》徐一士）

詹大悲冒死创办《大江报》

一个盛夏的夜晚，地处内陆的汉口，燥热而气闷。约9时许，《大江报》社前的路上气势汹汹地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巡警，后面跟着一批打手。随后，他们闯入报馆，抓走报社经理，并封禁了这家报纸。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它发生在 1911 年 8 月 1 日，距辛亥首义前两个多月。

《大江报》案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还是先从《大江报》的经理詹大悲说起。

詹大悲办报并不是从《大江报》开始的。1909 年 12 月，他的同学宛思演在汉口接办濒临辍业的《商务报》，由詹大悲任主笔，自此他步入报界，同时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20 世纪初年，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腐败不堪，民主革命思想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詹大悲兴受时代思潮有影响。在办报过程中，他与同事们一起用见诸报端的文字来抒发改革现状的志向。由于报纸办得颇有生气，并能触及时弊，受到读者欢迎。该报经营了一个多月后，因资金亏缺，詹大悲只得变卖财产借以维持。在报社面临困境时，当地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团体的部分资金拨给报社作为经费。于是，《商务报》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报馆作为学社的秘密联络点参预组织活动。

1910年4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清廷打算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在这样的形势下，群治学社的同志决定乘机举事，随之便开始积极地进行准备；与此同时，《商务报》对时政评论的言词颇为激烈，这些情况引起湖北当局的注意，警探对报馆实行严密监视，并不时地进行骚扰。《商务报》已无法再继续办下去了，最终被迫停刊，群治学社的活动也就此中止。

《商务报》停刊，使武汉革命党人失掉了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恢复建立革命的舆论机关，詹大悲与战友们又开始为创办新的报纸奔忙起来。事有凑巧，这时有一位名叫胡为霖的富家子弟拥有一笔闲置资金正待投资。他们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胡接洽，希望他能把资金投向报界。经多方劝导，胡最终同意投资500两银子。这样，《大江白话报》于1910年12月14日，在汉口歆生路创刊了，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与何海鸣任正副主笔。

这家报纸创办不久，汉口发生了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1911年1月21日这天，人力车夫吴一狗拉车由英租界汉舞台向怡园行进，途中遇上一名英国巡捕，吴一狗问他是否坐车，巡捕不答话，反而用警棍敲击车身，吴一狗以为巡捕要坐车，随即将车放下，无意中车轮碰到了巡捕的脚，巡捕大怒，挥起警棍，将吴打倒。当吴一狗刚要爬起时，那个巡捕又上前猛踢数脚，吴一狗被打成重伤，旋即死去。目击此事的路人走上前去评理，都被巡捕拘送捕房关押。事发后，汉口市民群情激愤，22日，花楼街一带店铺相约罢市一天以示抗议。同日，400余名车夫上街呼喊以鸣不平，与巡捕发生冲突。随后，英领事调来军队弹压，当场打死13人，击伤10余名。在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湖北地方当局对吴一狗案置若罔闻，也不明确表态，并下令各报刊不得报道此事。但是，詹大悲等人不屈服于压力，《大江白话报》不仅据实报道了外国巡捕暴行的经过，还发表了题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的社论。针对官府的软弱，该报指出："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无能是分不开的。"这些言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詹大悲的名字也渐渐为人们所熟知。

《大江白话报》对这一事件的鲜明立场，使英国领事大为不满，也使官府感到尴尬。胡为霖的父亲惟恐事态扩大危及儿子，立即将胡为霖召回，办报经费也一并带走，报纸因资金无着而停刊。为了继续办报，詹大悲四处筹资，得款3000元，将原报名改为《大江报》，自任经理兼发行，何海鸣、查光佛为编辑，居正、田桐、蒋翊武等革命党人为报纸撰写文章。

在此期间，詹大悲还直接参与了文学社的筹建工作。1910年末，蒋翊武约请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人在阅马厂集贤酒楼开会，讨论如何改变被动局面。当时，继群治学社之后成立的振武学社因活动败露，工作陷于停顿。会上，许多人主张恢复原组织的工作，仍沿用"振武"之名，詹大悲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振武学社已被官厅侦知，而"振武"二字又特别引人注目，不如另改名称，重新组织为好。他强调说："我辈革命，所重者在精神，不在名称瞀耸耳。"大家一致赞同詹大悲的意见，决定建立文学社，推举詹大悲起草文学社简章。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正月初一，革命党人以新年团拜为名，在黄鹤楼的风渡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会上，蒋翊武被选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

文学社是后来发动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之一。自它成立时起，《大江报》就成为它的重要喉舌。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发展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报馆在军队各标营中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还给各营送义务报一份。在内容上，《大江报》较多地登载文学社成员采写的新闻和评论。并且把黄花岗烈士的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随报分送。对于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报纸给予坚决地揭露。当时，军中时有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事件发生，《大江报》著文一一披露。第八镇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因劣迹被揭而撤职。1911年5月，清廷推行所谓的"铁道国有"政策，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接着，又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这一举动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席卷湘、鄂、川、粤四省。《大江报》走在舆论的前列，逐日发表评论，严厉地谴责盛宣怀、端方等人的卖国行径，鼓动人民起来抵制。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曾劝詹大悲不要持反对意见，他对詹说："象你这样明达的人，不应反对铁道国有。"詹大悲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所要反对的，不是国有，而是清有。"汤化龙听后，惊愕不已，不敢再说什么。

《大江报》旗帜鲜明的观点和疾恶如仇的言论为社会所瞩目，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同时，它也召来了地方当局的仇视。但是，在詹大悲的直接领导下，报社的同志仍一如既往，无所畏惧。当时武汉地区各报馆人员都留着长长的辫子，唯独《大江报》的编辑人员均为剪发，当局怀疑他们与革命党有关系，曾派出警员进行调查，因查无实据，只得不了了之。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这年夏天，黄侃由河南回乡，路经汉口，来到大江报馆。他与詹大悲都是湖北蕲春人，而且都赞同反清革命。既是同乡，又是同志，聚在一起少不了有一番叙谈。7月的一天，他俩在一起喝酒，席间，两人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论及时局，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愤懑。酒后，黄侃把两人的感受付之于笔墨，写下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短文。文中说："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

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詹大悲立即将该文作为时评刊登在7月26日的《大江报》上，署名“奇谈”。文章尽管只有200来字，但它那饱含激情的文字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震撼着人心。此时的中国，革命的溶岩正在地表下奔突欲出。作者的呼唤成了1911年大风暴来临的预言。此前，《大江报》还发表过何海鸣撰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使清朝统治者恼羞成怒，再也无法忍受了，湖广总督瑞澂遂下令封闭报馆，永禁发行。于是，就有本文开头所叙述的那一幕。詹大悲时年仅22岁。

詹大悲被抓的第二天，审判厅法庭传讯他到庭。法官要他说出《大乱》一文的作者是谁，詹大悲拒绝回答。法官又问：“你是发行人，编辑何海鸣，你可交出吗？”詹大悲说：“我是发行兼编辑，一切责任均归我负。”法官见他甘愿自负责任，于是话锋一转，“你登此项时评是什么意思？”詹大悲坦然地回答说：“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法官抓住文中内容，想迫使詹大悲就犯，便说：“你所登时评有和平之无望一语，明明是淆乱政体，扰害治安。”詹大悲义正词严地反驳道：“试问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曰和平解决。又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还是因乱而来？”一番质问，问得法官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詹大悲接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一片爱国热忱，反因之得咎，究应如何办理，请速示之。”法官不敢作主，詹大悲仍被押回监狱。不久，何海鸣也遭逮捕。

詹大悲在法庭上的辩词深深打动着人们，他见义勇为的品格也为人们所称道。对此，一家报纸评论说：“詹一力担承，谓大江报总理、总编辑、发行人均我一个，壮哉！”《大江报》案发生后，汉口各界舆论哗然，社会各团体要求放人。《大江报》馆墙上贴着很多哭吊的短文和安问纸条。在民众的压力下，瑞澂对于此案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判处詹、何二人一年半监禁。

二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詹大悲在起义的炮火声中离开监狱，积极参加起义，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后，他追随孙中山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是，在他一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创办《大江报》的这段经历。在革命的准备时期，詹大悲所做的这些宣传、组织工作，对武昌起义的发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无疑是他个人历史中最光辉的篇章。

（摘自《民国春秋》）

洪门与辛亥革命

辛亥期间，中山先生见同盟会与致公堂双方意见不甚融洽，认为对筹饷大有障碍，逐运动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作。致公堂方面要求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中山先生便介绍黄芸苏、赵昱、张蔼蕴、李是男、黄伯耀、刘鞠可等与所有在美国的同盟会会员都加入致公堂。双方合作后，革命事业推进甚速。

五月二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的推动下，致公堂与同盟会共商筹饷事，组织洪门筹饷局，对外名称为国民救济局，黄三德为监督，朱三进为总办，唐琼昌、黄伯耀为西文书记，黄任贤、刘鞠可为中文书记，李是男为会计。发行金公债，券面有十元、百元两种，由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及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即李是男）签名盖章；规定凡捐款五元以上者给以两倍币值债券，即以十元券给之。洪门筹饷局设于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内。

六月二十六日，洪门筹饷局公推孙中山、黄芸联、赵昱、张蔼蕴四同志为游埠筹饷专员，孙、黄担任北路，赵、张担任南路。七月初二日出发，沿途演讲，到处劝捐，成绩斐然。

孙中山先生抵盐湖城时，接黄兴由港发来的密电。当时因密电码本置于行李箱中，已运去典化城（Denver），中山先生即赶赴典化，从行李箱中找到密码本，将电文译出。电文大意是居正抵港，向孙报告武昌即将起义。中山先生接电后彻夜不眠，研究形势，考虑再三，拟翌晨复电黄兴，待筹集巨款，各方配合后再大举事。次日晨阅西报，知武昌已举义。孙中山先生遂拍电至圣路易城，催我和张蔼蕴速筹旅费。我和张乃急赴芝加哥，筹得五千金，直往纽约，在亚灵顿旅馆见到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留我和黄芸苏、张蔼蕴同寓数天，谈及武昌起义后种种事情。中山先生在纽约劝勉诸弟兄努力筹款，随即携朱卓文经欧洲归国。筹饷局亦陆续汇旅费与中山先生。而我和张蔼蕴即回旧金山，我则准备回国效力。

九月间，芝加哥同盟会萧雨滋、梅乔林、梅光培建议购买飞机，以充军用。经筹饷局核准，至十月初旬，购买寇缔司式（Gutis）飞机六架，聘请威尔霍士（Wilcox）为飞机师，年俸一万美元。芝加哥同盟会会员李绮庵、余夔志愿从军，学习飞行。十月下旬，我偕飞机师威尔霍士夫妇及李绮庵、余夔回国。十一月十二日抵沪时，中山先生派人乘战舰迎接。

飞机队归国，对革命战争虽无甚帮助，但对促成共和，其功匪鲜。威尔霍士飞机师自谓飞行经验丰富，但奉母命，不得凌空飞行，只能教练。教师尚且如此，学生学习成绩自然可知。但据唐绍仪对我说：“革命党飞机队抵沪

后，袁世凯亦获情报。袁乃据以入奏帝后，故作危言耸听，谓革命党飞机队已抵沪，声称倘不即议共和，行将轰炸皇城。一时寡妇孤儿，意为之夺，乃决定退位。故飞机队对促成共和，其功不少。"

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由沪赴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

十月，洪门筹饷局办理结束，派冯自由回国，携未发行之金公债余券缴交孙中山先生。计筹饷历时三月，共筹得美金十四万四千元。中南美洲致公堂均有捐款，尤以墨西哥致公堂为多。

武汉首义，各省陆续响应，海外人心大为振奋。虽筹饷局已告结束，但各处洪门弟兄及同盟会会员仍努力捐输，影响各界华侨，亦纷纷输将。有一人捐几百元者、有一个捐几千元者，甚至一个捐几万元者。所捐款项有汇至南京总统府者，有汇至上海军政府者，亦有汇至福建军政府者，有汇广东军政府者。是次海外各地华侨，万众一心，争相捐输，空前踊跃。

当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初，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即一饭一宿，亦常见拒于人。当此困难之际，华侨中毁家纾难、投笔从戎者，大有人在。革命军兴，华侨捐输，靡役不与；每次举义失败，不为之气馁，反益增国难家仇之感，捐输益形积极。故中山先生缅怀往昔，不禁感慨系之，喟然叹曰："华侨乃革命之母也！"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流行风

小说《六月霜》

作者静观子，主要内容：

该书据嬴宋季女之传奇写成，记述清末革命烈士秋瑾就义事。全书以越兰石（吴芝瑛）女士为线索，以她见报载秋瑾就义开场，而以收葬秋瑾为结束。秋瑾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她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痛恨当时腐朽、残酷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痛恨他们出卖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她对于妇女解放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不满于自己过家庭妇女生活。1904年夏天，秋瑾终于毅然和那纨绔子弟的丈夫决绝，到日本去留学。她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和徐锡麟等，并参加了同盟会，为革命呼号奔走。回国后曾编女报，又在绍兴办学，与徐锡麟取得密切联系，组织"光复军"，策划军事起义。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不幸失败。事后，浙江巡抚曾敭密令绍兴知府贵福逮捕秋瑾。当清兵包围她所主持的大通学堂时，她烧毁了教职员和学生名册，然后勇敢地向清兵冲上去，终于被捕。她被捕后，经受了两天两夜的严刑审问，没有半字口供，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诗，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一岁。本书以"六月霜"为名，有着双关意义。一则正如第六回末尾所引的典故："邹衍下狱，六月飞霜；齐妇含冤，三年不雨。"六月霜就是指冤狱。再则秋瑾就义，也正在旧历六月。全书着力描写秋瑾这个人物还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刻画她的性格更为突出。书中所引用的诗篇文字，大都是秋瑾原作。该书政治性比较强烈，而且在反映历史真实一点上，有其较大的意义。但该书成于清季，不能不有所顾忌，书中有些地方，是作者有意的掩饰。小说中的人物，有的虽是作者故弄玄虚，易姓改名，然而参照晚清史实，大多斑斑可考。

小说《电冠》

作者陈鸿璧，主要内容：

写英国伦敦一著名科学家研究电冠事。高德士是英国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多年来致力于研制可以记录人所思所想并显现于大庭广众的科学仪器——电冠。高德士虽然声名显赫，但在爱情上却颇为坎坷。他原与家道中落的男爵小姐蒲梅姿订有婚约，然蒲梅姿另有所爱，与青年律师叶乐生情爱笃厚，并退了与高德士的婚约，高德士因妒成恨，命受制于他的浮荡之士蔡礼和接近叶乐生，并将其诱至高德士处。叶失踪后，蒲梅姿悲痛欲绝，高德士藉机多方抚慰、帮助。这时，蔡礼和因耐不住良心的谴责而自杀身亡。社会哗然，纷传此事。高德士并未杀叶乐生，而是将其作为试验品囚于试验室中作电冠试验。电冠试验已近尾声，蒲梅姿也有重缔旧好之意，高德士得意飞扬，在一次盛大宴会上向众人宣布了电冠研制即将成功的消息，并欲借著名记者梅哲伯之笔传扬之。不想，在与梅哲伯交谈中，将叶乐生的烟盒遗失，被梅哲伯所得。梅哲伯由此产生怀疑，后蒲梅姿突然造访，两人均梦蔡礼和并有所指点，更疑叶乐生在高德士处。电冠研究已毕，叶乐生已无用处，高德士便欲将其置之死地。在高德士当众表演电冠功用时，由于其助手酒醉误将电冠戴于叶头上，致使叶乐生在高德士处真相大白于天下。叶乐生被救，高德士惊惧而亡。高德士心血所成之电冠也由于世人认为它可将人的内心世界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实为可怖而将其捣

毁。小说表面写科学家由于爱情生活的挫折走向堕落、走向灭亡的故事，实则在写电冠、树科学。小说通过科学家因情犯罪过程的铺叙，介绍了电冠的原理，形式、构造、功用，其中穿插介绍了许多电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该小说技法纯熟，叙事、状物、写人非常细腻，塑造了一个较为丰满的科学家形象，既写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执着精神，也不讳言其为人方面的阴刻狠鸷。

小说《生生袋》

作者克明，主要内容：

叙述一科学家为人祛病禳灾的事。一个文明未开的小岛上有个老学究，一天，一位神通广大的客人来到老学究面前，与之讲解太阳辐射的道理，并治好了老学究的佝偻病。老学究始知其博学，遂请他登堂入室。从此，这个客人便在小岛上为人治病、审案、解惑，颇受尊重。岛人有难，有惑皆向他讨教，他每欣然前往，悉力襄助，每遇一生理现象，便耐心解释其科学道理，树正批谬，用科学开启民智、民识。由于他的努力传播。生理学在这个小岛上普及开来，深入人心。作品通过科学家对一系列疑难病症及“怪异”现象的治疗、排除、解释、宣传了生理学的知识。正如作者在叙言中所说：写这个小说旨在“为生理学绘一副真相”，所以作品中充盈着大量的生理学知识。这对普及生理学知识，尤其对于科学启蒙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小说构思奇巧，情节跌宕，语言优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诗《台湾竹枝词（选二）》

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肥；
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

（梁启超）

绿阴阴处打槟榔，蘸得蒟酱待刘郎；
愿郎到口莫嫌涩，个中甘苦郎细尝。

（梁启超）

词《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

（一九一一年秋）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黄兴）

历史档案

黄兴致海外同志书

（一九一一年五月初）

良友尽死，弟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惟此次之失败至此者，弟不能不举毅生、雨平二人之罪。毅生所主张用头发公司之陈镜波，据现在事实观之（昨新闻纸已载用头发送枪弹之说），陈实为大侦探。弟到省时，毅生即言陈自云曾充李之哨弁，毅是以不敢前寄之子弹取出（共计十包），以致临时无多子弹分配。其已储于石屏书院者，又临事畏惧，云有警查窥伺，取出予姚雨平，致雨平有枪无弹，不能出队（所谓警察窥伺者，皆自相惊扰之词，以彼方张罗、任其投入，为一网打尽之计，必不为小破坏以惊吾党。故司后街、小东营、莲塘街一带，至廿八、九更为注意，然听吾人自由往来，如取如携，绝不查问。有一次老喻搬炸药入屋，李应生之弟闻警察自相语云：经物想又是那东西。据此，则亦何惧之有？）。又廿八之期，原毅所主张。及弟到省公议廿九，即电告港部。而港见龙王庙添兵，即运动竟存、执信提议缓期，健侯亦忧不敌，赞同共说（后雨平到，甚反对改期，然伊亦要枪，数在五百以上，方允办。此刻枪所到者不过七十余支，而弟上期尚未取出，不敢作必得之数，是直不办而已）。弟见各部如此，所谓改期者，实解散而已。弟之痛心当何如也！故弟当即决心愿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助款之各同胞，亦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当即与宋、周二君同商量，先将伯兄部全数返港，随即遣回籍）。一面保存已到之松支，留与公等作后图。此即缓期之一段落也。后林时塽、喻云纪两君到弟处，云不但不能缓期，且须速发，方可自救，此巡警局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户口之札饬，且夕必发也（河南巡官系四川同志，报告于喻者）。弟以两兄之决心，欲集三、四十人以击督署，议亦决。毅闻之，又运动林时塽兄将已到三十人遣归。喻闻之愤愤（喻是日自来搬炸弹二次）。适李文甫兄

来，多方劝慰，哈喻尚未允。而陈姚借至，云：顺德三营之同志皆归，现泊天字码头，即可乘此机会（喻闻即三跃，携弹以去，李文甫兄即返港报告）。陈遂往与其人商定，不久，即回复：其人已决。当即电港，定期二十九。弟意此三营若能返正，不患余营不降；现在新军以助之，事必可成，即定计画与竞存兄。弟即召集余人，以当督署。意欲督署一破，防巡即入，李准不难下也。熟料事竟相反，死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无一人。观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报纸所云藩司、学司适在开审查会者，皆是捏词。如两司在，必有轿及仪仗各物。今一切皆无，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侦探报告，不能有如是之灵活。吾党头脑既多，姚又逢人运动，以巡防为最可恃，使弟部牺牲多人，姚之罪亦不少减。又可愤者：既约定时刻陈破巡警局，毅率二十人守大南门（毅自云，欲驳壳十余支，只给弟部六支。后毅亦不知何往。若当时自己不出，多给弟十余支，则殪贼必多，或全部击出城外，亦未可知。弟思及此，尤叹毅之无良）。姚部即不能出，则驰往新军，必可成功。何姚并此不为，徒作壁上观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呜呼！闽友四十余人，川友十余（五）人，战时无不以一当百。林时塽兄在西辕门（当攻卫队时，见当门投置炸弹，曾弹如雨集，屹立不动，无人能当其勇者），当街中招抚李准之先锋队，脑中枪以死，余在卫队门首死者多。方声洞兄偕弟往奔大南门时，与巡防遇于双门底，首先开枪，击毙哨弁并伤多，曾闻于南门口就义。弟归途觅其尸首无着，不知果在何处。喻云纪兄当攻龙王庙时，一人当先抛掷炸弹，巡防见之，无不披靡。昨报纸所载某米店叠米为垒，与敌鏖战，三十余人尽被其焚毙者，弟料必喻兄所率诸人。朱执信兄当攻督署，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在督署二门时，为后到误击，伤其肩际，当时顾坐地告以伤处。弟慰止，勉忘其痛苦，则立起如前，其勇有加。后偕弟往大南门时，弟与方君稍前遇敌，遂不知以后事。昨闻得养伤于陈村，是亦不幸中之一幸也。李文甫兄亦奋勇向先，当攻卫队不久，即不见其人，弟料其必死于是间。昨晤徐维扬云："往小东营处。"不知确否？何克夫兄本率弟部攻督正门，后转攻其侧门，至收队攻龙王庙时，闻不见其人，想亦死于是也。弟旧部得生还者，仅刘梅卿一人。此人屡战向先，临机敏捷，竟不带一伤，尤为可喜。郑坤闻带数伤脱险返来，思之凄然。闻两人有入舍杀人事，惟属自卫，情尚可原。郑坤请给资就医为要。此次攻督署者共约三十人左右，内有徐维扬四十余人，刘古香十四人，徐、刘部稍弱。徐部由督署分队时，即驰向小北门去。是时城门洞开，城上并无守兵。七时二十分顷，弟往南门时亦然。当时巡防新军若能入城，必无阻者；且有弟等往大南门，徐往小北门，亦足资接应。惜皆虚伪，徒陷弟部多人，岂有人心者出此！呜呼！吾不为我死众友哀，吾为生友哀，吾并自哀。且寄语仲实、璧君、毅生诸人：兄等平日所不满意之人，今竟何如？毅生平日自诩一呼即至者，今竟何如？二十八晚劳朱执信驰往该处，二十九午后三时归来云："有十人来，至蓬塘街头发公司。"比朱兄往视，则弟部李群带来有十人，朱兄始恍然曰："我受其骗矣！"噫嘻！此"骗"字朱兄言之，恐毅生此刻还不言之，反为辩之，其愚有可及者矣。弟本待死之人，此等是非，本不足表白。惟此次预备时期，推弟为统筹部长，事之成败非可逆料，而事之实际不可有诬。以前屡次革命，伤吾党人材，未若如是之众。今若聚闽、蜀之精华而歼之，弟之躬虽万剑不足以蔽其罪矣。今手足虽疮痍，大约两礼拜即可就痊，报吾良友之仇亦近。今乞少助药费，以便即往医院疗治。并乞展兄向仲实兄假三千元，为弟复仇之资，将来用去剩余还上就是。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不能多书，勉以左手拈笔。

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

此合同系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五月二十号，在北京订立。其订立合同之人：一系邮传大臣，已奉旨允准订立合同；一系德华银行、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及美国资本家（以后即简称曰银行等，至美国资本家乃纽约城开设之摩根公司、昆勒贝公司、第一国立银行、国立城市银行四家合成者）。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大清政府准银行等办五厘利息金镑借款，数目系英金六百万镑。此次借款期限由发售债票之日起算，名为：大清政府一千九百一十一年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

第二款　此借款系为筹备资本，一为赎回前美国合与公司代大清政府所发售而未赎回之金圆债票，计美金二百二十二万二千元，并此票按每百分应加价二分半及应付之息；一为建造官铁路干线，由湖北省城武昌府经过岳州、湖南省城长沙府至湖南省南界郴州境内宜章县，接连广东省所造粤汉路线为止，此路线以后名为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估计共约长一千八百华里，约合九百启罗迈当；又，官铁路干线，由湖北省附近广水京汉路线之处起，经过襄阳、荆门州至宜昌，估计约长一千二百华里，合六百启罗迈当，又由宜昌起至四川夔州府止（此段路线系抵补截去之荆门州至汉阳枝路），估计约长六百华里，合三百启罗迈当，以后名为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二共长约一千八百华里，约合九百启罗迈当；其勘量路线均由邮传部核定。以上所言金元债票一经银行等禀请收回后，大清政府应允照办，其赎票需用之款，银行等由此次借款进项内拨用。此项赎回之债票作废后，即呈交与大清

政府。大清政府收到已赎回之债票后，即将从前案内所订以粤汉铁路作抵押之字样全行注销，并函知银行等。现并声明，赎取上开美国合兴公司所售金元债票所需虚数五十万镑，俟该票全数收回后，倘尚有余款，此所余之款应拨归上所载两铁路项内。

……(下略)

第十八条　建造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建造期内，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分别作为购买外洋各材料、机器、什物之经理人。除钢轨一项并其附件等邮传部奏明应由汉阳铁厂自行制造供用，其价目一切由邮传部与铁厂比较他路欧、美购连钢轨之时值订立，惟不得迟误，倘汉阳铁厂不及按时供应该铁路所应需者，即应令该经理人由外洋购买不敷之轨，所有购买一切紧要材料，由督办大臣或总办招人投票。若所购之材料、货物系购由外洋者，该经理人须以于铁路最合宜之价购买。按照原买时价，每百分加用钱五分。惟定购材料及支取费用非经督办大臣或总办核准签字，不能照行。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既得上文所详之用钱，自应各在其路内代为监购铁路所需建造、装配各外洋材料。此等材料，须在于公共市场择价值最廉而质料最佳者购买，并用专门工程司之由邮传部所选聘者验看此项货物。此等专门之验费由邮传部及该经理人等均匀分给。至英、法、德、美所制货物，若质料及价值与他外国所制者相同，应先尽由英、法、德、美公平购买。邮传部铁路总局如欲在中国或欲在外国招他人经理购买各项外洋材料以为更觉合宜者，可以有权照办，惟用钱仍照上所详，给该经理人。其轮船运费及保险费等须选用最廉者，并将其帐单及所有原来买货单、验单等项呈送督办大臣及各该总办查核。所有各项回用、扣头均归入铁路项下。所有该经理人购买各材料，须有制造厂原卖单并验单为据。该经理人除得上文所详用钱外，别无他项用钱，惟遇有聘用工程顾问人员，其酬费由铁路总局铁路项下提给。中国材料及经在中国各厂制造之货物，若质料价值与英、法、德、美或他外国材料相同者，由邮传部派用之验货料员会同总工程司商酌定夺，尽先购买，以鼓励中国工艺。购买中国材料，不给用钱。全路造竣后，于此借款未还清以前，铁路总局若为此两路内购买外洋材料，应先尽向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理购买。其办法章程嗣后彼此商酌办理。

第十九款　大清政府或将来为有裨益于该地方起见，以为须将本合同第二款内所言之铁路展长，自应由大清政府先以中国款项自行建造。如须用外国资本，倘银行等所给之条款利益不少于别家，则先尽银行等商办。

第二十款　此合同未满以前，历年除付借款本利息，铁路总局将本年铁路净进款盈余之内酌提足敷交付来年到期借款利息之数，在汉口或在上海存放银行等。所存放之款，随时按照市面情形，给与利息。

第二十一款　所有经理此项借款之费用，如分给外国各行经纪费，分售费，分售经用电报、告白、邮票、刊印招贴、价票各费，印花税、律师酬费及其余一切用项，概由承办银行等担任。

第二十二款　此项借款系德华银行、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及美国资本家均分承办，惟彼此均无互相担任之责。

第二十三款　德华银行、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及美国资本家可将其本合同应有之权利及责任，或全体或分别，过割或付托于德国他公司、英国他公司、法国他公司、美国他公司，或董事等，或经理人等接办，或再转过割，或付托代办，惟其接办、代办，均须先请邮传部核准。

第二十四款　本合同系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二十号，钦奉谕旨允准签字，并由外务部用正式公文照会德国、英国、法国、美国驻京大臣。

第二十五款　本合同缮写华、英文各八份，大清政府执收华、英文各四份，银行等执收华、英文四份。如文意有疑难之处，以英文为准。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二十号，本合同两造在北京签押。

满洲里界约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俄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七日，齐齐哈尔。

中俄两国重定由塔尔巴干达呼第五十八界点起，至阿巴该图第六十三界点，并顺额尔古讷河，至该河与黑龙江(阿穆尔)会流处止之国界总案。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大俄国大皇帝陛下，特由本国政府派遣大员，大清国钦命会勘中俄边界大臣黑龙江巡抚周，大俄国钦命廓米萨尔协都统菩提罗夫，均各奉有特权，甚属妥协，代本国政府彼此商立此案，定明如左：

一、由塔尔巴干达呼第五十八界点起至阿巴该图第六十三界点止之一段中、俄陆路边线，嗣后遵照宣统三年十月十八日，即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齐齐哈尔城所立第二次商定案，及附入此案之互换图，认为经过下列各界点，此项界点均与华历雍正五年，即俄历一千七百二十七年阿巴该图界约(互换信据)所载名称相同，每两界点之间均成直线。其界线以互换图中所画，由第五十八界点起，至第六十三界点，复顺达兰鄂罗木河，至额尔古讷河止之红线为定。各界点分列如左：

甲、塔尔巴干达呼，第五十八界点，在塔尔巴干达呼山顶正南十二华里六分四，即六俄里三百十二沙绳，亦即七千二百二十米达零一六之草地上。

乙、察罕敖拉，第五十九界点，在哈栏诺尔胡北岸西北十三华里五，即七俄里六十沙绳，亦即七千七百六十米达零八之高阜上。

丙、塔奔托罗海，第六十界点，临金源边堡，即成吉思汗边堡，并在察罕诺尔湖北岸西北七华里四分，即四俄里，亦即四千三百六十米达之处。

丁、索克图，第六十一界点，在东清铁路满洲里车站房东北九华里，即四俄里四百五十沙绳，亦即五千三百四十一米达之高阜上，并在金源边堡(即成吉思汗边堡)南一华里五分，俄四百沙绳，亦即八百七十二米达之处。

戊、额尔得尼托罗海，第六十二界点，在四顶之北坡，即在索克图第六十一界点东南二十四华里四分，即十二俄里四百沙绳，亦即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二米达之处。

己、阿巴该图，第六十三界点，在达兰鄂洛木，即木特内衣浦罗多克河西岸，并在阿巴该图俄屯西南十二华里二分，即六俄里三百沙绳，亦即七千一百九十四米达之处，亦即在中国名阿巴该图，俄名十字山西南六华里五分，即三俄里二百五十沙绳，亦即三千七百一十五米达之处。

二、中俄水路国界，由额尔古讷河口，即该河与黑龙江阿穆尔江汇流之处起，至阿巴该图第六十三界点止，遵照华历康熙二十八年，即俄历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尼布楚之条约，及华历宣统三年，俄历一千九百十一年，第一、第三两次商定案，仍以额尔古讷河流为定。额尔古讷河中所有洲渚，按照所立第一、第三两次商定案，属中、属俄业经和平分定如左：

所有关于五十八界点至六十三界点，及由额尔古讷河口至该第六十三界点之国界问题，其一切详细办法均于第一、第二、第三各次商定案，并附入案内之互换图及洲渚表内定明，此项议案、图表，均经中俄两国大臣画押盖印，其效力与此次总案相同，彼此均应遵守。

华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订于齐齐哈尔城，中文、俄文各二份，由两国大臣画押用印互换，俾两面均存有中、俄文之案据。

大清国钦命会勘中俄边界大臣黑龙江巡抚周

大俄国钦命廓米萨尔协都统普

华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俄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齐齐哈尔城

民军总司令官命令九月初十日午后九时于汉口满春茶园发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满军仍占领大智门新停车场附近。我湘军已有步兵两协，业已出发，不日来鄂援助。

二、本军今晚拟在原占领阵地，以战斗队形过夜。

三、步队第二协警戒线，右翼由歆生路后城马路起，左翼至查家墩以东火车站之堤坊一带。

四、步队第五协警戒线，右翼与步队第二协连络，左翼至玉带门一带。

五、其余各队之集合地如左：

步队第七标在满春以北空地。

马队一营在满春西端。

炮队一标在满春西北端附近。

工程一营在满春北端附近。

敢死队二队防御满春本司令部。

六、步队第一标及季雨霖标，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

七、各队给养，用军政分府预备之粮秣。

八、本总司令在满春茶园。

总司令官黄兴

注意：今夜口号“复汉”。

(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

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等电

章太炎

(一九一一年)

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

(选自《章太炎选集》注译本，第518—520页)

中国同盟会意见书

孙中山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曩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驰自易。又群治之进，常视其民品之隆淤〔污〕以为之衡，故本会主义于民族之后，次之以民权、民生。三者之中，驱于时势，差有缓急；而所以缮美群治之道，则初无轻重大小之别，遗其一则俱敝，举其偏则两乖。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之始端，后者其究极也。八年以来，义声所感，智能辐辏，分会成者数十，吾党足迹遍于天下。武汉事兴，全国响应，匝月之间而恢复两都，东至于海，南及闽粤，风云泱动，天下昭苏。当此千载一遇之会，得驰骤其间，为主义效其忠，为社会尽其瘁，亦吾党穷欢极乐之时哉！

惟吾党已众，散处各地，或僻在边徼，或远居海隅，山川修阻，声气未达，意见不相统属，议论岐为万涂。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上者于临时政府组织之军〔际〕，其祸乃大著。此皆吾党气息隔阂，不能自为联系，致良恶无从而辩，熏莸同于一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为害于本会者犹小，害于民国者乃大。则本会之造成灵敏机关，剔弃败类，图与吾军政府切实联络者，固今日之急务也。而汉阳复失，虏巢尚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非好为此不祥之言以相惊恐，《书》不云乎："两军对对〔峙〕，必哀者胜。"亦黯弱之民，见理不真，情感未固，无足恃耳。是吾党当亟为一致之行，操必死之决心，秣马厉兵于铁血中，而养其潜势力以为之后盾。巩固基础之道，舍是宁有愈哉？若夫虎啸而谷应，风起风波涌，物类之善于感召，人亦则然。军兴以来，智勇之士，雄骏之伦，与时俱起，廊庙之上，战阵之中，所需正急。吾党宜益广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惟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势已厚集，则来附者自多；密阴之树，众鸟归之，大风之会，群音奏之，必然之势也。上说数事，其端至浅，不必深思远识之士而能知之。

是则本会之改造与吾党之联合，固逼于利害，忍而不能舍者。而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遭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言夫其事之起，则此晚近之世，吾党之起于各省者屡矣，又何待于今日？言夫其成功，则元凶未灭，如虎负嵎，成败未可预赌；曰成矣，而吾党之责任，凯遂终此乎？中心未遂，盟誓已寒，义士所不忍为，吾党固非仅操民族主义者也。

夫聚人以为群，群之盛衰，则常视乎其群之人以为进退。国之群大于部落，亦犹是群也，故国之兴衰治乱，观其民而知焉。国之藉以胶固之者，其力常在于民，主治者其末矣。脆弱之群，得贤明之元首，非不足以维持其态度于一时，然其敝也，则终至失其扶衰集散之力。西方之人，其心幻中有天国，庄严华妙而居之者皆天人，盖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以无良民质则无良政治，无良政治则无良国。吾见夫人权颓敝者，其民多恭弱，祸害倚伏，无由而绝。国之与民因果相环，往往为常智之所忽，其端至微，毋可以语卤莽躁急者哉！则吾党所标三大主义，由民族而民权、民生者，进引〔行〕之时有先后，而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即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者，则固无庸疑也。外间谣诼有谓吾党将以天下为己私者，缢夫嫉媚之言，已宣言以匡其谬，并以使邦人诸友知吾党之真意，而祛其疑惑，引舆论为一途，亦吾党进引〔行〕上不能已之事。

今者总理归来，本会因地之便，集居沪各省职员，开临时会议，举如上所说，请之总理相为讨论。谨因缘旧制，略事更变，定为暂行章程，以求适顺乎时势。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于戏！昆仑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入于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吾党义烈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力任艰巨，以光吾国而发挥其种性乎！铜像巍巍，高出云际，令德声闻，流于无穷，吾党共勉之哉！

据上海《天铎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

在武昌受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时的讲话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兄弟才识本不胜任，既承不弃，亦不能不尽力。现今各省响应，大功已将告成，然我同胞亦不可以此自满。兄弟今日有三层意思勖我同胞：第一须努力。现在黄河铁桥已毁，敌兵已无归路，誓不能不拼死命以与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敌即攻入我腹心矣。临战时倘不努力，后退者决意斩首示众。（众拍手）第二须服从。军队纪律，非服从不可。倘不服从，长官命令皆不能行，此种兵士万不能以之临战。以后，军界同胞须服从长官命令，无论如何危险，

皆不得规避。(众拍手)第三须协同。自来成大事定大业者，必自己能同心协力。若自己各存意见，互相枘凿，无论有何种势力，皆不能成事。洪杨之败，其前车之鉴也。我同胞无论办事人及兵士，皆宜互相友爱，以期共达其目的。(众拍手)。

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斯时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但是军人打仗，第一要服从命令，第二要同心协力。自今而后，对于作战，倘有不服从命令及临阵怯敌者，即以军法从事。尚望大众努力前途为要！

据《革命军文牍》第三集、《中华民国军》第三集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

致袁世凯书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官黄兴，谨致书慰廷先生阁下:前由刘君转达尊意，敬悉一切。明公以胞与为怀，爱民如命，来示嘱敝军停止战争，以免生灵涂炭，仁者用心，令人铭心刻骨。惟满州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如但念及汉口之生灵尚即思休战，毋乃范围过狭，无以对四亿生灵。况汉口为我军所有之日，行商坐贾，百货流通，及贼军进攻不克，纵火焚烧，百余万生命、数万万财产均成灰烬。所谓涂炭生灵者，满奴乎，抑我军乎？至于遵嘱开党禁等四条，乃枝叶问题，而非根本问题。兴等之意，原不在此。以大义言之，夷虏与中华，原无君臣之分。明公虽曾服满人之官，而十八省之举义旗、兴义师者，何亦非曾服满人之官者？按之是非真理，明公当自晓然。以利害言之，鄂省兴师，四方响应，至于今日，大江南北，复我汉人之主权者都凡十一省。寡人政治之满廷早已瓦解，明公即奋不世之威力，将何用？以明公个人言之，三年以前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追伪监国听政，以德为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间耳。此段痛心历史，回顾能不凄然！况明公之辞国门之际，曾有誓言耶？革命动机未发以前，明公在邺燕居，犹且视为敌国，彰德、北京之道上，无日无贼政府之间探出没其间。追鄂事告急，始有烛之武之请，满奴之居心，不诚令人心冷乎！近日北京政界喧传明公掌握兵权，当为朝廷之大害，是以满奴又有调明公回京组织内阁之命。夫撤万众之兵权，俾其只身而返，乃袭伪游云梦之故智，非所以扬我公，实所以抑我公，非所以纵我公，实所以缚我公也。赵孟之所贵，赵孟原能贱之。满人之自为谋则善矣，所难解者，我公之自为计也。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不揣固陋，唐突上言，可否有当，均乞尊裁。条件若何？亦祈赐示。九月十九日。

(据《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一期所刊影印件)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2日　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学生罢课停学，要求速开国会，清廷命学部、各省督抚严行禁止，随时弹压。

1月3日　孙中山自巴黎赴比利时。

1月6日　清廷以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

直隶保定各学校罢课，预备第四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月7日　上海商人停市，要求减轻房租。

1月9日　天津人温世霖(子英)以“全国学界同志会”会长名义通电各省，同时罢课，要求速开国会。诏命发往新疆。

1月18日　黄兴自新加坡抵香港，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月底，成立革命军统筹部于跑马地35号，黄兴任部长，赵声副之。并分派专人负责发动新军、防营、巡警，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

1月19日　孙中山经欧洲抵纽约。

1月20日　上海《国粹学报》停刊。该报于1905年2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八十二期。

1月21日　英兵图占云南片马，清廷命总督李经羲妥慎防卫，并命外务部磋商办理。

汉口英租界巡捕房侦探踢死人力车工人。次日，人力车工人千余一律罢工，并聚众于巡捕房前质问，遭枪杀十

余人。23日，武汉各界数万人集会抗议。

1月25日　清廷颁布新刑律及暂行章程。

1月26日　学部报奏第二次教育统计年表(光绪34年度)，学校数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五所，学生数一百三十万七百三十九人(《辞书》教育统计表三作一百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九人)。

1月30日　湖北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在武昌黄鹤楼开成立会，选同盟会员蒋翊武为社长。社员以新军为主，达八百余人。

1月31日　孙中山自纽约抵旧金山。

广西南宁驻军谋变，未成。

2月4日　谭人凤应黄兴电邀抵香港，共商联络各省策应广州起义。次日，谭离港赴湘、鄂活动。此外，统筹部又派郑赞臣联络江、浙、皖三省，方君瑛等联络广西。各地同盟会负责人如宋教仁、陈其美、居正、孙武、焦达峰、方声涛等都奉命作响应起义之准备。

2月6日　孙中山自旧金山抵加拿大温哥华。旋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书记许昌发起“洪门筹饷局”(别名“国民救济局”)，在华侨中募款，侨胞募捐踊跃，不少工人慨然捐出一两个月工资。又曾赴鳞多利等埠宣传革命。鳞多利致公堂将堂址房产抵押，得三万港元，汇往香港统筹部。

2月8日　上海协和丝厂女工三百余人反对减发工资罢工。

2月21日　清政府以俄事紧急，命军机大臣、外务部、海军部、度支部、邮传部、军谘处通盘筹划军事。

2月23日　谭人凤奉香港统筹部命抵武汉，与共进会及文学社等联络，策划举事。

2月24日　清廷申谕停止刑讯，革除非刑、私刑。

3月3日　甘肃武威会党起事，清廷命陕甘总督严加镇压。

3月15日　武昌“文学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蒋翊武、王宪章为正副社长，并讨论会务。时入社新军达八百余人。

3月19日　孙中山离温哥华前往美国东部，沿途在加拿大境内各埠演说募款。此次加拿大之行共募集七万余港元，占全球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之首位。

3月22日　清廷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为副总裁。

3月23日　江苏扬州平民抢米。

3月25日　湖北天门饥民十余万人抢米店。

3月31日　湖南同盟会员刘文锦(新军排长)等五十余人在长沙会议，密谋起事(旋以事泄，未成)。

3月　湖南饥民三万余人，聚于岳州、华容、南州(今南县)等处，捣毁厘卡分局。

云南华坪知县抑勒银钱折价，乡民数千人围困县城。

田桐与景定成、续西峰、井勿幕等在北京发刊《北京国光新闻》报(时各省革命志士群集北京，谋实行“中央革命”)。

程家柽等创立《北京国风日报》，专以反对伪立宪及鼓动“中央革命”为宗旨。

同盟会员陈耿夫、李孟哲、黄胃九等在广州创办《人权报》，以“唤起民族思想”为宗旨。此外在广州发刊之《广州平民报》、《广州军国民报》、《广州齐民报》、《广州中原报》，其办报宗旨与《人权报》略同，其编辑人员多属同盟会员。

同盟会菲律宾分会成立。

4月3日　清廷颁全国军队训谕六条：“尽忠节”、“守礼节”、“尚武勇”、“崇信义”、“敦朴素”、“重廉耻”。

4月7日　赏陆军各镇统制官何宗莲、马龙标、吴凤岭、张永成、张彪、徐绍桢、孙道仁、张绍曾、吕本元、孟恩远副都统衔，各协统领官李奎元、王占元、鲍贵卿、卢永祥、陈光远、李纯、许崇智、黎元洪、田中玉、吴介璋、杨善德、蓝天蔚等协都统衔。

4月8日　同盟会革命军统筹部在香港召开重要会议。经数月筹备，已组成一支拥有八百人之“先锋”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亦已大致联络就绪。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于4月13日(阴历三月十五日)在广州举事，分十路进攻，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

同盟会员温生才自行决定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误将广州将军副都统孚琦刺死。此举使广州清军严加戒备，兼以国外饷械尚未到齐，故起义未能如期发动。温生才被捕，15日遇害。

4月9日　清廷从外务部奏，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订立章程，先行开学。

甘肃甘州乡民反对禁烟，聚众三万余人，捣毁城内盐店、统捐局。

4月12日　湖南巡抚杨文鼎奏，湘境铁路，湘人力能自办，无须借款，绅商环请陈奏，请饬部设法维持。

清廷命长江舰队统制萨镇冰、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为海军副都统，赏一等参谋官严复、烟台海军学堂监督郑汝成等协都统衔，命海军部各司长伍光建、李鼎新、蔡廷干及林葆怿、汤廷光等为正参领。

4月13日　黄兴自香港返广州，因清方戒备森严及军械款项尚未到齐，将广州起义时间改为4月26日(旧历3月28日)。

4月16日　清廷从邮传部奏，于吴淞创立商船学校。

4月21日　湖南华容会党联合饥民万余人抢粮，冲入县城。

清廷命赵尔丰署四川总督，王人文(原四川布政命)

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4月23日　黄兴自香港入广州，在小东营5号建立起义指挥部，布置武装起义。

甘肃张掖乡民聚众攻城，毁局围署。

南京下关饥民一千余人抢食品店。

浙江嘉善乡民数千人捣毁学堂、自治公所。

4月24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得知革命党人将起事，调兵防广州，并拟收缴新军枪械。同盟会员胡毅生等拟缓期举义。

4月26日　黄兴决定在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分四路同时起义，并急电香港赵声速令选锋队前来广州。

4月27日　赵声、胡汉民、谭人凤等决定是晚率众由香港乘船赴广州，并电请黄兴暂缓一日起义。

黄兴等举行广州起义，黄率"选锋"队一百二十余人袭击并占领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黄兴等退出督署时误与同盟会员温带雄所率防营冲突，互有伤亡；复与清军巷战，甚为激烈。

4月28日　广州起义军与清军彻夜激战，因其他三路未能同时起义（赵声与在香港之选锋未能在起义时赶至广州；胡毅生与陈炯明借故推托，起义前逃出城外；姚雨平亦因胡毅生刁难，未领到枪械），黄兴所部孤军作战，终被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击败。黄兴负伤后化装逃脱，林时爽、林觉民、方声洞等八十六人死难（事后，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城郊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同盟会决定广州起义时曾通令惠州及广州附近各处于4月28日（三月三十日）响应，届时惠州未动，顺德是日响应。旋为清军所败。

孙中山自加拿大经纽约抵芝加哥。从美国报纸上得知广州起义失败，当晚即致电香港机关部，询问起义失败情况。

4月29日　游美学务处于清华园自建校舍告成，定名清华学校，于是日开始上课。

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会（5月12日闭会）。

川鄂交界建昌地方饥民一万余人，抢豪绅粮。

4月　同盟会广西主盟人刘崛于梧州建立广西分会，加盟入会者有留日学生和士绅，但以当地第二师范学生居多。分会创办《梧江日报》、《广西日报》以开展革命宣传，并建立剧社，编写演出新剧。辛亥革命时领导梧州宣布独立。

5月3日　江苏谘议局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争预算案，全体议员辞职。

广州起义失败消息传至湖北，"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者尚有同盟会员居正及湖南焦达峰等人，会议确定今后应以湖北和湖南为"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

5月4日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唆使给事中石长信上奏："请亟定铁路国有折。"

5月5日　孙中山出席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会议，决心筹集巨款以图再举，会议商定设立名为"革命公司"之筹款机构，动员华侨认购股票，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会后，孙中山还亲自撰写《革命公司缘起》一文。

5月7日　孙中山离芝加哥赴波士顿。

5月8日　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责任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并均为国务大臣，奕劻仍管理外务部。

清廷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设立弼德院，以大学士陆润痒为院长，大学士荣庆为副院长。改军谘处为军谘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

江苏谘议局因争执预算，具呈辞职。清廷诏命不得逾越权限。

5月9日　清廷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奏，宣示铁路政策，干路均归国有（北京至汉口至广州为南干，北京至张家口至恰克图为北干，北京至齐齐哈尔至珲春为东干，自汉口至成都为西干），支路仍归商民量力酌行，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撤销。如有抵抗，即照违制论。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各具奏辞，不准。次日，奕劻再辞，仍不准。

5月10日　武昌"文学社"开代表会议，决定在小朝街85号设立领导机关，并推刘复基住社办公。

5月11日　"文学社"刘复基、王守愚等与"共进会"杨玉如、杨时杰等，在武昌长湖堤筹商合作问题（后均受同盟会中部总会之指挥）。

5月14日　湖南长沙湘路公司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到者万余人，16日，绅学商民各界一万余人往抚辕请愿。

5月16日　长沙铁路工人抗议"铁路国有政策"，举行罢工。

湖南浏阳乡民聚众进城抢米。安化、溆浦、新化、浏阳等县乡民打击官绅富户。新化、溆浦两县署被毁，知县逃跑。

川汉铁路董事局电邮传部请将川汉铁路仍归商办。

5月17日　资政院请开临时会议，将预算借款两事归院会议。清廷不许。

5月18日　清廷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命迅速前往妥筹办理。

5月20日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及川汉铁路借款（即湖汉铁路五厘利息

递还金镑借款)合同,款额一千万镑(先付六百万镑,续付四百万镑),以两湖厘金、盐税等作担保。

5月22日　清廷命停收四川湖南两省铁路租股(按租抽股),其已收之款,由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同该省抚妥拟办法。

清廷以湘省人民反抗铁路国有,命巡抚杨文鼎严行禁止,倘有煽惑,扰害治安,格杀勿论。

湖北施南府各县哥老会闻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起义,酝酿响应。

5月25日　清廷以湖南浏阳人民因米贵暴动,捣毁警察总分各局,命巡抚杨文鼎严厉镇压。

5月27日　川汉铁路公司呈四川总督请电奏收回铁路国有成命。

5月28日　邮政脱离海关,改归邮传部。于北京设立邮政总局,各省会设邮政管理局,各府、州、县、镇、乡分设一、二、三等邮局、支局、邮寄代办所或信柜。邮传部由此直接管理船、路、邮、电四政。

5月31日　湖南巡抚杨文鼎代谘议局呈请湘省铁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清廷严行申饬。

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并公布中央教育会章程十四条(按:中央教育会为中央教育议事机关,辅助学部征集有关全国教育意见)。

加拿大温哥华同盟会成立,推冯自由为支部长。

6月1日　武昌"文学社"开代表会议,正式决定与"共进会"联合并成立阳夏支部。

盛宣怀、端方电王人文,所有川路现存及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川人要求保存现有之款,发还已用之款)。

6月2日　署四川总督王人文代谘议局电奏,铁路改为国有,请饬暂缓接收(5月31日发)。清廷严行申饬。

6月4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孙洪伊、徐佛苏、雷奋、汤化龙、谭延闿、林长民、蒲殿俊等在北京成立"宪友会"(由"帝国统一会"改组),通过章程二十九条,政纲六条,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联责内阁相号召。

6月5日　广东铁路股东反对铁路国有,力争商办。

6月10日　都察院代递谘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臣组织。

张謇自汉口北上路过彰德,晤袁世凯,讨论时事。

6月11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奏,干路收归国有,请从速决定归还股本办法。

立宪派人、川汉铁路公司股东邓孝可,在《蜀报》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文章,痛斥盛宣怀所订借款合同。

6月14日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宗支不宜预政。清廷诏予申饬。

6月15日　因收回粤省铁路,有人倡议抵抗,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领银,牵动省城市面,清廷准张鸣岐向外国银行订借现款五百万两,周转市面,并命认真弹压,有敢作乱者,格杀勿论。

6月16日　广东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反对国有。

6月17日　清廷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回详细办法。

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反对铁路国有,并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不久,四川各府州县相继建立保路同志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

清廷颁示度支部、邮传部会奏之偿还路股办法。

6月18日　孙中山自纽约抵旧金山,旋即向美洲同盟会总会会长李是男、致公总堂首领黄三德等建议,为消除门户之见,两大组织应实行联合,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以便协力筹饷救国。经多次会商后达成协议,双方于是日分别在《少年中国晨报》、《大同日报》上刊登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

6月19日　署川督王人文奏,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丧权辱国太大,请将盛宣怀治罪,然后提出修改,以救危亡。

6月20日　学部奏准中央教育会遵章开会,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为副会长。

6月22日　江西抚州(今临川)乡民四、五千人捣毁积谷绅富家及米店,建昌(今南城县)亦有乡民七、八千人反对绅富屯积米谷,捣毁县署事。

6月23日　清廷宣布内阁属官制。

6月26日　浙江温州饥民捣毁米店。府城罢市。28日又有万人围困厅县,拆毁法庭。

6月28日　湖北宜昌川汉铁路股东联合农民二千余人,捣毁该地铁路公司机器房,宜昌城内罢市。

6月　同盟会员张俞人、郭守毅等在福建永定、上杭间创立军事研究所,借名体育实为训练军事骨干。辛亥革命时于上杭编练民军,光复潮汕、大浦、永定、上杭。

7月3日　清廷颁布资政院改订院章。

7月5日　都察院代奏谘议局联合会"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仍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清廷以朝廷用人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干涉。

7月8日　同盟会员、《新湖南》一书作者杨守仁(笃生),在英国闻广州起义失败,并愤于列强瓜分中国之危机,在利物浦投海自杀,年四十。

7月10日　江西新昌、乐安、永新、兴国等县乡民聚众抢米,捣毁县署。12日抚州饥民亦聚众抢米。

湖南常德、湘阴等地大水。是月,长江流域大水成灾。

7月14日　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四万多工人奋起斗争,湖广总督瑞澂惊呼"兵警弹压为难"。

7月16日　盛宣怀与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经理李

稷勋商以现存租股(七百万两)认办宜昌秭归段,即由邮传部委派李稷勋主持。

7月21日　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亦称国民救济局),由黄三德、李是男等负责。孙中山并为之制定《致公堂筹饷章程》、《革命军筹饷约章》两个文件,广为刊发。文件重申同盟会革命宗旨,号召侨胞"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

王人文代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人上奏,反对举借洋款和铁路国有。清廷命王人文仍遵前旨,倘"别生事端,以该督是问"。

7月24日　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公司订立"收回山东各路矿权合同"。

7月28日　江苏句容县办理垦务,引起乡民反对,8月5日遍发传单,8月8日聚众五六万人拥入城内,焚毁商会、学堂、自治公所、巡警局及天主堂等处,又烧垦牧公司。

7月31日　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鉴于广州之役失败教训,力图将革命注意重心转向长江流域。为此,决定仿行同盟会南方支部办法,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策动机构。是日,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举行成立大会。推宋教仁、谭人凤等为总务干事,并发布宣言。继派居正、焦达峰、范鸿仙、吴永珊(玉章)等分赴湘、鄂、皖、蜀等省设立分会,筹划长江流域革命。

清廷以川人对于路事将于8月4日开会,命川督赵尔丰兼程前进,多派员弁,实力弹压,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

7月　詹大悲在汉口《大江报》上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何海鸣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清政府以此封闭《大江报》,并逮捕詹、何二人。

陶成章与尹志锐、尹维峻等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组织"锐进学社"。

张永福、陈嘉庚等于新加坡创立福建保安会,募款支援福建党人活动。该会于福建光复前后,筹款二十多万汇寄闽省。

陶成章在南洋诸岛组织"光复会"分会。

四川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以作寿为名,集合会员密谋起义,进取成都。

8月5日　上海闸北协和、晋昌、长纶、锦华等丝厂女工联合罢工,反对减工。勤昌、久成两丝厂女工亦响应。总计罢工人数三、四千人,继续十天始复工。

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议,到会者五百余人,选举颜楷、张澜为正副会长。发言者大半主持废约以保路权,对于国有问题则无异议。

8月9日　江亢虎于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不久,又出版《社会星》杂志,标榜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

8月10日　清廷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于永平举行大操,派军谘大臣贝勒载涛总监两军。

8月13日　在黄兴主谋下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炸清水师提督李准,未中。林冠慈当场身殉,陈敬岳被捕(11月7日就义)。

8月17日　孙中山命美洲同盟会总书记林朝汉复函古巴华侨黄鼎之,委任他为当地主盟人。同盟会古巴分会旋即于哈瓦那成立。

8月24日　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及保路同志会,相继举行,倡导商店罢市,学堂罢课,停纳捐税。"会众散未毕,各街关闭市面已过半"。立宪派为防范暴动发生,连夜赶写所谓"保路同志会公启",并刊发光绪牌位,命令每户人家张贴门首,焚香致敬。以此散播"文明争路"。

清政府改设内阁官报,宣布法令。

8月25日　成都及附近各州县举行罢市罢课。成都街衢都搭席棚,供光绪万岁牌,两旁写有光绪帝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居民头戴万岁牌为护符。

清廷以四川铁路股东会议及保路同志会倡导罢课罢市,命赵尔丰严行弹压。

8月27日　四川荣县实行罢课、罢市、停纳税捐、拘留官吏,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主之。

奉天庄河厅潘永忠等抗纳警学各捐,捣毁复州自治议事会,包围厅署。9月10日又聚众三、四千人,反对调查户口、焚毁自治公所,9月15日始停。

8月29日　端方电内阁严劾赵尔丰,主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再行简派川督(昨日曾电盛宣怀主以袁世凯督川)。

湖广总督瑞澂电盛宣怀,允派鄂军入川,并主严旨责成赵尔丰镇压川人。

8月30日　赵尔丰应颜楷、张澜等请,铁路暂归商办,候资政院开会议决。清廷不准。

江苏南通大水。

8月31日　成都成立"官绅联合维持会"。罗纶报告该会宗旨说:"维持者,维持罢市时间无生他变。"

8月　浙江铁路风潮大起,同盟会员夏超、顾乃斌、俞炜等乘机进行革命活动,准备起义。

福建人民反抗"斩捐"捣毁审判厅,焚毁警署。

9月1日　立宪派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上被迫通过"抗粮抗捐"一案。内容有:(1)不纳租税;(2)不买卖田房;(3)不承认国债;(4)自今日起各地成立股东办事处,如清廷仍不允收回成命,则各地办事处即为推行上项决议之机构。

9月2日　孙中山与黄魂苏等从旧金山出发,赴美国北部各埠筹款,截至10月上旬为止,共抵达十余埠。所

到之处，必集会发表演说，论述革命与华侨之切身利害关系，阐释三民主义之革命宗旨，并痛斥保皇派在当地散布之各种谬论。

清廷以四川倡言废约，并有罢市罢课之举，命端方率兵迅速前往，认真查办铁路事宜，并命赵尔丰严厉镇压，迅速解散。

赵尔丰电内阁：川中群情义愤，有人乘机利用，实行改革主义，如不准所请，变生顷刻，全国受其牵动。

9月3日　四川保路会代表白坚、龚焕辰等在香港联合粤人开保路大会，到者近万人。

9月4日　清廷以赵尔丰、玉昆仍请交资政院议决铁路暂归商办，严旨申饬，并命端方酌带兵队，迅速前往(时嘉定、泸州、重庆已相继罢市)。

同盟会刘安邦等二百余人，在长沙密谋联络新军举事。

常昭水灾，难民聚众三万余人起事，连抢绅商。

9月5日　立宪派举行川路股东大会，发布"川人自保商权书"反映立宪派要求"地方自治"之主张。

9月6日　清廷命四川水陆新旧诸军悉归端方调遣。

外务部奏准赎回云南英法隆兴公司矿权。

9月7日　四川争路风潮扩大，赵尔丰以谈判为名诱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保路会会长邓孝可、股东会会长颜楷、张澜、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芳及江三乘、叶秉诚等。同日，成都人民聚众达万人，要求释放邓孝可等，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击毙群众三十二人，受伤数百人，并派兵逼令商民开市。各铺户坚持罢市不屈。

9月8日　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自荣县进攻资州，哥老会首领秦载赓自华阳，侯宝斋自新津迫成都，众至数万，号"同志军"。成都闭城，电报不通。

龙鸣剑等裁成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字句，然后将木板投入河中，顺流飘去，下游各地人民知成都发难消息，纷纷揭竿而起。

9月9日　清廷命湖广总督瑞瀓迅派兵队入川。

四川同志军与清军战于成都城外，清军将校方声涛、程潜、姜登选等应之。崇宁之张达三等亦向郫县进攻。

长沙株州间铁路通车。

9月10日　围攻成都之同志军为清军所败。

度支部饬铸币各分厂，于四国借款未交前，先铸银币一千万元。计字厂四百万元，奉粤两厂各二百万元，鄂川两厂各一百万元。

9月11日　邮传部与英使议妥沪杭甬路废约。

清廷命学部严饬各学堂，约束学生，不准随意出堂干预路事。命民政部、步军统领严禁聚众开会，并将四川代表刘声元押解回籍。

"西藏老练军有二千名"到成都，充实"防卫"。

9月12日　湖北"文学社"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应付新军被调入川之策。

9月14日　清廷以四川省城外聚众数万人，四面围攻，命湖广总督瑞瀓严饬所派赴川军队兼程入川。

赵尔丰连日(自9月8日起)派兵攻剿成都附近及龙泉驿、双流等处民团。

9月15日　清廷起用开缺粤督前任川督岑春煊入川协助端方、赵尔丰办理平变事宜，并命端方速解成都城围。

9月16日　湖北"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积极筹划起义，并成立领导起义之统一机构，公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又推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购手枪，促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举义。

9月18日　上海各船厂木工为增加工资罢工，22日胜利复工。

清廷命贵州巡抚沈瑜庆派兵克期赴川。是日，黔军千余人已向重庆出动。

成都陆续开市、开课。

9月20日　赵尔丰电奏川事办理情形。清廷仍命严饬各军分路剿办，并命端方督率鄂军，迅速进行。

总务税司赫德卒。

9月22日　武昌兵变，旋平。

西安盛传革命党将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9月23日　赵尔丰电奏，成都府属各县，无地不"匪"，各州县纷纷告警，地广兵单，顾此失彼(新津彭山均失。新军协统陈德麟连日与民军战于温江、崇庆、双流、仁寿)。

9月24日　"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机关部举行联合会议，商定首义动员计划，决于中秋节(10月6日)举事(旋又改为阴历8月18日)。

武昌南湖炮兵营革命党人起事，未成。

9月25日　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建立革命政权，由蒲洵任县知事，后改称行政长。

9月26日　四川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率领之南路同志军从成都撤退后，攻占双流、新津等州县。新津聚集起义军达数万人、邛州清军周鸿勋率部反正。从此，新军成为南路之重心，声势远及彭山、青城、眉州等地。

9月27日　王天纵起义军在河南砀山击退清军谢宝胜四次进攻，毙清兵数百人。

端方接收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

9月28日　四川中部城市相继罢市。

9月29日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要求辞职，清廷不许。

9月30日　瑞瀓迭接革命党将在湖北起事之报告

(外务部亦有密电),即调集军队防制,下令戒严。

端方率鄂军抵夔州。

10月1日　英人安格联正式任总税务司。

10月2日　岑春煊自上海抵武昌,不敢前进,称病请开去差使。清廷允其暂缓赴川。

10月3日　黄兴自香港致函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赞同利用蜀路风潮,发动举义。

四川民军胡潭(后改名重义)占领嘉定府(时清军在新津作战不利,灌县汶川亦相继失守)。

武汉加紧戒严。

10月4日　广(州)、九(龙)铁路工竣,通车。

10月5日　黄兴自香港致函旧金山之冯自由,告以蜀路风潮激烈,得居正函告湖北决定举事,不日将赴长江上游会合,请筹巨款。另函居正,陈其美等俟有外款,即当北上。

瑞澂恐武昌革命党人在中秋节起义,命各营提前过节,不准外出。次日特别戒严。

端方率军抵万县。

10月7日　四川东路同志军正副统领秦载赓、王天杰指挥起义军,同清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马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为时十九日,经历大小战斗二十余次,终因器械不良,未能向成都方面推进,决定分兵攻取州县。

清廷以各省管理盐政均"自保藩篱","不能谋国",改盐政处为盐政院,以度支大臣任盐政院大臣。

10月9日　上午八时,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试制炸药,失慎爆炸,长清里总机关暴露。下午五时武昌蒋翊武、刘复基等复悉汉口总机关被破获,决定是夜十二时下令起义。九时,文学社机关部被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翌晨遇害)。武昌山前山后、胭脂巷、黄土坡各机关均遭破坏,武昌、汉口间声息隔绝。是夜举事未成。

端方自四川万县电请增兵。

10月10日　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武昌被害。

清廷以湖北省内接收川粤汉铁路事宜办理迅速,传旨嘉奖瑞澂。

晚九时,武昌新军起义,总督瑞澂、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走。

10月11日　张廷辅、蔡济民等十五人组成谋略处。下午会议决定推黎元洪为都督,成立都督府。

文学社胡玉珍等率新军起义,占领汉阳。

10月12日　民军占汉口。

下午革命党人推定武昌军政府各部人选,立宪派汤化龙任民政长。

清廷诏夺瑞澂职,以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赴鄂,萨镇冰率海军,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同进,向革命党人进攻。

10月14日　诏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

10月15日　革命军占领湖北黄州,次日占领沔阳。

清军马继增开抵汉口江岸。

10月16日　黎元洪在阅马厂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

鄂军都督府组织条例制定,扩大都督府组织。

民军大败清军于刘家庙,清军退至滠口附近。

10月17日　武汉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暂行条例。

荫昌至信阳。萨镇冰率海军至汉口。

10月18日　民军占领宜昌。

汉口各国领事布告严守"中立"。

清廷命各省延期裁撤绿营巡防营。

10月19日　清军复据刘家庙。

10月20日　徐世昌赴彰德与袁世凯密谈。

10月22日　湖南长沙新军起义,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陕西新军会党于省城起义。次日举管带张凤翔为都督署,陕抚钱能训逃走。

10月23日　江西九江新军反正,拥标统马毓宝为都督。

10月24日　民军占领襄阳。

冯国璋督清军袭滠口,民军退守大智门。

10月25日　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广州将军凤山。

10月26日　盛宣怀革职,清廷以唐绍仪为邮传部大臣。

清廷命释放四川被捕绅商蒲殿俊、罗纶等人,罢斥激起事变之官吏,以欺骗人民。

10月27日　清廷召荫昌回京,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赴援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节制调遣。

又命军咨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

清军攻占汉口大智门车站。

10月28日　黄兴抵武昌。

10月29日　山西宣告独立,巡抚陆钟琦被杀,新军举标统阎锡山为都督。

第二镇统制张绍曾与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屯兵乐州,电奏速开国会,选举责任内阁。

10月30日　云南新军杀布政使世增,举蔡锷为都督,总督李经羲出走。

清军攻入汉口玉带门街市。

清廷依资政院奏,下诏罪己。并命资政院起草宪法。

资政院奏亲贵不宜充当国务大臣,请建责任内阁,颁布宪法,速开党禁。

10月31日　江西南昌新军反正,11月2日成立军

政府，举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湖南立宪党煽动兵变，杀焦达峰、陈作新，举谭延闿为都督。

11月1日　清方海军海琛、海容、海筹三人反正。

广东陈炯明、王和顺在归善、博罗两县起义。

内阁总理奕劻辞职，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由彰德南下视师。

11月2日　汉口失守，民军退守汉阳。

张绍曾等复奏申前请，诏复慰勉之。

吴禄贞屯兵石家庄劫运鄂军火，并严劾荫昌。

11月3日　上海工人新军起义。

黄兴于武昌任战时总司令，守汉阳。

清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

11月4日　工人新军占领上海。

上海清海军南琛各舰艇反正。

贵州新军起义，举杨荩诚为都督。

杭州新军起义，囚巡抚增韫，举汤寿潜为都督。

第二十镇管带施从云、王金铭等策动乐州起义，事机泄露失败。

清政府命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

11月5日　江苏独立，拥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清廷准袁世凯令前敌各军停进。

11月6日　清山西巡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死。

诏张绍曾为宣抚大臣，驰赴长江一带，以潘矩楹署第二十镇统制。

清廷开释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

11月7日　广西独立，举巡抚沈秉堃为都督。

上海军政府成立，举陈其美为都督。

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军反正，围攻南京雨花台。

11月8日　林述庆于镇江宣布独立。

安徽独立，举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1月9日　福建新军起义，推统制孙道仁为都督。总督松寿自尽。

广东独立，张鸣岐拒任都督，逃往沙面，施举胡汉民为都督。

黄兴致书袁世凯请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功”。黎元洪电约各省代表，至武昌议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资政院依宪法信条，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0日　镇江清海军各舰艇反正。

11月11日　汤寿潜、陈其美、程德全三都督通电倡议召开各省代表会议。

山东绅商学界开保安联合会，创议独立。

广西改举陆荣廷为都督。

苏浙沪军政府派军会攻南京，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

袁世凯派代表刘承恩、蔡廷斡至武昌议和，不成。

奉天成立保安会，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

11月12日　江西吴介璋辞职，彭程万为都督。

11月13日　西藏兵变，囚驻藏大臣联豫。

山东宣布“独立”，举巡抚孙宝琦为都督。

袁世凯抵京。

11月14日　清廷派张謇、汤寿潜、谭延闿、江春霖、梁鼎芬、赵炳麟各为本籍宣抚使。

清廷准奉天设立保安会。开去蓝天蔚协统领官。

11月15日　安庆扰乱，安徽都督朱家宝逃走，李烈钧为都督。

独立各省代表集于上海，成立各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1月16日　民军自汉阳反攻汉口。

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

吉林建立保安会，举巡抚陈昭常为会长。

11月17日　清第二军总统段祺瑞署湖广总督。

黑龙江成立保安会，巡抚周树模为会长。

11月20日　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并请中央军政府委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代表。

11月21日　江西彭程万辞职，马毓宝为都督。九江军政府取消。

11月22日　重庆独立，张培爵为都督。

11月24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昌，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联络。

11月25日　卢州宣布独立，举刘朝望为都督。

11月26日　奉天新军起义，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

11月27日　四川省城成都独立，举洛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

黄兴辞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去上海。

山东都督前山东巡抚孙宝琦取消独立，撤销临时政府。

清军冯国璋攻陷汉阳。

11月28日　安徽孙毓筠为都督。

署川督端方被新军杀于四川资州。

11月29日　陈雄、高新等组织敢死队，分五路袭北京失败。

11月30日　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公举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

12月1日　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告独立，驱逐清办事大臣三多。

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逃往葛店。

12月2日　民军占领南京。

各省代表议决先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举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委员。又议决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驻汉口英领事出面调停，自是日起停战三日。

12月3日　各省代表会宣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

12月4日　武昌各省代表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驻沪各省代表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12月6日　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以醇亲王退归藩邸。

武汉停战展延三日。

12月7日　清廷准资政院请，官民自由剪发，筹办改用阳历。

清廷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命该大臣委托代表人，赴南方讨论大局。

12月8日　成都兵变都督蒲殿俊逃走，尹昌衡率军入城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

袁世凯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民军议和。

清廷以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罢训练大臣载涛。

12月9日　南北两军续议停战十五日。

各省军政府公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与清方代表议和。

唐绍仪到汉口。

12月12日　烟台光复。

12月14日　各省代表由武汉至南京会议。

12月17日　各省代表复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2月18日　南北议和代表会议于上海英租界市政厅。

任丘、雄县起义失败。耿世昌等多人殉难。

12月20日　停战展延七日。

广东胡汉民随孙中山赴沪，陈炯明代理都督。

山西巡抚张锡率清军复占太原。

12月22日　成都民军诛赵尔丰，收满城军械，川事大定。

孙毓筠就安徽都督职。

张钟端等谋举义于河南省城，不成。

12月25日　孙中山抵沪。

12月28日　据唐绍仪电奏，清廷允开临时国会公决政体。

12月29日　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又议决改用阳历。

12月30日　清廷准袁世凯等奏请，以库空如洗，军饷无著，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

12月31日　双方代表协议展缓停战期十五日。

唐绍仪与伍廷芳策定国会代表四条件。

清军各统制电各亲贵要求军饷。

外　交

1月12日　驻京俄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要求续订1881年条约，提出三十五款（均与蒙古、新疆、东北有关）。

2月4日　外务部命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交涉撤退云南片马英兵。

2月16日　驻京俄使廓索维慈又向外务部提出六条要求，称如不允将采取自由行动。

3月18日　外务部驳复驻京俄使1月12日、2月16日之要求，略谓“中国无不守条约”事，实“俄人时欲扩张而已”。2月25日、3月14日、3月20日俄使又三次胁迫清政府允其侵略要求。

3月20日　英国允撤侵入云南片马英兵。

3月24日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中日邮传部借款合同》，款额一千万元，实收九百五十万元，用以清还京汉铁路借用度支部官款，及还付各路借款本息（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酝酿给清政府贷款，日本拒不参加，并抢先单独给清政府贷款）。

3月27日　外务部完全应允驻京俄使1月12日、2月16日之要求。

4月10日　邮传部与英国大东电线公司及丹麦大北电线公司订立整顿电报电话借款。

4月15日　度支部尚书载泽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五厘递还金镑借款一千万镑（五千万元）。

5月1日　盛宣怀派李维格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订立预借汉冶萍矿砂价值合同。

5月12日　中日订立抚顺烟台煤矿细则。

5月20日　盛宣怀与四国银行订立粤汉铁路六百万镑借款合同。

7月11日　俄分别照会中、美两国政府反对币制实业借款。

7月13日　英、日第三次同盟条约在伦敦签字。规定两国为维护其在东亚及印度之“特殊利益”，实行攻守同盟，为期十年。

7月24日中德订立收回山东各路矿权合同。

9月3日　外务部与英使议定收回滇矿。

9月11日　邮传部与英使议安沪杭甬路废约。

9月21日　外务部照会驻京俄使，已电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将一切新政变通缓办（8月28日俄使晤外务部大臣，欲图干涉蒙古新政）。

9月24日　中日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协定成立。

10月4日　广九铁路通车。

10月16日　清廷与日本订立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

合同。

日商内外棉业株式会社在上海兴建的纱厂正式开工。

10月27日　中法订立度支部与法国资本团为整理中国新财政借款合同。

11月1日　日本改筑安奉铁路成。

11月2日　中日订立安奉铁路国境通车协约及中日朝铁路国境通车章程。

11月26日　日本政府声明出兵北京，“保护侨民”。

12月20日　英、美、德、俄、日、法六国驻沪领事劝告南北双方代表速定和议。

12月22日　日本政府第二次声明出兵赴华“保护侨民”。

12月　中俄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在《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中，已明确规定了我国黑龙江省西部呼伦贝尔地区和俄国的边界线。但沙俄政府多年越界侵占，清政府不得不提出根据前述两个条约，重新勘界立标。是年12月，中俄双方政府代表在齐齐哈尔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这段疆界基本上按照原约，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但后来俄国沿着这条边界线，采取各种手段，侵占了我国大约1400平方公里的领土。

文　教

1月3日　《大江报》在汉口创刊。它是清末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初名《大江白话报》，三日出报一小张；后改名为《大江报》，一日出报两大张。由詹大悲、何海鸣等主办。它是文学社的言论机关，也是文学社的联络机关。创办以后，对宣传、组织新军士兵投入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夏，因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文，于8月1日被清政府勒令停刊。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旋被黎元洪封禁。

3月　《国风日报》在北京创刊。该报由程家柽主办，白逾桓任社长兼总编辑。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激烈抨击袁世凯的反动行径。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该报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揭露其真相。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

5月18日《时事新报》刊行。它的前身是《时事报》和《舆论日报》，1910年两报合并改称《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改本名。由汪仲阁、潘公弼主编。该报初创时，提倡保皇立宪，与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保持密切关系，民国后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后来以编译东西报章，介绍资产阶级学术文化为主要内容。1918年3月4日，增出《学灯》副刊，着重宣传新思潮。青年郭沫若曾在该刊发表大量诗作。五四运动后，该报逐步演变为抵制革命思想的舆论工具。最后成为孔祥熙财阀的喉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8月24日《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刊。王纯根、吴觉迷、陈冷、周瘦鹃、黎烈文、王任叔、卜少夫等曾任主编。初刊载文艺清闲文字，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博君一粲”、“缠绵悱恻”等栏目，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重要阵地。1932年12月改版，由黎烈文接任主编，以文艺“进步与现代化”为编辑方针，内容偏重杂文、短评，成为新文学的阵地。鲁迅曾用40多个笔名发表杂文一百数十篇。1935年10月31日停刊。1938年10月10日复刊。一度由进步作家王任叔(巴人)任主编。1949年5月与《申报》一同终刊。

8月《国光新闻》在北京创刊。它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由田桐、景定成等主办。宣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民国。南北议和后，曾报道宋教仁被刺案真相，与《国风日报》同遭袁世凯查封。

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发刊。它是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前身是湖北官报。由牟鸿勋主办，张樾任主笔。该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正式言论机关报。每日出版。以发表军政府的文件、公告为主，也发表部分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对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宣传不多，实际是共进会直接控制下的言论机关。1912年1月改名为《临时政府公报》，迁南京出版(1912年旧金山《大同日报》改组后也称《中华民国公报》)。

本年世界书局在上海创办。它是由沈知方主办的，总办事处设在福州路，主要出版学术专著、中小学教科书和杂志，也翻印古籍。1934年因经费困难，求援于世界社。后由张静江任董事长，吴稚晖、李石曾分任董事、监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书局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2年

导　言

一九一二年是在一片混乱中到来的。并不是因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换来了全国性的革命成功。在几方面的不同人士勾心斗角中，权力的争夺和更迭构成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最精彩的一幕。

十六年来不断流亡异乡，在海外奋战不已的孙中山，终于踏上了祖国大地，然而这还远不到欢庆胜利的时刻。革命成功了，建设新政府，构筑新国体成为他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毋庸多言，妥协已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南京也只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孙中山也成了一位临时大总统。

二千多年了，中国一直在封建专制的皇权下苦苦挣扎；二百多年了，人民生活在满族统治之下。“驱除鞑虏”终于成为眼见的现实，相信能经过这个年代的人终生都会庆幸不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太祖、太宗的赫赫武功已不复有再，康乾盛世也已成了昨日黄花，幼儿寡母在袁世凯软硬兼施下，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正式诏书，清朝大厦轰然崩坍。

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耍尽手法，终于被许可在北京任职。袁记北京政府堂而皇之地成立了，袁世凯多年的野心也终于可在此时一快，“中国华盛顿”之称顿时风行海内外，但是又可以欺蒙多久呢？

民国的称号还没有焐热，革命者就开始了悲惨之旅。张振武，武昌首义功臣之一，连革命果实还没有沾到边，就遭到了杀害。然而，现在的革命党们，已经把一腔热情都用尽了，只剩了争权夺利的心。张振武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仅仅是个开始，就已经显示出纷乱的迹象。唐、陆、赵走马灯一般，让人目不暇接，然而这只是形势，真正的操纵者正在幕后冷眼看着自己导演的一幕幕闹剧，不动声色。

《临时约法》的颁布和责任内阁成立，确实使一些人产生了天真的幻想，宋教仁便是最起劲的一个。他确想当总理，是故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为了在议会中拉到多数票。然而，很快他便将明白何谓中国政治，不过太晚了一些。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南京临时政府
- ●清帝退位
- ●袁记北京政府成立
- ●张振武案
- ●民国初年内阁的更迭
- ●国民党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

背景介绍

辛亥革命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于1911年12月3日在汉口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临时政府仿美总统制，以临时大总统掌握全国行政。1912年1月3日，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孙中山关于中央行政设立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9部及其权限提案，以及黄兴、伍廷芳等9名国务员入选名单。接着又委任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并委任各部次长。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具有主要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1月28日，成立临时参议院，执行议会职权，先后公布了一系列重要法案和除旧布新的政令。1913年10月，袁世凯迫使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改组国务院，临时政府结束。

材料：

- ·沪鄂之争
- ·元帅之争
- ·临时大总统
- ·永远的辉煌

材料一　沪鄂之争

两个集团在武昌和上海同时开始了筹组中央政权的活动。十一月九日武昌集团由黎元洪向独立省市发出通电，让他们拟制各部部长名单，并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同时请宋教仁等草拟“中华民国约法”，研究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上海集团本来准备抢先在上海建立一个各省联合机构，但因一时推不出向各省发电的领导人，结果比武昌晚了一步。十一月十一日他们变换方式，改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要求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筹组中央政府。

就当时的局势而论，武昌集团是有首义地区，黄兴、宋教仁都在这里，其号召力就优于上海集团。上海集团在第二次会议上只好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同意由湖北都督府行使中央政务，但上海交通便利，人员聚集，筹组中央政府代表会议应在上海召开。武昌集团得知这一方案后，群起反对，他们提出“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应在政府所在地，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并派代表前往上海磋商。上海集团只得暂时退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会决定同意武昌方面的意见，各省除留一名代表在上海作对外联络工作外，全部到武昌集合，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11月底至12月初，鄂、湘、闽、鲁、苏、皖、桂、直、豫、浙、川等十一省代表23人陆续到达武汉。恰值汉阳失陷，武昌危急，因此，代表会只好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内举行。11月30日开第一次会，举谭人凤为议长。会议开至12月10日，主要议决了以下事项：

（一）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四章二十一条；

（二）同意停战三日，期满续停战十五日；接受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与黎元洪或黎的代表进行和谈；

（三）议决和谈条件：1.推倒满洲政府；2.主张共和政体，3.礼遇旧皇室，4.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

但是，正当这些代表在汉口争权夺利的时候，十二月二日苏浙联军攻下了南京。南京的光复，与汉阳的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海集团感到他们战果辉煌，神气十足；武昌集团感到他们在炮火之中，有点气馁。陈其美立即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大造舆论，说汉阳失守，武昌危在旦夕，中央政府万不能设于武昌。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也深为武汉的安全担忧，于是同意了陈其美的意见，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在七天内齐集南京，一旦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达南京，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国都问题至此方告解决。

（摘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材料二　元帅之争

南京一被攻下，陈其美即于十二月四日将原来留在上海作对外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并请来在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举行都督府代表会议，以军队各部分散、亟须统一为理由，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黎元洪一伙获悉后，立即通电，反对黄兴当大元帅，要求上海集团“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同时又派孙武携带巨资，到上海组织民社，谋取权位，但“黄兴等均置之不理”。“适刘成禺以私事恨黄兴，于是孙刘结为一气，事事以反对黄兴雪恨。”在上海的一些人也反对黄兴当大元帅，章太炎声称：“克强功虽高，已受黎都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程德全的部将章驾时也大嚷：“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黄兴何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黄兴闻之不快，要让元帅与程德全，程坚辞不敢接受。黄兴毕竟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导人，许多革命党人和广大士兵群众要求选他作大元帅。十二月十日各省代表到达南京，十六日正式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恰在这时，袁世凯通过唐绍仪在南京表示袁就要“反正”，拥护共和。于是与会代表决议暂不选举临时大总统，把这一位置留给袁世凯，并承认上海集团举黄兴为大元帅的决定，还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上加上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这一决定，把临时大总统拱手送给袁世凯，博得了立宪派、旧官僚的赞同。但苏浙联军的一些将领决意不受“汉阳败将”黄兴的领导。黄兴也致电南京，力辞不就大元帅职。于是十二月十七日又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难离武昌，由副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黄兴当副元帅的消息传出后，“一时党人意气以大元帅降为副元帅为奇耻之辱，有在代表会跳嚷大叫者，忽迁怒于未独立之北方各省代表，目为汉奸或袁党，甚至以手枪拟之。其实未独立之北方各省代表固未尝敢有所主张也。”但革命党人这样抗争，并没能扭转大局。恰在这时得到了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黄兴认为“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于是他决意在上海等待孙中山的到来。这样，元帅的风波也就平息了。

（摘自《中国近代史新编》苑书义）

材料三　临时大总统

12 月 21 日，孙中山返抵香港，与廖仲恺、胡汉民等商讨革命大计。他拒绝了胡等提出的在粤组织武装进图全国的建议，并开导他们说：“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他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因此孙中山路经故乡而不入，赶往当时政治斗争中心上海。他坚定地表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自觉地把组建中央革命政权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

12 月 25 日，在“南北和谈”和组建临时政府的重要时刻，风尘仆仆的孙中山抵达上海。

本来，不管是在“议和”还是“推袁”的问题上，是在幕前还是幕后，起支配作用的都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和投机应变的旧官僚；在新政权的组建过程中，同样也被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所左右。自孙中山回国后，由于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由于他力排妥协论调，注意整顿同盟会，毅然承担建立革命政权的重任，从而使日趋分裂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比较坚定的领导核心，增强了同反动势力抗争的勇气，因而得以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压下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气焰，基本上控驭了组建工作的进程。

12 月 29 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出席的有苏、浙、鄂、湘、川、滇、晋、陕、皖、赣、闽、粤、桂、奉、直、豫、鲁等十七省近五十名代表，华侨归国革命党人代表也列席大会。上午九时，正式投票选举，每省一票。结果，除浙江外，其余十六省十六票均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消息在当天就传到上海，正在出席同盟会欢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心情分外激动，在黄兴的带领下，全场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共享得来不易的胜利欢乐。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四　永远的辉煌

各省代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详见表），决定采用阳历，以一九一二年为国民元年。

南京临时政府组织成员简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四月一日）

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
临时副总统		黎元洪
外交部	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祖
陆军部	总长	黄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部	总长	黄钟英
	次长	汤芗铭
内务部	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正
财政部	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洪猷
司法部	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部	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部	总长	张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部	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参谋本部	总长	黄兴
	次长	钮永建
秘书处	秘书长	胡汉民
	总务组	李肇甫　熊成章　肖友梅　任鸿隽
	军事组	李书城　耿伯钊　码瑛　张通典
	外交组	马素　张季鸾　邓家彦
	民事组	但焘　彭素民　廖炎
	电务组	谭熙鸿　李骏　刘鞠可　黄芸苏
	官报组	冯自由　易廷熹
	收发组	杨铨
法制局长		宋教仁
印铸局长		黄复生

（摘自《辛亥革命》中华书局）

清帝退位

背景介绍

袁世凯早就看准了帝国主义已经厌弃了日暮途穷的清王朝，而把稳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因此，还在他被载沣撵逐之前就已怀有“不臣之心”。“武昌事起，举朝皇皇，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他重新登台之初，“其左右亲昵即有以利用机会，取清室而代之之私议。”

随着形势的变化，革命派内部日益分化，妥协的倾向普遍增长，“一般党人，每思利用项城，以推翻清室”，黄兴、宋教仁等主张对袁世凯退让。一些同盟会的右翼分子也和立宪派、旧官僚一鼻孔出气，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攻击孙中山“理想太高”，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伍廷芳不断打电报给孙中山，说袁世凯不久就要反正，北伐各军万勿进击，以免和议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一月十五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

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接着，幕后进行议和的南北双方又达成了协议：只要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解去临时大总统职，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并拟定了一个清帝退位优待条件。袁世凯得到了南方这一保证，于是转过头来，开始逼宫。

为了帮助袁世凯"逼宫"，帝国主义指使在华各口岸的外国商会出面，向清廷施加压力。1月16日，朱尔典报告葛雷说："外国舆论已被用来为促进(清帝)退位运动而服务，我们已使各个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会懂得，它们对于目前这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以及它使贸易遭致损失的情形，如果提出它们的意见，并且暗示朝廷，劝其采取这样一些妥协的措施，以便满足广大人民的希望，这将使退位一事的实现，成为轻而易举。"于是，首先由上海外国商会于1月12日致电袁世凯、载沣和奕劻，声称：清廷"按照条约所载，担任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业已失此地位，而不能尽保护之责"。而"现在全国人民大部分之思想，以共和为目的，且既声明反对专制政体，总须能偿其所愿望"。因此要求载沣、奕劻等"迅速转致宫廷并各皇族，立刻设法俯顺舆情。"汉口、香港等地的外国商会，也向清廷发出了类似的电报——催命书。

材料：

- 连蒙带骗
- 无可奈何花落去

材料一　连蒙带骗

早在一月三日遵照袁世凯的旨意，姜桂题、冯国璋等数十名北洋将领借口对南方革命军开战，通电劝王公大臣输财助军，强硬地指出，若不出钱助军，"非但财不能保，杀身之祸，且在目前。"这些王公大臣家中虽然金银堆积如山，但要拿出一分一厘比割他的肉还疼。结果"应者寥寥"，袁世凯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清廷挖出了八万两黄金。袁世凯这一招，一方面使王公大臣深感革命军强大，清朝旦夕可亡，因而惶恐不安；另一方面也察觉到袁世凯忠于清室的表白是骗人耳目。这更使一些皇族亲贵如良弼、铁良等认清了袁世凯奸雄的本来面目，立即筹组"宗社党"，决心反对共和，与南方革命军拚一死战，并要除掉清室之奸臣袁世凯。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觉得唯一办法是用革命来压迫清廷妥协，于是他到处散布革命党力量强大，连北京城里也革命党四布。恰在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等人痛恨袁世凯操纵和谈、扼杀革命，预先持枪携弹藏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待袁入朝走到东华门时击杀之。但这次袭击没能打死袁世凯，却意外地帮了袁世凯的忙。其一、证明了袁的革命党潜伏京师的谎言，使王公亲贵惶惶不可终日；其二、使清廷感到袁世凯仍是忠于清室的，否则革命党不会暗杀他；其三、袁本来不想自己出头露面前去逼宫，这正好有了托辞，于是借口养病，派心腹赵秉钧、胡惟德进宫逼皇帝退位。一月十七、十八日清廷两次召开御前会议，许多年青的皇族亲贵坚决反对退位，一班老奸巨猾的老官僚默不作声，会议毫无结果。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谓革军势大，徐州已失，长此下去，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仍然坚持召集国会解决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政体问题，"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予决"。

从1月17日开始的御前会议，是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进行的。被袁世凯收买的贝子溥伦在首次会议中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而让袁世凯为总统的主张，并说："事若果成，岂但中国之幸，抑亦皇室之福"。奕劻也为袁世凯作说客，说除了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外，别无其它安全办法。溥伟(恭亲王)、载泽等表示反对。已经感到覆灭前的恐惧的隆裕，伏在案上抱着宣统皇帝边听边哭。双方驳诘甚久，无结果而散。次日再议，仍无结果。

19日，袁世凯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为内阁代表，邀集载沣、奕劻及其他满蒙王公亲贵来内阁会议。会上除溥伟重弹"痛剿"的老调外，其余"群臣中无一人"敢于公开站在溥伟一边。外务大臣胡惟德和赵、梁等乃联衔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隆裕遂于这一天再一次召集御前会议，袁世凯内阁仍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出席与议。胡、赵、梁等正式提出了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之议，却受到与会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连溥伦亦因受到溥伟一伙的威胁而站到了其他王公亲贵一边。胡、赵、梁等虽以内阁总辞职相胁，但会议又无结果而散。

材料二　无可奈何花落去

1月20日，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促清帝下台。所谓"宗社党"也加紧排袁，托名致书袁世凯，声言要与袁"同归澌灭"，甚至公然"创议南北分立"。有些蒙古封建王公且回归本旗，图谋武装反抗。一时北京空气十分紧张。在22日隆裕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奕劻避不出席，与会的载沣、溥伟、善耆、载涛、毓朗、载泽等亲贵和一些蒙古王公则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又只好伏案痛嚣。亲贵们复群起参劾奕劻误国，主张任冯国璋为将，率兵镇压"乱党"。倒是隆裕明白自己并无力量，不敢贸然答应。她胆怯地对亲贵们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事实上，亲贵们也都知道，冯国璋虽然主战，但毕竟也是袁世凯的忠实徒党，不可能真正效忠"大

清”。主战最力的溥伟于是就请隆裕“赏兵”，说他“情愿杀贼报国”。并转询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却含糊其词地答称：“奴才没打过仗，不知道。”隆裕知道，这些昏聩无能的亲贵们，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冒失话”，如果照此实行只能所局面弄得更坏。但她又不愿自动退位，因而就采纳溥伟提出的仍由“国会解决”的主张，于24日谕令袁内阁与南方筹商实际已被搁置的“国会”召集问题，借以拖延时日。

袁世凯见清廷仍未同意退位，就向隆裕复奏：“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预决”，实即以取消优待条件进行威胁。同时又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动用北洋武力。1月26日，前不久还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等50名北洋将领，根据袁世凯的授意，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及王公大臣，极言局势万分危急，如“政体仍待国会公决”而再迁延不决，即“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强硬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不得为“一、二亲贵所尼”。甚至过去被王公亲贵视为“股肱之寄”的毅军统领姜桂题，也与数十名北洋将领联名致书王公大臣，要他们交出多年搜刮来的百万家财充作军用；否则，“非但财不能保，杀身之祸且在目前。”于是，那些爱财而又惜命的王公亲贵们“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就连良弼这个所谓“宗社党”的死硬分子，也不得不承认：“现在除共和无别路”。

袁世凯这一着，不仅镇住了王公亲贵，而且也吓煞了皇太后——隆裕。当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入朝报告段祺瑞等的电奏时，隆裕哭着说：“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自此以后，隆裕彻底向逼宫的袁世凯屈服。

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彭家珍炸毙良弼的事件。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认为除掉良弼这个“宗社党”的骨干，“便可导致共和，使人民安居乐业”。于1月26日乘良弼返归私宅时，在其门前投掷炸弹。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受重伤亦于两天后毙命。皇族亲贵色厉内荏，纷纷逃离北京，潜居青岛、大连、天津等地的租界中。袁世凯乘此时机更为加紧逼胁清帝退位。

1月30日，隆裕再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到会的王公亲贵除了为袁帮腔而外，都支吾其词，再无一人敢于公开反对退位。隆裕知大势已去，愤然说：“你们不过是要我一人承担罢了”!随令罢会，让袁内阁准备宣布共和的诏旨。2月3日，隆裕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酌退位条件。

2月11日，隆裕也认可了优待条件，决定清帝退位。12日，她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举行这个封建王朝最后一次的朝见仪礼——也是它入土前的葬礼。承袭遗产的袁世凯仍未入朝，由他委派的代表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带同内阁成员走入阴森森的养心殿，向面容凄惨的隆裕和溥仪行首次改用的三鞠躬礼。随即由内监将最后的三道诏书放在隆裕面前。隆裕看了几行，就噙着泪珠站了起来，亲自将退位诏书交给胡惟德，使布告全国。想到清皇朝从此寿终正寝，这个末代皇太后不禁掩面抽泣。爱新觉罗家族的最后一次朝仪，连同这个王朝本身，就这样草草宣告终结。

（摘自《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袁记北京政府成立

背景介绍

二月十四日孙中山放弃了待各国承认临时政府方能辞职的条件，向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在咨文中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从此帝制永不留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业已达到。”“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二月十五日参议院召开临时总统选举会，到会有十七省代表，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当天，参议院就致电袁世凯，告诉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吹捧他为“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材料：

- 迁都之争
- 袁记政府

材料一　迁都之争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但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要袁世凯履行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袁世凯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其中第一、二项是“调虎离山”，企图使袁世凯离开北京的老巢；第三项是给袁世凯以法律上的约束。孙中山想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于孙中山的用意，富于反革命经验的袁世凯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到孙中山提出的遵守临时约法问题，是将来的事，而建都问题，需要马上实行，必须力争。帝国主义列强完全支持袁世凯，拚命反对建都南京，这是因为它们在北京享有驻兵

权，在东交民巷有一个“独立王国”，迁都南京就意味着削弱它们在华统治实力。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袁世凯表面上表示“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勉尽公仆义务”，暗中却按照张謇的计谋，“一从北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京数省人民着手”以“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稍有动静，牵涉各国相威胁，拒绝南下。”因为北京是旧势力的巢穴，北洋军阀的根据地，袁世凯离开北方，无疑是离群索居，无根无蒂，无所施其谋。

袁世凯是绝不肯远离北洋军阀巢穴而南下就职的。他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编造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时来警告。内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孙中山对此并不以为然，仍电催袁南下就职。袁世凯恼羞成怒，致电南京：“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为袁世凯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一再坚持“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2月18日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宋教仁、汪精卫等八名欢迎员前往北京“专迎大驾”。

袁世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27日，当蔡元培等一行九人抵达北京时，袁世凯表面上极其隆重的礼节迎接专使，慨然应诺南下就职，并假意编造了一个经由武汉的南下路线，骗取蔡元培等人的信任，暗地里却采取段芝贵的计谋，唆使曹锟等发动“兵变”，故意挑起列强干涉的严重形势，恐吓南京临时政府和迎袁专使。

29日晚，正当蔡元培等在议事时，突然间枪声大作，火光烛天，北洋第三镇士兵变乱，将沿街店铺抢掠一空，毁为废墟，并闯入迎袁专使住所，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接着，天津、保定的北洋驻军也齐声哗变，大肆焚掠，洗动一空。“四街各处繁盛皆成焦土”，“啼饥号寒之声比户皆是”。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又一次退却。上海《申报》、《时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孙中山“迅赐协商允妥，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立国都，以期南北统一，列邦早日承认”。蔡元培也呼恳：“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在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让步，提请参议院通过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

材料二　袁记政府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孙中山调虎离山计的破产。但孙中山仍坚持用三项条件的第三项即以《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的次日，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分七章、五十六条，是一个资产阶级宪法性的文件。它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采取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学说，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袁世凯对《临时约法》暂不反对，但对北京政府的组织人选却极为重视。袁任临时大总统后，许多革命党人致电反对，有不少革命党人对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提出质问，也有些革命党人还想亡羊补牢，极力主张由孙中山来组织责任内阁。对此袁世凯一伙极为不安。这时，赵凤昌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说：“在双方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之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名单，请参议员投票。在讨论此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凤昌是官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觉得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凤昌便开口说：‘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备诸君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桥梁，所以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的话音刚落，“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

三月二十五日唐绍仪公布的新内阁名单是：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总长陈其美，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庞惠，交通总长施肇基。乍看起来，内阁中同盟会员占多数，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还有内阁总理唐绍仪，而属于袁党的只有段祺瑞、赵秉钧、刘冠雄，熊希龄是立宪党，陆征祥、施肇基是无党派，但是实际上熊希龄、陆征祥、施肇基业已投靠袁世凯，袁世凯掌握着军事、外交、内务、财政、交通等要害部门，真正的同盟会员只占有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冷衙门”。四月一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四月五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百天就为北京临时政府所取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转眼之间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

张振武案

背景介绍

黎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的。他在故纸堆中找到一个会做骈体文章的腐儒饶汉祥做他的机要秘书。此时南北和议虽已告成，但是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存在着招兵买马、杀气腾腾的紧张状态，使人民感到战争的痛苦和战争的威胁。这个腐儒经常地代黎写出些"吁请息争以苏民困"的骈文长电，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或者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一些四六排联的字句，说上一大套"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废话，最后则用"垂涕而道"、"泥首以请"等沉痛语调作为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些文章与很多人厌恶战争的苟安心理完全合拍，特别是与满足于推翻清政府统治而对继续流血非常害怕的的革命妥协派的心理完全合拍。这些人并不仔细地研究电文的内容，甚至连文章也没有看或者看不懂，却都异口同声地叫好说："黎副总统说得真对，我们就是不要战争呀！"

声誉虽然日隆，黎的内心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自己知道他这个"民国元勋"是逼上梁山弄到手的，而逼迫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武很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尽管别人把他捧上三十三天，在三武看起来却是个渺不足道的人物。三武对他也很不礼貌，认为他的天下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因此，黎在精神上经常地感到威胁，想把这批恃功而骄的革命分子调出来，推荐到中央去任职。

在三武之中他所最恨的是张振武。他介绍张振武到北京去见袁，并说中央将畀以重要的职务。当张振武带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十三人动身往北京的时候，他就打密电给袁，加张振武、方维两个人以"煽惑军队"的罪名，请即"就地正法"。这是"调虎离山"和"借刀杀人"的双重诡计。这个"忠厚长者"也仿照袁的榜样，玩弄政治阴谋以达其铲除异己的目的。

袁接到这个电报，八月十日不露声色地设宴招待张振武等一行。从十一日到十三日，又令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轮流设宴，命宿将姜桂题等召集军界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十三日黎又打来一个万急密电请求提前处决。张振武等完全睡在鼓里，十四日还假座六国饭店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重要人员。十五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和同来的湖北将校突然被军警捕去，当天就由著名的刽子手、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天判决张、方二人的死刑，当天执行枪毙。

黎的本心是要袁替他担负责任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袁并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张、方两个人的罪状中把黎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录了进去。很明白，袁是惯于以别人为工具的阴谋家，绝对不肯代人受过，岂肯把这笔血债写在自己的帐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他要揭穿这个问题的内幕，使黎与同盟会的关系趋于恶化，而把黎逼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是要揭破黎的政治阴谋，使全国人民了然于那个"忠厚长者"的毒辣手段，并不在他这个"一代枭雄"之下。

同盟会对这样一个严重政治问题不能熟视无睹。首先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参议院议员张伯烈等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提出张、方二人的谋乱证据来。

还有两个武——孙武和蒋翊武——都早已到北京来了。十七日他们跑去会见袁，口口声声要求给他们"免死券"。

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违法杀人的大血案。但是，君主立宪派以及其他各政党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同盟会与袁、黎之间的一个争端，竟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同盟会本身没有决心和勇气对袁黎进行坚决斗争，也表现了虎头蛇尾的态度。

材料：

- 枪毙张振武、方维之惨案
- 参议员张伯烈等质问袁政府枪杀张振武案

材料一　枪毙张振武、方维之惨案

北京特派员函

八月十五日夜，京畿军政执法处枪毙湖北起义首功张振武、方维一案，兹将其情形详记于下：

发生之原动力　张振武本系民社发起人，现在共和党干事也。当发起民社后，与孙武意见不洽，屡起冲突，至成仇雠。孙系阴险派，张系激烈派，孙事事迎合黎元洪，颇得黎氏欢心；张自恃起义首功，轻视黎氏，时时谩骂之，黎对于张，外示牢笼，内实猜疑。此次派张来京，谒见大总统，筹画边事，实孙武密谋为借刀杀人之计。盖张在湖北颇有势力，不易下手也。

袁总统之迟疑　张系八月十号抵京，十一日黎请正法之电即到袁总统以原电"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当即复电，拟为之设法调停。十三日黎又来第二电，谓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袁尚踌躇未决。十五日晚五钟，孙武及黎之秘书饶毕生来京，谒大总统，密谈一小时，至九钟，而捕人之命令下矣。黎第一电十一即已到京，张振武十四尚谒见大总统，并在德国饭店约集同盟会、共和党重

要人物及各报馆记者宴饮，力主调和党派，直迟至十五日，始实行捕拿，盖此四日中电文往返磋商，未遽发表。大总统军令中所宣布者，不过黎之第一电，其第二次电，类于私交，总统力守秘密，不欲宣布，故外间知之者甚少也。

捕拿时之严密　大总统命令下后，由拱卫军会同步军统领衙门之旗兵，先将西河沿金台旅馆密围，于内搜拿张振武。时张已赴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晚餐未归，即将随员方维及同来鄂军将校十三人一并反缚，军士露刃，用车拉至孙公园玉皇庙京畿陆军执法处分局，因系在城外抓获，就近送交分局，不解往城内也。又恐张振武闻风逃走，遂将正阳门关闭，所有前门大街、骡马市、孙公园一带，均断绝交通，军警布满，如临大敌。一面在东交民巷西口外，密布军警，因六国饭店在使馆界内，不便直拿。至十时后，张乘马车出东交民巷，来至棋盘街，由军警抓获，拥至西单牌楼京畿军政执法处，张尚不知其究竟也。

枪毙时之惨状　张到执法处后，由执法总长陆建章接见，陆出黎副总统之电，令张阅看。张言电恐不真，陆答真伪不得知，所据者大总统之军令耳。张又言："余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不过余即有罪，应开军法会审，并要湖北交出证据，不能凭空杀人。"陆答以大总统军令只有正法字样，并未令审讯，此事余亦知未免野蛮，为足下代抱不平，然实无可如何，足下尚有家事须处分者，如向余言，余必代为转达。张索纸笔拟作一家信，执笔良久，不成一字，遂对陆言："信可不写，可速处死。"当由兵队拥至西院，缚其两手于木桩上。张尚对兵士曰："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言毕，即由兵士放枪，两枪均未中，第三枪始洞穿其胸口而死，时十五夜一钟也。方维同时在南城外玉皇阁被枪毙，临死时大哭不止，并骂张振武不为营救，因不知张已遭逮捕。闻方系湖北将练(校)团团长，亦去年起义时之首功也。

枪毙后之情形　是夜三钟后，共和党员刘成禺、总统府军事参谋官哈汉章，均往执法处营救。至彼处，张已陈尸于偏院，哈抚尸痛哭，刘则大骂袁世凯不止。不期孙武亦至，见哈痛哭，不发一言，其实一种得意之色，溢于眉宇。刘遂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之可言！"孙知其讽已也，鼠窜而去。

(《民立报》1912年8月21日)

材料二　参议员张伯烈等质问袁政府枪杀张振武案

张振武者，武昌起义首功之一人也，毅勇坚诚，出谋定难，勋绩昭著，海内同声。乃本月十六日，忽见政府揭有将张振武正法一示，所列罪状，不一而足。然按之法律，揆诸事实，则有令人骇异者。倘不据实宣布，恐天下闻之，惊疑群起，影响所及，大局攸关。兹据《约法》第十九条九项，提出质问如左，请即咨送政府，迅予答复，以释群疑而彰法纪。

一、质问张振武赴沪购枪吞蚀巨款之罪。当武汉战事吃紧之际，军火缺乏，伊时黎副总统特派张振武赴沪购办，盖以振武廉干可恃也。其中有无吞蚀情弊，固非局外人所能臆断。但振武自沪回鄂时，已由都督会同军政各界，开特别会议，将其经手之款，根据清单，逐一核销，当时并无异言。姑无论民国首功，义当保全，即使罪不容逭，亦宜即时惩办，始足警一戒百。乃事逾数月，忽翻前案，死者含冤，闻者酸鼻。此不可解者一也。

二、质问张振武武昌二次蠢动乘机思逞之罪。武昌二次蠢动，原系少数军人被京、汉、保及苏州兵变之影响，意图劫财之所为。是时振武甫自沪归，改任都督府高等顾问，闻此警耗，即奔走各处，晓以大义，始未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妇孺犹能言之，何以谓为乘机思逞?况据黎副总统此次来电，有"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云云，是将校团之人员，显与蠢动无关。而今与张振武同杀之方维，即将校团团长，凡属团员，莫不感服。既谓团员深明大义，则团长之督率有方可知。振武曾副长军部，嘉而善之，岂得为罪。乃剪诩如彼，杀戮如此，行背乎言，何以服人！此不可解者二也。

三、质问张振武近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之罪。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帖然，洎后编余散兵，被裁游卒，小有滋扰，旋经弹压，得以无事，初无所谓土匪，更何所谓勾结。且振武军官一职，解任已久，其于各营士兵，既无统带之权，安有操纵之术，谓为蛊惑，究何证据?凡天下事，必有事实发生，而后有罪案可定，腹诽莫须，岂能见于今日！至振武此次在鄂革命，为满清政府言之，诚属狼子野心，昌谋不轨。然铲除专制之淫威者，即系造共和之幸福，谓振武破坏专制则可，破坏共和则不可。不然，当其起义之日，敦请副总统出而视事，果何为者?改称中华民国，又果何为者?况此次入都，曾席请各党贤杰，消除党见，其维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闻、有目共睹。乃竟谓其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不知所指土匪者为何人? 所谓破坏者为何事? 此不可解者三也。

四、质问张振武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之罪。张振武前次奉调入都，大总统命其调查蒙古屯垦，固属任材录功，为事择人。但国家设官，原贵审实，请款设局，亦办法中所应用，然准否之权，固非彼所自操，此而为罪，致罗刑辟，则盈廷衮衮，谁宜生者。乃竟谓其飞扬跋扈，贯胸以死，此不可解者四也。

五、质问张振武冒政党藉报馆之罪。原电谓张振武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藉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试问共和国家，主权全在人民，非《约法》所明定者乎?不行政党政治，人民之意力何从表现，言论自由，亦系《约法》明定，报馆之臧否，自有法定之权，此而为罪，则

今之政党诸人及姓名之在报纸者，多于繁星，试问政府将任之乎？抑聚而歼之乎？即以副总统而言，既为共和党之理事长，又为同盟会之协理、统一党之名誉理事，其姓字之见诸报纸者，与张振武孰多？试检全国报纸而统计之，当可得数字上之证明，试问政府亦将执而杀之乎？抑舍之乎？又试问黎副总统于人则入之罪而杀之，于已则居之不疑，果又何说？此不可解者五也。

连署者：张伯烈、李国珍、林翰、张华澜、周瀚、刘成禺、田骏丰、战云霁、彭占元、俞道暄、郑万瞻、陈鸿钧、王树声、喜山、胡璧城、时功久、卢士模、曹玉德、李榘、顾视高。

（《民立报》1912 年 8 月 25、26 日）

民国初年内阁更迭

背景介绍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唐被派为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时，没有完全遵照袁的意见办事，曾经引起袁的不满并被撤回。但是，南北和议成立以后，袁急于要加强与帝国主义首先是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又要在形式上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内阁总理人选没有比唐绍仪更为适宜的人物。因此，唐得以组织民国的第一任内阁。

不料这位美国通是资产阶级型的官僚，与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区别。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责任内阁”这类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顺的走狗，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地不向袁请示而自行处理。他又以南北间的桥梁自居，不肯完全站在袁的一面。这些情形与袁利用他作为私人工具的意图完全相反。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又从旁挑拨，硬说唐与孙中山因同乡的关系结合得很紧，“他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而不倾向总统了”。当唐出进总统府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员又相互做怪脸，指着唐的背影子低声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这些话都已钻进到唐的耳朵里。唐总以为袁不致被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一天，唐又到总统府报告一些问题，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听了大为吃惊，才明白袁的确对他存有芥蒂了。

唐总理出走后，属于同盟会的四个阁员（工商总长陈其美从来未就职，次长王正廷改代理为署理）连带辞职，施肇基、熊希龄也跟着辞职，而属于袁系的阁员，则全部坐在位子上不动，这也是内阁制的一种怪现象。此时袁还不利于与同盟会立即决裂，所以他伪装诚恳挽留的样子，对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其余三个阁员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

内阁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袁世凯作临时总统后第一次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的政治重大事件。但是，临时参议院对此不加重视，各报和各政治派别有对唐冷潮热讽说他“不忍小忿”的，甚至同盟会也认为这是袁唐间个人之争，因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把临时约法的作用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在客观上对袁的实力政治起了助长的作用，可见当时各方面的政治嗅觉是很迟钝的。

袁提出外交界一个庸才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所谓超然内阁，是指这个“无色彩”的外交家既不属于袁系，又不属于同盟会。实际上，这个庸人是袁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但这样，属于前内阁的外交（陆兼任）、内务、陆军、海军四部总长，居然可以在新阁中蝉联而无需提交议院同意，这又是自有内阁制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怪事。

七月十八日，陆徵祥在通过总理案后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大政方针，并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一、财政周自齐，二、司法章宗祥，三、教育孙毓筠，四、农林王人文，五、交通胡惟德，六、工商沈秉坤。他根本提不出什么政见，却把提出阁员补充名单比作开菜单，当时引起了参议员的纷纷责难，并且不加考虑地把他所提的六个阁员全部否决。这个外交家吓得称病移居医院，从此抵死不肯出来。

八月二十日，以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成为第三届内阁。

材料

- 唐绍仪内阁
- 陆征祥内阁
- 赵秉钧内阁

材料一　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南北统一。依据临时约法，袁总统电南京：国务总理，以唐绍仪提交参议院同意，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于十五日到南京，十九日列席参议院宣布政见，其阁员即于是日提交参议院同意。三十日，发表如下：

外交　陆征祥（未到任前，胡惟德署）
内务　赵秉钧
财政　熊希龄（未到任前，施肇基兼署）
陆军　段祺瑞
海军　刘冠雄
教育　蔡元培

司法　王宠惠

农林　宋教仁

工商　陈其美

交通　施肇基(梁如浩未通过,唐绍仪暂代)

以上交通,系提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临时政府北迁后,改任施肇基。工商陈其美,未就职,由次长王正廷代理。陆军,南方先有任黄兴之议,后提段祺瑞(以上据南京参与者云)。

此次组阁在南京,未得其详。阅黎副总统电,可知概略,如下:

黎副总统致各省电云:

顷阅上海各报,载有覃振电称:"组织阁制一节,因总理久不来宁,袁公所提议阁员,概属亡清旧吏,无一纯粹新人物,差强人意者。此间军学政商各界咸怀不平,暗潮流涌,寻见南北组织之统一政府,势将破裂不可收拾。贵报主持舆论,最有价值,务希鼎力维持,大张公道,使袁公翻然醒悟,以融和南北感情,为今日救急之要,又万不可徇私行诈,功亏一篑,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国陷于分裂之惨,不胜祷盼。黎副总统代表覃振"等因。查覃振本派往北京,乃竟稽延南京,迟迟不发,甚至以代表名义发表个人私见,殊违背元洪宗旨,业已饬令撤差。该电自应作废。合亟声明,免滋误会。

其时南京方面,以此次组阁所有外交、内务、财政、陆海军重要各部均属北方旧人,南方只得教育、司法、农林、工商不甚重要各部,一般人心理都如覃振见解一样,以致组阁迟延不决。

三月二十二日,黎副总统致袁总统、各省各团体电云:

前以国都问题未定,曾于江电披沥详陈,幸蒙嘉纳。乃总统莅职,已越浃旬,国务各员犹未决定。夫有政府然后有国家,有部员然后有政府,若总统拥虚号,而各部无颛司,是犹五月胚胎,半龄龀龆,形骸不具,其状与无政府同。方今一发千钧,存亡呼吸,直追急起,尚惧失时;十日之间,已非昔比,一之为甚,岂堪再误?……窃谓破坏建设,才虽相异,用实相资。当此四面楚歌,事机危迫,国务各员但须择学识经验,确有专长,无论新旧南北,皆当竭力赞成,以蕲成立。纵万一少数部员不职,不过失司;各部未成,立召亡国。此中关系,无待解人,况弹劾之权,犹操国会。与断送于今日,宁补救于将来。明达如公,谅必能共体时艰,早决大计。设再迁延不决,祸变日深,十日以外,将有复求于今而不可得者。伏乞互相敦促,广为开导,俾民国政府早日观成。

三十日,唐总理电云:

昨提国务员名咨交参议院,顷准咨开:"所有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均多数同意,惟交通总长梁如浩,多数不同意"等语。因交通总长尚未通过,致难发表。现由仪暂行代理,以免濡滞。谨闻。仪。卅。

唐绍仪本北洋派,辛亥末,代表往上海与伍廷芳议和时加入同盟会。其中陆征祥无派,人称之曰"外交派";赵秉钧、段祺瑞北洋派;熊希龄立宪派(南京临时政府顾问);刘冠雄亦北洋派;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同盟派;施肇基亦可曰外交派。

四月一日,唐绍仪在南京接收南京临时政府,后偕同在南京阁员先后到北京就职。以魏宸组为秘书长,魏宸组同盟派。

六月十六日,唐因事去津请假,旋给假五日。

在上海议和末期,所有各省代表先后离去,惟章宗祥与我始终其事。唐组阁,任章法制局局长,我铨叙局局长。我到京办铨叙局事,不能参与政府内幕,袁、唐亦曾约谈多次,只泛论政治上轮廓,不得其中症结。此时政局,但据传说。府院因党派关系,彼此磨擦。六月十六日,魏宸组仓皇来告:"是日晨,唐乘马车到府,忽闻枪声,知其异,即坐原马车至前门车站赴津。"比询其故,魏密言:"自唐组阁后,府院两处意见不合,各走极端。院中每主张起用党人,最近提议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沈秉堃为内务总长等等,不止一事"云云。

唐辞职给假,有主张唐假满回院者,如下:

湖南谭都督电云:

临时政府组织成立未及数月,民国甫有初基,唐总理乃调和南北有功民国之人,实全国所信仰,各国所注目。授任未久,并未发生误国殃民各问题。现在西藏、蒙古,隐患方多,内地各省秩序亦未全复,此时政治尚在维持现状、整顿补救时代,并非秉持政纲、统一进行时代。国人同心,以巩固政府为唯一之目的,有何党争之可言?且今日政党之名初树,各省党派方在萌芽,岂可轻议排击总理?试问一总理去,他总理来,不幸他总理又因事去,国事尚可问乎?且国务员由总理组织,总理去,而各部总长势必随之更迭,……危险问题,岂有大于此者?唐总理既养病五日,假期满后,应请大总统令其力疾回院视事,以成救国初志。……此时自当消弭党见,共卫国家,临时政府即万无轻议更迭之理。……

十七日,以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材料二　陆征祥内阁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唐绍仪免职。国务总理,以陆征祥提交参议院同意,特任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其阁员于七月十七日提出,除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仍旧外,以周自齐长财政、章宗祥长司法、孙毓筠长教育、王人文长农林、沈秉堃长工商、胡惟德

长交通，外交由陆征祥暂行兼任。十九日，参议院开会，于所提阁员均不同意。自唐阁改组，议会党见更形激昂，此次提出阁员，一时喧传，议会以投不同意票为威胁，俾内阁不得成立，与府方以重大打击。乃投不同意票投后，各方议论汹汹，全集矢于参议院，谓其不顾大局，陷国家于无政府之状态。

黎副总统电云：

六部改组，竟成泡幻，谁为厉阶？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国之不存，党于何丽？筹思及此，五内如焚。推厥原愆，皆因误解共和，漫无界说，宪章不振，秩序纷如，内讧不已，外患斯乘，不有法律，其何能国？……惟有诉请各都督共扶纲维，以救危局。自兹以往，大总统主持于上，各都督维持于下，并请参议院诸君速为赞同，俾国务员即日表决，政府早日稳固，勿启外人以无政府之腾诮，而生其觊觎。元洪于政党荣誉，无不赞成，意见争执，决不阿附，谨策驽骀，为诸君后盾。

阁员投票不同意。七月二十五日，又提出以周学熙长财政、范源廉长教育、许世英长司法、陈振先长农林、蒋作宾长工商、朱启钤长交通。府方传出消息："此次提出阁员，尽可再不通过，好在能做阁员者甚多，再不通过，政府又再提，又再不通过，政府又再提，只要议会本身能站得住。"参议院既受各方攻击，而党派又以纷歧，不能始终团结。二十六日开会，周、范、许、陈、朱同意，只蒋一人不同意。三十日，改提刘揆一长工商，八月二日开会同意，于是议员气焰一时顿熄。各部名单如下：

外交　陆征祥(自兼，后改任梁如浩)
内务　赵秉钧
财政　周学熙
陆军　段祺瑞
海军　刘冠雄
教育　范源廉
司法　许世英
农林　陈振先
工商　刘揆一
交通　朱启钤

此次内阁完全由府方组织，陆本身无一人(秘书长王广圻亦系临时相约)，其新加入者，周，久在北洋，可曰北洋派；范，立宪派，与同盟派接近；许，段祺瑞派，与各派均接近；朱，徐世昌派(后为交通派)；陈、刘，同盟派。为陈、刘运动者，向府建言，以陈、刘加入，亦算同盟派有人在阁，其实同盟会既决定政党内阁，其加入者乃属个人行动。陈于同盟关系甚浅，刘本老同盟人，自加入后，同盟会人转轻视之，而府中则以此敷衍党人，盖不知彼中底细也。

陆就职，以王广圻为秘书长。陆在欧洲有年，国内各方素无接洽，对于党人尤为隔阂，其提出阁员到参议院发言，未能得党人同情。王广圻亦只长于外交，于全局政务不得提挈。陆本恬淡之人，于是因病请假。八月二十日，以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嗣后陆一再给假。其兼任外交，九月初二日，改任梁如浩。

材料三　赵秉钧内阁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陆征祥免职，国务总理以赵秉钧提交参议院同意，特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赵向我言："不愿兼任内务。"时言敦源(内务次长)在坐言："内务重要，如换他人，岂不失其运用?"赵笑言："凡事不在其名在其实，我们在民政方面根子多年安插下去，新来一人全摸不清，有何作为？上次唐总理要沈秉堃入阁，总统拒绝，殊可不必。沈入阁，不过得一高官，久之亦同化而已。"我问："此次是否拟约沈?"赵言："无此意。"我言："江苏都督程德全何如?此公久历封疆，在南方尤负时望，内阁重要各部均是北方旧人，如得此等人加入，面目当可一新，南北声气，亦易联接。"赵言："甚是，可作为你意向总统言之。"我即据陈总统，总统颇为所动，府秘书张一麐以"苏省情形复杂，程万不能离苏"持之甚力，此说遂停止，仍由赵兼任。其余阁员，一仍陆阁之旧。如下：

外交　梁如浩(十一月，改陆征祥)
内务　赵秉钧(自兼)
财政　周学熙
陆军　段祺瑞
海军　刘冠雄
教育　范源廉(二年一月辞，刘冠雄兼署)
司法　许世英
农林　陈振先
工商　刘揆一
交通　朱启钤

自唐阁改组后，党人时时指摘，内阁总觉不稳。此次阁员，府方授意一体加入国民党，以缓和反对者之口，但亦无益于事实也。

赵为人极聪明，更事又多，对于潮流所趋最能迎拒。在总理任时，所有院中纸片公文，概不披阅(内务部亦然)，一切事件直接总统办理。我于赵甚隔膜，除会议日外，往往数日不一见，见时以客礼相待。院秘书恩华(镇江蒙古驻防)为赵所赏识，有事多半由恩传说。每日命令经大总统盖印(此时命令，先盖印，后署名，至黎元洪为总统始改先署名，后盖印)，即交印铸局公布。汇积若干，偶至夜深兴到时，信手署名，并不阅正面(命令写在正面，年月日、总理总长署名在背后)，亦不问为何事。惟恩秘书有时在旁询之，赵答："总统阅过盖印，必不错误。且命令已发布，阅之何益。"而其全副精神，则用于应付各方面(除其秘密非一般可知者外)，所有党人无不极力笼络。议院中

人或密议，靡不令其满意。宋教仁住农事试验场，每于夜间进城，到院赵密室私谈，至天明始去。据魏宸组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推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崇宋为大党领袖，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时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亦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由是两人交欢，是否彼此推诚，抑系利用，均不得而知"云云。同盟会人本不同情于袁，自此更同情于赵矣。赵与各方既能接洽，而关于用人行政，又悉由府方主持，此时参院中人又各在本省竞争选举，每次开会不过议法律条文，其留在京者，赵亦有相当联络，所以政局一时安静，乃不意宋教仁案起矣。

三月二十一日，宋教仁被戕于上海北车站。

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日国务院例开会议，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秘书记录），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总理去府谈话，不知其详，一时街谈巷议，莫不以宋案为一重大事件也（宋被刺在三月二十夜，二十二日因伤重身故）。

宋案出后，举国哗然，除公布文电外，空气紧张，日甚一日。府方正筹对策，适四月三十日府秘书长梁士诒自沪返京（在宋案前梁以私事去粤）建议："此事只有先免赵职，改任唐绍仪，另行组阁，以平民党之气。至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其时赵辞职呈文已递多日，总统采用梁说即令府秘书办赵秉钧免职、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命令。当电我到府，将命令带院，由总理署名，交印铸局发表。有一人在座（我不识其人，年约五十岁以上）力言："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若果有决心，今日万不必出此。"袁迟回半晌，将命令收回。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祺瑞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之令下矣。赵秉钧所兼内务，以次长言敦源代理。

（摘自《北洋军阀史治选辑》社科出版社）

国民党成立

背景介绍

孙到北京之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化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排满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另外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鼎鼎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这些政党没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故常。他们所推戴的领袖，甚至也被其他的党推为领袖，而被推者对任何党都不关心。

实实在在，宋是想做内阁总理的。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的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主张将政权尽让与袁，同盟会退在为野党，专办实业、教育，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政党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的地位，使袁成为一个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总统。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不仅是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是个驰名全国的政论家，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这三个小政党是由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分泌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在孙中山到北京之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为一个大政党的基础就已打好了，只等孙一到就正式宣布。

孙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出席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九人为理事，并设参议三十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

材料：

· 国民党成立与民国政治前途之推察

材料 国民党成立与民国政治前途之推察

世人之常言曰："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盖云英雄与时势固常结不解之缘，而互为夫宾主者也。记者窃愿本乎斯义，为之下一转语曰："政党造时势，时势造政党。"党与时势亦常结不解之缘，而互为夫宾主焉。何为政党造时势？曰：其例不必远举，即如吾国之同盟会，在满清专制时代，以一秘密的团体，挟其热诚四出运动，遂颠覆索虏政府，而建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是也。何为时势造政党？曰：其例亦不必远举，即如吾国之同盟会，在共和开幕时

代，以最名誉的历史，略流驳杂四起压迫，遂不得不抛弃其一部分理想政纲而与他派汇合，以求将来成成一伟大健全之国民党是也。然则由是观之，是时势者实不能离政党，而为有目的之变迁，而政党者亦断难离时势，而为无意识之标榜，可决言矣。何则？盖时势之变迁必待政党以为之指导，而后其变迁乃能秩然不紊，有目的之言，不至混沌递嬗愈趋而愈下也。政党之标榜亦必视时势之要求以相应，而后其标榜乃能翕然与社会相适，有意识之可言，不至龃龉背驰益谬而益远也。政党促时势之进化，时势促政党之改良。政党耶，时势耶，其果殊时而各为帝耶？抑亦同时而共为帝耶？记者所不得而研究也。记者所不得不研究者，则为政党造时势、时势造政党，常结不解之缘而互为夫宾主焉。且记者所不得不研究者，则为此次同盟既被时势所造，抛弃其一部分理想政纲而与他派汇合，以求将来一伟大健全之国民党，藉合乎时势之要求。究竟今后及于吾国政治前途有如何之影响乎？此则记者所不敢不悉心剖解而为吾国民告也。

第一，欲知国民党今后及于吾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如何，当先知同盟会改组之苦心如何。夫同盟会之所以改组而与他派汇合，且并其一部分理想政纲而抛弃之，以成一国民党者，其原因虽甚复杂，要之以党员良莠不齐，虽负名誉历史，不堪博社会上全体信用，而政党内阁之主张终归失败，遂不能不设法改良，用为卷土重来之计。此实为彼一最大动机而无庸用其讳言者。是故以记者之肉眼推察之，则同盟会既因党员良莠不齐，不堪博社会上全体信用，政党内阁主张之失败，遂不惜翻然改图，抛弃其政纲内一部分，而与他派相汇合，以求伟大健全政党之出现。斯其一派党员对于吾国政治上之活动，其志不在小，可得而断。顾志不在小者，非空言可以达其志也，于是乎政治之运动必生。由斯而谈，盖国民党成立后及于吾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劈头定为对内阁问题当为所亿不远。

第二，欲知国民党今后及于吾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如何，当先知统一共和党与他党合并之原动力如何。原统一共和党之组织也；以留学生等为其中坚，本欲以其完全之知识执吾国政治界之牛耳，战败各党独挂桂冠也。故其初立于共和党与同盟会对峙外而撄时机以为雄飞之预备焉。厥后因内阁问题，始则右共和党之主张以制同盟派，继则右同盟会之主张以制共和派，最终缘舆论攻击，军警愤恨，遂为时势所逼将内阁问题暂为一束，而左右操纵之策亦归无用。然与共和党之互相诟谇，互相徽牴牾，则从此渐伏嫌衅划然若鸿沟矣。夫与共和党既伏嫌衅划然若鸿沟，斯不能不与他党提携，隐为抵制之谋，而难于犹如渔人之坐其旁势也，所无可如何者也。于是乎环顾禹州，除同盟会外无真正可以握手者，此其所以舍其最始之期许，而与同盟会合并之议乃协。且犹恐其两党之力之仍微，不足以占政治运动势力之优胜地位也。于是乎，国民公党也，国民共进会也，共和实进会也，均招而致之于麾下，以雄厚其势力，庞大其党员，藉作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之势焉。矧同盟会之对于共和党也，久蓄不征服其势力，誓不甘心之志，而与统一共和之会合，又适如鱼水之相得者乎。由斯而谈，盖国民党成立后及于吾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其次当为对共和党问题，亦当为所亿不远。

曷言乎对内阁问题也？大抵现下吾国人对于内阁组织之观察，其见解甚属不同，然因国运方转，阅历幼稚，其不能有确定之观察以促其进行，原无足怪。惟于无确定观察中，而一部分人亦颇具确定之信向，此则不可不研究者也。

一部分人确定之信向维何？曰：即同盟会党员主张政党内阁者是也。方唐少川之弃职而遁也，一时热心爱国之士，恐国家陷于无政府的地位，遂尔舆论沸腾，意见丛生。有主张超然内阁者，有主张混成内阁者，有主张政党内阁者，有主张问才不问党内阁者。厥后，缘各政党之互相反目，惧混成内阁之足以扼腕也，于是主张混成者致归失败。缘各政党之缺乏实力，惧政党内阁之难以收效也，于是主张政党者亦归失败。独问才不问党之主张，出于大总统之特识，宜若可以致成攻者。无奈各党派以参议院为闹意气之所，加之以同盟会党员不让使彼党中人物加入，于是积数孽因而成一恶结果，致令所提出的问才不问党之六总长无一通过，而问才不问党之主张，亦终归失败。最终由于报章攻击，军警愤怒，卤莽灭裂，审择不暇，而超然内阁成矣，而超然内阁成矣，而超然内阁成矣。

夫所谓超然内阁者果超出乎？五洲万国之上足以辅左吾大总统，以无负吾民国委托之重要机关，藉以定国是而张国威也，亦未始非吾四万万同胞五大民族之幸。奈之何受职已近半月，而政见之表发未闻，而对内对外之计划未闻，不特此也，且于各事各件亦无不劳大总统之亲身周旋。此等内阁尚得谓之为能负责任之内阁乎？故以吾推察之，国民党成立后必有见于内阁之丛挫而思有此纠正之，而大总统所主张之问才不问党之内阁说，与一部分人所主张之政党内阁说，如现内阁被纠正，能振刷其精神，激发其志气，而毅然任事也则已，倘若犹现状也，斯内阁一有动摇，则二说必活。是故记者所愿先警告乎大总统者，则在国民党成立后现内阁能负责任自不必言，现内阁不能负责任而受国民猛烈之责难时，宜与国民党相提携，使问才不问党之内阁终于实现。或察国民党如真组织至于伟大健全完备无憾时，容令政党内阁出现亦无不可。要之大总统是纯然以国家为前提，他政党为不执谬，开诚布公以相见，则大总统亦必乐开诚布公以相见。此则吾同胞之所确信者，而亦大总统之所自信者，无须记者之喋喋也。

总而言之，政党造时势，时势造政党，政党与时势既结不解之缘，则政党必宜视乎时势之要求以为之相应。而为适于时势之英雄者，又当与适于时势之政党相结合，以

促时势之进化，否则同归于尽耳。吾不禁穆然神往，愿登喜马拉亚之巅，远望神州，而冀适于时势之政党速速出现，而与适于时势之英雄速携手而负亚东之大责。并望适于时势之英雄，亦速求适于时势之政党，以为之同心戮力，共济艰难，勿使大陆陆沈云尔。

（《大自由报》，1912年8月16日、19日）

历史内幕

清帝退位诏书起草经过

一般人都知道张謇对辛亥革命有重要的关系，但有什么具体事实，则知者甚少。在张謇自编年谱中，也不愿详言其内容，主要是洪宪一幕，使他十分懊丧之故。我始识张于庚子年，宣统元年他负责大生一厂，我为大生二厂经理，后又与张奔走南北。一九一四年，张任农商总长，我为次长，虽仅数月我即辞退，但前后共事既久，接谈之机会较多。

辛亥十二月，南北议和代表人推张季直先生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盖其时北方代表唐绍仪自言未便属稿，清廷重臣徐世昌怕担"逼宫"之名，亦不愿草拟，而南方代表则主予稿清廷，可免措词失当。

季直先生初既徬徨于执笔责任，又踌躇于如何落墨，见询予于隔室（即上海小东门大生二厂办事处）。予当答以："今天既不是张某篡位自立，而且把政权还给老百姓，这是普天同庆的事，正应慨然承当，何所用其犹豫？"季直先生欣然动容，微笑点头说："那末，拜托，拜托。"我立即动笔，在二三十钟内草就，内容大致是："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遣派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乃旬日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政体一日不定，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国人民心理，既已趋向共和，……更何忍侈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听我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务使全国一致，洽于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与皇帝，有厚望焉。"

稿成，以示季直先生，先生默诵一过，略易数字，连说："可用，可用"，就转与唐绍仪，唐据以电告北京。

据好几个参与清廷机密的老朋友说：电稿到京后，袁世凯、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给汪衮甫（荣宝）。汪读后，就说："张季直为文，力模班史，词句硬碰硬，此稿却婉转庄肃，情见乎词，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汪遂援笔修改，把我原文末句"有厚望焉"改为"岂不懿兴"。定稿后，就送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见稿，泫然流涕说："我和皇帝决不以一姓尊荣，叫四万万人吃苦头。"她一头看，一头哭，忍泪说道："这里所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要说的话。"后来内阁就这件经过修改的稿子，电复上海和议代表，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了"懿旨"。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良弼被炸记

赉臣名良弼，清宗室镶黄旗人（系多尔衮之后，两广巡抚伊里布之孙，因其父久宦川粤，故赉臣幼年生长于成都，外多传其为荆州驻防或四川驻防旗人，皆误），留学日本士官第二期步科，毕业回国，派为练兵处差遣，旋调任陆军军学司监督，寻充司长。光绪三十四年冬创设禁卫军，以娴习韬略，充第一协统领，兼领镶白旗副都统。宣统三年秋补军谘使，在清室贵胄中以知兵名，性颇自负，庸臣权奸多姑忌之。

辛亥十一月廿八日午后，余赴军咨府访赉臣，正畅论间，有名崇恭者投刺求见。赉臣谕承启曰："这儿没时间谈话，告诉他到家里见我去。"越日余奉学部差遣，因事去天津，在津勾留近旬日。九日返京抵达车站，车夫小孙告余曰："良大人昨晚在家门口被炸坏了。"余到家即匆匆更衣赴良宅探视，见良仰卧床上，神智尚清，颔首曰："你坐"，语音甚低。余问其遇炸经过，答曰："你还记得前几天有名崇恭者到军咨府要见我吗？炸我者即伪扮崇恭之人。我没死，他倒当时死了。"余谓是否凶手还有别人，恐不若是之简单。伊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曰："诚然，但亦不难想知，今日之害我者，即来日之夺国者。"又曰："你要想法告诉肃王爷注意。"至此见其疲倦即辞出。问其家中人，始知昨晚返自肃邸，比及家门即遭此不幸。十一日上午余又往探视，见其精神较前为佳，适东医白川在为其治疗，未便多谈，稍坐即辞出。至晚，赉臣逝矣。据其家人传言，逝世前饮某医所进止痛药酒一杯，饮后只一时辰，忽气促神昏，竟致不起。赉臣逝后，余与伊之挚友多人耸动步军统领乌珍（字恪谨）、左翼总兵毓秀（字松泉）、右翼总兵鹤春（字松亭）等，到安外义地掘出凶手之尸照象，以便跟侦"凶犯"形迹。壬子正月初四日，步军统领派右翼总后鹤春率人往掘，时虽掩埋已二十余日，因天寒地冻，"凶犯"尸首

毫末变形。见“凶手”短身，圆面，浓眉，年约三十许。照象毕，仍掩埋之。

当武昌革命事起，袁世凯任国务总理之时，街市即散有较信笺稍小之说帖，有“先刺良弼，后炸铁良，二良不死，满虏不亡”及“肃王好，肃王引贼反清了。载泽好，载泽家里堆元宝”等不伦不类之语，人多谓系革命党人所为，然智者皆知此为巨奸造摇惑众之鬼伎也。后期年，经各方了解被难症结，始悉个中隐曲，确为袁氏借铁血会人之手所为，非民党所指使也。缘赉臣于内廷以下诏起用袁世凯时，即持反对之议，并曾暗中联络各旗军督统上疏谏阻，并奏陈袁之不可用多条。清廷终以无人统率各军，授袁以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之权，继之并任袁为内阁总理。但在清军汉口大捷一次之后，袁即索饷要械，兵不再进。当时智者多已识破袁之心计，为假清廷以压迫民军，假民军以恐吓清廷。因之反袁之议颇传于八旗人士之中，甚至有主张杀袁以清君侧者。此尤以禁卫军中血气方刚之青年如连兴、桂铮等下级官长为多，然群龙无首，徒言不能行。于是众皆属意赉臣，赉臣既不愿明拂众意，亦不敢冒然行事，坐事空谈，因循事机，徒召袁忌而已。当袁以大批金钱贿好奕劻、那桐、小德张压服隆裕太后之后，顾能掣其肘者只一禁卫军耳。然具有军事素养，魄强力壮，能指挥此一禁卫军且能联络日人为外援者，在清宗室中舍赉臣无人焉。故袁除使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缓冲禁卫军之叫战声沸外，为借刀杀人计，乃唆使卢木齐、王天纵讽示铁血会份子丁作霖、张榕定等，并宣传袁早同情革命，赞成共和，所以不能行其志者，只碍善耆与良弼耳。说以盖世之功，恃以总理之援，于是炸良之谋定矣。故当赉臣被炸故后，善耆即畏祸避往大连，而后终死于大连。此中情节，老友冯耿光（字幼伟）、文华（字秀峰）备能道之。证之民元后彭家珍之父得袁赏菜厂胡同住宅一所，并每月在袁处领取抚慰金一千元，益足信矣。

此案直至汪兰皋所著《彭烈士传》出，方知“凶手”姓彭，名家珍，字席儒，四川人。其著传之汪兰皋究系何人，十余年来迄未获知，或系化名涛张，难究诘矣。

（常顺）

清室退位前密商美使馆收容溥仪的策划

叶可梁

一九一一年，我以回国留学生资格考取翰林院编修，因而认识几个在朝要人，一为溥仪师傅陈宝琛，一为尚书宝熙，一为学部部长李家驹。此三人均是我的座师。我与同乡陈太师来往颇密，武昌起义后月余，陈太师曾约我便餐，在座八人，宝熙及李家驹在内。餐后，陈太师谈起，有一要事与我相商，谓此次革命，朝廷对于皇帝（指溥仪）的安全甚为担忧，想设法保驾，拟托我向美使馆联系，俾得于紧急关头暂躲一时。当时我与美使馆人员并无相识者，但有美国别士恒公司在京代表义理寿，与我相熟，他颇接近美使馆，可与商谈。因为我当时自认为是一个“立宪维新派”，信服康、梁学说，以为皇帝一走，革命即告成攻，就可避免南北血战，免使生灵涂炭，遂允与义理寿联系。李家驹则谓将向另一使馆（指日使馆）进行密商。我曾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我回报陈太师之后，迄无消息。不到两星期，隆裕太后下诏退位，此事遂不果行。

袁世凯“逼宫”详情

袁世凯既为内阁大臣，统全国十三镇兵马，藉口粮饷无着，请启赃款库及寿皇库以济兵饷。

赃款库者，历代查抄赃吏之籍没宝物，如鳌拜、和坤皆富可敌国者。因闭藏已久。为典守者盗换以尽，无可究诘。寿皇库，乃慈禧回銮之后，欲敛天下资财，藉万寿之名所收各省督、抚之礼物，大半均系金银。袁在北洋任内即送金洋钱三万枚。各省所输，何啻千万。

袁愚弄小德张，先恫吓总管有典守之责，将彻查赃款库；次许以厚赂，使说隆裕太后发诏旨启寿皇库取金银。事为各王公所知，极力反对，醇邸尤甚，至开御前会议 商讨。太后左右为难，无所可否，竟许王公向袁索回原旨。袁佯许诸王公，暗嘱北洋各军镇来电索饷，以无饷即将激变为要挟，兼以逼清帝退位。

袁伪自引咎辞职，各王公皆束手无策。最后，由庆邸出面挽留袁，并由太后表示自愿退位。盖庆邸拥贪黩之资，深恐畿辅之有变也。醇邸只力争退位优待条件。袁皆许之，事遂定矣。

（摘自《清代稗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民社成立马黎袁勾结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卿，夏口柏泉人，远在庚子年即参加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之役，以后经过日知会的失败，始由东北而至日本，同张伯祥、邓文军、刘公、焦达峰诸人于同盟会之外，组织共进会。复同焦达峰先行回国，分别在两湖地区联络同志，成立共进会分会，中经一度败

露，后又恢复，在武昌首义时，也起了一定作用。鄂军政府成立，孙任军务部长，这是军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一部。孙武没有为革命奠立基础，相反却侮慢同志，接近旧日官僚，拉拢孙发绪等人。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孙不仅没有全力支持，且嫉妒黄的声誉在他之上。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自以为武昌首义有功，特地赶往上海活动，希望得一总、次长的地位，不料南京政府无从位置，因之引起孙对南京政府的恶感。这样一来，孙便一意孤行，在上海拉拢大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培植自己的势力。老同盟会员刘成禺新自美洲回国，黄兴问刘在美国学什么东西等，刘亦深为不满。于是孙、刘合作，在上海成立民社，与同盟会公开对立。据说章太炎、汤化龙等虽未加入民社，但他们都是赞助孙武的。接着，孙武就与在上海所结纳的一批人偕同回鄂，又在汉口成立民社分社；事实上，民社是以湖北为重心的。民社理事长是黎元洪，孙武、刘成禺、饶汉祥、张伯烈、孙发绪等任常务理事，丁笏堂任总干事。和孙武有密切关系的李作栋时任鄂理财部长，李曾一次拨给民社活动经费五万元。谢彬所著《民国政党史》说："民社者，拥黎元洪为中心之政团也，以卢梭《民约论》为根本主义。其目的在图共和政体健全之发展。其地盘为黎元洪直属之湖北派。其干部为蓝天蔚、孙武、张振武、张伯烈、刘成禺、宁调元、饶汉祥诸人。"关于主义是说不上的，更说不上共和目的。如果说也有所谓政治纲领的话，那就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借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实际内容就是如此。谢著所举干部人物，似无蓝天蔚、张振武、宁调元诸人。因为蓝与孙武并不接近；张振武曾在民社查帐，大说黎的坏话，谓不应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用，且黎、张之间，素不协调；宁调元与黄兴关系极深，而以后宁又是被黎杀了的。其重要社员据韩大载同志回忆，尚有马较田、李组绅、覃达方、丁笏堂诸人。建都地点问题发生时，民社首先反对建都南京，这是露骨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袁世凯所求之不得的。可以说，民社就是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就我所知，湖北籍的国会议员，湖北的师旅长，以及各部首脑人物，多系民社主要分子。这些议员入京时，送川资，买车票，均由民社代办，民社也就成了袁世凯在武汉的办事处。忠实于革命的同志，要反对孙武，自然要反对民社，首义之区所以闹得互相倾轧，革命力量日渐削弱，民社应该首负其责。

民社对袁世凯帮忙，袁当然"实获我心"，进一步又示意黎之左右，说副总统是全国的副总统，当理事长也应做全国性政党的理事长。于是以民社为基础，在一九一二年五月成立了共和党。

（摘自《武昌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北京兵变

我亲爱的布拉姆：

自从我给你写上封信以来，这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上星期开始一切趋于平静，连公使馆也要求那些借用英国国旗的人把旗子还回来。星期四也似乎一切平静。《每日邮报》记者马克斯韦尔同我住在一起，我给他安排好了去访问袁世凯。他在星期四那天见到了唐绍仪，发现他心情紧张、激动、过份劳累。马克斯韦尔跟我说这一情况时，我认为情况相当可疑，不过，目前我深信唐绍仪对暴乱不会比我了解得多。

那天晚间射击开始时，袁世凯正同前山东巡抚孙宝琦和交通总长梁士诒共进晚餐，孙的妹妹嫁给了颜博士。兵变发生前有一段时间，士兵们主要是向空中鸣枪，这样做是为了吓唬人。驻在北京的第三师整个炸了营。这个师是袁世凯在1895年创建中国陆军时的最早一个师。他们是在政治危机期间专门为了维持秩序调到北京来的。人们把这个师看作是中国陆军中最信得过的队伍，我们提到他们时已经习惯于用"效忠于袁"的说法，然而在中国预言永远是靠不住的。

骚乱在七点三十分开始，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俱乐部里。最初，我们以为是放爆竹，因为这正是喜庆季节，直到我们动身离开俱乐部往家里走时、才了解到是在用来复枪射击而不是放爆竹。你知道我的住房在使馆区以外大约半英里，位于使馆区中心往北的大街的西侧。人们喜欢用我的名字叫这条街，它的中国名字既长又念着不顺嘴。当我刚走进条街时，正看见我住宅附近的房子在起火燃烧，大火正从四面八方烧起来。在我北面二百码的地方，这条街转朝西，直通到紫禁城的东大门——东华门。靠北侧转弯处分出两条岔路，那里有两家店铺。从前袁世凯从宫中出来回家经过时，就是从这两家店铺里朝他掷出的炸弹。在这个转弯处到我住宅一半路程之间的全部住房都起了火。在我西面的房子也起火焚烧。在我住房的街对面是北京最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物连同里面有一个占地若干英亩的戏院也被大兵放火烧了。

这些当兵的整个控制东城这一带，他们奉当官的命令挨家抢劫。有不少房子是因为碰倒了油灯而意外引起了火灾，但是也有许多是故意纵火。造成的破坏远远大于劫掠的所得。子弹呼啸，但都是朝着空中放的。当时如果象第二天那样刮起北风，我的住宅一定非常危险。事实上，东、西、北三面熊熊大火离我住宅那样近真够使人焦急的。幸亏我在不久前盖起一间防火的藏书室。星期四晚上我回到我的住宅立刻就和我的仆人们一起把我全部值钱的东西搬进这间藏书室中去。

我已然见到了街上所发生事情，接着我便坐下来给

你写电讯稿。才写到一半，在外边吃过晚饭的马克斯韦尔非常激动地闯进屋里，陪他来的有一个英国卫兵和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他说，"几分钟以内就要烧到你这里来了，你必须马上到公使馆去"，巴尔敦正式通知我，要我必须离开。否则，如果我留下来，要由我自己负责。我告诉你这件事，只是用以解释我发给你的蹩脚电报。我当然拒绝离开我的房子，那里有很多中国仆役都希望得到我的保护。但是马克斯韦尔决心离去，我很高兴他这样做。他看我在写电稿便说这样做没有用，因为电报局一定不会收电报的。他走后一小时又回来告诉我他弄错了，电报局还在营业。当时我非常匆忙地划拟了一份电稿，并为怎能出这样的错误感到十分气愤。接着他说他不愿意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他要求同我一起留下来，可是我不让他留下。在骚乱时刻，有一个脾气急躁的人呆在自己家里是不愉快的。

那天晚上我们走到街上，见到了有组织的洗劫，听到不断的枪声，不过没有外国人受到骚扰。外国警卫军开出来了，最先是意大利兵，接着美国兵，后来是英国兵。住在使馆区以外的外国居民都被护送到使馆区内，给他们以一切照顾，那里没有发生混乱或不必要的惊慌。我们公使馆的人这种作法是确令人赞许，同我们在克劳德·窦纳乐爵士时代所见到的情形截然不同，那时对于外国妇女是按照她们的身份地位给予庇护，传教士们受到轻蔑的待遇。在义和团动乱时期从来没有教会的人和克劳德·窦纳乐爵士同桌吃过饭。现在朱尔典夫人的每间屋子里都住进了教会的妇女和儿童。艾斯敦和所有其他人都非常好客和气。

星期五夜晚，在西城和北城又发生抢劫，造成的破坏程度和范围，不减于星期四夜晚干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同天津和中国的许多其他城市发生的情况相比还算轻的。后来几乎闯进我们的家里，因为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抢劫。这里的外国人感到得意的是：他们在周围正发生抢劫时镇静自若。但是想一想内地的情况，那里只有两三个传教士住在正遭受无法无天的大兵或土匪（这两个词很快就成为同义语了）劫掠的城镇里，而且他们知道离他们最近的英国援军要走一个月才能到达他们那里。

到了星期六，秩序已趋恢复，但是北京谣诼四起。唐绍仪将袁世凯给他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上说保定府已遭摧毁，天主教堂被焚，天主教神父被杀害，所有没有辫子的男人都被砍了头。毋庸置疑，这是吓昏了头的袁世凯，意图使外国害怕而增加他们在北京的兵力。唐绍仪把这封信递交给约翰·朱尔典爵士，从他的态度上给人的印象是，最好外国人能有所表示。因此，正象我电告你的，星期天已有所表示。

整个骚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一个当兵的受到惩办。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有些贫苦年迈的苦力，还有些妇女因为在被大兵们毁掉的建筑物废墟上捡走些小土块或小铁片，就惨遭斫头。再没有别的例子更能说明中国人缺乏正义感了。袁告诉马克斯韦尔说他不敢惩办士兵，但是他又说这些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加以处理的。

目前使馆区里挤满了避难的中国人。外国旅馆里一间客房挤着住十到二十人。唐绍仪从骚乱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旅馆，南京的代表们当他们的住所在星期四夜晚遭到抢劫时，先是逃到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大楼里，随后在美国人的陪同下，住进六国饭店再也没有离开过。

值得你注意的是：满洲人的住宅没有受到破坏，也没有满洲人开的店铺遭到抢劫，也没有企图闯进任何满洲亲王的大宅院，当然包括皇宫。皇太后的父亲、惠徵公爷的府第被第三师的炮手洗劫并纵火焚毁，他一家逃到紧邻的日本的西本愿寺去避难。不过，只有这一个例外。无疑一定是因为有所惧而使得汉人不去触动满人的财产。满人士兵没有参与抢劫，但是满人警察却趁火打劫。目前在北京的满人士兵在数目上大大超过汉人，至少是四比一。他们是一伙怯懦、颓废、柔弱的人，否则他们满可以趁机作出一番恢复王朝的大事。提起这件事来肯定对他们有利，因为到目前为止，满洲人的表现是顺从的。有组织地行凶作恶的，正是汉人。

我们五个人昨天骑马去察看我们紧挨着跑马场的乡间别墅。我们发现一切东西都完整无损，只是整个乡间都被强盗般的士兵有组织洗劫了。我们随后骑马穿过丰台，看到那些洗劫丰台的叛军，从那里带着他们抢来的赃物登上火车，顺京汉铁路向更远的车站驶去。看到这些冷酷残忍的人，在行凶作恶之后竟若无其事地坐在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专车上，运走了他们从派他们来保护的村庄里抢得的财物，真令人怵目惊心。我们也见到有一千多人马的一伙人列队穿过农村。他们对我们挺有礼貌，可是我却愿意看到他们一个个地被杀头，看到他们的官长被剥皮，因为当官的比当兵的更坏。

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他抱怨说他没有钱，他说列强应该用钱去支持他。如果各国给他钱，部队就有饷可发，士兵也就不会哗变。各家银行预付给南京的大总统二百万两银子，如今很可能后悔那样做了。中国正在经历着最大的苦难。

现在我没有功夫给你多写了。

顺致最好的祝愿。

你非常诚挚的

［乔·厄·莫理循］

（摘自《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

历史考证

清帝退位诏书是谁起草

《清帝退位诏书》是谁起草?起初,传说是阮忠枢草拟的。"当时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谕旨,几乎都出自阮的手笔"。可是诏书公布前,《大公报》说:"逊位之诏,皇太后已命徐太保拟定",于2月8日"将草案交由袁内阁核阅"。诏书公布后,《申报》又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但是,徐不愿承担"逼宫"之名,根本不肯插手《退位诏书》。

在清皇退位已成定局以后,张锡銮曾托人拟过一稿,交叶恭绰修改。叶认为为时尚早,未即动笔。2月7日左右,南方代拟稿电达北京,此稿就在叶处作废了。但至今未见有原文。

现在看到原文的有内阁民政大臣赵秉钧的亲信秘书洪述祖草拟的《退位诏书》。该诏书最后说:"无论君主主宪,民主立宪,余(隆裕太后自称)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并未明确宣布退位。唐在礼回忆:诏书"由袁面授要义而后由洪着意撰写的"。

据胡汉民记述:"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张孝若在讲到清帝退位一事时,把电发北京的《退位诏书》稿说是张謇收到"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胡汉民特致函谭延闿,嘱转告张孝若:"……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到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随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按:唐绍仪字少川)亦以为甚善,照电袁"。赵尊岳对张謇在赵宅(惜阴堂)着笔拟稿经过说得更具体,"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综上所述,《清帝退位诏书》的撰稿人是张寒。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还有两个问题:一、张謇交稿前是否还有别人草拟或代劳?二、清廷正式颁发的诏书和原稿比较,改动怎样?

按照赵尊岳所说,张謇是亲自撰稿的。但是刘厚生说:"南北议和代表佥推张季直先生起草退位诏书",张謇在上海大东门大生二厂办事处和他商量后,由他动笔草就,"稿成,以示季直先生,先生默诵一过,略易数字,连说'可用可用',就转交唐绍仪,唐据以电告北京"。刘还说:"据好几个参与清廷机密的老朋友说,电稿到京后,袁世凯、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给汪衮甫(荣宝),汪读后就说:'张季直为文,力模班史,词句硬碰硬,此稿婉转庄肃,情见乎词,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此说虽然有人物、有地点、有情节,甚至从文风、笔调方面论证此稿不是张謇草拟。但是否和刘厚生有关,现在还难以认定。李健青说"诏书末段'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是幕后人刘厚生的手笔"。如果核对原文就会知道,李健青引用的几句话,都是原稿所没有,而是北方修改后增加的。所以这几句话不可能是刘厚生手笔。

另外,陆丹林认为:《清室优待条例》外间多说是张謇主稿,而由赵凤昌参加意见,实际是诸宗元代笔。但又说《清室优待条例》和《清帝退位诏书》都是诸宗元代笔。

关于张謇草拟的退位诏书手稿,据张孝若说,他在得到谭延闿转在给他的胡汉民来信后,"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在赵先生凤昌处"。接着张分析道:"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预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长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固意中事也"。冯自由在《唐少川之生平》中也说:在南北议和时,"少川时假上海南阳路老友赵凤昌宅为办事处,黄克强、陈英士、张季直恒到赵宅探候和议消息,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词,即在赵宅起草,原稿今尚由赵宅保存之"。赵尊岳则说:"张謇草拟之《清帝退位诏书》,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综上所述,张謇手稿保存在惜阴堂,应该是可信的。但民国期间历年的《申报》国庆增刊,都未见赵尊岳纪念文章以及张謇原稿影印件,此说肯定有误。

袁世凯等对南方所拟诏书草稿,作了许多修改。赵尊岳说:"一字不易,仅加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与实际情况不符;胡汉民说:"袁世凯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授袁世凯全权字样是原稿就有的,所以胡汉民的概括也并不准确。

张謇所拟《退位诏书》原稿不具首尾,计256个字。正式颁发时除首尾外计305个字,原稿前半删改较少,全文保留的字数约近一半,其余大部分都是北方修改增添的。主要的改动则是将"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派遣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改为"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增加了"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将"听我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其北京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新疆以及伊犁内外蒙古青海前后藏等处,应如何联为一体,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协商办理",改

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些改动适应了袁世凯的政治需要的目的是明显的。特别是"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是袁世凯包藏祸心，阴图表明他的权力得自清廷，把南京临时政府完全抛除在外，孙中山洞烛其奸，当即致电袁世凯严肃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袁世凯通过唐绍仪进行狡辩说，这不是他的本意，把责任推向"满洲王公"。结果正如胡汉民所说"退位诏书"以其为遗言的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只得不了了之。

除希天在《新民晚报》著文《清帝辞位诏书主笔是谁》? 文曰：辛亥年冬，张謇被推为诏书拟稿人，他和雷震同到苏州杨廷栋家中，以后三人一起在维瀛旅馆闭门构思，以杨廷栋为主笔，文成，由雷送京直交袁世凯，事后由杨倩，吴湖帆绘《秋夜草疏图》和书疏稿，以纪其事，张謇作序，杨自撰跋，并遍征海内名人题咏云云。

据《啬翁自订年谱》载，10月16日(辛亥8月25日)，张謇到苏州，"巡抚程德全甚韪余请速布宪法开国会之议，嘱为草奏；仓猝晚膳，回旅馆约雷生奋、杨生廷栋二人同作；时余自书，时属二生书，逾十二时稿脱"。这就是程德全会同溥逦、孙宝琦等于10月22日发出的奏折。据黄炎培说："此稿藏杨君廷栋所，杨君倩吴湖帆君绘图装卷，张一鹏君题曰：《秋夜草疏图》。杨君既广征参与辛亥独立之役诸人题咏，自为跋以纪其事如下：……云阳程公德全方抚苏，睹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嘱廷栋偕华亭雷君奋邀通州张公謇莅苏熟议。张公适乘沪宁车由宁赴沪，乃与雷君迎至锡站，谒张公于车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苏抚署聚谈。晚，复同寓苏站西偏数十步之惟盈旅馆。……初，张公自起草；继，张公口授，由雷君与廷栋更番笔述之。稿成，已三鼓"。杨廷栋的题跋说明，他请吴湖帆绘图、张一鹏题字以及张謇、程德全、应德闳等题诗作序的《秋夜草疏图》，记述的是杨廷栋、雷奋协助张謇代程德全草拟奏折一事，所谓"疏稿"，就是奏折原稿。张謇在题诗作序后记述道："吴县杨生以辛亥云阳中丞拟疏稿草装卷见示，惝恍恻怆，不翅隔世点！赋诗四章题其后归之"。由此可见，《秋夜草疏图》并不涉及《清帝退位诏书》，当然不能据以论证《退位诏书》是杨廷栋主笔。张謇和雷奋、杨廷栋在阴历8月25日夜间代拟奏折，所以绘图纪其事时名曰"秋夜"、"草疏"。当时，清帝退位问题也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草拟《退位诏书》，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假使草拟的是诏书，时又是在严冬，名之曰《秋夜草疏图》，名不副实，且张謇等包括杨廷栋在内为《秋夜草疏图》所写的诗文序跋，都是文不对题了。

黄炎培在1931年写的《辛亥革命中之一人一程德全》中有过详尽记述。但是，30年后，他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一文中却说："(辛亥)8月25日，我和沈恩孚(信卿)、雷奋(继兴)、杨廷栋(翼之)，还邀到了张謇同去苏州阊门外惟盈旅馆，张謇受程德全委托，代草劝清帝逊位奏章，这事保留着一幅《秋夜草疏图》做纪念"。查对奏折原文，可知：张謇8月25日在惟盈旅馆代程德全草拟的奏折内容为请求清朝政府"解除亲贵内阁"、"下诏罪已"、"提前宣布宪法"，即实行君主立宪；而不是"请清帝逊位"。其实，当时武昌起义才6天，张謇、程德全都还弹着君主立宪的老调，没有转向共和一边，当然不会劝请清帝退位。程德全在发出张謇代拟奏折的第二天，以"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又命应德闳代拟奏折，继续为清廷出谋划策，强调"君主立宪政体，其精神实际全在君主神职不可侵犯一语"，"先朝宣布立宪"，其目的在于"消弭革命"。因此，张謇代拟奏折的内容，不可能是"劝清帝逊位"。至于张謇和伍廷芳等请清帝逊位的电报，是辛亥9月21日(即1911年11月11日)发出的，那是20多天以后的事情。程德全从来没有发过"劝清帝逊位的奏章"。

(摘自《民国档案》)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人辨证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起草的。据笔者查考，最早提出此说的是1931年2月出版的顾敦鍒著《中国议会史》。该书称："《临时约法》由宋教仁等起草，经起草二次，会议亘三十二日，自二月初七日开始，至三月初八日，全案告终，即日宣布。"此后一些有关著作，如193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立法史》(杨幼炯著)、1964年台湾出版的《民初之国会》(李守孔著)、1981年辽宁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李时岳、赵矢元著)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宋教仁集》(陈旭麓主编)，以及近年国内报刊所载一些论文，均沿用此说。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临时约法》是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的。查《参议院议事录》(以下简称《议事录》)关于起草、审议《临时约法》的记录，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宋教仁参与起草的记载。当时的《民立报》诸人与宋教仁关系密切，该报曾报导宋氏的活动，发布宋氏主持制订的政府法令，也报导过起草和审议《临时约法》的消息，但并无任何有关宋氏参与制订《临时约法》的报导。当时参与制订《临时约法》的人士甚多，也未见何人提及宋氏曾参与其事。宋教仁遇刺后曾出版过多种宋氏传略，荣哀录，如《宋渔父先生传略·遗著·哀诔》、《宋渔父》等，书中提及宋教仁积极参与政府立法工作，称"临时政府法令多出先生之手"，但未见一书提及宋氏参与起草《临时约法》之事。

以上事实表明，宋教仁并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

宋教仁是民初最为重视立法工作的革命者之一，曾

经与汤化龙等人共同起草《鄂州约法》。当时的政府法令，大多由宋教仁主管的法制局起草，经临时大总统咨送参议院议决后，由临时大总统颁布。或许是由于这种立法程序使后人误认为宋教仁参与了《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然而，《临时约法》具有宪法性质，其立主程序与一般法令不同，提案权属参议院专有，不允许政府官员参与。1月17日，汤漪提出"行政官不得兼为参议员案"，经代理参议院一致议决通过。随着立法机关逐步完善，立法与执法机关互相独立的原则也日渐明确起来。当时，临时政府掌握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代理参议院及南京临时参议院也是革命党人居绝大多数，但是同为革命党人并不妨碍参议员坚持立法机关的独立性。南京临时参议院一直力图保持这种独立性，为此曾经受到部分革命党人指责。胡汉民认为"参议院议员以同盟会占大多数，故狃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据说"数周之间，南京政府即累为参议院所厄"，"政无由行"，时人以此做为立法、政府两机关互相冲突，参议院掣肘临时政府的"明证"。从这种指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立法机关是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中，身为政府官员的宋教仁当然不可能参加参议院制订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的工作。对此，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做为佐证：在酝酿起草《临时约法》期间，《民立报》于元月27日公布了宋教仁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7章55条。它反映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就内容及结构而言当是一部宪法草案。因还需提交参议院讨论，法制局于28日通电更正为《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30日，孙中山将这个以《鄂州约法》为蓝本的草案咨送参议院"以资参叙"。政府的用心无可指责，但是参议院第二天即"将原案退回"，并郑重其事地议决了回复政府的咨文。该咨文原件现在国内已找不到，但据日文译文看，该咨文措词颇为严正地指出："宪法提案权应属国会特权。而在国会召集前，本院为唯一立法机关。因此，该法当由本院制订。现在，法制局预为编订该草案是为越权。所谓'以资参叙'，亦非本院必需"。南京临时参议院既然拒绝由政府法制局主管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组织法草案》，又如何能在事隔几天之后转而约请宋教仁代为起草《临时约法》呢？

其次，从《临时约法》产生的过程看，也找不到宋教仁参与此事的记载。

起草、制订《临时约法》，可以溯源于修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是各省代表会在武汉集会时期匆忙起草通过的，内容多不完备。此后曾有代表多次提出修正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各种修正案都局限于对国家机关的规定，并没有越出《大纲》原来的范围。临时政府成立后，形势要求制定较为完备的临时宪法。因此，1月5日，"鄂赣闽滇粤桂六省代表提出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湘赣浙滇秦五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入人民权利义务一章案"。这些修正的要求显然超越了《大纲》的范围，是为《大纲》演变成为《临时约法》的肇端。

元月5日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将上述两个提案"先付审查后即由审查员拟具修正案。举定审查员五人如左：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

元月25日，各省代表会的第四项议程是"起草员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当日议决该案"关系重要"，需"先付审查"，"应委任审查员九人限四日内审查报告"。据查《纪事》，元月5日至25日期间，并无举派"起草员"起草《临时约法》的记录；而5日举定景耀月等五人进行的审查亦无下文。由此可以推知，25日提出的草案即是五人审查后拟具的修正案。据《民立报》元月30日报道："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一则昨由景君耀月、马君君武、吕君志伊、张君一鹗起草，共有四十九条，颇为完备，但参议院办事甚为慎重，仍未敢议决，故暂公推审查员九人将约法草案详细审查，一俟妥协，再为公决"。

这则报道可以证实上述推测，但有几点需要说明。1.参议员中并无张一鹗其人，当系张一鹏之误。2.该报道使人误以为系景耀月等四人(而不是五人)于元月底(而不是自5日起)始起草《临时约法》。查《纪事》，自元月17日通过前述汤漪提案后，吕志伊即辞去参议员职任，专任司法部次长；景耀月、马君武二人就任次长后虽未向参议院辞职，但在1月17日至25日期间，马君武已不参加参议院活动，景耀月仅有一次到会；张一鹏虽未任行政官职，但在此期间也仅出席参议院会议一次；至元月23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后，马、张二人均非参议员；当时五人中仅王有兰一人始终积极参加参议院活动，25日出席会议的也仅王有兰一人，景耀月等四人并未到会。因此，就起草《临时约法》而言，景耀月等五人都曾经参与其事，但始终其事的只是王有兰一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在于立法机关的独立性，它迫使部分兼任行政职务的参议员逐渐脱离了立法工作。《民立报》在此突出景耀月等四人，恰恰漏掉了始终其事的王有兰。这或许事出有因，但已难于查考，视为报道失误也未尝不可。

以上是第一次起草《临时约法》的情况。

第一个草案提出后，代理参议院议决"先付审查"。当时尚无常任审查委员会，遂由临时议长赵士北指定林森、陈承泽、凌文渊、刘成禺、汤漪、王正廷、张伯烈、杨廷栋、平刚等9人为审查员，限四日审查完毕并提出报告。当时，对各种重要法案均先付审查，所谓审查，即对原案进行推敲加工，审查报告等于是对原案的修正案。因此，林森等9人的审查报告当是《临时约法》的第二个草案。

然而，这个审查多日没有下文。元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2月6日，经刘彦动议，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案关系甚重，应先交审议会审议，俟讨究大纲后，

再付特别审查会审查”。2月7日，参议院第二项议程是“编辑委员会提出临时约法草案”。根据前一天的决议，参议院决定将草案“先付审议会审议”。所谓审议会，即以全体议员为审查员，公同审查，从而为每个议员提供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先讨论通过大纲，然后据以起草供三读会讨论的草案，这种郑重其事的程序，后来成为议会制订重要法律的通用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第二个草案的“编辑委员会”，正是林森等9人审查委员会，因为显然不可能另有一批参义员与9人审查委员会做同样的工作、提出另外的草案。

这是第二次审查、起草的经过。

2月7日下午至15日，参议院举行审议会，由李肇甫任审议长。审议会通过的审议大纲决定了《临时约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结构。如实行《责任内阁制”、“任命国务员需得参议院同意”等，都是在审议会上决定的。2月15日，李肇甫做审议报告。16日，参议院议决将审议报告交付特别审查，会议主席林森“指定特别审查员九人如左：邓家彦、李肇甫、熊成章、钱树芬、谷钟秀、殷汝骊、欧阳振声、张继、汤漪”。

当时，孙中山已经辞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的制订刻不容缓。因此，特别审查委员会于一天之内即将审议报告审查完毕，于17日提出审查报告。当天下午，参议院开始举行二读会逐条讨论，至3月8日，全案三读通过。二读会据以进行的这个审查报告，则是《临时约法》的第三个草案。

上述情况说明，《临时约法》是由各省代表会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制订的。其间曾经起草过三次，先后参与其事的代表和议员达23人之多，其中以革命党人居多数，也有过去的立宪派人士，但并没有宋教仁。

（摘自《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张亦工）

风云人物

良弼

良弼(1877—1912)，字赉臣，大学士伊里布之孙，满洲镶黄旗人，爱新觉罗氏。其父久宦川粤，故良弼生长于成都。少孤，刻苦好学，由文童选送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毕业后留日观操，次年十二月调回。

时值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正好有了施展学识和才能的机会。回国伊始，即在练兵处军学司办理编译事宜。光绪三十年补编译科监督，译有《参谋要略》一书。翌年七月补军学司副使。八月间，袁世凯为了拉拢良弼，咨请派其充陆军步队第八标统带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良弼仍回军学司副使原差，并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良弼还历充考验迁安、保定、马厂各处陆军各镇大臣随员长，奏充考试陆军游学毕业襄校官、提调官等差。同年，良弼等随袁世凯赴第二镇校阅，记功一次。九月，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并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良弼充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七月，派在参议上行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充修订法律馆谘议官。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初二日，陆军部校阅四镇请奖案内，良弼以应升之级记名。五月初二日，两江总督端方奏称良弼“才猷敏练，学术精深”、“其宅心忠亮，足备武学顾问之选”。六月七日，日本驻清朝公使伊集院授良弼三等旭日勋章。十四日充禁卫军步队第一协统领，并赏给陆军协都统衔。由于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不懂军事，良弼实际上负责禁卫军日常操练和管理工作。

良弼是清末亲贵中有胆有识，才情卓越的军事人才，与吴禄贞、兰天蔚并称“士官三杰”，载涛依为谋主。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举凡陆军章制，教育规划莫不悉心赞划。

良弼尤留意人才，不存满汉偏见，唯才是举，自将帅以至军士莫不延纳，思有所建树。良弼推崇吴禄贞(湖北云梦人)、吴稚晖(江苏武进人)之才，曾言：“云梦之有才，云梦之可用。”说吴稚晖宗旨不同，但“此君真奇”，并赞同电促吴稚晖归国任首相。良弼与他们交好。良对吴禄贞说：“吾两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吴禄贞在练兵处任职时，周历蒙古、陕甘，巡视边兵，体察形势，并放言革命。陕甘总督升允陷之，得良弼在京营救，乃免于死。宣统三年吴禄贞出任第六镇统制，亦为良弼保荐。

良弼疑袁最深，反对袁世凯篡权。早在练兵处时，良弼对袁世凯把持练兵处、扩充实力、拥兵自重、权倾朝野就极为不满。他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生作班底，才敌得过他。”所以练兵处成立时向各省调士官生吴禄贞、哈汉章，易乃谦、沈尚濂，卢静远、章遹骏、陈其采、冯耿光等数十人来京，在练兵处任职。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作为士官派与北洋争夺军权的领导者”。

武昌起义后，王公贵人皆气馁，莫知所为。良弼竭尽

犬马之力，独与三数杰才，朝夕规划，外联群帅，内安当国，图救清廷。十月初二日，良弼致无锡密友廉泉函说："武夫热血犹是沸腾满腔，并无暮气，尚可一用。"廉泉见此，知无可言，乃嘱其妻吴芝瑛致函良弼，望其认清时局，放弃君究。函称："今日全国人心为革命风潮所鼓动，如水赴壑，不可遏制。"并引史正公之言："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并望密商载涛以五帝官天下之义，开陈主知，推位让贤，放弃君主，赞成共和。良弼得此函涕出，嘱其岳母："为我好好秘存毋失。"十一月初二日，良弼回函称："弟现在仍是从前宗旨，非到天荒地老，必力持不易。"

良弼虽思有所建树，但因资历尚浅，又与奕劻、荫昌不协，终未被大用，他的建议亦未被采纳，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见清廷无所作为，便联合一邦维护清室的王公亲贵组织宗社党。他说："上年我奏请释党人，开国会，皆不我听，今秋变起，请以禁军赴前敌，又不我用，而委之荫昌；内廷纷争，外患四起，我宗社之亡将无日矣！我见政府不可为，始组织宗社党。"宗社党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和《北京旗汉军民函启》，攻击袁世凯"蔑视纲常，损辱国体"，"其居心更不可问"。并呼吁清室王公"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12年1月17日），隆裕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清帝逊位，贝子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奕劻附和之。而良弼等一批少壮亲贵坚持反对退位。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还威胁主张退位的清室王公。三十日又开御前会议，奕劻未到，溥伦忽而反对退位，"系为宗社党人所挟持"。良弼等人还运动第一镇（满人组成）和禁卫军合力反对共和，并以激烈之手段对付袁内阁。十二月初五日，宗社党上书袁内阁，词语极为严厉，谓"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良弼与袁世凯的矛盾激发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段祺瑞等50名将领通电逼宫，袁世凯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无敢有异词者。良弼说："现在除共和无别路"，并在赞成共和单上签名。会后受袁令，往劝肃王善耆，不可坚持反对逊位。

袁世凯为了消除逼宫窃国的阻力，阴谋害死良弼。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冯国璋因攻陷汉口封男爵时，良弼就看出袁世凯有夺取禁卫军的意思，所以一再向隆裕密请，"先发制人，除掉袁世凯"。徐世昌将此事告诉袁世凯，袁子袁克定与汪精卫密谋，运动京津同盟会暗杀良弼。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出于革命义愤，对良弼阻止清帝退位非常愤慨，便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于是假崇恭之名炸良弼。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晚），良弼从肃王善耆府返回西安门外红罗厂本寓，下车等候开门之际，适有一马车停于门外，彭家珍自车出，喊称拜会良大人，接着抛掷炸弹，良弼当即炸伤左股，倒在门前台阶上。次日，请日本医生诊治，锯去左腿，但生命尚无危险。袁世凯见良弼遇炸未死，又遣赵秉钧买嘱一中医，进服药酒一杯。良弼服药后，伤处剧痛，辗转呼号，气促神昏，于十二月十一日晚身亡。终年35岁。民国十一年，良弼密友廉泉募赀，并请准黎元洪总统，建良公祠于西城翊教寺之东，并开追悼会。吴芝瑛辑《天荒地老录》一书。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彭　家　珍

彭家珍（1888—1912），字席儒，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1888年4月9日）生。彭家先世清初由湖南常宁迁至四川金堂（今成都市金堂县）。祖父贞吉，岁贡，曾任训导。父亲仕勋，戊戌时任教四川尊经书院，并同该院山长宋育仁办《蜀学报》，宣传新学。后以四川官费留学日本，曾任学部主事。仕勋颇具改革思想和民族观念。家珍一岁多时，其母即因病卧床，不能抚育，遂由其父亲任鞠养。五岁时，父亲教他读文天祥《正气歌》；稍长，又从父学习黄宗羲等人的论著。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家珍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三十二年（1906年）春，他以毕业考试最优等的成绩，受到四川总督锡良赏识并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及购买军械。在日期间，他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结纳进步人士，"油然萌保种救亡舍我其谁之志。"回国后，曾任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军事教官，四川新军第六十六标第一营左队排长、左队队官、弁目队教练官等职。三十三年（1907年），彭家珍在成都加入同盟会，并利用职务之便，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四川同盟会员策划的成都起义未发事泄，他"阴使人密告党众，而阳为政府严备守，由是党人多获免，被逮者数人而已。"新军统制朱庆澜颇疑彭家珍泄露机密，暗中加以监视。家珍自知活动困难，遂于宣统元年（1909年）夏离川赴滇，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练官，同年九月，升任本堂提调。在滇期间，彭家珍暗中联络党人，作起义准备。父亲屡次函促家珍返川与王清贞女士完婚，但他回信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愿大人勿念。"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彭家珍随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东北，被委任为奉天讲武堂学兵队队官兼教习，并结识了该堂监督旗人崇恭。在奉天（今辽宁），他与东北地区的同盟会员蓝天蔚、商震、程起陆等经常秘密集会，策划起义，因力量过于单薄，未敢贸然行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后，委彭家珍为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

彭家珍与驻滦州新军第二十镇中的同盟会员暗通声气，密谋大举。他还将兵站的免费乘车券、半价票、输送军

用物品票等私赠革命党人，作来往京奉沿线之用。

这年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汪精卫等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彭家珍参与其事，并在军事部任事。他奉派与黄复生、赵铁桥、罗伟章等赴上海联络革命党人。在沪期间，他与黄复生致力于研制炸弹。不久，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彭为北方招讨使，革命党人亦推选他为北方暗杀部部长。彭家珍等将所制炸弹秘密运至天津。北上之前，四川旅沪革命党人曾建议彭家珍回川主持军事，他“毅然以暗杀自任”，不愿返川，曾说：“北京为清虏根据地，四川枝叶也。拔其根本，枝叶自萎，吾愿任其难。四川之行，非吾意也。彭家珍在沪购买炸药的款项中，有二百元系天津兵站司令部军饷，赵尔巽得知后即飞咨陆军部以盗饷罪通缉。于是，彭家珍到北京后改姓名为朋嘉桢，号锡三。

彭家珍同陈宪民等在北京租凭秘密住所，筹划暗杀清室亲贵。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王金铭、施从云等举行滦州起义，袁世凯派兵镇压，革命党人密计诛袁。为此，彭、陈昼夜赶装炸弹。十一月二十八日(1912年1月16日)，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谋炸袁世凯于东华门，未成被捕。彭家珍所居住的四川营董宅遭警方搜查，仆人张顺被逮。彭家珍等避居中西旅馆四十三号，继续探寻清室诸亲贵踪迹，伺机铲除。某次，彭家珍获得一亲贵旁听券，携弹到资政院，因军警严密防范，未能得手，只得到天津暂避。十二月初一日(1912年1月29日)，资政院又开会，亲贵俱到。彭家珍从陈宪民的电话中得知消息，即刻动身，当日中午抵京，待取得炸弹后，资政院已闭会，事又不果。

几次谋杀不成，彭家珍等遂改变“一网打尽”的主意，决定“择其阻碍最力者先去之”。此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南北和谈仍在进行。磋商清帝退位后优待皇室及满蒙亲贵的条件。良弼、铁良等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旨在反对和议，阻清帝退位。时任军咨府军咨使的良弼，尤为狂獗。彭家珍认为：“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诸同志其他谋可耳，良弼虽力，我独当之。”腊八晚上，彭家珍身着标统制服，携弹佩刀，乘胶轮马车绕道往金台旅馆。甫入住室，即促店伙备马车，声称将到某处办理要事。他乘车先到军咨府及良弼住宅，均未见。再到良弼红罗厂新宅，出示崇恭名片求见。门房告以外出，引彭入坐客厅。久候不见良弼归，即起身往它处寻觅。离良弼宅不远，便碰见良弼坐车归，彭急令驭者返回，下车站在两马石之间。良弼下车，仆役即递上崇恭名片。良弼见彭家珍神色有异，便问：“夤夜至此，胡匆迫乃尔！”彭家珍当即投弹，触地爆炸。良弼左膝立断，惟筋皮相连。彭家珍亦因飞溅四射的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时年二十四岁。两天之后，良弼毙命，清室震栗，王公贵族闻风丧胆，纷纷出逃。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张振武

张振武(1877—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罗田人。后奇居竹山县，更名竹山，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幼时，聪颖过人。稍长，就读私塾，嗣入湖北师范学堂，受业于革命先达时象晋，时“每痛陈满洲专制、外人欺侮状，君辄感愤不已，革命思想，胥孕育于此。”毕业后在武昌省城黄鹤楼道小学任教员。他很善于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如讲地理就说某处原为我国土地，但被清政府所割让；讲历史就说清如何入关，如何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学生深受教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张振武引为奇耻大辱，毅然曰：“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因而变卖罗田家产，东渡日本求学。

宣统三年五月间(1911年6月)，张振武在鄂加入共进会，帮办会中理财事务。鄂事布置既毕，张即返回乡里，变卖竹山县产，以充军需，继又运动富户，筹款购械，并以一子寄崇阳鲁家，嘱咐说：“果事败垂成，当令此子继我后，而竟我志也。”表示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

武昌首义前，张振武把事先准备好的炸弹装在十多口衣箱里，运到武昌城门口。当时，由于防守武昌清吏戒严令下，守城士兵坚持要开箱检查，张振武遂“以拳碎籥锁，手血淋漓，令开视，戍兵感动，让之入。”武昌首义后，在八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的咨议局会议上，讨论关于如何组织政府等事宜。张倡设军务部，统一掌理军队编制。他被举为军务部副部长，正部长虽由孙武担任，但孙因伤不能视事，另一副部长蔡绍忠自以非党人，遇事不敢作主，故他以副部长代行部长职务。

黎元洪出任都督，张振武本不甚赞成。二十日中午，黎还在忸怩作态，他曾提议：“不如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神威，使一班忠于异族清臣皆为胆落。”后由于其他党人反复劝解，才勉强同意。

汉口、汉阳作战期间，他曾三次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鼓励革命军将士说：“革命目的在于推倒满清，现在武昌起义，多处响应，清军倾巢南犯，就靠全体官兵的努力。”他经常上前线督战。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敌军将至新沟，汉阳告急，他命令主管人持军务部名册点名编队赴援，由他亲自率领连夜开赴前线，途次受重伤落水，被卫兵救起，送往武昌治疗。及汉阳失守。张振武不顾伤病疼痛，跃马举刀，沿街呼喊：“汉阳失守，是我军疑兵之计，实无是事！”军心大定。

张振武既不满黎元洪之所为，便力谋向外发展，以赴沪购械为由，领得巨款，除正当开支外，挥霍浪费不少。鄂驻沪代表杨玉如将此事电告黎，黎即派员清查账目，并电

沪督陈其美监视其行动。张返武昌,“黎元洪问他采办了若干军械、若干服装,此问大触张怒,他说:‘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现在已经安富尊荣了,你也清起我们的账来了。’并把桌子拍的咚咚响,大发雷霆而去。后来,孙武创立民社拥黎,张虽列名其间,并不过问社事。黎一次拨款五万元充民社经费,张为报复计,亦声言要查民社和黎元洪之账,二人矛盾不断加深。

张平日过于专断,使人感到难与共事,加以他常与其他同志闹无原则纠纷,生活上也很不检点,致逐渐陷于孤立。为此,张也谋求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与大将方维过从甚密,控制将校团,以方为将校团团长;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进一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又公开对人言:“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

张既为黎元洪眼中钉,故黎极欲拔之而后快,但张在武昌首义,保卫汉阳,坚守武昌危城等战役中卓著勋劳,黎不愿也不敢居杀首义元勋之名,因电商袁世凯请调首义有功之人入京,畀张以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张初不应命;黎又电袁予以蒙古调查员名义,张仍拒绝接受;黎再电袁改东北屯垦使,设立机关,假意满足张所提的任何要求,骗张入京。张振武遂于民国元年(1912年)8月初晋京,将校团团长方维偕行。十五日晚,振武宴客于六国饭店,席散,被陆军部步兵统领逮至军政执法处,方维亦自金台旅馆逮至。张质问何故被逮,问官以黎元洪电出示,振武痛斥其妄,复以袁世凯命令出示,振武感慨地说:“死耳,夫复何言,竖子无良,乃一至此耶!”促速行刑,遂于翌日凌晨一时与方维同被枪决。

为掩人耳目计,黎元洪于给张振武罗织罪名的同时,又阳示哀伤,表示自己不得已而杀张之苦衷,并请求“袁大总统”“予以处分,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并致电袁世凯称:“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勋未彰”,故“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往尊祭,开会追悼,以致哀魂”。27日,张遗体由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28日,黎元洪亲至抱冰堂致祭,发给遗属恤金一次两千元。所办学校改为公立;《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当时,不少革命党人虽群起抗争,为张振武鸣冤辩诬,但迄无成效。荏苒至夏秋间,南北调和的妥协气氛一度转浓,由袁世凯、黎元洪合谋制造的杀害张振武的冤狱,就不了了之。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冯　如

冯如(1883～1912)冯如,号鼎三,广东恩平人,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制造家和飞行家。

冯如出身贫苦,12岁随表兄到美国旧金山做苦工。1901年起,转往纽约工厂,专攻机器制造。1906年学成回到旧金山时,已通晓36种机器,还设计制造出抽水机、打桩机和无线电收发报机。

日俄战争时,他说:“日俄战争,大不利于中国”。为了祖国的独立,实现有“千数百万飞机分守中国港口”,“以固吾幸”,“以慑强邻”的宏愿,他决心攻克设计制造飞机的技术难关。

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美国莱特兄弟于1903年12月发明制造的。1907年9月,冯如租得一间厂房,第二年4月也试制出一架飞机,但往奥克兰麦园试飞无效。在以后的研制活动中,他屡遭挫折:厂房被焚;飞机坠地,险些丧生;股东不复投资。这时,父母也来信催他回家。冯如说:“飞机不成,誓不返国!”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在麦园支盖的蓬屋里制成一架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1908年9月21日,冯如驾机试飞,飞行距离达2640英尺,打破了莱特兄弟首次试飞航程仅852英尺的成绩。这天,孙中山正在奥克兰,特地去观看了冯如的试飞,对他“赞勉备至”。隔了一天,《旧金山观察者报》以《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试飞。冯如揭开了中国航空史上的第一页。

不久,冯如和华侨黄梓材发起了创立广东机器制造公司,1909年10月,公司成立,黄梓材为总理,冯如为总机械师。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飞机制造公司。

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一种性能更好的飞机,机翼长29.6英尺,翼宽4.6英尺,内燃机30匹马力,螺旋桨每分钟1200转。10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国际飞行比赛大会上,冯如驾着它创航程20英里、时速65英里、高度700多英尺的世界记录,荣获优等奖,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

当时,美国想以重金聘他为教师,但他想造福于祖国,断然拒绝了美国的高薪聘用。正在美国游历的我国著名文化出版界人张元济闻讯邀请冯如归国。冯如表示:“吾侪不忘祖国,能以菲才薄技贡献于社会,此吾之深愿也!”1911年2月,冯如将广东机器制造公司改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回广州效外的燕塘,并规定其宗旨是“壮国体,挽利权”。不久,他偕同三名学生,带着制造飞机的机器和自制的一架单翼30匹马力汽油发动机飞机和一架双翼75马力汽油发动飞机返回祖国。但,两广总督张鸣岐对从美国归来的冯如不放心,唯恐他暗通革命党人,不准他作飞机表演,并监视他的行动,冯如极为愤恨。

11月9日广东独立后,冯如毅然参加了革命军,被任命为陆军飞机长。他和同志一起准备组织北伐飞机侦察队配合革命军作战。因南北议和,宣布“统一”,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1912年中国除了广州有冯如带领的飞行队外,南京

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华侨革命飞行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批准在后湖空地修建飞机场供他们使用，还有沪军都督府和湖北军政府的航空队，但飞机都购自国外。总之，中国的空军力量是微弱的，航空事业是落后的。

为了发展祖国航空事业，唤起各界关注，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呈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批准，于1912年8月25日十一点钟在燕塘作飞行表演。观众人山人海。他亲自驾驶一架双翼飞机飞上120尺高空，向东南飞行约五里后调转机头开始降落。当飞机快要着地时，他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名儿童，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猛拉操纵杆。飞机急剧上升，剧烈震荡，以致机件碰损下坠。冯如受伤，抢救无效。死时，年仅30岁。冯如垂危时曾嘱咐其学生说："吾死之后，尔等勿因是而失其进取之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珍闻轶事

民国初年外交部

中国的外交部始于1912年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此之前，清政府虽设有外交机关，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部。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清政府曾设立"抚夷局"，作为专门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办事处。1861年，在抚夷局的基础上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是为中国近代正式设立外交机关的开始。总理衙门的职官分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分三种，一种由亲王、郡王、贝勒担任，一种由军机大臣兼任，一种由内阁和各部院满汉堂官担任，都由皇帝特简，无定额，最少时仅奕䜣、文祥、桂良3人，最多时达12人。章京又称司员，分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四种，总共40人左右，满汉各半。总理衙门主要掌管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并兼管对外贸易和海关税务，由于它是当时唯一的对外机关，因此凡属洋务，如电线、铁路、矿务以及海军、制造、传教等等都由它掌管，权力相当于内阁，故堪称"洋务内阁"。

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条款，清政府又被迫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外务部的组织分4司、1厅、5处，即和会司、考工司、榷算司、庶务司、司务厅及俄、德、法、英、日5处。外务部的职官首为总理亲王，下有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各1人，左右侍郎各1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另有一些办事人员。外务部的职掌仍然十分广泛，凡带有"洋"字关系的事务均归其管辖，故仍是一个洋务衙门，只是地位比总理衙门还要优崇些罢了。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式设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部。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各部总长由总统任命。当时的外交部位列陆军部、海军部之后，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另有秘书1人，书记6人，参事4人，司长3人，以及佥事、主事、录事、翻译、通事、工事等若干人。外交部设3个司，即外政司、通商司和庶务司。外政司主要处理有关国际交涉事项及关于界务、铁路、矿务、电线等交涉事项；通商司主管有关保护在外侨民、通商行船等事项，以及税务、邮政、外债等交涉事项；庶务司主管办理图书及国际礼仪事项及接待外宾、监理外人传教、保护外人游历等事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取得列强政治上的承认，尚不可能采取革命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因此不但承认清朝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负责偿还清朝政府的全部外债和赔偿，尊重各国及其人民在中国所获得的种种权利，而且外交总长王宠惠还特别颁行了保护租界的10条规则，例如不许华人携带武器在租界行走，不得缉捕逃入或潜藏在租界的人犯，不准在租界搜查和扣留偷运接济敌人军火的外国兵轮等。即便如此，临时政府仍然没有获得列强的支持。各帝国主义出于侵略本性，以严守"中立"为名，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他们为加剧革命政府的财政困难，将中国海关的全部收入控制在总税务司手中，并且否认南京临时政府有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的资格，以逼迫革命派让出政权。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根据临时约法，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于3月15日到南京，19日列席临时参议院宣布政见，提出内阁名单，由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经临时参议院批准，29日唐绍仪就开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4月1日，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也随之北迁，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正式开始了北洋政府的统治。

在北洋政府的内阁中，外交部雄居首位，如内阁总理辞职，便由外交总长兼代，故唐绍仪于6月27日辞职后，即由外交总长陆征祥兼代内阁总理。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几个月内就换了3任内阁，唐绍仪内阁上任不到3个月就倒台了，陆征祥内阁则更短，只存在54天，则又开始

了赵秉钧内阁。内阁虽更换频繁，外交部则基本上一直由陆征祥主持。陆征祥由于多年在国外任清廷驻外公使翻译、参赞及驻荷兰公使、驻俄公使，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并且深谙外交应酬交际，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官。他在国内无党无派，自我标榜"超然主义"，在其代理内阁总理时，曾戏称补充阁员名单如"开菜单作生日"，一时传为笑柄，同时引起了参议院的反感，因此陆征祥当了 54 天的内阁总理就下了台。

陆征祥在政治上标榜"超然主义"，但在组织外交部时却郑重其事，严格要求。在唐绍仪内阁时，外交总长陆征祥便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提出了一个新的组织法，即由 1 名总长和 1 名次长主持部务。另外设有由 4 名秘书组成的秘书处和 4 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参事负责研究处理条约和有关外交部的法令、规章的实施等法律问题以及其他事务。秘书主要是参加外交总长或次长和各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的会晤、走访东交民巷的各国使节。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当时外国使团的地位要高于中国外交部。凡是外交总长回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不是召他来部，而是派秘书去公使馆答复。因此当时外交部的 4 个秘书分日、英、法、德 4 个语种，分别负责走访日本使馆，讲英语的各国使馆，讲法语的各国使馆以及讲德语的各国使馆。由此可见当时北洋政府性质之一斑。

（顾荃惠摘自《民国春秋》）

鲁迅参与设计民国初年的国徽

辛亥革命之后，鲁迅在实践中已经看到了这次革命的许多弱点，但他还是热切希望这个"民国"能够气运长久，不断改善。他认为民国的建立毕竟是个历史的进步。因此他曾在自己任职的教育部的工作中付出许多努力，以图发展新的思想、新制度。

鲁迅为"民国"做过几件甚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设计国徽。1912 年 5 月鲁迅随同政府的教育部迁到北京之后。8 月他就接受了负责设计国徽的任务，这件工作，指定由鲁迅（周树人）、许寿裳、钱稻孙三人完成，并且时间限制很短。

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件容易进行的工作，中国前此并无国徽，这更增加了开创性的困难。他们这三个人，都曾留学日本，眼界较为开阔。许寿裳优于政治与哲学的研究，鲁迅则对历史、文化极有造诣；而钱稻孙是一个专业美术工作者。这三个人配合起来，倒甚得体。经过他们的一番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据《鲁迅日记》来看，他们大约于 1912 年 8 月中旬接受任务，经过几天研究准备，这月下旬便开始了设计工作。8 月 22 日，三人曾经一同就饮于广和居，席间除议当天公布的官职任命之外，还商定国徽的具体设计方案。23 日钱稻孙即与鲁迅一同到琉璃厂"购纸"。24 日至 27 日，他们又几番往来于彼此的寓所之间，就商具体的设计制图工作。到 28 日，鲁迅写道："与稻孙、季市（按即许寿裳）同拟国徽告成，以交范总长，一为十二章，一为旗鉴，并简章二，共四图"，可见这项任务已经完成。

目前留存下来的仅为"十二章"一图，其余三图均未发现。这些图形，当为钱稻孙所为，但说明文字却是出自鲁迅的手笔。为了明白设计意图，现将"说明书"中有关部分录载于后：

"仅按西国国徽，由来甚久，其勾萌在个人，而曼衍以赅一国。……今中华民国，已定嘉禾为国微，而图象简质，宜求辅佐，俾足以方驾他徽，无虑朴素。惟历史殊特，异乎欧西，彼所尚者，此不能用，自应远据前史，更立新图，确有本柢，庶几有当。考诸载籍，源之古者，莫如龙，然已横受抵排，不容作绘。更思其次，则有十二章，上见于书，其源亦远，汉唐以来，说经者曰：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学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今即从其说，相度其宜，会合错综，拟为中华民国徽识。作绘之法，为嘉禾在于中，是为中心，嘉禾之状，取诸汉五瑞图石刻。干者，所以拟盾也，干后为黼，上缀粉米，黼上为日，其下为山，然因山作真形，虑无所置，则结缕成篆文，而以黻充其隙际。黼之左右，为龙与华虫，各持宗彝，龙复有火丽其身，月属于角，华虫则其味衔藻，其首戴星。凡此造作改为，皆所以求合度而图调和，国徽大体，似已略具。……"这个说明书的起首部分讲了国徽由宗族部落的标志发展而成的历史；结尾部分则说明由于国微图案之庄重繁严，不便随处皆用，所以另作了"五穗嘉禾"及"双穗嘉禾"等简图，以备日常正式用作政府笺证之类的标志图案。然而这些设计原图未能留下，所以实用情况也未得详知。

但有一项是用过的，那就是 1912 年 8 月至 12 月之间铸造的银元的一面，用的就是这个国徽的图案，这当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 1986 年学术界曾以"鲁迅是否设计过'龙凤币'而有过争端。当时我曾做过一些推想。根据 1912 年 11 月 1 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附银元及状面拟稿各一枚"记载，我认为：（一）寄银元一枚显系做为"样品"而非作为汇款；（二）寄样品而带设计原稿，只有两种情况能够做到，一是"造币局"；二是设计者本人。但鲁迅只有可能属于后者；（三）是否朋友设计后鲁迅取得原稿寄给老弟？但这"朋友"必须也是"老弟"的朋友才有可能，否则便无这种必要。根据鲁迅当时的情况，只有同在教育部工作的许寿裳是其"二弟"所认识的，然而"三弟"并不相识；况且许寿裳个人不事美术，不做设计，所以此想不能成立；（四）鲁迅自己有无条件设

计？这个可能性有的，当年8月他刚与许寿裳、钱稻孙三人共同做过国徽的设计，而据世界通例，国徽图案是可以用于币面标志的，因此，我推想这次所寄银元的币面，有可能就是鲁迅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

但是推想毕竟只能是推想，不过不久却居然得到了证实，原来当1961年鲁迅博物馆的同志访问钱稻孙时，已经早就谈过此事。钱稻孙说："总统府要定国徽，由陈任中传达，让鲁迅、许寿裳和我同拟。……起草由我负责，国徽的说明是鲁迅写的，……国徽上是十二件东西，拟好之后交部里了，很用了一阵子，驻各国使馆用了，国书上用了，证书上用了，钱上也用了。"又说："我那时跟鲁迅、许季茀（按即许寿裳）作过一个银钱的图案，样式太古了，没有采用，结果钱上用了国徽的一面。"如此，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了。

（摘自《民国春秋》）

袁世凯与孙中山

一九一二年八月，袁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面，意在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同时企图通过会见，进行拉拢，把中山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孙中山及其夫人到达北京之日，政府迎接的人很多。袁在事先命令对孙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原来的总统府，这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而且便于警卫，袁为接孙来京，筹划甚久，用心很深。他故意把原总统府腾让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住，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

孙到京后，按"行客拜坐客"的老规矩，先拜访了袁。袁也恭敬如仪地作了回拜。一时石大人胡同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客，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还有不少新闻记者。

袁为了表示竭诚招待，指派我和大礼官黄开文、常川在石大人胡同孙的行邸照料。我们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等支派使唤。孙如公出，即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否则即在行邸备膳陪座。

黄兴后孙半个月到了北京，陈其美也陪黄同来。总统府举行了欢迎孙、黄的公宴，袁亲自到场主持。因有孙夫人参加，所以除了邀请国务院各总长、次长及总统府各重要人员共七、八十人为陪宾外，袁夫人和府院大员的夫人以及各部总长、次长夫人也都参加，我妻沈友琴亦出席招待。晚宴摆在居仁堂大殿。开宴之始，袁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无非是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一套客气话。继而孙、黄依次讲话，话亦简短，态度毫无拘束，内容未涉及政治。之后，有些人亦发表了欢迎辞。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本来打算讲些话出出风头，向民党人表示一下他在袁面前很有地 位。不想他讲话从恭维孙很自然地转而恭维袁，继而牵涉到政治，批评了民党几句，刺激当时的上宾孙、黄。傅自以为说了几句这类的话，顺便煞煞民党的威风。傅是留日学生，本来不擅辞令，以致把当场的气氛搞得不伦不类。傅这番话并没使袁感觉高兴，袁当场就阻拦了他一下，说："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中山气量宽，看去面无愠色。后来，袁埋怨傅那天的话说得很不得体，说："那些是我们背地里的话，你未经我事先许可，怎好随便讲呢？"此后，袁因傅处事不得体，就不大重视他了。相反，袁对我夫妇俩当时的周旋，认为合情合式，得体得当，很满意。

这次宴会，除出了这个小岔子外，经过很好。袁孙之间，两位夫人之间，都表现得很亲热。宴会场中最活跃的要算徐世昌、段芝贵、梁士诒和我夫妇了。

孙等在京逗留前后约两三个星期，其后孙即由孔祥熙陪同，往山西去和阎锡山会面。

袁对孙来，很重视。他们曾面谈何事，我不得而知，只见梁士诒对孙特别凑近，也极力在各方面帮孙的忙。我本来认为梁、孙有同乡感情，所以格外亲密。后来才听说，袁早已同梁预先商量妥当，故意由梁出来同孙拉拢，主要的目的是要孙向全国公开表示永远不愿做大总统，而专心为国家搞实业，并且迎合着孙要办全国铁路的愿望，要求孙对全国宣布他要办铁路的决心。这件事确实是办到了。不久，袁就特授孙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接着又授黄兴以陆军上将衔。

这样，袁即认为孙、黄已被笼络，政治大局不成问题了。

（唐在礼《辛亥后的袁世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袁世凯与逊清贵族的关系

民国成立后，袁对逊清皇室的奴才根性依然未除，故洪宪失败、病势垂危时，犹遗言成殓时不穿龙袍，因"无颜见两宫于地下"。

在逊清贵族中，袁与荫昌相知最深。袁因彼曾留学德国，学过军事，遂赐以上将衔，任命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在袁、黎、徐、冯总统任内连任侍从武官长，至曹锟贿选总统就任后始去职，盖荫昌曾任武备学堂总办，曹锟为武备学堂出身，不敢以老师为侍从也）。

除荫昌外，袁与世续（曾任军机大臣，民国成立后，在故宫内溥仪小朝廷中任内务部大臣）交结甚密。洪宪称帝眼见即将成为事实时，世续曾突然到总统府求见袁，袁在居仁堂东房洋客厅（通常用于接见外宾者）接见。世续说："听说大总统就要即位称帝，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想从宫

里迁出来，让新皇帝居住。我们是不是可以迁到颐和园居住？再者，听说大总统有几位小姐，象五小姐、六小姐，跟宣统皇上年龄相仿，是不是可以联个姻亲？”世续出言甚为委婉，盖逊清王室中人见袁氏称帝在即，对自身安全不无戒心，依然蛰居后宫，颇有不妥，故作此姿态，一探袁氏风色。联姻计划如能实现，对溥仪未来地位亦多一重保障也。

袁自亦洞察世续此种企图，当谓：“后宫院落，现在尚不急于需要，以后有机会再说，不必迁颐和园了。至于联姻的事，我的几个女孩子年纪都还小，现在还谈不到。”

袁与庆王长子载振贝子有八拜之交，在逊清时代，曾经常走他的门路。二次任总统时，曾命载振袭庆王爵位。在此时期内，载振亦曾来总统府走动，但未发生任何作用。

（陶树德）

袁世凯向太后索要传国玉玺

袁世凯在1912年当选为总统后不久，派人与清室联系，要进宫见隆裕太后。清室答复当晚7时请袁大总统进宫。

临去时袁世凯令随从一律佩带手枪，紧随左右。袁入宫见到隆裕太后，诡称腿疾未好，不能跪拜，遂行三鞠躬礼。礼毕，隆裕坐上首八仙桌旁，袁世凯坐在对面屋门后，10名随从肃立门外。寒暄后，袁世凯说，大清退位，现已是民国，传国玉玺，应归民国收回，希望太后交出来。隆裕回答说，此物早在元顺帝北逃时带走了，国朝和前明都没有传国玉玺。还强调说明，是听孝钦显皇后这样说的。袁世凯沉吟了一会，交代说，我这次来希望太后不要声张出去，以防报纸上胡乱登载。隆裕说：“这里没人多嘴，你要嘱咐你的从人就是了。”

袁世凯回府后，给跟去的10名随从每人赏了50块光洋，并交代下来：“谁泄露今天的事，小心脑袋！”

流　行　风

小说《血泪黄花》

作者陆士谔，主要内容：

该书是以叙述湖北武昌八月十九日起义为主要素材，用写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贯穿全部事实的小说。书中男主人公黄一鸣是陆军学校的毕业生，在湖北新军充当队官、英武、豪杰、倜傥，倍受黎元洪的器重。女主人公徐振华是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俊雅、温柔、贤明，父早亡，与黄一鸣的妹妹是同窗好友。黄一鸣常去学校看望妹妹，遂与振华相识。二人互相爱慕，互相钦敬，便订为婚约，尚未完娶。八月十九日湖北起义爆发，黄一鸣踊跃赴战，英勇歼敌。徐振华情意绵绵，牵肠挂肚，与黄一鸣协商后，决定女扮男装相从。战斗连战皆胜。后黄一鸣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昏迷不醒，危在旦夕，由于徐振华的精心护理，日夜陪伴，才得不死，伤愈后重返前线，报效祖国。书中的叙述八月十九日起义时，对清总督瑞澂的昏庸无能，临阵脱逃，抱头鼠窜的狼狈相，黎大都督的慷慨誓师，同胞们的积极支持和热忱助饷。军人们的英勇奋战的描写，无不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本书在当时为人们输入了共和理想，普及了军事知识。全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语言简洁。

小说《九尾龟》

作者张春帆，主要内容：

该书取名《九尾龟》的用意，作者说：“大凡妇女不端，其夫便有乌龟之号。在下这部小说，名叫九尾龟，是近年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这个富贵达官，名叫康巳生，胸无点墨，却因为会钻门路，在前清时居然爬到江西巡抚的位置，人称康中丞。后来被参丢官，卷了一笔民脂民膏，住在上海。他家里有五个姨太太，两个姑太太，两个少奶奶，算起共是九个妇女，都是行为不检，生活放荡的，因此，“就有轻薄少年，把康中丞起了一个绰号，就叫作九尾龟”。但“九尾龟”康中丞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主人公却是一个风流才子章秋谷。此人论其貌，是“白晰丰颐，长身玉立”。论其才，是“胸罗星斗，倚马万言”。因此他走南到北，嫖堂子，玩女人，总是手到擒来，无往不利的。而且章秋谷既有文才，又会武艺，一身好功夫，有几次流氓要暗算他，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而去。他在辛亥革

命后，为了帮朋友的忙，还去做了几次官，真是“上马能杀贼，下马草露布”。书中描写章秋谷性情之豪侠，举动之阔绰，气概之豪迈，真可谓宇宙间独一无二之全才。嫖客和妓女的故事，在书中络绎不绝地出现，成为有闲阶级的“嫖学教科书”。全书十三集以前，时代背景是晚清，十三集以下，便是民国了。但晚清也罢，民国也罢，堂子里还是照样做生意，连得嫖客、妓女也还是那几个人物。该书系写妓院生活之吴语小说，用笔秀丽，叙事轻圆流利，是吴语小说中较有名的一部。但该书缺乏深沉的见解及深刻的描写，对章秋谷这个“才子加流氓”的人物又过于渲染和美化。

小说《断鸿零雁记》

作者苏曼殊，主要内容：

本书带有自传性特点，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落发为僧后的主人公“余”与日本姑娘静子在爱情上的遭遇，开头和结尾穿插了主人公与雪梅（主人公在中国由父母订下的婚姻）在感情上的波折，表现了爱情和宗教的思想矛盾。作品一开始，主人公便落发为僧，感叹身世飘零。在遇到乳母得知自己身世后，每日卖花攒钱以期东归日本寻母。一日遇未婚妻雪梅相助百金，回到日本母子团聚。在姨家遇表姐静子，两人相爱，但身为佛陀的“余”以佛法自律，思想上极为困苦。终于下决心脱离尘俗，回到中国灵隐寺。在一次做法事时又巧遇卖花时相识的麦氏兄妹，得知雪梅已为他忧思致死。书末写“余”回到广东寻雪梅墓不得，感情真挚。全书主要叙述了主人公绵绵不断的思亲之情，反映了在追求美好生活失败之际的感伤情绪，其间穿插了一些爱国主义思想，如借静子的口叙说明末遗民朱舜水的故事，但总的倾向是忧郁的，感伤的，文笔凄婉，感人至深。

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

作者荒江钓叟，主要内容：

写华侨乘气球寻妻、儿事。湖南人龙孟华因行刺权臣事败携眷逃往南洋，途中所乘轮船被其它的船撞沉，致使夫妻离散。龙孟华被救后在南洋的松盖芙蓉城定居，并任华侨开办的美华公司总办。倏忽间八年过去，八年间，龙孟华无一刻不思念妻子。后知妻子也遇救并与恩人在美国纽约定居，并生一子，便请日本友人玉太郎一同乘气球前往寻找。不料到纽约后，其妻所居之所遭火焚毁，妻子已随恩人前往欧洲，于是又赶往英国伦敦。待到伦敦后，其妻又离开欧洲。就这样，他们追踪着其妻的踪迹，先奔非洲，而后又赴印度孟买。到孟买始知其所乘邮船行至印度洋时遭陨星袭击，其妻下落不明。于是又前往赤道附近的一群岛屿中逐岛寻觅。这些岛大多蛮荒未辟，即使有人的岛屿或野蛮、或愚顽、或习俗怪异，或狮虎横行、或隐士出没，咸落后。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合家团聚。其中，穿插蛰居海外的义士歼击权奸，壮烈捐躯事。小说通过龙孟华寻妻、儿的故事，介绍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南洋诸岛的风情，着意讴歌了具有国际色彩的友谊，小说还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礼赞、野蛮社会的嘲讽，反衬、揭示清末的落后、野蛮。作者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对晚清权臣当道、社会腐恶、大众愚钝的现实痛心疾首的情感不时流于笔端。作品对驻外领事对华侨只知敲诈勒索，而不行保护之职的现象有所揭露，对由于国家贫弱，使人民倍受他人歧视、欺辱的现实有所表现。其中还穿插一些科学知识的介绍，诸如医学，天文学等。尤其是那个气球，日行千万里，颇似飞机。该小说包蕴广博，然流于泛泛，在叙事、状物、写人方面文笔粗疏。但描写龙孟华对妻子的感情，却千回百转，细腻感人。

诗《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

诗《盼捷二首》（选一）

龙蟠虎踞闹英雄，似听登台唱大风。
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

（高旭）

历史档案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孙文

1912年1月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bó，勃)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行动，整齐划一，夫岂甚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刻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

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次虽屡起屡踬(zh，治)，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biāo，标)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交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83页)

1912年中国政府五厘息金镑借款合同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北京。

本合同照一千九百十二年二月二十号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度支部副首领周自齐与华比银行在北京所订之草合同，于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三月十四号，即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四号，在北京订立，一方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度支首领所派陆宗兴与为代表，禀承大总统孙文、袁世凯之意见行事，此合同经两大总统核准现今与将来之中国政府均负责任，须得国会之可决，一方面为华比银行(以下单称银行)代表国际财政机关者，所订条文如左：

第一条　借款之名称及额数　中国政府欲向外国资本家约借金镑一百万，约佛郎二千五百万，本银行愿将此数预交中国政府。此借款以本合同签字之日为名称，即名为：一千九百十二年中国政府五厘息金镑借款。

第二条　用度　此借款之用度为统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组织国家与直省之完善行政机关及拯济人民与商界之困苦所必需之经费。

第三条　担保　中国中央政府对此项借款有直接偿还义务，须自行维持其忠心与信用，担保本借款本息之如期偿还，实行本政府所认定一切行为。

第四条　抵押品　中国政府以中国财政债券一百万镑，约二千五百万佛郎，交与本银行，每次计一万镑。此项财政债券以国家之通常岁入为担保，借款本息以京张铁路之净利及财产为首先抵押。

担保债券之岁入每年以银八十万两为度，即宣布此数与他项借款抵押物或保证品不得混杂。

指为抵押品之涉入，债权者不得干涉，如本息到期不还，过一定时日后，本政府不得阻止本银行之干涉，以为保护本银行利益之必要。

第五条　利息　借款息率过年五厘，照所借全数计算，利息每半年一付，自本合同签押之日算起，从此日起每半年为一期，到期前十四日须将息款交付。

第六条　折扣　本银行收取上文所言中国财政债券，照票定价扣百分之三，即九七扣(百分之九十七)。债券由大总统与财政总长签押。

第七条　债券交换公债票　如本银行愿意，可将财政债券交换中国政府财政公债票，其数目听银行之便。

第八条　公债票之签押　公债票或刷印或雕刻高级官吏签名盖章，皆由中国财政行政机关经理。如本银行以为必要，则由北京中国公使或他处官员盖印签字，以证明公债票之发行与售卖均正式许准，而中国政府担负责任

第九条　费用　设此种公债票兑换财政债券，所有关系发行之一切费用均归本银行担任。

第十条　借款之期限　借款之期以本合同签押后一年为止。此期限既过，中国政府将财政债券或公债票照其票面定价赎回。

第十一条　免税　关系本借款之债票及还款，中国均不抽税。

第十二条　债票遗失　如公债票遗失、被窃或毁灭，本银行与中国政府之代表应照中国政府与外国诸银行从前订合同之条款，用通常办法，妥保两方面之利益。

第十三条　偿还　本合同签押后十五日，除百分之三折扣外，借款全数应由本银行在比国京城或伦敦或巴黎汇交本政府。借款交与中国，应由本银行或本银行所指定之他银行经理，汇兑之价照与本政府所议定之公平价目为准。

第十四条　赎回　本政府将来从欧洲借款内提出款项偿还本债之本息，设本政府欲於于期限未满之前偿还本债，其息仍须照一年计算。

如将来由本银行经手发行公债(用以赎回借券或公债票)，本债券或公债票可照票面定价作九八五扣(即百分之九十八半)赎回，不必照票面之全价。

借券或公债票及其利息赎还之后，本合同即行取消，惟本合同第十五条仍继续有效，本政府仍负责任。

设本政府欲从中国政府所有经费内提出款项偿还本债款之本息，可用纹银(币制规定后即用全国通行之国币)于每次还期十四日前在上海交付本银行纹银或国币之数，须足以抵在欧洲兑换每次偿还金之数，由订约银行或所指定之他银行经理，以与本政府所议定之公平价目为准。

第十五条　优先权　本政府因本银行照本合同以财力协助本政府之故，愿以借债之优先权予本银行，其总数以本银行出借至一千万镑之多为限，惟本银行所拟之借款条件必须与他机关所拟者利益相等。此一千万镑之数至少有五百万镑于本合同签押之日后十二个月内向本银行筹借，惟以市面于中国政府有利益为断。中国政府将来借债，可请本银行承办，惟所拟条件必须比他机关所定者较为有益于中国政府。

第十六条　通知驻华公使　本合同由[原文空几格]签押，因本银行敦请，比、英、法三国驻北京公使由外务部将本合同正式通告。〔注〕

第十七条　本合同之分数　本合同共缮华、英文各六份，三份由中国政府保存，三份由本银行保存。解释本合同时如有疑义，以英文本为准。

一千九百十二年三月十四号，即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四日，两造签押。

国民党宣言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此消长倚伏之数，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而无往不如是也。天相中国，帝制殄灭，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

今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其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于一阶级、一部分，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其在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

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之类，其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伦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恒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

民。在实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法律上之议会与政府，又不过藉法力，俾其意思与行为，〈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实事上之政党也。是故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

且夫政党之为物，既非可苟焉以成，故与他种国家之他种中心势力同其趋向，非具有所谓(强健而良善)之条件，不足以达其目的。强健而良善之条件者非他，即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是也。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靳〔蕲〕响。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和。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已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是故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其所以成为政治之中心势力，实国家进化自然之理，势非如他之普通结社，可以若有若无焉者也。

今中国共和立宪之制肇兴久矣，举国喁喁望治，皆欲求所以建设新国家之术。然为问国中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果何在乎前?〔有〕识之士，皇然忧时，援引徒众，杂糅庞合，树帜立垒，号曰政党者亦众矣。然为问适于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者谁乎?纵曰庶几将有近似者焉，然又为问能合于共和立宪国之原则，不以类似他种国家之他种中心势力杂乎其间，而无愧为共和立宪国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者谁乎？质而言之，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有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而胜任愉快者。夫共和立宪国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而其共和立宪犹可信者，而今乃不然，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嗟乎！兴言及此，我国人其尚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国人之有志从事于政党者，其尚不知所以自处之道乎！

曩者吾人痛帝政之专制也，共图摧去之，以有中国同盟会。比及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时则俊士云起，天下风动，结社集会，以谈国家事者比比焉。吾人求治之心，急切莫待，于是不谋而合，投袂而起，又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之组织。凡此诸党，靳(蕲)响所及，无非期以利。国福民，以臻于强健良善之境。然而志愿虽宏，力行匪易，分道扬镳，艰于整肃。数月以来，略有发抒而不克奏齐一之功，用树广大之风声，所谓不适于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者，吾诸党盖亦不免居其一焉(此吾人深自引责而不能一日安者)。若不图改统〔弦〕更张之策，为集中统一之谋，则是吾人放弃共和国民之天职，罪莫大焉。

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吾人尤不敢不有以正之，示天下以范畴。四顾茫茫，此尤不得不以此遗大图艰之业，自相诏勉者耳。爰集众议，询谋佥同。继自今，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舍其旧而新是谋，以从事于民国建设之事，以靳〔蕲〕渐达于为共和立宪国之政治中心势力，且以求符于政党原则，成为大群，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众志既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故斟酌损益，义取适时，概列五事，以为揭橥：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凡此五者，纲领略备，若夫条目，则当与时因应，不克固定。

嗟乎！时难方殷，前途正远，继自今，吾党循序以进，悬的以赴，不务虚高，不涉旁歧，孜孜以吾党之信条为期，其于所谓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庶几可以计程跻之乎！由是而之焉，则将来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亦庶几可以归于政党之一途，而有以副乎共和立宪国之实质。世之君子，其亦有乐与从事者乎！是尤吾党之人所愿为执鞭者耳。

中华民国元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同盟会本部
统一共和党本部
国民公党本部　公布
国民共进会本部
共和实进会本部

(据北京《民主报》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黎元洪请袁世凯杀张振武密电

1912年8月11日

大总统钧鉴：捷密。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

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班。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为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祸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

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者，就近酌拨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淫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阘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元洪叩。真。印。

（《政府公报》，1912 年 8 月 18 日）

中国同盟会本部开除黎元洪启事

启者。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查黎系本会协理，此等行事，实与本会名誉攸关。爰召集职员、评议两部联合议决，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与本会断绝关系。至其种种暴戾，自有国法制裁，本会亦不过问。惟黎以前清协统而能倡议鄂州，轰名本球，不可谓非健儿。今未及期年，而恃功骄蹇，妒贤妒能，引用金壬，杀戮功首，目正士为土匪，诬名流以君党，穷凶极恶如此，实为同人始愿所不及料。本会迫于公义，不敢不与天下共弃。圣狂一念，有生所惧；知人则哲，惟帝其难。敢布中外，乞鉴察焉。此启。

（《民主报》，1912 年 8 月 22 日）

清帝退位诏书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前间，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内阁总理大臣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臣胡维德，民政大臣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臣绍英（假），学务大臣臣唐景崇（假），陆军大臣臣王士珍（假），署海军大臣臣谭学衡，司法大臣臣沈家本（假），署农工商大臣臣熙彦，署邮传大臣臣梁士治，理藩大臣臣达寿。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 年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条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　人　民

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

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第八条　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　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

第十二条　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三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义务。

第十五条　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参议院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十七条　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十八条　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

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九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左：

一、议决一切法律案。

二、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

三、议决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

四、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

五、承诺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四十条事件。

六、答复临时政府谘询事件。

七、受理人民之请愿。

八、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政府。

九、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出席答复。

十、得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

十一、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十二、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可决弹劾之。

第二十条　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

第二十一条　参议院之会议，须公开之；但有国务员之要求，或出席参议员过半数之可决者，得秘密之。

第二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

第二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否认时，得于咨达后十日内，声明理由，咨院复议；但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时，仍照第二十二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二十五条　参议院参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二十六条　参议院参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条　参议院法由参议院自定之。

第二十八条　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第二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队。

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第三十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　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　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四十二条　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第五章　国务员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条　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

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条　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

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条　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有认为有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条　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五十二条　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第五十四条　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第五十五条　本约法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之可决，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本约法施行之日废止。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参议院铅印本）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是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晚10时宣誓就任临时总统。誓曰："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并发表《宣言书》，宣布内外施政方针。

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再辞议和代表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开议"。

1月2日　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参议院未成立前，由该会代行其职权，并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

袁世凯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俟后请直接电商。唐则仍留上海，代袁与伍进行交涉。

1月3日　十七省代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各省代表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如下：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1月4日　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质问南京"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即取消"。

1月5日　孙中山发表《告友邦书》，历数清廷之罪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声明：凡革命前清廷与各国所订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与各国或个人之种种权利，民国政府均予承认、保护。

1月6日　甘肃谘议局以陕、甘、新三省绅民名义致电袁世凯，坚主立宪，否认共和。

1月7日　段琪瑞遣靳云鹏赴北京，联络北洋各将领迫清帝退位，拥袁为总统。

隆裕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请，准将奉省各王本年应征地租尽数留充奉饷。

1月8日　伍廷芳电复袁世凯，同意自12月31日早8时起，至1月15日早8时止，各战场继续停战十五日。是为第五次停战。并约定双方军队"非接有和议决裂、战事重开之通告，不可开战"。

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一亿元。实发七百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元。

北京《正宗爱国报》自本日起连载康有为《共和政体论》一文，鼓吹“虚君共和”。

1月10日　张謇密电袁世凯，谓“现以纱厂事需亲赴鄂，拟借与段芝泉密商”，以南北军人名义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体。张抵湖北再密电袁，请其就商北洋将领通电拥护共和，迫清帝退位；并谓“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25日袁世凯电复张謇，告以“连日协商，渐有头绪”。

1月11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咨请临时总统颁行各省。次日孙中山函复，谓俟民选国会成立后再行决定。

1月14日　袁世凯、伍廷芳电商决定，自15日早8时起，至29日早8时止，各战场继续停战十五日。是为第六次停战。

唐绍仪通知伍廷芳，谓得北京确实密电，现清廷正筹商“退处之方”，并探询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有何把握”。次日孙中山电伍廷芳，告以“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伍随将此意电袁。

凌晨2时，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光复军领袖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

1月15日　大连民军抵登州，清吏迎降。次日派队赴黄县，宣告和平光复。

1月16日　袁世凯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清廷，谓大局危迫已极，民军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望宣布共和；请开皇族会议，“速定方策”。同日隆裕召见袁世凯，袁再次请辞。

袁世凯入朝议事归，出东华门，革命党人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投弹击之，不中，三人被捕死难。

1月18日　孙中山电伍廷芳邀唐绍仪一并来宁，“以决大计”。

1月19日　袁世凯会见英使朱尔典，提出清帝退位后两项办法：一、据清廷事先所颁授彼全权诏旨组织临时政府；二、临时政府暂设天津。

隆裕召近支王公开御前会议。国务大臣胡维德、赵秉钧、梁士诒列席。赵提出袁世凯拟设临时政府于天津，并同时取消北京、南京两政府，遭王公亲贵反对。会议无结果而散。22日再议，仍无结果。

清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再次奏请清廷“明降谕旨，概允共和”。随后出使意、日、美、英、德、奥等国大臣亦就此事迭电奏请。

1月20日　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袁世凯经唐绍仪转告伍廷芳，拟由清廷授权在天津组织临时统一政府。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退位后即行解散。是日孙中山就此事电伍廷芳，明确提出：“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公举袁为大总统。”并谓“此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伍旋将此意电达袁氏，袁拒不接受。

同盟会在南京本部召开武昌起义后首次大会，商讨各项重要问题。各省代表均与会。

民社在上海公布缘起及规约，申明以卢梭《民约论》为宗旨。该社以湖北人士为中心，举黎元洪为首领。其主要成员有孙武、蓝天蔚、张振武、刘成禺等人。后为对抗同盟会，与统一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共和党。

1月21日　徐企文等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工党，是日开成立会。后于南京、芜湖、苏州、杭州、唐山、长沙等地成立支部，并发行《觉民报》。该报出版两月后停刊。

1月22日　孙中山提出辞临时总统五项条件，并经各省代表会通过。其要点为：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宣布政见，赞成共和。袁被举为总统后，须誓守临时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否则皇室、八旗各项优待条件均不能履行。战争复起，袁负其责。旋将此条件电袁，并披露报端。

1月23日　清巡防营统领张作霖杀害奉天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自此，清军在奉天省城大肆屠杀革命党人达数十名之多。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逮捕革命党人之逆流亦相继而起。

1月26日　清军将领段祺瑞等四十六人联衔电奏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

同盟会党人彭家珍炸清军谘使良弼于北京。当场彭以身殉；良弼伤一足，越二日死。清王公亲贵闻风丧胆，纷纷出京，潜赴青岛、天津、大连等地。

1月27日　孙中山以袁世凯屡次反复，无和谈诚意，乃决定停战届满不再展期；并电令伍廷芳将和谈实情公诸中外，以示袁奸。袁得悉，旋于次日电伍，谓“刻正密为布置”。

1月28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次日举林森为议长。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保护财产令》五条，规定“所有私产均应由人民享有”。清廷官吏财产除坚决敌视民国者须予查抄外，余均保护。

1月29日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创刊。后于4月5日停刊。

北方革命协会谋是日在津举事，因提前误发信号，致使军警有所准备，未成。

杨度等十四人在北京组织共和促进会并发表《宣言书》。谓目前主张君主立宪为时已晚，国家危亡在即，为“保全皇室”、“保全国家”计，应速实行共和。

2月1日　段祺瑞派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曹崇鉴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余大鸿、张大昕接洽。告以段“主张共和，拔师北上”，相约如阴历年内(即公历2月18日以前)不能解决国体问题，民军“即当前进，以资援助”。

隆裕召各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开御前会议，拟定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

2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各省都督、司令，重申民军“现时为数已多，实足敷北伐之用”，此后“如有呈请召募者，一概不准”。

清肃亲王善耆在日人策动下，携眷潜离北京赴秦皇岛。4日善耆一行二十三人(内有日人数名)复乘船离秦皇岛，5日抵大连。日关东都督予以“妥善安置”。

2月3日　隆裕诏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清帝退位条件。

袁世凯致电伍廷芳，告以清帝退位条件，“现本大臣有权以商酌此事。请自十七日(公历2月4日——编者)早八钟起，至二十四日(公历2月11日——编者)早八钟止，续停战一星期，以便协商”。4日伍电复，谓“毋须再议停战”。

袁世凯代表清廷提出清帝退位条件，由唐绍仪转告伍廷芳。伍接此件后，即于4日午后2时偕唐绍仪、汪兆铭赴南京，与孙中山面商一切。

2月4日　孙中山接见《字林西报》记者，告以一俟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辞临时总统职，并建议临时参议院举袁继任。

2月5日　孙中山将袁世凯交来清帝退位条件咨临时参议院讨论。是晚参议院已召开特别会议，议决对此条件之修正案。

2月6日　伍廷芳将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之清帝退位条件修正案电达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各省都督、各军总司令及驻沪购办处，重申非经由该部认可给有凭照者，不得私行采办军械。

2月7日　华侨联合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宣布以“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及研究侨民之利弊”为宗旨。举汪兆铭、吴世荣为正、副会长。

2月8日　晨，袁世凯令梁士诒携其新拟之清帝退位条件入觐隆裕，请旨验准。隆裕坚持者三：一、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二、不用“逊位”一辞；三、宫禁及颐和园随时听使居住。梁随将此意转达袁世凯，并密电唐绍仪，请其“务必劝伍迁就”。

2月9日　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袁世凯，并告以“现力求迁就，……已至极点，决难再让矣”。

2月10日　唐绍仪致袁世凯急电，告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并谓“若少不忍，转生大乱。言尽意竭，乞勿再赐电商”。

2月11日　隆裕认可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袁世凯将未颁发之清帝退位诏旨电达上海唐绍仪、伍廷芳并转孙中山、黎元洪、南京临时参议院及各部总长。同日复发一电，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并声明“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2日　清帝溥仪退位。是日下诏凡三道，第一即退位诏。据多数记载，该诏系张謇所拟。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系袁蓄意加入者。第二系公布优待条件之诏。第三系“劝谕臣民”诏。

2月13日　孙中山接袁世凯11日两电后，是日复袁两电。其一告以即行引躬自退，践约辞职。其二告以“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继就袁于清帝退位诏中所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予以严正批驳，极言“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电中促袁“即速来宁。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附条件三项：“(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2月14日　孙中山至参议院辞临时总统职。

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议决临时政府改设北京。15日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总统前，孙中山就建都问题咨交复议。表决结果确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2月15日　午后3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旋电告袁，请其即日来宁受职。同日孙中山亦电告袁当选及临时政府地点确定南京事，并言已派专使北上迎接。16日袁分别电复，表示愿受临时总统职，并再次强调南下为难。

2月16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以清帝退位，满清政府亦既消灭”，特议决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五条，提请孙中山查照施行。

2月17日　自孙中山辞临时总统，荐袁自代，经参议院选举通过后，国内外反对之电纷至沓来。孙乃于17日及21日分电劝解。然反对之电仍迭至不绝，复牵延多日始渐平息。

2月18日　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以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键、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迎彼南下。

2月19日　袁世凯设立临时筹备处。该处为袁未就

职前“备咨询筹划之机关”。下设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六股。各股办事员由袁亲选其得力幕僚四十四人充任。

2月20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举黎元洪再任临时政府副总统。

2月21日　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蔡元培及其一行离上海北上。24日抵津。

2月22日　孙中山亲临四川旅宁人士追悼四川死难烈士大会致祭，并致悼词。

2月23日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奉孙中山令，将新编历书颁行全国。按此为中国第一部阴阳合历历书。

2月24日　荷属泗水殖民当局加调马步兵，围捕华侨男女小儿四百余人。华侨书报社国旗被撕碎，并遭鸣枪镇压。

2月25日　张謇就袁世凯不欲南行事致彼密电、密函各一件，告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著手，一从北数省人民著手。飞箝捭阖，在少川(唐绍仪字——编者)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

2月26日　午后4时许，唐绍仪、汪兆铭由津抵京。汪到后，即下榻东城煤渣胡同迎袁代表招待所；随即晋谒袁世凯密谈甚久。是晚袁亲自设筵款待。

2月27日　午12时半，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代表蔡元培一行抵北京，旋即下榻迎袁代表招待所。午后2时许会见袁世凯，递交孙中山请袁南下就职之手书及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之选举状。是晚，袁委外务部首领胡惟德代宴诸代表。次日袁邀蔡等茶会。会间未谈及重要议题。

2月28日　武昌文学、群治二社社员所组织之改良政治群英会，因不满湖北军政府上层人物日趋反动腐化，遂联合武昌军界进步组织数千人，于凌晨举事。此即开武昌地区酝酿已久之“二次革命”。起事群众原拟将鄂军政府各部一体推翻，并免黎元洪职，后因少数团体意图妥协，乃改将矛头专指孙武及少数平日作恶多端者。后因新任军务司长曾广大发出悬赏千元通缉孙武令，起事遂于当日平息。事后黎元洪借口“奉令改部为司”及群众不满孙武，将所属各司悉委亲信，并借端大肆捕杀文学社等革命团体成员。

2月29日　袁世凯致电孙、黄，告以段祺瑞与蓝天蔚代表戴季陶、范熙磋商奉省善后办法业有头绪。并告已在28日电饬赵尔巽，“对于民军派员和平接洽”。

3月1日　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与日本大仓洋行天津支行正式签订借款九万日元合同。规定“以卓索图盟所有矿山作抵押，若不能归还时(债权人)可随意开采”按此款阳为大仓洋行借予，实系日陆军参谋本部所提供，由日黑龙会重要分子川岛浪速居间磋合，作为支持内蒙王公阴谋“独立”之用。同日另借予巴林王两万日元，用途相同。

3月2日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请对袁迁就。

3月3日　中国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之宗旨及政纲八条，并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

3月4日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再电临时参议院，请批准临时政府暂设北京；袁世凯不必南行受职；内阁总理确定后，由总理南下组织新内阁，追接收交代完毕，即偕同参议院北迁。

3月6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知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电复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临时总统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

3月7日　孙中山电蔡元培转袁世凯，希即依参议院所开手续在北京正式受职，并请“速将国务总理人选电告，俾参议院同意，刻日派遣来宁接收交代，早定大局”。

3月8日　袁世凯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9日孙中山循临时参议院之请，将誓词通电全国。同日参议院电袁，告以“电达誓词敬悉。谨照本院三月六日议决办法之第三条，认大总统为受职”。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是日颁布《大赦令》及《豁免钱粮令》，规定凡民国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实欠在民者，均予免除。

3月11日　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申明在正式宪法未产生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

3月13日　袁世凯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返南京。行前蔡发表《告京津同胞书》。

3月29日　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并提出各部总长人选。经参议院投票表决，除梁如浩外，均多数同意。次日即呈袁世凯正式任命。

3月30日　袁世凯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任。

袁世凯任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不受。

唐绍仪经孙中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

3月31日　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

4月1日　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正式解临时总统职。

袁世凯加班禅“致忠阐化”名号。

中华民国铁道工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举史青为正会长，虞愚、苏建勋为副会长。

4 月 2 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4 月 3 日　孙中山自南京抵上海。

西藏地方政府受英方唆使，自 3 月起派兵连续进攻江孜驻军。是日驻江孜英商务专员麦克唐纳与廓尔喀(即尼泊尔)代表拉巴哈达出面"斡旋"，驻军以势孤无援，被迫将武器"售予"西藏地方军，撤离江孜。

4 月 4 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自即日起迁往北京。

5 月 1 日　临时参议院开会，改举吴景濂、汤化龙为正、副议长。

袁世凯裁撤江北军政府，令该府军政、民政统归江苏都督管辖。18 日江北都督蒋雁行办妥移交事宜，20 日奉调北上。

孙中山发表十万英里铁路计划。

5 月 9 日　共和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该党系由统一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等六团体联合组成，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

6 月 8 日　袁世凯公布国旗、商旗及海陆军旗式。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亦适用；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6 月 15 日　袁世凯一反前与唐绍仪所定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之议，改任王为南京军宣抚使。并未经内阁付署，即将此令擅行颁布，唐当日留辞呈于国务院，愤而赴津。17 日袁令外交总长陆征祥暂代国务总理职。

6 月 26 日　袁世凯公布国务院官制。

黎元洪向德商捷成洋行借银三百万两，用于湖北官钱局资金及购置采矿机械。

6 月 27 日　同盟会驻沪机关部倡议组织完全政党内阁，并申明如共和党愿出组阁，拟举黎元洪为总统。

6 月 28 日　湖北襄阳民军司令张国荃因不服军政府编制，拥兵独立，并杀调查员周警亚。黎元洪派兵征讨，张不敌，逃郧阳。

6 月 29 日　袁世凯任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7 月 14 日　自唐绍仪辞国务总理后，同盟会阁员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相继向袁世凯提出辞呈。共和党阁员财政总长熊希龄亦辞。是日均照准，并令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财政。16 日复令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部皆以次长代理部务。

7 月 18 日　陆征祥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宣布施政方针，并将阁员名单交付表决。名单如下：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孙毓筠，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四部照旧。会间因陆征祥出言无状，全院大哗。次日阁员名单遭否决。陆即称病不出。

7 月 19 日　立宪党人张君劢、吴贯因、梁文卿等，月初以来接连函促梁启超归国。是日梁文卿函中有云："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

7 月 26 日　临时参议院在军警监视下通过陆征祥内阁人选。阁员名单如下：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刘揆一(8 月 2 日补任)；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四部照旧。

7 月 30 日　经廓尔喀驻藏代表"调停"，西藏地方军与钟颖军实行停战，并商定：北京政府驻藏官吏仍留拉萨；驻藏兵员除少数卫队外，余均交出枪械，撤归内地；所交枪械储存拉萨，由中央、藏、廓三方派员封固，嗣后未经三方会齐不得擅取。

8 月 16 日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杀害张振武、方维。先是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等奉黎元洪令 10 日抵京。行前黎诳张等，谓袁世凯将畀以重任。旋于 11 日密电袁，妄加张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罪名，请即"正法"。13 日黎再密电袁，催请尽速处决。袁遂于 15 日晚下令逮捕张、方，16 日凌晨秘密杀害。此耗传出，舆论大哗。湖北议员急赴总统府提出质问，孙武、邓玉麟并面见袁世凯请发"免死券"。18、20 两日黄兴迭电袁世凯，就处决张、方事追询缘由。东南各省都督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谭延闿、孙道仁等亦纷电严诘。临时参议院并在 19 日提出质问案，要求签署处决令之陆军总长段祺瑞到院作答。后此事即不了了之。

8 月 20 日　袁世凯令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

8 月 24 日　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抵京。

8 月 25 日　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该党系由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会间孙宣布该党政纲五条："一、促成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并作《解决民生问题》讲演。

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联合组成民主党。后举梁启超为该党领袖。

9 月 1 日　驻藏办事长官钟颖电告政府，西藏堪布请议和，并提出五项条件：一、恢复达赖封号；二、对佛教寺院不得加以侮蔑；三、西藏重大事件须与中央政府所派官吏协商，但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四、拉萨驻军以二百名卫兵为限；五、撤回四川入藏军队。

9 月 9 日　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

权。

袁世凯任贡噪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

9月10日　袁世凯准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辞职。12月23日令孙多森管理该行事宜。

9月16日　袁世凯任梁如浩外交总长；刘镜人为驻俄公使。

9月22日　袁世凯准国务总理陆征祥辞职，25日以赵秉钧继任。各国务员概仍其旧。

9月28日　临时参议院议决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9月29日　是日及11月9日袁世凯两次通令严查并解散秘密会社。

9月30日　北京总检察厅以各报泄露临时参议院秘密讨论善后大借款消息，传讯十五家报纸编辑人。

10月10日　全国各地举行中华民国成立周年庆典。袁世凯在北京阅兵。

10月14日　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以"筹划全国铁路机关急待成立，兹遵照前令，暂于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开办"。

10月15日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为题发表演说，连续三日。

11月10日　《俄蒙协约》披露后，举国舆论愤激，咸责政府外交失利，一误再误，至授俄人以可乘之机。外交总长梁如浩深恐责及己身，是日潜往天津，旋即提出辞呈。14日袁世凯准梁辞职。15日以陆征祥继任。

11月13日　共和、民主两党就《俄蒙协约》事联名通电各省支部，宣布政府十大罪状，指责政府对外交问题"坐失事机"、"一误再误"，以至"铸此大错"。

11月16日　孙中山致电临时参议院，请"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

11月26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凡倡言二次革命者，"即行按法严惩"。

12月1日　司法部在北京召开中央司法会议。中央及地方司法官员七十余人与会。

12月3日　黎元洪撤销盛宣怀汉冶萍公司督办，另以孙武充任。

12月5日　北京市民为抵制《俄蒙协约》，连日持票往俄国银行兑换现金达十二万元之多。

12月6日　驻芜湖士兵因欠饷哗变。商店均停止营业，交通断绝。

12月7日　上海银楼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9日罢工达到高潮。后遭当局压制，罢工失败。

12月8日　孙中山抵杭州。次日在浙江五十一团体国民公所演说"民生主义"四问题：资本、土地、实业、教育。

12月9日　驻京英使向外交部"抗议"禁烟。

12月10日　驻江西南昌一旅一团二营官兵联络当地洪江会党，以忠孝节义为号，在府学官纵火，谋劫军械，焚督署。江西都督李烈钧率护军镇压，次日事平。截至12日，参与其事者三百余名被杀。

12月11日　汉阳兵工厂工人因不满该厂总办刘庆恩专横苛虐、克扣工资，全体罢工。事发后，刘复指使卫兵胁迫复工。工人愤极，捣毁厂内机器什物，并坚持必将该总办撤职，始行复工。

经　济

1月24日　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任吴鼎昌为监督。28日该行股东大会议决，原大清银行停止交易。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

1月27日　南京临时政府由江苏铁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仑洋行签订借款三百万日元合同，以上海至枫泾间铁路为担保。

1月29日　度支部以救济京、津市面为由，自德商瑞记洋行两次借款七十五万英镑，约定以崇文门商税为担保。后以半数向德、奥购置军火，余款由度支部移作别用。

1月30日　公使团为攫取中国海关税款所拟之《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经清外务部同意，是日开始执行。其中规定：各海关净存税款每周汇解上海，由总税务司分存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银行，并依"委员会"所列次序按期偿还外债。此后，关税实权遂全部为外人所操纵。

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宣布以"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为宗旨。举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

1月下旬　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军用票。规定银行、钱庄、商店、纳税一律通用。

2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以"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不能不切实经营"，特通电各省都督，速立实业司。

孙中山就汉冶萍公司所属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被该省财政部没收一事致电黎元洪，请饬该部取消没收令，俾以此矿抵押借款，以济军需。4日黎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万难认可。

2月4日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致电各省都督及财政长，吁请统一借款，以免外人高抬利息，于借款丛生窒碍。

2月6日　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及日清公司草签一千万日元借款合同，以招商局全部财产为担保。后以各方反对，未成。

2月8日 “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于是日及10日连续开会，议定中国急须偿还之债款七项，共三百八十七万一千零九十三英镑，并规定付款日期及逾期偿还加息办法。旋于12日将此项决定通知上海关税务司照办。

2月10日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总理盛宣怀在日本与横滨正金银行签订《汉冶萍预借矿砂价值合同》及《汉冶萍中日合办特别合同》。约定以大冶矿山铁路作抵，借款三百万日元。后盛将二百万日元转借南京临时政府，以免没收其私产。

2月12日 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不应再用清国祖模鼓铸银铜各币，特令原度支部大臣周自齐，速电饬天津造币厂停铸。

2月17日 工商勇进党在上海成立。以“振兴工业，扩张商务，扶持工商上之建设”为宗旨。

2月21日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代表中华民国与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签署借款一百五十万镑草约。26日孙中山将该项草约咨达临时参议院请议决。27日午后付表决。按议员总数四十五人，斯时仅十四人在场，八票赞成，遂作为通过。湖北议员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等就此提出异议，遭议长林森呵斥，乃通电各方，即日辞职。上海、南京及江苏、湖北等省团体亦纷电反对。3月8日袁世凯电复上海各团体，告以此项借款“已归无效”。

广东人霍守华在安徽芜湖设立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1914年10月，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矿石买卖合同，约定该矿所采矿石全部供应日本，有效期四十年。

2月28日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自上海拨银二百万两，交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此款系袁世凯令唐绍仪与该银行团商借者。后四国银行团复于3月9日借予袁政府银一百一十万两；5月17日借银三百万两；6月12日借银三百万两；6月18日借银三百万两。合前后五次共借银一千二百一十万两。后此款在1913年5月31日由袁与六国银行团签订之“善后大借款”中扣还。

孙中山以中央业已发行公债票，特批示沪军都督陈其美，“将上海公债票即日停止发行”。

3月12日 四国银行团代表在伦敦开会，议决给予袁世凯政府六千万英镑借款，并同意日、俄两国银行团参加此项借款之要求。18日，日本政府复就此事知照驻日英、美、法、德四国大使，提出此项借款不得有损于日本在南满之特殊利权。英、美、法、德、日、俄六国银行团至6月18日始正式成立。

3月14日 国务院总理唐绍仪与比国财团签订借款一百万英镑合同，以国库券、京张铁路财产及余利为担保。借款宣布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大为不满，19日在北京集议，决定停止预付之借款以行抵制。25日四国公使面见袁世凯递交“抗议书”，指责北京政府违背原定四国优先借款之诺言。4月18日四国公使复联合照会北京外务部，正式声明中止借款。北京政府被迫于4月27日复照四国公使，取消与比国财团签订之合同。

3月22日 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讨论盛宣怀与日本所订《汉冶萍中日合办特别合同》。到会股东四百四十人，票决一致反对合办。即由股东会电盛取消此约。

4月30日 陈万远、沈九成、沈启涌在上海创办三友实业社，资本四百五十元。最初只制“金星牌”棉线烛芯；1917年始织毛巾，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之毛巾织造厂。

5月2日 唐绍仪商请六国银行团，自是年5月至10月借银七千五百万两。银行团以须聘外人监督借款用途为条件。唐以此项条件过苛，遂停议。

5月5日 浙江都督蒋尊簋与德商礼和洋行签订借款六百万马克合同，以该省丝捐及国库证券一百六十万元为担保，并言明须以其中二百万马克向克虏伯厂订购军械。

5月6日 署安徽都督柏文蔚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款二十五万日元合同，以铜官山铁矿为担保，并言明该矿由中日合办。

6月1日 滦州矿务公司与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合并为开滦矿务总局，是日签订正式合同，资本二百万英镑。该合同自7月1日起生效。

陈其美等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银十万两合同，是为第二次“沪督三井借款”。

8月1日 原北京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总行，是日正式开业。袁世凯任吴鼎昌为该行监督。

8月28日 交通总长朱启钤与英商华中铁路公司签订借款三十万英镑合同。

8月30日 驻英临时外交代表刘玉麟代表北京政府与英商克利斯浦公司签订借款一千万英镑合同，以盐课羡利余额为担保。该合同9月22日正式公布。10月23日英、美、法、德、日、俄六国驻京公使联名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反对此项借款。25日北京政府被迫申明取消此约。

8月31日 山东银行成立，总行设济南。12月改为商办，另招商股一百万元。191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

9月1日 上海法商万国储蓄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后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相继设立分会。

9月24日 交通部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学熙，与比国铁路电车公司签订借款四百万英镑合同，以陇海铁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用于兴建兰州至海州铁路及提前归还汴洛路借款。

10月16日 奉天都督赵尔巽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借款一百万日元合同，以本溪湖煤铁公司奉天所有股票

及出井税、抚顺煤矿产税及报效金并鸭绿江采木公司股票为担保,用于奉天省军政费用。

10月20日　吉长铁路全线通车。

10月21日　袁世凯颁布印花税法。

11月1日　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派代表参加,会议历时月余,至12月5日闭会。

11月4日　武昌起义后,汉阳铁工厂停工。是日第一座化铁炉修复,开工生产。

11月26日　袁世凯颁布经临时参议院议决之《兴华汇业银行则例》。则例确定:兴华汇业银行总行设于上海,资本总额为一千万元,股东限于中华国民。

12月23日　财政部公布《各省官银钱行号监理官章程》,规定各省官银钱行号一切事务须受财政总长任命之监督官监督。

12月31日　交通部与德商瑞记洋行签订借款四万七千英镑合同,用于购置电话器材,以天津电话局财产及收入为担保。

外　交

1月1日　日本借口保护租界侨民,派陆军五百名抵汉口。

1月3日　北京公使团开会,谋置中国盐税于海关控制之下。议定由英、日、俄、奥等国公使组成委员会研究处理。12日委员会就此事提交清外务部备忘录一件。

1月4日　英、美、德、法、日等国政府借口滦州新军起义,据《辛丑和约》规定,分别向京奉铁路京榆段沿线派驻军队。是日驻华各国军队司令官开会议决:北京—杨村派驻英军三百六十六名,杨村—北塘派驻法军四十四名,北塘唐山派驻德国九十四名,唐山—滦州派驻美军二百名,滦州—山海关派驻日军五百九十九名。

法外交部照会驻法俄使,告以:法不仅支持俄在中国北部之特权利益扩张至北满,并至蒙古、新疆。

1月5日　英借口"保护"开平煤矿,自天津派驻英军五十名。

1月10日　俄外交部声明,愿就外蒙问题出面"斡旋",但以中国不得在该地设治、驻军等条件为前提。

1月11日　梁士诒会见英使,探询如袁世凯于清帝退位后组织临时政府,列强是否承认。英使答以"袁世凯拥有列强之信任"。

1月13日　美国务卿电示驻汉口美总领事,可与当地民军领袖保持非正式关系,但此种关系不得认为美已承认民军政府。16日复电示驻华美使,通知各地美领事均照上述办法执行。

1月15日　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额鲁特、陈巴尔虎两蒙旗总管胜福、车和扎等,受俄国唆使、暗助,占海拉尔,宣布"独立"。呼伦道黄仕福率队避入东清铁路界内。1915年11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与俄国订立《呼伦贝尔条约》,承认该地为特别地域。

是日及17日,日外务大臣两次电驻汉口总领事松村,令速派海军陆战队开赴大冶铁矿,以阻民军进驻;并配备内河炮舰一艘就近"警备"。

日本内阁议决,途划分满蒙地区日、俄两国势力范围一事,与俄订第三次《日俄密约》;旋电示驻俄日使于适当时机提出《密约》草案。24日驻俄日使将此草案递交俄外交大臣。

1月17日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本日及19日两次要求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均未得复。

1月19日　美兵六百名自马尼拉抵秦皇岛,其中分调二百余名开赴京榆铁路唐山、滦州一带。

1月23日　俄外交大臣上奏沙皇,请乘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并加强在华特权利益,就中尤以满洲为最。并建议与日本共同胁迫中国同意修改1882年中俄《改订条约》。

1月24日　日本黑龙会干事长内田良平以"上海都督代表"名义与日商三井洋行签订借款三十万日元合同。旋以此款在日购置军械。按此乃陈其美、宋教仁于1911年12月12日委托内田代为交涉者。

德外交部鉴于英、俄、日有加紧插手中国内政迹象,是日上奏德皇威廉二世,请准与美国协商,由美发表不干涉中国内政宣言,以防止三国单独行动。威廉批示:"三位难兄难弟有了他们的计划,如我们不赶快一点,则我们只好站在外面白白望着。"德外交部旋即将此意电告驻美德使,令其与美磋商。

1月31日　德、美两国政府秘密商定,以交换函件方式互通两国对华政策,再据此知照有关各国政府。是日驻美德使函询美政府对中国时局之意见。2月2日美函复,主张仍应"先由列强协商,然后共同行动"。8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上述函件。

2月3日　京奉线山海关北一四一号铁路桥被炸,火车出轨,死伤一百五十余人。事发后,日军一小队立即开驻该地。北京公使团对此举极为注意,咸认此系日人为觅得出兵借口而蓄意策划者。5日,日"元老"山县有朋致函前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果请其力促内阁以此事件为借口,立即增兵满洲。并谓已得俄之谅解,延误将"坐失良机"。

2月12日　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将清帝退位条件及退位诏旨副本,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并请转达各国政府。

2月13日　日本关东都督借口辽东半岛为中立地区,迫民军在17日前与北军停战,并在七日内撤离该地。25日北伐民军及部分关外民军共三千余人一并撤至烟

台。

2月14日　俄外交大臣会见驻俄日使，告以俄国于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决与日本取一致态度，而目前则暂不承认。次日，日外务省由电复驻俄日使，表示同意。

2月16日　袁世凯在北京迎宾馆会见各国公使，就建都地点与彼等达成默契。各使咸表示，必在北京建设共和政府，否则断不承认。

2月21日　日外务大臣电示驻英、美、俄等国日使，令就日本政府所拟承认中国新政府先决条件，征询三国意见。其内容有：(一)新政府对于外人享有之一切权益必须继续尊重；(二)以往之外债，新政府必须承认偿还；(三)对于承认问题，各国应取一致行动。俄、美、英三国政府随即先后照复日本政府，表示同意。惟美提出"以此种行动不致对于承认中国新政府引起不必需之延缓为限"。27日驻德日使复以此项提案递交德外交部。德以"甚为乐于赞成"复之。

3月3日　各国借口北京兵变，相继调兵入京。是日英、美、法各由天津调入二百名，德由青岛调入一百名。次日日本由山海关调入一百名。两日内共调入八百名。

驻天津各国领事集议，决定由各国军队协助天津当局"维持地方治安"。

3月4日　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侨"，决定再由南满调兵千名至京津地区。是日驻华日使就此事致电日外务大臣，告知已由南满调至京津地区日兵二大队，继调一大队即可，多则易启各国疑虑。

3月5日　日外务大臣电驻英日使，告以因南满日军增援京津一带，需另派兵三千予以补充，令照知英政府。

日兵一千二百名由旅顺抵津。至此，京津地区所驻日兵总计约二千四百余名。

驻俄日使向俄外交大臣提议，日、俄两国参加四国银行团目前对华政治借款，但以此项借款不涉及两国在满蒙特殊利益为条件。16日俄照复同意。

3月8日　俄代理公使通知公使团，俄兵六百名已由哈尔滨调至京榆铁路。经公使团决定，天津至杨村一带由俄兵"驻守"。

3月9日　四国银行团致函袁世凯，就给予北京政府借款事提出四项条件。即自3月或延至8月，分期给予紧急借款；北京政府以盐税担保；具体条件待日后签订大借款合同时另行规定；此后北京政府所需之垫款及善后大借款应由四国银行尽先供给。同日袁就借款事函复四国银行代表，言明"中国政府向银行团等保证，如条件与其它同样有利，银行团等有决定承担大规模改革借款与否之权"。

3月23日　袁世凯将民国借债办法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告以今后借用外债，均以总统签字盖印为凭；其以个人名义私行借债者，概不承认。

日本政府继2月21日向俄、英、美等国提出承认中国新政府条件后，是日复拟具详细条件四项，指令驻外使节照会英、美、俄、法、德、意等国政府，并提议俟承认中国新政府时，各国以同文照会分别递交。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新政府应承担并履行清政府、临时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团体或法人所缔结之一切条约、协定、租界权利及偿还外债；并须全部确认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及其它种种特权。

6月1日　俄政府复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入侵伊犁。外交部即向俄使提出交涉。

6月24日　六国银行团与财政总长熊希龄谈判大借款问题。熊以条件苛刻，即日停议。

7月7日　外交总长陆征祥致电美国国务卿，请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未得复。

7月8日　六国银行团代表再就善后借款问题向北京政府提出七项条件，其要者为：指定垫款用途并监督使用范围；由六国设立特别机构监督盐税；在善后借款债券未发行前，中国不得与六国银行团以外之银行借款。财政总长熊希龄仍以借款条件过苛，并遭各方反对而拒绝磋商。11月27日再次开议。

俄外交大臣与日驻俄大使本野一郎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再次划分两国在内蒙势力范围。

7月20日　美政府电示驻英、法、日、德、俄、意等国美使，立即照会各驻在国政府，鉴于目前北京政府已能有效行使职权，美国认为应按国际法予以正式承认。英、日等国政府以时机尚早，回照拒绝。

8月11日　是月上旬，俄驻迪化领事照会新疆都督杨增新，就袁世凯派兵科布多及喀什提出"抗议"。是日杨复照该领事，声明此系内政，与俄无关。

8月13日　外交部电示驻英、日、俄三国临时外交代表，向各驻在国政府声明中国对满、蒙、藏之主权五事：一、满蒙各地为中国完全领土，凡有关满蒙各地之条约，未经民国承认，不得私订；二、满蒙各地矿产，无论何人不得私自抵押。向各国借款，各国亦不得轻易允许，遽行开采；三、民国政府对于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四、民国政府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商之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五、现蒙藏反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其主使者。

8月17日　英使朱尔典就西藏问题向外交部提出无理"抗议"，要求五项：一、北京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地方"内政"；二、北京政府所派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政权，并不得视西藏与内地各省相同；三、北京政府除驻藏官员卫队外，不得派军驻藏；四、中英两国政府应订立协定，规定上述各节，英国始能承认中华民国；五、中国内地与西藏间经由印度之交通，应暂时断绝。袁世凯允诺停止派兵入

藏。9月7日朱尔典面晤外交次长颜惠庆，再次提出“抗议”。声言如北京政府继续派兵入藏，则英政府将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袁乃于是月中旬及21日分别电令尹昌衡、蔡锷停止前进。后以英方指使西藏地方军频扰川边，日甚一日，外交部遂在12月23日就朱尔典8月17日所提“抗议”正式照复。申明中央政府有权派兵入藏，外国无权干涉；前清与英政府所订有关西藏条约甚详，无另订新约必要。

11月3日　俄密使廓索维慈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等擅订《俄蒙协约》。

11月30日　外交总长陆征祥与俄使就外蒙古问题在北京开始正式谈判。

文　教

1月1日　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是日开业。资本初为二万五千元，1915年增至一百万元。各地设有分局三十余处。

1月19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均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1月　私立法政大学在北京开办，后于1913年改名中华大学。

2月1日　中国社会党本部机关报《社会日报》在上海创刊。

2月12日　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令将原清政府之《政治官报》更名《临时公报》继续发行。后于4月1日复更名为《政府公报》。

2月20日　民社总部机关报《民声日报》在上海创刊。

2月24日　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致电袁世凯，告以在中华民国纪念邮票未印就前，“为权宜计，只可将前清邮票加印‘中华民国’四字，一律通行，以应目下邮件之用”。袁26日电复“已属转饬照办”。但北京邮务总办帛黎竟于前此彼擅自加盖“临时中立”字样之邮票上，复加“中华民国”四字，遂成“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八字。孙中山闻讯后，以此举“实属有碍国体”，急电袁，请令帛黎速将“临时中立”四字删除，方许发行。袁3月22日电复，告知已“将此项邮票即日停发矣”。

3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致电各省都督，告以高等以上学校规章尚未颁布，应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之课程，须一律废止。

3月19日　胡敦复等在上海创立大同学院。1992年更名大同大学。

4月4日　民国法律学校在上海举行开学典礼。

5月3日　袁世凯准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校，以严复署理该校校长。

5月12日　教育部决定将京师督学局及八旗学务处合并为北京学务局；将财政、法律、银行三学堂合并为法政学堂；八旗高等学堂及八旗各学堂仍准设立，惟将“八旗”名称取消，五族皆可入学；另贵胄法政、陆军两学堂即行废止，两处学生并入新立之法政及陆军学堂。

5月19日　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所办《新世界》半月刊，在上海创刊。7月15日该刊第五期首次全文译载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刊译文题目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

6月1日　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成立。

6月5日　高内蓊主编《真相画报》在上海创刊。该画报共出十七期，1913年3月1日后停刊。

6月17日　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更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7月10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由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全国各省及华侨代表五十六人与会。按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历时一月，至8月10日闭会。其间共开会十九次，提出议案九十二件。会议议决重订学制，制定“学校系统表”，规定小学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是为“壬子学制”，于9月3日正式颁布。会间并议决，三年内在武昌、南京、广州各增设大学一所。

7月25日　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成立。《民立报》、《民强报》、《神州日报》、《民报》、《天铎报》等均派代表参加。

9月2日　教育部分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9月13日　教育部规定自民国元年始，以公历10月7日为孔子诞辰，全国各校届时均举行纪念会。

9月　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成立。

10月1日　袁世凯准北京大学校校长严复辞职，以章士钊继任。

10月18日　袁世凯任吕海寰、沈敦和为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

10月22日　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设政法、医、药、农、工、商、美术、音乐、商船、外语等科。24日再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

内务部公布调查报告：自1912年2月12共和宣布之日起，北京报纸报部立案者共八十九种；北京各党会报

部立案者共八十五个，其中政治二十二，学术十七，实业十六，公益三十。

11月30日　留法俭学会第一批学生自北京启程赴法。

香港大学成立，设医、工两科。

12月1日　梁启超主办《庸言》杂志在天津创刊。该刊编辑为吴贯因、黄远庸。

12月27日　袁世凯准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辞职，以何燏时继任。

军　事

1月2日　直隶滦州新军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4日晚起义军乘车扑津。次晨3时与清军战于雷庄，因众寡不敌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死难。

陕西都督张凤翔率各路民军往援乾州，与清军战于北原。14日在张河大败清军。16日张率队回醴泉。

1月3日　陕西民军攻占河南灵宝，赵倜所部清军退陕州，据守渑池。

1月7日　伊犁新军起义，杀将军志锐，举卸任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杨缵绪为司令总长。次日组织军政府，并成立东进支队，进军迪化，与新疆巡抚袁大化所调之清军相持于精河、西湖间，直至4月始行休战。

1月9日　陕西民军克渑池。次日与清军战于英豪、观音堂间，失利，退灵宝、函谷关一带。

1月10日　陕西凤翔民军万炳南部会同西安援军大败清军，凤翔局势转趋稳定。

成都民军克雅安。先是署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各州县同志军围困成都，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率清军万余驰往解围，被阻雅安，四十余日不得进。成都光复，傅遂据雅安顽抗。成都军政府乃遣彭光烈率民军三千讨伐。6日民军进逼雅安，与清军激战三昼夜，是日攻克。傅华封被俘解省。

1月11日　孙中山组织六路军北伐。以鄂湘为第一军，宁皖为第二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关外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拟取道河南、山东、直隶，会师北京。后除宁皖、淮扬二路于1月下旬北进，烟台、关外二路有的所行动外，余二路均无进展。

1月12日　孙中山命北伐沪军及海容、海琛、南琛三舰统归关外都督蓝天蔚节制。

1月13日　阎锡山率山西民军进驻包头。21日占萨拉齐厅。26日进军归化，与清军交战失利，退还。

1月16日　蓝天蔚率北伐军分乘海容、海琛、南琛三舰自上海抵烟台。

滇军援川第二梯团抵泸州。18日击溃合江同志军。次日与川军冲突，杀川南司令部长黄方。时驻叙州滇军第一梯团亦于13日攻占会党所据之富顺。自是川南遂为滇军所控制，会党势力瓦解，川滇关系日恶。至同年5月，滇军始撤归云南。

清军陷灵宝、函谷关，陕西民军退据潼关。20日张钫率民军再弃潼关，退驻华州。

1月20日　山东清军叶长盛部进攻黄县民军，占黄山馆、北马镇，民军退守县城。24日沪军北伐先锋队抵黄县。次日沪、黄民军大败叶军，收复北马镇。31日北伐民军返登州。后北马镇复于2月7日被叶军乘虚夺占。

1月29日　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开军事会议，公举孙岳为浦、镇、扬联军总司令，即日布置各军北伐。

2月1日　张勋违反南北暂时停战协定，派兵暗袭固镇。民军无备，死伤各二百余，固镇陷。次日广东北伐民军来援，败张勋军，复固镇，进攻徐州。四日光复徐州。是役清军伤亡千余，投诚二百余。旋徐州复为张勋夺占。

驻安徽寿州、正阳关民军二次光复颍上。

晨5时，俄军暗助蒙军袭击胪滨府(今满州里)。俄军均着蒙服参战。双方激战数小时，俄、蒙军队被击溃。4日早8时，俄军马步炮兵约八百余名，复携同蒙军马步兵约四百余名围胪滨府营。限驻军十二小时内交出全部枪马，逾时即开炮轰击。府守多方交涉无效，仍于午后4时被迫将枪马交与蒙方，率兵离署。至此胪滨府遂为俄、蒙军队侵占。

2月2日　烟台北伐民军大队在辽东半岛貔子窝附近登陆，与当地民军会合。3日在花园口一带大败清军，6日占领瓦房店，10日攻克庄河厅。清方旋增兵该地，两军成对峙之局。

午后5时，固镇民军在任桥北西寺坡进攻张勋所部清军。激战一昼夜。次日午后6时，民军克宿迁，清军退至皂河。

2月3日　北方军界傅良佐、唐在礼等十六人发起组织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特电黎元洪、黄兴、陈其美等征求同意。10日清方将领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等复致电黄兴等，建议组织中华全国军界统一会。按此即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之变名。后该会于3月25日正式成立。

2月7日　奉天民军光复凤凰厅(今安东)。守城清军二百余名一律反正。

2月11日　早8时，伊犁民军与新疆清军协统王佩兰部在乌苏厅西百里之四棵树迤西古尔图地方遭遇。民军因众寡不敌失败。是役民军阵亡数百名，被俘百三十余名，东进支队司令长李仁同亦被俘遇害。

2月14日　大本营总兵站在南京成立，专司军队所有运输筹备事宜。兵站总监黄兴，次监钮永建。并在上海、

镇江、下关、蚌埠分设支站。后于3月底撤销。

2月27日　黄兴、蒋作宾等一百七十四人发起组织陆军将校联合会，是日在南京开成立会。所以"民国奠定，南北军界统一"，于4月25日宣告解散。

夜，同盟会党人宋世杰率民军攻入大同，与淮军杨荣泰部相持二昼夜。28日杨军东逃，民军再次收复大同。

2月29日　晚7时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在北京发动兵变。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大肆放火抢劫。至次晨始渐平息。是晚蔡元培等适于招待所议事。变起，仓卒逃出，得以身免。3月1日晚，毅军复大肆劫掠西城。第三镇军士及"保卫治安"之巡警亦均参与。纵火行抢，较前日尤甚。

9月7日　驻湖北沙市第七镇二十五标三营士兵因典当凶殴店夥，遭协统惩处，密谋报复。事泄，仓卒哗变。围攻协部，抢劫商民，捣毁监狱，纵放囚犯。该镇统制唐牺支调兵镇压，次日事息。

9月8日　袁世凯任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兼禁卫军军统。

10月27日　俄指使外蒙军分路进犯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及苏尼特旗。察哈尔都统何宗莲调军狙击，在达里岗崖牧场附近接战。何军失利，外蒙军深入锡林敦勒及昭乌达境肆行骚扰抢劫。

12月15日　袁世凯颁布《戒严法》。其要者为："遇有战争或其他非常事变，对于全国或一地方须用兵备警戒时，大总统得依本法宣告戒严或使宣告之"；"于接战地域内与军事有关系之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军政执法处审判之"，并于判决"不得控诉及上告"；戒严地域内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得"折阅邮信电报"，得"破坏毁烧人民之动产不动产"，"不论昼夜得侵入家宅、建造物、船舶中检查之"。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3年

导言

一九一三年，中国并没有出现歌舞升平的现象，相反，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忧患重重、前途艰险的一年。

沙皇俄国是唯一与中国毗邻的帝国主义国家。袁世凯政府成立后，沙俄多半是抱着一种拆台的态度，企图使中国永远保持衰弱地位。策划外蒙古独立，是它蓄谋已久的阴谋。继一九一二年签订《俄蒙协约》后，沙俄取得了在外蒙的独占地位。全国人民齐声反对沙俄的侵略，但袁世凯为换取沙俄承认和支持，在一九一三年通过谈判后签署了《中俄声明》，同意外蒙"自治"，中国只在外蒙保留一个形式"宗主"地位。

随着袁世凯的政治投机事业一步步前进，帝国主义列强意识到他是一个理想的工具，便秘密转向有力地支持袁世凯的行动。为了控制中国的财政和内政，列强通过借款问题不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而袁世凯为了备战和解决财政问题，于一九一三年四月签订了借款草案，善后大借款又一次将中国出卖了。

对民国的成立，宋教仁抱有极大的政治热情，企图建立责任内阁，使中国成为真正民主制的国家。这些正是袁世凯所不愿看到的，也正是他所害怕的。因此当宋教仁不遗余力地推行选举，制造议会政治时，袁世凯再也忍耐不住了，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血的教训终于惊醒了浴浸在幻想中的国民党人。

"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内阁辞职，为了给中国政坛蒙上民主外衣，袁世凯拉拢进步党人，以熊希龄为总理，组成了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成为袁的御用工具。

刺杀宋教仁是内战发动的信号，袁世凯下令秘密动员军队并大借外债，决心以武力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而南方国民党人却依然七零八落，舌计措手，直到袁方军队首先进发江西，李烈钧在湖口应战，掀起了"二次革命"，但由于力量过于分散，终于失败，孙中山、黄兴再次流落海外。

袁世凯以武力扫除了南方几省反袁势力，认为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时机已经成熟。同时由于大部国民党议员官迷心窍，利欲熏心，从而为袁世凯正式登上大总统宝座铺平了道路。

英国趁中国内乱频仍，侵略西藏变本加厉。为了把西藏控制在自己手里，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举行中、英、藏会议讨论西藏问题，这就是"西姆拉会议"。袁世凯政府终于抵制了签字，使西藏仍然属于中国版图。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俄声明文件》的签订**
- **善后大借款**
- **刺杀宋教仁**
- **熊希龄组阁**
- **二次革命**
- **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
- **西姆拉条约**

《中俄声明文件》的签订

背景介绍

沙皇俄国是列强中唯一与中国毗邻的国家。袁世凯政府建立后，它唯一的想法就是“使中国保持衰弱地位，并坚决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才符合沙俄的利益。所以，对袁世凯新政府，沙俄多是一种拆台的态度。

策划外蒙独立，是沙俄蓄谋已久的阴谋。只是到了民国政府易主后，沙俄洞悉到袁世凯政府迫切需要得到列强的承认和借款，不敢对沙俄的侵略活动有什么过分表示的情况下，才大胆进行的。

外蒙古很早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政府的怀柔政策下，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19世纪末，沙俄势力日渐渗入外蒙古，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严重的危胁。为此，清政府对外蒙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并推行新政，来加强外蒙与内地的联系。但由于在实行过程中，不免有操之过急的地方，使一些王公贵族渐生外向之心，心怀异志。沙俄则趁机笼络收买这些上层人物，扶植起一个甘心出卖民族利益的亲俄集团。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反清革命烈焰迅速燃遍全国。清政府手忙脚乱，全无方寸，沙俄认定这是吞并中国领土而达到其宿愿的大好时机。于是，在沙俄的一手导演下，1911年12月16日，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成立所谓“大蒙古国”。一个在沙俄扶植下的傀儡政权粉墨登场了。

1912年11月3日，沙俄软硬兼施，与新建的库伦伪政府订立了有名的《俄蒙协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重要内容有：

(1)俄国政府扶助蒙古自治，不准中国派军侵入蒙古境内；

(2)蒙古政府准俄国人享受本约所附专条所开的各种权利；

(3)蒙古政府不经俄国政府承认，不得与中国签订违背本约的条约。

除正约外，另订专条十六款，规定俄国人在外蒙古享有自由购买土地，以及商工农渔、游牧开矿等种种特权。外蒙实际上沦为沙俄的保护国。外蒙古原本为中国领土，绝对没有跟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利。但俄国妄图霸占外蒙，于是先承认它是独立国家，接着擅自与之订约，其卑鄙意图显而易见。协约订立后，俄国政府又公然将协约通告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通告日、英、法等国。

材料：

· 决定独立

· 中俄谈判

材料一　决定独立

姑且不论中国各种动荡不安消息的影响，对库伦办事大臣日益增长的怨恨以及对新政的焦虑与不安，使三多和蒙古人之间的争论更形激烈。关于这些导致了决定独立的事情，现在了解得还不够清楚。1912年，一个俄国人曾经听到某些身份不明的蒙古人说过，自从1909年或1910年以来，新政就成了汗和王公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只有土谢图汗盟的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和大沙比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等几个人，坚决主张独立和与俄国“联合”，其他大多数人却担心采取这样一个步骤是太早了。

然而，1911年春天，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来自内蒙的前旗官海山，却已明显地决定要促使事件迅速向前发展。他们上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建议宣布蒙古独立。呼图克图接受了这个意见，命令喀尔喀各旗和喇嘛教的统治者们借宗教节日(献曼荼罗，又作“永生”)的机会来库伦会盟，并讨论在各旗之间重新分摊赋税的问题。这两点都纯粹是为了聚会时避免引起猜疑而作的一种掩饰。这些王公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事业的支持是有疑问的。他们未必了解这个会议的真实目的。

7月10日前后，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在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衙门内召开了王公和高级旗官会议，传达

了呼图克图向参加会议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新政是否需要执行？会议陷于僵持：有的人主张反对全部新政，而其他的人则主张有选择地抵制。由于不能达成协议，有十八个贵族秘密聚商在可以俯瞰库伦的博克多乌拉山中，大家同意宣布独立。会议向呼图克图递送了下述呈文：

我们的确不能再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及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

在呼图克图祈祷的鼓舞和清朝帝国崩溃日近的情况下，一个称之为库伦临时政府的临时行政机构（喀尔喀库伦地区处理一切事务临时当局）组成。这个行政机构以土谢图汁盟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公为首，其中还有车臣汗盟副半军贡布苏伦贝子、车林索得那木王、那木萨赖公、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这些人除了车林索得那木以外，随后都在12月晚些时候所组织的正式政府中担任了部长级职务。

事情变化得很快。11月28日，这个临时政府命令四盟各动员一千名士兵。其后一、两天内，即有五百名从邻近各旗集中到库伦附近——其中就有未来的革命家德·苏赫巴托。11月30日，三多接到以四盟王公、喇嘛名义发来的信。这封信表示：库伦已接到中国的分裂运动的消息以及“革命党”军队准备由张家口进军库伦的报告。“我喀尔喀四部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信中还写道，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经发布命令，动员四千人“开往首都（北京），保护皇帝”。它要求办事大臣给这些人供给粮饷枪械，并限他在三小时内回答。由于没有得到三多的答复，蒙古人决定放弃这个骗人的把戏。一个贵族、喇嘛代表团来到办事大臣衙门，将宣布独立和呼图克图就任大皇帝位的决定通知了他，并限他于次日离开这个国家。三多向代表团恳求，承认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于他的愚昧。他答应上奏（清朝政府）给蒙古人以充分的自治，但不能独立。代表团简单地回答道：它之来只是送信，并非进行讨论。

三多曾一度想要反抗，但就像他很快发现的那样，这是用不着考虑的了：他在库伦只有一百五十名士兵装备很差的部队。这支部队由于饷银的拖欠而难于统率。第二天，他的部队被蒙古民兵和俄国的哥萨克兵解除了武装。三多和他的幕僚一同避入俄国领事馆内。12月5日，三多在俄军的护送下离开了蒙古。1911年12月或1912年1月（因所据资料不同），乌里雅苏台将军及其幕僚和衙门卫兵，在哥萨克部队的护卫下，和平地离开了。然而，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锢由于寄希望于从新疆获得援军，决定坚守到底。1912年8月，他的城堡被蒙军攻陷。他和他的幕僚也在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了这个国家。

12月1日，库伦临时政府发布通告，宣布清朝政府统治的结束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神权国家的建立。12月29日，呼图克图登极，就任为一个新的大蒙古国的“神圣皇帝”。（他致书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西蒙古的卫拉特和乌梁海各旗，邀请他们加入这个大蒙古国家。）

（摘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社科出版社）

材料二　中俄谈判

一九一二年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民国政府曾多次电告或派人赴外蒙，劝令外蒙王公、活佛取消“独立”，不要投靠外国，但遭到这帮叛国集团的拒绝。民国政府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曾准备出兵外蒙，取消其“独立”。沙俄获悉后，立即出面干涉，声称要采取“自由行动”。外蒙傀儡军在俄军配合下侵占了乌里雅苏台，又于八月六日侵占了科布多城。沙俄鉴于甘当儿皇帝的反动蒙古王公、活佛的“实力不足”，就从军事、财政、外交各方面进行“援助”，来支撑这个傀儡政府。外蒙宣布“独立”不久，沙俄陆军部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包括训练蒙军（四万人）、派遣以波波夫上校为首的军事教官团、提供武器（枪枝四万支、子弹四千箱、大炮八门）和贷款（二百万卢布）在内的“规模宏大”的控制蒙古的侵略计划，并很快就付诸实施了。随后，沙俄政府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向中国提出俄国“调停”外蒙问题的三条要求：（一）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二）中国不得向外蒙移民；（三）外蒙要取消独立，内政应由蒙人自治。这种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外交部的严词拒绝。沙俄政府为了达到利用外蒙问题“把中国若干地区割据来巩固”其“在远东的地位”的目的，于这年春夏之交，在国际、国内发起了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运动。沙俄外交部举行“对蒙会议”，研究侵占外蒙的各种具体对策。外长沙查诺夫在国会发表对外政策演说，公开叫嚣：“俄国现在正设法促进承认喀尔喀（指外蒙）自治一事。”沙俄驻华公使甚至建议它的政府“在蒙古采取积极军事行动，以达到吞并蒙古的目的。”同时，沙俄在外交上也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沙俄和日本经过半年来的多次谈判，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规定以北京子午线东经一一六度二十七分为界，把内蒙划分为东西两部分。沙俄以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有“特殊利益”，换取了日本对沙俄侵略西部内蒙和外蒙的支持。自此，日、俄两国侵略范围已扩大到内蒙地区。英、俄两国在九月通过两国外长的谈话，就英国侵略西藏和沙俄侵略外蒙问题达成了默契。

沙俄无视中华民国政府八月十三日对英、俄、日三国发表的关于《满、蒙、藏之主权五事》的声明，于九月秘密

派遣驻华公使科罗斯托维茨去库伦和外蒙王公进行非法谈判。临行前，沙俄内阁总理曾向他面授谈判的“根本方针”：第一，俄国既然“好意出头代蒙说话，甚至不惜以武力为其后循”，蒙古必须让与俄国若干权利，“以报偿之”；第二，蒙古“自治”区域之中，“应将巴尔嘎(即指内蒙呼伦贝尔地区)地方包括在内”；第三，允许给蒙古一笔借款，但须以“监督使用为条件”；最后特别指出，要让蒙古王公明白：“现在不是我们需要蒙人，乃是蒙人需用我们之时，因此，蒙人接受我们最低极客气之要求，以换取我们实力相助，乃是对蒙人十分有益之事”，否则，“听其自然变化而已”。这就把沙俄假“援助”之名、行掠夺控制之实的“传统”披露得淋漓尽致。科罗斯托维茨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带着《俄蒙协约》的草稿，于十月二十四日抵达库伦，马上与外蒙当局进行了紧张地讨价还价。最后按照沙俄提出的条文“一字不改”地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签定了《俄蒙协约》。其中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并为其编练国民军；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外国立约”。并在前言中公然宣布“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俄蒙协约》还附有《商务专约》十七款，规定俄人在外蒙古享有的特权。此后根据这个“专”，又签定了有关铁路、矿山、电线条约。从而沙俄控制了外蒙的外交、军事、财政、经济等各方面大权。

中国外交部在十一月七日发表声明说：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外蒙没有和外国缔约的资格。因此，俄国与外蒙所订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列宁当时曾经强烈痛斥沙俄政府“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的行为”。

沙俄政府所以采取支持外蒙“自治”，而取消外蒙“独立”的形式，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便于和民国政府交涉而已。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曾直言不讳地说：这“不过是替我们煮了一碗好汤，叫我们慢慢哽咽而已”。可见，沙俄策划外蒙“自治”，只不过是它阴谋吞并外蒙的一种过渡形式和手段，即先用“自治”的形式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然后“加以合并”。

十一月三十日在沙俄的强大压力和胁迫下，中俄开始在北京谈判。这次谈判，会议不下四十多次，历时近一年之久。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袁世凯政府为换取沙俄的援助和承认，以便对内镇压革命，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惜出卖领土主权，竟然与沙俄签定了《中俄声明》。《声明》承认了《俄蒙协约》的内容，同意了外蒙“自治”。虽然沙俄在表面上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政府在那里既不能设治、驻军，又不能移民，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的控制地位。随后又根据《中俄声明》的规定，举行了中俄蒙的恰克图会议，袁世凯政府与俄国、外蒙当局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签订了《中俄蒙协定》，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北京政府承认外蒙的“自治”及沙俄在外蒙的各种特权。这是把既成事实通过“协定”肯定下来，实际上，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一事“完全是形式的”。

（摘自《中国近代史新编》范书义　中华书局）

善后大借款

背景介绍

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岌岌可危，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此时，有一个阴险狡诈的人物，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或资产阶级革命均无所用心，而暗中寻求机会来达到自己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这就是曾在历史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在以后历史上又充任丑角的袁世凯。

袁世凯老谋深算，用革命的时机将清政府恐吓住，又转过来对付革命党人。他利用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作为要挟的砝码，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如果革命者不向我袁某妥协，那么我就支持清朝跟你打到底。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比较幼稚的，起义军内部也比较复杂，相当一部分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避免更多地流血。11月30日，武昌起义后独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代表会议的第三日竟然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的决议案。

与此同时，袁通过英国向革命军提出和平方案，革命军接受了英国领事暂行停战的建议。袁世凯暗自窃喜，以为政权垂手可得了。没想到，12月25日，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回到上海，并且因其德高望重而被革命党人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这对袁世凯来说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因此他对临时政府采取了公开反对和暗中分化的政策。

此时，一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抱着极端仇视态度的帝国主义国家，迟迟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如此。武昌起义后几天之内，长江上集中着日本和英国等国的10余艘军舰示威；在东北和内蒙则有帝俄和日本的军队在窥伺，监视革命势力的活动。列强们耀武扬威，并且口口声声宣称：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随时实行武力干涉，对革命大肆恫吓。革命军欲在大连登陆受到阻止，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也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10里内战斗

材料：

- 比国借款的成立
- 《监视开支暂行垫款章程》的签订
-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签订

材料一　比国借款的成立

随着袁世凯的政治投机事业一步步地获得成功，帝国主义认识到：这个封建势力的代表者是一个理想的傀儡工具。于是，各国对袁政权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吹捧袁是"弱国中的强人"，并散布空气，说中国非袁不可收拾残局，袁出来就可以取得各国的承认，中国即有资格跻身世界舞台。面对复杂形势，革命党人由于迫切希望和平，向帝国主义表示了妥协，由各列强穿针引线，南北和会开幕。孙中山致电于袁，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的位置一定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软硬兼施威胁清廷，使之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仅仅做了42天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宣布辞职，推荐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袁世凯站在封建统治的立场，一向是挟有北洋实力而又依靠帝国主义为靠山，他在政治上的野心是无止境的。根据《临时约法》建立的唐绍仪内阁成立后，袁世凯时时处处企图缩小内阁的权力。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则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引来袁世凯心怀猜忌。袁唐冲突日益尖锐，终于在5月初以向帝国主义借款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自武昌起义后，清朝中央财政体系就崩溃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前，英、美、法、德4国银行团就纷纷向袁世凯表示要给他提供贷款，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列强们充分认识到：在中国民主精神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控制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只能采用一种施加影响的手段，这就是控制中国的国库。当时，中国政府急需700万两银子，以供给南京政府遣散军队的善后之用，还有就是债务的偿还(以日债为主)。但北京兵变后，4国银行团以中国局势混乱为借口，非但没有续付已经答应的实业借款，反而向袁世凯提出额外要求：要袁保证除了4国银行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以此垄断对华贷款。

中国政府方面由唐绍仪主持借款谈判。唐一直不满意银行团对中国财政的垄断，中国向外借款，理应有自己的选择之权，怎么能随意让人摆布呢？于是，他决心摆脱银行团的财政控制，实行自由的独立的借款政策。3月14日，唐绍仪与比利时签订了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京张铁路为担保，并拟续借至1000万英镑。

比国借款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团的垄断，却引起4国列强的强烈不满。本来，银行团借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涉问题，但是，不肯放松用借款控制中国政局的银行团向唐绍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竟要他取消向比国借款，并公开谢罪。唐绍仪无奈中，被迫取消比款，并向4国公使表示了道歉。但银行团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借口唐在南方滥用此款，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财政监督的无理要求。

材料二　《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的签订

1912年5月，4国财团因日、俄的加入成为6国银行团。他们相继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苛刻的垫款条件：

(1)中国政府提出垫款目的和用途的清单，由6国银行团进行监督；

(2)作为抵押的税收必须由海关或类似机构来管理；

(3)垫款是善后借款的一部分，在善后借款合同规定的5年内，中国不得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

(4)在此期间，银行团应为中国政府的财政代理者。

袁世凯此刻急需向银行团贷款，以便在列强支持下，利用中央手中掌握财政的实力来操纵各省，稳固自己的地位。他把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借款的成功上，而不惜答允任何苛刻条件，并想借此时机狠狠打击唐绍仪。于是，袁世凯事事迁就银行团的要挟，于1912年5月17日，改由熊希龄出面和银行团签订了银300万两的垫款合同。这笔垫款为数不多，但在同时签订的《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上，列强规定了苛刻的监督条件。按章程规定：垫款发放军饷及遣散军队费用，均须由外国人担任的海关税务司或银行核计员会同签押，其领饷清单并须以一份送交有外国人掌管的核计处稽核，并且对于军饷，还予该税司及核计员以调查应需的方便。因此，这一章程不独监督财政，还直接监督了军队。数十年来，海内志士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所苦心缔造的民国，眼看就要断送在几百万贷款上。消息传来，引起国内舆论大哗。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加上银行团内部矛盾重重，在大借款正式谈判时，中国方面拒绝了银行团苛刻的监督条件。大借款的谈判暂时处于停顿状态。

材料三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签订

借款问题实质是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革命力量的一种手段。列强蠢蠢欲动，急于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财政，进而控制中国政局。袁世凯更急，当时中国政府积欠外债达1100万英镑，无法偿还，列强逼债甚急，加上为了备战，他迫切需要列强的财政支持。经过短暂谈判，袁世凯还是迎合列强要求，完全置民意于不顾，接受了苛刻的借款条件。1913年4月24日，双方秘密签订了合同草案。

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与袁政府签署的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银行团，并没有美国参予其中。表面上，美国自称是出于道义的理由，什么"借款的条件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实际上是因为美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矛盾重重而陷于孤立处境，不得已退出之故。其余的5国银行团，并没有因为美国的退出而改变控制中国财政的图谋。相反，当时中国国内因宋教仁被袁收买的暴徒杀死，而导致反袁情绪日益高涨，银行团希望尽快达成善后借款，以支持袁世凯。这样，使袁和列强的愿望一拍即合，善后借款的签署也就水到渠成了。

中国政府与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署的善后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数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借款期限长达47年之久，前所未有，这样累计须付息达42893597英镑，连本带利息共要付出6780余万英镑。善后借款折扣很大，中国政府实收84%，2500万英镑仅得2100万英镑，利息总额达到实收额的2倍。

善后借款合同中规定了借款的用途，其主要部分：一是抵还外债，二是准备赔偿外国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损失。算来需归还庚子赔款287万英镑，不久到期的外债大约为139万余英镑，准备赔偿外人因革命所受损失200万英镑，总数共计约1078万英镑，占实收额的一半还要多。转手之间，银行团借给中国政府的款项，大部分还是落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腰包之中，只是让中国人民背上了更沉重、更漫长的外债负担。经过七折八扣，中国政府实得仅850万英镑左右。其中，袁政府用于行政的经费，只能维持6个月，转瞬即尽。实际上不过是列强向袁世凯提供了一次战争经费而已。如此高利盘剥的借款，是列强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恶债。于袁世凯政府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留下后患无穷。

借款合同规定，中国政府需用主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作为外债的抵押，实际上，这是继海关之后，又将盐政置于外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此外，合同还规定，要在中国财政部之下设立盐务署，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加强盐税的管理。还有，银行团派员担任审计院顾问、审计院稽核外债室的稽核员，来稽核善后借款的用途，实际上是监督中国的财政。通过监督和控制中国财政，列强就可以摆布中国的政局，使袁政府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政局，善后借款又是一个"创举"，它标志着中国的殖民地化又进一步地加深了。

因善后借款条件过于苛刻，早在借款的酝酿阶段，就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但由于银行团造成的垄断局势已定，便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更为严酷的借款条件。消息传来，群情哗然，大江南北涌起反借款的风潮。袁世凯以断送国家主权，放弃经济命脉的重大代价，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对于国会，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只是将木已成舟的借款问题提请国会备案，并不请国会进行表决。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力下，反借款风潮被压了下去。袁世凯在借款问题上终占上风，善后借款遂告"成功"。

袁世凯弄权有术，又有帝国主义作靠山，最终如愿以偿，由临时总统变为正式总统。为了报答主子的帮助，袁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中，以明确的姿态表明：他的"民国政府"是清朝政府的卖国传统的继承者，各帝国主义列强尽可完全放心。他说："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经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

就在袁世凯就职的这一天，俄、法、英、德、奥、日等国政府均发出照会承认中华民国，这使袁得意非凡。因为各国的举动恰恰印证了袁党所谓"民国有了正式总统，列强才肯承认"的鬼话。可是，谁人不知，这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政权代理人早就布置好的一套双簧。

（摘自《勿忘百年国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刺杀宋教仁

背景介绍

抱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幻想的宋教仁，企图根据临时约法规定的约法实施后十个月内选举国会，制定宪法，力争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组织责任内阁，以和平手段同袁世凯争夺政权。宋教仁等人为争取未来国会选举的胜利，积极进行同盟会的改组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政党上，他认为，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其政治之优劣，决定于一个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大党。谁能组织起这样一个"强健而良善"的政党，谁就有资格组织政府，建立志同道合的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即使退而在野，由他党执政，"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两党"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因此，政党是一个实际左右统治权力的机关，在共和立宪国里，"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宋教仁完全不懂得中国对外缺少民族独立，对内缺乏政治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却紧紧抱住政党政治的信念，以罕见的政治热情，积极开展组党活动。

改组同盟会的根本目的既然是联合中间党派，造成第一大党，以实现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所以其前提就必须消除同盟会的革命性和急进性。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与受宋教仁影响较大的统一共和党，以及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政团合并，正式在北京建立国民党。国民党改变了同盟会的领导体制，由总理制改为理事合议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王芝祥等为理事。宋教仁取得仅次于孙、黄的票数，以“稳健分子”的代表掌握国民党的党务。九月三日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孙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使一个革命党变成了议会政党。国民党的政纲，把“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剔除了同盟会公开后“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也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宋教仁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把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拉入国民党内，“龙鱼杂处，真伪不分”。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占了六十席，成为第一大党。

国民党在宋教仁主持下，大力从事竞选活动，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南方还有几省地盘，又拉拢了大量官僚政客，获得了参众两院三百九十二个多数议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取得压倒优势的选举胜利，使立宪派为之失色，袁世凯也感到威胁。

材料：

- 宋教仁血案
- 有关各方文电

材料一　宋教仁血案

1913年1月，全国各省、地区的国会选举结束，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努力，结果国民党在众议院596席中占269席，参议院274席中占123席，大获全胜。按照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原则，无疑应由国民党出组责任内阁。宋教仁一下子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甚至社会上已纷纷传言他将出任内阁总理。

当国民党、宋教仁沉浸在喜悦之时，袁大总统却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总理赵秉钧也觉得威胁就在头顶。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4月8日在北京开幕。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共商国事”，于是宋教仁决定3月20日乘车前往南京，然后转乘津浦线列车北上。就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上海已纷纷传言，有人阴谋加害宋教仁。许多人劝阻宋教仁暂时不要北上，宋教仁坦然一笑：“光天化日之下，岂容这种卑劣小人。况且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即使有危险，我又怎能轻易就放弃自己的责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车站。在午夜到来之前，正是车站最繁忙和紧张的时候。上下车的旅客熙熙攘攘，不太大的车站显得有些拥挤，墙上贴着各式的广告、红红绿绿的标语，更增加了嘈杂混乱的气氛。11点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正待开车，这时从车站贵宾候车室走出来一群人，有的穿着西装革履，有的则是长袍马褂，一个个气度非凡，边说边向着检票口走来。忽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两声。只走在中间的一个人身体一晃，向前踉跄了几步，一下子趴在一张椅子上。

枪声一响，车站顿时大乱，逃命的人们有的拚命向外跑，有的吓得钻到椅子底下。混乱的场面持续了10几分钟，只听传来一声撕肝裂胆的喊声：“钝初——，钝初，你怎么啦！”人们立即像被钉住了，目光转向那检票口。“呜——！”列车启动了，长笛一声，划破夜空，像警号，也像哀鸣。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的消息，民国政府前农林部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先生昨夜在沪宁车站遇害。晨雾中传来报童一阵阵的叫卖，宋教仁的名字在大街小巷飘荡。“宋教仁被害，生死不明。宋教仁被害，凶手不明……”

此时，宋教仁躺在沪宁铁路医院里，脸色惨白，冷汗珠一颗一颗从额头上冒出来：他想到死，想到家中年迈的老母、娇小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想到了他为之奋斗的民国、即将召开的国会，想到他仅有的财产——给予他知识和智慧的书。德国医生从伤口中取出一颗勃朗宁手枪的子弹。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离心脏只有一寸多远。由黄兴代拟的电报已经发给袁世凯：“……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人。清政不良，起任改良，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总统府有关人士发表谈话：袁大总统对宋教仁遇害之事极表震惊，已命令江苏省都督程德全、巡按使应德闳及沪宁铁路局等，悬赏严缉凶手，限期破案。

宋教仁手术以后伤势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出血严重。21日下午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医生们才发现大肠有一处被枪弹划破，失血严重。手术以后，医生们表示只有看上帝的安排了。22日凌晨3点左右，宋教仁体温下降，手脚发凉，心跳微弱，呼吸急促，他望着黄兴、陈其美、于右任这些曾经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朋友，双手合十，与大家诀别。1913年3月22日凌晨4点38分，年仅32岁、壮志未酬的宋教仁气绝而逝，但他两眼依然直视前方。

就在医生们竭力抢救宋教仁生命的同时，破案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之中。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上海地方检察厅和上海租界巡捕房都在积极调查。但两天过去了，没有丝毫线索。唯一的证据就是宋教仁身上取出的一粒勃朗

宁手枪子弹和车站脚夫捡到的三个空弹壳。偌大上海寻找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刺客，谈何容易！就在山穷水复之时，突然一个小小的线索却瞬息之间使真相大白。

23日下午，国民党为宋教仁举行移柩仪式，将宋教仁盛殓，由医院移往湖南会馆停放。天空布满阴云，一会就下起阑阑细雨。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纵贯上海市区，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一个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走进了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他叫王阿发，以卖古董为业。10多天以前他到一个叫应桂馨的家中兜售字画，应拿出一张商务印书馆印刷的明信片，指着上面印着的宋教仁的像说：我打算要办这个人，你如果替我做了，我出一千块大洋。王阿发虽然倒腾古董字画赚的不多，但也不想为一千块大洋冒生命危险，于是就委婉地拒绝了。宋教仁被刺之后，王阿发寝食不安，良心难平。今日一见送殡队伍，更感到宋教仁先生人格伟大，死得悲惨，遂下决心揭露黑幕。国民党得知此情立即报告租界巡捕房，要求迅速逮捕应桂馨。捕房总巡卜罗斯虽觉证据不足，但仍以重大嫌疑罪名将应桂馨捉拿归案。这应桂馨也并非等闲之人。他又名应夔丞，早年曾开过戏园、烟馆，后来花银子捐了个候补知县，还在广州演过新剧。武昌起义以后又投靠革命党，在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做过谍报科长，在南京临时总统府卫队也混过一阵。以后又渐渐和革命党疏远，不知如何当上了江苏巡查长，什么共进会会长，在上海滩也是颇有势力。这样一个人物捕房自然也不敢空口无凭地随便羁押。应桂馨是被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妓院里抓到的，但他的家在西门文元坊，属法租界。经过法租界巡捕和卜罗斯的努力，终于在应桂馨家中搜得了大量的证据，同时也非常巧地在应家抓到躲在这里避风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士英是个流氓兵痞，只认钱不认人，在云南军队中混迹多年，练得一身好枪法，行刺之后第二天才知道宋教仁没有当场死去，一千大洋落了空。23日下午见到送殡队伍，知道宋教仁死在医院，于是到应宅讨赏钱，谁知正落进巡捕手中。

（摘自《民国春秋》）

材料二　有关各方文电

宋教仁致袁世凯电 1913年3月20日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受，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贺。

（《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袁世凯通令
1913年3月22日

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二十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办，立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嗣据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二十二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酋，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应即交国务院从优议恤，用彰崇报。所有身后事宜，业经电饬陈贻范会同钟文耀妥为料理。方今国基未固，亟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藐法横行，匪惟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应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通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此令。

中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黄兴挽宋教仁联
1913年4月13日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

熊希龄组阁

背景介绍

宋案发生后，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自5月间就被迫"请假"，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7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各部总长也七零八落，除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农林、交通有总长之外，其余各部都以次长代行总长之权，内务为王治馨，教育为董鸿祎，工商为向瑞琨，财政为梁士诒。当时，袁世凯正在全力准备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暂时无暇顾及内阁人员的补充问题。7月底至8月初，对南方用兵节节胜利，使调整政府机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对于总理这一重要职位，袁世凯不想让与北洋毫无关系的人担任。他曾想请徐世昌出山，表示

"舍徐菊人殆无第二人足以相属",但由于遭到国民党和进步党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徐不肯从命,只得作罢。最后,他不得已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他表面上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暂时利用。因为对南方的战争尚未结束,正式大总统选举也没有进行,此时取得进步党人的支持,对战胜国民党是非常重要的。

熊希龄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7月初,当江西准备起兵抵抗北洋军时,他曾以热河都统名义通电全国说:"尚望参众两院破除党见,电责叛军首领迅速解兵,听候裁判,"否则"愿与副总统及各部都督共击之"。至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

与前几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组阁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次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希龄在7月初得到组阁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意外,7月18日上辞呈说:"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所以总理一职"万难从命"。袁复电不允,并命他速来北京"计议大局"。7月20日熊希龄入京,与袁面谈,并与进步党领导人筹商进退。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并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北洋派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8月26日熊就职,28日赴参众两院发表施政演说,但内阁人选仍未完全确定。一直拖到9月初,袁才同意采取折衷的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9月11日,各国务员经国会通过,并由袁世凯任命。至此,民国以来的第三届内阁才正式组成。阁员九人中,进步党四人,其余五人都是北洋派。熊内阁是北洋派和进步党的联合内阁。由于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人的黄金时代。鉴于赵秉钧内阁应办之事都由总统包揽,"国务院不过盖章、副署之机械而已",熊希龄一上台就表示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府划清权限",并"勉成责任内阁人员,当不顾利害,积极负责任"。梁启超也想一显身手,为内阁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经国务会议通过。熊率领全体国务员出席国会,郑重宣布大政方针,此后并在全国各大报纸刊布。这是以往历届内阁所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所以熊内阁给不少人以政象一新的观感。

材料:

· 熊希龄内阁

材料 熊希龄内阁

赣宁之役,自五月一日湖口独立,至八月二十八日南京取消独立,二次革命告一段落。此时国务总理已改任熊希龄矣(八月底始自热河来京就职)。袁又托徐世昌来言:"此事当时他不赞成,不能勉强,今战事既告结束,他平日总言政治为主要,此其时矣。要以国家为重,出来帮忙。"其时各方面都有不利于议会的传说。我询徐:"总统对于议会意见如何?"徐言:"还是重视。"段亦派徐树铮来言:"上次因军事紧张,未能择言,万勿芥蒂。"尤其两院吴景濂、汤化龙一般议员人人自危,群相谆促。我私计政局演变,以个人力量或者于宪政萌芽可以稍稍维护,于是乃取消退志,出而任事。

段代赵阁,本是暂局。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后任国务总理以熊希龄提交国会同意,特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国会因赣宁役后,皇皇自救,无论任何总理,皆可通过。袁之真意,盖以"徐世昌为最满意之人,惟一切葛藤须先划除干净,徐世昌再出山"。此次任熊者,熊与各党派素有历史(尤其进步党),借其"以党杀党,可减少反响",非真属意于熊也。其时熊任热河都统,地方交代,未能即日来京。据张一麐告我,某日,袁以孙宝琦任外交、周自齐任财政,谓"俄案亟待办结,财政须有人负责,故先发表"。本人(张自谓)言:"熊既任总理,似此阁员,当与接洽。"袁踌躇言,亦可电告。熊复电:"俟来京面洽再办。"袁颇不怿。在熊未就职前即发生芥蒂。然即无此痕迹,而其所负之任务,只在解散国会。熊不自知,梁启超书生更不知也。

八月二十八日,熊自热河到京就职。其阁员如下:

外交　孙宝琦
内务　朱启钤
财政　熊希龄(自兼)
陆军　段祺瑞
海军　刘冠雄
教育　汪大燮
司法　梁启超
农林　张　謇(兼)
工商　张　謇
交通　周自齐

此时第一流内阁,喧腾都下,其实夹袋中,只梁启超、张謇、汪大燮三人。熊本意以梁任财政,在口头上表示,袁

不同意，故自兼，而以梁任司法，表面自兼，实即梁做也。杨度是其同乡，且有多年关系，自命亦第一流，且以交通自任，而熊始终未曾相约。外间传说熊约杨任教育，故杨以帮忙不帮闲解嘲。余与熊多年旧交，熊留我仍任秘书长。此次共事，乃知其底蕴。……相处半月，余于是决计辞职（我曾在黑龙江幕，熊拟任江省省长，我坚辞，未发表）。继者为陈汉第，本府秘书（府中人言，总统于秘书最敬畏张一麐、陈汉第二人，以其正直常进诤言，有时告左右说，这等事不要令他两人知道）。陈到院后，袁因熊关系，转而与之打官话，于是府院更形阂膜。即就一事论，各省军民长官来电，习惯上分致府院两方，其重要者单致府方，唐陆两阁期间，径由府复，其电末"奉谕特达公府秘书厅"，云云。其稿不交院，故院每日仅办照例公文而已。我任秘书长，屡次向袁建议："现在曰责任内阁，若重要事件院方概不闻知，责任谓何？岂不为各方所指摘？况府院面为国家办事，若院方人不可信任，尽可择信任之人，不必因人而废事，令后者无所取法。"后袁渐渐将府方复电稿交院译发，向用"公府秘书厅"改用"国务院"三字，府方复电稿中，前后事实不衔接者，亦可说明修改，久之，即径交院方拟稿。张常笑言："你做秘书长，我们府里倒清闲了。"除真正秘密非我辈所能与闻外，所有主张，我总本守法宗旨，与之诤论，袁亦虚心采纳。我于此，不敢曰国事有补，而综合全国军政大事，得增加个人识力经验不少。陈到院后，府方即将此种电文收回，仍用"公府秘书厅"名义拍发，不复交院，非以对陈，实以对熊，而院方如旧清闲，又复不闻不知矣。事且不闻知，安能处置？

十月初六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初十日就职。

十一月初四日早，我往府，过秘书厅，见一小室内，有书记誊写命令稿，我趋视之，乃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即变相之解散国会也。书记固素识者，言："此件秘密，万勿泄露。"我即往院，密问熊："国会闻将解散，于意云何？"熊言："总统未曾提过，料想不至如是。"正谈话间，府方电熊到府，不多时，即将此项命令携回公布。至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初十日，下令停止两院议员职务，而国会即在熊内阁告终矣。

二月□日，袁约我到府，言："院方只说话不做事，财政更无办法，总理辞职为是，或先辞财政，再辞总理。你与总理旧交，可往劝之，我不是强他下台，是他办不了。"我言："此等内阁进退，如何能局外人轻易言之？"答词未毕，适陈秘书长来。袁问："近日总理办些何事？"陈言："总理颇有退意。"袁作张皇不安状，言："总理如何能退？我意中无别人，务要安心办事。"我在旁悚然。其后□日，熊果先辞财政，□日辞国务总理。十二日，免熊国务总理职，以外交总长孙宝琦兼代；财政，周自齐代。二十日，梁、汪免职；司法，章宗祥代；教育，严修代（次长蔡儒楷暂署）；交通，朱启钤代；梁、汪去，惟张謇独留。（此段据公布命令）

经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由约法会议议决，于三月一日公布（新）约法，国务院改政事堂，而临时约法的内阁制一变。

（摘自《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

二次革命

背景介绍

刺杀宋教仁是袁世凯发动内战的信号。"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便秘密下动员令和大借外债，决心以反革命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力量。

为了筹集镇压革命的经费，袁世凯不经参议院同意，即于4月27日以全部盐税收入为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250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大借款被袁记政府用以"购军械，增军队，收买南方海陆军"，大大助长了反革命气焰。同时，5月2日，美国又正式给袁政府以外交承认。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认为：承认将在全国起稳定作用，增加老百姓对共和国（袁政府）的尊重，还可以使袁政权的反对派（指孙中山等）丧失信心。

四月七日袁世凯发布秘密动员令，命驻兖州的张勋与山东都督周自齐候令待发，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督率李纯部从湖北进江西；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准备沿津浦路进攻南京。袁世凯已经准备好用武力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黄兴大裁民军的同时，北洋军队急剧地膨胀起来。

黄兴自裁兵、撤销留守府后，已无军事实力，"江、皖、赣三省战兵不满三万"，因而动摇于战、和之间。他周围的国民党将领"皆主张慎重，以避袁氏凶风。克公笃实君子，敞纳其言"。黄兴对孙中山说："南方武力不足恃，敬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五月二十日袁发"传语国民党人"的长电："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果然，六月九日借口李烈钧反对借款，不"服从政府"，免其江西都督职。接着又解除了胡汉民、柏文蔚职务。七月五日北洋军进逼九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起兵应战。

七月上旬宋案发生已经三个多月以后，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才最后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十二日李烈钧奉孙中山命，由上海转回江西，在湖口宣布起义，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所谓"二次革

命"的反袁之役开始了。

江西首倡独立，各省相继响应。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挟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决心率"吊民伐罪"之师，"竭九死之身，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此后，江苏各属之徐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松江、清江等地相率树旗独立。

7月17日，安徽独立，柏文蔚被举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

7月18日，陈其美以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同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

7月19日，福建宣布独立，以许崇智为讨袁军总司令。

7月25日，谭延闿被迫宣布湖南独立。

材料：

- 讨袁之役
- 二次革命在南京的血战

材料一　讨袁之役

袁世凯觊觎非分，总理洞烛其隐，且以闽粤势处海边，袁氏鞭长莫及，乃密令发动讨袁。两省以内部整理未就，且有图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即动。又命湘省发难，谭延闿亦以种种不易情形报告之。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讨袁。时袁世凯以余有欢迎总理莅赣之举，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且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忌颇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当张继等来时，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且以恋位见疑，乃先赴海上一行，面谒总理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切取联络，诸友亦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作一切准备，遂由九江乘轮赴沪，面受方略。后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舣船待余，乃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开一紧急会议。众推省议员杨赓笙（字咽水）撰讨袁文，移时立就，并发出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并令要塞鸣炮致贺。

讨袁军既宣布成立，乃在湖口召集师长刘世均，旅长何文斌，水巡总监何子奇，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团长周璧阶、吴安伯等会议，决定宣布独立，通电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组织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参谋总长一人，副二人。军法部长一人，下置三科。财政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内政部长一人，下置六科。外务部长一人，下置四科。邮电部长一人，下置二科。军医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军政署长一人，其组织另定之。

是时江西都督已由省议会公举欧阳武继任，讨袁军宣布独立后，省方亦表赞同，并布告人民，俾众周知，江西民气益加振奋矣。

部署初定，忽接要塞电话报告，谓江面到有楚字军舰四艘，对湖口作示威状。闻者颇惊异。顾余以为当援皖、援鄂时，对海军一二舰队曾尽友谊之援动，黄鍾瑛、汤芗铭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故，不欲示以防御。未几，该舰等即向九江驶去。

自九江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北军派李纯统兵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初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乃不敌。团长周璧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周为云南讲武堂优秀学生，由川间关随余"出师未捷身先死"，滋可痛也（后由杨赓笙召集地方贤达为周立墓于湖口）。又有余邦宪者，亦以团长阵亡。余见浔湖之战，陷于不利，乃率所部退驻吴城，命炮兵营长刘凌扼守望夫亭，复命师长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粤援军，然久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状似难民者俱跪船首作哀求状，刘凌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夫亭，则伏兵登陆矣。方声涛挥刀斩数人，而吴城遂陷。

时有满载援军之两船，不知去向，余派小轮两艘遍江寻觅获之，命随余船行。复命讲武堂教官穆恩堂（山东人，亦日本同学）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以电话告知宪兵司令廖伯琅，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严厉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至都督府，廖伯琅逃赣州。守兵知其事，乃捕获之，电告余。余复电令解南昌法办，乃解至时余已去，卒为李纯所杀。宗旨不定者结果如此，可叹也。其时各高级官多已散去，财政司长魏斯灵亦携眷远走，不知去向。（初有献周瑜印者，篆文铜质，斑烂可观，余以此系国家至宝，不敢据为私有，当即交财政司保管，是时魏既逃去，该印亦不知落何人手矣。）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命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矣。有邓祖禹者，奉余命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两艘，待余于寺步门外。余见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又久不至，而赣军苦战，弹尽力疲。适湘督谭延闿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古有名训"之语，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劝行，余乃命分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南昌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故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行不久即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号桂良，与维新时六君子同时遇难之唐

才常之长公子也)，见余后表示湘省当局及同党意见，而援军亦次第到。余嘱停萍乡待命，乃偕桂良赴袁州。因一路援军四集，秩序欠佳，余立持镇静，比抵袁州，乱愈甚。时有不肖士兵在街市劫掠者，人民捆一人至，立时围观者二三千人，视余如何处置。余授意内卫队布置警戒之法，复命内卫队长钱义成将犯兵押送余前跪俟处决。余以举义讨贼而有贼民之兵，既怜且恨，然为纪律计，余乃自拔手枪命犯兵前行。不数步犯兵跪于地语余曰："都督请就在此地受法。"余颔首，乃连发二枪毙之，围观者皆吹呼，余频点首谢之。遂拔队行，翌日至萍乡。

萍乡人民闻李都督到，咸企踵欲一见。余学书剑无成，讨袁又失败，无以慰人民，而人民爱戴若此，实可愧也。旋乘火车至长沙，有谭都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将袁等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乃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日本驻大冶之办事人员招待亦殷勤，次日乘煤船启碇，桂良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过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一时。乃将余匿彼衣箱内，余始知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不虚也。行未一时，过湖口，船长又语余曰："将过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然炮位已移去，过此以往船行江面可无顾虑。"遂与桂良同到船长室谢其盛意，船长亦谦让不遑。至第三日已至黄浦，出海向日本前进矣。惟余虽脱险赴日，然因是役被通缉者，计有杨赓笙、胡廷銮、涂树霖、李儒修、王镇寰；被捕殉难者，尚有徐秀钧诸先烈；而被捕系狱者，有姜伯彰、何犹兴、吴安伯、杨翘新诸同志，直至袁逆自毙始先后恢复自由云。

(摘自《李烈钧自传》)

材料二　二次革命在南京的血战

一九一三年七月间，孙中山策动讨袁的计划决定后，江西都督李烈钧于是月十二日在南昌宣布独立，林虎所部亦于是日与南下的北洋军李纯部在湖口接战；十五日黄兴由沪来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自任讨袁军总司令。当时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即集合全师官兵于小营练兵场誓师讨伐袁世凯。陈在誓师时，曾很沉痛地说："袁世凯毁法乱纪，摧残革命党人，有袁世凯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袁世凯……"，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誓师后即编成讨袁军一支队，以刘建藩为支队长，率领王孝缜的三十团，配属骑、炮、工兵各一连，向徐州出发，并拟联合第三师一同北进。程德全没有讨袁的意愿，十六日即偕同民政长应德闳离宁赴沪。十七、十八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先后举义讨袁。陈其美当时亦组织讨袁军，围攻上海制造局。袁氏为了锄除异己，遂下讨伐命，并任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领大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沪宁。我讨袁军遂放弃徐州。师长陈之骥原系冯国璋之婿，袁世凯一面采用软化政策，诱陈取消独立，以保留第八师的建制为交换条件。陈之骥以那时湖口、南昌、安庆相继失陷，形势恶劣，为所动摇。黄兴见势不好，即于是月二十九日离宁赴沪，程德全亦于是日宣布取消独立。于是何海鸣向孙中山自告奋勇，于八月八日入据南京，宣布独立，并自任讨袁军总司令。陈之骥投袁之意已决，乃将何拘禁下狱，并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认为战则取胜无望，和则可以保全，主张接受袁氏提出条件，和平解决。与会人员虽均不赞成，但陈终于决定取消独立。官兵对此极为不满。结果，陈之骥离开部队，接着陈裕时、刘建藩、王孝缜、张厚琬等旅团长相继离职。此时，外则敌军压境，内则统率无人，于是推举李某(忘其名)统率，李某旋为乱军所杀，继又推举二十九团第一营长王涣充任。王于翌日亦离去，第八师遂成为无主帅统率的部队。十一日何海鸣出狱，复自任讨袁军临时总司令，指挥军事。这时，冯国璋和张勋两部大军大举进犯，大战序幕即告揭开。

战斗初期，第八师以哀兵之众屡予北军以重创。嗣因第一师洪承点部战斗力过于薄弱，屡失紫金山要点，经我师二十九团反攻，三复三失。那时我工兵营第一连守幕府山炮台，第二连守狮子山炮台，第三连守各国领事馆，一、二两连均能坚守抗敌。无如敌我兵力众寡悬殊，战线过长，加以何海鸣系属文人，不懂军事，有时使用一连兵力，亦由其直接命令，因此，造成分割建制，指挥不灵，防守亦疏，致使敌军由雨花台侧方乘黑夜冲入汉西门内。但我军仍然与敌从事巷战，浴血苦斗，直至九月一日，南京才完全陷落。

(陈树庭《辛亥回忆录》)

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

背景介绍

袁世凯在以武力扫除6了南方几省的反袁势力和镇压白朗起义军的过程中，认为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在镇压"二次革命"时，非但没有驱逐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反而宣布要"尊重"这些议员的权利，让他们充当可耻的垫脚石，使他的专制独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在北京的国民党理事吴景濂被迫声明："现在赣宁之难，系孙、黄等个

人举动，与本党无关。本部党员绝不扶助孙、黄，二者之间无何等关系。"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官迷心窍，利欲熏心，竟然看不透袁世凯的诡计，继续赖在国会里，要与进步党合作制定宪法。袁世凯一方面收买、分化国民党议员，使国民党分裂为各种小集团；另方面进一步利用进步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他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内阁。九月内阁正式组成，除主要仍是北洋军阀官僚外，也包括进步党的梁启超、张謇等人，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

在国会内部，国民党势力本来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进步党的组成，这种优势立即名存实亡。国会议员的政治成份本来就混入了大批旧官僚和政客，"曩日之资政院议员，即半为今日之国会议员"，在政治上跟着袁世凯跑。汤化龙出任众议院议长，进步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他的操纵下，顺利通过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号称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已经被大批"野鸡政客"所侵蚀，不少人为了独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原先就十分涣散的国民党议员，现在又分裂出诸如相友会、政友会、超然社、集益社等投机性的小政团，这些浑浑噩噩的所谓"稳健派"，连"法律倒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只能在袁世凯划定的圈圈里，被人当作选举机器使用。因此，国会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很快就被袁世凯的"积威"和"财贿"所制服，成为袁氏独裁统治的点缀品和遮羞布。

材料：

- 选举正式总统
- 就职典礼

材料一　选举正式总统

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和内外夹击下，9 月 5 日，国会顺利地通过了先选举总统后制定浣法的议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新的《大总统选举法》，于 10 月 4 日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通过公布。袁世凯为了能在 1913 年 10 月 10 日中华民国建国两周年"国庆"大典上，以正式总统莅临出席，竟胁迫国会在 10 月 6 日即仓促投票，选举总统。

6 日一早，国会议员们就纷纷来到选举大厅，履行他们所担任的"神圣职责"。可是，当他们进入选举大厅后，突然有数千名身着军裤、皮靴，佩带着短枪的军警、地痞、流氓，一个个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整队来到选举厅，把选举厅包围得如铁桶一般，呼喊示威，声称："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休想出院。"与此同时，公民党也在内部威胁恐吓。在这内外夹攻的形势之下，议员们一个个忍饥挨饿，从早上八时一直选到晚上十时，经过三次投票，袁世凯才以三分之二的微弱多数，勉强当选为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如愿以偿，"公民团"便高呼着"大总统万岁"的口号，整队离去。

10 月 10 日，在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纪念大典上，袁世凯身着戎装，宣誓就职。可是，袁世凯这次就职典礼，既不在总统府新华宫内举行，也不在国会内举行，而是借用逊清皇宫太和殿，即明、清封建皇帝御极的地方举行。而且，民国本来"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议员宣誓"，"如此自应将议长、议员席位设在北座南向居中央处，听取总统矢誓"，以示尊重民意。可是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却恰相反，模仿封建皇帝御极的形式，"坐北面南"，议长、议员们分排两侧，听取袁世凯的"谕旨"，"贻训世界"。从而暴露了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的狂妄野心。

次日，国会又选举黎元洪为正式副总统。英、法、俄、日、德等十三国继美国之后（四月八日国会召开时美国首先承认了中华民国），先后承认了中华民国，表示支持袁世凯政府。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二　就职典礼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仪式是与开国纪念同日举行的。当时由总统府（礼官处）发出请柬和通知券。参加典礼的，有参众两院的议长、议员和简任以上、上校以上的文武官员，有各国公使等，此外还有清皇室代表贝子溥伦、蒙藏代表、在野官僚、名流士绅以及金融界、报界人物等等。请柬和通知券上指明当日上午八时在太和殿入席，十时举行庆祝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及大总统就职典礼，参加者凭请柬或通知券由西华门通行。同时由外交部总长孙宝琦具名另发请柬、通知，订于当晚九时半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举行茶舞会。参加庆祝典礼时，文官一律着燕尾服，武官将军一律着军礼服，参加舞会时一律着晚礼服。

太和殿内外是由内务部负责招待的，这个招待工作很繁重。按照预定，在太和殿大殿分设东西南北四个席位。北面设主席台，准备作总统宣誓的席位。南列，居于殿中偏南部位安排参众两院议长议员席。议长议员席所以得此位置，还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力争来的。事前公府原拟将两院议长议员席位分列左右两边，靠近主席台。王说："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议员宣誓，其余参加典礼的只是外宾及见证的官民代表而已，如此自应将议长议员席位设在北座南向居中处，听取总统矢誓，万不可侧居客位，贻训世界，此事必须持重审慎。"因此后来经过一番争议，才折衷决定将议长议员

席设在南列北向居中，因为袁坚持非“南面”不可。那天虽碰着下雨，因为典礼隆重，两院议员出席者达四百余人。东列是文武官员席，国务总理、国务员以次简任以上、上校以上的文武官员皆在此席。西列是各国公使、清皇室、蒙藏代表及名流士绅席。关于当日典礼，事先袁曾责成大礼官黄开文指挥有关官员等认真演礼，以防临事失措。东席官员大部分曾参加演礼，所以当天招待他们比较方便，最繁忙费神的是西席的招待。

九时许，参加的人大致已入席。十时才过，招待人员扬言总统将至。这时有戴全金线军盔、着蓝色制服、佩带军刀的卫士三百二十名排队走入大殿，分两排站列在距东西两席前约十数步处形成了一个警卫的胡同。卫士立定后，先来了四人抬的彩舆四座，从彩舆走出来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皆着燕尾服；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皆着钴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最后袁世凯乘着八人抬的彩轿到来，着陆海军大元帅礼服，礼服亦钴蓝色，金线装饰甚多。袁下轿后，由梁等四人拥护前行，登主席台南面入座。

少顷，大礼官黄开文见诸事齐备，即着赞礼官程克赞礼。袁应声起立，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誓曰：“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誓毕，袁鞠躬。这时文武官员都高呼“万岁”。袁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赞礼官继续唱礼，由黄开文递上长篇的宣言书，袁重行起立宣读。读完，礼毕。一面由梁士诒等随总统召见各国公使及清皇室代表等，一面由招待人员等引庆贺人等同至武英殿茶点。

袁世凯于午睡后约下午三时许，由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陪同举行了阅兵仪式。袁乘二人肩舆登天安门城楼，由段等五人陪同。参加的军队约两万余人，先由将官结队登上城楼谒见，按照一般检阅程序，简单汇报受检军队情况。继由袁训话，训华，将官分别归队，下传袁训辞。接着楼下的队伍就走动起来。在开始走动时，袁和我们都还看看，不多时，小雨不止，我们就劝袁不必久留，袁叫我们有些人也回去休息。我当时也就走开，以后也未动向，所以不知当时操演到什么时候。

晚间茶舞会是由外交部布置招待的，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亲自在外交大楼厅前欢迎来宾，一一握手。我妻沈友琴也参加了招待工作。九时许舞会开始，厅内外裙屐杂错，中外麇集。

总的来说，当时的印象是庆贺袁世凯就职的气氛浓重，开国纪念则不过是附带节目而已。

袁世凯在就职后，颁布了各种勋章，还发行了铸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字样的银币和铜币。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西姆拉条约

背景介绍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达赖回到拉萨，投身于亲英分子们的包围之中，他不仅从日喀则、江孜调派军队开往昌都，而且派人往印度请求英国的帮助。

然而，当英国尚未来得及公开进行干涉的时候，钟颖的部队已由昌都绕道三十九旅迅速向拉萨进发，于一月三十一日占领江达，二月十二日先头部队到达拉萨近郊。这时，达赖在夏札等人的挑唆之下，于当日午夜简装出逃，先到亚东，后又转往大吉岭，投入了英帝国主义的怀抱。达赖到达亚东的当天，立即受到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欢迎”。据麦克唐纳供认：“我接到印度的训令，假使达赖要在商务委员公署避难，应予准许。所以我才能够欢迎他。”可见，达赖的出逃是英国侵略者精心策划和诱骗的结果。

达赖逃亡印度后，清政府立刻宣布废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命驻藏大臣另找灵童代替。驻藏大臣联豫也在西藏加紧进行政治改革，进一步提出政教分离的方针：“以后凡关于西藏的一切教务，由达赖专司其事，所有全藏之商务、外交，在西藏省制未设以前，悉由驻藏大臣秉承政府命令，相机处治，达赖不得越权干涉。”今后“如再有达赖私与外人缔结条约情事，中国政府一律不能承认”。

一九一二年四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大总统命令：“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五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并准备派遣军队进入西藏平息叛乱。民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的正义行动，使得英国侵略者极度恐慌，深怕即将得售的阴谋落空，于是剥去了一切伪装，公然以“保护商务”为名，于五月派军数千名侵入西藏，直抵拉萨附近。六月达赖便在英军的护送下返回西藏。七月西藏叛军在英军的直接声援下向拉萨发动进攻。钟颖率领驻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抵抗二十多天，到七月底终于被迫“讲和”。从九月开始，已经失去武器的拉萨驻军，大部分先后返回内地。达赖在英国的支持和控制下重新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在西藏大搞武装“驱汉”的同时，西藏叛军又发动了对川边地区的进攻。原来，武装起义爆发后，驻川边的清军相继被调回四川镇压革命，川边各地的土司相继发动叛乱。西藏叛乱集团在英国的指使下，派军前往支援土司们的叛乱，并直接向东进犯。到六月中旬，他们先后攻陷盐井、江卡、稻城、理塘等地，并包围昌都、巴塘等重镇。川边的形势迅速恶化。民国政

府迫于各界舆论的压力，于六月十四日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率川军前往川边平叛，接着又命令云南督军蔡锷组织一支军队，出云南与尹军相配合。七月初尹昌衡率领川军从成都出发西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川边的形势趋于稳定。

材料：

· 西姆拉会议

材料　西姆拉会议

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关系的趋向缓和，以及沙俄的积极插手西藏，引起了英国的极度恐慌。英国为了把西藏控制在自己手中，妄图迫使中国同意举行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以便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达到其分裂西藏的目的。在中英交涉中，袁世凯政府虽然曾提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中英两国会议不能有西藏代表参加的正确主张，但最后迫于英国的压力终于同意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在英国策划下，中、英、藏三方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正式开会。中国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原英国驻华使馆官员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英国代表是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西藏代表是夏扎，英驻哲孟雄委员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在西藏代表尚未出境之前，英国就曾派柏尔以迎接西藏谈判代表为名，窜入西藏江孜等地，与西藏参加会议的夏扎秘密勾结，并根据英国政府训令，与夏扎密商拟在会议上所提条约草案，商讨对付中国代表的办法。所以会议一开始，西藏代表就秉承英方旨意，提出了六项强硬要求："（一）西藏独立；（二）西藏疆域欲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三）光绪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四）中国不得派员驻藏；（五）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喇嘛主持；（六）所有勒收之瞻对税款及藏人所受损失，一律缴还赔偿。"值得指出的是，这六条竟同英方代表所提草约内容基本一致，证明它完全是在英国的操纵下炮制出来的。英国侵略者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目的，不仅在于完全割断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一切联系，而且还要割走中国的青海和四川西部的大片领土。这样无理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激烈反对。十一月一日中国代表提出了驳复条款七条，否定了"西藏独立"，对西藏邻近省分的划界问题，也坚持原界。谈判争执十分激烈。英国代表强作调人，直到翌年三月十一日才抛出蓄谋已久的"调停约稿"十一条。约稿除了重弹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滥调外，还恶毒地提出了划分内、外藏问题。所谓"外藏"，包括西藏地区及川边、青海大部分。约稿规定，外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西藏之内政（原注：选举达赖喇嘛事在内），应由拉萨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除中国驻藏代表及卫队百名，可驻扎西藏外，"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废除一八九三年、一九〇八年印藏贸易有关章程，允许英藏直接改订商约；英国商务委员必要时，可带卫队至拉萨等。这个所谓"调停约稿"，是妄图用外藏自治之名，以行西藏独立之实。约稿表面上规定，中国可派代表及卫队百名驻藏，似乎保留了原驻藏大臣的旧制，但实际上规定外藏内政、外交自理，中国驻藏代表形同虚设，中国主权丧失殆尽。英国搞的内、外藏阴谋，与沙俄侵略中国蒙古时制造的"内蒙"、"外蒙"如出一辙，这是英、俄争压与瓜分中国的共同伎俩。其时，袁世凯政府正忙于镇压南方各省反袁的"二次革命"，急需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在谈判中处处妥协退让。而英国代表却步步紧逼，多方要挟，"并限于一星期内以允否两字见复，否则即行决裂。经再三磋商，始允逐条开议"。四月二十七日英方将"调停约稿"稍加修饰后，便胁迫中国代表立即草签。陈贻范在英国的压力下，以"免致决裂"为口实，被迫草签了条约。但陈在草签时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正式签字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四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得到陈贻范草签条约的电报后，立即回电："英员仅许一隅之地划归青海，迫我承认，殊堪诧异，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陈贻范依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三个月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西姆拉会议举行以来，沙俄一直注视着会议的进程。英国要实现"西藏独立"的阴谋，就必须与沙俄达成谅解。从四月开始，英俄两国经过多方交易，沙俄在英国答应对西姆拉草约有所修改并在其它方面取得英国补偿的条件下，才作出了一些让步。英国与沙俄基本达成协议之后，便肆无忌惮地胁迫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六月六日英驻华大使向民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强硬照会，声明不管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代表将与西藏代表一起在条约上签字。此草约"实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国政府拒绝签字，不欲解决藏案，则该草约所定之利益，中国不能享有。"七月二日英方通知陈贻范，决定于七月三日正式签订条约，如果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则英藏将订一保护彼此利益之约"，并且"所有由中英两国所订关涉西藏之条约，当然消灭"，以后"英不得不保护藏疆及其自治权"。但是，陈贻范在中国政府的训示下，仍然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抗议，竟私自与西藏代表签订了条约，这就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于当天发表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接着，又于七月六日指示驻英大使照会英国政府，作出同样声明。以后，历届中国

政府都坚持了这一立场。这样，由英国片面提出而没有中国政府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自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只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记录的一张肮脏的废纸而存在着。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还背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它根据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第七款的规定，废除一八九三年和一九〇八年中英关于印藏通商章程，诱迫西藏代表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其中规定：英国有权在西藏土地上租赁土地，建盖房屋；英国人在西藏犯罪不受惩罚，而西藏人对英国人犯罪，则将受各种严刑峻法；英商可不受限制地在西藏各地贸易，可以雇用任何运输工具输入军火、武器等。这一非法的通商章程，使英国扩大了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在西姆拉会议之外，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国政府，用援助西藏五千支枪、五十万发子弹作为诱饵，引诱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中印边界线，把中国西藏东南部九万平方公里的一块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此事根本没有提上过西姆拉会议的日程，也没有通过中国政府，当然同样是非法的、无效的。

（摘自《英俄争霸中国史》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中国社会党的解散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不到一个月，江亢虎在上海常常演讲社会主义，不久就租了云南路仁济善堂的余屋，创办中国社会党本部；江亢虎被推为党魁。关于社会党的消息和党员名录，先在上海《天铎报》上发表，后来又在自创的《社会日报》上发表。

这年十二月，江亢虎和党员陈翼龙、詹天雁到苏州，借阊门外留园东部大戏台，开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成立大会，江亢虎一气讲了四个钟头的话。詹天雁当场提议打电报给袁世凯，得听众同意后宣讲电文，中有“愿公为华盛顿，勿为拿破仑”等语，而且激动地掏出怀中两枚银元掷在台上，作电报费。顾颉刚和他的中学同学王伯祥、叶圣陶及稔友王彦龙等都往听讲，就一起签名入了党。会后，江亢虎回上海，陈翼龙、詹天雁二人留在苏州，租到玄妙观里蓑衣真人殿的后园，作为支部办公处。那时苏州支部的党员约有五六十人，陈翼龙被推为总务干事，詹天雁为副总务干事，顾颉刚为文书干事，徐瀚澄为会计干事。其他还有交际、庶务等干事，人名已记不清楚了。支部收入，除每一党员月缴党费五角外，还靠自由捐输和向外捐募。

一九一二年冬天，由曹教先介绍李大钊与陈翼龙会面，畅谈终夜。李大钊对陈翼龙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佩服，当即宣誓入党。这年年底，陈翼龙偕同曹嘉荫赴天津组织支部，直隶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尽力阻挠，受了种种挫折，终因陈翼龙手腕灵敏，排除万难，宣告成立，党址设在东马路崇仁宫。一九一三年二月二日，天津支部在河北李公祠开成立大会前发出一张传单，上写：

本党宗旨，在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鼓吹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所以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也。辛亥九月，本部成立以来，全国风从，至今周年间，支部至四百九十余处，党员至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足徵社会主义之有触即发，如响斯应，有沛然莫御之况。民国元年八月，江亢虎、陈翼龙两君北上，设立北京部。江君旋渡河而南。陈君被举为北方主任，苦心经营，党势日盛。济南、烟台等部，刻已成立。张家口、奉天、太原、保定各地，刻正组织，不日即可成立。进行之速，一日千里。……

这一番踌躇满志的话，不知是谁起的稿，无疑是说得夸张了。这些话固然可以对党员们打打气，但反动政府看到了中国社会党竟有这么大的声势，必然火上加油，激起了“锄而去之”的决心。当时天津支部成立，推举李大钊担任总务干事。华林在天津某报工作，也参加了，他写了《新世潮》一本小册子作宣传。

顾颉刚在苏州支部趋向堕落的时候，看到社会党在北方办得这样有声有色，适津浦路刚通，就请陈翼办龙等寄路费三十元，偷偷地跑出家庭，赶到北京党部来。可是过几天就被他的父亲知道了，他的父亲也赶到了北京，流着眼泪对他说：“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不能让你办党！回想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我被江苏省考送京师大学堂讲书，为了家境贫寒，讲了书就无法养家，只得休学。当时我会发愿：‘我自己虽然不能毕业，定要我的儿子在这里毕业！’现在离入学考试期已不远，你就可报考北京大学。我并不强迫你脱党，只是要你升学！”话说得这样，他也无法拒绝，一九一三年春天考进了北大，因为马神庙离南横街太远，只能逢星期天到党部去走走，不担任任何党务。

就在那时，袁世凯派遣走狗在上海车站上暗杀了宋教仁，经过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侦查，把全部文件发表在

《民立报》上，从这“毁宋”的蛛丝马迹里，看出了主谋凶手一定是袁世凯，全国人民大为愤怒。陈翼龙在那时，紧握着顾颉刚的手说：“我很想‘犯罪’，如果不幸吃了‘卫生丸’（指枪弹），你可以替我写几句文章！”同时又看到别人写给他的信，上面说：“翼龙，翼龙，如不飞去，便该死去！”知道他已不惜牺牲，要拿实际行动来打击那万恶的袁贼了。到七月中，陈翼龙便以聘请教师为名，只身到上海参加二次革命。那时张星华已赴法留学，北京党务和附属各事业交与杨宝峰、曹教先、曹百遂、李宗熙、曹绥之、曹嘉荫等负责维持。可是这些人的活动力不大，经费没有来源，处境日益困难，只得函电交促，请他早日回京。八月二十四日，陈翼龙乘海船到津转京，那时反动政府早已布置了许多军警在等待着他，第二天上午即遭逮捕，解送京师警察厅，转送军政执法处，草草审讯，即行判处死刑。军政执法处的告示贴遍全城，并送登全国各报，文云：

军政执法处为通告事：照得阳历七月廿八号准京师警察厅函：“奉大总统交查‘社会党首领陈翼龙勾串外国党徒，妨害邦交’一案，遵经派员侦明陈翼龙往来京、津，行中外踪诡秘，遂于本月廿五号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社会党本部将陈犯弋获，并由其衣袋内搜出直隶中华银行军用百元手票一张，日记簿一本，内载该党简章三条，内有‘分设锄奸、救国等团机关，联络外国党徒，纠合同志，便于乘间起事，诸同人沥血宣誓，骨肉勿告’等悖谬字样。除呈报政府外，相应将所获犯证一并送请讯办”等因。准此，当经督员查明证物，详加研鞫得：“陈翼龙即陈意农，年廿八岁，湖北罗田人，于上年八月来京，秘密组织社会党支部，党组与俄国虚无党无异，即以慈善、教育普及为名。本党总机关设在上海，支部已有四百余处，诱集入党者约有五十万人。前因宋案发生，拟以猛烈手段对待，复发起锄奸团、救国社各种名目，与俄国虚无党联络，以图乘间举事。不想即被警厅侦获送案”等语。查该犯陈翼龙袭取外国乱党宗旨，多立团党名目，机关既已四百余处之多，党徒复有五十万之众，联络外国党人潜谋不轨，不恃法律视为并髦，直以同胞生命视如儿戏，实属天良丧尽，罪无可逭。陈翼龙应即按照军法，处以死刑。特此宣布三日，即提陈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枪毙，以昭炯戒。为此通告。

从这个布告中，可见逮捕陈翼龙是“大总统”直接下给京师警察厅的命令，为了他已下定决心非杀不可，所以替陈翼龙扣上了“勾串外国党徒、妨害邦交”的罪名。警察厅为要证实“大总统”的命令，就在陈翼龙的日记簿上所写的“分设锄奸、救国等团机关，纠合同志，乘间起事，诸同人沥血宣誓，骨肉勿告”的誓词中间也插进了“联络外国党徒”一语。事实上，俄国的虚无党哪有来中国和陈翼龙联络的？如果真有这事，我们天天和陈翼龙在一块的人岂有绝不看到听到之理，为什么我们竟一点都不知道呢？

陈翼龙因为袁世凯派遣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武士英等一班爪牙，刺死宋教仁，激于义愤，和国民党左派联络，组织革命群众，成立锄奸团、救国社等机关，要在北京发动革命，来和南方的二次革命相呼应，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时他的行动吓坏了袁贼，想要立即杀害他，可是在宋案上自己也觉得理屈，说不出口来，所以只得借用了“勾串外国党徒，妨害邦交”的大帽子来把他处死了。至于“支部已有四百余处，诱集入党者约有五十万人”，那是抄的天津支部成立时的传单。说是“秘密组织社会党支部”，又是漫天撒谎，“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牌子在南横街挂了将近一年了，难道警察和暗探们都是瞎子，看不见吗？

袁政府在杀了陈翼龙之后，立即通令全国，解散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首当其冲，一时军警包围，大肆搜索，除少数文件由曹嘉险、荫先斯携出之外，一切图书、文件、家具悉皆失落，同志们完全逃散。当陈翼龙被捕时，曹嘉险等检查他的皮包，内有手枪、子弹和小刺刀等，当将手枪、子弹暗中抛弃在南下洼子的草塘内，小刺刀则到今仍由曹嘉荫保存，作为永久的惨痛纪念。陈翼龙为反对窃国大资袁世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至于江亢虎呢，他本来是清朝的七品小京官，在游历外洋时偷得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讲坛社会主义的唾余，回国投机发起了中国社会党，妄想分取革命的果实，靠着他欺骗祖国人民的伎俩，居然成为党魁。但骗人的伎俩总是不会长久的，当社会党被解散之后，他就收拾起革命的假面具，索性作一个烂污政客，延到抗日战争中，他投身汪记伪政府，做了汉奸的考试院副院长。当时他还无耻地对人说：“正院长王揖唐是不会到南京来的，我就是正院长了！”抗战胜利后，他被关进监狱；全国解放后隔了几年，他病死在监里。这种人死有余辜，将永远为人民唾骂。

（顾颉刚《辛亥回忆录》）

湖北革命军退伍经过

我在一八九四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县城里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我兄弟四人，先兄祖昶、祖徽均在湖北新军第八镇当兵。我在家中读书时接先兄家信，得悉新军中人材济济，尚有出路，乃于宣统元年四月投笔赴鄂，投效第八镇十五协步队三十标三营后队二棚当副兵。宣统二年二月间升为本队五棚正兵。嗣于宣统三年二月由本队三棚正目王宪章、二棚正目彭纪麟介绍加入文学社。武昌起义的当夜，参与进攻督署的战斗。武昌光复后，暂编入第四标三营任随员，进行招募新兵的工作，旋又被任为十标掌旗官。黄兴来鄂后，十标任总指挥部的总预备队。汉口战事失利后，队伍转至武昌下游的两望地方布防。我标旋编为北伐第一军第三师第五旅第十团，开赴祁家湾附近两

路口地方暂驻。南北和议告成后一月,又开赴云梦县城,就地整训。

我军正在云梦县训练之际,忽于民国二年六月被迫令全军退伍。我起义后,辗转充任鄂军第三师步兵第五旅第十团第三营军需长,营长是彭纪麟。奉命退伍时,彭营长向我们同志讲述此次退伍原因云:"黎都督与袁贼世凯暗中勾结,往来密电商议好了,黎去北京供职,都督一席派段祺瑞接充。外部军政人员都不知道此事,一个叫唐仲寅者,跟黎都督多年,亲密接近,知道内幕。老段(指段祺瑞)到鄂省后,即密与黎都督洽谈,黎都督随把鄂省大都督印信移交老段手中,秘密乘车上北京去了。我鄂新军革命党人拚头颅,洒热血,夺取政权,历尽艰难困苦,始有今日曙光,不料黎元洪随章移交官僚执掌,这无异'开门揖盗'。老段是一个十足的老官僚,口蜜腹剑,很快的我鄂革命军人一定要吃大亏,今后只有另想法革命,或者不干,躲避风险。"言下不胜嗟叹。

湖北军政大权一落入段祺瑞的手中,他首先设法解除革命部队的武装。他借口鄂省军队有十万之众,军饷庞大,人民负担过重,且这些军队都是临时招募而来的,良莠不齐,又经过阳夏战役,自以为有功,骄气横生,像这样的队伍,不惟不好带领,他日对地方也没有多大好处,声言必须把这部分队伍退伍,回家耕田,另按征兵法规,在各县市征集有家有室的良民入伍,服常备兵役,再施以严格训练,可成为担任国防军的劲旅,这是一举两得。至于对革命有功绩的各级官长,一律保留原职原薪,预备充任征兵的正式各级军官,不让一人失业。但各级官长自愿退伍者听之。并订有各级官长退伍条例,如司务长退伍,只领一次退伍金三百元,排长四百元,连长六百元,营长一千二百元等等,并发给都督退伍执照一张,银质圆形奖章一枚,还照其原有阶级册报陆军部按职补授实官,在实官证书令未下达以前,可由各该师长先给予领薪官证明文件一份,以俟陆军部实官令颁发到鄂,各该员可持师长发给的证明文件,径往都督府领收实官委状,每月还有几成固定薪水可以终身领取。段用这样的欺骗宣传,谈得天花乱坠,而我鄂的天真的革命军官不惟信以为真,并说这个办法很合人心,于是马上服从命令,先将士兵退伍。兵士一旦退伍完了,官长成了光杆,赤手空拳,说话也不灵了,甚至于不敢说话了。段乘势施以吓唬威胁。各级官长见大势已去,又无人作主支援,只有忍痛退伍。我在退伍时担任营军需长,因是军佐职务,只拿退伍金三百元,领有黎都督退伍执照一张,师长窦秉钧补授实官委状一件(这两件迄今仍保存,惟圆形银质奖章一枚早年失落了)。我营官兵在云梦县退伍分别时,多失声痛哭,不忍离去,处此境地,可叹亦复可恨。段仰承袁贼鼻息,出此退伍诡计,不费一兵一卒,使我鄂革命军正式队伍八个整师和其它特种部队共计十余万人,很快就解除了武装。

(鲁祖轸)

江西起兵隐情

李烈钧不高兴汪瑞闿的话传出后,就有两个人出面反对汪瑞闿,一个是全省警察局局长陈廷训,一个是水上警察局局长蔡锐霆。陈廷训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恐怕警察局归省长管辖,必定难以保全地位;蔡锐霆是汪瑞闿在江西当武备学堂总办时开除的学生,也恐怕水上警察局归省长管辖,难以保全地位。于是这两人结合起来,大事宣传李都督反对汪瑞闿为江西省长,并扬言如果汪瑞闿不即日离开江西,他的性命就难保全。蔡锐霆的粗暴和杀人不眨眼,是南昌人所共知的。汪瑞闿见事不妙,乃即日离开南昌,直往北京,向袁世凯哭诉李烈钧如何侮辱他。袁世凯说:"你是李烈钧电保的人,何至于此?"乃派王芝祥来赣查办。王芝祥抵赣后,知道汪瑞闿此时不适宜在江西当省长,乃偕俞应麓同伴入京,把这些情况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始允在汪瑞闿未到任以前先派一人代汪为江西省长。俞应麓在北京与江西同乡商量,保荐赵从蕃(赵是江西南丰县人),如李烈钧同意,即请复电。李烈钧一面复电北京同意,一面把此事告知江西省议会正副议长,并请转告全体议员。这晚正副议长出了都督府之门,即往妓院吃酒打牌,不及召集全体议员谈话。第二天早上报纸上登出了北京任命赵从蕃代理江西省长的新闻,省议会各议员哗然,大骂袁世凯独裁,即日开会,反对赵从蕃代理江西省长。当时正副议长既不敢说明李都督已于昨夜告诉他们,只因他们吃酒打牌,没有对大家说话。我对李烈钧说:"此事既先得了你的同意,你又请了两位议长转达各位议员,今日之错,是两位议长吃酒打牌,把事情耽误了,你应当向各位议员说明一声,赵从蕃出长江西是先得了你的同意才发表的。"李烈钧对我说:"这件事不好说明,说明了,两位议长要受攻击,只好让他们去闹吧。"李烈钧又说:"光复后,正是民意伸张的时节,我们不应当抑制民意。"因此,袁世凯果然信王芝祥的坏话,说:"李烈钧这个人是不可以理喻的,只有派兵讨伐。"

当李纯的兵进入九江之后,李烈钧尚未到达湖口之前,我深虑李部进入江西后与江西军队发生冲突。先是李烈钧在江西时,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结成五省同盟,这时除安徽孙多森是北京派的新人外,陈炯明、谭延闿、孙道仁均系国民党党员,可与商量。于是我乃将黎元洪擅调李纯之兵入赣,必定要酿成战争的事,电告陈炯明、谭延闿、孙道仁,问他们如一旦发生了战争,李都督在任时所缔结的攻守同盟,仍然有效否?这个电报发出后,首先得到陈炯明的复电,说:"广东与李都督所缔结的同盟,仍然有效,如果李纯之兵敢向贵省发动战争,决不使

贵省独受其难。”我乃将陈炯明来电转告谭延闿、孙道仁，问他们的意见究竟如何?那个时节，湖南是程潜当军务厅厅长，福建是许崇智当第一师师长，可以分别左右谭、孙的行动，故谭、孙都复电给我说，同意陈炯明的话，如果一旦开火，一定派军队来赣支援。战争开始后，我乃电请广东、湖南、福建即速派兵来赣支援。陈炯明复电说：“即日派驻韶关的军队一旅出发援赣。”谭延闿复电说：“正准备派唐蟒率兵一团来赣，但湖南没有枪械，请贵省发给枪弹。”翌日谭延闿又来电报说：“自贵省战事发生后，袁世凯派奸细把湖南的火药库爆炸了，现在岳州吃紧，请贵省协助湖南步枪子弹一百二十万发，现派某某前来贵省具领。”我为顾全五省同盟之谊，即先给予九十万发子弹，交来使领去。而唐蟒的徒手兵一团，等到江西战事完结的时候才到。福建援兵，始终没有出发。广东援兵，行到粤赣边境又折回去了。这次战争，名曰有五省同盟，其实只有江西一省独立作战。

七月十一日开战后，因李纯第六师的兵未全部到达江西，且以人地生疏，作战上有些困难，而江西的兵，一因地形熟悉，二因以逸待劳，三因出于不得已而战，人人激愤，所以战争的初期屡战屡胜，使李纯心惊胆寒，夜退到停泊九江的军舰上去睡觉。江西的军队，除第一、第二两师八个步兵团外，尚有第五旅的两个步兵团，不但老兵个个奋勇，即新兵刚学会托枪，亦个个申请派上火线。但是，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战争终于失败。

我军节节失败的时候，甚盼各省援军早来。但天下人都想锦上添花，哪肯雪里送炭。因为我们的军事一经现出败象，广东、湖南、福建都不敢履行同盟义务。所以直到战局快要终结，也没有见到一个援兵。

（摘自《二次革命回忆录》文史出版社）

南京三次独立

南京自黄兴出走后，各街道墙壁上又发现了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的安民布告。但是这两个胆小人物仍然躲在上海不肯回来。南京军政界妄想袁能够宽大为怀，不究既往，能够答应维持七月十五日事变发生前的老局面。袁也表示无可无不可，只责成他们通缉黄兴等“暴乱分子”，并颁发了一道不同身价的赏格。

八月八日，南京忽然又一次宣布独立，但是讨袁军总司令换了何海鸣的名字，江苏都督换了陈之骥的名字，当陈之骥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时，立刻亲自带兵把何海鸣拘禁起来。这次独立只经过六小时就完结了。

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由于程德全不肯回来，在群龙无首的局势下，南京人心非常浮动，他只得过江去迎接他的丈人峰。他没有回来的时候，何海鸣煽动第一师同乡兵士把自己释放了。

八月十一日，何海鸣又一次宣布独立，并且立即派兵把守城外的狮子山炮台。这是南京第三次的独立。

南京第三次独立看起来类乎儿戏举动，但在国民党讨袁运动过程中却是最有声色的一幕。八月十七日，北洋军攻占天堡城，十九日又被讨袁军夺了回来，此后天堡城易手前后共达五次。北洋军方面有冯国璋和张勋两个大将，有充足的军火和军饷，有协同作战的海军舰队，而对方则是饷械两绌、大势已去、前途毫无指望的孤军。这支孤军的主力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第八师的第二十九团，这两团兵士几乎全部都是三湘七泽间的健儿。他们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抵抗，狮子山的守兵直战至最后之一人，炮声才沉寂下来。八月二十六日，北洋军攻入了朝阳门。

张勋的报捷电刚刚写好，攻入朝阳门的北洋军又因触发地雷而溃退下来了。以后就发生了北洋军放火焚烧下关的惨剧，正像两年前火烧汉口一样，而下命令火烧下关的，也正是这次进攻南京的主将，两年前下命令火烧汉口的冯国境。

北洋军分配作战任务，张勋部攻打太平门，雷震春部攻打南门，冯国璋部攻打北门。张勋也懂得利用别人的部队去当头阵而把自己的军队摆在后面的方法，他派扬州徐宝山的旧部作先锋，使用掘地道、埋地雷种种方法，轰倒了一段城墙，才于九月一日攻进了太平门。

直到城破之后，还有三五成群的讨袁军残部在城内与北洋军进行巷战。那个号称为总司令的何海鸣却躲在马棚草堆下得以乘机脱逃。

太平天国时代，野蛮的清军将领用三天不封刀的办法鼓励士气，在攻下一座城池之后，放纵兵士在三天之内任意地奸淫抢劫，直到第四天出示安民之后，这些行为才被“禁止”。南京人民曾经遭受过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这次张勋正是采取了这个办法，所以他挨到九月四日才进城。在前三天之中，南京又一次地化为人间地狱：雷震春的兽军在南门，张勋的兽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进行抢劫，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因兽军严密搜查受到破坏，只有搬不动的地皮没有被抢走；甚至有一家被抢好几次，抢光之后被兽军放火把房屋烧掉了的。

奸淫与抢劫同时进行。不少妇女在秦淮河投水自杀。

由于讨袁军总司令是湖南人，而坚守南京城对北洋军进行英勇抵抗的兵士，绝大部分也是湖南人，所以张勋恨湖南人恨得最厉害，湖南人的“乱党”嫌疑也最重。湖南会馆首先被查封。因嫌疑而被乱杀的湖南人不计其数。

在大抢劫的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发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些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些则因抢赃物而开枪互击。张勋打了一次胜仗，他的兵士点起名来

却少了很多，原来那些打完仗发了横财的老总们，都开小差回到家乡享福去了。

南京市民用罢市运动来抗议辫子军的滔天罪行。张勋认为开门七件事要紧，强迫柴米油盐等店首先开门，其余一概不问。

九月九日，沪宁火车首次恢复通车。南京许多人民又不约而同地举行了一次“避贼运动”，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人都急于要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对以后生活如何都来不及任任何打算。原来在三天封刀之后，辫子兵奸淫抢劫仍然没有终止，人民的生命财产仍然得不到丝毫保障。可是张勋却吹嘘辫子兵“纪律严明”，不承认有不法行为。他通电狡辩说：“诸军巷战，统将专事杀敌，间有一二不法军人趁匪军抢劫之余，见物辄取，固所难免。”

九月九日他有佳电表扬自己尽了维持地方的责任。电文中说：“匪军逃窜，乘机抢掠，土匪助虐，益肆凶残，多有假冒官军情事。此时各军号令不一，勋破除情面，派队巡衔，随地正法者二百余，秩序始复。此金陵各国旅居洋人之所共见，今路透电乃以蓝衣兵占多为言。查勋部入城，仅占东北一隅，地处荒僻，民户无多。其余繁盛之区，均由各军分扎，孰抢孰否，不难按户而稽。”

他不但把抢劫罪行推到败军和土匪方面，还推到友军方面，而把战功完全归到自己方面。他在“请奖叙有功人员”的一电里说：“南京易守难攻。昔者洪杨割据，固以天下之师，糜饷数千万万，犹以九年之久始奏克捷。今勋专令南征，每战必胜，用兵不及数月，实非始愿所期。”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　陶菊隐）

历史考证

袁世凯辩护词揭秘

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而我的写作生涯大约也自辛亥革命始，耕耘笔坛至今亦已80个寒暑了。追忆往事，在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有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戊戌纪略》，堪称珍闻佚史。

约在1921年左右，我在苏州编辑《消闲月刊》，内兄周梵生在袁家当西席，教袁世凯之孙伯崇、叔骝等读书学文，得悉袁氏确有那篇《戊戌纪略》，藏在他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中，从未对外发表过。内兄梵生曾看到过这篇《纪略》，还抄录一份寄给我看过。那时我想把它作为史料揭载，为郑重起见，先请内兄征得袁家同意。不料袁家认为不宜发表，只得作罢。次年，那位曾充任袁家幕府的步章五，别署林屋山人，在上海办一种名叫《大报》的小型报纸，毅然把这篇《纪略》公然刊登，引起史学家的研究。后来《纪略》的原抄本，归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了。

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在《纪略》上却是这般记载的：“谭嗣同夜访，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兹有朱谕。’请予出朱谕宣读，立将荣某正法，即以予代为直督，并派兵围颐和园，大事可定。谭言时，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谭又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密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上。’”以上语言，说得何等光明磊落，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原来谭嗣同事前和袁世凯密谈，袁氏玩两面手法，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新派。荣禄得知立即向慈禧报告，慈禧即从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一面下令逮捕新派，乃成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这段历史。袁世凯当时利欲熏心，卑鄙谄媚，新派未察，乃与虎谋皮，致遭杀身之祸。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内亦刊那篇《戊戌纪略》。编者另加按头语，云：“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作于阴历八月十四日，即阳历九月二十九日，乃在六君子被害后之次日。袁世凯所记，多为旧党和自己辩护，因此不可全信，编此仅作参考。”

袁氏次子袁寒云以往曾在《晶报》上发表《新华私乘》，对其父虽不讳言告密，然诬指新派为包藏祸心，阴谋叛逆。如云：“戊戌政变之初，康有为以说惑景帝，帝冲动无识，不辨其奸，遂重任之，设懋勤殿，夺军机权，有为渐施离间，欲假先公之兵，谋危孝钦后，先授先公以侍郎，维使谭嗣同至小站劫先公，假帝诏，命先公囚孝钦后，杀荣禄。先公早识宄谋，乃佯诺之，隐走告荣禄，禄仓皇请策，先公嘱禄密诣颐和园，请命于孝钦后，禄亟入觐奏，孝钦后从容返跸，立禁帝于瀛台，仍垂帘听政，斩有为党谭嗣同等五人，及有为弟广仁于市。”一句话，贬斥新派，为袁世凯辩护。

宋教仁之被刺，轰动全国，大家都知出于袁世凯的阴谋，是由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辈主使亡命徒武士英所为，是在上海北站作案的。当时于右任担任《民立报》社长，主笔是章行严、朱宗良、徐血儿、范鸿仙，宋教仁任中

外要闻编辑，邵力子任电讯编辑，杨千里任本埠新闻编辑，叶小凤任副刊编辑。以宋教仁、徐血儿的笔锋最为锐利，连篇充满热血气氛，攻击袁氏甚烈。我当时尚年轻，也追随其后在《民权报》上撰文痛斥袁氏，十分痛快。袁世凯视宋教仁、徐血儿、朱宗良为眼中钉，均列入暗杀名单。宋教仁被刺一案，最早披露内幕真相的即为《民权报》，因为这些报社当时都在租界里，袁氏势力鞭长莫及，乃通过淞沪警察厅出一布告："凡民立、民权、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立即禁止售卖，凡我人民，亦应一体勿再购阅。"之后，《民立》、《民权》各报销路大减，也先后停办了（《民权报》改办成杂志《民权素》，我继续为该刊写稿）。

袁寒云却巧为亲讳，说宋教仁是被陈士英所杀，与其父无关。他所著的《辛丙秘苑》第一则，便记述此事，摘录于下："宋遁初（教仁的别署）见害，其真象外间恐无知者，今关于此事者，咸不获令终，先公之冤可以白矣。初遁初入都，先公一见，即大称赏，每谈政事，辄逾夜午，欲以内阁畀之。遁初谓尚非其时，拟南下一察，庶有把握。遂出京，居于沪，虽同党中亦不深悉其所欲为，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次，遁初所察已竟，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宴之。筵间，英士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矣，我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无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谓予曰：遁初不得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邀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先公与予言及遁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先公且曰：'前亡午桥，后亡遁初，予之大不幸也。'午挢，端陶斋丈也，先公初不知赵、洪之谋，及电发觉，尚不信赵之出此，赵亦力白为人伪造，非已所发。予力劝先公通电自辩，先公曰：'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一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已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彼明察者必自知之。……'"

袁寒云把宋案的罪责，委诸陈英士，亦有其因。原来宋教仁北上前，陈英士竭力阻之，恐他受袁世凯的羁縻，而失其计划，但宋自信力很强，曰："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岂得为大丈夫哉！"不听竟去。陈没有办法，只能任之。陈固有醇酒妇人之癖。一日，和诸狎友宴于妓女花雪南家，正酣饮间，忽有人来报宋被刺于车站，陈初闻之愕然，既而却举杯向诸狎友曰："可干此一杯。"人们便误会陈藉杯酒庆功，实则陈之所以如此，乃深憾宋生前不听劝告，卒乃遭此毒手。

（摘自《民国春秋》）

赵秉钧与刺宋案的纠葛

76年前的刺宋案，似乎早已盖棺论定。但对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究竟是不是刺宋案的主谋和元凶之一，笔者以为颇可斟酌。

《辞海》说，赵"受袁指使布置特务暗杀宋教仁"。不少书刊也持此说。有的断言："确凿无疑的证据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者不是别人，就是堂堂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有的说袁世凯"密令内阁总理赵秉钧指派特务在上海刺杀国民党人宋教仁"，有的甚至说袁"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策划于密室"，云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奋笔写了一幅挽联，揭露袁世凯杀人，却并未点出赵秉钧。联曰："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六年之后，陈独秀在一篇短文中也没有把赵秉钧扯到刺宋案中去。陈文极短，全录如下："洪述祖判了死刑，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是那教唆洪述祖去谋杀宋教仁的袁世凯，乃是真正首犯，虽然死了不能加刑，何以政府里人人都还尊敬他不得了呢？"陈旭麓等著《宋教仁》和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对刺宋案论述颇详，却都没有说赵秉钧是刺宋案的主谋之一。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在斥责赵秉钧为刺宋案开脱自己的同时，指出，"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袁世凯"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即应桂馨）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指刺宋案）"。刘厚生早在《张謇传记》中就明确地说："指挥凶手的洪述祖，是直接受到袁世凯命令，而非由于赵秉钧所派遣。"刘厚生与刺宋案发时的不少人有直接交往，其说可信性值得重视。

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故刺宋案发生后，已任国务总理的原内务总长赵秉钧嫌疑最重，无法自解。其实，赵秉钧与洪述祖素无渊源。洪是"民国产婆"赵凤昌的内侄，南北议和时常奔走于赵凤昌家中，因此与唐绍仪相识。唐任内阁总理后，原拟予洪以国务院秘书，后来变了卦，把洪荐给内务总长赵秉钧。赵为人圆通，派洪为内务部秘书。这个职务是挂名的，不办实事，等于干修，于是洪投入袁的特务系统，还当了一名组长。袁组织的特务系统，分20多个组，每组8到10人不等，由袁直接指挥，并指定一个组长暗中监视赵秉钧。

袁派人监视赵，很能说明袁、赵之间后期的关系。毋庸置疑，赵是袁的得力助手。但袁对赵早存疑心，因为袁派赵等向隆裕太后（慈禧弟弟桂祥之女）陈说清室必须退位的理由时，赵第一个跟着太后大哭，并誓言保驾。事后袁得悉此事，认为赵忠于清室，是自己称帝的绊脚石。由此看来，袁、赵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有两重性，袁不必甚

至不应通过赵向洪下达刺宋的密令。有史料说，时任国务院庶务秘书程克（经世）曾对人说过，洪奉命去上海前进谒过袁。

刺宋案发生后三、四天，应桂馨、武士英（真名吴福铭）相继落网，并在应处搜出应与赵、洪往来函电多件。这些被人们看作是赵充当刺宋案主谋证据的函电，即说明赵初期参与洪、应在上海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更说明赵后期摆脱了这些活动（或者说袁撇开了赵）。前者，如"应君领款，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才行"（赵致洪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赵致应函）；"孙、黄、黎、宋运动极烈……"（应致赵电）。后者，如"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秉钧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洪致应函）；"梁山匪魁（指宋教仁）顷又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应致洪电）；洪奉袁之命复电"应即照办"，次日又电应："事速进行"。

由国务总理调直隶都督，也是赵秉钧被人定为主谋的根据。实际上，赵秉钧在案发后尽管对某些问题作了解释（如使用密码等），表白自己"久无问世之心"，甚至说要他"出庭受质"是"含血喷人"，但是他毕竟是卷进漩涡里的人，绝不可能把袁世凯的阴谋原原本本抖落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赵有口难辩，懊丧万分，辞职不准，援唐绍仪例，请假赴津。假设他与袁都是主谋的话，当然不应这样做，而应该与袁世凯共进退。袁世凯对此是清楚不过的，因此在案发近五个月之后，准赵辞国务总理职，并任命他为直隶都督，以示优崇。但此后赵心中的怨气难免不流露，这就埋下了袁买通伺候赵的人将赵毒死的种子。

总之，宋教仁是袁世凯难以对付的政敌。袁早就赠厚金拉拢过宋，宋表示："贫者士之常兮，骤贵，焉能忘其本。"拒绝了。在刺宋前夕，袁还送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簿给宋，宋原封不动退回（梁漱溟说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宋的行动，为袁所深忌，必欲杀之而后已。袁不杀宋，必受制而无可作为。相反，宋、赵之间无此势不两立的关系。宋为了出面组阁，曾与赵多次深谈，一度还住在赵的家中。

综上所述，赵秉钧是刺宋案主谋之说难以令人置信。

（摘自《民国春秋》）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的关系

对此，有两种不同说法。

【袁世凯策动兵变说】 这是传统的普遍的看法。胡绳认为："袁世凯一面盛大地欢迎专使，'恳谈'南下问题，一面密令他的亲信曹锟的部队在北京哗变，动掠商民，造成混乱，借以证明非由他坐镇北京不足以稳定北方局势。"

李新等也认为，袁世凯"口头上表示'极愿早日南行'，暗中却策动第三镇兵变，并以此为借口，迫使革命党人打消了要他南下的计划"。

此外，章开源、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等均持此说。

【与袁世凯无关说】 持此说者以谢再兴为代表。谢再兴认为："北洋第三镇士兵哗变，不是袁世凯密令发动的，也不是预定的阴谋。而是当时政治制度的腐败，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北洋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不满现实等复杂原因所造成的。""只是因为这次哗变在南北议和，谈判袁世凯来南京就职总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因此易为史家误认为袁世凯一手策动的。"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当时国内形势看，"辛亥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北洋军队"内部人心浮动，离心程度不断加剧"，"兵变在当时极为普遍，尤其是新军各镇中哗变往往是激烈的"。"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头一年里，发生一场士兵的自发哗变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至于兵变恰好发生在专使来京的第二天，那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第二，"从参预北京兵变主要部队——北洋第三镇来看。曹锟的第三镇士兵在哗变前几个星期，已明显地存在着动乱的因素"："军官没有权威，部队缺乏纪律"；"减饷的谣言"引起"士兵们言论哗然，群情激愤"。因此，"没有袁世凯的鼓动与密令，哗变也是很容易发生的"。第三，"从袁世凯本人及定都问题来看"。"在革命党人没有从根本上威胁袁世凯的权位时，他用不着以发动一次兵变的手段以相威胁，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也不会以他既得的利益和'荣誉'来冒这个风险"。因为"定都问题很明显袁是占了上风的"。所以，"袁世凯为了达到建都北京，并不需要采取操纵一次兵变方式，来达到他的预定目的"。第四，"从兵变的始末来看，兵变自开始到结束只有几天时间"。"论史者皆以兵变很快结束并恢复正常政治秩序，断定这是袁世凯以及他的手下支持者们所安排的，其实不然。从兵变的平息来看，一方面是袁的卫队和驻京巡防营的镇压，另一方面是列强军队的干涉"。第五，"从亲自经历北京兵变者所记录的原始材料来看，袁世凯也没有那么大能耐蓄制发动第三镇士兵叛乱"。

（摘自《中国近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风云人物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常用渔父笔名发表文章，化名宋谦、宋链、中岛等。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上坊乡湘冲(今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6岁开始习读《四书》、《五经》，有时还学武术。11岁起学习贴括词章，12岁能吟赋成篇。宋教仁少年时代就萌发了反清爱国的思想，要在将来为祖国做一番大事，练好"文不借笔，武不借刀"的本领。中日甲午战争中，腐败的大清帝国竟被日本打败，他为此痛哭流涕，写了两首诗词，其中一句为："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过汉关。"抒发他悲愤的胸怀。1899年春，宋教仁离开湘冲，到县城漳江书院读书，时常习学至深夜，对国家的时局更是关心，同年冬，陈优龙介绍，在常德河伏加入富有山堂。在一个夏夜，与同学在漳江书院纳凉时，大家议论国家形势，他慷慨激昂地陈词："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他的书房窗前贴有一副对联："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显露出了宋教仁对反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立志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的远大抱负。

1902年秋，宋教仁以优良的成绩考进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国宣传反清革命活动的黄兴，次年，2月15日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蔡锷、章士钊等在长沙创建华兴会，他被推举为副会长，接着，又到武汉发起组建武昌科学补习所革命组织，并担任文书。华兴会原决定待慈禧太后做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常德、德州、岳州、宝庆分五路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路，正当他设法变卖自己的家产，筹集革命经费时，华兴会组织遭到清政府的破坏，宋教仁被迫于1904年12月5日亡命日本，先后入东京顺天中学、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习日语、英语，学习政治、法律。1905年元月，在日本发起、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8月与孙中山、黄兴等创建中国同盟会。1907年3月23日，回祖国东北建立同盟会满州支部，8月，编写《间岛问题》。1910年底，根据同盟会的安排回国。1911年元月，担任《民立报》主笔，4月中旬，参加广州起义，任法制部部长，7月31日，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还创建长江流域各地分会，为发动起义筹款项，办武器，发表了著名的"革命之三策"和"革命之三宜"的论著，12月，到南京忙于主持组织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局长，南北议和后，4月20日到北京任农林部总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被暗刺，22日逝世，时年仅31岁。

宋教仁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之一。早在华兴会起义失败以后，他流亡日本，矢志学习军事，为今后武装起义作准备，后来他看到清朝统治已经被帝国主义打败得差不多了，推翻它容易，但要治理国家才是一件难事，决心认真研究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议会政治，改学政治和法律，自己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奥匈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准备作为建设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参考。他在《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的文章中写道："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他先后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民立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100多篇文章揭露民族危机，抨击清朝腐败政治和"立宪"骗局、镇压革命的罪恶，分析国际局势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抓住一系列事件，从政治上鼓动宣传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体制。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赶到武昌协助军政府制定法令和文告。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他鼓吹在政治建设上实行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主张整理军队，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发展地方自治、振兴民政，整理行政，实行"汰冗员"、"并闲置"、"励行官吏登庸考试"、"实行惩戒官吏失职"等；在经济建设上主张"中国今日苟欲图强，必先致富"，提出整理财政、开发产业，包括兴办国有山林、治水、开垦荒地、改良牧畜、振兴矿业、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奖励输出品商业以及兴办国有交通事业等等；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主张"强国之要，学战为先"，提倡发展法政教育、工商教育、中学教育和中、小学师范教育以及女子教育。在武昌的战斗中清政府想动摇革命党人的意志，下诏议和，宋教仁立场坚定地指出："此次所下立宪伪谕，皆鉴于吾国民已能将共和国家建成，不得不作此摇尾乞怜之计"，强调"民主国体与君主国体之优劣，虽因国情而定，然究可断言，君主国体未必胜于民主国体"。他坚信"吾辈以民国体为适应吾国之情也"。接着他离开武昌到长江下游继续活动和组织上海、浙江、江苏、南京等地武装起义，筹备组织中央临时政府。

宋教仁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1911年10月至11月在武昌起草了《鄂州约法》，宣布在中国"人民一律平等"，为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下了基础。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专横跋扈，践踏《临时约法》，宋教仁辞去农林部总长职务，四处奔走，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1913年春，全国第一届选举，国民党以压倒多数选票获胜，负责组织内阁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孙中山、黄兴推荐宋教仁代表国民党出席组阁，当时，他已回桃源家乡省亲，接黄兴函电后，从桃源起程，经常德、长沙到湖北，再由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他所经过的地方"开会欢迎者，恒以万数"，在一场接一场的欢迎会上他一日三次上讲演台，抨击袁世凯政府时弊，鼓励革命党人继续奋斗，大遭袁世凯妒忌，暗遣密探跟踪，宋教仁丝毫不畏惧，1913年3月2日，他到杭州登上南高峰俯瞰钱塘江，吟诗抒怀：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接着北京暗以"救国团"名义通电诬陷宋教仁，宋教仁振振有词的据理驳斥。3月20日晚上10时30分，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欢送他乘京浦车北上时，忽然一声枪响，宋教仁被袁世凯收买的流氓狙击，当即送铁路医院医治无效，于22日凌晨4时，停止了呼吸。临终时，宋还不知道是袁世凯派人刺杀的他，并托咐黄兴给袁世凯拟写了一个电报："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也是他留给人间的一份简短遗嘱。

宋教仁为实现宪政而为国捐驱后，举国震悼，悼念这位辛亥革命的政治活动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国民党的实际创始人。孙中山悼念他是"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革命经营十载难，功成才得唱刀环。无情又逐东流去，沪上征人不复返。"这是桃源——宋教仁家乡的人民追悼他的歌词，还修建了"渔父祠"，办起了"渔父学校"，后又修筑了"渔父路"。在他工作和牺牲的地方——上海，由黄兴等集资修建了"宋园"(即今闸北公园)，宋教仁就长眠在那里。墓前立着宋教仁的雕塑像，像座石上篆刻章太炎题签的"渔父"两个大字。

(摘自《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李烈钧

李烈钧(1882～1946)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1907年加入同盟会后，积极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十几年时间里，他是孙中山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

1910年，李烈钧因在江西新军中宣传组织革命活动而被捕。后到云南作讲武堂教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速返江西九江联络新军独立，成立军政府以为响应。他还及时部署兵力占领长江要塞，截住北洋舰队主要舰艇，并动员其起义，成为支持革命的一支力量。当时，他还率舰艇及部分军队援助安徽。武昌告急时，他又率部西上，命舰艇游弋于长江，使清兵不敢渡江，从而解除了武昌之危。之后，在许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李烈钧都有突出表现。1912年，他在江西都督任上，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改革，使江西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控制的重要地方之一。因此，李烈钧便成为袁世凯当时必欲去之而后安的打击对象，李烈钧的湖口起义是"二次革命"的起点。1915年12月25日开始的护国运动，李烈钧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任第二军总司令，师出两广，艰苦转战，先后在广西、广东击败龙觐光、龙济光部队。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李烈钧为大元帅府总参谋长。1918年，他奉命先率、滇、桂、粤军大败渡海进攻广州的龙济光军。然后北上进击段祺瑞所派北军，力挫强敌，攻克南雄。1921年，孙中山二次回粤、任非常大总统时，仍以他为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孙的北伐主张，积极拟定全盘北伐计划，并主持了第一次北伐，攻下江西吉安。1923年1月，孙中山第三次回广州，重组大元帅府，还是以李烈钧为参谋总长。1923年11月，陈炯明反攻广州时，他辅佐孙中山指挥滇、桂、粤军进行节节抵抗，最后保存了部队，避免了全面崩溃和覆亡的危机。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时，他以参谋总长名义随行。孙中山逝世后，他参与主办丧事。因此，终其一生，他确实是一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诚战士。

李烈钧虽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但他像许多旧军人一样，理论水平不高，在许多问题上认识不清。常常把私交、义气等看得比革命原则更高。因此，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因追随黄兴而不加入。1917年因唐继尧拒不就军政府元帅之职，他也随之一度不就参谋总长之职。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李烈钧因认识上的不足更使他政治态度上向右转。他一方面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在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12月他却通电赞成反共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的主张。1927年初，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西

省主席后，他更向蒋靠拢，政治态度更趋反动。故1927年8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参院院长。自1928年蒋介石重新执政后，他常住上海，不再担任任何实际职务。西安事变后，他有同情蒋介石的表示，被任为审判张学良的军事法庭的审判长。1933年，他曾对冯玉祥的抗日军公开表示过支持。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他在宋庆龄等十三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案上签名。抗战时期，李烈钧在昆明、重庆养病，1946年病故。

（摘自《中国近代史新编》徐泰来）

熊希龄

熊希龄　字秉三，湖南省凤凰县人，1867年生。1891年中辛卯科举人，1894年中甲午科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回乡任湖南矿务总办、长沙时务学堂总办，1898年因赞同维新变法，被革职永不录用，并交地方官看管。1905年经赵尔巽力保，开复原官。1907年任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之随员，后任奉天财政督理官、湖北省交涉使、奉天省盐运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江苏都督府财政司长，并与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谊会，不久变成统一党，任理事，后又并入进步党。1912年任财政总长；后任热河都统。1913年7月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14年2月被免职后任参政院参政、全国煤矿督办、水利局总裁等职。1915年任湖南宣抚使，1916年任平政院院长，1919年任湖南赈务督办。晚年从事慈善事业，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并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全国赈务委员会理事。1937年12月故于香港。著有《双清集》、《京畿水灾善后纪实》、《熊希龄全集》等。

陆徵祥

陆徵祥　字子欣，又字子兴，上海人，1871年生。上海广方言馆及北京同文馆毕业。1892年任驻俄使馆随员、参赞，1905年任驻荷兰公使兼办保和会事宜，1911年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时曾通电主张清帝退位。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外交总长，同年5月任袁世凯的外交顾问，7月至9月任国务总理，后改任外交总长。1915年又任外交总长，参与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活动，1916年一度任国务卿。1917年第三次任外交总长，1919年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22年任驻瑞士公使。1927年在比利时入修道院，从事宗教活动。1949年1月病故。

柏文蔚

柏文蔚(1876～1947)　资产阶级革命者。字烈武。安徽寿州(今寿县)人。早年入安徽武备学堂充学兵会，展开反对清朝和抵抗外侮的活动，事泄后逃往安庆，入武备学堂当学兵。1905年在芜湖任安徽公学教员，与陈独秀等人成立岳王会。不久到南京，加入同盟会，任新军管带。准备谋炸两江总督端方，未成，逃往东北。武昌起义后，从东北赶到南京，任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民国成立后，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6月，与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一起被袁世凯免职。7月宣布安徽独立。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后到南洋，参加欧事研究会。1917年回国，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府委员等职。著有《五十年经历》。

珍闻轶事

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

自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飞机，1908年在法国巴黎试飞成功后，飞机逐渐为世人所重视。中国航空事业先驱冯如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即敏锐地认识到飞机将在军事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决心研制。他受到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支持与鼓励，在华侨中集资设厂，亲自设计、制造、试飞，开中国航空之先河。当时清政府亦引起注意，宣统二年(1910年)订购法国苏姆式双叶飞机一架，并拟在京郊南苑设场试飞。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员冯自由，奉孙中山之命，募捐在美国订购单叶飞机六架，准备回国参战。民国成立后，由沪军都督府向奥国订购的两架飞机，亦运抵上海。适留英学习飞行的厉汝燕归国，由厉驾驶该机在上海江湾赛马场试飞成功。民元秋，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建议组织飞机队，并推荐熟谙飞行的革命党人谭根负责编练。但袁世凯对革命党人不放心，迟至民国二年春，接受法人军事顾问伯里索的建议，决定创立航空学校。并由财政部拨款27万元，请法人军事顾问博乐负责回国延聘飞行教官、修理技士，并购高德隆双叶飞机12架以及其他器材。

航校校址设于京郊南苑，隶属于参谋本部。一切由参谋本部筹办，当即领款6万元建校舍百余间，储机棚一座，修理工厂一座以及飞机场等应有设施。同时制订航校规章条例，招考学员。1913年夏末秋初，规模草具，9月1日开学。第一任校长由参谋本部骑兵上校秦国镛担任，教育长由参谋本部上校科长王鹗担任。在国外学习飞行的厉汝燕、姚赐九、潘世忠、鲍丙辰等人被聘为飞行教官。另有外籍教官二名、技师二名及航空医官一名。航校第一期学员62名，至1915年春毕业者41名。第二期学员1917年冬毕业42人。

航校创立于民初革命变动的局势之中，此后国事变乱相乘，航校亦被军阀控制，使用于各次战争。1913年秋，内蒙发生兵变，袁世凯派兵征讨，并派飞机一架，由潘世忠驾驶随军侦察。1914年再度派飞机河南轰炸白朗起义军。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派遣参谋长陈宧入川，并以飞机二架组织航空连以壮声势。云南起义后，袁再组织两个航空连，入湘入川镇压护国运动。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航校建制人事照旧。乃至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将南苑航校改为临时航空司令部，由秦国镛、王鹗主持一切，曾拟组织飞机轰炸清宫。

大战结束后南苑航校改名南苑航空教练所。1920年春招收第三批学员。1923年毕业学员39人。1923年秋，南苑航空教练所易名国立北京航空学校，招收第四批新生入学，1925年冬毕业学员39人。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再未招生。

（摘自《民国春秋》）

袁世凯何以不愿张勋为江苏都督

袁世凯攫取民国大总统后，专制自为，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至1913年5月，先后免去不为己用的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继而派出北洋劲旅段芝贵、冯国璋、倪嗣冲等分三路南下，向讨袁军发起攻击。9月1日，驻兵徐州的“辫子军”在张勋率领下，抢先攻陷南京城，纵兵烧杀，大掠三日。此时，这个曾在清亡前夕被授任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辫帅”，自鸣得意，认为江苏都督一职非己莫属了。果然，袁世凯很快就任命他为江苏都督。可是，未待张勋将都督的宝座坐热，12月16日，袁突然颁令升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规划他的部队“以浦口为起点驻十二营，其余各营分派临淮关、蚌埠、徐州、兖州等处一带”，并“准俟所部军队开发竣事后，月底交卸。”与此同时，调任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对于袁的这一举措，张勋极为恼火，但周围皆是北洋劲旅，只好忍气吞声，从南京退兵，移往徐州。

毫无疑问，袁世凯当初任命张勋江苏都督，不过是“安扶为权宜之计耳”，所以只用了他两个来月，待大局已定，即把这块宝地拿过来交给了嫡系心腹。为什么袁世凯不愿用张勋为江苏都督呢？史家多偏重于袁要把“长江流域诸省，尽为北洋军人所有，势成统于一尊”的一说。当然，这种说法无可非议。然而穷源竟委，袁之所以不用张勋为苏督，其中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秘。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浙联军大举进攻南京。当时守卫南京的清军江防营统领张勋势难招架，遂萌生投降革命军以待援兵之念。据参预指挥攻克南京战役的柏文蔚将军在《五十年大事记》中披露：

“张勋遣使二人，一曾云生，一杨绍先，皆武备练军同袍也。衔张勋命与余言和，提出条件：一、反正；二、拥张制军（张人骏，时任清两江总督）为都督；三、保全铁将军（铁良，时任清江宁将军）全家生命财产；四、张己身不要升官，保存其江防军存在。若能答应签字，即刻悬挂白旗，以免糜烂地方。……余观此情形，有不得不允之势，遂应之曰：‘张军门如此好意，余自当以十二万分诚意接受，但签约地点，在秣陵关你们不同意；在南京城内我不愿意，最好在镇江。即请二位老同学代表张军门如何？’曾、杨称善而去。”（见《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手抄本上册，藏安徽省博物馆）

张勋向革命军乞和事后来未能实行。他率清兵逃出南京到徐州后，于1912年12月16日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拍发代奏电，称：

“……全军至浦，革军狮子山幕府山火炮及兵船十余艘全力攻浦，臣将队伍调至后山。……督臣张人骏、将军铁良由臣同至日本兵轮，别后，旋雨花台调集各队渡江。臣治军无状，请从重治罪”。云云（见《宫中电报档》）

显然，张勋心中有鬼，把乞和事隐瞒下来。俗话说“隔墙有耳”，况且袁的爪牙心腹布满要津，耳目众多，焉有不知。像这样一个心怀叵测的人，岂能放心让他坐镇南京城？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袁不仅免去张勋的江苏都督，而且特意规划出一块地盘将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圈”将起来。就在张勋被“圈”在徐州后，袁密令安徽督军倪嗣冲将督军公署从安庆迁至蚌埠。这一突然行动，使当时安徽军界的一些上层人士甚感不可理喻，如堕入五里雾中，而倪嗣冲绝不作任何解释。时至60年代，这个谜底才由倪的亲属宁剑南先生道破，他说：

“倪嗣冲的督军衙门及省长办公地方，不设在省会安庆，而设在蚌埠，这是同袁世凯整个军事布置相适应的。袁把冯国璋放在江南，是北洋的主力，可以防止江南事变，所以就没有必要把倪的兵力集中皖南了。倪的军队在皖南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集结在皖东、皖北，其用意是监视徐海的张勋，也可以控制河南。”（见宁剑南：《我所知道倪嗣冲祸皖的情况》）

宁剑南系倪嗣冲的妻子宁氏家族人，所言非局外人所知者，确实可信。后来张勋复辟失败，倪嗣冲趁机一口吞并了张的定武军，皆事出有因，恐怕张勋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曾被袁世凯密令监视过吧。

袁世凯早有当皇帝的预谋，据1912年1月23日《时报》披露：

"袁党赵秉钧、杨以德等运动北方官绅，拟俟满廷退位后，即组织临时政府，拥袁为大总统，如南方政府不取消，即拥袁为皇帝云云。"

可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已有之，而且亦曾活动过张勋，后来张勋被袁以明升暗降的手段排挤出南京，一时恼羞成怒，竟将此件秘事抖露出来："余平南京后，有崇文门监督何棪者说余曰：君大功告成，盍请大总统为大皇帝。余痛骂之而去，此袁所以去予而代之以冯也。"这是张一麐在何旭如（白蕉）新作《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加的"眉批'张一麐多年充任袁世凯幕僚，并为袁所信任，所言诚可信也。

袁要当皇帝，而张勋却一心想着要恢复清王朝，不但不把袁放在眼中，还把说客痛骂一顿，袁岂能容他？袁不愿用他当江苏都督，原因种种，但这一件事恐怕是要害吧。

（摘自《民国春秋》）

鲁迅的官场生活

俯案疾书，登堂授课，对众演讲，当面斥敌……这些都是人们心目中的鲁迅活动的形象。然而鲁迅还有另外的生活，这在他的著作里有时也会偶有涉及，例如在《记"发薪"》一文中，他曾写道：

"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C君做点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

'去！'我一得警报，便走出公园，跳上车，径奔衙门去。

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这里所提到的"部里"、"衙门"，指的北洋政府时代的教育部；所说"做官要做得较大"，就鲁迅来说，他在这个教育部担任着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其官阶职称是荐任"佥事"。

一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第二年元旦，革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担任部员。不久，经过"南北议和"，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合并，鲁迅亦随之来到北京，在教育部担任科长共14年，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为止。

在南京时教育部的情况稍好一些，一到北京，就与前清时代的"学部"合并，人员成分复杂起来，思想也很混乱。特别是各派军阀之间的权势争夺几乎反映在各个方面。但是不论那派军阀掌权，他们所重视的都是武力倾轧与经济盘剥，至于文化教育，则是他们所不顾的，因而教育部也就成为一个陈腐冷落的陪衬衙门，难于兴办什么事业。鲁迅第一天到这里上班，所得印象就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而且这种情况历久难变。

但鲁迅并不是一个愿当闲官的人，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愿。这就形成两个矛盾：在政治上，鲁迅当时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与体现着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军阀政治有着深刻的思想对立；在事业上，鲁迅奉行着努力开拓祖国新的文教事业的信条，他不仅奋力推进工作的开展，而且个人也积极从事专业学术研究，这又与教育部的死水般的环境极难协调。

按照当时的分工，鲁迅所主管的第一科的职掌范围包括建立博物馆、图书馆，开展各种展览会以及发展有关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项文化工作，此外还有建立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这几乎囊括了当时有关文化艺术以及科普方面的大部分任务，实际上是那时最高的文化当局。鉴于社会政治如此昏暗，开展工作当然很难，鲁迅的对付方法是："只要有权在手，便当任意做之"，他的"为官之道"是决不随波逐流不干实事，一定要利用手中之权任从"有益于民"的意旨，尽量拓展文化事业。经过他的努力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改组、筹建了北京图书馆及通俗图书馆；筹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办了儿童艺术展览会在国内外的展出；进行了一定的文物调查并制定、发布了全国范围保护文物古迹的有关条令等等。这些工作，处在刚刚结束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的条件下，虽然仅仅是个开端，但是具有启蒙与开创性的意义。

由于人员芜杂，思想混乱，教育部很难说是个正规办公的地方。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曾经概述："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因此，"若欲得思路胡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这些触目都是的人在干些什么呢？据了解情况的人说，他们上班之后，有的下棋，有的品茶，有的念佛经，有的唱京戏，还有一些癖好特殊的人，他们能够极有兴致地经常用尘拂在身上拍打节奏以寻乐趣……。这些还是表面现象，至于背人之后，更有那些谄入进谗，营私设计，造谣生事，明赌暗娶之徒的丑恶勾当，搞得真是乌烟瘴气。鲁迅对此曾经极为厌恶的评述道："部中近事多而且怪，怪而且奇，然又毫无足述，述亦难尽，即述尽之乃又无谓之至，如人为虱子所叮，虽亦是一件事，亦极不舒服，却又无可叙述明之，所

谓‘现在世界真当仰东石杀(按即“他妈的”)者’之格言，已发挥精蕴无余，我辈已不能更赘矣。”在这种环境与心态之下，可想见个人若欲静心研究学问之不易了。

鲁迅既然为官，也就要跟周围的官僚们打些交道，在这方面，鲁迅一贯的态度是择交甚严，公事公办，既不奉迎吹拍，也不姑息营结，保持了在思想上高度的原则性。

他在教育部这个“官场”中有几个好友，那就是许寿裳，齐寿山，陈师曾，戴克让等。这几个人，无论从思想道德学问(或艺术)等方面，都是能够站得住，叫得响的，因此关系相当深厚，可以归入“寥寥”之属。在其他人中也有个别过从较多者，如经常共同处理工作问题的沈商耆，为研究佛经而颇多接近的许季上等。他对于同级同事，大多都合作共处；对于下级较正派而又努力者，也多予关怀帮助。但对于上层当权的人，鲁迅的态度则大不同了。

对于这些政府部长们，鲁迅仅在日记中写下几笔，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对于另外的一些总长，即使是在公开的场合，鲁迅的态度也就不再给人台阶下了，例如：

1913年10月3日，总长“傅增祥之父寿辰，其徒敛钱制屏，与一元”。

1923年9月10日，总长“彭允彝之父作生日，有人集资，出一元”。像打发市井乞讨似的“与”或“出”一元就算了事，鄙夷之态，溢于言表。

鲁迅为官14年，这种颇为独特的为官方式，注定是很“不得烟抽”的。他曾被某些上司及同僚视为“神经病”者。其实这话倒也贴切，“神经病”者，不与那些官僚政客同流合污的“非正常人”之谓也。他之不受赏识，盖源于此。14年中，鲁迅一直担任科长，椅子简直变成了铁的。而有的下属后来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如高步运；有的同级后来骤然升为教育次长，如王章祜，等等。以鲁迅的道德学问，那些人如何能够与他相比？但鲁迅是另一种人，当过了那个短暂的时光之后，鲁迅则属于整个世界，又有谁还记得那些与鲁迅同时的官僚们的渺小的名字呢?!

（摘自《民国春秋》）

流行风

小说《玉梨魂》

作者徐枕亚，主要内容：

该书写的是一个青年和一个青年寡妇相爱的故事。何梦霞怀才不遇，深觉人世艰辛，整日忧郁寡欢，多愁善感。后应聘到无锡蓉湖某乡村小学任教，寄寓于亲戚崔家，并兼教家主人的孙子读书。某日，梦霞见庭前落下梨花满地，勾起他的忧伤，遂效黛玉葬花，立石为志，题名“香冢”。不料晚上忽听见窗外有一阵啜泣之声。视之，见梨树下站立着一个缟衣素裙哀痛欲绝的美女梨影。通过孀妇之子传箫带信，从此他们步入恋途。然而他们都无力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只能通过诗词酬答倾吐相思的苦闷，即使偶尔见面，也难表达衷肠。梨影见和梦霞结合无望，征得崔翁同意，拟让小姑筠倩和他成亲。可是男女各有所思。梦霞始终热恋梨影，筠倩对被迫的婚姻也极为不满。三人都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不久梨影病死，筠倩怨恨身亡，梦霞也在辛亥革命攻打武昌时牺牲。作者虽欲以稗言为易俗之利器，但其莫大弱点是只知暴露，不言斗争，没有放弃“形隔势禁”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该书玩弄词藻，堆砌大量诗词，忽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尽管如此，由于辛亥革命之后，传统婚姻制度发生动摇，有新思想的人，要求变革。所以作品在《民权报》上发表后，社会反映颇为强烈。

小说《春阿氏》

作者冷佛，主要内容：

该书以清末北京城内发生的一桩真实案件为素材，写女主人公三蝶儿聪明美丽，自幼和表兄聂玉吉耳鬓厮磨，彼此爱慕，两家父母也为他们定了婚约。后玉吉父母暴亡，家境败落，三蝶儿之母悍然悔婚，将三蝶儿嫁给官宦文光之子春英，三蝶儿随夫姓被称春阿氏。丈夫憨傻，对她非打即骂；二个婆母又横加指责，春阿氏痛苦难言，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玉吉知此情后愤愤不平，夜入其家，砍死春英，意欲二人双双逃走。春阿氏极力阻拦不成，自浸水缸中，想一死了之，又被救起。见官后，春阿氏拒绝供出玉吉之事，承认自己害死丈夫，遂屈死狱中；玉吉也因怕败坏春阿氏名节，不敢自首，忧郁不欢，最后自杀以报春阿氏之情。小说从春英被杀写起，至春阿氏死结束，叙述整个审案过程，其中穿插二婆母与普二通奸事，使案件更为曲折。作品虽围绕公案、冤狱展开情节，实则旨在揭露包办婚姻的弊端，春阿氏悲剧的产生，她母亲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由于受事实的局限，作品结构散乱、人物性格也有矛盾之处，但作者以熟练的北京方言描写京城风俗，很有特色。

小说《沪江风月传》

作者许廑文，主要内容：

该书以民国初年上海为背景，叙述花月场中事。其中主要人物范次云串穿始终。他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因怀才不遇，经常寄寓于勾栏，深谙嫖经，但始终未改变豪侠的本性。先是出巨款为妓女漱琴、倩倩赎身，继而为嫖客梅玉堂和莲英“拉线”。当嫖客之间发生纠纷时，挺身而出，避免了一场冲突。此外，他对妓女素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见严瑞生等人图财害命，深恶痛绝，莫不体现他的良好品德。身边有宠妓，夫人劝之而终不娶，更说明他高尚的人格。该书涉及数十个各种类型的人物，作者用娴熟的笔法，贬褒分明，勾画出一群嫖客的生活，描绘了众多妓女的灵魂。在他的笔下，有刚直的蔼人，厚道的朱深甫，刁钻的周俊卿，愚蠢的梅玉堂；妓女中有才貌双全的素秋，心地善良的漱琴，争风吃醋的倩倩，唯利是图的莲英，充分体现了作者通观全面，驾驭小说的深厚功力，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滩光怪陆离的一个阴暗面和中国社会的某些弊端。由于成书仓促，作品稍嫌粗糙，个别人物的性格前后矛盾，结尾也不完善。但是作者对上海方言运用自如，描写妓院绘声绘色，使作品颇具特色。

电影《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是以家乡广东潮州一带的封建婚姻、习俗为题材而编写的。它以嘲讽的笔触，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影片是由一班文明戏演员演出，女主角也由男演员扮演。摄影师由依什尔担任。当时并不知道“导演”这个名目，但郑正秋和张石川担负的指挥拍摄，实际就是“导演”工作。影片在上海香港路亚细亚公司的露天摄影场中拍摄，郑正秋指挥演员的表演动作，张石川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当时，只是把摄影机摆好位置后，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做戏，镜头的位置不变，永远是一个“远景”。由于是无声片，演员也可不必照对白说话，随便启动嘴巴就可以。影片拍完共四本，在当时算是长片了。同年九月，在新舞台首次放映，颇受欢迎。

《难夫难妻》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情节的故事短片，也是郑正秋参加电影工作的开端。它比过去拍的戏曲短片进了一步，同时，影片内容提出了一个社会性的主题，对旧式婚姻制度作了一定的暴露和抨击。令人感到电影除了娱乐和赚钱外，还有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作用。这点正是郑正秋进步戏剧主张的体现。

电影《庄子试妻》

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拍片的同时，南中国的香港也开始了摄制影片的尝试。1913年，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和万维沙经香港返国时，与从事文明戏的“人我镜剧社”主持人黎民伟相识，并提出与之合作拍片，经双方商定，由布拉斯基出资和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利用“人我镜剧社”已有的文明戏演员和布景，以华美公司名义制片和发行。这样，由黎民伟编导、罗永祥摄影，完成了短故事片《庄子试妻》。

黎民伟，广东新会人。其父在日本经商，他生在日本，长于香港；9岁时即对摄影发生兴趣。清宣统三年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他在广州组织了“清平乐会社”，成为当时广东从事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华南影业界的先导。后来，黎民伟还拍过一些纪录片。孙中山就任临时大决统等纪录片，就是他拍摄的。

影片《庄子试妻》，取材于明、清传奇《老庄周一枕蝴蝶梦》中“扇坟”一场。它描写庄周诈死，化作一个楚国王孙，以试其妻子对他是否忠贞；而其妻急于改嫁，便将刚葬埋的丈夫坟头扇干。影片宣扬了封建道德，并多庸俗趣味。此片(共二本)，因系港地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试演反映尚佳。黎民伟是该片的编剧、导演，同时还扮演了主角庄子之妻，而他的夫人严姗姗(广东南海县人，香港懿德师范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过广东北伐军的女子炸弹队)，扮演了“扇坟”的使女一角。严姗姗在影片中虽不是主角，但却是中国电影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女演员，为中国电影用女演员饰女角色开了先河，因而，引起了当时观众的注意。

诗《哭钝初》

柳残花谢宛三秋，雨阁云低风撼楼。
中酒恹恹人愈病，思君故故日增愁。
豺狼当道生何盖？洛蜀纷争死岂休！
只恐中朝元气尽，极天烽火掩神州。

(陈去病)

诗《武昌狱中书感》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
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

殇。

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宁调元）

诗《书感步蒋观云皎然韵》

为守四方思猛士，登台高唱大风歌。投身五浊牺牲少，

吮血中原豺虎多。万姓分离无国史，一家笼络有儒科。

苍天梦梦依然醉，江自长流山自峨。

（高旭）

历史档案

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节录）

袁世凯

1913年10月10日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建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削丧无余也。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苦痛。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徬徨，难安寝馈（kuì，愧），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mǐ，米）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未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用诪（zhōu，舟）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浅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为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知古人敬事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

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

杨喆:《正式大总统就任记》第12—17页,《中华教育界》1913年10月号。

中俄声明文件

1913年11月5日

关于中俄两国对待外蒙古之关系,业经大俄帝国政府提出大纲以为根据,并经大中华民国政府认可,兹两国政府商订如下: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惟中国可任命大员,偕同应用属员暨护卫队,驻扎库伦。此外,中国政府亦可酌派专员驻扎外蒙古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但地点应按照本文件第五款商订。俄国一方面担任除各领事署护卫队外,不于外蒙古驻扎兵队,不干涉此境之各项内政,并不在该境有殖民之举动。

四、中国声明,承受俄国调处,按照以上各款大纲以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

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双方奉有本国政府委任签押盖印,以昭信守。缮具二份,立于北京。

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

西历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声明另件

大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孙,为照会事:照得本日签定关于外蒙古问题之声明文件,本总长奉有本国委任,以政府名义向贵国公使声明各款如下:

一、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二、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

三、正文第五款所载随后商订事宜,当由三方面酌定地点、派委代表接洽。

四、外蒙古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惟现在因无蒙古详细地图,而该各处行政区域又未划清界限,是以确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尔泰划界之处,应按照声明文件第五款所载,日后商定。

以上四款相应照请贵公使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俄帝国钦命驻华全权公使库

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947—949页)

善后借款合同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此合同于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订立。其订立者:一为中华民国政府(此下简称曰中国政府),由国务总理、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表;一为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此下简称曰银行)。

兹因中国政府欲借贰千伍百万金镑,计合马克伍万壹千贰拾伍万整,佛郎六万叁千壹百贰拾伍万整,卢布贰万叁千六百柒拾伍万整,日本金元贰万肆千肆百玖拾万整,为善后及行政之用(节目详后),并拟发售其金币债票以实现此项借款,其额即上所言之数。又因银行预借代中国政府将上言之借款之债票发售于公众,故订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中国政府准银行发售五厘金币债票,其总额计贰千伍百万金镑,合马克伍万壹千壹百贰拾伍万整,佛郎六万叁千壹百贰拾伍万整,卢布贰万叁千六百柒拾伍万整,日本金圆贰万肆千肆百玖拾万整。其发售或作一批,或分多批,由银行自行酌定。

此项借款之进款,或全数或几部分,或以金镑或以承购此项债票之各该国货币,按照以上所定比价交付中国政府,由银行自行酌定。附款于预约证券及正式债票之息票应付之款,应按照以上之比价在各该国交付。其正式债票之拈阄收回,或购卖,或清还,均按以上办法办理。

此项借款日期由首次发售债票之日起,命名为:中国政府一千九百十三年善后五厘金币借款。

第二款　此项借款之进款,除照后开第十三款所载预作首次息票之用外,系专为以下开列各事之用:

一、为交付本合同附件甲号所详中国政府业已到期应清还各款之用;

二、为购回本合同附件乙号所详各省现有借款全数之用;

三、为预借本合同附件丙号所详中国政府不久到期各款随时清还之用;连预借赔偿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一项亦算在内;

四、为按照本合同附件丁号所详遣散兵队之用;

五、为预借本合同附件戊号估计现时行政各费;

六、为本合同附件己号所详整顿盐政事务；

七、为中国政府与银行互相商允之他项行政费。

以上所载合同附件均视为本合同之一部分。

第三款　此项借款总额及关系此项借款之垫款系中国政府直接担任之债务，是以按期清还本借款及或垫款本利一节，及按照本合同所开政府应行各节，中国政府须诚实照办，以昭信谊。

……（下略）

第十六款　倘於未发此次借款招贴以前，遇有政治上或财政上之恐慌，以致影响各市面或中国政府各项债票之价值，在银行之意见以为此项借款未能照本合同条款发行，此项借款，中国政府应准银行自本合同签押之日起算，展缓六个月。设或届时市面仍属不佳，银行可请中国政府续展期限。如中国政府不允展期，则此借款合同即行作废。但银行关于此项借款所垫出之款之本息自应先行清还。倘此项借款按第一款所开分批发售，则每批之发行，除必须更改之处外，即应按本条款所规定办理。

第十七款　倘若将来中国政府欲以盐务收入为担保再行借款或欲继续借款以办理本合同第二款所详性质相同之事，则中国政府允银行照本合同第十三款所开，按债票面虚数提经手费百分之六为根据，自行酌量承办。

中国政府又允，本合同借款债票全行发售并且照招贴所开末次票价付清后六个月内，除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以前已经签订之借款外，非先与银行商允，则不得发行他项政府借款或政府担保之借款。

第十八款　此项借款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均分承办，惟彼此均无互相担保之责。

第十九款　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道胜银行及横滨正金银行，可将本合同应有之权利、权力及裁断权，全分或一分，转让或托付于无论英、德、法、俄或日本公司，或董事等，或代理人等，并予以再行转让或托付之权。惟此种转让或再行转让、托付或再行托付，均须先由中国政府核准。但本合同所载银行之担负，仍为有效。

第二十款　本合同系国务总理、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奉大总统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之命令代表中国政府签押。该命令已由外交部以正式公文照会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十一款　本合同共备华、英文各八分，中国政府执收华、英文各三份，银行执收华、英文各五分。如文义有疑难之处以英文为准。

外交总长

国务总理

财政总长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签押

宋教仁谈内政外交之时弊

1913年3月9日

民国建设以来，已有二载。其进步与否，改良与否，以良心上判断，必曰：不然。当革命之时，我同盟会诸同志所竭尽心力，为国家破坏者，希望建设之改良也。今建设如是，其责不在政府而在国民，我同盟会所改组之国民党，尤为抱极重要之责任，盖断无破坏之后即放任而不过问之理。现在政府之内政、外交，果能如民意乎？果能较之前清有进步乎？吾愿为诸君决断曰：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今次在浙江杭州晤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君，范云，蒙事问题尚未解决，政府每日会议，所有磋商蒙事者，云“与俄开议乎？与俄不开议乎？”二语。夫俄蒙协约，万无听其迁延之理，尚何开议不开议之足云。由此可见，政府迄今并未尝与俄一开谈判也，各报所载，皆粉饰语耳。如此政府，是善食乎？余敢断言，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视之恶政府所造成者也。今试述蒙事之历史。

当民国未统一时，革命纷乱，各国皆无举动。盖庚子前各强皆主分割，庚子后各强皆主保全，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之主义，此外交方针，各强靡不一致，此证之英日同盟，日美公文，日俄、日法、英俄等协约可明者也。故民国扰攘间，各强并无举动。时吾在北京，见四国银行团代表伊等极愿贷款与中国，且已垫款数百万磅，其条件亦极轻，不意三月间即有北京兵变之事，四国团即致函，取消前条件另议。自后，内阁常倾覆，兵变迭起，而外人遂生觊觎之心矣。五月间，俄人致公文外交部，谓库伦独立，有害俄国生命财产，请与贵国合力，取消独立，惟加有此后贵国不设官、不殖民、不增兵三条件。讵外交部署之不答，俄使催之若干次，始终不理。迄十月间，而《俄蒙协约》告成。时日本桂太郎在满洲见俄外相，即关此事之协商。自后，英之于西藏亦发生干涉事件。现袁总统方以与英使朱尔典有私交，欲解决之，此万无效也。盖蒙事为藏事之先决问题，蒙事解决，则藏事将随之解决。若当俄人致公文于外交部时，即与之磋商，必不致协约发现也。此后之外交，宜以机会均等为机括而加以诚意，庶可生好结果。

内政方面尤不堪问，前清之道府制，竟然发现。致财政问题，关于民国基础，当去岁原议为一万万磅，合六万万两，以一万万两支持临时政府及善后诸费，余五万万两充作改良币制，整理交通，扩充中央银行，处理盐政，皆属

于生利之事业。及内阁两次改组后而忽变为二千五百万镑，合二万万五千万两，主其议者，盖纯以为行政经费者。其条件尤为酷虐：一、盐政当用外人管理；二、公债当用外人管理，到期不还，盐政即归外人经营，如海关例。盐务为外债之唯一担保品，今欲订为外人管理，则不能再作他项抵押，将来之借款，更陷困难，且用途尽为不生利之事业。幸而未成，万一竟至成立，则国家之根本财政全为所破坏矣。

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如外交、军政、司法、国家财政、国家产业及工程，自为中央集权；若教育、路政、卫生、地方之财政、工程、产业等，自属于地方分权；若警政等，自属于国家委任地方之权。凡此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官制，万不能听其存在。

现在国家全体及国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曰"维持现状"。此语可谓糊涂不通已极。譬如一病人，已将危急，医者不进以疗病药，而仅以停留现在病状之药，可谓医生之责任已尽乎？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吾人宜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方为正当之政见也。余如各项实业、交通、农林诸要政，不遑枚举。现时间已有五时，仅举一愚之言，贡诸同志。

（《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

宋教仁君之时事谈——驳某当局者

某当局者谓各国保全政策，实各国互立协约，暗定界线，以免冲突，名为保全，实图侵略云云。此意何人不知之？余亦未尝谓保全为可恃，不过谓各国中实因种种关系，不能遽行侵略，故暂以保全为言，所以防一国之先下手。今吾国正宜利用此机，以修内政，且宜维持之，使多得一日，即多得一日之利，不可将此局自行破坏也。若俄蒙事，则实吾国不能维持此局，使俄人先下手之动机也。

某当局谓库约远在前清辛亥之夏，独立在冬季，宋于去年七八月进言，且仅及险象，并无办法云云。其言亦可笑。余并未尝言库约非前清辛亥夏事，亦未言独立非冬季事。余于去年之秋，只见日本桂太郎将赴俄国，余即往见赵智庵，谓恐有第三次《日俄协约》发生，其约必将以瓜分内外蒙古为目的，宜即时与日本提携，开诚相与，除去日本向来对袁总统之恶感，以免其与俄合，即库事或易解决。未久，余又见袁总统，言及外交事，余亦以此为言，并谓宜速解决库事，即俄人代要求之三款，可让步者，亦宜忍痛让之，否则将来即欲忍痛让步，以求解决，亦恐求之不得。袁总统时深然余言，其后并未见有何布置。日俄果有密约，俄人所代要求三款，且进而为攫库伦为其保护国之《俄库协约》，则实外交当局者因循苟且之咎也。

某当局谓库事实误于国民党，唐、孙、黄等皆以俄人方狡，俯就非计为言，一年来外交悉系该党员主持云云，实为诬陷之词。当唐内阁时代，余与少川屡言须速解决库事，其时以外交总长陆子兴未到任，故拟待其到后为之。及陆到，而唐内阁倒，尔后国民党皆未尝与于政府事。孙、黄等至北京，亦未尝言及库事当如何办法，询之袁总统当自知之。其余国民党除余一人建言二次袁总统、赵智庵外，亦未尝有一人陈外交上之策略也。某当局者谓外交悉吾党主持，岂非诬陷我国民党耶？

某当局者谓唐绍仪于三月十三日任总理，而京津三月二日三日兵变，宋乃谓唐之当国先于兵变，故六国要求乃酷云云。某当局亦未知当日实情。当余等偕唐君北上，乃在兵变之先。余等见项城时，唐君即以借款为言，谓已得四国银行团之允许，惟日俄二国加入事，尚待磋商。余当时曾力赞日俄加入。可见当时已有头绪。其后兵变既过，银行团乃忽持异议，唐君乃与比国商借，其后唐君至南京就总理任，乃在比款发生之后，某当局岂不知之耶？

某当局又谓统一后，南京要求三千万，嗣减至千万，其后比款七百万用途暗昧，故致银行团条件严酷云云，亦诬陷之词。当日要求款项，皆南京实在必须之款，未尝总共要求三千万或一千万，其后比款七百万亦非尽归南京支用。其南京所用者，皆有报销可稽询之，财政部档案可知，银行团亦未尝有比款用途暗昧之说帖。余当时在政府，每次说帖皆亲见之，未尝见有此说帖也。某当局又谓银行团所提条件，已经磋商，稍就范围，而国民党忽主张国民捐，议遂中止，及国民捐不成，要挟更甚，亦颇失实。银行团所提条件，初甚严酷，后乃渐渐减轻，遂乃有今日之顾问制度，何尝与国民捐有关系？当日交涉中止，乃因政府更换，又岂可归咎于国民捐乎？

某当局又谓余因争总理未遂，故发此怨愤无稽之言，亦可发噱。余始对于第一次内阁更换时，主张蔡君元培，二次主张黄君克强及赵君智庵，实未有自为之心。非不为也，实因余之资望能力皆不及诸人也。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及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推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

其既为之，则只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人之欲为总理、国务员者，亦当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国时代之常轨。乃若妄以此语诬人，视为攻击好材料，则更不值一噱矣。至于正式政府之总理，应由国会推出，余更希望黄、唐二公之当选，其理由甚多，不具述。总之，余当日演说，皆平心论事，某当局者语多失实，余虽未见其全文，盖实有意闹党见者之所为也。

(《民立报》，1913年3月12日)

江西讨袁军公启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四日

各党、各公团钧鉴：敬启者。

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横恣无道，倒行逆施，国民之被其虐者，至惨至酷。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不惜以危弱之赣，以专制恶魔对垒挑战，为全国创。开战之始，首占瓜子岭，再捷沙河，袁军歼者以千数计，足为公理犹存，士气可用之左证。近方秣马厉兵，再接再厉。

然以区区之赣，而欲悉以恢复共和之责任界之，则强弱之势悬殊，虽竭其能智，识者有以知其难。是廓清全局，仍不能不望之我全国国民之相继奋起也。诸公手创民国，造成共和，希望之念既深，巩固之志必切。既弗忍坐视专制之势日张，必尤弗忍坐视与专制挑战之赣省势孤力竭，而不一援手，听其失败也。

赣省之战，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是非赣省一部分之责任，全国国民共同之责任也。诚于此时以全国之力与袁氏战，则群策群力，一致进行，专制之毒，不难肃清，共和之基，自此巩固。是袁氏授首之日，悉诸公再造民国之功。河山无恙，日月重光，诸公之声势烂然，且将永为国民所讴歌。假其不然，各为自保之计，共作壁上之观，赣省固不幸而一蹶不振，沦于专制政治之下，各省亦将次第受袁氏军之蹂躏，而被毒于无穷。盖武力专制，得步进步，且以团结之力，击涣散之众，势犹易于摧枯拉朽也。故赣省之成败，实民国之存亡，明达如诸公，想断弗忍漠视。万乞奋袂群起，敌忾同心，登高一呼，众山皆应。馘彼妖孽，恢我民权，凯歌燕京，指顾可待。

烈钧等兵力虽微，然师出之日，已矢决心，有死无二。所赖诸公，指挥雄师，纡筹伟画，分途并进，以寒敌胆。赣军一部，当效前驱。民国存亡，在此一举。沥血陈词，不尽悬盼，军旅旁午，匆请勋安。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部李烈钧、林虎、何子奇、刘世均、耿毅、邓文辉、方声涛、蔡锐霆、俞应麓、袁程万叩。(七月十四号屡)

(录自《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致白朗书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敬启者：自足下倡义，鄂豫之间，所至风靡，豪客景从，志士响应。将来扫清中原，殄灭元凶，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后世。现在东南各省均已宣布独立，江西战胜袁军，五次告捷，苏军在徐州与袁军酣战，亦获胜利。现北有蒙警，赣又合力进攻，袁军以大兵分道南来，内地空虚，乘虚直捣，必获优胜。足下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可以窥取豫州。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为功实非浅鲜。抑有进者，此次兴师专为讨袁，以谋吾民之幸福。苏下饷械，两无接济，刍粮所出，不能不稍取给于民间。然必义不苟取，师出以律，无伤地方恶感，使人人晓然于吾辈之举动，实有吊民伐罪之意，则士民乐服，响从者众，而大局可以挽回矣。现有函润苍、夏焕三二君进谒台端，希予接见，俾资进行。临风响望，不尽欲言。此请勋安。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启。七月二十日。

(据介北逸叟：《癸丑祸乱纪略》卷下)

讨袁通电

黄兴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省议会，上海海军李总司令，并海琛、海圻、海筹、海容、应瑞、肇和各舰长，《民立报》转各报馆，扬州徐师长、吴淞姜总台官、江阴陶总台官、北京《民国报》均鉴：近北军又复轻师袭沪，入据各厂，闻风之下，惊骇莫名。自宋案发生，继以私借外款，袁世凯之阴谋一旦尽露，国民骇痛，理有固然。兴当时悲愤之余，偶电中央，婉词切责。湘、赣、皖、粤四督坦怀论列，亦本之忠爱民国之心。乃世凯遽有异图，日作战备。当时世凯罪状既彰，岂难申讨？徒以天下甫定，外患方殷，阋墙之戒，乃所宜守。爰戢可用之兵，徐俟元凶之悟。兴虽得世凯砌词辱骂之电，置而不答。四督何谴，罪斥随至，亦各决心谢职，翩然归田，宜可以告无罪于世凯矣。乃彼豺狼之性，终不可移，忽于各省安谧之时，妄列大兵于江海；当蒙边不靖之顷，转重腹地以兵戎。倒行逆施，至于此极！推其用心，非至剿绝南军、杀尽异己不止。似此绝灭人道，破坏共和，谁无子孙，忍再坐视？兴今承江苏程都督委为该省讨袁军总司令，视事之

日，军心悉同，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会，当即誓师北伐，殄此神奸。诸公保育共和，夙所倾服，望即协同声势，用集大成。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我祖黄帝之灵，居敌忾同仇之后，天下从风，独夫寒胆，则兴之本志，惟在倒袁。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农，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之想，神明殛之。临电涕泣，伏惟矜鉴。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印。

（据上海《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令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

大总统令

据警备司令官汇呈，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等，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穆密、鸿密各电数十件，本大总统逐加披阅，震骇殊深。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构煽，李烈钧、黄兴等乃敢于据地称兵，蹂躏及于东南各省。我国民身命财产横遭屠掠，种种惨酷情形，事后追思，犹觉心悸。而推原祸始，实属罪有所归。综该逆等往来密电，最为我国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数端：

一、该各电内称，李逆烈钧谓联合七省攻守同盟之议，是显以民国政府为敌国。二、中央派兵驻鄂，纯为保卫地方起见。乃该各电内称，“国民党本部对于此举极为注意，已派员与黄兴接洽，并电李烈钧速防要塞，以备对待”，是显以民国国军为敌兵。三、该各电既促李逆烈钧以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并称“黄联宁、皖，孙联桂、粤，宁为根据，速立政府”，是显欲破坏民国之统一而不恤。四、该各电既谓内讧迭起，外人出而调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是显欲引起列强之干涉而后快。凡此乱谋，该逆电内均有与该党本部接洽及该党议员一致进行，并意见相同各等语。勾结既固，于是李逆烈钧先后接济该党本部巨款，动辄数万，复特别津贴该党国会议员以厚资，是该党党员及该党议员，但知构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

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既据发现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各重情，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计，应饬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迅将该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该地方警察厅长及该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

至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既受李逆烈钧等特别津贴之款，为数甚多，原电又有与李逆烈钧一致进行之约。似此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自行取消其国会组织法上所称之议员资格。若听其长此假借名义，诚恐生心好乱者，有触即发，共和前途之危险，宁可胜言。况若辈早不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自居，国家亦何能强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相待。应饬该警备司令官督饬京师警察厅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从速行令各该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该党以外之议员，热诚爱国者，素不乏人，当知去害群即所以扶持正气，决不到怀疑误会，借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该国民党议员等回籍以后，但能湔除自新，不与乱党为缘，则参政之日月仍属甚长，共和之幸福不难共享也。

除将据呈查获乱党各证据另行布告外，仰该管各官吏一体遵照。此令。

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

大总统盖印　国务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署名

（录自《政府公报》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6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及统兵将领：“盐务收入各款，应自民国二年一月份起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

1月8日　袁世凯发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其中规定：除蒙古、西藏、青海三地外，其“已设民政长省分，以民政长为该省行政长官”；“未设民政长省分，以都督兼任民政长为该省行政长官”。各省设行政分署，其下统一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司。

1月9日　据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报告：英国在西藏各地连续增兵。计亚东一千一百余名、噶大克（今噶尔雅

沙)三百余名、江孜六百余名、拉萨七百余名、日喀则五百一十余名、加托克(今夏卜喀)一千二百三十余名、聂拉木二百六十余名、察木多(今察木达)三百六十余名。合共五千余名。是日,袁世凯为此特召集内阁及有关人员会议,决定于上述八处险要地段派兵驻守,但其后并未派遣。

1月10日　袁世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规定自此令发布之日起,"限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及众议院议员均须一律齐集北京。俟两院各到有总议员过半数后,即行同时开会。"

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帝国皇帝"名义致电袁世凯,谓其不应干涉库伦当局"乘时立国"。1月26日袁世凯电复哲布尊丹巴,重申"库伦不宜与中国分裂",民国"承前清之旧区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理应接管"。

1月12日　库伦当局以"答谢俄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为名,派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为专使率十五人赴俄,请求俄方代练蒙军,支援枪械,并商互派专使等事。是日杭达一行抵俄京彼得堡。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予以接见。

1月17日　宋教仁抵湖南。居二十余日,离湖南至汉口。旋乘江新轮沿江东下,2月15日午后6时抵上海。未几在上海就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职。宋所到之处均发表演说,批评时政,极力宣扬政党内阁制,大招袁世凯所忌。

1月29日　袁世凯准汉粤川铁路督办黄兴辞职,2月3日以岑春煊继任。

袁世凯任颜惠庆为驻德公使;2月3日再令颜兼驻丹麦公使。

1月31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行政长官:省议会暂行条例议决公布前,暂照前清咨议局章程分别办理。

2月1日　袁世凯与顾问各员议商对待库伦当局办法。决定暂不用兵,以免招致俄方干涉。并初步拟定招抚办法五条如下:一、与哲布尊丹巴以旧有教权并加封号,岁与津贴三万六千元;二、加伪总理大臣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以徽号,岁与津贴八千元;三、任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为库伦长官;四、收编盘据车臣汗部桑贝子旗、受沙俄及库伦当局纵容、专事抢掠华商之胡匪头目陶什托琥(一译陶十陶)之部众,将陶招至北京给以要职;五、一切善后事宜由北京政府酌派阿穆尔灵圭前往库伦办理。

2月4日　北京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二百二十三席。其它兼党者及党籍不明者占二百五十五席。

宪法讨论会在北京开成立会。国民、统一、共和、民主四党代表均到会。举孙洪伊为主席,汪荣宝、易宗夔为常驻干事。

2月7日　内外蒙古赞成共和各王公在阿拉善地方集会,决议事项十一条,其要者为:内外蒙均应悬挂五色国旗,要求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五族统一;蒙人应遵守中华民国律例;内外蒙均不得私借外债,私造枪械;由北京政府派兵驻守内外蒙各要塞,与当地蒙民共同巩固边防等。

2月8日　袁世凯召集会议,内阁各员及蒙藏事务局正副总裁均出席。先由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徵祥分别报告大借款问题及关于外蒙问题与俄使之交涉;继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报告近日外蒙各旗相继归附等情。袁世凯表示,非迫不得已,不愿加兵力于库伦,并决定向反正各蒙旗预发饷银等事。

2月12日　各地举行南北统一共和周年纪念。

3月16日　袁世凯再电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独立,免受异族之灭亡"。

3月18日　由各省都督发起组织之研究宪法会是日在北京成立,举杨度为会长、马良为副会长。该组织对外标榜"系纯粹学会性质","与政治无关,并不承何人意旨,不受何人质问,其范围仅止研究二字",其实乃袁世凯御用机构。

3月19日　袁世凯通告"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国议会开会礼"。

3月20日　夜10时45分,宋教仁乘车北上前在沪宁路上海站遇刺,伤要害。入医院后,自分必死,遂立即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内中有云:"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内务部接陆军部转来袁世凯指令:为防止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即转饬各报馆,"对于外交、军事秘密事件一律不准登载,违者按律严惩"。内务部旋责成京师警察厅将此令转知各报。21日,该厅发布通告,决定自即日起实行新闻检查,并扬言:"倘有故违,……立即饬员究办,自有相当之对待"。

3月21日　袁世凯接宋教仁遇刺电后,电复假意慰问。内中有云:"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同日,又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县知事及沪宁铁路总办,令"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并派陈贻范及上海县知事前往医院"慰问",以掩世人耳目。

3月22日　晨4时47分,宋教仁不治身死。黄兴随将此耗电达袁世凯、国务院及参议院。

3月23日　上海英法二租界捕房据可靠线索逮捕宋案同谋犯应夔丞。次日搜查应宅,于宅内捕获刺杀宋教仁之正凶武士英(即吴福铭),并搜得密谋刺宋之确凿证据多件。内有国务总理赵秉钧嘱应夔丞"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之密函,并附注明"应密"之密电码一册;应致赵密议毁宋之"冬电"电稿;宋案同谋犯、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

祖致应之秘密函电一束，其中有告以袁世凯对应之"冬电""阅后颇色喜"，嘱即进行者；有告以向赵秉钧"索一数目"，以为刺宋之报酬者；有告以"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者；有告以袁允"毁宋酬勋位"者。并搜得宋被刺后应致洪之"川密"电稿一件。由此谋杀宋教仁之凶犯乃尽行暴露。

3月26日　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宋教仁遇刺身死，急返国，是日抵上海。行前曾自长崎电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嘱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抵上海后，当日即于黄兴住所与黄兴、陈其美、戴季陶、居正、钮永建、柏文蔚等密商宋教仁被刺之对策。会间孙力主讨袁，而黄等多人则坚持法律解决，不愿诉诸武力。

3月30日　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到者甚众，吴景濂、张继、林述庆、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孙毓筠等均与会。

3月31日　驻北京外交团，就宋教仁遇刺逝世，向中国政府表示哀悼。

俄政府派密探伪装商人，在张家口一带进行侦察活动。北京政府得报，是日电令各统领注意防范。

4月1日　袁世凯公布《行政执行法》，共十一条。

4月2日　袁世凯公布《省议会暂行法》，共五章四十一条。

4月8日　午前10时，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会。到会议员六百八十二人，其中参议员一百七十九名，众议员五百零三名。袁世凯委梁士诒送颂词到会。

依《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是日——正式国会成立日——临时参议院宣告解散。

4月11日　袁世凯以其御用报纸《国报》刊载诬陷黄兴、柏文蔚、李烈钧造反消息，是日故作震惊，佯指该报"情词荒诞，任意造谣，淆惑众听"，令内务部"饬查根究，以靖人心"。

4月13日　午前10时许，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假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到会者约三万人。是日黄兴因病未出席，追悼会由陈其美代为主持。会上发言致悼者有居正、徐血儿、吴玉章、于右任、沈缦云、伍廷芳、马君武、王玉树、陈国权、黄膺白等三十余人。追悼会至午后5时许结束。17日，该交通部复于南市新舞台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到者五千余人。

4月14日　袁世凯据黎元洪9日电，以"潜谋内乱罪"下令通缉湖北革命将校季雨霖、熊炳坤、曾尚武、容景芳。著就地"组织军法会审"，将季等"先行褫职，归案查办"。按前此袁世凯曾密电黎元洪，谓将派兵南下，假道武汉，以扑灭长江一带革命势力。季、熊等闻讯，遂谋以兵力迫黎去电反对。与此同时，曾尚武等密设"改进团"于汉口，图谋举事。讵料此二事均为黎所侦知，乃将二事合为一案，行"一网打尽"之计。改进团机关旋遭破坏，熊等闻风先逃。黎乃有9日致袁之电，请其通饬各省，"悬赏缉拿"。

4月15日　前镇江都督、克复南京首功之林述庆，8日在北京将校俱乐部赴梁士诒宴，归即病。医治罔效。是日夜12时身死。弥留时七窍流血，遍体皆黑。

4月16日　汕头国民党机关报《大风日报》发表题为《万恶政府》之时论，历数袁世凯政府结党营私、丧权辱国、排除异己、杀戮党人之种种罪恶。指出："桀纣之世无此横暴，共和之政府甚于黑暗野蛮之专制。"

4月17日　上海《中华民报》再发表题为《讨逆》社论，其中列举袁世凯十大逆迹，呼吁全国人民"诛奸讨逆"，"勿任彼逆贼断送共和"。

4月18日　由国事维持会发起组织之宪法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举孙毓筠为会长，汤化龙、黄为基为副会长。

4月20日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共和党本部开联合会，初步议定三党合并，取名进步党，并议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那彦图、汤化龙、王赓（即王揖唐）为理事。后经5月11日再次开会磋商，至5月29日三党始正式合并为进步党。

4月21日　英在片马增兵，且拟于该处开筑军用铁路。是日北京政府分电四川、云南二督，令"从实调查"。

4月24日　刺杀宋教仁之凶犯武士英暴死狱中。

4月25日　参议院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

4月26日　宋案主要证据公布后，是日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各省议会、政团、报馆，请"严究主凶，同伸公愤"。

赵秉钧、周学熙、陆徵祥在北京汇丰银行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金额二千五百万英镑之"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按此项借款未经国会讨论通过即擅行签字。

4月28日　湖北省议会电北京政府，反对善后大借款。内称此举"显系藐视立法机关、违背民法"、"丧失主权"，"继难承认"。同日并电参议院，请"死力抵抗，勿稍退步"。继之，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安徽、奉天、江苏、吉林、云南、陕西、甘肃、广西、福建、河南、贵州等省议会亦均通电反对。

4月29日　参议院以善后大借款未经该院通过，"与《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显相违反"，议决无效，并将议决结果通知袁世凯。

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电中指斥此项借款"不交国会议决，遽然签字，蔑视国会，违悖约法，丧失主权"，实为"灭国亡种借债"。要求袁世凯"速罢此议"。

5月1日　黄兴就4月28日国务院、周学熙分别通电为违法借款进行诡辩事，再次通电指斥政府"玩国民于

股掌，视议会如寇雠”，并严诘：“倘以此激动民心，酿成巨变，责将谁负？”6日，财政部再就此通电进行反扑。

5月4日　省议会联合会经全体在津代表议决，是日由天津迁往上海。

国民党员、工商总长刘揆一，借调和党争为名，集国民、进步两党党员三十余人组织相友会，是日在北京开成立会。刘自任会长，副会长陈黼辰，骨干人物有孙钟、黄赞元、张国裕等。

5月5日　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联名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电中指出：“海内外烈士前仆后继，躬冒万死，缔兹民国，而政府甘以断送于借款之下。”要求袁世凯“立罢前议”；并吁请各方“协力抗争，毋使民国因借款而亡”。

众议院开会，以政府违法借款，决定将政府送达该院有关大借款之咨文退回，以示否认。6日，进步党议员出而阻挠，设法将此项决议推翻。7日再付表决。该党议员竟中途退席，使众议院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表决，以至咨文未能退回。8日，参议院于表决退回该项咨文时，亦因进步党议员阻挠而无结果。10日、12日再付表决。该党议员复中途退席，使参议院亦未能将该项咨文退回政府。

5月6日　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秘密会，为发动内战进行军事部署。其第一期总方略为：“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京汉方面，对于湘、赣、皖取攻击目标”，以北洋第六师一部驻武汉三镇，为攻赣主力，河南第一师、毅军赵倜部、北洋第二师为预备队，另将倪嗣冲部及雷震春禁卫军一部集中河南郾城，以贾鲁河为补给线。并将黎天才第一师一部及雷震春禁卫军一部调驻湖北荆州（今江陵）、新沟、蔡甸（今汉阳县）一带，借以防湘。“津浦方面，对于苏宁取攻击目标”，以北洋第五师及张勋部为主力，北洋第四师为预备队，以徐宝山部“为扰乱苏宁内部之牵制队”。此外，并拟将预备征蒙之何宗莲部经海路调粤，将福建驻军一部调沪，“如不可恃，则以驻西陵、南苑、定州等处第三师之一部充之。”8日，大阪《每日新闻》将此阴谋部署予以披露。

5月8日　国务院将袁世凯令电达黎元洪、各省都督、民政长及省议会。令中恶毒攻击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四都督反对政府违法借款之通电为“捏词耸听，淆乱人心”，“雌黄信口”，“自污国体”。

5月9日　国务院将袁世凯令电达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令中又以上海十九商业团体不满关于宋案、借款之“争议”，祈“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借口，命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官，“遇有开会聚众，散布浮言、潜谋内乱者，立予查拿惩办”。

5月12日　北京《国风日报》刊载《忠告政府与军警同胞》一文。京师警察厅加该报以“煽惑军警，妨害治安”罪，于当日午后6时派军警宪兵百余名包围报馆，并将该报协理裴梓青、编辑郭究竟及社员二人逮捕，交检察厅审讯。次日，《国风日报》出白版四页以示抗议，仅于头版以头号大字刊登广告一则，文曰：“本报昨因军警干涉，自昼达暮声势汹汹。拘去协理及编辑人。扰攘竟日，不获事事。空白三页，阅者谅之。”19日，该报再出白版二页，头版内载《本报暂行停刊痛启》，宣告自即日起被迫停刊。

5月13日　湖南公民团在长沙开成立会，到万余人。会上就宋案、借款事通过决议五条。其主要内容为：“宋案一日不了，袁世凯一日不能行使总统职权，我湖南应不受中央命令，暂时脱离关系；违法借约一日不取消，湖南应停止中央解款，宣告永不负该款之义务”；“宋案如中央政府不允组织特别法院，应由本团联络各省公民共同组织”。

5月15日　袁世凯以黄兴“迭经辞职”为借口，著陆军部撤销其陆军上将衔，并令“勿庸发给补官证书”。

5月17日　总统府秘书厅奉袁世凯令，将各地赞成及否认大借款之来电逐一汇集，“以征舆论”。计自4月26日大借款签字之日起，至是日止，共收来电二百八十四件，其中赞成者一百零五件，否认者一百七十九件。

5月18日　众议院议员邹鲁、李肇甫、伍汉持等十八人，以宋案主谋犯赵秉钧抗拒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久不到案，是日向赵提出书面质问。

5月21日　袁世凯令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传语国民党人，谓：“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当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即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5月22日　上海地方检察厅电促北京地方检察厅，速提宋案主谋犯赵秉钧及其秘书程经世归案。

5月23日　黎元洪串通驻汉口法领事，强行限制在法租界发行之汉口《民国日报》言论自由。26日，该报遣社员二人往晤法领事，为持论谴责政府据理进行申述，要求法租界当局勿加干涉。当场遭该领事恶言拒绝。《民国日报》乃决定移往华界发行，而社址则仍在法界。

5月24日　晨7时许，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于宅内被炸身死。30日，袁世凯依段祺瑞所请，准将该军改编为江苏陆军第四师，并任徐弟宝珍为该师师长。

5月26日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据周予儆诬供，以天津《民意报》主任赵铁桥为血光党副会长，是日派军警前往围捕。赵适外出，得免。军警竟将该报馆全部捣毁。《民意报》被迫停刊。

5月28日　陈家鼎等集国民、进步两党议员数十人

组成癸丑同志会。举刘公为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陈家鼎任政务部长。

5月29日　凌晨2时零5分，中华民国工党领袖徐企文手持书有“中华民国国民军”之白色旗帜，率七八十人攻上海江南制造局。因28日夜9时陈其美即将徐等谋攻制造局一事以电话密告该局督理陈逋，故局中已严密设防。旋被击退。徐等二人被捕，死难数人，余均逃散。次日袁世凯下令悬赏缉拿为首诸人，并饬“严究党羽，尽法惩治”。6月3日，举事重要成员柳人环及其余十二人在江西被捕。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经多次宣布合并，是日正式合并为进步党。

5月30日　据是日汕头《大风日报》揭露：北京政府近日准备内战不遗余力。陆军部除已密令北洋制造局、福建造船局、德州制造局、汉阳兵工厂赶造枪炮运京外，并向德国克虏伯炮厂订购野炮十八门、八十八年式快枪五万支、大小子弹四百万发；另向奥国波的辉厂订购九十五年式曼利瑟枪一万四千支，定期三月内交货。

晨，京畿军政执法处派军警百余名搜查北京《国光新闻》社，肆行骚扰，后无所获离去。该报被迫停刊三日。

5月31日　北京地方检察厅据周予儆之诬供，借口黄兴“组织暗杀团，谋炸要人”，特将该“案”移上海地方检察厅，由上海交涉使陈贻范转饬会审公廨“审理”。公廨立出传票，发交捕房，派探往传。领事团以该案“既无切实证据，原告又不到沪质讯，与租界定章不符”，遂令总巡捕房于6月5日将传票退还公廨。

6月1日　凌晨4时许，白朗军攻河南唐河县，架梯入城，与驻军战。旋据县署，焚案卷，缴枪枝。迅即主动撤离。

6月2日　袁世凯鉴于北京大学学潮，深恐波及全国各校，是日特发命令一道，内称：“考察京外各学校，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者绝不相同。……学生在校最重服从，讵可任其嚣张，败坏规则？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主。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以示惩儆。”同日，并令教育部将北大预科“滋事学生严切查办，毋稍宽假”。

6月3日　章炳麟离京赴东三省筹边使任。及至吉林，始知筹边使一职乃无任所之虚衔，遂转道上海。19日，电袁世凯辞职。内称“炳麟从政以来，除奸无效，从昏不能。宋教仁无故被戕，大借款损失过巨，炳麟岂不知其奸宄，但以司法不可妄参，国命不可自蹙，故隐忍不言耳。……即日辞差，冀遂初志。恳乞将东三省筹边使开去，死生之分，一听尊裁”。

6月4日　湖南境内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交通部派员前往清理湘路公司帐目。

北京政府聘英人李佳特为盐税顾问，是日离伦敦前来中国。

6月6日　教育部代总长董鸿祎为防止学潮继续扩大，是日再令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即将现时在校之预科学生暂行解散。俟暑假后开学时，除已被斥退之八人外，凡现经请假出校诸生均准回校”。

6月7日　众议院议员叶夏声致电上海《民立报》转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谓：“国会成立，选举总统自应由国会制定宪法，依法选举。乃各省少数无识之徒，不知受何人运动，遂尔迫不及待，任意通电，指名推举，……属望一人。争相拥戴，何异黄袍加身！”“尚望力为劝诫，勿任嚣嚣，以靖人心，而息邪说。”

6月8日　南京私立民国政法大学全体学生一千余人，因要求省议会准将该校改为官立，遭校方阻挠破坏，是日举行罢课。17日，江苏省议会将该校改官立案否决。午刻散会，学生拥至议长室据理力争。在场议员竟呼警察逮捕学生十一人，解送警厅拘留。

6月14日　袁世凯任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同日，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并任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16日，胡汉民电袁世凯，告以“一俟部电指授即行就道”。17日，胡再电袁，内称“汉民久居外洋，素昧藏事，若往宣抚，既虑言语之鲜通，尤恐感情之暌隔，贻误边疆关系匪浅，敢请收回成命”。事遂作罢。

6月17日　共和党日前宣布脱离进步党。是日午后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重振党务方法及以后政策”。

6月20日　孙中山自上海抵香港。23日，对报界发表有关筹筑全国铁路之谈话。26日，应陈炯明电请，偕胡汉民离香港返抵广州。

6月21日　袁世凯发布命令，为其阴谋发动内战制造反革命舆论。令中描述当时之形势为：“党见分歧，是非淆杂，用人掣肘，政府几空，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并谓“冀彼隳突叫嚣者内省良知，自崖而返”，勿“误会共和真理，借美名以逞其恶焰，假公义以便其私图”。令末复云：“本大总统以隐恶扬善为怀。毋我薄人，宁人薄我。尤愿我军人服从命令，勿得逾越范围，其非分之事慎勿干涉，致淆政体；并愿提倡改革之先觉爱惜名誉，诰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

6月22日　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

6月23日　袁世凯密遣孙宝琦、李盛铎赴日。7月2日抵东京。此行明为考察日本经济，实在诋毁孙中山、黄兴及其领导之国民党，为袁世凯即将发动内战开脱罪责，并设法阻挠日本急进派协助南方反袁势力与袁为敌。二次革命起，孙、李于7月19日离日返国。

6月26日　宋教仁葬于上海。送葬者达数万人。谭人凤、王宠惠、居正、胡瑛、王燮、沈懋昭、陈国权、章炳麟、唐元湛、杨开甲等均参加葬礼。

午后，黎元洪遣军警会同德捕，在汉口德租界捕获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当经德捕房收押。7月5日，驻汉口德领事应黎元洪之请，将宁、熊引渡。黎旋将二人交军法课审讯。8月4日，国务院转达袁世凯令，著黎将宁调元、熊樾山"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8月27日，宁、熊被判死刑。9月22日，在武昌被害。

6月29日　江苏省教育会开会，举张謇、黄炎培为正副会长。

6月30日　袁世凯免柏文蔚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改以陕甘筹边使虚衔委之。同日，任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

参众两院开宪法会议，共选出宪法起草委员六十名，两院各半，联合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其中国民党三十三人，进步党十九人，共和党七人，超然社一人。

7月5日　奉黎元洪令，李纯所部第六师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开赴九江，6日抵达。江西护军使欧阳武急分电北京国务院及黎元洪，痛陈李部进驻九江之不可，内称："万一因误会而生冲突，因冲突而启衅端，不独九江一隅难免糜烂，诚恐牵动全局，患不胜言，武实不能任此重咎，"要求"迅速调退北兵"。同日并电袁世凯辞职。

7月8日　李烈钧自上海潜抵江西湖口，约会九、十两团密谋举事，并调集辎重、工程两营分扼要隘，同时勒令各炮台司令交出炮台。

众议院开秘密会，通过5月20日中俄双方就外蒙问题达成之协议六款。

7月9日　李纯率步兵一团、骑兵百余名、机关枪一连并携山炮六门进驻九江南门外十里铺。10日，欧阳武再急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并径电黎元洪，要求将李纯所部"即日调回"。

7月12日　李烈钧于湖口得林虎旅与李纯所部袁军开战消息，即时召集会议，决议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

7月13日　江西省议会开特别大会，本各界人民公意，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同日将选举结果通电各省，并宣告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

7月15日　午后1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等人迫促下，发出通告，宣布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应德闳、黄兴旋将江苏独立事联名电告各方。另，坚决反对独立之江苏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及要塞掩护团教练程凤章等，均于宣布独立前被起义士兵处死。

黄兴于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后，即日誓师，通电讨袁。16日午前，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黄兴任章士钊为秘书长。

柏文蔚在南京被举为临淮关总司令。

驻芜湖安徽第二旅旅长龚振鹏发布讨袁世凯檄文，文中历陈其十大罪状，请"与天下共弃之"。

袁世凯加李烈钧"背叛民国，破坏共和"罪名，下令褫夺其陆军中将并上将衔，著欧阳武、李纯"设法拿办"。

7月16日　黄兴、柏文蔚等在南京开军事会议，会间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岑于18日自上海抵南京，19日就大元帅职。22日，省议会联合会开会，补行正式选举程序。十八省代表一致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并规定"凡各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会后，省议会联合会备文咨达岑氏，告以"即照临时约法临时总统职权行使"。随咨并授以"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之印"一颗。

7月17日　安徽宣布独立。时柏文蔚尚在南京，众举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并举第一师师长胡万泰暂行代理都督，孙多森仍任民政长。21日，胡、孙先后离省，由宪兵司令祁耿寰暂摄都督事。后复举刘国栋代之。27日，柏文蔚携胡万泰自南京抵省，旋就安徽都督职，并组织讨袁军。

7月18日　晨，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吴淞炮台同时响应。早9时，陈其美、钮永建、李平书及上海各团体代表在市政厅开会，商讨组织讨袁军、保卫地方秩序及敦促驻制造局之袁军归附等事。

7月19日　福建都督孙道仁在驻福建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迫促下，通电宣布该省独立。孙仍任都督，许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23日，许崇智发表出师通电。电中历数袁世凯蹂躏民国、破坏共和、帝制自为之罪，呼吁各方戮力同心，共举义师。

7月22日　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一切荣典、军职。随后复下令一道，加黄兴以种种罪名，并诬指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等反袁活动为"明目张胆，倒行逆施"。"著冯国璋、张勋迅行剿办叛兵，一面悬赏缉拿逆首"。

7月26日　袁世凯发布命令，内称："陈炯明祸国祸乡，竟敢通电各省，措词狂悖，罪不容诛。应即褫去广东都督职官，并撤销陆军中将暨上将衔。著龙济光督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拿办。"同日任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龙觐光为副使。

7月28日　晚，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以战事失利，弃南京潜往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随即通电宣告南京取消独立，并委杜淮川代理第一师师长，"先行赴宁，料理一切"。

8月9日　江西宣布独立后，被举为该省都督之欧阳武、省长贺国昌，见袁军节节进逼，讨袁军处境日劣，是

日离南昌潜往吉安。10日夜，李烈钧率队抵南昌。

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福建取消独立。14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及各部总长，报告福建取消独立及一切复旧事。电中有"幸赖大总统厚福，一气呵成"等语。

8月10日　袁世凯据黎元洪所请，准"将居正、胡秉柯、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按照内乱罪犯，咨院革除议员名籍；其得有勋位、军职者，一律褫夺，按律拿办"。

袁世凯加谭人凤、程潜、陈强、程子楷、唐蟒以"谋叛民国"、"甘心叛逆"罪名，下令撤销谭人凤长江巡阅使，褫夺程潜等人军职，著湖南都督谭延闿饬所部"严拏惩办"，并著各省都督、民政长"一体严缉"。

8月14日　张勋军陷镇江。张勋抵瓜州设营。

午后2时半，香港英总督宣布：奉英政府训令，永远不准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胡汉民、岑春煊到港。

章炳麟自上海抵北京，住共和党本部。袁世凯令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派密探予以监视。继被袁先后软禁于北京军事学校、外城西南之龙泉寺、东城本司胡同及钱粮胡同等处，为时将近三年。直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章始恢复自由。

8月16日　湖南省议会于7月29日致电参众两院及各省议会，请"由各省通电取消参众两院"。后该电被汉口电报局截留，呈报袁世凯。是日袁加湖南省议会以"攘夺国会权限，违背约法"罪，著湖南都督谭延闿立将该省议会解散。

8月17日　广东新会东北之天河、周郡两围基决口，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至22日，水势继涨至九尺有奇。临近各地均遭波及。居民病饿淹毙者为数极众。

8月22日　凌晨3时，熊希龄自热河抵京。27日，正式受任国民总理职。

驻法、德、比、俄公使胡惟德、颜惠庆、王广圻、刘镜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北京外交部、参众两院，请"速先订定选举法，举定总统后再订宪法"。

9月1日　冯国璋军火烧下关。烈焰三日不熄。大观楼至靖海寺，悉付之一炬。下关房屋十焚八九，居民无处栖身。

张勋军攻陷南京后，狂肆屠戮，至杀日本侨民三人。此即所谓"南京事件"。由此构成是月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之第三借口。

9月4日　袁世凯准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辞职，令各部次长暂行代理部务。

袁世凯任鲍贵卿为大通芜湖镇守使。

9月5日　众议院议决先定总统选举法及其权限，于选举总统后再定其余宪法。6日，将此议案咨达参议院。8日，参议院议决通过。

段芝贵返抵北京。

9月6日　袁世凯免江苏民政长应德闳职，以韩国钧继任。

9月11日　袁世凯任命熊希龄内阁各部总长：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工商兼农林张謇；交通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兼。

9月12日　午后1时，参众两院首次联合开会。决议咨请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五日内将宪法中有关选举总统之必要部分从速拟定，再交两院决议。

9月23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复举张耀曾、汪荣宝、黄云鹏、孙钟、李庆芳等五人为宪法条文起草委员。

9月26日　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通过《宪法会议规则》共五十八条。

9月27日　袁世凯公布《议院法》共十九章九十四条。

9月28日　袁世凯准云南都督蔡锷病假三月，令"来京调养"。云南都督一职由贵州都督唐继尧署理。唐未到任前著谢汝翼护理。

袁世凯任赵倜为河南护军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9月29日　袁世凯准黎元洪辞"兼领江西都督事"，并令李纯署理该职。

10月6日　国会选举总统。两院议员出席者七百零三人。选前，袁世凯授意其亲信组成公民团包围会场，胁迫议员举袁为总统。自早8时至晚10时，经三次投票，袁世凯始以五百零七票当选。

10月7日　国会选举副总统。两院议员出席者七百十九人。黎元洪以六百十一票当选。

10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就正式总统职。同日黎元洪在湖北都督府就正式副总统职。

10月24日　袁世凯令湖南都督谭延闿、湖南查办使郭人漳"均来京另候任用"。同日令汤芗铭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并于湖南民政长王瑚未到任前暂行兼理民政长职。

袁世凯令将阿拉善旗、鄂尔多斯旗及伊克昭盟所属之乌审、鄂托克二旗均划归宁夏将军节制。

10月25日　袁世凯以宪法草案中于己不利之条文甚多，而派往宪法会议干涉制宪之各员亦遭拒绝，是日特通电各省军政官员，授意群起反对宪法草案。

10月27日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历诉财政困窘之情形六端，并吁请各省将应征之入款，"于谋自给而外，应悉数缴于中央"，以救财政之危机。

11月3日　袁世凯公布《国籍法施行规则》，共十五条。其中规定有关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出籍、复籍等细则。

11月4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该党国

会议员之证书、徽章。令称："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搆煽，李烈钧、黄兴等乃敢于据地称兵。"

11月8日　北京内务部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告以自各省奉袁世凯令解散国民党支、分部后，"如遇有意存煽惑，登载报纸或印刷品，或散布传单，是即以乱党自居。……应即严饬各地方官吏、警察厅署，一律严加取缔，并就近如照该地邮局不准递送"。

11月9日　黎元洪以"定孔教为国教"一议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是日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民政长，内称："祀孔配天实为国家万年根本至计，"请袁"于宪法未定以前，通令京内外各学校，……每届上学、放假期前，一律设立崇祠，俾昭宗尚，而树风声"。

11月10日　国务院电令各省："务于本年内按照《文官惩戒法草案》组织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

署广东民政长李开侁　令警察厅将广州《中国报》、《震旦报》、《国民报》、《粤东公报》、《民国报》、《民生报》等六种国民党报纸一律封禁，并拘捕各报主笔。

11月11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会中二十八名国民党员已被袁世凯取消议员资格，另有数人辞职，以致无法开会，是日被迫宣告解散。

12月1日　午后1时，参众两院剩余议员三百余人开谈话会，由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主持。会间宣读前此公推丁世峰、黄云鹏二人就非法取消国民党议员问题所拟之质问袁政府书。与会议员一致签名赞成。

袁世凯任章宗祥为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12月9日　晚，黎元洪被袁世凯迫调离汉。11日晨抵京。

袁世凯任刘玉麟为驻英公使，陆宗舆为驻日公使，唐在复为驻荷公使，高而谦为驻意公使，沈瑞麟为驻奥公使。

12月10日　袁世凯令段祺瑞"暂兼代领湖北都督事"。

12月13日　袁世凯再令"严禁军警入党"。

亡清光绪帝、后入葬崇陵。袁世凯特派赵秉钧、梁启超、梁士诒、朱启钤、荫昌、昆源、陆建章、马龙标前往"敬谨致祭"。国务院事先通电各省，是日"一律下半旗致悼"。教育部并通告京中各校均停课一日。

12月14日　袁世凯任张国淦为政治会议副议长，顾鳌为政治会议秘书长。

12月15日　午前10时，袁世凯于总统府居仁堂召见政治会议委员，并致"训词"。午后3时，于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政治会议开会式。全体委员八十人中到会六十九人。

12月22日　袁世凯再以16日黎元洪等电呈为题，借口"增修约法为当务之急"，而"国会现状一时断难集议"，特向政治会议咨询"增修约法程序"，令与前此咨询之"救国大计""并案讨论办法，分别具覆"。

袁世凯公布《修正各部官制通则》并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商、交通等部官制及国务院秘书厅官制。

12月23日　国务总理熊希龄强词驳复众议院议员邓毓怡等一百九十四人及参议院议员张其密等六十一人先后就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及取消国民党议员问题提出之质问书。内称："质问权之行使，……虽不必经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兹来咨即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则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胡此项质问书"应认为非法，无答复之义务"。

12月29日　午后1时，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于是月18日及22日先后提交之"救国大计咨询案"及"增修约法程序咨询案"。与会各员均以两案关系重大，应先派员审查，然后议决。当由议长指定蔡锷、孙毓筠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并由蔡锷任审查长。定于次年1月2、6两日开审查会。

袁世凯据署湖南都督汤芗铭电请，是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及各地方官转饬所属，严拿二次革命时赞助讨袁之湖南人士周震鳞等四十三人。

12月30日　袁世凯据兼代领福建都督刘冠雄电呈"福建财政困难，请裁去都督以节经费"，是日下令"福建都督缺著即裁撤，交镇守使接管"；"刘冠雄俟经手事件清理完竣，回京供职"；原福建都督孙道仁"留京任用"。

外　交

1月4日　俄政府就陆徵祥1912年12月17日　所提关于外蒙问题修改条件六款，再提出五点反建议。

美帝国主义分子丁义华等在北京组织中美国民同盟会，佯称以"增进中美两国国民睦谊，互换智识利益，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是日开成立会，举孙中山、罗斯福为正会长，丁义华、丁韪良、吴景濂、金鼎勋为副会长。

1月10日　俄籍间谍佐治野夫代表西藏达赖喇嘛与库伦当局私订《蒙藏条约》。条约共九款，其要者为："西藏达赖喇嘛承认蒙古之自治权及……黄教首领活佛独立之宣言，""蒙古政府承认西藏之自治权与宗教首领达赖喇嘛之独立；""两国政府于内忧外患危险之际永久互相援助，""两方贸易自由，并互设新商业机关。"

1月11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代表北京政府再就4日俄方所提关于外蒙问题修改条件，提出五点反建议。

1月19日　财政总长周学熙致函六国银行团代表

熙礼尔，告以"现在本国用款万分急迫，如垫款不能克期交付，……自本日起，本总长有自由借款之权"。

2月10日　外交部于1912年12月23日曾就西藏问题正式照复英使朱尔典，迄未得英方回复。是日外交部奉袁世凯指令再次照会英使，询问英政府对西藏问题之意向。17日，英使往见外交总长陆徵祥，佯称英政府嗣后对于藏务严守中立；北京政府如再派兵入藏，英国决不干预。旋即提出请允英政府修筑自印度直达西藏铁路之要求。陆未应。

2月14日　驻乌鲁木齐俄领照会北京政府陆军部，谓中国与俄国停兵议约之际，中国军队不得进兵科布多。当经陆军部将此照电达新疆都督杨增新。杨于17日分别照复驻乌鲁木齐及科布多俄领，告以"库伦及科布多蒙兵意图西窜阿尔泰山一带，本都督及中国带兵官……有防守阿尔泰责任"。"现在新疆兵队驻防察罕通古、布尔根河一带，原系为防守阿尔泰山起见，并无进取科城之事"。

2月16日　俄政府与库伦当局密订《俄蒙旅协定》。其中规定：俄政府为库伦当局装备一旅。包括二骑兵团、一机枪队及拥有一千九百名士兵之炮队。该旅教官均由俄军官充任。并规定库伦当局应交俄政府三十五万卢布，充作组织该旅之全部费用。3月10日陆徵祥就此事诘问驻京俄使："俄政府何故以武力助外蒙及售与军火？"俄使竟谓："俄以武力助蒙载在协约，此次经俄皇允许，系属当然之事。……至借款购办枪械，亦自应有之事。"

2月18日　北京政府因俄政府擅将中俄合办之库伦华俄道胜银行改为俄蒙银行，是日授权外交总长陆徵祥向俄使库朋斯齐提出质问。

2月25日　俄哥萨克马队五百名、炮队一营，携机关炮三尊、炮弹二百箱进驻哈尔滨。

2月28日　云南都督蔡锷因英兵二百余并测绘人员四十余擅入我国云南腾越（今腾冲）地区肆行勘测，是日遣员与英领交涉。其后复交涉多次，英领均置之不理。

3月3日　驻京公使团就六国银行团监督大借款之人员问题达成协议，并将此议通告北京政府。要求盐税稽核处聘英人为主办，德人为副办；国债局聘德人为总办；审计处聘俄、法各一人为顾问。北京政府以此议于借款谈判时未曾提及为由，加以拒绝。

3月5日　俄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对北京政府在中国境内东三省、新疆等地调兵设防、购置军械等事横加干涉，并威胁云："设中国政府不及早设法阻止，则将来俄国同等办理，双方均无利益。"3月10日继续开会，陆徵祥对俄使干涉中国内政这蛮横举动未敢予以严辞驳斥，仅谓："黑龙江添兵不过二千余人，购买军火并无其事。"

3月11日　驻乌鲁木齐俄领照会新疆都督杨增新，无理阻挠新疆军队驻防萨克赛河。照中威胁云："兹奉本国外务部令，饬向贵都督谆切说明，中国军队万不可逾越阿尔泰山之北。如果贵国军队调往萨克赛河，我国自有对待之法。其阿尔泰及沙拉苏美等处，难免我国不发军队占踞。"杨接得此照后，于12日急电袁世凯，请"饬外交部严重交涉"。

3月17日　日本政府以辽东半岛租期将满，要求展期二十年。是日驻日公使汪大燮将此事急电北京外交部请示办法。

德使哈豪森照会北京外交部，谓两国政府前曾有约合资修筑胶沂铁路（今山东胶县至临沂），今中国无力兴修，德国当实行约中所订下述二条：一、独资修筑胶沂路；二、该路附近三十里内之矿产德商得自由采之。陆徵祥当即照复德使，告以此项条约应在修改之列。

3月18日　美总统威尔逊发表宣言，声明美国政府不再委托美国财团参加六国银行团对中国之借款。19日，美国财团正式通知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及北京政府，声明退出六国银行团。

3月26日　驻北京日使伊集院彦吉访陆徵祥，称奉日政府令，要求详订东三省地方条约，并面交日方草拟条约六款："一、黑龙江一带为中日公认商民同利之航路，不准他国同沾利益；二、东省地方办理新政及垦务须向日本借款；三、沿南满铁路线内及由长春至大连租界内所管地，须永远租借；四、限制南满中国军队；五、日人在奉游学及游历须切实保护；六、宽甸、怀仁（今桓仁——编者）、通化、临江四县内二十余处矿产归日人开采。"

3月29日　俄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无理干涉北京政府在中国边省添兵布防，并威胁云："本国对于此事异常郑重，中国果有征蒙之举动，本国便不能不视之为两国之争端。且贵国边界军队不啻公然预备战事。本大臣敢断言，本国政府不能不有相当之预备也。"

北京外交部接库伦电称，若中国政府欲库伦解除《俄蒙协约》，须履行下述条件：一、库伦政府永久保存；二、中国不遣官吏干涉蒙事；三、中库各遣代表订立专约；四、双方军队自行撤回；五、中国政府不得阻止库伦向外国借款；六、库伦政府自行委任蒙官，中国政府不得干预。

4月7日　驻北京德使哈豪森自3月17日向外交部提出准德国独资修筑胶沂路等无理要求遭拒扣，继又强行要求四事：一、德国在山东得修筑四处铁路；二、中德合资开采胶州矿产；三、中国不拘何地均应准德人自由航行；四、德侨在中国内地得自由营业。后经国务会议否决。是日外交部以"有损国权，碍难照准"复之。

4月8日　巴西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此为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始。9日，国务院、教育部分别通告各官署、学校，于12日悬中巴两国国旗志庆；各校并放假一日。

日军三百余名借口保护日商，强行进驻延吉。

4月9日　秘鲁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4月11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就买卖城（今阿尔丹布拉克）华商屡遭俄人驱逐事照会驻华俄使库朋斯齐，谓此举实有背于1860年11月14日所订之中俄《北京续增条约》，要求从速制止。

4月29日　晚，外交部照会驻北京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告以中国政府承认担负大借款之完全责任，将来政府递嬗亦无变更。

4月驻北京英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英政府愿将片马归予中国，条件如下：一、扬子江流域不得对他国开放租界；二、准英国于内地开一特别通商巨埠；三、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永归英人充任。是月中旬，陆徵祥对上述条件答复四点：一、扬子江为我国领土，无论如何不得侵占；二、开放内地各口岸做为商埠，须俟交还片马始发生效力；三、聘用税司权自我操，无订立条约之必要；四、如六个月内不将片马交还，惟有请各国公论。

4月　驻北京俄使库朋斯齐照会外交部，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请许俄人在黑龙江有开矿专权；二、居住哈尔滨之华人须纳捐于俄工部局；三、中国军队调往外蒙或通过哈尔滨，须先期咨照俄官；四、凡华人欲搭俄船，亦须咨照俄官领取执照。"

5月2日　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墨西哥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5月3日　伦敦各主要报纸遍载孙中山《致各友邦书》。书中呼吁各友好政府与人民，设法阻止北京政府与五国银行团之善后大借款，并亟言此项借款将导致中国之内乱。

5月7日　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密函驻京俄使库朋斯齐，令向北京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其按《俄蒙条约》原则与俄政府就外蒙问题达成协议。函中并令俄使照会北京政府："如坚持拖延与俄国达成关于外蒙问题之协议，并继续在蒙古王公中煽动反俄，则俄国将与蒙古政府建立新关系，彼时将于全然不同之基础上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北京外交部照会英使朱尔典，提议修改1911年中英缔结之《禁烟条件》。

5月9日　俄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催促协定中国在东三省驻兵数目，并进而威胁云："本国陆军部拟派二师团至满洲，本大臣深不愿此举见诸实行。"

5月14日　俄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再次催促协定中国在东三省驻兵数目，并进而无理要求"此事至少贵国必须有一公文载明现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驻兵实数，并须担任以后有增添军队，按照条约知照俄国政府。至现在查阅实数，须有一俄国武备随员会同中国官员办理"。

5月20日　中俄双方于北京就外蒙问题初步达成协议六款。该协议于26日经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28日咨交众议院。30日，众议院开秘密会，由陆徵祥就协议条文进行说明。6月3日，参议院开秘密会，段祺瑞、陆徵祥均出席，会间陆就协议条文再度进行说明。

俄使库朋斯齐于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上，复催询东三省驻兵数目。陆徵祥答以"中国驻兵数目以能敷剿平胡匪之用为标准"，并拒绝俄武员之查阅。

5月27日　袁世凯任驻德兼驻丹麦公使颜惠庆为全权代表，前往荷兰海牙出席万国禁烟会议。

6月25日　驻北京俄使库朋斯齐照会外交部，就齐齐哈尔及海参威边界附近三夹口地方官员先后拘捕以记者身份为掩护之俄间谍，以及张家口附近驻军检查自库伦发出之俄邮件，并禁阻化装俄商之间谍取道该地赴库伦等事，无理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惩办。

7月13日　俄政府得知北京参议院将5月20日中俄双方就外蒙问题所达成之协议六款否决，正中其意。是日训令俄使库朋斯齐照会北京外交部，竟谓"此次协约之条款，若实行办理，恐两方面按照各条致多误会，故本国政府将末次所拟更改之字句，不能不推翻否认"。随即提出关于外蒙问题四项新条款。

8月5日　北京公使团开会，议决对南方讨袁军"不认其为革命性质"，仍认袁世凯政府公文为有效。并应北京外交部所请，相约各国"严守中立"，如有破坏成议、暗助讨袁军者者，即"按照国际公法，背约罚办"。"严守中立"之议甫定，旋又通过决议一项：为便于袁政府搜捕革命党人，"凡华人之旅居北京租界内旅馆者，须逐一严诘"；其与讨袁军通声气者，"即行逐出"。会后并将此决定通示各国驻天津、汉口各领事署，饬"一律照办"。

9月1日　西藏宣抚使陈贻范离京赴印度，与英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会商藏事。

9月9日　日本政府就兖州、汉口、南京三事件特开阁议，训令驻京日使山座圆次郎向北京政府正式交涉。10日，山座面晤袁世凯，就上述三事提出口头抗议。11日，再照会北京外交部，要求惩凶、赔款、严惩肇事有关人员；北京政府公开向日政府道歉；张勋须亲赴南京日领事馆道歉；行凶之军队须至日领事馆前行举枪礼以示惩戒。13日，北京政府照复日方，所提条件"一律承认"。17日，在南京日领监视下，将两名张勋军人处死，九十四名被判监禁两月，营长被判监禁十年，该营其余各官一律免职。同日北京外交部派代表前往日使馆，向日本政府递交道歉书。28日早9时，张勋亲赴南京日领事馆谢罪。午后3时，陆军中将白宝山奉张勋令，率队九百名至日领事馆前，行举枪礼三次。北京政府并认可赔款六十四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元。

9月18日　中俄双方磋商外蒙问题会议在北京复会。此次复会中国方面代表为外交总长孙宝琦，俄国方面代表仍为俄使库朋斯齐。会间，孙宝琦要求仍就5月20日双方初步达成之协议六款进行协商，俄使不允。

9月20日　驻京英使朱尔典曾于是年3月间偕同英属波罗岛总督至北京外交部"声请召北省农户数百家前往波罗岛试行垦殖"。后几经磋商，双方议定招垦条款十三条及章程十一条。经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公决允行，并派谢天保充任驻波罗岛华民垦殖监理员。9月中旬，外交总长孙宝琦将此事经过各情及所订条款、章程呈报袁世凯。袁于是日批准照行。

10月1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日本递信省签订《中日铁路联络条约》，共六条。

10月5日　袁世凯为求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之承认，授意外交总长孙宝琦与驻京日使山座园次郎秘密交换名为《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之文书。其中约定北京政府借用日资修筑四平至洮南、开源至海龙、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海龙至吉林五铁路。亦即将此满蒙五路之修筑权让与日本。

10月6日　驻北京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俄国、丹麦、法国、葡萄牙、日本、荷兰、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十三国公使于接得袁世凯当选总统之正式通知后，同时照会北京外交部，称"奉本国政府训令，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10月13日　中、英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问题。中国代表为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使王海平，英国代表为麦克马洪，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为伦兴香托拉。会议月余，毫无结果，于12月18日暂告停议。

11月6日　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驻北京俄使库朋斯齐，要求俄国政府施影响于库伦当局，勿再遣军骚扰内蒙。俄方旋照复北京外交部，以"无法保证我方劝说可产生任何效果"为借口，阴谋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中、俄、库三方会谈。

经　济

1月1日　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一千零九公里。

黄兴、王国权、龙璋、江心容等二十九人发起成立中华汽船有限公司，是日在《长沙日报》刊登招股广告。申明该公司之成立意在免除洋商垄断湘汉航线，"收回外溢之利权，扩张自由之实业"。股本二百万元。其中北京政府认股三十万，发起人认股二十万，旅湘华侨曾连庆、丘心容、谢坤林认股一百万，余待招。

谭延闿、王芝祥、赵恒惕、黄兴、沈秉堃、蔡锷、程潜等三十四人发起成立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是日在《长沙日报》刊登招股广告。申明"以振兴实业，挽回权利，补助军需为宗旨"。股本二十万元。

1月5日　上海大资本家沈缦苍、虞洽卿等十余人发起筹组北京华商电车有限公司，是日公布驻沪事务所通告。自2月10日、11日起，在《时报》分别刊登该公司招股简章及详细招股章程。确定股本为三百五十万元，承包北京内外城全部电车之敷设。预期一年半内"所有建筑工程一律完竣"。经北京政府批准，由该公司专办二十年。

1月11日　中法实业银行公布章程，申明该行"经营中外各国商务、贸易及汇兑等事，并代理各项借款"。资本暂定四千五百万法郎，其中三分之二为法国资本家所有，三分之一为中国政府所有。总行设巴黎，于北京设营业局。后设分行于上海。1921年停业。

袁世凯任齐耀珊为盐务筹备处处长。

1月13日　袁世凯任沈云沛筹办浦信铁路事宜。同年11月25日再任沈为该路督办。

1月15日　驻美公使张荫棠电告北京外交部，美第一国家银行总经理巴克对孙中山拟招股建筑铁路一事极为赞成，愿将该行公债八千万元投半数于中国，请即将此意转达孙氏。

1月16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与美商摩根公司签订借款二十万美元合同，以退还之庚子赔款为担保，用于留美学费垫款。

2月11日　孙中山为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午后2时乘三城丸邮船离上海赴日。随行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等人。行前，曾于4日电袁世凯、国务院、各部总次长，告以行期，并谓"此行欲以个人名义联络两国感情"。

滇越铁路全线竣工。此路系借法资修建，先后共用一亿五千八百四十六万六千余法郎。

冯国璋、吴景濂、沈云沛等创办民富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日在《大公报》刊登招股广告，标榜"振兴渔业，增进渔民生计，抵海产之舶来"。企业资本一百万元。总公司设天津，分公司设北京、保定、奉天、济南等十一处。

2月19日　袁世凯公布《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共十六条。公债定额二万万元。用以"拨充中国银行之资本"、"整理各种零星短期借款"，及"整理各省从前发行之纸币"。旋以善后大借款成立，此项公债遂未正式发行。

北京政府特设财政委员会，筹划全国财政。梁士诒、周学熙、梁启超等均参与其事。

2月28日　中华民国蚕丝总会在北京成立。以"确定蚕丝业进行之方针"、"力图蚕丝教育之普及"、"扩张海外生丝之销场"、"调查世界蚕丝业之现状"为主要会务。举陶善昌、李嘉瑗为正副会长。

3月1日　财政总长周学熙与德商瑞记洋行签订借

款三十万英镑合同，以契税收入为担保，用于支付军政各费。

山东银行成立，资本总额定为五百万元，实收一百四十一万余元。总行设济南。

3月4日　袁世凯任高凌楂督办改组各省银行及推行纸币、开办金库事宜。

3月31日　袁世凯公布《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共十三条。

4月10日　财政、海军二部经德商瑞记洋行，与奥国下奥证券公司分别签订借款一百二十万英镑及二百万英镑两项合同，以印花税及契税为担保。此项借款名为订购舰艇，实乃济北京政府穷蹙之开支。

4月11日　福建民政长张元奇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一百万日元合同，以泉州、沙埕等五地常关收入年额三十万元为担保，用于福建省行政费。

4月15日　袁世凯公布《中国银行条例》，共三十条。

5月1日　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借款八万元合同，用于行政费。

5月2日　袁世凯未经参议院议决，擅自批准财政部所拟《金库条例草案》十二条，并令"由部通行各省，先行试办"。

5月15日　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开业。该行系国内资本家与南洋华商合资创办，资本总额六百万元，实收四成。总行设上海，分行设新加坡。总理沈缦云，协理吴世荣，经理席缙华。

6月6日　交通总长朱启钤与英国中英公司签订借款五万英镑合同，作为广九铁路追加借款。年息七厘，二年偿还。

6月18日　袁世凯任詹天佑为交通部技监。

袁世凯据交通部呈请，准汉粤川铁路归该部直辖，无庸再派专员，并责成交通次长冯元鼎赴汉口接管，执行督办职权。所有该路工程事宜仍由詹天佑会同办理。

7月4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伦敦西南区宝林公司，在上海签订筹建广州至重庆铁路及日后接展至兰州之简明合同。

7月5日　袁世凯令陈威代理中国银行总裁；吴乃琛代理中国银行副总裁。

7月22日　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代理财政总长梁士诒以修筑同成铁路（大同至成都）为名，与法比两国铁路公司代表陶普施签订借款一千万英镑合同，以同成铁路全部财产及收入为担保。后袁世凯虽于同年12月25日派黄开文充同成铁路督办，并派施肇曾兼会办该路事宜，但因此项借款于8月间已挪作镇压南方讨袁军军费，同成铁路迄未建成。

8月11日　中日兴业公司总会在东京成立。资本总额五百万日元，中日各半。按该公司原为孙中山于是年2月赴日考察铁路及实业时所发起。此次正式成立，原定举孙担任总裁，但因二次革命起，日本各大资本家咸以孙"处于嫌疑地位"，故将总裁一席暂空，待日后补选；副总裁由日人仓知铁吉担任。

9月25日　袁世凯任汤睿为中国银行总裁，项藻馨为副总裁。

10月9日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中法实业银行总理签订一亿五千万法郎《实业五厘金币借款合同》，作为"兴办国家实业与建造公共工程"之用，并议定第一期工程系建造浦口商埠。同年12月5日，双方复补签该合同之附件，以明确原合同中之若干条款。

10月10日　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借银三十万两合同，以芜湖米捐为担保。

10月14日　外交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提议修改关税，实行值百抽五税则。

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比利时军火商汉斯·赫尔费德代表签订五十万英镑《军事债票借款合同》。

11月14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交通总长周自齐与英国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代表梅尔思在北京签订三百万英镑《浦信铁路借款合同》，用于修筑浦口至信阳之铁路。

袁世凯准工商总长兼导淮督办张謇在北京暂设导淮总局，以便由该局出面，将淮河流域农产收入抵借外债。

12月2日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董事会会长盛宣怀与日本国制铁所及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签订两项借款合同，共一千五百万日元。用于在大冶添设熔矿炉，扩充改良汉阳铁厂、大冶铁路电厂及江西萍乡煤矿电厂洗煤所等项。借款分四十年偿还，以分批售予制铁所头等铁矿石一千五百万吨及生铁八百万吨抵债。

12月21日　袁世凯任张謇为全国水利局总裁，丁宝铨为副总裁。

12月24日　袁世凯公布《盐税条例》，共十三条。规定除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外，民国产盐销盐各地方均适用此条例。

军　事

1月5日　驻烟台关外士兵千余名，因被遣散不满，是日哗变，放火劫银，全埠闭户。后经海圻、飞鹰两舰并海军练营士兵及部分鲁军联合镇压，次日始平。降回士兵六七百名皆被押上日船，运往大连湾遣散。

1月21日　袁世凯将内城巡警总厅正式更名为京师警察厅，改任原厅丞王治馨为京师警察厅总监。

1月26日　晚，俄兵三百余经辽源州（今双辽）侵入宾图王府。

海军总长刘冠雄呈袁世凯，请准予"延聘各项海军专门洋员，分别充膺海军军官学校及各练习舰教习"。是日袁将此呈批交国务院财政部查核办理。

2月6日　驻吉林延吉府局子街（一名延吉冈）巡防营士兵八十余名，因不满统领王文治苛待，群起哗变。杀死统领王文治并四出劫掠。官商多避入日、俄领事馆。吉林府尹率巡警前往镇压，被击退，府尹亦被缚。变兵复将警局贮钱二万吊席卷而去。7日，变兵继行抢劫。后闻珲春驻军将至，乃分二部退往头道沟等处。8日，珲春军至三百五十名，哗变事遂息。

2月15日　云南都督蔡锷因英又在我片马、蛮允（今曼允街）大量增兵、运粮、筑营、设垒，并将大量武器弹药运存他戛（今称戛），是日急电北京政府，请设法防御。

夜11时，驻热河（今承德市）第三营士兵乘当地大部驻军调往开鲁之际，在革命党人协助下举事。杀连、排长及军需官并焚营房。随即破军械所，得枪百余枝、子弹十余万发，并奔赴银库，夺得库款一万九千余两。复焚电报局、兵备处，并攻财政局、都统衙门。都统崑源急调邻近庄头营子驻军驰往镇压，激战数时，举事一方不支，阵亡、被俘数十人，余四散。16日晨事息。

3月9日　晚七时，云南剥隘驻军因欠饷全营哗变，先砍电线绝对外之联系，随即毙伤哨长及管带，出营抢劫各商号。天明转入广西境内。

3月10日　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德商捷成洋行签订借银二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八两二钱八分三厘合同，以中国银行为担保，用于购置军械及栈租。

3月18日　各省军事代表在总统府开会，决议改组全国军队。规定大省二师，小省一师，边疆大省可增至四师；每连兵额平时一百二十六名，战时可增至一百七十名，由退伍兵员内选充。

3月24日　库伦蒙军进犯大王庙，与驻当地新练骑兵一团战于距该地六十里之锡林郭勒河。是役以团长沈某调度失宜，几全军覆没。幸赖淮军大败蒙军于距经棚（今辽宁省克什克腾旗）四十里之沙托子，始将战局挽回。

3月25日　驻湖北樊城第二十一团一、二两营士兵，因被裁撤，要求发饷一年。团长不允，遂于夜间9时哗变，放火劫掠。后被该团第三营协同驻襄阳第十八旅驱散。

4月4日　各省军事会议代表在北京发起军界同胞会，是日开成立会。

5月5日　袁世凯令李纯所部第六师自保定移驻信阳。10日，再令该师进驻武昌。

5月14日　自袁世凯派兵南下后，驻汉口各国领事借口保护侨民，除将原有军舰集中汉口江面外，复纷电本国政府添派大型巡洋舰。是日午后，意大利巡洋舰马可勃罗号抵汉。16日上午，德、奥巡洋舰各一艘亦先后抵达。继来者尚有英、法等国巡洋舰。

5月16日　袁世凯公布《步兵操典》，共三编三百九十条。

5月　海军部决定分中国沿海为三大军区：一、自鸭绿江至烟台为北区，设司令部于秦皇岛；二、自烟台至三都澳为中区，设司令部于崇明岛；三、自三都澳至澳门为南区，设司令部于琼州岛（今海南岛）。

6月9日　白朗军三千余攻河南鲁山，未克。10日，分兵二路，一路往攻宝丰，一路由白朗亲率再攻鲁山，占该县附近之大营、狼店、逢窑等地，歼敌数百人。14日晚，白朗军千余人再攻禹县，知事弃城逃匿。白朗军入城后，抢劫豪富，收缴全部枪枝，随即放款济贫，乡民从者甚众。16日，闻敌援军至，主动转至泌阳。22日，与敌军相持于角子山。25日，乘敌不备，经玉林山、锦屏山一带抵方城附近。26日，攻方城，又获全胜，毙敌军统领牛得功。河南都督张镇芳闻报，急调师长张锡元率队一千二百名驰往镇压，并飞调驻防郏县一团、许昌一旅及角子山驻军前往合攻。

6月19日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方震因陆军部事事与之为难，愤而在校自杀。未遂。事后，该校职员张翼鹏等具呈控告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除斥异己，任用私人，刁难把持，诸事掣肘"，以至酿成此事。21日，袁世凯派荫昌、陈宧前往查办。蒋方震旋即提出辞职。9月3日，袁准蒋辞职，并以曲同丰继任该校校长。

为准备发动内战，镇压南方反袁势力，是日海军总长刘冠雄在大沽检阅海军。海圻、海琛、海容、飞鹰、泰安、镇海等十舰均参与演习。

7月1日　热河都统熊希龄电袁世凯，报告战胜盘据乌泊罗河一带之库伦蒙军事。内称："毙匪多名，并攻取匪卡五处，夺获枪械马匹多件。"

署绥远城将军张绍曾电袁世凯，报告战胜侵袭内蒙之库伦蒙军事。内称："连日剿匪获胜。迭破板申图山口、丹伯岭诸要隘，肃清西苏尼特王府及滂江等处，擒斩二百余名。"

7月3日　白朗军破河南荆紫关。守将王天佑大败，逃往淅川。

袁世凯派海军中将郑汝成、团长臧致平率警卫队一千三百余名进驻上海江南制造局，并令协同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共谋镇压上海革命。

山西都督阎锡山电袁世凯，报告战胜入侵后套一带之库伦蒙军事。内称："此次晋军赴援后套一带，先后剿平台梁、大奈太等处蒙匪，现又攻克苏白尔盖昭庙，并分援白灵，节节获胜。"

7月5日　凌晨2时，库伦蒙军骑兵四五千名进犯察罕通古，与当地驻军接战。天明，蒙军败退。是役双方互有伤亡，而以蒙军为重。11日早8时，蒙军骑兵三千名再

犯察罕通古，又被驻军击退。

7月10日　12时及午后2时，驻德安赣军第一旅旅长林虎迭电护军使欧阳武，告以李纯所部袁军已由南康(今星子)及沙河两路进逼该旅防地，请速示办法。

7月12日　早8时，赣军林虎旅在李纯所部袁军节节进逼下，被迫奋起应战。至午，林军乘胜占领青山瓜子岭一带，并占金鸡炮台。午后再战，直至深夜，袁军退往赛湖。

7月13日　早8时，赣军林虎旅与李纯所部袁军在瑞昌附近接战，袁军节节败退，晚退入九江。为此李纯急将分驻武汉、蔡甸、岳口等处之十一混成旅及新编黎天才、石星川两混成旅调入江西。

袁世凯再令海军部电饬驻泊烟台、大沽之海容、海琛两舰，即行南下，巡缉长江。

7月14日　月初白朗军破河南荆紫关后，自淅川进至湖北均县贾家寨。袁世凯闻报，立饬湖北、河南、陕西三省军队联合围攻。是日白朗军与该三省联军大战于贾家寨东。白朗军胜，缴获子弹数十箱。

7月16日　黄兴令驻南京之第一师一部开赴宿迁，第八师一旅沿津浦路开赴徐州，配合驻徐州之冷遹第三师防堵张勋所部袁军南下。同日，又调第一师第二团之一部及第八师步兵一团附机关枪一连，开往临淮关准备北伐。17日，再调第一师一旅开赴徐州。

早8时，驻徐州之冷遹所部第三师讨袁军向驻山东韩庄之靳云鹏所部第五师袁军发动进攻。连日鏖战。冷军先处优势，后以兖州张勋军及衮镇田中玉军往援靳军，冷军遭数面夹攻，始退据山东、江苏交界之利国驿。19日午后5时，袁军陷利国驿，冷遹部撤向柳泉。

8月1日　来自姑塘之袁军主力于7月30日与赣军林虎旅接战，陷沙河以南之兰桥(一名南桥)。7月31日，两军激战于庐山以南之黄老门。历一昼夜，林军终因力单不支退守德安。黄老门、马回岭均入敌手。是日晨，林虎知德安不守，遂令焚粮弹、毁车头，随即分头向建昌(今南城)、吴城转移。德安陷。同日瑞昌、南康(今星子)亦陷。

夜，冯国璋率所部袁军抵安徽宿州(今宿县)，随遣其先头部队十九混成团于2日晨由固镇渡淮河进逼蚌埠。午前，蚌埠陷。讨袁军撤斑临淮关。冯于当日进驻固镇。

8月2日　晨5时，袁舰暗袭吴淞炮台。讨袁军开炮还击，中旗舰海圻号瞭望台。战斗未及一时，袁舰即遁去。

拂晓，安徽倪嗣冲所部袁军攻凤台。战斗历十二时，讨袁军失利，午后4时凤台陷。

8月20日　午后，袁舰海圻、海容、永丰及水雷艇一艘抵镇江。23日，南琛、楚有、镜清、应瑞四舰及运载袁军之新康、顺大二兵轮继达。以备水陆会攻南京。

11月11日　白朗军围攻河南信阳。是日袁世凯急电黎元洪，令速调军队驰往镇压。旋由北京陆军部调拨奉天一混成团，会同河南陆军一旅及驻湖北北洋军第二师二千余人奔赴柳林、信阳，与白朗军接仗。自16日至18日，连续激战三日，袁军终未得手。后白朗军以弹药告罄，乃于18日晚主动向南阳转移。

白朗军宋老年、李鸿宾等部攻克河南宝丰。

美、英、法、德、奥、日、俄等帝国主义侵驻天津部队共七千余名，是晚举行军事演习。

11月16日　驻守江阴炮台之海军陆战团第一、二营士兵，因不愿奉调开赴福建，加以接连三月未发饷银，于当晚9时许哗变。

11月24日　袁世凯公布《海军军港司令处条例》，共三十条。

12月8日　袁世凯任吴俊升为经棚一带守备司令官。19日，令经棚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改任林西镇守使，“以专责成”。

12月　陆军部规定有关军事方面对外人之限制三条：“一、陆军事项聘用洋员，除顾问、教习外，他项军职不得聘用洋员；二、各国游历人士，非陆军部指有在某省某处阅操字样护照文件，各游历人士不得参观军队；三、险要地点禁止外人测量。”

12月31日　英在片马增兵五六千名，旋分兵三路进据称戛、六库、腾越(今腾冲)，并大肆侵扰滇西。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英兵始撤离。

文教

1月6日　宋教仁、陈家鼎等发起筹建民国国史馆。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均致电赞同。是日在北京开筹备会，确定该馆任务在撰修民国史。会间举平刚草拟民国国史馆章程并筹办一切。

袁世凯以北京《民见报》社刊行《开国纪念十日刊》，内载《不堪回首之南京政府》一文，鼓吹“二次革命”，饬内务部查办。

1月8日　教育部通电驻外各使馆，裁撤各国留学生监督，改设经理员。

1月12日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二十八条。其中对于大学分科、各科分门、修业年限及入学资格等均有规定。

1月16日　袁世凯任高鲁为中央观象台台长。

1月25日　教育总长范源濂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各省专门学校一律正名为某省公立某某专门学校，以资划一，并请报部备核。

1月26日　中国社会党上海支部机关刊物《人道周报》创刊。该刊由安真编辑，共出九期，*1913年3月30日*后停刊。

1月27日　内务部准蒙藏事务局所办《蒙藏回白话报》备案。该报申明以“开通风气，灌输边地人民知识”为宗旨。

1月28日　袁世凯准教育总长范源濂辞职，以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

2月3日　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菲律宾首府马尼拉举行。中国由各大学、团体选出代表三十六名出席。比赛结果，中国获四项冠军、十三项亚军、七项第三名，占总分第二。

工商部致函各省民政长，请将各省通志并官书局所出与地学有关之公私著述，各具一份送部，以备该部矿务司筹办地质调查研究所之用。

2月12日　国民党汕头支部机关报《大风日报》创刊。申明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

2月15日　教育部为“筹议国语统一之进行方法”，召开读音统一会。与会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八十余人。举吴稚晖、王照为正副会长。会间拟定拼音字母三十九个，于5月26日闭会。

《法学会杂志》在北京重新创刊。法学会成立于1911年10月，“以研究法学，赞助立法、司法事业为宗旨”，会长沈家本。该会曾出《法学会杂志》五期，并组织法政研究所。1912年初会务中辍。同年10月20日召开会员大会，恢复会务。到会会员二百余人。公举汪有龄、曹汝霖、章宗祥、江庸、施愚为干事；汪曦芝、朱深、姚震、马良、余棨昌、汪荣宝、沈家本、汤化龙、董康、张耀曾、董鸿祎、顾鳌等二十四人为评议员。11月确定该会研究法学分为三部：一、宪法行政法部；二、国际法部；三、司法法部。后以“民国宪法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乃公议“自二年一月起，每一星期开第一部全体会议，讨论宪法上各种重要问题”。《法学会杂志》重新创刊，主要即为发表各方有关宪法问题之主张而设。

2月23日　中日新闻记者俱乐部总会在北京开成立会。宣称“以加强中日两国亲睦，保持东亚和平为宗旨。”是日到会中日记者六十余人。临时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等亦到会。

2月24日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共三十五条。

2月28日　《震旦》月刊在北京创刊。该刊由赵管侯、李梦林编辑，统一党政务讨论会发行。

《孔教会杂志》在上海创刊，由该会会长陈焕章主编。

3月4日　全国禁烟联合会在北京开会。该会由万国改良会中国总会会长、美帝国主义分子丁义华发起，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会间议决禁烟空文数款。七日闭会。

3月7日　稽勋局通告北京及各省大学、专门、高等、中小学校“嗣后对于烈士后裔及革命出力人员贫苦不能自给者，持有本局证书，一律免收学费，按其程度分配何校何级，但学校以国立及各省官立为限。”

3月22日　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在上海创刊。该刊先后共出十期。康于《不忍杂志序》中哀叹：“……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其于辛亥革命后一切稍含进步意味之措施均深恶痛绝，“所以为不忍杂志耶”。该刊以宣扬尊孔读经、鼓吹复辟倒退为唯一职志。

4月1日　《言治》月刊在天津创刊，由北洋法政学会编辑。

4月7日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4月12日　黄兴等创办之国民大学及附属中学在北京开学。学生共九百八十余名。彭允彝任校长。是年秋，该校与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更名北京私立中国公学大学部。

4月15日　国民党旅日各支部机关刊物《国民杂志》创刊，以“发扬党纲，阐明平民政治原理”为宗旨。该刊系月刊，在东京编辑发行。国内上海、南京、汉口、衡阳、北京、天津、奉天、大连等地均有代派处。杂志社社长夏之时，副社长吴作镆，总编辑邓泽。该刊共出四期，7月15日以后停刊。

4月27日　南社社友在北京集会，与会者数十人。议决进行数事：“一、设机关部于北京；二、重修明史；三、编南明史；四、征求太平天国之遗史；五、征求光复以前之殉难者；六、征集民国时人小像；七、征求宋遁初（宋教仁字——编者）先生遗墨；八、编辑南社杂志。”

孔社在北京开成立会。宣称“以阐扬孔学，融汇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为宗旨”。举徐琪、饶智元为正副社长；徐世昌、世续、王闿运、赵惟熙、陈昭常等为名誉社长。是日袁世凯派秘书夏寿田代其往贺，并致祝词。12月，该社刊行《孔社》杂志。

5月1日　《中华实业丛报》在上海创刊。该刊由吴稚晖、王幼安编辑，专事鼓吹实业救国。第一期《本报宣言》中写道：“凡强国所以致此者，其原千条万端，而悉归于实业。……实业者，得之则利重于丘山，失之则祸在眉睫，此本社丛报编纂之所由。”

5月20日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机关刊物《国民》月刊创刊。孙中山、黄兴分别为该刊撰写《出世辞》。孙中山在《出世辞》中，勉全体党员“以进步思想、乐观精神，准公理，据政纲，以达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目的”。该刊仅出二期。一卷二号于7月份出版。旋即停刊。

6月2日　北京留法俭学会所办留法预备学校，第三班学生四十余名预备期满。是日早8时，离京赴法俭学。

6月17日　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在学生、校友及社

会舆论反对下，被迫向袁世凯请辞。是日袁批复不准。但预科学潮亦因学生被解散离校而停息。

6月23日　教育部批准京师学务局呈核之《教会设学立案办法》及《解散私塾善后办法》。

7月14日　北京教育部批准武昌中华大学立案，并指定陈宣恺为该校代表人。

8月20日　刘师复主编《晦鸣录》在广州创刊。此为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之机关刊物。《晦鸣录》系周刊，其中各篇均为中文及世界语两种文字对照。该刊仅出二期，即被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于9月8日迫令"永远停版"，晦鸣学社亦同时被封。12月20日，该刊转澳门出版第三期，并更名为《民声》。《民声》继出二期后，龙济光奉袁世凯令，串通澳门葡萄牙当局又将该刊封禁。1914年4月11日，《民声》转上海秘密出版第五期。为免再遭封禁，自是期起，始终托言于日本东京发行。

教育部公布《经理欧洲留学生事务所暂行规程》，共二十条。

9月1日　北京政府参谋本部于2月初在北京南苑开始筹办航空学校，是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六十二名，由秦国镛任校长。

9月17日　北京教育部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内称："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在该校行礼。……请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并谓："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行礼。"

9月18日　教育部公布《颁发历书条例》及《翻印历书条例》各七条。《颁发历书条例》中规定，教育部中央观象台"每年七月以前将翌年历书样本颁发于各省"，"各省行政长官接到样本后，依照式样翻印颁行"；并规定"京内各机关、蒙古、西藏及各国华侨每年于历书出版时由本部直接颁发"。

9月20日　上海自由谈话会所办《自由杂志》创刊，由童爱楼编辑。该刊多滑稽游戏之间，期以此术讥讽时攻，免于被禁。然仅出二期即被迫停刊。

9月23日　教育部委任驻美赔款留学监督黄鼎兼充该部游学经理员，并公布《经理留美学生暂行办法》。

10月20日　教育部通电各省，拟详细厘定留学生规程，并决定于新规程未公布施行前，暂停遣送学生出国留学。

《生活日报》在上海创刊。宣称以"开导社会，增进人民智识，研究生活问题"为宗旨，并申明该报"无偏无党"。

10月23日　《新上海报》在上海创刊，由朱恨孟编辑，宣称以"发挥民意，鼓励民生，改良社会，提倡实业"为宗旨。

10月29日　教育部以北京图书馆为举国观听所系，决定予以扩充。特派该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等会同该馆人员清理图书、帐目，悉交周树人等接收报部，以便迁移，听候改组。

11月2日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筹备就绪，是日开学。此即武汉大学前身。

11月22日　北京教育部决定由驻外各领事兼管各地华侨学校。是日公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共八条。

12月10日　署湖南都督汤芗铭封闭谭人凤在长沙创办之中华印刷社。

12月25日　《雅言》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由康逵寄编辑。该刊系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之工具。

12月26日　教育部补周树人(即鲁迅)为社会教育司佥事。

12月27日　教育部公布《留欧官费学生规约》，共十八条。

12月31日　在上海发售之旧金山华侨所办《中华民国公报》，经内务部检查，指为"语多悖谬，有害治安"，特令江苏民政长韩国钧转饬淞沪警察厅严禁发售。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4年

导　言

一九一四年，在世界范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为契机，中华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几年"黄金时期"，但同时各项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并没有丝毫减轻，袁世凯的势力也开始出现了某些裂痕。

本年中，中国北洋军阀时期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白朗起义最终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短期内土崩瓦解的同时，一支农民起义军让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丢尽了颜面。白朗军在豫、皖、赣、苏四省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北洋军只能尾随其后，拾人敝屣。然而白朗军由于没有有力的指挥和稳固的根据地，一九一四年八月陷入重围，最终失败。

独裁主义的袁世凯，根本不喜欢任何限制其权力的机关存在，他在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就觉得没必要再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一月十日，他下令解散国会，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民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 400 元，饬令回籍，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解散了。

在袁世凯建立军事独裁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并没有放弃斗争。但是孙中山没有正确总结全面经验，造成了与黄兴的分裂，双方只得各行其事。孙中山在日本重新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被推举为总理，成为一个与国民党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又重新举起了革命的大旗。

袁世凯早就对《临时约法》极为不满，多次提出要求修改，在击败革命派"二次革命"后，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动手了。约法会议召开后，首先确定谋求国权之统一作为增修约法之主旨。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制定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正式颁布施行。

日本窥视中国已很久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在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对中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扩张。九月二日，日本出兵在山东龙口登陆，入侵山东。十一月七日，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德军投降。至此，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全部为日本所攫取。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白朗起义
- ●解散国会
- ●中华革命党成立
- ●中国民国约法出台
- ●日本侵入山东
- ●新约法之政事鉴

白朗起义

背景介绍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为了镇压革命，确立其专制独裁统治，不断加重对人民的搜刮，通令全国“将旧税一一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规定各省除了属于中央的“国家税”以外，还可“自行筹划”省、县地方税，“横征暴敛，摧残民生，较清朝为尤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验契税、印花税、门捐、戏捐、妓捐等等，不一而足，陡然使劳动人民增加许多负担。江苏南通1914年上等田的地租比1905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中等田增加百分之五十七，下等田增加百分之七十四。

在袁世凯逐步加强军事专政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脱离人民群众和本身的软弱，已无力反抗。“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全盘失败了。就在这个时期，在河南爆发了以白朗为首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袁武装斗争。白朗起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河南属于清朝封建统治中心地区。袁世凯上台后，又把河南作为他的反动统治巢穴，任命其表弟张镇芳为河南首任都督，强化统治，压迫与剥削十分沉重，任意搜刮，无恶不作。白朗军原是辛亥革命时河南民军王天纵部的一支。南北议和，王天纵被袁世凯骗降，白朗部仍在鲁山一带坚持武装斗争。辛亥后，袁世凯逐渐消灭异已军队，被遣散的民军和农民起义军不少加入白朗军。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民生凋敝，日益加甚”，一九一二年夏，白朗起义军迅速壮大起来。一九一三年六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二次革命”尚未发动起来，白朗军一举攻克河南富庶的禹县城，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群众踊跃参加，声势大震。“每到一处，只劫掠官家及绅富财物”，所以“地方上正多渴想白狼之人”，“白狼之势乃大”。九月进军湖北，攻占重镇枣阳，焚烧教堂，俘虏洋教士十三名，教训一通后宽大释放。这时鄂、豫间破产农民纷纷参加，兵力已达八千余人。开封的进步青年，由于张镇芳的大屠杀，也多投入白朗军中。接着白朗军回师北上，连克唐河、方城、卢氏等县，十一月攻占白朗故乡宝丰城。白朗军在击败河南护军使赵倜部的毅军后，又越过京汉铁路东进，连克商城、固始、罗山、潢山、光山等地，准备向安徽进军，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反袁。

1913年底，袁世凯严令河南都督张镇芳、护军使赵倜对白朗起义军组织大规模的“围剿”。白朗为了避开敌军主力，并与东南各省的革命党人会合，便跳出豫西，突围东进，连克光山、潢川、商城，1914年1月进入安徽，攻克六安、霍山，“全皖为之震动”，“皖省大局，岌岌可危”。袁世凯惊恐万状，忙将张镇芳、赵倜革职，改令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组织北洋主力数万人“围剿”，妄图将起义军一举歼灭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也公开叫嚣，“非与大惩创，不足以儆将来”，建议“用飞机抛掷炸弹”。英、俄等国武官亲往信阳“观战”，为北洋军鼓劲打气，出谋划策。但是，起义军巧妙地避开了敌军主力，回师豫南，进入鄂北。3月7日攻克鄂北重镇老河口，歼敌二千余。在此，白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3月14日，攻克荆紫关，打开西进陕西的大门。4月初逼近西安，5月进入甘肃，连克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然而，这一带都是回、藏等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起义军没有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陷入困境。一部分人产生思乡情绪，主张返回豫西。起义军乃取道东下，攻克秦州(今天水)，沿渭河回河南，分散活动。

8月，白朗率百余人回宝丰，在虎狼爬岭被围，突围时身负重伤，不久牺牲，部队溃散失败。

材料：

- 王占元致袁世凯、参陆两部及段祺瑞电
- 段祺瑞四省围剿计划的破产
- 段、袁通电及段祺瑞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

材料一　王占元致袁世凯、参陆两部及段祺瑞电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开封段总长钧鉴：华密。占元在鄂奉段总长令，率混成一旅向信阳集中，于七日完结，随即开赴光州。占元十一日抵光州。同日，接奉总长转来倪督电称："霍山于六日晚失守。大股南窜，叶家集仍有小股。"又接段总长转来赵督办电称："匪在杨家滩、十八滩集聚，设栅筑垒。"综合前后各情报，匪约有六七千余人，因在霍山时匪约仅有二三千人，分途窜扰，本在意途〔图〕之中。然既破霍山，已成南窜之势。遂一面函知蔡司令迈〔汉〕卿，于松子关方面严加防范，并请饬罗田队伍对于英山方面准备迎头痛击；一面命令高统领文贵，限所有队伍开赴松子关附近，与蔡军联络；复饬步队第九团，于十三日往驻商城，为高军后援。所有后方部队，均拟陆续向商城出发。俟到商之后，派一部到松子关一带防匪西窜；派一部直抵杨家滩一带；其余部队待机于商城、松子关之间。如匪徒果出英、潜，即率队南下；如回头北窜，即西击于松子关、商城之东，以达痛歼之目的。惟固始系豫、皖交界重地，防备不可稍疏，拟俟王副司令到后，再令驻该地之陈旅长文运、孙团长传芳率所部南来参与战斗；熊帮统文朗率所部赴光州，守备后方联络线。按，此匪非常狡猾，捣虚是其惯技。今六、霍连次失守，可见不患追赶无兵，只患迎击不力。现据倪督蒸电内开："皖省重兵分驻霍山、六安、舒城一带。而英、潜两处未闻如何布置，殊为可虑！且大本〔部〕兵力均在左面，如再攻破英、潜，公私将来之损失，何堪设想！"恳请电饬皖督，须增迎击之队，不必厚追随之兵。如此，小丑乌合，倘得经一次会战，即当瓦解矣。然此特占元就目下情形所及之处置，以后随匪情之变更，再随时电禀一切。占元覃叩。印。

材料二　段祺瑞四省围剿计划的破产

由于白朗军在东征入皖的进程中，连续攻克六、七座州县，所向披靡，不仅使新任"统筹全局"的段芝贵企图围歼白朗军于"光、固之间"的计划又成泡影，而且沿途"附和日众"，人数倍增，声势大震，更加引起中外敌人的惊恐不安。各国驻华领事、公使，纷纷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借口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如再不能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他们就要求"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这不能不使袁世凯感到十分丢脸与焦虑。于是，他一面下令撤去段芝贵"统筹全局"的委任，免去张镇芳河南都督之职，给予河南护军使赵倜以及张锡元、刘镇华等革职留任，"立功自赎"的处分；一面命令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马，兼代豫督，指挥豫、鄂、皖、苏四省的地方军；并调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第八混成旅旅长徐占凤等所部，也由段祺瑞统一调遣，严令一定要把白朗军迅速扑灭。

段祺瑞于2月中旬急忙由开封赶到信阳，立即布置了一个各路"会战"，企图把白朗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的围剿计划：南路，命令湖北陆军扼守皖、鄂交界的松子关，并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江面"，以防白朗军南下；东路，命令安徽陆军在舒城、六安一带集结，以防白朗军东进；北路，命令河南陆军及北洋军向南进逼；又抽调王占元师作为主力，令向商城、固始一带集结，堵白朗军西归之路，并逼白朗军在霍山与霍邱之间决战。与此同时，英、美、俄、法等帝国主义驻京使馆，也纷纷派遣武官赶赴河南战区，以"观战"为名，为段祺瑞出谋献策；俄国还派遣飞行员康士坦丁驾驶飞行艇，准备对白朗军的行动跟踪侦察，及时向反动军队提供消息。一场中外反动派共同策划的大"围剿"开始了。

面对数万反动军队的四面包围，白朗也清楚地看到形势的严重。他原打算在六安过年之后，即"出发安庆，直下长江，攻取南京"，与革命党人联合"共图大举"，以实现这次东征的目的。但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使他看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实现了。同时得知，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相继逃往国外，想要找他们领导已不可能。虽然皖北各地一些下级革命党人，曾联合会党起来响应，但因他们的势力都很小，很快就被敌人镇压下去了。而江苏等地的革命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这不能不使白朗和他的将领们大为失望。另一方面，出乎白朗意料的是，敌人的行动很快。段祺瑞亲自指挥豫、鄂、皖、苏四省的反动军队，几乎倾巢而出，各占有利地势，形成四面包围；而两师、两旅的北洋军，又正在步步进逼。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再继续向江南进军，不仅非常危险，而且已没有必要了；必须迅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返回豫南，保存实力，才能和敌人继续战斗。

1914年2月下旬，白朗率主力西返，仍由皖、豫交界的叶家集进入豫南。行至商城东北的郾家集一带，与王占元拦截的部队相遇，经过两昼夜激战，打垮敌人的两个团，突破重围，日夜兼程，经光山、罗山，于27日夜由信阳以南的双河及柳林附近，越过京汉铁路。3月4日即入鄂北的应、随、枣一带。3月6日又折而北上，进入豫南新野的新店铺一带。这时豫南一带又纷纷告急。段祺瑞、赵倜等人，都断定白朗军必重返宝、鲁家乡，立即调豫西各军赶来防剿。白朗看透了敌人的打算，因而不再继续北上，径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西南挺进。遂由豫、鄂交界的黑龙集、邓县西部的郑赵集，直趋鄂北商务重镇老河口。3月8日白朗军攻克老河口，打垮守敌一个团，获得大批枪炮弹

药。同时，将英、美帝国主义设在该镇的烟草公司，亚细亚煤油公司等财产没收、房屋焚毁；又焚毁教堂、惩罚无恶不作的传教士。至此，段祺瑞四省"围剿"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三　段、袁通电及段祺瑞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

1914年2月12日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钧鉴：华密。真令敬悉。佳日得霍山麻日失守之耗，曾电告倪督设法堵截，毋使惊逸。又饬王占元拨一支队向松子关与鄂师联合严堵。盖以马联甲仅一支队，势难兜围，拟俟大军到齐，为合围聚歼之计。查倪督阳电称："马师追匪数日，未得一战"；真电又称："马探到霍山西门，而匪已掠霍山而东"。云云。尾追而不迎击，是送匪也。鲍镇守使庚电言："数日间，匪专在六安西、南二方焚掠，马师长率队跟踪数日，竟未追及。匪复由西转东，若再游击，恐蹈马师覆辙。现在率队赴舒堵截"等语，用意亦在于兜剿。又查赵护军使探报："匪于歌日至卓林店，距霍邱二十余里，闻城有驻兵，即复回窜。"当时城中仅兵二营，匪尚不敢犯，亦堵截胜于穷追之明证。如谓兵蹑其后，匪即无暇肆扰，岂霍山失守，未遭蹂躏耶？

窃谓倪督真电意在速战，固自勇往可嘉，但恐愈追愈窜，窜逸愈远，结束愈难。愚见尚以四面兜围，堵匪使北，歼之于霍邱霍山、叶家集之间为上策。现在王总、副司令距匪不远，已饬遵照真令，约期会合，严行痛剿，用副一鼓歼尽之意，谨复。祺瑞叩。文。

袁世凯致段祺瑞电　1914年2月12日

开封段总长：部密。真电悉。张督近为中外攻击甚力，留之适足害之，不如避位，以塞舆情，于公私为两得也。大总统。文。印。

解散国会

背景介绍

1月10日　袁世凯违法解散国会。1913年10月6日，国会经过三轮选举给袁世凯戴上了正式大总统的桂冠以后，原以为可以专心制定宪法，把袁氏的权力约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使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但抱独裁主义的袁世凯，根本不喜欢任何民选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所以一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10月16日，即国会选举总统后的第10天，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的权力。而国会这时正在讨论宪法草案，认为没有必要再修改约法。袁世凯闻讯，恼羞成怒，指责"国会专制"，并决心用暴力手段对付国会。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5日又包围国会，追缴已宣布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书。两天之内共缴议员证书438件。超过国会议员总数之半。国会从此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只得停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竟违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国会在法律上不被解散的条文，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400元，饬令回籍。民国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被取消了。

材料：

- "救国大计"
- 布告解散国会原因文

材料一　"救国大计"

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以完全出自捏造的"乱党首魁与乱党议员潜相构煽"的假情报为理由，规定："自湖口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籍隶该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从速令行各该选举监督暨初选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众两院候选人，如额递补。"同时还有一道命令指出："广东、湖南为该党之根据地，暴民专制，土匪横行。……嗣后如有再以党之名义演说、开会及发布传单者，均属乱党，一律拿办。"

命令发表的当天，袁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手段，派军警三百多人包围顺治门外彰仪门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参众两院，甚至半夜里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像捉贼搜赃一样，共计缴获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三百多件。

这还不能满足袁的要求。他的目的不仅要解散国民党，还要附带地使国会不能存在，这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在收缴国民党议员三百多件证书、徽章后，他计算两院议员仍足法定人数，仍可继续开会，他就不惜违反自己所发布的命令，指使军警继续追缴湖口之役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以及跨党分子的证书、徽章，又有八十多件。合计起来共有四百三十八件。这样，国会就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了。

十一月五日两院开会时，大批军警把守会场入口，对进入会场的议员就像盘查江洋大盗一样，态度十分粗暴。当然，被追缴证书、徽章的议员是不能入场的，有些能够入场的非国民党议员，也被这些凶神恶煞吓走了。

十一月十日，也就是下令解散国民党的第六天，宪法起草委员会宣布解散。在国会陷于弥留状态的时期，所有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仍然舍不得这块冷猪肉，他们开会

不成，便又改开所谓两院联合谈话会，想研究一个起死回生之道。

此时袁还不敢直截了当地下一道解散国会的命令。根据他的命令，在解散国民党以后，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这是袁用以欺骗全国人民的障眼法，他明明知道，当第一届国会进行选举的时候，国民党在全国广大地区内占有很大的优势，该党党员不仅在当选议员中占了多数，在候选人中也占了多数，如果以候选人递补，国民党将仍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就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因此，袁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无庸完成递补手续，而使国会没有借尸还魂的可能。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就假口国会本身无法存在，而召集所谓政治会议、约法会议来篡夺国会的职权了。

关于解散国民党的问题，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尖锐。它的大意说："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炮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

在政治会议开幕之前，袁又嗾使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发表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电报，这个电报的领衔人仍然是"民国元勋"黎元洪。

袁向政治会议首先提出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案和增修约法案两个内容。他假口国会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搁置不议，因此提交政治会议讨论解决。他希望这个御用机关对以上两案作出决定来，作为他推行总统独裁制的法律根据。

然而，即使是袁自己所创造的御用机关，也不敢觍然以立法机关自居而作出荒谬绝伦的决定来。十二月二十九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大家面面相觑地提不出意见来。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于一九一四年一月二日开会，提供初步意见，听候大会解决。

在审查会开会的过程中，大家仍然认为这两个难题目很难做出好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决定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的问题，另设"造法机关"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往外推"的办法；对解散国会的问题，决定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

一月十日，政治会议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采纳施行。

就在同一天，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答案，下令解散国会。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北洋军阀以非法手段解散国会的第一次。当然，这个国会并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袁始而以暴力威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继而连这个在形式上号称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也被他一脚踢倒，共和制度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期，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极端愤慨。而解散国会的命令是由"名流内阁"副署的，所谓名流竟然堕落到这一地步，也就不能不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摘自《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布告解散国会原因文

民国正式国会，系《约法》上国家机关之一。本大总统前在临时任内，业于民国元年八月公布《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各法，当饬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督饬筹备国会事务局，克期筹备。二年一月十日，本大总统依照《约法》所定期限，发布第一次民国议会召集令。曾经声明民国正式国会为共和建设所关，共和政治之良否，政府固有完全之责任，而尤以国会为管枢等因。综计一年以来，政府对于国会经过两种时期，一为筹备，二为成立。方其在筹备时期以内，选举法令之制定，选举程序之进行，惨淡经营，谅为我国民所共闻共见。及幸而国会成立，四月八日开会礼成，不惟本大总统以为吾国数千年有史以来未有之光荣，对此庄严神圣之国会，欲其一德一心，共图盛业；即我四万万水深火热之国民，亦复延颈企踵想望太平，以为国会开幕，从此民国国家建设大计，国会政府，可以共济艰难，而革命时代所身受之苦痛，或可取偿于代议制度，徐以待共和幸福之来。凡斯种种，均出于政府尊重国会及国民希望国会之诚心。国会议员之能以国家为前提者，谅不以本大总统之言为河汉也。乃政府与国民尊重希望之愈殷，而国会常会四阅月，一法未经议决；延长会期以后，迟迟至于上年九月始议决一议院法案。其余应有职权，则悉为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而议员中之持稳健主义者，率相与太息痛恨而无可如何。因此结果，立法机关既无法之可议，行政机关亦无法之可行。本大总统之负咎于我国民者乃愈重。然本大总统则以为共和国家，究重国会，故始终以维持调护为怀，凡可以委曲求全之处，决不欲国会自损其法律上之尊严。岂意天祸吾国，事与心违，而国会议员之隶籍国民党者，竟不幸而蒙乱党之嫌疑。上年十一月四日，本大总统乃不得已而下追缴该党国会议员证书之令。惟国会为国家机关，议员乃个人资格，与乱者虽应取消，合法者仍须递补。是以令饬内务总长，从速行令查取候补当选人之合法者递补如额。无非求所以宣达真正之民意，巩固真正之共和。

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据前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中略）电称：共和国家，以法治为归宿。当破坏之后，亟宜为建设之谋。所有应行法治，千端万绪，虽急起直追，犹恐不及。民国初创，以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而成立年馀，制定法案，寥寥无几，惟以党争闻于天下。适为建设之障碍，

决无进行之计画。中外士庶，乃移易其渴望之心，属诸国会，以为国会既成，必可将各项法制，依次制定。不意开会七阅月，糜帑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欲仅如前参议院尚能立东鳞西爪之法，而亦不可得。民国前途，岂堪久待。盖因各议员被举之初，别有来由，多非人民公意之所推定，谓为代表，夫将谁欺。其有爱国思想者，固不乏人；而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者，反占优势。且人数过多，贤者自同寒蝉，不肖者如饮狂水，馀皆盲从朋附，烟雾障天。虽有善者，或徒唤奈何，宁与同尽。上下两院，性质相同，无术调剂。因之立法成绩，毫无进步，中外援为诟病，国家日益阽危。上无道揆，下无守法，赖我大总统以救国为已任，毅然刚断，将乱党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令候补当选人，以次候补。顾候补人员与前次人员资格相同，无论一时断难如额；既使如额，而八百余人，筑室道谋，仍恐议论多而成功少。现在国本初定，重要法案，何啻数百件，由今之道，以七阅月而未立一法，虽迟以百年，亦复何济。而强邻环伺，破产在即，岂从容高论之秋。我不自谋，必有起而代我者。欲不为人之牛马奴隶，何可得耶！元洪等行政人员，亦国民一分子，国苟不存，身于何有，苟利于国，遑论其他。用敢联名切恳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以各国长治久安之成式，施诸水深火热之中华。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美为共和模范，而开国之始，第一次宪法，即因束缚政府不能有为，遂有费拉德费亚会议修正之举。是役也，全体会员无不有政治之经验，其会议之所议决，多轶出原有宪法范围以外，而自操制定宪法之全权，论者不诋为违法。先例具在，可为明徵。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与美国往事由各州推举之例正同。请大总统饬下国务院，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若众意咸同，则共和政体之精神，即可因兹发轫。即例以南京政府以十四省行政官代表之参议院，其完缺大相悬殊，正与华盛顿修正宪法若合一辙。元洪等承乏地方，深知人民心理，痛恶暴乱之议员；各国论调，极亦公允，我大总统何所顾忌而不为之所。文明国议员无论何党，皆以扶持国本为宗旨，断无以破坏阻挠为能事者。现在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其余稳健议员，素知自爱，闻已羞与哙伍，愤欲辞职。虽欲固结，已属无从。留此少数之人，既无成立之希望，应请大总统给资回籍，另候召集。各议员皆明达廉洁，决不恋恋于五千元之岁俸，而浮沉于不生不灭之间，以误国家大计。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伏乞鉴核施行，民国幸甚等语。

本会议全体决议，认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应请大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况议员职务虽停止于一时，而国会尊严自确立于民国。所有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一经厘订召集，国会不患无日。与其听个人之浮沉无定，致启国民以轻视国会之心，何如求机关之进步改良，尚留国民以尊重国会之地。其现有议员，既经停止职务，如何给资之处，或依据院法所定，或斟酌财政情形，应由政府迅速筹画施行。至现有议员停止职务后，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等情，呈复前来。

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于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以慰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政府公报》，1914年1月11日）

中华革命党成立

背景介绍

在袁世凯建立封建军事专政的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左派，并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孙中山先后派人联络东北农民军和白朗起义军，还派陈乔英等组织上海起义，都没有成功。同时孙中山为重振革命精神，在日本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举行大会，七月八日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要继续完成已经失败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说：“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这个党我不要了。”他总结失败的教训，要“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严密党的组织，号召中华革命党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总结辛亥革命轻让政权于袁世凯、革命方略无从实行的教训，决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这说明，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一个远袭同盟会时期革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而不是民初国民党的蜕变。

中华革命党虽然采用狭隘的秘密结社的某些形式，但是，仍然“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不仅继承了同盟会时期民权、民生主义的全部内容，而且把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纲的主要内容，比起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前进了一步。

中华革命党建立前后，正是袁世凯破坏《约法》，图谋复辟的时候。孙中山在国外创办了大量报刊，深刻地揭露了袁世凯"神奸窃柄，金壬弄权，专制炎威，炙手可热"的严重罪行，号召人们为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奋斗。他自己也在1915年、1916年三次发布《讨袁檄文》和《宣言》，历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为"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表示为推翻袁氏专制独裁统治，"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

材料：

-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 中华革命党党章

材料一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孙中山日益明确的认识到：革命事业要者有三，即立党、宣传、起义。其中首要是立党。他坚信，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为此，孙中山不顾面临的种种困难，倾全力于创建中华革命党的事业之中。

鉴于前车之失，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新生的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坚固的宗旨，党员有纯洁的志趣"，朝气蓬勃，具有旺盛战斗力的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在东京"发起重新党帜"。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这天，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首立誓约，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其誓约全文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孙中山特别在誓约中提出，"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本意想借此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入党者在誓约上打指模是克服异党入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但是，由于孙中山片面地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甚至错误地认为服从他，就是服从他所主张的革命，服从他的革命，自然应服从他。这种思想驱使他固执地改变了同盟会时期民主选举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借用了旧式会党的落后组织手段。其结果使秘密发展中的中华革命党染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这不但对他党有讨袁之心又有所归向者，表现为简单排斥，就连许多昔日风雨同舟的人也难以接受。一些老同盟会员指出，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中华革命党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孙中山强调树立领袖的权威，同封建意义的独裁专制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既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他主动挑起再举革命的重担，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领袖的作用。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二　中华革命党党章

第一条　本党名曰中华革命党。

第二条　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

第三条　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第四条　本党进行帙〔秩〕序分作三时期：

一、军政时期

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

二、训政时期

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

三、宪政时期

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

第五条　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发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力为其难，为同胞造无穷之幸福。

第六条　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

第七条　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

第八条　凡党员须纳入党费十元，每年捐一元于本部；惟前时曾致力于革命及现在为革命奔走者悉免。其有额外义捐巨资者，照事前筹饷章程办理。

第九条　每党员至少须介绍新进一人，方完义务。其有于革命军起义之前介绍新进百人者，记功一次；千人者记大功一次，照酬勋章程办理。

第十条　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

第十一条　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

第十二条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

第十三条　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

第十四条　凡有功于本党或曾在本党人员之麾下服务一年者，虽未照第七条之手续进党，若得党员十人之保证，可补立誓约，请本部追认为首义党员，得享元勋公民之权利。

第十五条　本党公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

第十六条　总理有全权组织本部为革命军之策源；协理辅助之或代理之。

第十七条　本部各部长、职员悉由总理委任。

第十八条　各地支部长由各地党员推荐，总理委任。

第十九条　本部之组织如左：

一、总务部；

二、党务部；

三、财政部；

四、军事部；

五、政治部。

第二十条　每部任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职务长若干人，职务员若干人。

第二十一条　总务部之职务如左：

一、总务部庶务；

二、接洽内地支部；

三、接洽海外支部；

四、制管公文符印；

五、交涉党外事宜；

六、办理不属他部之事。

第二十二条　党务部之职务如左：

一、主盟新进；

二、存管誓章册藉〔籍〕；

三、调查党员履历；

四、招待外宾；

五、传布宗旨。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之职务如左：

一、管理党中度支；

二、接收支部党费义捐；

三、筹集事前款项；

四、规定因粮方法；

五、计划事后财政。

第二十四条　军事部之职务如左：

一、物色并培育将才；

二、调查各省敌情；

三、计划作战；

四、运动敌军；

五、调查并购制武器；

六、筹备军政。

第二十五条　政治部之职务如左：

一、物色并培育政才；

二、筹备中央政府；

三、规划地方自治；

四、审定建设规模。

第二十六条　凡属党员，皆有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故统名之曰协赞会，分为四院，与本部并立为五；使人人得以资其经验，备为五权宪法之张本。其组织如左：

一、立法院；

二、司法院；

三、监督院；

四、考试院。

第二十七条　协赞会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由总理委任；各院院长，由党员选举，但对于会长负责任。

（说明）所以由总理委任会长、副会长者，为统一党务起见；若成立政府时，当取消正副会长，则四院各成独立之机关　，与行政部平行，成为五权并立。是之谓五权宪法也。

第二十八条　立法院之职务如下：

一、创制各部规则；

二、提议修改总章；

三、批准支部章程；

四、筹备国会组织。

第二十九条　司法院之职务如下：

一、裁判各部或职员之冲突；

二、裁判党员之争执及处罚事宜；

三、裁判各支部、分部之冲突；

四、筹备司法院之组织。

第三十条　监督院之职务如下；

一、监察党务进行；
二、责备党员服务；
三、察视党员行为；
四、稽查党中账目；
五、筹备监督院之组织。

第三十一条　考试院之职务如下：
一、考验党员才干而定其任事资格；
二、调查职员事功而定其勋绩；
三、筹备考试院之组织。

第三十二条　支部为各地之自治团体，得自行议立章程，请本部批准，并推荐支部长，请本部总理委任。

第三十三条　支部长得便宜行事，派委人员在其附近地方设立分部，而直接统辖之。

第三十四条　分部发达至万人以上者，能自立为支部，直接受本部统辖。

第三十五条　凡国内及海外各种政治组合及爱国团体，人数过万，有欲归属本党者，须照章写立誓约，缴入党捐，便得为本党支部。

第三十六条　国内支部，专事实行；海外支部，专事筹款。所事虽异而成效无别，故于革命成功之日，国内、海外各支部同一享参政之权利。

第三十七条　革命政府成立之后，每支部得举代表之人以参预政事，组织国会，并各种补助机关，以助政府之进行。

第三十八条　各支部皆有权推荐人才，政府当量才从优器使。

第三十九条　本党总章之修改，须由立法院之提议，得本部职员及协赞会职员三分之二决可，乃得修改之。

（摘自《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约法出台

背景介绍

袁世凯早就对孙中山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十分不满，多次提出要求修改。1913年2月，他雇佣一些官僚政客成立了宪法研究会，专门研讨专制政治的各种宪法。10月16日，袁世凯一当上正式总统，就提出增修《约法》案，把由于自己倒行逆施所造成的一切流弊统统归罪于《临时约法》，说："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临时约法》"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总统，则其困难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缚于《约法》"。为此，他要求增修《约法》，并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同时，他提出要求拥有宪法公布权，"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

这时，主要由国民党议员参加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将次第完成，正准备通过时，袁世凯突然于10月22日咨照国会，要求派遣施愚、顾鳌等八人为委员，参加一切有关宪法的会议，代其陈述意见。袁世凯的无理要求遭到了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严词拒绝。他恼羞成怒，于25日通电全国，诬称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家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

袁世凯一声通令，其分布在各省的党羽、政客群起应和，竭力攻击《天坛宪法草案》，诋毁国民党和国会，从而酿成了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的巨案。

约法会议本来就是袁世凯一手导演出来的，自然视袁世凯的旨意为转移。3月18日开幕以后，首先确定以"力谋国权之统一"，"但求统治组织无所变更"作为增修《约法》之主旨，"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经过"历时四旬"的起草决议和反复讨论，约法会议终于制定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由袁世凯公布。

材料：

- 约法会议
- "造法"运动

材料一　约法会议

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各省军政长官联电政府咨询政治会议以救国大计，除请资遣国会议员外，并请修正民国根本法，略谓："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美为共和模范，而开国之始，第一次宪法即因束缚政府不能有为，遂有费拉德费亚会议修正之举……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与美国往事由各州推举之例正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政府复咨询政治会议以增修约法程序，令仰并案讨论办法具复。

政治会议于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开会提议，经各议员就大体上一再讨论，以为此案关系重要，应先行审查。当由议长依据《政治会议规则》第十条，指定蔡锷、饶汉群、许鼎〔鼐〕霖、《政治会议规则》第十条，指定蔡萼、饶汉群、许鼎霖、朱文劭、顾鳌、姚震、梁建章、沈铭昌、孙毓筠、邓熔、方枢、那彦图、贝允昕、王印川、陈瀛洲等为审查员。各审查员于三年经政治会议于一月九日开正式会议议决，即日呈复大总统裁夺施行。原文略云：

本会议以为约法之应行增修、与增修案之得由大总统提出，揆之法理事实，均属毫无疑义。本会议所当讨论

者，即系以何种机关议决此项增修案之问题。……本会议依据法理，参之事势，佥以为宜于现在之咨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既可示天下以尊重《约法》之意，且与该兼领都督等以时势造法律之意相符。……且有此一造法机关，将来《约法》修定以后，凡附属于《约法》之各种重要法案，即可由其制定。……。

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并希望此种造法机关如果设立，应请召集各地方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之员，妥慎组织，以符尊重造法机关之本旨。

政府据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特设造法机关，以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之各重要法案，即准如议进行。惟以此种造法机关，究应如何组织？应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及议员选派方法，应如何妥慎规定？特再咨询政治会议克日议决具复。

政治会议于三年一月十六日开会提议，经大体讨论后，即决定派员审查，当即指定蔡锷、许鼎霖、刘馥、顾鳌、方枢、王印川、李庆芳、邓熔、朱文劭、孙毓筠、刘邦骥、黎渊、贡桑诺尔布、林万里、陈瀛洲等为审查员。该审查员等于一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两次开会审查，多数议决，拟具《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附具意见书，提出报告。政治会议复于一月二十四日开正式会，经各议员先行议定大体，复逐条讨论，均经全体议决，当日呈复。

袁氏据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二十二条，即于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施行。依该条例所规定，约法会议议员由京师选举会选出四人，各省选举会每省选出二人，蒙藏青海联合选举选出八人，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会选出四人，各该选举会分别以内务总长、各省民政长、蒙藏事务局总裁、农商总长为选举监督。凡选举人必须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三十岁以上之男子，而具有四种资格之一者：(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而通达治术者；(二)曾由举人以上出身而夙著闻望者；(三)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而研精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选举人均由选举监督调查认定，列入选举人名册。至蒙藏青海，得以在京之王公、世爵、世职及其他相当人员充选举人；全国商会联合会得以在京之职员，及其他殷实会员充选举人；各由选举监督认定列入名册。

约法会议议员被选举人之资格更严，由选举监督调查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三十五岁以上，而具有三种资格之一者，列入被选举人名册：(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五年以上而确有成绩者；(二)在内外国专门以上学校习法律政治之学三年以上毕业，或曾由举人以上出身，习法律政治之学，而确有心得者；(三)硕学通儒，富于专门著述，而确有实用者。

约法会议各选举会之选举，用记名单记投票法，以得票较多数者为当选。当选人由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审定后，给予议员证书；如不合格，由各该选举监督开会另选。约法会议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议员互选，以得票过半数者为当选。投票至二次无人当选时，以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决选之。

政府于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时，并一面令饬各选举监督遵照，俟关于选举程序之施行细则订定颁布后，即各切实进行，俾此项特设造法机关得以克期成立。又设立筹备约法会议事务处，饬将选举事宜，次第筹办。旋各选举监督先后报告各当选人均依法选出，复经议员资格审查会审查完竣。至三年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举行开会式，出席议员四十四人，选举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议员除浙江、广东、云南应各另选一人外，共五十七人。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大学出版社）

材料二 “造法”运动

约法会议成立后，袁大总统于三月二十日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咨交约法会议开会讨论，咨文中有最扼要之语云：

窃以民国草创，根本大法虽不能不取法于共和先进诸国，而事事削足适履，究其实，或将以利吾国者始，而害吾国者终，福吾民者求，而祸吾民者应。……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宪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

旋约法会议即依照袁氏所提《增修临时约法大纲》七项，另行议定《中华民国约法》，由政府于三年五月一日公布。此约法标题无“临时”字样，盖已接受袁氏之意见，认定建设国家应有两种时期，《约法》并非施行于短时期也。自此约法公布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均毁灭无余。

自《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大总统选举法》之基础即不免有动摇。第一，《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大总统之机关，为由国会议员所组织之总统选举会。《中华民国约法》所规定之立法机关为立法院，采一院制，法律事实均有变更。第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中华民国约法》采总统制，不设置国务院，将来关于摄行总统之职务，无其他法定机关。第三，《大总统选举法》附则明定大总统之职权，暂依《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之规定。《临时约法》既因《中华民国约法》施行而废止，则该附则所谓“暂依”，已

失其根据。且《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所规定大总统之职权，范围广狭悬殊。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以《大总统选举法》与现行新《约法》抵触之点甚多，并以约法会议有修正与宪法效力相等之《约法》之职权，自可修正属于宪法一部分之《大总统选举法》，爰于八月十八日开会议决，建议大总统转咨约法会议将《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分别起草议决。

约法会议即将大总统咨交参政院建议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案列入议事日程，于八月二十六日开会讨论大体。复于九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后开会详加讨论，议决《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咨由大总统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

约法会议原以议决增修约法案及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为其职权，除议决《中华民国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外，经先后议决《参政院组织法》，咨由政府于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立法院组织法》及《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均于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布。后约法会议又依《中华民国约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议定《国民会议组织法》，由政府于四年三月十二日公布。四年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以议事告竣，宣告闭会，历年刚一年。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大学出版社）

日本侵入山东

背景介绍

一九一四年9月2日，日军在山东黄县龙口登陆，开始入侵山东。此前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互相厮杀，暂时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以英日同盟为幌子，积极展开参战活动，目的在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2000余人突然在山东龙口登陆，强占电报局，不许中国商民发电报，又派兵占据附近村镇，断绝交通，强迫商会为其供应骡马车1000辆及夫差数百人，还发生军用钞票，强制中国人民使用。9月3日，又有日军3000人登陆。同一天，北京政府一面提出“抗议”，一面照会各国公使，划定山东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地方为日、德交战区。日军在龙口停留5天后，便向平度进军。9月10日，日军侵占平度。17日，日军占领胶州火车站。26日，日军越出交战区，占领潍县车站。10月5日占领青州，6日进占济南车站，将胶济铁路全线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11月7日，日英联军侵占青岛，德军投降。至此，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全部为日本攫取。

材料：

- 日本对德宣战
- 外交次长曹汝霖会见日本公使

材料一　日本对德宣战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以“日英同盟”及“确保东亚和平”为借口，向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胶州湾租借地限于九月十五日以前无条件地交与日本，以便将来交还中国。以上两项，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以前如无满意之答复，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措置。

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公开表示：“德国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八月十六日，日本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自行破坏中立。

八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要求将山东省黄河南岸地区划作非中立区，袁政府予以拒绝。二十九日，日本退一步要求将潍县、诸城以东地区划作战局，并称无论中国同意与否，日本势在必行。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无满意答复，正式宣布对德作战。

中国中立受到破坏后，九月三日袁政府不得已援引一九〇四年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行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这就是将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则为中立区。二十一日袁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但是日本毫不顾及中国的声明，仍然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它扬言可在六小时之内攻下青岛。守青岛的德军一共只有六千人。德皇电令他们“必须战至最后之一人”。德国胶州总督华德克在日军进攻青岛之前，也夸称、日本攻占青岛，必须付出四万人的代价”。青岛德国当局仿照英国香港总督对待德侨的办法，在青岛的英国领事和英侨倘能安分守己而不违反当地的战时法规，准其照常居住、照常营业。但是对待非敌国的中国人民，他们却采取了横蛮无理的态度，除强迫劳动人民替他们挖掘战壕、搬运军用物资外，其余的中国居民都限期出境，过期如未迁出，则在战事结束以前不许离境。中国人在银行中的存款不许提走。青岛原是前清遗老和宗社党的“世外桃源”，此时以载洋为首的清室贵族都被迫迁回到北京来，遗老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都离开了青岛，只有宗社党头子“恭亲王”溥伟不肯走。

日军并无意于立即攻占青岛，它的兵力逐步向西发展。在日军登陆的同时，就有四百多日本人改穿中国人的服装，来到济南，分别住在外国旅馆里，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中国警察不敢施以检查。日军长驱无阻地进入到胶济线，九月二十五日占领潍县车站，十一月五日占领青州车站，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中国军队奉令不许抵抗。

对于日军侵占胶济线以及它的种种强盗行为，袁政府除了提出抗议外不能更有所作为。日本公使公然强词夺理地回答一个照会说："山东铁路为德国财产。胶济路所到之地，即胶州湾租借地延长之处。日本为破坏德国之根据地，占领胶济路及济南，殊属正当，与中国毫无关系。"

十一月七日，日军攻下青岛。德军被俘者二千三百余人。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电令，叫他们毋庸死守。十一月十四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强占青岛的第十七周年。

青岛既被日军攻下，袁就请日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将占领山东各地的军队撤退，日本政府不但仍然置之不理，而且在山东各地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日本的领土。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二　外交次长曹汝霖会见日本公使

小幡云：青岛税关派员组织事，顷接本国政府训令，谓十一月二十七日，贵国陆公使往晤松井次官，松井次官告以照中德约例，应全用日人，无杂用英国人之理由。乃二十九日陆公使忽以公文知照，谓中国政府已派定立花，发表不便更易云云。查此事尚未经彼此商妥，而贵国政府突然派员发表，本国政府决难承认。

次长云：此事并非突然发表。贵使馆得贵国政府之训令，谓日政府希冀全部用日本人，系于二十五日收到。先是本部于二十四日致陆公使一电，告以政府现拟定两办法，一为派英人充正税司，日人为副。一以日人为正，英人为副。惟于青岛根本问题未解决以前，以日人为正亦可。现在政府亟须派员前往，以便实行，令其催询贵国政府速复。嗣于二十五日，贵代理公使以贵国政府全部用日人之训令，通告本政府。乃于即晚复电陆公使，告以正税司派日人，不派副税司，其余关员则不拘定。二十六日接陆公使二十五日所发之电，谓松井次官言日本政府不满意于黑泽，且有英人只能用作书记之语。中国政府为重视日本政府之意，故于二十七日派定大连税务司立花前往，此正为副日本政府之希望。何云突然。

小幡云：二十三日贵次长来晤本官时，本官曾告以日本政府希冀全部用日本人，若中国政府突然发表，则有未妥。

次长云：贵代理公使并未言及突然发表之语。

小幡云：此事于彼此商议未定之前，贵国政府突然派员发表，现接本国政府训令，谓贵国政府如此任意办理，是为漠视迭次往来之交涉，认为贵国政府于手续颇有欠缺，本国政府甚不满意。

次长索阅该国政府训令，日政府训令中有，中政府如果如此任意办理，虽言明该税关不交还中国亦可之语云。云：然则此项税关，是否认为中国税关。

小幡云：是中国之税关。

次长云：即为中国税关，则中国政府有派关员之权，自无疑义，原无通告日政府之必要。当日税务处早经派定人员，本拟前往接办，因有日置公使之提议，是以暂缓派往。且该税关派员事，曾经询问总税务司，按照中德约例系如何办理。据总税司云，一面发表，一面通告德使。此次既系如此办理，并无不合之处。

小幡云：贵国虽有派税关员之权，然未与日本商妥，万一日本军政署不许其入青岛，又将如何。

次长云：立花亦为日本人，以日本政府不许日本人入青岛，本次长尚信不至有此事。

小幡云：立花为中国雇佣之官，亦属无法。况纵令许其入青岛，而不许其行税务司之职务，又将如何。

次长云：青岛税关为中国之税关，中国派往之关员而不能使其行使职务，贵国何以对公论。

小幡云：青岛税关之建筑物及其财产，应属于中国，若行使税关之职权，则仍非与日本协议不可。

次长云：该关之岁入不过一百余万，纵令抛弃之，亦所不惜，特既为中国之税关，自不能不派员接办。总之，税务司既经派定，不能更易，以后关于选派关员及其他各事，再行彼此商议，未为不可。

小幡云：本国政府对于派定立花之事，不能承认。

次长云：然则取消立花，贵国政府尚有何种办法。

小幡云：此节未接奉政府之训令。

次长云：取消立花，又无别项办法，万一中国政府另筹他法，而贵国政府又不承认，又将如何。

小幡默然。

新约法之政事堂

背景介绍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国务院为内阁制，政事堂为总统制。根据（新）约法，国务院改政事堂，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各部如下：

外交　孙宝琦(四年一月,改陆徵祥)
内务　朱启钤
财政　周自齐(四年四月,改周学熙)
陆军　段祺瑞(四年五月,王士珍署)
海军　刘冠雄
司法　章宗祥
教育　汤化龙(四年十月,改张一麐)
农商　张謇(四年四月,改周自齐)
交通　梁敦彦

政事堂各部,循国务院之旧,惟农林、工商两部,并为农商部,系张謇主张。张与我谈及,我言:"农商两字,不能赅工,何不名为农工商部?"嗣以各部均两字,故农商亦用两字。此屡来言官制者之通病。张任农商,我问:"何不与伯唐、任公一同去职。"张言:"因多年经手实业关系,暂时尚未能摆脱,非恋恋一官也。"

政事堂又设左、右丞。盖参仿宣统年间东三省总督设左、右参赞例,杨士琦为左丞。袁以汤既就教育,拟以我为右丞,嘱杨士琦告同乡周树模约我担任,我固辞。内务朱启钤约我为内务次长,此时吾母正病,力陈:"母病不能任事。"逾日,吾母弃养,辞职。

我在居忧期内,声明不担任任何职务。即在家读书,自定课程,研究政治、经济、法律各科。日到法政专门学校,随同学生听讲,回家,搜考各科译本,又作学生时代生活,几与外间隔绝。其时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任我秘书长,我以母忧辞;又任我参政等职,俱不就。

自筹安会起,徐世昌不表示意见,及帝制将实行,十月二十六日徐辞国务卿职,以陆徵祥暂兼代理。

材料:

·徐世昌出山

材料　徐世昌出山

徐世昌肯到北京来"俯就"国务卿,是袁很高兴的一件事情。这位"前清遗老"并不是当真的"耻食周粟",早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举行所谓清朝光绪帝后"奉安"典礼时,他秘密到过北京一趟,自称为了参加典礼并乘便祝贺老朋友就任大总统而来。他表示不受袁所颁给的勋一位。

一九一四年二月,袁又派徐的门生王揖唐到青岛,迎接他到北京来参加政府。他看见老朋友权威日盛,而且对他情意殷殷,乃于三月二十九日又一次来到北京。袁于五月一日任命他为国务卿,他表示不愿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更番前往劝驾,他开始还是装模做样地不肯出来,随后又改变口气说:"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姑且出来过过渡,希望早觅替身,至于民国的官俸,我是绝对不受的。"

袁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出来改作"政事堂",自己搬在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此后经常跑过来和徐谈天,他吩咐手下人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虽然他口称不受民国的官俸,但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四千元送给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徐觉得受之无愧而笑纳了。

袁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并不是要把老朋友找出来同享荣华富贵,而是看中他是这个时期最适宜的政治工具。袁敢于与全国人民为敌,却最怕别人骂他篡了清朝的皇位。他不愿把帝制自为的真面目过早地暴露出来,利用徐出面,同时大批起用清朝遗老和旧官僚,就可以混淆一般遗老的视听,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对旧朝"不能忘情"。

徐的国务卿发表,暗暗叫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想做国务总理;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没有想到袁竟会把这个老古董搬出来,把他的好梦吹散。在此以前,袁曾指定总统府纯一斋为杨的下塌地,以便"秉烛夜谈"。自从徐"拜相"的一天起,杨就绝迹不到纯一斋了。

政事堂设有左右丞各一人,左丞为袁的智囊杨士琦,右丞为徐的旧僚属钱能训。总统府机要秘书张一麐被调为政事堂机要局长。

徐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呈送履历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五月二十九日为农历端午节,他戴上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的身分参加了清室的节宴,并向溥仪叩头拜节。由于这些怪现象,外间就有袁将通过徐恢复"大清帝国"以及各部次长将用满族充当的一些怪消息传布出来。

(摘自《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

历史内幕

“名流内阁”倒台记

熊(希龄)内阁从上台的一天起,关于财政总长的人选就与袁的意见相左。袁虽允许熊自兼财政总长,暗中却指使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在财政上掣他的肘。由于各省军阀声势汹汹地向内阁讨索军饷,熊没有方法应付,就建议大举裁兵节省财政开支,全国陆军以二十师为限。这个建议立刻受到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坚决反对,甚至在国务会议上拍案大骂,使熊置身无地。

熊是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他和湖南都督谭延闿私交极深而且以前同为君主立宪派。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到北京来听候处分,熊没有力量替他帮忙。熊知道北洋军的纪律很坏,当谭延闿撤职一事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建议调任云南都督蔡锷为湖南都督,以免北洋军开入湖南。蔡不仅是湖南人,而且又是进步党首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熊向袁极力保证蔡是拥护“中央”的,“国民党在湖南的力量已经消灭,就没有派中央军到湖南的必要。中央军到湖南,只能引起湖南人的排外感,有害于湖南而无利于中央”。他所说的“中央”是指袁,“中央军”就是北洋军。

正像以前唐内阁建议调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情形一样,袁对熊的意见表示可以接受。但袁从来就是口是心非的人,他把湖南看作国民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为了贯彻他的武力统一政策,他派北洋军到湖南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而且蔡锷也正是他所疑忌的一个对象。不久他就派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并且把蔡锷调到北京来加以软禁。

汤芗铭迎合袁的心理,在湖南大兴党狱,杀人如麻。北洋军把湖南当作他们的征服地,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旅京湖南同乡经常向熊控诉北洋军无法无天的暴行,请他以内阁总理的地位“为三千万湖南人请命”,但他无能为力。他最怕别人骂他“卖省求荣”,而他恰恰扮演了这样一个可耻的角色。

但是尽管如此,“名流内阁”还是不肯下台,还在百依百顺地为袁服务。到一九一四年年初,袁不仅不需要这个工具,甚至十分厌恶这个工具了,就授意党徒把热河行宫盗宝一案登在报上,借以打击熊的威信。熊函请内务部转知警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竟将原信照转到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竟在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字。在官权极重和官官相护的时代,对现任内阁总理如此不留情面,这是前所未闻的一件怪事。很明显,没有袁的指使,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怪事的。

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熊才称病请假,到二月十二日才解除职务。袁派孙宝琦代理内阁总理。“名流内阁”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成立到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时间不到半年。“名流内阁”做了许多亏心事,呕了许多龌龊气,最后赢得全国人民的唾骂,退出政治舞台。“名流内阁”倒台后,除张謇留任农商总长外,熊得到全国煤油督办,梁启超得到币制局总裁,都是有官无职的空头衔。他们像是做了一场春梦一样。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霸王请客——黎元洪被逼进京

在与国民党作战前,袁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送到武昌,以示对黎的宠异。国民党失败后,他又亲笔写“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大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门外。

黎对袁的某些疑云渐渐吹散了,觉得这个人虽具有使权用诈的手腕,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感情为重的,因而也是够朋友的。他不但在军事上、在政治影响上给袁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很大的支持,而且参加了战后大举屠杀人民的实际行动。举一事为例。国民党中湖南人很多,因此湖南人所犯的“乱党”嫌疑也很重。讨袁战争失败后,袁政府颁布了“惩治乱党”条例,旅居外省的湖南人被滥捕滥杀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湖北靠近湖南,住在湖北的湖南人比其他各省更多。湖南“革命元老”谭人凤有一封质问黎的信,说黎“专以仇杀湖南人为能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居住自由权、行动自由权皆被剥夺。”这就是这个“悲天悯人”的“忠厚长者”为了讨好袁做出来的血腥罪行。

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黎对袁由怀疑的心理转变为心悦诚服,由中间派的身分下降到走狗的身份。八月五日,报上登载以他为首的各省都督和大军官请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联名通电,这还可以说他是被动列名的,是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十月间,他有个人私电请袁“奖叙袁克定翊赞共和之功”。袁克定就是袁的大儿子,献媚献到下一代,这就只能说他是厚颜无耻。他说出这种难以启齿的话来,即使是“家天下”的独裁者,也不得

不报之以委婉谢绝的电报。

即使黎对袁恭顺有加，袁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革命伟人”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子上。不难理解，一代枭雄的袁，心肠和手段都狠毒到极点，不是奴颜婢膝所能取得他的信任的，何况黎既非他的嫡系，而又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偶像”！因此，他从未间断地想借一个题目把黎调到北京来，免去其湖北都督，像以前清政府调他自己为军机大臣而免去其直隶总督一样。

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就是想用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来交换他的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一会儿要他“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又要他“兼领湖南都督”，也不外乎是采取逐步的和走弯路的方法，想把他调出湖北来。

前面早已说过，袁预定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由于黎完全倒在袁的方面与国民党为敌，袁不便使用“假道伐虢”的伎俩。国民党失败后，袁不止一次地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事实上是“请君入瓮”。这个“老实人”对切身利害的问题却看得非常清楚，他推三阻四地没有吞下这个香饵。如果袁用军事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师出无名，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而且有可能激成事变。到十一月间，袁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方法，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去劝驾。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第一号大将来邀请贵宾，这绝对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黎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消息。

十二月八日段到汉口时，黎就知道不北上已经成为不可能，曾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他表示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与黎只匆匆地见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九日就面催黎启程北上。黎走到半路上，十日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问题终于弄明白了，派第一号大将亲自出马，显然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回湖北的双重任务。黎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的。要调动这样一个目标大的人物，就不能不派另一个目标大的人物接替他的位子。国民党已经完全失败，袁已经不怕把黎“逼上梁山”，所以才敢于采取这个“霸王请客”的办法。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部马车正是上年八月用以迎接到北京参加所谓四巨头会议的孙中山的。黎所受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孙中山。袁立刻规定副总统月俸一万元，每月办公费二万元，比起上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规定每月月俸三万元，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袁指定以瀛台为黎的馆舍，这正是以前西太后软禁光绪帝的地方。

这个时期，黎在政治上还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因此袁又找黎的同乡汤化龙做现成的媒人，进行袁黎两家的联婚手续。把下代的婚姻作为自己权利地位的担保品，这也是宗法社会的一种典型作风，袁正是利用这些手段来巩固和发展他的个人势力的。最可笑是，双方还没有完成定婚手续，袁就赶着黎叫“亲家”，叫得十分亲热。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请“亲家”过来一同吃饭，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这件东西真名贵”的一句话，袁立刻解下来执意地要送给“亲家”。这又是奸雄收买人心的一套惯技。

黎已经知道他由政治俘虏进而做了名副其实的俘虏，乃于十二月十九日呈请辞去湖北都督兼职。这个辞呈又是“词章名家”饶汉祥代拟的，文中充满着酸腐的气息，如说“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袁在批准辞呈的指令中也用酸腐来回答酸腐，有云：“听夕握谈，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座，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

黎当然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的名义周游列国一趟。袁怕他一去不返，就用拖延的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段祺瑞在“权代”湖北都督的短时期内，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黎的力量铲降，把北洋军开到湖北，从此湖北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段是袁身边的得力助手，不能长期地放在外面。袁本来是预定以另一段（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的。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段祺瑞于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再任陆军总长，袁就发表了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的命令。

段在北京与黎相见时，不象像那样虚伪，脸上显露着一种倨傲之色。原来他在辛亥年做过清政府的护理湖广总督，认为黎仅仅是当年的一个协统，而此时也仅仅是袁的一个政治俘虏，是不值得加以重视的。

（摘自《北洋时期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

肃亲王善耆和宗社党

一九一一年，宣统皇帝退位，我父亲首先偷偷地跑到天津；川岛速浪得知，也来到天津找我父亲。那时，我父亲虽不甘心宣统退位，不愿意受革命党的统治，但心里尚无一定的打算。川岛速浪探明我父亲的思想，声称日本可以帮助想办法，并劝他到旅顺居住。我父亲答应了。复经川岛速浪从中联络，驻旅顺的关东军督都福岛安正大将即派日本军舰“千代田”到秦皇岛等候，我父亲则带着家人溥宽从天津乘火车潜往秦皇岛，然后登上日本军舰到了

旅顺。后来我才知道，在他离开天津逃往旅顺的路上，他还写了一首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首看峰火，中原落照红。"反映了他这时已决心投靠日本了。不过因为家里人当时还不知道，大家还很挂念他。

一九一四年，大限重信组阁当了首相，小川平吉当了铁道省大臣。大限重信和川岛速浪等，便进一步策划利用我父亲进行复辟活动。记得那时我们家也像遇到喜事似的，喜气洋洋。我二哥宪德表现得特别神气，时常到我父亲屋里谈话，谈"风外"(川岛的别号)又来了电报等等。每逢此时，我母亲便把我们领出来，让他们爷俩秘密谈话。有时我想问他们谈些什么，我母亲就说："国家大事，小孩子不用问。"但是我却由当时的气氛中感到，好像我们家不久就要时来运转了。那时，我家一个当差的还向我父亲说：现在大家都把大清国叫做"前清"，那么既有前清，就一定会有"后清"了。我父亲听了，非常高兴地夸奖了他。

宪德到了东京，就在大限重信的策划下组成了"宗社党"。据我所知，宗社党的本部设在东京，大连、海拉尔设有支部。宗社党成立时照了一张相，前排正中坐着宪德，穿西式礼服；左首坐着升允(曾任陕、甘总督)穿长袍马褂；右首坐着头山满(日本浪人)，另外还有数人，我不认识。川岛速浪、宫岛大八(日本浪人)、青柳××(大限重信的秘书)、山田修(护送我们到旅顺的)、工藤铁三郎(后为溥仪警卫处长)、若日太郎(后为大连市长)等三十多人。

宗社党的主要人物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以及升允、巴布扎布等。溥伟的祖父是咸丰皇帝的第六子恭亲王奕䜣，溥伟是他的嫡孙，有继承光绪作皇帝的资格，本人也有这个野心。后来溥仪当了皇帝，他心中不满，辛亥革命后，他跑到青岛，想依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来大连居住，与日本建立了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他想试探东北人心的趋向，特地到沈阳祭陵，不过那时日本正在扶植溥仪上台，把他赶回了大连。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他一个职位，就连零钱也不肯给。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新华旅社里。

宗社党成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除了进行政治活动外，还策划巴布扎布举行了武装叛乱。巴布扎布原是一个蒙古匪徒，日俄战争时，因引导日军中沼挺进队，深入到俄军后方破坏了开原的新开河铁桥，使奉天方面的俄军受到了很大损失，因而很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赏识。川岛速浪把他介绍给我父亲，加入了宗社党。巴布扎布举行暴乱以前，先把他的两个儿子农乃与甘珠尔扎布送到我家上学；我父亲则把七子宪奎送到他的军中，实际上是互相交换人质。宪奎临走时，还另外起了个名子叫金壁东，意思是东方的一个壁垒。同时，川岛速浪也派了几个日本人来，同宪奎一起经奉天、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了哈拉哈河巴布扎布的军中。此后不久，巴布扎布便率所部三千多人，扯起龙旗，举行了叛乱。这股叛军由哈拉哈河经索伦、突泉、郑家屯、梨树，一直打到了郭家店。与此同时，我父亲也用由大仓喜八郎那里借来的钱，从关东军买了野炮四门、步机枪三千多支，由川岛速浪派来的退伍炮兵中尉西岗大元和工兵大尉入江錘矩等，准备在郭家店方面进行接应，一齐攻打奉天城。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大限重信内阁倒台了，对我父亲的援助也告停止。巴布扎布由郭家店退往哈拉哈河的途中，在林西被部下杀死，这次叛乱就这样失败了。

善耆不但自己积极进行复辟活动，还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其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到旅顺以后，他把子女们全部送进日本学校，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因此，一九二二年他死了以后，他的一些子女也搞起了叛国活动。

在这以前，善耆的七子金壁东已就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后来又任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善耆的女儿金壁辉(川岛芳子)成了著名的日本间谍。后来，我也参加了伪满洲国的军队，曾任军医少将等职。

(宪均)

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一九〇五年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克强先生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指挥了钦廉、镇南关(今睦南关)和黄花岗各次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的声势震撼了清朝政府，也显示了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此后辛亥武昌首义，获得了十七省的响应，终于推翻清廷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选举了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孙、黄两先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接着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却曾一度发生过意见上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讨袁军事与整改党务两个问题上；尤其关于整改党务的问题，克强先生所持意见完全与中山先生相反。因此，当时外间对于孙、黄关系多滋猜议，反动派更是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其实，在革命主张上，黄克强先生始终服膺中山先生，矢忠民国，直至后来在策划护国军云南起义的时候，也能够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精诚团结无间；在党务方面，克强先生也终能化除成见，服从中山先生的统一领导。现在就我个人记忆所及，将讨袁前后的一段经过事实，谈出一鳞半爪，以供了解孙、黄两先生关系的参考。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山先生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统辖南方各省的革命军。南方的革命军在辛亥起义以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加。未几，南北和议达成，溥仪退位，中山先生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让出政权的条件，向临时参议会辞职

并荐袁世凯自代，想从此奠定共和民国的基础。袁世凯原无拥护共和诚意，对于南方革命势力多所畏忌。他初则借口北方重镇，不能轻离南来，于同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继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縻饷过巨，南北既已统一，国民希望和平，倡议裁兵。克强先生当以既经让出政权，为了表示和平建设，也同意裁兵倡议，当既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各省多数革命同志，起初对此举是不愿意的；但是，克强先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是要想训练精兵，也必须先裁冗兵。各省同志一方面感到兵增饷绌，另方面恐怕加重人民负担，也就奉命执行了。裁兵之后，克强先生随即撤销南京留守府，随中山先生北上，着手筹划全国铁路建设事业。而袁世凯在各省进行裁兵的同时，急图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于是进一步采取了阴谋措施，首先假军民分治之名，在各省设立民政长以削督军之权，继又增设护军使，直接受其指挥调遣。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孙、黄两先生电召各省重要同志到上海开会商讨对策，我由湖南奉召参加。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认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全党同志对此极为悲愤，必须乘机立即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罪致讨；并认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为时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还未妥贴，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

讨袁军事失败，孙、黄两先生和各省革命同志只得东渡日本，以图再举。中山先生总结失败经验，认为宋案发生后本应立即兴师讨袁，不应等到大借款成立以后方始举事，以致袁世凯得以从容布置，使革命军遭到失败。因此，中山先生对于克强先生颇有责难。关于党务方面，中山先生认为党内精神涣散，行动极不统一，必须恢复民国以前的精神面目而加以严格的整肃，因而决意另行筹建中华革命党；原来的国民党党员，志愿参加的，也必须各具誓约，服从党魁一人之统率，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克强先生则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在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而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他不同意中山先生另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表示他个人决不参加。当时两人的态度都很坚决。中山先生虽然一时不能说服克强先生，但仍积极筹建中华革命党，而将协理职务仍然虚以待黄。当中山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各省重要同志二十余人一方面拒绝参加，另方面又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中半数为湘籍。陈英士方面的人早就觊觎协理一席，欧事研究会的出现，更使他们振振有词了。当时还有少数叛徒已被袁世凯收买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尤其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克强先生因奔走革命多年，已染胃病，亟思易地疗养，乃向中山先生表明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于一九一四年春离日游美。中山先生对他仍然极表关怀，当电告美洲支部同志曹亚伯等为克强先生照料旅居方便。克强先生在美洲各地发表演说和谈话，内容也仍然是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足见孙、黄两先生虽然在意见上发生了一时的分歧，而在革命的根本主张上仍然是一致的。

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迭电促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共同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议会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赍志以逝。中山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

（摘自《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历　史　考　证

黄兴为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以后，黄兴即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当然，以暗杀对暗杀虽可打击袁的凶焰，但不一定可取。当孙中山由日本归国表示反对后，他也同意了。随后，孙黄拟议用兵，并分电粤、湘两督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两督复电反复陈明不能用兵的情由。只是在孙、黄后来与国民党各省主要负责人集会上海研讨对策时，黄兴才有稍缓用兵、以观其变的主张。无疑，这是考虑到了广大党内同志尚无思想准备和各

省负责同志处境维艰的具体情况，认真听取了党内多数骨干的呼声后提出来的，自然，黄兴的这个正确意见，在上海会议得到支持。

二次革命失败，孙、黄等东渡日本后，作为党的领导者，在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时，理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竭尽全力让党人看到光明前景，用以激励斗志，以利再战。总的来说，自责应多于责他。在这方面，我认为，黄兴的识见是正确的。他认为：

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尽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

可孙中山的态度却并非如此，他把这次失败，完全归咎为不听"号令"，怪罪党内意志未能按他的意旨高度统一，责难黄兴就更多了。

当时的情势，是不是就如孙中山所说，按照他的意旨，提早发动二次革命就不会失败呢？非也。须知，宋案发生，是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的讯号，在此之前，可以说革命党人毫无防范的准备，特别是南军裁后，革命元气大丧，即使五国银行团的大批借款未到袁世凯手时，革命党人提前举事，也只能是冒险蛮干，很难成气候，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是太悬殊了，何况，举事以后，袁的借款也一定会到手，因为英、法、德、日、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决不会在袁处于困境时，袖手旁观"中立"，致使自己在华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可以想见的。

再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要依靠广大党员干的事，理应集思广益，耐心做好工作，倘单靠党的首脑高压，是不能成功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多年的事实，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写誓约、打指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服从孙先生的命令"。这即是说，孙中山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相标榜，但在组建政党时，却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竟还要求党人履行侮辱人格的仪礼，这能说不是咄咄怪事？

黄兴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并自任领袖的作法是不满意的。认为"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应履行正当手续，在适当的集会中产生。至于"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是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

特别使黄兴感到愤愤不平的是，竟然在中华革命党党章中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在党内划分什么"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并且分别"隶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规定享有政治权利也有极大的差异：首义党员享有"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则"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利"了。十分怪异的是，"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在一个党内，仅仅按照入党时间的先后，就划分为如此森严的等级，并分别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难道入党早的就一定是功劳大，入党迟的就很少功劳或没有功劳？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划分党员的优劣高下，无异是在党内制造分裂，严重脱离了广大党人，不利于党内团结。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公民还有等差，公民资格的有无及其等第，竟由党章来规定，岂不是把党凌驾于国家政府之上，把党章与国法混同了吗？因而，不讲其他，仅此也可以这么说，中华革命党党章，既是中国同盟会章程的倒退，也是国民党章程的倒退。

黄兴可不是这样看待党、看待党的成员的。他认为，"党员入党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因而，率直地指出孙中山的上述作法是"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他说："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不仅黄兴如此，即"一般首义有功的同志，尤其是在首义时作过高级将领的同志"，也"不肯附和。"后来的事实正如黄兴预见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后，"附和"者不多，虽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但因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特别是未能广泛地团结反袁力量，仅仅采取单纯的军事冒险方式，先后在广东、山东、湖南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均遭失败；1917 年领导护法运动，继续同北洋军阀斗争，也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谓二年为期，可以实现革命成功的诺言，也只不过是泡影。于是，在 1919 年 10 月，孙中山又把它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取消了一切不合理的手续和提法。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举家来到日本。日本曾是黄兴从事学习与革命工作多年的地方，人缘较好不说，地利也较为理想，与祖国一衣带水，便于了解国内革命斗争信息，及时指导与声援国内的革命斗争。从黄兴本意来说，他是想在这儿呆下去的，不然，为什么要在东京购造房屋呢？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他提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甚满足"。因为，孙中山想在"第三次"革命时，"欲负完全责任"，并且满有信心地说："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指黄兴－引者）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孙自称－引者）当让兄独办。"对此，黄兴作了强有力的批驳："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随即又向孙中山诚恳表示："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依于常理常情，孙中山是应采取欢迎的

态度的。至于黄兴究应如何"为之"，孙中山也是可以提出意见劝他照办的，革命力量总是愈多愈好。可是，孙中山再一次对黄兴说："兄所见既异，不能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用"静养"两字，剥夺了他参与革命的权利，尤有甚者，竟然向黄兴提出："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这无异是说：革命事再也不愿与黄兴理论了。黄兴倘在日本呆下去，势必遭到孙中山的疑忌。他本是一个注重修身内省的刚直男子，在担任南京留守时曾告诫下属："须立身反对面而使无置喙之余地，方为完壁。"在这时，又轮到他自己再一次来身体力行了。于是，在这年的6月27日在寓所宴请孙中山与之叙别，即于6月30日由横滨乘轮赴美国。在轮船上他赋诗：

口吐三峡水，
足踏万方云。
茫茫天地阔，
何处著吾身？

从与孙中山等合作组建中国同盟会以来，黄兴处处注意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倘想争夺名位，是有许多机会的。如1907年3月，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是应清政府请求)，曾接受了日本政府及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1.5万元，孙以2000元留作《民报》经费，2000元用于别前聚餐用度，余款以"充军费"为名悉数携走时，章炳麟、张继、陶成章等人认为这是孙出卖《民报》之举，攻击孙"受贿"、"被收买，要求当时主持同盟会会务的代理庶务长刘揆一召开同盟会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黄兴当时如有心为之，满可以顺水推舟。但是，他在香港获悉后，立即致函东京同盟会会员："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晓以大义，东京倒孙风潮，才渐告平息。又如辛亥举义后，各省代表集会商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初推黄兴为大帅，他力辞，后举黎元洪为大元帅，他就副元帅，黎暂驻武昌，由他代行大元帅职，去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正拟成行时，得知孙中山即将归国，故推辞赴宁组织政府。他当时向他人表示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倘若黄兴是个争夺权势的人，这次机会他能放过吗?何况担任大元帅或副元帅，确属推选出来，是名正言顺的呀!再以这次中华革命党的组建来说，如果黄兴真要与孙中山抗衡，他要拉一帮子人组个什么党，也是不太费力气的，当时，也确有一批人想拥戴他另组新党，可是他严词拒绝了："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事实不难设想，本着他对政党性质的理解，以他的威望，也许不需要采取什么对"不赞成加入"者，行"大肆攻击"的手段，也能赢得更多革命志士的拥戴，从"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的"流言"中不是也反馈出这一讯息吗？但是，他连一闪念也没有。

所以，揆诸史实，不仅黄兴从来没有在党外组党的意念与行动，也没有想在党内与孙中山较个高低、决一雌雄的打算。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标帜以与先生异。"无疑，这封信即是忠实表白，又是有大量事实作注脚的。

(摘自《黄兴新论》石彦陶　武汉大学出版社)

风云人物

白　朗

白朗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农民家庭，幼时曾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弱，经常受本村地主的欺侮。1908年夏，白朗与一个叫王岐的地主发生口角，互相殴打，事后王家贿通官府，将白朗逮捕入狱。在狱中一年多，白朗受尽了狱吏的敲诈欺侮和非刑拷打，使他对反动的官府、地主积下很深的仇恨。出狱后，因家产被勒索几尽，本村又无法存身，只好以赶牛车(拉官盐)和开炉场(冶铁)来维持家人生计。由于经常往来各地，对许多劳动群众遭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深表同情。他经常尽其所有地帮助别人，因此，群众对他很有好感，遇事都爱找他商量。年轻的人都爱呼他为"大哥"，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

清朝末年的河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加之1911年夏季，宝丰、鲁山一带又遭受了严重的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而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逼得饥饿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白朗也在宝丰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

白朗最初只聚集了二、三十人，手中使用的是"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所以当时被人称为"笨炮队"或"袄片队"。他们的活动开始不久，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人

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依然如故，因此，白朗军的斗争矛头便又指向了袁世凯的统治政权。1912年4月，白朗这支小小的队伍，“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得快枪二十余支。到5月下旬，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初步站住了脚。接着就和各支农民武装相配合，打得宝、鲁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河南都督张镇芳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焦灼，他指使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农民队伍就范。在敌人许以官职、金钱的引诱下，杜启宾、秦椒红等十多个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被敌人全部杀害。白朗没有受骗，他率领全队穿过郏县，攻占了禹州的神垕镇。杜启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众都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队伍很快增加到五、六百人。

1912年冬到1913年春，白朗率众避开敌人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声称“打富济贫”，到处号召饥民参加；并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绅、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除一部分留充军饷外，其余全部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因此，他们到处受到穷人们的欢迎。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无以为生的人，纷纷加入，白朗军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

1914年1月间，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并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进入安徽，26日攻下安徽的六安，随后又攻克霍山等地。当白朗军攻克六安时，把衙署、监狱、天主教堂等焚毁；并出示安民，开仓济贫，与六安人民共度春节。由于一路上各地饥民纷纷加入，白朗军大发展，“共有四十个大队，每大队约五百人”，总计约二万人左右，这是白朗军的最盛时期。

白朗军的纵横驰骋与迅速发展，使得中外反动派都非常惊慌，驻华各国公使有出兵代为剿办的表示，北京的“国会”和中外大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对张镇芳镇压白朗军的失败大加指责，逼得袁世凯不得不把张镇芳撤职，改派他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豫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王占元、王汝贤的二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以及豫、鄂、皖、苏等省地方军数万人进行四面包围。又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阻截白朗军南下，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妄图把白朗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

白朗军的流动作战，把袁世凯政府搞得手忙脚乱，大丢其脸。袁在给段祺瑞的电中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殊损威信”。段在回电中承认：“劳师縻饷，贻笑中外。”袁世凯为此枪毙过弃城逃跑的县长，调动了十多万军队，撤换过许多将领，后来又把段祺瑞调回，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

白朗入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一方面由于川、甘交界的白水江水涨，无船可渡，川军又有重兵防堵，不易通过；另一方面当他们深入甘肃后，部队已过于疲劳，岷、洮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甚至饮水也很困难，加上时疫流行，又有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主力损失日渐严重。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全军上下思乡情绪严重起来，在临潭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不愿再奋战入川，要求立即返回豫、鄂。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1914年5月下旬，白朗率众退出临潭，经漳县、宁远（武山），6月上旬克秦安，接着就由清水长驱进入陕西。一路上虽然有敌人前截后追，但由于白朗军发挥了“善走”的特长，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除在宝鸡、郭杜镇、子午峪等地和拦截的敌人发生过几次战斗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通过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6月下旬就到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到河南故乡，补充兵力，取得喘息的时间；但不料一入河南境，战士们就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无法制止，沿途星散，不复成军。就这样，这支历时四年，纵横五省，攻克过五十多个县的农民队伍，终因缺乏坚强的领导，无法克服农民的落后思想，而迅速解体。最后，追随白朗的只剩下百数十人。8月中旬，他们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交界的虎狼爬岭时，遭到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和敌人血战两昼夜，最后由于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

（杜春和《民国人物传》）

赵秉钧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今临汝县）人，生于1859年2月3日（清咸丰九年正月初一）。1878年，他考秀才不中，投入左宗棠所部楚军，随军进驻新疆。1883年，在伊犁充当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由于“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二年后补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0年至1901年，他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镇压义和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委派他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并奏保他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仍留直隶补用。

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认为他“才长心细”，于1902年初派他担任保定巡警

局总办，创办巡警，并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和袁世凯的警务顾问三浦喜传（日本人）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迅速地成立了一支有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治安”，“成绩昭然”。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把新军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然后率领巡警一千五百人进入天津城，担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在伊藤和原田的指导下，他又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为探访局）和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他将天津和保定两所巡警学堂合并，更名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以推行“猛治”，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03年3月，袁世凯奏保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8月奉旨照准。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10月巡警部成立，经袁世凯奏保，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由于他的特务才干出众，袁世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对北京的警政，他“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次年1月，他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把北京的警政抓到手，使原来在北京办巡警的肃亲王善耆“地位颇危，仅能自保。”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重要情报都能及时地送到袁世凯手里。这样，他便一跃而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工头子。

清帝被迫退位以后，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让位给袁世凯，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唐绍仪组织内阁，赵秉钧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深知袁世凯和同盟会的妥协只是一种策略，当唐绍仪提出在内务部司员中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时，他坚决反对，说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他便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而且从此拒不出席由唐召开的国务会议。问其理由，则说：“会议关系本部之事甚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

不久，袁世凯逼走唐绍仪，赵秉钧暗中唆使北京军警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威胁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陆征祥内阁国务员名单，他仍连任内务总长。8月间，陆征祥因受参议院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奉命代理。此后，为了骗取同盟会领导人的信任，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请人代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同时对应邀进京的孙中山和黄兴极力表示亲热。9月，袁世凯准陆征祥辞职，提出赵秉钧由代理改为实任。当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企图通过赵秉钧实现“政党内阁”主张，便在参议院国民党议员中极力疏通，使赵内阁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仍兼任内务总长。与此同时，外交总长梁如浩、农林总长陈振先、司法总长许世英都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本来已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愿意恢复党籍。因此，赵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但对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当时“人多非笑之，谓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然而，不久他就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使内阁变成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赵秉钧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权位有被夺走的危险，便和袁世凯一起策划暗杀宋教仁的阴谋活动，但在表面上他却对宋教仁特别友好。

尽管赵秉钧使用了这些鬼蜮手段，终不能掩盖事实真相，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引嫌自请免官。袁世凯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他一再续假，直到7月16日袁世凯才准他辞职，而让段祺瑞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次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21日又担任了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对京津一带反袁的国民党人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袁世凯　扑灭“二次革命”以后，赵秉钧于12月16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脱逃的应夔丞来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世凯密令，于1月19日在京津铁路火车上用电刀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袁世凯装作不知内情，2月19日又让他兼直隶民政长。但是，没过几天，即2月27日，他在天津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世凯“遣人置毒羹中，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孙　宝　琦

孙宝琦　字慕韩，浙江省钱塘人，1867年生。共父孙

诒经为户部侍郎，曾是光绪帝师。1893年以四品荫生入刑部贵州司，任学习行走。1895年后任直隶淮军支应、稽查津浦铁路及武卫前军随营学堂，1898年任办理天津洋务局及办理海河工程，1900年任办理西安电报局。以后投入外交界，为驻德、奥、法等国公使的随员，1907年升为驻德国公使。回国后任襄办津浦铁路及顺天府尹，1910年任山东巡抚。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迫宣布独立，不久即撤消，因此被清政府调离。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以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1月调任审计院院长。1916年4月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6月改任税务处督办，直至1923年12月。此期间还担任过经济调查局总裁、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北京中法大学董事长，并与袁世凯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1月被直系捧出，任国务总理，7月去职。1925年2月任淞沪商埠督办，同年8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未赴任。以后移居大连，不久又回上海。1931年2月故去。

汤芗铭

汤芗铭　字铸新，湖北省蕲水县人，1883年生。系汤化龙之弟。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到法国习海军，加入兴中会。回国后在海军中任军舰机关长、舰管带。1912年任海军部次长，1913年8月任湖南都督，1914年6月改称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1916年护国战争时被迫宣布独立，袁死后即被驱走。1917年1月授为将军府信威将军，后投靠直系，曾任汉口商埠督办。1925年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与张君劢、张东荪等发起组织民社党，任该党中央总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抗战胜利后任民社党中央组织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晚年从事于佛教研究，1975年故于北京。

珍闻轶事

“关余”之由来

所谓“关余”，就字面而言，即指海关税收余款或海关税收盈余，它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的一个特殊名词，为中国所独有；就实质而言，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海关的特征之一，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众所周知，海关关税收入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不可分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若其财政收入大于支出，只有财政结余之理，绝无关税盈余之说。中国之所以出现“关余”这一特殊事物，是由于中国近代海关大权操于外人之手以及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帮办”中国海关为突破口，篡夺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担心其以海关税款作担保之债款失去保障，遂强迫清廷订立税款归还外债办法八条，乘机攫取了中国海关税款的保管权，继而进一步攫取关税的支配权。原办法只规定海关税款必须存入“关系尤重之汇丰、德华、道胜三家银行”，确保外债之偿付，并未涉及所谓关余。直到1913年12月24日，外交团提议修改，并于1914年1月15日经中国政府批准，其中第二条修改为“……，由1914年1月为始，每月杪待每月应付关税所保1900年前所借各款本息全行付清，所余之款，应摊拨关于赔款各银行帐内……”税务司魏尔特(S. F. Wright)在《关税纪实》中称：“此条所称所余之款，在当时及其以后数年间，系指业经分配之海关税款，于偿付1900年前以关税担保之各项外债后所余者而言”。总税务司安格联(F. A. Aglen)也认为：“关余云者，以海关收入偿付外债之外所余之款之谓也。”可见原所谓关余的含义，仅仅指偿付1900年前所担保之各项外债，并不包括偿付赔款在内。但一般人却误认为应包括偿付赔款在内，且具有权威性的辞书也是这样解释“关余”词条的。如《辞海》给关余所下的定义：“旧中国关税中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经费等所剩的余额”。后人之所以这样下定义，主要是根据旧时海关的实际情况来理解的。”当时海关税款收入确实先得支出海关巨额经费，还必须偿付外债和赔款，剩余部分才归中国政府处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地入侵，迫使清政府接受一项接一项的赔款，而不得不举借一笔又一笔的外债，以至数十年间中国海关关税收入远远不够其所担保和抵押的债赔的偿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无关余可言，直到1916年下半年才出现被曲解的所谓关余。然而，列强却又蛮横地剥夺中国动用这部分余款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关余的拨付权，中国若要动用关余每次都须征得外交团同意，即把关余拨付权作为一张王牌，垄断中国财政，操纵中国政局。而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处于罗掘俱穷的状况，敌不过列强的任意要挟，只得对列强百依百顺，任其摆布，满足其任何苛刻的无理要求。如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饮鸩止渴，竟冒天下之

大不韪，违背广大人民的意志，牺牲国家利益，批准金法朗案，以此换得被外交团扣留的关余、盐余，使得我国损失关平银6000万两。

（摘自《民国春秋》）

袁世凯与“模范团”

“模范团”成立于1914年10月，其性质是一个北洋军官训练班，袁世凯亲任了第一期团长。当时北洋系统的军校已有数个，而袁世凯为什么还要建立“模范团”呢？事实上这是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一个明显暴露，袁世凯担心他一手经营的北洋军在他死后可能生变，而决定建立更为可靠的为其“家天下”服务的“御林军”——模范团。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其势力更加膨胀了，同时袁的帝制野心也日益外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不断加强个人集权统治。他解散国会，设立政事堂，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但是在镇压革命党人的过程中，袁手下的一些北洋将领的权势也大大加强。在北洋众将中，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是所谓“北洋三杰”，即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而这三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王士珍发迹较早，开始地位超过了段、冯，但他为人圆滑世故，加之身体欠佳，辛亥革命后就退隐了。冯国璋当时坐镇南京，对中央的事务也较少过问。剩下的在中央握有大权的仅存段祺瑞了。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的关系本来很深，这不仅因为他们之间多年的袍泽关系，还因为有私亲关系。袁世凯夫人于氏只生了袁克定一子，袁世凯认一世交的女儿张佩蘅作义女，段祺瑞断弦后，袁作主把张许给了段。段祺瑞开始一直对袁小心翼翼，奉命唯谨。这样段曾深得袁的信任，并委以要职，辛亥革命后历任陆军总长。不过段祺瑞本身也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其势力不断扩大，加上袁世凯当时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筹备帝制上，军事一般都由段决定。段职权提高后，用人行事就不免自作主张，对军官的提升往往也独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多是他的亲信、学生、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先新、曲同丰等。但日子一长袁世凯便产生了疑心，袁本人就是靠军队左右时局的，他当然也格外担心别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为了实现“家天下”，袁世凯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限制段祺瑞等人的权力。1914年5月18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张玉钰为副厅长，办事员轮流在处值班，一切军事要政均由袁世凯裁决。“办事处”表面上是集中陆、海、参谋三权，更好地统筹军事，实则是削弱了段祺瑞的军权。对此段祺瑞也深知袁的用心，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便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段从此经常不到陆军部，一切事务由次长徐树铮代办，对统率办事处会议也常常借故缺席，这样也更加深了袁段之间的矛盾。袁世凯看到，像段祺瑞等人现在心中虽有龌龊，但却也无能独树一帜，而在其“晏驾”后，就恐难为“太子”所驾驭了，袁世凯的“家天下”也难以长久。因此袁世凯下决心要改造北洋系统的军队，使之更服从于他及“太子”。他一度想用蔡锷组织新班子，但这样过于显露，事急生变袁世凯也不能不考虑。因为要完全改造北洋军、解除旧将兵权在短期内是办不到的，于是袁世凯下决心要另起炉灶，建立一支不同于北洋系统的军队，这便是后来的“模范团”。

“模范团”的最初方案始于蒋方震的条陈。蒋方震1901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而获日本天皇颁赠的军刀，后被派往德国学习，袁世凯对蒋很器重。蒋在日本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痛恨日本侵侮中国，提出了练兵雪耻的条陈。主张改变练兵的旧法，完全采用德国的军事教育方法，创办中国的士官学校。

“模范团”建立过程中另一重要人物是袁克定，他是“模范团”计划的直接制定者。袁克定是袁世凯之长子，他也是帝制的狂热鼓吹者和主要策划者，其人野心之大不下其父，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便俨然以“太子”自居。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无耻下流的小人，如阮忠枢之流，袁世凯的许多帝制策略就出自他们之手。袁克定对段祺瑞长期把持军权非常不满和担心。1913年他到了德国，德皇威廉二世向他讲了所谓“强干弱枝”的理论，使之深受震动。回国后便向袁世凯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迎王士珍来京代段主军事，二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都同意并采纳了。1914年下半年，复辟帝制的活动进入高潮，而段对这位“太子”并不十分买帐，袁克定对此极恼恨。他多次挑拨段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两人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袁克定急于在军队中树立自己的威望，对蒋方震的条陈很欣赏，希望借此由自己主持一个士官训练班，尔后组建自己的军队。在废省、废督计划遇到阻力时，袁克定就向其父建议在统率办事处直接领导下成立“模范军”，由大元帅兼任军长。这个建议和清摄政王载沣集中兵权于中央，组织禁卫军的目的是一样的。但鉴于清组织禁卫军曾招致北洋军的极大反感而弄得军事解体，袁世凯考虑到“模范军”的目标太大，为了避免引起反感，初步决定改为“模范团”。袁世凯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最终确立了练兵计划。

面对袁氏父子咄咄的攻势，段祺瑞既不敢与他们公开翻脸，又不肯顺从地交出权力。他首先对蒋方震百般刁难，1912年12月袁任蒋为保定军校校长，因事前没与段商量，该校经费常受陆军部的截留，蒋被迫辞职。后袁改

任蒋为军事处参议，段竟拒发委任状。段对建立"模范团"更是百般阻挠，而这反过来使袁越发感到有建立的必要。在袁的压力下，段祺瑞无奈只得同意。在"模范团"人选上，袁世凯提出让袁克定任团长，段说："我看他不行吧。"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袁世凯气急责问："你看我行不行呢?"段无言以答。这样，1914 年 10 月 23 日"模范团"正式成立了。

"模范团"本部设在北海，袁世凯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另外在西城旃檀寺设立了"模范团"办公处，以王士珍、袁克定、陈光远、张敬尧为办事员。从人员上看除王士珍外，其他人多为北洋派中的二、三流角色。这也正是袁世凯的苦心所在，他希望重用这些低位的将领，使之感恩图报。"模范团"军官的来源与旧北洋体系也有很大不同，以前北洋军的军官多来自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而"模范团"的军官主要来自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模范团"的下级军官从北洋军各师的中级军官中抽调，士兵则由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士兵年龄限在 22 至 26 岁，要求是素日忠诚、身强力壮、经过实战的人。

袁世凯建立"模范团"时初步的计划是该团分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可练成 4 个旅的"模范"军官，五期合计可以练成 20 个旅的军官，也就是说可以组建"模范军"10 个师。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袁世凯父子掌握的新武装将超过北洋诸将的兵力，当时全国北洋系的直属部队不到 10 个师。

袁世凯把"模范团"视作将来帝制的支柱，因而他对"模范团"的事务也极为重视。无论怎样忙，他每周一定要亲自骑马去观操一次，并召集军官训话。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律要到总统府向他叩头谢恩。新兵入团也要进行效忠宣誓，1915 年 1 月 13 日"模范团"第一期团员到关岳庙宣誓，袁世凯派荫昌监誓，由陈光远领誓。条文是："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以后这种誓忠的形式推广到了整个北洋军。为了进一步笼络团员，袁世凯在待遇、晋级等方面给予了特殊优待。学员伙食津贴很高，穿蓝呢制服，毕业后均晋级使用。考试优秀的团员，袁世凯还亲写命令，授以侍从武官军衔。"模范团"第一期结业后，袁认为时机已到，公开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并用"拱卫军"的名称代替了"模范军"。拱卫军最早是清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募练的军队名称。1911 年秋，清廷成立了一支守卫京师的新军，沿用了拱卫军的名称，初驻河南，后调入北京，辛亥革命后隶属于北洋军。袁使用拱卫军的名称是为了建立更明确的有别于北洋旧军的新武装。当时建成了拱卫军步兵四个旅、炮兵、骑兵各一团；机关枪营、辎重营各一营。全部军火都是由德国购入的。1915 年春，"模范团"第一期结束后，段祺瑞的势力已遭到很大打击，段被迫避居西山"养病"。因此从第二期起，袁世凯公然让袁克定任团长，陆锦任团副。由于第二期学生基础较差，所以第二期结业后仅编了两个旅。第二期结业后不久袁世凯就垮台了，"模范团"也因此停办，拱卫军的名称从此消失了。已编练成的军队被段祺瑞改编成北洋军。第一期的步兵四个旅被改编为北洋军第十一、十二两师，李奎元、陈光远分别任师长。第二期的二个旅编为北洋军第九师，陆锦为师长。拱卫军残部被编为北洋军第十三师。

建立"模范团"是袁世凯帝制活动的一部分，他想以此来加强个人集权，但事实上却反而加深了内部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模范团"也是袁、段矛盾的一个产物。袁世凯的作为使得"北洋宿将个个寒心"，护国战争爆发后，他们对战事消极应付，甚至暗中指使旧部与南方媾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袁的迅速垮台。"模范团"的建立标志着原业曾是袁横行天下最大后盾的北洋军，已逐步成了使袁世凯疑心和担心的力量。袁的淫威固然在一段时期内还颇有效力，甚至像段祺瑞这样的枭雄也不得不去"养病"，但实质上袁赖以维持局面的基础也随之动摇了。袁建立"模范团"是在重蹈清摄政王载沣组织禁卫军而使统治内部解体的故辙，这一点袁当时也多少注意到了，并想设法避免。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袁氏父子不断膨胀的帝制野心，以及袁世凯那种大军阀所特有的专制、猜忌、险毒的性格，使他终于铤而走险了。他抛弃了一批他疑心的旧部，但事实上最后却是被这批同样具有野心的人所抛弃了。

（摘自《民国春秋》）

袁世凯毒杀赵秉钧

袁世凯师法齐侯杀公子彭生的伎俩，因刺杀宋教仁一案循环连杀五人，手段阴鸷而又卑鄙。

袁当时恨宋教仁入骨，以刺宋事谋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托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领袖应桂馨，应又指使他手下一个名武干英的退伍军人，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由上海北上时，以枪狙击宋于车站上。

武在刺杀宋后，当场逃脱。两天后，上海当局根据得到的线索，将应桂馨捕获，武也落网。一个月后，武突然死于狱中，死因不明，实际是袁为了灭口而害死的第一个人。

应在狱中住了一个时期，被他手下党羽救出，避居青岛。后来，赵秉钧秉承袁的意旨，叫应来到北京。据说，袁起初还没有对应下毒手的决心，想对他加以笼络，但赵、洪在事前曾答应送应十万元作酬劳金，应这时坚决要求兑现，袁感到这个流氓头子并不能俯首贴耳受他指使，怕迟早要泄他的底，就派遣侦探郝占一又将应刺死于京津

车上。

郝刺死应后，不能守口如瓶，反而到处吹牛。袁引以为患，授意陆建章把郝调到陕西，将郝也杀死。

最后，袁又对赵秉钧心怀猜忌，将赵也毒死。

这时，赵已经不担任国务总理，正在做直隶都督。据赵的心腹刘某之子刘松庵事后追述：有一天，袁忽然派人送赵丸药两粒，对赵说："总统听说宫保有病，送药来。"

赵听后大吃一惊，说："我没有病！"

来人道："没有病也要吃药！"说时声色俱厉，并从腰下抽出手枪相向。

赵知道难逃毒手，仓皇四顾，喊道："你们拿水来，让我送药。"这时，赵还存万一希望，期待左右有健儿出面相救。

来人又从腰下拿了一个水壶出来，说道："水已经备好了。"直等赵吞下丸药后，才扬长而去。

赵服药后，急派人叫刘某来托以后事。赵死后，袁因刘某并未参预刺宋案的机密，授意后任直隶都督安插以暗差美缺，终老其身。

计袁除刺杀宋外，又循环杀死武士英、应桂馨、郝占一、赵秉钧四人，共杀死五人之多。其手段不能不说是极毒辣之能事了。当时，袁放过的只有一个洪述祖。洪在青岛躲了多年，后来化名到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捉住，终于被处绞刑，死于司法部狱中。

在刺宋案后，袁还千方百计掩饰真相，布置疑阵，而实际上天机早已泄露，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于式枚(字晦若)曾为这件事填了《浣溪沙》词一首：?

跌足槌胸哭宋初。装腔作势骂施愚。当时跑煞阮忠枢。

造意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李家驹。算来总统是区区。

还有一说是：赵秉钧之受袁猜忌，不单是因为刺宋案，而是早就伏因于袁东山再起，入京组阁之时。当时，袁在彰德，动身入京前，谋士云集，共商大计。赵在众谋士中是袁最亲信的人。袁特地邀请赵进臣室密谈，谋取清而代之的策略和步骤。赵献的计谋，袁一一心领神会，莫逆于心。最后，两人仿照群英会诸葛亮与周瑜的故事，各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赵写的是："两利俱存。"袁写的是："两面威吓。"两人所写，大意相同，而赵的四字涵义更深。袁因此感到赵的谋算在自己之上，从此，虽然一面靠赵为智囊，暗中却防赵一手。这时，杀机已经隐伏下来了。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中君)

张治中在保定军校

1914年，23岁的张治中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3年后毕业。他在军校期间，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军校的学生有些出身富豪官绅之家，对读书学习不感兴趣，却经常出入于娼寮妓院，及饭馆酒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从不挂在心上。张治中耻于与这类同学为伍。他入军校后，专心致志地读书，认真研究军事学。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他连续两个暑假没有回家，遍阅了古今中外军事参考书籍。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以适应未来艰苦的军旅生活，每当星期天或节假日，他就与几个同学一起，带上烧饼，背上水壶，到保定郊外远足、游憩，在那里吃花生、嗑瓜子，谈古论今。

张治中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无论是行动上的表现，还是在思想上一闪而过的念头，他都作深刻地反省。有一次考试野外勤务，张治中前座一同学利用考官在黑板上写题之机，偷翻教科书，张治中也凑上去一同偷看。这件事并没有第二人发觉，但张治中深感内疚，他在日记中写道："斯时以作俑非我，不过利用乘便，似无大伤，又觉情尚可原也。抑知人冒险而作穿窬，我安坐以享分赃，质之良心安否?"可见张治中律己之严。

在军校学习期间，张治中的学科与术科成绩都很优良，但他并不一味追求分数，他说："在学校求学，首以心得为贵。"又说："假使囿于分数之见，不问死活以竞前茅，毋乃大愚。"他认为应当以"精神体力之所及及能力之所至，为用功之标准，不拼命以争胜，不牵强以侥幸，只求问心无愧"。张治中不主张读死书、死读书，他关心国内外时局的变迁，积极参与了军校同学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5年，袁世凯作起了称孤道寡的"洪宪"之梦，这件事刺激了张治中等一些青年军人的心，大家既惊奇又激愤，"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保定军校校长王汝贤非常低能，只凭着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当上了校长，他宣布不准学生发表反对帝制的言论，不准看反对帝制的报纸。有一天，一个学生正偷看反对帝制的《顺天时报》，被官长发现，马上报告了王汝贤，王汝贤命令卫士把那个学生抓到校部，痛打40军棍，以"杀鸡给猴看"，向学生们示威。没想到这40军棍引发了学生们被压制已久的愤怒，他们冲进校长室，把校长的像片撕毁扔进厕所里，把校长痛斥一番。

(摘自《民国春秋》)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

癸丑(民国二年)秋间，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应共和党之招，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凯羁留，至丙辰(民国五年)袁死，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其间轶事有可述者。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

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惟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擘画，即应招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专制，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厄，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行监视，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迎接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而已。）

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民国三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阒其无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魋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民国三年十一月出版，写民国二三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著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

……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的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甚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的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必恭必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么？”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兴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

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馀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张瞋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了囚，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特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以革命有功授与之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寒，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癖。逸经第九期，载冯君所撰《革命逸史》之《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一节，纪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会事至警署，"长衣下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绋，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摘自徐一士书目《一士类稿》文献出版社)

"巧"调张勋

袁对江苏和湖北两省看得特别重要，原拟派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段芝贵为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时候，派这两个人做两路统兵大员，就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前提。后来张勋所统率的部队首先攻下南京，他不得不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传统观念，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这只是他的一时权宜之计。

当辫子兵在南京乱烧、乱杀、乱抢的时候，由于一时杀红了眼睛；有三个日本人受了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顿然鼓噪起来，纷纷向日本政府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和罢免张勋。袁派张勋的江西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勋对日本人让步点，以免引起两国间的关系进一步地恶化。

对本国人民凶狠如虎的"大人物"，往往正是对帝国主义驯顺如羊的小角色。张勋与日本驻宁领事船津直接谈判的结果，日本方面撤回了张勋应当撤职的要求，张勋于九月二十八日亲自到日本领事馆履行了道歉的条件。

日本方面的责难虽然告一段落，英美帝国主义者却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们的公使不止一次地向袁政府表示：把这样一个怪物摆在江苏都督的位子上是极不相宜的，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侨民的生命财产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还把这个意见说成是对中国政府表示好感。袁正想利用外交压力撤换张勋。十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告知张勋。讽示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更大的外交压力，否则对他的面子就更难于保全了。

张勋正在兴头十足地做"两江总督"，听了这些扫兴的话，就跳起脚来发火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拚得来的，袁宫保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用不着劳动你老哥的大驾来和我商量。"阮忠枢把他发火的情况报告袁，吓得袁慌了手脚，接连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走马灯似的到南京来进行疏通。其中"乾殿下"最长于词令，他说：" 总统确有苦衷，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意见。"随后提到袁想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他又天花乱坠地说："巡阅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巡阅使管好几省的军事。"

张勋被他说动，而且事实上也不能造袁的反，就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督府开支六十五万元准予报销，二、再拨开拔费五十万元，三、规定长江巡阅使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这些条件都经袁允诺。十二月十六日，袁发表了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及调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的命令。

巡阅使这个官职，袁的本意也像屯垦使、检查使之类的官职一样，是个徒拥虚名的大头衔。由于张勋手中有兵，又提出了有职有权的条件，此后巡阅使竟成为驾乎都督之上的大官，并且成为割据数省的大军阀的一个特殊地位。在袁战胜国民党威望最高的时候，对于一个北洋附属军的将领尚且这样迁就，以免激成事变，这又说明袁的武力基础是不够强大的。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

流 行 风

小说《孤掌惊鸿记》

作者范烟桥，主要内容：

该书记述了袁一掌这个侠义之士的轶事，也可谓为他的侠义壮举树碑立传。袁一掌自幼喜好武艺，后拜在当时很有名气的甘凤池门下，成为他的得意弟子，他的本领非同小可，拳剑两项出神入化，尤其擅长一套醉八仙拳法，他的绝技是单手劈石，"一掌"两个字也由此而得名。他初出茅庐就路遇不平，扶弱济困，立了第一功。故事便从这儿展开：夺耕牛，救游女免遭无赖欺侮；冰天雪地，救济快冻死一乞丐；在紧急时刻，从焚烧的高楼中救出一老妇人；救货船，敲冰送米；为寡母赎女，免遭虐待；除士豪朱大辫子，判他三年监禁；智擒巨盗草上飞周卓，擒贼擒王为民除害。全文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尤其是写"火中救人"、"敲冰送米"、"智擒草上飞"等，把袁一掌这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感人。该书叙述简练，语言生动。

小说《古戍寒茄记》

作者叶小凤，主要内容：

该书开头第一回楔子，作者便借一首诗，演出了一部英雄轶史。故事一展开便借齐姬瑞和故友杨春华在蓟州北门市上一座酒楼巧遇一场，介绍了本书主人公杨春华。杨春华是个文经武纬的全才，一世之雄，因犯了圣谕广训上最大的罪恶，托世祖恩深，被充军宁古塔，远戍塞外，但他雄心不死，仍想干一番事业。在遣戍途中被搭救，从此便在红石山一带，周巡讲学，和中军统领萧涵碧一起训练士卒、控制塞外一局，准备时机成熟，举兵南下，揭竿起义，书中以叙述杨春华起义为主线，引出了众多救民殉国的忠臣义士，草中雄杰。主要人物有古凝神，他是一个主持全局的关键人物，是个有胆有识的中原英雄，他跋涉万里，潜形销声，广交豪俊，成为关中屯户的统领，并在杨春华被充军途中，设计谋救出了他，并同杨春华一起共谋举兵起义之大略。还有大明伯爵胡石声和大明烈皇亲拔进士及第文经武纬，名满东南的袁灵芝，他们控制了东南一局，为了实施编练舟师计划，征船募兵，毁家义举，明耻教战，配合杨春华，一举北上。另外书中还穿插叙述了五儿、吹儿、鸠儿、瞿三星，迪先、陈克勋、韦奉雉等众多豪杰的故事，他们都各具特色，或有勇、或有谋，成为义军中的先锋和将领。书中还写了清廷中的一些人物，如八王爷、金抚台等，反映了清朝统治者荒淫无度，昏庸无能，已到了众心解体的地步。该书最后的结尾落在了齐姬瑞在泰山三茅观做的一场梦上，梦见陇上雄师已出关东下，杨春华正犁庭扫穴，残败清兵横尸遍野，正看到义军会师进攻时，梦被打断。山下各路义师究竟如何，书的结尾始终没作交待。该书所叙述的人物众多，典型人物突出，刻画细腻生动。书的开头及结尾写得很有特色，但由于人物线索过多，略显杂乱。

小说《爱苓小传》

作者绮痕，主要内容：

全篇叙写出身寒微的苏州汪氏女爱苓自幼年至少年时事。她聪慧无双，丰姿绝世、酷爱学习。幼时倚学于兄长，稍长，就读于女子学校，成绩蜚然。情窦初开时，受西方爱情小说影响，与女友扮男爵美女之戏，好友翠如与王生自由恋爱更使其春心萌动。正当她即步翠如后尘之时，母亲却应允了媒婆，欲将其嫁给 40 岁丧偶，有冠带相、并有势力的童知县为妻，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小说情节简单，意蕴颇深，既抨击了封建旧礼教对千万妍媸少女的戕害，又展现了新女性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属"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天戮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载《月月小说》)者列。小说行文干净利落，结尾尤佳，用一"诺"字渲染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氛围、隐隐昭示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颇耐咀嚼。

电影《黑籍冤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而美帝国主义者便乘隙而入，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在电影方面，美国影片大量输入中国放映，取法国影片而代之；同时美国胶片也于 1916 年运往上海推销，使一度停止的中国摄影活动又得以复苏。这时，张石川等人，凭着过去在"亚细亚"工作的经验，想自办公司，拍摄电影。于是，他找了新剧家管海峰合作，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资金由几个

人凑集，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黑籍冤魂》。

《黑籍冤魂》原是上海新舞台几经演出，卖座不衰的文明戏，由许复民编剧，著名演员夏月珊、潘月樵、七盏灯等主演，是一部暴露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戏剧，因而很受观众欢迎。

《黑籍冤魂》——管海峰改编，张石川导演兼主演，摄影师为意大利侨民劳罗。其他主要演员有查天影、张利声、徐寒梅、黄小雅、黄幼雅、洪警铃等，均为“民鸣社”的演员。影片通过曾和度逼子吸烟的描写，批判了当时一般封建家庭怂恿子弟吸食鸦片的愚昧思想；通过曾伯稼由热心公益到吸食鸦片，最后流落街头、路倒而死的描写，也生动地揭露了鸦片毒害之深，有发人猛省的意义，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帝效果。同时，也应指出，影片作者同情的是封建阶级的不幸和没落，并把其破产归罪于店伙的“卖主侵资”，对影片的主题有所削弱。这正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这部影片共四本，它和舞台剧演出相仿佛，也分为数幕。但也拍了一些外景，曾妻投河自杀的镜头，用了分切和组接的方法，即先拍她跳水状，再拍投石后的水面，连接起来就达到投河自杀的完整效果。影片完成后，在上海各城镇影院放映时，颇得好评。正因为影片《黑籍冤魂》有揭露鸦片毒害中国人的内容，7年之后在官方宣布鸦片公卖时，上海新爱伦影院又重映了这部电影，从1923年5月17日起连映四天，以表示对鸦片公卖的抗议。当时，为重映此片而登的广告写道：

鸦片流毒实非浅，到我中华已百年；
英雄埋没知多少，耗尽金钱真可怜。
烟禁虽严如儿戏，如今公卖将出现；
贻笑外人尚小事，害我同胞何堪言。

这说明了这部影片有着良好的社会效果。

诗《太平洋舟中诗》

（一九一四年七月初）

口吞三峡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著吾身？

（黄兴）

诗《论诗六绝句》（选一）

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太史公。
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

（柳亚子）

历史档案

致黄兴书

孙 文

1914年3月

前由英士沥陈近况，迟迟未得还云，甚怅甚怅！文关怀祖国，见于政府之专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思痛心！癸丑（1913年）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犹忆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协和等相继被黜，静山观望于八闽，组安反复于三湘，介人复盘踞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梓倡议金陵。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mèi，媚）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xì，细），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张之兵联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亦岂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清、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1913年）之耻，实欲竟辛亥（1911年）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离日以后，深虑失援，英士明达，复以函问，而公又置不与复，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1913年）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

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也。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6—97页）

复黄兴函

孙中山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克兄鉴：

来示悉。所言英士以兄不入会致攻击，此是大错特错。盖兄之不入会，弟甚满足。以"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何以言之？若兄当日饱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切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此等流言，由兄部下言之，确确有据。此时虽无大碍，而他日事成，则不免生出反动之力。兄如能俯听弟言，竭力禁止，必可止也，则有赐于弟实多矣。

至于英士所不满意于兄之事，多属金钱问题。据彼所称：上海商人尝言兄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英士向来皆为兄解辩云，断无此事。至数日前报纸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皆向日友解辩，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天仇始发信问宫崎，意以为必得否认之回音，乃与该报辩论。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以为此事亦真，则从前人言种种亦真矣。倘俱真的，则克强岂不是一无良心之人乎，云云。英士之此种心理，就是数日间所生者也。如兄能以理由解释之，彼必可明白也。

以上则兄与英士互相误会之实情也。乃忽牵入入会之事，则甚无谓也。且金钱之事，则弟向不在意，有无弟亦不欲过问。且弟以为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不过世人眼浅，每每以此为注意耳。今兄与英士之冲突在此点，请二人见面详为解释便可，弟可不必在场也。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此复。

（孙文　五月二十九日）

复孙中山书

黄　兴

（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或二日）

接读复示，因来客众多，未即裁答，殊为歉念。今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绝对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

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

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于前途为不

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至云弟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云云，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故绝对无部下名词之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昔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今之往来弟处者，半多先生会内之人，言词之有无，弟不得而知，当可为先生转达之。

又英士君之攻击于弟，弟原不介意，惟实由入会问题，则弟不肯受。今先生即明其非是，弟亦不问，听其所为而已。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先生今力任大事，窃附于朋友之义，有所诤谏，终望采纳，不胜幸甚之至。

讨袁檄文

孙中山

（一九一四年五月）

壬子之五〔二〕月，国民悯构兵之惨，许清室旧臣自新，竭诚志以临时政府付袁世凯，四海之内，莫不走相告曰：息兵安民，以事建设，是大仁大义举也。吾民既竭诚以望袁，今袁所报民者何如哉？辛亥之役，深〔流〕血万里，人尽好生，何为而然？若知袁之暴戾更甚于清，则又何苦膏血万户，以博一人皇帝之雄哉！所以宁死而不悔者，誓与共和相始长耳。

今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武汉京津，扼要诸军，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声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画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三军既兴，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俊共图之！孙文檄文。印。

（据上海《生活日报》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

（《孙文檄文》）

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　文

1914年7月

吾党自第一次革命，国体与政体变更后，即以巩固共和、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己任。乃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涣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gòu，够）谇（suì，岁），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言之不胜慨叹！

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海内外同志，立约宣誓，争先恐后。夏6月，开总理选举会，到者八省，文当选为总理。7月8日，在日本筑地精养轩开本党成立会，文于是就总理之职，当众宣誓，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自是之后，着意进行，本部组织，于焉成立。用特通告海内外同志，自中华革命党成立之日，凡在国内所有之国民党本部、交通部、分部被袁氏解散者，不能存在无论矣；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告解散外，其余美国、南洋各地未经解散者，希即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内容组织，以更张之，即希注意。]均已履行《总章》第七条之手续，填写誓约者，认为本党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该法颁布，国基确定时，均由吾党员完全负责。

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异党入据，以伪乱真。国内无论矣，即海外人士，亦须严加审判，非由我中华革命党支部、交通部特别选派，及其承认介绍者，政府概不收纳界以政事，使保皇妖类，计无所施。

现在全欧战云密布，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及我。且世界金融机关已经紊乱，袁贼之财源已竭，饷糈自空。英雄有用武之地，正吾党努力建功之时，凡吾同志，务望担负责任，切实进行，黄龙痛饮，为日有期。

惟近有不宣誓约，非中华革命党员，假国民党名义，蛊惑我真正热心同志，藉端滋扰，日有所见；非力加调查而甄别之，则不足以固党基而定国是，此本党同人拳拳之

意也。

《总理全集》中册《宣言》第18－19页，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

白朗告示

1914年4月

父老伏处于异族专制，几三百年，水深火热，控告无所。势极则变，物极则返，相摩相荡，于是始有往岁革命之举。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已，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今汉虽复，若一任袁贼自为，而不早为扶持，行将即颠，则又焉用吾民？夫天下之大，匹夫与责。秦民夙称强武，而又热心爱国，岂其见神奸主政，群凶盈廷，河山之断送，汉族之沦胥，而遂漠然不一援手？朗幸赖黄帝在天之灵，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兹者兵指秦陇，坚城雄关，望风披靡，虽则由我师武，要亦民苦虐政，人无斗志。现已逾秦岭，出大峪，耀武咸宁，观兵长安。城克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约，不举项王三月之火。我诸父老昆弟，其各安堵勿恐。此布。

(《时事汇报》第8号　上海时事新报馆1915)

收回沪杭甬浙段铁路议订和款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北京。

案查交通部(下文省称为部)曾与浙江铁路公司(下文省称为铁路公司)议定收回沪杭甬之浙段铁路(下文省称为该段)为国有；又查该段业于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十六号交由部派局长管理，该部所允付给该铁路公司赎路之款，今须开始分批交付；又查中英公司(下文省称为公司)已允由一千九百零八年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息借款项下，按该段可以表明实在价值之数，拨付该铁路公司，惟沪杭甬全路(下文省称为铁路)应即照同国有铁路妥善管理；兹由该部与该公司双方合订条款如下：

第一条　该部声明该段物产及进款均未经抵押，并该铁路公司所有未清之债务由该部所允给该铁路公司之款内拨付。

第二条　该段实在价值已由部及公司估计，应合上海规银八百万两，兹议定下列各款，按照左开日期，允由该项借款内拨付：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规银二百万两；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规银二百万两；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规银二百万两；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规银二百万两。

以上各款，由上海汇丰银行妥备，听候部饬拨用，但应订明此项借款项下，若随时支付修理暨建筑及与沪宁铁路聊轨各款之后，所胜余款不敷应付上开末批之付款，则不敷之数由该沪杭甬铁路附续借款所得之款内拨付。

第三条　自付上开所允许之第一批借款之日起，该路即由该部实行管理，且该铁路公司已允自该日起，对于该段所有之权利一概取消，其余各批付款，独向中国政府而言，不得对该铁路交涉；此条件应印在部给该铁路公司之政府价票上。

第四条　该路管理事宜由中国局长一员董率之。总工程司一员，运输总管一员，机车总管一员，账务总管一员，均须英国人，为公司所同意者，及其他所必须之职员，均应即行委派，其材料总管一员，须用英国人。以上各员应归局长或其正式委派代表之指挥；兹为管理合宜及节省起见，该中国局长及职员等，均须为沪宁铁路之中国局长及职员。该员等之全份薪水及公费，应由沪宁铁路与沪杭甬铁路各按两路里数比例摊派。该路与沪宁铁路降轨一事，俟本条款签定，即行举办。所有必须购买地亩之款由该供给，其建筑聊轨必须之费则由借款项下拨付。

该路由杭州至宁波之工程应由该路局从速办竣。

第五条　账务总管承局长之命专管该路所有进出款，凡关于动用路款之公文，须与局长会同签字。该路进款由账务总管存放上海汇丰银行，收入该铁路账内；除支付营业费用外，如有余利，则该款应备付一千九百零八年沪杭甬铁路债票上之利息。

第六条　此项条款华、英文并用，系附属并推广一千九百零八年三月六号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倘遇解释条文所有疑议，自以英文为准。

本合同于一千九百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华民国三年九月十九日，在北京签定。

告诫国民党人令

近年以来，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

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简单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查广东、湖南两省为该党之根据地，而暴民专治，土匪横行，其痛苦亦甲于各省。倘各省均如湘粤，岂非成一暴民、土匪之国，更何言共和幸福。该党标其名曰国民，而专以残民为事，与民意违反，善良者，敢怒而不敢言。

本大总统为顾全大局，容忍经年，深盼其默化潜移，渐趋正轨。乃近来体察情形，该党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秘密机关，逐经发现。本大总统何能宽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利害于不顾。不得已，始有解散该党之令。但籍隶该党之人，或未察内容，致歧途之误入；或牵于大势，类从井以救人。倘因党籍牵连、沦于废弃，岂得谓平。著各该长官留意考查，其情形暴戾，甘与逆谋，固为法律所不宥；如心术纯正，才具优长，经此次解散之后，仍可量才任使，不得预设成见，故意诋排。并饬各县知事告诫民人，不得怀挟私仇，借端报复。该党人既经解散，仍是公民，须知有国而后有家，有家而后有身，当以爱国为前提，以危身为炯鉴，万不可轻信煽惑，以致害于尔国，凶于尔家，自贻伊戚。将此通令知之。此令。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5日）

咨参众两院请选举正式大总统文

为咨行事。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经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元年三月十日就临时大总统之任。惟时军事甫平，人心未定，悍将骄卒，冲突时闻，内政外交，益形困难。本大总统以国民委托，总揽政务，与前参议院议员诸君，互相提挈，勉自支持。凡所设施，要以国家为前提，博征人民之同意，既不敢操切以启分裂之祸，亦不敢姑息以博煦孑之名。无非求我四万万同胞，同登康乐而已。受职以来，已逾一稔，环顾全国，秩序渐定，而人民未挽疮痍，纲纪初张，而建设尚鲜时效。夙夜撄心，神明负咎，所可自信与可报告于我国民者，区区此爱国之忠心而已。夫中华民国既由中华人民组织而成，其主权当然属于国民全体，而国民依法选举之国会，实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今正式国会完全成立，自此以往，临时之事业将终，正式之时代开始。深望国民代表，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以谋全国人民之福利，而固民国新造之宏基。无任歧祷。此咨。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5日　袁世凯以广东阳春县破获国民党机关，又灵山、化县亦有国民党人联合当地“绿林”队伍进行活动事，令广东都督龙济光“查缉乱党”，“务绝根株”。

1月7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切实查禁国民党印刷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1月8日　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赤峰、洮南（今吉林洮安）、龙口（属山东黄县）、葫芦岛等七处自开为通商口岸。

1月10日　袁世凯宣布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籍。

政治会议循袁世凯之意，呈请特设“造法机关”修改约法。次日袁命拟具具体办法呈报。24日政治会议通过“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并呈报袁世凯。

1月13日　袁世凯命裁撤川边经略使，设川边镇守使，任张毅为该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

1月14日　湖南湘潭国民党机关被破坏，杨礼臣等三人被捕。杨于3月4日被杀害，余判徒刑。

1月20日　河南都督张镇芳以防剿白朗军不力，被撤职留任。2月13日免职，17日应段祺瑞之请，仍留河南会办“剿抚事宜”。

袁世凯委派陈锦涛赴欧美游说“各资本家及工程家”会商组织中、英、美、法、德五国国际建筑公司，承办中国铁路借款及包工事。陈在法国活动，消息外传，五国银行团大加攻击，事遂搁置。

1月26日　袁世凯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约法会议以议决增修约法案及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为其职权”，由京师选出四人，每省选出二人，蒙、藏、青海选出八人，全国商会联合会选出四人组成之。

袁世凯任命赵倜“督办豫南剿匪事宜”，所有派往豫南“围剿”白朗军各部均归其节制调遣。

1月27日　袁世凯以“各省盗风未靖，匪警时闻，小之焚劫市乡，大之攻陷城邑”，命各省严办“盗匪”。7月20日复令各省地方官与军队合力防剿。11月27日公布《惩治盗匪法》。

1月29日　内务部再次通令各省民政长迅速追缴省议会国民党议员证书，并查明是否尚足法定人数。

政治会议循袁世凯之意，议决祭天祀孔。祭天日期在冬至，祭礼用跪拜，祭品用牲牢，祭服请大总统饬下所司酌古准今制定特别冠服。祀孔沿用清朝旧例，作为大祀，祭期仍用春秋上丁，礼节祭服与祭天同。

1月30日　北京政府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二千万美元导淮借款合同。5月12日垫款十万美元，后以欧战爆发，事遂中止。

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一百二十六处，两县同名，定名在先者存，后置者改名。

2月1日　袁世凯命段芝贵署理湖北都督，段祺瑞卸任回京。13日命段祺瑞在鄂、豫一带督师围剿白朗军，兼领河南都督。

袁世凯公布"法律编查会规则"。规定该会负责调查编纂民事、刑事等法规。原"法典编纂会"于3日裁撤。18日"法律编查会"成立，梁启超任会长。

2月2日　段祺瑞命驻湖北陆军第二师王占元部编成两混成团进入河南。11日至潢川，向商城集结。

2月3日　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十余省都督民政长曾先后致电袁世凯，谓各级自治机关"良莠不齐"，"动称民权，不知国法"请令解散。袁于是日颁布命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

2月4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谓党人在上海暗设新同盟会机关，严行禁止"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

2月6日　袁世凯以财政窘困，致电各省严征国税。"将旧税一一恢复"，并按新订各项税则切实征收。7日派视察员分赴各省，会同地方当局议定财政办法。

陆军部电饬段芝贵严剿白朗军，谓白朗军进入安徽省后，"毫匪、乱党、青红各帮、饥民"纷纷加入，已由一千多人增至六七千人。

袁世凯命伊犁镇边使裁撤，改镇守使，命杨霞飞署理。6月2日正式任命。

教育部公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

2月7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崇祀孔子，以春秋两季行祀孔礼。20日公布"崇圣典例"，并通令各省每年冬至行祀天典礼。

2月12日　国务总理熊希龄辞职，外交总长孙宝琦兼代。

2月16日　内务部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各省应试者二千零六十八人。

2月18日　厦门鼓浪屿租界因印捕擅自拘捕市民，激起公愤，发生冲突，印捕开枪击伤市民四人，捕九人。事件发生后，领事团拒绝将被捕人等移交会审公廨，并强行驱逐公廨中国会审员，又派巡捕占据公廨，遂起交涉。至5月11日领事团始将公廨交出，15日议定办法，事遂了结。

2月24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民政长仿照四川方法，于各县成立警队，由县知事自行招练。3月19日又批转《改订四川通省团练章程》令各省仿效执行。

2月27日　直隶都督兼民政长赵秉钧暴死。以朱家宝为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

2月28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3月2日　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禁止"秘密结社"及"同盟罢工"，"同盟解雇""强索报酬"等。

农商部公布《商人通例》，7月19日又公布《商人通例施行细则》。

3月3日　台湾新竹厅苗栗抗日起义(事在1913年11月)领袖、同盟会会员罗星南，在台北监狱为日本殖民当局杀害。

安徽铁路芜湖至广德线于1905年准由商办，时逾十载成路无多，股东请归国有，是日与交通部签订契约，27日交通部接管。

农商部公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承垦人经官署核准，每亩纳保证金一角，开垦后按土质肥瘦分五等交纳地价，每亩由一元五角至三角，按等递减。

3月6日　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甘肃民政长兼署都督。原都督赵惟熙3月15日辞职。

山西盂县乡民抗交验契等税，聚众反抗，县署派兵镇压，乡民死伤四十多人。

3月11日　袁世凯颁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妇女节操可以风世者"等由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受褒人及其家族"愿建坊立碑者，得自为之"，以宣扬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

农商部公布《矿业条例》，31日又公布《矿业条例施行细则》。

袁世凯以围剿白朗军连遭挫败，致电段祺瑞。谓"发兵二万人，奔驰两阅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而老河口又发生"戕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命组织轻便部队"配利器"、"加饷费"，迅速围剿。

北京航空学校三架飞机首次试飞，自南苑飞至保定。

3月12日　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至北京孔庙代行"春丁祀孔"礼。礼毕，梁讲《论语》"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3月13日　袁世凯电令段祺瑞、段芝贵及陕西都督张凤翙，严防白朗军"窜入川陕"。

3月14日　国民党议员林英钟、徐镜心、段世恒等五人，因与东京党人秘密联系，从事反袁活动在北京被捕，林、徐二人旋遭杀害。

3月15日　云南东川县李正品为抗拒铲烟，聚众二千余人举事。

3月16日　奉天国民党人孙祥夫、刘芝舟、马明远等在大连、长春、公主岭等地设立机关密谋反袁。是日，大

连机关遭破坏，马明远被捕遭杀害。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派丘丕振赴东北组织武装，策划起义。丘以“东北讨袁军总司令”名义，派人到营口、铁岭、昌图、长春、辽阳、哈尔滨等地策动起义，先后均遭失败。

四川垫江县红灯教彭兴安等聚众六、七百人举事攻城，为当地驻军所败。

3 月 19 日　约法会议开会，举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议员五十七人。

3 月 20 日　袁世凯以增修“约法大纲”咨交约法会议，规定该会“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造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

日本大正博览会在东京开幕，中国参加展出陶瓷、金漆、竹木、美术工艺、丝织品等产品八千余件。7 月 31 日闭幕。

3 月 21 日　袁世凯致电段祺瑞、段芝贵等，谓“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因而近日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饬令“速平”白朗军。

3 月 23 日　段祺瑞奉调回京。袁世凯给段的调令说：“部长久在外，各国注视‘白狼’更重，且久不平，大损声威”。

3 月 24 日　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以赵尔丰“无端因乱被戕”为由，替赵翻案“昭雪”。是日袁世凯竟公然明令国务院“从优议恤”并“宣副史馆，以彰劳荩”。

3 月 26 日　安徽定远乡民组织“江淮义侠军”于本日举事，29 日攻占县城，31 日遭镇压败散。与此同时，合肥广兴集亦有“义侠军”活动。

3 月 29 日　新疆土鲁番维族农民艾买提率众举事，反对封建主伊明郡王的残酷剥削。吐鲁番县署派兵镇压，艾买提率众退入克孜里山坚持斗争，后转移至奇台县境天山活动。12 月艾买提被叛徒杀害，起义失败。

4 月 1 日　交通部创办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五铁路联运，自本日起实行。为我国统一实行联运之始。

4 月 2 日　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其中第十条规定，凡涉及“淆乱政体”、“妨害治安”等一概不准登载，违者重惩。

4 月 25 日　国民党人主办的《民权报》关闭后，该报成员刘铁冷、蒋著超等编辑《民权素》杂志，是日在上海创刊。序言说：民党机关报纸相继被封，“而抨击政府之最有力之民权报亦随潮流而去，独此《民权素》者掇于《民权报》之零缣断素得巍然刊于世”。

4 月 27 日　海军部与德商瑞记洋行签订五十万镑第三次借款合同，做为海军经费。

4 月 28 日　广东梅县驻军一营举事，营长王国柱称“广东讨龙军潮梅总司令”，以革命军广东大都督陈炯明名义出示布告。29 日攻入海阳城，未几败散。

4 月 29 日　约法会议议决以《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临时约法》。

5 月 1 日　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限。

袁世凯废止国务院官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孙宝琦外交总长，朱启钤内务总长，周自齐财政总长，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章宗祥司法总长，汤化龙教育总长，张謇农商总长，梁敦彦交通总长。

5 月 3 日　袁世凯任命杨士琦、钱能训为政事堂左右丞，梁士诒为税务督办。4 日政事堂成立。

5 月 5 日　台湾台南罗阿头、彭汉文等率众发动抗日起义，袭击大埔、大丘园、王爷宫等地日本派出所，旋主动退入大埔山坚持斗争。日本调集大队军警分路“围剿”，起义军失败。次年 2 月罗、彭二人被处死刑，起义志士判无期徒刑者一百三十余人。

5 月 8 日　浙江杭县留下镇茶商，因县署派员勒派学捐罢市。茶农因新茶上市销路无门，遂聚千余人捣毁收捐委员住所，警察厅惧事态扩大，派员劝说各店照常开业。

5 月 17 日　江苏江宁县朱门镇国民党人联合当地帮会，设立机关，密谋举事反袁。本日秘密机关遭破坏。

5 月 18 日　蒙藏事务局改为蒙藏院，直隶大总统。特任内蒙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旗郡王贡桑诺尔布为总裁。

5 月 20 日　袁世凯公布《地方保卫团条例》，规定各县未设警察地方可建立之，各县原有“乡保甲”按此条例整顿。县内划分区团，各团按户指定一人编入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

5 月 23 日　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省设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各官及巡防营警备队等。道置道尹。县置知事。

5 月 24 日　袁世凯公布《参政院组织法》，规定“参政院应大总统之谘询，审议重要政务”。

5 月 26 日　袁世凯停止政治会议，特任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陆徵祥、于式枚、瞿鸿禨、吕海寰、梁启超、王闿运、劳乃宣、赵尔巽、李经羲、锡良、荫昌、萨镇冰、蔡锷等七十人为参政。

6 月 1 日　政事堂批令取消国税，地方税名目，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湖北省清乡公所，在全省六十九县设立清乡分所。按：湖北省于本年 5 月拟定“清乡章程”十五条，经袁世凯批准，遂于省城设立清乡公所。是日开始在全省各县设清乡分所，名义为“调查户口，清除匪类”实为镇压“党人”，并于汉川、沔阳、潜江、天门、荆门、钟祥、京山、应城、云梦、安陆十县，分区驻扎军队重点清查。“规定户族可指名

报告或密告”“以杜乱党密谋”。

重庆警察厅出令悬赏，查获“党人”一名奖银一千元，四人以上者奖银六千元；查获“匪犯者”一百元，三人以上者每各奖银一百五十元。

6月10日　广西西江流域，自是日开始连日大雨，漓江、古江、左江水势暴涨，致西江水位高于平时数丈。梧州、浔江、柳州、平乐等道所属三十八县均被水淹，为1844年以来未有之大水。10月，广西巡按使又呈报北京政府全省二十余县遭旱灾。

财政部规定常关税率为海关税率一半，本日经批准实行。

6月14日　设察哈尔特别区域，辖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左右翼八旗，达里冈崖、商都各牧场，以及张北、独石、多伦(以上三县原属直隶)、丰镇、凉城、兴和、陶林(以上四县原属绥远)七县。

6月15日　湖北武昌自六日至本日，国民党反袁团体“讨袁党改政团”、“军政学社”、“义侠团”等所设秘密机关连遭破坏，四十余人被捕，其中李和生，刘汉杰等八人17日被枪杀。

6月16日　袁世凯电责陆建章、张敬尧率队万余人在宝鸡“数十里内尚不能截剿残匪”，乃使白朗军破围而走，令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

6月20日　参政院行开院礼，徐世昌代表袁世凯宣读颂辞及助词，黎元洪代表参政院致答词。

彭世凯调陕督张凤翙入京，任命陆建章署理陕西都督。

6月21日　湖南国民党秘密机关连遭破坏，被捕四十余人，其中二十九人21日、22日被汤芗铭下令枪杀。

6月29日　袁世凯发布命令：立法院未成立前，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

6月30日　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各该省军务。北京设将军府，置将军诸名号，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管理将军府事务。

袁世凯任命督理各省军务官员。直隶朱家宝，奉天张锡銮(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山东靳云鹏，河南田文烈，山西阎锡山，江苏冯国璋，浙江朱瑞，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湖北段芝贵，湖南汤芗铭，陕西陆建章，甘肃张广建，新疆杨增新，四川胡景伊，广东龙济光，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热河特别区域姜桂题。

黄兴由日本去美国，7月15日抵旧金山。

7月1日湖北汉川县国民党人联合会党举事反袁，遭军警镇压失败。

江苏嘉定县署在该县南翔镇地区茶叶税内附加学堂捐，加征十倍，后又改充警务经费，并派员勒索，该镇商店于是日一律罢市。

7月2日　湖北国民党人在汉水流域各县联络退伍士兵一千多人，在脉望嘴等处同时举事反袁，遭各地清乡驻军镇压失败。

河南南阳镇守使向段祺瑞报告，白朗军返回河南家乡后，“纷纷逃散”，或弃枪回家，或分成小股。白朗率众数百人返回宝丰、鲁山、临汝一带山区活动。

袁世凯公布《惩治盗匪条例》，规定死刑九款，由巡按使核准即可执行；但在“事机急迫”，“有劫夺之虞”等情况下，由军队长官审判执行。

7月5日　奉天怀德县乡民为反对税局勒收人头税等(大口一元，小口五角，鸡、鸭、鹅、犬均令各纳三角)，聚众捣毁税局。是日张作霖派员前往处理，被迫同意停征苛税。

7月6日　袁世凯令改绥远城将军为绥远都统，下设绥远道，辖归绥等八县。又于热河特别区域设热河道，辖承德等十四县；察哈尔特别区域设兴和道，辖张北等七县。

7月8日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加入者须立誓约，打指印。党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

7月12日　中华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悼会”。开会公启谓自二次革命以来，“党人”“先后死难不下万人”。

7月13日　湖南将军汤芗铭为消除“党人”势力，命裁撤各地巡防营队。“党人”李国柱等乘机运动湘南防营反袁。是日郴县驻军哗变举事，附近各县起而响应，不旬日即占领桂阳、宜章、临武、永兴、耒阳、嘉禾等县。汤芗铭派兵由衡阳、常宁、零陵分三路“围剿”，起义军坚持月余后失败走散。

7月16日　吉林省城因淞花江水陡涨，漫溢城区，城内水深数尺，吉长铁路停驶。31日依兰县被淹，城内水深丈余。

7月18日　福建镇守使改护军使，任命李厚基充任。

7月28日　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分卿、大夫、士，以上、中、下列为九等。

江西南昌“党人”组织“华民军”事机泄露，“华民军江西支部长”陈秀伟等十余人被捕。

8月9日　湖北兴山县县知事阎凤冈，借验契敲诈勒索，民不堪扰，本日及12日群众数百人哄闹县署，要求免征苛税，县警开枪镇压，逮捕十余人。

8月10日　新疆将军杨增新派马队两营在和阗捕杀哥老会首领刘镛等六人，严禁哥老会所立码头山堂。

8月16日　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欧柏林城组织勤

学会。后于1916年8月15日改名为“欧柏林中国学生工读会”，标明宗旨为“以半工半读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8月17日　中国军警与日军在奉天昌图县八面城发生冲突，日本借此擅自向郑家屯（今双辽）派兵一个中队。

8月18日　上海中华革命党人拟于江苏南通举事反袁，图谋占领如皋、泰兴、扬州等地。本日“党人”四五十人到南通，为军警发觉，被捕三十八人。

8月22日　江苏泗阳县洋河地区会党首领丁三花、仲八等聚众千余人举事，占据仁里圩、闸塘周围二十里村镇，活动于泗阳、泗县交界地区，江苏防营屡攻失利。是日苏、皖两省派兵“围剿”，会党溃散。

8月24日　袁世凯将参政院建议修正总统选举法议案咨交约法会议审议。

8月26日　政事堂礼制馆拟订《祀孔典礼》一卷，并附说明书，经国务卿徐世昌核定，袁世凯批令执行。

9月1日　孙中山发表宣言，通告海内外，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经解散者，“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9月8日　袁世凯据“衍圣公”孔令贻呈请，批准曲阜孔庙祀田仍归孔府所有。按：所谓“祀田”，实际是孔府霸占的土地，最多时达一百万亩，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仅山东即有五屯、四厂、十八官庄。

奉天本溪中华革命党人联络当地绿林队伍举兵讨袁，攻占县城，破狱释放囚犯。张作霖派兵前往镇压。

9月15日　山东省潍县、胶县、昌邑、平度、高密、即墨等县水灾，灾区面积东西三百余里，南北百余里。是日北京政府拨款救灾。本月安丘、广饶久雨，河水泛滥成灾。

9月19日　湖北省向北京政府呈报灾情。江汉、襄阳、荆南各属三十余县水、旱、虫灾严重，仅汉川、沔阳、随县、光化四县灾民即有六十万人。

9月21日　袁世凯任命赵倜督理河南军务。

9月25日　袁世凯发布祭孔“告令”。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规定9月28日“旧历仲秋上丁”中央与各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9月28日　袁世凯率各部总长交并武官吏，着新式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礼。

10月4日　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辖大兴等二十县，设京兆尹为行政长官。

10月5日　新疆将军杨增新呈报北京政府，谓迪化县哥老会周乔生等开设山堂，散发票布，定于旧历中秋举事，刻已破获，首要枪杀，余众解散。

10月16日　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开祭孔大会，各省去曲阜参加大会者，火车票价七折优待。同日孔道会、孔社在北京分别举行大规模“孔子圣诞纪念会”等活动。

10月22日　中华革命党人集中江、浙等省活动，以夏之骐、吴藻华、范鸿仙分别主持浙江、江苏、上海地区工作。16日夏之骐召集党人决定于浙江举事，党人陆续集中杭州，谋先攻打将军署，杀浙江将军朱瑞。事为军警侦知，自本日起，秘密机关连遭破坏，先后被捕三十余人，内有十余人遭杀害。

10月27日　上海油漆业工人以银元价骤涨，铜元贬值，工人以钱价论吃亏甚大，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油漆业同业公会资方本日被迫同意，允于11月7日开始增加。届时资方毁约，工人再次罢工。同业公会请官署禁止工人集会议事，工人坚持斗争。12月20日上海官署惧怕事态扩大，出面调停，议定每工增加二十五文。

袁世凯公布立法院组织法。规定“立法院为民国议会”由中央特别选举会选出四十人，各省、地区选举会选出235人组成。然终袁之世，并未实行，只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

11月2日　上海水木业工人四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24日业主被迫同意每工增加三十文。

11月5日　中华革命党人洪兆麟聚众二千余人，在广东惠州举兵反袁，龙济光派大队军警赶往镇压。

11月15日　北京《亚细亚报》于本日至18日连续登载劳乃宣《正续共和解》、《君主民主平议》，及劳致徐世昌、赵尔巽等人函，鼓吹复辟。

11月16日　司法部公布《易笞条例》，恢复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已废之笞刑。

11月18日　广东电白县“党人”陆志云、许国丰联络退伍士兵举事反袁，遭镇压败散。

袁世凯令徐世光督办直隶濮阳黄河决口事宜，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巡按使为会办。1913年7月黄河于濮阳双合岭地方决口，河堤迄未修复，今年水势复盛，濮阳、寿张、范县遭水淹。

11月19日　袁世凯美籍政治顾问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校演说“中国新约法论”，谓临时约法不合中国国情，“采用内阁制，事权集于国会，因之起党派之纷争，而总统反不足轻重”，新约法“所规定政府之形式与中国之历史习惯，更为相合”因“目前之中国人民无合群共动之能力”。

北京政府总检察厅通饬各省检察厅，严禁刊布书籍、文章煽惑复辟谬说，肆行煽惑者，依法惩办。次日内务部亦就此通咨各省将军、巡按使。

11月23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以近日有人倡“归政清廷之说”，严禁复辟邪说，如有“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

11月25日　山东地方政府与日军代表商订“胶济

路临时治安条款”十五条。

11月27日　袁世凯公布《惩治盗匪法》。12月6日又公布《惩治盗匪法施行法》。

11月29日　袁世凯批令内务部将上书主张复辟的宋育仁押解回籍。

11月30日　湖北将军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向袁世凯报告全省清乡成绩，谓“此次清乡重在清查乱党”自6月以来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

12月6日　山东省各界发起组织“东亚和平维持会”，推定代表赴京上书请愿，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军用区域，交涉撤退胶济路日军，在欧战议和以前调查损失，要求日本赔偿。

中国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赛会部分展品四百箱由上海启运，另有一千六百箱随后运出。监督陈琪及农商部委员陈承修随船赴美。

12月12日　袁世凯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12月13日　外交部据外交文书编辑《光绪宣统条约》成书。

袁世凯以广东将军龙济光、浙江将军朱瑞迭次破坏“党人”反袁秘密机关，分别授予一等嘉禾章及文虎章。

12月23日　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祀天礼。

12月28日　约法会议三读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次日袁世凯正式公布。该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将其姓名“亲书于嘉禾金简”，密藏石室，届时交付选举。

12月31日　英文《北京日报》吹捧《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谓“无论该项法律有何缺点，须知此选举法应中国之特需，由是观之，则此法诚有利于中国”。

外　交

3月1日　中国政府照会瑞士政府声明正式加入“万国邮会”。5月3日任命戴陈霖为代表往西班牙出席“万国邮政大会”。

3月24日　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兴夏托拉，在印度德里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以秘密换文方式，擅自划定中印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领土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地区划入印度版图。7月3日参加西姆拉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根据中国政府训令，向会议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以后中国历届政府也都没有承认过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3月29日英使朱尔典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保护西安教士，剿办白朗军。是日，袁世凯致电段祺瑞严饬各军队“克期扑灭”。

4月3日　德国外交大臣雅哥电示驻英大使李绪诺维斯基，针对英、俄两国在中国西藏和外蒙古的活动，命其向英提出：门户开放原则应不仅适用于中国本部各省，也应适用于中国边疆各地区。8日德驻英大使就此向英外交部提出。英外交部覆称：“在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范围”，“例如英人在扬子地区”，德国在山东。

4月10日上海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与驻沪法总领事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扩大法租界范围。

4月19日　德国外交大臣再次电示德驻英大使，谓德国不能承认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有一个独占权力的势力范围”，表明对华政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以保持中国的完整及在全中国为我们的商业维持门户开放为原则。”

5月13日　袁世凯任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为全权代表，会同颜惠庆前往荷兰出席海牙万国禁烟会议。

5月15日　厦门鼓浪屿事件（2月18日发生），中英屡经交涉，本日达成协议：北京政府惩办肇事商民，会审公廨仍由中国地方当局派员出席会审。

6月5日　德驻英大使据日本政府指示，就中英西姆拉会议事，向英外交大臣葛雷提出：德国政府认为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德在华所享有之“无限制最惠国待遇，现在像过去一样，也适用于西藏。关于蒙古我们去年十一月对俄国也采取了同样立场”。

6月13日　日本政府就传闻英国与中国政府商议修建由北京经热河至赤峰铁路事，发表声明，重申“南满东蒙”日本有特殊利益，希各国予以尊重。

7月3日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伦兴夏托拉在印度西姆拉擅自签定《西姆拉条约》，北京政府代表陈贻范根据指示，拒绝签字，并在会议上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3日和7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声明。西姆拉会议自1913年10月召开至此无结果而散。

7月11日　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取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活动。

7月23日　日本政府任命日置益为驻华公使（原任公使山座圆次郎5月28日死于北京任内）。

8月1日　德俄宣战。3日德法宣战。4日英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2日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谓：如英国卷入战争，日本将根据“日英同盟”采取必要措施。

8月3日　中国驻美公使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请欧洲交战诸国同意不在中国领土、租借地发生战争行为。美国据此分别于11日、13日与英、德磋商，无结果而罢。10日日本诘责北京政府不应先向美国作此请求。

8月4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求见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提出当战争波及远东，香港、威海卫受到德国袭击的情况下，英国希望日本给予援助。7日格林送交英政府照会，希日本舰队在中国海攻击德国舰队。

8月6日　北京政府就欧洲大战爆发，发表中立宣言，并公布局外中立条规二十四款。

8月8日　7日夜至8日晨，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认为：乘机参战，驱逐德国在远东的势力，是合于时机的"良策"。

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据外交部指示，向日本政府提出，由日、美两国共同劝告欧战诸国限制战区，"使战祸不致及于东方"。日内阁总理大臣大限重信答以"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反对限制战区。

8月9日　日本将对德宣战一事通知英国。10日英国复照谓：为避免在中国引起纷乱，影响通商利益，希日本只限于海上"保护英国商船"，表示阻止日本对德宣战。11日日本答复英政府，反对限制其军事行动范围，并表示对德宣战决定不能改变。

8月13日　德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愿将胶州湾租借地直接归还中国。是日日驻京使馆代办小幡酉吉向外交次长曹汝霖提出警告，阻止中国接受德国建议。

8月15日　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无条件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交付日本，即时撤走德国在日、中两国海面上军舰，否则完全解除武装。以上两项8月23日中午以前如无满意答复，日本将采取必要措置。

8月20日　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抵北京。

8月21日　美国照会日本政府，谓日德宣战后，希日本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维护各国在华商业利益均等，如中国内地发生动乱，日本采取必要措施时，应根据1908年美日"罗脱—高平协定"精神，事先与美国协商。

8月23日　日本对德宣战。

8月24日　公使日置益面见外交总长孙宝琦，无理要求北京政府按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域"，并撤退胶济铁路中国驻军。其后于25、26、29日一再催促北京政府接受日本上述侵略要求。

8月29日　外交部就8月17日日军侵驻郑家屯一事，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

8月30日　外交部通知驻日公使陆宗舆转告日政府：胶济路潍县以东至青岛"日人可任便布置"，希日政府"明我好意，勿为过分之举"。

9月3日　北京政府照会各国公使，划定山东省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地方为日德交战区，不负完全中立责任。次日德、奥公使就此向外交部提出抗议。

9月6日　北京政府出席中俄恰克图会议专使毕桂芳、副使陈箓并随员一行二十八人，于8月29日晚由京乘车出发，本日抵恰克图。

9月8日　中俄及外蒙古地方当局代表三方在恰克图商会公所开预备会议。中国代表毕桂芳、陈箓，俄国代表亚历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地方代表达布札布（后改为希尔宁达木定）、察克都尔札布等并三方随员均出席，议定会议程序。恰克图会议系根据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第五款规定，进一步商订"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及各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会议历时九个月，至1915年6月7日始签订《中俄协约》。

9月15日中俄及外蒙古地方当局三方恰克图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北京政府代表于会上声明："此次会议性质乃确定中央与自治区之交际，而俄国为之居间，与外交会议不同"，会议应以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为根据。

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解纷免战条约》。

9月22日　日外务省训令驻京日使立即向中国政府交涉，借口军事需要，日军将占领胶济路全线，并由日本经营管理。28日日置益就此照会北京政府。次日外交部指示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9月30日　俄国驻库伦总领事与外蒙古地方代表签订"铁道条约"、"电线条约"，使俄国在外蒙取得铁路建筑权，及由俄境依尔库次克省之孟达至乌里雅苏台电线架设权。

10月1日　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路会见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要求日军撤退。日方坚持胶济路为德国财产，当与胶澳一并占领，并要中国军队由上述地区撤走。

10月7日　外交部就日军非法侵占胶济铁路，再次向日驻京公使提出抗议。次日日使复称：此为日本预定军事计划，并未侵犯中国中立。

10月17日　日外务省训令驻京日使：日攻占青岛后海关应置于日军管理下，海关职员全部任命日人。日使随即向北京政府提出照会。外交部答复：青岛未交还中国前，海关可暂用日人或英人。

10月19日　日军在山东平度县出示"斩律五条"，内有"如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等语，舆论为之大哗，外交部以此向日使提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

10月29日　日本黑龙会代表内田良平向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黑龙会《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通称黑龙会备忘录），共分三节：一欧战与中国问题；二中国问题与防御同盟——中日防御同盟秘密条款；三中国问题和现内阁的外交。狂热鼓吹乘西方帝国主义相互厮杀，无力顾及东方时刻，日本应建立侵略中国的优势地位。并附函说："今欧洲大战为解决本问题千载难逢之机遇，不

可有一日之踌躇逡巡。”

11月10日　外交部照会驻京日使，要求拆除日军在山东胶州、即墨间所架设军用电线及龙口经莱州、平度所筑轻便铁路。18日又提出撤退青岛日军。日本对此均置之不理。

11月11日　日本内阁通过“对华交涉案”(即二十一条)，次日电召驻京日使日置益回国。是月中旬日置益返回北京。

12月2日　日本内阁就“对华政策”(即“二十一条”)上奏天皇批准。

12月4日　日本“国民外交同盟会”成立。伊东知也、内田良田、田锅安之助等七人为干事。该会规则规定：“本会以自主外交为本义，确立举国一致的对外政策，以求对华问题根本解决为目的。”

12月5日　日本新任关东都督中村觉向日本内阁提出“对华要求”事项，一、日本在南满及东蒙地区得享有居住、营业、不动产所有权，及开办铁路矿山并其他企业优先权；二、奉天巡按使聘请日本顾问若干名，以改进奉天政治、财政、警务、法律；三、奉天将军聘请日本军事顾问若干名，进行军事改革。

12月14日　日驻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推荐青岛正副税务司及帮办八人，要求北京政府任命。外交部以违反中国海关用人先例，拒绝未允。青岛未为日军攻占前日本即向北京政府表示此意。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原大连税务司日人立花正树为青岛税务司，日本无理坚持应由其选定通告中国政府派用，遭拒绝，双方遂起交涉。后日本允以立花正树为青岛税务司，但其余应按日方要求任命，北京政府被迫同意，事乃息。

12月28日　日本拒绝北京政府管理青岛海关。是日驻青岛日本侵略军司令部公布海关临时规则六条，擅自开关。

12月2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通知日使日置益，以青岛德军投降，决定声明取消本年9月所宣布之山东省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交战区域。与此同时，驻日公使陆宗舆根据北京政府指示，就此问题照会日本政府。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电示日置益，采取强硬态度阻止北京政府发表此项声明。

经　济

1月11日　袁世凯公布“契税条例”、“验契条例”、“所得税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验契条例”规定：凡条例公布前之旧契一律呈验，每张交纳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借以增加财政收入。是年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向北京政府报告，1914年5月至9日底该省验契增收一百零六万余元，较往年契税增加二、三十倍，较之田赋增加一倍。是年广西水旱灾荒遍及全省。本年底财政部向袁世凯呈报全国各省验契收入总数达三千零九十八万四千五百零六元。

1月13日　袁世凯公布“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保息条例”规定：政府发公债二千万元为保息基金，新设棉织、毛织、制铁、制丝、制茶、制糖等公司，开工三年之内，按实收资本可呈请保息。

1月16日　袁世凯以“近岁国家收入奇绌”令各省按旧制新章，“严定责成”，“优加奖励”，督催各项应征应缴之款。

袁世凯公布“督征经征分征官解款足额奖励条例”，规定自五百万元以上起，各省除盐、关两税外，原有国税征收足额报解京师者，分别奖给劳绩金与奖章。

1月21日　北京政府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六亿法郎钦渝铁路借款合同。旋以欧战爆发中止。仅垫款三千二百一十万五千五百法郎。

1月22日　黑龙江省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四百万卢布借款合同，做为军队经费，以全省金矿为担保。

1月25日奉天溪碱铁路(本溪湖至碱厂，为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所建之轻便铁路。)自1913年10月6日开工至本日建成(本溪湖至朱心台段)。9月25日满铁株式会社始与奉天巡按使及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签订溪碱铁路备忘录，规定该路中日合办。

2月7日　袁世凯公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以纯银库平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单位，称圆。12月24日天津造币总厂始铸袁世凯头像银元。

2月9日　财政部公布盐务署稽核总所及分所章程，该章程系根据1913年4月26日善后借款合同有关条款制定。总所章程规定：稽核总所设中国总办一员(盐务署长兼)，洋会办一员，并兼任盐务顾问；中国政府盐务收入账内之款必须总、会办会同签字“方能提用”。“总、会办有保护盐税担保之各债先后次序之职任”。分所章程规定：各产盐地设立分所“设华洋经、协理二人，其等级职权均相平等”。中国盐税权完全为外人控制。

2月10日　北京政府与美商签订合办石油公司合同。使美国获得开采陕西延长、直隶承德油矿专利权。经勘探，美国以无利可图，于1917年宣布废约。

2月14日　财政部公布民国二年度“修正全国预算”(1913年7月至1914年6月)，岁入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五元，岁出六万四千二百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六元，出入相抵不敷八千四百九十四万零七百三十一元。

交通部与中英公司签订三十七万五千英镑《上海枫泾铁路清还抵欠合同》，以此项借款清还1912年1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商大仓洋行所借之三百万日元。

交通部与商办江苏铁路公司在北京签订《赎回上海枫泾铁路议订条款》，将上海枫泾铁路收归国有，路款由交通部偿付。

3月31日　北京政府与中英公司签定八百万英镑宁湘铁路（自南京经芜湖、南昌至株洲）借款合同，后因欧战爆发中止，仅垫款五十万英镑。

农商部公布《权度条例》统一全国度量衡，该条例规定：权度分甲乙两种，甲、营造尺库平制，长度以营造尺一尺为单位，重量以库平一两为单位。乙、万国权度通制，即国际通用度量衡标准。同日公布《民业铁路条例》。

4月7日　袁世凯公布《交通银行则例》，规定该行可分理国家金库。资本定为一千万两，官四、商六。

4月11日　交通部与商办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代表议定，将杭州至枫泾、曹娥至宁波两段铁路及杭州江干至湖墅支线交归国有，公司所有股本由政府偿还。6月16日交通部派员管理。9月19日在北京签订《收回沪杭甬浙段铁路议订条款》。自此江、浙两省商办铁路全部收为国有，北京政府遂将沪杭、曹甬两段铁路及江湖支线与英人握有实权之沪宁路合并为沪宁、沪杭甬两路管理局，并修建一条两路联合线，自上海北站经现上海东站至新龙华，于1916年完工。

4月　奉天省抚顺煤矿古城子矿区开始露天采矿。

唐绍仪在上海创办金星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人寿、水、火保险，资本一百万元，总公司设上海，于国内各大城市设分公司。

俞家骥在山西大同创办大通机器面粉厂，资本五万两，总号设大同，于北京、张北、丰镇等处设立分号。

5月17日　江西南浔铁路公司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签订第二次二百五十万日元借款合同。

5月31日　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以一百万英镑为限之准备金，作为发行新币、收回广东旧币之用。

周肇昌在湖北沙市创办积成纺织厂，纱锭五万枚，资本规定二百五十万元。

福安保险公司创办于天津，经营人寿、水、火灾保险，资本规定一百万元。

6月22日　农商部批准中日实业有限公司开业，资金五百万元，中日各半。本店设东京，于北京设总营业所，上海设分所。该公司成立后，即对安徽繁昌桃冲铁矿贷款，嗣后又有电话借款，山东实业借款，汉口造纸厂借款。

6月30日　乐汝成等在山东济南创办泰康罐头食品公司，资本仅五千元，仿制饼干糖果及罐头食品。至1918年已遍销山东及平津等地。1921年在上海设批发所，1923年设总厂，资本增至十五万元。1933年增至五十万元。

华年人寿保险公司在汉口创办经营人寿保险，资本一百万元。

7月1日　中国银行广东分行自是日起兑换新币。广东自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金融混乱。本年3月28日北京政府派王景芳前往整顿，嗣经呈准于6月1日成立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由善后借款整顿盐务费项下拨一百万英镑作资金，发行“五元特别券”，旧币以五成兑换新券，同时并发行五元、一元新币。旧币自7月1日至31日止，限期收回。据该分行报告共收回旧币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余元。

7月25日　北京政府与英商宝林公司签订一千万英镑沙兴铁路（湖北沙市至贵州兴义及湖南常德至长沙支线）借款合同，后以欧战爆发，仅垫付五万英镑，事遂中止。

7月31日荣敬仁、丁梓江在上海创办福新第二面粉厂，资本十万元。后于1919年7月焚毁，1921年重建恢复生产，增加资本至六十万元。

8月3日　袁世凯公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以整理金融、补助国库为由，发行国内公债一千六百万元。旋设立内国公债局，任梁士诒为总理。12月21日又追加募集额八百万元。实际共募集二千五百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元。

8月7日　财政部与比国证券银行签订四十万镑借款合同，以田赋及关税余款为担保。

8月31日　刘长荫于浙江长兴创办长兴煤矿，后以资金不敷，1918年3月与朱葆三、刘万青组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一百五十万元，总店设上海。

9月12日　王荆山在吉林长春创办裕昌泺火磨（面粉厂），资本五十万元。

袁世凯公布《征收厘税考成条例》、《征收田赋考成条例》，对完成和未完成厘金、田赋征收额之地方官吏分别予以奖励和惩处，在此聚敛措施下，据民国三年北京政府概算所载，全国各省田赋收入较清末旧额增收加倍。

农商部制定并公布《商会法》，规定“各省城各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商会”，“研究促进工商业之方法”。

9月17日　北京政府与英商萨穆尔公司签订一千万英镑汉口修建借款合同。

9月30日　范旭东在天津宁河县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为我国精盐业之始。初时资本仅五万元，未及十年资本增至二百五十万元，经理处及总店设天津，支店遍及国内各大城市。

周庆云在浙江杭县创办虎林丝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三十万元。

10月11日　中国、交通两银行筹集资金一百万元设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储蓄券。是日袁世凯批准并公布

章程。该行总行设北京，10月23日临时营业，1915年2月21日正式开幕。1919年4月4日增加资本总额至五百万元。5月上海分行开始营业。

10月21日　奉天省向日商大仓洋行签订一百五十万元借款合同，以扣还1912年10月16日借款及本溪湖煤矿增资中方股本。

10月31日　高懿丞在杭州租用已停工之通益公旧厂设备（清末开设，为杭州最早的近代纱厂）创办鼎新纺织公司，纱锭二万零三百六十枚，资本二十万元。

11月9日　河南中原公司（系由中州、豫泰、明德、凭心四煤矿公司合并组成），与英商福公司联合组成"福中总公司"，是日双方签订草合同，规定资本一百万元，总事务所设焦作。1915年5月7日签订正式合同。

11月12日　陕西延长油井开始施工。

11月22日　殖边银行总行在北京开幕。该行为徐绍桢、王揖唐等于3月6日呈请袁世凯批准设立，规定资本总额二千万元，以开发边疆为宗旨。12月6日上海分行开业，后因滥发纸币，上海分行于1916年倒闭。

12月3日　农商部批准商人陈滔、胡奎文创办张（张家口）多（多伦诺尔）汽车公司，修建公路四百公里。

12月24日　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依照《国币条例》开始铸袁世凯头像银币。嗣后财政部南京江南造币厂亦开始铸造。

12月27日　币制局裁撤。

12月　虞洽卿在上海创办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二十万元。初仅轮船一艘，航行于上海宁波间。1918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1919年增至二百万元。先后购买千吨级轮船六艘，航线亦增加长江、南洋、北洋等线，并兼航海参崴、仰光、日本、南洋群岛各地。在长江各埠设有分公司、码头仓库、趸船等，在长江航线中与招商局、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家轮船公司竞争。至1936年拥有轮船二十艘。

军　事

1月9日　白朗军在河南确山县新安店与北京政府陆军第二师王占元部激战，京汉路交通中断。10日白朗军攻罗山未下，13日破光山，14日占潢川。

1月17日　白朗军破商城，安徽都督倪嗣冲急调皖军各营往六安、颍州、寿县防守。

1月18日　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秉承袁世凯之意，派军队驻曲阜保护孔林孔庙。

1月19日　白朗军在六安金家寨击溃巡防队一营进入安徽省境。舒城韦道应、乔三等绿林队伍六、七百人起而响应，白朗军声势更盛。怀远、滁县、定远等县群众武装斗争纷起，至六月间先后失败。

1月25日　白朗军23日破安徽霍山县城，本日攻占六安。27日弃城西走，活动于霍山、六安间，部众六、七千人。袁世凯急令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会剿"。

1月30日　白朗军在安徽六安县叶家集击溃赵倜两个营，折向六安以南地区活动。

2月22日　段祺瑞指挥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军队，在豫、皖两省交界之六安、商城、固始等地区，分兵驻扎，层层设防，计划将白郎军"歼之于霍丘、霍山、叶家集（属六安县）之间"。是日十时，白郎军万余人由商城鄢家集北面金刚山一带突围，激战一昼夜，次日黎明破围西走。27日出现于豫、鄂交界之武胜关，武汉为之震动。3月6日段祺瑞急命王占元率军返回湖北防守。

2月28日　白郎军突围返回河南，其大队往新野、邓县，另队于信阳以南进入湖北省境在应山、随州等地活动。

3月7日　白郎军过襄阳围攻老河口，次日攻克，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焚烧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及英美烟公司等。9月返回河南，13日围攻淅川，未下，破荆紫关，遂在内乡、南召一带活动。

3月10日　广东黄冈县驻军营长吴文华率兵举事，宣布独立，称"三次革命"，旋败。国民党人朱执信、洪兆麟等乘机在惠州等地组织反袁武装，龙济光派兵镇压。

3月18日　白郎军万余人由富水关进入陕西境内，克商南，破龙驹寨（丹凤），陕督张凤翙亲率队驰赴商县防守。袁世凯命四川派兵驰援汉中。

3月22日　白郎军由陕西商南西走，24日破山阳，30日取孝义（今柞水）。图汉中，受阻，乃逾秦岭趋鄠县。4月上旬前锋逼近西安。白朗以"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名义在西安附近张贴布告，痛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己意为法律，仍欲以帝制自为，……摧残吾民，盖较满清尤甚"，"朗因此痛心疾首，奋起陇亩，集合豪杰而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现我军早已逾秦岭出大峪，跃武威宁，观兵长安，克城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约，不举项王三月之火。我诸父老昆弟，其各安堵勿恐"。西安为之震动，袁世凯慌忙调兵入陕。

4月6日　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组成飞机支队前往陕西参加围剿白朗军。是日该校法式双翼飞机四架由京汉路转陇海路运至渑池，又以人力运抵潼关装配。26日起在陕西各地从事侦察，此为我国飞机用于军事之始。

4月8日　白朗军在陕西攻破周至，连下雩县，乾县，永寿。袁世凯急命赵倜所部入防西安。又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十二营并雷震春部八营沿京汉路南下入陕。

4月14日　白朗军破邠县，次日与陕军陈树藩混成旅在太峪镇大战，双方伤亡均重。

4月15日　甘肃都督张广建调集甘军崔正午部援陕，在陇县、凤翔一带布置防守。另派提督焦大聚率兵驻通渭马营镇厄守通兰州之要路。本日白朗军至长武为甘军所阻，南向破麟游，17日过岐山。

4月17日　云南临安县驻军一营，与当地会党联合举事，围攻驻军团部，占据县城。驻军团长与当地官绅率民团联合镇压，举事者失败。

4月18日　袁世凯命陆建章督办西路剿匪事宜，赵倜为会办。

4月20日　白朗军在陕西攻破凤翔，甘军崔正午部五营不战而溃。白朗军沿渭水入甘肃境，逼向通渭。赵倜率军跟踪。30日双方在通渭接仗，白朗军走陇西。甘军在秦州(今天水)、伏羌(今甘谷县)布防。

4月24日　袁世凯任命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署理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5月2日　白朗军由陇西入宁远(今武山县)甘军统领陈正魁率部两营在宁远洛门镇防守，白朗军设伏围歼之，陈仅以身免。次日赵倜部毅军四营自陇西来援，白朗军走伏羌。

5月4日　白朗军攻秦州，5日攻破，甘军八营溃散，总兵马国仁被击毙。白朗军首领李鸿宾战死。白朗军旋即南下入徽县、成县，两县驻军闻风远遁，县吏迎降。

5月9日　袁世凯设立“陆军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荫昌、王士珍、萨镇冰等为办事员。12日裁总统府军事处。

5月12日陆军第三师第五旅扩编为陆军第十师，任命卢永祥为师长。

5月14日　白朗军破阶州(今武都)。次日走西固。川军抵阶州防白朗军入川，白朗军趋岷州。

5月23日　白朗军破岷州(今泯县)，25日克洮州(今临潭)，筹集粮草发生困难，“杀马匹充饥”。

5月31日　白朗军攻占洮州后，赵倜率所部并联合甘军，分别进驻陇西、临洮、礼县一带策划四面包围。本日白朗军进至漳县，攻城不下，次日与赵倜军接仗，白朗军败走宁远。

6月2日　白朗军在甘肃伏羌与赵倜所部各军激战，再败，白朗本人负伤，退往秦安。

6月4日　白朗军六千余人破秦安，克清水，急欲东归，8日由宝鸡破围南走。

广东国民党人朱执信于吴川、电白、信宜三县地区组织反袁武装。是日龙济光派军队于黄坡分路“围剿”，驻广州湾法国侵略军会同堵截，朱执信败走海上。

6月17日　白朗军于宝鸡突围后，分前后两路东返，宋老年率一路在前开路，白朗一路尾随，共约三四千人。10日过周至13日由子午谷走镇安，本日破城。21日过山阳。

6月26日　赵倜率部抵陕西龙驹寨(丹凤)，立即派队在山阳竹林关、荆紫关布置防守。白朗军宋老年部本日在富水关突围，路经杨家沟与镇嵩军激战一昼夜。次日白朗率大队亦至，遂破围而走。29日由荆紫关西坪一带返回河南。

张家口发生兵变。因兵士聚赌巡警干涉所引起。店铺一百余家被抢劫烧毁。都统何宗莲派兵缉拿。25日至27日先后枪毙变兵百余人。参与变兵行动者，当局诡称缴械遣送回籍。7月1日遂尽驱上火车，载赴山谷地区，预先布置伏兵，变兵约有两连之众，全部击毙。

6月27日　安徽国民党人在巢县密设机关，连络全椒、含山等县会党群众一千余人，预定7月举事。事泄，“党人”崔国栋等六人于本日被捕遭杀害。

6月28日　奉天国民党人在开原联络当地绿林武装三十多人图谋举事反袁，事泄，在四家子为官兵包围，仅十余人突围走脱。

7月21日　赵倜为“围剿”白朗军余部，率所部毅军、镇嵩军等万余人，在河南鲁山、宝丰、临汝、方城等县村镇驻扎，“清乡严洗”。是日赵倜向袁世凯报告“清乡”情况。

8月3日　白朗于7月28日为北洋陆军第三混成旅张敬尧部击伤，本日死于河南鲁山县石庄。刘镇华镇嵩军闻讯，于5日掘尸报袁世凯请功。白朗起义军至此完全失败。

8月27日　日本第二舰队宣布封锁胶州湾。31日相继占领胶州湾附近各岛屿。

9月2日　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在山东黄县龙口登陆，次日日军大队陆续上岸，强迫地方当局供应军需用品，俨然以占领者自居。7日日军西进，沿途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任意枪杀民众，无恶不作。

9月10日　在山东龙口登陆日军，本日侵占平度，12日抵即墨、高密，13日侵占胶州。

9月14日　河南省第一师改编为陆军第九师，任命张锡元为师长。1916年又改为河南省第一、第二两旅，以黎天才第十一师改为第九师。

9月18日　第二批日军于山东半岛劳山湾登陆。

陆军第七师裁撤，改编为第十五第十六两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分任旅长，原第七师师长陆建章免职。10月另以驻河南第三混成旅改编为陆军第七师。

9月23日　英军九百人在山东半岛劳山湾登陆。

9月25日　日军四百余人侵占潍县车站。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日使复称：胶济路系德国财产，故按站占领。

9月26日　日军攻击青岛外围德军第一线阵地。27日迫进青岛，28日第二舰队攻击胶州湾，第四舰队占领劳山湾。

10月3日　日军由潍县沿铁路线西进，5日侵占青州车站，6日侵占济南，胶济路全线为日军占领。袁世凯命中国驻军撤出铁路沿线地区。

10月10日　日军非法侵占山东博山煤矿。

日海军舰队炮击青岛德军各炮台。

10月15日　陆军第三混成旅及该旅备补营改编为陆军第七师，以张敬尧为师长。

10月23日　袁世凯成立模范团，士兵由陆军各师选送和由保定军官学校挑选，实系军官训练团，以备编练模范军之用。

10月25日　中华革命党人在广州成立敢死队、炸弹队，进行恐怖暗杀活动。自本日起广州城内连续发生爆炸案。

10月27日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

10月31日　日军对青岛发起总攻。日英军舰炮击德军阵地。

11月7日　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德军投降。29日日人擅自成立青岛市政厅，由日军师团长神尾光臣任行政长官。

文　教

1月1日　中华书局编辑发行《中华实业界》于上海创刊。该刊以"助政府研究实业政策"等为方针。同日该书局编辑之《中华小说界》亦于上海创刊发行。

1月30日谷钟秀等主编《正谊》杂志于上海创刊。该刊自称"以公平之主张发稳健之言论，不涉一党伪私之见"，"负指导社会并忠告政府之责任"为宗旨。

3月9日　袁世凯令设清史馆。9月1日开馆，以赵尔巽为馆长。

5月10日　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杂志创刊于东京。据第二期"布告"载："本报为纯民党之代表言论机关，研究民国政治上革新之重大问题。"各期所刊皆以反袁为宗旨，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鼓吹"三次革命"。

章士钊主编《甲寅》杂志创刊于日本东京，在上海发行。创刊号宣告"本杂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

5月19日　教育部核准北京私立民国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明德大学、私立中国公学四校立案。

5月21日　北京体育竞进会在天坛举行第一次全国联合运动大会。竞赛项目有田径，足、棒、篮、网球等。

5月25日　国史馆成立，6月17日开馆，王闿运为馆长。

6月12日　留美学生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翌年1月在上海创办《科学杂志》。

6月24日　教育总长汤化龙通咨各省区谓："我国之有孔子，固数千年所奉为师表，国性之永存，国维之弗坠，胥在乎是。本部拟于中小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中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曾经详具理由呈请大总统批准在案"。"从前业经审定发行之本，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慎改订，呈部审查，以重教育。"

7月10日　袁世凯公布《奖学基金条例》，设"学术评定委员会"，规定凡本国或外国高等学校毕业者提出论文或著述，经学术评定委员会评取后，每年得领学资四百元，满四年为止。7月17日任命汤化龙为学术评定委员会委员长。8月7日该会正式成立。

7月20日　商务印书馆主编《学生杂志》创刊于上海。

8月31日　江苏省咨请教育部就两江优级师范学校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经筹办于次年9月10日开学。后于1923年该校并入东南大学。

10月14日　内务部于北京故宫武英殿设立古物陈列所，是日开幕，售票供游人参观。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5年

导　言

一九一五年，日本趁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在德军投降后仍迟迟不肯撤军。它的真正目的在于吞噬整个中国，占领山东后又有了要挟中国的条件，便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恰好袁世凯当皇帝的心思越来越大，日本投其所好，以支持他当皇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二十一条》。这是一个彻底灭亡中国的计划，但袁世凯为了实现帝制，最终还是应允了大部分条件，成为中华民族耻辱的又一个象征。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并解散国会后，立即转过手来向临时约法开刀，他要求"政治会议"修改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正式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使大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皇帝。但他仍不满足，又炮制出《总统选举法》，力图为帝制做好最后一步准备，到本年中期，袁世凯自以为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立即准备将"中华民国"招牌取下，建立袁家王朝。

复辟帝制再也不可能使广大人民忍受下去了。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共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仅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反对称帝，就连长期与袁世凯共事，做其附属的进步党人也感到不可理喻，在梁启超和蔡锷策划下，一场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国的护国战争在年底爆发了。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抗帝制的战争，终于迫使袁世凯在次年取消帝制。

也正是在本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刊物，在陈独秀的带领下，对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地批判，使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批哲人走了出来，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中华文化谱写了簇新的篇章。

一九一五年是袁派势力由盛转衰的关键一年，袁世凯被自己利令智昏的行动所削弱，广大人民和民主革命者则在斗争中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维护共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二十一条”

●袁世凯复辟

●护国战争

●新文化运动开始

“二十一条”

背景介绍

日本趁欧战之机在山东制造“悬案”。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形势也随之发生变化。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互相厮杀，暂时无暇顾及远东，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大隈内阁认为此时是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以日英同盟为幌子，积极展开参战活动，实际是拉开了进一步侵华活动的序幕。

日本以英国为挡箭牌，是有其目的的。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英帝国主义居于主导地位。1914年列强在华的总投资为225566美元，其中英国为66459万美元，占29.4%。英国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担心日本参战，可能影响远东的和平和它的商业利润。但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向英国明确表示：日本参战的目的在于维护远东和平，对中国领土并无野心，也不会损害英国的贸易；同时强调日本内阁应英国之邀而参战，非有重大事变不能变更。8月初，英国以限制战局地区为条件，同意日本参战。8月15日，日本政府以确保东亚和平为借口，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完全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今青岛市）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由日本交还中国。德国没有答复，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宣战。

早在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宣布了中立立场。8月6日，袁世凯以中国政府名义宣布中国对欧战严守中立，并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发生作战行为。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答复，相反受到日本的无理质问：“此等关系东方的重大事件，中国为何竟先向美邦提议？”袁世凯一听，紧张得不得了，赶紧向中国驻美公使电令，婉言取消此项建议。

德国在青岛驻军仅5000多人，自知无力抵抗日本，便与袁政府交涉，试图将胶州湾直接归还中国。但软弱无能的袁世凯，慑于日本的淫威，不敢接收，暗中要求美国接管，以后再交中国。美国不想因此得罪日本，置袁政府于不理，仅仅空口声明：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及机会均等主义，将来应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等等。美国的空头支票，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所谓“确保中国领土完整”，不过是废话一句。9月2日，日军2000人在山东龙口登陆，拘捕枪杀当地人民。美国对此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日本便放心大胆、无所顾忌了。次日，又有日军3000人登陆。

11月7日，日军攻下青岛。袁政府宣告撤销以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占领山东各地的军队撤退。日本以战胜国自居，蛮横地告之中国政府：中国独断不当的声明，日本不能受之拘束。实际上，中国当时划定交战区域，是自己国家的外交措施，没有跟日本签定任何协定，战事结束，中国自行宣告废止，岂有征求日本同意的必要？况且，该区域内德军早已解除武装，英军也撤走了，日本根本没有继续停留的正当理由。但是，日本迟迟不肯在山东撤兵，有意制造“悬案”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侵略阴谋，殊可谓：别有用心。

材料：

· 日本对华阴谋

·“二十一条”的提出

·“二十一条”的内容

材料一　日本对华阴谋

日本的阴谋团体黑龙会在1914年9－10月间曾提出过一个秘密的备忘录——“对支问题意见书”，与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大体上相符。这意见书的基本精神是要乘欧战的机会，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从政治上和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怎样达到目的呢？对日本来说，首先要独立自主外交，反对与欧美列强协调。对于中国，日本则应对其提出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优越权，将其统治权委任于日本；让中国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采用日本兵器，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将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让与日本，等等，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树立东亚霸权。从此以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黑龙会秘密备忘录实际上已包含着“二十一条”

的雏形。

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在华已取得的巨大利益，并进一步攫取更多的权益，迫切希望在中国扶植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日本则有所不同，它的对华政策并不以支持袁世凯为中心，而是多方下手，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乘机渔利。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说过："日本不想要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想要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想要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国家。"说到底，日本在中国采取的一切行动，均是为了实现日本的现实利益。在此思想指导下，黑龙会就是否支持袁世凯问题提出了一个阴谋。狡猾的日本人已经看出了这样的端倪：袁政权并非稳定，大多数中国人对于那摇摇欲坠的袁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全国都在攻击他出卖了祖国，在中国很可能会发生革命和叛乱。袁政权如果没有外力的援助不可能加以镇压。还有，袁世凯所继承的，还是清政府的那套"以夷制夷"的外交衣钵，而过分依赖西方列强，就不会对日本忠实到底。日本从帝国主义列强对付辛亥革命中引出这样一条经验：既然西方列强可以通过辛亥革命扶植出一个甚至比清政府更可靠的忠仆，那么日本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比袁世凯更好的忠仆呢？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也就不喜欢同西方列强共有一个在华代理人。所以，黑龙会建议不要"盲目"地一直对袁世凯支持下去。因为欧洲列强厮杀尚酣，不可能给袁以实际帮助，日本则可以借此良机，自由选择和制造完全受它控制的新的中国统治者。袁世凯此时正偷偷摸摸地进行帝制活动，正是日本加紧武装侵略和外交讹诈的良好时机。所以日本一方面不放弃袁世凯这个工具，怂恿他的帝制活动，以便更好地控制他；另一方面则准备好随时把这个工具踢开，另换新的工具。

1914年8月间，新任日本公使日置益来到中国。他根据首相大限的秘密指示，向袁世凯暗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他说："做皇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国政府应当向日本人民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才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说，只要袁决心投降日本，日本就不会反对他由总统变为皇帝。同时，大限曾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袁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是日本政府摆在袁身边的间谍，对帝制运动的策动起了很大作用。他竭力怂恿袁世凯做皇帝并提出以下理由：如果两国政体相同，对两国提携合作将更为有利。

日本趁欧战之机占领山东，不过是赴宴之前刺激食欲的小吃而已，它的真正目的在于吞噬整个中国。至11月上旬日军攻占青岛以后，日本有了要挟中国的条件，便开始推行进一步侵占中国的计划。

材料二 "二十一条"的提出

日本为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多年苦心经营，一步步逼近目标。待青岛被占，则认为最佳时机业已到来，便开始实施最大的侵略计划——提出并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

为实现计划，日本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日本外相加藤提出的关于"二十一条"谈判的建议中，即可看出日方的精心。在谈判建议《关于对中国提出要求之拙见》中，日置益认为："谈判性质对我实属重要。在着手之前，应事先做精密周到考虑，以期万无一失。因此要拟出要求全文及各项确切依据，并订出着手谈判之最佳时机及方法手段；同时作好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以防在进行中遇到障碍和困难。"为顺利实现计划，日置益认为应该让中国政府理解到"帝国国力伸和有助于保全中国与安定大局"，而不视为单纯利于日本的性质。怎么办呢？这就要向中国千方百计地进行劝诱和威胁，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其中的引诱条件为：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安全；

(3)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之下的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针对袁政府财政困难，拟以借款为诱饵。

此外还要加上威胁条件，如：

(1)将出征山东的军队留驻现地，以此显示日本的威力，使中国政府感到日方的军事威胁；

(2)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的气势，以此来威胁。

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秘密从事交涉布置。此时，他已经看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于是把支持帝制做为交涉的重要的引诱条件之一。他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1915年1月18日，由曹汝霖安排，日置益晋见袁世凯，并当面递交了《对华交涉训令提案》，即通常所说的"二十一条"。一国外交代表与另一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不通过外交部而直接去找总统，这是国际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日本公使之所以有此"创举"，是抓住了袁世凯偷偷摸摸进行帝制这个致命的弱点，想以承认帝制交换袁承认他提出的"二十一条"。

袁于1月27日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日置益要求袁只能允许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助理员一人参预此项交涉，其余人员一概不得过问。陆是个昏庸透顶的外交官，曹则早已被日本收买，由于他擅长日语，在交涉中

能起很大的作用。用这样两个人办理这次交涉，不用说是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的。

材料三 “二十一条”的内容

“二十一条”要求分为5号。

第1号，关于山东问题4款：

(1)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的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2)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3)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的铁路。

(4)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2号，关于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7款：

(1)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均延至99年为期。

(2)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的租借权和所有权。

(3)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

(4)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各矿开采权，让与日本臣民。

(5)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后办理。

(6)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练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

(7)中国政府先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99年为限。

第3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2款：

(1)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2)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的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第4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1款：

中国政府允许，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5号，共7款：

(1)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的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

(2)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3)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通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4)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的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5)允许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的建筑权，许与日本国。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

(7)允许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5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48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日本在最后通牒中说：胶州湾为东亚商业、军事上的要地，日本帝国因取得该地所费的人力与财力委实不少，既然为日本取得后，毫无交还中国的义务，然而为两国国交亲善起见，准备交还中国，而中国政府竟不体谅日本政府的苦心，实在遗憾。好一番“苦心”！言下之意，为了日本帝国的这片难得的“苦心”，中国政府应该对日本将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胶州湾归还的行为感恩涕零；为了这番“苦心”，中国政府理应心甘情愿，别无二话地报答日本，欣然做它的“保护国”，将中国美丽的河山拱手交与日本人，作为报答的礼物。真是一派强盗的逻辑、强盗的行径！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袁世凯权衡利害，决定接受日本通牒。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4月26日提出的修正案，除第5号中各项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允诺。

(摘自《勿忘百年国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袁世凯复辟

背景介绍

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并解散国会之后，立即转过手来向《临时约法》开刀。他要求“政治会议”修改约法。这个御用工具马上议决，召开一个新的造法机构“约法会议”。这个同样由地主、官僚、买办、军阀和进步党人拼凑起来的班子，炮制了一个迎合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由袁世凯正式公布。这个袁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和君主专制时代的皇帝一样，规定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政事堂设国务卿，作为

辅助总统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据此，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内阁制完全取消。任用徐世昌这位前清遗老为国务卿，具有复辟象征的作用。徐“相国”上任后，便秉承袁世凯的旨意，恢复了大部分清代官场仪式，恢复了祀天祭礼，又恢复了文武官员的封建职称，来了一场复旧复古运动。文官分卿、大夫、士，各分上、中、下(少)三等九级。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县。按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院”代行立法之权，参政全由袁世凯任命，七十个参政中尽是封建余孽、反动政客和一些进步党人，黎元洪兼任院长。这个御用参政院顺承袁世凯的旨意，向约法会议建议修改总统选举法。一九一五年元旦公布约法会议制定的新《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姓名写在“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选举时始取出。这样，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中华民国约法》，本来是一部袁记总统的独裁法，不过也仍是袁世凯过渡到帝制复辟的桥梁。毛泽东曾指出：“宪法，中国已有过了，……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

袁世凯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以为政治、思想和外交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立即开始向帝制顶峰爬攀，妄想在一天之内就摘下“民国”这块空招牌，建立袁家王朝。

材料：

- “选举”中华帝国皇帝
- 筹安会与请愿联合会
- 匆匆登基的一幕

材料一　“选举”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亲手制造的空前绝后的皇帝大选举，是大费周章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里，御用人物就在石驸马大街酝酿帝制。后来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出面带头组成了筹安会。美国顾问古德诺也在里头鬼混。杨等很卖力，很快就在国内各城市成立了分会，听说在日本也设立了机构。后来他们搞得不尽如袁的意，就改名为宪政协进会，但还不好，才用了徐世昌的主意，改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当初这些人迎合袁的意旨，劝他做皇帝，他总是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徐世昌摸透了袁的心思，就提出了这一办法。

这事的具体做法是：袁先叫梁士诒等领起头来，把所有袁的亲信拉在一起，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九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叫沈云沛做会长，那彦图、张镇芳做副会长，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做皇帝。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请愿的大局面。强奸民意的电报接二连三地拍到北京，“请求”袁世凯赶紧做皇帝，口口声声“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北京城更比别处热闹，不仅当地报纸着意鼓吹，还组织了不三不四的人群列队到内务部请愿。

既然出现了这个“全国性要求”的场面，袁就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正式的”、“合法的”国民代表会议，投票决定国体和选举皇帝的大事。这一工作是分两条线各别进行的。

一条线是专门做一套与实际选举完全不相干的表面宣传，做法是以命令指定“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的事务。然后，用该局的名义按时期、有步骤地发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样文章，命令各地把这一成套的文章及时发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标榜这一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大事，是完全出于民意，是完全合法的、民主的。

另一条线是由名义上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出密电，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当时，先由十人发出一个密电，向各省当权者郑重说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该局指示的官样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进行宣传，并相应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于表演。重要的是万万不可按照那些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件合乎实际要求的。在这个说明密电以外，另有一封密电详细地指示一套实际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遵照这一密电指示的原则办理，并必须严守秘密。另外还密示只要能达到密电的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也就是说：尽可不择手段，不妨违法乱纪，便宜行事；但叮嘱如果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的时候，却万勿以电报向事务局请示，因为一经请示，局方就不得不以打官腔复示“应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如此表里便难于分清，反而弄得枝节横生，事情就难以顺利地办通了。

决定国体和皇帝选举，倒是比较顺利的。所谓全国国民大会的国民代表选出以后，并不集中举行国民大会，就在各省的将军、巡按使监督之下，由国民代表用记名方式

投票决定了国家政体。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全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的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的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事后，命令各地将决定国体的全部票张集送北京，封存在当时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里备案；同时密令各省一定要把办理国体决定事宜的一切文电全部焚毁，以杜绝人们就“国体决定大事‘有所依据’流言滋事”。

至于“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工作，和上述“决定国体”的做法完全相同。只是在印好上述字样的选票上，由国民代表亲自签个全名，就完成这个空前绝后的奇特任务。选举的结果是全部代表都在印好的选票上签了名。当时我们只要求各省把选举的结果报京，并未把选票征集到京，因此后来这批选票就分存在各省的省署里了。

如此，决定国体和选举皇帝两件大事都如期宣告成功。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材料二　筹安会与请愿联合会

古德诺论说发布后，不数日而杨度、孙毓筠及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即发起筹安会。其发起词大致以中美、南美各共和国及葡萄牙、墨西哥争权病国为殷鉴。且谓外人之爱中国者，犹以无偏之见，陈诸吾人之前，吾国民对于此重要问题，安可不求根本之解决？请国民入会，讨论国家之前途，共和政体之利弊云。该会初定八月二十一日开成立大会，嗣以开会恐有阻格，遂于十九日发布启事，谓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繁，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为理事。其通告会员书中，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同时杨度著《君宪救国论》上、中、下三篇，其后刘师培著《国情论》大都推扬君宪制度，与中国之宜行君主立宪。

该会成立后，即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请派代表至京，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各官，寄与古德诺论文及入会请愿书暨投票纸，请各员书明赞成与否，并请代募会员。旋得各省军巡复电，多数赞成，且派代表到会。各省商会，亦有派委代表者。杨度等初意拟俟各省代表到齐，开一会议决定后呈请实行。但该会非法定机关，无迳行呈请之资格，若由国民会议行之，则召集尚需日时。于是改变方针，拟由各省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然各省代表未能急速到京，而代行立法院则定九月一日开会。于是又改变手续，组织公民请愿团，由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起草，以便开院时呈送。九月下旬，该会通告会员，附以表决票一纸，谓“本会原拟俟各省代表到齐，定期开会，现因入会者将近万人，会场难觅，不得已用投票议决之法，请于表决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本会即据票数多少，以为议决标准。”

盖筹安会成立月余，未尝开会一次。初则由少数人操纵其间，发电通函，广为号召：“继则由各省代表会议进行；所谓学理研究者，果何在耶”该会发起时士夫颇存观望，嗣见反对者多归失败（详后段），而该会则声势赫然，始相率联翩加入。湖南、吉林、湖北、安徽、南京等处且组织分会，相与联络。广东之集思广益会，名称虽异，宗旨则同。其余各省都会商埠，均有专员为之运动。会中经费，颇为宽裕。传言发起之初，曾得二十万元之给助，其后复随时接济。确否固无从悬定，然杨度等不能有此雄厚财力，则人所共知也。自参政院议决将国体问题付诸国民大会决议，筹安会已无用力之地，遂于十月十三日通告会员，改为宪政协进会，十六日宣告成立。自是而筹安会名义遂归消灭矣。

有继筹安会而起，于帝政运动收莫大之效果者，则请愿联合会是也。当公民请愿团先后请愿于参政院，参政院审查之结果，拟建议召集国民会议，以为解决；帝制派嫌其旷日持久，乃由梁士诒发起组织此会，联合各种请愿团体，积极进行。九月十九日成立，推沈云沛为正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该会宗旨对于已成立之团体极意联络，未发生者则扶携而提倡之。当日北京所传之“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说者谓皆该会所默示而指导者也。是会成立后，即举行各请愿机关联合之总请愿，即所谓第三次请愿也。大致以参政院对于前此各团之请愿，拟建议政府（时参政院虽已决议建议尚未行文），请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抑另订征求民意之妥善办法两语（参政院建议详下），谓为模棱两可，要求议决，召设征求民意机关。参政院遂据此以为第二次之建议，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组织，而帝制遂以产生。是帝制运动非筹安会无以开创造之基，非联合会无以收速成之效。两会之设立，固与帝制有至大之效力也。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三　匆匆登基的一幕

袁世凯就任总统的时候，就把他的公馆搬进了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都设在中南海，政事堂设在丰泽园内遐瞩楼，统率办事处亦设在丰泽园内。后来，袁世凯帝制酝酿了不少时间，在这段期间内，府内

外早已出现一种气氛，像是总统不定哪天就要登极，我们都要朝贺了。

忽然，在十二月十三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八、九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约在九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时贴身侍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欢喜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换了朝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

后来知道袁世凯、袁克定父子对段、黄等能很快地办好这件大事，还是满意的，而段等也相当得意。从这里我们才逐渐知道些匆匆举行登极仪式的原因。

就袁世凯本人而言，他从取得总统地位以后，早就处心积虑地要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在他达到这个目的以后，野心更大，于是专心去策划帝制。袁既迷于帝制，很自然地就被袁克定、段芝贵、张士钰等包围起来，而且这个包围圈在逐渐缩小。

袁世凯这人有极大的统治欲望，同时喜欢运用权术，又极考究选择手段，而且过去的确尝着不少甜头。因此，当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的时候，就会断然下手，实际不知不觉玩弄手段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境界。他这种做法持之既久，与他接近的人就不免人人自危，只好看在金钱、势力的面上去侍奉他，实在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淡，对他的厉害越来越怕。在这样的恶境中，后来他自然就走上一意孤行这条绝路，直至身死名败为止。

到了袁事败的那几天，过去围在身旁的人日益稀少甚至进去看病的人也不多，只有徐世昌、段祺瑞对他关心些。

袁病后，除“御医”刘绍业、肖龙友为他用中药滋补营养外，为他诊疗的还有一个他信任多年的法国医生贝熙叶。袁最后患腰子病，就由贝替他局部麻醉，动手术，打针，抽水，抽血。袁始终还是信任贝熙叶的，但抽过之后，身体马上垮下来。在抽水抽血以后的几天，我去见袁，他精神已很不好。他死的前一天，我又去看他，那时已奄奄一息，但还是勉强要坐起来，想睁眼却睁不开。我当时看出他将不久于人世，第二天他就死了。袁死以前，有好多天都由他最喜欢的两个姨太太服侍，抽水、抽血也就由他们先做主张，经袁自己做出决定的。

这次登极仪式是内部朝贺，原拟另行卜吉公开正式举行典礼，照拟定的所谓“国礼”邀请各国使臣、钦差等一起觐贺，可是，随着袁的一死，这一计划也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计划了。

（摘自《八十三天皇帝梦》）

护国战争

背景介绍

进步党是资产阶级右翼，曾与袁世凯合作，反对国民党，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他们对人心背向的正确观察，使他们反对倒退、复辟和由此而激起的社会动乱、国外干涉，这决定了进步党在反袁斗争中的基本立场，而不愿为“牛后”和危及进步党的“生存”，促使他们抢先取得反袁的领导权。

进步党的反袁斗争，迟至筹安会成立时才开始。当时，梁启超与蔡锷感到事态紧急，在天津频繁密议，师徒二人一个靠笔，一个靠枪，决定文字鼓吹与武力倒袁双管齐下，同行并进。

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在《大中华》杂志正式发表。文章指责筹安会鼓吹帝制乃“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并以大量篇幅反对变更国体，“痛斥帝制之非”。指出“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表示“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十一月底，蔡锷因病住进了天津日本人所办的同仁医院。函招刚卸贵州巡按使的戴戡，一块到梁启超寓所，

最后商定了讨袁计划: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立即宣布独立,贵州一月后响应,广西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两省兵力下四川,广西兵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武昌,以定中原;先派王伯群赴滇桂两省,让唐继尧、陆荣廷预为准备,并把像片和指挥刀寄给了回到湖南老家的母亲,可见蔡锷已抱定了为共和制而献身的坚定决心。

十三日袁世凯下令称帝,蔡锷返回北京销假。十七日微服出京,再住天津同仁医院。十九日凌晨雇洋车到梁启超家,与老师告别。二人互相约定:成功,什么地位也不要,回头继续作自己的学问;失败,宁可死也不跑租界,不跑外国。这既可以看出梁启超比戊戌变法时勇敢了许多,也反映了蔡锷为争国格、人格、维护进步的共和制而发动反袁起义的真诚动机。

云南的中下级军官早就对袁世凯的胡作非为十分不满。孙中山也先后派遣李烈钧、吕志伊、方声涛、熊克武等潜回云南运动。罗佩金等准备拥唐继尧独立,如唐继尧不从,则杀唐,另立罗佩金为首领。他们"屡进言蓂督(唐字蓂赓),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所以,在蔡锷抵滇之前,云南的反袁斗争已如箭在弦,势在必然。蔡锷的到来,则更增添了云南革命党人的信心和力量。因为蔡锷为云南前任都督,拥蔡讨袁更为顺理适势,附和人心。

材料:

· 护国战争爆发
· 云南起义始末

材料一　护国战争爆发

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有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承、殷承瓛、由云龙、籍忠寅、刘云峰、杨蓁、唐继禹、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耿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当众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举义日期,不可再缓。"接着,蔡锷介绍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经过和各方面反对帝制的情况。他说:"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与会者一致赞成,并共同议决举义步骤如下:1、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2、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随后,蔡锷命戴戡宣读梁启超早在天津就起草好的讨袁通电,征求同意。多数人认为,由于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因此原稿中"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以下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略加删改,方可为用。但戴戡坚持任公文章,他人不得更改一字,要改也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次护国起义中的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接着,又讨论了军队命名和出兵方略等具体问题。对军队命名,蔡锷欲袭明永乐靖难之例,命为"讨贼军"或"讨逆军",而吕志伊,李根源方面人士却提议"护国军"或"共和军"。李烈钧以元、二年有"共和党"之故,为避免误会,反对用"共和军"。李曰垓则从反对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出发,主张采用"护国军"。讨论结果,一致采纳了李曰垓的意见。对于首脑机关,戴戡根据天津成议,提议设立元帅府,但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认为如此即近于竞争权利,殊失大公。蔡锷也坚持应"力事谦抑,以待来者",主张暂时"从缓"。最后议决仍采民国元二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至都督人选,因唐、蔡推让不止,只好公决唐留守,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并推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总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

次日晚10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王伯群、殷承瓛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在将军署举行宣誓典礼,一致表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23日夜11时,唐、任署名的首通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电报操着进步党人的老腔调首先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十二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丁难镇劝"为词,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24日,蔡锷、戴戡二人再电袁世凯,促其"迅予照准"唐、任"所陈各节。"

当然,唐、蔡等人十分清楚,袁世凯早已利令智昏,仅凭一纸通电,是休想让他取消帝制的。因此,电报发出后,他们并没有坐待袁的答复,而是加紧作武力解决的准备。24日,唐继尧继21日之后,再次任命了一大批下级军

官，并放饷发械，积极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他们"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

次日下午1时，唐、任召集省会所有各机关科长、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于第一师部大礼堂庄严宣告：为反抗袁世凯称帝，云南已宣布独立，希各照常办事。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后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等丑行。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类似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所发的五点声明：1、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任；2、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3、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4、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5、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蔡锷等人向全世界宣布：护国战争爆发了。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二　云南起义始末

事前之准备：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少有眼光之人，皆知袁逆必得叛国称帝。及唐公继尧由黔调滇，沈观默察，愈感自身责任之重，而所处地位有如孤臣孽子，不得不以缜密方法积极准备。计自莅滇至起义，约两年间，其最重要之准备约有四端：

甲、储才：举大事者首须人才，故内则调整本省人事，如被袁疾视之叶荃、黄毓成、赵复祥等，愤时闲居之罗佩金、顾品珍等，在外散处之刘云峰、李雁宾、吕志伊、李曰垓、李宗黄等，莫不庇护勉慰，先后起用。外则与各方同志密通声息，派人邀约，如蔡锷、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熊克武、韩凤楼、但懋辛、王伯群诸公，亦皆久相默契，次第来滇。凡起义前后之军事、政治、饷械、宣抚、游说、联络等等，皆赖内外同人分任合作，乃收云龙风虎集贤成事之效。

乙、整军：时滇省陆军只有两师，一旦有事不足应付，故除将现有部队，加以整顿训练外，自行添编警卫两团，以唐继禹、赵世铭分任团长。而藉补充之名，召募退伍及新征之兵，以待编组。复选赋闲军官及测量班学员，命于讲武堂补习，以备任使。并以治安为名，密令各县整饬地方团队，以俟时机。

丙、饷械：唐公旋滇之初，曾密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元之械，惜因欧战发生，仅得起运一部来华，被袁侦知截扣。继于四年春夏，借办模范团名义，向参谋部次长唐在礼，虽然诓得若干械弹，终恐无以济事，乃于九月初旬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前赴日本购买军火，适于起义不久，赶运到滇，裨益作战甚大。旋又密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埠，慰问华侨，筹募饷款。一面密令财厅及各县，清理各项财政，并将地方枪械，以修配为名，悉数收集解省，复令军械局兵工厂，分别整理旧械，赶造新品。

丁、情报：自七月间袁逆以国防为名，召开会议，实即商筹帝制。迨至八月下旬筹安会正式成立，段祺瑞反帝（制）免职。唐公鉴于阴谋暴露，乃于九月十一日召集高级将领幕僚，商谈时局，是为讨袁之首次会议。密议结果，咸以无论待何时期用何方法救国，均须先明各方真相。遂决定派刘云峰等往浙江，吴擎天等往两广，李植生等往四川，杨秀灵等往湖南，李雁宾等回贵州，侦察向背虚实，联络豪杰同志。其后出兵策略及各方呼应，得力于此不小。

迭次之会议：九月十一日之第一次密议，为派员分赴各方，进行情报联络工作，既如上述。至是月下旬，伪代行立法院建议变更国体，北京及各省发起请愿，形势日急。复于十月七日召集高级将领，商定起义日期（时传袁拟五年元日登极，改元洪宪，故初拟于是日起义，嗣因蔡、李诸公到滇，形迹已露，乃提前数日发动），是为讨袁之第二次会议。及十月下旬，英、俄、法劝告展缓称帝无效，益知大祸已成，无可挽回，乃于十一月三日在警卫团本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密定实行出师计划，是为讨袁之第三次会议。比蔡、李诸公到滇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之会议，所以号为第四次、第五次之由来也。

一部军队之先遣：第三次会议出师方略既定，遂分头积极筹备一切，约一月间大体就绪。其时袁之授勋特使何佩文早已到滇，伺察动静，逐日密电报告。盖滇中准备之事及迭次密议，袁已微有所闻，故藉授勋为名，派何前来监视。并封唐公为一等开武候，其余各级将领，均封爵位，并每月津贴三万元。此足见袁疑忌之深，妄欲恩威并用诱胁成事。因此部署虽竣，苦于无法措词以为出兵掩饰。适值川匪阑入滇境，遂以防边剿匪为言，于十二月九日命邓泰中所属全部及杨蓁所属大部，先向东、昭一带开拔。及蔡公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启旆，而我先头节节攻战，已于二十日占领叙府，若非事前先遣此军，断无如此神速也。

蔡、李诸公之入滇：蔡公自癸丑冬季调京任经界局督

办，唐虽设法时与通信，而袁防闲甚至；及蔡在北京寓所被搜，通讯愈感困难。而李公羁栖海外，尤不易得确息。其初传闻蔡已出京之讯，曾派邓泰中密赴港、沪一带探寻踪迹，未能相遇。十二月中探得李到香港，及蔡转由日本南下之报，乃派其弟唐继禹以调查自来水名义，亲往越港，访迎来滇。继禹到海防时，由日本使馆探悉蔡已到防，电告唐公。因是时蒙自道尹周沆、阿迷县（今开远）知事张一鲲为袁死党，深恐疏虞，复加派政务厅长陈廷策续往迎迓，入河口后，并加派士兵一排随车保卫。行至阿迷，张一鲲果率警团多人，登车欲行劫杀，因见继禹、廷策并有卫兵而止（其后逮张正法，据供奉有袁之密电）。于是李等于十七日，蔡等于二十日，陆续安抵昆明，而袁令统率办事处传达之巧电（十二月十八日发，略谓据报乱党多人入滇，应由唐便宜处置，立置于法）、皓电（十九日发，略谓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查防），亦于此时拍到，并闻有商越政府截捕引渡之举，若非唐公布置敏密，断难如此安全也。

独立起义之宣布：蔡公到昆之次日（二十一），由唐召集重要人员会议（继前为第四次），商议起义的手续日程，审定电函文稿。二十二日夜十时重要文武集于光复楼（第五次会议），依照昨议，由唐主盟歃血宣誓，与誓者除唐、蔡、李、任、罗、戴外，有张子贞、陈廷策、刘法坤、成桄、顾品珍、孙永安、黄毓成、赵又新、殷承瓛、杨杰、耿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禹、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第、李修家、李朝阳、董鸿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李雁宾、王伯群、庾恩旸三十九人。即于是夕通夜会商举义大计及对内对外一切布置。议定遂于天明（二十三日）先以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两人之名义，致电袁逆，请其立将内乱罪犯之杨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刑，重申拥护共和誓言，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否则武力解决，即世传有名之漾电是也。逾期无复（袁时故作痴聋，通电唐、任系被胁迫，非出本心，一面任命师长张子贞为将军，刘祖武为巡按使；更托英使朱尔典电嘱滇省英领转达唐公，若能杀蔡，即封亲王，并由汇丰银行兑款三百万元以为犒酬；欲以煽诱离间惯技，妄冀转圜），乃于二十五日，仍以唐、任名义通电全国，申明万不得已用兵护国之旨，所谓有电是也。二十七日午刻，唐公亲到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宣布独立，万众欢呼。全市人民自动书贴'拥护共和万岁'标语，遍悬国旗，情绪热烈庄严。并通告外交团，声明宗旨，列邦因守善意中立。于是是壮烈之革命战，遂以展开。

（摘自《北洋军阀》白之瀚）

新文化运动开始

背景介绍

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为中心开展起来的。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从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一问世，就异军突起，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它思想敏锐，别具风格，非其他刊物所能比拟。陈独秀在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约三千五、六百字，是该刊纲领性的文章，它用深刻的思想，众所周知的材料和易懂的推论，启发读者思考国家兴衰的问题。它说："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作者以充满爱国主义的焦急心情，启示人们必须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以顺应历史的发展，警告人们绝不能陷于迂腐，受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的束缚。他认为西方因科学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引起世界巨大的变化，我们亦当明确地把科学的认识和对人权的认识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希望人们看清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痛心事实，惊呼："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在陈独秀看来，振兴中国的责任，势必落在青年一代的肩上，"吾国之社会，其隆耶？抑将亡耶？非予之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自然之淘汰，惟不愿心如流水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热望青年要有宏伟的胸襟，宽阔的眼界，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应战胜恶社会，而不为恶社会所征服。"因此，他向青年陈述"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他那富于情感的笔端奔腾膨湃，他期望"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就是"民主"的意思，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吹响起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材料：

- 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 百家争鸣

材料一　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大多从政治上思考这一问题，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指出："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通过共和思想来赢得共和国体，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走了一段同西方前辈们相反的路程，这个迟到的思想运动，决定了下面这个历史特点：它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障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纲常名教。陈独秀曾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在这里，陈独秀精辟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文化思想，新国体与旧文化绝对不能调和。辛亥革命忽视了这个问题，重视前者，轻视后者，陈独秀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通过失败后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个认识称作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基于上述认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伦理发动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忠、孝、节的封建秩序，和天赋人权所提倡的人格自主是根本对立的。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学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表示："提倡孔教必挦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儒学。在鲁迅的笔下，封建礼教被斥为"吃人"。吴虞也写道："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同时，他们还撰文抨击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陈独秀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年轻的留美学生胡适和《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0年至1917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时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7月归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这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启迪心智、开扩思想的作用。

1916年10月，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倡议改革文体，并提议从八个方面着手改革，而后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这八个问题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这个意见，立即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并把它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以他特有的勇猛的性格和笔法，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议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的倡议主要是讨论新文学的形式，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则触及到了新文学的内容。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战斗队伍中，又增添了

一支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军"。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的技巧和风格上，如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从而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而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把文学革命概括起来看，胡适首倡白话文，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鲁迅率先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周作人则具体而深入地阐述了新文学理论。同时，钱玄同、刘半农等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特别是宣传白话文方面，也有所建树。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材料二　百家争鸣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就任北大校长。针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好同恶异"的劣根性，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个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思想专制的否定。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到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进步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瑾〕(崔适字怀瑾)、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对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做法，陈独秀表示反对，认为："像董仲舒那样的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讲演团、新闻研究会、静坐社、雄辩会等等。各类刊物也很多，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属于保守势力方面的则有《国故》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总的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势力对它的攻击还不很激烈，所以《新青年》还要用"双簧戏"的办法，来引起新旧思潮的争论。然而到1918年底至1919年，情况就不同了，封建卫道士们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这场谩骂的高潮，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荆生对三人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小说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情绪的发泄。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旧势力的挑战。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荆生》小说发表后，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他正告林琴南等人道："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

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摘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二十一条签定内幕

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十二月日置益再到中国来，借口回任请求与袁面谈。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他把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当面递交袁。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

一国外交代表与另一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不通过外交部而直接去找总统，这是国际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日本公使之所以有此创举，是抓住了袁偷偷摸摸地进行帝制的这个弱点，想以承认帝制交换袁承认它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之所以要求袁在商谈中保守秘密，是怕西方国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因而从中作梗，使交涉不能顺利进行。

袁把条文略略翻看了一下，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袁于一月二十七日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日置益压迫袁只能允许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助理员一人参预此项交涉，其余人员一概不得过问。陆是个昏庸透顶的外交官，曹则早已被日本收买，又由于他擅长日语，在交涉中能起很大的作用。用这两个人办理这件交涉，不用说是完全符合于日本的利益的。

在交涉的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和“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等等。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因偷窃财政预算案内容献与日本，被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只是出卖国家情报中的一个“苍蝇”。主持此项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一次他在公府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前早已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此言一出，气得袁站起身来大声斥责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我！”

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也可以亲自出马。日本的外交官、武官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境内进行各项间谍活动，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的间谍可以化装为旅行家或者利用其他名义，在这个门户洞开的国度里以“贵宾”的身份出现。

这个时期，不但全国人民誓死反对袁政府秘而不宣的卖国投降政策，就是袁所卵翼的北洋军阀，以冯国璋为首的十九省军事长官也曾发表联名通电，“请缨为国御侮”。袁命令他们只许对内，不许对外。命令说：“该将军等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等协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误。”他又指使外交部通电欺骗全国说：“全案确已修正，当可和平解决。外间谣言，统属无稽。”

但是袁的心理与前清西太后一样，“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对热爱祖国的人民采取了无耻的欺骗手段与残酷的屠杀手段。他一方面用“外交秘密”四个字回答人民的质问，拒绝公开条件内容和会谈经过，并于三月二十五日下令严禁抵制日货。命令中轻描淡写地说：“近有协议案件，外交部与驻京日使掬诚榷商，可望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他随即露出狰狞面目，想加爱国人士一顶“乱党”的帽子，以制止他们的爱国言论与救国行动。命令中写道：“倘有乱党假托名目，扰乱治安，着即严拿惩办，用维大局。”

五月二十五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他厚颜无耻地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他却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五月九日这个日子的惨痛教训。

他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有五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装腔作势地说：“这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他的公开通电和秘密文件互相矛盾，这是他用以欺骗全国人民的双重手腕，因为在当时，为了和缓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不能不用“无损主权”的谎言来隐瞒交涉失败的真相。他又考虑到这个失败是终于隐瞒不了的，因此又准备好秘密文件来进行下一步的欺骗，借以推卸责任，并使人们相信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筹安会六君子的结合

袁在公开帝制运动以前，想叫杨度做个居间联络员，由他授意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网罗全国一些大名流参加，然后把这个“民间团体”作为表达人民意见的团体，为改行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当然，他自己不出面授意，通过杨间接授意对他是较好的。但他不愿叫杨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后人，因为杨和他的关系太深，他不愿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动是他自拉自唱的戏法。

杨却另有一种打算。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发号施令，如果隐身幕后，他就不可能抢得“开国元勋”的地位。

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国博士做进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国大名士加入捧场。这个意见与杨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论界“骄子”梁启超，曾以春宴为名邀请梁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投机。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就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今天仍然只研究政体而不论国体。”

同年四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转呈。袁看了大为嘉奖说：“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提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还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杨得到夏的传话，叫他做帝制问题的联络工作，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他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他所拟定的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是“筹安会”。

这五个“知名之士”有的与杨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的被杨硬拉进来，有的自愿上钩。其中有两个变节的国民党人，两个“学者”，一个失意军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那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后来以贩布起家，就是孙毓筠的一房；小儿子改行做读书人，清朝中过状元、一直做到大学士的孙家鼐就是第二房的后代。

一九〇五年，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影响，想做革命党人，到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派他秘密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军，他和同乡人殷云、权道涵同在南京被捕，杨度曾竭力进行营救。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处以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曾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任为安徽都督。后来他离职到北京，从此与国民党断绝联系。国民党“二次独立”失败后，袁先后任他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他又组织了一个宪政研究会，从此就完全成为袁的政治工具了。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曾到东京加入同盟会，曾在京汉线上追踪铁良想作搏浪之一击，曾在湖北加入日知会因而被捕。武昌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自立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为山东都督。南北和议告成，胡解除都督职务，袁先后给以陕甘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等有官无职的漂亮名义。他和杨度也是多年的老朋友。通过杨的关系，一九一五年五月下旬他由东京回到北京，成为袁的另一政治工具。

严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也是参政院参政之一。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学的是海军，却以翻译西方名著闻名于世。他的脾气很古怪，喜欢跟别人“抬杠子”，别人说往东，他偏要说往西，等到别人也说往西时，他又说往西不如往东好。袁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过他，他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当载沣逐袁下台，他又不胜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柱石，奈何投之闲散？”并亲身到彰德去“烧冷灶”。南北议和时，他又南下为袁奔走。民国成立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袁氏父子想找几个大名流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因为找不到梁启超，就想找严来递补。杨度奉命与严联系，严始而不愿参加，杨组织筹安会时，把他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他却未加否认，因此被拉上了贼船。

刘师培原名光汉，清朝末年著有《攘论》、《中国民族志》等文，曾与章绛（章太炎的本名）创立光复会，是早年鼓吹反满革命的健将。他又是一个国学家，所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读左劄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多种。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政治鹰犬。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担任国学院主讲。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介绍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袁先后任其为洛议、编审、参政等职，并给以上大夫的头衔。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illegible]论》，另外还发表一封《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信，借以讨好袁。

李燮和早年是长沙求是书院的学生，曾经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个“光复军总司令”的名义，没有得到发展。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他由湖南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从此留在北京。

杨度物色以上五人做筹安会的发起人，这些人有的

可以受他的控制，有的不会出面来和他争功。而袁此时既然找不到更好的工具，又急于要黄袍加身，同时看到杨所物色的人有民党也有学者，也就不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研究帝制的团体了。

（摘自《旷代逸才》）

袁世凯与冯国璋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帝制问题的动态。虽然袁对梁和进步党已经白眼相加，但是他们因为出路很少，所以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仍然愿意继续为袁服务。梁在政治上是敏感的，知道全国人民都不允许袁做皇帝，如袁一意孤行，必然自取灭亡。有一件事使他惶恐不安，就是这年年初，他收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准时到达，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位客人在座，就不免感到惊奇。袁克定满面春风地站起来说："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随着，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道："近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停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经过这次试探，梁肯定袁父子正在搞帝制的把戏。他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天津，本人则于三月二十五日出京，绕道上海回到广东探望他的父亲。他和冯国璋早已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六月间，他又到南京来访冯，想从冯的口中探取北方时局的真相，冯就约他同程北上，于六月二十七日到了北京。

冯一连谒见袁三次，每次都和袁共进午餐，曾经谈到关于帝制问题的谣言。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暴民（指国民党）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流露过愿意退位或者归政清室，但我本人决不愿做皇帝。近来新约法颁布，条文中规定总统得颁授爵位，有人又疑心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步骤。我早已感觉到满蒙回藏各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应当享受同等权利。我将来必须做到一视同仁。目前为了避免误会，汉人授爵尚未实行。"

冯想说几句话，但是没有机会插进去。袁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明说。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我的大儿子身带残废，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下级军官）都不放心，能够付以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更不忍把灾害留给他们。当然，皇帝还可以传贤不传子。但总统同样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总统皇帝不就是一样的吗？"

冯抓住了一个机会插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将来总统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哪！"

袁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读书，我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通过袁这种极端诚恳而又极端坚定的表示，冯应当不再存在任何疑心了。但他跟随袁最久，对袁的作风知道得最多。他退下来后，还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麐，把袁的话传述了一遍，问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已充当袁的文案，参预机密最久，和冯的私交也最深。他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是：的确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是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冯国璋又把袁的谈话和张一麐的意见说给梁启超听。梁说："我想仲仁（张）的话是对的，他不会这样傻。"

梁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所以袁冯谈话的内容很快地就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因此，全国关于帝制的谣言忽然沉寂下来。不料冯回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通电成立。冯打电报问张一麐，张的回电不再否认其事。冯跳起脚来发火说："好，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西山十戾

北京城早就流传着"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这个神话说，北京西山有十个修炼成精的妖怪，投胎人世，做了清朝开国以来一直到目前的当权人物。这十个妖怪是：熊、獾、鸮鸟、狼、驴、猪、蟒蛇、猴子、玉面狐、癞虾蟆。它们托生的人身是，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坤、海兰察、年羹尧、曾国藩、张之洞、西太后、袁世凯。这个神话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艺术性，按照各人不同的体态、不同的性格作了适当的安排和影射，以表示对统治者的极端憎恨。如鸮鸟象征残忍悖逆；狼在神话中代表贪馋狠毒；患着皮肤病的曾国藩经常褪脱皮屑，象蟒蛇脱皮一样，而蟒蛇又是一个危害人类的凉血动物；张之洞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经常坐而假寐以待天明，神话中把猴子当作睡眠很少、变化多端的动物，而且张的形态也瘦小得活像一个猴子。至于用癞虾蟆来刻画袁，不但因为他颈粗腿短，走的是八字路，而且寓有"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的另外一个意义。

根据这个神话，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传说：

袁有午睡的习惯，每次要睡上一二小时。醒来时要喝一口茶。他有一只雕刻精致的玉杯子，由一个书童按时献茶进去。

一天，书童进房献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个极大的癞虾蟆躺在床上。他吃了一惊，手一松，把玉杯子掉在地下砸碎了。

幸而袁鼾睡未醒。书童蹑足退出来，惊慌地跑去找一个老家人，请他出主意挽救这场祸事。那个老家人动脑筋想了一会，就教给他一套话来应付。

当袁醒转来要喝茶的时候，看不见那个常用的玉杯子，就把书童唤进来问："玉杯子哪里去了？"

书童老老实实地说："砸碎了。"

袁厉声地说："什么，砸碎了吗？"

书童不慌不忙地说："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袁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说，你说！"这个时候袁的眼睛睁得很大，满脸都是怒容。

那个伶俐的书童并不拿正眼来望他，却指手画脚地说道："我正在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

"是什么？混帐东西！"

"我不敢往下说。"

"你不说，看我打断你的狗腿！"

"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

"胡说！"袁怒吼了一声，但是他的脸色立刻平定下来，好像怒气已经消散，并且从抽屉里拿出一百元钞票赏给书童，叫他不要在外面胡说。

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颇为流行。冯国璋向人讲过这件故事，还作了一个结论说："项城当初并没有做皇帝的思想，只因书童证明他是真龙转世，他才相信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代世代相承都没有能够活过五十九岁的，而他这一年（一九一五年）已经有了五十七岁，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死之前过两年皇帝的瘾，然后把帝位留给子孙。"

这个传说是有人特地编造出来的，清朝的肃顺也有过类似的传说。编造者取材于"西山十戾"的神话，作了进一步的加工，用以说明袁是丑恶的癞虾蟆托生，而不是什么真龙转世。这个传说同样是对独裁者表示憎恨的。由于这个传说盛行一时，具有迷信头脑的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人相信袁是真龙转世，而认为癞虾蟆成不了帝王之业，可见这个传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历 史 考 证

蔡锷是怎样出京的

1913年，袁世凯把蔡锷调离昆明来到北京，先后任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参政院参政等桂冠。袁世凯所以将蔡锷调离，显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原来，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依仗手中的北洋军队，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逼使孙中山下台，他自己于1912年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但他的野心并不以此为满足，一心想复辟、当皇帝。1913年，袁世凯又用武力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他的势力伸向了南方各省，他对于执掌着云南军政大权的蔡锷极为疑嫉，一再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有阴谋"。蔡锷虽然没有参加国民党，但和国民党人来往密切；他虽然是拥袁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学生，关系密切，但两人的政治态度并不一样，蔡锷倾向革命，加上蔡锷手握边远省份的大权，袁也感到鞭长莫及，所以对他始终放心不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

1915年秋，袁氏父子复辟帝制的阴谋渐渐暴露，蔡锷怀抱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坚定信念，试图跑出虎穴，起兵倒袁。但袁贼早已布置鹰犬，对他跟踪监视。蔡锷万不得已，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冒着舆论的种种评议，伪装意志消沉，日夜逍遥于市场、戏院，并常涉足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结为至交。借此，同家里大吵大闹，使眷属先行离京，既为日后脱身解除了牵挂，又给袁党造成了"家事尚不能治，何暇顾及国事"的错觉。接着故意托袁的亲信梁士诒以重金购买别墅，宣称将"金屋藏娇"。密探们见他不像有出走之意，监视亦稍松懈。1915年年底，蔡锷终于逃离袁世凯的樊笼，经天津，东渡日本，旋又南下云南，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

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与小凤仙有什么关系？

一种说法认为，蔡锷潜逃出京，幸亏了云吉班的小凤仙。

1986年3月1日《文汇报》曾转载了许姬传先生发表在香港《大成》杂志上的《小凤仙谈蔡锷脱险》一文。文中说，1951年，许姬传从梅兰芳处看到小凤仙给梅兰芳的信，得知她在沈阳做保姆工作，已改名为张洗非。之后，梅、许和凤仙三人作了一次长谈，内容涉及到蔡锷逃避袁

世凯的监视，从北京云吉班到天津的经过。有关内容如下："有一天，老蔡（指蔡锷）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我说'后天是掌班的生日，院子里来往的人多，是个机会。你在这里摆酒，不要请外客，你早点来，我们商量布置一下。'到了那一天，姐妹们屋里都有客人摆酒捧场。我给老蔡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圆桌面上放着怀表，为的是可以算准钟点。老蔡估计天津的车将要开行，就起身往外走，假装解手，趁院中乱哄哄，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他走时，衣帽仍挂在衣架上，怀表亦未拿走，侦缉队以为他小解就要回来的。"这是一种流传较为广泛的说法。

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说："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稍稍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陶菊隐在这里叙述蔡锷逃出北京，不仅与小凤仙有关系，还同梁启超有关系。

追随蔡锷多年的僚属雷飙先生，回忆他听蔡锷口述的赴滇经过最为详细：一日晚间小凤仙处请客，正当宾客满座、狂歌畅饮之际，蔡锷悄悄离去，单身赴崇文门车站乘火车赴天津，次日早晨到达，住进日本共和医院。袁世凯得到报告后，立即派蒋百里与一个参议官赴津挽留，蔡锷告诉他们这次来津确实是为了养病，并请他们转达于袁世凯。蔡锷知天津非久留之地，当天晚上即隐姓埋名，化装后去塘沽坐船赴沪。不料船到上海时，岸上军警林立，侦探上船搜查，于是蔡锷便不上岸，乘原船赴日本神户，而神户警察搜查也十分严密，只能再乘该船返沪，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秘密买通船上的服务员，请他代购去香港的船票，这才辗转由香港到越南，最后抵达云南（《蔡松坡先生事略》，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

另一种说法认为，蔡锷逃离北京，是曾鲲化精心筹划的。

1984年9月12日《邵阳日报》刊载了贺舜田文章，文中谈及他的岳母曾龙珠老人回忆她父亲曾鲲化筹划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这是最新的说法，现介绍如下：

曾鲲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曾与蔡锷一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他积极支持反袁斗争。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筹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山公园，来到大松柏树下的"来今雨轩"露天茶社饮茶。蔡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闲自如。密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认为像蔡锷这样的大人物决不可能身着短衫上街，更何况留下小凤仙及衣帽钱袋呢，所以没有去厕所查看。

蔡锷佯作解手，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20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妇装，由曾家的厨师和马车夫两人用轿子抬着，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只有崇文门专供外国人使用，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总长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还有一种说法，蔡锷离京出走，与小凤仙和曾鲲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1915年11月10日，袁世凯要员哈汉章为其祖母80寿辰，大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与牌友玩牌至次日七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哈宅，直入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异之，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午后十二点半到某处同吃饭。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见刘成禹《兴宪纪事诗三种》）。

总之，蔡锷是怎样离京出走的，至今还是个谜。

（摘自《历史之谜》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云人物

陈其美

陈其美(1875～1915)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陈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后又介绍同乡蒋介石入盟。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亦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1908年回国后，奔走于浙、沪、京、津等地联络党人，在汉口筹办《大陆新闻报》，在沪筹办《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鼓吹革命。并加入青帮，成为其大头目。在同盟会中，陈其美以"四捷"：口齿、主意、手段、行动敏捷著称。他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的人物：一方面，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曾写过一付对联表白自己的心迹："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陈其美是实践了誓言的；另一方面，作为青帮头目，他纵情声色，生活挥霍，与流氓交密，帮派性十足，辛亥光复后他刚当上上海都督，便同室操戈，派人刺杀了同盟会和光复会的著名领袖陶成章，以巩固自己沪督地位。

孙中山对陈其美评价很高，在其被刺身亡后，通告全党追悼，这是因为其在辛亥革命和反袁复辟的斗争中有卓越贡献之故。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廷在紧急中起用袁世凯，在清军重兵攻击下，汉口失陷，革命处于危急中，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及时响应和支援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情况下，陈其美奔走各地，先后到南京、杭州发动起义，但两地都希望上海先动，其又赶回上海策划，与光复会首领李燮和分头联络，策反防军和青帮，商团和士绅。11月3日发动起义，开始很顺利，但进攻地处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时，遇到守军的顽抗。陈其美在率队攻打两小时亦不能克时，决定在立宪派分子、江南制造局提调李平书陪同下，冒险进入局内，企图通过谈判解决，结果守军将其扣住，并用铁链将其捆在椅子上。李燮和急调力量进攻，到第二天早上才攻克这个重要据点，取得大批枪械，救出陈其美。上海亦随之光复。

上海光复，影响很大，不久杭、苏、镇等城相继宣告独立。但张勋仍以重兵盘据南京，陈其美联络民军，组织苏、浙、镇、沪联军，推徐绍桢为总司令出征，陈其美留上海负责后勤，经过二十多天努力，攻克南京，扭转全国形势，不久清帝宣告退位。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其美一木之所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陈其美在反袁斗争中的作为也是值得的一提的，他在上海三次发动反袁武装斗争，对全国的反袁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次发生在1913年7月，当"二次革命"发动后，其在上海组织讨袁军，战斗中，由于事先表示中立的海军被袁世凯收买，向讨袁军进攻，到月底，讨袁军失败。1914年12月，陈其美又在上海发动第二次讨袁行动，即有名的"肇和之役"。当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的一员悍将，陈其美等反袁必先除郑，利用郑去参加日本领事为天皇登极举行的宴会之机，于11月10日在外白渡桥行刺成功。利用刺郑的大好形势，12月5日，陈其美等决定在上海水陆两路同时发动，杨虎在舰上水兵配合下，顺利夺取肇和舰，并开炮轰击江南制造局，但袭击他舰者失利，陆路亦先胜后败。后应瑞、通济二舰为袁方收买，突然发炮轰击"肇和"，"肇和"猝不及防，数十人受伤后被执就义。同时，起义总部亦被英巡捕抄获，起义失败。第三次是在1915年4月12日，由于计划不周未动即告失败。

陈其美在上海连续策动起义，使袁世凯又恨又怕，于是悬赏进行暗杀，1915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许国霖和叛徒李海秋等人暗杀于上海萨坡路十四号寓所，时年仅四十岁。

(摘自《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

严复

严复(1854～1921)严复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懋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父亲是当地有名中医。严复十一岁时，从学于福建宿儒黄少岩，"钛闻宋元明儒先学行"，奠下了旧学的根底。十四岁时，父卒，家贫不再从师，考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在学堂里呆了五年，"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孤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初步接受了科学知识，为日后钻研西方科学文化打下了基础。毕业后，他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巡历了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开阔了他的眼界。

1876年，严复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为中国第一次派遣的留学生之一。次年入抱士穆德大学院，后入格林尼

茨海军大学。在留学期间，严复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方面，并曾去法国考察。当时，他不仅留心观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从中寻找富强的原因，还注意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异同。他后来回忆说："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即当时清朝驻英公馆郭嵩焘），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以为卓识"。他还曾在其他地方称赞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行政"。在研究观察西方政治制度过程中，严复初步倾向接受以英国君主立宪为蓝本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与此同时，严复力图辨析"西学"（或"新学"）与"中学"（或"旧学"）的异同。当时，"湘阴郭筠先（即郭嵩焘）侍郎方使英，引与论析中西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及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严复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树立了要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理想。从而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四大代表之一。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在马江船政学堂当教员。严复是洋务派所养培的人才，在英国时又与洋务派要人之一的郭嵩焘交往甚笃，并深得他的推重赏识。回国后第二年，李鸿章也"伟先生能，辟总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这时，他与很多洋务派官僚往来密切。因此，严复归国后试图通过"仕宦"之途来实现他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理想。但是，因为他不满日本等帝国主义对中国友邻国家及其边疆的侵略，"慨夫朝野玩愒……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环我如老悖牛耳"！言词尖锐，使得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他一直不得意，就是升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也是"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在此执教达二十年。严复深为自己"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并未放弃这条道路，而只是认为因为自己"出身不由科第"才"所言多不见重"。于是"欲博一第，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乃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应试。"结果并未成功。以后又于1888年、1889年两次赴京应考，均失败。严复想借科举的阶梯登上政治舞台来实现其理想最终也破灭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及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严复刺激很大，他抛弃了走"仕宦"之途的想法，决定"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他在1895年，不仅发表了几篇震动一世的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是年还翻译了《天演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变法维新政治运动。

除了从事理论宣传外，严复还参加了变法维新的实践活动。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他亲自撰写了该报的大部分社论。严复也知道，他的这些尖锐泼辣的文章，会得罪许多人，但他宁愿如此而不做八面玲珑，讨好卖乖的文章，表示一定要"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否则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当时，严复在与人议论时事时，措词更是辛辣些。晚年他给其门生的信说："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此时严复保留着朝气蓬勃的优点。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风行全国，而严复在天津所办的《国闻报》则成为北方最著名的报纸，一南一北，互相呼应。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严复则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没有超出康有为、梁启超的水平。1898年，严复起草《拟上皇帝万言书》，刊于《国闻报》，首次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年秋，他就以王锡藩之荐，见了光绪。光绪命他抄万言书以上，嗣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这样他与康、梁的变法行径真可谓"殊途同归"了。

不幸戊戌变法失败了。改革派的人物，杀的杀了，逃的逃了，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及光绪被囚称病的无限愤慨。但是，因为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并没有直接参加维新的政治活动，又与参加实际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关系不密切，外加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和洋务派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仍然安稳地做他天津水师学堂总办。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去上海。先在上海讲演名学。其时，上海人士邀集各省代表组织国会，挽救时局，严复被推为副会长。次年，应张翼招请赴天津主持开平煤矿局工作。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编译局总办。1904年又辞去此职，离京赴沪。次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这年因为开平矿务诉讼赴英，在伦敦会见孙中山，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两人意见不合。随后沿途游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1906年任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不久辞职，被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校长），后又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1910年曾充任资政院议员，海军部成立，被授以"协都统"头衔。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严复过着南北往来随处啖食的生活。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兼文科学长，后又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但以后基本上过的是衰病闲居的生活，虽然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及给亲友的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了保守的道路。"1913年，孔教会成立……以严复领首。同时，他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亦旨在尊孔读经。在此以后，他又写了《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极力提倡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1914年，他看到卫西琴（A. Westharp）所著《中国教育议》中有赞美孔丘的话，就引为同道，将全书翻

译过来。"同年，严复在《庸言报》杂志第25、26期上发表了《民约评议》，这是一篇攻击卢梭《民约论》的宣言书，逼真地刻画出严复对于封建君主制度的无限眷念和惋惜的"遗老"心情。这篇文章攻击了卢梭、特别是他的"天赋人权论"，而和严复早年宣传"天赋人权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思想上的倒退和政治上的更加保守，导致严复终于在1915年被列名参加了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丑剧，并且一直成为共和制度的极端反对者，即使在袁世凯垮台以后，仍然顽固坚持已见，他又一再说："项城之失……，因别有在，非帝制也。……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中外人士人同此言。""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总之，鄙人自始自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政体。"这时期，严复已完全成为顽固的封建复古主义者，至死还留遗嘱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他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改。"

1921年，严复在家乡福州去世。

杨　度

杨度　字皙子，号虎公，晚年号虎禅师，湖南省湘潭县人，1875年生。1879年中丁酉科举人，1902年入日本东京宏文书院，1903年回国考取进士，后又赴日本入法政大学，并任中国留日学生会长。1907年任宪法编查馆提调、内阁统计局局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南北议和北方代表随员。1912年任总统府政治顾问，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督办汉口商埠建筑事宜。1915年任国史馆副馆长、总统府内史监内史，同年8月组织筹安会(后改称宪政商进会)任理事长。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晚年居于京沪之间，倾向革命，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1年9月病逝于上海。

孙毓筠

孙毓筠　字少侯，安徽省寿县人，1871年生。为孙家鼐之侄孙，曾捐纳为同知及道员衔。1903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同盟会，任庶务干事。1905年在南京被清政府逮捕，被判处监禁。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后任安徽都督，不久去职。1912年为国民党参议、袁世凯总统府顾问。1913年"二次革命"后投靠袁世凯，任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1916年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之帝制效力，袁世凯死后曾被通缉，匿于天津租界。晚年信佛，1924年为胡景翼之食客。1925年病故于开封。

朱启钤

朱启钤　字桂莘，号蠖园，堂号存素堂、同功堂，贵州省紫江县人，1871年生。举人出身，曾任北洋习艺所及京师译学馆监督。1905年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1907年后任奉天垦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局督办。1912年7月任交通总长。1913年9月任内务总长，直至1916年4月。1914年还曾兼代过交通总长，是旧交通系的主要成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帝制失败后，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受到通缉。1918年2月获特赦，同年8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总代表。1927年任安国军政府政治讨论会委员。并曾任过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晚年从事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解放后，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从香港回到北京，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2年2月病逝于北京。著有《蠖园文集》、《芋香录》、《李仲明营造法式》、《同素堂丝绣录》等。

郑汝成

郑汝成　字子敬，河北省静海县(今属天津市)人。北洋水师学堂及英国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北洋军政司教练处帮办、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总办。1907年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烟台海军教练营统领、烟台警备队统带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人驱走。1912年后任总统府侍从武官、海军执法官，1913年任上海镇守使。1915年10月被授为将军府彰威将军，11月被中华革命党人打死于上海外白渡桥。

陈　宧

陈宧　字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1870年生。曾入两湖书院及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中丁酉科拔贡，曾任武卫前军营务处稽查、武卫中军记室、河南巡抚林绍年的幕僚。1903年后任四川常备军帮统、参谋全省营务处、四川陆军混成协协统、四川武备学堂会办。1907年任云南新军协统，并被授为陆军部员外郎。1909年任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会办巡防营务处、陆军第二十镇镇统，1911年去职。1912年任参谋本部次长、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915年5月任四川军务会办，8月为成武将军

督办四川军务，并兼四川巡按使。1916年5月被迫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6月被川军逐出四川。1917年授将军府明威将军。此后长期居于天津。1943年故去。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20) 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庵。1903年在上海结识爱国学社成员，改名汉光，赞成革命。同年冬出版《中国民族志》、《攘书》，署名光汉子。1904年任《警钟日报》主笔。同年加入光复会。1907年加入同盟会，与张继东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后创办《天义》、《衡报》等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民族革命。1908年变节。1909年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1911年随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后在四川国学院讲学。1913年到太原，充当阎锡山高级顾问。1915年参加发起筹安会，任理事，拥护袁世凯称帝。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任《国故月刊》总编辑，与《新青年》对抗，反对新文化运动。对经学、小学及汉魏诗有深邃研究，著书甚丰。有《刘中叔先生遗书》，共74种。

李燮和

李燮和(1874～1927) 原名柱中，湖南安化人。1904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加入华兴会，参与长沙起事未成。流亡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第二年去南洋爪哇，在学堂担任教习，助陶成章恢复光复会。1911年回国，任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专事联络驻吴淞等处之湘籍防军。并与陈其美合作，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受陈排挤，赴吴淞任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辞职引退。1915年与杨度等发起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袁死后退居故里，1927年病死。

珍闻轶事

洪宪旗

袁世凯称帝时，曾为他梦想中的洪宪帝国设计了一面旗子。或说这面旗子的样式是在原来的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取义为"五族共戴一君"。实际上这只是当时拟议中提出的方案之一，并非最后定案。最后议定供袁选择的有两个方案：其一是以红十字将旗面划分为四块，左上角一块为黄色，右上角一块为黑色，左下角一块为蓝色，右下角一块为白色；其二是以两道交叉的红色斜条将旗面划分为四个三角形，上方的三角为蓝色，下方的三角为黄色，左、右边的三角分别为黑色、白色。袁看中了后一方案，已预定在他举行登基大典后用以代替原来的五色旗，但不久袁被迫取消帝制，这面怪旗就始终未见天日。

对于这件事，还有一则不同的记述。据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云："海军总长刘冠雄，……英海军学生也，以英帝国双十字架斜叠旗式说项城。原议：中华民国国旗，以火德王，故为红黄蓝白黑；洪宪以土德王，宜改为黄红蓝白黑，竿涂黄。冠雄由英国旗双十字架悟加斜叠双五色条于原五色国旗之上。……夜扣宫门，进呈图式。项城……大喜，遂交大典筹备处筹备。……当时议定国旗有三说：(1)仍用五色旗，黄色在最上，红色次之，蓝白黑仍旧；(2)仍用五色旗，加黄龙于旗左角；(3)沿用黄龙旗，复中国历代旧制，龙伸五爪，爪用黄红蓝白黑。自刘冠雄旗样出，群议始息。"这一"刘冠雄旗样"与上述第二方案有相似之处，而又有所不同，姑录存以另备一说。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妓女请愿团

京师八大胡同，本多鼓吹帝制诸人之成绩。一时传言，有云：无论何人，此时若上书赞成帝制，以后俱有特殊之奖励。于是彼狐媚儿亦发狂病。一二自谓红倌，与政界诸人有关联者，妄挟封典希望，遂纠合同志，上书劝进，俨然步安静生之后尘焉。当时领衔者传为小阿凤。其书稿则出自名流易某手笔，易乃小阿凤之狎客也，今为某总长之宠姬矣。或云领衔系花元春，花为皇长子克定所眷。要之其书未编入所刊印之请愿书中，乃杨杏城与阮内史所删，以其性质近乎游戏耳。闻袁氏得书后，顾谓十三太保等曰："彼等亦竟来劝进，第对付一节，颇费踌躇。登极后宜若何予以相当之酬报？倘设置之度外，则同为国民，胡为令彼等独抱向隅耶？"皙子曰："此亦不难，请皇上于登极后，按凡列名请愿者，赐以特别商标，虽皮肉生涯，亦属新朝旷典也。"袁笑而拒之，命姑俟届时更议。旋因杨、阮等议事近轻亵，乃寝不发刊。

（摘自《北洋军阀秘史》青海人民出版社）

乞丐请愿团

袁氏之以民意粉饰帝制，其最滑稽可哂者，即于女子请愿团不足，而有娼妓请愿团；国民请愿不足，而有乞丐请愿团；洵历史以来未有之奇闻趣闻也。闻倡此议者，即大名赫赫之筹安第一君子杨氏。杨氏当筹安势绌，而梁财神等之请愿团渐盛时，心颇怏仄，亟思有以胜之，苦思力索，终觉未能出人头地。一日，驱车过闹市口，见乞丐者二人口角。一丐厉声曰："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祷祈老天，复生一皇帝也。"杨氏忽偶然有悟，心口相语曰："若辈亦信仰帝制耶？"盖借此好题目，试作一篇奇妙文字，不禁大喜。既归，立命家人召管丐之首领至（京师有管丐头目，谓之团头），语以如此，歆以权利，约于三日内召集，提会中经费施用，每名给以番饼一元，管丐首领则给百元，一律列名签押。内外城各丐闻是耗，晷刻之间，不期而麇集者不下万余人。其稍识之无者，即自行署款；而目不识丁之辈，或请同类代押，无不踊跃争先。以故于各请愿书进呈，比较列名最多者，以乞丐请愿团为第一。书就，杨氏捧之而喜曰："吾即视为滑稽，亦足以间执梁氏之口而令汗颜，况今裒然成帙，固已成确当名义，皇帝见之，必色然喜。是岂不足以夺梁某之气而平吾忿耶？"遂即日赍呈。杨氏入府见袁，递前称贺曰："古史颂帝王之德，谓泽及枯骨。今吾皇之恩义，下逮乞儿，是岂寻常感应哉。若辈亦知今兹时代非实行帝制不可，是固深明世界大势者。乞丐而能如是，吾皇之盛德溥及群生可知也。"袁氏闻此谀言，亦大喜曰："皙子辛苦，亦掷运动费几何耶？"杨氏正色曰："此实吾辈自愿为之，绝不劳一文运动费。且度虽不肖，亦何尝下与乞人伍？特彼辈闻吾为筹安请愿首唱人，已默记吾姓名住址，乃自推彼辈中首领为代表，衣冠求见，出书言如此。度喜其诚笃勇毅，且明礼数，遂教以呈递之法，书遂得上。据彼辈之意，但求吾皇正位后，遍设栖流所、习艺厂，广施冬衣赈米，使若辈幸免饥寒足矣。"袁笑而颔之，遂以铅管记载秘密簿册上，以备他日施恩焉。盖此等簿册为袁氏特置之怀中秘宝，凡遇请愿劝进之名字，必亲录之，以备查考，为他日酬庸之根据。此次丐者列名至万余人，不能尽书，乃仅记其前列十人于册，而令书记缮其全体姓名于别纸，常置秘密案头，与秘密簿册参看，其郑重若此。杨氏出而谓人曰："吾此举强于顾巨六所运动之妓女请愿团百倍。窥息上之词色，以妓女辈媚人无诚意，且迹近轻亵。而丐者则同系公民，不过稍贫贱耳！况更博得泽逮穷黎之美名，故皇上视此举极为隆重。吾之功简在帝心，盖可必也。"语次，大有自得之色云。梁氏闻之，投书戏之曰："以子旷代逸才，自有此异想天开，出人意表。但终未脱'请愿'二字之窠臼，则仍可称傍吾门户也。"杨氏得柬，笑骂财神贫嘴而已。

（摘自《民国野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莫到琼楼最上层"

洪宪称帝是历史上的一幕丑剧。当它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幕前幕后的笑话奇闻，不一而足。更妙的是：袁世凯本人还没有正式登基，皇帝并未产生，而未来的太子问题也一度闹得乌烟瘴气。

当时，袁世凯的长子克定素有足疾，不良于行，但野心勃勃，认为只要袁一旦当上了皇帝，皇位继承权舍他莫属，所以在帝制运动中，策划奔走，最为起劲。外间人早把他叫作太子，他也居之不疑。袁世凯心中却另有打算，并不一定想把皇位传给克定。袁在称帝前曾对冯国璋发誓赌咒，说明他并没有做皇帝的意思，并且编了一套理由说："我何必还要做皇帝呢？要做皇帝，无非是为子孙打算，可是，我的老大是个残废，老二一心要当名士，老实说，让他们做排长，我都不放心，哪放心让他们做皇帝呢？"袁是个最会撒谎的人，这席话更是骗冯国璋的鬼话。不过，话里却透露了一点真情，就是他对长子克定和次子克文并不满意，认为都不是能继承他的血腥事业的理想人物。

袁在诸子中最钟爱的是第五子克权，曾有意在他本人登上皇帝宝位后，把克定外封为蜀王，而另立克权为太子。一九一五年六月间，陈宦督理四川军务，抵达成都后曾大治宫室，并对他的亲信说，这是替克定当差，透露出袁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

在这情况下，克定与克权兄弟间明争暗斗，时起磨擦。以名士自况的克文，自揣继位无望，比较起来头脑不那么热，在帝制高唱入云时别唱一调，赋诗见意云："乍著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塞雁掩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引起克定反感，抄示乃父。这时，袁满心要过皇帝瘾，迷梦正酣，看诗后大为扫兴，想对克文加以惩诫。克文事先得讯，逃往上海，才幸而获免。

这场阋墙之争，可说是袁世凯称帝丑剧中的一个小插曲。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申君）

袁世凯的"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凯帝制罪恶者，是帝制派的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然而，袁

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他的十三太保。了解十三太保，对于研究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其统治手法，是必不可少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袁世凯十三太保的生平简介、活动能耐及其在袁氏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一一列出，以飨读者。

族侄袁乃宽。十三太保中，攀龙附凤以此公最为昭著。他是河南人，初为直隶总督僚佐，碌碌无闻，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才得以在府中办事。因其处处恭顺，善于辞令，颇得袁世凯赏识，常常委以美差。乃宽常言与大总统同宗（实则同姓不同宗），按辈份排列，他为族侄，袁世凯以族繁人众为荣，竟予首肯。乃宽又常以主持新华宫及大典筹备处土木建筑所得丰厚油水，寻购珠宝珍玩，献给袁世凯的宠姬们，得其欢心，于是渐以皇侄身份出入府中无忌。袁乃宽对复辟帝制煞费苦心，不遗余力，而对革命党人，则大张挞伐。其子袁瑛，字不同，因极力反对帝制，对其父连宗大不以为然，曾借机在新华宫埋设炸弹，企图炸死袁帝全家。事发后，他溜之大吉，随寄警告信一封，勒令袁世凯"取消帝制，解职待罪，静候国民之裁判。"世凯闻后怒不可遏，拟立治乃宽教子不严之罪，后查出其与子无关，仍加信任无疑。及至天津警察厅将袁瑛逮捕归案，解往京城交乃父看管，袁乃宽竟毫不留情地将儿子绑送军政执法处，按律治罪。

财神梁士诒。十三太保中，权位势力首推士诒，他在财经方面的能耐最为袁氏倚重。梁任总统府秘书长，谙熟袁氏心理，知其称帝决心已定，在"六君子"发起筹安会之初，便迫不及待地与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唐在礼等秘密成立"大典筹备处"，并以他们十人的名义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告以"将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请愿书，每省各具请愿书一份，均由大典筹备处代办。"随后，梁又于1915年9月19日另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安福胡同挂起招牌，当天联合"各省代表"向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自此以后，"请愿联合会"成为帝制活动的中心，筹安会不免相形失色，杨度不得不将筹安会改名为"宪政促进会"，想在袁皇登极之后，另作文章。

梁士诒积极为袁世凯筹措经费。1915年6月，他推荐蔡乃煌为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禁烟特派员，并要蔡某在上海将沪粤关栈存的鸦片6000箱出售，每箱价4500元，共得2700万元，悉数提为帝制活动经费。9月间，梁又献计动用两笔款项：一是交通银行存款及前清遗老富绅之积蓄。其理由是，"此辈既赞成帝制，我皇上经国制用，当然可以提取。"二是救国储金。梁认为，"国民既以爱国为目的，此款之即充当国家正用，自属天经地义。况不用之于战争，而用之于和平，尤为国民之幸福。"据梁士诒称，这两笔款项共得4000万元之巨。袁世凯十分感慨地说："吾得此数以谋大事，何忧其不济耶？卿真吾之活财神也。""帝制事成，首揆一席，非卿而谁？卿其爱惜精神，毋负新朝元佐也。"袁死后，梁士诒遭通缉，潜往上海，后由曹锟出面，以"人才难得"为由，呈请特赦，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及交通银行总理。

军师杨杏城。杨氏足智多谋，长于吏事，早在辛亥革命时，就以反对共和而闻名。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际，将他特召入京，参与谋划。此人颇为洒脱，主张直截了当地搞帝制。他认为，袁大总统已军权在握，心腹不少，想复辟帝制就复辟，"若遮遮掩掩、蝎蝎螫螫，夫既欲之，又恐人之议我，则反对者且从而有辞，则事败于游豫之中"。他常讥笑筹安诸君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即梁士诒之请愿团，也属多此一举，只需他们数人上一劝进表即可，何必授人以伪造民意的口实。但袁世凯误认民意向已，不从其"直截了当"之计，而呼之为"单料军师。"

干殿下段芝贵。就跟袁世凯的感情密切而言，十三太保中当首推御干儿段芝贵。段氏，安徽合肥人，1886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赴东瀛留学，学成归国，投效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被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护理湖广总督、驻京司令官和拱卫军总司令等要职。段某对袁氏十分效忠，是军中推行复辟帝制最力者，曾联合14省将军密呈袁氏"请速正大位。"他是全国众多高级将领中，唯一参与帝制机密之人，经常为袁世凯代印、代发机要文书。袁皇登极之后，得封一等公。

内务总长朱启钤。朱氏，字桂莘，贵州人，举人出身，徐世昌干儿子。民初历任内务、交通总长，与梁士诒、周自齐同称交通系三巨头。为人干练，处事果决，很得袁世凯宠信。筹安议起，袁用他作谋臣，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为复辟帝制出尽全力。袁死后，朱启钤作为帝制祸首遭通缉，逃匿天津租界。

小智囊阮忠枢。阮氏跟随袁世凯较早，是他在小站练兵时期的老幕僚，关系亲近，一切公文批答，非阮手笔，不能遂袁心意。1914年袁总统秘书改为内史，阮做了内史监，相当于秘书长。他是个鸦片烟鬼，常常不能按时到公，袁氏以为其人不习吏事，未予独当一面之重权。帝制事起，阮之奔走，亦甚著劳绩。为扫除帝制障碍，他帮袁世凯调兵遣将攻打云南，张勋忍痛抽十营辫子兵加入征滇军，就是阮内史亲自跑到徐州游说的结果。他还往来于南京、徐州间，力劝冯国璋与张勋联合北洋派军人，发一个拥护帝制的联合通电，藉以澄清所谓北洋派分裂的传言。冯、张始终不肯，阮忠枢便自拟一个这样的电报，以冯张的名义发了出去，难怪袁世凯常呼他为"小智囊"。

表弟张镇芳。张氏家中富有资财，又擅长媚术，他将女儿嫁给袁世凯的第三子为妻，获得亲上加亲的关系，被袁氏委派做了河南都督。在帝制活动中，张镇芳很是活跃，出力不少，袁世凯临终时，曾令他与段祺瑞、王士珍一同前往接受遗嘱。

参谋顾问夏寿田、顾鳌。夏是湖南湘潭人，与杨度同乡同学，关系很深，他做袁的内史，便是杨度推荐的。夏氏任职奉命唯谨，按时到班，朝夕不离袁的左右。袁世凯十分宠信于他，一切机密均出其手，在内史中是个头等红人。有时人们向徐世昌(政事堂国务卿)问事，徐不高兴时便冷冰冰地说一句："你们何不去问夏内史？"顾鳌原是清末部员，碌碌无名，与袁世凯相识后，颇得青睐，被提为某局长。他积极参与筹备大典，负责与新闻界接洽，疏通舆论，鼓吹帝制。

"屠户"陆建章。陆系安徽蒙县人，性残忍，工心计，得袁赏识，历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右路备补营统领、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长。他对捕获的革命党人大行诛杀，前后不下千数百人，赢得"陆屠夫"称号。陆对复辟帝制很是热心，不仅首先称臣，而且指使小妾上书袁氏第十夫人(两人为姐妹)，颂扬其不日将进位为妃。他还慷慨解囊，献出珠宝钻翠无数，以充帝制活动经费。

健将朱家宝。朱氏、云南宁州(今曲靖)人，光绪年间进士，历任知府、按察使、巡抚、都督等高职。他是东南疆大臣中首先劝进之人，并疏通各省官吏，捏造民意，极其复辟之能事。在帝制活动遭到全国人民唾骂，各省将军纷纷起来反对之际，朱家宝仍不悬崖勒马，继续为虎作伥。1916年3月，冯国璋以五省将军名义密电各省联合起来，迫袁取消帝制，朱家宝时任直隶将军兼巡按使，获此电报之后，立即报告了袁世凯。

周自齐，字子庚，山东单县人。历任驻美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等地领事，1911年为袁内阁度支部大臣，1913年后历任交通、财政、农商总长及中国银行总裁。此人亦非泛泛之辈，在帝制活动中任大典筹备处处员，出力不少，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亡命日本。

卖国贼曹汝霖。曹氏，字润田，上海人，为梁士诒之高足。早年先后入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一度做过律师，不久任袁内阁外交次长。1915年伙同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多次秘密赴日，密议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特别爱其聪明，要他参与复辟事宜，并允诺登极后由他掌握财政。在"五四"运动中，曹宅被爱国学生付之一炬，使他臭名远扬，此后他隐居上海，终身不敢复出。

十三太保是帝制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筹划于内，奔走于外，作用远胜于"筹安会"的秀才们。在舆论上，他们疏通报界，摇唇鼓舌，弄虚作假，起了"六君子"起不到的作用。在组织上，他们拼凑"全国请愿联合会"，代庖请愿书，操纵参政院和国民代表的选举与劝进，成立"大典筹备处"等等，无一不是复辟帝制的重要步骤。他们还多方筹款，甚至连家藏金银财宝也不惜奉献出来，为袁世凯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袁世凯能于1915年12月13日端坐于怀仁堂，接受百官朝拜，同十三太保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摘自《民国春秋》)

各种"真相"

蔡锷出京很富传奇性，除了上面两种说法外，当时和嗣后还有种种述叙"真相"的文字。各种"真相"，都有一定的实事依傍，言之成理，有的十分生动有趣。

小凤仙在天津掩护

……先生自与夫人离异后，日夜不归私宅，与小凤仙益形密切，时袁氏仍密派侦探伺其左右，先生佯为不知，常携凤仙诣天津作汗漫游。凡剧场、餐馆恒有其足迹，或朝去暮还，或间日始返，如是者率以为恒。侦者虽见其了无他异，然犹不敢稍懈也。当实行远飏之日，先生又挟小凤仙至天津，寓于某旅社，与凤仙坐话于官房内，议论风生，津津有味，更大骂其夫人之忤已。时侦者皆窗外窃听，先生忽言腹痛，呼馆佣来，询以厕所何在，命佣导之往。先生故一手掀衣，一手捧腹，伛偻行。侦者以其如厕也，未尾而随之，先生乘间，亟由后门逸出，时日本山东丸将开驶，亟诣港口登舟，故得安然脱险去，计诚狡矣。(《蔡松坡轶事》)

潘夫人在天津随侍

那么真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蔡锷为了迷惑袁世凯，确曾与杨度等人作冶游，但绝没有借助小凤仙逃出北京。先是一九一五年初夏，蔡锷偶感风寒，低烧不退，经日本医生诊为喉头结核症。医治一个月后未见好转，经日本医师介绍，住天津共和医院。蔡锷以治病为由，向袁世凯请假得到批准。在此有潘夫人随侍在侧。得到各方面部署安排妥当后，即由何鹏翔护送潘夫人携女儿径返云南。蔡锷本人则乔装乘轮先到日本，然后经香港、越南转赴昆明。上面情况是潘夫人生前口述，黄一欧(黄兴之长子)所写史料亦可证明。(袁松涛《蔡锷出京之谜》，载一九八一年八月卅一日《北京晚报》。)

与梁启超密谋

袁世凯以湖南都督啖蔡锷入都，后遂羁留之。锷素师梁启超，而与熊希龄乡里。是时熊希龄当国，启超为袁世凯礼重，数为解免于袁世凯，得为约法议员及经界局督办，然屏息不敢发议论，追逐诸贵人伺颜色，或则出入娼

家，佯不问时事。世凯手平赣宁大难，解散国会，订新约法，设参政院，用古天子礼郊祀天地，世皆以世凯借革命党以覆清，必意在自为。而世凯微见风采，又若无意，四年乙卯筹安会兴，劝进者满天下。设筹备大典处，刻期临御，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或言已御便殿受贺，章奏称陛下，外人责难，即以民意答之，且声言决无反对者。锷亦列名劝进，阴策其事难成，料段祺瑞、冯国璋立异，世凯不易制之，有隙可乘。日人忌世凯必不使之得意，遂与启超密谋。适戴戡新罢黔巡按使来京，亦与谋画，谓在黔发难，则道路相距远、北兵不能至，可以持久。其年十月微服走天津。（邓之诚：《纪护国军起义始末第二》）

男扮女装乘轿子往崇文门火车站

最近，曾龙珠老人与我闲谈时，说到了电影《知音》没有把她父亲曾鲲化当时筹划蔡锷逃离北京，并在她家化装出逃的真相写进剧本中去。

曾鲲化先生，新化县人，辛亥革命的先驱。早年同蔡锷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经孙先生提名，担任了民国政府交通总长。他积极支持反袁斗争。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返滇率部讨袁，精心筹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到大松柏树下的“来今雨轩”露天茶社饮茶。蔡锷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当时最名贵的草帽，每顶价值七十元）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闲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认为像蔡锷这样的大人物决不可能身穿短衫上街，更何况留下小凤仙及衣帽钱袋呢。便断定他必定会回来，所以没有去厕所查看。这是蔡锷和曾鲲化事前分析了密探的心理，采取的金蝉脱壳之计。

蔡锷佯作解手，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二十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着，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前门火车站有军警宪兵严密盘查来往旅客，只有崇文门火车站是专供外国人使用的，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总长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曾龙珠老人说：我当时年幼，虽然看到家里人用轿子送一位“女客”，但不知内情，直到解放后，我母亲刘灿华才把当年帮助蔡锷逃离北京的详细经过告诉了子女和外孙女们。当时如果走漏消息，全家老小必遭杀害，所以几十年来这一事实外人亦不得而知。今天论起电影《知音》，我将辛亥革命的这一重要史实向你们讲讲，使世人了解蔡锷将军逃离北京的真相。（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邵阳日报》载贺舜田《蔡锷将军逃离北京的真相》）

袁世凯看戏遭辱记

袁世凯很喜欢唱戏，特别是在他得意高兴之时，总不免要手舞足蹈，哼几句戏文。那段日子，朝思梦想要当“皇帝”的袁世凯，听说即位大典的筹备事宜已安排就绪，不需多久就会坐上皇帝交椅，整天心花怒放，喜形于色。回到新华宫中，经常开口大唱戏文。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袁世凯所唱的不外是“孤王酒醉桃花宫”、“我薛平贵也有今日一天”及《大登殿》之类。

袁世凯喜欢唱戏，更迷恋于看戏，每逢自己的生辰与觉得应该庆贺的事情，他总要召集京城名角来唱堂会。许多演员对袁世凯的窃国行径恨之入骨，有的拒绝为他演出，有的在戏台上借题发挥，借戏文对袁进行讽刺和鞭挞。

1915年，袁世凯过生日，大宴宾客之后，又延请京城有名气的演员来演戏贺寿。京剧名角孙菊仙、谭鑫培不愿为这个卖国贼演出，借故不来。袁世凯的亲信九门提督江朝宗为讨主子欢心，亲自率领着京城驻军，硬是把孙、谭两人挟持而来。谭鑫培沿途高声大笑不止，进入新华门，乘坐宫艇，到达同仁堂。排演时，袁世凯提出要演《新安天会》，并指定谭鑫培为主角。谭断然拒绝。袁世凯无奈，只得改唱谭鑫培的拿手戏《秦琼卖马》作压台戏。戏一演完，谭不辞而别，大笑出新华门，沿途依然高声大笑不止，一直到了家，笑声才停了下来。他人不解，问道：

“你为什么要沿途大笑不止？”

“我不愿‘小叫’，岂不可大笑吗？”谭鑫培戏名“小叫天”，在大笑声中，把对袁世凯的鄙薄、仇恨发泄殆尽。

寿戏演完，袁世凯吩咐手下人赏谭、孙各二百块银元。孙菊仙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赏赐”，“我以前在清廷里供奉慈禧老佛爷，眼中只见过银两，并不曾见过银元！‘我做皇帝，赏你二百银元’，真是程咬金坐瓦岗寨，大叫一声，‘大风到了’！暴发户小子，不值一笑！”孙于是将二百银元沿途丢撒，一边走，一边喊：“袁头银洋，都落地了！”等出新华门时，二百银元全撒完了。“袁头落地”，表现了对袁世凯强烈的仇恨与诅咒。

这年，袁世凯的宠臣、国务卿徐世昌过生日时，也东施效颦，广招演员来演戏，一大批溜须拍马的官员也捧着

大红礼盒，争先恐后地赶赴东单牌楼五条胡同徐府祝寿，清室师傅陈宝琛也在其中。这天，演出的是《大登殿》，由孙菊仙扮演皇帝，戏中文武百官请圣上登宝座，孙菊仙谦让，站在圣坛之下，口中连称："不敢，不敢。"扮演文武百官的演员假装不懂，忙问何故。

"自从清室退位，从前皇帝已经没有了，现在是民国，并没有皇帝，将来的皇帝，还没有出现；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怎敢做皇帝，怎么敢做皇帝！"说罢，孙菊仙用手指着满脸惊讶的徐世昌，笑问道：

"哈，现在谁是你的皇帝？"

没等徐世昌从惊讶中醒过神来，孙菊仙又指着愧色满面的陈宝琛问道：

"哈，现在谁又是你的皇帝？"

说完，孙菊仙后退三步，用手捋着自己的胡须，一甩，大声说，"哈，我又是谁家的皇帝？"

言毕，扬长而去。看戏的达官贵人们一个人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袁世凯妻妾成群，却时常打着女演员的主意。在他筹备帝制期间，曾用总统府的名义，逼迫女演员刘喜奎去唱堂会。刘喜奎姿容秀美，扮相极佳，1913年到北京，时值二十芳龄，与鲜灵芝、金玉兰并称"女伶三杰"，声誉日隆。袁世凯为了能接近她，大办宴席，请她去宫中内宅吃饭。刘喜奎断然拒绝袁世凯的"好心"与"盛情"，并提出，以后演出，一不去内宅，二不许陌生男人进她的化妆室。

有一次，刘喜奎正在化妆，袁世凯的听差跑来告诉她，"有人请"。问是谁，听差只道："到时你便知道了"。非请刘喜奎走一趟不可。刘喜奎跟着这位听差来到一间铺设极为豪华的房子里，心中的猜疑，这时已经证实。她转过身来，厉声问道：

"是谁找我，有什么事，站出来讲！、

这时，一个清朝遗老模样的人见光景不对，连忙从帘幕中钻出来，慌慌张张地说，"没事，没事，只想找你聊聊天，聊聊天。没事，没事。"

刘喜奎轻蔑地冷笑一声，挪腿便走。

"这女人可真不好惹！"帘幕后露出袁世凯光亮的头。

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便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声中一命呜呼。演员刘艺舟在袁世凯筹备做皇帝时，曾被袁世凯逮捕，关押在北京。袁世凯死后，他编了一出京戏《皇帝梦》，在汉口满春戏院演出。他自饰袁世凯，穿着绣龙袍，在台上唱道："孤王酒醉新华宫，杨皙子生来好玲珑。宣统退位，孤的龙心动，那怕他革命党的炸弹凶！孙中山革命成何用？黄克强本领也不中！天下的英雄虽然众，哪一个逃出孤的计牢笼！梁士诒理财真有用，虽然是民穷，孤的库不空！"

活脱脱的一幅丑态！

（摘自《民国春秋》南京古籍出版社）

流 行 风

小说《绛纱记》

作者苏曼殊，主要内容：

该书叙述书生梦珠，姓薛名瑛，岭南人氏，性温雅淡泊，好恬静。与邑中儒门大族谢翥有旧交。谢家三女秋云爱慕梦珠，恋情深切，用绛纱裹以美玉私赠给他。时逢乱世，梦珠不辞而别，卖玉为资，存绛纱留念，径去慧龙寺落发出家，又巡游印度、缅甸、暹逻等国。归来后，见纱思情，怀念秋云，遍访不得，遂抱羸疾，隐于苏州教学。自梦珠走后，秋云家遭横祸，当地巨绅陈某之子欲强娶秋云，其父不从，以家藏邝常肃（指康有为，号长素的谐音）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为证，诬陷暗通维新党，谢翥无以自明，吞金自杀。秋云被二姐营救，投奔香港婶家。一日见报载僧侣梦珠游印度绕道星嘉坡消息，秋云不忘旧情，去找梦珠，然追寻不见。后在梦珠同窗挚友昙鸾的帮助下，于苏州城外一小寺内找到梦珠。当她亲见分别多年的恋人时，梦珠已坐化，从他衣襟间露出半角绛纱，秋云悲恸不已，也遁入空门。书中还穿插描写了昙鸾与五姑、霏玉与新派女郎卢某、玉鸾与浪荡子的婚姻悲剧。作品通过几对恋人颠沛流离的遭遇，反映了戊戌政变后，清政府镇压维新派和政局动荡不安的情景，思想性较高。本书故事情节虽简单，却描绘的曲折引人。由于作者笔下人物命运的结局凄惨，致使作品有着浓厚的灰暗色彩。书中有一段"桃花源"式的渔村描写，反映出作者唯心主义、虚无主义的世界观。

小说《焚剑记》

作者苏曼殊，主要内容：

该书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宣统末年。广东省有一巨富而后家道没落的青年独孤粲，文武双全，为人孤洁耿介，因得罪权势，逃往南境更名避难。在深山村中遇一老人和二孙女阿兰、阿蕙。老人感其正义而留住，并请他教

两孙女读书。后独孤粲知阿兰是好友胞妹，两相爱慕。三年后，南境也兵乱骚扰，老人重病，临终前托嘱：将阿兰许配独孤粲，让二人照料好阿惠。独孤粲携二女逃奔香港谋生。情节由此展开，通过主人公辗转的遭遇，描写乱世情景，有遍地死尸，为暴兵残酷洗劫的村落，有以人肉为食的穷乡野店，有大水为灾的侵袭，有抢劫杀人的强盗。同时也引出几个人物，有中弹藏于乱尸中，濒死幸生的农民周阿大；有为继母虐待，想投海自杀又被搭救的孤女媚娘；有被生父卖入娼门而又从良，一生命运蹇薄的老妪；有对朋友图财害命的大烟客。最后，阿兰两次被逼婚出走，暴病卒于途中；阿蕙被迫嫁于先亡人，成了新寡，独孤粲凄怆悲愤之下，焚烧宝剑，与周阿大浪迹四方，不明去向。作品就是这样反映出晚清社会兵连祸接的混乱情况，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深重的灾难，同时表现了平民百姓的善良、纯朴，同舟共济。这样的主题在同期的小说中还是不多见的。然而故事情节分散，给人杂沓的感觉，特别是以焚剑结尾，使作品的立意显得苍白无力，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出世思想。

小说《金屋梦》

作者梦笙生，主要内容：

故事叙述了《金瓶梅》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后代、转世人等在金兵大举入侵中原的动乱社会中悲欢离合的种种际遇。塑造了伪帝张邦昌、奸相秦桧，敌酋金兀术、老帅宗泽、忠臣岳飞韩世忠，以及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的转世人金哥、金桂、银瓶儿、名妓李师师和富豪商贾、婢仆佣人、尼姑和尚等各类人物形象。还描写了君主的软弱，朝廷腐败，官场上种种寡廉鲜耻、通敌卖国的恶行，为富不仁，男盗女娼等丑恶的社会现象，是一幅艺术而形象地反映宋代封建社会的画卷。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写作艺术手法新颖娴熟，所塑人物个性多姿多彩，用笔不多但鲜明有特色。如写王氏的狠毒，只说她做事"件件都极毒辣，因此秦桧敬畏她和父母一般"，秦桧的阴险狠毒众所周知。且要让她三分，那王氏狠毒到何种程度则可想而知。小说在语言方面多用通俗口语，间杂一些方言，恣肆畅达，生动活泼。本书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它虽以月娘因兵乱舍子始，以母子相认终，但由于中间插以过多其他的事件，使情节稍嫌松散、错杂。另书中还有一些因果报应、封建迷信和淫秽的描写。但总的说来，《金屋梦》是许多《金瓶梅》续作中较好的一个本子，它不但可以当小说阅读欣赏，而且也是研究世情小说发展史，研究宋代社会及名著《金瓶梅》的重要资料。

小说《海上繁华梦》

作者孙玉声，主要内容：

全书分正续二集，每集100回。正集叙述苏州人杜少牧因向往上海的洋场风光，与朋友谢幼安一同去观光游历。一到上海，杜少牧便涉足妓院，留连忘返。先后与妓女巫楚云和颜如玉相好。而巫和颜却倾心于美貌青年潘少安，二人把从杜少牧手中骗来的钱送给潘。后把戏拆穿，给了杜少牧以惨痛的教训。杜少牧不仅嫖，而且还赌，书中有不少地方是叙述赌的黑幕的。在续集中，杜少牧和谢幼安等，都成了"前辈"，而他们的儿辈却"风华正茂"。有个名叫温如玉的青年，其父温生甫在正集中也是个活跃人物，被人视为"瘟生"。其子也颇有父风，又结交了一个劣友萧怀策，眼看就要失足，亏了其父和杜少牧、谢幼安的劝阻和"现身说法"，才算没有掉下水去。而那个萧怀策，则是个"外正内谲"的人，他最大的狠处是算计了你，陷害了你，还能赚你的感激，骗你的信任。其中被他害得最苦的是戚祖诒。戚本来很有钱，可他又嫖又赌又烟，其母亲、妻子气得自杀。而他的四个妾，都受了萧怀策的指使，把财物席卷一空而去。戚祖诒人财两空，还以为萧是好人，找他去讨口饭吃。最后等他醒悟过来，他的性命也完结了。书中所叙大都是此类故事。此书为专写妓院情形之收，指出恶有恶报，像巫楚云、潘少安、萧怀策，像一些赌棍、拆白党等，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作者创作此书，旨在警醒痴迷。本书可以看作是早年上海的社会记实，而且是五花八门种种罪恶的记实。全书以清末民初的上海为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纸醉金迷的洋场风光，写得很有特色。尤其是看戏，不但写了京派谭鑫培等人的戏，也写了海派七盏灯、夏月润等人的戏。另外像髦儿戏、梆子戏、苏滩等戏也有描述。总的说来，正如胡适所评价的：此书"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却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

诗《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
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
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

（柳亚子）

历史档案

敬告青年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林(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

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人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知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 S. 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

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陈独秀）

中俄蒙协约

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俄历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恰克图。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诚愿将外蒙古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公同协商解决，各派全权专使如左：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都统衔毕桂芳、少卿衔上大夫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陈箓；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特派驻蒙古外交官兼总领事国务正参议官亚力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派司法副长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克达木定，财务长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札布；为全权专使，各专使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俱属妥协，议定各款如下：

第一条　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

第二条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第三条　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及土地问题，中国政府担任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中俄声明另件第二条办理。

第四条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

第五条　按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文件第二及第三两条，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

第六条　按照声明文件第三条，中国、俄国担任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之制度。

第七条　中俄声明文件第三条所规定中国驻库伦大员之卫队，其数目不过二百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过五十名。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在外蒙古他处添设佐理专员时，每处卫队不过五十名。

第八条　俄国政府遣派在库伦代表之领事卫队不过一百五十名，其在外蒙古他处已设或将来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添设俄国领事署或副领事署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

第九条　凡遇有典礼及正式聚会，中国驻库伦大员应列最高地位。如遇必要时，该大员有独见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之权。俄国代表亦享此独见之权。

第十条　中国驻库伦大员及本协约第七条所指在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得总监视外蒙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使其不违犯中国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古之各种利益。

（下略）

第二十二条　本约用中、俄、蒙、法四文合缮各三份，于签字日发生效力。四文校对无讹，将来文字解释，以法文为准。

大中华民国四年六月七日

二十一条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平和，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一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二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　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中日交涉始末》附件1第1—3页）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瞿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断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当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何以言乎不当问？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当问也。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由甲种而变为乙种，或由乙种而复变为甲种，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乎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

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其消极的严守之范围，则既若是矣，其积极的进取之范围，则亦有焉。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成为政治家节操之问题；惟牺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张，以售易一时政治上之地位，斯则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耳。是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之一大义，实彻上彻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膺也。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源。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就著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磋。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戮辱我，岂犹未极？苟数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戮民耳。复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骇，吾非聋瞶，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丐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呜呼，前事岂复忍道，吾请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乙巳两年《新民丛报》中之拙著一覆观之，凡辛亥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此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夸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下百数十万本，可覆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在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我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著论腾书，泪枯血尽，（吾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可取证，然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弛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自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万国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奕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捐之也。譬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万不可孟浪以失身于匪人，倘蹈危机，则家族亲知，临事犯颜以相匡救，宜也。当前此饶有审择余地之时，漫置不省，相率怂恿，以遂苟合，及结缡已历年所，乃日聒于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终身也。爱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尝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

（梁启超）

护国军致袁世凯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酿，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决议；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辨奸论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现时各国之关系日益密切，而欧亚两洲中之纠葛，又大有打破将来和平局面之恐慌。故凡有心于将来世界安乐、人类利益之士，对于现局之表示，均应小心衡度之；且须以政治家之手段，指导将来之趋势，而不当处于被动之地位者也。

近年以来，各国中违背公平人道与夫诚信之轨者，屡有所闻。因是之故，是以有欧洲之战，与其发生后种种惨剧。不意欧战未已，复有一变状突现于东方。其事之重大，可影响于美国之郅治富盛者，实前事所未有。今美国执政已晓然于遗世独立政策之不可复行，吾知美国之民亦不能以敝（吾）国之事，视为无关重要矣。盖中国将来之富强与否，全视美国之富强为依归。中美间之事物相同、利益相共者，为数不可屈指数。就地理论，则中国以太平洋与美相联接。其不尽之矿藏，与夫种种财源，举待发展，其广大之市面，又待供给。迨巴拿马运河成，而两国间之商务交际互助之联络以立。

原中国人之意志，固欲效法美国之主义目的，以图造成一大民主国者也。何期十一日电报传来，竟倡变革，民主毁灭，袁氏称帝。夫以吾人不顾生命及种种所有，而换取自由平等正谊人道之幸福。四万万之众，积怨独夫虐政专制之流毒者凡千百年，今刚晓然于自由爱国之新义，谓能顺盗窃政柄之阴谋私意，举吾人破家流血所得之幸福完全毁弃，而率一己以及子孙，复奴隶于专制帝皇贪欲之下耶？公等乃大自由国之伟大国民，宁为伪造之选举所欺，与"人民无统治力"之诳语所骗，坐视袁世凯举连接东西两大共和国善意利益之枢纽自由撕灭，且任其种伏东方将来战争革命之祸根耶？况中国之共和存于东方，则美将来万一有急，亦可得一共和友国为作屏障，常受其热诚活泼之援助。不然者，吾恐民主主义失败，而专制侵凌之祸起矣。

顾受袁氏之金钱而为之辩护者，动谓袁为现时中国最大之伟人、东方之强士；又谓中国共和等于无物，华人不知自治，素性崇拜皇帝，以一般并无经验之故；总统继承问题，必为争乱之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袁世凯与其党徒欲证实上说之可信，遂不惜牺牲多数爱国男儿之血及小民脂膏以自解免，自称四万万华人已举彼为帝矣。仆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函，曾言袁氏统系的计画之目的，端在帝位矣。顾以袁氏就任之时，曾为"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之严正宣誓，及至最后时间，犹胆敢向世界宣言，不认自己有一点帝皇思想，复屡屡以追美华盛顿为言，谓外间所传彼挟君主之野心，实其仇敌捏造，欲以煽动内乱。仆因是之故，沿迄于今，犹未敢强人相信，谓彼之种种作态，将以为今日僭政之地步也。抑仆之缄默，与吾华数万万同胞之缄默，岂吾人本意哉？夫亦根上述之原因，故未即哓哓与辩耳。今袁之行事，已证明其为狡猾之乡愿。原彼之意，固谓己之野心，不至酿成变乱，故不惜掩其假面目，而静候登极之佳期也。今吾人平素所信已变为真，敷陈事实，断不能复诿为怀挟恶意。仆于是不敢放弃义务，特以明洁之笔，举现局之危于中国与危于贵邦者，陈请诸公之前。先就袁氏与美人辩护者之要点一讨论之，诸公其许我乎？

说者谓：袁世凯为现时中国之最大人物。以袁任中华民国之总统，目为最大人物，固理所应然，其说自无足深

辩。然诸君亦知袁之所以得成最大人物者,果何自来耶?亦由彼现时所仇逐之共和代表自甘退让,因是始造成袁氏今日之权势。

而说者又谓:袁为东方之强士。欲知是说之真伪,必须解析其权势之本来。夫袁之权势,即在彼扪心自问,固不敢谓从个人正直与统治无私得来也,特幸而遭值机会,出其狡猾诈伪之手段,以蒙蔽少数浅见之辈,使不获窥见其帝欲之隐私,予以赞助,故袁氏得有今日耳。袁之诈伪与其表里行为皆已暴露,自私之目的又极显著,此晚近来赞助袁氏之重要分子所以逐渐解体,有如夏日之雪也。

说者又谓:中国共和几等无物。但试问:孰操政舵,以致无物?失败之咎,夫谁任之?迹袁氏数年来往事,其有意使共和失败,俾得归罪于人民之不能自治,与借口于君主之必要,在在皆有线索可寻。仆之原意,本欲揭其详尽证据,条告诸君。防扰清听,遂致未敢。今仅略述一美人熟于中国情形者之言,以实余说,当亦诸公所许也。其言曰:“袁世凯于北方教唆兵变,以造成其留居北京之必要,因而能威临恋爱自由之南人;遣奸徒四出煽乱,以造成其遣派野蛮兵队之必要,因而得占领南方各地;施行暗杀,蹂躏人民自由权利,破坏人道正义,以造成革命之必要;及南人不忍桑梓受祸,彼又实行用兵,逼成二次革命。综袁氏之计画,无不以推尊一己为主义,欲尽餍其无厌之欲。于是不惜杀尽仇敌,解散国会,私订宪法,奉己以魔皇无限之权,拔除爱国民主之精神,禁压人民之意思,威压全国,愚蛊黔蒙,吾知袁世凯为帝之必要,不久又将由各都督与其他高等官吏代为说破矣。”上文所述,系成于一年以前,然就窥见袁氏之野心者观之,其言固甚透切也。

说者又谓:华人无自治之预备,因断为君主之必要。平心言之,如谓一般华人之脑中,其了解近世民主主义,不如美人之明晰,尚犹有说;然亦知美国经多少年代,乃得达今日之完全程度耶?夫美人之习于共和,亘百余年矣,后此百年间美国统治术之进步,当较既往而益大,可无疑也。然使后世之人,谓今之美人不适于共和,有是理耶?又使今世之人,谓尔之先代不适于组织一大民主国,有是理耶?由是推之,苟因华人遭逢不幸,被叛贼背弃明誓,阴谋窃政,剥去人民一切习于共和之权利,遂诿为人民能力不足,弗能进于人类自由平等正道明谊之坦途,其无理一也。况君主之制,相传已数千年,使谓该制实适于华人,则宪法政治已不患无发展改良之余地?而回观数千年君主历史,竟每况愈下,祸乱相寻,从可知民主制度乃中国最宜及唯一之制度矣。盖华人之为人,若风俗、习惯、组织等项,皆含有极富之民主性质。且质地佳美,守法易驯,具建设自治共和之稳固基础。此凡熟于中国情形及与曾居中国之美人类能道也,非夸辞也。

为之解者又谓:自武昌革命日起,迄共和成立,为期仅及百日,出之太骤,故人民未有预备云云。殊不知惟全国之人同心一德,故能以极短促之时间,将一朝推倒,扫皇帝之劫烬,建强力之共和。然推其所以致此者厥有二因:一则华人均厌恶专制,一则华人均趋近共和。是以行事皆正大光明,一致勇进,绝无狡猾欺骗之弊,成功乃得如是之速。今说者故反其辞,岂非无理取闹之甚耶?

推之如谓华人醉心帝制,其说亦同一荒谬。古代仁圣勇武之帝王,吾人至今犹怀其德,事或有之。若谓华人历来皆崇拜帝王,证之往史,绝无其事。矧袁世凯投身公仆而后,确无丰功伟绩,足以致吾人之景仰者乎?数传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吾知叛贼、权奸、私心幸运儿等之名称,袁当独专其美矣。

若论总统继承一事,为袁氏辩护者,又谓人民无共和预备,故总统继承一节,必无完满之解决,最浅亦当酿成争执之机,墨国往事,可为殷鉴云云。以余所见,中、墨情形大相悬殊。当中国南方共和党鼎盛之际,其总统为爱国爱民起见,甘以大位让袁氏接任,绝无阻力,自制力之伟,吾不知世界历史中果有其比否耶?袁世凯则不然,盘锯大位,把持政柄,首逼国民将总统任期由五年展为十年,继又展至终身。讵壑欲未厌,今不特欲专利于一身,且思以其二十一妻妾、三十二子女晋为后妃皇子。但吾人中虽有此万恶奸凶,吾华全族并非与袁同一鼻孔出气也。要之:无论如何人,实不能谓共和之制,视君主为劣。又何况政党势力之平和的伸张,确较君主之力征经营者为善耶?

今更进论袁世凯最近之宣言。考去年十一月念二日纽约《独立报》载袁氏致美民之书,其中有云:“余信中国苟为帝制,其对付内乱之弱与外患同。矧当兹世界开明,君政已无相倖之道,中华帝制之不可复活,亦犹诸美国耳。”及其窃政之谋已抵成熟,彼又言:“为总统抑为皇帝?均视民意为依归。”今袁氏对于世界,固谓四万万华人一致推戴,因而诞膺大宝矣。甚矣,袁世凯之诈伪也!甚矣,袁世凯之狡猾也!

道路修阻,恐诸君闻见未周,或不知袁氏狡狯之真相,用略述前事,以为论据。中国国会自正式举袁为总统之后,袁即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勒令解散,省议会则于三年二月五日解散,其下之地方自治议会亦同时解散。顾欲继续其欺人手段,袁于是有参政院之设,派其亲信傀儡尽充议员。中国全国之立法机关扫地以尽。可知所谓由四万万华人,于合众国等面积之广区,以短促时间选出代表,选举投票等事,不特纯属儿戏,抑亦势有所不可也。又何怪著名素以袒袁为主义之上海《字林西报》,亦复不能忍此欺伪,而为警告之辞耶?其言曰:“使戏剧之终局,而果与实事相符也,吾知中外人士多欲坐观其成,且咸预备剧幕一垂,大为袁世凯氏喝采。然苟幕复一幕,其终剧不外出于幻想一途,是又岂观剧家之本邻耶?若今之所谓命令、国民会议劝进表等项,全属一派伪词,吾不知其中果有佳处否也。倘必强吾人以观此虚幻无稽之剧,平平淡淡

迄于收场，则吾敢为袁世凯进一警告，彼之终剧行（将）受阻扰而致一倒采也。”

除此而外，如仆非恐以渎亵见罪，则更当以筹安会如何设立，与如何运动袁世凯为帝之详情，备陈于诸君子之前矣。复查该会设立已久之后，袁尚发出命令，通告全国，信誓旦旦，谓忠于共和，并且自承应守其严正之职务，消灭一切君政运动。同时又经访员等手，以虚伪之书，致诸美民，竭力否认。一面则筹备种种诈伪方法，步武拿翁，已死之帝制遂复活于袁世凯之手。至各省劝进之如何由政府授意，选举票之如何伪造，均不难和盘托出。第袁氏罪恶，虽罄南山之竹，难以尽书；饶燕许之笔，莫能穷相。约举数事，其余可以类推，无事哓哓为矣。

今举棋已定，称帝者早有决心。现在问题，即袁世凯是否自信称帝之后能增加权力，为中国谋长久之利益耳。假使酝酿多年，耗费财力之节节阴谋，不外破坏共和，揽持权柄，以遂其个人私欲，则帝制运动与夫称帝之事，惟招世界之诋诽耳。试观袁世凯致美人之书所云：“中国苟复帝制，其对付内乱之弱与外患同。中国帝制之不可复活，亦犹诸美国耳。”可知袁氏断无意于称帝，而后勉自激励，实心为国，以期驾乎昔日之所为。抑味其书词，袁世凯已不啻自承为害国之叛贼，而称帝之热，无非欲餍其揽权之私与无厌之欲而已！且以理测之，帝制下之政治，断不能较昔日为佳，且必较昔日为甚。何则？自爱之士固不甘身事权奸，彼之委身袁氏者，必其自陷于死地者也。袁世凯逆行之第一步，即为君主立宪。然以理论之，焉有行君主立宪制度而袁能得较大之权者？在昔彼之政敌，均翩然去国，任其自由。而袁乃蹂躏宪法，蔑视民意，借五国巨债，以破坏民国。迨妄用公款，私割国土，卖统治之权，以乞怜外国，而人不加阻挠，袁于是益肆无忌惮，凡爱国志士敢于声讨其罪者，辄戮辱暗杀之，其惨无天日，求诸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未见其匹。顾袁犹以为未足也。推其意，固非君主立宪之谓，亦谓将欲行使一无上之权，虽世界魔王所不敢冒者，彼亦卒欲得之。要之，暴君虐政者，乃袁之目的。将来之袁家帝业，总不外贪劣苛残，其腐败所至，当百倍于满清末叶。考诸古史，推之将来，中国专制帝王未有能支持到底者。以今日如是之腐败，爱国志士宁能自安缄默耶？清季帝政，吾人亦既同心协力以推倒之，袁之当讨，更何待论？

吾因是代表吾国四万万同胞，敬求伟大共和国之代表，予吾人以道义上之协助。回忆美国独立之际，法人曾助美以争回自由，建设民主，美民至今犹食其赐。吾知恋爱民主主义之诸公，迫于公义所在，今日亦当能力援东方之共和国民，扫去前此之贪污恶浊，养成来日之进步自由。俾数载而后，世界得睹一少年再造之中华民国，脱离战争革命，而开放异彩也。

（据《护国军纪事》第二期）

（黄兴）

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海分送《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时报》、《申报》、《新闻报》，北京分送《亚细亚报》、《国民公报》暨国内各报馆鉴：兴等无状，与父老兄弟别，亦既两年。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惟是非未明，内外资为口实，戕我国脉，淆我舆情。此为国家存亡所关，非直流俗毁誉之细，敢复不辞覼缕，略有所陈。兴等去国以还，权威所存，戮辱已至。而游探盈国，好事者塞途，又复争相诋诃，务尽媒孽。萑苻有警，辄入兴名；炯、蔚、建、钧，均见钩致。迩者国交顿挫，举国惊迷，兴等乞援思逞之谣，观腾播中外。夫本无其事，被谤议不能自明者，古来何止百数。兴等无似，亦诚愿安缄默，俟之百年。无如兴等见毁，乃由奸人假之，涂饰庸俗耳目，以售其欺；甚或他人用之，恫喝软弱政府，以收其利。纵国人不察，愿绝兴等，兴等果安忍自绝于国人，不一暴其素志，使知所自处哉？

在昔清政不纲，邦如累卵，国人奋起，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政不加良，奚取改革？南北统一以后，政柄已集于一隅。吾党遵守宪政常规，诚有所抨弹牵掣。时则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国中贤达，每来诮让之声，兴等自维前失，敢不引罪？

癸丑七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苟有他图，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戮，又何足悔？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恇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斯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士一兵，安敢妄言激进？毁兴等者，即不计吾徒居心之仁暴，亦当论其设策之智愚。

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凡此所谈，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烦兴等言说短长，实为遗憾！战败以来，兴等或居美洲，或留欧土，或散处南洋各地；即在日本，亦分居东西京、神户、长崎有差。外患之生，尚未匝月，东西万里，居各未移，商发本电，已极艰困，则聚且未能，谋将安出？乃闻国中谈士，戟指怒骂，昔年同志，贻书相讥，谤语转移，哓哓嗷嗷，恍若道路所传，已成事实。呜呼！兴等纵不足惜，顾如利用者掀髯于旁，公等冥冥中偾其国事何哉！

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

致。辛亥已事，即为明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日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今者政治清浊，事业兴废，士气盛衰之度，较之满洲何如？此俱国人所闻见。当兴等随国人后与闻政事，当局者每借口大权未一，强饰其非，此中是非，无取辩说。但今日之失政，何与于昨日之争权？兴等蔽罪以去，则新治宜呈矣，胡乃抵排异己，甲乙无择，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一语反诘，真相立明。年来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易女为男、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又辄借词内乱未已，政力不专，其为欺谩，尤不待问。

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之力，厚于分子；此种政治通义，背之不祥。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宜乎他国以全国之力，仅为束缚驰骤一人之计，而若行所无事也。夫只知媚外，亦有穷时；专务欺民，何异自杀？吾国经此惩创，实乃迷梦猛醒发奋独立之秋，曰存曰亡，惟视民气。

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虽怀子卿"不蒙明察"之冤，犹守亭林"匹夫有责"之志。引领东望，神魂俱驰。

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有。

（摘自《黄兴集》中华书局）

陈其美致黄兴书

（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

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征驱西发，美正养疴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爰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

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权利，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经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藉，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涤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于朝野冰炭，政党水火，即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诸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

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画，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中山先生自谓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

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画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 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无何，刺宋之案，牵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销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坚持以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镑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鄂、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机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实以识不过人，智暗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 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

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于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斯，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 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间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于运掌。美虽愚暗，愿竭绵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

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熏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急进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于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专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诸同志均乞致候

弟陈其美谨启。四年二月初四日

（据何仲萧辑：《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

筹安会成立宣言

1915年8月23日

我国辛亥革命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猝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袁世凯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凡在1914年12月31日以前，“犯附和乱党之罪”者，一律赦免。

1月6日　袁世凯颁布《权度法》与《权度营业特许法》。

1月7日　袁世凯令各省切实查禁“党人”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1月9日　舆地学家杨守敬病卒。杨著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等书。

1月10日　袁世凯批准奉天开办全省官地清丈局。新民县奉令开办清丈局，13日乡民二三百人执械围攻该局，相持两昼夜，遭巡警镇压。

1月16日　上海太古、招商等十七家轮船公司堆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六百余名工人举行同盟罢工。

袁世凯特任蔡锷督办经界局事务。

1月22日　东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刊载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动大批警察，予以没收销毁，但消息终于外泄。

北京《亚细亚日报》与英文《北京日报》首先刊载“日本又向外交部提出新要求”(指“二十一条”)的消息。31日《亚细亚日报》译刊《朝日新闻》号外全文。为此，27日及31日日使日置益及使馆书记官小幡分别警告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及外交部，曹允商请内务部取缔。2月2日政事堂在各报刊登通告，严禁外交人员及各部院录事人等向报纸泄露消息，违者依法惩治。

全国经界局筹备处在北京成立。

1月23日　四川成都《国民公报》登载袁世凯亲信陈宧即将入川任职新闻，当日即以“无端造谣，煽惑军心”罪名予以封闭，报社主笔潜逃。

1月27日　袁世凯特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31日外交总长孙宝琦卸职，陆征祥就任。

2月1日　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严防袁世凯离间，并说明革命意义。

山东峄县中兴煤矿矿井起火发生爆炸，工人被炸死四百余人。

2月11日　留日学生千余人冒雨在东京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大会决议五条：“(一)电请政府拒绝要求，并公布条件；(二)以文字警告劝导海内外国民；(三)拟定留日学生对外宣言；(四)设立分机关于京沪；(五)准备归国之办法。”14日选举驻京、沪代表。15日成立评议部。20日各代表由长崎归国，分赴京、沪等地。

2月12日　袁世凯聘梁启超为政治顾问。

2月21日　加拿大温哥华华侨救亡会成立，以“合群御外，挽救危亡为宗旨”。25日公举陈道之、叶春田为正、副会长。28日开第二次大会，华侨二千余人参加，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2月24日　袁世凯颁布《修正觐见条例》其中规定特任、简任、荐任，“须于任命后觐见大总统”。

2月25日　黄兴在美国为“二十一条”交涉与旅居南洋的李烈钧、柏文蔚等往返函商，是日联名通电上海各报，谓“自后非有社会真正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主张“暂停革命”，一致对外。

2月26日　日军在山东益都金岭镇修筑轻便铁道工竣，该地居民集会反对，派代表赴省呈诉。

3月2日　2月下旬上海各界成立国民对日同志会。是日该会发布会员规约，宣布“本会以结合群力，拥护国权为宗旨，凡本会会员必具爱国之决心，若遇国家外交受无理之挟迫时，誓以死救国”。

3月4日　革命党人、前四川民政长张培爵从事反袁活动，1月上旬在天津被捕，旋即解北京军政执法处。是日被杀害。

3月9日　孙中山致函南洋同志，谓“弟睹祖国之濒危，与海内外同胞所受之苦痛，以为非急倒彼恶政府，无以挽救，而往事之失，则当引为鉴戒，是以一面日图进取，一面重整党务，以企完全负责统一进行”。

3月18日　上海绅商学界，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在张园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三、四万人，大会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留日学生代表肖汝霖演说，揭露日本政府侵略中国之野心。会间工部局巡捕干涉集会，群情激愤，不肯解散。最后大会决议六项：一、致电北京政府及各省；二、设办事处；三、派人往各省发起分会；四、提倡国货；五、办白话报；六、设公民捐输处。次日，国民对日同志会等团体致电袁世凯，谓“民等宁为战败忠魂，不作亡国奴隶，务乞速作战备，捍卫国家，人民誓死以赴国难”。

3月19日　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谓“日来据各方面报告，日本派多数军队向东三省、山东、津沽等处出发……希以政府训条向外部面询此次派兵用意之所在，以便安慰人心”。

袁世凯以“要结乱兵，擅离职守”，将前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处死。

3月22日　旧金山华商总会飞电各处，宣称抵制日货。是日致电广州商会、报界公会转华安公所，告以“敝处停办日货，乞鼓吹继续进行，力争国体”。

3月25日　袁世凯通令各省严禁人民抵制日货。6月29日又重申此令。日本向袁世凯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弥漫全国。在反“二十一条”运动高潮中，日本对华输出商品锐减。1914年5月日本对华输出商品为一千五百二十三万八千元，1915年5月减至九百三十九万五千元。

3月28日　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至北京关岳庙代行合祀关岳礼。

4月1日　袁世凯颁布《四年内国公债条例》，定额为二千四百万元，用于“整理旧债补助国库”。

4月4日　淞花江解冻，江水暴涨成灾。

4月5日　袁世凯申令，对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革命活动，著各省将军巡按使“严加防缉”。

4月14日　袁世凯颁布《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施行规则》，共三十二条。

4月18日　山东济宁官吏强制推行印花税，全城商号二千余家，全体罢市。

袁世凯颁布《电信条例》共二十一条，其中规定“电报电话不论有线无线均称电信；电信由国家经营”。

5月5日　陆宗舆致电外交部，谓“昨今连日阁议，

闻元老已赞成最后通牒，现正准备诸事。大限口气坚强，无从再商。……庶通牒交到时，舆可先面告以和平解决，冀免有军事行动，多生枝节”。

5月6日　午间陆宗舆致电外交部，先以“同午开御前会议，决定最后通牒”。午后5时又电，谓“顷闻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6时答复，内容未详。惟望接牒后，先将诺否方针密示”。

外交部电示陆宗舆，谓“本日政府会议，决定再让步方针，训电即发，希与加藤预约面晤。”

5月8日　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及各部总长开紧急会议。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决定忍辱承认。

午后5时袁世凯派外交部部员持复文送交日使日置益征求意见，日置提出有关第五号添入“日后协商”字样，即可接受。

北京商务总会致电各省商会，谓“日本利用欧洲战事，乘我新造国家，提出吞并朝鲜同一之条件，逼我承认，五月七日竟以武力为最后之要求，四十八钟内，倘不承认，立即进兵。……自本年5月7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永存此志，勿忘国耻”。

5月9日　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是日凌晨一时，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复文谓：“中国政府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对日本国政府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号中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中关于福建问题以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并照日本政府所交最后通牒附加七件之解释，即行应诺。以冀中日所有悬案，就此解决，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即请日本公使定期惠临外交部，修正文字，从速签字。”

5月10日　孙中山致函邓泽如等，谓袁将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于消灭，内地不平之声甚烈，即袁所部如冯、段辈亦表反对。……党中重要人物，已冒险深入内地，急思发动，成败在此一举，不能复待”。

5月12日　袁世凯根据日本侵略要求，授意梁士诒在参政院提议通过沿海岛屿不割让租借与外国议案。次日袁据此，以沿海险要关系国家安危为由，发表申令。谓嗣后“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概不允认租借与让与”。

6月9日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告取消独立。

6月12日　袁世凯策令“所有外蒙现充各扎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职及喇嘛各名号，无论沿袭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著一仍其旧”。

6月14日　袁世凯批准广西省会仍建桂林，为巡按使驻扎地；将军仍驻南宁，以重防务。因有碍难情形，10月28日内务部呈准该省会缓迁。

6月16日　袁世凯特任陈箓为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

6月22日　袁世凯为加强反动统治，镇压革命党人，颁布《惩办国贼条例》。

7月1日　袁世凯申令参政院推举宪法委员，组织委员会，制定宪法。3日该院推梁启超、李家驹等十人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7月3日　袁世凯调张鸣岐为广东巡按使；调李国筠为广西巡按使，未到任前由陆荣廷暂行兼署。10日陆荣廷辞兼职，由田承斌护理。

7月8日　日本以袁世凯公布《惩办国贼条例》中有“私与外国订立契约”一条，认为与“合办事业”有碍，特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立即解释，并将说明书分送各国使馆。

7月11日　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

7月13日　袁世凯准广西省巡按使李国筠免职；特任王祖同为该省巡按使。

广州十三行发生火灾，焚去铺户二千余间，连烧两日。

7月14日　日本在九江、济南开设领事馆。

7月17日　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刺伤广东将军龙济光被捕，次日被杀害。

7月24日　国民党美洲支部在旧金山开恳亲大会，8月3日闭会，各埠代表数百人参加，推举黄兴为名誉会长。冯自由、林森等与黄兴、钮永建商谈“团结一致讨袁方策”。

7月27日　是夜至28日江苏、浙江两省飓风为灾。是月江西、广西、云南、湖南、奉天等省皆发生水灾。8月初河南、山东亦发生水灾。

7月31日　袁世凯任韩国钧为湖南巡按使；李兆珍为安徽巡按使，未到任前由徐鼎康护理。

8月14日　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在北京发起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声称“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为商榷，中国幸甚”。在此前后，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一文，鼓吹帝制。

8月15日　蔡锷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梁谓“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

8月19日　筹安会发布启事，谓“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繁，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为理事”。

8月20日　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8月23日　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并致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省商会，谓"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8月24日　侵占青岛日军开始撤退。

8月25日　北京军界在云南会馆开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蔡锷为打销袁世凯怀疑，率先签名。

8月26日　署理湖北军务王占元、绥远都统潘矩楹等先后电复筹安会，谓"提倡君主立宪，极表同情"。

8月28日　袁世凯颁布《国民会议议员初选举施行令》、《立法院议员选举法》第六章初选施行细则。

8月29日　筹安会发表第二次宣言。谓"日昨投票议决，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其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

9月1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集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会者千余人。

9月3日　孙中山致函荷属泗水中华革命党人，揭露袁世凯帝制阴谋，谓"北京近有筹安会之设，盛倡帝制之说，有反对(者)竟被逮捕。袁氏积恶至此，将来反动，比之满清末年尤大"。

9月5日　袁世凯为加紧推行帝制公布：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日期暨筹备期限令，规定"国民会议议员复选举于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举行"；国民会议议员单选举互选日期暨筹备期限令，规定"国民会议议员单选举于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二十日举行，国民会议议员互选举于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三十日举行"。

9月6日　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袁发表关于变更国体宣言：谓"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

9月23日　是晚(阴历8月15日)大隈邀陆宗舆在官邸赏月，乃向陆耳语"吾闻袁总统欲改帝制，如有意相商，吾当有所贡献，且乐观其成，君试密告之"。次日，陆即将大隈的话电告袁世凯。

9月26日　筹安会副理事长孙毓筠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等提出包办选举国民会议办法。谓"现拟另筹征求民意办法，由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就在省各县绅民中，每县择定一人，召集临时国民会议"。

10月1日　黎元洪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

国货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10月3日　袁世凯特任郑汝成为彰威将军仍兼上海镇守使；杨善德为克威将军仍兼松江镇守使；曹锟为虎威将军；王占元为壮威将军。

青海办事长官一缺裁撤，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同日袁世凯任命马麒为该镇守使。

10月8日　袁世凯颁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共十六条。10日发布申令称："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

10月16日　筹安会改为宪政协会。

袁世凯任命杨以德为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

10月18日　袁世凯特任龙觐光暂兼代理广东巡按使；派周学辉督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事宜。

10月27日　国务卿徐世昌称病请假，袁世凯特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暂兼代理国务卿。

外交部致电陆宗舆，嘱向日本外务部密告："近接各省官吏电信，……大约主张君主立宪者必居多数，届时政府亦无权违拂民意……此次改变，出于全国人民一致之意愿，政府顺从民意，秩序必不至扰乱。……我两国友睦素笃，特于未经决定宣布之前，以实情密告，以免误会。"与此同时并秘密告知俄、英、法等国。

10月28日　自是日开始，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各地"国体"投票即告完成。

11月7日　袁世凯公布《著作权法》和《违警罚法》。

袁世凯特派董康为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

11月16日　袁世凯令封爵暂照前清办理。

袁世凯任命胜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

12月14日　黄兴致电美驻京公使，请勿赞成袁世凯称帝，谓"吾国民断不能坐视袁氏任意复行帝制"。

袁世凯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即行推荐宪法起草人员。

12月15日　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受。

12月16日　袁世凯申令："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袁世凯特任前清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参政院院长。

梁启超自天津乘轮船赴上海，18日到达。

12月17日　李烈钧奉孙中山命，偕熊克武、龚振鹏秘密抵达昆明。

12月8日　袁世凯申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袁世凯申令："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袁世凯将原总统府，改称新华宫。

袁世凯特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未到任前，以唐在礼代理。

12月19日　蔡锷偕戴戡秘密由日本经越南抵达昆明。

12月20日　外交次长曹汝霖访晤日驻京公使日置益，提出袁世凯希望明年2月4日(旧历正月元旦)称帝。

袁世凯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12月31日　袁世凯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外　交

1月4日　日驻京公使日置益访外交次长曹汝霖转达日本政府拒绝立即取消山东交战区域。曹以北京政府迫于山东各界及地方团体之强烈反对，要求日本谅解。7日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公使，正式声明取消山东交战区，并告以“贵国现在该区域内之军队，如有留在，一律撤退，以符尊重中国中立之意”。9日日使日置益复照外交部，拒绝取消战区，并答以“不能因此通告受何等之影响，亦不能因此而受拘束，特为声明”。16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使，重申7日声明。

1月8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电示驻京公使日置益定期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交涉。是日再次致电日置，催询已否约定会晤袁世凯日期，并电示“仍照原案及早尽速进行”。11日加藤再次电示日置，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尽量避免逐条讨论，应坚持按号(“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编者)交涉，一揽子解决。

中俄暨外蒙古地方当局代表三方恰克图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北京政府驻库伦大员及其佐理专员所带卫队数目及俄国领事卫队数目等条款。

1月18日　日驻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号四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要求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筑路和开矿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99年；第三号二条，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别国；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并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22日驻英日使井上胜之助会晤英外交大臣葛雷，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一至四号秘密通知英国。25日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将上述内容通知驻日英使格林。

1月20日　日置益亲往北京政府外交部补递“二十一条”，作为正式交涉根据。

1月24日　英、法、俄驻京公使，为“二十一条”事先后访问日使馆。英使朱尔典对条款内容一再询问。日置益急电东京请示：万一英使复来追询第五号，将如何回答。次日外务大臣加藤电示：“一、严重提示中国政府泄露秘密后果；二、东京已于25日约见英使，只以第一至四号通告；三、万一朱使追问，可以个别悬案中二三事，系出于对华劝告性质，酌量回答”。

1月25日　新任驻京德使辛慈于17日抵京，是日向袁世凯呈递国书。

1月26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电示日置益，告以“今回交涉迅速解决，极为重要，中国政府希每周会谈一次，殊嫌缓慢。交涉一久，内容自然外泄，势将妨碍交涉进展，希贵官先要求中国政府对全部条款作主义上诺否的表示”。

2月2日　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与日使日置益、书记官小幡酉吉、高尾亨在外交部举行关于“二十一条”第一次交涉。会上陆主逐条按顺序详细审议，日使坚持逐号一揽子讨论。会间，陆对第一号第一条提出修正，即日本将胶州湾交还中国，中国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其他特权让与日本，当即为日使拒绝。

2月3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约驻日公使陆宗舆密谈。陆致电外交部转达加藤旨意：“袁大总统如有意联交，即或遇革命纷乱之事，日政府自应中政府希望，尽力援助，并非干涉。”

日使派使馆书记官高尾亨往访外交次长曹汝霖，指责北京政府对“二十一条”交涉故意迁延，催促从速进行。

2月5日　关于“二十一条”举行第二次交涉。陆征祥发表对全案的意见：对第一第二号部份条款提出修正，而对其余各号条款表示难以接受，并声明：“同意先就全部条款，分别说明意见，但中国政府于讨论细节时，逐条尚有意见提出。”日使要求北京政府提出修正案，陆允9日将修正案送日使馆。

4日日外务大臣加藤电令驻俄大使本野、驻美大使珍田，将“二十一条”一至四号秘密通告各驻在国政府。是日加藤又秘密将上述内容通告俄国、法国驻日大使。8日通告美国驻日大使。

2月6日　日使日置益致电日外务大臣加藤，报告两次“二十一条”交涉情况，提出为迫使袁世凯妥协，迅速全部地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授权对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7日加藤电复同意。8日日使根据日本政府指示访陆面告：“照上次会议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大纲，日本政府断不允接受”。并提出“警告。”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第一次修正案，日使以未能全部接受日本要求，表示大为不满，并以不开议为要挟。袁世凯北京政府对日妥协，“允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展期99年，三、四两号亦允酌议”。经多次接洽，12日日使始将一二三号修正案收下，

转达日本政府。

2月8日　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致函驻华公使芮恩施，谓"余感觉对于现在之交涉，予中国以任何直接劝告，或任何直接干涉，均属害多益少，且将引起日方之猜忌及敌意，中国将首蒙不利。……现在余正慎重注意情形，准备步骤于适当时机行之"。

2月10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向日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关于日本对华要求条款漏告第五号，深表遗憾。11日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将"二十一条"全文电伦敦本社。

2月1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第一次修正案后，日使仍迫议第五号，未果。是日该部致电陆宗舆，谓"昨日日公使奉训条来称，中国政府不能商议第五号理由，日政府殊难了解，力请对于第五号中国政府允以可与商议云云。答以第五号碍难商议"。

2月18日　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与智利驻英公使艾德华在伦敦签订《通好条约》，谓"两国国家向来和好，须永敦和好，历久不渝，两国人民亦互相友睦。"

2月20日　美驻日大使询问日本政府对华要求中是否有第五号。从是日至27日日本政府将第五号分别秘密通知英、美、法、俄等国。22日英驻日大使格林根据英政府指示访加藤高明，表示日本在对华交涉中希望尊重英国在华既得权利及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

2月22日　关于"二十一条"举行第三次交涉，北京政府按照日本侵略要求，接受山东问题第二条不得将山东任何部份岛屿及沿海一带割让与外国。25日第四次交涉。日本坚持第二号"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东部内蒙古除外，会议无结果。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赴日活动，是日金抵东京。

2月28日　关于"二十一条"举行第五次交涉，北京政府又允许如中国需用外款建造烟台或龙口接连济南铁路之时，倘德国愿抛弃借款权，则尽先由日本借款。3月3日第六次交涉，又进一步同意，将山东省内紧要城镇辟为商埠，其章程由日本政府承认。

3月4日　北京政府代表海关监督与俄国政府代表格雷夫在北京签订《关于中俄陆通商章程第十四条所载免税物表之协定》。按照该协定，中俄于7月27日在哈尔滨又签订退还关税章程七条。

3月5日　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致电日驻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迟迟未能全部接受"二十一条"大为焦急，谓为迫使北京政府全部接受，将以换防名义向东三省、山东及京津地区增兵，进行武力威吓。并训令日置益促北京政府谈判代表陆征祥迅速"和平圆满地解决此次交涉"，否则，"日本政府不得已将采取必要手段"。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致函驻日公使陆宗舆，告以袁世凯派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就中日"二十一条"交涉问题赴日活动，"游说元老"。此行"关系匪浅，……兄宜与有贺推诚相与，虚心协商"。

3月8日　日使访曹汝霖，面告"若数日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9日外交部致电陆宗舆，令探听日方消息，谓"南满换防，本应四月底举行，此次提前换防，是否含有他种野心，抑仅作虚声，详探电复"。

3月10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照会日本政府，提出日中"二十一条"交涉，第五号有关南昌——杭州、武昌——九江、南昌——潮州等铁路权，中国与英国已订有成约，要求日本注意。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要在东三省、山东、京津地区增加军队，对中国进行恫吓。11日日本颁布"南满驻屯军"换防令。从3月中旬至下旬，日本向山东、东三省等地增兵。

3月13日　关于"二十一条"举行第十次交涉，袁世凯继续对日妥协，按照日本侵略要求同意旅大租借地及南满安奉铁路展期九十九年，并将南满铁路原合同三十六年后给价收回一节无形中取消。16日又允许在东三省南部与内蒙古东部建造铁路，日本有借款优先权。

3月20日　中日"二十一条"举行第十二次交涉。17日日使日置益坠马伤足，日方由使馆书记官小幡酉吉为临时全权代表，继续迫议在东部内蒙古享有特权利益问题。

3月23日　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至日使馆就日置益病榻，举行"二十一条"第十三次交涉。此次交涉允许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东三省南部税课抵借外债或聘用顾问时，日本有优先权；在东三省南部指定区域内日本有开矿权。

4月6日　袁世凯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回国游说"元老"，今日致电政事堂参议曾彝进告述活动情况。9日曾复电，谓"中国政府切望速行解决，只须日政府训令日置使，稍为让步，速予同意，便可了结"。

4月10日　中日"二十一条"举行第二十一次交涉。关于第五号中福建一款，允诺日后照日方意愿，另行声明。17日第二十四次交涉，日使仍迫议"东蒙"问题，未果。日使声明"各事讨论，须俟政府训令，会议就此中止"。

4月12日　美国在长沙设领事馆。派代理上海会审公厅陪审官约翰生为领事。

4月13日　北京政府与法国签订《边界禁匪章程》五款。其中规定"法国官员如查知有中国叛党在越南成股，即当实力解散"。"中国地方官如查知有越南逆匪、乱党在中国与越南接界各省成群结股，即当实力解散"。

4月26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17日中止后，是日日使日置益复请谈判，并提出最后修正案二十四款

（此修正案删去第二号前文之“优越地位”等字样），促北京政府速表同意。日置声明“如中国政府将二十四款完全承认，则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一带之地，以适当机会，交还中国政府”。

4月28日　陆宗舆致电外交部，告以“急派周秘书赴英馆密报扬子铁路新案情形（指4月26日日本所提出“二十一条”最后修正中有关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等铁路权条款），并探问意见。英大使甚感，特面告云：三日前英政府有一公文，详载扬子路线中英已有成约，请日政府注意”。30日陆又电外交部，谓“南省铁路，已将中日并无约言一层，密告英馆，使有准备”。

5月1日　北京政府将最后修正案送交日使，是日日本外务省召集会议，根据4月26日日本最后修正案，决定发出最后通牒。

5月4日　英外务大臣葛雷致电驻日英使，请转告加藤：“英国对于中日两国国交决裂之推移，至为关切。”次日，英国通告日政府“如诉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

5月6日　美国向英、法、俄提议，共同干涉日华交涉，遭三国拒绝。8日，日本驻美大使珍田请美国政府不要共同干涉日中交涉。

美国国务卿白里安致函大隈及袁世凯，希望日中交涉和平解决。

5月7日　午后3时，日使日置益将最后通牒送交外交部，限四十八小时内“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英外交大臣葛雷电示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向北京政府非正式的提出“强硬劝告”，立即接受日本有关“二十一条”最后修正案。

5月8日　驻京英使朱尔典访晤外交总长陆征祥，谓“中日交涉，竟至决裂……各国即同情，亦无能为力。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之一法，接受日本要求，以避危机”。

5月11日　英驻日大使格林根据英政府指示，访晤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谓：英国政府对日中二十一条交涉圆满解决，表示满意。13日日驻英大使井上代表日本政府对英国在日中交涉中给予日本的支持深表“谢意”。

10月15日　陆宗舆致电外交部，报告日本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接任，对华态度强硬。彼谓：“中国因改帝制，形势不稳，关系东亚和平，不得谓仅关系内政，日本不能不问，或须先正式询问中国，一询究否改制；二是否可保平和；三与日本如何提携。”

日本政府决定劝阻袁世凯复辟帝制。是日训令日驻英大使就此与英政府磋商，采取联合劝告行动。

11月3日　是日法国驻京公使康梯，奉本国政府训令，致外交部声明，与日、英、俄三国协同一致，劝告袁世凯展缓变更国体。5日意国驻京公使华蕾亦至外交部作同样声明。

11月6日　外交总长陆征祥与驻京俄使库朋斯齐在北京签订《呼伦条约》八款。

11月18日　日本内阁讨论对华政策，决定联合英、法、俄、意四国，就袁世凯帝制活动，提出第二次劝告，并通知日本驻四国大使，分别向驻在国政府进行磋商。

12月1日　中国与巴西签订修改条约。其中规定“两国人民皆可侨居，须由本人自愿，均照最优国相待”。两国“互派大使”。“两国通商照各国章程办理”。

吉长铁路依“二十一条”要求签订新约，移交日本管理。

军　事

1月13日　袁世凯所成立之模范团至北京关岳庙宣誓，袁特派荫昌监誓。团副陈光远宣读誓词，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2月17日　山西垣曲驻军一个支队哗变，击毙排长、什长，晋南镇守使董崇仁派兵弹压。

2月20日　袁世凯任陈宧会办四川军务，唐在礼暂行兼代参谋次长。

3月4日　袁世凯任吴佩孚为陆军第三师步兵第六旅旅长。

3月14日　日本增派侵略军三万人来华进行威胁。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质询增兵原因。

3月25日　袁世凯颁布《陆军审判条例》。

3月　德国使馆参赞巴本希姆偕德人七名、汉人四名、蒙人一名，携带骆驼二十只暨飞艇炸药等物，至内蒙谋招巴布扎布匪帮炸毁西北利亚铁道，以断日俄交通。巴匪佯许以二千人相助，同时又阴令部下将此情况驰报海拉尔俄国领事，俄领事即派员，令巴匪速将德人等全数击毙，焚尸灭迹。巴匪遵照俄领事指示即将德人等全部歼灭。德人所带银钱十余万及驼马、护照、军械等，由俄领事派员查验后，悉数交与巴匪，分赏余党。

4月5日　袁世凯准长江巡阅使张勋将武卫前军改编为“定武军”。

6月26日　袁世凯免陆军次长徐树铮本职，以田中玉继任。

8月22日　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督理湖北军务，未到

任前以王占元署理;段芝贵督理奉天军务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

8月29日　陆军总长段祺瑞免职(段自本年5月即称病请假),以王士珍继任。

9月11日　云南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等在警卫混成团本部召开团长以上秘密会议,全体一致反对帝制,并议决三事:"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开第二次秘密会议,商讨起义日期。11月3日开第三次秘密会议,决定起义作战方略。

10月10日　朱执信抵香港与邓铿策划举兵反袁。10月下旬及11月上旬革命军相继起事于惠州、博罗、佛山。

10月13日　袁世凯加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督理军务衔;准恰克图佐理员张寿增免职,以张庆桐继任。

11月22日　凌晨,察哈尔多伦镇守使肖良臣率兵攻游格吉庙巴布扎布匪巢,巴匪据庙抵抗,后逃往海拉尔为俄人所收容。是役巴匪被击毙千余名,生擒五百余名,并将勾结巴匪之游格吉庙活佛拘留。

12月5日　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旋即失败。

12月22日　云南唐继尧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反袁问题,会上蔡锷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

12月25日　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举唐继尧为都督。拟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讨袁,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

12月27日　云南护国军发表讨袁布告。谓:"共和成立,于兹四年,各国承认,内外相安。元首违法,背叛誓言,自为帝制,擅行变迁。凡尔士民,勿庸惊疑,各安生业,勿受谣欺"。

经　济

1月1日　交通部令全国各铁路自是日起实行统一铁路统计年报,是为我国铁路有统一会计统计年度之始。

吴淞、广州两处无线电站工竣,是日开始收发电报与海上船舶通信业务,并公布《无线电发报章程》。

1月10日　俄国诱使外蒙古地方当局订立银行条约,规定在库伦成立俄蒙银行第一分行,资本五百万卢布,总行设俄京,该行有权在俄国铸造蒙古货币,并以限制北京政府在外蒙古设立银行为交换条件。

1月12日　财政部公布《稽查造币总分厂简章》十一条。

1月13日　奉天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所于1913年兴工,1914年12月工竣,是日开始生产,日产生铁百三十吨。1917年12月第二座熔铁炉投产。

2月3日　南浔铁路(九江至南昌)全线通车。

2月17日　袁世凯准将"自制工品"择要酌量减免关税。

2月20日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北京政府农商部派员参加。3月9日中国馆开幕。

2月　教育部蔡儒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借款公砝银三十万两合同。

3月16日　劝用国货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议事厅开成立大会,公举虞洽卿、黄少岩为正、副会长。

3月24日　袁世凯任赵椿年会办中国银行事宜。

3月26日　盐业银行开业,资本五百万元,官股二百万元,商股三百万元,总行设北京,张镇芳、袁乃宽为正、副经理。

3月29日　张绥铁路张家口至大同段工竣通车。9月1日大同至丰镇亦通车。

4月7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陆军部、上海制造局与上海顺发洋行签订借款规平银四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七两合同。

4月8日　虞洽卿等在上海发起中华救国储金团。20日该团致电政事堂,报告成立宗旨:"冀达人人爱国,人人输金之目的"。

4月9日　中华游美实业团团长张振勋、副团长聂其杰,应美商之请,由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参观巴拿马赛会并考察商务。

4月11日　北京总商会发起救国储金,在中央公园举行大会,据报载到会者二、三十万人,储金一百万元,并宣传抵制日货。5月23日开第二次大会,到会者十余万人,储金八十余万元,并宣传爱国自强,提倡国货。

4月12日　袁世凯任李士伟为中国银行总裁,免去参政本职。

4月20日　袁世凯批准财政部将现行会计年度以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终止,改为自4年起以每年1月1日开始至12月31日终止。

4月28日　袁世凯任钮传善为全国烟酒公卖局总办。

4月29日　袁世凯派蔡乃煌充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

4月30日　湖北沔阳新堤镇商民,反对在该镇设立征收分局,全体罢市。

5月1日　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蔡乃煌与英商沪港烟土联社各商行、公司签订《苏赣粤三省禁买土烟合同》。其中规定,联社自愿捐款赞助北京政府在该三省严查违法售卖土烟,使现存沪、港六千箱印度鸦片能尽早售

卖。本合同1917年4月1日起生效。

广州商民因财政厅抽收品茗捐，全体罢市，连续五日，各茶馆派代表与财政厅长交涉豁免，该厅被迫暂行缓办，商民复业。

南京屠户反对屠宰税，一律罢市。

江苏扬州商民反对征收落地税，全体罢市，该县知事被迫允从缓办，商民次日开市。

5月7日　华商中原公司与英商福公司，在北京签订《合办福中公司合同》，双方议定两公司各出五十万元，专销两公司生产之煤炭。6月1日福中总公司在河南修武、焦作开成立会。

6月3日　陈光甫、庄得之等发起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日成立。资本十万元。1916年增资为三十万，1921年增资为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兼办旅行部，1926年改为中国旅行社，1946年增资为一千万元，分支行处有四十处。

6月17日　上海德大纱厂正式开工。纱锭一万枚，工人五百名。后于1925年售与申新纺织公司改为申新五厂。

7月1日　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改组，易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资本一百万元，官六商四，总行设杭州，分行设上海。后1923年3月官商划分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改组为浙江实业银行。

7月23日　李国筠与台湾银行签订借款四十万港币合同，以小押饷、硝磺税及屠宰捐中每年划出二十八万五千元为担保。

8月1日　上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钱业公会是日起，将以前所开龙银行市，一律取消，只开新币(袁世凯头像银元)行市。凡江南、湖北、广东及大清银币四种银元，均按新币行市通用，其他各种龙洋，得向中交两行兑换新币，从此全国银元市价统一。

8月6日　中国总税务司安格联与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订《恢复青岛海关协定》四条。其中规定，在本协定有"德国"文字者，易以"日本"文字。关于青岛海关恢复与其规定手续，于中、日两国政府间俱行有效；原属税务司所管之海关簿籍、公款及所属财产，于日军占领时押收者，仍交还与总税务司。

8月15日　袁世凯准财政部呈请设立民国实业银行，并拟具章程及招股办法。

12月25日　袁世凯命该行改名为中国实业银行。

9月12日　黑龙江金矿试验场在汤原县成立。后于1918年改称梧桐河金矿局。

9月30日　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资本五百万元，经营各种实业及信托业务并承募债票。

10月9日　袁世凯公布《农工银行条例》。17日设立农工银行筹备处。11月7日农工银行在通县、昌平开始营业。

10月20日　10月17日，袁世凯准货币交换所归并中国银行办理。是日公布《取缔纸币条例》九条。

10月31日　袁世凯令中国、交通两银行负责划一币制与整理公债。

11月　中和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总事务所设北京，办事处设河北磁县峰峰村，资本总额六十万元，生产烟煤焦炭。

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公司成立，总事务所设天津，资本总额原定二十万元，后增至二百八十万元。

12月4日　交通总长梁敦彦与英商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签订短期借款合同，借款上海规银二百一十万两，以京奉铁路余利为担保。

12月17日　财政总长周学熙、交通总长梁敦彦，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四郑铁路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合同，以四郑铁路一切财产、不动产及各项进款作为头次抵押。

12月31日　广东巡按使龙觐光与台湾银行签订广东水灾借款日金六十万元合同，以卷烟、牛皮税及屠宰税为担保。

12月31日　钱润清创办蒙古制碱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二十万元，本店设张家口，支店设北京。

吉林延吉天宝山银铜矿开办，资本五十五万元，该矿名为中日合办，实际全为日商资本。

12月　袁世凯传于江苏创办贾汪煤矿公司，总公司设天津，分公司设上海。1917年至1921年日产六、七百吨。1927年停工。

直隶模范纱厂在天津创建，资本二十五万。1918年与恒源帆布厂合并，改为恒源纺织有限公司。

文　教

1月1日　袁世凯申令"注重国民教育……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6日教育部据此令，拟定"提倡忠孝节义施行办法"。袁批示："拟定教科书关系尤重，应由该部从速编订，呈候核定颁行；惟初等小学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俾资诵习，用端趋向。"

1月18日　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梁为该刊撰写发刊词。

蓝公武针对袁世凯一系列尊孔复古活动，在《大中华》杂志著《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予以驳斥，指出"比者国内复古大盛，皇皇策令，无非维系礼教……政府既提倡于上，社会复应于下，孔教会遂遍布于国中……且中国之礼教，所谓忠孝节义者，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背

反”,“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亦仅属过去之文化,而非今所可奉以为教化之法则……”,今日改革之道“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伟人为导师,此吾所以视今日复古之举,不得不以辞辟之也”

1月　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七项。

中国科学社主编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宗旨”。

2月4日　袁世凯制定《教育纲要》,是日,由国务卿徐世昌发交教育部,并令该部“分别妥订细目,缮具正式公文呈明次第办理”。《教育纲要》共分“总纲”、“教育要旨”、“教科书”、“建设”、“学位奖励”五项。“教育要旨”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法师,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教科书宜采辑学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渊源。”“教科书”项内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由教育部编入课程……。”“各学校应读之经如左:小学校初等小学《孟子》,高等小学《论语》;中学校《礼记》节读、《左氏春秋》节读。”另在“建设”项内提出对“私塾取奖进主义”,并于大学外单独设立“按经分科”的“经学院”及“提倡各省各处设立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之所”。

2月23日　东西洋留学生举行甄拔考试,是日初试。其后经复试及两次口试,于3月19日揭晓,录取一百五十一名。

2月　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11月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3月15日　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创办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正式开学。

3月26日　孔丘“忌日”,北京孔社举行纪念会。4月29日该社成立二周年,开大会六天,举办图书展览及讲经等活动。

4月23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于天津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代表五十一人,代表十八省区。

5月15日　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在上海举行第二届远东运动大会。

7月31日　袁世凯准免夏曾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职,改派为京师图书馆馆长。

7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编辑的《观象丛报》,在北京创刊。

8月5日　江苏医学会在省教育会开成立会,是日参加大会代表有北京、四川、留日学生界等。次日,公举汤尔和、蔡禹门为正、副会长。

8月31日　中华农学会成立。张謇为名誉会长。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农学之发展及农业之改进为宗旨。

9月10日　上海《亚细亚日报》创刊,为复辟帝制造舆论。次日晚7时该报馆门口发生爆炸事件,死伤数人。12月17日夜,该报编辑部再次被炸。

9月15日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至1916年二卷一号起改名《新青年》。

9月30日　美国教会在南京设立金陵女子大学,是月开学授课。

10月10日　谷钟秀、杨永泰等主编《中华新报》在上海创刊。

比利时天主教神甫雷鸣远在天津创办《益世报》。

10月25日　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公举任鸿隽、赵元任等五人为第一期董事,杨铨为编辑部部长。先是该社由留美学生于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发起,1915年1月在上海创办《科学杂志》。该社后于1917年呈准教育部立案。1918年办事机构由美国移归国内,在上海、南京设立中国科学社事务所执行社务。1926年2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议决补助该社常年费一万五千元,指明为生物研究之用。

11月　北京“读者统一期成会”,会员王璞等呈请教育部“即将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并由会员在京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12月经教育部呈请袁世凯批准立案。该所附设“注音报社”,出版注音《百家姓》、《千字文》,又发行定期刊物《注音字母报》。

12月　清华学校编印《清华学报》(季刊)在北京创刊。后曾一度停刊,1924年6月复刊,改为半年刊。1934年又改季刊。1941年复改半年刊。

12月　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大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妇女杂志》、《英文杂志》、《辞源》等书刊。

福建省基督教会在福州创办福州协和大学,1916年正式招生开学。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6年

导 言

在所谓的“洪宪元年”到来之时，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也达到了顶峰。袁世凯终于觉察出某些不对劲的气氛了。但他终究不舍得将权力让于他人，又制造了取消帝制，恢复总统制的骗局，这已经无法取得人民的谅解，也无法再欺骗视听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终成一朝流水，袁世凯在郁闷中死去。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再次请老朋友出山视事，试图挽回不利局面，以期继续坐稳中央，并准备和南方和谈。但是面对这种局面，以圆滑著称的徐世昌也一筹莫展。四月，袁又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却没料到段祺瑞一伸手就要权，袁世凯不免恼火又无可奈何，段祺瑞又开始向顶峰权力角逐。

正在袁世凯为段祺瑞的背主自立而大为伤脑筋之时，另一爱将冯国璋突然发电表示拥护总统留任。相比之下，袁世凯感觉还是冯国璋可用，而实际上，冯国璋并不那么忠实，他也不过是自己想当总统罢了，为了实现梦想，冯国璋百般运动召开了南京会议，未料倪嗣冲、张勋和他三人三条心，南京会议只落得个无结果而散。

护国战争开始后，一直没有统一指挥南方、代表南方的机构存在，在广西、广东宣布独立后，梁启超又提出了组织军务院计划，首先讨论了抚军长和军务院所在地问题。唐继尧、岑春煊都有意任抚军长。五月七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宣布成立军务院，在肇庆办公，是之为“肇办军务院”。

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的遮天大树终于轰然倒下，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各方神魔大显神通，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尤其是在大总统一职上展开了激烈争夺。结果，三位北洋核心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谁也没当成大总统，黎元洪手无寸兵，居然又一次幸运地成为妥协的产物。

新旧约法是一个遗留的大问题，段祺瑞用新约法使黎元洪合法继任总统，但是立刻遭到孙中山的激烈反对。直到六月，海军宣布独立后，段祺瑞才不得不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实际上仍然是一纸空文。

新旧约法之争，由于段祺瑞的妥协而告一段落，然而南北各势力的争夺并没有就此告终，在全国暂时统一局面背后，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斗争。徐州会议就此粉墨登场。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袁世凯取消帝制
- ●民国五年内阁
- ●南京会议
- ●肇庆军务院
- ●黎元洪继任总统
- ●新旧约法之争
- ●徐州会议

袁世凯取消帝制

背景介绍

袁世凯取消帝制并没有得到人民的谅解，全国的反袁浪潮进一步高涨。袁世凯为了加紧对南方用兵，被迫启用段祺瑞和冯国璋。一面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一面几次派员请冯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通电拥袁留任总统，调解南北冲突。可是，段仿效当年袁世凯逼迫清朝的故伎，以组织责任内阁为条件，向袁世凯夺权。袁被迫改革政府组织，以国务卿总理国务，作为责任内阁的过渡形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上台，便步步进迫，逼迫袁世凯交出许多军政大权，最后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冯国璋也婉言拒绝了袁世凯的说合，甚至公开要求袁下台，指出若"无术挽回，无宁敝履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然后，他利用反袁的高涨形势，施展出两面手法，一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在南京开会，"结成团体"，"扩充实力"，以便"对于四省和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一面极力拉拢反袁势力，与唐绍仪、汤化龙等密切往还，企图造成介于中央和南方反袁派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左右逢源，取袁而代之。5月1日，冯通电全国：主张暂时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待国会召集，由袁提出辞职，再举继任总统。

袁世凯不肯下台，舆论遣责更为愤激。《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中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再接再励，扑杀此獠，以绝乱种。"海外华侨也纷纷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将袁"执行国法"。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明他不仅要打倒一个袁世凯，并且要和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坚决态度。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各有打算，冯国璋几次电告袁世凯不宜再当总统，段祺瑞想乘机要挟袁世凯交出更多的权力。五月袁世凯解除徐世昌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实力的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这时全国反袁斗争更加扩大，袁世凯的忠实走狗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迫于形势通电宣布独立。六月初大野心家、大卖国贼袁世凯环顾四周，众叛亲离，气急败坏，一病不起，于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十五分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材料：

·取消帝制

材料　取消帝制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表面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深"疑帝制之难安"。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时，他就在国务紧急会议上抱怨过："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指"洪宪"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极力为自己的丑行开脱。12月31日，他虽硬着头皮，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变乱"和所谓有"匪徒蠢动"，毕竟没有勇气依原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2月23日，他更公开下达延缓登极令说："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28日，又申令早已被他遗弃的"立法院"提前于5月1日召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企图以此缓和全国人民的反抗。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以袁世凯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袁斗争仍在猛烈发展，与此相联系，袁政府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也急遽发展起来，从而更加速了他的失败。

首先是财政陷入破产。云南独立前，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耗资约六千万元，财政本已极其困难。云南独立后，为了镇压护国军，各项费用更加浩繁。光张敬尧督队南下，曹锟布置司令部及设兵站、安粮台等种种开支，便用去五百余万元。结果，连大典筹备处呈领二十万元登极费，也未获"照数全支，"仅领得"十二万元"，可见其财政已拮据到何等程度。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袁世凯先令各省将中央直接收入之款认真整理，按月督解，不得有丝毫挪欠及截留情事；继则设立洪宪元年中央专款，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月各二十万元，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月各十五万元，四川、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月各十万元，山西、陕西、奉天、吉林四省月各五万元之数摊派筹解。他并一面于2月底命警厅暗禁商民前往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5月12日更公开发布停兑令，以维持此两大纸币发行银行的金融界信用；一面命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国内公债二千万元，胁迫全国官民认购。此外，他还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各种税收和利权作抵，换取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支持。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竹篮打水，完全落空。不管袁世凯怎样三令五申，催促各省速解"应解中央之款"，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解款综核处作为专办各省解款机关，然而事实却是：置诸不复者有之；答以"云贵事起，为保卫本省安宁，费用骤加，无款可解者"有之；借口地方危急，反向袁世凯请款者有之。财政总长周学熙束手无策，惟"转陈袁氏，徒唤奈何而已"。对洪宪元年中央专款，除奉天段芝贵先后汇解三十万元，鲁、豫、苏、赣等省总计解交百万元外，"各省或解未足额，或因军务倥偬，呈请截留"，实际解款者寥寥无几。中国、交通银行"经袁下令维持，商会演说劝导，警厅暗中严禁后，商民提款兑现者"不但没有减少，反日有增加，"形势愈觉不稳"。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也未给他带来什么转机。人民膏血早已榨干，加上灾荒频仍，哪有余力认购公债？何况他卖国称帝，久已失信于民，即有余力，也无人受骗。无怪乎不少地方官吏在电复袁世凯询问能应募公债若干时，或答以"现在情形与年前不同，前定募额能否足数，殊无把握，或以该处人心未定，募债实多困难等语"搪塞。由于全国商民拒绝认购，原定二千万元的公债额实际仅得七百万元。至于对外借款，在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便是一无所得。"初向日本某银行借款二百万，而美国银行拒绝之。继以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而某银行拒绝之。"其他各国自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后，自顾不暇，以怎能救袁之急？所以，英国麦加利银行董事一见梁士诒欲启齿借款，便"立刻拒绝"。不仅如此，连袁政府赖以苟延残喘的盐税余款也为各国所扣留。在此内部罗掘已尽，对外告贷无门的窘境中，袁世凯的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破产的深渊。其次，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更加公开化了。

袁世凯在这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不得不采纳前述冯国璋等五将军和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以应危急。他先令天津造币厂所铸帝国纪念新币暂缓启用；接着批准停发大典筹备处经费，悄悄摘下了臭名远扬的大典筹备处招牌。与此同时，他一面召见因反对帝制而被他免去了机要局长的张一麐，要他参照现任机要局长王式通所草原稿，重新起草一份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一面召见老朋友徐世昌，因徐曾劝他取消帝制，特问他"变更宗旨，能否相助？"并恳求他务必敦促段祺瑞出而共任时艰。为了统一思想，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各方联席会议，自国务卿陆徵祥以下至各部总长一律参加，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新由安徽到京的倪嗣冲也应召出席，总计三十余人。首由袁世凯说明帝制无法坚持，决用明令取消，其态度虽似"从容、镇定，但声音颤震，显有内受激刺，外示镇静之象"。接着便将张一麐起草的命令文稿"交诸人传观"。其间，虽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倪嗣冲跳出来反对，但多数以为舍此已无他法。会议最后同意取消帝制，其手续是先由袁世凯将推戴书却还参政院，然后再由参政院议请袁世凯取消，借此表示与承认帝制一样，也是循"民意"所请。同日，袁世凯命开去陆徵祥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即日视事"。22日，正式发表由徐副署的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消，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次日，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告令"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稍后，又公开焚毁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以期达到笼络人心和销赃灭迹双重目的。

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宣告破灭。这是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护国战争所取得的很大胜利。从袁世凯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民国五年的内阁

背景介绍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凯命开去陆徵祥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即日视事。四月中旬，袁世凯眼看和谈即将破产，为巩固其总统地位，决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代替三月上任以来在挽救危局方面无所措手而迄无成效的徐世昌。他满以为段是他一手提拔的，这点面子总不至于不给。万没料到段会向他提出改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袁意识到，这是四年前国民党人限制其权力的老法子，心里不免窝火。但一想自己所处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也只好忍气吞声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23日，任段兼陆军总长，陆徵

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原名王赓）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宣告成立。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要求袁世凯"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明目张胆地逼他交权。然而，袁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从而更加深了段祺瑞的不满。

材料：

· 在袁世凯任期内阁
· 在黎元洪任期内阁

材料一　在袁世凯任期内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申令："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之初步。（下略）"

四月二十二日，以段祺瑞为国务卿。其各部如下：

外交　陆徵祥（六月请假，曹汝霖兼）
内务　王揖唐
财政　孙宝琦（五月辞，周自齐署）
陆军　段祺瑞（自兼）
海军　刘冠雄
司法　章宗祥
教育　张国淦
农商　金邦平（六月辞，章宗祥兼）
交通　曹汝霖

五月四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继徐世昌任国务卿，自以为解决时局极有把握。袁的看法，究竟比徐、段高一点，他认为以后问题却在副总统身上。当托徐告我："此时帝制虽已取消，大局纠纷，仍然未已，黎副总统为此时重要主角，段组织内阁，务请特别帮忙。"段亦来言："此次改组，须约未经参加帝制而又近在北京者，教育、农商两部，请自择其一。"我言："国事如此，对于此种艰难局面，亦不敢置身事外。此时大局，如能根据约法，以求解决之方，亦属易易，倘果同意，自可帮忙。"段亦以（根据约法）为然。我又言："此时谈不到部务，不必推究何部。"于是任我教育总长，加入内阁。

次日，段偕各部长进府，循例谒袁。寒暄毕，均退出，袁留我一人谈话，袁言："副总统许久未见，大局如此，须得副总统为我帮忙。副总统人极长厚，但是经验似还不够。本人意思，打算请副总统每日到府，与我同桌披阅文电，商讨大计。这样局面，将来总要他担任，此时多多接头，以后种种好办，烦你将我意思向副总统说明。"我默思："此事动机，全不明了，而黎自武义亲王后，对袁感情甚恶，今日即果插入，将来又如何抽出，应先与黎计议为是。"当言："此事颇有重大意义，总统平时与副总统往来，何人传话？"袁言："杏城（杨士琦）。"我言："总统派杏城正式往请，比较郑重，我从旁再陈述总统意思。"袁派杨前去，我即先与黎讨论，黎自不愿进府。杨见黎，闪烁其词，不得要领。杨据以复袁，袁亦未再催促也。

段就职，有一事关于袁段之决裂，即秘书长问题。政事堂设有机要局，初任张一麐，因其反对帝制，任为教育总长，以府秘书王式通继。至此国务院恢复，段拟以徐树铮为秘书长，托王士珍向袁言，数日未得消息。段又托我向袁言："王式通素未共事，不能合手，徐树铮相处有年，文笔甚佳，请予任命。"我不悉其内幕，即到府向袁言，适王士珍在座，袁对徐树铮有不愉之色，言："段总理军人，徐某亦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为秘书长，大不相宜。书衡（王式通）文笔亦佳，何不可用？"我言："总理因素未共事，不能合手。"袁言："从前段代总理时，你做秘书长，曾共过事，现在可以教育总长兼任，总能合手。"我言："既任教育，自不能兼。"我又言："总理告我，已请聘老（士珍）代陈。"王不发一言（事后，乃知王亦不满于徐）。我又婉转言之，袁不同意。最后言："总理若以徐某之才可用，不妨令其为陆军次长。"我复段，只好约略其词，尚未毕，段言："总是不答应耳。"即将口衔香烟嘴重掷案上，向前猛推，厉声说："今日还是如此！"其鼻向左斜歪（据人言，段盛怒时乃有此现象，人背后呼段为歪鼻子，我只看见此一次）。段此次出山，本拟与北洋元老商洽北方应付南方之策，虽不惬于袁，尚不肯为已甚。自此以后，即决心与西南通电，互谋对袁（段与西南通电亲笔原稿在秘书涂凤书处），其发端在此，而袁不知也。（据徐世昌云）

（摘自《北洋军阀盛衰及消灭》张国淦）

材料二　在黎元洪任期内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二十九日，申令仍遵用临时约法。同日，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唐绍仪（未到任前，陈锦涛兼）
内务　许世英
财政　陈锦涛
陆军　段祺瑞（自兼）
海军　程璧光
司法　张耀曾（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

教育　孙洪伊
农商　张国淦
交通　汪大燮

黎段本可合作，黎为段拥戴而出，双方原具好感。黎初继任，以我为府秘书长，此时府院颇融洽。先是帝制发生后，黎之幕僚大半回鄂，惟秘书瞿瀛、副官唐仲寅留京。及继任总统，其回鄂者先后来京，府中秘书厅、军事处，俱是在湖北都督副总统时旧人，一时所指为湖北会馆也。秘书厅人员向与院无往来（饶汉祥因劝黎受武义亲王，此时不到府），军事处为哈汉章、蒋作宾、金永炎等，彼等素不慊于段。由于张某者与军事处人员言："项城殁时，大众在春耦斋讨论继任问题，东海首先主张副总统继位，合肥尚踌躇"。其离间者复加以蜚语，黎至此始信徐而疑段。及孙洪伊自沪至京，极力在府方布置势力。孙在反对帝制时，与南京冯国璋结纳，因献联冯排段（联直排皖）之策，我力劝黎，以黎在京无别依据，徒恃法律上名义建立于北洋派之上，"冯段同是北洋，段非不可共事之人，最好一视同仁，奚必联彼排此，徒事纷扰？"而孙洪伊则欲挟黎以分化直皖，正适合府中一般人心理。哈在前清军谘府曾与冯共事，冯为人易与，段则不易接近，故此辈皆愿附冯，因此即附于孙。此时府方空气，无人不以院方为敌人，又以我在黎左右，因从而媒孽之，于是以排段者排我。我乃辞府秘书长之职，孙推荐丁世峄为府秘书长。

八月一日，国会开会，二十一日通过国务总理，所有阁员提交同意，如下：

外交　唐绍仪（九月免，伍廷芳继）
内务　孙洪伊（十一月免，范源廉兼）
财政　陈锦涛（四月，因案免）
陆军　段祺瑞（自兼）
海军　程璧光
司法　张耀曾
教育　范源廉
农商　谷钟秀
交通　许世英（六年，因案免）

唐绍仪外交，本系黎意，唐在沪观望，对人言："总统如倚重张某，尚可稳定政局，"曾以此意由卢信到京达黎，黎亦连电促唐来京。而徐州张勋等通电诋唐；唐甫到津，即受北方军人威胁，不敢去京。时我农商已去职，唐即由津折回沪。九月二十九日，免唐职。十一月十三日，以伍廷芳继长外交。

（摘自《近代史资料・中华民国内阁篇》）

南京会议

背景介绍

正当袁世凯为段的背主自立而大伤脑筋之时，4月18日，冯国璋突然会同新任督理安徽军务张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通电各省，提出总统留任、大赦党人、惩办奸党等八项主张，请求同意。袁世凯对此虽不尽满意，但总统留任一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冯国璋可用，因而"颇欲置段而倚冯"。蒋雁行5月4日向冯透露："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人，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

然而，冯国璋对袁世凯并不比段祺瑞更忠实。帝制取消后，他不但继续与梁启超等护国人士保持联系，反对袁世凯"以武力为后援"，甚至要求他"敝屣尊荣，预作退计"，而且一直在利用护国军和袁世凯双方对他的依赖心理，积极联络、组织第三势力，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4月25日，他致电未独立各省，提议"各省联络，结成团体"，"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指南方独立各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并露骨地表示："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5月1日，他又在先前与张勋、齐耀琳联合所提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依据所谓"法律"与"国情"，重拟关于总统、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祸首、党人等八项主张，作为他们的共同纲领。关于总统问题，他谎谬地提出："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为〔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国事，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可见，冯国璋所以承认袁世凯暂负总统责任，不过是为了抵制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而他所以抵制黎继任，正是因为他自己要当总统。

南京会议本定5月15日召开，由于袁世凯的干预与破坏，张、倪日渐消极，各省代表，所到无多，延至18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度代表二十三人，公推冯国璋为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首先发言说："大局危迫，宜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接着，湖南、山西代表表示赞

同、其他代表也相继附和，主张袁氏退位之说占了上风，袁世凯见势不好，急命倪嗣冲亲自出马。力挽危局。倪率卫队三营于当晚赶到南京，次日抢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并力图变南京会议为"征剿"护国军的军事动员会议。在倪的讹诈与威胁下，原主张袁世凯退位的代表，大都噤若寒蝉，有的甚至改变初衷，反主袁留任了。为挽救败局，冯国璋借口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提议由国会解决。接着又接过丁世峄的建议，提出电邀南方独立各省派代表出席会议，以解决总统问题，幻想借助护国军之力打击倪嗣冲等人的嚣张气焰。岂料南方独立各省早已不满于他5月1日所提仍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的八项主张，断然拒绝派代表赴会。而张勋、倪嗣冲二人则有意散布他也是拥袁留任的主战派，大违冯的本心。冯以希望落空，遂于30日宣布保境安民，解散南京会议。

材料：

·南京会议始末

材料　南京会议始末

南京会议的三个核心人物，各人有一条心。冯国璋想利用这个会议造成第三种势力，张勋也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而为清废帝复辟创造有利条件，倪嗣冲则想尽可能地复活洪宪王朝。袁正要利用冯张二人的矛盾，以达其互相牵制、从中操纵的目的。

他派张镇芳、阮忠枢二人在徐州包围张勋，又派蒋雁行公开列席南京会议予以监视。会议召开之前，五月十七日他打电报给冯、张、倪三人说："予自退稳田园，无心问世。不幸辛亥变作，强与诸君子出任国事，不避艰险，而心长识短，丛脞横生。自滇省发难，远近骚动，既无洞察之明，又乏应变之策，夙夜惭怍，早存退志。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佥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宧亦相劝以休息，均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

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既约同名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毋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

南京会议原定于五月十五日召开。由于各省代表没有到齐，直到十八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十五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军阀代表二十余人。山东代表丁世峄在会议上首先提出袁氏必须退位，这个建议是得到冯的暗中支持的。湖南代表陈裔时首先附和，各省代表也都没有相反的意见。袁退位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虽然没有提付表决，但已占有极大优势。不料当天晚上，倪嗣冲忽然带领卫队三营赶到南京，就使南京的空气顿然紧张起来。倪原已派裴景福为出席代表，他赶到南京是奉了袁的密令来监视会议的。他是唯一拥护袁的主战分子，正像清政府末年的良弼一样，想把南京会议改变为鼓动战争的会议，借以挽救北洋派解体和袁退位的危机。

倪出席了十九日的第二次会议。他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表示反对，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贺、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都站在丁的一边。倪就回过头来问丁："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却私通南方？"（此时靳尚未被撤职）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君子爱人以德。"冯贺、何恩溥也都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袁总统，而是为袁总统着想。"这些话气得倪脸上青筋暴起，几乎要和他们争吵起来，后由担任主席的冯调停其间，才把讨论的范围引入到"能战始能言和"的方面。

在这次会议上，张勋代表万绳栻也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以前同意袁退位的代表都不敢发言。关于备战的问题，倪与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够出兵多少，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发言，同样也作不出决定来。

二十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冯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大家一致赞成，但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具体办法来。通过二十一日的第四次会议和二十二日的第五次会议，才决定采取由丁世峄提议而为冯所赞同的办法，通电邀请西南独立五省派代表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倪嗣冲根本是反对与西南五省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讨论的。同时，张勋想赶走冯而取得督理江苏军务一席，因此与倪嗣冲采取一到致态度反对冯的意见。

二十八日，张勋以个人各义发表戡电，列举各省出兵的数字，他自己愿出三万，据说奉天可出两万，河南、安徽各出一万，合计其它各省共可出兵十余万人。军费由各省分别摊认。他自告奋勇地说："督师之任，职务重大，勋虽不敏，愿任其难。"他认为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就不难"一鼓荡平，灭此朝食"。

自张、倪的会衔"有"电和张勋的戡电发表后，北方战争的空气压倒了和平的空气，袁喜出望外地电召张勋到北京商讨进攻西南的问题，并命倪嗣冲到汉口组织征湘司令部。西南五省通电拒绝参加南京会议。冯国璋宣告保境息发，结束南京会议。

五月二十九日，袁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的申令，这是对护国军发动大举进攻前的一个信号。申令把变更国

体的责任归到各省公民，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把筹备大典说成是："借词筹备，不即正位，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

他敢于发表这个抵赖自己罪行而将一切责任归之于人的挑战性申令，是由于他认为此时已经有了可用之兵，态度不妨逐步强硬起来。他没有估计到倪嗣冲的安武军是只能用以屠杀人民而丝毫没有战斗力的，而张勋则是用出兵的鬼话骗取江苏的地盘，不会为袁火中取栗，各省军阀更不会替他白打仗还要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他的寿命只有几天，死神已在向他招手了。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南隐）

肇庆军务院

背景介绍

龙济光宣布拥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后，梁启超立即向各有关方面重新提出了军务院组织计划。首先讨论了抚军长人选和军务院所在地问题。在此之前，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实际是暗示他要当抚军长，因为他心理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李根源说："军务院所在地，初议云南。继在广东濒海，策应较易，佥谓广东便。"这是护国战争发生后，唐继尧野心家面目的首次暴露。李根源以乡土关系，附和唐意。上海陈叔通等 人则认为"领袖何人不敢下一断语，然总不可使有总统嫌疑之人为之，以为袁氏利用，转坚他派忠于袁氏之心；"并指出："如以陆荣廷为领袖，便无何等嫌疑。"梁启超初主岑春煊，"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后根据各方意见折衷提出："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唐继尧）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岑春煊）任之。"这一折衷办法为军务院的实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蔡锷起初以为设立军务院将与大总统问题"并为一谈"，本不赞成，后接阅梁启超所草各宣言及军务院组织条例，知是"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才勉强采取支持态度。这固然说明他没有争权的欲望，但同时也反映出发他害怕因此引起北洋军阀反对的怯弱心理。

5月7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宣布：为统一对袁军事和筹画建国方策计，"今由继尧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 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军务院组织条例》也同时公布，共十条，其中关于抚军的规定是："军务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各省都督或护理都督，两省以上联合军都司令、都参谋及各独立省确已成军有二师以上之军总司令任之。凡新取得前项资格者，同时取得抚军资格。"这是一个有意"避大元帅制，免贼借口"，对所有尚未宣布所谓"独立"的军阀、官僚、政客均预留余地的八面讨好的方案。所以，"于与段、冯接洽，固毫无滞碍也"。

8日，酝酿两月有余的军务院，在龙济光拒绝于广州提供办公地点之后，不得不在肇庆宣告正式成立，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因唐不能驻院，其职权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摄。推唐绍仪为特会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抚军初由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吕公望十人组成。后蔡锷"为取得发言权，贯彻其主张计"，又坚持补入罗佩金、戴戡二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不断增加，但直至军务院最后撤消，也没有增补一个中华革命党的代表。

材料：

- 军务院之成立
- 进攻北军

材料一　军务院之成立

陆本来没有讨龙的决心，而梁则因讨好地方实力派，不敢再提替友报仇的话，同意陆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他们向龙提出了六个条件：一、交出蔡、颜两凶犯；二、调警卫军出省；三、整顿军纪，解散侦探；四、陆到广州后，不到观音山拜会龙，须由龙来拜会；五、济军（龙军）一半留在广东，一半随同护国军出发进攻江西；六、指定东园为广西军驻所。龙对以上条件全盘接受，因此广东局势遂又由紧张而转为缓和。

但龙采取的是缓兵之计，条件没有履行，并且放走了正凶颜启汉。同时，广东人民一致反对陆以个人意见处理广东问题，广东民军也不肯接受陆龙协定的约束，陆被迫于到达肇庆后电劝龙率部北伐，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龙又请张鸣歧到肇庆来求情，由于没有结果，龙就于四月十九日亲自到肇庆与陆成立了五个妥协条件：

一、承认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推岑为都司令；二、龙仍暂任广东都督；三、枪毙蔡乃煌；四、即日调兵北伐；五、民军由岑处理，岑未到前，暂从三水划清防区界线，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驻守，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下归济军驻守。第二天龙回到广州，就

着手组织广东护国军三个军，作出整装待发的姿态，并于二十四日将蔡乃煌交与谭学夔解往长堤亲自枪决，以报乃弟之仇。

四月十九日，岑春煊由香港启程往肇庆。五月一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推岑为都司令，梁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五月六日，梁 应龙的电邀偕同张鸣歧、李根源到广州，想去调和龙与民军的意见。据说龙的部下又有不利他的风传，因此仅仅住了三天，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溜到上海去了。

根据梁的说法，龙把观音山建成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如果要攻下这座堡垒，必须使用很大的兵力，还需要很长的日期，而有了这些兵力和时间，就可以打下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因此，他主张与龙妥协以稳定广东的局势，使广西护国军能够集中力量北伐讨袁，以解救四川方面护国军孤军作战的危机。这些话是他用以遮盖自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遁词。真的情况是，为了迁就陆的意见，不但他自己放弃了讨龙的意见，反而劝告广东民军停止一切对龙的进攻。他只看见一个地方军阀的实力，而看不见广东全省人民的力量。与龙妥协不但不能稳定广东的局势，反而加深了广东局势的紧张和纷乱，阻碍了护国军的北伐计划。

五月八日，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抚军资格规定为独立各省都督及军长以上的实力派，梁是以军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列名为抚军的。抚军长原来拟推岑，因为唐继尧是首义省区的都督，所以改推唐而以岑代行其职权。蔡锷原来是反对组织军务院的，由于梁去电解释，他才撤回了反对意见。

军务院发表宣言，否认袁的总统资格，主张依照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言说："黎公今方陷贼围，未克躬亲职务。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席，由国务院摄行职权。今大总统身犹蒙难，副总统职尚虚悬，国务院又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而军事正亟，应当求统一之方，且国运方新，尤宜作通筹之计。今由同志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

军务院是进步党、国民党军人派与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而把中华革命党排除在外。军务院仅仅在名义上是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机构，从来没有发挥过它的作用。

（摘自《中华民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进攻北军

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早在 4 月 18 日，唐继尧等人便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了第一、二号宣言，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军务院成立后，当即于 5 月 9 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这样就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11 日，军务院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曰：拥护国法而已"；号召"各省国会议员迅速筹备集会程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各种法定机关得以成立"。它于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次日，针对冯国璋否定"约法"的谬论，梁启超再次声明："约法"者，民国之生命也。项城毁之，国人争之。国人以爱护"约法"，故不惜縻顶踵以为之殉。项城虽自绝于"约法"而"约法"未尝因此而损其毫末也。项城所以失去总统资格，全因其犯"约法"上之谋叛罪，并非"约法"消灭，总统名义消灭，而彼之资格随而消灭也。梁氏的这一声明，进一步表达了他捍卫"约法"的决心。

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 月 7 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沈鸿英等部三十余营人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今衡阳市）。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饬原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而刚由昆明经贵阡抵达湘南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的程潜则集重兵于武冈，压迫宝庆（今邵阳市）。在大军齐发的形势下，湖南北军倪毓棻、唐天喜、刘跃龙等部望风而逃，不战自退。据林俊廷等 5 月 16 日电称："前派赴衡州委员回报倪毓棻确即退兵，现已陆续开发起程。"24 日，望云亭也报告说：衡州"倪军全部退出。长沙、湘潭唐天喜之兵，日内亦完全出境。至宝庆刘旅长（指刘跃龙）迭次函称：'大局危急，力求和平'"，"日内决意全行退出"。至此，湘南几已无北军踪迹。

赣闽两路，由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直接担任。早在军务院正式成立之前，岑春煊即已开始筹组军务院直辖部队。他征得唐继尧同意，调李烈钧所率云南护国第二军至肇庆"拥护根本"。李部自广西百色出发，经南宁、梧州，于 5 月 12 日到达广东肇庆，受到岑春煊、梁启超以下全体军务院成员的热烈欢迎。这月下旬，除龙济光济军一军尚暂未任定司令官外，其他各军皆已编组就绪，

正式组成了直隶军务院的滇桂粤护国联合军。

（摘自《军务院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

黎元洪继任总统

背景介绍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表面化。首先在大总统的继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按照袁世凯1914年12月29日颁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的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将姓名"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藏于"金匮石室"；选举时取出，向选举会宣布，然后进行投票。袁世凯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确保他自己能连选连任，或由他"推荐"其后代或亲信继任。以使世袭总统合法化。

当时，袁世凯政府中的北洋系核心人物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都想继袁为大总统，三人各不相让。最后确定由北洋派以外的南方军人黎元洪继任总统。

1916年6月6日上午，日、英、法、俄、比、意六国公使即于日本使馆研究袁世凯死后对华应采取的措置。下午，六国公使会见段祺瑞，英使代表六国，对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表示满意，并声明对黎将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接着日本外务相急电驻华公使日置益，令其向黎表示，新政府只要"确实实行日中亲善政策，日本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将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段祺瑞假"大总统告令"，宣布依"新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6月7日，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

材料：

- 袁死黎继之经过
- 一幕哑剧

材料一　袁死黎继之经过

一九一六年五月袁世凯病笃，知帝制不可为，有悔意。先由袁之于夫人以电话告段祺瑞之张夫人，谓元首抱病，急于一晤芝泉，汝先疏通，即有后命。盖张夫人系于夫人之义女也。张夫人为前江西巡抚张芾之侄孙女，父名瀛，字步洲，在山东与袁交好，步洲早逝，母陈氏不两年亦去世。于夫人抚养张女如已出，段元配吴夫人逝世，即由袁夫妇主婚，以张女归段为继室，往来甚密。段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因反对袁之帝制，在陆军总长任内引病开缺，给假两月，并颁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段乃在家闭门谢客。得于夫人电话之次日，政事堂果传话邀段。段到，徐世昌已先在座，我亦随段同往。因段谓我知医，在旁察言观色，便知病之轻重。袁住在中南海万字郎廊后一大院落中。袁在病榻上接见，面色红赤，说话气力尚照常，案上所列皆中医脉案与药方。袁对段云：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消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段云：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熟计之。稍坐即离去。

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仍照民国元年官制组织政府，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不久因徐世昌辞国务卿职，以段继之，即电南京冯国璋商挽大局，于是有南京会议之召集。不料南方进一步促袁下野，冯、段正在疏通；而北洋系督军亦渐不听命，四川陈宧、湖南汤芗铭等先后通电反对帝制。外交陆徵祥、财政孙宝琦相继辞职。袁病势愈殆。群医亦告束手。

段派我赴南京以详情及大局形势面陈冯国璋，并商以袁死以黎继之事。当日安徽督军倪嗣冲亦在南京，对我质问云："汝在幕后帮助段合肥反对帝制。"我答云："我乃闲民无常职之人，又非袁党，有何能力反对帝制。"至于段之反对，乃段人个见解问题，我不能左右之。至于今日我奉命来此，因袁病重，命在旦夕，商量继任人选问题。今日不是反对帝制。"倪始无言。冯国璋等亦认为黎本为副总统。顺理成章，非他莫属，乃复电赞成。六月六日袁逝而黎继。

材料二　一幕哑剧

四位接受遗嘱的人分头打电话把各部总次长和其他有关人物二十余人都请到春藕斋来——袁停尸的地方——摆下香烛祭品，向袁的遗体三鞠躬。

段在人堆中看见了张国淦，就向前抓了张的手说："乾若，我们同看副总统去。"

张国淦随着段上了车。段在车中就像哑巴一样，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张不知道看副总统是什么一回事，但又不敢动问。车子一直开到东厂胡同黎宅停下来，张先跑进去报告说："总理来了！"

黎走到客厅里，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长方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在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这幕哑巴戏做了很久，段才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表示告退，黎也站起身来送客。

段临走向张说了一句话："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问道："国务院的事呢？"

"有我。"段一面说，一面踏上汽车，车子就开动走了。

六月六日下午发出公报："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时发表了袁的遗令。

六月六日半夜里，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打来一个电话说："外边的情形很不好。"黎不晓得外边出了什么岔子，想来总是与总统问题有关，他十分不安地请留在他家中作伴的张国淦打电话问段一下。那边听电话的是一个副官。他回答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旁边十分焦急地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再次接通了电话，照着黎的话说了一遍，等了一下，那边回答说："你如果有要紧的事，总理请你当面来谈。"

黎忙说："你去，你去。请你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

张驱车到了国务院，虽然在夜静更深的时候，总理办公室还是挤满了人，都是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穿制服的高级军官。段忙得满头大汗。他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众人把张带进另一间小屋子里。

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的情形。"

段扳起一副古铜色的面孔，傲慢地说："我姓段的说要姓黎的，我的话始终不会改变。无论有天大的事。我姓段的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想多知道一些情形，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用拳头在桌子上击了一下，粗暴地说："他要管，就让他去管！"说了这句话，他就匆忙地回到挤满了人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回到黎宅来，只提到段对总统问题负责到底，却隐瞒了段的生硬的态度和粗暴的言词。黎感到这种情形很不妙，就和张两个人在沙发上打盹，等到天明，再叫张继续探听消息。

张再到国务院来，就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派高级军官包围段，一定要举徐或段继任总统，反对北洋派以外的南方人为总统。通过段的解释，问题才得到解决。段把拟好了的通电稿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有这样几句话："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他就向段说："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不要让受人情的人感到不痛快。"段才提起笔来，删去了那些使人不痛快的词句。

六月七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就职后发表第一道命令，竟把万恶滔天的人民公敌说成是一个功德巍巍的大人物。命令说："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礼，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这道命令是由段拟好，请他盖印后公布出来的。

从黎就总统职的一天起，就像他在辛亥年被人牵出来做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的权力，而只能在公文上签字盖印，成为段与北洋派的一个政治工具。

（摘自《近代史资料》《中华民国回忆录》张国淦）

新旧约法之争

背景介绍

袁世凯"自遭诛灭"，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临死前留下了按其1914年所造约法办的遗言，特别是继袁而起的段祺瑞，决心继承他的衣钵，不顾护国军依照《临时约法》，恭承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公然于6月下午3时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自造的所谓"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这样，紧接着又展开了一场持续二十余天的新旧约法之争。

其实，段祺瑞何尝不想当总统，可是细察大势，刚刚推翻"洪宪"帝制而锐气未减的护国军各要人，屡以拥黎为言；而北洋军阀内部又各怀异志，一盘散沙，难为后盾；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又公开宣称将给黎以"道义上的的支持"。在这种局面下，他也只好将计就计，接受徐世昌建议，先奉黎元洪为总统，其他待以后再图了。为此，袁世凯尸骨未寒，他便携教育总长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任总统的手续。当夜，黎元洪听说北洋军人对他有所不利，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又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要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由此可见，他对请黎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这也是他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宣言依袁世凯新约法，奉黎元洪代行总统，借此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的根本原因。

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护国军早就宣言过："黎副总统继任乃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月宪法会议所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事关信誓，自然反对袁世凯遗命和段祺瑞通电所称"代行职权"之说。6月8日，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说："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且继承与代行职权大有区别，"继承"尚有二年任期，"代行"即止于三日。为此，他鼓动独立各省，速起抗争。其实，黎元洪何尝不想依旧约法"继任"。早在就任之日，他就亲自向国会议员郭同表示过反对"新约法"之意。怎奈他手无一兵一卒，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看段祺瑞脸色行事。所以，他虽认岑春煊等所举四事"实为目前当务之急"，但却不能单独有何表示。

但是，段祺瑞却强词夺理，顽固地说什么由政府下令

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就是"蓄命令变法律"，既为各派法理学说所不容，自然也为政府所"未敢附合也"。22日，他公然通电全国，一面极力为袁世凯新约法辩护，一面重申："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直到25日原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联合发宣言，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后，才打破这一僵局。

材料：

·恢复约法

材料　恢复约法

在全国一致反对新约法的呼声中，段向各省军民长官发出漾电（六月二十三日）说："民三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煞，则国中一切政令，均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至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国内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他在通电中极力解释他对新旧约法毫无成见，只是以命令变更法律，不敢随声附和。他所提出的理由是："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视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果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他发出这个电报，其目的是想仿照民国元年召集南京参议院的办法，由各省军民长官各派代表三人到北京组织"修正约法委员会"，在新旧约法之外产生另一约法，也就是完全合乎他的要求的新新约法。另一方面，他又想仿照袁世凯的办法，利用北洋军阀为其应声虫，以求实现其毁法造法的个人野心。但是，由于他的威望远不及袁，就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也有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主张恢复旧约法，和他的步调并不一致。西南各省的反对就更不用说了。

段的漾电招致了全国各方面的坚决反对。广东政客集团中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回电反驳说："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指旧约法），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于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合法，则元年约法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这个电报不仅提及总统继任问题的法律根据，同时还涉及国务院成立问题的法律根据。因为在新约法的条文上，根本就没有国务院这个组织机构，如果新约法应当视为有效，国务院本身就将成为一个非法机关。

由于约法和国会问题久未解决，新的事态发生了。

六月二十五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因拥护旧约法而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宣言说："……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公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足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

海军的独立，使段感到事态日益严重和自身日益陷于孤立。

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是海军的主力。只有第二舰队未加入护国军。海军力量虽不雄厚，但一向掌握在北洋军阀的手里，在国民党反袁战争时期，曾经帮助袁起过很大的作用，在护国战争时期，袁又经常利用它运兵南下，威胁沿海各独立省区，这次海军的独立，却是另外一种独立，是高举"护法"旗帜、反对段而不反对黎的一种独立。海军的独立，不仅严重威胁北洋派势力下的东南沿海各省，而且护国军很有可能利用海军运兵北上，北方地区也将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段终于被迫放弃其不肯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成见。

六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公布恢复民元约法。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之大总统选举法，至宪法之一部，仍应有效。"同日发布命令，定于八月一日召集国会复会。

同日下令裁撤参政院。

（摘自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

徐州会议

背景介绍

新旧《约法》之争，由于段祺瑞的妥协暂时告一段落，然南北各派势力，从各自的政治利益出发，围绕着争夺分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重新进行组合，在全国暂时所形成的南北统一局面的背后，正在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斗争。

1916年6月9日，张勋邀集出席南京会议的北方各省代表在徐州开会，会议议决十条，如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电劝独立各省取销独立，抵制迭次倡乱的"暴烈分子"（指革命党人），固结团体遇事筹商等。它反映了北洋派对西南[illegible]力的敌视心理和戒心，也透露了张勋的政治

野心。徐州会议并不表明张勋对段祺瑞控制下北京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它反映张不甘心居于段、冯之下，力图利用袁死后的形势，造成自己一派的势力，并想以北洋派盟主自居。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袁氏一死，旧《约法》、旧国会恢复，自己政治斗争的目的即已完成。7月25日，中华革命党遵照孙中山的指示，通告国内外各支部、分部，停止军事行动，各地“中华革命军”、“护国军”先后解散。另外，国民党中相当一部分人醉心于分享政权，国会恢复、参加内阁对他们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他们虽然认识到段祺瑞及其左右的官僚政客，并没有与国民党人合作的诚意，但以为只要努力展开活动，扩大政治势力，建立一定的基础，自能贯彻其政治主张。并设想在议会中联合原进步党中孙洪伊一派，拥唐绍仪为首领，组成一大政党，在力量雄厚时，驱段下台，建立以唐绍仪为总理的责任内阁。然而这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段祺瑞新内阁成员共九人，各部总长属于国民党或倾向国民党的人士占六席，即外交唐绍仪、财政陈锦涛、海军程璧光、司法张耀曾、农商谷钟秀、内务孙洪伊。内阁中安排如此多的国民党系的阁员，并非是段之本意，这与袁死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有关。因日本当时决定支持黎元洪继任总统，融合南北各派势力组成内阁，以便扶植一个南北统一的亲日政府。由于有着日本对华政策这一因素，段对增加国民党人入阁人选，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容忍让步的态度。但在幕后，却操纵北洋派军人，对内阁组成的人选上进行攻击，排斥国民党人入阁。

9月2日，张勋就所谓“烟土案”通电各省，猛列攻击国会，指责张耀曾“贩土营私”声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接着张勋又于9月21日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通过联合会章程十二条，以巩固北洋团体反对南方国民党势力为号召。并于24日通电反对唐绍仪“使掌外交”。第二次徐州会议系段祺瑞一手导演策划，段利用张勋一心想当北洋派盟主的野心和对国民党的仇视心理，唆使鼓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反对派势力。他派段芝贵暗地操纵，徐树铮居中联络，而反对唐绍仪的通电，也是事先拟好电稿，由曾毓隽带到会议上通过发出的。

国民党人以国会为阵地，组织政党内阁的政治企图，开始就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实力政治所打破。

材料：

· 张勋私开会议记

· 唐绍仪之辞职

材料一　张勋私开会议记

南京会议解散后，张勋遣使邀北方各省区代表到徐集会，欲以商定用兵事宜。勋使抵宁，即接袁氏死耗，各代表于六日由宁赴徐，计共十二省区，九日下午，张勋集各代表正式开会。张勋主席，委任万绳栻代为宣读开会大意及所提要纲十条。万参谋长起立宣言云：敝上将军命意，以为自滇、黔各省，借口帝制，倡言独立以来，兵连祸结，南北交困，袁大总统曲徇众意，以息事宁人起见，早将帝制撤消，为国之心，昭然若揭。不意彼方胶执成见，犹坚以退位为请，桂、粤等省，又相继效尤，足见有心构乱，无意和平，退让益多，则要求益进，国本一动，立召分崩，将来把持政权，攘夺私利，国家从此更无安宁之望。我同志各省军民长官，各处一方，彼此意见，多不相谋，道路谣传，殊难得其真象。敝上将军与冯上将军、倪将军，用是有召集江宁会议之举，幸承各省军民长官不弃，选派代表，克期来宁，敝上将军心感无既，惟以防务所羁，不能亲自列席，藉参末议，抱歉殊深。嗣经代表诸公一再讨论，多数皆以固结团体、巩卫国家为宗旨，维持大局，人同此心，众志齐一，当经公推冯将军主稿，电致独立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不意多日未接复电，今者袁大总统即逝，遂令此会几无结果。但敝上将军尤有厚望于此会者，则以招集初意，本为巩卫国家，既欲巩卫国家，斯不能不拥护元首，此实出于对内外之公心，并非有私于袁大总统之一人。今袁大总统虽薨，而国家仍然存在，我各省军民长官，均担负地方重任，对于国家前途，应取何种政策，始为正当精确，自非固结团体，一致进行，不能期于永久。故特派人到宁，邀请诸公至此小住，以便筹商，兹就管蠡所及，择其最重要者数端，另列要纲，共同讨论，如果意见相同，即行定议，归告各本长官切实进行。至于将来国家应办事宜，千头万绪，非此俄顷时间，所能计议完尽，各省军民长官，倘有所见，仍祈随时电商，以启愚蒙，惟诸公其留意焉。现在所提要纲共有十条：（一）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一）保全袁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一）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一）催促滇、黔、桂、粤、浙、蜀、陕、湘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一）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预政权；（一）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一）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旅饷项，仍当通力合筹；（一）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中央，实行减政，罢除苛细杂捐，以苏民困；（一）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一）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敝上将军之意，略具如此，请诸代表逐细讨论。当经各代表依次宣言，大都以此十条大纲，非常佩服，且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对待一般暴烈分子。惟固结团体，必须公推

一望资隆重之人为领袖，遇事电商，借易联络。且以为必须设立一固定机关，设法令各省或留一人在徐，听候续议，或随后招集，以为永久之局，不可便令结束。张勋宣言此后进行，尚须努力，望各代表回省，致意各本长官，务令团体固结，一致进行，果利吾辈，本上将军无不力任其难。各代表皆称曰善，张勋遂据以通电与同气类之人，而会议亦于此中止矣。

惟共和复活，袁系人物中之力赞帝制者，睹新政府之改组，旧国会之召集，深惧不利于已，有所动摇，于是密电往还，由前派代表与张勋代表万绳栻接洽，愿奉张勋为首领。于是各省区复派代表，往集徐州，而联盟会遂以成立。此会初仅九省，既而十一省，继成十三省。帝制罪魁梁士诒等闻之，均请输款拥戴，或参帷幄，或效奔走，狼戾贪污之士，竞往依之，公同制定各省区联合会章程，俾资遵守，计章程十二条：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

（二）本团体为防止暴乱份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

（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

（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

（五）本团体公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不及往返电商者，迳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

（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择定之。

（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为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府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

（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制服之。

（九）本团体以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挟持私愤，假借他项名义，倾陷恢复者，本团体即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

（十）各方面对于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所以减削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

（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

（十二）本节略仅具纲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定盟后，张勋乃益自负，于是干涉国会，攻讦总长之电，迭发而无顾忌，政府忍之。更厉声请解散国会，否则出于横决，亦所不辞。横暴至此，洵国家将来之大蠹矣。

（摘自《护国军纪事》第5期）

材料二　唐绍仪之辞职

自唐绍仪被任为外交总长以来，为时已三阅月，国民再三敦促，仍不肯轻于出庐。嗣因两院完全同意，乃始奋然来京，以应国民之希望。世人方盼其早日就任，突于前日向大总统及国务总理提出辞表，殊属出人意外。此事最惹中外之注目，试一读其辞职电文，即可知唐氏之苦衷，而吾人对于现在政局不能无一言以为当局者告焉。

原夫段内阁之出现，乃在袁总统时代，自黎总统继任以来，性质即为一变，非复从前之暧昧内阁，乃堂堂正正依据《约法》组成之责任内阁也。承第三次革命之后，负创业守成之重任，段总理之苦心惨淡，可想而知。此内阁之主要目的，即在妥协南北，统一国家，故依南方之主张，恢复《约法》，再开国会，并采用南方之新人物，列于阁员。现因外交总长缺员，国务院尚未得为完全成立，必待唐氏就任，始可望巩固内阁之基础，整理荒废之政务，维持全国之秩序。然则唐氏之就职与否，其关系顾不重哉。兹唐氏突然辞职，匪特段内阁之不幸，亦即中国之不幸。盖今日时局，表面虽似小康，而里面之暗潮，奔腾澎湃，如怒涛狂澜，变动莫测。当此乱象环生，风雨飘摇之际，纵举国一致，犹恐不足济此难局，何况毫无爱国之念，但知保全自己之地位，贪图私人之利益，不恤惹起平地波澜，而逞其阴谋诡计，以排除异党为得计，此诚不可解之现象也。例如近日风传军人干涉政治，尤其彰明较著者，此风若长，恐国家遂致不可收拾。故段内阁宜自知责任之重大，而为绸缪牖户之计也。

然观于段内阁之态度，则有令人不能无疑者。彼定武将军张勋所召集之十三省督军会议，其连日所议者，无非藐视《约法》，蹂躏国会，侮辱政府。表面虽在拥护中央为名，其实不过拥兵自卫，目无国法，于人民之休戚，毫不顾念。更进而干涉内阁员之进退，甘冒破坏宪政之大不韪。又有散布传单及报纸于京、津之间，历数唐氏之十二大罪者。并于唐氏现住之天津，特开所谓公民大会，以排斥唐氏。此等肆无忌惮之行动，可谓全然暴露无政府、无纪律之状态。乃政府置若罔闻，既不禁止徐州会议，又不押收散布之传单，一若任武夫之跋扈，奸人之跳梁，而视为无足介意者，诚不知政府何居心？无怪近日谣言盛起，谓徐州会议、天津公民大会，均为段总理及其部下与帝制余孽协力压服民党之作用，此说不可谓全然无据。若政府与此等有害国家之集会毫无关系，胡不设法禁止耶？况徐州会议更显然违反《约法》，政府不加禁阻，尤令人不得其解矣。

段内阁成立之要素，首在妥协南北，今大业未成，遽欲放逐南方文治派于政治圈外，未免令人大失所望。如唐氏者，其声望阅历，均可称当代名流，加以第三次革命，曾在上海纠合民党，反抗帝制，对于共和复活，颇著功劳。段

总理若不忘最初之精神，欲极力保持国内之平和，纵有些须不满之处，亦当隐忍迁就，欢迎唐氏入阁。乃对于反抗唐氏等之妄举，匪特全不过问，且有教唆之形迹焉，欲使世人不疑惑段总理之心事，其可得乎！（下略）

（摘自《顺天时报》1916年9月27日）

历史内幕

袁世凯被"逼宫"

三月九日，装病多日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忽然销假视事。在此之前，阮忠枢奉袁命南下，往来于南京、徐州之间，极力劝冯与张勋联合北洋派军人发表一个拥护袁和拥护帝制的联名通电，以澄清各方面关于北洋派分裂的流言，并为前线北洋军打气。冯、张在口头上总还是拥护袁的，当然不便明白拒绝，但是这个电报始终没有发出来。这位"钦差大臣"实在熬不住了，就代替冯、张二人拟好一个电文发了出去。冯、张二人虽然很不高兴，但也不便明白否认。不久广西宣布独立，冯肯定袁的末日即将到来，他暗中与各省北洋军阀加强联系，想造成在袁与护国军以外的第三种势力。他对梁启超、陆荣廷打来的文电或者派来的代表，都不作肯定的表示，但又暗示他不是护国军的敌人，言外之意似乎是说，"你们倒袁我是赞成的，但要我亲口说倒袁的话或者直接参加讨袁行动，是不可以的。"他本来是袁的好学生，完全学会了袁在辛亥年的榜样，想一面利用护国军打倒袁，一面再联合北洋军阀对付护国军，使他不蒙忘恩反噬的恶名，而能达到取袁而代的目的。

与广西独立的同时，四川将军陈宧派代表胡鄂公到南京和冯接洽。冯的侄儿冯家祜、女婿陈之骥陪同胡去见冯。胡向冯直接陈述："二先生(陈宧行二，手下人都称他二先生)对时局的态度，完全唯上将军(指冯)之马首是瞻。二先生说，如果上将军同意四川宣布独立，叫我在这里发去一个密电，他就宣布独立。"冯似应非应地哼了一声，马上又用别的话岔开了。

胡一连去了几次，渐渐地厮混得熟了，冯的侄儿和女婿又都保证这个人可以深谈，不至把机密泄漏出去。一次，冯情不自禁地说："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不到几个月就要完了，癞虾蟆难过端午节。这也是天意如此。我对他非常痛心。"最后问胡："你的电报呢？拿来我照发好了。"

由于阮忠枢擅自作主代发了一个拥袁电报，使冯大不痛快。因此冯密电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借以打击袁。当时回电愿意列名的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冯觉得五个人联名声势还不够大，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用五个人联名密电征求其它各省将军的同意。这个密电落在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就向袁告密。袁正在因为广西独立暴躁异常，三月十九日又接到这个密报，吓得几乎晕倒过去。直到这个时候，袁才完全明白他自己一手培养的北洋军阀已经转变成为他的敌人，而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更为可怕。他两眼失神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哼声说道："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指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他又十分沮丧地提到他的历代祖先都是在五十九岁之前死亡的，而他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他害怕过不了五十九岁这一关。

因此，袁不得不厚着脸皮亲自写好几封密函，于三月二十一日交由承宣厅派遣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请他们参加当天下午的公府紧急会议。专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这样，徐、段等人就不好意思拒绝不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正像清朝末年御前会议解决退位问题一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还是袁自己提出取消帝制的意见。他说："取消帝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彼曲我直，我们就不怕他们继续捣乱了。"徐、段两人都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此时应袁电召来到北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也出席了会议，他站起来大声地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仍然自称为臣，愿意带兵去打西南为"圣主"效力。袁说："丹忱，你看。"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电文给他看，他也无话可说了。

再隔了一天，袁接到另外一位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的劝退电，称他为"先生""执事"而不称为总统。电首说了两句泛泛的客套话："白宫睽隔，瞬已两年。"下面就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来骂他："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带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与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这个电报比起康有为的一封长信来，措词更为严厉。此时袁已经没有勇气再和他们进行意气之争了，他分别致电康、唐二人，请他们以国家为重，在调停时局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月二十九日，公府焚毁有关帝制的公文八百四十余件。

四月二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摘自《民国史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陈其美之死

袁世凯见对陈其美拉拢与威胁不成。就下达了对陈暗杀的指示。袁通过江苏都督冯国璋，找到辛亥革命时期曾在陈其美部下任过沪军团长的张宗昌（此时张宗昌已叛归北洋军），让张派遣密探程国瑞（化名程子安）、朱光明、王甫庭等人到上海策划暗杀陈其美。

程子安、朱光明等人来到上海后，打听到陈其美正为革命党活动经费困难而苦恼，便想出了一个毒计。他们假意开设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然后设法收买了与陈其美熟悉的李海秋与王介凡，让他们去与陈其美联络，伪称事成后，鸿丰公司将把押矿借款的4/10给陈其美作革命经费。陈其美正苦于无法筹款，未及仔细思考便贸然答应。李、王与陈约定，5月18日到陈其美寓所签字。18日下午，叛徒李海秋以介绍人身份与鸿丰公司的许国霖五人来到陈宅，另外几个凶手暗携抢弹埋伏在附近。约好李海秋出门，凶手即进去行刺。

当陈其美回到十四号寓所时，鸿丰公司的办事人员许国霖等五人与介绍人李海秋也按时来到了。李海秋是陈其美的老熟人，这次合同签字事就是由他介绍给陈其美的。陈其美招呼来客在客厅内坐下，就准备在合同上签字。忽然李海秋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他忘记把合同底稿带来，要立即回去拿，说着拔脚就往外走。李海秋刚刚走出客厅门，从外边突然闯进两个凶手，举起勃郎宁手枪就向陈其美猛烈射击。陈的头部连中数枪，倒在血泊里，顿时殒命。

这时，在陈其美寓所的外室，革命党人丁景梁、吴忠信、萧纫秋、余建光、曹叔实等人正在会商事情，听见枪声，急忙入室视看。两个凶手立即对他们狂击，丁景梁、曹叔实当即受伤，余人退回外室。在这当儿，两个凶手与鸿丰煤矿公司的五名办事人仓惶逃向屋外，来到马路上。

一位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就这样突然地结束了生命，年仅39岁。

以精明干练著称的陈其美，由于一时疏于防范，竟中敌人圈套，丧于一旦。他的死，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来巨大的损失。孙中山称颂陈其美“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对他的死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弗瞑目。”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经盛鸿）

皇帝梦与太子梦

民国四年秋，洪宪帝制酝酿已臻成熟，袁因下令自民国五年元旦起，改称洪宪元年。

袁对称帝事，表面上似并不热中，尝谓：“我这个大总统，可称为终身大总统，没有必要做皇帝。再说，我年纪也已快六十岁了，袁氏祖辈、父辈中无过花甲者，故更没有必要。”

但袁之长子克定则热中于当太子，以便在不久以后，即能继承大位。克定的企图对袁氏称帝颇具推动作用。结果不啻一枕黄粱，父子俩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和太子梦。

洪宪宝座设中南海居仁堂，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地毯亦黄金色，系熊希龄自热河行宫中取来，据传其中掺有部分金丝织成。

登基之日，袁到居仁堂受朝贺，衣海陆军大元帅礼服（事前曾赶制龙袍一袭，并试过身，但届时袁未服用）。袁未就座，仅立龙案左上方，手抚案面，受文武百官及外交使节三鞠躬礼，满族及蒙古王公则行三跪九叩礼。

袁之失败，固咎由自取，克定对彼之影响亦大。袁徒知为克定打基础，拉关系，但克定实乃一阿斗。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曾在瀛台宴请曹锟、张作霖、靳云鹏三人，席间，张作霖慨然说：“袁世凯当大总统，做洪宪皇帝，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们原都是穷光蛋，是他把我们提拔起来的。可惜他没有回头看看……。”下面虽没有说出来，意思指的却是袁克定。

北伐后，袁克定经常居住天津。我那时即在袁宅管事，直到日军占领天津为止。他手下无一正派人，气度极小，吝啬成性，像我这样与袁家有这么多年关系的人，除了工资外，没有给过我一文钱，送过我一件东西。他年轻时每日斗鸡走狗，捧京剧演员，自奉甚奢。袁世凯去世多年，而彼犹常以太子自居，指望“有朝一日”。克定爱住名胜地区，好旅行，经常往来济南（前湖北督军王占元系彼亲家）、苏州（丈人吴大澂，妹嫁清末著名散文家薛福成之子，均住苏州）、上海，吃喝玩乐，随从常达十余人（如按摩医生、厨子、当差、侍卫等）。日寇占领天津期间，司令坂西常往晤谈（克定不仅通日语，尚通英、德及拉丁文字）。日本投降后，境况日落，有时住北京西山、汤山、颐和园等处。解放后，七十九岁时死于北京。

袁任临时大总统时，曾在中南海卐字廊旁建一石室，称“金匮石室”。一日，袁取出一铁匣，将书有几个人名之字条放入匣中，自行锁好，并加封签，命我将此匣送往“金匮石室”中锁藏，谓系大总统继承人名单。洪宪时，袁即命人去石室将铁匣取回，自行开锁，将此名单取出撕毁。帝

制取消后，又放置一次，仍将石室钥匙放入袁之办公室抽屉中。袁死后，袁家属即将铁匣取回，见匣中名单上竟赫然并列袁克定、黎元洪、徐世昌三人姓名。

（陶树德《辛亥革命回忆录》）

蔡锷与黄兴

当蔡锷正在日本潜心学习陆军之际，黄兴也受湖北当局的选派。于1902年6月抵达日本东京，进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黄兴抵日以后，继续致力于学习军事技能，课余之暇，常常延请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也常常去士官学校联队参观各种兵操。每天早晨起床，还赴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而且每射必中，得了很多奖牌。由于黄、蔡都喜欢军事，而且都是湖南人，据黄兴1913年写给蔡锷的对联中"论交深在十年前"之句看，黄、蔡相识大体在这个时期。这年秋冬，黄兴与杨笃生、樊锥、梁焕彝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樊锥是蔡锷幼时恩师，杨笃生既与黄兴很相契，又是蔡锷在时务学堂时的老师，而且当时都住在东京，时相过从，蔡得樊、杨介绍与黄兴相识，应是比较可信的。以前人们多把蔡、黄结识定在1903年组织拒俄义勇队之时，其根据即是上述那句联语。实际上诗中言明为十年之前，而联语旁署明为"民国2年夏6月黄兴书于申江"。即是说，结交在1903年(倒数10年)6月以前，既可以是1903年，也可以是1902年。揆诸当时情况，黄、蔡结交似应定在1902年为宜。因为办《游学译编》时，据有些记载，蔡锷亦追随樊、杨等人参与其事。他写的《至湖南士绅书》也在1903年1月13日出版的《游学译编》第3册中发表。这些都足以表明黄、蔡结交要比拒俄运动为早。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其《公约》规定，设运动员无定数，可以公举、公认，也可自认。运动员的主要职责是回国发动爱国革命运动。教育会成立后，黄兴即自认运动员，负责运动湖北、湖南、南京一带。同年5月31日，黄兴启程回国，6月抵上海，7月抵武昌，在两湖书院等处散发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并发表演说，鼓吹反清革命。后来回到湖南，一面在明德学堂任教，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1月4日，他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等发起成立华兴会，被举为会长。1904年，黄派万武、刘道一往湘潭策动会党首领马福益起义，派宋教仁、陈天华、周维桢等分别赴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开展活动，而由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策应，自己则奔走于长沙、武汉、上海间，积极筹划十月长沙起义。可惜因事机不密，起义未及发动就被清政府破坏了，黄兴在友好的帮助下，辗转出走上海。这时，正值蔡锷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途经上海。此次蔡锷归国，意在报效国家，抵御外侮，因而他抵达上海后，即参加了杨笃生、章士钧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据章士钊回忆说，1904年，"杨笃生与吾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此会即华兴会之外围，笃生为会长，吾为副会长)松坡正由日本毕业返回，道出沪渎，应吾辈之要约，参加斯会。彼戎装莅盟，佩剑锵然，其持态严肃，为吾六十年来永矢勿谖之印象。"黄兴抵上海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1月7日，他邀集杨笃生、仇亮、陈天华、章士钊、黄炎培、张继等近40人重新集会于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商讨继续反清革命策略，准备"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蔡锷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不料，皖人万福华愤于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主张联俄，谋刺王之春于四马路，余庆里机关被外国巡捕侦知。黄兴等人因涉嫌被逮捕入狱。蔡锷得知黄兴被捕，冒着严寒，火速从上海赶到泰兴，向在泰兴做知县官、又是同乡好友的龙璋求援。龙璋立刻筹措千金，买通狱卒善待黄兴等人；与此同时，江西巡抚夏时也在营救同时被捕的郭人漳出狱，终使黄兴冒充郭的随从，得与郭人漳一起获释。

武昌起义以后，黄兴于10月28日赶到武汉，指挥了可歌可泣的汉口汉阳保卫战，坚持斗争达一月之久。蔡锷得悉武昌起义以后，洞观形势，迅速作出决断，确定立时发动起义。蔡锷到云南后，和在广西一样，"十分沉着，从来不公开与讲武堂来往，却暗中和同盟会会员们保持密切联系，什么人都不怀疑。他利用他的地位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好的掩护。他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但到了这关键时刻，他却召集同志密议数次。10月22日，蔡"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沈石泉、韩凤楼、殷承献及(雷)飙等歃血同盟"，并由蔡锷规定动员时间，准于九月九日午后三时开动，如敌方先动，即时群起赴敌。"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正是黄兴抵达武昌的日子，远隔千里的蔡锷，又"与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沈汪度、刘存厚、张子贞等，会于唐继尧宅，为最后之会议"，熟筹方略，"决期重九夜三鼓举事"。10月30日(九月初九)夜间约9点钟，北校场首先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李鸿祥、李根源随即率领73标由北校场出发，蔡锷则闻声率领74标由城南巫家坝开拔。南北夹击，起义军很快攻入城内。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至11月1日上午，全城都为革命军控制。随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公推蔡锷为都督。不久，云南各地亦相继光复。云南是继湖南、陕西响应武昌起义的第3个省份。这次起义，在西南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对正在武汉进行艰苦卓绝保卫战的黄兴一个有力的声援，也是对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

关于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历来有各种说法。详细评述并非本文任务，不过有几点值得指出：第一。蔡锷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

时，他曾一再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不要"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应该乘胜北伐，"长驱北指，直捣虏廷"，否则，"我再承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由此可知，蔡对袁的诡诈是早有所察觉的。其次，雷飙是蔡锷的贴身同乡，同为樊锥弟子，自从1905年蔡任湖南武备、兵目两校教官起，一直跟在蔡锷身边，关系非同一般。据雷飙云，二次革命时，蔡公早知袁有帝制野心，拟乘此机会，名则派兵定川、实欲合川、滇军会师武汉，以固共和。"雷飙的这番话，由于他深悉内情，应该是可信的。第三，蔡锷是深通兵法的军事家。"兵不厌诈"，蔡锷对此是深有领会并运用纯熟的。如护国战争时，蔡一天发出6个电报，由于对象不同，体现了6种态度，这就是战略的灵活运用，其中心目的即在使敌人摸不清底细，以便争取各方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二次革命前，谭心休奉黄兴之命去劝他兴兵时，他对谭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闻此言，返沪后遍告同志。过去人们往往以这番话作依据，说明蔡不赞同讨袁。其实，这段话既可能是蔡对形势的估计，也可能是蔡放出的烟幕，更有可能是用来迷惑敌人的。

黄兴和蔡锷，都是怀着一颗纯洁的卫国之心投入讨袁护国斗争的。蔡锷在南下之前，即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黄兴则在辛亥革命前即表示，"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在护国战争之初，他又重申："兴屡与国人相助，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所以他们在护国战争结束之后，都敝屣权位，不愿出任要职。黎元洪曾一再要聘黄兴为总统府高等顾问，黄兴坚辞不受。汤芗铭逃走后，湖南议会与各界会商，公举黄兴为湖南都督。黄兴亦加辞谢。他说："湘督一节，鄙人非敢忘情桑梓，故鸣高蹈，特当此人欲横流之日，暂不欲置身政界，转增多口。鄙意湘督一席，最好是蔡松坡。松坡此次首义，名重东南，伟绩丰功，昭人耳目。湘人欢迎，自不待言。"蔡锷本是带病领导护国战争的，由于日夜操劳，病情有增无减。护国战争结束，为了处理善后事宜，曾出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仅半月即请假去日本治病。他们的高风亮节，足以后世楷模。

1916年8月28日，蔡锷在赴日治病途中到达上海，黄兴命黄一欧前往码头迎接，一欧见蔡躺在床上，"瘦骨清肌，面容憔悴，声音也暗哑了。"当回去把情况禀报黄兴时，黄兴叹息不止。蔡锷在沪停留期间，黄兴曾亲往看望数次。9月中旬离沪赴日，又亲往码头相送，依依惜别。那知从此竟成了永诀，时隔仅一个多月，黄兴即因胃血管破裂，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凌晨逝世。此时蔡锷病情日益严重，随侍的石陶钧等怕蔡锷得知，因悲伤而加重病体，凡登有黄兴病故消息的报纸，有意不送给他看。但过了几天，蔡锷无意中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黄兴逝世消息，顿时痛哭流泪，亲撰挽联称颂黄兴功德，深表悼念之情，并函托张嘉森代表往祭黄兴和致电谭延闿，请电中央特别请恤。蔡锷挽联云：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首挽联，既表达了蔡锷对黄兴的崇敬之情，又寄托了自己无限的悲恸之思。既是金石之论，又是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蔡、黄之间的深厚情谊。

离黄兴去世仅仅8天，即1916年11月8日，蔡锷也因悲伤过度，使病情突然加剧，终至溘然长逝。这两位同为民主共和奋斗终生、卓著功勋的民国伟人，虽然就这样相继与世长辞了，但他们的功勋与友谊，将铭刻史册，光照千秋！

（摘自《领袖与群众》武汉大学出版社）

历史考证

梁启超是护国战争发动者、领导者吗

云南讨袁护国起义是谁发动领导的？是我国民国史研究中所罕见的争论问题之一。

第一个出来争夺这项桂冠的是梁启超。1916年护国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在《大陆报》上发表了《国体战争躬历谈》，宣扬云南护国起义是他和蔡锷两人发动的。所谓"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议之结果也"。梁启超在短短不到一年里，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和书信，不遗余力地鼓吹云南护国起义是他和蔡锷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说法为许多近代史、民国史著作所沿袭，也为某些教科书所采纳，在一个时期成了正统观点。

梁启超宣扬他和蔡锷策划领导了云南护国起义，主要依据之一是他在筹安会发起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过程。

梁启超辛亥革命后从保皇到附袁，"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是当时梁启超的八字大方针。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梁启超肉麻地吹捧袁是中国的华盛顿。1912年8月27日，民主党成立，梁启超为党魁，与统一党、共和党同为支持袁世凯政权的三大党。1913年5月29日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名是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为理事，实际上是以梁启超为首领，确定了继续拥袁的方针。7月26日梁启超向袁世凯献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二次革命后，以熊希龄为总理的进步党人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内阁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垮台。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梁启超连续发表了一组文章为"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辩护。1915年1月20日梁启超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的文章第一次发出了脱离政治的宣言，专事文化教育、理论研究事宜。梁启超"自六月杪度偕冯入京晤言后"，就长居天津。

梁在4月末准备返粤时，曾致袁世凯一封长信，劝袁世凯悬岩勒马。6月22日梁偕冯国璋抵北京劝阻袁称帝，但"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梁在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到此时梁启超还是拥袁的。8月袁世凯原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写了《共和与君主论》，原法律顾问日人也写了《共和国宪法持久策》鼓吹帝制的文章，8月14日杨度、严复等人的"筹安会"出笼。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梁启超这时才不得不表明态度，由拥袁开始向反袁的道路走。"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第二，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被他自己说成"不啻金鸡一鸣""对袁投了一棵大炸弹"，"好像一声沉雷，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他"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民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稳耳"。事实并非如此，是梁启超主观夸大之词，他写此文的真意是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实际上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和《异哉所谓支那教育权者》、《难哉使施域之才》等等同为梁启超一般的评论文。同一时期，有关国体的论文不少，其中旗帜鲜明的不在少数。例如1915年8月25日共和维持会宣言"国家将亡，必有妖孽"，9月3日孙中山致函荷属泗水中华革命党人，揭露袁世凯的帝制阴谋，9月15日留美学生联合会上袁世凯书等，历数改变国体之弊端。9月17日《泗水商务总会致袁世凯电》，反对改变国体，要求解散筹安会，9月18日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揭露"筹安会发生乃袁氏所主使"，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一号发表答王庸的二信，批驳筹安会变更国体的谬论，10月10日留日各界发起国庆纪念会启事，反对变更国体，同日欧事研究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发表了《驳君宪救国论》，当时昆明的《觉报》等报刊也发表了不少社论和文章，反对筹安会，反对帝制。10月《甲寅杂志》第九号刊登了周子贤《中国国体论》，说："二次革命之际，梁启超辈如何为袁策划，推翻革命，举国人所闻见，"要求解散筹安会，同时该刊刊载了日本法学博士副易义一著，廖犍译的《支那国体变更并驳古德诺代帝制论》也反对帝制。

因此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绝对不是唯一的"居虎口中直道危言"，也不是"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13日在北京英文报刊上刊载，随后中文报刊也有转载的，立即引起了争论，有著文批驳者，有赞扬者，至今对梁启超的此文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梁文是"梁启超对袁世凯的刻骨镂心的忠谏之书"，有的认为是"在袁世凯的鼻子底下揭橥了反对变更国体，反对复辟帝制的义旗"，不少人认为不仅是一篇讨伐帝制的檄文，而且在反对帝制的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具有革命意义。可是，梁启超自己都说"超本书生，素厌破坏，心所谓危，苦口忠告，上欲以挽国家浩劫，下欲以全项城威信"，他是为了成全袁世凯的威信而写此文的。

第三，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内容看，正如有人指出该文的字里行间，跳动的仍然是梁启超那颗忠于袁世凯的赤心。文章的基调是出自肺腑的娓娓规劝，文章的要害作在"称帝选错了时候"。对梁文的内容，早在1915年10月10日观海写了《驳梁启超反对帝制论》一文中，进行了有系统的批驳。指出："盖梁氏近作，所谓反对帝制者，非不主张袁氏之称帝，不过谓称帝之非其时，非主张共和之决当保存，不过恐帝制之难于恢复，其心筹安会之心，事筹安会之事，无以异也。""尤可恶者，梁氏一面骂人以主张帝制，而己复一面主张帝制；一面骂人以破坏纪纲，创业不正，而己之破坏不正或更过之。"

综上所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客观上确实为反袁活动，起了些作用，但由于梁文内容矛盾，梁文对国体、政体概念混淆不清，梁启超一直是保袁世凯的，像他这样的"舆论界之骄子"发表了不完全同意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在当时确曾引起各方面"震惊"，在客观上增加了反袁的宣传力量。但他的文章绝对不是他所宣扬的反袁"义旗"。

当梁启超拿起他的笔杆子争夺云南护国起义发动者领导者的桂冠时，当即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反驳，最早起来驳斥梁启超的是云南省都督唐继尧，以及参加云南护国起义的白之翰、由云龙、周钟岳等人，贵州的周素园、王伯群、欧事研究会的黄兴以及国民党的其他人士，他们当时都写了文章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1916年12月，唐继尧在悼念蔡锷病故的演讲词中说："要知道云南起义，乃全体云南人，自主自做之事。"为了驳斥梁启超的谎言。1915年12月云南都督府秘书厅编纂了《云南起义事略》经唐继尧修订名为《云南首义记略》并在上海等地的《时报》、《中华新报》上刊登，云南的报纸、杂志纷纷著文阐述云南起义是在唐继尧领导下的"自主自做之事。"据护国起义参加者李鸿祥回忆说："护国军事结束数月后，我回滇一转，发生护国运动发动者谁何之争执。"

云南白小松说"起义之事，实由自决，而史事之误，则由任公"。

贵州周素园1927年2月在《贵州民党痛史草稿》中写了《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正谬》，说："吾舌一日尚存，吾腕一日未断，当尽吾力之所文，声讨梁启超昧良造谎之罪，与天下后世共明之。"

此后，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再次掀起了争论的高潮。

云南护国起义发动者领导者是谁?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是梁启超、蔡锷发动领导的；有说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策划发动的；有说是唐继尧策划领导的；有说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薰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所发动领导的；有说是黄兴与唐继尧一道策划领导的；有说是两党(进步党与中华革命党)合作领导；有说是三种势力合流发动的；有说是多种势力合作而成的。

现在我们对上述的几种主要论点进行简要剖析：

①所谓"梁启超、蔡锷发动、领导"说。众所周知，这是梁启超自己吹出来的。他说"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

梁启超一贯以护国英雄自居，实质上梁启超作为改良派，对袁世凯是忠贞不二的。他只是在全国反袁的大好形势下，对袁"忠谏"不成，才转而参予反袁斗争的，他的每一步活动，都打上深深的改良派的印记。在云南护国起义时，梁启超仅仅是配合了起义，间接地通过蔡锷参加了云南护国起义的一些工作，为云南护国起义代拟了些文稿，起到了"师爷"的作用，梁启超远离起义地点，只能是有一点运筹之"功"而已。"余自云南初起时，即在沪专务鼓吹舆论、联络各省"。

②所谓"唐继尧领导发动"说。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文献都一致承认云南起义时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为首，唐是盟主，名义上的挂帅人物，因此有人认为唐继尧是领导讨袁者。

我们说名义上的挂帅者，不等于云南护国起义的英雄、代表人物。犹如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并没有把挂帅者黎元洪、发动起义者文学社的蒋翊武作为辛亥革命的代表人物和旗手一样，一致公认的辛亥革命的旗手是孙中山。

③所谓"国民党领导发动"说。邹鲁、李宗黄在其编著的国民党史中说云南护国起义是国民党发动领导的，"护国军崛起之动力，实为革命党人继辛亥革命势力之再起"，"在国民革命史立场看来，它还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整个革命军运动的一环"，"国民党革命的力量所以开导其先路，策动其义举"。

无数事实说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虽然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最坚决的力量，但他们在各地组织暴动，策划起义，由于种种原因，停留在单纯军事冒险上，因此不断遭到失败。国民党人叶楚伧则认为："这段革命过程，不过是讨袁反帝的宣传，不能算是本党的革命运动。"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在《云南首义之回忆》中说："滇黔当日之义举，非一党专致，乃两党合作，故得合群力，收集思广益之效。"国民党的陈训慈认为云南护国起义是三种力量合流：一是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进步党；二是西南数省军人的力量，三是国民党的力量。

④所谓"中下级军官领导发动"说。王伯群说"云南一事，外边以为是唐继尧主持，实在是我们多数同志在下层蕴酿而成功的"。原云南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也说"民国四年秋间，筹安会初起，群下三、五组集，已无日不在秘密筹议运动之中"。

在当时条件下，光靠几个下级军官，发动不了这样大的运动的。因此中下级军官所领导发动的也是不可信的。

云南护国起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领导权，他迷信武力、依恃列强、背叛民国，公然称帝，遂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党各派和各族人民在反袁的旗帜下，不断汇集，组成联合阵线，最后取得了反袁斗争的胜利。云南护国起义是各派联合发动的领导的。

马列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爱尔维修所说："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作为一个时代的运动必然要有一个代表人物，云南护国起义作为一个时代的进步的运动，当然不能例外，也有自己的代表人物。

这个代表人物是谁呢? 我认为：

第一，从宏观上讲，云南护国起义是属旧民主主义的范围，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辛亥革命的旗手是孙中山，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前后一直领导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影响和带动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孙中山又直接支持了护国起义。因此从宏观上讲，护国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完全合乎历史的事实和逻辑的。

第二，护国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辛亥革

命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保存得比较好的一个省份，全国反袁力量也集中在云南，形成了云南护国起义的群众基础。因此云南起义不是哪几个人发动的，也不可能靠几个中下层军官就能发动领导起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来。如前所述，任何运动都是自己的旗手和代表人物，笔者认为，云南护国起义的代表人物是在云南护国起义中有重大贡献的，实际亲自参予领导的人。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又亲自参加了云南护国起义，由于他的声望，壮大了云南起义的力量，他率领护国军第一军入川，浴血奋战，在众寡悬殊的艰难条件下，他奋不顾身，与部下共甘苦，终于取得了讨袁战争的伟大胜利，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死后，人们一直怀念他，以他作为护国战争的英雄。蔡锷实际上是当时发动云南起义的中心人物，又是帅师入川的主帅。为尊重这段历史，为敬仰蔡锷的丰功传绩、为尊重多年来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感情，现在仍然要以蔡锷为护国起义的旗手、代表人物。

（摘自《护国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陈其美是不是上海青帮大头目

有两种不同说法。

【曾是上海青帮大头目】持此说者以胡绳、黄德昭为代表。

胡绳认为："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是上海帮会集团（所谓'青帮'）的一个头子。"

黄德昭也认为："陈其美曾在上海加入青帮，并且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游乐场所，多有党羽。一九一〇年四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为了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在上海组中部同盟会，很重视陈的力量，约他参加，并委托他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设秘密机关，负责策应。"

【不是上海青帮大头目】持此说者以郭斌、杨树标、赵宗颇等为代表。

郭斌、杨树标认为："称陈其美为青帮头子，则在当时还不够格！""陈其美未曾在浙江会党中做过革命的联络和发动工作，在陶成章叱咤风云的时候，他还是个上海滩的流氓，一九〇五年才当上了上海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一九〇六年夏，与谢持留学日本，入东斌警监学校，""他在日本混了近两年，加入同盟会。"

赵宗颇则认为："陈其美参加青帮与否，是值得怀疑的。"他列举了几条怀疑的理由，指出，第一，据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记述，陈其美在武昌起义前，是上海滩一个不出名的新闻记者，连上海自治公所总董、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都不认识他，"如果陈其美是青帮大头目，称霸一方的青皮流氓头子，那么地方实力派李平书和号称维护地方利益的自治公所的议员们，怎么会对陈一无所知呢？"第二，"在陈其美死后十一年，他的拜把子兄弟蒋介石于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以后，每逢陈的忌辰，都要举行纪念会，由党政要员报告陈的生平事迹。"但"在这类报告中，也从未提及陈加入青帮，须知青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帮助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窃夺北伐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陈其美若是青帮的大头目，为什么在追述其生平事迹时，却避而不谈呢？而那时正是青帮最红的时期，也没有忌讳的必要"。第三，陈其美在上海响应武昌起义，"亲自督率以青帮头目刘福彪为首的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而刘福彪与陈其美相识，则是由中国公学学生刘承樵引见的，假如陈是青帮大头目，刘福彪何必由刘承樵引见？"第四，陈国屏著《清门考源》一书，收录大字辈帮人，但无陈其美，"假如陈其美是个大字辈，怎么能把他遗漏呢？"据此，赵宗颇指出："那种断言'陈其美是青帮大头目'，进而演化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的说法，显然是缺乏可靠根据的"。

（摘自《中国近代名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风云人物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 黎元洪字宋卿，号黄陂。湖北黄陂县人。1864年生，1879年进私学正式受学。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先后在海军、陆军中工作。1906年任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相当于后来的旅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后来的袁世凯政府中，任副总统。1916年袁氏死后，黎继任大总统。1917年被总理段祺瑞驱走。1922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大总统。1923年又被直系驱走，寓居天津。1928年病死，终年64岁。

黎元洪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和素养。在天津水师学堂期间，曾经以操课成绩优异，得到总办周馥、监督

严复的嘉奖。1888年毕业，派往海军服役。1890年被调往广东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1893年一度应调去湖北任炮厂监工，后又回广东。1894年升为广甲舰管轮，驻上海。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该舰奉调北上增援，在渤海口触礁，又被日舰击沉。黎等穿救生衣落水，飘浮到旅顺登岸。

战后，黎元洪脱离海军，到南京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受到器重；先命监修狮子山等处新式炮台，后委为炮台总教习。1896年，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黎随张到武昌，被委为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东渡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升为护国军管带、督带。1905年，任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兼护该镇统制。1906年任由第二镇改编成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并以第八镇统制名义率南军参加在河南彰德举行的秋操，得到"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好评。在清末收回铁路自办运动中，黎元洪以军界代表参加"湖北铁路协会"。1909年湖北水灾严重，黎曾带兵下乡弹压饥民。1910年任陆军讲武堂会办，其地位和声望逐渐引起社会各界注意。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黎元洪曾多次处分渗入他的军队的革命党人，压制革命士兵的活动。10月10日，起义的当晚，他还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然后又惶惶不安、逃匿不见。后来，由起义军从床下拉出，被胁迫勉强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在革命军相继光复汉口、汉阳，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后，黎的态度才逐渐由消极转为积极；在黄兴到汉口督师作战期间，尚能予以适当的支持和配合。当武昌首义，群龙无首，又值汉口、汉阳战事紧张之际，黎元洪的出任，虽然在军事指挥方面没有做出重大的积极的贡献，但在稳定革命军阵线方面却是有益的。11月9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昌组织中央政府，后来，由于汉口、汉阳先后失守，代表会议改在南京举行，黎元洪被举为大元帅。12月下旬，孙中山回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组建南京临时政府，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上台后，黎元洪仍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1912年4月，共和党成立，拥黎为理事长。自参加起义以来，黎元洪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曾先后伙同袁世凯或假手他人，将反对自己的革命党人或起义元勋宋锡全、张振武、方维和蒋翊武等人杀害，并亲 自下令处死载文批评自己的汉口《大江报》编辑凌大同，他常以"乱党"名义，排挤摧残湖北革命势力。二次革命爆发前，黎屈从袁世凯，同意北洋军队预先进入湖北，为进攻国民党的讨袁军提供基地。二次革命失败后，黎进一步投靠袁氏，支持袁解散国会，并被接到北京幽居瀛台，成为袁氏手中工具。1914年6月，袁世凯成立御用参政院，任黎兼院长。在袁准备称帝的过程中，黎逐渐产生离心倾向，不愿做袁的殉葬品。曾几次谋求离京，为袁所止。1915年，黎表示不能违背民国，请辞参政院长、副总统之职，并搬进了东厂胡同寓所。12月15日，袁世凯册封黎为武义亲王，他坚辞未受。对复辟帝制的闹剧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下令恢复民初约法，定期召集国会，释放政治犯，通缉帝制祸首，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等等。但黎元洪被掌握实权的总理段祺瑞所制，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导致公开冲突。段力主对德绝交，黎则反对。段祺瑞煽动各省督军向黎施加压力，黎坚持宣战案以国会表决通过方能有效，国会则因段采取武力威胁拒绝讨论。段唆使别人提出要求解散国会的呈文，黎被逼下令免去段的职务。于是，安徽、直隶等北方各省督军纷纷宣布脱离中央，新被任命的北洋人物王士珍、李经羲又不愿就总理之职，黎元洪只好答应由驻徐州的张勋率辫子军进京调解矛盾。张勋借机要挟黎下令解散国会，并公然于7月1日捧出清废帝溥仪复辟。黎元洪拒绝在"奏请归政"的手续上签字，于7月3日逃进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并不得不重新恢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令其率部驱逐张勋，同时电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段祺瑞带兵赶走了张勋，7月14日回到北京，把黎从使馆迎回，冯国璋请其复职，黎表示不再回任，南方各省决定迎其南下亦未成行。8月，离京赴天津英租界寓所，成为 寓公。

1920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战胜皖系军阀段祺瑞，1922年又战胜奉系军阀张作霖，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又把黎元洪拉出来复任大总统，并召集旧国会，搞所谓"法统重光"的政治骗局。黎提出在军阀同意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条件下，于6月11日到北京就职；当天下令取消1917年6月24日所发解散国会令，电邀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岑春煊诸人北上共商国事。但黎这次入京，仍不过是直系军阀控制下的一名傀儡，内阁和国会操在直系手中，大小事情都要请示在洛阳的吴佩孚。1923年初，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电痛斥兵匪之害和督军制的流弊，甚至明说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无异自己的太上皇。他还派人与孙中山谋求和平统一。曹、吴拥黎上台是别有所图的，所以，黎上台不久就为了任期问题和曹家党徒发生争论，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派人收买议员，迫使国务总理辞职，陷政府于瘫痪；又指使北京军警官佐向黎索饷，雇佣流氓便衣军警组成"公民代表团"游行请愿；军警罢岗，断绝总统府的水电，其部下还以辞职相威胁。黎不甘示弱，6月12日一天内发生七道命令，申明在京不能行使职权。13日，偕随员专车出京。14日晨车抵天津车站后，曹锟令直隶省长王承斌带领军队把他围困十多个小时，向他索取总统印章，逼迫他签"辞职"文。直到他交出印章，才被允许下车回家。

黎元洪在天津将事变经过通电全国，各方反映冷淡。

9月，在部分议员邀请下，离天津赴上海，力图组织政府反对直系势力，未能成功。10月，东渡日本养病，1924年5月回天津。该年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段祺瑞重新执政。1925年1月，孙中山北上过津晤黎。1926年，段祺瑞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协商拥黎出任总统，黎未予理睬。如果说，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以后，民国只剩下一块招牌，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块招牌就是黎元洪。各派军阀在用得着的时候，就把他挂出来；用不着的时候就踢开。黎元洪本人，开始也乐于供人利用，后来则多少表现了一点自主意识，对军阀们的胡作非为略有抵制，终于没有"违背民国"。

晚年，黎元洪把多年巨额积蓄投资实业，其中以煤矿为主，且长期担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此外，他在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面粉、纺织等业及湖北石膏公司等，均有投资。在武昌油坊岭等地还购有大量田产出租。有人据此称他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意识。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患脑溢血死于天津。1935年11月24日，国民党政府为之举行国葬，章炳麟为其墓撰《大总统黎公碑》

（摘自《中国近代史记》徐泰事）

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西南军阀滇系集团的首领。他不仅在地方军阀中，而且在早年参加同盟会、以后却变成军阀的人物中，也是很典型的。

唐继尧生在一个"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的地主家庭。中过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曾参加同盟会，但他一开始就不是一名好会员，除了当时对武装起义态度消极外，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仕进、前途。在万余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的歧视政策，或罢课、或回国时。他却一反众议，继续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新军七十四标一营任管带等职，因其不辞劳瘁，"多为大府嘉纳"。1911年，参与昆明起义，在"大汉云南军都督府"中任军政、参谋两部次长等。1912年春，他在奉派北伐途经贵州时，却利用贵州地方宪政派与自学社党人的矛盾，袭占贵阳。他实行大屠杀，并依靠贵州宪政派旧官僚等封建势力的支持，一跃而为贵州临时都督。这以后，他不仅在迁都北京，善后大借款等问题上，表明了亲袁的态度，还以出兵反对"二次革命"，表明他背弃了当年参加同盟会时的初衷，开始走上拥兵自重的军阀道路。

1913年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在1915年护国运动中，唐继尧被迫同意反袁。12月25日，与蔡锷连名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尽管他对讨袁并不积极，还借护国之名扩张其势力，就客观历史作用而论，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唐继尧是有功有过，应予实事求是的总结。但从护国战争结束，他将护国军三军扩为八军，积极向四川扩占地盘等表现看，他在军阀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了。

1917年唐继尧参加护法运动，但又不就任护法军政府元帅。1918年他又暗与北洋军阀勾结，且与陆荣廷策划改组护法军政府、排挤孙中山，从孙中山所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将唐继尧这个滇系军阀集团总头子的本质已揭露无遗了。

此后，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打败刘存厚、赶走吴光新，拼命向川、黔等地扩张。1918年5月，唐继尧任川、滇、黔、鄂、豫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号称"联帅"。同年下半年，他还与吴佩孚等达成军事同盟密约《救国同盟》。这是西南地方封建军阀集团——滇系的极盛期。也充分暴露他不仅想称霸西南，还想逐鹿中原、作东大陆主人的野心。

唐继尧不断出兵川黔，挑起战争。而滇系军阀一旦丧失向外扩张的势头，其内部矛盾就不免激化，1920年，川滇军阀之战滇军失败后，第一军军长顾品仙即以"士兵厌战"，为由，率部回滇，驱逐唐继尧。迫使唐继尧于1921年2月辞职，流亡香港。1922年春，唐继尧策动北伐的驻桂滇军回云南而再掌云南军政大权。这时的滇系军阀已只能参与"联省自治"的合唱；并实行"民治"，唐就任省长。尽管唐继尧又扩编所部滇军五军为"建国军"，且自号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但他毕竟只能力保地盘罢了。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后，仍不计前嫌，力促唐参加北伐，且在广州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提议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但他不但拒不接受，还在1925年1月陈炯明进攻广州时，派滇军入桂，占令南宁、进逼广州，与之呼应。3月12日孙中山刚逝世，3月18日唐继尧便通电就副元帅职。在企图夺取广州政府的领导权阴谋未逞后，又企图颠覆广州政府。3月19日，广州政府通电讨伐唐的反革命行为，并击溃在粤的滇、桂军。8月，南宁、柳州的滇军也不得不先后退回云南。

在唐继尧反动统治之下，连年扩张战争，不断增加苛捐杂税、以及滥发纸币、强售公债、统运大烟等等，使云南的人民群众如在水火，不断奋起反抗。

1926年下半年，唐继尧加紧与吴佩孚、孙传芳相勾结，妄图"反共""讨赤"，但随着唐继尧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1927年以龙云为首的四个镇守使发动的"二六"政变中，唐又一次交出政权，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唐继尧"愤懑吐血"，终于在1927年5月23日不治而死。而滇

系军阀集团仍在西南和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影响和作用。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蔡　锷

蔡锷(1882～1916)　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县亲睦乡。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蔡锷在他三十四年的短暂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值得怀念的东西，虽然他在辛亥革命前，追随过君主立宪派，辛亥革命后，对袁世凯有过幻想，反对过“二次革命”，但这些都是其生涯中的支流，而且并未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他所做的两件事情，即参与领导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具有深远影响，其功绩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是蔡锷对中国人民所做的第一件好事。

蔡锷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即于1904年返国，由于蔡锷曾致书湖南巡抚赵尔巽及当地士绅，请其力行新政，为各省倡，于是“东南封疆大臣，咸知公名矣”。因此，他一回国，即受到各省巡抚的重视和聘任。在广西新军任职期间，由于形势变化及与革命党人接触，蔡锷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人的同情、赞助有所增加。据传，这一时期他曾参加同盟会，林虎说：“1905年，黄兴到桂林，由黄兴召集其平日所注意的同志九人加入同盟会，由黄兴主盟，按各人年龄为次序填写誓书，当众焚誓。人名次序为黄兴、郭人漳、蔡锷、赵声、杨祖时、雷殷、胡毅生、卢竞寰、杨尊任、林虎。”此事虽然还有不少辛亥革命老人提及，但因史料不足，很难证实。不过有一点却是能肯定的，即他对革命党人的活动是抱支持、同情态度的，否则他参加领导“重九起义”就无思想基础可言。

蔡锷为人处事，颇为沉着、冷静，不轻易表态和任意行动。他在广西任职的后期，由于采取了对革命党人较冷淡的态度等原因，因而惹得广西同盟会员们发起驱蔡风潮。

1911年初，蔡锷到滇。这时，蔡锷认为：“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因此，在等待就任新职之时，伏案著书，写成《曾胡治兵语录》。蔡锷编辑此书，附以按语，虽然对曾国藩、胡林翼赞赏备至，但他编书的本意，并不完全同于曾、胡，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民族危机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希望加以“挽回补救”，从而“厉兵秣马”，以对付外国侵略。这本书，在当时颇有影响，1924年，黄埔陆军学校还曾以《曾胡治兵录》作为教材，发给学员。

1911年7月，李经羲向清廷上奏，推荐蔡锷担任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奏章中说：“第三十七协统领官分省补用知府王振畿，现经调充兵备处总办，遗差查有前充广西兵备处总办，留日士官毕业生蔡锷，干练果毅，经验颇深，堪以委充第三十七协统领官”。清廷同意李经羲意见，并令“赏给陆军协都统衔”。

1911年8月，“川路事起，同盟会机关总部通告约期起事”。革命党人加快行动步伐，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嗣后湖南响应，川黔动摇，云南革命党人积极行动起来，从10月19日起，云南同盟会领导人在唐继尧家中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和“同议可共事革命之人员”名单，蔡锷被列为“可与谋革命之人员”中的第一位，以后又分别在刘存厚、沈汪度、唐继尧家中召开了四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蔡锷及与会者唐继尧、刘存厚等歃血为盟，在10月28日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于10月30日深夜十二时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临时总司令。会上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在辛亥昆明重九起义中，革命志士牺牲150余人；清军死者二百余人，伤者百余人。所以后人评论说：“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战至第二天中午，占领总督署，昆明重九起义成功。不久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云南全省光复。

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在蔡锷的领导下，云南军都督府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省一级政权机关，其组织是比较完备的和稳定的，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某些有民主色彩的改革。蔡锷一反清廷官吏作风，自己带头，两次裁减薪金，使云南都督的薪俸与一个营长相等，“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1913年，宋教仁被刺事件和善后大借款的相继发生，惊醒了孙中山及一部分国民党人，使他们逐渐认识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决定武装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差不多波及到整个中国南部。其时，蔡锷不仅没有反袁表示，反而暗中为袁出谋划策，要袁“早日扑灭”，蔡锷曾致电袁世凯说：“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以免星火燎原。”蔡锷当时有这样的表现主要是因为袁世凯的面目还未完全露出，其身份还是临时大总统；蔡锷作为与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有着深厚师生关系的人，对当时国民党与袁世凯之争，还有着扭曲的认识，以为是党争；在经历了清末以来长期的动乱后，人们普遍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这些，使蔡锷在“二次革命”期间站在袁世凯一边。

然而，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和热情没有维持多久，就为袁世凯独裁和卖国的行径所扑灭。袁通过流氓手段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后，更加肆无忌惮，他下令解散国会，取消《临时约法》。蔡锷到京后的一两年，眼见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受到深深的刺激，迫使他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尤其是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蔡锷等一批官吏的反对而不顾，接受了几乎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样，蔡锷对袁的幻想，终于被铁一样的事实所粉碎，促使蔡锷走出了从拥护到反袁的决定性一步。

云南护国首义时，蔡锷已得重病，据朱德回忆，当他率队到达昆明去见蔡时，只见"他瘦得像个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蔡锷正是带着病残的身体，不畏艰难，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武装讨袁最前线，其精神为后人叹服。

当时，护国军经费十分困难，成立总司令部时，仅领得一万元作经费。因没有经费，三个主力梯团中的二、三梯团竟无法成行，后因罗佩金参谋长"以数世积累之产，押之殖边银行，得银十二万元"，才得以成行。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十九大罪状。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即达五、六千之多。

袁同时调兵遣将，以七万大军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总数不过万余人，但士气高涨，蔡锷指挥得当，得到广大人民支援，所以双方在泸州打成均局。后来由于广西将军陆荣廷被梁启超劝说起义，北军主力冯玉祥部又骑墙观望，使战局大为改观。护国军乘此反攻，北军司令张敬尧见己军伤亡惨重，只得与护国军停战议和。眼见袁世凯政权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各国逐渐改变态度，北洋军阀内部亦山崩离析，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都持消极态度。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使袁心惊肉跳，不得已于3月22日下令撤消帝制，百日帝梦，逐成泡影。但袁还想赖在大总统位置上，并虚张声势地以"大总统"名义发号施令。蔡锷、唐继尧即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其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其进行审判。同时，蔡锷清醒地看到形势仍十分险恶，指出"袁撤消帝制，是为了缓和目前人心，将来还会反扑，要作好打仗准备"。5月8日，滇、黔、桂、粤省各省反袁力量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务院，有力地促进了护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情况下，北洋军阀纷纷"反正"，宣布独立。袁世凯忧病交加，于6月6日上午10时死去，护国战争无形中结束。蔡锷作为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发动、领导、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坚决果断，运筹帷幄，艰苦奋斗，对于粉碎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保卫共和制度，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其带病坚持战斗在第一线，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护国战役后，蔡锷处理完主要善后事务，赴日治疗，但终因积劳病重，于1916年11月8日上午4时，逝世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终年34岁。

（摘自《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中华书局）

龙济光

字子诚，又字紫诚，云南省蒙自县人，1867年生。原为当地土司，1901年因办团练得到岑春煊赏识，被授同知衔以道员补用。1903年后曾任广西泗城知府、广西右江道、广西左江兵备道、广西太平思顺道，1909年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率军进驻广东肇庆，任广东新军统制官、第二十五镇统制官。1912年任广东副护军使，1913年8月后任广东都督。1914年6月又被任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所部改称为振武军。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所部被驱至海南岛，任两广矿务督办。1917年护法时期，北洋政府任其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1918年被护法军击败，后在天津小站重编振武军，1920年直皖战争时，所部被奉军缴械遣散。后北洋政府授予将军府隆威上将军。1925年3月故于北京。

张敬尧

字勋臣，堂号百忍堂、庆馀堂，安徽省霍邱县人，1880年生。1897年入新建陆军步兵学堂，后曾任哨官、京旗常备军教习。1904年在陆军第三镇任队官、帮带，1905年在陆军第六镇任营督队官。1906年入保定军官学堂第一期，1908年后任陆军第六镇的营管带、标统。1912年为陆军第六师步十一旅二十二团团长，1913年7月任步十一旅旅长。1914年3月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9月任陆军第七师师长。1915年12月任征滇军右路司令，1917年任苏皖豫鲁四省剿匪司令。1918年3月任湖南督军，并兼任湖南省长，1920年6月被驱走，1925年任直鲁联军第十二军军长，9月被授为将军府贞威将军。1927年任安国军第二方面军团副军团长，1928年兵败后居于大连。1933年5月7日被国民党军统暗杀于北京六国饭店。著有《征赣记略》。

陆宗舆

字润生，浙江省海宁县人，1876年生。1899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1年后曾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考察宪政大臣参赞、东三省盐务督办。1908年后任宪政馆馆员、资政院议员、印铸局局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度支部右丞、代理副大臣。1913年12月至1916年6月任驻

日公使，1916年秋任交通银行董事长，1917年任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19年初任币制局总裁，系新交通系的主要成员。"五四"运动时，被列为三大卖国贼之一，1919年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下令将其免职。1925年任执政府的临时参政院参政、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1941年故去。著有《陆润生五十自述》。

吕公望

字载之，浙江省永康县人，1879年生。1905年入光复会，1906年入浙江巡抚署卫队当兵，1907年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炮科，后在浙军中任见习官、广西兵备道科员、浙军八十二标督队官。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浙军支队参谋长。1912年后任浙江陆军第六师步十一旅旅长、第六师师长、嘉湖镇守使等职。1916年被推为浙江省督军兼任省长，1917年北洋军入浙，被免职，授为将军府怀威将军。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援闽浙军总司令、军政府参谋长。1921年后在天津闲居，1927年任北伐军浙江宣抚使，1928年后在家乡经营工矿业。抗战时任浙江赈济会委员。1946年任浙江省议会副议长。解放后任浙江省政协委员。1954年6月病逝。

倪嗣冲

字丹忱，安徽阜阳县人，1868年生。曾中秀才，在淮军中任职。因其父倪和曾在袁世凯家中任教，遂于1895年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升至北洋营务处总办。1907年捐纳为知府衔，经徐世昌力保任奉天提法使、黑龙江布政使兼巡防军翼长，1909年被锡良参奏革职。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1912年任武卫右军翼长、督办皖鲁豫四省剿匪事宜，1913年7月任安徽都督。1914年6月任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安武军总统领官。1916年7月改任安徽省长，1917年7月任安徽督军，1920年7月皖系失败后被免职。1924年故于天津。

珍闻轶事

清末民初的"四大"

清末民初，号称"四大"的非常之多。戏曲界，前有"四大名昆"，指谭鑫培、王楞仙、陈德霖、何桂山；后又有"四大名旦"，指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中医界有"四大名医"，为孔伯华、萧龙友、杨浩如、汪逢春。其中孔伯华开药方喜欢用石膏，外号"孔石膏"。北京有"四大凶宅"，为湖广会馆、万福居、西城大同公寓、东城某公寓，都以"闹鬼"而远近驰名。当时，关于这几个凶宅的传说很多，见神见鬼，活灵活现。饭馆中有"四大名居"，即广和居、万福居、同和居、砂锅居。四名居各有名菜：广和居以潘鱼、江豆腐著名；万福居有赛螃蟹、万鱼；同和居的拿手好菜是三不沾；砂锅居是白肉馆，只以一味猪肉能制出各种口味不同的菜肴。晚清还有"四大恶少"，指张君宜、岑春煊、左孝同、劳太乔而言。四人都身出权门，少时倚仗家庭的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时，他手下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号称"四大金刚"。

此外，以"四"见称的，清末有所谓"四谏"，指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四人而言。当时以陈等为首，常在竹筠庵集会，议论时政，直言弹劾，声震一时，而后来大多收声敛迹，和光同尘。陈最后做了溥仪的师傅，更以老成稳重见称。戊戌政变时慷慨就义的六人，当时称为"六君子"，而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又称"军机四卿"，因为四人在政变前经光绪帝载湉授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为新政的主要参与者。

还有，陈三立、谭嗣同、吴彦复、丁惠康曾号称"四公子"（另一说以陈、谭、吴及陶葆廉为"四公子"）。其中，陈、谭两人都曾在戊戌政变中获罪。谭嗣同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戊戌政变时，嗣同被处死，而继洵却因事先写信给嗣同有所训诫，得免于罪。另一说是：继洵训子的家书，实际是嗣同在将被捕前怕连累老父而代写。陈三立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戊戌政变时，父子同受到革职、圈禁的处分。三立号散原，致力于桐城派古文，被推为一代宗匠，同时以诗名，与陈宝琛（沧趣）、陈曾寿（苍虬）并称"海内三陈"。在抗日战争发生前，陈三立曾一度寄居庐山。蒋介石慕陈之名，派专人前往罗致。陈故意问来人："蒋现在做什么官？"来人答："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又问："相当前清什么官？"来人说："委员长的地位实际等于前清的皇上。"陈假装惊讶道："哟！喏大的官！"不管来人死话活说，陈终于不肯应召。蒋自找无趣，碰了一个钉子，受了一番奚落，但也无可奈何。

在袁世凯称帝时有所谓"嵩山四友"，为赵尔巽、徐世昌、张謇、李经羲。后来，李经羲在丁巳复辟事件前做了几天短命的内阁总理。徐世昌在丁巳复辟后一年从安福国会手中当选为非法总统。"嵩山四友"的称号，脱胎于"商山四皓"，而实际是比拟不伦。

（摘自《民国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金匮石屋

袁临危的时候，把老朋友徐世昌由河南辉县接到北京来，与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同为接受遗嘱的人。六月五日，徐匆忙地赶到公府，袁向他投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徐勉强地安慰他说："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但又接着说："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是好的。"

袁眨着惨白无神的眼光，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约法?约法有新有旧，袁所指的究竟是哪一种约法?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个约法是被袁用命令废止了的，而西南护国军所坚持的正是要恢复这个约法的效力。新约法是袁自己制造出来的，关于继任总统的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藏之金匮石屋，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人中决选一人为总统。

直到这个时候，袁克定还没有放弃继承大位的野心，他在榻旁替他的老子补了一句话："金匮石屋。"

袁的精神萎顿不堪，由法国医生打了一针强心剂，才在昏迷状态中苏醒转来，口中喃喃地说："他害了我。"这句话的用意永远没有人知道，是他的儿子害了他，朋友害了他，还是部下害了他?

到六月六日，这个军事封建大独裁者抛弃了皇冠和总统的尊位，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后来有人泄露出来，段祺瑞的名字原先写的是袁克定，袁病重时瞒着儿子改写了段的名字，袁克定还蒙在鼓里。袁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变了卦呢？这并不是意味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能说明他善于为自己打算，不把"家天下"的把柄留在人间；同时也知道，他死后别人断不会辅助这个泄了气的皇太子继承大统。

关于总统的继任人选，名单虽已看过，但是大家打不定主意，都请徐世昌首先发表意见。徐主张根据约法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他和袁临终前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界限，这倒不是由于他神志昏迷，恰恰相反，却正是这个老官僚的精明独到之处，因为新约法是西南护国军所反对的，旧约法又是北洋派所不满意的，不言新旧，但言约法，就能够做到面面讨好。无论根据新约法或者旧约法，黎元洪都有资格继承总统。利用黎来收拾残局，利用这个政治俘虏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说来是当时最好的打算。

徐又怕他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于是他又瞟了段一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取决于总理。"

段不开口说话，屋子里沉静得像荒山中的古庙一样。大家足足等了一刻钟，才听得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两个字"很好"。

（摘自《北洋军阀盛衰及消灭》张国淦）

袁世凯葬礼

袁世凯称帝后，因全国人民反对，而气恼成疾。"夜间失眠"，"喜怒不定"，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呆若木鸡。虽经中西名医多方医治，三儿媳"割股疗亲"，都无济于事，于1916年6月6日因尿中毒一命呜呼。终年57岁。

袁世凯死后，在怀仁堂停灵21天。6月28日起灵，火车运至彰德洹上村家中，又停灵开吊，至8月23日下葬于太平庄。前后共用78天。

袁世凯死讯传出以后，独立各省悬旗祝贺，护国军"三军雀跃，万众欢腾"。但是，北京政府却下达命令说："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意。"丧礼及营葬费用，北京政府拨款50万元，又由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张震芳等袍泽捐款25万元。通令全国下半旗，禁止民间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服丧，停止宴会27天；还要在停灵期间组织人每天轮流去灵前行礼。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新华门外举枪致哀。出殡时，大总统黎元洪到新华门恭送。总揽北洋政府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率百官执绋步行到车站，并送丧到彰德。灵车从车站出发时，鸣礼炮101响。

袁世凯的丧葬，在家庭内部，是由其长子袁克定主持的。袁克定热衷帝制，曾私铸"大皇子印"。袁世凯病重时，就由他代替批阅公文。现在他仰承父志，把丧事办得无比隆重奢华，处处模仿清室帝王仪注，把袁世凯装点成"大行皇帝"一样。

袁世凯遗体入殓时，没敢穿原准备"御极大典"用、代价80万元的两袭龙袍，又不甘心着大总统服，于是把1914年12月23日冬至，仿效皇帝在天坛祭天时的一套行头拿来。头载平天冠，身穿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绣千水纹紫缎裙。这副非驴非马的打扮，却也正好和他既是总统又是皇帝，一会儿总统，一会儿皇帝，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当上皇帝的身份相称。

袁的丧葬执事，由曾经承办过清室帝后丧事的永利杠房办理。用的是皇杠，杠夫32名。棺罩用黄缎底绣龙、云、水纹。出殡时，也由32名杠夫将灵柩抬至新华门外，换80名杠夫的大杠。

出殡路线是：从怀仁堂南出新华门，过天安门，出正阳门，到京汉路车站（即前门车站）。沿途布满军警，黄土铺路，清水净街。殡仪行列由警察、保安队开道。然后是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统府军乐队、华乐队各七八十名，奏着哀乐。另有清音一份，奏笙、管、笛、箫、九音锣等鼓乐。五棚僧、道、喇嘛，穿着鲜亮的法衣、道袍，手执引幡、经幢，吹奏法器。撒纸钱也与众不同，几辆轿车载着黄纸钱，撒满沿街。指挥丧仪行列行止的催押锣有五对。红缎子做的铭旌特别高大，由22名杠夫抬行。其他打香幡、伞、扇和各色绣旗的，抬香亭、彩亭和金山、银山、鹿、鹤、奴婢冥器的，执金瓜、钺、斧、朝天蹬和各种木制金漆枪刀、虎头牌的，共几百人，都穿着各色銮驾衣。拿花圈、挽联、雪柳的，计二三百人，都穿着一色的白孝衣。小拿48名，用方盘托着袁世凯生前爱玩的古董玉器。他们还负有“助哭”即帮助孝子哭泣以增强悲哀气氛的使命。

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车一辆，内放“皇帝”应用的各式器皿。执事们手执长枪，身背弓箭，骑在马上。12对黄鹰、细狗、骆驼、蒙古包，披红挂采。这些都是清朝皇帝外出时的排场。还有影亭一座，设袁世凯的大照片。魂轿一乘，供袁世凯的魂牌，由袁的卫队1百多人护送。黄色绣缎座伞下，由侍卫牵着袁世凯生前的坐骑一匹，杠夫抬着虎皮椅一座。在魂轿前后，还有袁世凯花40万元特制，供登极使用的金漆盘九龙嵌珠宝皇帝宝座。花24万元雕成的传国玉玺——“中华帝国之玺”，和御宝——“皇帝之宝”，都由穿绛丝銮驾衣、着金边大黄帽的杠夫抬来了。大概袁世凯还想到阴曹地府去坐在皇帝宝座上，发布诏令吧！

执绋送丧的宾客有外交使节、文武官吏、清室代表、生前侍卫侍从、门生、亲戚等。

袁克定头戴麻冠，左手持魂幡，由两个侍从扶着，和16个弟弟在灵柩前行走。灵柩后有48名后护刀枪手。再后是袁世凯的大太太于氏、8个姨太太、13个女儿、几房儿媳妇和其他女眷，都乘坐轿子或马车，带着丫环仆妇。

于氏麻布包头，穿麻衣，手捧青玉宝瓶，内装各种祭品少许，以备死者在阴间享用。按民俗，宝瓶应由大儿媳抱持；让大太太来捧，这是依清廷规矩办事。

送丧队伍前头到达前门车站时，大杠还在新华门口。这天，京汉路局为袁世凯运灵，开了三列专车。一列是隆裕太后死时曾经用过的灵车新装修的，运送袁的灵柩及家属。一列运仪仗、执事、工匠、伕子、卫兵。政府官员坐在第三列车内。

出殡时，除了在前门车站由段祺瑞举行盛大的路祭之外，火车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吏在车站祭奠。

灵柩运到洹上后，停灵在家，重新念经、开吊。吊丧者络绎不绝，每天要为吊丧者开几十桌乃至上百桌酒席。

8月22日，袁宅举行了“点主”仪式。点主就是事先将木主牌位上的“主”字，少写一点，写成“王”字，点主时由题主官用朱笔在“王”字上加上一点。袁的木主用的是金丝楠木，雕龙纹，犀牛座，二三尺高。袁克定请了徐世昌为鸿题官。当派人去迎接徐世昌时，仪仗没用袁世凯时代徐世昌的官衔牌，而是用的徐曾任清朝的各种官衔。这是考虑到袁世凯当过皇帝、总统，故而采用变通办法。

23日上午出殡，仍用北京运去的各色仪仗，80人大杠把灵柩抬到坟地。

1909年袁世凯被革职蛰居于洹上村时，曾请堪舆家在宅地北面太平庄圈买了2百亩土地，做为坟茔地，广植松柏，此时已是郁郁葱葱。袁世凯灵柩即下葬于此。墓地按照皇帝陵格式布局，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负责营建。陵墓自南而北，最前面是大门，有牌楼一座，立竖匾。袁克定本要题“袁陵”二字，徐世昌怕引起公愤，改题为“袁公林”。门内二三丈宽的白石甬道，道旁望柱、石马、石虎、石狮、文官武将，东西相对，共12对。碑亭一座，徐世昌题“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东西值房各三间。其后，再一座大门，门后有东西配房各五间，其间有铜鼎炉一座。之后有享堂七间，署名“景仁堂”。堂内正中供奉牌位，两旁陈列袁生前的衣冠佩剑。所有建筑物，都用绿色琉璃瓦覆盖。再后为墓台，设石供桌、石香炉。最后是高一丈二尺的圆形宝顶，下面浇钢筋混凝土，上面圈砌青石，顶封草皮，有隧道通墓穴。墓穴有雕龙纹大石门两扇，中为石室。三间大殿置汉白玉石床、石桌，也都雕龙纹。石桌上供着袁爱好的古玩，燃金灯两盏。全部工程到1918年6月才完成。

大杠抬到坟地后，改用24人软杠，把棺木抬入墓下石室，到晚上，按择定的时辰，放到石床上就位。家属亲友行礼后，所有人退出，关上石门。焚化冥器，葬礼结束。

袁世凯的丧葬极尽奢移。然而，豪华的殡葬仪式和宏伟的墓地建筑，徒给后人留下更多笑料！

“洪宪”帝号说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即令部下拟进年号。先是有二种意见，一种主张应体现袁世凯的武功韬略，并引汉光武、明洪武开基之例，主用“武”字，考虑到袁的继嗣袁克定之故，多请用“武定”年号；一种则以为袁是顺乎民意当上皇帝的，非以武力定天下，主张用“文功”年号。二说各有所据，相持不下，袁世凯一时也没了主意。后又产生第三种

意见，主张以《洪范》五行之说为据，朱元璋开基至今刚逾五百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云。这五百年又为汉民族与外族统治不断消长的时代，前有洪武帝驱逐胡元，后有洪秀全起义抗清，现有黎元洪举兵倒戈，三人都与"洪"字有缘，取字"洪"字顺理成章。况现虽复帝制，尚且立宪，故"洪宪"之号最为恰切。袁世凯对此大为满意。

洪宪年号颁定后，北京童谣一时有"家家门上挂红线"之说，因红线与洪宪谐音，表示祝贺也。这与袁政府下令将小食元宵(谐音袁消)改名汤元大相异趣。有人为此作诗道：犹忆儿童拍手歌，家家红线意如何。幻成年号真奇绝，半继前清半共和。下半句是针对"洪"字半取清旁水、半取共和之共字而发的，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了。

（摘自《民国春秋》）

袁世凯两改"年号"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所控制的参政院"推戴"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袁世凯假意谦让，退回劝进书，参政院再劝进，1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

袁世凯所定"洪宪"年号今人尽知，然袁世凯两改年号，最后才定"洪宪"为年号却鲜为人知。

最初袁世凯已决定用"昭武"为中华帝国的年号，袁记政府的币制局甚至已在美国订印印有昭武年号字样的钞票一万万元，以作开国纪念。可后来有人反对用此年号，理由是清代的吴三桂反叛朝廷，自立的年号就是昭武，再用昭武为年号恐怕不祥。于是改用"明宪"二字作为年号，"取著明立宪之义，以服新旧两派"，好像既要让袁当皇帝，又要搞什么君主立宪，好让新旧派人物皆大欢喜。可最后仍没有明宪作为年号。

"洪宪"二字的意思是，"汉人自洪武以来一人而已"，俨然是朱元璋(年号洪武)第二。

（摘自《民国春秋》）

流行风

小说《碎簪记》

作者苏曼殊，主要内容：

该书叙述居住在上海，出身于封建阔绰家庭的青年庄湜，为叔、婶所抚养长大。本人受良好教育，有学识，会法文。一次去北京游玩，正值袁世凯筹备称帝时期，故旧某要人，请他用法文译一通告列国的文件，并让他签名，均遭庄湜拒绝。后被诬陷，被巡警局羁押。当时同窗挚友杜灵运为某院秘书，鼎力相救，才得幸免，灵运为此弃职，拟出国去瑞士，行前将胞妹杜灵芳介绍给庄湜。灵运兄妹早年丧父，随母生活，灵芳曾与兄游学罗马四年，贤淑端庄，才貌不凡，灵芳钟情于庄湜，将玉簪赠他，以为信物。但他叔叔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道德的老先生，认为不通过长辈的许可而私订婚姻，是"蛮夷之风，不可学也"。为庄湜定了一位大家闺秀，婶娘的外甥女燕莲佩。莲佩天资疑丽，善刺绣，又通经史和英、法文学，也钟爱庄湜，因亲眷关系，常来家中向庄湜主动表示爱情。庄湜心目中属意灵芳，而非莲佩，又不能违抗叔、婶之命，处于苦闷彷徨中。灵芳来访，叔父乘庄湜不在，向她晓以"大义"，请断绝关系，又让灵芳自碎玉簪。事后灵芳给庄湜一封诀别信。结果庄湜郁悒病死，灵芳、莲佩均自杀殉情。作者以浅近的文言，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绘了一个恋爱的悲剧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的忠贞爱情，追求婚姻自主，反对家长包办，带有反封建的性质。也从侧面抨击了袁世凯称帝的丑剧和欧美的物质文明，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社会问题的进步见解。文笔凄婉清丽，又吸收了外国小说的描写技巧，多用对话表现人物心理，比较细腻生动。但整个作品充满悲观感伤的情调，给人以消极影响。

小说《春梦留痕》

作者汪激碧，主要内容：

该书主要人物是周象浚和闵绶章，以这两个人物为主线，写了他们的生活经历，由此而引出了海月村中闵家、周家、范家、毛家等各家族众多人物。周家在海月村是有势力的一家，周象浚继周老太爷之后，充任区董，也成为村中首领人物。周象浚是个前清举人，三十多时妻子死去了，便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周象山之妻秋姑有了私情，后由于家人反对，又继弦娶了庄采虹，生出了许多矛盾，秋姑被赶出门，和周象浚断绝了关系。闵家是前清乾嘉时由邻村迁居而来的，在海月村也算是富户，闵绶章是大房中的人。闵绶章和毕怀萱自幼青梅竹马，结婚后感情也很好，不幸妻子中途因病而死。之后闵绶章受朋友的挑唆和

自己的放纵，先后和范家之女金凤、秋姑、毛家之女织成等人发生了感情纠葛。书中很多篇幅描写了闵绶章和秋姑之间的恋情，书的结尾写闵绶章终于离开了少长相亲的海月村，去汉口求学，把过去的儿女情长之事留在了故里。该书写的是海月村一些家族、人物之间的关系，但它又 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际关系，可谓社会小说。书中虽是春情艳语，卿卿我我，但从中又可剖析各种人物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该书人物众多，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来龙去脉交待清楚，

小说《双龙记》

作者越眠云，主要内容：

故事发生在清道光中叶，京师李主政（字寿门）与金侍御（字乾惕）为莫逆之交。李有一女，叫倩云。金有一子，名云士。二人均聪慧敏捷，自小青梅竹马，一起学习生活。不久，李主政因为人耿直被贬，后又受人牵连，被诬下狱，金侍御全力相救。李主政出狱后，为"双云"订了婚。李主政因厌恶仕途，带全家移居长沙。不久士云亦南下与倩云作伴。这时倩云母病故，李续娶张氏。张氏嫉妒"双云"之才，心怀不满。此时金侍御病逝，金家败落。李主政听其妻谗言，欲将倩云别嫁。倩云听后，剪去长发，矢志不嫁。李主政也深悔自己行为，最后让倩云和士云完婚，两人终于喜结良缘。小说围绕"双云"的婚事，波澜起伏，娓娓道来。语言朴实无华，旨在揭露旧婚姻制度的弊端，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小说故事情节流于一般言情小说俗套，没有什么创新。

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

历 史 档 案

第二次讨袁宣言

孙文

1916年5月9日

文自癸丑（1913年）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有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一为国人谈也。

文持三民主义，廿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靖献于国民者，固甚恨不能罄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未孚时，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愿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息，残害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逞矣。

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余，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环顾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wēi，威）蛇（yí，衣）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认以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之敢信，而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

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华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他人，犹之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之中国同盟会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竟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

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zhū，朱)《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皆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逆顺，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宝，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又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其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jū，鞠)，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民国元首，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惜也。

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0—103页)

孙中山致黄兴书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克强我兄大鉴：谂兄遄返东瀛，甚慰。甚欲兄来共商种种，闻尚有所事，未果。兹有要件求兄臂助，本拟电告，惟各情非简单之电报所能尽，故谨托宫崎兄代达。至最近国情及弟所主张图谋者，请撮其概要述如下。

一、袁氏尚有负隅恋栈之志。一面为缓和人心之计，如提议妥协停战等事；一面则嗾起北方军人为自保保袁之密画。日夜谋借外债，不能偿其希望，则欲实行纸币政策，以企财政持久，从事战争。津门消息，早传彼作退位准备，而北京探报，则至今不特袁氏无此种意态，即一般官僚顽迷如故，自信甚深，即段祺瑞亦然。段组内阁，而财权完全为梁所把握，即实权仍在袁氏。可知谓段能踵袁往日故事，以袁迫清者迫袁，未免去事实太远。此时就彼一方，并无比较的乐观。

二、冯本与滇、黔约，使先发而后应之。其时，冯因未预知袁僭帝密谋，惴惴不自保。滇、黔起义，冯得仍居南京，实受唐、蔡之赐。顾其态度始终暧昧，以口头与沪上诸人接洽者，则皆可听。而事实及书面之发表，则迥然相反。近有南京会议事件，或受袁之愚，作保袁之计，或谋自保而团结一种势力有所觊觎。均未可知。要之，此辈衷情叵测，决不能与南方同其步调。故现时沪上诸人亦渐觉悟，认为无甚希望。

三、弟到沪后，决定赞助南方，共同讨贼。尤企西林能统一各省，以对内对外。近察情势，则西林地位亦至艰窘。云、贵既不尽同情。而西林势狡毒甚于张勋。西林或迫于事势，不能不姑息弥缝。然先与龙提契，以临民军，各派俱不能俯首听命。岑、龙乃会衔出示，谓北伐编师，限于有六米厘八、七米厘九枪，及每枪配足子码百枚者，否则遣散。又其原为地方军队乡团者，要复其旧，不得应选民军。有不遵从此命令者，合力剿办。弟于十二三两日电岑，告以已饬执信、仲元所部改换旗帜，取一致行动，并诫此后与龙毋相攻击。又与青木、松井商定，为我军购械，编作北伐，由溥泉、孝怀、钦甫电岑，请认许。事过一周，尚无复答。即弟前致云、贵、两广之通电，云、贵已复，而岑亦不答，令人爱莫能助。龙氏在粤积恶，粤人恨之甚于袁氏。龙甚险诈，自岑到肇，龙势转张，盖名义上有所凭借。且托词北伐，据有省库，更广招兵，专力对待民军。事体稍变，龙

必反戈，其次亦为南面张勋，而断不能如岑所期望。岑仅带有桂兵二千，肇庆李耀汉有十五营，而李则人尽可属。故两广都司令及护军府根本极薄弱，可忧，周孝怀等皆知之。

四、沪上形势最为重要。英士于肇和事件失败后，迭遭挫折。同时惕生亦经营进行。顾前此不能为一致之行动，故常有积极的无形之冲突，两难奏效。弟到沪后，各人感情渐洽，方与惕生谋合办方法，而英士惨遭不测矣。英士死后，所图必大受影响。但冀将来由惕生专任歼彼杨、卢二贼，事当有济。然军队运动已久，而屡不得力，其卑劣之观望，正未易破。冯在南京为阴为阳，卢、杨益有所恃，其部下更难决心。大抵民党他方无特别之势力发展，则沪事急遽无好希望也。

综上情形，大局殊未易定其归宿。欲求达共和之目的，倒袁为必经之路，而吾人达到与否，视倒袁经过之事实如何。若民党势力只如目前，即侥幸以何等妥协了局，则必比前此之南北议和为更不逮。已往将来，中国问题实为新旧之争。换言之，则为民党与官僚派之争。其争孰胜，即为国家治乱所系；孰胜孰败，则视彼此之团结如何。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主义虽同，而政见或异，民党性质本来不好苟同，故时有参商。官僚则唯利是视，反为不可破之团结。已往之历史，已足教训吾人于将来。是以弟孰思审虑，但求贯彻吾人之主义，而宁牺牲一切之办法，求最大之团结力，以当彼官僚一派。近与各派接洽，幸亦俱无何等意见，盖皆知大敌当前，不宜立异。此亦为前途一线之曙光（其间各与疏通，则溥泉、亮畴之力为多）。然武力之发展，此时尤不容缓。统观全局，独山东方面有可为之基础，且可即时布置。合觉生与吴大洲等兵力，有二千余枪，已占领潍县、周村等处，进战退守，均有依据。若能由此益进，则扼北方之咽喉，不难转移大局。惟靳氏尚能支拒于济南。吾人武器不足，即须为之加增。并就此招募人士，训练成军。假有二师（二师之中下级军官已略有准备），可以取齐鲁而迫燕赵。弟经以借购军械之事，与青木、松井商量，伊亦赞可。惟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此时兄尚在日本，惟兄足以助成此举。并拟以兄与弟二人名义，提出请求，须得同意认可。吾人积多时之公忿，无所发舒，固急欲一当袁氏，而与南方相联并进，亦惟此着最为有力。机局紧急，袁系方张，民党无不相提携之理。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忘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此事成否，关系全局，如上云云，望兄以全力图之。事有把握，仍企来沪一行，共商进行各事。东京究隔膜，即弟亦颇恨到沪之迟也。余事更托宫崎面达。专此，即颂近安。

英士兄以十八日下午五时被刺，系在萨坡赛路十四号山田家会客。先两日，英士病颇剧，杜门，而是日则约有两处人相见。第一起为刘基炎（说山），为鸿丰煤矿公司四华人一日人。坐顷，更有二人入。坐客兴辞，英士亦起身，客即以枪击英士头部，立倒地。丁景良、吴忠信、萧纫秋、余建光在外室闻枪声，闯门欲入。数凶手枪乱放，丁景良亦中枪，余人走避。凶手等且放枪且逃，丁、吴从后追呼。凶手等本乘汽车来，此时汽车夫先走往捕房报，故获得凶手许国霖。又一凶手王介凡，则毙于道，或云自杀，为云其伙杀以灭口。继获李海秋一名，则介该公司与英士交涉，而是日同来者也。李与日人俱云不知情（日人亦可疑，然此时未捕）。李海秋与王介凡为英士素识，许国霖与一程起鹏则是日始问姓名。许被获，已认凶手，并云王、程、李皆凶。王已死，程未获。李之介绍鸿丰公司人来，谓有矿产将抵押与中日实业公司，借五十万，而请英士担保，可借二十万与革命党。英士固常闻人云，鸿丰为侦探机关，然不料其有大不测之举动。且见沪事再失败，前费巨款无效，谋再起，因急筹款，则姑与接洽。事变突起，未尝防备。闻捕房查得是日到者十六人，把门守路者皆持枪击人，盖非寻常暗杀事件可比。英士头中一枪，颊中两枪，故登时殒命。丁景良伤腹旁，非要害。一厨人伤手，一下女伤耳，均轻微。一曹姓同志伤手肘。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年始四十，遽被贼害，伤哉！数年来，如宋钝初、范鸿仙、夏之麒俱为逆贼购凶刺死，今又继及英士。君子何厉，天实仇之，令人生无穷悲忿。

孙文 五月二十日

（据黄一欧原信影印件，原件送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促袁世凯退位声明电

（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北京袁世凯大鉴：国人未尝负公，公实负国。公生平以权谋奸诈，愚弄一世，以此骗取总统，以此攘窃帝位。然卒以此败，岂非天哉！共和创造之初，公誓与国人竭诚拥护共和，故吾党欣然以总统让公。未几，公握大权，乃用武力破坏共和，阴谋帝政。法律不足以制公之凶恶，余始于癸丑之秋兴师问罪，公于是时复申前誓，力保共和。人民为公所欺，希望和平甚殷，余不忍拂人民之意，故中道罢兵。公此后遂以为人民易欺，更无忌惮，帝制之谋，竟成事实。人民内困，强邻外侵，公之不恤，于国势险恶之时，乘欧战正酣之际，悍然为一身一家之谋，而竟以此激全国人民之怒。人民愤公之欺诈，誓死拥护共和，一隅轰起，全国响应。公知大势已去，始下令取消帝政，不得为皇帝，犹冀为总统，公之厚颜无耻，毋乃太甚！公之反复无信，已至再三，人民不复为公所愚。人民既一再以剑血拥护共和，断

不肯复戴一背畔共和、主张帝政之元恶为总统。公虽善于变化，不拘泥名分，然由欲望未满之皇帝，化身为总统，在公为降尊，在国为奇辱，在世界为笑柄。公如负固不即行引退，人民必将诉最后之武力，正公一人畔国之罪。公以一人而敌全国，岂非至愚？牺牲多数生命，以争个人之公职，岂非至酷？今者独立之声遍于全国，兵精械足，士气振奋，而公众畔亲离，左右皆敌，公纵不知爱国为何义，亦当知所以保身保家之道。若见机早退，犹得略息人民之怒，稍留去后之思。不然怨毒郁结，何所不泄？势机切迫，稍纵即逝，望速决择，无贻后悔。黄兴谨布。

（据《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建国月刊》）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云南取消军、巡两署，成立都督府，举唐继尧为都督。

袁世凯公布“洪宪元年总预算”，拟岁入四亿七千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元；岁出四亿七千一百五十一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元。

袁世凯令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袁世凯任命徐时霖为都护副使分充科布多佐理员。

北京环城铁路完工，正式通车。

1月2日　戴戡奉蔡锷派遣，率部前往贵州策应独立。24日行抵贵阳。

1月4日　岑春煊抵上海，与梁启超密晤。

1月13日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特派那旺那林、扎木彦多尔济，由库伦启程进京，向袁世凯呈送礼品。

1月16日　江苏南汇县张江栅等地饥民，反对屯田缴价，聚众起事，向富户索钱米。19日后，斗争蔓入上海、川沙两县，旋因力量分散，被军警击散。

1月27日　贵州宣布独立，原护军使刘显世称都督，戴戡任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并别组军队东击湖南，以拒入湘北军。

欧事研究会成员程潜等十余人，由香港抵昆明，与唐继尧等就商讨袁事宜。4月30日程赴湖南靖县组织讨袁军事力量，5月10日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

1月28日　梁启超致函日人犬养毅，综述反袁情形，并“期于患难相扶”。

袁世凯以惠州反袁军被击退，加封龙济光郡王衔。

2月10日　墨西哥华侨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表示“不恤任何牺牲”，以维护共和制度。

2月21日　湖南“党人”杨王鹏等率领百余人攻袭长沙将军署失败。杨等十余人被捕遭杀害。

2月23日　袁世凯宣布延期实行帝制，申令“从缓办理”。

李烈钧率云南护国军第二军由昆明出发，东击龙觐光。

2月24日　孙中山特派冯自由前往南洋、澳洲等地，筹募讨袁军饷。

2月26日　孙中山向日商久原房之助借日金七十万元，作为反袁军事费用。

2月28日　袁世凯申令本年5月1日为立法院议员召集期。

3月2日　袁世凯公布外交官、领事官官制。

3月3日　张敬尧所部北军攻陷叙州。7月占领纳溪。蔡锷率部移驻大洲驿。

日军舰十一艘由佐世保驶抵青岛。

3月4日　梁启超应陆荣廷密约，乘日轮离沪前往广西。4月4日行抵南宁。

3月7日　广东中华革命军在黄埔进袭“肇和”舰，受挫。是役，由谢伯尧、罗金兰率领的南洋等地华侨“决死队”，奋勇参战，伤亡甚重。

3月10日　袁世凯公布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条例，发行总额二千万元。

3月11日　袁世凯公布颁爵条例。

3月18日　陕西中华革命党人王绍文、南南轩、杜守信等十八人，因密谋讨袁，事泄被捕，在西安被陆建章杀害。时“党人”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人，在渭北宣布护国，讨袁逐陆，连克同官（今铜川）、宜君、洛川等十余县。

3月21日　袁世凯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准陆徵祥辞去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

3月22日　袁世凯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仍称大总统。此令公布后，即遭十七省国会议员通电反对，并有井勿幕等十九省公民联名发表宣言，主张以武力迫袁退位。

山东肥城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量局。东平、东阿、平阴、新泰等县农民，也继起举事。旋遭驻军镇压。

袁世凯下令召集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临时会。25日该院正式开会。

3月23日　袁世凯下令取消洪宪年号。

袁世凯准冯国璋辞去参谋总长，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3月27日　潮州"党人"联络当地驻军攻占潮安，进据汕头。30日宣告潮汕独立。

3月29日　袁世凯指令总统府焚毁帝制公文八百余件。

3月30日　袁世凯以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名义，致电蔡锷等人，要求"罢兵"停战。

广东钦廉镇守使隆世储，宣布钦州、廉州独立。

3月31日　蔡锷与陈宧、张敬尧等达成停战协议。自是日起，两军停战一周，届时，又相继展期两月。四川"护国"战事至此结束。

4月1日　参议院代行立法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君主立宪国体案。

袁世凯下令国民会议与立法院组织及议员选举，"应恪遵各该本法所定程序"，分别办理。

北京拱卫军因求"恩饷"未遂哗变，遭镇压。

4月3日　山东曲阜"经学会"成立，孔祥霖为会长，聘"讲师"六人，常年"讲经"。

4月4日　广东"江大"、"江固"、"宝壁"三舰，归附反袁军。

4月6日　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改称都督。

4月10日　孙中山函告"党人"，认为帝制取消后，袁世凯必倒。此时"一般官僚复活，即与第二第三袁氏无异"，"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务须继续组织武装力量。

4月12日　浙江宣布独立。先是驻省城旅长童保暄等，谋求独立不成，遂于11日晚率部围攻军署，将军朱瑞逃走。是日各界公推原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屈不就，允仍以巡按使名义兼总司令。旋屈密通袁世凯事发，被迫辞职。5月6日，吕公望就任都督。

广东各界在广州海珠召开善后会议，筹商反袁军与龙济光合作等事宜。旋因意见分歧，发生冲突，梁启超代表汤觉顿等多人，当被龙部击毙。

4月13日　蔡锷等致电北京政府，谓袁世凯"违反约法，自召兵戎"，虽除帝号，"复据总统"。战事无法调停，应速行宣告退位。

4月16日　冯国璋电劝袁世凯"尊重名义，推让治权"。

4月17日　冯国璋通电各省，提出调停大纲八条。主张慎选议员，重开国会，明定宪法，袁世凯仍任大总统。

4月18日　滇、黔、桂、粤四省都督唐继尧、刘显世等，联名发表宣言，谓袁世凯"犯谋叛大罪"，现据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除其所任大总统资格，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并领海陆军大元帅职。

4月19日　龙济光抵广东肇庆(今高要)，同陆荣廷等协商军政事宜。并议定成立两广都司令部等五项妥协案。

岑春煊由上海绕道香港，转抵肇庆。

4月21日　袁世凯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

唐继尧致函梁启超，筹商倒袁善后事宜和军务院设置等问题。

4月22日　袁世凯准徐世昌辞去国务卿，特任段祺瑞充任该职。段祺瑞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

孙中山电告美国三藩市(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决意27日离日归国，由东京返回上海。

袁世凯特任倪嗣冲署理安徽巡按使；张作霖为盛武将军，次日加任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

4月24日　江西"党人"占领玉山、广丰，宣告独立。27日进据上饶。旋被驻军击退。

龙济光因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效忠袁世凯，反对广东独立，策划海珠事件，引起各界不满，被迫于是日将蔡枪毙。

4月25日　冯国璋通电未独立各省，主张"各保疆土，共维公安，责任同肩，扩充实力"以便对于独立四省和袁世凯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审度国情，妥定方针，"融洽双方"。"四省若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

4月26日　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告独立。

4月27日　盛宣怀在上海病死。

4月28日　奉天桓仁县知事王济辉、"党人"邵兆中等，率众起事，宣告独立。组成"辽东护国军"，以邵兆中为总司令，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东三省尚武之军人及有识之仁人义士"，"共同举义"，讨平叛逆，保卫共和民国。嗣后进军安东，5月2日攻占蒲石河口。旋进至长甸与防营交战失败。

冯国璋致电独立各省，要求"早作罢兵之计"。

5月1日　冯国璋就4月17日所拟"调停大纲八条"，重加参酌，提出解决时局修改办法八条，通电各省，反对黎元洪继任总统，主张以袁世凯为过渡总统。此电发表后，即遭唐绍仪、谭延闿、汤化龙、胡景伊、吴景濂、谷钟秀等二十二省区旅沪"知名"人士通电反对。

两广护国军在肇庆(今高要)成立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

汤芗铭应日本等国领事“特请”，自是日起，相继在湖南湘潭、益阳、安化、宝庆、常德、岳阳、平江、沣县、衡阳、桂阳、沅陵、辰溪、会同、新化等县，成立“华洋诉讼处”。

5月3日　湖南保靖(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驱逐县知事，响应反袁护国。

5月5日　冯国璋抵蚌埠与倪嗣冲密晤。次日冯、倪同赴徐州，与张勋策划召开南京会议。旋由三人联名电请袁世凯和未独立各省派代表赴宁，“开会协议，共图进止”。

上海中华革命党人在吴淞图袭“策电”舰，未成。

5月8日　袁世凯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5月9日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主张“尊重约法”，一致讨袁。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宣布独立，自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15日率部进据西安。18日就任陕西都督，迫陆建章离省。

黄兴由美国抵日本。15日电告广东陈炯明等，愿为反袁斗争“补助进行一切”。

5月10日　湖南“党人”占领乾城(今乾州镇)，宣布独立，以张学济为湘西护国军总司令。

5月11日　抚顺东乡炭坑工人五百余名，罢工三天，要求释放无故被扣押的工人。

5月15日　南京会议原定本日开会，因代表未齐延期。是日，袁世凯电饬冯国璋等，谓“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办法”。

中华革命党人居正与吴大洲所部，分别于是日、25日和6月4日，袭击济南，卒以兵力不支，均被防军击退。

5月17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向袁世凯辞职未准，暂给假一月；特任曹汝霖兼署外交总长。

5月18日　南京会议正式开会。与会十五省代表，就袁世凯去留问题，争议不下。22日冯国璋电请独立五省派代表赴会，均遭拒绝。会议至月底无结果而散。

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5月20日　袁世凯特任周自齐署理财政总长。

5月22日　陈宧被迫宣布四川独立，改任都督。宣称“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5月23日　居正所部占领潍县，张树元率部退走。至此，山东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已分别攻占邹平、临淄、淄川、即墨、高密、安丘、莒县、诸城、平度、日照、昌乐等十余县。

5月24日　袁世凯令陈宧开缺进京。特任重庆镇守使周骏为崇武将军，署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帮办四川防务。

袁世凯令内务、财政两部：暂停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项事宜；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也一律从缓办理。

湖南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在凤凰县宣布独立。

5月25日　福建中华革命党人吴适等攻占连江，宣布独立。旋因兵力不敌，被驻军击败。

袁世凯亲信袁忠枢函告张勋，谓：南京会议“必无良好结果”，即“商清”倪嗣冲，“迅约各省代表，汇集徐州，结成团体，预备各种抵制宁垣之法”。“结成团体，即可联盟签约，推其中一、二人为盟长副盟长”，“专以挽留”袁世凯“勿遽退位为惟 一之根本主旨”。

5月29日　袁世凯特颁告令，宣布所谓帝制案始末。

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改称都督。

5月30日　山东将军靳云鹏应调离职进京。是日袁世凯特任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署督理山东军务。

6月1日　湖南武冈农民暴动，破县城，释囚犯，获胜而归。

江苏吴县各机户因减少工价，举行罢工。

奉天“党人”杨子元等率众四百余人，在西安县孤山子起事。杨自称“东三省护国军北路司令”，发表讨袁布告，指斥“东省大吏”，“甘为袁逆之家奴”，表示将“与彼决一生死”。同时发布减税示谕，规定“所有地方从前一切杂捐恶税，概行豁免”。后因驻军进攻，受挫失败。

6月6日　袁世凯在北京死去。

是日，段祺瑞假“大总统告令”，宣布依新约法(即民国三年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此令公布后，即遭赴沪国会议员反对，宣言新约法“全由袁氏一人私意妄自窜乱而成”，与旧约法(即民国元年临时约法)“根本抵触”，“不发生国法上之效力”，依据民国二年国会所订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黎当继任大总统，所谓“代行”说“万难承认”。

6月7日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即日颁布命令：“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仍旧供职”。

梁启超由上海致电独立各省，谓“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宜竭力援助段祺瑞，“毋令势孤”，“致生恶感”。即对袁世凯亦“不妨表相当之哀悼”。

陕西都督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服从“中央”。

6月8日　唐绍仪电请黎元洪遵照临时约法，“迅速召集国会，以决国是”。国会未开前，国务总理暂由段祺瑞代理。

陈宧宣布四川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

6月9日　孙中山发表恢复《临时约法》宣言。并电请黎元洪“恢复约法”，“尊重国会”。

孙中山以“袁死，内外情势大变”，电令山东居正“按兵勿动”，候商黎元洪解决。10日、13日和26日，复分电广东、福建、四川朱执信等人，照上述电令办理。

黄兴致电黎元洪，主张以明令恢复临时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从速召集国会；组织内阁，严惩帝

制祸首。

黎元洪致电汤化龙转商旅沪国会议员，“推举数人来京”会商善后事宜。7月初，旅沪议员代表张继、王正廷等，北上与黎等就商善后条件。

张勋邀集出席南京会议部份代表，在徐州开会，并提出解决时局“要纲”十条，主要内容为：“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保全袁世凯“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催促独立七省“取消独立”，否则“仍以武力解决”；“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经议决后，即日通电发表，结束会议。

龙济光宣布广东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

张作霖向日本朝鲜银行奉天支店借款日金一百万元。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资产及商埠地产等作担保。

6月10日　唐继尧电请黎元洪恢复临时约法；速开国会，补选副总统，组织正式国务院；撤退各路北军；召集特别军事会议，解决善后军事问题。并重申，俟正式国务院成立，军务院即行撤销。

旅沪国会议员致电黎元洪明令恢复临时约法及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废除袁世凯“自造新制”。

黎元洪下令裁撤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所有原办事宜，分归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办理。

黎元洪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

6月13日　孙中山致电黄兴，征询解决时局意见，谓黎元洪如能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次日黄兴电复赞同，并望主持一切。

黎元洪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6月15日　冯国璋电请黎元洪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速定宪法。

6月16日　黎元洪下令停战，所有派出军队，“克期撤退”。

6月17日　黎元洪电请孙中山派代表北上来京筹商善后。23日孙中山复电，谓已派萧萱、叶夏声前往会商。

6月19日　驻北京各国公使分别觐见黎元洪祝贺就任大总统。

6月20日　段芝贵、江朝宗在北京政府陆军第二、三、六、七、八师的将校支持下，于北京发起组织“军人同德会”，主张临时约法恢复后，国会应速定宪法，选举段祺瑞为正式大总统。

段芝贵辞去督理奉天军务兼署奉天巡按使等职。

6月21日　黎元洪特任龙济光兼署广东巡按使。

自是日起，安徽阴雨兼旬，山洪暴发，滨淮十七县遭水灾。其中，霍丘、颍上、阜阳、怀远、凤台五县受灾尤重。

6月22日　段祺瑞通电各省，托辞政府不宜以命令“变更法律”，拒绝恢复临时约法。

6月23日　黎元洪准署财政总长周自济辞职，特任陈锦涛为财政总长。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与吴光新等，在国务院召开拥段会议，并要求张勋、倪嗣冲、冯国璋、李纯、王占元、张作霖等予以支持。

6月24日　黎元洪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该省巡按使；任命曹锟会办四川军务。

黎元洪电令周骏来京另候任用，所辖军队交王陵基接管。同日，任命王陵基为重庆镇守使。

6月26日　孙中山以龙济光“在粤三年，无恶不作”，致电黎元洪明令罢斥。

6月29日　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裁撤参政院；撤销有关立法院、国民会议各项法令；民国三年五月以后“所有各项条约”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有明令废止外，一切仍旧”。

黎元洪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6月30日　黎元洪准各部总长辞职。特任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

黎元兴准驻日公使陆宗舆辞职。以章宗祥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

7月1日　库伦举行册封典礼，库伦都护使陈箓代表大总统将印册授与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读册文。博克多率官员仪礼领受。

7月4日　居正、吴大洲各派代表至济南与山东将军张怀芝会议停战条件。8月5日居、吴至济南与张怀芝代表商定：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山东讨袁战事至此结束。

黄兴由日本门司启程回国返沪。10日上海旧国会议员八十余人开欢迎会。

7月5日　湖南护国军逐走汤芗铭，7日改举地方绅士刘人熙为临时都督。23日刘人熙取销湖南独立，召开省议会临时会。8月3日黎元洪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

7月6日　黎元洪下令废止袁世凯所公布的《颁爵条例》、《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和《纠弹法》。

黎元洪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所有职权组织“暂仍其旧”。

黎元洪任命各省督军、省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督军，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浙江督军兼省

长吕公望，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19日又以陈炳焜兼署)，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直隶省长兼督军朱家宝，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

7月8日　黎元洪下令废止《文官官秩令》。16日废止《报纸条例》。

7月11日　黎元洪令全国经界局裁撤，未竟事宜归并内务部办理。

7月12日　惠民公司所招首批华工一千六百九十八人，由天津大沽口乘船出发开赴法国。从本月起到次年12月止，赴法华工二十五批，共三万一千六百五十六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赴欧华工总计约二十余万人。

黎元洪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

7月14日　北京政府下令惩办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洪宪帝制罪犯。杨等在皖系军阀庇护下先后逃出北京，惩办令仅一纸空文。

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陆荣廷、蔡锷、刘显世…等十三人通电全国，谓“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相符合”，宣布撤消军务院，次日唐继尧等将此事通知北京公使团。

7月16日　孙中山在上海邀请参、众两院在沪议员及各界名流于张园开茶话会，孙在会上发表演说——《地方自治制》，主张学习美国，建立地方自治。谓“地方自治，国方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全力于地方自治”，应视为今后“建设方针”。

7月18日　黎元洪电促在上海两院议员速赴北京。议员10日电复：准于本月31日以前抵京。

7月20日　孙中山在上海欢送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演说“采用五权(即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编者)宪法之必要”。

7月21日　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在汉口与中华革命党、革命军、护国军三大反袁组织代表议定给资解散办法。

7月25日　中华革命党遵奉孙中山指示，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统就职”，“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目的已达，各省革命军停止军事行动。

7月27日　安徽报灾，谓自6月21日阴雨兼旬，山洪暴发，沿淮河霍丘、颍上、寿县、凤台、盱眙、怀远、凤阳、五河等县河堤漫溢，田禾庐舍尽被淹没，为四五十年未有的大水。是日北京政府拨款救灾。

7月29日　蔡锷自泸州至成都接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旋因病委罗佩金暂行代理。8月8日离成都去上海赴日本就医。

7月30日　日本军舰嵯峨号驶抵广州珠江水面，声称：“广东现有战争，特来保护本国侨民。”日本这一侵略行为遭到广州及全国各地人民反对，外交部亦向日使提出抗议。10月10日日舰撤离广州。

7月31日　张勋、倪嗣冲、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通电全国，责难李烈钧滇军在广东进攻龙济光振武军，要求北京政府由江西、福建派兵援粤止乱。

汉口、汉阳铁路巡警勾结帮会暴徒聚众纵火抢劫。是日夜汉口华景街、汉阳东门外及鹦鹉洲等处同时纵火、抛掷炸弹，乘乱抢劫，被焚者数百家，商民损失颇巨。

8月1日　国会复会举行第二次常会。(国会于1914年1月10日被袁世凯解散至是日复会。)参、众两院议员到会者三百六十八人。黎元洪、段祺瑞及各部总长均出席开幕仪式。黎元洪于会上宣誓就任总统职。

8月21日　众议院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23日参议院亦通过此案。

9月5日　参、众两院开宪法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将1913年宪法草案提交大会，由起草委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说明宪法条文。8日、13日继续开会，经大会议决，将宪法草案提交审议会审议。

9月9日　原国民党议员张继等为对抗“宪法研究会”，组织成立“宪法商榷会”，原国民党议员多参与该会活动。

9月11日　孔教会头目陈焕章等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

9月15日　宪法审议会开会，20日开二次会议，议决：将宪法草案所有重大问题先行讨论。

9月16日　黎元洪特任曹锟为直隶督军。

9月21日　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有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十三省区督军和代表出席，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以巩固北洋团体反对南方国民党势力为号召，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唐绍仪等参加内阁。会议至25日结束。

湖南各界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为向日本兴亚公司借款，以中日合办湖南水口山铅矿为抵押条件，要求废除契约，“以固国体”。是日长沙成立“公民保矿会”。

9月22日　宪法审议会开始正式审议宪法草案条文。会议继续至1917年5月。在审议过程中争议最大、冲突最烈者，为孔教应否定为国教，及省制加入宪法两大问题。

9月25日　京兆永定河决口。

云南富县暴雨成灾。

9月29日　张勋等开第二次徐州会议，引起国民党和西南各省反对。是日黎元洪训令禁止军人开会干政，谓

“国势颠危，有如累卵”，惟少数人“每囿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为名，实召亡之渐”。段祺瑞亦通电各省督军护使、各师长，谓“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

黎元洪准唐绍仪辞外交总长职。

9月30日　北京政府将广西省南宁、镇南两道所属忠州等十土司改置镇结、龙茗、思乐、绥渌四县。

10月1日　湖北、安徽、江西、贵州、河南、吉林等省议会于是日复会。

10月4日　张勋、倪嗣冲、姜桂题、王占元、李纯、曹锐、朱家宝、张作霖、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赵倜、田文烈、张怀芝、张树元、张广建、田中玉、潘矩楹、杨善德等十三省区督军省长等致电黎元洪，请“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保存郡县学宫及其学田祭田，设奉祭生，行跪拜礼，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

10月20日　宪法审议会讨论“省制加入宪法”议题。原国民党议员焦易堂、吕复、宋渊等提案“省制加入宪法”，认为“宪法草案仅规定中央政府，独于地方政府付之阙如”，甚为不妥，主张学习欧美各国，将地方制度订入宪法，给予各省地方政府以一定自治地位，省长民选。宪法研究会汤化龙等反对“省制加入宪法”。经多次讨论，双方相持不下。11月29日投票表决，出席议员七百二十三人，投票结果，赞成者三百六十一票，反对者二百五十四票，均不足三分之二，宣布延会再议。

10月21日　天津市民数千人齐集商务总会开“维持国权国土会”，声讨法帝国主义强占老西开，表示誓死保卫“国权国土”，并议决派代表进京，请政府严重交涉。

10月25日　天津八千余人集会成立公民大会，一致通过六项决议：一，通电全国与法断绝贸易；二，不使用法国银行纸币；三，解散惠民公司，不准招募华工；四，中国货不售与法国；五，严厉处治与法人作侦探者；六，致电驻法公使要求法国政府撤换法驻京公使与驻津领事。

10月26日　天津法汉学校全体学生因老西开事件于是日起罢课，继有老西开高小、中学校罢课。

10月28日　外交部次长夏诒霆赴津处理老西开事件，天津市民代表质问对法如何交涉，夏答以：“尽力对待，如办不好不办。”群众大为不满，于次日召开市民大会，齐集天津交涉公署要求公开答复。夏与直隶特派交涉员王麟阁等态度蛮横，群情愤怒，捣毁交涉公署，夏、王等人越墙逃遁。

10月30日　国会参、众两院选举江苏督军冯国璋为副总统。11月8日冯在江苏督军府就任。

10月31日　吉林省各界成立“各团体联合会”，并派代表面见督军、省长，坚决反对日本借口郑家屯事件肆意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同时分函全国各省区一致力争。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响应。

黄兴在上海病故。

11月2日　天津公民大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万余人，由国会代表报告北京政府对法交涉情况。群众认为“法使允为暂时恢复原状”，“仍属空洞”，再次电请北京政府照原案要求条件“严重交涉”。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商会纷纷响应天津公民大会决议，抵制法货。

陕西督军陈树藩指使王砺廉等纠合百余人，假借“公民”名义，闯入省议会，迫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李根源为陕西省长（7月29日黎元洪任命李根源为陕西省长，免陈树藩省长兼职），遭拒绝。王等遂率众搜打议员，捣毁议会。7日参、众两院议员咨请北京政府查办陈树藩。

11月8日　蔡锷在日本福冈病故。

11月12日　天津法租界工人一千六、七百人，为反对法侵占老西开，自是日起罢工，直至次年2月。在工人罢工影响下，法租界华警全体罢职，商人罢市，商店和居民纷纷迁出“租界”，为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群众反帝斗争。

参、众两院顽固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一百多议员，在北京发起成立国教维持会，并通电吁请各省督军省长给予支持。

11月13日　黎元洪特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

11月14日　日人犬养毅、头山满在东京组织成立中日协会。

11月15日　福州发生大火灾，居民铺户二千余家被焚。

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转动米粮，供应京津地区。内务、财政两部以漕运局于1916年6日停办后，“京畿一带粮价腾贵”呈请恢复，是日黎元洪照准。

11月19日　政学会于北京江西会馆开成立会，国民党议员三百多人到会，选出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李肇甫、郭椿森等十三人为干事。该会骨干分子多系原欧事研究会成员。

11月20日　黎元洪下令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职。孙洪伊原系进步党成员，后与国民党议员关系密切，在内阁日常工作中常与段祺瑞发生争执，故段迫黎将孙免职。

11月23日　黎元洪准财政部将各省烟酒厘税归并公卖，统一征收。

11月25日　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一千余人全体罢工，反对厂警搜身并污辱殴打工人。该所总办被迫取消搜身制，将有关警员撤职。

11月26日　全国公民大会在北京江西会馆开成立大会，并通电全国坚决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天津老西开。对老西开问题，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未敢同意法国的侵略要求，双方谈判多次，毫无结果，而法国也未敢侵占，事遂搁置。

12月5日　国会通告本届常会会期延长至下届常

会召开之前一日

12月8日 宪法审议会继续讨论省制加入宪法问题。是日表决"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命、地方制度加入宪法"提案，出席议员六百三十九人，四百二十二票赞成，二百一十四票反对，赞成票差四张不足三分之二。益友社（原国民党议员组成）议员指责宪法研究会投票舞弊，致起冲突，会场墨盒坐椅纷飞，双方被打伤多人。事后宪法研究会与益友社先后通电全国，相互诋毁。

12月9日 段祺瑞派曹汝霖赴日内幕事泄，参、众两院议员激烈反对派曹为特使赴日。段被迫改派熊希龄为特使。是日段电告驻日公使章宗祥"转商日外部"。次日章经西原龟三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透露此意。寺内等认为熊代曹来日"毫无意义"予以拒绝，"希望中国重新考虑"人选。

北京政府裁撤塔尔巴哈台参赞一缺，改设塔城道，设道尹，加副都统衔，归新疆管辖。

外 交

1月5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访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征询日政府对袁世凯行帝制的意向。

1月10日 俄驻英大使访英外交大臣葛雷，并递交照会。以二月初，袁世凯将行帝制，建议协约国予以承认，以免德奥诸国抢先承认，而陷于被动，致招煽动"党人"起事反袁的嫌疑。葛雷即表同情，并于次日将照会内容转告驻英日使，上达日政府。12日，日外相石井对驻日英使答称：没必要因德奥等国承认帝制，而改变态度。此时，驻北京日使亦报告本国，谓英、法、俄驻北京公使认为，若袁行帝制，应在适当时机予以承认，以免中国政局继续"动乱"。但因反袁斗争急剧发展，英、法、俄助袁企图，遂遭破灭。

1月18日 驻京日使日置益奉令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拒绝中国特使周自齐前往日本。

1月22日 驻京日使日置益以护国战争爆发，要袁世凯延期实行帝制。同日，日外相石井通知陆宗舆："若北京政府无视各国劝告及国内动情况，实行帝制，日本政府决不承认。"

1月23日 日海军中将青木宣纯奉令来中国"调查"政局，是日行抵上海。

1月24日 北京政府驻库伦办事大员都护使陈箓、电报会议委员郭世荣同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密勒尔签订《电报合同》十五条。

2月2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在英属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地区）设置总领事。

3月1日 日驻沪武官青木宣纯中将往访梁启超，约以提供交通便利，助梁离沪赴桂。

俄驻库伦总领事就库伦电报局拟用汉族职员七人事，进行干涉，并要求库伦办事大员都护使陈箓命其取销。陈予以驳斥。该总领事遂胁迫外蒙古地方当局，另行招聘汉族职员四人，俄国职员二人。

3月7日 日内阁开会，研讨中国局势和确定对华方针。决定：乘袁世凯失势之际，"确立在华优势"，使袁"引退"；于适当时机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以民间形式出面，支持中国国内反袁活动等。21日外相石井特派森田宽藏前往中国，向驻华日使及有关领事，转达上述决定。

3月31日 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秘令关东军利用宗社党复辟势力，在东北地区加紧密谋策划"满蒙独立"，并派土井市之进大佐负责主持，由黑龙会骨干川岛浪速等人参予活动。拟于6月间，在秦皇岛、庄河、复州、辽阳、本溪湖等地举行暴乱。旋因袁世凯毙命未遂。

4月10日 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电令关东都督府次长西川虎次郎：此时应向张作霖"表示日本之真意，使他独立"，并将"尽力供给兵器、资金等"。

4月11日 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政府递交照会，要求对袁世凯"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将切实加强"两国亲善提携"。遭日政府拒绝。

6月6日 是日晨，日英法俄意比等六国驻京公使，以袁世凯病危，齐集日本使馆，谋划对策。决定袁死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午后一时，六国公使往见段祺瑞，告以上述决定，并要段留任总理，迅发正式通告。

6月6日 日政府以袁死黎任大总统，急电驻京公使日置益，速见黎元洪，要求主政后，"采取日中亲善政策"，并与"南方妥协，消除动乱祸根，恢复国内和平"，照此进行，则日本将给予"直接或间接之援助"。同日，日外务大臣电饬驻上海、南京、广东、云南等地领事，迅将以上内容通知张继、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等，务请"支持黎元洪，努力收拾时局"。11月日又电令日置益会见段祺瑞，转达上述对华方针。

6月17日 驻京俄使库朋斯齐，卸任归国。是日，新任公使库达摄夫觐见黎元洪，呈递国书。

6月22日 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秘派西原龟三来中国"调查"政情。西原抵北京后，即与日使日置益等人研讨对华政策，并同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密相往来。7月11日西原离京返日，行前曾与段祺瑞会谈，段称"日本以本人留学德国，传说我与德国有关系。请日本不要有些顾虑"。西原至东京后，即向寺内提交"目前对华经济措施纲要"。主张组织财团，"实行对华实业投资"，提供借款，使北京政府得以整理中英及各省财政和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本位货币，以"促进日中货币混合并用"。

7月3日 本年2月日俄两国就缔结第四次密约开

始谈判。是日日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第三次"协定"和第四次"密约"。日俄两国在密约中相互"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在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中国之"重要利益"时，双方得协力阻止，以至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该项"密约"与前三次"密约"相比，将所谓双方"重要利益"范围，由中国东三省及内外蒙古地区，扩展至中国全部领土。

8月4日　北京政府以库伦都护使陈箓因病呈请辞职，任命陈文运为都护使经驻库伦办事大员。俄驻京公使库达摄夫以简派驻库伦办事大员须先征得俄国同意，反对陈文运出任，直到1917年4月始任命乌里雅苏台参赞陈毅出任此职。

8月7日　俄驻京公使照会外交部无理要求北京政府将外蒙古议员取销。外交部以外蒙为中国领土，"选出国会议员，此系当然之权利"，严词拒绝。

8月29日　日本内阁借口郑家屯事件中国军队围攻日军，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9月2日日驻京公使林权助据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指示，先后向外交总长陈锦涛、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出，惩戒28师师长，严惩并罢免肇事官兵，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必要地点派驻警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奉天督军亲往关东都府及奉天总领馆谢罪等八项要求。

8月30日　日本黑龙会骨干分子川岛浪速等是日前往奉天郭家店犒赏巴布扎布匪帮，并部署撤退事宜。日本关东都督中村觉以临视执行停战协定为名，公开由铁岭派日军一支队开赴郭家店。

9月12日　德驻汉口领事借口"保商"要求汉口华景街警察权，遭当地商民激烈反对。德领事被迫于10月28日自动撤回此项要求。

10月5日　俄国政府拨款补助俄皇家学会组织蒙古探险队，是日该队由彼得堡出发。

10月6日　外交总长陈锦涛与日驻京公使林权助就"郑家屯事件"正式开始谈判。

10月17日　法驻京代理公使玛德尔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将天津老西开划为"法租界"，撤去中国警察，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自由行动。北京政府请求暂缓实行，法使不允，并于20日晚8时由法驻天津领事带领兵警至老西开，拆毁中国警局，捕去警察九名，以武力强占老西开。

10月20日　驻京德使照会北京政府，抗议法国在华招工，谓此举"违背中立"。11月8日外交部以华工系往法从事农业为由驳复。

10月31日　俄国在黑龙江富拉尔基等地擅筑炮台多处。省地方当局与俄人交涉无效。是日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电告北京政府请外交部并驻俄公使提出严重交涉。

11月6日　英驻京公使朱尔典以英、日、俄三国公使名义，出面调停中法天津老西开问题交涉，提出中法共管老西开。15日朱尔典离京回国，所谓调停亦遂中止。

11月7日　日本擅自在福建厦门设立警察处，福建特派交涉员向日驻厦门领事提出交涉，日方置之不理。12月中旬，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提出抗议，日使以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日本有权在厦门设警为词拒绝。

11月16日　10月间日本政府向驻日公使章宗祥透露：希段祺瑞"派一适当的人来日本"，"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具体办法"，并示意以曹汝霖"最为适宜"。段祺瑞遂决定借赠日皇大勋章为名，以曹为赠勋专使赴日活动。是日段电告章宗祥就此与"日本外交当局接洽"。

12月7日　日俄第四次密约签订后，两国即就转让长春至吉林省境松花江南岸段中东铁路事相互进行试探。俄国欲以出卖此段铁路，换取日本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日本企图乘机扩张和巩固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9月2日日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电示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正式向俄国政府提出中东路及松花江航行权问题。是日俄驻日大使库柏斯基照会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就上述两问题进行谈判并提出具体条件，自此日俄就瓜分中国主权利益进行讨价还价，谈判延续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双方始于11月22日匆忙达成协议并秘密换文。

12月12日　日本改筑南满铁路为双轨，任意侵占民田，奉天地方当局向日本提出交涉。

12月14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决定再次派西原龟三前来中国进行活动，"与中国要人及日本在华官宪商谈，以求打开局面"。18日，西原由东京启程，20日经奉天，22日抵北京。

12月23日　西原龟三在北京与曹汝霖、陆宗舆会晤，西原自称此次来华目的系就"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进行充分交换意见。次日段祺瑞会见西原龟三。

军　事

1月6日　广东中华革命党人朱执信及陈炯明等，相继在惠州等地举事讨袁，朱部号称中华革命军，陈部为护国军。是日，两军分别攻占九龙新城盐田税关和淡水。旋因兵力不敌，均被驻军击退。

1月8日　袁世凯任命王金镜为陆军第二师师长；特任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1月15日　袁世凯申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督率各师，分兵两路进扎川湘。2月下旬，第一路司令马继增、第二路司令张敬尧，相继率领陆军第三师、第六师、第七师及安武军等，分途进入湖南辰沅宝庆之间和四川泸州一线，进攻护国军。

1月18日　蔡锷率云南护国第一军主力部队，由昆明出北进。拟经贵州毕节入川，会攻泸州，进取成都。

1月21日　蔡锷所部入川护国军攻占叙州（今宜宾）。2月5日进袭泸州，连战数日未克，遂拒守纳溪一线，与北军相峙。

1月25日　袁世凯以蔡锷所部进川，申令“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堵击。

1月26日　袁世凯令陆军第十一师改为第九师，以黎天才为师长；张永成署第十一师师长，陈光远兼署第十二师师长。

1月31日　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响应反袁护国，率部进驻纳溪，发表讨袁“露布”，改称护国川军总司令。

2月2日　戴戡发布出征通告。次日率护国第一军右翼军由贵阳出发，拟经遵义进取重庆。11日突入川东，进攻綦江，激战兼旬未下，于3月初退守黔边。

2月3日　贵州护国军分兵三路攻入湖南西部。是日，占领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16日攻克麻阳，复进兵芷江等地。旋因兵力不足，停止进攻。3月6日北军反攻，陷麻阳。

2月7日　朱执信率部进攻番禺县石湖村兵工厂，被驻军击退。

2月8日　袁世凯下令查办刘显世，以唐尔锟为贵州护军使，暂署督理军务；2月14日复令各路军队“进剿”贵州

袁世凯特任龙觐光为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初，龙任广东广惠镇 守使，1月中旬奉令攻滇，率部进入广西，取道南宁进驻百色，与滇军李烈钧所部相持。3月2日龙军攻占剥隘。

2月18日　武昌中华革命党人联络当地部分驻军起事，被防军击败。

2月28日　袁世凯令四川陆军第一师改为陆军第十五师，以周骏为师长。

3月8日　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进兵贵州，以陈炳焜兼护督理广西军务。11日陆率部由南宁至柳州，停师不前，策划反袁。并联络滇军，潜师围攻百色龙觐光军。

3月9日　龙济光密遣龙体乾回滇，在个旧、蒙自、临安等地，联络土匪，组织暴乱，被滇军击溃。

3月12日　陆荣廷、李烈钧所部进攻百色，生俘龙觐光，全歼该部。

3月13日　孙中山电告居正各地讨袁军事形势，并望山东方面月内起事，夺取济南。

3月15日　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为都督。并别组军队进攻湖南。

3月17日　蔡锷所部发起总反攻，激战数日，收复纳溪等地。北军张敬尧所部受挫，退守泸州。

3月19日　袁世凯任命周文炳为陆军第六师师长。

3月20日　岑春煊等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借款日金一百万元合同，作为护国军行政费用。

4月10日　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成立，石青阳为司令。

袁世凯特任张勋兼署督理安徽军务。

4月15日　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率“海容”、“新裕”等舰轮，由塘沽启舰南下。20日舰至温州海面，舰轮相撞，官、兵七百余人死亡。余部在福建登陆。

4月16日　江苏中华革命党人攻袭江阴。18日进据吴江。旋被驻军击退。

4月17日　宗社党善耆等人，在日本支持下，募集“勤王军”千余人，由日本军人和浪人作骨干，在奉天旅顺营城子进行操练，伺机发动骚乱。

5月3日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刘重等占领湘乡，宣布独立。7日进据新化。旋因安武军进攻，于9日退据衡山。

5月4日　居正所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及夏重民等人率领的加拿大、美国等地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进攻山东潍县，同北军第五师张树元部展开激战。是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吴大洲部攻占周村，宣布独立，另立旗号，改称山东护国军，吴自任山东护国军都督。

梁启超拟往上海，自肇庆抵香港。经驻港日领事劝阻和撮合，次日赴广州与龙济光会商广东善后等事。

5月5日　河北易县山北社千余人起义，抗阻清丈地亩，反对苛捐杂税，进攻县署、经界局。冀中十几县奋起响应，其中固安县斗争坚持到9月。卒以兵力不敌，被军警击散。

5月6日　陆荣廷电告岑春煊，准于7日由南宁督师出发，进攻湖南。是月上旬，广西护国军攻入湖南，在衡州（今衡阳）、宝庆（今邵阳）一线，同北军周文炳师激战。6月初，周师以湖南独立，自行撤离。7月上旬，陆亦返师回桂。湘南讨袁战事遂告结束。

湖南新化锡矿山工人罢工，并夺取新华昌公司矿警连枪枝，宣布工厂独立，悬挂护国军旗帜。旋因力量不敌，被驻军击败。大部工人投刘重所部。

5月8日　滇、黔、桂、粤四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为抚军。

5月12日　李烈钧率部由桂入粤，至肇庆。6月上旬移师韶州北进，进攻江西。

6月6日　奉天中华革命党人攻入兴京（今新宾），继又攻占昌图。旋被驻军击败。

6月18日　广东江北战事爆发。是日，龙济光密令韶连镇守使朱福全炮击韶州城外李烈钧部，激战两日，李部攻占韶州。

6月25日　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保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加入护国军。宣称："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

陈宧离川赴京，退出成都。27日周骏率部进据，自任都督。

7月1日　巴布扎布匪帮三千余人，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黑龙会策动下发动叛乱。是日由日本骑兵大尉表柳胜敏指挥。自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喀尔河(即哈拉哈河)畔出发，向洮南窜扰。24日至突泉，26日为洮南镇守使吴俊升所部奉军击败，巴匪渡辽河向郭家店(今属吉林梨树县)逃窜，巴布扎布匪帮1913年曾附合外蒙古的内蒙多伦诺尔一带骚扰掠夺，失败后在俄国侵略势力庇护下盘据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带抢劫。1915年袁世凯派兵追剿，又逃至呼伦贝尔地区。

7月3日　李烈钧所部滇军攻占广东源潭，桂军攻占三水，龙济光所部振武军退守广州。21日桂军进占佛山，两军在广州附近激战。22日英驻广州领事致函军务院岑春煊，希滇桂军勿攻广州。

8月2日　广东龙济光在滇桂军进攻下，连向北京政府求援。是日电请段祺瑞派兵解围。4月段复电，谓李烈钧等"违令进攻"，"不顾大局"，"除以武力划除外，别无良法，日前已电令赣闽星急出师，分道进攻，以救全粤"。段祺瑞此举，迫于当时形势，未敢付诸实行。

陆荣廷通电全国，谓广东振武军炮轰驻留关李烈钧滇军，激起三省义军公愤，故起战争，非为"扩张势力"。

8月11日　北京政府令广东滇、桂军与振武军双方停战，并特派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率海军驶往查办处理。

8月13日　奉天郑家屯(今吉林双辽)非法驻有日军五六十人。是日一日人因细故殴打中国儿童，当地驻防奉军一士兵出面劝阻，引起争执，事后日军结队至当地驻军二十八师某团团部寻衅，挑起冲突，双方开枪，互有伤亡。日军方即由公主岭、铁岭等地向郑家屯大量增兵，逼令当地驻防奉军撤出城外三十里。某团被迫撤出。21日日关东都督照会奉天督军张作霖，无理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三十里内中国军队全行撤退，经交涉无效，沿线奉军被迫撤出。郑家屯事件既起，日本政府遂借此提出种种侵略要求，引起所谓中日郑家屯事件交涉。

8月15日　巴布扎布匪帮，在奉军追剿下是日退据南满铁路线梨树县郭家店，洮南镇守使吴俊升部遂将该地包围，当地日军竟公开出面干涉。经交涉以巴布扎布匪遣散归旗为条件，奉军即不加追剿。8月16日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西川虎次郎与黑龙会头目会商决定，指示巴布扎布退出"南满"地区。

李鼎新宣布取销海军独立。

8月17日　湖北沔阳县北乡农民要求缓征堤垸保护费，遭县署拒绝，并派警队强迫催征，乡民聚众三千余人，持农器抗拒，警队逃遁，堤工局亦被捣毁。

李烈钧通电罢兵离粤，将所部滇军交由参谋长成桄、师长张开儒率领。27日李抵肇庆。9月5日滇军自广州附近退驻源潭，防地由桂军接管。陆荣廷、龙济光就接交广州事进行交涉。

8月18日　程潜宣布取销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部队改编为湖南陆军第四师。11月15日该师又编入湖南第一师。

8月19日　黎元洪令各省军民两署划清陆军和巡防营管辖权限。陆军归督军管辖，警备巡防各营队归省长管辖。

8月31日　川边康定驻防川军两营哗变，肆意抢劫。川边镇守使殷承瓛将变兵缴械，组织军法会审，于11月19日判处营长傅青云等四十一人死刑，另三十九人罚充苦工。

9月2日　巴布扎布率残部在日军掩护下自奉天郭家店撤出。次日行经公主岭朝阳坡大肆抢掠，为当地驻军派兵包围。日军又出面干涉，并借口驻军枪弹射穿日本国旗，开枪挑衅，双方遂起冲突。4日驻辽阳日军五百余人开赴朝阳坡。当地驻军被迫撤离该地。

9月27日　四川新津驻防川军发生兵变，变兵抢掠后结队逃逸。川边镇守使殷承瓛于泸定地方将变兵围捕。11月25日三十二人被处死。

10日7日　巴布扎布匪帮残部在热河林西县附近袭击当地驻军，次日攻林西县城，巴布扎布被击毙，余众后退回呼伦贝尔地区，1917年为黑龙江督军所收编。

10月14日　广东督军陆荣廷自佛山率桂军进入广州，龙济光率振武军退虎门陆续乘船开赴海南岛。广东滇桂军与粤军战事至此终止。

经　济

1月23日　京张、张绥铁路归并办理，改名京绥铁路。

1月　叶友才等在上海开设"华生电器厂"，初造小件电器用品，嗣后增资制造 各种电风扇和电动机等。

2月9日　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进呈"《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2月12日　奉天省锦县辟为商埠。

3月1日　孙毓蕃与日人佐佐江嘉吉在内蒙东部开办钱家店农场，占有耕地四万八千余亩。

3月5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财政部与比利时铁路电车公司签订陇海铁路七厘国库券合同，代款比金一千万佛郎，以该铁路财产收入作担保。

3月27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财政部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滨黑铁路五千万卢布贷款合同，挪作行政费用。规定以该路财产、收入作担保。

3月　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二百余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与警察发生冲突。

清肃亲王善耆与日财阀大仓喜八郎男爵议订借款日金一百万元，作为宗社党复辟的军事费用。并约定事成后，以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一带非民间所属森林采伐等各项权益，作为双方合办事业，委与大仓经营。

奉天鞍山日中合办振兴无限公司成立，开发鞍山附近矿区。

4月7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美国李·希金逊公司借款美金一百万元，作为军政费用。

4月8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财政部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滨黑铁路一百五十万卢布借款垫款合同。经该路财产、收入作担保，挪作行政费用。

5月7日　年初，梁士诒、叶恭绰依驻华法使康悌建议，指派梁汝成、李兼善等，与法国军部代表左治·陶履德上校订立在华招工合同，筹办惠民公司。是日，梁汝成等就此事呈报外交部"立案"，并将招工事宜，悉归该公司专办。

5月12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暂停兑现。

北京政府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华宁公司库券合同，借款日金一百万元。以该公司所采江宁凤凰山铁矿作担保。后改以国库券作担保。

5月14日　惠民公司在天津正式设立公司，开始招募华工赴欧参战。并于是日起，至次年8月止，相继在天津、香港、浦口、青岛附设招工机构。此后，俄、英两国均引其例，分别在哈尔滨、威海卫等地招送华工。

5月17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美商裕中公司签订株(州)钦(州)、周(家口)襄(樊)铁路借款垫款合同，款额为美金一百万元。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款项无着，事遂搁置。

6月30日　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通车，长二百二十四公里。该段铁路自1906年动工，工程时进时停，至是日始完工。

7月　农业储蓄银行创立于山东威海卫，资本规定为五十万元，于烟台、上海设分行、支行。

荣宗敬、丁梓仁于上海创办福新第四面粉厂，资本十二万元。

8月1日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向汇丰、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华比、有利、台湾等银行借款二百万元，作兑换准备金。

奉天财政厅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二百万日元借款合同，以该省全部契税、酒税及他种岁入为担保。名义上充奉天市面金融救济，实际用于军政开支。

8月4日　交通部与德华银行签订九十五万元借款合同，作拨付德华银行短期借款本息用，以京汉铁路余利担保。

8月9日　财政部与美商花旗银行在京签订一百五十万英两购银合同，作为天津、广州造币厂向美国精练公司购买银条之用，以国库证券为担保。

8月16日　日商在上海开设东亚制麻株式会社，有纺锭三千零四十枚，麻袋织机八十五台，麻布织机六十二台。

8月20日　自是日至9月11日交通部向中日实业公司先后三次电话借款计三百万日元，以北京、武昌、汉口、汉阳电话局全部财产及收入和营业权作担保，用以偿付津浦、京汉两路借款本息及购买电话器材。

8月23日　汉冶萍煤铁公司与日商安川敬一郎签订合办九州制钢厂合同，并附合办九州制钢厂生铁供应合同。合同规定钢厂在日本九州创设，资本一千万日元，先收五百万日元，中日各半；汉冶萍公司保证供给钢厂生铁"以每年六万吨为最少限度"，铁价以伦敦市价八五折计算，半年一定。

8月31日　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规定资本三十万元，实收二十万七千元，纺锭一万二千二百四十枚。是月正式开工。1917年改称申新一厂，创设布厂，有布机三百五十台。

姚东彦、王锡彤、赵从藩、张璜、孙多森等在天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先后在天津、通县、正定、青岛、郑县等地设厂。

9月10日　财政部、农商部与日本兴亚公司在京签订五百万元借款合同，以中日合办湖南水口山铅矿和安徽太平山铁矿为条件，并用直隶等七省印花税为担保。嗣因湖南、安徽两省民众反对及英、美、法、俄四国提出抗议，遂于本月25日改订契约，借款额不变，改以制钱精炼的利益偿还。此项借款主要移充军政经费。

9月30日　郭子彬、郑培之等在上海创办鸿裕纺织公司，是月开工，纱锭四万三千九百枚，布机二百四十台。1918年为永安公司收买，改称永安第三厂。

中日合办天宝山公司(采掘银、铜矿)创办于吉林延吉，资本五十万元。

10月26日　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是日开始兑现，用现金收兑该行纸币。各地分行亦先后开兑。

10月27日　江南造船所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三十万银元，以盐税余款及国库证券作担保。

10月31日　财政部和北京中国银行向汇丰、东方汇理、华俄道胜、横滨正金四银行签订八十万银元借款合同。以盐税余款作担保，该项借款用作兑换准备金。

11月7日　孙多森等在天津发起创办中孚银行，资

本二百万元，并于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分行。

11月11日　财政部汉口造纸厂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二百万日元借款合同，名为扩建工厂，实则拨付军政各费。

11月18日　财政部与美国芝加哥大陆通商银行签订五百万美元实业借款合同，以烟酒税和河南、安徽、福建、陕西四省货物税作担保。21日北京《公言报》将合同全文泄露，英、日、俄、法四国银行团以该项借款违反1913年善后借款合同规定，于22、23日两次质问北京政府，并于24日提出抗议。

11月　孙吉孚、陈保钦在上海创办物华丝厂，资本十六万元。

12月11日　沪杭、沪宁两铁路接轨通车。12日售票营业。

12月28日　西原龟三在京与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及陆宗舆议定第一次五百万日元交通银行借款，以国库券为担保，此即所谓“西原借款”之始。经日本外务省同意，次年1月4日双方正式签字。1月14日西原龟三离京回国。

文　教

2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版，易白沙作《孔子评议》，反对孔教和独崇儒学。认为孔子不过是“独夫民贼”和“野心家”的“百世之傀儡”。

3月29日　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与法人欧乐、穆岱等人，在巴黎召开“华法教育会发起会”，并推选 干事，拟定会章。举蔡元培、欧乐为会长，汪清卫、穆岱为副会长。规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济之发展”为宗旨。6月22日该会召开成立会。同年，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巴黎创办华工学校。1917年在北京设立华法教育会，于京、津两地创办孔德学校，并陆续在京兆、直隶、山东、湖南、四川、福建、上海等省市设立分会。1918年又在北京设立法文高等专修馆，于长辛店设分馆工业科，蔡元培任馆长。

6月15日　留日中国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所办《民铎》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

7月10日　内务部通知各省、区，前停邮的旧金山《中华民国公报》、《民国杂志》、《少年晨报》，仰光《觉民日报》，日本《民国月报》，香港《观象日报》、《泰东日报》应准予邮寄。前查禁 的上海《五七报》、《公论报》、《甲寅》杂志、《正谊》杂志、《爱国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中国白话报》、《中华革新报》，广东《兢业日报》，四川《醒群报》，贵州《铎报》，云南《国是报》、《共和滇报》等报刊解禁。

7月30日　邵振青于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我国自办通信社之始。

8月16日　《晨钟报》创刊于北京，该报为宪法研究会机关报。

《旅欧杂志》创刊于法国巴黎，该杂志为宣传留法勤工俭学早期刊物之一。

9月1日　《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是日发行。

9月7日　教育部通知各省区撤消1915年袁世凯颁行的《教育纲要》。

9月18日　黎元洪指令教育部分别废止或修改袁世凯1915年颁行之各种教育法规。

10月12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北京开第二次大会，到会各省代表五十余人，至25日闭会，通过注意贫民教育、请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速颁国歌等十几项提案呈报教育部或通告各省、区。

10月　国语研究会在北京发起成立，会章规定“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黎锦熙、彭清鹏等人著文提倡。次年该会在北京开第一次大会，推举蔡元培、张一麐为正副会长。

12月3日　中国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等人发起成立丙辰学社，后于1920年10月在上海设总事务所；1923年6月改名中华学艺社。该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

12月27日　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12月31日　道德学社在北京开成立会，标榜以“阐明圣学，敦崇道德，实行修身”为宗旨，社长王士珍。该社采用讲学、星期讲演会等方式，宣扬孔孟之道。1917年1日印行《道德学志》(旬刊)。1918年1月10日道德学社南京分社成立，江苏督军李纯任社长，并出版《道德浅言》月刊。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7年

导 言

1917年，南北两方的矛盾因暂告"统一"而得到缓和，但北京政府内部矛盾又尖锐起来。由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争斗，府院之争拉开了序幕，尤以制定宪法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为激烈。双方各不相让，终于酿成分裂，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职，段祺瑞出走，为后来张勋复辟埋下了种子。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领"辫子军"北上，在天津实行"兵谏"，向黎元洪提出解散国会的先决条件。6月14日，张勋进入北京，立即着手复辟，一时间北京城又成了龙旗的天下。张勋、康有为等又搬出废帝溥仪重登大统，发布复辟诏，清王朝的僵尸阴魂又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当张勋复辟、解散国会时，孙中山就发出了维护临时约法的号召。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仍然拒不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意识到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华民国只是徒有虚名，因而联合南方军阀发动护法运动，随即开始了护法战争。然而，各省军阀并非真想帮助孙中山实现共和，而是只想如何保住地盘而与北京政府妥协，从而使护法运动失败了。

就在张勋复辟的次日，段祺瑞便组织武力，在马厂誓师，准备讨伐张勋。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在7月5日正式开始，讨逆军进展顺利，辫子军兵败如山倒。段祺瑞将总司令部自马厂移至天津，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以"再造共和"英雄自居。

在张勋复辟后，黎元洪总统躲进了日本公使馆，致电冯国璋代理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复辟事败后，黎元洪羞于任职，从而使冯国璋成为正式大总统。这是民国第四位总统，也是北洋老派代表，然而，这并没有消除北洋政府内部分歧。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终于因不存在议会干扰而得以顺利通过。眼看大战已近尾声，段祺瑞捡了个大便宜，中国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列居战胜国地位了。

美国与日本在中国有着极深的矛盾，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无暇东顾，从而不得不与日本妥协。著名的《蓝辛——石井协定》就此出台，中国成为刀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府院之争**
- **张勋复辟**
- **护法运动**
- **讨逆战争**
- **冯国璋就任总统**
- **对德宣战**
- **蓝辛——石井协定**

府院之争

背景介绍

1916年秋至1917年夏，南北两方的矛盾因暂告“统一”而得到缓和，但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又开始尖锐起来。由于黎元洪和段祺瑞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其主张和要求也因反映各自主子的利益而有所不同。皖系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急于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黎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同皖系争抗。黎元洪集团（总统府）和段祺瑞集团（国务院）的这场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斗争焦点主要表现在制定宪法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

1916年8月，国会恢复会议，着手制定宪法。当时，国会中党派关系有了很大变化，议员中人数最多的是原来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国民党人数虽多，但分成无数小派别，比较涣散，总体上是反对段祺瑞的。进步党人数在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他们废党立派，演变为宪法研究会，内部比较团结，基本上是拥护段祺瑞的，但和冯国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时也拉拢黎元洪和西南军阀。

在制定宪法时，拥段派（研究系议员）为加强段的势力，主张中央集权和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长。反段派（国民党各派义员）则相反，主张地方分权和民选各省省长。研究系代表当权的北洋派利益；国民党派多代表地方军阀的利益。北洋派各省军阀关于制定宪法的意见，多与研究系共鸣。冯国璋曾通电完全支持研究系的意见。西南各省忙于扩张实力、争夺地盘，则大都支持国民党各派的意见，偶有倡议省宪和联省自治者，呼声微弱。12月8日，众议院举行省制问题审议会，会议在表决手续问题上，研究系（进步党）和益友社（国民党）议员发生激烈争辩，以至互相辱骂，最后，演出了一场武斗闹剧。

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以总统府黎元洪为首的反参战集团与以国务院段祺瑞为首的主张参战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争。斗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材料：

- 黎段失和
- 府院划分权限

材料一　黎段失和

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约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欲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见分歧之开端。后南方各省一律主张恢复约法与国会，而海军李鼎新竟有独立宣言，要求恢复国会。段迫于当时形势，亦无可奈何。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黎令召集国会速定宪法，并召开选举副总统大会。冯国璋当选，议宪开始，气象一新。但有部分国民党议员，欲结黎倾段。此次组阁本属混合制，国民党阁员及议员居多，故多数拥黎，而黎顿觉局面迥非昔比。双方左右媒孽乘机挑拨，府院之间冲突愈形尖锐。孙洪伊以阁员身份，日在总统府指挥一切，徐树铮心尤不平。适中国银行为兑现，借到美金五百万元，言明按九一交款，未与银行团商量。此事本系阁议秘密通过，亦为黎所赞成，而孙洪伊将此消息漏泄之。报纸竟将原条文宣布，五国银行团来函抗议。市面先时中国银行票价，仅四五折左右，若能保守秘密，则借款到手，暗中逐渐收回中票，则此项借款可于中票收回后，尚可留为整个善后之用。但孙洪伊泄之，引起外交抗议，风声所播，市面中国银行票价陡涨至八折以上，故又费尽力量，中行始克兑现。徐树铮又搜得情报，谓孙洪伊之为此，因其个人先以贱价收买中票，故利于未兑现前中票先涨价，借获厚利，损公利己。故段认为此人不能共事，去孙之意甚决。而徐树铮与孙洪伊，因此事在阁议时互相冲突。府中则每以无关系之用印小事多方指摘，以致狂躁之徐树铮难于相容，府院之间成见日深。黎素不满徐树铮之跋扈，亦欲去徐。乃由许世英主张，作孙徐两罢之议。于是孙洪伊免去内务总长之职；徐树铮免去国务院秘书长之职，以张国淦继之。

不意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徐树铮与许世英本无怨无德，此次徐之下台，发动在黎，徐迁怒及许。因许世英画蛇添足，于事后以一函致段，函中谓徐树铮学识精力尽有过人之处，但彼既弃文学武，宜就其所长，加以驱策，政治非其所长，不如任以武职，且彼门户之见稍深，与段兼容并包之旨亦不相合，武职尽多要津，若能用其所长，则所以保全树铮，亦即可以保全总理，云云。在许以为词甚婉转，在段视此函为平常，并未秘藏。不料此函又为徐树铮所见，大中其忌，谋以报复。

适交通部与各路局局长以运输快车有租车之议，租约五年，每车每日以三元计租，照市价约值一千八九百元。按三元计租，则车商不到两年本息即可相抵，所余三年多，租价皆属盈余。且洋商揽售运输车者甚多，亦可分期还款。租车之议弊端太大，而彼辈犹以每日三元为未足。商人系金荫涂、鲍星槎新立公司，递呈到部。乃次长王黻炜将原呈内三字改为四字，且眉批云："部章各局互相调用，车辆系每日每辆作价四元。此件退回。"金鲍两人本系架空生意，即以此件示各洋商，盖表示其门路甚宽，以便向各洋商赊账也。不料各洋商将其原件用照相机拍照，留存此照片。如何又落于徐树铮之手，则不可知。

先是四五个月以前，许世英忽向段前请派我为京汉局局长。因当是时我正在国务院任秘书，我表示不愿就，与许同在段前交涉。许谓："屈汝为局长，为我作耳目也。"段遂劝我暂就，为许帮忙。至租车之议垂成，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三局长，以合同见示，且约联名。我立时却之，且告以租价惊人，须知车非路轨何能运输，一切费用在内，故每日定为四元；且各局互调，报销归部无分彼此。商人只有一车，何能引此例为比较。外议沸腾，嘱其谨慎行事。我即夕以此事始末告之于段，段谓许隽人何言？我答尚未往见。段曰速去速去。我到许宅，谓许已四处寻我。因彼已得王家俭报告，我推却签此合同。于是许垂询及对此事意见。我乃以此事决不可办之理由告之，且告以祸在目前。我闻徐树铮已将王黻炜通同舞弊之确据，日内必定在检察厅起诉，并告其金、鲍等人新组织之公司，虚有其表，彼原系德商买办，大战后失业，故冒险作此勾当。许谓此等内容我均不知，即夕派参事雷中夏、路政司司长曾鲲化查办。雷秘告王黻炜，即夕潜逃。次长既逃，遂将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等正副局长送法庭办理。许一面对黎、段自请处分，求去。经黎、段挽留，此事始告终了。徐树铮去职之后，在府院之间，尚引起此一段风波也。

（摘自《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七十二期）

材料二　府院划分权限

黎之恨段并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以前他以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地位实权兼而有之，后来段奉了袁的密令突然来到武汉，用绑票的手段把他押上火车，从此他就做了袁的政治俘虏。袁对他虽然束手束脚，还有虚伪的礼貌，段对他却只有一副冷酷可怕的面孔。袁死后，段到东厂胡同迎黎出任总统，并不是表示热情拥护，而是颐指气使，这对黎说来又是一个深刻而痛苦的烙印。在黎接任总统后的这些日子里，段总是把他当作盖印机器来使用的，甚至段的党徒也都只知有总理而不知有总统，黎对此更有"芒刺在背"之感。

段之看不起黎也有长期的历史根源。第一，前清时期，他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第二，袁世凯当权时期，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第三，目前黎的总统地位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他认为对黎没有假以词色的必要。

黎就总统后，调任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府秘书长。府秘书有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八人。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四人。军事幕僚经常建议总统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总统不管军事，就不如不做总统。"黎也觉得袁世凯做总统何等威风，我这个总统虽然不集权，毕竟还是一个总统，不能不管军事。这个意图与段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段以为他是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掌握全国政权，以陆军总长的地位掌握全国军权的，总统不负实际责任，只能安分守己地做一个盖印机器。段的政治独裁是建筑在军事独裁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让总统管军事，就等于把自己放在手无寸铁的空位子上，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黎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原来这些反对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此外，黎的军事幕僚擅自打电报劝陈宧通电取消独立，随后又劝陈宧自动解散军队，陈宧居然不向内阁请示而奉总统之命以行，因此段把这批幕僚恨入骨髓，指斥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黎管到与督军有关的问题，并且擅自解散北洋派的军队，段认为必须及时制止，决定采取杀鸡吓猴（杀陈宧）的手段以警戒黎。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前的重大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段本已苦于有一个国会使他对一切问题不能独断独行，现在再加上一个总统遇事掣他的肘，如何受得了。他有时向他的党徒发火说："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段自己不愿经常与黎见面，便把府秘书长张国淦当作府院之间的传声筒。一天，段请张转告，拟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这是张又一次碰到的同一个难题目：以前袁政府时期，段曾请他把用徐树铮为院秘书长的意见转

达袁，他碰了袁的一次大钉子，他知道黎也是最恨徐树铮的。但是，他想到黎的性情比较"温厚"，或者不至于一口拒绝。不料他向黎提出时，这位"温厚"人物满脸都是气地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不愿照实回答，便去找徐世昌研究一下。徐为此到公府来劝黎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他又补充说："不要怕又铮（徐树铮）跋扈，芝泉（段）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

黎对徐不仅有好感，更重要的是徐与北洋派具有深厚关系，想利用徐以抵制段。黎提出一个交换条件："以后院秘书长因公到府，必须与府秘书长偕同来见。"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徐树铮为院秘书长的命令。

徐树铮到职不久，就露出专断态度来。一天，因发表福建三个厅长的命令到公府办理盖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个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很不耐心地说："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他出府后，黎向手下人气鼓鼓地说："我本来不要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然目无总统！"

由于府秘书长提出划分府院权限的方案，段的私党捏造府方行将恢复总统制的谣言，段又气得一连请假数日，到八月二十六日才销假视事。但他内心上未尝不想减轻府院之间的摩擦，因此向徐树铮下了一道手谕："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赍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异。"又呈报黎说："……逐日语件，均由徐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

关于府院权限问题，段坚持总统不应列席国务会议，最后双方成立协定如下：一、关于国务会议，事前呈阅议事日程，事后呈阅议事记录；二、会议后由国务员公推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三、每逢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四、总统对议决之案，如认为不合，得命总理及主管部阁员说明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五、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

（摘自《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

张勋复辟

背景介绍

1917年，伴随军阀割据而出现的权力争夺的加剧，进一步在北洋政府内部反映出来。这年春夏，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与亲美的总统黎元洪，围绕着所谓"对德参战"问题而展开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达到了高潮。4月25日，段祺瑞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纠合"督军团"在北京集议，通过对德宣战案，向黎元洪炫耀实力。5月10日，又派出便衣警察3000多人，打着各种"公民团"的旗帜，包围国会，殴打议员，用强暴手段胁迫国会同意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段祺瑞的横暴，在国会内外激起极大的不满。黎元洪坚持主张"中立"，议员停议对德宣战案，非皖系的内阁阁员也都辞职以示抗议。黎元洪在国会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则指使皖系八省督军宣布"独立"，并于6月2日在天津组设"独立"各省的总参谋处，公然对抗总统，北洋政府于是完全瘫痪。为了打破僵局，互相撕咬的双方都想借助张勋这一"第三势力"，用以击败对方，这就给清朝复辟集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复辟良机。

张勋此时不仅手中握有一支20000多人的军事实力，而且还由于他在1916年5月18日冯国璋主持的南京会议上，带头反对逼袁世凯辞职，主张"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一鼓荡平"西南护国军，而得到北洋各派的支持和赞扬。张勋的主张，由于袁世凯死去而未能付诸实施，但他立即邀集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北上，于6月9日举行第一次徐州会议，目的在于进一步"固结团体"，维护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同时暗中策划拥戴清帝复辟。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领5000辫子军从徐州北上。在天津实行"兵谏"，向黎元洪提出解散国会的先决条件。黎被迫从其所请，于13日将国会解散。14日，张勋即率部进入北京，立即着手实行复辟。各地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大喜过望，纷纷向北京涌入，陈请立时复辟的函电也如雪片般飞来。黎元洪察觉为张勋所欺弄，但为时已晚，无力扭转局面。

7月1日凌晨，张勋身穿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文武大小官员300多人涌入清宫，跪请复辟："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仅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年仅12岁的宣统在这班狐臣孽子的导演下表示接受吁请，发布复辟诏："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于是，三角龙旗翻飞京城，蟒服顶戴成了热门货。随即分封官爵，授予张勋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南北洋大臣的要职；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兼太傅，赏给头品顶戴；其他复辟分子也分别授予大小不等的官职。清王朝的封建僵尸，又死后还魂，重新在中国的土地上徘徊。

材料：

- 张勋进京
- 丁巳复辟

材料一 张勋进京

一九一七年农历四月底，我带着一营卫队、一营炮兵、两营步兵，和另一统领李辅廷带着六营步兵，共计十营人，随同张勋由徐州出发，先到天津，队伍全部驻扎在天津河北车站附近，我个人随着张勋到他的旧德租界公馆里。张勋元配夫人曹琴常住天津，北京南河沿亦有公馆，定武军的驻京办事处就设在他公馆里，因为当时定武军的粮饷军械都取给于京津，所以曹夫人经常往来于京津两地，除有重大的事情外她不去徐州。我到公馆首先找了个机会把张文生嘱咐的话向曹夫人说了，并且说明无论如何，要夫人劝阻大帅，千万劝大帅别办复辟这件事。当时曹夫人听了我的话也很注意，后来她亦确向张勋说了。只是张勋效忠清室的心愿太坚定了，亦可以说太顽固了，未能接受劝阻。后来张勋进京，曹夫人没去，只是张的二太太邵夫人和姨太太王克琴、傅筱翠等几位带着子女一同进京的。

在张勋到了天津的当天晚上，段祺瑞闻讯赶来看他。原来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了国务总理职务之后就住在天津，所以他一听说张勋到了天津，马上就来看张。这次张段会面我亦在旁。当时他二人谈话的时间比较长，说的话亦多。全部谈话是记不清了。不过其中有几句话我很注意。记得段当时对张说："大哥来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治安，这是要紧的事。别的事亦可以办(不知所指何事)，只是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可南方亦不会答应，我看这件事还是慢慢来办。"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心说老段这个人还真够朋友。可张勋听了这话之后并未回答，只是点了头。段去后又过了三天我就随从张勋带着队伍进了北京，张勋在前门下车后带着眷属径赴其南河沿公馆，我和李辅廷带着队伍驻扎在天坛。

张勋到了北京之后曾与大总统黎元洪会晤了很多次，并未作倒黎的任何举动，段祺瑞复职的话亦未听说，相反地是推出李经羲来继任国务总理。黎既未被推倒，而段祺瑞亦未能复职。就在这时，有一天张勋向我们说："到北京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回徐州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一天晚上，张勋正在江西会馆看戏，突然万绳栻来要张回去开会。就在当天晚上在张勋公馆里开了会，我记得当天晚上参加开会的有：张镇芳、雷震春、吴镜潭、万绳栻、胡嗣瑗、康有为、江朝宗、汤玉麟、冯麟阁、张海鹏，还有几位姓名记不清了。当时首先发言的是雷震春，他说："请皇上复位的事大家都签了字，这时不办要等什么时候再办？"张勋说："这件事得好好地商量。"张勋随即面向吴镜潭问："北京的事应该跟北京的人来商量。北京谁的声望最高？谁能维持北京秩序？你是警察总监，你最清楚。"吴镜潭回答说："那还要首推王聘老(王士珍号聘卿)。"张说："好，那么就请聘老出来，大家一块商量吧！"这时雷震春很急躁地抢着说："事情到现在了还要跟这个商量那个商量，那得商量到什么时候！干脆，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张勋说："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商量着办吧！"可是这批参加会议的人，等到后来一开火就星流云散了。万绳栻在未开火之前就溜了。张镇芳藏在家里想避一时之风，不久即为对方拘捕，扣留了些日，最后以向熊希龄举办的香山慈幼院捐款为名，被敲诈了四十万元了事。雷震春当时叫喊得最凶，非立刻保皇上复位不可，可是他却平安无事。张海鹏溜出了京城，化装成渔民出关了。胡嗣瑗躲起来了。康有为更甭说，早就跑了。其余的人连影子亦见不着了。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材料二 丁巳复辟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前去祝贺，黎元洪也派了代表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仍送回紫禁城。有些王公大臣们还得到了民国的勋章。有些在袁世凯时代东躲西藏的王公大臣，现在也挂上了嘉禾章，又出现于交际场所。元旦和我的生日那天，大总统派礼官前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肴馔。这时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门各等侍卫，要带领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各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又像从前那样活跃起来。到了丁巳年(民国六年)张勋进宫请安，开始出现了复辟高潮。

这天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梁鼎芬点头赞许，"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

按照清朝的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

究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道：

“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连忙补充说，“越谦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延觐见天颜，到现在写信来还不忘称颂圣德。……”

过了半个月，阴历五月十三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是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的口：

“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贴，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后来奏事处太监拿来了一堆已写好的“上谕”。头一天一气下了九道“上谕”：

即位诏；

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授各部尚书（外交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和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兴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

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

（摘自《我的前半生》溥仪）

护法运动

背景介绍

当张勋复辟、解散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就发出了维护临时约法的号召。段祺瑞赶走张勋后，孙中山曾致电段祺瑞，劝他恢复《临时约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段祺瑞等声言民国已为张勋复辟所破坏，主张另行成立参议院，其目的在于抛弃旧国会和临时约法。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在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华民国仍然徒有其名，因而提出要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旧国会。1917 年 7 月 17 日孙中山从上海乘海琛军舰到广州，揭起“护法”的旗帜。海军部分将领程璧光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发表“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宣言，率第一舰队南下护法。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而附和护法。8 月 25 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到达广州的议员一百三十人的“非常国会”。非常国会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9 月 1 日开会选举，到会议员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次日选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10 日建立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南方政权——护法军政府。

陆荣廷等桂系军阀控制的两广，在张勋复辟时已宣布“自主”。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滇系军阀唐继尧等也通电不承认段再任总理的合法性。西南军阀害怕段祺瑞吞并他们，所以也愿意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还想乘北伐之机，扩弃势力，所以也参与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但是唐继尧、陆荣廷不肯就任军政府的元帅，这是为了不和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保留和北洋政府的总统、直

系军阀的头子冯国璋进行勾结以图转圜的余地。

护法运动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向南方各省用兵。10 月他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己势力，阴谋消耗双方兵力，坐收渔人之利。而冯国璋则打算与南方军阀相勾结，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冯国璋提出与“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的口号。在冯国璋指示下，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不替段祺瑞卖力。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系督军又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迫使段祺瑞一度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但段祺瑞野心不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指使其爪牙徐树铮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1918 年 3 月又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不得不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又大肆叫嚣“武力统一”，并迫使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了长沙，段祺瑞马上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以扩大皖系地盘。曹、吴对此极为不满，便按兵不动。6 月吴佩孚通电主张和平，抗拒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发表通电赞成和平。在直系与南方军阀的联合反对下，8 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停止进攻，“武力统一”宣告失败。

材料：

- 军政府成立
- 南方护法运动

材料一　军政府成立

孙中山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北方局势的发展。

早在 1917 年 5 月 22 日，孙中山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曾联名致电段祺瑞及众参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若与政客交换条件，使少数人得被擢用，而以国家为牺牲，无论官僚、民党，悉为国人之所不容。”同时，他又与章太炎等联名致电黎元洪及两院议员，指出“乱党独立，要求元首退位、国会解散，此但威吓行为，断不可长其骄气”；要求黎元洪“信赏必罚，勿事调停”；希望议员们“与宪法共死生，……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随后，他怒斥“倪逆叛乱，附者八省”的反革命罪行，指出倪嗣冲一伙“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他揭露天津伪政府玩弄“拥护总统，解散国会”的花招及张勋借调停之名解散国会、大搞复辟的阴谋，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

孙中山从正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过程的表现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重要性。他认为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群盗鸱张，叛形已著”的情况下，屈服于督军团的压力，“求与调和，以损元首之尊严，国会亦或自议解散。……不知国会一散，去中坚而存守府，叛党得挟元首以令全国，反客为主，其祸更甚于反侧跳梁”，这种做法，“实同降伏”。因此，他指出：今日的中国，“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宜宣言拥护总统”。冯国璋身为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时，“力能申讨而佯守中立，阴与周旋，兼为从中游说，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既然正副总统或者“降伏”叛逆，或者“通同谋叛”，完全丧失了充当国家元首的资格，那么，建立护法政府就显得十分必要的了。

孙中山也从段祺瑞在张勋复辟的表演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紧迫性。段始则嗾使张勋复辟，继而打着“讨逆”、“拥护共和”的旗号，窃权盗国。这种“以叛讨叛、以贼灭贼”的行径，完全暴露了北洋军阀政府“乃与张勋争权攘利，而非拥护共和”。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

孙中山通电全国主张择地另开国会，重新组织临时政府。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先后至沪，住在法租界恺自尔路惟善里国会议员通讯处。孙中山抵粤后，致电国会议员来粤开会。广东各界也通电表示欢迎。至 8 月中旬，南下抵达广州的议员已达一百五十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18 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立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虽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19 日，南下国会议员一百余人在广州回龙社前烟酒公卖局原址第一招待所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议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 8 月 25 日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七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随后南下议员通电西南各省，指出：“同人等昔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惟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荷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用，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

8 月 25 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29 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二十一条，规定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会议员组织之；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

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之。31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共十三条，其主要内容如下：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军政府设立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者任之。

显然，这个《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是为了适应戡定叛乱的战时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作为《临时约法》的补充而存在的。其特点是把恢复《临时约法》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在《临时约法》未恢复以前，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力；对总统则虚位以待。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出席议员九十一人，孙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翌日选举元帅，唐继尧得八十三票，陆荣廷得七十六票，均当选。余一名元帅原预定为程璧光，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同日下午，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及国会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至黄埔，举行大元帅授印仪式。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材料二　南方护法运动

民国五年，袁氏殂落，黎氏继任，赖西南之护法，及海军之独立，《临时约法》始得恢复。六年夏，督军团在京开会，并联名呈请解散国会时，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等即电请黎大总统维持《约法》，以固民国基础。滇督唐继尧续发通电，亦有"如有破坏国会，危及元首者，义不共戴"之语。及解散两院令下，粤督陈炳焜，桂督谭浩明，通电暂行自主，谓："国会非法解散，所有私意改造，不依法定手续成立之政府，万不能承认。"海军总长程璧光亦辞职南下，谋有所举动。复辟乱平，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等，再三电询冯代总统对于国会问题，如何解决？陆荣廷并密电冯氏，谓："若不速定国会问题，则荣廷对于西南各省，无法调停。"使冯、段当时稍有转圜之意，则西南护法运动，或不致于扩大。

六年七月二十日，孙中山先生乘"海琛"军舰抵粤，粤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及省议员等开会欢迎。中山先生当宣示召集舰队来粤，以粤为海军根据地，然后欢迎国会议员来粤集会，并请黎总统南下组织政府之意。七月二十一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通电各省，以三事自矢：一拥护《约法》，二恢复国会，三惩办祸首。并声明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无所根据，当然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亦当然否认。翌日，率领全舰队开赴广东，于八月八日驶入黄埔，同来者有唐绍仪、汪兆铭、章太炎诸人。

自参、众两院解散后，议员即陆续赴粤，至八月中旬，到有百五十余人。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公宴各议员于黄埔，即开谈话会，决定在粤组织政府。八月二十五日，国会开非常会议，讨论组织政府案。三十一日，继续开会，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即日宣布施行。此组织大纲明定中华民国军政府之组织，在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又设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各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辅助大元帅执行职务。凡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或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关系者，均任为军政府之都督。《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并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九月一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次日选举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后又选出各部总长。九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军政府组织成立。

六年十一月，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通电主和，岑春煊在上海亦通电劝和。孙中山先生对于和议虽不反对，但坚决以恢复《约法》与国会为唯一条件，并发出通电，略谓："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文虽不敏，至于拥护《约法》，维持国会，实具牺牲之精神。依照军政府组织大纳，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断不废止。"但岑春煊等仍倾向和议，至七年一月二十日，岑春煊、章士钊、陆荣廷、李根源等，在广州组织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不啻为与北方议和之总机关。七年五月四日，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先生向非常会议辞大元帅职，离粤赴沪，并发出通电，略云：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役，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文不忍坐视正义之弗伸，爰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义护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议决，由是发生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于中华民国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是用不避艰险，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自是以后，粤、桂、滇、黔、川、湘，又莫不宣言护法……其他表同情而来附义者，尚复所在多有，不得不谓为护法之已告成功。……乃者非常会议议决改组军政府，以应各省之要求，今而后庶可资群策群力，以昭护法之大业，而告厥成功。……谨略述颠末，向非常会议辞大元帅之职，幸公鉴焉。

（摘自《中华民国立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讨逆战争

背景介绍

张勋宣布复辟的次日(7月2日),段祺瑞与徐世昌略事商讨后,便偕同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从天津乘汽车赶往马厂,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段祺瑞要在天津附近组织讨张的军队,也有一番周折。当时驻京畿的军队除张勋辫军外,十一师(师长张永成)驻北苑,十二师(师长陈光远)驻南苑,十三师(师长李进才)驻西苑。此外还有近畿第一旅(旅长张锡元)、近畿第二旅(旅长吴长植)和江朝宗统领的京城卫戍军驻扎北京城内。这些军队的将领在复辟发生后态度暧昧。江朝宗、陈光远、张永成、李进才、张锡元、吴长植等人,都在宣告复辟的通电上列名,段祺瑞不敢打这些人的算盘。除以上京畿驻军外,直隶北部还有:一师(师长蔡成勋)驻宣化,八师(师长李长泰)驻马厂,三师(师长曹锟)、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驻保定,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驻廊坊。上述各军队的将领除蔡成勋外,都未列名复辟通电,多数尚在观望,有的已表示反对复辟。但是这些军队大都非段祺瑞的嫡系,使段大费踌躇。段与左右再三商讨,最后确定运动驻马厂的八师发起讨伐张勋的军事。该师团长阎繁瑞、阎繁敏原系段的马弁,师长李长泰与段私交甚厚。与此同时,段还派人运动驻廊坊的十六混成旅。该旅旅长原为冯玉祥,4月初被段的心腹排挤,改任直隶巡防营统领。冯走后,十六混成旅旅长由原参谋长杨桂堂继任。杨平庸无能,冯的潜势力仍在。复辟发生后,张绍曾、陆建章都有所举动,段祺瑞深恐冯玉祥为他人利用,赶快重新任命冯指挥第十六混成旅。

3日,驻保定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密电征得冯国璋的意见之后,通电宣布反对复辟,参加讨逆,从而加强了段祺瑞讨逆军事的阵容。当时,段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张志潭、曾毓隽、丁士源、张弧、任凤苞以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分任各职。

马厂会议决定: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分东西两路同日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率三师、二十师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任司令,督八师和十六混成旅集合于廊坊,然后沿京津铁路西进。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破坏民国的八大罪状,宣布讨伐。同日,八师自马厂誓师出发,经天津赴落垡、廊坊。

讨伐张勋的军事自7月5日开始。5日凌晨4时,讨逆军东路军八师一部在廊坊、万庄之间与辫军首次接战。辫军无备,稍事抵抗,即退往丰台,讨逆军追至黄村(今大兴县城)以北。同时,西路军三师也乘火车北上,占领涿州、良乡,直抵芦沟桥。6日,讨逆军东路冯玉祥部也参加战斗,与八师王汝勤部合兵追击辫军至丰台以东。同日,由南苑航空学校组成的讨逆航空队轰炸了丰台辫军的阵地。7日,讨逆军攻丰台,东路先发起。辫军正在抵抗之际,西路会同新加入讨逆阵营的十二师陈光远部自西发起攻击,辫军不支,向西北逃窜。原依附张勋的近畿第二旅吴长植部在战场上倒戈。正午,讨逆军完全占领丰台。据曹锟报告,此役辫军仅死"数十名","我军人马一无损伤",可见战斗并不激烈。同日,西路三师吴佩孚旅占领协寨、跑马厂等地。自此,北京城东南要隘尽为讨逆军控制,辫军只得紧闭城门,龟缩在北京城内。

与进攻丰台同时,讨逆军航空队轰炸了北京城内辫军营地和清宫。投下的三枚炸弹,两枚落在宫内,炸伤轿夫一名,使辫军人人自危,惶惶不安。清室不得已,才出面托日本公使林权助函劝段祺瑞停止轰炸。

叶恭绰出任讨逆军司令部交通处长,对讨逆战事顺利展开作用颇大。经他运动,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局将大批客货车皮集中于天津和保定,载讨逆军北上;同时又将徐州附近各车段的空车皮完全调走,使徐兖地区的辫军不能北上增援张勋。

研究系的重要成员几乎全体出动,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梁启超、汤化龙直接参加"讨逆军总司令部",这一时期段向外发布的重要文电,都是梁启超的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向四方活动。7月1日,复辟消息一传出,熊即致电上海赵凤昌,要他疏通国民党人与段祺瑞"速释嫌怨",联合起来反对张勋。"万不可于北军范围内发起革命军,恐北方将领畏有萧墙之祸,反致团结一气,投入复辟游涡"。4日,熊希龄再电赵凤昌,请"设法运动海军……开赴大沽",威胁辫军,并促使当时态度尚不明朗的陈光远、蔡成勋两部迅速加入"讨逆军"。

5日,段祺瑞将司令部自马厂移至天津,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暂以直隶省公署为办事处。

材料:

· 张勋请降

· 段祺瑞通电讨逆

材料一 张勋请降

张勋见大势已去,于6日派梁鼎芬(复辟授外务部尚书)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提出只要段同意"维持君主政体",张立刻率兵"离开北京"。张勋也于6日发出通电谓:"我国自辛亥以还,因政体不良之故,六年四变,

迭起战争，海内困穷，人民殄瘁，推原祸始，罔非共和阶之厉也。勋以悲天悯人之怀，而作拯溺救焚之计，度非君主立宪政体，无以顺人心而回末劫。欲行君主立宪政体，则非复子明辟，无以定民志而息纷争。此心耿耿，天日为昭。所幸乞求声应，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嗣以事机牵阻，致有停顿，然根本主义，讵能变更。现以天人会合，幸告成功，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漾，遍于都城，万众胪欢，咸歌复旦。使各省本其原议，多数赞同，何难再见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处地不同，遂生门户之见，于是主张歧异，各趋极端。或故违本心，率以意气相向，或反持私见，而以专擅见规，遽启兵端，集于畿辅，人心惶恐，辇毂动摇。……惟念此次义举之由，本以救国济民为志，决无丝毫权利之私搀于其间，既遂初心，亟当奉身引退。……爰于本意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8日，溥仪发布所谓谕旨，准张勋辞职，内阁政务暂由王士珍"妥慎办理"，俟徐世昌来京，"再会同筹商善后办法"。显然这都是张勋所玩弄的一套自拉自唱的把戏。复辟不成，即想一走了事，返回徐州老巢，继续当他辫子军大帅。段祺瑞岂肯放虎归山，同意张勋率兵退出北京。段提出三项条件通知张勋，"一、保留清室优待条件；二、取消皇帝称号；三、解除张勋及部下武装，并保护其生命。"向来依靠枪杆子作威作福的张勋，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投降的条件。张勋的回答是："第一同意，第二不同意，第三不解除武装。"他将主力屯聚天坛和皇城四周及南池子自己住宅附近设防，密布炮位于天安门、景山、东、西华门各处。企图顽抗作垂死挣扎。此时复辟集团土崩瓦解，昔日鼓吹复辟最甚者，溜得最快，张镇芳、雷震春企图逃出北京，在丰台被讨逆军查获；康有为躲进美国公使馆。树倒猢狲散，其余大小复辟喽啰，均逃之夭夭。

讨逆军于和平解决已无希望，遂于11日晚通知公使团，将对辫子军采取军事行动，但战斗区域设法限制，不至危及外国人的安全。12日，讨逆军各路，分别由永定门、朝阳门等攻入城内。凌晨四时半，旅长冯玉祥、吴佩孚率部攻天坛辫子军据点，激战两小时，辫子军不敌，提出发饷三个月，作为投降条件。段祺瑞允之，即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支付。上午七时，天坛辫子军投降。据守南池子地区辫子军，在张勋督率下，继续顽抗。讨逆军占领宣武门，炮轰张宅，张勋丧胆，十一时，由德人保护下，乘汽车仓皇逃往荷兰公使馆。残余辫子军全部缴械投降，讨逆战事，就这样戏剧般地结束了。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段祺瑞通电过逆

段既特派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由京津、京汉两路进攻京师。五日，东路军占领黄村，西路军占领芦沟桥。六日，冯国璋在南京布告代行大总统职权，电请各方要人赴宁组织政府；段祺瑞在津亦成立国务院临时办事处，商请政府移设天津。七日，讨逆军大败张军，进占丰台，张勋退入京城，屯天坛，又密布炮位于天安门、景山、西华门、南河沿等处，谋困斗。八日，政府下令褫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职。令曰：

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陆军上将张勋，久膺民国重寄，不知竭诚自效，阻兵怙势，包藏祸心，此次借命入都，阳托调停之名，阴行叛逆之事，动摇邦本，沦陷神京，罪恶贯盈，溥天同愤！张勋应即褫去本职。并褫夺勋章勋位，着传知前敌各军，严拿务获，尽法惩治，以申法纪而收人心！此令。

同日张勋因复辟以来，各省一致反对，向清室辞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职，并将情形电告各省。其电云：

我国自辛亥以还，因政体不良之故，六年四变，迭起战争，海内困穷，人民殄瘁，推原祸始，罔非共和阶之厉也。勋以悲天悯人之怀，而作拯溺救焚之计，度非君主立宪政体，无以顺民心而回末劫，欲行君主立宪政体，则非复子明辟，无以定民志而息纷争。此心耿耿，天日为昭。所幸气求声应，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到诸计划之一。嗣以事机牵阻，致有停顿，然根本主义，讵能变更。现以天人会合，幸告成功，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漾，遍于都城，万众胪欢，咸歌复旦。使各省本其原议，多数赞同，何难再见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处地不同，遂生门户之见，于是主张歧异，各趋极端，或故违本心，率以意气相向；或反持私见，而以专擅见规，遽启兵端，集于畿辅，人心惶恐，辇毂动摇。勋为保持地方治安起见，不能不发兵抵御。战争既起，胜负难言，设竟以此扰及宫廷，祸延闾里，甚且牵惹交涉，丧失利权，则误国之咎，当有任之者矣。惟念此次举义之由，本以救国济民为志，决无丝毫权利之私搀于其间。既遂初心，亟当奉身引退，况议政大臣之设，原以兴复伊始，国会未成，内阁无从负责，若循常制，仅以委诸总理一人，未免近于专断，不得已而取合议之制，事属权宜。勋以椎鲁武人，滥膺斯选，辞而后任，方切惭惶。爰于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但使邦基永定，渐跻富强，勋

亦何求?若夫功罪,惟有听诸公论而已。敢布腹心,谨谢天下。勋。巧。印。(阴历十一月十八日即七月六日)

九日,驻京各国公使出面调停,劝张勋解除武装,免京城糜烂,张执不允。十二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分三路直入京城,围攻张军于天坛及南池子张宅。张勋败逃,匿于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奔美国使馆,而天安门、景山、西华门各处张军皆降。京师克复。

复辟之役既平,黎总统引咎去位,冯副总统遂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再起组阁,政局又告一段落矣。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冯国璋就任总统

背景介绍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冯国璋请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清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视京师为其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不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优生,黾戴河间,奠我民国。"时,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向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及其随从参谋长师景云、军务处长熊炳琦、军需总监张燮元、参谋项致中等人抵达北京就职。

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述"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像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因此,冯国璋就职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

材料:

- 冯国璋到京代理总统
- 冯国璋北上内幕

材料一　冯国璋到京代理总统

七月十四日,段趾高气扬地偕同汤化龙、张国淦由天津到了北京。当天在府学胡同段宅讨论关于总统的问题。张国淦建议迎黎复职。他只说了这句话,段就沉下脸色来咆哮着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还能和他共事!"

旁边就有一个人拿出手枪来,大声叫喊:"谁做黎元洪的说客,就当军法从事!"张回转脸来一看,认得是讨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丁士源。以前张在黎的面前建议起用段为国务总理,黎的私党金永炎摸出手枪来,厉声骂他是段的说客,现在又有人骂他是黎的说客,因此他就不能往下谈了。

段的内心并不主张迎接冯国璋到北京代理总统。他深切地了解到,冯的野心大,手中有兵权,在北洋派中也拥有不少的娄罗。如果冯继任总统,比手无寸铁的黎更难对付。段在天津时,曾与私党秘密讨论,拟于到达北京时,授意北方各省军阀通电拥戴徐世昌为临时总统,组织临时政府,俟召集新国会后再行选举正式总统。他认为徐是一个文人,他能加以控制。但他没有来得及布置这套计划,没有摸到他的底细的北方军阀,就已纷纷通电拥护冯代总统,请他到北京代行总统职权,如果段不让冯继续地代下去,可能引起北洋派的分裂而使西南各省有隙可乘。当然,迎黎复职就可以拒冯代任。可是段恨黎达于极点,不愿再把他摆在自己的头上。他又转过来一想,今天既然是采行责任内阁制,谁来做总统,谁就会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把冯调到北京来当总统,比他在南方有兵权、有地盘,能够遣将调兵,反而容易对付。因此,他决定迎冯代理总统。

张国淦劝段在礼貌上对黎有所表示,因此段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馆迎黎回居东厂胡同私宅。段当天也到日本公使馆,对林权助公使保护总统表示谢意。事实上,段是向林权助表示对日本代垫讨逆军费并从各方面予讨逆军以便利的谢意的。

就在这一天,黎发表函电,表示决不复任总统。这个

电报把下令解散国会、电召张勋进京，以及他自己逃往日本公使馆的这些事件，作为引咎辞职的理由，把讨伐叛逆、恢复民国归功冯段两人，对北方叛督曲加原谅，对西南各省则劝其保持统一，勿起政争。这个电报也被疑为是由北洋军阀捏造的，也有人说是受到压力而不得不发布的。

八月一日冯国璋抵京时，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欢迎。这位代理总统原是清朝末年的禁卫军军统，今天荣幸地做了公府的新主人，想起了前朝的深仁厚泽，乃于八月四日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代表，乘坐汽车，由西华门进去，在武英殿下车，换乘黄缰四人藤轿，在乾清宫下轿，以一国大使的礼节觐见"大清皇帝"，答谢他派员欢迎的盛意。清室派世续、绍英迎接汤在大客厅坐下。世续单独走进去"奏报"溥仪，溥仪传"旨"召见。这个前清末年曾为湖北省谘议局议长的民国总长，偷眼看见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身穿黄龙纱袍，外罩青团龙马褂，缀以东珠朝珠的小娃娃，俨然还是一个皇帝的模样，他就恭行三鞠躬礼，并大声地唱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派内务总长汤化龙，致谢大清皇帝，并敬问大清皇帝安好！"溥仪没有开口说话。世续跑到"御座"前跪下来，向溥仪低声低气地说了几句话，就站起身回过脸来，代表溥仪大声地唱着："大清皇帝谨谢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答礼的盛意，并回问大总统安好！"

这是袁世凯派公府秘书长梁士诒到清宫祝贺"隆裕皇太后"寿辰的旧戏重演。北洋军阀从来就是这样富于模仿性，万变不离其宗。也许他们自以为能与"皇帝"分庭抗礼是一件无上的"光荣"。因此，溥仪在做不成全国"大皇帝"之后，仍然可以逍遥自在，关起门来做"小皇帝"。

材料二　冯国璋北上内幕

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日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私下早已开始组阁的活动。张勋复辟不仅帮助段解决了总统黎元洪和国民党占优势的国会，而且为组织完全排除国民党人的内阁创造了条件。由于研究系为皖系反对国民党和黎元洪效了大力，段便起用不少研究系政客，组成段派官僚和研究系的混合班子。而研究系与冯国璋也一向有所拉拢，所以冯对段的内阁班底表示赞同。14日，段由津入京，次日，冯国璋任命汪大燮、刘冠雄为外交、海军总长。18日，冯又任命五名总长：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

冯国璋虽通电接受代理总统，但对于是否北上正式继任总统，却犹豫了很久。当时，冯派、段派内部对此问题都有歧议。在段的左右，徐树铮、丁士源一派恐冯手握兵权，再加总统名义，比黎元洪更难对付，力主段自行摄理总统。张志潭、张国淦一派则主张黎元洪解职，由冯国璋北上继任，比较合乎情理；而且把冯调离南京，比较更容易对付。段派内部尚在酝酿之际，李纯、曹锟等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北上就职。段祺瑞恐因此问题在北洋派内部闹起风波，便采纳张志潭等的意见，派靳云鹏南下劝冯北上。冯国璋左右对冯是否应北上也意见纷纭。冯的女婿陈之骥等认为冯不能离开经营有年的南京和自己的军队，去北京做空头大总统；而冯的参谋长师景云等则认为，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是冯扩大权势的大好机会。冯本人尚在犹豫，靳云鹏已衔命来到南京，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此次组阁，一定服从冯国璋，并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语，力促冯、段合作。在师景云、靳云鹏等人怂恿下，冯国璋终于答应北上就总统职，但提出必须以调江西督军李纯接替他走后所遗的江苏督军职务为条件。此外，提升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接替李纯。段祺瑞原打算以自己的心腹段芝贵接替冯国璋出任江苏督军，但为了对付西南，稳定政局，只好答应冯的条件。同时，段也提出交换条件：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冯国璋见段已同意李纯和陈光远的任职，也接受了段的交换条件。冯、段幕后交易作成后，7月29日，冯国璋通电宣布：黎元洪"坚持引退，长此濡滞，则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三十一日早自宁出发至京，亲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

冯国璋所谓进京敦请黎元洪复位，当然是骗人的鬼话。8月1日，冯率警卫部队抵北京，当天上午到东厂胡同拜访事先特意从避居的法国医院中赶回来迎候的黎元洪。二人见面后，冯假意劝黎复位。黎当然明白冯的用意，坚决拒绝。冯敷衍了几句即欣然离去。4日，冯通电宣布代理总统。

北京政府表面上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重新组成了。但是，这一体制仍是脆弱的。冯、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处于对立的地位。冯国璋上台前，二人在用人与地盘上的讨价还价已为新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线。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对德宣战

背景介绍

张勋复辟平定之后，对德国宣战一事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由于再不存在国会干扰的问题，因此宣战命令顺利发表，并且将宣战的范围扩大到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

宣布对德、奥宣战。布告声称："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乃自断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该布告由段祺瑞及各部总长汪大燮、汤化龙、梁启超、刘冠雄、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曹汝霖联名副署发表。

是日，外交部照会各协约国、中立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驻京代表（中德断交后，德国委派一名代表照看在华利益）、奥地利驻华公使，通告中国对德、奥宣战，美、英、法、日、意、俄等国公使当即复函外交部，对中国参战表示欢迎。然而奥地利公使则在复函中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黎前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外交部认为，中奥已为敌国，不能接受这一公文，当即将公文退还奥地利公使。其实，由于段祺瑞根本不愿恢复旧国会，因此宣战案也无法提交国会。该宣战案是在一年之后，才为安福国会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以协约国胜利、德国战败而告终，中国自然也忝居于战胜国之列，段祺瑞因对德宣战有功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

材料：

- 大总统布告
- 英报劝中国宜加入战团
- 论中国宣战后之利益

材料一　大总统布告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者，亦复甚众。我政府不能不视为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后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其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我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协约。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宣战主旨在乎阻遏战祸，促进和局。凡我国民宜喻此意，当兹国变初年，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惓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公法之庄严，不能自我失之，国际之地位，不能自我绝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自我而迟悟之。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劝贞，为我中华民国系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此布。

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

（摘自《北洋政府档案史料》南京市第二历史档案馆）

材料二　英报劝中国宜加入战团

英文《京津时报》，论中国宜加入战团文曰：

两日前本报曾著一论，谓美德邦交现已决裂，中国政府对战事所处之地位，必须详密酌夺。惟彼时尚未知美总统威尔逊已将在国会之宣言正式通知中国政府，更未知美总统并饬由驻在各中立国之大使或公使，以各该国倘步美国之后尘，则可使欧洲战事趋入议和之一途等语通告各该国政府也。此项消息传入吾人之耳鼓，其于记者所谓中国对于欧洲中部各国关系之宜有所措施，且须速于从事之主张，只须加以印证耳。至于结果如何，实勿庸过于深虑，中国尽可袒怀与美国联袂而起。中国已知美国政府及其多数之商民，本亟不欲与德国公然决裂，则可断定德国于威吓各中立国一举已铸九州之大错，无可挽回。现在德国不法之行为，既已由华盛顿宣告判决，故中国此时亦宜酌夺其自己之利益。设以美国为是，德国为非，而对于此项意外之变，竟于现在或将来坚不少动，是岂其利益乎？则记者不待辩难，即可见其大有不然者也。

日昨北京某华字报谓：中国于德国之恫喝，因其现有华工数百名赴欧正在中途之故，实直接受有影响。缘德国所宣布潜行艇猛攻之政策一旦实行，竟将载运华工之轮船击沉，则华人之生命，必致蒙有损失。此则虽世界极弱之中立国，亦得以表示其反对之意见。诚以此种举动，危

及其按法航海多数商民之生命也。然应研究之问题，尚不仅限于此。缘中国屡经革命，前数年来国势因之大为不振，现在中国所可希冀以保其完全独立者，即系对于震骇世界之战争终止后，数年内其言论得于远东占有最大势力之各国。以修其善意及友谊。查协约国固无侵犯中国之意，即中国所最惧之日本，现亦将侵犯中国之意全行捐除，已由彼国外交家宣布意见，愿与中国敦睦邦交。而英、法、俄、意国之计划，亦与中国完全独立毫无妨损。至中国与协约国所悬未了无关紧要之争端，仍有数起，然中国果能应合机宜，则此项争端于彼此邦交信义固无碍也。其在彼一方面，中国对于德国及其联盟各国，现时并无何项可希，或可恐之情事。

夫德国业与全世界挑战矣，而其挑战之结果，断难幸免，殆无异日之升必有沉。假使德国恐吓中国，中国可以泰然不稍置意。缘其所恐吓者，断不能成为事实。纵使德国有所许诺，中国亦莫如慎加防维，免致战事终局，德国之许诺竟成废纸。当此垂危之际，中国如欲免因捕风捉影之希望，致损己国之利权，最好于德国所恐吓所许诺者，全不在意。设使中国得协约国之同情，并其感激之利益，吾人以为必较德国所有报复之恐吓及德国所有发生之许诺为更多，且中国决无在海陆实行分任战事举动之问题。诚以中国无论陆军或海军，均不足当欧洲现时战斗之役。

然而所有晓事之华人，此时应知除从事海陆战役外，按照现势犹有紧要之措施，类如巴黎现有经济会议，此华人必须稔知者也。协约国深欲排除德国远东商务之利益，而所以未即实行者，徒以中国处于中立之地位耳。此层华人亦不能毫不闻知。如按个人意见，根据中国本国利益设想，其一方面之问题，则不能不晓然于中国此时如与各大国满意议价，实一特别有益之机会。缘各该国之友谊，将来实与中国大有价值。自前十六年以来，最阻碍中国之发展者之一。厥为庚子赔款。迨去岁杪所悬此项之赔款约六千万磅，致使中国租税收入，每年之漏卮约有三百五十万磅之谱。中国所有此项之赔款数目，德国即占有百分之二十，即系每岁六十六万二千磅。倘中国得协约国之允诺，与欧洲中部各国决裂邦交，则协约国必承认中国有权拒绝所悬德、奥之赔款，自属毫无疑义。按记者所观察，中国果能于其能力之内，履行其助于协约国之事项，此事项内即包括将所有德人驱逐出境，或拘禁或将其租借地全数收回，则协约国各政府必能酌量将其应得之赔款从重减轻。查美国对于应得之赔款，曾退让五分之二。据此推测，中国若能按照适宜方法提议，于协约国必不能拒绝其所请，倘使于此项赔款中能减去一百万磅，则除铁路赔款外，已足应付中国所有以关税抵借之外债，由此即可实获盐税改良之完全利益。

从政治上观之，与欧洲中部各国断绝邦交，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决非感情上之作用，能阻中国使不克用此计划。况此时期，中国对于德国毫无担负之义务可言，并有数事，德人在中国境内颇系破坏中立之举。即如青岛一埠，倘未经协约国以海陆军降服之，则中国对外之贸易，势必完全停滞。观此，即谓中国商业之盛，得以继续，必赖协约国海军保护商船之力，非谶论也。

总而言之，中国现时适遇从来未有之机会，得以立见实利之举动，联络协约各国之感情及友谊。至于欧洲中部各国，未必能诱导中国，使保其友谊之存在。须知德国已不得指为远东含有政治臭味之国。假使中国将应否与欧洲中部各国断绝友谊，详细熟商，如中国政府执政诸公，具有真实远虑及爱国之心，当必决定步美国之后尘。若然则为协约各国政府及其在远东居民所欢迎，勿烦记者之大声疾呼也。再此等并可使协约各国一击而于此最大经济之战争竟获胜利，且经济政策乃战争中紧要之一部，故中国如果毅然加入协约国，则可信赖协约国必予以最宽之待遇。现在为时已促，而其事又相逼而来，倘中国犹豫不决，必致将从速决定实行后所期望应得之利益全行抛弃。况德国困于内艰，随时均有崩溃之虑，若其溃乱发生于北京政府采取方法之前，则多数利益应为中国所有者，均将天然弃置。是以深望中国迅速决定，明断实行，庶可因其所决定者，于数十年内，享获利益于无穷。

（摘自《民国日报》1917年7月14日）

材料三　论中国宣战后之利益

十四日《字林报》云：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在精神上所得利益之巨，姑不具论，纯从经济上观察，所得直接利益几何，此诚有研究价值之一问题也。昨本报载路透社十一日伦敦电云："协约国为尊重中国之对德宣战，已协允中国征关税五厘，缓付赔款五年。由是可知，中国已获将庚子赔款每月之付给展缓五年，并得加征海关税百分之五之特权。"电文简略，未言征税货值之根据。据吾人推测，大约以现今之货值为根据，而非以五十年前之货值为标准也。宣战一举，首先将中国与欧洲中部列强所订各条约废止，于是对德、奥之拳乱赔款，从此止付。此两宗赔款，每月计六万四千三百六十磅（德六万一千一百六十磅，奥三千二百磅），每年共七十七万二千三百二十磅，此数付至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即民国二十年）为止，然后每年增加数额，直付至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全部了毕，综计一千三百万磅。今乃可省一笔数百万磅之金钱矣，至每月赔款总额为三十万四千磅，俄国只肯缓付三分之一。即二万九千四百四十磅。依此推算，连取消德、奥赔款在内，中国五年之内，每月可净省二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磅，五年可共得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九千六百磅。充作他用。而此积欠之数，将来或可全部免付，亦未可知也。（扣至一九一七年二十月三十一日为止，应付各国赔款共约

六千一百五十万磅。至赔款原定总为四万五千万磅，载至一九四〇年付清。德国占百分之二十一。）至美国赔款，每年由该国将付款退还，规定作中国青年赴美留学之用。所以每年有“赔款学生”大批赴美。数星期前，曾由中国出发。又据昨日路透社北京电，谓美国提议，中国应以付还赔款作维持北京清华学堂之用云。以上为中国所得关于赔款之利益。德、奥赔款既不必再行过问，五年之短期内，又省一六，四四〇，六〇〇磅之巨额。然此外尚有一宗更重要之实利，即增加关税是也。

据前电所称，协约国除许中国缓付赔款外，并许征关税五厘。按普通之人多知关税本系做百抽五，而不深求其故，则觉此电所指之新定办法，似不可解。盖既已五厘，仍征五厘，中国之所得安在者？其实五厘之上，应加以“有效”二字，意义即明。须知中国关税，虽普通皆称为值百抽五，其实不然。其理由如下：中国进出口税率，皆制定于一八五八年，距今已久。一九零二年，曾改定进口率一次，出口率则仍一八五八年之旧，凡进口新率中可不特举之物品，仍照一八五八年之率抽税。至税率虽通称为值百抽五，然进口出口，其率皆各别规定；即凡物以普通称谓之数量为准，而抽定额之税，如一担或一匹，抽税几何，皆有一定。然此等各别规定之率，关于出口货，系以一八五八年之货值为准，入口货则以一九零二年货值为准。今相隔多年，货价完全变更，自无待言。而抽税则仍照旧价，此所以名为值百抽五，而实则非也。由此可以推定，协约国之许征五厘关税，盖系按照现行货价实行值百抽五。倘此项解释不误，则现行税率势将废止。以后入口货照出产国宣布之价，出口货照中国市价，各值百抽五，其结果收数几何，目下虽不能加以近似之预算，然大致现在收数，可以骤增一倍，则可必也。中国当局本欲改为值百抽七半，日本制造家对于此改率之决定不欢迎，尤依赖中国市场大销其棉纱之纺织家为特甚。盖税率一致，进口日本棉纱将纳远重于前之税，而中国纱厂则居尤胜地位，大可专与日本竞争也。当数月前，改抽七厘半之议提出时，日本制造家反对之声甚高，后渐不闻声息，近来彼之纺织家似得悉列强许诺之计划，又起激昂。本月五日，英字《日本纪事报》载，此等纺织家上一长文字之书于关系之各部大臣，力言日本政府应拒绝中政府之议，不但有利于日本之工商业，亦为“中日两国友谊起见”云云。总之，改正税率之举，必且逾时甚久，始能见诸实行也。

（摘自《民国日报》1917年9月15日）

蓝辛——石井协定

背景介绍

1917年5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向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麿表示，希望日本派遣特使来美，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及远东问题进行会商。5月22日，日本内阁议决派遣特使赴美谈判，随即于6月13日派前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为特使，随员中包括有海军中将竹下勇、陆军中将须贺野、外务省秘书永井松三等人。按日本政府的指示，双方将就关于日本人在美国的地位问题和协调日美两国在中国的行动问题进行商讨。日本的意图，显然是试探美国现政府对1915年布赖安声明的态度。7月6日，蓝辛在复照中指出：布赖安声明虽承认日本在与中国毗连地区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美国同意日本对中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扩充其在华的政治影响。从日美之间的这些来往照会，可以看出谈判前双方各自的主张，以及日本希望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侵略地位的迫切要求。

8月23日石井抵达华盛顿，9月6日与美国国务卿蓝辛开始进行谈判。双方谈判的重点，很快转到中国问题上。蓝辛提议日、美就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机会均等诸问题发表宣言，企图借此排除日本在中国的独占优势。石井原打算以同意废除势力范围作为代价，以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如果各国也仿此废除势力范围，日本就可凭借地理邻近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使在华的经济竞争处于有利的地位。石井将这一方案请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因在上年7月与俄国签订了互相确认两国在中国东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的第四次密约，因此不赞成石井的方案，并指示石井说：放弃势力范围，影响甚大，所以不要涉及这个问题，而要致力于“不拘形式如何”，“只谋求其承认我之特殊地位”。美日双方经过往返磋商，最后于1917年11月2日完成换文，并分别于11月6日、7日在华盛顿、东京同时公布。日本政界普遍把这一协定的签署看作是日本外交的一大胜利。美国也宣称这一协定“获得的主要成果是：两国政府关于对中国政策的指导原则，达成了相互间的谅解”，并极力向中国宣传说：“这不仅对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重新的肯定，而且加进了不干涉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原则，如果一般地予以施行，正是威尔逊总统所公开宣布的永久国际和平的精髓。”但当蓝辛将换文内容通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芮恩施一语道破地说：“照会声明美国承认日本在

华的特殊利益，……这一行动会深刻影响他们（指中国）的利益，而且一看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变。"英国驻日公使格林评论说：他"担心'特殊利益'这一词，将会引起日后麻烦"。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相互交易的筹码，任意宰割，相互承认在华侵略的所谓"原则"。

材料：

· 美国对日本的妥协

材料　美国对日本的妥协

1917年上半年，日美两国围绕着中国对德参战问题的矛盾和斗争，就是双方在华激烈争夺的一幕。由于日本勾结皖系军阀段祺瑞，使美国遭到挫折。在此期间，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对德参战，自己也卷入欧洲战争，一时也无力继续与日在华对抗。正如美国国务卿蓝辛在签订《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蓝辛——石井协定）之后，致美国驻日大使莫理士的电文中说："应当看到目前战争的大量开销，阻止了美国在华的大量投资，这时企图用财政投资的手段与日本竞争，实为不智之举。因而中国不能在这些投资事业上继续利用美国来抵抗日本。我们仍极愿用财政援助中国的方法，来表现我们的友谊，但是这只能采用与日本合作的某些方法才行。如此才能防止日本单独攫取中国投资市场。"故当"府院之争"处于高潮时，美国政府已在谋取与日本暂时妥协。1917年5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向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磨表示，要求日本派遣特使，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及远东问题进行会商。日本为缓和双方的关系，也想就中国问题与美达成某些谅解，故对美国提议表示赞同。5月22日，日内阁决议派遣特使赴美。6月13日，日本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随员包括有海军中将竹下勇、陆军中将须贺野、外务省秘书永井松三等人，按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将就日本人在美国的地位问题和协调日美两国在中国的行动问题进行商讨。6月15日，日本驻美大使佐藤根据外相指令，向美国口头转达日本政府的一分备忘录，要求美国对1915年3月13日，前美国国务卿布赖安致日本驻美大使照会内容，以适当的方式，重新加以确认，以便消除日本人民对美国在华活动所产生的疑虑。1915年布赖安在该照会中曾有如下一段话："美国有理由反对日本有关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不过美国坦白的承认领土的接近产生日本同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系。"按日本方面的解释，此即为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的正式声明，希望美国政府再次给予肯定。日本目的非常明显，是想乘机取得美国对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的明确认可，毫无疑问，这是日本派出特使的与美国商讨中国问题的既定目的。对日本的这一企图，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此向蓝辛非常明确的提出说："日本大使暗示，在1915年国务卿布赖安曾承认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由日本支配。不管布赖安先生对日本如何友好，当中国自身已成功地抵抗对其基本主义遭受侵犯时（指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布赖安肯定不会承认中国成为日本保护国的这一个现实。甚至当前如果公开这个要求，也会在中国激起暴风雨般的愤慨。"7月6日，蓝辛照会日本驻美大使针对日本的上述意图提出："布赖安声明，虽承认日本与中国毗连地区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美国同意日本对中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扩大其对华的政治影响"；"虽然布赖安国务卿的照会表示过美国对远东国际关系的见解。但是，他的话在任何方面并未超出这一范围，即表明或承认：日本与中国就整个情况说来有着特殊的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像阁下在我们6月15日会谈中所说的那样。布赖安国务卿只是说，美国承认：由于领土毗连而导致日本与中国一些地区如山东各县、南满及东部蒙古有着特殊关系。但是布赖安国务卿并没有承认美国将来对中日关系，甚至牵涉到上述这些地区关系时，不能表示美国的意见。"

"蓝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进行对抗的情况下妥协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但绝不意味着两国在华竞争就此终止，而美国会甘心情愿地承认日本在华的霸主地位。实际上在换文后，双方即对"特殊利益"一词的解释，各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始终说：这是基于地理上毗连的公理（axiom）。日本却强调它在政治上的含意。双方各怀鬼胎，都不愿放弃各自在华的侵略地位，而且都想在争夺远东霸权上，走中国这一步棋。显然，并不像美国一厢情愿所想的那样，"协定"可以约束日本在华的侵略和扩张。正如蓝辛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说：日本将协定内容通知北京政府时，"于'特殊利益'等字之上，加上'重大利益'及'特殊势力'等为人所不能接受之解释"；"日本政府或其代表之举动，实无可辩，且为故意曲解字意"。日美双方所达成的妥协，意味着美国暂时的退让，但也预兆着未来更加激烈的冲突和角逐。因此，随着大战的结束，日美两国在华即以争夺取代了战时的妥协。1920年新银行团成立。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都是美国联合英、法抑制日本在华扩张，并迫使日本让步的几着棋，双方在华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化。1922年2月，日本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已把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国。1923年4月14日，日美换文废除了蓝辛—石井协定。

（摘自《北洋政府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黎段失和主要原因

黎就职后，以黎段素日交情，又兼以此次拥戴继任大总统，宜可欣合无间。盖黎入居东厂胡同荣禄旧邸，系洪宪之赐第，黎以武义亲王之身份入居，与领衔劝进等等行动，当时非不可加以挑剔。而段为顾全大局，在所不计，故就职之初，意见甚融。后以黎之左右，如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等，所谓四大金刚是也，从中挑拨作梗；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不但不从中拉拢，常以小事屡次与府员冲突。

对德宣战为黎段失和主要原因。盖段祺瑞虽早岁留学德国，却无盲目崇拜之意；另一方面得梁启超文字上、口头上之力不少，因梁曾有文字条陈说明外交关系与德国当时形势，故段主张对德宣战最力。经两院开会通过对德断绝邦交，国务院即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除总理与外交总长为正副会长外，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精卫、汪大燮、张国淦等为评议员。关于处理德侨与对协约国应提条件、招募华工、供给物资、改正关税、巴黎经济同盟以及将来在议和大会上应提出各项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继而德国公使辛慈出境，我国驻德公使颜惠庆回国，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北的租权，停付德国赔款，处理德侨德商等，次第施行。突接荷兰公使照会，以绝交与宣战不同，不能适用待遇敌人条例，又称已受德国委托代管在华利益。事势因此紧张，不免棘手。而协约国劝诱参战者纷至沓来，且美国、日本此时已先后加入战团。段以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败；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山东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又以我国驻外各使，电告协约国对条约修改、缓付赔款等均允许商办；而荷兰交涉又如此紧张，促使段对德宣战主张，更为坚决。若黎元洪在袁世凯帝制时代之态度，在段以为极易就范。不意黎性暗弱，惑于丁佛言等中立之说；且认为断交已属好大喜功之举，参战则更为危险，适此时国民党议员又得其党内指示，极欲借端倒段，盖欲先倒段再议外交，简而言之，即不欲段在外交政策上成功，提高其威望也。尤可憾者，黎暗弱无能，为其左右所利用，另一方面黎又以议员为后盾。而在段以为以对德断交时，通过甚容易，对议员疏通迹未周密布置。当黎氏不得已以参战案交议会时，人杂言庞，议员对参战案相持不决时，段方在议院中，此时适有不达事理之傅良佐未得段氏同意，纠合公民团扰乱议院。虽经段召兵警将公民团解散，而多数议员借为口实，实行散伙。致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作为对参战案之消极抵制。

徐树铮事事占先，独于对德宣战抱消极态度。因徐素日崇拜德国，谓民族优秀，科学进步，无战败之理，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守中立。有一次徐权铮为参战事，又上书段氏，段当面将上书弃之于地。以后又发现徐树铮暗中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示意，嘱其电请中央维持中立。及段电召各省督军来京议政，各督军皆拥护宣战政策。据倪、王并称：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徐树铮遇事与总统为难，独于参战与黎看法相同。于时各督军曾邀两院议员在外交大楼当面疏通参战事，并面陈黎总统。黎认为此事应由议会主持，非督军所应干涉。而议员则仍保持消极态度，尚以法定人数不足作借口，故无法开会。各督军以一电攻击宪法之歧误，相率从容出都。段在平时一怒便拂袖而去，此次为力争参战，偏倔强不退。黎乃毅然将段免职，以伍廷芳署总理。各省始则通电指责副署违法，继则通电独立。当此是非纠纷之际，徐州又召开督军团会议，复辟之谣已炽。黎不但不闻不问，反明令张勋随带八千人入卫，复辟之机伏矣。

（摘自《近代史片断的记录》张国淦）

张勋之谜

张一贯自命忠于清室，慨然以复辟为己任，但终袁世凯之世，他虽然几度跃跃欲试，却并没有全力以赴。这是因为他本身自有矛盾。他一方面常对人说“君恩不可忘”，另方面又常对人说“受袁宫保二十年知遇之恩，知遇之感不可负”。这时，张固然与袁有磨擦，而依然在袁的笼络之中。更重要的是：张自揣实力，还难与袁较一日之短长。因此，辫帅尽管为人鲁莽，可在这问题上并不鲁莽行事。而且，在更早一个时期中，张可能对袁还有某种迷信和幻想。袁是一个最善于布疑阵、做假戏的人。他利用辛亥革命夺来了天下，而又对已经退位的清室尊崇备至，待以上国之礼。他的做作，使有些醉心于复辟的人感到他还有缅怀故主之情，甚至误认为他之出任总统有其苦心孤诣，“还政于清”是其最终目的。有一个时期，“还政”之说甚嚣尘上，不仅张摸不到袁的底，就是有些为复辟奔走的遗老旧臣也上过当，受过骗。曾为张座上客之一的劳乃宣（字玉初，号韧叟，清末曾官至学部副大臣，京师大学堂监督），就高唱过“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

一九一六年，在袁世凯于三月间被迫撤消帝号后，冯国璋曾提出调停办法，接着先后到徐州、蚌埠会见张勋和安徽省长倪嗣冲，拉张共同出面召集各省督军于五月十八日举行南京会议。冯的目的是要借这次会议抬高自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会议自始至终纠缠在一个总统的去留问题上，毫无结果而散。这一炮打空了。到六月五日，袁世凯死去，黎元洪代理总统，段祺瑞蝉联国务总理。张就利用袁死后北洋派感到需要团结对外的心理，邀请参加南京会议的原班人马于六月九日齐集徐州，共商大计。有人称之次集会为第一次徐州会议。张在这次会议上初步奠定了盟主的地位。以后在九月二十一日和次年一月十一日相继举行了第二、第三次徐州会议，由九省联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督军团的声势一天天高，张的权势也一天天大。一时间，徐州成了北方的政治中心，而辫帅挟诸侯以令天子，成为气焰熏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是一件历史上的怪事。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矛盾、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南与北的矛盾、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矛盾、纠缠错杂，而徐州会议的召开适逢其会。这就莫名其妙地把张推上了三十三天。

正当徐州城里一次一次的会开得十分热闹的时候，北京城里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冲突发展得越来越尖锐了，最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总统反对参战，总理主张宣战。这本是一个对外政策问题，竟被利用作内部倾轧的手段，成为府、院之争的导火线。最后，段祺瑞为了对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表决参战问题。众督军本来多数是激烈的反战派，经过段拉拢、疏通后，却摇身一变而为坚决的主战派。一时间，督军团在北京城里到处出头露面，闹得天翻地覆。到国会开会讨论宣战案时，段更排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包围国会的趣剧。结果，弄巧成拙，局面更僵。最后，督军团放出了呈请修改宪法、呈请解散国会的起身炮后，浩浩荡荡离开了北京。

这时，作为督军团盟主的张勋，却在徐州好整以暇，作壁上观。对张说来，一则是无意为段效劳；二则是留有余地，好相机行事，做自己的文章。他这次拿定了稳坐钓鱼台的主意。

于是，众督军重新聚集在徐州，于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始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胡嗣瑗也闻风赶来，身分是冯国璋的代表。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被张勋倚为心腹的万绳栻。张只在会上露了一两次面，尽管众人慷慨激昂，踊跃陈词，而他态度淡漠，不动声色。有时，屋子里在开会，他却在院子里坐在一只茶几旁，独自品茗，悠然自得。众督军抵达徐州的次日，他还以置身事外的姿态、以通风报信的口吻，给黎元洪拍去一封电报。电文说："各督及代表等二十余人，昨偕同到徐，以宪法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庭电开：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等因。咸以民国适用内阁制，凡任免官吏，非经总理副署，不生效力，群情愤激，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谨飞电直陈。"这封电报已经令人莫测高深，更令人不可测的是：这时在天津的刘廷琛听到免去段祺瑞总理的消息后，认为是复辟的大好良机，立即拍电劝张乘机而动，而辫帅对这位平日尊为上宾的刘幼老的来电，竟也置之不理。

可是，就在这同时，张已经把这最后一次的徐州会议一步步引入正题，迫使其图穷匕见。众督军到徐州之初，还不知道段祺瑞被免职的事。张收到北京来电后，立即公之于众。大家看后，好似火上加油，一个个暴跳如雷。张却慢条斯理地说："各位要出这口气，非用武力不可。可是，用什么名义出兵呢？既然师出无名，忍下这口气好了。"说完这席话，他就起身告退，其目的是为众人出一个题目，静候得出他所预期的答案。

当晚，众人又听到免倪嗣冲职和免朱家宝职的种种传说，更加怒不可遏，立即请张出来共商对策。见到张后，首先从倪嗣冲和山东督军张怀芝口里道出了复辟两个字。两个字既经提出，顿时间多数人都成了心怀故主、效忠前朝的孤臣孽子，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少公（张勋字少轩）之后"。座上，倪嗣冲和张怀芝的发言最激烈。还有一个福建督军李厚基，自称他之主张复辟是奉母命而行，在他离开福建时，他的老母对他说："你可记得你的父亲是为国阵亡的？你这次上京，只要遇到关系皇室的事，就应当尽力报效。这才称得起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报答国家的厚恩。"因此，他说："我要不为这件事尽力，不但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父母。"

最后，辫帅看到鱼儿已经上钩，才心满意足地开口道："既然这样，很好。不过，这件事不能空口说白话，说定了就要干到底。"于是，众人商定了复辟的计划，在一幅黄缎子上签了名。计划的第一步是解散国会，第二步是逼迫总统退位，第三步是宣布复辟。这次会议，后来就被人叫作"复辟会议"。

辫帅如愿以偿后，就准备趁热打铁，借调停中央与地方争端之名进京实现复辟计划，而为了名正言顺，更向黎元洪示意，希望得到一纸命令，奉召前往。实际上张早就对黎布下了层层圈套。上面提到的那封在会议次日发出的电报，像以中间人又像以领衔人身分发出，像是报告又像是警告。这已使黎如坠五里雾中，而张在给黎的另一封电报中更说"中央困难情况，已分告各督，务以国家为重，勿念"，又俨然是以地方盟主身分给黎吃的一副定心丸。段被免职后，黎指定的继任人是洪宪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李字仲轩，是李鸿章的侄儿，接到负责组阁的任命后，特地向张请示行止。张的回电是"苍生霖雨，允符众望"。虽然不着边际，却也像表示赞同，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这位外号"泥菩萨"的黎总统，平日对张并无好感，颇

具戒心，但这次在张摆下的重重迷魂阵里，又在病急乱投药的当口，不由得不把张看成是唯一的支柱和调解人。这时，荣膺组阁重任的李经羲，自揣无拳无勇，更把张当作唯一的靠山。李表示，要入京组阁，必须与张同来。这样，黎终于自己钻进圈套，不惜引狼入室。于六月一日下令："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体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黎的命令一到，正中张的下怀，也原在张的意中。这位"公诚体国"的督军，已经为颠覆民国、实现复辟做好了安排。除了刘廷琛已奉召由天津赶到徐州外，劳乃宣从青岛奉召前来，还有康有为的密使也到达。张与众人议定，于六月七日由张率领四千名辫子兵北上，在启程前一日，先由刘廷琛入京向清宫报信。张并与刘约定，过天津不下车，直接驰赴北京，立即发表复辟。

凶杀案·夺印案

1917年7月16日早晨。引咎辞职的前大总统黎元洪正在住宅的花园里散步，突然，一个彪形大汉手持明晃晃的大刀，鬼鬼祟祟地向他走来。黎心头一惊，急忙悄声躲避。持刀人尾随紧追，似非取黎之首级不可。众卫士大惊失色，一拥而上，捉拿刺客。持刀人毫不畏惧，抡刀硬砍，顿时横尸遍地，血流成河，慌乱中，一卫士举枪射击，持刀人当场毙命。经查，持刀人系黎宅卫队的排长，此人之所以持刀行凶，乃是因为他患了精神病，并无政治目的。

几乎就在同时，上海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夺印案。事情是这样的：黎元洪的军事顾问丁槐，并没有将总统印信转交代总统冯国璋，而是携印到了上海。更奇怪的是，7月13日，他突然在上海公开宣称，黎元洪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权的通电是假的，合法总统仍是黎元洪。直到此时，已宣誓就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才知道总统印把子的下落，遂派人前去索取。可丁槐拒不交出，声称除非合法大总统黎亲笔信才能索取印信。拒交印信之举，搞得冯国璋十分尴尬。他一面通电吁请黎元洪复职，一面派人设计夺印。于是，夺印人尾随丁槐，伺机下手。丁槐东躲西藏，如惊弓之鸟。最后被英巡捕逮捕，并被引渡，理由是总统大印丢失，而丁槐乃是盗印贼。这样，以盗印为罪名逮捕丁槐，才得以夺到总统印信。

两件似无联系的案件，其实密切相关，背后隐藏着一个大秘密：张勋复辟丑剧上演，段祺瑞东山再起，率兵讨逆，重掌北京政权，与国民党连成一体的黎元洪则引咎辞职，冯国璋代之而起。这样，中央政府全部落入北洋派之手，这不仅为国民党势力，也为非北洋派系的地方实力派军阀所不愿接受。于是，讨平张勋复辟，请黎恢复行使大总统职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连那帮被黎非法解散国会打碎了饭碗的国民党议员们也不计前嫌，拥黎复职。正当此时，黎宅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凶杀案，黎元洪吓得胆战心惊，不要说复职，就是在家里，他也感到不安全，索兴住进了法国医院，不再出头露面。这一来，拥黎复职的希望破灭了。至于上海夺印案，则是南方势力试图在黎元洪通电上作文章，迫冯让黎，但最终未能得逞。

北洋派独占最高权力，国民党誓不接受。当段祺瑞讨平复辟，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拒不恢复国会时，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国会议员招待处，这批只知饭碗不知其他的议员纷然南下，以西南军阀为后盾，组织了"非常国会"，并由"非常国会"产生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

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中华民国连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这种局面居然断断续续维持10余年。南北对峙，战战和和，不战不和，作不完的交易，讨不完的价码，争不完的地盘；而两个"中央政府"内部，也从未有过一日宁静，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刀光剑影，把民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摘自《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考证

段祺瑞怎样从抗日派转变为亲日派

提起段祺瑞，凡了解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是北洋军阀皖系的首领，是著名的亲日派。但要说段祺瑞早期曾是个坚定的抗日派，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本文要介绍的就是段祺瑞是如何从抗日派变成著名的亲日派的。

1885年段祺瑞20岁的时候，考入李鸿章在天津刚刚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学堂。当时的清朝，从皇室贵族到重要的军事官僚，如李鸿章、袁世凯等，无不认为德国的陆军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因此天津武备学堂的六名军事教官全都聘请的是德国人。

段祺瑞在武备学堂跟着德国教官学习炮兵技术，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化炮兵军官。1887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奉派到辽东半岛的旅顺港，负责监修炮台。旅顺港海岸炮台12座，陆地炮台9座，共安装大炮七八

十尊，虽然并不都是段祺瑞一手监造，但其中确有他的心血和汗水。可惜 1894 年中日战争中，日军进攻旅顺，据守要塞的清军将领不战而逃，这些炮台并未发挥作用，即沦于日军之手。

段祺瑞在旅顺干了一年多，便参加武备学堂的留学生考试，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政府选送到德国，进入柏林军校深造，依旧研习炮兵，并曾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军工厂——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 年底他学成归国，不久被派到北洋水师的舰队基地威海卫港，担任随军武备学堂的教官，主要教练炮兵技术，前后有四年多。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在占领辽东半岛后，于 1895 年初进攻威海卫，目的是要消灭困守在港湾内的北洋舰队，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当日本军队从海陆两路进攻威海卫时，段祺瑞作为一名军事教官曾亲自带领武备学堂的学生，协助炮台的守军发炮轰击敌军，与夺取炮台的日军战斗，表现了一名中国军官应有的爱国精神。

如果说段祺瑞此时的抗日举动，还只是因为他作为中下级军官必须服从上司命令的话，那么到袁世凯统治时期，段祺瑞已成为政府重要官员，他的抗日主张显然是出自于他本人的意志了。

就在甲午中日战争进行之时，清政府接受德国军官的建议，增加编练新军。1894 年底，袁世凯奉命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完全采用西式武器和编制，配有步骑炮工等多兵种，并起用了一批新式武备学堂毕业生当军官。这支"新建陆军"就是后来袁世凯赖以发家的"北洋系"的滥觞。段祺瑞这位文武全才的留德炮兵军官也被袁世凯看中，1896 年奉调担任新建陆军的炮兵统带，成为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

从此以后，段祺瑞步步紧跟袁世凯，协助他带兵、练兵、培养军校学生、镇压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中又领衔通电迫使清帝退位，使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二次革命中调兵遣将镇压国民党人，使北洋系势力扩张到全国。袁世凯对段祺瑞自然也是宠信有加，从 1912 年起就一直让他在政府中担任陆军总长掌管军队，甚至一度要他代理总理。

1915 年 1 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不敢答应，故意在中日谈判中拖延时间。拖到 4 月初，日本方面以换防为名，增派驻华军队，同时派出三支舰队在渤海海面游弋示威，企图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答应。作为中国政府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对日本的狂妄态度怒不可遏，主张强硬对待。从 4 月中旬开始，他向军队做了秘密动员，接连三个星期利用夜间进行军事运输，调兵遣将，做备战工作。

5 月 7 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在 48 小时之内答复，对《二十一条》(除去第五号内容)，只能表示"诺"(同意)与"否"(不同意)两个字，否则将诉诸武力。袁世凯召集文武官员集议。自袁以下绝大部分官员都倾向于接受这屈辱的条约，而段祺瑞独持异议。他坚决反对接受《二十一条》，认为这样屈辱地迁就日本，怎么能够立国？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惜与日本一战。袁世凯竭力说服段祺瑞，声称条约各条内容虽有损国家利益，但还不是亡国条约，等等。段祺瑞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中华民国开国刚刚几年，就接受如此丧权辱国的条件，如果列强纷纷仿效日本，提出类似的苛刻条件，并以最后通牒形式加以威胁，我们将如何应付？

然而孤掌难鸣，段祺瑞一个人的反对，毕竟拗不过袁世凯及众官员的一致意见。袁世凯政府终于还是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同意了《二十一条》。然而，从中国近代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看段祺瑞，应当说他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爱国心。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说这个时期的段祺瑞是个亲日派，相反，只会认为他是一个抗日派。

段祺瑞从抗日派变为亲日派的转折点是他正式出任政府的内阁总理。1916 年 6 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在众叛亲离的状况下死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职，段祺瑞担任政府总理。这时国内国际正面临极其复杂而又十分微妙的形势。

段祺瑞上台之时，正是护国运动刚结束，国内政局混乱，尤其是中央财政更是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段祺瑞雄心勃勃要想当好总理，必须要有钱。这钱只能靠举借外债才能得到。他环顾宇内，西方列强正忙于打仗，本国都陷于匮乏境地；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东方，发现日本正在微笑着向他招手，因此他逢迎上去，向日本伸出求援的双手。为了消除日本对他的顾虑，段祺瑞在会见西原龟三时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日本因为我留学德国，故认为和德国有着特殊关系，这诚然是多余的顾虑。据说寺内先生长期在法国，并没有人说他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我所想的只是中国和东方。"为了证实自己对日本的友善，他派著名的亲日派章宗祥出任驻日公使，并告诉章说，对日外交要诚意来往，不再实行袁世凯时期的远交(欧美)近攻(日本)的外交政策。

为了表明自己已彻底亲日段祺瑞在参战问题上追随日本的外交方针，不惜与总统黎元洪闹翻脸。1917 年 2 月原来在欧战中持中立态度的美国宣布对德断交，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同时还说服中国也照此办理。日本素来反对中国参战，目的是单独控制中国。此时闻讯也改变初衷，支持中国参加协约国，以抵制美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段祺瑞得到日方的旨意，立即表示"诚意"地响应。美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又转而劝告中国不要参战，受美国影响的黎元洪因此竭力反对对德国断交。于是以段祺瑞内阁为一方，以总统黎元洪和大多数国会议

员为另一方，发生了“参战之争”。当时反对对德断交的舆论主要是担心，日本会利用参战进一步干涉中国的内政，使中国在外交上失去自主权。黎元洪曾当面对段祺瑞说：“你一定要上日本的当！”

日本政府为了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给段祺瑞打气鼓励，第三次派西原龟三来华。西原面见段祺瑞时，巧妙而伪善地希望中国“与日本推诚合作”，使中国可以利用欧战的五六年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据记载，段祺瑞听了西原的话，未等翻译讲完，便双手猛击大腿，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就像一条贪婪的鱼，段祺瑞一口吞下了日本人的香饵。

更有甚者，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为干涉苏俄，向中国暗示建立共同军事协定。段祺瑞认为：“日本政府关于此问题好意热心的表示欲与我合作，我亦宜以热诚相待，与其达成完满之协定。”他主动向日本军界人士表示，这种军事协作开始后，决不使“日军有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我国东北的北部地区），乃理之当然。”公然允许日本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对苏俄作战的基地。

1918年5月，中日两国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约生效。这两项协定打着“相互平等”、“推诚相善”的幌子，使日本得以控制中国的军队，并能在中国境内任意调动日本驻军。这年8月间，日本即寻找借口，未经中国方面同意，擅自派兵进入黑龙江省，甚至以武力迫使驻满洲里的中国军队后撤至海拉尔。

段祺瑞迎合日本侵华的野心，通过西原借款和《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彻底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他自身的转变，给自己烙上了“亲日派”的深深印记。从此，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更深地插足我国的东北。日本首相寺内正义临下台前曾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得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当年曾表示要用武力来反对《二十一条》的段祺瑞，数年后竟亲手完成了十个《二十一条》，从一个抗日派变成了可耻的亲日派。这一历史的嘲弄正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任何一个掌权的统治者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都必然要投靠一个帝国主义。

1919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收回山东权益的正当要求，遭到操纵和会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拒绝。而拒绝的理由，就是段祺瑞政府曾表示过“欣然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五四”爱国运动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亲日派列为卖国贼，作为打倒的对象，但事实正如段祺瑞自己所说，矛头是对准他的，因为段正是这三个亲日派的后台。上海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提出“惩办段祺瑞”的口号，正是找准了这个历史的罪人。千秋功罪，段祺瑞何能辞其咎！

（摘自《民国春秋》）

风 云 人 物

康 有 为

康有为（1858～1927） 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失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他幼习文史，“频阅邸报，览和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1873年，“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继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鄙弃程（颐）朱（熹），喜好陆（象山）王（阳明），“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矣”。这是因为陆、王那种“冲破罗网，焚烧刑棘”的气概，甚合他的品质与志向。陆象山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也正是康有为那种大破大立狂气的写照。但是，康有为毕竟难以尽同于陆王心学，因为陆王之学过分强调个人道德，而忽略了对社会环境的探讨，康有为既有志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当然不会以陆王心学为满足，很快，他就“以日埋故纸堆中，汩没灵明，渐厌之”，遂弃帖括考据之学，开始注意各种经世致用之学和一些西学书籍，俯读仰思，“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1879年，他薄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之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882年，康有为道经上海考察了外国租界的管理，“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精心研究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加涉猎，从此在思想上开了新的境

界，尽释故见，大讲西学。他引行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学说，重新评估中国的传统思想理论。

1891年，《新学伪经考》刊行。康有为大胆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缨衿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仍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这种论断未符合实际，但重要的是他在此公然把历代统治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内的一声惊雷，打破了思想界长期来的沉寂局面，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根据提出了挑战，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引导知识分子转而注重西学，探究西方资本主义的治国之道廓清道路。

康有为还写了《人类公理》，1902年正式刊行为《大同书》。在此，他列举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们身受的种种苦难，为解脱苦难和改变不合理现象，他设想出一个"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尽管在书中康有为借用了传统儒家理想、公羊三世学说和佛教慈悲思想，但真正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武器却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整个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批判，表现了他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烈不满，对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康有为心目中的"大同世界"与陶渊明描述的"桃源仙境"不同，不是一种乌有之乡，而是科学文明与精神道德持续进步的必然结果。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他试图通过进行资本主义改革，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实现"大同理想"，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基础上设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这与落后的封建社会相比，毕竟距"大同世界"近了一步。

1888年，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考试的机会，第一次写了一封五千多字的上皇帝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求"及时感悟上心，翻然图治"。他指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必须赶紧"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的危亡。同年，他又利用代御史拟奏折的机会，指出不能抱祖宗成法不求变通，"凡法立久则弊生，令行久而奸起，于是祖宗法制之美，为奸吏弊窦之丛。至于今日，不稍变通，无以尽利也"。要求皇帝"特下哀诏"，"求言图治"。然而，"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上书不达，康有为愤而离京。

1895年，正当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全国人民痛心疾首。康有为义愤填膺，发动参加会试的十八省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他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篇一万余言的奏章，吁请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举"。变法内容包括"富国"、"养民"、"教民"诸方面，举凡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等"靡不涉及"。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即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不仅提出了变法的要求，而且涉及变法的条例，表明康有为的社会改革主张已经开始具体化了，成为以后戊戌维新纲领的蓝本与原型。尽管"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它把酝酿多年的变法思潮推进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也由变法理论的导师进而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强迫割地和租借势力范围的狂潮。康有为闻讯，立即赶赴北京，在当年12月和次年1、2两月，又连续三次向清帝上书。在上清帝第五书中，他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指出：以德占胶州为嚆矢，"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又是"乱民蠢动"，"奸宄生心"，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警告光绪必须当机立断，"发愤维新"，否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要求："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等等。在康有为的诸次上书中，以此书言辞和内容最为激进，字里行间，跳动着他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此书当时虽未达光绪手中，但它内容警切，北京的士大夫们辗转传抄，津、沪等地报纸也公开发表，广为流传。次年1月，光绪"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当面批驳了荣禄、李鸿章等人的谬论和诘问，再次申述变法主张与措施，受到帝师翁同龢的赞赏。在翁的推荐下，光绪命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挡扣压，并令总署呈上康有为所辑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康有为的七次上书，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他变法维新思想。与洋务派及早期改良派相比，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具有如下一些鲜明特点：一是深刻化，从洋务派坚持的"变器不变道"发展为要求改变封建统治制度，从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朦胧向往发展为明确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二是具体化，从早期改良派对"变法"的笼统的泛泛而谈发展到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措施；三是系统化，从早期改良派零碎的、分散的建议和条陈发展为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政治和理论纲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各个方面，其核心是要对封建专制的中国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造。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第一次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表明态度，提出要求，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想要把传统的封建帝国变成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变成君民合治的立宪政体，把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变成以工商为主的商品经济这必然会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麕集在慈禧太后身旁的顽固势力伺机而动，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先一日离京赴沪“督办官报”。在英国保护下逃香港。清廷曾派飞鹰快船追踪未及，又令挖康氏祖坟，直到1900年仍悬赏纹银十万两要康的首级。

变法失败初期，康有为奔走海外，组织保皇会，图解光绪于瀛台之阨。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发起国会，组建自立军，康有为参预其事，并以筹饷为己任，申明旨在“勤王救上，以求中国”。可见“当时是，素质尚在，未尽澌灭也”。

自立军起义失败，改良主义运动的最后一点余烬熄灭。此后，革命浪潮逐渐成为历史主流。康有为仍坚持其改良主义立场。刊发《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渐由一个维新志士蜕变为一个保皇首领，一个走在时代潮流的先进人物堕落为一个历史的落伍者。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煽“虚君共和”之邪说，鼓尊孔崇教之波辞，企图“弭暴乱以复秩序”，“尊国粹而整纪纲”并亲任孔教会会长，为复辟帝制造舆论。1917年与张勋策划清帝复辟，预草“诏书”，被授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潜逃出京。以后又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持反对态度，诬“五卅”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为“沪乱”，国民党改组后建立广东革命政府为“粤乱”。1927年病逝于青岛，弥留之际，还向清逊帝溥仪上书谢恩。

张　勋

张勋(1854～1923)　张勋字少轩(又作绍轩)。出生于江西奉新一个小商贩家庭。1884年在长沙投军，后入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92年累升至参将加副将衔。1894年为准军管带，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1895年参加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充工兵营管带。1899年随袁至山东镇压义和团。1902年被调到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1906年又调奉天，1908年2月被授为云南提督，旋改甘肃提督，仍驻奉天。1910年接统江防营，驻浦口。1911年8月为江南提督，后被授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先后被任为都统、陆军上将、定武上将军、江北镇抚使、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1917年制造复辟丑剧失败后，先躲荷兰使馆，后寓居天津。1921年7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热河林垦督办，未就职，1923年9月病死。

张勋是清末著名的孤臣孽子，封建大军阀，他终其一生都不忘竭尽愚忠，效忠清王朝，对抗革命，早在武昌首义时，他便率其江防营在南京与新军第九镇激战于雨花台，并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滥杀人民。随后江浙革命联军围攻南京时，他又率领江防营在紫金山、天宝山、狮子山等地负隅顽抗。12月间败退徐州后，又大肆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反对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他一方面对袁世凯所授各职受而不避，拥大兵尾大不掉，希望袁“还政”于清；另一方面则宣称“朝廷之恩不可忘”，阻止袁世凯收“衍圣公”祭田与移逊清两宫于颐和园，又和逊清宗室及遗老旧臣们秘密联系，纠集复辟分子，图谋复辟。他坚决不受民国政府的断发令，而且令所部一律禁止剪发，纷纷拖着一条长辫子，成为世人所指的“辫帅”和“辫子军”。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他便乘机连续召开徐州会议，以盟主自居，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后又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攻击国民党及国会。1917年5月又在徐州邀开督军团会议，不久后即以调解为名，率军入京，逼走黎元洪，解散国会，于7月1日拥立溥仪复辟，制造近代史上第二次帝制复辟闹剧。因为其时民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他的“辫子军”又不堪一击，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在段祺瑞“讨逆军”的猛烈进攻下，复辟闹剧便告草草收场，他自己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摘自《近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段　祺　瑞

段祺瑞(1865～1936年)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865年3月6日出生。早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后赴德国学习军事。1896年，应调到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总办。自此，成为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骨干，他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龙、虎、狗”北洋三杰”，曾任北洋军第三、第六镇统制、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民国成立后，他长期边任陆军部长、国务总理等要职。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起用袁世凯，同时任段为第二军军统，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镇压革命。他先到彰德见袁请示机宜，然后进军孝感，以军事实力支持袁窃夺总统职位。一方面，他不断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又逼迫清帝让位。1912年初，他率领北洋将领四十六人两次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民国成立，段任历届内阁陆军总长，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1913年，段主持镇压"二次革命"，出任湖北都督兼河南都督，血腥镇血白朗起义军。1914年，袁世凯削弱段的兵权。段辞陆军部长职，被封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由是，段对袁大为不满。次年5月，他称"病"辞职，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采取了消极态度。护国战争爆发后，袁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他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他甚至不顾袁的面子，公开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

1916年6月，袁世凯毙命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由于所代表的国际势力背景不同，黎段之间很快以"对德参战"问题为导火线爆发了"府院之争"。1917年5月，国会讨论"参战案"时，段仿效袁世凯的故伎，唆使军警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会场强行要求国会通过"参战案"。段的倒行逆施遭到国会和大部分阁员的反对，黎元洪乘机免去了段国务总理的职务。段退居天津，与北京政府势同水火。一方面，他指挥各省军阀纷纷宣布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表示武力倒黎。另一方面，他通过亲信徐树铮到徐州鼓动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入京，实行复辟。于是，7月1日张勋便乘机在北京演出了一出清帝复辟的丑剧，赶走黎元洪解散了国会。段见倒黎的目的已达到，特别是全国人民奋起反对复辟，也打出了"讨逆"的旗帜。7月3日，他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在《讨逆告国人书》中他表示："誓为共和并命，不与逆贼戴天。"讨逆军很快攻占了北京，段祺瑞成了"再造民国"的英雄重掌北京政权。

段祺瑞重新执政后，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并在宣战的名目下，大肆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利益，扩充皖系实力。同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了反对段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护法运动，并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和北京政府相对抗。段立即决定对南方用兵，于1917年10月派兵攻入湖南。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引起了直系军阀的不满。1918年8月直系将领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连发"罢战主和"通电，给段以极大的打击。10月，他被迫辞去国务总理，退居幕后操纵北京政权。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北京政权转入直系手中。段被迫通电下野，移居天津日租界，以窥测风向，等待时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这时，孙中山应邀北上，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为了反对孙中山的主张，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外崇国信"，表示尊重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久，又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以对抗国共两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

1925年冬，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占领了天津。日本等国为了帮助奉系军阀、阻止国民军在天津布防，炮轰大沽口，并发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人民于1926年3月18日集会天安门，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会后游行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指使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4月，国民军放弃天津，退守北京，段逃入东交民巷，被迫下野。不久，再避天津，做了租界寓公。

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迎段南下，并委为国府委员，段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病死于上海。

陆荣廷

陆荣廷(1859～1928)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壮族。西南军阀旧桂系首领。

陆荣廷早年操舟贩盐，当过兵也做过绿林首领。自1893年被清政府招抚后，1904年至1905年他镇压过会党等起义，1907年又镇压革命党人发动的镇南关之役。为此，他得到清政府的赏识，从管带升至总兵，1911年更擢任广西提督，直接指挥着10营边防军，这也就是他以后能成为桂系军阀的资本和原因。11月7日，原广西巡抚通电"独立"时，就不得不拉他作副都督。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刚打算反对他，他即"发兵包围新军，勒令缴械"，革命党人只能束手就擒。1912年2月，在陈炳焜等地方实力派的推举下，他又率军入桂林就广西都督之职，后又兼广西民政长。就在"桂人治桂"的旗号下，他联络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旧军官，纠合广西籍的旧官僚及立宪党人，形成一个以拜把关系、裙带关系维系的封建宗法小集团为其核心的桂系军阀集团。陆荣廷则是这个集团的首领。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

作为封建军阀，陆荣廷一贯反对革命。他很善于投机，有时公开反对革命，有时又与革命势力虚与委蛇，从中谋求更大的好处。如1913年他支持袁世凯，并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以后，袁世凯重用龙济光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他虽对袁的帝制活动上书劝进；同时又与岑春煊、梁启超等，秘密反袁。1916年1月，他请求讨伐贵州骗取袁的饷械，却又拒绝袁军假道广西入滇，并袭击龙觐光军。3月15日他宣布广西独立并讨袁，乘机向湖南、广东进军。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陆荣廷名为九个抚军之一，但却是真正操纵军务院活动的后台。

桂系军阀向外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广东。袁世凯死后，陆即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赶走龙济光，并自任广东督军。1917年春，他亲到北京活动，以两广巡阅使而操纵两

广军政大权。他把桂军扩至五万，成为西南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他大借外债、加税开捐、滥发纸币、搜括民财，给两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17年，他宣布两广"自主"，但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就在他表示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同时，他又与吴佩孚暗中勾搭。1918年，他更与唐继尧勾结，通过"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组军政府，使其成为桂系军阀控制下的工具。在他们的排挤下，孙中山被迫离穗至沪。由于桂系军阀的反动本质已暴露无遗，反对桂系军阀的斗争不断公开和日趋激烈。

1920年8月，桂军攻闽，受孙中山影响的粤军陈炯明部即出动反击之。10月下旬，桂军战败，广东督军莫荣新弃逃，岑春煊、陆荣廷只得通电撤销"护法军政府"，并取消两广"自主"。陆荣廷公开投靠直系军阀，他不仅反对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并陈兵粤桂边界，伺机反击。孙中山为了大举北伐，决定号召粤、滇、黔、赣各军讨伐，以扫除陆荣廷这一侧背之敌。1921年6月，桂军刘震寰部首先倒戈。粤军攻战梧州后，掌握桂军主力的沈鸿英宣布"自治"，逼陆下野，其他桂军则望风而逃。7月19日，陆只得通电辞职，辗转逃往上海。

1922年6月，当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时，陆荣廷又潜回龙州，通电就广西边防督办职。1923年12月，他又到南宁任北洋政府所委之"督理广西军务"，并乘机取沈鸿英所占的桂林、柳州，表面上统一了广西。

桂军中出现的新兴力量李宗仁、黄绍竑两部受孙中山所命而通电讨陆。并困陆荣廷于桂林达三月之久。最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1924年9月23日，陆荣廷通电下台。陆下野后经湖南逃沪，又移居苏州，后病死。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人大出版社）

冯国璋

冯国璋(1857～1919)　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字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人，1884年到大沽口淮军营中当兵，次年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被留任教习。1893年入聂士成军，后随聂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1896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创办"新建陆军"，他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总监，不久被任为总办。1899年随袁至山东镇压义和团，被保升补用知府。1901年袁世凯创练常备军，他被派为总办。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他又经袁世凯荐举，先后担任军令司副使、军学司正使。1906年，他被署为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次年开始又长期担任军谘使。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他先后被任为禁卫军统领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直隶督军兼民政长、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江苏都督、宣武大将军。袁死后，他成为直系首领，1916年当选副总统，1917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死。

在他的一生中，曾长期追随袁世凯，而且深得袁的信任、赏识和重用，是袁创办北洋军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初创时期，他即亲历其事，袁世凯创办"新建陆军"和创练常备军时，他都充任总办，统一了北洋军队的训练，而且还曾根据袁的旨意创办了保定将弁学堂、训练中下级军官的速成武备学堂及其附设的武师范学堂、经理学堂，为北洋军阀集团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骨干，并安插到了全国各地和北洋各镇中，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他和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军阀的形成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动，因而并称这"北洋三杰"(王龙、段虎、冯狗)。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1913年被授为江苏都督、宣武大将军，坐镇南京，成为雄锯东南的大军阀，确实起到了北洋系看家狗的作用。另外，在北洋军阀分化，他成为直系首领后，又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盾，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皖系，称"长江三督"。正是他们这帮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合纵连横、朝云暮雨，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不尽的灾难。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李经羲

字仲仙，又作仲轩，安徽省合肥人，1859年生。系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次子。1879年中己卯科优贡，1887年任四川省永宁道，次年丁忧开缺。1892年后任湖南盐粮道、湖南盐茶厘金局、湖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1901年4月升任广西巡抚。5月调任云南巡抚，1902年被革职，任署理贵州巡抚，1904年开复原官衔，又任广西巡抚，于1905年乞求病免。1910年2月任云贵总督。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礼送"出境，避居上海。1913年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1914年任审计院院长，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嵩山四友"之一。1916年6月任财政总长。1917年6月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仅十余天，即发生张勋复辟而去职，以后在上海作寓公。1925年故去。

程璧光

程璧光(1861～1918)，字恒启，号玉堂。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父程芳在檀香山耕牧经商。九岁时他听说父亲患病，便随族叔前往省亲侍疾。两年后父病殁于檀香

山，程璧光扶柩归里，因“生事益蹙，殆无以继学业”，遂往福建投靠姐夫陆云山。陆时任靖远舰管带，命程学习航海术。光绪二年(1876年)程璧光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成绩优良，“每试辄冠其曹”。毕业后，被派充扬武舰见习生，不久即擢升为超武舰帮带，后再任元凯舰管带，适广东在福建定造的广甲等舰成，程奉命驾驶回粤，遂历任广甲舰帮带和广丙舰帮带等职，在海军界开始显露头角。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广丙、广甲、广乙三舰前往参加会操。演习时广丙等舰“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中靶亦在七成以上”，颇得好评。会操结束时，中日关系已渐趋紧张，两广总督李瀚章命广东三舰充当北洋舰队后备队。程璧光闻命后，慨然表示：“舰所以备海战也，今外交已决裂，其势必出于战，战则海军首当其冲，不可不集全力以张吾军威，何后备之云？”于是亲谒李鸿章，请求率领粤舰开赴前敌。李鸿章嘉其志，允将广东三舰编入北洋作战舰之内。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舰队战于黄海，程璧光带领广丙舰全体官兵奋勇作战，在指挥战斗中受伤。

光绪二十一年初(1895年1月)，日军进犯威海卫，很快占领南北两帮炮台，并封锁了东西港口。提督丁汝昌于正月十七日(2月11日)悲愤自杀。第二天，北洋舰队洋员浩威等偕刘公岛营务处道员牛炳昶盗用丁汝昌名义起草了乞降书，派程璧光乘镇北炮舰，将乞降书递交给日本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

《马关条约》签订后，程璧光被革职，归里闲居。因腹部弹伤而经常到孙中山所开“东西药局”就医，因而与孙中山相识。程璧光的弟弟程奎光(时任广东水师镇涛船管带)已是兴中会会员。孙中山认识程璧光后，劝他加入兴中会。程璧光起初逡巡犹豫。程奎光劝他说：“弟已入会多时，决以身许国，兄亦断不能置身事外，请即毅然入会，勿再迟疑。”程璧光度不能免，才提笔书写誓文，但仍“意未释然也”。是年九月上旬(10月下旬)，兴中会广州起义谋泄失败，孙中山逃往海外，程奎光、陆皓东等被捕死难。程璧光惧怕牵连，先匿居香港，再避往槟榔屿，与革命党人脱离了关系。次年，李鸿章出使欧洲经过槟榔屿，程璧光自请谒见。李问他何故至此，程璧光回答：“甲午之役全军覆没，朝廷方降罪。”李鸿章说：“此大事于一人何尤，且归，吾当为君电解之。”于是程璧光得以回国复职于海军，任监造军舰专员。

中国海军经甲午一战丧失殆尽，迫于外患，清廷时思规复，即向英国定造装甲巡洋舰“海天”、“海圻”。光绪二十二年夏，程璧光作为监造专员之一前往英国。二十五年率两舰回国，先后担任海容、海圻等舰管带，后又调北洋营务处会办。由于他为人谨厚，常接济贫困，处事干练，所以颇得人心，遂渐成为清末海军界的重要人物。三十三年，清廷于陆军部内设海军处，程璧光被任命为该处船政司司长。宣统元年(1909年)初，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南北洋海军统一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次年冬，清廷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程璧光为第二司司长。载洵常向程学习海军战术，对他十分倚重。

宣统三年，英皇乔治五世行加冕礼，程璧光受命为副使率海圻舰随专使载振赴英致贺。礼毕，适墨西哥华侨以遭居留地官吏虐待而频向清廷申诉，清廷因程璧光在欧之便，命他领舰前往墨西哥保护侨民。途经美国时，程曾至白宫晋谒美国总统塔虎脱并结交美国海军将领。是时，墨西哥事件平息，程璧光又奉清廷电令顺道慰问古巴华侨。古巴华侨扶老携幼，纷纷前来观看来自祖国的军舰。程璧光此次率舰巡行，是中国军舰第一次出现在欧美大洋上。

正当程璧光逗留英国时，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伍廷芳等电促程璧光归国主持海军事务，但他迟疑不决，直到1912年夏才返回上海。第二年春，袁世凯邀他入京，委为海军高等顾问。1914年5月，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萨镇冰、王士珍等为办事员，任程璧光为参议，以为羁縻。程璧光目睹袁氏复辟帝制逆迹显露，心中郁闷不乐，常流露出“哀我中国，生机已尽，暮色苍皇，惟有仰天长叹”之愁情。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程璧光因起初与黎供职水师“同事有年，意甚相得”，遂被任命为海军总长。在“府院之争”中，他始终站在公府一边。1917年6月程率肇和舰南下抵沪。其时孙中山正在上海联络各方力量进行反段活动。主动函约程会商。张勋复辟后，他表示奉大总统黎元洪命“起兵讨贼”，不赞成孙中山“复设临时政府”，“复称临时大总统”的主张。7月22日，程璧光率第一舰队所属海圻等舰离沪南下，并发布海军自主宣言，以三事自矢：一，拥护约法；二，恢复国会；三，惩办祸首。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程璧光为海军总长，但程始终没有就职。

桂系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并不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为了拉拢程璧光，他们每月拨10万元作为南下舰队的军费。这年11月5日，孙中山准备用武力驱逐陈炳焜，命令海军炮击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程璧光拒不执行命令，把军舰调泊黄埔，并宣布戒严。孙中山于1918年1月3日晚亲率少数卫队登豫章、同安舰，密令两舰炮击观音山督军署。第二天程璧光即以擅自行动为由，将两舰舰长撤职。

1918年初，程璧光曾指挥舰队在琼州海峡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争。这年2月，有人提出“拟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程璧光“力赞其议”，与此同时，广东地方实力派又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电请陆荣廷调莫荣新为

讨龙军总司令，另举“极得全粤人民之信仰”的程璧光为粤督。就在这时局动荡之际，1918年2月26日晚8时，程璧光在海珠海军司令部对岸遇刺身死。当时一般都疑是桂系军阀为防止粤人得势而发，后来又有人说是朱执信派刺客肖觉民、李汉斌所为。军政府为追念程璧光在护法中“首倡大义”之功，特于广州海珠公园建立铜像，以资纪念。其遗体于1919年1月葬于江苏宝山县。

（摘自《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

珍闻轶事

孙中山称许谭延闿

满清翰林而跟从孙中山革命的，谭延闿是第三人。他在民国六年入党，较程潜加盟为迟。但谭任湖南督军时，程反在他部下任师长，因而演出驱谭恶剧结了嫌隙。

孙中山为了团结同志，乃特约谭程到他寓所便餐，说是要商量有关湖南的事务。谭似已会悟孙中山意旨，依约提前三十分钟就到了，他和参军赵超招呼，先不要为他通报，等程到后再一齐晋见。

不多时，程也到了，谭即向程连打招呼，并拱手作揖说：“颂云，以前是我对不起你，请多原谅。今后一同跟随总理，你是我的前辈，应该多加指导！”程一时忸怩不知所措，也忘了答礼，谭遂和程挽手进入客厅并坐。

这时，孙中山也自楼上下来，与谭程握手，先以茶相待，然后入席。孙中山自以开水代酒，劝谭程开怀畅饮，相与欢谈，言归于好。孙中山待他们席散走后，他对赵超说：“组庵知礼识大体，很了不起！”他对程却无赞许的表示。

“盟单”失落之谜

民国六年一月十一日，张勋在徐州召开了部分保皇督军的联合会议，策划了一套复辟计划，准备第一步解散国会，第二步逼黎元洪退位，第三步扶溥仪复辟。当时为了表示隆重，特在张勋的二姨太邵夫人处找来一块预备给少爷压邪用的黄绫子，作为“盟单”，与会的各省督军和段祺瑞的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名。

后来，张勋带着辫子兵进京复辟，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反复辟”。辫帅火了，把辫子兵调到天安门前，修筑工事，准备负隅顽抗。但局势越来越对张勋不利，原先在“盟单”上签字的那些督军们，纷纷起来“反复辟”。这下辫帅更是气愤至极，要把那块黄绫子“盟单”公布于众，作为降服那些“背信弃义”的“盟友”的法宝。可就在这时，他却怎么也找不着那份“盟单”了。张勋记得“盟单”是存放在参谋长万绳栻那里的，就去找他。但万绳栻说，某次张勋已将“盟单”拿去了。两人死无对证，张勋也没有办法，只好吃这个哑巴亏。

原来张勋晚了一步。冯国璋摸透了张勋的脾气，知道一旦将他逼急了，张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冯国璋自己也在“盟单”上签了名，落下了把柄。为了以防万一，这个出名的吝啬鬼这回拿出了二十万大洋，把那份“盟单”从万绳栻手中买去了。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糊涂总统冯国璋

冯国璋在代理大总统期间，有时糊涂得令人难以置信。

民国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在上任之前到总统府去谢委。可冯国璋已记不起这个人了，看了名帖，才知道林摄的姓名。他懒洋洋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林摄回答道：“禀告总统，我久住北京。”冯国璋又问道：“你现在作什么事呀？”林摄又答道“塞北关监督发表不久。”冯国璋愣了一会儿，突然瞪眼问道：“谁叫你做关监督的呢？”这位新任官简直被问糊涂了，只好硬着头皮回答：“是总统任命的！”这个糊涂虫自己惊诧了起来，想了想道：“我几时任你做关监督的呢？”林摄答道：“明令发表已有好几天啦！”糊涂总统“哦”了一起，似乎想起来了，说：“不错，有一天我睡午觉，有人拿了一道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那回事吧！”说完，挥挥手叫他退下。

一日总理汪大燮

冯国璋是段祺瑞捧上台的，段祺瑞原以为冯国璋当了总统可以听他的指挥。未想到冯在有些事上糊涂，在某些大事上却也并不糊涂，他极力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两人的矛盾越闹越深，民国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段祺瑞提出辞去总理职务不干。国务总理不可一日无之，但段辞职后，无人敢再当此任，这可急坏了冯国璋。后来，冯国璋总算找到了一个人，就是病态恹恹的汪大燮。

汪大燮开始不答应，冯国璋苦苦哀求，才答应了。但同时提出了一个滑稽的条件：“只做一天总理，只签署两个文件。”冯国璋也只好苦笑着答应。

十一月二十三日，冯国璋下达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的命令，这就是汪大燮签署的第一个文件。第二天，汪大燮就到新华宫去找冯国璋，拿了一个空白文件，签上了名，说这是他签署的第二个文件，要冯立即填上继任总理的名字。冯国璋一时哪里去找呀？汪大燮便天天去催。冯国璋只得去找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向他打拱作揖，请他千万帮忙。王士珍情面难却，在那张空白文件上签了字。

因为那张空白文件是早就填好了日子的，从文件上看，汪大燮实际只做了一天的总理，所以人们都戏称他为"一日总理"。

张辫帅的辫子

辛亥革命时，张勋任江南提督，驻军南京，曾慷慨请求驰援武昌。这时，两江总督为张人骏。布政使樊增祥、总参议杨晟及九镇统制徐绍桢等，在张謇推动下，联合请求宣布独立。张人骏没有同意，邀请张勋及将军铁良，会同官绅到总督公署商议防守事宜。座上，樊增祥等还是极力主张独立。正相持不下时，张勋后到，头扎布巾，腰佩双枪，推门而入，听了几句话后，突然拔出一支枪来，瞪眼吼道："不必多说！独立就是造反，造反就是强盗。今天我们是同事，明天谁要背叛朝廷，竖起白旗，我就把他当作强盗对待。"大家遇到这位横眉怒目、手扳枪机的莽将军，只好仓皇而散。当晚，张与徐绍桢大战于雨花台，后来被赶出南京，退守徐州。清廷嘉奖他孤军奋战的功劳，任命他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

张入民国后，最出名的是他的一条辫子，与辜鸿铭的那条辫子可说是无独有偶，驰名中外，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当时，张坚决不肯接受断发令。为此，袁世凯曾派专使百般劝说，张誓死不剪。袁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更妙的是：张部下有几万官兵，也都不准剪辫子，成为有名的辫子兵。张本人被称为张辫帅，或干脆被叫作张大辫子。张对国民，特别对革命党，深恶痛绝，常对人说："我在前清受恩深重，君恩难忘。"他不仅始终留着那条意义深长的辫子，而且在见客时还要行前朝的跪拜大礼。他虽然是个行伍出身的老粗，却也以卫道自居，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反对新学。他驻军兖州时，因地近曲阜圣地，曾派兵守卫孔庙、孔林，而且还在他晚年刻印的一本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松寿老人自叙》中扬扬得意地说："其后，政府议给俸衍圣公而悉收其祭田。勋又争之。卒寝其事。"接下来，他为了表示谦虚，不敢居功，写道："是盖圣人之灵，幸假手于勋耳，非敢云勋力也。"这里，居然把自己写成了"大成至圣先师"之灵的凭附者，堪称奇文妙语。正因为他的这些表现，当时策划复辟的遗老旧臣就与他特别臭味相投，对他一往情深，先后向他游说的使者络绎不绝。

当然，尽管他如此倦念清室，痛恨民国，而入民国后，他并没有像有些遗老旧臣那样以不仕新朝来表示忠贞，依然是"好官我自为之"。

（摘自《清末民初云烟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辫帅"张勋剃发记

众所周知，民国初建之时，从京都到各地方，都有一批晚清官吏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政府的文官武将，其中，有一个怪模奇样的人特别引人的注目。你看他是怎生地打扮：

身穿民国将军服，
留着两撇八字胡；
挂勋披肩红绶带，
脑后辫子左右甩。

此人是谁？他就是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人称"辫帅"的张勋。

这位定武上将军不仅自己留着一条一尺多长的辫子，他所统率的二万多名定武军官兵，也都是一个个脑后拖着一条大辫子。所以这支队伍另有个绰号，叫"辫子军"。

张勋视发辫如命。定武军驻扎徐州时，曾有几个士兵外出被人暗地戏弄，剪去辫子。立时就有人将此事禀报张勋，引起他的震怒，将这几个士兵抓回大营，当众开刀，斩首示众。所以在他面前谁也不敢提剪辫子的事，以免招惹是非，引祸杀身。但奇巧的是，这位辫帅确曾受到过三次剃发的告诫，而且最后一次的告诫，终于逼使他剪去了那条顽固的辫子。

1913年，段祺瑞派员到徐州，劝告张勋及所部官兵一律剪去辫子

那时，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在公布制定陆军礼节后，段深感张勋及定武军官兵蓄辫一事不合体统，有碍军容，于是就派员去徐州劝告张勋，希望他带领全体官兵一律剪去辫子。张勋一听之下，顿时火冒三丈，冲着来人怒目大吼："头可断，发辫绝不可剪！"吓得来人颤惊惊地告退，连夜返回北京向段总长复命去了。

段祺瑞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向大总统袁世凯据情禀报，想促请袁出面镇一镇张勋。未曾想到袁听完报告却哈哈一笑："他是一个武夫，憨直顽固，不宜操之过急，慢慢地来吧。"原来当时正是用人之时，徐州地处南北要道，袁是不愿意因区区辫子的事激怒张勋，从而影响大局。

这是张勋第一次被告诫剪辫子。

平剧名角刘喜奎说:"要是王爷真心要娶我,就请王爷先把辫子铰掉!"

1917年7月1日,张勋挟清帝溥仪在北京宣告复辟,受封忠勇亲王、议政大臣,一时气焰逼人,不可一世。过去,这位"辫帅"曾迷恋过平剧名角刘喜奎,想娶他为妾,然而喜事未成。这件事张勋耿耿于怀,及至复辟锣鼓一响,龙旗飘扬,这位新王爷也飘飘然起来,于是又想起刘喜奎来,就派幕僚刘文揆上门去说合,想完结这段姻缘。

刘喜奎哪敢说个"不"字,她害怕这位新王爷恼羞成怒,一变脸害了自己;可是心里压根儿就不愿意,讨厌着呐。所以低着头闷着,长时间没出一声。

刘文揆误会了,以为她是害羞,就说:"刘小姐,您就点头表示一下吧,大帅等着回话哩。"

有道是急中生智。刘喜奎闷着头忽然想出一条脱身妙计,就抬起头来嫣然一笑,说:"刘先生,王爷要娶我,这是小女子的天大荣幸,不过……我得有个条件,不知当提不当提……"

"可以,可以。"刘文揆喜孜孜地说。

"那好,"刘喜奎说,"王爷要娶我,就请王爷先把辫子铰掉!"

刘文揆猛然一愣,"傻"了好长时间,这才摇着头说:"刘小姐,您知道,大帅视发辫如生命,如今龙旗再举,此意恐行不通呀!"

刘喜奎瞪着一双大眼睛:"那我就誓死不从!"

刘文揆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咕哪着:"慢来慢来。"

刘喜奎语气柔和地:"刘先生,您呐不妨把我提的条件去向王爷禀报一声,他要是真心娶我,或许能答应了不是?"

刘文揆一听也在理,便告辞返回南河沿"帅府",把刘喜奎提的条件向张勋一摆,只听张勋"哇呀"一声,说:"这小妮子真是恶作剧,岂不是要难煞老夫矣!"搓着双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刘文揆眨巴眼睛,走近张勋身旁悄声地说:"大帅,何不去买一条辫子来……"

"着哇!"张勋一击掌,"快去办!"

再说刘文揆捧着买来的大辫子送到刘喜奎的面前,把她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刘文揆莞尔一笑:"刘小姐,给个日子吧,我们好去张罗喜事"。

刘喜奎用手指轻轻地挑了一下那根辫子,随即甩进盒子里,质问:"刘先生,您太欺负人了,您这是从哪儿买来的?"

"笑话,这是怎么说法,大帅的发辫,亲手铰下来的……"

"我不信!过去大总统、总长劝他铰辫子,他都不听,偏偏听我的!"

"啊哟喂我的小姐,这不正说明大帅喜欢您吆,俗话说的好:一物降一物,是这个理吧。"

"我就是不信!我要亲眼看看大帅,果然是剪了,我立时就过门。"

刘文揆又"傻"了。

刘文揆捧着装辫子的盒子回到"帅府"一禀告,气得张勋大骂山门,顺手劈脸给刘文揆一巴掌,大吼一声:"滚!"

刘文揆捂着半边脸退出大厅,在走廊过道里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讨不到小老婆,拿我来出气!"一气之下,直奔火车站,走了。

刘喜奎深知不妙,急忙到朋友家"猫"了起来。这时,张勋受到各路大军的讨伐,急于应付战事,就把强娶刘喜奎的事搁到一边去了。不过也算是又受到了一次剪辫子的告诫。

复辟失败,采纳洋人意见,准备剪辫子外逃

复辟很快失败,张勋逃至荷兰使馆避难。段祺瑞组织政府,公布张勋复辟罪状,并照会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复辟祸首张勋归案。吓得张勋坐卧不安,连忙求助于洋人。

荷兰公使表示:"阁下现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

张勋当即同意。

荷兰公使双肩一耸:"可是阁下这个样子是出不了使馆大门的,顶好是剪掉辫子穿上我们的服装。"

张勋摸着脑后的辫子,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晚,张勋即剃发剃须,做遁逃外洋的准备。

他的爱妾王克琴有意逗他,取笑说:"大帅过去誓言凿凿,决不剪辫,今晚突然一改初衷,是何之故呀?"

张勋说:"我过去不剪,是不忘故主、不降民国的表示;今天要剪,是要去入外国籍了。"

(摘自《民国春秋》)

张勋复辟前的扶乩活动

1917年7月1日,辫帅张勋把宣统又捧上了皇位,演出了民国史上一出短暂的(仅12天)复辟清廷的丑剧。在此之前,五六月间,张勋与万绳栻、康有为等人加紧进行准备复辟的筹划,在入故宫晋谒溥仪的前夕,为选定复辟的日期,他们搞了一次扶乩活动。

参与这次扶乩活动的万绳栻是辫子军的参谋长。原来张勋幼年时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境贫困,万绳栻的

叔父救济过他们。张勋由于感恩，就格外看重与信赖万绳栻。张勋本人耽于酒色，军中事不大过问，多交与万绳栻。这个万绳栻遗老的气味很浓，热衷于搞复辟。5月21日在徐州召开第四次督军团会议，张勋以督军团大盟主与东道主的身份作为会议主持人，可是这个会都是由万绳栻谋划与安排的。会上张勋提出了复辟清室的动议。随后，参加会议的督军们讨论了实行复辟的策略。此次会后，万绳栻一再报告张勋说，时机已成熟，可以行动了。可是采择哪个日子，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求助于神灵。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为名带着5000辫子兵自徐州北上，开往京城驻扎。万绳栻自此就与住在上海的保皇党头头康有为密电来往，通报与合谋复辟的方略与步骤。这个"文圣人"康有为按照万绳栻的授意，先草拟了宣统皇帝的伪诏。在复辟开始实施的时候，万绳栻电召康有为进京。康随即乔装一番，化装成一个老农，手摇一把蒲团扇，自沪乘上火车，经天津转车，于6月28日抵达北京。他在北京永定门站下了车，就有四个辫子兵迎了上去，用一辆马车把他接到南河岩张勋住宅。紧接着，张勋、万绳栻就与康有为谋划于密室，搞了一次扶乩。

他们请"神"降临，在"扶箕"即沙盘上画出字迹（实际由人操纵），作为"神"的启示。画出的字迹是杜甫的诗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和李白的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他们分析道，"又逢君"（他们理解为复辟）在"落花时节"，而"落花时节"（"落梅花"）在五月。于是他们择定丁巳年五月十三日（阳历1917年7月1日）为复辟的"黄道吉日"。

（摘自《民国春秋》）

黄侃谑胡适

黄侃最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次他在讲课中赞美到文言文的简明，他举例说："若胡适丧妻，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之多。如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分三之二。"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因而招致学术界的嘲笑。黄季刚曾在中央大学课堂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其故？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胡适有次和黄季刚在同一筵席，他正大谈墨学，被黄大骂说："现在讲墨学的，都是混帐王八。"

胡听后隐忍还没有答话。黄竟又说："胡适的老子，也是混帐王八。"胡立即怒冲冲地指斥黄不应侮辱他父亲。黄却轻松地笑笑说："你不必生气，我是要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正如孟子所说是无父也。你心目中还有你老子，那你就不是墨子的信徒了。"

黄说得全席哄然大笑，胡则显得非常尴尬。

（摘自《近代稗海》荣孟源编）

中国战史上第一次使用飞机

1917年，当北洋政府总统府和国务院在参战问题上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清政府"辫子兵"统帅张勋，以为复辟时机已经成熟，亲率五千辫子军，杀到北京城，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被迫宣布下野。1917年7月1日，张勋伙同康有为等发布"上谕"，宣布满清废帝宣统复位。

复辟消息传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恢复共和，惩治复辟元凶。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见到复辟"圣旨"后，勃然大怒道："中华民国岂能就此覆亡！我务必竭尽全力，铲除叛逆，恢复共和！"

7月3日，秦国镛召集全校教员、学员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讨讨贼事宜。全校人员均磨拳擦掌，纷纷请战。会议及决定筹组空军队，讨伐叛逆。秦以为空军从未参加过战斗，对其成败把握不大，遂又决定联络附近陆军共同作战。结果与陈光远统帅的第三师等部队达成协同作战的协议。次日，组成了航空队，以秦国镛为总司令。5日下午4时，派学员章斌驾机飞往丰台、永定门一带侦察张勋部队的动向。这是中国航空飞机的首次参战。

7月6日早晨5时，秦派学员马毓芳飞临北京上空，撒下一批传单，宣称要严惩复辟祸首；与此同时，又派学员傅锦隆再次飞往丰台、永定门一带侦察敌情。7时，又派航校教员潘世忠和学员尉迟良驾机飞赴长辛店与"讨逆军"西路军司令曹锟接洽（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组织了所谓"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由天津向北京进攻），后飞到紫禁城抛撒传单。同日下午5时，秦命令学员蔡祖尧飞往廊坊与"讨逆军"东路军司令段芝贵联络并报告敌情；7时，又派马毓芳前往廊坊汇报战况。不料起飞后天气陡变，马在"巨雷烈风"中沉着镇静，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完成了任务并受到嘉奖。

7月7日上午6时许，与航空队联合作战的第三师师长陈光远命令学员张纳墀驾机飞往天津，向段祺瑞汇报战况。同日，"讨逆军"十一、十二两师在丰台、南苑一带与辫子兵展开激战。秦国镛立即派出技术高超的潘世忠飞赴前线，向张军扔下数枚炸弹，当即炸死张军四、五十名。辫子兵吓得纷纷弃械而逃。上午10时左右，潘世忠、尉迟良再飞丰台助战，准备再向张军阵地抛掷炸弹，因见张军溃退，故调转机头，向北飞到紫禁城上空，掷下三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皇宫内，炸死清朝宫廷侍卫、太监数人、轿夫1人，并留下了1个巨大的弹坑，防守的辫子兵惊恐而散。

飞机助战仅两日就取得了极大战果。秦国镛越发坚

定了杀尽叛逆的决心。正当他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出击时，忽然接到北京军警长官王士珍的电报，称清朝皇室被飞机的袭击吓得胆战心惊，请秦总司令暂勿再派飞机空袭紫禁城。同时，清廷也运动日本驻华公使，以勿扰京师秩序为名劝阻秦司令，秦国镛见空军参战目的已达，遂答应不再派飞机抛掷炸弹。

7月12日，"讨逆军"打到北京，与辫子军在城内展开激战。航空队于上午6时15分派出飞机两架，在辫子军阵地及皇宫上空盘旋两周，而后向南飞回共和军阵地，报告敌情。就在这一天，辫子军被打败，张勋化装逃跑，复辟丑剧失败。

总计在一个星期时间里，航空队出动飞机11架次，进行联络和侦察、抛撒传单和空袭等作战行动，对打败辫子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摘自《民国春秋》）

流行风

小说《非梦记》

作者苏曼殊，主要内容：

该书叙述青年海琴，自幼与其父世交老画师汪玄度学习绘画，勤奋向上，孜孜不倦，玄度爱如亲子。画师有二女，长女薇香、二女芸香，皆品貌端正，贞静达理。画师想以薇香配海琴为妻室，两家满意，将举行订婚礼，不料海琴父母相继病逝，留下海琴依靠婶娘刘氏生活。画师重提婚事，刘氏婉言拒绝。婶娘却打算将外甥女凤娴嫁海琴，她家有资财，门当户对。两相见面，凤娴也热爱着海琴。但海琴与薇香一起从师学画，志同道合，早有爱慕之心，薇香将母遗留下的合心花钗赠他为定情信物。海琴不同意婶娘想法，又不敢说明。刘氏别有用心，和凤娴及女婢阿娟串通一气，设下圈套，离间海琴与薇香的感情，造成矛盾，并让凤娴乘隙而入，向海琴殷勤献爱。凤娴浓情蜜意，日益加切，使海琴不知所措，处于似梦非梦的境地，而对薇香产生怀疑，主动退还信物花钗。海琴内心痛苦，忧伤成病。一次他到报恩寺养病，遇到薇香奶母韦媪，知薇香仍挚爱着自己，非他不嫁，才明白受骗。海琴悔恨回家，请求婶娘玉成好事，刘氏以门户不当，强迫与凤娴定婚。海琴万般无奈，离家出走，到五指山削发为僧。薇香投江自尽，凤娴爱情也落空。作者用浅近的文言描写细腻委婉，着重表现了海琴与微香的情深义重，和凤娴的眷恋之情，谴责了以婶娘刘氏为代表的封建家长的专横，和把婚姻变为金钱关系的社会现象。作品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也流露出逃避现实，颓废绝望的情绪。

小说《鸳鸯梦》

作者贡少芹，主要内容：

本书以隋朝为背景，以蒋青岩为主线，叙述了他、张澄江，顾跃仙与陈朝遗民华刺史（蒋的姑丈）的女儿柔玉、掌珠、步莲的爱情故事。蒋等三人才高品逸，少年英俊，无意功名，柔玉三姐妹也才貌双全，彼此在苎萝山中诗书唱和。但权贵杨素英却强得要柔玉作妾，将华刺史逮京下狱。蒋青岩多方奔走营救，其间又先后与柔玉的侍女韩香，扬州皮姓妻子沈兰英，袁太守女儿秋蟾，陈朝执金吾之女柳碧烟产生爱情，这些女子也都才高貌美，与蒋青岩相亲相爱。最后为营救华刺史，柳碧烟作柔玉的替身进杨府，救出华刺史，柳碧烟也用计脱身。蒋等三人也高中鼎甲回乡，蒋青岩与柔玉，柳碧烟、秋蟾、韩香完婚，此时兰英已因思念蒋将青岩而死。张、顾二人也举家前来，大家同在苎萝山隐居，终山水田园之乐。作品继承了明话本小说的创作传统，叙事简明晓畅，结构严谨。开头和结尾以自观和尚偈语承启，每回首尾以诗词起兴，文中穿插了许多近体诗，雅而不俗。

小说《燕蹴筝弦录》

作者姚鹓雏，主要内容：

书中描写江苏吴江乡村一儒生诸鸳机，风仪俊雅，与表妹寿姑相爱。寿姑美貌聪慧，天真活泼，但诸母觉得寿姑的姐姐嫦姑稳重大方，决定让鸳机与嫦姑成亲，鸳机与寿姑无法表白两人的心愿，为暂时躲避，鸳机随友人赴岭南任职。途中遇舞女云娘以身相许，鸳机忠贞不渝，仍日夜思念寿姑，寿姑在家中忧思成疾，诸母又做主为她定了亲，鸳机得知后赶回家乡，寿姑整日不出房门，也不见鸳机，两人都痛苦难言。后鸳机赴京应试，寿姑在孤苦无依中吐血而亡。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全书以文言叙事，描写极为细腻，文词婉约工丽，人物形象生动。

诗《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刘半农）

诗《月夜》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

诗《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里的水。
无愁地镇日流，
率真地长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温泉里的水。
我底心儿他尽是爱游泳，
我想捞回来，
烫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里的水。
借荷叶做船儿，
借荷梗做篙儿，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处来！

（应修人）

历史档案

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休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

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固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悲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　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

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胡适）

孙中山就职大元帅宣言

1917年9月10日

昔胡清失道，人心思汉，文与海内志士合谋征讨。武昌倡议，黄陂实为主帅。江南既定，共和初造，则南都武昌为中区焉。以虏运告终，授之袁氏，文虽自甘退让，而推荐非人，终于反噬。南方涂炭，元勋杀戮，国会解散，恣睢五稔。僭号称帝，实赖西南豪杰出师致讨，兵未渡江，元凶殂殒，黄陂以副贰之位，依法继任，然后知神器不可以力竞，民意不可以横诬也。徒以除恶未尽，权奸当道，帝孽纵而不治，元勋抑而不用，怏怏之威，上陵元首，诈取之谋，南暨吴蜀。侵《约法》宣战媾和之权，辱国会神圣立法之地。既被罢黜，蝥贼兴戎，以肇解散国会之祸。小腆乘之，应机复辟，民国根本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张绍曾、丁槐等实受黄陂密命，倡义讨逆，师期漏汇，为凶人所掩，乘间攘窃，饰功取威。既覆孱胡，亦以是黜黄陂之命，数遣狙击，逼迫卧寝，纠合无赖，劫夺印玺，以自成伪政府。譬尔朱荣、高欢辈互为首尾，盗取国柄，其罪均也。

文于是时，身在海隅，兵符不属，乃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共商大计。既遣兵轮赴秦皇岛，奉迎黄陂，亦不能致。犹谓人心思顺，必有投袂而起者。迁延旬月，寂然无闻。用是崎岖奔走，躬赴广州，所赖海军守正，南纪扶义，知民权之不可泯没，元首之不可弃遗，奸回篡窃之不可无对抗，国际交涉之不可无代表也。于是申请国会，集于斯地，间关开议，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文忝为首建之人，谬膺澄清之责，敢谓神州之广，无有豪杰先我而起哉！徒以身与共和生死相系，黄陂为同建国之人，与义犹一体也，生命伤而手足折，何痛如之！艰难之际，不敢以廉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袍，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摘自《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第八师军官请惩傅良佐电

1917年11月25日

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天津曹督军、济南张督军、开封赵督军、南京李督军、南昌陈督军、武昌王督军、盛京张督军、齐齐哈尔鲍督军、吉林孟督军、太原阎督军、西安陈督军、兰州张督军、迪化杨督军、杭州杨督军、福州李督军、重庆周督军、吴查办使、成都刘军长、张家口田都统、归化蔡都统、承德姜都统、各省省长、徐州张督办、琼州龙督办、龙华卢护军使，并转各师长、旅长，各镇守使钧鉴，各报馆钧鉴：窃为我师成军以来，泽袍共经，数载于兹，征蒙叛，战四川，剿白狼，讨张逆，无殿后之羞，是为国人共见。此次南下，原为移防岳州。甫抵湘境，适值零陵变起，傅督命令攻讨，转战数百里，克复衡山，斩将搴旗，迭经报捷，黄龙痛饮，指日可期。今忽猝然班师，闻者咸相惊讶。军官督率无方，戕刃难辞其罪。嗟我同胞，士卒无辜，惨受屠残，疾首痛心，束身待罪，伏念事未剖明，死难缄默。当我军临前敌，傅督始则诸多掣肘，继则电促退兵，终则携款潜逃，置全城于糜烂，弃同胞于水火。今谨缕呈颠末，乞垂闻听。

我军进攻贺家山也，酣战月余，师长拿旗指挥，身先士卒，昼夜风雨驰驱，泥泞蹀躞，子弹两次缺乏，米粮三日断绝，赏银延迟不发，兵士啼饥号寒，犹复争先杀敌。兵站乃全军命脉，理应如何周详。乃所设多属虚浮，管理其事者，全系湘人，非其亲友，即其故旧，接济军用，非有心延岩，即故意推辞。而所派衡山兵站，有暗通逆党，密谋焚粮扰乱情事。逆军日增，我寡敌众，永丰乡为长沙门户，倘一面坚守重门，一面增兵济饷，衡山无后顾之虞，以此图攻，何攻不克。乃朱旅附逆，永湘同陷。湘乡距离湘潭仅数十里，唇亡齿寒，后路不保，衡山背腹受敌，岌岌乎危。两次告急，请傅督添兵相助右翼，俱以兵难飞渡为辞，反令退却返保长沙。以我将士无数铁血克复之功，何忍一旦抛弃？始犹坚忍不拔，既见又来催促，有拼命退却等语。后路屡被袭击，危势日增，岂堪坐毙？无可如何，负疚忍痛，遵令分路班师。军用物口，完全携带，方冀整我军旅，严守锁钥。不意左队甫至湘潭，即闻傅督潜逃，朱旅内应。商旅与本师附属之一团，同被陷湘潭，已引敌据。右队行至株州，又遇定武军之编入安武军者，仇视我军，几操同室之戈。加之警察团防，沿途土匪，乘机扰乱，炮火烽烟，迷漫天际。左右两队，当此疲劳跋涉，弹绝粮断之时，一无援兵，势成孤立，且战且行，犹未稍懈，以一当百，士卒死亡，接济散失。及将至长沙，闻秩序大乱，王总司令虽竭力坐镇，支持危局，无如主体已解，全体安恃？譬之重担千钧，弃肩非易，坏棋一局，着手无从。匪徒暴动，枪声隆隆，火光灼灼，我军夜间经过，莫辨情形，危机盖迫。且兵士分乘各船，仓卒不能集合，虽有斗心，奈无战力，流离颠沛，至此损失殆尽矣。师长以空拳莫奋，此所以不得已来至岳州也。

此次地方失守，军民死亡，器械毁弃，财产损失，军用物品，以及私有行李全数无存，损失几及百万。各军伤亡甚众，惨不忍睹。推原祸始，皆由傅督一人杀之。傅督身膺重寄，全局攸关，乃任用匪人，兵站则通逆，朱旅则内应。

医院不设，前敌送到伤兵，竟不疗治，任其号呼，而毙者不可胜计。揆之种种情形，该督意气用事，调度无方，以至战略失败，复行携款潜逃，国法神款，罪不容诛。全体将校，合辞涕泣上陈，仰恳大总统毅然下令将傅良佐惩以军法，以谢国人，而慰死卒之灵，以鼓残军之气。

讨逆军总司令布告

共和军总司令段祺瑞谨痛哭流泪申大义于天下曰：呜呼！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显位。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婪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乞，私橐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比以世变涛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阴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自其启行伊始及驻京以来，屡次驰电宣言，犹以拥护共和为口实，逮国会既散，各军既退，忽背信誓，横造逆谋。据其所发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谕，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怀，再三胪举奏折，一若由于群情之拥戴，夷考其实，悉属谶言。当是日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于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控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奏词，尤为可骇。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迭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勿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被诬控，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自昔神奸巨盗，劝进之表，九锡之文，其优孟儿戏，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该逆动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昔人有言，长星劝尔一杯酒，世岂有万年天子哉！旷观史乘，迭兴迭仆者，几何代几何姓矣！帝王之家，岂有一焉能得好结局？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天厚其报，使继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享殊荣，即食旧臣之报，仁至义尽，中外共钦。今谓必复辟而始为忠耶？张勋食民国之禄，于兹六年，必今始忠，则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既不忠于朝，今复不忠于民国，刘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将不食矣！谓必复辟而始为爱耶？凡爱人者必不忍陷人于危，以非我族类之嫌，丁一姓不再兴之运，处群治之世，而以一人为众矢之的，危孰甚焉。张勋虽有天魔之力，岂能翻历史成案，建设万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于再亡，及其再亡，欲求复有今日之条件，则安可得？岂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领，而清室子孙且无噍类矣！清室果何负于张勋，而必欲借手殄绝之而始为快？岂惟民国之公敌，亦清室之大罪人也！张勋伪谕，又借口于民国不能善政，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向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法兰西三复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确立共和，国乃大定，而既扰攘八十年，国之元气消耗尽矣。国体者譬犹树之有根也，植树而屡摇其根，小则萎黄，大则枯死。故凡破坏国体者，皆召乱取亡之道也。防乱不给，救亡不赡，而曰吾将借此以改良政治，将谁欺，欺天乎？复辟之遗害于清室也如彼，不利于国家也如此，内之不特非清帝自动，而孀妃耆傅，且不胜莫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群公劝进，而比户编氓，各不相谋，而瞋目切齿。逆贼张勋，果何所为何所恃而出此？彼见其辫子军横行徐衮，亦既数年，国人优容而隐忍之，自谓人莫敢谁何。遂乃忽起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以次铲除异已，广布腹心爪牙于各省扫荡全国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而使之受支配于彼之土匪军之下，然后设文网以坑贤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于彼股掌之上，及其时则取而代之耳。罪浮于董卓，而凶甚于朱温，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男子矣！祺瑞罢政旬月，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时政。忽遇此变，群情鼎沸，副总统及各省督军省长驰电督责，相属于道，爱国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义之军侣，环集责备，义正词严。祺瑞抚躬循省，绕室彷徨，既久奉职于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策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谨于昨日夜分，视师马厂，今晨开军官会议，六师之众，佥然同声，誓与共和并命，不共逆贼戴天。为谋行师指臂之便，谬推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义之所在，不敢或辞，部署略完，克日入卫。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向我同袍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文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子横行都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蒙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谓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定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剑及屦及，率先勇进，以为国民去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

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时，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利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民国六年七月三日。

张勋奏请复辟之原折

1917年7月1日

奏为国本动摇，人心思旧，谨合词吁请复辟，以拯生灵，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经国以纲纪为先，救时以根本为重。我朝开基忠厚，圣圣相承，立教则首尚人伦，敷政则勤求民隐。是以皇灵赫濯，敬者懔(Lin 凛)若帝天；化泽涵濡，爱者戴如父母。虽经捻、发寇氛之巨，卒赖二三大臣效忠疆场，用能削平祸乱，弼我丕基。盖仁泽入人既深，而王纲又足以维系之也。

廿载以来，学者醉心欧化，奸民结集潢池，两者相资，遂成辛亥之变。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荣，罹万民于涂炭，勉徇所请，诏设临时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岂意根本动摇，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厉民之虐。彼时臣勋、臣国璋等，孤军血战，莫克回天。臣嗣冲、臣怀芝等，虽力遏妖氛，卒难荡决。贻忧君国，寝馈难安，忠愤填胸，积年成痗(mèi，妹)。然不敢不仰承庙略，幸冀升平，蒙难艰贞，于兹七载。乃共和实行以后，上下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贪济暴，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内外纷呶(nào，挠)，迄无宁岁，苍黎凋瘵(zhài，债)，逃死无门，此实非孝定景皇后逊政之初心，我皇上所当收回政权，实行安心，以仰承志者也。

臣等伏査列强之世，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此义近为各国所主张，尤深合吾民之心理。以中国之皇王神圣，代有留贻，规复典章，易如反掌。而我皇上英姿天挺，圣学日昭，虽在冲龄，睿逾往圣。况当杌陧之运，曾无七鬯之惊，天殆默佑圣躬，以宏济艰难，俾延无疆之祚。而吾民迭婴荼毒，尤徯后以来苏。臣等蒿目时艰，痛心天祸，外察各国帝观之论，内审民国真实之情，靡不谓共和正体不适吾民，实不能复以四兆人民敲骨吸髓之余生，供数十政客毁瓦画墁(màn，慢)之儿戏。非后何戴，穷则呼天。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谨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臣等内外军民，誓共效命竭忠，保又皇室。伏恳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请，天下幸甚。

所有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吁请复辟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

(《东方杂志》第14卷第8期第196页)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段祺瑞往晤徐世昌，发誓决心解散国会。声称“二十二省及三特别区之通电已显令解散国会之意，既有各省为我后盾，我料黎元洪将来亦无可如何”。

1月2日　浙省军警长官及省议会、教育总会、总商会分别集会，议决电请中央收回杨、齐任浙成命。

1月4日　杭州各界四千余人开公民大会，要求浙人治浙。一致拒绝杨、齐。公推章炳麟等为代表，分赴南京、北京请愿。

1月9日　张勋与各省督军代表在徐州开第三次会议。段祺瑞派徐树铮、靳云鹏等与会。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及改组总统府等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

1月16日　孙中山在上海接受黎元洪所授大勋位。

同日　冯国璋致电国务院，以制药为由，敦促政府收买上海洋商公所存土(鸦片烟)，并建议在江苏、广东两省销售。

1月24日　长江沿岸湘、鄂、赣、皖、苏各省地震。2月22日，武汉、安庆又有地震。

同日　四川江北县火灾，烧毁民房千余家。

1月25日　福建、浙江、广西等省地震。次日，上海地震。

1月27日　黎元洪任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

同日　国会各政团开宪法协商会议。22个团体莅会，讨论宪法第十九条第二项(即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

修身大本)。主张维持第十九条第二项原案、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者,有宪法协议会等七政团;赞成维持第十九条第二项、并赞成定为国教者,有研究会等四政团;反对第十九条第二项并反对定为国教者,有宪法商榷会、丙辰俱乐部;宪友会、民彝社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对第十九条第二项主服从多数;政学会等三政团无定见。

1月28日　山东民军首领吴大洲在北京被捕。5月26日,判处无期徒刑。

同日　清庆亲王奕劻在青岛病死。

1月30日　《甲寅》日刊发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一文,痛斥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为"怪诞之事实"。

2月6日　教育部下令重申禁止学生加入政党。

2月7日　张勋、倪嗣冲以宪法审议会未能通过国教案,再电北京政府及各省,要求将孔教列入宪法。8日张作霖,9日曹锟、卢永祥,27日陈炳焜、刘承恩亦通电主张此议。

2月10日　段祺瑞及其阁员全体出席参众两院会议,段在会上报告政府对德抗议理由,两院一致赞助政府对德方针。

同日　陕西省长李根源离京赴任。20日到省接印视事。

2月11日　段祺瑞致电章宗祥,令其探询日本政府对于中国绝德后之意见。当日,章使复电,称本野外务大臣深望"断绝国交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

2月12日　国会各政团开联合会议,议决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以研究对德通牒后外交之进行。

2月16日　"全国禁烟联合会"会长柏文蔚致电北京政府,以沪上外商抬高存土售价,吁请政府派员切实调查。

同日　国务院"外交委员会"成立。

2月18日　国会议员在北京发起成立"外交商榷会"。

2月19日　"两院各政团宪法协商会"开会讨论宪法第二十一条,一致赞成两院制。当日并交宪法审议会,获通过。

2月20日　国会开会质问政府收买存土案。越二日,参议院开会继续质问。

2月23日　冯国璋抵北京。即日会晤黎元洪、徐世昌。是晚段祺瑞设宴招待,席间段向冯详谈绝德内情。

同日　张勋联合十六省区督军、省长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速定孔教为国教",否则即应"以简当手续直接取决于多数民意",或者"另组制宪机关,作根本之解决"。

2月25日　"中华国民禁烟会"在上海开千人禁烟大会,一致通过致北京政府及各省要求立即废约电,并举代表北上请愿。于右任、章炳麟等被推举为该会正、副会长。

同日　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会议绝德宣战事。一致同意对德绝交并加入协约国。

2月26日　冯国璋致函众议院,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

2月27日　黎元洪令准平政院院长周树模辞职,特任熊希龄为院长。

3月2日　黎元洪任载涛为镶黄旗蒙古都统。

同日　黎元洪令废止文官任职令。

3月4日　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段祺瑞请黎元洪核准致驻日公使嘱令向日本政府磋商绝德后加入战团条件之电稿,黎以此事须经国会同意而未准照发,是日段愤而辞职,且赴天津。

同日　上海总商会等十团体致电北京政府及各省,以加入协约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请"始终中立"。

同日　山东、浙江等十六省尊孔会、社在沪代表发起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通过简章,以"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为宗旨"。设总事务所于上海。

3月5日　黎元洪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协商内阁事。黎请徐任国务总理,王任陆军总长。徐、王婉辞。冯等三人主段复职。黎被迫请冯、徐赴津劝段回京。

3月6日　段祺瑞回北京复任。冯赴津前,曾与黎元洪商订段复任条件:(一)阁定外交方针总统不加反对;(二)阁拟命令总统不拒盖印;(三)阁训电各使、各督军省长,总统不加干预。事先,徐世昌、王士珍亦皆据此情电告段氏。段即日归任。

3月7日　段祺瑞就复任事密电各省及各驻外公使,告以阁议对外方针,黎元洪已表赞同。希各省大吏于政府既定之对德方针,"切勿再生异议,致碍进行"。

3月13日　国务院成立"政务评议会",段祺瑞为会长,伍廷芳副之。另聘王士珍、陆徵祥、熊希龄、曹汝霖、汪兆铭、汪大燮等十余人为评议员。该会以研究对德绝交后之外交事项,诸如中国对于协约国应提之条件及有关议和大会之问题等七端为目的。是日,开首次评议会。

3月15日　湖北省奉命收回汉口德国租界。次日,直隶亦收回天津之德租界。

3月16日　四川万县开为商埠。

3月18日　清陕甘总督升允在青岛进行复辟活动,是日访晤日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探询日本对复辟之态度,并要求给予支持。

3月22日　广州、武汉总商会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加入协约国,以免贻害商业。

3月24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排字两部工人二百余,为争取结社集会自由,反对无理解雇工人,举行罢工。越三日,罢工波及"中华书局",罢工人数增至七百名。

3月26日　广东督军陆荣廷抵北京。

同日　梁启超致函政务评议会，主速对德奥宣战。越三日，章炳麟、谭人凤致电北京政府，批驳梁氏参战主张。

4月1日　上海工部局收回租界烟土售卖执照，即日起各土栈烟膏店闭歇。是日，以中英禁烟条约禁绝鸦片之期届满，上海禁止烟土入口。

同日　内务部在北京召集之全国警务会议开幕。于5月8日闭幕。

4月4日　法国在沪招募之华工首批一百名放洋。25日，第二批一百名启航。

4月10日　黎元洪特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特任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同日　北京政府以行政处分与法律案有别为由，将国会议决之取消购买存土案退回。

同日　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告以将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会议，"所有中央计划自应遵照一致进行"。

4月11日　冯国璋通电各省，主加入战团。

4月12日　是日蔡锷国葬典礼，15日，黄兴国葬典礼，先后于湖南长沙举行。

4月19日　交通总长许世英以津浦铁路正副局长购买机车舞弊案引咎请辞。次日，黎元洪致意挽留。

同日　黎元洪指令停办国史馆。

4月20日　宪法审议会二读结束。二读期间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共89条，原案通过者53条，原案否决者8条，修正案通过者13条，悬搁未决者1章15条。

4月24日　参议院开会，段祺瑞出席报告三案处理情形。谓收买存土案，政府已电南京设法取消，财政部受贿案已交法庭办理，交通部租车案合同已令取消。

4月26日　"外交商榷会"致电各省议会，反对对德宣战。

4月27日　湖南常宁县水口山矿工千余人要求加发红奖举行罢工。次日，矿当局被迫宣布加发红奖，罢工乃停。

5月1日　国务院通过对德宣战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谓"一俟通过国会，即将命令盖章"。

5月3日　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疏通参战案。要求议员认清世界大势，予以赞同。

5月4日　督军团宴请国会议员，为段祺瑞疏通宣战案，出席者三百余名。李厚基代表各督军演说，以"为国民请命"自诩，扬言"不惜一时之名誉"，主张对德宣战，要求议员"务谅政府之方针进而赞助"。

5月5日　"旅沪各省公民团"夏芷芳等二千六百余人致电北京政府，声明"宁死不欲宣战"，并请国会"勿予通过"。

同日　江西省议会通过弹劾省长戚扬案，并致电北京政府，谓"其枉法蠹政之罪，罄竹难书"。

5月6日　"丙辰俱乐部"议决反对对德宣战。

同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推定王正廷、黄炎培等九人为临时干事。

5月7日　国会"政余俱乐部"在北京成立。推定王正廷、胡汉民等人为总务干事。

5月9日　"政学会"开会否决宣战案。

5月10日　北京"公民请愿团"围攻众议院。上午十时起，陆续有"公民"数千人麕集院门，各揭"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学军商界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白布旗，在陆军部人员指挥下，散发传单，迫令议员赞成政府宣战案。在场军警竟不予阻止。致有反对宣战之议员十余人被暴徒殴伤，议员被围困达十小时之久。

5月10日　谷钟秀以"公民团"围攻国会事件，愤而请辞农商总长职。次日，张绍曾、程璧光分辞司法、海军总长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亦微行出京，至是内阁仅剩段祺瑞一人。

5月11日　黎元洪据内务部呈请令司法部将"公民团"滋事人交法庭依法究办，并责成内务部饬警妥为防护。

5月16日　孙中山致电"政学会"等三政团并国会议员，力促否决宣战案。

同日　张作霖致电段祺瑞，坚持宣战主张，发誓"无论作何地步"，都要"执鞭弭以从公后"。

5月18日　英文《京报》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中日借款一万万元密约。次日，该报记者陈友仁即被警厅逮捕，旋以"妨害公务"罪，处以徒刑四月。6月4日，黎元洪令特赦陈友仁。

5月23日　黎元洪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伍廷芳暂代。任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是日，并通电各省阐明段祺瑞免职理由，同时派员赴津敦请徐世昌出任总理。

同日　段祺瑞通电各省不承认免职令。声称免职令未经段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越二日，伍廷芳通电声明免职令符合"约法"规定。

5月31日　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辞职，吴景濂当选为议长。

同日　毕桂芳、许兰洲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职令，否则黑龙江省"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进行"。

6月1日　黎元洪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同日　曹锟、朱家宝等通电宣告直隶独立。是日，并令驻涿州混成旅移驻长辛店。次日，复派驻保定第二十师七十七团连夜开赴良乡，威逼京师。

6月2日　黎元洪提出解决时局五项条件，4日派钱能训赴津面告徐世昌。5日，徐亦提出解散国会等四项答复条件。

6月3日　冯国璋致电参众两院，佯请辞职。8日，黎元洪致电冯国璋及各省，以约法规定，副总统未代行总统职权之前，“仅属荣名，无职可辞”，予以慰留。

6月4日　毕桂芳、许兰洲以胁迫黎元洪下罪己令，解散国会未遂，是日，通电宣布黑龙江省独立。

6月5日　倪嗣冲复电王士珍，要求“严惩奸谀，解散国会，另组议宪机关，起用老成硕望总理阁员，除帝制嫌疑各人罪名”。

6月6日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本月7日“挈队入京，共商国是”，要求“各省业经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驻处所，勿再进扎”。

6月7日　曹锟、范国璋致电王士珍、冯国璋及独立各省，指出天津成立“总参谋处”，是为别图拥戴，攫夺政权。要求各省“以议宪为正论，以国家为前提，抱定宗旨，共扶危局”。

6月8日张勋抵天津。是日，其所部定武军十二营四千三百余，直开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

6月9日　张勋在天津电告冯国璋及各省一俟解散国会命令宣布，即入都“调停”。

6月15日　曹锟致电张勋，声称现时“势必军人内阁，乃能统一兵权，大振国威”，主王士珍出组内阁。

6月16日　陆荣廷致电黎元洪及各省，谓国会业已解散，各省应即罢兵，如“再肆行要挟”，则“只知维持共和，拥护元首，不恤其他”。

同日　张勋密往清宫觐见废帝溥仪。

6月17日　康有为致电黎元洪，诡谓国会“无道”，“约法不良”，督军团“勒散国会”，“大有功于国民”。要求总统明令“开国民大会，以公议宪法”。

6月18日　张勋致电独立各省，以“所提条件”，“既经解决”，请即“取消独立”，将军队“调回原驻地点。”

6月24日　黎元洪特任李经羲兼财政总长，王士珍为陆军总长仍兼参谋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特派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

7月1日　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凌晨，张勋、康有为等数十人同入清宫，谬称“共和解体，人心思旧”，奏请复辟。上午溥仪发布“即位诏”，诡谓“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改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

7月2日　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驻京日使当即通告各国使馆及张勋，声明绝不允许黎作任何政治活动。

同日　黎元洪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7月3日　冯国璋致电各省，略谓“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革命之人”，“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从前之不主张革命”。要求各省兴师讨逆。

，日　，祺瑞“曾受恩于前朝”，“不忍”听其“陷于自灭”。是日，段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布告讨伐张勋，文中却对清室优待条件，表示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

同日　段祺瑞以黎元洪“失其自由”，“不能执行职务”，电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

7月5日　段祺瑞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自马厂移津，暂以直隶省公署为办事处。又谓已电请冯国璋迅即“宣布代行大总统职权日期，并恳请早日莅津视事”。

7月7日　冯国璋令褫去安徽督军张勋本职并军职、勋章、勋位，特任倪嗣冲兼安徽督军，齐耀琳暂兼江苏督军，着免直隶省长朱家宝本职，以曹锟兼署。

7月13日　驻徐海一带张勋辫兵统领张文生所部六十营，不受倪嗣冲招抚，约同哗变。

7月14日　段祺瑞由津入京。黎元洪通电去职。

同日　北洋军界通电，提出取消优待条件，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及惩办叛逆诸元凶等四项解决时局办法。

7月15日　冯国璋令准免陆军总长王士珍本职，以段祺瑞兼任。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

7月18日　冯国璋任命段祺瑞内阁各部总长：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同时免去范源濂、李经羲、江庸、李盛铎、龙建章等人内务、财政、司法、农商各总长职。

7月21日　海军发出护法宣言。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自上海通电全国，痛斥倪、张毁法叛国，宣布海军将士“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否认国会解散后之政府。次日，程、林率舰队开赴广东。

8月1日　冯国璋抵北京。6日，通电宣布就任代理总统。

同日　张怀芝、曹锟分别复电北京政府，赞成召集临时参议院。

8月4日　旅沪国会议员一百八十人启程赴粤。

8月5日　程璧光率海军舰队抵粤。次日，广东各界万余人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号召声讨段逆，拥护国会。

8月17日　冯国璋令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拨款一万元治丧。

8月18日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公园宴请南下国会议员一百二十余人，协议开非常国会事。

同日　冯国璋特派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任刘询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

8月19日　南下国会议员在广州开谈话会，议决通电西南各省，以莅粤议员不足法数，决定于25日在广州

开非常国会。

同日　陕西焦子静、郭坚等率兵围攻西安，陕督陈树藩退走汉中。

8月20日　陈炳焜电请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出兵援湘。

同日　农商部为调查全国经济状况，规划战时及战后经济之设施，在北京开"经济调查会"成立大会。魏宸组为会长。

8月21日　冯国璋复电唐继尧。以所谓旧国会"祸国殃民"，拒绝恢复。

8月22日　刘显世通电恳请冯国璋按照约法定期召开国会。

8月24日　冯国璋任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后于11月20日授省长职。

同日　云南靖国第四军司令黄毓成自昆明率师启程赴川，9月22日，抵泸县。

8月25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国会议员一百二十余人出席。

8月29日　谭延闿任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

8月30日　广州非常国会议决"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

8月31日　冯国璋任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准免督军陈炳焜省长兼职。

9月1日　非常国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9月10日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表就职宣言，誓"竭股肱之力，根除奸凶，恢复约法"。是夜，广州万余人举行提灯会，庆祝大元帅就职。

9月11日　广(州)惠(州)镇守使莫荣新奉粤督命召集军事会议，议决"誓必推倒非法之段内阁，务使约法完全发生效力"。并致电陆荣廷等要求"传檄誓师"。

9月21日　孙中山与非常国会分别致电刘建藩、林修梅祝贺湘南自主。

9月22日　非常国会议决承认对德奥两国处交战状态。26日，军政府布告对德奥宣战。

同日　冯国璋往北京国子监祀孔。

9月23日　天津暴雨成灾，市民流离失所者达数十万；津浦铁路火车停开。

同日　湖北省武昌人力车夫举行全体同盟罢工，反对车帮公所增加车租。

9月24日　马济、林虎所部粤军十一营在广州东校场誓师援湘。次日，由统领邱渭南、陈志先率师往援。

9月25日　军政府发布募集军事国内公债五千万元。

9月26日　孙中山派军政府秘书长章炳麟赴滇与唐继尧筹商时局，是日抵昆明。

同日　大理院判处复辟罪犯张镇芳无期徒刑。

9月27日　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抵衡阳。次日，特撰训词昭示部下勿听妖言，免堕段氏"以湘治湘"之计。

9月29日　冯国璋借口孙中山、吴景濂等开非常国会、设军政府，加"擅发伪令，煽动军队"，"联络马贼，预备起事""紊乱国宪，逆迹昭著"等罪名，下令"各省军民长官，一体严缉拿交法庭依法讯办，并褫夺勋位、勋章"。又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事宜及各省长官选派参议员到京组织参议院。

同日　冯国璋任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

同日　陆裕光所部援湘桂军由旅长贲克昭率领抵衡阳。

9月30日　冯国璋令免川边镇守使殷承瓛本职，调熊克武继任。10月16日，又以熊未赴命，另着陈遐龄护理。

同日　俄军在海拉尔附近与蒙匪千余人冲突，借口追击蒙匪，强占该境。经中国当局交涉，促其退去，俄军不从。

10月1日　段祺瑞与《大陆报》记者谈话，声称将"出师剿灭"南方粤、桂援湘之军队，对反对派诸领袖"政府必不宽宥"。

10月15日　熊希龄为赈直隶水灾，以盐税余款担保，向日、美、法、俄等国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华比、正金、花旗等七银行借规平银七十万两，是为天津水灾借款。

同日　冯国璋任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为重庆镇守使。

10月17日　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致电冯国璋，请去段祺瑞职，并依约法解决国会内阁问题。越三日，冯复电拒绝。

10月19日　周伟、宋鹤庚进攻永丰之朱泽黄。适傅良佐派卫队一团增援，朱军获胜，周宋部退至黑田铺(宝庆县属)，朱军占青树坪。

同日　上海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车床间工人二百余，要求厂方撤换工头，举行同盟罢工。

10月20日　谭浩明就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誓师援湘。24日，自南宁率师出发。

同日　周伟与朱泽黄约定：周部退出宝庆，朱部阴守独立。是日，朱泽黄进驻宝庆。25日，冯国璋任朱泽黄暂行兼署长宝镇守使。

同日　冯国璋任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为陆军第十七师师长。

10月22日　冯国璋令褫夺刘建藩、林修梅原官勋

章，着傅良佐严拿惩治。

10月25日　非常国会致电日本政府，指出段祺瑞军械借款在于“屠戮异己，宰制国民”，请予严词拒绝。

10月26日　谭浩明、程潜及粤桂联军诸路司令通电声讨段祺瑞，历数段氏威劫元首，构成内乱，垄断政权、故纵帝孽等四大罪状。号召“湘粤师旅，共执鞭弭，以讨段罪”。

10月27日　冯国璋以粤督陈炳焜倡言自主，令即行褫职，任省长李耀汉兼署，莫擎宇会办军务。31日，陈炳焜通电驳斥褫职令，指出“中央此令，无非欲粤省自起内讧”，表示“决不堕其术中”。

10月30日　冯国璋令临时参议院定于11月10日，举行开会式。

10月31日　冯国璋以滇军拒不退兵，令褫夺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等官职，着周道刚“督饬所部，分路进剿”。

11月1日　“湖南各军总司令部”在长沙成立。“总司令”王汝贤宣示“训词”，声称“奉总统、总理命令，出总师干，惟期师武”，扬言为早日“敉平”护法军尽力。

11月6日　孙中山任林祖涵为湖南劳军使，林旋赴湘慰劳湖南各护法军。是日，林致电孙中山，谓晤程潜等“转达尊意，极为感谢”。

11月7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越三日，上海《民国日报》等刊载十月革命成功消息。

11月15日　段祺瑞请辞国务总理职。次日，通电全国，为其对西南用兵极力辩解，指责王汝贤停战系“为虎作伥”，“不顾大局”，声称“为免北方军人分裂”，呈请辞职。

11月18日　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联衔通电调停时局。主张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撤兵停战，表示愿任调停之责。

同日　孙中山发表时局通电，指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并希西南各省，一致主张到底。

11月22日　冯国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汪大燮暂行兼代。

11月23日　冯国璋致电各省，告以段祺瑞辞职经过，并称：“目前段总理虽暂时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总理扶持之雅，不异曩昔。”

11月24日　陆荣廷复电李纯，赞成直隶等四督军停战通电，并望转呈总统以明令颁布。

11月27日　攻闽粤军占梅县。越二日，占揭阳。

11月28日　谭浩明奉陆荣廷之命通电停战，是日又电催直、苏、鄂、赣四督军“通饬前敌军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表和平决心”。

11月29日　孙中山复电李纯，指出：“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

11月30日　冯国璋令准免暂代国务总理汪大燮本兼各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又令准免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商总长职。

同日　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致电冯国璋，请派员南下面商调停之策。

12月1日　冯国璋任命王士珍内阁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内务钱能训，财政王克敏，司法江庸，海军刘冠雄，农商田文烈，交通曹汝霖。是日，又令准免王士珍参谋总长本职，以荫昌继之。

12月3日　冯国璋致电陆荣廷等，请“各饬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进行，听候解决，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

12月6日　谭浩明复电冯国璋，重申湘省停战须以北方撤出岳阳为条件。

同日　冯国璋任刘存厚为崇威将军，仍留川会办军务。

12月7日　冯国璋特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兼署督军。次日，谭复电提出北京政府所派军队撤离湘境及募足两师省防军等五项条件。声明如“中央不表同意，决不就职”。

12月9日　冯国璋通电各省，以俄、德媾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英、法政府“深望我国与日本同一进行”，主张息争，助日攻俄。

12月10日　程潜致电西南各省，指出北京政府陆续增兵岳阳，声明不能“轻与议和，致中诡计”。

12月12日　程潜自长沙率队开赴平江，指挥南军各部进攻岳阳。

12月13日　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

12月14日　陆荣廷通电卸两广巡阅使职。次日，致电冯国璋等，要求“罢兵息民，一致对外，化除畛见，同护共和”。

12月20日　冯国璋令准海疆巡阅使萨镇冰因病辞职；又任李静诚兼署广西省长。

12月25日　冯国璋布告“弭战”。

同日　冯国璋公布“国定关税条例”。凡八条，适用于无条约国，其中规定：奢侈品进口从价由百分之三十至一百，普通商品由百分之十至三十，必需品由百分之五至十。

12月26日　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致电冯国璋，指出临时参议院为非法机构，解决时局关键在于“恢复旧国会”。

同日　“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张学济应石星川所请，

派队援鄂。是日，张军抵湖北监利县。

12月30日　北京政府派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南下攻湘，是日，张部先遣队抵九江。

外　交

1月10日　驻京俄使就蒙古选派国会议员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

1月11日　外交部答复驻京美使上年12月21日照会，对美总统提议欧战讲和深表同情。

1月22日　中日郑家屯(今吉林双辽)交涉案解决。外交部与驻京日使互换照会，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申饬第二十八师师长；(二)酌惩有责任之中国军官；(三)出示告谕人民与日人亲善；(四)奉督派员至旅顺向日方表示歉意；(五)给日商吉本500元恤金。俟上述五项全部实行后，日本将撤退因郑家屯事件增派到四平至郑家屯一带之日军。27日，国会通过此交涉案。

2月3日　参议院讨论福建省议会关于日人在厦门违约设警事件，议决以原案咨达政府。6日众议院复咨大总统，请政府与日本严重交涉。20日，外交部就此事向驻京日使提出口头抗议。

2月5日　驻京美公使芮恩施要求中国政府与美采一致行动，宣布对德绝交。越三日，芮恩施再次往访段祺瑞促其作复。

2月9日　外交部就德国实行海上新潜艇政策。向驻京德使辛慈提出严重抗议。

同日　外交部复照美国，赞同美4日对德通牒。

同日　国务院电嘱驻日公使章宗祥，探询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参战之意旨及一般舆论。9日，章复电告以晤日外务省政务局长小幡酉吉，彼答称："美既劝告，自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

2月12日　驻京日本使馆参赞芳泽谦吉往晤段祺瑞，告以日本政府希望中国迅速对德绝交。越二日，外交部电告章宗祥谓绝交事"政府现已决定，可不俟德国回答"。希日本政府对中国将向协约国提出酌加关税及缓解庚子赔款事给予支持。

2月14日　日本总理大臣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17日，西原与曹汝霖、梁启超密谈，极力劝诱中国对德绝交。21日复与段祺瑞密谈。

2月15日　驻日公使章宗祥往晤日外务大臣本野，要求中国绝德后，日本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及有关各国同意提高中国关税税率和延期偿还庚子赔款。次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亦向芳泽参赞提出同样要求。

2月27日　黎元洪特派汪大燮前往日本向日皇呈递大勋章。

同日　日本于内蒙赤峰设立领事馆。

同日　日本本野外务大臣约见陆宗舆，称："中国苟毅然实行(绝德)，协约国自表同情。中国希望之事，自有商量余地。今中国乃各处试探，又故意迟延，恐大陷于失策，"望速下决心，勿使日本政府为难。

3月11日　驻京德使向外交部呈送德政府复牒，拒绝中国政府2月9日抗议通牒。

3月14日　黎元洪布告对德绝交。略谓中国抗议已逾一月，德国潜艇政策依旧实行，且据彼之正式答复，声称"碍难取消"。决定自即日起与德断绝外交关系。是日，外交部照会驻京德使辛慈，令其出境。25日，德使启程回国，驻各地领事，亦先后出境。

3月26日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约见章宗祥，声称："日本对中国并无野心，中国果有信用日本之意，不妨将真意告知"，不必提出希望条件，"方可诚意接洽"。

5月1日　日驻京公使林权助访晤黎元洪，警告：若议会否决参战案，将有使政局发生纷扰之危险。

6月5日　驻京美使芮恩施照会外交部，声称："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美国尤为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负责之政府。"

6月11日　驻日公使章宗祥致电陆宗舆，告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认为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时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仍非根本解决之道，嘱转达东海、合肥参考"。

同日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日本不支持目前张勋复辟活动。当日，又急电驻京公使林权助，以"适当方法"直接表明日本态度。

7月7日　外交总长伍廷芳在上海电告驻京各国公使及中国驻外使馆，否认伪外部。声明所有外交事件，仍与本总长直接办理。

8月14日　冯国璋布告对德奥宣战。略谓"自断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人民"。宣布自"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并声明废止与德奥两国所订之一切条约。

同日　本日，日、英、美、意驻京公使，次日，俄、比公使，分别复照外交部，允将中国对德奥宣战书转呈本国政府。并称，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

同日　天津收回奥租界。

9月8日　驻京协约国公使团访外交部，由法使康悌陈述协约国五项议决案。其大要为：关税实行值百抽五，庚子赔款除俄国外全数展缓五年，中国军队通过天津

租界需向各国提出。

10月8日　驻京日使林权助往晤段祺瑞，转达日本政府提供军械装备之决定。按本年7月22日、25日，段曾先后派傅良佐、吴光新向日驻华使馆武官斋藤提出此项要求。

11月2日　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宰割中国之"兰辛——石井协定"，内中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日本"对于他国在华商业不加歧待"。7日，驻京日使将该"协定"送交北京政府外交部。

11月9日　外交部就"兰辛——石井协定"发表致美、日及各国公使宣言书，谬称"尊重""各友邦凡于条约所得之利益"。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交书互认有所拘束。"

12月12日　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就"兰辛——石井协定"向美国提出正式抗议。

军　事

2月4日　黎元洪任许兰洲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2月11日　"征兵学会"在北京成立，公举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会长。

4月18日　驻成都川、滇军队开战。罗佩金奉北京政府令裁编驻川各军，靳云鹏将罗裁兵计划秘密泄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引起刘的反对，自是遂启衅端。

4月19日　刘存厚围攻督署，并通电宣布与"罗督军脱离关系"。是夜，刘军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火势延烧三日之久。

4月19日　阮忠枢（张勋代表）自北京密电张勋，略谓倪嗣冲以冯国璋不来参加军事会议，"正可推定武（张勋）作一领袖"，如黎元洪不以为然，即可倒黎（元洪）排冯（国璋），拥戴徐世昌，一、二年之后，"再由东海（徐世昌）之手，归还旧主（溥仪）"。并谓倪之计划，"皆欲假手于我公是利用我公"，并"于利用之中，且隐有倾陷之意"。要求张勋可派一代表"周旋其间"，而不必来京赴会。

4月20日　黎元洪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戴戡暂行兼代四川督军；另任刘云峰为陆军第二师师长。24日，唐继尧与滇省议会分别通电反对。

同日　驻成都英、法、日领事邀督军、省长及刘存厚三方代表在法领事署会商调停办法，议定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队防区之间，使其脱离接触。

4月22日　戴戡会同领事团及川省巨绅，邀集川、滇军队代表在省署会议调解办法，约定川、滇两军三日之内退出城外。25日，滇军开始撤离成都，次日川军亦退出城外，省城战事乃告止息。

4月23日　黎元洪任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张习为查办副使。当日并令川、滇两军停战。

4月24日　黎元洪以刘存厚违抗北京政府停战命令，令着即免职；并令川、滇两军开拔出城，不得再滋事端。

4月25日　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对德绝交后之外交方针。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曹锟、倪嗣冲、孟恩远、王占元、李纯、阎锡山、张怀芝等到会。陆海军总次长、参谋总长列席。段提出对德宣战案，经多数赞同通过。

4月28日　黎元洪令驻川滇军一师着编为陆军第十四师，任顾品珍为师长。

5月2日　京师东路警备队司令高清山率警备队三百余名哗变，向蓟州（今河北蓟县）之盘山逃去。旋在芦台缉获。

5月29日　张作霖通电再次要求"解散国会"，删定宪法，组织"良好内阁"，否则"当率辽奉子弟，直捣京师"。旋于6月初，派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率同奉天独立军混成一旅向栾州进发，并令驻锦州第五十六旅开赴山海关。

5月30日　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对于时局取旁观态度。

同日　王士珍在北京召集军事会议。曹锟、李纯与在京高级军官出席，议决致电倪嗣冲等，主张和平解决时局。

6月2日　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推雷震春为总参谋长。宣布另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

同日　安武军"北伐总司令"倪毓棻奉命率队进攻北京，是日自蚌埠出发开赴天津附近之良王庄。

6月3日　张怀芝派旅长徐凤宾率一支队开赴天津附近之独流镇、良王庄一带。

6月22日　黑龙江省陆军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与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致电北京政府，以许兰洲胁迫督军退职，宣布与许断绝关系，要求将许调离本省，仍催令毕桂芳督江省。

7月3日　段祺瑞于天津附近马厂召开军事会议，议决设"讨逆军总司令部"，段自任总司令，分东西两路，以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

7月4日　冯国璋、段祺瑞联合通电，列举张勋破坏民国，"辜负先朝"，糜烂京师等八条罪状，宣布率师讨逆。

同日　段祺瑞颁发通告，宣布军令六条。当日并致电张敬尧，望"克日拔队北上"。又电田中玉，告以张勋"拟劫清帝西走内蒙"，务请会同第七师驻张家口骑兵"朝夕严防，毋令该逆幸脱"。

同日　段芝贵所部东路"讨逆军"第八师自马厂出发，经天津转赴北仓，进驻落垡、廊坊一带。次日凌晨在万庄击退张军。

同日　曹锟所部西路"讨逆军"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芦沟桥一带。7日，与张军战于丰台，张军败退。

同日　驻马厂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通电宣布讨逆。

7月5日　川黔军在成都开战。溥仪"谕旨"到川，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4日，戴戡召集军事会议，迫刘拒受伪职，又令该军北伐。刘均不奉命。5日夜间，黔军至北校场察看川军哨所，川军开枪射击，战争于是爆发。川军势孤退守西门待援。

7月12日　冯国璋任倪嗣冲为"讨逆军南路总司令"，所有沪、杭、赣各师旅统归节制。越二日，倪嗣冲通电宣布就职。

同日　段祺瑞任李长泰为"讨逆军参赞"。次日，复任为"讨逆军东路副司令"。11日，李长泰通电宣布就任副司令职。

同日　李纯下令动员誓师北伐，宣布自任赣省北伐军总司令，编组一、二两军，先遣队相继出发。

同日　浙江督署开军事会议，议决编组"混成支队"出师讨逆。越二日，支队开抵上海转赴南京，编入南路北伐军，受倪嗣冲节制。

同日　刘存厚增派部队进入成都，川黔军于成都巷战。次晨，川军占领东西两校场，黔军焚毁民房达六、七千户，移入皇城固守。

同日　贵州督军刘显世通电声讨刘存厚，宣布派遣黔军三梯团，分赴川境，增援驻川黔军。

8月1日　滇军自嘉定县进袭眉山县张家坎，川军二师由夹江县乘虚占嘉城。是日，川军三师复战资阳。

8月2日　滇军攻眉山，与川军激战一周，滇军伤亡惨重，是日，川军乘胜进逼青神。

8月3日　7月底，川军占仁寿，旋失。本月2日，川军反攻，是日，再占仁寿。

9月6日　滇军退出资中。川军二、三师久攻资中不克，适值川滇军队议和，周道刚向滇军交涉请让资城，滇军从其所请。是日，悉数撤至自流井、叙府，川军一师前往接防。

10月2日　陆荣廷在南宁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陈炳焜、程璧光等参加。议决桂、粤共出援兵八十营，组成五军，任谭浩明为"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各军司令。旋改由韦、林(俊廷)陆分任桂军第一、二、三军司令；马、林(虎)分任粤军第一、二军司令，另委任沈鸿英为粤军第三军司令。林虎、沈鸿英因广东战事均未赴湘。

10月9日　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援湘、攻闽等事。议决：(一)派员与陆荣廷及两粤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等计划；(二)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三)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四)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加紧训练，为滇军、海军后援；(五)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11月4日　湘桂联军克宝庆。自上月20日朱泽黄部进驻宝庆后，双方曾几经争夺，互有得失。本月3日，联军再攻宝城，朱军弃城逃走。

经　济

1月9日　众议院三读通过保利银公司借款合同及收炼制钱合同案。16日，参议院三读亦通过。

1月14日　广东省长朱庆澜为实业用度，由北京政府担保，向荷兰商人保文氏借港洋300万元，是日省议会通过借款合同。

1月15日　汉口水电公司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签订日金100万元借款合同。

1月18日　冯国璋等以民元六厘公债、契债及印花税担保，向英商上海鸦片康采恩借规平银1000万两，是为江苏收购存土借款。

1月28日　冯国璋与上海洋药商行签订收买存土合同。合同规定收购2100箱，每箱银8200两上海纹银，以中国政府六厘债券偿还。

1月31日　黎元洪令改以7月1日起，至次年6月末日止为会计年度。

同日　杨翰西、周学熙在无锡创办"广勤纺织公司"，资本100万元。

2月10日　中、法合办之"中法振业银行"开幕。资本200万元。

2月11日　国务会议通过冯国璋收买存土合同。

2月24日　农商部公布"实业协进会"章程，凡八条。该会以"联合全国有实业上之学识经验者共同尽力促进实业之发达为目的"。农商总长兼该会会长。

2月　粤汉铁路湘鄂段武昌、蒲圻间通车。9月通车至岳阳。

同日　美商在上海开办"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资本65万美元。

3月1日　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开幕，讨论规定国家税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互相协济之政费等六项要案。17日闭会。

3月14日　上海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请保护工商业。勿使日本之进出口品免税。

3月23日　保利银公司宣告解散。自国会讨论保利借款以来，众议院对于收炼制钱合同多所修改，于公司不

利，商人多撤回股款，保利银公司为之解体。是日，该公司发出宣言，说明解散真相。

同日　湖南公民龙璋、刘重等人致电国会，请准将湘省公矿仍归地方公有，反对中央接收。

3月27日　众议院议决咨请政府不得收买存土，越二日，参议院亦通过相同之议决案。

3月29日　第五次中日铁道联络会议在东京举行。

4月2日　广东士敏土厂为解决营业资金，以该厂全部财产为担保，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日金300万元借款合同。

4月25日　由各省绅商发起之“中孚银行”在上海举行开幕式。资金100万元。总经理孙荫庭。总行设于天津，分行设北京、上海、武汉等处。

4月　“华宝谦记煤矿公司”创设于天津，经营山东泰安矿区，资本100万元。1919年，该公司工人达1100余人。

5月1日　财政部以钦渝铁路库券担保，向法国中法实业银行借款1125万法郎，是为财政部中法资金库券借款。是日，又签订41万法郎钦渝息款垫款借款。

5月1日　日商为操纵湘省金融，攘夺矿权，在长沙开设“中日银行”，资本10万元，发行钞票竟200万元。是日，不顾湘垣各界反对，强行开幕。

5月13日　广东中国银行分行以该省盐税剩余金担保，与日本台湾银行签订日金100万元借款合同。

5月15日　“金城银行”开幕。周作民任总经理，总行设于天津，于北京设立分行，并设分庄于上海办理汇兑事宜。该行股份200万元，实收50万元，1927年股份扩充为700万元。

5月30日　日商开办“大连交易所钱钞信托株式会社”，资本300万元。

5月31日　日商在大连开办“满洲制麻株式会社”，资本100万元。

6月　日商在天津开办“东亚火柴株式会社”分厂。是年，又于沈阳、大连、济南三处开办分厂。四厂资本共计40万元。

同日　薛宝润等在上海创设“厚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20万两。

7月26日　江西中国银行以省币 制公债票150万元担保，向九江日本台湾银行借日金100万元。11月19日，江西财政厅又向该银行借日金50万元。两次借款，均充江西军政费用。

8月10日　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规约成立。“规约”规定总行设北京，资本为1000万元。

8月28日　财政总长梁启超以盐税和国库税担保，同日本正金银行签订借款日金1000万元合同，“作为四国银行团善后续借款之垫款”。该项借款全部用作军政开支。

文　教

1月1日　《新青年》二卷五号出版发行，载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1月12日　黎元洪指令将北京故宫端门、午门一带地方拨归教育部设置京师图书馆。

1月20日　司法部公布北京朝阳大学、中华大学、明德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化石桥法政专门学校等校为审核认可之私立大学。

1月27日　京师图书馆开幕。

1月27日　章士钊主办《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2月17日改为周刊。

2月1日　《新青年》二卷六号出版发行，载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

同日　《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指斥儒家学说。

2月22日　黎元洪指令准内务部关于创设警官高等学校之呈请。

3月1日　《太平洋》杂志在上海创刊，李剑农任主编。

3月5日　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以吴淞中国公学停办，呈教育部核准分办，改名中国大学。

4月1日　“江皖水利联合研究会”在上海开成立会，选韩国钧、柏文蔚为理事长。该会以研究治水学术和联络督促苏、皖两省水利规划进行为宗旨。会所设于南京。

5月29日　张公权等在上海创办《银行周报》，诸青来任编辑。

6月6日　华侨集资创办《民国大新闻报》在上海出版。该报“出版宣言”表示“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宗旨。

6月26日　黎元洪据教育部呈请令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在文科附设国史编纂处，处长由校长兼任。

6月28日　教育部布告改订大学学制办法，规定大学修业年限预科两年，本科四年。

8月　北京“中华大学”因款绌停办，学生并入“北京大学”及“中国大学”。

9月27日　教育部修正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又规定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各科。修业年限本科四年，预科二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8年

导言

一九一八年，中国的政治仍然是一片混乱，看不出有多少好转的迹象。南北两个政府依然同时存在，政出多门，莫知所由。

日本对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二十一条》的意图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这使日本颇不甘心。为了能使日本早日实现吞并中国的梦想，日本又开始扶植新的代理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西原借款”的后果，中国出卖了比二十一条还要多的国家利益，不由得使日本内阁弹冠相庆。

段祺瑞“再造共和”后，迷信于自己的武力统一，提出“不要约法、不要国会、不要旧总统”的“三不”政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同时，美、日对段祺瑞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使得他更加目空一切，从而坚定了武力解决南方问题的决心。但是由于傅良佐的无能，南北战争陷于被动，“武力统一”也成了泡影。

在推行武力统一的同时，皖系集团在政治上也开始新的动作，以图建立皖系的独裁统治。一九一八年三月，安福俱乐部在安福胡同成立，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不过是一帮臭味相投的政客集团，但在一九一八后的几年中，安福系控制了国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安福国会。

一九一八年，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日期已满，为了排斥冯国璋，安福系在控制了国会以后，立刻把选举总统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九月四日，鹬蚌相争，东海渔翁堂堂皇皇入主总统宝位，成为第二位任期时间之长的民国总统。

西南军政府也出现了问题。孙中山一心想大力开展的护法运动，在西南军阀的掣肘下，难于开展。与此同时，岑春煊施展各种手段，提出军政府改组。五月十八日，非常国会开幕，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选举大总裁，孙中山为其中之一，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孙中山失意而走，第一次护法运动彻底失败了。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诞生了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日本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东三省和西伯利亚。为了推行“大陆政策”，缔结中日军事协定，出兵进驻中国东北成日本的主要注意中心。在日本的引诱下，段祺瑞政府又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满大开了方便之门。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西原借款
- ●“武力统一”
- ●安福国会
-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 ●军政府改组
- ●中日军事协定

西原借款

背景介绍

“西原借款”是指寺内内阁时期西原所经手的借款，但这仅是日本当时对华借款的一部分。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在寺内内阁执政期间(1916年10月9日——1918年9月28日)，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总额达386,450,000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前当时的对华借款总额120,000,000日元相比，仅仅两年之间，就增加到三倍”；这其中，“对中央政府借款279,860,000日元，对地方政府借款18,570,000日元，对公司及私人借款88,020,000日元”，对中央政府的借款即占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上述借款中，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八项，共145,000,000日元，其名目虽标为银行、电信、铁路等经济性借款，实际上大多充作当时北京政府的军政开支，成为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南方发动战争所需的军费，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借款。

支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加强日皖之间的勾结，是寺内内阁推行其侵华政策的重要手段。西原龟三的各项借款活动，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西原不仅参与寺内内阁对华外交和侵略方针的制定，而且先后六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皖系军政要人和亲日派官僚关系密切，并干涉和操纵中国的内政。他是日皖之间的直接牵线人物，而“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下面是西原通过各项借款活动与皖系进行勾结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1916年10月间，西原与胜田密议：“深悉此时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实在是最适机宜的事。……并表明以曹汝霖为特使最为适宜。”他们将此意透露给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立即电告段祺瑞：“近日晤后藤(时任内务大臣)，谓两国亲善，宜以经济联合入手，为疏通意见起见，最好由中国政界素有名望之人来日一游。”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深感自己的政权还是不稳固的。他们不仅要对付南方的反对势力，还要提防北洋系内部各实力派的相互倾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急需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正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日本遂成为可以左右中国政治的帝国主义势力，北洋军阀内部的亲日派官僚政客，便竭力鼓吹亲日外交路线。这对段祺瑞来说，自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当即将赴日的新任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他请示对日外交方针时，他即表示：“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至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于今日，现阁方针如是，幸君善为之。”其言外之意，显然是决心要改变袁世凯原来执行的亲英、美的外交路线。

于是，寺内便于1916年12月中旬派西原龟三秘密前来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直接洽谈。12月22日西原到达北京，23日就与曹汝霖、陆宗舆会谈。西原认为：“此次会谈，接触到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双方充分地交换了意见。”随后，西原又会见了段祺瑞及中国政界各要人和在华日人，积极进行活动。为了表示日本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诚意，12月28日，由西原经手与曹汝霖、陆宗舆草签了第一次交通银行五百万日元借款合同。这就是“西原借款”的开端。

材料：

- ·“西原借款”的正式实施
- ·对华借款方针
- ·对华借款原则

材料一 “西原借款”的正式实施

大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寺内、胜田、后藤三人聚集在总理大臣官邸，决定了下列“日华亲善与日华经济合作”具体化的方针：

(一)提供黑吉林矿借款三千万日元，吉会铁道借款一千万日元；

(二)作为铁自给方策，(向中国)提供设立官营制铁所的资金。作为其担保品，为改善烟酒公卖制度确保收

入。

（三）组织铁道资本国；

（四）免除团匪赔偿金。

为了“将预定的对华政策最后付诸实施”，西原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往北京。出发的前一天，他这样写道：“此次出差北京，的确是确立日华经济合作，日华两国成为一体的自给策略的开端，鄙人担任这一任务乃一生之荣誉。”（《梦之七十余年》）至八月十一日西原回国，其间经过了两个半月时间，开始了以制铁所借款为核心的、对华经济援助总方策的工作。西原抵达北京后，立即于五月三十一日给胜田发了一份电报：

按中国政府现在之计算，仍需继续其多年来之强硬作法。财政拮据已达极点，本年内如无七、八千万日元，则很难维持局面，即使在开支上精打细算，加上发行金币券、汇兑业务等，亦非要求全部借款不可。为了维持现政局之稳定，至少需七千万元借款。即以此借款之成立，作为显示现内阁基础巩固之证明。

烟酒公卖，在去年之收入预算中，为一千几百万元（其额数已忘，本日将送上详细书面报告），如仿效盐务行政聘请外国人以谋实行改善，则岁收可确保四、五千万元，进而实行专卖，则可成为唯一财源。美国公使已直接照会曹氏，询问是否与日本谈判烟酒公卖借款。因此，如借款数额不大，恐内外将掀起反对风潮。另外，黑龙江省、吉林省之金矿森林等方面的借款，如金额少，亦必将陷于同样结果。基于曹氏如此说法，协商借款金额如下：

一、黑龙江、吉林林矿借款三千万日元

二、吉会铁路建设预借款一千万日元

铁路契约成为正式条约，非常麻烦，至少需时一月，先签订草合同，预付一千万日元。详如另纸所载。

三、逐步将烟酒公卖，改为实行烟酒专卖的方针。制铁所借款以预付形式，给予五千万日元，其中两千万日元于明年拨款。

四、制铁所事业资金三千万日元。

五、武器贷款基于满期后尚可延期一年之条约，预定于后年支付。

六、中国财政虽自民国五年以来，陷于紊乱，打算本年内谋求国内统一，明年收支可能还多少有些不够，后年起采取措施确保收支平衡。

以上情况及借款金额分配，电请指示，仰乞鉴核。（大藏大臣与在中国之西原龟三氏往返函及电信《胜田家文书》第111册3号）

西原电报的主旨是：为了填补中国的财政赤字，以维持段祺瑞内阁，想在本年内由日本至少贷款七千万元，故希望依次按黑吉林矿借款三千万元，吉会铁路借款一千万元，烟酒公卖借款三千万元，给予中国提供贷款。把烟酒公卖借款三千万元作为形式，看作制铁所借款的预先支付款。把烟草和酒由公卖改为专卖，以年度总收入作为担保，以确保制铁所借款的偿还。另外，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币券，如果能谋求在本年内取得国内的统一，那么估计明、后年将会出现中国的财政收支平衡。

西原计划如实反映出，计划中的这些借款，本来全是政治借款，为对付列强各国在名义上却给以经济借款的伪装。另外，以美国为中心的各国与日本的借款竞争，不如说是由谁控制抵押担保品的斗争。中国所残存下的担保品，只有作为美国芝加哥银行和中法银行等担保在内的一部分烟酒公卖收入。

对于西原在五月三十一日的电报中提议的七千万元的借款分配方案，胜田六月五日在杉大藏秘书官给西原的电报作了如下指示：“借款金额：吉会预付款一千万日元，金矿森林三千万日元，烟酒公卖五千万日元，其中二千万日元翌年交付，即本年依次交付七千万日元。”西原接受了这一指示，首先于六月十八日缔结吉会铁道借款草合同。与此同时，为黑吉林矿借款进行准备工作。

这样，每个借款的签订虽在顺利的进行，但胜田、西原此次借款谈判的中心问题，即以庚子赔款做为进行振兴棉花、羊毛产业，建设国立制铁所的“日中经济合作”计划的进展来说，妨碍这一计划进行的活动逐渐显露出来了。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对华借款方针

帝国主义各国，历来都是把对旧中国的借款，看作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日本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在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其内阁主要成员胜田主计、后藤新平以及其信赖备至的西原龟三等人，在这方面都有着系统地成套地经济侵华的主张和方案。他们都主张利用大战给日本造成的有利时机，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铁矿等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市场，力图以大量资本输出的形式，加强它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准备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其终极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为从属于日本附庸国、殖民地，即西原所谓的“日中经济一体化”。为在短时间内达到上述目的，胜田主计极力主张：趁日本国内市场资金充裕之机“鼓励本国资本家主动应承中国各项借款”。因此胜田于寺内内阁成立后即制定了《对华借款方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态度。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的权益的

手段。

二、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头绪繁多，用途分散的弊病，选择主要目标，集中投资。例如：地区则决定在划归我势力范围内的山东省、福建省和江西省等。事业则选定为铁矿、电信、邮政、银行等类。四国银行团筹办之政治借款属于另外问题。

三、对华借款谈判中尽量避免以获取手续费为目的之私人或公司介于其间。

四、对华借款所需资金先试由民间筹集，其不足部分在政府预金部(即储蓄部)能力范围内提供。

五、对华借款所需资金之筹集，第一阶段求诸正金银行、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及台湾银行之联合财力。有特殊情况则按各行财力办理。

六、对上述借款特种银行宣告其财力不足或必须利用普通银行时，得与三井、三菱、第一、第一百、十五各银行协商办理。

七、东亚兴业公司及中日实业公司之类代办机构应尽量利用之。

八、如私人或公司以自家核算承当借款或进行投资，无须强加干涉。但国外应尽量报告公使和领事，国内则报告外务省，由外务省通知大藏省。

九、外务省在批示私人或公司可否进行对华借款时，因牵涉筹集资金，应在事前与大藏省协商。

在胜田所制定的对华借款方针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华获取权利时，强调改变过去惯用的军事威胁手段为“经济合作”，以便在中国建立起巩固的经济实力地位。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对华借款原则

一、政治借款

日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将维护东方和平和增进双方繁荣，此点无庸赘述。日中利害完全一致，这是中国应该考虑的，也是日本应该考虑的。关于中国的政治借款，日本亦本此宗旨，愿衷心维护中国利益。对此次1,000万英镑借款，亦正在进行斡旋，以促其尽速尽量以对中国有利之条件达成协议。乘英、法、俄目前战费数字巨大，对海外投资互相观望之机，在三国同意下，日本考虑纵然以单独之财力临时垫付三国承担部分，亦愿促使该项借款尽速获得成功。关于此项政治借款，希以田赋为担保品，四国银行团对此已有所讨论，这是考虑到为确保债权、易于筹集资金，以及为保持将来中国公债信誉之必要而提出的，决无他意。

又，与田赋担保有关，私下议论说应聘用四国银行团代表为田赋顾问。此亦无他，其宗旨不外是为了从事中国大笔岁收田赋制度之调查与整理，以巩固中国财政基础，并增进中国在海外之信用。综上所述，中国亦应体谅日本之诚意，以诚相待，勿使四国产生疑虑，认为中国有背信弃义之行为，至希注意。

二、经济借款

我国政府相信日华亲善友好根基在于两国经济联系。发展中国产业、扩充交通通讯机构、发展中国经济力量，是日中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幸而近日日本市场资金充裕，以此鼓励本国资本家主动应承中国各项借款。此项对华投资，其目的之一在对华经济援助，非有任何他意。然鉴于近日我国借款往往被利用为中国党争之手段，引起中国官民之误解，认为我国对华投资之目的多为获取利权。致使欲趁我国内地银根宽松之机，促进两国经济联系之意图，化为泡影。故此希望消除中国方面误解，以使中国官民充分彻底了解我国的诚意。

三、改变中国方面在同一项借款中接近几国资本家之方法

从来中国方面进行借款谈判时，为了巧妙地诱惑各资本国家以取得相当优越条件，每每将同一项借款向几国资本家进行试探。这个办法虽有时取得成功，但多数场合徒使事态趋于复杂化，推迟事件解决日期，并因此伤害了资本家团体的感情，结局大多给中国造成不利。故特忠告中国方面，对某一借款，例如，既已信任日本资本家并已开始谈判时，应改为坚决对此表明诚意务求其成之方针。

四、同样对日本资本家亦应改变就同一借款向数名资本家接近之方式

例如，将同一项借款在向三井公司提出申请之同时，复向大仓组、日本正金银行及台湾银行进行探询。此事之利害得失与上述第三条所述相同，结局造成中国方面之损失。故将来亦希充分注意此点。至于借款以请求我国哪一资本家为宜，倘中国方面能征求日本驻华公使或日本驻各地领事之意见，他们将不辞辛劳，分别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具体介绍。

五、借款谈判勿经多人之手

当中国方面要求提供某项借款时，有关方面往往通过自己熟悉的各方人士开始交涉。如此不仅徒使事情发

生纠纷，最终难以收尾；而且易于为所谓浪人等参与其事提供机会，为此造成付出不必要牺牲之后果。故望将来借款谈判务求限于一条途径。

六、促进日中合办事业蓬勃发展

密切日中两国经济联系之手段，以奖励日中两国合办事业最为有效。盖合办事业比单纯借款易于加深两国人士利害相关之观念，并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然近来有迹象显示，某一种思潮正在出现，即中国方面被党派人物煽动或为识见短浅者流肤浅顾虑所误，动辄视日中合办事业为危险。鉴于日中将来之经济关系，对此不胜忧虑。故望借助中国方面有识人士鼎力扶持，迅速廓清此种错误见解，以促进日中合办事业蓬勃发展。

七、招聘日本顾问多人，以整理税制及制定专卖制度

中国财政须以增加岁入为要旨。增加岁入宜整理税制并制定各项专卖制度，舍此无他。对此我方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聘请对税务及专卖事业具有知识和丰富经验的日本人，迅速规划此事。如果中国方面有招聘本邦人士之决心，我国政府当就其人选尽力为之。如前此逝世之已故河田税务调查员之继任人，奉劝及早聘用。

八、对中国银行之救济

为整理中国财政须给中国银行以救济，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日本许久以前即已怀着满腔同情和善意考虑救济中国银行的办法。前此中国方面提出的500万美元借款要求，如果四国银行团最终决定不能接受时，日本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研究，准备单独接受。故望中国方面能够领会日本之诚意，勿轻易接近别国财团。关于这一点，不得不附带申明，最近达成协议的美中借款是日本大为不悦的一件事。

九、对交通银行之救济

给交通银行以救济也是日本方面以同样之诚意要与中国方面举行谈判的。究应采取何种方法救济，虽然尚需等待当事双方进行谈判，但特别迫切希望曹先生给予帮助。

十、请求修订兴亚公司借款

前此获得成功的兴亚公司借款不幸被用作中国党争之手段，使一部分中国人怀疑日本资本家对华投资之目的，以致给日华经济关系发展带来颇为不利的影响，此系日本政府深感忧虑之处。因此相信用改变担保品的方法，迅速而圆满地解决兴亚公司借款之善后措施，是此际最关紧要的。此点希望曹先生给予适当帮助。

十一、日中政治家及实业家团体互相来往访问

误解系因不互相交流思想而生。故望经常由日中双方派出政治家及实业家团体，互相往来，双方有识人士互相交流思想。

（摘自《胜田家文书》第108册20号）

“武力统一”

背景介绍

张勋复辟的丑剧是复辟派们策划已久的阴谋，段祺瑞曾微妙地参与其事。然而当张勋把复辟计划付诸实行的时候，段祺瑞却在日本百万日元的资助下扮演了反复辟英雄的角色，并乘机而起，得到了一顶“再造共和”的桂冠。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废帝溥仪上台，重新作了皇上。次日，段祺瑞便复任国务总理。紧接着，又由默认复辟的同谋者摇身一变而为讨伐叛逆的共和军总司令。由于复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终于很快失败，段祺瑞意气自得地重掌权柄，而黎元洪则灰溜溜地去职赴津。段祺瑞在“平叛”之后深感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重要，因而面托西原向寺内正毅致以谢意，并作出“将来一切照办”的表示。

段祺瑞以讨伐张勋复辟而自恃建立了“再造共和”的殊勋，因而“一手遮天，目无余子”，对内公然宣布“三不”施政纲领，即“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用以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对外则加紧勾结日本取得支持。段祺瑞就是以这样的内外政策为支柱建立皖系在北洋政府中的独裁统治。

段祺瑞一直迷信于武力统一，必然视国会、约法为障碍，因而公开表示要废除旧约法，取消旧国会，于是引起被解散议员的不满，他们联合西南军阀，揭出维护约法的旗号以反段。1917年7月16日，孙中山为捍卫民主法制，毅然由沪去穗，希望借助南方的反段势力达到维护约法的目的。他的护法号召得到海军和议员的支持，又联合滇桂地方军阀，高张“护法”旗帜，反段声势日甚。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10

日，军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申明护法的目的是“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的正式开始，南北方又出现了对峙的局面。

南方政府以两广、云贵为中心，而两湖、陕西、河南、浙江、山东、安徽等十数省区也都相继响应，形成护法热潮；但除孙中山是抱着真诚的护法态度外，其他各种势力都是各有所图，因而彼此牵制、抵消，使力量大为减弱。

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得到了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甚至美国驻华公使把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誉为“开明的纲领”，并以延长庚款的还期和提高关税5%对段表示实际支援。日本则更明目张胆地表示要“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的援助”，并制订了财政、武器援助的具体政策。段祺瑞有了美日的这些“援助”做依靠，便着手于实现其“武力统一”的美梦，以销除异己。1917年8月开始对南方用兵，其计划是：一线由四川进攻云贵，一线由湖南进攻两广，并即派其嫡系部将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代替与护法军政府有联系的原湘督谭延闿。不久又于10月6日派直系军人王汝贤、范国璋等率军南下攻占一些城市。一时意气自得，大有于三数月内扫平南方实现武力统一之势。

材料：

- 段内阁之武力计划
- 段内阁第二次倒台

材料一　段内阁之武力计划

段祺瑞内阁决计以武力对待反对省分，假统一之美名，为破坏之行动。兹探其最近军事计划汇志如下：

对湘　共同通信社消息：日前段总理已致电闽、赣、鄂、宁、浙各省，速作军事准备，苟南方风云日急，以备随时调遣。此次段氏对于南方力主武力从事，以谋民党根本覆灭。现驻保定之一师亦下动员令，将以吴光新为总司令，范国璋为副司令，吴光新拟自率军队先攻湖南而出广东。吴氏此次来京，即系此项准备。二十七日段氏致电诘责湘督谭延闿；由其〔如无〕结果即当今岳州之军队前进云云。按南北所争，端在《约法》，段祺瑞假法治之名以号召天下，而对于南方法律之争，则以武力恫吓。袁氏前车之覆，愿段氏三思之也。又吴光新氏原拟于二十七日离京回任，惟因与某方面尚有接洽事件，是以延顿，一二日内磋商就绪，即行出京。吴氏此次回任，确系奉命整顿部下，准备与南方开战云。

对川　又据英文京报载称：入川之师二十七日已经派定，除吴光新之兵一师外，段又拟派管金聚率兵一旅，由陕南向川北进发。吴光新之急急出都，即奉到政府此项命令，令其从速返岳为出兵之筹备，至于两路进川之意，全以唐继尧由滇出师，刘显世由黔出师，将以攻川，段之欲速平川难，即以防滇、黔之借此进兵，并为控制云南之预备云。

对粤　京报载称：自海军第一舰队独立后开赴广州，粤事遂日趋险恶。据国务院消息，某总长建议谓民党谋粤日亟，不可不先时预防。迨至某项事件发表，即特任龙济光为广东督军，另调陈炳焜赴某省。段颇韪其言，已于日前密电龙氏筹备一切云。

（摘自《中华新报》1917年7月31日）

材料二　段内阁第二次倒台

王汝贤、范国璋于发出主和通电的当天，不经北京政府许可，就自行停战，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右路朱泽黄部和左路李传业部收缩兵力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出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是日，省城绅商组织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办公处主任。

傅良佐的仓皇逃走，宣告了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11月15日，段向代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16日，他给北洋系将领一份密电说：“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结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一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柢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者，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种而后快。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决藩篱，落彼陷阱也。”他在电文中还说：“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倘能达我愚忱，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这份密电随即被报纸披露了。它半是谤文，半是哀歌；既是一篇绝妙的辩解词，也是一篇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段祺瑞攻击南方对北方采取“利用、离间、诱饵”的策略，“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亡国灭种而后快”，实是他以己度人的写照。

“四督”响应王、范通电主和,激怒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段祺瑞。他愤于冯派将领逼迫太甚,于11月20日再次提出辞职。22日,代总统冯国璋自以为夺取北洋军政大权的时机已到,毅然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又令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免职。段祺瑞第二次内阁宣告倒台。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安福国会

背景介绍

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的同时,政治上开始谋划操纵选举新国会,以取代张勋复辟的旧国会,达到排除异己,建立皖系的独裁统治。段采纳研究系梁启超的建议,根本不理会西南各省和孙中山国民党人的坚决反对,成立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作为皖系御用立法机构。1917年9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命令,谓:“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决议,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并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事宜及各省省长指派参议员到京组织参议院。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会,出席人数102人,皖系政客王揖唐被举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王印川为秘书长。

参议院成立后,立即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北京政府又公布了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蒙古四部及西藏第二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法。新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与旧法相比,减少了两院议员名额。参议院议员名额由274人减为168人,其中138人由各省选出,30人由中央选出;众议院议员名额由596人,减为406人;以便于操纵控制。3月6日,又公布了第二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日期的命令,规定5月20日和6月20日为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日期。皖系军阀、政客为操纵选举,于3月8日即有安福俱乐部之组织。据《安福大罪案》(一名《直皖战争始末记》)一书记载:“安福俱乐部者,段合肥用徐树铮之谋,以反抗冯河间(冯国璋)者也。”徐与王揖唐共商国会选举,驱冯下台之策,“揖唐笑曰:是何难。现在选举总统之期将届,只须办一政党,选举老总(指段祺瑞)为总统可矣。揖唐非敢自诩,对于此事确有十分把握,惟经费无从出耳。君苟以巨资畀余,可反掌而成也。徐即于某银行中取款八十万畀之。”

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等皖系政客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月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此名。据皖系重要成员后期负责安福俱乐部事务之曾毓隽记载:“安福俱乐部者,由王揖唐承徐树铮之意办理选举而来。初王在安福胡同赁一巨宅,作为招待议员,以及竞选中各方面有关人物接洽之处,有时利用为皖系人员以及议员娱乐之地,与宴客联欢之所。初名之曰‘梁公馆’,当时含有秘密之意”。又说:“当日因光云锦一言,谓取某某党不妥,因政党二字甚为世人所厌恶,现吾辈所聚合之地为安福胡同,何不以安福俱乐部名之,既脱俗又别致,且安福二字含有吉祥之意。遂以命名”。曾为安福俱乐部后期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段亲信,且与徐树铮关系密切,此说当为可信。

安福俱乐部的首领徐树铮、王揖唐、曾敏隽,均为段之亲信,特别是徐树铮为段之门生,段与日本的勾结,发动对西南的战争,打击直系的各种阴谋策划,徐均是重要谋划者与参与者,段对其言听计从,依若左右手。安福俱乐部是徐树铮、王揖唐直接组织并为首领的一个政治团体。其经费开支,系徐树铮由陆军部军费中每月拨付三十万元作为安福议员的津贴,并由徐委派专人管理。该部从其成立,到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的两年多时间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哄动一时的所谓“安福系”,是皖系左右北方政局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当时舆论一般均把安福系视为皖系的同义语。但皖系并不等于安福系,包括段祺瑞本人在内许多皖系军阀的重要人物,并非安福系中人,这一组织只是皖系军阀为建立本派独裁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

材料:

·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 安福国会的召开

材料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所谓“再造共和”之功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国内政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国会和总统问题。段祺瑞以前次对德宣战案,国会与之为难,与国会的嫌隙已深,不愿见其复活。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当时参加了内阁,成为段内阁的重要支柱。研究系阁员因国会中本系人数过少,不能申张其主张,也不愿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即段内阁成立的那天,梁启超、汤化龙等向段献策,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经一度复辟推倒,即已蜕化

死去，现在复生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何况国会不好，首先是因《国会组织法》不完善，倘不先组织一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必将蹈旧国会的覆辙。梁启超还指出：第一，“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之担保。”因此，他们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对研究系这一改组国会的主张，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赞成。

《修正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公布的第二天，即 2 月 18 日，北京政府即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认为政治上竞争角逐的时刻已到，机不可失。他们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便操纵国会选举，把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己派所用的人来当总统，并进一步把持政坛，控制局势，于是组织了安福俱乐部。

早在 1917 年 8 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

1918 年 3 月 7 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横、曾敏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翰、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 3 月 8 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大家表示赞成。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成立，次年 3 月 8 日王揖唐在该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曾作了如下的记述：“自前年段合肥马厂誓师扑灭复辟后，恢复共和，中华民国死而复生，共和国家斯不可以无国会，又鉴旧选举法、组织法之不良，于是根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修正两法，本部同人彼时在参议院者，对于两法有所商榷而为一种结合，而安福胡同始觅房屋，因委托梁式堂筹办一切。开始之初，假定梁宅以为收发函件之标帜，又经徐又铮君极力赞成，遂告成立。此为本部筚路蓝缕之起点也。去年三月七日晚，本部开会，经郑万瞻等提议正名为安福俱乐部，虽因地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于是安福俱乐部自去年三月八日起成立。”

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

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一次，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说：“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

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

（摘自《近代史资料丛刊》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

这场包办选举的策划者和幕后指挥者是徐树铮。从下面几封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为了使自己的同党多多入选，徐树铮是如何在其后台老板段祺瑞的支持下，密谋策划，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发号施令，指使其亲信和党羽倾力包揽选举的。

5月27日，徐树铮在岳州途次给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密电中说：“新奉国会为国家根本，晋省选事得我兄大力包举，凡在同人，极深倾佩。兹更有进者，人才以坚定不摇为上，而举总统、任总理、制宪法、议法案、选议长荦荦诸大政，尤须与我辈一本公义专谋利国之主旨步骤合一。顷者复选期迫，往来京津，互叩菊、芝两老（即徐世昌、段祺瑞）意见，选才一节，佥主严加拣拣，谓此时多一分考察，即异日减一分枝节。诚以目下党派纷岐，诡谋繁衍，一有不慎，将来院内情形，即非院外人所可推测云云。昨由揖唐议长与子琮、芬圃（即田应横、李庆芳）诸君仔细切商，务求一劳永逸之计，一俟诸君审议有定，即行专电奉察。吾兄与国休戚，谅已成竹在胸。”

6月1日，徐过郑州时致电皖系各督军说：“飞急。密。亲译。顷接一堂（即王揖唐）沁电：‘接王仲芗（即王善荃，时任福建政务厅长）由闽来电：两院选举，闽、漳、建三道均有把握。昨忽有人自京来称，中央不甚赞成，闻之惊讶。除仍照旧进行外，祈速确示遵办。敝处复电文曰：奸人希图破坏，幸赖高明洞烛，祈始终坚持，无论何人造此浮言，严予拒绝云云。邦本安危，在此一举。选期迅迫，少纵即逝，拟请迅电同志各省，杜遏奸谋’等语。此次选政，所系甚大，若辈诡谲多端，造谣煽惑，自无所不用其极。闽中既发现此事，难保不分途秘进，极盼坚持促办，俾奸人无所施其伎俩，庶选政可早日告成。除电复一堂外，特以密闻，祈赐鉴察。”

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

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二百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五十五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四百元，并须加付来京川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张玉崑以八千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二万元高价夺去。张与林交涉，林贪安福重金，与张废约。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张玉崑、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张、何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

类似上述黑幕，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一百四十七名（按总额为一百六十八名，西南五省一特区二十一名未选出），众议员三百二十五名（总额为四百零六名，西南五省一特区八十一名未选出）。两院合得四百七十二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名，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

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

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虎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一百零六人，众议员三百五十八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

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

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

（摘自《民国政史拾遗》台湾文海出版社）

徐世昌当选总统

背景介绍

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段合肥用徐树铮之谋，以反抗冯河间”，徐树铮与王揖唐共商“取款八十万”元给王，是年3月，王揖唐、曾毓隽等人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从而正式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安福系。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段祺瑞建议推北洋军阀集团中处清客地位的徐世昌为下届大总统。如冯愿意，可退为副总统；如冯不愿作副总统，段表示愿意陪冯一起下台。6月19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一致同意推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意见。

8月12日，皖系一手包办的以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史称安福国会。安福国会是段祺瑞的御用国会。它采取了贿选手法，给安福议员每人预支出席费300元。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正副众议院院长，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的正副议长。所以当时北京有“无会不烟酒，有官皆安福”之说。

9月4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大总统。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一直是段祺瑞扶植的傀儡，但他并不愿居傀儡地位。他在对待西南的问题上，打算继续推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留副总统席于西南，换取西南对自己的拥护；在对待北洋派问题上，拟继冯国璋之势力，团结直系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在对外政策上，他企图改变只依靠日本一国之方针，等等。这与段祺瑞的投靠日本，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有一定的矛盾。

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在怀仁堂与冯国璋举行交接典礼。当天，徐发布命令，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以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12月20日，经安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徐世昌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次日，任命各部总长。

材料：

- 选举总统内幕
- “文治”总统

材料一　选举总统内幕

当时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究竟谁来担任较为合适，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这是包括直皖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直皖之间就这个问题暗中进行激烈的争斗。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在法理上没有什么不合；他又是直系领袖，并得到研究系等一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他不同意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同南方的争端，背地里同西南军阀声息相通，保持联系，因此，他还得到西南的同情和支持。西南曾表示，如果北方不选举冯为总统，南方的非常国会可以举他为总统。但是冯国璋在北方政界的势力不大，在国会中的力量十分微弱，只有江苏和直隶一部分议员支持他。冯虽身为代理大总统，但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手里，早已是一个被排挤遭冷落的人。1918年初，他曾异常懊丧地对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据，我自己亦实在处不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好在我之私宅已在外边租妥，继任之人随时可以请进府来居住。现在我已无事可办，不过作一个看守印信之人而已。”而且，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的第一个直接政治目的，就是把他这个劲敌赶下台，他已被段派视为“在所必去”的人物。因此，冯国璋不得不一再表示不愿当选总统，希望另举德高望重的贤才。他说：“下次总统选举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余决不再作冯妇，俟正式国会成立，当喻以此意声明。”“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且余乃承认新国会而不承认旧国会者。如西南于策略上举我为总统，则西南亦必同时举出副总统，我不往就，听彼副总统自代职权可也。至新国会之举总统，如为东海(徐世昌)，我竭力赞成，万一而及于余，亦惟有不就而请副总统代理。余已在河间构置住屋，退职以后，不住在京，亦不在天津，将归河间故乡，耕种自活。”8月12日新国会开幕后，他立即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表明自己告退之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

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

段祺瑞对膺任大总统一席，也不是不感兴趣的。他掌握有中央政权，并且有日本帝国主义后台的支持和援助。在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又占了多数。因此，他很可以运用金钱和权势，引诱和强迫新国会选他为总统，如同袁世凯迫使第一届国会选举袁为总统一样。事实上，在1918年初，徐树铮初次出关联结奉系首领张作霖出兵，以压制冯国璋时，即有将来总统推段，副总统推张，徐本人或王揖唐出组内阁的默契。段派中也颇有一部分人替段奔走活动，拥戴他为总统，以"发展雄图"。他们举段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费尽全力，办成新国会，就应选举我们的首领当大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直皖斗争和南北纠纷使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这样，总统的候补者就只有徐世昌一人了。

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善观风向，长于玩弄权术。他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以"调和者"自居，两面讨好，不为左右袒；对段派不即不离，对直系则暗示亲近，对西南则表示有和平妥协的愿望。皖系以段祺瑞无法选任总统，徐世昌为文人，没有兵柄，易于操纵，便决定改提徐，想让他作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诸事"反有益于进行，而便于倒冯"。6月12日，徐树铮给王怀庆的电报说："时局多艰，非东海莫克负荷，尤非我辈共矢公忠，莫为捍卫。"冯国璋以段祺瑞不当总统，于自己的北洋首领地位无损，也表示同意由徐世昌任总统，认为要度过目前政治上之难关，"而谋大局统一，非东海登台不可"。前面提到他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造平和者"，指的就是徐世昌。直皖之间的斗争，需要有一个第三者缓冲人物出来，借以维持北方政局，徐世昌正是这样一个适当和权宜的人物，因而受到两方的拥戴，可以说是坐收渔人之利。此外，交通系大多数与徐世昌皆有渊源，梁士诒曾向安福系提出过他就参议院议长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徐世昌任总统。研究系讨论会一派原本属徐，研究会一派议员因冯国璋在选举中完全失败，也倾向徐。这样，徐世昌便受到北方各政派的一致支持。

9月4日，总统选举会在象坊桥众议院正式举行。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安福俱乐部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和各招待所之间，接送该部议员到会投票，由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任务。上午10时，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宣布开会，梁因患感冒，改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任大会主席。宣布参议员出席者一百三十一人，众议员出席者三百零五人，共四百三十六人，超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接着举行投票，结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另段祺瑞得五票，王士珍、张謇、王揖唐各一票，废票三张，冯国璋未得一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全场一致鼓掌欢呼。安福系苦心经营了半年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获得了全胜。在参观席上的徐树铮，亦"面有喜色"。

（摘自《中华民国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文治"总统

徐世昌就职后，副总统虚悬，不愿身边有个跋扈专横的军人，时常放出空气，属意于南方之岑春煊。曹锟始终有意于这个席位，徐派秘书长吴笈孙劝说，副总统只设一人，总统左右为难，曹只好表示放弃。终徐之任，副总统迄未产生。徐就任后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大权独揽，使责任内阁徒具形式。其内阁成员多为旧日僚属，如素有渊源的旧交通系的周树模、朱启钤、梁士诒、叶恭绰、周自齐等。

徐世昌以清翰林出身担任总统，利用群情厌战、痛恨军阀的心理，处处标榜"偃武修文"的"文治总统"形象，以示与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的军阀主政不同。当然，徐以"文治"标榜，是有政治资本的。宣统三年辑刊任东三省总督时"治绩"《东三省政略》；民国三年组织幕僚编订《退耕堂政书》刊行；民国六年又主持编成《大清畿辅先哲传》；次年缉印《水竹邨人诗集》。与前几任民国总统无法同日而语。他在总统府设"晚清簃诗社"，与樊增祥、柯劭忞、严修、易实甫、吴辟疆等清朝遗老和诗人，每周聚宴一次，分题拈韵，互相酬唱，作为粉饰太平之举，后有辑录之《晚清簃诗汇》刊行。在画家周肇祥家设画学研究会。创办中法大学的李石曾赴法，向法国当局赞颂徐为文治总统，法国拟赠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徐即倩黄郛捉刀撰成《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旋命吴世湘、曹秉章、许宝珩、谢宗陶审校，增益以史实及儒家伦理，以中、英、法三国文字印刷，特命朱启钤为专使，接受了巴黎大学学位。其沽名钓誉，显而易见。

徐世昌就职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命令。11月3日下令整顿官风，命令说："近倾国纪凌夷，官邪日肆。抚字之职，纵匪为奸；征榷之司，敛财肥己；甚至假公义以侵帑，挟市道以猎官；刑宪不加其身，党援或庇其后；罔上溺职，无所创惩，非所以肃官方，端治本也。"表示要按法从严惩治，贪劣长官循情容隐，或纠弹不力者，"并予究惩、不稍宽贷"；同时"奖掖廉能"。自己要"尊重法纪"，"为国人先"。百官应"正己以资表率"，期以"仕途整肃风气转移，各奋天良，弼成民治，有厚望焉！"姑不论这篇民国元首文告形同封建帝王上谕，究军阀统治之实质，包括徐本

人在内，窃国为侯，以权谋私，卖国肥己，岂一纸惶惶命令所能矫治?!故而终徐之任，迄未惩办一个贪官污吏，就是徐世昌本人，也不曾如命令中所表示的要以身作则，他就任伊始，先饱私囊。早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曾开先例，新任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拨款一百五十万元，总统留一百万，余五十万分给各部总长。而徐到任后，由曹汝霖过付，徐照数全收，其他阁员应分肥之数悉入其私囊，曹不好索要，其他阁员也不能代索。总统月俸三万元，办公、交际费用每月各四万元。崇文门关税，清朝作为内帑，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继承了这种制度，据为总统府所有。徐任总统后，派其亲信刘鹤庆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每月名义上报效徐四万元。全国烟酒事务署独立后，徐派其亲信张寿龄任督办，每月公开补助徐六万元。以上数项，徐每月可收入二十一万余元。至于总统秘密活动费，举办内外债时分润回扣，家用开支一切取给于总统府经费者，远在此数之外。三年半总统，徐世昌由原来连应试盘费都要人周济的穷秀才，成为宦囊丰满的百万富翁。徐氏惩治贪劣，奖励廉能的官样文章，只是"文治总统"的伪善标榜而已。

1919年1月，徐世昌写成《将吏治言》一书，颁行全国。该书引证孔孟"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以为政在人，"设官分职，以民为极"。奉卫民治民为圭臬，"有卫民之官焉，今之督军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长，以及道尹、知事是也"。划分督军、省长、道尹、知事四级官员职权范围，"以箴有位"。徐企图借此使"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厉以图，庶几起衰救故，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国之民者，抑亦诸君之大幸也。"民国以来，大小军阀拥兵自雄，割据一方，行政官员皆仰其鼻息。为了争权夺利，刀兵相向已成常事，兵锋所及，玉石俱焚，烧杀奸淫，残民以逞，何论"卫民"！各级官吏，层层盘削，以聚敛为能事，"治民"只是害民的代名词。军阀们弁髦宪法，废立总统总理，制造政党，强奸民意，岂徐之一册《将吏治言》所能约束！对此，徐世昌并非无知，不过是出自"以文治武"的需要罢了。

1919年12月4日，颁令将柯劭忞所著《新元史》增入正史，使二十四史增为二十五史。同年发布命令仿印四库全书，因故未成。

徐世昌上台即"改弦易辙"，发动"和平"攻势。在就职通电中说："极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不但国内人心厌战，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相同的趋向。徐世昌就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帝国主义很快要重返亚洲，为争夺中国进行角逐。就职第三天，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贺电中要中国早息争端。由美国返任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转达美国总统劝中国速谋统一的意向。

（摘自《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

军政府改组

背景介绍

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

2月2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莫荣新等，邀请孙中山在海珠开会，讨论改组军政府问题。会上决定将军政府的领导体制进行改组。会后，拟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用意约有两端：甲、将军政府原来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地位平等，责任同负。乙、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其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这样一来，军政府的护法性质就改变了。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许多革命党人也不赞成。21日，章太炎从重庆发来通电，指斥岑春煊的议和主张"于义师初起之宣言，一概抛弃"，"莠言乱政，乃至于此"，并揭露其"热中利禄，谄媚僭盗，欲使南方护法靖国之师，皆为一己利用"。他提出："除电请唐帅否认外，应请宣布岑春煊罪状，以告天下，毋使老奸再行煽惑。"22日，当军政府岌岌可危的时候，孙中山通电全国，呼吁尊重国会，拥护约法，指出："此次西南兴师，目的止于拥护约法，根本主张，惟在恢复约法之效力，与求国会永久之保障耳。……执权者若能共喻斯旨，弃其非法乱命，息战罢兵，一切解决，悉听国会，则国是既一，大乱立定。若徒恃个人之智与力，以图保持权位，不特战祸延长，殃及国脉，即于各执权者自身，亦为速亡之道。"同日，他通电西南护法各省，说明对时局主张，指出经国会非常会议选出之元帅及各部总长，多未就职，"举国国民，见北京政府既为非法僭窃之机关，而西南护法诸君，又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乃徬徨歧路，无所适从。世界各友邦见我主张拥护国会者尚不能服从国会，更疑我护法之战争为割据争雄之举动。内不能示国民以趋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是非不明，国是不定，国家危险莫大乎此"。孙中山吁请各将帅贡献救济良策，倘能恢复约法效力，愿即引退。随后，他向唐继尧提出改组军政府，必须有切实可行办法，并郑重声明："护法之惟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无论改组内容如何，此主张绝对不能有所牺牲，必须一致坚约，始可共议改组。"但唐继尧始终不置可否。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六十余人，由罗家衡等提出改组军政府组织案，因桂系及政学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者竟达四十余人。居正、邹鲁、马君

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最后由议长指定二十人审查提案。同日，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二办法：一、挽留大元帅；二、改组施行延期。”11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他说：“军政府视国会如君父，国会之决议，军政府无不服从。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之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夫今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明文，今日何以自解？军政府近于外交方面正在进行接洽之中，今蒙此影响，军府基础已摇，日后必无进步可言。……故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13日，国会非常会议审查会推代表诸辅成、王湘、吴宗慈、卢仲琳、王葆真五人会见孙中山，征询对于改组军政府之意见，孙中山再次表示：“改组事，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苟不论法律而论事实，则余无不可委曲求全者。若国会必以联陆为有利者，则余虽亲至南宁、梧州晤之，或以大元帅让之，皆无不可，是可见余非争一己地位者矣。”在这期间，传来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的下列主张：“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现在办法宜遥戴黎、冯为大副总统，或认冯为代理大总统；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置六部，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内政，陆荣廷长陆军，林葆怿长海军，唐绍仪长财政，张继或王宠惠长司法。政府地点宜暂在广州，俟局势稍形发展，则迁往南京或武汉。总理（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至此，孙中山终于看到了唐继尧勾结政学会分子与桂系军阀阴谋推翻军政府，踢开大元帅的真面目，于是决心辞职离粤。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议员八十余人，首先由汤漪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赞成改组军政府者四十余人。超过四票通过。孙中山当时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通电向国民痛切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时瘏口哓音，以蕲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二十七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同月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十二条，其名称仍用军政府，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而主席总裁则由政务会议选出。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一百二十余人，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当选。随后，陆、唐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材料：

- 护法政府之改组

材料　护法政府之改组

军政府成立之初，陆荣廷、唐继尧不就元帅职，谋与北京政府议和。孙中山先生在粤，虽有护法议员之拥护，但除海军外毫无实力。政学会与桂系既对中山先生不满，益友系要人吴景濂、褚辅成等鉴于军政府与陆、唐关系疏远，不能发生实际力量，亦渐向右倾。于是改组军政府之议，甚嚣尘上。至七年四月，渐趋成熟。所谓军政府之改组，即取消大元帅之首领制，而改为实力派之合议制，意在排除孙中山先生。七年四月十四日，汤漪、杨永泰起草军政府改组案，得罗家衡等四十人之连署，提出于国会非常会议。虽有民友社议员之竭力反对，卒于五月四日，以大多数议员之赞成，可决军政府改组案。五月十八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联合军政府组织大纲》，即日公布，并通电全国，略云：

曩者军政府成立伊始，只以事属首创，未臻完备。遂使唐、陆两公，谦让未遑；西林一老，置身局外；伍、唐、陈、林、胡诸总长，袖手于广东，幸赖孙公中山一人，仔肩危局，撑持至今，斯岂诸公护法之彼此异志欤？抑亦立法未善之所致也。同人等返躬第一次政务会议。十九日，岑春煊被推为政务会议主席。八月三十一日，军政府通电否认北平国会选举大总统。十月九日，广东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自七年十月十日起，委托军政府执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务，至次任大总统选出就职之日为止。军政府即开政务会议议决承受，并发布通电，略谓：“军兴以来，军政府及护法各省各军，对内对外，迭经宣言其护法之职志，惟在完全恢复《约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国会之乱命。以求真正之共和，为根本之解决。……乃闻徐氏已就伪总统，事果属实，何殊破坏国法。……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护法戡乱，固责无旁贷也。”

改组后之军政府虽以护法相号召，实极希冀与北京政府议和，并无拥护国会之诚意。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粤旧国会忽提出改组军政府案，又有议号提出不信任政务总裁主席岑春煊案，虽其结果均未通过，而军政府之前

途已难乐观。九年春，旧国会议员多数离粤，发出通电，声明军政府政务总裁只有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泽三人在粤，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自三月二十九日以后之命令，概属无效。时旧国会议员仍有少数留粤，乃于五月四日开会补选熊克斌、温宗尧、刘显世为政务总裁。六月二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又联合宣言，谓在粤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军政府一切政令无效。离粤议员亦于八月七日在云南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免岑春煊职，旋补选刘显世为政务总裁。十月二十二日，岑春煊即宣言引退，复于二十四日，与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联名通电，解除军政府职务。

内省，鉴于时局上之要求，而共认军政府改组之不可缓久矣。今则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业于本日议决公布。自时厥后，同人等最终希望，惟在海军及各省同志，戮力一致，拥护新政府之成立及发展，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继续现军政府未竟之功，回复《约法》之效力，维持国会之尊严，建设统一之基础，促进宪法之成立，同人谨拭目望之。

《联合军政府组织大纲》全文共十三条，规定军政府于国会。大总统之职权不能行使期内，行使中华民国之行政权。其职权凡六：(一)关于和战事件；(二)办理共同外交，与订立契约；(三)监督共同财政，与办理内外公债之募集；(四)裁决省与省之争议事件；(五)关于承认护法省区军队之加入事件；(六)关于统筹军备及计划作战事件。军政府以由国会非常会议所选出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行使其职权。并设外交、内政、财政、参谋、陆军、海军、交通、司法八部，直隶政务会议。此为中华民国采用行政合议制之始。

七年五月二十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文、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七人为政务总裁。七月五日，唐继尧等通电就职，宣告军政府依法成立。八月十八日，军政府开会宣告成立。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中日军事协定

背景介绍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沙皇俄国势力的瓦解，使世界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中国东三省北部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俄国势力的极大削弱，无疑是日本扩大势力范围，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因此，它迅速地作出了侵略性的反应。1917年6月，日本外务省委托满铁理事川上俊彦开始对俄国进行了四个月的考察。11月中旬，川上向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提出一件《俄国视查报告书》，在结语中建议：如果俄国苏维埃政府单独对德讲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州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1918年1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成立军事共同委员会，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负责研究出兵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及出兵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必须取得出兵进驻中国东三省北部的合法依据。为此，缔结中日军事协定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如日本外务省在《日中同盟缔结之意义》文件中所说的：“帝国外交之中枢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之要谛，其归结点即是日中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紧密联盟。……若以同盟的形式明白确立日中两国间的关系，帝国将根据盟约所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无须顾忌列国及中国产生的疑虑，得以公开的推行我之对华政策。……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份内部文件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的侵略目的，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它是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材料：

- “中日合作”
- 论中日秘约之危险
- 《中日军事协定》的取消

材料一 “中日合作”

1917年11月14日，段祺瑞的亲信皖系军阀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乘机相继向靳、曲二人游说，陈述俄国发生革命后，德有侵入东方的危险，暗示有必要加强日中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东侵。但此时中国政局由于直皖矛盾加剧，11月2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继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与直系首领大总统冯国璋关系密切，这对急于缔结中日军事协定的日本极为不利。日本参谋本部密令坂西利八郎（当时陪同靳云鹏、曲同丰赴日参观演习）返华后，向中国各界要人游说，以促成此事。坂西与青木宣纯（时在华任总统府顾问），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进行分头活动，不断向

冯国璋、王士珍及北京政府官员宣传说：鉴于欧战形势和俄国目前现状，日本有可能施行自卫而采取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贵国如“不与日本从事合作，于两国关系上将是很不利的”；建议中国为此应编练几个师的新式军队，以为参战出兵的准备云云，为日本正式向中国提出缔结中日军事同盟大造舆论。

1918年2月1日，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致电坂西，指示他采取措施，立即诱使冯国璋、王士珍同意并主动提出中日建立军事同盟事，以免“万一由我方提出，而冯、王不同意时，极有损我国的体面”；并指示坂西与段祺瑞接洽。次日，坂西复电建议由田中本人非正式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然后由章向北京政府报告，以促成缔结协定；坂西估计，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冯、王不会断然拒绝。坂西并报告说：“本职已和参战督办段祺瑞(段于辞职后于1917年12月18日任参战督办)、陆军总长段芝贵正在制定大体计划”。2月5日田中向章宗祥非正式提出：鉴于德国势力东渐，“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章宗祥立电告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探询段祺瑞对此事的态度。段立即表示：“日本政府关于此问题好意热心的表示欲与我合作，我宜以热诚相待，与其达成完满之协定。……并非像一部分人杞人忧天似的，认为日本人将利用此问题，以达到其野心。毋宁说此时的危险，是我之因循苟且。余深信此问题将是解决中日间多年悬案，实行亲善提携的绝好机会”。段并向外交总长陆徵祥说：“此问题紧急，不可片刻耽搁，此事系由外交总长专管事项，望阁下迅速主持此事，热切希望尽全力促其成功”。2月14日、16日，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讨论中日军事协定问题，陆徵祥主张与日合作，王士珍表示此事待与大总统详细讨论后再议。持慎重态度。

嗣后，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连续对冯国璋、王士珍进行工作，露骨地要冯国璋授与段祺瑞以处理参战事务全权。坂西对冯说：“段虽有参战督办之地位，实无业务可做。……今日日中两国军事合作方针已确定，大总统应命参战督署开始工作，并明确其作为常设军事机关之权限”。日本频繁地活动于外，段祺瑞皖系军阀积极响应配合于内，冯国璋迫于内外的压力，终于接受了中日军事合作的建议。

3月23日，大总统冯国璋在皖系军阀和日本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再次任命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段一上任，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中日军事协定。3月25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方所规定的调子提出中日共同防敌的要求。本野立即表示同意就此行进行协商。至此，完全由日本自编自导自行设计的一出侵华丑剧，终于开始粉墨登场了。其有关具体条款即由中日双方指派的军事委员讨论议定。换文后日本即通过坂西将日方拟定的协定草案交给靳云鹏，以后即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正。

5月16日，中日正式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十二条。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条。以后又于9月6日议定了《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规定》七条。这些“协定”和“规定”都是在日方提出草案，由中方代表在文字上稍加修正即行通过。根据这些协定，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须与日军合作，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则“应入日本军司令部指挥之下”；“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关于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两国应互相供给”。协定条文仅泛言“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并不确指地区与范围，届时日本即可据此条款在华任意行动，还以供给军需品及原料为名，掠夺中国煤、铁、棉花、羊毛、粮食等。同时还规定：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须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的各项设施，而中国必须提供交通运输等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满打开了方便之门。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论中日密约之危险

二十六日《大陆报》社论云：欧战以前，欧洲各国政府容有以秘密手段处置关系全国人民利害之事务者。然战事既开以后，各国政府乃不能不事事使人民洞悉其内容。于是事情迥然一变，凡属国家政务，无复秘密之可言矣。今若谓英之唐林街、美之白宫、法之沃塞街诸当局人物，如有任何关系国家之行动，而不使国民预闻而允许之，殊为吾人所不信。即如协约各国政府，苟与中欧诸国议缔和约，而不先商诸曾在战事中为大牺牲之国民，殆属断无其事也。夫一国政府之威权，得诸人民之允许。凡政府之任何举措，纯以人民之意思为根据，诚以政府乃人民之公仆。即英国之国王，亦如美之总统，不过国家之首仆耳。今欧洲各国政府之行动，正与此等政治原理相符。须知此等原理，至为明显，无待烦言，记者所以略举于此者，以此等在欧洲适用之原理，亦适用于中国。今中国谣诼繁兴，盛传日本关于西比利亚共同出兵事件，提出若干要求，有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完全，并使中国政府严守秘密。则为中国政府者，开诚布公，以告国民，诚当务之急也。迄今政府关于此事之正式宣布，仅为对于商会抗议之一种答复。上海方面，由卢护军使发表。观其措词，承认中日两国间关于共同防御俄国过激派人势力之计画，有某种谈判正在进行；并谓此等谈判，以对付敌人之军事策划为限，议定

之后，须俟绝对必要时，方始实行。其内容并不妨碍中国之实业、财政及交通，外间所传丧失国权之说，全属子虚云云。按此项宣布之措词，殊为浮泛，凡公平之旁观者，当以为政府于此对于国民定有难言之隐，是以答词如此闪烁。

试思政府果开诚布公者，曷不以谈判之条件，列举其原文而宣布之。果使其内容不如外间所传之严重者，可以立即解释公众之惊疑，其为效岂不多多乎。若照目下情形，人民之怀疑于北京政府及日本政府，乃当然之理。盖谈判性质之可以责备与否，姑置不论，而此严守秘密，即足以惹起公众之惊疑也。华字报纸对于此项交涉，已予以极恶之解释。两国政府果欲消释嫌疑者，厥以尽量公布为惟一办法。据华字报之拟议，中日两国政府实有意以俄患为借口，以开始此等谈判，日本要求之范围，远过于时势之需要之外。质言之，目下要求之包罗一切，且过于一九一五年之第五项。简词言之，则华人舆论以为：日本实欲乘此机会，囊括中国之海陆军、警察、兵工厂、财政、实业、矿产及中国全部之土地与主权，而移归日本也。使华字报此等说词果有若干之根据者，则日本之目的，直欲于政治上吞灭中国明矣。

夫中日两国在西比利亚提携行动，其事亦颇简单，何以必须中国准许如斯广大之权利，确为吾人所不解。然谓日本竟图如此制伏中国，亦为吾人所不敢言。盖如此举动之意味，即为完全否认日本与英、美两国所缔之种种条约。而此等条约，日本在现时及将来，必须继续依赖之，以保其势之继长增高者也。当此欧洲协约各国有事于世界大战之时，日本攫取中国几许之利益，而丧失英、美两国之善意，轻重相权，吾谓日本实得不偿失也。此种理由，吾人以为日之秉国者，断无不明，因此吾人不欲信彼等果抱有外间所致疑于彼等之意志。然吾人以日本为协约国之一员，故虽不欲信日本抱有此等企图，而同时敢效忠告于中政府：须知政府引国民为心腹、而不以既成之事实强国民以负担，乃绝对必要之事。凡关涉国民利益、安全之问题，政府必应先商诸国民，果使国民晓然于此次中日之交涉，于国民有利而无害，则国民不至靳而不予，殆无可疑。惟交涉之内容，必须尽量公开耳。

（摘自《民国日报》1918年4月27日）

材料三 《中日军事协定》的取消

小幡驻华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

1920年4月3日

第310号

万国侨会驻沪总代表徐维绘（上海基督教普益社社长）于出席此次在天津举行的青年会大会之便，在四月二日来访本官，谈及南北统一问题。该氏谈到因与王揖唐、唐绍仪及王正廷等系故交关系，曾前后五次正式会见王揖唐、王正廷。据告南方之李烈钧、李根源之争乃区区小事，新旧国会问题亦不成问题，而南北统一之主要障碍，在于中日军事协定。倘若北京政府废止协定，南方军政府将立即使唐绍仪与王揖唐开始谈判，决定统一问题。而王揖唐虽然对本人保证说将废止该协定，但协定只要没有取得日本之承诺，非中国一方之意志得能废止者。且王揖唐之保证是口头的，没有何等效力。为此希望日本政府于人人属望南北统一之际，对中国发出取消该协定之声明，北方据此通告南方，则上海和会即可开会，南北统一立可实现，而对日本之种种误解亦可消除，故愿日本争取时日，从速考虑此事。

本官本着日本政府最近所发表之声明，西伯利亚撤兵时期一到，该协定自然没有存在之必要这一宗旨答复说，该协定之取消，不过是时间问题。

另有从巴黎归来之刘崇杰亦对本官暗示说，中日军事协定已成为南北统一之障碍，一般说来，协定受到各方抨击，莫如废止，以释中国人民之误解，较为得策。

总之，该协定在中国普遍不得人心，种种误解，屡见不鲜，相信当局对此已有适当考虑，故特请参考。

已函达上海。

驻华公使馆武官东少将致

田中陆军大臣电

1920年12月7日

第869号

就军事协定之废除，须先经两国军事当局认定其失去效力后，始能移交外交当局声明废止。所以在此军事废止实行时，拟请先在两国军事代表间，交换下列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特别对取消大正八年二月五日签定协定之精神予以说明者，系以中国现在尚未批准巴黎和约，且日军仍驻在乌苏里地方，因此如果取消此有效期限之协定，显然得声明须在战争状态已达终了时期。

有关军事协定中对战争状态终了之承认。

“中日两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中日两国共同防敌之必要业已消灭，兹取消民国八年二月五日签名盖印之关于中日军事协定有效期限之协定，以本文签名盖印之日，承认已达军事协定第十一条第二项战争状态终了之时机。”

中日两国军事代表者签字盖印。

（摘自《北洋军阀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历 史 内 幕

段祺瑞与冯国璋

对复辟的态度

一九一六年的初夏，我在上海得到北京有复辟的消息，即乘沪宁夜车去南京，次晨见了冯国璋，问他对复辟有何看法，作何准备。他说："这次督军团意在逼黎下台，不料反闹出这场复辟的把戏。不久以前，全国一致推倒了'袁皇帝'，这不是专对项城个人的问题，谁做皇帝，人民都不赞成。说句干脆的话，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愿意再有这种老一套的制度，因此我们既反对洪宪，也必然反对宣统复辟，这一点不必研究了。现在芝泉已到天津，我们正在紧密联系中。听说他已有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徐州方面如有动静，我来对付他们，这班辫子兵的力量有限，也还不难解决。目下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督军团里除了张勋以外，我知道也还有人在想借着攀龙附凤的机会做他们封侯拜爵的迷梦呢。我希望芝泉在北方能发动得快，速战速决，把北京城里这群昏瞶胡涂的帝制余孽早日肃清。否则，夜长梦多，还怕出别的岔子哩。"

我们正在签押房里谈话，当地的英、日领事同来求见。那时正值盛暑天气，冯把小褂脱掉，只穿了一件夏布大褂出去会客。我听见英、日领事首先问冯对复辟有何意见，冯的答复是："中国的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英、日领事又问："副总统既不赞成复辟，有什么对策？"冯大声地说："只有打！打！打！"我从帘子里望见冯在说三个"打"的时候，还捋起袖子，每次都伸出一只拳头比给外国领事看，以表示他的决心。外国领事原为刺探中国当局对复辟的态度而来，冯既有这样坚决的表示，也就不再多谈，告辞而去。

冯、段的政治活动

冯、段政治活动的方式，显然有所不同。冯之为人，性情温和，外貌朴素，政治野心不大。他在直隶、江苏都督任内，不干预当地的行政和财政，不扩充军队，不组织小集团，不安插私人为之四出搜刮钱财，由于缺乏经济来源，政治力量也比较单薄。当时北洋派中坚人物中，他是比较稳健、谨饬的一个。可是他的政治实力虽不如人，却也有一套政治手腕。他应付袁世凯的方法是处处谨慎小心，对待段祺瑞则往往逆来顺受。等到黎元洪做了总统，副总统一席；北洋派中可以逐鹿者只有冯、段二人。段要抓实权，情愿放弃副总统这个虚名，争取内阁总理。于是冯得到进步党和大部分直隶籍议员和一部分西南各省议员的支持，水到渠成，就当选为副总统。不久，府院之间又发生了摩擦，段祺瑞嗾使督军团哄走黎元洪，接着又打垮辫子兵，当然不肯再迎黎回京复职，副总统照例代理总统，他就是这样适逢其会地当上了大总统。

与冯的做法相反，段祺瑞早就抱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他网罗了一批所谓外交家、军事家和理财家，组织小集团；复借参战军名义，积极扩充自己的队伍。他历任内阁总理，掌握了财政命脉，先后经手借款达五万万元之多（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叶恭绰撰的《西原借款内幕》），有这一笔惊人的巨款供他运用，加以外交上也有联络，所以在袁世凯死后，北方的政治舞台上就让他翻云复雨地闹了好几年。

冯、段的交谊

讲到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十分深厚的。早期曾易子而教，段的长子住到冯家来，冯的长子住到段家去，两家往来甚密，亲如兄弟。当时有人说，他们这种深情厚谊，却在两次接替职务上（一为督办保定军官学校，一为总理湖北军务，都是段接冯的手）发生了裂痕。其实，在这两件事情上，即使在新旧交替时不免有些争执，事过境迁，也就完了。冯在这方面从未谈过对段有什么不满。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矛盾存在呢？有的。据我的观察，冯从那次响应西南，发电劝袁退位以后，就开始与西南有了联络，一直保持到他当总统，关系没有中断。这件事段最不痛快。安福系的中坚分子就常对我说，河间联络西南，是为自固其位。此为造成冯、段矛盾的因素之一。等到冯、段同时出任总统和内阁总理，一个是徒拥虚名，形同傀儡；一个是实权在握，敢作敢为。双方的摩擦就多了。虽然冯常常让步，矛盾终不可免。我看到有这样两件事：

阁员名单照例要送总统批准。冯在南京尚未进京，段将名单电请核准，时隔三天，未接冯的复电。北京方面的朋友来电托我探问真相。我见了冯，谈起阁员名单，他顿时露出极不愉快的样子，从公事桌的抽屉内取出了这份

名单递给我说："你瞧，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太不象话了。芝泉真是胡闹，我准备把它退回去。"我看名单内有曹汝霖任交通总长（他是筹安会中的健将）。可是名单并没有退回去，大概他又是经过了考虑，深怕刚做总统就给段一个下不来台，以后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仍然采用了让步的办法。

又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告诉你一桩荒唐的事情。我在江苏都督任内定的一批军火，被徐又铮在秦皇岛截留了（那时徐树铮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设有司令部）。这批军火虽然数目不大，在我也没有多大用处，问题是徐又铮如此跋扈，这群人的胡作非为，将来芝泉必受其害。"他边说边用右手的拳头重重地打了一下左手的手掌，看他的神气是十分愤慨的。

冯的忍耐和让步，到达一定程度，也会爆炸的。我已记不起为了一件什么事，由于府、院的意见不一致，总统拒绝盖印，总理竟一怒辞职而去。后来双方都脱离政治，闲居北京，时相过从，又复言归于好。

（冯耿光《辛亥革命回忆录》）

段祺瑞内阁纪略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陆征祥（十一月赴欧和会，次长陈箓代部）
内务　钱能训
财政　曹汝霖（兼）
陆军　段芝贵
海军　刘冠雄
司法　朱　深
教育　傅增湘
农商　田文烈
交通　曹汝霖

此次段凭借奉军入关之力重行组阁，所有阁员纯是北洋旧人，其个人主张当然贯彻武力政策。先是三月十七日，曹部吴佩孚攻克岳州；四月二日，攻克长沙；十八日，进至衡阳，于是主战派气焰大张。其时主和派如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所谓长江三督者，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段于四月二十日赴鄂犒师，一方面鼓励士气，一方面与长江三督联络，二十八日循江而下，由津浦路回京。但是和平空气仍在酝酿，吴佩孚首先入湘，政府以湘督畀张敬尧，吴至衡阳顿兵不进，亦其原因之一。同时，张怀芝军在江西溃于萍乡；五月三十日曹锟又回天津，实予主战派以重大打击。皖方主战，不得不借重直方，六月三日授吴佩孚威将军，倪嗣冲于六月十二日到津，向曹锟、张怀芝等疏解；二十日，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曹锟虽一度到汉，复回天津。至八月二十一日，吴在衡阳通电请罢内战，而段武力政策乃受了更重大的打击。

关于国会方面，西南护法，北方造法，在段武力统一之下，自是不顾一切。安福系国会开会，其所视为最重要者，即大总统选举问题。自洪宪失败，北洋部下即有以徐世昌出任总统之主张，但以南北统一问题，不得不请黎副总统出来。段祺瑞个性特强，对于政治重在权而不在位，平素以舍我其谁自负，责任内阁有权，故不肯放弃总理（徐树铮主持尤力），但自任总理以后，经过黎、冯，极感苦痛。他平时对于徐世昌，倍极尊崇，故始终拥戴徐，私以为徐为总统，己为总理，必能合作以大行其志。不知徐城府甚深，平时对于段（徐树铮）的跋扈早已不寒而栗，一朝得位，安能共事，而段不知也。此次大总统，安福系当然拥戴其党魁——段祺瑞，段坚决主推徐世昌。九月四日，安福系国会开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十月十日，徐就大总统职。未数日，即由外交方面酝酿以挤段，而段不得不辞矣。二十三日，段免职，以钱能训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此次段辞职原因，是吴笈孙（府秘书长）告我的。在冯一方面，张联棻、恽宝惠说："冯虽决定放弃总统，当时曾对我两人说：'我们这次栽（即输也，北方俗语）给芝泉，不算什么，以后再看我们的。'虽是解嘲，而内心之愤懑不平可见。其左右对段及小徐愤恨益深，仍想拼着再干。东海未就职前，深悉此中症结，所以当时表示冯段同时下台，冯段两派的人亦同时去职。徐树铮借赴日观操远引，亦以杜其再来搅扰政局，所谓暂时告一段落也"云云。并录之以备参证。

徐就职，通电尊重和平以谋统一。在钱代阁期内，因和战问题，十一月十五日，徐召集督军会议，到者奉天张作霖、安徽倪嗣冲、直隶曹锟、吉林孟恩远、河南赵倜、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山西阎锡山、绥远蔡成勋、松沪卢永祥等均列席，总统、全体阁员亦列席。讨论五项。其第一项即停战撤兵，此时欧战告终，和平空气经外交团劝告，几于弥漫全国。各督军本无成见，段亦不得不附和其议。十六日，令前方各军队罢战退兵，至二十二日，广东政府亦宣告停战，段亦不得不徘徊和战之间矣。计段自民国五年任总理后，对于政权紧握着，有时出以强硬而不肯放手，徐乃以和软的手段解除之，使其敢怒而不敢言，柔果胜刚，其信然欤！段此次免去总理后，以后即不得再任总理，于是专任参战督办，训练参战军——边防军，至于直皖之战而完全失败。国务院参议杨熊祥预言：有黄陂（黎）而合肥（段）碰壁，有河间（冯）而合肥下监，有东海（徐）而合肥盖棺矣！其言果验。

有此有一事足纪者，为张志潭秘书长问题。复辟后，段任总理，以张志潭为秘书长。张与段部下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都好，尤其徐树铮更好。他做秘书上长，所有国

务院秘书厅事，无一不与徐接洽，差不多就算徐做秘书长，后因王到隆承办永平一带盐务，张不能照徐的办法，因此徐非常恨他。段这次回来，仍以张志潭为秘书长。徐在天津即转电曾毓隽极力反对。曾向段说："现在徐树铮顶不满意他，还是不要他做秘书长。"段说："我用秘书长，徐树铮不能过问。"徐树铮就给张打电报叫他到天津，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去了，准备去当面和他解释。但徐树铮以奉军司令部总司令的威风，见面后历数张志潭的大小罪恶，当面逼问。张样样都承认。徐并问他："以后改不改？"张说："改。"又说："以后段老总方面的事，你不许参预。"张说："以后不参预。"这样俯首听命，徐只得又让他回来了。有人说："如果张志潭这次稍微硬一点回上一两句的话，脑袋一定保不住了。"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很大的问题，徐（总统）段、徐（树铮）靳就把北洋的旧局面翻腾了。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曹汝霖忆西原借款

曹汝霖在《民初外交回忆录》中写道：

复辟之后，旬日敉平。段合肥入京组阁，仍征余长交通。余以被交通银行股东会举为总理，深恐不能兼顾，乃力辞不获。接任未久，有日本人名西原龟三者，以公府（当时称总统府为公府）顾问坂西利八郎之介绍来见。自称奉寺内总理之内命，来华谋改善国交力图友好，力言大限内阁政策之错误；又云贵国目前最困难者莫如财政，因受四国银行团之限制，不能单独任事，惟如有所需，敝国愿尽微力。此次以私人资格请见，不经日本公使介绍即是如此。坂西又盛称寺内任朝鲜总督时，西原幕后策划，深得信任云云。余以交通银行挤兑以后，元气未复，姑以银行名义商借日金五百元万，以观其信用。西原电东京后，由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回电允许，并未要求抵押，借款乃迅速成立，方信其言非夸。后以财政总长梁启超辞职代以王克敏，不久王又辞职，合肥坚邀余兼任财长，余辞以无此精力。合肥云，交通部有誉虎在，君请多问财政部事可也，坚辞不获，乃就任财政总长兼职。

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地方扣留，发内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借外债则有四国银行团之约束，缓不济急，且亦不易磋商。因西原有如有所需可以效力之言，乃与商向日本政府借日金二千万元以有线电报作抵押品，得到成功。并称此款由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垫借，不向市上经募，故可省却手续费及借款折扣等等，故合同订明实足交款不折不扣云云。余感其诚恳敏捷，并言此后中国建设需款，希望多助。彼答称若为建设借款更愿效力，此款彼此心照，不限定用于电信方面。叶次长要求拨五百万给交通部为修理海底电线，余亦照允，余则全挪为政费。以当时政府军警、教育、出使等各项经费，每月约需二千万元，而财政部所收关盐余、烟酒税、印花税等，合计不足一千二百万元，悉恃借款为弥补。后以开支不继，又陆续向日本商借，日本方面亦有难色，派员来商，实则调查情况。西原从中斡旋，又允续借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此是西原授意，以银行方面只知道要数量较大之抵押，若以森林为抵数量甚大，而采伐困难则银行不知也。森林金矿均属于农商部管辖，商得田文烈总长同意，亦由日本专员来华签订。（按此款系由中华汇业银行出名签订。）

但政府出兵不利，局面又非，余甚灰心。合肥亦以政令不行，府院意见不合，亦有倦勤之意，拟商借二千万日金以为结束之计。西原在京深知我国内情，颇同情于合肥，自告奋勇，愿回国面陈，予合肥以最后之援助。其时日本寺内内阁亦有改组之说。正在磋商之际，合肥忽与河间宣告同时下野，借款问题因之搁浅。交通银行方面极愿将此款移作交通银行商业借款，余以有总理名义关系姑允试商。经日本调查之下，居然允将二千万日金移借交通银行。（按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缔借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冯段同时宣布下野是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之事，曹氏此一段记忆可能有误。）

追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合肥退任参战督办，钱能训组阁，仍强留余联长交通。余力辞，徐亲自极力挽留。余以东海知遇，感于私谊，遂允联任。东海就任后，主张和平统一，需款更巨，财部无法支应，乃与日本续借二千万日金。时日本外相为后藤新平，曾任南满铁路总裁，东海任东三省总督时与之颇有交谊。经后藤之斡旋，此项借款得以成立，惟要求以德国已失之高徐、顺济铁路借款权为担保。余恐有问题，不肯照允。东海急于用款，且以借款权德国已丧失，移作日债担保同是外国，无甚分别，命余照允。（按同时尚缔借满蒙四铁路借款日金二千万元一笔，曹氏度已忘却，只提此一项。）

夫借款必有抵押品，中外皆同，而抵押品之轻重则大有不同。西原借款为日金一亿元，与善后借款英金二千五百万镑相比，数目虽差，亦不能谓为小借款。然一则以生命线之盐税作抵，按期还本付息，本利无亏；一则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作抵，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至今分文未还。合同载明实足交款，不折不扣，方以为开外债未有之先例，岂知直皖战争皖方失败，合肥下野，吴子玉遂以此为罪，遽命政府通缉，为世诟病，真始料所不及矣。

（摘自《民初外交回忆录》曹汝霖）

北洋派分裂之内幕

英文沪报社论云：日来又有北京总理段祺瑞拟欲辞职之说传出。北京段氏此种拟议，是否将成事实，乃以某某有势力之督军之态度及扬子流域在预期中之某种发展为衡。现于数日来之事情，段氏迩日颇为烦恼，可以想见。曹锟甫返天津，张怀芝又率全部参谋员匆匆回徐州，此等迅急之发展，将若何影响于湘省之战局，今尚不可知。然曹、张两氏之态度，可以发生重大之结果，此则吾人所为拭目以待观其究竟者也。兹就吾人所得报告，综述大局形势如下：

原第一军司令兼两湖宣抚使曹锟之率兵南下也，本为徐树铮之诡计所迫。其始曹氏但知北军攻取岳州、长沙后，即罢兵与西南言和。迨岳、长既下，而曹又奉命再率兵南下以攻衡山、衡阳；再则曹军于攻岳、长有功，当局并未予以具体的承认，而罕有战功可言之张敬尧，反被任为湖南督军，此实曹锟所部第三师之耻。然曹氏并未有不平之言，仅顿兵不再进而已。维时曹之弟曹锐，忽传一可异之谣言至汉口，谓徐树铮欲自为直督，或令奉督张作霖调任。此说虽乏实据，颇有可信之理由，果尔则曹锟将失一督军位置矣。夫政府曾以两湖巡阅使一职许与曹氏固也，然此种职位，实无价值，如张勋曾为长江巡阅使，迨率部退出南京，根据一失，即仅拥一空名而已。曹一闻此耗，立即辞职，北京不许，并保证决不更动；同时王占元、张怀芝、陈光远等一致反对此项更调，并联名致电北京，公然言之，然曹氏仍不肯再进兵。段氏因欲祛此因疑而生之障碍，乃亲往汉口疏通，其结果在湘北军乃稍稍进行。然此奋兴之效力存在不久，一二日后，所谓第二军者，遂获大败，和平之呼声又起于某方面。维时北京渐闻曹锟与张怀芝间曾有密约，及不愿促进战事之意，彼等致北京之电报，亦公然反对再行南进，其理由以山路崎岖，彼等部下多患病故也。然北京不甚注意于此等报告，以为曹、张所欲者，不过金钱，于是尽力向日本借款，中日新约之速结，职是之故。维时曹锟屡次称病乞退，在此时期内，曹、张并力请在北京任徐树铮为北军总司令，或为第一军或第二军司令，卒得北京答复，谓将任徐为攻粤军司令，而非在湘北军司令，旋徐南下至汉口。据可靠消息，曹、张见徐后，皆痛责之。徐急离汉至衡阳，与吴佩孚商量。吴佩孚者在湘南作战之主力，北军之司令也。于是曹锟不待北京准许，即离汉回津；翌日张怀芝接踵亦行。于是遂来段祺瑞拟辞职之报。

按此中种种纠葛之原因，可以数语括之，即徐树铮之野心与自大是已。当反抗西南之战事之初起也，徐手下无一兵一卒，迨曹、张诸将率兵离任，实行为徐氏援助，徐乃阴谋以夺彼等之根据地。就位分而言，徐远在曹、张之下，然段总理事事令曹、张与徐商量，一若徐为三军统帅者，然亲临战阵者为直隶、山东两省军队，而日本所供给之良好军器子弹，皆畀诸奉天军，徐氏即藉奉天军以谋压倒曹、张诸将焉。然徐氏否认彼欲为直隶督军，亦无以张作霖代曹锟之企图。曹、张乃另出方法，以究徐氏之真目的究竟安在。后乃知北京之意，实欲直鲁军队攻入广东，而徐乃率奉军长驱入广州，居征服西南之功，所谓他人出力，而我食其果也。夫此种举动，既非为国家，亦非为北洋派，直为一人之权利，则曷怪曹、张之决然不再干乎！吾人试曹、张之心理，必自言曰：果徐欲为两广巡阅使者，任彼自己打入广州可耳，吾辈再与西南战，殊无益处，不如归休。按曹、张此举，断然于段祺瑞大失体面，使曹、张先请命而后行，段之面子便可保全。今则使曹、张无此请命之机会，盖段氏之代表徐树铮已到湘南，图劝吴佩孚独立行动，谓吴若能不听曹锟命令而作战，将以湘督一席畀之。事势至此，曹氏安能再待乎！徐欲以贿赂方法取得第三师之赞助，曹乃撤兵以应之，斯诚针锋相对之妙法也。至于纪律二字，可以不谈，试思国务总理之代表，亲自贿赂一军队之将佐，以期倾陷该军队司令之地位，更有纪律之可言乎！是以曹锟不别而行，以掴段祺瑞之脸，张怀芝亦不辞而去，以批段氏之颊，虽然丧失面子，尚子足以尽事实。须知此实徐树铮阴谋所造成之纸屋崩颓之起点，段派被挑战之先声也。段氏将起而应战乎？抑自认失败而退走乎？尚不可知。

至在湘、直、鲁军队间必有严重之发展，倪嗣冲之皖军与张怀芝之鲁军，已有一部分从前敌撤退，此后或全部撤回，殆随时可见诸事实。然此虽重要，尚无命脉关系。时京电称长江三督联名电政府，请速与西南为根本之解决。此所谓根本解决为何，不得而知，然主和之运动，又在进行，断无疑义。盖使北军中有为餍足段、徐二氏之野心起见，而愿牺牲彼等之生命者，则最近之未来，决无和平可言。今曹、张退出战地，和平运动殆已发轫矣。段氏曾宣言非征服南方，或南方允无条件之投诚，决不停战。今最有力之北军将领主张和平，段将如之何！又段氏曾言："余至不能与西南战时即行辞职"。今辞职之期已到。又闻王占元、曹锟、张怀芝、倪嗣冲曾联名电请政府，将新中日协约之原文宣布，以告全国。此电甫出，旋即继以与南方解决之要求。夫段氏关于中日协约亦曾自言："倘有意外之事发生，至不能再守秘密之时，余愿负其责任。"今全国人民连各省督军、省长均反对此秘密，段将如何负其责任乎！彼将训令各省督军如对于学生然，令彼等自治其事欤？抑将承受此次要求，为挑战而立即自行退休欤？抑或从徐树铮之策略，借奉军之赞助，到底以武力解决乎？

（摘自《戊午周报》第9期1918年7月）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月十七日修正国会组织法、修正参众两院选举法,命令公布后,聚集广州的一部分旧国会议员,于三月初旬发出通电,诋代理总统冯国璋破坏国法,从二月十七日起,不承认他是合法的大总统。

当是时,段祺瑞辞职居津,徐树铮滞留奉天,冯国璋认为这是他操纵选举、谋夺下届总统的良好机会。冯密嘱他的"驸马"将军府参军陈之骥、总统府庶务处长张调辰,提出这个问题,向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商议,因冯素知一麐与宪法研究会有渊源也。

张一麐是一个谨慎人,坐在公案上办理文牍,他优为之,若奔走联络,非其所长。他当即向陈、张二人说道:"此事须找叔鲁(王克敏字)。"于是由陈之骥假传圣旨,把财政总长王克敏叫到总统府,他们四个人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

王克敏平素看见他的"岳父"王揖唐以办党起家,心中十分艳羡,今日居然碰着这一宗好买卖,极为高兴。

王克敏是一个精明人,回宅以后,仔细思量,此事须要慎重。他认为:"冯国璋不能比袁世凯,冯若肯大破悭囊,自己掏腰,就乐得效力帮忙,从中取利;若要滑头,叫我王某在财政部或银行先行借垫,那就敬谢不敏。"王克敏主意拿定,第二天即邀张一麐同见冯国璋,王克敏开口即说此事需款二百万元。这一句话,把冯吓了一大跳;少顷,神色略定,勉强说道:"现有南京汇来的利息四十万元,先拿去用吧。"冯亲手将支票交给王克敏,并很郑重地说道:"此事须要办的有把握。"王接款后,立赴小绒线胡同,将款交给宪法研究会政务部长王家襄,并声明"只此一次,下次不管"。

宪法研究会党务部长梁善济,是一个山西商人,凡事都要精打细算。他收到此四十万元以后,即分派各省党员,回籍办理选举,每人发给交际费及路费二千元,以能当选为限,若不能当选,原款退回。一般旧国会议员,自一九一七年六月,经黎元洪解散,潦倒京寓,已将近一年,闻此办法,有许多人不愿回籍竞选,因恐倘不能当选,还不起这一笔债务。选举结果,宪法研究会当然大失败,而冯国璋的四十万元遂掷诸虚牝。所以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冯国璋临死的时候,尚对其长子冯家遂说道:"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五百七十万元、张调辰这个小子侵吞了三百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四十万元,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

关于新选举,宪法研究会固然大失败,安福俱乐部亦未占到胜利。因此次选举并不是真正选举,而是含有指派性质的。各省军民长官,奉到安福俱乐部密示的议员名单,并不完全遵照办理,而将自己的至亲厚友羼入了许多。不过此一类议员到京以后,各遵本省军民长官之嘱,都在安福俱乐部挂上了名字。

安福俱乐部是一个议员招待所,不是一个政党;因既无党纲,又无政策,只是一大部分议员,每月受徐树铮、王揖唐招待而已。

安福俱乐部列名的议员,每月受津贴三百元,确系事实,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一个;此系王揖唐的主意,意在勉励议员。而梁士诒等竟散播谣言,大肆挑拨,造出津贴分列四等之说,绝非真相。不过有少数不安分的议员,例如乌泽生、郑万瞻、克希克图、康士铎等,往往巧借名目,讹赖交际费,则随时有之。

安福俱乐部的组织甚为简单,譬之一家商店,徐树铮是财东,臧荫松是内柜的掌柜,王揖唐是外柜的掌柜。王揖唐对于金钱,并无权随意开支。关于一切支出,须经臧荫松核准。王揖唐对于此种办法,心中不甚高兴,然在徐树铮箝制之下,无奈何也。

当是时,徐树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段祺瑞、徐世昌几等于帝政时代的太上皇,而国务总理、国务员,亦须屈意与之联欢,因国会议员掌握着同意权及弹劾权也。此时奔走北池子徐宅之人士,约分四类:

第一类:老学究　徐树铮幼受书毒,咬文嚼字;他最得意的一部书,就是《古文辞类纂》,每日有暇,即圈点讽诵,不离手也。因此之故,他对于世所称文学家,颇能推崇优礼,最著者为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姚文朴、林纾、王式通等。

第二类:势力鬼　徐既揽权怙势,一般以升官发财为目标者,当然趋附恐后。此类最著者为曾毓隽、曹汝霖、李思浩、龚心湛、姚震、梁鸿志、王郅隆、丁士源、姚国桢等。

第三类:各省代表　最著者为甘肃陆洪涛的代表董士恩(士恩系洪涛之胞弟,因过继舅家,故冒董姓),安徽倪嗣冲的代表倪道杰,山西阎锡山的代表田应璜,山东张树元的代表张满元,奉天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河南赵倜的代表胡鼎元,江西陈光远的代表李盛铎,湖北王占元的代表魏联萌,陕西陈树藩的代表何毓璋,福建李厚基的代表王永泉,新疆杨增新的代表杨增炳,湖南张敬尧的代表张敬舜,直隶曹锐的代表杨以俭等十余人。他们因徐此时权势,有祸福人的力量,故每逢星期六晚间,北池子徐宅照例聚集朋友之期,他们必不约而同地齐集徐宅客厅,探听消息,预备向本省长官报告。

以上三类,均与安福俱乐部无关,其中虽有几名国会议员,然系以私交关系或以代表资格参加,非以议员资格参加也。

第四类:安福俱乐部少数不安分议员,当时徐树铮在安福俱乐部仿佛是一个总经理,一般不安分的议员,自以为已经有了接近政府的资格,他们听得北池子徐宅每星期六晚间照例高朋满坐,他们攀附心热,遂麕集徐宅,作

了不速之客。徐有时需要与诸友商议要政，这一伙议员绝对没有列席的资格，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然心中已十分厌恶。于是将星期六的例会，潜改为星期二，他并对王揖唐道："请转告议员诸公，没事不必瞎跑。"此一类议员除上述乌、郑、克、康四人外，尚有二十余人，姓名从略。

世之论者，多将段派及安福派混为一谈，实乃大误。所谓段派，乃段祺瑞自小站练兵起，久共甘苦的朋友及他的学生。此派多军人，最著者为杨善德（一九一九年八月去世）、卢永祥、段芝贵、李厚基、曲同丰、马良、陈文运、魏宗瀚、田中玉、倪嗣冲、许世英、龚心湛、贾德耀、卫兴武、张敬尧、陈树藩、吴炳湘、吴光新、张树元等。以上所列诸人，惟倪嗣冲与徐树铮实行合作，张敬尧、陈树藩虚与敷衍，龚心湛因希望组阁，时与徐联络。此外多数反对徐树铮，因他系一个少年新进，而又态度狂傲，目中无人。段的一班老朋友尤深恶之。

其时，靳云鹏因与徐树铮争权，亦树党植援，自成一派，军人中亦有归附之者。然仅系旅团长阶级，政界人士以张志潭、潘复、屈映光三人为最著。张志潭屡被压抑，心中甚愤。潘复、屈映光志在升官发财，他们趋附靳云鹏，只是借为升官捷径。至于上述段派旧人，因靳为人卑鄙，多看不起他。表面上靳好象是边防军的总领袖，然边防军三个师长曲同丰、马良、陈文运皆与他不睦，尤以曲同丰为甚。因曲与鍾麟同关系极深，辛亥秋间，勒云鹏在昆明陷害了鍾麟同，故曲每谈及靳，辄切齿痛恨。

段派嫡系军人中与靳云鹏接近者只有一傅良佐。傅原与徐树铮交厚，他到湖南作督军，亦出于徐的主张。及至傅良佐失败回京，徐每与之见面，辄詈其"不中用，太丢人"。傅因羞变恨，遂转附靳云鹏。

所谓安福派，乃系徐树铮预备脱离段祺瑞，自创局面。在他的心目中久视段祺瑞是他的陈胜吴广，甚至认为段存在，是他前途发展的一种障碍。他既暗中酝酿自作领袖，所以他的一切布置，绝对不愿段派老辈预闻。其中只有曾毓隽是段祺瑞练兵时代的幕友，但曾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他趋承徐树铮，无所不至。他又拉扯了他的密友梁鸿志、庄景珂，对徐包围。徐自作领袖的阴谋最初只与臧荫松密商，被臧戟指痛骂。以后徐即与曾毓隽密商，曾初闻此语，几于三呼万岁，于是二人终日密议，如何削弱段祺瑞，如何抵制靳云鹏，如何勾接外援。徐树铮作事荒谬，举动暴横，当然归于失败，而推波助澜，狼狈为奸，则曾毓隽不能辞其咎。

（刘冰天）

历史考证

程璧光被刺之谜

1918年2月26日。广东海珠。

一个针对着护法舰队统领、海军总长程璧光的阴谋计划，已经到了最后实施的时刻。当天晚上8点多钟，随着两声罪恶的枪响，程璧光倒在了血泊中！

程璧光，字恒启，自署玉堂，广东省香山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海军统帅之一。他16岁入马江水师学堂，毕业后充任"扬武"舰见习生，因是广东籍人，广东舰队初建时，调程璧光任"广丙"舰管带。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程璧光担任领队，率领"广甲"、"广乙""广丙"等舰赴北洋会操，尚未返回广东，中日战事已起。程璧光当即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率舰赴前敌"，得到允许。在威海之战中，程璧光在日舰的炮林弹雨之下，"独立'广丙'舳首应战，自朝起至日中。腹被弹，血染中衣过半，不知也"。最后终因弹尽援绝，北洋舰队被迫向日本舰队投降，程璧光奉命前去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联络接洽受降事宜，因此甲午战后被撤职离舰，返乡闲居。在此期间，程璧光结识了誓以反清革命为己任的同乡孙中山。孙中山劝他"同任光复事"，他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并且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不久，孙中山策动的广州起义事泄夭折，程璧光为逃避追捕，"亡命海外"，而他的弟弟程奎光则被捕遇害。流亡海外期间，程璧光与革命党人联络渐疏，两年后，又被清政府起用为"监造军舰专员"，赴英、德等国购回"海天"、"海圻"等舰，致力于中国海军的重建。

辛亥革命爆发时，程璧光正受命率"海圻"舰赴英国祝贺女王登基。后又"赴美利坚、墨西哥、古巴慰问侨民。中国军舰至远西自此始"。1912年，程璧光率"海圻"舰自欧美归国，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想拉拢程璧光为己所用，对之优礼有加，而程璧光觉察到袁的帝制自为的野心，便效法三国时代刘备的故事，"阳为柔谨，日以粮鸟灌园自晦"。实际上，他是坚决反对袁世凯葬送民国、帝制自为野心，但又感到孤掌难鸣，无能为力，陷入深深的忧患之中，"与人书，自恨不速死"，宁死也不愿作帝制帮凶。

洪宪帝制覆灭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程璧光同在晚清海军中共过事，"程尝为'广丙'管带，黎公以管轮属君，甚相得也"，私人交谊很好。此刻，黎元

洪既想依靠程璧光来整顿和掌握海军，又想以程璧光为臂膀来对抗北洋派军人的势力，“以是委任甚专”；程璧光也不负重托，“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正身率物，日召诸将以奢惰为戒，故是时诸部皆窳败，而海军事独起”，海军重又成为一支独具威慑力量的武装。在其后的“府院之争”中，程璧光坚定地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段祺瑞和北洋派督军的专横跋扈。张勋复辟时，他又和全国人民一道声讨张勋和封建余孽的倒行逆施，“与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宣檄以讨张勋”，受到全国舆论的褒扬。

1917年7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程璧光毅然率领部分海军参加，统领第一舰队“移师粤海”，加入护法阵营。“当是时，刘冠雄及海军上将萨镇冰，数以无线电阻海军南行，凡五、六至，卒不能动”，可见其决心之坚。率领海军参加护法运动，这是程璧光一生事业的顶峰。1918年2月26日，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面临胜败兴废的关键时刻，程璧光在广州海珠遇刺身亡，年方60岁。“护法诸省闻之，知与不知，皆失声恸”。程璧光被刺身死后不久，孙中山就被迫辞去了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就于此降下了帷幕。

凶手到底是谁？首先涉嫌被捕者为水鱼雷局局长周淦。周淦被拘留于督军署数十天，经过数次提审和侦讯，既无周某作案的实据，又找不到他行凶的确证，只好宣布无罪释放。此外又陆续拘捕了其他数名嫌疑犯，然而也是“皆以不得要领置之”。追捕凶手的工作，陷于困境。

程璧光遇刺身死，凶手久捕不到，引起护法军政府的极大震惊。孙中山大元帅府发出了《缉凶训令》：

海军总长程璧光，突于本月26日午后8时半，在海珠码头，被凶徒狙击，洞中胸脏，创剧遽殁。该凶徒残害元勋，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而该管地方军警，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立获正犯，殊难辞责。为此令行该代理内政总长，仰即令饬广东地方检查厅，通令地方军警，一体严缉，务获征办，以肃法纪，而慰英灵。

广东督军莫荣新，也于案发后发布“悬赏缉凶”布告，文曰：

为悬赏饬缉事，照得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害身故，显为敌人所忌，主使凶犯，暗行刺杀。省垣重地，竟有此不法举动，言此深甚痛恨。现下凶手在逃，除饬行军警严密查缉外，合行悬赏缉拿，仰诸色人等，一体知照。如有侦悉此起凶犯确实踪迹，报信拿获，一经讯有确实供证者，即赏花红银一万元，以示奖励。赏银现封存库，犯到讯实，即行提取，决不食言。

数月后，赏格增加到5万元，本来希望以此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效，但结果却“缉凶案悬数月，未得解决”，行刺凶手依然踪迹渺茫。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踊跃提供线索。据说某军政要员，当晚也应电报局长之邀与程璧光同席，比程璧光约早10分钟渡河。在经过码头木栅栏时，好象看见有两个人突然站起，“迎面逼视”，该要员不免心中疑惑，向前走了几步又回顾，见那二人“似有回避意”，他也未再深究，就自管自走了。当地警察局中也有人报称，程璧光被刺前几天路过码头时，就已经有人在一旁窥伺了。然而，“凡此皆扑朔迷离之词耳”，即使确有其事，也只能说明暗杀程璧光的阴谋是早已在策划与进行的，对于缉捕凶手的工作却难有多大帮助。时人感慨道：“真凶未获，鸿飞冥冥，滔天巨案，破获何时？伤哉！”

70多年过去了，刺杀程璧光的凶手一直未落法网。他究竟是谁？躲到哪里去了？

程璧光被刺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有些论者写道：“1918年1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他们抢杀了拥护孙中山的海军部长程璧光，并勾结国民党右派议员操纵非常国会。”西南军阀认为海军是当时孙中山所实际能够依靠的军事力量，而孙中山又主要是通过程璧光这个关键人物来联合海军的，除去了程璧光，就等于对孙中山釜底抽薪。显然，这些论者认定程璧光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拥护孙中山”，从而成为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障碍，遭到西南军阀的忌恨，中了滇桂军人的黑枪。

南下海军对护法运动所起的最大不良影响，是积极参与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1917年底，海军附和桂系，联名发表“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规定以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海军程璧光为联合军事代表，而孙中山则只居一个政务委员空名。这样，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实际上成了“拥护实力派以抵触军政府的组织”。护法人士称此为“乞降之兆”，章太炎说：“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主张“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联合会议搁浅后不久，海军又与滇桂军阀和一些投机政客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要求废除大元帅，设多人总裁，实际上是要剥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使实权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愤而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以往论者多将护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西南军阀的破坏，当时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的邵元冲则指出：“桂系即使横暴，若海军能坚持护法南下时之主张，则桂系犹将有所忌惮而不敢恣睢。无如当时之海军惟利是附，一经桂系之利诱，即不能自坚其初心，桂系遂益得而为所欲为矣。”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觉悟到，旧式海军“皆无才而多坏”，理解到革命不能依靠陆上军阀取得成功，同样也不可能依靠海上军阀得到胜利，从而产生出“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之决心”。

凡此种种，都表明程璧光在政见上与桂系并无分歧，显然，程璧光与西南军阀搭档得很好，与孙中山则离心离德，既然如此，滇桂军阀有什么必要采取极端手段暗杀他

呢?

其实,剖析程璧光被刺一案,不能只注意西南军阀的言行,而把北洋军阀完全排除在外。汪精卫在为《程璧光殉国记》作序时说:程璧光率海军舰队南下护法后,北洋政府曾派遣使者来向他"游说万端",他却坚持说:"如果想要我罢兵息争,并不困难,只要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就行。"由此可见,程璧光之"与非法者争,为国是而争也。争之不已,而至于与非法者以兵革相见,为国是而兵革相见也。乃至以兵革相见之故,为奸人忌,以至于死,为国是而死也"。程璧光在世,受威胁最大的是北洋系军阀。首先,程璧光与黎元洪关系非同一般。上引《程璧光墓志铭》说:"黎公既践位,镜意完葺海军,知非君无可恃者,又时袁氏余櫱犹在,举事数不如意,亦欲倚君为心膂,用以自强,以是委任甚专。君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可见黎元洪起用程璧光,主要目的就是要程掌握海军,结为强援,以与北洋军人相对抗。在黎元洪与北洋军阀的一系列冲突中,程璧光都是旗帜鲜明地率领海军站在黎大总统一边,表现出鲜明的反段(祺瑞)立场。1916年夏,段祺瑞上台伊始,废弃民元《临时约法》,数日后,海军各舰队暨各舰长即联合通电宣告独立,表示"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之命令,概不承受"。1917年5月,段祺瑞故伎重演,指使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立即和其他内阁成员共同提出辞职,使段祺瑞成为一个空头总理。同月,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一职,北洋督军蠢蠢欲动,企图举兵谋叛。海军闻讯,当即派遣战舰前往安庆江面,镇慑首先倡乱的安徽督军倪嗣冲。这些都表明,程璧光与北洋军阀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海军掌握在他的手里,北洋军阀就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其次,程璧光率舰队参加护法后,对当时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东南沿海省区威胁极大,连北洋巢穴京津也处于海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孙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已操制海权矣"。他自信有了海军的援助,再出动1万陆军,那么只要10天就可以打到武昌,把握中原要冲,从而迫使北洋军"非降即逃而已"海军的南下,加强了护法阵营的武力,曾经支援护法军队攻占长沙,又曾配合护法军征讨福建,并且平定了两广地区与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叛乱。事实表明,程璧光可能会与西南军阀拉拉扯扯,但他与北洋军阀则是势不两立的。

由于程璧光率领海军主力舰队参加护法,增强了护法阵营的军事实力,使得北洋军不敢放胆进攻南方,对他,北洋军阀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当时,北洋军阀派遣许多密探在西南地区活动,他们的间谍报告中对程璧光和海军的动向十分重视,这很可能就是在捕捉对程下毒手的时机。刺杀了程璧光,既可以彻底剥夺黎元洪的武力基础;也可以拆孙中山护法军队的台;还可以在护法阵营内部制造矛盾,挑起争端,以坐收渔人之利;又可以利用刘冠雄等人把程璧光带走的海军重新拉回来为己所用。真可谓是一石数鸟之计!程璧光刚刚被刺,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徐树铮就立即致电新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刘冠雄,认为南下海军失主,势必群龙无首,可能北归,要刘冠雄"务乘此机切实注意,早日下手"。由此可见,刺杀程璧光,正是北洋军阀所迫不及待要做的事。

上述推测,不可谓没有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而仅凭推理是不能成为历史的。所以,程璧光究竟为什么被刺,可以说还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摘自《民国春秋》)

苏曼殊的生母究竟是谁

苏曼殊是我国近代著名作家和杰出诗人。一八八四年出生,父苏杰生,曾任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买办。苏曼殊早年求学日本,学生期间就与在日本留学的章太炎、陈独秀、刘师培、张继等交往密切,并加入华侨革命组织。资助其生活的表兄林紫垣反对他从事反清活动。苏曼殊被迫回家,不久削发为僧。苏曼殊虽说出家脱俗,但并未忘世。

一九〇九年加入南社,与陈独秀合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自译了拜论诗选。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等多部小说,并写了不少旧体诗。苏曼殊的旧体诗虽说多般是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但是,他的诗感情真挚,写出了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真实苦闷。苏曼殊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译作,在清末民初影响极大。章士钊称他为"一时南社广诗才,著个诗僧万象开"。鲁迅早年受过苏的影响,在《坟·杂忆》一文中说:自己当年读苏译《拜伦诗选》而"心神俱往"。

但是,苏曼殊的生母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在研究者中已争论有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悬而未决。柳亚子最早写苏曼殊传,在《苏玄瑛传》中说:"母又越在海外",曼殊"数东渡倭省母"。该书没有提出苏母姓名。章太炎则提出苏曼殊是日本人,"其先日本人也",其"母河合氏"。苏曼殊是由河合氏带到苏家的。以后,当柳无忌写《苏曼殊年谱》时,问柳亚子要有关材料,柳亚子将署名飞锡所写的《潮音·跋》一文找出并细读后,发现旧作《苏玄瑛传》"荒疏过甚",决心"详考其身世"。通过冯自由介绍,柳亚子与苏曼殊表兄林紫垣、堂弟苏维翰、异母兄苏煦亭、学友张文渭进行了通讯联系,柳亚子宣称由此"才把曼殊的血统和家世,完全弄清楚了"。在重新撰写的《苏曼殊传略》和《重订苏曼殊年表》中,他说:苏曼殊是一个中日混血儿,生父

苏杰生，生母为若子，养母为河合仙。在《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笺注》中，说：若子"是一日本乡间女子，在（苏）杰生处当地下女"。换言之，苏曼殊是苏杰生和女佣人结合而生的。此论一出，多数研究者从之。近年来，我国新出版的苏曼殊著作前言及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曹旭《苏曼殊诗歌简论》、伍访秋《苏曼殊论》等，都持此说。

苏曼殊的同学陈国权则持第二种观点，他说：若子是河合仙侄女，她原住乡下，应河合仙之邀请，到苏家助理家务。

苏曼殊的九妹苏慧珊近在海外发表了第三种观点，她说：若子是河合仙之妹，她随其姐来苏家，自愿作偏房。《近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中，马以君《生母·情僧·诗作—苏曼殊研究三题》赞同苏慧珊说，该文并陈诉理由四条：第一，陈独秀见过河合仙，并说她与苏曼殊很相象，而相处"随地可以表示出母子间亲爱的关系"。但是，苏曼殊不承认这点，只说河合仙是亲戚。马文认为，这是养母又有血缘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第二，苏杰生的二妾大陈氏曾转告柳亚子说，苏曼殊的大哥苏熙亭是河合仙所生。这证实河合仙确有其妹而又为苏家生过孩子。当年大陈氏住在日本横滨苏宅。陈的话有可靠性。苏慧珊之说也来源陈氏，两者吻合。第三，苏曼殊在《画跋》中曾题："吾姐榎木荣子属画"。"吾姐"提法也在其它跋中出现。苏曼殊并无姐，苏家未曾有过榎木荣子此人，日语若子"贺哈家"，荣子"贺沙家伊"一音之转。唯此，可能是苏曼殊"思维身世，有难之恫"，才如此以假存真的。第四，苏曼殊与养母河合仙感情深厚，至临终仍"念东岛老母"。马文推测，这是生母又有血缘的特殊关系的原故。

马文虽立论充分，但有些地方仍属推断。下女、侄女、胞妹，若子究竟是怎样身份的人，揭开此谜底，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

（摘自《中国历史悬案百题》齐鲁书社）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任职

据李义彬撰文介绍，有两种看法。

【李大钊同时担任教授和图书馆主任】"1942年李大钊同志殉难十五周年的时候，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该文说：当时'大钊同志就被聘为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兼图书馆长职'。这种同时担任教授和图书馆主任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

【李大钊先任图书馆主任后任教授】"建国初，金毓黻先生曾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证。他说：'1918年2月，章（士钊）先生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继续他作图书馆主任，蔡先生就答应了，自是时起，大钊先生就作了北大图书馆主任，但是不兼教授。'他又说'我又从北大不完全的档案查出，自1920年9月起，北大教授中就有李大钊姓名在内，一直到1925年8月。'但大钊同志究竟从何时起担任北大教授，金先生没有查出。"

"根据笔者接触到的史料看，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不是1918年2月，而是1918年1月。他开始担任北大教授不在这时，而是两年半以后。《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记载：1920年7月8日，北大评议会一致通过，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这是可靠的。""高一涵先生与大钊同志长期共事，1927年5月他得悉大钊同志惨遭军阀杀害的噩耗后，为悼念故友，曾撰《李大钊传略》一文，发表在1927年6月23日出版的武汉《中央副刊》第六〇号上，其中谈到'段内阁成立，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因守常投闲，故以图书馆主任一职让之。此为守常入北京大学之始，时民国七年也。守常入北大后，越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史学系教课。'"

（摘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风云人物

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清末民初著名的官僚政客。祖籍直隶天津，1855年10月20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省汲县。早年结识袁世凯，受其资助，北上应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和国史馆编修。曾任清政府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民国成立后，担任过内阁总理和总统。

徐世昌的仕宦生涯是从参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的。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经袁奏请，1897年徐以翰林身份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经常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和张勋、段祺瑞等结成深厚情谊。自此成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谋士。

日俄战争后，东北的形势非常紧张。1906年底，徐世昌奉命赴东北考察政治。回京后，他向清政府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将东北改为行省，设总督一人，

“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清廷依其请，1907年4月改东北为行省，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在各省督抚之上。在主政东北期间，他积极主张“广开商埠”、“聘用洋人”、“举借外债”、“引进英美势力”，以“抵制日俄”。同时，他又积极推行“新政”以求内治。但由于加征捐税，聚敛逞能，招致了人民的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奏请将北洋军第三镇及另外两个混成旅调往关外。又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成立“巡警”、“劝业”道。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1909年，因受袁世凯罢官的影响，徐世昌被内召为邮传部尚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扑灭革命。他去河南彰德与袁密谋，代其向清廷要求权力。袁世凯组阁后，他退出内阁，表面站在清廷一边，实则仍参与袁的机密，作为逼迫清帝逊位的“内线”。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徐表示“国变忧愤”，力辞太保，避至青岛隐居。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会以后，徐应邀出任袁政府国务卿，时人称为“相国”。1915年10月，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善于窥测时局的徐世昌知其必有风险，遂向袁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他认为，“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谋为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洪宪帝制很快覆灭。徐果然不食前言，再度出任国务卿，为袁效力。1916年6月，袁病危，托徐以家事。袁死后，他因实力不足，无法承袭其元首地位，乃故表淡泊之意，再回水竹村，自称“水竹邨老人”、“退耕老人”，以待时机。

1917年5月，“府院之争”爆发。段祺瑞被免职后，其党羽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拟推徐为大元帅，被他拒绝。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任徐为弼德院长，也被他借故推脱。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实权则操纵在段祺瑞手中，直皖两系矛盾激化。徐世昌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各国向中国南北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立即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以求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选举是非法的，拒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爆发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三千多名爱国学生聚会在天安门前的时候，正在与曹汝霖等人欢宴的徐世昌立即下令警察“妥速解决，不许游行”，但须“文明对待”。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罢免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时，他仍为其辩护，说他们“从政有年，体国公诚……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因此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才被迫罢免曹、章、陆等职务，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关于巴黎和约的签字问题，徐起初是主张签字的。但“五四”以后他逐渐改变了态度，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权衡利害，断难签字”。后在各方压力之下，6月26日北京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这一指示对于拒签“巴黎和约”，冲破中国近代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有着积极的意义。

徐世昌本无实力，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纷争中一直以“调和者”自居，以维持其总统的虚名。1920年和1922年，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先后战胜了皖系和奉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徐世昌成了直系军阀首领攫取最高权位的障碍物。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职为名，逼徐下台。曹吴控制下的旧国会通电指责他为“伪总统”。这个善于权术的老官僚智绌计穷，只得称病辞职，退居天津英租界私宅，直至1939年6月5日病死。

（摘自《中国近代人物传略》河南教育出版社）

李　纯

字秀山，堂号立志堂，天津人，1871年生。1889年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在淮军中任职。1895年入新建陆军，任督队稽查先锋官。1902年后历任直隶政军司教练处提调、京旗常备军管带及统领，1907年任陆军第六镇步十一协协统，1911年11月任陆军第六镇统制官。1912年任陆军第六师师长兼豫南剿匪司令，1913年“二次革命”后任九江镇守使、江西护军使、江西都督。1914年6月任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1916年7月改称江西督军。1917年7月任江苏督军，1920年10月任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同月11日暴亡。

王　占　元

字子春，山东省馆陶县人，1861年生。1879年入淮军刘铭传部任亲兵，1887年入北洋武备学堂，后在宋庆部任职。1895年入新建陆军，任队官、管带。1904年任北洋第一镇步一协第一标标统，1906年任陆军第二镇步四协协统，1911年任陆军第二镇统制官。1912年任保定留守军总司令、陆军第二师师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北洋第一军右路司令官。1914年1月任专办湖北军务、1915年10月授将军府壮威将军，1916年1月任襄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7月改称为湖北督军，并一度兼任省长。1920年任两湖巡阅使，1921年8月被湘鄂联军赶走。

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军讨逆军检查使。1925年任孙传芳五省联军训练总监。后在天津作寓公，于1930年故去。

王士珍

字聘卿，河北省正定县人，1861年生。17岁时入正定镇标营当兵，后升为队官。1885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在淮军中任职。1895年入袁世凯之新建陆军，曾任督操营务处会办、工程兵学堂监督、右翼工程兵管带、武卫右军参谋处总办。1902年后任北洋常备军步兵第一协统领兼全军操防营务处、北洋常备军左翼翼长、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北洋督练公所总参议、陆军第二镇第六镇统制官、兵部右侍郎、江北提督等职。是北洋军队早期骨干，被列为"北洋三杰"之一。1910年以病乞退。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清政府任为湖北军务帮办，以病未赴任，袁世凯组阁时任为陆军大臣，亦未赴任。1914年后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参谋总长，1917年8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918年2月授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宜，不久退出政界。1930年7月1日故于北京。

徐树铮

字又铮，堂号正志堂，江苏省萧山县人，1880年生。曾中秀才。1901年在段琪瑞处任文案，深受段的赏识，1905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1910年任江北提督署参谋官，辛亥革命时任清军第二军参谋官。1912年后任陆军部军马司司长、陆军次长。1916年7月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任奉军副总司令。1918年纠集一批皖系政客，成立安福俱乐部，同时任参战军参谋长。1919年6月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并率军入外蒙，任外蒙善后督办。1920年7月授将军府远威将军。直皖战争时任定国军参谋长兼东路军司令，兵败后匿于日本使馆。1922年在福建策动一些皖系军人，将李厚基驱走，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1924年因参与江浙战争，被上海公共租界驱走，赴欧洲游历，后以执政府特使名义考察各国，1925年底回北京。12月30日由京赴津时，被冯玉祥命人枪杀于廊房车站。其著有《视昔轩遗稿》、《视昔轩选编》、《建国诠真》、《徐树铮电稿》、《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等。

王揖唐

初名志洋，字慎吾，后易名赓，字一赓，又作揖唐，号什公，晚年号今传是楼主人，安徽省合肥人，1878年生。1904年中甲辰科进士，后入日本振武学校及法政大学，回国后任兵部主事、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吉林全省营务处会办兼参谋处总办、吉林陆军混成协协统等职。1912年后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参议院参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1913年参加共和党，后并入进步党，任该党理事。1915年任吉林巡按使，1916年4月任内务总长。1917年任临时参议院议长，并参加安福俱乐部，1918年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此外还兼任北京民国大学及中华大学校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1920年7月皖系失败，遭直系通缉，逃到日本。1925年执政府任为安徽省长兼军务督办，仅月余被奉系迫走。1928年被南京政府下令通辑，避居于天津日租界，以后任天津汇业银行总经理。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一批汉奸政客于1937年12月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政府委员及赈济部长，后改任内政部长，1940年3月任汪伪南京政府考试院长。1940年6月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于1943年2月下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判处死刑。著有《东游纪略》、《今传楼诗话》、《广德寿重光记》等。

珍闻轶事

冯国璋"南巡"

段祺瑞虽然下野，但皖系实力仍存无损，因此段下台后，竭尽全力破坏冯的"和平统一"政策。首先拉拢直系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于12月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南方用兵；同时，段还指示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冯虽调十五师、十六师来京，却仍感力量单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统一"政策因进行缓慢而无效果，致使护法战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阴谋得逞，冯在北京陷于孤立。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一千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

隶军政委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劝阻冯前往南京。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个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因事前倪嗣冲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是非，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说直皖两派要分家。若真的分了家，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明："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摘自《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

"绑票"议员

副总统的选举会几度流会，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本来是互相敌对的两个政客集团，但在反对曹锟为副总统的问题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第二，安福系和旧交通系的分家，反映了徐世昌与段祺瑞的分家；第三，即使安福系议员，也并不是全部都能接受段的调度的，可见政治集团建筑在个人利益之上，貌合神离的现象是不能避免的。

十月十日是冯国璋代职期满的一天。这天上午九时，怀仁堂搭了一座礼台，冯、徐两人举行了总统交替典礼。当天，徐发表第一道命令，解除段的国务总理，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总理。徐又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绶嘉禾章，曹锟拒而不受，徐就改授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以示隆异。曹锟虽然先后得到银质狮钮大印和九狮纽宝光金刀，当然不会感到满足。因此，在王揖唐的主持下，安福国会定于十月十六日继续进行副总统的选举。

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不出席副总统的选举会，与徐的态度有关。他邀同梁士诒见去徐，请徐表示对副总统问题的意见。徐十分老练地回答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举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八月十四日，周自齐又带了一批议员作天津之游。他在自己的私宅英租界球场二十九号设立了议员总招待所，又在四家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情意殷殷地邀请在京议员到天津来饮酒看花，及时行乐。当他吸引到议员一百四十人的时候，就准备召开一次谈话会，请他们联名提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的两项建议。同时，梁士诒在北京的态度也逐步明朗，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梁士诒和周自齐都是旧交通系领袖，也是徐世昌的私党。旧交通系反对选举副总统，正和不久以前徐世昌偶然流露出来的"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的话完全合拍。这样一来，问题终于弄明白了，造成副总统选举会几度流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段所扶植的政治傀儡徐世昌。

但是王揖唐决不甘心从此罢休。十月十五日，他派安福系"大将"克希克图携带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宅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新车站停下来，只等"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一行分作四批，每批两人，分乘四部汽车到四家旅馆进行"绑票"。十分奇怪，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就连一个目的物也没有找到。于是他们集中人马，飞快地赶到周自齐的住宅去找，也没有发现一个应当被绑的人。不久终于弄清楚，原来这天下午周自齐在南市妓院里摆下了"花酒"，那些议员老爷们都"倚红偎翠"去了。于是这批打手又一窝风似地冲到妓院来，居然一口气捉到了四十多名议员。

这件事发生在十五日深夜三点半钟。这些被绑议员在汽车里乱嚷乱叫，引起了站岗警察的注意，喝令停车检查，直待押车者拿出议员证件来，才得放行。被绑议员要求回旅馆取行李，也不被允许。当他们被挟登火车的时候，机车早已升火等候，所以一上车车子就开动了。但在夜色迷漫中逃脱了几名，也有人到了北京后又逃回到天津来。

这就是安福系首领王揖唐表演的“精采节目”。这件事立刻风传全国，引为笑谈。

倪嗣冲穷奢极侈办寿庆

1918年阴历4月15日，是皖系军阀、安徽督军倪嗣冲的50岁生日。

据《申报》记载，这一年的“2月12日，安庆地震”，“3月5日，凤阳、蚌埠发现鼠疫”，“5月6日，贵池县东乡一带陡起狂风暴雨，一时山石树木悉为震拔，草庐瓦屋随之而倾，压毙人口甚多，未死者栖宿道路，啼声遍野，惨不忍闻”，不久，“潜山、太湖两邑山洪暴发，河水倒灌湖内，万余亩禾苗悉数淹没，田庐屋宇，尽在一片汪洋之中……”然而倪嗣冲竟不顾这一切，为隆重庆祝自己的生日，恣意下令各县增设“寿捐”，弄得民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寿庆那一天，蚌埠“将军府”门前张灯结彩，鼓乐齐鸣，江西督军邓如琢、湖南督军张敬尧和段祺瑞的代表以及各省督军代表，步入寿堂向倪嗣冲祝贺。接着，省署军政要员及60多个县的县长们鱼贯而入，向倪氏朝拜献礼，那礼品种类之多，价值之高，花样之奇，真是骇人听闻，如整颗象牙雕刻的“八仙过海”、“西湖全景”，黄金镶玉的麻将牌，名贵的古董字画……其中最使倪氏感兴趣的，是一尊用百两赤金精心铸雕而成的关公，全像金光闪闪，栩栩如生，后来成了倪氏的供奉之物。

为了媚取倪嗣冲的欢欣，原在安武军任后路局总办的王郅隆，疏通关系从北京重金聘请了孙菊仙、龚云浦、王瑶卿、王凤卿、陈德霖、刘鸿声、杨月楼、杨小楼、余叔岩、钱金福、程继仙、侯喜瑞、梅兰芳、尚小云等几十位京戏名角，汇聚蚌埠，一时轰动国人，堪称戏史一绝。如今蚌埠档案馆内还收藏有当年倪嗣冲寿堂会戏的一页戏单，足资为证。

戏是在倪氏寿日这天上午8时开锣，演了全天和一个通宵，至翌日凌晨3时才收锣停演。

值得一记的是，也就在这一天，革命志士方国华怀揣炸弹乘机混入将军府，欲进入寿堂炸死倪嗣冲，但不慎为门卫识破，在院中被捕。方国华怒目而视，历数倪嗣冲祸国殃民的罪行，怒呼：“老子今天未能杀掉你，自有人来要你的狗命！”倪嗣冲狼狈不堪，慌忙喝令：“拉出去砍了！”这一举动，使得前来贺寿的各省大员心惊肉跳，纷纷借故婉言告辞，急忙乘车离开蚌埠。

经这一吓，倪嗣冲突然癫狂，哭笑不止，不久，便被亲属送到天津外国医院治疗。倪1924年病死于天津。

（摘自《民国春秋》）

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美国恐日本在华势力扩大而有损其权益，遂提出愿帮中国培训飞潜人员。袁世凯为威慑他系军阀，亦谋掌握新式武器，便表示同意。授意海军总长刘冠雄筹办。

海军部变卖了在海外订购的一艘军舰充作经费，于1915年派陈绍宽、李世甲等赴美考察飞机、潜艇制造，随后又命留学英国的巴玉藻、王助等人转往美国学习航空工程。他们原在1909年由前清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出洋考察时，带往英国入阿姆斯特朗工学院学机械工程，转赴美国后入麻省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因勤奋刻苦，成绩突出，仅一年多就获毕业。后又分别就聘在美国各飞机厂工作。不久，巴玉藻担任寇提司飞机厂设计工程师和通用飞机厂总工程师，王助亦任波音飞机厂第一任总工程师，跻身美国航空界前列。他们立志开创祖国航空事业，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于1917年回国。

其时，袁世凯已死，刘冠雄为图海军实力的壮大，仍热衷于飞机、潜艇制造，已在福州马尾开办了“海军飞潜学校”。巴玉藻等人归国后，刘冠雄视他们为不可多得之才，先安置在飞潜学校从事教务，同时加快飞机制造厂筹办步伐。经派员赴天津大沽口、上海高昌庙等地考察，最后确定飞机制造厂设于福州马尾，因其“地段最宽，足敷展布，而厂所机器尤足”。报北京政府国务院批准后，1918年2月正式在马尾船政局内创设了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巴玉藻、王助分任正、副主任。制造飞机所需的工场及办公室，由船政局的铁胁厂、船厂等处改建，因经费缺乏无从添置机械设备，仍使用造船机器。当时制造飞机多倚赖手工，工程处为此注重培训技术工人，挑选局内技术水平较高的机械工、钳工、油漆工和木工四十五人，并招收学徒二三十人，分专业加以训练，巴玉藻等人亲自授课，讲解航空机械知识，这些工人逐步成长为我国第一代飞机制造工匠。

设厂不久，巴玉藻等即着手进行试制。旧中国各方面都很落后，飞机制造又是一门崭新工业，困难可想而知。其中原料就是一大问题，早期飞机主体部分大多为木质，欧美各国一般采用白银枞、胡桃木，如进口成本极高，运输也不便。巴玉藻等经反复筛选严格试验，以国产杉木、白梨木、樟木和白麻栗木取代。当时国外同行对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用独特方式生产飞机，颇感惊诧和怀疑，有个英国人到飞机棚参观后说：“这种飞机只能供人观赏，哪能飞上天空？”巴玉藻等不为所动，以顽强的毅力和严肃的科学态度，闯过道道难关，终于在1919年8月成功

地造出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时距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首制原始动力飞机仅10余年。当时北洋政府曾嘉奖表彰。

"甲型一号"为双桴双翼式水上飞机,即以双桴为支撑体由水面滑行继而升空的飞机,马力100匹,总重量1055公斤,最大时速120公里,配有双座双操纵系统,供飞行教练用。该机在试飞中因临时聘来的飞行员操纵不熟练,不幸失速侧滑坠水,机损人存。第二年工程处又制出同型机一架,试飞顺利。此后,飞机工程处制造水平逐步提高,陆续造出各式飞机共15架,性能不亚同时代欧美各国所产。如1930制成的"江鸿"号飞机,曾由马尾起飞至汉口。这些飞机多充作教练用,但也参加过实战,1926年北伐战争中,北洋军张毅部由闽南溃退至闽侯峡南,欲进攻省垣福州,已易帜的马尾海军要塞司令部就出动水上飞机投掷石子弹和玻璃弹,协助由何应钦指挥的北伐东路军围歼张部。

"甲型一号"飞机的制成,表明我国航空工业起步不晚。值得一提的是,巴玉藻与王助还曾在1922年合作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水上浮动飞机库,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停置难题。

(摘自《民国春秋》)

岑春煊:滑稽儿戏的主演

1918年底,民国上下,流传着一幅对联的上联:北方徐东海,南方岑西林,且看这两个东西,如何调和南北?

此联是对南北两个政府傀儡首脑的莫大讥讽。

1918年8月9日,改组后的护法军政府选出的七总裁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孙中山等,推举出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春煊欣然宣誓就职;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的大总统徐世昌也在北京中南海宣誓上任。11月16日,徐大总统颁令前方军队,停止向南军进攻,退兵罢战;22日,岑主席总裁也下达了与北军的休战令,南北议和正式开场。徐世昌号东海,岑春煊字西林,遂有两个"东西"调和南北之说。

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军政府,何以被岑春煊坐了第一把交椅?这还要从东西南北错综复杂的关系说起。

岑春煊其人,前清时即任两广总督,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西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军阀都曾是岑总督麾下爱将,在陆、唐眼里,岑春煊比孙中山更有资格坐西南政府的第一把交椅。而岑春煊不仅资格老,也颇倾向进步,前清时就倾向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了国会中一大党派——政学系的首领;1916年讨袁,他曾任军务院代理抚军长,护法政府成立后,他利用非常国会中政学系势力和与桂、滇两系的深厚关系,积极活动,伺机取孙中山而代之。陆荣廷、唐继尧本不同意组织军政府,但这种看法是随北洋政府态度而转移的:北洋政府武力统一政策占上风,他们就抓住军政府与之抗衡,以免背上不服从中央的罪名,以"护法"来抵制北洋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叛逆"罪名;如果北洋政府中"和平统一"政策占上风,他们就着手瓦解军政府。令他们不安的是,北洋政府战、和两派争斗不已,翻云覆雨,使人捉摸不定。因此,他们密谋排挤了孙中山,以岑春煊来看守军政府大门,以使灵活周旋,见机行事。

北洋政府内部常常因为对南方的不同政策主张而明争暗斗,而南方政府内部也因为对北方的不同利益关系矛盾异常激烈:非常国会中拥护孙中山护法的国民党势力和政学系政客之间、桂系和滇系中间,明争暗斗,矛盾难以调和。徐东海、岑西林这"两个东西",不要说"调和南北",连调和内部也无从谈起。

(摘自《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上海人民出版社)

拈阄借债

安福最大之政策、最大之成绩,即为滥借外债。盖每一借债,以金价及汇水高低之关系,每百万中,经手人可得十三万,利益之巨,令人咋舌,个中人固莫不视为利源所在焉。

某次复有某项借款发生,由安福党员甲乙二人分头进行。顷之,皆已略具眉目。二人以大利所在,各不相让,甲乃诋乙所拟之条件损失权利太多,乙则讦甲所定之回扣数目太巨,纷争不已,几至挥拳。事闻于党魁某氏,因召二人往,笑谓之曰:"彼此皆一家人,何争竞之有?余今亦不作左右袒,其拈阄以决之可乎?"二人唯唯应命,及拈阄,则为甲所得焉,乙乃嗒然而出。

安福系成员津贴

当安福势焰最盛之际,全国大小官吏无不奔走于其门。有鄂人某甲者,亦热衷之徒也。前清曾管某省榷务,宦囊颇为充裕。自入民国颇抑抑不得志。至是,因某显宦之介绍,投入徐树铮之门。树诤诏之曰:"汝可以十万金助党费,余当以汝名入党籍。苟有相当位置,即以汝充任也"。某甲欣然从之,未几,即放某省财政厅长。抵任以后,任意搜括,凡有欲求厘差者,非钱不行。盖前所助之十万金,将什佰倍取偿于此耳。以致物议沸腾,人皆侧目。省长某亦不以之为然,密电政府,要求撤换。某甲闻之,笑曰:"我有某部为后援,宁畏彼哉?蜉蝣撼树,多见其不自量耳!"未几,政府果电复省长,曲为开脱,竟不撤换。

安福党员,分议员与非议员二种,统以"任重致远"四

字排行。其"任"字一辈党员凡数十人，月可得千金；"重"字、"致"字二类，以次递减；下而至于"远"字，亦可得三百金。故统计每月津贴，不下十数万。而重要党员如徐树铮、曾毓隽等，尤可任意支取，略无限止。嗟嗟，凡此孰一而非民脂民膏哉！

南北战争轶闻

友人王君，桂军军官也，近自战地归，告余以转战湘西时之情形，颇有可记者。据云，当张敬尧之尚未败走也，南军困于一隅，饷竭财匮，困苦万分。兵士每日仅得支钱十二文。所谓官军者，亦仅得大钱百有二十耳，菜色满面，衣衫褴褛，视乞丐仅去一间。欲舍而逃走，则又恐为张部所得，反遭杀戮。盖张部每得南军，立即枪毙，略不矜恤耳。故一开战，南军勇气十倍，奋力死战，意谓能从此雄飞而出，实大佳事，不则亦束手待毙耳。用是连战辄捷，北军大败。韩信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此之谓也。

衡阳地居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四围又多山，足以驻守。当南军之进攻也，北军以某山适当要冲，可以居中而守，因驻重兵于其上，复广设机关枪炮以为御。某日，南军蜂拥而来，徒手争登。北军即发枪炮以御之，死者累累。然南军勇敢万分，前者仆，后者继，略无畏葸之色，卒致北军为其所围，竟乞降焉。

南军中有某军者，虽骁勇异常，然乏新军学识，每当战时，秩序殊乱，虽有司令之人，未能号率其众。每有一二人兴会所至，辄排众而前，突跃至一二百米达以外，不问全队何如也。与之表同情者复继之，于是东也三五为群，西也十数成队，大有人自为战之概。初不联贯一气，最近湘西战时，仍作是状，然北军初不知也，见各山之上，皆有南兵，不禁大惧。以为南兵多乃至是，其何能敌？即相率溃去。而湘地山路又盘旋曲折，不知所届。北军不识地理，恒迷失途径，如入八卦阵中，久久不能出。一为南军侦悉，围而执之，如羔羊之就屠矣。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流行风

小说《雪鸿泪史》

作者徐枕亚，主要内容：

该书托言为《玉梨魂》主人何梦霞的日记，实则徐枕亚故弄玄虚，都是他的作品。所以，这两部书是为姊妹篇，是作者呕心沥血的力作。《雪鸿泪史》的例言中指出："是书主旨，在矫正《玉梨魂》之误，就其事而易其文，一为日记，一为小说"，"书中人物，悉仍《玉梨魂》原本，间有加入者。情节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诗词书札较《玉梨魂》增加五六。两书牴牾，附注评语，以清眉目。"通观两书，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但后者着笔细腻，男主人公何梦霞家事更详，次要人物略有增减，事件时间有所不同，诗词信札随处可见。加上作者的评述，使作品生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该书写法一如《玉梨魂》，依然用骈文叙事，追求词藻华丽。作品初在《小说丛报》刊登，随即出单行本。但问世不久，就有人揭露其中部分诗词实属剽窃。书再版时，作者行即纠正。

小说《换巢鸾凤》

作者于星海，主要内容：

小说写清朝末年，陆军军校学员邵辉华少年英俊，热爱寄居邵家的翠秋姑娘。辉华与翠秋曾于花前月下，吟诗作词，相互倾诉爱慕之情。但此事遭到辉华母亲叱责，辉华之母嫌贫爱富，断然否决辉华的求偶选择。辉华一气之下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加入革命党，与另一革命党人倪秋石结为密友。秋石因无意中透露革命党的组织情况，被革命党判处死刑。后辉华搭救秋石，两人归国。辉华在革命军中任将军之职，秋石是他的副官。辉华在与清军作战中负伤，医院护士郭绚霞小姐一见倾心，向辉华求爱。但辉华心中仍苦恋翠秋，而翠秋却与秋石定婚。后秋石在与清军作战时，捕获敌方侦察员，秋石发现清军侦察员原是自己在军校时的同窗好友，遂私放敌军官。此事败露，辉华为拯救秋石而在军前引咎自杀。秋石与翠秋结婚，不久，翠秋一病不起，绚霞前往看护，言明辉华生前对翠秋的挚爱深情，但翠秋却不信而亡。绚霞思念辉华至甚，终生不嫁。秋石百感交集，孤身远行。小说用倒叙手法写成，结构虽新颖但失之错乱，书中夹杂大量诗词韵语，人物形象则苍白无色。

诗《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胡适）

诗《三弦》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着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沈尹默）

小说《狂人日记》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小说以日记的形式，描绘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病症的"狂人"形象，并通过"狂人"所经历的社会和人生来揭露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小说塑造了一个貌似狂癫实则十分清醒的人物。日记中语言也颠三倒四，看似荒诞，实则揭示了鲜为人知的真理。主人公总是疑心别人企图杀死他，因而忧心忡忡。路上别人看他，议论他，他便疑心别人在密谋杀害他；哥哥为他请来医生诊治疾病，他疑心哥哥同医生合谋要杀死他，医生为他摸脉，他又疑心这是要"揣一揣肥瘠"，于是他想到，"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并联想到古代易牙将儿子蒸了给桀纣吃，联想到"易子而食"的传说，联想到狼子村某人被杀，心肝被人掏出来炒吃的事。他苦苦思索，发现别人之所以要吃他，只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他翻开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字缝中却到处都写着"吃人"两个字，从而悟出，中国四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他决心从自己的哥哥开始，规劝人们不再吃人，并告诫人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下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将来的孩子不再被吃，也不再吃人，因而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作品用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狂人"的眼，给普通的生活现象赋以新的含义，从而揭示了生活的真理，并通过踹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等细节来表现"狂人"的叛逆性格。作品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产生了石破天惊的艺术效果。作者在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时称"《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由于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比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

历史档案

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大正七年五月十六日，北京。

基于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之结果，依据两国政府交换之文件，经两国军事当局互派委员，协定事项如左：

第一条　中、日两国陆军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

第二条　关于协同军事行动，彼此两国所处之地位与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条　中、日两国当局基于本协定开始行动之时，对于各自本国军队及官民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当命令或训告使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以期达成共同防敌之目的。

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日本军队须尊重中国主权及地方习惯，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第四条　为共同防敌，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俟战争终了时，即由中国境内一律撤退。

第五条　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

第六条　作战区域及作战上之任务适应于共同防敌之目的，由两国军事当局量各自本国之兵力另协定之。

第七条　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为图协同动作之便利起见，应行左记事项：

一、关于直接作战上，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

二、为图谋军事运动及输运补充敏活确实起见，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

三、关于作战上必要之建设，例如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应如何设备，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之；俟战事终了，凡临时之建设工程均撤废之。

四、关于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两国应互相供给，其数量以不害各自本国所需要之范围为限。

五、在作战区域之内，关于军事卫生事项，应互相辅助，使无遗憾。

六、关于直接作战上之军事技术人员，如有互相辅助之必要时，经一方之请求，应由他方辅助之，以供任使。

七、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关于谍报机关之通信联络，彼此互相辅助，图其便利。

八、协定共用之军事暗号。

本条所列各项，其须预先计划及应预先施行者，在作战未实行之前另协定之。

第八条　为军事输送使用东清铁路之时，关于该铁路之指挥、保护、管理等，应尊重原来之条约，其输送方法临时协定之。

第九条　本协定实行上所要详细事项由中、日两国军事当局指定当事者协定之。

第十条　本协定及附属本协定之详细事项，中、日两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之秘密事项办理。

第十一条　本协定由中、日两国陆军代表者签名盖印，经各自本国政府之承认时，发生效力。其作战行动，俟适当之时机，经两国最高统帅部商定开始之。

本协定及基于本协定所发生之各种细则，俟中、日两国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即失其效力。

第十二条　本协定以汉文及日本文各缮二份，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保有一份为证据。

中华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

大正七年五月十六日

中华民国陆军军事协商委员长果威将军靳云鹏

日本帝国陆军军事协商委员长陆军少将齐藤季治郎

于北京

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大正七年五月十九日，北京。

基于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之结果，依据中华民国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两国政府于东京交换之文件，经两国海军当局互派委员协定事项如左：

第一条　中、日两国海军因敌国势力之东渐，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欧战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

第二条　关于协同军事行动，彼此两国所处之地位与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条　中、日两国当局基于本协定开始行动之时，对于各自本国舰船及官民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当命令或训告使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以达共同防敌之目的。

第四条　作战区域及作战上之任务如适应共同防敌之目的，由两国海军当局量各自本国之兵力另协定之。

第五条　中、日两国海军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为图协同动作之便利起见，应行左记事项：

一、关于直接作战上，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

二、为期军事行动及输运补充之敏活确实起见，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

三、关于修造舰艇兵器及军事机具等并其所需材料，应量力互相辅助，其军需品亦同。

四、关于直接作战上之军事技术人员，中、日两国海军如有互相辅助之必要时，经一方之请求，应由他方辅助之，以资遣用。

五、中、日两国海军于必要之地点，各自设置谍报机关，又互相交换行动上所要水路图志及情报，并为期通信联络之敏活确实、互相辅助以图其便利起见，两国当事者应临时协定其所要之设备。

六、协同商定共同之军事暗号

本条所列各项，其须预先计划及应预先施行者，在作战未实行之前，另协定之。

第六条　本协定实行上所要详细事项由中、日两国海军当局指定各当事者协定之。

第七条　本协定及附属本协定之详细事项，中、日两

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之秘密事项办理。

第八条　本协定由中、日两国海军代表者签名盖印，经各自本国政府承认时发生效力。其作战行动，俟适当之时机，经两国海军最高统率部商定开始之。

本协定及基于本协定所发生各种细则，俟中、日两国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失其效力。

第九条　本协定以日本文及汉文各缮两份，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执一份为证据。

中华民国七年五月十九日

日本大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委员长海军中将沈寿堃

委员长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

于北京签印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帝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种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李大钊）

寺内内阁期间对华借款总额

在寺内内阁任职约两年期间，新成立的对华借款，其金额在五百万日圆以上者有：

政治借款：

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　30,000,000日圆(已偿还)

经济借款：

有线电信借款　20,000,000日圆

吉会铁路借款　10,000,000日圆

吉黑两省林矿借款　30,000,000日圆

满蒙四铁路借款　20,000,000日圆

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　20,000,000日圆

军械借款　32,081,548日圆

参战借款　20,000,000日圆

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　5,000,000日圆(已偿还)

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　20,000,000日圆

京畿水灾借款　5,000,000日圆

合　计　212,081,548日圆

以上借款共二亿一千万日圆以上，此外，未满五百万日圆者有汉口造纸厂借款、印刷局借款、四郑铁路短期借款及吉长铁路借款，对中国地方政府和民间借款也有相当的数额，以上合计我国对华借款总额约三亿八千六百万日圆之巨额，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万日圆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这些借款分类如下：

(一)对中央政府借款　279,860,000日圆

(二)对地方政府借款　18,570,000日圆

(三)对企业或个人借款　88,020,000日圆

合　计　386,450,000日圆

备　考　以一银元折合一日圆，一两折合一日圆五十钱。

(节译自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章伯锋译)

曹锟俭电

1918年4月28日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参陆办公处鉴：正密。本路克复衡阳，业经电报在案。兹据第三师吴师长敬日电陈克复衡阳情形较为详细，用特补陈。

查原电内称："自本月十五日晚在湘潭奉到督帅愿电，以红罗庙地当冲要，令速设法派队占领，又因十二团在花石告急，师长即于十六日率队往援。并饬商五旅张旅长、第三旅宁旅长各酌率部队，由株洲易俗河出发，至前方督队作战。所有第六旅在花石战况，前报业经详陈，不再赘述。当于十八日由花石分路进击，二十日抵渣江，查悉逆寇在台源市、杉桥之间，凭藉屋川廷宇，防御阵地。二十一日奉到督帅递电一通，以朱亭吃紧，乞派大支队进攻，并中央仍用三路进行计划，以进至衡阳为第一目的各等因。师长当以孤军深入，对于两旅进行事宜势难兼顾，遂责成第一旅王旅长率第一团进驻湘潭花石一带，以为指挥一切；并令第二旅为总预备队，进驻株洲易俗河一带，预备增援。旋得第三旅张旅长报告，已于二十日完全克复衡山。师长以时机可乘，当令十一团第一营葛营长树辰率该营由国清向集兵滩方面前进，令十二团华团长率该团第一营由蔡店铺向〇〇牛羊圉方向前进，令第六旅张旅长率十二团二三两营及第一旅二团第三营彭营长随同前进，令第二团阎团长率其馀各队留守渣江，并向红罗庙方面佯攻，均用混合部队。于二十二日黎明俞营协同进行，师长同六旅旅长督队前进，及至台源市附近，于早九点与逆军开始攻斗。查该逆兵力约六营有馀，归伪副司令陆长胜指挥，竭力抵抗，战至午后三点，逆军崩溃，分向礴阳及衡州大营逃窜。二十三日黎明，各部队即由台源市、马真市、江伯场一带之地区分向衡州方面追击，并令驻渣阎团长所部向祁阳方向警戒。是日午前追至李桥，遇逆兵百馀人，当被前卫击退。至松亭渡又遇逆兵约一营，正在用饭，被我前卫冲散。及到衡阳城内，查有逆兵数百人，被我前卫立即被[驱]逐，该逆等由南门、东门分头逃窜，遂于是日午后六点将衡阳完全克复。当据绅商云：'逆首潭浩明已于二十二日弃城向祁阳、永川方向逃走，程潜、林支宇、赵恒惕均于本日早九时向耒阳、郴州方向逃走'等语。

复查我左翼葛营，二十三日午前在神王山附近遇逆兵约有三千人，械不全，战斗甚形激烈，我兵阵亡一名，受伤三名，该逆伤亡未详。当经华团长率第十二团第一营由集兵滩附近袭逆侧背，敌势不支，当晚退至衡州北门外停止。地方绅商拟出调停，令该逆缴械。师长已嘱绅商前往致意。至该逆等是否受抚，尚未能预定。现由渣江至衡州经我军沿途设卡，以兜围衡州之南西两面；并由花石至衡山有各旅分布要隘，以防堵衡州之北东两方。其逆军未经退走之兵力虽未详悉，大约不少，拟令第三旅派兵一团由衡州向祁阳方向作追击势，以威吓之。又拟令十一团陈团长、骑三团王团长及第三旅由衡州北端严密搜【缉】，以清馀孽。

此役自十月六日起至二十三日止，途道经三百五十馀里，六旅两战，五旅一战，搜索逆巢，克复名城巨邑，【上】仰仗钧帅神威，下赖将士用命，故克臻此。惟六旅在花石战役伤亡过多，是一憾事。兹查逆势已蹙，子弹缺乏，零陵地方米盐皆缺，若令赵紫云先生前往设法收拾，则湘南军队约可全数缴械。如湘军俱已受抚，则桂军势孤计

穷，自必离出湘境矣。师长现正会同衡阳地方绅商，维持现状，以待后命”等情。

查该师长来电系在第二路攸县未失以前，现在情势一变，又令该师设法赴援矣。谨此电闻，伏乞鉴察。曹锟。俭。印。

《每周评论》发刊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陈独秀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原载《每周评论》第 1 号）

辞大元帅职通电

孙文

1918 年 5 月 4 日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变，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使冯、段两氏有悔祸之心，虽争个人权利，苟能撤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使国会继续开会，则与一言兴邦何异，夫谁得而议其后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国，遂致衅起川、湘，而全国之统一以破。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谓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泯泯（mǐn，敏）棼棼（fén，焚），莫如底止。文不忍坐视正义之弗伸，爰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议护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决议。由是发生国会非常议会于广州，于中华民国 6 年（1917 年）8 月 31 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虽自知弗能胜此重任，然国家多难，匹夫有责，文忝在手造民国之列，不能视大法之沦亡而不救，用是不避险艰，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使吾国及友邦之人咸晓然于军政府之职志；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凡以存民国人民之正气于天壤间而已。自是厥后，粤、桂、滇、黔、湘、川莫不一致宣言护法，始以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为共和（同）之目的，于是地方之争，一变而为国会之争。军政府无尺地之凭借，而此志已范围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思附义者，尚复所在多有，均在酝酿发难之中，不得不谓护法功矣告成之后。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 瘏（tú，徒）口哓（xiāo，消）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心（何）求”，斯之谓矣。然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之所以忍辱负重以迄于今者，良以责任无人，非得已也。凡文之所以谋使各省尊重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者，无所不至。今自岳、长累败以来，各省始悟分则俱伤，合则两美，然后知有组织统一机关之必要，且知有以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图之，犹为未晚。而文之力固已尽于是矣。

计自提取盐税存款以充国会正式会议经费，预定 6 月 12 日为开会之期。文之效忠于国会任务本已将尽。今者非常会议决议改组军政府，以应各省之要求，今而后庶可资群策群力，以光昭护法之大业，而告厥成功，岂非民国之幸。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国会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辜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谨略述颠末，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大元帅之职。幸惟公鉴。孙文支印。

（吴拯寰：《孙中山全集续集》第 1 册第 3 辑《杂著》第 28—30 页，上海三民公司 1929 年第 2 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华侨学生会在上海成立，举伍廷芳、杨晟、黄仲涵等为名誉会长，谢碧田、李登辉为正副会长。

1月2日　粤督莫荣新枪杀孙中山卫队连排长及士兵多人。

1月4日　苏督李纯、鄂都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联名电请北京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以示和平之旨”。

同日　冯国璋致电南方各省，拒绝恢复旧国会。

1月5日　北京政府收到莫荣新、陈炳焜、李烈钧、程璧光、方声涛等来电，提出停战条件：(一)召集旧国会，(二)内阁改组，(三)取消龙济光巡阅使命令，(四)北军退出岳阳，(五)莫擎宇军调往他处。

1月8日　冯国璋电北洋各督，同意对西南诉诸武力。

1月13日　曹锟等十六省督军、都统等，再次电催(1月8日已首次电催)冯国璋速颁对西南讨伐令。

同日　川督刘存厚致电北京政府，请速颁对西南讨伐令。

1月14日　冯国璋通电北洋主战各督，拒发对西南讨伐明令，谓：“为维持国家秩序起见，以后倘各省抗命不从，有扰地方治安，即目为土匪，当命各省长官讨伐之，故不必明发讨伐令”。

同日　南方护法各省联名致电冯国璋，要求恢复旧国会。

1月16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电令鄂督王占元及曹锟、吴庆桐、吴光新，各派一混成旅进攻荆襄地区，并声明不涉及岳州地方。18日荆襄地区南北两军战事起。20日北军吴佩孚师张学颜旅攻占襄樊；21日吴光新部攻占沙市、钟祥，22日攻占江陵。

1月26日　冯国璋“出巡”济南、徐州、蚌埠，与皖系各督张怀芝、倪嗣冲，以及李纯代表长江巡阅副使王廷桢等，会商时局。28日冯由蚌埠起程返京，次日抵达，并即于居仁堂召开会议，决定对西南下“局部讨伐令”。

1月30日　冯国璋下达对西南“局部讨伐令”；“著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

同日　冯国璋特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任曹锐署理直隶省长。

2月1日　徐树铮密电陕督陈树藩、晋督阎锡山、闽督李厚基、川督刘存厚等，谓：“现议由奉省抽调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运京奉、京浦路次，强请明令罢李(纯)，李去后王(士珍)必自退，不退再请罢之”。

2月3日　徐树铮密电奉、皖、闽、浙等省督军，谓王占元密告，苏督李纯倡议苏、赣、鄂三省联防，一省有事，“同时动作”，坚拒北军南行“过汉口、浦口”。

2月4日　冯国璋据曹锟等呈请，下令洪宪帝制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三人，均准免予缉究。

2月5日　冯国璋在北洋主战各督压力下，发表“罪己”布告。

2月7日　孙中山在广州宴请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并发表关于宪法问题演说，认为国家“强弱之点尽在宪法”，主张五权宪法，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及监察五权。

同日　曹锟由天津赴鄂。12日张敬尧由徐州赴鄂。

2月17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修正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法。次日又令内务部筹备选举事宜。

2月20日　署国务总理王士珍因“病”请假，由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国务总理。

2月21日　冯国璋特任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

同日　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入陕。陕西靖国军举于为该军总司令。

2月24日　长沙米荒，米价暴涨，贫民群起，勒令各米坊减价，按每升百文售米，风潮波及全市。地方当局被迫布告设局平价售米，每升一百五十文。26日风潮始息。

2月25日　西南靖国联军总司令、滇督唐继尧由贵州毕节电令熊克武兼任四川军民两政。次日熊克武在行营宣布就职。

2月26日　广东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身死。

同日　驻俄公使刘镜人率馆员撤离彼得堡启程归国。3月15日抵满洲里，25日到京。

2月27日　籍忠寅辞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职，由于宝轩兼任。

同日　“山东靖国军”攻破东平县城。3月29日再占东平。

2月28日　上海轧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同日　冯国璋开释帝制复辟案犯雷震春、张镇芳。

3月2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盐税条例》。

同日　张敬尧率军抵湖北通城，准备与吴佩孚师会攻岳阳。

3月3日　冯国璋公布《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节》。

3月5日　孙洪伊致电孙中山等，主张恢复旧国会。

3月6日　冯国璋公布：6月20日选举参议院议员；5月24日选举众议院议员，6月20日复选。

3月7日　冯国璋向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及镇守使等通电辞职，并请彼等共商解决时局办法。

同日　徐树铮等奉段祺瑞之命组织安福俱乐部，王揖唐为首领，以操纵议会选举。

同日　曹锟、张敬尧、张怀芝联名电请张作霖"顾念大局，化除意见，先将军械归还，一面将军队撤退，以定人心"。

3月15日　冯国璋下令赦免除张勋外之杨度、康有为等所有洪宪帝制犯和复辟犯。

3月18日　广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会议议决，定于6月12日北京政府解散国会一周年之际，在广州召开正式国会。

同日　唐继尧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建议广东军政府和护法各省联合会合并。23日陆荣廷电复反对。

3月20日　日驻京公使林权助访晤徐世昌，请其力劝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次日又约见王郅隆，表示希望段"独断独行"组织新内阁。

3月23日　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3月26日　段祺瑞召集国务会议，决定俟攻占长沙后再决和战。

3月27日　冯国璋特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谭延闿为省长，未到任前由张兼署。30日谭延闿致电北京政府辞湖南省长职。4月9日张到署视事。

3月29日　冯国璋公布段祺瑞内阁各总长任命令：外交，陆征祥；内务，钱能训；陆军，段芝贵；海军，刘冠雄；教育，傅增湘；司法，朱深；农商，田文烈；交通兼署财政，曹汝霖。前内阁各总长免职。

同日　冯国璋特任孟恩远为吉林督军，田中玉回察哈尔都统本任。

4月5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吁恳（南北）双方停战议和"。

同日　冯国璋聘请王克敏、梁士诒为财政顾问。

同日　北京政府应海参崴各国领事团会议决定，派陆军和"海容"号军舰前往海参崴。

4月6日　绥远鼠疫"肃清"，防疫机关裁撤。

同日　北京参议院办理选举事务所开幕。

4月7日　滇军华封歌部攻占四川会理。

4月9日　北京政府接曹锟电，请求与南方停战议和。

4月10日　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部成立，巴英额为总司令，19日就职。

同日　唐继尧通电主张成立护法各省临时统一机关，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或代理大总统，以岑春煊为总理。29日，又通电主张设临时政府。

4月16日　日本于山东坊子正式设立民政署，山东省议会电请北京政府速向日本政府交涉。

同日　北京政府税务处通令各海关，自本日起取消茶叶运俄禁令。

4月17日　上海英租界人力车工人数千，捣毁英电车六、七辆。遭英巡捕镇压。

4月18日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组织新民学会。

4月21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大会。6月4日闭幕。决议选派代表进京，要求北京政府息争停战，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谈判情况。

4月27日　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程潜、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莫荣新等联合致电冯国璋，誓不承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4月29日　广东非常国会通电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同日　广东督军署举行讨龙（济光）祝捷大会。

同日　南军攻占湖南浏阳，李传业所部新安武军败逃。

同日　北军占领湖北巴东，次日占秭归。

4月30日　上海公共租界小贩为反对工部局加捐，捣毁北西藏路和福建路两处卫生分所及工部局卫生分处。5月1日举行罢市，迫使工部局取消加捐。

5月4日　广东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为此，孙中山于是日通电辞大元帅职，并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5月17日　伍廷芳等十三人联名通电，望各省护法议员于5月31日以前齐集广州，参加6月12日开幕之旧国会。

同日　徐树铮致电闽督军李厚基，乘西南内讧，宜向潮汕进击。

同日　徐树铮密电上海龙华护军使卢永祥："速密悬重赏，设法缉捕"正在上海之陆建章、孙洪伊。

同日　冯国璋公布《禁止与敌通商条例》。

5月18日　广东非常国会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20日非常国会根据该大纲废除元帅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为军政府总裁，共同组成政务会议以行使职权。6月5日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5月19日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海军部分，由北京政府海军中将沈寿堃和日本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分别代表双方政府在北京签字。

同日　北京《大中华报》揭载《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内容。次日各报纷纷转载。

5月20日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召集紧急大会，抗议北京政府亲日卖国，要求公布《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5月22日　归国留日学生上书冯国璋，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5月23日　北军李炳之部进攻四川巫山，旋为滇军顾品珍等部击退。

5月24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就闽省募集地方公债事，电复闽督李厚基："尊处若能指定用途，悉数拨充军用，自当援案准募"。

5月25日　南军赵恒惕部和北军吴佩孚部双方代表于湖南耒阳县举行停战谈判；6月15日达成协议：规定6月15日至8月15日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战。

5月27日　英国在上海发行战事公债。

同日　曹锟、张怀芝、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六督联名电请北京政府，对西南取和平解决方针。

6月1日　湘督张敬尧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早日息争谋和"，并派衡阳道尹林树藩与南军磋商和议计划。

6月2日　江西黄淦率众举事，称"赣北护法军"，联合鄱阳县兵警占据县城，6日又占都昌县。

6月5日　梁士诒在北京开办证券交易所。

同日　吉督孟恩远派兵保护中东铁路，并任高秀山为中东铁路东路司令。

同日　奉天殖边银行因滥发纸币被张作霖查封，并拘押行长岳春煊。

6月12日　广东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正式国会（以下称护法国会）开幕式；20日举行第二届常会继续开会式。

6月13日　南军退出湖南常德；次日北军冯玉祥部占常德。

同日　章炳麟于四川峨眉受戒，宣言不再与闻世事。

6月24日　广东督署逮捕《民主报》主笔陈耿夫，并于25日枪杀。

同日　甘督张广建致电北京政府，报告已奉命特派左军统领吴常桂为甘肃援川总司令。

6月25日　长沙市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

同日　唐继尧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电主张武力解决南北之争。

6月26日　驻福建德化县闽军营长朱得才，与驻晋江陆军营长陶质彬联合宣布独立；推陶质彬为闽西护法军总司令。

同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电令驻湘南、湘东各路北军，自26日起向各要隘开始总攻。

6月27日　援粤总司令张怀芝由济南赴汉口，7月1日抵达。

同日　孙中山致电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北军连续派兵援粤援闽，陈部"地位极为危险"，主张"冒险进攻"，"以攻为守"，必收奇效。

6月28日　冯国璋特任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护省长职。

同日　北军范国璋部攻占湖南桃源。

6月30日　陕西省与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大仓洋行签订三百万日元陕西实业借款合同。

同日　成都学生召开四川学生救国筹备会。

同日　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7月1日　张钫在陕西雒南称陕西靖国军南路司令。河南省王天纵与张钫靖国军会合。

同日　滇督唐继尧致电广州伍廷芳、林葆怿、吴景濂等，赞成修改军政府组织大纲。

7月2日　广州非常国会决议发布正式会议开会宣言。

同日　北京政府电令援粤闽军总司令李厚基、副总司令童葆暄速攻汕头、潮州。

7月4日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

7月5日　广东军政府伍廷芳、岑春煊、林葆怿及陆荣廷、唐继尧在广州海珠举行会议，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次日通电护法各省及政务会议承认之护法各军，派代表一人参预政务会议，速来粤筹划大计。

7月11日　护法国会参、众两院假广东省议会召开谈话会。报告参加护法议员名额。众议院二百四十人，参议院一百零二人，并宣布议员递补办法及除名标准。

7月12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致电各省区行政长官，着所有新选参、众两院议员务于8月1日以前齐集北京，定期开会。

7月13日　各省省议会代表致电北京政府、广东军政府，要求息兵休民，共筹对外。

7月20日　美驻京代办马克谟访晤外交部次长陈箓，谓中国欲于此时收回中东路，废1896年所订东清铁路条约，"实属不合时宜"。

7月21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密电各省，查禁各校学生组织爱国会或联合会等名目。

7月23日　北京政府任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援粤本队总指挥，安武军马联甲为左翼司令，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为右翼司令，悉归吴佩孚指挥。并令吴佩孚速反守为攻。

7月28日　张作霖、曹锟、龙济光、徐树铮等于天津

开会，讨论选举总统、副总统及对南方用兵问题。

同日　岑春煊、冷遹等抵广西武鸣与陆荣廷会面，8月7日返回广州。

7月31日　督军团在津开会。继28日会议后，皖督倪嗣冲，援粤总司令张怀芝亦到津参加会议，继续密议总统、副总统人选。多数主张举徐世昌为总统；副总统人选，因主张不一，迄无结果。8月6日会议结束。24日，张作霖回奉，曹锟返保。

8月2日　唐继尧通电反对梁士诒等倡导之"新国会选举总统，旧国会公布宪法，俟总统、宪法俱产出，两个国会同时解散，再依法另行选举，成立国会"。

8月4日　苏、赣、鄂、湘四省督军联名致电天津督军团会议，提出：一、对南方政策和战皆无所主张，唯侵入我辖境者讨伐之；二、总统、副总统听国会决定；三、出兵问题，承认中央决定。

8月7日　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致电苏督李纯，痛斥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说安福国会是"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斥段祺瑞"内争年余，以借款杀同胞"。

8月12日　总统冯国璋通电辞职。（按：北京政府总统一职，系依民国元年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为五年。黎元洪代袁世凯，冯国璋代黎元洪，冯于民国2年10月10日就职，至本年10月10日期满五年。）

8月12日　安福国会在北京开幕，临时参议院闭会。

8月19日　驻满洲里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张焕相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日军五千人由哈尔滨进至黑龙江省，分驻中东路各站。

同日　广东护法国会正式推定岑春煊为政务会议主席总裁。21日岑通电就职。

8月20日　北京政府致电吉、黑两督军，谓日使馆要求禁载日军在东三省"所有一切行动"消息，当地日领事"倘来接洽，即乞酌核办理"。

8月21日　广东护法国会发布《中华民国国会宣言》，谓"凡非法政府所公布之法律及违护法精神之命令，绝不发生效力"，"缔结之条约及公债，在未曾依照约法经过国会之议决或同意以前，概认为无效"。

8月22日　吴佩孚再次发出主和电，曹锟复电斥其"殊属不明事理"并通电全国谓已"电令吴师长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

同日　安福国会参议院选举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朱以现充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为由，辞参议院议员。

8月25日　孙中山到达上海。

同日　湘督张敬尧致电段祺瑞，报告："祁阳方面军队，奉吴令撤退"。

8月27日　北京国务院会议，议决徇曹锟之请，开复范国璋原官，29日发布命令："范国璋着开复陆军中将并给还勋位、勋章"。

8月30日　岑春煊电复吴佩孚，赞成促进和平。

同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出《通告海内外同胞书》。谓："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应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

8月31日　段祺瑞致电各省军政长官，表示政府改组后，决定"引退"。

同日　曹锟通电表白自己淡于名利，不希望做副总统。

9月1日　奉督张作霖电鄂督王占元，请其致电中央，特赦张勋，遣充边防，立功自赎。

9月4日　北京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委员会，选出徐世昌为大总统。

同日　广东护法国会第二次发表宣言，否认北京安福国会有选举大总统之权，谓："非法选举之总统，无论选举何人，对内对外绝对不生效力。"

9月14日　曹锟通电，反对继续对南方作战。20日吴佩孚复电，建议由长江三督担任南北间"调解人"，并请增徐世昌为"调解人"领袖。

9月19日　孙中山致函广东军政府，委派徐谦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27日政务会议复电同意，并任徐为司法部长。

10月7日　冯国璋发表主和通电，陈述一年来南北军政情况及当前时局。

同日　广东军政府岑春煊等，联名发表通电，响应谭浩明、吴佩孚通电。是时，湘军代表文鹿鸣、刘钟岳与直军代表刘杰、包映芝联名发表声明：在南北未实现全面和平以前，湘直两军长期停战。

10月10日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在怀仁堂与冯国璋举行交接典礼。徐世昌发布命令：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开复王汝贤陆军中将衔及原官职，发还勋位勋章。同日各国驻华使团觐见徐世昌。

10月16日　安福国会参、众两院继续召开副总统选举会（此为第三次选举），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到会主持，坚持将该缺留给南方。是日因到会人数仍不足，遂又延会。

10月23日　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二十四人通电宣告将成立"和平期成会"。其宗旨为促进和平，不分党派，亦非政团，和平告成即行解散。11月3日于北京开成立会，举熊希龄蔡元培为正副会长。

11月3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各省，限制增募军队，以节饷源。

11月12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议决召开南北和平会议。次日，钱能训电告苏督李纯拟派人"赴桂商

洽”,并将有关和平办法派人送李处。

11月20日　徐世昌电告唐绍仪,冯、段相约共同下野,希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复电主张:“和谈必须南北对等,代表人数相等,谈判公开”。

同日　段祺瑞上徐世昌《统一意见书》,表示不赞成召开南北对等之和平会议及部分先解决闽、湘问题。

11月21日　安福国会众议院开会,选举宪法起草委员会,投票两次,票数与名次均不符,安福系议员指责旧交通系有意捣乱,大起争执,无结果而散。

11月22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停战。次日,发布停战令。

同日　曹锟、张作霖、孟恩远、张怀芝、王占元等在北京发起建立北洋派团体,定名“戊午同袍社”,推曹锟为社长。

11月24日　唐继尧通电,主张“宜仿辛亥成例,在上海开和平会议”。

同日　徐世昌颁布邮政储金条例。

11月25日　北京政府撤销对德宣战后成立之战时国际委员会。

11月26日　李纯致电岑春煊谓北京政府已议定和平会议,双方各派代表十人,解决法律事实诸问题。以南京为会议地点。次日以同一内容致电吴佩孚。

12月7日　安福国会众议院开会(交通、研究讨论各系议员拒绝出席),议决会期至12月12日期满后,再行延期两个月,参议院亦于10日通过此案。

12月17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以唐绍仪为议和总代表。

12月18日　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联合组成“全国和平联合会”是日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蔡元培为总代表。

12月20日　徐世昌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安福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14日、19日通过钱为国务总理)。次日任命各部总长,除陆军靳云鹏,财政龚心湛,内务钱能训兼任,其余各部均未更动。

12月21日　徐世昌于总统府设财政委员会。周自齐任委员长,张弧为事务主任,梁士诒、汪大燮、陆宗舆、曹汝霖、李士伟、朱启钤、陈振先、吴鼎昌、张志谭、王克敏、徐恩元、张寿矜、叶恭绰等为委员。

12月30日　孙中山撰《孙文学说》成书,自序于上海,倡“行易知难”说。

12月31日　徐世昌令山东会同直隶、江苏、安徽各省,于津浦沿线剿除“匪患”认真防护交通。

外　交

1月19日　俄苏维埃政府通知中国驻俄使馆,俄将撤销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和退还租界,并请组成中俄混合委员会协商解决中东铁路办法。

2月2日　驻汉口各国领事鉴于南北两军可能在汉口作战,开会议决:(一)将汉口划为中立地点,不得在租界内有战斗行为;(二)各国商团及碇泊于汉口之各舰,须协同赴租界自卫,举日本驻汉口驻屯军司令官为总指挥。

2月13日　北京政府驻俄使馆,就原沙俄驻日公使与日政府秘密订约出售中东铁路之老少沟至长春段事(1917年俄日换文议定),询问俄苏维埃政府,覆谓:原驻日俄使已被苏维埃政府褫职,无权签订售让铁路条约,所订条约不予承认。

3月8日　日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谓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应“迅速决定实行,以免贻误时机”,并出示换文草稿,促北京政府照此拟写换文。

3月15日　英、法、俄、日四国驻京公使(日为代理公使芳泽谦吉)会议决定,为确保京津间铁路“自由交通”,就奉军进驻京奉线一带,对北京政府提出警告。

3月18日　西原龟三奉日总理大臣之命来华抵达北京。20日西原会晤日驻京公使林权助。

3月19日　日驻京公使林权助向冯国璋提议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同日　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在满洲里与俄红军协议决定:俄红军不犯华境,华军不助白俄谢米诺夫部。

3月25日　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交换《共同防敌协定》草案。协定规定:为“防敌(指德国)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决定“及早协同考量应行之处置”。

4月26日　法国新任驻京公使柏卜向冯国璋递交国书。

5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原沙俄驻京使馆:自本日起中国政府延付俄国庚子赔款。

5月8日　冯国璋特派驻日公使章宗祥为全权代表,与瑞士驻日公使萨利司商订中瑞《通好条约》,并于6月13日正式签字。

5月12日　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沙俄驻日公使已与日本政府签订出售中东铁路老少沟至长春段契约(1917年12月俄日换文议定)。16日原沙俄驻京公使库达摄夫亦将此事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分别向日本及沙俄驻京公使声明,不予承认。

同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限在京留日学生于6

月10日以前各回原校就学，违者开除学籍。29日又布告：限在上海及原籍之留日学生于6月中旬以前返日就学。

5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日驻京公使林权助，于北京相互交换经双方政府批准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文件，并公布"协定"条文，而对陆、海军军事协定内容仍密而不宣。

同日　日驻京公使林权助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赔偿因西南战事所受之损失。

同日　英驻京公使朱尔典为陕西省破坏禁烟条约事，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

7月8日　日驻京公使促请北京政府依照1915年中日条约第六款之规定，开放朝阳、锦州、开鲁及林西等处为商埠。外交部答以政府近来财政支绌，缓日实行。

7月10日　美国务卿蓝辛致函英、日、法三国驻美大使，提出四国组织新银行团共同承担对华借款。嗣后各国即就此磋商。

7月14日　日驻京公使以北京政府所订《矿业条例》及《铁矿公司监督权限章程》不便于外人，要求外交部予以修改。遭拒绝。

7月17日　北京政府添设驻罗马教廷特命全权公使。任命驻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公使戴陈霖兼任；28日罗马教皇遣使来华。8月6日法驻京公使就此提出抗议。24日北京政府遂决定在欧战期间暂不派遣，教廷派来公使亦不接待。

8月6日　西原龟三与曹汝霖在北京密商议定《中国铁道资本团协定书》及制铁厂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规定：由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给予北京政府一亿日元借款作为开办资金。后因寺内内阁于9月28日辞职而搁置。

8月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前俄驻京公使库达摄夫，允许继续交付每月应付俄国之庚子赔款。

9月10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决定：中东铁路仍由中国自行管理，不可委诸他国。

同日　唐继尧通电声明：西南各省既不承认非法之北京政府，其所订一切借款合同及条约等均归无效。

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使声明：日俄两国如有售让中东铁路之协定，中国断不承认。18日，日代公使芳泽反责北京外交部向报界泄露俄国向日本售让老少沟至长春间铁路权利。

军　事

1月1日　鄂军总司令蔡济民部攻占施南、利川、咸丰、来凤等县。

1月3日　孙中山命海军"豫章"、"同安"两舰，炮轰广东督军署。

同日　福建汀漳镇守使臧致平部与攻闽滇军方声涛部在福建诏安接仗。

1月9日　熊克武在重庆就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职。

同日　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段芝贵面请冯国璋速颁对西南讨伐令。

1月10日　北京政府参陆办公处电令湘鄂援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克日分路进攻湖北荆襄地区石星川、黎天才自主军。

同日　上旬哈尔滨白俄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该埠。

1月22日　湖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解职。2月7日唐克明接任。

1月23日　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2月2日　北军第七师田树勋旅攻占湖北蒲圻。

同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岳阳"讨伐"军费一千万元。

2月17日　陕西靖国军曹世英、胡景翼、郭坚等部攻占西安。3月27日靖国军退出西安。

2月18日　北京政府电令前线各军将领，自18日起南北两军停战一星期。25日又电令再停战一星期。

同日　四川刘存厚军与黔军在四川简阳、金堂间激战。

2月22日　陈树藩部攻占陕西蒲城等县，靖国军胡景翼、曹世英、郭坚等部败退。

2月23日　张作霖命奉军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堂率部进驻秦皇岛，截持新自日本运到秦皇岛之全部军械。24日将该项军械押运奉天。26日张作霖向北京政府开单呈请备案，并继续派兵入关，分驻京奉铁路沿线。3月12日在军粮城设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为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3月16日徐树铮抵军粮城任职。

3月7日　广东护法军推李烈钧为讨龙(济光)军总指挥。

同日　吉林督军田中玉特派么培新旅赴满洲里车站驻防，奉天、黑龙江亦派兵前往边境。

3月9日　北军进攻岳阳。11日南北两军激战。17日吴佩孚师第六旅攻破岳阳，次日完全占领，南军伤亡达千人，向长沙败退。

3月21日　奉军由津浦路开赴湘鄂。

3月22日　滇军李善本部占领四川马边。26日占屏山。

4月19日　广东讨龙军刘达庆部攻占茂明。

同日 北军鲁、赣两军进占湖南醴陵。

同日 岑春煊、张绍曾、卢永祥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停战。

同日 赣督陈光远奉命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是日率兵出发,次日占领南雄。此后南雄为南北两军拉锯争夺之地:4月21日南军占领,29日北军占领;5月9日南军占领,旋又被北军夺回。6月3日、10日、23日又先后三次为南军占领。

5月9日 苏督李纯奉命派第十九师第三十八旅援赣。

同日 徐树铮致电张作霖,谓"就时局而论,有战然后芝揆可以支持,选举可以赶办。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着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同日,张作霖据此致电靳云鹏,说明主战理由。

5月10日 陈炯明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

同日 粤督莫荣新解散军政府陆军部警备队,并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之招兵机关。

同日 陈炯明援闽粤军发起进攻。是日许崇智部占武平。24日入上杭。26日孙中山由广州抵大埔三河坝援闽粤军司令部视察。

6月6日 南军占湖南安仁、茶陵,并次第占祁阳、常德、耒阳。9日吴佩孚师败退衡山。

6月7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命令:吴佩孚代行攻湘鄂第一路总司令职,节制所有第一路军队。

同日 张敬尧电请北京政府挽留曹锟、张怀芝,"以维各路军事现状"。

同日 徐树铮密电有关各督,禁阻各该省议员赴宁参加议会联合会;已赴宁者,设法召回。

6月14日 北京政府将进攻南方各省军队编为五路:第一路湖南,总司令张宗昌;第二路湖南,总司令马联甲;第三路四川,总司令许兰洲;第四路福建,总司令童葆暄;第五路广东,总司令杨春普。

同日 徐树铮于天津奉军司令部枪杀陆建章。次日冯国璋据徐树铮呈报,发令褫夺陆建章所有军官军职勋位勋章。

6月15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继续"讨伐"西南。

9月20日 日政府照会北京政府:日军根据《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将在北满采取必要行动,旋即增兵北满。截至10月初,侵驻东三省北部之日军,已达六万人。

经　济

1月3日 永亨银行成立。总行设上海,董事长为施肇基,总经理为朱蕙生。

1月5日 北京政府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二百万日元印刷局借款合同,借款半数归财政部用以收回开滦股票,半数归该局偿还积欠经费。

同日 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除中国代表外,另有英、美、日、法、俄、意、比、荷、葡、丹麦、挪威、瑞典、巴西等十四国代表出席。17日开第一次会议,至12月22日结束。

同日 北京政府批准暂缓偿还届期还本之民国三年有奖储蓄票一千万元。

同日 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往浙江温州之普济轮,在吴淞口与新丰轮互撞,普济轮沉没,溺毙乘客二百余人。

1月6日 北京政府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一千万日元善后续借款第二次垫款合同,以盐税和国库券为担保,用为拨还中国银行垫支军政费用,收回该行所发钞票。

1月18日 北京政府与花旗、汇丰、汇理、正金四银行签订七十万两规银防疫借款合同。

1月19日 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开成立会。2月1日开始营业。总行设北京。总理为陆宗舆,专务理事为柿内常次郎。9月25日于上海设立分行。

1月31日 徐静仁等创办之上海溥益纺织公司,开车生产。

2月1日 段祺瑞、张勋、冯国璋、倪嗣冲等与日本大仓洋行、棉花株式会社合办之天津纺绩有限公司开工生产。

同日 江苏省筹办凤凰山铁矿。

同日 中东铁路督办公所成立,北京政府特派吉林省长郭宗熙督办中东铁路公所事宜。

2月4日 湖南长沙铜元局与日本古河洋行签订二万二千两规平银借款合同。

2月7日 北京政府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二百六十万日元四郑铁路短期借款合同。

2月8日 北京政府与日本兴业会社签订十万日元南浔铁路借款合同。

2月21日 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与日本三井洋行签订五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七英磅双桥电台借款合同。

同日 北京政府从2月31日至3月25日,先后向英商安利洋行、荷兰银行、中法实业银行、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和日本大仓洋行签订北洋保商库券借款合同共六宗,计行化银三百二十万零一千一百二十四点一一两。

2月28日 张奏熏、王郅隆等创办之丹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总公司设北京,资本一百二十万元。

同日 刘子山、成兰圃于山东历城创办东莱银行。

3月14日 北京政府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二百五十万法郎息款垫款合同。

4月1日 郑崇基等创办之上海鸿章机器织染厂开

车生产。

4月17日　段祺瑞、倪嗣冲、王郅隆等投资创办之天津裕光纺织厂开车生产。

4月22日　奉天财政厅长王永江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三百万日元官银钱局整理借款合同，用以整理东三省官银钱号发行奉票资金。

同日　张家口至库伦公路通车。

4月27日　冯国璋公布《民国七年六厘短期公债条例》（发行额四千八百万元）和《民国七年六厘公债条例》（发行额四千五百万元）。

5月2日　北京政府与美国广益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签订二十五万美元运河借款第一次垫款合同。

5月28日　吉林省濛江林业局长陶昌善与日本大仓洋行、王子制纸会社代表日本驻吉林领事深泽暹签订中日合办华森制材公司合同，借日款二百万日元，以本公司制售木材收益为担保。

6月18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代表吉川高秀签订一千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草合同。

7月9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会议，决议先将张家口、归化城、洮南、赤峰、葫芦岛、多伦诺尔等六处开放为商埠。

7月　上海英商创办之鸿源纺织厂，出售与日华纺绩株式会社，改称日华纺织第一厂。

同日　湖北中华铁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汉阳成立，资本三十万元。

同日　日商在奉天成立满洲殖产银行，资本五十万元。

同日　中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8月9日　冯国璋召集各部总长及中、交两银行当局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准备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之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祺瑞同意此建议。

8月27日　北京政府陆军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话有限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话六十万英镑借款合同。10月9日交通部又与该公司签订二十万英镑借款合同。

8月30日　张敬尧开办裕湘银行，资本自称一千万元。

同日　允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资本三十万元。

同日　中法储蓄会在北京成立，资本四十五万元。1926年法股完全收回。

同日　章锡琛等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

9月　五族商业银行在北京成立，资本一百万元。

同日　东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成立，资本五十万元。

同日　惠丰面粉有限公司在济南成立，资本三十万元。

10月23日　北京政府要求公使团交付关税剩余金二百八十万两。驻京协约国公使于30日开会议决，在中国南北未统一前拒付关税剩余金。11月4日英、美、法、日四国公使分别以同文照会致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时，并训令四国驻广州领事将此决定通知军政府。

11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四国银行团，同意币制借款展期六个月，即延至明年4月14日。

11月28日　上海交易所行开幕礼。12月1日开始营业。该所系中日合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资本三千万元，实收半数，经营棉纱、棉花及各种有价证券、股票等交易。1927年1月停业。

12月19日　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于本年1月5日在上海正式开会，至是日通过《1919年改订输入税率并附属规程》，规定次年8月1日实行。与会英、美、日、法等十四国委员同意中国海关改订输入税率按从价课税五分，以欧战前五年间之平均物价为基数。战后物价下落时，在和平条约签订二年后再行修正。会议于22日闭会。

12月31日　虞洽卿、谢莲卿于农商部注册在上海创设“鸿安商轮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一百万元。

同日　李盛铎于北京创办商业银行，资本一百万元，设分行于天津。

同日　吕文会于山东博山创办博山电灯有限股份公司，资本五十万元。

同日　陈文鉴于上海创办中国兴业烟草公司，资本二十万元，北京、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均有分号。

文　教

1月7日　美驻京公使以未曾征得其同意为由，反对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之清华大学校长范源濂到校接任。

3月4日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日刊创刊。

3月15日　《新青年》杂志为引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在四卷三号上发表该刊编辑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新青年》编辑部信——《文学革命之反响》；同时发表另一编辑刘半农复信——《答王敬轩》。在刘半农复信中申明“本志排斥孔丘”，并指出“孔教之流毒无穷”。

4月15日　《新青年》四卷四号刊载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指出：“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并强调“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

民族，必以废孔学……为根本之解决”。

5月15日　《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一篇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反动本质的讨孔檄文。

7月5日　《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宣称以“介绍外情，唤起国民爱国心与自觉心”为宗旨。

7月25日　全国高等专门学校校长会议开会。

8月15日　鲁迅用唐俟笔名在《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我之节烈观》一文。

8月20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陆家滨成立“中华职业学校”。9月8日开学

10月15日　《新青年》五卷五号出版，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 的胜利》两文。

同日　《京报》创刊出版，该报为北京新闻编译处主任邵振青主办。

10月17日　北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报纸条例》。

11月19日　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正式成立，发起人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

12月22日　新文化运动中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创刊。该刊发表大量反孔文章，并于十七、十九两期连续出版“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其中转载各报有关言论，对当时复古尊孔逆流以有力抨击。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19年

导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又把视线转回到东方，中国又一次成为列强的角逐场。中国又回到被人愚弄的时代。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以期达成共同意见，实现南北政府的统一。但由于段祺瑞和皖系军阀集团对和谈进行了大力破坏，加上双方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所谓的和谈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世界大战后的残局，在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在法国凡尔赛宫进行大收拾。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企图分羹一杯，以收回山东的权利，不枉参战一场。但是五大国在此问题上丝毫不愿为中国而得罪日本，从而劝说中国将山东转移给日本，引起中国代表不满，更由于五四运动的兴起，中国外交代表顶住了压力，没有在和会条约上签字。

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人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积蓄多年的怒火终于因这么一个导火索而爆发了。五月四日，爱国青年在天安门聚会，举行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惩处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收回国家主权。随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掀起了广泛的爱国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六月三日后迅速扩展了全国，上海工人的罢工将五四运动推到了高潮。

本年，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开始退还庚子赔款，并不是由于良心发现，而是看到用另一种方式来控制中国将得到更大利益。一般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但往往为历届中国政府所挪用。

经过长时间筹备，十月十日，在纪念武昌起义八周年时，国民党发出通告，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从前的中华革命党及各支部一律停止，统统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中国国民党与民初国民党不同，系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华革命党基本精神得以延续。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心。尤其是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迫使一部分先进分子去思考社会深层的发展原因。新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和反传统精神的结合中继续深入了。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南北和谈
- ●巴黎和会
- ●五四运动
- ●退还庚子赔款
- ●中国国民党成立
-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南北和谈

背景介绍

一九一八年九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继冯国璋执掌政权，欲趁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声誉，来巩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希图借此摆脱各军阀的挟制。他与南方的岑春煊皆属前清之督抚，有同僚的关系，与唐绍仪更有悠久的友谊。而南方军政府亦同样希望利用时机，与徐进行和谈，所以就明商暗契，互相遣使通函，来磋商一切。初意北方代表为李纯，南方代表为岑春煊，并有不少拟议中的人物。最后的决定，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南北各九人（后来南方分代表增为十人）。北方代表启程之前，由国务总理钱能训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宴会饯行，并向各代表致宣言如后：

政府委任诸君代表南下，与西南代表会议，兹当诸君临行，愿以政府之意见宣布于诸君之前。自复辟乱后，西南数省关于法律问题，观察互异，内争扰攘，年余于兹。今大总统莅任，以和平统一为志，适值欧战终了，国际多事，本内阁承元首之意，以为协约诸友邦方战胜强权，将以崇高之人道主义，贡献于世界之进步。我国参列战团，允当顺应大势，发展国力，以尽其对于世界之义务，不当复为内部之纷争，而贻误建国之大业。是以受任伊始，即与西南开诚协商，促进和平，继复纳西南之请，而有此次派遣代表会议之举。是政府之所可首告诸君者，无他，政府为国家进步计，而深以国内平和统一为必要也。至于法律问题，政府与西南因约法条文解释之争执，致有今日不幸之现象。将来会议之时，深望各具世界眼光，均以国家为前提，以多数舆论为基础，而使真正之法意归于一致，此本内阁所乐于观成而深有盼于诸君者也。若夫军事善后，烦难为甚，政府意见在根据现状妥筹收束。国家财政如此，势须速减兵额，缩少支出，方能免破产之厄。而被兵省份，城邑糜烂，匪祸蜂起，如何规复治安，尤赖双方妥议。所望诸君与西南代表同察现状，妥拟方案。善后经费以必要为限，改良计划以能行为主。是不惟政府所乐闻，而西南各省疆吏亦深有期待于诸君也。抑更有进者，七年三乱，国本不宁，今世界大势不容我故步自封，是以政府尤望借此次内争之结束，为国家厉行民治，肇造新邦，其如何而能一新人心，如何而能巩固邦本，倘有良策，尤所愿闻。行矣诸君，为国宣劳，责艰任钜，本内阁与有厚望焉！

十二月三十一日，代表们由津专车先赴南京，等候南方代表商讨各项问题。南方代表是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陆续到沪的。

为了开会地点，即经过多次磋商。北方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唐绍仪主张在上海租界内开会，坚决不允来南京，意谓不能在军阀包围之下开会，因为当时南京是在直系军阀李纯管辖之下。更有人提议会场设在金山寺，或是在兵舰上游弋开会；这都未免近于笑谈。北方为迁就南方的意见，最后决定在上海，借用旧德国总会为会场。南方代表住愚园路九十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关于会议名称，双方意见又极不一致。北方曾拟称为“善后会议”，南方认为这是清代在绥靖地方土匪时才用善后字样，主张称为“上海会议”，并坚持对等议和。北方政府尤其是安福系反对对等议和。几经磋商，始终未得一个双方同意的正式名称，结果各用各的名称。北方称为“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则称为“上海会议”。所以在北方文卷档案中未发见有一个正式规定的会议名称，亦没见到正式钤印。

材料：

- 南北和谈的酝酿和准备
- 有关通电
- 南北和谈破裂

材料一　南北和谈的酝酿和准备

上述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于停止南北战争，促进国内和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需南北双方作出让步和努力。南北战争中，皖系军阀是北京中央政权的统治者，又是战争的主要一方，北方

对和平的态度如何，是南北和议能否顺利召开及其成败的关键。

徐世昌是不同意继续进行战争，主张南北和解的。还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冯国璋和朱启钤等就有意请他出来促进和平统一。他曾说："朱桂老来对我说希望和平之意，我极赞成，但我为在野之人，政府方针如何，不便干预。"他还表示，如果段祺瑞与冯国璋两人"意见完全一致，我必乐为赞助统一之业"。10月10日，徐在就职宣言中提出："今我国民心目中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宜尊重和平。……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颜力达和平之主旨。"当段祺瑞辞职时，他委令钱能训代理，随后又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钱能训于清末在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曾在徐手下任参赞，被人们看成是徐的"夹袋中人物"和心腹。钱也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任命他出来组阁，显然是徐世昌为谋求南北议和作准备的。

徐世昌虽有谋和的愿望，但他就职后，对于如何解决时局问题并未明白表示，宣言书中希望和平，也是"含混其辞，直令人无从捉摸"。这固属老于官场的一种圆滑手段，其实在他心中也并无一定把握。徐为北洋界元老，但他属于文治派，没有实力，虽由钱能训组阁，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仍然掌握在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手中。徐世昌需要以北洋派为后援，他出来首先是为了协调和缓直皖之间的矛盾，维护北洋的统一和团结。"无东海则北洋派分裂，无北洋派则东海失据。"因此，人们认为，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统一北洋，至少是不要使北洋内部的矛盾加剧，"至于解决南北问题犹在其后"。"牺牲北洋之统一而与南方握手，为东海所不为。"何况他是被主战的段派军阀和安福系推戴出来的，在和平问题上，他需要观察形势，小心谨慎从事，不能完全违背段祺瑞、徐树铮的意愿，走得太快太远，以致损害皖系军阀统治的根本利益，"转与自身不利"。他还认为，南北统一固以和平为主，但必须保全政府之威严，故打算不先由政府出面，而托在野名流疏通双方意思，俟有把握，能得双方同意后，再作具体的妥协，并且以为，如果"以北方名义先行表示，则必惹起西南无穷要求"。这种状况，多少决定了后来南北议和的结局。

12月11日，北京政府阁议通过参加南北和平会议的名单，随即发表了委任令。代表姓名及其所代表的党派和方面如下：

朱启钤（总代表，代表徐世昌）
吴鼎昌（代表安福系）
方　枢（代表段祺瑞和安福系）
汪有龄（代表旧交通系梁士诒）
施　愚（代表直系李纯）
刘恩格（代表奉系张作霖）
王克敏（代表直系冯国璋）
李国珍（代表研究系）
江绍杰（代表安福系）
徐佛苏（代表研究系）

在拟定名单时，安福系因其首领王揖唐未获选，大发牢骚，向徐世昌提出必须将他补进去。徐因不满意王的所为，表示朱启钤已答应担任首席代表，不便更改；如果派王为普通代表，则又与王的众议院议长地位不相称。安福系无可奈何，又推荐普通代表多人如王印川、郑万瞻等，徐世昌无法应付，只好让安福系最初所推荐的江绍杰加入。研究系以李国珍非其嫡系，要求改为籍忠寅。和平期成会则极力反对刘恩格为代表。徐世昌均不同意更动。

随后，12月16日，南方也决定委派西南七总裁之一、前不久从日本回国的唐绍仪为总代表。

继对等会议问题解决之后，在当时南北开始对话接触过程中，还出现了南北会议地点问题、名称问题以及陕西剿匪问题的争论。

关于会议地点问题，北京政府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则要求在上海。11月30日，西南七总裁致电徐世昌说："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双方各派相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解决。"12月5日，徐世昌复电表示，他对会议有关问题一无成见，办法由国务院另电答复。

同日，钱能训在致七总裁的复电中声称：会议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少之分，但为迅速解决纠纷，可以不拘成见，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主席，公共协议。至于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点，认为京沪同属国土，何有中立之可言。

（摘自《中华民国史》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有关通电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

1919年5月15日发，16日到

朱总代表鉴：梓密。南代表所提出条件，除一、二两项，欧会所拟山东问题，中央现已一致坚拒；中日密约既在欧会宣布，事关国际，非可臆定：该两项未便置复外，至订立密约，情形复杂。即如二十一条密约，本由彼方强制，当日在事人员悉力争持，多方补救，均有案牍可考。时势所迫，在政府亦非得已，岂能追溯既往，罪及关系之人。揆度情势，无此办法。

三、四两条本已在悬案之内。近来蒙边情形益紧，急在调度出师，万难遽议裁废。至对人问题，未便议及，前此已累电言之。

第五项取消解散国会命令。持论趋于极端，实属万难办到。国会所以代表民意，旧会成立以来阅时过久，岂能合今日之民意。况解散命令因反对参战而起，事实具在，岂能取消。此时中央国会团已依法选举，并已行职权，以根本问题断难迁就。唐总代表以此为主张让步，然则不让步又将如何？

第六项所云政务会议监督履行，是于政府之上另设机关。揆诸法理，衡诸事实，均不可行。至阁员同意之权属于国会，以此项会议代之，果何所据。

第八项承认总统一节。元首当选以来，中外共认，乃加以"临时"字样，复另有正式选举之议。动摇国本，诒诮邻邦，影响所及，沦胥立见，此尤中外人士所断难赞同者也。至第六项已经议定，或付审查各案，当须分别决定。所决定者亦不可恃，将何能恃以解决大局？

以上各端，此间公同计议，均认为毫无理由，必应坚拒。南代表既以和平为重，乃以此等不可能之事实列为条件，其中语[?]和平非出诚意，无可讳言。务希切实驳拒，要求将所提条件即日撤回。倘仍胶执前见，则是彼方于和平问题已无磋商余地，我代表等应克期回京，另筹解决。即希照办为要。能训。咸。

唐绍仪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5月1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铣电敬悉。探得北方代表全体辞职，经已照准。北政府对我所提八条，完全否认，有电致沪，按条斥驳。据可靠之消息，言北京政潮酝酿甚恶，证以对沪和会之态度，恐有急剧之变化，望筹所以对付。现在和议既末由进行，仪等去留更无甚关系，尚乞鉴谅一切。绍仪等叩。皓。印。

（以上录自《1919年南北议和资料》）

材料三　南北和谈破裂

1919年4月9日，南北议和正式复会，双方代表举行第六次会议。南方总代表首先提出继续讨论解决之议题六条："一、取销中日军事协约。二、裁撤国防军（指参战军）机关及所属兵士。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四、和平会议未终了以前，双方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五、陕西问题。六、湖南问题。"新议案十三条："一、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二、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三、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河道，以安插兵士。四、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五、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六、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七、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八、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九、整理财政，免除厘金。十、贩卖人口、贩卖马啡烟土、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严行禁绝。十一、惩办祸首。十二、省治安善后问题。十三、整顿海军问题。"

北方议和总代表提出之议案为："第一条，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子、裁减标准与其方法；丑、安插方法；寅、裁减时间；卯、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第二条，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子、省之改革；丑、道之改革；寅、裁汰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卯、扩充全国教育；辰、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子、县自治；丑、省自治；寅、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发展国民经济：子、兴筑国道；丑、改革币制；寅、废除恶税；卯、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戊）善后借款问题：子、借款额数；丑、借款用途。"

对照南北方议案，北方提出者，完全回避了造成南北分裂的一些要害问题，而是官样文章。因南北分裂起因于国会问题，但北方笼统地提出所谓军事问题，南辕北辙，双方的着重点根本不同，和谈怎能会有成果。

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忙于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全国反对皖系的空气，日益浓厚。5月10日，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以书面形式向朱启钤提出下列八条：

"一、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宣告不承认。

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

三、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

四、恶迹昭著，不洽舆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

五、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二日命令无效（指解散国会令）。

六、设政务会议，由平和会议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组织，由其同意。

七、议决各案，及已付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举出正式总统之日止。"

唐绍仪并特别说明："此第八条绝不能单独讨论，必须有第一条至第七条之实行，乃有第八条之结束，如第一条至第七条不能实行，则第八条仍属无效，故特编为最后一条也。遂后又于5月13日南北议和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就以上八条，逐一进行阐明，并宣布此为南方谋求统一之最后让步。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声明："第五条由和会宣布黎令无效，北方万难照办。此项不易，他项终无可议"。会议终无结果。会后南方全体议和代表即电广州军政府辞职。14日，北方全体议和代表亦电北京政府辞职。15日，北京政府完全否认唐绍仪所提八条。同日，徐树铮致电北方代表中安福分子说："黄粱将熟，梦可醒矣！……夫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实力，戴东海之德望，据二十四

省之大地……，何患不气吞欧亚，若五省之就范，直瞬息间事耳！”段祺瑞皖系军阀，仍念念不忘他们的武力统一政策。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黎和会

背景介绍

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大厅举行开幕式，陆徵祥和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当时中国方面多称为会长或议长），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四人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名代表组成，称作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他们是：美国的威尔逊和兰辛，英国的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的克列孟梭和外长毕勋，意大利的奥兰多和外交大臣索尼诺，日本的牧野伸显男爵和新田子爵。

会议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为五名代表，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由于中国内定的五名代表均已到达巴黎，不便安排两名，因此陆徵祥仍旧将五名代表上报和会，但每次会议仅由其中两名出席。其他弱小国家大多也采取这一办法。中国代表排列顺序是：陆、王、施、顾、魏。

在中国代表中，较早注视并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的，是那位名气不大、资历甚浅的青年外交官顾维钧。还在战争期间，顾就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等问题。1919年1月23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三次会议，陆徵祥简要报告了中日山东换文的情况。他说：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案，“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在这里，陆徵祥讲得很清楚，政府是以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的路权，作为日本部分撤军的“交换条件”。铁路合同既然是作为“交换条件”而提出，那么也就不是一项孤立的经济合同，而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北洋政府默认了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否则日本决不会自行撤兵的。显然，铁路合同和日本撤军这两项于1918年9月24日同一天签订和商订的文件，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曹汝霖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均回避了这两项文件之间的联系这一关键问题，孤立地谈论两项协定。

在陆徵祥发言后，顾维钧当即发言说：山东问题、铁路问题以及中日间许多条约，“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顾维钧的发言，实际上是否认了中日政府关于山东的各项换文，统统称之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因此必须在巴黎和会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和会开幕之初，五强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在1月27日上午的十人会议上，临时改议日本代表提出的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要求，美国代表表示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十人会议。

材料：

-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的辩论
- 顾维钧回忆拒签对德和约之经过
- 帝国主义的阴谋

材料一　中日代表在和会上的辩论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大国为便于操纵，会议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为全体大会；一种为英、美、法、意、日五强国出席的小型会议，称曰“十人会议”（由英、美、法、意各国首脑和外交部长及日本两个特别代表组成）。中国代表不但没资格参加“十人会议”，而且出席大会的代表也只有二席。自3月24日以后，又有“四人会议”的组织，由英、美、法、意四国首脑出席；另组织一“五人会议”附属于“四人会议”之下，由四国外长与日本代表组织而成。“四人会议”是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一切重大问题由它们决定，然后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四人会议”，日本虽无代表，但遇讨论远东问题时，日本仍可参加。所以“十人会议”与“四人会议”，日本均有代表参加，而中国只是在有关问题被邀时，方得列席。和会开幕之初，已充分暴露这是一次在和平伪装下的、帝国主义列强战后的分赃会议，它根本不可能对世界和平与维护各国民族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除陆徵祥之外，其他成员主要为驻美、英等国公使，故他们在陆徵祥尚未抵巴黎前已先到达，并为和会提案准备文件资料。最初由驻美公使顾维钧提出七个问题：即“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经代表团其他成员同意，分头准备。顾维钧主动承担了“二十一条”与山东问题的文件准备工作。显然以上这些问题，已远远超过北京政府内定拟向和会提出问题的范围，特别是有关山东问题。但由

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及国内舆论的推动，山东问题，却成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坚持要求解决的主要提案。

此次辩论，中国代表得到与会代表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日本代表强词夺理蛮横无理态度，遭到与会者的冷遇。日本政府为中国代表出乎意料之外的作法所恼怒，2月2日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谓："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查外交惯例，两国所订之秘密文件，如须发表，必须得两方面之同意，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外交部次长陈箓（时代理外交总长）答称："大总统注意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继而小幡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况日本亦有相当之体面，不能不极力维持"云云。

顾维钧、王正廷在巴黎和会上，为山东问题慷慨陈词，一时颇博得舆论的好感。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国内爱国群众激情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日美之间，在远东问题上矛盾的反映。在欧战期间，两国就由于在中国的争夺，致使矛盾日趋尖锐，蓝辛——石井协定的成立，只是一时的妥协。战争结束，美国势力重新回到远东，所以它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采取抑制政策。顾维钧在会上会下针对日本有关山东问题的各项活动，或多或少得到美国的鼓励和支持。实质上，山东问题成为美国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的一根筹码，是美国借此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手段。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顾维钧回忆拒签对德和约之经过

6月27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急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亟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晚饭之后，我去看陆总长，发现岳也在。我们一道交谈了几个小时。岳先生后来起身向外交总长告辞，要返回巴黎。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在当时看来非常可怕的事情。岳先生在走后二、三分钟又匆匆地折了回来。他脸色苍白，对外交总长说，他在医院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讲，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很多人是学生，也有一些华侨商人。他们拦住了他，诘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是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作是陆总长的心腹，并认为陆不顾代表团其他人的劝阻，已经决定签字。据岳先生讲，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女学生甚至当真在她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跑了回来。他说，他还是在医院里过夜为宜。我尽力使其平静，同时说道，人们恐吓他是可能的，但还不至于真的想杀死他。两点钟左右，我告辞出来，偕岳同行。我对岳讲我将负责他的安全。我们下楼之后，人们又将他围住。但是，当人们看见我以后，局势似乎便不再那么紧张了。显然他们了解我是主张拒签的。我告诉他们，不允保留，中国当然不会签字，而由于未得到任何支持，保留看来已无可能，因此，签字一事便亦不复存在，诸位可不必为此担忧。

人们听了这番话之后便散开了，我们也得以走出医院。几年之后，我在纽约常常见到魏道明夫妇。魏夫人名叫郑毓秀，西名苏梅，她曾参与过1919年6月27日圣·克卢德的那次聚众之事。距今四年前的一天，她缅怀往事，对周围的宾客们大谈我在危机之中是何等勇敢。我答称，对那次事件我了如指掌，我当时断定她那假冒手枪之物不过是藏于口袋之中的一段树枝而已。她笑道："你猜得很对，可是岳先生当时真吓坏了。我那时站在一旁暗自好笑呢。"她又说，她认为我很勇敢。我说："我知道你并无手枪呀！"虽然爱国学生与华侨在那次事件中是认真的，但这一事件还是一出喜剧。

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一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博士，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于和会这一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目。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6月28

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我于是去圣·克卢德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景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那真可谓一次旅行——在清晨五、六点钟时分，从圣·克卢德到巴黎，竟用了十五甚或二十分钟。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摘自《顾维钧回忆录》）

材料三　帝国主义的阴谋

二十一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衷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同日下午，威尔逊在“四人会”上报告与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路易乔治建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予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二十二日上午续开“四人会”，此时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忿而退出会议，“四人会”实际上成为“三人会”，西方帝国主义阵线发生了很大的裂痕。日本代表的态度便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并称奉到本国政府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一九一七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这是日本用以挟制英、法等国的有力武器，不啻警告它们，“你们在密约中早已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此时只有履行条约的义务，不能跟着美国走”。在此以前，四月上旬日本代表曾提出人种平等一案作为陪衬，以交换美国对山东问题的让步。不难理解，如果日本继意国之后退出和会，和会便会瓦解，整个帝国主义联合阵线也会随之瓦解，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便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日本代表的这套手法，对西方国家起了深刻的影响。

同日下午续开“四人会”（实际上是三人会），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他们已经知道山东问题凶多吉少，还幻想那位中国的“亲密友人”，那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认为是主持“正义”与“公道”的美国总统，能够出面来仗义执言，为弱者鸣不平，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果然那位“伟大人物”开口说话了。但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象法官宣判一般十分严肃地说道：“我们参加这次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是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中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义务。在这些情况下，山东问题没有变更的余地”！

顾维钧说：“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而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是以前约为根据而产生的。”

威尔逊说：“可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在军事上已经处于绝对优势，日本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换文上有‘欣然同意’的一句话”？

顾说：“当时日本在山东不撤兵，地方备受扰害，民情异常激昂。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承认签订这个续约”。

路易乔治若有歉意地说：“英国和日本签订密约时，地中海以东地区局势异常紧张，英国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力。现在感觉到，当时付予日本的代价未免稍昂，但条约究竟是条约，不能作为废纸”。

于是威尔逊神色不安地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并非不愿主持公道，无奈受到以前各项条约的拘束，对中国无能为力。好在国联成立后，将来如再有以强力加之于中国的，国联会员国自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乔治跟着说：“我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大多抱有好感，问题在于受到条约的约束。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目的范围超过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即无支持日本的义务。如果以后日本再欺负中国，本国一定给中国以助力。”

接着，大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发言，同意乔治的意见。

二十四日，中国代表向“四人会”提出另一说帖，内容分为四项：(1)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可先移交五强，将来由五强交还中国；(2)日本于签订对德和约一年后完全退出山东；(3)中国愿偿还日本攻占青岛的战费，其数目由四强规定之；(4)中国愿将胶州湾全部辟为商埠，并划出一定区域供外人居住。这是中国代表对山东问题表示让步的一个新方案，其目的在于迎合美国意旨，反对日本独占，同意暂时性的国际共管，企图以此获得美国的支援。就在这一天，意国代表团正式撤退回国，和会危机严重，西方三国更倾向于讨好日本，对这个新方案感到难于接受。

以后“三人会”续开数次，到二十九日，国际三“巨头”作出最后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

让予日本，然后由日本自动交还中国，但在交还后，日本仍得享受以前所有的经济权利。这就是说，西方三国在"道义上"认为日本必须将山东权利交还中国，日本是否愿意交还及何时交还，则留待中日两国自行解决。这个决定，事前并未征求中国代表的同意，不让中国代表再有机会表达意见，甚至会议记录以及和约草案也不发交中国代表过目。五月一日，英国外长巴尔福代表三国将上项决定通知中国代表。四日，中国代表向"三人会"提出抗议，也竟然没有下文。到了这个时候，关于山东问题，列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竟和战败国一样，受到惨痛的处分而告结束。

五月十四日，和会议长克里孟梭通告中国代表："中国代表送来说帖，不能认为属于和会讨论范围内，应俟国联行政部成立时，请其注意"。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影）

五四运动

背景介绍

5月4日，因章宗祥刚刚回国，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爱国青年在天安门聚会的消息，立即报告到正在与曹、陆、章等人欢宴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一同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察厅估计到学生将来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据《每周评论》记载，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后，"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因当天是星期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内容是："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

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大门紧闭。据曹汝霖回忆：这时，"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字）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到处寻找曹汝霖，曹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曹汝霖接着回忆说："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未找到曹当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事不妙，立即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然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材料：

- 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 山东代表请愿书
- 上海国民大会

材料一　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一、四日事件以先的酝酿　山东问题在最近两三个月里，成了中国外交上唯一的大事件，国人的动作很活跃。最近一个星期里竟有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而所以失败的缘故，一大半为着国内有亲日派暗中动作，所以国民的愤怒达于极点。不特各地自行动作，并且互相来往，山东人到北京来，北京的公民到山东、上海去。共同的目的是外而争回青岛，内而惩罚国贼。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国民对日本人取最坚决的对待，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这举动议决的时候，已经夜十一点钟。

二、四日上午的学生代表会　四日上午已经有几个学校制造旗子，预备出发；也有几个学校，前一夜的临时大会不曾知道，所以本日上午十时，又在堂子胡同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到会的有十二个专门学校，并且有一个陆军

学校也派代表列席。这个会在一个半钟头里议决了几件要事:(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街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这会里最可纪的,就是大家议论行事很迅速,面上带着很愁很怒的颜色。

三、四日的示威事件　这天下午一时半,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或两个白旗,旗上写着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我青岛","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运命","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等,好几千面没有同的。也有用英文法文写的,也有画很有刺激力量的图画的。到两点钟整队出中华门前面,两面很大的国旗当中夹着一付〔副〕挽对,上面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旁边写"北京学界泪挽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到了东交民巷西口,使馆界巡警不放行。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递上说帖,又派了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使馆里求见递说帖,各公使都因为是礼拜,早已出门,都派馆员接见,表示同感的意思。这里大队就退出交民巷,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　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指赵家楼曹汝霖宅去了。沿路散了许多传单,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采,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最要的一个传单上写着: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到了曹家门前,大家齐呼"卖国贼呀!"曹宅的周围有二百多个巡警站着不动。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学生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翻,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当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苏佩秋,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这天晌午,曹和陆、章,三人都在总统府宴会,有人劝曹不要回去,曹说:"怕些什么?"所以就同着章宗祥回家,就碰到这桩事。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了个晕倒血流,头盖上露骨。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到这时候,火势已大,不能再停,一齐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就带队赶到。曹看打人的已去,才从老妈子的屋里出来,大喝吴氏疏忽,还说:"你快快把这些不知道曹总长利害的混帐学生全给我捉去。"吴有点迟疑,他又说:"有我哩!"吴才下令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捕到三十二人。然而曹也不再停,坐着吴氏的汽车,带着武装,携着秘密文件一箱,直往东交民巷。东交民巷的巡捕因为他车上有武装,行的又太快,把车夫汽车捉了去,他一个人只得躲到六国饭店去。

(摘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材料二　山东代表请愿书

为请愿事:窃维欧会和约,举山东权利付与日人,是无异举山东人民陷诸死地。群情愤激,誓死拒争。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祗以死亡所迫,反顾弗遑。原期政府垂怜,容纳民意。乃观近事,则大不然。对国贼则因辞免官,初无惩意。对外交则隐讽暗示,别有会心。东民一息尚存,宁甘待毙。敬承等匍匐来京,作最后之请求。冀当途之觉悟,椎心呕血,谨为贵院覼缕陈之:

(一)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必须拒绝签字也。政府谓拒绝签字,则国际地位无术保持,此特惑于胡使一面之说,未加深省。但签奥约,仍可加入联盟,王使正廷来电可按,则胡使六不可不签字之条陈,殊不可凭。即就利害言之,青岛为沿海要港,山东为全国咽喉。一入日本范围,足制我国死命,达人硕士论之綦祥。是我画诺对德之和约,不啻注销中国之名义。国且不国,有何地位之保持。若谓日人再肆贪婪,列强将加以禁制。则既能加禁制于日后,何不可禁制于目前。况拒签之声万方,一概不恤众论,冒昧执行,恐和约之墨渍未干,我国之土崩已见。不签字固未必不亡,签字则必至于亡。情势昭然,勿庸蓍蔡,此签字之必当拒绝者也。

(二)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必须废除也。查高徐、顺济路约,既未经大总统盖印,又未经国会议决,特由二、三佥士,暗中受授,揆诸约法,实难认为有效。政府贪于涓埃之接济,罔恤祸患之根因,硁硁坚守,不予解除。率至青岛问题,提出和会,日人依此为根据,怙势力争,列强借是为口实,谢绝援助。我使继绊〔结〕舌瞠〔目〕,欲辩无辞。海岱精华,乃随斯约以俱去。东民愿竭膏血,偿款解除。迭电哀呼政府罔应,三千万众今犹是心。此约苟存,青岛不复。亡羊补牢,未为晚。此高徐、顺济路约急当废除者也。

(三)卖国奸人必须严惩也。查曹、陆、章诸奸,居心险诈,但图身肥,罔恤国瘠。二十一条之迫签,既为若辈所嗾使。高徐、顺济之订约,亦为若辈所构成。和会方开,公论犹在,青岛归我,众喙同音,若辈何心独标异议,谓青岛等于旅大,胶济等于东清。既在国务会议危论劫特〔持〕,复于专使进行,多方掣肘。其为日人尽力,一若有巨谴大罚驱迫而为之者。似此凶狡,久稽形诛。深恐谬种流传,完用辈出,三韩殷鉴,噬脐难追。庆父不除,鲁难未已。仅予免职,何足蔽辜。此曹、陆、章诸奸亟当惩办者也。

以上三端,代表等承父老之嘱托,作阊阙之呼吁,既将命而远来,必得请而后返,除将愿书分呈大总统暨国务院外,理合陈请贵院查核。伏乞垂察舆情,迅速提议公决施行。

山东省议会代表

张敬承	王者塾	杜荣相	秦福堂
朱启江	于之昌	李庆施	赵树枋
李允峰	张逢源	王永昌	孙祖荫
姚元谦	朱文泉	张树德	景传诗
孙郛五	王成业	吴荫曾	聂澄泽
牛金铸	李有典	刘范颐	

学界代表

姜汉三	牟绍周	连警斋	李益三	刘益三
汪洋洋	崔梯云	程墨斋	张湘溪	徐星垣
郝宝书	鲁佛民	亓轮升	韦延稹	张漱石
刘沛然	尹世铎	刘一鹤	用振策	田象孚
冉少亭	杨沅香	郑沐之		

材料三　上海国民大会

七月一日午后一时,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开会,讨论拒约签字救亡办法,到者约十余万人;推定李君大年为临时主席,并推定王君孙为临时速记。随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和约签字,山东亡国家亦亡,今应全力挽救危亡,并取消东方德意志主义及警下承认卖国政府。”随由留学生凌炳君略谓:“台湾既亡二十余年,今青岛又将成第二台湾。二十一条及种种密约,原望欧会取消,协约国既不能主张公道,我国人当自谋取消,否则国亦随亡矣。日本现乏粮食,国内恐慌已极,不足畏惧”云云。次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君云:“闻和约已签字,此次大会为吾人生死关头,略分对内对外办法两种,与大会主张略同。”次天津学生代表沙立培云:“欧约签字,山东亡天津随之而亡,国亡而政府尚压迫人民爱国,可为痛恨。”随大哭不止。次商界代表华氏云:“外人庆祝签字,吾商界应罢市一日并下半旗,以表示吾国丧失国权哀痛之意。”次中华工业协会代表吴灿煌君云:“救国须国民一致反对卖国政府,应请李督军、卢军使出师讨贼。”次工界代表谢申岳君云:“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次山东协会代表崔世一君云:“山东亡,我们救国惟有组织自治机关,订立自治规约,而国民大会即为发起之机关。”次王君祺云:“闻吾国已签字,惟卖国政府及外交团不肯宣布,恐惹起吾民激动。吾人今应切实研究签字后对付切实进行方法。”随有某某君演说,语皆激昂。复有由主席报告游行示威运动,由领队从本会头门出,经林荫路、老西门、大东门、中华路天主堂街、十六铺、民国路后,仍回会场,秩序井然,众无倦容。中有年逾六旬须发皆白之袁肇荣及姜昌舲二君,沿途演讲勿卖日货及参观外人庆祝提灯会,众均极感动。各商家多备有凉茶止渴。返会场后,有某君报告“中央新闻社”译员言吾国确已签字。主席遂将前日二次国民大会决议八条逐一付表决,众皆赞成,兼嘱各团体推举代表二人,明日午十时在公共体育场再开会讨论实行方法。众乃向国旗行三鞠躬,三呼“中华民国万岁”,然后宣告散会云。

(摘自《时事新报》1919 年 7 月 2 日)

退还庚子赔款

背景介绍

庚子赔款是 1900 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等 11 个国家于 1901 年 9 月 7 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大宗赔款。这宗赔款总数达 4 亿 5000 万银两,分 39 年偿付。加上年息 4 厘,本息共计 9 亿 8200 多万两,尚不计地方赔款 2000 余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空前勒索,其中俄国勒索的庚子赔款数额最大,占总数的 28.9%,其次是德国点 20%,法国占 15.75%,英国占 11.24%,日本占 7.7%,美国占 7.3%,意大利占 5.9%,比利时占 1.88% 等等,还有瑞典、挪威、葡萄牙的少量民间索赔。

1911 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停解赔款,中国即停付庚款。但不久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下,继续偿付庚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 年 3 月 8 日中国正式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延付庚款。不久,北京政府对德宣战,于是协约国各国同意自当年 12 月 1 日起延付庚子赔款五年,免加利息。俄国庚款因所占份额最大,只同意延付 1/3,其余 2/3 仍继续支付。中国与德、奥因已处于战争状态,故德、奥庚款立即停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因战败而放弃庚子赔款。但未加入协约国的荷兰、西班牙、挪威、瑞典等国的庚款并未延付。庚款中的国际赔款部分,中国政府于 1918 年 9 月一次付清。

此后，俄、美、法、英、日等国的庚款先后退还。

材料：

・俄国庚款的放弃
・美国庚款的退还
・英、法、日等国退还庚款

材料一　俄国庚款的放弃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北洋政府担心上海道胜银行将俄国部分庚款交付新生的苏俄政府，决定扣留当年12月份应交份额。但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立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要求将俄国庚款中的2/3仍交上海道胜银行，专供“远东各使领馆向该银行支取经费之担保金”。于是从1918年1月份起，北京政府继续交付俄国庚款。

然而，苏俄政府对中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1918年1月1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正式致函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宣布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不能代表苏俄政府，并同刘镜人公使非正式接触，表示愿废除帝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担心继续支付俄国庚款、支持旧俄公使，会得罪苏俄政府，因此决定自1918年5月份起，再次停付俄国庚款。但不久北京政府在协约国列强的诱逼下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从1918年8月份起北京政府又继续照付俄国庚款。1919年5月，因发生旅俄华商巨款被扣案，北京政府又扣留俄国庚款两个月。以后，北京政府继续交付俄国庚款直至1920年7月。

早在1918年7月4日，苏俄外务委员契切林即表示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庚子赔款。同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会议又作出决定：“将取消中国向俄国交付军费赔款一事知照中国政府”。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废除旧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部分庚款。1920年3月26日北京政府正式收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6月北京政府即派出以边防处官员张斯麐为首的非正式代表团赴苏“实地考察”，备受苏俄政府的欢迎。同时，在苏共(布)中央指示下新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也派优林来华，准备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对苏俄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停付俄国部分庚款。7月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正式通知旧俄驻华公使停付庚款，9月23日北京政府便宣布取消旧俄使领资格。

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苏俄政府放弃庚款，但要求中国方面不得将此款支付前俄国领事及俄国其他团体或个人。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作为附件《声明书》规定：“(一)苏联政府所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于该项赔款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中国教育款项之用。(二)设立一特别委员会管理并分配款项。该委员会以三人组织之，其二人由中国政府委派，其一人由苏联政府委派。凡议决事项，以全体一致行之。(三)该款于随时收入时，应即存储于上述特别委员会所指定之银行”。但后来这部分俄国庚款除清偿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外，虽尚有余款9700多万元，名义上为专供教育之用，而真正拨付教育经费者，前后不到400万元，仅及余款的4%。

材料二　美国庚款的退还

美国原先多索庚子赔款。美国政府为示好中国，培植亲美势力，最先退还多索的庚款。早在民国建立以前，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在国会咨文中提出退还多索庚款，作为中国教育经费、派遣留美学生之用，经参众两院通过后，1908年5月25日美国总统签署此案。美国原收受庚子赔款总额为24,440,778美元，现减为13,655,492美元，应退还多索的赔款10,785,286美元。这一笔上千万美元的大数目，是美国第一次退还的庚款。

1924年5月美国议会通过退还庚款余额案，应庚款余额为6,137,552美元，自1917年10月起至1940年12月止，每年退还539,588美元，本利合计12,545,437美元。这是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

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用于留美学生与兴办清华学堂的经费；清华学堂以培养留美学生为主，从1909年至1929年共培养留美学生1,289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之用。1924年9月，中美共同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接收、保管并运用美国庚款，设董事会15人，内中国籍10人，美籍5人。第一任董事由中国政府委派，自第三届年会起，董事会每年自行改选1/5。该会保管的基金有：(1)该会自有基金，即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2)清华学堂基金。自1929年起，清华基金委托该会保管。(3)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基金，以及其他基金。该会自办的事业有：科学教授讲席，科学研究教授席，科学研究补助金，编译委员会，华美协进社等等。

由于美国率先退还多索的庚子赔款，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各国同意延付庚款5年，加上中国国内财政的困难，教育经费不足，而且庚款数额巨大，因此中国政府与民间均希望各国将庚款退还，并多方进行活动与交涉。况且各国庚款本来就有多索情况(且不说这是对侵略者的战争赔款)，当时俄国外交大臣就说：这是一次“最够本的战争”。同时，各国看到美国退还庚款，培植亲美势力，好处甚多，所以相继退还庚款。

材料三　英、法、日等国退还庚款

英国表示退还庚款，仅晚于美国，但宣布退还，反在日本之后。1922年12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正式通知中国，但真正实施退还，迟至1931年。自1922年12月1日起至1931年6月，应付英国庚款加上银行利息近400万英镑，扣除付给香港大学及伦敦中国大学委员会465,000镑，尚余350余万英镑。根据中英双方的换文，自1931年4月起，到期之庚款，一半由伦敦购料委员会使用，一半交由中英庚款董事会使用，而交与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款，亦分借国内生产事业。整个英国退还的庚款，均先投资于实业(铁道、导淮、黄河水利等等)，以其利息用于教育事业。

英国庚款以其投资所得利息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从1934年开始办理，每年一次。1931年7月4日，中英庚款董事会议决定英国庚款息金分配办法，分为五类。甲类占25%：(一)保存文化古迹，补助十余起，最主要的是整理影印敦煌经卷。(二)建设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这两馆因抗战影响，未完工，后在重庆建一分馆。乙类占35%：补助高等教育研究机关，特别注意农工医理四科。丙类占15%：考选留英公费生，从1933年开始办理，至1941年共选派留英学生193名。后因世界大战紧张，停止选派。丁类占1%：设奖征求教科书及民众读本。戊类占24%：其他"事业"如办理职业学校等等。

抗战期间，中英庚款董事会增加三项工作：(一)保存文物：运出故宫所存之古物万余箱，居延汉简八箱运至美国保存。中英庚款董事会与中央图书馆合作，在沦陷区搜购公私古籍印本1.5万余部。(二)补助研究人员：设讲座40余席，补助研究人员400余人。(三)自办事业：有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蚕桑研究所，中国美术学院，甘肃科学教育馆，还设立中学三所。此外与教育部合办了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1943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改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

法国于1921年表示退还庚款，此时正遇中法合资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法国便将庚款作为该行偿债复业资金。因法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为贬值，法国政府发行的新法郎，仅值民初法郎的1/3或1/4，于是法国政府于1922年向中国提出按金法郎偿付庚款，引起中法之间的争执，称金法郎案。1925年4月，北洋政府被迫承认金法郎案，不仅未得到法国退还庚款之利，反而受巨大损失。

关于日本庚款。日本侵华野心早已暴露。日本看到退还庚款用于中国文化事业，可起到特殊的侵略功效，所以1918年9月21日日本外相向中国驻日公使提出非正式照会，表示准备退还庚子赔款。1923年日本众议院通过对支(那)特别会计法法案，确定"对支文化事业"财源以庚子赔款为主，用于中国的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文化事业，以及在日本有关中国之学术研究等，而使用权完全由日本政府掌握。

日本退还庚款的办法，自然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要求将退还的庚款，由中国自己支配。1923年12月中日双方议定用庚款补助留日学生320名。1924年1月中日双方又达成关于庚款的协议九条。1925年5月中日两国协同组织总委员会，管理以这笔庚款为资金举办的在华一切文化事业，中国委员11名，日本委员10名。日本利用退还庚款为侵略中国服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的所谓文化事业，则主要为配合日本侵华战争而设。

其他如比利时、意大利与荷兰等国庚款余额也都先后退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庚款数额较少，未退。

各国所退庚款的数目，占庚款总数的41.89%。中国教育界人士希望将各国退还的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但实际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仅占退回及停付庚款总数的12.09%，其他除投资实业外，多为中国历届政府所挪用。

（摘自《民国春秋》）

中国国民党成立

背景介绍

经过长时间筹备，1919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发出通告，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国民党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在名称上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而且其性质也和旧国民党不同。旧国民党由五党合并而成，而中国国民党则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新党章第四条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华革命党的基本精神得以延续。

10月13日，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主任居正呈请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主任，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当即批令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

与此同时，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曾经以排满为主要目标，因此辛亥以后，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一度模糊起来，中华革命党党

章干脆取消了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了反对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纲领。这次重新恢复三民主义，表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1920 年 11 月 4 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说，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这是确定不能改易的。"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所作的这一解释，表明他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民族问题的基本问题，表明中国国民党党章是在对帝国主义作出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恢复三民主义的。这是一个进步。

为了更广泛地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十元者即可入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封建性的苛刻条件。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进步，使国民党更加具备现代政党的面貌。"五四"以后，国民党"大量吸收青年入党"。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他的建党思想的根本点，即是要把国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建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以肩负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任。1920 年 5 月 16 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阐述党的责任问题。他说："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九年以来，我们得了许多经验，许多教训。以后我们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同〔传〕他到全国，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在这里，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再进行一番大革命"，以建立一个真中华民国，并且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向全国。

材料：

· 中国国民党

· 中国国民党党章

材料一　中国国民党

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公布规约焉。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精神团结，虽与日俱增，但国外因居留政府立案关系，仍多沿用国民党名义。国内亦未明白党已改组，原曰国民党员，不少在本党旗帜下奋斗。是国外有名实不符之病，国内有实至而名未归之嫌。遂于八年十月十日正式通告，改名中国国民党焉。加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且除中华革命党党员外，入党者仍须依章加盟。则二者更判然可明矣。其通告及规约如下。

启者：本党《规约》及《海外总支部通则》、《海外支部通则》，为时势变迁，由本部提出改正案。经长时间审议，多数可决，业于民国八年十月十日公布施行。颁寄各总支部、各支部、各分部，务祈各按照新章组织。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而便进行，除由本部赶制颁发外。特此通告。

时，总理与伍廷芳、唐绍仪回粤，就军政府总裁职。嗣于十年春，设本部办事处于广州，以张继为干事长，田桐、周震麟、卢伯琅、黄复生等先后为干事，取接近总理，便于指挥一切党务。当时民众及兵士，纷纷加入本党。及五月五日，总理改就国会选举之总统。粤军在桂，亦先后将陆荣廷等肃清。总理亲率北伐之师，驻于桂林，以备北进。经过及所驻地方，尤注意于主义之宣传，党务之发展，且随时随地，亲自演讲。嗣以吾党势力，日渐北进，将以长江为中心，上海本部足以控制而有余，办事处无再设之必要，乃于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将办事处所办事务，迁往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本部办理。及邓铿被刺，陈炯明扼于后方，复使赵恒惕阳迎阴梗。总理乃回师，改道北江，由赣北伐。陈炯明于六月十六日，使由南宁返粤之叶举等，乘晨早三时，袭击观音山总统府。幸总理适由林直勉、林树巍告变，数促出府，而至军舰。卒在永丰孤舰上，与敌抗拒五十九日，直至许崇智、朱培德、李福林等由赣拔回援救之师失败，始离粤回沪。

先是，是年六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留居北京之一部分国会议员王家襄等，及南下护法而中变之议员吴景濂等相勾结，迫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下野，拥黎元洪复位。并宣布恢复约法，重开旧国会。适陈炯明叛变，总理蒙难，党人亦相率离粤赴沪。本党议员谢持、邹鲁等，乃乘机由沪转程北上，出席国会。并奉总理命，谋北方党务之进展。谢持、邹鲁等之计划，以联络北京各大学之青年学生为入手，先后介绍入党者，计有陈敬修、汤茂如、袁世斌、杨大可、何学海、纪人庆、周淦、谭克敏、姜绍谟、陈兆彬、孔庆宗、郑献征、杜克鸿、耿勉之、庄禹灵、叶兆麟、舒启元、王猷新、张哲农、郭智石、刘继烯、李兰昌、李君度、傅汝霖、钟汝中、曾集熙、周一志、宋振矩、何淑达、程元斟、张绍琦、余维一、张六师、黄俊昌、何海、蒋光旭、王汝玙、巫启圣、巫启瑞、马克强、陈顾生、刘正华、傅启学、张平江、刘榴芸、廖文英、彭革陈、邓鸿业、杨健、苏锡龄、苏炎坤、李大超等。秘密组织中社，为活动机关。又发行《民主周刊》，宣传党义。旋复成立民治主义同志会，大量吸收

青年入党。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本党在北方之势力，为袁世凯摧残殆尽，至此始恢复活动。北京青年学生受本党主义之感召，莫不欢欣鼓舞。追闻总理由粤抵沪，纷纷派代表南下晋谒，请示救国方针。总理一一为之恳切开导，各代表满怀感奋而归，益扩大党务活动。其后北方革命运动之蓬勃兴起，于兹已树其基。故总理于在粤失败之余，见各方信仰主义者日多，党之势力日益扩展，未尝不引以自慰也。适苏俄复派代表来沪谒晤，谓中国革命，必需三民主义，当使中国共产党加入本党工作。总理乃审察社会心理之要求，及政治潮流之趋势，而确定本党之新计划焉。

溯民国七年，总理由粤来沪，曾致电苏俄，祝其革命之成功，并鼓励其努力奋斗。时各国正嫉恶苏俄，列宁得总理电，大为感动，视为东方之光明。民国十年，总理北伐师次桂林，苏俄派至中国之专使马林，特来相见。畅谈之后，总理心至愉快，深信其《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必能实行，并电述其事于廖仲恺等。谓其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盖俄之经济状况，尚未且实行共产之条件也。及马林来，始知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其实业计划相差地无几，故油然生欣悦之心。

厥后马林由桂抵粤。一视广东情形，颇为失望。彼以为总理之实业计划与俄之新经济政策相类，固甚可为中国革命前途之光。然对于广东之陈炯明与国民党组织宣传之松懈，认为不能负起实行之责任，并认陈炯明必与总理不相容。

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总理在广州蒙难，八月十五赴沪。苏俄代表越飞亦于总理抵沪之前派人携函来沪与总理接洽。总理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与今总裁蒋中正(字介石)书云：

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近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通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即来筹备一切。

嗣越飞抵沪，与总理晤面后，于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发表如下宣言。

(下略)

(摘自《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

材料二　中国国民党党章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党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第二条　本党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

第二章　党　　员

第三条　凡中国人民成年男女，与本党宗旨相同，愿确守本党信条者，由党员二人介绍，并具誓约于本党，由本党发给证书，始得为本党党员。

第四条　党员入党时，须纳入党金十元，每年年捐一元。但曾效力于革命，及现在为革命效力者，得由本部认可，免纳党金。

第五条　前经入中华革命党领有党员证者，得换取或补给新证书。

第六条　凡党员须遵守本党一切规则

第七条　党员不得兼入他党，并不得自行脱党。

第八条　党员如有违背规约，或个人行为妨害本党名誉者，经干事会审查确实议决后，得宣告除名。凡已受除名处分者，不得再入本党。

第三章　机关及组织

第九条　本党设本部于上海，管理全党事务。

第十条　本党设支分部于国内各省区各县及国外之华侨所在地。并因交通上之关系，得设总支部。总支部之应设地点，由本部定之。

第十一条　总支部、支部、分部之通则，另定之。

第十二条　本党总理一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

第十三条　本党本部，分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宣传部，其他直隶本部之必要机关，得依总理命令创设之。

第十四条　总务部之职务如左：

一　管理本党机要。

二　管理本党庶务。

三　接洽国内外各总支部、支部、分部。

第十五条　党务部之职务如左：

一　主管入党事务。

二　保管誓约及册籍。

三　调查党员履历。

第十六条　财政部之职务如左：

一　管理本党度支。

二　征收党费及义捐。

三　调查预算及决算报告。

第十七条　宣传部之职务如左：

一　出版编辑及译述事项。

二　演讲事项。

三　教育事项。

第十八条　各部长承总理之命，综理各该部事务。

第十九条　各部副部长，辅助部长处理各该部事务。部长有事故，得代理之。

第二十条　各部干事长、干事，承各该部部长之命令，分掌各科事务。

第二十一条　各部部长副部长，任期二年。

第四章　会　　议

第二十二条　本党每年由总理召集大会一次。其有特别重大事件，由总理召集临时会。

第二十三条　大会以总理为会长。

第二十四条　大会会期由总理定之。

第二十五条　大会会议、本部各部会议、及特别会议，另以规则定之。

第五章　党　　费

第二十六条　本党党费以左列各款充之：

一　党员入党金。

二　党员常年金。

三　党员特别捐。

四　借债。

第二十七条　本党财政，按月由财政部长造具清册，汇齐公布。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部、支部、分部及总支部间之关系，另以规则定之。

第二十九条　本规约经本部职员过半数，或支部长五人以上之提议，得修改之。

第三十条　本规约自公布之日施行。

（摘自《中国国民党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背景介绍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5日）的时候，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编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而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19年8月7日至11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1919年内）达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同时，实用主义也在中国流传开来。由于杜威亲自来华宣讲和胡适的鼓吹，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思潮，不仅被引进到学术领域，也被引进到政治领域。

胡适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提出了他的政论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以教训的口吻说道："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文中说的"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主要是指的马克思主义。

胡适的挑战引起了李大钊的反击。李在《每周评论》第35号（8月17日出版）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在"五四"当年（1919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但是，他们都是三民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可以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他们虽研究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学说，却只是徘徊在门口而未登堂入室。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他们不仅却步不前，而且站到它的反面去了。

在"五四"当年，真正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在青年学生中，则几乎没有。

材料：

-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吃人与礼教

材料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人民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很自然地把本国的反帝运动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五四”爱国运动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巨大政治威力，又推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学习和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团体。于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便迅速地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了。

曾经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以后，逐渐地成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阵地。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并且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后来，李大钊又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文章，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正确的说明和批判。马克思研究专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地发表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下，从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六个多月，连续地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及有关社会主义文章。

《每周评论》在“五四”之后，也不断地登载了许多论文，介绍苏俄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和建设情况，驳斥国内外各反动报刊对苏俄的造谣污蔑。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为《新青年》七卷一号所写的《本志宣言》中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且肯定了“五四”运动的主要经验，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一九二〇年，他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的觉悟》、《答知耻》的通信、《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谈政治》等一系列的论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陈独秀在文中指出：“工人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每日所得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叫做红利”。资本家抢走剩余价值，“反过来还审问被抢者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他在为《共产党》第一号起草的《短言》中，进一步明确宣布：“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溃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他强调，“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他说：“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些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渴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

“五四”以后，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传播新思潮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约有二百种以上的报刊，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苏俄情况，宣传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是宣传新思想有力的刊物。它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一日，共出版了五号。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号召广大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贵族、资本家的统治，仿效俄国的革命方法，实行中国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得到全国进步思想界的重视。一九二〇年七月，毛泽东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经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瞿秋白组织进步青年出版的《新社会》旬刊，专门讨论和宣传劳动问题和社会改造问题，是当时著名的进步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杂志。恽代英在武汉组织的互助社、共存会，出版了《互助》、《我们的话》等刊物。赵世炎在北京高师附中组织少年学会，出版《少年》半月刊；邓中夏在北京大学发起了平民教育团。在上海，还有《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杭州有《浙江新潮》、《教育潮》等社团和刊物。

在这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九二〇年四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接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也翻译公开出版。较保守的报刊，为投读者所好，也刊载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北京《晨报》刊登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俄国革命史》。《东方杂志》也发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的《论粮食税》等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也占据了一定的讲坛。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种种破坏和阻挠。一九一九年九月，段祺瑞训令对马克思主义报刊"严密查禁"。一九二〇年北京政府又明令查扣马克思主义和有关新思潮的书刊八十三种。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内务部设"著作及出版物研究委员会"，专门查禁进步书刊。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为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住的。

（摘自《中国现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吃人与礼教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现在试举几个例来证明他的说法：

（一）《左传》，僖公九年，"周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以太牢祀孔子'"。孔二先生背时多年，自高帝用太牢加礼以后，后世祀孔的典礼，便成了极重大的定例。武帝以后，用他传下这个方法，越发尊崇孔学，罢黜百家，儒教遂统一中国。这崇儒尊孔帝为首功了。班固又恭维高帝道："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据这样看来，汉高帝哭义帝，斩丁公，他把名教纲常看得非常重要。他晓得三纲之中，君臣一纲，关系自己的利害尤其吃紧，所以见得孔二先生说"君臣之义不可废"的话，他就立刻把从前未做皇帝时候"溺儒冠"的脾气改过，赶忙拿太牢去祀孔子，好借孔子种种尊君卑臣的说法来做护身符。他又制造许多律令礼仪来维持辅助，以期贯彻他那些名教纲常的主张。果然就传了四百年天下，骗了个"高皇帝"的尊号，史臣居然也就赞美他得天统了。却是我读《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汉王这样办法，幸而有位项伯在旁营救，说是"为天下者不顾家"，——就是说想得天下做皇帝的人，本来就不顾他老爹死活的。项王幸亏听了他的话，未杀太公。假如杀了，分一杯羹给汉王，那汉王岂不是以吃他老爹的肉为"幸"吗？又读《史记·黥布列传》，说："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这也可见当时以人为醢，不但皇帝吃人肉，还要遍给诸侯，尝尝人肉的滋味。怪不得《左传》记"析骸易子而食"；曾国藩日记载"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钱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原来我们中国吃人肉的风气，都是霸主之首、开国之君提倡下来的。你看高帝一面讲礼教，一面尊孔子，一面吃人肉，这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这是记襄王祭文王、武王之后，拿祭肉分给齐侯。说，"齐侯年老，可以不下拜，讲君臣的礼节。"齐侯听得襄王如此分付，便同管仲商量。管仲答道，"照着襄王分付的话做去，不行旧礼，便成了为君不君，为臣不臣，那就是大乱的根本了。"（《齐语》）于是齐侯出去见客，便说道："天子如天，鉴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不敢不拜。"据这样看来，齐侯是很讲礼教的。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就是关于小小的一块祭肉，也《近思录》、《传习录》的老先生讲起礼教来，未必有这样的认真，齐侯真不愧为五霸之首了！然而我又考《韩非子》说道"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管子说道："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戴子高《管子校正》：《治要》"首子"作"子首"，《韩子·难篇》同，今本误倒。）你看齐侯一面讲礼教，尊周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葵丘大会说了多少"诛不孝，无以妾为妻，敬老慈幼"等等道德仁义的门面话；却是他不但是姑姊妹不嫁的就有七个人，而且是一位吃人肉的。岂不是怪事！好象如今讲礼学的人，家中淫盗都有，他反骂家庭不应该讲改革。表里相差，未免太远。然而他们这类人，在历史上，在社会上，都占了好位置，得了好名誉去了。所以奖励得历史上和社会上表面讲礼教，内容吃人肉的，一天比一天越发多了。

（二）就是汉高帝。《汉书》：高帝二年"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高帝虽是大流氓出身，但他这样举动，是确守名教纲常，最重礼教的了。十二年，过鲁，类崇儒重道的礼教家，可怕不可怕呢！后来太公得上尊号做"太上皇"，没有弄到锅里去成了羹汤，真算是意外的侥幸呀！

（三）就是臧洪、张巡辈了。考《后汉书·臧洪传》："洪，中平末，弃职还家，太守张超请他做郡功曹。后来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将赴其难，自以众弱，从袁绍请兵，袁绍不听，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洪，城中粮尽，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臧洪不过做张超的功曹，张超也不过是臧洪的郡将，就在三纳的道理说起来，也没有该死的名义。

便有知己之感，也止可自己慷慨捐躯，以死报知己，就完事了。怎么自己想做义士，想身传图象，名垂后世，却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杀死爱妾，以享兵将马人当成狗屠呢？这样蹂躏人道，蔑视人格的东西，史家反称许他为“壮烈”，同人反亲慕他为“忠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自藏洪留下这个榜样，后来有个张巡，也去摹仿他那篇文章，考《唐书·忠义传》载：“张巡守睢阳城，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折骸而爨。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士卒。”（《新书》）臧洪杀妾，兵将都流涕，不能仰视；张巡杀妾，军士都不忍食。可见越是自命忠义的人，那吃人的胆子越大。臧洪、张巡被礼教驱迫，至于忠于一个郡将，保守一座城池，便闹到杀人吃人都不顾，甚至吃人上二三万口，仅仅他们一二人对于君将，对于郡主，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

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 来了。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也有没做过吃人的 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干净净！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中华民国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吴虞草于成都师今室。

（摘自《新青年》第6卷第6号　吴虞）

历史内幕

南北和谈之内幕

北洋军阀当时分为直系及皖系两大派：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曹锟、李纯及后起之吴佩孚等皆为其重要人物；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亦称为安福系，其中实徐树铮操纵一切。各省之督军、省长及师旅长等大半皆隶属直皖两系。后来以奉系独树一帜的张作霖，此时尚接近直系。冯国璋、段祺瑞早先虽同隶袁世凯部下，长期以来，暗斗甚烈。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以马厂起义之功继续任国务总理，府院摩擦日形激烈，直皖两系之争遂更明显。皖系实力较充足，掌握了北方各省大部分的军权政权，一向主张武力统一。皖系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所以在对德参战后，利用日本借款练兵并购买军械，实际上是欲假借参战名义来充实自己的武力，以达到其武力统一之目的。直系是根据冯国璋“和平统一”政策，希图与西南滇桂军阀联系，来搞南北和议以抵制安福系之专横。如长江三督之首李纯与南方酝酿和谈，及曹锟得力部下之吴佩孚进入湖南后按兵不动，均是“主和派”。

安福系所组成的新国会，于一九一八年九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遂下野。安福系 认为这次选举既能倒冯，又举一个毫无军权实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来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参战督办地位，无论是出面组阁与否，实际上操纵全部军政大权。但是徐世昌并非甘心作傀儡，他这次能被选出为大总统，亦正是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坐收渔人之利。徐世昌就职以后，观察国际和国内形势，为了自己提高名誉、巩固地位，所以积极筹措南北和议。适在此时，国际正将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英美法意日等亦正想进一步向中国伸开侵略的魔爪。所以徐世昌之提出南北和议，不仅是国内的形势所促成，还更有帝国主义者的威迫利诱在背后鼓动。

和议联系伊始，首先是代表的人选问题。北方总代表先有直系李纯之说，又有安福系王揖唐之说，当然都有偏于一方之嫌。最后徐世昌挽出旧友朱启钤为总代表，可以说朱是代表徐的，而不属于直或皖那一系者。在代表名单中，不难了解，安福系占半数以上，吴鼎昌为中坚分子，直系以王克 敏为中坚分子。在整个会议前后过程中，几乎一切均操之于吴、王之手。南方总代表本拟以岑春煊，后由章士钊斡旋，敦请唐绍仪担任 南方总代表。又因为唐绍仪与徐世昌早年在东三省为同僚，本有极深密之关系，徐世昌希望唐绍仪任南方总代表，当然有他的用意，看一看下面的电报 ，就可以略见梗概了。

徐世昌致唐绍仪电文原稿（似系徐世昌亲笔）：

唐少川先生鉴：卅暨微日两电计均达矣。时局至此，已无从容解决之余暇。兹幸事势渐形凑拍，急应力求直捷了当办法，以免别生枝节。此间拟推桂辛代表赴会，南中不审进行若何？吾弟热心爱国，能出当斡旋之任否？兄与吾弟均愿速了此局以策治安，绸缪拮据，同具苦衷，务望统筹全局，早底于成，无任跂祷之至。

南方代表是西南各省所推派的。章士钊系代表岑春煊，为南方代表中之主要人物。

安福系尤其是徐树铮向来是主张武力统一的，对于这次和议当然不会赞同，但是因为慑于当时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及国内人民期望南北统一停止战争之各方面舆论，所以不敢公开反对。他们绝不愿意和议成功，因为和议成功后，徐世昌的地位将比较稳固，不能再多受安福系的指挥；而直系是早与西南军阀有联络，自然将占居上风。可以说和议成功就是安福系之失败，尤其是怀有野心的徐树铮更是不甘心于此。

徐世昌亦早 明了这点，故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派徐树铮去日本观操，乃调虎离山之计，以免在国内兴风作浪，破坏和议。徐树铮虽勉强去日本一次，然不久就回国了，因此更怀不满。其实，在和议开会之前，安福系在代表之中已作好准备，遇有机会即设法破坏，吴鼎昌即担任这个主要脚色。会议中的重要布置及文电，多由吴主持起草，总代表受成而已。会议中途，吴鼎昌曾回北京当面向政府报告情况，因为国会问题牵涉到徐世昌本人地位并北方国会是否合法，因此和议就很难进行。吴鼎昌在京与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等研究了对策，使北方代表采取强硬态度，不惜决裂。在这里可看到徐世昌与安福系段祺瑞、徐树铮本是利害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和议成功，另一方面要和议不成，但是遇到国会问题时，他们两方又有了共同利害，变成目的一致。后来徐树铮以一个参战处参谋长的资格，竟对和会代表发号施令，电报中大放厥辞，不仅暴露其专横狂妄，亦看明白徐树铮蓄意要将和议破坏。

直系的首脑冯国璋，已被安福系逼迫下台，退居幕后。当时直系中有实力者为直隶督军曹锟及其部下率兵入湘的吴佩孚；长江三督之首李纯不仅拥有实力，而且与桂系早有密切联系，这次议和，他有十分重要关系。开会前之南北两方联系，如停战划界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名称之商榷，皆由李纯从中斡旋。在会议期间，朱总代表每日向南京报告情况，看来李纯实为和议之背后主持者。直系的目的是要借这次和议成功来击败安福系，而且是表面拥护徐世昌，实际要想趁国会问题来重捧冯国璋为总统。在一九一八年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时，原内定选曹锟为副总统。以拉拢直系。徐世昌却不愿有一个拥有兵力的副总统，以防可随时取而代之，于是巧妙地说，大总统和副总统全是天津人影响不好，应该把副总统一席空着留给南方军政府，以便得到合作。徐世昌密嘱周自齐在议院中设法破坏，几次召集开会选举，均因出席不足法定人数，遂结果未选出副总统，曹锟为此大怨。所以直系实力派与南方桂系暗中勾结，欲招国会问题喧腾起来，以便牵连到 徐世昌成为非法当选总统。他们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在口头上说将来国民会议仍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而实乃是一个骗局，准备在改选时选出冯国璋来。照这个预谋如果实现，则直系大获全胜。我们从吴鼎昌自北京致朱启钤电报中，可以看到李纯与陆荣廷勾结情形，亦可看出吴鼎昌在会议中活跃之恣态。以上是北方内幕情形。

南方的派系亦甚复杂。当时广州军政府有七个总裁：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以岑为主席。这几个人之中，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为实力派，亦就是所称滇系、桂系。但是另外的广东、福建、贵州、四川、陕西、湖南，皆在各地军阀势力范围之下，军政府亦无指挥之力。从南方代表名单中可看出，是每省推有代表，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辖机构。岑春煊既属赤手空拳的主席，唐绍仪亦是新自日本回来，并无实力。所以当时南方的重要势力，还是在滇桂两系，尤其以桂系陆荣廷为中坚。南方军政府本是风雨飘摇的，军政之费甚为拮据，若不趁此国际国内和平空气高涨之时积极与北方政府谈和，前途甚为阴暗，桂系所以与直系有了很密切联系。孙中山自从通电斥责滇桂两系后，不久即离开广州赴上海，只派了胡汉民当代表参加南北和议，对于当时南方军阀亦很难指挥。总之军政府是全在桂系支配下，这次南北和议主要亦是由桂系暗中与直系联络的。唐绍仪之为总代表，一方面由于与徐世昌的旧关系，一方面背后有国际上的支持，南方亦就利用这两点而推他出来。陆荣廷想借和议成功后，可以选为副总统，其他西南各省当然亦各有其目的，以图各有所获——充实力量，巩固地位。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能训内阁纪略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陆征祥（次长陈箓代）

内务　钱能训（自兼，八年六月免；朱深兼署）

财政　龚心湛（未到任前，次长李思浩代）

陆军　靳云鹏

海军　刘冠雄

司法　朱　深

教育　傅增湘（八年五月免，次长袁希涛代；六月袁免傅岳棻署次长代）

农商　田文烈

交通　曹汝霖（八年六月免，次长曾毓隽代）

徐世昌在前清东三省总督任内，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徐尊周而亲钱。此次总理，周、钱都是意中人，钱既以内务兼代总理，故总理属之钱，拟以内务位周，派人往商。钱以其地位相逼也，坚持自兼；周亦不愿加入钱阁。所有阁员，大都旧人，唯龚心湛合肥人，新加入。朱深在上次段阁已加入，据说都是安福系关系，谈不上政治上意义。

段虽离开内阁，一方面拥参战军实力，一方面挟安福

系大多数议员，其关于重要问题，大半一意孤行，有时府方亦不得不勉强对付之。如钱阁者，更不在其心目中也。

总统主和，故有南北停战议和之举。北方代表派朱启钤，南方代表派唐绍仪，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旧德国商会在地址开会。未开会前有二问题：一、关于陕西停战；一、关于取消参军战军与停支参战借款。双方相持不能解决，故和议虽经开幕，而未正式开议，因此二问题，至三月三日，南代表通电停止和议，北代表亦向北政府辞职。三十日，陕西战争停止，遂于四月八日继续开会，南北代表各提出条件。讨论数日，无结果。至十一日，南代表提出八项，其中如：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宣告无效，并处罚缔结此等密约之关系人；三、取消参战国防军及其他一切类似之军队；五、由和会宣布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命令无效。北代表反对。于是南北代表复辞职，和议遂告破裂（后来八月十三日，北方政府派王揖唐为议和代表，南方反对。在靳云鹏代阁期内）。

欧战告终，美总统威尔逊提倡和平会议，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在法京巴黎开会。十八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二十一日，中国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参与赴欧和会全权委员。二十七日，英法意美日五国会议开会，关于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于二十八日提出详细说帖，由顾维钧作长时间之辩论，各国均为之动容，而日本代表反对。自是和会注重国际联盟问题，至四月中旬以后乃讨论及东方问题，经过四月二十二日英法意美四国会议、二十四日英法美三国会议，其解决山东问题方法，以前德国享胶州湾权利让与日本，日本将山东主权自动的交还中国，并许日本保留德国所享经济特权，且许以特殊铁道警官之聘用。我代表提出抗议，三国会议无表示，于是我国在巴黎和会上不签字。

和会交涉失败传至中国后，全国愤怒。五月四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农业、工业、法政专门五校及私立中国大学三千余人，聚集天安门开 示威大会，高呼“还我山东！惩办国贼！”等口号，排队至总统府，并至东交民巷，意在向英美法各使馆表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强占山东之愤激。行至东交民巷西口，为巡捕拦阻，不许通行，大众遂折回往东城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私宅，寻曹不获，即纵火焚屋，殴伤驻日公使章宗祥。旋警察及保安队赶到弹压，始散。警察捕去学生多人，拘于北京大学，所谓五四运动也。由是全国风靡，罢市罢课，要求罢免曹汝霖（交通总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日本公使）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经此运动，而钱阁瓦解矣。十三日，钱能训免职，以龚心湛暂兼代国务总理。九月二十四日，以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

（摘自《北洋军代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参战军概述

参战军开始成立军士教导团时，我任该教导团第三营第二连排长。参战军正式成立时，我任参战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第二连连长，并且参加直皖战争。本文所记关于参战军和直皖战争的始末，除一般情况外，主要是叙述参战军第一师的梗概。兹将所能回忆起的，概述如下：

参战军的缘起与编制

参战军于 1918 年 7 月开始筹备，8 月先成立参战军训练处，不久成立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12 月两教导团结束，分赴各地招募新兵，筹备扩编成师，于 1919 年 1 月正式成立参战军，共编成三个师。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不适宜，乃于 1919 年 7 月改称为边防军。至 1920 年 7 月发生直皖战争，迨战事结束，部队遣散，参战军从此告终。

参战军最高统帅为参战督办，由段祺瑞自兼。下设参战军训练处，处理指挥、训练、经理、卫生和补给等一切事宜。负期责的称参战军督练，由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任，地点设在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参战军共成立了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在训练处之下，设有一个参战军教导团，地点也设在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内分步兵、炮兵、工兵和劈刺等科，课目和教育方式完全按照日本各专门学校办理。步兵、炮兵和工兵各科是抽调参战军各师的军官进行轮流训练，劈刺体操科是抽调各师的军官和军士进行轮流训练。各兵科的教官，聘请日本军官担任，助教由日本军士担任，这些人的待遇和期限等均订有合同。

训练处直辖炮兵一营，备有十五公分口径的榴弹炮，一切装备均来自日本，就连马匹也使用日本的。此外还购有十公分零五的加农炮，尚未编练完成，参战军即告结束。

为了造就确实可靠的封建势力，在成师之前先成立了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和参战军军士教导团。目的是通过训练造成师生关系，以便成为与段祺瑞有直接关系的派系势力。

军官教导团团长为陈文运。该团设立在北京安定门外黄寺。选择保定军校毕业生比较优秀以及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加以训练，时间定为三个月，自 1918 年 9 月开始，12 月即分派到三个师中充任初级军官。

军士教导团团长为曲同丰。该团设立在北京北苑。由接近皖系的北洋各师选择优秀军士送团受训，共编为六个营，每营辖四个连，每连平均约一百三十人，共计约三

千二百人。时间定为三个月，自1918年9月开始，12月即分发到三个师内充任军士。教育课目以精神讲话为主，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参战军和个人发展前途等思想，此外并将典范令择要加以讲解。

军士教导团在训练开始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开学典礼。参战督办段祺瑞和督练靳云鹏均亲自到场。到场的还有内阁的全体阁员，训练处的领导人，日本顾问头子板西利八郎和全体顾问，以及北京各界领袖人物。段祺瑞在讲话时，曾手指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和参战军督练、身穿陆军上将大礼服的靳云鹏说："你们看靳督练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能当到了国务总理。你们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好好练习本领，将来是一定不可限量的。"在讲话之外，段祺瑞还宣读了一篇训词，全文记不清，但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计"。靳云鹏的讲话一开始就说："我是当年小站练兵时段督办手下的一个小炮兵，今日的地位，全是受段督办的一手栽培提拔而得来的。今日你们作了督办的学生，将来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的。"此外曲同丰等也都讲了话。这正可以说明段祺瑞组织参战军的目的。

参战军第一师的成立

参战军第一师是1919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全师共辖步兵两个旅，另外师直辖骑兵、炮兵各一个团，工兵、辎重和机关枪各一个营，共计一万余人。每旅辖步兵两个团，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四个连，每连计战斗兵一百二十六人，骑兵团共辖四个连。炮兵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有火炮四门，第一、二、两营为野炮，第三营为山炮，口径都是七公分五。工兵营辖四个连，分任通信、架桥和筑城作业。辎重兵营共辖四个连，运输工具全部是大车。机关枪营共辖四个连，每连有重机枪六挺。全师使用的武器除山炮是六年式山炮外，全部是日本三八式。

参战军第一师团长以上的姓名：师长曲同丰，参谋长斐建准，步兵第一旅旅长苑尚品，第二旅旅长程长发，步兵第一团团长李景林（后换王兴文），步兵第二团团长姜炳炎，步兵第三团团长王连波，步兵第四团团长马登瀛，炮兵团团长宋玉珍，骑兵团团长姓名记不清。

参战军第一师军官、军士和列兵的 来源和素质有如以下的情况：由于师长曲同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校长数年，并因当时各部队对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多不愿任用，而参战军第一师系新成立的部队，需要大批军官，因此参战军第一师的军官，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其中上、中级军官，不是日本留学生，就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而且这些人多数在保定军官学校任过教职员。初级军官除少数行伍出身者外，绝大多数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素质一般较好。上、中级军官除少数人有实战经验外，一般是初次在部队任职。初级军官除少数行伍出身者外，一般都是刚由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士是由北洋各师选送，经过参战军军士教导团毕业分拨来的，素质和训练极不整齐。列兵是由河南西平、遂平和汝南各县招募的，素质一般较好。

参战军第一师的训练，完全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方式实施的。因为当时的教育令就是由日本的教育令翻译过来而稍加修改的，再经过参战军教导团的轮训教育和日本顾问的指导，所以参战军第一师的教育，完全是日本式的教育。在实施教育上是将全年的训练分为三期，自第一周至第十四周为第一期，完成连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实弹基本射击和劈刺体操的基本动作。自第十五周至第三十八周为第二期，完成营、团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营以下的对抗演习和射击、劈刺的应用动作。自第三十九周至第五十二周为第三期，这一期的教育、除补习第一、二两期的课目外，主要课目有连、营攻防对抗演习、团、旅、师的野营演习，班、排、连基本战斗射击和步兵炮兵联合战斗射击。全年有两周作为机动日期。除上述术科外，每日有学科两小时，课目为精神讲话和典范令的讲解。在各期之间还实施了野战筑城作业和夜间教育。在第一、二两期教育完成后，都举行了全盘周密的校阅。

野营演习的课目有：团攻防和遭遇战的对抗演习，旅攻防对抗演习，师对假设敌的进攻演习。

步炮兵联合战斗射击，是由步兵每团挑选一个连和野炮兵一个连组成一个混成营，由开进后对防御的敌人进攻的方式实施的。

参战军第一师为了显示实力，在1919年12月野营演习的旅攻防对抗演习和步炮兵联合战斗射击两个课目时，曾邀请全体阁员、军政各界首领和各国驻中国的武官前往参观，段祺瑞、靳云鹏均亲自到场。为了参观人员交通方便，旅对抗演习在北京西郊石景山附近，联合战斗射击在北京北郊汤山附近，均搭有临时看台，以便参观。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历史考证

新文化运动到底分为几段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二段说】 以此说彭明、吴雁南、杜文铎、肖堂炎等为代表。

彭明认为："从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的创办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新文化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主要讲启蒙运动，'五四'以后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吴雁南、杜文铎、肖堂炎基本上也坚持以"五四"运动为界把新文化运动分为两大阶段，认为"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是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范畴。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才促使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二期三段说】 孙思白是持此说的代表。

孙思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又可分为两段，即两期三段。人具体划界是："(一)前期，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第一阶段：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至1918年11月(《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发表)。第二阶段：1918年11月至1919年5月('五四'运动)。(二)后期，1919年5月('五四'运动)到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前)。"其理由是："第一，从1915年9月至1921年6月是这一运动的全部过程"。"第二，以'五四'运动为界标把这一全过程区分为前期与后期，显示出新文化运动性质的重要转变"。"第三，上述过程的各个阶段，各具有自己的特征"："(1)前期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向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文化作斗争"，"同时，新文化代表中，无论其还有什么急进温和之别和不同流派之分，但在向封建主义文化作斗争上是一致的""(2)前期第二阶段的 特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但是应当特别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已开始孕育"，同时，"新文化的锋芒，也开始指向现实的政治问题"；"(3)后期运动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了。"

【二期四段说】 孙宪琛是此说的提出者。

孔宪琛指出："我们的方案叫做两大时期、四个小阶段的分期法，即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五四'以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在两个大期之中，又各分为二个小的阶段，合起来共四个小的阶段，即一九一五年九月——一九一八年七月；一九一八年七月——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一九二一年七月"。如此分期的理由是：第一，以一九一五年九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反映了客观历史实际。第二，之所以"要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是因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爆发又使新文化运动得到了新的力量，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后不但宣传新文化的刊物数量增多了，而且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思潮为主流，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运动了，成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第三，"所以要以一九一八年七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又分为两个小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了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后，在内容、性质等方面有了某些变化，虽然是微少的变化，部分的变化，但把它再划分出一 个小的阶段，则可更好地体现出'五四' 新文化运动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看出它的发展规律，掌握它的特点"。第四，之所以要"以一九一九年'六·三'为界标把'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两个小阶段"，是因为"'六·三'以后，由于上海、唐山、天津等地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罢工，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掉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也不敢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这不但使'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风云人物

曹汝霖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1月23日生于上海。幼年读私塾，继往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留日期间，他对日本帝国势力的发展十分崇拜。归国后成为著名的亲日派，因代表袁世凯政府承认“二十一条”，而被国人目为汉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对德宣战，派兵在胶东半岛登陆。袁世凯政府宣布中国守中立，并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但日军全然不顾，悍然派兵占领潍县车站。1914年10月2日，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声明：胶济铁路将不转让给日本以外的第三国，战后日德政府对该路订有任何协定，中国政府将“不持异议”。企图以出卖主权来缓和日军的行动，但日军不予理会，强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

1915年1月，日本大畏内阁经过预谋，向袁世凯政府正式提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受袁氏之命，曹汝霖协助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谈判。曹不仅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而且多次私访日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起草有关文件。经过几个月的交涉，5月7日日本以最后通谍方式迫使袁政府承认了“二十一条”(除第五项内容“容日后协商”)。5月25日，曹同日公使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山东、南满的条约二件。由此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18年秋，日本寺内内阁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失去在山东的权益，遂用二千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商徐 两条铁路的控制权，并提出战后“中日合办”胶济铁路。北洋军阀政府只求有款可借，不惜断送山东主权，而由曹汝霖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授权他以“欣然同意”的照复交付日本。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但仅有“山东问题”一项列入讨论。中国方面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军侵占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日本拒绝交还。结果，会议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但曹汝霖仍然坚持媚日卖国立场，他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决不可失日本之欢心，必须服从其意”。在国务会议上，他还公开为日本侵占青岛辩护，说什么“独索日本之青岛，甚非公平之道”。

5月4日，北京三千学生举行集会游行，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队伍包围并冲入了曹宅赵家楼，曹汝霖躲藏起来，正在曹家的章宗祥遭到学生痛打。之后，学生们又放火烧毁了曹宅。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后曹汝霖依靠日本的庇护，投资于实业。抗日战争期间又担任汉奸华北临时政府的高等顾问。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曹汝霖逃往台北。1966的8月4日死于美国底特律。

傅增湘

字沅叔，晚年号藏国老人，因藏有宋刻百纳本《资治通鉴》及元刻《胡注资治通鉴》，又称双鉴楼主人，四川省江安县人，1872年生。1888年中戊子科举人，后在保定莲池书院就学于吴当伦，1898年中戊戌科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贵州提学使、直隶提学使、北京女子师范传习所所长、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时，为南北和谈北方代表团的顾问。1914年任肃政厅肃政使、约法会议议员。1917年11月任教育总长，1919年5月去职，后被聘为总统府顾问。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委员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晚年从事于藏书和版本目录研究工作，刊行有《双鉴楼藏书记》、《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宋代蜀文纪要》、《清代典试考略》、《藏园居士六十自述》、《秦陇记游》等书。1950年病故于北京。

王正廷

字儒堂，浙江省奉化县人，1882年生。1896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堂肄业。后在天津新学书院、湖南高等学堂任教习。1906年赴日本，后转至美国，入 密尔根大学、耶鲁大学，曾担任中国留美同学会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南 京临时参议员副议长，并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4月任工商部次长并代理总长，7月辞职。1913年任参议院副议长、中国青年会会长。1917年任广东非常国会副议长、广东军政府外交次长。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代表，次年因反对岑春煊等垄断军政府，愤然去职。1921年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1922年8月北洋政府任为山东问

题中国全权代表、青岛商埠督办。此后，在北洋政府中几次出任外交总长，并一度代国务总理，并署理司法总长、中俄交涉督办，1926年脱离北洋政界。1927年任陇海铁路督办，1928年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1926年至1938年任驻美大使。此外，王正廷还曾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长、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961年故于香港。

龚心湛

字仙舟，又作仙洲，安徽省合肥县人，1871年生。金陵同文馆肄业，以监生报捐县丞。1889年后曾任驻法、比、西班牙等国使馆随员。1898年后历任广东办理洋务局事宜及广东缉捕总局、署广州知府、广东边防督办兼钦廉兵备道、云南临安广开道兼蒙自关监督等职。1911年9月任云南提法使。1912年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行长、安徽赈抚局督办、安徽国税筹备处长、安徽财政厅长等职。1915年6月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督办。1919年任财政总长，同年6月代国务总理，于9月去职。1924年11月任执政府内务总长兼赈务督办，1925年11月改任交通总长，直到1926年。此后注重经济活动，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通益味精公司董事长、大陆银行、中孚银行董事。抗战时被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聘为咨询委员。1943年12月故于天津。

钱能训

字幹臣，又作斡丞，浙江省嘉善县人，1870年生。原为荫生。1893年中癸巳恩科顺天乡试举人，1898年中戊戌科进士。后任刑部山东司主事，1901年任刑部直隶司员外郎，1903年任广西乡试副考官，同年8月任河南道监察使。1906年任巡警部左参赞、民政部左丞，1907年任东三省总督署右参赞。1909年任顺天府尹，1910年任陕西省布政使，后署理陕西巡抚，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起义军逐走。1913年10月任内务次长，1914年5月任政事堂右丞，1915年任平政院院长，1917年10月任内务总长。1918年10月任国务总理，1919年"五四"运动后去职。后居于苏州，曾任督办太湖水利工程事宜，1920年8月辞职。1924年6月故去。著有《浙江会事纪实》。

顾维钧

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人，1888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任国务院秘书、外交部秘书、总统府秘书，1915年任墨西哥公使未赴任，同年10月任驻美国公使兼驻古巴公使。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20年任驻英国公使、国际联盟行政委员 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代表。1922年至1924年曾多次出任外交总长。1926年任财政总长，10月至1927年6月任安国军政府代国务总理及外交总长。1928年任安国军政府条约研究会会长，同年7月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避居东北。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国联调查团中国代表。1932年任驻法国公使，1935年升为大使，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1941年任驻英国大使，1946年任驻美国大使。去台湾后于1967年退职，居于美国纽约。1985年11月14日病故，著有《顾维钧回忆录》。

章宗祥

字仲和，堂号为怀德堂，浙江省吴兴县人，1879年生。日本帝国大学及明治大学肄业。曾任仕学馆及进士馆教习、修定法律馆纂修官。1907年后任农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则例局提调 及记名右参议、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1909年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赴德国考察，1910年任内阁法制院副院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南北和谈北方代表。1912年后任总统府秘书及国务院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农商总长，同年6月任驻日本公使，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爱国学生列为三大卖国贼之一，北洋政府被迫将其免职。后任中华汇业银行经理。1928年任安国军政府外交讨论会委员，同年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抗战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日伪华北电力公司董事长。抗战胜利后，经吴鼎昌向蒋介石请求，未被列入汉奸。1962年故于上海。著有《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等。

珍闻轶事

徐世昌内外不是人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十余所学校的学生3000 余人，手持各种旗帜，沿街游行至天安门，他们发传单，搞演讲，情绪异常激动，最后直奔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邸——赵家楼，殴伤国务院币制局局长陆宗舆，放火烧毁曹汝霖住宅。

当晚，钱能训国务总理召集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国务员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采取严厉措施，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会议不欢而散。

徐大总统闻报，不禁大惊失色。上任半年来，虽无实权，可周旋八方，还算能平安度日，如今学潮骤起，内阁争执不下，如何应对，实在棘手。他深知，如采高压手段，得罪学生，指逆舆情，后果不堪设想；但交通总长宅邸被烧，币制局长被殴伤，不有所表示，恐安福系不肯罢休。左思右想，忽生出一个妙计，于是发出了一个人称"绝妙"的通令：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保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定，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此令。"

这道命令，一不为曹、陆"伸冤"，二不向学生加责，而是把警察总监训斥一番。岂知想两面讨好，却落得四面反感：学生指责大总统袒护卖国贼，安福系指责大总统袒护学生，警察厅不肯任咎，内阁对大总统如此使巧卖乖颇多反感，徐大总统大叫其苦。

学潮越闹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交通总长曹汝霖等提出辞职，北大校 长蔡元培为抗议当局逮捕学生，也愤而辞职，各机关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徐世昌还幻想用"面面顾到"的折衷办法，蒙混过关，于是连下数令，无非是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挽留曹汝霖，以安安福系之心；同时摆出师长身份，告诫学生"唯当以殚精学业，为唯一天职"，否则，免不了"以爱国始，以祸国终"，到时追悔不及。

徐的大总统令一下，更激起各方的反感。安福系大光其火，派军警大肆逮捕学生；学生方面见大总统置学生罢免卖国贼的基本要求于不顾，居然慰留曹、陆等人，更是群情激愤，学潮反而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并引起各界普遍同情。学潮，又引发了工潮、商潮，罢工、罢教、罢课、罢市，波及全国，声势浩大。

徐世昌见状，无乖可卖，只好寄希望于通过释放被捕学生的办法，来缓和各界不满情绪。好一个大总统，忽然对学生十分亲热，说什么学生都是爱国的，政府很珍视学生诸君的爱国热情，只是混进去一些流氓乘机滋事，过激行为是这些流氓所为。因为玉石不分，政府怕学生被利用，故而委屈学生诸君"集中"，别无他意。可任凭你如簧之舌如何鼓噪，不罢免 卖国贼，学生就是不出狱。徐世昌无奈，下令批准曹汝霖等人"辞职"，算是解除了几个卖国贼的职务。

事已至此，责任内阁首先承担责任，钱能训总理率全体国务员于 6 月 10 日总辞职。徐大总统颜面大失，如此重大事件，处理失当，也不好意思赖在台上，所以内阁总辞职的第二天，也宣布辞职，向国会递交了辞职咨文。

想两面讨好，却落得四面反感，徐世昌看家本事失灵了。如果不是英、美、法三国害怕徐倒台后亲日派上台，公然表示支持徐继续担任总统，安福国会差一点就批准了徐的辞职。不怕人民而怕列强的国会见西方国家对"文治"总统尚还留恋，只好退回了徐的辞职咨文，徐世昌在总统交椅上晃了几晃，总算又坐了下来。

（摘自《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太炎不满胡抹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用新式标点的书。胡在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两人名旁，各加了一条黑杠符号。

章因弄不清这个符号的作用，他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吃了花生莫逃课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授英文，开学的第一天，他请学生们吃有壳的花生，就用英语讲吃花生之道。

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和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就愈有味道。花生又名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听了，为之哄堂大笑。

哄堂听胡说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恋爱哲学

胡适谈起自己的婚姻时，有一番创造性的恋爱哲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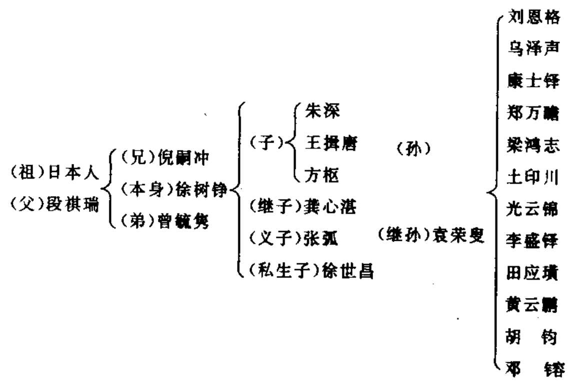
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教育出版社）

对民国总统"名誉诽谤"案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誉诽谤案"。

那么，这篇"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



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等合同，肆意出卖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人是安福系的"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不亲自出面，显然为"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终协同徐"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自是"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方"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系除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恰合螟蛉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入安系，为安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新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近投安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则螟蛉孙之得意者"。

这篇"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的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二人到庭。10月1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月3日，法院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被告律师林百架首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二）原告控案，应由北京当局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三）原告指控的文词原为游戏性质的政策批评文章，未违反宪法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该文本意是为了促进中国有良好政府，俾中国人民永享和平之福，并无任何侮辱意义。进一步言之，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举动越出了宪法规定的自由范围，

也不能认为被告有罪。总之，原告实际提出的证据与控告实际依据的法律之间相距甚远，毫无符合之处，不能视为有效，法庭应将此案注销。

被告律师辩护后，原告穆律师当即起身反驳，称《民国日报》所载之文足以促使社会舆论讥笑"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不但侮辱了他们，而且容易引起民众对他们的轻视。他认为，对此案应从四方面考虑：(一)被侮辱者之地位；(二)侮辱之方法；(三)侮辱时间及方法；(四)侮辱人之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位被告身为报馆主笔，皆受过高等教育，明知该文有侮辱性质而不加删裁，仍旧刊用，用心极为险恶。不仅如此，此文一经登载，使得南北和谈双方愈难接近，于中国未来和平前途大有妨碍。总而言之，被告以上海为避地，极尽诽谤、侮辱之能事，贬损政府官员声誉，情节恶劣，无疑应受到法律严惩。

法庭在听取双方辩论后，进行了庭议。迫于安福系的淫威，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称《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惟"侮辱大总统"一层属实，案情重大，最终判邵、叶二人各罚洋100元。轰动一时的"名誉诽谤案"就这样匆匆结案了。

（摘自《民国春秋》）

流 行 风

诗《铁匠》

叮当！叮当！
清脆的打铁声，
激动夜间沉默的空气。
小门里时时闪出红光，
愈显得外间黑漆漆地。

我从门前经过，
看见门里的铁匠。
叮当！叮当！
他锤子一下一上 。
砧上的铁，
闪着血也似的光，
照见他额上淋淋的汗，
和他裸着的、宽阔的胸膛。

我走得远了，
还隐隐的听见
叮当！叮当！
朋友，
你该留心着这声音，
他永远的在沉沉的自然界中激荡！
你若回头过去，
还可以看见几点火花，
飞射在漆黑的地上。

（刘半农）

诗《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她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堰下的土，逐渐淘水，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样，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象我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河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的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拌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那里去了。

（周作人）

小说《孔乙己》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作品写一个没落的穷读书人，因为他姓孔，对人说话时，又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虽然读过许多书，但没能考上秀才，又不会营生，日子越过越穷。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孔乙己非常喜欢喝酒，有时没钱，就连书籍纸笔都卖掉了。穷极时，还混到别人的书房里去偷东西。被人抓住，硬说“窃”书不能算偷。孔乙己虽然好吃懒做，可他心地善良，与人无争，对儿童充满了爱心。作品通过孔乙己到咸亨酒店来喝酒的几个生活片断，生动地展示了孔乙己的个性和他悲惨的生活和结局。平时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喝酒的人就都看着他笑，有的人便高声说他偷了谁家的东西挨了打，来引逗众人哄笑。此时，孔乙己只能涨红了脸，绽出额上的条条青筋，为自己争辩一两句。别人喝酒，常常拖欠酒钱。孔乙己却很爱惜声名，很少拖欠，即使偶尔没有现钱，也会很快还清。有几回，邻舍的孩子听到酒店的笑声，赶来看热闹，孔乙己便给他们茴香豆吃，每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这个细节，作者描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以后很长时间，孔乙己没有到咸亨酒店喝酒，原来他到丁举人家里偷东西，被打断了腿。小说的结尾，是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来渴酒。这一段写得更为精采，成为全篇情节的高潮。

小说《药》

作老鲁迅，主要内容：小说写清朝末年，一个开茶馆的小商人华老栓，为了治好儿子华小栓的“痨病”，买通了刽子手，在处决革命党人夏瑜的时候，买到一个蘸着人血的馒头，拿回去给儿子吃。然而人血馒头没能保住华小栓的命，小栓还是死了。作品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革命的狰狞面目；一方面讴歌了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清楚地显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缺陷。作品还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情节，痛心地揭示了华老栓夫妇那样的一些人民群众对革命不理解，过着麻木、迷信的僵化生活的可悲现实。这篇小说显示了鲁迅极高的艺术技巧。作者通过很普通的生活细节，用很朴素平淡的文笔，在作品中掀起一个又一个令读者惊心动魄的情节高潮。资产阶级革命家夏瑜为革命被砍了头，他的鲜血本应唤起更多的民众。可是却被不理解革命的华老栓用重金向刽子手买去，让儿子吃下，作为治病的药物。这不能不说是人世间一幕惨痛的悲剧。这药本身，就是愚蠢、凶残以及虚妄的见证。作者用“药”来作小说的标题，是喻意深刻的。尽管小栓吃了这特别的“药”，可是到清明节来临时，华大妈还是参加到了祭奠亲人的行列中。巧得很，小栓的坟正好同夏瑜的坟一字儿排着。当夏瑜的妈妈也来给儿子上坟时，竟意外地发现，夏瑜的坟顶上有一圈红白相间的鲜花。作者用这花环，显示革命不会完结，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小说《燕云粤雨记》

作者杨尘因，主要内容：小说记叙民国六年（1917）段

祺瑞再任国务总理职、安徽等省宣告独立，段祺瑞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出兵讨贼之事。傅良佐奉命率军进驻湖南，任湖南督军，原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被免职。湖南各界民众力挽谭留职，反对傅良佐任职。广东成立军政府，广州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湘军此时分为南北两派，相互交战，兵火所到之处，百姓遭难。后湘、粤、桂联军占领长沙，傅良佐化装逃走。北方各省督军举行会议，派曹锟与张怀芝率军南征，南北战争爆发。北军收复长沙，北京政府向国外借款，以支持与南军作战。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任命李厚基为闽、浙援粤总司令。南北战争此时因双方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变故，实际已无法继续。吴佩孚、冯玉祥遂通电主和。北京国会进行大选，徐世昌被选为总统，段祺瑞辞职，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南北遂罢战言和。此书是一部时事政治小说，它记叙了1917——1918年的南北战争史实。其间，描写了段祺瑞、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的活动，与史实多相吻合。

小说《战地莺花录》

作者李涵秋，主要内容：小说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军阀混战、学生爱国运动为背景，描写闽浙一带以“省议员”林耀华之子赛姑为中心的莘莘学子和高门闺秀的故事。林耀华之子出生后，听人“规劝”而“易”男为“女”。称女孩，着女装，做女孩事，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先被陆军学校学生赵珏痴爱；入女校后，与赵珏妹赵瑜相识，同榻共衾相爱；逃兵荒，为年轻军官陶如飞所劫，“暂留”夫人兰芬身边，三人形影不离，共效于飞之乐。兰芬妹芷芬妍丽过人，赛姑把爱又移到芷芬身上，几次亵戏，芷芬全然不明。醋性大发的兰芬揭出赛姑底细，芷芬怒火中烧，赛姑几近刀下之鬼。赛姑被砍醒了，闭门思过，面壁苦读。他从报纸上得知国家被军阀糟踏，北京政权丧权辱国，京沪等地学生又遭拘捕，毅然投海洗罪，以死唤醒福建民众及学生。但被人从海中救起。同时，书中还穿插方钧爱赵瑜，秀珊爱赵珏等情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甜酸苦辣，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令人忍俊不禁。但爱国之心始终寓于爱情描写之中。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作者出于迎合当时读者的心理，作品人为斧凿较为明显，人物的命运过于戏剧性，减弱了真实性，结局的大团圆较为牵强。

历史档案

大总统对南北议和之态度令

(1919年5月21日)

大总统令：

国步多艰，民生为重，和平统一，实今日救国之要图。本大总统就任以来，屡经殚心商洽，始有上海会议之举。其间群言嚣杂，而政府 持以毅力，喻以肫诚，所期早日观成，稍慰海内喁喁之望。近据总代表朱启钤等电称：唐绍仪等于十日提出条件八项，经正式会议据理否认，唐绍仪等即声明辞职。启钤力陈国家危迫情形，敦劝其从容协商，未能容纳，会议已成停顿，无从应付进行，实负委任，谨引咎辞职。等语。所提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这本指。除由政府剀切电商，撤回条议续开会议外，因思沪议成立之初，几经挫折，哓音瘏口，前事未忘，既由艰难擘划而来，各有黾勉匡持之责。在彼务为一偏之论，罔恤世莠，而政府毅力肫诚，始终如一，断不欲和平曙光由兹中钝，尤不使兵争参黩再见国中。用以至诚恻怛之意，昭示于我国人。须知均属中华，本无畛域，艰危夙共，休戚与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则政治无自推行，人民益滋耗敝，甚或横流不息，坐召沦胥，责有攸归，悔将奚及？亟望周行群彦，戮力同心，振导和平，促成统一。若一方所持成见，终戾事情，则舆论自有至公，非当局之不能容纳。若彼此同以国家为重，凡筹虑所及，务期于法理有合，事实可行，则政府自必一秉夙诚，力图干济，来轸方遒，泯棼何极。凡我国人，其共喻斯恉，勉策厥成焉。此令。

〔副署〕国务总理　钱能训

〔《北洋政府公报》1919年5月22日第184号〕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

(1919年4月)

说帖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提出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

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

甲、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

一、初，德国亚东舰队欲于远东得适宜之地，为海军根据及商港，曾游弋于中国沿海一带，竭力搜求。德政府调查员，尝以胶澳地方最为相宜之说进。适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有德国教士二人，在山东内地之曹州被害，论厥情形，本为地方官防范所不及。而德政府方欲以武力遂其素志，久思有所藉词，至是，即挟为口实，遣军舰四艘至胶澳，派兵登岸，声言占领。中国政府见德兵入境，事势危急，迫不得已，乃与德国订立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

二、该约规定，胶澳海面潮平周围一百里内，准许德国官兵过调，惟主权仍归中国。复以胶澳之口南北两面及岛屿若干处租与德国，以九十九年为限。

三、该约复准德国在山东省盖造铁路二道，并于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开挖矿产。

此项路矿事业，由专设之德华合股公司举办，华德商人均得投入股本、选派董事。中国政府又勉力允从，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需外国帮助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应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

胶济铁路及支线，共长四百三十四基罗迈特，为山东铁路公司投资建筑两路之一。该公司于一八九九年六月一日，奉德政府特许，于是年六月十四日成立。一千九百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公司与山东巡抚订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一九〇四年六月路工告竣，开车营业。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所准之开采矿产权利，由山东矿务公司承办。该公司于一八九九年十月一日，奉德政府特许，于是年十月十日成立。其已经开办及正在开办之矿产，为淄川、坊子之煤矿及金岭镇附近之铁矿。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山东矿务公司复将所有权利负担让与山东铁路公司和管业。于是路矿两权，均为铁路公司所有。

四、保护胶济铁路之权，属于中国。一千九百年三月二十一日订定之胶济铁路章程第十六款云：倘在百里环界外，有须兵保护之处，由山东巡抚派兵前往，不准派用外国兵队。

又，第十六款云：该公司在查路时及行车时，倘因事禀请山东巡抚派兵保护，应立即准如所请。

……

丙、中国何以要求归还

一、胶州租借地，包括胶澳及其岛屿而言之，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之租与德国，实肇始于德国侵略之行为，中国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其情形已详本说贴之甲段。德国在战事前，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亦即此次让与之一部分。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不过依据公认之领土完整原则为公道之一举。若仍举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以公道矣。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内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者，亦在该省。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尚，热心爱国之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咸无以异，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抑亦为备具此项原则之模范，而其志愿殷切，欲其桑梓之得免于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无疑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两大圣贤孔子孟子所诞生，中国文化所肇始，实人民之圣域，中国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数以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四、山东省人民稠密，致经济竞争颇为剧烈，况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方英里之地面，衣食之源，不外农业，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地面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剥削外，无他结果也。

……

五、进而言之，中国既于宣战布告中，显然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之而得据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法律言之，即业已回复于领土之主权国，即出租该地之主权国。易言之，即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地等各项权利，故已不复享有所谓关于山东省之权利，可以让与他国者也。即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而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亦未见德国能转租其他〔地〕与他国也，至铁路一节，则按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国胶济铁路章程，本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中国鉴于上列各理由，深信平和会议对于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关于山东省之他项德国权利之直接归还，必能认为合于法律公道之举。苟完全承认此项要求，则中国政府、人民对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必永远感激于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此一举也，不特日本与诸友邦所愿维持之中国政治之独立与领土之完整，借以巩固，而远东之长久和局，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北京大学学生诸君，并请全国学生联合会诸君公鉴：

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即以提倡国货而言，贩卖固其要务，然必有制造货品之工厂，与培植原料之农场，以开其源。若驱工厂农场之人材，而悉从事于贩卖，其破产也，可立而待。诸君自思，在培植制造时代乎？抑在贩卖时代乎？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 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然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纷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摘自《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三人会"（英、美、法三国首脑及中国列席代表）会议记录（摘译）

威尔逊说，中国全权代表前一天已与日本代表举行了会谈，今天早上他们又来谈判。很遗憾，奥龙特先生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自从上次见到顾先生以后，他已仔细地阅读了文件，从而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参战之前，中日双方已有过一次换文，那是在1915年（顾维钧插话说，是5月25日）。在那次换文中，日本政府提出战后德国在胶州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以后，日本将把它们交 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后来又有一次换文及合同，虽然他只见过换文，但日本政府提出了某些条件，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英国和法国与日本达成了大致相同的协议（劳合·乔治插话说，是在中日双方两次换文中间），大意是说英法将支持日本政府对大陆及赤道以北岛屿的要求。在英国政府与日本之间有一个谅解，即日本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的德国岛屿的要求。所以，英国和法国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大体相同。

劳合·乔治解释说：那时候潜水艇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的大部分鱼雷舰在北海，在地中海则很缺。当时迫切需要日本的援助，日本就提出要求达成上述的协议，英国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就同意了。

威尔逊说，中国代表团可以看到现已造成的困难局面，劳合·乔治先生和克里孟梭先生不得不支持日本的要求。同时，中国自己与日本又有换文，他提醒顾维钧先生说，在法国外交部举行的十人会上，顾提出山东问题时，顾坚持认为战争的爆发已废止了中国与德国政府的成约。然而，战争并没有废止中国与日本政府在战前就达成的成约。他自己曾促使日本将胶州租借地交给五强，如太平洋上的岛屿一样作为托管地处理。他并不认为可以不遵守条约，但是在会议上达成一项修改条约的协议还

是可能的。他也向他们建议说，所有外国政府都应该取消他们在华的特殊权利，从而使中国摆脱强加在她身上的限制。日本不愿意将胶州交给五强，英国和法国政府又被成约所拘而处境为难。他曾要求日本方面对他们的协议的内容作一解释。他们回答说，对两个煤矿和一个铁矿的开采并不成功，这样就牵涉到与之密切相关的铁路问题。然而他们也提出愿意撤除日方的行政管理部门；只在铁路终点站保留军队；如果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愿意取消领事裁判权。他们极愿与中国共办铁路，唯一要保留的即在胶州辟一居住区。

顾维钧说，1915年的条约以及后来的换文，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的产物，并且一次就达成了所有的重要条款。他强调他在"十人会"上已说清楚了这一点。缔结条约和换文是在日方递交了哀的美敦书以后进行的，他认为这不符合正常的缔约规程，它们与战事引起的事件有关。

劳合·乔治问，顾讲的哀的美敦书指什么，威尔逊问劳合·乔治，是否从来未听说过二十一条。劳合·乔治说，他没有听说过。

顾维钧说，在占领胶州之后，1915年1月，这个口岸被开辟为商埠。中国曾要求日本从山东省腹地撤军。日本抓住这一机会，称它为不友好的行动。不久就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分成五号。其中要中国接受日本顾问，要中国放弃与其它西方列强有关的铁路特许权。他提醒劳合·乔治注意这一事实即英国也与此铁路特许权有关。中国被置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她再三反抗，最后被逼得万般无奈才屈服。5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要求，限中国在四十八小时内接受，否则日本就将不受限制采取行动。中国政府为此大为惊愕，不得不屈服于武力胁迫。

劳合·乔治问：中国是否曾向美国呼吁？

威尔逊说，中国呼吁过，美国也曾对这一破坏主权和政治独立的行动进行过干预。但是，整个换文事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只是间接地听说过一些。

顾维钧说，日本曾用严厉的处罚方式来强迫中国保守秘密。曾有过这种说法，即日本告诉协约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日本只向中国提出了十一条，但实际上它强加于中国的有二十一条。中国政府认为，条约和换文是以用最后通牒作后盾的二十一条要求的结果出现的，是违反常例的。中国一向努力以信义行事。但是，这次是违背中国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以前的换文也有类似的情况。自从日本占领胶州四年以来，日本军队向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山东省内渗透。其结果是民不聊生。中国政府曾为此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撤除它驻扎在二百五十里铁路线上的军队。日本拒绝了，还进而在山东省内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控制，向中国人民征税，甚至行使司法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异常强烈，中国政府感到民意的压力，要采取紧急措施使日本撤除军队与行政机构。只有当和会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后，这种紧张状态才能消除。

劳合·乔治说，在他看来日本政府通过与中国的成约，取得的东西比原来德国要多。他问顾维钧究竟愿意取何者，是要与日本的成约，还是让日本取得原来德国的权利？

顾维钧说，形势是如此险恶，他必须直言不讳。日本的位置与中国太接近，尤其是在满洲，它在那里占有一条直达北京的铁路，如果将德国权利转让给日本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如果日本占领着满洲和山东的铁路，北京就将处在一个被钳制的地位。

威尔逊指出，日本要求与中国合办山东铁路，同时他们提出撤除日本的行政机构。

劳合·乔治说，顾维钧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如果各大国要做出决定，是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是根据中日之间的成约履行权利，中国倾向于哪一种？他指出英国要遵守由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协议。

威尔逊说，如果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权利，那就意味着她可以保留租借地。他认为劳合·乔治先生的意思是：日本可能要求比德国更大的权利。由于英法政府必须支持日本取得德国曾经占有的东西，它们希望了解哪一种选择对中国更好一些，是让日本行使乔治同意说，这正是他的意思。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中国来说，与日本的成约比让日本行使德国的权利是否更有利。（此时给中国代表们片刻时间交换一下意见）

顾维钧说，他已征求了他的同事的意见。他不能对此作出选择，因为两者都是不能接受的。他只能将它们作一比较。与日本的成约及换文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这种归还仅仅是名义上的。两者比较，他认为德国的权利较之日本在条约及换文中所要求的权利要少些。但即使仅仅让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也将对中国的未来造成严重的局面。在要求直接归还德国原来在山东的权利时，他并不是要对中国的参战索取赔偿，而是视其为远东和平的必需。以往三年的经验已清楚地说明，如果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或是保留它与中国订约后所得的权利，中国将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无论对中国人民或是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他丝毫也没有夸张之意，他只是将必要解释的形势加以说明。

威尔逊说，劳合·乔治先生和克里孟梭先生可以证明，他今天上午已向日本代表团提出中国问题。他曾强调过日本和中国之间互相信任和友谊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这对远东和平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中国应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得到她自身的发展。他现在所要求的仅仅是摆脱目前这种极度困境的办法。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是唯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英国、法国、中国和日本都被

条约所束缚，他们之所以要这样遵守条约，是因为过去的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条约不受破坏。

劳合·乔治说，在1918年9月换文之前，中国本可以抵制到底。

顾维钧说，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二十一要求而订立的山东条约的产物。

威尔逊说，中国当时别无其它选择，只能接受这个条约。

劳合·乔治说，他想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专家们将这两种选择鉴别一下，看哪一种途径对中国更为有利。

克里孟梭表示他无意反对。

劳合·乔治说，应该让中国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英国和法国与中日之间的条约无关，它们只是对各自与日本的成约负责。

威尔逊说，二十一条中还有排斥其他列强在商业和工业发展中的内容。他读第三部分的第一条："缔约双方互相同意当时机成熟时，汉冶萍公司将……"

顾维钧指出，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煤铁矿业公司，位于长江流域。他要求宣读更为严重的第二条。

(威尔逊读第二条)

劳合·乔治问，中国是否已经同意该条。

顾维钧说，中国政府除了作一些细小改动外，已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求纠正的理由。

威尔逊问中国代表是否会重视以下看法，不管作出什么安排，日本与中国都将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而这一国际组织将保障它们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这就是说，国联将关注这些问题，中国将来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将来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他本人就准备在国联行政院和代表会议上号召各国放弃它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声称她将支持这一行动。中国的利益不能忽视，如果列强现在不能应允她现在希望得到的条件，他提出这一点是为中国将来的安全考虑，他希望中国代表考虑这一点。中日之间的条约和换文还存在疑点，但是和英法签订的协议并没有疑点。所以，即使它们与日本之间的成约被废除了，这两国政府还是不得不支持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因此，中国代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他们究竟倾向哪一种选择，是让日本取得中日成约中的权利，还是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顾维钧说，他不能过于强调以下事实，即中国人民现正处于分叉路口。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既与欧美合作又与日本合作，但如果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中国有可能被推入日本的怀抱。中国内部有一个小派系是信仰亚洲人的亚洲，并主张与日本密切合作的。然而政府的立场是相信西方的公正并寄希望于西方。如果正义不能得到伸张，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进一步说，根据以下几点事实，他认为成约的法律效力是有疑问的。(1)它们是在战争中出现的；(2)中国本身后来也参战了；(3)各国现已接受了新的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与日本的成约和它们是有矛盾的。最后，他感谢最高会议倾听中国代表团的观点，他希望说明取得可以依赖的并能持续五十年之久的和平的重要性，不能选择一种不公正的和平，那样只会播下日后纷争的种子。

威尔逊说，以上的考虑都是慎重的，但他个人不赞成顾的看法，即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是不公正的安排。条约的神圣正是大战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并非一堆废纸。如果条约与和平赖以存在的原则不符，我们还是不能废除过去的义务。如果只接受原则，我们就要从历史上退回去，法国就要接受1915年的条约，那样就没完没了了。不能因为被一个条约所制，便漠视正义。

顾维钧说，应该防患于未然，如果不幸的条约对未来的持久和平不利，现在就应该解除这些不幸的条约。

劳合·乔治说，大战的目的不在于此。战争是为东方和西方进行的，中国也从赢得的胜利中得到了保护。如果德国打胜了，要求山东和北京，她就可以得到它们。英国与日本的订约是在极度需要日本的支持时进行的。并不是说没有日本的支持就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如没有日本的支持，胶州就不可能收复。订立条约是严肃的，英国现在不能掉过头来对日本说"行了，谢谢。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时，你给予帮助，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条约很不好，不应该执行。"在条约的限度内他准备尽量大可能保护中国的地位。但是，如果中国象冯·佩斯曼·赫尔威格一样视条约为一堆废纸，认为可以随意处置，这对中国是毫无帮助的。

克里孟梭说，顾维钧先生可以认为劳合·乔治先生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所要说的。

威尔逊希望中国代表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并使之能尽早再提出讨论。

(袁明泽)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教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

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

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

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刱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麏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复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方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盖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标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变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不，皆败衂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故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兔，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原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仿我为鴃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凝不于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况天一上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甚为我公惜之。

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苏维埃军队击溃了仰仗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反革命暴君高尔察克的军队，胜利进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各族的革命人民会合。当此之际，人民委员会特向中国各族人民发表下列友好宣言：

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经过两年战争和极大努力之后，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此行不是为了横行霸道、

奴役人民、侵吞掳掠。关于这一点，每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和每一个西伯利亚工人都已了解。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它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尤以压迫中国人民为甚 。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再一次提请中国人民注意我们于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后对中国人民所作的声明。此项声明可能已为卖身投靠美、欧、日的报纸所隐匿不宣。

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它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工农政府接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此项谈判延续至1918年3月。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同俄国工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洲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已有，它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援助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美、欧、日等国非军为什么侵袭满洲和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再度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明了真相。

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作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华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自己的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诳人骗子驱逐出境。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除这些要点以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苏维埃政府深知：协约国和日本这次 还会竭力不让中国人民听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呼声；把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必先铲除盘据于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匪军。因此，苏维埃政府目前在向中国人民送达这一消息的同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摆脱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日本。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苏维埃政府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

1919年7月25日

北京《晨报》揭载曹、章、陆免职令发表的经过

曹、陆、章之免职命令，其原文已见于本日“命令栏”。兹闻此项命令之发表，实分为三次，其第一次发表者为免曹令，盖日前已内定者也。乃该令发表之际，即得天津罢市之消息，同时上海各银行又电京行报告上海罢市绵延多日，形势日益重大，政府如不能尽本日将罢免曹、章之命令发表，则沪上金融无法维持，危险万状云云。京行得此电报，遂联合向政府声明，并请速定办法。政府无可如何，遂于昨（十日）午后将陆宗舆免职令发布，以为如此，似可餍足商学界之人心，而镇压眼前之危险。敦意下午复得上海中国各银行团体及商会来电，略称：政府如能将曹、陆、章三人同时罢免，则彼等可担任向商界极力疏通，劝其于明日开市，如不能完全办到，则商民有所借口，前途将益纠纷，安危所系，只在一日，专候明令云云。京中各银行得此电，复向政府交涉，政府踌躇再三，谓章宗祥并无辞呈，无人批准免职等语。各银行代表谓：安危已在俄顷，政府如尚无决心，彼等实不能负责云云，政府 迫于无法，遂答应再将章宗祥免职令发表，但请各银行代表务担保命令发表后，本日可以开市云云。同时并将以上三种命

令派员带往天津，提示大众，劝其开市。闻昨下午国务院、内务部、农商部、教育部各派专员赴津，即携有此项使命云。

（原载1919年6月11日《晨报》）

陆征祥等被迫放弃签字的电文

大总统钧鉴：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祥、廷、钧、组。二十八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4日　唐绍仪自上海电南京朱启钤，就奉军许兰洲、管金聚两旅参加陕战、蓄意破坏和局一事，痛加斥责；并请朱电告北京政府，明颁停战命令，惩办许、管，另将嗾使奉军加入战争之陕西督军陈树藩即日调离陕境，以遏乱源。5日，朱电复唐，对其4日电中所言避而不答，仅谓去岁12月28日李纯所拟解决陕事五条办法“系根本解决纠纷之策”，北京政府“自当本此五条，通令办理”，请传催军政府尽速表态。

1月10日　徐世昌准财政次长李思浩辞盐务署署长及稽核总所总办兼职，改令张弧兼署。

1月11日　北京政府钱能训内阁改组，是日徐世昌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未到任前由次长陈录代理），财政龚心湛（未到任前由次长李思浩代理），陆军靳云鹏，海军刘冠雄，司法朱深，教育傅增湘，农商田文烈，交通曹汝霖，内务钱能训兼。

1月28日　朱启钤接北京国务院唐在章密电，告以唐绍仪“近密致英公使一函，叙述议和意见，计列七款：一、撤参战处，废国防军；二、裁减军队；三、推行警察；四、去督军制；五、省长由民选；六、废厘金；七、改国会制。并谓总统目前仍受制武人，望协助”。

2月4日　北京政府迫于日方压力，是日举行阁议。决定即由外交部电出席巴黎和会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诫勿再与日代表意见相左。然段祺瑞对此项告诫犹以为未足，力促徐世昌撤换顾、王。

2月6日　唐继尧提出解决南北问题办法四条。其中包括有关制定宪法，选举总统，解散新旧国会，解决地方行政，划分军区，处理滇、川、黔、陕、鄂、豫、湘西联军范围以内善后问题等项建议。

2月7日　徐世昌据北京国会决议，公布7月3日（按即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之日）为“民国纪念日”。

2月8日　朱启钤所提议和会议大纲办法四条，经北方代表3日赴上海与唐绍仪面商修改后，取得一致意见。是日由章士钊、胡汉民、方枢、汪有龄四人共同草拟会议细则，并确定于上海开议。

2月11日　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北京成立。宣称“以促进国际同盟之主义为目的”。举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为代理事长，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为理事。

2月12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公布中日各项密约。

2月15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山东问题长篇说帖，要求将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在山东强占之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

2月20日　南北议和会议于上海开幕。会上双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朱启钤先后发表演说。

2月23日　《民国日报》刊载《留日学生对外宣言》。内称：“胁迫我国缔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无不违背国际人民民主主义之精神，损我国之主权，而贻将来国际纠纷

之隐忧。"主张："一、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应行破除；二、青岛应以无条件交还；三、一九一八年中日军事密约应行解除；四、各种借款条约当然作废；五、各地驻屯日军应即撤退。

2月25日　上海日商三井洋行所雇驳船伙友，因物价昂贵，要求增加工资三成，举行全体罢工。后资方被迫允加工资二成，风潮乃息。

3月1日　段祺瑞出于保留并扩大参战军之同一目的，是日再指使谢葆璋、陈恩寿与日本代表伊集院俊、八角三郎签订《关于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战争终了之协定》。

3月2日　南方代表为和议停顿发表告全国书，其中列举议和期间陕西北军不独不停战后而进攻；国防军（即参战军）不独不裁撤反渐事增募等项事实，指出"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故北京政府于和议停顿不能辞其咎。

3月5日　广州军政府设大理院，任赵士北为院长，是日开院。

3月6日　北京国务院不待与北方议和代表预行商洽即通电全国，亟言南北和议之延滞，其咎在南而不在北。

3月15日　南方议和代表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北京政府言和无诚意情形再次通告全国。16日，正式发表第二次告全国书，其中仍着重揭露北京政府屡令陕西北军停战无效；继续增募国防军（即参战军）、提用参战借款；擅自发行八年短期公债等事。

3月23日　李厚基电告北京国务院，福建划界事宜已由童葆暄、臧致平与陈炯明直接商洽。4月初，双方同意以厦门鼓浪屿为会议地点，并决定先自海澄、江东及同安一带进行磋商。4月9日正式开议。至29日议妥，界线亦划定。而泉州及上游一带划界事宜则频起争端。

3月24日　英使朱尔典一再要求扩大上海租界，是日北京国务院开会，议决以人民反对为由婉言拒之。

3月31日　奉天造币分厂工人四百余名，为抗议厂长单伯宣扣发"红利"、延付工资、苛待工徒，举行全体罢工。后北京政府财政部被迫将单某撤职，工潮始息。

4月4日　午后，南方议和代表开紧急会，议商应否续开和议事。会间多数认为，虽三原于右任、张钫均无来电证实停战，但应顺从舆情继续开议。后决定7日重开谈话会。旋将此议通知北方议和代表。

4月5日　午后2时，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就梁启超秉承段祺瑞意旨，潜往巴黎进行袒日卖国勾当，致使中国代表对日交涉深受影响事进行讨论。

4月11日　夜，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离东京返国。行前中国留学生三十余人赶往车站，痛斥其卖国罪行，并以卖国贼呼之。

4月12日　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商会代表抵上海，向南北议和代表递交公函一件。函中请速电巴黎和会各国代表，声明否认二十一条及1918年中日铁路密约，并要求和会支持将德国所占山东一切权益直接归还中国。另请电促北京政府，立即宣布取消前项中日密约，以保主权。

4月16日　巴黎和会美、英、法、意、日代表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会间美代表为抵制日本独霸山东，提议德国在山东所占各项权益先由五国暂收，"俟中国将青岛及山东省内要点，按照协约国另议之办法开作商埠后，即将前项各权利利益交还了"。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当即起而反对。其余三国代表因事先各该国政府已与日方达成默契，故均不表态。

4月17日　午前11时，上海民议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华侨联合会、对日外交后援会、救国团、四川同乡会、陕西同乡会等七团体代表前往南北议和会议地点，向双方总代表递交公函一件，并附各团决议五条。要求取消一切中日密约，取消参战军及参战借款，惩办卖国之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等人；并宣称南北和会议决之条件，倘有一方不予执行，即与全国国民共声讨之。请议和会议对上述数端"先行决议表示"。

4月20日　山东各界十万余人在济南南关演武厅前广场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要求省长沈铭昌转电北京政府，坚持青岛及山东路矿由巴黎和会公判直接交还中国，并惩办祸首，废除非法密约。21日，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再以十万九千七百人名义分别电北京政府及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前电促徐世昌、钱能训等俯顺舆请，恢复主权，并将外交方针明白宣布，以平众愤而释群疑"；后电要求各代表力争无偿还我青岛及山东路矿。

4月24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为避免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占一切权益，是日向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提出解决山东问题四项办法：一、胶州先交英、美、法、意、日五国暂收；二、对德和约签字后一年内交还中国；三、中国愿给予日本以相当补偿；四、将胶州湾全部辟为商埠。

4月29日　出席巴黎和会美、英、法政府首脑举行三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30日继续开会，三国首脑竟擅自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占一切权利。5月1日，英外交大臣白尔福受权将上述决定口头通知中国代表。4日，中国代表就此向三国会议提出正式抗议。6日，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于宣读对德和约草案大会上，声明对山东条款"有保留之义务"。

5月4日　午后1时许，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法政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医学专门、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十余校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

游行。

5月5日　曹汝霖在爱国舆论强烈斥责下，被迫提出辞呈。呈中对其种种卖国罪行极尽狡辩之能事。8日，徐世昌指令慰留。令中竟称誉曹汝霖"体国公诚"，"因公受累"，着其"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

5月7日　浙江省教育会、杭州之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十三校、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神州学会、丙辰学社等团体，纷电北京政府，坚决要求立即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并呼吁各界一致力争。同日，谭人凤电徐世昌、钱能训，指斥彼等"妄施逮捕"，摧残教育。

5月8日　钱能训内阁提出总辞。9日，徐世昌将辞呈发还，并召阁员面留。

5月10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告以"无论何项条约，如与中国自主权有碍，及违背南京临时约法与国际公法者，因民全体誓不承认。宁退出和议，万勿签字"。又电巴黎中国使馆转和会，声明"无论何国与其他国间对于中国所订一切密约，……吾人断不承认"；并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否认二十一条及高徐、顺济铁路密约。另通电全国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报馆、学校，呼吁一致力争国权。

5月14日　徐世昌再令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督同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及京师军警督察长马龙标、京兆尹王达等一体防范并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同日，徐世昌并下令诬蔑学生爱国运动为"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名为爱国，适以误国"；令京外各校学生"务各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

5月15日　徐世昌准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令次长袁希涛暂代部务。

5月22日　济南各界愤日本侵夺山东，是日于南门外大校场开会，议商对策，到者"十有余万"。会间各团体代表相继演说。最后一青年泥瓦工人跃登讲台，痛陈劳动者受日人侮辱情形；并谓青岛未亡已受此种痛苦，倘一旦归日本所有，其痛苦必甚于今日，且不止劳动者受此侮辱云云。听者无不感动，相约誓死力争。同日，济南二十一校学生联合抵制日货。

5月23日　全国和平联合会电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内称："巴黎和会草案所拟关于胶澳及山东问题之办法，全国国民誓死否认。一致主张我专使不得签字。……乃闻政府竟有主张签字之说。违反民意，断送国权，不知是何用意。国民闻之，至为愤骇"。要求"电饬专使切勿签字，以为挽救地步"。

5月24日　段祺瑞通电北京政府所辖各省当道，主张放弃山东主权，无条件签署对德和约。诡称"欧约若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此乃"借爱国以祸国也"。电中并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学生爱国运动极尽讥讽诬蔑之能事。

5月25日　徐世昌令北京及外省官吏"悉力制止"爱国群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并谓"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

5月26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因北京政府对北京、上海学生所提各项要求至期仍无答复，遂按原决定宣布，自是日起上海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

5月28日　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内称："至今和议不成者，罪在不求之于国家组织之根本，而求之于个人权利之关系。"认为"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故"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

5月29日　南京中等以上二十一校全体学生三千四百十三人一律罢课。当日发表罢课宣言并将罢课决定电告徐世昌及北京国务院。

5月30日　陕西学界全体发布通启，呼吁各界一致力争青岛。

6月1日　徐世昌公布所谓青岛问题"真相"。其中徐为北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历次丧权辱国之交涉极力狡辩外，并将曹、章、陆种种媚日卖国勾当誉为"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同时反诬广大群众力争青岛、抵制日货等项爱国活动为"外损邦交，内隳威信，殊堪慨喟"。重申禁止散发传单，集众演说，饬京外各官吏"切实办理"。

6月3日　午前，北京各校学生分赴四城演讲，反对北京政府媚日卖国。当局随即下令逮捕。计3、4两日共捕学生千余人，均拘于北京大学法科。5日，学生外出演讲者较前尤为踊跃。军警继行逮捕。截至午后3时，被捕者已达二千余人，致法科无地容纳，遂转解北大理科予以拘禁。

6月5日　上海商界全体罢市，要求北京政府惩办曹、章、陆，释放被捕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自6日晨至12日，相继罢市者有：南京、厦门、松江、宁波（以上6日）；镇江、浦口、吴淞、奉贤（以上7日）；无锡、芜湖、金山、苏州、常州、临海、海门（浙江）、武进（以上8日）；宝山、杭州（以上9日）；天津、汉口、济南、宜兴、常熟（以上10日）唐山、安庆（以上11日）；九江、武昌（以上12日）等地。

6月6日　上海锐利机器厂、求新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华商电车公司全体工人，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部分工人，海关造册处全体工人、职员，均举行罢工。

6月7日　北京各界于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到三千余人。议决六项："一、电欧使不签字；二、取消欧战中日本压迫我国成立之条件，抄没国贼家产偿还顺济铁路垫款；三、惩办国贼；四、维持教育；五、提倡国货；六、促进和局。"随将此议通电全国。

6月9日　上海工人罢工斗争进入高潮。是日各业

工人举行罢工者主要有:全市汽车司机二千余人、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厂全体工人五千余人、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工人、江南船坞工人、各轮船水手、浦东美孚及亚细亚两火油栈全体工人、美商慎昌洋行电器工人、全市清洁工人及全体漆工等。

6月10日　沪宁、沪杭两路工人全体罢工,交通断绝。是日,上海各业工人举行罢工者主要尚有:电话局全体工人、各马车行全体工人、水木业全体工人、荣昌火柴第一第二两厂全体工人、华昌盒片厂全体工人、大有榨油厂全体工人、美商奇异电灯厂全体女工、日商铃木洋行全体中国职工等。

6月11日　徐世昌以广大舆论坚拒签署对德和约,国内和议无成,是日咨达北京国会参众两院声请辞职。同日,咨文被退还。22日,北京国务院发出通电,申明徐已"取消辞意"。

6月13日　徐世昌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辞职,令财政总长龚心湛暂兼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次长于宝轩暂代部务。16日,徐准于宝轩辞职,令朱深兼署内务总长。

6月16日　午后2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于上海大东旅社开成立会。与会者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济南、嘉兴、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地学生联合会代表及留日学生代表共五十五人。

6月18日　午后3时,天津各界联合会于天津总商会内开成立会。确定以"救中国之危亡,以谋中华民国永久治安"为宗旨。与会代表举卞荫昌为会长,马千里、刘俊卿为副会长。

6月23日　北京国务院就签署对德和约问题征得段祺瑞及北京国会两院议长同意后,是日电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告以和约中"胶澳问题""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6月27日　午后2时,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北京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共四百余人,前往新华门请愿。

6月28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举国人民严厉督责下,拒签对德和约。当日,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人联名将拒签事电告徐世昌,并再次自请"开去差缺,一并交付惩戒"。

7月2日　章炳麟以护法后援会名义发表《通告国民书》。内称:"北政府者,日本之外藩;徐世昌者,日本之土司头目。……惟有通电宣告不承认政府,不承认非法僭立卖国祸首之徐世昌,而后签字归于无效。"

7月6日　张作霖为独霸东北三省,一再迫促北京政府罢免吉林督军孟恩远。是日,徐世昌下令将孟免职;调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署吉林督军,未到任前令吉林省长郭宗熙暂行兼署。同日,令孙烈臣署黑龙江督军;8月11日,再令孙兼署该省省长。

7月8日　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通电,声明:"一、反对补行不保留山东三条签字;二、废除二十一条并不承认一切密约;三、青岛交还问题,反对中日两国间自行解决;四、取消高徐、济顺草约;五、宣告军事协定延长时效无效"。同时,各地爱国团体亦先后发表类似声明。

7月9日　午后3时,北京各界十三团体代表于南湾子石达子庙开北京各界联合会成立会。会间通过简章并选举职员。申明该会"以超然于政党关系之各界团体组织之";"以国民之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

7月15　长沙各界四百余救国十人团为取一致行动,共同组成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10月下旬,该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被举为副总干事。

7月20日　徐世昌令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并令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8月15日,徐世昌公布《督办边防事务处组织令》,共六条。

7月25日　浙江温州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永嘉新学会。该会以"培养德性,交换知识,促进思想之革新"为宗旨。会员五十余人。郑振铎曾任该会编辑部编辑。

8月1日　湖北各界联合会成立。该会由武汉学生联合会、律师公会发起,联合武汉教育会、农会、商会、各报馆等共同组成。旨在鼓吹救亡,激励民气,以挽救外交之危机。筹备期间,施洋被举为筹备员并任文书。该会宣言、章程、函电等多由其草拟。

8月5日　济南镇守使马良为媚日卖国、发泄私忿,妄加爱国回民马云亭、朱秀林、朱春祥三人以"煽惑军警,危害公安"罪,是日晨将三人枪杀。马良暴行激起全国各地群众极大义愤。自23日起直至月末,山东、北京、天津各界代表接连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严惩马良。

8月6日　午后4时,英使朱尔典奉英政府训令,偕同驻川边英领事铁克门至北京政府外交部,向代理外交总长陈箓提出所谓处理西藏问题办法三项:一、西藏版图以达奇克姆(大吉岭)会议时所用地图为依据;二、西藏自治权、宗主权问题以西姆拉会议为依据;三、西藏自治及军队等具体问题由西藏代表会议自行决定。

8月8日　徐世昌批准司法部呈拟《高等审判厅办事章程》及《高等检察厅办事章程》。定于10月1日起施行。

8月9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硝石总厂代表朱耀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借款二十万日元合同,以提交硝石一百万斤及此后必须与日本陆军省缔结售买硝石契约为条件。此款用作该厂经费。

8月12日　北京国务院改派安福系头目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消息传出,各方纷电反对。9月5日,广

州军政府正式电告北京政府，对此项任命拒不承认。9月19日，王竟恬颜抵沪，并大肆活动。南方议和代表拒绝与之接触。

8月16日　晚9时，张敬尧密遣爪牙，刺杀赴湘进行爱国活动兼筹组上海中华工业协会湖南支部之上海国民大会干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理事吴灿煌及中华工业协会特派代表程鹏于长沙船山学社。案发后，张竟玩弄贼喊捉贼伎俩，悬赏千元缉拿凶犯。

8月21日　京师警察厅奉北京政府内务部训令，是日发出布告，以北京《京报》所载文字"多有触犯出版法及刑律规定之处"为由，饬令停止发行。22日，该报被迫暂行停刊。

8月28日　午后4时许，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奉北京政府内务部令，派军警将天津各界联合会解散。该会随即转入租界，照常进行会务。

9月1日　徐世昌再据北京国会决议，公布7月3日为"恢复共和纪念日"。原以7月12日为该项纪念日之决定即行废止。

9月7日　徐世昌公布《民国八年公债条例》。该条例规定，此项公债"以二万万元为额"，"暂先发行五千万元"。28日，广州军政府通电反对。

9月23日　午后1时，上海中华国民励志会召开紧急大会。通过决议如下："一、北京政府发行之八年祸国公债，我国民应当从大多数之主张一致反对，以保国家命脉；二、北京政府与日缔结之军事协约，今奥约签字已复和平，应请从 速解除，以免后患；三、安福派之卖国国会应合力驱除与国家政治共谋改良。"

9月24日　徐世昌准代理国务总理、财政总长龚心湛辞职，令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25日，令财政次长李思浩代理部务。

10月9日　谢米诺夫率布里雅特蒙古兵一千六百名入侵外蒙，意图进犯库伦。驻库办事大员陈毅电请北京政府速派援军。

10月10日　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规约。其中规定中国国民党本部分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孙中山旋即指定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三部主任。

10月24日　京师警察厅奉北京政府内务部令，以北京《国民公报》"自本年七月以后所登载之评论等件，均有触犯刑律及出版规定之处"为由，将该报封禁，并传讯该报编辑孙几伊。12月，孙被判处一年零二月有期徒刑。此为轰动一时之"国民公报案"。

11月10　午后1时，全国各界联合会于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开正式成立会。与会各团体代表共六百九十七人。孙中山亦派代表出席。其中由全国十三省二十七处选派、参与组成联合会之正式代表共六十二人。未派代表各地，后亦陆续选派。该会为当时全国统一之民意机关，"以发展民生、促进民治、拥护国权为宗旨"。

11月17日　库伦当局正式宣布外蒙取消独立，仍归属中国；并声明前与沙俄政府所订各项条约"概无效力"。22日，徐世昌将外蒙取消独立事通令公布，并加封哲布尊丹巴"翊善辅化"名号。

11月18日　午后2时，广州宪法会议开幕。国会议员共出席五百九十二人。其中参议员一百八十八人，众议员四百零四人。

11月23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就福州事件向各地团体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

12月3日　徐世昌准旧阁各部总长辞职。同日任命靳云鹏内阁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未到任前由次长陈箓代理），内务兼农商田文烈，财政李思浩，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教育总长缺，仍着次长傅岳棻代理部务。

12月6日　浙江嘉兴各界八千余人为福州事件举行大会。议决发奋救国，不用日货，并要求北京政府与日方严重交涉。会后举行示威游行。7日午后，嘉兴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

12月14日　长辛店铁路工人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特邀集各界开国民大会。是日午后1时半，工、商、学、妇女等各救国十人团及市民千余人齐集娘娘宫开会。大会重申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八条件，推举工界代表史文彬、李懋银等及学、商各界代表共十余人组成委员会，议商永久抵制日货办法并拟定致北京政府书。

12月15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半月刊）创刊。此为该会专对市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之出版物。

12月17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电各地各团体，提出三项"自卫之方"："一、以演说、游行、传单等促全国人之觉悟；二、积极抵制日货，不供给日本米粮煤铁及种种原料，以促日人之反省；三、赶办学生军、商团、民团，以厚人民实力。"呼吁"一致进行，以收众志成城之效"。

12月25日　午后1时，昆明各界二万余人为福州事件于南城外公园召开云南第三次国民大会，"筹备抗日方法"。议决：一、电请各省力争实现解决闽案各条件；二、电北京政府要求外交公开并撤惩闽督李厚基；三、本省应即力行抵制日货。

外　交

1月5日　徐世昌任汪荣宝为驻瑞士公使；魏宸组为驻比利时公使。

1月15日　美、日两国政府代表在东京擅行议定由美、日、英、法、中、俄、意等国合组协约国监管路政委员会，共同监管西伯利亚俄路及我中东路计划。2月17日，两国驻北京公使将此计划正式送交北京政府外交部。18日，北京政府召开阁议，被迫于原则上接受监管方案。旋委派刘镜人为监管路政委员会委员，詹天佑为该会技术部代表。3月5日，协约国共同监管西伯利亚俄路及中东路委员会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式开议。会间虽经刘镜人、詹天佑一再提出中东路与西伯利亚俄路性质不同，应由中国经管，不容他国干涉；但美、日等国代表均不予理会，以至未能改变定局。

1月29日　徐世昌据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呈，以欧战以来"侨工事务倍形繁重"，请准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设总领事馆，是日指令"准如所拟办理"。2月14日，任罗昌为驻伦敦总领事；廖世功为驻巴黎总领事。

2月3日　各省旅京人士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按是时该会尚未宣告正式成立）集议，筹商对付日方威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办法。决定即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向和会转达全体国民三点严正要求："一、中国宣战后，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应直接归还中国；二、欧战期内凡各国所结密约，关于处分中国土地、权利者，擅视中国为买卖品，中国人民誓不承认；三、欧战后中日所订各约及各合同，皆由日本用武力阴谋强迫，应全取消"。

3月16日　自是日起，北京政府外交部陆续公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与日、英、美所订各种密约。

4月28日　自是日起，至同年8月16日，北京政府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与日本正金银行陆续签订总额四十万银元借款合同，以关余为担保。其中除拨一百万法郎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用费外，余留部用。

7月20日　北京政府就巴黎和会意大利代表提出要求"继承天津奥租界权利"一事电陆征祥，令"向协约国声明，天津奥租界应由中国收回后开作商埠，意大利不能要求继续此项权利"。

7月25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向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声明苏俄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

9月10日　午前10时，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参加签署对奥和约。

9月12日　早8时，驻北京美使芮恩施离任返国。公使一职由该使馆一等秘书丁家立代理。1921年9月3日，舒尔曼正式接任公使职务。

9月13日　桂系操纵下之广州军政府致函驻广州美代理总领事，声明军政府认为"新银团之政策含有扶助中国政治上及工业上之改革，……不干涉中国之行政，且不有垄断利益"，故"本军政府实赞成此新银团之政策"，欢迎"新银团所包括之政治及实业借款"，并请将此意转达驻北京美使及美国务卿。

10月15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欧战档案编纂处，编辑中国参战后该部所办各项文件。

10月27日　俄白匪军于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炮击北京政府派赴松花江之防舰。北京政府据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向鄂木斯克伪政权提出抗议。

10月28日　徐世昌派驻日代办庄景珂为全权代表，与玻利维亚全权代表、驻日公使模罗斯签订《中玻平等通好条约》。12月3日，该条约在东京正式签字。

11月1日　经驻京公使团同意，是日北京政府派员接收自1900年起被美军占领之北京正阳门城楼。

11月22日　外交委员会就福州事件向北京政府提出对日交涉六项条件："一、更换驻闽日领；二、由日本政府谢罪；三、慰恤死伤者；四、惩办行凶日人；五、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六、惩办驻闽日领署警长。"

11月24日　北京政府因库伦当局已正式宣布外蒙取消独立，是日照会驻京沙俄公使，所有前订中俄蒙条约及俄蒙协约并中俄声明文件应即失效。

11月27日　午后4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就福州事件向驻京日使小幡酉吉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四点："一、撤退福州领事；二、充分赔偿福州闹事中华人生命之损失，并给与受伤华人之医药费；三、按法严惩肇事负责之日人；四、福州日领事应向福州中国当道道歉。"抗议提出后，经接连三次催复，日使均以"须先取缔排货"拒之。

12月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王鸿年、沈觐扆，教育部派徐鸿宝赴福州，会同日方人员调查闽案真相，是日离京赴闽。3日午后5时，日使小幡酉吉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日外务省已派定松冈洋右、驻京日使馆已派定西田耕一为调查闽案日方代表。7日，王、沈、徐三人抵福州。12、18两日、西田耕一，松冈洋右亦先后抵达。

12月3日　午后4时40分，英使朱尔典偕参赞二人前往北京政府外交部晤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就西藏问题提出五点声明，佯称："一、无侵略西藏之野心；二、英国绝无供给西藏军火之事；三、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立之国家；四、藏界问题以维持印度之安全为目的，其他并无奢望；五、将来双方商议此事，英政府必可酌量让步"。

军 事

1月2日　广州军政府岑春煊等电江苏督军李纯，告以"此间以为，非陕、闽、鄂西停战问题解决后，不得开议"；并谓"军与匪之区别，首宜分别"，"今之争点在北方指军为匪"。电中同意"由双方或居间公团派员分往指导监视，秉公商定，……或请就地领事及教会为之保证亦可"；并提议"对于陕西方面，或由双方共推威信素符之大员前往查视，划定区域，以杜纠纷"。

1月6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任钮永建、李书城、蒋尊簋、林虎、马济、刘祖武、陈强、金永炎、张孝准、吕公望、魏士厚、魏帮平、缪嘉寿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8日，决定由李烈钧任军事委员会会长，以蒋尊簋为常任干事，并补方声涛为委员。

1月31日　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靳云鹏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借款三百五十万五千二百日元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用于支付参战军械价款。

3月20日　陕西停战划界监视员张瑞玑抵渭南。22日，抵西安。23日，电南北两政府、上海南北议和代表及江苏督军李纯，告以"陕省双方军队刻俱停战"，拟即与双方"会商停战划界事宜"。

3月26日　徐世昌令军事司法与普通司法各守权限，"嗣后各省区县知事不得以普通刑事案件请求划入军法范围；各军政长官对于不应归军法审判之案，亦不得率行受理"。

4月7日　代理阿尔泰办事长官张庆桐以私印纸币发放军饷，激成兵变。变兵通电宣布独立。10日，北京政府举行阁议，决派新疆驻军前往镇压，并将张庆桐撤职。

4月22日　闽粤边防督办方声涛将所部军队改编为福建靖国军，是日就总司令职。

4月23日　西南五省各军代表电唐绍仪，请力争广州"国会完全自由行使其职权"，以符护法初旨。

6月12日　广东桂系督军莫荣新为剪除地方派势力，下令通缉前省长李耀汉，并由军政府下令免其肇军总司令职。同日，桂系干将林虎接任肇阳罗镇守使；代理省长翟汪被迫辞职，遗缺由张锦芳暂行护理。

6月13日　徐世昌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再令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并准将西北边防筹备处改为西北边防总司令部。7月18日，徐世昌公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共七条。

7月19日　吉林督军孟恩远被免职后，即与其甥吉林第一师师长高士傧合谋对抗。张作霖随即调兵分南北两路进逼长春，并暗约日本关东军相机配合。是日午后2时，驻长春日军突于二道沟地方向高部寻衅。

7月24日　徐世昌据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呈请，准该省设置布尔津河县治、布伦托海县佐。

9月9日　孙中山于8月7日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声明辞军政府总裁职后，9月5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致电"挽留"。

9月26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电直隶（今河北）、湖北、山西、浙江、安徽、河南、江苏等省督军、省长及淞沪护军使，请"转饬该管地方警察官厅"，"分别解散或禁止"各界联合会。

11月7日　徐世昌据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呈请，准于上将军及冠字将军两等之外，增设不冠字将军，列为三等，月薪自六百元至八百元。18日，再据国务总理靳云鹏呈请，批准所拟任命将军命令程式。

11月15日　湘西护国军第四梯团团长廖湘芸率部哗变，杀该军总司令周则范及第三梯团团长杨玉生，自任纵队司令。旋诬加周等以"通敌"罪名，通电全国。

11月18日　徐世昌因前代理阿尔泰办事长官张庆桐以私印纸币发放军饷，激成兵变；并于未奉北京政府命令之先，擅与沙俄领事订立条约，着从严惩戒。并令新疆督军兼省长杨增新照会沙俄领事，声明前约无效。

12月26日　徐世昌免张树元山东督军职，调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继任。同日，调长江巡阅副使王廷桢继任察哈尔都统，并通令裁撤长江巡阅副使一职。

经 济

1月1日　日本为掠夺奉天（今辽宁）锦西大窑沟等处煤矿，与华人合资在天津开办锦西煤矿有限公司，资本三百万两。由日人安川敬一郎任日方总理，通裕煤矿公司代表陈应南任华方总理。规定"股票不得让与日华以外之人"。

1月14日　蔡元培等发起组织商学协进会，是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以联络全国商学两界，造就商业人才，发展商业为宗旨"。

1月16日　广州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广东中国银行及地方实业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借款七十六万日元合同，以广州电话局、广东省烟酒税及纸币五十六万四千余元为担保。此款用于维持广东中国银行所发纸币。消息传出后，北京政府即向外交团声明，不承认此项借款。

1月20日　为调查战后国内外经济状况，北京国务院成立战后经济调查会。由国务总理钱能训任委员长，孙慕韩、周缉之任副委员长。钱并指定黄序鹓、张益芳、王人文、陈铭鉴、张武、易宗夔、萧承弼等七人负责起草该会各项细则。

2月11日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为掠夺中东铁路海

林站附近之森林，垄断该地电灯、制粉、窑作等副业，假借“中日合办”名义，于哈尔滨开办中东海林实业公司。资本定额三百万日元。开设期限二十年。后该公司转由日本纸器制造株式会社经办。

2月15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借款二百五十六万二千五百法郎合同，以期票为担保。此款用于交付中法实业借款第十期利息及手续费。

3月9日　唐绍仪就北京政府拟将所募民国八年短期公债四千万元。

3月13日　唐绍仪就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大仓洋行暗中拟定《中日合办南京凤凰山铁矿合同草案》并将签字一事致函朱启钤，谓此条件损害国家权利甚大，并质问“当兹南北方议和之时，而北方政府又欲假铁矿为名大举外债，是何居心”，请“电京阻止”。

3月18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分别签订借款八十万元及五十万元合同，以民国七年八厘公债券、盐余、烟酒税等为担保。此款用作财政经费。

4月17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日商东亚兴业公司签订借款三百万日元合同，以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面八百万元、七年六厘公债票面二百万元并大沽船坞为担保。此款用作财政经费。

5月1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借款四百三十万法郎合同，以尚未修筑之钦渝路库券为担保。此款用于购入中法实业银行第二次股本。

5月20日　北京总商会开全体大会，到五十余行业。议决：一、各行业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止贩运日货，违者从重议罚；二、不用日钞；三、不阅日人在京所办报纸《顺天时报》，不在该报登广告。当场并宣告成立国货维持会。该会附属于总商会，各商董均为会员。自北京总商会议决抵制日货后，各店贩运日货者一律停止。日人所开店铺均无人问津。日货迅速跌价。各界持日钞往日本正金银行兑现者拥挤异常，且各店亦均拒绝收用。《顺天时报》销数亦大减。

5月22日　日本为掠夺南满森林，继2月11日开办中东海林实业公司之后，是日又假借“中日合办”名义，在哈尔滨开办庆云制材株式会社。资本定额二百万日元。按该会社实系日商三井公司独资经营。华人张岱杉任挂名总裁，实权操于副总裁三井木材部长守冈多仲之手。开设期限三十年。

6月4日　北京政府为延期偿还1918年于日本发行之甲号财政部证券，是日财政总长龚心湛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国政府民国七年甲号财政部证券改借契约》。约中规定1919年7月7日另发“中国政府民国八年甲号财政部证券”，面值一千万日元，“以中国盐税收入之全数为优先担保”，偿还期一年。

6月13日　徐世昌据内务、财政、农商三部呈请，准设立漕运局，并派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兼充该局总办。

6月27日　吉林省官银号与日商朝鲜银行签订借款一百万日元合同，用于整顿该省大洋票及汇兑资金。合同规定，此款须存入朝鲜银行，并由该行监督使用。

6月30日　自是日起至同年10月25日，北京政府交通部所属各电话局与日本古河、住友两洋行陆续签订总额为四百六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十八日元七角六分借款合同，用于支付各电话局材料费。

7月1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于北京、天津、太原、开封、济南、汉口、南昌、南京、上海、安庆、杭州等地 开办邮政储金。

7月5日　徐世昌准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设立边业银行。

7月8日　顺直水利委员会代表熊希龄与美国广益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签订借款三十五万美元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此款用作运河工程局经费。

7月29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法商施乃德公司、法国邮船公司分别签订借款四十一万八百零五法郎及四百零六万二千三百七十五法郎合同，以国库券为担保。此款充作与法商合办求新机器厂股本。

8月10日　日本为操纵吉林四平街贸易，与华人合资开办四平街交易信托株式会社。资本定额五十万日元。主要出资者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华人孙步瀛仅出资一万一千元。实权由日人把持。开设期限十年。

8月25日　苏浙两省各埠七百余只米船船工，因要求增加水脚，举行同盟罢工。米船工人持续十七日拒不装船。后各米行资本家被迫让步，罢工取得胜利，于9月11日始解缆装运。

9月8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龚心湛、代理交通总长曾毓隽与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代表理事川上俊彦在北京签订《四洮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四千五百万日元，以准该会社发售同量款额之“中华民国政府五厘利息四洮铁路公债”为条件，并“以现在及将来属本铁路所有一切动产、不动产及各项进款作为头次抵押”。

9月22日　日本为包揽长春农产品之购销并进行农贷剥削，与华人合资开办长春实业粮栈。资本钞票银八万元。其中日本东省实业会社出资五万六千元，华人马金堂、李奎章出资二万四千元。虽由李奎章任经理，然实权仍操诸日人。开设期限十年。

10月1日　北京政府代表与英商费克斯有限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第一次飞机借款合同》。借款额一百八十万三千二百英镑，用于订购该公司所制维梅式商用飞机一百架及筹组地面设备。此项借款以发行同等数额“中华民国八厘十年英镑国库券”尝付。11月1日，广州军政府电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就此项借款提出质

问，要求“早日作罢，以释群疑”。

10月11日　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及财总长特派代表徐恩元、驻美代办容揆，与美国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代表于华盛顿签订借款五百五十万美元合同。此项借款原定以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费全数为直接抵押品”，后因他方提出争议，遂改以河南、安徽、福建、陕西四省厘金及其他税收为担保，用于偿还到期1916年六厘金币借款库券。

10月29日　日本为掠夺南满森林并控制该地区木材之购销，继2月11日、5月22日开办中东海林实业公司及哈尔滨庆云制材株式会社之后，是日又与华人合资于哈尔滨开办中东制材股份有限公司，“专营”木材业与木材金融。资本定额五十万日元，中日各半。主要出资者为日人大西库治、高桥庄之助及华人赵自如、刘静安。由刘静安、大西库治分任正副经理。开设期限二十五年。

11月3日　广东省财政厅与台湾银行签订借款十万日元合同。此款充作留日学生经费。14日，北京政府教育、财政两部亦与台湾银行签订一项借款合同。借款数额及用途与前者完全相同。

11月4日　“中日合办”开原银行于奉天（今辽宁）开原成立。资本定额一百万日元，中日各半。主要出资者为日人川岛定兵卫、津田善松及华人王执中、米玉斋等人。以日人藤冈织太郎为该银行代表。开设期限二十年。

11月26日　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财政总长李思浩与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借款五百五十万美元合同，以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费为直接抵押，并言明由北京政府聘美国人一名任烟酒公卖会办，以监督烟酒税收。此项借款系供北京政府“拨充欠发军费及清还到期债务之用”。

12月12日　湖南矿务局长张荣楣奉张敬尧密令，在京与美商签订借款一百四十万美元草约，以湖南水口山铅矿作抵。此事被以毛泽东为首之湖南赴京请愿团探悉。经毛泽东亲自调查属实。遂于28日分函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二部，声明湖南人民对此草约“万难承认”；坚决要求两部趁该约未经调印之前，迅电张敬尧立即取消草约，退还借款，并撤惩张荣楣。

文　教

1月1日　《国民》杂志在北京创刊。该刊为学生救国会机关刊物，目的在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刊物宗旨有四：“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李大钊曾为该刊撰稿。《国民》共出八期，1921年5月二卷四号出版后停刊。

同日　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出版物《新潮》月刊在北京创刊。《新潮》于创刊之初，积极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故深得李大钊、鲁迅等人支持与赞助。五四运动后，该刊明显右转，蜕变为宣传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之讲坛。《新潮》共出十二期，1922年3月三卷二号出版后停刊。

1月3日　徐世昌以清儒颜元、李塨“生平著书立说本原仁孝，归功实用，深得孔子垂教之旨”，准内务部呈请，令即“从祀”孔庙，“以示来兹”。

1月23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组织全国中学校联合会。该会以研究改善中学教育为宗旨。决定“先办月报，以为交换知识、商榷方法之机关”。

2月6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区各学校教职员，嗣后“应每年组织参观团，分赴教育发达各地方，就其现状详加调查，以为采长补短之计”。

2月17日　曹汝霖、陆家舆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矿藏，又以三兴公司名义，与日人“合办”辽西新邱煤矿。资本三千万日元纯系日资。对曹、陆、靳云鹏、曲同丰等均赠若干股。

3月10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聘请范源濂、蔡元培、陈宝泉、蒋梦麟、王宠惠、吴敬恒等十九人，并指派部员沈步洲、张继煦等九人组成教育调查会。26日，该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举范源濂、蔡元培为正副会长。

3月12日　毛泽东离北京南下。14日抵上海，送别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4月6日抵湖南。

3月19日　是日至23日，林纾复于上海《新申报》接连发表小说《妖梦》，继续诋毁新文化运动，并对否定封建伦常、提倡白话文诸人及其言论进行恶毒攻击。

4月15日　鲁迅于《新青年》六卷四号发表小说《孔乙己》。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通过描绘没落知识分子形象，对封建制度予以深刻揭露及有力控诉。

4月19日　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于省教育会开正式成立会，到各校代表百余人。举工业学校学生刘汝巽为正会长，齐鲁大学学生王佩之、工业学校学生张文英为副会长。会间并议定进行方法等事。

4月21日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开正式成立会。会前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指定张一麐为会长，吴敬恒、袁希涛为副会长。该会自即日起举行会议，至25日闭会。其间通过有关议案九项。

4月30日　午后，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抵上海。胡适、蒋梦麟等前往码头迎接。杜威来华后，即由胡、蒋等人陪同赴各地演讲，大肆贩卖实用主义哲学及资产阶级教育学说。

5月15日　《新中国》月刊于北京创刊。此系综合性杂志。常为该刊撰稿者有北京各大报记者及北京大学师生。同年12月15日出版一卷八号，其中载有列宁著作《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部分译文（郑振铎译）。

按此为目前所见列宁著作之最早中译文。

5月31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先后通令查禁上海发行之《进步》、《清华杂志》、《民生》、《新中国》等刊物，以及无政府主义出版物《进化》、《太平》、《工人宝鉴》等。

6月8日　孙中山指派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之《星期评论》(周刊)在上海创刊。该刊除单独出售外，并随《民国日报》免费附送。

6月15日　长沙健学会正式成立。该会由湖南省教育会长陈凤芳发起。会员中有湖南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朱剑帆等人。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会所设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毛泽东对该会曾予以赞助，并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撰文为之介绍。

6月17日　长沙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部分学生创办《岳麓周刊》。该刊以"发扬平民精神，倡导民生主义"为宗旨。同日，长沙明德学校部分学生亦创办《明德周刊》。该刊以"提倡国货，唤起爱国精神"为宗旨，申明"不取报资"，分送各校并本省工商各界及外省外府州县各镇乡团体，"以资广通声气、借谋联络"。

7月3日　午后1时，湖南省八团体代表于少教育会开联合会。议决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收回青岛，废除各种密约、解散新国会，严惩安福系议员。

7月13日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为在四川传播新思想、开展新文化运动，创办《星期日》周刊。该刊存在一年，共出五十二期。

7月14日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周刊在长沙创刊。该刊于五四时期极负盛名，影响巨大。毛泽东曾为该刊撰写《创刊宣言》以及大量文章、评论。

7月21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该报由周恩来主编。申明"本革新同革心的精神为主旨，本民主主义发表一切主张"。

8月1日　孙中山于上海创办中华革命党(同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并为其撰写《发刊词》。

8月9日　周恩来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核心，联合各校刊物，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该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造成强有力的言论，以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论机关"为宗旨。

8月14日　北京中华博物协会举办博物展览会，是日开幕。为该会提供展品者有一百七十校、八社会团体及个人。共展出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图表、模型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二件。展览会于9月10日闭幕。

8月24日　五四时期著名小型通俗刊物《新生活》周刊在北京创刊。该刊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负责编辑。宗旨为："希望四万万国民，睡到五更半夜，摸一摸心想一想，打算一打算：在这欧战告终、皇帝将绝种的新世界新潮流中，何以谋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新生活》具有鲜明反帝反封建色彩。李大钊为该刊撰写文章六十余篇，多为时评。

9月28日　上海画家江新、丁悚、杨清磐等发起组织天马画会。以"促进我国美术之真艺术为宗旨"。是日午后2时，于西门外白云观图画美术学院开正式成立会。

9月30日　《新青年》六卷五号出版。该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由李大钊主编。李大钊于该号及同年11月1日出版之六卷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予以系统介绍。

10月20日　武昌健学会成立。该会之产生系受恽代英1917年发起组织之武昌互助社影响。会员十余人。其中数人又系互助社成员及骨干。健学会宗旨为"改造自身，改造环境"，并确定"实践、奋斗、互助、坚忍、俭朴"为会员共同遵守之信条。

11月25日　由教育界知名人士黄炎培、袁希涛、邹楫、任诚(江苏师范校长)、陈宝泉(北京高师校长)、孙其昌(沈阳高师校长)、杨若堃(成都高师校长)、金曾澄(广州高师校长)、谭锡恩(武昌高师校长)等十二人组成之欧美教育考察团，是日出国考察教育。

12月1日　李大钊于《新潮》杂志二卷二号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物质与道德之关系，并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之存在予以深入剖析。

12月4日　徐世昌准教育部呈请，令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将柯劭忞著《新元史》列入正史。

12月20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各教育会、各学生联合会及其他教育团体，23日再发表宣言，揭露军阀官僚摧残教育种种罪行，声明坚决支持北京教职员罢教之正义行动及要求。

12月23日　恽代英于湖南衡阳新城端风团出版物《端风》杂志第二期发表《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文，就孔孟所倡礼教伦常予以有力驳斥。同期并刊载廖焕星《名分主义的罪恶》及《名分主义与孝友》二文，亦针对孔孟反动说教进行批判。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0年

导　言

一九二〇年是中国陷入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开始。以前历次政府更迭还依靠斗智来解决问题，而从本年开始却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从今往后，便是有力者居天下了。

从袁世凯死后便一直掌握北洋政府军政大权的段祺瑞皖系政府，一直成为各路豪强的靶子。想取而代之者不计其数，但大多限于实力，只有保境安民的份。冯国璋在世也无能为力，只有听任皖系把持中央政府。但直、奉两系早就心怀不满，自从直系有了个吴佩孚，天平就不再总向段系摆动了。二〇年直皖一战，吴帅声动天下，段总理则只有黯然隐居，从此输光老本。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派为了政治分赃而吵闹不已，善后问题成了时局的中心议题。吴佩孚毕竟资格太浅，政治上还没有太多发言权，只有听任几位大头目摆布。张作霖、徐世昌和曹锟达成了分赃协议，终于算是将善后问题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开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五四”以后，各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更为普遍，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成为中国革命新气象的先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建党的先驱。

孙中山依然在战斗着，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临时约法》，奋斗到底。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在和第一次粤桂战争结束后回到广东，再次组织正式政府，并任命各部部长，以期为重新统一而努力。

中国幅员广大，各省小军阀林立，为了保有各自地盘，小军阀们也在想方设法。“联省自治”遂流行于天下。这一主张在湖南谭延闿处得到了极度发挥，“省宪法”成为一时流行名词。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直皖战争
- ●善后会议
-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 ●孙中山恢复军政府
- ●联省自治

直皖战争

背景介绍

“五四”爱国运动所掀起的反抗热潮沉重地打击了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打击了左右着北洋政府命运的皖系势力。但是，段祺瑞为挽救其统治权和增强派系实力而采取了如下军事、政治对策：在军事上，于 1919 年 7 月 20 日将“参战军”经由“国防军”改为“边防军”，段祺瑞自为督办，而指派徐树铮实际控制。这支军队继续由日方训练、装备、指挥和控制。它是段氏的私兵，是皖系军阀的私产。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为削弱段祺瑞的羽翼，特乘机任命段祺瑞的爱将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远戍外蒙，企图置徐树铮以棘手窘迫的境地，从而造成段祺瑞的被动地位。不意徐树铮较妥善地处理了外蒙“自治”问题，反而抬高身价，皖系势力范围与军队实力大见增长，从而与直、奉两系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段祺瑞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而加以疏导和缓解，反而自以为得计，利用安福国会，操纵政柄，置内阁于胯下，颐指气使，致使大总统徐世昌与阁揆靳云鹏均难以接受，形成对峙的局面。

与段祺瑞的皖系在军事上成对峙态势的是以吴佩孚为实际首脑的直系势力。那时，吴佩孚对直系绝大部分兵力已具有指挥权，加之身在南北战争的前线而有举足轻重之势。他自 1918 年 8 月即扯起罢战主和的大旗以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暗中与南方通好，于 11 月 28 日与陆荣廷、谭延闿等订约停战。曹锟则与奉张加强联系，于 1919 年秋冬之间约会奉直七督结成七省联盟（直督曹锟，苏都李纯、赣都陈光远、鄂都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及黑督孙烈臣）谋划反段。1920 年初，吴佩孚正式提出撤防北归。这样南军势力必会随之北进，对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威胁甚大。段祺瑞为阻止吴部北上，采取了安插亲信，步步设防的军事措施，结果为渊驱鱼，不仅没能收到防范实效，反而使豫督赵倜有所猜忌而反段亲直，并参加七省联盟，于是，直、奉各督群聚于直吴周围。1920 年 4 月 9 日，直系首脑曹锟借追悼湘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研究对付皖段策略，决定由湖南撤兵回防以反对武力统一，威胁段祺瑞；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以削弱段祺瑞的政治实力。吴佩孚如响斯应，立即行动。5 月底即开始北撤。奉系军阀也认为有隙可乘，进兵京畿。一时风云突变，战云密布。直奉军阀进一步联合，将反对矛头直接指向皖系，提出削弱皖系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具体要求，使皖系难以接受。从 7 月初开始，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徐树铮调兵遣将，积极布署备战；直奉则迫使徐世昌断然下令，剥夺徐树铮兵权，收取边防军指挥权，直捣皖系命脉要害，名义上对付徐树铮，实际上已予段祺瑞以难堪，致使素以北洋领袖自命的段祺瑞勃然而起，由原来的幕后操纵转向幕前指挥，动员军政力量，发布声讨直系的通电，以重兵强制徐世昌发布惩办曹锟、吴佩孚的命令。7 月 9 日，直皖双方已处于临战前夜。皖系由徐树铮组编“定国军”，段芝贵、曲同丰、魏宗瀚分任一、二、三路司令，作好迎战准备，直系则组成“讨贼军”，在天津誓师，由吴佩孚、王承斌指挥西路、中路；曹锳、李景林指挥东路，宣称“驱老段，诛小徐”。奉系张作霖伺机而动，公开站到直系一方，率军入关，企图分享一杯羹。12 日，直奉各督联名通电直指段祺瑞为祸首。14 日，直皖战争正式启幕，双方激战于涿州、高碑店、杨村一带。从 14 日至 16 日三天二战，直军均败绩。但从 17 日开始，战局陡变，直系由于 奉军入关助战，形势逆转，皖军全线溃败，曲同丰被俘，徐树铮、段芝贵遁逃，段祺瑞再次引咎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直、奉军队进驻京畿。直皖战争历时五天告终。皖系兵力大多分由直、奉消灭或吞并，仅在福建（李厚基）、浙江（卢永祥）尚保持一些兵力，两省虽有七万之众，但有些地方部队已不听命，实际为皖系所能指挥的不过四万人而已。军事实力的损失和政治上的失势，使皖系军阀不得不拱手让权，直奉军阀代替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段祺瑞在战争失败的第二年退居天津。

材料：

- ·直皖战争的经过
- ·皖军败因

材料一　直皖战争的经过

参战军的成立，就是直皖两系争权夺利、针锋相对的

具体表现。自参战军成立之日起，就有直皖两系要打仗的传说。到了一九二〇年春，形势日见紧张，备战的空气也日渐浓厚。参战军第一师的各高级军官在讲话时也常表露这种意思。最明显的是在一九二〇年三月间，第二旅旅长程长发在一次集合全旅军官讲话时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至此直皖必战之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在直皖战争尚未开始之前，就有内定刘询为直隶省督军和曲同丰为河南省督军的传说。传出这种消息的用意有两方面：一方面许以西路前线两师以两省的地盘，是使两师的全体官兵努力作战，有了地盘，就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一方面也表现出段祺瑞认为参战军实力雄厚，有不战则已、一战必胜的气概。

一九二〇年六月间，直系已有所准备，将部队由湖北、河南向北移动，有与皖系备战的模样。当时皖系认为如乘直系军队集中未完而击之最为有利，于是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即宣布了作战计划。分为两路：一为西路，沿京汉铁路线由琉璃河向南进攻，第一个进攻目标为保定，是作战的主要方面，集中地为琉璃河车站附近地区，集中时用铁道输送；一为东路，沿津浦铁路线由济南向天津进攻，第一个进攻目标为天津，是作战的助攻方面，集中地即在济南驻地附近。战斗序列：西路总指挥为段芝贵，下辖参战军第一师曲同丰部、参战军第三师陈文运部和陆军第十六师刘询部，共三个师。另由参战军教导团编了一个重炮兵营（十五公分榴弹炮），并将参战军第一、三两师的骑兵团编为一个骑兵旅，归参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苑尚品指挥，掩护集中后担任西路左侧背的掩护。东路为参战军第二师马良部，即由该师师长马良负责指挥。

西路的部队，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开始向琉璃河车站附近地区集中。参战军第一师用铁道输送，每营一列车，由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车站上车，在琉璃河车站下车，约一周全师集中完毕。陆军第十六师亦同时集中完毕。集中地区的分配，参战军第一师在京汉铁路以西地区，陆军第十六师在京汉铁路以东地区。

部队集中完毕，西路总指挥部发布了作战部署，参战军第一师和陆军第十六师沿京汉铁路线左右向保定前进，两师的作战地境为京汉铁路线，线以西归参战军第一师，线以东归陆军第十六师。另由参战军第一师的步兵第一团为基干编成一个右侧支队，由京汉铁以西的山区经过房山县向保定前进，掩护西路的右侧背。骑兵旅俟与敌接触后，主力置于西路左翼担任掩护左侧背。重炮兵营在参战军第一师之后跟进。参战军第三师为总预备队。总指挥部在部队前进后即进驻琉璃河车站附近。

集中完毕，约在六月二十日的中午，命令部队即时由集中地区向涿县城关以南地区推进。部队于正午十二时许出发，行至涿县城以北，与第十六师的部队行进路发生交叉，因此不但迟滞了前进，而且部队发生混乱。日没后又落大雨，临时命令部队在涿县城关以北地区宿营，炮兵停于涿县城内道路上。由于对直系部队的情况不明，并缺乏实战经验，当日下午涿县城关以南的下坡店已到有直系掩护部队约一个连而不知，因此宿营地未按原则来分配，且前面也未派警戒部队，尚以为没有敌情顾虑，而毫无备战观念。

六月二十一日晨，对下坡店的敌情仍不知道，命令部队以战备行军的态势继续向高碑店前进，前卫部队行至下坡店遭遇直系掩护部队的抵抗，才知此地已到有敌军，战斗从此开始。当时直系部队在京汉铁路正面的只有董政国混成旅，主力在高碑店车站附近，下坡店是其掩护部队集中的一个连，指挥部设在高碑店车站附近。

参战军第一师的前卫部队在下坡店与直系的掩护部队发生战斗后，由于皖系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而且对直系的情况不够明了，以致没有正确的判断，处置因之产生错误。直系在下坡店掩护集中的最多不过一个连，系用逐步抵抗逐步撤退的办法以迟滞皖系部队的前进。而皖系误认是敌人主力，就将部队逐次展开加入战斗，并布置师属炮兵团在涿县城南关附近，重炮兵营在涿县城以北地区，均进入阵地开始射击，入夜探照灯队也协助战斗。至是参战军第一师的主力已全部加入了战斗。当日夜间，参战军第一师已将下坡店完全占领。拂晓时，全线官兵均准备乘胜前进，直趋高碑店，但始终没有前进的命令，而拂晓后却通令各部队就在下坡店以南之线构筑野战工事，形成了防御态势。当时大家均甚诧异，认为这样处置极为不妥，应迅速前进，乘直系兵力薄弱之机，直取保定，毫无问题。步兵第三团第一营曾请求全线各部均停现地不动，由该营独立进攻，保证将高碑店攻下，如若达不到目的，愿受严格处罚。但师长、旅长均不允许，却通令各部队严守待命，并说如若刘询的部队不前进，我们不能独立进攻，免得腹背受敌。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的处置是失败的根苗，如若迅速攻下保定，形势大变，刘询的意外行动，即可不致发生。

直系见皖系的部队停止不进，即陆续向前增加部队，形成对峙状态，并常以小部队向皖系部队扰乱，使皖系部队更不敢前进。同时刘询的部队始终没有前进的模样。皖系部队就这样在这条线上停了六天。到了二十八日的拂晓前，就听到由刘询部队对面的直系部队方向吹奏停战的号声，不久两方面第一线的部队都发出了同样的号音。当时的景况，与平时的对抗演习一样，全线官兵均莫名其妙。不久枪炮声均停止，两方面的官兵均走出战壕自由活动。拂晓后，才接到了严守原线停战待命的命令，但是为什么要停战，还是不清楚的。

在停战当日的日没前，突见琉璃河车站附近有浓密

的炮火，当时大家认为已经停战，为什么总指挥部附近还发生炮战，当时也是不清楚的。

停战的当日和夜间，全线安静，并未发生战斗。到了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突然接到战事停止、速返北苑驻地待命的命令，并规定以每营为单位自行选择路线，情况紧急即时出发。此时人心恐慌，不知有何变化，但是失败的形势已然不问可知矣。约十时许各营均开始行动，而部队的秩序还很齐整。当时的行进路旁已发现有直系部队（直系戴红色臂章，皖系戴白色中间有一条红的臂章）的活动，但未发生冲突，战事就是这样结束的。参战军第一师在此次战斗中，由于战斗的时间很短，且无激烈战况发生，因此伤亡的人员不多，武器装备也无何损失。

东路方面的参战军第二师，配合西路方面同时动作，战况进展，颇为顺利。在西路停止战斗之时，它已进至桑园附近，但因西路方面的失败，也只有停止战斗，听从整个局势的变化。

（摘自《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韩世儒）

材料二　皖军败因

皖军之败，败于天降暴雨，败于皖军内变，其所以至败之重大原因，则行军重视仁义，而吴光新之受绐于王占元，又为直系是役成功之母。盖当日以直皖两军之战斗力相较，皖军有航空队及重炮队，而直军无之；且无射击飞机之大炮。段合肥不忍严令航空队施掷炸弹，并令重炮队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准施放重炮。故直军得能保守其战斗力。又皖军作战计划，因定吴光新一军，计四混成旅，开抵武胜关，合同西北军夹攻郑州，以击直军之背，而绝其后路之接济。乃吴率部路经武汉，鄂督王占元与吴为八拜交，柬邀赴署洗尘。吴至督署，即被拘留，送交军法处监禁，并将吴军缴械，致使直军无后顾之忧，悉以全力抵抗前敌。然斯时曲部虽受第十五师之影响，其兵力则仍雄厚，倘退守京城，以与直军对抗，或移师京奉路线，与徐树铮会合，进占天津，以待马良之生力军（计一师及一混成旅）由济南来援，则胜负犹未可知。因马良奉令后，补充迟缓，尚未出动，候至西路失利，始行进击。一战占德州，再战取桑园，嗣又奉合肥停战令，始将部队交鲁督田中玉接收，辞职赴沪。是直军之胜，不得谓非侥倖成功矣。合肥在京既接得西路皖军失败之讯，即电致廊坊徐树铮，令其兵退通州，听候结束。复上书于东海，引咎自劾，辞职下野。东海准之，并颁命令，恢复曹、吴官职。派靳云鹏与萎桂题、傅良佐挟中央所提四条件：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部；四、解散新国会；赴津与曹、张会商，俾示好于直系。讵傅良佐甫下车，又被拘禁，曹、吴又坚不罢兵，竟欲置段氏及树铮等于死地。卒经张作霖作调人，与曹锟等开一会议，根据前次八省同盟会议之结果，由吴佩孚提出条件六项：一、解散安福部；二、惩办罪魁十四人；三、取消边防军与西北军及其他属于该两军之一切机关；四、京畿保卫，归直、奉两军，永远驻扎京城以内，由王怀庆卫戍总司令担负全责；五、撤销安福包办之和议机关，驱逐王揖唐和议代表，另与西南直接办理；六、解散新旧两国会，另办新选举。以上六项，为主要条件，尚有先决事件两项：一为政府速将三年以来所借外债及用途公布全国；一为更换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东海只知顾全一己地位计，完全批准，即下惩办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丁士源、李思浩、朱深、姚国桢、王郅隆、姚震、梁鸿志十人之命令。时该十人已于皖军解散之时，避难于东交民巷。至曹锟进京，又请总统颁发命令，褫夺该十人官职官勋，各处张贴照相，悬赏二万元，密派便衣军警，在东交民巷一带，严重监视。并咨文外交团，要求引渡。外交团以合肥负一时重望，况其败败于党争，竟置之不理。此虽曹、吴之不度德，不量力，实则贻中国国体之羞也。

徐世昌以安福之力，藉新国会选举为大总统，乃于直胜皖败之后，密与曹、靳勾通，竟将安福部及新国会解散。当命令将下时，有人谓徐曰：公之首座，为新国会产生，苟解散新国会，则影响将及于公。为公地位计，宜力持保全。徐曰：君所言，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选举总统，为国会应尽之职务，既经选出之后，则国会与总统即无连带之关系。故国会既可以弹劾总统，而总统亦可以解散国会。况余之欲去安福国会，更无用下令解散，但须逮捕安福重要分子，解散安福机关，则新国会不解自散矣。即日下令逮捕安福议员郑万瞻、康士铎、光云锦、张暄等；复徇苏督李纯之请，通缉和议总代表王揖唐。于是机关完全解散。说者谓徐氏心思之阴险；实出于项城之上。而天道好还，徐氏之不能终于其位，亦早在人预料之中矣。执政者固可不引以为戒哉。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善后会议

背景介绍

直皖战争结束后，一些英美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及其记者，对吴佩孚给予很高的评价，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并且对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等主张表示支持。《密勒氏评论报》指出：“吴佩孚将军为一时代之人物，……公认为中国一国之英雄，与保障人格之伟大，一时人咸注目其身，而叹服其战段之神勇，中外之人，无不皆然。”一个英国记者说：“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另一美国记者说：“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唯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

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待。"8月中旬，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书中，认为中国只有像英美那样，实行代议制度，根绝军阀官僚政治，才能解决时局问题，因此他表示赞赏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这些看法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合意人选。

直皖战争结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废除安福系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密约，严惩皖系军阀头目和安福系祸首，解散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彻底清算安福系的罪行；并且根据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主权在民的原则，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让国民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机会。人民指望吴佩孚这个积极倡导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风云人物，能代表民意，出来有所作为。但是，军阀战争本身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是一种妥协的结局。吴佩孚虽然表示要遵从民意行事，但他毕竟不能越出军阀的轨范；在同安福系作斗争和对皖战争中，他有着巨大的功勋，但在北洋系军人中，他还是个偏裨后辈，位卑职小，打仗是本分，说话是不能算数的，不能成为左右时局的人物。因此，战争结局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及其盟友徐世昌、靳云鹏共同分享胜利成果，也即是进行政治分赃。人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实际上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

材料：

· 皖系军阀势力的倾覆
· 日本的反映
· 天津会议

材料一　皖系军阀势力的倾覆

皖系在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其军事力量的土崩瓦解。安福系罪魁祸首失去依靠，纷纷潜逃。吴佩孚提出："一、边防督办官制取消，边防军解散；二、西北筹边使官制取消，西北军解散；三、段合肥安置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止；六、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追交证书，永褫公权。"等处置皖系方案。但徐树铮、曾毓隽、朱深、姚震、姚国桢、丁士源、段芝贵等早已先后逃入日本兵营和使馆躲藏起来，王揖唐潜逃日本。7月28日徐世昌根据直、奉方面的要求，下令通缉徐树铮等十人。同日，驻京公使团应英、美公使要求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收容皖系分子并给予避难权问题。英国公使声明：英国已通知"使馆区域内之英国人不得收容保护皖系政治犯人"；美、法两国公使表示同意英国公使意见，不承认皖系分子为国事犯。日本公使表示反对。8月3日日本外务省急电指示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庇护皖系分子，说："如拒绝为世人公认与日本有密切关系之段派于穷途末路之际所求之保护，即将丧失日本今后对中国政客之威信。且徵诸最近之公使团会议，将给予中国人一种印象：由于日本屈服于英、美方面的压力，始不能庇护政治犯人。此在我对华关系上，将招致不体面的后果。有鉴于此，对彼等亡命者，此际一律采取予以保护方针"。8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公使团要求引渡藏匿于日本使馆之徐树铮、曾毓隽等九人。日使复照称：按"国际上之通义"，"决定对于以上诸人，予以相当保护"，拒绝交出。直系也无可奈何。11月14日，日使馆不顾中国各界人士的反对和谴责，派人掩护将徐树铮秘密送往天津，后转上海躲进公共租界。

皖系统治倾覆，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及徐世昌、靳云鹏成为北方政局的中心人物。对于战后的善后处置，吴佩孚主张较为激进，提出严惩安福祸首，幽禁段祺瑞，解散安福国会，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国是等政治主张。特别是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上海成立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北京成立了国民大会促进会。北京学界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召集临时国民大会，并提出"解决目前切要事件"的政治方案。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正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他在致中国政府的建议书中，也表示赞成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谓"就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但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并不断的挑起战争，并无真是真非，为了打击对方，他们可以揭露敌手的种种不法行径，摆出一付吊民伐罪为民除暴的架式，提出一些根本不想兑现的所谓解决时局的方案。战事一旦结束，战胜者将战败者驱逐下台，也就不再过分追究对方的责任了，他们所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故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等人，对吴佩孚这些主张和要求，并不感兴趣，对召开国民大会，更是激烈反对。徐世昌说："国民程度过浅"，"究竟能否实行，尚待研究"。张作霖说：吴佩孚的主张有某国人操纵，"吴氏不过其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属不可能。"至于直系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的要求，徐世昌也借口不愿承担解散国会的坏名声加以拒绝。这时他们感兴趣的是内阁的组成和扩张各自的军事实力和地盘。经过反复协商，各方最后同意由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并组成了反映直奉两系势力的新内阁。至于其他问题均不了了之。

新内阁的成立，标志着直奉两系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开始，原来的直皖矛盾消失，新的直奉之间的矛盾，已经潜伏存在，招牌换记，新瓶旧酒，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

依然如故，全国人民所期待的“曙光”，终归化成泡影。

（摘自《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日本的反映

小幡驻华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

1920年7月29日

第766号

关于此次直皖两派纷争及其善后措施，英美方面，特别是美国对直派直接间接隐然予以支持，欲利用直系打破日本在华势力，进而有利于自己国家将来在华之发展。此种情况，谅阁下早已在诸多方面观察及之。在北京，可以看到法国公使对此倾向于附合英、美之态度。当前的趋势是继三总长免职之后，紧接着的便是考虑惩办安福系首领问题。这些政治犯将逃窜到公使馆界内一事所引起之耽心逐日加深。随之，英、美方面，尤其是美国，本诸上述方针，对安福系方面之行动将加以牵制。如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导报》社论，以《庇护所的权利》为题，认为：向来外国公使馆匿藏政治犯往往不肯引渡一事，殊属无谓；继而论述曰，此事在实行上虽有种种困难，但希望外交团以某种一致方法革此恶例，拒绝接受保护此种犯人。

果然于翌日（二十八日），应英、美两国公使提请，突然举行外交使团会议。一如前例，首先由美国公使馆随员但尼提出与上述相同提议。英国代理公使表示，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奥尔斯顿代理公使任内，曾对公使馆区域内之英商六国饭店通告，不得收容保护此种犯人，今拟援用此例，通知六国饭店与居于公使馆区域内之英国侨民照此办理。首席公使与葡国公使之间，亦就此交换二、三有关意见。本使一方面痛感日本与安福系所结之孽缘，今日尚在被人论长说短，如再遇事支持彼等，徒负恶名，极不得策。且为这些问题，与英美对立，等于无故招人怀疑，故力避免。但复思如一味顾虑外国方面及社会猜疑，始终以英美马首是瞻，随声附合，不仅须深思其是否得当，特别在外观上，当人所共知与日本有深切关系之安福系，今日面临末日之时，日本即掉头不顾，弃之不理。如给人以此种印象，必使今后欲与日本共事者以日本不足信赖之感，诚可虞也。且不难想到，今后英、美方面动辄将以此种手法压制我方。本使兴念及此，立即阐明我方独立不羁之主张，以挫其强横之锋。实则为维护日本威信也，极关重要。就此本使先向英国代理公使叮问，该使之提议，是否意欲作为外交团之决议以实行之？盖因英、美、法公使最初本意，务欲使其成为外交团之决议，此则可从其前后发言中，不难推察出大略梗概。而该代理公使却答云：总之，此乃出于余个人意见，不过提供外交团参考耳。就此，本使当即表示，若然固佳。但就如是重大原则问题提交外交团决议，本使不得不以纯属个人意见进一言。本问题根本关系到国际法乃至国际惯例，亦即在其实行上至少有动摇过去国际惯例之嫌，并且一旦付诸实行之后，不只限于公使馆区域，必将涉及将来与各地，至少在各专管租界及公共租界，如不能确定和贯彻执行同一原则，不仅难免出现不彻底不公平之现象，且必导致因时因地而使用两种办法，这时究应如何处理？总之，对如此重大问题，在短时间不能如此轻率地议论决定，此须予以慎思熟虑之审议。在我发言之后，英、美公使未表示任何意见，他国公使无发言者。最后除前述英国代理公使之外，美、法两公使亦表示将对公使馆区域之各自侨民发出禁止保护政治犯之命令。遂即散会。

本使归馆后，葡国公使来访，私下（此处有脱字）评论，并责难其他大国态度专横。此外，本使在会议席上曾注意各小国公使态度，据观察他们对本使之陈述，似亦有同感。总之，窃思本件目前虽暂时告一段落，但因时局之发展，本问题势必将因中国方面提议而提交外交团讨论。今日北京政府军宪当局已非正式地照会首席公使，询问外交团对于逮捕政治犯人可否给予善意援助。该公使答以不能予以所期待之善意援助。云云。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三　天津会议

所谓天津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切国家大权都抓在几个大军阀的手里，由大军阀作出决定，交由北京政府遵照执行。徐世昌原来幻想在段祺瑞失败后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此时才感觉到去了一个“太上政府”，又来了两个“太上政府”，甚至想用自己的亲信做内阁总理也都办不到。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定后，十分沮丧地向僚属们表示：“第一项我就办不到，因为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天津会议前，有不少英、美记者兴高采烈地跑到长辛店访问吴佩孚，吴向他们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的具体意见。他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国民大会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全国各县县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各选一人为初选当选人，再由各省省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在初选当选人中间进行复选，选出五分之一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此项选举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国民大会可以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在六个月内制定宪法，修改国会议员选举法，即行闭会。国民大会有权审查历年来北京政府与外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密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他认为各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公意，必能接受办理。关于历年来所借外债及其用途，也应提交国民大会审查，并查抄安福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关于总统问题，他认为应由国民大会解决。谈到这里，西报记者

提出了一个问题："张作霖通电中一再强调拥护总统，如果总统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岂不与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吴不假思索地说："徐世昌未取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只算得半边总统，临时总统。我本人就是一个拥护总统的，但我所拥护的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总统而不是半边总统"。最后，吴谈到为了避免军人干政，自己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他只能做一个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他已经向曹经略使提出此项建议，须待天津会议解决，然后通电全国征求同意。

关于内阁问题，吴在另一场合下表示应当先进行全国和平统一，然后组织正式内阁。

自从直皖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看中了吴佩孚是个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国唯一的"英雄"，在报纸上竭力加以煊染，而吴自己也就飘飘然自负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吴对这次战争的估价和张作霖完全不同。张认为如果奉军不参加作战，直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参加战争是这次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性问题。吴则认为奉军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松林店一仗，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他又认为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七月二十六日，张到天津的当天，就有一批西报记者跑到恒记德军衣庄来访问他，谈到吴佩孚，他轻蔑地说："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

其实，根据吴佩孚所制定的国民大会提纲所产生的"国民代表"，只能是军阀官僚的代言人，这样一个国民大会，只能是寡头政治的装饰品，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吴佩孚沽名钓誉，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实现个人野心。但是，即使这样一个装饰品，当时的当权人物看起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就是他自己的上司，也不肯予以支持。他的同盟者岑春煊，也表示不能同意。吴佩孚放了一次空炮，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把第三师撤回到洛阳，以示"不问朝政"。八月四日，他由天津乘坐普通客车转道到了郑州，向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宣布他的四不主义：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他还感慨地说："这次战争，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背景介绍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人民获得无产阶级战斗的科学武器，引起各种反动势力的惊恐和反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深恶痛绝。同时，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纷纷传来，鱼目混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着破坏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不仅逐渐变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栏、专号，并且先后开展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讨论"、"讨论无政府主义"等三次大的思想斗争，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最大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自发走向自为阶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罢工运动的蓬勃兴起，也迫切需要有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人于一九二〇年春来北京，找最先拥护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同志，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同他们研究建党问题。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由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即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由它与各地联系，发动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工作。同年九月，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济南、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相继成立。稍后，周恩来同志在欧洲也开始准备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上海党的发起组成立以后，将《新青年》改为它的机关刊物，并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又创办《共产党》月刊做为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以及与其他党派的区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是要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从事工人运动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是出版工人刊物，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组织工人队伍。采用这种方式的首先是上海发起组。它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创办了《劳动界》周刊，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宣传革命道理，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的经验，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工人来信说："独秀先生：……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从前……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

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面目为之一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有会员三百七十多人。同年十二月，上海又成立了印刷工会，会员达一千三百多人。北京小组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酝酿，于一九二一年五月，正式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湖南、武汉、济南、广州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上海造船工人李中在《劳动界》发表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以气壮山河的气魄宣布："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这个宣言可以说是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新觉醒，预示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的一个红色信号。

材料：

·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

材料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

一九二〇年春，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维金斯基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在北京知识界中举行讲演会、座谈会。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和陈独秀等人会见，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建党的问题。

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接着，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北京、湖北、广东、山东、湖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筹备组织和开展建党准备活动。在法国，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一九二〇年八月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将《新青年》作为自己公开的机关刊物。十一月七日又秘密出版了《共产党》月刊，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国内工人运动的情况。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了《劳动界》月刊，并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经过这些工作，上海工人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十二月又成立了印刷工会。一九二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筹备庆祝活动，在天后宫举行了集会。一九二〇年八月，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和陈独秀的帮助下，俞秀松等八个青年，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进步青年入团，成为党的后备军。与此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招收革命青年学习俄语，一九二一年秋选派一批青年赴莫斯科学习。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对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很大，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一九二〇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在北京大学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十一月，创办了以工人为对象的《劳动音》月刊。一九二一年的元旦，又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小组成员经常前来讲演。一九二一年五一节，长辛店工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举行了空前的游行示威。五一后，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会），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参加者有四十人。一九二一年春，少共国际邀请上海和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少共国际大会，北京派何孟雄出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帮助天津和其它地方进步青年团体，做了许多工作，还派人到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指导工人运动。

一九二〇年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成立。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领导建立了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在武汉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汉阳兵工厂等许多工厂，开办了识字班，和广大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成立了人力车夫工会，并于一九二一年三月，领导了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〇年冬，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参加者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劳动者》周刊。一九二一年又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在广州成立了理发工会和土木建筑工会。土木建筑工会有会员四千多人，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一九二〇年下半年，酝酿组织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于一九二二年成立。

一九二〇年秋，济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李大钊派人到济南，同山东的共产主义者联系，一九二一年初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

在湖南，毛泽东、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为建党进行了许多工作。一九二〇年八月，毛泽东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九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一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参加了青年团。青年团还吸收了工人参加。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初，毛泽东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们，进行了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正确方法，是组织共产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给毛泽东信中说：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很重视工人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一九二一年五一节时，长沙各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改善待遇”、“加强团结”等口号。上述这一切活动，为在湖南正式建立共产党，做了重要准备。

此外，一九二〇年秋，陈独秀委托张申府（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在巴黎成立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三月，周恩来加入这个小组。赵世炎、陈公培等于同年春转入该组。周恩来、赵世炎组织和领导了旅法、德、比等国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表明在中国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

（摘自《中国现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恢复军政府

背景介绍

十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的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劝止他们与岑、陆等签定一钱不值的南北和约。可笑的是，北京政府竟然不顾事实，仅仅根据岑、陆、莫、谭等的空头电报，于十月三十一日宣布南北和平统一，并表示依照民国元年八月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改选国会。这就是直桂两系多年来所共同追求的“旧法选新会”的“和平统一”。大家都还记得，一九一二年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平统一”，还有一个虚伪的统一局面和短暂的和平时期。这次北京政府所宣布的“和平统一”完全是“纸面上的和平统一”，是骗不了任何人的一套把戏。

三十一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通电称：“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于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初不意北方遽引为口实，遂有伪统一之宣布。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惟察北方用意，思以伪统一借取外债，延长命脉。此等宣言，文等决不承认”。十一月一日，陈炯明通电否认广东取消自主。五日，唐继尧通电否认统一。十一月二日，陈炯明到了广州，不承认汤廷光为广东督军。汤于六日宣布解除督军一职。十一月三日，孙中山宣布裁撤广东督军一职，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任粤军总司令，节制水陆各军。陈于十一月十日通电就职。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孙宅举行会议，孙、唐、伍三人决定偕同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他们二十五日由上海动身，二十八日到广州，二十九日就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推定孙中山兼任内务部长，唐绍仪兼任财政部长，唐继尧兼任交通部长，陈炯明兼任陆军部长，伍廷芳兼任外交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并提升汤廷光为海军部长以代弃职逃走的林葆怿。

材料：

·第一次粤桂战争

材料　第一次粤桂战争

直皖战争发动以前，直桂两系曾经相约同时动手，直系在北方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势力，桂系在南方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这本是多年来直桂同盟的共同目标，也就是两系企图实现“和平统一”必须采取的军事步骤。另一方面，皖系与国民党及滇系也有一套反击直桂两系的计划：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段的指示下，接济粤军军费五十万元和子弹六百万发，帮助粤军反攻广东；唐继尧暗约粤军反攻广东，自己出兵广西，使桂系首尾不能相顾，然后会师广州，改组军政府。这个计划虽已拟定，但由于唐继尧要集中力量应付川滇军的战争，一时腾不出手来，而陈炯明也因孤掌难鸣，不敢单独发动。

粤军是以广东省长所属的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现已发展到一百零八营，总司令陈炯明兼任第一军军长驻漳州，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驻龙岩。桂系刘志陆、沈鸿英等部则驻潮汕一带，用以监视粤军。驻诏安的靖国军军长方声涛也是倾向桂。

七月中旬，正当直皖战争发动的时候，国民党人周之贞、何克夫等在江门起事，组织了五路救粤军，海军江大、江固两舰逃出广州加入救粤军，同时已下台的广东地方派领袖李耀汉也策动肇庆、钦廉一带的旧部起而响应，广东局势顿趋紧张。莫荣新得到情报，救粤军拟与陈炯明所部粤军里应外合地扫除桂系在广东的势力，因此陆荣廷在龙州召集会议讨论对付闽南粤军的问题。此时直系已在北方战胜，林葆怿所属海军又与桂系合作，内外形势都对桂系有利，所以龙州会议决定以进攻福建北军为名，大举向粤军进攻。龙州会议结束后，桂系便制造北军侵犯漳浦的消息作为进兵借口，而陈炯明窥破他们的阴谋，马上通电声明并无其事。

八月十一日，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的动员令。桂军以沈鸿英为总司令，下分三路，以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林葆怿率领海军前往诏安配合作战。桂军兵精粮足，又有海军为辅，自信万无一失。

粤军得到桂军动员的报告，才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十二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以洪兆麟为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

即日出发平和指挥作战。粤军只留四营在后方，所遗闽南各地尽由李厚基派北军前来接收。

粤桂军的战争从八月十六日开始。粤军人人思归，士气十分昂扬，而多年来养精蓄锐的桂军，竟然不堪一击，望风而溃，十六、十七两日，蕉岭、大埔、饶平均入粤军之手。在桂军兵败如山倒的影响下，方声涛的靖国军不战而退，已经行抵汕头的林葆怿观望不前，吕公望所指挥的浙军陈肇英部也按兵不动。十八日，桂军又放弃黄冈，粤军以破竹之势由竹篙山进占潮安，另一路由大埔向三河坝挺进，潮汕交通就被粤军割断了。二十日，汕头发生兵变，那位莫荣新的义子，以广东人而为桂军将领的刘志陆，仓皇弃城逃走，林葆怿急忙将海军舰队撤回铜山，自己逃回广州，澄海、汕头又被粤军占领。

粤桂军的战争发动时，岑春煊派文群为代表到北方接洽恢复上海和会，企图廉价交换和平。可是北京政府长着一双势利眼，认为南北和平将取决于广东战争的谁胜谁败，和会无足轻重，而李纯又不肯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因此不加理睬。

粤军占领潮汕后，桂系大为震动。一向仰承桂系意旨的岑春煊便又换上了一副“和事老”的伪装，用军政府的名义劝告双方停止战争。可是，当胜利在望的时候，粤军那里会理睬这个被敌人利用的傀儡工具。所以粤军仍然分兵两路前进，一路由梅县、长乐、兴宁进攻龙川、河源，一路由揭阳、普宁、惠来进攻陆丰、海丰。对方桂军刘达庆部守龙川、河源一线、卓廷贵部困守惠州待援。

这时，退往湘南的滇军朱培德、杨益谦两部也在湘粤边境跃跃欲试，莫荣新便又调回沈鸿英以加强北江防务，另派马济为西江总指挥，带兵由石龙进驻惠州。

二十日，惠州战局又有新的变化，粤军从飞鹅岭炮打惠州城，二十二日占领惠州，二十五日继续占领石龙。粤军恢复了以前势如破竹的战斗精神，岑春煊看见大势已去，便于二十三日通电宣布退职，这个电报称赞李纯自杀为“尸谏”，为“纯洁牺牲”，使他大受感动，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迅速召开国会，大力裁兵，中央与地方开诚布公，共图善后。二十四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荷怿、温宗尧竟以四总裁的名义宣布撤销军政府。二十六日，莫荣新宣布广东取消自主，并称“在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地方治安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军负责”。十一月四日，谭浩明也宣布广西取消自主。

（摘自《中国国民党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

联省自治

背景介绍

一九二〇年，褚辅成、殷汝骊等倡“联省自治”之说，他们认为：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繁杂，各省民情习俗，各不相同，欲订一部全国性的宪法，困难很多，主张各省自订宪法，实行自治。中央政府仅管军事、外交，地方政治不应插手。这就是他们当时所谓的“联省自治”政见。此种政见发表后，南北军阀多表赞同。因为这样，正吻合他们造成“独立王国”的企图，使他们所形成的割据局势，得到合法保障。是年八月间，褚辅成、殷汝骊邀同章炳麟、郭同（大公报编辑）等，联袂到达昆明。云南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召开盛大欢迎会，命各界人士亲聆褚等演说。章炳麟当时亦颇韪褚等的谬论，实际上褚等特利用章炳麟以重其说。唐继尧对褚等特别招待。此时正值秋令，昆明有名的“合香楼”月饼，一盘一盘的陈列在席前，章炳麟被吃病了。云南驰名的鸦片清膏也一罐一罐的送到他们寓所。郭同原来是一个瘾君子，除尽量大吸外，还贮藏一大罐，准备带回天津享用。一九二〇年九月间，褚、殷、章等由云南陆行赴川，独郭同一人仍由滇越铁路返回天津，携回鸦片清膏一大瓶，被法帝国主义者在越南老街检查关税时，在郭的袴裆内检查出来，经罚款若干，始得放行。褚等到四川以后，又以“联省自治”向川中军阀游说，更获得各军阀的欢迎，不久就提出了“川人治川”的口号。杨森等乃纠集川省将领，联合排挤当时驻在四川的滇军。而褚等则由川返回北京，于是年十一月间，在北京成立了各省自治联合会。

材料：

- 湖南联省自治
- 西南各省自治

材料一　湖南联省自治

直皖战争结束后，广东又爆发了粤桂军的战争，善于投机的谭延闿看见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便发表祃电（八月二十二日），主张中国采取联邦制，实行民选省长。他认为“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又指出湖南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大的损失，“汤芗铭、张敬尧对待湘人，无异异邦异种，而今日直皖之争，川滇、粤桂之争，皆由地方观念而起。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这个祃电

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祃电不但主张废除督军制，而且主张废除一切避其名而居其实的巡阅使、军区长、总司令等名称，以民选省长掌握一省军民两政大权，这在表面上象是最彻底的一种"废督论"，但是，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就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要的一套手法，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文人，当督军常被别人指责，如果实现这种主张，他在当选省长以后，就可以在实质上做到省长兼督军，避免另有一个掌握军权的人和他分庭抗礼，更便于借口地方分权，维持他的地方割据。

谭延闿和熊希龄都是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派，关系极为密切。民国成立以来，君主立宪派转化为研究系，熊是研究系的"名流"之一。早在洪宪帝制垮台时期，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曾提出改中央集权制为地方分权制的意见，后来他自己加入了北方军阀内阁，才把这个意见搁置一旁。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因此，熊希龄又拾起地方分权的学说加以发挥，提出省自治法和联省自治方案，希望通过他的老朋友谭延闿，首先在他的故乡湖南推行。他接到祃电后，就立刻回答一电，劝谭不必等衙国会制定省自治法，先由本省自行制定，提交全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施行。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速成方案，当然符合于谭延闿的迫切要求。同时，熊还请梁启超执笔代拟自治法条例、自治法大纲及说明书多种，寄供谭延闿参考。

谭延闿在粤桂军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本来是倾向桂系军阀的，但因此时粤军势如破竹，他就采取了两面敷衍的态度。九月六日，他向粤桂双方进行调解，主张"干老(陆荣廷)出而主持，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竞公(陈炯明)爱国爱乡，亦当早息干戈，言归于好"。从这个电报看得出，他在调解粤桂战争中，还在贩卖联省自治这个政治"私货"。

这时，南北两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怀抱来。九月一日，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阁员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却用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的说法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九月九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由上海来电，竭力劝告湘军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的后路，以收夹击之效。这个电报对湘军与桂系的关系有所分析，指出桂系历年来怀抱"兼并湘粤"的野心，每次湖南战事发生，"冲锋陷阵均属湘人，克地获城则归桂贼"。国民党认为把湖南拉回到西南方面来，是团结西南、重组军政府的重要关键。因此，属于国民党的湘籍旧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丞、陈嘉会等，均由上海回到湖南活动。但是谭延闿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

材料二　西南各省自治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取消两广自主，而北京政府竟据以宣布"全国统一"，这一措施引起了全国的冷嘲热笑。国民党随即否认桂系军阀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的行为，并将军政府恢复改组而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南北两个政府，根本谈不到"和平统一"。

在这时期，西南方面川、湘、滇、黔、四省都已宣布"自治"。"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又有所不同，它在一省范围内"保境息民"，脱离南北两政府，保持局外中立，但对北京政府并不采取敌对的形势。

西南六省宣布"自治"以湖南为最早。一九二〇年湘军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后来进一步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并提出以"联省自治"为全国统一的最后目标。其实，这种"自治"是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外省军阀侵入本省，而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卫手段，根本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湖南军阀首先发明了这个办法，随后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作为驱逐客军出境，巩固割据势力的借口。西南最大的两个军阀，除桂系军阀因退出广东而宣布取消自主外，滇系军阀因在四川站脚不住，也想宣布"自治"，以求退保云南一省的统治权。

以前军政府虽系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但在形式上还不失为西南各省所公认的南方统一机构。而改组后的军政府，由于各省宣布"自治"，仅成为广东一省和国民党一派的军政府，其势力不能越出广东的范围。

北京政府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三十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三十一日颁布广西、四川两省军阀的授勋令；又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对于湘、滇、黔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这些就是北京政府促成"统一"的具体措施。但是，除广西军阀外，刘存厚无力控制四川，四川军阀一致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湖南军阀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归附北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军阀卢焘对于北京政府劝诱"北附"的电报也都置之不理。北京政府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仍在国务院成立"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北京政府这样做不是没有目的的，原来帝国主义集团所组织的四国银行团，声明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北京政府就要这套滑稽手法，企图骗取借款。但它没有得到什么。

北京政府大做"统一"文章的时期，"自治"运动不仅在南方各省蓬勃开展，而且波及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民选省长运动的高潮：江苏省

议会在李纯自杀后议决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选代表到上海，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七日）；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从一九二〇年冬天起，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在北京，自治运动成立了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山西十二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四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摘自《文史资料选集》第 24 期）

历史内幕

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7 月 19 日，靳云鹏、姜桂题、傅良佐、张怀芝等六人受徐世昌的委派，并携带段祺瑞同意的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系及罢免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四、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四项条件赴天津与直奉方面议和。当时曹锟不在天津，张作霖也未来津，直系方面的意见，认为“六人之使命，如为总统所派，则督军受总统之调停，名分上实断不敢；如为段派居间，则段派已倒，更无所用其调停”。显然，曹锟、吴佩孚他们觉得现在来讲调停，未免太不合时宜，另外这些条件也还嫌低，不能满足获胜者的要求。直隶省长曹锐对代表态度冷淡，告诉他们：“虽家兄（指曹锟）亦无主张可以发表，须俟各省公决。”傅良佐因替段祺瑞作说客，并随带有武装警卫一百七十余人，被曹锐扣押，其警卫全部被缴械。姜桂题等四人无结果返京，靳云鹏则单独前往奉天与张作霖磋商。

靳云鹏到奉天后，除了转陈上述议和条件外，还替他的恩师段祺瑞求情，希望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时，给段祺瑞留点面子，不要使他太难堪，这也是徐世昌的意见。张作霖同段祺瑞的交谊原本不恶，在他看来，段祺瑞之所以不好，不过是被徐树铮这类奸佞包围利用了，现在安福系既倒，这时出面为段转圜，必将可以赢得一部分皖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增加同直系抗衡的资本。7 月 21 日，当张作霖接到段祺瑞 19 日发出的自劾乞和电报时，当即复电说：“引责各节，不忍卒读”，“吾公一世令名，坏于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泪下如雨”，表示“作霖当躬率三军，愿为督办扫除群小。至对于督办，决不稍有侵犯”。靳云鹏到奉后，7 月 23 日，张作霖马上又给段祺瑞去电安慰他说：“翼卿到奉，业已接洽。窃念此次兴戎，譬如子弟相争，无关长者，为父兄者尽可置之不问，任凭子弟自行设法了结。今日之事，无以异此。伏望我督办切勿介怀，遇事仍襄助元首，维持大局，并救济近畿一带之生灵。作霖日内到津，即当约集曹使，联络各省，筹商善后一切事宜，以资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勉节忧劳，为国珍慑，无任盼祷。”这两个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张作霖对段祺瑞这个祸国殃民的魁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也为尔后处理皖系军阀定了基调。

同一天，吴佩孚给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拍了一个电报，要求严厉处置皖系。电文说：“段氏窃柄，视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为拥戴元首计，为保卫国家计，均非将奸党歼除 不可。”他提出六项要求：一、解散边防军，取销边防督办官制；二、解散西北军，取销西北筹边使官制；三、安置段祺瑞于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会；六、追缴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证书，永褫公权。吴请王怀庆将这六项要求汇呈大总统徐世昌核办。曹锟和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对这六条都表示赞同。因此，7 月 26 日，这六项要求作为保定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的处理善后问题的条件。吴佩孚还认为：“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凡所设施，苟能以民意为标准，则人心自易翕服。将来各项问题，最好召集全国国民大会以解决之，庶公论得伸，国事可定。”因此，他再次提出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可以看出，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上，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比奉系张作霖的态度要明朗激进得多。

吴佩孚的言论，立即引起张作霖的不满。7 月 25 日，张作霖偕靳云鹏到天津，26 日就向外报记者表示，他“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这样，皖系一被打倒，原来共同对

敌的直系和奉系这两个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磨擦渐次发生。

（摘自《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靳云鹏内阁两任国务总理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陆征祥（九年二月免，陈箓代）

内务　田文烈

财政　李思浩

陆军　靳云鹏（兼）

海军　萨镇冰

司法　朱　深

教育　范源廉（傅岳棻代）

农商　田文烈（兼署）

交通　曾毓隽

钱阁改组，经过龚代阁，而终为靳云鹏者。此时政局重心在段，段为参战督办（七月二十日改边防督办），挟有参战军三师（后改边防军）、徐树铮西北边防军四混成旅（前在段阁，通过募练边防军十混成旅，现已编成四旅，因参战军改边防军，乃改西北边防军），又有河南、山东、安徽等之联系，其实力雄厚，人人心目中但知有段督办。段重在实力，私意以参战军属之靳云鹏，西北边防军本为徐树铮而设也（以下单称徐，即徐树铮）。其与段相抗者，冯虽去任，而曹锟在近畿，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三督在长江（吴佩孚在衡阳），遥为声援。奉军入关，又于直皖着手拉拢，为总统者几穷应付。但是段部下靳徐争权，交相恶，靳非除敌也。徐又控制安福国会，以为政治上武装，故一般人更畏徐。其时张志潭因秘书长问题为徐所辱，时思报复，此时他站在徐总统方面，于是建议："此种难关，当从段本身分化之，其方法即利用段袒护徐靳心理，并利用徐靳仇嫉心理，以靳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由靳挟段以制徐，再以靳联直奉以制皖，必扶植靳，以倒徐而压段，造成皖直奉平衡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总统深韪其议，于是以靳组阁。张在此时即多方作倒徐活动。

此次组阁，李思浩、曾毓隽、朱深（安福系），靳夹袋中如张志潭，未得入阁，亦趋势使然。自民六年冯代总统第一次内阁以后，大半为军力所支配，此次虽为一党所操纵，其实亦军力也。

靳就总理，极意奉承段，每日问起居，所有阁务，必请示而后行，对于徐浸润肤受。而段左右亦日攻徐之短，但段并不以此亲靳而疏徐也。先是八年六月，在龚代阁期间，发表徐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其所募练四混成旅，其第三旅褚其祥驻张家口，至十一月，徐率褚旅由张家口直达库伦。大军既临，又日以礼物宴会联络。是月十七日，外蒙活佛撤销自治。十二月二日，特派徐为册封专使，九年一月，行册封典礼。段以徐建不世奇功，自是愈重徐，而靳虽依靠府方以倾徐，乃以段对徐更加亲信，自揣力量不彀。但既与徐为敌，即不得不借直奉外援，且利用南方空气，于以促成吴佩孚撤防之局。

于此有改组一段足纪者。靳勾结直奉外援，自不能掩盖人耳目，安福系为专一拥段者，尤恨靳，靳几不安其位。适吴光新督豫问题，府方拒绝盖印，而河南旧军，又有抗命不稳之说。靳即借词于二月二十三日递辞呈。安福系要求府方批准，府方拟以周树模继靳，段亦同意。三月三日，派教育傅岳棻、秘书涂凤书先后往与接洽。周意在织阁人选须罗致名流，对安福颇踌躇。傅、涂言："就现在局势，不干则已。如干，必安福阁员照旧，且当多邀。"次早，曾毓隽谒周，周亦无圆满答复。当晚，安福系开会，以周树模、田文烈二人假投票，田得多数，即征田意见。田愤然以为有意玩弄，田自作罢，周亦不能再提。其时，直奉外援均拥靳，而靳阁得以维持。

直奉结合倒皖，段究是北洋老辈，未敢轻侮，故置段而攻徐。至五月间，各方面公然开始动作，靳亦不能舍段，而完全站在直奉方面，遂于五月十四日辞职，以萨镇冰暂兼代国务总理。

五月二十三日，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归。三十一日，过武昌。六月八日，到郑州。十□日到保定，开保定军事会议，即通电攻击安福系。此时一步紧一步，靳为自身脱卸计，屡求辞退。七月二日，靳免职。三日，曹锟、张作霖响应吴，通电讨徐。府方慑于曹吴之威，四日开去徐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各职。段时驻团河，大怒，即于八日回京，在将军府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用边防军（即参战军）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讨曹吴，一面胁迫府方惩治曹吴。府方又慑于段之威，九月，开去曹吴各职。十二日，曹张联名通电讨段，以吴佩孚为总司令，率兵北向。十四日，开始接触，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处，奉军亦在东路加入前线。十七日，定国军败溃。十九日，段引咎辞职，遂于二十六日撤销曹吴处分。二十八日，段免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西北边防军。二十九日，惩办安福系等。至此，皖系遂完全失败。有嘲靳者言：靳总理站在旁边看老师唱戏，不知向谁拍手也。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日，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颜惠庆

内务　张志潭

财政　周自齐

陆军　靳云鹏（兼）

海军　萨镇冰

司法　董　康

教育　范源廉

农商　王迺斌

交通　叶恭绰

自直皖战后，直皖问题又变为直奉问题，总统以靳与直奉有关也，故又令其组阁。靳初尚不知曹、张意旨，半推半就。经曹、张在津与靳会晤，提议三事：一、取消安福国会，以旧选举法改选国会；二、撤销参战军、中日军事协定；三、停止参战借款。决定后，派张志潭入京报告，总统允许照办。于是靳入京就职，除取消安福国会、撤消参战军、军事协定、停止参战借款先后照办外，其以张长内务，即为办理旧法新选。一般人认为选举问题即大总统问题，靳逢人辄道除总统第一任、曹第二任、张第三任。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密告直隶省长曹锐："旧法新选成功，靳将自为总统。"若如靳云云，在直方（第一任）固有戒心，即奉方第三任亦不能满意。其时，直鲁豫已初选，至是停止复选，而改选国会不能进行。

此次阁员，张站在府方，靳尤倚重之；周、叶，交通系；王，奉系，不发生作用；其重心在张、周、叶三人。靳以联结直奉而为总理，故周旋曹张两大之间，唯恐失欢。此时中央财政竭蹶，而新银行团借款又未收效果。吴佩孚以战胜余威，日向中央索款，无以应付。三月三日，财政部提出整理公债计划，但是缓不济急。靳以交通系当财政责任，若不去周、叶，则内阁不能支持。乃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召集四巡阅使会议。到者直鲁豫曹锟，东三省张作霖，两湖王占元，两广陆荣廷，及各省督军、护军使等二十余人，联合威吓周、叶。周因之辞职，叶不为所动。乃以内阁总辞职方法出之，以排去周、叶，而由靳重行改组。亦异闻也。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被通缉的"十大祸首"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两军在北京附近交战，皖军失败，段内阁因而倒台。是月二十九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缉惩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十人，当时报上称我们为安福系的十大祸首。我们在令下前就已逃入东交民巷，云霈、又铮等九人都住在日本兵营里，我则因和道胜银行买办孙某为故交，故避居在道胜银行宿舍。

我在那里一住三年多，直至一九二三年黎黄陂再度就任大总统时，经王聘卿（士珍）等的疏通，才取消了对我们的通缉令，我才离开东交民巷，回天津闲住，不久就去浙江投奔了卢子嘉。

皖系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我们皖系几个人，知道大势已去，而京津交通又为直系、奉系军队严密控制，大家商量如何躲避。徐又铮、曾云霈等主张逃入日本公使馆，我不同意。我比他们早几天进了东交民巷，因为道胜银行（原为俄国人开办，那时中俄断交，由法国人经管）的买办孙吉甫是我的同乡好友，我直接去找他，他欣然接待我住在该行宿舍里；该行的法国大班也表示欢迎，并介绍一个法国人给我当保镖，此人每月要我付三百元作为保镖费，我付了两年，形势缓和了，才把他辞退。

徐又铮、王祝三、吴光新等托庇于日本兵营，他们在那里没有住多久，首先是又铮溜出了北京，他是化装成日本人，由日本使馆派人陪同溜出水门（在东交民巷西段城墙上开的小城门，可直达东车站）乘火车赴津。不久他到福建和王永泉（原是他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旅长之一）一起搞什么制置使府，失败后就到外国去了。其他如曾云霈等八人，不久也先后离开了北京。我在东交民巷住了三年多，潜赴天津住了几个月，就到杭州卢子嘉处当了上宾。民国十三年齐卢战争爆发，不久卢失败，我跟他逃出杭州，到上海后，他去日本，我没跟去。

我们十大祸首躲进东交民巷后，被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悬赏通缉我们。当时的内阁总理靳翼青本来也是皖系，因为我和又铮成为水火，早已改投直系，他对又铮怀恨入骨，这次必欲得而甘心；他千方百计派出侦缉队包围东交民巷，想诱捕我们。但我们靠了外国人的保护，他终究奈何不得。

不久，靳翼青下台，空气略为松动，大家跃跃思动，又铮第一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天津。在他到达上海后，日本公使馆还煞有介事地通知中国政府，大意说：托庇于本国兵营的政治犯徐树铮，忽于某日夜潜逃失踪，遍觅无着"云云。实际上，不仅又铮逃往天津是日方负责设计、保护出去的，到了天津，他们还护送到塘沽，送上日本轮船。又铮到上海后，又在日方保护下乘日轮去了厦门。可以说，全部过程都是日方周密设计、仔细安排好的。

（摘自《李思浩生前谈北洋财政和金法郎案》徐铸成）

对安福国会和徐总统的评论

我亲爱的莫理循：

我收到你的信（尽管这封信过了三个月才寄到）实在很高兴。但我也急于想知道一些你动过手术之后的健康情况。〔・・・〕

我料想你已从报纸上知道中国方面的事情。由我这样一个处身中国政治之外的人向你谈中国政局，未免多余。故此迟迟没有下笔。但既经问到我，便简单地说一下。目前的主要特征是厌恶安福俱乐部和它的成员们的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同样强烈的憎恶日本人情绪也在高涨。所有国立院校的学生正在酝酿组织一次全国规模的庞大罢课罢工。他们正在步步接近目标，以此来表 达他们的国家为山东问题感到的深刻愤慨。他们不愿用任何方式同

日本进行直接谈判，因为他们深信，直接谈判只会使日本单方得利。徐世昌的表现证明他不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人。国会成了大笑话，它的开幕日期已经推迟。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的呼声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大概已经听到芮恩施博士正在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出场，薪水是三万金元。政府最近从日本所借的一笔9,000,000元借款，在群众中很不得人心，全中国的报纸都给予严厉批评。朱尔典爵士回英国后无疑会去看你。他在北京受到一系列的盛宴款待，总统、总理等人轮流为他设宴饯行，感谢他对中国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两个星期以来，每晚他都有应酬，而他每次都能得体地即席致词。他所说的不仅仅是些客套，而是有益的临别赠言。我在为朱尔典爵士送别的宴会上遇到的中国官员中，不少人向我问到你。在中国人中间，你已经为自己博得非常好的大名声。这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也是很大的荣誉。你在一大群能力参差不齐的外国顾问当中是突出的。

我们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教会医务工作会议。有二百七十多位医生出席。我对其中曾在外国学习或训练的中国医生数目之多感到惊异。而且他们都能用流利英语宣读科学论文和参加讨论。他们多数去过美国。从使用教育方法征服远东这件事来看，美国人显然领先。法国也在努力吸引中国学生。我们英国的政策似乎是中国学生愿来就让他来，不愿就听他自便。我们除了开办香港大学（它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之外，所做工作甚少。这种情形以后难免对于我们的贸易和其他利益起不利作用〔···〕。

新的北京饭店已经开张，每天下午许多人聚在那里举行茶会和跳舞等等。〔···〕

永远是你诚挚的

德来格

（摘自《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

历 史 考 证

是否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

当前主要有两种意见。

【赞成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李俊新和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央党校编《中国共产党史稿》持此说。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主张“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通称”。理由有三：一、“这个名称最早见于1926年俄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36年陈潭秋……写的《回忆党的“一大”》和米夫写的《英勇奋斗十五年》，也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各国党一般把第一次党代会以前成立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名称很不相合的各种组织，统称‘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小组’”；三、“一大”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说法不一，为了避免混乱”，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

李俊新指出：“1936年6月，陈潭秋同志……正确的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他的这一认识和表述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为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专指‘一大’前我党仅在上述八个地方成立的党组织，而不包括‘一大’前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专指‘一大’前的党组织，仅从这意义上讲，它已是‘忠于事实’的，是‘反映出我国建党的实际和特点’的。众所周知，我党从1920年夏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7月正式成立，所酝酿的时间是很短的。当时一些创始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足，在建党问题上缺乏经验，缺乏集中的统一领导。……这就是我党创建的实际和特点。正因为这样，当时创建时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的名称。因此，党的‘一大’后，人们……就需要寻找和使用一个比较合适的名称来统称‘一大’前的党组织。由‘共产主义组织’演化而来的‘共产主义小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应运而生的”。共产主义小组“专指我党‘一大’前的党组织，因此，它也就反映了当时党组织的性质。使用‘共产主义’字样，是专指它具备党的性质，使用‘小组’的字样，是说‘一大’前党组织的组织形式。而且，这一名称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成为当时组织的专有名词。因此，为了区别反映‘一大’前的党组织与1921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之间的关系，用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大’前名称不一的党组织的统称，是比较恰当的”。

【不赞成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此说以沈庆林、曹仲彬等为代表。

沈庆林认为：“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没有确切反映当时的历史实际。第一，它没有反映出这种组织有的就叫共产党或具有党的性质；第二，它没有反映出这种组织

和1921年7月成立的党的关系。因此，用共产党小组或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可能更为确切一些”。

曹仲彬认为，“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来表达党的早期组织，既没有反映出我国建党的实际和特点，又不能确切地表达出它的真实性质”，不如用“党的早期组织”或“各地共产党小组”，“比较符合它的性质和特点”。其主要论据是：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各早期组织，都没有叫过‘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不是历史名称”。这个名称是“事隔十五年之后，从陈潭秋发表了回忆文章开始才逐渐叫开的”二，“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不能真实地反映党早期组织的性质”。“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之间有着联系又有着区别”，二者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一个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湖北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尽管叫法不一，但是所有的名称全有‘共产党’字样，都属于共产党性质的组织”。

（摘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

1920年4月至1921年3月，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对其这次来华时的身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

【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栖梧老人、李达等持此说。栖梧老人认为“第三国际……约在1919年冬天至1920年春天之间。派魏金斯基来中国”。李达回忆说：“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丁斯克（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

【俄共（布）的代表说】苏联学者K·E·舍维廖夫和中国学者马贵凡等持此说。舍维廖夫指出“维金斯基一行是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马贵凡认为“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是俄共（布）的代表”。理由如下：

1. 从共产国际方面看。“1920年初以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当时，共产国际正在集中精力领导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对东方的工作还没有给予很多的注意”。只有到“1920年初以后，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先后失败，革命转入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积蓄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时期，这时共产国际才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东方，开始重视东方的工作”。具体时间是“1920年7、8月，共产国际二大专门研究了东方问题，通过了对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1920年8月，为了解中国国内情况，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委派了常驻代表马林”。

2. 从俄共（布）方面来看，“1920年初以前……俄共（布）中央及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组织一直很重视对远东各国的工作”。

“早在1919年3月，俄共（布）第三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就认为‘准确及时地将苏维埃俄国和西伯利亚的革命进程通报给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919年6月18日，为了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上级写了一个专门的报告，建议在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必须有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以便“更好地完成其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此后，俄共（布）的代表同中国革命者断断续续开始有所接触……1919年夏，后来出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民族处处长的布尔特曼，曾来到中国会见过李大钊”。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领导人之一维经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中国派出了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一行”。

“维经斯基来华之后，开始是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1920年7、8月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之后，所有事务均由该处负责，维经斯基一行遂同由西伯利亚地区和俄国远东地区派往远东各国的其他代表，归东方民族处领导，并按其指示行事。”

由此可见“维经斯基在第一次来华期间，一直是在俄共（布）组织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系俄共（布）组织所派”。而“俄共（布）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决定派人去中国工作的问题上，请示共产国际领导，这是正常的工作程序。共产国际领导表示同意，不等于就是共产国际所派”。

（摘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风云人物

陈炯明

陈炯明(1875～1933) 广东海丰人。字竞存。青少年时期就学于广东法政学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广东副都督、教督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组织中华水利促进社。护国运动中任闽粤军总司令。袁世凯垮台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赶走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次年任军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勾结英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以联省自治为名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计划割据广东。1922年6月,炮轰总统府。企图加害孙中山,孙中山率部讨伐,被迫退守东江。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第2次东征,所部被全部消灭。隐居香港。1933年病死。

吴佩孚

字子玉,堂号迪德堂,山东省蓬莱县人,1873年生。曾中秀才。1889年入聂士成之淮军当兵,后入榆关武备学堂。1900年任武卫前军后路炮队队官,1902年入保定陆军学堂测绘科。1904年日俄战争时,被派至东北刺探军情。1905年后在陆军第三镇任督队官、参谋、营管带及炮三标标统等职。1912年后任陆军第三师炮三团团长、陆军第三师副官长,1914年任陆军第三师步六旅旅长,1918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后任援粤军副总司令。1920年7月指挥直军将皖军击败,9月任直鲁豫巡阅副使。1921年8月又任两湖巡阅使。1922年5月指挥直军将奉军击败,使直系控制了北洋政府。1923年1月授将军府孚威上将军,10月任直鲁豫巡阅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逃居于湖北黄州及湖南岳阳。1925年10月组织十四省讨贼联军,自封为总司令,1926年7月其主力被北伐军歼灭,1927年5月逃至四川,依靠四川军阀。1932年被张学良请回北京,“七七”事变后拒不担任日伪职务。1939年12月猝然故去。著有《正一直铨》、《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明德讲义》,及经人编有《吴佩孚书牍全编》、《吴佩孚先生集》、《吴佩孚政书》、《蓬莱诗草》等。

曹锟

字仲珊,其堂号为五聚堂、德善堂、大信堂,天津人,1862年生。先入淮军当兵,后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在淮军宋庆部任教习。1895年入新建陆军,任右翼步队的营帮带,1902年任北洋常备军右翼步队营管带,1903年后任北洋常备军左镇步一协协统、陆军第二镇步三协协统,1907年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官,1912年4月改称陆军第三师师长。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1915年10月授将军府虎威将军并任征滇军总司令。1916年9月任直隶督军,1917年12月任两湖宣抚使、南征军第一路司令,1918年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援粤军总司令。1919年继冯国璋之后成为直系首领。1920年7月将皖系击败,9月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1922年6月战胜奉系,控制了北洋政府。1923年10月以贿选手段当上大总统。1924年10月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将曹囚禁,1926年4月被释。后在天津作寓公。1938年病故。

曲同丰

字伟卿,山东省福山县人,1872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07年后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教练官、正监督,1910年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步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标统,1911年任第十九镇步三十八协协统。1912年后任将军府参军,1915年9月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8年任参战军军士教导团团长。1919年任边防军第一师师长,1920年直皖战争时任定国军西路前敌总指挥,兵败被直军俘虏。1925年1月任临时执政府航空署署长,后投入张宗昌之直鲁联军,任第十七军军长,1928年直鲁联军溃败而去职。1929年被人刺死于天津。

靳云鹏

字翼青,堂号为敦厚堂,山东省济宁县人,1877年生。1895年入新建陆军当兵,1898年炮兵学堂肄业。1902年任直隶军政司参谋处提调,1910年在浙江新军中任职。1911年任云南第十九镇总参议,辛亥革命时化装逃出昆明,任段祺瑞的第二军参赞官。1912年7月任陆军

第五师师长、会办山东军务，1913年7月任山东都督，1914年6月授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1916年5月授将军府果威将军。1917年任参战督办处参谋处长，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1919年1月任陆军总长，11月任国务总理，因与徐树铮不和，任职内受安福国会的非难，而日益倾向直系。1920年5月辞去国务总理之职，8月皖系失败后被直系抬出继续任国务总理，1921年12月去职。此后居于天津，曾任中日合办的鲁大矿业公司理事长兼总经理、鲁丰纱厂董事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等职。晚年从事于佛教徒的居士林活动。1951年故去。

齐 燮 元

字抚万，号耀珊，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1885年生。1904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1908年后在陆军第六镇任随营学兵堂教习、哨官、队官等职，1909年入陆军大学。1911年任陆军第六镇步十二协执事官、步二十三标教练官，辛亥革命时，任清军第二军副官、参谋官。1912年后任豫南总司令部参谋长及陆军第六师参谋长，1913年任江西都督署参谋长，1914年1月任陆军第六师步十一旅旅长，后改任步十二旅长，1916年9月任陆军第六师师长，1917年12月兼任江苏江宁镇守使。1920年10月任江苏督军及苏皖赣三省巡阅使，1922年7月授为将军府宁武上将军，1925年初被奉军驱走，同年12月任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失败后在天津作寓公。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委任为江北招抚使，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2月与一批政客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政府委员及治安部长，1940年3月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于1943年7日去职。1946年以汉奸罪在南京被处死刑。著有《陆军第六师演习日本》、《东野文编·东野诗存》(东野系齐之日本化名)。

朱 执 信

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字执信，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童年入私塾，1902年进广州“教忠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任广东省核计院院长，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军事联络及机要文书，1918年到上海办报。1920年在广东虎门牺牲，时年35岁。

朱执信青少年时代就对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很感兴趣，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教忠学堂”读书时，他和同学在校内组织“群智社”，购阅新书报、探求新知识，开始接触《天演论》、《原富》、《民约论》等书。后来，他以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科。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和其它革命党人。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朱执信积极参与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论战，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捍卫和阐发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可贵的是，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他片断地译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肯定了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称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手段”，显示出比当时的一般民主主义者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1906年，朱执信自日本回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和方言学堂任教。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联络民军、策反新军，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自丁未至辛亥，凡广东革命之起，无不在焉。”

1910参加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总参议、审计院院长等职。“二次革命”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护法，并协助孙中山撰写《革命方略》，编辑《建设》杂志及《民国日报》。1920年赴广东联系民军驱逐桂系军阀，在虎门遇害。

珍闻轶事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那是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陈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

我高兴地接受了陈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也一直很想认识孙中山博士。此外，我知道，他近日要动身去南方，到其追随者、国民党员陈炯明将军的军队掌握的广州去。

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关于这位陈将军流行着各种离奇的传闻，说他组织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校，邀请革命学生到他的军队里进行教育工作，有的说他几乎打算在中国南方建立一系列的公社。

认识了孙中山，我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我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如何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来复辟帝制,而孙中山本人又怎样在东京经过朋友们的斡旋对当时任外相的加藤施加影响,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与袁世凯断绝联系。有趣的是,孙中山几乎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政府和袁世凯之间那个有名的条约即二十一条,并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才签订的。孙中山认为,这简直就是袁世凯本人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或向其暗示的,即只要日本方面协助复辟帝制,他就签约,后来果然签约了。

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反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 * *

不久孙中山就到广州去了,他和总司令陈炯明之间的摩擦开始了。孙中山想要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利用在南方的胜利,把革命运动发展到华中和华北。陈炯明坚持主张停止所谓的北伐,他建议把南方的广东省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按照他的观点,这个范例能促使人民在全国建立南方式的制度。

孙中山离上海到广州以后不久,我也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广州,并且和陈同志一起拜访了陈炯明将军。陈炯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将领,他早年是新闻记者,是秘密组织成员和国民党员。陈炯明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看,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孙中山和张作霖之间的纷争,其结果对孙不利——因陈炯明举行叛乱并占领了广州,孙中山只好于1921年秋逃离广州。

孙中山再次逃亡上海,他从那里领导自己的部将进行反对陈炯明的斗争。1923年春,孙中山又返回广州,此后他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 * *

去年夏天在广州,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他住在珠江彼岸的一所大宅院里,从城里去只能乘渡船。

我和孙中山的热烈拥护者、国民党的耆宿、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一同前往。

仪仗队排列在住处大门的两侧。我们登上二楼,走进一间宽大的陈设朴素的房子。孙中山预先知道我们要来,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他的衣着和五年前一样俭朴,但穿的不是草绿色咔叽布服,而是灰色制服。这次孙中山向我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许多问题。孙中山好象从遥远的,但又与中国很“亲近”的国家找来了我这样一个使者,孙不仅想听到对他的问题的回答,而且还想把这个来自苏联的人的声音、服装和风度做一番研究。

令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如何得到恢复和我国的农民怎样生活。听说我们在工业领域没有达到战前产量,他不太愉快,感到吃惊。但当我们谈到国民教育情况和正在成长中的世界上最自由的我国青少年一代时,他又喜形于色了。

我拜会孙中山之前的几天,我国和中国北京政府在北京缔结了条约。南方政府里甚至有些国民党员对此都不满意,他们感到这个条约的缔结对孙博士的南方政府是不完全忠诚的举动。广州和北京处于敌对关系之中,而我们却和北京缔约。

当时他们不明白,我们对全中国都持友好态度。与北京政府缔约,正是为了以此来减少对南方政府的威胁。现在全中国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了,但当时倒是要担心许多人会不理解这一点的。

我谨慎地探问了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他深刻理解苏联和中国政府缔约的目的,以及该条约对于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具有的意义。

孙中山接着又详细询问了列宁逝世后苏联的国内状况。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

孙中山对中国解放运动发展的看法是乐观的。他相信,帝国主义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使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开展一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看来,至临终前他一直抱有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基础写入遗嘱留给了国民党。

(译自1925年3月15日苏联《真理报》。江海译)

安福系议员臭汗淋漓

安福失败后,凡籍隶安福系之议员,咸岌岌自危,惧

新国会之将解散。因密邀数十人冒暑抵津，将以副座为饵运动胡帅，为新国会稍留残喘。胡帅以若辈无耻已极，思有以小惩之，乃定某日上午九时接见。是日天热异常，达九十三四度，诸人衣冠整齐，群趋行辕求见。阍者传语，胡帅早餐未毕，请在应接室稍待。室小人众，几不能容，且室只一窗，阳光射入，热度益高。待至正午，胡帅尚未出。群请侍者速之，侍者归报：大帅本拟即出见，缘总统有特使至，不克分身，请诸君稍安毋躁。诸人无奈，复静坐待之。至下午三点钟，诸人臭汗淋漓，袍皆湿，加以饥火中烧，苦难言状，忽有副官出告曰："大帅忽感受暑气，不克出见，有负诸君盛意，他日当再订期延见耳！"诸人乃狼狈而出，见者咸匿笑不止云。

讽安福系联

段祺瑞以皖系首领把持北洋大权时期，先由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再由徐树铮奔走操纵选出"安福议员"而组成"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实则仍由段以国务总理把持一切。终因直皖一战，皖系惨败而逼使段在政治舞台上倒了下来。时人为撰一讽联：

安者危之基；

福兮祸所倚。

滑稽条陈

直皖战事停后，曾有某君上书大总统，具有条陈，约为两大端：(一)节省酬应；(二)限制纳妾。其说明大意谓：酬应一节，除宴请外宾仍用西餐外，余如官场一切交际筵宴，请一律用八盘五簋，中实鸡鸭鱼肉等物，屏弃海参鱼翅。照此办法，以全国计算，约每年可省费至数千万之多。至纳妾一项，原为新法所不许，但中国风俗不同，自当酌量习惯，加以限制。例须原配四十岁无出者，始准纳妾。而纳妾之手续，须经父母允许、原配同意。且妾之方面与纳妾人方面出以相互之证书，在警厅注册，粘贴印花税至四十元，违者处两千元以上罚金。如年老而娶最少之妾者，处二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六千元以上之罚金。如此则国家每年又增一巨大之收入云。

总统阅之，颇为轩渠，谓迹虽近乎滑稽，而语实可采，不日且交部院核议，将使见诸实行焉。

政治麻将

段祺瑞做执政时，有天，他要打麻将消遣，当由他的安福系大将王揖唐约到梁鸿志、章士钊奉陪成局。

有圈牌中，梁做万字一色，听和一四七万。王则做筒子一色，和五筒嵌张。段牌平平，章是做的索子一色，也听一四索了。轮到段摸牌，他摸到一张五筒，随手打出了一张一索，章刚说要碰还没说完，段又收回一索，改打了一张大家都不要的牌。章看在老段面上，只好哑吧吃黄连做声不得。

接着梁也摸到一张五筒，他怕打出给王和牌就宁可牺牲自己的大牌，将一万打出，单吊五筒。在段又摸进了牌，他突然将前摸的五筒打了出来，王竟按牌不动，且神色如常。梁以为王不和五筒，在摸到一张二万后，仍图保持自己的大牌，而打出了五筒，王才从容的把牌摊了下来。

这局牌，就是传诵当时打"政治麻将"的最佳范例。

皖系十大祸首

皖系兵败失势，北洋政府绘影图形，悬赏缉拿十大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因而到处贴有十人的照片。但其中丁士源、王郅隆二人，则因平素在任何场合决不照相，所以都无法找到相片，竟以北京著名扒手马二顺子和萧国柱的两张照片，附印在其他八人之后，另加说明丁王与马萧形貌相似，可供参考印证。一时报章竞载，指为窃国与窃钩者同罪，而斥为最荒唐的大笑话。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

流行风

电影《春香闹学》《天女散花》

1920年，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拍摄了来沪演出的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两部古装戏曲片，并获得较好成绩。这两部影片均由梅兰芳主演兼导演，疗恩寿摄影，地点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新建的大玻璃棚内。

昆曲《春香闹学》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所著传奇《牡丹亭》中的一折，共有三个角色。梅兰芳扮演春香（丫环），李寿山扮演陈最良（老师），姚玉芙扮演杜丽娘（小姐）。服装、化装和舞台剧一样。书房内景用舞台布景的片子，桌椅等道具，都是红木制的实物。为适应无声影片的特点，把剧中的唱词进行了压缩，用字幕插在片中，但身段、动作的表演则大为增多。春香的出场用了一个特写镜头，拿一把折扇挡住脸，镜头慢慢拉开，扇子渐渐下撤，脸儿渐渐露出；接着又做了一个顽皮的笑脸，以此代替了舞台上一出场的唱段。影片还把春香逛花园的暗场戏改为明场戏，梅兰芳在这场戏里表演了打秋千、扑蝴蝶、拍纸球等身段，优美动人，富于舞蹈性，很好地塑造了一个稚气可爱的小丫环形象。

京剧《天女散花》是梅兰芳根据宗教故事编写的神话戏。舞台演出六场，电影分为七场，梅兰芳演出三场："众香国"、"云路"、"散花"。梅兰芳扮演天女，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胸前两条飘带，以优美的动作，丰富的造型，表现了天女凌空飘逸的意境。在天女御风而行的几个镜头中，画面还叠印了一些移动的云彩，增强了气氛和美感。

《春香闹学》分上下两本，《天女散花》是一本。这两部戏曲短片的拍摄，是继《定军山》之后又一次新的探索，它们采用了特写镜头和叠印画面，在摄影技术上达到了当时较高的水平。

电影《阎瑞生》

这是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1920年，上海发生了洋行买办阎瑞生图财害命，在徐家汇麦田勒死上海"花国总统"（妓女）王莲英的案件，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社会新闻。上海新舞台曾把它改编成文明戏，演出达半年之久。这引起了当时洋行买办陈寿芝、施彬元、邵鹏等人的注意，想把此剧改编拍成电影，企图赚一大笔钱。于是，他们在上海南京路百货公司对面，西藏路口的一个弄堂里，挂起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牌子，找了"商务"的杨小仲担任编剧、撰写字幕说明，任彭年担任导演，演员由他们自己分别担任。杨小仲曾回忆道："主角阎瑞生由陈寿芝扮演，他原来也是一个洋行买办，和阎是至友，据说面貌也非常相象。陈的一些动作也很能模拟阎的神情；王莲英由一个妓院出身但已从良的小姊妹扮演（佚名），她的丈夫朱某，亦在戏里扮演了阎的朋友、朱葆三的儿子朱老五；邵鹏是当时的蓝球名将，也在洋行供职，也扮演了帮凶吴春芳。这部影片拍成以后，中国影戏研究社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影片故事表现阎瑞生借钱买跑马票未中，心中十分懊恼。他到好友朱老五处去玩，看到在场的妓女王莲英，一身贵重饰物，便起害命图财之意。他买了麻药和绳子，借用朱老五的汽车。找了朋友吴春芳帮忙，再把王莲英骗来，佯称请她外出兜风。逛至半夜，汽车开到郊外，就用麻药将王连英闷倒，再用绳子勒死。掠其全部饰物后，把尸体抛进麦田。作案后，阎瑞生逃往外地，后被警察在徐州车站缉拿归案，并判处死刑。

电影《海誓》

这是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之一。1920年秋，在上海专事画月份牌美女和杂志封面的但杜宇，由于对电影发生了兴趣，便找朱瘦菊、周国骥等友人，集资千元，从一个外国人手中买到一架爱脑门摄影机，经过拆装钻研，反复练习，终于掌握了摄影技术，同时发起组织了上海影戏公司。翌年便拍摄了第一部影片《海誓》。

影片《海誓》描写的是一个女朗福珠，起初和一个穷画师相爱，并订有婚约。他俩起誓：将来谁若负约移情，当蹈海而死。后福珠被其有钱的表兄诱惑，就背弃前约与表兄结婚。当进入教堂举行婚礼时，她忽然良心发现，想起两人的誓言，便逃奔画师。而画师愤怒拒绝，她便投身大海。后又得画师相救，两人终成眷属。是一部无聊的爱情片，并带有浓厚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情调。影片中人物十之八九穿着西装，穷画师竟住着一间西式洋房，家中陈设有铜床、地毯、西式椅子和大小花瓶……影片字幕全部用文言文写成，两人誓词用了四言韵语。总之，这种人物装束、环境陈设的欧化与字幕说明的文言古雅，显得

极不谐调；场景不接、情理不顺之处也颇多。影片拍成后，于 1922 年 1 月 23 日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公映时，因慕 F.F 女士大名，影片卖座之盛，超过了舶来品，而观众的评价毁誉参半，大多认为初次试验长故事片，有些成绩已属不易；殷明珠表演活泼，尤为上乘之才；编导但杜宇的大胆尝试，尽管显得幼稚，也值得赞扬。

诗《卖布谣》

一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卖布买米，
有饭落肚。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弟弟裤破，
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是谁买布，
前村财主与地主。

土布粗，
洋布细。
洋布便宜，
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
饿倒哥哥嫂嫂！

二

布机轧轧，
雄鸡哑哑。
布长夜短，
心乱如麻。

四更落机，
五更赶路：
空肚出门，
上城卖布。
上城卖布，
城闹难过：

放过洋货，
捺住土货。

没钱完捐，
夺布充公。
夺布犹可，
押人太凶！
“饶我饶我！”
“拘留所里坐坐！”

（刘大白）

诗《天狗》

一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二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 X 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底总量！

三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郭沫若）

诗《炉中煤》

——眷念祖国的情绪

一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二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四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郭沫若）

小说《风波》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小说以 1917 年封建军阀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描写了这一复辟事件在一个普通乡村中引起的“风波”。风波的核心人物是七斤。七斤虽然住在农村，但从他的祖父到他，已经三代不捏锄头柄了，靠帮人撑航船养活全家。由于七斤每天撑船进城，消息灵通，成了村里的名人。辛亥光复之后，他在城里被人剪去了辫子。有一天，他神情沮丧地回到家，原来他在城里的咸亨酒店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了”。而皇帝是要辫子的。七斤恰恰没有了辫子。七斤夫妇正在着急气恼，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走来了。赵七爷被认为是方圆三十里以内最体面的学问家，大家都恭敬地想听听他的意见。赵七爷煞有介事地搬出《三国演义》和“长毛”时候的典故，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更把七斤一家吓得坐卧不宁。然而很多天过去了，人们照旧生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过一些天，七斤老婆竟发现赵七爷的辫子也像道士似的盘到了头顶上。于是人们松了一口气，相信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一场辫子的风波也就结束了。鲁迅善于抓住生活中具有特征性的事物进行创作。本篇通过一条辫子的纠葛，深刻地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并没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封建势力还顽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此外《风波》的结尾耐人寻味，一场闹剧像一阵风似的吹过，人们又回到了原来那种沉闷、窒息的生活中去了。本篇小说没有集中的人物刻画，侧重记事，记下了一些江南乡村的民俗风情，如“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又如“面河的农家的烟囱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们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文字不多，就简洁地写出了乡间夏天吃晚饭的情景。

小说《爱国英雄泪》

作者杨尘因，主要内容：详细描写了十九世纪末朝鲜亡国的惨痛历史。日本对朝鲜垂涎已久，一直设法扩大在朝势力，寻机控制朝鲜。而此时高丽王朝内部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懦主李熙听信李完用等奸臣之言，不辨是非，反对派为搞乱局势，故意围攻日本使馆；日本军队乘机攻打朝鲜，朝日交战；云在霄等爱国将领被排挤迫害，亲日派借外敌势力祸国殃民，朝鲜内外交困。日本军人在朝鲜横行肆虐，杀人抢掠、污侮妇女。爱国青年安重根为

洗国耻刺杀日相伊滕博文以身殉国，终未能挽回局势。日本乘势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条约，彻底控制了朝鲜。朝鲜人民沦于亡国境地，倍受欺凌。此书为作者有感于当时国事危乱而作，作者预见到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想以此警诫国人，故充满反帝国主义思想。全书以白话行文，语言平直，因内容所限，结构比较散乱，人物众多，但都一般化，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

小说《茶寮小史》

作者程瞻庐，主要内容：本书以小小茶寮为舞台，演出了文人名士之流上等人盗名盗利的闹剧，以刻画旧知识分子的怪现状。茶博士和中间人物王轶千为串场演员，通过他们的活动和见闻，把众多的角色联系了起来。典型人物是沽名钓誉的守旧派张子彝，他本提倡新教育，但后来一反过去主张，转而攻击新学，甚至不准幼子进校读书，他口称是诚实不欺的长者，出版诗集却又不肯舍去劣作。于是将诗稿分为三等，最好的刻上自己的名字，其余算为夫人，长子的作品。以致闹出了夫人夜宿寺院与长老对弈，儿子未出世便能写诗的笑话。此外，书中还描写了探讨当文豪秘诀的中学生、盲目崇洋的新派人物袁志新、考据家娄师古等。全书文笔流畅、语言幽默，充分显示了作者谐谑的文风，特别是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民间谚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作者和不少旧知识分子接触，熟悉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对各种类型人物，虽着墨不多，但都性格鲜明、写来得心应手。整个故事自始至终未离茶寮、却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书结尾的俚歌，点明写作目的和主题，但也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讽刺了旧知识分子的穷形极相，却又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阶层的优秀分子身上。

历史档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

一年多以前，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表示俄国政府将以前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尽行废弃，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中国的一切，全部交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正式议判，以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们得到通知，这一宣言已为中国政府收到，并且知道中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层和团体都表示真诚希望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谈判，以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已派遣张斯麐将军率领军事外交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莫斯科，深表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代表的直接谈判，获得有关中俄共同利益的相互谅解。我们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幸福，俄国和中国人民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俄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力求阻碍我们两国的友好和接近，他们明白，我们两大民族的友谊和互助将使中国强盛，以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再象现在一样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

不幸在尽快建立俄国和中国友好关系方面，还有某种障碍。贵国代表团已经能够确信我国对于中国的真诚和友好态度，但是该代表团至今没有接到适当训令，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得以固定下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两国接近的迟延，致使双方政治上和贸易上的重要利益不能实现，感到遗憾。为了帮助和加快两国人民友谊的建立，特此宣布：我们坚决遵守 1919 年 7 月 25 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为了两国的幸福起见，有必要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下列协定的要点：

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二、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随后根据缔约双方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贸易经济的条约。

三、中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1)不给俄国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以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

(2)在签订本条约时，须将中国境内反抗苏俄及其盟

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禁，并引渡给苏俄政府，同时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

(3)苏俄 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斗争的个人和组织，亦负有同样的义务。

四、凡居住中国的俄国公民当一概服从中华民国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俄国的中国公民服从苏俄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六、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七、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华民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应立即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

八、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可参加。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协定的上述各点作为主要条款，同贵国代表进行友好协商，为了两国的共同幸福，中国政府认为需要提出修改意见，亦可友好协商。

中俄两大民族的关系，不限于上述协定中所述各点，两国代表今后还需要另订专门协定，解决贸易、国境、铁路、税关 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苏俄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以求建立双方最密切最真诚的友谊，希望中国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并迅速提出建议，以便尽快缔结友好条约。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

1920年9月27日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

润之兄：

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我到法后，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

1.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

2. 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 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 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 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 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 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 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 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 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 万国同盟结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议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

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什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砺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昨(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某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须(预)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本斯哥(莫斯科)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量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他：

(一)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

(一)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数目必多。

(二)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国内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惇元，殷伯，诸友均此。

彬　　一九二〇，八，一三

(蔡和森)

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

独秀先生：得你的责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 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

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

东荪先生：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比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儿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那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只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民国成立以来，九年三乱。近且有借名护法，阴图割据者。自湖南建议，破走北军，光复旧壤；而四川亦击走滇黔，自固疆围；广东之于桂军，骎有灭此朝食之势；下及湖北江浙，靡不以地方自治为声。是知敬恭桑梓，无滋他族，为人心所同然，亦事势所必至。欲济横流，在此道也。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此各省内治之大略也。然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

政府，权借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豫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卷之权，犹在各省。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联省各派参事一人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则内乱庶其弭矣。或云，外交大权，中央不能专主，则应敌为难。不知今日所公患者，不顾外人之迫胁，而在中央之贩卖路矿，以偷一时之利耳。中央之所以贩卖者，其实还在各省，而非中央自能有之。以中央去人民远，密谋贩鬻，人民无自审知；比其觉察，则签约已成，不可追改。此正外患所由生也。今使事涉某省者，皆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负其责任，督军省长去人民近，苟有奸，事易宣露。身为是省之人，而与外人朋比以贩鬻本省人民之公产，千夫所指，其倾覆可立而期；虽甚贪愚，焉得不深自敛戢。故外交权归于各省，则贩卖自止，而应敌反易，外患亦可渐息矣。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若但如德美联邦之制，则中央尚有大权，行之中土，祸乱正未有艾也。谨议。

（章炳麟）

北京坂西少将致上原参谋总长电

坂极秘电32号（六月七日外务省收到副本）。

昨二日访段祺瑞于团河，段所谈要旨如下：

一、关于靳总理：靳任总理本不称职，但是，若在坚定的方针下，相信尚可以裁断诸政。当其就任伊始，曾激励所属奉行总统之命，亲身为各省督军作出典范，而彼之性质素来过于温厚，诸事流于优柔寡断，遂至失去中央威信。同时，该氏目下之健康状态，于总理一职也不能胜任。

二、关于对西南方针：予历来主张武断解决问题，然以时势之推移知其不可。最近陕西、四川骚乱，又以吴佩孚撤军北上，引起湖南纷扰。故予向政府表示，如需武力解决，愿亲自担任指挥。至于使用军队及军费，则主张由自己命令各地方长官负责筹备。

三、就使用边防军问题：本职表示对段之南征并无异意，唯就使用边防军问题，则不赞同。段对本职这一质问答曰：人马之移动，虽已进行，但原则上将保持边防军现状，请予放心。

四、关于军事协定：对于社会舆论，予虽无所顾虑，但协约国军队既已撤退，中国军队亦开始撤至国境以内，只要对贵国在西伯利亚之军队没有不便之感，取消军事协定之形式，窃以为对双方都有利。

总之，没有段氏之充分谅解，靳氏决难留任。段之武力解决，坂极秘电30号虽曾估计张作霖承认支出军费等，但段之活动，难免有左右策士的阴谋与过信自己声望之处。而段自己如能以轻举为戒，则直皖两派之冲突，亦必不易发生。段对边防军三师不能用于内战，似有所了解，并觉察到取消军事协定问题，于本派立场似乎有利，对南北和谈进展，能有效果。报告详备笔记。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济南学生联合会在城内第二区大舞台公演话剧，学生就舞台演说抵制日货。警察厅长金荣桂横加干涉，以武装包围大舞台，殴打学生，十余人受重伤。2日晨，学生要求惩治滋事军警，又复食言，故议决全体实行罢课，以相对抗。3日，济南全体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后援。新任督军田中玉答应撤换警察厅厅长后，19日学生复课。

1月1日　1919年12月2日徐世昌特派徐树铮为外蒙古册封专使，恩华、李垣为付使。徐树铮等抵库后，是日在库伦佛宫正式举行册封典礼。

1月3日　下午3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为支持湖南学生驱张运动，在北大第三院举行湖南来京学生代表大会，北大方豪主席，中国大学祁大明及燕京大学瞿世英、朝阳大学崔学礼等先后演说，表示“与军阀派势不两立，讨伐民贼，责无旁贷”。

1月28日　上午12时，湖南公民代表与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三团体，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去国务院请愿，要求撤换张敬尧。

1月28日　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呈请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并取消中俄会订条件，徐世昌批示照准。

1月31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被镇压事通电全国，呼吁释放学生代表，声援学生运动。

同日　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三十九校学生万余人，为声援天津学生，齐集天安门，冒雪游行，表示抗议。旗帜上书“山东问题不得直接交涉”，“福建问题须根据国民主张办理”，“恢复天津各界言论集会之自由”，“营救天津被捕代表”等字样。

同日　下午2时，上海各学校及全国各界联合会等八十三团体，为山东问题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三万余人。会后冒雨游行，群众手执白旗，上书：“反对直接交涉”，“声讨卖国贼”，并通电全国。

同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电复曹锐，谓：“如为维持秩序，势非戒严不可，届时应即就近参酌情形，依法宣布行使戒严职权。”

同日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九千余人，要求日本资本家仿效英商分给花红，日方不允，反而殴打工人。工人忿而捣毁工厂家俱、玻璃窗等，举行罢工。厂方答应发给工人六天工资，工人始于2月8日复工。

2月1日　北京政府军警当局为镇压学生运动事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直接行动计划，决定质问教育部，如无办法制止学潮，将直接采取行动。2日，日本公使至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从严取缔学潮。

2月2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上界各界联合会为曹锐、杨以德镇压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事致电北京政府，略谓：“大好河山，将为公等卖却。国人为自卫计，作种种救亡运动。天津省署警厅既不能维持，反加之摧残，捕拿代表，并有杀戮之耗。……乞即严责曹锐，撤惩杨以德，释放代表，恢复会社，以谢国人。”

同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谓：“津学生被曹锐、杨以德殴绑游街，且有枪毙代表之说，摧残学生至此，是否政府决意与国民宣战。今特致忠告，请立即释放学生，惩曹、杨，否则全国国民将视政府为公敌。”

同日　南京学生联合会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被镇压事致函天津学生联合会转各界联合会，表示支持和慰问。

同日　陕西各界联合会为山东问题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词拒绝日牒，谓：“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一涉错误，则遗害无穷。……近据报传日政府欲借交还美名，收实际权利，望当局诸公，严词拒绝”。

2月4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举行国务会议，在安福系阁员的把持下，曲从驻华日使所提抗议的要求，通过了从严处理学潮的决议。

2月6日　徐世昌下令禁止学生干政，镇压爱国运动，称：“凡有干纪构乱者，不论何项人等，一律依法惩处。”

同日　徐世昌下令取缔学生运动，略称：“凡学生有轶出范围之举，立予从严制止，总期销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扇乱者，查明斥退，情节较重，构成犯罪行者，交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

同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各省，关于山东问题当镇静勿扰。

同日　内务部通告各省督军、省长，谓：“外交部函称，本月二日，日使来部会晤，以学生等在京津等处骚扰异常，要求严加取缔”。

2月10日　北京国会闭会。

2月17日　熊克武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

同日　军政府五总裁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通电反对直接交涉，提出四大理由和两步办法。

2月19日　徐世昌颁布《民国八年公债务例》共十四条。其第一条为：“政府为补助预算不足起见，募集公债以五千六百万元为额，定名曰民国八年公债。”

同日　徐世昌特任张寿令为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任命饶孟任为币制局副总裁。

2月26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内阁请徐世昌盖印发表，徐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段祺端斥骂靳云鹏“如何配做总理”，靳被迫于29日提出辞呈。

同日　徐世昌特任王印川署河南省长；任命恩华为蒙藏副总裁。

3月1日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团体，对各国发表宣言，反对日本贷款与北京政府。

3月1日　北京国会开会。

3月3日　安福系积极倒阁，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次日提出辞职，以拆靳内阁的台。由于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电请挽留靳内阁，段祺端指使安福系三总长取消辞职，等待有利时机再次进攻。4月，靳云鹏回国务院复职。

3月7日　下午3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工界志成会、法租界商界联合会等九团体为挽救危局，在青年会开会交换意见，与会者四十一个团体，决议：“(一)以今日到会各团体为中心，联络各团体；(二)传单悬旗讲演；(三)若至根本解决时机成熟时，到会各团仍须联络一致进行。”

3月14日　唐继尧、谭浩明、刘显世、谭延闿、熊克武、陈炯明反对汉绥铁路借款，致电北京政府，谓：“近迭各方报告，北京当局以京绥、京汉两路联合抵押日本，借债三十兆元，闻讯不胜骇异。……各省疆吏，各方团体共起执言，借图补救。誓以解除条约保全路权为务，奋全国之民气，促执政之警醒，若必执迷不悟，孤行己意，继尧等愿以兵力为诸君后盾也。”

3月20日　滇军警政学商各界通电指责李根沅、莫

荣新"任意横行，不顾大局"，表示"以全力维持我滇军之威令，杜绝彼李逆之野心。"滇省议会亦于同日通电声讨李、莫。

同日　吴光新致电曹锟、张作霖、李纯等，否认督予之命出于安福系主谋，并指斥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胡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

3月24日　唐继尧将岑春煊秘密与北方接洽和议内部文件全部公布，并称此项办法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应重开和会决定一切问题。

3月27日　奉天督军张作霖在沈阳假做寿为名，邀集各省督军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应付皖系对策，决定："(1)拥靳不反段；(2)解散安福系；(3)推荐张勋为安徽督军代替倪嗣冲。"

4月1日　第八次全国青年大会在天津开会，全国各地分会代表与会者共一千一百人。次日选举张伯苓为正议长，诚静怡、刘东生为副议长。下午由张伯苓和前总统黎元洪演说。

同日　徐世昌制定《征收官任用条例》。

4月8日　曹锟为巩固直系势力，假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集八省代表会议，组织八省联盟。参加者有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豫督赵倜、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讨论应付皖系对策。会议决定："(1)拥靳不反段；(2)直军撤防北归；(3)宣布安福系罪状，勒令解散。"

4月12日　上午9时，杭州各校学生二千余人手执小旗，上书"还我青岛"、"抵制日货"、"还我山河"、"大众速醒"等字样，列队游行，并至督军署与省议会递交请愿书。

4月14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各省"促进和平"。

同日　军政府参谋次长蒋尊簋因李根沅派队包围，搜查参谋部，通电辞职。

同日　唐继尧通电否认军政府政务会议效力。"继尧承选为总裁，当经派赵藩至粤，代表出席政务会议。自本年二月，赵代表电请辞职，业经照准。嗣是继尧并未续派代表参加会议，是自赵代表辞职之日始，所有军府一切行动，继尧概不负责。……查军府政务会议，向以至半数之出席人员为法定数。现继尧未派代表，伍(延芳)总裁又复离粤，中山(孙)、少川(唐绍仪)两先生亦均无代表出席。是军府政务会议，已无成立之理由，所有一切政治行动，当然无效。"

4月19日　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曹锐致电北京政府，谓："近日学潮陡起，公然通电约会全国学校，一律罢课。无理争持，动窬轨范。若不迅行遏制，势必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于国家前途影响非浅。除遵电通饬各属严密慎防外，谨复。"

4月24日　卢永祥密电国务院，谓："昨晚复据探报，学生等顷在法界各联合会开紧急会议，提出办法四条：(一)推倒南北政府，驱逐武人官僚政客；(二)组织平民政府；(三)要求各公使承认；(四)不承认政府借款。以上各条准明日下午一时在西门体育场开国民大会表决。"

同日　国务院密电内务部，谓："径密启者：'准卢永祥护军使漾(23)二电称，罢课学生结合流氓数百名，打毁电车，鼓动罢工罢市，并拟五月一日大举，拟宣布临时戒严，以资防范'等语。除复准予备案外，相应抄录往复电文函达贵部查照可也。"

4月25日　唐继尧、伍延芳、唐绍仪宣告脱离广州军政府。

4月29日　国务院以上海、杭州及全国各地各界联合会等承受苏俄政府对华通牒，致电各省查禁。并诡称："通牒果否可凭，尚属问题。"

同日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全国各界、各团体、各报馆，声讨卢永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罪行，并揭露其所倡废督之说，"虽属娓娓动听，其实不过为促成分赃和议之饵，其居心殊不堪问。敝会固素主张废督去兵，惟对此等违心欺人之论，不得不发其阴谋，尤希国人特别注意。"

4月　孙中山函促谭延闿速定攻桂大计，略谓："今则国会既去，军府无名，桂系遂为天下之公敌。闻蓂赓已决从滇边进兵，贵州亦已携手。粤人恨桂实深，竞存(陈炯明)更不能不急速回戈。惟湘当其中，须与首尾相应。鄙意以为当由竞存先发，而湘为应援。滇黔更以精兵复其巢穴，如此则桂必败亡，而大局可望有根本解决。"

5月4日　熊克武宣布复职，准备以武力驱逐滇黔军。

同日　政学系召集留粤议员开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代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

同日　到沪国会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国会迁滇，并发表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与国会。

5月8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紧急通告："本会横遭摧残，而救国之志始终不敢稍懈。兹经评议部议决，坚持罢课，以促政府反省"。

5月12日　山东省议会通过将该会迁往北京，以监督北京政府，不许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

5月14日　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徐世昌特任海军总长萨镇冰暂兼代国务总理，将派张元奇为经济调查局总裁。

5月29日　徐世昌传见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密谈军事问题，并促孙迅速回任，以资坐镇。

6月2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云南代表在上海孙宅举行会议，决定由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军政府及在广州之

国会，并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恢复和谈。

6月6日　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并通告北京政府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代表业经取消。"并声明"孙、唐、伍等宣言及一切行动无效。"

6月9日　孙中山对唐继尧通电解除督军职务，复电表示嘉许，并望唐"削平大难，贯彻主张，俾平民政治，由云南而普及于全国，则国民幸甚。"

6月16日　苏州杭缎工人万余人，因米价昂贵，生活困难，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工人曾和警察发生冲突，由知事派人调停，分别增加工资，工人复工。

6月22日　下午7时，张作霖抵保定。曹锟设宴招待，吴佩孚及苏、赣、鲁、豫等七省代表亦参加。席间讨论解决时局问题，提出五项务件，请张作霖带回北京：(一)解散安福系；(二)靳云鹏复职；(三)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四)罢免安福系三总长；(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次日，张回北京。

7月6日　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数百名与海军发生冲突，伤毙工匠三名，工人举行罢工。8日，所长请惩办凶手以平民忿，海军当局故判重责军棍数百下，并至各厂示众，工人复工。

7月15日　唐继尧邀请李烈钧、褚辅成至署举行会议，决定将军政府与国会移设重庆。

7月17日　广州军政府国会联合会议讨伐段祺瑞，决议："(一)通电全国，讨贼救国；(二)咨请军政府下讨伐令；(三)通电各国公使中立，勿助段祺瑞。"

7月20日　张勋通电徐世昌及各省督军省长，否认段祺瑞指责他勾结曹锟重谋复辟。

7月24日　湖南全省国民大会集会声讨安福系，并当场议决五条：一解散安福系，严办安福系首领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朱深、曾毓隽、李思浩、张敬尧等；二解散非法国会，剥夺安福议员全权公权；三取消军事协定，及中日间一切秘密条约；四不承认非法借款，并清查国家历年财政；五铲除亲日派。

7月28日　徐世昌令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本兼各职；准大理院姚震免本职，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8月9日　徐世昌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参谋次长唐在礼准免本职；任命蒋雁行为参谋次长。

8月11日　徐世昌特任颜惠庆署外交总长，张志潭署内务总长；周自齐署财政总长；靳云鹏兼署陆军总长；萨镇冰署海军总长；董康署司法总长；范沅濂署教育总长；王乃斌署农商总长；叶恭绰署交通总长。

8月18日　徐世昌特任张弧为印制局总裁；任命潘复兼盐务署署长稽察总所总办。

8月21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通电："南中护法，于兹三载。不图奸人内讧，致兆离析，大法未申，嗟痛何似。乃者国会在滇宣言移渝，重建中枢，复欣诸君克仗斧钺，肃奠巴蜀。文等谨当携迁，随诸君后，共奠邦家，以新国命。"

9月2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大二院邀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出席者有北京教育会、女界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八团体。10月，北京学生联合会邀请各报馆、各通讯社代表开会讨论筹备国民大会问题。25日，各团体在北京大学二院开会，宣告国民大会成立。

9月10日　徐世昌特任陈毅为库乌科唐镇抚使；准驻日公使刘镜人免去本职，调胡惟德继任。

9月12日　下午4时，济南工界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警察厅特派巡警数十人临场警戒。工界代表演说，言及工界联合会有组织之必要，促工人自觉。16日午后2时继续开会，由青年会会长林济青演说《世界工界之趋势与中国工界之现状》。

9月18日　上午9时，粤事维持会在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粤人治粤问题，主张：(一)废督以杜客军野心；(二)民选省长，恢复自治；(三)禁烟赌，除苛捐；(四)一切募债借款鬻产，概不承认；(五)客军未离粤境以前，停纳粮捐；(六)凡海陆军疟祸粤者粤人视公敌。凡粤人隶客军者，应即反正；(七)付托陈总司令(炯明)暂维全省治安，并将此项主张电达沪、粤各团体。

9月25日　北京政府收回天津俄租界。28日，收回汉口俄租界。

9月30日　徐世昌公布《库乌科唐镇抚使公署编制章程》共三十三条；《库乌科唐各理事官公署编制章程》共五条；《乌科唐各参赞公署编制章程》共八条；《恰克图民政员公署编制章程》共七条。

10月15日　曹锟、吴佩孚、田文烈、冯玉祥等在保定举行会议。决定："(一)提倡国民大会速开；(二)请中央遴派议和总代表，以期南北早日统一；(三)推戴王聘卿(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四)提倡华界赈济直鲁豫三省灾民；(五)整顿各军旅，严加训练。"

10月24日　曹锟、吴佩孚、王承斌、张福来、肖耀南、闫相文等在保定巡阅使署举行重要会议，讨论要项如下："(一)废督事件，认为废督一事有缓行之必要；(二)援蒙事件，第一步先应由察绥两区就近出兵；(三)和议事件，桂系既希望原订和约条件，北庭允予提前签字，不妨允其所请，直隶全部将士决定为之后援。"

10月27日　苏、赣、鄂、豫、粤、甘、鲁七省代表等，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开七省自治废督联合会，孔庚任主席，宣称该会宗旨在于："本互助之精神，谋共同之福利；共同之福利维何?即'自治'是。然欲求自治，势必先去为自治障碍之督军"。广东代表发言，痛斥陆荣廷祸粤罪

行。

10月30日　翟汪电请孙中山赴广州主持大局。广东国会议员谢英伯等亦于同日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提出解决粤局四项主张：一，请三总裁即时回粤，主持护法政府，国会议员同时回粤集会，以为护法政府之后盾；二，督军一职，亟宜乘时废去；三，省长一职，请胡汉民回粤履任视事；四，解散广东省议会。

11月1日　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免去海军部长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本兼各职；任命汤廷光为海军部长；任命林永谟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署理海军总司令。

11月2日　列宁接见张斯麟，谓中俄将团结一致，促使帝国主义灭亡。

11月9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致电唐继尧等，要求护法各省“宜本真正民意，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

11月24日　唐继尧召集云南军政各界要人，在联部开谈话会，首由唐讲演此次关闭自治之理由。并郑重宣言二事：(一)主张正义；(二)坚持废督裁兵。应再宣布者：(一)团结内部；(二)否认伪统一令；(三)维持本省治安。

11月29日　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等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并重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选定各部部长：内务部长孙中山兼任；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

11月30日　中俄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谈。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刘镜人，朱鹤翔，远东共和国方面为优林及随员柯尚宁等。北京政府提出四项前提条件，待得有确实担保后，再行商议商务经济问题。北京政府关于缔结商约之四项前提条件：“(一)在中国领土内，不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二)赔偿中国侨俄人民因俄国政变所受之损失；(三)担任保护现居远东各地华侨之生命财产，并予一切便利；(四)中国人民在新疆边地及后贝加尔湖地方，曾遇种种可憾情事应明白处理，并须遏止此种情事重行发生。”优林表示承诺。

12月5日　上午10时，苏、皖、赣三省代表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事务所开联席会议，反对北京政府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议决：“(一)不承认苏皖赣巡阅使之命令；(二)通电苏皖赣三省各公团，若政府不收回成命，三省人民，应速起自决；(三)以书面劝告王士珍坚辞到底。”

12月6日　广州军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北方频年行动，最有害于国者三：(一)利用军阀盗窃政权；(二)以善后赈灾等为名，欲欺骗新银行团，而未经得国民承认之借款，擅加国民之负担；(三)宣布伪统一令，自认非法，而又以无国法上地位之机关，擅令各省举行伪国会选举。凡此三者，苟有其一，已足破坏和平，陷国家于危境。本政府仍盼北方速行摒除军阀，停止借款，取消伪令，庶可相见以诚，继续开会，为正当之解决，以付人民之希望。”

12月19日　河南全省学生会豫西总分会在洛阳商场开公民大会，与会者两千余人。首由学生理事报告，继由公民代表发言，谓：“此次赵倜摧残教育，盗卖郑州，实全省之公敌，应将学生二次请愿团，改为公民二次请愿团。当即表决，办法有四：(一)二次致电政府，请严惩赵、张；(二)致电曹、张两使，责其渎职；(三)组织全省公民二次请愿团；(四)由各界推出代表二人，速组国民自治团，决于阴历十年元月一日起，实行罢工罢税。”

12月22日　上海南北两商会讨论赈税问题。各商界一致拒绝，要求两商会再电国务院，赶速收回成命。否则一致停止营业。

12月26日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为上海商界反对附征赈捐致电北京政府，请“查照该商会等屡次电呈，暂将上海一埠附征赈捐，缓予施行。”

12月27日　张作霖在使署，召集文武要员四十余人开政务大会，讨论：(一)援鄂问题；(二)编旅问题；(三)珲春问题；(四)吉防问题；(五)学潮问题；(六)警务问题。

12月29日　徐世昌令：“据谭浩明李静诚电呈：‘军府业经撤销，责任解除。特率全省文武官吏，宣言取消自主，一世政令悉候中央主持。并据耀武上将军陆荣廷电呈，军府收束，国是大定，亟盼从容措理，郅治观成。各等语’。……所有该省善后事宜，即著遵照前令，悉心妥筹办理。”

12月30日　徐世昌令：四川省长张澜开缺另候任用；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任命刘湘为重庆护军使。

军　事

3月5日　四川督军刘存厚密电国务总理靳云鹏，谓：“本日奉到宥(26)电遵知即转饬所部加意严防。顷又据前线及川中各确报称：一，旧历腊月二十七日熊克武由成都派兵取消邓锡侯所部独立旅，双方业在仁寿开战，正月元日已有伤兵抬回省城；二、卢(师谛)、黄(复生)、吕(超)前图倒熊，已被侦知，各该军恐邓旅取消，将续邓后，倒熊趋势愈紧。三、石(青阳)、颜(德基)两军因争防地，业在营山大起冲突。……据此情形，川中难端已发，厚部地当前线，不能不未雨绸缪，前电请领饷械，伏望早日筹济，以期有备无患。”

3月13日　日俄两方军队在俄领庙亍(今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古)地方(即尼港)发生冲突时，中国正有军舰四艘仃泊该处。日本于事后指控中国军舰曾炮击日本军民，

且供给俄军以武器弹药。中日两国因此发生庙亍案交涉。

3月14日　滇桂军冲突。

3月15日　川督刘存厚电告北京政府，川中战端已启，应如何进止，乞速示遵。国务院以"按兵不动，守城卫民"电复。

3月18日　段祺瑞秘密到保定，要求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北京政府陆军部致电复知吴佩孚在中央未有明令以前，不得自由行动。

3月18日　张敬尧电告北京政府，吴佩孚军队已撤防北返，"前方防线顿行空虚，务恳查照迭电所请，速拨军队前来填防。"

3月19日　徐树铮邀集十一省区督军、都统代表，在天津吴光新宅开秘密会议，议决各电本省区陈述下列意见："(一)靳云鹏借关外声援，破坏北洋团体，兼负合肥；靳谋牺牲国会及闽、湘、陕督军，见好南方，固自己地位；(三)吴佩孚撤防，亦靳主动，危害张敬尧位置，望速固结北洋派真正团体。"

3月25日　滇桂军冲突，由岑春煊调停停战。27日岑春煊亲至韶关迎接李烈钧。31日，岑得知伍廷芳出走，即先回广州，留李书城等候李烈钧。4月1日，李烈钧赴韶关，旋即返回广州。

3月31日　江西督军陈光远密电国务院，谓："据探报称，李烈钧所部滇军，于敬(24)日攻入南。临时司令为鲁子材，所带一混成团。"

4月13日　李根沅部将赵德裕借口追查逃兵，包围参谋部，鸣枪示威，入内搜查，无所获。同日，警备队队长进入赣军令部搜索。此两处皆是李烈钧常往之地，为此李逃往海珠海军部以避其锋。27日李秘密到香港，5月30日由港抵沪。

5月20日　湘南吴佩孚直军开始撤防，大批军队由湘南开拔北上。

5月26日　川军刘成勋、向传义、陈洪范、但懋辛、刘湘、吕超联名通电否认唐继尧、刘显世的三省联军总副司令名义。

6月1日　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实行废督，即日解除督军职务。

6月29日　徐世昌以张敬尧"退出湘境，实属咎无可逭"，着令"毋庸留任"，所部军队交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接管，并令张敬尧于交卸后，"迅即来京听候查办"。

7月2日　徐世昌令准国务总理、陆军总长靳云鹏免去本兼各职；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改设淞沪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

8月12日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声讨桂系。以洪兆麟为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陈炯明兼任第三路司令，即日出发平和指挥作战。

9月9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电促谭延闿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后路，以收夹攻之效。

11月8日　西南联军总副司令唐继尧、刘显世通电宣布将滇黔留川军队撤回边境。

12月3日　赵恒惕致电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推荐程讼"出任长陆军，"谓："现在军府成立在即，陆军部长一职，总握军事中枢，关系极为重要。……程公潜自湖南起义，转战千里，恢复长、岳，功在当时。倘以之出长陆军，必能胜任愉快。敬恳诸公酌裁，予以特任。"8日，孙中山复电谓："拟任程君为陆军次长。"13日，赵恒惕再电复孙中山谓："程颂云潜兄，刚建笃实，晓畅军机。承畀陆军次长，为事择人，诚为恰当。"

12月19日　李烈钧所部滇军从四川退出后，拟假道湘省入粤，连日与湘军在晃州、芷江等处接战，是日，李军占沅陵。

12月26日　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等致电北京政府，声明与甘督张广建脱离关系。

同日　赵恒惕以有重要军事相商为由，电召李仲麟等来长沙，当日深夜将李枪杀，其第四团团长瞿维臧亦被枪决。赵恒惕旋于26日通电宣布李、瞿"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破坏湘局……勾结军队，约期举事"罪状。

外　交

1月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电各省禁止抵制日货。

1月10日　出席巴黎和会代表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告以协约国对德和约已批准交换，中国拒签在前，仍未列席。美国因未经批准，亦未出席。

同日　驻日使馆武官与日本三菱洋行签订日金三万元借款合同。

1月13日　中德恢复和平状态后，德国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中国对德国侨民财产勿再没收；(二)准德人来华自由贸易；(三)请即以前天津领事塞伯特及德华银行爱格林为驻华非正式代表。

1月16日　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要求取缔反日、抵货运动。

1月19日　驻京日使向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交涉案，要求直接交涉，略谓："对德和约现已发生效力，日本政府拟履行以前屡次宣言，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关于山东善后各事，拟由贵我两国组织委员会，商议解决。至山东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亦不必待新约成立即可撤退，希望贵国组织巡警队，保持铁路，惟组织未完备以前，日本军队仍暂保留。"陈箓次长答以："此案关系重大，暂不能将

中国政府所持方针，有所表示。”此后，直接交涉问题引起全国人民激烈反对。

1 月 29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各国声明关于中东路的防边护路办法：(一)中东路属我国领土主权，不容第二国施行统治权；(二)霍尔瓦特仅为铁路坐办，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三)按铁路合同，公司俄员及侨居沿线中外人民，应由我国完全保护。

1 月　梁士诒致电巴黎和会英、美、法、日各专使，反对各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

2 月 2 日　日本驻华大使小幡至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从严取缔学潮。

3 月 1 日　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卸任回国。

3 月 2 日　驻京外交使团因推举法国公使柏卜继朱尔典任领袖公使。

3 月 4 日　驻美日使币原在纽约日本会社宴次演说，声称：“日本对于山东问题，无论中国取何行动，决不变其方针。”

3 月 6 日　挪威首任驻华公使米赛勒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3 月 19 日　河南泌阳县英国传教士孟恩赐被杀，英国公使向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严予究办”。

4 月 2 日　是日及 26 日，驻京日使向外交部催议山东交涉。按巴黎和约日本于三月内还我山东之规定，至 4 月 9 日期满。

4 月 3 日　苏俄政府致北京政府通牒，重申废止 1896 年中俄密约、1901 年北京条约、1907 年及 1916 年有关中国问题的日俄密约；中东铁路以及帝俄政府以掠夺手段向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一律无偿交还中国；同时放弃 1900 年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俄帝驻京公使及各地领 事使用。北京政府因与协约国取一致步调，未便单独有所表示，对此通牒暂不答复。

同日　日本政府声明接受美、英、法三国政府“不允许新银行团的活动范围妨及日本国防及经济利益”的担保，撤回对加入新银行的保留案。

4 月 21 日　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向北京政府报告接收中东铁路经过。

同日　英国新任驻京公使艾斯顿向徐世昌呈递国书。

同日　徐世昌特派戴陈霖、刘符成为全权代表，前往出席万国邮政会议。

4 月 22 日　澳门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古伯铨、中华各界联合总会张民权、外埠华侨联合总会黄白平致电驻京各国公使，谓：“伪总统徐世昌、伪总裁岑春煊，窃据政权，瓜分民国，阳示议和，阴谋借款。……应请贵公使转达贵国政府”，“拒绝大小借款”。

5 月 8 日　北京政府致电驻丹麦代办公使曹云祥，转告苏俄政府派赴丹麦之代表，略谓：“中国对劳农政府前日提议归还各种权利及租借地，以为承认莫斯科之报酬，感谢异常。惟中国为协约国之一，不能单独行动，如协约国能与俄恢复邦交与贸易，则中国政府对俄提议自当尊崇，希望劳农政府善体此意”。

5 月 11 日　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经多次交涉，双方妥协。日本以“兰辛石井”宣言作为保障，表面收回“满蒙除外”之主张，并由美英法三国承认日本在满蒙所筑各路不列入新银行团范围之内。

5 月 17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日本政府在西伯利亚撤兵宣言中将“满洲”与朝鲜并列，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

5 月 15 日　北京政府对英日同盟续约发表声明：此次续约文内凡关于保全中国领土巩固主权，以及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字样，希望一律删除。

5 月 22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日本催议山东交涉案，内称：“因对德和约并未签字，全国人民对于本问题态度激昂，本国政府不容率尔答复。至贵国政府愿将胶济沿线军队撤退，此节与解决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愿贵国政府将战时一切军事上之设施从事收束，以为恢复和平之表示。”

5 月 27 日　中国新疆伊犁道尹兼办交涉事宜许国桢、交涉局局长孝昌、伊宁县知事牟维潼与俄国特权外交委员黎玛列夫、特权商务委员维列塔斯在伊犁伊宁开议“关于两国边界、伊犁与七河通商及俄败兵、逃民等回国各问题”，共十条。

6 月 4 日　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匈和约于是日签订，中国政府派驻美公使顾维钧出席签字。

6 月 8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对英日联盟发表声明，宣称：“英日盟约中含有关于中国之条款，似中国已被视为签约国之领土。此项条约决难为中国所公认。将来凡国际会员所订关于中国之条约，若无中国承认，不能作为有效。”

6 月 27 日　北京政府派出非正式代表团，由陆军中将张斯麟率领，抵达上乌丁斯克。

7 月 5 日　侨俄华工数十万选出代表，开第三次全俄华工大会，议决通电孙中山转全国同胞，提出四事：请求全国同胞团结，大力协助中国青年革命事业；请求我国即行承认劳农共和国，并请我国对于反对俄国之列强勿施以援助；请求我国即派正式全权代表来俄，以结邦交；请求我国对在俄侨民之欲回国者予以便利。

7 月 21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西北筹边使署，倘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改为商务委员名义，可允其来京。

8 月 10 日　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土和约签订。因该约规定仍保有列国在土耳其境内之领事裁判权，中国代表未签字。

8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电驻英、法、意、比、荷各使，了解各国如何待遇前俄皇政府代表及对俄远东各临时政府之态度，以作参考。

9月24日　沙俄驻京公使库达摄夫就停止领事待遇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同日，并照会驻京使团，告以"本人使华之任务业已结束。"

9月27日　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中俄原有各种条约概为无效，俄国在中国之租借地概行退还，帝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党在中国所侵夺之权利，一并永远无偿退还中国"；希望中国政府与沙俄政府断绝关系，中苏恢复正常国交。北京政府仍然置之不理。

10月2日　珲春朝鲜革命党人纵火焚烧日领事馆，日本旋即派兵入境。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10月11日　驻京使团为北京政府停止俄国使领待遇事照会外交部，谓："中政府万不能永远取消俄人按约在中国所享之利益，此不过暂时办法，俟俄国将来政府成立经各国承认时，再行议定一切。"

11月11日　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东方部长杨森致中国政府通牒："因为蒙古边疆中国军事当局的要求，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深愿派兵入蒙，一意扫除谢党。蒙古境内虽有中国大兵驻守，而白军自由行动，甚至包围库伦数日。中国政府对于前项通牒，不知何故从未置答。虽然如此，而中国军队确已将谢党从库伦及邻区逐退，我们也认为十分满足。俄罗斯共和国既以保持他国主权为职志，当即停止派兵，并希望中国当局，速以严厉手段，将谢党一律扫除。"

11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徐树铮逃出日使馆事，电令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徐树铮逃后，发生行动及影响，均日本负责；（二）日武官有纵逃形迹，应予处分；（三）向中国道歉；（四）余八人应速引渡，防再逃。"

12月1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徐树铮潜逃事件，再次照会日本公使，引渡安福系祸首段芝贵等八人，如再脱逃，日使应负全责。

12月1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将与优林谈判经过及准备开议情形，密呈徐世昌。

12月24日　中日庙街交涉结束：（一）由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本政府道歉；（二）前尼港中国海军司令向日军总司令道歉；（三）负轰击之责任者，应加惩治；（四）以三万元抚恤误毙日侨家属。

12月31　北京政府向苏俄政府抗议，否认曾请其出兵援助库伦。

经　济

1月1日　江西财政厅与日商古河洋行签订规平银四十万两借款合同，以江西金库券六十万元为担保，用于发放军饷及扣还1919年1月27日所欠日金五十万元本利。

1月12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日金五十万元借款合同，以北京中国银行钞票二十万元及七年长期公债三十万元为担保，用于拨还该行美金借款、海军部德奥船租保证金、京兆尹署、漳厦路经费等。

1月27日　陆军部汉阳兵工厂与日本东亚通商会社签订银元三十万元借款合同，用于订购军械。

同日　广三铁路局与日商台湾银行签订日金十五万元借款合同，以广三铁路局全部财产为担保。

2月6日　上海华丰银行开幕，董事长王学侃，总经理许承之，副经理范少珊。资本六十万元，专营商业银行各种业务，兼营信托及储蓄事务。6月在苏州设立堆栈，代客堆货。1922年5月17日，周转不灵停业。

2月10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签订有线电报扩充及改良借款合同，借日金一千五佰万元，以有线电报全部财产及收入为担保，用于购买电信材料之用。

2月15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法金五亿一千五百万零六万四千零九十九佛郎借款合同，以期票为担保，用于交付实业借款第6、12期利息垫款。

2月24日　庆丰合资银行在上海开幕，资本二十万元，专营商业银行业务，并兼办储蓄。经理郑声和，协理傅裕经。

同日　广东省银行与华南银行签订日金十五万元借款合同，以汉冶萍股票4616股及土地240井为担保，用于支付地方实业银行借款余额。

2月　广东商办新宁铁路全线通车。

同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株萍路与慎昌洋行签订银元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元借款合同，用于支付购机车两辆价款。

同日　广东省长莫荣新与美商五金公司签订美金四十万元借款合同，以兵工厂财产为担保，用于兵工厂订购机器未付价款。

3月1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日实业公司签订中华三纱厂日金三百万元借款合同，以中华实业公司纱厂全部财产及津浦路货捐为担保，用于承办纱厂资金，后挪用于政费。

3月7日　财政部规定各省官银钱行号"不准擅发纸币，其已发者，应即遵照取缔纸币条例，确定限期，逐渐

收回。”

3月24日　美国摩根财团代表拉门德抵京。

同日　广东财政厅广三铁路局与华南银行签订日金十五万元借款合同，以广三铁路局财产为担保。

3月　虞洽卿、靳鸣皋、李云书等发起组织劝业银行，资本总额五百万元，分五万股，每股一百元。总行设于北京，于19月20日成立，上海分行于12月6日开幕。总行行长张寿镛，沪行经理为石运乾，副经理陈淮钟。该行系照劝业银行条例设立，并兼营储蓄事务。嗣后因时局变化，宣告停业。1930年4月20日，该行上海分行又改组复业，次年复又停业。

同日　交通部湘鄂路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英金十一万四千零四十二磅借款合同，用于购机车12辆，货车90辆。

3月　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与日商一和洋行签订美金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二元借款合同，以国库券21纸为担保，用于订购枪弹。

4月14日　苏州储蓄银行总行是日开业。资本五十万元，专营普通储蓄及有奖储蓄。总董洪少圃，经理为吴伯英。上海分行设南京路。9月16日开业。1921年6月16日又于南市董家渡设立分行，经理有奖储蓄事务。1927年4月4日苏州总行因被军阀挪用款项而停业。4月7日上海南北两行也宣告停业。

4月　梁士诒联合中国、交通、汇业、金城、盐业、新华、五族、大生、大陆、中孚、华孚、北京商业、广东实业等十三家银行，创办中华银公司，资本一千万元，承办、承募国家、地方及公司各种债款营业。总事务所设北京，梁士诒为董事长。

5月7日　富华储蓄银行开业。资本总额二十万元，总行设常州。后在上海设办事处，经营普通储蓄和有奖储蓄。1921年4月27日为推广业务，将上海办事处改为分行，行址设于江西路，以史雪舲为经理。嗣后以沪分行事务较简，将沪行裁撤。不久以常州纱厂借款搁浅而停业。

6月7日　北京政府农商部与日商正金银行签订日金四十万元借款合同，以盐税、龙烟铁矿股票一百万元、汉冶萍官股利息为担保，用于农商部经费。

6月18日　陕西省政府与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代理大仓洋行，在汉口签订追加添购铜元机器合同。

7月1日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开幕。此为中国有交易所之始。资本总额五百万元，营业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理事长虞洽卿，理事闻兰亭、赵士林、盛丕华等六人。

11月21日　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入会会员有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东洋纱厂等三百七十多人，孙中山、陈独秀到会演说。孙中山指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

11月22日　上海各区商界联合会为反对增加印花税及所得税问题，开联席会议，决定征求全体商界意见，并将商民痛苦转达北京政府，同时向省议会请愿。

12月15日　孙中山就“自由贸易”问题发表意见，指出：“目下之税则，徒助励外货之轨入，损中国之出口家，以利外商而已。”指斥“海关仅为外国入口家经营，以遏制华商为务。”

12月17日　湖南水口山矿工五千余名，因矿主拖欠工资，生活无着，全体停工。19日开全体大会，商议维持办法，全场议决：(一)急向衡州等处商借谷米维持生活；(二)公推代表赴省告急。

文　教

1月1日　《钱江评论》创刊于杭州。该刊为青年学生和教师所办的不定期刊物，6月20日终刊，共出了十三册。

同日　王光祈在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

1月12日　北京教育界停职风潮，教职员提出五项要求，北京政府均逐条答复，教员遂于是日复课。

同日　杭州学生联合会为声援北京教职员，是日起各学校一律罢课。

1月20日　《秦钟》月刊创刊于北京。该刊宗旨为：“第一唤起陕人自觉心；第二是介绍新知识于陕西；第三是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共出六期。

1月　《少年世界》创刊。该刊为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第二种月刊。

同日　北京教职员许绳祖、沈士远等发起组织“教职员公会”。

1月　徐世昌令准清华学校校长张煜全辞职，派罗忠诒继任。

2月1日　湖南学生代表团在上海创办《天问周刊》，以揭发张敬尧祸湘罪行和呼吁全国各界援助驱张运动为主要内容。其中分评论、思潮、湘事述闻、国内述闻、外交述闻、诗、小说等。

同日　上海第二师范“新学社”创办通俗读物《平民导报》。

2月15日　《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月刊二卷四号是日出版，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此刊系进步党人创办，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撰文反对马列主义，经李达、陈独秀等著文驳斥，发起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2月　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此为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始。

3月1日　《政衡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宗旨是：“政

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

3 月 19 日　徐世昌下令实施义务教育,着教育部将山西省所定办法通行各省参照,以便逐步推广。

3 月 20 日　青年会征求大会在上海闭幕。是日晚到者共有千余人。由会长聂云台宣布开会宗旨,继由陈独秀作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讲。

3 月 29 日　暨南学校校长赵正平等发起在上海创设商科大学,是日开会讨论进行方法,推黄炎培为筹备处主任。

3 月　北京大学本教授治校之宗旨,组织评议会、行政会、教务会、总务处四大部。

3 月　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等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 月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陈望道翻译。本书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

5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劳动纪念号"出版,其中有工人生活图片三十三幅,十二个工人的亲笔题词,并发表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历史》一文,介绍五一节的来历及各国纪念的情况,是中国报刊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第一声。

同日　孙中山为《新青年》杂志劳动纪念号题"天下为公"四字。

同日　《妇女评论》在苏州创刊。

同日　广州中华工会刊物《工界》创刊。

同日　复旦大学学生编辑的《平民》周刊在上海创刊。

5 月 5 日　全国报界联合会在广州开第二次常会,与会报社、通讯社代表 112 家,代表 196 人。

同日　上海《时事新报》设立本埠新闻专栏。

同日　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报学系。

同日　《现象报》在广州创刊。

7 月 27 日　苏督李纯令苏常镇守使勒令苏州安福系之《苏报》停刊。该报经理王伯薇闻讯逃往上海,主笔朱梁任、编辑顾铎亭等被捕判刑。

8 月 8 日　徐世昌下令:"教育为国家要政,前以经费支绌,亟应设备基金,明令交部筹办。前据教育部呈称,华俄道胜银行股息,原俄专作教育经费,应请明令将此项股本,定为教育基本金。"

9 月 1 日　《新青年》杂志第 8 卷第 1 期出版。该刊从此期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机关刊物,大量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俄情况的文章。

9 月 5 日　梁启超、蒋方震创设"讲学社",邀请各国学者来华讲学,每年由教育部补助二万元。

9 月 16 日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会之简章,谓:"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思想)为宗旨。会务包括:(一)从事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10 月 3 日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刊物《劳动者》是日创刊。该刊每星期出一册,先由广州《天民报》经售,后由《群报》总经售。

11 月 7 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刊,是日创刊。

12 月 15 日　《评论之评论》是日创刊,其宣言声称:"'评论'是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生命底唯一锁钥"。该刊为北京大学法科学生主办的刊物,由上海太东图书局发行。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1年

导　言

一九二一年，在粤军驱逐桂军以后，陈炯明恃功而骄，企图割据广东一省，无意出兵北伐。孙中山认为革命应当继续进行，便发表演说，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正式政府。非常国会召开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

湖南自从谭延闿下台，程潜一派也被一网打尽，赵恒锡东山再起，利用“自治”招牌宣布保境安民，一面又与川、滇、黔、粤四省结成“联省自治”阵线，试图巩固自己地位。然而湘军并不以他的意思为转移，宋鹤庚、鲁涤平将赵恒锡赶鸭子上架，推为“援鄂”总司令，挥兵进湖北，企图控制湖北，这样，湘鄂战争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威尔逊怅然而返。同时，由于日本在远东势力的扩张，引起美国不满。为了向远东市场扩张，以缓和本国经济危机，一九二一年，美国建议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北京政府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准备好好讨论一番主权问题，孰料又被人晾在一边，作了一回无奈的陪衬。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候，新旧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纷纷破土而出。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开端，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作了有力回击，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作了相当的推动。

一九二一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终于在七月展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活动中心，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也就焕然一新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旧更替的年代，各种势力都在分化组合以适应形势的改变，这是本年的一大特点。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建党的酝酿——共产党人的早期活动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
- **衙前农民运动**
-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 **湘鄂战争**
- **华盛顿会议**
- **社会主义论战**

建党的酝酿——共产党人的早期活动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背景介绍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为避北洋政府的拘捕，在李大钊陪同下经天津赴上海。路上，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在南北筹备建党。在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与在津的老布尔什维克布尔特曼会晤，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2月初，李大钊回到北京，陈独秀经武汉去上海，分头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东方局又派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旅俄华侨，俄共党员）等来华，帮助中国进行建党工作。他们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又由李介绍至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经过多次商谈后，同年七八月间，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发起，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由上海小组与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联系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到1920年秋或稍后一段时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张申府、罗章龙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建立后不久，施存统即去日本留学，而随后加入上海小组的又有李达、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和林伯渠等人。此后，施存统与周佛海在东京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2月，陈独秀应粤军陈炯明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他与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又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各地还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作为党的预备队。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李启汉、张太雷，是最初的一批团员。

材料：

- 中国的第一支共产主义火炬
-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
- 投身革命的毛泽东
- 周恩来旅欧寻真理
- 中共建党之初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材料一　中国的第一支共产主义火炬

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中俄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于是1920年5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到北京。

那时听说维金斯基来北京是经日本到中国的，又有人说他是直接来中国的。维金斯基来北京之后，首先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大学经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际上有了一些声望，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渐渐与北大有往来。一是图书的交换，二是北大的同学出国留学，只要由北大出一个证明，证明学习过什么课程，国外大学都承认有效，而其他学校则没有此种地位。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金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金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

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位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金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金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金斯基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进行几次座谈后，又邀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我们谈话是漫谈性质，主要是了解个人学习、工作情况，涉及面也很广泛。有一次谈话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坐下之后，他像谈家常一样，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找了张地图看了看，说：“这离北京很远吧！”他还说：“你们同学中间，南方人不少，家离这里都很远。”然后他又问，你们是如何学习的，从前读过一些什么书，现在在读什么书，学校里现在教些什么，学些什么？我就把学习的情况，看过的书刊，一一同他谈了。同时把我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跟他说了。我说，现在我们学习的书很少。他就把北大地址、个人名字及通讯处都记下来，并答应回去以后寄些读物来。此外，他还同我谈了一些青年的理想、前途等问题。他还说，俄国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维金斯基是学经济统计的，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这次谈话中，我了解到维金斯基十月革命前在美国学习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美国工人运动研究也很全面，后又游学欧洲。维金斯基年纪四十开外，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在谈话中，他表示来华前，对中国问题曾作过研究，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和同盟会主要人物的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内部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通过与他谈话，我感到维金斯基是一个学问渊博、思想革命的人。他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介绍。在两人漫谈间，维金斯基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谈到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及展望未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落后七倍，比德国少三倍，燃料比美国少十七倍，比英国少十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5%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1/3。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他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他的一席话，使我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我们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之后，他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他行前与我重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的事。我们后来源源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外文书刊。他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写信介绍到上海，是作为北京小组写信给上海的。他决定离开北

京，转往上海访问，临行时对我说："我们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不久的将来会有重要结果。"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握手道别而去。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当时我们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我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中坚分子，参加过工人运动的，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后工人党员渐渐增加了。当时的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推守常作为小组领导人，其他人遇到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后来工作渐渐发展，开始有了简单分工。张国焘主持组织、交际；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与共青团工作；我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当时彼此分工界线不明显，可以说是既分工又合作。

(选自《椿园载记》，作者：罗章龙)

材料二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威琴斯基来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由王尽美(山东第五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由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加入的(以后都又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止，共有八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而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十六开本，约三十二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间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新渔阳里六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由威琴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这S.Y.的组织，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

(选自《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作者：李达)

材料三　投身革命的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屡屡失败，人们期待着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终于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已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锋芒的青年毛泽东，一经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中去。

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活动，为建党做理论准备

1919年末到1920年夏，是毛泽东完成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性时期。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广泛接触，并大量阅读革命书籍，由此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公正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济南、泰安、曲阜、南京等地，一路风尘，于5月5日到达上海，与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等人见面。毛泽东在沪期间，曾与陈独秀多次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及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而陈独秀对毛泽东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则在毛泽东一生中关键性的时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当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逗留半年之后，于1920年7月返回长沙时，他已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整个湖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后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的影响推进革命运动。于是，他立即请来新民学会的骨干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共同商议创办文化书社。

经过一番准备，毛泽东等17位发起人于1920年8月2日在楚怡学校召开文化书社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八条，并推定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为筹备员。毛泽东起草了《文化书社缘起》，文章指出："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岸的俄罗斯"。表明了对俄国十月革命新思想的向往和推崇。关于文化书社所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这样，文化书社从一开始便成为在湖南广泛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毛泽东请李大钊担任文化书社的"信用介绍"，沟通北京方面的出版机构。又请陈独秀担任"信用介绍"，沟通上海的有关出版机构；恽代英在武汉的利群书社也给予湖南文化书社很大支持。文化书社办得有声有色，仅据1920年9月至10月的统计，就推销了《新青年》杂志150份以上，推销《劳动界》130份，销售《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30本。文化书社还印制传单和书目，介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著作的中译本，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文化书社的影响和声望日益扩大。不久，文化书社又成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进行建党活动内外联络的秘密机关。后来李维汉曾经写道："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又与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作为派人赴俄学习考察的公开机构。在成立会上，何叔衡宣读了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研究会的任务是："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以后，提倡以自学为主，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独到之处，并多次进行集体讨论，彼此交流学习心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研究会还选派张一宗赴京，"随同京团体赴俄，备信两函，一介绍于俄国，一介绍于北京"。在研究苏俄、向往苏俄的氛围中，毛泽东等人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把任弼时、肖劲光、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一批热血青年介绍给上海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随后到苏俄东方大学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发起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注意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俄罗斯研究的革命活动，从思想上、干部上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建党工作的陈独秀已把长沙列入全国组党计划之内。1920年秋冬之交，陈独秀致信毛泽东，请他在长沙建立与上海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先后寄来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以及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毛泽东经过慎重的挑选，与何叔衡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由此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到这段经历，他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

1956 年毛泽东在填写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证时，在入党时间一栏亲笔写下了 1920 年的字样。

毛泽东在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还开始着手从事创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1920 年 10 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寄来的青年团章程和信件，请他在长沙发展团的组织。在这之后，毛泽东开始从新民学会会员以及进步学生中，进行挑选，发展团员。关于毛泽东建团的活动，当时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学校的张文亮曾在 1920 年冬的日记中，有过真实的记录：

11 月 17 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 10 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 月 21 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 月 2 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同志。

12 月 15 日。接泽东复信，……(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四)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 月 16 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 月 17 日。泽东送来《共产党》9 本。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团工作抓得很紧，很细，“并注重找真同志”以保证质量。彭平之、张文亮、杨开慧等都是毛泽东首批发展的青年团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与陈独秀密切联系，并拟请陈独秀来湘讲学和参加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但因故未能实现。1921 年 1 月 13 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毛泽东担任了第一任书记。

毛泽东在长沙筹建党、团组织期间，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经常通信，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以及建党问题。蔡和森曾两次来信，明确提出应该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而现在当务之急是建立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但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主张“温和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两次复信旅法诸会友，指出：“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并明确表态：“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在 1921 年 1 月 21 日的信中，毛泽东还精辟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欣喜地告诉他们“党一层陈仲甫①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为仲甫所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除了继续以各种方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之外，还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对此，萧三曾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

……

交几个工人作朋友，通过他们，可以认识和团结千百个工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和工人们接近了，给他们办夜校，办补习班、识字班，教育他们。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讲工人应该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道理。

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毛泽东同志都努力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并通过他们，开展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

毛泽东所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中的上述活动，卓有成效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同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后来发展、壮大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和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湘发展地方党团组织

经过艰辛的努力，到了 1921 年春，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这六个中心城市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海外建立了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样，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日渐成熟了。

1921 年 6 月，毛泽东终于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发来的通知，要长沙方面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 月 29 日下午，毛泽东、何叔衡两位代表由长沙启程赴沪。谢觉哉曾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952 年谢觉哉进一步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 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正式召开，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来自各地的 13 位代表在一栋简朴的两层楼房内围坐在一起，共商建

① 即陈独秀。仲甫为陈独秀的字。

党大计，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何叔衡、陈公博、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周佛海、董必武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分别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5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这次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还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中国共产党从此宣告正式成立。

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活动，在党的一大上受到代表们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据李达回忆："一大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重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从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看，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代表大会还未结束，他已在紧张思考回去之后如何进一步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大事了。对此，李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

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便积极着手进行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中共湖南支部一经成立，便本着既积极又慎重的原则，首先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人队伍中发展了一批条件成熟的先进分子。毛泽东和李立三还深入安源煤矿，从事工运和建党活动。1922年2月，中共安源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在这前后，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也建立起党的支部。在此基础上，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包括江西萍乡安源)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当时名李隆郅)为委员，不久又增加了郭亮。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至此，湖南的建党工作已初见规模，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已在湖南的大地上点燃。

(作者：宫力原载《党史纵横》)

材料四　周恩来旅欧寻真理

周恩来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籍，在天津组织"觉悟社"，进行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0年11月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周恩来利用一切时间向难友宣讲"马克思传"、"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本集中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1920年11月，周恩来为了寻求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根本道路，进一步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远离祖国，到欧洲勤工俭学，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战斗生活。在这期间，周恩来已经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4月，英国爆发百万煤矿工人大罢工。从这次罢工中周恩来已看出"劳资战争除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益信。"而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经为典"。1921年6月，他在与赵世炎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又在巴黎成立了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根据团中央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规定"以进行共产主义为最要之事"。后来他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过程时说："直迟到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这时他感到"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共产主义也就够了。""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922年8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出版了《少年》杂志，作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周恩来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论工会运动》等文章，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中国问题。他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文献。在这篇文章里，他系统地阐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指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出路。在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过程中，周恩来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但他一旦确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就终生为之奋斗。

(选自《风云七十年》)

材料五　中共建党之初

周恩来同志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谈到了自己的入党问题，他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读着这一段文字，我心情激动，感慨万端，它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六十多年前的难忘岁月，带到了北大红楼、陶然亭慈悲庵和法国的巴黎……

一

一九一三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跳班考入本科哲学系(后转数学系)。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创办于一八九八年，这座高等学府是维新派冲破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学校分文、法、理、工四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做了北大第一任校长。以后，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也随之改称为大学校校长了。

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继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办学方针及具体措施。过去，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当时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嬗继下来，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而是混文凭，到处找靠山；还有的人上学不读书，整天打麻将，逛八大胡同。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学校里缺少学术研究的空气。

蔡先生主持改革，首先是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整顿文科。他聘请了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因主办《新青年》而闻名，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蔡元培又请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他是北大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学校中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容纳了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北大实行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倡思想自由和培养学术研究的空气。改革后的北大，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极盛；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像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新潮社、进德会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社团。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基本条件，提倡培养个人的高尚道德。蔡元培、李大钊都是会员，我和张国焘、康白情、罗家伦等学生也都入了会。进德会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不满的产物，对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产生过较好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我毕业留校做了助教，翌年提为讲师。北大也在这一年迁入沙滩红楼，从此，它以更加崭新的姿态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

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正在寻求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北大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一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新军开始组成。

一九一九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各阶层群众参加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工人参加了斗争，显示出这个阶级的巨大威力。五四运动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九二〇年四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

记得这一年的八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所以这样讲，我理解一是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了解情况，认识的人也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宜于谈此事，况且建党一事又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大时，和大钊、我接触较多。那时，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我除了教书，也在图书馆做点事情，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彼此的观点许多是一致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大钊和我经常投稿，一九一八年底，我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工作接触多，关系也很密切。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

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此外，陈独秀同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也谈过此事，他们没有同意。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也在同时进行筹组活动。大钊同志性情温和，乐于与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

稍缓慢了一点。

九月中旬，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我前往上海迎接。在上海，我见到了陈独秀，并且住在他的家里。我听他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见到了早期党员周佛海、田汉、沈雁冰等，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并首先想到了刘清扬。

刘清扬是天津人，在天津严氏小学教书。她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组织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加、领导了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九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有志青年为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踊跃报名，更有一些人是因为不堪于国内军阀的长期混战，到欧洲寻求生活的出路。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里昂大学筹办了一所中国学院，他们聘请我去教逻辑。这样，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我离开北大，登上了赴法的征途。

三

一九二〇年底，我们乘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到了法国马赛。同船到达的有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等。蔡先生是赴法考察教育的，另外还有广东的郑毓秀，她是个法国通，此次出国，她带了二十几个女学生。

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开阔了眼界。站在甲板上，望着无垠的大海，心情十分激动。大家常常聚拢在一起，热情地交谈，互相倾诉自己发奋读书、立志报国的理想。途中，我向刘清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讲了共产主义，也讲了共产党的性质，她对党的组织有了新的认识。

抵达马赛，我们坐火车到了巴黎。当时中国学院尚未开学，我便常去巴黎大学听数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学校街五十号。

一到法国，就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异国相逢，倍感亲切。提起和周恩来同志的相识，还得追溯到一九二〇年的八月……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社团，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路，一些进步的社团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团结了进步青年，成为具有战斗性的革命组织。著名的有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等，"少年中国学会"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社团组织。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广大青年思想的解放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也推动了许多进步团体的活动发展和相互交流。

一九二〇年的暑假，天津"觉悟社"的成员在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的率领下，来到北京，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举行座谈，希望各方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改造旧的中国。

八月十六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二十余人，在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觉悟社"发言，主要讲了"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他气度不凡，侃侃而谈，其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

还在这次聚会之前，我曾听李大钊同志谈到过恩来。那时大钊经常往来京津进行讲演，熟悉周恩来同志，屡次向我介绍他的情况，并且也对恩来同志讲到过我。这使我们虽未曾相见，却先相知了。

陶然亭聚会，我和周恩来同志认识了，我们畅叙理想，热烈交谈，共同讨论中国的前途，交换各自的看法。以后由于工作之便，我们经常见面，往来越发亲密。周恩来同志头脑清醒，思维缜密，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待人诚恳，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周恩来同志是比我早一个多月到法国的，他告诉我：他曾有意到英国去学习，但英国生活水平高，且不宜读书，所以只住了一个月便回到法国。周恩来同志住在巴黎南郊的哥伦布，从这里到巴黎坐火车大约用一个小时，他在一个补习学校补习法语。

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当我的生活安顿下以后，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刘清扬同志对党的认识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便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为一九二一年初。接着我又与刘清扬商量一起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之事。

刘清扬和周恩来同志都是天津的学生，曾经一起领导学生运动，彼此很熟悉。我与恩来同志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同志谦虚且热情，积极而肯干；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全身心地投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和刘清扬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同志。我们与恩

来同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讲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其时，周恩来同志对十月革命已作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一九二一年的二、三月间，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事后，我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那时，党组织刚刚建立，发展党员只要有人介绍就行了，并没有其他的手续。

此后，赵世炎、陈公培相继来到法国、他们已是党员。于是，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在旅法青年中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选自《纵横》86年6期作者：张申府 张燕妮整理）

材料六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产生

民国八年，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住霞飞路七一六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当时以法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思主义之干部。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至复杂，有陈独秀、张崧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其后，各方志士周佛海、张闻天、李达、卜士畸、罗觉(即罗亦农)、彭湃、陈为人、李农志(即李立三)、袁达时、傅大庆、恽代英等等，均自各省及国外归来，会集于外国语学社，遂成中国社会主义者之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亦渐因此酝酿以成。

共产党之成立

社会主义者既以不容于各省，纷集沪上，维丁司克即正式提议组织共产党，宣传布尔什维克，以纠正无政府主义之活动。于是一方面即由独秀找北平李大钊广州谭平山到沪，与戴季陶、沈玄庐密商；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方具雏形，当时即由独秀、汉俊、望道、大钊、明斋主其事。其后，季陶等即已退出。社会主义青年团，至开代表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之个性较强者如袁振英、李绰均退出，费哲民等欲加入而不可得矣。

（摘自仿鲁《清算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相继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上海地区共产党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地区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地区共产党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共产党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共产党代表邓恩铭、王烬美，广东共产党代表陈公博，日本地区共产党代表周佛海等12人出席了大会，共代表国内外党员50余名。陈独秀不能出席会议，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会议。在巴黎的共产党员，因未取得联系，没有派代表。由于会场遭到巡捕的搜查，大会的最后一天，不得不迁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

大会听取了各地共产党活动的报告，起草并讨论了党的纲领和计划，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大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立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党员和党的组织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发展职工运动，党在目前不仅不拒绝而且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从事革命运动。为更好地领

导工人运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会议认为，对待其他党派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要求党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独立的立场上，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3 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大会决定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并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的斗争有了自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材料：

材料一 "一大"的准备

1920 年 12 月 16 日，陈独秀由上海去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发起组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由李汉俊、陈望道主编。1921 年 2 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关系恶化，不愿再任书记的职务，便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由李达担任上海发起组书记的职务。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发起组继续发挥发起、联络的作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是由上海发起组李达、李汉俊等人具体进行的。

1921 年 6 月间，荷兰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自莫斯科经欧洲抵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接替魏金斯基的工作，也抵达上海。马林、尼柯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知道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 7、8 个中心地区有了组织和活动，因此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正式成立。根据党内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代表大会。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推派代表前来上海参加大会。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的政治环境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长沙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的。当时与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教育馆编《湖南通俗报》的谢觉哉，在 1921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上记载："午后 6 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哉在 1952 年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新观察》1952 年第 11 期）。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船，他们从长沙乘船出发，只能先到武汉，再由武汉转到上海，途中约需 5 天，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 7 月 4 日前后。

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又正好是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北京推选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因为要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先去上海。刘仁静是在 7 月 2 日至 4 日于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停留了 2、3 天，才动身去上海的。

陈独秀因为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筹备广东大学事，走不开，未出席大会。广州推选的代表，是陈公博。他是 7 月 14 日启程赴沪，21 日到上海的。陈独秀还委派包惠僧参加大会，他比陈公博提前一天到达上海。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明，日本留学生中党员的代表周佛海，也先后到达上海。

上海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他们两人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各地代表先后到达上海，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住在法租界白尔路 389 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 127 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师生都已离校。这里距"一大"会址较近，所以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联系，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校长黄绍兰租借房子，作为代表的住宿地。代表们就在楼板上打地铺。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明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

大会的会址在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的家里。当时,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李汉俊和他哥哥住的两幢房子(望志路106号、108号),是沿街的里弄房屋,有后门通向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环境较为僻静。李书城的身份和"李公馆"附近的环境,对"一大"的召开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选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者庄有为等)

材料二　陈独秀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陈独秀还告诉过我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我听了非常诧异,就问他,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他说:"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像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他对一个人的革命或叛变,没有做出阶级的分析。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闲谈中谈得较多,不管谈的正确与否,现在我如实地把它写出来,供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做参考。

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

(转引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

材料三　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毛泽东"一大"回忆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何叔衡)。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烬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

小组。这次大会(指七大——引者注)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情也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选自《毛泽东谈毛泽东》)

材料四　陈公博对"一大"的回忆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这次大会给我的坏印象不少,大概我后来脱离共产党,要以这次大会给我的恶劣的印象为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为后果。

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是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学的,也有住在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发生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

第一件事就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甚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我心内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为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着,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甚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极了,我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内倒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人反对,又取消议案,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类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过宣言,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那时孙先生是广东非常国会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徐是北洋军阀左右下的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对,辩论很久,宣言终于通过了。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后来到最终会议,才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第一次大会的文献,没有宣言,不过当日共党是秘密组织的,有无宣言,世间也不注意罢了。

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国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他们走后不到三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现在我还记得,有三个法国警察官,有四个中国的便衣密探,至于外面还有多少人,那我被关在楼上是不知道的。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乎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着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为首的法国警察。问谁是主人,汉俊不慌不忙的自己承认。这样搜索,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惟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审问汉俊。他们问汉俊为什么家藏许多书,汉俊是懂得几句法语的,告诉他们他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他们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他们问汉俊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

审讯完汉俊之后,便轮到我了。在搜索时间,我不能发言,我不能起身,但抽烟是可以许可的。自从国焘们走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我们刚刚燃着一支,法国

警察便上来，我坐着没有事做，连续把那余下的四十八支烟卷吸完，终于被审问了。还幸他们问得早一点，若再迟五分钟，便无烟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法国巡捕开始用法语问我，我那时还未习法文，旁边一个中国人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这时，我很诧异，为什么那位先生倒以为我是日本人。我想还是直接通话为便罢，遂用英语问他懂不懂英语。这样，他便用英语问我，以下是开始的简单问答：

"你是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气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我有些开玩笑。

"你懂不懂中国话"？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

"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由广东来的"。

"你来上海什么事"？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这里"，我一想不好，我决不能告诉他我住在大东，在旅馆我还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有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所以这样告诉他。

法国警官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但关于我是否日本人的问题，他还反复研问，我揣测他这样寻根觅究，也许他另接报告，以为我们中日俄党人在这里开什么会。这样又经过半个钟头，那位法国先生便用法语向汉俊演说一番，后来汉俊告诉我，法国人所说的话，大意说知道我们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的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希望我们以后专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我们了。

他们一窝风下楼之后，汉俊便催我急走，我说危险算是过去，我们何必事后张惶，再开一听长城牌享受一下罢，因为我不吸烟又半个多钟头了。尤其是难受的，两个钟头未喝茶，口干得厉害。汉俊重新叫人煮水沏茶，楼梯又响，我那时真有些吃惊，难道他们又卷土重来，谁知那人头探出来的是包惠僧。惠僧问我们法国巡捕走了没有，我说此非善也，你还是走罢，详情明日再谈。惠僧走后，我和汉俊再谈几句，看时计已十点多钟，遂和汉俊告别。

我总以为大风过去，海不扬波了，但出了汉俊门后，倏见一个人隐身在弄口，似乎在侦察，我走了几步，他居然跟着来，我故意走快几步，他也走快几步，我走慢几步，他也走慢几步。我心想今夜终不能回大东旅馆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为有许多文件，倘不烧毁，终须贾祸。路边恰巧有一家商店，还是灯火辉煌陈列着许多商品，我装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样脱身。可以说是灵机一动罢，我记得去年由北京转沪回粤，在上海曾逛过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两场电影，地上露天，屋顶也露天，那个地方异常黑暗，是容易脱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黄包车往大世界，谁知那人也雇了黄包车跟在后头。我到大世界后什么地方都逛一逛，很游闲的逛书场，逛戏场，终在地面的露天电影看了三四分钟，便踱至屋顶的露天电影，在人丛绕了一个圈，从别门下楼雇车回大东旅馆。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了箱子，关好了房门，一口气把文件用火焚烧，全搁在痰盂，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形，湮灭证据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夜是阳历七月中旬，是上海最热的时候，我们的汗闷得出不来，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两人把席子拖下地板，才安稳睡了一觉，热极生风，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我从地板跳起来，打开房门一看，看见走廊寂寞得没有一个人，只是急雨打窗，狂风吹面，我想明明有枪响，有惨叫，那莫不是我变了福尔摩斯的案中人么？我唤起励庄，告诉他我所闻，但两人都猜不出什么事故，我反怀疑是一种梦境。

还是睡罢，到了九时，有一个茶房跑进来，说你们隔壁房间有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我问他什么一回事，他说前日有一男一女投店，今早那男的起身还叫了一碗面，食后出去，我们问他要钱，因为他只交柜上五块钱。他说立刻便回，我们也不注意，不料刚才我入房打扫，那女的已死在床上，经理立刻来看，她身中一枪，并且颈上还有毛巾缠住，看起来大概男的打了她一枪不死，又用毛巾来勒毙的。我听了之后，我也不告诉他今早所闻，恐怕他还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不过我再想，如果有巡捕和侦探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此地不宜耽搁，还是走罢，我去找着总经理，那时大概是郭标罢，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我说我隔壁出了命案，我的太太非常惧怕，所以今日要去杭州一行，把所有行李，暂存旅馆，俟回来还要换一个房间。这种说话，自然郭大经理坦然不疑，我和我的太太，趁着巡捕和侦探没有光临，遂离开旅馆。先在一家饭馆安顿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鹤鸣告诉他昨夜的经过，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我更可以从容的游西湖，逛灵隐了。

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的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那个西崽，趁他的大班往青岛避暑，偷了他一根手枪和孔阿琴来大东开房间。到了天明，开了一枪，而孔女士居然不死，那男的急极了所以又加工的用毛巾去勒。大概一时男的有悔意罢，或者独生总比同死为佳。他收拾起死心，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又叫了一碗面吃饱，才扬长而去。此事经已大白，初到的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

天热的杭州，等于一个大汽炉，蚊大如蝇，夜热逾昼，我们只好赋归了。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大会宣言发出与否，授权仲甫决定，因为仲甫已被举为中共书记，当日所谓书记，就是党魁。我和各人草草谈了两三次，遂乘船回广东了。

在上海还听见一件关于戴季陶先生的轶事，季陶和仲甫约定共同发起共产党，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来了一封信，说他和国民党关系太深，的确不能参加共产党组织，不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正在创办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但和各代表来往很少。佛海正闹着恋爱，共产党人的议论也有赞成也有不赞成，但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的事，为了恋爱，有时性命都不顾，朋友的赞成和反对，更是闲事。佛海夫人杨淑慧女士直至我在民国十四年由美国回至广东才相识，那时我对佛海的恋爱批评，算是宣告中立。

（选自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材料五　回忆中共“一大”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我们都到了上海，共计七个地区，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上海李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东京周佛海。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七月十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开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开会的时间，原决定四日至五日。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作了一个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词，报告的时间很长。李克诺斯基也报告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任务，他的报告很简短。报告完毕时间就不早了，即宣告散会。第二、三两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问题。

“党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我也记得不很清楚，内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讨论党章时，是有些争论的，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这一次的代表会议也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指导之下举行的。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联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即令有人有右倾或“左”的倾向，但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至于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太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的方向，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至于李汉俊的右倾及他的堕落是以后的事。再说刘仁静，他此时还是十九岁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如在会场和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扛，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至于他的“左”倾及他的堕落，也是以后的事，此时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意见。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党章”有“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还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本来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对于陈公博和李汉俊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陈公博刚在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们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首先由张国焘、刘仁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中间李汉俊提出修正意见：“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原案的“官吏”是包括从内阁总理一直到低级科员，修正案的“政务官”只是在中央的阁员，在地方的督军省长，问题就不大了，但是大家也不

同意，辩论了很久，陈公博也软下来了，李汉俊虽然坚持他的意见，但是少数，最后提出表决："维持原案"占多数。经过这一场的论战，张国焘等就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而李汉俊自以为是，见多识广，目空一切，也不向同志们说明他的见解，仅在主观上认定别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只有他懂，因此李汉俊就孤立起来了，也并没有什么李汉俊的一派。好像第二天的会，党纲还没有讨论完，时间不早就散会了。第三天的会，没有继续讨论党纲，因张国焘说：马林对党纲还有意见，等马林来出席时再讨论，就开始讨论"劳动运动计划"。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会议共十三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五十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马林在他的报告中，也指明这个问题。因此，大家都认定如何深入到劳工群众中去，如何发动工人和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党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把劳动运动的计划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最先发言的是刘仁静，他把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组织形式讲了一大套，归结到我们的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反对职业组合，甚至说我们要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紧要。周佛海译过一部社会问题概论，李达译过一部社会问题详解，他们对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也算是有点研究，也是每人讲了一套，都是空论甚多，接触到实际问题很少。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意见是说中国是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较少，有很多城市没有产业工人只有职业工人，还有很多手工业工人，我们的劳动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产业组合固然好，但有些职业工人没有什么产业的凭借，如码头夫、黄包车夫等就不能采取职业组合的方式了。毛泽东也是同意这个意见。辩论了很久，终于是决定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关于劳动运动的总方针也写了一个文件，大意是(1)组织起来；(2)经济斗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福利等）；(3)政治斗争（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请愿的自由等）。这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张国焘说：马林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今天讨论的结果留在下次开会时马林出席再作决定。

第四天的会是当天下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出席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后门）。我也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和陈公博迎出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巡捕房来了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一番，没有搜到什么，很侥幸！我的写字桌抽屉里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看见了，他们竟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的（李书城）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还说了几句客气话走了。"汉俊还说："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我即匆忙出来，走了几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三马路买了一点零细食物，从爱多亚路绕了几个弄堂回到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当夜，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马林、李克诺斯基当然也不方便去。约在十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地风景甚好，游人不多，我们便雇了一只大船，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经过了前夜一场虚惊以后，大家发言也精简了些，在正午一点钟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就吃饭。吃完午饭以后，就开始讨论"宣言"，讨论"宣言"时，也有一些小的争论。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董必武反对这个意见。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像是把这一段删去了。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约在下午六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到达上海时间虽不很晚，已是灯火万家了。接着各地代表准备离沪，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留在上海部署中央的工作。李汉俊住在上海，间或也参加一些别的工作，但接触不多。

（选自《包惠僧回忆录》）

材料六　密探搜查和南湖续会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

会议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张目四看。代表们问他干什么？回答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代表们告诉他，没有这个人。他说：

"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退了出去。事情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去。"于是，代表们迅速从前、后门分散走开，只剩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大约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的家。那个法国士兵是全副武装，几个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表现出要马上拿人的样子。他们翻箱搜箧，严密搜查，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得很乱，字迹模糊，他们以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连看也不看，所以没有被发现。

搜查之后，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李汉俊沉着地作了回答。

"谁是这屋子的主人?"

"我。"

"你们刚才开什么会?"

"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我是教员，这些书是为了参考、研究用的。"

"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到上海，常来这里谈天。"

法国巡捕没有搜查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从李汉俊的回答中得到什么东西，只好搭讪几句，怏怏而去。

巡捕房搜查望志路会址，并不是偶然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北京军阀政府曾三令五申，密令各地"防范过激党"。对于国际大都市上海，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更是严密注视，防范国内和国外来的革命者进行活动。马林从欧洲到上海的途中，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遭到了拘捕。不久，虽然得到释放，但是维也纳警察局把马林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并向马林打算去的所有国家作了通报。所以，马林一到上海，就受到监视。当年荷兰外交部档案文件中，就记载着：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9月底，他到汇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里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年10日。可见，马林到法租界望志路来开会，显然已被人监视。况且一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在一起，更加引人注目。

当天深夜，转移出来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李达当时住在这里。大家认为，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有造成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已受到监视，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进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想到，她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艘画舫，在湖中开会。代表们都同意，委托她去安排。

7月31日清晨，王会悟和代表们乘火车去嘉兴。为了缩小目标，代表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与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乘头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续行。陈公博正值新婚，没有去。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怕引人注目，也没有去。上午10时左右，代表先后到达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嘉兴鸳湖旅社租了两间客房，作为代表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画舫。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王会悟坐在船舱处望风、放哨。上船后不久，忽然大雨滂沱，游人渐少，更利于大会的进行。

这次游船上的会议，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时期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声望，因而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组织工会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

(选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者：庄有为)

材料七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原计划在6月20日召开。"万事开头难"，头一回把分散在各地的代表们聚首上海，陆陆续续，直至7月21日陈公博来了，才算到齐。

7月的上海，昼长夜短，晚上过了7时，天才慢慢暗下来。23日那天夜里，天黑之后，离博文女校不过几百公尺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后门不时闪进一位位客人。

这幢房子也是青砖、红砖相间砌成，人称"李公馆"。寓主李书诚，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元老，李汉俊的胞兄。此时，他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一同住在"李公馆"里除了李妻薛文淑、弟弟李汉俊之外，还有他的女儿声韵以及姨娘和一个姓廖的厨师。

本来，中共"一大"可以在博文女校里召开，不过，两位外国人进出那里，很容易引起注意。李家本来就交际甚广，客人进出颇多，而且地段僻静，房子宽敞，于是选定在这里开会。

大约晚上8时，"李公馆"底楼餐厅那张跟乒乓球桌差不多大小的长方餐桌四周，围坐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15位代表。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时刻终于到来——中共"一大"开幕了。穿长衫的，着衬衫结领带的，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戴眼镜的，讲汉语的，操英语、俄语的，汇聚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会议的当然主席，本是陈独秀。他没有到会，大家推选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另外，由于刘仁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便让他和汉俊轮流担任翻译。

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张国焘，他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提出这次会议要制定党纲和实际工作计划。接着，马林声若洪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代表共产国际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指出，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多了一个东方战友。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讲述了自己在莫斯科会见列宁以及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殷切期望。尼科尔斯基的话不多，除了表示热烈祝贺之外，建议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

开幕式结束之后，当代表们离开"李公馆"，夜色如黛，除了那些特殊的眼睛还在张望之外，居民们早已闭上睡眼了。

此后的几天，代表们忙着交流各地区的建党情况以及起草会议文件。生怕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会招来麻烦，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没有出席会议。

一个星期飞快地过去了。7月30日晚，大会举行闭幕式。这天，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事关重要，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夜幕降临之后，又悄然走进望志路上那座石库门房子。密探，已紧紧盯住了马林——从他在维也纳被捕之后，他一直是密探跟踪的目标。

晚8时多，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子忽地闯进餐厅，朝着围在长方餐桌四周的人们看了一下。这位陌生人来干什么？马上有代表盘问他，他闪烁其辞，说是"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马上又改口："对不起，找错了地方"。然后扭头便走了。

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意识到情况蹊跷，迅速作出反应："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好险！代表们刚刚散去才不到10分钟，"李公馆"便处于密探们的包围之中。

3个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闯进了李宅，只见李汉俊与陈公博在楼上抽烟聊天。

他俩受到盘问，除了问他俩自己的身份之外，详细问及那两个外国人。李汉俊答道："他们是英国人，北京大学教授，暑假中来上海，常常来谈。"李汉俊既能讲英语又会说法语，答话滴水不漏，法国警官抓不着破绽。

警官们搜查李宅，大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搜寻暗藏的枪支弹药，却忽视了抽斗里那张画满修改记号的中共党纲。

一无所得，警官和密探只得悻悻而去。

突然出现的险情，扰乱了中共"一大"的进行。

看来，再在上海开会，会面临着一网打尽的危险。有人提议转移到杭州开会。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出了个好主意"她在嘉兴读过书，知道那里有个南湖，游人不多而又比杭州近便。

于是，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上那儿去太醒目，没有出席。李汉俊和陈公博也不便去。这样，11位代表在南湖画舫里，举行中共"一大"闭幕式(也有人认为何叔衡未去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决议，选出了中央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是在中国的新兴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伟大的"五四"运动催生的，中国共产党一旦宣告成立，便当然地成为率领中国亿万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一段非常准确而精练的话，表述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选自《风云七十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集中力量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中旬在上海北成都路十九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干事有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董锄平、许白昊等人。张国焘等26人在《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上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露和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深重灾难；阐明了工人阶级组织产业工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性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其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的必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建立中国工人与外国工人的密切关系，号召工人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同奋斗，谋求解放。

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张国焘兼编辑主任，包惠僧、李启汉、董锄平等为编辑，其任务是：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在上海设立总部外，还在其他几个有党组织的地方先后建立了分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在武昌建立了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后为林育南)；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后为冯菊坡)；在济南建立了山东分部，主任王尽美。1922年6月，上海租界当局逮捕李启汉，封闭《劳动周刊》。7月25日，又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于遭到帝国主义的迫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于同年8月由上海迁到北京，另在上海设立分部，主任袁达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迁到北京后，邓中夏接替张国焘任总部主任，罗章龙任副主任兼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主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创办刊物和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二是在各地联络、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实际就是公认它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而使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团结奋斗的道路。同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北洋军阀政府召开"国会"、准备制定宪法之机，提出工人运动的纲领《劳动法大纲》19条，并要求纳入宪法中，发动全国工人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立即集中全力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13个月之中，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人以上。其中著名的罢工斗争有香港海员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等。通过这些罢工斗争，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提高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威望，也扩大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1923年二七惨案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工人运动遭到挫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被查抄，职员被通缉，总部被迫从北京迁回上海。此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因无法公开活动而被迫转入地下，逐渐由产业总工会等组织代替其领导职工运动的职能。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中央决定不再使用书记部的名称。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材料：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 《劳动周刊》发刊词

材料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

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康健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是我们敢断言的。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都来做的，所以我们请求那些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界的伙伴们呀！我们拿外国经历过的事实做比例，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等二十六人宣言

——原载《共产党》第六号

材料二 《劳动周刊》发刊词

（一九二一年八月）

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我们这个周刊是不比得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那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

衙前农民运动

背景介绍

浙江省肖山县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的一次农民运动。这次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是上海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又名沈定一）沈玄庐是衙前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沈家祖父辈都是浙江有名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沈入党后，将土地交给农民种，自动减了佃户的地租，并且以衙前为中心，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抗捐减租斗争。1921年9月23日，沈玄庐在肖山北山地区，向附近的二三十个村庄的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说，指出：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的主权归你们掌握，你们有了组织，就不怕牺牲。并且号召农民：你们赶快的团结呵！你们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们总有一天会投降你们的。这次演说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在肖山农民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为了促进农民组织的建立，沈玄庐出资兴办了衙前农村小学，约请杭州一师毕业的进步学生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唐公宪等担任教师。这所学校免费招收100多名农民子弟入学。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正式开学。在开幕式上，颁布了《衙前农村小学宣言》。宣言大声疾呼：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么？9月27日，在衙前村东岳庙召开全村农民大会，正式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农民协会。会上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宣言提出：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章程规定：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大会推举李成虎等6人为农协委员。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迅速波及到周围的农村。1921年秋冬，附近七八十个乡的农民，以衙前为榜样，先后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捐减租斗争。这一年，肖山许多乡村农民都交了6折的租。12月18日，正当各村农民代表在衙前召开减租大会时，绍兴官府派出一营军队包围衙前东岳庙，打伤农协积极分子数人。随后又逮捕农民领袖李成虎等，用武力强行解散了农民协会。李成虎被捕后，于次年1月24日死在狱中。衙前农民运动虽然被敌人镇压下去，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中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它揭开了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页。1922年6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记载："浙江方面组织八十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

材料：

- 萧山衙前最早燃起的农运之火
- 沈玄庐与衙前农协
- 浙江萧山县衙前农民协会宣言
-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材料一 萧山衙前最早燃起的农运之火

1921年秋至1922年春，发生在浙江的以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

衙前是萧山县境内浙东运河边的一个农村小集镇。这里河港纵横，交通发达，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是鱼米之乡。可是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农民深受地主的剥削压迫。

1910年之后的10多年中，萧山绍兴一带水、旱、蝗灾频繁，钱塘江由于失于治理，大片土地被江水吞噬。农民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流离失所，卖儿卖女。

就在这个时候，沈定一回到家乡衙前。沈定一出身于衙前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沈江梅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曾在闽、台等地做官，在衙前置有大量土地、房产，是萧绍平原颇有名望的官僚地主。

沈定一在青年时代，就初具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任知县、知州时，他曾暗中资助过反清斗争，因被人告密，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时，他因组织"公民急进党"，进行倒袁斗争，遭到通缉。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沈定一和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陈公培、李达、沈雁冰等人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共党员。

沈定一对农民的疾苦深表同情，自1919年6月至1920年6月，他在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先后发表

100 多篇诗文，揭露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宣传农工神圣。他在文章中鲜明地提出："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占最大多数，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

沈定一回到衙前后，首先创办了衙前小学，作为农民运动的基础。在他的影响下，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徐梅坤、杨之华等革命者也先后来到衙前，协助和领导开展农民运动。

沈定一一面与革命者研究《共产党宣言》，讨论社会问题；一面身穿农民服装，口操方言，到群众中去演讲。他颂扬农民"生产能力的伟大比钱塘江水底源流还要长远"，他号召农民"赶快团结呀！赶快精密地组织呀！大地主总有一天会向你们投降！"

在沈定一等人的启发教育下，农民逐渐觉醒。其中衙前农民李成虎、李成蛟兄弟俩成了他的密友。李成虎家贫如洗，曾讨过饭。他虽已 68 岁，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深受村人尊敬，大家都叫他"成虎公公"。

1921 年春夏之交，正值青黄不接，一些米商任意抬高米价，农民十分气愤。沈定一因势利导发动农民与不法米商斗争，他选择的第一个斗争对象就是他的妻舅和他妻舅开设的"周和记"米店。

那天，沈定一号令一下，李成虎解下身上的大围身，系在竹杆上当旗帜，带领农民向坎山镇进发。他们捣毁了"周和记"米店后，又翻过莫家岭，经长巷，到瓜沥，继续与不法商贩斗争。沿途农民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农民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一些哄抬粮价的奸商，迫使粮商恢复了原价。

沈定一在家中还号召佣人罢工，出钱让他们到茶店喝茶，叫家里人自己动手操理家务。他还带头对佃户实行减租。为此，他曾和他母亲发生争吵。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说："沈家里原有很多土地和房子，他的母亲当家。他时常说不向农民收租，说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应用到农民身上。"

1921 年 9 月 27 日，衙前农民在农岳庙召开大会，宣告党领导下的全国第一个农民团体——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经村民们议定，农会通过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宣言声明："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民"，"土地是农民传播气力来养活人类的工具"，"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

"我们总不忘记世界上农作生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

章程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并阐明衙前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和减租政策。

农民协会根据章程规定，选出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瑞张为农协委员，李成虎为议事员。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萧绍平原。在短短一两个月里，西起钱塘江畔，东到曹娥江边，三四百里范围内的农民，都开始酝酿成立农会。当时的《民国日报》报道说："衙前农民协会既成立，绍兴、萧山各处响应而起的 80 多村，纷纷向衙前农民协会索取章程，而衙前所印刷的几千份章程，早已散发完了。"

即便如此，每天总还有几百人来到衙前，有的要见沈定一，有的要宣言、章程。当时沈定一在杭州出席省议会，李成虎劝大家回去团结起来，与地主干。

据浙江党史工作者考证，当时以衙前为中心，有 82 个村庄组织了农民协会。浙东运河两岸三四百里，数 10 万贫苦农民，为保卫自身利益，掀起了抗租减租的风暴。

衙前农民协会一成立，就作出了"三折还租"的决议，即按原定租额的三折交纳，并改大斗为公斗量租；取消田主下乡收租要佃户负担所谓"东脚费"；反对交预租，每年应看年成好坏交租。

这些规定，各农民协会纷纷效行，贫苦农民拍手称快，但地主却大为恐慌，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一次地主纠集 80 多条收租船，气势汹汹来到衙前，分头向佃户逼租，妄图以势压人。农民协会组织了近千名农民，向收租船投掷石块，高呼抗租口号，不让收租者上岸，迫使地主空船而回。

前梅村有个叫周仁寿的地主，往年下乡收租任意提高租额，稍不遂意，即将农民捆绑送官，农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年 12 月 8 日，他又带着一帮人到九曲乡清坞村收租。对农民协会的减租决议，他置若罔闻，坚持按一石四斗高额收租。农民协会领导人带领五六百佃农同他说理，他反而大骂农民，并喝令捆绑佃户。农民怒不可遏，打得他头破血流，昏迷过去。清坞村地主高云卿连忙叫人把周仁寿背进高家桃园躲藏起来。

周仁寿回到城里，立即到县公署控告农民协会，要官府查办肇事者。此事震惊了萧绍一带的地主豪绅，一时反动舆论大哗。

针对地主的反扑，南沙二三十个村的农民协会联合发表了《萧山南沙组织团体宣言》，控诉了几千年来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地主残酷压榨农民血汗的罪行。宣言重申："若地主不肯改良，仍然习惯起我地，逼我租，我们联合全体誓与他们奋斗！""我们从今天以后，具牺牲的态度，斗争的手段，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势力，叫他们有产阶级的人，在我们面前屈服！"宣言呼吁："无产阶级的人，大家起来呀！"我们的肉体可以牺牲，我们的精神却会永远存留！"

与此同时，正在杭州参加省议会的沈定一向当局提出质问案："如今饥饿的痛苦逼来，尚且不让农民喊一声痛，这是何种政治现象！"

衙前的农民运动，震惊了反动当局。他们派来大批军警，四下搜捕农会负责人，疯狂地镇压农民运动。

在这危险时刻，李成虎还在为减租东奔西走，他妻子劝他："别人进农会依旧做工，独你把身子都送给了农会，整天价连饭也忙得没工夫吃。现在风声紧，你也避避吧！"

李成虎爽朗一笑说："你懂得什么，这正是我该做事的时候。大不了，头落地就算完了，怕什么！"

12月27日，李成虎正在田里耜泥，不料几个密探盯上了他，一涌而上要抓他。他将围身往腰上一扎，毡帽朝头上一戴，说道："不要动手，我跟你们去！"

在萧山县知事审讯时，李成虎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衙前农民协会的议事员，是我主张组织农民协会的，我还是还三折租的倡导者，怎么样？"

知事恶狠狠地说："好，好！好一个农会的议事员，我赏你两副脚镣，还要你的性命！"

当即李成虎被钉镣收监。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前后与敌人斗争了一个多月。1922年1月24日，这位农民运动的先驱在狱中被凌虐致死。

在此前后，大批农会会员被逮捕，遭杀戮。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斗争并未结束。衙前人民把仇恨埋在心底，酝酿着更深的斗争。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斗争，他们隆重举行了李成虎烈士遗体安葬活动。他们请人画下烈士遗像，在风景秀丽的凤凰山安葬了烈士遗体。墓前立一石碑，上面刻有沈定一写的"李成虎君墓"和"衙前农民协会委员之一"，"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害于萧山狱中"的碑文。

衙前小学教师刘大白等，还写了《提起我的锄》、《每饭不忘》等歌曲，教给农民、学生唱，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农友们后来还围绕烈士墓，建造了东、南、北三条墓道。在南墓道的入口处竖起了一座高大的石坊，上面刻着两副挽联：

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头一个，
四山乱葬堆里之坟墓此外更无第二支。
吃苦在我，
成功在人。

农民们在农会经常集会的东岳庙内设立了"成虎堂"，正面挂着烈士的遗像，两边分别放着他用过的铁耙、铁锹，挂着许多纪念他的挽联。沈定一写的是：

为群众而牺牲，问耕耘不问收获；
振义声于陇亩，见锄锹如见须眉。

衙前农民运动不是孤立的运动，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到广大劳动群众和进步人士热情支持的农民斗争。当衙前农民革命斗争掀起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报刊，都及时地报道了有关消息和文章。《新青年》还全文刊登了衙前农民协会的《宣言》、《章程》，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选自《风云七十年》作者：邹爱国，薛建华）

材料二　沈玄庐与衙前农协

1921年夏，沈玄庐回到家乡——浙江肖山县衙前村。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肖山有名的地主，家产甚丰，在衙前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沈玄庐，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叛者，公然站在农民一边，回到家乡以后，主动在农村宣传革命道理，并多次公开表示不向农民收租，还说要把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沈玄庐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以衙前为中心，展开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作。8月，他来到肖山的山北地区，站在土地庙的戏台上，向附近二、三十村庄的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说。这天，沈玄庐头戴农民草帽，身穿土布衣衫，讲演中又使用本地方言，使在场农民群众感到十分亲切。他向农民说明了地主和佃户的剥削关系，提出"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底主权归你们掌握"，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才有活路。他接着又说："如今你们要求我发表根本的主张，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而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最后又热情号召"你们赶快的团结呵！你们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们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沈玄庐观点鲜明、通俗易懂的演说，在肖山农民中广泛传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农民组织在一个宣言中，对此事曾有如下记载："可怜我们乡民，已经人多地狭，还要被有产阶级剥削，使农民犹如泰山压顶，弄到无余钱盖房做衣，吃餐断顿，惨酷的情况，无可言喻。今年8月里，玄庐先生到我们北山村中戏台上演说，题目叫做农民自决，我们听了他的话，如见天日"。

这年暑假，一些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或教书的肖山人，也回到乡里。他们大多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思潮的熏陶，思想比较激进，对贫苦农民有深切的同情。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同样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介绍各地工农群众的斗争情况。这些活动使肖山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团结奋斗。

在广泛发动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肖山农民开始进入组织起来的阶段。衙前农民协会是肖山农民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当时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通常是从办工人夜校入手，通过识字，讲革命道理，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然后因势利导成立工会。衙前农民协会也效仿了这个做

法，在沈玄庐的帮助下，首先办起了衙前农村小学，作为筹建农民协会的准备。

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举行开幕仪式。这所小学只限于接收农民子弟入学，当时共有学生100多名，分五个班，免收学费，学习用品也全由校方免费供给。参加开学典礼的除教师、学生外，还有家长、附近的工农群众以及当地的士绅官吏。当场宣读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向旧的教育制度宣战，尖锐指出有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掠取无产者，而且还剥夺了无产者受教育学知识的机会，“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么？”接着，宣言提出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我们已经了解农村小学校经费底性质，已经改变掠夺劳动剩余的性质为自己使用的性质了。我们更了解农村小学校所施的教育性质，已经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为‘人底发见’的教育性质了”。

曾在衙前农村小学任教的杨之华，对于当时情况后来作了如下回忆：“1921年下半年，沈玄庐叫我到肖山办‘农村学校’。浙江肖山的农民运动，就从这个‘农村学校’开始的。‘农村学校’设在肖山衙前沈玄庐家，经费也由沈玄庐家负担，教员都是杭州师范出来的进步学生，有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我等（后来宣中华、徐白民都是浙江党的负责人）”。文献和回忆都表明，衙前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而且以多种方式宣传减租减息、抗捐抗税，讲解农民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了衙前农民活动的场所，发动和团结农民群众的中心。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农民协会的条件基本成熟。9月27日，衙前召开了全村农民大会，宣读和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并按章程规定，选举了六名农协委员，又推举贫苦农民李成虎为领导人。至此，我国新型的农民早期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

（选自《七十年史话》）

材料三　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农民协会宣言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民，可惜精神上的尊敬，被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毒水淹死了。

农民出了养活全中国人最大多数的气力，所有一切政费、兵费、教育费以及社会上种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消费，十有八九靠农民的血汗作源泉，而这许多血汗所换来的，只是贫贱、困顿、呆笨、苦痛。积了许多人的贫贱、困顿、呆笨、苦痛，才造成田主地主做官经商聪明的威福。

我们农民，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长大时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负担维持生存条件的牛马奴隶，老来收不回自己从来所努力的一米半谷来维持生活。人生少、壮、老，三个时代这样过度，这还好算是人的生活么？

天年丰收，丰收的还是田主地主，我们农民没有份；天年歉收，田主地主在收租簿上就记上一笔第二年该还的欠帐；农民今年正不知道怎样图明年的活，却叫农民今年预欠明年的债。乡镇上所有一切典当，杂货，米，布等铺户，又没一家不敲剥农民流剩的一点汗血。

一般第三阶级主政的世界，已经支持不住我们所需要的生活了。他们所崇拜的经济制度，发展我们的贫困，比发展他们的私有财产还要快。关于这种不良的经济制度所给的苦痛，农民和工人是一样受着的。照这样看来，他们第三阶级正不配做主权者。

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地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

大地敞着胸襟，欢迎我们下锄头铁耙造成锦绣，人人生活在这锦绣堆中，全仗农民的气力。农民在锄头柄上传播气力，才用得着土地，所以我们该认定“土地是农民传播气力来养活人类的工具”。

那么，这种工具不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么？在目下似乎这句话还很远的。

我们因为处在“这样，叫我们怎样活得过去啊！”的叹声中，权且定了一个眼前救急的章程出来。

我们终不忘记世界上农作生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

（原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材料四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一条　本村农民，基于本村农业生产者还租的利害关系，求得勤朴的生存条件。

第二条　凡本村亲自下气力耕种土地的，都得加入本会，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

第四条　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遇必要时，本会对于渠们的团体或个人，应当尽本会能力所及，加以扶助。

第五条　本会的组织，基于会员全体：由大会选举委员六人，为本会委员。又由委员六人中互选，选出议事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三人。委员一年一任，只得连任一次。执行委员，掌管本会名册及登记簿，执行由大会及议事会议决事件；并连络别村与本村同性质的团体。

议事委员会，议决关于大会所交议及会员三人以上所提议的事件。凡有利益于本会的事项，议事委员有考查提议的责任。凡本会会员有私人是非的争执，双方得报告议事委员，由议事委员调处和解；倘有过于严重的争执，由全部委员，开会审议解决。

大会召集，由会员五分之一或议事委员会之主张召集大会。

第六条　本会会员，月纳会费铜元二枚。每月一号，交由执行委员存贮应用。

第七条　本会会员，将每年农作所得成数，分春华、秋收两期，报告执行委员会登记。

第八条　本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由大会议决公布。租息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

第九条　本会会员，有因依照本会大会议决的纳租成数被田主地主起佃者，本会有维持失业会员的责任。如有因上项情事被田主地主送官者，本会全体会员皆为被告人。

第十条　会员不得违反本会的决议案。

第十一条　会员有违反本会决议案及有不利益于本会的行为者，除名。

第十二条　两村以上的农民协会，得组织农民协会联合会。

第十三条　凡是关于两村以上的农民利害关系发生时，随时可由联合会协议。议决执行。

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大会议决，大会能随时以多数同意修正。

这宣言和章程已经由衙前全村农民，于一九二一，九，二七，在本村议决，并举出委员六人。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也正在酝酿同性质的团结。

玄庐附记

（原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背景介绍

粤军回粤逐走桂系军阀后，陈炯明恃功而骄，视粤军为其政治资本，企图割据广东一省，无意于出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粤军是以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系当年国民党向桂系军阀力争得来，所以粤军是国民党的武力，个个不应居功，而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当继续北伐。由于他们的目的不同，感情距离日远，于是双方在军事实力上首先展开了争夺战。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陈以前属于国民党军人派，并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许则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因此许被称为孙的嫡系将领。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委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都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粤军第一军所辖原有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部，陈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所以第一军的实力远在第二军之上。为了扩充实力，孙中山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经常被陈派兵加以解散。

陈兼任陆军总长，却从不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他以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为了削减陈的实权，孙中山划广州为直辖市，任命孙科为市政厅厅长，不受省长的管辖。

一九二一年元旦，孙在军政府演说，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正式政府。这个消息发布出来，海外华侨国民党支部纷纷电请速选总统，陈却禁止广州各报登载有关总统问题的报道。为了拆穿北京政府“纸面统一”的假把戏，使它不能取得四国银行团的大借款，四月四日孙又大宴国会议员，公开建议速选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四月七日，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尚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骞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最后，非常国会采取“开快车”的办法选举总统，除废票一纸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在二百二十二票中以二百十八票当选总统。

孙中山于五月五日就总统职，当天除电劝北京总统徐世昌自行引退外，另有宣言指出：“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得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孙中山本来主张建立集权制的中央政府，与西南各省军阀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政府根本不同。这个宣言所谓“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是迁就军阀的意见，其目的在于减少他们反对总统的火力。其中加入了“各省分权于各县”的一句话，与西南各省军阀强调以省为自治单位的意见却又大有出入，这说明他是始终不赞成“联省自治”这个运动的。

材料：

- 孙中山回师广东
-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略

材料一　孙中山回师广东

一九二〇年七月，中山先生命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讨伐桂系，桂军战败，收复广东。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山先生

由沪抵广州，恢复军政府。嗣以北方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已丧失中央政府的资格，而法统不可一日中断，内政外交均需成立中央政府。于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国会非常会议决议，取消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五月五日就职，这是先生在广东第二次组织政府。六月，中山先生命粤、滇、黔、赣军进攻陆荣廷的广西老巢，击溃全部桂军，占领广西，两广遂成为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发表对内、对外宣言，提出了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和发展实业四大政治主张。对内宣言称："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本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对外宣言称："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契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利源，悉予开发，抱门户开放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与技术。"十月，国会通过北伐案，"以竟护法全功"。

广东已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拥有两广作根据地，军队除粤军陈炯明一部分外，其余粤、滇、黔、赣军都能服从指挥；并与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取得协议，南北夹击直系，北伐是具备了相当条件的。

据我所知，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段祺瑞、张作霖曾先后派代表要求与中山先生合作讨伐直系，这就是后来的所谓三角联盟。当时同志们认为，段为护法讨逆的对象，张是"红胡子"，直系卖国，皖系、奉系又何尝不卖国，所以对于联段、联张，不少人是怀疑的。中山先生解释："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我当引为同志。"又加以说明："与段祺瑞接洽系政略之运用。"大家也就无意见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山先生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第二年春出师湖南北伐。陈炯明即公开阻挠破坏，诱使湘督赵恒惕反对假道湖南，中山先生乃免陈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以示惩戒，但仍保留陈的陆军部长，以促其悔悟；并改道江西，移大本营于韶关。

(摘自《文史资料选集》第26期)

材料二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略

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我虽老病侵寻，亦愿强起执笔而略纪当时经过。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十月，援闽粤军奉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命，自闽回粤驱走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中山先生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旋即自沪返粤，决心以广东为根据地，出师北伐。当时陈炯明及其所部将领(邓铿、许崇智等除外)阴持反对，其是理由是：(1)粤省一隅之地不足以敌北京政府及其所属军阀；(2)联省自治可以相安而进于长治。实则若辈欲苟安于粤而初无远见大志也。中山先生极不谓然，曾集合粤军在省官兵演说，晓以大势，并谓中国如欲富强康乐，必须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同时还分析了北伐必可成功之理由。中山先生随又个别召见各将领，详加晓喻，各将领皆无词以难。中山先生以北伐必先正名分，以堂堂正正之旗鼓以与北京政府抗，更足以树风声而资号召，于是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由国会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授予北伐全权。正筹备就职间，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陈炳焜发出青电(四月九日)反对。陈炯明便以此为借口，谓力量不足，不宜北伐，认为目前如抽兵北伐，桂军必将收集余部反袭报复，更不宜就总统职以树全国之敌。中山先生乃亲至省长公署向陈炯明当面解说。陈炯明答容考虑数日并与各将领商之。越数日，消息杳然。当时余任粤军总司令部及省长公署参议，每天与参谋长邓铿、政务厅长古应芬及秘书黄居素陪陈炯明同桌用膳，遇事间进说言。尤其邓铿于孙、陈间多所弥缝。一日，中山先生召余询问究竟，余答陈炯明仍无决心，似有畏怯患失之意。中山先生乃曰："我由国会选出为大总统已逾半月，决不能不就职，形同儿戏。尔告竞存(炯明号)，我必须于四月内就职。"余谨述以告炯明，炯明蹙然曰："我已商之各将领，皆谓中山先生必欲就任大总统，亦不过是一时的广东总统而已。万一北京政府及邻省借词出师声讨，我等实难负战守之责。"云云，言下似有恐吓之意。余当时闻此，窘极，只得回复中山先生，略谓：竞存意仍请稍缓，俾其饬所部于粤桂边境布防就绪，再行奉陈(其实当时部署进攻广西桂系已将就绪，不日下令总攻)。盖余实欲以此婉转之词，稍迁延时日，留磋商余地耳。中山先生乃曰："我被选为大总统，举国皆知。只要我一出师，长江及华北军民甚多欢迎归附者，北洋军阀决无力来犯粤省，桂军残部惩于侵粤之败，那还敢再向粤谋，请竞存放心。我必须于本月内就职并速行北伐。成功自不用说，万一事败，则我出走，粤省任由竞存去和人家妥协，我可不管。这样好吧？"余复将中山先生切直的话原原本本转告炯明。至此，炯明亦再无词可推。次日，炯明乃语余曰："中山先生必要做广东总统，请其于五月五日就职如何？盖距国会选出之期亦尚未逾一个月。中华民国国庆为'双十'，今孙总统就职为'双五'亦是恰好之纪念日也。"余遂走报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微笑，徐曰："我是广东总统，竞存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广东谚语)，我遵命就是。"遂定于"五五"就职。是日举行阅兵典礼，仅有粤军第一师邓铿所部参加(第二军许崇智部驻北江一带，其他各部队亦多已开赴粤桂边境前线，故概未参加)，由该师

旅长梁鸿楷任指挥官。师长邓铿随同大总统检阅。炯明借故未到。余当时在场目击，心窃讶之。不图次年三月乃有邓铿被刺之恸。中山先生在桂林闻耗，遂决定改道北伐。行抵肇庆，下令免陈炯明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职，另命伍廷芳为广东省长；裁撤粤军总司令部，所有粤军统由大本营直辖。仍留炯明陆军、内政两部长职，以策后效。炯明愤走惠州，阴令叶举率驻桂粤军东下。盖此时炯明已与洛阳吴佩孚、湖南赵恒惕通，故未几遂有乘北伐军攻克赣州之际而发生六月十六日围攻总统府、请孙下野之叛变。中山先生登军舰，击叛军，苦斗两月，直至闻得北伐军许崇智部回师戡乱不克而转攻福建，始离舰赴沪。一九二三年一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梁鸿楷等白马会议，率部东下击走叛军而克广州，中山先生才复回粤就大元帅职。其后中山先生躬自东征北伐，竭蹶两年多，功未竟而卒病逝于北京。呜呼！可哀也已！

（摘自《中华民国史资料选集》第14期）

湘鄂战争

背景介绍

湖南自谭延闿被逐下台，程（潜）派军人被一网打尽后，赵恒惕利用"自治"招牌宣布保境息民，一面与川、滇、黔、粤四省军阀组成了"联省自治"阵线，一面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鄂、赣两省建立了联防条约。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方挟西南以自重，首先必须拉拢湖南，而湘军必须向湖北购买军火，湘米出口也必须经过湖北，所以双方的关系拉得很紧。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是反对湖南"自治"的，但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军阀，没有余力同时对南方作战，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局势，以阻止孙中山北伐，对他颇为有利，所以对湘军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湘军所患者只有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而孙受制于陈炯明，陈、赵之间建议了秘密联盟，这方面也就有恃无恐了。

一九二一年春天，长沙发现了一批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士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请愿撤换王占元外，并推荐作宾、孙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他们在湖南散布空气说，湘军"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自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1)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2)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3)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孙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一百箱、步枪二千支、军米二千石、现洋二十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王占元虽然感到惊异，但他相信湘军既已出动"援桂"，就不会出动"援鄂"。七月四日，又赠予湘军子弹六十万发。

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适有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要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赵就叫他乘便征求吴的意见。葛去后久无回报，赵又加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只见吴每天忙这忙那，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鲁诸将抢先一步把萧找过来，叫他用假情报回答"老总"（指赵），说吴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

七月二十日，湘军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推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湘军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孙庚为政务院长，夏斗

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湖北自治政府发表宣言，驱王后借镜湖南制订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同时湘军发表宣言，驱王后"鄂事还之鄂人"。

材料：

· 湘鄂战况

· 湖南援鄂军战争写真

材料一　湘鄂战况

一、羊楼峒之役，民国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午前三时，鄂自治军司令官夏斗寅所部，由路口铺、五里牌出发，进攻鄂境羊楼峒，即与鄂军在羊楼峒以北约六华里某地接触。约两小时，夏军进前三里，误触地雷，轰毙百余人，而仍奋勇前进，激战甚久，鄂军力渐不支，纷纷后退。夏军即进拔羊楼峒要隘，该站站长魏伯衡及鄂军兵站当移驻羊楼峒后方。是役鄂军死伤约五六百人，损失军用品亦多，而夏军死亡者，亦颇不少。时在七月卅一日。

二、赵李桥之役，夏斗寅于攻拔羊楼峒之明日，即又向前盘进。惟时鄂军团长潘守桢实勇敢善战，故湘军连击不得逞。后潘守桢以天气炎热，不便作战，又南风势劲，每发弹非难于命中，则不能及远，因定计深夜袭攻，意在一举荡平。不料事为鄂人所知，以恨王占元故，泄其事于夏斗寅，夏遂严阵以待。潘军至，湘军佯败十里，及至朱鹤镇，左右伏兵齐出，潘中流弹毙命，兵士死三百余人，其余缴械投降。鄂军受此大挫，遂退走八十里。羊楼峒险要已失，赵李桥亦不能守，鄂军大本营遂麇集于蒲圻县城矣。原此次湘军致胜其因有三：一诸军芒鞋斗笠，取广西军装束，颇得轻便利益；二、连日南风大作，湘军每发弹，中敌者颇多；三、湘军敢于猛进，虽手臂断折，锐气不稍馁。然湘军之死亡者，亦共达千余名。

三、进行中之双方军事变化，鄂军第一防线被冲动后，孙传芳电省，略谓"天气酷署，我军水土不服，死亡枕藉，兼以南风过大，御帮颇感困难，特令退出羊楼司待命，请速派队前来助战。"王占元得此警耗，大为愤怒，即欲将孙传芳调回，护理督篆，亲赴蒲圻前线。嗣以人多阻劝乃止。比晚，即电令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总司令，蒲通镇守使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王都庆为右路司令，第二师第四旅长张俊峰为后路司令，第二师第八团团长穆恩棠为游击总司令，并令前线各军，一律改取攻势。

湘军援鄂，原定：自岳、临进攻蒲圻为中路，以驻湘鄂军团为先锋，并湘军一、二两师之各一部分担任之；自平江进攻通城为右翼，以第一混成旅率同铁道警备担任之；自澧县进攻荆沙为左翼，以一师骑团及第八混成旅担任之。自八月三十日后，于三路略有变更，除右翼仍旧外，左翼则令其暂取守势，而将中路分为二支：一出临湘沿铁路进行者为中路，以刘铏及邹序彬两旅担任之；一出临湘沿江而下者为左翼，以唐生智、贺耀组两旅担任之。

四、赵李桥之失守与克复，湘鄂军队，自七月二十九日在羊楼司接触后，激战四昼夜，双方兵力均疲顿万状。二日，即行休息。三日午，鄂军方面，加入近畿二师三旅六团全部生力军。湘军前方，亦增加兵力，故续行接战。是时湘军枪枝缺乏，每五人仅有枪二枝，加以大雨之后，北风颇劲，作战不易，而孙传芳则督队猛进，并斩退后营长郭某一人，徇于三军，以故激战数小时，卒败湘军，收回赵李桥、霸王山等要隘。而湘军则退扼羊楼司待援。五日，双方复行开火，湘军由总指挥宋鹤庚亲在羊楼司督队进攻，夏斗寅亦亲冒矢石在前指挥，士气百倍。近畿第十八师残部，此时均成强弩之末，虽有赵李桥高山险隘，与精利枪炮，亦不耐攻击，即行退走。是役湘军进追数十里，前所失地均被恢复。鄂军退至茶庵岭，扼险死守，因该处驻有靳云鹗所部经八混成旅全部，故湘军未敢即进，然其头道防线已迫近蒲圻矣。

五、进攻蒲圻之役，鄂军既退茶庵岭，湘军复乘战胜之威，率队攻之。适大雨滂沱，路滑泥湿，北军步履不便，又不谙地势，以故大挫，弃茶庵岭而走。是日宋鹤庚所部之第一团团长郑鸿海，率领全部，亦向北军第一旅孟昭月挑衅。孟旅长当命第二团团长陈煊恺，以炮兵一连，在茶庵岭附近荆港铺、韩家山等处迎战，约二小时，北军不支，团副顾学志死焉。孟闻该团失利，又加派第一团二营，前往协助，湘方郑团亦猛力抵御。已而，夏司令斗寅所部第二梯团之第三营营长杜启荣，率队向北军东路要塞音峰岭，绕道金钱脑，奔攻陈团之根据地，战二小时，北军炮兵连长翟连辉先遁，所有炮兵亦弃械逃。南军乘胜追击，多所俘获。时陈团所部见炮兵败退，亦无斗志，节节反却。荆港铺、韩家山遂为湘军所占领。是时蒲圻北军前敌西路要塞紫金山亦为宋鹤庚所部关健仁营所攻夺，驻守该地之刘跃龙之补充三营，悉远溃，死者亦过半数。七日下午三时，夏斗寅入蒲圻。

六、汀泗桥之役，蒲圻失后，湘军中路左翼，又连陷沔阳、嘉鱼。北军守将，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所部，退至离省六十里之金口，至是中路鄂军，已成不可收拾之势。而夏斗寅率师迫之，又胜于中伙铺。北军退守汀泗桥，时是地为鄂军之第一防线，由靳云鹗所部驻守，待援集后，再改攻势。当南军渡江时，值水涨溢，而北岸军队麇集，枪炮林立，极难得手。因绕道上游，令金华衮所部，各持白刃浮河而渡。北军望见，开炮轰击。夏斗寅复率敢死队随后助战，前仆后继，卒登彼岸。是役计夺机关炮四尊，而军队之死者亦甚多。北军以势不支，退驻离该桥五里，以待援兵。计汀泗桥距武昌仅五十余英里，且平坦无险，实无再战之余地。惟是时湘军既已疲备，援鄂之直军又源源而来。以

故不能一鼓而荡平武汉。且由湘鄂战争忽变而为湘直之对垒。

七、右翼及左翼之战况，先是湘军左翼，原取三路并举计划，旋于三十日后，忽变方针，暂取守势。以故八月初，尚无激烈战事。未几孔庚、唐荣暘等以中路节节胜利，亦由牛浪湖进攻公安。时公安驻有重兵，战辄不利，乃改由华容县属焦山，以迫石首县之调弦口，转战二日，下之。旋又退据塔市驿，扼河而守。北军第八师长王汝贤闻之即派兵一团，助防石首。久之，王军渐不支。而时驻宜昌之赵荣华部，以被川军牵制，亦不能下驶救应，故王汝贤于此时，惟有乞援之一途。乃南军乘其战胜之威，复进击公安、石首二县，连陷之，益进窥沙市。及直军云集鄂渚，佯倡和议，左翼之兵乃暂守不攻矣。右路崇通方面，湘军以金华衮作前锋，叶开鑫为后应。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初尚竭力抵抗，嗣因士卒畏战，渐形不敌，通城要隘之新店，忽被湘军占领。八月四日，叶开鑫率所部亲冒矢石，挥军猛进，剧战竟日，乃将通城完全占领。未几通山、崇阳二县，亦悉被湘军攻陷。崇通镇守使刘跃龙所部之第二混成旅，死伤溃散殆尽。八日刘携残部百余人返武昌，王占元即令其仍回咸宁收拾残部。然已难再振矣。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二　湖南援鄂军战事写真

此次湖南援鄂军战争之剧烈，殆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惟外间传闻，间有不得其真相者，记者亲随行军有日，凡一切战况，皆所目击，见闻较为确切，略将开战以来战况之梗概，再陈述于同业诸君之前。

援鄂军发动之主因，盖湘省为首倡自治之省，原以“联省自治”为主义，欲贯彻此种主义，遂不能不藉武力以排除为此种主义之障碍物。故南援桂以逐陆（荣廷）助桂自治，东援鄂以驱王（占元）谋鄂自治。此湖南今日之战，盖为“联省自治”主义而战，非为争城争地以战。

援鄂军之编制，援鄂之编制计两军：九纵队、一总预备纵队、四混志旅、又鄂军一梯团、宪兵两营。湖南援鄂联军总司令赵恒惕，湖南援鄂联军总指挥兼第一军长宋鹤庚，湖南援鄂第二军长鲁涤平，第一纵队长贺耀祖，第二纵队长唐生智，第三纵队长刘铏，第四纵队长邹序彬，第五纵队长叶开鑫，第六纵队长陈嘉佑，第七纵队长张辉瓒，第八纵队长谢国光，第九纵队长吴剑学。总预备纵队司令赵钺，第一混成旅长罗先闿，第二混成旅长陈渠珍，第三混成旅长田镇藩，第四混成旅长唐荣阳。鄂军梯团司令夏斗寅，宪后司令王得庆。

布置及作战计画，以羊楼峒、蒲圻、汀泗桥至武昌为正面，以通城、通山、崇阳、咸宁为右翼，以公安、石首、新堤、嘉鱼一带为左翼。以羊楼峒、蒲圻为第一期战争，以武昌为第二期战争，以武胜关为第三期战争。援鄂军主力军全集于正面及右翼，因左翼为长江天堑，无海重〔军〕作战，陆路虽得嘉鱼，终不能出京口之险，故左翼仅一纵队占缀而已，非所重也。

驱王时代之血战，七月二十九日援鄂军与王（占元）军开始攻击，一战而克羊楼峒，王军总指挥孙传芳、团长潘守蒸，乘车向羊楼峒及赵李桥退却，援鄂军遂追攻羊楼峒。羊楼峒皆崇山峻岭，面积约十余里，实为天险，重以孙传芳骁勇善战，约集两师三混成旅之重兵，骈力扼守，分火线为五道。每道皆挖深濠，排列机关枪，杂以大炮拒敌，使非精锐勇猛之湘车，安能破其万一。援鄂军以三十日为总攻击，以第二军全军及第一、二两纵队，鄂军一梯团并总预备纵队之一团，同时由正面向该峒王军攻击，一昼夜，无胜负。三十一日又猛攻一日，仍无胜负。然两军互有死伤，援鄂军以王军顽强，乃大愤，各军官长会议决计用白兵战斗，（即以刺刀相刺，血肉相搏）并宣誓不破此峒，不回营。宋总指挥壮其议，遂于是夜三时，全军以白兵冲锋，杀声震天地，王军以机关枪与大炮横扫，而援鄂军持枪乱刺，不顾一切，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遂一鼓而夺王军山头五座。无如王军亦复猛勇反攻，援鄂军大创，幸援军至，又败王军，如是反复攻击，血肉相搏者三昼夜，王军死伤近五千余人，伤旅长孟月昭，亡团长潘守蒸，营连长闻伤亦复数十人。洵可谓数十年来未有之剧战矣。宋总指挥以正面攻击损失过巨，遂用包围攻击，适右翼第五纵队及鄂军已克通城，第六纵队已全部加入火线，乃令第五纵队包围峒右，以第一、第六两纵队包围峒左，惟峒左之石山、关山、船形山及赵李桥，又皆险隘，而赵李桥为孙传芳总指挥所驻，闻其在此道火线者之兵力，亦不下万余人。宋总指挥遂亲赴左翼督战，鲁军长则督师攻石山。亲放大炮，石山遂为鲁军占领。陈纵队长（嘉佑）攻关山，贺纵队长攻船形山，围敌一团缴械，陈夺关山渡河，直捣赵李桥。时鲁军长亦率师至，孙传芳乃斩关以逃，官兵死者以千计，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可谓惨矣。

至右翼叶纵队长亦同时占领大沙坪，以绕峒后，于是羊楼峒之王军，全部向茶安岭退。时援鄂军乘胜追击，遂连克茶安岭，王军向蒲圻退却，又追击至蒲圻，王军落水溺毙者约二百余人，被枪毙者约百余，伤者数百。蒲城与赵李桥之尸臭，至今犹须掩鼻。援鄂军乃追击至汀桥附近之五里而止，于是宋驻蒲圻，鲁驻中伙铺，石翼叶纵队长由崇阳攻咸宁，驻官埠，左翼时已占领新堤，而王占元之督军印绶，眼看为萧耀南夺去。适吴佩孚抵汉议和，驱王之战事告一段落，而记者亦有事至沪，至战吴状况详情容俟返前线时再为报告。

援鄂军退出嘉鱼新堤真相。

十六日以前，援鄂军与吴军正在商和，迨至十七日，忽得间谍密报，谓吴佩孚决计作战，其计划一面以军舰掩护陆军，自嘉鱼、新堤用军舰炮火猛力横扫我军，一方面

掘堤水以灌我军。赵总司令闻告，乃急令第一纵队长，所有左翼自、嘉鱼、新堤沿江之队伍，迅即一律向后退却，故吴军抵新堤，而援鄂军已全体登船，不战而退；惟嘉鱼援鄂军未及乘船，而吴军骤至，掘堤以灌，有无损失，刻尚难知。要之此次之退，纯战略上之计划，决非战术上失利也。

吴佩孚之残暴：

吴佩孚初不欲与吴占，以免地方重罹战祸，不谓吴佩孚残民以逞，且曰鄂人非取消自治政府，湘军非完全退出鄂境不可，否则即以武力对付，其横暴有如此者。既与自治军为敌，已属罪不可逭，乃竟敢于嘉鱼掘磁矶堤，复于咸宁掘拦江堤以灌援鄂军，庐墓为墟者数千家，人民生命溺毙者三千余人，鄂声撼天地，而吴佩孚方且快意，其残忍又复如此。先以提倡民治之人，而反对自治，以尊重民意而主开国民大会之人，而故残民命，人禽之判，吾人殊难加以批评也。

（摘自《民国日报》1921年8月28日）

华盛顿会议

背景介绍

一九一九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从巴黎回国后，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巴黎和约，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美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是美国在远东方面的主要敌人，日本在英、日第三次同盟快要满期的时候，竭力运动继续这个盟约，美国必须打破英、日同盟，才可以避免英、日两国联合的威胁。在军事上，由于日、美两国积极准备战争，引起了英、美、日三国的海军竞赛，大大增加了三国的财政负担。在经济上，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欠欧洲国家三十六亿美元的债务国变为战后欧洲国家欠它一百六十八亿二千万美元的债权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欧洲市场萎缩，美国生产过剩，不能不向远东扩张势力，夺取市场，以和缓本国的经济危机。在中国问题上，亲日的皖系军阀已被亲美的直系军阀打败，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受到限制。根据这些情况，一九二一年四月，美国上议院议员波拉建议召开英、美、日三国会议，讨论停止海军竞赛问题，这个建议五月获得通过后，美国新任总统哈定便于七月向中、英、日、法、意各国非正式交换意见，打算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

此时，日、美两国的关系颇为紧张，日本皇太子裕仁到伦敦运动日、英继续同盟，英国政府为了要保全在中国和印度的利益，准备予以接受。但是，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日本形成对立，反对继续这个同盟。当英国政府摇摆不定的时候，美国必须及时地采取措施来破坏这个同盟。

七月十日，美国发出了致英、日、法、意四国的照会，建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限制军备的会议。由于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与限制军备有关，美国建议邀请中国参加，各国政府都同意了。日本提出有条件的参加，在七月二十六日答复美国的照会中，希望事前能够了解会议所讨论的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的性质与范围，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向美国政府接洽，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实际上中国问题是这个会议的主题，这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进行斗争的另一幕，美国企图通过会议，在国际均势的幌子下控制中国，粉碎日本的独占。

八月十三日，美国对以上五国发出了正式邀请书。十六日，北京政府正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十八日，北京外交部成立了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这样一来，不少中国人士又一次复活了对美国的幻想，以为两年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非由于美国坐视不救，而是由于日本与英、法、俄、意等国订有处分中国的密约，威尔逊总统陷于孤立，爱莫能助。这次会议既然由美国主动发起，开会地点又在美国，中国就一定能够取得美国的帮助，解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挽救过去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以前各帝国主义处理中国问题，并不邀请中国参加，而这次中国居然有资格参加大国会议，这是亲美派乐观论者的另一个论点。

材料：

- 太平洋会议讨论“山东问题”
- 美国的干预
- 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上大总统呈文

材料一　太平洋会议讨论“山东问题”

太平洋会议原定十一月十一日举行，因是日为欧战休战纪念日，改于次日正式揭幕，到会各国代表，计美国为许士·路德（Elihu Root）等四人；英国为贝尔福（Arthur J. Balfour）等七人；法国为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等四人；意国为司强曹（Carlo Schanzer）等三人；日本为德川家达、加藤友三郎等三人；我国为施、顾、王三人；另荷兰为柯尼碧克（Van Kornebeek）等三人；葡萄牙为阿尔戴（Viscountd, Alte）等二人；比利时为卡德（Cartier）一人。首由美总统哈定及国务卿许士相继发表演说，经英代表贝尔福提议，推定许士为大会主席，葛雷特博士（Dr. John W. Garret）为秘书长，并决定全体委员会有二：其一为讨论缩减军备问题，仅英美法意日五国参与之；另一为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与会九国均参与之，亦由许士担任主席，有关中国问题，均于此委员会中提出讨论（见贾士毅《华会见闻录》）。当许士致开幕词时，

对于裁减军备，为极明了具体之表示，各国代表咸为感动。而许士对于远东问题，亦有具体之计划，只以关于海军缩减提案，过于坦白，颇遭反对，因之中途取消，而怂恿中国代表自动提出。十五日晚间，美国务院忽通知中国代表，谓"明日之会，美国对于远东问题不能提案，请中国自提"云云。于是施、顾、王三代表及蓝辛、韦罗贝两洋顾问，于深夜十二时至三时之间，草成所谓十原则，次晨（十六日）未及斟酌，遂于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全体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由施肇基当众宣读，其译文如次：

第一，甲、各国约定尊重并遵守中华民国领土完全及政治上行政上独立之原则；乙、中国自愿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无论何处，割让或租借与无论何国。

第二，中国既极赞同所称门户开放主义，即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自愿承认该项主义，并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

第三，为欲增进彼此间之信任，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俾有机会参与外，不于彼此间订立直接关系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之条约或协定。

第四，无论何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各种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或享受特免之权利及一切成约，不论其性质如何，或契约上之根据若何，均当宣布。凡此项要求或将来所为之要求未经宣布者，均视为无效。其现已知悉或将来宣布之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或享受特免之权利及成约，当与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其审定有效者，并当一一融和，且与本会议宣布原则谐和。

第五，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自由行动之各项限制，应严重取消，或按照情形从速废止。

第六，中国现时之成约，其无限期者，概须附以相当明确限期。

第八，如有战争，中国倘不加入，则中国处于中立之一切权利，应完全尊重。

第九，应订立和平解决条文，以便解决沿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之国际间争议问题。

第十，关于太平洋及远东国际间诸问题，应预定将来会议时期之条文，以便按期讨论，而为签约各国取决共同政策之基础。

以上十原则，虽系匆促草就，但北京政府训条之主要提案，亦部分纳入。惟据代表团顾问黄郛之秘书袁同礼事后回忆云："此十原则系于夜间拟就，膺白先生及代表团高级职员，事前均未与闻。发表以后，莫不为之哗然。次日代表团举行会议，膺白先生首先陈述十原则之不妥，达二小时以上。关于第一条，膺白先生认为措词失当。盖中国既为独立国，则'领土的完整及政治的独立'，无须要求各国尊重及遵守。而'今后不割让领土'，文字尤欠斟酌。关于第二条，膺白先生认为最严重。盖'门户开放'为外人联合共同侵略之名词，今我方列为原则，则不啻正式承认，而范围较前扩大，由商埠而推及于全国，从商业而加入工业，似此不加任何条件之'门户开放'，将遗后患于无穷。此外各条除第四、第五、第六尚可差强人意外，均嫌空洞，辞句之间，待考虑首尚多。而全国以及全世界注意之实际问题（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毫未提及，凡表同情于中国者，亦莫不为之扼腕。但第一步既已失着，此外除在分条讨论力谋补救外，亦无其他办法。"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二　美国的干预

美总统哈定既出面干预，益增华府方面之压力，而美、英驻京公使复向外部积极劝说，于是颜惠庆无法抗拒，遂于二十六日以部电指示三代表接纳调停案，时为颜奉兼代阁揆之前夕，惟该电未为外交档案抄档录存，想已佚失。至是中日山东问题之会外直接谈判，自十二月一日开始，至一月三十一日整理各案就绪止，先后凡举行会议三十六次，而告全部结束。外部因于卅一日通电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省议会、津沪汉商会、银行公会、上海青年会余君日章，公布鲁案交涉结果如次：

"鲁案在华会协商，迭准代表报告，各项问题，几全解决。计已议定者：（一）胶澳租界完全交还中国。（二）海关全归中国管辖。（三）德人在山东之优先权，日本一律放弃。（四）公产原属中国及德国者，无偿归还；日占时获得或建造者，酌给原价数成；道路、自来水、公园、沟洫、卫生设备，全部交还；电灯厂、屠宰场、洗衣厂，交还市政局后，招商承办；电话收归官办。（五）中国允将胶澳开作商埠，准外人自由居住、经营商工业及其他合法职业；日本允不设置专管或公共居留地；德租日占期内，外人合法公道取得之物权，概尊重之；其法律上地位及效力，由中日派员会商决定。（六）济顺、高徐铁路需用资本，让归国际资本团承借；烟潍路由中国自行建筑，若用外资，亦由国际资本团承借。（七）胶济沿路军队宪兵，一俟中国派警接防，即行撤退；撤兵分段为之，尽三个月撤尽，至迟不得逾六个月；青岛守备队应于移交后三十日内撤尽。（八）青烟、青沪海线，除日本移用一部充青岛、佐世保海线外，均交还中国；又青岛及济南之无线电台，于撤兵日交还，由中国秉公给价。（九）德人所办之淄川、坊子、金岭镇三矿，交由中政府特许之公司承办，该公司之日本资本，不得过中国资本之额。（十）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以上十端，在我应得利权，业已收回，故即双方定议。

"惟胶济铁路，关系重要，两国代表，争持尤烈。彼初坚持历次主张之合办方法，几经磋商，始允放弃合办之主张，由我完全收回自办，但仍欲以该款作长期借款，任用日人为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等职。争持至十二月二十

日，始由中日代表拟有两种办法，各向政府请示。乃日政府仍坚持须订借款合同，多用日人，交涉因之停顿。嗣经英、美疏通，继续进行会议。旬日以来，专就筹款赎路及支付券期限两端，再四磋议，相持不下。近由英、美调停，提出最后折中条件，劝令日本让步，允中国以国库支付券赎路，由中国完全收回，派委局长管理；支付券分十五年清偿，惟五年后得次付清；又劝中国酌用日人，一为车务长，中日会计长各一员，均受中国局长之管辖，以支付券付清之日为度。现按三代表一月二十二日电称：'美许外长，英贝代表各奉其政府之命，正式劝告中国承受此议，以为日本已由合办让至借款，由借款改受支付券，年限用人，亦均逐次让步，若中国坚持年限之长短，及用人之正副，而致令全功尽弃，胶澳仍难收回，殊非得计，且恐机会一失，即欲开会重议，势亦有所不能。大会停闭在即，不容再有迟回'等语。驻京美、英公使，亦奉其政府电示，来部恳切劝告。

"查鲁案争执，悬搁数年，不惟全国上下疾首痛心，并为世界列邦注意瞩目。值此华会开议，解决可期，内而政府，外而代表，亦既殚竭志虑，深愿获竟全功，恢复二十余年既失之领土主权，以慰我四万万同胞之渴望。今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若听其业败垂成，终难达收回之目的，因即提出国务会议，郑重讨论，一致议决，再电三代表，为最后之争执。万一时不与我，竟无商量余地，亦只可就此定议，并照原议报告大会公认，以图结束。国内各界正在热心筹款，虽会期迫不及待，斯事非仓卒可成，尚盼积极进行，于最短期内凑成巨数，即可早日收回支付券，取销债务。至该路将来如何由国有改为民有，自应由主管机关从速筹备，以报全国筹款赎路之热诚。用将经过情形，据实电闻，尚祈亮察。外交部。三十一日。"

二月一日，中日议定之山东悬案条约正约十一节二十八条，附约六条，及会议纪录中之协定条件六款十六条，由太平洋会议主席许士，提向第七次全体大会宣读。四日，复经中国代表施、顾、王，日本代表加藤、币原、埴原正式签字。六日，远东九国公约亦在华会批准公表，会议遂告闭幕。

(摘自《中华民国外交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上大总统呈文

为呈报太平洋会议大概情形仰祈钧鉴事：民国十年六月六日奉大总统命令，特委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充参与太平洋会议全权代表此令等因，嗣由外交部领到文凭、训条、附件各等因，肇基、维钧、宠惠当即先后抵美，祗遵任事。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开幕，出席者中国、美国、比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国、日本国、荷兰国、葡萄牙国共九国。先由美总统亲致开会词，各国代表互致颂词。旋经主席美休外长宣布议事程序，将缩减军备、远东问题分股会议。窃查此次会议，除缩减军备我国暂未参与，此外远东问题关系我国十居八九，当时外交形势尚无把握，列国之间或狃于凡尔赛成约，冀遂其蚕食之谋，或借口我国内政方艰，欲渐肆其越俎之计。肇基等夙夜忧惶筹维至再，乃于远东分股开会之始，即提议原则十条。本国际公法之精神，示领土主权之有属，破势力范围之成见，杜秘密缔约之危机，因人道厌乱之同情，博世界提携之公论，上托大总统威信，内承院部维持，幸获列邦赞许，并列议程。肇基等乃得本此原则历提主要次要各案：一、关税自由；二、租借地之退还；三、治外法权之收回；四、撤去客邮；五、撤废无线电台；六、撤退驻华军队、巡警；七、取消势力范围；八、确守战时中立；九、取缔各国对华相互缔约行为；十、现有成约之法律上地位问题；十一、山东问题；十二、废止中日二十一条之要求。此外，各国代表提出者：一、罗脱四原则；二、维持中国门户开放主义及设调查局问题；三、劝告中国裁兵案；四、停运军火到华案；五、东清铁路问题；六、西比利亚撤兵问题。共计会议三十一次。决议条文，或定期施行，或委员调查，或彼此宣言，或订立条约，或由他国代表撤回，或待至将来续议。历年积案，告一结束。此远东会议之大概情形也。山东一案，尤为我国上下所痛心。巴黎和会竟拒绝签字于前，而中日互文又拒绝直接交涉于后。政府之焦劳已极，国民之想望可知。开会以后，迭次交涉。英美两国纵有相助之意，而与会各国皆因巴黎和约关系，颇受拘束，不愿与议。复经数次会外接洽。美政府竭力劝告，并宣布调停之意。遂将该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大会提及，旋由主席及英代表主张分组。鲁案会议，英美派员参加讨论。自此该案各项问题，与远东各案，并日开议，兼程并进。前后协议凡三十六次，所得结果：一、胶澳租界完全交还我国；二、海关全归我国管辖；三、德人前在山东之优先权，日本一律放弃；四、公产原属中国及德国者，无偿归还，日占时获得或建造者，酌给原价成数，公共卫生设备及公共营业，交还我国官办，或市政局办理；五、我国允将胶澳目行开作商霍；六、高徐、顺济需用资本，让归国际资本团承借；七、烟潍铁路，由中国集资建筑，若用外资亦归国际资本团承借；八、青岛及胶济沿路日军，限期撤退；九、海底电线交还我国；十、无线电台，于撤兵日同时交还，由我国秉公给价；十一、胶济沿路各矿，由我国特许之公司承办；十二、青岛盐场，由我国备价赎回。惟胶济铁路尤关重要，一因二十一条第一部分涉及此项问题，一因民国七年换文曾许无期合办。故日本坚持甚久，继犹要求借款付价。历经磋商，几至停顿。后仍以友邦劝告斡旋，其间始得以库券赎路，由我国收回自办。库券定五年后，可全行赎清。赎路期内，酌用日员二人，全归我国该路局长节制，以偿清库券之日

止。现在全路日员，可以随时撤退。其余节目覼缕备详，订为专约。经函达大会主席美外长，报告大会备案。此鲁案协议之大概情形也。山东条约由肇基、维钧、宠惠于本年二月四日会同日本代表，彼此签字；复由主席报告大会。其余关税条约、九国协约，于二月六日分别签字。仍由美总统亲临演说，举行闭会仪式。除议事报告咨送外交部外，理合将会议情形，具文恭陈。再，前奉训条内列英日续盟业已废止，又蓝辛石井协约，亦已无形消灭。合并呈明，伏乞大总统钧鉴。

顾维钧
参与太平洋会议全权代表施肇基　　谨呈
王宠惠

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上）》）

社会主义论战

背景介绍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候，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在中国各自找到其存在的阶级土壤，得到流传。这种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情况，反映新旧民主革命交替时期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政治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指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去观察国家命运，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不但遭到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迫害，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安和小资产阶级的非难。于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论战。

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第一，否认真理的普遍性，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出要“把一切‘主义’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第二，宣传一点一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说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认为卖淫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等等，都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抛开这些具体问题高谈社会主义，去求“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它打击了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污蔑，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广泛传播的思想阵地。

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张东荪，一九二〇年十月间曾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他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十一月六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成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宣言。十二月间，他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他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一九二一年二月，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也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其他研究系分子发表了一些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言论。

在这次论战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驳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动谬论，而且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虽然他们还不可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步骤。但是，他们毕竟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坚持要成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正在进行中的建党工作的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一九二〇年开始的，而以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最为激烈。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黄凌霜及区声白等人，他们以广州的《民声》与北京的《奋斗》等报刊作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材料：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
-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材料一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

“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

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种教训吗？”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个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我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的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不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查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

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摘自《每周评论》第31期　胡适)

材料二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东荪我兄:奉书及大著"现在与将来"稿本,诵悉一切。承征鄙见,仆方麋精力于他种著述,对此问题,不能有刻入详尽之解答,谨拉杂略述所怀:

我近年来,对此问题,久在彷徨闷索之中,欲求一心安理得之途径,以自从事,而苦未得。所谓闷索者,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之利害与之相缘。而权衡利害,避重就轻,则理论乃至纷纠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为,今勉强截断众流,稍定祈向,然终未敢自信也,谨以质之执事。

……

至于对游民阶级,吾以为惟当尽力设法,使之农渐豹变为劳动阶级,然后与之共事。当其未豹变以前,则宜勿与为缘。若利用游民以行社会主义运动,结果必至毁灭社会主义何也?

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能增加游民。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也。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夫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夫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刮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必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簿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运动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

综括以上大意,其所推论事理之要点如下:

一、非奖励生产事业,则全国人非久且瘵死,更无何种主义之可言;

二、奖励生产事业之结果,资本阶级必发生,其相缘之毒害亦随而发生;

三、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

四、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

五、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运动之前途,无益而有害。

根据以上事理以为吾辈今后进行方针如下:

一、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在现行经济制度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二、极力提倡协社,使尽量分取生产事业,以移入公众之手;

三、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

以上所论,不知能否对于尊论有所发明补正?仆对此问题之解决,今犹在苦闷求索中,殊不敢自谓有真知灼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耳。

(摘自《改革》第37期　梁启超)

材料三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这确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的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陷于盲从。而且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而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皆可同时发展,以待最后之决胜。所以我说现时讨论的人越多,越是好现象。

"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文字均有点研究,我读了非常感佩。但是这儿篇文字之中,也有误解社会主义的,也有同情于社会义的,也有积极赞成资本主义的,也有恐怖伪劳农主义的,我觉得这种地方,却也应该详细研究分别讨论。只是我没有许多闲暇作从容的论辨,所以只就梁任公一篇代表的文字,讨论一个大概。

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很多,我只举出最重要的三种;一为议会主义,二为劳动运动,三为直接行动。这三种手段,究竟那一种宜于中国,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先就议会主义说。议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想借立法机关,成立改善劳动地位或矫正资本阶级的法案,慢慢的改造社会。这种手段,没有多大的效果,我们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先例就知道了。社会党要和作对的资本阶级在议会中妥协,试问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么?不过要求资本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欧美各国社会党,得了多年的经验,受了俄国革命的提醒,多能觉悟到议会主义已经破产而倾向于有效的争进的方面了。

再说劳动运动。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大的武器。可是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而不是全部,社会党若专

靠行劳动运动,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工会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是劳动者学习支配管理生产机关的教场,学会了组织训练,准备组织劳动者的国家。可是不能利用罢工的手段来举行革命。因为举行总罢工实行革命,劳动者非皆有相当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劳动者既然有如许的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要实现新社会了。然而事实上决不能与理想相合的。所以劳动运动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

现在说直接行动。现代各国进步的社会党都觉悟了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都晓得采用了。直接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直接行动,可分两种,一种是劳农主义的行动,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

我的讨论说完了,现在我把这篇讨论文字的大旨,简单明了的条陈于下:

一、中国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

二、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的经济的解放,作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

三、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四、万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向无产阶级磨牙吮血,则采必死之防卫手段,力图扑灭。

五、联络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图巩固的结合,为国际的行动,与世界资本阶级的国际行动相对抗。

为达到上列的计划,采必要之运动手段:

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

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

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

(摘自《新青年》9卷1号李达)

历史内幕

中共"一大"实录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1921年夏,法租界贝勒路李公馆楼下餐厅,一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十五个人。

晚八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十五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集在一起。

餐厅里点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那花瓶原是李公馆主人李书城和薛文淑几个月前结婚时置的。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二十四岁的他,比那两位三十一岁的"二李"活跃,富有交际能力,主持大会。"二李"是主人,反而没有主持会议。

张国焘在报告了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谈了四点意见:

"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正

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这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

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马林非常强调地指出：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共的代表们在捉摸、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不言而喻，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当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还说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说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毕之后，尼科尔斯基致辞。

大约由于语言关系，也由于毕竟年轻，尼科尔斯基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大概这番话给中共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至后来误传他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尼科尔斯基讲毕，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黝黝的夜如墨染一般。这是中共"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一次会议。

在这黝黝的暗夜之中，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然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

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李公馆，尚不得而知。不过，李公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却是事实……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可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好险！代表们刚刚散去才不到10分钟，"李公馆"便处于密探们的包围之中。

3个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闯进了李宅，只见李汉俊与陈公博在楼上抽烟聊天。

他俩受到盘问，除了问他俩自己的身份之外，详细问及那两个外国人。李汉俊答道："他们是英国人，北京大学教授，暑假中来上海，常常来谈。"李汉俊既能讲英语又会说法语，答话滴水不漏，法国警官抓不着破绽。

警官们搜查李宅，大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搜寻暗

藏的枪支弹药，却忽视了抽斗里那张画满修改记号的中共党纲。

一无所得，警官和密探只得悻悻而去。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作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也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点二十五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两点五十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 7 点 35 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

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共“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之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7月28日，正值阴历6月24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只是相当于今日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是吴国，设置嘉兴县。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心，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624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两层楼的嘉兴车站，看上去像幢办公楼。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不直奔南湖，却领着众人朝嘉兴的“南京路”——张家弄(今已拓宽，改名勤俭路)走去。

张家弄里有个热闹的处所，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叫做寄园。寄园里有假山，有楼阁，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先在那里开了房间，为的是担心当天会议不能结束，有个过夜的地方。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鸳湖旅馆帐房先生代订画舫。

画舫，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

“租双夹弄的！”王会悟小姐很内行，她对帐房先生说出了租船的规格。

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定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帐房先生答道。

所谓“单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只有一条过道，表明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帐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定好了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吗？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定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从船头穿过小巧的前舱，便来到宽敞的中舱。

这中舱虽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

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

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上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甩掉了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的湖面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一尘不染，令人心旷神怡。

湖上的游船不算很多。偶而有画舫从近处经过，传来留声机的歌声，代表们便哗哗洗起麻将牌来。

将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斗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不在场，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过程不像往日那么激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这个党纲，便是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着疏漏之处。除了第十一条空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第九条、第十三条中所提及的“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实际上“下面”没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为引起争论，删去了“下面”的条文，以致造成前后文不衔接。

尽管仓促成文，这个党纲是中共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共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在南湖的那艘画舫里，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起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篇宣言未曾传世，迄今未能找到。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共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共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着手进行之际，湖面上忽地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们收起了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又起麻将来。

“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过，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未前来找“麻烦”。事后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局无关。

一场虚惊过去。选举继续进行，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果真，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6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节选自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中共“一大”的安全工作

1921年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动身来华，6月3日到达上海，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也于6月到达中国。他们同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建立了联系，商议及早召开中国共

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换意见，最后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李达分别写信函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出席“一大”，并寄去路费200元。7月中旬，各地代表陆续到达上海。由于会议是在反动势力集中的上海召开的，故此，为了保证安全不出事，有关负责同志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住址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精密的安排。

各位代表的住宿由李达负责安排，李达让妻子王会悟设法解决，因为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居住上海时间长，又会讲上海话。王会悟当时找到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30多岁，未出嫁)，向她借房子，说北京有个学术团体来上海，且贵校正值放假时期，希望租给他们住一段时间。黄绍兰听说是搞新文化运动的名流，就欣然应允。这样，当时除陈公博带着他的新婚夫人住大东旅社41号房，董必武住湖北会馆，何叔衡住湘益公寓，其余的代表全部下榻于博文女校的楼上。楼下，除了一位姓赵的厨师兼校役外，再无其它闲杂人员进出。关于开会的地方，则是选在望志路106号(原树德里30号)，同时规定每晚8—12点开会。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在上海召开，除来自全国各地代表外，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共计15人。7月30日晚8点，宣布开会不到半小时，突然有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人闯进会场，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警觉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改地点开会。”于是，各位代表匆忙分头走开。只留下房主李汉俊及陈公博。代表们走后不到一刻钟，来了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搜索了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搜到，只好不了了之，一窝蜂下楼去了。

撤出的代表们离开望志路后，陆陆续续地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是陈独秀的家。陈独秀去广州后，其夫人高君曼带着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住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汇集到这里。到了10点多钟，还不见李汉俊和陈公博回来，甚是着急，让包惠僧去探听情况。包回来后，将发生的情况转告一遍。于是，大家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下去了。有人想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提议去嘉兴继续开会。

7月31日一早，王会悟乘早班车前去嘉兴准备。除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马林、尼可尔斯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意，留下未去外，其它代表，三三两两到上海北站乘第二班去嘉兴的车，上午10点左右代表们到达嘉兴南湖。此时，王会悟早已租好了一条游船，把代表们迎上船去。为了防止意外，在游船上摆上了酒席和麻将牌，王会悟扮作歌女坐在船头负责望风。遇有小船游近时，王即用折扇在船板上敲一敲，里面就“一索”、“二索”地高声叫着，好象打麻将牌似的。那天下着小雨，船荡入湖心，游人也就少了，因而会议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游船中园满结束。

(选自《党史文汇》89年2期，作者：陈国清)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国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国留学，有人认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不想出国，这与他晚年的思想封闭有某些联系；还有一种可笑的充满现代迷信的说法：“毛泽东是真龙天子，他是条土龙，按照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他需要东海之水润泽，因此他取名‘泽东’，字‘润之’。”如此说来，毛泽东当然不能出国了。如果说前者属于对青年毛泽东的无知，那么后者则充满迷信色彩，毫无科学性可言。那么毛泽东为何未出国留学，可从他未赴法俄两件事中找到答案。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正赶上了1919年至1920年在中国出现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这个运动的发起，可追溯到1912年，在这年，由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去法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李石曾于1915年6月专门成立了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又成立了华法教育会。

在这个运动深深影响着全国青年的时候，毛泽东的同学和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三以及他尊敬的老师，当时43岁的徐特立在1919年至1920年纷纷出国。在这个运动中，湖南赴法留学工作，据毛泽东的同学们回忆，他出力最多。但是，毛泽东在积极组织、支持一大批青年出国后，自己却留在了国内，他为什么没有赴法勤国俭学呢？

第一，这与毛泽东“为了实现目的，天涯海角都要去人”的想法有关。

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特别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有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特别是毛泽东在这期间在北京接触了李大钊等人后，他认真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正在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时的毛泽东考虑问题就比别人要深一些、远一些。他认为：“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他还考虑到：“我们要想达到一种目的，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能’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阐述了这一想法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

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毛泽东送走他的好友和同学之后，他自己不想出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毛泽东是想暂不出国。

毛泽东为什么决定暂不出国呢？对此，他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因此，毛泽东想暂不出国，“暂时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他还列出了暂不出国的目的和好处。

他说：“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收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第三，毛泽东通过对法俄革命的比较，决定不去法国。

在1919年五四运动大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主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先进人士。特别是列宁代表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毛泽东通过认真研究，他认为：“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所以，他在《致陶毅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

以上是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赴俄留学呢？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先进人士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结论。了解、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成为当时中国先进人士的愿望。毛泽东同样有去俄国的机会。如果说他不想赴法的话，但他却决心赴俄。未能如愿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毛泽东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的学术大纲弄清楚之后再去俄。

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写的《致陶毅信》中表明自己不想往法，安顿往俄的想法。在信中他还说：“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谈到自己的打算：“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毛泽东还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

第二，毛泽东准备学好外语再赴俄。

毛泽东在《臻黎锦熙信》中说：“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他痛感外文有待提高。他说：“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第三，毛泽东在等中俄交通的改善。

俄国十月革命后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时并不稳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它进行武装干涉，旧沙俄的军队也发动叛乱，占领了俄国的远东地区。这样中俄之间的交通也就中断了。直到俄国远东共和国成立，并于1921年1月在赤塔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后，中俄的交通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曾说：“同住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既往。”

第四，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组建长沙共产党小组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繁重工作，使毛泽东的出国留学计划落空。

1920年6月7日，在《致黎锦熙信》后的几个月，毛泽东接受了陈独秀的委托，开始在长沙建党，并积极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蔡和森也于1920年8月和9月写信给毛泽东多次谈到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与时同时，在1920年6月以后，毛泽东还积极参加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了会章和宣言，被选为文牍干事；7月底至9月上旬，筹办文化书社；9月16日，又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9月至10月，参与组织长沙各界两万余人的自治运动请愿游行。这些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无法静下来学习，也无法实现留学的愿望。

在毛泽东《臻黎锦熙信》以后的一年零一个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后，毛泽东负责湖南党的工作，这样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只好放弃留学的愿望，而专心致力于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青年毛泽东不是不想出国，而是暂时不想出国留法；第二，毛泽东认为他的同志应该在世界各地都成为打先锋的人，因此他想留在中国这个“地盘”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情况；第三，毛泽东决心赴俄留学，但由于交通、语言等问题，他决定明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过一二年再去；第四，建党、建团等繁重工作以及毛泽东当时在长沙所从事的其他工作，使毛泽东赴俄的计划落空。

毛泽东没有去留学。但是，他出国的计划，留在国内的打算都是为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一目的。而他留在国内，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他毕生致力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作者：陈述，选自《党史文汇》）

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中共“一大”召开前，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一共有53名党员，其中有两名女党员。刘清扬是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缪伯英则是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的。缪伯英是我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其中一年因缪芸可赴日本考察教育，缪伯英在平江县启明女子学校就读）。1919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她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毅然中断在女高师的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由王光祈等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半读和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缪伯英在第四组。这个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思想的追求，脱离家庭和学校，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她们租赁了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但是，她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工读互助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失败。为此，缪伯英在女高师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陈独秀、李大钊等编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于是，她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是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小中、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1921年8月，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中老胡同5号。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相继兴起，缪伯英与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深入京郊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开办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他们还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她还在自己任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不久，她担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根据党的指示，她继续在京郊发动女工和工人家属参加工人运动，有时还去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发展劳动组合

书记部的基层组织。8月，她又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委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随后，她又驱车南下，帮助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以及赴湖北女师开展学生运动。一路风尘仆仆，在她返回北京时，因劳累而病倒。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立即投入斗争，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吴佩孚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广为散发。他们还及时赶赴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出色工作非常满意，曾称誉她是一个“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命令将他们缉拿到案，在女高师已临近毕业的缪伯英和李大钊各自走避家乡。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北京，回到长沙，后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这段期间，正值我国南方大革命运动的高潮。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她在会上发表讲话，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她领导的女师宣传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的机关移到女师附小内办公），这是她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公开身份。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附小主事的思想“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路旁观看者无不为之感动。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坐卧不安，立即对长沙实行戒严。“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有的爱国人士甚至遭到枪杀。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约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使一些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置。

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曾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并坚决揭露和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盛况空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发起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极大地振奋了湖南工农群众斗争的勇气。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祺瑞）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唐生智趁机倒戈，带兵进入长沙。3月11日，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不久，吴佩孚调集北洋军阀精锐部队南犯湖南。与此同时，北伐军自广州挥师入湘援唐（生智），又方鏖战激烈。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湖南民众起来响应国民革命。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被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同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他们夫妻平时聚少离多，此时添了一个男孩，也就添了几分欢乐。他们住在武昌东湖，又在一起战斗了。

（选自《纵横》92年5期作者：曾长秋）

国共两党党员最早的一次军事合作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这种合作关系反映到军事上就是两

党共创军校，共同北伐等。可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一场由国共两党党员共同领导的军事行动就已开始了。

1921年秋，孙中山平定广西以后，决定联络四川军阀，取道湖北，大举北伐。而湖北当时被直系军阀王占元、肖耀南把持。孙中山要北伐，首先就得和他们交战。另一方面，共产党刚刚成立，各项活动急于推行，故他们也要求推翻反动军阀在湖北的统治。这样，在共同的目标之下，中共方面派出了董必武，他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准备启程前往联络。适逢国民党人潘怡如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催促川军出师，于是，董必武就和潘怡如一道前往四川，行至途中，恰遇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和随军谋划的詹大悲按孙中山的指示，协同援鄂军由四川出师至巫山。于是，董必武就随部队指挥作战，辗转巴东、秭归、宜昌等地，直到9月下旬，鄂西军和援鄂川军由于孤立无援，粮尽弹绝，开始败退。退至巫山后，董必武受命于危难之间，代理鄂西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总司令潘正道等相继离队，鄂西军和施南一带的行政工作就由董必武、潘怡如等轮流负责。后来，由于四川军阀中途变卦，暗中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这样，董必武、潘怡如等无法在鄂西立足，被迫于1922年相继返汉，战事失败。但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两党党员四处奔波，血战疆场达半年之多。

几乎是与此同时，孙中山通过粤军将领何梓林与其堂兄、共产党员何叔衡联系，要求何叔衡利用他在湖南社会的影响，帮助他经过湖南讨伐北洋军阀。为此，何叔衡多次前往桂林、韶关、广州等地，会晤孙中山，廖仲恺、许崇智等人，详细介绍了湖南的社会情况和革命状况，并共同讨论了北伐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军事合作，虽然范围还不大，规模也较小，但却为后来两党之间实现全面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选自《党史文汇》92年11期，作者：王建武）

周佛海的蜕变人生

1948年2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个从中共一大代表蜕变成大汉奸的人最后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周佛海。

一

周佛海，又名周明繁，字子美，号佛海。湖南省沅陵县人。1897年，出生在福建莆田县。其父周菱九，举人出身，曾为曾国藩的幕僚，出任过福建莆田县署衙，后在当地禁烟运动中献身。父亲死后，周佛海随母亲回到沅陵老家居住。1915年，周佛海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沅陵第八联合中学。同年奉母之命与本乡一姓郑的姑娘结婚。女方比周佛海大3岁，是个俏丽贤淑的女人。在第八联合中学读书时，周佛海才思敏捷，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口才超群，是第八联合中学有名的学生领袖。他除出色完成各门功课外，还向一留学日本的蒋先生学习日语，这为他以后留学日本打下了基础。1916年，著名护国将领蔡锷在东京医院去世，消息传到沅陵，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作为学生代表慷慨陈词："我们要以民族英雄蔡锷为榜样，为民族复兴而刻苦读书，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拯救中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难道我们今后就不能出第二个、第三个蔡锷吗？"

1917年，周佛海因带头闹学潮同校方领导发生争执，导致被开除学籍。他告别妻、母，只身到长沙求学。到长沙后，遇到外地求学的数名青年，相互提供了些外省学校招生的消息，他们计议，决定去上海。在上海仍未找到门路入学，恰巧在客栈里遇到一个留学日本的湖南同乡，说在上海不能入学，不如去日本。于是周佛海与两个同乡一起来到日本。几经周折，他终于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后被分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在日本读书期间，周佛海接受了新思想、新潮流，并同一些进步的留学生参与新旧思想的大论战。写过《中国的阶级斗争》、《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等进步文章，有些文章被《新青年》杂志所采用。在留学生中小有名气。

1920年暑假，周佛海回到上海。因周经常向《新青年》杂志投稿的原因，受到陈独秀的召见，并将周介绍给尼科尔斯基。此时，正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周佛海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员，并负责起草了共产主义小组筹备工作计划。

暑假快过了，周佛海重又回到鹿儿岛学校。周在学生中，经常发表演讲，宣传马列主义学说，有的听众称赞周具有列宁的讲演风度。周飘飘然，领袖欲日长。

1921年7月，周正沉湎于竹下玉子小姐的柔情蜜意之中，突然接到陈独秀从上海的来信，要他速回上海。周事先已知7月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心想此次回上海，很可能就是参加会议。周匆匆告别竹下玉子，赶到上海，果真是要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作为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会，成为一大13位代表之一。会后，周经李达夫妇作媒，正式娶了一位湖南同乡杨淑慧小姐为妻，并将杨带到日本鹿儿岛；竹下玉子悄悄离开了周。同年，周佛海获得第七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1924年毕业于帝国大学经济系回国。时值国共两党合作，周走马上任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兼广东大学教授。他原想在共产党内

出人头地，没想到却在国民党内显山露水。他平时与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极右分子打得火热，思想上与共产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必须缴纳党费，周从不交纳党费，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却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多次发表反共言论。尽管如此，党组织多次对周进行耐心教育，周仍然我行我素。一天晚上，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工作，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周佛海仍一意孤行，并交了一份要求脱离党的辞职书。后经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认为周佛海思想上、政治上日益堕落，屡教不改，决定同意周佛海退出中国共产党。

二

周佛海脱党后，为向国民党邀宠，纠集一些反动文人，办了一个叫《社会评论》的杂志，发表文章，影射中国共产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广州一片混乱。周佛海一家避到上海，不久再赴日本。1926年3月回国，被聘为武昌商科大学教育长。北伐战争期间，周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兼任，张治中任教育长，因蒋、张很少到军校，故军校的工作基本由周佛海主持。

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由南昌到达汉口，次日召见了周佛海。周利用这一良机，阿谀奉承，博得蒋介石的欢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后曾一度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宁汉合流后，蒋介石重新上台。为了掌握舆论阵地，蒋特指派周佛海、戴季陶、陈果夫、邵力子、陈布雷五人在上海创办政治性刊物——《新生活月刊》，以周佛海为总负责。一时间，周俨然成了一个上窜下跳的理论权威，在月刊上组织发表了一大批反共反人民的理论文章，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3月，蒋介石在南京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经蒋介石安排，周佛海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周佛海替蒋介石起草了讨伐令，并为蒋出谋划策。蒋取得胜利后，便提拔周佛海为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这是周佛海仕途上的一次飞跃。

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此次大会，周佛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周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3年，周担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活动。1935年11月，周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周佛海为宋美龄出主意营救蒋介石。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握着周佛海的手说："佛海，夫人已经告诉我，你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很好，我不会忘记的。"后周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成为蒋的心腹幕僚。

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全面抗战开始。对中日战争，朝野上下有着不同的看法。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一部分人认为，战必大败，和能救国。到处散布与日和谈论调，无形中形成一个以周佛海为主的主张对日议和的小集团。人称这个小集团为"低调俱乐部"。在对日的观点上，周佛海与汪精卫可说是臭味相投，周多次亲临汪精卫家密谈，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谈解决中日战争，并商议由汪精卫出面，向蒋陈词，实现对日和谈的主张。

1937年底，蒋介石从南京撤退武汉，为制止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占上风，便根据周佛海等人的建议，决定成立一个暗中和共产党唱对台戏的灰色文艺团体——艺文研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研究会请了一些老反共分子，大肆宣扬反共降日的论调。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推选周佛海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自1937年底到1938年10月，低调俱乐部成员往返穿梭于香港、上海、武汉、日本，秘密进行着降日谈判。11月20日，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密约》签订。周佛海、汪精卫已将中国的大片河山出卖给日本。

12月19日，周佛海同汪精卫一起叛国投敌，乘飞机逃往河内。在河内成立了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周任财委会主任，兼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实际上三个委员会都抓在周佛海手中，为今后汪伪政权奠定了基础。

1939年3月21日，重庆军统特务制造了一起刺汪案。汪精卫、周佛海汉奸集团由香港窜回上海，在日本的庇护下，进行卖国求荣活动。同年5月，周佛海协助汪精卫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方法》，作为对日谈判的条款。尔后又与汪精卫赴日本，参加汪日首脑会谈。6月18日，汪精卫回国，周佛海留在日本继续与日本商谈。7月初，周佛海秉承日本的旨意回到上海，筹建汪伪政府。7月10日，在周佛海的策动下，《中华日报》作为汪伪机关报复刊。7月22日开始，周在《中华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回忆与前瞻》，为自己卖国求荣开脱罪责，竟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说成是中国人造成的。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8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对周佛海下达通缉令。

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特工总部所在地极司非尔路76号大礼堂举行，周佛海为主席团主席。在伪

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财务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1月1日，日汪双方代表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开始了秘密谈判。汪精卫任命周佛海为主任，主持谈判一切事宜。12月，汪日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由于秘密条约的签订，汪、周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使得顺利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大纲、政纲及政策。并定于1940年2月中旬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3月26日"还都南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党政府成立。这天，周佛海踌躇满志，得意非凡，颇有一统天下的气概。在伪政府中，周佛海身居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导委员兼秘书长等要职。同年12月被委任为伪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1941年3月任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指挥伪军特务配合日军设置封锁圈，挨户搜索，编定保甲，实行联保连坐进行"反共清乡"。1943年1月，兼任伪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3月任全国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1月，又兼任伪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控制了人事、外交、军事、特工、财政金融大权，被人称之为汪伪的权力象征。

四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所遗各职由陈公博接替，周佛海又接任陈公博的上海特别市市长并兼保安司令等职。他从1941年后即与国民党军统特务联系，参与联合反共的阴谋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委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负责维护上海及沪杭线治安，保证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全面接收。

自周佛海当汉奸直到灭亡，他的一切活动就是扩充自己的实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首先从人事方面看，凡汪伪政权任命的官员，基本上由周佛海首先审定，要害部门的官员非周的亲信不用。周有一套用人的"哲学"："用人要疑，疑人有用"，"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对于外交大权，周佛海紧抓不放。汪伪政府成立之前，日汪之间的秘密谈判，基本上由他任首席代表。对军事大权，周佛海垂涎三尺，他时时扩充自己的势力，建立起一支御林军——上海税警团。税警团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在特务工作方面，一开始周佛海就紧抓在手中。从筹建特务组织，选择据点，开展一系列特务活动无不出于周佛海之手。在财政金融方面，周佛海更是左右逢源，据查抄汉奸财产登记，在他家中共查抄黄金1858两、美金8万余元，及各种名贵印章、字画等。

1945年9月，周佛海被国民党军统局押送至重庆软禁。1946年解往南京，交付法庭审判，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佛海从中共一大代表蜕变成大汉奸的人生轨迹到了尽头。

（作者张宗高，原载《党史纵横》）

投身青天白日旗下的刘仁静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他那时在北平伊罗生家中，帮助伊罗生翻译在中国搜集到关于江西苏区的材料。1935年2月，刘仁静把东西翻译完后，准备携夫人回湖北应城老家。临走时，伊罗生劝刘仁静不要带具有煽动性的东西，以防检查。就在刘仁静去火车站的途中，有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跟踪在周围，到北京西站，特务、警察就检查刘仁静的行李，发现行李中有一张打过英文字的纸，就以此为理由，把他带到王府井附近关押，后来又把他送到北平警察厅，让留俄学生认他的照片，在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后，北平警察厅把他移送南京警备司令部。

嗣后，刘仁静在南京于1935年底被送苏州反省院反省。

在苏州反省院，刘曾担任反省院犯人自治会主席。他还在苏州反省院的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主张中国应当"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陈独秀在狱中读到刘仁静的文章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

1935年12月15日，托派中央临委发布《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1936年12月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14期，《通告》称："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而置信，近闻江苏省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之后，来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1937年10月29日，他又写信给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可是托洛茨基在1938

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信中，对陈独秀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托洛茨基的态度使刘仁静颇感意外。无奈刘仁静又到武汉求救于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很客气，见了刘一面之后，给刘留信一封，表示和刘仁静绝交，划清界限。

刘仁静重入托派组织的努力失败之后，就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刘仁静在武汉逗留时，日本侵略者已进逼九江，威胁武汉，刘仁静通过黄季陆、康泽的关系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并随他们的船撤离武汉，经长沙、桂林到重庆，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处科员，黄季陆是其顶头上司、宣传处长。

1939年，刘仁静投到梁干乔麾下，梁干乔也是留苏回国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是军统的小头目。刘仁静在他手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从事对延安的反共宣传。后来刘仁静由梁干乔介绍到西安西门外战干四团任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刘仁静在抗战后期还担任了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并担任西安《正报》主笔，直到抗战结束。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在胡宗南的秘书徐先麟办的刊物任总编辑。不久，他又在特务刊物《民主和统一》当主编。《民主和统一》是"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刊物，社长兼经理刘伯闵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民主和统一》停办后，刘仁静在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孔祥熙的《时事新报晚刊》当过主笔。这时刘仁静在北大时的同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刘仁静，要他去南京效力，于是他辞掉《前线日报》和《时事新报晚刊》的职务，于1948年7月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刘仁静写了四篇反共文章，颇得陶希圣赏识，陶希圣又把刘仁静介绍到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处，邓文仪安排刘仁静到镇江国防部教导所，后来刘仁静觉得在此地工作没有意思，就辞职回到上海，一直到上海解放。"

（选自《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1945年8月25日凌晨三时，在一片黧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了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26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行。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是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飞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妻子叫"东山文子"。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10月3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陈公博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共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共，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的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共、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他出任实业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汉奸罪行辩解，写下洋洋六万余言、四十七页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戌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2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2时23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在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局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公博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5月14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6月3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的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选自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近日时局内幕

内阁动摇之说，曹、张来京之说，外间言者纷纷，政府概加否认。然考诸事实，则倒阁之酝酿，亦确有之，不过目前尚未至推倒之程度。政府亦确曾电召曹、张、二王来京，而曹与二王均辞不来，即张之行期，亦尚未知何日。目前形势，盖仍在相持中，将来或至内阁不能维持，张等必将入京，则时局必又有一种险象。观民六段阁将倒，而有督团之北京会议。去年靳阁不支，而有张作霖来京，其前例皆令人抱秩序上之危惧也。

直派各督之不满于靳，已无待言。闻长江流域之某督，与人谈及，辄谓内阁受奉天之支配，我辈听命于内阁，直不啻间接受奉天之支配云云。可见其不满于靳者，仍对奉之恶感。而合纵之势，则以某派接近之浙、闽、秦与长江之苏、赣、鄂，及曹、吴力所能及之直

鲁、豫，七拼八凑，憧憧往来。汉口王子春之寿筵，与吴佩孚最近之赴保，皆此中之影戏。选举展期一事，即倒阁计划之见端。而尤有著者，阁中无一直派，次长中亦只一汪士元，而汪忽决计不干，虽不能说拆台，亦实含堕甑不顾之意，闻直派之计，欲拥王士珍出面组阁，以为庶不至为奉所左右。日前师景云赴正定一次，外间谓系催王就巡阅使，而实际则在阁不在使。比师氏回京，王仍不来，则目前之继任无人，倒阁之声遂暂低矣。到于各报所述直系对靳之不满，为对川问题，选举问题、库伦问题、张勋问题，是所用之材料，尚非其总因也。

靳于奉张，果能沆瀣一气乎？是又不然。张近来对于靳氏，已渐有谯诃之词。举其小者，如张宗昌之在赣，竟被陈光远解散，靳心已不愿，而大张犹怪靳不能保护小张。举其大者，则张勋起用，全国无不反对，府院所得各处之电，积尺许厚。而奉张之意，则始终主张径以张勋巡阅苏、皖、赣，又怪靳氏无此担当，不肯任命。加以其他督军、都统、省长之易人问题（山东即其一），凡奉张所主张者，多未见之实行。遂嫌靳仍偏徇直系，自作好人。近日函电往来，已渐见征于色发于声矣。靳氏对直、奉两方，日前均曾表示不干之意，即所谓两姑间难为妇者。然直欲倒阁，而所拟继任之王士珍，实奉张所断通不过之人，故奉之于靳，犹不得不仍予援助，以图将来之效用也。

外间纷传之召集四巡阅会议，即欲调停直、奉，并以维持内阁者。一电以外，于王士珍则有师景云之行，于曹锟则有田中玉之行，于王占元则有驻京委员魏联珉之归，于张作霖则其子张学良之归，皆顺便令其速驾。今已知其决不来者为王与曹，而鄂王、奉张，皆尚未有切实之回复，惟奉派之张景惠、秦华，皆有怂恿奉张入京之意，故纷传奉张可来。日前在津祝倪寿之新安武军人物，亦多有由津赴奉者。此时奉天有所谓会议，张之来否，实将于会议之

结果决之，尚非数日内事也。然直派方面，则不惟曹氏不来，而以各督交换意见之结果，决将各项意见开出，不向中央说话，而派人赴奉与张磋商。现在直奉之间，使命往来，即为此事。故目下尚有直、奉协调之一幕，而协调之成否，即两派和战之关键。其关系亦不尽在若辈之来京与否也。

两派相持之各问题中，苏皖赣巡阅仍属重要。张既必欲用张勋，而直派期期以为不可，直欲使王士珍就任，而奉张力加打击。所谓九师南下之说，日前甫在萌芽，而奉张已有抗议到京，遂致中止。且如宋支队（属九师）之在吉，本中央决定调回而奉并不留用者，然有九师南下之风传，张即来电留护东路。外传王士珍将在徐州就职，其实王有此大胆耶！而张勋方面，则决不肯就林垦督办职，政府前令王乃斌往劝。张勋之答语，则谓政府与我开玩笑，我欲办森林，自己会办，不须任命，其意仍非巡阅使不可。而此次新安武军军官之赴奉，仍是谋所以抬出张勋者，结果如何，尚未可知。而直派方面，则即林垦督办，亦尚有责言。政府始欲使张勋先就林垦督办职，然后劝王士珍南下。以现在情势观之，皆做不到。而此一问题，殆有俟与内阁问题同时解决之势矣。

（摘自《申报》1921年3月4日）

潘复与日记者谈北方时局

日本某通讯社记者，昨（二十五日）特访财政次长潘复氏，叩以时局上各种重要问题，据潘氏所答如此：

外传曹、张两使感情不洽，龃龉时生，惟观此次津中会议，两使俱能披沥诚心。交换意见，则前传之误会，定能一扫无痕矣。现在时局上之各项重要问题，已经津议决定，由曹、张、王三使各膺解决之责。（一）蒙古问题归张使处置。外蒙古王公原无反抗中央之意，即活佛亦曾遣使求和，声明反抗中央，全非出自本心，大有悔悟之意。是以中央对于蒙事，仍拟以和平手段解决，惟若今后旨依然执迷不悟，自不能不加以讨伐，彼时应派之征蒙军，亦已决定，纯由张使编遣，以期事权统一。又张使命叶交长筹措军费三百万元一说。全非事实。又谓叶交长倘不能筹措，即令解职，尤为无稽。（二）河南问题归曹使处置。从来北洋派对于中央政府，鲜有出反对态度者。此次成慎反对赵倜，间接即系违抗中央，中央为保其威信，自当予以讨伐。靳总理与曹使之意见既已全然一致，故令吴佩孚派师痛剿。成慎虽然败走，仍拟严予惩处。赵倜之处置，亦多有未当，亦拟予以处分。至处分成、赵之办法，均拟由曹使秉公办理。（三）南方问题。南方政府并西南各省问题，统拟委诸王使相机办理，至其如何进行，皆须俟津议决定。（四）教潮问题。教员罢课纯由要求补发欠薪及指定基金而起。最近由各当局极力筹划，行将完全解决，预计不日即可开始上课。（五）内阁问题。三使在会合以前，均有声明，对于政治概不过问，以免有干政之嫌，是以三使对于内阁问题。毫无表示。刻下周财长，实因病重，提出辞呈。外间所传谓余（潘自称）将继其后任。但此等重任，余何能担，业向极峰表示难承之意矣。其继任之人，一时苟难物色，惟有仍挽周氏勉为难。（六）北洋派之结合。北洋派自经此次三使会晤后，当益巩固。前者对于豫乱，靳揆与曹使之意见，即已一致，故将来之政局，决当得有良好之结果。王三使来京之期，当在一星期以内，靳揆在津，当有两三日之滞留，一俟三使到京后，再开中央会议，结束一切。

（摘自《申报》1921年4月28日）

孙中山北伐在桂林

我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下旬入大本营参军处当书记官，这时大本营驻在梧州前镇守使署。参军处的组织，除参军长胡毅生外，还有参军林树巍、吴铁城、黄实都是将级；副官黄梦熊、陆耀文、宾镇远、伍慎修、黄百、林荣、叶显、司徒非、邝石等等，都是校级；辎重队长陆志云，电讯队长麦萼楼，卫生队长崔炽黄也是校级，书记官仅为上尉。

我是和李秩、谢毅、朱江三个同学一齐冒充行伍出身去投军的，都派在参军处为书记官，连同原有的李词垣一共五个人。领导大本营是孙中山先生（以下简称先生），随从左右的有黄惠龙、马湘两副官，黄昌谷、李禄超两西文秘书。大本营分设四个处：一、文官处，文官长为胡汉民，下为秘书和科长科员；二、参军处，组织见上；三、幕僚处，处长为蒋作宾，知名的幕僚有熊克武、吕超、卢师谛、田桐等等；四、党务处，处长为陈群，人数不多，组织不详。金库长为林云陔。卫士长为卢振柳。侦缉队长为李天德。这些侦缉队员都是海外华侨，关心先生安全，自愿负责查缉奸宄，保护先生的。又有庶务部，部长为李杞堂。供给局局长为伍子謇。此外还有很多随军出发的随员，皆属当时社会上“有名”人士，其中有赵士觐、梅乔林、李绮庵、李应慈、陈策、招桂章、熊耿等等。

九月初旬，预备出发桂林，先生对参军吴铁城说：“你的老母，年事已高。你不如回家侍奉老母，当中山县的县长去吧。不必随军出发了。”吴濒行时，先生还亲笔写了个寿字，替吴的老母祝寿。

此时忙煞了庶务部李杞堂那两个助手，一个叫蔡懿恭，一个叫刘觉生，天天出去封船。抚河水急滩多，大船不能上驶。即小小的船，也要几个船夫，才能将船拉上去。这次，连载护卫的兵士，需船三百多艘。先生和陈少白、胡汉民三人同船，船桅挂着枝小小红旗，使易于识别。

梧州距桂林，不到五百里程，但因船多拥挤，每天只能行二三十里。因此先将晚上泊船的地点，通知大家，每天在船上吃过早点，即上岸步行。先生也和我们一样。他穿着薄绒中山装，黑丝袜，黑漆皮坡装鞋，戴着顶拿破伦式的黄斜毡帽，持着根手杖，黄、马二副官挂着个千里镜随侍左右，每到村落，即小作休息，先生必找村中父老细询生活情形和收成怎样。

三百多艘船从早上九时开行，衔尾前进，到下午三时以后，始到达指定的停船地点。晚上查船，是参军处的任务，有时先生的卫士，也参加帮忙。途中曾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事情，原因是这次出发，没有一个人敢带家眷同行，独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部长邓家彦带有家眷，他的爱人是山东籍，习惯赤身睡觉的，某次查船，他的爱人已经睡下，但检查的偏要她起来，因此发生冲突。事后，查船的人，统受处分。

到昭平时，地方人士在沙滩站队欢迎。这里驻有一团炮兵，团长梁若谷是广东罗定人，欢迎至为热烈。先生到商会演讲三民主义和民治、民有、民享的真理。

平乐是赣军总司令李烈钧的驻地，先生到时，李总司令带着两个梯团长李明扬和赖世璜到岸边欢迎。赣军的服装，非常齐整，精神也十分饱满。先生异常欣悦，到商会演讲后，还赴广东会馆应同乡的宴会。诘朝开船时，李总司令随同先生下船赴桂林。

过平乐后，便是阳朔，桂林已接近眼前了。桂林人士，欢迎先生，至为隆重，从码头起以至先生驻所桂王宫止，全搭凉棚，上用五色布幔遮盖，异常肃穆。此时粤军总指挥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鄂军总司令程潜、豫军总司令樊鍾秀皆云集桂林，因此到码头欢迎的，真是人如山海。

护卫先生到桂林的，原是许济那团部队。一抵桂林，邓师长铿已选了一团最优秀的士兵，到桂林警卫先生。这个警卫团的长官，真是极一时的人选，团长阿可钰，团附李章达，团副华振中，第一营营长叶挺，第二营营长薛岳，第三营营长张发奎。由此可见邓师长的眼光，一点不含糊。

不久，孙夫人由副官司徒非护卫，亦到桂林。我常见先生和夫人在大礼堂兜圈子散步。

这时抚河的船舶，来往频繁，先生派陈策当抚河船舶管理局局长，熊耿当总务，招桂章当护航第一营营长，叶剑英当第二营营长。

先生派黄昌谷为广西银行监理。

先生有两个久随身边的厨子，一个叫区云，一个叫林荫生。替先生理发的卫士林耀光。先生和夫人、陈少白、胡汉民四人依旧同餐。

先生一有空闲，即去各处游览名胜，乘藤兜，有一排宪兵前导。那个宪兵排长叫李燕谋，兴宁人，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卫士后随，便衣侦缉散在四方保护。先生曾到丽泽门外蒋翊武殉国的地方凭吊，建筑起庄严朴素的华表，由胡汉民作记，记述蒋翊武殉国的事迹甚详。

十一月中旬，苏俄的马林同志到桂林见先生畅谈过多次。

同时，我奉命出测桂全军路，全队出驻桂林北门外单边街。当我们测到甘棠渡时，碰见赵士觐带着先生的卫士四人，到全县开办军粮局，赵士觐任局长。叶挺还派第一连连长李扬敬带全连兵士随同保护。

一九二二年一月底，桂全军路全线测量完竣，我们是随测随计划的。回桂林复命后，先生任李杞堂为军路局长，开工那天，先生亲到北门外持铲锄泥，替工人们示范。

（韩锋）

靳云鹏三次组阁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颜惠庆

内务　齐耀珊

财政　李士伟（未到任，次长潘复代；十月，高凌尉任）

陆军　蔡成勋

海军　李鼎新

司法　董　康

教育　范源廉（未到任，次长马邻翼代）

农商　王乃斌

交通　张志潭

此次内阁，以总辞职形式而改组，专为排去交通系之周、叶。奉系加入者为齐、王（王原任）；财政李，是周学熙一派，久在天津，不过接近直系（历来内阁，直系均未参加，县亦无人参加）。至十月，高凌尉长财政，秘可谓之直系也。直方停办新选举，故以张调交通，其重心在张一人。外交方面，七月十日，美总统倡议召集太平洋会议；十三日，邀请中国参预；十月六日，特派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为参预太平洋会议代表。十三日，在华盛顿开会。十六日，中国提出十大原则案，美国另提出四大原则案，经修正后由中国以外与会各国通过签字。二十三日，中国提出关税自主案，又继续提出山东交还中国等案。此项交涉，乃是外交部商承府方主持办理，有时阁议，亦不过形式而已。

军事方面，七月二十七日，鄂湘战争开始。其时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湖北自治军由李书城、孔庚、夏斗寅等率领由岳州进攻，克复蒲圻、通城、通山等处。八月九日，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自洛阳率兵南下，二十七日，攻

占岳州。自治军以首属不应，遂败退。川军进攻宜昌，亦败退。自是武汉上游为吴势力所占据，奉方亦久思伸张势力于长江各省，至此计划失败。

在财政李士伟未到任以前(五月至十月间)，以潘复代部。府方不喜潘，张志潭与潘亦不协，而财政潜势力仍握在交通系。靳初以为排去周、叶，财政有办法，至此更毫无办法。其时，直奉两方对靳尚无恶感，惟府方因潘而牵及于靳，时时发生龃龉，其直接冲突，则在全国烟酒事务署。据其内幕中人言，向例，烟酒署有提交总统府秘密费十万元，督办为张寿龄，总理徇潘之请，主张更换张寿龄，府方反对。某日，总理面言于总统，总统言："张寿龄虽不胜，总比潘复强得多，何以潘复不更换?"靳言："不换张寿龄，我不能干。"不欢而散。经徐世章等调停，以汪士元继张、高凌尉长财政。自是府院裂痕揭开矣。

此次交通系排去后，积愤不平，认为有机可乘，遂谋以京津停兑为倒阁政策。先得府方之同意，提出中交银行准备金不足，要求政府下令京津行停兑。中行王克敏、冯耿光密告政府停兑之危险。靳不敢坚持停兑，而府方催促尤力。政府某要人乃用以矛攻盾手段商议对策，于是直隶省长曹锐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府院电云："近闻中交两行有停兑之谣，爰召集中交两行行长面询真相。据中行卞行长面称，津行准备金足资周到；交行林行长言词闪烁。当派员赴该行盘查库存，津行存款超过发行钞票额甚巨，诚巩另有作用。并据密报，主使中交停兑之人，即在北京暗中策动。似此扰乱金融、危害国家之无恶，应请密饬京师卫戍司令、步军统领严密查获，依法严惩。"电到后，院方即密派军警监视交通系有力者，而府方有人密示意叶恭绰离京。于是叶当晚秘密乘车赴奉，由杨宇霆介绍见张作霖，力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为曹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张为所动，遂于十二月十四日入京。曹锟闻张到京，亦于十九日由保到京，与张会晤。曹言："内阁不宜更换，我等疆吏不应干预中央之事。"张言："此系总统意思。"曹邀张同见总统，总统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曹张无言而退。曹当晚回保，张多留一日。其时靳云鹏已于十八日辞职，以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至二十四日，梁士诒组阁之命下矣(以上张内幕中人云)。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梁士诒内阁纪略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　颜惠庆
内务　高凌尉
财政　张　弧
陆军　鲍贵卿
海军　李鼎新
司法　王宠惠
教育　范源濂(十二月二十五日免。黄炎培任，未就。齐耀珊兼署)
农商　齐耀珊
交通　叶恭绰

此次梁阁系奉方所推。奉方加入者鲍、齐(齐原内务)；历来陆军均北洋派，鲍以奉系加入，亦创格也。直方加入者，高(原财政)、张，准交通系；叶，交通系。其重心在张、叶，而叶尤为主干。

其时军人势力仍在直奉。奉军入关，由京榆线自滦州分布于天津，以至于北京，处处与直方接触，但欲驱至关外，又无可借口。吴佩孚战胜皖系，又新得武汉，其气势不可向迩，遂以鲁案问题发难。

吴反对梁阁，其要点在梁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十二月二十八日，外交部通知三代表电：本日小幡谒内阁，详询"胶路办法"，梁答以"定借日款自办"。一月□日，华会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北京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梁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云云。此事真相不明。据当时在局中者言，梁就任，日使循例进谒。日使本梁旧识，谈及财政枯竭，日使言"日本可借款帮忙"。日使询及"胶路意见"，梁言："当然筹款赎路，或债票，或库券，须由国内外合筹"。日使言："当尽我日本。"梁言："如借外款，定可借日本款。"梁申辨电中有"未尝言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梁不曾否认日款，但不如外部之肯定耳。在梁登台，政费无着，亟于得到一笔借款，故对于胶路亦迁就其词，并未提及在北京直接交涉，亦无接受要求之事。此人所言如是。吴通电公开肆骂，不留余地。梁亦通电申辨(电文太多，不录)。最后将诉诸武力，梁即于一月二十三日请假去津。二十五日，照准，以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

外交方面。二月四日，太平洋会议，关于中日鲁案交涉解决，正约十一条，附约八条，会议记录本日在华盛顿签字。六日，公布九国远东公约，于是太平洋会议闭会。此项交涉，乃是外交部商承府方主持办理(此时梁请假，在颜代阁期内)。

财政方面。先是一月二十六日，财政部发行八厘债券，名曰偿还内外短期公债，总数为九千六百万元，所谓九产公债也。公布后，长江各督反对，吴佩孚抨击尤力。二月十七日，设偿还内外短债审查会，董康为委员长。审查结果，认为弊端甚大，董遂据以纠参。三月七日，张弧闻而逃走。此亦倒阁重要案件之一。(此时梁虽请假，但其决定在梁去津以前)。

张作霖拥梁，屡通电以为抵制。自靳阁成立后，张景惠以察哈尔都统兼副司令，管理北京一带奉军，秦华为京师宪兵司令兼奉军参谋长，无形中为奉派势力。至三月三十一日，添派第二十七师张作相、第二十八师吴俊升、第二十九师汲金纯入关，集中廊房。吴亦积极准备，先密电武汉、岳州，抽调第二十四师及第三混成旅北来；一面令王承斌等率部开赴前敌。两方相持，而战事一触即发，故颜代阁敌职。四月八日，以周自齐兼国务总理。二十五日，奉方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先后入关，与张景惠在落垡会议。张作霖自沈阳至军粮城指挥。吴佩孚亦自郑州至保定。二十六日，直奉战争开始，奉军西路长辛店先败，中路固安、东路马厂同时亦败，至五月五日，全部败退军粮城，自后撤出关外。据张景惠言："本人为拥靳联曹之一人，一般人都以直奉平素关系，不当言战。此次张使调兵，纯系恐吓手段。本人与曹使密议，如不得已而战，即作一战争形势，奉军佯败，以消灭张使之气焰，将来由靳调停，仍拥靳出而组阁。曹使采其计，曾派曹锐出关，跪求张使退兵。张不允，调兵入关，而吴佩孚等分兵出发。其初，长辛店方面，奉军暂编第一师梁朝栋、炮兵旅邹芬，交绥而退，尚欲作战争形势，不意中、东两路亦败。吴遂势如破竹，直到天津。所有长辛店退兵将至南苑，王怀庆暗伏重兵，将奉军退出者全部缴械，至此乃知曹使失信，为其所贻。而直奉决裂，无可挽回"云云。此亦直奉战争中一段秘史也。

直奉战争，本因倒阁而起，其结果以至成为总统问题。此时吴固不满徐，亦偏重恢复法统，但是并无坚决即时去徐之意。此等重大问题，一般军人根本上不明了，故不敢冒然主张，即吴最初亦在各方面试探，未曾作何决定，故十四、五两日，均有电征求恢复国会意见。十五日，孙传芳电请黄陂复位，系彼个人主张，不过视为一种建议而已，并非保方授意也。此次战事结束，吴同前敌将领在保，研究善后事宜，某日，得北京情报：徐总统密召曹汝霖、陆宗舆深夜入府，不知商量何事。吴大愤怒，以为其勾结日本，别有捣鬼作用，即留参谋长李济臣驻保，自回洛阳布置军事。临行，命李电告北京代表注意府方行动。于是在保将领，有以密电示长江各督者，故孙传芳二十八日通电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二十九日，齐燮元电请徐总统退位，在保方尚未肯表示意见也。其故退位之说，不是徐走不走问题。徐走后，曹无名义到京，若依孙电请黎复位，黎亦不是我们意中人，比较起来，不如暂时维持徐，于是改计密电各省联名通电拥徐。张志潭亦参与其谋。正商辩间，不意二月一日深夜，李济臣接吴电追问北京情形，当以军用电话诘责北京代表钱宗泽，谓："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钱聆电话，恐吓失状，忽略"将来"两字，次日大早，即以军用电话向府秘书长吴笈孙疾声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云云。忽略"将来"两字，就要将徐赶走。徐认为严重，即采用田文烈、徐世章建议，当日下午四时出京。事出仓卒，真是意想不到。但既已如此，大众集议，只好走恢复法统一条路，拥护黎总统复位。当夜派李济臣到洛，商吴同意后，次日，熊炳琦同李济臣到津请黎。黎满口应许。旋发出废督裁兵鱼电，忽又变成僵局。保定加派王承斌到津。据保定参谋长熊炳琦云："此时徐已离京，舍黎别无办法，于是我们三人在天津英租界黎宅，跪求半日，经多少周折，黎始嘿允出山。此八日事。是晚，齐燮元代表孙发绪到津，力主张绍曾组阁，要挟过分，黎又表示不出。复经九日一日之疏解，十日，黎始允次日入京。"

自四月二十六日直奉开战后，关于总统问题酝酿经月。至六月二日，徐世昌辞职，令国务院摄行职务。国务员周自齐等通电大总统职权奉还国会，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十一日，黎元洪入京就职。至此而旧者终结、新者开始矣。

（摘自《北洋军阀盛衰及消灭》张国淦）

历史考证

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疑

长期以来，我国党史界一直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可是，当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都否认当时曾使用过这个名称，并认为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

从1920年8月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在各地成立。当时这些组织的名称，没有那个叫"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李达，上海共产党最早成员邵力子，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成员罗章龙、刘仁静，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成员朱务善，武汉共产党支部最早成员包惠僧都异口同声地说，当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

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确实没有出现过"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而"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是事隔15年之后，从陈潭秋发表了回忆文章开始才逐渐叫开的。

“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既不是历史名称，又不能真实地反映党早期组织的性质。

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之间有着联系又有着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性质不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小组是少数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拥护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团体。

1920 年 8 月以来建立起来的党的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是“党”，而不是什么“社团”。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地早期组织的原名称：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正式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叫“广州共产党”，北京、山东党的早期组织叫“共产党小组”，湖北党的早期组织叫武汉共产党支部。

以上的分析和考证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地早期组织，都没有叫过“共产主义小组”，也没有一个属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的，党的各地早期组织，尽管叫法不一，但所有的名称，全有“共产党”字样，都是属于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当然它是属于早期地方共产党性质的组织。现在，有的同志把它叫作“党的早期组织”或“各地共产党小组”。我认为这种叫法还是比较符合它的性质和特点的，如果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来表达党的早期组织，既没有反映出我国建党的实际和特点，又不能确切地表达出它的真实性质。

（摘自 84 年《近代史研究》第 2 期
作者：曹仲彬）

中共“一大”代表的年龄和社会职业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 108 号（今兴业路 78 号）召开，参加“一大”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的年龄和当时的社会职业如下：

上海：李达，29 岁；李汉俊，31 岁，二人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译。

北京：张国焘，24 岁；刘仁静，19 岁。二人同为北京大学学生，并分别兼任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的数理教师和英语教师。

长沙：毛泽东，28 岁；何叔衡，45 岁。毛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相当于校长），何为该校教师。

武汉：董必武，35 岁；陈潭秋，25 岁。董是武汉中学校长，陈是该校英文教师。

济南：王烬美，23 岁，邓恩铭，20 岁。王是济南第一师范学生，邓是济南一中学生。

广州：陈公博，31 岁；包惠僧（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27 岁。陈是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包当时无固定职业，由陈独秀向《新青年》杂志发行人苏新惠介绍暂到报馆工作。

日本：周佛海，24 岁，他是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中国留学生。日本小组只派出周一人出席。

另外，中共的两个主要创始人“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因故未出席“一大”。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请假未获批准而不能动身，同时他还正忙于筹集广东大学预科班经费，也抽不出身。他于是派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陈对“一大”非常重视，他向大会写了《致出席代表会议信》。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公务繁忙，难以脱身，而且李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的行动会引起社会注意，受到北洋军阀威胁，所以他派了张国焘参加会议。

（选自《革命春秋》91 年 3 期，作者：金英豪）

中国共产党命名经过

在党史著述和报刊宣传中，多认为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叫“共产党”，其实刚成立时叫“社会党”，随后才改称“共产党”。

1920 年 8 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后，9 月 1 日出版发行的这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据张申府于 1983 年 3 月说：“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 1920 年 8 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1920 年 8 月中旬，李大钊和我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我商量。李大钊告诉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叫我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信大约是 8 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他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摘自《资料卡片》

毛泽东与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和蔡和森等许多新民学会会员

积极响应华法教育会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希望青年学生在国外的工读生活中，养成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探索革命真理，学习新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同时向各方筹措学生赴法留学经费。次年因母亲患病，准备经上海回湖南侍候，于3月12日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按理说，他回湖南应由京汉铁路经汉口转长沙，而他却绕道上海，为的是要在上海欢送湖南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在上海停留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上海，经常前往斜桥湖南会馆（原制造局路43号，今已不存在），看望湖南来的赴法青年学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到国外后，仍要关心国事，勿置国事于度外，并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归国后以所学贡献于国家社会。

3月15日，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在会所内（原静安寺路51号，今大光明电影院附近，原建筑已毁）召开欢送赴法学生的大会。这批赴法学生共八十多人，湖南籍占半数，其中有欧阳钦（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林蔚（回国后曾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牺牲）。3月29日又欢送第二批三十多人赴法。这两次欢送会，毛泽东、肖三、吴玉章（时任华法教育会会计）等人都参加，法租界公董局的法国人也参加了。会上，有人大谈法国的旖旎风光和纸醉金迷的生活，毛泽东听不下去，没有发言，很快就走了。欢送会曾摄影留念，毛泽东也在内，此照现在保存下一张，弥足珍贵。

3月17日、31日两天，阳光明媚，春意正浓，毛泽东等赶到码头，分别向两批赴法学生频频挥手送别，直到海轮驶出码头，才依依不舍地回来。毛泽东送别了两批赴法学生，4月6日才离沪返湘。

同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上海，借榻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专程拜访了正在上海候船赴法留学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和蔡母葛健豪。在匆忙紧张的几天中，他们畅谈了勤工俭学和湖南政局等问题。一年之后，毛泽东写信给在法国的向警予时，曾提及："湘事去冬在沪，姐曾慷慨论之。"从这些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厚。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上海。5月8日，他在南市半淞园召开会议，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旅沪会员肖三、彭璜、欧阳泽、刘明俨、李思安、劳启荣、魏璧、周敦祥、陈绍休、熊光楚等十二人出席。会上，他们讨论了新民学会的会务问题，认为学会应该采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不要像有些团体那样空泛虚浮，徒具形式。因此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还提出今后介绍新会员要谨慎仔细，新会员要具有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这次会议虽然只有十二人参加，但大家精神振奋，意志坚定。正如《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黄昏前，他们在霏霏细雨中摄影留念。第二天，5月9日，毛泽东等到黄浦江畔欢送肖三、劳启荣等六位会员赴法。

从1919年到1920年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其中湖南籍最多，有好几百人。这是和毛泽东、蔡和森等的积极宣传，并推动湘籍人士章士钊、杨怀中等的支持分不开的。

（摘自1983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毛泽东同志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一文，作者：任武雄）

李大钊为何未出席中共"一大"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李大钊没有亲自出席这次重要会议，其原因何在？有何影响？至今史学界说法仍不一致。最近，郑天贵同志发表了《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载《党史纵横》1990年第4期）一文，对李、陈未参加党的一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三点原因：忙于公务，无法分身；一大不可能在北京、广州召开；一大也不能改期召开。读了郑文后，感到文章提出的关于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关于第一个原因，当时，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师两校代表，参加代表联席会，并先后担任该会新闻股干事、《半周刊》编辑，并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曾两度代理主席职务，其间（3月14日至7月16日）各校代表联席会议召开百余次。由此看来李大钊是够忙的。但这是否就是李大钊不出席中共一大的第一位的原因呢？

据包惠僧回忆，广州是在6月中旬接到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来信。北京也应是在这个时间。全国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郑文说"7月"，这是实际召开的时间，而不是预定的日期。大会没有按期召开。到7月以后，索薪斗争已近尾声。胡适在当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四个月之学潮——三月十四日至七月十四日——至此始有一个比较可以满意的解决！"7月14日到23日还有9天时间，到上海参加会议还来得及。由此可见，"忙于公务，无法分身"，不是主要原因。

郑文说："李大钊这时是公开的合法的'索薪代表团'主席的身份，并且三、四天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缺席，世人即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十天，索薪斗争的会议就很少了，有文字记载的活动已不多了，仅有7月20日参加会葬陈愚生夫人金绮，7月27日在美术学校作讲演。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教授，有其公开的合法的身

份，这不是参加中共一大的障碍，这正是他参加会议的很好的掩护。况且，党的一大召开时，正好处于暑假，这时李大钊离开北大，是不会引起什么注意的，何况世人并不知道李大钊要去参加中共的一次重要会议。李大钊公开活动的时候也很多。因此，郑文认为“如果缺席，世人即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件事实：正当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李大钊离开了北大，“应邀赴四川举行暑期讲演。”李大钊去四川讲演，并非临时决定的，是在7月初就定下来了。这时早已接到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据胡适当年7月7日的日记写道：“四川朋友邀我们去重庆讲演，已允去的有陈惺农、陶孟和、高一涵、李守常、文范村诸君”。这件事至少可说明两点：虽然李大钊名声大，行动还是方便的。这是第一点。暑假虽然很忙，但还是有时间去外地。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几个疑问：为什么能去四川的重庆，而不能去上海呢？为什么能公开举行讲演，而不能出席党的秘密会议呢？讲演重要呢，还是党的成立会议重要呢？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李大钊不但没有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也没有参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有其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其一，李大钊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对不出席中共一大恐怕也是如此。包惠僧回忆说：“我在北京工作的两年中所知道的：守常对党的一般活动不大参加，也很少出席党员大会，如有较重大的事就由他代表党出面。其二，作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党组织的中共一大，当时没有引起李大钊的足够重视，所以这是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根本原因。中共一大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伟大意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的。如果当时李大钊认识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那么，他是不会沉湎于北京的索薪斗争。无论如何，索薪斗争也不会比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重大。公务再忙，再不能分身，李大钊也会放下来，亲自出席，更不会不出席中共一大，而“应邀赴四川举行暑期讲演”。

郑文认为，李、陈没有出席一大，“原因之二：‘一大’不可能在北京或广州召开”。一大在上海召开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在上海召开也是正确的。如果一大在北京召开，李大钊就一定能参加吗？我们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决定能否出席会议，不在于开会的地址。1922年8月的西湖特别会议，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李大钊不也都参加了吗？”原因之三‘一大’也不能改期召开”。推迟召开的时间，李大钊就一定能参加吗？一年后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时，李大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或其他的原因使他不能出席会议。二大前夕张国焘去北京，李大钊显然是知道召开二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东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议展延了几天。”会议不能如期召开，主要是等李大钊。李大钊没有去，而高君宇出席了。毛泽东已去上海，但没有找到会址，所以没出席。直到党的二大召开，我们建党工作才圆满胜利结束。在李大钊生前，党召开过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都是有资格参加的，但他只出席过党的三大。郑文认为改期召开，李大钊就会参加，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对会议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使各地代表有些失望，因为他们“都盼望李大钊先生亲自出席”。其次，因为李大钊影响大，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如果他能出席会议，一定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可是他没有出席，会议就由张国焘主持，张的一些做法在许多代表中引起不良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共一大及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时，应当全面分析，作出适当的评价。不能因为李大钊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贡献，而对此问题进行回避，或只强调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不从主观方面进行研究。

（选自《党史纵横》91年1期
作者：路海江、林修敏）

何叔衡是否出席过中共“一大”

我国党史界普遍认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但是，笔者根据下述材料，认为尽管何叔衡是湖南派去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然而他到了上海后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第一，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主席，对出席人数应当是了解的。他回忆道：“……毛泽东、权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但是“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一大”前后（二）》第173—174页）有的论者驳斥了张国焘所说的“何叔衡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但是。这只能说明何叔衡客观上怎样和张国焘等对何叔衡认识的错误以及作出的决定的错误，并不能证明张国焘等没有根据错误认识作出不让何叔衡出席的错误决定，在回忆录中，张国焘没有必要为诬蔑何叔衡而假造这个决定，因此，这个决定不是无中生有的。

第二，毛泽东与何叔衡一同前往上海，对何叔衡是否出席，也应当是清楚的。他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说：

“在上海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指党的“一大”——引者注）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这里的“一个湖南人”，斯诺误以为是何叔衡，实际上应当是李达。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出席了党的“一大”，第二年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毛泽东说在“一大”上除了他自己（实际上还应除去他点了名的另一湖南人周佛海）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李达），这就暗示了也是湖南人的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如果何叔衡出席了“一大”，毛泽东不可能忘记此事，并且在回忆中也没有必要隐去他的名字。正由于何叔衡到了上海而没有出席“一大”，毛泽东才采取了这样的暗示方法，透露了这段隐情。

第三，何叔衡本人有一事说明他自己没有出席，这就是他曾向出席了“一大”的董必武打听“一大”的详细情况。为此，董必武于1929年12月31日专门复信给何叔衡，介绍了“一大”的时间、地点、代表、议事日程和会场等情况，并且说：“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三辑第1—2页）这件事可以说明二点：一是对：“一大”的情况，张国焘记得详细，因此张国焘说何叔衡没有出席，是可信的；二是何叔衡对“一大”情况一无所知，故需要向董必武打听。由此可见，他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第四，各地派去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有十三人，（包括包惠僧，因为“一大”的出席者董必武1929年12月31日给何叔衡的信、1937年与尼姆韦尔斯的谈话、1956年“八大”前夕的谈话，陈谭秋1936年6月7日写的发表在《共产国际》上的文章，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周佛海1942年1月的回忆，陈公博1944年的回忆，包惠僧1953年8月20日以及后来的多次回忆，张国焘1971年的回忆都说包是代表。李达的回忆以及受李达回忆影响的刘仁静认为包不是代表。但是一个非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代表大会整个过程并且积极发言，这是不可理解之事。）而实际出席的代表只有十二人（见译自俄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1936年的回忆，张国焘的回忆，李达的回忆），这说明确实有一位代表没有出席会议，这位代表根据上述材料，只能是何叔衡。

第五，苏联史学副博士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所列举参加“一大”的12名代表中，湖南代表只有毛泽东而无何叔衡。（《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合刊）

（摘自《广西党史》95年1期作者：陈标）

关于包惠僧的中共一大代表身份问题

目前，许多党史教科书及一些论著在表述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身份时说他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我以为关于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身份的这种表述是不合适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下面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除了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没有回忆文章外，其他八人（不算包惠僧本人的回忆）中有七人证实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而不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二、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在1955年回忆时没说包惠僧出席了一大。1957年3月18月他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上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成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晚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李达否定包惠僧是一大代表这段话与其他代表的回忆相悖且不说，就是这段话本身也有几点疑问。第一，他说“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其实，包惠僧当时已属于广州小组的成员之一。第二，包惠僧当时若是以武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为何董必武、陈潭秋的回忆录中反到一致说他是广州代表？第三、包惠僧是独自一人前往上海，他若不是代表又怎能“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并天天随代表们去开会？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第四，若说包惠僧是一大的列席旁听代表也不符合事实，首先，当时党内还没有正式代表与列席代表之分；其次，李达于1955年的回忆中谈到在嘉兴南湖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分析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时，“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一貉’”。陈潭秋在回忆录中谈到大会最后一天讨论时，“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和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从所引的这段话可推断出，李达所指的“有人”显系包惠僧。他若是列席旁听代表怎能自由加入讨论？再次，从其他七名代表的回忆中看不出包惠僧有何特殊之处。所以，李达否定包惠僧代表身份的这段话理由是不充分的。

三、从包惠僧的回忆看，他和陈公博广州小组的代表身份是由陈独秀提议，其他同志没表示异议而决定的。若说指派的话，陈独秀同时指派了包惠僧和陈公博，舍陈公博而独谈包惠僧为指派的代表是令人费解的。至于陈独秀对包惠僧今后工作的打算，鉴于包惠僧系由武汉去上海，后又因上海小组事赴广东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常的，不能认为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的根据。包惠僧本人也曾说：“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代表，不是广东的代表，这是不对的。我是广东的代表，不是陈独秀的代表。”

四、李达在回忆一大时期的陈独秀时说：“他具有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

辄拍桌子，打茶碗，发作起来，”再加上陈独秀在当时很有威望，大家都尊重他，包惠僧若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一定会带有陈独秀的权威意见。但从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看不到任何有关的回忆。从陈潭秋的回忆看，包惠僧认为孙中山比北洋军阀更坏一些，这种看法当即受到与会代表的反对。而且，当时陈独秀正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里担任教育委员长，这种话恐怕不会是他的意见。

五、邵维正说包惠僧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尚缺乏有力的论据，并举例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记载道：“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他认为一名代表的地方是广州和日本，陈公博应是广州代表。我认为在理解这个问题时，可否考虑下面几点因素：1. 与包惠僧原是武汉小组成员是否有关？2. 与包惠僧参加一大后未回广东工作是否有关？3. 与陈公博最后一天未去嘉兴南湖开会是否有关？4. 撰文者有没有失误？我觉得光凭这一点判定包惠僧不是广州小组的代表，理由也不是很充分的。

（摘自86年《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
作者：杨波）

当年一大会址为何遭搜查而无恙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客厅开幕。7月30日，突然有一个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闯进会场。密探见到十多个人围坐在长桌四周，还有外国人在座，认定是在举行秘密会议，便借口找错了人家而匆忙离去。代表们发觉其中有问题，立即转移，李汉俊留下应变。一刻钟以后，两个法国人带着十多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来到这里搜查，不久即悻悻离去。当时，会址未遭任何破坏，房主人也没有被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当年望志路106号不仅是李氏兄弟的寓所，同时还是《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新时代丛书》社，是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等十五人于1921年6月发起成立的专事翻译的出版机构。同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社编辑缘起》，谈到该社出版宗旨是“增进国人普通知识”，编辑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之知识”，通讯处“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笔者注：即望志路108号，与隔壁106号同为李家所住）。筹备党的一大时，因望志路106号主人李书城同情革命、李汉俊参加革命，又鉴于这里是出版机构公开通讯处有进出、集议之便，所以设会场于此。在会议举行过程中，会址突然受到巡捕搜查时，李汉俊即泰然自若地以《新时代丛书》为题与之周旋。当巡捕走后即去李家的一大代表包惠僧说，李汉俊当时向他这样讲：“他们问我开什么会，我说：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在这里谈天，顺便谈谈编写现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什么会。”既然是出版机构的通讯处，编辑成员在这里会商不足为奇，所以巡捕们搜查得很马虎，“写字台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来得及收检，他们竟没有发现”。由此可见，当时党的一大会址之所以安然无恙，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的掩护。

（摘自85年《上海党史资料通讯》
第7期，作者：朱少伟）

中共“一大”上不同政治观点之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未出席会议。临开会前另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陈独秀虽然没出席会议，但他的意见对组织原则的确定，仍然是有影响的。他在“一大”召开时写给出席会议代表的信件中，提出了四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陈独秀的意见，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

当中共“一大”讨论陈独秀的“四点意见”并制订党的纲领时，代表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

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右的观点。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

“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

另一种是以刘仁静为代表的“左”的观点。刘仁静“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的。”“包惠僧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张国焘的观点也接近刘仁静。

多数代表不同意李汉俊的观点，也不赞成刘仁静的观点。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反对和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左”思潮对党的建设的影响，防止和克服知识分子自由散漫习气对

党内生活的侵袭，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要建成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决不能变成松散的软弱的学术团体。

于是，在确定党的纲领时，会议有针对性地规定了党内组织生活中的若干原则问题，并以条文的形式在“一大”《纲领》中作了明确的表述：《纲领》第3条规定“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即党内生活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纲领》第4、5条规定必须慎重发展党员和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纲领》第6、7、9、10、13条强调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纪律。

（二）关于党在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

李汉俊在讨论时提出：中国的工人阶级为数甚少，力量薄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准备还不足以参加政治生活。要立刻以工人为基础组党是不可能的。当前要用马克思学说武装知识分子，以便使革命的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只需要办马克思主义大学，办图书馆，出版各种报纸。”在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提出党应该立即向产业工人进军，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的斗争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在斗争中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工作。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情景：“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多数代表不赞成李汉俊的观点，他们主张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李汉俊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但表示可以服从多数人的意见。然而，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党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党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由于当时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思想还没有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内。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经历更多的革命斗争实践，因而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的认识是模糊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历史的局限，使党的“一大”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现阶段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当然，更不可能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

（三）关于共产党员是否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议员，到现政府做官的问题

部分代表认为，在现阶段既然无产阶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政权，那么公开的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因此，必须把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党应该挑选合适的党员，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或者到资产阶级政府去做官，用另一种方式为无产阶级利益斗争。

另一部分代表反对这种意见，他们指出共产党员既不能当议员又不能做官，共产党决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议会斗争不能为社会革命事业增添力量，使无产阶级获得利益，反而有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党的危险。因此，必须放弃议会斗争，集中党的精力，领导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争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在修改纲领的条文时，争论的双方都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因而，“一大”《纲领》第14条规定：“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

从上述三个问题的争论看，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和确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习气，在党的各地组织中，以至在党的骨干中都有所反映。是容忍，还是纠正这种状况？是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战斗力很强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把党仅仅作为一个松散的争论不休的自由结合的团体？这是建党初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中共“一大”通过不同观点之争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

（选自《党史纵横》92年3期，作者：褚家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以前

目前，对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间，公认在党的一大以后，具体地说，是1921年8月，其根据是一部分老同志回忆，还有《劳动周刊》的出版日期推算。《劳动周刊》保存下来的是第13至16号，以及第18号，从第13号的出版日期向前推算，每周一期，如不脱期，确切的创刊日期是8月20日，那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大概是这时产生的。这种推算并不严谨。从下面一些史料的记载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应产生在党的一大以前。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第6号，是1921年7月7日出版的，该号公布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以张特立（即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正式宣布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从这个时间看，就比7月23日召开的一大早半个月。

《共产党》月刊第6号还转载了《劳动周刊》的发刊词，发刊词的开头一句即是：“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该号在转载《劳动周刊》的发刊词时，在前面写了一段按语，对考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时间，更提供了直接的帮助。按语写道：“上海劳动界从张特立李启汉包一德等创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劳动运动大有起色。工人的觉悟，也一天一天的进步。他们又办了一个劳动周刊，现已出四期，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界的智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从上可知：在1921年7月7日出版《共产党》月刊第6号以前，不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经成立，而且其机关报《劳动周刊》已出版了四期，如果不脱期，至少在6月上旬已出版了创刊号。还可能更早一些，因为《共产党》月刊的组稿、编辑、印刷，要有一定的时间；作为《劳动周刊》主持机关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一个筹备的过程。因此，它的成立时间，可以推到5月下旬。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时间，也可以从罗章龙1980年的一则回忆中得到印证。罗章龙的《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一文说：“1921年5月，上海中共党组织决议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建立，并由张特立领衔发表宣言，签名者26人，其中少数为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张特立、李启汉、李中、李振瀛、袁笃实、张秋人等，余为青年学生，如包一德、李新旦、刘荩人、顾耕野、汪洋、杨意贞、董锄平等。……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主持人张特立，编辑人李启汉、李振瀛、杨意贞、汪洋、董锄平等。通讯地址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

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时间，定在1921年5月下旬或6月上旬，并不排斥它是党领导下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近代工会组织，因为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建立了，而且可以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即先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形成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摘自86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作者：曾长秋）

关于沈定一问题

沈定一作为浙江的一个历史人物，对他一生中的功过是非进行研究和探讨是可以的，但不能把他作为革命烈士来宣传。

沈定一是早期中共党员，曾领导过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他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委、浙江省临时党部常委，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化。沈定一也遂起变化。同年5月，沈定一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出席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回浙后，即密谋策划，于7月5日在萧山衙前召开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他俩在会上一唱一和，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阴谋破坏国共合作。会后，沈定一对各县市党部（左派）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同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称西山会议），进行反共活动。沈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仅在会上发表反共言论，而且参与了会议的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回浙后，更加肆元忌惮，按“西山会议”通过的《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的决议，开除了临时省党部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并竭力排斥左派人士，另行筹组所谓“浙江省党部”。1926年3月，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共气焰更为嚣张，公然反对孙中山创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决议。沈定一是这次大会的宣言起草人。由于沈定一公开叛党反共，1925年已被我党清洗出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沈定一担任了浙江国民党清党委员、浙江反省院长等职。沈定一就是这样由共产党员堕落成为一个国民党右派。1928年8月28日沈定一于萧山衙前遇刺身亡。

（摘自85年《浙江党史通讯》第1期）

陈炯明叛变前蒋介石与孙中山关系考辨

孙中山在失败后，深感自己没有军队之苦，他决心组织一支自己掌握的军队。1917年11月，决定从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警卫军中划出20个营，约8000人，组成省长亲军。但遇到桂系军阀反对，最后以不驻广东、开赴福建为条件，将这支军队改称“援粤军”，委任陈炯明为总司令。陈炯明是前清秀才，民国后二度出任广东都督，完全不懂军事。孙中山对这支新军倾注全力，委派许崇智、邓铿、蒋介石等军事干才去辅佐陈炯明。1918年3月15日，蒋介

石被任命为陈炯明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蒋到任后，颇受陈炯明的信任，一切作战计划均出蒋之手，然后由陈批转各部队执行。特别是如何利用炮兵攻城的计划，发挥了蒋介石从日本学来的本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5月9日蒋到达司令部驻地三河坝，拟订了《对闽第一期作战计划》，进攻北军福建驻军李厚基部。先后攻克上杭、福州、永定和广东的平远县等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此时蒋介石感到孙中山没有象对陈其美那样重视自己，委以重任。又感到粤军地方观念太强，抱怨"粤军自成风气"，认为自己"挥之便去，招之便来，此何等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他看到粤军三个主要负责人陈炯明、许崇智和邓铿都是广东人，唯独自己是异乡人，感到在粤军中工作，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作不懂军事的陈炯明的副手，仰人鼻息，不能独当一面，为他人做嫁衣裳。再有，时间长了，蒋逐步发觉陈炯明并不真正执行孙中山的命令。其间，蒋曾私下对邓铿讲："我之入幕，为服从孙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助陈炯明而来"。加上蒋介石性情骄躁，与人寡言，正是这些真真假假的矛盾，蒋介石无心长期在粤军中，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谋求重要的权位。1918年7月31日，蒋介石终于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派人持他的亲笔函件前往挽留，说"粤军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孙中山也多次劝慰要蒋留下工作。

9月18日，蒋在家一段时间后又回到粤军司令部(漳州)。9月26日，被晋升为第二支队司令，统领一千余人。一些分析家认为蒋介石第一次辞职后得到晋升，以后便常用此手法，讨价还价，抬高身价。自此时起到1924年4月，6年之内共13次辞职，复位、晋职，地位却不断提高、巩固。

第二支队为许崇智第二军所属，蒋与许的关系比较好，许也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这年10月29日许生病，蒋代许任第二军代总指挥。其间，蒋拟订反攻广州的作战计划，从三河地区出发，1920年11月2日，粤军打回广州。在广州战役中，朱执信被桂系军杀害，这对孙中山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损失。11月29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云："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可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在孙中山眼里，蒋介石对他的忠诚可与朱执信相比，而知军事更比朱高一筹。可见蒋在孙的心目中地位是高的。在广州收复和朱执信被害后，蒋介石更加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但是，打回广州，受到器重，并没有使蒋介石安心于粤军中工作。据说是因为第二军高级将领不听他的调动，同时，代人指挥，总不是个滋味，不久，他又不辞而别，声称要"自练可靠者"，培植自己的嫡系亲军。

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到达刚收复了的广州。次年4月2日，举行国会非常会议，宣布取消军政府，建立新政府，孙中山被举为非常大总统。6月18日，广州政府开始西征广西，追击广西陆荣廷部。在此期间，孙中山曾多次去电，催蒋"速来助我一力"。蒋介石也回过广州、与陈炯明等商讨西征军事计划，但始终没有直接参与战斗。这中间除了上述不满情绪外，1921年6月14日蒋母病死，为料理后事，花了很多时间。蒋介石满脑子封建意识，一心在家守孝。孙中山、胡汉民等人都去电，要他"墨经从戎"，但终未接受。直到这年12月其母安葬后，才算比较安心地重投军旅。

两广既平，孙中山将大本营建立在桂林，开始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蒋介石积极协助筹划。1922年1月19日，蒋介石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商讨北伐事宜。早在1921年，蒋在家里就拟订过三个《北伐军事意见书》，内容大体上是：以四川军定西北从陕西攻河北；以三个师攻打湖北，沿京汉路北上；以广州出三个师平定东南取南京，然后沿津浦线北上；再以6个旅取海道赴渤海湾，从秦皇岛登陆。整个北伐，拟算军费每年约3000万元。军队编制仿各国军制取现代化，统一番号，统一指挥。

但是北伐军事真正开始以后，蒋介石与孙中山产生了意见分歧，主要是对陈炯明的看法和处置上认识不一。蒋介石与陈炯明直接接触，对他的为人和思想蜕变，了解较多，并从个人权力地位出发，对陈不满，在军事上也瞧不起陈炯明。1921年3月5日，蒋写信提醒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后来又进一步发现陈炯明纵容部下叶举公开诋毁孙中山，骂孙为大炮。又在粤军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特别是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因此蒋介石主张应"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即先清除陈炯明，再行北伐。并具体建议孙中山先发制人，出陈不意，先派兵占领梧州，切断广东与南宁间陈炯明部的联络。孙同意蒋的建议，并命蒋担任此项任务。蒋率兵兼程到达梧州。1922年4月19日，孙中山到达这座两广水陆交界处的名城，并命陈炯明来见。陈作贼心虚，拒绝赴会。孙中山大怒，撤销了他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政部长之职，由于胡汉民的劝阻，保留了他的陆军部长一职。接着蒋进一步建议，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陈炯明部缴械赶走。孙中山急于北伐，因为当时正值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利用矛盾，是北伐的好机会。因此对蒋的这一建议，未予采纳。为此，1922年4月23日，蒋又提出辞卸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孙中山力劝挽留，说是："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许崇智字)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孙中山如此诚恳求贤，蒋很感动，就留了下来，并两次去南宁会晤陈炯明。一则说服他支持北伐，二则探察实情。不料，陈炯明非常冷淡，满腹牢骚地说"民国二年，展堂(胡汉民字)一定要我出兵反袁，实害了我，如果那时不反袁，广东由我干到现在，岂不什么都办

好了吗？"这时蒋介石进一步认定陈炯明非但不会参加北伐，而且有反叛之危险。回到桂林后，再次建议孙中山提防陈炯明。孙中山对人宽容仁慈，总不会从很坏的方面着想，他也早看到陈炯明自尊自大，但总希望陈能悔过自省，尽量争取他，至少不要反对北伐。为此，孙中山将大本营从桂林迁到韶关，以便控制广东。蒋介石见状，又回到家乡。

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亲率5万大军在韶关誓师北伐。13日，分三路攻打江西，取得了赣南一些地方。5月25日，蒋又电汪精卫、胡汉民和许崇智等人，对陈炯明"盘踞省城，逆命作乱"表示愤慨，再次主张"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又去电许崇智说，现在"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指陈部）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但是，北伐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如果回师广州，会使北伐功败垂成。但后方不稳，也会牵制北伐。为此，6月1日，孙中山带领少数警卫返回广州，大部队继续北伐。孙中山到广东后，发现陈炯明在惠州调集部队，不肯前来见面，并散布"北伐军前线战败"的谣言。6月2日，孙中山急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如此胸怀坦诚，求助于蒋。可是蒋介石在浙江老家，忙为他母亲去世周年纪念，没有立即去穗。6月16日，陈炯明公开叛乱。第二次护法战争又告失败。

（摘自《民国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与陈洁如从未结婚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云："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这意味着，陈洁如与蒋介石从未正式结婚。

然而《陈洁如回忆录》却着力描绘了一个蒋、陈结婚的动人场景，并强调："孙中山作见证要我们尽快结婚，结婚典礼于1921年12月5日很安静地举行，地点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大宴客厅内"，"张静江福证，季陶为介石主婚"，婚后三日归宁后即起程赴宁波。在溪口，陈洁如与毛福梅相见、祭祖、喜筵、为蒋母上坟、游雪窦寺等，度过了一个温馨的蜜月。

两种说法，何者为是？唐华在《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发表《〈陈洁如回忆录〉质疑》一文，对陈洁如之说予以否定。文章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记载与陈说大有出入，从1921年10月8日至12月11日，蒋正以孝子身份忙于其母王采玉窀穸之事，根本未离开过溪口，因而不可能在上海与陈洁如结婚。请看《蒋介石日记》：

"下午三时抵家。见纬儿面部疮疤犹在，颇讶，旋往抚母棺。十年十月八日。"

"下午，筹备丧事，给讯璐妹。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璐妹，即陈洁如——笔者）

"晚，辑先妣哀思录。十年十二月五日。"

蒋、陈结婚会不会在1921年10月以前?1921年6月14，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为母治丧，直至8月10日，在孙中山的电催下，蒋介石勉强至沪。"留旬余，时值大风雨，因念母灵柩在堂，恐被水淹"，故于8月24日复返溪口。蒋于8月11日至8月23日留沪期间，会不会与陈洁如结婚呢？《蒋介石日记》中找不到只字记载。《陈洁如回忆录》也否定了这种可能。回忆录说，陈父学方于1921年9月7日去世，陈母在张静江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洁如需在为其父守孝三个月后，方能结婚。8月中下旬，陈父应当还健在，因此不可能结婚。回忆录还说，蒋陈结婚三日后归宁，然后同归溪口拜祭蒋母墓。而此时蒋母之棺尚厝堂中。因此，蒋、陈结婚不可能在此阶段。

那么蒋、陈婚礼会不会在1921年12月12日以后呢？1921年12月13日，即蒋从溪口返回上海的当天晚上，《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陈洁如的记述："晚，璐妹来省。"但次日，蒋介石便乘轮赴粤，12月18日抵广州；1922年1月18日，抵桂林，直至1922年4月27日返沪，共在两广停留约5个月。这期间，不可能抽出10多天时间在上海结婚。蒋介石日记中无片言只字可以说明蒋曾于这段时间与陈洁如结婚。

因此，可以判断，蒋介石与陈洁如从未结婚，回忆录中有关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并共度蜜月的记述都是杜撰的。

（萧　青）

风 云 人 物

陈 独 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曾用过陈仲子、陈由己、陈铎生、三爱、只眼、方桓甫等笔名或化名。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早年读私塾,17 岁时中秀才。1897 年,到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后来,因有反清言论,被警察追捕,逃回安庆。1901 年,到日本东京留学;翌年返回,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旋被清朝当局追捕,逃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03 年,陈独秀和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和拒俄义勇队,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不久,回到安庆,组织"安徽爱国会",并被推选为该会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后到上海,佐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 年,到芜湖安徽公学任教,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6 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907 年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安徽独立,成立了都督府。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3 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军事斗争。失败后亡命日本,佐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1915 年,陈独秀回到上海。9 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 年 1 月,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在此期间,陈独秀发表了《警告青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袁世凯复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等许多文章,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孔教;提倡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和主将,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

1919 年 5 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6 月 11 日,他到天桥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自己起草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军阀政府当场逮捕,直到 9 月 16 日才获释放。出狱后,因在北京无法立足,由李大钊护送到天津,然后转至上海。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谈政治》、《讨论社会主义》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 年 5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于 8 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任书记。同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 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到广州后,他又和谭平山等组织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他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

1922 年 7 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1 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 年回国。6 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陈独秀先后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丢掉农民。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1925 年 1 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5 月,参加领导了上海的五卅运动。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 月,在中山舰事件中;5 月,在"整理党务案"事件中,陈独秀都采取了右倾、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乘机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7 月,陈独秀又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陈独秀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 4 月 5 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农之事"。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在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到严重损失。

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1927

年初，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4月27日，陈独秀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一定的批评。但是，大多数代表对其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还认识不足。因而，他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坚持他的右倾投降主义。7月，他下令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交出全部武器。致使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当地工人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由于陈独秀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也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主持工作。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对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隐居上海，专门研究文字学，在政治上更加动摇，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多次拒绝了党给予他的改造自己的机会。如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前往苏联，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拒绝了；1928年，要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又拒绝了；六大后的新中央告诉他，共产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担任东方部长的职务，他初则应允，后又取消；最后，他又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的决定。与此相反，他却联合彭述之等人，反对六大路线，反对六大选出的新中央。1929年，他公开为托洛茨基辨护，反对共产国际；公然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运动，反对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一部分人组织秘密小集团，反对共产党。1929年11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起草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并和彭述之、高语罕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接着，他又组织托派，任托派的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翌年4月，在南京受审。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判处他十三年徒刑；一年后改判为八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拒绝了一些人要他到美国去写自传的要求，也没有同意张国焘要他再组织一个“共产党”的要求；还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防参议会。当时，他表示了抗日救国的态度。王明、康生曾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但在1937至1938年间，他仍然拒绝党中央要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后甚至公开撰文诋毁我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最终拒绝了党对他的挽救。出狱后，他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江津等地居住。靠写文章和北京大学校友及同乡亲朋的一些接济度日。晚年贫病交加。1942年5月，因心脏病在江津去世。1947年，其三儿陈松年，将他的棺木迁葬于安庆。

材料一　如椽大笔一先驱

五四建党时期，社会上曾流传过这样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如今，“两巨人”之一的“孤松”——李大钊同志已被公认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而另一位“巨人”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如何，目前还有些争论。

众所周知，在中国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而陈独秀正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陈独秀就曾谈到过社会主义。比如，他在1915年9月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就提到了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称为“近世三大文明”之一，但此时的陈独秀并未能完全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真义。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陈独秀的影响很大。从1919年初开始，陈独秀陆续发表了不少肯定和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他发表的《公理何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过激派与世界和平》等文，都不同程度地肯定或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他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伟大作用，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一套不能救中国，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他撰写的《新青年》宣言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更明确地说：“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益，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益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这些言论表明陈独秀已开始抛弃走资本主义的路，接受走社会主义的路。1920年4月，他公开声言要“走俄国人的路”。认定“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即开始大量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极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和传播者。

他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批判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1920年4月，陈独秀写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批判马尔萨斯学说是“掩护资本家底偏见”，论证了所谓人口过剩现象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指出：“比较贫困的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造成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

他通俗地解释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肯定地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陈独秀提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口号。他还号召工人们起来，准备夺取政权。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是要求管理权。”他强调“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

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1920年5月，陈独秀在《我的意见》和《答知耻》等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他说“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要改变这种制度，“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陈独秀还愤怒地指出，资本家的高度剥削“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

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1920年9月，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现在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就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压迫多数的劳动阶级。他指出，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劳动专政，才能改变这种现状。“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他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革命手段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最根本的手段。当时的陈独秀十分强调的革命手段就是要采用暴力革命反对走议会道路，他指出“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他在《谈政治》一文中，批判“新派”时指出：“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陈独秀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消亡的思想。指出：“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便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的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

陈独秀不仅较早地从上述几方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率先发动和参加了两次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思想上建党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一次是同张东荪、梁启超的伪社会主义的斗争。在1920年11月前后，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同伪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他在1920年12月1日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1921年1月19日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叫嚷在中国要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认为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确也增加贫乏”。陈独秀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陈独秀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在中国，“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陈独秀的这些论述，戳败了伪社会主义者的进攻，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另一次是在1920年前后同区声白、黄凌霜等无政府

主义者的斗争。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又是陈独秀。他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谈政治》,1921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批判》等一系列文章中,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国家、政治、法律,主张绝对民主、自由的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陈独秀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笼统地反对一切暴力和强权是错误的。"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本主义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使用强权的必要"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因为劳动阶级必须"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在赦底思诏,""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因此,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

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先进青年尊他为导师、榜样,与他探讨,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同志1921年2月写信给陈独秀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很多青年称赞陈独秀的《谈政治》、《马克思学说》等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著述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好入门书。"

当时的反动势力则对陈独秀大加攻击。1921年3月8日的上海《中华新报》撰文:"陈独秀之学说,则诚如滔天之祸,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

当时,广东省有一帮旅居上海的反动人物也通电全国:"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这些攻击正是从反面对当时的陈独秀做出的很好评价。

毛泽东同志曾以亲身经历说明过陈独秀的影响。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同志说:他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前,曾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

茅盾也曾说过:"陈独秀为了反对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愤然把《新青年》移至上海出版。上海版《新青年》第一期就有《谈政治》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了一下,文献俱在,这是不能抹煞的。"

这些谈话都对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作了公证的评价。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非常突出的。尽管他在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在集中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比李大钊同志稍晚,而且在其文章的论述中也存在着某些理论观点上的模糊和错误。但是,他毕竟较早地较系统地、大张旗鼓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些基本观点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勇敢斗争。这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陈独秀能有上述的认识,能做出上述的努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应该肯定的。从1920年4、5月份,陈独秀开始公开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文章的数量、质量、影响等方面来看,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选自《党史纵横》91年6期,作者:牛辅恒)

材料二 《新青年》"一枝独秀"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目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它为中共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1936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独秀山。据传,五十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

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罗嗦，一望而知是笔名。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

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1901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1902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1906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1914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

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1911年11月11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疏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好景不长。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叱咤安徽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

经过这般大起大伏，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1915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

"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1915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

"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

更名《新青年》，使《青年》更加名声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名声鹊起。

(选自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材料三　陈独秀的品格特点

陈独秀与李大钊，通称我党历史上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著名而复杂的

人物，一生曲折坎坷。他的性格品质也如他的一生经历：既有光明面熠熠闪光，也有阴暗面锈迹斑驳；既有政治思想家的风格，又有更多的旧文人气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典型的个人特色。毛泽东曾推崇陈独秀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俗学之比拟”。

据曾任陈独秀秘书的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中等身材，身材魁梧，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的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特别强。这是陈独秀的一般表象特征。至于陈的性格品质特征至今论述甚少，本文作一尝试。

陈独秀刚烈倔强，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富有怀疑、批评、开拓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政治软弱。

陈独秀自幼带有叛逆性格，宁折不弯。儿时，面对绰号“白胡爹爹”祖父的毒打，他总是一声不哭。祖父气得没法，却似又从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年轻时，他虽执意未参加同盟会，但同样在政治思想上发展成为朝气蓬勃、敢讲敢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中，他积极大胆地参加了反帝爱国和反对清政府的斗争。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他由沪返回安庆，第三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的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拟即枪决”。他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于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学术的斗争异常勇猛顽强。他曾公开声明，为了“民主”和“科学”，“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为提倡文学革命，他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932年，陈独秀最后一次于沪被捕，在押解去南京的列车上，他竟“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当蔡元培先生于九日被迫出京时，许多朋友劝陈也离开，他不肯走并愤懑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他在24号《每周评论》上说“研究室和监狱是文化的发祥地”，表现了他“宁为主义情愿牺牲的决心。”之后，他不避风险前行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而被捕。

李达认为，对陈独秀“要表两种的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陈独秀性格刚强坚毅，具有开创革命大业的英勇气概。然而，他又表现出文化战线上勇敢与政治战线上幼稚软弱的两重人格，而且相当地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陈独秀才思敏捷，博学多艺，造诣精深，但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

当1914年陈独秀首次以“独秀”笔名发表文章时，他的好友汪孟邹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他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其实，此名的选用，不妨理解为隐含着他的胸怀与抱负。

世人皆知，李大钊生平言行诚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他为党捐躯，慷慨就义，是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据濮清泉的一次回忆：我问陈独秀：“人们说‘南陈北李’你比李如何？”他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我说：“自谦乎？”他说：“真言实语，毫无虚饰”。陈独秀对鲁迅也是相当钦佩的。他说：“我认他不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

（选自《党史文汇》，作者：张修成）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号龟年，后改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出身农民家庭。是遗腹子。出生后十六个月，母亲亦去世，由祖父抚养成人。10岁时，奉祖父命完婚，其夫人较之长六岁。李大钊早年读过私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在此期间，他看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写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等文章，从一个爱国学生转变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

1913年冬，在汤化龙(进步党领袖之一)的资助下，李大钊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此期间，曾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并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这时，他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1916年5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后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任《晨钟》报总编辑；旋与之决裂。1917年1月，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当编辑。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以孔丘为代表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

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替其职务，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后，又兼任经济学教授。到北大后，应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6月，又和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了《国民》杂志社导师，《新潮》杂志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任编辑兼校对。当时，北京大学的各种社会团体，

几乎李大钊都曾参加和发起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也是我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他先后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向我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庄严宣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019 年 5 月，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的时候，他还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时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办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除在北京大学任教外，还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学》、《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和《女权运动》等课程。他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教授，同时又是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良师益友。在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扩充了大量外文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并向很多朋友和青年推荐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影响了当时整整的一代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他曾写了《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号召青年把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曾亲自到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并曾为营救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和革命学生而四处奔走。1919 年 8 月，他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鼓吹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高尚德、罗章龙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 月，又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建党、建团的同时，李大钊还先后派人到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帮助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当时，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创建都与李大钊有关。所以有"南陈北李"之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负责领导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1922 年 8 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西湖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会后，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会见孙中山，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并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成为我党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开始从事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 年 6 月，李大钊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 年 1 月，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北京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由李大钊和胡汉民、汪精卫等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持大会的实际工作。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帮助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选举李大钊、谭平山等三名共产党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七名共产党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形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会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组建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国民党工作。1925 年，孙中山临终前，又指定他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924 年 6 月，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到北京。接着，又领导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还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政府召开的关税会议，并要求关税自主的运动。李大钊还非常重视团结各民族共同参加中国革命。1923 年冬，在北京蒙藏学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4 年 4 月，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1925 年 10 月，又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培养出多松年、李裕智、奎璧、吉雅泰、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革命干部。1925 年冬，在张家口召开了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李大钊当选为书记，赵世炎等当选为副书记。

1925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 月，他和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北京人民开展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3 月 18 日，在率领群众到执政府请原时，遭到段祺瑞卫队的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到处是白色恐怖。李大钊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都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继续坚持斗争。由于当时是革命初期，斗争经验不足，李大钊也没有估计到封建军阀敢于袭击外国的大使馆。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的协助下，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

在狱中，李大钊勇敢地承担责任，开脱同案人员。他说："倘因此而重获罪状，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

矣。"表现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舍身救人的崇高品德。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京师看守所被北洋军阀秘密绞杀。1933年4月，其棺木安葬于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遗著编有《李大钊选集》。

材料　庶民的胜利

守常（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路。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

（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

包　惠　僧

包惠僧（1894——1979）曾用名包晦生，别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

曾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外勤记者，1920年与董必武、陈潭秋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上海编辑《劳动周刊》。1922年至1923年，先后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1922年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在武汉，组织了租界人力车夫罢工，筹建江岸工人俱乐部、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汉冶萍工会、码头工会、纺织工会等，推动了武汉工人运动的开展。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东征，任黄埔军官学校后方政治部主任。后任黄埔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随北伐军到武汉后，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后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的组织。从1931年起，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年调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任人口局局长。1948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复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后去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从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在北京病故。撰写有《包惠僧回忆录》。

周　佛　海

周佛海（1897—1948），原名福海。湖南沅陵人。早年

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肄业于沅陵辰郡联合中学。1917年，留学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取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一年后，预科毕业，升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在校三年，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直到1924年毕业。在留日期间，他翻译过《社会问题概观》和《互助论》等书。

1920年6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省母。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由陈独秀、李达和周佛海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拟定好计划，分头派人工作时，周佛海才返回鹿儿岛继续求学。1921年7月，他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私欲和政治野心，作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该小组的另一成员是施复亮），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当他的私欲不能实现时，便叛党而去，成为国民党政客和汉奸卖国贼。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在其回到上海之前，由周佛海代理其职。在此期间，他和张国焘等一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开始发动劳工运动。接着，他又到长沙和武汉等地，会见了毛泽东和陈潭秋，让他们召集一批青年，准备去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回到上海，向陈独秀移交了党的工作，然后到日本继续求学。

1924年5月，周佛海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之邀，他担任宣传部秘书。不久，又应广东大学校长邹鲁邀请，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此后，在政治上便日趋反动。他和邹鲁一起参加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并发表宣言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公开背叛党的纲领。1924年冬，周佛海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秘书，随军北伐。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在武汉成立总司令行营，周佛海被任命为行营秘书，襄助行营主任邓演达工作。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这时，他站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一边，同共产党对立。1927年5月，他乘恽代英率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同夏斗寅的叛军作战之机，带领妻儿逃出武汉，投靠蒋介石，并发表《逃出了赤都武汉》一文，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他也辞职到广州，协助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办学。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指定周佛海和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等五人为委员，筹办《新生命月刊》，并由周佛海负总责。不久，他又创办了新生命书店。在此期间，他写成《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一书，成为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之一。

1928至1931年间，周佛海历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先后参加蒋介石对桂系、对唐生智、对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的新军阀混战，以及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充当蒋介石的主要谋士。

1931年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佛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此后，又兼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等职。

1937年，周佛海任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兼训练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后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周佛海假托外出视察为名，逃离重庆，经昆明、香港到达敌占区上海，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卖国贼。

周佛海在叛国投敌后，任南京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兼秘书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敌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特别市市长、上海警察局局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和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是地位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第三号汉奸巨头。他们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沦陷区组织汉奸特务和反动武装，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屠杀爱国志士，并协助日军进行所谓“经济战”，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掠夺物资资敌。

1942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派王安之、程克祥、彭寿等人对周佛海进行所谓“策反”工作。实际是使周佛海和戴笠的特务组织建立起联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亲电重庆，请求给予名义，以保护身家安全。蒋介石遂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美其名曰“维持”上海的地方秩序。9月，戴笠到达上海后，将周佛海送到重庆磁器口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企图将他包庇过关。

1946年春，戴笠死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才将周佛海由重庆解回南京，由法庭公开审判。结果，陈公博、褚民谊等人被判处死刑，周佛海被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仍然受到特殊优待。1948年，因心脏病暴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 公 博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早年就读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不久,与中共的早期活动家谭平山共同创办了《群报》,鼓吹革命。1921年初,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7月,中共一大召开,陈作为广州代表出席了大会。1922年,支持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受留党察看处分,仍无改悔之意,公然叛党,于1923年被开除出党。嗣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

从1925年至1927年,历任广东省农业厅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部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及江汉关监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等职,成为国民党右派头目之一。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追随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汪合流后,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对蒋独揽大权不满,于1928年底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他是改组派首领之一。1932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同汪精卫投降日寇,1940年,担任南京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成为汪伪汉奸政权的第二号人物。1944年汪病死日本后,由他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继续对沦陷区人民施以暴政。

1945年,日本投降,他逃往日本,避居东京。后被提解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被解至苏州监禁。后被枪决。

张 作 霖

字雨亭,堂号三畲堂,辽宁省海城县人,1875年生。1895年开始为匪,1903年被清政府收编,曾任奉天新民府游击马队营管带、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1912年9月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16年4月任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7月改称奉天督军,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后逐步控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形成奉系军阀。1920年7月又兼任蒙疆经略使。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失败后,自任东北保安司令。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取得胜利后,控制了北洋政府。1926年11月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7年6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1928年与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混战,兵败出关,6月4日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

卢 永 祥

字子嘉,山东省济阳县人,1867年生。1891年毕业于榆关武备学堂,后在淮军任队官。1895年入新建陆军,任兵官学堂教习、管带等职,1904年后任陆军第一镇步二协三标标统、陆军第六镇步十一协协统、陆军第三镇步五协协统。1912年8月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14年任陆军第十师师长,1915年任松沪副护军使,1917年升松沪护军使。1919年8月任浙江督军,是皖系在南方的中坚人物。1924年9月与齐燮元争夺松沪地盘,因孙传芳由福建进攻其背后而失败。直系失败后,被执政府任为直隶军务督办。1925年携奉军南下,将齐燮元驱走,任江苏宣抚使、江苏军务督办,同年8月因奉系挟制去职,9月任故宫博物院董事会董事,1926年任故宫博物院维持员。后在天津作寓公,1932年国民政府聘其为国难会议议员。1933年病故。著有《废除督军制之商榷书》、《与国人商榷国事书》。

刘 湘

字澄浦,四川省大邑县人,1888年生。1904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转入四川武备学堂。曾在四川陆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协任哨官。1912年后在四川陆军第一师任营、团长,1916年8月任四川陆军第一师第二旅长,1918年4月任该师师长。1920年川军驱滇军时,任四川第二军军长及前敌司令官,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兼管全省民政。1922年支持杨森进攻四川第一军熊克武部,杨森兵败,其亦避居于家乡。1923年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联合其它川军进攻熊克武之第一军,乘机出山,指挥各部川军将熊部驱出四川,同年7月政府任为四川善后督办,10月授将军府嘉威将军。1925年5月临时执政府任为川滇边防督办,7月联合川黔军各部将杨森打败,又任为川康督办及四川善后督办。1926年4月又联合川军将黔军袁祖铭驱出四川,同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任为第二十一军军长。1928年南京政府任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席,1932年任为四川善后督办、节制全省军队,同年10月与其堂侄刘文辉发生战争,1933年8月将刘文辉击败,成为四川势力最大的军阀。1934年任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剿匪"总司令。抗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突然病故于汉口。

顾品珍

字筱斋，云南省昆明人，1883 年生。1908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归国后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1912 年后历任滇军团长、云南讲武堂堂长、云南陆军第一师步一旅旅长、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等职。1915 年 12 月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1917 年任川滇黔靖国军第一军长，曾指挥滇军与四川军队进行多次混战，1920 年被川军击败，率军退回云南。1921 年 2 月将唐继尧驱走，以滇军总司令名义主持云南军政。1922 年 3 月唐继尧率驻桂滇军返滇，所部被击败，其在天生关被打死。

梁士诒

字翼夫，号燕孙，广东省三水县人，1869 年生。1889 年中已丑科举人，1894 年中甲午科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后主讲于广东凤冈书院。1897 年任国史馆协修，1903 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4 年赴印度任议约大臣随员。1905 年任铁路总文案，1907 年后任邮传部五铁路提调处提调、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帮理、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外务部丞赞上行走，1911 年被盛宣怀撤职。1911 年辛亥革命时任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副大臣。1912 年 3 月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1913 年任财政部次长，1914 年任税务督办。是旧交通系的头子。1915 年积极从事于袁世凯的称帝活动，1916 年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而受通缉。1918 年 2 月被撤销通缉后，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1921 年 12 月在张作霖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遭到直系反对，1922 年 5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受到通缉。1925 年任执政府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并再次任交通银行总经理。1927 年任安国军政府的政治讨论会会长，1928 年又任税务督办，同年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九一八”事变后，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委员。1933 年 4 月病故于上海。其门人编有《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施肇基

字植之，浙江省杭县人，1877 年生。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任驻美使馆随员，后入康乃乐大学。归国后任湖广总督文案、考察宪政大臣随行参赞、邮传部右参议、京汉铁路总办、京奉铁路会办、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哈尔滨海关道、吉林交涉使、外务部右丞。1912 年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等国公使，同年 4 月任外交总长兼署财政总长。1913 年任总统府大礼官，1914 年任驻英公使。1919 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20 年任驻美国公使，1921 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代表。1923 年又任外交总长，后仍任驻美国公使。1925 年任关税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同年 5 月被任为外交总长未就。1926 年任驻英全权公使，1930 年任出席国联中国全权代表。1931 年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未就。1933 年任驻美公使，1935 年升为驻美全权大使，直至 1937 年离任。1945 年任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58 年 1 月故于美国。著有《施肇基早年回忆录》。

颜惠庆

字骏人，上海市人，1877 年生。美国弗几尼亚圣公会中学及州立大学毕业，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及商务印书馆编辑，被清政府授为译科进士。曾任驻荷兰公使馆翻译、驻美国及墨西哥公使馆参赞，此期间还入华盛顿大学学习。1909 年后任外务部主事、参事、左丞。1912 年任外交部次长，1913 年任驻德国公使，1919 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1920 年 8 月任外交总长，1922 年 6 月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923 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农商总长。1924 年又出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同年 10 月去职。1926 年 3 月又任过短期的国务总理。后居于天津，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大陆银行董事长、天津自来水公司董事长、南开大学董事会董事、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主席。1931 年任华洋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同年 9 月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32 年任驻苏联大使，1936 年去职。1949 年 2 月任上海各界代表，赴北京商谈南北通邮通航事宜。后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并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 年病逝于上海。著有《颜惠庆回忆录》，编有《英华标准双解大辞典》，曾流行多年。

徐绍桢

字固卿，堂号为学寿堂、学海堂，广东省番禺县人，1861 年生。1894 年中甲午科举人，1897 年应江西巡抚李兴锐之请，任江西课吏馆副馆长，1901 年任江西总理营务处及讲武馆，并兼任江西常备中军统领。1903 年 5 月任广东全省营务处总办，10 月任福建军政局总办。1904 年任福建竹畸关税务委办，同年 12 月任两江督练公所参谋处及教练处总办。1905 年兼统两江常备军步一标，同年 7 月授江苏省苏淞镇总兵，仍留省练兵，10 月任江苏陆军第九镇统制官，1906 年兼任两江督练公所会办及总

参议。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南京卫戍总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参谋总长。1912年后任总统府军事顾问，1914年6月任参政院参政等职。1917年7月参加护法政府，任广州卫戍司令、广东军政府陆军部练兵处总办，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参军长。以后长期居于上海，从事于藏书及历算的研究。1936年9月13日病故。著有《学寿堂日记》、《学海堂奏议》、《韵义便考》、《六书辨》、《学寿堂题跋》、《学海堂诗烬馀草》，此外其学寿堂丛刊中收有《四书质疑》、《三国志质疑》、《考经质疑》、《后汉书朔闰考》、《勾股通义》、《学一斋课算学》、《学一斋勾股代数草》等。

珍闻轶事

从“社会党”到“中国共产党”

多年来，人们往往认为我党从建党起就叫“中国共产党”。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演变过程。

据参加早期建党工作的张申府回忆：“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1920年8月上旬正式成立的，当时叫‘社会党’。”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在《对时局的我见》一文中提到了“吾党”，并使用了“社会党”这一名称。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陈独秀曾给李大钊、张申府写信，介绍了上海建党的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的组织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原叫社会党的也已经或准备改称“共产党”了。所以还是叫“共产党”好，而且征求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意见。此后，由张申府执笔复信陈独秀，建议党的名称叫“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份正式刊物，它就是著名的《共产党》月刊。

最早使用“中国共产党”一词的是蔡和森。他在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应“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但这仅仅是一个提议。“中国共产党”这一称谓是1920年11月7日之后开始使用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11月制定党的第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被明确地称为《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通过了我党的第一个党纲，党纲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这时，我党的名称才最后确定下来。

（选自《党史博采》90年8期，作者：高运荐）

1921年7月成立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在北京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创办了《今日》刊物，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

“今日派共产党”的组织者是胡鄂公和邝保汉两人，主要成员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人，并发表了声明。

胡鄂公曾做过军阀王占元的政务厅长，后为国会众议员。曹锟贿选总统时，他是被收买的议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今日派共产党”派彭泽湘等人赴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争“正统”，并要求加入第三国际，遭到共产国际的拒绝。

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宗旨，曾指示北京共产党组织接纳胡鄂公等，并考察他是否参加曹锟的贿选。北京党组织在弄清情况之前，先将胡鄂公、邝保汉等人放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考察，经查实胡鄂公确实参加了曹锟的贿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便将他们开除。不久，“今日派共产党”宣布解散。

（摘自《党史纵横》）

第一个培养干部的机构——外国语学社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举办一些培养干部的机构。上海成立了外国语学社，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广州则有俄语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

上海外国语学社设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这里和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2号相近，联系较为方便。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大门口挂上外国语学社的牌子。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实际上是以公开的办校形式，掩护革命活动。

外国语学社的校长是杨明斋。学生多的时候达五、六

十人，以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为主，为留俄作准备。学校由杨明斋和魏金斯基的夫人讲授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

外国语学社学生的生活比较艰苦，每月生活费只有5元左右，有时4、5个学生住在一起，只包3、4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钱，作为其他费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华俄通讯社和《劳动界》做收发、缮写、校对等工作，为自己生活、学习创造条件。

1921年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挑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曹靖华、汪寿华等20多名团员，先后分3批去苏俄学习。赴苏俄学习，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还要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他们从上海乘船绕道日本，先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乘火车到伯力，进入俄境。一路上，经受了车船的颠簸与艰辛，最后终于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5月，外国语学社结束活动。

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是由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联合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在1920年8月22日的成立会上，何叔衡宣读的简章表明，该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会务是：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研究会于9月16日推举姜咏洪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当时；研究俄国革命成了一时风气。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利用"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马克思主义宣传员，它是由广东教育委员会开办的一个公开的教育机构，陈公博任所长，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担任教员。学员有100多人，来自广东各地。讲课内容有国语、常识、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知识、三民主义等，约于1922年6月停办。

（选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者：庄有为等）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二十五个"第一"

（1）中国第一个宣传苏俄十月革命的人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12月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热情赞颂十月革命。

（2）南中国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杨匏安。他在1919年11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社会主义》，其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

（3）湖南第一个吹响十月革命号角的人是蔡和森。他在1918年8月从北京写信给毛润之（泽东）说："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4）西北地区第一个介绍苏俄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人是席石生。他在1920年11月2日至8日在《鼓昕日报》发表《布尔什维克主义论》。

（5）中国第一个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党即共产党的主张的人是李汉俊。他在1919年9月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日本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的译文，于《译后记》中说："人家叫我做民党叫社会党，我应该在这一点上有切实的打算。"

（6）中国第一个筹备建党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被通辑的陈独秀秘密出京赴津转沪。在京津道上的骡车内二人相约分工在南北筹备建党，通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7）受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派遣第一个到中国的代表是维经斯基。他于1920年4月到达北京，先找李大钊；5月，又到上海找陈独秀，协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8）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第一任书记是陈独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陈独秀等函约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共八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9）1920年九十月间，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成立。第一任负责人是李大钊，负责联系济南、天津、唐山、河南、太原以至内蒙、东北等党员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组织。

（10）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党领导下创办的工人通俗刊物《劳动界》创刊，发起人是李汉俊、陈独秀。

（11）1920年10月，中国产业工人第一个在党领导下建立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发起组织人是陈独秀和李中（工人）。

（12）1920年8月，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译者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望道。

（13）1920年11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主编李达。

（14）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名代表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邓恩铭、刘仁静、何叔衡、陈公博、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周佛海、董必武。

（15）中共"一大"选出第一个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书记、张国焘组织（指工人运动）、李达宣传。

（16）"一大"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领导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国焘。

（17）"一大"后，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是陈望道。

（18）"一大"后，中共北京地委第一任书记是李大钊。

（19）"一大"后，第一个为革命被捕坐牢的是陈独秀（10月4日）等。

(20)"一大"后，中共湖南支部的第一任书记是毛泽东。

(21)"一大"后，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于1921年9月1日成立，社长是李达。

(22)"一大"后，党领导下在浙江萧山衙前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农民协会，会长是李成虎。

(23)"一大"后，党领导下在湖南建成第一个培养干部的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人是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

(24)"一大"后，党领导下在湖南创办全国第一个织布厂，以解决党的活动经费，这是个创举。发起人是毛泽东和易礼容。

(25)"一大"后，第一批为党的事业献身的两名青年团员是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

(选自《人物》91年3期，如辑)

国民党人曾参与中共建党活动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些国民党人参与了中共建党活动。并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先后参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活动的国民党人有：上海：戴季陶(戴传贤)、沈玄庐(沈定一)、邵力子、林伯渠；北京：江浩、李留九；武汉：刘伯垂(刘芬)、董必武、张国恩(张眉宣)；广州：谭平山。长沙和济南方面虽然没有国民党人直接参与筹建活动，但长沙小组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39名团员中就有36人加入过国民党；济南小组则在筹建前，得助于国民党人、山东省议员王乐平的大力支持。这些国民党人在参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活动的过程中，均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国民党人，有的成为中共杰出的领袖人物，有的则退出了共产党，有的甚至成为国民党右派，极端仇恨共产党。但是，对于这些人早期参与筹建共产党的历史作用，仍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

我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图书室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藏书上盖有"亢慕义斋"的印章。"亢慕义斋"即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室名字。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翌年11月，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月刊》上登出启事，公开声明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目的。蔡元培校长拨了两间房子给研究会作活动场所：一间当办公室，一间作图书室。研究会为图书室起了个名字——"亢慕义斋"，即英语COMMUNI SM(共产主义)的音译。

李大钊和研究会的进步青年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各方面搜集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还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驻中国使馆，搜集和收藏了共产国际出版的英、德、日、法等文字的书籍，集中在、亢慕义斋"供人借阅。李大钊也常在"亢慕义斋"指导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这批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自《党史博采》90年5期)

为中共"一大"作出贡献的两位女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然而，为"一大"召开作出贡献的两位女性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还鲜为人知。她们是为代表提供宿住地的黄绍兰和为"一大"改址出主意的王会悟。

黄绍兰，1892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清朝末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1年曾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博文女子学校并担任校长。她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十分关心我国的进步事业。五四运动后，随着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思想上、干部上、组织上建党条件日趋成熟。1921年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便酝酿正式建党，为了避免反动势力的干扰破坏，代表们对于会址、住宿场所动了少少脑筋。经过反复考虑，有些同志便提出用黄绍兰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场所。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意见，再研究落实的措施：陈独秀和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在北大共过事，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同黄侃一起并肩战斗过，便决定通过黄侃的关系，让他写信给妻子黄绍兰。为了保险起见，还决定由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和黄绍兰联系。本来黄绍兰对于进步事业就非常支持，这时又正值暑假，女校的师生都不在校，经王会悟登门说明来意后，便欣然同意，并为代表们安排了住宿、吃饭等有关事宜。参加"一大"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等共13人，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参加了党的成立大会。住在博文女子学校的有9名代表，黄绍兰把他们安排在该校当街的一排校舍的楼上：毛泽东住在西头的后面一间；前面的一间住着王烬美和邓恩铭；张国焘、周佛海与包惠僧住在东头的一间。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只有一个厨

师兼校役住在楼下，别无他人。黄绍兰交给他的任务一是为代表做饭，二是严格把门，不许放进任何一个外人。安排就序以后，7月22日的预备会和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具体地址是当时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博文女子学校（校舍犹存）。正式会议的会址则选在女校附近的民房、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宅里，具体地址是：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由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担任警戒。

7月28日上午，王会悟象前几天一样在楼下后门口望风，突然发现一个年轻人手里托着一件尚未抖开的湿衣服，急匆匆地从厢房里跑出来直奔二楼的晒台。这时，"一大"代表们正在二楼开会，开会的那间屋子的门就对着晒台。

王会悟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她连忙跑上楼，汇报了情况。具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性很高，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桌上的文件便走了。当时正讨论在兴头上，有的代表还认为这是不是有些大惊小怪？

下午，李达来到李书城家探听消息。四点钟回来，一进门便向妻子道歉说："今天上午错怪你了，很对不起，你今天立了大功。"接着便向妻子讲了休会之后的情况。

代表们机警、迅速地隐蔽起来之后，没过10分钟，便来了两辆警车、从车上跳下9个法国侦探和警察。屋子里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由于没有搜到任何可疑的物品，因而也没有理由捕人。这帮家伙捕空之后，教育了与会代表这里已经很不安全了，必须另选会址。

会议停了两天，少数代表在此期间秘密相聚，商量另择会址之事，王会悟也参加了意见。在几个方案被否决之后，她说："我今天又要多嘴了，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象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径嘉兴的游客。"王会悟的意见立即得到了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一大"新会址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选自《革命春秋》91年1期，作者：黄九如）

中共一大代表的归宿

中共一大代表，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出的共有12人，另一名为陈独秀派出的代表包惠僧。在党的一大以后，他们在激烈的革命浪潮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归宿。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7人：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

董必武——1975年4月病逝于北京。

李达——1966年8月，受林彪一伙迫害，在武汉逝世。

陈潭秋——1943年9月被害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何叔衡——1935年2月壮烈牺牲于福建长汀。

邓恩铭——1931年4月在济南英勇就义。

王尽美——1925年8月，在青岛逝世。

脱党后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的3人：

李汉俊——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包惠僧——1979年7月病逝于北京。

刘仁静——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逝世。

脱党后变为革命敌人的3人：

陈公博——1946年6月在苏州监狱被处决。

周佛海——1948年因病死于南京监狱。

张国焘——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摘自《党史文汇》）

"一大"代表周佛海之死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伪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相继被公审、处决，而大汉奸周佛海却由死刑变为无期徒刑，直到1948年2月，病死狱中。个中原因如何呢？

原来，从1942年周佛海就开始向蒋介石"输诚"。通过戴笠的中间作用，周佛海提供了不少日方重要情报，掩护大批国民党特工人员潜伏沦陷区，打入伪政权各级职能机关，为蒋尽效犬马之劳。1945年8月12日，周佛海受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指挥伪中央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第十二军所属3个师、浙江保安队等部队，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周佛海曾致电蒋介石，表示要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中央"，绝不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为"保卫大上海"，为蒋介石重返江浙作出"贡献"。

然而，当时国民要求惩办汉奸的怒潮席卷全国，加之国民党势力逐步进入华中、华北沦陷区，汉奸们的作用日趋消失，于是从9月下旬开始，国民党政府作出姿态，下令在全国逮捕汉奸。周佛海当即被逮捕关押于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9月21日由该院检察处开始侦讯。

10月7日，高等法院在夫子庙大殿正式开庭，周当庭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辨护，并道出抗战期间与蒋藕断丝连的关系。法官并不理会，于11月7日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判，并请来几个大名鼎鼎的律师为他辨护，最高法院认定维持原判。此后，有人给周佛海出点子，叫周不要再提抗战期间与重庆方面的勾结之事，只着重提抗战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的"功劳"。于是，周佛海就把蒋介石的丑事隐瞒下来。

与此同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致函蒋介石，竭力保救周佛海(周在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任教育厅长，是二陈的亲信)，说周“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为周密，胜利后更使江浙两省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蒋对周佛海在抗战期间的“输诚”，接收上海时所做的“贡献”以及周的反共坚决态度原本非常赞许，内心并不愿意看到周被处死，所以，从一开始就暗中给其以保护。最高法院开审前的一天，蒋介石召见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询问是否可以不判周佛海死刑。谢为难地称周佛海目标太大，恐处理不妥会引起舆论指责。蒋又欲托人向经办此案的推事私下交涉，谢答：“承办这一案件的是一位老先生，比较古板，旁人很难直言。除非由委员长召见并亲予指示，或许能够变通。”于是，蒋便要谢冠生约那位推事同进午餐。席间，蒋问那位推事说：“从法律上看有无条文可以引用，免周佛海于死刑?”不料那位推事很率直地答道：“周佛海所犯罪行比陈公博大得多，倘使周佛海不处死刑，社会舆论一定哗然。”顿时，场面极为尴尬。谢冠生从旁边打圆场道：“法律条文没有办法，可有其他法子可想?”那位推事说：“只有在法院判决后，由国民政府主席运用特赦权，给予特赦或减刑。”于是，蒋亲自写信给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声言他曾经通过戴笠对周佛海表示过“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的意见，提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可否改判，即希由司法院核办可也。”经过反复磋商，几度公文往来，194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终于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出《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蒋称周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下令对其特赦，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周佛海闻讯，高兴得如痴如狂，当即在狱中吟诗曰：“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庆幸捡了一条命。

1948 年 2 月 28 日，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选自《纵横》89 年 3 期，作者：居忠友)

毛泽东的第一次“军事”指挥行动

1917 年 11 月中旬，北洋军傅良佐被广西军谭浩明打垮，从长沙逃往湖北。这时谭军尚未赶到长沙，但市内一夕数惊。湖南省立一师遂组织学生自愿军护校。毛泽东最先报名参加，他曾有过在新军中的半年正规军事生活经验，对学生自愿军的训练很内行，又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在师生中威信很高，他领导学生自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11 月 17 日前后，援傅的北洋军王汝贤部一路抢劫。消息传到城内，顿时紧张慌乱。毛泽东得知北兵疲惫、饥饿、惊慌、无战斗力，又不知城内虚实、易于赶走。遂挺身而出，迅速组织学生自愿军中胆大的同学作好出发准备。又到南区警察分局，要求派些警察配合学生行动，得到同意。当天晚饭后，毛泽东带领持真枪的警察兵在前，100 多名学生军随后，向溃兵滞留处前进。快到目的地时，分三路布于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待大家作好准备后，毛泽东下令鸣枪，学生军大放鞭炮。一会齐喊：傅良佐逃走了，广西军已进城，你们缴枪没事。北洋溃兵不知虚实，不敢抵抗。于是 3000 余人的部队全部缴械。毛泽东巧布空城计，智退北洋兵，一时在长沙传为美谈。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1991 年第 9 期)

人民出版社的诞生

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 9 月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关。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央局于 1921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工作。社址设在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为保障安全，防止敌人破坏，故意将社址写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1921 年 9 月 1 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登了人民出版社成立“通告”，简述了该社创办的宗旨与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并指出：“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此通告还列出了计划出版的书目，其中马克思全书 15 本，列宁全书 14 本，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丛书 11 本，其他书籍 9 本。到 1922 年 6 月底，出版社共出了 12 本书，其中马克思全书 2 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全书 5 本：《列宁传》、《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礼拜六》；康民尼斯特丛书 5 本：《共产党底计划》(布哈林)、《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托洛茨基)。以上 12 本书各印 3000 份。到同年 9 月，新出版的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劳动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李卜克内西纪念》等。此外，为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东纺纱工人罢工，还及时印发了大量文章、传单。这些宣传品战斗

性很强，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宣传工作。《共产党》月刊从第六期起由人民出版社发行。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人民出版社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对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毛泽东的四位老师

我和毛主席因均在长沙读书，虽没有同过学，但有几位老师是我们共同受过教的。由此，我与主席常常谈起长沙第一师范、以及我们共同受过教的杨昌济、袁吉六、徐特立、符定一等先生。先生们的教诲。对于我们均起过一定的作用。对于这几位先生们的情况，报纸杂志上也有过介绍，这里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补进少许。

首先是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同志的父亲，是毛主席的老师。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杨先生在那里教伦理学和哲学。中国的宋明理学和德国的康德哲学，是他所最熟识的，后来杨先生又到北京大学教伦理学。毛主席学问渊博，中西哲学无所不窥，是与杨先生早年的影响分不开的。

我就教于杨先生，大约是在1917年上半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快要毕业时，杨先生到一中来教修身课。他教育学生怎样好好地控制自己，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修身课当时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教本，但杨先生为了更好地联系学生实际情况，不用教本，自编讲义发给学生。讲义中多是"严以律己"的教育条文。我记得第一页即列了十四个"毋"。"毋"，即"不要"的意思，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十四个"毋"中第一个，即"毋多谈"。这并不是指上课时不许讲话，而是指我们今天所谓"言多必失"。也就是言多必犯错误的意思。十四个"毋"的要求是很好的，但不易做到，如"毋多谈"这一条，我自始就没有学会，辜负了良师的教诲。

其次一位是袁吉六先生，他是湖南宝靖的一位进士，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毛主席在学生时代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袁先生到省立一中教书，也是我快毕业之时。记得第一次叫我们做文章，出了一个极干燥无味的题目，曰"本期开学迟之因"。像这样的题目，要做千把字的古文，实在不易。而先生却要求很严，分数也扣得很紧。一次，袁先生在课堂上发作文本，首先发出的是我的，我翻开一看，批六十分，很不愉快，因为我作文向来是得九十分以上的对此十分难过，即把本子藏在衣袋里，怕人家看见。迨发完后，看别人的分数多是二十分或三十分，五分的也不少，我才放下了心。我不仅是头名，而且袁先生对我文章里引用的一句古诗"日月其除"，我在除字右上角加了一个小圈。表示这个字要读去声。先生对此很有意见，在作文本上用行书足足批了两页，而且在课堂上又当众用口头足足批了几十分钟。袁先生讲课很有神气，但毕竟以批分扣得太紧，学生不喜欢，他知难而退了。毛主席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这证明毛主席能看出老师之长，我们则只注意老师的弱点，大大阻碍了自己的学习，可惜可惜。

第三位是徐特立先生。这是大家所熟识的、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辈，他是我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为党、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不论是在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还是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里，他都能保持着极为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革命热情，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道德品质，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大家尊他为"徐老"。毛主席曾回忆说："他后来是我上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先生，他还是我革命的老师哩！"1937年毛主席给徐老六十寿辰祝贺信中开头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并号召全党向徐老学习。

我也把徐特立先生当我的老师。

大革命时，我同一些朋友在长沙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以帮助革命。协会成立之时，要发表一篇宣言，大家推我起草。我由于认识上的偏颇，草稿中对教师批评相当严重，徐老看了，很慎重地说："不行，今日的青年，都是中学老师教出来的：说他们一无是处，说不过去。"后来宣言稿经他改了才发出来。

徐老自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以后，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他的自由讲学的启事，我去听了。徐老讲几何学，而且还重点介绍了法国的一些社会情况。自那以后，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教育家。

一次，徐老在我们母校省立一中作报告，我以一名教师的资格去听，听到其中有一段说：

"一个人要帮助别人，有时也很容易，一句话就可以挽救人的一生。譬如一个人做了坏事，抬不起头，被人指责，你却说他是一个好人，他很能改过自新：因此他也确实好了。这就是一言可以挽救人的一生之例。"

徐老"诲人不倦"。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挽救人的一生"的至理名言，我至今不忘。解放后不久，我到北京，徐老随即要我带他去看历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和陈垣庵先生，似此，他又是一个"学而不厌者"。

最后一位是符定一先生。毛主席很敬重符先生。符先生在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同我一起在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组。后来文史馆成立，他任第一届馆长。当时，在符先生看来，馆长之职似无所谓，不过文、老、贫而已，意即谓文史馆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

是老而贫的文人就行了。毛主席对此，则补上一句曰："还要才、德、望。"意即谓还要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这对符老是一种安慰，也足证毛主席始终尊敬老师；同时符老也确实有可以尊敬之处：除以至诚拥护共产党外，还以一人之力著一部三十六卷的大书《联绵字典》，可见心迹。

符先生在湖南办学时，办法很特别，有独到之处，如他在办省一中时，可能考虑到要培养出国留学的人材，故而学校里的外文课设三个语种：英文、德文、法文。但当时为社会条件所限，英文班毕业，升学没什么麻烦，学德文和法文的，据说后来升学很成问题。符先生实在还是一位旧时的政治家，他给学生作报告，可以不用稿子，讲两个钟头，这一点很受学生敬仰。

袁世凯要做皇帝时，杨度组织筹安全，帮助袁做皇帝，符先生则为湖南筹安会会长，帮袁的忙。尽管如此，两人的变化，都变到共产党一边来了，这也说明他们自己有远见，能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跟着共产党走。

（选自《纵横》84 年 1 期 作者：周谷城）

毛泽东与杨开慧

初　相　识

1914 年春，长沙南门外天鹅塘一所旧式小平房。门上隶书："板仓杨"。进门左侧天井旁，一只腰圆形大木桶里盛满了水。厅堂正中挂了一幅对联：可有风雷惊宇宙，欲栽大木柱长天。厅堂右边是卧室兼书房。书架和凳上摆满了各种线装外文书。

这是省立第一师范教师杨昌济的家。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是位 40 开外的学者。他圆圆脸庞，浓眉大眼，中等身材，身着西服，系一根绛色领带。这时，他正在书桌旁翻阅学生的作文，读着读着，突然拍案叫绝：好文章！好文章！

杨开慧，这个十三四岁、活泼伶俐的姑娘从屋里跑了出来，偎依在他身边："爸，谁的好文章？"

他一边抚摸爱女的头发，一边递过一本署名毛泽东的作文本。

"毛泽东是谁？"

"他是我的学生，你不认识。"

杨昌济的妻子向振熙走了出来，说："昌济，明天礼拜天，你不是要带开智、开慧去岳麓山么？"

"好！带着夫人、儿女上云麓宫，就看你们的脚劲。"

"爸"！开慧高兴地跳了起来。

杨昌济夫妇携着开智、开慧，在灵官渡渡口租了一条划子，向着江心划去，江上白帆点点，一艘艘帆船在微风中移动。水波粼粼，风景如画。开慧站在船上，喜看这美丽的河山，不禁心旷神怡。

突然，一艘冒着浓烟的军舰从北边开来。江面顿时波涛翻滚，几条木船被巨浪掀翻，传来凄厉的哭喊声。杨开慧一时没站住，也跌倒在船舱里。

杨昌济愤怒地站起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爸，哪里来的军舰，这样凶！"

"霞仔，你看那船上不是挂着膏药旗吗？是日本军舰。"

开慧的脸庞上变得格外严肃，呼吸也变粗了。

游兴被帝国主义军舰赶跑了。杨昌济愤然地说："回去！"

南门口，司门口，八角亭，这些长沙最繁荣的街道上，一队队北洋军阀士兵横冲直闯，街上的洋车、大桥、骏马、仕女与小贩、乞丐……拼成一幅怪异的画面。

晚餐桌上。杨昌济对子女说："政局在动荡，民众在受苦，军阀在混战，洋人在横行，中国哪里还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中国非脱胎换骨不可！"

入夜，杨开慧翻开《达化斋日记》，只见父亲在上面写着："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杨开慧合页沉思。"毛泽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1915 年夏日之夜，"板仓杨"寓内，杨昌济正弹七弦琴《出塞曲》，一家人都围坐在厅堂里，侧耳细听。这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群学生蹑手蹑足走进院内，立在门外。

琴声一转哀怨三清，变成一个个马蹄落地的声音，犹如万马奔腾，强烈地拨动了屋内外听众的心。学生们不禁一拥而入："老师，好琴！"

杨昌济夫妇站了起来，招呼大家坐下。杨昌济将蔡和森、邓中夏、陈章甫、肖子升、张昆弟、罗学瓒等人向杨师母、开慧一一介绍。当介绍毛泽东时说："这就是我曾向你们提起的毛泽东，又叫毛润芝。"

杨开慧天真地瞪着眼睛，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英俊青年，蓄着稍长的头发，穿件洗旧了的青色学生制服，眉宇间显露出坚定沉着的神情。

"你大概就是开慧同学吧！听杨老师说，你在家里发愤自学，已经读了好多书。"毛泽东大方地说。

开慧显得有点拘束，低着头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呀！"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是一群豪情洋溢、奋发有为的青年学生，他们满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正在急切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家围在他们敬爱的老师杨昌济身边，纵情畅谈，从治学的

方法，谈到做人的道理；从国家的兴衰谈到自己的抱负……

杨开慧坐在一条小凳子上，两手撑住下巴，眼里闪着喜悦的光，静静地听着，听着……

忽然争论起来。肖子升说："读书自然不是为了做官，但有官做，救国救民岂不更便当。"许多人不同意。

毛泽东说："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为救中国，求真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今世道，想当官救国，也办不到。"

杨昌济说："我从欧洲回来，谭延闿要我做湖南的教育司长，我不干。我决不做官，要教书。"他指着"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对联说："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国正处在内则危亡腐化，外则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好，好，留着下次讨论，请大家吃点心消夜。"杨开慧买来一盆热喷喷的臭豆腐，放在桌上，大家你一块我一块乐呵呵地吃起来。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有人不禁好奇地指着大水桶问："老师，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大澡盆，我春夏秋冬，下雨落雪，每天早上都洗个冷水澡，从不间断。这可以强健皮肤，锻炼身体。开智、开慧也这样做，你们不妨试试。"

回校的路上，毛泽东同蔡和森、陈章甫等人约定："明天早起，除了跑步，还洗个冷水澡。"

转眼已是1917年。11月的一天傍晚，杨开慧正捧着一本法国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细看毛泽东写在书上的批语。突然，毛泽东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兴冲冲地踏进门来。杨昌济杨师母也都走了出来。开慧忙问："润芝哥，带来什么好消息。"

"俄国劳工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农兵代表会议掌握了政权，十月革命胜利了！"

听了这消息，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这天晚上，开慧思绪如潮。她深深被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同时，又因父亲白天告诉她的另一消息，内心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困扰：父亲应聘去北京大学任教，全家迁居北京，这样就不能经常见到毛泽东了。想到这里，又心烦意乱了。

灯下，她打开《伦理学原理》，再次阅读毛泽东的批语。开慧想到毛泽东那宏伟的抱负，那与旧势力顽强斗争的毅力，那刻苦好学的精神，那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眼前浮现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

毛泽东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编印、散发；

毛泽东发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长沙街头贴着毛泽东写的工人夜校招生广告；

一大队北洋军阀的溃兵在暮色中向猴子石一带开来，毛泽东组织同学，联络附近的警察，设计缴了溃军的枪……

杨开慧的脑海中，又浮现毛泽东耐心帮助她学习的情景。怀揣着毛泽东亲笔改过的诗，开慧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她带着微笑睡着了。

北 海 定 情

1918年的夏天，一名邮差走进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在打写有"板仓杨"的四合院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送进一封信。

杨开慧飞快地跑来，一眼看见那熟悉的字迹，心便禁不住乱跳，她匆匆浏览一遍，抑止不住兴奋："爸、妈，润芝哥他们快来北京啦！"

"霞妹，快给我看看，写些什么？"开智来抢信。

"不，不给你看。"开慧把信放在身后。

"我晓得，这晌这么多来信，四部曲：'开慧同学'、'润芝兄长'；'开慧妹"、'润芝哥'；'开慧''润芝'；现在的称呼是'霞'、'润'真是君山的银针茶——越泡越浓！"开智做了个鬼脸。

"妈妈，你看智哥，偷看我的信。"开慧撒娇地追打开智。

"行了，行了，快去读书吧。"妈妈爱抚地看着一对儿女。

几天以后，毛泽东带着罗学瓒、张昆弟等一批人，来到杨家。杨昌济夫妇十分高兴。

开慧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连忙跑了出来。

"润芝哥，学瓒哥，昆弟哥……你们都来了，要是信上写准到京日子，我一定到车站接你们"。17岁的杨开慧，两颊绯红，格外兴奋。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霞姑娘长得越发标致了。"张昆弟开玩笑道。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杨开慧。

杨昌济："润芝，你们行动真快，赴法勤工俭学是好机会。全国都在发动，湖南有好多人去？"

毛泽东："一百大几！"

杨昌济："好、好。润芝，这么多人，好好安顿一下，先进留法预备班学好法文，路费也要着手解决。"

"我们已经找好住处，在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距北大很近。"

这天早饭过后，杨开慧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进门一看，只见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罗学瓒等8人住一间小房，挤在一条炕上。

"哈！哈！8个人挤在一起，切磋琢磨，抵足而眠，多热闹。"

毛泽东说："这叫做'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翻身都要事先招呼呢！"

杨开慧："爸爸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初次进京不必

客气。”

蔡和森：“我们的困难，润芝一概全知，你们出去商量一下。”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他带着开慧走出住所，漫步在街头林荫道上。杨开慧这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好象有说不完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谈起。

还是毛泽东先开口：“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你，只见两三封回信，是学习忙吧？”

“你的信写得真好，我当文章读哩！”

“老师、师母都知道？”

“妈妈还把信要去看了。”

“对我们通信他们有什么意见？”

“爸爸妈妈说，你人品好，才学高，有志气，踏实果敢，要我多向你学点。”杨开慧甜甜地笑着。

“真的？！”

开慧羞怯地点点头。问：“润芝哥，这次你去法国不？”

“我不打算去。”

“什么？你为赴法勤工俭学做了这么多事，倾注了多少精力，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自己不去？”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太少了。我决心留下来，有许多工作和事情要做。”

“你不去我也不去！我也在国内多学一点东西。哦，对了。爸爸要我告诉你，他已写信给李大钊先生，推荐你去北大图书馆工作哩！”

“真的，那太感谢啦。我是身无分文，连五六块钱的生活费都付不起。”

“你还是住到我家去吧！爸爸妈妈都喜欢你。”

“不了，我在北京时间也不长，办完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就回去。”

经过杨昌济的推荐，毛泽东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

转瞬已到冬天。一天下午，杨开慧来到图书馆，看见毛泽东和李大钊、邓中夏谈得正起劲，便朝他微微一笑，悄悄地坐到长桌旁，翻阅起新近出刊的《新青年》。不多久，毛泽东走到开慧身边，俯身朝着开慧的耳朵轻轻地说道：“下班了。”

开慧连忙起身，他们告别李大钊，回到杨家。杨家客厅里又热闹起来。

师母拿出一件藏青色新棉袍，对毛泽东说：“润芝，冬天到了，你衣服单薄，我给你做了件棉袍子，看合身不？”

杨开慧拿起棉袍，给毛泽东穿起来。

“蛮合身，谢谢师母。”毛泽东感激地一鞠躬。

“明天星期天，我们去北海吧。”杨开慧提议。

“老师，师母也去吧？”毛泽东用眼光探询。

杨昌济咳嗽着说：“这一晌我身子不舒服，你们去玩吧。”

第二天，毛泽东和杨开慧肩并肩漫步在北海琼岛。北国的冬天，腊梅盛开，松树舞动着冰枝，北海边的杨柳倒悬着水晶似的冰柱，象是一朵朵梨花。

“开慧，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感到身上发热。”

“此时此景，我倒想起岑参咏塞外冬雪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也想起李商隐一首诗。”开慧沉吟着。

“什么诗，快念。”毛泽东催着。

杨开慧脸上绯红，羞怯怯地念：“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两人相视会心地笑了。

今天的毛泽东格外高兴，杨开慧也兴致勃勃。在冰封大地、风景如画的北海，两人的感情升华了。

“发了八块大洋的薪水，我请你吃冰糖葫芦。”

两人拿着葫芦，边吃边说，越说心贴得越紧。

幸　福　结　合

1920年春。一个晴朗的日子。长沙福湘女子中学高年级的下课铃响了。200多名女学生分别从几个教室走出来，分散在走廊和草坪上。

杨开慧与李淑一并肩走着，她们穿着白衣青裙，蓄着短发，显出女学生特有的秀气和青春活力。

忽然，大门口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柳直荀。

“霞姐，让我找得好苦，有事同你商量。”

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是杨昌济的留日同学，两家相距不远，又是世交。前几年杨昌济在长沙教书，柳直荀就寄宿在杨家。

“直荀弟，我给你介绍，这是李淑一，李老师的女公子。”杨开慧笑着说。

“我们见过。”李淑一说。

“对，好象是上次抵制日货游行大会上。”他们盘膝坐在草坪上，柳直荀接着说。

“这几天风声很紧，张敬尧这条毒蛇眼看就要完蛋，口口声声要长沙城交出80万块光洋，不然烧成焦土。何叔衡等一班新民学会会员，正在组织各校学生联合起来，成立学生联合会。”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

“明天在长郡中学。我们雅礼，你们福湘，都是教会学校，洋人不让参加社会活动，所以来同你商量。”

“不听它，我们都去。”

全省学生联合会成立了，杨开慧、柳直荀被选为干事。决定发动学生，组织游行。

张敬尧搜刮民财，准备逃跑的消息传到福湘中学，在杨开慧和一些进步学生的发动下，同学们的情绪沸腾了。

校方见状，赶紧锁上了通向湘春街的那两扇漆黑大门。于是，同学们推选代表，找校方交涉，校长林支尼自己躲起来，将教务交由教员施庄克代理。施庄克这个四十开外的洋小姐十分顽固，不但拒绝学生代表要求，还动手打人。学生代表大喊："洋人打人啦！洋人打人啦！"

集合在操坪的游行队伍怒不可遏，蜂拥到办公室，杨开慧挺身高喊："不许洋人打人！"

这时雅礼中学的游行队伍由柳直荀带领，来到了福湘门口，高喊声援。

施庄克吓得目瞪口呆，赶紧示意校工打开大门。两校同学合在一起，高呼口号，走上街头。

在湖南人民的愤怒声讨中，6 月 11 日晚上，张敬尧放火焚烧"镇湘楼"和军火库，在冲天大火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滚出了湖南。

7 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场雨，天气显得格外凉爽。毛泽东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腋下夹着一大卷宣传学习材料，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校。杨开慧一见，高兴得跳了起来：

"润芝哥，你回来了，叫人好想！"

"我昨天刚回。这次在北京、上海学了不少东西，这里的情况回来后全都听说了，你们干得好。现在各方都要人。省学联想调你去工作怎么样？"

杨开慧高兴地跳起来："我去，我去，润芝哥，我没经验你要多帮我一些。"

毛泽东哈哈大笑："我们的霞姑娘今天也谦虚起来！"

"本来嘛！"……

毛泽东递给她两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说："这是手抄本，你看后可传给一些进步同学看。"

1920 年 9 月。长沙潮宗街 56 号文化书社开张营业。这天可真热闹。学校、同行前来道贺的不少，一时鞭炮轰鸣。

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在门口招待前来道贺的长沙县知事姜济寰、著名商绅巨子左学谦和教育界名流易培基、朱剑凡、方维夏。杨开慧、陈子博、柳直荀、李淑一等在柜台上忙个不停。

这间书社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筹办的，投资入股的除一批会员外，还有一些上层人士。因为是新开张，书价打折优待。一天下来，毛泽东问易礼容、杨开慧："生意如何？"

杨开慧说："生意做不赢，今天销得最多的是杂志，象《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新潮》、《新教育》等卖得不少。进步书籍也卖出了几十本。"

毛泽东听了笑眯眯地说："办文化书社这路不错，没有新文化，就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新材料，不可能有新研究。如今湖南人脑子饥荒得很，文化书社要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实青年，提供研究者的新材料。"

以后，开慧只要一有空，就来书社帮忙。

杨开慧在工作中锻炼成长。不久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天，杨开慧来到一师，正好遇上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送新被新帐到学校来，毛泽东忙介绍：这是四嫂。

开慧笑道："泽民、泽覃、泽建在这里读书，四嫂又来了，一家都齐伴了。"

泽建握着开慧的手："开慧姐，你晓得一家人来是做什么的吗？"

四嫂开玩笑地说："霞姑娘，我们是来喝喜酒的哩！"

开慧刷的脸红了。

屋里只乘下毛泽东和开慧两人时，毛泽东深情地说："开慧，我们结婚吧！"

"我怕。"

"怕什么？"

"怕配你不上，人家都说你行，我幼稚，怕给你丢丑。"

"傻妹妹！同意的话，我们婚事新办，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戴凤冠不请客，不作俗人之举，你看如何？"

"我不晓得，要问妈妈。我赞成你的主张，最怕戴凤冠坐花轿。"

"我看师母不会反对，就在月底？！"

"看你急的，妈妈的陪嫁衣裳还没做好哩！"

"这也是，我得做身新衣服，虽然不拜堂，也得象个新郎公罗。哈！哈！"

结婚这天，正好冬睛，杨师母领着开慧，由开智夫妇，还有堂弟开明、堂妹开秀陪着，分乘几辆人力车，来到一师，毛泽东、泽民、泽覃、泽建、四嫂早已迎候在大门口。

今天，毛泽东理了发，穿了件藏青色新长袍，显得格外英俊；开慧穿了件花色旗袍，修剪了的短发，更加文静端庄。在四嫂和泽建的精心布置下，卧室也焕然一新。

何叔衡、陈章甫、易礼容、郭亮等一班新民学会会员都来道喜。

陈章甫说："润芝，开慧婚事新办，几盅喜酒还是要喝。我同何胡子商量好了，今天在我家办两桌，为你们贺喜，请师母赏光。"

师母笑得合不拢嘴，说："老头子教一辈子书，口口声声要栽大木，我看见你们一个个成长，信服你们，这酒要喝！要喝！"

刚上席，泽民通报："易培基校长、方维夏老师来了。"

润芝、开慧连忙起身迎接。

"哈，哈，润芝开慧结婚，信都不发，连老师都瞒着。"

"易校长如今是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学台大人，不敢惊动；方老师也一向很忙，我们结婚简单得很，亲戚朋友都没发信。"

"好，婚事新办，一大改革，借花献佛，干一杯！"

易培基又转向开慧："开慧，我敬你一杯，你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戴凤冠不披纱，给天下女子立了榜样，看你文静端庄，真象个平民皇后！"

"易叔叔"，开慧不好意思。

"培基老兄，何时学的星相术，算起命来了"。何叔衡笑着说：

"章甫，你口才好，来几句赞词吧！"方维夏补话。

陈章甫："我没想好，胡乱凑几句吧。

杨师爱徒，师之爱女。

切磋琢磨，亲密相处。

北海定情，星沙共许，

志同道合，共造环宇。"

（选自《人物传记》90年4期 作者：王中杰）

"本事"和"银幕"名称的由来

最初，电影的故事情节印成特辑或说明书，称为"本事"这是名导演陆洁开始的。他编导了《人心》、《小厂主》、《透明的上海》、《殖边外史》等，都有"本事"。补白大王郑逸梅当时在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编撰，曾写过一系列的"本事"。

国产电影，第一部爱情片《海誓》，是上海影戏公司但杜宇拍摄的，女主角是殷明珠。这时候女演员不多，且大都出身封建旧家庭，思想受到束缚，明知拍戏是虚构的，可是赤裸裸演爱情片，不仅家长反对，演员自己也觉得害羞，不敢尝试。殷明珠却活泼成性，又有大胆作风，毅然担任这部爱情片《海誓》的主角。由于她表演得真切动人，又能捉摸电影特性，充分展示人物心理，使感情和表演融化为一，因此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拍摄成后，放映于上海静安寺路的夏令配克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是专放西方名片的，放映国产片《海誓》，是破例第一次。

称电影为"银幕"，创始者为《小说世界》的主编叶劲风。《小说世界》和《小说月报》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小说世界》为周刊，创刊于1923年，自3卷5期起，卷首特辟一栏，登载电影方面的文字和插图，称为"银幕上的艺术"，成为杂志登载电影图文的开始。那"银幕"两字，顿时成为新名词，被大家所应用。

（摘自《民国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

探亲相骂

1921年4月底，天津曹家花园演出了一幕"探亲相骂"的活剧。

事情是这样的：国务总理靳云鹏邀集直系首领曹锟、奉系首领张作霖，共同商定北京政府的军事、财政大计。这天，会议一开始，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之弟）在会上发言，抱怨靳内阁在军费分发上，分给奉军的多，发给直军的少。靳云鹏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家何如。"不料省长听总理如是说，动了肝火，顺手抄起一个茶杯，"哗喇"一声向靳总理头上掷去，口中还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尊为总理，却被一个省长如此欺侮，不禁跳脚大叫："谁再当总理谁是王八蛋！"张作霖见状，连连跺脚，"快快替我预备车子，让我回去。"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

（摘自《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上海人民出版社）

"广东皇帝"与"广东总统"

1921年4月6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半个月过去了，仍未能宣誓就职。孙中山多次向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表达早日就职的愿望，得到的答复总是"再缓"。孙中山十分焦急，派人转告陈炯明：我由国会选为大总统已半月，决不能不就职，形同儿戏！可陈炯明仍坚持说：骤然就职，必招致邻省和北洋政府借词讨伐，故应稍缓。孙中山不悦，再告陈炯明：请放心，万一事败，则我出走。陈炯明见孙中山态度坚决，只好说，那就5月5日就职吧。民国国庆是"双十"，孙总统"双五"就职，也有纪念意义呢！孙中山闻言，不禁苦笑道：我是广东总统，他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遂于5月5日，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不料，孙中山的几句戏语，却不幸而言中了：广东总统敌不过"广东皇帝"。

（摘自《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士诒之捞钱手段

当梁士诒罢官之初，或有吊之者，梁怡然曰："一官之得失，何足介意。极峰到没有钱使时，必然舍不下我。"及欧战既起，外债路绝，梁财神果然重复登台。其登台之第一出拿手好戏，即是三年内国公债票。演得十分卖力，袁世凯大为喝彩。梁感恩知己，遂打足精神，把全身本领施展出来。如采用铁道国有政策，将各省铁道收归部辖。未几，更举行验契税、印花税、所得税等。并将各省官产由部主持，任意变卖，且明令取消地方税名目，统由官吏征收。创立新华银行，发行储蓄票，与前清之彩票无异。复令烟土商报效三千余万元，准其将烟土行销江苏、江西、广东三省。新排好戏连台开演，而不解事之肃政史，偏又文章

弹劾。噫！何其愚也。

中国铁道约二十余线，当清季时，已成者十之六七，未成者十之三四。然已成之路，率多抵押与外人，而未成者尚待兴筑。袁项城与各国密议，借资建筑未成之路，所借之款，必浮出筑路资本一倍。即以此项余资供赎回京汉路线，计款一万二千五百万法郎。而所借之金尚多二百余万，悉存储之银行，为公积金，利息则十之二为办事员之报酬，十之八为袁与梁之利益，皆梁一手经理，梁悉数吞没。事为袁所知，向梁索款，梁曰："公胡需此区区物，某不过代公收藏耳。他日公果需此，我敢靳弗予哉！"袁一笑而罢。及帝制议起，梁担任一切费用，名为偿袁夙逋，其实悉取之中交两银行。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梁号财神，真名副其实哉。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

溥仪大婚

早在一九二一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我五伯载沣、父亲载涛，以及载泽与内务府大臣世续、"帝师"陈宝琛、朱益藩等，就相聚议论，谓"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大家同意后，又和溥仪及太妃们奏明，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即开始办理选后事宜。挑选的条件，必须是蒙古王公或满蒙旧臣家的女儿。

自从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我们家里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送"名门闺秀"相片的人往来不绝，并且还再三拜托我父亲，务必"玉成"其事。记得我父亲的书桌上堆集的照片，几乎可以装订成册了。消息传到了天津、沈阳，连徐世昌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只因当时有满汉不能通婚的限制，况且溥仪又是皇帝，所以都婉言谢绝了。

我父亲几次把这些照片送进宫去，供溥仪与太妃们挑选，均不如意，以致拖的时间很长。后来经过几悉淘汰，只剩下四家，即阳仓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满族，曾任都统）、荣源（后任内务府大臣）和端恭（满族，额尔德特氏）。又经过仔细挑选，最后只剩下荣源的女儿婉容和端恭的女儿文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端恭的女儿文绣是由我六伯载洵和六伯母推荐，并得到了敬懿太妃的大力支持；荣源之女婉容是由我父亲推荐，并得了端康太妃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于是形成僵局。我六伯与我父亲之间、敬懿与端康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实在无法再拖下去了，就由我五伯拿着文绣、婉容的照片，到宫里请溥仪作最后的"圣裁"，不知溥仪是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呢，还是由于其他缘故，他毫不犹豫地就指定荣源之女婉荣为皇后。对于落选的文绣，王公、师傅们又经过商议，劝溥仪纳她为妃。据我所知，溥仪是本不愿纳妃的，大概是碍于敬懿与我六伯的面子，也就只好同意了。

接着，筹备处即发表溥仪的婚礼于十二月一日举行。消息传出，各方面送礼的简直络绎不绝。满蒙王公、遗老旧臣与活佛等，当然都有"进奉"，自不待言。就是民国要人，上自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的政客等等，也纷致贺礼。我还记得，黎元洪送来如意、金瓶和银壶；曹锟送来如意和衣料；吴佩孚送来衣料和银元七千元；冯玉祥送来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张作霖送来如意和衣料；徐世昌送来成套的新式木器；王怀庆送来九柄金如意；张勋送来银元一万元；康有为除送来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一千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一付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以豪富著称的遗老们，如陈夔龙、李经迈等，送的都是钻石珠翠。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何东，也都送来了不少珍贵礼品。真是琳琅满目，堆积如山。当时，由于无处存放，溥仪叫人都储藏在福建宫里，后来绝大部分都被大火烧毁。

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幸而溥仪并没有摔伤，练了几天就会了。他后来自己又买了许多自行车，时常带我们以骑车为乐。

十一月二十九日，溥仪结婚前夕，先举行了一次册封"淑妃"典礼，也就是为文绣进宫举行的一次仪式。这次仪式，既无纳采，也无大征，又没有乐队仪仗。只有照煦和绍英把册封"宝册"送到端恭的家里；并于三十日凌晨二时备了黄围轿车一辆，悄悄地把她接到养心殿，给溥仪叩了头，然后等候翌日迎接皇后到来。

十一月三十日，举行册封皇后典礼。由诚堃、毓麒（怡亲王）为册封正、副专使。上午十时，正、副使从乾清宫内，捧出"金宝"、"玉册"，分置于两座黄亭之内；然后上马前行，后面照例是些伞棍旗牌之类。所不同者，是有"凤舆"一顶、金顶黄轿车一辆。这顶凤舆，其实并不用，只是放在荣府的大门外，叫做"亮轿"。舆、车之后，还有黄色座伞六对、雉尾扇五对、金瓜二对、节一对、黄黑色龙旗各二对。出神武门，除马队外，又加上许多宪兵随行护卫。到达荣源家里，还是跪迎、跪送那一套，未婚皇后也到大厅内向"宝册"谢恩。婚前的各项典礼，到此即算告一段落，就等迎娶了。

大婚典礼于十二月一日举行。三十日夜间，满蒙王公和遗老旧臣们，就已齐集在宫内等候典礼。一日零时，溥仪穿着袍褂来到乾清宫，派载振、昭煦为正、副使，并派御前侍卫衡永等八人随行。同时命那彦图（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载泽和溥信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二时，溥仪派人把一柄如意放到凤舆里边，然

后由载振押着出发。这顶凤舆三天前就摆在乾清宫的丹墀之上了,我常看见銮仪卫(掌管宫中卤簿仪仗事务)的人员,抬着它演练。它比普通轿子大得多,需十六个人抬;轿顶涂金,正中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背上有一个小金顶;周围有九只小金鸾,嘴里都衔着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围是鹅黄色缎子底,上边绣着蓝色凤凰,抱着红色双金伞,绣工极为精细。据说是光绪结婚时在杭州定制的,这次又重新进行了釉饰。

迎娶用的是全付卤簿仪仗。除了伞、棍、旗、牌、金瓜、钺、斧、节、扇,比以前更多以外,还增添了牛角和大鼓各一百余对。出神武门,仪仗队前面的军乐队增加到五起,军警宪机关派来的骑、步兵增加到二千人左右。迎亲所经街道,照例戒严。马路两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北洋政府要员与外国人来参观者,每人发给一枚钢质徽章,才准通行。

凤舆发走之后,即派我母亲与增崇(前内务大臣)之妻带领福晋、命妇二人来到坤宁宫铺设"龙凤喜床"。床上的被褥也是在杭州定做的,上绣"龙凤呈祥"图案,绣工之精致华美实为罕见。铺设完毕,正中又放上"宝瓶",瓶内装着珍珠、宝石、金银钱与五谷之类;四角各放一柄金如意。接着,她们又连夜赶到皇后家里,给婉容梳好双髻,戴上双喜如意,穿上"龙凤同合袍",头上盖上绣有龙凤的盖头,手里拿着一个苹果。这时就只等凤舆到来了。

三时左右,皇后登舆,即由衡永等八名御前侍卫,手执藏香在前引导,仍由载振骑马率领原班仪仗,经东华门,把皇后迎到乾清宫。

这时,溥仪穿着袍褂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凤舆来到乾清宫檐下,先越过一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到达坤宁宫又越过一副马鞍。通过这些"障碍"之后,到了宫内。按规矩在皇后下轿以前,溥仪还要向她连射三箭,但他又临时传谕说不射了。这大概是因为溥仪从未射过箭,他又是近视眼,不愿意搞这一套了吧。

皇后下了舆,我母亲从她手中接过苹果,递给她一个宝瓶,溥仪这才揭下她的盖头,一同走上喜床,吃"子孙饽饽";同时,窗外还有一个官员用满语高声念诵祝词。此外,宫内另摆下一桌筵席,叫做"合卺宴",有猪羊叉、金银酒、金银膳等。其实这只是一种仪式,溥仪夫妇只坐一坐就离开了。随后新后又要向东南方坐帐,和溥仪一同吃"长寿面"。这样,婚礼第一天的仪礼就算完了。

二日早晨,我母亲、增崇之妻和福晋、命妇等先向溥仪、婉容呈进茶果;接着换朝服,由皇后行"捧柴礼",就是捧起一束外包黄绫的一尺余长的小木棍,交给萨满太太收藏在宫内。然后,他们夫妇向"天地桌"、"喜神桌"和灶君行礼。礼毕分左右坐在炕上,在福晋、命妇们的伺候下,共吃"团圆膳"。到此,大婚第二天的仪礼也算完成了。

三日上午,举行"受贺礼"。按原先的计划,一切都按照元旦大典那样办,但由于各国驻京使节早就提出要参观婚礼,当时为了维护清室的体制与尊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现们又通过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再三请求要到宫中向溥仪祝贺。在这种情况下,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且成立了一个招待处,由庄士敦、梁敦彦任总招待,以下还有彬熙、存耆等十几名招待。在景运门外临时搭了两座大席棚,由北京饭店定购了丰盛的冷食、糕点和法国香槟酒。另外,还准备了一百余台二人肩舆,供他们来往乘坐。乾清宫外,仍照元旦那样,陈列着静鞭和各种乐器,并且搭了一个大牌坊,上面挂着各色采绸。上午十时,大批驻华使节来到东暖阁,向穿龙袍褂、戴珠冠的溥仪和穿旗袍、梳两把头的婉容行鞠躬礼,溥仪夫妇只是微微点头,表示答礼。因为事先我父亲就和庄士敦商议,溥仪这时虽还保持着皇帝尊号,但毕竟已经退位,不宜再象过去那样,高踞于宝座之上接受祝贺,所以就改在东暖阁了。

接见了外国使节,溥仪又坐上宝座,接见黎元洪大总统的致贺专使黄开文,礼仪同元旦时大致相同。黄开文退出,又接见北洋政府文武大员和各省军阀的代表。我记得有颜惠庆、孙宝琦、吴毓麟、王怀庆、聂宪藩、李准、王廷桢、哈汉章和袁金铠等共四十多人。另外,还有张作霖的代表张景惠以及曹锟、吴佩孚等人的代表。礼毕,并请他们吃饭、看戏。接着又鸣鞭、奏乐,满蒙王公、旧臣遗老仍象元旦时一样,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不过人数比元旦时多得多,据说有不少是特地从各省赶来的。

受贺典礼结束后,所有的驻华使节、王公旧臣和遗老遗少等等,一齐来到景运门外那两座大席棚内,大吃大嚼起来,一百多张大圆桌全被挤满,听说仪式就花费了万金以上。

(摘自《晚清宫廷见闻观记》文史资料出版社)

亚东饭店的情杀案与陈公博的开小差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位极有"名头"的人物。此人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国民党改组派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与顾孟余同为汪精卫的哼哈二将;后来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第二号人物。说到这里,读者自然明白:此人就是陈公博。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公博作为最早的共产党小组成员,代表广州共产党小组,带着新婚燕尔的娇妻,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为了躲避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密探,中共"一大"的 13 位代表并不住在一起。陈公博与新婚妻子住在十里洋场有名的亚东饭店。这家饭店在 20 年代的旧上海算是比较气派的。7 月 30 日晚,陈公博下榻

的亚东饭店发生了一场情杀案，巡捕、警察不时传讯饭店的旅客，足足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上海不少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再加上报社记者笔底生花，绘形绘色地一番渲染，消息着实哄传一时。恰巧那天下午巡捕又出现在中共"一大"会场。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晚又发生这场情杀案。陈公博当时又不知就里，着实吓得不轻，误以为是来搜捕共产党的。第二天便不顾一切地带着新婚的妻子离开了上海。当"一大"的其他代表会齐于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会议时，陈公博已是杳如黄鹤，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们夫妇已到了杭州，在那里悠哉悠哉了。所以，陈公博未曾等"一大"开完就开了小差。

（谢茂权）

流 行 风

诗《田主来》

一声田主来，
爸爸眉头皱不开。
一声田主到，
妈妈心头毕剥跳。
爸爸忙扫地，
妈妈忙上灶：
"米在桶，酒在坛，
鱼在盆，肉在篮；
照例要租鸡，
没有怎么办？——
本来预备两只鸡，
一只被贼偷；一只遭狗咬；
另买又没钱，真真不得了！——
阿二来！
和你商量好不好？
外婆给你那只老婆鸡，
养到三年也太老，
不如借给我，
明年还你一只雄鸡能报晓！"
妈妈泪一揩，
阿二唇一翘：
"譬如贼偷和狗咬，
凭他楦得大肚饱。
别说甚么借和还，
雄鸡雌鸡都不要。
勤的饿，惰的饱，
世间哪里有公道！
辛苦种得一年田，
田主偏来当债讨。
大斗重秤十足一，
额外浮收还说少。
更添阿二一只鸡，
也不值得再计较！
贼是暗地偷，狗是背地咬，
都是乘人不见到。
怎象田主凶得很，
明吞面抢真强盗！"
妈妈手乱摇：
"阿二别懊恼！
小心田主听见了，
明年田脚都难保！"

（刘大白）

诗《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郭沫若）

诗《赤潮曲》

赤潮澎湃，
晓霞飞涌，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
光华万丈涌。

（瞿秋白）

诗《繁星》

一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一〇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骄傲些罢，
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五五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一三一
大海呵，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冰　心）

小说《故乡》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

这是一篇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既有小说创作，又有真实的记载。“我”回到了相隔二千余里，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心情很不平静。然而眼前的故乡同记忆中的故乡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美好的梦幻被无情的现实冲破，剩下的是悲哀、遗憾和怅惘。作品围绕着过去和现在两个故乡展开，通过强烈的对比，看出差距。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那是令人神往的，充满了诗情画意，“深蓝的天容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二十多年过去了，艰难贫困的生活使闰土变了模样，“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然而比外形的改变更令人悲哀的是他早已麻木了的神经。“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小说中有两个细节深刻地写出了封建制度对闰土精神世界的严重摧残。一是“我”与闰土久别重逢，当“我”热情地呼他“闰土哥”时，他却于欢喜和凄凉之中转为恭敬，称“我”为“老爷”，完全是按封建的尊卑观念行事。又如闰土在挑选赠品时，用心地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希望通过崇拜偶像，减轻一些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力。过去的闰土和现在的闰土，相去如此遥远。作者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再一次鞭鞑了那个

罪恶深重的社会，同时对农民精神的麻木、冷漠和迟顿表示了忧虑。小说结尾则寄托了作者的殷切希望，希望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小说《阿Q正传》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主人公阿Q是一个无业游民，籍贯不详，姓名也不详。有一回，他自称姓赵，赵太爷是他的本家；赵太爷闻讯给了他一个嘴巴，说他不配姓赵，阿Q从此再也不敢说自己姓赵，所以至今没人知道他究竟姓什么。他没有固定职业，长期给别人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他自称“先前阔”，因而看不起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他进过几回城，因而十分自负，既鄙薄城里人，又看不起乡下人。无奈头上长有癞疮疤，因而讳“癞”，并推而讳“光”、“亮”、“灯”、“烛”，谁若犯讳，他便动怒，估量一下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被人打了，他便以“被儿子打了”安慰自己。有时挨了打还不得不说“人打畜牲”，“打虫豸”，事过之后他又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自豪。赌博赢来的钱被抢，还挨了一顿打，他无计可施，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于是他又“胜利”了。他严于“男女之大防”，满脑子封建正统思想，总认为凡尼姑必私通和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必是想引诱男人，所以每次看到一男一女说话，他总要在冷僻处向他们掷石头。但又总想调戏小尼姑，还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他向吴妈求爱，遭到拒绝，还挨了秀才一竹杠。他本来憎恶革命党，但看到赵太爷、举人老爷都那么惧怕革命党，便不禁“神往”起来，于是决定投降革命党，“革这伙妈妈的命”。然而，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革命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命运，城里带兵的还是以前的老把总，但阿Q却以造反罪而被捕。阿Q进了监狱还抱怨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临死前还遗憾画押时圈画得不圆。阿Q并没有造反，却以造反罪被枪毙，而投机分子假洋鬼子之流却侵吞了胜利果实。鲁迅塑造阿Q这一形象是为了揭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的精神胜利法鲜明地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它不仅是小生产者落后、闭塞、保守、软弱的精神状态的缩影，而且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接连失败的屈辱地位的产物，精神胜利法不仅是某个个人、某个阶级的精神特征，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的高度概括，是作者长期剖析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的思想结晶。另外，作品还辛辣的讽刺了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软弱、投机者的专横跋扈及其与农村封建势力的狼狈为奸，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

小说《沉沦》

作者郁达夫，主要内容：主人公“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渴望着真挚的友谊和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备受轻侮和嘲弄，他孤冷而空虚，忧郁症如蛛丝缠体，拂之不去。在东京学习一年后，他来到N市乡下第X高等学校。随着春草渐绿，他体内青春期的性苦闷也高涨起来，驱赶他步入手淫的歧途。他一再自我犯罪，一再深自痛悔，又一再自我宽慰。自责、恐惧搅扰得他一日也不能安宁，忧郁症更加厉害起来，达到交游离绝，孤冷得几乎将死的地步。此时，他住的旅馆里主人的女儿幸而还可牵引他的心。有一天，他听见主人的女儿在浴室里的泼水声，禁不住跑过去窥浴。窥浴之后，他自愧地打了自己的嘴巴，并逃出旅馆，搬进荒废的梅园。到了梅园，他的忧郁症又变起形状来了。先是去信同长兄绝交，后来又为自炊的事自寻烦恼。他有如退院的闲僧，除了怨人骂己，就无别事可做。有一天他在梅林的曲径里散步，偶然间窃听到一对青年男女的野合，这又勾起他性的苦闷。夕阳西下时分，他竟跑到酒肆寻妓，但由于自己是“支那人”，妓女也怠慢他。悲愤中他喝得大醉，并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走出酒肆，投身大海。投海前他遥望西天，呼唤祖国强大起来。《沉沦》带有浓烈的“自叙传”色彩，郭沫若说，作者那种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使那些“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到作假的困难”。作品文笔流畅，意境优美，佳言绝句俯拾皆是！

电影《红粉骷髅》

也是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之一。1921年冬，新剧家管海峰发起，好友殷宪辅兄弟投资，成立了新亚影戏公司，办事处设在上海山西路26号，拍了唯一一部影片《红粉骷髅》，由管海峰编导。

影片《红粉骷髅》是以揭露社会黑幕为主题的。它描写一批社会败类组成黑党即保险党，专门利用女色去迷惑一些无知青年，以骗取大批保险赔款。女学生黄菊英（沈凤英饰）被汽车撞伤住院，和一位青年医生鲍宗瀛（紫少庸饰）相识而相恋。有一天，两人会面时，鲍医生被保险党党徒娟娘（陆曼珠饰）施计诱捕。一面为他保寿险，一面对他下毒手，企图骗领巨额赔款。黄菊英的哥哥黄谦（殷宪辅饰）是个律师，以为鲍另有所欢，便登报寻找。接着，

黄谦也被保险党骗去关禁。后黄谦设法逃出，又和妹妹黄菊英化装打入保险党巢穴。兄妹俩历尽艰险，在侦探、警察协助下，终于破获保险党，救出奄奄一息的鲍医生。最后，鲍、黄两人终成眷属。

《红粉骷髅》的主要演员是从文明戏演员中挑选的，次要者如警察打手之类，是从六班街拳术艺人中挑选的，共约四十人。布景是仿照美国电影的布景制成的，全部用进口硬纸板裁制，用粉画和贴花纸来美化板面。除苏州“宝带桥水里搏斗。用外景外，共制四堂内景：①石壁大厅的保险党党部；②布置华丽的党徒寝室；③西洋式的大会客厅；④石壁、石梯的地下室。服装设计比较新型，保险党十姊妹均着旗袍。总之，它既模仿西方影片的布景、化装，又混杂着中国自有的武术和言情，可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租界洋场文化的一种表现。影片的拍摄，是借商务印书馆的玻璃摄影棚完成的，共长 12 本，片长约 9 千呎。于 1922 年 5 月 10 日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由于大肆宣传鼓吹、花招奇特，所以影片卖座率很高，观众拥挤不堪，连在上海的外国人也来观看。影片除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放映外，还运往日本、越南等国放映。

历 史 档 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

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地点：上海望志路一〇八号（现兴业路一〇六号）。会议将近结束时因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的一只船上把会开完。

出席代表：十二人。实际出席会议的有：

毛泽东　何叔衡　董必武　陈潭秋　李汉俊　李　达
刘仁静　张国焘　王尽美　邓恩铭　陈公博　包惠僧
周佛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也参加了大会。

党员人数：五十七人。

主要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第一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陈独秀　张国焘　李达
中央书记：陈独秀
组织主任：张国焘
宣传主任：李达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

应保守秘密。

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很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作者)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有五个委员会时，应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

十四、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

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一、工人组织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会——作者)。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以便尽快进行改组工作。

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才能成立工会，同时，至少要派我党的两名党员到该工会去工作。

二、宣传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三、工人学校

因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了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

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

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加以解散或改组。

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

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

为了更适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形势。研究的结果应定期发表。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

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在必要时，应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并派代表到其他远

东各国去，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

孙中山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齐契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到达的。我之所以迟迟未作覆，是因为想见见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来应当是将信从哈尔滨寄给我的。因为他至今还未能来广州看我，我就决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礼和关于恢复中俄商业关系的建议。

首先，我应当告诉您：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曾经有几次报道，断言好像莫断科向我作过一些正式的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万一从您的同僚中有谁已往曾寄信给我或现在正寄信给我，那末让我告诉您，我还没有收到过一封信。

我应当简要地向您说明中国是怎样一个情况。且回溯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当时我的政治事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依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如您所知，我们已经将他击败了。

他死了以后，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发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

在您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为一、它本身的权限是根据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和一部唯一的中华民国组织法；二、它的成立是为了执行在法定的中国国会中按照约法所赋予全权的政权机关的决议，现在国会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我的政府也是实际的政府，它的权限已经为中国西南诸省及其权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认。

现在，因为地理条件，我还不可能和你们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地图，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是在扬子江以南，而在这片领土与满洲和蒙古“门户”之间，——只有经过这些“门户”才可能建立商业关系——有张作霖及其同盟者横梗着。只要还未建筑起包括在我所计划的中国铁道系统内的大铁道干线，那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过新疆的“门户”。

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我最近九、十年以来都在从事于这一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发生某种形式下的积极的外国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事业。外国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西方列强。它们大概已被北京喂饱了。

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像莫斯科一样，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

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

您的真挚的孙逸仙

又：这封信是经伦敦苏俄商务代表团转寄的。如果它能安全无阻地到达您手中，就请通知我，以便我今后能经过同一个中间人与您联系。如果从莫斯科来的信将由你们在伦敦的使节转寄的话，我就这样地建立联系来接收它们。

（摘自《孙中山选集》上卷
第434—436页人民出版社）

区声白致陈独秀书

独秀先生：

先生前天在法政学校讲演，对于无政府主义批评，弟有很多怀疑的地方，兹特列举出来望先生指教。

1.“……先就经济而言：现在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据我所知，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若照先生说，“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就是以少数压服多数，无政府党人是绝对不敢赞成的。但是先生所批评的不知是那一种无政府主义？如果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极端反对的，我很希望先生声明一句。

2.“……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

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中国有一种旧习惯，每逢一地方遇了火警，各地方的居民都很踊跃同往救援，无论在冬天雪夜，一闻告警，即争先恐后跑到患灾的地方，救灾的时候，无论怎么危险亦没有畏避的，患灾者对于他们亦没有什么酬报，社会亦没有替他铸铜象，大总统又没有给他一个嘉禾章，又没下过一度命令——各地方居民如不联合救火的就杀无赦，法律又没有规定不救火的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如果是邻近的，犹可说是恐怕连累，但是很多在城中由极东跑到极西的，因一处地方的灾难，各地方的居民竟能以一最短促的时间自由联合起来，可见联合与自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数万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不特是这样，能够以法律绳人、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更可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我很愿意先生把无政府主义各派别分清一下再下批评。总之无政府党人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化的，即如巴枯宁之主张由未善而至于较善、克鲁泡特金之主张由较未幸乐而至于较为幸乐，亦即是由最不自由而至于较为自由。若是先生所说的“绝对的自由”，不知是那一个无政府党人之所主张，还望指教。

3.“……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但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象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

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如果无论善人、恶人都不能去干涉他，那么，无政府党人之暗杀官僚、推翻资本家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所批评的想必又是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主张反对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敢赞同的。至于先生恐怕法律废止之后，如有发癫的人就怎么办，这是很容易的事，把他送到癫狂院医治便得了。因为发癫是由于生理上的关系，没有甚么罪过。若果疾病都要受法律制裁，虽民主主义的国家亦没有这种的法律。至于强汉之杀人放火，我们准可以善言劝导他，并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使他悔悟。假使先生问这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怎能够处置他呢？人类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便连饭不会吃的。我举一个例：比方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有少数不良分子想破坏大学，后来经共同的意见把他拘禁起来，这是不是法律？总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一种公意，凡事皆由公众会议解决。公意是因事实之不同而可随时变更的，不象法律是铜板铁铸的，由几个人订定，不管他人如何，一定要他人遵守的。且订法律的时候也没有得遵守法律之人的同意，这是不对的。由此可以证明无政府之不难实现。若果依照自由、自立、自主的原则向前进行，沿途都是康庄大道，除了盲目的人外，断不致撞得头破额裂的。

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

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下：

(1)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2)我所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歧，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不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自古受人压服的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个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3)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

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从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于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时固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象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近日时局之评论

近来时局问题，似乎非常沉闷，然实有一大酝酿，正在憧憧往来之电影中。其酝酿为何，即中部及西北将有一大联合，用以打破直、奉把持之政局是也。去年曹、张在京时，与徐、靳所定约束，其中最要条件，为各省之事，必得曹、张之同意，而张之力量手段，皆优于曹，其结果遂使北京之政局，全受奉张之支配，其他督军如何愿意？故长江方面，加靳阁以奉天出张所之徽号，去冬川、湘、赣、浙、陕、闽等省之代表，集于武汉，外间纷传八省同盟之说。其主张之最要者，即为不办选举。嗣又有六省联盟之说，为南之川、湘、滇、黔、北之鄂、赣，皆读者所已知，其所谓同盟者，虽无若何盟约之表见，而其相互之组合，则已确而有征，且皆以湖北为接洽之中心点。王占元俨有执牛耳之势。盖地势使然也。近来不办选举一端，已渐见事实，鄂、赣、闽、浙、陕无一办者，即去冬同盟之征验也。

王占元之与西北联合，为今年之事，其枢纽为陕陈。自曹主撤陈而用蔡成勋、张主撤陈而用许兰洲陈乃先求援于李纯。李纯既死，乃转而之鄂。瞿寿禔、张丹庭诸人，奉陕陈之使命，络绎赴鄂，而所得之结果，则陕西向汉阳定购之快枪五千枝。靳阁电王扣留不许交陕，而鄂王竟许其运回，且使之溯汉江而上，以免经过洛阳，为吴佩孚所扣。陕陈并分二千枝与陆洪涛。俾其赴兰洲就任，此今春之事也。因此陕陈、甘陆缔结同盟。最近陕陈，以省内战争，又竭力结欢于阎锡山。且以阎氏亦为曹、张所欲撤者，更以利害关系，有同盟之暗结。现在形势，又将由陕陈之穿插，偕晋陇以附于长江上游之新局面，陕人虽欲去陈，恐亦无如何矣。

三子同盟之说，亦曾见之报纸中，三子者卢子嘉、王子春、吴子玉也。愚尝加以调查，事诚有之，且三人之代表，于杭州、武昌、洛阳间络绎不绝，直以吴为脑气筋，奉张所深忌。而吴为自固计，亦不得不以长江为后援。且如湘鄂之联防，尚恃吴之穿插。现在吴之力量，为与冯玉祥、郑士琦（山东第五师长）成一三角同盟，专从事军队之训练。但政治上事，与王、卢时通声气，故选举之缓期，山东、河南已与鄂浙等同调，而直隶亦决不遽办复选。而最近曹锟电西南各省，要求互派使节，谋实际之联络。吴且以扩张自治共谋，进言于滇黔，此决非为靳阁之统一政策计，而与王同下联合之手段，以免直隶之立于各省联合外也。惟对于陕西，王既联陈、而吴则主去陈，犹未一致耳。

总上述情形以观，北方之吴，西北之陈，中部之王，皆为一部分之枢纽，而适中之势，则以湖北为地理上之中心。政府近对鄂王，直视为骄子。王芝祥回京未久，即继之以田文烈，并依其请求，而以省长畀刘承恩，皆畏王而求悦于王者。至日前京中半官式通信社所发表，谓王之六省同盟，系为政府谋统一者，掩耳盗铃之谈，自遮羞颜者也。现在此种大联合，尚在进行中，如果有所成，则奉、直把持政局之现状，必将打破，而奉张更受打击矣。或谓上次召、张、王三人来京会议，王氏拒绝不来，系防张之作弄，而张亦不来，实受王影响焉。

于此有一最关重要之事，则内阁问题也。今之政府，已如第三期之肺病，一息仅存，固未必即倒，亦不便说倒。盖所谓统一政策者，西南之自治如故，广东复产出一总统，且即北方各省，亦不能统一之。所谓国会选举者，江苏奉天而外，未闻复选，且并未初选者居十分之七。而财政一端，更为致命伤，但观二十五万之教育费，亦筹不出，而日以空言搪塞，酿成教部总次长去津，教职员全体辞职，以有今日之学生"读书运动"，已可见其一筹莫展。即如五百万之政费，华银团三百万固未承认，交通部二百万亦在未定之天；阁不成阁之弱点，又已暴露。其所以未倒者，固由"奉张有内阁不算什么，由翼青干住再说"之言，而王氏闻靳将辞，亦云"且劝他暂时勿辞"。张氏之意不过留以自助。而王氏之意，则据知其内幕者所谈，确将有所待。盖上述之中部西北部之各省联合，即去冬所传八省同盟之联省主义，特非民治而为军治耳。据愚所闻，现在之酝酿，确在平均政权。其暗中之趋势，将于各自联合之后，为改造政府之举，即由和督派重要代表，协商内阁之组织，而共操政避者。其结果或如从前军政府之代表会议制，特其奔

走磋商尚未就绪。此间之消息灵通者，已料定靳阁命运之长短，视彼等联合成功之迟速矣。（四月十二日）

（摘自《申报》1921 年 4 月 15 日）

湖北自治军发布之文电

旅湘鄂人根据所制临时约法选出之省总监蒋作宾，与鄂籍重要分子组织湖北自治军，即以"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自治军湖北自治政府临时省总监"名义发布各种文电。兹择录如下：

（一）致各省电：吾鄂不辰，遭逢凶丑，七年痛祸，四境为枯。罪迹昭彰，中外共恫，具如檄列，无待赘陈。同人有鉴于民国之俶扰多故，不欲重事兵革，苦我乡人，强自忍抑，冀其反省。讵王占元怙恶鲜耻，为祸日深。宜、武百年繁盛之区，中外士商荟萃之地，竟亦口族使其系信军队一再劫掠，继以焚屋杀人。无辜良民死以万计，货财损失以数千万计，伤心惨目，亘古罕闻。焚劫之灾，不仅毒及吾鄂一省，而损失邦交，遗羞与国，觉书腾责，影响国权。是王占元不仅吾鄂罪人，实全国祸首。凡我中华民籍，人人得而诛之。苟北廷之威信犹有，国家之法律有效，早已陈尸东市。传首九边，岂待吾民亲执梃刃，挞彼凶残。抑使吾民生命稍得苟延，则亦惟偷一夕之安，决不愿铤而走险。今也黄台之瓜，一摘再摘，民穷财尽，创巨痛深，将再匍匐呼号于燕市乎！吾父老昆季，亦既屡为之而不一为之矣。新华闭拒，厌听民瘼，宁可置吾鄂三千万人民于死而不之恤，决不忍王占元一旦失其地盘。吾鄂民求生路绝，忍无可忍，迫不得已，计惟有自决续存之一法。作宾忝负乡人付托重任，惟有亲率诸军，指日东顾，驱除残慝，绥靖灾黎。此纯为鄂人自救之谋，但求恢复乡邦，实行自治，成败利钝，所不敢期。幸赖湘、川两省顾念唇齿相依之谊，不忍吾民之呼吁，慨允出师相助。诸公仁心仁术，继绝扶危，夙有同志。省宪建国亦已公认，甚望加以提携，扶持正义。岂惟吾鄂民受其赐，抑亦我四万万同胞所共馨香祷祝者也。临电激切，统希鉴示。湖北临时省总监蒋作宾叩。有。印。

（二）致外交团电：北京外交团汉口领事团公鉴：敝同人等以为非各省自治，则不足以保全中华民国之治安及恢复政治之秩序，而督军天职则在保护其省内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乃湖北督军王占元罔识治体，对于省内自治进行横加阻挠，且侵吞军饷，酿成全省兵变，以致数千生灵无辜涂炭，巨万财资悉被劫掠。职是之故，敝同人等哀恳北京政府罢免王氏，以谢中外。乃政府明知王氏之当去，而假词力不能及，一再迁延，不予执行。敝同人等为防兵变之再见，与便利省自治之进行起见，故于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会议长沙，制定临时省宪，依法选举蒋作宾大将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省总监，管理全省军民政务。当经宣誓就职，统率湖北自治全军，联合湘军，向鄂前进，驱逐王氏，藉保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敝军所过，秋毫无犯，用是电达贵公使贵领事团转告贵国侨民等一体知照，毋惊毋疑。再，北京政府及王占元既乏治鄂之能力，自失代表该省之资格。自今日始，希贵公使领事及贵国侨民，一致与北京政府及王占元与其所属机关断绝在湖北政治上、经济上及其他种关系。尤祈勿助饷械之接济，致增我国之内乱，而伤两国之睦谊，不胜盼祷之至。湖北自治军及各团体代表孔庚等叩。

（摘自国史编辑社编：《湘军援鄂战史》）

中华劳动联合会讨吴佩孚宣言

全国国民公鉴：新军阀吴佩孚者，性非良善，人本寒酸，为洪宪之爪牙，亦满之妖孽。迨共和再造，吴氏复奉段祺瑞乱命，驻兵衡州。嗣因要求督军不遂，而撤防停战之议始起，其时假使段祺瑞不吝厚赏，张敬尧再能见机退让，首先将湘督显职奉献吴氏，吾知吴氏必能发挥段祺瑞武力统一之主张，而不致至今日始对湘下总攻击令也。讵知天佑湘民，段、张计不及此，吴氏遂不得不含怒北归。又明知不奉军令，自由撤防，使张敬尧地位摇动，决不容于刚愎无谋之段祺瑞，乃不得不亟亟推倒安福，以自免于祸。明知己位不尊，设段氏爪牙一旦卷土重来，必于己身不利，故假托提倡民治，广结厚援，使段氏无重登舞台之馀地。明知段氏武力解决为国民所不喜，乃不得不姑为和平统一之言，以徐图攻心之策。明知国民大会为北廷所万万不能赞同者，乃不妨姑作人情，以作不负责之空谈。明知废督裁兵，为国民普同之心理，乃不惜作违心之论，与冯玉祥等相约不作督军，不拥兵自卫之宣言，以尽驱愚夫坠其术中。即如去岁驻湘时，曾贿托上海某通信社，发表各种文电于中外各报，所发表者，倘洛阳纸贵，为人传诵，而吴氏则承认不遑；设有反响，吴氏则诿为副官误发。即此一事，已可知吴氏为狡诈沽名，望风转舵之手段，实为北洋诸军阀所不能及。总之吴氏奉段命，助张敬尧守湘，而即卖张、段，迨撤衡阳之师，奉靳命为王占元援鄂，而即卖靳、王，以收渔人之利。综其崭头露角以来，固无一不用翻戏党、倒脱靴方法，故吴佩孚者，实民国之罪人、军阀之败类也。何方面倚为心腹，即何方面受其欺诈。吾可断言乱民国者，必吴佩孚也。我国民苟无自决之心则已，如其尚有天良，不忘祖国，自当以除伪保真，提倡民治为唯一义。欲提倡民治，自当以先铲除此伪记民治之新军阀吴佩孚为始。前吴氏讨段，有与贼不两立之说。吾今讨吴氏仍以此两语为誓，至成败利钝所弗计。我国民乎，我同胞乎，盍兴乎来。中华劳动联合会全体同启。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大会。广东省军政各界要人、国会议员、知名人士及群众一千多人与会。军政府总裁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主张"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

1月3日　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成立。孙中山派张继为干事长，周震鳞为总务科主任，田桐为党务科主任，黄复生为财务科主任，邓家彦为宣传科主任。

1月8日　甘肃督军张广建特派古朗仓、李仲连等先后赴藏，与达赖喇嘛切实接洽，说明汉满蒙藏回本属一家，合之则足以抵外，分之则为人所弃，并宣示北京政府对藏之诚意。达赖闻之极为感动，因于日前委派喇嘛洛桑庚丁为代表赴甘答礼，陈述达赖对北京政府怀柔之意极表满足。

1月10日　国民大会策进会第一届各省区代表会在上海开幕。会议通过办事简章、组织法草案及宣言书，通告全国同胞，郑重声明欲救中国全在国民自决，欲求自决全在国民大会，事贵全国努力，非一部分所可胜任。于28日闭会。

1月30日　广东省国民党支部成立。孙中山作"三民主义"演说，指出：民族主义，非推翻满清民族主义便了，须使各民族都平等；民权主义，须人民有普遍选举立法免官之权；民生主义，须趁此资本家、地主不多之际，行资产国有制，借机器以兴实业，普利一般人民，消弭阶级斗争。

1月31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对俄方针，并致电张作霖，谓现在俄国旧党几于全灭，对于新党当有非正式的联络，对俄军入境应行拒绝，对谢来诺夫等只要无妨害我主权之行为，仍暂保持旧日态度。

2月21日　蒙古成立所谓"自治"政府，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重登大汗宝坐，册封恩琴为亲王。恩琴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2月24日　全美国民党恳亲大会致电孙中山、唐绍仪及国会，谓"亟宜由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中心"。同时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华侨亦纷电国会，请选举总统。

2月28日　蒙古国民党在托洛依茨郭萨甫斯克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有托洛依茨郭萨甫斯克的党员和各旗的代表十七人出席。会议讨论了关于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建立军事领导机关等问题，决定由苏赫——巴托尔等五人组成军队司令部。3月1日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有二十一人出席，大会批准了国民党的政纲，并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3月1日　各省众议院议员定于是日举行初选，但届期进行初选的只有奉天、江苏、吉林三省。各地选举中违法舞弊事件层出不穷，民众纷起告发。4月15日，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被迫判决上海众议院议员初选无效。

3月6日　孙中山在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讲，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指出："民族主义，应废汉满蒙回藏五族名称，成一新中华民族"；"民权主义，应实现选举、罢官、创制、复决四权"；"民生主义，应先行土地平均，消弭阶级斗争。"

3月16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北京政府举行国会选举。

3月20日　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开会，起草《省宪法草案》、《省长选举法草案》、《省议会组织法草案》、《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县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草案》计六种，于20日闭会。

3月30日　广州千余名妇女集会要求男女平权，提出"男女平等"、"还我选举权"等口号。会后列队游行赴省议会、省署、军政府请愿。此前亦有湖南女界联合会代表陈仮等致函省宪起草委员会，要求规定女子应有公权，男女教育平等，禁止买卖人口。

3月27日　张作霖通电京、津、沪各警厅，否认帝制运动，命向各报馆更正复辟谣传。嗣于4月3日徐世昌通令各省严查复辟谣言。

4月2日　北京各界联合会开联席会议，商议库伦问题，一致谴责北京政府有意弃蒙。议决三项办法：一、警告曹锟、张作霖促其速行援救；二、派艾达天代表本会忠告蒙古各王公勿受奸人愚弄，玩误自身；三、派代表往谒徐世昌、靳云鹏，质问对库伦究竟有无办法，促其限期速派援蒙军队收复失地。

4月4日　孙中山、唐继尧宴国会议员。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外交团将关余交北京政府，不啻对西南宣告死刑，我人不皆成土匪？救济方法，惟有快选总统"。大多数议员表示赞同。

4月7日　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通过周震鳞等人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丁象廉当即依据组织大纲第二条，动议选举大总统，多数议员附议。大会随即采记名投票法进行选举，出席议员二百二十名，孙中山以二百十八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选毕，粤省各军均向孙中山祝贺，市民结队游行，燃放爆竹，以示庆祝。

4月9日　外蒙古活佛特使牛福厚持活佛意见书抵京，要求北京政府以恰克图条约为根据，订立条约承认蒙古属于中国，给汉族商人以贸易上之便利。但不许北京政府在蒙古地方驻军。

4月10日　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指出成立正式政府的必要，说明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原委，并敦请孙中山就职，建立正式政府。

4月21日　陈炯明依据《县自治暂行条例》、《县长选举暂行条例》及《县议会议员选举暂行条例》，是日委定全省九十四属之县自治选举监督，令各县选举事宜按照条例程序妥速办理。各县随即先后举办选举，并将选出的县长报请委任。

4月27日　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卢永祥、吴佩孚等三十三人联名通电，反对国会另拟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旋卢永祥致电曹锟、王占元，对曹等代签此电表示不满。

5月1日　长辛店一千余铁路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工人亦派代表参加。大会通过成立工人俱乐部的决议。会后游行示威，工人高呼“劳动万岁！”“五一节万岁！”“八小时工作！”等口号。5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正式成立。

5月4日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通电，谓“中华民国大总统已定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政府成立，军政府即应于是日取销，所有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是日应解除。”

5月5日　孙中山赴国会宣誓就任大总统，发表就职宣言，谓“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同人，幸共鉴之。”旋至北校场检阅军队。广州全市二十万人执旗游行，晚间举行提灯大会，以示祝贺。

5月6日　孙中山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廉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徐绍桢为总统府参军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5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修正外交部官制草案》，令所属各厅、司职掌暂照修正官制草案办理；同时裁撤编译处，添设条约司，所有编译事宜归并条约司办理。

5月25日　靳云鹏召集在京蒙古王公会议商讨征蒙问题。议决先由在京蒙古王公派代表回库伦劝令活佛绝俄，服从中央政府，否则大张讨伐。次日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蒙古王公。徐世昌、勒云鹏、张作霖均发表讲话，表示要平定蒙古叛乱。

5月29日　徐世昌准王章祜辞职，任马邻翼署教育次长，在范源濂未到任以前暂行代理部务。

6月4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连发二电致各省区，一是说明“六三”事件的经过，一是公布北京教育风潮的始末。电报诬称八校教职员“破坏教育，破坏秩序”。

6月12日　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谓外蒙匪势既成，对内蒙影响极巨，嗣后宜分三时期入手：一、劝慰两蒙王公，解除外患；二、严剿余匪，谋去枝节；三、先按和平手续，电令活佛投顺；如其不悟，再兴干戈，以示怀柔而息边患。

6月15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就北京教育风潮再次通电各省区，谓少数教职员借端煽动包围新华门，击伤马次长，种种不法行为，业经构成刑事罪名，自应断之法律解决。

6月22日　谭浩明派代表向孙中山乞和，愿驱逐陈炳焜，恢复自主。孙中山告以欲和须陆、谭、陈一律解兵，完全由桂民自治。

7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建议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出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十二人，代表着五十七名党员，在上海法租界秘密举行。

7月5日　广州各界召开国民大会，抗议日轮小川丸运输济桂军械。议决三项办法：一、忠告驻粤日领事，阻止小川丸运输济桂军械；二、请广州政府外交部严重交涉；三、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

7月6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发表宣言，指出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1922年7月18日书记部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迁北京，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邓中夏任主任，同时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立分部。

8月10日　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田维纲等五十余名议员提出北伐请愿案，并咨请孙中山宣布徐世昌罪状，明令出师讨伐，以谋国家统一。

8月13日　吴佩孚在武昌督军署召集武汉各文武官吏及议会、商会、各团体代表二百余人开会，议决：一、由武汉各团体致电赵恒惕、蒋作宾等，要求停战；二、致电京、津两湖要人，恳其从中调解；三、肖、吴两人及议会、商会各派代表二人赴湘接洽；四、在汉口召开和平会议。

8月15日　孙中山令驻桂各军均归陈炯明全权节制，民政由马君武治理，各军不得干涉民政，务须切实扶

植桂民自治。

8月25日　孙中山召集国务会议商讨太平洋会议事，决定发表国务会议宣言，主张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应由广州合法政府委派，不承认北京政府所派代表。

8月29日　孙中山发表文告，反对北京政府滥发公债，谓“伪庭徐世昌命令所发行之民国十年公债及其一切公债，未经合法国会通过者，均无效。将来统一之后，政府不负偿还之责。”

9月2日　张绍曾承吴佩孚意旨，通电主张在庐山开国是会议，并拟办法草案十四条。直系军阀吴佩孚、陈光远、肖耀南、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等以及赵恒惕纷纷通电表示赞成。其余实力派多持旁观。吴佩孚派人运动各省赞成，无应者。会议终未召开。

9月3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宴各军将领二百余人，以奖援桂之功，勉以北伐；并以《统一中国非北伐不为功》为题发表演说，指出北伐为统一全国之举，用平桂之勇敢，决能制胜北敌。

9月8日　北京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颜惠庆报告小幡提出鲁案经过，主张发表往来文件，视全国舆论再定迎拒办法。其他阁员主张通电各省区长官及法团征求意见，取决多数。

9月23日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哈尔滨、浙江、江西、南京、济南等地十八名代表及北京政府财政部三名代表与会。会议发表对外宣言，阐明对华盛顿会议的观点，并就四国借款、铁路、币制等问题作出决议，最后推举冯耿光、沈步洲、罗鸿年三人为银行公会联合会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

10月5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总商会开会，直、鄂、湘、晋、豫、皖、川、滇、闽、赣、鲁、浙、苏等十三省代表八十余人与会。推聂云台为主席，磋商当前国内重要问题及太平洋会议问题，于10日闭会。

10月8日　孙中山向国会提出北伐案，经国会非常会议通过。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乃令陈先返广州，主持后方接济。

10月10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庆祝国庆，后赴北校场阅兵。军民结队游行庆祝国庆。

10月12日　粤汉铁路湘鄂段八百多名职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粤汉路局总管英人卡墨客尔不允，并将为首的工人解雇。工人坚持斗争。后经湖北督军署和汉汉关调停，承认工人的要求，于17日客货车始照常运行。

10月13日　孙中山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报告财政情况及将来方针，并说明出巡桂省原因，决定出巡后由伍廷芳代理总统职务。

10月23日　孙中山抵南宁，与陈炯明商北伐问题，反复说明北伐的迫切意义，表示此次决心讨贼，义无反顾。北伐不能，亦不回戈而南，希陈勿再阻挠。并与之商酌出发桂林之饷项。此饷已筹三、四百万元，但大军出动，子弹之供给，米粮之储助，每月须请接济。陈允惟力是视。但孙中山至桂林半载，而未见陈一粟一弹之补助。

10月31日　唐继尧由粤入桂经柳州回滇，驻桂滇军总指挥杨益廉私自率队往护。李烈钧于是日下令撤杨益廉职，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并派朱率部招回杨部。孙中山得讯致电李烈钧，批准撤销杨益廉及加委滇军各长官，并予嘉勉。

11月4日　吴佩孚在汉口召集长江联防会议，肖耀南、杜锡珪及苏、皖、赣、湘各省代表出席，议决鄂、湘、赣、皖、苏五省为联防区域，实行攻守同盟，以对抗广州政府北伐。

11月11日　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该会由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发起，全国各地一百十八个团体三百余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致美国总统哈定及华盛顿会议各国代表电。

11月14日　徐世昌公布《刑事诉讼条例》及施行条例，并规定此条例自次年1月1日起先在东省特别法院区域执行；又将前次公布之《民事诉讼法草案》改称《民事诉讼条例》。

11月20日　曹锟召集保定会议。吴佩孚、高凌尉、张景惠及各省代表葛豪、郑士琦等三十七人出席。议决同张作霖携手共御南方；川湘赣防守由吴佩孚负责，直省实行亩捐，鄂省增加货税，截留京汉、陇海两路收入，以裕军需；对国会问题持旁观态度等，于26日闭会。

12月4日　孙中山抵桂林，整军北伐，设大本营于桂王府。桂林各界举行提灯会，放焰火，热烈欢迎。七日桂林军政学各界七十六个团体开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为造成世界之工具》的演说，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这便是防患于未然”。号召到会各界人士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12月6日　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学生手持白旗，写“外交后援”、“国民速起”、“力争青岛”、“不用劣货”等字样。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代表谒颜惠庆，请电美阻止鲁案直接交涉。北京各团体联合开会，警告颜惠庆直接交涉违反民意。

12月7日　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代表刁作谦、王宠惠、施肇基、顾维钧等提出辞职，北京政府致电慰留。

12月10日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发表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说，指出这次北伐是件非常的革命事业，是要“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

污，而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民国”。认为苏俄军人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农工联合而造成新国家。并表示相信“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目的的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在俄国之上。”

12月12日　下午2时，北京大学、中大、燕大、交大、民大及中大附中、山东中学等三十四校学生及北京女界联合会会员共万余人，齐集天安门游行示威。学生们手持大、小旗帜，上书“宁可退出华会，不得苟且交涉”、“争领土”、“我们的外交，全靠民意”，沿途齐呼“山东问题，国民快起。”队伍行至外交部时，高呼“尊重民意，力争外交”。公推何玉书等四人进见颜惠庆，提出尊重民意，无条件归还山东，鲁案提交大会解决等四项要求。颜惠庆应允。学生高呼口号后，乃将警告外交当局之旗帜，插于园中之冬青树上，整队而回。

12月15日　孙中山就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山东问题事发表文告，斥徐世昌等出卖国家，表示将“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二十一条”，并号召举国上下对徐世昌及其党羽，“共起诛之”；同时训令外交部通电全国。

12月17日　孙中山、伍廷芳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勿因海军减吨案，以中国实权为牺牲；日本与北代表所议妨害中国主权之条件，正式政府代表全国民意，概不承认。

同日　徐世昌派吴笈孙商梁士诒组阁。次日梁士诒对人言，以前组阁机会均谢绝，现政局已濒末路，非至愚何必自苦。若有法解决时局，或不惜牺牲；若责以维持现状，则谨谢不敏。

同日　徐世昌令改黑龙江省奇乾治局为县治，又令在吉林省乌株河镇、苇沙河镇添设治局。

12月18日　徐世昌准靳云鹏辞职，特任颜惠庆代理国务总理。颜惠庆表示只代理一周为限。

12月19日　曹锟抵北京，次日入府见徐世昌，面商内阁问题，对梁士诒组阁初仍犹疑，嗣允不反对。

同日　梁士诒入见徐世昌，允组阁。

同日　广东省议会通过省宪法草案，并将草案交省署，另组宪法研究会研究。

同日　太平洋会议两湖协进会在汉口交渡桥开湖北国民外交大会，五万三千人与会。议决反对四国协约，取消“二十一条”。会后举行盛大游行示威。

12月22日　段祺瑞派徐树铮抵粤。孙中山电派廖仲恺、汪兆铭、蒋介石为代表，与之商洽共同打击直系军事计划。

12月23日　北京政府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赴古巴任驻古巴公使，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尹鹤龄为代理秘书长。

12月24日　徐世昌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

同日　徐世昌令增设驻巴拿马公使，以刁作谦兼任。

同日　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反对北京政府加征田赋及鲁案直接交涉。

12月25日　徐世昌特任颜惠庆为外交总长，高凌蔚为内务总长，张弧为财政总长，鲍贵卿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未到任以前特任董康署理，黄炎培为教育总长，未到任以前特任齐耀珊兼署，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

12月30日　广州政府大理院发布通缉徐世昌、梁士诒命令，谓“梁士诒为帝制罪魁，前经通缉，久已匿迹销声。乃近复敢在北京受徐世昌之命，组织国务院。查徐世昌与梁士诒均属从前袁世凯叛国称帝谋臣，兹复沆瀣一气，公相号召，叛乱民国，罪证确凿，自应严拿治罪，以彰国法。”

外　交

1月1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与远东共和国通商谈判因西伯利亚华侨生命财产及赔偿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谈判破裂。次日外交部将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送部文书全部退还。

1月15日　苏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牒北京政府，指责中国当局侵害俄罗斯消费组织联合总会在蒙古的贸易活动及在加须加区域扶助白俄安恩哥夫、都托夫等残部。

1月2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远东共和国提出签订通商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一、废弃俄帝时所有特权，二、废除1881年所订陆路通商条约，三、先订暂行通商条例，四、未订正约前两国领事只用贸易保护官名义，五、通商草约依据新疆局部商约十条商定。是日送交优林。

2月3日　北京政府派遣办理总领事事务陈广平抵莫斯科。直到3月31日始受苏俄政府正式接待。

2月10日　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致电外交团，要求照拨前派与军政府之南方关税百分之十三，“若不交款，必派人接粤税关”。次日外交团允交付关余于军政府，但因美使忽接美政府反对训令，事又搁浅。

2月1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将中国政府对苏俄1920年9月通牒复文送交苏俄政府，表示“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

2月15日　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正式接收哈尔滨各机关，改悬中国国旗。前一日董士恩曾分访驻哈各国领事，声明中国将继续尊重1914年之英俄协约，是日又以同样内容正式照会各国领事。

2月21日　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在巴黎举行。次日我国代表顾维钧被举为修改国际联盟盟约委员会委员。

3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日使先撤延属日军两连及散处汪清、和龙诸县警察。8日驻京日使小幡访颜惠庆，谓奉东京训令，延、珲日军三月底撤尽，但警察不撤。24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外交部，延、珲日军“撤尽”，暂留警察。后仍未撤。

3月7日　白俄谢米诺夫的代表福列查斯基等人在北京车站就捕。前驻京俄使馆参议格拉卫等运动驻京公使团要求释放。

3月8日　驻英公使顾维钧奉外交部指示，邀请苏俄驻英代表克拉辛商谈，面致外交部《答复俄劳农政府宣言稿》付本及备忘录一件，并对加拉罕2月23日之照会提出口头抗议。同时电陈广平就近同苏俄政府接洽。

3月22日　徐世昌派夏诒霆为专使，参加秘鲁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纪念。

3月2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及航空署就日本飞航学校飞行演习途经我国领空，拟定临时限止办法九条，经国务会议通过照办。

4月2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接待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此后，凡交涉重大问题皆由颜惠庆与优林直接商洽。同时，苏俄政府声明与各国均采取直接交涉，优林无权代表苏俄政府。

4月26日　优林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访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磋商商约谈判手续。

4月2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准将北京政府驻古巴公使由兼任改为专任。

4月29日　湖北官钱局将二百万张纸张恶劣印刷不明，已报请作废的新式小票擅自动用，以致商民发生纠葛。是日省议会通过查办官钱局案。

5月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中俄通商协定草案》事复优林，允议通商；并于9日又将《致远东共和国宪法会议书》交优林，再次表示开始接洽商约事宜。

5月6日　北京政府就日本擅自派八名军事联络员分驻珲春、六道沟、头道沟三处事，令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5月16日　日首相原敬在东京召集殖民事务大会（通称东方会议），与会者有内阁阁员、朝鲜总督斋藤、关东厅长官山县、海参威派遣军总司令民立法、关东军司令官河合，驻青岛日军司令官由比、驻台湾日军司令官福田、驻京公使小幡、驻奉天总领事等。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坚持中日直接交涉，同张作霖保持亲善以经营满蒙，满铁贷款给东省铁路以取得满铁车辆进入长春、哈尔滨，并在上述地区扶植日本势力等侵华方针，于25日结束。

5月17日　日本内阁就对张作霖的政策作出决定：对于张作霖在东三省充实内政、军备的措施给予援助，但反对张作霖把势力伸进关内及中央政权，当日并将此决定通知东方会议。

5月18日　优林离北京返赤塔，其职务由阿格辽夫代理。优林旋出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

5月20日　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谈判中德协约事，经五十余次非正式会议完成草案，是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并声明：“凡因与中国订立1898年3月6日之条约及其他一切关于山东省之文件而获得之一切权利、产业权、特权抛弃之。”

6月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议定解决中德间债票办法两项：一、凡国民与国民间，政府与国民间之债权券票另定办法；二、凡政府与政府间之债权券票，自断交、宣战之日起，无效。

6月3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陈广平，口头承诺北京政府所提先决条件，表示即派非正式代表赴北京。次日陈广平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

6月16日　徐世昌派唐在复为签订中国、波斯条约全权代表，并令就近在意京办理。

6月1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顾维钧，告以俟苏俄正式书面承诺中国所提条件，方可允其派非正式代表来京；召回陈广平，改派郑延禧办理总领事事务，前往莫斯科照料华侨。顾维钧即将外交部意旨转达克拉辛，27日克拉辛复函顾维钧，对中国所提条件表示异议，并谓华工在俄享有充分之平等与自由。

6月28日　驻粤美领事首次正式觐见孙中山。孙中山与美领事畅谈中美两国邦交。后美领事复到外交部拜访伍廷芳、伍朝枢。

6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顾维钧，饬将复苏俄电文转达克拉辛，谓“恩琴勾结蒙匪，盘踞库伦，中央业已特命东三省张巡阅使兼充蒙疆经略使，前往痛剿”，6月15日来电所称，“因与恩琴作战计划不得不经过蒙境各节，惟事关领土主权，中国政府殊难承认”。

7月1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及参事王景岐等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总代表卜尔熙、华根纳在外交部互换照会，彼此申明《中德协约》由是日起发生效力。

7月23日　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优林抵奉天访张作霖，会商蒙古问题。张作霖就远东共和国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出兵库伦事提出抗议，并要求迅速交还蒙古。优林表示远东共和国一定交还蒙古，至于交还办法日后在满州里商议。次日晚优林离奉赴京。

8月1日　徐世昌特使朱启钤抵达东京，次日向内日康哉递交徐世昌亲笔信。

8月14日　徐世昌特任刁作廉为驻古巴特命全权公使。

8月1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施肇基照会美国政府，对美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表示同意。

8月30日　广州政府驻美国代表马素电广州总统府，称据美国务卿表示，美曾通知北京政府太平洋会议中

国代表必南北兼派，北京政府回电称南方唐绍仪可充代表。为此，广州总统府于是日发表通知，声明对于太平洋会议代表，"并未与北庭有一字商量"。

9月10日　外蒙王公公举车臣汗王部属扎萨克郡王多尔齐为代表，请愿内向。

9月7日　日本内阁于9月2日决定《山东问题解决大纲》。是日小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处置案》，即鲁案第一次节略九条，表示日本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中国将租借地辟为商埠，并于山东省内适当都市自行开为商埠；山东铁路、矿山中日合办；山东铁路延长线（指济顺、高徐两铁路线——编者注）之权利及烟潍铁路优先权让与四国新银行团经营等。15日外交部将此案全文交各报社发表。

9月12日　新疆督军代表刘希曾与苏俄西伯利亚驻军革命委员会代表波戈金在塔城缔结《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开入中华民国国境以剿灭阿尔泰区白匪部队之协议》，规定苏军自行自斋桑城地区实行攻击动作，中国军队负责防卫布伦托海地区及乌伦古河以东之后方；苏军自其开入中国领土之日起，一个月内由中国无偿供给粮食；军事行动结束后，苏军立即撤离中国国境。

9月16日　驻澳门葡萄牙海军在银坑越界干涉我国国防军缉盗，竟先行开炮。我国军队反击，伤葡萄牙水兵四名。

9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太平洋会议日程将中国与委任统治地并列，殊非平等，是日一面通知舒尔曼要求改拟，一面电致施肇基，令向美国政府详细声明否认之理由，并试拟太平洋会议议事日程对案六条。

9月26日　北京政府驻墨西哥国全权公使王继曾答复墨外部关于现约展限及禁工办法照会，指出：中墨两国政府商定，所有两国于1899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所签订之中墨友好通商行船条约之有效期间，应展限至两缔约国将来按照两国宪法所规定之手续，商定对于该约确定及正式之修改之日为止。在墨西哥国政府禁止外国工人入境期内，两缔约国各禁其本国工人入他一缔约国境内。

10月1日　广州政府就澳门事件向驻粤葡领提出四项要求：一、葡舰先开炮，应向我国道歉，二、惩办肇事军官，三、葡萄牙各种船只不得驶过银坑湾仔华界，四、澳门须定期禁赌。

10月2日　太平洋外交商権会在上海成立，有二十九个团体参加，推喻育之为主席。该会以商権关于中华民国在太平洋会议之正确主张及行动为宗旨。

10月4日　徐世昌批准外交部派张煜全为赴美参与太平洋会议代表团专门委员，刁作廉为秘书长，曹云祥为帮办秘书长。

10月2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邀集朝野人士在外交楼商议鲁案问题，多数意见认为鲁案即使提交太平洋会议，恐未必有利。北京外交联合会议决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北京各团体联合会议决鲁案提交太平洋会议。天津二十六个团体亦电请府院拒绝直接交涉，并电全国一体拒绝。

10月28日　日本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以换防为借口增派军队，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员密查确实，饬交涉员向驻济日领抗议，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是日外交部电令胡维德向日本政府交涉。

11月2日　徐世昌令驻美国公使施肇基、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加全权大使衔。

11月12日　华盛顿会议开幕。该会由美国政府发起，先邀请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参加，其后荷兰、葡萄牙以有属岛在太平洋，比利时以有经济利益在中国之故，均被邀参加。会议商讨限制军备暨远东及太平洋问题。推美国务卿休士为大会主席。大会下设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和限制军备问题总委员会。北京政府全权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出席。会议至次年2月6日闭会。中经八十六日，共开全体大会七次，协定条约七件，议决案二十七件。

11月2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阿格辽夫，抗议远东共和国政府擅自派兵侵入库伦、恰克图。指出：事前既未得中国之许可，又无任何之通告，此种举动，不独有损中国主权，且违万国公法，不顾国际信用。同时催其速派代表赴满州里与中国接洽交还库、恰事宜。远东共和国政府未作答复，满洲里会议遂未能举行。

12月8日　顾维钧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提出各国不得相互对华订约案。英国代表巴尔福反对，谓此等建议足以限制各国订约之主权。后经英国代表盖德士提出修正案，作为各国对中国原则之一，经总委员会通过。

12月10日　华盛顿会议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通过《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决议由美、英、法、日等八国政府组织一委员会调查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以及中国司法状况，提出方法，建议各国逐渐或用他种方法放弃各该国之领事裁判权。

同日　苏俄全权代表巴意开斯抵哈尔滨，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称在外蒙问题上"苏俄从未怀有任何侵略意图"，"一旦在外蒙古敌视苏俄的组织所造成的威胁解除，吾人之军队即行撤退，自不待言。"

12月1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山东问题处置过程文件，谓"英美两国以大会待决问题正多，此案可由英美居间商権，俾得从速解决。"政府详加审度英美两国主张，"未便置之不理"。而"此次英美出任调停，以提出大会为发端之始，以大会公认为解决之终；每次会谈均有英美

代表之参予；即议而不协，仍以大会讨论为后盾，实与我国向来希望尚无抵触。”

同日　北京政府驻法、意各使电告，华侨对鲁案直接交涉表示强烈反对。

12月17日　英驻日大使爱理鹗发表英日同盟终结的声明。26日内田亦作同样声明。

12月24日　日本政府决定中止胶济铁路谈判。于是中日两国华盛顿谈判休会。

12月31日　舒尔曼到顺成王府拜会张作霖。旋张作霖到东交民巷美国公使馆回拜。同时到日本公使馆、英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访各国公使。当张作霖访艾斯敦时，艾斯敦即提出：贵经略使入京，一手改组内阁，不免有“武人干政”的名声；贵国政府正要裁兵，贵经略使却极力招兵，不合民心，而且奉省军队在京畿一带驻扎，名声很不好。

军　事

1月1日　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批准龙济光辞两广巡阅使，特任为隆威上将军。

1月6日　白俄阿年阔夫匪部七百余人在新疆古城举行暴乱。经我驻军协力堵御，匪部不支，被迫解除武装，一半遣送甘肃敦煌安置，一半留新疆安置。阿年阔夫系沙俄七河省陆军少将，上年为苏俄红军击溃，率残部逃入我国新疆各地，先后为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兵解除武装，多数资遣返回俄境，所余不愿返回者被安置于古城等地。

1月9日　白俄恩琴率领白俄及蒙匪三千余人，在参谋长山田（日人）的策划下，使用日本供给的枪炮，再度大举进犯我国外蒙古地方。是日褚其祥率第二十五混成旅在煤窑南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同时急电援库总司令张景惠速派援军。

1月25日　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急电北京政府报告后地失守，库伦粮绝，军心商况顿起恐慌，白俄蒙匪有克日会攻库伦之说，请迅电张景惠速饬各援军星驰前进。但张托辞天寒不能急进，按兵不动。

1月28日　叶荃在云南寻甸召集李永和等旅长开会，密商袭取昆明，推翻唐继尧。会后李入省向唐告密。是日叶荃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在寻甸以闹饷为名举行兵变。叶荃率部攻昆明，抵达杨林板桥即与唐军遭遇，激战数日，叶军败退，唐军尾追，至2月1日将叶军全部击溃。

2月3日　恩琴匪部猛攻库伦，以主力急攻东北面防兵，乌里雅苏台沟之褚旅防线不支，高在田团亦因之发生误会，乃同向二里半滩急退。原驻东营子之高团接济营亦同时纷纷退却。商人等随之而退，秩序大乱。东面敌人适于此时猛攻而入，东营子遂失守。

2月7日　滇军军长顾品珍借回家省亲之名，密率所部由宣威县出发进逼省城，是日行至距昆明百里的杨林口。唐继尧因讨叶荃大军未回，即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次日仓皇出走。9日顾品珍入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维持秩序。

2月18日　刘湘、但懋辛、刘成勋等通电宣布刘存厚罪状，同时率军分四路向成都进发。

2月22日　北京政府参陆处决议分四路援库：一、东路奉军担任，由张景惠亲往督战；二、北路黑龙江孙烈臣调一旅，绕由贝加尔至恰克图进攻；三、南路由曹锟指调冯玉祥全旅由张家口乘汽车开往防线；四、西南催令新疆杨增新调军队由科布多前进。曹、张接电令后要索巨费而不愿出兵。

3月5日　鄂西“神兵”乘船向四川进发，是日抵万县。上岸时，在城外向民众宣言，“神兵”专为讨伐军队，保护良民。万县川军龟缩城内，至次日晨始出城攻打“神兵”。两军激烈战斗，“神兵”败。

3月11日　大股白俄蒙匪围攻叨林，我军奋起抵抗，经三昼夜激烈战斗，于是日失守。援库付司令邹芬退乌得。白俄蒙匪继续侵犯，于13日攻陷乌得。

3月15日　徐世昌时以陆军第十一师兵变劫掠，取销该师建制，并褫夺师长李奎元、团长李式白、营长高文珊等人官勋。

3月18日　蒙古国民军及改穿蒙古服装的苏俄红军三千余人由托洛依茨郭萨甫新克向恰克图进攻，迫令北京政府驻军缴械。恰克图防军及警备队败退，恰城于上午11时失陷。原退驻以不齐的库伦防军即向北增援，在距恰城五里迤南沃涝的小山上，架炮向恰城射击，下午1时将恰城收复。但因仅剩空城，无粮无草，仍自动弃守。

3月24日　孙中山在黄埔检阅海军陆战队，并发表演说，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

3月31日　徐世昌任李垣暂行代理库乌科唐镇抚使，褫夺陈毅官职、勋位、勋章。又特任孙烈臣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4月16日　原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潜赴彰德（今安阳），伙同该地河南第一旅一团长孙会友率部举行兵变，反对赵倜。赵急调军队进攻，吴佩孚亦派兵助攻。

4月19日　东省铁路四站原沙俄官兵八千余人宣布独立，归附谢米诺夫。吉林督军孙烈臣饬令延边驻军一体严防。

4月23日　粤军第一、二两师排长以上军官在广州东园开恳亲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军人宜以卫国卫民为天职，要发扬爱国思想，不可以兵为做官发财的业务。”

5月7日　孙中山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

令，顾品珍为滇军总司令，卢焘为黔军总司令，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

5月11日　川军将领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逼走熊克武。徐世昌以川乱为名，遣刘存厚进攻成都。

5月15日　四川邓锡候通电，宣言于本月19日解除靖川军第四军军长职务，所属靖川军第一师、第十一师暨兼领第六师等部队，由川军联合办事处处理。

5月28日　孙中山命陈炯明率部出驻肇庆，以趋梧州。又命许崇智由北江入桂夹击，李烈钧率赣、滇军，谷正伦率黔军齐向桂林，并约湘军同时攻桂。

6月5日　陆军第八师之一部士兵因索欠饷未遂，在湖北沙市哗变，放火抢劫，地方损失甚大。

6月6日　川军混成旅旅长以上将领在重庆开会，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并于24日将此事通电全国。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发表宣言，主张川省自治，同时取销川军联合办事处。

6月13日　桂系军阀谋重得广东地盘，勾结直系，集大军于梧州，是日下总攻击令，分三路攻粤。

6月20日　孙中山任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

6月24日　徐世昌下令处分武、宜兵变各负责官佐，免去宋太霈、孟昭月旅长本职，孙建屏、穆思棠、王锡黄、彭德铨团长本职，此外团付、营长以下各员，仍着湖北督军详细查明汇呈惩办。

6月26日　粤军海、陆、空三军二十余万人于21日全力攻击梧州，经数日剧战并得刘震寰部配合，于是日上午9时占领梧州。梧州为广西门户，粤军既克，已成破竹之势，各处桂军急谋自保，纷纷与陆荣廷脱离关系。次日粤军将总司令部移至梧州。

7月2日　赵恒惕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兵协助广东，讨伐桂系军阀，援助桂人自治。派第三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援桂总司令，第六混成旅旅长罗光闿为前锋总指挥，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为中路司令，宪兵营司令王德清为兵站总监。

7月9日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在旅沪广东同乡的请求下，扣留济桂军械。是日北京政府国务院电令何丰林放行。何复电称，各团体坚持扣留，无法起运。

7月20日　赵恒惕借欢迎蒋作宾为名，召集湘军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以援鄂为名，出兵两师，任宋鹤庚、鲁涤平为援鄂正、付司令，并饬财政厅长杨丙兼充兵站总监。

7月21日　赵恒惕下援鄂总动员令，任宋鹤庚为第一军军长兼总指挥，鲁涤平为第二军军长兼中路司令，夏斗寅为前锋司令，赵钺为左翼司令，叶开鑫为右翼司令，调集军队四万人向湖北挺进。

7月26日　川军将领推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决定调二万大军攻打宜昌。是日刘湘宣誓就职，宣言此行系援助鄂人驱王，既非广州政府之命令，亦非含有占领鄂境之意，俟王占元离鄂，扶助组织自治政府后，川军与湘军同时撤退。

8月12日　徐世昌特任蒋拯为海军总司令。

9月4日　曹锟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曹锐、边守靖、吴毓麟等参加，吴佩孚派专员与会。会议商讨湘省局势、军费及防御南方问题。决定直军分布于湘、鄂、赣三省：第三师、第二十五师及靳云鹏、董政国两混成旅驻湘，第二十三师、第二十六师及豫军一团驻鄂西，第二十四师及鲁军一旅驻赣。

9月18日　陈树藩联合川军由汉中分三路攻陕，东路出兰田之阳峪口，中路出长安正南之子午谷，西路出宝鸡之南天门，同时派人联络陕中旧部以为内应。

9月21日　冯玉祥同于右任达成协定，改编靖国军。是日胡景翼召集靖国军所驻地区三原、泾阳等县公民开国民大会，宣布取消靖国军。旋冯玉祥推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会会长，并呈报徐世昌任命胡景翼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12月5日　海军大批军舰赴鄂助吴，现留守长江者，尚有"楚有"、"江利"、"拱辰"、"湖鄂"、"江元"、"江复"、"楚谦"、"江鲲"、"烈字"、"江犀"、"永安"、"建中"十二艘，因欠饷窘状已极。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是日特急电肖耀南，谓"全军积欠饷粮，已一年有奇，循兹以往，深恐军心愤激，抚慰无从"，请就近拨款协助。

经　济

1月1日　上海城厢内外闸北一带，各大商铺张灯结采，庆祝元旦，除悬挂国旗外，并悬出白旗，上书"尊重约法，反对苛税"，抗议政府假赈灾为名，实行加征赈捐、印花加贴及所得税。同时，天津、杭州、宁波、江苏及江西等地商人也纷起反对苛捐杂税。

1月3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发出通电，谓附收赈捐用于筹办工赈经阁议通过呈报大总统批准，"政府公报刊登在案，层次分明，始末班班，非容虚造"。次日华北五省救灾团体通电，反对赈款挪作路用。11日五省赈务代表赴总统府、国务院，请求停止工赈。交通部于2月15日被迫改变办法，将附收赈捐一半拨归赈务处散发急赈，一半用于修筑沧石、烟潍两路。

1月9日　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开成立会，推徐沧水为主席，马寅初、徐沧水、杨端六等为干事员。

1月11日　北京政府海军部与英商亨得利乔公司签订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二百镑《水面飞机借款合同》，用于购买一百零五架水面飞机。是日由公司先交付垫款四十万镑与海军部。

1月18日　驻京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通告新四国银行团成立。同时美国银行团代表史蒂芬来华活动。

1月19日　徐世昌公布《征收所得税考成条例》。

2月11日　在华的日本商业会议所（即商会）在上海召开联合会议，上海、大连、奉天、天津、汉口、青岛、北京、济南各商业会议所和实业商会的代表三十人出席，日驻沪总领事山崎亦列席。商议设置对华贸易统一机关、组织对华投资团、设立中日合办之大银行、兴办教育机关及慈善医院等五十余件议案，于14日结束。

2月13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管理特种财产事务局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签订《三百万元借款合同》，以武昌、汉口前德商工厂等为担保，作为接管前德商经营的各工厂经营费用。

2月19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财政部拟定整理内债办法。会后，周自齐、叶恭绰至银行公会发表国内公债整理意见，谓自1912年至1920年公债发行总额已达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元，政府急图补救，通过整理案。

2月26日　徐世昌令所有赈粜粮石免税展限至本年二月底止，并著财政部饬属严密稽查奸商借端影射，希图渔利。

3月3日　徐世昌令财政部会同内国公债局，"按照三、四年公债暨七年短期公债办法"整理内国公债。财政部随即拟定整理内国公债详细办法，于是月30日呈准施行。

3月10日　徐世昌公布《证券交易所课税条例》。

4月1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设置减政委员会，由各部次长等二十五人组成，以郭则法为会长。委员会依据国务总理靳云鹏关于中央军费每月不得超过三百万元、政费每月不得超过二百万元的规定，拟定减政办法六条。

4月21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会同内务、农商、交通各部及税务处就防止粮食由东三省影射出洋事，议决办法五条。

4月25日　孙中山发表英文本《实业计划》序，希望"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强调指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事业发展之一事也。"

5月1日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会议，决议建议北京政府废两改元，改铸旧币，停止滥铸铜元。北京政府未予采纳。

6月10日　山东武定、东昌间汽车路建成，全长一千二百余里。该路为美国红十字会出资五十万元，用以工代赈办法招募灾民修建。

6月17日　徐世昌以上海商场铜元充斥，价格跌落，饬币制局令湘、皖、赣、宁各造币厂暂行停铸。

7月1日　中法实业银行总行在巴黎倒闭。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香港等地分行，亦相继停止营业。该行于1912年成立，专在中国经营实业投资，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郎暴落而陷于停顿。该行发行钞票为数甚巨，人心因之恐慌。经北京政府财政部与全国银行公会协商，决定所有中法实业银行发行，印有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钞票，自13日起由中国各银行暂行垫款代兑。

7月19日　西北各地商会代表在北京总商会开会决议，抵制京绥路货捐，于是日起停运货物，至捐局撤销为止。8月1日察哈尔都统张景惠致电北京政府，谓"顺从民意，暂将捐局封闭"。

9月1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发行六百万元八厘短期购车公债，委托经募车债银行团代为经理，是日起开始募集，至30日截止。

9月4日　薛文泰、秦祖泽等创办中国棉业银行，资本总额一百万元，先收一半，设上海。1927年因时局变化，于3月13日经股东会议决解散，所有存款如数发还。

10月15日　中央信托公司由上海绍兴邦三十家钱庄联合发起，于是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资本总额一千二百万元，实收三百万元，推田时霖为董事长，田祈原、王晓籁、孙铁卿、魏海涛等十八人为董事。1935年改名中一信托公司。

10月19日　冯耿光、曹汝霖代表银行界谒徐世昌，表示非财政公开不再垫款，并希望财政有确定具体之计划。

11月3日　李瑞九等创办惠工银行，是日在上海开幕。资本总额一百万元，先收四分之一。1922年1月又开办储蓄业务。嗣于1923年2月3日因内部周转不灵而停业。

11月15日　北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先是流传中、交两行信用不稳，外国在华银行、商店拒收两行钞票，于是各企业及市民纷纷持钞到两行兑换。人群川流不息，两行至深夜始闭门。次日挤兑更甚。仅两日两行共兑出五、六十万元。北京政府及银行界要人迭开会议，讨论救济办法。决定拨关余七百万元，作为偿还两行公债还本付息之垫款；各商号、银行一律收存中、交钞票，作为现金定期存款。风潮因之缓和。北京中行于12月1日恢复原状。挤兑风潮波及天津、济南、开封、汉口等地，旋皆平息。惟开封中、交两分行因现款一时无从调集，两行经理及官钱局局长面请军政两长出示停止兑现两个月。

11月26日　奉天总商会会长鲁棣琴与日商业会所石田武亥就取消大连金建案举行谈达成协定：中日双方交易，无论何时买卖何种货物均须以奉票为本位，惟买卖上一切货币，因三省情形不同，各地有从来之惯例者，即按照惯例办理。

12月14日　王宠惠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

上提出取消日本侵略中国之“二十一条”。日本代表埴原反对“在大会内讨论”，会议主席休士宣布停会，此案遂被搁置。“二十一条”虽经国内民众强烈要求取消并经在华盛顿国民代表等催促，但北京政府代表团不但无提出之勇气，且无此要求。后美国代表休士忽示意北京政府代表团可以提出，因此时日代表对海军比率持延拓政策，故美国以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案来迫日本承认海军比率。

12月27日　梁士诒与张作霖在北京签订交通银行借款合同，奉天向交通银行贷款四百万元，作为交行钞票的兑现基金，利息一分五厘，以交行官股作抵，并允由奉天派一人监察业务。

12月31日　北京政府狂借内外债，所欠债额，至是月止，为十五亿八千八百八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二元九角六分。以四亿人计，每人已平均负担四元之债务。就中长期外债十亿四千六百六十九万零七百七十元一角五分，短期外债一亿零三十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二元三角五分，内国公债二亿六千三百二十二万六千七百三十八元，所欠内国各银行、银号、公司短期借款八千九百九十九万五千九百九十一元五角三分，欠各处经费、所发库券四千四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二十六元零三分。而所入各款惟盐余为可恃。盐余除去各项开支、外债利息及公债担保金外，月余仅约三百万元。但短期外债与内国银行短期借款及垫款，总数已二亿三千四百五十万三千零二十九元七角九分。此种短期借款，利息轻者八厘，重者一分八厘，平均以一分半计，已月需三百四十七万余元。盐余付息，已不足四十七万元。

文　教

1月2日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就南洋华侨教育事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及驻京英使艾斯敦，谓英在南群岛提出学校注册条例，“无异限制华人学校之发达”，要求将该条例暂缓施行。4日华侨联合会开紧急会议，商定办法，吁请政府向英国交涉。

1月16日　北京政府内务部经国务会议批准设立著作及出版物研究会，专门搜集研究著作及出版物，以防止新思潮之传播。同时北京军警当局对外来邮电及印刷品进行检查，稍有涉及新思潮的电讯及印刷品即予扣留、没收。

2月13日　《劳动与妇女》周刊在广州创刊，发刊后到第十一期停刊。编辑和撰稿人有沈玄庐、陈独秀、谭鸣谦（即谭平山）、陈公博等人。

3月10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校部及经济部各科设北京，理工各科分设上海、唐山，另设附属中学及特别班。严修、唐文治、张謇、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等十七人为董事。3月24日徐世昌派叶恭绰为校长。9月1日正式开学。

3月17日　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陈世璋、姚憾赴府、院及教育部公呈北京八校教职员停职宣言并交涉教育经费。

3月31日　徐世昌批准通行教育部编订的国乐、国歌正谱及燕乐、军乐各谱。

4月6日　南洋华侨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开办基金八百万元，陈担负一半，余由南洋华侨捐助，聘邓芝园为校长，招收学生三百名。校址选定厦门演武亭，校舍未落成前，先在集美学校开学。是日上午在集美学校举行开校式。

4月7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北京八校，谓教育经费交通部已允特别协助，旧欠亦分批发还，望各校即日复课。八校教职员以教育经遇仍无确实保障，决总辞职。

4月21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采纳八校教职员要求，议定办法三项：一、京师教育经费于一星期内先发3月份一个月。自4月份起由财政部就交通部协济政费项下每月按期拨付二十二万元，作为北京八校、北京师范及公立各中小学校经费；二、教育部向财政部额领之款以向来额领之数为准，由财政部筹定拨付；三、上年12月起至本年2月止，八校及中等各校积欠经费四十余万元，先发一个月，其余分为三期，于4、5、6三个月各付一期。

5月19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以北京八校迄未开课为借口，推翻四月三十日议决案，决定将教员薪资暂行停发，由财政、交通两部查照前议储款以待，俟各校开课再行照发，同时饬教育部转知各校督促上课。

5月31日　北京各界联合会召集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北京教育会等八团体代表二十余人假政法专门学校开紧急会议，讨论维持国内教育办法，决定举行北京市民维持国内外教育大会。

6月21日　第五次广东教育会议在广州召开，全省四百名著名教育家参加会议。议决将教育行政与省政府脱离关系，设立教育委员会专司其事，为独立机关，不受政治上之干涉；教育经遇亦特别规定，不得拨作他用。提议施行全省普及教育，增加小学经费，添设师范学校等项措施，于30日结束。

7月1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咨各省，施行经国务会议决定的虞舜卿云歌之国歌及新谱。6日教育部复呈准施行国歌正谱及燕乐、军乐谱各篇。

7月13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推广蒙养园，并拟订二项办法：一、女子师范学校应附设保姆科；二、除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讲习所应附设蒙养园外，每县至少须设蒙养园一所。

7月24日　北京政府履行范源濂等提出的五项提议，是日派王芝祥在尚志学会举行教育界慰问会。会后，王芝祥又赴法国医院慰问马叙伦。财政部以盐余二百万元作担保，印发证券二十张，每张十万元交教育部作八校教育经费之准备金。

8月17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是日在上海开成立会，到二十二校代表，通过《简章》八条。

9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论书籍。到1922年9月，共出版了《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十五种。1923年与新青年社合并。

9月23日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会见南洋学界代表廖衡，表示支持华侨教育，指出："摧残侨民教育，无异摧残我国内教育，现政府誓与华侨同其祸福，据理力争，不为强暴所屈"；同时饬外交部向英国交涉，保护南洋华侨教育。

10月27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在广州举行，十七个省区派出代表三十五人参加，举汪精卫为主席。会议讨论改革学制系统、经费独立、援助华侨教育等案，于11月7日闭会。

12月13日　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出版《妇女声》月刊，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宗旨。

12月20日　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在广州开幕，全省有四十五个县的美术协会参加。共选出的绘画、雕刻、刺绣展品共一千八百六十件，其中以梅县、普宁、香山、兴宁四县为最，每县有一百二、三十件之多。此外省内外个人或团体送来的绘画一千余件，刺绣千余件，雕刻五百余件。

12月23日　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汪兆铭、熊希龄、张伯苓等九人为董事。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2年

导　言

一九二二年，直奉两系共同掌握北京政权的局面终于因内部矛盾的加剧而无法维持下去了。四月，双方调兵遣将，磨拳霍霍，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再战而胜奉系，直系从此独霸北京政权。

孙中山还在军阀中周旋，他联合皖系和奉系共同反对直系，形成孙、段、张的反直三角同盟，却没料到肘腋生患，悉力培植的陈炯明却在个人野心的膨胀下，发动了炮轰总统府的叛变事件，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凭借八面玲珑的圆滑手段久居总统位置的徐世昌，在直系再战胜奉系以后，便再也无计可施了。直系为了消除南方护法军政府存在的理由，更兼于曹锟有当总统的强烈欲望，京皖系的徐世昌自然不适合直系的政治需要。为了一位能够“德高望重”而又可为自己掌握利用的人物来充当门面，几年前已销声匿迹的黎元洪转眼间又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了。6年，黎大总统再度出山，继续其傀儡生涯。

本年九月间，“好人政府”隆重出台。起告首王宠惠、蔡元培、胡适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张，军阀们索性用王宠惠这位“大好人”来担任内阁总理，一群无党无派的“好人”们担任了政府要职，然而“好人政府”终究还是军阀手中的玩具，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本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中国革命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成立后，在各地帮助建立工人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这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首先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陆续开展了安源路矿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

一九二二年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后活跃的一年。为党的发展培养了中坚力量，也为未来的斗争积累了经验。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
- ●上海大学
- ●第一次工运潮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批判“好人政府”的主张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西湖会议
- ●《向导》周报创刊
- ●第一次直奉战争
- ●陈炯明叛变
- ●徐世昌下台
- ●黎元洪复任总统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

背景介绍

在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以前，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以及某些官僚政客，为了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曾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长沙、唐山等地工人中进行各种活动，并组织了一些工人团体，如广州的茶居工会、理发工会、机器工会、互助总社；长沙的劳工会、中华机械工会；上海的中华全国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等等。他们有些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些是为了推行劳资合作，发展所谓实业；有些是为了支持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有些则是把工人组织当作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工具。这些形形色色的团体，虽然宗旨不一，各行其是，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却在工人群众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争取和团结这些工人团体，使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目标下联合起来，为迎接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而斗争，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刻不容缓的任务。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召开的。

全国劳动大会召集的原则是，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根据这个原则，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会议。通告所宣布的大会主要内容是：(一)纪念“五一”节；(二)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三)讨论改良生活问题；(四)各代表提议事件。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来自十二个城市，共计一百七十三人。他们代表着一百一十余个工会，三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以广州、香港两地为最多，占全体代表的大多数。来自北方、中部、东南地区及长江一带的有北京、天津、唐山、太原、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处工会代表；铁路方面有京汉、京奉、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代表；矿山有开滦、安源各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政治背景就其大者而言，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代表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京汉铁路工会代表邓中夏，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香港海员工会代表陈炳生、林伟民、苏兆征，上海海员工会代表朱宝庭，广东机器工会代表黄焕庭等。

5月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和广州市的五万多工人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旗帜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地前进。每个游行的人都拿着纸作的小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日万岁”、“五一劳动节万岁”等口号。游行队伍集中到第一公园，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纪念“五一”节大会，到会群众情绪极为热烈。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由于代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不时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共产党善于掌握政策，排除纠纷，采取民主讨论、求同存异等互相协商的办法，从而避免了分裂，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在全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上半年，中国南北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北方有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权；南方有孙陈战争，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陈炯明宣布取消南方护法军政府。吴佩孚趁机蛊惑人心，宣言恢复国会，制定宪法，并于同年8月16日在北京重开国会，进行制宪。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这个时机，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发动劳动立法运动。为了动员全国的劳动界起来响应这一号召，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

告》。提出要乘此制宪运动的机会，将劳动者应有的权利用宪法规定下来。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四项劳动立法原则，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其要点是：(1)要求法律上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并要求承认劳动者的国际联合；(2)要求改良经济生活和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待遇；(3)要求法律承认劳动者参加劳动管理的权利；(4)要求政府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提出了以要求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立法大纲》19条，并在《工人周刊》和全国报刊上发表，号召全国工会开展立法运动。《劳动立法大纲》公布后，各地工会纷起响应。最早响应的是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华新纱厂等工会。这些工会组织成立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和国会，要求通过《劳动立法大纲》。9月3日，还发表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宣言》。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响应制定劳工法案，于1922年8月28日致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表示了万众一心，不达到目的不止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们还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制定劳动法典。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继起通电，呼吁全国工会一致行动，并通电国会请愿。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召集土木工会、新河粤汉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代表，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议决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同盟。武汉工团联合会联合江岸京汉路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厂工会等工会团体，通电国会请愿。此外，上海、天津、济南、广州等地都在酝酿组织"劳动立法运动大同盟"。在各地劳动立法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国会议员开展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如9月3日开会招待国会议员，到会的60多名议员，大都同情劳动立法。作为北洋军阀卵翼下政治工具的国会，虽然不可能同意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但由于劳动立法运动和《劳动法大纲》的广泛宣传，劳动法在工人群众中深入人心，实际成为工人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向前发展。此外，这一运动揭露了军阀"制宪"的骗局，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

材料：

- 全国劳动大会之所闻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

材料一　全国劳动大会之所闻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今年五月一日，中国全国劳动者在广州开了个破天荒的劳动大会。听说此次大会召集时间极其匆促，其初不过由广州、上海、北方十余个工会，感受世界潮流，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发函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书记部发函之期，是在"五一"之前三星期；谁知此消息传出后，不论接到或未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欣，竟派代表与会。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各处派代表赴粤者约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百六十余人，代表工人三十余万，不可谓非我国劳动阶级一大觉悟。

此次大会，各省代表提出议案甚多。经审查委员审查结果，或归并、或注销，认为可以成立者只十余案。逐日付议，皆能仔细讨论。计议决共十案，分列于下：

（一）罢工援助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

（二）八小时工作制案（提出人同上）。

（三）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长辛店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提出）。

（四）订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唐山京奉路机务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共提出）。

（五）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湖南劳工会代表张理全、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代表苏兆征提出）。

（六）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汉口人力车夫总会代表彭大汉提出）。

（七）中国在相当期间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提出）。

（八）尊重劳动节及儆戒工界虎伥案（中国劳动同盟会沪总部代表谭竹轩提出）。

（九）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广东中国机器总工会代表邓汉兴提出）。

（十）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公众临时动议）。

以上十案，皆极重要。就中以"罢工援助"及"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两案为尤有关系。闻并决定明年在汉口举行第二次大会云。

——原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新申报》

材料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全国各工人团体均鉴：

顷接各处工会来函，主张"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志盛典，且可以联络全国工界之感情。本书记部亦认为有举行之必要，特拟就宗旨及办法列后；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派证书，如期赴会为荷！

（一）开会宗旨：

（甲）纪念"五了"节；

（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

（丙）讨论改良生活问题；

（丁）各代表提议事件。

（二）每一工团要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点：广州市。

（五）川资由各团体自备，在广州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在英界北成都路十九号本部。

——原载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申报》

材料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

一九二二年八月

一、保障政治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权，如言论、集会、结社等，为共和国家任何阶级所应享受，"临时约法"上虽亦有此规定，然自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法"之后，实际上已无形取消矣。至同盟罢工则显为法律所禁止。从而劳动界之言论与行动，已全无发展之机会。我等为脱离此种束缚计，非将此种非法命令及"刑法"中制止劳动运动之条文完全铲除不可。此外劳动者之团体契约权，亦应受法律之正式承认，俾免资本家乘劳动者之弱点，以单独契约劾夺其利益。又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亦吾人应要求法律之承认者，因无产阶级运动之意义所以重大者，即在其为国际的也。

二、改良经济生活。我等在今日无政府无法律的资本家制度之下，所受残酷的待遇，盖为世界所不经见。劳动时间由十小时至十八小时，休息期间无定。夜工超过八小时，童工女工，工作无限制。工资由资本家任意规定，毫无标准。失业救济及疾病保险等为吾人梦想所不及。凡此种种苦境，吾人应设法从速脱离。欧美各国之劳动者对于改良彼等之境遇，非已均奏凯歌耶？我等应参照西欧诸国之劳动法规，实现我劳动阶级之利益。此外，农民（不掠夺他人劳动之农民）之农产物价格，亦应以法律保障之，盖因农业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常为资本家或商人所掠夺，今应以法律规定其价格，俾勿使之降于所费劳力之下。

三、参加劳动管理。为解放劳动者并与以管理之经验计，应使其有参加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国家劳动检查局之权利。现时雇主所以毫不顾及劳动者之利益者，即缘劳动者对于关系自己之业务，无参加管理之权，因此劳动者之利益，永不能有保障与进步。设吾等能有参加管理之权，则必能明了生产与经济之情况，改良工厂管理制度，并匡正雇主之错误。一方促进劳动阶级之利益，他方则为将来无产阶级管理工厂之准备，故吾等应要求法律承认劳动者有此种参加之权。

四、劳动补习教育。现代社会之不平等，大半起于无受教育之机会。政府每年支出巨额款项，专为资产阶级办教育，至无产阶级则毫未顾及。此等不平，使我等永为彼辈之奴隶，故我等应要求政府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

以上为我等最低限度之要求，亦所应努力实现者也。

（选自《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版）

上海大学

背景介绍

上海大学是1922年春在上海创办的我党最早的干部学校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革命培养文艺战线和理论战线上的干部。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22年10月改名上海大学。改为上海大学后，设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和附属中学三个部分。于佑任为校长，后邵力子为校长，陈望道担任教务长，邓中夏担任总务长。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任弼时、沈雁冰、郑振铎、杨贤江等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李大钊同志曾在上海大学作过演讲。

上海大学的教育活动，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由理论教学、实际问题的研究、参加实际斗争三个部分组成。如社会科学系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着重于"农民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并设有"政治研究会"，每周进行一次学习和讨论。在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方面，当时上海大学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一支最出色的战斗队伍，每次反帝斗争它都是站在最前列。因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它恨之入骨。在1924年以后它曾经不断地遭受敌人的迫害，"五卅"惨案后帝国主义强占了校舍，1927年被反动派查封。

材料：

- 上海大学的沿革
- 上海大学的一些情况

材料一　上海大学的沿革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1922年至1927年间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是中共参加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2年春，校址设在上海闸北青云路，校长王理堂，校务长陈勋武，设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和附中，共有学生160余人。该校创办人本想借办学之名发财，因而学校设备简陋，师资缺乏，引起学生不满。1922年秋，学校发生学潮，经教职员和全体学生讨论，宣布驱逐校长，改组学校，恳请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并担任过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著名国民党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10月23日，东南高师正式改组成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的校长始终由于右任担任。当时担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的著名国民党人士邵力子(当时也是中共党员)，应于右任的邀请参加了上海大学的领导工作，任副校长，并兼课。1923年冬到1925年夏，在于右任离开上海期间，由邵力子任代理校长。1925年夏邵力子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后，又由行政委员会主席陈望道主持校务。1923年4月，经李大钊推荐，于右任聘请著名共产党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任上海大学校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7月，又聘请瞿秋白担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当时，于右任主要从事国民党的政治活动，不能经常到校视事。邓中夏、瞿秋白等到校后，即与在校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国民党人士一起，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确定学校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第二，改革学校的学科设置，设立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使上海大学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文科大学。第三，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任教，如陈望道为中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为学务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洪野为美术科主任、刘大白、茅盾、俞平伯、傅东华、田汉、叶楚伧、丰子恺、施存统、蔡和森、安体诚、张太雷、肖楚女、周建人、蒋光赤、杨明轩、杨贤江、侯绍裘等在各系任教。学校还设有特别讲座，曾邀请李大钊、恽代英、胡适、张继、马君武、戴季陶、吴稚晖、杨杏佛、胡汉民、章太炎等社会名流到校讲演。一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有真才实学、有革命抱负的教师队伍，为上海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2月，上海大学从闸北青云路搬迁到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新校舍，学生也由160增至400多人，后人数最多时达600多人。学校迁移到新校后，学制又作了改变，设大学部、专门部和中学部。大学部设文艺院、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等三个学院。学校之下分设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俄文、德文、法文、绘画、音乐，社会学、政治、经济、法律、史学、哲学、教育学、商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系。中学部设初中班和高中班。上海大学由原先的“弄堂大学”，变成一所学制完备的革命学府，被社会人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上海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要求学生比较广泛地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中外历史知识，并要学会研究分析现状；二是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尤其是社会学系。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学生的课外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如开设特别讲座，举办演说讲习会，设立书报流通处，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三民主义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湖波文艺研究会、春风文学会、中国孤星社、探美画会等学术团体，并创办有《上海大学周刊》、《春风文学》月刊、《孤星》旬刊、《上大附中》半月刊等刊物。

从1924年春到1925年五卅运动，在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期，上海大学师生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实际斗争，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1924年春，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师生，在上海大学创办平民学校，在上海的工人区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工人夜校，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工会、培养工运骨干。同年下半年，许多同学参加了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1925年2月，邓中夏、刘华、杨之华、郭伯和等带领学校师生参加了上海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的罢工斗争。五卅惨案的当天，上海大学约400人组成学生讲演团，分38个组在南京路一带进行反帝宣传。下午，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当场牺牲，另有13人受伤，130多人被关进老闸捕房。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学生会发表通电，宣布罢课，投入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上海大学也因此而名震全国。上大师生的革命斗争，遭到帝国主义的仇恨。6月4日，公共租界先派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搜查上海大学；继之，又派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校舍。1925年下半年，上海大学因校舍被查封，被迫由公共租界迁到闸北青云路师寿坊，建立临时校舍。这时，学校的革命师生发扬五卅运动精神，继续投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但由于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教师和进步学生相继离校，或奔赴广东革命根据地，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或参加其他革命工作，因而使上大在革命斗争中的影响和号召力较五卅运动以前有所下降，但仍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如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上大师生和工人一起，同北洋军阀的反动军队进行英勇战斗，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1927年4月1日，上海大学

又搬迁到江湾镇自建的校舍中，继续上课，并进行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于5月2日派兵进驻上海大学，武力封闭了这所革命学校。上海大学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却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其中著名的有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刘华、郭伯和、何秉彝、张琴秋、杨之华等。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材料二　上海大学的一些情况

上海大学创立于1922年10月，它的前身是私立上海文科专门学校。校址在闸北青云路(今西宝兴路)青云里，校舍只有两排座东朝西的二层楼的破旧小房子，教师和学生多半住在校外。

上海大学的创办，正值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际。我党派了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到上大，邓中夏任教务长，其他人任教授。国民党派于右任为上大校长，邵仲辉(邵力子)任总务长。由于于右任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校务时常由邵仲辉代理。当时上海大学主要有三个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何世桢；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另有美术系，只办了一段时间就停办了。

1923年上大学生人数猛增，校舍愈感拥挤，遂于次年2月间迁址到公共租界西摩路(现陕西北路)132号。迁校后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规模更大。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帝国主义强行封闭上海大学。经过上大师生的斗争，于1926年在江湾又建新校舍。1927年4月底5月初，北伐军到了上海，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突然派兵进驻江湾新校址。上大不少学生被捕，财产被抢劫一空。上海大学被迫关闭停办。

上海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办学富有创新的精神，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它先后为我党培养出许多革命骨干，成为培养革命理论干部的重要基地。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就在上海大学内代招。上大考取黄埔的学生很多。五卅运动后，上大许多优秀学生纷纷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上大师生作出了重大牺牲，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选自1983年《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6辑《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一文，作者胡允恭）

第一次工运高潮

背景介绍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不久又在北京、长沙、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帮助各地建立工人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

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13个月内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斗争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这些罢工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性质，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决心。

1922年1月12日，香港2万多名海员在中华海员总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激起工人的反抗。为声援海员工人，2月底香港全体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人数达10万人。英帝国主义大为恐慌，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和破坏工人的斗争。为争取罢工胜利，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香港，动员工人离港回穗。当回省工人步行至九龙沙田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弹压。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政府和全国工人纷纷支援香港工人。在全国工人阶级声援下，罢工坚持了56天，最后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被迫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命令，并答应增加工人工资15%—30%。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士气，全国工人运动以此为起点蓬勃开展起来。

安源路矿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有17000多工人。为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先后到安源调查情况，组织工人。在湖南党的领导下，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1万多工人冲出矿井和厂房，举行大罢工。罢工爆发后，路矿当局调来大批军警，准备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工人们进行了英勇斗争，于9月18日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13项协议，取得了罢工胜利。

开滦煤矿是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企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多次派人去开展工作，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俱乐部等组织。1922年10月23日，5万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罢工得到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工人特别是唐山工人以及学生声援。英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调集了1万余人的武装队伍，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罢工遭到失败。

材料：

- 共产党广东支部《敬告罢工海员》传单
- 开滦五矿总罢工宣言
-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对安源路矿罢工的决议

材料一　共产党广东支部
《敬告罢工海员》传单

（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

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为争生存而举行这次大罢工，凡是有良心好和平的人们，除资本家及帮助他们的走狗——官僚军阀外，没有不同情于我们的。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有人格的自觉，不愿将劳力仅仅当作货物卖出，而想把各人都取得一个有意义有兴趣的生活，就是：不被少数人利用，为之做牛马奴隶的生活；所以才与资本家宣战，实行阶级斗争。那么；我们此次轰轰烈烈的伟大举动，当酝酿与发动的时候，就算是我们得到光荣的时候了。我们的胜利，是可预期的。资本家在现代生产制度之下，筑起独占的堡垒，豢养许多的守卫，他用巧妙心思，奸狡计划，兼并了榨取了多数人的精血。但是他好像吮人血的蚊虫，他太饱了，他渐渐飞不动了。他故意在社会中筑成一道分别阶级的厚墙，墙外的人们越多，他自己就成为孤立了，他不知不觉在他自己狡狯的打算中，就掘下他自己的坟墓了。全世界的劳动同志们，将群起而收回自己的权利，不至再受将死的资本家的糟踏了。我们海员在这样世界工潮中，为此正当的要求主张，那自然是不会失败的。

不过我们还是不可疏忽，就是资本家的爪牙众多，侦探遍布。他有本事能够造作谣言，颠倒是非，欺骗我们的同志。所以以下列诸点，还要注意：

一、坚持到底。我们最后向船东提出的条件，那是体量现社会组织的情形，为争个人生存上最低限度之一种，断不可因威迫利诱而稍形退让。任何人出面调停，必须如愿相偿，方能应许。

二、团结一致。中国人办事没有五分钟的热度，外国人常常用这种话讥诮我们，就是形容我们不能团结的意思。俗语说得好："众擎易举，一木难支。"我们劳动者能够战胜资本家的优点，就是仗着人数多，合起群众能有阶级觉悟，若使不能团结行动，资本家就不难用种种方法，把你各个击破。

三、严守秩序。我们由长河大海、惊涛骇浪的生活中，暂时来住陆地。我们应该想想，这岂不是资本家逼我而成的吗？我们当然有一种愤恨填在胸中，但是这样愤恨，都要针向我们的仇敌发泄，不要对于帮助我们的人们，稍有得罪。所以我们的言语行动，也要守着一个范围，就是很奋敏的很严正的采取一些文明手段，去要求帮助我们的朋友，对待仇视我们的敌人。

四、注重自治。我们到省城的不下数千人，承各界同志的帮助招待，自然是感谢不尽。我们要晓得仇敌的侦探是很多，他最会的是造作谣言，挑拨是非。他冒充我们海员，来混在团体中，故意作成种种不名誉的事，冀图破坏我们团体的，恐怕也是难免的。我们因此上凡是起居饮食，一切细微动作，都要加一层的注意。不然，他们就要说我们程度不毂的话头了。我们应该随时想想，我们一切的动作，果有可以被人谈论的地方么？没有么？

我们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应该抖擞精神，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我们晓得资本家已到运命的末日了，但是也要晓得将熄的灯火，他有回光返照的幻象，我们更是应该鼓起百倍的勇气，防备他回光返照样的一大打击。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海员同志们啦！快快共同一致的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以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啊。

材料二　开滦五矿总罢工宣言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唐山快函云：开滦煤矿，为东亚数一数二之产煤区域，矿域共分林西、马家沟、赵各庄、秦皇岛、唐山等五处，约有工人三万余人。每年获利数千万。自庚子之役，大好矿产，即被英、比二国攫去，言之痛心。该矿务局对待工人，异常苛刻，工人早有与资本家奋斗之决心。近年来见各处罢工甚为流行，于是该矿工人暗中结成一气，进行待遇改良、工资加增之运动。不料矿局对于工人要求，不独毫不采纳，且目为破坏治安，并指为乱党，乃派警察用武力压迫，工人被压不过，于二十三日早晨，实行五矿总罢工，发出宣言，并提出要求条件六则，非达到目的不止云。兹照录罢工宣言及要求条件如下：

全国工友们！同胞们！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矿务局被压迫的苦工人，现竟被洋资本家视若匪徒，昨日无故任意在林西扣留我们六名代表。在局中，我们原来是酷爱和平，不愿铤而走险。谁料洋资本家，这样故意来挑衅我们，我们逼迫得万不得已，才于今日（二十三日）举行这悲惨、最后的罢工手段。工友们！同胞们！开滦矿务局平时对待工人，不说没奴隶的身价，连一匹骡马尚比不上呢？往往井下发生了危险，洋人只问死伤了多少骡马，人是不介意的。因一匹骡马死了价值二三百元，一"头"工人苦命，不过仅给百元就是了。工人因公受伤，就立刻逐出局外去，不顾你的死活。工人伤牲口，不独受罚，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其余别些污辱我们工人人格，草菅我们工人性命事实，是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用言词也是说不出来的。真是人间地狱呵！现在我们正在打起精神，拼命奋斗，不达到圆满目的不止。望全国工友们，同胞们，快快来援助呵。

条件：

（一）请求加薪分为三等：（甲）十五元以下者必加三成；（乙）十五元以上者必加二成；（丙）五十元以上者必加

一成。

(二)工人每年年底,应照庚子条约给一月工金。

(三)工人应在一月间给四星期(日)之休息,年节及庆贺日等亦停止工作,亦照庚子条约发给工薪。

(四)凡工匠煤条及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待遇。工人每月工资十二元者,应享此条件。

(五)凡工人在局工作,有作二十五年者,应发给养老费,按照原薪发给;倘无大过,不得无故开革。

(六)凡工人因工受伤,应照给工资。因工致命者,应发给体恤金。最少照原薪计算,补至五年为满期,并须一次补足。

(原载1922年10月28日《大公报》)

材料三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对安源路矿罢工的议决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第八次董事临时会,到会者:盛泽臣君兼代表贺得霖君,傅筱庵君,刘襄孙君,沈联芳君,监察左子曈君兼代表孙会长,邵子愉君。……

经理函,上月接萍矿李矿长舒副矿长寒勘两电,报告窿工处工人罢工。正核办间,据该矿长函称,此次路矿罢工风潮原因:本年一月有醴陵人李隆郅来安源设立路矿工人俱乐部,呈经县署批准立案。现萧镇守使有取销该俱乐部之举,该俱乐部于本月十一日分函路矿两局,要求三条,首重由两局陈请官厅出示保护。其时正值粤汉罢工风潮已起,不得已于十三晚将三条完全答复。又料十四日又复罢工,旋由该俱乐部送来要求十五条,限日答复,深恐酿成暴动,当即报告镇守使县知事派兵弹压保护,并由旅长与该俱乐部代表先商保全抽水打风电机以保产业,经许久曲折,始有保全之把握。商会境绅调停无效,十七日突有工人纷来电机锅炉房,驱逐工人,硬息炉火。当由旅长弹压,得保护火未熄。路矿两局再四熟商,现象日迫,愈延愈坏。萧总司令、路局正副局长亦均电嘱和平解决,不得已由两局各派代表随同绅商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郅磋商,吞敝唇焦,至十七夜始商定十三条,限十八日九时答复。两局郑重会商,如约再示弱,不如约则决裂。决裂之后,路矿产业必不能保,事到危急,与其坚持致令全体败坏,毋宁示弱以保产业,将来或尚有办法。不得已于十八日午刻始与订约,十九日早照常开工。惟订此条件后,姑不论工资加多,而此后各工程诸多窒碍,实难应付,事已如此,不得不速图善后。寿铨衰朽不堪,修泰才识短浅,均已计穷力竭,断难再负重任,特乞转请董事两位亲临萍矿察看保存之产业,主持善后之办法,并请速即选派正副矿长来此接替,切实整顿等语。查核协定十三条,其间条款殊觉宽假,然事急治标,容有不得不然之势。嗣后究应如何对付之处,照抄条件送请核夺,示遵。

公议:查核所订十三条,多所迁就,实属窒碍难行,于公司前途损害殊大,本会断难承认,应仍责成该矿长等设法挽回,勿稍诿卸。即请经理查照饬遵。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青年团的建设,以适应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局和临时团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知,说明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运动"。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地区的代表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等25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了这次大会。会期选择在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开幕式邀请了正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及广东各界来宾1500人参加。张太雷致开幕词,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发表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还有10多位代表和来宾发言,大会隆重热烈。

这次代表大会共开了6天,施存统作了临时中央的情况报告,广州、北京、长沙、南京等地的代表报告了本地区团的工作,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6个决议案。纲领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为在中国建立"初期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团章规定"凡15岁以上、28岁以下的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最后,选举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担任书记。

材料: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 谭平山大会前夕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

材料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

（一九二二年五月）

在最近十年间的世界情形，完全为欧美资本帝国主义所威胁。这可惊可怕的欧美资本主义大企业日益扩张，其出产品的大部分并不销售在欧美自己的国内，而输出于欧美以外的国家。

结果，每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想日日扩张自己的市场，以销售自己国家过剩的出产品，一方面又从欧美以外的消费国中收买原料及半制品。因为要不断的争夺及保护这些市场，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弱小民族就不得不用武装的侵略和竞争；现今他们竞争最烈的大市场就是亚洲。因此印度、中国和高丽等国就特别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1914年到1918年惊天动地的世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完全由于英、法、德、奥互相争夺市场。战争的结果，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了德、奥、保加利亚的经济基础，使德、奥、保加利亚成为英、法的殖民地，并且把世界的经济秩序完全破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先后在巴黎、华盛顿及日诺瓦会议中貌为和平，心实争夺宰割世界。此等会议中互相冲突的暗礁，又将为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导火线。

日、美战争既为最近期间必不可免的趋势，而英、法冲突又将相见于疆场，所以将来第二次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爆发起来，其猛烈凶残必较新近完结的大战为尤甚。

华盛顿和日诺瓦会议，不过为苟延将来必不可免的大战时期之一种方法，一方面彼此藉此稍延期间充分作战争的准备，他方面又可在此稍延期间尽量吸收弱小国和殖民地底精液如原料劳力等，以补偿其在大战中的损失，并准备第二次大战的经济基础。

上次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日本对于东方各民族的侵略愈加厉害，如英国侵略印度，每年约有百万印度劳苦人民死于饥饿，日本侵略高丽，更是一口吸收其所有精液一滴不漏。

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略中国又另取一种形势，中国最足为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贪婪掠夺的写照。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以中国有广大的肥美土地，多量的贱价原料和多数的消费人口是一块肥美之肉，各想夺取比较他国更优越的权利，遂至互相争夺，而造成中国现今在国际上的特殊状况。

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支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于是列强更藉为口实而谋瓜分中国或共管中国；所以中国国内的特殊状况，也是国际资本势力造成的。

中国的分裂和内乱既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植，加之又有一班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及最近将来更能把中国一切的经济生命尽量卖给外国资本家，例如种种权利之割让，最廉价的原料之输出，最廉价的劳力之供给等都是。

国际资本的压迫日甚一日，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之失业和贫困也就跟著日甚一日。他方面，大都会里又产生了欧化的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也采取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形式用资本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

在最近的中国，这种欧化的资产阶级虽有相当的势力仍未得着充分发展的机会；而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还是农人、小商人和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知识者等小资产阶级。

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义和团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民心情狂乱而反动的表现。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起来直接反抗封建帝政以铲除革新障碍，间接革新内政以反抗国际资本帝国势力的外患之表现。

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即是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这种革命实现之迟速，乃依世界状况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之强弱而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

义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然这种奋斗的道路并非直径的，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规定下列现时的方针，以期达到最后的目的。

政治方面

(一)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二)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

经济方面

(一)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六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工人，每日不得过八小时，但应争得平均的工值；禁止十二岁以下的青年作工。(二)每星期至少应有连续三十六小时的休息；一切节日停止工作。(三)禁止厂主与艺徒私自缔结契约，应制定保护艺徒的法律。(四)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五)男女工人待遇平等，女子在分娩期两月中应停止工作，并须照常给发工资。

教育方面

(一)关于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为所在地方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并发刊通俗的日报、月报、小册子。对于青年农人亦应特别注意。又应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受普通教育。

(二)关于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其方法或集会讲演，或刊行出版物和小册子，并特别讲述中国政治情形及其他种种情形，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

(三)关于学校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学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中国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反抗各种迷惑青年阻损青年思想进步之政治或宗教运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承认对于解放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为世界问题，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非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革命不可。

——原载《先驱》第八号

材料二　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谭平山

今日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日子，并且同时是纪念马克思先生，承各界来宾拨冗光临指导一切，兄弟谨代表敝团同人答谢诸君盛意。兄弟更于感谢之外，还有一事希望于诸君的，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但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全社会的人们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的，而且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但马氏学说实在高深得很，我们团体的目的志在参加实际运动，虽不是专尚高谈学理，但我们想改造社会，应该以现实社会做对象，故不能不先经过研究那一个阶级。但我们现在团体的分子对于马氏学说，多是属于初步研究的，故这要对于马氏学说有兴味的人，或研究有素的人，都加入本团，来指导本团，或时时和本团分子共同讨论，这是我们同人所希望的。

又青年团之设不自今日始，这也须向各位声明的。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哪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各省区虽没达解散的目的，但于进行上发生种种的困难，故去年十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并且设七种委员会，分途联络，研究与实行并重，这是本团改组的目的。我当时受了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十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人数已经达一百四十人，到现在已有五百余人。至佛山、肇庆、梧州、南宁、汕头、琼州等，均派有人组织分团。这是本团成立的经过。至各省成立的已有十一区，将来正式中央机关设于上海，且决定于四月间开全国大会，且选派全国代表出席于第三国际。

至本团的进行计划，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凡属团员都要负有一极大的责任，而且一个团员，同时要担负研究评议执行三种责任。本团所出版的青年周刊于二期所登载的组织大纲表，虽没有详细说明，但这边的意思，现在可略加说明：这个组织大纲表、评议、执行，同隶属于执行委员会，同时受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凡属团员，必须加入一种委员会以上，又要在执行部担任一种任务。所有执行大权，集中于执行委员会。故本团之精神，是主张中央集权的。但执行委员会是由各委员会委员长和执行部各部

部长，以及全体大会所选举出之书记共同组织而成，纯属于委员制。故本团组织，评议与执行不分离，所以无议会制度的弊病。采中央集权制，所以无地方分权的弊病。一方又采委员制，所以无少数专制的弊病。更有一层，本团虽以实行改造为目的，但我们也要经过一种研究工夫。所以要设立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供团员的讨论，而且人人都有提出问题及解决的职责，所以无普通社团随意挂名的弊病。至本团已经成立的，有青年周刊，青年剧社，劳动通讯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讲演队、巡回影画等。而讨论会、通讯、图书馆，日间亦可成立，这也可以报告的。但我们既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改造社会的事业，并非少数人能办得了的，要以社会全体共同担任这个责任，方易解决，故希望各位都要加入这种社会运动，并须人人都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这是我们除感谢今日到会诸君的盛意之外，所希望于诸君的。

（原载《青年周刊》第四号，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批判“好人政府”的主张

背景介绍

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等人在1922年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连年混战，使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谋求中国的出路。胡适、蔡元培、梁漱冥、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于1922年5月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应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认为，“好人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的方面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及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他们提出了今后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要求：要有一个“宪正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的“好人”（优秀分子）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组织“好人政府”，才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主张是：南北议和，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裁兵，裁官，财政公开，改良选举制度，实行直接选举等。1922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改组内阁，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总统黎元洪任命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罗文干、汤尔和、顾维均等入阁，分任财政、教育、外交总长。王、罗、汤、顾等人是亦学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属于国内的任何党派，被认为是当时的“好人”，这届政府也被标榜为“好人政府”。胡适等曾对此大加捧场。而实际上，它是听命于吴佩孚的“洛阳派政府”，并遭到了曹锟“保定派”的反对。这届“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到11月下旬便宣告破产。这种“好人政府”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认为在中国不需要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只要成立一个由“好人”组阁的“好人政府”，中国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富强起来。这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道路。这种“好人政府”的主张，遭到了共产党人的严厉批驳。

材料：

- 共产党人反对“好人政府”的斗争
-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
- 评“好人”政府
-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

材料一　共产党人反对“好人政治”的斗争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

当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

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制〕中国的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障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

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选自《我的回忆》，载《"二大""三大"前后》，作者：张国焘）

材料二　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2 年 5 月 14 日）

胡适等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

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的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象前三年的分脏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谘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1922年5月13日

（《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出版。）

材料三　评“好人”政府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好人”们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好政府”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之中“好人”们在北方政治舞台上活动了什么成绩，我们没有看见；只晓得闹穷的仍然闹穷，索薪的照常索薪，甚至于“好人”周刊的记者胡博士也在大挥其“政笔”，硬说王宠惠“恋栈”了！

最近更令我们怀疑的，就是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公然要行公事到内务部，要取缔新思想，并要逮捕“好人”——胡适之先生了！幸而这事经过了“好人”为政的阁议，否决了；不然，“好人”就要被“好人”为政的政府逮捕，岂不冤枉死了“好人”么？

原载《武汉星期评论》第53号1922年11月25日

材料四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我们看他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却使我们非常失望，且更使我们的革命主张得到坚确的反证。

有人说，胡适提倡白话诗，有人去尝试，等到他提倡手枪炸弹，却没有人去干了。其实有没有人去干，那另是一个问题，我们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

在《努力》第四期中，有人问他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设好政府呢？他的答案是：“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我们真不解一方要在恶基础上“努力”建设好“政府”，一方认定非先破坏不可，这个工怎样分法？怎样能殊途同归？除非胡先生先站在两者之间袖手旁观，等到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他再来领着“殊途同归”。

胡先生是以“打图起屋”的人自居，而以“烧房子”的人待人的。但是房子还没真烧，他却要告人先来做“收拾颓椽剩瓦”的事，自己以为可以在那里打图好备起屋了。果然他所打的图是烧了房子后的新图，那还可听他在那里把图自玩，如是一张好图，尤可供大家的研究。只是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了，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胡先生先迷信“公开的南北和会”，继迷信公开的“各省会议”会能解决时局，实现统一。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豁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如果人民象胡先生所说，“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竟不争了，然而各大军阀又肯容忍么？不容忍，还不是一样地要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办法么？与其这样弯曲(但这还是我们替胡先生推论如此，他并没有这样坚决主张)，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这不又是胡先生缺乏革命精神的明证么？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

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却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只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

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胡先生偏认在此列强均势之下有利可图，漠视北京东交民巷所牵线的英美派外交家，竟认其为“好人”。信美国政治家(即美国帝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可亲，特跑到代新银行团游说，鼓吹宪期借款的美顾问芮恩施家讨论宪法问题。张作霖明明已是日本的爪牙，英美的政府又正向直系军阀送秋波了，而胡先生竟还赞成“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的主张，还以为这是“最大胆的”计划。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干”的一声，连环解了！这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努力歌”，但是我们竟不明白这位哲学教授指示人“干”的地方究在何处下手？然而他却说了“从下手处下手”！这样的笼统话，能令我们满意么？

胡先生又曾宣誓说“各行其是，各司其事”，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

因此，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如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府，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也是胡先生说的，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然而绕了这些道儿，迷惑了民众多时，这是何等的不经济！

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非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

(原载《少年》第 6 号。署名：飞飞)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提出一个当前的具体的革命纲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战斗。这个任务便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高君宇、邓中夏等 12 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确定了党的纲领与政策。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等 9 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分析了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指出中国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只有与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取得胜利。宣言分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宣言根据中国社会性质指出中国在现阶段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获得革命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和无产阶级结盟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根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宣言明确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大会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中国共产党"二大"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并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材料：

- 张国焘：我在"二大"前后
- 追记"二大"
- "二大"的经过

材料一　张国焘：我在"二大"前后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俟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

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的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选自《我的回忆》，载《"二大"
"三大"前后》，作者：张国焘）

材料二　追记"二大"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邓培、高君宇等人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远东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问题。这次会议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理解，从而帮助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发展党、团组织，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同时开展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制定出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以推动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对革命斗争的领导。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于 1922 年 7 月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烬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等 12 人。会议由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

这次会议鉴于一大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只召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余时间则进行分组讨论。在这次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作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施存统作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 9 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的建设经验，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作了具体规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因此"（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章程，对党的各级组织机构的任务和活动，对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妇女和少年运动等项决议案，明确指出党不仅要领导他们进行经济斗争，还必须领导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而斗争。大会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 5 人为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向警予为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张国焘任组织部长，向警予任妇女部长。

二大的重要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产生了第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首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标志着党的创立任务的完成。大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指出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只是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并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此外，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对工农联盟问题，以及建立工农政权等问题，也都还没有认识。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三 "二大"的经过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向警予、项英，共12人。会议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

"二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七弄30号）李达寓所召开。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央局向大会报告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并阐明了党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现阶段应采取的纲领和策略。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现状，当前还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现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那时，资产阶级能得到发展的机会，无产阶级也可以得到一些权利和自由，并进一步成长壮大起来，有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够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张国焘、施存统也分别就出席远东民族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党的"二大"鉴于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接受了"一大"遭受侵袭的教训，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会议决定以小型的分组活动为主，全体会议的次数不必过多。小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中，部分上海的党员也参加了小组活动。有必要召开全体会议时，也必须每次会议都变换会址，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

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在英租界的另一个地方举行的。会议首先讨论一年来党的工作，肯定了党在发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批准了中央局的工作报告。会议接着讨论了党在现阶段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多数代表认识到中国当前不可能实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问：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现在我们却要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使敌人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一个矛盾吗？大多数代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方针与党的根本目标是不矛盾的，因为进行民主革命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固然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工农群众同样可以得到一些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加强本阶级的力量和地位，这种暂时的联合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会议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大会宣言，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并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有关文件。

7月23日，"二大"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在英租界举行，但又变换了一个会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九个决议案，即《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C·P·C"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会议决定创办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负责主编。最后，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担任党中央书记。"二大"完成了预定议程而胜利闭幕。

（选自《七十年史话》）

西湖会议

背景介绍

共产国际为了贯彻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并寻求中国共产党同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合作，于1921年6月派马林来华指导工作。1921年12月，马林赴广西桂林会见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为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随后，马林又通过在广东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确认国民党是中共可以合作的真正的革命势力，根据国共两党的实

力和孙中山的意向，断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合作唯一的形式。为此，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最初不赞成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的建议。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明确反对马林的建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联合战线。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又确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1922年7月上旬，马林正式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报告，迅速得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采纳，并责成马林再次赴华执行促成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使命。7月1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中共中央必须立即由上海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间，正值马林第二次来华前夕，共产国际作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显然，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联合战线的决议精神，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仍不相符。因为党的二大赞成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而共产国际则主张进行“党内合作”。

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在马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张太雷7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他指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马林还认为，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并要求中共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讨论中，大多数中央委员起初反对马林的建议，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也不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精神。通过马林的耐心解释与说服工作，多数中央委员为尊重共产国际纪律，勉强接受了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对马林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也作了部分修正。会议只决定部分共产党员，即中共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会议对张国焘为首的“小团体”活动，提出了批评。张国焘在党的二大以后，企图使劳动运动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做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造成党的不团结，使之“分裂成了两派”，会议“取消了那个小团体”。

为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大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向导》周报于1922年9月13日创刊，蔡和森担任主编。

西湖会议标志着中共政治主张的重大改变，即同国民党合作形式由“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这次会议部分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不愿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左”倾观点，为党的三大确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材料：

·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

·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党内合作”的不同意见

材料一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贯主张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革命分子结盟，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排斥其他党派的方针是不妥当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的决议，促使马林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党派的情况。为了邀请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团体国民党派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和阶级基础，马林亲自同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了联络和接触，并于1921年冬起程去华南访问，直接了解了孙中山和陈炯明，分别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同时，他还间接了解了吴佩孚。通过这些直接和间接的考察和了解，马林对孙中山、陈炯明和吴佩孚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他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比甘地更有战斗性；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吴佩孚则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孙中山的主要敌人。

马林在中国南方访问期间，通过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调查研究和对各个派系力量的考察分析，认为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也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说：“在华南访问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对于国民党的地位和可能性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印象，海员罢工事件，对罢工的支

持，对我当时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华南访问回来后，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促使他们重视群众运动，并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和国民党人一道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这样，马林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可以合作的对象，提出了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国民革命的主张。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党内合作”的不同意见

1922年3月底，马林离京赴沪，分别与国共两党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结果是国民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马林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中，一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他认为“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不过“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只希望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对马林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表示坚决反对。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书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陈述了反对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的6点理由：

第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第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第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第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到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第五，国民党孙中山派向来过于排斥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第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陈独秀在信中要求维经斯基当共产国际讨论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时，代为陈述上面的6点理由。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向导》周报创刊

背景介绍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决定停办《共产党》月刊，另办全国性的政治机关报，由蔡和森负责筹办。大会以后，党曾拟在北京办《远东日报》。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环境和我党的实际情况，办周报为宜。1922年8月，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决定创办一种周报。另一位国际代表吴延康（魏经斯基）也提出建议，主张把刊物的名称定为《向导》，因为我们党创办的这个刊物，目的是要领导国民革命，“向导”就是领导者的意思。因此，会议正式决定，我党第一个中央机关报的名称为《向导》，由蔡和森负责主编。

材料：

-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 敬告本报读者
- 回忆《向导》周报
- 《向导》周报在江西的传播

材料一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

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规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载《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材料二 敬告本报读者

《向导》周报 同人

亲爱的读者诸君！虽然你们付给本报的代价已是不少，但是杯水车薪，本报仍难借以维持。本报出版才十五期，支出不下一千三百元，收入却只一百五十元。加之邮局往往没收，使本报受意外损失。为本报的基础能够稳固起见，为本报能够迅速发展起见，都非有读者诸君的特别赞助不可。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多半赞成本报的主张，和我们一样的爱护本报，所以我们敢同诸君要求援助。而且这里有许多理由足够证明读者诸君有援助本报之必要。

第一个理由，就是《向导》有一种不可磨灭的价值。象《向导》这样有系统的批评政治，这样有独到的见解，这样有坚定的主张，在中国要算第一次发现。象“向导”这样拥护真理，不断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在中国也算第一次发现。他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他是中国苦同胞的忠实好友，他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不可少的先锋，他的影响现已布满全国，他将来更能完成他的革命任务，在中国革命史上占重要位置。所以这样一个周报，实在值得读者的援助。

第二个理由，因为《向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共产党——穷党——与著述机关绝对不同，因为他由出版物得来的代价仍然用在宣传事业上，为发展他的宣传事业起见，我们不但要求读者出较高的代价，还要求读者特别赞助。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多半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所以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因为赞助本报，一方虽然是赞助共产党的宣传事业，一方读者自己也可以不断的看到共产党的各种出版物。还有一层，现在本报既然代表中国共产党赞助国民革命运动，一班国家主张者和革命的民主派更应该与我们以充分的赞助。

第三个理由，因为敌人压迫本报。本报既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所以北京政府，军阀，外国侵略家莫不压迫本报。我们的敌人既然压迫本报，所以本报的好友便须极力加以赞助。

第四个理由，因为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象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倘若读者赞助本报，便能使共产党的金钱用在别的实际运动上，使他的运动更易发展，不啻就是赞助中国的革命。

赞助本报的方法如下：

（一）以金钱捐助本报。如有捐助本报金钱者，以三分邮票起码，寄交发行通讯处。本报接到钱或邮票后，即发一收据；如在相当期间之后，没有接到收据，即请来函质问。

（二）请直接向发行通讯处定阅本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各省向上海发行通讯处定阅；黄河流域和关外各省向北京发行通讯处定阅。

（三）为本报宣传，务使本报销路推广，定阅人数增加，并自动的劝人捐助本报。

亲爱的读者们！我们相信你们是有赞助我们的力量的；就是很小的捐助，都是我们所欢迎的。诸君赞助本报的意义，便是实际赞助革命的表示。我们固然欢迎诸君的赞助，尤想借此测度诸君对于革命的同情呢！

（《向导》周报第十五期，1922年12月27日）

材料三　回忆《向导》周报

党的"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出版发行中央机关政治刊物《向导》周报。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他俩给《向导》写的文章最多。李大钊、张太雷、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等也经常写一些文章，后来写文章的还有瞿秋白、彭述之、赵世炎、恽代英等。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向导》上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向导》的编辑人员很少，"三大"以后，毛泽东同志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向导》编辑工作，并且写过一些文章。

我那时在中共江浙区委工作，因党中央在上海的人手不够，中央就叫我兼管《向导》的出版发行工作。

当时我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在一家小印刷厂当排字工人，每天半日做排字工作，半日做党的工作。这家小印刷厂在公共租界梅白格路（今新昌路），叫光明印刷厂。《向导》就是利用我的这种工作关系在这家印刷厂里排印出版的。老板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因为我们给他的钱多一些，他见有利可图就愿意干，至于印什么内容，他从不过问，更不必担心他去外面告密。

我和该厂的五、六个青年工人一起参加过很多期《向导》等报刊的排印工作，他们都是党外的人。

每期的稿子是由我到陈独秀、蔡和森的住处去取。我也到过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去拿稿件。那时，毛主席和杨开慧住在莫尔明路的一所两底两层楼房，他们的大孩子毛岸英刚满一周岁。他们住在楼下。楼上住着蔡和森向警予夫妇。楼下的前厢房不住人，毛主席常在这里写文章，写好的文章由杨开慧帮助抄写。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们的住处不远，所以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和蔡和森他们两家人。

每期排印好的《向导》，都存放在厂里我睡觉的一间小屋子里，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后来，老板破了产把厂子卖掉，光明印刷厂从此也就关闭了。但《向导》的印刷出版并没有就此停顿，很快又改在明星印刷所排印，也是由我负责与这家老板联系。明星印刷所比光明印刷厂大一些，距离很近，在梅白格路西福海里，老板叫徐上珍，上海人，比我小几岁，也会排字印刷，是党外人士，与我的关系很好。一九二七年我在杭州被捕时，徐上珍曾出钱营救过我，但未能成功。一九二九年他因印《向导》等刊物而被捕，罚了很多钱，还判过二、三年徒刑。明星印刷所除印《向导》外，还印《中国青年》、《解放周报》等刊物。徐上珍对我们党的帮助很大，明星印刷所后来被查封，徐上珍就到河南一家印刷厂去了。

我们还在西福海里对面的三德里，租赁了一间空屋，明星印刷所印就的书刊，都存放在那里。

《向导》在国内传播很广。起初发行数量不大，大约在一千份左右，每期按规定数目送到指定的地点，不收费。我记得当时在上海、武汉、广州、北京和杭州等地发行。北京的《向导》是由我们派专人经常带过去。杭州的《向导》每期发行二百份，有两个专人拿到杭州去卖，其中有一个叫徐洁身，浙江诸暨人，是个印刷工人，家里很穷，以卖《向导》为生，他从我这里免费领去再拿到杭州去卖，当了义务推销员。他因卖《向导》曾先后三次被捕。第一次被军阀逮捕出狱后，我介绍他入了党，第三次是被国民党抓去的，我先是用钱把他营救出来，以后又不断接济他。

《向导》都是由我经手发出去的。由于当时官办的邮政系统不给邮递这类印刷品，所以我们就通过民办邮政，叫民信局，将《向导》发往各地。再后，按不同份数分发各机关、团体。"三大"前后，中共中央机关一度迁至广州，《向导》便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公开发行。

我是最早负责《向导》出版发行工作的，干了大约两年时间，当时有一个湖南青年，名字已记不起来，帮助我作送稿、发行等工作，以后又改换张伯简帮助我，他也是湖南人，是个知识分子，我离开《向导》以后，由张伯简接替我的工作，后来他生肺病不幸过早地去世了。

《向导》的报头题字，我是通过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熟人写的，我找到他以后，他高兴地当即就写好了"向导"二字，他是党外人士，小说作家，弟兄两个字写的都很漂亮，可惜现在名字忘记了。《中国青年》的封面题字是邓中夏的手笔，编辑是恽代英和萧楚女。

办《向导》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马林从共产国际拿出钱办的。我们自己的党费非常少。

当时《向导》在国内影响很大，是党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战斗的武器，特别是许多革命青年，争着看《向导》，受到的教育和鼓舞也是很大的。在黑暗的旧中国，《向导》犹如一盏明灯，给那些向往进步、追求真理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向导》真正起到了革命向导的作用。

（作者：徐梅坤，选自《"二大""三大"前后》）

材料四　《向导》周报在江西的传播

《向导》周报——这份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在大革命时期，犹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它在向人民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进行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方面曾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江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向导》在江西传播的渠道和方式

《向导》在江西的传播，是从"南昌文化书社"和"南昌明星书社"开始的。

1922 年 9 月，由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 15 个进步青年联名发起，在南昌百花洲畔沈文肃公祠，开办了“南昌文化书社”，年方 23 岁的方志敏任经理。书社公开销售一般文化读本，秘密销售《向导》、《先驱》等革命书籍和刊物，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和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1923 年书社遭军阀查封。

1924 年 6 月，中共江西党团组织在南昌西湖横街设立“南昌明星书社”，由北京派回省进行革命活动的曾天宇任经理，继续秘密销售《向导》等刊物。

1923 年 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后改为南昌地方团)成立后，为扩大《向导》在江西的发行面，通过团南昌、九江、吉安地方组织，在南昌、九江、吉安建立了发行网点，设书报经销处或流通处。

《向导》周报传往江西，主要是通过一些同志从总发行所捎带或从邮局邮寄而来。一般邮寄某商号或邮局某职员代转，分内外两层装，内外地址和收信人亦不同，以避免检查。后来，有些地方可直接邮寄，如寄往吉安的刊物就曾直接寄吉安第七师范宋大勋(团吉安特支书记)和其继任郭化非收。有时因情况变化或为稳妥起见，临时改变通信地点或换用信封和笔迹。

在上海等地加入中共组织的江西籍青年学生和革命者，不断将《向导》等进步书刊寄给南昌、吉安、赣州等地的同学、同事、亲友，并利用回乡之机，带回《向导》、《新青年》等，在群众中传阅。如吉安县在上海大学学习的罗石冰、曾延生，南康县在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朱由铿，永新县在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习的刘真、刘作述、王怀，兴国县在黄埔军校工作的陈奇涵和吉安县在赣州工作的肖韶等，都主动捎寄、传播《向导》，积极宣传马列主义。

《向导》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由党团中央赠送。《向导》周报曾刊登启事：“凡工人团体、学生团体、各地公众图书馆、阅报室及一切政治团体要看本报，望将地址开来，本报按期送阅一分。”南昌地方团为扩大宣传面，曾建议团中央对各县县立高级小学及中学赠阅一份《向导》、《中国青年》。

二是党团组织订阅。南昌地方团要求每个支部购下列刊物：(1)《向导》；(2)《新青年》；(3)《科学社会主义》。团九江特支报告说他们订了二三份。

三是通过各地书店、经销处、流通处等销售(开始时是秘密销售，后转为公开销售)。

经销书店有南昌的文化书社、明星书社，吉安的吉光书店等。当时的历史文献对此作了如下记述：

据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记载：设书报经理处或流通处若干处，于各校同志负经理之责，专售关于主义的杂志、报纸及丛书(如《向导》、《中国青年》等)。

团吉安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称，他们将《向导》等书报，指定专人负责，向各团体发售，还分配到各支部去代售。

团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说：《中国青年》、《向导》都能在九江公开出售购买，故在各校找比较靠得住的学生，在该校设分销处。

二、《向导》对江西革命运动的反映和指导

《向导》周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非常关注各地的革命运动。它发表了许多反映江西革命斗争的文章，指导江西革命斗争的开展。

《向导》第 3 期为江西人民反对军阀蔡成勋的斗争发表蔡和森的评论《勖江西人民》，指出：“现在江西人民的需要，是在将运动的质量立刻扩大起来，运动的群众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体，’向着他们一起开火起来！”

1923 年 9 月，江西乐平马家村农民抗税，被县知事捕杀 50 余人，焚烧民房 300 余栋，3000 余人流离失所，投诉无门，《向导》第 41 期为此发表章龙的文章，强烈抨击军阀贪横、酷吏恣虐、法律无灵，指出“农民革命的需要是很迫切的”问题。

1924 年，九江日清公司大班佐藤唆使其走狗袁阿发安加罪名，推工人刘财明下江淹毙，群情激愤，5 月 30 日码头工人全体罢工，《向导》周报第 68 期全文登载《九江码头工会罢工宣言》，揭露其事实真相，吁请各界的正义声援。

1925 年，江西民众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燕腾热烈之时，军阀方本仁躬受英日帝国主义收买，由灰色军阀一变而为白色恐怖将军，《向导》第 133 期发表了米流金的文章《方本仁媚外残民》，以激愤的语调历数了其剥削搜刮江西民众，妄兴大狱，逮捕、通缉革命志士的罪行，揭露方本仁“摧残民众以献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帮助江西人民认清方本仁的反动本质。

1925 年 9 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驻军驱使矿警武力封闭，捕去 40 余人，遭严刑拷打或武力饿困，俱乐部主任黄静原等被打死，路矿 5000 工人被开除。《向导》周报第 137 期为此发表罗夫的评论文章《安源工人之惨劫》，指出：“安源工人俱乐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军阀所造成的政治压迫下被封闭的”。“安源工人从这一次严重的牺牲中应当得着一个新的教训：没有得到整个的政治胜利以前，一切和平的建设事业，都会保持不住，而非一刻不懈的从事政治争斗不可。”

《向导》周报对江西革命运动所发表的还有《日趋紧迫的江西》、《孙传芳对赣之一箭双雕》、《悼赵醒侬同志》、《九江陷落与天津会议》等十多篇文章。

江西的赵醒侬、袁玉冰等革命者也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文章。

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言词犀利，切中时弊，正确分析了江西革命运动的形势，指出了革命的方向，以无可辨驳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江西剥削搜刮人民、镇压工农运动、屠杀人民和革命志士的罪行，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沉重打击。难怪军阀陈炯明要对《向导》实行没收和查禁，江西两书社亦因发行《向导》、传播革命思想而遭查封。

三、《向导》周报对江西革命运动的影响和作用

《向导》周报在江西的传播，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革命者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在江西传播马列主义，而《向导》是其重要媒介，通过《向导》，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中央的声音、国内外形势和各地革命运动情况传播到江西党团组织和民众中去。这种媒介作用，在江西党团组织建立前尤为重要。

《向导》周报作为党中央的舆论工具，在江西的传播，扩大了革命思想在江西民众中的影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阵地，《向导》不仅在江西党团组织中传阅，在学校、机关、团体、工厂中亦拥有不少读者。

《向导》周报在江西的传播，给沉沉黑夜中的江西送来一线光明，将江西民众从混沌、麻木中唤醒，使江西民众逐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江西革命斗争的实践。

《向导》在江西传播的结果，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团南昌、九江、吉安等地方组织经常向团中央报告《向导》发行、学习、宣传情况，并要求和督查团员、学生阅读、研讨《向导》，在宣传教育、组织训练、考察同志等工作上，都把学习、研究《向导》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向导》等，以马列主义指导革命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团的队伍。1923年1月，南昌地方团第一批有7名团员，到1926年5月，发展到147人。吉安、九江等地团组织亦有不同程度发展。在此基础上，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团员转为党员。1924年5月南昌建党以来至1927年7月《向导》周报停刊时，中共江西省委拥有党员5100多名。

事实充分证明，《向导》周报在江西的传播，对于推动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选自《党史文苑》94年2期，作者：宋允平）

第一次直奉战争

背景介绍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掌握了北京政权。但是，日本在皖系日益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时候，就已经另外又物色了一个军阀集团——奉系作自己的工具，与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对抗。

直皖战争正在进行之际，直、奉两系就已产生了裂痕。战争中，奉军参战人数很少，却坐收渔人之利，夺得大批皖军的军械辎重，满载而出关，因而引起直系的强烈不满。战争结束后，直、奉军阀在争夺地盘问题上矛盾更加激化。

直奉联合之初，关于地盘问题是以维持现状为原则的。战后，张作霖和曹锟仍分别任东三省巡阅使和直、鲁、豫巡阅使，而吴佩孚也只得到一个直、鲁、豫巡阅副使的空衔，并没有分得地盘。1921年4月，张作霖、曹锟和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以及内阁总理靳云鹏等在天津召开会议。会议就地盘的分配达成新的协议：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得到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个特区；作为补偿，吴佩孚部师长阎相文被任命为陕西督军，接替附皖的原陕督陈树藩。1921年7月，湖北籍地方军人李书城、蒋作宾等联络湖南军阀，驱逐王占元，在湖北实行自治。8月9日，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吴部师长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吴出兵击退湘军，两湖又纳入曹吴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张作霖非常不满。

直奉两系争夺的中心是北京政权。直皖战后，靳云鹏于1920年8月再次组阁。靳内阁开始亲奉，经过改组又成为亲直内阁。张作霖联合对直系心怀不满的总统徐世昌，于1921年12月18日推到靳内阁。24日，徐世昌按张作霖的要求，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士诒是交通系的首领，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他上台后，秉承张作霖的旨意，首先赦免了皖系要员段芝贵、曲同丰等人，并抑制吴佩孚，拒付他在组阁时答应拨给直军的300万元军费，激起直系的怨恨。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梁士诒还同意日本的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乘此机会，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接连不断地通电揭露梁内阁的丑行，逼梁下台。直奉关系因而完全破裂。

1922年三、四月间，直奉双方开始调兵遣将，积极备战。3月，吴佩孚抽调驻两湖的直军集结于河南，又命陕西督军冯玉祥（原陕督阎相文入陕后不久即自杀，旋以冯代之）率军东出潼关，进驻郑州、洛阳。4月19日，张作霖亦命令奉军入关，准备和直军决战。

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战争分东西两路进行，东

路在津浦线，西路在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战争一开始，奉军曾发动猛烈攻势，直军一度后退。5月4日，西路奉军中原属冯国璋部下的一个师停止战斗，牵动西路奉军全线瓦解。东线奉军闻讯大乱，由胜转败。5日，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率残部由滦州出关。

战争结束后，徐世昌在吴佩孚的指使下，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宣布"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做东北王去了。

材料：

- 战事之经过
- 直奉战争亲历记

材料一　战事之经过

四日（夏历初八日），直军主将吴佩孚临阵，多有战略，自知兵数军械皆不及奉，故甚恤其军力及弹药，每战必先以少数弱军尝试，胜则长驱，败则以主力军继之。故自开战以后，两军虽互有胜负，大率直必先败而后胜，损伤惟奉军实多。三日之战，直军中路大胜，而西路仍系豫军及毅军，用以牵制及探敌者，虽遭挫折。而长辛店几为所拔。于是佩孚知奉军炮弹尽，无能为力，始决然以直军全力扑之。即于三日傍晚，命飞机两架，在长辛店总司令部抛掷炸弹，张景惠大惧，轻骑避丰台。佩孚遂下三路总攻击令，而特集精锐于西路，亲自督战，先遣一营乘黑夜向长辛店方面诱战。奉军以其为日中败军，易之，向之还击，直军战且退，未数里，直军故遽被包围，奉军大喜，勒令缴械。忽然后面大乱，盖佩孚已另派生力军一混成旅，占领长辛店西凤皇山，向奉军两翼迂回攻击其背，奉军知中计，乃拼命奋战，终不能敌，死伤枕藉。至四日拂晓，冯玉祥军由马鞍山进攻侧背，奉军子弹不济，邹芬十六师在门头沟先投降，张景惠第一师及第二第九两混成旅纷纷向丰台、芦沟桥溃退，直军遂克长辛店。

初，直军侦悉奉军中路战线主力军将西援长辛店，即从西部侧面攻下榆垡、庞各庄，以阻奉军。又从三日起，亘永清、安次一带猛烈作战，先击败奉军，故三日夜，长辛店奉军尚竭力拒战，以望中路之援。迨四日晨，中路败讯至，士气沮丧。加之数日炮战，耗弹过多，补给不能充分，步兵疲惫不堪，直军要击，故败北。丧参谋长周子新、旅长田献草，伤鲍德山，降邹芬，其余伤亡中级军官百余名，目兵千余名，被击散者有两师之众，更失粮食器械七十余列车，重炮数十尊，机关枪三十余架，于是奉军之菁华尽矣。奉军即败，直张锡元旅向丰台，李鸣钟旅向芦沟桥追之。张景惠在丰台闻三日夜长辛店大战，将率兵援之。黎明，闻战败，即下令撤兵，一部分乘车退天津，一部分乘车退通州。及前敌败兵至丰台，车站所剩者只八列车鹄立以待，形极狼狈。忽西南方枪声如连珠，直兵万人持西路司令部之旗追至，奉军情迫争先上车，挤踏及跌入轨道死者数十人。即匆匆开车向天津驶去。遗下伤兵一队，不得上，潜纵火于所弃之子弹列车中焚之，直军遂进占丰台。

下午二时，吴佩孚至丰台，购面包十万供降兵食，命张锡元向黄村、廊坊进击。

下午六时，北京城外西南一带，已无复有军装之奉军，京汉路车站，则遍贴直军通告外人之文，拥观者数百人。其辞曰：

"北京各国公使、天津、上海、汉口各国领事均鉴：胡匪张作霖，身为民国官吏，乱国毁法，盗心未改，年来北京失败，内乱不息，实由其勾结私党、把持政权、剽劫国帑种种行为所致。帝制余孽之梁士诒，复辟罪魁之张勋，悉皆引为心腹，参与军权政权。张作霖不惜危害国体，荼毒民计，中国将无统一之望，张作霖招纳匪军，扰乱京畿治安，现又无故进兵天津，逼近保定，啸聚胡匪，劫掠青、胶沿海岸，显背华会各友邦劝告裁汰冗兵之盛意。彼既甘心为戎首，佩孚等为正义人道计，不得不取正当之防卫，凡京津地方治安，及外人生命财产，均负保护责任。战事一告结束，即行恢复交通，整理善后，用答亲爱诸友邦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之诚恳。亦请各友邦于驱除匪军期内，根据条约，按照公法，毋得有资助匪军饷械及一切有利益于匪军之行为。其有外人在东三省军事上服务者，亦希先期声明，即行退出，不得参与战斗，至为感荷。特电奉闻，敬请察照。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同启。"

五日（夏历初九日），败退西苑之奉军十六师及第二十五旅第二混成旅，由京畿陆军第十三师勒令缴械。败退南苑之奉军第一师及第二十八师一部并各混成旅，由京畿第一、第九两师勒令缴械。黄村、丰台之奉军，由直军缴械，总计约三万人。西路之奉军肃清。

（摘自《奉直战史》上海宏文图书馆）

材料二　直奉战争亲历记

一九二二年四月末，直奉战争开始，我率领第四十五旅，担任中路霸县方面作战。我部原有六个步兵营，其中有两个营被王承斌调到永定河沿，又有两个营调到苏家桥支援第三师（第三师的一部分，被奉军强迫村民欢迎进村，伏兵围攻，因此损失甚大），本旅只剩下两个营。我就将这两个营和一工兵营拉一长线，每个兵距离很远，在煎茶铺附近，布置阵地，以抵抗敌人。这种布置，本是冒险的，只因兵力过于单薄，不得不如此。

敌人误以为此处是我方中路所在，使用全力攻击，有张学良的两团和汤玉麟的两团，大炮四十余门，向我军猛扑。但他们的射程过远，炮弹都落在我军阵后，只炸死了

一个留在后方的兵名叫刘鸿年。我方只有八门炮，便在此处放几炮，立刻转到旁的地方再放几炮。我们所以这样做，一则恐怕敌人知道我们的炮位，集中优势火力予以打击；一则担心敌人发觉我方兵力单薄，猛冲过来，我军众寡不敌，必然失利。

虽然这样，我军究竟人数过少，气力不加，渐渐抵挡不住。第一营营长向我报告："敌军力量过强，我军抵挡不住，只能后退。"我说："军事我自有办法。不能退，退后一定要杀。"我眼看他擦着眼泪走了。我立刻调动后勤人员一百多人，打发他们少带笨重武器，多带子弹，去扰乱敌军后方。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地理很熟，不一会儿就绕到敌军后方，大家一放枪，又将鞭炮放在煤油箱里一点，冒充机关枪。敌人以为我援军已经开到，袭击他们后方，阵势立刻大乱。这时我方营长又向我报告说："敌军阵势有些松动，似有后退模样。"我说："那是由于我们的援军开到了。"

我用兵最注意用侦察兵，又采用连锁的传递方法，敌后情报很快就能传到司令部。这次最前的一环，竟摸到敌人指挥部附近，窃听到敌人向上级报告，说"敌军十分顽强，不易击退"。侦察兵还向我报告了敌军指挥部所在的确实地点。我亲自向那个方向开了三炮，内有一炮正落在敌军指挥部内，将一个团长炸死。张学良大惊，放弃阵地，退到信安镇。我军追到信安，敌军又退到胜芳镇。我军追到胜芳，他们退到独流。我们追到独流，他们向东逃窜。我以不足一旅的兵力，竟完成了中路的胜局，就停在独流不再前进，以听取东西两路的战况。这次战胜，夺获奉军许多军用物资固不必说，最有趣的是夺得张学良的一口棺材。这是因为张作霖让张学良仿三国时庞德战关公的办法，抬着棺材督战，不想他竟弃棺逃走了。到一九二六年直奉合作时，张学良见到了我，对我说："当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可叫你把我打苦了。不过我也消灭了你一团人。"我说："你消灭的是第三师的人，不是我的。"我就谈起当年作战我方布置的情形，他十分佩服。

当各路战罢，奉军退到冀东时，吴佩孚指挥作战多日，身体十分疲乏，想在天津休息几天，将总司令职务暂交王承斌代理，我在前线见到奉军除李景林一旅尚可作战外，其他各部队都溃不成军，便建议乘胜打出关去，不要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我一连给总司令部打了四次电报，都被王承斌压下了。原来王承斌是奉天人，很有乡土观念，不愿将家乡人得罪太苦了，所以起了"刀下留人"的念头。到后来我见到吴佩孚，说起当日应当急速进兵的事，吴说："你的话，何不早说？"我说："我已经来过四次电报了。"吴说："我全未见到。"大家追悔不及。

（摘自《直系的分裂》王维城）

陈炯明叛变

背景介绍

1922年春，孙中山联络皖系和奉系，形成孙、段、张联合反直的三角同盟。但陈炯明却极力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他一身兼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要职，握有广东的实权。陈炯明打着"保境息民"的口号，利用手中的权势，控制财政，阻筹军饷。他还勾结吴佩孚，与吴相约夹击北伐军，并联合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3月陈炯明在广州暗杀了倾向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邓铿。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认为陈炯明居心叵测，广东方面难以有所接济，遂决定改变计划，督师回粤。

4月，孙中山率部返回广东，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内务部长、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仍留任陆军部长，以冀其悔悟。陈率部退至惠州。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宣布北伐令，以韶关为大本营，改道江西北伐。6日，孙中山抵韶关，8日，发布总攻击令，以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分兵三路，进攻江西。6月13日，北伐军克赣州，15日占吉安，进逼南昌，直系的江西督军陈兴远逃走。

就在北伐军节节取胜之际，陈炯明竟公然发动了政变。5月18日，陈部叶举等由广西返抵广州，省城再次被陈炯明所控制。叶举等通电要求恢复陈的职务，要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6月1日，孙中山应廖仲恺请求，自韶关返回广州。16日凌晨，叶举等率部包围总统府，炮击孙中山的住所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等人帮助下脱险，登上永丰舰，集合海军各舰，准备进攻广州，并电令北伐军迅速班师回粤，讨平叛变。由于陈炯明得到直系军阀的支持，北伐军在韶关失利，于8月初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地区退却。8月9日，孙中山因反攻无望，离广州赴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材料：

- "陈家军"清君侧
- 炮轰总统府后见闻

材料一　"陈家军"清君侧

四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家军"坚决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这是大元帅威信所关的问题，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孙中山承认陈炯明可以用陆军总长名义接收总司令职权，并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家军"的防地，派叶举为粤

桂边防督办以统率之。这个问题得到陈炯明的同意后，滇桂各军开到韶关，改道江西北伐，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孙中山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孙中山对陈作了重大让步，又相信他不会“造反”，因此五月六日偕同胡汉民、许崇智出发韶关，并在当天下了总攻击令，八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同时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李烈钧电劝张作霖切勿气馁，坚持待援。

从五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但是广州却落在“陈家军”的手中。原来，叶举等并不接受孙中山的命令，五月八日率领“陈家军”全部回抵肇庆。十日，孙中山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陈家军”那里肯听，十八日回到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攻击对象为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二十二日，叶举等公开电请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罢免胡汉民，魏邦平在电报上列了名。孙中山采纳了汪精卫等妥协分子的建议，允许陈在北伐军中路联军总司令、粤桂联军总司令、两广军务督办三职中选择其一，并派汪到东江与陈当面接洽。但是叶举等坚决要求恢复广东总司令，不赞成其他任何名义。二十七日孙中山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对这个命令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等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六月十二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了对“陈家军”的态度。他说：“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而出兵江西，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竞存疑心改道是为了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竞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家将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应当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来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总长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而且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也都不能加以反对。但我仍然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做到仁至义尽，而陈家将张牙舞爪没有改变。我如果没有把握，决不会自己投入到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家将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诰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人民的意见，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

孙中山发表演说后，第二天“陈家军”就在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十四日，他们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十五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十五日晚间，叶举等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化装走到海珠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十六日，叶举在广州城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十七日，孙中山亲率永丰、永翔等舰驶入白鹅潭，炮击白云山叶举的总部和观音山洪兆麟的司令部，开炮后各舰驶回黄埔。同日，魏邦平、伍廷芳、偕往黄埔谒孙，孙命第三师协助海军收复广州，但魏按兵不动。十九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电请孙、陈双方停止战争。海军总长汤廷光要求各舰勿向广州开炮。二十一日，海军与“陈家军”妥协，汤廷光、叶举、魏邦平三人以陆海军的联合名义布告安民，吁请“孙公下野”。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

材料二　炮轰总统府见闻

6月14日，中山先生由韶关回广州，以大无畏精神坐镇广州，以期化险为夷，便利北伐军早日夺取长沙，俾竟护法全功。在此以前，陈炯明已在惠州多次集会密谋，设法谋害中山先生，因中山先生途中已有戒备，未被暗算，得以安全回穗。中山先生车抵黄沙后，即乘海防司令陈策派迎的小兵舰直达天字码头，回抵总统府。在11日至14日之间，陈围攻总统府的布置已经就绪。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及陈少白先生等也有所闻，并曾报告中山先生妥为戒备。陈此时为缓和外间空气，特由惠电中山先生表示愿意追随北伐，但要求中山先生交出胡汉民作为条件。14日，陈电财政次长廖仲恺赴惠商要事，却密令驻石龙部队于廖车抵石龙时将廖扣留。廖被扣后，即送往石井兵工厂监禁。

以上系回忆当时传闻所记。15日，我由百花洲回穗，

发觉市内传说纷纭，陈要谋叛的事已是妇孺皆知了。此时听说中山先生还没有作出什么应变的具体措施。

我于15日下午四时到叶举的总指挥部，叶举一见我便说："你回来正好，今晚开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你也顺便参加吧。"是晚七时开会，到会的人，我所记忆得起的有传达所所长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之弟）、锺景棠、洪兆麟、旅长李云复、尹骥、罗献祥、江防司令周天禄、财政厅长锺秀南、炮兵司令王惺庵、参谋长张醁村等。我和其他由百花洲归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被邀列席。会议是叶举主持的。我还记得他当时发言时的重要几句话："民贼不除，国无宁日"；"今日的会是为民请命，共诛民贼的会，请各抒所见，作出共同的决议付诸实施"。主张炮击总统府最力的是洪兆麟和锺秀南、锺景堂、陈炯光等海丰系。洪兆麟虽然不属海丰系，但主张则更过之。我还记得熊略当时的讲话一二，他说："民贼是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先决条件。"他还说："粤军所有的部队是总司令一手培成的，打不打总统都可以。要打，就是因为总统仅仅留一个陆军总长给总司令（意指中山先生免去陈炯明所兼职位）；不打呢，就要送鬼出门，让他去北伐，对我们也有好处。"他的意思，总之是要把中山先生赶走，却不一定非打死中山先生不可。但当时的气氛，主张轰击总统府的力量占优势。乃即席推举熊略为攻城指挥官，企图炮击总统府时活捉中山先生。

熊略被定为攻城指挥官后，一面作攻城布置，一面暗地里派他的亲信连长（忘记了姓名）通知陆志云（忘记其职衔）立刻转报总统，说16日凌晨三时决定炮击总统府，请总统迅速出走。中山先生当时并不为所动，仍在总统府坐镇。

熊略的攻击布置如下：

锺景堂部攻击鱼珠、牛山炮台，监视黄博各舰；洪兆麟部以一旅攻击越秀楼的总统卫队，以一旅配合罗献祥攻击总统府正面的陈可钰团；熊略所部担任沙河大沙头、长堤一带的戒备；陈炯光所部担任西关一带的戒备；江防司令周天禄和炮兵司令王惺庵于16日凌晨三时分别向总统府炮轰，洪、罗二部即向总统府进攻，活捉中山先生。

当炮击总统府时，广州居民皆由梦中惊醒，不知所措，西关一带几被抢掠一空。

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前夕，中山先生仍不虞有变。事后陈策对我说，中山先生对熊略的密报，仍未置信，以为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魏邦平、陈策等多次敦请中山先生暂时离府，均为中山先生所拒。迨事将发时，乃仓卒由秘书林直勉、林树巍等强代中山先生更换便服，挟其出走，乃免于难。

中山先生离开总统府后，即在黄埔鱼雷局设立行营，17日亲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舰由黄埔经车歪炮台直驶白鹅潭，向占据沙河、瘦狗岭、沙头、观音山等地的陈军炮轰竟日。魏邦平陆军因被陈军监视，难与海军配合作战，未能给陈部叛军以更大的打击。嗣后中山先生即率舰经中流砥柱炮台折返黄埔，等待北伐军的回师。

陈于此时深恐北伐军回粤，自己无力抵挡，于是千方百计设法谋害中山先生，严令锺景棠等部攻占长洲对面的牛山、鱼珠二炮台，以监视中山先生的行动；一面请孙下野，一面收买温树德所部海军。20日，温树德率永翔、同安二舰驶入省河与陈部商谈停战条件。25日又派吴礼和到肇和舰与该舰长田士捷协商，要他驶出西江，分化海军的力量。30日，温树德下戒严令，对中山先生作进一步的威胁。陈炯明等谋害中山先生的花样百出，但中山先生不为所动，也无从施其伎了。以上的办法不得逞后，又由参谋陈君韬代陈拟致总统信一封，派锺惺到舰面谒中山先生。陈此函是以退为进，明里是向中山先生申诉"苦衷"，暗里是威胁中山先生下野。函中"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一语，实是如此。陈当日的原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6月16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余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使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端此，即请钧安。

陈炯明一面威胁中山先生下野，一面作抵御北伐军回师的布置。18日即令翁式亮率黄任寰师进踞韶关抵抗北伐军回击，并同时电令北伐军中的粤军第一师由和平、连平兼程回师，该师是陈一手培植的，北伐时与陈定有特别密电码。师长梁鸿楷奉命后即整师星夜分途经三南向和平、连平兼程后撤。师抵和、连后，该师陈修爵团请缨兼程开赴马坝归翁指挥迎击南下的北伐军。叶举即集中汽车将陈修爵部官兵由和平运往马坝增援翁式亮。当时北伐军南下是势不可当的，仅在韶关北门的师范学校的高山上激战数小时，翁部下支，即向马坝撤退。北伐军正在分途向马坝追击中，适值陈修爵部加入战斗，北伐军目击陈部旗帜，得知第一师已经倒戈，内部遂形分化；兼以北伐军饷弹两缺，不能再行南进，因此许崇智部退入福建，李烈钧、李明扬、朱培德各部退入贵州，赖世璜部退回赣州。回师平叛之举，卒之未能实现。

中山先生电令北伐军回师讨陈以后，曾遭受多次威胁。除上文所述，陈炯明迫其下野外，陈还多方谋袭中山先生的驻地，企图在北伐军回粤前把中山先生迫离广州。7月1日，陈谋袭长洲要塞，鱼珠、牛山为锺景棠占领，海军三大军舰"海圻"、"海琛"、"肇和"有降北之说。6日且熄灭灯火以威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当时坚守长洲要塞等待北伐军回师，旋以大局动荡，人心浮动，乃于7月10

日亲率“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璧”等舰强袭车歪炮台，通过阵地，进入白鹅潭，以镇人心。

自中山先生回抵白鹅潭后，陈的谋臣策士多方谋袭“永丰”舰。因“永丰”舰适停泊在一美舰之旁，谋袭不易，于是群相献计。张醁村曾自告奋勇，说他认识香港某工厂的工程师徐直，是鱼雷专家，他派人赴港约徐来穗共商大计，并说：“民贼不除，终为国患。”18 日晨，我和叶举在天字码头斜对面的指挥部大厅内坐谈，张醁村进门来，一见只有叶举和我在座，迫不及待地破口便说：“我和周天禄、徐直等已准备好了五个水雷，明晨一定使民贼去见阎罗王了。”说时好象很有自信。19 日晨水雷果在“永丰”舰与美舰之间爆炸。与此同时，张还收买小轮船数十艘准备于水雷袭击“永丰”舰时，向“永丰”舰进行袭击。因水雷没有击中，小轮也袭击不成。徐直于 19 日上午继续敷水雷时被捕获，才知道五个水雷是江防司令周天禄用重金买来的。

自 27、28 两日陈炯明的陈修爵部进占韶关后，北伐军分途撤退，回师平叛之举，未能实现。中山先生以平叛不成，乃转乘英轮赴港，即晚转轮赴沪，粤局即由陈炯明所统治了。

（摘自《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

徐世昌下台

背景介绍

曹、吴自战胜奉系以来，绝迹不到北京，徐世昌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徐的总统地位是在北洋军阀均势下的特殊产物，当年冯（国璋）、段（祺瑞）相持不下，捧出他来做总统；冯死后，他利用直皖两系的斗争保全了地位；皖系失败后，又利用直奉两系的斗争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他对吴佩孚从来没有好感，吴以前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称他“东海先生”，后来虽也称起总统来，但是一再发起国民大会和庐山会议，阴谋改造政局，这些内幕他都早有所闻。他因反对曹锟为副总统，和曹的关系也是很不妙的。他曾利用张作霖驱逐靳云鹏下台。但他摇摆于直奉两系之间，不肯完全接受奉系的调度，张作霖对他也不满意。奉军战败后，张作霖放了一把野火，说他派兵入关是徐派遣乃弟徐世章和公府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奉天，叫他以武力来“拱卫京师”的。同时，徐对张作霖有所顾虑，推迟发表惩戒命令，命令发表后，又有密电向张作霖解释，并劝他暂勿退兵，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他的两面三刀的手法，更加引起了吴佩孚的反感。此时北方军阀的均势已不存在，徐的总统地位也就无法保持。当吴策动恢复法统前，曾任航空署署长的丁锦向吴建议采取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促进南北统一。吴有信回答说：“统一问题，须东海自决。东海如能牺牲权位，则统一可期”。根据以上情况，直系逐徐下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势所必然的了。

徐接到保定会议的情报，不禁大惊失色，急忙派参谋总长张怀芝到保定疏通，并建议提前召集第三届国会（当时称旧国会为第一届国会，安福国会为新国会或第二届国会，直皖战后正在改选中的国会为新新国会或第三届国会），选举遭锟为总统；总统未改选前，自己愿居虚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曹锟并未加以理睬。

材料：

· 大总统徐世昌退位

· 徐世昌辞职通电

材料一　大总统徐世昌退位

直奉胜败既分之后，总理一席遂由颜惠庆代理，嗣因颜氏不愿长负代理责任，乃特任周自齐为教育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惟时老徐亦知地位不稳，急欲组织正式内阁以巩固之，而人选问题为第一难关，虽极注意于钱能训、熊希龄辈，但料定特殊势力必不同意，不敢提出。惟有王士珍为北洋系之先进，曹氏本为王之部下，吴氏对王亦执晚辈之礼，使王氏出而组阁，直系虽不同意，而为面子计，决难加以反对。况自己既为北洋系之老辈，更得王士珍来以两个老辈支持局面，直系虽挟以全胜之功，当亦无可如何矣。由是劝驾之使络绎不绝，王氏逼于无可如何，只得入京以看风色。老徐闻王已至，乃纡尊降贵，亲顾茅庐劝王出山，不料王亦老奸巨猾，抵京之后，鉴于总统问题已起，直系正谋根本之解决，自己若居阁揆地位，助徐则无以对直系，且不能奏功，助直则又无以对老友。因此之故，老徐虽再三请求，王氏终徘徊瞻顾，不肯轻出，迁延半月，而政变已起，徐既难安于位，王阁亦从此打消矣。

旧国会议员得曹、吴之同意在津召集之初，拟借顺直省议会会场为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老徐闻之，知旧会重开，己之位置必不能保，急欲加以阻止，而天津地方又非权力所及，于是，电致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请其查禁。其电曰：“天津杨厅长鉴：大局未定，讹言宜杜，旧国会系既经取消之机关，近忽麇集天津，自由行动，时局前途必蒙影响。警厅职责所在，应即迅行查禁，以维治安”云云。

老徐阻止旧议员在津集会之谋既已失败，乃与心腹之人别谋破坏旧会之计。某策士曰：“在京、津之旧议员合两院计之不足三百人，非招集在粤议员及沪、汉各地之分子北来，不能足法定人数，为今之计，宜速联络在粤旧议员阻其北来，且京、津议员大半为国会非常会议所除名，

正可怂恿在粤议员反对京、津议员之非法行动，不能认为有效。"徐善其言，立出重金派人收买旧议员，只须其不复北来，虽耗费不赀，亦非所惜。此外，对于在沪之一部分议员亦令人相机结合，阻其北上。讵意所派之人本为旧议员，彼等领款至津，忽而声明并无受徐委托之事，道路所传全属奸人中伤之计。于是老徐之第二次阴谋又遭失败，且受金钱上之重大损失，懊丧至于不可名状云。

大总统通电向称本大总统，此电则称鄙人，闻系秘书拟稿进阅时老徐亲手所改，即"敬候明教"四字亦系老徐加入，盖欲格外谦抑，以和缓反对者之心也。然恋栈之私心于此可见，故此电一经发出，而政变益迅速矣。

光园会议之后，请老徐下野黄陂复位既已决定，乃派专员来京将情形告知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王氏乃立刻召集警察总监、京兆尹、步军统领等军警长官开紧急会议，列席之后，王氏将保定方面议决之详细情形报告一遍，并谓我辈受东海培植已历多年，彼因时热如此，不能不即日下野。我辈对于彼之生命财产及其个人一切权利自应以全力保障之，使其不受及损失，此是我辈分内所应为之事。至于总统问题，乃系国家大事，我辈无权过问，只以维持地方治安，静待国民公意解决为唯一办法，充其量亦不过东海去后，我辈念及私交，与其一同下野，暂不做官而已。然就公言公，我辈即做官亦无甚关系。列席之人均以此说为然，约定对于地方治安全维持，其余各事静待民意公决。议竟，王氏入府将前后经过情形详细告知老徐，并语以大势已去，不如早去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徐见王氏亦临难变节，不以死力相卫，只得挂印而去矣。

（摘自《徐世昌全传》上海书局）

材料二　徐世昌辞职通电

各报馆均鉴：频年以来，海内多故，鄙人外以愍民生之困顿，内惭孚辑之无方，迭次通电宣意，久以退休为志，徒以国会未设，继任乏人，荏苒光阴，以至今日。兹以撄疾衰颓。不堪任兹艰巨，已于本日明令宣告辞职，依法由国务院代行职务。惟是此四年中，身所经历，心所蕴结者，不得不于将去之时，一为倾吐之也。

曩者丁巳一役，国脉中断，冯前副总统代任元首，召集第二届国会，据法改选，迨冯前代总统任期届满，国会乃以大任相属。鄙人当以衰老无能，再三辞让，竟不获已，强起就职。时则海宇崩析，生灵涂炭，欧战将停，国交方亟，私心祷祝，首愿竭忠尽虑，企谋统一，以纾民困。次则合群策群力以谋政治外交之逐渐改良，是以莅任之初，即揭橥此旨，首令南北同时罢战言和，复派遣全权代表，开会议于上海，冀以毅力促进和平。乃磋商经时，尚鲜端绪，南则党见纷出，北则代表再更，益启纠纷，迄无效果。遂使神州中剖之局，沿袭累年，未由统一，黎民疾首，征伐相寻。此则鄙人所为痛心者一也。

以统一之无期，致衅隙之交构，于是乃有庚申六月之事，其时譬解既尽，戢兵无方，畿辅陈师，至于旬日，闾阎震骇，功罪纷纭，而国家之威信，军旅之精英，亦既损失过半矣。此则鄙人为痛心者二也。

二年以来，张皇补苴，略见安辑，乃以阁揆进退，辄起争持，排喻俱穷，重劳师旅，邦畿千里，芜为战墟，劳瘵生民重以剥伐。此则鄙人所为痛心者三也。

鄙人德薄能鲜，诚信不孚，才不足以言统驭，智不足以言几先，驯至纲纪沦胥，生灵憔悴，每一念及，寝馈难安。夫国事之不能就轨，乃至溃决，为祸者既已彰彰，返而察夫庶政之措施，则亦寡所成就。教育为立国之根本，实业为救时之要图，就任之始，计划綦详，用欲敦勉实行，以裨大计，四年之间，其谆告于官吏者，实不过所怀之毫末。乃以大局不宁，财政枯竭之故，互为牵掣，不但无课功，而且日益窘困。至于地方自治，为共和国家要义，屡经督促，而迄未奉行，此皆返躬自责，而不敢稍自宽假者也。

所差能为国家致忻望者，则欧战以还，世界大事，变迁异乎昔时。巴黎、华盛顿两次会议，赖我国人同心协力，一致进行，举我国所希望之条件，大都通过，山东悬案，亦得解决。虽实施有待，而自奋有基，友邦之信用较深，国际之地位较胜，此皆国民督促之力，与代表用命之功，非鄙人所敢引以为劳者。然而最初愿望，惟此一端，实为我国人奋兴孟晋之会，其整理繁重，自非衰朽所克胜，当其闭会之后，即思引退以让贤者。而其时内阁之风潮未平，不得不暂为隐忍，勉予维持。今则局势稍定，更不容再缓须臾矣。

国家者，国民之公器也。鄙人不过为国家服务之一人，比年以还，劳精疲神，茹辛忍辱，调和群才，而不蒙相谅；遇事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不私一人，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苦之备尝，夫何权位之足恋。从兹隐处林泉，不复再问世事，而私衷所希冀诸端，吾知后来贤达，必能振作有为，为国家建无疆之业，以副国民喁喁之望也。掬诚布达，幸谅察之！徐世昌。冬。

（《民国日报》，1922年6月4日）

黎元洪复任总统

背景介绍

1922年5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以少胜多，打败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但要赶走亲皖的总统徐世昌，消除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存在的理由，从而使自己控制的北京政权具有"合法"性，就必须推举一位既"德高望重"，又能为已掌握利用的人物出

来充当门面，于是，几年前早已销声匿迹的黎元洪又成为曹、吴的最佳人选。

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元洪复职，以求全国统一，直系诸将纷纷响应。冷落多年的黎公馆，顿时热闹非凡，前来敦请黎元洪出山的人流络绎不绝，大有老黎不出，国无宁日之势。对此，只有章太炎写信给黎，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劝黎元洪"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黎元洪对于时局的变化和曹、吴的政治野心并不糊涂，只是他又不甘政治上的沉寂，因而总抱有一番侥幸心理。6月6日，黎元洪故作忸怩地发表鱼电，表示："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无愧于心乎？""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销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同时，又试探性地重提当年废督裁兵的主张，以此作为他再度复出的政治条件。为显示这一决心，特意至电曹、吴，声言："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

为应付时局，引诱黎氏早日赴京，尽管曹锟等人心有不满，但还是竞相通电，以示支持。黎元洪又一次为军阀们的"成功表演"所感动，马上对驻津的记者们发表谈话："余为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凯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不幸，这番谦词在一年之后竟被言中。

6月11日，黎元洪在曹锟的代表高恩波，吴佩孚的代表熊炳琦，旧国会众参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几十伯千呼万唤声中，率亲信金永炎、哈汉章乘专列赴京就职。当天中午，黎氏一行先到东厂胡同黎宅稍事休息，然后，兴致冲冲地来到中南海举行了隆重的大总统复职仪式，在鲜花美酒的映衬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如同五年前一样，黎大总统上台亮相后，首先要求切实实行"废督裁兵"的既定方针。6、7月间，他先后任命了十多位省长以期将实权从各省督军手中夺过来，但结果遭到了手握军权的督军们的强烈反对，被新任命的省长，不是拒不受命，就是被当地拒绝，就连当初毕恭毕敬，表示废督裁兵愿为首倡的吴大帅，这时也装聋作哑，一拖再拖。"废督"之举最后也只好是不了了之。"裁兵"一事与前者一样，在各省军阀的抵制之下，再次化为泡影。

材料：

- 黎元洪再任总统
- 复任通电

材料一　黎元洪再任总统

民国十一年五月，吴佩孚战胜奉天，中央政局完全在其势力支配之下。就事实方而言，直派军人凭藉战胜的威力，以为此后总统舍曹锟莫属，一般趋炎附势的国会议员，复从而怂恿之。其时北京总统，尚是安福国会选出之徐世昌。徐为北洋派最有关系老辈，在民五黎元洪继任时，北洋军人即拟拥出为总统，但自民八徐任总统后，对于北洋所用操纵手段，为北洋各方面所不满，而欲推翻安福国会选出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恢复《约法》的国会。恢复《约法》的国会，不得不拥护黎元洪，而黎元洪又非直派满意之人。

就法律方面言，吴佩孚在九年倒段战后，倡开"国民会议"；十年援鄂战后，又由张绍曾领衔通电在庐山开"国是会议"。最近在北京的国会议员集议主张："继续行使职权"吴尚于十一年五月十四日通电"征求各省意见"。十五日，孙传芳等通电"恢复《约法》，黄陂复位"。十九日曹、吴等又通电（略）。彼等对于法律问题，根本上本不明彻，故不敢断然主张，吴虽偏重法统，亦无坚强的决定也。据保定参谋长熊炳琦言："直奉战争结束，吴将军同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各将领集保定，研讨善后，某日得北京情报：'徐总统密召曹汝霖、陆宗舆等深夜入府，不知所商何事'。吴愤怒言：'徐世昌勾结曹、陆，又在搞什么鬼，将来必将逐出国门，另谋办法'。"乃留其参谋长李济臣驻保定，自返洛阳布署军事。临行，命李济臣电告北京代表注意徐之言动，于是一面示意于长江各督。故孙传芳二十八日通电"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二十九日齐燮元电"徐世昌总统退位"。

徐世昌早有所闻，乃派陆军次长何恩溥赴保定，征询曹锟意见。曹锟是无主张之人，其弟直隶省长曹锐、第七师师长曹锳，均以暂时维持现状，免生纠纷，拟即通电拥护徐世昌，并约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联名响应，此电尚未发出。

洛阳驻京办公处长为皖人钱宗泽，为一粗鲁军人。六月一日上午，李济臣由保定用军用电话责备钱宗泽："徐世昌勾结曹、陆，在府捣鬼，你何以一点不知道。吴大帅很生气，已返洛阳准备一切，将来一定要把徐世昌请走，你赶快注意这件事。"钱听吴大帅生了气，又怕又急，把电话中将来一定要把徐世昌请走的"将来"二字，忽略过去，便叫总统府的电话，向秘书长吴笈孙说："吴大帅有电话来，请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

徐世昌召集左右商议，田文烈与其十弟世章力主即日离京。其时顾维钧华府会议后回国，徐已约集在京高级官员于次日十二时设筵欢迎，届时不动声色，宴会尽欢。宴会毕，止留周自齐、田文烈在府，告以如此如此，令交周自齐依法代行职权，即出新华门乘专车去津。

安福国会选出之总统徐世昌走了，形势急转直下，随之而来的是恢复《约法》的国会问题。七月二日，直系将领都集于保定曹锟的花园里，讨论办法，做了四条决定。最初提出三条：一、依据《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二、请黎总统补足未满之八十三天。三、俟国会恢复后，一面恢复制定宪法，一面依法办理总统选举。稍稍商议后，又增加一条。四、本年十月十日国庆日以前，颁布宪法与选新总统两事，并须同时举行。

由李济臣带着这四条决定，当晚到洛阳与吴佩孚商议。次日，吴派李济臣回保定，表示"同意"，并催促保定方面赶快请黎元洪来。乃于次晨由熊炳琦代表曹锟，李济臣代表吴佩孚，从保定到天津谒黎元洪，表示各将领因中央无主，恳请黎总统依法复任总统。黎初尚推谢，继亦签应。这是七[六]月二、三日的事。

但黎左右分两派，饶汉祥主张向他们先提出条件，待答应条件后才出来。瞿瀛主张无条件，等出来后再提出条件。条件是什么呢？黎鉴于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又因为以前受过督军团的威胁，所以一直主张废督裁兵。于是由饶汉祥拟稿发出废督裁兵通电，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黎大总统主张废督裁兵的鱼电，里边有："下至护军，上至巡使，皆请解除藩服，先待都门"等语。这种主张，本属正当，事实上不是空口所能办到的。

六月七日、保、洛两方看到这个电报异常惶惑，八日又摧促熊炳琦、李济臣到黎宅恳请黎出来，至于下跪（当时黎宅称曰跪请团）。当日曹锟又派王承斌到天津见黎，秘谈两三小时，表示"竭诚拥戴"。王承斌亦加入熊、李跪请团，在英租界十九号路黎宅大客厅里跪了很久的时间。瞿瀛以此僵局报告周树瑛，周赶至黎宅，力劝黎不宜失此有为之机会。黎乃请王、熊、李起来，共同商议，王、熊、李坚持非总统答应，不敢起来，于是黎默认了。是日晚南京齐燮元代表孙发绪到津，向黎表示"一定要张绍曾组阁"，言语有些过火，黎又表示不出。复经九日一天的疏解，黎才在十日来京发表蒸电，就总统任。

（摘自《北洋军阀》张国淦）

材料二　复任通电

1922年8月10日

（衔略）鱼电计达。顷接曹、吴两巡阅使、齐督军、冯督军、阎督军、萧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日通电，具见体国公忠，遣荣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馀生，得闻福音，剥尽复亨，喜极以泣，当为全国遗黎顿首拜赐。惟所虑军队改辖，权限归并，陆部之放任既久，将校之欠饷尚多，期以浃旬，执多窒碍。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恐生剧变。伏念元洪退职已久，思过未遑，栋折榱崩，将压是惧，纵懔覆车之戒，忍怀忘世之心？鱼电所陈，昌言干讳，亦实以症结所在，寝馈难安，冀以哓音，仰回清听，于私交为稍戾，于公谊为甚忠。乃者鉴其悃忱，矜其戆直，解兵释甲，同然一辞。丈夫相交以心，出语若石，一言坚于九鼎，片言重于千金。宁复执久待之前言，贻丛生之后患，逆亿之罪，待朋友为不诚，操切偾谋，于国家为不智。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面恢复国会，刻期齐集。当此议员陆续入京之日，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谨当矢此公诚，待其结束。谋身之私，所为敢出，对人之念，所不敢存。甚望力屏浮言，完成壮志，我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如其国会开幕，现状依然，他日解决总统问题，无论复任另选，元洪皆当力践前誓，揖让后贤，息壤有盟，菟裘无恙，国人亦当怜此暮齿，放之海滨，不忍值国家浩动之时，强沦胥以俱尽也。掬诚奉告，谅荷鉴原。元洪。蒸一。

历史内幕

安源煤矿罢工斗争纪实

1922年9月14日的凌晨，坐落在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安源煤矿，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中。株萍铁路象一条巨大的蟒蛇，蜿蜒躺卧在安源山下。十里矿区，一片寂静。

突然，"呜——呜——呜——"安源车站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紧接着，安源修理厂、八方井的电笛也高声长鸣，一直持续了五分钟之久。这响彻云霄的笛声，划破黑暗的长空，在向人们庄严宣告：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大罢工的战斗打响了！

工人们潮水般地涌出矿井，奔出车间，冲出工棚，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斧头、岩尖，大声高呼：

"罢工了！罢工了！"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

这时，这场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总指挥李立三同志和工人全权代表刘少奇同志，顾不得连日来紧张工作的劳累，又开始了更为紧张的战斗！

大罢工的汽笛和怒吼，如一声惊雷，震荡了安源十里矿区。一万三千名工人的革命行动，把矿长李镜澄、副矿长舒修泰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在办公室里急得象热锅上

的蚂蚁，绞尽脑汁思索着对付工人的计策。终于，他们想出了一条诡计。

9月15日，安源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贾旸谷，领了矿局的旨意，以调解人身份来到工人俱乐部。他们一见到刘少奇同志，便脸上堆出笑来，说："矿长大人委托鄙人，有请刘代表到矿局的玻璃房商谈条件。"

玻璃房，是矿局老板经常为洋人老板设宴的豪华会客室。请刘少奇同志到那种地方去，敌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这肯定是矿局的花招？"少奇同志对李立三等同志说，"我立即就去，当场戳穿他们！"

少奇同志从容不迫地走进了玻璃房。矿长李镜澄，副矿长舒修泰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刘代表，请坐，请坐呀！"

少奇同志一看，屋子中央的一张大圆桌上，摆满了酒菜，周围坐满了形形色色的头面人物和调解人。少奇同志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意。他慢慢地把一张椅子拉到一旁，坐下，冷笑了一声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矿长大人！你们真的想商谈条件吗？"

"哎，别急嘛，来来，先喝两杯，边吃边谈。"舒修泰装出笑脸说。

"闷心的酒，半点不沾。我是来谈条件的，不是来喝酒的。快谈条件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少奇同志义正词严地说。

李镜澄见此情景，只得放下酒杯，悻悻地说："今日请刘代表到此，是想请谅解我们的困难，请工人先开工，条件嘛，都好说。"

"莫要说了！"少奇同志见他们根本无意谈条件，气愤地说："你们是想要工人先开工，再谈条件，这绝对办不到！如果不先答应我们的条件，就莫想要工人下井！"

少奇同志站起身来，继续说道："路矿两局该放明白点，工人说话是算数的，还是老老实实答应条件为好。想要什么把戏，骗不了人的！"说完，大步向门外走去。

路矿当局见"软"的一招不行，又使出了"硬"的一手。

第二天，路矿当局从县城搬来了一营军队。路矿总监工王三胡子和一个敌营长亲自出马，带领军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工人俱乐部。

王三胡子一步踏进门来，蛮横地说："你们这里谁管事？"

"我！"刘少奇同志挺身走了出来。

"你是什么人？"

"工人代表！"少奇同志响亮地回答。

敌营长望着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晃了晃手中的枪，杀气腾腾地说："好，好！我是代表，你负责！戒严司令部有命令，要你们马上复工！"

少奇同志厉声说："复工？答应了条件吗？"

"什么条件不条件！简直无理取闹！"王三胡子威吓说。

"这是什么话！工人要活命，是无理取闹吗？"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

敌营长凶相毕露："你们要活命，就马上复工！否则，"他拔出手枪，"以扰乱社会治安治罪！"

少奇同志怒视着敌营长："你吓哪一个？我们严守秩序，并未犯法，治什么罪？"

敌营长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罢工就是犯法。违反戒严司令部的命令，更是罪上加罪！"说着一挥手，想要抓人。

工人们闻讯围了上来，象洪水冲垃圾似地把这群士兵连挤带推往外赶。王三胡子也被团团围住，差点把手枪都挤掉了。他气得暴跳如雷，连声叫嚷："这还得了！这还得了！快抓人，抓人！"

敌营长也慌了手脚，狼嚎似地喊："抓人！快给我抓人！"

但是，士兵们早已被工人团团围住，挤在一角，连枪也端不起来了。

这时，少奇同志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站到一块石头上，高声对士兵们说："弟兄们，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出来当兵是为了要吃要穿，为了活命。我们工人罢工也是为了要吃要穿，为了活命。我们的工钱被当局扣住不发，连粥都吃不上了。我们再三向当局要求发清欠饷，当局不答复我们。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活不成了！我们要死里求生，才迫不得已罢工……"

士兵们听了这一番合情合理的话，刚举起的枪又慢慢放了下来。

王三胡子见势不妙，大声吼道："不要听他胡说！不许听！"

少奇同志愤怒地回击说："这是胡说吗？弟兄们，你们看一看工人穿的破烂衣服，看一看大伙面黄肌瘦的脸色，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胡说。你们家里也有爷娘崽女呀！你们用手里的刀枪来杀我们要求活命的同胞，也于心不忍吧？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武，我们也只好拚着一条穷命，冲突起来，两下都莫得好处。"

正义的声音很快瓦解了敌人的队伍。士兵们一个个从人缝里往外钻。王三胡子和敌营长也无可奈何地溜了回去。这一队士兵，就这样溜得一干二净。

工人们望着敌人仓皇逃去的狼狈相，兴奋地围着少奇同志，称赞他有勇有谋。就这样，敌人"硬"的一手也失败了。

罢工进行到了第三天。工人们在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越战越勇。路矿当局精心设计的破坏手段，都被工人俱乐部击败。敌人已经黔驴技穷了，但还不甘心失

败，策划了半天，又使出了最后一招。

16日中午，路矿当局派人给工人俱乐部送来一封信，请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俱乐部决定派全权代表刘少奇同志亲自前往。

设在矿局办公大楼内的戒严司令部，警卫森严，杀气腾腾。门口台阶两旁，架上了两挺机关枪。进门楼梯的两边，站着两排背盒子枪的卫兵。走廊里也密密地站着上了刺刀的卫兵。满脸凶相的敌营长拿着手枪在走廊里来回巡查。

当少奇同志手里拿着条件书向戒严司令部走去时，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大家为少奇同志的安全担心，纷纷说："刘代表，你不能去，他们会害你的。"

少奇同志亲切地对工人们说："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说着，大步向戒严司令部走去。

少奇同志穿过重重岗哨，走进了戒严司令部会议厅。戒严司令李鸿程威风凛凛地端坐正面，恶狠狠地盯着门口。少奇同志轻蔑地瞧了他一眼，从容地坐了下来。

屋子里鸦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只有墙上的钟摆在"的达、的达"地响着。

沉默了一会儿，李鸿程想给这个工人代表来个下马威，蛮横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我?是解决问题，还是想把问题闹大?"少奇同志厉声质问，并理直气壮地申述了罢工的理由。

李鸿程没有料到这个年轻人竟这样厉害，吃了一惊，气急败坏地在桌上捶了一拳，说："你们如果坚持作乱，就先把代表正法!"他手下的卫兵一把操起了盒子枪，就等司令下命令了。

少奇同志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正义要求，你们就是把我砍成肉泥，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你有一万多工人，我有一万多军队！我们有法子制裁!"李鸿程狂叫起来。

"哼！你有本事，就请你制裁吧!"少奇同志冷笑了一声说。

这时，戒严司令部外面，黑压压地站满了工人，大楼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怒吼声：

"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汗毛，我们便打得路矿两局片甲不留!"

"要谈判到俱乐部去谈!"

工人们一面喊，一面从楼梯口拥了上来，士兵们用枪托挡也挡不住。路矿两局局长去喊话，更是无济于事。舒修秦额上直冒冷汗，连忙恳求少奇同志："刘代表，请你去帮助维持一下，问题好商量，好商量。"

少奇同志鄙视地望了他一眼，走到走廊上向工人们招了招手。大家看到自己的代表，高兴得欢呼起来。少奇同志一面招手一面说："工友们，兄弟们，大家静一下，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工人们马上静了下来。

少奇同志的崇高威信和工人的强大力量，把资本家和戒严司令的威风一扫而光。李鸿程不得不客气地说："请刘代表下午再来商量!"

少奇同志严厉地说："若不好好磋商条件，我就不来!"说着昂然走出了谈判室。

"是是，一定商量。"矿长，局长点头哈腰地说。

敌人的一切诡计都彻底破产了。在工人们的正义要求和强大威力面前，矿局只得老老实实地和少奇同志磋商条件，最后达成了十三条协议。9月18日早晨，路矿两局的资本家彻底屈服，不得不在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约上签了字。坚持五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事后，工人们都说少奇同志孤身入虎穴，一身是胆。工人张明生问少奇同志："听说你有十三块金牌护身，所以老板和军队都不敢动你，是吗?"

少奇同志笑着说："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真理在我们一边，因此我不怕。我哪有什么十三块金牌，半点也没得，你们一万多工人的团结，才是我力量的源泉。"

大家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许多年轻工人围着少奇同志，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安源的工人们交口称赞少奇同志："刘代表一身是胆!"

（选自《刘少奇的故事》，作者：黄峥）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秘密召开

日月飞逝，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一年，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1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共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其实，那是辅德里625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

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和渔阳里2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成了中共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一排排房子统一格式，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625号一楼一底，建筑面积为74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造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1922年7月16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7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12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如他对斯诺所说：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7月召开中共“二大”的。

在中共“二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旅俄8人、旅日4人，旅法2人，旅德8人，旅美1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21人，女党员4人。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共“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中共“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另有两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即邓中夏和向警予。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

中共“二大”比中共“一大”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共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共“二大”总共通过了十一种文件。除了《宣言》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

（选自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李立三与青红帮

李立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他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实行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表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为中国工运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底，李立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发现矿上红帮势力很大，很多工人参加红帮，不少工头就是红帮分子，甚至是红帮头目。因此，正确对待红帮的问题成了关系工运能否深入发展的大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的前一天，即1922年9月13日，李立三提着一只公鸡与两瓶烧酒，由两个曾加入过红帮的工人会员带路去见帮主。李立三很爽快地与其共喝了鸡血酒，然后说：我们要罢工，为穷兄弟们谋幸福，请你讲义气，多多帮忙。帮主见李立三身居工人俱乐部主任要职，亲自登门来拜会自己，认为这是看得起他，便拍着胸脯说：“一定帮忙！一定帮忙！”李立三接着又向其提出了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关闭烟馆、收起赌摊、不发生抢案。帮主又连拍三下胸脯，表示全部接受。随后，帮主将如上要求写成布告张贴出去，要本帮弟子切实遵守。果然大罢工时这三条都做到了，保证了罢工的顺利进行。

1924年4月，李立三奉调到上海，负责领导该地区工人运动。茫茫上海滩，青帮势力很大，许多工人加入帮会，青帮头子欺压民众，勾结反动当局充当走狗，破坏工人运动，危害很大，使这里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遇到了怎样对待青帮的问题。李立三到任后，吸取了原上海党组织对青帮不予理会与过于信任这样两种错误做法的教训，依据自己在安源时期对待红帮的经验，结合上海地区的

实际，实行了联合青帮徒弟和小头目，反对青帮老头子的政策。一次，一开澡塘的青帮头目绑架了李立三，强迫他做徒弟。李立三认为这是个小头目，联系他有利于工运，于是就将计就计地答应了。那小头目为大名鼎鼎的李立三能做自己的徒弟而欣喜万分，于是将李立三平安放回。由此为线索，李立三同青帮势力有了更多的接触，并与青帮徒弟和下层头目有了较好的关系，为日后工运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1925年6月，在大买办虞洽卿指使下，少数大青帮头子组建工贼工会“上海工团联合会”，企图取代上海总工会，并召开所谓工人大会。若让其阴谋得逞，后果相当严重。于是李立三奋不顾身，决意单刀赴会。那些被收买到会的工人一见李立三出现，便都纷纷退走了，会场只剩寥寥二三十人。青帮头子恼羞成怒，污蔑说总工会贪占救济公款，并令李立三交出上海总工会的印章，顿时会场里笼罩着一场大打出手的紧张气氛。然而李立三大义凛然，并当场揭穿这个工贼组织破坏工人罢工的罪行，结果听众中发出“打倒工贼”的吼声。这时，一个与李立三联系较多的小帮头出来打圆场，青帮头子只好狼狈收场，破坏总工会的阴谋破产了，上总的权威得以捍卫。后来，那个青帮头子也想收李立三做徒弟，意欲以此控制上海总工会，但被李立三严辞拒绝。再后来，他又请李立三参加宴会，自己坐头把交椅，让李立三坐二把。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李立三慨然前往。由于李立三灵活地采用了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斗争策略，击破了反动派的阴谋，维护了全上海工人运动的团结与统一。

（作者：孔德生，选自《党史博采》94年5期）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之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处在国内战争的艰苦岁月，外部又有资本主义列强网罗的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因此它渴望得到世界各国的革命支援。但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革命很快被镇压下去，于是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便引起了苏俄政府的关注，并寄予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19年7月25日由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发布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侵夺中国的一切利权，并希望中国冲破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束缚，与苏俄结成革命的联盟。一个大国自动放弃一切在华利权，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近80年间，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宣言”的发布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但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有两种不同的文本，一种写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给中国，另一种则没有这一段文字。究竟哪一种文本是正式文本，一直是一个“谜”。在早期的中苏谈判中就曾发生过争执，苏俄使华代表说，“宣言”的正式文本没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文字，而北洋政府则肯定它正式收到的“宣言”文本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内容。于是苏俄使华代表说，北洋政府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一个“误本”。

中东铁路是沙俄根据1896年“中俄密约”与1898年《旅大租地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线，是沙俄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与争霸远东的重要工具。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因沙俄战败，将长春至大连段铁路（后称“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但沙俄仍占有中东铁路干线，控制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北部。显然中东铁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与经济利益，是中苏之间的重大悬案。因此，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一成立，即派员同中国驻俄公使谈中东铁路问题。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具体涉及中东铁路问题，是很自然的，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很奇怪的。

1951年美国学者A·S·惠廷在一家图书馆中发现1919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的B·JI威廉斯基著《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一书附有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其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内容，译文如下：“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内容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俄文本。

这个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俄文本是否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正式文本的抄本，以及北洋政府收到的“宣言”法文本是否也是正式文本，回答都是肯定的。

据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的回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俄文稿，最初是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交给“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并译成中文发表于旅俄华工的报纸《大同报》上，其中就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话，但1919年8月26日发表在《消息报》等苏维埃报纸上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则删掉了这一段文字。刘泽荣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又是当事人，事情又那样重要与明显，因此可以肯定刘泽荣的回忆是没有错的，可惜这份《大同报》至今没有找到。

过去苏方一直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有包含“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内容的俄文本，50年代初惠廷发现威廉斯基的书所附的俄文本后，苏联历史家贾丕才承认有，但认为是一个“误本”，他解释说：“在起草宣言时，确实有一个草本，其中有一段文字说，苏维埃政府无偿交还沙皇政府以及克伦斯基政府等夺取的中东铁路，所有矿山、森林、金矿和其他租让。但是，这一文本未被政府批准。B·

Д·威廉斯基(西比里瓦科夫)参加了宣言的起草工作。1919年他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错误地公布了这个草本,而忽略了与正式文本校订。1920年3月,这个文本交伊尔库次克电台用法语广播,并于3月27日刊载在中国报纸上。"贾丕才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威廉斯基既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犯了纪律错误,苏俄政府不会视而不见的。但苏俄政府根本未追查此事,威廉斯基仍受到信用。同时还要看到,威廉斯基的《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一书是莫斯科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如果作者在书中有如此重大差错,出版社的编辑也一定会指出,并有责任加以纠正。

在此之后,1920年北洋政府正式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法文本,也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同上述俄文本内容是相同的。这个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法文本是正式文件,由当时的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请中国驻伊尔库次克领事馆转交北京政府的,并说明是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全权委托交办的任务,法文本"宣言"除最后加拉罕签名外,并有杨松签字:"证明抄写无误"字样。这个文本在台湾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中,以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均有发现。但苏联历史学家贾丕才在《苏中关系》(1958年出版)一年中未加说明,似乎当时北洋政府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没有这一段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实际上,当时苏俄政府除通过中国驻伊尔库次克领事馆递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外,同时还通过其他途径递交"宣言"。这些递交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均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后来苏联使华代表越飞与加拉罕说北洋政府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一个"误本",但举不出什么证据。

退一步说,北京政府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即使有误,苏俄政府也会很快发现的。因为当时北京政府曾通过驻丹麦的领事与苏俄代表就"宣言"的内容进行过接洽,不仅当时中国报刊登载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且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纷纷致电苏俄政府对苏俄方面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一些感谢电中也列举了"宣言"内容,有些还引用了"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但是,苏俄政府并未声明加以更正。后来苏俄第一个使华代表裴克斯来华后,也未对中国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文本加以修正,他主张有条件的无偿归还中东铁路,这就是说,既符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原则,又要照顾到1920年9月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对中东铁路提出使用的要求。他说:"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苏维埃共和国愿依照历次宣言将此路交还中国。此行使命,即与中国外交部商量将此路交还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之办法,绝对不求取任何财政与经济的利益。"这就是说,当时苏俄政府认为中国北洋政府收到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正式文本,是没有错误的。

1922年8月苏俄使华代表越飞来华后,才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内容,说本团所存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并无此段文字,但他也无法否认北洋政府提出的"宣言"文本,于是他说:"中国政府于当时并未答复此项宣言,亦未容纳俄政府所提缔结友谊之建议。且中俄关系一切问题,须在未来中俄会议内提议。"越飞的意思是说苏俄方面已收回了所发布的"宣言"。接替越飞的苏俄使华代表加拉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更是粗暴,他说:"北京政府在正式公函中,继续本其爱好而坚持1919年宣言之误本,鄙人殊不知其目的何在?若1919年宣言能略予中国政府以根据(姑不论权限),使中国政府借以对于宣言所允许者得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则此种坚持尚可了解。但1919年宣言,并未为中国政府造成若何权限。苏联代表团在1923年11月13日致外交部之牒文中业经述明,中国政府未接受1919年宣言。"实际上,当时中国北洋政府也并非要求无偿归还中东铁路,曾表示:"从前劳农政府首领虽屡次宣言将中东铁路完全无条件归还中国,然在我决不敢抱此过大希望。故所有前俄帝国政府暨人民所担负该路之建筑费,双方应派专门委员并聘欧美专门人员,会同估定价值,中国政府担任偿还半数。至关系自满洲里至海参崴一段铁路,既连接远东共和国领土,中国政府允与远东政府运输上种种便利。"应该说,这是合理解决中东铁路的办法,但即使这样,苏方代表越飞、加拉罕也均未接受。苏方提出中苏合办中东铁路,并且苏方要掌握管理实权。后来苏方虽然同意中方赎回,但提出必须用本国资本,苏联清楚当时中国无资本赎回铁路,并且说铁路全部为苏联所有,要价很高。中国提出用发行库券的办法赎回铁路,苏方也未同意。因此,虽然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国可用本国资本赎回铁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事实证明苏联方面也没有交还的诚意,因为加拉罕曾明确地说过,苏联在中国东北要保持一定的势力。

那末,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什么要写上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呢?这是与当时苏俄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列宁执行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分不开的。参加起草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B·Л·威廉斯基在《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一书中说,这是为了促成中国与苏联建立革命的联盟。1921年7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在接见远东共和国使华代表时还提到:"列宁当初曾有将该路(指中东铁路)完全无条件交还中国之宣言",可见无偿归还中东铁路也是列宁的意思。后来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化,苏联国家的逐步巩固,尤其是在斯大林实际掌管苏联国家权力后,大国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思想滋长,表现在对待中东铁路问题上,便是不愿交还中东铁路的利权。可见后来苏

联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内容，实际上是不仅不愿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连有偿交还也不愿意，其目的是继续实际控制中东铁路。这就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之“谜”的实质。

（李嘉谷）

历史考证

所谓1922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湖会议并无其事

本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发现过1922年4月中共中央曾经在杭州西湖召开过会议的任何线索。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提出的。这一年，国外学者道夫·宾先生在他的论文《斯内夫利特（即马林——编者）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了“迄今尚未报道过”的中国共产党1922年4月在杭州召开“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的新说法，并具体指出：“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和斯内夫利特。”道夫·宾先生的这种说法，近年来逐渐为中国国内某些党史工作者所接受。但是，笔者根据对一些有关材料的分析，认为道夫·宾先生提供的有关1922年4月中共中央杭州会议的论据不足。

道夫·宾先生引用了1935年伊罗生教授的马林访问记中的一段话来论证他的观点：“1922年初，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马林的这段回忆，是道夫·宾先生认为存在四月杭州会议的根本立足点。可是，1922年的年初，马林尚在华南考察。为了使这次“年初”的杭州会议成立，道夫·宾先生根据荷兰外交部档案文件材料，具体推论出“第一次杭州全会的时间应该在1922年4月2日到23日之间。”我们认为，马林在事隔十三年后的这段回忆明显有误。他把1922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杭州全会的时间错误地记忆为“1922年初”。马林所说的“1922年初”召开的杭州全会，实际上就是同年8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杭州西湖全会。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除马林以外，找不到任何当事人的材料来证明有过这次四月杭州全会。在同时代的中共中央其他上层领导和活动分子毛泽东、蔡少森、李达、包惠僧、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等人的著作和回忆录中，也找不到关于这次四月杭州全会的片言只语。

第二，中共一大时，仅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

党并不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瞿秋白无疑不可能参加“四月杭州全会”。

第三，在马林所提出参加会议的名单中，除瞿秋白之外，其余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三人都参加了中共中央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全会。既然被马林认为参加过四月会议的成员中有一半以上参加了八月会议，而参加八月会议的成员却没有一个人提及曾经参加过四月会议，我们就不得不对马林关于“第一次西湖会议”的回忆产生怀疑。

第四，马林在继“1922年初，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的话之后，还有如下一段回忆：“在杭州，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即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编者）。只有一两个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正是这一段被道夫·宾先生回避了的材料，为我们证实马林所谓“1922年初”的杭州西湖会议实际上就是同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提出了进一步确凿的证据。按马林提法，在1922年初的杭州西湖上，“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我们却有材料可以充分证明，在1922年8月以前，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观点根本没有被中共中央所接受，直到1922年7月，中共中央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抱断然拒绝的态度。在1922年8月召开的杭州西湖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才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另外，马林认为“1922年初”的西湖会议上对他的观点“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而事实上张国焘是在八月西湖会议上极力反对接纳马林主张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马林所说的“1922年初”召开的西湖会议，实际上就是八月西湖会议。

第五，如果马林在同伊罗生教授的谈话中，除了“1922年初”的西湖会议外，另外还谈到了八月西湖会议，那么道夫·宾先生认定存在着第一次西湖会议似乎还有一点可能性。可是，综览马林对伊罗生教授谈话全文，他在回顾了“1922年初”召开的西湖会议之后，对八月西湖会议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在马林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西湖会议。

总之，马林1935年的回忆弄错了西湖会议的时间；道夫·宾先生以讹传讹作出了中共中央1922年4月第

的胡作非为，被迫出走上海，以后又到过日本。

室后面小屋里搁一小铺，借以午睡或晚间休息。在休息时

（摘自1983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对1922年4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质疑——与道夫·宾先生商榷》一文，作者：童志强、周蕙）

黄爱、庞人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黄爱、庞人铨这两位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书写我国劳工运动史首页的先烈，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无政府党的首领，或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大量事实充分说明：黄庞是我们共产主义营垒中的重要成员。那么黄庞无政府说从何而来？

首先是来自军阀赵恒惕的诬蔑，加上无政府党人的混水摸鱼。黄庞被害时，赵恒惕在布告中写道："为查封事，本部在劳工会拿获黄爱、庞人铨二名，盛倡无政府主义，借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这全是无耻的捏造，不足为奇。但是无政府党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竟到处宣扬黄庞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吾党的第一牺牲者"。在上海我党召开的追悼黄庞的涵义。相同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作为革命运动的主体，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不同的是，工农群众的先锋作用侧重于"主体"（基本队伍）的意义，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侧重于"先导（指导力量）的意义，作为革命力量的不同部分，其先锋作用的范围、程度、特点有不同。工农群众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具有人数上的优势，是革命运动的最基本物质力量，他们的斗争直接影响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容易直接动摇统治阶级的经济秩序；知识分子主要从事精神生产和科学活动，具有知识上的优势，他们的斗争更容易影响到统治阶级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是革命运动的物质力量之一，又是革命运动的指导力量。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与工农群众的先锋作用及其有机结合，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知识分子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占人口比例较小，又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本身作为革命运动的物质力量显得比较薄弱，但是，由于它所具备的特殊条件，它往往能够给人民群众"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从而调动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造就气势磅礴的革命运动。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具备丰富知识和杰出能力的人来给予恰当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这种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并产生效用。一个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斗争纲领，并按照目标和纲领的要求而实施合理的组织与指挥，革命运动的胜利就是一句空话。一般说来，知识分子正是这种革命运动所必需的知识的拥有者，纲领的提出者，领导的担负者和组织指挥的实施者。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迅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自85年《湖北社联通讯》第8期《浅议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者：裴大新、王明安）

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

广州血案

1922年3月21日傍晚7时许，一列从九龙开广州的火车缓缓驰进广州车站，一位身穿戎装，年纪30开外的军官，昂首阔步和旅客一起步出车站大门。正准备登上前来迎接他的一辆黑色轿车时，突然从旁边闪出一个帽檐遮脸的大汉，向他举起手枪连发两枪后，迅速混入混乱的人群中逃跑了。他立即倒在血泊中，车站内外顷刻大乱。这位被刺的军官是谁？他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

邓铿没有死，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走到汽车旁，命令司机迅速送他到粤军总司令部去。车到总司令部里，一时大乱，人人惊愕万分。邓铿尚且清醒，但已预料到难以救治，对他的夫人李慎逸说：我虽然学识和才能不如朱执信，但是我和他是同样坚信革命；朱执信先我被人暗杀，我现在也遭人暗杀，真是天不能容好人啊！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立即出来，表示大惊失色，命人用汽车送往法国人开的韬美医院抢救。经检查，邓铿身中两弹，一颗子弹中下腹部，未及要害，一个颗子弹中上腹，射穿胃部，腹内大量淤血，并已感染。经抢救无效，于23日清晨5时不幸身亡，年仅38岁。

当时凶手并未抓获，而且并无蛛丝马迹可寻，一时新闻界发出一连串可疑的消息，并进行种种的猜测和传闻，终无一个可靠的头绪。那么这次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刺杀邓铿？

邓铿为何被刺

邓铿曾是陈炯明部下。辛亥武昌起义后，邓曾在广州的副都督陈炯明手下任陆军司长，负责收编各地分散的军队。邓把军队扩充到三个师，建立了粤军。陈炯明怕邓铿权力过大，不久将他调到海南岛去任琼崖镇守使。后来桂系陆荣廷的势力伸到广东，邓因不满桂系军阀在广东

的胡作非为，被迫出走上海，以后又到过日本。

邓铿于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认识了孙中山并追随他革命。1918年孙中山到广州成立护法政府，被推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福建。邓铿率粤军主力第一师首先攻取了福建漳州，并成为粤军的根据地。不久，由于桂系和滇系军阀的捣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1920年孙中山再次联合陈炯明，以驻闽粤军为主力，对付桂系军阀陆荣廷，桂军组织三路军队企图先发制人，向福建进攻，均被粤军击败。粤军反攻入粤，很快攻占了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后，组织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邓铿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21年孙中山亲自指挥粤军西征，彻底打垮旧桂系陆荣廷势力，邓铿把自己第一师的一个团交给孙中山作为卫队，让第一师中最可靠的团长陈可珏当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时陈炯明曾随军到广西，邓铿留守广州，广州的一切军事大权曾由邓铿负责，孙中山在广西十分放心。西征军的一切粮饷、弹药供给，也靠邓铿支持。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拥护者和支持者。邓铿被刺的时候，孙中山正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并准备出兵湖南。消息传来，孙中山万分惊愕，不胜哀悼，立即发唁电到广州曰："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时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孙中山感到邓铿遇刺，影响到当时的北伐大计和整个的革命事业，于是决定停止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回师广州，以扭转危局。

邓铿被刺后，广州曾有谣言说是"孙中山派人来干的"，目的是"为搞垮粤军"。邓铿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支持者，孙中山为何要刺杀他，"自毁长城"呢！实际上刺邓的人恰恰就是放出谣言的陈炯明及其一伙。

陈炯明是打着孙中山革命的旗号起家的，他又依靠了邓铿的参赞襄助，才得青云直上。陈是个野心家和军阀。当孙中山讨伐旧桂系取得胜利后，两广的军政大权落到了陈炯明的手中，于是他不但不支持孙中山北伐，而且还处处阻挠、事事作梗，暗中与北洋吴佩孚联络，和湖南的赵恒惕共同彭吹"联省自治"，从而孙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早在粤军刚驱除桂系出广州时，陈炯明就有过"自立"的打算。当时邓铿劝陈炯明迎接孙中山来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却有人对陈说：依照广东形势，没有请孙先生回来的必要。如果真的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就等于请个爸爸回来。试问老总能受得了吗？陈炯明听后不语，心中若有所思，因而迟迟不作行动。后经邓铿多次催促，陈炯明才派人去上海迎孙中山到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怨言百出，与孙中山经常发生矛盾，邓铿自认为他是孙陈磨盘中的谷子，他的使命便是阻止孙陈之间的彻底破裂。而因邓是一直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的，故自然为陈炯明所不容。邓铿为人勤勉，经常不回家，在司令部的会客室后面小屋里搁一小铺，借以午睡或晚间休息。在休息时常听到陈炯明和人说一些不满孙中山的话，认为陈"越来越和革命相去甚远"。胡汉民曾劝他不要在这间小屋里休息，以免遭人暗算。但邓却置之一笑说："怕死则不作革命事业，大丈夫宁玉碎，何虑也！"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县人，他提拔用人总要选海丰人。陈炯明任广东都督后，很多海丰人跑到广州来要官当，凡是要求者，陈都一一答应，于是广州都督府几乎成了海丰人的天下。1920年后陈炯明当了广东省省长，他在省政府里安插的亲信更多，比较有名的有马育杭、钟寿南、陈炯光、陈觉民、陈修爵、陈达生等。钟寿南当了广东省财政厅长后，又把许多海丰人安插在财政厅和税收机关内。邓铿为人正直清廉，对这班不会办好事，专意贪污勒索的人，十分鄙视。尤其是对他们常插手一些军政要事，十分反感，曾多次向陈炯明陈述那些不良现象，要求加以约束。陈炯明不但不听，相反进一步纵容他的亲信。邓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引起陈的心腹对邓的不满。1919年在漳州时，陈的族人曾买通为邓铿做饭的仆人放毒药在饭菜内，企图毒死邓铿，因这个仆人见邓铿为人正直清廉，不忍加害而罢。陈炯明当广东都督时曾发行过一批兑换券，广东人称它为"陈炯明票"。老百姓对此种兑换券很不放心，不愿使用，兑换券快就大幅度贬值。陈炯明的侄儿陈达生和陈觉民利用时机操纵票价，大发横财。邓铿对此非常恼火，把他们叫到面前加以训斥，因此陈炯明的那些亲属爪牙对邓铿更为不满，多次阴谋暗杀邓铿。由于邓铿地位较高，他们一时难以下手。孙中山率粤军平定了桂系陆荣廷，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他们谋害邓铿的阴谋活动也步步加强。这年初，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的职务，陈炯明即把邓铿看作是孙中山埋在他身边的一颗钉子，认为要公开武力反对孙中山，必先除掉邓铿。于是纵容他的那些亲信爪牙去除邓。

凶手是谁

刺杀邓铿得到陈炯明的默许已是事实，那么这次刺邓的直接凶手究竟是谁呢？由于当时行凶暴徒没有抓到，没有真凭实据，故邓案始终是个疑案。但是广东军政府对这次刺杀案是十分重视的，作了大量的调查和侦缉工作，认为这次案件是有内线联络和指使的。

那天邓铿去香港，是为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有粤军司令部里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北京政府中发生了直皖两派军阀间的矛盾，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被直系军阀打败，解除了职务，段祺瑞极全力组织力量反扑，到处派人游说拉拢人支持他，也派了一些人到广州活动。段祺瑞知道邓铿在广州握有兵权，周培善是邓铿的同学，于是派周去香港约邓游

说。邓铿接到周培善约他香港见面的电报后，决定去香港一次，并把情况告诉了陈炯明。他于20日上午和谢持两人一起搭广九火车去香港，临行时陈炯明还特意送他到楼梯口。但陈炯明对邓铿此行很不高兴，因为陈这时正同北洋的吴佩孚等暗中联络，怕邓铿和周培善说得投机，使孙中山和段祺瑞联合起来，打乱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因而把邓铿去香港的行踪告诉了陈达生。

陈达生是最痛恨邓铿的。除为操纵兑换券的事被邓铿训斥外，还因为曾要求担任广东盐运使、主持广三铁路和主持省立银行遭邓铿拒绝，故对邓仇恨很深。1921年，总司令部侦探黄福芝依靠陈达生和第一师的团长陈修爵的势力，从事武装贩运鸦片走私舰截获，走私鸦片价值达100万元，案情重大。事发后，陈达生和陈修爵求之于陈炯明，陈因兼任禁烟局长，不便说话，推给邓铿去处理。邓铿接案后，坚持严办，没收全部走私财物。陈达生见无可挽回，纵黄福芝逃往香港潜居。这次陈达生得知邓铿单人出行香港，认为刺杀邓铿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与在香港的黄福芝联系。黄福芝即在香港出巨额钞票买通一个黑社会歹徒，守候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伺机刺杀。邓铿到了香港后，和周培善只以同学之情交往了一天，即于次日一个人先返回广州。从车站出来时，天已将黑，人潮流涌，未及防范。当他步出大门临近汽车的一刹那，被歹徒迎面拦住击倒在地。由于身边并无警卫，无人追捕凶手，使凶手逃之夭夭。事后报纸上传出新闻，说歹徒是陈达生出钱所买，陈达生也感到害怕而逃到香港匿居。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政务厅厅长古应芬认为，歹徒仍匿居香港，如果不早翦除，必有大患，曾派夏仲民带一班人马去香港暗中察访，探得这次暗杀确系陈达生和黄福芝两人买通黑社会歹徒所为，要求港英当局协同将凶犯逮捕归案，引渡广州处置。但港英当局慑于陈炯明的势力而不予答应，终使凶手逍遥法外。后来，陈达生一次在戏院看完戏出来，密探将其击毙于戏院门口，为邓铿报了仇。

邓铿遗体遵照他生前遗愿，原葬于广州黄花岗。与朱执信墓相邻，后来迁入黄花岗。廖仲恺先生曾有悼词曰：“仲元遽遭惨害，吾党继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诉及良友，辄多潸然出泪！”

（陆仰渊）

风云人物

李立三

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3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4月调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上海地区工人运动。1926年5月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同年9月任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主任。1927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同年6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负责领导武汉和华中地区的工人运动。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他是五名常委之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到香港、广州地区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工作。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冬至1930年秋，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它在党中央的统治。他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认识并改正了错误。1930年底，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赴苏联学习。193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被派往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称苏联外文出版局）任中文部主任，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译工作，并担任过《救国时报》主编，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回国，先后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等职，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负责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1949年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职工运

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9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1955 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 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政协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1967 年 6 月 22 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 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苏 兆 征

苏兆征(1885——1929)　广东香山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少年时随父务农，后读了三年私塾。1903 年，被迫到香港去找职业，经别人介绍在一条外国轮船上当"侍证"(即杂役)，后相继在"乐生"号上当过"车臧"、"塔夫"，在"总统"号上当过扫地工。1908 年加入同盟会，后被捕入狱，一年后获释。十月革命后，大力宣传革命真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0 年与林伟民等筹建海员工会。次年 3 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1922 年 1 月，领导了海员大罢工，被选为罢工总务部主任，后任代理会长。

1925 年春，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北京召开，他代表广、港工人出席。在李大钊等人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5 月，返穗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参与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上海五卅惨案后，参加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次年五一节，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选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6 年底，国民政府迁武汉，任劳工部长。5 月 9 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6 月 19 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开幕，继续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7 月，汪精卫叛变活动日趋明显，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党员。他发表《辞职书》，并将劳工部十多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发给失业和贫苦劳工。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与瞿秋白、李维汉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兼管工委工作。1928 年 2 月，在上海秘密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用工厂委员会形式团结广大工人进行斗争的策略。不久，主持召开太平洋职工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他从 1924 年起是该会主席团成员，秘书处负责人之一)。会后赴苏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1929 年 1 月，因病从苏联回国。2 月中旬召开中华全总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精神。1929 年 2 月 20 日在上海病逝。

蔡 和 森

蔡和森(1895——1931)　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上海。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899 年，因家境贫困，随母葛健豪从上海回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原属湘乡县)外祖父家，伴表兄读私塾。1908 年秋，到杂货店当学徒。学徒期间，坚持自学，寒冬酷暑从不间断。1911 年秋，入永丰镇小学读书，1913 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 年 3 月，一师与四师合并，从此与毛泽东相识，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1915 年，转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18 年 4 月与毛泽东等共同创建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骨干。1918 年 6 月到北京，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组织在京的湖南青年投入运动。

1919 年 12 月，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等，从上海乘船去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此期间，收集各种重要书籍约百种，"猛看猛译"，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20 年 8、9 月间，在写给毛泽东的两信中，明确提出按列宁建党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作了详尽的论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系统论述建党思想的开篇之作，也是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1 年 10 月，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同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进行斗争，被驱遣回国。1921 年底在上海由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22 年 9 月至 1927 年初，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撰写了一百余篇文章，在理论和宣传战线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上，曾不同意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三大以后，同李大钊、张太雷等以个人名义第一批加入国民党，并围绕国共合作问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重视对工农运动的指导。1925 年 2 月，提出了"武装工农"的思想。同年 5 月，与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等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10 月，偕李立

三、向警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期间，应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邀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27年春，回国来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湖北期间，坚决反对陈独秀妥协投降的政策，提出用暴动对付暴动的正确主张，建议中央"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大革命失败后，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信，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反对"逃跑主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他与毛泽东等人一道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会后，受中央委派，以中央特派员(后改称为巡视员)身份，前往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并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1928年6、7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出席会议，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回国后，因反对李立三的某些"左"的主张，被斥为"右倾"，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他顾全大局一边养病，一边从事理论方面的著述。在此前后，写了《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论陈独秀主义》等重要文章，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既深刻地剖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批评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些文章中也流露出某些"左"的情绪，这种矛盾的思想状况，是不成熟的党的特征在其领袖人物身上的反映。1929年1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后来在讨论"立三路线"时，对李立三进行了热情帮助，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1931年回国。3月，被派赴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6月10日，在出席海员工会会议时，被叛徒指认，与施滉等五人一起被捕。中共组织派人营救未成，被香港当局秘密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8月惨遭反动派杀害。主要著作收入《蔡和森选集》。

邓铿

邓铿，名士元，字仲元。1886年1月31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父邓薰玉、父邓丽川，世在归善(今惠阳)淡水行商，邓铿从七岁起随父住在淡水。

邓铿九岁就学于归善，稍长肄业于崇雅学堂。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愤懑不平，亲见亲闻孙中山领导的1900年惠州起义，为之慨叹不已，与友人辄以革命相勉励。1905年，他考入广州将弁学堂，列步兵科第三班肄业。翌年春卒业，留学堂充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法政学堂体操教习。1907年充学兵营排长，代理左队队官。1909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常以革命思想教人。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同盟会筹划再举。是年冬，邓铿去香港见赵声等人，拥赞再在广州举义。不久，同盟会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为在广州先期凭屋设立秘密机关，邓铿慨然以其父所营米店署保，表示：即有不虞，毁家不顾。不幸1911年4月27日的起义没有成功，邓铿出走匿居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决定广东迅速响应。除由胡汉民、朱执信负责在广州起义外，另于各江成立四个军分别行动。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第一军担负攻略清陆路提督所在地惠州的任务，邓铿任第一军参谋长。10月30日，陈、邓等潜入淡水，以民团发难，收缴巡防营的枪械，进攻归善城。当时第一军面临敌众我寡、枪械不足的形势，激战数日，几濒于危。邓铿身先士卒，率众冲锋，在民团配合下，终于击溃清军，进驻归善城。清提督秦炳直投降，所属巡防营洪兆麟等四营被收编为一团。惠州之捷先声夺人，北江、西江、韩江诸路义军亦起，全省大震，11月9日广州即告光复。

广州光复后，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当时各路民军云集广州，秩序很乱。陈炯明被举为副都督，任邓铿为陆军混成协协统，负广州卫戍之责。12月下旬，胡汉民随孙中山赴南京，旋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以副督代理都督职，邓铿任都督府陆军司司长兼稽勋局局长。他协助陈炯明编遣民军，建立正规的陆军两个师和一个旅以及警卫军数十营。1912年5月，胡汉民自南京回任，邓铿仍任都督府陆军司长，整军除盗，多所擘划。不久，都督府改制，裁陆军司，邓改任都督府参谋长。他斡旋于胡汉民、陈炯明之间，调解他们的矛盾，成为胡陈合作的纽带。

海南岛为我国防要地，帝国主义多方觊觎。胡汉民特派邓铿为琼崖镇守使兼办琼崖民政事宜。1913年3月邓到海南岛后，鼎新革故，遣散旧防营、师船，致力于交通垦殖、开发利源、移兵为工、建设国防。当时有贩卖人口出洋的"猪仔头"，在帝国主义领事唆使下拐骗了五百多人，邓将四个"猪仔头"捕获枪决，受到民众赞扬。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赣、苏先后宣告独立。这时陈炯明已任广东都督，奉孙中山命于7月18日宣告独立。龙济光受袁世凯命为广东都督，率部自西江入粤，迫近三水河口，广州危急。邓铿奉命回省，即赴三水督战。但因驻广州燕塘的炮兵团突然炮击都督府，8月4日，陈炯明仓惶出走，局势急转直下，广州被龙济光占据，讨袁军事失败。邓铿被褫职通缉，避往香港。

是年冬，邓铿经上海去东京，谒见孙中山。1914年春，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党，严格吸收党员，立誓约，按指模，严密组织纪律，要求绝对服从总理领导。当时，袁

世凯四处捕杀革命党人，革命处于低潮。邓铿置身家于不顾，坚决信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孙因此而对邓倍加亲信，任为军务部副部长，佐许崇智筹划军事。邓即赴香港，负责开展广东方面的讨袁军事活动。同年夏，率陈可钰、李杰夫、罗翼群等在饶平、黄冈举义，另命洪兆麟在惠阳发难，并遣布耀庭到广州运动龙济光军某部，但均未成功。继以军费无着，无力再举。在此期间，邓曾遣怡保归侨鍾明光刺龙济光，未中而鍾牺牲。1915年10月，邓奉孙中山命赴新加坡筹募讨袁军费。次年4月，从香港潜入广东增城，策动旧部防军统领徐连胜反正，因受徐部下阻挠未果。5月中，再入增城，促徐连胜部反正，旋攻占石龙、博罗。邓出任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与广州、惠州、东莞三面来敌苦战月余，以机智勇敢击溃敌人。6月袁世凯死，讨袁军事结束。邓铿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被留下赞划党务和军务。

1917年春，邓铿赴日本养病，考察军事政治。夏，奔父丧，经沪回粤。7月，孙中山率驻沪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邓铿葬父毕，即应命到广州参与护法。冬，军政府成立粤军，准备援闽。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邓深感护法不止援闽，还要问鼎中原，直捣北洋军阀巢穴。他征得孙中山、陈炯明同意，广招军事人才，电邀蒋介石、吴忠信等来粤参赞军机，任为粤军总部参谋等职。粤军当时为二十营，仅有枪五千，器械窳败，糈饷支绌。经过在潮汕增莫和集训，扩得十营，力量渐见充实。1918年5月17日，粤军全线向福建进攻，进展顺利，连克闽西南二十余县，8月，粤军总部进驻漳州。邓铿进一步协助陈炯明整顿扩充队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粤军发展到二万余人，正式编为两个军，陈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仍任总部参谋长。

1920年6月，孙中山电令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铿坚决响应，并敦促犹豫观望的陈炯明服从命令，挥戈返粤。邓亲赴福州与福建督军李厚基接洽合作办法，商定将闽南交李，由李接济粤军军费，并巩固粤军后方。8月，驰铿统率第一军的洪兆麟、熊略、梁鸿楷等部为左翼，直趋韩江下游，从云霄、诏安攻汕头。不旬日即克黄冈、澄海而攻潮安。接着与右翼许崇智等各路会攻惠州，邓由龙门、平湖直攻石龙进取广州。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桂系军阀败走。

11月，孙中山自沪返粤，重组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决定建立粤军第一师，任命邓铿兼任师长。粤军这时已扩充达八九万人，品类复杂；又因援闽、回粤接连胜利而渐渐骄悍与腐化。孙中山嘱咐邓铿选择素质较优者编建第一师，严格训练，以为全军模范。邓励精图治，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培养成具有政治觉悟、坚强意志、英勇善战的部队。邓重视军官的选拔和训练，设军官教育班、军士教导班，予以严格训练"，尝谓"有强将无弱兵"，"要强兵必先强将"。他选配陈可钰、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叶挺、李章达、陈铭枢、蔡廷锴、薛岳、蒋光鼐、陈济棠、缪培南、余汉谋等人分任第一师的团长、参谋长、参谋处长、营、连长等职。

邓铿治军严谨，廉正不阿，嫉恶如仇。对军中不肖分子包庇烟赌的行径，毫不徇情，迭次派出宪兵，缉拿偷运烟土者。一次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烟土两百多担，查明系陈炯明部属洪兆麟、陈炯光、陈觉民等人伙同所为。邓不予宽容，召集各界代表和各国驻穗领事共同监视烧毁。时人赞颂为林则徐后第二次焚烧鸦片。自此陈炯明亲旧对邓畏惮，含恨在心。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为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统一全国。6月，桂系军阀在直系支持下集重兵分三路窥粤，孙中山决定组成援桂军予以讨伐。邓铿率第一师奉命留驻广州坐镇，击溃突由北江来袭之沈鸿英部，收复连阳等县。援桂军于6月25日占梧州后长驱直入，三个多月即底定广西。孙中山拥有两广后，决心全力北伐，12月10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邓铿由第一师抽调叶挺、薛岳、张发奎三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派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率领前往。陈炯明以种种借口反对北伐，拒不参加大本营会议。孙中山约他到梧州、肇州会昭，他也不理会。邓铿虽多次说服、催促，他只敷衍。邓为弥合孙陈嫌隙，多年来斡旋转圜不遗余力。遇有分歧矛盾，纵或一时未能解决，亦必善为延待；若受令转达，每每婉转其词以曲达其意。他曾对人说过：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1922年3月，前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周善培来广州·"观光粤政"，邓铿以师礼亲赴香港迎接。21日傍晚回到大沙头广九车站，突遭奸徒手枪袭击，腹中两弹。邓负创奋力追踵凶手，不获；急登车回省长公署，随入韬美医院救治，23日凌晨逝世，年仅三十八岁。广州及桂林"袍泽"闻讯，无不恸哭。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追赠邓铿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并为他亲书墓碣。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王宠惠

王宠惠，字亮畴，原籍广东省东莞县。自其祖父起，把家搬到香港。父煜初是香港基督教堂牧师。王宠惠1881年（清光绪七年）在香港出生，家住香港荷理活道七十五号，与孙中山早年学医之西医书院为近邻，因此，王从少年时就和孙相识。

王宠惠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学英文，继入皇仁书院肄业。189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0年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1901年往日本留学，研究法政问题，并曾参与秦力山、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任英文记者。随后转赴欧美留学，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又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的会员。他将《德国民法》翻译为英文，被英、美各大学采用为通行的教本。

1904年孙中山到达美国纽约。王宠惠见着孙中山，听孙谈论有关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计划。王协助孙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文章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劝说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给以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王加入同盟会，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

1911年9月王宠惠由欧洲回国，抵天津时，武昌起义爆发，即赴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1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开始议和谈判，王受派为民军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接着孙中山自美洲归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宠惠以广东代表身份出席会议，被推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副议长。1912年1月3日王宠惠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袁世凯政府成立，王任唐绍仪第一届内阁的司法总长。6月，唐绍仪忿于袁世凯的独裁，辞职出走，王也继唐绍仪之后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改当外交部顾问。不久又往上海，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兼在孙中山所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13年受聘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当年著有《宪法平议》，随后又著《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他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1916年护国运动发展，5月西南方面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命王宠惠为外交副使，他在上海曾有所活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总统。1917年王宠惠赴北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20年改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回国后，于12月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

这时，美国为了控制中国，加紧侵华活动，增加对华投资，注意支持和培植亲美的政治势力。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1922年5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要求"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他们草拟了"政治计划"，争取美国公使芮恩施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支持。6月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入京取代徐世昌，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王任司法总长。8月初国会开会后，黎正式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名单中王改任教育总长。因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激烈反对，唐阁没有组成，便由王宠惠兼代总理。9月19日，王宠惠在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字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入阁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因此，这届内阁被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操纵在直系军阀手里。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帝国主义乞讨借款，为军阀筹措内战经费，引起人民的不满。当时直系内部分为以曹锟、曹锐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王宠惠倾向洛派，对其提供较多的军费。保派对王宠惠内阁十分不满，企图通过推倒内阁，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夺取大总统的"宝座"。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对罗加以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事件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锟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主张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只得屈从于曹，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的支持，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由汪大燮署理阁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党反动政府。6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部长。1928年8月王当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效劳。1929年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国际联盟再次选他为海牙法庭正法官。11月兼任内外债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初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统治合法化，命王宠惠等草拟《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选任"，严重地剥夺了人民的合法权利。1931年2、3月间，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派"胡汉民等为争夺权力，发生冲突。在蒋扣押胡汉民后，又触发了两广的反蒋行动。王宠惠的态度倾向于两广方面，4月他和孙科一起离职，从南京赴上海。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下台，王宠惠不愿深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起程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职务。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曾选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他未就职。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1936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庭法官之职。这时正当全国抗日运动高潮，他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后，他们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联合抗日之后，

于1937年3月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久又兼代行政院的院务。当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平津后，又于“八·一三”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时，王宠惠等在全国抗日洪流的压力下，曾于1937年8月14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抗日声明，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改变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但又不敢顺应人民的要求，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而为以后的“和谈”以至妥协投降保留退路。同年11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会议上，英美政府企图牺牲中国，为日本传达所谓和平条件，促蒋介石集团放弃抗日，外交部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指示出席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说：“我国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表明当时国民党政府希望中国恢复九国公约维持下的半殖民地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以英美利益为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王宠惠也从外交上加以配合。1941年蒋介石集团阴谋制造了包围新四军的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王宠惠等歪曲事实真象，颠倒是非，通过胡适等人在国际上造舆论，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吹嘘国民党军事部署周密，“即令共军续有异动，必可立予制止”。1941年4月王调离外交部，后来改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2年2月王宠惠随蒋介石访问印度，1943年11月又随蒋赴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4月中国派出有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王宠惠是当时国民党派出的代表之一。

1946年11月蒋介石非法召开了反共反人民的伪国民大会，王宠惠参加了大会并参与伪宪的制订工作。伪国大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内战“合法”化。宪法规定大权集中于总统的一身，它可以不受刑事诉究，任期六年连选连任。与此相反，人民、地方和议会处于无权的地位。王宠惠还赶忙写了《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一文，吹嘘伪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竭力掩盖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随后，王宠惠再次任司法院院长。1949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的前夕，王宠惠逃往香港，不久转赴台湾，1958年3月15日病死于台北。

（摘自《民国人物传》）

吴景濂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别署晦庐，晚年又自称“抱冰老人”，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县）人，1873年3月18日（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生。父吴大祥，在乡经商。吴景濂于1882年入塾读书，1894年考取秀才。1898年参加乡试，中第六名副车。后在家设馆授徒。戊戌变法时，吴同情维新派主张。

1902年冬，吴景濂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四年后毕业，学部奏请给举人出身，并授给候补内阁中书，加五品衔。1907年春回籍，经奉天提学使张鹤龄聘为奉天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吴在奉天创办全省教育总会，被举为会长。1908年，他又在教育总会内设立宪政讲习所，鼓吹立宪，从而获得一些声望。是年夏，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资助下，吴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09年10月，奉天省谘议局成立，吴被选为谘议局议长。其时，他极力主张编练全省预警（后改称“保安团”），兴建全省水陆交通网，并想通过向英美借款，开发东北资源。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奉天的一些革命志士曾要求吴景濂宣布该省独立，但吴借口“事关重大”，予以拒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吴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乃极力拉拢革命党人，谋议通过和平方式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宣布独立。赵尔巽闻讯，立即调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部进省镇慑，使宣布独立的计划告吹。11月12日，赵尔巽操纵下的“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赵被推为会长，吴景濂任副会长。这时，吴看到巡防营张作霖军队调省益多，形势日恶，又接到驻奉天巡防营另一统领冯德麟关于“省城保安局面恐生变化”的密告，预感到自己在奉天处境有危险。时苏浙有召集各省代表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之议，吴作为奉天谘议局选出的省代表，于11月24日潜出沈阳，南下赴沪，参加会议。12月29日，他在选举会上投了孙中山的票，并参加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工作。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吴景濂当选为参议员。这时政党林立，吴急谋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乃在南京参与筹组统一共和党的活动。4月11日该党开成立大会，吴被举为参议。统一共和党介于同盟会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之间，是当时重要的第三党，举足轻重。4月底临时政府北迁，参议院重选议长、副议长。共和党为了削弱同盟会的势力，与统一共和党“暗相提携”，愿以正议长相许让。吴善于钻营，被统一共和党提为议长候选人。5月1日吴景濂被选为正议长。继而统一共和党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选举中夺取选票，决定与同盟会联合。8月25日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吴景濂被选为理事。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采参、众两院制，吴景濂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并被国民党推举为众议院议长的候选人。但袁世凯不愿国民党人当众议院议长，授意选进步党人汤化龙为议长，吴遂落选。国民党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孙中山曾派人至京要吴景濂南下讨袁，吴竟然拒绝南下。7月31日，袁世凯悍然传讯在京的

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员，令限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开除出党，并自行宣布“不与逆谋”。8 月 3 日，吴景濂以国民党北京支部长的身份前往警备司令部，公然申明遵令将黄兴等五人开除出党。吴对袁这般恭顺，所以 10 月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后，吴被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 年 8 月间，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帝制活动大力鼓噪时，孙曾请吴景濂加入。吴善于观察形势，他对袁称帝之能否成功，心存怀疑，遂谢绝参加。1916 年 3 月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攻击下被迫取消帝制后，妄想保住总统职位，吴景濂当时躲在天津，他看出袁之败局已定，乃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反对袁继续任总统，袁十分恼火，当即下令予以通缉。吴潜往大连，联合东北革命党人杨大实、顾人宜、赵忠鹄等发起“三省公民讨袁协会”，促袁世凯尽快下台。他的这一行动，又为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

6 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而掌握实权。8 月 1 日国会复会，吴景濂回北京参加国会。复会后的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互相抗衡。吴景濂和张继、王正廷等又挂出“宪政商榷会”的招牌，同进步党的宪法研究会进行斗争。不久商榷会又分裂为四派，吴景濂归入“益友社”一派。这些派系虽然各立门户，但无助于大局。因为这时的政局，既有南北的区界，又有直皖的分化，复有府院之争。国会中的党派，只不过在一系列政潮中推波助澜而已。1917 年 5 月 28 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在府院之争中辞职，吴景濂继任议长。6 月 12 日，黎元洪被迫非法解散国会，19 日吴景濂赴天津。张勋复辟后，吴与在津的六十五名国会议员一起通电讨伐复辟。

7 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揭起护法旗帜，吴景濂赴粤参加护法运动。8 月 25 日，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吴景濂仍被选为议长。9 月 1 日，国会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建立护法军政府，吴被聘为军政府高等顾问。不久，国会决定继续审议未完成的宪法草案。吴景濂派议员分赴京津沪等地，联络各省议员来广州开会，到 1918 年 9 月，以候补议员递补方法凑足法定人数，国会正式开会，吴再次被众议院举为议长、主持宪法会议。到 1919 年 2 月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议员星散，宪法会议告中断。吴景濂亦离广州到上海去了。1921 年 5 月孙中山第二次回广州，重组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吴正在上海办交易所。孙中山电吴“盼速偕留沪议员来粤开会”。但此时已在直皖战后，吴景濂默察全国形势，不愿再回广州，旋即借口母丧回籍，闲居天津，等待时机。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吴景濂见时机已到，便设法接近直系。曹锟想当总统，吴景濂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等向曹、吴献策，在驱逐徐世昌后，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指民六国会）作为“过渡”，然后“名正言顺”地扶曹上台。曹、吴同意后，吴景濂从保定回到天津，积极进行倒徐世昌的活动。5 月 16 日，吴与王家襄打出了“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的招牌，6 月 1 日在津召集一些国会议员开会并发表宣言，宣称即日行使职权，同时宣布徐世昌为“非法总统”。曹、吴暗示各省直系军阀立即通电响应。吴佩孚并出面号召，为使“法统重光”应召集民国六年旧国会，并愿拥黎元洪复职。吴景濂与王家襄当即前往黎宅敦请黎元洪复出。11 日，吴从天津亲送黎元洪赴京就职。次日，吴在京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到 8 月 1 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次正式宣布复会了。黎元洪也深知自己地位的危险性，便竭力拉拢吴景濂。10 月 10 日，授给吴景濂勋一位及一等文虎章。

曹锟把复会的旧国会看成自己手中的工具，为迅速完成“过渡”，必须利用国会把黎扶起后，再把他赶走。11 月 18 日，在曹锟授意下，吴景濂等出面，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的金佛郎一案中有“受贿”情事，迫使黎下令逮捕罗入狱。此举目的在于推倒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的“好人内阁”，为曹锟篡夺总统职位扫清道路。与此同时，吴景濂等人与曹家兄弟在国会内外加紧活动，收买议员，做“驱黎拥曹”的准备。经过他们一番紧张活动，1923 年 6 月，终于把黎元洪赶下了台。然后以五千元乃至万余元一张选票的高价，贿买大批议员，在这年的 10 月 5 日，把曹锟选为“大总统”。8 日，吴景濂亲赴保定，向曹锟呈送总统当选证书。随后，吴等又匆匆地搞了一部“宪法”，以图掩盖他们的贿选丑行。

曹锟登上总统的宝座后，吴景濂满以为自己包办贿选有功，一定会被曹锟派作内阁总理。“讵知曹锟甫得当选，即背义食言”。12 月，众议院内有一派拥高的议员提出吴景濂任期届满，应改选议长。同时，吴又听到不利于己的消息，便于同月 21 日携带众议院印信潜逃天津日租界匿居。北京地方检察厅以吴毁坏文书罪提起公诉。吴闻讯乃秘密东渡日本暂避。

吴景濂隔年后回国，闲居天津，虽企图东山再起，终无所获。随后便以皈依佛法为名，无所事事。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翌年，“国联”李顿调查团经过天津时方问吴景濂，吴如实向李顿陈述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及东北民众的真实心愿。“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企图拉吴下水当汉奸，吴以老病托词拒绝。1944 年 1 月 24 日，吴景濂在天津病死。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铁事

安源工运中的廉政建设

20年代初期，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不仅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而且它在廉政建设方面也很有特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

早在安源工运开始萌芽的时候，毛泽东就提议，以真正为工人谋利益，解除工人所受阶级压迫与痛苦为宗旨，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把路矿两局广大工人团结起来。俱乐部成立后，为了充分体现和贯彻这一宗旨，按照“民主的集权制”原则，以“十人团”为基层单位，建立了代表会议制度，让工人直接参加管理。同时，为能忠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谋取私利，俱乐部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均经俱乐部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具有绝对权威，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不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部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被依章制裁。例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规定：“凡各代表、股长、干部有不称职时，得由主任团或总代表提出于总代表会议依法处理之。”《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也规定：“社内发生无意之损失，或帐目朦糊或有其他事情者，得由总经理会同俱乐部主任团查明免职，并照数赔其损失。”当时，俱乐部一个股的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被发现并经查实后，俱乐部代表会议便依章作出将陈的房屋用具封存、限期缴还欠款、免除经理职务的处分决定。

俱乐部还建立了民主监督机制，把制度管理工作完全置于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例如，在财务管理上建立了“公布”制度，规定“每月须在本部公布一次”帐目，让工人了解收支情况。在现今保存的安源工运档案资料中，发现有当年俱乐部“对于消费合作社、教育股、会计股、庶务股之帐项，每月均审查过一次，审查无讹后，即由本会审查部主任及委员盖章，张贴本部前门”的详细记载，可见其管理制度之严密和监督机制之健全。也正是这种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监督机制，才有效地限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大大促进了清正廉洁风气的盛行。

（二）

为了防止和清除腐败现象，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安源党的组织和俱乐部还十分注重思想教育工作，并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22年9月罢工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以权谋私、违反纪律者也有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李立三、刘少奇等先是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们反复地教诫大家“我们(是)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的；但是，“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酬报，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得很不平等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并要求大家”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做出违背主义的事情。”他们还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在1923年8月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即对俱乐部主任团的工作“大散漫、大无系统……有点官僚的态度”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又对自己“对工友交际和谈话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了坦诚的剖析。正是这些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无私无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帮助处于幼稚阶段的工运领导人逐渐走向成熟，牢固地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引导和团结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的道路前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安源工运中廉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领导者模范地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

在整个工运过程中，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人，始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刘少奇积劳成疾经常吐血，仍抱病工作；一双袜子没有底还在穿，有时吃饭没有菜就用开水泡。罢工胜利后，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资，工人代表会议一致提出要给俱乐部的负责人每月200元光洋的饷薪。可李立三、刘少奇坚决不同意，谢绝了代表和工人们的好意。为了不让俱乐部的领导者享受超出工人生活水平的任何特权和津贴，他们还主持召开俱乐部干事会议，议决本部职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不得超过15

元，并率先执行。据当时俱乐部会计股的财务报告记载，李立三从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共10个月中合计支洋145元，刘少奇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0月共14个月中合计支洋199元，平均每月都不到15元，同工人保持相同的水平。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人谋利益，“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力”的精神，受到工人的高度赞颂。工人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正是领袖们的廉洁自律和无私奉献，使这里的党组织同工人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成为人民群众能长期跟党同心同德英勇奋斗的重要保证。

70年前安源工运中廉政建设的这些经验，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荣革命传统，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廉洁奉公的精神，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时、处处、事事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选自《党史文苑》，94年3期，作者：朱吕）

二十年代毛泽东与胡适的交往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但对二十年代，毛泽东作为胡适的崇拜者与胡适的历史联系却知者甚少。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还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在五四时期，毛泽东不仅具有反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对胡适是非常佩服的，并把胡适作为楷模。也是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的来往以及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留下深刻的痕迹。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先后就学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前后，提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62年病逝于台湾。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后期，经杨昌济的介绍，成了《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那时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胡适的名字并不陌生。特别是他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参加了几个学会，旁听过胡适的讲课，并拜访过胡适。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创办文化书社，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主要负责人作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则决定不去法国，这很出乎大家意料。对此，毛泽东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非留学篇》（一）、（二）、（三）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号。文章主旨是呼吁设立国立大学以救国中无高等学府之失。胡适不曾想到，他这篇只印发了数百份的文章在五年后会被毛泽东引为同调。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暂不出国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想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更为有利，但与胡适的赞同、支持和影响却是分不开的。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也这样做了。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论文时，胡适看后便在他主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

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有人说，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面对如此巨大的恶势力，加上来自反动军阀的政治迫害，胡适当时敢于那样义无反顾地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地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视之为自己的"好兄弟"，应该说这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

在胡适的影响下，毛泽东曾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不久即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但在当时提出研究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革，这对反对封建保守势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很可能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受其启发，于同年9月1日提出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散发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其中还包括胡适十分感兴趣的"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等。该章程原拟在《湘江评论》上公开发表，由于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故未能刊出。为此，邓中夏便以邓康的笔名将《章程》全文刊登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在章程之前，附上"邓康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后来，这个问题研究会并未发展会员，成立组织，正式开展活动，始终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我们今天从这个章程的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来看，显然是受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按照胡适提出的主张，成立"问题研究会"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到了1920年，毛泽东对"主义与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了重新的认识。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蹦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显然，这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主义"的重要性，否定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对"问题研究会"的宗旨作了重要修正。

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时，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了胡适的意见。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这个建议也被毛泽东采纳了。胡适所以把它改名为"自修大学"，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作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进步的。但是，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毛泽东同胡适的看法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显而易见，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是与毛泽东不辞劳苦的筹建与胡适的参谋作用分不开的。

正因为毛泽东与胡适之间，不仅有一定的往来，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受过胡适思想的影响，对毛泽东所进行的一些革命活动，当时胡适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与帮助。所以，当时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的。这从毛泽东在1920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信的全文是：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

教安

此信是明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信中提到的"张"即指作恶多端、为湘人恨之入骨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曾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为领导者之一，于1920年1月15日拜访胡适，吁请他的支持。此信写于驱张运动胜利后，表明毛泽东不仅感念胡适曾给予的支持，而且想继续借重胡适的声望解决湖南问题。此信完好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毛泽东与胡适真实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1921年7月，毛泽东联合湖南各界知名人士27人，

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租了三间房，创办文化书社，作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总机关，毛泽东亲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在书社经售的书报杂志中，有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杜威五大讲演》，还有其它一些介绍实验主义的读物，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民族的发展》等。毛泽东把这些书作为经过严格选择的有价值的新出版物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如何从政治思想上评价前期的胡适，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最早对胡适作出认真评价的是毛泽东。1923年4月他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式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这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把胡适划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

（选自《党史博采》94年5期，作者：武在平）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

少奇很少谈他的光荣历史。1948年，他曾对我说："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他的谦虚，使我深受教育。但是，他在同老同志、亲戚、旧谊来往中，在谈论其他问题时，难免要涉及他的过去，因此，我还是零零星星地听他讲起过去的一些事。

少奇记不得自己的生日，结婚后我曾问过他，他说不知道。当时我还很有意见：工作中的事保密，生日还跟我保密?!其实，经历数十年忘我的斗争生活，他确实忘了自己的生日。解放后，我根据他的家乡来信才查出他的生日。

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本来，还有两个弟弟，因家中条件不好，生下不久就死了。少奇小时候身体不好，有胃病，还得过肺病。上私塾前，他帮家里放牛、割草、砍柴，上学后在假期里也要放牛，同时不是吹笛子，就是读书，常常忘了吃饭，这些都是他得胃病的原因。为了锻炼身体，少奇小时候练过武术，"文革"前，家乡旧居纪念馆还陈列过他练武时用过的一条木棍。上学以后，他踢过足球。小时候的少奇曾跟妈妈去烧香拜过佛，姐姐结婚叫他去送过亲。他还多次谈过，他家里妇女不能上桌子吃饭。封建习俗的不合理，使他很反感。

少奇从小就喜欢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他正式读书时是八岁，由于书看得较多，知识比较丰富，得个绰号叫"刘九书柜"(按祖父大排行，兄弟间他为老九)。1961年回家乡，我还见到一本他当年读过的《了凡纲鉴》。1912年，少奇的二哥(即大排行的六哥)刘云庭回到家乡(云庭原是湖南新军三十九标的连副，他所在的部队响应武昌起义，在援鄂途中被解散了)，带回来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少奇认真读了这本书，并看了不少当时的传单，受到了影响。在他再三坚持下，他姐姐帮他剪去了辫子。

后来，少奇进了玉潭学校。在这里，他对数理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很感兴趣，也具有了初步的民主思想。

1916年，少奇进入宁乡驻省中学学习。他本来考取的不是这所学校，但民主革命先行者黄兴早年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少奇那时很崇拜孙中山和黄兴，因而他直接插入了宁乡中学的二年级。

就在这年，少奇的母亲和兄长作主，让他与邻村麻雀塘的周姓姑娘结婚。少奇这时已有了民主思想，认为婚姻应当自由，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但是，家里以母亲生病为借口，把他从学校骗回家，逼着他结婚。少奇坚决拒绝，当天晚上，他一夜没睡，坐在灯下看书，第二天凌晨就逃走了。后来，他托表兄成秉真转告周氏，要断绝婚姻关系，周氏不同意，说她绝不能回娘家，恳求允许她住在刘家，并希望少奇以后给她个儿子养老。周氏实际上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少奇对这件事是处理得好的。后来，他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给了周氏，并托人将何宝珍烈士所生的大儿子刘允斌(葆华)送她抚养。

1917年春，少奇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这年秋天，讲武堂毁于南北战争后，他回到家乡，但一直没在家里住，住在表兄成秉真家，与成一起读书，探讨问题。成秉真和刘云庭、陈步舟、周立三等四人对少奇的少年时代影响很大。他们四人同庚，思想都比较进步，除成秉真专习中医外，刘云庭等三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

少奇在少年时，常常到一山之隔的首自冲周祖三家看书。周立三、周祖三兄弟的父亲叫周瑞仙，曾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家里有不少新书，少奇常去看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同时，周家男子不蓄发，女子不缠足，也使少奇颇感新奇。

从讲武堂回到家中，复习了一段时间课程，为了得到一张文凭继续升学，1919年初少奇考入了长沙一所私立

中学——育才中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少奇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撒传单。那年暑假放得早，他立即赶到北京。刚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尾声，天安门广场还有学生在举行示威游行，还有天津的学生进京请愿，营救被捕的学生领袖马骏，少奇也跟着一起参加了。

在北京，少奇投考了北京大学等好几所学校，都考上了，但有的生活费太贵，上不起；有的包食宿的学校，如军需学校，他又不愿上。于是，他找到李石曾和范静生，要求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与李、范二人并不认识，是硬找上门去的。他们介绍他去保定，进育德中学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当时，刘仙洲在育德中学教机械学，教过少奇的课。解放后，少奇和我专门到清华园看望过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刘仙洲不记得少奇，他的学生太多了。少奇对他说：我曾在育德读过书，听过刘老师的课。

从育德毕业回到北京，找不到门路去法国。因为直皖战争，京汉铁路不通，又回不了家乡，只得住在鼓楼附近一同学家。由于没有钱，生活非常艰苦。但少奇在这段时间看了不少书和进步刊物，并与许多人甚至同善社的人有过来往，还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铁路通车后，少奇返回长沙，曾去船山学社看望贺民范老先生，贺当时是船山学社负责人。经贺介绍，少奇加入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去上海进了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去俄国学习。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俄语的是一个白俄女青年。在这里学习时，适逢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少奇和同学们争相学习。同时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杂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为了出国，少奇要六哥等帮助筹措路费。家里人不同意，以母亲的名义劝阻他。但少奇很坚定，他说：远离家乡，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

1921年初，少奇等同志去莫斯科，一路很艰难，处处遇到困难，火车时常停车，要他们到森林伐木。在西伯利亚，他们一个同行者的通行证被搜出，这个通行证是党组织发给他们证明身份的。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搜查者是谁，以为马上就要被抓起来了，结果搜查者正是红军，这才受到了热情照顾。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十分艰苦。在上海期间，由于他们热衷于上街撒传单等，并没有学到多少俄文，语言不通、课程很难掌握。俄国当时粮食很少，尽管给了中国学生较高的待遇，可还总是吃不饱。当时，少奇他们常用糖跟俄国人换土豆吃。在艰苦的情况下，少奇表现得很坚定。这段时间，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程，看到了列宁并听过列宁的报告，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1年冬天，他由罗亦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有几个中国学生实在坚持不下来，并对俄国革命表示怀疑。组织上决定，必须把这几个人送回国来。由谁来送他们回国呢？必须是立场坚定又有组织能力的人，于是决定派少奇把这些人送回国。这样，少奇于1922年春天回到上海。

回国后，少奇继续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开始了他长期的革命生涯。

（选自《大江南北》90年2期，作者：王光美）

朱德寻找共产党

1922年初夏，朱德放弃云南省警察厅长的职位，带一连人进了四川。在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招待。当时，刘湘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他谢绝了。他已决定不再惆怅，不再徘徊，他要追求真理，要一心一意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因为在这以前，他经过朋友的介绍，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初级读物，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他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他是一个立志拯救中国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抛开了金钱、地位和舒适的生活，告别了家乡、亲人和朋友，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找共产党来了。

他到了上海，开始踏进了这座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踏遍了整个大上海，看到了繁华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一派纸醉金迷的腐败景象，看到了衣衫褴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从工厂里倾泻出来，看到了外国小汽车撞死自己的同胞。总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社会。

朱德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他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北京给他的主要印象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在北京，朱德仍然找不到共产党的身影，他只好又回到上海，在那里谒见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陈独秀。这次会见时，朱德对于共产党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以后，他相信就可以从此踏上新的革命道路。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陈独秀对他十分冷落。在这位总书记看来，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和一部分象他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们的事，一个当时名声不太好的将军，一个参加多年军阀混战的“军阀”，为什么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也许，这是陈独秀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他冷冰冰地看着来客，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考验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默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大门，敲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然而，朱德并没有因此而心灰意懒，更没有因此而惆怅失望，因为，朱德终归是朱德。朱德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朱德是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朱德是决心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中国军人！他精神振奋，毅然决定到德国去求索。他读过马克思的书，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国不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要追求共产主义真理，就必须到共产主义的故乡去寻找那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不是说它在欧洲徘徊吗？

于是，朱德于 1922 年 9 月的一天，乘法国邮船“阿尔及利亚”号赴欧，先抵本次航行的终点法国马赛，接着抵达巴黎，继而到达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柏林。在那里，他碰到周恩来和许多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朱德在 1922 年这一年，从南方跑到北方，从北方又回到南方，从亚洲跑到欧洲，从法国又跑到柏林，象一匹脱缰的马，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奔驰，不辞辛劳地奔驰，不畏艰险地奔驰！他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一找到共产党，便立刻投入了党的怀抱。这是 1922 年 10 月间的事，那时朱德的年龄是 36 岁。

（选自《九大元帅珍闻轶事》）

颗颗爱心
——周恩来童年时的五位母亲

周恩来童年境遇坎坷，但对他倾注爱心的五位母亲，不仅从生活上关照了他，更重要的是对他优秀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见，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伟人、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其多方面的因素源远流长。

——编者

公元 1898 年的 3 月 5 日，在古淮安城驸马港的一所普通院落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家里人期望这孩子能给全家人带来祥和如意的生活，就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鸾。这就是后来的一代伟人——周恩来。

大鸾出生后的命运是极其坎坷的。从他来到人间到 12 年后离家赴东北读书，先后共有五位母亲向他倾注了爱心，以至在周恩来成长后，母亲们的性格、擅长等在他身上还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母万妈妈

大鸾的生母万氏，是清河（今淮阴市）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乳名“冬儿”。她属“庶出”，排行十二，娘家人都称她十二姑。她生得外貌美丽，心地善良，性格豁达开朗。她还敢于同陈规陋习作斗争，在那盛行妇女缠足的封建社会里，她却坚决不裹足。万知县十分钟爱她的这个争强好胜的女儿，经常带着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由于万氏聪明贤慧，见多识广，办事精细，在家时就主持了万府家务，出嫁后又掌握周家这个败落大家庭的全部事务。平时，周、万两府或者他们亲戚家出了难事，哪怕再棘手蛮缠，只要请来十二姑，便马上迎刃而解。后来她处理这些麻烦事时又常常带着爱子大鸾。日积月累，生母开朗直爽的性格，排解纠纷的果断能力等对周恩来日后治理国家以及他那惊人的谈判能力等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过继母陈妈妈

大鸾生下八个月时，他的十一叔周贻淦身患痨症（肺结核），在当时是治不好的绝症。大鸾的父母为安慰病者和家人，就按当时的习惯，毅然把大鸾过继给十一叔，借以“冲喜消灾”。十一叔的命当然没有“冲”过来，不久即故去。这样，刚刚过门一年的十一叔妻子陈氏便成了大鸾的过继母。

陈氏父亲陈源是位未第秀才。陈氏很小时，父亲就教她书画诗文，使她养成温文尔雅、恬静好读的性格。她恪守封建习俗，丈夫死后，经常闭门不出，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大鸾身上。三、四岁时，她就叫大鸾认字方，念唐诗，让他读书写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名句，大鸾早就背得滚瓜烂熟。认字、读书、写字累了，她就给大鸾讲故事。什么岳飞朱仙镇大捷、梁红玉击鼓战金山、洪秀全金田造反、关天培虎门殉国等等，她讲得绘声绘色，大鸾则百听不厌，终日“绕膝不去”。大鸾年岁稍大一点后，她又让大鸾看小说。《西游记》、《天花雨》、《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等等都成了大鸾常读的书。遇有不认识的字，陈妈妈就帮他查字典，和他一起理解书中的意思。过继母的好静秉性，给大鸾留下了良好影响，她精心指导读写等又对周恩来后来的渊文博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乳母蒋妈妈

大鸾八个月过继给十一叔为子后，陈妈妈还是位未足二十岁的少妇，就请了一位乳母和她一起抚养大鸾。她就是蒋江氏蒋妈妈。蒋妈妈家住淮安南门大街的小鱼市口，丈夫是个轿夫，家境贫寒。蒋妈妈勤劳俭朴，心地善良，一粒米落地上也要捡起来。她常带着大鸾在院内长瓜种菜，母子俩一起汲水浇园，许多农民种地的知识都让她带给了高墙深院中的大鸾。蒋妈妈还经常带着大鸾走亲串户，拜客访友，赶街上集。淮安最大的两个庙会：东岳庙

会和车桥庙会，蒋妈妈都带大鸾去看过。清代末期，淮安水旱连年，民不聊生。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在淮安城乡竖立起石碑，上面刻着农民必须缴租的条文。并把无力缴租、欠租的农民诬为"恶佃"、"顽佃"、"奸佃"、"刁佃"等等，都要"从重惩办、按律治罪、决不宽贷"。走投无路的淮安农民忍无可忍，群起砸了一些"逼租碑"。蒋妈妈就带着大鸾站在一些断碑前，给他讲农民奋起砸碑的故事。长此以往，大鸾与蒋妈妈感情深笃。在他到天津读书期间，蒋妈妈还专门乘船到天津去看望他。经济上还很穷的周恩来不仅热情接待，留住几天，临走时还买了毛巾、搪磁钵子等送给蒋妈妈。建国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这位乳母，还多次对从家乡淮安去的人询问蒋妈妈后代的情况。蒋妈妈的勤劳俭朴，爱憎分明的性格对后来周恩来的廉俭从政和富有正义感的性格都是个最早的铺垫。

干母蔡妈妈

大鸾过继母有位姨父龚怀朴，曾做过淮安县管钱粮的官，家里很富有。他去世后，儿子龚荫荪经常在外做事，家中只有陈氏的姨母、表嫂和三个孩子。陈妈妈在淮安举目无亲。有时便带上大鸾去看她住在淮安东岳庙的姨妈，也就是大鸾的姨外婆。这位姨外婆乐善好施，对聪明伶俐的大鸾十分喜爱。为怕大鸾有个万一，就按淮安旧时风俗，提议把大鸾认给自己儿媳做儿子。因为大鸾的表舅母蔡氏属牛，这样就可把大鸾永远"留"住。对姨母的细心、周到，陈氏感激涕零，给大鸾掌红烛，拜"牌位"，认了表舅母为干妈。这样，大鸾表舅母蔡氏就成了他的第四位妈妈。

蔡妈妈对大鸾也是体贴入微，倾心爱护。她虽是大家闺秀，却做得一手好针线。她象对待自己孩子那样，经常给大鸾做新衣服和新鞋子。这对家道衰落的大鸾来说，真是难得的温暖。特别是大鸾九岁那年，连续失去了生母和过继母，凄凉地从淮阴返回淮安，生活无从为计，只能靠典当度日。在蔡妈妈的安排下，大鸾进了龚家的家塾馆，和他的表姐龚志茹、表妹龚志蕙和表弟龚仁甫同窗共读，亲如家人。在蔡妈妈的家塾馆里，塾师周先生治学严谨，给大鸾以多学科的教育。特别是书法，他先要大鸾练颜体，要他写出"颜真卿的为官清正，刚正不阿"的气势来；后来又让大鸾加练魏碑，增添"刚烈雄劲"的笔锋。大鸾十岁生日，蔡妈妈还特意给家境已十分贫寒的大鸾办了一桌丰盛的家宴，并为他做了一双新布鞋。蔡妈妈不仅给了大鸾上学的机会，也使他享受到了童年的欢乐。特别是周先生将书法与人品结合起来的教学，不仅对后来周恩来颜体兼魏碑的笔法是个最早的锻炼，而且给他日后的坚韧刚强的处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养母杨妈妈

大鸾九岁带着两个弟弟回淮安后，父亲外出谋生，八婶母杨氏就成了大鸾事实上的监护人。八婶母是现任江苏省人大科教文卫负责人周尔辉的祖母。她好佛从善，常为失去母亲的大鸾三兄弟诵经祈祷。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关怀倍至。大鸾十一岁那年，龚家出事，干妈蔡氏举家西迁，大鸾兄弟只能与八婶母相依为命。无论是家务还是应酬都由八婶母提醒或者帮着操办。她还带大鸾拜佛烧香，要他为人从善，永远不做恶事。大鸾离家求学后，八婶母始终留在淮安老家看家守宅。建国初，周恩来曾把她老人家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直到这时，她还对周恩来说："我就晓得大鸾长大会做大官；因为我一直给你拜佛念经，求菩萨保佑。"1955年八婶母生病去世，周恩来给予了极大关心，百忙之中写信安慰，并两次向淮安县人委寄了生病治疗费和丧葬费共225元。

周恩来没有成为佛教徒，但他终生为人民"行善"，应该说是八妈妈的最早启迪。

周恩来作为一位世界杰出伟人，成长和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完全可以这么说，五位妈妈对他童年所倾注的爱心是造就这位一代伟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党史纵横》92年2期，作者：秦九凤）

胡适拒受北洋政府勋章

1922年10月，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离北京去山东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健全，小学与中学界限不明，中学教育又与高等教育脱节，这无疑不利于教育的发展。1921年教育界在广州召开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草拟了一个草案。

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广州议案为基础制定了一个方案。1922年10月山东会议上，胡适被推为本次会议制定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员。他采取折衷的办法，在大体确认广州议案的基础上，适当参考了教育部草案的内容。他所拟的草案被大会通过，于是年11月，以总统教令的形式予以公布施行。

这个学制案规定，小学分初级四年，高级二年，初级四年是普及义务教育；中学定为六年，以三三制为基本形式，而以四二制和二四制为变例；大学四到六年。该案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不仅主张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而且要小学高年级的设职业课程。它的宗旨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谋个性之发展"，也就是说要培养"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人；另一条是"注重生活教育"，就是

说教育要与实际结合。该学制案大体奠定了民国年间学制的基础，而且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初期。

1923年4月4日，北洋政府颁发勋章，因胡适办“鲁案”有力，奖给三等嘉禾章。胡适在《努力》杂志47号上公开声明：“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张神根）

冯玉祥迁坟

1922年初秋，在古城保定的大街上，走过来一队送葬的人群。前面一人白衣白帽，打着幡儿，后面一群人，分抬着两口套棺。抬棺者中有一个肩宽体壮、面色黝黑的高大汉子，是鼎鼎大名的河南督军冯玉祥！

督军大人亲自抬棺，所葬何人？正是他的亲生父母。冯玉祥早年家境贫寒，在保定城东康格庄度过了他凄苦的童年。父母辞世后，他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冯玉祥原不计较婚葬之事，但想到父母困苦的一生，生前又十分讲究死后的归处，因此，许多年来他都牵肠挂肚地想着这件事。这次在军政倥偬之中，抽了几天功夫由河南回到保定，与长兄商议，在保定西北的薛留营买了5亩空地，把父母的遗骸迁葬过去，了却这桩心愿。

冯玉祥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节，招摇铺张，因此这次为父母迁葬，没惊动任何亲友，他亲自抬棺，前面打幡者是他的长兄基道。迁葬第二天，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得知，还埋怨冯玉祥说：“焕章老弟，这等大事何以不告诉为兄一声？”

这次回保定，冯玉祥停留数日。他家住管驿街，每次都是步行到巡按使署去。走在大街上，老百姓指指点点，有的说：“那就是督军冯玉祥。”有的说：“堂堂督军大人，不坐汽车罢了，起码坐顶大轿啊，要不太不够官派了！”

（范秀莲）

戴季陶投江

1922年8月，四川各界派代表至沪，欢迎正在襄赞孙中山的戴季陶回川，调停内战不已的川局。戴于10月中自沪乘轮西上。行至汉口，戴阅报得知川军各将领磨拳擦掌，欲火并一番，自觉此行希望渺茫，无脸见家乡父老与久别慈亲。自此每日长吁短吁，食宿不安，渐萌生厌世之念。一日傍晚，江轮行至上距宜昌49公里、下距枝城8公里的枝江县龙窝处，戴乘晚餐后无人注意之机，跨栏纵身投江。戴的水性并不好，又时值初冬，其投江后非但未下沉，反而漂流10余公里为农夫所救。可谓大难不死。

原来戴身着丝棉长袍，内衬鸭绒，落水后，长袍四面张开托着其顺江南飘，使其借此欣赏了一番月白风清的江流和浩瀚的长江冬夜景。当漂至枝城南岸的沙洲而搁浅，戴爬起行不多远，因冷冻不支而倒地呻吟。此时天色已暗，恰有附近农民屈顺发正在自家门前打扫禾场。屈听到江边有呻吟声，即循声察看。只见沙滩睡着一个浑身水淋淋、已失去知觉的人。屈顺发慌忙呼喊其子家寿将落难者背入家中。屈氏家人忙作一团：屈顺发为落难者换上自家的棉衣；屈家寿点火取暖；屈顺发的老妻钟氏为其熬姜汤。一番忙碌，落难者终于苏醒过来。但自报了屈氏家人未曾听说过的姓名后又昏昏入睡。屈钟氏又连夜将其湿衣烘干，以备换用。

翌日，戴恢复正常。早饭之际，戴询问屈家在县城有无亲友，屈顺发说有妹夫杨开成在县城长江边照看趸船。戴请求屈氏引送其到县城，屈顺发慨然依允，饭后即吩咐其子家寿送客人至枝城。

戴食宿于杨开成家，杨氏家人以礼相待。戴有感于杨氏的诚挚，曾吐露了其投江的动机和经过。杨也曾托县商会会长薛伯翰代为戴联系。薛怕麻烦而婉言推托。失望中，戴取出派克笔托杨变买以作赴沙市的船费。杨说：“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穷嫌富不爱’。这样吧，明天下水船停靠时，我给船上打个招呼，免费送先生到沙市。”戴听后感动不已。

次日上午，戴上船后迟迟不进舱，却站在船舷上向岸上张望。突然他像发现救星似的高喊“向二哥”，人群中被称为“向二哥”的人听见呼唤，喜出望外，急奔向戴。这位“向二哥”，本名传义，时为川军第三师师长，与戴系至交。向此次专门奉派至沪迎戴入川。戴投江后，向登岸沿江寻觅无着，今天是到枝城张贴打捞戴“尸体”告示的。两人相见，恍如隔世。戴季陶、向传义及随从四人当晚宿于杨开成家。翌日分别时，向拿出20块银元，交与杨开成和闻讯赶来的屈顺发，并说戴先生会“厚报”二人的。

戴走后一直未与杨、屈二人联系。1930年春，枝江县县长唐启虞忽然收到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托其“查寻救命恩人”的信函。

此间，正在省听候处置的枝江县教育局局长贺述林，获悉戴院长正在“查找救命恩人”，灵机一动。他谎称系屈、杨二人的“亲戚”，通过省教育厅厅长黄昌谷向戴季陶陈情，结果被免予处分，照任原职。贺述林回乡时，还带回戴季陶赠送杨开成、屈顺发的感谢信、匾额及1000块银元，赠屈、杨二人的匾额为白绫裱糊、黄绫镶边。赠屈顺发的匾额题字是“佛心侠骨，古道照人”；赠杨开成的匾额题字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落款为“吴兴戴传贤（季陶）敬赠”。并盖有“传贤”、“季陶”二枚方印。屈、杨两家将戴院长的匾额高悬堂屋正中，可谓“蓬荜生辉”。地方文武百

官也刮目相待。

1931 年春，屈、杨二人及家人 10 多人曾应戴之邀远赴京城作客。戴在考试院以上宾宴请。宴后，戴提出为屈、杨二人各安排一官半职。两人自知不能胜任而谢绝，仅提出在南京多“见见世面”。戴依允，每日派张副官陪同。屈、杨一行返乡时，戴又送给每人一匹绸缎，并由张副官专门送至武汉。此后，戴每年均给屈、杨两家寄钱，直到抗战爆发。

（春蚕）

张作霖回乡认祖

奉系首领张作霖生前曾回河北省大城县冯庄认祖。笔者因在大城县县志办公室工作，得以了解张作霖回乡认祖的详情。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于 4 月 10 日开始大举进兵入关，从军粮城、静海、马厂向西南方向推进。4 月 27 日起，直奉两军在大城县子牙河沿岸斐庄、白洋桥、南赵扶、姚马渡、子牙等村庄对垒，连日激战。奉军所到之处要粮要款骚扰百姓，人们很反感，唯独在子牙河东岸二里之遥的冯庄驻扎的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时人们非常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里驻着奉军统帅张作霖，曾下令一律不准骚扰这里的百姓。这个一代枭雄张作霖为什么对这个村格外优待呢？这里有一个奥秘：

道光三年(1823)七月初，连降大雨，“御河、子牙河、黑龙港河，皆溢悉无岸”(《大城县志》)，田园被淹，秋收无望，人民纷纷奔走他乡。有个叫张允贵的贫苦农民，除了二亩坟地、一纸当契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于是，含泪离家下了关东。他漂泊数年，即在海城城西小洼村落了户。这个漂泊而来的张允贵就是后来统帅奉军的张作霖的曾祖。

张作霖由一个胡匪头目，受抚为清廷马队管带，几经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他驱逐了吉林与黑龙江的督军，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他戎马生涯大半生，如今身居显位，却想起回乡认祖来。奉军的大本营设在军粮城，张作霖却来到小小的冯庄督战，就是想实现他的夙愿。

张作霖住在冯庄富户秦辉奎家。秦曾任旅长、热河省主席，与张曾有交往，故友重逢无所不谈，谈话间张作霖就讲了曾听老人说，他家祖籍就是大城冯庄，并表示有认祖之意。秦辉奎不敢怠慢，当即找该村张姓族人转达此意。张氏族人听说奉系军阀张作霖要来认祖，意见却不一致。有的嫌他当过胡子，有损于张氏门庭；有的以为奉军正与直军对垒作战，胜负未决，恐怕得罪直军。由于人们不愿多事，没有统一思想，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使张作霖吃了个闭门羹。加之战争紧张，奉军在子牙河一带吃了败仗，焚烧了白洋桥大桥即匆匆退去，张作霖也就逃回东北去了。

此后，冯庄村张氏家族有个叫张顺峰的曾到东北找张作霖认本家，目的是求其谋事。但张作霖对认祖一事态度冷淡，即没有拒绝，也没有明确相认。张顺峰没有谋得职位，扫兴南归。为什么呢？后来在他的护兵口中找到了答案：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从 8 月 17 日起，双方混战开始，由于直系军阀内部分列，冯玉祥倒戈反直，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踌躇满志，于当年 11 月 10 日来到天津。据大城县演马村 79 岁的任润林老人回忆：那年他正在天津一个洗染房学徒，张作霖的护兵到这里为他浆洗衣服。得知任是大城县人时，便拉起话来，那护兵说：“我们大帅就是大城冯庄人。那年大帅曾到老家认祖，冯庄人嫌他当过胡子不愿相认，可是以后冯庄人又找大帅认本家了，我们大帅才不认呢！”原来这是对那年在冯庄受到冷遇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报复。一语道破了张顺峰到东北未能如愿的原因。

打这以后，风风雨雨战争迭起，一直不安宁。虽有传闻张作霖要再来大城认祖，但一直未能实现。不过，自张顺峰去东北回来后，张姓十四世即按张学良的“学”安排下来了。因此，在《张氏家谱》中用的一个是“顺”字，一个是“学”字。这个“学”字就是从那一年改的。这件事为该村张姓人所共知。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戎马生涯的武夫张作霖也曾思乡认祖，这是人之常情吧！

（李玉川）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汉译与民国“维特热”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文学家、思想家歌德早期一部杰出的散文体小说。该书以近百封长短不一的抒情书简集成的形式，写了一位平民出身的维特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聪明俏丽的绿蒂姑娘，尽管绿蒂已经订婚，但两人一见倾心，双双沉入感情的急流之中。绿蒂未婚夫阿尔伯特的归来使维特陷入尴尬的境地。烦恼、失望，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接受了公使秘书的职务离开了绿蒂。但同僚们追求地位的欲望、上司的迂腐固执使他再度陷入烦恼；上流社会的傲慢自大、盛气凌人又使他气愤万分。一年后，处处碰壁的维特再度见到了已经结婚的绿蒂，看着她那平庸的生活和内心隐藏的要求，极度失望，他给绿蒂留下了一封信就开枪自杀了。他的桌上放着莱辛的悲剧《爱米丽娅·迦洛蒂》，他的身上穿着与绿蒂第一次跳舞时的

礼服。

这部被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誉为“素朴的诗”的书信体小说，1774 年出版后即在欧洲青年读者中引起轰动，作品的伤感主义及主人公的“世纪病患者”的性格，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反响特别热烈，不少人甚至追慕维特遗风而仿效其青衣黄裤的服饰。有些人苦于恋爱不自由而衣囊襟袋中挟此小书而自杀。在“维特热”流行弥漫的氛围中，歌德在 1778 年再版时补上了“请做个堂堂男子哟，不要步我后尘”的箴言。

据阿英先生考证，中国最早提及此书的是赵必振先生译述的《可特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作新社出版的由赵必振据日本大桥新太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译编的 5000 多字的《可特传》中，特别简要介绍了《乌陆特陆之不幸》(即《少年维特之烦恼》)，称“此书既出，大博世人之爱赏，批评家争为恳切之批评，翻译家无不热心从事于翻译，而卑怯之文学者，争勉而模仿之。当时之文学界，竟酿成一种乌陆特陆之流行病。且青年血气之辈，因此书而动其感情以自杀者不少。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最早节译此书的可能是著名诗人马君武，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他曾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一节诗文，题作《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称“贵特为德国空前绝后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籍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介绍社会之最初杰著也”。

第一个把全书完整地译成中文的是著名作家郭沫若。1922 年 4 月该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引起的轰动并不亚于欧洲。郭译本一年余连出 4 版，1924 年 8 月出第 8 版，到 1930 年 8 月，泰东等书局先后印行达 23 版。整个民国时期，参与出版郭译本的有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复兴书局、大中书局、群益出版社、天下书店、激流书店、重庆东南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印过不下于 50 版。1928 年上海创造社还推出黄鲁不译本，先后又由上海龙虎书店、春明书店再版；其他还有达观生译本(世界书局)、陈弢编译本(中学生书局)、钱天佑译本(启明书局)、杨逸声译本(大通图书社)；这些译本不少都出过不下于 3 版。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在《初步研究指南：德国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认为，此书是中国 20—30 年代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这一结论，恐怕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这部小说以其疯狂的恋爱热情、对社会的判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年轻读者的青睐。茅盾的名著《子夜》中几处提到此书，一本读得破旧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夹在书里的枯萎的白玫瑰花——这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赠予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雷鸣的定情之物，真实地展示了此书当时被一般青年男女奉为“圣经”的文化现象。他们谈论着此书，为维特和绿蒂两个人物形象所吸引，他们传唱着《绿蒂与维特》之歌，畅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陶醉于男女神圣爱情的理想之中。叶灵凤在《霜红室随笔》中这样写道：“此书虽然故事情节很简单，但由于是书信体，许多情节要靠读者自己用想象力去加以贯穿，然而它的叙述却充满了情感，文字具有一种魅力，使人读了对书中人物发生同情，甚至幻想自己就是维特，并且希望能有一个绿蒂。而且在私衷暗暗的决定，若是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也要采取维特所采取的方法。这大约就是当时所说的那种‘维特热’，也正是这部小说能迷人的原因。”他说自己第一次读了郭译本后，非常憧憬维特所遇到的那种爱情，自己也以“青衣黄裤少年”自命。声称“如果这时恰巧有一位绿蒂姑娘，我又有方法弄到一柄手枪，我想我很有可能尝试一下中国维特的滋味的”。凭着这一部小说对歌德乃至文学发生兴趣的还真不少，叶灵凤是一例。“左联”著名作家彭柏山称自己也是读了郭译本后，对文学发生强烈的兴趣，而导引对进步文学的热切追求。1927 年还有一位自命为“维特狂”的青年曹雪松，在克服了失恋后几次想抱着该书跳入吴淞江的念头，把该书改编为四幕悲剧，次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他在此剧序中称该书“非寻常作品可比，经营之惨淡，描写之细腻，结局之悲惨，简直无词可以形容”。30 年代柳无忌在《少年歌德与新中国》一文中讲此书当时几成了一般青年男女“爱情的信物或生命的护符”，断言维特曾经在感情上影响过很多中国知识分子。1931 年蔡元培先生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和《三十五年中国之新文化》两文中在提及文学翻译时，都首列此书，并认为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不过捷克汉学家高利克在《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一书中又认为民国时期“维特热”中的那些狂热信奉者，并未真正了解这部杰作的伟大之处，抓住此书思想精髓和革命性的精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经验相连接的关系而对此书中的爱情狂热表现出认同，甚至可以认为不少人只是一种没有精神深度、没有追求目标、没有理解的浅薄的装腔作势而已，《子夜》中逢场作戏的吴少奶奶和爱出风头的雷参谋就是上述结论的一对互相映衬的典型。

如果我们误认为吴少奶奶和雷参谋即是民国时代“维特热”接受影响的典型，那将是大错特错了。郭译本问世后，先后有过为数不少的书信体小说，如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1923 年)；黄庐隐的《一封信》(1924 年)、《愁情一缕诗征鸿》(1924 年)和《或人的悲哀》(1924 年)；王以仁的《流浪》(1924 年)；向培良的《六封信》(1925 年)；郭沫若的《落叶》(1926 年)和《哈尔美萝姑娘》(1926 年)；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1926 年)；潘垂统的《十一封信》(1927 年)等等。这些作品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模仿和继承着《少年维特

之烦恼》的特点，它们受到此书的启发和感染，采用了主人公写给某个知己者的内心独白，流露出维特那种失恋者、反叛者和多余人的情感，这些作品的结局也往往以主人公的自杀或绝望出走的悲剧而告终。维特那种反叛的性格、追求爱情的狂热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和欧阳山《玫瑰残了》中的主人公。如果要列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那么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应是当之无愧的。

（邹振环）

流行风

小说《江湖奇侠传》

作者向恺然，主要内容：

小说围绕昆仑、崆峒两大武林派系间的嫌隙和争斗写出许多奇怪的人物和奇怪的事情，涉及的人物达百多个，叙其由来为之“立传”的也有四五十人。故事由长沙隐居山下的书香子弟柳迟寻师写起，说他生性古怪，在叫化堆里混了三年，始遇昆仑派剑侠笑道人，得入清虚门下，并拜昆仑派首脑金罗汉吕宣良为师。故事由此荡漾开去，逐个引出朱镇岳、红姑、杨天池、向乐山、智远、了因、朱明、甘联珠、铜脚道人、欧阳后成等老少剑侠，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相互间又勾连交织在一起。这一派的创始人为黄叶道人，系“洪武大帝的十一世嫡孙”，曾欲助洪秀全在金陵成帝业，未能如愿，后派铜脚道人之子杨钺胡往云南茨通坝，建立复兴基地以待时机，所以昆仑派诸侠都抱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以四海龙王杨赞廷为首的崆峒派对昆仑派很不服气，双方嫌隙极深，这派重要的人物是甘瘤子和常德庆。小说以平江、济阳三县人争夺赵家坪的械斗作为两派冲突的焦点，各自支持一方，欲藉此一决雌雄。崆峒派感到势单力孤，广泛邀集能人，又引出了红云老祖师徒等一系列的怪人怪事。两派也曾联袂斗败欲霸武林的左道旁门哭道人、镜清道人，但始终不能消除积怨，最后由法力无边的江南酒侠作和事老，才使群雄避免了这场赵家坪的大劫。书中穿插的奇人异事极多，如峨嵋派的方绍德、蓝辛石，无师承的刘景福等。但最吸引人的是火烧红莲寺和张汶祥刺马的故事，这是全书最精彩的段落，多次被搬上银幕、京剧舞台，被绘成连环画册，成为三四十年代妇孺皆知的故事。全书语言通俗流畅，情节曲折离奇，但枝节横生，整体布局显得散乱。人物众多，一个引出一个，有若连环，但缺乏鲜明的个性，唯有张汶祥的豪侠写得较为出色，是条义烈的汉子，马心仪的险诈无耻也刻画得较为成功。书中写迷信较多，也写人情狡黠，间或有所嘲讽，续书的文字、情节、人物均较逊色，结尾草率，使全书有虎头蛇尾之感。邛莱山斗法写得吃力，酒侠的形象也甚为唐突模糊。该书曾风行一时，与《玉梨魂》《广陵潮》、《啼笑姻缘》同被列为鸳鸯蝴蝶派的“四大说部”，是现代通俗文学中的一部名著。

小说《冲积期化石》

作者张资平，主要内容：

作品采用自叙体的写法，通过“我”和同乡韦鹤鸣从幼年到青年的一段求学经历，着重描述塾师韦天厂对儿子鹤鸣的亲子之爱，揭示了清末民初那个历史时期的黑暗社会，新旧教育制度过渡期间种种可笑现象，以及教会学校内部的腐败。在反映知识分子和下层生活中，对受污辱者表示人道主义的同情；在描写留日生活中，对旧中国政治腐败和日本军国主义时露愤懑之情。小说受《留东外史》影响，叙事平铺直叙，枝蔓丛生，描写技术粗糙，其中夹杂不少作者的大段议论，读后令人乏味。

小说《一叶》

作者王统照，主要内容：

以民国初年为背景，以主人公李天根的生活经历为主线，比较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天根在父亲去世后，与秀才的女儿伍慧相恋，后秀才强迫女儿与别人订婚，不久伍慧即忧郁而死。天根为此抱恨终生。几年后，在医院里与护士芸函相识而产生感情，并为芸函曾被官商骗奸的悲惨身世而感动，对她更加敬佩。与此同时，朋友张柏如突然遭人诬陷，被捕入狱，精神与身体备受摧残，出狱后愤然去英国谋生，社会的黑暗，使天根失去了对人生的美好理想和信仰，忧郁寡欢，愤世嫉俗。作品除了从李天根的思想变化中反映旧社会封建势力的罪恶外，还描绘了民国以后军阀连年内战，地方政府苛捐杂税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反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惨败。小说体现了作者为人生的文艺观和对人生美的追求。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

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最初之课》

作者郑伯奇，主要内容：

写一个中国留日学生被歧视、侮辱的遭遇。主人公屏周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血性青年，怀着拯救民族沦没的朦胧理想留学日本，满以为到了国外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礼遇。然而，在开学后的“最初之课”，他受尽了种种侮辱，尤其是讲课教师竟把课堂当作宣传军国主义的场所，鼓励日本青年去侵略中国领土，并把中国人称为“猪”。最后屏周在忍气吞声中抑制心中的怒火，牢记着最初之课的教训。作品以愤怒的笔调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表达了爱国青年为祖国处于低下的国际地位的沉痛心情，流露出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小说以先扬后抑的手法，把开头的乐观气氛与随后的沉痛心情加以对照，突出了主题。文笔比较拖沓，细节尚欠精练，是创造社早期抒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诗歌《春水》

一道小河
平平荡荡的流将下去，
只经过平沙万里——
自由的，
沉寂的，
它没有快乐的声音。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将下去，
只经过高山深谷——
险阻的，
挫折的，
它也没有快乐的声音。
我的朋友！
感谢你解答了
我久闷的问题，
平荡而曲折的水流里，
青年的快乐
在其中荡漾着了！

（冰心）

诗歌《她底眼睛》

她底眼睛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她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会暖洋洋？

她底眼睛是解结的剪刀；
不然，何以她一瞧着我，
我的灵魂就解除了镣铐？

她底眼睛是快乐的钥匙；
不然，何以她一瞅着我，
我就过着乐园里的日子？

她底眼睛已变成忧愁的引火线；
不然，何以她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忧愁的深渊？

电影《劳工之爱情》

1922年明星公司拍摄的滑稽短片之一，共长三本，郑鹧鸪主演，是我国库存最早的一部短故事片，曾参加了1983年北京举办的“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影片表现一个摆水果摊的木匠（郑鹧鸪饰），与对面街坊医生（郑正秋饰）的女儿（余英饰）恋爱的故事。它穿插了以楼梯机关跌伤男女赌徒，为医生招徕病人等噱头；最后取得医生允许，两人终成眷属。影片共分四个场景，都是内景戏。这部电影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一些可取之处：①它有反封建意识与劳工神圣之思想；②艺术表现上，虽属滑稽片，但并无低级、黄色东西，其滑稽夸张表演，有一定生活基础，因为水果商是木匠出身，用锯子锯西瓜、用线盒掷水果给女友以及做机关楼梯等，既引人发笑，又合乎情理。③从电影发展上看，它有了不同的景别，运用了主观镜头、空镜头、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叠印镜头（在画面右上角圈印）和机关特技、变格摄影；并使用了蒙太奇技巧，展示了同一时间中不同的三个空间；掷果的抛物线剪接得也很准确。这部影片，在电影化程度上，虽落后于同期外国影片，但却使我们看到了当时我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水平。

歌曲《问》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年华如水？
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
垂垂！垂垂！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
你想想呵；
对，对，对。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人生如蕊？
你知道秋花开得为沉醉？
吹吹！吹吹
你知道尘世的波澜有几种温良的类？
你讲讲呵：
脆，脆，脆。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

时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地点：上海
出席代表：十二人。其中有：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谭平山　李震瀛　杨明斋　施存统　李　达　许白昊　罗章龙　王尽美等
党员人数：一百九十五人。
主要决议：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二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高君宇　邓中夏
中央书记：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

（一）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现今这般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万万数数的无产阶级)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象是决不会消灭的。这个现象最值得弄个明白，因为个个中国人(不但是劳动阶级)都应当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便是发源于英、德两系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近东市场的冲突。

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履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的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不过他们常常被逼着去救济资本主义无法挽回而日见扩大的世界经济恐慌，冀图避免社会革命的锐利锋芒，故不得不借此种会议的分赃妥协行为，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掩盖他们中间的裂缝，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战时期。同时并可在此苟延期间之内，加劲劫夺殖民地和弱小

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轭，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

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国铁蹄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群众死于英国资本家的长爪之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石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米粮强迫的输出，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

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二)、(三)、(四)略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怎样宰割中国和剥夺中国工人和农人的贪婪的写真。

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但是被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最要明了现今世界大势，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战以后，英国生产力停滞，法国经济破产，美国生产力过剩，而帝国主义者简直没法恢复战前经济原状。他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权利、互利维护其掠夺物的相互保险政策，结果又被他们自己拆散了。

华盛顿会议把日、美冲突弄得更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还更危险；大战的“破坏”既然已将资本主义的墙脚掘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发生塌倒之可能，还能说及恢复和再造吗？这便可证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离他的末日不远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的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了五年的奋斗，势力日见巩固；德国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达到极烈的顶点，英、美、法、意等国常常发生极可怕的罢工运动，已动摇了资本主义的老巢穴；就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声势浩大的兴盛起来，至于印度、埃及、爱尔兰、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掠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迅速伸长的确证。

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

(一)(略)

(二)

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他们曾经百端阻挠中国经济自动的改进：如他们不让中国人民自己建筑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及川汉铁路，强迫清政府借他们的款子来兴工，以及他们夺取汉冶萍公司之类。但是这样阻挠的结果，曾激成剧烈的反抗，对他们经济的垄断政策加以打击。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帐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

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

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运动。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一层，中国的知识阶级，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

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三)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

(一)(略)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1. 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2. 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3. 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4. 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 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 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条，是对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

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同前进！

打例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和平，自由，独立万岁！

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际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二全国大会

评胡适的“努力”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周恩来

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我们看他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却使我们非常失望，且更使我们的革命主张得到坚确的反证。

有人说，胡适提倡白话诗，有人去尝试，等到他提倡手枪炸弹，却没有人去干了。其实有没有人去干，那另是一个问题，我们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

在《努力》第四期中，有人问他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设好政府呢？他的答案是：“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我们真不解一方要在恶基础上“努力”建设好“政府”，一方认定非先破坏不可，这个工怎样分法？怎样能殊途同归？除非胡先生先站在两者之间袖手帝观，等到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他再来领着“殊途同归”。

胡先生是以“打图起屋”的人自居，而以“烧房子”的人待人的。但是房子还没真烧，他却要告人先来做“收拾颓椽剩瓦”的事，自己以为可以在那里打图好备起屋了。果然他所打的图是烧了房子后的新图，那还可听他在那里把图自玩，如是一张好图，尤可供大家的研究。只是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了，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胡先生先迷信“公开的南北和会”，继迷信公开的“各省会议”会能解决时局，实现统一。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如果人民象胡先生所说，“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竟不争了，然而各大军阀又肯容忍么？不容忍，还不是一样地要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办法么？与其这样弯曲（但这还是我们替胡先生推论如此，他并没有这样坚决主张），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这不又是胡先生缺乏革命精神的明证么？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

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只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

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胡先生偏认在此列强均势之下有利可图，漠视北京东交民巷所牵线的英美派外交家，竟认其为“好人”。信美国政治家（即美国帝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可亲，特跑到代新银行团游说，鼓吹宪期借款的美顾问芮恩施家讨论宪法问题。张作霖明明已是日本的爪牙，英美的政府又正向直系军阀送秋波了，而胡先生竟还赞成“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的主张，还以为这是“最大胆的”计划。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干”的一声，连环解了！这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努力歌”，但是我们竟不明白这位哲学教授指示人“干”的地方究在何处下手？然而他却说了“从下手处下手”！这样的笼统话，能令我们满意么？

胡先生又曾宣誓说“各行其是，各司其事”，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

因此，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

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府，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也是胡先生说的，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然而绕了这些道儿，迷惑了民众多时，这是何等的不经济！

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

（原载《少年》第 6 号。署名：飞飞）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

中国、日本彼此极愿以友谊，按照共同利益，解决关于山东各悬案，因决定订立一解决各该问题之条约。为此简派全权：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全权公使施肇基、全权公使顾维钧、前司法总长王宠惠；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特派海军大臣加藤、全权大使币原、外务省次官埴原；

各全权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洽，议定条例如下：

第一节 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之交还

第一条 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

第二条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应行清厘事项，各任命委员三人，共同组织一联合委员会，与以商订执行详细办法之权。

为此，该联合委员会应于本约实施时即行会集。

第三条 上条所开移交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事项，应从速办理完竣，无论如何，至迟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

第四条 日本政府担任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之际，并将移交行政权时所必需及移交后中国治理该租借地及胶州湾周围五十启罗迈当地域所必需之档案、图样、册籍、单契及其他证书或各项签证之副本，现为日本所有者，交付中国政府。

第二节 公产之移交

第五条 日本政府担任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包括土地、房舍、工程及一切设置等项，无论前属德国官厅所有或日本管有期内官厅所购置、建造者，全部移交中国政府，惟列入本约第七条者不在此限。

第六条 前项移交之公产，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但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者及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照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还正当并公平之成数，但以除去折旧、估计现值为原则。

第七条 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之公产中，有为设立青岛日本领事馆所必需者，归日本政府保留。其为日本居留民团体公益所必需，如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该团体执管。

第八条 以上三条内所开事项之详细办法，应由本约第二条规定之联合委员会协同妥议。

第三节 日本军队之撤退

第九条 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

第十条 上条所称之中国警队或军队之配置及日本军队之撤退，可分段行之。其每段配置与撤退日期，由中、日主管人员预行协定。此项日本军队如能于本约签字日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尽，应即撤尽，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逾六个月。

第十一条 驻青岛之日本守备队，如能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时同时撤尽，应即撤尽，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逾移交行政权之日后三十日。

第四节 青岛海关

第十二条 本条约实施时，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

第十三条 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六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合同，于本约实施时应归无效。

第五节　青岛济南铁路

第十四条　日本应将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枝线并一切附属产业，包括码头、货栈及他项同等产业等项，移交中国。

第十五条　中国担任照上述铁路产业之现值实价，偿还日本。

偿还之现值实价内系五千三百四十万零六千一百四十一金马克(即德人遗下该项产业一部分之估价)或其同价并加日本管理期内对于该路永久增修所实费之数，减去相当折旧。

上条所开码头、货栈等项产业，不须给还价值，惟于日本管理期内永久增修之费用，亦须酌偿而减去折旧。

第十六条　中、日两国政府应各派委员三人组织联合铁路委员会，按照上文规定，畀以评定铁路产业之现值实价并办理移交该项产业之权。

第十七条　第十四条所称之铁路产业应从速移交完竣，无论如何，不得逾本约实施后九个月。

第十八条　中国因实行本约第十五条偿还路价办法，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期限十五年，但得任中国政府之选择，由交付库券之日起，满五年时或五年后不论何时，经六个月前通知，将库券全数或一部分偿清。

第十九条　在上条所称库券未偿清前，中国政府应选任一日本人为车务长，并选任一日本人为会计长，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等，其任期均以库券偿清之日为止。此项职员统归中国局长指挥、管辖、监督，有相当理由时得以撤换。

第二十条　关于前述国库券财政上之专门事项，为本节所未规定者，应由中、日当局从速协定，无论如何，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

第六节　青岛济南铁路延长线

第二十一条　关于青岛济南铁路二延长线之让与权，即济顺线、高徐线，应令开放于国际财团共同动作，由中国政府自行与该团协商条件。

第七节　矿　山

第二十二条　淄川、坊子、金岭镇各矿山，前由中国以开采权许与德国者，应移归按照中国政府特许状所组织之公司接办。日本人民在该公司之股本不得超过中国股本之数。此项办法之形式及详细条件，应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称之联合委员会协定之。

第八节　开放胶州德国旧租借地

第二十三条　日本政府声明并无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之意。中国政府亦声明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

第二十四条　中国政府更声明，外国人民在德国旧租借地区域内之既得权，无论在德国租借时或日本军事占领时经合法、公道取得者，应尊重之。

关于日本人民或日本公司所得此项权利之法律上地位及效力各问题，应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联合委员会协定之。

第九节　盐　场

第二十五条　因盐为中国政府专利事业，议定：凡沿胶州湾海岸盐场确系日本人民或日本公司现在经营之利益，统由中国政府公平购回，并照相当条件以该沿岸产盐之若干量数准予贩往日本。其一切办法，包含移交该项利益于中国政府在内，应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联合委员会筹办，并应从速完竣，无论如何，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

第十节　海底电线

第二十六条　日本政府声明，关于青岛、烟台间及青岛、上海间前德国海底电线之权利、名义、特权均归于中国。惟该两线之一部分，为日本政府用以安设青岛、佐世保间之海线者，不在此例。至关于青岛、佐世保线在青岛上岸与其运用之问题，应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联合委员会按照中国现行各合同之条件协定之。

第十一节　无线电台

第二十七条　日本政府担任将青岛及济南之日本无线电台，于该两处日本军队撤退时分别移交中国政府，而给以该项电台之相当偿价。其数目暨移交之详细办法，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联合委员会协定之。

第二十八条　本约连同附约在内应由两国批准，其批准文件应从速在北京互换，至迟不得逾签字日四个月。

本约自互换批准文件日发生效力。

为此各全权将本约英文两份，各签字盖印。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四日订于华盛顿

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

加藤、币原、埴原

华盛顿九国公约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

美利坚合众国、比利时国、不列颠帝国、中华民国、法兰西国、意大利国、日本国、荷兰国及葡萄牙国，兹因志愿拟定一种政策，以巩固远东之状况，维持中国之权利利益，并以机会均等为原则，增进中国与各国之往来，议决订立条约，因是简派全权(人员衔从略)。各全权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协，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三)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第二条　缔约各国协定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足以侵犯或防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者。

第三条　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取：

(一)任何办法为自己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有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

(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可剥夺他国人民在中国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或他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从事于任何公共企业之权利；抑或因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久长，地域之广阔，致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之实行者。

本条上列之规定，并不解释为禁止获取为办理某种工商、或财政企业、或为奖励技术上之发明与研究所必要之财产及权利。

中国政府担任对于外国政府及人民之请求经济上权利及特权，无论其是否属于缔结本约各国，悉秉本条上列规定之原则办理。

第四条　缔约各国协定对于各该国彼此人民间之任何协定，意在中国指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或设有互相独享之机会者均不予以赞助。

第五第　中国政府约定中国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遇不公之区别。例如运费及各种便利，概无直接间接之区别。不论搭客隶何国籍，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货物出自何国，属诸何人，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船舶或他种载运搭客及货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国铁路之先，或已上中国铁路之后隶何国籍属诸何人。

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对于上称之中国铁路基于任何让与、或特别协约、或他项手续，各该国或各该国人民得行其任何管理权者，负有同样之义务。

第六条　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于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中国声明，中国于中立时愿遵守各项中立之义务。

第七条　缔约各国协定无论何时遇有某种情形发生，缔约国中之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适用问题，而该项适用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系之缔约各国，应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第八条　本条约未签字之各国，如其政府经缔约签字各国承认，且与中国有条约关系者，应请其加入本约。

因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于未签字各国应为必要之通告，并将所接答复知照缔约各国。任何国家之加入自美政府接到该国通知时起发生效力。

第九条　本条约经各缔约国依各该国宪法上之手续批准后，从速将批准文件交存华盛顿，并自全部交到华盛顿之日起发生效力。该项批准文件笔录由美国政府将正式证明之誊本，送交其他缔约各国。

本条约英文、法文一律作准，其正本保存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档库，由该政府将正式证明之誊本，送交其他缔约各国。

兹将议定条约由上列各全权代表签字，以昭信守。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订于华盛顿

(美利坚合众国)　许士印

洛治印

恩特华特印

罗脱印

(比利时国)　卡德印

(不列颠与爱尔兰及海外属地)　白尔福印

黎印

健特士印

(坎拿大属地)　鲍腾印

(澳大利亚属地)　皮而斯印

(纽丝纶属地)　散而孟印

(南非洲属地)　白尔福印

(印度属地)　萨斯赤利印

(中华民国)　施肇基印

顾维均印

王宠惠印

(法兰西国)　沙罗印

尤赛龙印

(意大利国)　司强曹印

利西印
阿而白丁尼印
（日本国） 加藤印
币原印
埴原印
（荷兰国） 贝拉斯印
蒲福印
（葡萄牙国） 阿而戴印
物司康赛雷斯印

（录自于能模等编:《中外条约汇编》第610—612页）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天津五万余人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在意、法、英各租界游行。武汉、西安等地群众游行讲演，开展救国运动。

1月8日　上海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借日款赎路，起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及举办九千五百万元盐余借款。同日，美国旧金山华侨二十余团体举行游行并致电华盛顿会议和中国代表，反对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1月9日　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宣布徐世昌、梁士诒罪状，谓："徐为洪宪枢臣，靡恶不作，近更令梁为伪国务总理，同时令代表在华盛顿向日本代表秘密商妥鲁案问题，急谋向日借款。梁本帝制罪魁，民国五年曾明令通缉，徐竟使秉伪政"。并下令通缉徐、梁，号召"共诛危害民国者"，即日由广州政府用万急电通电中外。

1月12日　香港中国海员工人因要求加薪遭英国资本家拒绝，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罢工人数共约一千五百人。所有香港开往广东内地轮船及到港之英、荷、法、日、美各国轮船华工均一致行动。

1月14日　北京外交联合会推代表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依民意备款赎路，同日，驻华盛顿国民代表团通电力争收回胶济路。

2月1日　中国银行运往天津之盐税银十四万八千两、银元万枚，被曹锟军队截留。吴佩孚借口军饷欠缺，强行提取汉口中国银行现款一百五十万元、交通银行一百三十万元。3日晨，英、法、日三国公使致牒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各省截留盐税。

2月6日　华盛顿会议闭幕。参加会议之中、美、英、日、法、比、意、荷、葡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所谓《九国公约》)，共九章。该约贯彻美国所主张"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同日，签订九国关于中国关税条约，规定中国关税由中国实收五厘，但须先行组织委员会裁减内地厘金；拒绝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2月8日　上海香港后援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援助香港罢工海员方法，除捐款外，并电勉香港海员坚持到底。陇海铁路工会总会致函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表示同情和支持海员罢工并捐款援助。

2月20日　孙中山布告声讨徐世昌卖国罪行，指出："华盛顿会议徐世昌所派伪代表与日本协定条件，违叛民意，丧失权利，甘为国民公敌。……若再姑息，势必益恣诡谋，借亡无日。讨贼救国，愿与国民奋起图之。"

3月4日　香港发生"沙田惨案"。自1日起，香港饮食、运输、印刷、电讯等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罢工，相继罢工。3日，香港英总督下令戒严，不许居民出境、外人入境，渡船亦禁开驶。是日，香港工人两千余人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港附近的沙田，英兵向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八人。

3月7日　月初，徐世昌曾派蒋雁行赴保定、洛阳，协商组阁问题。是日，蒋返京向徐世昌报告，吴佩孚为组阁问题提出三项条件：(一)停止发行"九六公债"；(二)免梁士诒内阁职；(三)同意鲍贵卿组阁。同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不反对鲍组阁，但以去张弧为条件。

3月14日　广州国会召开非常会议，议决：(一)暂行新刑律二百二十四条，侵害人民自由，应予废止；(二)致电英国，抗议香港英国警察枪杀沙田华人事件。

3月22日　外蒙政府派代表达伦噶尔向张作霖磋商投诚条件：(一)投诚后不废活佛尊号；(二)此次变乱，不咎既往；(三)中央须有相当保护，以脱离俄人势力范围；(四)与内蒙王公享同一待遇。张允电北京政府商议解决。

4月26日　徐世昌下令，奉直双方军队撤回原防，不得进入北京城，"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同日，徐世昌又向各省发出通电，令各省派遣军政、财政、民政三方面代表，克期来京开会。

5月1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次大会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出席大会代表一百六

十余人，其中除共产党外，还有国民党、无政府党和无党无派的代表，共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二十三万多会员。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消除各地工会行帮观念及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

5月9日　北京第三届国会十一省区全体众议员通电斥责梁士诒"特赦安福，起用曹、陆，滥借外债，断送鲁案"，破坏国会选举等，并催请各省赶办选举，克期召开国会，以定国是。

5月19日　奉天省议会宣布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举张作霖为三省总司令，兼奉天省长。

6月3日　孙中山通电反对黎元洪复任总统，表示应由护法政府承继法统。同日，广州非常国会亦通电宣告中外，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筹备召集续开民六国会，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

6月7日　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工兵计划宣言》，主张解决国内问题之途径，在于恢复约法，而对裁遣军队的安置，则宜实施工兵计划。

6月11日　黎元洪入京就职，暂行大总统职权。同日，黎令，特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并准兼署国务总理、教育总长周自齐、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董康、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高恩洪均免本兼各职。

6月14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例会，黎元洪出席旁听，提出三大要案：(一)通令各战区即日停战谋和；(二)组织裁兵委员会；(三)裁减各部预算。

6月17日　孙中山改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亲率海军永翔、楚豫、同安等七舰由黄埔出发，炮击白云山叶举之总部。同日，广州政府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陈炯明。魏邦平、伍廷芳偕往黄埔谒孙中山，孙命魏率第三师协助海军收复广州，但魏按兵不动。

7月7日　吴佩孚电复唐继尧，反对召开联省会议，主张统一问题应由国会解决。9日，吴电蔡元培等，反对联省自治。12日，再电唐继尧，反对召开联省会议。18日，曹锟、吴佩孚又电复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

7月15日　北京政府陆军、内务、财政、农商等部职员八百余人，组成索薪团，至国务院向财政总长董康索八个月欠薪，遭董辱骂。职员愤而殴董致伤，当场有万文藻、万重成、刘逸仙等八人被捕。董提出辞职，次日黎元洪亲自慰留。

7月25日　张作霖以保安总司令名义致书盐务稽核处，声言从本月13日起，东三省之收入全部充东三省政费，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亦不受现北京政府之命令。

8月1日　(民六)国会在北京继续集会，众、参两院由王家襄、吴景濂两人分任主席，宣布此次开会，"系继续六年二期常会"。会上议员姚桐豫等数十人提议，此次国会应先行从事制定宪法，暂停行使其他一切职权。吴佩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等亦通电请国会专意制宪。同日，民八议员(指民国七年在广州递补，民国八年为莫荣新逐出广东之议员)在北京分别组织"法统学会"，倡民八正统之说。孙中山派员入京运动民八议员，反对旧国会。

8月12日　下午3时，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请愿团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发起人提出该团之要求为：(一)联省民主；(二)女子参政；(三)贯彻信教自由；(四)教育独立；(五)劳工保护等项。

8月13日　汉阳兵工厂两千六百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军警开枪镇压，打死工人三名。工人愤而爆炸机器一部，斗争结果取得部分胜利。

8月15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宣布陈炯明叛乱始末，并表示对于今后统一之意见：(一)护法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目的；(二)实施6月6日宣言所说之"兵工计划"；(三)发展实业；(四)尊重自治，惟不容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

8月24日　长辛店三千多铁路工人在工人俱乐部领导下举行罢工，断绝南北交通，粉碎军阀武装镇压，坚持两日，取得胜利。罢工工人共提出九项条件，主要有：增加工资，开除最坏之工头，争取工会有推荐工人权利等。此次罢工成为北方铁路工人罢工之起点。

8月26日　广东省议会开会选举省长，议员议论纷纭。议长陆梦飞与议员关文渊言语冲突，陆拔手枪击之，未中，秩序大乱。次日，广东省议会开紧急会议，将陆梦飞除名。28日，通过陈席儒任临时省长，陈炯明仍为总司令。

9月2日　在京护法议员一百二十人于中央公园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发表"保持资格，维持法统，促成统一"等主张，呼吁新闻界主持公道。次日，旅沪护法议员六十余人亦召开会议，议决留沪护法议员作北上之后援，发表声明时概用"法统维持会"名义。

9月4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会议，到会五十三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6月，孙指定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为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等九人，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10月4日　山海关京奉路铁工厂工人一千五百余人为反对厂方破坏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并以山海关工友俱乐部名义发表宣言，向铁路当局提出开除工贼、增加工资等六项要求。铁路局不仅不理，反而进行武装镇压。

10月10日　北京天安门举行国民裁兵大会，共七十七团体，两万余人，蔡元培主席。黎元洪到会演说，谓："兵额宜以强国为标准，军费勿过支出三分一"。忽有人要求立即取消治安警察法，黎勉强支吾数语，即退去。当场

演说者十余人，会后，全体游行，举小旗上书“减兵额救国救民”，“打倒军阀”。

10月13日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三千五百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消灭包工制等举行罢工。罢工后，该局副处长孙鸿哲向美国兵营求救，美兵立刻出动，将工人解散。工人大愤，遂发出第二次宣言，要求开除张起祥、贾香圃二工贼，并对美国兵营提出质问。经过八天罢工斗争，路局同工人签定九条协议，工人最后取得部分胜利。

10月18日　汉口英美烟草公司三千多女工为抗议虐待女工，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罢工十三天，取得胜利。后因厂方爽约，于次年1月2日再次举行罢工，又得到胜利。

10月19日　孙中山指示香港国民党支部组织“驻港办事处”，并分函海外侨胞及国民党员筹款讨伐陈炯明。

10月29日　北京五十余团体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撤销治安警察法大同盟”。会上决定：(一)即日再向政院呈请实行废止“治安警察法”，并限期答复；(二)组织永久机关，专为废止治安警察法事宜；(三)各省组织分部。当场推定费觉天、谭平山起草呈文，由蔡元培、林长民、毛一鸣、刘仲介到府面递。次日，民权大同盟等发起六十余团体，再次于北京大学第二院举行大会，议决向北京政府递请愿书，扩大运动规模等项事宜。

11月5日　中国各省区民治运动总联合会第一次职员会议，通过修订之章程大纲及宣言。该会为各省区暨蒙、藏、华侨等各团体所组织，“以发展民治，保障国权”为宗旨。总部设于北京，各省区设支部。

11月15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会议，审查国民党改进案。推定汪精卫、胡汉民为宣言起草人。

11月17日　东三省省议会电各省属机关声明直奉政见误会已由鲍贵卿从中调和。但张作霖对归还京奉车辆及盐税等问题仍无明确表示，并以“保境安民”为职志，拒受北京政府之命令。鲍于8日抵奉，23日由奉抵京复命。

11月21日　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通电，说明19日准备所下命令之内容；指责吴景濂等屡次包围黎元洪不令盖印，声明责任内阁已被破坏，惟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待罪”静候解决。次日，吴、张通电驳斥王等“淆乱听闻，借资抵制”。

11月23日　曹锟通电，攻击罗文干签订奥款合同丧权卖国，列举五罪：(一)“追加八厘利息”，(二)“滥算复利”，(三)“抛弃定银”，(四)“发行九折新票”，(五)“滥加所得税”。请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

12月4日　曹锟电请黎元洪饬法庭速开审罗案。吴佩孚亦于日前发表声明，请慎重处置罗案，勿使“刑事案”牵入政治，宣称对该案各方均无左右袒，对组织新阁不愿干预，对曹锟依然融洽。

12月18日　北京众议院通过张绍曾组阁案。上午，张邀两院议员数百人于外交大楼茶会，散发油印品并口头宣布政见，主对各省和平统一，并召集南北军事会议。下午，黎元洪派饶汉祥出席众院，说明提张组阁理由及其略历，随以多数通过并移送参议院。当日，蔡成勋即通电致贺。

12月19日　周予觉致电北京政府报告与唐继尧接洽统一之结果。谓商定由西南六省与北京政府各派代表，择地开南北联席会议，条件如下：(一)尊重国会自由行使职权，速成国宪；(二)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实行联省自治；(三)废督裁兵；(四)宣布民国五年以后北京政府所借内外债数目及用途；(五)宣布民国以来与各国缔结各项密约；(六)筹商各省善后事宜。又谓该条件唐已遍征西南各省同意，为最后之让步。

12月24日　北京成立救国联合会。该会为徐谦发起，旨在召集救国会议，协议解决统一问题。推冯玉祥、徐谦等为董事，全国商联会亦派代表任董事，又推徐为总干事。该会得到孙中山等人赞同。26日，冯玉祥宴请国会各派议员领袖，赞同徐等救国主张。

12月25日　东蒙王公于长春会议，决定依那彦图计划，请政府速迫苏红军退出蒙境，并电请蒙藏院协力进行。次日蒙藏院议决赞助该计划。

12月29日　北京参议院通过张绍曾组阁案。同日，护法议员第七次宣言，以国会自身未经合法，反对滥用同意权。

军　事

1月2日　直系靳云鹗第八混成旅全部自鄂省撤防，准备赴豫。5日，吴佩孚派参谋长赴保定与曹锟磋商，调曹锳五十二旅守卫辉，王承斌四十六旅守新城。豫、直二省重要车站均派得力军队扼守。

1月10日　沈鸿英部第二支队约一营人，在湖南平江城外哗变，抢劫商民，旋溃散，赵恒惕派宋鹤庚率部往剿。

1月11日　广州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北伐方案，决定向赣、湘出发，李烈钧部为前锋，许崇智部为后队，李福林部集中韶州。14日，孙中山宣布北伐大本营组织条例。15日，宣布北伐军分组七个军待命出发。同日，赣军赖世璜、李明扬两部奉孙中山令先期入湘，已陆续向永州移动。北伐军在桂林有四万人以上。

1月16日　顾品珍通电就北伐军滇军讨贼总司令职，以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宣布出师北伐。孙中山令

刘祖武代理云南省长。

1月21日　唐继尧在柳州设滇军总司令部，图回滇。是日，宣布委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

1月28日　唐继尧出发回滇。因黔军各旅扼守长安，唐军受阻，乃改道向西，分为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滇省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在庆远等地遇桂军残部，展开夺路夺枪之大混战。第一军军长李友勋战死，唐任命该军前敌司令龙云代理军长。

2月1日　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各师、旅准备粮服听令。6日，张作霖又召集高级军官开军事会议，并令所属各军整理军备，演习野战大操，候动员令下即分路出发。关内奉军均纷纷调动。

2月3日　孙中山下令北伐，命李烈钧率部攻江西；许崇智率部出湖南。同日，金汉鼎致电孙中山，请求声讨北京政府滥发库券。

2月19日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会议，议决：(一)决定设经略副使，4月中在奉天召蒙古王公开蒙务大会；(二)定六区实行联防，许兰洲为总司令，准下月初大举清乡；(三)决扩充奉天兵工厂，并于吉、黑添设分厂。

2月23日　直系召开洛阳会议，甘、陕、鄂、赣、苏、鲁、豫、直八省代表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对广州政府希其缓和北伐，不得已时，驻鄂直军拨一部分归赵恒惕指挥，以防御孙中山。同日，驻武昌二十五师炮队奉令准备赴岳。

2月27日　广东北伐军在桂林大本营举行誓师典礼。孙中山发表演说，表示："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3月22日　川督刘湘得孙中山援助，分三路进攻鄂西，北京政府国务院电吴佩孚筹防。

4月7日　湘军在衡州召开军事会议，议决：(一)湘军拥护孙中山北伐；(二)举谭延闿为湘军北伐总司令；(三)驱逐政学、研究两系人物；(四)设委员会执湘军政。

4月12日　陈炯明调动军队，图阻北伐军回师广州。

4月15日　直军分两路备战，吴佩孚、冯玉祥主力防陇海路，抽调王承斌、张福来防京汉线。许昌一带之直军，及由鄂开豫之第十二、十三、十四混成旅，陆续乘车开向保定方面。

4月16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抵梧州。旋即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决定"出师江西，悉命诸军集中韶关，以大本营设于韶关"。孙中山电召陈炯明赴梧州，陈因与曹锟、吴佩孚勾结，拒不前往。

4月17日　直军第十七混成旅是日由保定开向琉璃河、高碑店、涿县一带。第三补充团原驻高碑店，亦开至琉璃河与第二补充团联合一气，担任琉璃河第一线之防务。张福来驻岳之二十四师亦陆续北上，驻涿州。

4月21日　孙中山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省长及所兼内务部长职务，专任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属海陆军直辖于大元帅。特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兼卫戍总司令。当日晚陈炯明率部退往惠州。22日，伍廷芳就广东省长职。同日，陈部下叶举等通电宣称由南宁还师广州。

4月23日　孙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自梧州抵广州，任命陈炯明为讨贼军第一军司令，许崇智为第二军司令，李烈钧为第三军司令；孙并派古应芬赴惠州促陈炯明回省。同日，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黄大伟、李福林等通电，

4月24日　陈光远致电北京政府告紧，谓孙中山轻兵回粤，李烈钧部已抵韶关，许崇智部已抵连州，赣边危急，乞速救援。

4月27日　孙中山派温树德、陈策等接管驻黄埔北洋舰队，海琛号略有抵抗，经炮台及飞机示威，各舰次第服从。同日，孙中山电劝蒋拯、杜锡珪来归。同日，陈策通电宣布驻粤海军奉孙中山令，指日北伐。

4月30日　直奉战争西路战场，奉军增加兵力，猛烈前进。直军向涿州方面徐退。此时在奉军后方长辛店附近之三家店，也发生战斗。直军正围攻该地奉军之弹药库。奉军由丰台开来二十七师一部，激战两小时，直军退往良乡。

5月2日　北伐军第二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孙中山亲临授旗。广州市各工会特发起祝捷大会，庆祝许崇智军出师北伐。

5月5日　孙中山特任于右任为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总司令；免去大本营第四路游击司令陈策职务，另任陈策为广东海防司令。

5月8日　孙中山于大本营下讨伐总攻击令，令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军。任命李烈钧为中路总指挥，许崇智为右翼总指挥，黄大伟为左翼总指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三路总指挥。同日，陈炯明部下叶举要求复任陈为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省长，免胡汉民职。孙中山任命叶为粤桂边防督办。

5月20日　陈炯明所辖翁式亮、熊略、陈炯光、杨坤如、罗绍雄、何国梁、邱耀西各部七十余营抵广州，分扎城厢内外。广州全入陈势力范围。同日，陈部军官及各要人在陆军忠烈祠会议，并致电孙中山要求：(一)仍任陈炯明为粤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促其返粤；(二)免胡汉民职。

6月16日　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是夜，陈派四千军队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幸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登楚豫舰，驶入白鹅潭。召集各舰长，计议应变戡乱之策。随

后，宋庆龄亦脱险，与孙中山会合。

7月2日　孙中山召集各舰长说明应坚守黄埔之理由，各舰长表示服从。同日，孙中山任徐树荣为别动队司令，守卫黄埔。

7月3日　张作霖召开东北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对北京政府守中立态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调解，并认真训练三省军队。

7月4日　广州政府海军司令汤廷光、副司令温树德宣言赞成统一，请孙中山下野。

7月6日　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前线各将领，命北伐各军从速回粤定乱。

9月5日　孙中山分函朱培德、陈嘉祐，令其联合刘震寰、黄明堂攻取桂林。9月，朱培德、赖世璜退出湖南，占领广西全州，向桂林进军。广西自治军梁华堂谋与陆荣廷旧部韩采凤合力抵御。

9月6日　川鄂和议经刘成勋派代表陈敬循向孙传芳商谈，所商条件为：(一)川鄂军同时撤退、两不相犯；(二)渝宜交通立时恢复；(三)川鄂联防条约继续有效，由孙传芳电吴佩孚接洽。8日双方签字。

9月28日　刘震寰召开军事会议，决先肃清广东大河、抚河两路，回复桂梧、邕梧交通。滇、黔军均派代表谒刘，表示一致，自治军亦派代表接洽，广西桂平镇守使韦荣昌欲在戎墟运动军队起事，被刘拿获。

10月11日　黎元洪令：特任聂宪藩为宪威将军，李准为直威将军，金永炎为炎威将军，杨以德为将军府将军。

10月24日　黎元洪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为讨逆总司令、萨镇冰为副司令，高全忠为总指挥。

12月8日　张作霖因边防紧张，召集特别军事会议。决定由三省抽调四旅组成临时边防军，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一带。中俄边境实行戒严，驱逐中东铁路地区无业俄人，取缔红军张贴布告，禁止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同日，奉天官报公布划中东路沿线为特别区，以朱庆澜任长官，所有区内军警、外交、行政、司法各机关统归管辖。

外　交

1月2日　在华盛顿之中国国民代表二十余人赴中国代表团，抗议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下午，国民代表团总部召开露天大会，决议以上内容，并游行示威。

1月4日　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召开代表大会，并发出通电，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解决山东问题，反对四国协定；并表示：在相当期间，以上三项如不能解决，将设法抵制日本，并否认北京政府。

1月5日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致电美国总统哈定，抗议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支持日本，干涉中国。

1月8日　徐世昌令：中俄条约暨陆路通商章程已届第四次十年期满，现俄国正式政府尚未成立，无从提议改订新约，自本年四月一日起应即毋庸继续履行，嗣后俄商由俄国运来货物及在中国运出各货应完进出口税项，均照现行海关进出口税则完纳。

1月11日　中日代表经美代表许士斡旋，复就山东问题谈判，胶济铁路问题暂行搁置，先讨论他项问题。是日连续举行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会议，议决胶济沿线日军于中国军警接防后六个月内撤尽，青岛日军于移交行政权后三十日内撤尽。

1月27日　徐世昌授予参加华盛顿会议之顾、施、王三代表以山东问题签字画押之权。

2月1日　华盛顿会议开全体大会。美国代表许士宣告中日山东问题业已解决，并公布条约内容。大会通过中国铁路统一、外国无线电台移交中国、外国军警撤退等有关中国议决案。

2月13日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以香港当局因海员罢工，竟禁米、煤出口，近于报复，有伤两国感情，特致函驻穗英领事提出抗议。同日，英国政府电令香港总督速解决海员罢工事。

2月1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令取消华盛顿会议筹备处，另组华盛顿会议善后会，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3月14日　英国派巴尔敦赴洛阳交涉截留盐税问题。吴佩孚决定：(一)宜昌所扣之款原存大中银行，复转入中行汇京，同时政府酌拨款项交孙传芳；(二)宜汉增加附加盐税即电萧耀南暂勿实行，另行筹款；(三)河东盐款将尾数解京过帐，由财政部补一支付单，令由协直饷项下扣出归还该款。

3月21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使，抗议吉林六道沟日警武装部队深夜侵入垦民村庄任意拘捕伤杀村民，并电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本政府抗议。

3月3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两使：要求洋商货物交由华商在内地出售，应以华商商品论，遇有损害，不能由洋商出面要求赔偿。

4月10日　徐世昌宴请各国公使，颜惠庆及阁员均作陪。徐世昌演说“世界和平与中国之关系”，并称中国“政潮已平息，希勿误会”。各公使允电告本国政府。

5月1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牒英、美、法、意、日、荷、比、葡等国，请展期一年调查司法。

6月26日　驻津英领事要求美、法、日三国总领事急开四国领事会议，质问北京政府，何以对直军妨害铁路交通之举置诸不问。28日，四国公使开会议决由四国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要求，无论中国何项军队，对于辛丑条约均应严守，不得任意破坏天津、山海

关间之交通。

7月17日　巴意开斯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苏俄政府“业经允准本代表回莫斯科，派越飞为全权，使与中国政府商议一切”。27日，越飞自莫斯科启程赴北京。

7月22日　驻京比利时公使艾维滋赴北京外交部表示，已接到本国电令，同意中国缓付庚子赔款一年。法国指定以庚子赔款大部为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之用，其中小部分用于教育方面。英国议院正就此项赔款进行讨论，亦有充作教育经费之意，不赞成全数充作政费。日本则惟欧西各国之马首是瞻。

8月12　苏俄政府代表越飞率随员二十四人抵京。越飞一行于9日抵哈尔滨时，曾对记者发表声明，强调中俄建立友睦关系之必要。是日抵京时，有二十一个民众团体集会表示欢迎。13日晚，越飞宴请记者。

8月22日　各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通告：(一)中国政局纷乱已极，各国在此纷乱政局期间，决不能对中国政府为财政上援助；(二)外交团善意劝告中国政府，宜极力速谋全国统一；(三)张作霖之截留盐税及东三省之外交状态，外交团认为违反条约，要求中国政府确实答复；(四)届期外债本息，要求中国政府速行支付；(五)各省兵变频发，故要求中国政府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须切实保护，并要求损失之赔偿。

8月25日　苏俄代表越飞在李大钊、林伯渠陪同下与孙中山会晤，就当前远东局势与中国革命等问题连续商讨六天，宋庆龄等在座。为避开英租界特务的侦伺，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与苏俄代表去日本详细会谈。

9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别照会日使及苏俄代表，再次声明长春“日俄会议”如涉及中国领土主权与中国利益，非先得中国政府同意概不承认。

9月8日　顾维钧宴请中外人士王宠惠、王正廷、汪大燮、孙宝琦及芮恩施、福开森、辛博森等二十余人。席间美使芮恩施建议开募一种宪法借款，每月借美金二百万元，以十个月为限。

9月24日　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驻日代办公使，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于10月以前将“沿海洲”军队全部撤去。至于保护侨民，当另筹措置。北满日军之撤退日期，当俟中国军队能担任保护侨民为断。北京政府参陆处已电三省军事当局筹复。

9月2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接葡萄牙公使照会两件：(一)指责越飞在华宣传过激主义，应注意侦查。(二)希望中国即速实行华府决议案，即行裁兵。如中国再不实行裁兵，将来发生兵变，各国损失须由中国担负完全责任。

10月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驻京各国公使，新修税则定本年12月1日起施行。总税务司亦布告，12月1日起照新税则征收。16日，外国公使团恐关税增收之结果，为一党一派所垄断，通过葡公使代表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

10月1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驻京日使抗议海参崴日军私售军械于张作霖。16日，第二次提出抗议。25日，日使在外交部口头答复，否认海参崴日军官有售械与张作霖之事。

10月2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澳门葡兵惨杀华商一事，向驻京葡使提出交涉。要求(一)严办肇事葡兵及警察；(二)更换广州领事；(三)惩罚澳门总督，(即予撤任)并处分肇事警察长官；(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种行动；(五)澳门警察，一律更换华人充当，以免误会；(六)葡萄牙政府应向北京政府道歉；(七)驻广州之葡领，应向广州省政府道歉，并吊唁被害者之家属。(八)对于被害者家属，应优予抚恤。

11月3日　越飞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声明除苏俄外，各国均无权与闻中东铁路。要求：(一)取消该路管理处，将总工程师粤斯特罗莫夫逮捕法办；(二)派员彻查帐目；(三)与苏协商组织临时管理机关。8日，复送照会重申以上三项要求，并声明道胜银行对中东路已失去资格，其举动侵犯苏权利，有碍中苏关系。

11月6日　越飞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谓：中国政府未履行1919年及1920年宣言所载条件，倘继续藐视苏利益。苏将不再履行宣言义务。声明两国间各项问题解决之前，所有苏在华权益并不失效。强调中东路系西伯利亚铁路之一部分，即使让与中国人民，苏对该路之利益仍不消灭。9日又致外交部节略，重申该内容。

11月7日　外国驻京使团以各省截留盐税，危及借款担保，是日议决再向北京政府抗议，以派员赴各省交涉并由海关代收盐税相威胁，旋由领袖公使向外交部提出。北京政府答复，谓已设法解决，保证不影响借款担保及偿还本息。

11月8日　北京众议院将政府咨请追认之九种条约付审查。计有：《中智商约》、《中瑞商约》、《中波商约》、《中德协约》、《国际法庭公约》、《国际邮政公约》、《九国间对华适用各原则及政策条约》、《九国间对华关税条约》、《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11月14日　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18日越飞与远东委员团分别通知北京政府，远东委员团撤消，俟后一切事宜均向越飞接洽。

12月2日　俄军百数十人乘夜袭击黑省边境之札兰诺尔车站。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查明禁止。11日，越飞答复：彼系白党乔装红军所为，白党得在边界活动及北京政府纵容所致。

12月4日　秘鲁通惠总局华侨自卫会以秘众议院通过废止中秘商约，禁绝华侨入境，侨民生命财产失去保

障，通电全国请急起援救。11日，国民党驻利马总分部电请孙中山立即拯救。孙转电北京政府办理。21日，秘华侨代表五百余人通电，

12月20日　越飞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节略，拒绝16日之抗议。谓中国政府五年来完全片面处置中东铁路，且听任该路为白党练兵场及出攻苏之根据地。苏收回境内该路财产与中国政府对该路在中国之部分办法相同。声明关于俄境内所有东路财产之决议，于中俄会议双方对中东路问题完全解决之前，暂不能取消。

12月22日　驻京英使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将英庚款余额退还中国，作为“中英共同利益之用”。28日，英使馆于沪汇丰银行开一特别存户，将英庚款存入。同日，北京政府向英使表示感谢。

12月23日　驻京日、英、美、法四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北京政府不清偿到期债务，声称关余及烟酒、交通等收入不能单还内债，外债亦须顾及。

12月2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金法郎案函复法、比等公使，决定以纸法郎偿付庚款。

经　济

1月2日　广州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梧州任命陈少白为中央银行监督，梁长海为行长。

1月7日　华城银行开幕。该行由中国、挪威及丹麦三国商人合办，资本一千万元，1926年停业。

1月22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特种盐余库券一千四百万元(亦名“一四库券”)。偿还日期为民国十二年九月，利率月息一分五厘，以盐税剩余为担保。其用途，以一千一百万元还各银行债，三百万元作军政费。

2月7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交通次长郑洪年提案：(一)从法国退回赔款中或增收关税中，各指定百分之几，作交通大学基金；(二)交大开办费恢复原来所规定之一百零六万三千四百元；(二)交通大学经常费由五十八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元追加至五万四千元。

2月11日　徐世昌令：公布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条例凡十四条(即“九六公债条例”)。

2月15日　国民监督财政会在北京成立。大会决定：发表宣言，反对盐余公债；调查盐余公债之内幕；警告银行公会；清查财政当局拍卖中国银行官股。大会并推举吴鼎昌等十余人为代表，赴财政部、银行公会交涉一切。

2月16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仿照各国遗产税制发布《遗产税税则大纲》，通令各省照办。

3月15日　国民财政大会通电揭发张弧、潘复勾结发行之“九六公债”营私舞弊，要求北京政府停止发行，已发行者不能认为有效，并希望全国人民拒绝收受此项公债。

3月17日　北京政府外交、内务、财政、农商、交通五部共同规定“胶济铁路定为民有办法大纲”十四条，19日经徐世昌核准。主要内容为：胶济路干支各线及附属产业，由人民集股赎回，永为民有；各省区股款收齐后应即召集股东会，组织公司；一俟公司路款交清、全路赎回后，即由公司接管该路，归交通部监督。

3月31日　上海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在总商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为中国、英吉利、日本、比利时、巴西、丹麦、法兰西、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十一国代表，计三十七人。

4月14日　上海大中华纺织厂正式开幕。该厂于1919年6月发起，10月12日开创立会，1920年7月1日在农商部注册，1921年11月试车，厂址在吴淞蕴藻浜，厂基一百五十亩，资本二百万元，有纱锭四万五千余枚，总理为聂云台。

6月5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董康提出财政计划，建议由中外各银行合组一中外财政稽核处，所有政府应支经费，须经该处审查后方能发放。

7月9日　北京政府与法国公使签定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办)新约。条约规定，该行以庚子赔款充改组之用，银行业务只限于远东方面，管理董事会设于北京，公司资本总额为一千五百万法郎。

7月26日　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开会议决：(一)以后关税收入，除为赔款及善后借款支出者外，剩余之款全由总税务司保管，充作公债基金；(二)以前之公债基金，政府不得动用；(三)关税增加之一部分，作为“九六”公债基金。

8月9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长吴佩璜通电，历述电政已频破产，所负外债，已达极点，全国电政收入及营业权，将抵押尽净，急宜开源节流以图挽救。

9月1日　北京政府组织之修改税则委员会开第一次大会。英、美、法、日、比、意、荷、丹、挪、葡等十余国代表到会。由蔡廷干主席。会议讨论此届修改税则后之实行征收期与现行值百抽五税率。25日闭幕。

9月9日　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两部召集之全国关税研究会开会。各省总商会到者十余人，外交、财政、农商各部及税务处、财政讨论会均派员与会。

9月20日　黎元洪令：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顾维钧准免兼职，特派张英华任该会委员长；任命严璩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同日又令，著司法次长石志泉暂行代理部务。

9月25日　黎元洪令：公布《民国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条例》，凡十五条。规定发行一千万元以“筹付中央紧急政费”，利率为周年八厘，分五年还清，指定由庚子赔款展缓期满之停付俄国部分赔款为还本付息基金。

11月1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第四届大会于汉口开幕。出席者鄂、湘、川、陕、豫、鲁、晋、赣、苏、皖、浙、闽、粤、滇等十四省七十五人。推鄂商联会长吕超伯主席。萧耀南等到会致贺。在北京参加关税会议之各省商会代表以全国商联会副会长张维镛为首，主大会移京举行，与汉会大起争执，后妥协，仍赴汉加入大会。

11月14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华义银行经理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该项债券自世界大战以来早已贬值，德奥奸商在欧洲以低价收购该债券，并以债权人资格要求偿还或换发新券，屡被财政部拒绝。此次通过华义银行办理，王宠惠等为应付吴佩孚催索军饷并迫于各国政府压力，同意续约。王等乃将补款八万磅(合华币六十余万元)悉数交吴，惟未通过国务会议，仅由王批准。次日该行协理徐世一向吴景濂等告密。

11月28日　北京政府总税务司通令各海关，原定12月1日实行之新税则因关系各国尚未一律承认，展期实行。

12月3日　全国商联合第四届大会闭幕。2日，选举吕超伯为会长，穆藕初、张维镛副会长(穆坚辞未就)。定第五届大会于山东举行。会议期间，设审查会审查裁厘加税等案，并通过撤废常关、否认所得与营业税、取缔各省铸造铜元、反对铁路货运加价、取缔五省通用纸币、撤废货物附加税等议案一百二十七起。对罗文干案曾致电北京政府，请公平措置。

12月6日　黎元洪令：特派劳之常会同王正廷接收胶济铁路。派马叙伦等五人为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派张其密等九十余人为政治善后讨论委员会委员。

12月7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以奥款展期合同未经财政部咨请外交部通知各关系国公使签字，认为并未成立，责成外交、财政两部办理。

12月9日　中日邮政会议签订四项协定：(一)互换邮件，(二)互换保险函件，(三)互换包裹，(四)互换汇票。均于次年1月1日起实行，在华日邮同时撤废。南满铁路附属地日邮问题由两国政府另行解决。

12月10日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该总工会由汉阳钢铁厂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会等五个工团组成，会员三万余人，为当时全国最大之产业工会。

文　教

1月2日　北京大学、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校教职员，是日及3日连续会议，决定催索欠薪及经费，并提出分期发给办法，分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交通总长叶恭绰、教育部次长陈垣，声明如10日前不发清欠费，决不开课。

1月4日　北京平民大学成立，林长民为董事长，张一麟为校长。

2月5日　北京教育界召开教育独立运动筹备会，由蔡元培等向北京政府呈请将德国退回之庚子赔款三千九百余万元项内之四百万元现金拨作八校教育基金。京师教育会、私立中央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亦要求援照国立学校例，每月拨款，以资补助。

2月12日　“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于北京开成立会。20日发表教育独立宣言书，内容包括：(一)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脱离自治藩篱，明定预算，指拨款项，由教育界直接取用，共同保管，政府无取用之权。(二)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三)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

2月18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全体职员开索薪大会，21、22日又续开紧急大会，决定派代表六十四人向财政部坐索薪金，如目的不达，即实行总辞职。

3月1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筹办“退款兴学委员会规程”凡九条，规定该会专司筹划退还庚子赔款接洽事宜，并调查国内教育状况，决定退款用途及分配标准等。

5月21日　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浦东中学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四百余人，主席罗赤人报告开会宗旨，说明因要求精神之自由故反对基督教。

5月25日　北京午门历史博物馆，所贮明末及前清内阁档案、试卷等物，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员督同该馆移交北京大学收管。

7月2日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省议会开会，来自全国各省百余人参加，蔡元培致开幕词。

7月21日　黎元洪令：任命雷光宇为上海南洋大学校长，俞文鼎为唐山大学校校长，仝绍清为唐山大学分校校长。

7月26日　浙江教育行政研究会在教育会开会，会长叶谦，教育厅长马叙伦致词。大会决议：(一)以增加关税拨充教育实业支配案，公决付审查。(二)请预定“庚子赔款”退还后，充教育基金案，亦付审查。(三)指定学校试行新学制。(四)改校长委任制为聘任制。

7月28日　八校教职员联席开紧急会议，讨论教育经费问题，由尹炎武主持，要求北京政府同意：八校经费于关税实行值百抽五后，按月由关税收入项下拨付三十二万元。

8月20日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正式开会。社员到者四十余人。由主席张謇致开幕词，张孝若致欢迎词，社员谭仲逵致答词，梁启超，马相伯演说。22日下午举行第一次社务会，由杨杏佛主席。

9月20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黎元洪

到会讲话。蔡元培为主席，会议讨论内容：(一)学校系统改革案。(二)山西教育局所提学制系统草案。(三)省区教育行政机关设立参议会案。30日闭会，通过七项学制系统案。小学分初、高两级，定四二制；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中学分初、高两级，定四二制，但得通融为三三制；师范定六年；高专改为单科大学；高师改师范大学。

10月12日　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开幕。各省共推代表四十五人，田中玉致开幕词，袁希涛、胡适、何日章等演说，会议讨论内容包括学制、编订课程。

11月1日　黎元洪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初等教育：小学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中等教育：中学一般初高级各三年，师范六年，甲、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年限各地酌定，得用选科制；高等教育：大学四至六年，专门学校三年以上，用选科制；大学院年限不定。共二十九条。7日，教育部咨各省区遵照施行。

11月10日　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成立，中外记者及著作家百四十余人到会。推林天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六十人为评议员。其简章称："本会以向国会请愿，废止妨害言论自由一切法规，并另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为宗旨。"

11月15日　北京"万国报界学会"茶会欢迎美联合通讯社社长诺伊斯。诺倡言北京报界组织不受政府及派系束缚之通讯社。后诺赴沪，亦鼓吹参照美联社不党不偏之独立精神发展中国新闻事业。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3年

导　言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这次他抛弃了护法的旗帜，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旧国会恢复后已蜕变为一群政客投机的场所，因此以护法为国的民主革命，已不符合人民愿望，有鉴于此，孙中山打出“讨贼”旗号，具有更广泛、也更实际的意义。

曹锟在直系控制政权后，对总统宝座已是垂诞欲滴，抬出黎元洪只不过是做个样子，取得合法依据才是根本目的。1923 年 5 月，保定派议员提出黎任期已满，应当另行选举总统，为曹锟夺权制造法律依据。在一帮投机政客和亲信的帮助下，曹锟演出了一幕空前绝后的贿选丑剧，从而得到了“贿选总统”的头衔。

孙中山在与苏联接触后，又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在苏联和共产党帮助下，他着手进行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重新制订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和党纲。《中国国民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津浦路临城附近的沙沟山，发生了一起劫车案，车上旅客约 300 人被绑架，其中外国旅客 39 人。事件发生后，驻京各国公使严重抗议，为迅速平息此项事件，北京政府命山东督军田中玉采取措施，以欺骗手段解救了人质。

广州解围后，讨贼联军迫切需要军饷，孙中山命广州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使团，将粤海关关税主权交还广州政府。外交使团以军事相威胁，十二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以强硬立场发表宣言，终于收回了广东海关主权。

本年，广州海陆丰农会在彭湃领导下成立，为后来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早期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京汉铁路工人在本年掀起了大罢工，但由于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为保存力量，总工会发出复工命令，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 30 人。主要讨论了同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但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海丰农协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 ●“二七”大罢工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陆海军大元帅府成立
- ●曹锟贿选
- ●中国国民党改组
- ●收回关税主权
- ●临城劫车案

海丰农协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共产党员彭湃于1922年在自己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成立了赤山农会。农会领导的农运斗争影响日益扩大，不少地方都相继成立农会或酝酿成立农会。1923年1月1日，正式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会员达10万人，彭湃被推举为会长。以后又有陆丰、归善两县在海丰农会的影响和推动下相继建立了农会。三县农会会员达20多万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彭湃又将三县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久又改称广东省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长。广东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为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材料：

- ·彭湃：广东农会之组织经过
- ·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

材料一　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

一九二三年九月

彭　湃

海丰农会自去年八月成立，初入会者限于海丰人。后推及于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会员达十余万人，可谓空前之大会。后曾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近以范围渐广，遂改称广东农会。其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其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关。省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分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部。其会务计十二项：一、防止田主吊田，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工作，致生产日下。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田主请减租额。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极力和解，以免讼累。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事项。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十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业产品。第一、二、三、四、五、九、十二各项均已次第实行。

该会主持其事者为彭湃。彭系日本留学生，卒业于早稻田大学。人甚刻苦坚毅。无论暑天雨天，日常步行数十里，到各乡村演说及调查各事。此会日渐发达，东江各属，无论男女老幼，均无不知彭之名，因而田主恨之者亦日多，往往起以为难。唯彭始终不屈，恨之者固无如何也。

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团演《二斗租》之农村悲剧，当一贫农被田主之侮辱时，状最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当时田主闻知其日盛，有不利于己，已有扑灭之野心。

今年五月一日之劳动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会者万余人，手持小旗，欢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军警到乡，农会出而与之理论，而无恃其威。乡民有事，不用求于绅士之门。于是官厅绅士益加仇视，每每造谣农会交通土匪，收买枪弹，希图不轨，以构陷农会，然毫无凭据，莫可如何。

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大吹台风、大水，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该处空前之巨灾。其受害者，尤以农村为

甚。故该会按照其会务第二项，特召集大会讨论旱季减租问题。议决：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该会执行委员会发出减租传单如下：

（此处似缺佚——本书编者注。）

八月十一日，突有承批教育局租批商林卓存（现任海丰县保卫团局长）命其侄某，前往北笏乡（约三十余户之小乡村）收租。佃户戴阿丑，以凶年恳减。林谓："官租无减，十足照收。"而阿丑无力照纳。林便用斗盖木迎头痛击，阿丑逃避，林复追击。乡人闻声，争出劝阻。林借势逞威，踝跳怒骂，失足仆地，遂卧地诈伤。嘱其下人用轿抬回，诣县请验。县长王作新，竟侵越法庭权限，贸然受理。验后，即派游击队二十余名，武装到北笏乡围捕。乡民畏官，闻枪声响，纷纷走匿。时值久雨，潦水未退，妇孺无地隐藏，则相率呼号，奔突于途。官兵追至，圈而捕之，恣意搜屋掠物。最后，遂苛索差礼银三十余元，掳去乡民戴阿扶等三人，镣铕投狱中。此八月二十日（即癸亥年七月初一日）事也。

农会闻讯，当于十五日（七月初四日）开大会，议决：一方依据法律诉诸法庭；一方筹金救济入狱家属。而县长王作新，竟与粮业维持会等绅士集议，勾结军队，突于十六日早（七月初五日）带同军警百余名，围捕海丰农会会所。当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九百余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锁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苏等。十七日早（七月初六日）复查封农会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甚至诬说农会存款五万余元，寄存吕楚雄处，当勾结海丰粤军筹饷局长冯璧环，着令吕楚雄交出，提充军饷。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迫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近虽曾由老隆陈总司令去电，着令该县县长王作新即行释放被捕会员，恢复农会机关。然迄今尚未见施行，而军警下乡逼迫，日甚一日云。

以上是香港《华字日报》九月五号第二张第三页粤闻栏所载的，予多添同乐会及"五一"会于中段。至于请愿一段尚未添下，到底这几段若非详细写下，仍觉不甚重要。如何请裁之。至该报说我的好处，仍有过当，姑留为君一看。

选自《彭湃文集》第46—49页。

材料二　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纲领：

图农民生活之改造。

图农业之发展。

图农民之自治。

图农民教育之普及。

组织：

一　本会称为海丰总农会。

二　本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

三　会所暂设龙山宫。——通讯处大街宏仁西药房。

四　本会由各约农会代表及决心援助农民之青年组织之。

五　本会选出正会长一人，代表本会，总揽会务。副会长二人，辅助正会长。庶务部书记部财政部调查部部长各一人，主任各一人，部员若干人，专理各部事务。

六　本会经费，由各约农会每年会费缴交一半。

七　本会每月开常会一次。遇紧急事件发生时，由会长召集，开临时会。

会务：

一　本会议决事项，通知各约农会施行之。

二　各约农会如遇有不能解决或重大事件，得报告本会，代为解决之。

附则：

一　本简章于本会章未制定前有效。

说明：湃本来是要仿照"苏埃维"的组织法，不过我对于这种组织，尚未彻底明白。次是，一般农民智识低下，头脑单简，怕那难记的名词，所以就普照普通学生会式的章程。至于各约农会章程，亦是湃起草的。另外附上参考。

（原载《晨光》第2卷第1号）

"二七"大罢工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对京汉、津浦、京奉、陇海等铁路的工人迅速开展工作。其中，以京汉铁路全路工会工作最为显著，到1922年4月，全路已有16个工会，组织工人达3万之众。经过半年多筹备，1923年2月1日决定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当京汉铁路16个分会代表及其它方面人士约300多人到达郑州以后，吴佩孚便下令禁止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郑州军警实行全城紧急戒严，代表们不顾军警阻挡，冲破封锁到达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孚派军警捣毁封闭总工会，并封锁了代表们的住所（见史料1）。

为反抗军阀的压迫，总工会于当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于2月4日12时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工人总罢工，提出

"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并提出撤销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的职务、赔偿大会损失等5项条件，呼吁全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此外，还决定将总工会移至江岸办公。

当2月4日12时罢工命令届时下达后，全路所有客车在三小时内一律停开，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2月5日，吴佩孚派军队到处强迫工人复工，但都遭到拒绝。2月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派军队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44人惨遭杀害，300多人受伤，60余人被捕入狱，1000多人被开除(见史料2)。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下，"二七"大罢工失败了。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为保存工人实力，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忍痛宣布复工。

"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援京汉路工人的斗争，各地纷纷举行示威，声援"二七"罢工(见史料3)。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了支援工人罢工的宣言(见史料4)。

"二七"罢工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军阀吴佩孚的反动统治，而且在经济上也使北洋政府及帝国主义受到损失，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威力。在斗争中，也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

"二七"惨案也使中国工人阶级得到了血的教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工人阶级必须组织国民运动，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争取革命的胜利。

材料：

- 津浦路罢工风潮之非常激烈
- 风云突变，全线罢工
- "二七"大屠杀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

材料一　津浦路罢工风潮之非常激烈

——受长辛店汉口之激刺/挑拨者不能辞其责任/宜如何设法速行消灭/政府勿取自杀政策

(1923年2月9日)

(本报特讯)职工之举，无论国家及工人方面，皆有极大之牺牲，苟为爱惜国家及工人计，安忍见其扩大。但凡事必有激之使然者，若专责工人，决非事理之平也。此次各路罢工风潮如此暴之举动。夫时至今日，无论如何顽固守护之国家，断不能否认人民结社集会之自由。工人之开总会，既非秘密行动，亦未必有何政治意味。若最初当局者有眼光、有手段、有诚意，则因势利导，允许工人相当之自由，而范之于正轨，工人之智识增进，能率亦因而增进，团体坚固，可以对外，为政府之后援，实国家之大幸。乃一误于郑州禁遏工人开会，致双方衝突，为极巨风潮之导线，此最初应付方法之大错特错，官厅不能辞其责也。京汉既有罢工之事发生，政府若能及早注意，知此项问题之重大，且有扩张之虞，则从速以和平方法消灭之，亦未始不足以补过。乃一误再误，未几有长辛店之惨剧。又据汉口来电，则杀戮压迫之祸尤惨，竟毙工人数十名。以如此之时机，遇如此之风潮，若谓漫无政策，一味用武力可以奏效，虽愚者亦知其不然。此事发生以后，应付方法之大错特错，官厅更不能辞其咎也。既有四方风动之危机，难保无人从中推波而助浪。官厅竟一而再再而三，挑拨激刺，若惟恐其不扩大，于是蔓延之祸成，国家与工人之损失，乃皆不可以数计。须知从国家和社会的眼光观察之，工人亦支持国家社会之重要分子。任意摧残，岂非太不经济。此本报极中正严明之观察，若非别具肺肝者，决不能谓非正当也。

因有长辛店汉口之两种大激刺，于是为南北干线之津浦路工人，乃早有秘密酝酿之报告。前日有人晤其局长，谓南段有不稳之消息。然不过提出条件，要求加薪等事，未致于爆发也，大约因汉口之风声传播，于是昨日津浦路亦如京汉之陷于全路罢工惨境。且闻手段非常激烈，而南段尤甚。可以证明此举之自南而北，其受汉口之影响，更无疑义。据交通界所得报告，则津浦工人之举动，未免过于激烈，毁坏车头七个，沿路之钉，皆已拔去，且职员工头之受伤者甚多。此事当局不宜掉以轻心，应细密加以研究。此类举动，又可证明其发动已为真正之下级工人，非少数人所指挥。盖若为机械的受人驱策，则不过消极的罢工而止，不至有如是毁物伤人之事。是必受激刺而触真正下级工人之怒，方有如是现象发生。此当局所当以沉静头脑研究，而可悟纯用高压武力之不济事，否则即不啻自

杀之政策。本报因希望京汉津浦以外勿再蔓延，乃贡献如是之意见。政府须知劝当局用高压武力者，非毫无知识即系别有作用也。

（原载1923年2月10日北京《京报》作者：邵飘萍）

材料二　风云突变　全线罢工

二月一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宣言内容如下："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和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的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策，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珣丧心病狂，捏造播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在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武器了，我们要发出全体动员令了，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珣；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邻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生、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诀定京汉铁路总工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二日，我偕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

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但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现在回头来分述京汉路几个主要大站，如长辛店、郑州和江岸等分工会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斗争情况。这些曾详载于我当年所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之中，其中包括许多历史文献，现略作补充援引如下，以飨读者。

在长辛店：该处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事项。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冯沺，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冯沺三个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此电未直讦吴佩孚、曹锟，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但文电俱在，岂能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选自《椿园载记》作者：罗章龙）

材料三 “二七”大屠杀

二月一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敌人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要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至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备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愤，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振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二月一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遗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会所被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实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会所

即被封闭。

（摘自《“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材料四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获悉你们为反对军阀——英、日、美资本的仆从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谨向你们致意，并相信：你们今后绝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红色工人旗帜。

铁路工人同志们！你们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你们居于少数是暂时的，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督军的斗争中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也是暂时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将同你们联合在一起。你们在最近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口号，以及你们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你们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你们的斗争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只有争得组织自己力量的权利，我们才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中国人民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进行进一步的斗争。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同你们战斗在一起。现在它正遭受着军阀的残酷迫害，而这些军阀在汉口和北京也枪杀过你们的同志。从这时起，你们就同中国共产党更加亲密起来了。你们会从斗争经验中发觉，你们同这个党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个党不仅捍卫铁路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你们既然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你们也就进入了领导全世界革命无产者斗争的共产国际的战斗行列。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原载1923年3月3日《真理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逐步形成的。1922年1月，列宁在接见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时，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能够相互合作。

1922年3月和8月，马林两次来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经过热烈辩论，最后多数中委接受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同拜访了孙中山，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不是偶然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曾长期进行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但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只有少数左派仍坚持革命立场，从整体看，国民党已成为一个成份复杂、组织松散的政治集团。孙中山要革命，就必须依靠共产党这一新生力量。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国民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认真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评了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倾向，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党的“三大”确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合法地位，公开或半公开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同时也有利于国民党本身的改造，使之获得新生。

材料：

- 我在“三大”前后，
- “三大”前后的回忆
- 毛泽东“三大”前后

材料一　我在“三大”前后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二十年代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大会。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是年五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根据北方区内党员人数比例，约十至二十名党员中选派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事后，发通知到所属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组织，说明中央即将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同志们重视这件事，及时选派代表。对较为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

通知发出不久，又接到“钟英”（当时中央的代号）给李守常和我的信，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准备情

况；补充了出席“三大”应该注意的事项，多半属于事务和保密工作问题；信中还要求李守常和我都出席“三大”。当时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守常，我是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并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央希望我们去，以便于全面了解北方区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也经群众选举，通过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十二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有：

李守常（北方区委代表）

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

王荷波（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仲一（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　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张德惠（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邓　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陈　涛（北京地区工会党团代表）

刘天章（陕西中共支部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和我同船到广州的有湖北代表项德隆。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党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开滦罢工期间，他曾亲来北方，深入基层，视察工人情况，与我过从较密）。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当时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没有住在大会会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上述北方区代表外，还有南方各地代表，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朱绍莲、林育南、项德隆、陈潭秋、恽代英、王用章、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等

还有一些代表和没有表决权的列席人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的代表等。总计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以铁路和矿山工人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物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前两次大会 所未有的。

“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五月就开始了，到正式开会约近一月时间。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各地代表齐集广州后，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三大”的各项问题，由国际代表马林主持。

在扩大会上，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概况，并强调了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文件，是关于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是由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翻译译成中文，全文有几百字，大意说：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革命发展很迅速、前途很乐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共同革命。这个文件无疑对这次会议起了指导作用。这次会议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准备了决议案。

“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崧、阮啸仙等人负责。

“三大”正式召开前，马林还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马林的谈话就很必要了。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在提到“三大”的组织路线时指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除国共合作的政策外，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在大会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

大会的地址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即陈独秀的住所。他家有一间较宽敞的客厅可作为大会会场。会议有时也在春园马林的住处召开。会议的日程安排有：国际代表的报告，“二大”中央报告，各区工作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还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别起草决议和文件。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文件和决议有：

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三、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四、劳动运动议决案

五、农民问题决议案

六、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七、青年运动决议案

八、妇女运动决议案

九、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三大”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最后大家接受了国际代表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

（选自罗章龙《椿园载记》）

材料二 “三大”前后的回忆

我是一九二二年一月以天津“新中学会”代表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候，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人们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穷党”，听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变化很大，我很想知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借此机会能到莫斯科去看一看。

当时我是天津法政学校的教员。是李大钊同志通知我去参加这次会的，和我一道走的还有唐山的工人邓培。我们从天津乘火车先到了沈阳，住在朋友开的一个旅馆里，然后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去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在满洲里有专人接待我们，用扒犁把我们拉到俄国境内一个叫十八里站的地方。从满洲里到十八里站是中俄两国不驻兵的中间地带，只有苏俄警察看守，在那里停着一列火车，等参加大会的代表到齐后，列车才开走。

在十八里站候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住在很破旧的车厢里。有一天，张国焘把我找去，他是共产党的代表，他住的地方比较讲究，是客车的包厢，里面有沙发、写字台、轮床，显得很阔气。当时他还是学生，我是教书的，我觉得学生应该尊敬先生。我走进去一看就有气。然后他就问我信仰什么主义？我一听更烦了，心想为什么一定要问我信什么主义呢？原来张国焘以为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会议，他曲解了列宁关于这是一次民族会议的本意，他想阻止我去参加这次大会，对我不信任，我就故意回答他说：我信无政府主义。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从国内去的有十七、八人以上，还有一部分在莫斯科学习的人也参加了。我能记起来的代表有：唐山的邓培；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还有一个姓王的，后来当了特务，名字记不起来了；安徽有几个人，名字记不起了；广东有两个工人；湖南有王光辉；无政府主义者有黄凌霜，还有黄璧魂，是个小脚，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孙中山曾发给张秋白一个证书，但他最初不暴露身份，而是以记者的面目出现。还有贺衷寒、俞秀松、瞿秋白等。瞿秋白当时在莫斯科，他一方面负责接待我们，一方面给代表团做翻译。

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日本、朝鲜、蒙古等国的代表，南洋只去了一个印尼代表。

在会议进行讨论时，我在会上就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了一个发言，那是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史》这本书中讲的一段庚子赔款的历史，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会后，听别人反映，认为讲得还不错。

会议期间，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张国焘。但他没有将列宁接见他的情况告诉代表们。我们对张国焘的这种作法，也非常不满。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我们还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把车站上半截劈柴罗起来，这活叫码闹子。那时火车不是烧煤，而是烧木柴，做饭、取暖都是烧木柴。

会议给代表们准备了很好的宿舍。当时苏俄经济十分困难，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俄的居民每人每天配给一些又酸又粗的黑面包。为了优待我们，给代表们吃一半白面包，一半黑面包。张国焘提议把白面包捐给儿童们吃。大家都支持他的提议，把白面包拿去送给儿童去吃。

开完大会回国时天气更冷了。代表团八个人编成一个组，分三批回国。朝鲜、日本和蒙古的代表也都从满洲里这段路回国，我离莫斯科之前，在那里买了一些印刷的油画。当时莫斯科市场上生活日用品很少，这种印画很多又很便宜。山东代表王乐平去的时候带了一些茧绸，卖了不少钱，回来时，他还买了些皮货。听说从苏俄的十八里站到中国的满洲里之间土匪很多，经常发生抢劫。我们路上没遇见土匪，在我们后面的山东代表却遇上了。王乐平带的东西、钱都被抢光了。到了满洲里，连路费都没有了，我给了他们路费，才到了天津。

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北京经李大钊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在天津法政学校任教，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女一中等学校兼课，每星期都要往返于天津北京之间。当时杭州法政学校也需要教员，马叙伦托李大钊给物色教员，结果李大钊把我介绍去了，我于一九二二年暑假到杭州去教书。

一九二三年六月，李大钊在北京写信通知我去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当时没有路费，就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

叫我去参加“三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老同盟会员接触孙中山国民党方便一些（李锡九、江注源、吴玉章等也是这种情况），联系国共合作等具体问题，孙中山容易接受。

杭州的党务工作最初是沈玄庐负责。“三大”以前，在上海的江浙区委负责人徐行之（即徐梅坤）经常到杭州活动。杭州出席“三大”的代表有两个人，除我以外，还有金佛庄，他是个军人，后来在黄埔军校当了教员和队长。我和金佛庄先到上海，然后一道乘船经香港再到广州。

我对“三大”的印象不深了，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和几个他手下的广东党员刘尔崧、阮啸仙等，还有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刘仁静、金佛庄、徐梅坤、李大钊等人，其他的人记不起来了。

在我的印象里，“三大”开得很急促，因为马上就要同国民党进行合作。会议的内容就是决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最后决定不是以全党的名义加入国民党，而是以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所以后来大部分人参加，少数人不参加，如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没有参加国民党，以表示共产党是独立的政治组织。

"三大"以后，我回到杭州继续教书，到一九二四年暑假又返回北京。

（选自于树德《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

材料三 毛泽东"三大"前后

1923年初，叛变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被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3月，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权。早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遇到很大的阻力，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加速国共合作的步伐，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等30余人（有代表权者19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大会讨论并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推动全国范围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大会前夕，毛泽东提前来到广州，同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住在新河浦"春园"，协助陈独秀进行筹备工作，起草"三大"的有关文件。大会上毛泽东同多数代表一起，坚持正确意见，反对错误的意见，特别在如下两个问题上发表了正确的见解。

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问题。张国焘不懂得同盟军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在大会讨论时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虽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但他在"三大"会上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毛泽东在"三大"会上，多次发言，提出主张国共合作的许多理由，主张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年1月12日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既批评了张国焘的"左"倾观点，也反对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且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他还针对陈独秀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轻视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观点，展开了争论。他以1922年长沙第一纱厂和1923年京汉路罢工为例，说明工人是有觉悟的。毛泽东说："'二七'罢工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二七'罢工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影响是主要的"，"二七"罢工后，"安源工人运动继续发展，有小莫斯科之称；还谈了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矿工人斗争的情况"。大会在充分讨论之后，通过了毛泽东等大多数代表的正确主张和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惑。……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

关于农民运动问题。"三大"讨论中，围绕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问题，对农民运动问题开展了一场争论。陈独秀在他所作的"三大"报告中未提到农民运动问题。在大会辩论中，陈独秀夸大中国农民的缺点和弱点，说"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像'"。"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于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针对这种错误，毛泽东在"三大"发言中，"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还说到历史上农民斗争的力量是很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毛泽东在"三大"发言时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央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作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贡献。……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张国焘这本书有很多歪曲、捏造事实的地方，但他这些对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的记述与评价，笔者认为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三大"通过民主讨论，大多数代表基本赞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正确意见，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遗憾的是这个《决议案》没有采纳毛泽东关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正确主张，对

农民革命的斗争目标提高得不够明确。当年出席“三大”的代表罗章龙在《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说：“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小组讨论会，是毛泽东主持的，我是参加了。对于没收地主的土地问题，毛泽东一早就提出来了，但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地主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是大地主多，有些地方是中小地主多。因此，大家对关于没收地主土地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还是没有把土地问题写进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建国以后，党史学界在评论中共“三大”时，认为：“对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是“三大”的一个不足之处。

由于毛泽东在“三大”讨论中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与支持，同时毛泽东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也进一步提高。因此，在大会选举中，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和中央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负责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的胜利召开，为国共和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了思想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为国共合作，推动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三大”闭幕后，代表们返回各省，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暂留广州，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他们为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随后，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到上海贯彻落实“三大”的决议。1924年1月，毛泽东等人再次赴广州，参加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李大钊、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会后被我党中央派到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中共“三大”象一座历史里程碑！“三大”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和农民运动的理论将永放光芒，指引中国革命不断前进！

(选自《党史月刊》，作者：黄其岐)

陆海军大元帅府成立

背景介绍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十七日到香港，二十一日到广州。孙中山在滇军让出来的农林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孙中山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将他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他从事民主革命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时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把“恢复法统”作为他们骗人的花招，旧国会恢复了，而这个国会的组成分子大多是争权夺利、投机取巧的政客，这个国会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人民迫切需要解除自身的痛苦，首先是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并且宣布此后转入到“讨贼时期”，实际上所谓“贼”是指称兵背叛的陈炯明，后来直系军阀和一切反对民主力量的各省军阀，也都被指为“贼”，都是孙中山讨伐的对象。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这个名称不但含义更为广泛，而且更为接触实际。他所设立的大元帅府仍然具有政府的性质，他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又改任徐绍祯为广东省长。

二十三日，孙召集各军将领在大元帅府举行会谈，发表演说，对北方主张维持和平，先讨伐西南内部首鼠两端的地方军阀。这个“远交近攻”的政策，与以前团结西南一致对付北方的政策截然相反。

孙中山下令嘉奖滇桂军讨伐陈炯明的攻勋。二十四日又下令，指定肇庆及西江北岸上自梧州为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的防地，所遗北江防务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派队接收；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以石龙、东莞、虎门等地为其防地；并指定罗定一带为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的防地。嗣后各军非有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材料：

- 参加孙中山先生大本营之回忆

材料　参加孙中山先生大本营之回忆

中山先生以1922年遭陈炯明叛变被迫离粤去沪，表面上看来似告失败，而实际上则大有所获。盖政治上既与陈逆划清界线，中山先生之伟大革命精神，益为国内外人士所服膺，为日后改组国民党，订立三大政策奠下了基础。中山先生抵沪下久，许崇智等北伐粤军转而攻下福州，驱走北洋系之闽督李厚基；继而西路滇桂军攻克广州，陈炯明被迫东退，中山先生重新又获得两省地盘，对内对外较有活动和说话之余地。其最重要者，则为得到中国共产党之帮助而与苏俄关系逐渐密切。有名的《孙越宣言》(1923年1月26日)发表后，革命路线分明，国民革命事业遂取得新的进展。其时中山先生在沪以内外联络关系，尚有即拟回粤，而只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使之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及团结滇、桂、粤各军肃清叛军残余，待机进取。并派邹鲁、邓泽如、古应芬、孙科等为胡之助。但不久，桂军沈鸿英包藏祸心，觊觎广东地盘，阴谋杀害

胡汉民、邹鲁、魏邦平、陈策等，因而有所谓"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虽未得逞，但胡汉民终被迫辞去省长职。中山先生乃改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孙科为广州市政厅长，港商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长，伍学晃为两广盐运使，暂维现状。中山先生随于2月21日由沪底粤，鉴于民十就非常大总统职事内部之不巩固(陈炯明辈阴阻)，曾引起桂系之通电反对，且未得北方段(祺瑞)、张(作霖)之赞助(段、张及所有北方将领多不附和或表示反对)。当时为了联合各方面力量，打倒当前最大之敌人曹(锟)、吴(佩孚)起见，必须注意联络段、张。故中山先生遂决定不复任大总统职(当时国民党内部主要人物亦主张暂不复任总统职)，而改任大元帅职。并在广州东郊之农林试验场(后迁于河南士敏土厂)设立大本营(帅府)。当时大本营主要组织和人选如下。

秘书长　杨庶堪

参谋长　李烈钧　李旋出任闽赣粤边防督办收抚叛军，改任蒋中正。

参军长　朱培德

财政部长　廖仲恺

军政部长　程潜

外交部长　伍朝枢

内政部长　(暂未发表)

建设部长　邓泽如

大本营所辖各军及指挥官如下：

东路讨贼军　总司令许崇智(约二万人，尚在福州)。

西路讨贼军滇军　总司令杨希闵(约万五千人驻广州及粤汉、广三路沿线)。

西路讨贼军桂军　总司令刘震寰(约万人，驻广州及广九沿线)。

又桂军　总司令沈鸿英(约万人，驻广州北郊及北江西江等处)。

其他尚有滇军军长朱培德约三千人，桂军军长刘玉山、陈天太各约二千人分驻广州、东江等处，粤军梁鸿楷等师旅约共万余人散驻于江门、四邑一带。

海军司令陈策，有江海防舰艇数十只。

以上各军，除东路讨贼军尚在福州准备回粤讨贼外，所有在粤各军，各皆占驻防地夺取税收，包烟、庇赌，民怨沸腾(就中少数如粤军第一师比较有纪律)。大本营辖下广东地盘，不惟尚未全复，即广州一隅，亦往往政令不能行使，广东各机关，类皆有职无权，形同各军附属之筹饷局而已(除应付各军索饷外，几一事不能办)。在大本营成立初期，统一军令政令，固多掣肘，财政情况，尤为拮据。4月16日沈鸿英公开叛变，投降曹、吴。中山先生以征讨叛逆，后方勤务极为重要，应设一统筹机构，爰于4月20日特任罗翼群为大本营兵站总监。当兵站总监部成立时，大本营财政部于万分拮据中勉强先拨十万元为开办费，以后由于兵站所需费用相当浩大，又由帅府下令除将广州市公安局所收本市房租捐一个月(月约一百万元，以后陆续加收至三、四个月)，并饬广东官产处变卖一部分本市和各地寺庙等公产以供军需应急。此外，虽仍责成各机关按月设法筹措，但所得有限，无以解决大本营经费上的困难。时廖仲恺任财政部长，每日忙手于应付各方需索，大有焦头烂额之感。

正当沈鸿英发动叛变，中山先生军书傍午，大本营财政罗掘俱穷之际，夙负时望之"交通系"要人叶恭绰偕郑洪年来粤表示愿意追随中山先生革命，遂大受中山先生之嘉许。时国民党中主要人物如胡汉民、廖仲恺等，对叶之来归亦表示欢迎。胡与叶本为少小同学，早有文字相知之雅；廖久掌财政，适在艰难困苦之中，今得负有"财神"之名如叶者入参大本营帷幕，正喜瓜代有人，故当中山先生于延请叶出长财政之际，大家都无异议，且表欢迎。中山先生遂下令以叶恭绰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郑洪年为财政部次长。由于叶之参加大本营，以致各机关人事大加调整：原任财政部长廖仲恺调任广东省长，原任广东省长徐绍桢调任内政部长，建设部长邓泽如调任两广盐运使，而任谭延闿为建设部长(后谭出任湘军总司令，又以林森为建设部长，林未到任前，命叶恭绰暂行兼署)，原任盐运使伍学晃改任建设部次长，原任财政厅长杨西岩改任内政部次长。5月间叶恭绰再度由香港回来，自审财政情形内外俱无把握，对于广东人事之复杂亦感棘手，乃只允就财政部长而辞兼财政厅长。中山先生不便相强，爰于5月18日改任邹鲁为广东财政厅长。

(摘自《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

曹锟贿选

背景介绍

张绍曾组阁后，曹锟即积极策划夺取总统职务的阴谋。1923年5月，保派提出黎元洪的任期到1922年12月已届满，应由国会另选举总统，为驱黎夺权制造法律依据。

6月6日，内阁中保派阁员在曹锟的指使下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内阁总辞职，事后，直系军人反诬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破坏责任内阁制。张内阁辞职后，北京出现无政府状态。8日，曹锟利用军警和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9日，曹锟又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等率领中级军官数百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同日，北京市警察罢岗。自此，各种公民团和军警，打着驱黎、索饷的旗号，不断地在黎的住宅滋扰。13日，曹锟见黎仍不交权，又指使冯玉祥恫吓黎元洪，要黎

在12小时内发给其部欠饷300万元，否则军队自由行动，冯将不能负责。当天下午，黎元洪离京赴津。黎到天津车站后，又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交出总统印信。次日，黎被迫电告留京的家人交出印信并发表辞职通电后，才获释放行。

黎元洪被逼出走后，曹锟便明目张胆地展开了贿选活动。曹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又以每张选票5千到1万元的价格，贿买了500个多个议员。10月5日选举的当天，曹锟派出大量军警在国会周围警戒。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曹锟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日，曹锟就职。同日，颁布了一部反动的《中华民国宪法》。

曹锟的贿选和制宪是直系军阀践踏民主政治的最丑恶的一幕。曹锟贿选的丑剧，教育了孙中山和全国人民，使人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首先必须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从此，"打倒军阀"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

曹锟贿选之日，便是直系军阀统治开始瓦解之时。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贿选。许多省都声讨本省受贿议员，责骂他们是猪仔议员，有的省还开除了他们的省籍。上海20余团体发起了"双十节国民讨曹游行大会"，组织数千群众游行示威，呼吁全国"出师讨曹"。孙中山以海陆大元帅的名义通电全国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积极筹划改组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推翻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材料：

- 买票活动
- 曹锟大选经费

材料一　买票活动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三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三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三百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常会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因此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宪后选"的诺言而代之以"先选后宪"了。

九月八日，保派规定大选出席费另加二百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二百元。但因条件还有距离，当天的总统选举预备会没有开成。

九月十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四百三十一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四百三十六人，会议得以开成，议决于十二日正式举行总统的选举。被冒签的议员和众议院秘书孙曜都有通电揭破吴景濂冒签名单的黑幕。

九月十一日晚间，摄政内阁阁员与熊炳琦、刘梦庚、王毓芝、边守靖等又在外交大楼联名欢宴两院议员，并提高大选出席费为五百元。十二日为正式选举之期，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在众议院门前张架棚帐，并派便衣侦探分布东、西车站阻挡议员出京，同时警察传知市民悬挂国旗，庆祝新总统的诞生。但因冒签名单问题引起争吵，大家一哄而散。

这个时候，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由于津、保政客办事不得力，于是直隶省长王承斌于九月十四日来到北京，向议员们提出了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决定在选举前发给每票五千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和先选后付的争端。可是不少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王承斌请他们派人到天津直隶省银行查明无误后，他们又担心直系势力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这笔贿款移存外国银行。

十月一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五百七十三张，每张为五千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的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以边守靖所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一直到这个时候，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还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有些议员怀疑总统选出后，直系反脸不认帐，他们打不起臭官司来。大多数议员则认为曹锟当选后，还须继续利用国会为其政治工具，不会恶劣到行骗赖帐的地步。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摄政内阁公开进行交易，直隶、山东两位省长公开到北京来替曹家办事，一时铜臭熏天，通国皆知，可是还缺少实人实证。十月四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的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这个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五千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证件发表后，直系在铁一般事实的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先将眷属送出北京，随后本人也到天津转道往上海避难去了。

十月四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四个月来流会达四十四次的宪法会议得以召开。出席议员要求摄政内阁公布众议院任期延长案，当然可以办到。吴景濂将宪法草案地方制度章自第二条以下各条提付表决，通过了二读会，国权章也交二读会讨论。当天选举总统会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十时选举总统。

四日晚间，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活动，门前停放汽车达几百辆之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立机

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的代价高达八千元，共计收买了四十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失败了。在这四十人当中，还发现有两面拿钱的。

五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梭巡。宪兵警察在虎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人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行退出。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里象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八时半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因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一百八十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十一时四十分，签到者还不过四百多人，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一时二十分，签到者有五百九十三人，才摇铃开会投票。四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十八票。废票十二张中有“孙美瑶”、“五千元”各一票，“三立斋”三票。

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联合“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以前投票选袁经过十四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六小时。所不同的，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匭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

总统选出后，总统选举会赶办公文通知摄政内阁，内阁赶派专车迎接“新总统”来京就职。议员到保定恭祝“老帅”当选者竟占两院人数的五分之三左右。

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十月八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全部获得通过，即于十月十日上午十一时由众议院予以公布。十年来经过无数波折没有完成的宪法，在十月四日至八日五天之内，随着贿选总统而开快车完成了。

曹锟于十月十日到北京就职。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原）

材料二　曹锟大选经费

关于曹锟大选经费，直、鲁、豫、晋、苏、皖、赣、鄂、闽、湘、陕、甘、新、热、察、绥十六省区，已答应报效，计分三等，富庶之省，出五十万元，次省出三十万，再次者出十万，能否立刻汇出，尚属疑问。而江苏之齐燮元独允一百万元，以三事为交换条件：(一)齐为副总统；(二)齐兼苏皖赣巡阅使；(三)以陈调元为山东督军。上列三项，须先发表，始能交款。但保方以曹未入京，如何发表此事，一时尚不易解决。又一消息云，曹锟既存非分之望，鉴于议员之非钱不行，决意收买，然不肯破悭囊。洪宪公司之关店信计杨度，窥知其情，乃为想上海打印子钿这法，推想至垫款买办法，由各省报效若干，待老三登位之后，发行非常公债二千万元，摊分垫款者，老四赞叹久之，直省先助五十万元，田中玉八十万，冯玉祥二十四万，吴秀才处一无表示，鄂轻[?]豫张，假装不闻。最奇者莫如山西之模范督军，只破费一张公文，轻轻加上财部汇拨山西饷三十万，划付保定，作为股本之一。时财部中有张姓其人者，览此公文，不觉失笑，私谓人曰：“我们财政部兼做汇划庄生意”。此语传之张英华耳中，立即开缺。人谓五年百前共一家，竟如此秉公办理也。津商（系贩米者之一）阿方，亦报效五万元，其款由潘大总长转交，潘竟吞没之，现在交涉中。尚有张英华、王买办、王占元、魏联芳，各助十万，故今日凡有十万五万凑入者，他日凌烟阁上，必有地盘题名也。

保方如今心中目中，认为最要紧的一桩事情，便是大选。照他们的意思，最好是不费一钱，白白到手一个总统。然而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交易呢！因此不得不急于想法子，要赶紧预备大选费。议员好比是接生的稳婆，大选费好比是一注喜钱，喜钱赏得不足，这个大总统要想安安稳稳地产出来，便很不容易了。可是想做总统的人，不肯挖腰包，想扶他登殿的人，也不肯挖腰包。论他们的腰包，未尝不丰富。不过大家总想做没本钱的生意，更有谁愿意掏出钱来？于是千方百计，但望别人替他出钱。照这两天电报，某省十几万，某省几十万，似乎很有个谱子了，如此办法，又象勒助捐，又象募化，真合上俗语说的“尼姑生子，众人帮忙”。众人帮忙之下的大总统，真好体面呀，哈哈！所谓某省十几万、某省几十万，也只算是入股。横竖目的一达，他们这些人便都是攀龙附凤的功臣，可以均分红利，并不吃亏。再进一层说，他们所报效的大选费，又何尝自己挖半个钱腰包，还不是在小百姓身上刮下来的么，可怜的小百姓，可叹的大选费。

（摘自《曹锟》新新书社）

中国国民党改组

背景介绍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9月4日，他邀集了包括共产党领导成员在内的上海国民党人53人开会，研究改进国民党的问题，马林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9月6日，成立了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共9人，有陈独秀、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管鹏、陈树人、丁维芬、茅祖权，共同草拟了国民党党纲和总章。

陈炯明盘踞广东，横行无忌，竟将黄埔抵借外款。叛军在广州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广东人民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孙中山派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人，分别向驻在福建的许崇智、李福林各部，驻两广边境的杨希闵、刘震寰各部，驻湘、粤、桂边境的谭延闿、朱培德、沈鸿英各部，以及西江一带的粤军联络，准备讨伐陈炯明逆军。10月18日。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孙中山先后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沈鸿英为讨贼军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第二路总司令；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12月6日，杨希闵、刘震寰召集各军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研究讨陈战略。12月10日滇桂军分别由西江南北岸进攻梧州。由于梧州粤军中级军官邓演达、陈济棠、莫雄、吕春荣的策应倒戈，讨贼军顺利占领了梧州。1923年1月2日，又连占封川、德庆、悦城等县。1月8日，长驱直入肇庆，直逼广州。陈炯明叛军部将纷纷反正，仅用35天的时间，陈炯明势力就被瓦解。16日，讨贼军收复了广州，陈率残部退到惠州、潮梅、汕头一带和南路琼崖各地苟延残喘。

孙中山任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等为全权代表，在广州代行总统职权，胡汉民兼任广东省长，魏邦平任广州卫戍司令。原陈炯明叛军驻潮梅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表示愿意投降，接受讨贼军指挥，孙中山回电叫他们戴罪立功，任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翁式亮、尹骥、李云复、赖世璜分别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二、三、四师长。原来，洪、翁等人投降是陈逆集团的阴谋，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投入讨贼军，以便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准备从内部配合陈炯明消灭革命势力。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改善工农生活等新方针：一、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二、实行普选制度，使群众“直接行使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各权”；三、确定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的自由权；四、制定工人保护法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及地价税法。宣言中的一些内容是过去几十年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次宣言中所没有的。《宣言》把无产阶级当时在政治经济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说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思想上已突破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宣言》还指出今后的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

材料：

· 中国国民党宣言

材料　中国国民党宣言

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四千余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求治者以抑强扶弱为能事，以杜绝兼并为盛德，贫富之隔，未甚悬殊。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久之效。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砺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本党总理孙先生文，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纳于轨物，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响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本此宗旨，爰有兴中会之组织，事出非常，屡遭挫折。继以时势之推移，人心之感动，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随地而涌，于是更扩而为同盟会，党员遍于各省而弥漫于海外，主义之宣传与实行，前仆后继，枕藉相望、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足以涂尽赤县之膻腥矣。清廷既覆。民国肇兴，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

实施，宜有政党，故国民党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变，痛邦基未固，国难方殷，复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集合同志，努力与卖国称帝者为敌。及帝制既踣，革命之进行于以停止。既而民八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连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设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盖吾党名称虽有因荣，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

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而挫折者，则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然颠踬而已。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前此数民，为民国与非民国之争，最近数年，为法与非法之争，反对者所挟持之力非不甚强，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复振。盖其所施为者，违反国情，悖逆时势，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观望，遂致民国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谓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本党同人爰据斯旨，依三民、五权之原则，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采用之政策，谨依次陈述于国民之前：

一、前清专制，持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复，而我党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国。欧我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下：

甲、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

乙、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欲践民权之真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三、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不均则争，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其纲领如下：

甲、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在一定时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权，不得超过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报价值于国家，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乙、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

丙、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整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丁、改良币制，以实货为交易之中华；并订定税法，整理国债，以保全国经济之安宁。

戊、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

已、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庚、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计虑，尚有不止于是者，上所陈述，特其彦略。其余国家重大事项，将依本党规程，就专任委员研究之结果，继续就商于邦人君子。谨此宣言。中国国民党本部，中华民国十二年正月一日。

（选自《革命文献》(台北版)第69辑）

收回关税主权

背景介绍

广州解围后，讨贼联军迫切需要解决军饷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三日，孙命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所扣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帝国主义认为与广州政府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公然置之不理，叫它向北京政府交涉。孙一气之下，准备直接向粤海关提取关税。十二月一日，北京外交团训令广州领事团警告广州政府，如果敢于截留粤海关关税，即以武力对付。十二月五日，伍朝枢复以照会说，海关为中国税收机关，应受中国政府节制，我们拟令广州税务司勿再以税款解往北京，这是中国内政，你们不能干涉。本政府拟再等待两星期执行，希望考虑回答。

帝国主义看见广州政府不受威胁，不禁恼羞成怒。十二月七日，英、法、美等国竟调来军舰十七艘驶入白鹅潭示威。十日，北京国务院电劝孙对海关问题应"慎重将事，勿引起列强干涉。"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激怒了广州市民，十六日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孙接见了市民代表，表示将以正式公文通知税务司接收关税。二十一日，两星期之期届满，帝国主义不作任何回答。

二十四日，孙命令广州税务司将本政府辖境内所收关税，除按比例偿还外债及赔款外，其余均应由本政府以命令支付，如果敢于抗令，即派员前来接收海关。三十日，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训令广州税务司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但是，帝国主义毕竟是欺软怕硬的，由于孙中山采取了强硬政策，广州英国总领事只得出面调停，海关承认拨付关余，但须指定为兴修西江水利之用。这是帝国主义用以遮羞的一种说法。

这是广州政府第一次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在此以前，孙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并且慑于帝国主义表面上的强大，以为它们是不可以被战胜的，因此在历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仅以本国军阀为革命对象，从来不敢触及帝国主义。可是帝国主义所乐于支持的是北京政府，对于孙中山一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帝国主义的妥协，除了换得冷眼蔑视而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帝国主义拒绝与广州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广州政府应得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为发动内战之用，这件事情曾使孙中山大动肝火，但又莫可如何。此时孙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愿再受人之气了，他第一次采取强硬政策，不向帝国主义低头，就打了漂亮的胜仗。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戴上“纸老虎”这顶纸冠，是当之无愧的。

材料：

·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行

材料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行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帝国主义者订立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关税不能自立，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除了赔款，剩下来的关税余款叫“关余”，也要中国政府向外国的海关税务司伸手来取。孙中山先生成立南方革命政府时，这笔“关余”自应为我南方革命政府收用，但当时被粤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诸多刁难，不肯将“关余”交出，各国战舰还集中白鹅潭示威，记得当时有美、英、法、日、葡等帝国主义调十多艘战舰集中向白鹅潭，卸去炮衣，指向大本营。因此孙中山先生就亲自写英文宣传品散发给各国军舰，提醒海军士兵，特别是美国海军士兵要主持正义，不要做不义的事情。还记得孙中山先生亲笔写好这些传单，是交给我们几个负责交际的副官拿去向外国战舰散发的。孙中山先生除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在1924年10月11日还以大元帅名义派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为收取关余全权委员(有照片存对)去向粤海关税务司交涉。税务司竟然置之不理，孙中山先生就不能不亲自出马。第二天早上计划布置好一切，派卫士队长姚观顺带两中队士兵改装便衣，暗藏左轮手枪或驳壳枪，先派密探侦知海关税务司上班后，立刻将这二百便衣卫士把整个海关大楼重重围住，每层楼在楼梯口站立二人，厕所门口站立一人，另派一班人上下巡逻，水泄不通，孙中山先生带领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等直入税务司办公室，要税务司交出“关余”。争辩半日，不允交出，孙先生以次各人均怒不可遏，尤其是姚观顺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有名“牛精”，几乎要拿人，孙先生对税务司人员说：“不准你们动。”坐到将近下午两点钟，整个海关人员都未得吃饭，便群起责骂税务司。这样才提取了一百万元。孙先生就在税务司办公室摇电话到沙面责备英总领事(英总领事是广州领事团的头头)，要他马上通知各外国军舰退出白鹅潭，并要英总领事来海关大楼与税务司一同签字，说明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关余”存款有好几百万元，孙先生得此一百万元虽不算多，但解决了大部分军费和行政费，亦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气焰，使革命顺利进行。孙中山先生为革命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接收“关余”问题上可见一斑。

(摘自《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

临城劫车案

背景介绍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深夜二时半，津浦路北上车经过离临城三里的沙沟山，司机人在半钩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便想煞车观察究竟。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钉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履。接着传来一阵枪声，就有脑后垂辫的土匪千余人蜂涌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这班车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多名，共有乘客二百余人。匪徒先用枪托敲门，睡在头等卧车中的英国人罗斯门不肯开门，被匪开枪打死。除车上服务员外，匪徒两人挟一人将全部乘客绑走，只有少数乘客跳进麦田得以逃脱。被掳西方男女共有二十六人，大部分仅穿睡衣，也有来不及穿鞋袜的。他们脚底下坎坷不平，又碰到一场急雨，被匪徒们押往抱犊谷山麓巢云观予以圈禁。

五月七、八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哈定总统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休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无侨民被掳，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五月九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二十四小时须

加赔款若干。洋大人的嘴脸使北京政府慌做一团，他们把一切政务都停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的问题。

匪巢抱犊谷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以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多散布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无忌的地区，抱犊谷匪首孙美松就是张敬尧的旧部。后来，山东督军田中玉派第六、第二十两个混成旅包围抱犊谷达十八个月之久，山上缺乏饮水和食粮，孙美松求救于他的堂兄弟孙美瑶。孙美瑶是滕县人，年仅二十五岁，他和大哥孙美珠一同落草，孙美珠也是张敬尧的旧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孙美珠被政府军在西集擒获斩首，孙美瑶接统这股匪众，临城劫车就是他干出来的勾当。

土匪劫车绑票后，先将外籍女票释放，叫她们带口信给政府军，须将围山部队撤出十英里外，否则被俘外侨均将被杀。土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谷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需要赎款。从山上递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切勿进攻，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与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从五月十二日起，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先后到枣庄进行官匪和平谈判，美国公使休士和有关各国领事以及前公府美籍顾问安特生等，也都到枣庄来督促进行。

材料：

- 劫车时之情形
- 解救经过

材料一　劫车时之情形

五月六日，津浦路第二次特别快车由浦口开往北京，于晨二时五十分钟时在临城沙沟间即临城南铁路六百零七公里零六米达之道房（即铁路旁小屋为工人所住）地方，被匪徒拆毁轨道，截车行劫，掳去中外旅客多名。匪徒行劫时，将车包围，连发排枪。旅客英人纳思满(Rothman)一名受枪毙命，并重伤本国旅客一名、路警一名。匪众行劫后，挟同所掳旅客向临枣铁路（临城至枣庄支路）之东北分股窜入匪巢（即山东滕、峄、费等县毗连之丛山中），扼险抗守，一面胁令被掳西人致函追剿之军官及外国领事等，要求停攻解围及就抚等条件。兹据公私报告及脱险旅客等所述当时被劫情形附录于后：

据道房工人声称：夜间一钟时，突由东南窜来匪徒多名，多操徐州土音，将工人一律围住，威逼拆毁铁轨一段。及二次车到当即出轨，随车护路警队均已携枪逃散。（兖州镇守使鱼电）

本月五日为津浦路第三段段长（闻系驻韩庄附近）张文通之生辰（按张为津浦路警务处长，报载职衔误），所有附近各站之正站长、警备队长等均于是日往祝，而站中留以看守者不过副站长及挂钩执旗之苦力。因是土匪乘虚而入，先拆轨道，潜伏路之两旁，以待车至遂行截劫。（5月9日《济南日报》）

车上向有随车护路警队一连，并带机关枪二架，随车保护。因见匪势汹汹，不敢抵御，机关枪二架亦为匪劫去。（5月9日济南《大民主报》）

脱险来济南之陈君云：车过沙沟站忽觉有猛烈之震动，搭客均从睡梦中惊醒，而车亦随停。旋即闻枪声由远而近。众知遇匪，急灭电灯。时车门均闭，匪等破窗而入，余亦屏息以待。继思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开门揖之。当即拧开电灯，并开包房之门，迎匪入内。告以衣物在此，请众位拿去。时有一匪首在侧（后知姓孙），见予言语慷慨，即曰：“不要紧，跟我走罢”。余即著小夹袄随之行，乘间问匪首云：“你们劫火车有何作用？”匪云：“我等但知劫财，别无作用。”余曰：“既如此，何不将客人等释放。”匪云：“这却不能，因为我们老巢豹子谷（抱犊崮）被官军攻击，不能立足。故劫人票以为抵制。”余乘间将衣袋中二十五元钞票给之，匪首甚喜，并觅驴给予代步。余因劝之曰：“搭客与你们并无仇恨，应予优待；且妇女胆小，尤应和平，不可苛虐”。匪甚以为然。（5月10日《山东法报》）

材料二　解救经过

六月八日上海商会在枣人员听得消息，日前山中所以来函邀冯少山、孙筹成二人入山领票，乃由于误会商会有钱准备赎票，而且认为票价可视各票有无家产与其亲戚中有无资本家愿为垫款而决定。因此，冯少山回枣后，孙筹成即建议，收编既近就绪，不必先往领票，冯以为然。同日下午以闻悉田中玉已派参谋长李镜蓉携带灰布军衣二千套及善后费数万元前来，因知本案结束之期，已不在远。

另据飞机队队长蒋逵、沈德燮谈悉，此番派来示威之飞机四架，计中央航空队及直隶航空队各两架，本日已奉令停飞。

十日冯少山、闻兰亭因事回上海，留孙筹成一个在枣。孙旋接温世珍交来传观的山里五头目联合致陈调元的一封信，文云：“迳启者：接诵大札。备悉种切。现同仁会议结果，一致赞成迅速办理，但头绪纷繁，未能完善，既云十一日进山，务望至期邀同安迪生先生、温佩珊先生、上海总商会代表冯少山、孙筹成二先生、全国商会联合会江湘浦先生及滕峄绅商等入山办理一切。同仁鹄候驾临。此

上雪喧(陈调元字)先生鉴。孙桂枝、周天伦、周天松、孙美瑶、郭琪才同启。"

十二日孙筹成和滕、峄两县士绅入山,两县赵、辛两知事送至东门外。抵娥山口,在陆军第二十团本部会合陈调元、温世珍、吴长植、安迪生同行。抵顺河匪方步哨线所在,头目周建兴率喽啰数十名在此迎接。续进至十里河,双方乃就一大草棚中开会,各具保证书彼此交换。

(一)安迪生交孙桂枝的保证书:"鄙人安德林美国人,中国之生死至友也。鉴于山中诸弟兄之苦况,并屡次会议,今鉴于诸当家表示之忠诚,言辞恳切,情愿投诚,鄙人愿担保诸兄弟编入军队为官与兵,不过三千人;政府担任二千七百人饷,其余三百人之饷由从当家自任。鄙人并愿担保诸弟兄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免赦。受编之后,所有规定饷项由政府按照阶级按月照发。此项担保,自签字日起以三年为限。诸弟兄投诚之后,为国为民,应表示爱国热诚,恪守军纪,使国人皆知诸弟兄为国服务,并赞扬诸弟兄个人牺牲之精神也。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安德森签字。证人:孙筹成、江湘浦、焦锡生、管象坤、金方远、刘毓桢、高延康、李柄章、陈家斗、刘玉德"均亲笔签名。

(二)孙桂枝交安迪生的保证书:"鄙人孙桂枝代表众兄弟,愿受招抚编成国军。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作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并代表众兄弟郑重声明:对于安先生亲信不疑,对于安先生担保永矢遵守。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孙桂枝印。"(证人姓名同前)。

当日订立保证书后,即释出其他外票,华票仅释张绳祖、洪锡麒、郑炽、谢三宝计四人,各票即交由安迪生、温世珍先行伴送下山。其余入山诸人留山中。缘保证书虽已签定,匪方对官方尚存疑虑,深恐外票释出之后,官方或竟改抚为剿;其所以要求安、温及上海总商会三代表,滕、峄两县绅商入山办理手续,亦由于此。以是去人是夜留宿山中,虽由匪设筵款待,实际等于作质,特彼此心照不肯揭穿而已。洪锡麒释出后,将住在巢云观内未释华票名单一纸交付孙筹成。孙以华票仅少数释出与西票全释殊不相称,认为未免过于重洋轻华,曾提出意见,请交华票中年龄最大之庄泽轩(嘉兴人)及年龄最小之秦楼元(十五岁)一并先行释放。孙美瑶即席应允,即令庄、秦二人随安迪生等一行去枣。但当二人下山通过匪方步哨线时,步哨查点人数,认为庄、秦二人之释放单上未经孙桂枝盖章,仍不许通过,将其留在顺何。由此一事可见孙桂枝在山权力之大。

是夜,留山之人同宿于一大草棚内。孙美瑶前来闲谈。陈调元与孙美瑶已有多次接洽,比较私熟。陈见孙双目红肿,询问原因,孙答因改编事务很忙,连夜失眠。陈立将自己所戴的墨晶眼镜取下赠孙,并称:"老弟一寨之主,关系重大,应格外保重。"孙一面道谢,一面即向陈建议,谓"您和吴旅长(指吴长植)所带来的卫队都携有手枪,放置身畔,在山内恐不方便,不如由我来替他们保管的好。"其对官方之不敢轻信溢于言表,陈、吴二人立即应允,陈吩咐副官命令卫士"将所有武器一并交与孙当家代为收藏"。

孙美瑶离大草棚以后,陈调元向同棚诸人提议,:同人今夜受困在山;卫兵枪械被缴,堪称难友,应将各人姓名、年龄、籍贯开列成单,名曰'办理招抚临案各匪官绅难友表',以留纪念"。此单制成后,并将当日已先下山之温世珍、安迪生、金方远等六人一并列入,合留宿之十四人,计共二十人。此十四人中除保证书上已列名者外,尚有陈调元、吴长植、黄德本、朱锡泉、陈孝全、吴志、张桢、王亚猷等八人。

十三日晨,孙筹成向孙美瑶提出,意欲去巢云观看看未释诸华票。孙当应允,且派一小伙持枪陪同前往。孙筹成与此人且行且谈,彼知孙曾在军队内当过军官,因谓自己曾在张敬尧部当兵,彼此原属同行,且取出舶来品香烟相敬,说明此系洋票所赠。约行八里,抵巢云观,有华票六人同住一草棚内,皆头发很长,面黄肌瘦,衣服肮脏,臭气扑鼻,形同囚犯。众谓自被掳迄今,所见都是面目凶狠,手段毒辣、动辄打人骂人之辈,从未见过一个和善的人;被架时如赶鸭一般被赶到山上,鞋底跑穿;抵山后饥寒交迫,所受痛苦一言难尽,并谓前闻上海总商会派有代表携带物品和医师前来救济,不胜盼望,但迄今未见有人前来医病或送物品,致无衣服替换,害病亦无人管,远不如洋票时获物品接济。又谓观内尚有肉票十三人,分居三处。孙筹成即嘱各票集合一处,询知姓名,当告以华票不久可以全释;至于前送上山之救济品,据闻已被伙计中途吞没,所以未能送到。孙筹成并和众票说明已与孙美瑶提起,请其传知各伙计对华洋各票应一视同仁,不可虐待华票。众票对于无条件释放仍未能轻信,临别曾写有公函一封交孙筹成转致上海总商会,请垫款赎票。具名者计有钱光治、曹星洲、庄择轩、孙修天、王有训、庄川生、张华轩、赵翌章、李荣贵、秦锡青、秦楼元、刘恩玉、马少周、吴韶甫、焦子琴等。

先是到枣西人与匪方洽妥,可与洋票彼此通信,且备有临时邮票,逐日派人入山投递。华人俗与山内通信,亦须借贴此项邮票。孙筹成认为我国邮权收回不久,不宜听任外人任意自印邮票,为日后开一恶例;曾私向郑士琦陈述意见,劝其出面干涉,并向邮局说明,改由邮局每日派人上山送信,改贴本国邮票。但郑士琦未同意,谓"本人既已同意在先,且此系临时通行办法,未便更改"。

山里头目对于华票迄存有收取赎金之意。官方初亦未予拒绝。当各团体代表到山,孙美瑶设筵款待之时,陈调元曾在席上起立发言,谓"山上未释诸华票,孙当家并

不要钱来赎，但我认为众弟兄都很穷困，想在座诸位能设法帮助若干，则可圆满解决”。言时目注孙筹成，分明代提要求，意在言外。在彼等心目之中，上海有钱人多，总商会更是有钱人的组织，如果总商会出面，捐些钱来，轻而易举。孙筹成闻说之下，恍然会心，但故意顾而言他，伪装不解。次日孙筹成向陈调元示意，谓现在困居山上，无法可想，还待下山，方可策划。陈中其计，便向美瑶说明着孙下山，并不备轿。孙筹成到枣后，立即乘车到济南见田中玉，详陈在山中目睹之华票困苦状况，并谓：匪方内部意见倘未一致，前一日犹有被枪伤之两匪送至枣庄医治。在此关头，必须坚持华票不论新旧应一律无条件释放。匪已受编，断无仍许勒赎之理，否则全国严词责备，鲁省当局将何以堪。田以为然，既电令郑士琦向孙桂枝等坚持，孙桂枝等始知难作罢。

孙美瑶等就抚之后，孙筹成于十八日回至上海，向商会汇报情况。商会因临城劫车所做的工作也就此结束。孙部经官方编成一旅，即以孙美瑶为旅长，孙鸿图为参谋长，孙桂枝为军需长，郭琪才、周天松分任第一、二两团长，王守义、曹文成，刘清元、褚思振、五继湘、孙美松等为营长，均归山中自行推定，由田中玉照所拟头衔委任。其他官佐的委派也是同样。其实官方早有安排。同年冬，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设筵宴孙美瑶，即席将孙杀害。所部由郑士琦发给免死票遣散。安迪生的保证，不过是骗局而已。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15辑）

历史内幕

“二七”喋血

1923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多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4月，首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十六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决定2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2月1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1月28日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25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1月25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借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

1月27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大造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30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

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31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2月1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2月1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2日，我偕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3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5人、纠察队员10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2月3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5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3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5、6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4日12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3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5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吓的话，并限工人12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500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1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局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们的最狠毒的阴谋。

6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洲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

在郑州

2月4日上午12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

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工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5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州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义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6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挟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在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2月5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2000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亦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薰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2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但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2月6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2月4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龚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6日晚，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7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乘交通专车赶到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吴春溪、杨锡珍、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易顺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来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

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

（选自罗章龙《椿园载记》）

律师应仗人间义
——施洋在最后的日子里

施洋(1889—1923)，字伯高，号万里，出生于湖北竹山西乡的一个书香人家。早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曾在家乡创办国民学校。1914年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继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18年开始执行律师事务，并以其过人的机智、雄辩的口才、崇高的声望当选为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1921年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研究会。1922年初，被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担任了武汉地区所有工会的法律顾问。由于他时时处处为工人利益着想，为工人说话，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劳工律师"。

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潮高涨。1922年上半年，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保定、正定、郑州、信阳、江岸等16个主要地区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后改为分工会)。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党决定把全路近3万名工人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施洋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聘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京汉铁路总工会经过三次筹备会议，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施洋以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

1月30日晚，施洋在欢送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然后同代表们一起乘车北上。

军阀吴佩孚禁止总工会成立的消息传来，施洋在信阳车站 站台上大声疾呼："工友们！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甚大，在人民中占主要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他号召工友们："当此大敌之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施洋在驻马店等地也作了充满激清的演说，动员广大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而斗争。

2月1日，施洋和各地代表、来宾不顾军警的阴挠破坏，冲破军警的防线，直奔开会地点——普乐园。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上，施洋发表演说，愤怒声讨和揭露了军阀吴佩孚摧残工会的野蛮暴行，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当晚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以反抗反动派的武力干涉；并决定总工会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办公。会议还决定施洋和林祥谦等武汉方面代表连夜乘车返汉。途中，施洋利用停车时间，向欢迎的人群进行宣传，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

2月4日上午，按照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命令，开始了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当天，施洋以法律顾问身份出席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根据会议决定，施洋顾问负责联系各报馆编辑出版罢工的"号外，"争取各界同情，壮大罢工声势；还和同志们分头动员各工会、学校和社会团体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声援罢工斗争。

2月6日上午，在江岸工会门前，举行了万人慰问大会，施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指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为了打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解除共同的压迫，求得共同的幸福。他号召工人"一定要坚持斗争，不胜利决不上工！"会后，他与林祥谦等率领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由江岸福建街出发，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动专政万岁！"等口号，英勇无畏地经过日、德、法、英等帝国主义在汉口的租界。

罢工期间，正值寒冬时节，施洋经常顾不上吃饭、休息，冒着刺骨的北风，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又是演讲，又是募捐，又是发表紧急宣言，鼓励工友们去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就在此时，麇集在英国驻汉领事馆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们，与他们的爪牙吴佩孚、肖耀南正进行密谋策划，要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大屠杀，要对施洋等人下毒手。风声传来，有人劝施洋躲避一下，他坚定地表示：要和工人们在一起坚持斗争，绝不后退。在施洋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吃完饭，问他的夫人："怕不怕？"夫人说："不怕。"施洋高兴地说："对！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

2月7日下午5时，反动派开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了。32名工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同志壮烈牺牲。当晚，施洋回到家中，正在一楼卧室里烧毁一些重要文件时，突然有十几个便衣警察，象一群恶狼一样，闯了进来。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用手枪对着施洋说："敝厅长请先生去有几句话说。"施洋冷笑道："贵厅长是谁？倒请起我来了，怪事！"那家伙把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敝厅长就是汉口警察厅长，奉督军命令请你的，你还不明白吗？不要多说，赶快跟我一路走！"施洋早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便毫不畏怯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大声喝道："要走就走！不用侍候！"这时，施洋的夫人赶上前说："往哪里去？我也去！"施洋对夫人说："你去干什么？我没有犯法，无论到哪里，都不怕！"说罢，便昂首阔步地同那伙警察一道走了。

施洋被捕时，住宅大门外站满了警察，不许任何人跟着出去。施洋的夫人见此情景，就把藏在梳妆盒里的秘密文件拿出来，用包头藏在头上，装扮成四川保姆的样子，从凉台爬到隔壁大同旅社的凉台上，从旅社走出来，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的《真报》馆，把文件交给组织，报告了施洋被捕的消息。武汉党组织、各工团、学联等团体多方营救施洋未果。

施洋被押进汉口警察厅的一间小房后，便大声质问："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看守回答说："可能是为工人罢工的事，请你来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施洋说："那是太看得起我了！罢工潮流，传遍了全世界，我是什么人，就能解决？"施洋在这里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由两名便衣警官、六名武装警察押过江到湖北陆军审判处。在小火轮上，施洋对警察说："中国全体人民，无论是谁，均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万万不能自相残杀，让洋人坐收渔人之利。"一位警察感动得流泪。在狱中，施洋被戴上沉重的镣铐，行动艰难，却感到这是"蓄精养锐之机会，钻研锻炼之良辰，所以觉其乐，而不觉其苦也……为得执行法律而被坐牢或杀害，就是求仁得仁。"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千字的《伯高狱中七日记》，详细记载了被捕的经过、狱中生活和反动派的残暴。

2月8日下午4时，施洋律师在审讯室大义凛然地驳斥敌人说："救国运动为合法行为，农工商学各界，既然能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为什么不可以参加呢？对于贫苦工人或工会与人有诉讼事件来委托我，不过在法律范围之内，本律师应有之职权。代拟诉讼或书状，有何犯罪之言！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驳得敌人张口结舌。施洋又抗议说："第一，施洋没有犯法，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洋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没有权力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在法律上要负相当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这样的牢狱里，已够威风了，又钉上这样重的镣铐，是不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敌人理屈词穷，只好把施洋的脚镣手铐去掉。

2月9日7时，施洋起床后草拟了一个约两千字的"供状"，声明自己无罪。他还为同狱的难友们申请筹划农历年关福利，组织难友反抗黑暗的监狱制度。

13日，施洋写了一首"监狱乐"的诗：'人人都说监狱苦，我坐监狱反觉乐，不要钱的衣给我穿个鼓堆堆，不要钱的饭给我饱个肚儿圆。"来发抒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4日，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不杀施洋，京汉路不能通车。"要肖耀南将施洋秘密处死。

15日7时，北风呼啸，乌云密布。施洋被押到武昌洪山脚下。临刑前，执法官假惺惺地问："要不要写家 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声色俱厉地讲："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 洋，还有千万个施洋？"执法官被弄得狼狈不堪，连忙气急败坏地狂叫："开枪！开枪！"施洋面对刽子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刽子手惊慌失措，连忙开枪，施洋傲然屹立，继续高呼"劳工万岁！"壮烈牺牲。施洋牺牲时年仅34岁。

噩耗传来，广大民众无不义愤填膺，悲痛万分。群众冒着危险将施洋律师的遗体收殓，停放在武昌城外江神庙里。后来，江岸铁路分工会和武汉人力车工会将施洋的灵柩安葬在武昌洪山北麓，并立碑纪念，碑上刻着"施洋先生之墓"。

为了纪念"二.七"烈士施洋同志，发扬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1953年武汉市总工会将施洋烈士墓迁到了秀丽的洪山上面，重建了施洋烈士纪念碑。碑前立有施洋烈士的半身塑像。1957年董必武为施洋烈士墓题词，文曰：'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肖遗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选自《纵横》86年6期作者：周慧芳）

二十年代中苏建交谈判的一段波折

两国关系的两大症结

1894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战败，接着，

外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又成为中俄争端中的两大症结。

1911年10月10日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在俄国煽动下，于11月18日以“大蒙古帝国”新君主的名义在库伦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并于次日会同俄国军队解除了为数不多的中国驻军武装，把中国派驻外蒙古的参赞大臣三多驱逐到恰克图。1912年10月21日，新成立的蒙古政府与俄国驻华公使廓罗思签订了俄蒙条约，给予在蒙古境内经营企业的俄国公民免税的特权以及在采矿、铁路和邮电部门的独占权，以此换取俄国支持自治政权、抗拒中国军队的保证。当中国接受了俄方起草的1913年11月5日的共同宣言后，蒙古政府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在这份宣言中明确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蒙古自治并撤回驻蒙古的一切军政官员；禁止向蒙古移民。

在1915年6月7日签订的中蒙俄三方协定中，外蒙古接受了上述中俄宣言，从而使自治政权有了法律依据。

1917年，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困境中的沙俄帝国爆发了革命。当时担任北京政府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趁机出兵库伦，迫使外蒙政府在1919年11月22日正式取消自治，并且废除了1915年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三方协定。可是1920年7月徐树铮的边防军在直皖战争中被直系的军队消灭，失去了对库伦的威慑力量。于是外蒙政府又和冯·恩琴·史坦堡男爵的白俄军队相勾结，于1921年7月11日再次打出了独立旗号。这是外蒙古问题的由来梗概。

中俄之间的另一个争端是中东铁路问题。这是中国在甲午战争后采取联俄拒日外交政策造成的。有一次李鸿章作为清廷特使被派往俄京圣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庆典，沙皇政府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持伯爵向李提出，俄国为了抵制日本扩张，维护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需要修建一条假道中国东北通往海参崴的最短运兵铁路线。于是，李鸿章在1896年6月3日签署了中俄同盟条约，随后两国于这年八、九月间签订了中东铁路修建、经营合同和成立华俄道胜银行的中俄协定。

中东铁路建成后，俄国政府除了控制中东铁路的全部股份外，还攫取了铁路沿线区域的司法权、警察权、征税权、采矿权及其他权益。

1920年3月11日，中东铁路工人举行纪念俄国革命三周年的罢工，当时的黑龙江省督军兼中东铁路局长鲍贵卿借口平息铁路工潮，解除了白俄副局长霍瓦斯的职务，重新恢复了对铁路行政和警察部门的控制。

苏联政府提出建交建议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鉴于中东铁路区域的局势和设立于鄂木斯克的白俄政府的暴乱，以及协约国对西伯利亚的联合武装干涉，认为中国是“进行世界革命最可靠的后方基地”。因此，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以设立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共和国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的名义，向中国北京、广东政府发出长一次宣言，要求进行两国间建交的谈判。

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优林抵达中国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在8月1日通知帝俄公使库达聂夫伯爵说，中国政府不再认为他是庚子赔款俄国份额的合法受领者。此后，中国总统徐世昌于1920年9月23日发布命令，宣布不承认库达聂夫公使是俄国的代表。同时，北京政府着手控制汉口的俄国租界和在中国本土及库伦的19所俄国领事馆，以便为中苏建交会谈铺平道路。此外，北京政府交通部也于1920年10月2日与华俄道胜银行在北京及上海的分行签订了管理中东铁路的补充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交通部将代表俄国政府行使有关中东铁路的全部管理和经营职权，并接管其全部特权，直至两国政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时为止。

随着白俄军队残部在西伯利亚开始崩溃，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他的包括八项原则的第二次宣言，但这两个宣言都没有涉及外蒙古问题。

为了答复苏俄驻伦敦代表克拉辛关于举行谈判的要求，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驻伦敦公使顾维钧向克辛提出了谈判的条件：1. 苏俄的谈判代表应该是非正式的商务代表，不继承以前俄国公使的资格与职责。2. 苏俄代表不得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或携带宣传品。3. 在俄国的中国商人应免除一切强制性的服务，不得没收或征用他们的货物；对旅俄的中国工人不得施加压力或限制。4. 中国侨民(在革命中)遭受的一切损失将由苏俄政府根据中国和苏俄联合进行调查的结果予以赔偿。

但是，由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加之苏俄军队在击败冯·恩琴·史坦堡男爵的白卫军后不顾北京政府的反对而强行驻兵外蒙古，中苏谈判因此搁浅。1922年初，苏俄第一个正式代表巴依克斯虽曾短暂出使中国，也未能打开这一僵局。

1920年7月和1922年4月，北洋直系军阀在华北分别击败了皖系的定国军和奉系的军队(东北军)，随着亲日的皖系和反俄的奉系退出政坛，整个形势变得逐渐有利于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重开建交谈判。

1922年8月12日苏俄的老牌外交家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抵达北京，但因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

尚未达成协议，北京政府一直没有和他进行建交谈判。越飞断定，如果不解决中苏之间的关键问题，中国的北京政府不会考虑承认苏联。于是他以“治病”为名前往上海，谋求广州政府的支持，直到著名的《孙中山—越飞宣言》发表后，北京政府才于1923年3月27日任命王正廷为中苏谈判的全权代表。

王正廷——加拉罕的初步协定

王正廷被国务总理张绍曾任命为中苏交涉事务总办后，立即开始组织他的班子，并在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中，寻求支持。他打着“外交高于政争”的旗号，相继拜访了直系的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和奉系的张作霖。当时驻节洛阳的直系风云人物吴佩孚对王正廷作出保证，大大增加了他在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中的实力。王去沈阳访问时，在奉系要员杨宇霆陪伴下，曾去哈尔滨、吉林、黑河、长春、及满洲里等地旅行，实地调查中东铁路的纠纷由来。中国旅俄侨民遭受虐待情况以及松花江航行问题。后来张作霖又派吕荣寰为代表，率同一批熟悉中俄关系的人员从东北前往北京参加谈判。

1923年8月18日加拉罕一行到达沈阳。他和张作霖进行长时间会谈后，于9月2日到达北京。加拉罕曾是两次苏联政府对华宣言的起草者，他在抵京之日更受到了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1000多名群众欢迎。他在到达北京当天，又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了第三个宣言，表示苏联政府将本着前两个宣言的精神，竭尽全力援助中国。

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和中苏交涉事务总办王正廷在9月4日正式接见了加拉罕。9月15日在《京报》编辑邵飘萍举行的宴会上，加拉罕就几个问题阐明他的观点说，中东铁路是苏联和中国的事情，与任何第三国无关。他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建议中国应该在举行中苏谈判之前，先承认苏俄政府。

王正廷关于解决中苏问题的方针要点是，镇压退入中国东北境内的白俄败军，承认苏联，与苏联缔结商务协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王正廷主张采取中日解决胶济铁路问题的模式，筹资赎回这条铁路及其全部附属财产，由中国自行管理。王正廷的中苏谈判方案中还包括苏联政府应对在赤塔、伯力和满洲里等地遭到白俄大批屠杀的中国公民付给赔款，由苏联当局赔偿中国政府因收容白俄难民而付出的费用，赔偿因卢布贬值给中俄商务所造成的损失等。

9月18日，王正廷和加拉罕在预备会议由于争论是否应该先承认后谈判问题而陷入僵局，以致原定9月24日举行的正式会议也未能召开。中国外交部一再申明“中俄关系仍然是一种事实上的关系，加拉罕先生来华是代替越飞先生，对他的接待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承认”，借以消除驻北京的其他各国公使团的疑虑。这时北京政府对中苏谈判停滞不前感到不满。及至年末，加拉罕于12月25日重申了他的谈判立场，说以前的苏俄各次宣言中并没有保证将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的条款，于是谈判终于破裂。

1924年1月，英国和意大利相继承认了苏联政府，这一举动使得苏联没有必要再坚持先承认后谈判。同时北京大学的40多位教授和许多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也纷纷敦促顾维钧外长和王正廷总办继英国之后，在谈判之前承认苏联。此外，苏联在广东的贸易代表鲍罗廷的活动取得成效，导致加拉罕宣布他要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和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为此，王正廷匆匆从上海赶回北京，阻止加拉罕的广东之行。在1924年2月21日至3月1日之间，中苏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中国接受苏联的要求，同意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承认苏联，然后举行预备会议，确定解决中苏争端的大纲。

1924年3月3日，王正廷把他的协定草案和加拉罕的最后修正案呈交曹锟总统。在3月6日的国务院会议上，王正廷出席对这个协定修正草案作了说明。3月13日晚，王正廷就国务院提出的两处修改意见取得了加拉罕的同意：1. 在订立新的中苏协定之前，所有以往的中俄条约应予废除；2. 中国应修改有关禁止白俄活动的保证，使之成为中苏双方的责任。1924年3月14日，王正廷和加拉罕的谈判结束，双方在协定草案和附件上签了字。这些文件共包括《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5条，《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协定》草案11条以及七项声明和照会。

按照《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协定》，理事会将由10人组成。其中5人包括理事长由中国任命，另外5人包括副理事长由苏联任命。7人构成法定人数，理事会的决议应有不少于6个人的同意。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共同管理事会的事务，并共同签署理事会的文件。铁路设监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2名中国人包括会长由中国任命，3名苏联人由苏联任命。铁路设局长1人由苏联人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一。这些官员均由理事会任命，并经各自的政府批准。铁路的各处处长和副处长由理事会任命，如果处长是中国人，副处长须用苏联人，反之亦然。各处人员按照中苏两国人民平均分配原则任用。一俟铁路问题在中苏间新的会议中获得解决，本协定即告失效。

在《王正廷—加拉罕协定》草案的各项声明中，中国政府允诺立即采取措施，把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和外地的房地产移交给苏联政府。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在该赔款所担保各之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将全部作为发展中国的教育基金。为管理和分配此项基金，将设立由3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其中2人由中国任命，1人由苏联任命。

顾维钧——加拉罕协定

在北洋政府3月1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王正廷—加拉罕协定》遭到了外交部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和财政总长王克敏的强烈反对。主要集中在3个问题上：1.苏联政府在保证中宣布，前沙皇政府与任何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有妨碍中国主权者概为无效，但该保证未曾提到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缔结的《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条约》。2.苏联从外蒙古撤军的诺言，取决于是否能就撤军期限及为双方边界安全所采取之措施达成协议。3.苏联要求立即把俄国东正教会的全部房地产移交给苏联政府，如果同意这项要求，将开创一个先例，使得其他国家日后在中国内地可能援引利用。国务院指示王正廷同加拉罕协商修改，但被加拉罕拒绝。

由于国务院未予批准协定草案。3月19日加拉罕分别照会中国外交部和王正廷总办，说苏联政府认为与中国正式代表的正式谈判已经结束。因此，苏联政府拒绝就已签署协定中的问题重新会谈，一俟3天期满，苏联政府即不再受协定约束。加拉罕还声明，除非无条件地恢复中苏关系，苏联政府将不和中国政府重开谈判。加拉罕在致王正廷的照会中指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追随列强反对苏联的政策，原已取得全部谈判成果被推翻，就是由于法国3月12日的警告所引起的。

这时，王正廷总办也表示不愿承担重开谈判的重任，他的消极态度迫使国务院在3月20日决定撤销中俄交涉事务总办公署，把谈判的任务转移到外交部。

3月22日，顾外长给加拉罕发出照会，说明中国政府只授予王正廷从事谈判的责任，没有授予他正式签字的权力。顾外长还宣称，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预，从而反驳了苏联暗示法国操纵中国外交的说法。他同时通知苏联代表，今后外交部将指导同苏联政府的一切谈判。

3月25日，加拉罕复照称：王正廷曾被授予作出最后决定和签署上述文件的权力，中国政府只能接受或者拒绝这个协定，不能再作修改。因此他坚决拒绝再进行任何谈判。中苏谈判看来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僵局。

在此以前，还没有任何国际问题象中苏谈判破裂那样在中国公众中引起如此关注。从3月18日至3月26日的短短几天里，直系的核心人物吴佩孚曾6次致电国务院敦促批准协定。吴的态度也反映了包括湖北督军萧耀南、福建督军孙传芳和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等许多地方实力派的意见。上海的诸多群众团体一致指责政府按照列强的旨意制定外交政策，主张中国人民应该促使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承认苏联，还要求苏方保留《王正廷—加拉罕协定》草案作为中苏重开谈判的基础。4月1日，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北京学生联合会谴责国务院和顾外长的宣言。他们敦劝苏联在以前各次宣言的原则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

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1924年5月30日曹锟突然颁发了一道总统命令，宣布《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附件已由双方准备就绪，顾维钧被任命为有权签字的全权代表。次日，另一道总统命令宣布《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协定》以及7项声明和两项换文已由顾维钧外长和加拉罕代表正式签字。于是峰回路转，中苏两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何林荣）

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曹锟在清末当了多年的第三镇的统制，尤其在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时候，弄了许多钱。后来每到曹锟生日时候，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前来祝寿。慢慢地，就有人奉承他，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接着就有人说“大帅愿意当总统”。

有一天我在秘书长王毓芝（兰亭）的屋内闲谈，王承斌（孝伯）忽然对我说：“养怡（我的号）是很有主意的，能不能把这一个疑窦给我们打开？”我说：“什么呀？”王承斌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是当得当不得，当好不当好呢？”我说：“那就得看是为着什么。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嫌了一辈子钱无用处，老了不愿意干了，买一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此决心，可以当。无此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三、二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焉得有好的呢？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我说这话，好象是我不愿意曹锟当总统似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曹锟要当总统，并且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涤尘等二百多人，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组织了一些人领头活动。这几个活动地点，一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俶青；一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蒙族）；一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钦宇等。

某一天，我在顺治门里油房胡同一号王毓芝屋里坐着闲谈，忽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直隶议员谷芝瑞（霭堂），一个是山东议员史刚峰，他二人说话完全是要打倒吴景濂的意思。我心中暗想：“这吴景濂倒不得，若他真倒了，我们办大选就不好办了。”谷、史二人刚走，我就向王毓芝说：“咱们这个事情一年多了，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急不如快，我看还是快些好。”王毓芝说：“谁说不是呢！孝伯（王承斌）、子玉（吴佩孚）全和大头（指吴景濂）商量不好。怎么办呢？”我说：“他二人商量不好，我去未必商

量不好。大头这小子怕老婆，他的老婆怕我。我去十分可行。”王毓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得打电话问他在家不。”我打通电话一问，吴恰巧在家，就约定在家等我。我就坐着王毓芝的车子去了。

当时吴景濂住小麻线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几句闲话，我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就说：“大嫂，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我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乘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一个官。你看好不好？”接着我又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一个总统当，买个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生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事情我们都已预备好了，明天我把参谋长和秘书长领来，和大哥一见面，就等于曹锟本人和大哥见面一样。这事就算定妥，随便您哪一天开会，这事就算完成了。将来给钱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都不管，归孝伯一人经手。好在孝伯从小时候就出入你家，已非一年，你们是如同一家人一样。”吴夫妇俩听完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就说：“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呆了一会，我告辞出来，并说：“明天我就把熊、王两位领来和大哥见面。”我由吴家回到油房胡同，就要王毓芝叫保定电话。熊炳琦（润承）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他说：“兰亭别挂，等我报告大帅（指曹锟）一声。”有大一会儿，熊说他报告过了，并说大帅要我当天晚上上天津和四爷（指曹锐）见面。这话我明白，就是让我再向曹锐报告一遍的意思。

当天晚车我上天津见了曹锐，并即赶回北京。第二天十二点以前，我到油房胡同，等着熊炳琦来同王毓芝三人一齐吃午饭。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小麻线胡同一号吴宅。熊、王、吴三人见了面，谈得很圆满，晚车熊就赶回保定。于是我经手的人我送钱，并通知大家谁经手的谁送钱（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这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只是送钱的事情就办了六七天，但谈到选举这正经的事情，都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四十万，其他每人送给五千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五千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

后来冯玉祥倒戈时，把曹四抓去，要他拿出钱来。曹四拿不出来，说钱从前是有的，都被三爷买总统用去了。冯不信，逼着他要，曹四服毒而死。曹锟当了一年的贿选总统，下台后活到七十三岁才死。

（王坦）

清宫的最后一年

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仪出宫时为止，是我们在清宫度过的最后一年。此时，北洋政府正忙于表演曹锟贿选的那幕丑剧，无暇顾及清宫的事。溥仪便借此机会大有励精图治的意思，继裁撤太监之后，又大力整顿内务府，打算做到经费自给，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一九二三年，溥仪先后命宝熙（满族宗室）、荣源（溥仪岳父）为内务府大臣。宝熙虽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研究；但在政治上，只是一个腐儒式的官僚，遇事夸夸其谈，而结论必归于毫无办法。荣源则更不及宝熙。他原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出身，不但文化程度不高，社会经验也很不足，似乎还有一些轻微的精神病状态，遇事毫无主见，只知唯唯诺诺。这样的人，当然难以满足溥仪理想中所要求的那种“能臣治吏”。一九二四年，郑孝胥来到北京，溥仪便命他来整顿内务府。其实郑孝胥来京，并不是专门来投奔溥仪的，而是想趁北京混乱之机，捞上一把。但他的政治地位又平常，一时想要爬上政治舞台，也很不容易，于是就和陈宝琛拉上了同乡关系，由陈引荐到了宫内。这对郑来说，不过是借水养鱼而已。最初，溥仪也只是派他为懋勤殿行走，可是又因他巧言善辩，遂获得溥仪的欢心。一九二四年三月，溥仪竟有一天之内连下了三道“上谕”，赏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加太子少保衔、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得此“殊遇”，常常对人说：“深感皇上一日九迁之恩，一定要彻底整顿内务府！”未几，又命金梁（曾任奉天民政厅长）充任内务府大臣。这样，就使内务府大臣增至六名之多，还有两、三名赏内务府大臣衔的不在其内，真是空前庞大的官僚机构了。

自郑、金任职以后，养心殿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所递的奏折。记得溥仪还叫我看过两次，内容不是整顿宫内财产，就是请皇上励精图治，恢复祖宗遗业等一类的话。郑孝胥在溥仪的支持下，还把他的同乡佟济煦拉进内政府，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上下齐下手，大有油水可捞了。其实，郑完全不了解内务府的情况，那时的内务府，经常库空如洗，绍英、耆令不断地喊穷，说是内廷开支一天比一天增加，使他们实在无法应付了，总想辞官回家。记得一九二四年夏，竟穷得连庄士敦的房租都无法支付了。房东屡催庄士敦搬家，内务府打算把宫内吉安所的房子加以修缮，叫庄士敦居住；可是尚未修出，溥仪就出宫了。至于拖欠下来的内务府官员的薪俸，更是无法计算。好在这些官员

们大都是世代在此供职，不仅贪污的东西很多，而且还兼营商业，一般家资都很豪富，有的甚至凌驾于王公之上，因此，薪俸的有无，他们并不十分计较。郑孝胥初来乍到，不明就里，新官上任三把火，企图雷厉风行地革除弊端，但他督促的越严，上班的人就越少，渐渐地竟形成有官无兵的状态了。

后来郑了解到内务府的实际情况，就想从"节流"开始，减少开支。首先想把各处机构加以裁并，精减人员，可是宫内自裁撤太监后，人员并不多了。宫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恐慌，纷纷到我五伯和父亲处求情，说是再裁减就无人了。后经我五伯向溥仪说明，郑的计划未能实现。随后，郑又向溥仪呈递奏折，建议只把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银、灯、皮三库等十余处裁减；在开支方面，把上赏、津贴等名目一律取消，所有薪俸均改为月薪。溥仪把这个奏折交给绍英等研究处理，绍英等认为，裁撤人员必须补发欠薪、发遣散费，目前库空如洗，实无法筹办。这个奏折的结果是"留中未批"。

郑孝胥碰了几个钉子以后，逐渐认识到，只是"节流"而不去"开源"，总是事事难以办到，于是又向溥仪建议，将内务府的官房租库裁撤，把房产、土地全部拍卖以充经费。可是又据绍英讲，内务府所管的房地产确实不少，在官房租房里，光契纸和租约就堆了三间库房，多少年来从没有人动它一动，辛亥革命后，经过十多年的变迁，有些土地已由北洋政府接管，盗卖的也不在少数。房产大部为铺面房，平时有交租的就收下，不交也不去催问。因为内务府也闹不清土地、房产在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郑是个汉族大臣，自绍英以下，对郑都持排斥态度，听说要清查财产，深恐把盗卖等情事暴露出来，因此便故意制造许多困难加以阻挠，使郑的开源计划也成为画饼。

郑孝胥仍不甘心失败，他又向溥仪建议，要把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运往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向国内外销售，可以获得一笔厚利，作为宫内经费。由于他与商务馆关系很密切，自然他也可以发一笔大财。不料，北洋政府得知了这个消息，首先是国会议员李燮阳等十余人致函内务部，请速制止清宫盗运古物。接着，总统府与国务院也致函内务府，禁止把《四库全书》运沪影印。同时，外边还盛传北洋政府对清室私运古物事已严加注意，拟派冯玉祥、李石曾等草拟保护清室古物的办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郑的这个计划又以失败而告终。

这期间，郑孝胥还提出要整顿颐和园，并向溥仪推荐，让庄士敦管理颐和园事宜，以便增加一笔收入。庄士敦很高兴担任这个职务，他到了颐和园，原也想要认真地整顿一番，但由于他对行政管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外行，怎么能应付得了善于营私舞弊的那些旧官员呢？搞了一个时期，毫无成效，便也不再认真地搞下去了。他干脆从英国订购了两艘极精巧的游艇，在湖光山色之中尽情地游乐。在周末或星期天，还不断宴请友好，我也时常去参加。整顿的结果，竟把颐和园变成他的别墅了。

虽然这样寻欢作乐，但是溥仪仍不满足。他又买了一辆汽车，时常乘车到我五伯和我家里。时间久了，觉得光在城内开来开去太乏味，又带领妻妾、内务府大臣、护军统领等到颐和园、香山等处游玩。北洋政府的军警机关听说溥仪出城游览，就由薛之珩、聂宪藩派军警保卫，一行二十余辆汽车，浩浩荡荡地从宫内出发。北京市民一见地安门的正门大开，就知道溥仪要出来了，都聚集在马路两旁，互相招呼着说"看过皇上喽"！这大概就是这个末代皇帝，在北京出的最后一次风头了。

在这一年里，到宫中来看溥仪的人也增多了。以前，大都是些王公旧臣；现在，江亢虎、胡适等都到宫中来过。记得胡适会见了溥仪之后，庄士敦在"中英协会"为欢迎胡适而举办的晚会上，曾向胡适问起溥仪会见他的观感，由于庄士敦对人谈起溥仪时总是称"His msjestiy"（陛下的意思），胡适也顺口答言地说了一句"His msjestiy"，恰巧被一位记者听到了，翌日就在报纸上说胡适见了溥仪，受宠若惊，连呼"皇上"。这大概就是对胡适在见溥仪以前，曾对人表示绝不向溥仪叩头请安、不称呼皇上的一种讽刺吧。一九二四年四月，经庄士敦介绍，溥仪还接见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他的随行人员鹤谷（印度人），以及伊连赫尔（作家、英国人）、戈林（女记者、英国人），并在花园设宴招待。当时，这个"小朝廷"对于各方面的联系，比起以前显得十分活跃。

在同一个时期内，溥仪对于所谓"慈善事业"也大感兴趣。最初，凡在报纸上看到"因贫求助"的旗人请求救济，即派人送去捐款五元或十元。报纸上也常登载"宣统帝助某人若干元"的消息。后来，捐款的范围逐渐扩大，有一次，向当时的一个慈善团体"窝窝头会"捐助了一千元，并附亲笔信一封，署名宣统。我记得一次在看窝窝头会举办的义务演出时，他们还在正楼挂着一张很大的黄纸条，上书"宣统帝捐助一千元"的字样。当日本横滨发生大地震时，溥仪又给日本公使馆送去了古瓷和珍珠手串等物，表示"救灾恤邻"之意。据说这批古物价值二十万银元，超过了北洋政府赠款的数额。当时的中、外报纸都把溥仪说成为"大慈善家"。北洋政府对溥仪这种"乐善好施"的举动，起初只认为不过是沽名钓誉，还不十分介意。后来看到溥仪捐款的范围愈来愈大，捐款的数额愈来愈多，特别是未通过自己的外交途径，即把大批古物送到日本使馆，便认为他别有用心，有意识地在国内外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了。因此，对他动用宫中古物也就特别注意起来。

一九二四年九月，直奉战争爆发，不但北洋政府陷于混乱状态，就是"小朝廷"也呈现出乐极生悲的景象。十月二十日，端康太妃突然因病死去，灵柩移到慈宁宫，王公大臣照例穿孝、喇嘛照例念经。十月二十三日，我父亲和

内务府大臣们正商量热热闹闹地大办丧事，不料第二日清晨，突然传来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重要路口都被大军堵塞，宣布全市戒严。在这种情况下，丧事当然不能再办下去了，只好暂于慈宁宫"封灵"，待时局平静下来再办。但是，时局的变化对这个"小朝廷"越来越不利了。在曹锟被囚之后，据庄士敦、郑孝胥分别从英、日使馆得来的消息，都说冯玉祥要派兵到宫内逮捕溥仪，并没收各王公的财产。有的太监也说，被溥仪驱逐的太监们也到冯玉祥的司令部，控告溥仪盗卖宫内古物等事，使溥仪与王公大臣们，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象载振与增崇那些朱门豪富之家，早已闻风避入东交民巷和天津的外国租界去了。我父亲为此几次召集王公、帝师、旧臣开会，商量应付的办法。会上，他们不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就是夸夸其谈，不得要领，每次会议的结果，总是说先看看风头，听听消息再说吧。就这样听听看看，拖到了十一月五日，真是晴天霹雳一声，由鹿钟麟、张壁、李石曾率领的军队包围了皇宫，把溥仪妻妾和敬懿、荣惠两太妃逐出宫。从此，不仅永远结束了溥仪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也永远结束了封建王朝的残余统治。

（摘自《晚清宫廷见闻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商人政府"幻梦的破灭

1923年7月初，工商界巨头群集的上海总商会，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直系军阀曹锟策动"僭窃政权"，要求"国民自决"的救国声中，发起组织起了一个"民治委员会"。此举引起了社会上的责难和非议，指责上海总商会包办组织"商人政府"，而上海总商会中当选的"民治委员"们则矢口否认有染指政权的企图。一时间，攻之者言其有，辩之者辟其无，舆论沸扬。究竟这个"民治委员会"组织者的真实意图何在呢？

中国商人素以"在商言商"为其恪守的行为准则，但在西方议会政治的思想影响下，也逐渐萌生了议政参政意识，而视"在商言商"为传统痼疾。到20世纪20年代初，从厌恶北洋政权蠹国殃民的心态出发，又开始接受"直接民权"的观念。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驱逐胯下监印总统黎元洪，以国务员高凌尉等临时摄政，并蓄谋僭窃总统高位，这一事件，遭到了国内民主势力的同声谴责。上海工商界在政变的当天，包括商界团体上海工商学界、各同乡会等代表约50余人举行紧急会议，会上首先提出了"直接民权"的主张，认为作为平民代表，应尽主人翁天职。代表中小民族资本家利益的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发表《对政潮重要宣言》，指斥曹锟一伙为"满布朝野"的"亡国妖孽"，提出"国民自决"的政纲，认为"民国犹一公司，国民犹之众股东，京内外凡百执政，总分公司中之职员耳。今各职员横行无忌，居股东地位者，断无任其败坏破裂，置公司血本于不问之理"，表示不承认曹锟政权，暂停缴解税款给北京当局，由全国各界发起召集国民会议，公推德望较孚者组织一国务委员会处理国是。

上海工商界要求的"国民自决"，就是以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组成一个"民治"机关，取代军阀政府，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他们认为"最后一线希望，全在纯洁商人与平民"只有依靠这个力量，民治就可以实现，政治就可以清明。他们把实现"民治"的希望寄托于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享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上海总商会身上。可是，控制上海总商会权力的某些上层人物一开始举止比较审慎，并不轻易附和"民治"主张，而于政变的第二天以该会名义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文（寒电），仅仅批评国会议员对政局变化"不发一议，不设一谋，驯至政府虚悬，狐鼠横行，实属贻羞中外，辜负委托"，要求约束总统内阁。这些委婉词令，同当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民治"要求很不协调，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非议。上海商界各团体纷纷致函总商会，敦促总商会转变政治态度，出面领导"民治运动"。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信中说：上海总商会为"上海商界的领袖团体"，理应"即日发起召集国民公共团体之联席会议，藉以表示真正民意"；并表示愿"追随左右，共济危局"。沪西四路、长浜路、东北城、沪北五区、吴淞路等7个商联会署名函请总商会"登高一呼"，"为全国倡"，以收"万众响应"的效果。6月17日，又有颍州、三北、嘉兴、徽宁、温州等旅沪同乡会致函批评总商会"寒电"是"僭窃"开端，且违背沪上各公团的公意。要求总商会沿着"国民自决"的途径同力合作地进行。同一天，旅沪25个省区同乡会在广肇公所召开联席紧急会议，确定了民治运动的目标，以抗税为后盾，宣称要使中华民国的民治进入正轨。经公同议决，推派5名代表敦促上海总商会推进民治运动。部分同乡会还另发专函，拥护总商会的领导地位，表示要作其后盾。

其实，上海总商会自1920年间经过一次改组以后，正尽力发挥法定团体的力量，追赶时代革新潮流，强化了参政意识。早在1922年2月间，在《上海总商会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是与国是会议》的署名文章，尖锐抨击北京军阀政府为"不生不死之政府"、"非法破碎了政府"，认为面对这样的政府，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必由国民自动建造一合法统一之政府以行之"。这是上海总商会通过自己的喉舌向社会公开表明主张"直接民权"的信号。

3月17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董会，研究应付时局的应变对策。翌日发布通告，宣称：政府当局制造乱源，而国会又"廉耻丧尽"，奔走权门，逢恶作虐，致土崩瓦解之祸即在目前。因此决定于7月23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大局"，并"谋彻底之解决"。

7月23日召开的上海总商会临时会员大会，声势浩大、正气凛然，出席者共260余人，还有不少群众自动列席旁听，反映出“民治运动”的深入人心。大会主席、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首先致词，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当此国家存亡之秋，商人处于重要地位，各方面对本会属望甚殷，不得不谋挽救之策”，俨然以身负救国重任的商人领袖地位自命。接着，鼓吹“民治运动。奔走最力的总商会会员霍守华作了措词激烈的发言。认为“现在之中国纷乱已极，无一可赖之机关，将来一切重任，全视各省商会之举动若何”；当今“政府中断，国会违法，早失人民信仰，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今日正人民行使其主人之职权”。他要求所有当选的民治委员，须宣誓不违反民治运动，不得藉此私图幸进。如有违反民意或另有作用者，社会当以极严重之名誉惩戒，并永远剥夺其公权”。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第一、否认高凌尉等非法摄政，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之资格，并通电中外，宣布自本月十四日起，北京政府对内对外的种种行为，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第二、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加意保护外人，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第三、宣布国会议员不能代表民意，所有一切行动概属无效；第四、关于以外种种建设问题，组织一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在当时，这些决议远远超出商会的职能范围，商会头面人物染指政权的意向溢于言表。然而这一推进“民治运动”的政治举措，却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喝彩。《民国日报》为此发表时评说：“上海总商会非但在上海公认为有力团体，而且在全国也公认为有力团体，……以难得的大会，应付非常的时局，于此可以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态度”；并且认为这个大会“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的前驱，是抱牺牲主义的，是抱革命精神的”。毛泽东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专文，热情赞扬上海商人们否认国会、组织“民治委员会”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指出“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对于时局主张中甚至提出：如果国民党不能承担政治建设责任的话，“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

民治委员会成立后，在将“民治运动”推向新商潮的同时，也出现了内部的分歧和裂痕，致使这一运动迅速转入低俗。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个令人痛惜的结局。1923年7月4日，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里，开创近代中国历史先例的民治委员会成立会正式揭幕。会议主席方椒伯在开会词中指出：“约法有言，主权在民，一般国民亦靡不视之为金科玉律，以为此系十年来辛苦经营所得之代价。”他宣称：“本会之以上海商界开其先，而希望各省区各界人士之继其后，盖亦既悬民治为标帜，则政权自不容垄断于少数人之手，势非结合全国人民为一大团体，继不足以挽已倒之狂澜”。这一天，上海各商店和各工商团体，纷纷悬旗庆祝。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希望通过民治委员会组织“合法政府”，建设“平民政权”，认为“全国纯粹国民，自起治国，建设合法政府，此正其时”。一度分裂成上海两大派别的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受民治委员会正式成立的鼓舞，决定实行合并“同向此民治目标并力前进”。

可是，由上海总商会主持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却严重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成了孤家寡人的组织。尽管他们再三辩白并无“藉此机会以作官”的企图，但其种种作为却难以避免其包办民治委员会进而“包办商人政府”之嫌。民治委员会的组织，完全由上海总商会独家包揽。他们无视各界人民的意见，也不经过各方平等协商，片面规定所有总商会35名会董为当然民治委员。又从总商会会员中另推选出35名民治委员。因此，在全数70名民治委员以及从中产生的14名常务委员，全部是清一色的总商会成员，排斥了各界人民群众和其他工商团体的代表参加。他们竟把民治委员会的机构纳入上海总商会的隶属范围，这就暴露了其染指政权的真正用心。上海总商会的一些上层人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错把社会的信任和期望当作可以独揽“民治运动”的领导权力的政治资本，结果使各界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大失所望。上海总商会迅即成为各界群众群起而攻之的对立面。这种社会离心颂向，导致总商会和民治委员会内部的分裂。不少民治委员来函辞职，有的拒不出席出议，有的要求辞去总商会会董职务。民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只到了29人，第二次会议仅出席18人，第三次会议也只有24人，均不到应出席委员人数的半数。该会的工作，多半停留于挽留辞职委员的函牍往来，讨论组织名称、宗旨、章程条文，以及所谓“治标”“治本”等空泛议论之中。至此民治委员会已经涣散无力，变成上海商界中少数寡头的活动场所。这种借“民治”之名，行“绅治”之实的作法，是注定要失败的。该会常务委员闻兰亭在1923年7月14日第三次民治委员会上哀叹道：“现在此会之本身如散沙一般，乌能办国家事。……长此以往，恐到者愈少，不啻无形消灭。”果然，事隔不久，这个喧嚣一时的民治委员会，在成立后的几个月内，未曾办成过一件实事，空名虚悬，形同解体。一度沉浸于上海商界某些上层人物头脑中的“商人政府”幻梦，随着民治委员会的消声匿迹而迅速破灭了。

（徐鼎新）

历史考证

陈独秀究竟任过何职

关于陈独秀的任职问题，党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许多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的表述中却是相当不准确的，而大部分作者是把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的总书记写进论著里。因而有必要提出来予以纠正。

据党的文献资料记载，党的"一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是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二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五名执行委员和三名后补执行委员组成，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党的"三大"根据党章规定，首先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五人为后补委员。并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大会后之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的规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等五人为中央局成员，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党的"四大"决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李大钊等九人为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工：陈独秀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党的"五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等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上述可知，在党的一至五届，陈独秀的任职是："一大"为"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那种认为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总书记的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是应该纠正的。

（作者：郭学旺，选自《党史文汇》）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有积极的一面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提出的口号。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右倾口号，把它视为取消中共和工人运动独立性的同义语。近有论者提出：第一，当时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左倾情绪还相当严重，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马林为了反对"左"倾思想观点，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与"三大"的历史任务是大体一致的，与中国革命进展的实际需要是基本同向的。第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并不意味着要取消中共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而与国民党合并。这个口号的原话是"一切工作都到国民党内去做"，其中心则是要求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也可以国民党的名义去组织进行。马林是在保持中共与工人运动独立性的前提下，提出这个口号的。第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本身，没有被中共"三大"采纳，但它所含的各项主张，则基本上为"三大"所接受，对于"三大"克服党内的左倾思想情绪，确立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迅速促成国共合作，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四，"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就其性质而言，带有反对"左"倾思想情绪的成分，但同时又包含着马林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因素，这种右倾不在于否认保持中共及工人运动的独立性，而在于它反映了过高估计国民党，特别是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实质，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若干消极影响。

（选自《试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浙大学刊》84年3期，作者：毛丹）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吗

在一些著述和文章中，一般论者谈到1922年8月孙中山因粤系军阀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时，过于描绘和渲染他当时的思想状况，说他"处于绝望之中"，甚至加重其思想危机的程度："陷于绝望之中"。

所谓"绝望"，无疑地可解释为：希望断绝；毫无希望；断念。那么，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研究及考察当时国民党力量、孙中山的性格，认为此说不能苟同。

（一）孙中山和他的战友未曾以这样的字句来表述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孙中山把粤军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对陈炯明也倚畀甚重，不意，祸起萧墙，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收买和怂恿下，于6月16日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

孙中山希图依靠陈炯明粤军以达到革命目的的计划

就此落空，这自然加重了对其打击的份量。他于9月18日在上海发表《致国民党员书中》，痛切地反思道："……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并检讨自己"任用非人，变生肘腋"，然而，他并未由此而甘处战败者的地位，而是以其辩证的词句去鼓舞全党党员。"然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在他策动下1923年1月，讨贼各部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同月，在他发出的《和平统一之通电》中欣喜地指出："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出陈逆而戡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期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尽心竭力以郛促和平统一之进行"。

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10月，他著述了《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一文，认识到："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的重要原因，除没有注意党义宣传，党员不愿为主义奋斗外，就是那些"不肖党员，行为不正"，挂着党员的招牌到处招摇，以党为私，"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为了振兴国民党党务，他认为首先"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这样才能除去国民党"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本党"才可望蒸蒸日上，不致失败"。为此，11月他毅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提出由总理委任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这项工作，然后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进行讨论。他主张"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并且很快认识到中国当时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显而易见，从他避居上海到力主改组国民党，以致改组国民党后的著述，并未留下反映他思想状况的"陷于绝望之中"的字句。确切些说，陈炯明的叛变，并没有使孙中山丧失革命的信心，更没有"陷于绝望之中"；相反，则在"艰贞蒙难"之际坚信"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的努力者"。断然采取了措施——改组了国民党。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经历了这一事就的始末。在她的选集中，也没有使用反映当时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的字问，只是对其失误作了说明。指出，孙中山"曾企图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这是一条充满惨痛失败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给了孙中山和其它革命者一个重要的教训"。

翔实记载廖仲恺、何香凝一生论著、演说、函电、公牍等资料的《双清文集》，同样没以这样的字句来总结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陈炯明叛变则是孙中山屡遭挫折的革命生涯中的再现，只不过与以往失败的程度和对手不同而已。这次陈炯明要置他于死地，可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哪次不面临被杀的危险？这次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了，可自辛亥革命后他领导革命不是已经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挫折与失败了吗？既然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著述中都没有以"陷于绝望之中"的字句出现，因此，我们后人又何必用夸张的笔触，去片面描绘和渲染先行者的思想面貌呢。

（二）国民党当时的力量还不致于使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由于使用陷于绝望之中的字句，似乎他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已处于"实力丧尽，无地容身"的境地。事实上，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在军事方面，孙中山离开总统府后，即在黄埔鱼局设立行营；6月17日亲率永丰、永翔等7舰由黄埔经车歪炮台直驶白鹅潭，向占据沙河、瘦狗岭、沙头、观音山等地的陈军炮轰竟数日。嗣后孙中山即率舰经中流砥柱炮台折返黄埔，等待北伐军的回师。当北伐诸军将领得知陈炯明叛乱消息后，"军心激昂，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决议，旋师讨贼，黄大伟继归，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他们所率各部从7月9日开始与陈军展开激战，屡挫贼势。然而，陈贼据粤汉铁路，运输便利，又任藉坚城以为顽抗；北伐诸军饷弹不继，兵额死伤者无可补充，无可再战，于是北伐诸军退至赣东和湘边。据孙中山抵沪后得报："许宗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在赣东省，有众万余人，朱培德、陈嘉祐等部在湖南省，也有众万余人"，而这时"军力未失，士气至厉，被劳恢复，不难再举"。同时，"黄明堂在高雷、钦廉举兵讨贼，以为响应，迟不及事，退至桂境，而两赣同志军队、蓄志杀贼待时而动者，为数尤多"。10月，孙中山重整旗鼓，组织讨贼军，令许崇智为东路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不久，又组织杨希闵、刘震寰为西路军。叫他们各率所部分头向陈炯明攻击。他们奉到命令，都切实执行。在两路大军的进攻下，陈炯明叛军从广州退往惠州。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重组大元帅大本营，就任大元帅职。大本营所辖各军：东路军总司令许崇智约2万人，西路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约1.5万人，西路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约1万人，又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约1万人，其他梁鸿楷等师旅约共万人，少军司令陈策，其他尚有滇军军长长朱培德约3千人，桂军军长刘玉山，陈天太各约2千人，粤军梁鸿楷等师旅约共1万人，海军司领 陈生骨江海防舰艇数十足"。这样，广州又成为国民党对抗北方军阀的根据地。

在党的状况方面，宋庆龄在回忆中说，孙中山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具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

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和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发财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他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国民党的现状的。国民党里那些“最优秀的人”增添了孙中山革命的信心和力量，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是孙中山所深 为倚重的主要的得力助手。宋庆龄在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的危急形势下，坚持孤身留下吸引敌人，让孙中山先行离开险地。直至说服孙中山先行撤离后，她才在卫士掩护下脱离险境。她“处处为孙先生着想——也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作着想。临难应变，这么大义凛然，真令人感动”。当她了解了改组国民党的想谛后，积极参与谋方，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跟苏俄和中共合作。1922年夏廖仲恺遭陈明囚禁60余日，经何香凝营救脱险后，立即离穗赴港转沪，与孙中山会合。他到达上海即接受孙中山义给的任务，赴日本同越飞会谈。他们竭力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力地赞助孙中山的新政策。再说，国民党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南方党和群众基础尤为深厚。从叛乱发生，孙中山武装部队在敌众我寡形势下奋力抵抗陈军，到永丰诸舰各将士受命于孙中山平叛；从北伐军讨逆陈贼到孙中山下令东路和西路讨贼挥把陈炯明逐出广州，不能不说明许多国民党员经过三民主义的洗礼，具有革命精神、士气和勇气，是“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的，因而追随着自己的领袖——孙中山。据国民党本部党务报告：到1923年海内外国民党机关恢复及增加者计400余处，党员激增至20多万人”。其中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占很大比重。

在群众基础方面，孙中山在全国人民当中享有万众景从的声望。陈炯明的叛乱，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内外正直人士愤慨，纷纷表示声讨，并对孙中山予以支援。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陈炯明，广州黄埔附近乡民千余人组成义勇队，与海军共同保卫黄埔，广州电力、自来水和铁路等行业工人举行联合罢工斗争，反对陈炯明叛军，要求叛军撤出广州。美国、古巴及泰国等地华侨，在陈炯明叛变第二天，即纷纷发出通电，请求孙中山速调北伐军回粤讨贼，表示“誓为后盾”，“尽力接济”。住在隔河乡村的徐树荣叫合了弟兄180人前来替中山先生效力，并拿出各弟兄签名单给中山先生看，同时举行右手宣誓：“徐树荣带同兄弟190人，立誓服从民中山先生，护卫中山先生，如有违背，坠海而死”。身居香港的伍学租来一艘比利时货轮运载着粮食、煤炭等需品至黄埔，以供永丰等讨贼诸舰。伍又另送500元做大总统膳费。当孙中山从广州抵沪的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怀着对先驱者的崇敬，对叛乱者的义愤，对战败者的同情，自动涌到新关码头等地迎接孙中山。由于风阻航船，热烈的欢迎场面在暴雨烈日中持续了三天！

（三）孙中山性格和当时言行，也决定了他不会也并没有“陷于绝望之中”。他在总结自己革命经历时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长期有革命过程中，他形成了滴水穿石的韧性风格，能在颠踬困厄中“愈挫愈奋”。

陈炯明的叛变，委实使孙中山受到自辛亥革命以来，“未有甚于此役”的刺激；那么，因此就可以断定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吗？鲁迅曾说过，中山先生“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败了还是革命”。“在关于他的革命经历的记载中，充满了他为追求他的目标而坚韧不移地无数事例”。当时，他一如既往，具有不容移撼的内在力量。

他在舰上还鼓动士们：“同志们不要灰心，失败是成功之母”，又说，“我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了，第二次在伦敦被骗拘禁了十多天，可是我还是要把革命事业坚持到底”。在与陈贼炮兵交战之际，他毫无惊慌，指挥若定，在枪林弹雨中跑到舱面抢救受伤士兵，并替他们包扎伤口，同时还鼓励大家：“做为革命党人，就有万死一生的危险，但是不要灰心”。蒋介石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8月9日也有记载：“总统自6月16日蒙难以来，至此方离广州”。总统与幕僚言曰：“不图吾与君等，竟得脱险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自负初心也”。并“与幕僚谈时局，及外交事，至深夜二时始就寝”。因为陈炯明的叛变。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李朗如在《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几件事》中写道：“我到上海将失败的情况向孙中山先生报告，他坚定地对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次虽然失败了，可是有了这失败的经验，下次成功就更有希望了’。孙中山先生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永远忘不了”。

不仅如此，我们从《孙中山全集》中还可以考证到，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发生到1923年6月，孙中山发表的文章、起草的党纲、宣言、通电、演说、谈话、致复函、训令、题词 、布告、贺电等达1284篇。在此，我们不妨再略述几桩他抵沪后的主要活动；8月，他在上海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整整谈了六天，主要商讨联俄、联共和打倒军阀等问题；同月，他与由北京到上海的中共党员李大钊进行多次交谈，讨论“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9月4日，他在上海约集在沪各省国民党人张继等53人，交换改组国民党的意见；9月6日，他指定陈独秀、丁惟汾等9人为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即筹商起草改进计划。同月，他要求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11月15日他又召集国民党代表59人开第二次会议，审查国民党纲和总章草案。12月16日孙中山再次召集国民党代表65人开第三次会议，审查国民党改进宣言。1923年1月，他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等文

告;7月后又陆续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总支部通则》等文件;8月16日,他派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恳亲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并设立党务讨论会;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办事处,正式委派廖仲恺、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此外,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他还要讨伐陈炯明叛军。在孙中山的积极努力下,1924年1月在广州他于陈炯明被逐走的地方召开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了。孙中山这坚毅勇敢的步伐,使他晚年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可喜的异彩。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陷于绝望之中"这一提法不能成立。

(摘自《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风云人物

彭　湃

彭湃(1986—1929)原名汉育。广东海丰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袖。

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在日本参加中国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集会,被日本军警打伤,他啮指血书"毋忘国耻",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激励海丰青年的爱国反帝热情。在早稻田大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讨论会并研究农民问题。在这些理论探索和社会活动中,逐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2年1月,出任海丰教育局长并出版《赤心周刊》,宣传革命道理。不久被撤去教育局长职务。6月,他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头戴斗笠,深入农村,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农民生活痛苦的原因和解救办法,并把祖父留给他那份田地的田契当众烧毁。在彭湃领导下,1922年10月25日,海丰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任会长。1923年底到1924年初,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6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定,彭湃是第一届和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1925年2月和10月,彭湃两次参加东征,广泛发动东江农民,为东征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1925年5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在广州期间,还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农委负责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系统地总结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是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必读课本。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他是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中共八七会议上,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11日,为中共南方局委员。9月24日,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南昌起义失败后,去香港。1927年11月初回海丰,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主持召开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海丰苏维埃政府。后被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2月,调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8月24日,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因叛徒告密被帝国主义工部局逮捕,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30日,在龙华英勇就义。

邓中夏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六岁开始读书,先后到郴县联合中学、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7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参加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请愿示威运动。1919年3月,在北京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其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同年10月,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和何孟雄等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1月,代表该小组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同年5月成立了工会。11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音》的出版工作。是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

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初,与瞿秋白共同创办上海大学,任校务长。从1924年下半年起,以主要精力从事上海工人运动。这期间,曾积极参加中共主办的工人刊物《中国工人》的筹办和编辑工作,并且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和党

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的右倾观点进行批判。1924年11月，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论证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第一次说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1925年2月，参加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四万工人反日大罢工。4月，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6月，和苏兆征等组织和领导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中共第二、三、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一度代理中央秘书长。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在赤色职工第五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在留驻莫斯科期间，努力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1930年9月，从莫斯科回国，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1年冬，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迫害。1933年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同年5月15日晚，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不久，被叛徒杜玲英（又名林素芹，当时任互济总会援助部长兼对外联络）出卖。8月，被引渡到南京。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施　洋

施洋（1889—1923）

字伯高。湖北竹山人。出生于世代书香家庭。由于家境衰落，年幼时就参加劳动，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有感受。1907年考入湖北郧阳府立农业学堂，毕业后转入郧阳农业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创办国民学校，被乡亲们推举为本县农务会会长。1914年到武昌，先后就读于湖北警察学校和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立志学法为民，并经常参加校内外的爱国宣传活动。毕业后于1917年和武汉法学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要保护人权，伸张公理，反对谋取私利。1919年在武汉当律师。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参与组织了湖北各界联合会，被选为副会长和赴京请愿团团长。10月初，和天津、上海等地各界代表聚集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并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被选为评议部部长。1920年春，与恽代英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不久，他参加了武汉分部的工作，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工人运动。12月与林育南等发动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并取得了胜利。随即成立了武汉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人力车工会"，被聘为该会最高顾问和对外全权代表，被称为"劳动者律师"，1922年1月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法律顾问。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与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任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随后去上海参加全国司法会议，提出了《反对〈取缔过激法草案〉案》和《废止〈惩治盗匪法〉案》），得到大会赞同。11月任粤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1923年2月1日同各工会、团体代表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积极领导工人同北洋军阀吴佩孚作斗争。随后返回汉口，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7日，吴佩孚出动军队镇压罢工的工人群众。造成了二七惨案，他于当晚被捕。在狱中，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15日在武昌英勇就义。

林　祥　谦

林祥谦（1892—1923）

福建闽候人。1905年到马尾船政局办的学堂读书。1906年停学后，进马尾造船厂学徒。1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当钳工，曾被推举为福建工人同乡组织的首领。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他积极响应书记部提出的铲除帮口、按照产业原则组织工会的号召。同年12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召开的会议，并作为发起人之一，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1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任俱乐部财务干事，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为工人谋利益，深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改名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他是江岸分工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久又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同各工会、团体代表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禁止和破坏，他和代表们一起，不顾禁令，冲破军警的包围圈，进入会场，举行会议。会后，总工会为抗议军阀的残暴行径，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他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罢工的总负责人。在罢工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英勇搏斗。2月7日，吴佩孚、肖耀南等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屠杀，造成了二七惨案。同日他遭到逮捕，被缚于江岸东站的电杆上，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复！"遂英勇就义。

材料　宁死不屈的林祥谦

1923年2月4日，一声汽笛长鸣，京汉铁路3万工

人全线大罢工开始了。

这次大罢工象一把利斧，砍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摇钱树，斩断了他们的吸血管。2600多里的京汉铁路，象一条“死蛇”一样，毫无生气地躺在从南到北的原野上，使敌人惊恐万状。

以英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北京公使团，命令吴佩孚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2月5日吴佩孚急令他的参谋长张厚生要挟江岸工会交出林祥谦等工会负责人，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派了大批匪兵强占车头厂，威胁两个“软骨头”到车头厂偷偷点火开车。工人调查队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向林祥谦汇报，林祥谦派了纠察队长率数百名纠察队员及时赶到车头厂，冲破军警的封锁线，将两个“软骨头”带回工会，挫败了敌人妄图破坏罢工的阴谋。

罢工持续到第四天，敌人决定下毒手了。2月7日下午5时20分，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江岸工会，向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32名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惨遭杀害，英勇牺牲。与此同时反动军阀还派了大批军警挨门挨户搜捕罢工工人。就在就天晚上，林祥谦和其他一些工人不幸被捕，绑在江岸车站东边站台电杆上。

张厚生来到车站，亲自提着马灯在被绑的人群中，认出了林祥谦，要林祥谦下“上工”的命令。林祥谦严词拒绝说：“这一次同盟罢工，是关系到3万工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总工会的命令，不能上工！”张贼气得暴跳如雷，喝令刽子手用大刀砍他。这时，林祥谦的妻子赶到车站，挤了进去。她深知林祥谦是个刚强的英雄汉，决不屈服，必定要遭毒手，便急忙喊道：“祥谦，祥谦，有什么交代？”林祥谦听到妻子的呼唤，坚定的对她说：“你不要管我，快回去吧！”就在这时张厚生又连续令人对他砍了七刀，凶恶地问：“上工不上工？”

林祥谦厉声回答说：“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

张贼被林祥谦的革命正气吓得瘫软在靠背椅上，气急败坏地惊呼：“给我砍！砍！……”

当他苏醒后，张厚生又嚎叫起来：“现在怎么样？”

林祥谦面对屠刀，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怒斥道：“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王八蛋、军阀走狗的手里！”没等他讲完，张贼就慌忙地令刽子手下了最后的毒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就义了。

（选自《宁死不屈的林祥谦》作者：刘元璋）

王 占 元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县人，生于1861年2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青年时代投淮军刘铭传部当兵。

1886年被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一期学习。1890年毕业，投入宋庆的毅军，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往天津小站投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被委为工程营队官。1902年，袁世凯着手扩充军队，以小站旧部为骨干，于保定编练成北洋常备军，王占元任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二年晋升为步队第一标统带。1904年，袁世凯、铁良奉命开始编练北洋陆军六个镇，王占元被得升为第二镇步队第三协统领。1906年王占元由副将衔补用游击，准以“参将留直补用”。1910年升为记各总兵。1911年4月，授陆军协都统衔。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的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伙同他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陷于严重困难。王占元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提任第二师师长，驻保定。1913年春夏间移驻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3月，兼“豫南剿匪总司令”，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4月，任湖北军务帮办。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王占元积极拥护，曾列名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10月，袁世凯授以“壮威将军”，12月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王向袁表示忠诚不贰，袁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正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而精神沮丧时，王占元还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这种为袁世凯称帝捧场的丑行，成为当时人们谈话的笑料。2月18日，王占元又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

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授王占元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王表面对黎恭顺，暗中附和实力派。不久，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在段在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施加压力。王占元曾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之后，黎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5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职，九省督军宣布独立，王占元表面未曾列名，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以冯国璋为首）皖（以段祺瑞为首）两系，王占元站在直系一边。9月，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这时，直皖两系由于

利益不一致，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发生分歧。冯国璋依靠王占元等长江直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政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两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接着，18日，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锟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挫，军事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取得暂时优势，但由于皖系的牵制，对和战犹豫不决。

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采取观望态度，企图左右逢源。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2月11日，冯国璋免去被联军击败的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占元兼代。王占元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并无真正实力，总司令谭浩明为了争取湖北中立，向王做出"不入鄂境"的保证。南北对峙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王占元附和曹锟、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1920年4月，他出席了曹锟为部署反皖系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盟会议。5月，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前线撤兵北上，路经湖北时，王占元慷慨资助饷械。6月13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曹锟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7月，王又乘直皖战争之机，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从而扩大了他在湖北的军事实力。

直皖战后，奉系张作霖把触角伸向长江中游，想方设法拉拢王占元。北京政府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曹锟、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想以此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一、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作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

王占元曾经用搜刮来的钱，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在山东投资于纱厂、煤矿；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电力股份公司；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在北洋军阀中，王占元算得上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

1934年9月14日，王占元病死于天津寓所。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作者：张振鹤）

曾　琦

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创始人。原名昭琮，及长，因慕韩琦之为人，改名琦，字慕韩。1892年9月2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的一个富宦家庭。其父曾友三清末在广西作小官，全家迁居桂林。

曾琦幼年时，在家中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读书。不久，因其父母相继去世，遂与其兄变卖家业，扶榇返回祖籍四川。1909年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肄业，与王光祈、魏时珍、周太玄、李劼人等同学。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课余为报章撰述评论，《成都商报》曾聘为主笔。辛亥革命前后，曾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服》，并于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赴重庆，追随熊克武、杨庶堪参加讨袁之役，事败潜回隆昌。1914年曾琦至上海，入复旦学院习法文，与同学左舜生、李璜等相识订交。

1916年春，曾琦东渡日本，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秋后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留日期间，与易君左等二十余名留学生创办"华瀛通信社"，为国内报刊撰写稿件。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

康有为参与其事。是时正在日本房州避暑的曾琦，曾写信给梁启超，劝梁慎于出处，继续提倡国家主义。

1918年夏，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纷纷罢学归国。曾琦哀叹"人生最不幸之事，莫过于中途辍学"。但在广大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的爱国潮流推动下，亦于6月25日回到北京。到京不久，即与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筹备，于翌年7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不久，曾琦离京赴沪，执笔于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其间，受业于章太炎，章为他讲说《易经要旨》和《佛学大纲》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曾琦抱同情态度。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他以深刻影响。7月1日他在写给留法的周太玄、李璜的信中说："我在上海前后病了三个月，真是奄奄无有生气，直到5月4日，北京学生痛击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我如饮了一付兴奋剂，……马上就启程北上，视察学界情形。……我到京后，接洽学界许多青年同志，精神是非常愉快，又亲眼看见6月3、4、5日北京政府捕拿学生二千余人，囚在译学馆的一班爱国青年，前仆后继，再接再励之精神，觉得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是年8月下旬，曾琦从上海乘船去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与周太玄、李璜等人组织"巴黎通信社"，充当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讯稿件。

五四运动后，"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分化。李大钊等学会中的左翼分子，力图把这个成员复杂、宗旨笼统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曾琦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已经站到反动方面去了，他反对李大钊等人的革命主张，从法国写信给国内的同伙左舜生说："宣言本会为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许个人本其专长，为社会的活动。不许个人为政治活动。"同时，他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蒲鲁东学说，择要撰述稿件寄回国内"，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

1923年12月2日，曾琦纠集留法学生中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在巴黎郊区玫瑰村召开中国青年党成立会议，被选为党务主任。会上通过了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宣言》标榜青年党的宗旨是："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曾琦还在《宣言》中明目张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说它不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到会五十二人，曾琦被选为委员长。

中国青年党建立后，曾琦等人变本加厉地破坏旅法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他唆使其党徒邬刚如采用特务手段盗窃了中国共产党一份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文件。他亲自拿着这份文件面见旅法的国民党人王宠惠、蔡元培、郑毓琇等，极力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又托国民党右派分子谢持之婿曾任远将此文件密转其岳父，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供炮弹。后来他回国后，与谢持"约定内外夹攻"，反对国共合作。

1926年夏，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青年党建立后，其党名长期保密，对外活动则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出现，因为标榜国家主义，所以被称为国家主义派。这时，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曾琦等人散布的谬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揭露和批判，其反动面目逐渐被人们识破。一度被蒙蔽的青年纷纷觉醒，声明脱离国家主义派，自称为"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派，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曾琦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由民国十三年秋迄十六年春，愚虽居沪滨，而时复漫游大江南北，讲演不下数百次，为文不下千余篇，意在醒青年之迷梦，存国家之元气。

严酷的事实，使曾琦认识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于是他就投靠各地封建军阀，"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从1926年起，他派出一批重要党徒与各地军阀相勾结，充当军阀的鹰犬。他本人则时而回川与四川军阀相勾结，时而到山东依附韩复榘。

曾琦一再煽动蒋介石背叛革命，破坏统一战线，屠杀共产党人。北伐前夕，蒋介石搞"整理党务案"时，《醒狮》周报就公开鼓动蒋介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排斥共产党"。北伐进军途中，曾琦"希望国民党……绝对不容党内有跨党分子，毅然开除共产党，以免内起萧墙之祸，外贻赤化之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对蒋介石"对付共产党之采取严厉手段，尤深赞其勇敢"，还提醒蒋介石"开除共产党后，勿遽认为祸患已绝。须知共产党之基础，本在下而不在上。仅仅罢免一、二高级军官，逮捕三数领袖人物，何以制共产党之死命？"这是公然煽动屠夫蒋介石向广大工农群众开刀。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青年党在反共反革命上已完全一致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排斥异己，在一个时期内不承认青年党，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没有能够合流起来。因此，"四一二"后，曾琦在继续反共的同时，也曾反对蒋介石的"党治"。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召开。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主张"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同年11月，青年党撕下"在野"与"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伪国民大会，曾琦被指定为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曾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张君劢（民社党）等签署

"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参加蒋介石反动政府,任伪国府委员。为此,曾赋诗道:"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对蒋感激涕零。

1947年夏,蒋介石要对共产党下"讨伐令"。曾琦向蒋介石建议"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俟其明目张胆,组织伪政府时,再从而大伸天讨。犹之刘先主之讨曹魏,明知其迟早终必篡汉,仍待曹丕僭号称尊,始行计伐"。这一献策得到蒋介石的鼓励和嘉奖。1948年元旦,蒋授予他一等卿云勋章。他又向国民党反动派献策:严格保甲制度,在各地组织"老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以切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一再强调"军民如何互相配合,实为当前剿匪之要旨"。

1948年3月,曾琦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4月19日,代表青年党致电国民党,祝贺蒋介石"当选行宪第一任总统",说什么"群伦爱戴,徵民主之舆情,国运昌隆,卜共和之盛世"。会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1948年10月,曾琦赴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5月7日,病死于美国华盛顿。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作者:李义彬)

珍闻轶事

"农民王"彭湃

彭湃(1896—1929)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

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1913年在海丰中学读书,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与同学组织"群进会"研讨革命道理,向反动势力作斗争。

1917年夏,彭湃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19年5月7日因参加了部分日本留学生在东京举行的国耻纪念集会并示威游行,遭日本警察殴打受伤。1921年彭湃毕业回国,在家乡海丰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道路,1922年任海丰教育局长,这年的"五·一"劳动节彭湃组织海丰县学生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因而被免职。从此,彭湃决心从事农民运动,成为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被誉为广东"农民王"。

组织"贫人党"

彭湃被免去海丰县教育局长职务后,意识到原先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了,他决心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到离家不远的赤山约(乡)想找农民谈心,启发他们认识革命道理,但农民看见彭湃一身学生打扮,知道是富贵人家的子弟,都不愿接近他,一个个客客气气地走开了。这给彭湃很大启发,他明白,要和农民一道就要使自己从形象到生活习惯思想感情都与贫苦的农民融汇起来。于是他换了粗布衣裳,赤着脚、戴上竹笠到田间同农民一起劳动,逐渐同农民交上了朋友。

过了一段日子,彭湃通过青年农民张妈安,串连了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景,五个年青人常常来到彭湃的书房"得趣书室"谈话。有一天彭湃问他们:"为什么许多农民还是不愿同我说话?"得到的回答是:第一,"你的谈话太深,听不懂";第二,"没有人给你带路,人家觉着陌生"。彭湃受到又一次启发,他当即邀这五位农民与他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六人农会共同开展工作。为了让农民明白农会的含义,彭湃把农会称为"贫人党"当晚共同宣誓入党,并定出秘密联络信号,党员接头时,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大姆指和食指伸开,向对方表示"贫"字的顶部。然后把掌心向下,伸开的姆指和食指则表示"人"字。第三个动作收回大姆指,伸出四指,表示党字下面的四点(繁体字)。从此广东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就首先在赤山约点燃起来。到1923年建立起海丰县总农会,会员人数达二万户十余万人,农民运动在海丰县已成燎原之势

智斗陈炯明

海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地主豪绅非常害怕,终于出动军警进行武装镇压。彭湃分析形势,认为总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不宜力敌,必须智取。考虑到海丰地主豪绅的总后台是当时正盘据着东江的陈炯明,陈炯明虽然实际上站在地主豪绅一边,但他为巩固东江地盘又想利用农会的力量,因而也表示过要支持农会。彭湃抓住陈炯明这个矛盾心理巧妙地施展策略。

1923年8月彭湃亲自步行500华里到老隆找陈炯明争取他的支持。经过一番说理斗争,陈炯明终于同意了减租(因凶年)和释放被捕的农会会员,并以电报通知海丰县长。彭湃机警地在陈的电报稿上加上了"函知农会收"。客观上起了陈炯明承认农会合法的作用。稍后,彭湃又经汕头到香港再找陈炯明,并随同陈炯明返回惠州,住进陈炯明的总司令部,使地主豪绅认为陈炯明器重彭湃,

不得不作些让步，同意释放被捕农民。就这样，彭湃利用陈炯明吓住了豪绅，救出了农会会员。

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4月彭湃到达广州，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并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1924年7月，在共产党人彭湃等建议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干部，彭湃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他吸取海丰农民运动一再被地主武装势力破坏的教训，认为组织农民武装十分重要，为此他聘请黄埔军校优秀学员徐成章等对农讲所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彭湃又强调在实践中学习的重要，他亲自带领农讲所学员到广州郊区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协助农民组织农会，进行了为时三天的实习。

广州近郊农会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广州工人的斗争。当时，在工贼马超俊等控制下的"广东机器工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破坏工人运动的组织，他们宣称工人应以"行业"的形式组织工会，反对共产党人以产业为单位组织工会，为了打击破坏共产党在铁路工人中的工会组织，他们以"体育大队"的形式组成武斗队伍，到广州近郊火车站等候火车到达，即上前围攻火车司机等机器工人，强迫他们参加机器工会，不遂即寻衅斗欧，机车工人寡不敌众，常常受到欺侮。

郊区各地农民协会在农讲所学员协助下组织起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体育大队"前来寻衅时，火车司机立即拉响汽笛，在田野上耕作的农会会员闻声带上锄头扁担从四面八方合围而上，把武斗分子吓得抱头鼠窜，大壮了铁路工会的声势。

1924年8月，农讲所第一届学员结业时，正值广州商团煽动罢市，妄图搞垮广东革命政权。农讲所学员200多人在彭湃率领下编成广东农民自卫军（农团军），由彭湃担任团长，开赴省长公署，承担警卫省长及公署人员安全的重任。后来还参加了10月15日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

支援广宁农民运动

1924年4月，广宁县农民在共产党员周其鉴等领导下为坚持组织农会同当地县长李济源展开斗争。彭湃亲自到广宁协助解决，他在广宁停留了十天，不但解决了农会立案问题，并亲自深入农村，宣传组织农会的重要意义，使许多农民提高认识，积极加入农会，广宁农会会员由4000多户猛增至7000多户。10月10日广宁县农会正式成立。

同年11月，农会在争取减租斗争中受到反动县长李济源支持的地主武装的镇压。彭湃立即亲赴广宁支持农民斗争，他一面向县署有关方面交涉，一面直接帮助农民组织武装斗争，地主武装寡不敌众，躲进炮楼。彭湃指导农民并直接参加挖通地道爆炸炮楼，逼使地主武装投降。斗争取得胜利，农会举行盛大庆功活动时，彭湃又亲自上台演戏，表示祝贺。1925年2月29日，彭湃在广宁农民热烈欢送下返回广州。

此后，彭湃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重返海陆丰，组织农民配合东征军击败陈炯明，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发动农会会员支持罢工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彭湃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创者和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广东"农民王"。

（作者：黄尊辉，选自《炎黄春秋》）

中共早期文件中的秘密代号

在我党早期形成的文件中，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常以一些术语代指党团工作的有关词语和工作内容。现整理如下。

大学（C.P）
大学之道（共产主义）
大学生（共产党）
大学读本（《向导》）
学年大考（全国代表大会）
总校（中央）
总校教务处（中央局）
总校长（中央书记）
总校教务会议（中央委员会）
高级（区）
高级教务处（区委员会）
高级教务长（区委书记）
特级（特别支部）
班（小组）
班长（组长）
班考（小组会议）
班长会议（组长会议）
级务处（干事会）
级务会议（干事会会议）
学费（团费）
校刊（团刊）
记大过（留团察看）
自行退学（退团）
学生调查表（团员登记表）
农业专科（农会）
中学读本（《中国青年》）
产科研究（《中国妇女》）
工科读本（工人刊物）
每月决算表（每月统计表）
总校年鉴（宣言及决议案）
得病（被捕）
入院（入狱）
受传染病（被检查）
下体操（群众运动）
生理科（妇女部）
民校（国民党）

高级生代表会(区代表大会)
初级(地方)
初级教务处(地方书记)
初级月考(地方大会)
初级教务会议(地方会议)
初级教务处(地方委员会)
级(支部)
级考(支部会议)
级长(支部书记)
级长会议(支部书记会议)
斥退(开除党籍)
学款(经费)
讲义(通告)
学生自治会(学生部)
学生自治会主任(学生部委员)
庶务(组织)
中学(C. Y)
试卷(报告)
训育(宣传)
经济学(经济斗争)
经学试卷(政治报告)
拜访(考察)
游历(巡视)
校规(纪律)
工业专科(工会)
农科读本(农运刊物)
聘请教员(调人工作)

除此之外,党团组织还常用商业术语来暗指地下的党团活动。

(作者:雷明义)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记邓中夏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火含落辉,彩霞如赤柱。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这是邓中夏1920年9月到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洞庭湖时写下的《过洞庭》一诗中的著名诗句。当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襁褓中的时候,这位北京大学学生已抱定共产主义信念,并为之奋斗了。作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和党的理论家,邓中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在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过旧学教育,1915年考入湖南省高等师范中文专修科,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他一心攻读古书,幻想通“古”入仕。但是北京大学蓬勃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想,使邓中夏顿时觉醒过来。他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春,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李大钊的启发教育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参加了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国民》杂志、建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活动。特别是五四运动中,他站在游行示威的最前列,之后又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回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湖南学联,发动湖南学生支持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邓中夏一方面攻读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于1920年3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率平民教育团到长辛店等地演讲,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

1920年上半年,邓中夏从北大毕业,他毅然拒绝了父亲在农商部给他谋得的优越职位,也放弃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是发起人之一。他积极协助李大钊开展工作,并具体负责编辑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创办长辛店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他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因忙于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而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他为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1922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上海,邓中夏也随之抵沪。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邓中夏任上海大学校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他一改学校过去陈腐气息,强调学生“读活的书”,让学生走上社会、投身于革命运动。他聘任了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李达、沈雁冰、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和进步教授来校讲学。“上大”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不少革命战士。同时,邓夏利用在“上大”的有利条件,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和创作。“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公开否定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邓中夏最早发表文章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观点。1923年底至1924年,他先后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我们的力量》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较科学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方针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阐述。邓中夏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革命两大任务,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因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就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发生动摇,“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如果“因为稍稍受了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那么,“再革命一百年,也不能成功”。中国过去的民主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

这三个群众尚未觉悟和组织起来”。在工农兵三种力量中，邓中夏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只有工人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邓中夏认为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将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建立“工人纠察队”和“组织民团”。强调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得领导权。邓中夏上述思想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为党的“四大”解决领导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鼓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为迎接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因而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在党的“三大”、“四大”上，邓中夏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革命的发展，证实邓中夏的见解是正确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工农运动又恢复和发展起来。1925年2月，他和李立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5月，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邓中夏与苏兆征、杨殷等受党中央委派，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之所以坚持一年多，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与邓中夏深入细致的发动、坚决勇敢的斗争和采取的正确策略是分不开的。1927年2月，邓中夏专门写了《一九二六年广州工潮》一书，总结了这次罢工斗争的经验，并且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中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的问题。

1927年4月，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五大”，邓中夏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被调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繁重的日常事务。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与李立三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7月底，从九江回武汉，参与“八.七”会议的筹备，邓中夏在会议的发言中，严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坚决拥护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他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去上海恢复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冒着危险，同当时省农委书记王若飞一起经过艰苦努力，使江苏的党组织和工农运动恢复起来，到1928年，上海罢工人数达21万，宜兴、无锡等县组织了农民暴动。

1928年2月，党中央调邓中夏去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又派他代表中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上，邓中夏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会后留莫斯科，参与筹备党的“六大”。他出席了党的“六大”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之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驻莫斯科。此后的两年中，他为促进国际工人运动，争取国际工人阶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情与支持做了大量工作。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史》一书，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各次重大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是职工运动中和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宝贵文献。

1930年7月，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邓中夏回国。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即派他去湘鄂西苏区和贺龙、周逸群等一起领导湘鄂西武装斗争。邓中夏接受任务后，水陆兼程，于1930年9月到达湘鄂西。他与贺龙、周逸群等采取坚决措施，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军队的壮大。但当时正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邓中夏在军事上也犯一些错误。王明一伙一上台就对他进行打击，指责他在湘鄂西苏区“犯了路线错误”，在莫斯科时“反对国际路线”，撤销了他红二军团政委等职，并于1931年冬调回上海作“检查”。邓中夏到上海后，不仅遭受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也陷入困境。没有分配给他工作，也不给任何经济援助，一家生活就靠妻子李英每月几元钱的工资来维持。后来安排他到沪东区委宣传部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务，编过一阵油印小报《前锋》。当帅孟奇见到这位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时，不禁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邓中夏笑答：“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直到1932年秋，党中央才派他担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互济会是一个营救革命同志、救济死难烈士家属的组织，当时也遭敌人破坏。邓中夏不顾危险，深入群众，接洽各方人士，很快打开了局面。

1933年3月15日晚，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救援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时，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党中央设法营救，还请史良等著名律师帮助辩护，加上法租界当时并没有弄清他的身份，所以只判了50天监禁。但因林叛变出卖，供出了邓中夏的身份。蒋介石得知消息，大喜过望，用大洋买通法租界官吏，将他引渡给上海公安局，然后立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敌人软硬兼施，一方面派人“劝降”，一方面施以种种酷刑。邓中夏坚强不屈，同敌人在法庭上和监狱里进行了唇枪舌战。他告诉监狱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他给难友们上党课，讲解马列主义，讲解工人运动。牺牲的前一天，他还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无限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次日黎明，即1933年9月21日清晨，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选自《党史文汇》作者：薛豪卓）

少年毛泽东联语故事

毛泽东自幼聪颖过人，文思敏捷。他不仅善作诗词，洋洋洒洒，行有余力；同时也是撰写联语的大手笔，其联语常于平凡处显示出高超的艺术魅力和非凡智慧，体现

出他的豪迈情怀和高远之志。

1901 年，8 岁的毛泽东入南岸私塾，启蒙教师是邹春培。这一天，邹先生因事外出，临走时嘱咐学生们温习功课，不得离校。然而，当书读熟后，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就与几位同学到校前池塘戏水弄波。顿时，池塘里水花飞溅，好不热闹。恰在此时，邹先生回校，看这情景，甚是气恼。他弄清为首的是毛泽东时，心中明白背书已无法难住这个学生，于是他便要毛泽东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邹先生出上联"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将语意上升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邹先生见一"对"不成，略一停顿，又出一联"牛皮菜"，以为这个书外之联可以难倒毛泽东。谁知毛泽东竟"嘻嘻"一笑，惟"马齿苋"相应。该联上下皆为菜名称，而"牛"与"马"、"皮"与"齿"相应更是确切。邹先生无可奈何，只得摸了摸毛泽东的头，暗地里却对毛泽东赞不绝口。

1910 年秋，毛泽东"出乡关"到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该校是新式学里，校规严格。这对滑稽调皮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种束缚。有一次上国文课时，教师谭咏春忘了带课本，立即走出教室去取。谭老师刚出教室，毛泽东已走上了讲台，对他的同学们"讲演"起他刚读过的《新民丛报》。过了一会，教室外传来教师的咳嗽声，毛泽东才急忙溜回到自己的座位。谭老师进教室后，一脸严肃，对同学们说："今天你们若无人对出我出的对子，我就要严惩毛泽东。"谭先生出的上联是："跳跳跳，跳下地"。用意是讽刺刚才从讲台上溜下去的毛泽东。同学们面面相觑，无言以答。片刻之后，只见毛泽东站出座位，朗朗有声："飞飞飞，飞上天"。下联立意深远，志趣高雅，远胜上联。这样毛泽东既摆脱了刚才的困窘，又展示了他少年有为的鸿鹄之志，谭老师顿时转怒为喜，笑容满面，颌首称是。

在一师求学期间，博学多闻的毛泽东与一师才子肖瑜交谊甚深。他们常在湘江畔散步游览，品诗论文，高谈阔论。湘江两岸风光旖旎，引人诗兴大作。1914 年秋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与肖瑜又来到江边。只见江中落霞缤纷，秋水长天，渔歌唱晚，群鹭齐飞，好一派怡人惬意之景，毛泽东与肖瑜诗意勃发联句吟颂：

肖：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

毛：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肖：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高阁倚佳人。

两人抚掌感慨，沉浸在这美不可言的诗情画意之中。

1917 年夏，毛泽东与肖瑜到宁乡、安化、沅江等地旅游。两人出游时，几乎未带分文，而采取旧时学子们"游学"之法，以解决旅途中的生活问题。

一日，两人经过长时跋涉，到达乡宁境内的一个小镇时，俱感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打听之后，他们得知该处居住着一位刘姓老绅士，是前清翰林，便决定前去拜访，以求解决腹中空空的窘状。肖瑜建议作一首诗送给刘翰林，用隐晦些的诗表达拜访的目的，毛泽东点头称赞。于是，两人击节感叹到。

毛：翻山渡水之名郡。

肖：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

毛：沾衣晨露浸饿身。

这首联诗完成后，他们又细细地读了几遍，感到相当满意，竟由衷地笑了起来，一时忘了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几天之后，毛泽东与肖瑜游历到了安化县城。他们得知县劝学所的夏默安所长毕业于两湖学院，著作甚丰，可算是饱学之士，遂决定上门拜访。可这位夏所长自恃学富五斗，孤僻清高，一向少与人往，更不愿理睬那些"游学"之人。毛泽东与肖瑜两次登门拜访，均遭谢绝。毛泽东第三次前去，夏默安终于会见了，但提出要毛泽东对一对联，方能予以资助。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夏先生便出了一上联：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沉吟片刻，即应答如流：

春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毛泽东所对之下联的典故出自《晋书、惠帝纪》，载惠帝游园闻虾蟆声而问左右：虾蟆叫：为官乎，私乎？"左右答："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夏默安见毛泽东泰然应对，且对句严谨，用典自然，知其学识根深底厚智慧非凡，便马上一扫倨傲之态，以客礼相待，落座与毛泽东评诗品文，十分投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临别时，他还赠予毛泽东 8 块光洋作旅费。

（选自《党史文汇》93 年 4 期，作者：张奇俊）

倚仗曹锟权势的李彦青

在电影《直奉大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冯玉祥将军部下的高级将领蒋鸿遇、鹿钟麟等人多次向曹锟的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请领军饷受到刁难，最后被李勒索去 20 万元，这个李彦青原来是北洋直系军阀曹锟的贴身仆役。他早年跟随曹锟胁肩谄笑，嗲声嗲气，深得曹锟的宠幸。1923 年在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之后，李彦青也一步登天，担任了总统府收支处长，狐假虎威，作恶多端，终于在 1924 年"北京政变"中被冯玉祥处决。

李彦青，山东聊城人，幼时家境贫寒，父母终日劳苦，不能维持全家温饱，李遂同乡人"跑关东"去东北谋生。李长得面容清秀，皮肤白晰，虽出身农家，但口齿伶俐，机智过人。先在营口一家山东人开的澡堂里打杂，为浴客擦背。时当辛亥革命的前二年，曹锟任东北新军第三镇统

制，一次由宽城子(现长春市)来营口督募新兵，在营口住了半个多月，有一天正巧到这家当地最大的浴池洗澡。李对曹锟伺候的很周到，曹一时兴起，就把他叫到宅中当护兵。因李善于逢迎，能揣摩迎合曹锟心理，极讨曹的欢心。曹乃渔色之徒，经常嫖妓，李彦青时年十七岁，貌如处女，曹在军中正苦无猎艳处，得李乃大喜，于是成为曹的男宠。二年后，曹以婢女大凤为李妻，夫妇二人均得曹锟的宠幸。李后由护兵升为马弁(即副官)、巡捕、承启兼办军需。曹锟并将自己的私人财产，交给李彦青掌管，虽曹之子侄和兄弟也不能插手，足见曹对李信任之深。

论李彦青的职位并不高，但因曹锟信任的缘故，他几乎无事不管，无事不问，俨然成为曹的大管家，每日不离左右。凡有军政高官或其他来宾拜谒曹锟，必先和李打招呼，由李作主安排接见。后来，曹锟竟让李彦青代批阅文电，有关人事任免，李彦青如不同意，曹竟不予盖印。迨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李彦青竟一跃而成为总统府的收支处长，还兼任北京官钱局督办。曹更授以陆军少将衔，一时朝野为之侧目。

李彦青平生认钱不认人，没钱打点他什么事也办不成。比如发放军饷，他大权在握，曹的内阁陆军总长也得仰承李之鼻息。虽然陆军总长已经批准发放，但还要找李认可才能领饷。李凡发放军饷，均要打个六折，和做买卖四六分成一样，以四成入李私囊。所以，在曹锟得势的数年之间，李私蓄银元不下千万。李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的住宅和保定所建造的花园，几同清政府王公府第相侔，重门深院，朱门兽环，全是由各省军阀为取媚于李而自愿报效的钱兴建起来的。

李彦青仗曹锟的权势，卖官售爵，大肆贪污，视为理所当然。北洋大总统上台时，照例要由印铸局铸造纪念币章。曹锟上台后，就下令国务院印铸局长郭则沄铸纪念币，批给经费银元 3 万元。虽然曹已批了"照发"，但李彦青却仅给了 7000 元。因经费不足，郭则沄暂时将印铸局的职工工资垫入，以致该局半年之久欠款未发。郭则沄受到曹锟的训斥，愤而辞职。

李彦青最怕吴佩孚，并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曹锟有要事派李彦青到洛阳去见吴佩孚。吴见李后，佯装不相识，对李说："和老兄未见过，老兄一向当何差使？"李仓猝不知所对。吴又问："外间纷纷言讲公府有四凶，内有娈童派、保定派，到底全是甚么人？你知道否？"李回答说："这全是外人胡说。"吴接着说：我若入京，要效法古代清君侧，定将这帮乌龟王八一概枪毙！"李彦青闻后，浑身抖栗，面色如死灰。

有一天晚上，李彦青在家中与几位官员打麻将，曹锟突有电话找李，催他立即去总统府，李推开牌桌不打了，在座的王克敏问："主座(指曹锟)找你何事？"李竟脱口而出："总统等我给他洗脚。"李即仓皇乘汽车而去。王克敏回家，和他的爱妾小阿凤(北京韩家潭名妓，出身苏州青楼)谈及此事，后常和从良小姊妹饮游间当笑话说，遂传遍北京城。在当时政界中，有闻总统府电话者，必有人借此开玩笑说："总统等你洗脚吧？"事为《京报》记者邵飘萍所悉，便在该报副刑上登出一首打油诗，以讽李彦青："屁精何事抱头窜？元首传呼洗脚来。兔子当遭七弟骂(曹七弟曹锳常语人云：我三哥身旁三种人"乃王八、兔子、贼也)，雀牌忙把六爷催。传自盟嫂小阿凤，且喜同年并小梅(李彦青十二月十八日生日，刚度过三十大庆，军阀官僚皆往祝寿)。一见少爷吴子玉(吴佩孚)，尿流屎出面如灰。"

曹锟常和人说："我在外边是靠着本派的各督军保着我当大总统，里边是靠着李彦青调护我的健康。我今生得此两者，可以优游一世，死而无憾矣。"由此可见曹与李的关系超出兄弟手足之上。

1924 年 10 月 23 日，正在进行第二次直奉大战时，冯玉祥从前线班师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在冯玉祥进京的当日晚，即将李彦青逮捕，拘押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经国民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多次刑讯，李彦青最后认贪赃鬻爵等情不讳。12 月 14 日下午，总部军法处又提出李彦青做最后一次之审问，当由冯玉祥将军手令警卫总司令部验明正身，即日枪决。15 日上午 10 时，警卫总司令部鹿钟麟总司令即派司令部参谋长王书箴，率领大刀队一小队和第四师第八旅第十五团第三营第四连士兵一排，全副武装前来执行。先由检阅使署李姓副官带领士兵 6 人入监房提李，李问士兵："请我何意？"士兵说："到时你自知。"李知不好，急欲写信留给家人，李副官不准；李又请求一见曹锟，也不准，李不肯行，两名兵士左右挟之。李自被拘押后，国民军即禁其吸食鸦片，故李面孔呈苍青的之色。发为西式分头，身穿华丝葛狐皮袍，外罩黑礼服呢大衣。兵士挟李到院中后，将其双手向后捆绑好，推上汽车，并插上纸招。李在出旃檀寺时，大呼"冯司令救我！""三爷救我！"不绝于口。刑车经参谋部(现北京西城府右街北口对面北大附属医院)、西安门、西四、西单、宣武门大街、菜市口，到天桥停车。在先农坛东墙根，拖李下车令向西跪，王参谋长命令士兵在西墙上张贴李之罪状布告，令排长某执行，一枪即死。

李彦青被枪决后，有人报告曹锟。曹悲痛不已，几至昏厥。和李彦青同监一处的还有张敬尧、潘鸿钧，都有兔死狐悲之感，特请某翰林代作一祭文，辞意沉痛，并藉以发泄各为其主的冤枉。《京报》邵飘萍以《兔为牺》为题作诗，并有小序曰：报载冯军入京，李六郎首先被捕，此实一大快事也，为之浮一大白。诗云：恩宠于今冠等侪，余桃风味美于回，春明一霎惊飙起，狡兔居然入网来。

(王振中)

张宗昌与郭松龄的一场争吵

一九二三年秋，奉天陆军举行演习，校阅委员会的成员有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由于张宗昌在五站种植鸦片烟，又因他在队伍原为土匪招安，虽然大加整顿有了一定成绩，但是土匪气味依然浓厚。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极力反对张宗昌拥有这样的一支军队，每欲伺机把他除掉。张作霖对校阅委员说："每年花一百多万，养着这帮队伍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因此郭松龄在秋操演习中，对张宗昌部队特别严格。

那时庄稼已经收割，地里全是高粱根子，硬挺在地面上，恰在演习那天又下了大雪，深达数尺。张部士兵在雪地卧倒，既看不见高粱根，又泥泞不堪，就在这样恶劣条件下演习，有好多人受了伤。张宗昌看到这样，心里大不痛快。休息途中。在野地里见有三间独立房子，四无依傍，其中并无居民，张宗昌和我进屋里暂避风雪。张蹲在炕上，把随身带来的烧酒，拿出来喝。他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在骂时，郭松龄忽然推门进来，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就问张说："你在骂谁？"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松龄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指着张宗昌的鼻梁大骂："我造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这时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我以为张发了火，要翻脸，认为张要拔手枪打郭，殊不知他跳下炕来马上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造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于是郭负气走了。我赶上去拉着郭的衣服，劝他别走，想替他们和解。张在后面却拉着我的衣服，不要我留郭。郭走后，张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郭松龄和张宗昌打嘴架，闹得彼此不欢，秋操演习完毕，这事为李景林所知。李认为张宗昌受了委屈，于是电请张宗昌到沈阳，为他和郭松龄见面讲和，并邀来张学良。李劝解他们两人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对付直军，更要紧的是打吴佩孚。茂辰(郭松龄字茂辰)和效坤(张宗昌字效坤)，不要把你们闹别扭的事搁在心上；郭向张赔礼。彼此表示歉意，也就不提这事了。李景林又提议，他们四个人结为弟兄，就在李宅郑重叩头，重申盟誓，以打倒吴佩孚为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把秋操学习成绩，向张作霖报告，陈述张宗昌的第三旅，学科战术成绩优良，士兵如何能够吃苦耐劳，夸大其词，形容了一番。张作霖根据张学良报告，认为张宗昌已经把他这旅人练成了一支很好的军队，因些对张宗昌大加宠爱，视同亲兵，把他的军队调到沈阳附近的东丰、西丰、西安三县驻扎。这时张宗昌的吉林第三旅，改为奉天陆军第三旅，下辖三团：第五十五团，团长是褚玉璞；第四十四团，团长是许琨；第二十八团，团长是程国瑞。在与直系第二次开战前，又编了一个炸弹团。团长是王栋。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张宗昌与程国瑞的关系。原来张宗昌在二次革命时，他通过冯国璋的关系，接受了袁世凯的金钱，背叛革命，出卖他的领袖，把陈其美暗杀了。那时张宗昌是属于陈其美革命军闸北司令李徵五部下，李是旅长，张任团长。张命他的营长程国瑞(字竞武)把陈其美枪杀。这事多年来，迄未破案，也无人知底蕴。在五站秋操后，张部整顿队伍，大家对程国瑞这团人纪律不好，啧有烦言，就是他自己内部的人，也这样议论。我也向张宗昌说程国瑞团军风纪太差，影响整旅的名誉，要张把程撤换。不料张宗昌对我说："旁人说程竞武怎样不好，那不去管他。你当参谋长，可不能那样说，你要晓得程竞武和我的关系，我派他打死陈其美，花了四十万元，一个钱也没有给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现在当上一个团长，那又有什么呢？"张亲口谈出这事，我才知道程国瑞和张宗昌有这么一段不可告人的密事。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集》社科出版社)

国会中议员演出全武行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是一家人，但由于互相争权夺利而分道扬镳。一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由于曹锟常不理公务，不喜接见宾客，一些事常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渐压倒了津派。津派由于被疏远、冷落，同保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矛盾的激化点集中在"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上。津派的总理人选是现任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他和王承斌都是在曹锟贿选总统时期曾卖过大力气的人。而保派则抬出高凌尉，他是现任代理总理。另外，现任外交部长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由此形成三角竞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与反吴的两派势力，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各不相让，有时甚至大动干戈，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国会开会常常大闹一场不欢而散。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有一次，当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只好被迫宣告散会。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

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曹锟在征得保派的同意后，提出让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以便让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容易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这一方案也被耽搁下来了。

国会内的武行越打越起劲，有一次开会，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一天通过了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又讨论了孙宝琦内阁的同意案。这下子，激怒了反吴派，不少反吴派议员拿起墨盒朝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把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互相扭住一团斗欧。

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送地方检察厅，请他们起诉处理。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党议员，许其交保释出。

反吴派为了报复，高凌尉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欧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就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警卫员到达议院，又与旧警卫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交械，汤步瀛被捕。

根据众议院院法，议院的警卫队应受议长指挥，队长是由议长委派的，高凌尉这一做法显然是不合法的。于是，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

在国会与内阁的斗争中，曹锟是站在内阁一边的，而吴佩孚则因与保派政客嫌隙很深，在许多问题上则站在吴派的一边，他不反对孙宝琦组阁。在众议院的最后一次内阁投票中，以二百五十票顺利通过孙宝琦内阁案；结束了高凌尉代内阁的使命。尽管当时新派来的警卫队不服从主席指挥，不照章封锁会场，把票匦签筒封锁起来，割断电线，阻止投票的进行，但并未得逞。

孙宝琦从未想到自己会当总理。当他乘车南行路经天津时，有人把他追回，让他组织内阁。他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是他妹夫颜惠庆从中作成的，他想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纸名单来，总统早就指定了全部责任内阁的名单，只是让他作个百依百顺的傀儡总理，连换一个人选都不行，真是一场空欢喜。

（摘自曾炎主编《民国官场秘史》）

曹锟三姨太京奉路上施威风

一九二三年，军阀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人得道，于是鸡犬升天，连曹锟的那些姨太太也肆起淫威来，当然，中国的百性是只好吞气忍声的；但是，外国殖民主义者就未必买帐。在京奉路上就发生了一起事件，曹锟的三姨太同英国稽查之间发生了一起冲突。

曹锟的三姨太自从成为总统姨太后，社交上的应酬之事就更加多了。1923年，她离开北京到保定活动，应酬事完后直接返回北京。由于所乘之车并非专开之车、又由于办事人不力，错乘了由保定开丰台然后转往天津的车。所以，列车到了丰台，照常折入京奉东下线上，准备开往天津。当时，三姨太的护卫队队长发现不对，即去询问为何不开往北京。车守告诉他，这车是开往天津的车，不能开往北京，卫队长这才知道，他们错乘了车，卫队长立即去报告三姨太。不料这曹锟的三姨太，非但不责怪手下的人办事糊涂，反倒责怪车守不执行命令。什么命令？她三姨太要回北京的命令。她命那车守停止车行，立即召来站长问话。不一会儿，站长赶来了，英国稽查毕塞尔带了数名稽查也随同赶到，曹锟的三姨太命速将列车转向北行。站长告诉她，此关系行车章程及时刻，是不能轻易改动的。但三姨太坚持非回车不可。此时，站长方知乘车者是曹锟的小妻。于是，和各位洋稽查商量，不如将三姨太所乘头等车一节，卫队车一切卸下，另挂一车头开往北京，原车仍开往天津。当即用电话同各有关车务段商量，得到同意后，一面告知队长，转禀三姨太。三姨太一听自己的淫威起了作用，当然很高兴，于是一口答应。

由于列车已开过了站头，要将专节卸下，须将卸下的车厢纳入其它路轨，方可使此事办成。于是使列车先转轮后退。但三姨太不知其里，一看列车仍在向前行动，以为站长与洋人在哄骗她。硬迫她到天津去。一怒之下，她柳眉倒竖，淫威大发，马上不问青红皂白，喝令卫队打人。卫队开始都不敢动手，三姨太大怒说：“尔等怕什么，打出事来有我们总统做主，都有我哩，与你们什么相干”。卫队听了此言，才无奈动起手来，一阵拳打脚踢，中国人受伤的不算，洋稽查毕塞尔亦被围打，致成重伤。

当时，同一列车的诸乘者都目睹这一情景，车上大哗，一同乘车的二个英国人见状，立即跳下车去，打电话给英国驻华使馆，将车上发生的事特别是英人被打一事，详细地描绘了一番。英驻华大使接到电话，一面打电话诘问外交部，一面发电报去天津，命令驻津英国提督迅速派兵驰往丰台。外交部接到英使馆的电话诘问，立即去报告总统府，与此同时，交通部也已经接到丰台站长的电报。部长吴毓麟复电丰台，令先将三姨太送回北京，其余事俟查服后再处理。而丰台站站长，还没有等电令到，就已将曹锟的三姨太送回了北京。

英国大使馆对此事特别重视，专门派人赴丰台肇事点调查事情经过，当时有同列车二英人作证，声言亲见总统之姨太太喝令士兵围打英人稽查，无可抵赖。英使知道详细过程后大怒。当时天津接英使电报后派出的英兵五十也到达丰台，英驻华大使就命令那些士兵驻扎该处，担任护路之责。英使还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说中国军队之行动，野蛮至此，以后铁路上非有外兵保护不

可，趁机对我国提出非礼的要求。

后来曹锟被迫出面，允将滋事的士兵严办，以平息由此产生的危机。曹锟又要求外交部向英使交涉，请先将护路外兵撤退。英使则坚持非将喝打之人重办不可，各路洋稽查中之英国人，以及天津英人对此均很激昂。曹锟当然不会去严办他的三姨太。后来只是处打人者的轻微伤害罪，并赔偿英人以巨金，始行了结。

（摘自曾炎主编《民国官场秘史》）

流行风

小说集《呐喊》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

收入作者自1918至1922年间创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作品充分体现"五四"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生动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广阔的中国社会的图景。《狂人日记》对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孔乙己》猛烈抨击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药》和《风波》揭示了长期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愚昧和无知，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群众的深刻教训；《故乡》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破产及其社会根源。《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现实，剖析了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思想所形成的时代精神病态——阿Q精神，并彻底批判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呐喊》成功地塑造了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等不朽典型，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通过对愚弱的国民性的批判，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改造社会的重大课题，开创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

小说《被摈弃者》

作者白采，主要内容：

描写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女主人公"我"曾与人相爱，是一个正在孕育新生命的年轻母亲。不久，情人要她打胎，为了承担这个私生子的重任，她与情人分了手。从此，这个女人就被摈弃于社会之外，同伴们不理她，她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终于下了狠心把心爱的孩子亲手沉到河里。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大胆的诅咒和愤怒的谴责，猛烈地批判了那寡情的世界，揭示了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根源，并表现了她对光明的憧憬。

小说《浣衣母》

作者冯文炳，主要内容：

小说写寡妇李妈一生的慈爱和辛酸。李妈的丈夫一去杳无音讯，留下二男一女，死的死，走的走，但李妈对儿女的慈爱广施于他人，成了这里的"公共的母亲"。正在她孤苦无告的时候，来了一个中年的单身汉，在门口搭茶铺，李妈帮他过日子。于是招来非议，谣言四起，原先的"公共母亲"顿时变为"域的老虎"，李妈的道德价值，她的仁爱和古风，立时化为乌有。小说通过浣衣妇李妈的遭际，有力地抨击了把劳动人民推向绝路的封建伦理道德。文笔冲淡质朴，醇厚深沉，具有田园风味。

小说《海滨故人》

作者庐隐，主要内容：

写五个女青年在欢聚于海滨以后的不同遭遇和性格。露莎孤僻深沉，又敏思多感；云青拘谨又软弱，是旧礼教的牺牲者；宗莹和玲玉追求理想伴侣的体贴和温顺；莲裳随遇而安，追求人生的享乐。他们都是受"五四"新思潮冲击，从旧家庭挣脱出来的闺秀，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但又不敢与旧势力抗争，在人生道路上苦闷、徘徊。后来，有的屈从于旧家庭的压力而牺牲自己；有的沉溺于爱情而不能自拔；有的抛弃了事业，过着平庸的生活；有的还在苦斗挣扎。作品着重写主人公露莎，由理想不能实现而悲观厌世，认为人间祸福无常，抱着游戏人世的虚无态度。小说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重压下，寻求出路所产生的苦闷，严肃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透露出对旧制度的不满与憎恨，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作品在表现对人生问题的焦灼、思索中悒郁感伤的悲观色彩相当浓重。文字如行云流水，明丽通畅，富有抒情意味，在风格上颇有特色。

电影《孤儿救祖记》

是1923年明星公司摄制的第一部长片正剧，也是郑正秋编剧的第一部"社会片"。影片描写一个富翁杨寿昌（郑鹧鸪饰），听信侄儿道培（王献斋饰）挑拨，怀疑守寡的儿媳余蔚如（王汉伦饰）不贞，将她赶出家门，蔚如离家后，忍辱负重，一心扶孤。待儿子余璞（郑小秋饰）长大后，送入其祖父开办的市民学校读书。一天，在祖父险遭其侄儿暗害时，孙子余璞挺身相救。于是，真相大白，一家团聚。影片表现了"劝善""惩恶"的主题，宣扬了社会改良的思想。影片有较高的艺术性，特别是在电影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很好成绩。它摆脱了对西方影片的因袭、模仿，剧本取材、演员服装、布景陈设，均能力避欧化，因而影片富于民族的生活气息；更多地摆脱了文明戏的舞台化的表演，力求形象的真实性和生活化，因而，使影片更富于电影特性；故事性强，性节曲折动人，有引人人胜的魅力。所以，影片公映后轰动一时，获得了营业上的成功，促进了国产电影运动。

诗《纸船》

——寄母亲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迭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迭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迭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冰心）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

时　间：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至二十日。
地　点：广州。
出席代表：三十人。其中有：
陈独秀　蔡和森　瞿秋白　张国焘　毛泽东　王　俊
罗章龙　何孟雄　刘仁静　王仲一　王用章　徐梅坤
谭平山　冯菊坡　刘尔松　陈　天　张太雷　李大钊
刘天国　陈　涛　林育南　张德惠等
党员人数：四百三十二人。
主要决议：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第三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陈独秀　蔡和森　李大钊　毛泽东　王荷波　朱少连
谭平山　项　英　罗章龙
候补委员：
邓　培　张连光　徐梅坤　李汉俊　邓中夏
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　毛泽东　罗章龙　蔡和森　谭平山
委员长：陈独秀
秘　书：毛泽东
会　计：罗章龙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党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中央决定：

谭平山留任驻粤中央委员；王荷波加入中央局为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1923年6月）

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更复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向导》周报第30期，1923年6月20日出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在对外政策方 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呜呼！二十世纪之国家，其国基之飘摇不定，其政象之杌陧不宁，孰有过于今日这中国乎？二十世纪之青年，其处境之艰难困苦，其心思之忐忑不安，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乎？内有残民以逞之军阀，外有伺隙而动之列强，官僚既舞弊营私，政客更寡廉鲜耻，奸商但逐什一之利，乡愿徒为两可之辞，其余假公济私之辈，损人利已之徒，更不胜枚举，行见大好河山，竟将断送于若辈者之手。环顾国内，非无多数之前辈，而以时势之迁移，忠烈者死于锋镝矣，狡黠者变于中途矣。坐令奸党横行，善人裹足，民有偕亡之叹，国无重振之极。当此之时，舍吾辈青年奋起而以血肉与黑暗势力相搏战，则中华民国之前途，又安有光明之望哉？适来海内忧时之士，不乏救国之谈。有欲输入欧洲文明，以期改造思想者，此虽根本之图，要非救急之策，试杌往籍，殷鉴匪遥，道学虽盛，何补南宋之亡？玄理纵高，无救东晋之乱！向黄巾面讲孝经，对虎豹以谈仁义，适足形其迂拘，曾何补于国是？又有主张一阶级专政，而忽视其他各界者；殊不知吾人欲行革命，不可不察本国之情势，就国内之人口计之，则全国国民，农居八九，商界次

之，学界次之，据最近全国职业之调查表，工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百分之四强。以如斯少数之工人，而欲实行专政，征诸事实，殆万不能。况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之压迫，各有倒悬之痛苦，于此而独倡一阶级专政之说，几何不使他界失望？虽不至迫彼等以附和军阀，亦将使吾人失却最多数之同情，不能行大规模之革命，总令军阀官僚得以延其寿命耳。又有知理想之难行而欲依他党以成功者，殊不知已有政党，早失信用，即有二三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明者，殆难以望诸彼辈，则吾人又何取乎依赖行为，而失其独立精神，以与过去人物同为一邱之貉耶？此同人等所以外瞻大势，内审国情，毅然有中国青年党之发起也。本党之宗旨：言乎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盖鉴于国际强权之方盛，世界大同之尚遥，新加坡之增筑军港，太平洋之派遣舰队，铁路财政之共管，宜昌长沙之示威，在在令人惊心动魄，故不敢再为空言以误国也。至于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盖鉴于全国国民之齐受宰割于军阀，欲唤起各界之觉悟，合群力以诛国贼，人人皆当协力同心，故不敢徒唱高调以拒人也。若夫成败利钝，要亦不难逆睹，昔意大利之再造邦家，实成于少年意大利党之手；近土耳其之恢复故土，亦由于青年土耳其党之努力。即吾国旧属之三韩，亦有朝鲜青年党之组织，三月革命之举，全球为之震惊。事在人为，理有或爽。他国青年之奋斗如此，吾国青年之有血性者，宁能无所感奋哉？抑吾人之所谓青年，非必以年龄为限，而要以精神为主，苟能奋斗不懈，则春秋虽高，亦吾党之同志，若其畏葸无能，则年龄纵幼，实社会之赘民。世有志有兴邦而意存救民者乎？则请细览本党党纲，而加入协同工作。众志成城，行见青年之奏凯；人心未死，伫看祖国之重兴；是则本党同人所敢郑重昭告于海内外青年同志者也。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于巴黎。

（选自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遗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印行）

孙中山重莅广州通电全国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大元帅敬日通电全国

北京参众两院议员及护法议员诸先生、黎宋卿先生、张敬舆先生、冯焕章先生、王亮畴先生、各部总次长、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张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阳吴子玉先生、杭州卢子嘉先生、南京齐抚万先生、上海岑西林先生、何茂如先生、章太炎先生、蔡孑民先生、南通张季直先生、成都刘禹九先生、熊锦帆先生、湖南赵夷午先生、贵州袁鼎卿先生、南宁林甫田先生、各省省议会、省长、督军、总司令、各师旅团长、并各省教育会、工会、农会、各法团及各报馆均鉴：文曩在上海，于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统一及裁兵纲要，并列举国内实办诸派，冀共提携，推诚相与，以酬国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后迭奉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舆诸公先后复电，均荷赞同。文亦以叛陈既讨，统一可期，虽滇、桂、粤、湘诸将及人民代表屡电吁请还粤主持，文仍迟回，思以其时为谋求和平统一良好机会；又以沪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适宜，故陈去已将弥月，而文之返粤固尚未有期也。不图以统筹全国之殷，致小失抚宁五方之雅。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哄动一时。黠者妄思从而利用，间文心膂，飞短流长，以惑蔽国人耳目，以致黎张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为浅薄已可慨叹。文之谋国，岂或以一隅胜负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诸将，据有国内武力之一，乃独于文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怀疑之端，亦无表示。报纸所传，竟谓洛吴对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还，推之当世诸贤，不容独有此迷梦。贤者固不可测，文于今日犹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终之一悟也。抑文诚信尚未孚于国人，致令此唯一救国之谟，或反疑相对责难之举。借非然者，何推之浙卢、奉张而准，而于举国人心厌乱之时，复有一二军阀逆此潮流而趋，而邻于悍然不顾一切也？此文与西南护法诸将讨贼伐暴之初志，国有大梗，何难重整义师相与周旋。顾国人苦兵久矣，频年牺牲已为至巨，而代价复渺然不可必得。文诚思之心悸，万不获已，唯有先行裁兵以为国倡。古人言："请自隗始。"以是之故，断然回粤，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兹于今月二十一日，重莅广州矣。于抚辑将士绥靖地方外，首期践文裁兵之言，同时复从事建设以与吾民更始，庶几文十数年来苦心经营之建国方略，一一征诸实现。以吾地广人众之中华民国，卒与列强共跻于平等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虚语。天相中国，能进而推之西南诸省，以及全国，其为闳愿岂胜企仰。然一隅之与全国，渐进之与顿改，其图功之利钝，收效之速缓，昭然未可同日而语，称铢而计。故文之愚，尤以统一为能立供国民以福利，遂不惜举当世所矜之武力，以为攘窃权利之具者，躬自减削，以导国人。亦冀拥节诸公翻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图治，舍裁兵实无二途。文倡于前，诸公继之，吾民馨香之祷，岂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压国人，横决之来，殊可危惧，诸公之明，当不出此。披沥陈言，鹄候裁教。孙文。敬。印。

（选自《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9 页）

曹锟就职总统前在保定发表通电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

北京参众两院、国务院各部院、王巡阅使、冯检阅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京兆尹、各省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总司令、承德、张家口、归化各都统、下关海军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商会、各法团、各报馆钧鉴：

顷接总统选举会歌电开，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出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等因。不胜兢悚，伏念锟从事军旅垂数十年，政治一途未尝学问，前因改选其期迫，曾经历次宣言表明微悃，所冀两院诸公慎选各贤，早奠邦基，乃不蒙垂察，谬采疏庸，自反初衷，实殷惶惑。值此国家多故，民力困穷，宪法待成，统一未就，属在贤能犹虞竭蹶。况自欧洲战役告终，政治之潮流日异，华府会议以后，国际之责任弥艰，新治何以导成，人才何由延集，自惭庸顿非所能堪。窃维民国建设甫十余年，元首数经更迭，或有勋劳于国，或有闻望于时，竭智殚心，共谋匡济，尚徒格于时，会未竟其功。当兹改选之初，宜为慎始之计，陂坡知畏，孱力难胜。诸公伟略，匡时嘉猷素裕，敬希时教，以启愚蒙，临电不胜迫切。曹锟。阳。印。

（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一〇二五）66）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授权发表下记宣言。在越飞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重。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再来中国南部，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

孙逸仙　越飞签字

（原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孙中山在沪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对时局的主张与民族、民权、民生政策。内称该党“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

1月4日　孙中山在沪通电讨伐陈炯明，宣布陈之叛国罪恶，痛辟陈军散布“客军入境，亡省可虞”的谰言：指出讨贼军的任务是“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岂屑如陈逆等之惟知盘踞地方，以土豪自命乎？”

1月10日　中国国民党通告即日起实施新颁宣言、党纲及总章，民国九年十一月公布之总章及规约即行废止。

2月4日　在京汉路总工会的领导下，京汉路爆发争人权、争自由的政治性大罢工，全线客货车全部停开。京汉路总工会发出罢工宣言。

2月5日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开会，决定组织工人后援会，发表宣言，进行募捐，声援京汉路罢工工人。

2月7日　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下令对京汉铁路罢工事件进行武力镇压。清晨在京汉路长辛店方面，直军第十四混成旅长时全庭指挥大批士兵，向集中于火神庙警察局门前要求释放昨晚被捕工会干部的二千余名铁路工人开枪，工人当场牺牲者三人，重伤后不准医治而牺牲者三人，轻伤者三十多人，被捕三十多人。

2月9日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严重的牺牲，以图再战，京汉铁路总工会根据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指示，决定暂时退却，宣布忍痛复工。翌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紧急通告，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明工人们今后应有的态度，劝说工人忍痛复工。

3月21日　北京众议院通过决议，促请政府拒绝接受关于取消二十一条要求之日本复文，并请政府通告日本，对彼复文甚不满意。

5月1日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天安门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会议议决六事：一、农工集会结社自由；二、打倒军阀吴、曹、萧；三、释放京汉路罢工被捕人员；四、恢复铁路及各业工会；五、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5月4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女高师开会纪念“五四”，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到会，会上强调应继承“五四”精神，作政治运动。提出：对内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否认现国会，拥护人权和教育独立；对外则应起来作国民的自动外交。会后，分为两队，一队去教育部，一队去彭允彝宅示威，“驱逐彭允彝”。

6月6日　张绍曾内阁召集会议，以黎元洪拒绝批准任命官员（指拒绝盖印任命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破坏内阁权限，提出总辞职以倒黎元洪，当晚张绍曾离京赴津。

6月11日　北京军警千余人又闯入黎宅索饷；王怀庆要求黎即日给饷，否则须有相当处置。同日，众议员彭占元等一百六十二人通电助黎速走。黎元洪致函参众两院，报告数日来军警及公民团滋闹情形。

6月16日　北京参众两院开合会，通过自13日以后黎元洪所发命令无效案，及赞成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案。因拥曹驱黎有功之各议员，收到曹锟所赠“节敬”五百元，次日，议员丁佛言、郭同等纠正16日两院合会之人数不足三分之二，指出以过半数表决系属非法。

7月2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发出对时局宣言，其要点为：一、拥护约法，承认合法国会议员南下制宪；二、赞成护法总统团结西南、东南，组成正式政府，戡乱讨贼；三、委员制决不适用于中国，督责民八合法国会监督护法总统实力戡乱，以扫除政治障碍，消灭军阀。

7月3日　英国政府提出所谓“补救中国乱局办法”，妄图干涉中国内政，内有：一、以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二、以外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三、在中国口岸外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四、征收附税，以应付国际共管下之军民行政经费等。

10月5日　北京国会开会选举总统，场内外军警、侦缉队、保安队密布。军警要人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亲自出马。因不足法定人数，三次延长时间，始到五百九十人，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为贿选总统。

10月9日　众议院常会决议：一、咨请政府依华会决议，向法国政府收回广州湾；二、请政府对北京私立各校经费优重补助。同日，参议院常会决议，本届三期常会已满，改为临时行政委员会。

10月25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在广州举行改组特别会议，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8日　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首次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分部登记；设立广州市党部；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及设立讲习所等工作。

11月16日　北京内阁特别会议议决裁员办法：各机关凡非实缺人员，除考试及格部分任用者外，一律裁汰，其积欠薪水，另议办法。如被裁人员有法外举动，即依法惩办，断不姑容。

11月7日　曹锟公布《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区域令》，规定自治法自民国十三年(1924)4月1日于直隶省所属东光等四十七县实施。

11月8日　反对吴景濂派议员王枢等八十余人在京开会，认为吴之议长资格已消除，决议令吴将民国八年之后的帐目完全交出，由议员组织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在议长未选出之前，设置临时行政委员会。

11月12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应付时局问题”，由临时中执会召集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及组织委员在广东支部开特别会议，讨论组织义勇军，以高师为训练地点，请党中军人同志训练。

11月25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说明该党改组主旨在加强组织与训练，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之渴望；而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同日，公布《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共六十一条。

12月23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党员大会，到三千余人，汪精卫报告孙中山关于改良党务宗旨，胡汉民、廖仲恺均发表演说，并选出张秋白等三人为出席

1924年1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12月26日　武昌各工厂工人及劳动界召开大会，决议就汉口日人残杀田仲香案组织工界外交委员会，实行对日绝交，同日，武汉商界田案外交后援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对日严重交涉。

外　交

1月3日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就侨商克门被张家口中国士兵枪伤毙命案，向北京外交部再提五项要求：一、杀人凶手抵命；二、惩办当事长官；三、在肇事地点为死者立纪念碑；四、优给死者家属恤金；五、中国政府道歉

1月5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通告驻华外交使团，本月17日起实施切实值百抽五新税则。

1月1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伯力、驿马河等处华侨商会被封闭，会长会员被捕，向苏联代表团提出抗议，要求速将被押华侨释放，各处商会即日启封，在事俄员应予惩处。

1月26日　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

2月3日　因北京参议院未通过施肇基外交总长之任命，是日黎元洪令准署理外交总长施肇基辞职，以黄郛继署。

2月9日　关于庚子赔款法国部分改付金法郎问题，在东方汇理银行以扣留盐余和法国公使以限定2月10日12时以前答复，否则取消中法银行复业协定相威胁的情况下，是日北京国务院会议决定允诺法方要求，次日由北京外交部照会法国公使。

3月1日　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吉田参事官照会北京外交部称：中美间之无线电合同，侵害三井洋行之无线电合同权利"决难承认"。美国方面则表明对日本之意见亦绝对不能通融；中美无线电台应照合同开筑。

3月1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致照会于日本外务省和驻京日使馆，声明取消民国四年5月25日关于中日条约及换文（即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顺、大连两租借地。

3月14日　日本外务省分致复文与东京中国公使馆和北京中国外交部，拒绝取消民国四年"二十一条"换文与收回旅顺大连之接洽。

4月2日　苏联代表团在接获北京政府外交部上月28日关于特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节略后，于是日将驻华苏联全权代表越飞自日本复电照转北京外交部，对王正廷任命表示欣然同意。

5月4日　驻华英国公使麻克类、法国公使傅乐猷，美国公使舒尔曼、日本代办吉田访张绍曾，对直奉再战提出警告，并催结到期外债。

5月9日　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于是日发表声明，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全数救出临城被掳外侨，逾限依时要求赔偿。北京政府派沈瑞麟分访各国驻京公使，说明政府处理此案方针。

5月19日　日本驻华公使饬驻沪日总领事设法向各国领事及中国官厅，要求严厉取缔排日运动及抵制日货等，并要求将宣传排日运动之公私团体一律发封。

6月2日　北京公使团由英美法意等七国组成武官团赴枣庄调查临城劫车案，北京政府陆军部派梁上栋同往。

7月14日　驻古巴公使刁作谦因使馆经费无着，电外交部请裁撤驻古巴公使，归并驻美使馆兼办，本人请解职回国。

9月2日　苏联代表加拉罕到达北京，各团体及外交界人员前往车站欢迎。次日，加拉罕在京发表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之原则与精神依然为苏联对华关系之原则，并指出中苏两国亲善之必要。

9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介绍苏联成立情形；苏联的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之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派驻华全权代表团"。同日，顾维钧外长会见加拉罕。

10月1日　驻京日使芳泽谦吉向外交部提交抗议照会，要求中国政府训令速释"宜阳丸事件"被扣之日人。外长顾维钧表示该案不至稽延。4日，海军总长李鼎新向顾维钧建议，由外交、海军两部会衔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请各国将派往长江之军舰从速撤退，各国在华侨民统由中央会同地方军队保护。

9月2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俄国侨民居留我国各地者往来无定，难免不有"过激派"混杂其间，于华人治安问题关系甚巨为由，通电各省按所规定之"取缔俄民留居规则"办理。

10月6日　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邀请，派鲍罗廷到中国帮助改组国民党，是日鲍抵广州；鲍、孙就改组党和建设军队问题作长谈。

10月12日　英、美、荷、法四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抗议中国政府将关余拨充整理内债基金，要求将来此种关余不得再专供抵偿内债，当兼充清理中国政府所担保之外债及交务之用，占用关余，"外债实有其超乎内债之上的一种自动优先权"。

10月15日　驻京十三国公使及三国代办入总统府觐见曹锟，祝贺曹当选总统，罗马主教刚恒毅亦同往。日使芳泽虽还未呈国书，亦随同觐贺。领袖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公使致贺词，申明各国均愿助中国完成统一，恢复国

内治安秩序。

10月26日　驻京日使芳泽赴外交部质问中国政府财政、交通两部以无线电权转让美国，毁弃信约。妨害日商权利，日方无论如何，坚持日三井洋行在华无线电之专利权。

10月31日　驻京法公使傅乐猷就金法郎案照会北京外交部称：法国国会将于11月13日开会，金法郎案将在国会讨论，中国政府对该案应履行黄郛照会内承认之条件，否则，法政府将另取相当手段。

11月5日　北京政府电饬驻美公使施肇基向国务卿休士接洽美国在华设无线电台问题。日、美两国在华设无线电台专利权之争，拟在华盛顿由日、美直接商洽，然后中国再加入协议。

11月21日　北京外交部照会日公使芳泽，谓中国政府尚未接收双桥无线电台，故该电台合同中之日本在华无线电独占权之效力尚未发生；中国对合同中关于日本三十年独占权不能承认。

12月4日　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奉派赴日调查地震中华侨被惨杀案，是日途经奉天，对张作霖谈：中俄交涉诸问题，与日本的利益关系密切，"东京政府之意向，认为有倾听之必要，故余有此东京之行。"

12月5日　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就截留广州关余事复照北京公使团，谓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

12月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就日人惨杀华侨案照会日使芳泽谦吉，提出三项最低要求：一、日政府迅速调查事件真相，依法严惩杀人凶犯；二、按次发表调查结果及处罚情况；三、对被害华侨之家眷给相当之恤或安慰费。

12月1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查询五国军舰是否占据黄埔粤海关，因何事故，请查实情。

12月28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依据《辛丑条约》照会法、意、比、日、英、美、荷兰、西班牙八国公使，驳复各国关于用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之要求，声明中国政府主张以1901年和约第六款暨1905年协定付款。

军　事

1月3日　陈炯明军自肇庆（今高要）向广西梧州反扑，因桂军取道怀集、广宁攻其侧面，陈军败退三水。

1月7日　北京孙传芳奉吴佩孚命图闽，将所部开抵江西临川，准备开入福建。

1月9日　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通电宣称，该部奉孙中山大总统令，即日由闽返旆讨贼。

1月12日　驻广州之粤军谭启秀部晚间反正，围攻农林试验场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驻观音山之炮队亦响应。

1月18日　粤军第一、三两师由江门调回省城后，是日粤军第一、三、四师暨警备队、海军、江防舰队各长官在海珠开会，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军总司令。同日，广州各军设立"海陆军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以魏邦平为主任。

1月23日　广州讨贼军各领袖在大沙头李烈钧处开治安及军事会议，桂军沈鸿英乘机派兵袭击粤军谭启秀与梅萼所部于观音山。沈更利用陈炯明所散布的"客军入境、广东亡省""之流言以煽惑滇军，谓魏邦平将联合广东军队，解决滇桂军。

1月30日　北京政府以陈炯明下野并请求收编其所部为北军，本日黎元洪明令特予嘉许，并冀"在粤主客各军将领互谋谅解，勿再私争"。又派丁槐为两广宣慰使；林俊廷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任命高凤桂为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2月6日　桂军首领沈鸿英江防之变阴谋败露后，遭到粤军、滇军及粤海军各方面之反对。沈以一时计不得逞，不得不暂戢凶锋，将所部由省垣移驻广州郊外。

2月12日　吴佩孚为实现其武力统一西南各省计划，令驻宜昌之杨森军队向川东进发，并派孙传芳所部卢金山师助杨，川鄂战衅重开。

2月20日　川军第七师陈国栋部之朱宗悫、段荣琮两旅包围成都，23日晨省军第一军赖心辉、但懋辛部援军赶到，成都解围，陈国栋部退往新都、金堂、淮州镇等处。

2月21日　孙中山返抵广州，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孙中山因与北方谋和平统一，虽回粤而仍不任总统，但各军不能不有名义以统率，故设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之。

2月24日　孙中山鉴于沈鸿英暗通直系军阀，为防沈引导北军攻粤，决定重定各军防地，是日，令桂军总司令沈鸿英所部移驻肇庆并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择要防守；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龙、东莞、虎门各处；东路讨贼军第一师师长吕春荣所部，着移驻罗定各地方。此外各部军队，着就现驻地点驻扎。嗣后各部军队，非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3月6日　孙中山为贯彻裁兵主张，是日在广东开始着手裁兵，办法是限各军于半个月内将该军营数驻地、官兵姓名造册呈报，再由大元帅派员点验，倘有虚额，不准再招，其老弱及无枪支者，均一律裁汰。

3月18日 原粤军第四军军长及八属总司令陈德春"勾通逆党，希图扰乱大局"，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及各将领奉孙中山令，于是日拂晓将陈德春部全部缴械。

4月2日 孙中山特派古应芬为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全权主任，所有留驻江门水陆各军队，概归节制调遣。

4月4日 孙中山任命梁鸿楷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一师师长，郑润琦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三师师长。又任命马伯麟为虎门要塞司令。

4月10日 孙中山准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辞职，特任张开儒为大本营参谋长；派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宣传委员会委员，6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陈独秀任委员长。

4月13日 孙中山发布军事调度与编组命令：广东讨贼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中央直辖第四独立旅旅长张振武及现驻新兴第一独立旅旅长余六吉等所部，均归广东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梁鸿楷指挥，并由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全权主任古应芬节制调遣。又令将中央直辖第二、第三两师，改编为中央直辖第七军。

5月9日 陈炯明旧部在东江复叛，陈修爵进占龙门，图袭增城；杨坤如攻石龙。叶举、洪兆麟于次日到惠州，成立陈系粤军总指挥部，通电攻击孙中山借政府名义"卖产骗财"，并率部进扰增城、石龙。

5月12日 东线陈炯明军攻占广东大埔三河坝，许崇智军退往高陂。同日，叶举率熊略、杨坤如、练演雄各部分三路犯石龙，图由此进窥广州。

5月14日 孙中山特派魏邦平为西江讨贼军总指挥；特派周震鳞为大本营劳军使兼督率中央直辖第一第二两师事宜，任命尹骥为中央直辖第一、第二两师指挥。

5月16日 西江讨贼军总指挥魏邦平抵广利，召集军官会议，下令撤肇庆西门之围，致书沈军旅长张希栻，限两日内退出。

5月28日 东线讨贼军分三路攻惠州，陈军退入城内，讨贼军占飞鹅岭。陈炯明令熊略、练演雄分兵抄出后方，袭陷博罗，进窥石龙，广州震动。

6月3日 湖南省交涉司杨宣诚向长沙日领事抗议，除要求伏见号日舰立即离去，并提示：一、撤换日领与舰长；二、开枪日兵以军法治罪；三、水兵上岸侵我主权，须日政府道歉；四、抚恤死难伤者；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次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答复，措词含混，除表示歉忱外，丝毫不得要领。

6月9日 东江讨贼联军第二次向惠州城施行总攻击，守惠陈军得知潮汕方面援军即到，于11月改守为攻，联军总攻失败。

6月12日 北江讨贼滇军张武旅叛变，牵动全线，杨希闵率部退至英德之河头站。

6月22日 陈炯明自香港抵汕头，与林虎、黄大伟、洪兆麟及叶举代表开军事会议。

6月25日 北京摄政内阁令免去兖州镇守使兼山东陆军第六混成旅长何锋钰本职，调张培荣继任，调任徐鸿宾为曹州镇守使兼山东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又任命张培勋为第五师第九旅旅长。

7月5日 吕超就任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刘成勋将川军第十师刘春蕃部及川北清乡军吕镇华部，拨归吕超节制。

7月7日 北路讨贼滇军王均部攻占乐昌，谢文炳残部向九峰、坪石溃退。次日，谢部退入湘边，被湘省收编，谢离军。

7月15日 粤北路沈鸿英部及北军退出南雄，讨贼滇军进占南雄、始兴同日，西江讨贼联军第一、三两师协同舰队进占都城。

7月18日 粤西江讨贼军占领梧州，17日，美国军舰"潘邦加"号护送美孚油轮抵梧，梧州镇守使冯葆初及各公团请美舰长出任调人，经与魏邦平接洽，允沈鸿芳桂军于24小时内退出。讨贼军遂于是日占领两岸炮台，梧州城内则由桂军之输诚部队黄绍竑、马葆初驻扎。

7月20日 陈炯明军林虎部攻陷广东饶平之黄冈及闽南之平和，俘臧致平军五百余，分路包抄诏安、云霄。

7月23日 陈炯明以西路援军俱已开到，在东江进行反扑。从河源开抵之黄凤纶、陈炯光两部，由海丰进逼博罗；从三多祝、平山开抵之邓本殷、胡汉卿各一部，由淡水，龙冈进逼平湖；惠州城内陈军则反攻飞鹅、馒头各岭；驻龙华之熊略、练演雄两部，亦由永清进逼正果，战事剧烈。

7月26日 孙中山再次赴东江督师。次日，在博罗许崇智总司令部召集各部高级军官开联席军事会议，筹谋夺取惠州计划。

7月27日 东江讨贼军向白芒花、平山一带进攻，以截阻惠城与海陆丰之交通，是日占领白芒花，直达平山。陈炯明由河源率部猛攻淡水以救平山，8月1日占淡水。驻守白芒花之讨贼军以后方危险，退守永湖之东山。

8月7日 中央直辖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黄绍竑、驻梧州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及驻梧州西江海军部队，奉孙中山密令将桂军冯葆初部缴械。冯降附大本营后仍驻梧州，阳奉阴违，暗通沈鸿英桂军，意图复叛，故收缴其枪械以除隐患。梧地治安改由黄绍竑维持。

8月8日 陈炯明系林虎部刘志陆攻占闽南漳州，臧致平军刘长胜部不战而溃。同日，讨贼军许崇智部刘志达旅在漳州哗变。

8月9日 西江讨贼军总指挥魏邦平以广东西江各地已收复，于4日提出辞职，是日孙中山特派魏邦平为琼

崖实业督办，准其辞去西江讨贼军总指挥及西江戒严司令等本兼各职。

8月14日　驻四川澧都原隶川军四师杨春芳所部贺龙独立旅，反戈归附省军石青阳。贺龙经石青阳委为川东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贺与周西成、汤子模联合，益以颜德基部，攻占忠县，进袭长寿，重庆，万县间交通阻断。

8月23日　赵恒惕向各路"护宪军"下总攻击令，谭赵两军在衡山附近激战。次日，护宪军中路蒋锄欧团击退吴剑学部第十七、十八两团，占领护湘关，25日占衡山。谭部湘中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宋鹤庚对所部军队（贺耀组、唐生智两师）失指挥能力。弃职赴汉转沪。

9月13日　原东路讨贼军第二师师长吕春荣叛投陈炯明，吕部下旅长莫雄及梁若谷通电与吕脱离关系，仍一致拥护孙中山。次日，吕春荣在遂溪宣布就任陈系粤军第二师师长兼高州善后处长职。

9月14日　湖南谭延闿部讨贼军克醴陵，向攸县、茶陵、株洲活动。是日，驻军湘中暂持观望态度之鲁涤平本日发表通电，主张谭赵两方在长沙开和平会议。

9月19日　广东陈炯明系粤军第二师吕春荣进犯阳江，孙中山调陈策部前往抵御。

9月23日　东江陈炯明军由三多祝向平山反扑，讨贼军许崇智部退回白芒花，陈军复占平山。同日，马鞍、横沥一带陈军改守为攻，滇军胡思舜部退回三栋，前此被讨贼军切断的惠州与汕尾间的交通恢复。

9月26日　东江讨贼军占领龙华（镇）及龙门（城）。同日，许崇智从横沥赴博罗谒孙中山，孙命许东江作战中央军总指挥。杨希闵任右翼，朱培德任左翼，分途击敌。

11月4日　陈炯明粤军与联军在樟木头激战，孙中山亲临前线督阵，树黄色大旗一面，上书"帅驾亲自督阵，各宜奋勇向前"。联军士气大振，将粤军击退二十余里。

11月15日　孙中山以战事紧迫，财源益艰，是日令各军将领及大本营军政部和程潜、财政部长叶恭绰、两广盐运使伍汝康、广东财政厅长邹鲁、广州市长孙科等竭力筹措饷项，以供军需，毋得稍涉稽延。

11月21日　孙中山特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鲁涤平为湘军总指挥，任命宋鹤庚为湘军第一军军长，鲁涤平为湘军第二军军长，谢国光为湘军第三军军长，吴剑学为湘军第四军军长，蔡钜猷为湘军第五军军长，陈嘉佑为湘军第六军军长。

12月14日　英、美、日等列强派军舰十七艘驶入广州白鹅潭示威，对孙中山大元帅府扣留关余事进行武力恐吓。

经　济

1月3日　总税务司安格联复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三团体，对上年12月30日来电表示内国公债彼经管一日，对于其后发生各款，必竭力维持其已成立之优先权。

1月8日　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联合致电北京国务院、总税务司安格联、外交总长施肇基及英法美日四国公使，反对增加关税作为整理外债之用，要求内债基金应照1921年10月整理原案及"九六公债条例"切实履行，无担保之内外债亦应统筹。

1月15日　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报告民国十一年（1922）度海关总收入比十年（1921）度增收四百十余万两。

1月16日　北京政府发布命令称：现行法令有妨于农工商之发展者，应先修改；未备者应即编订，由农商部悉心厘订，以利推行。又令：军警机关除属于军事范围及违警案件外，一切民刑诉讼，均不得违法受理。

1月22日　日本正金银行北京分行向北京财政部交涉，要求在盐余中扣除该行所得俄发债券本息。财政部因此项债券已宣告无效，予以拒绝。

2月13日　北京众议院召集紧急会议，议员褚辅成等提案反对北京政府允诺法国要求以金法郎交付庚子赔款，其损失当在五千万两以上（折银元七千万元左右），决咨请政府速将该案提交国会议决。同日，国会议员王廷弼等三十三人联名通电全国，以此案国家损失过大，且在中法银行有债权之中国人，颇多权要，内阁通过金法郎案颇有损削国家以附益个人之嫌，要求取消此案，以资挽救。

2月23日　胶济路民有公司认股人在上海总商会开会，到黄炎培、颜德清、张兰坪、方椒伯、余日章、沈信卿、穆藕初、陆达权、史量才、贾季英等，讨论决定股本总数为四千万元，除以三千六百万赎路外，尚余四百万作为修理扩充之费。

3月2日　《申报》报道1922年日本对华贸易出口总值为三亿三千零四十二万五千日元，进口总值为一亿八千三百十三万一千元，对华出超一亿四千七百二十九万元。

3月15日　北京政府农商部设立"修正法规委员会"，商会代表加入者七人。农商总长李根源称该会以"除兴业障碍，保人民权利"为宗旨。商会代表称。官商协议法规，今为第一次。

3月16日　广东省财政厅发行金库券六百万元，以金库收入担保。是日《金库券发行手续之监督条例草案》经孙中山批准办理。

3月18日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决议

将官股划出，以杭州，海门、兰溪三行划归官股，改名为浙江地方银行。商股部分另行招股补足二百万元，就上海、汉口原有两行继续营业，并即日推设分行于杭州等处，改名为浙江实业银行。

3月27日　孙中山派谭延闿往晤沈泓英商开拔事，饬广东财政厅筹十万元为沈部桂军之开拔费。次日，沈电孙中山称，已分饬所部陆续开赴西江一带，并于肇庆设立桂军总司令部。

3月29日　北京政府农商部以近来“罢工风潮日趋激烈”和“调解劳资冲突，预防工业流弊”为由，于是日公布《暂行工厂通则》，全文共二十八条。

4月2日　北京政府推翻所拟整理内债基金原办法，计划停付内债基金本息一年二千四百万元，而以一千四百万元付外债，一千万元充作政费，消息传出，内国公债持有人均感不安，是日联名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建议组织债权团，向北京政府争取付息还本。

4月14日　北京政府组织整理内外债委员会，以刘恩源兼委员长，赵椿年、文群任副委员长，5月4日公布《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章程》十二条，派沈瑞麟、杨寿枏等二十人为委员。

4月15日　全国银行公会第四届联合会议在汉口华商总会开会，讨论议案十项，其中关于维持公债基金案，议决在内外债未整理实行以前，各在会银行不得单独或联合承募或购买政府发行之新公债，并由各地公会登报公告之。19日，会议结束。

5月4日　青岛市面辅币充斥，价格日落，商民受亏，影响甚大，是日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电请北京财政部转饬造币厂勿滥发辅币，以维持青岛金融。

5月27日　黎元洪商税务处会办蔡廷干，向代理税务司包罗指借沪海关建筑费一百二十万两，分四个月拨交。每月以十七万元充制宪经费，以十三万元充使领经费。次日，财政总长则另进行关税公债、盐余库券，反对黎所允之制宪及使领经费。

6月1日　北京银行公会举行临时会议，王克敏主持，请财政当局维持公债整理原案及“九六”公债优先权，反对发行民国十二年公债。

6月17日　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准林云陔辞中央银行行长职，由副行长宋子文代理。

6月21日　北京摄政内阁通过高徐、顺济铁路改订正约案。次日，与日本兴业银行签订高徐、顺济两路垫款合同。

8月7日　广东财政厅长邹鲁以广东土地税收入不多，且民间争夺土地，豪强胥吏因缘为奸，而纠纷甚多，为平息纷争，增加土地收入，报请成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以厘正经界，确定民业，并随附《广东全省经界总局规程草案》。是日经孙中山核准，并令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转饬该厅遵照办理

8月15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增印铜元票向银行抵押借款，到期因财政部无款备赎，此项无准备金的铜元票遂暗中流向市面。是日北京市面发生铜元票挤兑风潮铜元票跌价，至月底始暂告平息。

9月1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向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在京签字，借款总额为一百七十万元，月息一分三厘五，本息以正太铁路全部余利之三分之一为抵。

9月17日　华威银行上海分行开幕。该行为中国、挪威两国商人合组，资本额一千万元，该行总裁刘焕，副总裁曼德，董事长江天铎，行长谭海秋，副行长哈斯伦。

9月20日　北京平市官钱局因借款难成，铜元票无款况现，加之抵押之铜元票到期不赎，多流入市面，挤兑风潮再起。与此同时，中南、边业、劝业、保商、华威、察哈尔兴业六家银行，亦发生挤兑。同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以平市官钱局内容复杂，黑幕重重，呈请北京当局将贪墨官吏一一逮捕，依法惩办，并查封彼等财产抵作铜元券基金。

10月18日　孙中山公布《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该条例规定每年征地价税为：有建筑宅地征千分之十，无建筑宅地征千分之十五，农地征千分之八，旷地征千分之四。教育、慈善机关、寺庙、庵观、福音堂、公共墓地、公立劝业场、公立免费公园免征土地税。

10月22日　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电北京财政整理会，反对美、英、日、法四国公使要求将关余全部作外债担保基金，请该会向政府建议，全力维持内债基金原案。

10月29日　北京政府财政次长贺德霖向驻京法使傅乐猷交涉汇理银行扣放盐余案，贺力争不能因金法郎案拍及善后借款，此系截然两事。法使仍要求财部用金法郎付款，否则，法国只得收回赔款，中法实业银行一案，别无办法，贺答以该案众议院已否决，碍难办理。

11月2日　总税务司安格联休假期满由英回华，受到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欢迎，并与之商议维持内债基金办法，安格联表示对“维持关余担保内债之优先权”问题，“凡系本人所经管之内债以及外债，自当始终维持。

11月10日　财政部训令各省区财政厅，将各银行状况及详情调查明晰，造册送部，同时电告各省区调查各该省积欠岁款，并商询将来汇款办法。

11月15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就美、英、法、日四国公使抗议关余案咨复外交部：一、关余担保偿还各种债务之优先权，应以各债务指定以关余担保之先后为序。二、各项外债，因原定抵押品失效，不能如期付款者，须待将来财政好转再付本息。

12月1日　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联名

电孙中山，请勿将广州开放为自由贸易港，谓此举影响公债基金太大，况整理内债案中之八厘军需公债，系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如令此亦动摇，实有反创共和国者之意，望能保全关税，使商民免遭受损失。

12月4日　财政、外交两部以俄退庚款为基金，发行国库券五百万元，给驻外使领馆为欠薪经费。

12月10日　北京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王克敏报告称：财政紊乱枯竭。积欠内外债已达二十万万元，收入关盐税已无余，可为中央用者仅烟酒印花岁入二、三百万元，除山西省外，各省亦欠债累累，中央亟欲与各省协同统筹计划，谋正本清源之良策。中央政费每月定三百万元。定明年二、三月再开第二次会议。

12月11日　北京国务院就英、法、美、意、日诸因广州当局议定取消海关，改广州为自由贸易口岸，各派军舰集泊海面，并拟派陆战队登岸之事，电令援粤前敌各将领：海关税早充赔款及借款担保，不容任何变更，若外兵登陆，有关领土权，除向公使团质问外，希慎重将事。

文　教

1月8日　教育基金委员会在北京教育部开成立大会，推熊希龄为委员长，蔡元培、孙宝琦为副委员长。教育部设立该会之目的，在使教育经费之筹划扩展及保管等事务，得一专管机关，以热心教育之人担任其事，以免政潮起伏、人事去留而影响及于教育事业。16日又增派张謇、王克敏、李煜瀛、谈荔孙为该会委员。

4月5日　赣省教育会起之当西实施新学制讨论会开幕，14日结束。决议：(一)关于省会各小学，各县小学校决议案。(二)农专、法专、医专改办为江西大学；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改为工业专门学校；第二甲种工业学校改办窑业专门学校，迁往景德镇；体专仍照原案。

4月30日　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报告本年度(1922至1923)全国小学生数为6,601,802人，中等学生数为182,804人，专门以上学生数为34,880人，共计6,819,486人。

5月31日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经教育部呈报批准改组为大学，以严智钟为校长，在大学组织未完备前，即以严智钟为医学专门学校校长。6月3日，北医教职员以彭允彝此举实系借以摧残医校，向府院呈请收回成命，并推代表八人向严智钟提出忠告，劝勿为彭允彝所愚。

6月4日　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议订小学、初中各科纲要及高中课程总纲，并刊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一册。

6月28日　美国全国教育联合发起万国教育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7月6日结束，中华教育改进社派蔡元培、范源濂等八人出席会议。会议议决成立"世界教育联合会"、"改良乡村教育"等案。

7月8日　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改名)在沪开第一次社员会，该社有社员六百多人，均系东西洋留学专门学生及国内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该社刊物有《学艺杂志》，并将发刊《学艺丛书》

8月24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京举行第二次年会，计到会五百余人，决议案一百三十件，是日与会全体人员一致反对使团护路委员会借临城案干涉中国铁路警察及会计权，一面发表宣言并推熊希龄、黄炎培、张伯苓到外交部、交通部分头接洽，另向使团表示上述反对态度。

10月22日　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共到十五省区代表二十二人，推由云龙为大会主席。11月5日闭会，其间开大会十次，通过议案三十一件。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4年

导　言

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黄埔军校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批军事骨干。也为蒋介石的起家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又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在各地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由中央委员负责指导当地党务。大批共产党员成为各地执行部主要负责人。

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协定规定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无条件废除帝俄日期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后，彭湃提出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农民问题为中心，进行革命基础理论和农运理论教育。讲习所名义上是国民党农民部主管，实际上是共产党负责，为促进农民运动作出了贡献。

八月十五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全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政策问题，经孙中山裁决，全会重申了一大通过的决议案。

九月三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皖系督军卢永祥之间为争夺上海引起的战争。卢部战败，卢永祥逃往日本。皖系的最后一股力量也烟消云散。

继江浙战争爆发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也拉开帷幕。吴佩孚率军25万人与张作霖激战山海关与热河。由于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军一溃千里，吴佩孚惨败，乘船南逃。

孙中山没有及时采纳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建议来坚决镇压广州商团，助长了商团的气焰。十月十日，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在广大工农群众支持下，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叛乱。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摄政内阁为各省直系军阀所反对，冯玉祥为防止直系军阀北上，请皖系段祺瑞出山组织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临时执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国国民党"一大"
- 黄埔军校的创办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 平息商团叛乱
- 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
-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
-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
- 江浙战争
- 第二次直奉战争
- 北京政变
- 临时执政府成立

中国国民党"一大"

背景介绍

1923年9月，孙中山聘请苏联共产党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10月，又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共产党员)等九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11月，孙中山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2月初又不断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应以人民的心力作基础。要求国民党党员要以革命事业作为个人的终身事业，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进行改组。孙中山的这些宣传为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制造了舆论。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应把它的三民主义按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重新解释。决议关于三民主义的新论述，对国民党纲领、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及"一大"宣言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6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还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量的领导工作。大会从1月20日到29日，一共开了十天。孙中山在会上作了五次重要演讲。他总结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革命政策的重要性。

他所说的革命政策，就是联合苏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扶助工农群众的三大政策。孙中山还重申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说明他以前讲的三民主义还不够明确、不够彻底，并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因此它便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确定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次大会选举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于方舟、张国焘、韩麟符、沈定一等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大会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建立中央党部和地方各级党部，又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工作，在地方各级党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成了骨干和主要负责人，各地还吸收了大批工、农、学生参加国民党。这样，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材料：

- 鲍罗廷：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的笔记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选)

材料一　鲍罗廷：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的笔记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月二十三日白天，孙中山派一名信差请我到他那儿去。他在代表大会秘书处等我。他的头一个问题是：取消国民党宣言，而用他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将成立的全国性政府拟定的纲领来代替宣言是否好些。右派对这个纲领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反之，他们会欢迎这个纲领，把它当作是摆脱在国民党宣言草案中提出的那些可恶的问题的最好途径。在纲领中宣布，政府准备满足人民

关于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要求。政府准备保卫人民的利益，但在纲领中却只字未提什么是"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一切，为在中国实现这个乌托邦，应当创造何种条件。因此，中国的、海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纲领，那些在海外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现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党会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来他们会被从东南亚撵走。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他们不干脆退出国民党？那样至少可以不搅扰民族解放斗争。不，他们说怎么能退出已经加入了二十年的国民党。这就是不"尊重元老"了。实际上在这种"尊重元老"下面隐藏着某些自私自利的目的。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狡猾的家伙、政治投机者正以国民党的名义作幌子，在侨居海外的华人中间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募集巨款。光在加拿大就有一万华人(主要是工人)支持国民党。事实上这些经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上。国民党的全部进款都落入了那些狡猾的家伙的腰包。暂时还可以去掠夺海外华人，又不冒什么风险，也就是说国民党对帝国主义者暂时没有任何危险(因而后者毫不反对国民党)，这些狡猾的家伙就心满意足了。但从国民党在其行动纲领中明确宣布他将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之日起，海外国民党冒险家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必将告终。

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海外国民党人(不是群众，而是他们的领导人——官僚，以及商人、地主)抓住了宣读过的政府纲领不放。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使孙中山放弃宣言草案并用该纲领代替之。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极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如此等等。他们甚至得以在害怕分裂的左派国民党人中制造混乱。这种混乱状态已经使很重要的一点从宣言中删去了，该点谈到要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等等，这是为了达到表面的统一对右派作出的让步。右派对自己在土地问题上的胜利颇为得意，他们又毫不松懈地"工作"，目的在于废弃国民党的宣言草案。

担心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因奉行旧的和极有害的"尊重元老"的路线，换句话说，与加入党二十年、并在每次集会时都向他的肖像鞠躬的人们友好的路线，他尽力避免摩擦，同意撤销宣言草案，提出政府的纲领。

情况是危急的。取消宣言草案，就意味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是毫无益处的，国民党无谓的漂亮空话依旧统治着党。

自然，我对孙中山向我提出的问题回答说，我认为用纲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他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是从国民革命运动的具体任务出发的，而是从这个运动一百年后的远景出发的。我对孙中山说，纲领需要完成，它应当公布，但无论如何它不应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混淆起来，因为在宣言中第一次多多少少明确地谈到了党的直接任务，以及党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原则。我认为，如果说政府纲领本身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那它自然也不会有害处。但是，如果国民党宣言被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那么它就将成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乌托邦的政府纲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因此，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的和决定性的文件……

在谈话中我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也是我们谈话的议题，这件事促使孙中山作出这个决定。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些报纸上刊载了孙中山与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后者同孙中山谈了三个小时，而他所公布的只是有利于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部分，其余均密而不宣。孙中山向舒尔曼表示，即使他不得不同列强各国作战，他也将用武力取得关税。舒尔曼答应对于友好地解决向广州政府转交关余的问题提供帮助，只要将关余用于改善内河航行和改善航道，而不是用于军事需要。孙中山表示赞同，但他责备了舒尔曼乃至列强诸国对待中国的不公正态度。孙中山说："列强拒绝承认按权力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我及我的政府进行斗争，同时，他们不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以自己的干涉裁减督军的军队，反而支持督军"。他对舒尔曼说，如果所有督军都裁减军队，只保留维持秩序的警察，在这种条件下他准备参加讨论现状的华盛顿圆桌会议。舒尔曼大使只公布了全部谈话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孙中山为了裁减督军的军队，赞同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

孙中山问："您认为以我的名义发表声明会给人什么印象？应当做些什么来補救现状？"

对此我回答说，如果现在他沉默，那就意味着承认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干涉等项的声明，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原谅他的这一声明。即使把干涉理解为由中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来裁减督军的军队，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而如果声明是断章取义的、歪曲了他同舒尔曼谈话的意思——我相信声明是这样的——那就应当立即辟谣。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可以成为辟谣的一种形式，在演说中可以明白清楚地阐述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作斗争的问题，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专有权作斗争的问题，关于废除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在这种场合，孙中山有极好的机会消除关于他同外国人妥协和拥护外国对中国进行干涉的一切臆测。这样的演说将在全世界发

表，到那时美国大使舒尔曼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企图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我对孙中山说，目前您要拿定主意，是在被压迫的中国和其他被压迫国家同帝国主义世界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呢，还是为争取正义者的权利而斗争。假如我不是在现在同您谈话，而是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胜利之前交谈，那么您可能把为被压迫国家的权利进行的斗争想象为是沦落在海外某地、只是幻想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幻想家小团体进行的斗争。目前所谈的是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一亿五千万苏联人在支持您，现在沦为半殖民地的德国的人民在支持您，刚刚获得独立、但在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余各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毫无使自己免受毁灭的保障的土耳其在支持您。伊朗、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各国的人民都会感到您是为被压迫民族的事业斗争的战士。一句话，您当前要做出决定：您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呢，还是依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其他类似美国的国家的代表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

孙中山点着头，还作着其他赞同的表示。我们谈话结束后，他和我握了握手，走下楼去，回到主席座位上。他代表委员会关于国民党宣言的报告作得极好，并成功地主持了热烈的讨论。全国代表大会赞同宣言草案。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表示赞成。

（选自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4页）

材料二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选）

二　国民党之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之贯彻。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了然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残羹，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智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于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民权主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

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民生主义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尤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中国为农业的国家，故军队多由农民征集补充而成，乃不为民利捍卫，又不助人民抵抗帝国主义，而反为帝国主义所操纵之军阀，以戕贼人民之利益；国民党于此，认为有史以来莫大之矛盾。其所以然之故，在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穷苦，不得已而受佣于军阀，以图几微之生存。其结果，乃至更增贫困，加人民以压迫，使流为土匪而不顾。欲除此种矛盾，使军队中农民真实之利益与其现在所争之利益无相妨之弊，国民党将于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中极力宣传运动，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凡助国民党奋斗以驱除民贼、建设自卫的革命政府之革命军，国民对之当有特殊待遇。每革命军人于革命完全成功之后，愿意归农，革命政府行将给以广田，俾能自给而赡家族。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孙中山全集》第9卷）

黄埔军校的创办

背景介绍

国民党改组之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就把建立黄埔军校，创建革命武装作为巩固广东、完成北伐的第一件大事。孙中山当时曾经痛切地说：中国革命所以遇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人民的基础，现在无论哪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克扣军饷，剥削人民，贪图私利，贻害苍生，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现。我做了骄兵悍将的傀儡，成为人民的罪人。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为得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主旨，也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

黄埔军校于1924年1月开始筹备，5月第一期新生入校。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担任军校的各种负责工作，并从各地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军校学习列宁创建红

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教育内容方面采取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并重的方针。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原理等。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在建设革命军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周恩来于1924年秋代替国民党右派分子邵元冲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更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黄埔军校的创办，为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工作人才，为建立国民革命军提供了干部力量。它对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并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材料：

- 黄埔军校创建始末
- 黄埔军校紧张的学习和战斗生活
- 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

材料一　黄埔军校创建始末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现代第一所革命的军政学校，因校址设于广州黄埔，故通称"黄埔军校"。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又再次向苏联表达了要"以俄为师"的愿望。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帮助下，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秘密会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会谈中，马林不但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且对中国革命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建立军官学校的三点建议，孙中山欣然接受。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学习创办军校的经验。10月某委派廖仲凯和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加快了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校的步伐。不久，又在国民党中央通过了组织军官学校的决议。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下令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同时指定以广州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2月6日，又在广州南堤2号设立了军校筹备处，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军校任职，中共中央为此还发出了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指示各地的党组织积极开展招生工作，选送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

苏联派鲍罗廷来华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领导军校的筹建，而且还派来加伦将军等10多位军事顾问，担任学校的军事和政治教育工作。此外，苏联还向军校提供了约200万卢布的办学经费以及若干枪枝弹药和教学设备。在筹建过程中，蒋介石曾借故辞职，擅自返回上海并企图解散筹委会，使筹建工作一时受到影响。由于廖仲恺和叶剑英、邓演达等人的坚决反对，以及依靠国共两党同志的紧密合作，才使筹建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1924年3月2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余名考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为期3天的入学考试，经过严格挑选，录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5月5日，黄埔军校开学，正取生和备取生编成4个队入校学习，成为第一期学员。孙中山亲任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6月16日，来自全国的教官和学生，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人共500余人在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主持，并致开学词，正式宣告黄埔军校成立。

（作者欧国锟　选自《党史博采》94年1期）

材料二　黄埔军校紧张的学习和战斗生活

五月初，我们就踏上了四面环水的黄埔岛，开始了军校生活。

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岛上，先巡视了学堂和宿舍，又进大礼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的讲话精辟有力，通俗易懂，富有革命精神。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相反，俄国的十月革命比中国革命晚六年，却大告成功。原因是俄国"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他明确指出："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以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他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孙中山讲话中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

孙中山先生这篇开学演说，中心内容是讲建立革命军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是篇很好的讲话，当时对大家有很大的鼓舞，今天读起来仍感十分亲切。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四百七十人，开始是四个队，我在第一队。以后湖南讲武堂并来，又编了第五、六队。我们一个队一百四十多人，分为九个班。同学中各省的人都有。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国民党员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一些同志都把这件事当笑话说。

黄埔军校初期的组织，是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后为汪精卫）为国民党党代表。军校在校部下设教授部、政治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政治部主任开始是戴季陶，此人初次演讲就贩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一套，因而学生哄他，不久便下了台。嗣后政治部主任换成了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后聂荣臻同志也到政治部任秘书，主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军事总教官何应钦，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同志。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都任过军校的教官。

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排得满满的。

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等。《三民主义》一书，系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初所著，已不同于过去的旧三民主义，而是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被列为政治教育的首要课程。军校训令中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均可阅读。这类书籍，在书亭上摆着，可以随便买。校刊《黄埔潮》、《黄埔月刊》上的文章，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肖楚女就经常发表文章，文笔流畅、犀利，很吸引人。这些课程和书刊，使我对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苏联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过，那时我还分不清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

黄埔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教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少数；二是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多数。有时，苏联顾问也给学生讲课和示范。

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紧张。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三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十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我们吸烟的人只得偷着吸。一个学生发十个毫子，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这点钱都花不完。

（选自《历史的回顾》作者：徐向前）

材料三　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

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共开办六期，招收学生12000余人；其中一至五期毕业生共7300余人。经长期战争的锻炼，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的骨干力量。

人民解放军方面重要将领主要有：

在1955年授予的10位元帅中，黄埔军校出身的5位：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陈毅（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该校中共党委书记）、林彪（黄埔四期）、徐向前（黄埔一期）和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0位大将中，黄埔军校出身的3位：许光达（五期）、陈赓（一期）和罗瑞卿（武汉分校）。57位上将中，黄埔出身的8位：杨至成（五期）、宋时轮（五期）、张宗逊（五期）、陈伯钧（武汉分校）、陈明仁（一期）、陈奇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周士第（一期）和郭天民（六期）。177位中将中，黄埔出身的9位：王诤（六期）、倪志亮（四期）、郭化若（四期）、唐天际（四期）、常乾坤（三期）、阎揆要（一期）、彭明治（一期）、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和谭希林（五期）。还有8位黄埔出身的少将：周文在（六期）、方之中（四期）、洪水（四期）、张开荆（六期）、李逸民（四期）、袁也烈（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指导员）、曹广化（四期）和廖运周（五期）。

国民党军方面主要有：

特级上将一人：蒋介石（黄埔军校校长）。

一级上将：李济深（黄埔军校副校长）、何应钦（黄埔军校教育长）、李宗仁（南宁分校总负责人）、顾祝同（黄埔军校管理主任）、唐生智（长沙分校总负责人）、陈诚（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周至柔（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王权铭（黄埔一期）、桂永清（一期）、黄杰（一期）、刘安祺（三期）、刘玉章（四期）、胡琏（四期）、高魁元（四期）、彭孟缉（五期）。

二级上将：刘峙（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蒋鼎文（黄埔军校学生队区队长）、俞飞鹏（黄埔军校经理部主任）、陈大庆（一期）、胡宗南（一期）、袁守谦（一期）、袁朴（一期）、罗奇（一期）、郑介民（二期）、石觉（三期）、罗列（四期）、唐守治（五期）。

追赠上将：刘戡（一期）、甘丽初（一期）、张镇（一期）、邱清泉（二期）、熊受春（三期）、毛人凤（潮州分校一期）、胡长青（四期）。

中将加上将衔：张治中（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队长）、钱大钧（黄埔军校军事教官）。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背景介绍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促进农民运动发展，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1924年7月开始举办的。它的领导和主要教学工作都由共产党人负责，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等都先后担任进讲习所主任，彭湃还是第一、第五两届的所长。从第一届到1925年底的第五届，主要是培训广东农运干部(第一、第二两届全部是广东学员，第三届有2名广西学员，第四、第五届曾招收有湖南、湖北、福建、广西等省的部分学员)，先后共毕业478人，其中三分之一被选派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特派员，三分之二分送回原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作。他们中很多人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对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3月毛泽东接受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职务。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共吸收了来自20个省的327名学员。讲习所于5月3日开学，学习的课程包括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许多教员也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员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担任，如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

材料：

-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小记
- 第一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统计

材料一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小记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农运特派员、成立广东省农会等七项内容，正式提出了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张。农讲所组织章程规定学员的入学条件是：“年龄在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经本党(注：即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介绍，或由各地农民协会之负责介绍与保证”，“考试合格者取录”。教学内容包括：本党主义；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及实施方略；注重实习宣传训练。纪律是：“一切行动，均以军事训练方法管理”，所内“一切规(章)、(条)例及命令，均须绝对服从遵守”，以“习惯团体生活，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活动干员”。训练的目标是：“本所为训练革命人才机关，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1924年7月3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这是大革命时期开办的第一个农讲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6届，第一至五届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叫“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4月，在武昌开办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两个农讲所是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它一些省也先后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如在广西，韦拔群创办了广西东兰农运讲习所；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办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湖南，徐特立、何叔衡在湖南农村师范和湘江中学开设了农运讲习所和农运训练班；茶陵、醴陵、宁乡、湘潭、衡阳等10多个县，均建立了农讲所或训练班。在广东，还开办有广东农民协会农民训练所及农民自卫军训练班、雷州农讲所、北江农军学校等。在福建，上杭、漳州成立了汀属八县农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和工农运动讲习班。在湖北，开办有湖北农民自卫军养成所；在汉川、应山等地有农运训练班，等等。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如广州第一至六届农讲所先后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担任主任、所长；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农讲所教员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各地农讲所或农训班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共产党人在各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农讲所教育有以下特点：进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教育，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民武装教育，并进行军事训练，使学员毕业后能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成为农民武装自卫的领导者；组织学员到农民运动和农民自卫军搞得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对农民问题和农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增强学员从事农民运动和搞好农民自卫军建设的决心和力量。

农讲所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是促进全国农运发展的大本营。仅广州第一至六届农讲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培养了1600多学员，加上其他省区的农讲所或农训班，毕业学员数量则更大。他们毕业后，以国民党中央、省或县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奔赴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对组织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农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种子。

(选自《七十年史话》)

材料二　第一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统计

	时间	主办人	招生人数	毕业人数
第一届	1924.7.3—8.21	彭　湃	38(女2人)	33
第二届	1924.8.21—10.31	罗绮园	225(女13人)	142
第三届	1925.1.1—4.3	阮啸仙	128	114
第四届	1925.5.17—9.1	谭植棠	98	75
第五届	1925.9.14—12.8	彭　湃	116	114
第六届	1926.5.3—9.11	毛泽东	327	318

资料来源：中国革命博物馆。

平息商团叛乱

背景介绍

1924年夏秋间，广州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商团是广州商会建立的维护买办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组织，在广州有1.2万人，在全省有近5万人。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伙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倚仗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在7、8月间积极策划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8月初，陈廉伯从香港私运大批武器到广州。广州革命政府扣留这批武器，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煽动商人罢市对抗。孙中山开始曾想采取妥协办法使事件平息，反动势力的气焰却更加嚣张。10月10日，在广州市各界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三、四万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商团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多人，打伤100多人。商团还威迫商人罢市，要求孙中山下台。这时，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者指使下派兵进攻广州，英国军舰也开到广州附近的白鹅潭，为商团助威。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的反革命叛乱，给予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材料：

- 廖仲恺在平息商团叛乱中
- 陈廉伯与广州商团叛乱
- 平定商团叛乱的前前后后

材料一　廖仲恺在平息商团叛乱中

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工农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廖仲恺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工作更加勤恳了。大好的革命形势，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廖仲恺针锋相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8月10日凌晨，当廖仲恺正在酣睡之际，"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接过电话，知道是共产党人谭平山打来的。谭平山在电话中说，反动商团向英国购买的一批枪械，已用挪威商船"哈佛号"运到天字码头。廖仲恺意识到，如果这批武器落入商团之手，将严重威胁着广东革命政府的安全。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打电话请示孙中山，经孙中山同意后，他向蒋介石转达了孙中山的命令："由黄埔军校派军舰将'哈佛号'轮扣留！"蒋介石接到命令，立即派出一艘军舰从黄埔港快速向珠江开进。到了天字码头，军舰靠近商船，黄埔学生军迅速登上那只挂有丹麦国旗的商船舷梯。共缴得七九步枪、驳壳枪、手枪9800余支，各式子弹430余万发。

就在这一天，为说明扣械理由，廖仲恺以广东省省长身份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隔了一天，他又发表《第二次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指出私运枪械的实

质："私贩军火，罪等谋乱"，劝告商民"万勿受人煽惑，自由纷扰"。

广州商团的头子陈廉伯，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他自恃有英国主子的支持，丧心病狂地策划从内部来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他原定8月14日发动武装暴乱，但10日的扣械，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并不从此善罢甘休，而是继续扩大事态。

8月12日，大元帅府门口，2000多名商团军闹闹嚷嚷。这是陈廉伯策划的"请愿"。"坚决要求发还枪械"的旗子东倒西歪。"工人有工团军，农民有农团军，我们商人为什么就不能有商团军"的责骂声不绝于耳。他们并以"罢市"相要挟，形势极其严峻。

13日，商团军不顾政府的反对，悍然宣布正式成立联防总部。同时以索取枪弹为名，出动团丁，进行捣乱。廖仲恺为维持治安，立即令黄埔军校派出第三队、第四队学生军开进市内。接着，商团总机关移设佛山，由佛山大地主、商团副团长陈恭受主持，陈廉伯携家眷逃至香港，遥控指挥。

在这关键时刻，廖仲恺毫不妥协，他于21日复电旅沪粤商，指出"陈廉伯谋为不轨，业查有确据。政府为维持治安计，在所必惩"。但反动商团不听劝戒，22日，佛山首先罢市，而且迅速蔓延到广东许多市镇。陈恭受自任攻城总司令，并以"公夫公妻主义"、"共产"等谰言诬诋政府，宣称必定推倒现政府，改由陈廉伯任省长。

针对商团的反动气焰，次日，廖仲恺以广东省长名义，发出通缉陈廉伯、陈恭受的命令。并立即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桂、湘军进驻广州，加以防范。

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短兵相接的战斗，迫在眉睫。廖仲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主张对商团的反革命活动给予坚决回击。这时，英帝国主义也从幕后跳到前台，派出9艘军舰开进白鹅潭，将大炮指向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扬言"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吓破了军阀和右派分子的胆，他们以"调停"为名，演出了一幕闹剧。

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滇系军阀范石生、廖行超等人，擅自和商团代表邓介石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并发还枪械。陈廉伯等人则在香港等处利用报刊攻击廖仲恺，说他已经参加共产党，企图赤化广东，进而赤化全中国。国民党内许多右派人物也跟着附和，他们并极力包围孙中山，对孙中山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抗议，29日，廖仲恺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去广东省省长职务的呈文。

这天，廖仲恺回到家时，夜已经很深了。他到了客厅时，看见何香凝正坐在那里发呆。"怎么还没睡？"廖仲恺关切地问。何香凝这才站起来，接过他的公文包，回答说："睡不着啊！想等你回来问问情况。"廖仲恺悲愤地说："那些主张发还商团枪械的人胜利了。""呵！怎么会这样？"何香凝瞪着惊奇的眼睛。廖仲恺向沙发上一靠，不无感慨地："我革命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才知道，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革命是多么困难啊！"何香凝深情地望着丈夫，劝慰道："难是难，可不能灰心啊！"廖仲恺双眉紧锁，心绪万千，他突然说："香凝，我已向孙先生辞省长职了！""这话当真？"何香凝理解丈夫的心境，但万万没想到压力会这么大。廖仲恺忿忿地说："不辞职，就只能屈从于胡汉民他们搞的所谓多数，再用我的名义去欺骗人。我辞去省长，让胡汉民重任省长！"何香凝愤然站起，忧心忡忡地说："他当省长，会向商团妥协的。""那当然。可你知道，那伙人天天包围孙先生，他的压力也不小啊！"廖仲恺这话似向夫人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谈了很久，直到破晓才就寝，可是谁也睡不着。

孙中山接受了廖仲恺的请求，于9月12日，免其省长职，改由胡汉民接任。胡汉民就任省长后，于9月20日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同时决定以商团报效50万元给政府为条件，发还部分枪械。商团在英国的支持下，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书写"打倒孙中山、廖仲恺"、"请孙文下野"的传单到处散发。10月4日，广东全省188个县镇商团代表在佛山集会，议决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10月9日，李福林等人又将枪械4000余支发还给商团，商团总部却发出全省总罢市的最后通谍。次日，商团竟然枪杀广州纪念"双十节"游行的工农大众，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

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发生后，廖仲恺马上将严重情况电告在韶关的孙中山，请孙中山回师戡乱。11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等6人组成革命委员会。14日，又令廖仲恺为秘书，全力扑灭商团叛乱。同日，在廖仲恺等人的指挥下，黄埔学生军与滇、湘、粤、豫各军兵分五路，对商团占据的广州市西关实施包围。15日，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于平定了商团叛乱。

（选自《纵横》92年1期，作者蒙光励，有删节）

材料二　陈廉伯与广州商团叛乱

广州商团叛乱，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等策划的一起反革命叛乱。

陈廉伯，广东南海县西樵简村人，祖父陈启沅，南洋归侨。父陈蒲轩，于广州西关设昌栈丝庄，经营丝业致富。陈廉伯于清末在香港读书，毕业于香港英政府开办的皇仁书院。毕业后回广州，继承祖业，为广州昌栈丝庄司理。不久，又当上了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

陈廉伯充任英商买办后，以洋商为背景，以昌栈丝庄为基地，借祖父陈启沅余荫，积极向广州商界活动。由于

他善于投机钻营，拉拢广州商界要人，操纵商场，牟取暴利，很快成为省内有名富商。

清末民初，时局动乱，散兵土匪到处骚扰抢劫，广州社会治安不靖。商人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要求组织商人武装以自卫，广州商团于一九一二年正式成立。

商团成立之初，只许资本家、店老板、少老板及主要店员司理、掌柜等参加，共有四十人。每周集中操练（资本家常派工友顶替），参加者备价购领枪支，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警察站岗，维持市面秩序，纯系商人自卫性组织。陈廉伯最初被推为商团理财科主任，管理商团财务。为了攫取商团权位，他苦心经营商团，主动垫支数万元办理团务，博得商人拥护，一九一九年被选为商团团长，从此掌握商团实权。

一九二一年，广州商团扩充到四百余人，市内设总团，下设十个分团。同时广州市附近的佛山、江门、顺德、九江、肇庆等地亦设有商团，并与广州商团互相通气，虽然也是维持社会治安，俨然是一地方武装，到一九二三年已发展到三千余人。

一九二四年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广东成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对此十分畏惧和仇视，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英帝国主义首先起来反对革命政府，它一方面支持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准备从外部向广州进攻；另方面则利用市内买办阶级，嗾使陈廉伯运动商团企图从内部颠覆广东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分子煽动陈廉伯说："如果你能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已经入了英国籍的买办陈廉伯，有主子的支持，野心勃勃，从一九二四年五月开始，便以商人自卫为号召，积极扩建商团武装，准备发动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权，建立"商人政府"。五月二十七日，他召集各县镇商团代表三百余人来广州开会，筹建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一连数十天，通过议案多项，主要是：(1)购置武装巡舰案；(2)筹设商团军制弹厂案；(3)组织商团军学校或讲习所案；(4)筹组商团公立银行案及商团联防总部下设军事参议及联络各属分团案等。会议决定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推陈廉伯为总长，阴谋反对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陈廉伯向英商购买大批枪械后，事先托粤汉路总理许崇灏（许崇智兄，商团分子），向政府请求发给购枪护照，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于八月四日发出护照交陈廉伯。护照注明要在四十日以后生效，可是八月八日（领照后四天），即有悬挂挪威旗的丹麦船"哈佛号"满载军火入口，十日，孙中山下令黄埔军校扣留全部枪械。经查验，计有"七九"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支，子弹二百十五万发，驳壳枪四千三百三十支，子弹二百零六万发，手枪六百六十支，子弹十六万五千发，价值百余万元。枪支数目大大超过护照上规定的数目，广东政府决定没收。十一日，孙中山手谕大本营军政部吊销该项军火入口护照。同时下令禁止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

陈廉伯原定八月十三日就商团军联防总部总长职，此时闻风一面宣布辞职，伪称赴港，一面指使其爪牙煽动商民反对政府。十三日，商团不顾政府警告，举行"庆祝"联防总部成立活动。十四日，商团代表千余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无条件发还被扣枪械，否则罢市。孙中山接见了代表，指出这批枪械无论枪支数目及运到日期均与护照不符，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应待查明处理。同时指出政府正在调查陈廉伯策划颠覆政府的阴谋，劝代表转告商人，勿为陈廉伯所愚弄。

可是陈廉伯目无政府，于十八日又煽动银钱业罢市，拒收政府中央银行纸币。二十日，孙中山令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布告指出：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八月十四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避港，煽惑罢市，奉帅令予以通缉。通缉令中还指出：此系陈廉伯个人谋叛，与商团无涉，不得稍有株累，借示宽大。随后又下令通缉另一商团首领佛山大地主陈恭受。

八月二十一日，商团总部迁往佛山，由陈恭受主持。陈恭受召集各埠商团在佛山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同时罢市。二十二日，佛山首先罢市。二十三日，陈恭受向孙中山提出三项要求：(1)扣械全部无条件发还；(2)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3)取消革命政府对陈廉伯的通缉令。二十五日，在陈廉伯及其党羽的煽动下，广州罢市。到此，全省罢市达百余埠。广州商人罢市后，各大商号悬挂英、法国旗，商团军还散发反革命传单，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

这时英帝国主义也公开出面支持商团叛乱。八月二十八日，英舰九艘集中白鹅谭，并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当晚领士团向省长廖仲恺提出"警告"。二十九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再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公然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面对商团公开反抗政府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主张对反革命商团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并指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应该是：第一步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是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

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广州的工农群众纷纷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商团。八月二十四日，广州两万工人集会声讨陈廉伯、陈恭受，反对罢市，表示誓作政府后盾。二十九日，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八百余人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明令讨伐商团。当商团威逼商人罢市，企图以饿死市民威胁政府屈服时，广州市劳动人民立即推举代表

会集于省长公署，组织管理粮食的平崇委员会，准备接管粮食及其它生活必需品，以对付商团罢市威胁。

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也表示必须解除商团武装。

在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和影响下，孙中山决定对商团的反革命行动采取镇压政策。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调兵入省宣布广州戒严，以对付商团叛乱活动。二十六日，在大本营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上，孙中山主张以武力解决商团反革命活动，强制商人开市。同一天，又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责成商店复业，否则将没收枪械并予严办。当八月二十九日英驻粤领事对广州政府进行恫吓时，孙中山立即于九月一日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严厉指责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并提出："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但是，广东革命政府中的汪精卫、伍朝枢、许崇智、胡汉民等反对孙中山武力解决商团的主张，认为应"和平解决"。驻在广州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二师师长廖行超等早与商团相勾结，此时竟以第三者的姿态奔走于商团与大元帅府之间，进行所谓调停，谋求妥协，并于八月二十九日与商团订立了六项条件：(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府，服从政府，政府即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2)商团枪械由范石生、廖行超担保照军政部护照规定数目发还；(3)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受省长节制，其细则须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处，由范石生、廖行超调解，要求立案；(4)各商店一律于二十九日复业，军队于复业后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调省军队，一律开回原防；(5)商团报效军费五十万元，于领械时交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石生、廖行超担保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商团和范石生等还以"宣布独立"和调兵入省要挟孙中山接受上述条件。

根据条件，反革命陈廉伯、陈恭受只须发一纸拥护政府通电，即可恢复自由；反动商团联防总部准予成立；商团只要交纳五十万元，被扣军械即可发还。这是完全符合商团利益的条件。商团的要求达到了目的，条件签订后，商店开始复业，等待政府发还枪械。

同一天，廖仲恺则因严办商团主张受阻挠，向孙中山面辞广东省长职。

孙中山此时感到面前困难重重，他认为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干涉内政，陈炯明在东江伺机反扑，客军蛮横，必须立即离开广州，"另谋生路"。九月三日江浙战争爆发后，他决定北伐，认为"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于是四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迁大本营于韶关，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五日，发表《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不数日亲往韶关，督师北伐。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广东的反革命气焰日益高涨。九月十五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不承认勾结英帝国主义，图谋不轨，也没有表示悔过，因此扣械未发还。商团借机攻击政府，散发反动传单，并酝酿第二次总罢市。九月下旬，广州买办商人，豪绅地主在陈廉伯的指使下，纷纷集会，攻击革命政府，并致电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

对商团的反革命行径，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完全采取妥协态度，九月二十日，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十月三日，又决定发还部分枪械。

商团见政府一再妥协，软弱可欺，十月四日又于佛山召开全省一百八十八县商团代表大会，决定于十月十日"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双十节"前，广州盛传商团要发动武装叛乱，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反动武装准备从石龙、东莞袭击虎门与商团会师，局势日益紧张，九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

孙中山忙于北伐，九日晚，遂令蒋介石依照胡汉民转呈广州市长兼全省民团督办李福林所拟妥协办法发还商团枪械五千支，条件是商团交二十万元捐税，并通电解释误会，表明自卫心迹。十日，胡汉民、李福林等于清晨派人赴黄埔将枪械四千支运回广州，发还商团。商团见政府继续让步，认为叛乱的时机已经成熟，陈廉伯等鼓动商团在"双十节"收回枪支时叛乱，并于事先招收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准备对政府进行武装示威。十日，广州市商店在商团号令下罢市。

鉴于商团如此猖狂，为了打击反革命气焰，十日下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民族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农民自卫军、工团军等三十个团体，约万余人于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会议决定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警告一切反革命派，复活辛亥革命精神，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动派"、"实行国民革命"、"追悼革命先烈"、"复活辛亥革命精神"、"中国民族独立万岁"等口号，到会群众愤怒声讨商团和帝国主义反革命罪行，强烈要求打击反革命商团。三点钟会议结束，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当队伍行到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开枪向徒手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受伤者百人以上。反革命商团惨无人道，竟把打死的人剖胸割势，沿街示众。惨案发生后，十二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驱逐孙文"等反动标语。这时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

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州地方委员会发表告广州市

民书，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坚决打击反革命派以保卫革命。参加游行的团体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大家“速起与反革命派决此最后死战”。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出通电，“誓为政府后盾”，坚决消灭商团军。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及黄埔军校的学生，纷纷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政府镇压商团叛乱，随时准备对商团军作战。孙中山见到时局严重，又有广大群众作坚强的后盾，迅速改变了犹豫妥协态度，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十月十日，他在韶关大本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翌日，特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为全权委员处理商团问题。同时电饬胡汉民及各军司令，指出对商团叛乱不得“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切勿犹豫，以招自杀。”十三日，商团又在沙面秘密集会，阴谋扩大叛乱。这时孙中山随一面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一面令韶关警卫军及北伐军一部星夜赶回广州讨伐叛乱。

十月十四日，北伐军先后抵广州，政府下令各军立即武力解散商团军。商团军在陈廉伯的指使下，集中全市商团军枪支，占据广州西关进行顽抗。他们架设天桥，修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街道，把广州分割为城内和西关两部分，以武力控制西关，从十四日晚到十五日晨向政府军开枪扫射。十五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与桂、湘、豫、粤等各军分五路包围西关，勒令商团军缴械。商团军名义上是由各商店资本家、老板组成，实际上广州市一万余户商店参加者不过三千户。参加而不同事的尤属多数，真正实干的不过五百人，其余几千人均为陈廉伯招募的，其中很多是土匪和退伍军人，由陈炯明派军官教练。北伐军回广州后，许多被迫罢市的商店即开市，商人充当商团军的也多偷偷换装逃跑，只有被雇的几千人在顽抗。当政府军向其发起总攻时，商团军不堪一击，激战几小时即纷纷溃败，缴械投降，政府军完全占领西关地区，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

十六日，政府发出安民布告，从十七日起，全市商店一律开业。至此由英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相勾结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一场叛乱彻底被粉碎。

（选自《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作者：石雅负）

材料三　平定商团叛乱的前前后后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其前身是广州商人的自卫组织。它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兼资本家陈恭受。自1919年陈廉伯继任广州商团团长后，商团迅速扩展成为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集团。这个反动武装集团依仗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支持，与北洋军阀政府及陈炯明等相勾结，其势力由广州市发展到南海、江门、佛山、花县等地。广州商团军共有10个团4000多人，装备齐全，他们利用沙面租界作为反革命根据地，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权，建立所谓商人政府。对广州革命政府形成严重威胁。1924年8月上旬，广州商团从香港订购的9800多支长短枪和337万多发子弹，由挪威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孙中山得悉后立即下令扣留枪械，并下令通缉陈廉伯和陈恭受。成为广州商团叛乱的导火线。8月12日，陈廉伯煽动全市商店酝酿总罢市，要挟释放“哈佛”号并发还枪械。14日，商团还组织约1000人的“请愿团”闯入大本营。孙中山调兵入省，宣布广州戒严，准备武力镇压商团。当时驻广州的滇军第2军军长范石生、第2师师长廖行超，反对武装镇压，主张调停，以便从中渔利。孙中山一面将扣留的部分枪械发还给商团，一面向商团发出不得叛乱的警告。但是，商团对此置若罔闻，于8月23日提出无理要求：(1)政府扣留的枪械，无条件全部发还；(2)准商团成立统一的联防总部，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在上述要求被孙中山拒绝后，8月25日，在商团的煽动下，广东全省有100多处罢市。商团还到处散发张贴反动宣传品，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决定将扣留的一部分枪械发给黄埔军校。英帝国主义公然出面干涉。28日，有9艘英舰驶入白鹅潭，炮口对准孙中山大元帅府。29日，英国驻粤总领事向孙中山发出通牒，宣称“如遇中国当局向城市开火，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8月29日，范石生、廖行超与商团签订所谓调停条件，企图胁迫孙中山接受商团条件。这一行径受到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反对，他们表示支持革命政府，要求明令讨伐商团。8月3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谴责范、廖“阳拥政府，阴护商团”的行径，声明绝对否认调停条件。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随后，孙中山将大本营由广州移往韶关，并于18日发表北伐宣言。商团趁孙中山离广州督师北上之际，酝酿第二次罢市。此时，留守广州的国民政府代行大元帅、广东省长胡汉民等，力主与商团妥协。9月20日，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并发还其被封财产和被扣枪械。孙中山也开始下令发还商团枪械4000支。

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张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提出革命军事计划：第一步解散商团军，第二步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能是北伐。孙中山、廖仲恺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决心镇压商团叛乱。10月10日，广东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庆祝双十节，声讨商团反革命行径。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军悍然开枪屠杀游行群众，打死打伤工团军和学生数十人。商团还封锁了市区，到处张贴侮辱攻击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的标语传单，用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准备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在这紧急关头，中国

共产党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商团叛乱。10月10日，成立了镇压商团的指挥机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委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13日，孙中山命在韶关的警卫军和一部分北伐军星夜回师广州平定叛乱。14日，孙中山下达平定商团手令："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同一天，孙中山还下令解散广州商团，并命令胡汉民限于24小时内解除商团武装。中国共产党发动黄埔军校学生军、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以及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军队平定商团叛乱。共产党员周恩来、陈延年、谭平山、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在领导革命群众平定叛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0月14日，商团军首先向政府军发动进攻。15日，政府军和黄埔学生军分5路向商团军发起总攻击，双方交战几个小时，政府军击败广州关西区的商团军，随后又解决了佛山商团，摧毁了广东的主要商团基地。革命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等9人，商团军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商团叛乱终告平定。

平定商团叛乱是国共合作后广东地区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尖锐斗争的第一幕。它充分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广东反动势力，使广东革命政权转危为安，并得到初步巩固，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选自《历史大观园》）

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

背景介绍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1924年1月3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于广州偏于南部，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等地设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以执行中央任务。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统辖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的党务，是除了广州中央党部之外，全国最大的核心组织。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后补执行委员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等都驻在上海执行部。中央监委和后补监委张继、吴稚晖、谢持等负责监督执行部的工作。上海执行部又选出了各部部长、秘书，组成常委。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桢；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各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秘书，其中很多干事是共产党人。上海执行部以《民国日报》为宣传阵地，"一大"后连续发表有关文件，介绍三民主义、五权（立法、行法、行政、弹劾、考试）宪法。1925年后又有力地声援了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惨案发生，上海执行部派青年委员到各大中学校，与国民党组织联系，动员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并向工商学联合会供款7千元，还组织了"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这年12月14日，上海执行部被"西山会议派"所接管，成为他们的"中央党部"。

材料：

- 决议案
- 各地执行部成员

材料一　决议案

1. 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组织问题案

民国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设下列各机关：一、秘书处；二、组织部；三、宣传部；四、工人部；五、农民部；六、青年部；七、妇女部；八、调查部；九、军事部。

说明：

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应设一秘书处及八部。上海、北京、汉口三处执行部不设军事部，关于军人军事事项，应由调查部秘密处理之。其余四川、哈尔滨两地，应分设各部，俟中央执行委员到该地体察情形后，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2. 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

民国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1. 监察委员拟定驻地如下：

甲、驻粤监察委员（名略）。

乙、驻沪监察委员（名略）。

丙、驻京监察委员（名略）。

2. 监察委员会设在广州，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

3. 监察委员专监察各地党部及党人行动调查事，开列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各地执行部。有地方执行部不能解决者，必须提交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4. 上级机关监察委员，对于下级机关有发出训令之权。

5. 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

3. 党部常务会定期案

民国十三年二月一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1. 常务委员会议定每日开会一次，时间上午十时至十一时。

2. 中央委员会会议每星期开会两次，时间为星期三、星期六下午七时至十时，地址星期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星期六在大本营。

4. 对外问题态度案

民国十三年二月一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甲、收回租界问题；

乙、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

丙、自管关税问题；

丁、庚子赔款问题。

理由：

本党宣言中对于以上四个问题已有明白表示，各地党部应该如何宣传及运动，亟须预备进行方法，并应如何整齐各地党员之行动。

决议：

(一)先搜集以上四个问题之沿革及现在中国所受之影响，编成各种出版物，向全国人民宣传；使之了解本党宣言所以规定四个问题之原因，并本党在国民革命中所负之责任；且使人民知道欲解决以上四个问题之困难，必要国民党成功方有希望。

(二)组织对外委员会担任(一)项责任，同时推定邹鲁、于树德、廖仲恺三同志为对外委员会委员。

(三)对外委员会用对外委员会名义聘请专门家为对外委员会委员，共同组织对外委员会。

(四)关于以上四个问题之出版，限一个月内编成。

5. 对广东政治财政统一问题案

民国十三年二月一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理由：

广东为最高党部所在地，与全国革命有极大关系，广东政治、财政未能统一，亟应设法统一，使吾党地趋于巩固，方能全力以策全国革命之进行。

决议：

以中央党部名义建议于本党总理。

材料二　各地执行部成员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由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前往组织，并规定各执行部所辖的区域。实际上，建立的只有北京、上海、汉口三个执行部，其成员如下：

(一)北京执行部

组织部长：李大钊；宣传部长：马叙伦；学生部长：于树德；妇女部长：褚松雪；工人部长：丁惟汾；农民部长：谭熙鸿；调查部长：王法勤。

(二)汉口执行部

组织部长：林祖涵

秘书：李实番

干事：李能至、许白昊。

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未到任)

秘书：(未定)

干事：项德隆、杨德甫

青年部长：覃振(未到任)

秘书：李廷铿

干事：林育南、杨继肃

妇女部长：覃振(未到任)

秘书：杨道馨

干事：夏之栩

(三)上海执行部

1. 秘书处，

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

文书主任：邵元冲(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

书记干事：叶纫芳

录事：向昆

会计庶务主任：林焕廷

庶务：周雍炀

录事：刘其渊

2. 组织部部长：胡汉民

秘书：毛泽东

统计登记干事：郑观

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

录事：陈德征

3. 宣传部部长：汪精卫

秘书：恽代英

检阅本国报纸干事：韩觉民

检阅外国报纸干事：张君谋

宣传指导干事：施存统、沈泽民

录事：曾繁彦

4. 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

秘书：邵力子

调查干事：邓中夏、王陆一

办事员：刘伯伦、王荷波

录事：帅功

5. 青年妇女部部长：叶楚伧

秘书：何世桢

助理：向警予

录事：费公侠

6. 调查部部长：茅祖权

秘书：孙镜

调查干事：周颂西、喻育之

录事：周渭波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中博党史研究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

背景介绍

1923年9月初，苏联政府派出的以加拉罕为代表的外交使团到达北京，4日，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报界发表声明，即第三次对华宣言，申明苏联政府仍将以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作为“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在对外关系中，苏联“正在制订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这样”。随后，加拉罕开始与北京政府任命的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进行谈判。对于中苏谈判解决双边问题，帝国主义，特别是美、日、法深为不满，处处掣肘。在谈判前夕，他们先是要求北京政府先与他们交换意见，在谈判过程中，又借口所谓“股东”在“国际共管”期间曾对中东铁路“投资”而反对。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1924年3月，中苏协定已经草拟就绪，但北京政府突然变卦，拒不签字。这激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尤以北京学生为最。3月21日，北京教育会等9团体，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外交之压迫；督促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联。①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警告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谓：“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的故事，可为殷鉴”。②保定，广州、哈尔滨、武汉等地也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责成外交部办理此案，重新开始外交谈判。

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鉴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定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主要内容有：

（一）凡帝俄与第三者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

（二）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三）中苏两国政府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四）苏联政府抛弃帝俄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的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

（五）苏联政府放弃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

（六）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

（七）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处，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联政府同意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其所属一切财产，并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中东铁路的前途，只能由中苏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中苏双方还鉴于了与上述协定有关的七项声明书。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比起苏俄对华宣言有所后退，但它的鉴定，严重地打击了列强强加在中国的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材料：

- 加拉罕致王正廷函
- 秘密交涉之成功

材料一　加拉罕致王正廷函

敬启者：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五〇九号来函已悉。查其内容，系由贵督办转达国务院对于本代表前函之答复。兹再请贵督办将下开各节转达贵国政府：

查国务院之答复，对于近日状况之原因，并未注意。故应将一切事实陈述如左：

（一）三月十四日午前，所有交涉业已完竣，双方最后修正之各项协定，亦已签定，并经双方相约，将各项文件立即誊写，即日加以签定。国务院所谓交涉并未完竣等语，乃因国务院对于事实并未深悉所致。

（二）国务院愿将本月十四日签定之协定，加以磋商，虽以慎重态度为词，然考其事实，当交涉完竣。协定业已签定之后，而犹欲重行讨论者，足征内阁之处事并不慎重，而于亲善上毫无诚意之志愿也。

（三）苏联政府以为，破坏交涉及取消业已告成之协定之手段，其原因不外一种极有关系之政治上之事实。盖公众所知，中国政府外交之方针，本以列强之政策为主，其对于苏联之方针尤见其然。有前此中国大总统关于此事之命令足以证明。查中国各种正式之文件，中国对于此项政策，并未加以更正，则可知中国迄今仍以各列强之政策为准。现在中国政府不承认其代表之签字，其原故必不

外上述政治之情事矣。一切经过之情形，足以证明也。本代表与中国代表在近数星期以来，彼此交涉，本为顺利，并未发出如何意外之情形。中国代表时常将交涉之经过报告国务院，国务院来函亦声明此节。然则政府对于交涉之情形，始终备有确实之报告，而中国代表一切之行为，本与政府同意办理。惟双方签字前一日即三月十二日，忽然发生问题，以致推翻一切已成之结果。盖当三月十二日法国致中国政府一恫吓之警告，此为现在状况之确实原故也。法国以外之他国，亦已警告中国，但其他各国之举动，并无公开之形式。法国之公开者，乃因世界各国之中，法国最为仇视苏联之故耳。

（四）国务院提议拟定一协定，将所有各问题完全解决。此种提议，本代表不能容纳。缘照此办理之后，殊无开中俄会议之必要。双方原定于一个月期内，开中俄正式会议。而三月十四日所签定之协定，不过为将来会议之一种根据而已。在苏俄政府方面，亦以为该协定中尚有若许问题，并未解决或解决而未得圆满之结果。所以甘于缄默者，亦希望将来会议中加以妥协之磋商耳。查三月十四日所签定之协定，对于中国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已能如愿以偿。此种有利益之协定，恐任何第三国皆不能拱手让之中国。设若有第三国能将该协定中尊重中国利益及人民希望之点，以十分之一付之中国，则中国政府必以为有无量之幸福，而将感激于无涯矣。

（五）国务院所谓本代表对于中俄亲善造成一种障碍，并谓三日之限大背以前宣言之旨。此种声明，本代表应以愤懑之态度驳回之。苏联政府系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提议与中国结成亲善之政府，其亲善之原则，此次三月十四日所签宣言之协定中，业已详明列入。中国政府在道德、政治上、事实上皆无责备我苏联政府之权。缘中国政府对于苏俄最亲善之提议，竟答以助推翻苏俄政府及扼制俄国国民自由独立之举动。中国政府曾随同帝国主义之列强，欲灭除苏俄政府。用种种方法援助白党，容纳白党在三省存在，且任其侵略苏联领土。但我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罪恶，始终并未责成中国国民负其责任。故现在仍将数年前所允许之利益让与中国，并且列入此次所订之协定中，以资信守。五年以来，我俄力劝中国政府与俄亲善，虽中国人民屡次表示愿意，而中国政府竟置之不理。故中国政府如欲有责备苏俄政府阻碍亲善之权，则必须将五年以来固执及仇视之事实，觅得相当之理由以解释之。

（六）苏联政府闻知三月十四日协定告成，甚为欣幸。本国全国人民莫不额手相称庆，咸谓自三月十四日起，俄国人民得与受痛苦压迫之中国巨大民族，用正当之方法发展两民族间之友谊，俾日形坚固。及闻知此项协定又被中俄亲善之仇敌破坏，其怨痛正与欣幸相等。苏联各邦，对于中国政府取消一切交涉之结果，及种种轻视阻碍之举动，十分愤懑。

此项所订协定，中国政府倘以历来与各国所订条约略一比较，则必无不满意之根据。而中国政府徒在琐细小节上十分注意，而反对已经妥协之重要节目置而不言。例如，撤消领事裁判权、种种租借优越权及庚子赔款等项，在威尔赛、华盛顿两次会议，中国力争求脱除各种与优越权有关之下堪之束缚，而在华盛顿会议，仅争得组织委员会审查治外法权一节，但以法国之反对，迄今未能成立。然此次所订之协定中，此种权利我俄已一律抛弃矣。

现在各列强责成中国最重者，厥为关税条约。此种条约破坏中国实业无余，而且税则既经与人订立，则经济实权操之外人之手，而最重之财政来源，亦遂为外人所监督矣。

华盛顿会议，曾允许中国增加关税。而此等允许，迄今并未实行。而于三月十四日之协定内，苏俄则愿抛弃束缚中国之一切商务关税之协定，并本相互平等之原则规定之。因中国政府不设法肃清在蒙古白党之故，苏俄不得已而派兵入蒙，但于协定中切实声明，尊重中国主权，并准备一俟在会议中商定期限及保障，即将军队撤退。至中东路问题，苏俄所让于中国政府者，较中国政府所能正当要求者实多。惟中国政府对于因苏俄公平主张而得之圆满结果，则默然焉。苏俄政府欲铲除在中国境内帝制主义之罪恶污辱之余烬（按即白党），迄今继续五年之久，方克达到目的。中国政府就三月十四日协定中，苏俄对于中国之尊敬及对于中国国民之友谊，极应接受而重视之，乃中政府竟牺牲以中国名义签字该协定之代表，而欲将该协定推翻，殊出意外。

此种闻所未闻之行为，苏联政府应认为五年来之忍耐力消耗已尽，尤以最近确商交换意见之半年为甚。苏联政府为使中国易于接受友谊协定起见，对于中国无不表示让步，且对于从速无条件恢复邦交，为开会之先决条件，亦已抛弃。而中国政府对于苏俄政府之友谊努力，并未加以相当之注意。

苏俄政府因中国政府取消双方正式代表三月十四日所签订之草案，不得已于十六日备函要求明白确定。兹本代表为证明三月十六日函起见，更以苏联政府名义声明如左：

（一）与中国政府正式代表谈判已于三月十四日告终。故苏联政府对于业经议妥之协定，拒绝重行讨论。

（二）三月十六日函中所指之三日期限满后，苏联政府为对于三月十四日所签之协定不受任何拘束，并将来与中国订约时保留完全自由之行为。

（三）苏联政府应预为声明，将来中国政府若欲重提谈判时，惟须先行与苏联恢复正式邦交，不附任何条件及协定。

（四）苏联政府应预先警告中国政府，勿铸成不可补

救之错误，勿破坏已告成之协定而负重大之责任。因此种不慎重行为，足以影响于将来中俄两国邦交也。

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公报》第36期。

材料二　秘密交涉之成功

大纲协定交涉之破裂，实非双方之本意。吾人观俄方于草约签证后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交涉成功，莫斯科政府故意泄其消息于外，致有该处各国代表之道贺；则可断定其限日签字之紧急照会，为促进交涉而非破坏交涉。又观中国四月一日让步之照会及以后签定之正式协定，则可断定十五日阁议之变化，为顾维钧与王正廷间互排之作用而非对俄之故意挑剔。因是双方于交涉虽表面成为相持不下之情形，而实际则均有挽回之意思。

自四月一日中国发出最后照会，直至五月二十一日后秘密交涉之进行，此停顿之两月间，中俄两方面表面虽均沉机观变以图控制对方，内幕则各有所活动以促交涉之进行。所谓双方均沉机观变者，俄代表因中国知识阶级及舆论之袒俄，吴佩孚等有力疆吏之主张照王、加协定签字，外交当局对俄方针之不确定，均为可乘之隙而足供利用者，因之故意持强硬之态度以迫中国之让步；中国因莫斯科政府与北京俄代表团对华政策之不同，加拉罕地位有不稳之势，因亦故意设法促加拉罕之退让。所谓各有所活动者，俄代表盛倡局部交涉之说，借鲍罗廷以接洽广东当局，使德夫金、伊凡诺夫以接洽奉天当局，更猛力促成进行多年之新疆局部通商条约，欲借以挟制中国之北京政府，而日俄交涉在北京之急进，亦为此项之一；中国政府宣言改向莫斯科政府进行交涉，议员及新闻记者倡言请俄政府撤换代表。实则凡此种种均为徒劳无功之举动；而交涉之斡旋，中国方面以李家鏊在俄京之接洽为有力，俄国方面以德夫金西归报告与安特诺夫东来主持为转机也。

两月来双方既有种种举动以造成交涉进行之时机，适五月二十二日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往俄代表处答得关于纵容白党之抗议，谈及协定交涉停顿之非计，俄代表并表示对于中国外交当局受使团压迫之不满，于是双方约定，以极秘密之手段进行交涉。自此俄方借日俄交涉以转移北京外交团之注意，中国则朱鹤翔等日间在顾维钧宅闭门磋商，夜间驰赴俄代表处交换意见。旬日之间，谈判二十次，幸得俄代表对中国所争三点之让步，两方之意见始能接近。及接洽就绪，顾维钧借调和阁潮为名，在宅集阁员开特别阁议，报告经过情形，即呈请大总统指令委顾全权答约，于三十一日在外交部举行正式签字典礼，互祝邦交成立，从此十五条之《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十一条之《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七种声明书、一种换文，遂成中俄间正式之基本条约矣。

此正式签定之中俄协定，较之以前之王、加协定，吟一地第四条略有增改，及关于蒙古撤兵与俄国在华教产之规定有所改变，并增一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声明书外，其余一切无所变动。此层本志前号《时事述评》中已详述，兹为避免重复，不复再记。要之，顾维钧对于中俄交涉之手段虽告成功，其余则无可称述也。

（摘自《东方杂志》第21卷）

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连续举行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其中二十一日讨论共产党问题。原自共产党徒加入国民党以来，即不断发现其阴谋，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曾向中央检举共党不法案。为解决此一纠纷，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是日全会由展堂先生任主席，首由展堂先生向全会报告称："综核现在党内纠纷情形，约有三派：(甲)认共产派合作为有害；(乙)认共产派合作为有益；(丙)认共产派跨党无害，而有秘密党团作用则有害，若能使这个秘密公开，则党团作用自可消除。准此三点观察，症结所在，甚属明湜，爰拟就是条请讨论。再有须注意者，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员为共产党守秘密是当然的。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庶彼此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矣。"

最后全会决定按照政治委员会议所拟"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草案解决之"。

材料：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布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

材料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

本会前因党内共产派问题，建议总理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以期妥筹解决。自八月十五日开会以来，综合中央监察委员之报告暨各级党部及各党员之提议或报告，经详细之讨论，为郑重之决议，呈请总理裁可，特发训令如下。

今年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发表宣言，说明中国之现状，同时对于此现状，以三民主义为根本解决方法。复制定最少限度之政纲，以求救济。全国以内凡具有革命之决心、不惜牺牲、以为国民而奋斗者，皆一致集于本党旗帜

下。诚以构成中国现状之原因，实为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互相勾结。此种恶势力酝酿既久，蔓延复广，欲谋扑灭，其事非易。大多数人民呻吟痛苦，而莫知其所以然；少数之谈政治者，又相率倾于保守与妥协，不能知症结之所在，或虽知之，而不敢献身从事。故凡属革命派鉴于环境之艰窘与情势之危急，一方面须为国民前驱，以与恶势力奋斗；一方面须指导国民，毋入歧途，以成为恶势力之助长者。其责任至重，其需要共同努力亦至殷。虽在平日思想派别或有参差，而对于中国之现状既已认识，对于本党之主义与政纲复已湜知为中国革命所必由之途径及当然之步骤，则无疑无贰，加入本党，以期集中势力，一致进行。此诚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但休戚相关，抑亦生死相共，至诚结合，始终无间，庶于革命之责任，能负之以趋。凡在同志，所有同感者也。

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其事远在改组以前。溯其加入之原因，在于灼知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况，非国民革命，无繇打破；而国民革命，惟本党员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繇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势之关系，初不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故其党员之跨党，亦与元年以来国内政党党员以跨党为风气者，异其旨趣。且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加入本党之始，曾以此意陈之总理，得总理之允许。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开会之际，有提出党员跨党问题者，及其决议，卒不执此以绳党内共产派，职此故也。

如上所述，则党内当不致因有共产派而发生问题。盖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本党以本党党员待遇之，未尝有所歧视。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其足以发生问题而有待于解决者，盖数月以来，迭次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暨“青年团团刊第七号”等印刷品。前者发行于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后者发行于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就于此等印刷品，党员之观察各有不同；其一，以为共产派加入本党之后，不应再加歧视本党之见。且李大钊同志于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曾郑重宣言，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得谓之跨党，不得谓之党中有党。今按之此等印刷品所载，则显然为党团作用，应不许共存在。其二，则以为中国共产党于其党员加入本党之后，施以告诫，俾知对于本党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此不能视为恶意，毋宁谓出于善意。以此之故，而被以党团作用之称，实为过枉。此两种观察，既趋纷歧，遂致争议起于党内，谣言兴于党外，一时若甚嚣尘上。中央监察委员认为情节重大，故搜集证据，提出报告，并拟具办法，以期解决。各级党部及各党员亦相当贡献其所观察与判断。由此可知纠纷之由，实不外乎党团作用之一点。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派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同志平日相与戮力，其精神之浃洽，不外于理智之互浚，与感情之相孚。而此等之秘密行为，实足为感情隔膜之导因。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决议不付之秘密，本会敢信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从发生。而今者补救之方法，方惟对于此点而求处置。顾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之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会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职务之一，即在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如是则本党之最高党部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党内之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形消释，而党员之对于共产派亦无所其猜忌。此本会为解决纠纷计，所愿自进而负此全责者也。

自经此决议之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凡我党员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此急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本会对于党员，不胜厚望。

于此犹有当为党员告者：党内共产派同志平日无论言论著作，往往有意的或无意的于国民革命之主张不免参差，因而被其他党员之指摘，以为于参加国民革命之初衷，得毋刺谬，甚且有认为无诚意者。而诸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又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本会于此不能不申以告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诸党员对于道义上，应有此觉悟；对于同志间关系，尤应有此忏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其各留神省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革命文献》第十六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1957年3月出版）

江浙战争

背景介绍

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一直把持着北京的中央政权。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夺取在华的独占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进一步扶植东北的奉系军阀；同时，拉拢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英美势力控制下的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于是，在1924年秋策划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卢永祥联合反对直系军阀的战争——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

由于1923年10月12日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地位，并停止与北京政府公文往来，一时间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一带，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而且浙卢又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形成三角反直同盟。因此，直系军阀为拔除这个钉子，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外，在南方则派孙传芳进入福建，企图由孙传芳与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并从闽、赣、皖包围浙卢。1924年5月，北京政府为谋犯广东，任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以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但广东革命根据地不易伸入，而福建一省也难以容纳孙、周二军阀同时并存，所以孙传芳亟谋向浙江扩张势力。于是经曹锟、吴佩孚同意，由直系的地方军阀苏督齐燮元、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闽督周荫人订立联合图浙计划。而卢永祥则联合其部属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组织浙沪联军相对抗。双方积极备战。8月24日，江苏军阀齐燮元以浙江军阀卢永祥收纳被直系军阀周荫人击败的福建军阀臧致平、杨化昭为借口，与皖、赣、闽联合压迫卢永祥解散臧、杨部队，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招纳叛亡”的卢永祥。9月7日，北京政府“褫卢永祥、何丰林官勋，并免本兼各职，令齐燮元督部剿办”。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

材料：

- 战争的原因
- 江浙两军战斗之实况

材料一　战争的原因

齐燮元由于是陆军大学出身，而他的高级军官和同事也多半是正规军事学校毕业，自然就有自命不凡和高人一等的想法。因此，他虽是直系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他对曹锟、吴佩孚并不那么崇拜与尊敬。而曹、吴对齐也不象对张福来、王承斌等那样关心。齐虽然名义上是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可是对最有军事经济价值的上海，却始终不能染指。他认为这是一件憾事，时常对他的密友马荷琛（十九师旅长）说：“吴佩孚不支持咱们拿过上海来，我们不要说巡阅使是个空衔，就是江苏督军也不完整。我同旁省督军比来，真是相形见绌。”言下十分愤慨。由此也可看出齐对上海是如何的垂涎了。齐曾一再向吴佩孚献策：只要江西蔡成勋、福建孙传芳和南京给卢永祥一个联名电，叫卢撤出上海，卢是不敢拒绝的。不战而取上海，既增强了直系的威望，在经济上也有重大收获，而且从此拔去了多年插在我们腹部的一把利剑，可是，他这个献策并未为吴所接受。

齐燮元对臧致平、杨化昭两部投卢永祥一事，更感到恼火。他既怕卢的势力不断扩大，又顾虑臧、杨两部无法对付，因为臧是皖系有名勇将，杨又是有名小诸葛，一个有勇，一个善谋，他们投卢简直等于给猛虎添了翼，对他极为不利。当臧、杨退至闽赣边境时，齐曾连电吴佩孚要求急电江西蔡成勋迅派重兵堵截臧、杨，包围缴械，以除后患，又亲电蔡成勋乘臧、杨疲于奔命之际，速派大军彻底解决。那知蔡成勋堵截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臧、杨，反而被臧、杨缴了两个团的械。从此臧、杨实力更加更大，齐也就更觉不安。

齐燮元也极垂涎于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埠，税收之大，全国无与伦比。更令齐眼红者是外国大批鸦片经常运沪销售，或由上海转运内地各省销售，利润极大。根据当时卢永祥方面内部人说，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卢永祥在上海对印度烟土，一方面向外国商人和买办资本抽收重税；另一方面自己直接派员到印度去贩运。后一个办法比收税的利润更高。当时的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护军使何丰林都直接参与这个罪恶勾当。他们把利润大部用来购买军械，其余由承办人和许多高级军政官员朋分。他们每个大员都在这个肮脏勾当中分了几十万元。所以齐燮元方面对上海这批鸦片收入自然十分眼红，从而鸦片问题便成为齐卢之战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卢永祥方面，他的想法与齐燮元有些不同。他出身行伍，今天当了督军，真是作梦也没想到的事，而且为人也比较谨慎，所以他并不愿与齐开火。在齐卢开火前，卢在杭州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卢曾表示为了避免打仗，宁愿下野让贤。当时臧致平就站起来说：“刘燮元欺人太甚。我臧致平和我的官兵在患难之中，你曾挽救了我们，我和杨化昭两部包打南京，把齐瞎子（齐的外号）活抓过来。”大家哄堂大笑。经过几小时的议论，会议决定：1. 即时颁布戒严令；2. 分任臧致平、杨化昭为沪宁线前敌总、副司

令；3. 任郑俊彦为吴淞防守司令；4. 派员到南京去看看，有无讲和的余地。

关于派人到南京去的事，有的主张派马鸿烈去，因马与齐有多年深交，但马由于职务上关系走不开。后来决定派马葆珩走一趟，因马的大哥马葆琛是齐的好友，又属齐方的实力派（当时任十九师旅长，齐的参谋长名义上是何恩溥，而实际能左右齐者是马葆琛）。派员去南京，目的就是说明浙江绝无侵犯江苏的企图，也没有仇视齐燮元的意思；至于上海虽属江苏省的一部分，但它过去很久时期就归浙江管辖，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应该由中央政府会同有关双方商洽解决。此外，还要说明双方在地方都已多年，应当顾虑到父老的疾苦等一些大道理。当由宪兵司令马鸿烈写了一封问候信给齐燮元，山马葆珩亲自带去。

马葆珩从上海北站乘车时，北站已进入战争状态了。站上除了军队以外，便是军用物资。由南京东来的火车，逃难百姓挤得满满的，几无插足之地。而马所乘去南京的列车上，只有零零落落几个乘客。在这风声鹤泪、草木皆兵的时候，上海变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一大批一大批地涌向上海而来。这时在沪宁沿线黄渡、安亭以及浏河一线上，齐卢双方只相距几华里，都在挖战壕，构筑掩蔽部。两军遥遥相望，自由自在地在战地活动，真好象是军事学校野外演习一样，看不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即将到来。马葆珩沿途遇到苏军东开兵车约十余列，到下关时，车站秩序之乱，比上海北站有过之无不及。军警检查，如临大敌，逃难百姓的行李受到严密搜查，难民们敢怒而不敢言。东西检查完了，又挤不上车子。有的孩子挤上车，而妈妈又上不去。妈妈喊，孩子哭，好不悲惨。

马葆珩到南京家里时，马葆琛因与齐商谈军事已两天未回家了。通电话后，马葆琛当晚回家。马葆珩当将杭州方面意见简略谈了一遍。马葆琛说："双方都准备好了，就差看谁先打第一枪了。哪还有谈和的希望呢？"次早，马葆珩、马葆琛兄弟俩同去齐家吃早饭。当时，何恩溥、宫邦铎都在座。齐看了马鸿烈信后，便笑对马荷珩说："老弟尽上人家当。兵荒马乱之际，何必受此劳累。臧大牙（臧致平外号）已在大吹牛皮，要包打南京，活捉咱的，还谈什么讲和呢？欺人太甚！"说罢，哈哈大笑。马葆珩仍将浙江意思简略地叙述一遍。齐说："咱们几个老兄弟欢迎我们自已的老弟。对你这个和平使者，我们应当谢谢你。"齐又对马葆珩说："你告诉老懋（马鸿烈号）好好的抽大烟吧！很感谢他的好意。"马葆珩、马葆琛俩弟兄回家后，马葆琛说："我们决定进攻上海，内部情况是很复杂的，既是为了要控制这个在军事经济上有价值的地方，又是为了给宫师长安插一个适当的位置。瞎子也有他的难处。"马葆珩看到战事已无法避免，便只好回去向卢复命。

（摘自《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社科出版社）

材料二　江浙两军战斗之实况

自九月一日苏军取攻势行动，二日苏军拆断昆山，安亭间沪宁铁路一段，并割断苏州电线，交通完全阻断，交战形势已成。及三日而沪宁路安亭、黄渡间两军乃正式接触矣。前线各地战况如下：

沪宁线方面：三日上午十时，黄渡苏军一大队，先放排枪向浙军示威，浙军不理。十一时许，苏军一营开始向浙军冲击，并开大炮，浙军死伤十余人。浙军三十九团团长林兰亭，因被包围，忍无可忍，遂下令抵抗。先用机关枪，继放大炮三发，击毙苏军四、五百人，余部溃退，浙军向安亭方面追击。下午三时许，追过安亭镇。五时许，苏军大队退却。四、五两日，黄渡、安亭间，两军屡退屡进，阵线无大变动。六日晚九时后，两军在安亭大战，互用炮轰，半夜仍在血战中，苏军退至陆家浜附近。浙军从俘虏中探得青阳港方面苏军电网地点，因派工程队密将电网割断，敢死队数十人，即乘隙泅水渡河。苏飞机至南翔掷下炸弹二枚，一炸裂，未伤人，一未炸。浙飞机亦每日飞至安亭、黄渡间侦探敌情，回沪报告。

浏河方面：四日下午，太仓苏军马玉仁、吴恒瓒二部一万余人，先后向浙军冲锋，浙军连发开花炮抵御。是役攻军超过守军两倍，浙军略向后退，力取守势。前线离罗店近三里，下午五时，浙军失利退罗店。是夜八时许，苏军又猛攻浙军，浙军臧致平亲临前敌，仍取守势。计历七小时，浙军后方杨化昭部生力军已到。至五日上午三点十五分，苏军复以敢死队三百名冲锋。时浙军已有预备，待其冲入后，四面围击。一面由臧致平亲率前线士兵，追击苏军。至此苏军见敢死队全军覆没，向后退避，浙军追击，复占浏河。时苏军第四旅第二团团长冀汝桐，因黑夜退避，误认追击之浙军为苏军，被浙军擒获。至五日早九时，浙军已占领浏河五里以外。苏军因太仓方面，后援已到，遂复还击，午后双方激战更烈，互以大炮机关枪轰击。至下午四时，苏军又退。五日夜间，苏军又向浏河反攻数次，均经浙军击退，苏军伤亡甚多。六日晨五时，浙军下总攻击令，臧致平亲自督战，与苏军肉搏，激战颇烈。上午九时许，苏军向太仓溃退，浙军追击十余里，俘军官四人，兵士二连，获械甚多。至晚七八时许，浏河南北二十里内，苏军业已肃清。

嘉定方面：三日晚间，苏军进攻嘉定西门，四日浙军杨化照部六营赶到，五日遂有剧战。六日苏军继续猛攻，终被浙军击退，但苏军尚在娄塘，仍在剧战。

青浦方面：五日苏军十九师由安亭分两路南下，正面进攻离安亭六里许之泗港口，侧面进攻泗港口西南之白鹤港。六日下午三时许，两军交战于青浦北十余里之孔宅，鏖战甚剧。

宜兴方面：苏浙两军对峙，在宜兴、长兴间者，亦于三

日上午十时同时作战。系由苏军方面先下动员令，攻击浙军，浙军较胜。因浙军系驻扎在附近山内，距宜兴仅三十里，浙军之炮，能直射至宜兴。苏军攻浙，因有山障碍，事实上较困难。五日两军激战甚烈，浙军进攻，距宜兴仅十余里。陈调元部有三营兵变，一营降浙军，二营哗散。

总合前线各路战情，苏军虽尽力猛攻，而浙军抵抗亦殊不弱，臧、杨军队颇能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六日以后，浙军反守为攻，节节前进。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第二次直奉战争

背景介绍

奉系军阀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积极经营，图谋再起，并与粤、浙结成同盟以壮声势，待时而动。迨江浙战起，张作霖即以粤、浙同盟关系，决计进兵入关，于9月4日发出了响应卢永祥、责备曹、吴的通电，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战事初开时，张作霖将奉军编为六军，自任总司令，而以姜登选为第一军司令，出兵山海关；李景林为第二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张学良为第三军司令，出兵山海关；张作相为第四军司令，作援军；吴俊升为第五军司令，作援军；许兰洲为第六军司令，由开鲁攻赤峰。9月15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此时，直系军阀亦积极备战，锟接到张作霖的挑战电后，即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命令，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其兵力部署，分三路出兵：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山海关；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并设十路援军，分别以曹瑛、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田维勤、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司令。同日，张作霖也发表誓师通电。于是，一场从热河到冀东战线的规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了。

这次战争，双方动员的兵力：直系有二十五万人，奉系有十七万人，总数达四十二万人，双方并都有海军和空军参战。从9月13日起，京奉铁路全线交通断绝。奉军分向朝阳、山海关进攻。在热河战线，奉军于22日起至10月初，先后占领朝阳、建平、凌源、赤峰、隆化等地。在山海关方面，从9月17日起，双方不断发生战斗。10月7日，奉军下总攻击令。12月，吴佩孚亲到山海关督战，而九门天险已为奉军占领。直、奉两军大战于九门口、石门寨、三道关等地，双方死伤一万多人；吴佩孚指挥舰队攻葫芦岛，为奉军所制。奉军全线猛攻，先后攻占石门寨、山海关，于17日开始进入长城。吴佩孚退至秦皇岛，以舰队运兵三万，增援反攻，企图挽回颓势。但由于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遂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迅速溃败。

吴佩孚闻变之初，原冀以全力对奉作最后一战，因未能挽回败局，乃于10月25日在秦皇岛通电称：奉曹锟密谕，号召全国讨冯。直系将领王怀庆等三十六人联名响应。旋因日本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通告直军不得使用秦皇岛码头，吴佩孚乃于26日退至天津，将军队集中于北仓、杨村、军粮城等地，企图回救北京，并电苏、浙、鄂等省求援。奉军长驱直入，由冷口进占滦州的张宗昌部，截断了吴佩孚军的天津与榆关间的交通，榆关一带的直军均被包围缴械。这时，苏、浙、鄂一带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肖耀南等，原欲出兵支援曹、吴，一面通电讨冯，一面派兵分路北上。但由于鲁督郑士琦于11月1日宣布"武装中立"，不允江、浙的援吴军假道北上，孙传芳的援吴军被迫由南京退回上海。同时，晋督阎锡山派兵占驻石家庄，截断了京汉路交通，阻止河南李济臣的援吴军北上。这样，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空了。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狈遁逃。

材料：

- 双方兵力部署
- 奉军的进攻

材料一　双方兵力部署

在双方大战前，先生直接指挥之陆海空军力，大至如下：

（甲）陆军

陆军第三师	师长吴佩孚	驻洛阳
陆军第二十四师	师长杨清臣	驻河南
陕军第一师	师长胡景翼	驻顺德
陆军第十四师	师长靳云鹗	驻信阳
陆军第二十六混成旅	旅长田维勤	驻河南
陆军第二十师	师长阎治堂	驻陕西

先生除本部第三师三万余人外，尚有四师及一混成旅可以调动（河南省军及新收编之陕军除外），人数约及十万。

（乙）海军（归温树德指挥之渤海舰队）

舰名	旧属	种类	吨数	速力	制造年度	制造国名
永翔	第一舰队	炮舰	七八〇	一三·五	一九一二年	日本
同安	第二舰队	炮舰	三九〇	三二·〇	一九一二年	德国
海圻	第一舰队	巡洋舰	四二〇〇	二四·〇	一八九八年	英国
楚豫	第二舰队	炮舰	七四〇	一三·〇	一九〇六年	日本
肇和	练习舰队	驱逐舰	二六〇〇	二二·〇	一九一一年	英国
海琛	第一舰队	巡洋舰	二九五〇	一九·〇	一八九五年	德国
豫章	第二舰队	驱逐舰	三九〇	三二·〇	一九一二年	德国

(丙)空军:洛阳有飞机三十余架。

直奉双方关于陆军之战斗,各以十余万大军分成三路,互相对垒。同时因地势与战略之关系,两方又出动其海军,并策划空中飞机战。

此次直奉大战,自以陆军为主力。九月中旬,奉方发表组织六军,其部署如下:

总司令张作霖。第一军总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第三军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第四军总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第五军总司令吴俊升,副司令阚朝玺。第六军总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

至关于其军事布置,设大本营于锦县,分三路布防,以第三军一师一旅兵力,守山海关;第一军兵力两旅驻绥中;第二军兵力一师一旅向朝阳进展;第五、第六两军则利用其骑兵队分攻开鲁、赤峰;第四军集中锦县为总预备队。其计划向朝阳方面者主攻,以图取得热河,其余二路主守。

直军方面之部署,自先生于九月十七日入京后,政府除下对奉讨伐令外并颁命令如左:

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副司令王承斌。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彭寿莘(第十五师师长),第一路副司令冯玉荣。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王维诚(第二十三师师长),第二路副司令葛树屏。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国(第九师师长),第三路副司令时全胜。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第十三师师长),第二军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前敌副指挥龚汉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十一师师长),第一路司令张之江,第二路司令李鸣钟。

第一军兵力三师,在山海关方面与奉军第三军张学良对抗,较为重要,其数约计四万余人。第二军兵力一师两旅,以热河为根据,向朝阳方面抵拒奉军第二军李景林部之进攻。第三军兵力一师三旅,由古北口出承德、赤峰,对付吴俊升、许兰洲之军事行动,人数不下二万五千,为直军之劲旅。直军之军事计划,由第一军在山海关与海军联合进攻沈阳,第三军绕道攻沈阳之后方,以相呼应,第二军在热河取守势。

论及两方援军,则奉方有尚未调动之四混成旅及吉、黑尚未调动之军队,更有蒙古骑兵,亦决定赴奉助张。直方则于任命前敌各路司令时,亦任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及派定曹瑛等十路援军司令,后更加出兵各省督军以援军司令头衔,其后方势力,颇为雄厚。

直军之海战计划,亦有足述者。直军自拥有海上之军舰,既可威胁由京奉铁路调动之奉军,又可掩护自己陆军之前进。先生于任命陆军各军司令后,又任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其目的即在抽调杜氏之长江舰队及温氏正在修理之渤海舰队北来助战。当时上海独立舰队因降杜而势力消失,直军乃倾其海军全力向辽东湾活动,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先生又拟利用海军并征集商船,运输陆战队及他路援军驻安东、营口,由南满铁路进扼沈阳之背,因须与日本交涉,一时未能实行。

奉方年来虽积极谋兴海军,在葫芦岛有所经营,但其舰多为江防舰及商船加设炮位而成,颇不适用于作战,故其海上势力,似不足以抵御直军。张作霖亦有计划,欲利用此种不能作战之军舰偷运陆军赴山东登州以扰直军后路。然直军方面已任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任迟云鹏为总指挥,担任沿海防务,以破奉军上陆登州之计划。

空中战争亦为直奉双方作战计划之一。奉方之飞机,外人常称其性能优良。张作霖致曹锟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其以此自豪,可以想见。甚至侨居京津之外人,亦因此大事张皇,引起阻止飞机抛掷炸弹之交涉。至关于战局之观察,日本军官发表意见,谓奉方飞机不能在此长距离中来京津投掷炸弹,人心始稍安定。此次奉方飞机临时编成战事航空队三大队,以葫芦岛为根据,向山海关、喜峰口活动,于侦查军情,破坏敌军铁路交通,扰乱敌军军心,颇收功效。山海关方面之直军,屡受其威胁,一面时以探照灯向空侦察,一面急调春间由意大利购买而储

存于三家店之高射炮运来应用。卒击落奉方飞机若干架，奉方空中活动之势始稍杀。朝阳方面亦击落奉方飞机数架，惟奉方飞机颇多，驾驶外人中不无好手，其势力足与直方海军相抵消，而可以补救奉方海军军力之不足，其司令部设于葫芦岛或基于此种战略上之理由也。

直军飞机队又编成四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驻航空处。合计储存于南苑、洛阳、保定、清河及停止〔在〕京戴、京津航空线所得之数目亦当有七八十架。据报纸所载，直方航空司令敖景文所率一队飞机翱翔于山海关方面上空，曾以大维梅式飞机两架与奉方飞机战斗，高飞于奉方飞机之上层，向下对奉方飞机压迫，奉方飞机不战而退，则直军之空中能力，或不致如外间所传全属无战斗能力也。

（摘自《吴佩孚先生集》赵恒锡）

材料二　奉军的进攻

奉军在九月十三日发动攻势，各军进攻的地点，似乎吴佩孚的作战计划已经有人泄漏出去，直系各师战斗力的强弱以及部队防守某地，奉方都已知道，所以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直军之中，以第二军第十三师战斗力最弱，因为他们纯粹是旧式的战法，一个人扛着大旗前进，全军都看大旗的指挥行事，组成密集队进军。奉军第二军李景林部队见到这种情形，就拉开一个大散兵线，远远地将他们包围起来，很短的期间就消灭了他们两个营，乘胜前进，于九月十六日攻朝阳；二十二日占领，三十日进占凌源。吴佩孚得报大怒，十月三日，免去刘富有帮办热河军务及第十三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等职，以陶经武继任指挥，崔维藩继任旅长；免去龚汉治兼职，以张林继任。十月六日，又免王怀庆第二军司令职，命张福来急往接替。

奉军既打败了直军第二军，就转向直军主力所在的第一军进行攻击，于是山海关方面战事渐紧。直军方面也积极布置，准备大战，于九月二十九日，派冯玉荣为第一军第一路副司令，葛树屏为第二路副司令，时全胜为第三路副司令。三十日，我和彭寿莘、董政国在山海关相会，商议对奉军战守之事。奉军猛攻第二路义院口娘娘庙一带阵地，炮火极猛，并且有飞机助战。但我军掩蔽有方，多利用山洞，潜伏在内，伺隙出击，奉方的炮弹炸弹都失其效力。敌人在前线猛扑四十余次，都被击退。他们撤退之时，我们以兜屁股枪欢送。他们遗弃尸体无数，其中有白俄。我方死者只三人，伤者三十余人。此次战胜，以四十六旅孙清山部和十二混成旅葛树成部特别卖力气，所以获得了卓越的成绩。第四十五旅旅长曹恩培是曹四的孙子，庸劣无能，所以我没有调他上前线。

奉军攻第二路既不得逞，就向南攻第一路山海关正面一带阵地。彭寿莘是直军中有数的猛将，有“刺儿彭”之称。他布置阵地，除了战沟盖有钢板之外，又有电线围绕。奉军用极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炸弹向他的阵地轰炸，又有若干敢死队拼命前扑，居然攻进了孟姜女庙一带阵地。彭寿莘下严令，非夺回此地不可。次日拂晓战，经将兵反攻，又将此地夺回。奉军旋即反攻，为势更猛。我军交战良久，然后撤退，奉军蜂拥而进，不意地雷大发，死伤很多人。从此奉军知道彭寿莘的厉害，不敢向山海关的正面进攻了。

奉军攻山海关正面既遭挫败，探得九门口守备单弱，守将冯玉荣又庸劣无能，就以全力攻打九门口。九门口当时的局面，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却不及我在第一次直奉战以两营人对付四团人的紧急，无奈冯玉荣既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又没有随机应变的本领，竟自弃关后撤，但为彭寿莘部所阻，不得逃走，就服毒身死。奉军于十月九日占据九门口，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西边进攻石门寨，南边威胁山海关正面，正应了我对吴佩孚所说，一地得失，影响全线。吴佩孚听到九门口失守，大惊失色，于十月十二日亲率直辖劲旅第三师到山海关督战。（第三师原本是保卫北京的，到此时不得不开赴前线，京防便空了。）

吴佩孚既到山海关，以形势业已改变，就重新布置，改变从前计划。因为二十三师屡次战胜，并且损失最少，对我大加奖励。又以第一军第三路司令兼第九师师长董政国屡次战败，伤亡最多，准其辞职，将其部下第九师和第十四混成旅归我指挥。复以冯玉荣部溃散，第一路兵力单薄，将十二混成旅拨归第一路指挥。此后战略，不再专取守势，命二十三师出义院口绕道攻绥中，以威胁奉军后方。此举若得成功，则奉军数万人都在包围之中。这时榆关方面因吴佩孚亲临前线，援军亦源源而来，军心甚心振奋。奉军则精锐全在前方，因首取攻势，损耗甚大，后力渐渐不支。这时，二十三师部队出义院口，进到干沟镇，已经突出二百余里，距绥中只有七八十里，探知守军甚少，不难一鼓而下。可是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前线，影响了军事进行。

当冯玉祥回师北京的消息传到前线，吴佩孚大怒。他觉得冯玉祥的军队不堪一击，将总司令职务交与张福来代理，仓猝回转天津。吴临走时还对各将领说：“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去。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他回转天津，并没有抽调前线上的劲旅，只抓当地现有的军队。有潘鸿钧的一旅，是在前线上打溃了下来休息的；又有二十六师的一旅，是因为不能作战才留在后方的。这种军队，在杨村与冯玉祥的军队一接触，便溃败下来。潘被俘，旅长程某被吴正法，悬首天津新站，但吴在天津的处境却更危险了。

（摘自《直奉线史》王维城）

北京政变

背景介绍

1924年10月，正当直、奉两军在榆关一带激战的时候，直系将领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以驱曹。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兼行回师。23日凌晨进入北京，占据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派兵包围总统府，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接管北京全城防务。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原是吴佩孚的部属，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出任河南督军，因与驻防洛阳的吴佩孚发生矛盾，北京政府依照吴佩孚的意图，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免去其豫督的职务，改任为陆军检阅使。时值中国革命高潮之际，反曹、吴的呼声遍及全国，冯玉祥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因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饷糈缺乏，迟不进兵，暗中酝酿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同时，与胡景翼、孙岳、米振标(热河都统)及所属师旅长等联名通电主和停战，表示坚决与"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相周旋。10月24日，曹锟被迫下令：(一)前敌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衔，山海关一带军队着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以资结束；(三)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改派为督办青海屯垦事宜。接着，颜惠庆内阁提出总辞职。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于10月25日通电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同日，冯玉祥等在北苑举行会议，决定：(一)开元老会议；(二)组织临时内阁。10月31日，曹锟等待吴佩孚入卫的希望破灭，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兼教育、交通两总长，王正廷为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未到任)，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未到任由刘治洲代)。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送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至此，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

材料：

- 首都革命
- 国民军通告

材料一　首都革命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棚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一路以来，部队行进如流水一般，官兵无不欢欣鼓舞，至此益发精神振奋，大骂曹吴祸国殃民，我们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识到此番作为的意义和自身责职的光荣与重大。

那时参预总统府机要的人员，许多人与我们取得联络。吴在前线的情形，随时都有人给我报告。洛吴败讯，在我们开会议时即已闻知；但未证实，不敢深信。乃致电于吴，报告我们前头部队已抵达承德及沿途粮饷难济炮弹潮湿的困难情形，同时并探问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吴的参谋复电，有云："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根据此电可断定吴战不利之讯，确实无可置疑。我即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军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即日班师。

布置妥定，我即亲率刘郁芬首途返京，走到滦平，遇笠僧的代表刘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计划，请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签字，以昭郑重。次日抵高丽营，那晚刮着大风，天气极冷。黄膺白先生从北京赶来相见，详谈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吴在前线败绩之事，京汉线军民拥塞，弄得车辆倒错不开，吴怒而扣押司机，难民悉被锢禁于闷车中，扣在站上数日，整车整车的饥饿而死。种种凶莽暴行，令人闻而发指。当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组织摄政内阁，又把如何迎请中山先生之事具体计划一番。谈到深夜十二点，黄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风，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见，分配了工作任务以后，当天晚上八点钟即率部由北苑出发，十二点驰抵安定门。孙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务，同时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尽皆割断，一切应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办个妥贴。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见这些情景，都闪着惊疑的眼光，不知道这些事实究竟是如何出现

的。

这次部队回京，所以能够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瑞伯办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会议之后，鹿返驻在地密云，即每日令部队练习行军。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总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一头走着，一头于路旁打野外；有时刚刚支起帐棚准备露营，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赶回驻地。每日如此，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天天看惯。故奉命班师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为意，士兵们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达北苑后，照着命令在此间设法先运一团人入城。他每次派两连人，作为进城取东西的模样，暗进明出，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数次之后，城中即陆续聚了一团人。这一团人于奉命进城之前，于如何占据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电线、占电话等等技术办法都已有完密的计划与练习。到晚间大队入城，乃以混成营为单位，每一混成营辎重以至火夫俱全，掉一个身，以辎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后，鹿亲自带队前行，以防不测。一营入城，给以命令，带第二营续入，城中每个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队招呼，使不致走错路程。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弹办得妥妥贴贴，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为河北定县人，名钟麟，字瑞伯，曾为第一混成协学兵，那时第一混成协的学兵是有名的"龙虎班"，教官皆陆大毕业生。鹿在此三年，于战略战术及战斗知识有特殊研究，后来任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协营副，在四川时始来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为营长。民五在廊房任军法军，为炮兵营长及团长，升旅长，又升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为人谦下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堪任繁剧，与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战有作战的办法，作事有作事的办法，乃国家栋梁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洛，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意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会议席上，又将前晚与膺白先生谈的组织摄政内阁之事从头商讨一番。胡孙二位说：

"许多事都请总司令全权办理，不必一一和我们商量。事实上我们是分散各处，各有任务，难得聚会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事耽误了。"

我说："这却不然。内阁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大家从长议决；再则今天诸位都已在会，正该就此问题好好讨论一番。"

当时决定：曹吴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国民军入城后，他的卫队与曹世杰的所部都已由孙二哥派队缴械遣散，此事已不成问题。于是便商议摄政内阁的组织，其中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二职，最费研究。我的意思，以为无论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之议，必不可作罢。为表示此点诚意，并贯彻吾等初衷，此二职必得以老革命党充任之。当时孙二哥因提李协和先生曾为中山先生总参谋长，李书城先生曾为黄克强先生总参谋长，故决定请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李协和为参谋总长。因孙、黄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大家对此议均赞同。内阁人选即定，我们都觉得十妥十全。其中没一个我的私人，亦无胡、孙一个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意思决定的。摄政内阁于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黄郛充任国务总理，全部阁员的分配如下：

外交总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　黄　郛（兼）
海军总长　杜锡珪
陆军总长　李书城
司法总长　张耀曾
内务总长　王永江
农商总长　王乃斌
教育总长　易培基
参谋总长　李烈钧

内阁的名单发表，不免人言啧啧，说这回内阁人选，陆军、参谋、财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个内阁无一个不是南方人。曹吴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饭呢？其时竟有人郑重其事的来见我，对我大说一顿。我回答他们说："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么？眼光如此之小，请您回去再仔细想想看。"记得有好几位被我说的红着脸走了。

（摘自《首都革命》冯玉祥）

材料二　国民军通告

大家要晓得，这几年来，各省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谁生厉阶，谁是罪魁呢？就是那穷兵黩武、贪功嗜杀的吴佩孚了。吴佩孚此次要胁元首下令，兴师东北，仓卒之间，后方绝不筹备，所以一到前敌，屡战屡败，大多士卒，死于战争的，死于冻馁的，竟达四五万人。山海关一带，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谁非人子，谁无室家，言之痛心，闻之酸鼻。现在吴佩孚带了饥瘦零落的残部二三千人，狼狈徬徨，向后退却，不日就要缴械纳[投]降了，莫说他是已经败了，就是他侥幸胜了，也不过应那一句“一将成功万骨枯”的古语。我们堂堂正正的国民军早觉得内争无益，好杀残民，大乖人道，期望今后不再向国内用兵，与我四万万同胞休养生息，共谋建议和平的民治。须知现在余孽未尽铲除，若果深明大义，赞成我军和平的主张，便是我们亲爱的友军，若竟执迷不悟，志在扶同余孽，希图死灰复燃，那时也便不客气，就要以武力扑灭了。但是民物好生，心同此理，其有本人群互助的精神，共襄义举的团体，本军一律欢迎，还望大家兴起。国民军全体通告。

（《晨报》，1924年11月2日）

临时执政府成立

背景介绍

段祺瑞自直皖战争失败后，避居天津，等待时机，以图再起。及北京政变发生，直系政权垮台，皖系政客军人认为这是段祺瑞重掌政权的好机会。他们一面竭力抵制当时要求以委员制组织政府的舆论；一面由山东督理郑士琦向冯玉祥提出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的建议。这时，由于冯、张矛盾日趋尖锐，奉系实力虽强，但难以消灭国民军；而国、奉两军联合南下消灭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军事实力又不可能；而且冯玉祥的倒直及其倾向革命又为各帝国主义所不容，使黄郛的摄政内阁难以继续下去。因此，冯玉祥为防止直系势力北上，决定联皖制直，同意郑士琦的建议，于10月26日通电拥护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29日，段祺瑞通电响应冯玉祥的停战主张。30日，张作霖也通电推段祺瑞为联军统帅。吴佩孚见大势已示，在天津亲访段祺瑞时，也表示赞成和平。

迨吴佩孚南下后，为组织一新的过渡政府，并调处国、奉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待长江流域各省直系的策略，11月10日，张作霖、卢永祥和冯玉祥分别到了天津，在段祺瑞寓举行会议。由于段的居间调停，首先划定各军暂时驻扎区，后确定以河南、直隶两省地盘分属冯、张，以缓和双方的矛盾。同日，长江流域原属直系的各省军阀见曹、吴一败涂地，乃由齐燮元等十一人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接着，齐燮元又在南京召集了苏、浙、豫、皖、赣、闽、陕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并由他领衔通电，声言中央政府中断，概不承认北京摄政内阁所发的命令。冯玉祥鉴于长江流域各省形势日迫，乃在11月15日的天津紧急会议上，与张作霖决定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并力促其早日出山就职。段祺瑞以时机已至，乃于21日通电宣布他将接受各方拥戴，就任临时执政；并宣布其大政方针，期于一月之内召集各省区代表举行“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的善后会议；三月之内，召开由善后会议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

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3日，黄郛摄政内阁通电于24日解职。24日，段祺瑞在张作霖率领一批奉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宣布就任临时执政职，并发表就职宣言称：“段不才，忝膺执政，誓固共和，内谋更新，外崇国信”。同时，发布临时政府条例及各部人选，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于是，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遂告成立。

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即采取积极措施，消除直系势力。先后免去直隶督军兼省长王承斌、河南督理张福来、安徽督军马联甲、江西督理蔡成勋、热河都统米镇标、绥远都统马福祥、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等职务，分别以李景林、胡景翼、王揖唐、方本仁、阚朝玺、李鸣钟、张之江、王芝祥等为督办，并免京兆尹刘梦庚职，以王芝祥继任。其他段势力不及的省分，也将督军、督理改称为督办。并改任杨树庄继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于是，直系势力日见凋零。

材料：

- 段祺瑞出山
- 执政就职情形

材料一　段祺瑞出山

直系政权倒台后，摄政内阁首先为奉系所不满，各省直系军阀也都通电不承认这个政府。此时就有一批未参加贿选的议员，从事于维持法统的活动，主张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否认曹锟所公布的新宪法，仍以旧约法为过渡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并由非常会议选举临时总统，继续制定宪法。但是，国会除去贿选议员而外，所余议员已属无多，关于议员延长任期和除名递补等问题，在法律上又都缺少根据，而几年来国会议员分赃受贿、朝秦暮楚的种种丑恶行为，久为全国所共弃，国民党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

帜，北方军阀也没有人愿意支持国会，所以这一活动不久就幻灭了。

关于组织新政府代替摄政内阁的问题，冯玉祥所主张的委员制不为段与奉系所接受，最后由张作霖、卢永祥、马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法，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

段不但为冯、奉两系所推戴，同时还受到直系军阀的一致拥护(吴佩孚除外)。西南"联治派"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陈炯明等也都表示了拥段出山的态度，不过希望段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以符合他们割据一方的目的。总之，这位两年前曾经受到万人唾骂的卖国贼，这时突然变为全国实力派所拥护的对象，似乎斯人一出，多年来不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就可以完成，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得到解决。

段受到推举后，打算留在天津与孙中山见面后再往北京就职。由于吴佩孚在武汉放了一炮，冯、奉两系催促迅速成立新政府以定人心，段才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北京，二十四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

段在宣言中郑重其事地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个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为之骇然。十分明显，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此时西方帝国主义正因它们的工具直系政权被推翻，与日帝国主义产生了新的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南方革命统一战线的建成，它们更加害怕。这个宣言却使它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因此段上台的当天，外交团就决定承认这个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同时希望这个政府对吴佩孚不再使用武力。

段的宣言发表后，国民党曾去函加以谴责。同时，全国人民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个卖国贼毕竟还是卖国贼，此时不仅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成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工具。因此全国人民和段政府展开了"外崇国信"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两条外交路线的尖锐斗争。

段上台后，首先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由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临时执政在事实上是以总统而兼总理。二十五日，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总长。原来打算吸收奉、冯两系有关人物姜登选、薛笃弼为陆军、司法两部总长，他们都借口另有任务而拒绝入阁。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和阁员龚心湛、李思浩等都是安福系人物。这个政府虽然点缀了唐绍仪、杨庶堪两个南方政客，但是实质上是以安福系为中心的政府，唐绍仪始终未就职，随后提升次长沈瑞麟为外交总长。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

材料二　执政就职情形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合肥段决定二十二日进京，当以电话通知路局，预备车辆。京奉局长得讯后，即派路员柳昌年等乘专车一辆，沿途查看路线有无妨碍，并于车站备车以待。合肥卫队遂于先一晚由津开拨一部入京，共八列车，计四千人。合肥则于二十一日下午同张作霖、冯玉祥等乘汽车前赴马厂检阅军队，下午五时，始返私邸。当晚又召集紧急会议，对于应付时局有所决定。及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张(作霖)、冯(玉祥)及津埠军事长官、各国驻津领事，均至天津总车站欢送。下午一时至廊坊，张之江率全体官兵在站恭迓。二时在张庄车站，因候车头，少停。二时四十五分专车抵北京前门车站。首列为卫队，次差役，次随员，次饭车，最后为花车二辆，即合肥所乘也。车到时，军乐大作，欢迎者脱帽致礼，即有摄阁全体国务员上车欢迎。未几合肥下车，衣便衣呢帽，两鬓斑苍，精神矍铄，在站少憩，向众周旋毕，即乘汽车返吉兆胡同本邸。至车站秩序，由警卫司令鹿鍾麟指挥，济济跄跄诚极一时之盛。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余，摄政内阁国务总理黄郛率同全体阁员、文武特任简任各官、商民代表及外国顾问铎尔孟等，共计五百余人，均到执政府大楼下休息室鹄候庆贺。九时三刻，段执政由吉兆胡同乘汽车至执政府，沿途军警举枪致敬。抵门口时，军乐大作。下车后，由大礼官黄开文指礼。礼官照礼单依次赞礼，首由执事员分引国务员、特任官以次文武官及商民代表等序立。十时零五分，大礼官黄开文及侍从武官等，导引段执政由后堂休息室出。登礼台。段执政穿大礼服南向立。礼官赞肃静，奏国乐。乐止，礼官赞宣言，侍从武官恭递宣言书，段执政双手捧持，朗声诵读。其文曰：

祺瑞不才，忝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重任，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谨此宣言。段祺瑞。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历史内幕

国共携手真相

20年代孙中山在广东的处境极为艰难，他内受粤军将领陈炯明、叶举等的挟持，外受北洋军阀的围攻，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中。为了免除内部的冲突，希望向外发展，亲率建国第一军黄大伟部联合一部分桂军刘震寰等出驻桂林，名义上是北伐，实际上是缓和或者可以说是避免与陈炯明的冲突。他只求陈炯明按月给他相当的给养，至于广东政府从上到下一切用人行政，他都不过问。陈炯明一身兼九个要职，如军政部长、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之类，可以说广东政府实际权力是在陈炯明的掌握中，已形成了陈炯明的“狄克推多”的局面。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北伐军大元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而且陈炯明已与北洋政府信使往还，孙中山有随时被陈炯明遗弃的危险。

这时苏派马林来访，孙中山派廖仲恺在广州接待他，很快地就派人送他到桂林。孙中山正在苦闷中得到马林的访问，作过好几次的长谈，当然主要谈的是中国革命问题，也涉及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在精神上给孙中山很大的鼓励。孙中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知道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很孤立，他如果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建立“联俄”、“联共”的关系，在国际方面就可以得到苏俄的支持，在国内就可以得到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使他在广东摇摇欲坠的革命政权得到新的血液。他认识到革命的武装固然是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以革命之名而行私人割据之实的武装部队，不仅不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是革命的障碍。同时，他了解到组织革命的武力与他一贯地运动军队搞的军事投机也有本质的不同。

自从马林与孙中山会谈以后，孙中山才由悲观失望转变为生气勃勃，勇猛前进，他的革命方法由依靠军事投机转变为依靠工农群众。他更大的进步是开始接受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确定以俄为师的政治路线，学习列宁的革命理论和方法，开始建立他的革命理论，把他的思想和已经写出来了的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修改成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晚年即在1924年夏天在广东大学所讲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在民生主义部分中特别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做共产主义。”虽然说很多地方是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倾向到新的方面，这不能说不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进步和转变。

孙中山同马林会谈之后，他的思想被革命的真理武装起来了。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由桂林回到广州，对陈炯明等不假以词色，甚至下令免去陈炯明的本兼各职。孙中山当时在广州差不多是赤手空拳，他敢于同陈炯明的数万骄兵悍将决斗，所恃的是什么呢？无疑的是国际方面有苏俄的联系，在国内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支持。他认清了革命的力量，知道了革命发展的方向，他才不怕反革命的骄兵悍将，更不怕失败。

约在1920年粤军回粤之后，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之前，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时，曾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从事实判断，陈炯明对陈独秀似有相当的信任。陈独秀离开广东时，是1921年9月的前后，孙中山下令免陈炯明本兼各职，是在1922年6月中，此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在酝酿中，并无成议。陈炯明被孙中山免职以后，即由广州退到惠州，表面上通电下野，暗中是在进行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实行他的所谓联省自治。在这双方相持的形势之下，国民党人跟着孙中山的固然是多数，跟着陈炯明走的也有，首鼠两端乘机观变的也有，而共产党在当时的政论上是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共产党义正词严地把革命与反革命划清界线，使孙中山革命的旗帜更鲜明，革命的力量更强大，全国的进步势力都站在孙中山这一边，孤立了陈炯明，挽救了孙中山和国民党。

在陈炯明叛变，叶举炮击总统府的前后，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如陈公博、谭植棠、谭鸣谦（谭平山的原名）等违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们这三个人迷信陈炯明的实力，看不起孙中山的空架子，他们同陈炯明搞在一起。共产党中央对他们三个人写信、打电报，下命令要他们帮助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他们不听。陈炯明窃踞广州时，他们还是照旧任职，共产党中央命令他们离开广州，他们才推谭平山到上海报告广州的情况。中共中央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党籍，谭平山也受了处分，要他到北京听候分配工作。1922年秋天，“今日派”的领袖胡鄂公希望加入共产党，多方拉拢共产党人，他拉谭平山到高等警官学校任训导主任。当时李世璋也在警官学校任职，李世璋同谭平山的关系就从此开始。一直到1923年秋冬之交，孙中山再回广州主持革命大计，正式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共产党才派谭平山回广东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

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中，谭平山成为一时的红人。陈公博、谭植棠一直追随陈炯明到底，在陈炯明战败的前夕，陈公博骗了陈炯明一笔钱，溜到美国混了两年。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到1923年底才正式建立起来。在联合战线的初期，发生了不少的波折，主要的情况是：在国民党方面，它虽然说是个有领袖没有群众，大而无当，空空洞洞的党，但是它有辛亥革命，缔造共和的历史，孙中山之下还有不少的大人物，有国会的议员、议长如张继、谢持、居正、田桐、邹鲁、冯自由之类；有在民国初年当过督军省长的如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熊克武，但懋辛及正在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等；还有华侨的领袖陈友仁、邓泽如、陈树人等；帮会的上层人物李福林、魏邦平、樊锺秀等，以及搞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还有一些有影响的人如于右任、胡景翼、孙岳、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汪精卫等。就当时的情况说，这些人是士大夫集团，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差不多都是风头人物，在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是思想落后的人物了。他们差不多都中了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毒，把苏俄和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似的，称为“过激派”，同这样的一些人来谈“联俄”、“联共”，就如对牛弹琴！一窍不通。但是孙中山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人，他不顾一切要建立“联俄”、“联共”、“工农政策”，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创造一个新的局面。他在癸丑之役以后，鉴于国民党的暮气很深，他不顾黄兴等的反对，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他领导少数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革命。在陈炯明叛变以后，他理解到国民党的失败，仍然是因为组织不健全，纪律不严密。更以受了列宁的启示，苏俄革命的影响，所以马林的建议一提出，他就很敏感地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在决定改组国民党时，谢持、居正、田桐、张继、冯自由等极力劝阻；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他们鉴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无法挽回，他们不跟孙中山走，也没有另外搞一套的政治本钱，因此就造成了国民党内的“反共”暗潮。从表面上看，当时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活动的有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陈友仁、邓泽如等。其他如宋庆龄夫人、何香凝夫人是赞成孙中山的主张的，但是他们此时还没有参加实际活动，蒋介石此时还是革命的后辈，不起甚么作用。事实证明真正襄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只有廖仲恺、陈友仁等少数人而已，其他如伍朝枢、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以及大小军政学方面的人物，多半是乘机观变，依违两可，或是别有用心如胡汉民等，一面装出孙中山的股肱心腹的样子，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一面暗通右派搞反共反俄的活动，这就是联合战线建立的初期国民党方面的情况。

共产党方面，也有些不利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问题存在。当时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学生、教职员、新闻记者及少数的工人，大部分是没有政治经验。把革命事业看成是纯洁的神圣的事业，对于在政治上争权夺利的人就看不起，自视过高，对整个的政治环境估计不足。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看法，从好的一方面，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从坏的方面，说它是堕落腐化，争权夺利的士大夫集团。

我们不相信国民党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更不相信国民党能够同共产党共同革命，这是国共联合战线的初期许多共产党人的见解。但是在共产党的初期，党的集中领导重于民主，中共是服从第三国际的，地方是服从中央的，个人是服从组织的，这一次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是从上而下决定下来的，虽然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了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不过对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多的争论；最后的决定是：共产党员得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内部可以指定某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中央书记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及谭平山、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事实上是孙中山指派的），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这样才把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与政策方针作了新的部署，中国国民党的阵容为之一新。

（选自《包惠僧回忆录》）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做过的“官”

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组织，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的。许多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各级领导工作。毛泽东是这次合作运动的热诚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他担任过国民党多种领导职务，为国民革命运动作出过重大贡献。

一、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会议。1月22日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毛泽东被大会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1月30日，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根据孙中山的提名，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大会召开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

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宣传工作报告，大会决定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并参加起草《关于宣传决议案》。1月18日，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7月，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即终止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务。

二、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职务

1924年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组织中央执行部，指挥监督当地党务工作。全会肯定了加强上海党务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规定上海执行部统辖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的党务。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2月25日，毛泽东参加上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组建执行部机构，确定各部门人员。毛泽东被推选为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部长胡汉民）并代理文书科主任（主任邵元冲未到职）。毛泽东具体指导了上海各区党部的整顿和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等工作。

12月底，毛泽东因劳累过度，请病假离沪回湘休养，结束了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三、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职务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以政府事务繁多，难于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会议通过此案，并要求毛泽东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于是毛泽东立即赴广州任职。

11月2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3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宣传部出版一种周刊，作为刊载革命舆论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宣传阵地。会议决定出版《政治周报》，由中央宣传部主办。12月5日，《政治周报》第一期正式出版，毛泽东任主编。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在1月22日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组建新一届中央党部，推举中央各部部长人选，汪精卫仍然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全会通过毛泽东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提案。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整理党务案》，限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辞职。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8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5月28日第29次常务会议照准。于是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政治周报》也随之停刊。

四、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职务

1926年1月23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推举林祖涵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2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次常务会议议决，成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中央农民部工作。毛泽东由中央农民部提名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次常务会议，批准农民部提出的“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于是毛泽东担任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结束，到武昌主持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议决，推举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由毛泽东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

1927年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担任了中央农民部部长。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土地委员会，具体研究有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民土地问题。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了由邓演在、徐谦、顾孟余、毛泽东、谭平山五人组成的中央土地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幼稚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认识了国情，积累了经验，探讨了理论。毛泽东的这一重要实践活动，虽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告结束，但为以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贺世友，选自《党史研究》）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廖仲恺点将叶剑英参与筹备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大会

还有一个重要的建树，那就是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鲍罗廷等多次会谈，采纳了他们提出的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的建议，于1月24日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并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这次代表大会的消息，象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珠江两岸，使身在广州的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孙中山精心物色人选，于2月1日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等7人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定于2月6日在广州南堤2号正式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处，开始办公。

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推选李济深、王柏龄、林振雄等分别为临时主任，李济深是粤军第一师师长，暂不到职，由邓演达代任。

蒋介石虽被委派担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真正负责实际筹备工作的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孙中山在筹备军校之始，就委任廖仲恺当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廖仲恺不但日夜为筹措办校经费操劳，也在为物色办校的人才费心。他听说粤军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材，便邀请他来参与办校。

当年，蒋介石并未看好黄埔，曾一度欲停办军校；廖仲恺抚慰筹备人员，叶剑英勇挑大梁

天有不测风云。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忽然来到筹备处，召集大家开会，郑重宣布：本人奉蒋委员长命令，特意奉告诸君，军校从今天开始停办。

在座的同志眼睛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使者，耳听宣布这样一个莫明其妙的消息，半晌没有吭声。

叶剑英站起来，质问这位秘书，停办军校是件大事，究竟为什么停办呢?创办军校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宜任意宣布停办；再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即使不办了，也要说个明白。

邓演达和叶剑英等提出抗议，反对不明不白停办散伙！

停办军校，筹备处散伙，象一阵旋风在广州和黄埔岛的上空刮起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邓演达、叶剑英等人摸不清底细，经过商量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决定去请示廖仲恺，恰好廖仲恺先生去了香洲不在广州。廖仲恺回来以后，立即到筹备处来安定人心，主持办校大计。他对大家说：“诸位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你们中间有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美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

大家听了廖仲恺的一番话语，吃了定心丸，纷纷表示按廖先生的意见去做，叶剑英从心里敬佩这位革命先驱的开阔胸怀和与人为善的精神。

蒋介石在离开广州前，特意给孙中山留信，要求辞去军校的职务。孙中山劝谕蒋介石“务须任劳任怨”、“不准辞职”。同时任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廖仲恺也多次电催蒋介石回归。

在蒋介石辞职未归的日子里，军校筹备处在廖仲恺的关怀和领导下，继续紧张地工作着。

蒋介石走后，由于王柏龄三心二意，若即若离，筹备处有关教授方面的事务多半落在叶剑英肩上，从制定教授计划方案、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到置办教具，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操办。许多重大问题还要同王柏龄、邓演达等商量，请示廖仲恺才能解决。

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以校为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很久没有回音

5月5日，黄埔军校终于开课了。

从全国各地考取的近500名有志于革命的热血青年，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军歌，跨进校门，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为了加强对军校的领导，学校组织机构陆续健全起来。孙中山亲自兼任学校总理，确定办校宗旨是“创建革命军”，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倡导“团结，奋斗，牺牲”三大精神。他非常强调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制度。5月9日，他特别任命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执行党代表的职权，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由党代表签署交由校长执行，否则无效。

1924年6月16日，学校正式开学。孙中山特意选中这一天开学，是为了纪念三年前在广州蒙难的雪耻日。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向全校师生发出号召：“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

黄埔岛上阳光灿烂。数百名热血青年，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按照孙中山创造革命军的要求，明耻教战，以校为家，跃马谈兵，闻鸡起舞，到处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叶剑英斗志昂扬，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教育训练之中。他黎明即起，着装整齐，跟上学生队伍，沿着黄埔岛开始了长跑。他看到有些“公子哥”式的学生，怕苦怕累，便开

导他们说："我们上军校是来干革命，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你们看，现在东西北江，哪一条江不是炮声隆隆，平时舍不得流汗，打起仗来就要多流血的！"

军校日常生活和作风的养成是严格紧张的。这和蒋介石等许多高级军官就学日本是有关系的。他们把日本军校的军规、军纪、军礼等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规定学校每周都要实行内务检查和武器检查。叶剑英等轮流到各队检查，从军容风纪、整理内务，擦拭武器到出操、晚点等起居作息的各个环节，都认真检查，坚持讲评。在这些方面，叶剑英一点也不含糊，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同学们敬佩地说："叶教官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他处处率先垂范，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

军校正式开学后，各种军事教育科目，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数百名学生，只有一二十名教官分担那么多的科目，人手奇缺。叶剑英除继续到各队讲授兵器学课程外，又担任了劈刺课和战术教程的讲授和训练。劈刺课是冲锋陷阵、短兵肉搏的基本操练，在步兵课程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是叶剑英的"看家本领"。他的透辟讲授和精采表演吸引了许多教官和学生。

在战术教学中，叶剑英遇到难点，向邓演达、钱大钧、顾祝同等教官虚心求教。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战术原则并学会应用，叶剑英十分注意教授法。

他自己绘制地图和标图，与学生共同研究假设战斗中各兵种的行动和协同动作，讲解指挥军官如何记述和传达上级命令、通报等，作出准确的战术判断。同时进行沙盘作业，作出各种地形地物，用队标显示各兵种行动以及单兵和小部队的动作，以增强形象感，使学生对战术原则融会贯通。

叶剑英利用出操和野外演习的机会，指引学生观看环岛的要塞炮台，告诉大家：这些炮台，大都建在鸦片战争时期，是两广总督林则徐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防设施。

叶剑英回顾历史，介绍说，那个时候林则徐亲自订下岛上要塞群的防守章程，叫做"寓兵于农，寓将于学"。规定各家各户有养护田，农忙时从事生产，农闲时就操练，平时是农民，战时是武装的壮士。这种约法，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他联系现实趁势启示大家说："可见，革命军一定要同民众结合，才能打胜仗，否则，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这就是中山先生说的'扶助农工'的道理。"

叶剑英接着向大家讲述两年前，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往事，告诉大家，那时孙中山就驻扎黄埔港，依托这些炮台，与叛军英勇作战。他意味深长地说："可惜当年没有得到工农群众的配合和支援，所以暂时失败了。但中山先生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是永远要发扬的。"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把昔日学得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学员们，教学相长，他自己从教学实践中也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思想水平，同时更当重要的，已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新的收获。在军校第一期学生中间，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叶剑英也经常参加这些进步活动。同时，购买或借阅《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史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著)、《社会进化史》(蔡和森著)等书籍，认真研修，提高认识。学生队有个共产党员叫韩摩柯的，是梅县人。叶剑英同他结识以后，因为是同乡关系，便试探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叶剑英并没有灰心，继续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叶剑英后来写的这两句诗，再恰当不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作者范硕，选自《党史博览》94年1期)

二次直奉战前后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拉拢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本占优势，但结果直军溃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其主要关键，在于冯玉祥所发动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固然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但是张作霖利用直系内部矛盾所进行的拉拢冯玉祥的活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兹就当时亲身经历和见闻，追述如下：

在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窥知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因争夺河南地盘发生了矛盾，乃蓄意与冯暗中联系，一九二三年春间曾派其司令部参谋处科长傅兴沛秘密入京，进行活动。傅因与冯的参谋长刘骥系陆军大学同学，到京先至刘的私寓与刘晤面，托其向冯转达来意。刘允于翌晨向冯报告，并说："如明天上午给你来电话，你可即来南苑进见；如无电话，你就急速返回奉天吧。"第二日上午，傅接到电话，即驰赴南苑与冯晤面，代表张作霖深致问候之意。冯说："北京耳目众多，你立即回奉天吧。"傅即于当晚离京回沈。这是奉军与冯的秘密联系的开始。

不久，直军王怀庆部强制没收张作霖在北京的房产顺成王府，当时张派在京看守顺成王府的，为其亲信副官马炳南。马在留居北京期间，时与冯的交际处长张树声相往还(冯在二十镇任步兵连长时，张树声任骑兵连长，马炳南任团书记官，三人早已相识，冯、马又均系基督徒)。据张树声向马透露，冯的处境极为苦闷，颇有与奉军联系之意。马于顺成王府交出后，返回沈阳，即将张树声所谈

情况密报于张作霖父子。张即派马炳南再行入京，与冯暗取联系。适值冯与李德全结婚，马乃代表张学良往贺，并约前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北京市公益联合会总干事刘锡廉（字砥泉）一同前往，由张树声带领见冯。在马谈到张氏父子愿与冯合作时，冯曾向马笑着说："你在两大之间（意指他与张作霖而言），要好好负责。"在那时，通过马的往还，曾由奉军秘密接济冯军一些军事上的补给。从此以后，双方联系始终未断。

一九二四年秋，曹、吴密谋出兵东北，马炳南复往南苑见张树声探询冯氏意向。张告以：吴拟派冯率部出古北口，经承德、东蒙绕击奉军后路，并以黑龙江省主席许冯；但冯因吴在第一次直、奉战后行赏不公，心怀怨望，现已决心，接受张绍曾"全军为上策"的秘密建议，不拟与奉军作战云云，并嘱马见冯面谈。马旋往见冯，冯派刘骥代见。刘竟称冯部行动，一切听命中央。马闻之愕然，当答以中央乱命，何必听从，辞出后即往告张树声，始知刘所谈非真心话。张并密告马：冯部一师三旅已奉命日内移防，分驻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镇、古北口，并转达冯意，请奉军万勿入关，嘱马立即回沈阳报告，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

马炳南当即由天津搭轮转大连到沈阳向张作霖报告，并遵张命报告杨宇霆。杨当将张作霖致张绍曾、靳云鹏函各一件交马炳南入京面投。马到京时已逾期三日，冯军先头部队已开往承德，冯本人也进驻古北口。马即偕刘锡廉往找张树声觅一汽车同往古北口见冯。途中适遇王承斌赴古北口监视冯部进军，检查颇严，马等乃将张作霖函撕成三分，由张、刘、马三人分别携带。及至赶到古北口，马将撕碎的张作霖致张绍曾函拼凑起来交冯。张信大意是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阅后很为满意，当即用一张旧东昌毛头纸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下署"玉祥"二字，并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奉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资识别。至此，协议完全成功。在此同时，冯接到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告，"前线形势危急，不有意外的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因而更坚定了回师北京的决心。

马炳南由古北口回来，行至建昌县，即被毅军截住，不得前进。以后马回南苑，潜伏了两天，冯军即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当时冯所写的"成"字复信，曾由马托张树声、王国裕（东北人，朱庆澜的旧部）带至东北交给张作霖。张、王二人由热河平泉、凌源穿过毅军米振标部防线，始达沈阳，但为时已在北京政变以后矣。

（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作者：马炳南）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勾结日本的两件事

第二次直奉战中，我担任奉军一、三联军参谋长，当时奉天方面与日本关东军勾结的两件事，在我脑海中印象很深。

其一，在战争将开始时，张作霖不放心前方的情况，特由奉天派来一个日本军事顾问团，这个顾问团共十余人，为首的系一中将级日本高级军官（据闻系南满路守备队司令菱木某）。他们来到一、三联军司令部，司令部特备三间宽敞的房子，挂满了军用地图供顾问团使用，日本顾问团首先询问我军攻击计划，以及追击目标。我方扼要地报告了攻击计划，并告以追击目标决定为滦河车站。日顾问团对我方拟定的追击目标，认为太远，他们主张追击目标，应在榆关镇和北戴河。原来日顾问团是以日本军队的训练标准来作决定，殊不知中国军队（当然是旧中国军队）所谓"兵败如山倒"，一旦败仗下来就不可收拾。我方参谋人员与日顾问团正在争议间，经张学良采取折中办法，改定追击目标为昌黎、抚宁。后来战争发展证明，我方起初所拟定的追击目标（即滦河车站）仍然正确，日顾问团所定的就显然太近了。直军溃败后，张宗昌率部首先抵达滦县车站，收缴了直军大量人员和武器。一、三联军是奉军的主力，牺牲也最大，由于追击目标定的太近，战果因而减少。

其二，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战斗正在最激烈之际，奉方子弹忽告紧急，一、三联军只剩子弹二十万发，仅第一军裴春生一旅在一个夜晚即消耗二十万。原来奉军训练太差，士兵以乱放枪可以助胆，遂任意射击，特别在黑夜，乱放子弹已成为习惯。当时张学良非常着急，一面购买大批纸制鞭爆送往第一线，以替代子弹；一面召集郭松龄等重要将领开会（未令姜登选参加）。张说："我去奉天向大帅要子弹，如一周不回，咱们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匪。"正在此时，山海关以北安民塞方面直军靳云鹗派来军使商量求和。这个军使走到陈琛炮兵阵地方被发觉。当将军使两目用布蒙蔽送来总部。我们利用这个军使，虚与委蛇，迤延时间。幸好一周之后，张学良返回前方，带来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弹四千万发，炮弹十万发。收到这些弹药之后，郭松龄率领四个旅出击，一举而突破直军阵地。据后来听说，日方供给此项弹药。

（录自《近代史资料》，总37号，作者：魏益三）

溥仪出宫

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取得胜利后，冯玉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先提请黄郛摄政内阁予以讨论。在这一提案尚未交付阁议的时候，北京警备总司令部获悉清室已预知其事，且将有所举动。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即据以报告黄郛，并谓事不宜迟，迟恐生变。黄郛乃连夜召开紧急阁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

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是：

"今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规章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当归民国政府所有。"

紧急阁议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改通过后，即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十一月五日晨，鹿、张、李会商执行步骤。张说："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带多少军警?"鹿答："军警各二十名就够了。"计议既定，先将故宫外军警布置妥当，并将电话线割断后，即率军警各二十名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其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张、李径趋溥仪住所。值清室正开"御前"会议，当由内务府大臣绍英出迎，鹿等即出示国务院通过的修改优待条件，并告知来意，请其转达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虽惊慌失措，但仍故示镇静，并指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绍英又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他们稍停片刻，现在就出了乱子了"。绍英不得已，乃入告溥仪，但往返数次，仍希有所转圜。鹿见事不能决，乃故意大声告其随从人员说："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溥仪闻而大惊，于是立即答应迁出宫外，随即交出印玺，收拾私物，在鹿、张、李的监视和保护下一同离开故宫。鹿并亲自送他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鹿问溥仪："从此以后，你是愿意当平民呢，还是愿意作皇帝?在我们中华民国，不允许皇帝存在，我们有对待皇帝的办法。"溥仪答称："我既答应接受修改优待条件，当然不能再作皇帝，我愿作一个平民。"鹿说："我们对平民当然要保护。"

溥仪离开故宫之后，对宫内的宫女和太监等均任其自由迁出宫外。

溥仪出宫后，即由国务院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十四人，为：汪兆铭、蔡元培、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绍英、耆令、载润、宝熙、罗振玉(绍英以下五人为清室所推荐)。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损。故宫的警卫由鹿钟麟派兵担任，直至国民军撤出北京时，始交由内务部接管。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出宫之次日，段祺瑞曾致冯一电，极表不满，其电文大意是："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为："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过了几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溥仪即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下车后，复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看中了溥仪这个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往日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所布置的。但是当时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却对此政治阴谋等闲视之，始终没有对日本方面提出过一次抗议。当时北京"反对优待清

室大同盟"曾为此发表宣言，谴责段政府放纵溥仪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嗣后溥仪如有危害国家的行为，日本人应负责任。

（摘自《晚清宫廷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缪秋杰彻查鄂岸盐务舞弊案

1924年6月，汉口揭发出了一起官商勾结、侵吞盐税[illegible]0万元的大舞弊案，引起"社会轰动"，成为当时"通国皆知"的一大要闻。

自清朝以来，盐政的腐败黑暗一向以两淮为最；积弊之深，又以两淮之四岸（湘、鄂、赣、皖四省是淮盐行销区域，分别称为"湘岸"、"鄂岸"、"西岸"、"皖岸"，）为尤甚；四岸之中，鄂岸又向称弊薮。民初鄂岸盐务机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鄂岸榷运局，隶属盐务署，主管盐务行政；一是鄂岸稽核处，由稽核总所管辖，专司稽核盐税。其时，鄂岸专商引岸制度根深蒂固，官视商为利薮，索费徇情，商视官为护符，短斤营私，使盐务管理中充斥着腐败现象。这种状况，诚如鄂盐舞弊案检举人鲍骧所检举的。鲍骧原系鄂岸榷运局售盐所事务员，供职九年，经办关于售卖余盐事务，深悉内情。他在告发信中说，鄂岸官销淮盐每年350票，每票4000担，运商于收盐时以司马秤，运到汉口售出时则改以库平秤计算，两相比较，每担多2斤4两，此项余盐为部准免税。另外每担另加卤耗5斤，每票遂多出20000斤，而实际消耗仅在6000斤上下，其余140000斤左右为多出之余盐，应照部章纳税。汉口榷运局及各地分局每年销盐约在二百三、四十票，合计余盐27000担左右，应交国税50000余两，折合银洋80000余元。而此项余盐为历任鄂岸榷运局长勾结淮盐公所（设置在汉口的淮盐运商组织）与汉口稽核处的部分人员，私勒盐税每担3元，由淮盐公所公然在榷运局设柜课本分收，再加上私售漏税等舞弊行为，每年吞没余盐税达十余万元，从1919年起至1924年案发事止，共侵吞国税约500000元左右。据称，这项舞弊收入，榷运局分得5成，稽核处得2成，淮盐公所得3成。鲍骧还指出，凡财政部所颁售盐凭单，"皆以天地元黄等字编号"，而榷运局所售漏税余盐凭单，则"系以局字编号"，即凭单亦非部发，这就为此案提供了确凿证据。然而上述"私售余盐、侵吞国税，上下其手，相率分肥"的黑幕，非局中人不能知其底细，此外私分余盐漏税也是自清以来盐务界约定俗成的一项陋规，所以长期未被揭发。

1924年春，北洋政府财政部稽核总所委派巡视员缪秋杰出巡扬子四岸，"彻查盐务利弊"。缪秋杰，字剑峰，江苏江阴人，1913年步入盐务界，后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办、局长等职，对民国盐政建设和改革贡献殊多。其时他35岁，在稽核总所已小有名气。缪氏视察的消息传出，鄂岸榷运局、稽核处等为掩盖其舞弊罪证，事先派稽核处调查员江某到榷运局，嘱鲍骧将私售余盐的印票簿据预先收藏起来，并指示当缪氏到鄂时暂停提售余盐，以免为其查悉。不知是因为受到排挤、分肥不均的缘故，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敢同流合污，对于此种弊窦，久思自行出首，借赎前衍"，当他在5月间听说缪氏将巡视鄂岸消息后便打算向缪告发此事，因此对江某答以"事涉暖昧"而拒不执行。榷运局长王毓芳知道后大为震怒，干脆于6月9日将鲍骧开除，鲍骧实不甘心，便将提售余盐的凭单等各项证据分别捡齐一大箱携走，逃入日租界，准备缪秋杰到汉时检举揭发。

但是缪秋杰于6月16日到汉后，被鄂岸盐务官方有意安排在稽核处长严家驹私宅里，鲍骧无法晋见，只得递送函件，而两封信函又均被严家驹扣留，"使下情不能上达"。缪秋杰虽风闻鄂岸舞弊情形，但终未能见到鲍骧，亦未得确据，不久即离汉北上。而榷运局则先发制人，以鲍骧诈财未遂为由，下令通缉，意图索还证据，掩盖其吞税分肥的种种劣迹；鲍骧则一再在报上发表通告，揭发此案内幕。汉口《江声日报》、上海《申报》、北京《晨报》等报刊以《鄂岸官商吞税大弊案》、《鄂岸舞弊真相》为题详细报道了案情，并主张究办。由于案情严重，牵涉要人甚多，诸如前任榷运局长王嵩孙、孙尔康、赵秉琛，现任局长王毓芳，现任处长严家驹及淮盐公所经理万援伯、坐办朱执甫等，皆与此案有关，所以此案成了轰传一时的社会要闻。

自此案揭露后，淮盐公所方面，极为恐慌，派童某以巨金向报馆疏通，请勿宣传。但王毓芳、严家驹等则自恃有背景，态度非常强硬。6月26日，鲍骧在日租界被榷运局兵士及日探捕去，拘禁在榷运局总务科长王文明等伙开的日亨银号内，"颇受优待"。不久，传闻鄂岸当局应允鲍骧复职为交还舞弊证据的条件，双方谈妥订约。王毓芳见鲍所携走的单据已收回，别无顾虑，便于6月30日特电盐务署自请查办。一时间因官商设法掩盖真相，又失去案子重要见证人，此案遂成见首不见尾之局。

不料7月初，榷运局见"案将消息"，又呈请盐务署拿办鲍骧，并指令内部属员开列罪状控告鲍骧。鲍知上当，设法逃脱匿居在租界之内，将留存私吞盐余凭单四张"撮印多份，公诸报端"，引起各界大哗，有省议员郭璜提案请办，连遁居岳阳的吴佩孚方面也派员询查，社会舆论一致呼吁彻底查处，"为盐纲一祛积弊"。迫于形势，盐务署免去王毓芳职务，由曹元森接任榷运局长。稽核所方面，因此案事出有因，且牵涉到汉口稽核处有关人员，准备彻查。因缪秋杰坚主查办，且素以刚直著称，于是稽核总所于1925年春免去严家驹职务，特调缪秋杰为汉口盐务稽核处长，"使其彻查积弊，以图根本革新"。

缪秋杰到汉口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并深入到武

穴、黄安(今红安)等分局查证落实,首先查明了鄂盐舞弊案的真相,确如鲍骧所说,“并非张大其词”,而且缪到任后,淮盐公所照例送给他余盐税款的1/3,缪收下后全部汇交稽核总所,更加证实了确有此项陋规存在。同时,缪还发现鄂岸盐务机关营私舞弊、侵吞国税的现象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而且其手段变化多端,不胜枚举,除侵吞余盐漏税以外,尚有勒索盐商规费、私加盐价等等。

面对这种情况,缪秋杰决定以彻查舞弊案为契机,进而逐步对鄂岸盐务进行全面整顿和改革。他首先拟定了数条补救办法,如规定由榷运局和稽核,处双方封锁盐仓以杜卖私盐;派稽核处人员监视各分局以防私加盐价扣留商本;商人纳税直接交给中央银行以防止挪移税款生息图利等,并上报盐务署与稽核总所核准实行。显然,上述措施是以加强盐务机关的职责为重点的,并试图通过简化商人纳税环节而防止官商舞弊。不料鄂岸榷运局因这些办法损害了其权力和利益,大加反对。缪秋杰在初步的改革受到阻挠后,知道要清除积弊,光靠治标不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便呈准将阻挠改革的榷运局长曹元森撤职,由吴本忠暂代,并于7月份发表《鄂岸盐务改革商榷书》,上报署所,同时公诸报端,以求获得民众的支持。

在《商榷书》中,缪强调实施鄂岸盐务改革的宗旨是为国计民生,减轻人民负担。他建议撤销“病商扰民”的鄂岸榷运局和稽核处,将其原有的岸税改在产盐区征收。并主张盐价由盐务最高机关规定,不准私自增加;盐质必须洁净,不准掺加泥沙,售盐时不准克扣斤两;违者严加惩罚。缪秋杰知道,革除陈规陋习,触犯了那些长期倚恃陋规牟取厚利的专商及营私分肥的盐官们利益,必然要遭到他们的拼命攻击,而盐税征收权的集中,也必然会遇到昔日靠擅提盐款为己用的地方军政当局的掣肘,但他明确表示:“所以主持积极改革者,亦因盐税抵借外债,我国如任其窳败,不亟自整理,人将代谋,非仅吾国人士之羞,实丧权辱国之尤”,因而“时艰虽棘,人格尚存,在鄂一日,即尽一日之责;宗旨既定,非武力金钱所能左右,亦非利害毁誉所能动摇,自当坚持到底。”

缪秋杰的盐务改革计划受到稽核总所与盐务署的重视。9月,署、所核准于鄂岸实施就场征税政策,命令自9月15日起,所有行销鄂岸盐斤产销两税均在两淮产地一次完纳,鄂岸不再征收。此令一发表,鄂岸官商大起恐慌,一面宣布停运以为要挟,一面运动军阀电请中央取消成命。这项改革政策实行甫经两月,不久即发生直系军阀吴佩孚截留苏浙闽皖赣豫川鄂湘陕晋黔十二省盐税的风潮,缪秋杰因抵制截留盐税及彻查鄂盐舞弊案,开罪地方势力,被湖北督军萧耀南下令拘捕,此项改革遂告流产。秋杰在鄂岸彻查积弊,改革盐务,其锋芒所向,是对准封建引岸专商垄断制度的,虽遭挫折,但对日后鄂岸盐务改革影响深远。

(刘经华)

历　史　考　证

黄埔军校为什么定于6月16日开学

1924年9月底,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一期第三、四队学生(一、二队已拨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五队,我是第四队学生)在韶关举行毕业典礼,由孙先生亲自主持和亲手发给毕业文凭。在典礼大会上,孙中山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并解释了黄埔军校定于6月16日开学的意义。

孙先生首先讲述了革命道理和北伐的重要性,然后说:我革命了数十年,积累经验和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认识到搞革命有了革命党还不行,还要有真正革命的军队,亦即党领导的军队,所以我要成立黄埔军校作为党的军队的基础。因过去十多年来,有自称革命军队,投靠革命,但其目的是要地盘、要饷、要械。他们不仅不革命,而且进行反革命。陈炯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跟随我很多年,而且做到了总司令,一旦关系到个人利益时,就进行反革命勾当。1922年6月16日,他竟倒行逆施,炮击总统府,实行反革命。所以我决定6月16日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日子,作为没齿不忘的纪念日。但我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只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军人应有牺牲精神,没有将定于6月16日为开学典礼的意义讲给大家听。现在你们毕业了,同样也是我的学生,而且你们听我讲“三民主义”和革命道理很多次,更应深深体会这种精神;现在马上就要大举北伐,你们到革命军队里去,要宣传革命道理,还要注意部队的动态,有没有陈炯明第二。同时你们要将我最后这段话,转告给黄埔军校的全体同学知道,使他们明白自己所负的使命的重要性……

时间已经过去63年了,孙先生的这段讲话,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

(选自《纵横》87年3期　作者:冯也愚)

"黄埔"筹建时蒋介石为何挂冠而去

在中国现代史上，黄埔军校是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曾被誉为"革命势力的制造所"、"国民革命的中心"。对蒋介石个人来说，黄埔军校则无疑是他起家发迹的重要资本，军校的创建，是他政治生涯的新开端。但在受命筹建黄埔军校的过程中，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辞职而去，使军校的筹备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状态，并由此导致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门于蒋的回任复职，这一段诡谲莫测的插曲已很少被人提及，其曲折内幕更是鲜为人知。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原是蒋介石孜孜谋求、向往已久的关键职位，但为时不久，2月21日，蒋介石却突然留下一纸辞呈，不告而别。蒋介石为什么要辞职？个中缘由何在？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虽然颇多揣测，众说纷纭，但迄今仍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蒋介石的辞职与复职，并不是简单孤立的个人行动，它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蒋介石的权谋策略及其个人性格，更集中地展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前后国民党内部主要人物对联俄联共政策的意见分歧及由此引发的人事分合。辞职返乡不久，蒋介石曾分别致函孙中山、廖仲恺，申明自己辞职离粤"原因盖非发于一时，亦非为一人一事"，吐露了内中原委复杂的真情。在诸多辞职动因中，有由来已久的远因，有直接触发的人、事近因，还有蒋介石个人政治性格的作用。

蒋介石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思想认识上的严重分歧是他辞职的基本动因，也是他所谓"由来者浙"的远因之一。思想直接左右行动，蒋介石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和反对态度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众所周知，从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护法斗争有始无终到"联甲倒乙"策略屡试屡败及陈炯明变生肘腋等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中，孙中山认识到创建革命武装和发动民众的重要，他决心"以俄为师"，借鉴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他深知国民党内部良莠不齐，成份庞杂，组织涣散，亟须实行彻底的改组，注入新血液，增强革命性。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他顺乎潮流，改弦更张，改组国民党，筹建军校，确立联俄联共的新方略。但在这同时，作为孙中山主要军事助手的蒋介石的思想却循着逆反的轨迹在发展。早先，蒋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给予热切的关注，对革命后的俄国抱有朦胧的憧憬和向往，对俄国共产党援助中国革命表示过感激。1921年3月5日，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蒋曾建议："放弃外交，以俄国自强自力为师法"。期间，蒋还几次萌发游俄的念头，很想"看看苏俄成功的秘密"。1923年7月13日，蒋又毛遂自荐，向孙中山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系指苏俄）外，则弟以为无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积独善，以求自全"，急切请求孙中山派他赴俄，考察苏俄的政治、党务和军事。但蒋介石在苏俄考察三个多月的结果，却是对苏俄的认识及态度的根本变化。关于他思想认识上的这种转变，蒋介石晚年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作过如下的补注，他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和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灭。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更是危险。"基于这种认识，蒋在《游俄报告书》中详尽地陈述了他对俄共的疑虑，但蒋的这些意见受到了廖仲恺等人的批评，孙中山也认为他顾虑过甚。孙、廖的上述态度使蒋大失所望，因此在回国之初，蒋介石滞留奉化故里，迟迟不愿南下复命。经过再三催促，蒋始于国民党"一大"前夕离家赴粤。不久，国民党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其间，孙中山既未邀蒋与会，会后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更没有蒋的位置，孙只令其专心筹办军校，他的意见书也被搁置未议，这使蒋又恼又羞，他公开抱怨："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遑也。"一方面，蒋介石固执已见，对孙中山"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思想主张不愿降心相从，坚持其反对联俄联共的立场。另一方面，他所竭力反对的这一政策又在迅速地推行。蒋介石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这种思想认识上格格不合的状况以及他与周边环境的巨大反差，使他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他事后坦承："到粤月余，终日不安，如坐针毡，居则匆匆若忘，出则不知所往。"这种狼狈处境迫使他作出进退去留的抉择。选择的结果是："走"为上。

蒋介石离职返乡不久，3月2日给孙中山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挂职不干的动因之一是他对孙中山的强烈不满。他抱怨孙对他不信任，没有对他专任不疑，没有让他过问党政大事。

蒋介石离职的又一层原因，在3月14日他致廖仲恺的另一封长信中也表露无遗，那就是他对廖的不满。他对廖仲恺坚决主张联俄联共不以为然，并认为廖在军校事务上干涉他，有意削夺他的权力。

廖仲恺当时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为中执会三常委之一，同时还兼任大本营秘书长，协助孙中山处理日常事务，是广东革命政府的核心要角。他热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政

策，并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巨大努力。廖当时的这一政治立场，适与蒋介石处于无法调和的对立面，廖还曾对蒋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主张作过严正批评。在写给廖的长信中，蒋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直告”廖仲恺，认为对俄共“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指称“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他在信中借题发挥，责备廖仲恺“因循苟且，专意顺从（孙中山）”、“知而不言、言而不忠”，“使其（指孙）固执已意”，确定联俄联共政策。他攻击廖在担任广东省省长兼主持广东财政期间“赏罚不明，邪正倒置”，“引用非人，措置无方，百弊丛生”，并再三强调廖对此不应规避责任，言外之意，是要胁迫廖“反省自悟”，引咎辞职。

在筹备军校的具体问题上，蒋介石也认为廖仲恺处处干预、肘掣他，使他不能独断专行，这是权欲很强的蒋无法忍受的。如上所述，孙中山为筹办军校曾作过长时间酝酿。早在军校正式开始筹备前，孙即已内定蒋为校长，廖为党代表。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在委派蒋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同时，还委任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俞飞鹏等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委会的这些人大多系蒋所邀，为蒋之亲信。廖仲恺其时在军校尚无正式名义，但此期间廖曾以个人名义邀请、援引了若干人员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2月8日，军校筹备处召开校务筹备会议，廖又以国民党中执委身份担任会议主席——而不是由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此外，蒋筹办军校，经费支绌、需款孔亟，但禁烟督办杨西岩（杨是廖的下属），为斯时广东重要理财人之一，却时常借故不给款……凡此种种，在蒋介石的百感交集之中，均被他理解成廖仲恺有意染指军校，削夺他权力的侵权行为。他遂于2月21日扔下一纸辞书：“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不告而别，使军校的筹备事宜骑虎难下，也存心让廖仲恺难堪。

不容否认，蒋介石早年任性使气的性格，对他辞职这件事上也是有影响的。青壮年时期的蒋介石，任性暴戾，而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常为同僚所不容。曾有记载说，蒋“性倔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世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孙中山对他的这一性格深有所知，并曾作过语重心长的批评：“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劝导他不要嫉俗太甚，应有容人之量，更要为主义、为党而牺牲个人所见。蒋介石当年结拜金兰的盟弟戴季陶也剀切劝诫：“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怀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虞招祸，即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综观蒋早年的活动，他的任性自为，动辄使气的作风时有表现，并留下许多可以稽查的记录。蒋辞职返乡不久，曾向人坦承：“气质顽梗，变化不易”，“至今不惟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蒋介石并没有也不可能真如他信中宣称的那样“遁迹绝世”了。事实上，不久以后，蒋即于4月14日回粤就职，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他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新起点。那么，蒋介石又缘何自食其言，南下复职的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辞职。如前所述，孙中山为创办军校曾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努力，他希冀能由此重建革命武力，“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来挽救中国的危亡”。2月21日，蒋介石不告而别，孙中山极为震惊，他随即于23日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委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浙，促蒋回粤。对蒋的辞呈，孙明确批示：“所请辞职，碍难照准”，并责成蒋“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对蒋的辞职行为，孙一方面责备蒋率性使气，不顾大局，并严令其回粤；另一方面，又对蒋抚慰有加，对他作恳切的说服劝导工作，并以宽厚优容的胸襟，对蒋提出的若干要求，作了认真严肃的处理。如对禁烟督办杨西岩免职查办；电请胡汉民回任大本营秘书长（时由廖仲恺兼任）；仍任命蒋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暂由李济深代）。同时孙还郑重表示要“刷新党政，此后共图大业”。孙中山一再电催蒋回任。而蒋介石也清醒地知道：他若是对孙中山“重违意旨，背负恩德”，对党对孙决绝不顾，“久久消极”，那么“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

其次，蒋介石辞职后所提的要求、条件基本上得到了满足。蒋辞职不久，3月15日，孙中山即按蒋之意愿下令对禁烟督办杨西岩免职查办，代以政见与蒋颇为接近的邓泽如；同日，孙中山致电胡汉民，请其偕同许（崇智）、蒋南下，“以资辅翼之助”，表明改革更新的诚意。胡汉民当时曾作分析说：粤方“不惜免杨西岩，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指蒋）之意思”。这期间，曾备受蒋介石责难的廖仲恺的态度也有很大变化。对蒋的批评和指责，廖作了深刻的省察，“以往之政事、党事，弟任其咎”，恳切表示愿意“反省以求已过”，并再三电请蒋赴粤“共同策进”。在蒋介石最所关心的军校问题上，廖仲恺也明确表示：“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一切由蒋办理。对于军校的人事任用，廖也表示无意过问，主动提出“军官教授待兄而决”、“各级官长暨同事均待驾临决定”，同意蒋介石在人事问题上的“独立自主”之权。显然，蒋在军校事务上可以大权独揽了。

再者，蒋介石比谁都更清楚，军校校长对他所寓含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联甲倒乙”军事活动过程中，蒋介石作为异乡之人，手无一兵一卒，曾经备尝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受人排挤的滋味。屡次失败的经历使他坚信：军事武力是政治活动成功的保证，必须

建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孙中山在迭经挫折后也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故决意创办军校。蒋介石自然深谙孙此举的目的是创建军队，他全力以赴地谋到了军校校长的职位。通过军校而培植并掌握军事力量进而谋求政治上的更大发展便成了蒋当时的奋斗目标。舍弃军校无异于丧失一切，这对怀有很高政治欲望的蒋介石来说，是怎么也不会愿意的。所以当3月26日廖仲恺再次打电报问他“归否？俾得自决”后。蒋介石即于28日复电表示“弟必来粤”。4月14日，蒋与许崇智相偕由沪赴粤，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由此迈出了他政治生涯中至为关键的一步。

（陈国强）

1924年孙中山为什么北上

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这一行动是与曹、吴争夺权势还是在孙中山的影响与国民革命推动下的进步行动?孙中山接获冯玉祥来电后，立即北上，除了为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和“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外，还有其他什么背景？笔者近来由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在孙中山逝世后主编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发现了一段足以揭示上述问题真相的珍贵的资料。

《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为连史纸线装油印，共4大册。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延请孙中山生前友好、国民党元老及有关专家分头按年编撰其所熟悉的那一部分。1932年10月，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将《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寄发各地广泛征求意见，胡汉民、邹鲁、孙科、居正、唐有壬、蒋介石、平山周等50余人就年谱的取材、整体编排和具体条目签注了1000余条意见。

1933年5月，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将各种意见，巨细无遗地进行汇总，编印了《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少量油印散发，再次征求各方意见。这些签注者大都是当事人，提供的史料价值很高。

在1924年孙中山北上条目中，王用宾签注了这样的意见：“谨按：总理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从广州赴北京，在革命史上占重要一页，若书作冯、胡、孙忽班师回京，总理允其电请即北上，非出于本党革命计划而然，岂不失之轻举。”

王用宾为此引用了孙中山北上途中，在神户东方饭店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讲所说的一段话：“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因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举行，所以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少，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的。由于这个道理，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到这次变化发生之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待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战事起了之后，他们催促更急，主张要我一定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我正在韶关，督率北伐军同发江西。要北伐军完全离开广东，进到江西之后，才可以离开广州。……不上十日，北京就发生这次变化，外间的新闻传到了，我们同志的报告也同时到了。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

孙中山北上的原因在这里已说得十分清楚了，那么革命党在促成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做了一些什么事呢?王用宾在签注意见中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说：“自民国十年，总理就大总统职时，锐意北伐，密派宾为北方特派员，到北方观察结果。十一年返粤，呈意见书十数章，极力发挥北伐非北军自伐，革命非中央革命不可，二义极蒙赞成。此书唯田桐、焦易堂两同志见之，已毁于陈逆围攻观音山之役。当日先后于段、张携手，造成直皖、直奉战端，即第一义也；国民军直捣北京，即第二义也。自民国十一年，陕西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顺德，直军第十五旅旅长孙岳为冀南镇守使驻大名，胡、孙皆同志，防地紧接，北京同志又集是处，谋北方革命。宾以中央革命之必要，语刘守中、续桐溪两同志，刘、续以语胡、孙，甚赞成，谓冯、吴交恶已深，直奉再战，不难连冯败吴。惟总理不来，徒为段造机会耳。遂托宾于十三年春入粤转陈于总理。及江浙战作，直奉牵动，胡率兵往喜峰口，过京与冯、孙约定组织国民一、二、三军，在中央革命。宾复于十月下旬往沪，密电总理请速北上，电中有：如总理北上，中央革命不实现，请杀宾以谢举国同志之语，以去事实发动尚十余日也。电由环龙路四十四号发，曾经居觉生、谢慧生两同志手奉韶关大本营电后可行，又电请先派各军慰问使，旋特派徐季龙、续桐溪、王用宾任及往返电文今尚存之。宾遂偕张继、徐季龙、丁惟汾、方振武各同志同船赴津，至则吴佩孚尚退据天津车站，又二日，胡景翼、张之江兵至，吴自海遁逃，胡、张一见，即询总理何时到，遂各发电敦请即日北上，此当日经过大略情形。”

王用宾当年披露的这段事实十分重要，它对于弄清孙中山北上之真因及北京政变的背景很有参考价值。

（董邦安）

风云人物

阮啸仙

阮啸仙(1897—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原名熙朝,字瑞宗,别号晁曦,曾用过阮比力、王宏等化名。广东河源人。早年在本村道南初等小学,河源县城的三江高等小学读书。1918年秋,考入设在广州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曾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与周其鉴等发起组织"广东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是第一批团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秋,阮啸仙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的工作,与刘尔松、周其鉴等在广州的工会中创办了爱群通讯社,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23年,开始从事青年运动,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书记。他积极进行组织整顿,加强思想建设,使青年团成了"更有组织、更有力量的为青年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革命团体。"同时,他还组织了"广东新学生社",作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并任该社执行委员会书记。6月,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到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阮啸仙是中共两广区委和广东省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广州区临时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第一区分部执行委员会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组织干事、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等职。此外,他还兼任第一至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曾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和全国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他还利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的身份,选派干部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自己也深入到花县、顺德、广宁等地筹建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并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从而使广东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阮啸仙、彭湃、罗绮园三人当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正式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他和毛泽东、林伯渠、肖楚女等九人任委员,负责对全国农民运动的指导工作。5月,参加组织领导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农民协会向大会做了《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的报告,并继续当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11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阮啸仙、彭湃等七人为委员。在阮啸仙、彭湃等的领导下,到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80万人,农会组织遍及全省,并且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阮啸仙和彭湃,同是广东农民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年4月,阮啸仙到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返回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改任省农委书记。先后在广州、韶关、香港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阮啸仙和刘少奇、孙津川等三人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30年,阮啸仙被调到上海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旋改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不久,又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阮啸仙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负责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预算并监督预算的执行,积极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阮啸仙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和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2月,赣南苏区被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决定突围。项英、陈毅率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红二十四师为一路,阮啸仙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赣南党政机关及独立团为另一路,于3月3日分头突围。当阮啸仙、刘伯坚率部到达于都和信丰间的牛岭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6日,在激战中,刘伯坚身负重伤被俘,阮啸仙不幸中弹牺牲。

陈延年

陈延年(1898—192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陈延年又名林木，曾化名陈友生。陈独秀之长子。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在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读书。1915年前后，他和陈乔年随父亲到上海继续求学。1917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后，他俩留在上海，初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班学习，后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1月，他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郑佩刚等在上海组织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并任主编。

1920年2月，陈延年和陈乔年到达法国巴黎。之后，他们一边做工，一边自学。当时，他仍信奉无政府主义，并主办我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出版的《工余》杂志。后来，通过勤工俭学的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才摒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参加李立三、赵世炎等发起组织的"勤工俭学学会"，和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起进行革命斗争。1922年，在法国巴黎，经胡志明介绍，和赵世炎、王若飞、肖三、陈乔年等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规定，他们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1922年6月，陈延年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出版《少年》半月刊(后改名为《赤光》)。后来根据国内党中央的指示，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陈延年和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尹宽等五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陈延年还专刻钢板和油印，负责《少年》的编辑出版工作。旅欧青年团中的十多个党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陈延年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为支部负责人。

1923年3月，陈延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6月，奉调回国。10月，到广州，负责广东团的工作。11月，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接替周恩来任中共两个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离开广州为止。两个区委负责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的工作。当时的广东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因此，党在广东的工作也显得特别重要。在广州工作中，他领导中共两广区委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同先后在广东工作过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彭湃、张太雷、苏兆征、恽代英等一起，发动和领导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士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广东的农民运动，不仅是全国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全国的第一个农民运动中心；省港大罢工历时十六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大罢工。在广州工作期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主要负责人，和国民党进行密切合作，指导了国民革命运动。他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参与了平息商团叛乱，平息刘杨叛乱，消灭陈炯明反革命势力，消灭邓本殷反动武装等工作，从而统一了整个广东，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同时，他还对国民党右派作过坚决的斗争；对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反对。陈延年对广东党的建设，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对广东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4月14日，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陈延年和李立三、维金斯基三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由武汉到达上海，向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转变策略，隐蔽力量，等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后再举行暴动的指示。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由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等九人组成的特务委员会，负责党的工作，处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所面临的紧急情况。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他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五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以挽救中国革命，但未被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采纳。不久，罗亦农奉调到武汉工作，陈延年继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延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不久，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江浙区委改组成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担任改组后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陈延年不幸被捕。7月4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王烬美

王烬美(1898—1925)，原名俊瑞，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诚县)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被推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参加集会、游行、罢课、宣传等活动，后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同年9月领导学潮，迫使省教育厅撤换了一师校长。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11月，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任编辑、编辑主任。1921年初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任支部书记，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成立后，任支部主任。他还是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1922年1月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领导济南理发业大罢工。7月创办《山东劳动周刊》，任主编。同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留在中央，专做职工运动工作，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负责人，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并入北

方分部后，任副主任兼秘书。8月赴山海关等地开展工人运动。10月领导山海关、秦皇岛工人大罢工，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1923年1月任京奉铁路总工会秘书。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同年秋，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参与营救二七大罢工中被捕的同志。中共三大以后，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努力促进国共合作。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任职，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山东的基层组织。8月领导成立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11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年底，孙中山约见，任命他为国民会议宣传员和特派员。是年创办并主编《现代青年》。1925年1月在青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与邓恩铭等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取得罢工的胜利。3月赴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4月组织发动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5月因病改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病逝。

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波人。水族。1917年去山东，次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主编一中校报，组织一中学生参加济南学界举行的罢课活动。1920年11月与王烬美等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又和王烬美等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为领导人之一。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会后回济南，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成为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后领导济南、青岛及淄川、博山、张店矿区等地的工人运动。同年，他参加发起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为负责人之一。1922年1月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受党的委托，去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了淄博矿业工会；建立了洪山矿区党支部，发展了新党员。年底赴青岛，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23年1月中共直属青岛支部成立，任支部书记。成为青岛党组织的创建者。中共三大以后，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参加组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山东省党部的工作。同年春中共直属青岛支部更名为中共青岛市委员会，任市委书记。1925年2月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和王烬美等成立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4月发动和领导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遭反动当局逮捕，并被逐出青岛。随后又潜回青岛，组织全市工人大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后又成立青岛市总工会。7月去济南参加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回青岛后，被反动当局通缉，转移到张店，召开了胶济铁路沿线各段党支部的代表会，会后再次秘密回青岛，组织新的市委。8月任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1月初区委机关遭到破坏，他被捕入狱，旋因病保释。1926年重赴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7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会后应邀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回到山东后，任中共山东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八七会议后改组山东省委，任省委委员。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是年夏调回省委，被派到淄博矿区负责党的工作。12月在济南因叛徒告密遭逮捕。狱中曾组织两次越狱斗争未成。1931年4月被杀害。

冯玉祥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冯玉祥将军所走过的道路是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战胜各种困难，实现自己革命夙愿的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乌兰夫《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冯玉祥，字焕章，原名冯基善，一级陆军上将。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窘困，十一岁时，其父所在营的管带(相当营长)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年正式入练军当兵。六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先进，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加上勤学苦练，颇得赏识，仅三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相当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陆提拔，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1911年前后，他受进步思想影响，投入辛亥革命，参加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他被拘禁，随后递解回籍。1912年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陆部奉命围剿白朗，冯玉祥升任第七师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

从这时起，冯玉祥逐渐在中国军界和政界发达起来。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目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尿，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打”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

（摘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

冯玉祥从1896年投军到1946年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在军队里呆了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中，他的重要军事活动主要在1922年到1930年之间。这段时间冯玉祥军事集团由发达到重创，到复苏，再走向鼎盛，最后被瓦解，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1921年，北洋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的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前锋部队。冯玉祥率部驻阌乡、灵宝，取道渑池、陕州直入潼关。在了解到陈部各驻军情况后，他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各领一支，分路进击。第一纵队败姜宏漠，第二纵队于坝桥击败陈军一部，第三纵队于蒲阳镇击败姚振乾。尔后冯军集中兵力与陈军激战，迫使陈军退入西安城。冯军向城内开炮，陈树藩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逃跑。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十六混成旅作战有功，冯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不久阎相文服毒自杀，冯玉祥又继任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混战爆发。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冯军应调救急，冯玉祥同时被任命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对整个战局起了重要作用。5月5日，与奉系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败赵部，并追击赵残兵至开封。此役结束，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到任后，冯玉祥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就此发达起来。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冯军在这次政变中囚禁了曹锟，驱逐了清室，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组成了国民军，所以这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 权又落到段、张手中。

冯玉祥祖辈贫穷，历经磨难，他的童年是在保定附近的康格庄挣扎过来的。成为一名高级军事将领后，他身上还保留着普通农民和下层兵士的许多优点。他为人正直坦率，爱打抱不平，生活简朴，热爱学习，厌恶酗酒、赌博、抽大烟和逛窑子。抗战文艺中独树一帜的“丘八诗”为冯玉祥所创造，连这种诗都采用的是质朴清新的民歌情调和音韵，生动地反映出被人们称为“民主将军”、“布衣将军”的他的鲜明性格。1940年5月，冯玉祥在诗作《我》中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这是对自己的写照。

1947年蒋介石镇压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冯玉祥大为愤怒。他于5月26日发表《告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当局，开始公开反蒋。此后，他在美国发表了数百次报告演讲，举行了五次记者招待会，组织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抨击蒋的内战独裁政策，反对美国援蒋，声援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中央控制下的国内外机构、报刊开始对冯玉祥进行围攻和诬蔑，蒋介石采取高压手段命令冯玉祥回国并断绝他的经济来源。1947年11月，他在激愤中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檄文。冯玉祥此时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我自己：1. 要下监。2. 要被蒋枪决。3. 要被蒋特务杀害。这是为民主和平努力应得的报酬。”于是，他抓紧一切时间着手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此书共七十七章，冯玉祥从自己二十年亲身经历出发，对蒋介石作了全面揭露，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恼怒万分，便以“冯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革除冯玉祥公职，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他的护照。紧接着，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又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

"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罪名，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电请美国希望将冯玉祥驱逐出境。但冯玉祥处变不惊，置生死于度外，2月8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并于2月10日写下了遗嘱。在公开信中，他痛悔自己曾对蒋抱有幻想，错把蒋扶上高位，严正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蒋立刻下台，将权力交还人民。他写道："现在我已经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1948年初，一批爱国反蒋的中坚分子从蒋记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被推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极为欣喜兴奋。他在美国积极发展组织，广为宣传，汇合本党的进步分子为反对封建独裁统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工作。

在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为了保住其在华利益，美国密谋踢开蒋，拉起第三势力，与中国共产党对抗，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由于冯玉祥在国民党军政界威望很高，在海外又有巨大影响，于是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收买笼络。1948年4月，美国政府派员登门游说，表示美国愿意出钱出军火，帮助冯玉祥回国收拾败局。但冯玉祥坚守民族大义，当即予以拒绝。说客蛮横地下"最后通谍"道："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冯玉祥冷冷地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听说过，天听自美国人听，天视自美国人视，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样事的人吗？"

美国政府见冯玉祥软硬不服，恼羞成怒，便准备将他驱逐出境。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冯玉祥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毅然决定返回祖国。1948年7月，冯玉祥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和迫害，在纽约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取道苏联投向祖国怀抱。

至此，"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周恩来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追悼会上的悼词)。

不幸的是，9月1日"胜利"号客轮在黑海失火，冯玉祥遇难身亡，终年六十六岁。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刘 镇 华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清末附生，后在直隶省(今河北省)保定府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学习，毕业后，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的庶务长。辛亥革命时，他以河南省视学的身份奔走豫西一带，参加反清活动，结识了许多豫西地方帮会头目和所谓"游侠之士"。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陕西响应，成立了军政府。清政府派毅军赵倜向潼关进攻。陕西军政府派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与清军在陕豫边境交战，刘镇华率领豫西一带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参加了张钫的秦陇复汉军。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办理文案，后来升任参议，担任对外交涉事宜。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鉴于军队太多，系统复杂，地方财力不堪负担，同时认为清朝既已推翻，革命已经成功，用不着这么多的军队，因此决定裁兵减政。张钫部队需要裁减三、四千人，他们多是豫西一带人，如果不给出路，势必影响到地方的治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把裁减下来的这些人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分驻豫西二十二个县，这一地区靠近嵩山，所以命名为镇嵩军。刘镇华和这些部队有历史渊源，张钫向袁世凯保荐他为豫西观察使(后改道尹)，兼镇嵩军的统领。部队编为三个标，一个炮兵营，全部共计三千余人。他竭力整饬和扩充部队，加强实力，不久就成了一个小的军事集团，称霸豫西。

刘镇华善于投机钻营，谁的力量大他就投靠谁。当时袁世凯权重势大，他就竭力巴结袁。"二次革命"时，黄兴派杨体锐前往豫陕联络民党，策划反袁。杨带了黄兴致刘镇华和张钫等人的信件，先见刘镇华，投交了信件，然后转往陕西。刘镇华竟派人赶到灵宝杀了杨，把杨带给张钫等人的信件拿来向袁世凯告密，从而取得袁的信任。袁世凯败亡之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依附皖系军阀。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陕西国民党人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建立了靖国军，与安福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相对抗。1918年2月，靖国军围攻西安，陈树藩岌岌可危，急电刘镇华入陕相助。刘接到告急电后按兵不动，复电说豫西部队入陕是师出无名，暗示要有交换条件。陈知其意，表示可以把陕西省长位置让给他。刘镇华这才率部经潼关入陕，解西安之围。3月23日被任命为省长。不久段祺瑞政府又调动八省的军队到陕西，向靖国军发动攻击，使陕西长期陷入混战状态。刘镇华就在这连年混战中，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扩大个人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

打败了皖系段祺瑞。曹、吴为了扩大直系势力，派遣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率部入陕，驱逐皖系残余势力陈树藩。刘镇华感到他的省长地位很不牢靠，一面对陈树藩虚与委蛇，表示支持；另一面又派人与阎相文接洽，表示愿意协助直军解决陈树藩的残余势力，为阎进陕扫清道路。在刘镇华的协助下，直军迅速占领了西安，陈树藩被赶下了台。刘镇华不但保住了省长地位，而且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军队。

阎相文当陕西督军不久即服毒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继任督军。刘镇华为了取得冯的信任，在冯面前尽力逢迎阿谀。如冯标榜艰苦朴素，刘也穿起布衣布鞋，一早就起来跟着部队上操。冯信仰基督教，刘就经常出入礼拜堂，甚至邀请一些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到他的部队讲话。因而逐渐获得冯的好感和信任，两个人成为互换兰谱的结拜兄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曹锟、吴佩孚之命，率军赴豫与赵倜作战，把督军的职务交给刘镇华。从此刘镇华成为陕西督军兼省长，集军权、政权于一身。

刘镇华掌握陕西省军政大权后，搜刮民脂民膏，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除了把镇嵩军扩编为三个师外，又把其他杂牌队伍和靖国军残部编为六路镇嵩军及陕西部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刘镇华认为又是一个发展机会，即派第二师张治公部出陕对奉军作战，同时派憨玉琨为剿匪总司令驻潼关。憨玉琨就以潼关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河南陕州，待机而动。不料直奉战争一开始，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失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一、二、三军，拥皖系头子段祺瑞为执政。段任执政后即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率领国民第二军进攻河南。吴佩孚战败，由海道绕回洛阳，企图凭借控制在直系军阀手中的豫、鄂、苏、陕四省力量，东山再起。刘镇华鉴于上述情况，指示憨玉琨"冯、胡要讨，段可捧，吴不能背"。憨玉琨颇感为难，认为"捧段就是背吴，讨冯、胡就不能捧段。"他与幕僚一起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认为吴佩孚大势已去，决不能为吴出力。于是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佯令军队开赴郑州，突在洛阳下车，逼走吴佩孚占据洛阳。刘镇华也通电拥护段祺瑞，表示与国民军合作。憨玉琨占领洛阳后，因争夺河南地盘，与胡景翼发生尖锐矛盾，1925年4月初爆发了胡憨战争。打了半个月，憨玉琨所收的杂牌军发生内变，形势极为不利。刘镇华为支援憨玉琨，就把陕西督军职务交给陕西军务帮办吴新田，以出巡为名，亲到洛阳督战。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战事很快以刘、憨失败而结束。憨玉琨服毒自杀。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运城，投靠阎锡山，充当阎锡山反对国民军的工具。

1925年秋，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北方国民军。刘镇华通过阎锡山向张作霖、吴佩孚疏通，又回到了直系。吴佩孚给他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让他去兴安重整旗鼓。刘镇华招集散在各地的镇嵩军旧部、土匪、红枪会、大刀会，很快编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大军，以阎锡山供给的枪枝和弹药把这些乌合之众装备起来。此时，岳维峻率领的国民二军在河南受到直奉联军的攻击，退往陕西。经过豫西的时候，被刘镇华打得大败，岳维峻只身逃山西。与此同时，出关支援岳维峻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和国民二军驻在洛阳的师长田玉洁也被刘镇华打垮。在此形势下，刘镇华派柴云升为前敌总指挥，乘胜西入潼关，演出了围攻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惨剧。

1926年4月初，刘镇华部兵临西安城下。守城部队是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部分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兵力不到五千人。4月16日，国民军第三师杨虎城部进城。城内部队合计也不足一万人，而刘镇华包围西安的兵力约七万人，双方力量十分悬殊。5月中旬以后，西安与外县一切联系均被切断，成为孤城。

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县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即日率师援陕，策应当时正在两湖和江西等省胜利发展的北伐战争。冯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等部经平凉东下。10月初，前锋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也于10月12日随军到三原，组国民军第一、二、三联军总司令部。10月15月，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西军开始向刘镇华占领的咸阳地区发动总攻。经过四十余日的激烈战斗，到11月27日晚，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受到援陕军的抄袭和城内守军的袭击，被迫撤围，沿着西安至潼关大道向东溃退。途中又受到民间武装的袭击。刘镇华一气退到河南的陕州，才着手收容残部，分别驻在陕州、灵宝一带，从事休整。

1936年10月，刘镇华神经失常。1937年5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刘尚清接任省主席。刘镇华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刘镇华与家人一起逃往台湾，1952年3月死于台湾。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黄　郛

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百官镇。黄氏先代经商致富，后渐衰落。他父亲黄文治是个候补的县官。黄幼年时随父母住杭州。六岁父死，依靠母亲维持家计，进塾读书。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1904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不久，黄受清朝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相织识。次年转学入日本陆

军测量局地形科。1919年毕业后归国，投入清廷军咨府任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陈其美在上海策划响应，黄赶往参加。上海光复之初局势混乱，黄提出迅速成立沪军都督府并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主张，受到了采纳。11月4日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黄任参谋长。他们立即招募兵员，编练了一师陆军，称为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由黄兼任师长。这时沪、浙、苏、宁、镇、粤各军联合谋攻南京，陈、黄对此役有所策应。蒋介石也在这时从日本回国，投机革命，陈、黄委他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基于共同的反动政治立场，陈，黄、蒋三人互相结托，订为"盟兄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黄郛兼任兵站总监，准备北伐。其后中山解职，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沪军都督府撤销，并入江苏，黄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这时原准备北伐的各路民军多停留在津浦铁路沿线。黄郛被指派负责处理津浦路南段各军的善后工作。他首先主动地解散了自己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又依次遣散了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民军全部解散。这恰好适合了袁世凯的需要。1913年4月，"宋案"发生，黄郛在北京得电，回到上海。当时革命党人分为"武力反袁"与"法律解决"两派，黄认为"国家不堪有内战"不主张武力解决。但是，袁世凯已准备好对南方的进攻。7月，国民党人在江西湖口和南京等地被迫发动了反袁起义。这时陈其美在上海仓促起事，黄也参加了。他们向江南制造局进攻，结果失败，遂相偕逃往日本。稍后黄经南洋去美国。

1916年护国之役起，黄由美国返回上海，对浙江反袁军事，有所策划。此役结束后，黄即移家天津，直到1921年。

黄住天津期间，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曾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书出版。但这期间他和一些北洋政客来往不断，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1918年10月，徐世昌上台后，英美政府曾提出南北议和的"劝告"。当时欧战即将结束，中国国内确也出现了要求和平的呼声。黄这时一度与张耀曾、张绍曾等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名，搞"和平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徐世昌的嘱托，代徐起草了《战后中国》一书。到1921年初，他以考察战后经济为名出国游历。到美国时，恰值美国总统将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黄事先发表了有关会议问题的论文，被北洋政府聘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会后，于1922年经欧洲回到北京。1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黄参与了这一政变的策划。先是，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扎南苑，黄郛应冯之约常到冯的部队中讲学。从此他们之间日渐密切。到曹锟以贿选上台后，全国人民声讨贿选，黄郛乘机与冯密议推倒曹、吴的问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冯率部出热河，黄在北京，为冯通风报信。10月22日冯率部回师北京时，黄秘迎冯于高丽营，代冯草拟通电。冯部入京，推翻了曹、吴。10月31日起，在冯部的支持下，黄郛代理内阁总理，11月3日起又以代总理摄行总统职权。但这个摄政内阁，不为奉系所欢迎，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上台，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黄郛被迫辞职，返回天津。

1925年，黄虽然家居天津，但对南方革命阵营中的起伏变化也密切注视，并和他的一些老关系保持着联系。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由来已久的。1926年11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率军进入南昌，随后就派张群持密信约黄郛南下。这时蒋介石决心投靠帝国主义，其反革命趋向已日益明显。1927年1月黄郛到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密商。他受蒋指派，潜往上海，纠集反动势力，为迎蒋入沪作准备。接着，他又北上会见冯玉祥、阎锡山，拉冯、阎附蒋反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反革命政府，黄郛于7月初被任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黄与蒋同进退，也宣布下野。黄下野后，利用他自己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在日蒋之间牵线，替蒋出访日本作准备。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推荐黄郛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推行对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他上台不久，就着手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英国公使蓝浦生就上年3月英美兵舰炮轰南京事件，进行屈辱的谈判，并于3月30日首先与美公使成立了解决此案的协定。这一协定，除将事件的原因与"罪责"诬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外，还承认双方调查南京美领事馆及美侨损失，由中国赔偿、道歉和惩凶，而对中国军民两千余人的重大死伤，则一字不提。协定成立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黄郛为首的外交部竟把这种媚外投降的行径，无耻地吹嘘成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年5月国民党军"北伐"途中，日本军队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济南。蒋下令撤军，黄陪同蒋介石逃出济南，任凭日军继续在济南屠杀，并将济南及胶济路占领。日军的暴行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黄为逃避舆论指责，不得不赶快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生活来。

黄退居莫干山，又一次声称不问政治，实则和国民党政客们来往频繁，他和张群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把他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为首的一帮政客称为"新政学系"。他山居期间(到1933年)，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中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之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1932年6月，黄到上海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声称研讨"学术救国方案"，发生《复兴月刊》，鼓吹"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为蒋介石的不抵

抗政策打掩护。他和张群等人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并被看作是“日本通”的人物。因此，他虽居山，蒋介石并没有忘怀了他。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4月底逼进通州，平津震动。蒋介石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起用黄郛为委员长，令黄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带着殷同、袁良、殷汝耕、李择一等一批亲日分子于5月14日北上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时，被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弹，几乎丧命。

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次年，黄郛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先后于5月和12月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乃于1935年春托病躲入莫干山。1936年12月6日因患肝癌死于上海。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中共创建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

1924年11月成立的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并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就是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编而成的。

1924年3月下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由法国启程，从海路回国，于9月初抵香港，旋到广州。10月，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在此之前，周恩来受中央委派，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1月，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决定组建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根据与孙中山的商定：铁甲车队的编成、干部的选配与调动等事宜，均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及后来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负责；铁甲车队的主要工作及活动情况也直接向广东区委请示报告。周恩来亲自抓铁甲车队的组建工作。他从黄埔军校挑选特别官佐徐成章任铁甲车队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任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从中共广东区委干部中选派廖乾吾任铁甲车队党代表兼中共党小组长、曹汝谦任政治教官。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集一批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自卫队员和青年学生作为铁甲车队队员。铁甲车队成立后，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建立，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在以英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动和支持下，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不断地向革命势力发起进攻，企图扼杀广州革命政府。在平息商团叛乱、军阀叛变的战斗中，中共广东区委指挥的铁甲车队，直接参加平叛作战，或镇压反动地主武装，保卫革命政权，支援农民革命运动。1925年1月，广宁县的农民运动遭到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与摧残。铁甲车队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奉广州革命政府命令，开往广宁县支援农民运动，并在大元帅府大本营卫队的协同下，对广宁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镇压。1月中旬，盘踞东江流域的军阀陈炯明，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在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策动与支援下，乘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之机反扑，准备进犯广州，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参与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出师之前，铁甲车队根据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加紧参战的各项准备。东征开始后，铁甲车队第3排在政治教官曹汝谦、排长高超指挥下，活动在广州到石龙间的铁路线上，掩护东征军的集结与开进，进行侦察、警戒，修补铁路，保障军用物资运输畅通，并发动沿线群众支援东征讨陈。5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主力远在东江地区，广州空虚，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东军阀陈炯明密谋发动武装叛乱，一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军主力遂奉命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在这次平叛作战中，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奉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命令，配合东征军主力作战。铁甲车队发挥装甲厚、火炮威力大、机动性强的优势，向叛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火力袭击，掩护主力部队冲锋；并以一部担任警戒和封锁香港方向的任务。在东征军主力的反击下，杨希闵、刘震寰叛军被迫全部缴械，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随着国共两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也迅速扩大。1925年1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将铁甲车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团，并由周恩来负责扩编工作。广东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选拔一批学生（大部分系党员、团员）担任排以上干部或班长；从广东工农群众中招募新兵；并任命叶挺为团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全团约2000人。广东区委还决定，在独立团建立一个中共党支部，各连成立中共党小组，班、排均有党、团员。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根据广州革命政府授予的番号，该团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通常被人们称为叶挺独立团。

（选自《党史博采》作者：茂生）

熊雄和黄埔军校校歌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办不久，校部颁布了一首校歌。歌词如下：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这首校歌的歌词据说是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所作。但韵律不太流畅，唱起来词不合曲。校长蒋介石虽然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起这首校歌，但教官和学生都不喜欢唱这首难以上口的校歌。因此，它在社会上流传不广。

1926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是著名的共产党人熊雄。当时，军校第四期学生已毕业，奉命分途开赴北伐前线。第五期、第六期共6000多名学生在校学习。随着革命势力的扩大发展，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学员情绪高涨，刻苦学习，弥漫着一股浓厚的革命气氛。熊雄的心情也十分兴奋。但是，他为军校缺少一首好的校歌而感到遗憾。在举行全校集会或大型活动时，没有校歌就很难调动起这些青年学生的情绪。于是，熊雄便想起了他的好朋友陈祖康。

陈祖康出生于福建省的一个书香世家，16岁到法国留学。他从小爱好文学，尤其会写诗。熊雄到法国勤工俭学时与陈祖康相识并结为挚友，还介绍他加入周恩来主持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熊雄到黄埔军校后，特邀陈祖康前来担任政治部少校政治教官。

有一天，熊雄和陈祖康二人在长洲岛的江边散步谈心。熊雄对陈说：“现在军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一首校歌。这是政治部的责任。大家觉得你对歌、诗素有研究，最好由你来撰写校歌。就请你马上动笔吧。”陈祖康听后想：黄埔军校开办两年多了，连一首好的校歌也没有，实在太不应该。熊披素（熊雄字）认识我，就是看过我的诗，才与我通信联系，而成为朋友。今天，他要我创作校歌，是对我的信任。我不但不能拒绝，而且还必须写得象个样子。于是陈祖康欣然应允。

一连几天，陈祖康一直在苦思冥想，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歌词：

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陈祖康将歌词拿给熊雄看。熊雄连声赞好，请来军校少校音乐教官林庆培谱了曲。不久，这首新校歌便刊登在《黄埔日刊》上，并很快在校内外传唱。

有一次，黄埔学生在军校俱乐部唱起这首校歌，大家唱得热血沸腾，情绪激昂。熊雄听后即兴发表讲话：我提议将歌词中“党旗飞舞”一句话改为“红旗飞舞”，因为国共两党的党旗都是红色的。

（选自《广东党史》94年第2期作者　卜穗文）

黄埔军校小史

黄埔军校，是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因校址始设于我国南方最大城市——广州市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所以又通称为黄埔军校。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革命武装，没有人民群众的基础。他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心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孙中山亲自指定黄埔岛上原有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校址为军校校舍。五月五日，黄埔军校成立。六月十六日，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长篇演说。

黄埔军校建立时，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加伦为首的十多名优秀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和教学工作，并提供了办校经费和各种军械武器。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张秋人、叶剑英等先后来军校工作。党还从各个地区抽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经验。在组织机构上，建立了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苏联人加伦任军事教官，同时兼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在

校长和党代表下，设立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政治部先后以戴季陶、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崧年、邵元冲、鲁易为副主任；胡汉民、肖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主任教官，聂荣臻为秘书。教授部最早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顾祝同、钱大钧、刘峙、陈诚等为军事教官，何应钦为总教官。在培养目标上，军校规定，要造就既熟练于指挥军事，又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军官。在教育内容上，黄埔军校开设政治课，实行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并重的原则。同时还邀请当时社会名人如"谭延闿、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何香凝、鲁迅、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等到校演讲。后来，黄埔军校实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被推行到国共合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的各级部队中去。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工农红军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是黄埔军校的鼎盛时期。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各地进步青年，憧憬革命，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广州。此外，还有来自朝鲜、越南的革命志士和海外华侨。这期间毕业的前四期学生，达四千九百八十一人。这些人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军校被誉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一九二六年三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在长沙、武汉等地设立分校，仍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从创办到停办，共招收七期学生。除第七期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招生的，前六期学生都是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革命高潮中招生的。我军的许多杰出领导人和军事干部，如徐向前、罗瑞卿、刘志丹、陈赓、周士第、左权、黄公略、何长工、段德昌、周逸群、陶铸、蒋先云等，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军事学校，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黄埔军校的性质也从此改变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黄埔军校正式停办。

（选自《纵横》86年2期，作者臧文贵）

黄埔三杰

"黄埔三杰"为陈赓、贺衷寒、蒋先云。三杰均来自湘江。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入黄埔前，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贺衷寒出生于湖南岳阳，曾于岳阳、长沙等地搞学生运动。陈赓是湘军行伍出身，1924年与蒋先云、贺衷寒同时参加了黄埔一期的招生考试。早已以一笔锦绣文章饮誉湘江的蒋先云笔试成绩名列第一；贺衷寒排在第三名之外，但却在口试中以滔滔不绝的辩才受到蒋介石的赏识；陈赓成绩平平，在口试时以堂堂军人相貌打动了蒋介石的心。在1924年年底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1925年的东征中，陈赓以其眼疾手快、动作麻利先后两次救蒋介石脱离险境。北伐中陈赓为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联络，一夜行走160余里山路。所以，黄埔学生中传着：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赓的腿。

三杰都受到蒋介石的赏识，都先后做过蒋的侍从秘书。但是，学生时代的三杰即开始走着两条不同的路，蒋先云、陈赓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指导下组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在国民党元老谢持的支持下，针对蒋、陈成立了孙文主义研究学会。在军校内，两个组织的学生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在攻打奉系军阀的战斗中，蒋先云身为团长，率兵冲锋陷阵，于河南战场壮烈牺牲。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时，陈赓毅然跟随周恩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成为共和国的大将。贺衷寒一心投靠蒋介石，是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核心人物，随蒋逃到台湾后，曾出任交通部长、国策设计委员长。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陈赓与宋希濂

陈赓与宋希濂都是湘乡人，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两人又都是我国现代军事史上的显赫战将。不同的是，陈赓是中共中央委员，担任过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志愿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是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官至集团军总司令，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美国自由勋章等奖赏，也是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战将。陈赓和宋希濂在战场上有过并肩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斗岁月，也曾代表各自阶级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拼杀。他们之间有合有分的历史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

考场邂逅

1923年冬，一天上午，长沙育才中学的考场里并排坐着一对青年。稍高的一个叫陈赓，是湘乡柳树铺人，长沙岳云中学的活跃分子。略矮的那个叫宋希濂，湘乡溪口人，长沙长郡中学的高材生。他们通过彼此交谈，方知是老乡，又都是闻孙中山先生派人来长沙招一批青年去广州接受军事训练之讯，特赶来投考的。6天以后发榜，他俩同时被录取。当局宣布长沙录取的人分批去广州，可以自行组合。陈赓和宋希濂等20余人组成一批。因陈赓善于交际，被推当领队，负责沿途购票、住宿事项，宋希濂则

鼎力相助。一路上，谈笑风生，十分投机。

黄埔同窗

因当时粤汉铁路只通到衡阳，去广州要绕道武汉、上海、香港。1924年2月他们才到达广州。湖南招去的100多名学员，大部分进入了程潜办的讲武堂。陈赓和宋希濂比较机灵，到广州不久，便打听到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决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陈赓和宋希濂天天到学校筹备处去打听招生条件和招生日期。3月份，两人同时报了名，4月间到中山大学参加考试，在2000多应考生中，这对湘乡青年双双被录取。5月5日，两人在天字码头乘船到了黄埔，宋希濂编在一队，陈赓编在三队，开始了他们同窗共读的生活。学习、训练之余，两人常凑到一块，无话不谈。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学校。学校形成了阵线鲜明的两大营垒，共产党领导下的左派学生(以后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控制下的反动分子(以后组成"孙文主义学会")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陈赓于1922年在长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担任三队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在这场两大阵营的对垒中，始终站在斗争前列，经常和校内外的国民党右派周旋。在学校，陈赓十分活跃，组织了血花剧社，自编剧本，上演了一幕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他又担任演员，因他富有表演才能，每次演出都很成功。当时，陈赓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宋希濂则性格内向，在两派斗争中，表面上不偏不倚，但在陈赓影响下，实际上倾向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左派的一些活动。后来，陈赓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由同乡、朋友发展为革命战友。

分道扬镳

当时，广州的革命政府极不稳固。黄埔军校成立之后，有人扬言要"派兵解决"。为了防止事变发生，黄埔学生常常是白天出操上课，晚上放哨，警惕敌人袭击。军校并于1924年9月开始筹组军队，并频繁地参与战事。广州国民政府以黄埔学员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1925年初进行了第一次东征，随后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是年10月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因忙于战争，陈赓和宋希濂不在一个团，少有会面机会。中山舰事件后，宋希濂调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当营长，驻广州附近石牌训练新兵。1926年7月出师北伐后，陈赓由粤入湘、鄂，而宋希濂所在二十一师11月由粤入赣、浙，他们更没有见面机会。宋希濂自到二十一师就脱离了党的组织。1927年宋希濂在桐庐战役负伤，后在苏州一家医院疗养，彷徨无路，遂写信给蒋介石叙述经过，蒋即复信要他伤愈后去南京见他。从此，宋希濂便跟着蒋介石，而与陈赓分道扬镳了。

两次重逢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希濂奉命率三十六师进驻潼关。事变解决后，又率部入驻西安并担任西安警备司令。1937年4月，陈赓由延安来到西安，两位老友分别10年后重逢，甚为欢洽。宋希濂作为东道主，设宴款待。席间，陈赓叙述了别后往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遇险，是他背着蒋介石过了一条河，才救了蒋的性命；内战时期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送到南京，蒋介石要他脱离共产党，并许以高官，他不答应……陈赓的叙述，既是表白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也是委婉地启发他面前的这位同乡朋友。这时，他们各有各的信仰，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私交。

时间又过了12年。这期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经过了几番较量。1949年12月9日，宋希濂在四川省峨边县的沙坪被俘，关押在重庆磁器口白公馆。1950年春的一天，已是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的陈赓，同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周兴来监狱探视宋希濂，两人自上午10时谈到下午4时多，所叙多为国共两党2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陈赓还让周兴备午餐款待，临别时，又亲切地嘱咐宋希濂不要有任何精神负担，抓住这个机会多看点书。

"又走到一起了"

1959年1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了宋希濂等战犯。1960年春他和杜聿明等来到北京南郊红星人民公社参加劳动。4月的一天，陈赓约请宋希濂、杜聿明等6个黄埔同学到四川饭店吃饭。陈赓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开怀痛饮，畅谈往事。陈赓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早逝，大革命由他领导，会不会弄得国共分裂，以至长期内战呢?席间，每人都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陈赓又问了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其意之诚挚，令人感动。这次宴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陈赓并留他们住下，请国防部办公厅王新亭安排了住宿。

1960年10月19上午，国务院派车接宋希濂到颐和园张治中正在休养的一栋别墅里作客。这一次，名义上是由张治中请客，实际上是周总理亲自安排。到中午，周总理和邓颖超、陈赓、徐冰夫妇、童小鹏、邵力子夫妇及屈武、郑洞国、侯镜如等30多人先后来到。席间，周总理风

趣地说："今年收成不好，毛主席都不吃肉，我们文白(张治中的号)先生本事大，弄到这样多菜！"饭后，大家在院内合影留念。陈赓和宋希濂单独照了一张，然后沿湖散步，畅谈往事。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不幸逝世，宋希濂闻讯，极为悲恸，他饱含热泪到中山堂参加了吊唁。以后，他又写文章说："陈赓逝世是国家的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他的伟大，他的忠诚，他的卓越指挥，他的无私无畏……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后的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他的谈话令我心折，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1985年初，陈赓夫人傅涯赴美公务并探亲，得到在美定居的宋希濂、蔡文治、李默庵等黄埔同学的盛情款待。他们对于陈赓龙骧虎步、高下在心的指挥艺术和急公好义的为人，非常钦佩，赞叹不已。他们恳请傅涯回国后代买鲜花到北京八宝山祭奠英灵。这些，深刻地说明陈赓的生命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延续！

（作者谢秉忠，选自《党史月刊》90年10期）

宋庆龄的第一次演说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了声名狼藉的直系政府，然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孙中山历来同情人民的疾苦，痛恨军阀混战、封建割据，因此不放弃一线和平统一中国的希望，慨然答应所请。11月13日，他偕宋庆龄等人在广州长堤天字码头启程北上。这时，孙中山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他和宋庆龄结缡近十年，他和这样一位夫人和助手，无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都是密切不可分离的。

当时中国局势复杂严峻，一路上充满艰难险阻，为此他们选择了广州——香港——上海——神户——天津——北京的路线。24日下午到达日本神户港，停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孙中山会见了日本友人、当地的国民党人和旅日华侨，宋庆龄则应邀到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作演说。

28日下午，孙中山陪同宋庆龄到达该校时，受到校长本田须磨子及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一女生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宋庆龄。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站着。

孙中山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孙中山先讲话。他说："我希望在将来，地处亚洲的中日两国将为确保东洋而充分携手合作。我希望得到日本全体国民各位的援助。"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

她在演说中首先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见，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她又说："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库尔特斯坦山区的广阔版图上，有一位妇女当了总统；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接着，她满怀信心地表示："不论是种族和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

宋庆龄这篇着重讲述提高妇女政治地位重要性的演说，是她1913年写的第一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后，十一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那时她正在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读书，文章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妇女》，发表在该院院刊上。文章从1907年中国开始招考赴美留学的女学生一事，论证了女孩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孩子差，要提高人类中占半数的男子，不能不同时提高人类的另一半(妇女)。她表示深信："用不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文章还阐述了妇女要获得与男人平等权利，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而必须靠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去争取；尤其是那些在外国留过学的妇女，她们不应该使自己成为性格孤傲的知识贵族，而应该进入社会为民众谋取福利。(《威斯利安》1913年4月号)

从这篇文章以后，研究妇女解放问题，进行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宋庆龄一生革命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她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和领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神户的这次演说，就受到广泛的重视，当时日本的各大报纸均作了报道。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57年后(即1981年)担任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的岛越文子，曾在当年现场亲耳聆听宋庆龄的演说。她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演讲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这次演说对宋庆龄本人来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是一块里程碑。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表明经过十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锻

炼，她已经克服腼腆和娇嫩，具备了政治家的品性，结束了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活，可以独立工作、独立战斗了。而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默默地听着，偶然也讲几句话，但她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有人这样记述：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无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罗比·尤思森《宋氏三姊妹》)。

宋庆龄演说后，孙中山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留念。这张题字被该学校视为珍贵文物，经过精工装裱后妥为保存，在战争时期又被运送到农村安全地区保藏，现在悬挂在学校纪念室里，并已列为神户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对它尤为珍视，还特地将其刻成石碑，竖立在孙中山和宋庆龄那次演讲后参观过的“移情阁”院中，供人参观。“移情阁”是一幢风格独特的建筑，为三层八角形的楼房，屋顶呈尖塔状，坐落在神户海岸松林环抱的舞子风景区。它是国民党老人、爱国华侨资本家吴锦堂为寄托“望乡”之情而建造的别墅。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时，吴锦堂就在这里接待过他。这次孙中山和宋庆龄又专门来访问吴锦堂，参观“移情阁”。1983年，经过修复后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唐宝林)

康有为卧龙寺“盗经”公案始末

1924年初，正在陕西游历讲学的“天下名士”康有为，突然被法院以“卧龙寺盗经”案下票拘传，古城西安街谈巷谈，《新秦日报》及《新闻报》也连发数件文图，使“康夫子”陷入轩然大波的漩涡。

一、康有为来西安的背景

康有为自戊戌变法被誉为“天下名士”，后因丁巳复辟保皇失败而名落千丈。1923年在军阀纷争中走访各地，一来搜览文物圣迹，二来讲学鼓吹复辟之道，以君主立宪同革命派民主共和对抗，但多不如意。当年秋天，直系吴佩孚在曲意应酬康的同时，将其推荐于陕西督军刘镇华。刘镇华正遭陕西进步潮流抨击，欲借康圣人之口抵制革命思潮，于是邀康入陕。

康有为保皇复辟计划一再碰壁之余，作为一个书法家及著名学者，对“十二朝皇家故都，数千年第一文化之区”的陕西仰慕已久。加上陕西有其交往多年的朋友与门生，如清末教育家刘古愚是他神交已久的知己，曾被关中学者称为“南康北刘”。礼泉宋伯鲁更是变法时同舟共济并曾代康上奏的亲密战友。咸阳李岳瑞、渭南雷延寿不但参与变法且充当了康与光绪帝的桥梁，康得以在政变前逃生也得力于李岳瑞的通风报信。再如刘古愚的一批弟子也曾拜在康的门下。这些就是促成康有为赴陕讲学的原因，而陕西新旧两派的斗争则成为酿成“盗经”公案的复杂社会背景。

二、“盗经”公案的起因

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西安寺庙宫观众多，碑帖石刻名满天下，其北的咸阳原又是周秦汉唐帝王大臣陵墓的集中葬地，地上地下堪称历史文物的宝库。陕西官绅士人历来以其文物古迹自重自珍，毕沅抚陕还曾专门整理缮修并为古迹圣地刻石立碑，虽多有舛错但也表示出保护历史文物的一片爱心。康有为在讲演及拜会刘古愚之外，几乎游遍了西安、咸阳周围的名胜古迹，但他确也心怀私心，借以搜求重要历史文物。他带走的秦砖汉瓦当等曾装了10几箱。据孙迟等人记述，康在从唐昭陵至兴平茂陵途中，曾在花花庙寨子古庙中逗留并在村东古庙顺手带走无量佛莲台上三足双耳圆形大明宣德铜香炉一座，因而为陕人所不齿。

康有为来陕时因宣传复辟而名声已臭，陕西进步人士对刘镇华祸陕及反对革命新思潮十分反感，而康应邀为刘镇华座上客为其涂脂抹粉更使陕人不满。康在西安多次讲演中又一再攻击革命派、大倡尊孔读经，遂成为陕人攻击之目标。康在游览了碑林、广仁寺，祭奠了孔庙及董仲舒墓(在城东南下马陵)后，在城南文庙东邻卧龙寺中，得知这座始建于隋代，后被宋太宗命名为“卧龙寺”的古庙，藏有宋版(实际为宋版明代重印)《碛砂藏经》7000余册，极为珍贵，遂索要观览。康索览残经后，因版文精美而爱不释手，又因经书已有破损、生有虫鱼，对此倍加痛惜，遂设法与寺僧商议要求借读换经，但尚未经佛教会公决，康即派人将经书搬走，并多拿了其他经籍。此事传出，陕人大哗，众说纷起，到处传言康有为欲“盗”名经，从而掀起诉之法院的“盗经”公案。此后众说纷纭，康有为只得将经书退还原寺，康有为也灰溜溜离陕。他返回杭州后，仍认为蒙受不白之冤，遂写文自我辩解。当时咸阳人李浩然(李岳瑞之子)任上海《新闻报》主笔，亦写文驳斥，文末有联语云：“都说你有意，谁曰秦无人。”

三、康氏“盗经”风波的几种说法

当年任陕西省议会议长的马凌甫认为“盗经”一案源于“借经”。但康在派职员赴卧龙寺借经时，带了一名武装马弁，又没有得到寺僧的同意。陕西进步人士得知后商议此事，省议员兼律师陈松生同意众人说的“非其有而取之

者盗也”(孟子语),而以陕西古物保存会议名义向法院起诉,法院出了拘票。加上康临离陕时,确曾将秦砖汉瓦等装了几十箱子,因此陕人哄传为圣人“盗经”(参阅《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我所知道的刘镇华》一文)。

当年陪同鲁迅赴西安讲学的《晨报》记者孙伏园考查了“盗经”情节后认为,事实“与报载微有不同”。卧龙寺的“钦赐龙藏”的镇寺之宝藏经,系宋版明印,分南藏北藏,南藏“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认为是邪念引起偷经。并补充材料说,“但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甚不少”。(见《伏园游记》第 92—95 页)

民国时任咸阳县长的刘安国事后回忆说,康在卧龙寺“看到《南宋碛砂大藏经》,确属海内孤本,奇货可居,心已有翻印出版发财的想法”。但又说康提出用新经与残经对换,并与寺僧定慧写明合同,签字换经后才派人将经书运回,准备带走而被省人所控。(单演义著《康有为在西安》第 156—157 页)。

解放以后,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郑志毅在查阅了许多当事人书面材料后认定,康有为发现卧龙寺藏经“保管不善,稍有残缺,认为可惜”。回宾馆后遂派人与寺僧定慧协商用自家“多部藏经与之交换。在达成协议,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只因康有为派宾馆卫士到寺搬运经时,曾将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一些经卷一并搬去”,才引发了讨经及诉之法院之事,理由不过是认为“康有为派人搬去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引自《康有为在西安》第 155 页),当年宋伯鲁的《与康更生(有为字——笔者注)书》也说:“……卧龙寺换经一事,将起绝大交涉。窃思我公德高望重,辞受取与之间丝毫不苟,弟熟知之矣!卧龙寺残经,榆档流传,历祀数百,秦人视之,有若球图。一旦闻公辇去,自然不悦,群起而争,势所必至。”

四、“盗经”公案引起的风波及辨析

康有为借经未遂,酿成“盗经”公案后,陕人掀起轩然大波。在上海的三原人老同盟会员徐朗西在报上刊一漫画大加讽刺,画为一人挟经前跑,一僧在后追赶,寺门写明卧龙,并配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醒目标准。渭南的武念堂则又拟一对联,流传至今。其联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联横为“王道无小”,以歇后语暗隐“妖孽”“贼”“康”几字,合而言之即康有为是“妖孽”是“贼”。康离陕前,刘镇华为之饯行,赴宴的宋伯鲁为暗劝康送回残经,曾即席口诵“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向康质询。原来此联为五代时华山陈抟所书,藏于书法家李梅庵处,后康久“借”不还。经李家费尽周折,方才讨回。故宋伯鲁以此联暗谏康。而康发脾气讽刺宋说:“你是先恭而后鄙,是怕!”“不要经,算了!”连夜将残经送还该寺。

从以上各说及风波前后情况辨析,当以郑志毅的分析及宋伯鲁之说较为合乎情理与事实。今人单演义经研究后也认为,康有为因搞尊孔复辟而遭谴责是罪有应得,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学问家,因珍本经书保管不善以至残损而甚感痛惜,从而动换经之念是在情理之中的,不应过多指摘。如果签约换经后加以缮修影印,不能不说是保护文物的一个善举。所以“邪念”、“翻印发财”、“偷经”诸说均未免强加于人或夸大其辞。多种说法中共同的一点是或经协商,或经签约,都构不成“盗窃”之罪。且康氏最终又未带走一本,其中纵有不慎之举,恐无兴师动众甚至诉之法院之必要。那么,何以康氏签约换经一事终于酿成一场公案风波呢?实在是因为幕后的思想与政治斗争。正如郑志毅所说:“康有为这次来陕所发生的事件,是因他讲学所引起的一场新旧思想上的冲突,而形成了反对康有为和支持康有为的刘镇华的政治斗争。至于‘康圣人盗经’之说,亦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这是对“盗经案”真相的一种说明。

(陈崇凯)

为中国革命而捐躯的第一位苏军将领

为中国革命而捐躯的第一位苏联红军将领是巴甫洛夫将军。他是 1924 年 5 月受苏联政府派遣来到广州担任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的。1924 年 7 月 18 日,他因公前往前线东江石龙城附近视察,不幸落水殉职。巴甫洛夫将军是杰出的苏联红军领导人。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乌克兰和中亚任军长,曾获两枚红旗勋章、布哈林一级红星奖章和一件金质荣誉武器。他被派遣来中国短短的两个月内,为组建国民革命军做了不少工作。7 月 23 日,孙中山为巴甫洛夫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并发表演说,称赞他的才能和功绩。孙中山还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巴甫洛夫将军是俄国为中国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今殉职,本人不胜悲痛,他是邻邦的英勇、高尚的儿子,死得其所,他增进了俄中两国间的联系,使国民党愈加坚定其决心——不将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进行到最后时刻,誓不罢休。”后来,巴甫洛夫将军的骨灰送回莫斯科,葬于瓦甘科夫墓地。

巴甫洛夫殉职后,苏联政府即派加仑将军到广州继任军事顾问。

(何玉叶)

流行风

电影《玉梨魂》

是郑正秋创作的第一部妇女题材的电影剧本，系根据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徐枕亚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张石川、徐琥导演，王汉伦主演，1924 年摄制。

鸳鸯蝴蝶派是民国初年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辛亥革命前后，恋爱悲剧小说风行一时。徐枕亚则是早期鸳鸯蝴蝶派著名哀情小说家，《玉梨魂》是其代表作，发表于 1912 年，曾 10 次出版，轰动文坛。郑正秋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符合他当时的世界观和创作要求。

影片《玉梨魂》写的是年轻寡妇梨娘（王汉伦饰）与自己儿子鹏郎的教馆先生何梦霞（王献斋饰）产生了爱情。但她被封建礼教束缚，不敢大胆相爱，却忍痛割断了与何的感情。她又怕贻误了何的青春，便请其公公作主，将小姑筠倩（杨耐梅饰）嫁给了他。然而，两人并无感情，何仍思念梨娘，她也更加郁郁寡欢。后来，何离家远走，梨娘忧郁而死。这时，筠倩带着嫂嫂遗书和侄儿去找丈夫，何见遗书与孤儿，哀痛至极，最后与妻子和好。结尾虽是调和主义的，削弱了影片的主题，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但电影比小说具有进步性。它表现了寡妇守节的痛苦，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影片女主角王汉伦，苏州葑门人，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原名彭剑青，肄业于上海圣玛利女校。1923 年冬，一个偶然机遇，被任矜钺发现并推荐，主演了《孤儿救祖记》。当时，她并不懂演戏，请教导演，张石川说："你要假戏真做，化身剧中人，忘记自己。"于是，她认真想象，努力做戏，很好地完成了角色要求。影片公映反大为轰动，王汉伦由此一举成名。接着，她又出色地主演了《玉梨魂》。这次，导演向她提出"要用眼神来刻划人物内心感情"的要求，她也尽力摆脱文明戏演员舞台程式的影响，而更生活、更自然地表现了角色的复杂感情和性格特点，给人一种清新美悦之感，开现实主义表演之先河。王汉伦虽不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却可以说是照亮中国银幕的第一颗明星。

电影《弃妇》

长城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是《弃妇》，由侯曜根据他的同名舞台剧改编，李泽源导演，1924 年摄制。影片提出一个所谓"弃妇独立"问题，有一定进步意义。其故事是描写一个豪门家庭的媳妇，被有外遇的丈夫遗弃，她带了丫环走向社会，独立谋生，并参加女权运动。后来，被其丈夫诬告为逃妇、乱党，迫其隐居起来，最后又遭劫受惊而死。作者接触了社会现实，提出了妇女独立问题，但因找不到解决妇女问题的正确办法，因而女主人公只能是悲剧的结局。1925 年，又拍摄了《摘星之女》，仍由侯曜编剧，李泽源、梅雪俦导演，是一部讨论男女恋爱的影片，提出了"能牺牲者才是真爱"的哲理性命题；同年还拍了《爱情的玩偶》和《一串珍珠》等，都是讨论婚姻和家庭道德问题的影片，有一定现实意义。

电影《采茶女》

电影《采茶女》，由朱瘦菊编剧并与徐琥联合导演，经广馥摄影，杨耐梅等主演。影片是根据鸳鸯蝴蝶派小说《采桑女》改编的，它讲一个富家子弟爱上采茶女，遭父反对。后来得知此女也是出身显贵人家，才终成眷属，宣扬了门当户对结良缘的思想。

小说《旅途》

作者张闻天，主要内容：写青年工程师王钧凯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由苦闷到振作，最后投入革命斗争的故事。第一部写主人公王钧凯在天津某工程局工作时，正值"五四"落潮期，感到生活寂寞空虚，加以父母强迫婚事，使他在痛苦中逐渐沉沦。第二部写他在美国经历爱情的痛苦后，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才是改造黑暗中国的希望，由苦闷徘徊中振作起精神。第三部写王钧凯回国后目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腐败，毅然参加革命政党，任第一路军副司令，在随北伐军进攻上海时身先士卒，率众进攻炮台，不幸牺牲。作品通过旧社会的一个青年工程师由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的艰苦历程，歌颂革命青年的牺牲精神，在当时颇有积极意义。但作品中对主人公的转变写得不够真实，情节脱不出革命加恋爱的框架。整部作品基调昂奋，是早期革命文学的一部力作。

小说《祝福》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作品集中描写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祥林嫂是一位平凡纯朴的农村妇女，丈夫死后，瞒着婆婆跑出来帮佣。不久被发现，婆婆带人将她抢回去，转手卖到了山里。祥林嫂奋力反抗，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破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然而因祸得福，祥林嫂在山里同第二个丈夫渡过了一段她一生中最为平静和幸运的日子。可好景不长，先是丈夫病死，接着她心爱的小儿子又被狼吃了，她的精神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她被夫家族里人赶出后，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做佣人。却不像以前那样手脚灵活，得主人的欢心了。她逢人便讲儿子被狼吃了的故事，后来全镇的人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也就没人再听她讲了。因为祥林嫂嫁过两个男人，她在鲁家以及在镇上都倍受歧视。为了改变处境，祥林嫂听了柳妈的劝说，用一年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当做替身。谁知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她还是受着人们的歧视，鲁四老爷家祭祖的时节仍是不肯让她沾手。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终日惴惴的，有时就像一个木偶人。此后，祥林嫂沦为乞丐。在一个新年的除夕，她带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一家人能不能见面的疑惑，在热闹非凡的爆竹声中寂寞的死去。鲁迅在作品中没有编织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不着重描写祥林嫂生活上的痛苦和磨难。而集中笔墨写她灵魂深处受到的封建道德观念、封建迷信意识的毒害蹂躏，以及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毫无同情怜悯可言的冷酷关系。是无边无际的精神重压导致了祥林嫂最终的悲剧。小说在艺术上着意刻画祥林嫂的人物形象。她的善良，勤劳和无辜同她悲惨的一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

小说《旅行》

作者冯沅君，主要内容：小说以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为题材，描写了一个敢于向封建传统大胆挑战的青年女子的形象。女主人公“我”为了追求神圣纯洁的爱情，冲破礼教的束缚，和她的心爱的人去外地旅行。“我”抱着牺牲的决心，要让爱情自由发展，表现了敢于向旧礼教挑战的勇敢精神。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要求和行动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有形无形的压力。这使“我”也产生矛盾心理。正如鲁迅所说：“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小说通过“我”对爱情自由意志追求的描写，表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女子的勇敢的反封建精神和获取爱情幸福的艰难。小说以大胆的内心活动描写以及清丽细腻的文笔著称。

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

作者郁达夫，主要内容：小说通过一个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女工真挚友谊的描写，表现了下层人民共同的不幸命运，诅咒了旧社会不公的世道，是我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描写产业工人的作品，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烟厂女工陈二妹身世凄凉，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心中蕴藏着自发的阶级仇恨。在对陌生邻居“我”的关心、体贴中展示了她纯洁、善良的美好心灵，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获得振作精神的力量。作品以“我”作为组织材料的线索，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把被繁重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工与想出卖自己劳动而不可得的知识分子交相映照，揭示了旧社会的冷酷、黑暗。人物个性鲜明，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抒情气氛浓烈，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

小说《阳春别》

作者郭沫若，主要内容：写留学日本十年的工科大学毕业生王凯云，回国后想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但到达上海后五个月，却一直找不到职业，穷得卖书籍，当衣裳，每晚在车站过夜，只得以吃廉价的阳春面充腹。最后连身边的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也送进当铺，作为旅费准备再度远去异国谋生。作品以沉痛的笔调抒发一个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辛酸的慨叹，也是对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和高唱“东方精神文明”的统治者的批判。

诗《哀中国》

我的悲哀的中国，
我的悲哀的中国，
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
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
你身上排列着许多蜿蜒的江河，
你身上耸峙着许多郁秀的山岳。
但是现在啊，
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
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
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
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久已做了外国人的军港；
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
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
为什么这般地自甘屈服？
为什么这般地萎靡颓唐？
满国中到处起烽烟，
满国中景象好凄惨！
恶魔的军阀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怜的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钱！
卑贱的政客只是图谋私利啊，
哪管什么葬送了这锦绣的河山？
朋友们，提起来我的心头寒，——
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
东望望罢，那里是被压迫的高丽；
南望望罢，那里是受欺凌的印度；
哎哟，亡国之惨不堪重述啊！
我忧中国将沦于万劫而不复。
我愿跑到那昆仑之高巅，
做唤醒同胞迷梦之号呼；
我愿倾泻那东海之洪波，
洗一洗中华民族的懒骨。
我啊！我羞长此沉默以终古！
易水萧萧啊，壮士吞仇敌；
燕山巍巍啊，吓退匈奴夷；
回思往古不少轰烈事，
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
却不料而今全国无生息，
大家熙熙然甘愿为奴隶！
哎哟！我是中国人，
我为中国命运放悲歌，
我为中华民族三叹息。
寒风凛冽啊，吹我衣；
黄花低头啊，暗无语；
我今枉为一诗人，
不能保国当愧死！
拜伦曾为希腊羞，
我今更为中国泣。
哎哟！我的悲哀的中国阿！
我不相信你永沉沦于浩劫，
我不相信你无重兴之一日。

（蒋兴慈）

诗《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鲁迅）

歌曲《老天爷》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
老天爷你年纪大，
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
年纪大，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煞。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

“五四”、“五四”，
爱国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
雄鸡、鸣天下白，
同声击贼贼胆悸，
爱国俱同心。
壮哉此日！
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

自由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
为民众而争正义，
军警刀枪都不顾，
精神冠古今。
壮哉此日！
壮哉"五四"！

历史档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

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志诸君：

今天是我们国民党代表大会开会的第十天，也是这次大会闭会的一天。这次开会以来，所办的重要事项，秘书长刚才已经报告了。至于会中所办重要的事，即刻要拿去做宣传材料的，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全体，分作三段：第一段是讲中国国内的现状。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就是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实行这个主义。但是自民国成立以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十三年，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主义的目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由于我们的办法不完全，二是由于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协力，一致行动。我们这次开全国代表大会，订一个完全办法，划一同志的步骤，并议定党中的纪律，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把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做成事实。推究这个主义的来源，是我从前和各位同志经过了许久的讨论与研究，然后才确定出来的，在革命党没有成立以前，便有少数同志很赞同去实行；后来革命党成立了，就有多数同志赞同去实行；到了今日，便有极多的先觉先知赞同去实行。由此便可见本党的三民主义，是始终都不改变的。大家对于三民主义以后要心悦诚服，完全担负实行的责任。

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党的政纲，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节目。我们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所以不得不照中国的现状，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这个政纲。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所以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我们从前革命，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就是为人民求幸福而牺牲。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如果人民明年有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但是人民的要求，在短时期中，决无大变动，所以我们订定的政纲，至少也要维持一年。在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动，照所订定的条件去实行。我们在这次大会所订定的政纲，或者有见不到的地方，诸君以后对于自己定的政纲以外，不能说没有新见解，所以这次所定出来的，不能说是完全周到，没有遗漏。但是诸君如果有了新见解，必须等到明年开第二次大会的时候才去修改。在没有开第二次大会之先，我们对于这次大会所定的政纲，就万不可违背，如果有了违背，便是乱大众的步骤。而且此次大会所定的政纲，是从前经过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多的研究，又再经过大会中诸君的聪明才力才订定出来，订定的条件，是预算在今年之内要实行的办法。我们在这一年中的言论行动，便要和这个办法相符合；如果不然，便是这个办法没有效力，这个办法没有效力，便是枉费了这次大会的工夫。政纲和主义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时期，最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对于政纲是发生根本变动的，我们临时才可以召集特别大会去修改。由此便可知政纲的修改，是有一定时间，因为预定了一定时期，大家进行的步骤，才有秩序，不致纷乱。本党党员，从前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纲相矛盾，这是本党自乱的大毛病，此后大家必须要除去这个毛病。各位同志，以后纵然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或者中途得到新见解，或者有特别聪明的人，一时发见政纲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以自作自为，如果一二人自作自为，便是乱了全党的一致行动。

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以致牵动全军，不能一致前进，弄到结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就要覆没了！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得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以后要我们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团结精神。自根本上计起来，革命事业，是大家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实行，如果不能同

心协力，便永远不能实行。所以这次所定的政纲，是本党临时的号令，至少要行一年。在此一年之中，不是要一两位党员去实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实行的。大家共同去实行，便是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就是党员的好道德。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奋斗的方法，在中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各地方的，大家要组织区委员会或各地方委员会，把我们国民党布满到全国。诸君此次不远千万里而来，在此开了十日大会，议决了许多议案，是已经受了奋斗的任务，得了奋斗的材料。散会之后，带回到本地方去，应该分给本地的各位同志，教各位同志都要拿这种材料，分途去奋斗。所以这次的大会，好像是一个大军事会议，定了种种作战计划，下了许多攻击命令，交各将领带回去实行作战一样。又好像是一个大兵工厂，制了许多枪炮，出了很多子弹，诸君在此领了很多枪炮子弹，回到本地方去，便要分给到各位同志去补充他们。各位同志得了补充，便要他们实行攻击，不可空耗了这些补充。到了实行攻击的时候，必须审察敌情，临机应变，对于敌人，要能够收效，那才算是不枉费了这些补充。

这次的大会，是头一次试办，只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办理中央的事务；各地方委员会和地方上的事务，就要大家分头去办理。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是由多数同志推举，再交本总理向今日大会中通过了的。大家不能说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便能够做事，也不能说只有本总理所提出来的人，便能够做事。各位同志中有很能够做事、在此次委员名单中没有提出来的，自然很多，大家如果知道了是很能够做事的，在下次大会中还可以推举出来。我们不能说做了委员的才可以做事，不做委员的便不能做事；只要大家各尽各的责任去实行，各尽各的能力去奋斗，便可以说是做事。

至于讲到做事的结果，此时更不能预定谁是能够做事，谁是不能够做事，必要各位有了成绩，贡献到党内，到来年再开大会的时候，才可以决定。各位要将来的成绩如何，散会之后，便要努力去奋斗。到了来年开大会的时候，把自己奋斗的成绩，都报告到大会，让大家去比较。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是谁的成绩顶好。因为成绩是由于奋斗而来的，如果多数人不奋斗，当然不能有成绩；若是一个人尽力去奋斗，也可以得一个大成绩。能奋斗不能奋斗，是在有没有武器。诸君从这次大会已经补充了很多的武器，回到各地方上尽力去奋斗，将来的成绩，一定是很好。在来年大会中，拿诸君的成绩去比较，知道了谁的成绩是顶好的，自然可以知道是谁的奋斗顶多。我们要本党的成绩都好，就要从今以后，大家一齐去奋斗。现在已经是民国十三年，就是国民党在各地方公开奋斗了十三年。因为见到从前的奋斗尚不充分，所以这次要开大会，把全党来改组。从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办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办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天天成功，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宣布到全国的民众，在今年之内，一定可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选自《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39—54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24年5月31日

大中华民国、大苏维亚社会联邦共和国，愿将彼此平日邦交恢复，协定解决两国间悬案大纲，为此派定全权代表如左：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顾维钧

大苏维亚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特派喀拉罕

两全权代表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洽，议定各条如左：

第一条　本协定签字后，两缔约国之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

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

第二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列各条之规定，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予以施行。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过自前项会议开始之日起六个月。

第三条　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在前条所定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

第四条　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缔约两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

第五条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第六条　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第七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第八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将两国边界江湖及他种流域上之航行问题，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则，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规定之。

第九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根据下列原则，将中东铁路问题解决：

一、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

二、苏联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

三、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解决赎路之款额及条件暨移交东路之手续。

四、苏联政府担任对于中东铁路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三月九日革命以前所有股东、持债票者及债权人负一切完全责任。

五、两缔约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六、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条第三项所规定事项未经解决以前，特行规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办法。

七、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之会议未将中东铁路各项事宜解决以前，两国政府根据俄/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八日所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所有之权利，与本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暨中国主权不相抵触者，仍为有效。

第十条　苏联政府允于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特权及特许。

第十一条　苏联政府允予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

第十二条　苏联政府允诺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

第十三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之会议中，订立商约时，将两缔约国关税税则采取平等、相互主义同时协定。

第十四条　两缔约国允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讨论赔偿损失之要求。

第十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日起即生效力。

为此，两全权将本协定英文两份各签字、盖印。

大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喀拉罕

北上宣言

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党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北伐目的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

经济及一切生产，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团结力之增长，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藉。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具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繇实现。为谋目的之达到，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

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求逞，军阀亦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此，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议；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瞭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

(选自《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80—88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卢永祥之誓师词

曹锟贿选窃位，罪状昭然，中外皆知，人神共愤。本总司令受浙沪各将领公推，总领义师，吊民伐罪，今当师行伊始，谨揭正义，申明职责，告予有众。

第一须明军人地位。国家干城，非同厮养，故军额扩弃与收缩，均以国家利害为理由，不以个人利害为前提，曹锟日日刮饷增兵，举国周知，乃独借口解散臧、杨，称兵东南，其处心积虑，盖欲永久把持政权，必先铲尽异己。我浙、沪军人，只知有国，与曹锟利己主义，积不相容。且在彼心目中，凡效忠于国不效忠于曹者，皆可作臧、杨观，今日除甲，异日除乙，势必使国中好义知耻之军人，同归消灭而后快。天生元凶，造此浩劫，国贼未除，何以家为！与其死于私人刀俎，何若效死疆场。急公义非争私利，争人格非争地盘，此义应共了然。第二须明军人责任。捍卫国家本属天职，军队饷糈，身家赡养，悉是人民膏血，理宜利害与共。今日人民痛恨曹氏，几若不共戴天，南方各省，明遭屠戮；北方各省，隐受剥割，死于贪吏，死于凶年，死于苛税，死于盗匪，然而人民无可如何。盖自军器革新，万非斩竿揭木所能举事，以故贤豪饮泣，父老吞者，对于军人，馨香祷祝以求援救，若解倒悬，军人若犹坐视，宁不愧对人民。当此严重之时局，义当负严重之责任，群众使命，无可诿避，此义应亦了然。秉此二义，遂生两大信念：第一信念，曹氏摧残守正军人，我为守正军人战，则守正军人必表同情；第二信念，曹氏残杀全国人民，我为全国人民战，则全国人民必表同情。以全国军人全国人民助我义师，何敌不摧，何坚不克，胜负之数，岂待蓍龟？愿我有众，慎守纪律，以保令名，人民田庐，秋毫勿犯，一志杀敌，不屈不挠，惩彼独夫，奠我邦国，天日昭临，不渝此誓。浙沪联军总司令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广东：廖仲恺　谢英伯　胡文灿　冯自由　邓泽如　陈树人

广州市特别区：方瑞麟　陈竞西　董维　孙科　吴铁城　谭平山

上海特别区：张拱辰　谭惟洋　朱之洪　叶楚伧　何世桢　伏彪

北京特别区：许宝驹　谭克敏　石瑛　李大钊　谭熙鸿　延瑞祺

汉口特别区：李能至　廖乾五　居正　夏声　李法

福建：许卓然　林黄卷　林丽生　丁超五　黄韫山　刘通

广西：蒙卓凡　施正甫　徐启详　刘蝙　苏无涯　覃超

云南：周自得　杨华馨　刘国详　李宗黄　杨友棠　胡盈川

湖南：林祖涵　罗迈　邹永成　夏曦　袁达时　毛泽东　程潜　陈嘉祐　李执中　谢晋　刘况

江西：赵幹　刘伯伦　洪宏义　徐苏中　胡谦　周道万　萧炳章　彭素民　王恒

浙江：戴任　胡公冕　宣中华　沈定一　戴季陶　杭辛斋

贵州：周仲良　王度　凌霄　李元箸　简书

直隶：韩麟符　于兰渚　陈镜湖　王法勤　于树德　李永声

山西：邓鸿业　苗培成　赵连登　谷思慎　韩书麟　刘景新

陕西：姚丹峰　江伟藩　于右任　焦易堂　路考忱　张兆基

山东：王尽美　杨泰峰　孟广诰　王乐平　丁惟汾　张苇村

江苏：顾子扬　朱季恂　张凌霄　茅祖权　刘云昭　狄侃

安徽：凌毅　杨虎　李次宋　曹似冰　柏文蔚　张秋白

四川：刘咏闿　刘泉如　杨庶堪　赵铁桥　谢持

湖北：刘芬　张知本　孙镜　刘成禺　詹大悲

河南：王友梅　赵峻　薛广汉　李存智　刘荣棠　李衡　张善与　宋聘三　王传恕

奉天：王秉廉　朱霁青　祁耿寰

吉林：张晋　李忠选　赵志超　李希运　董耕云　徐清和　何猛

黑龙江：龚德宣　常毓堃　韩喜亭　田铭章　乔根　傅汝霖

甘肃：张宸枢

西藏：乌勒吉

蒙古：恩克巴图　克兴额　白云梯

哈尔滨特别区：秦广学　张识尘

海防：冯苇渔

越南河内：陈觉梦

三藩市：刘芦隐

雪梨：黄右公

暹罗：萧佛成　陈美堂　林伯岐

怡朗：杨挺秀

八打威：李国瑞

芙蓉：萧振堂

西贡：陈麟生　林永伦

菲律宾：梁为杰

仰光：黄馥生　黄德源

联义社：林达生

日里棉兰：滦如九

东京：宋垣忠

西贡薄寮：何觉非

西贡金欧:邱家荣
西贡美获:许英祥
西贡金边:陈有庚
日本神户:刘士木
澳门:蔡世芬
菲律宾咙吗倪:赵鸿汉
加拿大:黄季陆　赵卫平　黄发文
檀香山:刘福球
墨西哥:余和鸿　黄宽禄
南洋:陈鸿锐
尾利伴:雷鹏
美国:叶祟濂　陈汉子
香港:阮旺　李林
妇女界:　陈璧君　何香凝　唐允恭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北京政府总统曹锟发布众议院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初选于4月14日举行,复选于5月14日举行;蒙古、西藏、青海选举于5月20日举行。同日发布减刑、免刑令。

1月15日　孙宝琦内阁正式成立。阁员除教育总长范源濂、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余七人均就职。下午举行第一次国务会议,议决特派吴佩孚兼任督办直鲁豫汽车道路事宜等案。同日,曹锟明令公布。

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各省及海外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孙中山任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

1月30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廖仲恺临时提出的政纲对外政策部分增加:(一)收回租界;(二)在中国领土内之外人,应服从中国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拨作教育经费。

2月1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预备实施新宪法,特设宪政实施筹备处,是日公布该处办事规则八条,并令各部亦增设宪政实施委员会。此后,各部宪政实施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

4月8日　赵恒惕在吴佩孚催逼下,决定附北,但又恐各方攻击,遂商定避去取消自治之名而行附北之实。是日与吴佩孚代表马济等秘密签字《湘军北归草约》,双方各作如下让步:(一)取消省宪问题,赵允修改省宪与国宪抵触部分;(二)直军驻防湘西,洪江改设禁烟督办,不影响湘军税收。

4月9日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因财政困难提出辞职。次日,曹锟亲批"勉为其难,勿庸固辞",退回辞呈。但王仍以"财政先有办法"为复职条件。

4月12日　孙中山公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要旨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建设之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宪政告成,国民则依宪法民选政府,建国大业告成。

4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准谭平山辞去常务委员一职,专任组织部工作,由彭素民接任常务委员。

5月中旬　北京国会议员梁昌诰、李载赓等向国会建议:对德要求赔款及收回德发债票两问题,为近日外交、财政上之重大事件,二者互相牵连,内容复杂,政府不应秘密办理,应提交国会公开解决。

5月28日　廖仲恺召集彭素民、马超俊、罗绮园、杨匏安、施卜、彭湃、西人法兰克等多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创设广东合作发展社,以谋广东乡村市镇合作事业之发展,当即拟定草案。

6月3日　北京内阁因孙宝琦两次呈辞后,仍出席国会允将德债案交议,全体向孙辞职,以示反抗。曹锟密示阁员勿逼孙过急,宜与孙周旋,俟德债票办妥再作处理,并于孙辞呈上亲批"恳切慰留"字样。

6月8日　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司法会议,决在东三省行政委员会内组织最高法院,统辖东三省司法机关。嗣后三省案件即归该院,不再送北京大理院。

6月上旬　张作霖在哲里木盟召开蒙王会议,讨论经营蒙古政策。张派总司令部顾问王家桢、张寿增参加。内蒙各旗王公、各重要官长、各团体首领均到。外蒙亦有数旗加入,库伦亦派遣代表出席会议。

7月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讨论邓泽如、张继、谢持所提"弹劾共产党案",决议:(一)须有表示态度宣言;(二)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讨论办法;(三)呈请孙中山决定。推定汪精卫、邵元冲担任起草宣言。

7月8日　北京政府内阁讨论吴佩孚请以俄庚款筑路,以路款兴学案,决定由外交、财政、教育、交通四部开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实行办法。

7月11日　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

会，作为辅政机构，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孙中山自任主席，聘俄人鲍罗廷任该会高级顾问。是日，举行首次会议。

7月20日　北京反帝大联盟通电声明联盟之宗旨及任务：(一)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政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凡愿加入本联盟反帝国主义者，本联盟即认为同志；(三)本联盟若发现帝国主义走狗，充作帝国主义之汉奸者，本联盟亦必用扑灭帝国主义之手段以扑灭之；(四)除反帝国主义之工作外，其它任何事务概不与闻。

8月1日　北京众议院第二次议颜阁同意案，又被反颜派以弹劾全体阁员案所抵制，会议争吵不已，一哄而散。

8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两草案，作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向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讨论。

8月2日　北京金融因江浙战谣发生恐慌，公债暴跌，投机家均将破产，即组金融维持会，要求政府设法维持。

9月1日　孙中山为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

10月23日　晨1时，冯玉祥抵北苑召集会议，胡景翼、王承斌等出席，一致主张和平停战，并议及维持现政府或另筹过渡办法、停战后收拾大局、宪法及国会有否修正改组之必要等问题。又邀京畿警备副司令兼陆军第十五混成旅长孙岳前往，面商北京治安等问题。

11月2日　曹锟宣布辞总统职，移居南海延庆楼，将大总统印送交国务院，由国务院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由警卫司令会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办理。

11月9日　广州大本营代大元帅胡汉民谋为其弟胡毅生作广州市长，是日突然宣布实行市选，并通告本月17日为造选举人名册截止日期。伍朝枢、谢英伯、林云陔等立即掀起争选市长风波。

11月21日　段祺瑞通电准于24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

11月24日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就职宣言声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同日，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

12月2日　段祺瑞据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转陈蒙古王公联合会等呈询，指令该院宣示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暨蒙古待遇条例昭然有效无疑。

12月14日　段祺瑞执政府会议决定三令：(一)解散国会；(二)取消宪法；(三)取消约法。

12月24日　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抵制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条例》规定善后会议以下列各员组织之：(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

外　交

1月9日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依据黄郛任内所许，仍请用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

1月17日　苏联代表加拉罕致函王正廷，指责北京政府按列强意旨干涉苏联、庇护白党等活动，重申中俄会议必须在承认苏联、恢复中苏邦交后始能开会，并表示在中俄会议中一切问题皆按1919及1920年宣言精神解决。

1月30日　驻京使团反对商标法，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承认商标法的四项条件：(一)商标公报用英文；(二)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三)反对更换代理人；(四)反对六个月期限。5月27日，农商部允诺商标局雇用洋员，惟主自行选聘，不受使团推荐。

2月4日　驻京使团在荷兰使馆集议中国不承认以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问题。荷使欧登科主张提交国际法庭公断，法使傅乐猷反对。法使拟就驳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公文，于10日经使团会议通过，坚主用金法郎偿付。

2月6日　北京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务局局长出渊胜次在东京订立《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议》。

2月1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驻京荷兰等八国公使本月11日有关金法郎案共同照会。其大意为：(一)根据辛丑和约第六款，赔款乃金货债务，不能用银货或纸币支付；(二)不能改变原来之数额与品位；(三)即使依1905年协定采用电汇方法，亦仍不失其用金之意义。故中国政府须依照金法郎价格购买电汇票以为偿付。

2月21日　王正廷因中苏交涉发生变化，由上海返回北京，访加拉罕进行磋商，表示可先承认苏联，再开正式会议，解决悬案，意欲以此阻止加氏南下访孙中山。加拉罕赞成先议交涉协定大纲，以示互让。

2月25日　王正廷与加拉罕会商，加允诺中东铁路用中国资本赎回，并允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王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十三条及《暂行管

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十一条。加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与道胜银行所议变更中东路权事，一概无效。

2月28日　驻京外交使团由荷兰公使欧登科领衔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商标局聘用外国顾问为条件，承认北京政府所订之商标法。

3月1日　北京政府全权代表王正廷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在北京会商修正《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中苏交涉第一阶段结束，王缮成公文，报告曹锟、孙宝琦、顾维钧。

3月8日　北京阁议讨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王正廷报告交涉经过。顾维钧主张慎重，议决将草案交各部签注意见。自8日起连开特别阁议多次，将各部对于外蒙撤兵、废除旧约、中东路赎价、取缔白党等问题的意见，迭令王正廷访加拉罕要求修正。

3月12日　道胜银行管理公司代表贝蒂海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认为中、苏两国商议赎回中东路一事，违背1896年所订合同，提出抗议。

3月13日　英国公使麻克类奉政府训令，要求重审在丰台殴伤京奉路洋稽查毕尔塞尔之军官陈国贤，并由英使馆派员观审。陈原经陆军军法处判决监禁十个月，后改判监禁二十八天。27日，英使麻克类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对陈国贤殴伤英员事，处理失当，有意庇护。

3月14日　王正廷与加拉罕拟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十五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十一条及中俄协定附件七种，各以两国全权代表名义签字，待双方政府批准后签证。

3月15日　北京政府阁议讨论中俄协定草案，顾维钧、陆锦、王克敏力持反对意见。顾、王声称：俄蒙协约仍未废除，外蒙撤兵仍附有条件，归还俄国教堂财产恐他国效尤，庚款充教育基金、中东路赎价均不能允可。其他阁员亦主慎重。中、苏交涉顿起变化。

3月16日　苏联代表加拉罕以紧急照会致王正廷，限三日内正式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并声明三日期满所议协定即失效，一切随此而产生之后果，由北京政府负之。

3月17日　北京阁议，仍坚持废除俄蒙协约，撤除驻蒙苏军，拒绝交还教堂产业，令王正廷向加拉罕商议修改协定。

3月20日　曹锟令外交部接办中苏交涉，迅与苏俄代表继续商议进行。王正廷奉令即于是日停止中苏交涉。

3月22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加拉罕19日照会，为北京政府拒绝14日已签订之协定辩护，并表示准备继续谈判，早日缔结中俄协约。

3月26日　北京政府驻苏代表李家鏊收到苏联政府节略，内容为：协定大纲应速批准，交涉停顿责在中国政府；苏联对外蒙、中东路等问题迭次退让，放弃权利；如中国不察实情，将协定大纲推翻，则中国将迫使苏联在外蒙之地位及在中东路权利之扩张。

3月29日　驻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中、苏两国关于汉口俄国租界交涉，须得法国同意。

3月30日　北京使团开特别会议，讨论北京外交部所提收回上海会审公廨问题，决定以推广公共租界为中国收回会审公廨问题之条件，要求将自靶子路以北，河南路、黄浦江及虹口公园北界以内之一段，划入租界范围。

4月1日　驻京英、法两使分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不同意召开关税预备会议。法使并声明金法郎案如不履行协定，法国决不批准华盛顿会议条约。

4月10日　苏联代表伊凡诺夫致电孙中山，告以拟将中苏交涉案卷携粤进行协商，与大元帅府先行相互承认。

4月11日　驻京使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上海会审公廨允将华人民事案交还中国法庭，仍以扩大上海租界为条件；刑事案件则仍归公廨办理。

5月3日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5月3日　驻京美使舒尔曼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美国维持各国在中东铁路之利益，警告中国勿缔结取消外人利益之片面条约。法使傅乐猷亦于5月7日以同一内容致牒外交部。

5月5日　日本公使芳泽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长江等处正在筹划5月7日排日举动，请电地方官禁止。北京政府即通令全国，严禁人民召开“五七”、“五九”国耻纪念会。

5月13日　加拉罕通过华俄通讯社发表关于中苏谈判停顿敬告中国国民之宣言，并严斥美、法等国干涉中苏谈判。

5月19日　顾维钧趁苏联代表要求答复取缔白党牒文之机，派外交部参事朱鹤翔与加拉罕商谈恢复中俄邦交问题。加允诺，但提出不得以4月1日中国之通牒为约束，谈判内容要求严守秘密。

5月25日　北京政府以英兵侵藏窥川，令驻英代使朱兆莘向英政府交涉。是日朱复电称：英政府不承认英兵有意外行动，谓拉萨所驻英兵，实系护侨，对我要求撤兵一项，仍无明白答复。西藏谈判问题，须将威海卫问题解决后方能开始接洽。

5月31日　顾维钧与加拉罕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五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十一条，及与上述协定有关之《声明书》七种。

6月2日　中苏邦交恢复后，各国要求保留中东路既得权利，是日华俄道胜银行及驻京法使向北京政府提

出抗议，驻京美使亦提出警告。提出同样照会，主张保留日本在中东路权利。

6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驻京德使博邺秘密签订《解决中德战事赔偿及债务问题换文》。

6月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驻京九国公使，要求交还俄使馆。10日，驻京使团再次开会反对交还。

6月11日　驻京使团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拒绝中国所提交还俄使馆之要求，声称："外国使团曾于1920年10月4日声明负责保管俄使署，直至各国完全承认俄国时止，须俄正式代表前来请求，始能予以考虑。

6月12日　北京阁议，顾维钧报告使团11日照会拒交俄国使馆各情，决定由外交部再向使团交涉。

6月27日　北京政府照会驻京使团，驳复11日照会，强调旧俄使馆及文件等，应照中国要求全部移交，并声明："使馆界虽由使团管辖，但仍系中国领土，故俄使馆不受他国管束……。中国请交还俄使馆给苏俄代表，乃对友邦尽国际应有之礼遇。"

6月29日　汉口法国领事照会交涉署，俄界毗连法界江岸马路，未得法国同意，不能遽行收回。

7月1日　英、美、法、日、意、比、西、荷八国使团为交还前俄使馆问题复照北京政府外交部，称使团虽愿将前俄使馆交还俄国代表，但必须在俄国派出正式代表向使团接洽，并须俄国代表切实表示愿服从使馆界一切规章之后，方能交还。

7月4日　驻北京法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议中德协定违反国际赔偿委员会之各项义务。

7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顾维钧在京招待外国记者，答复各项外交问题。(一)中东路外国债权在中俄协定签字以前为正当合法，现时依然；(二)俄国使馆问题正在考虑外交团最近送来之照会，将尽力使此项问题圆满解决；(三)关于奉俄交涉，迄未接有正式报告，一切外交事件应由外交部与各国办理，各地方政府虽有奉中央政府之训令而与外人订立地方协定者，但如不经北京政府之认可，亦决不能发生效力；(四)中暹派领考虑已有十余年之久，目前尚未切实决定进行方法；(五)西藏问题政府迄未接驻藏委员之正式报告，中、英间尚未开始西藏问题之交涉；(六)威海卫接收交涉无进展，中国正筹从速了结之办法。

7月21日　加拉罕为退还庚款事照会顾维钧，略谓按照5月31日订定之声明书规定，中、苏须选派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管理及分配俄国部分庚子赔款，请从速选派该会中国委员。

7月24日　沪俄领署由交涉员陈世光移交苏联代表依勒德及帮办司克罗夫。烟台及天津俄领事馆分别于7月中旬及25日移交苏联领事馆代表接管。

7月31日　苏联第一任驻华全权大使加拉罕向曹锟呈递国书。

8月8日　日本加征奢侈品关税值百抽百案公布实施后，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全国商民抗议文电日必数十起，乃于是日向驻京日使芳泽提出照会，略谓：此项税率至不平等，违反华会九国关税协定，我国商业所受影响很大，商民愤慨异常，要求分别品目予我国以豁免或减轻。

8月29日　驻京英、美、法、日四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请注意去年8月11日使团警告：各国人民如因江浙战争而受损害，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赔偿责任。晚，驻京英使麻克类照会外交部称：沪宁路系向英国抵押借款，请即严令江、浙两方之军事长官勿干涉沪宁铁路，以免损害英国之债权。

9月7日　张作霖邀见驻奉天英、美、日、德各国总领事，声明对直出兵原因，谓直系已命四师六混成旅向山海关、喜峰口、热河方面三路出发侵奉，决举三省精锐，尽力防卫，事出万不得已，请予谅解。对于在东三省之外侨可负完全保护责任。

9月22日　苏联全权代表柯司尼赤夫与东三省代表郑谦、吕荣寰、鍾世铭签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联邦政府之协定》(即奉俄协定)共七条，规定：(一)中东铁路六十年后由中国无条件收回；(二)中东铁路理事会由奉俄会商解决，使中东铁路之权安然由旧俄董事移交苏联董事之手。该协定于1925年3月12日经段祺瑞核准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附件。

9月25日　北京外交使团因奉天声言飞机将袭北京，乃由荷兰公使欧登科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及张作霖，抗议掷弹于毫无设防之城市，谓北京或任何通商口岸外人生命财产如因轰炸而受到损害，两军则应负完全之责任。

10月24日　驻北京使团向外交部提三项要求：(一)恢复京津间铁路交通；(二)东交民巷西口外之冯军减少至十五名以内；(三)通讯机关恢复原状。对国民军停战主张表示好感。

11月28日　驻京各国公使经日本公使芳泽斡旋，分别谒段祺瑞祝贺出任临时执政，对临时执政府表示非正式之承认。

12月9日　驻京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至外交部面递美、比、日、英、意、法、荷七国公使署名之联合照会，声明承认北京临时政府；各国政府愿在最短期内设法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惟要求尊重不平等条约，不得任意变更。

12月15日　驻京日使芳泽访晤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劝早日解决金法郎案。次日，驻京意使翟录第闻讯，向芳泽表示谢意，并请斡旋。驻京比使艾维兹亦作如此之表示。芳泽更积极进行，往返于法公使傅乐猷、

李思浩之间。

12月17日　《中华玻利维亚通好条约》由中国驻智利代办欧了庚在智利互换。

军　事

1月4日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重要会议，到各省代表、大本营各部总次长、各军总司令计六十余人，议决最短时日在粤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

1月8日　孙中山特任曲同丰为北洋招讨使；柏文蔚为北伐讨贼军第二军军长。

2月8日　蒋介石、廖仲恺奉孙中山命积极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由筹备委员长蒋介石任主席。至5月8日止，共开会三十二次，蒋介石离职期间，由廖仲恺代理主席。

2月10日　陕督刘镇华令所部镇嵩军麻振武侵夺郃阳县(今作合阳)高峻部防地，发生战争。刘即电免高峻旅长职。

2月29日　沈鸿英因迫于吴佩孚派陆荣廷联合马济统一全桂，乃多次派代表向孙中山输诚。孙中山见其有悔过之意，予以收容。是日，任命沈为桂军总司令，并拨款二万元、子弹数十万箱，助沈返桂。

3月20日　广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奉令前往西江制止陈天太和李济深冲突，并派陆兰培第二独立旅前往三水，以武力调停。

4月5日　孙中山任命方鼎英为湘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张辉瓒为第一军第九师师长，戴岳为第二军第二师师长，谭道源为第三军第三师师长，王得庆为第三军第六师师长，吴家铨为第四军第四师师长。

4月16日　东江讨贼陪军(滇、粤、桂军)15日合围惠州城后，是日分兵攻淡水。陈炯明之钟景棠、练演雄等部由淡水败退平山。

6月21日　赵成梁电告广州大本营：方本仁以援粤总司令名义在赣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7月1日开始攻粤，以高凤桂部为前锋，邓如琢等四旅由信丰、南安、新城分三路进行，兵力约二万。次日赵又电告：方本仁部向南安进兵，前锋已有一旅之多到达南安，数日后即犯粤。

6月26日　广州大本营会议决定：陈炯明倘愿媾和，则须全部开赴北伐。陈如照办，可由联军担任后方供应；声明悔过一事，亦可让步。后陈炯明代表金章、马育航、陈觉民在香港向汪精卫、李福林表示，陈必欲回占广州握军政大权。和议未成。

7月13日　湘军宋鹤庚部第六师长王德庆率部由横芙头驻地经锦场渡河，投归林虎。宋电请谭延闿将王德庆免职通缉。21日，谭在广州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决发联衔通电拥护孙中山，停止与林虎议和。22日，孙中山据谭呈报，指令各军长官饬属严办王德庆。

7月22日　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率领李军及黄绍竑军一部，进攻柳州沈鸿英部。适驻柳州之沈部师长何才杰由柳返阳朔为母祝寿，途中被陆荣廷溃军击毙，李、白乘机全力进攻，8月6日攻占柳州。

8月8日　北京政府军事处与洛、宁、闽、皖代表商定攻浙办法，以孙传芳、齐燮元为中坚，由中央拨款一百五十万元，接济子弹百万发，为攻浙之用。

8月17日　曹锟、吴佩孚为防奉援浙，筹备东北防务。是日，曹派陆锦赴天津与王承斌商洽。18日，召见第九师师长董政国，嘱速往洛阳听吴调遣。20日，又召见冯玉祥，拟以东北重任委冯，冯答称："力不胜任，愿卫京师。"

8月28日　英舰九艘集中广州白鹅潭，并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当晚领事团向廖仲恺提出质问和警告，声称如政府开炮轰击市民，当以实力加以制止。

9月1日　昆山苏军对浙取攻势，第二师混成一团前进至陆家浜。浙军第十师第四十团出发至安亭，两军相距十华里。苏军安亭前敌司令朱熙、宜兴前敌司令陈调元、太仓前敌司令宫邦铎均亲往前线督线。

9月11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政务军事联合会议，推唐继尧为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同日，再电唐请兼任川滇黔军司令。

9月15日　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李景林第二军第二十三旅李爽恺部在义州九官台门与直系毅军米振标部四营接战，战至午刻，直军不支，奉军改守为攻，占朝阳寺及大凌河左岸。

9月20日　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驻韶各军旋分二路出发。第一路军由朱培德、何成浚、赵成梁、李明扬、樊钟秀等军组成、樊为攻赣先锋总指挥，率所部四千余人先入江西。第二路军又名援鄂军，由湘军谭延闿部、皖军柏文蔚部、赣军胡谦部及李国柱部等组成，程潜为总司令，进军湖南。

9月26日　闽军卢香亭旅在嘉兴与苏、皖军会合进占枫泾。浙沪联军退驻离枫泾十八里之石湖荡，将枫泾与浙江交界处之三十一号桥炸毁。27日，孙传芳至嘉兴，兵分三路，以苏军白宝山部为中路，皖军史俊玉部为右翼，闽军孟昭月部为左翼，孙任总指挥，迫向石湖荡。

10月1日　广州商团自恃有备，并有范石生、廖行超等为后盾，拒不依政府颁布条例实行改组，也未筹北伐战费五十万元。是日，全省商、乡团代表在佛山开会，商议索还枪械事，决定于双十节在广州及各属一致大罢市，停止纳税，宣称"与械同存亡"。

10月4日　吴佩孚因朝阳、凌源等地先后失守，免

去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刘富有、副指挥龚汉治本兼各职；以第二十五旅旅长陶经武、热河第一混成旅旅长张林分别继任总、副指挥。

10月11日 孙中山令革命委员会用会长名义便宜行事，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12日，孙电令胡汉民宣布广州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应非常之变；各军既觉悟纵容商团之非，着令一致服从于革命委员会命令，不得再事犹豫。

10月15日 广州商团叛乱弭平。晨3时，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军与滇、桂、湘、豫、粤各国分五路进攻西关商团，先由张民达部攻西门，迭次冲锋均为商团军击退，乃从观音山开炮向西门射击，一弹击中来安押当楼，商团失据，纷纷溃退，各路军分头追击，直至下午，商团军全部溃散。

10月20日 冯玉祥命张之江第二十一旅当晚退回北京。又命严加警戒，为防止泄漏班师回京消息，所有往来京、热者，均行扣留。

10月24日 晨2时，张作霖得京津关于冯、王回京之加急电，立转各军长向各所部宣传，谓：冯玉祥、王承斌已率兵返京，京津已被冯、王军队占据，胡景翼率军东来

11月10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11月25日 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在韶关开军事大会，宣布北伐军费有着，中央军需总局成立。各将领皆主张乘赣省内乱，刻日出发攻赣，乃议决由北伐联军总司令下令各军，限文到五日内，一律开至南雄及赣边集中，听候命令出发。

12月12日 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吴光新、梁鸿志、叶恭绰、李烈钧、马良等在天津曹园会商对江苏用兵计划，决定由卢永祥率兵南下，张宗昌担任前锋，会同张允明和皖军攻苏，联合江西断苏、鄂联合，胡景翼出兵砀山、铜山响应。

12月16日 北伐军占领万安，中路湘军张辉瓒师与朱培德、李明扬会师城内。时林虎之先遣队王得庆一部已至赣东之寻邬，谭延闿即令赣西之陈嘉祐全部、朱培德之一部开赴三南，并令右翼卢师谛部赶至龙南，又令在粤桂军伍毓瑞师加入北伐军右翼。

12月22日 北伐军占领吉安。谭延闿下令将韶关北伐军总司令部移设南雄。次日谭率豫军千余赴赣州。

12月25日 方本仁通电向北伐军下总攻击令，即日以邓如琢部从正面进攻，置精锐于峡江、新淦、临江三县。

经 济

1月12日 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指令，准财政部为救济财政，调剂金融，发行有利支付券，总额定为毫银三百万元，劝令殷富商民认购，以广东全省沙田登记费、民产保证费及印花税等项为还本付息基金，月息一分，二十五个月内本息还清。

1月18日 中日盐务会议在北京开幕，讨论鲁案细目协定中有关青岛盐输出办法，日本委员提出输出数量、税率等意见，中国委员允提对案后再讨论解决。

1月24日 孙宝琦内阁举行政务会议，讨论维持年关财政等问题，谓年关至少需四百余万元，不敷尚巨。财政总长王克敏、教育总长张国淦均出席。当日下午，王至财政部就职视事，半小时即去，为避索款麻烦，在宅称病。

2月13日 广州大本营财政委员会通电各军，请派员会同组织筹饷局，从速交出财政机关，以统一财政。

3月1日 中国银行对钱庄开始举办领用纸币办法。其后，浙江兴业、中国实业、四明等银行亦相继仿行。

3月13日 全国商联会致电新疆总商会，请调查开采该省石油矿，内称：“顷准大阪中华总商会函称，兹见朝日新闻记载，新疆有极大之石油矿发现，现美英日等国均思染指，设吾国不自开采，恐偌大利权，又被外人攘夺。”

4月1日 广州市政厅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并定6月1日开始抽收铺底捐。商民以此案困商贫民，乃联合商店数百家请善后委员会转请市政厅收回成命。广东总商会亦以此事影响商场，呈请省长取消。市政厅一面布告解释，一面派人向市内绅商婉劝，勿反对政府。

5月10日 全国银行公会第五届联合会议为维持国币币制事致函上海总商会，略谓：年来各省滥铸不合国币条例之银元，上年复滥铸银铺币，打破十进法价。近且发现安徽造币厂之银元，其成色分量均不及法定原额，必至扰乱金融市面，物价腾贵。为保全市面起见，共同议决维持国币办法五条，其主要内容有：请各埠商会、银行公会及中、外银行遇有违反币制条例之造币厂，不得代购生银及代售银元；随时调查其铸造数目及检验其银元之成色，登报公告。

6月1日 广州大本营财政部，发行军需库券二十四万元，专备拨付军费之用，月息一分二厘，7月1日抽签还本，以印花税、造币余利充本息基金。

6月4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华比银行签订借银元七十万元合同，月息一分三厘五毫，以盐余及正太铁路余利作担保，用作财政部拨借款项。

6月15日 张作霖召开东三省金融会议，决定：(一)合并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

(二)取消各处货币交易所。

8月1日　上海总商会、上海机器面粉公会、上海华商粮食公会、苏州总商会、杭州总商会等团体纷纷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征收路、电、邮、航关税附捐。

8月13日　广州中央银行奉政府特准发行货币，自8月15日开幕日起开始发行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券四种。

8月16日　广州大本营中央银行正式开幕，孙中山亲临致开幕词。勉励各界共同维持中央银行信用，促成中央银行发展，"使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

9月3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向南满铁路会社借款日金一千二百九十二万元，年息九厘，用作包工建造洮昂铁路用费，内省署提用二百万元，以洮昂铁路收入为担保。

9月5日　中国兴业银行在上海开创立会，举孙丹林等九人为董事，蔡葵雨等七人为监察。

9月30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向安利洋行借行平银一百六十七万九千零八十一两二钱一分，用以偿付瑞记德奥借款利息。

10月7日　曹锟核准发行"四二库券"，总额银元四百二十万元，自10月1日起生效，按九四折发行，年利八厘，每年分3月31日及9月30日二次付息。但民国十三年10月1日以后所募款项按照日数扣利息，10月1日起还本付息，用德国庚子赔款拨付四年特种公债及五年公债利息后之余剩款项为担保。

文　教

1月1日　湖南教育界在长沙召开平民教育运动游行大会，号召有钱者快办学，识字者快教人，不识字者快读书，并前往省署及省议会请愿，请求支持经费。15日，湘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李剑农代表省长演说，各界代表要求政府负责筹办经费。李剑农，罗农闿被选为该会董事。

2月23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二十条，附则三条，规定得暂设预科；私立大学应参照本条例办理；前大学令、大学规程即日废止。

3月21日　何香凝主持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召开的妇女党员大会，决定组织贫民妇女生产保护医院和创办三所妇女劳工学校。28日，妇女部通告全国妇女界，号召参加国民党，共同为国家努力奋斗。

3月24日　北京大学发表宣言反对教育部所颁《国立大学条例》，并由该校评议会具呈教育部，指出大学内部行政，自有校长总负其责，无须有董事会。

4月3日　戴季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第七次执行会议上提议搜集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及社会思想等各种文献，上海、广州各备一份总目。经孙中山同意，并允拨五千元作为开办费。

4月12日　印度诗人泰戈尔抵沪。徐志摩、张君励、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等往迎。泰戈尔系应北京大学之聘来华讲学。

4月22日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中国科学社等教育学术团体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开会，讨论日本外务省拟以庚子赔款合办中日文化事业问题。

4月30日　商务印书馆向北京政府请准筹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四百部，已装箱准备启运上海影印。因公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索贿未遂，乃由国务院电令内务部阻运。

5月10日　北京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派馆员裘善元、顾问董光忠在信阳游河镇发掘到大批古物，计王坟洼地方掘得东汉墓一座，获有殉葬陶器及泉币等物；擂鼓台(距镇半里)掘得宋墓一座，获得宋代磁瓶、磁碗等物；在该台东部获得刀斧及陶鼎等残片，悉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内多考古家前所未见之珍品。

5月25日　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武昌举行第八届年会，到二百八十二人，开会三天。同日，汉口举行第三届全国各省职业教育出品展览会，展品共一万二千余件。出产学校为鄂、湘、陕、豫、川、冀、奉、晋、皖、苏等十一省，一百十一所学校。参观人数达十一万五千余人。

中华民国大学联合会在南京成立。选出会长范源濂、副会长郭秉文，并通过组织大纲六条，规定该会以联合各大学共谋学术上之合作及课程上之联络，促成全国高等教育之进步为宗旨。

7月10日　中国国民党就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事发表宣言，反对以庚款筑路导淮，再以筑路导淮之收入兴学之说，主张应由教育团体组组委员会保管庚款，审定其用途，务合振兴文化之旨。

7月22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中央政法专门学校、通才商业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平民大学、华北大学等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均经先后核准立案。

7月28日　国民党农民联欢会在广东大学开会，到农民二千人，由彭湃主席。孙中山、廖仲恺演说，详述中国农民之地位及国民党与农民之关系，希望农民觉悟团结。后由彭湃提出组织市郊农民协会，并选举农民协会临时职员。

8月14日　我国学生赴美国留学，受美国新定移民律影响被拒。是日，美政府训令驻上海美领事，指定该国十四大学准我国学生就学，赴其余各校留学之学生，概遭拒绝。16日，美政府续发表哈佛等二十二大学准中国学生入学。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5年

导　言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孙中山北上以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率3万兵力进攻广州。广州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后，决定东征讨陈。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很快打垮了陈炯明。九月，在国民革命军组建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炯明。

临时执政府成立后，段祺瑞为了排挤孙中山，召开了善后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分赃会议。结果由于各系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加上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善后会议草草收场。

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4年11月，应冯玉祥之邀，孙中山抱病北上，结果因病重入院治疗无效而去世。孙中山的去世使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公开化了。

段祺瑞政府与法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金法郎案的卖国协定，立即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结果金法郎案虽然解了段政府燃眉之急，却在全国人民反对声中拖延下去，最终未能实施。

五月三十日，英国军警在上海租界屠杀爱国学生，造成五卅惨案。惨案的导火索是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一时间反帝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六月，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举行大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

国共合作的政权机关——广州国民政府于7月成立。由于陈独秀的错误主张，共产党员没有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领导工作。

十月十五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不宣而战，向奉军发动进攻，浙奉战争爆发。奉军由于战线太长，决定快速收缩兵力。同时吴佩孚也宣布"讨逆"，浙奉之战演变为第三次直奉战争。十一月底，孙传芳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军阀中实力最大的一支。

奉系将领郭松龄受革命思想影响，对张作霖依靠日本祸国殃民不满，从而发动了反对张作霖战争。由于日本出兵助张，郭松龄兵败被杀。

十一月下旬，以谢持、邹鲁、林森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西山会议派正式形成。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反苏、反国共合作的决议，遭到中国国民党总部的弹劾。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两次东征
- ●全国革命高潮的兴起
- ●《热血日报》创刊
- ●反对戴季陶主义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 ●《政治周报》创刊
-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 ●善后会议
- ●金佛郎案
- ●孙中山逝世
-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 ●浙奉战争
- ●郭松龄倒戈
- ●西山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开展工农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24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他们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党利用统一战线的形式，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工作，使工农运动逐步恢复。1924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得到广州市民的大力支持，最后取得完全胜利。在我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使一度遭到陈炯明镇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党还领导人民配合广东革命政府，平定了陈炯明的叛乱和商团判乱，支持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

为了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 年 1 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党领导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等 11 个议决案。

大会着重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国内的政局是处在军阀统治加速崩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如潮涌而遍及全国。要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完全靠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有正确的政策并努力在民众中做广泛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还幼稚，但在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列的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会议要求全党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党的工作，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的准备。

大会明确提出了农民同盟军问题。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民族革命时代，农民问题尤为重要。只有坚决保护农民利益，才能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没有农民同盟军，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着重指出，右倾错误比“左”倾错误更危险且更普遍。根据国民党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的实际情况，大会提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必须采取帮助和扩大左派，批评和争取中派，坚决反对右派的方针政策。

大会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及党的宣传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同时决定，为了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将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支部。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以及大会作出的一系列议决案，是“二大”以来党内关于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争论的总结，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材料：

- 中国共产党“四大”的召开
- 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中共“四大”追记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四大”的召开

大会之经过

大会的重要提案一共有：（一）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前面所有的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所起草，在大会时再组织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在审查草案委员会里，除民族革命运动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较有争论外，其余委员会都很少讨论（述之除农民草案审查委员会外，其余委员会均得参加）。在大会中对于提案有争论的也只有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在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所争之点有二：（一）有些同志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此说张申甫主之（申甫非代表，以发言资格参加讨论）。（二）仍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第一点很明显的是申甫的错误，当时加以解释就完了。第二点上面已经说过了。在职工运动中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即青年团）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不过此种企图终已失败。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

至于各种议决案的内容，因为太多不能详叙，最重要的是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决议案，今附寄在内，其余的决议案尚待一星期寄上；有几种已译成俄文或英文，可向吴廷康同志处索阅。

此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如下：(1)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九人：仲甫、守常、和森、张国焘、平山、秋白、述之、李维汉、段德龙。(2)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和波、朱锦棠、邓培、张太雷。(3)中央局委员：仲甫、和森、秋白、国焘、述之。仲甫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国焘工农部主任，述之宣传部主任，秋白、和森宣传部委员。

各决议之要点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的要点是：（一）说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之目的及特性，由此就可以得到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之正确的地位。（二）说明我们在民族运动中之左右倾的经验并指明其客观的原因与其纠正的方法。（三）确定我们对于国民党之态度，即与国民党合作中之具体方案。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最重要之点是怎样能扩大我们的党。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之要点：职工运动与国民运〔动〕之关系，工厂小组和重要的工业区域之工作问题等。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很搜集了些有价值的经验，并且从广东的农民运动经验中，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运动方案。青年运动决议案〔要点〕在C.P.与C.Y.之正确关系，并指明C.Y.应怎样使其工作青年化；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全国组织亦与正确的答案。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第一次的尝试，然而在这个决议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思，对于各方面的宣传都与以具体的规划。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在能将中国目前一般的妇女运动与以客观的分析而定出对付的态度。以上不过随记忆所及略为指出之，将来全部决议案到后，望诸同志仔细研究，务求精细了解。

还有一层可报告者，就是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有几处不完全）已有九百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一千党员，并且党员中工人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

（节选自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材料二　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中共“四大”追记

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全国革命高潮，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大钊、李立三、陈乔年、邓中夏、张太雷、李维汉等20人，代表党员900余人。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

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和新的党章。

大会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当时中国的政局是处在军阀统治加速崩溃、人民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一方面，将是更广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到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革命的破坏也愈来愈凶暴，愈狡猾。大会号召工农被压迫阶级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大会分析了各个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会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是最受压迫与最有集合力的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认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还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必联合各革命阶级，并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认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成份，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会还分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指出他们是民族革命的重要力量。大会对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大商买办阶级”对外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对内勾结军阀政府，“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他们“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民族革命运动，是“反革命派”。还指出：在民族革命中，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立足于本阶级利益之上，起初是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又往往欺骗和出卖工农，而与敌人妥协。

大会初步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批驳了党内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工作的政策。大会决议指出，“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主张只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右的错误的主要表现是，反对革命的阶级斗争，反对党的独立工作，反对支持和帮助国民党左派对右派进行斗争，主张阶级妥协。决议提出，右倾错误是当时党内更为普通和更为危险的错误。大会分析了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已经形成左中右3派的情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必须采取帮助和扩大左派，批评和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对于国民党不保障工农利益，听任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镇压工农运动的错误政策，必须给以揭露，并发动工农群众坚决反对。

为迎接革命高潮，发展革命力量，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大会对于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都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大会决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任务是，必须积极领导工人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政治教育，努力发展各种工会，使工人有自己强固的、统一的独立组织，从组织上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会认为领导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是共产党的重要责任，提出要联合农村各阶层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教会霸占田庄的斗争，指出必须组织独立的农民协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对广大农民经常地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对于青年运动，大会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决议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建立青年的独立的群众性的组织，加强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决议还规定各级党部均须设立妇女部，以便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并对妇女运动作了具体的部署。

大会认为，要使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成为更加自觉和更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并取得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大会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要将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纪律，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委员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部，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党的组织工作的指导。大会还规定，要在国民党和其他带政治性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团，以便实行具体领导。

大会最后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等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被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被选为中央宣传部委员，张国焘被选为中央工农部主任。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是中共以前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

认识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民主革命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也有着重要意义。这次大会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而且为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涨做了准备。但是，大会对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对于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进行讨论。这对于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两次东征

背景介绍

1925年五卅运动前，广东省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相峙的状态。广州革命政府虽成立两年，但一直未能控制广东全省。当时，陈炯明盘据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雷州一带，各有3万多兵力，时刻觊觎广州。广州政府内部也不巩固。其所属部队很复杂。滇、桂、湘、奥各军都是军阀部队。其中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表面上拥护国民革命，暗中却与帝国主义势力和陈炯明相勾结，随时准备颠覆广州政府。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举兵进犯广州。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南路的黄埔军校校军和许崇智部粤军攻势凌厉，以破竹之势击溃陈炯明主力，占领潮汕地区。到4月中旬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陈炯明残部窜逃福建境内。

第一次东征期间，杨希闵和刘震寰两部分别为北路和中路军，但杨、刘却按兵不动，并乘南路军东进未返时，陆续撤回广州。6月初，公开在广州叛乱。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于12日平息了叛乱。当东征军回师平息杨刘叛乱时，陈炯明余部于9月重占东江地区。粤南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准备配合陈炯明夹击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再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4日攻克惠州，歼灭了叛军主力，11月上旬收复潮汕地区。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残部，胜利结束第二次东征。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又挥师南征邓本殷。南征部队于10月底至12月间，连克高州、廉州、钦州、雷州，接着又渡海追歼残敌，于1926年2月收复海南岛，邓本殷残部被缴械收编。

东征的胜利，使四分五裂的广东省在国共合作的新条件下，迅速地获得统一。这时，已统一广西的李宗仁等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广东革命根据地和两广的统一，增强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材料：

- 第一次东征
- 东征讨陈
- 第二次东征

材料一　第一次东征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战败以后，即在东江一带负隅顽抗，并接受了北洋政府任命的粤军总司令之职。陈炯明所辖各部有叶举、熊略、钟景棠、林虎、洪兆麟、谢文炳等约三万余人，并与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互通声气，以联省自治相号召，声势亦颇不弱，是革命政府当前的第一个顽强敌人。孙中山回师广州剿灭商团不久，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以国民军的名义讨伐曹吴，囚曹锟于中南海的延庆楼，驱逐溥仪于故宫。冯玉祥请出段祺瑞来维持北洋政府的残局。在那样大动乱的局面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孙中山在广东发出和平统一的号召，段祺瑞、冯玉祥等亦自知那样的变乱局面不容易收拾，也就将计就计地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的大计。孙中山准备北上，北伐之师就停顿下来。革命政府以陈炯明既勾结商团叛乱，又窃踞东江，他的防线布置到石龙与东莞附近，随时威胁广州，因此而有第一次东征之役。

东征军是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及粤军张民达一师，莫雄、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组成的。革命武装的核心是黄埔军校校本部。蒋介石、加伦、周恩来等的紧密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教导第一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编制采用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战斗兵。团部直属部队有两个机关枪连、一个特务连、一个侦探队、一个通讯队、一个卫生队、一个辎重队。团设团长一人，团党代表一人，参谋长一人，中校副团长一人，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长一人；党代表下设少校干事一人，上尉书记一人，团部还有上尉参谋二人，上、中尉副官各一人。营部设营长一人，营党代表一人，副营长一人，上、中尉参谋各一人。连设连长一人，连党代表一人，副连长一人，特务长一人。排设排长、副排长各一人。当时在广东作战主要的是步兵，兵器主要的是步枪。当时敌人没有炮，我们的炮也很少。在第一次东征时没有发生攻城战斗；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攻城时才用炮战。我们的炮手也很少，射击不准确，苏俄顾问常担任炮手。作战中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机关枪，其次是驳壳枪。敌人方面连机关枪、驳壳枪都很少，每逢一次战斗，只要我们的机关枪一开火，敌兵就望风奔逃。党军作战差不多是连为作战单位，每

连有九个军官，配备九支驳壳枪，我们在火线上是军官持驳壳枪任前驱，士兵持步枪跟着军官前进。每一连的九个军官中差不多有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仅身先士卒，还要监督其他官兵作战。所以在火线上无坚不摧，树立了黄埔军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

在第一次东征中打了两次恶仗：第一次是淡水之役，党军第二团与陈炯明的主力叶举、熊略各部战于淡水城下，战斗正进行到紧急关头，团长王柏龄逃跑了。后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与各级党代表严密合作的情况下，不但把战斗继续进行到底，并且攻下了淡水城，瓦解了敌人的战斗力量，树立了政治工作在党军中的威信。这一仗的胜利，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第二次是棉湖会战，这一次陈炯明的主力是林虎统率的"三黄部队"。所谓三黄部队就是有三个姓黄或王的师长统率的部队，广东人是王、黄不分的。它是陈炯明割据东江的支柱。在东征军方面是以党军第一团为主力，配合以粤军一部及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和"三黄部队"血战了两天三夜，双方都有相当大的伤亡。党军第一团始终士气旺盛，加以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党军所到之处，人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并送水、送稀饭、送草鞋，军民一体，更鼓舞士气。最后敌军动摇，分向大埔、饶平及兴宁、五华以北逃窜。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即传檄而定潮梅，第一次东征即告一段落。

（节选自《包惠僧回忆录》）

材料二　东征讨陈

1924年冬，孙中山平定了商团叛乱，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统一，便接受了冯玉祥的邀请，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赴北京。

孙中山北上后，盘据在惠州的叛军头子陈炯明认为反扑时机已经到来，遂自任"救粤军总司令"，准备率部大举进犯广州。

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政府发布总动员令，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任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东征军参谋长，周恩来兼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亲自出征。当时在粤军二师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奉命投入了东征之战。

战争开始，作为东征先头部队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于1月下旬从广州出发。与黄埔学生军会师后，力量倍增，连战皆捷，乘胜前进。2月上旬进抵淡水城郊。

叶剑英亲自勘察淡水敌兵力和地形之后，第二天到龙岗军校教导团驻地总司令部，报告协攻淡水城作战计划，与蒋介石，周恩来，军事顾问加伦等，详细地商讨攻打淡水的部署。

蒋介石问："淡水城有多少敌人？"

叶剑英回答："叛军从广九路溃窜到淡水城的熊略等部将近4000人，企图固守待援。"

蒋介石又问："淡水乃弹丸之地，有什么防守工事吗？"

叶剑英说："淡水城虽不大，但城墙又高又厚，敌军筑有上中下三层射击阵地，在城墙高处还装有照明设备，一遇攻击，三层炮眼同时还击，形成火网，加之地势险要，很难攻克。"

蒋介石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叶剑英又补充说："现在，我们东征军地形不熟，粮食不济，孤军深入。攻城宜速不宜缓，要速战速决！"

经过半天的研究，大家采纳了叶剑英提出的作战方案，确定：教导团由平湖、龙岗突击淡水南面，粤军自西北面、东北面进击，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前进，对淡水展开三面包围攻势。2月13日，二师一马当先，协同友军向淡水发起攻击。于15日晨进占淡水。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洪兆麟部从沙坑方向进行猛烈反扑。在敌兵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见势不妙，临战脱逃。教导一团三营营长王俊指挥不力，连吃败仗。

张民达、叶剑英仍坚守在城内。因部队已出发，调援不及，乃率领警卫连等部队，居高临下，以机枪、驳壳枪反击，歼灭敌前锋三四百人，使淡水转危为安。

叶剑英事后回忆说："淡水一仗打得很苦。"经过这一仗使东征军信心倍增，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奠定了胜利基础。

叶剑英在这次战斗中，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往来于友军之间进行联络，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

关于淡水战斗，国民党的战史里多次吹嘘蒋介石指挥学生军打得如何之好，有意贬低二师和粤军的作用。为了说明事实真相，不妨摘引当时参战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几段战场札记：

"蒋介石向来不是果断的。他调动部队十分胆小，到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时才走了十二公里，到了龙岗，才决定停下来宿营。第七独立旅旅长下午四时告知说，上午九时左右听到从第二步兵师的地段传来炮声。蒋介石估计这是敌人企图进攻第二师，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查明情况。

"二月十三日晨八时，敌人从惠州和淡水攻击第二师。第二师不仅击退了进攻，而且以灵活的战术成功地俘获了约三百名敌军，缴获了若干步枪和三挺机枪。

"他们（指第七旅的士兵）在逃跑中竟然把辎重丢了，

蒋介石吓得半死。他叫嚷着一团、二团撤往清坑，随后，同士兵一起跑了。

“守卫淡水城门的是张民达将军的第二师第七团的士兵，而不是我们黄埔军校二团的士兵，这使我们有点惊讶。

“我们正准备走，遇到了七团的一名军官。我们问他蒋介石的司令部转移到哪里去了？军官回答说：‘跑了，跑了！’我们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才在离城几公里的一个寺院里找到了司令部和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不了解情况，他估计打了败仗，因此命令第二团撤退，蒋介石看见我们后，没有掩饰内心的喜悦。他听完汇报，担心地请求尽可能悄悄地将一团从其所占领的阵地撤到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这位将军仍然没有明白过来：他是胜利者，而不是战败者。我反驳说：‘敌人被打退了。淡水在我们手里。为什么要使城市失去掩护部队呢？一团应该留在那里。’蒋介石犹豫了一阵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蒋介石竟然和张民达在自己门口比赛起踢球来了，尽管事非所愿，他还是把城市交给了第二师第七团，因为他们既了解情况，又不惊慌逃跑。

“我们是蒋介石将军、他的司令部和二团团长王茂和（王柏龄）丧魂落魄的见证人。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将军在战斗中表现得坚决果断。”

东征军东出淡水，迅速攻占惠东的平山。2月22日，东征军粤军司令部在平山附近的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

当时敌军态势是：洪兆麟、叶举部虽然溃退，但海丰、汕头老巢未动，河源、惠州仍在敌军之手，随时都可以反击。地处广州与汕头中间的惠州尚有杨坤如部三四千人坚持防守。同时，林虎部仍盘据在兴梅一带，虎视眈眈。而东征军左中翼两路按兵不动，徘徊于增城、博罗之间，作壁上观，只有右翼学生军和粤军二师等奋力进击，一战而克淡水，再战而取平山，重创洪、叶部万余之众，但因出师以来连续战斗，部队疲惫，后方联络、供给也均感困难。

面对这种形势，下一步如何打法？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何应钦等为代表的黄埔军校的军官多数主张先打惠州。认为惠州为东江支撑点。惠州一下，则东江不难迎刃而解。相反的，以张民达、叶剑英为代表的粤军军官，则极力反对先打惠州，提出了暂时监视围困惠州，以主力直取潮州的作战方案。

作为粤军第二师的参谋长，叶剑英继续陈述己见。他首先回顾惠州作为战略要地的历史沿革，说：“惠州又称鹅城。有这样一首诗：‘铁链锁孤舟，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这首诗说明惠州天险。惠州兵多城高，防守坚固，我军力薄，不是一两天能打下来的。而敌军洪兆麟部与叶举部尚有二万人近在咫尺，我若先攻惠州，敌将里应外合，陷我于被动地位。用兵贵在主动。要争取主动就应该先追歼洪、叶当面之敌，直捣潮汕老巢，然后杀个回马枪，惠州不攻自破。”

许济、莫雄等粤军军相继发言，都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蒋介石是主张打惠州的，但表面上装着听取双方的意见，不表态。这时，蒋介石终于沉不住气了，慢吞吞地摆出一大套理由，强调攻下惠州有如何如何的重大战略价值，实际上是想要二师等队伍去打惠州、老隆，自己利用海上兵船运输的方便，去打海陆丰，先占汕头。

双方意见坚持不下，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总司令许崇智听了双方的争论和苏联顾问加伦的意见，考虑到左、中翼滇桂军按兵不动，惠州仍处在滇桂军围困监视的原来状态，最后决定，让右翼军集中兵力进攻当面之敌，举兵东下。确定由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二师、四师主攻三多祝洪兆麟部，向潮汕进军；由蒋介石率领黄埔两团学生军绕过三多祝，迂回海丰，袭击叶举残部。

在叶剑英85岁高龄的时候，笔者访问老人家，曾问起这件事，叶剑英记忆清晰，肯定地说：“有这件事。蒋介石要打惠州，除去东征的后顾之忧。他这个想法，在军事上也有点道理。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陈炯明部队在潮汕一带，惠州城防守得很坚固，不是一两天能打下来的。惠州没打下来，林虎就打来了。蒋介石要把我们的队伍拉去打老隆、惠州，他自己打海陆丰，利用海上兵船运输的方便打海陆丰。”

（选自《人物》94年4期《叶剑英与蒋介石》作者范硕）

材料三　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是紧接着改编粤军、肃清南路、消灭川军之后开始进行的。在第二次东征之前，党军第一师的一、二、三团，是集中在广州市北教场训练，师司令部在旧造币厂内，也在北教场旁边。周恩来是第一师的党代表，但他不经常住在第一师司令部，因为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在长堤八旗会馆，他同蒋介石经常在八旗会馆办公，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在邵力子任主任及熊雄任主任时期，蒋介石都是交给周恩来处理，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如恽代英、聂荣臻、安体诚诸同志，以及高语罕、李召林等，都是由周恩来向蒋介石或军官学校提出任用的，无形中他是代表共产党的活动。

在准备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调我到党军第三师当党代表；因为这一师是粤军许济部改编的，师长谭曙卿是湖南人，行伍出身，虽然识字不多，他是粤军的宿将，兵士及下级干部都是广东人，它们差不多是许崇智的子弟兵，地方色彩很浓厚，政治工作，毫无基础，已编为东征军的作战部队，所以要调我去一面行军，一面整理。我当时认为这是很不好做的一种工作。而党军第三团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兵，三个营中第一营营长郭俊，第二营营长吕

同德都是共产党员好共事，第三营营长王禄丰虽然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但这个人很平庸，好控制，全团的干部和士兵我都处得很好。我知道打仗不是可以随便凑合的，如果这个部队我掌握不住，打起仗来是很容易出麻烦的。我是一个文人出身，没有作战的经验，我总以为在一次战斗中，不是成功，就是成仁，中间的路是很少有的，我不能不作一个比较安全的准备，所以我坚决下去。我同周恩来说，要调请把仗打完了再调，周恩来听了我陈述的理由也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果然在华阳一战，第三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虽然有点为个人打算的思想，但是党军第三团在海丰一战，我们以两营兵力击溃洪兆麟、谢文炳部七千余人，还俘敌千余人，我坚决留在第三团也算起了一点作用。

东征军设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是蒋介石，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是何应钦，所属的部队为党军第一师全部，第二师第五团，粤军张发奎一旅，总共约万余人，这是东征军的主力。第二纵队司令是李济深，所属部队是党军第三师全部，及粤军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总共约万余人。第三纵队司令是程潜，所属部队除攻鄂军全部不过二千多人而外，还有何成浚所部的鄂军及朱培德所部的建国滇军，拼凑起来一共也不过四五千人，担任总预备队的任务。另外有一个独立炮兵营，营长是蔡忠笏，是蒋介石的同乡，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总共东征军的兵力约三万余人。卫戍广州的部队除党军第二师四、六两团外，还有入伍生第一团驻沙河，入伍生第二团驻西村，吴铁城所部的警卫军驻广州市区，加以驻在北江的湘军及各种杂牌部队共达二万余人，卫戍司令仍由王懋功代理。

在讨伐滇桂军胜利之后，即将孙中山时代的大本营结束，成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得到中共与苏俄代表团的密切合作。苏俄代表团的总顾问鲍罗廷及军事高等顾问加伦将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都到北京参加国民军的工作，还没有回来，苏俄顾问团由新来中国参加工作的季山嘉负责，东征军的军事顾问由罗嘉党夫将军担任，还有步、炮、工各兵种的顾问一共有五六人。

这一次的东征，打了三次很激烈的仗，我们大概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初由广州出发，在十月中旬就开始对惠州的攻城战。惠州的城防司令是陈炯明的一个师长杨坤如，为粤军著名的骁将，而惠州倚山带河，三面环水，形势险要，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东征军在飞鹅岭布置了炮兵阵地，党军第一师第一团及第二师第五团任前锋；在炮火连天地攻打了四五天之后，敌人仍在城上沉着应战，毫无动摇的迹象，到了第六天，惠州城内着弹起火，北门的城楼被炮火攻垮了，城墙亦打开了一丈多长的一个缺口，第五团即开始爬城，在爬城的战斗中，党军死伤甚众。周恩来同苏俄顾问和蒋介石等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北门外督战，第三团驻守博罗县城，担任惠州攻城的预备队，整装待命出发中，第五团团长，刘尧宸战死在惠州城下。从围城到城破，剧战十余日，敌人弹尽粮绝，由惠阳向紫金方面逃窜。惠州城攻下后，党军第三团奉命尽先进城，清理战场，安抚百姓。所见败瓦颓垣，尸横遍地，行人稀少，满目凄凉，我真感到战争的残酷。我们的队伍在惠州休息了一天，蒋介石同罗嘉党夫将军召集我们讲过一次话。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团死伤惨重，残余部队不过三、四百人，由副团长惠东升调升团长，调回广州休息整理，东征军即分两路东进。第一纵队由平山、赤石、梅龙镇经海丰陆丰趋潮梅。第二纵队由河源、紫金经五华、兴宁定期在潮梅会师。总指挥部率领第二纵队进到紫金以东的华阳镇与林虎统率的三黄部队发生遭遇战，第三师谭曙卿的三个团打垮了两个，剩下的一个团还不完整，谭曙卿失去了指挥的能力，官兵纷纷地从前线溃退下来。蒋介石带着很少数的卫队及政治部的工作同志进到了最前线，已到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关头。陈赓当时在政治部工作，他同政治部的工作同志奋勇督战，还打死了几个擅自退却的官兵，才把战线稳定下来。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总指挥部，慑于党军的声威，以为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即向安流方面仓促退却；如果敌军再前进，这一纵队就会完全消灭，蒋介石不死就被俘！敌军到了胜利关头退却，宁非怪事。他们刚刚到达安流，党军的增援部队真赶到了，粤军陈济棠、陈铭枢两旅由五华南下，党军第一师一二两团由河婆北进，正在安流会合，打了一个大包抄，三黄部队损失三分之二，第三师在华阳战役损失的人枪，在安流这一战除将原人原枪缴回而外，还俘获敌军官兵万余，步枪八千余枝，辎重器材无算。在这一战役，林虎的三黄部队，差不多完全瓦解了。这一路此后就没有打甚么仗。

在第一师向华阳增援的同时，党军第三团由平山、白云、赤石、梅龙进入海丰向沿海各县搜索前进，并派郭俊的一营到汕尾搜索、二三营及直属部队在海丰宿营，海丰城城东北面有一条大河，宽约二十余丈，不能徒涉。河上通陆丰方面有钢筋水泥建筑的一座大桥，名郑家桥。桥距海丰北门不过一二华里，这是一条公路，桥上可行四路纵队。我们到海丰宿营时，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来同我们联系过，据说距海丰三十华里之地，即有敌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共约七八千人，号称万余人。我们已知道了情况，即在海丰城北门外右侧面的一个小土山上设置了一个连哨，郑家大桥的桥头上设置了一个傍望哨。当天的黄昏时候，我同钱大钧还亲去看过哨位，以为这样设防，不会有甚么问题。我们的团部，驻在城中心的一个学校的楼上。到夜半三时许，我们正在熟睡中，特务连长龙慕韩来报告说：北门外有很密的枪声。我是没有打仗经验的人，自行军以来即时时刻刻准备应战。钱大钧要打电话到二三营

去问情况，我说，枪声很紧了，我们到北门去看看。在五分钟内，我们都准备好了，带着特务连和侦探队，一个跑步到了北门外的一棵大榆树下，了解了前线的情况，第二营全部投入了正面的战斗，第三营在左侧面的小山附近待命，正面的敌人已进入到我们连哨所在地的小土山上，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混战状态中，我们的机关枪无法施展，前进的号音，越听越近，步枪的子弹已经飞到我们阵地的前后左右。我们判断敌情之后，即派侦探队长俞济时率领所部从右侧方冲锋前进，抄袭敌人的后路，为第二营增援。传令兵来报告，二营营长唐同德受伤，正面有崩溃的危险，我们又将特务连挑选了两排人向正面增援上去，团部即再无战斗兵可调了，仅剩我同钱大钧的八个卫士及不到十名的传令兵，钱大钧同中校团副蔡熙盛、参谋长赵锦雯很恐慌，他们问我："党代表，怎么办？"因为执行连坐法的是各级党代表，他们见于形势不利，想退却，先回团部，向师部请援，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营长如果阵亡，我答应团部退却，是要受临阵脱逃的处分，是要枪毙的，无论向前如何艰难险阻，只能死中求生，不能向死路去就死，我当时答应说：退却是要受连坐法的处分的，我们还有二十几条枪，还有两挺机关枪，我们还有第三营，我们打一个冲锋上去把第三营拉过来，还可以希望挽回这个危局。龙慕韩同意我的意见，钱大钧也无话可说，于是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团本部由左侧方即第三营所占的高地前进。此时已到五点钟了，我们站在高地上，望见敌人的队伍密集在公路上，蠕动地前进，我们才开始用机关枪向公路上的敌人扫射，并命令第三营向郑家大桥桥头冲锋前进。俞济时部已先第三营冲到郑家大桥桥头，把敌人的一字长蛇阵的队伍截为两段，在桥头以东的敌人就不得不退却，在桥头以西的敌人就不得不缴械投降，这一战斗，告了结束。第二营的官兵死了二十余人，伤数十人，唐同德腹部受伤，抬到卫生队的临时医疗所。我去看他，他躺在铺板上很痛苦地呻吟，我问他的伤情？他说："党代表！我怕不行了！敌人打退了没有？"我说："大敌击退，前线的敌人被俘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枝。"他忍痛微笑说："我们胜利了！"当天夜晚，他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唐同德是安徽人，江西讲武堂毕业，他是笃信共产主义、埋头苦干的一个共产党员，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没有结婚。战后审讯俘虏，据说：谢文炳亲到桥头督战，他们这一路军队企图绕过我们的第一纵队后路，由平山淡水趋樟木头、进取石龙，威胁广州。如果不是这一战我们胜利了，洪兆麟、谢文炳的部队冲到东征军的后面，东征军的全局，当为之一变，胜负之数，亦未可知。

当时何应钦的纵队司令部在公平，钱大钧当天中午骑着马到公平报功请赏去了。我们在海丰休息一天，郭俊的第一营也从汕尾调回来了。第三天拂晓，我们又从海丰出发，一路之上搜索前进，到陆丰宿营，敌人又在距陆丰约四五十里之博美一带逗留，据报有回窜的模样。我们在海丰粗心大意对待敌人，几乎吃了一个大亏，再也不敢马虎了。钱大钧、蔡熙盛、赵锦雯（团部参谋长），轮流守着电话，经常同前哨保持联系，了解敌人的动向，一直到次晨四点钟我们吃了早饭，开始行军。经过河田到河婆与第一二团会合，我同周恩来在马上见了一面，又分途向潮梅前进。我们由普宁、揭阳搜索前进，一直顺利地到达潮州，没有发生战事。残敌一部由饶平、大埔老路窜闽南，一部由平远窜赣南，陈炯明从这一次战败以后退逃到香港做寓公去了，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活。

东征军会师潮梅，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战役。我们从广州出发一直到抵定潮梅，不过五十余日，杀敌致果，党军的声威，震动遐迩。

（节选自《仓恶僧回忆录》）

全国革命高潮的兴起

背景介绍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纱价跌落，生产紧缩，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17日，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照发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许，而且开枪镇压，顾正红饮弹牺牲，另有重伤七人，轻伤数十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

5月24日，由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起，公祭顾正红烈士。参加大会的有工人、学生、市民约一万人。大会气氛悲壮，群情激愤，"支援日本纱厂工人"、"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会场上空。中国共产党追认顾正红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日本厂主残杀顾正红的同时，上海租界工部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等损害中国主权、侵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四个提案，更加激起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浪潮。党中央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支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随后汇集群众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悍然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15人，50多人被捕，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党中央决定把反帝斗争深入各阶层，号召全市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5月31日，上海工人在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刘华等人领导下，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宣布实行全体工人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首

先举行政治大罢工，学生、商人纷纷罢课、罢市响应，形成了以"三罢"为中心的"五卅"运动。6月7日，由总工会发起，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斗争的公开机关。联合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17项交涉条件，表明中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把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运动的中坚。

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苏兆征、邓中夏去香港领导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爆发了十几万工人的大罢工。香港当局用紧急戒严和封锁来对付罢工，引起罢工工人极大的愤怒，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生军等十多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法帝国主义水兵的射击和军舰的炮轰，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造成"沙基惨案"。"沙基惨案"激起广州、香港人民的更大怒火。香港罢工人数迅速扩大到20多万，其中有13万多人回到广州，准备长期斗争。7月初，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同广州工人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领导机构，共产党员苏兆征被选为委员长。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还组织了一支得力人的工人纠察队，在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封锁东起汕头、西到北海的海岸，断绝对香港的物资供应。香港交通停顿，商业一落千丈，粮食日益恐慌，经济陷入瘫痪的的状态。香港资本家曾两次致电英国政府请求出兵攻打广州，梦想重演鸦片战争的故伎。罢工委员会采取孤立英国的政策，提出除英国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商人来广州贸易发给"特许证"，这样就拆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盟，使英国的企图不能得逞。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形成了全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材料：

- 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 工人先锋顾正红
- 关于顾正红惨案的报道
- 省港罢工震中外
- 省港大罢工中的蔡林蒸

材料一　五卅运动的导火线——顾正红事件

1925年5月15日晚，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资本家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这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顾正红是江苏阜宁县(他的家乡现划归滨海县)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5岁那年同母亲和弟、妹讨饭到上海。进内外棉九厂当了童工。后来，由于反抗工头克扣工人工资而被开除。随后又到内外棉七厂当盘头工。在"二月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沪西、沪东等地区22家日商纱厂工人在2月10日举行的罢工)中，20岁的顾正红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和鼓动队，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四五月间，棉价高，纱价低，棉纱市场清淡。日商纱厂资本家认为这是向二月罢工工人进行反扑的好时机，就无故克减工人工资，开除工会积极分子，声言要取缔工会组织，甚至任意关厂停工。针对日本资本家的反扑，共产党决定采用"怠工"、"轮流罢工"和反对"锁闭工厂"的办法。5月14日，日商锁闭了内外棉七厂。次日晚，夜班工人顾正红和工友们来到工厂门口，要求开门上工，遭到拒绝和斥骂。顾正红挺身而出，带领工友们冲破厂门，涌入厂内。日本资本家指使打手用铁棍、刺刀向工人乱打乱刺。顾正红和工友们冲进车间拿起打梭棒进行反击。日本资本家瞅准带头的是顾正红，就向他开了枪。顾正红倒下去又爬起来，呼喊着继续同凶手们搏斗，直到身中4弹倒在血泊中。顾正红事件激怒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导火线点燃了。两个星期以后，伟大的五卅运动就火山般地爆发了。

(选自《革命文物》80年3期)

材料二　工人先锋顾正红

顾正红一落地就泡在苦水里，到上海做工又横遭压榨，赶出九厂他进了七厂，照样还是在日本资本家及工头手下当牛做马。他与被欺过甚的工友们有时也反抗，但都没有得到多少结果。

难道命该如此，出路到底在哪儿？年轻的顾正红不解，却迫切想解，日日心潮难平。终于有一天，当他走进了工人补习学校的大门，那苦思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了……

工人补习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1924年，为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党把沪西工人区列为重点。继开设补习学校后，又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方针，组织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举行各种活动，吸引周围工人，向其灌输革命思想。

顾正红9岁时读过一年书，那还是靠了当私塾先生的舅舅勉强读下来的。而今又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他欣喜万分。在上了补习学校后，他继而加入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并很快成为积极分子。当时，经常到俱乐部讲课或与工人座谈的有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他们宣讲革命道理，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工人欢迎。每次上课顾正红都听得十分认真，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没有一次迟到早退。他爱俱乐部，在这里，他认识了一

批坚贞而聪颖的人，接触了一些新鲜又透辟的道理，开始了一段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一天晚上，顾正红及几个工人向刘华谈起日本厂主的种种罪行。顾正红首先讲了自己被九厂开除的经过，其他几个工人也纷纷咒骂东洋老板及走狗对工人的虐待，并说到过去斗争中往往人心不齐，让资本家钻了空子。刘华觉得这是开导工人、培养其中骨干分子的一个好机会，于是说道："天下穷人是一家。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易折断了。所以团结斗争力量大。"这番比喻，听得顾正红大受启发，犹如一束强光投入胸间，他的心里亮堂了。

从那以后，顾正红的觉悟迅速提高，斗志更加旺盛。与此同时，沪西俱乐部的影响不断扩大，到1924年底，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参加的工人总数近千人。顾正红作为工人骨干，在七厂车间非常活跃。他向工友们宣传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同大家一道商议反抗资本家的办法。逢到夜班，午夜后东洋领班回去休息了，车间里便响起低沉而有力的歌声，这是顾正红在工友们中间教唱革命歌曲。为未来的伟大斗争加紧准备。

的确，不斗争是再难活下去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劳苦大众的仇恨不断聚积。正如郭沫若诗中所云："就在这静安奇的街道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

火山在1925年吼叫了。

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厂长殴打女工，开除大批男工，逮捕工人代表。暴行激怒了工人群众。刚举行了"四大"的党中央决定抓住时机，组织反帝大罢工，并成立了由邓中夏、李立三等负责的罢工委员会。

2月9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并迅速成立了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很快地，周围各厂纷纷响应，10天之内即发展成沪西、沪东22家日商纺织厂3万5千多工人的同盟罢工。这便是著名的"上海二月大罢工"。

二月罢工中，顾正红冲锋陷阵，勇不可当。

他佩戴上工人纠察队的袖标，到交通要道"把口子"，向过往群众进行宣传，劝不明真相的工友不去上工。

他随同"打厂队"即罢工鼓动队，到各厂去鼓动、串联，遇有走狗挡道，便用铁棍、榔头与之搏斗，冲破层层阻挠前进。

他为发展工会组织四处奔走，向工友们传达俱乐部的指示，散发传单，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工会的影响和力量迅速扩大。

轰轰烈烈的罢工势头，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使昔日骄横的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低下头来，在不准随便开除工人等项条款的协议上签了字。二月罢工初战告捷。

广大工人精神振奋，信心大增。复工那天，有的厂工人逼着日本厂主到各车间给工人鞠躬，然后才开机。看到原先神气活现的东洋老板低声下气的样子，大家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斗争的烈焰飞快地锻造着顾正红，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凶残狡猾的帝国主义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二月罢工"后，一直伺机反扑，经常找岔挑衅。到了四五月间，纺织业行情出现了世界性的变化，棉价由低升高，纱市从旺转淡，这对纺织工人开展斗争显然不利。党及时分析和研究了形势，决定转变策略，领导各日本纱厂工人采取轮流怠工的方式，使日人穷于应付。从5月初起，内外棉等一些工厂相继由罢工转为怠工，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日本资本家先是动用巡捕和警察进行干涉，达不到目的又转而把矛头对准工会积极分子。5月14日，日本厂主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的数名工人代表。工人们愤起质问，遭到铁棍殴打，当场有5人被打伤在地。

血腥弥漫在沪西上空，沉沉的雷声逼近了。

风险，极大的风险！这，顾正红早已想到。还在"二月罢工"时，父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再三劝他少出头露面。顾正红对父亲说："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你不跟东洋人斗，他就更欺负你。"

正是抱着决死一斗的信念，顾正红迎向暴风雨。

清晨，在一间挤满了工会积极分子的小屋内，夜班后匆匆赶来的顾正红神情严肃地聆听着党的最新指示。前一天十二厂工友被打的事件激愤着他，会上关于日方很可能以十二厂停工使七厂织布无原料的借口而关厂的分析更令他注意。他牢牢记下了会议主持者刘华的话："如果东洋人用这个花招来破坏我们工人队伍的同志，七厂工友一定要全力抵制，坚持上工。"

日本资本家果然毒辣。15日下午5时左右，当夜班工人陆续来到七厂门口，漆黑的铁门却紧紧关闭着。一帮凶神恶煞的巡捕、日本点名员及"包打听"把准备进厂的工人拦住："厂里没有纱，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人群中站出顾正红，他领头高喊："叫大班出来讲话！""不发工钱，决不回去！"一片怒吼声中，数百工人奋力破门而入。凶狠的巡捕和日本点名员大打出手，一连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见状怒不可遏，振臂高呼："东洋人打伤工人啦！"遂带领部分工友冲进物料间，拿出一些打梭棒用以自卫。

潮水般的工人队伍向前奔涌，高擎打梭棒的顾正红一马当先，久蓄他心头的深仇大恨化作串串激昂的口号："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不开工就得发给工钱！"这时，内外棉副总班和七厂大班带领一群打手，持枪持刀地迎面扑过来。然而工人队伍并未退缩，冲在前列的顾正红步子更大，口号更亮。

七厂大班看到工人队伍的为首者正是他们早就盯上的顾正红，杀机顿起，举起手枪对准顾正红，一枪打中他

的左腿。两旁的帮凶见大班开了枪，越发猖狂，朝着工人们死命殴打。这时腿部受伤的顾正红忍住剧痛，使出全力呐喊："工友们，团结斗争啊！"他的英勇形象极大地鼓舞了苦斗中的工友，众人顶着铁棍和屠刀继续猛冲。又一发子弹，从大班的枪口射向了顾正红的腹部。顾正红摇晃了一下，却没有倒下，他紧紧抓住身旁一棵小树，怒视着前方，如注的鲜血染红了嫩绿的树干。紧接着，顾正红头部再中一弹，他仍然挣扎着，想同敌人最后一拼。灭绝人性的日本大班继续射击，同时棍棒齐下，顾正红的身躯浸在血泊之中……

悲愤填膺的工人们把顾正红及其他负重伤的阶级兄弟抬上人力车，去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诉冤请验"，并送往医院抢救。

终于，因伤势过重，5月17日，顾正红年轻的心脏停止了搏动。他身上共中4弹，刀痕达10余处！就在奄奄一息之时，他嘴中还喃喃念道："我不去东洋人的医院……"。

顾正红的牺牲很快震惊了四方。

5月16日及19两日，中共中央为顾正红惨案连发32号、33号通告，要求各地区组织各界援助上海内外棉罢工，掀起反帝运动。

5月18日上午，大批工人抬尸游行，所到之处，哭声不绝，群情激昂。下午，4000余工人和学生聚会悼念烈士，人们扶灵控诉，气氛悲壮。5月24日，举行公祭大会，到场的工商学各界人士1万多人，会场上传单飞飘，挽幛如林，五处讲台同时演说，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刘华为烈士亲书挽联，上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是："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

（摘自梧沙《65年前的一次大流血》）

材料三　关于顾正红惨案的报道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肇祸原因　自上次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解决后，日商与工人间即订立一种条约，双方签字，以昭信守。讵日人则每藉端为难，条约之履行者不多觏，近则时常藉故开除参与上届工潮之工人代表。昨日第十二厂中有六人忽被开革，工人愤甚，始有罢工之举。外传此次风潮起于工资问题，实非真相。

肇事情形　十二厂既罢工，其余别厂工人则工作如故。讵第七厂工人正拟前往工作，日人不许，工人以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乃群起质问。无如日人并无充分理由答复。工人见无理可喻，乃要求发给工资，然后回去。时工人愈集愈众，一致为坚决之要求。讵闻有该厂小大班川村者，及其余职员，突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中弹身死为顾正红（江北人，二十余岁）、王福全，受重伤者三人，为周阿大、吴阿四、徐阿平〔炳〕，较轻者尚多。无何，日人复以电话报告巡捕房，谓"有工人扰乱纱厂，请速派得力探捕前来弹压"，未及半小时，华印探捕各十余人武装驰到，如临大敌，然已在日人放枪之后，工人见此，愤激益深，坚聚不散，印捕乃亦放枪，意在驱散工人，讵枪弹适中潘姓女工。当时西捕多人亦在场，捕房方面旋拘去工人五六人。是役日人方面绝未受伤，厂中器具等件亦无被毁者。事后乃由普陀路捕房派西捕多名，雇坐黄包车送至公共公廨，由驻廨捕头电告中国红十字会驱病车到廨，将受伤工人，车送医院疗治；因伤毙命之工人尸体，已由西捕舁送斐伦路验尸所，候报请公共公廨中西官相验。

（原载1925年5月16日《时事新报》）

材料四　省港罢工震中外

1925年5月1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代会四大团体，曾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为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支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广州举行罢工，由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李启汉等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之后，邓中夏、杨殷、杨匏安即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苏兆征一同组织罢工。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工人首先于6月19日举行罢工；接着洋务、码头和煤炭各业工人起而响应。15天内，香港罢工工人总数共达25万人，其中有13万人撤出香港，返回广州。6月21日，在刘尔崧、李启汉、周文雍等的发动领导下，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和在市内英、美、日洋行做工的工人也宣布举行罢工。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黄埔军校师生热情支持省港大罢工。他们积极同工人阶级站在一条线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

6月23日，香港、广州工人以及农民、市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五六万人，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工农界会场由谭平山主席；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席；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代表李启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商民协会代表甘乃光、广州特别市党部代表孙科等等，在大会上宣读了决议案或作了演说。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从东校场出发，经惠爱路、永汉路、南堤进至西濠口。沿途高呼口号，秩序井然。下午2时，游行

队伍巡至西堤沙基口。

沙基是傍水而筑的一条街道，与英、法租界沙面，仅有数丈之隔。省港罢工爆发后，美、法帝国主义加强了警戒，不但完全关闭了东桥和西桥的铁闸，而且派水兵登陆，在沙面的各重要据点，垒起沙包，筑起牢固工事。各国兵舰泊在白鹅潭上，准备作战。

是日，黄埔军校入伍生和党军第一、第二团各派代表参加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入伍生由第二营营长朱棨率领；党军第一团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率领；第二团由该团第二营代营长蒋先云率领。曹渊、孙一中、宋希濂、文起代、郭光彩、义明道等等，均在游行队伍之列。党军师长何应钦，担任总领队。下午2时40分，当黄埔军校的队伍进入了沙基东、西两桥之间时，沙面早有准备的帝国主义军警，竟然隔水对着游行队伍开起枪来。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兵舰，也卸去炮衣，对准密集的人群，开炮轰击。刹时之间，机枪突突，炮声隆隆。不幸中弹者，死的死，伤的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时，狂风呼啸，大雨倾泻，沙基道上，血流成河……

当帝国主义分子的屠杀开始时，军校总领队何应钦认为，此案已酿成国际案件，非一部分武力可以解决，因而严令各营连不准开枪。官兵遵令不作还击，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群众撤离险境。但沙面帝国主义军警却没有停止射击。党军第三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及第二团第二连排长义明道、陈纲，排长文起代，入伍生郭光彩等二十多人均中弹牺牲。在这个惨案中死难的群众，共达五六十人；重伤者共一百七十多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于惨案发生后赶到现场，只见死亡枕藉，尸骸遍地，不禁悲愤填膺，失声大哭。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发起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斗志，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更加扩大。7月3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委员长、李启汉为干事局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为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广州数十万工人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大罢工的风暴很快波及南部中国。

省港大罢工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封锁香港。当罢工工人离港后，香港全市不仅车船停开、机器停转，而且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也成为问题。繁华的香港，顿时死气沉沉，百业停歇，垃圾粪便成堆，成为死港、饿港和臭港。据当时的估计，罢工一日，香港就要损失七百万元。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罢工工人纠察队，以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由邓中夏任训育长、黄金源任总队长、徐成章任总教练（徐成章调离铁甲车队后，由周士第任铁甲车队队长）。黄埔军校派出大批教官和学生，充任纠察队的教练、各级队长或训育指导员。铁甲车队也支援给纠察队一批武器，并派出教官赵自选，排长莫奇标、高超等担任教练，调出一批队员充当纠察队骨干。组织严密、生龙活虎的工人武装队伍被派往各地，执行维持秩序、封关缉私、截留粮食、打击工贼的任务。在东至深圳，西到前山，绵亘数百里的地带，筑起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保卫了省港大罢工。

在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的坚决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港英当局的走私偷运活动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他们不肯甘休，便策划了一场大规模袭击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的事件——沙鱼涌事件。

沙鱼涌位于深圳的东部，是一个海边小村。1925年11月3日，港英当局侦悉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一百多人驻扎该村，便纠合民团、土匪和反动军队一千多人，趁夜前往扑击，敌人抢占了沙鱼涌东、南、北三面山头，控制了西边的一片海滩，集中火力，向铁甲车队、罢工纠察队阵地猛烈冲锋。天亮后，又出动一艘兵舰和一架飞机，配合地面部队，猖狂进攻。敌人悍然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目的是想一举扑灭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以解除对香港的封锁，从而使他们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困境。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不利形势下，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奋起应战。他们在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吾的沉着指挥下，坚守阵地，奋勇迎击来犯之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其中铁甲车队班长黄华然领着一个班，抵挡着数百名敌人的轮番进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同敌人拼刺刀，大量消灭敌人。黄华然身负重伤，仍在阵地上指挥战斗。这一场恶场，共持续了五、六个小时。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越打越顽强，先后击毙敌人的参谋一人、连长二人、排长五人，打死打伤敌之官兵约二百人。最后，周士第、廖乾吾带领两队队员突围，由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掩护，冲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木桥和重重包围圈，绕道横岗、龙岗，胜利返回深圳。在这一场战斗中，铁甲车队共牺牲了十五人，其中黄华然全班牺牲在阵地上，排长李振森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罢工纠察队也伤亡了十多个人。这是铁甲车队、罢工纠察队武装反击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它再次挫败了敌人企图破坏封锁的阴谋，保卫了省港大罢工。这两支队伍勇迈绝伦、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奋斗事迹，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表彰，对当时的罢工斗争和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节选自曾庆榴：《东征演义》，
原标题为《省港罢工震动中外，
黄埔校史又谱新篇》）

材料五　省港大罢工中的蔡林蒸

蔡林蒸同志是蔡和森、蔡畅同志的哥哥。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虹口工人组组长。1925年，在震惊中外的省港罢工中，蔡林蒸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支队长，与英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武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不幸光荣牺牲。蔡林蒸牺牲后，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蔡林蒸等死难烈士。蔡林蒸的斗争业绩，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

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香港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为了声援上海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还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委员会"，由党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过问并调集了一批有才能的干部。时已参加革命的蔡林蒸被调到纠察队，担任第三大队第十支队队长。

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对广州的封锁，罢工委员会于7月10日宣布对香港武装封锁，断绝交通，同时派出工人纠察队开赴各海口驻防，执行封锁任务。蔡林蒸奉命率队驻守宝安县(深圳)大鹏属沙鱼涌王母墟一带，截留私运出口的粮食，查缉走私物资，与英帝国主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纠察队严格执行任务，勇敢斗争，激起了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仇恨。他们互相勾结，制造事端，围攻迫害纠察队，骚扰地方，企图破坏省港大罢工。陈炯明残部伙同地方土匪几百人，经常来往于香港沙鱼涌一带走私。纠察队驻防后，增派步哨警戒，加强了缉私活动。匪徒们扬言要缴纠察队的枪。蔡林蒸的第十支队只有百把人，30多支枪，要对付这么多武装雄厚的匪徒是有困难的。但他沉着镇定，毫不畏惧。他对队员们说："我们要坚守阵地，绝不让敌人从这里打开缺口。"

10月下旬，蔡林蒸患病卧床，他深知敌情紧迫仍坚守岗位，处置若定。10月30日，数百名匪徒包围了驻天母墟的第十支队。蔡林蒸一面沉着指挥应战，一面派员冲出重围，求援于附近的第九支队和驻深圳的铁甲车队。英军和匪徒们通过被俘人员知道了十支队的实力和蔡林蒸患病，集中各方面的军队，企图在沙鱼涌对省港大罢工进行第一次军事打击。

11月4日凌晨，英帝国主义搜罗了陆军1000多人，配以大小兵舰和飞机，向沙鱼涌纠察队发起进攻。这时，第九支队与周士第、廖乾吾率领的四个班铁甲车队也到达沙鱼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拚搏。匪徒们占领了东、南、北三面的山头，包围了纠察队驻地。患病卧床的蔡林蒸听到枪声，立即拿起枪上火线，指挥战斗。至7时30分，三面敌军各增加百余人，兵舰上的200余名士兵亦同时登岸，又从香港飞来飞机一架，驶来大兵舰一艘，用机枪对准纠察队扫射。一时弹如雨降。9时许，所有高地均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失守，纠察队决定突围。西面海滩被英国兵舰密集火力封锁，东面是敌人主力。于是由铁甲车队长周士第带领部分队员在前，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吾率工人纠察队居中，排长李振森率员断后向东冲去。为了分散敌人，蔡林蒸带领部分纠察队员向敌人据守的山头冲锋。他身先士卒，冲在前面，身负重伤。附近海关的厨房工人把他抬到厨房，用禾草隐蔽起来。但匪徒们发现了血迹，跟踪追击，终于把他搜了出来，并向他补开了几枪。凶残的敌人还将他的尸体砍成四块，丢进海里。蔡林蒸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当时，他只有36岁。

为了纪念这次重要的战斗，追悼死难烈士，11月1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委员会各工会机关职工，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隆重追悼会。会场悬挂了各位烈士的遗像和写着"为民族解放的牺牲者"字样的横匾。邓中夏同志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作了讲话。

11月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详细报道了沙鱼涌战斗的经过，严厉谴责了英帝国主义和广东反动派的暴行，并以《悼我们好战士！》的醒目标题，沉痛悼念蔡林蒸烈士。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的《罢工纠察各地死难烈士略传》中，为蔡林蒸同志立了传，并在原惠州会馆门前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烈士纪念碑上镌刻了他的名字。

(选自《忆蔡林蒸烈士》载《人物》88年3期，作者刘昂)

《热血日报》创刊

背景介绍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为此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华等同志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6月1日，全市实现了"三罢"，党中央又连夜举行会议，讨论了运动的目标及如何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并决定出版一张能为人民说话的、天天与群众见面的报纸，以便指导五卅运动胜利发展。当时，上海的资产阶级大报对顾正红事件，不但不说一句公道话，连事实真相也不刊登。设在租界的《申报》、《新闻报》、《时报》还发表错误言论，即使是一向比较革命的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也对五卅惨案采取回避态度。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自己没有报刊，它想发表宣言、文告、启事等文件，就是出巨额广告费也往往被各报拒绝刊登。形势迫切要求党建立起更强的舆论机关，因此，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担任主编，并从中宣部、上海《民

国日报》编辑部抽调沈泽民、郑超麟、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热血日报》终于在6月4日正式出版了。两天办一份报,这种速度恐怕是报刊史上所罕见的!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第一份日报,它和《向导》一起组成了五卅运动中宣传战线上的司令部。这是一份半公开的、4开4版的报纸,它的公开通讯处和发行所是北浙江路华兴坊567号,编辑部却是秘密的。《热血日报》起初在明星印刷厂印刷,后来这个印刷厂被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发现,厂房被封闭,老板遭逮捕。后经共产党的努力,替他付了150两的罚款和600两的保金,他本人又向巡捕房写了保证书,始获释放。从此他再也不敢承印共产党的任何报刊了。幸好这时党办的第一印刷所已经建成投入使用,所以《热血日报》得以继续出版。

《热血日报》只出了24期(这是目前能看到的)。但是,它在上海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激发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指导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在五卅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宣传、组织、批判和推动的作用。

材料:

《热血日报》发刊词

材料 《热血日报》发刊词

瞿秋白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

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热血日报》第一号,1925年6月4日)

反对戴季陶主义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背景介绍

国民党改组后,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也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党。改组后的国民党,仍有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军阀和政客留在党内。国民党自身成分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统一战线阶级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斗争。具体说来,统一战线内部存在左中右三派力量。左派代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企图利用工农的力量,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之间,除了一般的左右派的分歧外,还突出地存在着由谁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从国共合作形成和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便开始存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加尖锐。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既是国民党内部出现新的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的信号。

1925年6、7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相继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歪曲新三民主义。戴季陶的反动谬论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故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在思想上,用儒家的所谓"仁爱"学说来曲解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提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民生哲学",而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因此,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声称"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农夫工人努力"。他认为只有这种以"仁爱"为思想基础的三民主义,才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而"绝不需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否则便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

第二,在政治上极力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以"仁爱"说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

和论。戴季陶认为，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革命是出于仁爱之心，是一种仁慈的事业，革命就是行仁，而非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致。他说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这一个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即"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另方面，"要被治者劳动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因此，"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国民革命不需要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而应该以仁爱之心去感动治者阶级。只要"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他们就会为工农的利益而革命。这种天方夜谭似的反动谬论，其实质是取消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

第三，在组织上，以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运动"来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戴季陶鼓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他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保持自己的组织，就是一个大团体中包含一个小团体，"两个团体混在一起，自然不能不受同性相拒、异性相求的原则支配"而产生"排他性"。因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和脱离共产党，"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否则，"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共产党也会遭到国民党排他性的排斥。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传播，不仅给国民党老右派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而且为国民党新右派反共篡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加速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形成，从思想上酿成了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合流。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的猖狂进攻予以坚决回击。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发表文章，有力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揭露了戴季陶的反动本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极大地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潮的恶劣影响。

1925 年 11 月 23 日至翌年 1 月 4 日，原来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一部分国民党老右派邹鲁、林森、谢持、居正、张继等 12 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延解雇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反动决议，掀起一股反共逆流，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后，他们又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于 1926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召开了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决议，反动气焰嚣张。

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刊登了大量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文章，声讨其分裂统一战线的罪行。同时，陈独秀、瞿秋白等也在《新青年》和《向导》上发表文章，批驳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西山会议开场后，即致电各级党部，严厉谴责这个非法会议。国民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通电，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1925 年 12 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了西山会议的分裂活动，并决定于次年 1 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

材料：

· 共产党反对戴季陶主义与西山会议派的经过
·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节录）
· 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二则）
·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节选）
·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材料一　共产党反对戴季陶主义与西山会议派的经过

针对国民党右派所掀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于 1925 年 12 月发出 67 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纷纷发出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讨国民党右派的浪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击了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叫嚣。

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的斗争。1925 年秋，他从湖南到广州以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负责主编《政治周报》。他为该报所写的发刊词，揭露了反动派及反革命势力的罪恶活动，严正指出："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深刻地批判了阶级敌人和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各种反动谬论。揭露了反革命派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叫嚣广东"赤化"的反革命阴谋，提出这是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毛泽东历述了国民党右派自五卅运动以来，勾结帝

国主义、封建军阀，攻击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一系列罪恶事实，指出国民党右派已经“由不革命地位退入反革命地位”，“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表了许多文章，批驳戴季陶所散布的反动观点。瞿秋白在 1925 年 9 月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书中，系统地揭露了戴季陶鼓吹的反动观点，指出戴季陶在理论上建立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国家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假面具，因为“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使其为工农阶级利益来革命，完全是欺骗工农的鬼话。瞿秋白说：“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瞿秋白列举工农进行革命斗争的事实，驳斥了戴季陶提出的阶级斗争会破坏国民革命的谬论。瞿秋白还揭露了戴季陶所说的团体有“排拒性”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根本上还是要 C. P.（中国共产党）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 C. P.”。1925 年 8 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 87 期上发表的《读〈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一文中，批判了戴季陶提出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谬论，驳斥了戴季陶的所谓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价值，便不能创造文化，便不能进行革命的反动观点。恽代英指出，戴季陶宣扬的所谓中国固有文化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伦理思想。我们必须“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摒弃中国的封建主义的文化，才能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萧楚女在《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批驳戴季陶关于共产党人主张阶级斗争“贻害中国”的谬论，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必然的事实，”当前共产党人为新三民主义而努力，“这自然不免有时要用阶级的意识，去教育群众，从阶级上要求他们革命。”此外，还驳斥了戴季陶关于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的反动叫嚣。萧楚女在《帝国主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还批判了戴季陶宣称帝国主义所以对外侵略是因为本国土地不能安置增加的人口的论调，指出这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向外侵略进行辩护的反动谬论。

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系统的批判，揭露了新右派自诩为“三民主义真诚信徒”的假面目，揭露了他们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保护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高了国民党左派的觉悟，在思想上、理论上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右派。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节录）

一九二五年七月

戴季陶

…………

左倾病的救治　左倾的人，要是把只顾说过算数，不问实际效用的毛病去了，拿总理“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作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那一个重要的遗教，时时放在心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更要切实将总理的民生哲学，何以成为指导国民革命之最高原则的原故，考究明白，便可以晓得，我们今天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为农民工人而奋斗，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放着可以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理论，去固执一个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理论，这才真正是害了空想病。这样着想，也就能够很大胆的，擎着青天白日旗前进，不用感觉心理的不安了。

…………

团体的排拒性　至于说到国民党的组织，尤其是困难得很。去年中央的决议，一面不许党员在党的组织之外，另有组织，而一面又公然承认组织极严的 C. P. 加入，而且承认他们得作最高干部，事实上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营养又被小团体尽量地吸去。这样一个畸形的团体，真有无从整理之苦，假若不是这样，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系统，在必要上，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和 C. P. 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部干，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这样办法，又要顺当许多。照现在的情形，在过去一年的经验上，真是困难极了。这个责任，旧的同志，固然要负若干。但是 C. P. 的寄生政策，不把国民革命当做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也不能不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认为 C. P. 的人，既然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 C. P. 或 C. Y 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与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从前中国同盟会时代，本来也包含着不少的各种主义者。所以不感觉这个困难的原故，是因为同盟会以外，没有更精干的团体。那些主义者，他们所抱的思想，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在党里面，除了诚心诚意拿自己的思想来感化大众，求大众赞成而外，不会有别种作用。所以一般同志，即使不赞成

他的主张，却绝不会因不赞成他的主张，而疑心他个人对党不忠实，而且他们也确乎对于团体，是毫无二心的。所以现在不是主义者的问题，是团体的问题。两个团体混在一起，自然不能不受同性相拒，异性相求的原则支配了。……我现在很恳切地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全体的同志大家真实地把中国的前途作一个负责任的打算。要作国民革命，便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心口如一的，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要把完成国民党的组织，作为自己道德上的任务。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如果仍旧固执"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的老子的残忍策略，甚至于只单纯地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那么就只好说是中国国民的厄运了。本来C.P.和C.Y.利用中国国民党，他的目的很纯洁，心情很高尚。他们所企图的，是在中国社会的急激的进化。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的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的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不但不是反对，并且也会自己主张起来。但是在条件毫不具备的时候，突过国民的需要程度和社会的经济条件，结果就是使中国受长时间的扰乱，使中国衰微的民族，更因扰乱的灾祸，而减少人口，阻碍文化。我为了救中国国家的危亡，图中国民族的繁荣，求中国社会文化的合理的进展，只有很诚恳热烈地，劝告中国至宝的青年，不要只顾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趋新性，用揠苗助长的拙策，阻止中国民族的生机，阻止中华民国唯一救主的中国国民党的自然成长。要晓得中国国民党即使破坏了，真实的民族要求，必定使它在别的形式上，发生出来。或者所不同的，只是加了一重反动性。短少了由三民主义的建国精神，所造成的历史的潜势力。此外一点所得都不会有。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只是恨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而不晓得这是反乎民族之历史的现实的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在中国所行这种齐天大圣对牛魔王的策略，高妙是高妙了，可是越过了一定限度，结果一定不好，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就C.P.中一小部分人的言论行动来说，在他们已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上，实在是太过不尊重团体的道德，在他们的机关报上面，单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策略，加以批评，我们还可以承认他们是应该作的，至于对于中国国民党领袖的人物，故意造作一种谣言，想借此使一般青年，生出不信任中国国民党的心理，这就很不应该了。尤其有几个没有常识的C.P.党徒，自己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并且作了中国国民党的最高干部，而把自己的地位，把国民党的关系，都完全忘却，公然说国民党的政策当中有反革命的政策。……去年总理北上的时候，《向导》对于总理的批评，最近说胡展堂同志想留一部分反动军队保持自己地位，以及攻击汪精卫同志许汝为同志种种挑拨离间的论调，这些胡说绝不是友党的机关报所应持的态度。还有一点，我们很看得出的，就是C.P.的人中，有些人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或许他们以为蒋许两同志冲突起来，他们便可以从中扩张他们的势力，并且可以使国民更因此生出厌弃中国国民党的心理，而趋向于共产党。这些纵横家的手腕，真不能不令人扼腕。固然，我也晓得这不是C.P.的人全体的意思，而且不是多数的意思，大半都是刻薄的所谓"中国列宁"的策略，但是C.P.的多数党员，为甚么不能阻止他，纠正他，也就可惜极了！去年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正当机关报，从没有对于C.P.的朋友，有过这样的中伤，没有对于C.P.一派的人，说过一句离间挑拨的话，并且从来不对甲而批评乙，对乙而批评丙，尤其不肯对于国民，说一句使C.P.丧失信用的话。这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很公正而忠实的态度。但是他们是不主张对敌人讲仁爱信义的，或者他们这一种的态度，是认中国国民党为C.P.将来之敌，所以取这一种埋伏战术罢？这一番话，并不是什么怪癖的理论，并不是要逆流倒驶，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从这一年来宣传的趋向，很能够看得出一个极明显而深切的处所了。

…………

（选自《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材料三　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二则）

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月

（1）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11月23日）

本党奉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指导全国民众，努力国民革命，肃清帝制余孽，扫清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建设中华民族之独立的国家。且愿扶助一切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国家中之被压迫民众，取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使任何性质的帝国主义，永远绝迹于世界。此实本党所负之使命，亦本党历史上之光荣也。

依于上述之旨趣，凡以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本党者，自为本党所乐受。向者，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国民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之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乃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本党党部及党员，曾再三以至诚之意纠正劝告，冀其勿负加入之初衷，迄无效果，且益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之意，实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此不徒事实昭然，抑且文字证据具在。共产党员忠于共产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俄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形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

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转得商洽并行，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用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善意的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进国民革命之成功。

至本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苏俄，在革命进程工作之中，有联合之必要时，自然相与提携。即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亦视为友党，以明此次善意的决定取消加入本党之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2)告海外同志书(12月20日)

本党去年一月改组之时，总理孙先生为谋革命势力之增加，以促进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容纳共产派分子加入之时，曾郑重加以限制：即彼之加入，乃为接受三民主义，并愿为三民主义而努力之个人加入，非以共产党之团体或共产党党员之资格加入。同时，总理为鼓励此等新分子努力起见，对于最高党部及各级党部，使彼等皆得当选为职员。待之不可谓不隆。乃一年以来，已加入本党之共产派分子，不特不能诚意的作三民主义之工作，且在本党内部组织共产党党团，竭力宣传共产主义，吸收本党得力分子加入彼党；离间挑拨本党旧同志，使之互相排挤残杀。又因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谭平山为共产派分子，故派至各地组织之组织员，悉属共产派分子，因此各级党部遂多为彼派所把持。总理逝世以后，俄顾问鲍罗庭笼络汪精卫，使之倾向共产派，并拥戴汪精卫攫取国民政府主席；放逐胡汉民同志，排斥许崇智同志，破坏广东大学。凡一切党务政治上重要机关，无不为共产派分子所攫夺。又派遣多数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宣传员等至党、军以内，以期为彼派所用。幸蒋介石同志及各级官长皆为三民主义信徒，不为所动。其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则百方把持，凡中央执行委员中之纯粹分子，皆陆续设法排斥，使屡次召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皆不足法定人数而延期。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则操纵选举，以期胜利，尽为共产派分子所操纵。最近汪精卫又听鲍罗庭之唆使，扬言华侨同志尽系资产阶级，若彼等反对广州之党部及政府，则不惜一律开除之云。此其诬蔑我海外同志数十年之革命历史及劳绩也甚矣。中央执行委员同人，既因广东方面共产派之高压，不能得言论行动及集会之自由；又念总理创造民国之艰难，诸先烈为国为党牺牲之光荣。吾海内外同志数十年奋斗之历史，不忍听少数党中不肖分子勾结共产派加以根本摇动、中断，万不得已，邀集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齐集北京西山，于总理灵前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之际，对于救党之根本办法决定数端，即(一)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二)将共产派分子完全开除。(三)俄顾问鲍罗庭解除雇约，修改不公平之代表大会选举法。(四)取消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五)惩戒汪精卫，开除党籍六个月。以上各案决定以后，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同人即陆续分赴上海及各省进行。现在中央党部已在上海正式成立，所推各部长皆为本党努力之青年同志，精神气象为之一新。而国内之学生界及工农商各界、又因本党正式与共产派分离，向日怀疑一旦尽释，亦均踊跃加入，努力工作。将来进步，必可一日千里。此后，一俟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改完竣，另选合法代表，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务发展办法。以海内外各同志之努力，加之以全国民众之倾向，必能于最短期内促成国民革命，实现建国大纲之工作，完成总理未竟之志愿。此可为海外同志告慰者也。至广州方面，现时虽尚为共产派势力所盘踞，然党军及各军中自官长至兵士及学界青年，多系纯粹坚贞之党员，彼等容恶已久，积愤待发，现见中央党部业已成立，态度渐已明徬，不久必肃清共产分子运动发生，则广东方面之问题，不久亦可有根本解决之希望也。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海外部长

（选自《清党实录》）

材料四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节选）

（一九二五年九月）

瞿秋白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甚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甚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知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

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家,那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杂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要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致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材料五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恽代英

此书系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这是相从孙先生十余年的成绩，他以为在今日国民党员中同时有老衰病和幼稚病两种，“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所以他大发宏愿，著了这本小书，想统一国民党员的思想。

在这书中我相信戴先生注重建设人民的权力，尤其注重建设在政治上经济地位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说明不为三万万七千万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没有救国的意义，便没有革命的意义。有智识能力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与过去二千年一切堕落了的儒者丝毫没有两样，这种侧重农工阶级利益与权力的态度，是很值得钦佩的。但谈到中国固有文化问题与发展阶级势力问题，我却疑惑戴先生引申孙先生的学说，未免有过当之处。

孙先生有时亦讲到中国固有文化，这是不错的；但若因此便说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那便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没有存在于世界的权利，甚至于说便在全世界社会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民族亦只有化为真正的弱小民族，以至于灭亡，这些话未免太过火而不近情理了。戴先生痛心于一般人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他说，象这样下去，在思想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如果中国的一切真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还要做甚么革命呢？我觉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为甚么不象戴先生一样赞美中国文化，便是认中国“一切”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呢？为什么那样便一定会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创造文化呢？固然我们要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认“中国的一切”亦不过与任何国的“一切”一样的有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犹如犹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样，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

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先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配谈革命，请问非洲里孚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赞羡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留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

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蛮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举起来。而且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来无人理会的所谓"正统"思想是中国的文化,我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

戴先生以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有纠正的必要,以为我们要促起全国国民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我颇觉他不能自圆其说。戴先生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宣战,只是把一个刚受孕的资本主义堕了胎罢了,堕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中国虽不能有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然而一则外国资本家移殖资本于中国境内,财政资本有汇丰花旗等银行,工业资本有内外棉纱厂英美烟公司等工厂,津汉青沪的工钱奴隶已数十万人,对此等资本主义不应宣战吗?再则中国资本家资力虽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将来决不能很爽快的屈服于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政策之下,对这种人不应当"预备"宣战吗?戴先生以为资产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真正站在利害敌对地位的不过百分之一,最没良心和知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实站在利害敌对地位和没良心知识有何分别。即欧美资产阶级之反动,其酷待劳工又何尝不可说是没良心?其违背进化潮流何尝不可说是没知识?不过他们站在与劳工利害敌对的地位,使他们不易有良心有知识耳。戴先生知道要解决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但戴先生却又要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要各阶级的人抛弃他的阶级性,似乎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阶级性的发展亦是不好的。戴先生要治者阶级"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这若不是一个空想,自然是没有人反对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认要农工阶级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无产阶级不应抛弃他自己的阶级性;而阻止无产阶级势力之扩大,绝对不是相信民生主义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了。戴先生又以为只有生活优裕的人才能得着革命的智识与觉悟,去"为"不觉悟的人革命。其实,倘若靠生活优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

孙先生说要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革命,其实这些人决不是完全不知不觉,乃因受了革命的宣传从生活上得着觉悟;这种从生活上得着觉悟的人比那些从知识上得着觉悟的人要勇敢坚决得多。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数治者阶级的"士大夫",来包办革命的事,而有意无意中似乎反对农工阶级势力的扩大与他们的阶级性的发展,这与戴先生自己所说要靠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正确之说根本矛盾,亦决不是孙先生的意思。

(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国青年》第八十七期)

《政治周报》创刊

背景介绍

《政治周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毛泽东任主编。

党的"三大"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这时,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邹鲁、谢持等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跑到北京西山,非法召开了所谓"中央全会",公开鼓吹"分共"。为了粉碎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担任主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主办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了。在发刊词中,毛泽东指出:"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并且声明,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等。

《政治周报》对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地主买办阶级、国家主义派、戴季陶主义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6月5日出版的第14期《政治周报》,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期。

材料:

-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 毛泽东与《政治周报》

材料一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1925年12月5日)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

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晦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象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选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材料二　毛泽东与《政治周报》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遭到了反动军阀赵恒惕的疾恨，1925年8月毛泽东被通辑，不得不离开家乡，于同年9月底奔赴广州。10月5日，在国民党第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请曾与他在上海执行部共事并做出很大成绩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于汪精卫的提议，会议很快予以通过，并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主持一切。毛泽东担任代理宣传部长期间（1925年10月5日至1926年5月25日），不负众望，很快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变化。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的林伯渠曾对此作过较高的评价。他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的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可以说比较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1925年12月5日，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的《政治周报》在广州正式创刊。毛泽东兼任主编并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创刊这份杂志的宗旨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是“向反革命派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从创刊到1926年6月5日停刊，共出版了24期，每期发行4万多份，居当时国内革命报刊之冠。它先后刊载各类文章110多篇，共约40万字。毛泽东亲自主编了前4期，撰写发表了21篇文章。以后由于工作繁忙以及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原因，就把编辑工作先后交副总编辑沈雁冰、张秋人主持。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把斗争锋芒直接对准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时还指向了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老右派和戴季陶之流的新右派。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敌人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派”，“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政治周报》不仅以大量篇幅揭露西山会议派非法和叛党行为，并从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军阀，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实质，而且还从理论上给戴季陶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政治周报》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热情赞扬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主要是大力宣传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刊载国民党有关宣言、报告、决议以及领导人的演讲，反复宣传三大政策。

（选自《党史纵横》91年6期，作者路海江）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背景介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反对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为了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指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既赞成又怀疑的矛盾态度，幻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拥有最广大的人数，经济地位低下，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别是贫农，人数最多，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集中，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者依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良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结论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材料：

- 意义重大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材料　意义重大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此文后来又在1926年2月出版的《中国农民》和同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上转载），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对中国革命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的论述。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分清敌友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在分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时，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特点，列举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次工人运动中所表现的伟大力量，阐明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近代最进步的阶级。他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主力军，"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正由于对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特点进行了深刻分析，这就进一步说明这个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着重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毛泽东还指出：自耕农（中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小资产阶级也是可以参加革命的。"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他特别指出，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历史的特点，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科学地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带有独创性的分析。指出：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揭示这个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批驳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他们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明确指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

一个幻想。"文章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和两面性的分析，不仅论证了这个阶级不能领导当时的中国民主革命，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善后会议

背景介绍

段祺瑞重掌政权后，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延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寿命，即按其既定方针，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企图通过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新法统，组织正式政府。并以善后会议代替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国民代表会议代替国民会议，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

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25日，特派许世英为"筹备善后会议事宜"。根据《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是：(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讨伐贿选及制止内战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会议讨论议决事项：(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二)改革军事事项；(三)整理财政事项；(四)临时执政交议事项。根据上述规定，段祺瑞邀请的代表，除孙中山等国民党方面人士外，均为各地有名的军阀、官僚、政客，如王士珍、陈炯明等。这些人员参加的善后会议，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军阀、官僚利益和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

2月1日，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正式召开了善后会议。但由于国民党籍会员的抵制，黎元洪、唐绍仪、章炳麟、梁启超、朱启钤等人的拒绝参加，奉系及西南各省部分会员尚未到达，一百六十六名会员中到会的仅八十六人，不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后经段祺瑞多方拉拢，至2月13日善后会议第一次会议始足法定人数，选举赵尔巽为议长，汤漪为副议长。

善后会议自2月13日第一次会议至3月16日第七次会议，历时一个多月，各个军阀、官僚、政客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争权夺利，争吵不休。段祺瑞交议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收束军事大纲》、《整理财政案》等议案，由于奉系军阀的抵制，无一获得通过，不得不决定休会两周，并延会二十日。3月31日复会后，经王揖唐、屈映光等多方疏通，取得奉系军阀的赞同，采纳顾鳌提出的折衷方案，将《收束军事大纲案》并入《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作为军事整理委员会的职权，并易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于是，在4月14日善后会议第十七次会议以后，出现了段、张控制会议的局面。自是日起，善后会议先后通过《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中国代表会议条例》；而《整理财政大纲案》也援军事案例，并入《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易名为"财政善后委员会"，于4月20日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至此，所谓《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等三个主要议案告成。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

材料：

- 段祺瑞之建设宣言
- 中国国民党为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宣言
- 善后会议之终场

材料一　段祺瑞之建设宣言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祺瑞在津宣言，欲本良心之主张，冀为彻底之改革。其改革程序，则(一)由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共谋和平统一，以回复国民固有之秩序；(二)由国民代表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适应时势要求，以避免现在及将来之革命。其改革目的，则(一)制定国宪，(二)促成省宪。凡此皆多数国民所祈向，祺瑞之所奉以周旋，所谓马日通电者是也。夫建设之业，条理万端，治乱之机，始简终巨。国人果其悔祸，为政岂在多言，是以马电内容，仅举建设大纲，就正国人，所望海内贤达，共相一致，匡其不逮，虚衷以俟，择善而从，斯为大幸！昔主荆公与司马君实论治，以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国中议政之家，务在立名，号于有众，用资宣传，祺瑞老矣，且非所长，然当今日善后开始之际，全民风动之时，既愿开诚相与，不得不倾吐所怀，以免知我者病其太简，好事者附会其词，致失真意所在。兹特综核名实，更就马电所及，择要申说，期于共喻，非矜我见而较论当世之异同也。

(1)辛亥革命之意义

辛亥一役，易帝制为民主，阅时未及半载，而清帝逊位，民国政府成立，南北统一，近世史家，至称之为无血革命，何其幸也。国人试一注意当时经过之事实，可得极精确之意义如下：(一)辛亥革命之成功，完全基于民意，绝非决胜于武力。当时所谓民意，即不外依南北议和之结果，使全国中心势力相与平等协作而已。凡反乎此平等协作之原则，而从事于武力之企图者，无论其所挟武力之量数为何度，亦无论其所揭橥之主义为何物，卒无一不遭国民消极之抵抗，而同归于覆败。由是而知，国民消极抵抗力之伟大，乃至不可思议，而为今后言救国者，所不可漠视之重大教训也。(二)辛亥所解决之建国问题，止于国体

一事，至民主政制施行之方案，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国民政治能力之养成，则一切在留以有待存而不论之列。于是宣布《临时约法》，以资保证，用垂久远。厥后虽有帝制复辟之反动，然皆于最短时期悉就扑灭。其他政治问题之争议，则以不得国民积极援助之故，不能及时解决，辗转迁流，至于不可纪极。由是而知《约法》根本效力固始终未尝中断，而以政制不备，职为厉阶，垂十三年非争则乱者，不能谓为《约法》不良之佐证。盖国宪未定，革命因之而延长也。

(2)革命延长之危机

中国自《约法》宣布以前，为国民革命时代，过此以往，则为党派或局部革命之延长。除讨伐帝制、复辟、贿选诸役为国民所许可外，其他军事行动，几于岁岁有之，于国民何与焉！其影响所及，至于创巨痛深不可收拾，约而言之：(一)为国家有形之损失。国家行政号令，不出都门；国库收入，全数悉被截留；凡国民教育生计之所资，地方命脉之所恃，无不摧残殆尽；世界万国，无此政制；割据偏安，无此政象。其在平时，固已然矣，至于战祸既起，尤为惨不忍言，与其认为革命之继续，毋宁谓为内乱延长之为当也。(二)为国民无形之损失。内争相持，国是未定，凡中国固有之中心思想，所谓不可得而变革者，既已敝败而不适于用，现代思想之输入，又多由于外铄一二人倡之，其附从之众，至于数十百千人而止，固未尝深入于人心，国民所发见理想与事实之矛盾，名实言行之不相顾，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夫使善恶无定形，是非无定名，则不特政府无致治之术，乃并国民望治之心，而亦绝其萌芽，政治生活，每况愈下，而无复向上之机。此革命延长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举国之中，殆无一人焉能否认此说也。是以今之急务，莫如防止革命，欲止革命，莫如速定国是，欲求国是之速定，则舍国民制宪无他途也。

(3)制定国宪促成省宪

制定宪法，为国民会议最大之任务，在世界先进各国，已成通例，无俟详说。其或以布宪为空文，而别图所谓彻底改革者，是直自扰而已。将谓辛亥革命，厥有《约法》，而内乱相踵，视清季殆有甚焉，是固然矣。顾不能因法未尽善之故，致疑于法之不当立，可断言也。设当日制定之际，其参加分子不以各省代表为限，其立法精神，不以取便临时自足，则其施行之效力，岂特维持民国之名而已，即十二年间之内乱，不作可也。不幸既废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谋第二临时之延长，又限于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制定宪法，以表示《约法》无历久之机能，于是有大力者，因之而生心，主法统者，假之为武器，法律争议，为内战之媒介，政治中心，随武力为转移，此则已往纷乱之局所由来也。此次国民代表会议之召集，首当制定国宪，为一劳永逸之计。各省制宪之自由，以国宪保障之，在省宪未定以前，政府促成之方法约举如下：(一)制定县议会组织条例，使各县一律成立县议会，以谋下级自治之发展，并为制定省宪之准。(二)制定省自治暂行条例，使各省获一自治省政府之雏形，进而谋民治之实现。(三)其特别市如上海、北京等处，并宜制定市自治条例，以垂模范。三者皆期于必达，亦今后治乱之关键也。

(4)善后会议与统一

善后会议之召集，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与国民代表会议截然为两事。性质既殊，组织各别，前布条例及筹备各电，言之至详，有识之士，当不至并为一谈。夫国民主权之在今日，所谓天经地义，五尺能道，然必谓政府善后之举，和平息争之责，亦当委诸主权者之国民，非所闻矣。中华民国及其国民自始无所谓不统一，观于国内分裂之局，相持至于数年之久，然而中央司法实业之行政自若也，全国商、教两政之联合自若也。举凡国民间之情感利害，殆无所往，而非秩序厘然，绝少冲突，国有恒性，孰能易之？若夫因时局之变，而为今日统一之障碍者，厥惟军事财政之紊乱。其症结所在，则以少数有力者之自私自利，互为因果，决非事实上之困难，已陷于不可收拾之状态也。国民方面，即无纠纷之可言，亦不能负解决之责，所当有事于补救者，将惟临时政府是赖。而区区之愚，则愿与全国军政当局，立于平等协商之地位，旁求当世名贤硕彦之指导，消弭循环报复之隐患，用成和平改造之新治，如是而已。至于国民代表会议之召集，祺瑞既可发议于前，则其组织及选举方法，凡愿与祺瑞同负改造之责者，自能决议于后，诚无取乎鳃鳃过虑者也。

(5)国民代表会议与制宪

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所当极端注重者：(一)国民代表选出之方法，务求公溥，而后所谓国民总意者始有表现之可能。(二)会议职权，无取夸大，议事程序，须极严重，而后民国根本大法，乃得早观厥成。兹二义者，为政府准备提案之纲领，以俟善后会议之考虑，即在国民亦有自由讨论之余地，非本宣言能详也。惟制宪大业，为成立国民代表会议之基本条件，所关尤巨。盖承令日法统既坏之局，举非一切改造方案，纳诸国宪范围之中，而悉受支配于其下，则将陷于有政治运动，而无国家行为之危险，恐怖时代，将自此始，革命之祸，伊于胡底，所望国人急起直追，而预为之计，则幸甚矣。

(6)建设前途之责任

综上所述，关于会议最大之任务与建设计划之次第，虽由马电发其端，然其运行之际，所以主宰而纲维之者，则不在个人，而在全体。盖善后会议，实为全国势力之中心，国民代表，专司总意表现之枢机；必谓发议之人，具有指挥若定之能，当负政由己出之责，夫岂其然，徒以纷争既久，渴望统一，革命告终，宜有建设，亦既全国憬悟心同理同矣。而历年来屡试屡败之武力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如其不可。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政府，其后起者也，有统一而后有政府宪法，其先决者也，有宪法而后有建设。继今以往，凡所以息内争而回复统一，舍革命而进于宪政者，一切皆将基于理性上之威权，诉诸国民之自觉，以决其成否。临时政府之所能为力者，殆至微末不足道，凡我国民，盍兴乎来。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一日　段祺瑞。

(录自费保彦:《善后会议史》,1925年版)

材料二　中国国民党为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宣言

全国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本党总理公布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而先之以预备会议以议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为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各政党。国民会议之构成分子与之相同，惟选举方法及人数较预备会议为繁且密，以期得真正之民意。自宣言公布以来，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群起响应，函电络绎，据露报端，为国人所共见。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更风起云涌，进行极猛。宣言所主张为人民心理之所同，于此可证。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未知何如？至于善后会议，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归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此为本党总理对于临时执政府最少限度之让步。二十九日临时执政府复电，对于此两条件未能容纳，而本党总理卧病未愈，未能亲决庶务，故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凡读本党总理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一月十七日之复电者，当知此议决实为本党必然之结果。惟本党尚有当郑重为临时执政府暨国民告者，本党总理一月十七日之复电，一方表示尊重民意之坚决态度，一方表示对于临时执政府相当让步之精神，本党仍守此坚决及让步之旨，务期真正民意得以充分表现，以为解决时局之最高机关。本党惟竭其力之所能至，以观厥成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印)

材料三　善后会议之终场

善后会议于四月二十一日延长期满，所有重要议案也都通过或决定搁置，于是举行闭幕典礼，演剧以庆成功。从表面上看，善后会议能有此结局，总算是寿终正寝，颇不容易。但若更就实际一看，则奔走全国军民官吏之代表，各省法团之领袖，以召集这会议，延时两月有余，糜费百数十万，而善后问题中应占重要位置的整理军事、财政两个大纲，全被消灭，所得称为成绩者，仅仅以议决可有可无的国民代表会议及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的条例为止。我们即替段执政退让百步，抛弃“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的标语，而如此劳民伤财，无补国事，恐亦未免大违其初愿了。

当会议闭幕前的十几天，形势万分险恶，不但所谓政客派的西南代表扬言以全体离京争临时政府制及联省自治两提案，使主持会议诸人为难；即被移为弁派的奉、苏代表，也迭次实行拒绝到会与中途离席的手段，以示不许西南两提案列入议程，与反对政府的收束军事大纲。“善后会议恐不能自善其后”，在那时实是全国一致，异口同声的话。不料因政府的昼夜开会协商，及与实力派领袖交换利益的结果，会议竟得大有转机，十四日以后，将弁派以全力助政府圆此结局。凡政府所视为在体面上必须议决的议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则修正议决；整理军事、财政两大纲虽消灭，军事、财政两个善后委员会的条例则通过。这时虽然西南代表因临时政府制案议决搁置，联省自治案不予提议，全体不肯出席，亦终不能阻会议的进行。从这一层讲，善后会议纵无实际成绩可说，而在这险恶的形势中尚得敷衍了局，撑住执政政府的体面，使不致陷入非走不可的境地，段虽然未免违了初愿，也还是可以自豪的。

善后会议的所以得能有此终场，一方面是由于段执政的为面子与地位而委屈求全，议案的内容尽可让步，或改变面目，甚至重要如整理军事、财政两大纲，也可并入两委员会条例中而无形消灭。但形势上三大提案的通过必须做到，至不惜以重要的地盘与实力派作交换。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实力派的已视这会议为无足重轻，会议的议决案我们可以不受拘束，我们将来的行动尽可自由，现在殊不必作拆台的举动，这些话虽未出之今日之所谓实力派者的口中，却已充满于他们的胸脯了。所以议案中于他

们过于有妨碍的，不得不使他消灭。其余则不妨以实利的条件与政府交换，以助政府的成功。我们从这两方面观察，觉得今日善后会议虽然圆了局面，而其与时局善后的无关，依然如故。我们以前悲观的批评在这里仍可应用，现在殊不必多费唇舌，加以重说。至于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内容如何，国民会议何年何月可以召集，以及什么政府起草宪法的问题，由军人代表集合整理军事、财政的问题，说来很长，非另篇讨论不可，这短篇里也不多说了。

(《东方杂志》，第22卷，第10号)

金佛郎案

背景介绍

金佛郎案是1922年法国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从是年起中国支付庚子赔款时，改变自清末1905年以来按各国流通货币电汇的方法，而改用金佛郎折算。法国采用金本位制，原来是表示纸币应有的含金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佛郎纸币贬值，根本无法与金佛郎等价，因而与中国银元的比价大大下降，如采用以往的支付方法，中国每年所付赔款仅及过去每年一半即可。当时中国尚欠法国庚款4亿佛郎，按当时电汇价，每佛郎合银行一角三分四厘，中国仅付5300多万元；若按金佛郎折合银元为三角四分，中国需支付1.36亿元。如果同属拉丁币制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均援比例，中国损失甚巨，故历届北京政府始终未敢予以认可。

法国为迫使中国让步，串通《辛丑条约》有关各国，决定自1922年12月1日起，将中国关余、盐余(即关税、盐税扣除当年应偿还之外债后所余之税款，应交北京政府支配使用者)，按金佛郎所折算的赔款数，由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按格联尽数扣留。同时，极力阻挠华盛顿会议决定关于在中国召开关税会议的实现(该会议系专门讨论中国海关增收附加税等问题)。1924年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财政极端困难，而到1925年春，总税务司扣留的关余、盐余款已达2360多万元。段为取得这批扣留款，并召开关税会议通过二五附加税，增加财政收入，就任后即指示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与法国公使秘密谈判金佛郎案，最后屈服于法国的压力，接受法方的无理要求。舆论为之哗然，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哄动一时的大事件，在北方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材料：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法国公使照会
- 财政总长谈金佛郎案

材料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法国公使照会

为照会事：关于应付一九〇一年法国部分赔款余额之退还及其用途，自经中国政府代表与贵公使交换意见后，本总长兹将两国政府议妥下列协定为备案。

(一)法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承认将法国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作为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之用。法国政府承认上项退还赔款得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算，其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后之二十四个月作为展缓；期内所有过期未付之款，悉数交与中国政府。

(二)中国政府向法政府承认将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未余额，按照一九〇五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与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办)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债之担保。此项公债分二十三年还清，按照所附逐年付款表办理。

中法实业银行经法国政府之同意，将换回远东债权人应得之债券，全数一次交与中国政府，作为偿还前项垫款之担保。前项垫款之偿还，当于本协定第四条所载之各款项收入时实行之。

如满二十三年所有债券未能如数偿清，则债券上尚有应付余额，中法实业银行对于中国政府仍负债务之责。纵使业经拨付之款已达上述美金公债债票之总额，并因法郎恢复原状发生或有之盈余，统应按照和解办法第八条归中国政府所有，充办理中法间有益事业之用，不得争执。

(三)中法实业银行经法国政府之同意，并得中国政府认可，得将发行之五厘美金债票用途分配如下：

甲、根据和解办法发给中法实业银行远东债权人，以票面换回此项债权人所有之债权。

乙、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之用，其执行条件应每年北京由法国政府代表与中国教育部代表商定之。中法实业银行因有债款关系，为替代利息起见，愿提出五厘美金债票若干，充中法间教育事业之用，其数每年至少为美金二十万元之实款。该行并应设法于实行协定应付各款外，使此项数目能达到美金二十五万元之实款为度。

丙、代付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股本余额。

丁、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各款。

如实行前列各项之用途外，倘有债票余额，应归中国所有，以充中法间教育或慈善事业之用。

(四)作为担保品之债券，应按照和解办法，以下列各项收入拨还之：

甲、管理公司(中法合办)以代表资格，经营中法实业银行财产所得之款。

乙、由中法实业银行自行经营财产所得之款，此项财产管理公司无代理权者。

丙、管理公司红利百分之九十五属于中法实业银行者。

丁、中法实业银行交与管理公司流转资金五千万佛郎所得之利息。

戊、属于中法实业银行各种让有权之收入。

己、中法实业银行得管理公司之许可直接经营所得其他各项利益。

(五)远东债权人所有之债券交与中国政府以后,应与其他债权人所有者享受同等利益,毫不歧视。每届半年决算时,统计前条所列各项收入,编列数目由管理公司中法董事会检查之。其收入之款项按照和解办法以比例方法分配之。

(六)美金债票上所载文字发行数目及其票面金额,应照中国政府所核定之格式办理。

(七)中国政府得以中法实业银行股东资格派员检查该行帐目及远东存户间分配债券之事。

(八)凡本协定所未载事宜,关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法国法律施行条件之规定,仍以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五日、九日及七月二十七日两国政府之各项换文为有效。

相应照会贵公使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大法国特命全权公使玛

大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附逐年还款表(略)

(摘自《中国民国史料》文明书局)

材料二　财政总长谈金佛郎案

金佛郎案是我在执政府当财政部长时亲手经办的。这件事,国家当然吃了大亏。我最初一直不肯办,怕被国人唾骂。段执政下了七次手谕给我,催我办,我都搁着没办。后来,徐又铮和法国政府接触后,从巴黎打来一个长电给芝老和我。执政接电后,立即召见我,交给我这个电报,催我速办。我说,这件事是吃亏的。直系当政时,曾经想办,惟恐遭到国人强硬反对,你芝老不也领衔发过通电,坚决反对直系办这件事吗?芝老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非办不可。"这样,我回到部里,立即找法方交涉,很快把这件悬案办了。段芝老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决然要办这件事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执政府财政奇绌,各方伸手要钱,无法应付;这事办成后,扣在总税司安格联手里的关余、盐余二千三百六十多万元,立即可以拿到手,执政府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了。二是他认为这事终究要办,他不办,继任的政府也非办不可,不如自己先办了,可以救一时燃眉之急。徐又铮的来电,增强了他这个看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那时想召开关税会议,把金佛郎案办好,可以讨法、比等国的欢心,想早日促成关税会议,可以增加一些"关余"收入。

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源是"关余"(即关税收入扣还庚子赔款后的余款),已被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长期扣除不发,在金佛郎案解决前,已被扣住二千三百六十余万元。原来,法国方面为了要在金佛郎的计算方面讨我们的便宜,已和英美等国公使串通一气,由领袖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出面,通知总税务司安格联,金佛郎案一天不解决,关税余款即一天不拨付。段执政主要是张雨亭捧上台的,上台后,张催索军费甚急。所以,段非急于办成不可。他曾对我说:"你如再不办,连执政府的日常开支也没法应付了。"

金佛郎成交后,安格联立即把扣住的二千三百六十多万元发放给我们。我们收到这笔款后,首先是应付奉军的催索,一次就拨往奉天张作霖五百万元,张还不满足,后来又给了他二百万元。此外,其他方面的军警费用,各部、各大学的欠款,也发还了一部分。总之,从我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再当财政部长,直到翌年十二月再度逃进东交民巷,在财部十三个月,主要就靠这笔钱以及后来陆续收进的关余、盐余勉力维持。有人说,我李赞侯在金佛郎案中发了大财,事实上,我经手的每笔付款都由财部库藏司登帐,以后,法院调查时,也逐笔查对的。我当时为了应付国会议员们的需索,有些没法出帐,还卖了北京的一幢房子,用去二十万元,才应付过去的。

在执政府时代,我当了一年多财政总长,有半年多是过得比较舒泰的,主要是解决了金佛郎案,拿到了在总税务司那里积压的关余二千三百多万元。除了应付奉方、冯军的军费需索和发放些机关、学校欠薪外,还实余一千五百多万元,手头松动了,应付当时中央政府的开支,有半年多没有闹"饥荒"。

金佛郎案的解决,中国当然是吃大亏的,那时,法郎早已大大贬值,而法方还要按照原来的比价结还它的赔款和欠款,法国占了我们极大的便宜。所以,在全国愤怒反对下,连曹锟政府也不敢签办。当时段芝老在台下,也曾表示坚决反对。他当了执政后,忽然决定要办,而且态度如此坚决,是什么原因呢?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主要原因是执政府开张后,财政一筹莫展,外债借不到(因为无可抵押),各地税款又被当地军阀扣着,分文不解中央,在万般无奈中,只能想到金佛郎案这帖药,明知有毒,暂以疗饥。其次,所以解决得如此迅速,关键还在于徐又铮。他在齐卢之战失败后,被上海租界勒令离开,从上海逃往国外,在执政登台后,派他在国外考察,他到巴黎,法国政府知道他是段执政的智囊,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对徐隆重招待。他们密商了金佛郎案,他曾连电给段芝老和我,极力主张速办。我那时还有些迟疑;财部当时成立了一个"金佛郎案研究委员会"。把有关该案的一切文卷、资料都调

齐了，也早已研究好解决的步骤。但我一直不敢签署交办，怕遭全国的责骂。但芝老却下了决心，他把我找去，拿着又铮的来电，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赞侯，你是怎么回事，老把金佛郎案拖着不办？"我回答："执政一定了解这件事办了以后的后果。思浩身败名裂，乃至送掉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有不少人正找机会要为难中央，为难执政，因此，不能不再三考虑。"芝老放下怒容，但还是很严肃地说："赞侯，你我相交多年，你还没有摸着我的脾气。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患得患失的，我一定要做，不要说因此丢了官，丢了地位，在所不惜，就是送了性命，我也是不顾的。有我负责，你快去办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只有遵命速办了。好在一切准备手续，早已办妥，所以，我回到部里，没有几个钟头，就办好公文，三天以内，就把这个悬案解决了。

人家都以为我因此案发了大财，其实，真是有苦说不出口。各方要钱，不能不敷衍，如各机关要历年的欠款，国会议员要历年的欠"薪"；还有些钱，花了没法出帐，有些报馆、记者讨津贴，有些公司要我入"股"，还有些以私人名义向我告"贷"。我为了怕挨骂，不能不多多少少应酬、敷衍些，这些冤枉钱，大都只能自己掏腰包。

我是当时主办金佛郎案的。如果说此案我国没有吃大亏，这是昧着良心说瞎话。照当时纸法郎和所谓金佛郎(当时法国实际早已不使用金佛郎了)的差价计算，我国至少要吃亏六千万元，但由于执政府财政困难至极，段芝老才下定决心，饮鸩止渴。

我在办此案时，就估计到此案一宣布，一定要受全国唾骂。而且将来还可能对簿公堂的。因此，在收支方面，不敢丝毫马虎，并关照下面员司，一定要把有关帐目，登记清楚，以免授人以攻击的把柄。后来，首都检察厅果然"请"我去谈话，我把所有簿册、单据全带了去，请求审查。他们没有找出任何漏洞，以后就没有再追究。

褚慧僧(辅成)先生是我极熟的朋友，在直系政府时，他曾坚决反对金佛郎案交涉。执政府登台后，他曾找我谈话，恳切劝我，千万勿办金佛郎案。我把我的处境和段芝泉的决心都坦率对他谈了。最后，我对他说："慧老，我恳求你一件事，这事办成后，有人要你联名通电反对，那是没有办法，但请你千万勿单独发表反对的通电。"他谅解我的心情，慨然答应了。后来，此案公开后，他曾领衔发表了一个坚决反对的通电，但他信守诺言，果然没有单独有所表示。

过了不久，上海报纸上登出"金佛郎案的内幕"之类的通讯，说我给了什么人多少钱，什么机关多少钱，其中涉及慧僧，说我给了他四五万元运动费。他气极了，疑心我用他的名义花了这笔钱。他写了一封长信责备我，并说，决定派某某两个秘书来京查清楚这件事。我立即复了他一信，说此事非片言可以解释清楚，欢迎他立即派人来调查。后来，他的两个秘书果然来了，我把库藏司所有关于金佛郎案的支出帐目全部交给他们查看，证明财部确没有支付给褚的任何款项，他们回去了，慧僧释然，写信给我，表示满意。

(摘自《李思浩谈金佛郎案》陶铸城)

孙中山逝世

背景介绍

1925 年 2 月 24 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 7 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 3 月 10 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脉搏每分钟达 156 次，呼吸 78 次，体温如常。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11 日晚 9 时，孙中山先生知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签字后，护士何芬上前移炕桌时，先生怃然向她致意："谢谢你——你的工作快完了。"何芬悲酸难语，泪流满面。

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说到此，他连唤两声"廖夫人"。何香凝听到这沉重的呼唤，伤心地和孙夫人掩泪走近床前，说："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先生听了何香凝的话，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11 日晚，孙中山处于昏睡状态，至深夜 3 时，忽然醒来呻吟不绝，不断喃喃自语："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以后呼吸艰难，不能连续说出完整语言，只能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此时，段祺瑞前来看视，先生已不能言语了。1925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战一生的伟大领袖与战士孙中山的心脏停止

了跳动，闭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国独立富强的眼睛，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终年59岁。

材料：

-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 总理病逝前后

材料一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3月12日，今晨上午一时三十分，总理转侧甚盛，厥状极呈不安，喉中哼哼作声，看护进麦秕汤少许，已不能纳，多流出牙床之外。三时十分，喘愈甚，以手抚胸不止，入气甚微。八时三十五分，看护再进牛乳，已不能启齿。左右皆仰泣。至是当由行馆同人立发电话，通知在平国民党党员先后云集行馆。九时十分，段氏派许世英来慰问，总理两目向上直视，渐不见瞳子。许急退出，云报段氏。而总理于此病状万分沉重之中，口里仍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同志奋斗"等数语，声至朦胧，几不可辨，时正九时二十分也。须臾，闻总理又呼汪精卫。汪先生至，总理张口欲有所言，不能出声，微以手示意庸之先生。汪先生请安睡，时总理喉中痰益上涌，面益转灰白色，手足渐冷，不能动弹，至九时三十分，竟溘然逝世矣！

总理病中，尝以本党重责托付庸之。盖其时本党革命之势力在两粤方在发轫，而北洋封建军阀之势力，犹弥漫全国，惟庸之先生北接国民军之实力，有冯焕章先生为之中坚，与奉张亦久有联络，而庸之本人学问思想，饱受世界近代最完全之教育，于三民主义于其基本出发之点，有深刻之认识，以孔子先圣后人而能明信基督教义；夫人宋氏又为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之令姊，从总理革命多年，一门饱学多才，受世界最高教育，奉信基督教至为深切。宋太夫人之笃信基督，虽总理亦受熏陶，故总理临终受命，对于庸之先生，其属望之殷，盖可想见。惟庸之自念本党同志，追随总理革命，出入生死劳苦功高者，或学问著闻中外者，不知凡几，本人德能浅薄，学问无足称述，遂谦逊不遑云。

其时，庸之先生暨总理家属及公子科等因遵总理遗嘱，令保存遗体，遂直接与协和医院商议办法。该院谓可敷抹防腐药，设法使遗体保存。乃即于午后十二时三十分，用医院大汽车将遗体迁至协和医院。上车时，遗体由软床抬出，上盖以国旗及国民党旗。当总理遗体移出寝室时，党中同志及来吊之宾客数百人，分立院中两旁，齐向遗体行三鞠躬礼。该病车由公子科与克礼医士同乘护送，其余各党员及家属，均乘汽车马车数十辆随行。沿途病车经过之处，军警均肃立致敬。车到医院，各党员因格于院中规则，多未能随遗体入院。遗体入院之南楼，医士等先将体内血液取出。注以药水，外部敷以防腐药粉，以便施用手术。惟此项手续尚须时日，遂留侍从武官数人在侧守视。当晚即组治丧办事处，通电国民党党员，左臂缠黑纱七日，停止宴会及娱乐七天，以表哀掉。当日九时三十分钟，总理逝世之时，适段政府方面举行国务会议，闻报立命散会，停止办公，下半旗志哀。诸阁员亦齐诣灵床吊唁。旋派柏文蔚，王耒为治丧代表，并发明令云，"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和平，肇我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悉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极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愁，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著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崇德报功之至意"云。又当时报载总理逝世情形，云噩耗发表后，中外名士赴邸吊问者踵相接，留京之重要日人，悉行赴邸，述吊唁之辞。总理临终床侧，有孙夫人及儿媳孙男等，亲友有孔祥熙、汪兆铭、戴天仇、李烈钧、于右任、李石曾、石青阳、林森、叶恭绰、杨庶堪、邹鲁，日本人山田纯三郎、菊池定一、萱野长智、井上谦吉及其他亲近之人等，肃静护视伟人之灵体云。又当日路透电云："克礼医士布告称，孙中山于今晨九时三十分奄然物化，神智至终清明。昨日午后，孙发最后训令，嘱咐数事，并告其妻，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药品，保存其遗骸，纳诸棺内，葬于南京虎山下(按即狮子山之误)。孙与其友谈话至濒逝前一小时始已。其遗骸将送协和医院施防腐法，并电致莫斯科，即运如列宁所用之棺来京，其遗骸将安置于中央公园二、三星期，以候俄棺运至。"又电云："今晨阁员及加拉罕均至孙中山行辕吊唁，苏联大使署已下半旗。今日阁议停，政府命各行政机关均悬半旗。举殡筹备，尚未宣布，闻政府拟在先农坛举行追悼会。"

又当时广东情报：据东方社12日广州电云："广东政府接到孙中山氏今晨九时三十分逝世之公电后，即商议善后事宜，一先任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黄芬、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邓泽如、吴铁城十名为葬仪筹备委员。又公布从本日起下半旗一个月，停止歌舞乐曲一星期，在职官吏停止宴会一个月，以表哀悼之意。市内虽充溢战时景象，但哀悲之情，笼罩于无形之中"云。

又上海情形云：本埠国民党于下午六时由张静江、叶楚伧、邵力子、恽代英、张廷灏等各职员，开会讨论哀悼办法，议决通告各党员自今日起一律臂缠黑纱，并召集各区党部会议哀悼事宜。并于明日起，即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宅设立灵位，供各界之吊奠。

(摘自《近代史资料》七十一辑中华书局)

材料二 总理病逝前后

总理督师东江讨逆，至是年十月失利退兵，当时总理由石滩与黄惠龙等驾机车先返广州，著荣独留前方主持

电话通讯，所有其私人衣物，于军败之际，全部遗失，蒙总理恩恤，面谕警局吴局长铁城给偿二百元，以资补购，而我军亦从事生聚教养，补充军实，再图大举，至翌年（即民十三年）誓师北伐，师次韶关，总理即派荣及邓才往南雄负责特务工作，于十月十二日，回韶报告工作经过，复适廖仲凯由广州赴韶，面陈商团叛变及后方动摇情形，旋随奉总理面谕，即夜会同廖仲恺回市，召集联义社等革命同志团体，会同黄埔军校学生，大本营直辖粤滇湘桂各军，肃清市面一带反动分子，以免后顾之忧（按总理秉性慈祥博爱，虽任何刺激，从来未形诸颜色，其愤激情形，生平以是役为最）。记得冯玉祥来电，促总理从速北上，主持南北大局，遂决于十一月十三日以所乘日商轮，自粤首途，过香港，即直驶日本门司，总理乃仅抵达神户而止，旋即易舟转道赴津，随行者除夫人宋庆龄外，汪精卫、戴传贤、邓彦华、赵超等。在神户时，虽曾于外交辞令上，对中日国交有主中日须亲善之说，惟未及于具体方案。赴津道上风涛颇盛，而总理殊镇静，恒手不释卷，处之泰然。抵津日，欢迎群众万人空巷，总理莞然就舟中与欢众握手，旋步出船舷，摄影者数百人争相摄取，欢迎仪仗军乐齐鸣，总理精神焕发，仪态雍容，众迎抵日租界秋山街之张家花园茶点稍息，接见当局代表，暨候迎本党重要同志不下千百人，总理皆一一有所训勉。未几，张学良衔其父作霖命到谒，具言即日正午，作霖拟请总理至曹家花园会晤。总理慨然允之，谓雨亭吾正欲与一谈，旋以正午十二时半，命车赴黄纬路作霖行署，随行仅侍卫长黄惠龙。既抵，张作霖亲迓至门外，下车携手入内，屏左右作深谈者逾二小时，良久告别出，登车返至张家花园，即感不适，一面嘱汪精卫代出席是晚国民饭店之市民大会，一面延日医生松冈诊治，戒以少食水果。旋前大总统黎元洪到访，嘱食白凡鱼粥谓殊适合胃病，总理依方烹食，服之略呈效验，余则留至下午，不料膳后即呕吐大作，遍体大汗，荣以毛巾代拭，竟透湿两巾，其严重情形，如此可见。至晚总理索食水果，不与不休，勉食后，翌早六时起床，精神略佳，似有起色，谓荣曰："日医嘱余勿食水果，今余食后病势已减，如该日医来时勿以告之。"讵是日下午肝痛暴发，旋闻段祺瑞在京召开违法之善后会议，总理甚怒，即星夜力疾入京驻北京饭店，当时病势日危，经数国医生验明确属肝癌无疑，会议结果决非开割不可，复征得总理同意，留医协和医院施以手术，荣等驻院侍卫。当时黄惠龙亦以随总理访张之役，得病奉准给假。总理又以荣辛劳过渡，面有病容，着荣外出休养。旋总理病势略愈出院，转寓铁狮子胡同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宅。荣与参军邓彦华二人奉总理面谕，不得擅离身畔，因随时须扶往花园散步呼吸空气。直至民十四年三月初总理病势日趋沉重，三月六日之晨，声音大解，当时侍奉者仅荣及宋子文二人，乃分举一足，更以便器置榻上，以便溲解。总理云：汝两人身躯雄伟，何乃不能举吾一足？"荣笑答曰："先生（党人称总理皆曰先生）之足，诚不易托也！"十一日午，总理猝发谵语，向空虚斥曰："汝辈牛鬼蛇神，岂得命我，诚欲见召，可令天师以今夜子正来。"至四时三刻，总理先呼阿荣，继呼阿平（阿平即总理长孙乃孙科之长子）。阿平至榻次，总理紧握其手抚之曰："乃公病剧，小子毋扰我，待病瘥当偕汝出游。"平出甫逾户，复呼阿荣，时戴恩赛博士傍侍曰："爷唤荣否"。总理曰："是也。"迨荣抵榻次，总理问外有何人，荣答马副官在外，总理曰："可进来，汝两人一长一短均合用。"马副官入，总理命荣紧抱其头部，马湘捧其双足，将全身提放地下。荣与马湘正踟躇未敢奉命，适夫人闻言以英语问总理曰："亲爱的汝要如何？"总理说："我要在地上一睡。"夫人答："地下冰冷睡不得的。"总理说："我不怕冷，最好有冰更妙。"夫人闻言侧面垂泪，悲怆不已。总理说："达龄（即'亲爱的'之西语）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夫人答："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言时哽咽，微顿其足。总理答："此即难言。"夫人益悲，泪如雨下，是时适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入内，总理以粤语问："仲恺、铁城何在？"廖夫人答云："均在广东。"总理谓："你最要通知仲恺办教育，自教育，办党务，自党务，不能混而为一，务须分别办理。"廖夫人答："我会知会他。"总现又云："你今后要照顾夫人"（指孙夫人）。同时宋子文入内用英语讲话提及荣与黄惠龙、马湘三人，总理云有革命政府一天，须维持其一天，勿令所失，互谈约四十分钟。继与孔祥熙略谈，复转粤语与孙科、李烈钧谈，至晚八时三十分钟止，始终语不及私。十二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四时三十分，仅呼"达龄"一声，六时三十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当时夫人暨孙科、宋子文、汪精卫等皆同声痛哭，气绝晕倒，左右随从侍卫，均泣不可仰，随命侍从理发师林耀光为总理整发修容，夫人频以手拭总理双眼使闭。呜呼痛哉，革命尚未成功，义师犹示报捷，固宜其死而不瞑也。荣旋奉派西山碧云寺护灵。

民国十五年有黄副官长惠龙，在西山碧云寺守灵，有东北奉军时到骚扰，黄副官长见情势不佳，遂将铁门紧闭，守灵人员暗中守护。

十六年由荣接任守灵。是年三月十二日举行总理逝世纪念仪式，有北京警厅警探安蓝田向警厅密报，谓荣悬挂党旗并在碧云寺开会议。警厅据报票传荣到厅问话，谓荣有反动行为。荣答不是开反动会议，缘今日纪念总理逝世，故悬青天白日党旗，至青天白日满地红乃海军旗。警厅始知为妄报，将西山区巡官及警察撤去一名，转派保安队到碧云寺驻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十月二十八日，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开军事会议。张宗昌提议，孙停灵处风水绝佳，所以南方北伐军队节节胜利。张作霖闻言，即谓可以放火烧毁。当时幸杨宇霆谓万不能干此事，况孙中山录榇不在此处。张作霖反问杨宇霆，现有人守护从何

知道不在。杨宇霆答守灵人其名侦探其实。张作霖即派人密为监视。十一月四日，张学良登报称，因有商民反对中山主义，请南方政府即将中山灵榇迁回南方，如迁回时可负责送到天津，否则将有意外情事发生。十一月十二日，荣又得朋友卢瑞芝君通知，据张作霖卫队长赵锡福说，如守灵之人系汝朋友，可速通知将总理灵榇迁往他处，因上次张宗昌提议大帅(即张作霖)已着人去放火烧，不过为杨宇霆所阻，事关大帅喜怒无常，倘第二次发怒必至烧毁。荣据报后乃往协和医院求刘瑞恒工程师，拟将总理灵榇移来协和医院保存，瑞恒不可。荣在万无办法中乃请刘瑞恒开列防腐药水名称，荣往德国药行购买，于十二月二十二晚十二时将总理遗体移过美式棺，用棉花药水防腐，秘密藏于碧云寺内水池边之石岩中，以防不测。迄至民十七年夏季张作霖被我革命军追逐出关，始将总理灵榇安返灵堂，以受北伐各军致敬。时首入北京者为国民革命军东北先遣司令叶夏声少将所部骑兵，故首率所部谒灵者亦为叶夏声司令及全部官兵，曾于灵前与侍卫同志摄影纪念，军容极盛，万人观迎，盖首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致祭故也。

(摘自《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背景介绍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使广州革命政权更加巩固。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等决议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政府改组宣言。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其组织采取委员会议制，推定汪兆铭、廖仲恺、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等十六人为委员，并互选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以汪兆铭为主席；下设三个部，以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7月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以汪兆铭兼任主席。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一军，以蒋介石兼任军长；湘军改称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任军长；滇军改称为第三军，以朱培德任军长；粤军改称为第四军，以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称为第五军，以李福林任军长；后来，程潜所部援鄂军和吴铁城部的一个师合编为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各军并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从此，军政开始统一，财政也渐收归中央政府。

国民政府成立后，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乘革命军回师平叛和沙基惨案外交紧急之际，于9月1日起，又重新占领了潮州、梅县等东江一带地区，并集重兵于惠州，企图和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合力夹攻广州。国民政府为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于28日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10月1日，东征军开始出师。14日攻占了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11月初，再度收复东江一带地区，全歼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后来，由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专员，设行政公署于汕头，负责潮州、惠州、梅县等地的行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和东江一带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又南征盘踞于高州、雷州、海南岛等地受段祺瑞政府任命为“粤南八属督办”的军阀邓本殷。10月29日，打退了邓本殷的北扰部队；至12月初，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克复海南岛，胜利结束南征。至此，革命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

材料：

-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材料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决议案》，但因两广没有统一，未能实行。东征胜利和广州叛乱的平定，不但使广东基本上统一，广西政府也于此时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而成立国民政府的条件大致成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是首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

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合议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十六名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他们是：“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闿、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由于实行合议制，虽然政府设主席一人，可是重要国务皆由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决定执行。这个原则较过去大元帅府时实行的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作法，显然是个重大的进步。

七月三日，广东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新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也进行了改组。设立军事、民政、财政、建设、商务、教育、农工等七厅，分别由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

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担任各厅的厅长，并由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为委员长。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即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军事方面。国民政府成立前，各派军队林立，独自设立防区，形同割据。国民政府成立后，取消地方军的名称，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七月三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等八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八月二十六日，军事委员会议决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是：黄埔学生军加上一部分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程潜所部的攻鄂军此时尚未成为一军，第二次东征后，改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广西方面的桂军，在两广政治统一的工作全部完成时，才改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北伐出师前夕，把唐生智（孟潇）的部队改编为第八军，由唐生智任军长。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各军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设立了政治部，因而各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制度，对于中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行政方面。国民政府成立时，广西当局还只是接受国民党领导。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研究和提出两广统一的方案。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两广统一案，其主要内容是：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全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六月一日，广西依照此统一案，始正式组织省政府，并由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至此，两广的政治统一才告完成。国民政府在抓紧两广统一的同时，对于广东省在行政管理上的统一也很重视。原来广东地方官吏，各自为政，大元帅府的权力难在广州以外实行。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东省政府把九十四个县划为东江、南路、广州、西江、北江、及海南六个行政区，委任周恩来、甘乃光、宋子文、古应芬分别担任东江、南路、广州、西江的行政委员，为该区之最高行政长官。周恩来治理东江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于他治理有方，成绩卓著，深受岭南人民的欢迎。

第三，财政方面。原来是各军自行收税派捐，强大的滇军掌握了广州的财源，如铁路、赌场、妓院、烟酒税等，而粤系军阀对此不能善罢甘休，矛盾非常尖锐。财政部长廖仲恺提出统一财政的文件，规定各种税款的征收和全部军事费用的支出都交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所有负责人员都要大公无私，决不克扣分文归己。由于廖仲恺态度坚决，措施得当，自统一财政后，收支状况有很大改善。一九二三年，广东省平均月收入为八十五万八千元，一九二四年降为六十六万五千元，国民政府成立后则迅速增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份收入达四百万元。

国民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在中国近代政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不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对于日后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仍然是初步的。在广东国民政府地辖区内，反动政治势力及其经济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

（摘自《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浙奉战争

背景介绍

1924年11月，皖系的段祺瑞被冯玉祥和张作霖捧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后，即于12月11日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和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职，以江苏省长韩国钧兼任江苏督办；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时，张作霖为谋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齐燮元势孤不能敌，不得不于12月14日按照临时执政府的命令办理交御，自行赴沪，并暗约孙传芳共同抵抗奉、卢。

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入南京就宣抚使职后，即招集旧部，进兵沪宁线，企图彻底解决齐燮元的残余势力。而齐燮元因得到孙传芳的援助，于11日秘密令驻沪苏军旧部驱逐分治上海南、北的张允明、宫邦铎。齐燮元自称为浙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为第二路总司令，于14日出兵占领苏州，使沪军与集中于镇江的齐燮元旧部联成一气。段祺瑞恐事态扩大，为了安抚孙传芳，特于16日任命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以示对闽、浙并无侵害之意。17日，又派陆军总长吴光新南下，表面上为查办齐燮元，实际上为调和孙传芳，使其中立。孙因此采取观望态度，而张宗昌率领的奉军则于此时与卢军会合，向沪宁线的齐军步步进逼。自1月17日起，两军大战于丹阳、无锡间。1月25日，齐燮元从苏州败退上海，旋赴日本，将所部交孙传芳接收。29日，张宗昌率奉军一万多人抵上海，将齐的一部分败军缴械收编。结果，由于吴光新的居间调停，2月3日，孙传芳与张宗昌签署了江浙二次和平条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交上海总商会保管”。齐卢战争告一段落。但由于奉军对段祺瑞和吴光新对上海的处置不满意，又开始了奉浙战争的酝酿。

齐、卢战后，段祺瑞应张作霖的要求，于4月24日特

派张宗昌为鲁督;8月29日,任命杨宇霆为苏督(因卢永祥辞职),姜登选为皖督。于是,孙传芳为先发制人计,暗中联络旧苏军师旅长陈调元、白宝山、马玉山、郑彦俊,以及鄂、皖、赣三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于10月15日自称为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杨宇霆、姜登选以势弱难敌,自动放弃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奉张派鲁督张宗昌固守徐州。16日,孙传芳与夏超、周荫人联名发出讨奉通电。17日,孙传芳抵上海后即沿沪宁路西进,11月初与奉军大战于徐州附近。11月7日,奉军败退山东。8日,联军占领徐州。20日,孙传芳通电自徐州返杭。从此,苏、浙、皖、赣、闽五省遂为孙传芳所割据。

材料:

- 战事发动之原因
- 孙传芳秋风扫落叶

材料一　战事发动之原因

直系政客力谋于双十节前发难,谣风甚炽。其所借口,则反对金佛郎案、反对关税会议,固已早有所闻。政府当局纷遣专使设法消弭,双十节始幸而安渡。然东南大局竟以孙传芳之突然举兵而有急剧之变化,影响所及,全国震动。盖推究其种因,实远在去年讨曹一役之为功不卒,而奉系扩张地盘太速,亦为激动反抗势力联结之一大原因。去年声讨贿选之役,国民军与奉军扫荡曹、吴,如秋风之拂落叶,其势宜莫能御。然而奉军由津浦南下以图苏、浙之计划既未完成,国民军由京汉路南下以定鄂、赣之企图亦遭挫顿,虽其间不无军事以外之关系,而所谓直系之残余势力尚未可侮,则亦不可否认者。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既形成三种势力并峙之局面,国命之安全遂完全立足于此畸形的三足鼎之上,一旦三足之中有一倾欹,则时局之簸摇随之,而今日者即此三种势力互相较量长短之时机。此其远因也。

段合肥执政以和平为号召,然其所以保持和平之办法,因各方掣肘,往往未能彻底做到。国民会议尚未开成,根本大法亦无眉目,执政府所劳心焦虑者,惟如何敷衍各方以求其势力之均衡。于是第一次论功行赏,而奉系得直隶、热河、山东,国民军得绥远、察哈尔、河南,而直隶亦奄有其一角。奉系向津浦发展,国民军向京汉发展,形势已成,顾均阨于环境,中途停顿,而两方之不相能已渐露其瑞倪,追讨齐一役而后,苏、皖实已处于奉系势力之下,孙岳军向陕发展,而西北实已为国民军之目标。第二次论功行赏乃以苏、皖两督界奉系之杨宇霆与姜登选,陕、甘两督界国民军之孙岳与冯玉祥。其时豫晋战谣、江浙战谣甚嚣尘上。豫、晋之间因各有顾忌而不敢发、江、浙亦然。杨宇霆南下,复不率师旅,以示和平无他,大局幸而得一二旬之苟安。然杨以奉系要人坐镇东南,终不能不使他方有所疑忌,而先发制人遂为孙传芳决定之大计。此又战事爆发之近因也。

(摘自《国闻周报》41期)

材料二　孙传芳秋风扫落叶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后,奉军于一九二五年初占领了上海和南京,并以邢士廉代替了张允明,杨宇霆代替了齐燮元。浙江孙传芳因实力尚不充足,便采取了一方面严守中立、一方面严阵以待的策略,由卢香亭率第二师进驻宜兴,谢鸿勋率第四师进驻松江。奉军占领沪宁后,知道孙军防范严密,便未敢擅攻浙江。

杨宇霆督南京、邢士廉守上海时,是奉军几次入关的极盛时期。但奉军纪律很坏,向来是闻名全国的。甚至北方人当孩子哭闹时,用奉军代替老虎吓唬孩子,说奉军来了,孩子就不敢出声了。奉军一到江南,就到处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弄得怨声载道。江苏士绅张季直等经常到杭州游玩,会着孙传芳时,不免流露出对奉军纪律败坏的不满情绪。孙传芳抓着这个机会,大作文章。不久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南京、上海等处士绅人民抗议奉军种种暴行的游行请愿。奉军正在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时候,哪把这些请愿的行动看在眼里。这时孙传芳已把接过来的四个师、一个独立旅整顿一新,尤其把第四师、第十师内部主要军官,均已调换自己的人。又把李宝章的卫队团扩编为第九师。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而在整顿过程中,按月发饷,按季换衣,可称得兵强马肥,军容一新。

孙传芳拥有如此庞大武力,又遇到苏沪人士反对奉军的机会,就命李宝章袭击邢士廉,命卢香亭率第二师夜渡太湖,袭占丹阳,截断奉军沪宁补给线,命谢鸿勋率第四师经宜兴进窥南京。

邢士廉张皇失措,略事抵抗,就逃入租界。李宝章在丹阳、上海之间,俘获奉军四千多人和各种弹械,进占了上海。卢香亭率第二师沿沪宁路紧迫奉军,向下关方面挺进。谢鸿勋越过溧阳,急攻南京侧背。杨宇霆感到四面楚歌,便亲率少数亲信,借去下关督战之名,弃城而逃。安徽姜登选眼看沪宁失利,而陈调远、王普、马祥斌等地方武力态度不明,自已又苦于没有直属部队,感到无法支持下去,也就弃职而逃。

孙传芳亲率大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召集卢香亭、谢鸿勋等主要将领开紧急会议。孙传芳说:“我们胜利了。他们兵败如山倒,追的越快,战果就越大。”因即命谢鸿勋率部队沿津浦路急追北逃奉军,命卢香亭沿津浦线东侧,迎击张宗昌,消灭他的白俄军(当时张宗昌率五千多名白俄

军，由济南南下支援姜登选）。

当邢士廉、杨宇霆、姜登选等战败逃走后，张作霖大发雷霆，召集张宗昌、褚玉璞、施从滨等重要将领会议。张宗昌自告奋勇，愿亲率白俄军去收复南京；施从滨愿率其四十七混成旅收复安徽。张作霖就派施从滨为安徽省善后督办；派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

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大批给养。特别是张宗昌，给白俄军领了一批活羊，还有大宗白兰地洋酒、大炮台香烟等名贵东西，专门供应这一大批白俄军享受之用。施从滨部经过数日整顿补给后，就由兖州、泰安防地、先后开到蚌埠附近。但施军布防尚未就绪，而孙传芳的谢鸿勋师和卢香亭师两路大军取钳形攻势，把蚌埠的西南东三面包围，连夜向市区施军猛冲。施部本是缺少训练的老弱残兵；又兼军饷积欠不发，兵无斗志，一遇谢卢两军夹攻，便纷纷溃退。蚌埠便被谢鸿勋占领了。

张宗昌的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线东侧，掩护施从滨向南急进。白俄军在张宗昌纵容下，毫无纪律，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张宗昌不但不加禁止，反而鼓励他们说："你们只要能替我打仗，一切由我负责。"因为白俄军纪律如此，更谈不上配合施军作战，当施军进入蚌埠时，他们还在蚌埠以北地区为非作歹，致使施军孤立无援。

孙军占领蚌埠后，便立命李俊义旅马葆珩团驰赴津浦路东侧迎击白俄军。马团官兵一路胜利，便有轻敌急功的念头。先头尖兵因过于突出，一遇白俄军，全部五十余人完全被大队白俄军包围杀死。残忍象野兽的白俄军甚至对孙军士兵挖眼睛、割鼻耳、取心肝以取乐。卢香亭大队开到，立即展开激烈冲杀。大部白俄军赤膊作战，一手拿着白兰地酒瓶，一手拿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一面狂饮，一面冲杀，凶猛如同野兽一样，把马葆珩团几乎击溃，副团长、营长多被打死，士兵伤亡甚众。马团急命步兵全线撤退，将全团机关枪和大炮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当即打死打伤白俄军八百多名，他们才酒醒，弃枪逃窜。可是他们都穿着长大皮靴，个子又大，跑得不快，又被活捉了三百多名。因为马团前锋曾被他们残杀，前线士兵为了给被杀官兵报仇，就把被俘白俄军，有的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吊在车站当活靶子打。等到旅、团长赶到时，才制止了野蛮的行为。

施从滨部撤出蚌埠后，仍在蚌埠以北坐着铁甲车督战，希图挽救失败的局面。不料谢师上官云相团，已绕到固镇桥以北，把铁轨拆掉，断绝了施军的归路。固镇以南卢师马葆珩团，又趁消灭白俄军的余威，向施军猛攻。此时施军遭到孙军腹背夹击，同时又悉白俄军已被消灭，感到孤军被围，形势紧急，就下令铁甲车开足马力向北速驶。铁甲车驶到固镇桥时，施从滨见长达一里的铁桥面上，挤满了向北逃窜的自己部队，他不忍在自己部队的身上碾过去，又命铁甲车往南开。没有开十几里远，见大部孙军冲杀前来，又急命铁甲车往北行驶。到固镇桥时桥面仍是挤满着部队，争先恐后向北逃窜。此时由北向南截击的上官云相团正包围奉军缴械，固镇以南的马葆珩团，又已经紧追前来。在生死关头，施就不顾自己部队的生命，急命铁甲车开足马力，在自己部队身上冲过桥去，桥上一千多人立刻化为肉饼；冲下河去也不计其数。当时血肉横飞的惨状以及惊叫惨呼之声，真是无法形容。还有许多带着上中校肩章的军官的下肢已被碾掉，尚能说话，要求过桥官兵快给他一枪免得痛苦。真是惨极了！孙军随军文职人员（书记军需等）过桥时，目睹此种满桥血肉狼藉情况，都吓得不敢过桥，有的竟痛哭失声。

施从滨驶过固镇桥后，满以为可逃此大难。那知铁轨已被拆掉，铁甲车立即倾倒路旁，他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那时施已是须发皆白的七十高龄老人，着陆军上将服装，他还很自然地对孙军说："你们辛苦了。"当由谢鸿勋派营长一员把他送蚌埠总司令部（谢还写一报告给孙传芳，并要求优待施从滨）。施见孙传芳时还行了军礼。孙在烟床上动也没动，便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就命人把施拖出去枪杀了。

事后孙部里许多军官，都对孙擅杀战俘表示不满。据孙自己对亲信说，他杀施是给邓如琢、陈调元等一个眼色看。内部将领都认为此次战争，是出人意料的顺利，很轻易地就占领了上海、江苏、安徽，致使孙传芳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

（《摘自《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马葆珩）

郭松龄倒戈

背景介绍

奉浙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奉系军阀，原分新旧两派，领新派者为杨宇霆，总旧派者为张作相。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均居要职，而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因而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与杨等不能相容，乃从奉系中分裂出来，与冯玉祥联合反奉。

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1925年3月的胡（景翼）憨（玉琨）战争中已占领了河南全省，并按原划定势力范围沿京汉线及豫、陕、甘发展，但因屡受奉军压迫，当奉浙战争爆发时，即准备反奉。及奉军败退徐州后，河南的国民

军一面乘机向鲁西发动，一面向大名进兵；而北京附近的奉军，也向驻守京城内的国民军采取了三面包围的形势。双方大战，一触即发。但冯玉祥自知难敌奉军，乃利用奉系新旧派的矛盾，与郭松龄联合，成立了反奉的秘密协定。

11月22日，郭松龄公开与奉系决裂，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23日，即在滦州宣布独立，并将驻守关内的反对派奉军将领姜登选及其他师旅长等多人诱捕，发兵出关攻奉，大败奉军。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郭军得宋部支援，声势更大，其右翼军已于12月中旬抵达营口，沈阳震动。在张作霖危急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助奉，于12月23日巨流河一战，打败了郭军。郭松龄兵败被杀。

材料：

- 势如破竹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
- 郭松龄失败

材料一　势如破竹

郭松龄断定反奉之事已经泄露，毅然决定提前发难。11月20日，郭松龄仍以张学良军团长的名义，命令部队东撤，向关外挺进。并发布通令："各部队长官，限于22日下午2时前到达滦州，参加军事会议"。21日，郭松龄率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专列火车到达滦州（今河北省滦县）。郭松龄曾经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决心把张作霖、杨宇霆赶下历史舞台。22日，郭松龄和李景林进行长时间密谈后，于深夜发出通电：第一电，电文数千言，要求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第二电，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第三电，宣布奉、国两军停止交战。23日，郭松龄在火车站已停业的火柴公司楼上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场警戒森严，没有郭松龄的手令，无论任何人不准出入。郭松龄在会议上郑重宣布了倒戈反奉的决定，同时，宣布了内政与外交方针，在内政方面，要求铲除封建军阀，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实行国家统一。在外交方面，主张睦邻友好政策，废弃日张密约。"言至此，声泪俱下，大家感动，群呼唯将军之命是听，无一持异议者。"郭松龄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唯有第5师师长赵恩臻、第7师师长高维岳、第10师师长齐恩铭、第12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甚至反对。于是，郭松龄把他们解职，派旅长宋九龄护送到天津李景林处扣押起来。当天，发表了《主和罢战之通电》，指出"天祸中国，内乱迭寻，……推原祸始，不过一二穷兵黩武之人，为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残民以相逞。……松龄等身列行间，未谙政治，只知内乱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同时，又发布了《讨伐杨宇霆之通电》。郭松龄将原属张学良第3军团步兵6个师，炮兵两个独立旅，重炮兵一个团，以及工兵等，共集奉军精锐7万人，重新编组5个军。在滦州会议确立了新的组织机构和作战部署。

这时候郭氏下达命令，仍与张学良共同署名，即为表示拥戴张氏，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

郭松龄认为：自己掌握了奉军所有精锐部队，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炮兵；而张作霖关外之兵，分驻各地，只有一营炮兵，奉天没有多少部队，又没有准备；吉林张作相第15师据守山海关，不堪一击；黑龙江仅有两个骑兵旅，又没有战斗力，即使急电来援恐怕鞭长莫及，因此，郭松龄充满了必胜信心。

24日，郭松龄在滦州发出第二次反奉通电，进一步列举张作霖、杨宇霆祸国殃民的大量事实。同时，冯玉祥也发表了讨张通电，愤怒斥责张作霖的累累罪行，"应当及时引退，……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并命张之江部迅速集中丰台至落垡一线，令宋哲元率兵集结多伦，准备攻取热河与赤峰。25日，李景林也发布通电，规劝张作霖"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言词比较缓和，无真心反奉，为后来叛盟归奉留下了退路。

26日，郭军突破榆关防线，占领秦皇岛。27日，派魏益三率领杨焕采18团、张廷枢90团、柏桂林工兵营先遣队，熄灭车灯，潜行出关，一举击溃吉林张作相第15师，到达关外万家屯车站，开始构筑工事。不料，郭军中第90团团长张廷枢和参谋齐家祯率军叛变，投靠其父张作相，报告了郭松龄造反情况。于是，张作相与汲金纯集中优势兵力，趁魏军尚未站稳脚跟时，先发制人，由于众寡悬殊，郭军暂时失利，魏益三率余部退至山海关小河口附近。张作相、汲金纯虽获小胜，恐怕郭军大队人马出关，把司令部迁至锦州，将张作相部于琛澂、李杜、李桂林3个旅与汲金纯部第9师两个旅，由山海关撤到绥中、兴城、连山一线据守，由张作相负责指挥，阻击郭军东进。

28日，郭松龄统帅大军迅速占领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30日，郭军总司令部迁至山海关，将所属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郭松龄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从此，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发号施令，并电告全国："松龄此次班师，……当保境而卫民，不问中央之政治"。然后，东北国民军陆续出关东进。

不料，李景林此时背叛了反奉的海誓山盟，投靠张作霖与日本，并接受大批武器、款项。从郭的后方封闭了郭军驻津办事处，解除卫队武装，逮捕工作人员，扣押了在天津的存款和6万套冬服，给郭军在物资上造成极大困难。同时，将所属部队改为直军，联合山东的张宗昌部，向

东北国民军开战！这时，郭松龄只好调魏益三第5军驻守山海关，防范李景林偷袭后路。同时，郭松龄又请求冯玉祥给予有力支持，以牵制敌人。但冯并没有立即派人支援。

张作霖获悉郭松龄统帅大军出关，日本又迟迟不表明态度，所以，一度惊恐万状，颓靡不振。"废寝忘食，坐卧不安，精神已经错乱，对于一切事物，都不过问了"。由于杨宇霆和日本关东军已经商妥，以"出兵保侨"为名援助奉张。张作霖闻讯振作起来，开始调兵遣将，准备抵抗郭军。11月30日，张作霖郑重宣布"讨伐令"。"当时总部下通缉令，悬赏缉拿郭松龄、韩淑秀夫妇。以郭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10万元，以韩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5万元"。并令张学良、张作相在连山备战筑垒，严阵以待，企图一举击败郭军；并恢复了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为奉军运筹帷幄，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迅速奔赴锦州。共调动步骑兵4万余人，利用辽西连山至塔山一线的有利地形，阻击郭军，并分三路设防。

12月2日、3日，辽西天气突然变冷，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人马在冰上皆可畅通，郭总司令决定发动全线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广大官兵每天步行军百余里，迅猛地开往连山阵地。郭军向奉军右翼进攻，由于郭军先头团第12旅的富双英团投降，使郭军的攻击一时受挫。但总起来看两天的连山战役，以郭军的胜利，奉军全线溃败而宣告结束。郭军乘胜包围葫芦岛，夺取高桥镇。5日清晨，郭军开始炮击锦州，奉军纷纷败退，郭军主力进入锦州。如能乘胜追击，攻取奉天，指日可待。

（摘自《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上午，在例行之内阁会议上，宇垣陆军大臣首先对中国时局问题，发表如下言论：

对于兴城张、郭两军对垒之形势，或可认为已经开战，根据种种情报判断，现并未处于生死决战之际，倒象处于持续对峙之状态。

然而，若如奉天方面之情报所言，此乃决一雌雄之战，其结果大概对奉天不利，或将以张作霖之失败而告终。以本人之见，倘张作霖去职，何人将取而代之占据奉天？其结局不能不考虑到，会出现无视日本地位之狂暴事态。特别是在此情况之下，长期为张作霖统治下北满之事态，将难保以往之平静。如上述情况，不予制止，其结果对日本必有不少不便及不利之处。然日本如对处于既倒形势下之张作霖给以强有力的支持，采取积极行动，这样甚为危险，此并非可以草率决定之问题。故目前可尽力采取各种手段，以保护南满铁道沿线日本国民之生命财产。如上述所言之事，不采取适合时机之措施，则应根据附属地之地势及败军杂乱之情况，派军队在铁道沿线一千米以内巡逻，寻求防备之措置，此乃十分必要。然对上述问题，既使在最少限度的必要范围内之措施，亦须对关东军司令官下达命令。

此外，宇垣陆军大臣对从日本或朝鲜重新派兵增援等问题之必要性，也有所言及。

陆军大臣还就形势之发展，声明日本立场之方法及时机等问题，征求了外务大臣之意见。

币原大臣言：

关于辽河以西目前之形势及不可能积极援助张作霖等问题，与陆军大臣之见解不同。

关于声明日本立场之形式，有必要仿照去年对直奉两军发出通告先例。

今年之时局与去年奉直战争时不同，从总趋势观之，冯玉祥及国民党将左右中央政局，此点无容置疑。因应此大势，驻中国之帝国代表打算与这派联络，指导其努力追寻正当之途径，防止脱离轨道。若只见满洲局部之情形，而不顾北京、长江方面之形势，而决定帝国之态度，实非上策，且属危险之法。因此，关于上述声明，尚须慎重考虑。

然据今晨报纸之报道，国民党中与日本关系颇深之殷汝耕，已参与郭松龄外交方面之事务。我方先出以声明做为手段，尽快通过殷汝耕方面对郭表示，日本确实守严正不干涉主义，并警告郭，如其敢有反对日本在满洲权益之言行，则必将刺激日本之舆论，将惹起重大后果。对彼打倒张作霖而进入奉天时的行动，事先予以充分注意，这样效果可能要大些。

之后，总理大臣言："此际日本需要采取最慎重之态度，不仅对满洲，对中国各方面之影响都应予以充分考虑。有必要通过殷，警告郭军。此亦不失为一种可行之法。"对上述意见，大体取得一致。

会后，宇垣陆军大臣对币原大臣密谈了以下三点看法：

一、对于芳泽公使报告中所说，关于京奉线上配置之日本军妨害郭军行动之事，我立即致电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命其查明真相。该司令官确言"毫无阻止郭军行动之考虑，所以部下之军队，也并无上述之行动，经迅速调查之后，事实确无任何行动。上述情况恐怕乃鹿钟麟对芳泽公使所言，我方并无此事。"上述所言，已转电驻中国公使馆武官，估计芳泽公使对此已有所了解。实际上，从中国方面得知此事时，如直接照会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对此充分调查后，可报告事实真相。中国方面认为我妨害其行动，若系我方无意识之行动的话，则须立予解释，消除误解。另派遣在外之军人亦应注意，因驻屯军司令官与驻华公使馆之联系不够，驻华公使基于中国方面片面之辞，而发出夸大其辞之电报，致使双方出现这种不愉快之事。

二、关于土肥原在汉口之行动，据其直属上司阪西中将之来电。该中将提出，此际在中国各方面之我国官宪，应禁止玩弄小计小谋。阪西中将无意采取张、吴提携之策，然土肥原对上司之旨意，拒不接受，自己继续实行干与之策，对此，真情确否不详，我想须立即向土肥原查核。依本人之判断，土肥原或许被驻在汉口蜑泽等人之言所惑，无意中承担了联络之责。无论如何，我作为陆军大臣坚决反对。此事将借此机会，充分调查，查明真相。

三、在陆军省或参谋本部之下级军官们声称，已得到本大臣之谅解，或称是本大臣之意见，而对外务省属下之官员，提出各种要求。以上之事，本大臣全然不知。希望我们今后对部属的话及其意见，不要过于重视。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本村局长述，冈崎记。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三　郭松龄失败

关外战事，初颇有利于郭军。郭军自滦州反戈出榆关，而绥中，而连山，而锦州，而沟帮子，而营口，而白旗堡，而新民，奉军节节败退。郭之入沈阳，盖指顾间事矣。讵知辽河沿岸最后之决战，竟至一败涂地，而只身潜逃，卒不能免于一死，殊出常人意料之外也。

郭松龄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半由新民府开始总攻击，中路进占巨流河，右翼占大民屯，左翼破公主屯，奉军之势已岌岌可危。不意二十三日张作相部在公主屯逆袭，郭军不支而退。张学良部中路反攻，又夺回巨流河阵地。是午郭军开始退却，张作相及张学良两军当即进围新民府，从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四日晨九时尚在继续战斗。郭军出死力试行逆袭，于杨高台子之争夺战，曾经三次行最猛烈之大激战，而卒归无交，形势为之一变。其致败原因：(一)吴俊升之黑龙江军绕攻白旗堡，竟奏奇功。(二)张作相绕攻右翼，张学良、汤玉麟、张久卿由正面猛攻，亦锐不可当。(三)巨流河之夜袭战，弹如雨下，郭军因缺乏弹药，白旗堡大半被焚。(四)新民屯复被奉军飞机乱掷，炸弹到处起火。于是郭松龄遂由新民屯乔装潜逃矣。

事前郭军知形势不利，频托驻奉日本总领事吉田调停。吉田二十三日晚谒张作霖，乞贷郭死，收容郭军，和平解决。张答收容郭军，概不追究，惟郭生命安全，因部下公愤，碍难保证。吉田派内山领事二十四晚赴前线，探询双方意见，而孰知郭军大败，郭是时已以被捕闻。盖二十四奉军穆师王营长在喇嘛台民户菜窖内搜获郭松龄夫妇及参谋二人，押解赴奉。而是晚在押解途中，又竟被兵枪毙。郭尸二十五日抵省，悬首街市，并有祭姜之说，亦云惨矣。助郭之林长民闻亦被枪决。二十六日张作霖特派参谋处长赴吉田声明，杀郭并非已命，要求谅解，此亦事之至可骇异者也。

郭军既败，二十四日黑军占柳河沟，与奉、吉军包围新民府。郭军二十五日入新民，北镇、锦州一带郭军皆陆续乞降，听候改编。其黑军将一部守备热河、朝阳、山海关方面，一部整理盘山、田庄台方面之郭军残部，已于二十五日分二路开拔。张作霖又派步兵一师、炮兵二旅、骑兵一旅、工兵一连击郭军残部。张学良向新民屯日本领事馆分馆要求引渡逃入该馆之郭军官吏七人，被拒。转向奉天总领事要求，亦仍拒绝。至郭军方面，闻尚有在山海关方面魏益三之郭军第五军，将附冯讨张。冯派萧其煊赴锦州调查。萧由锦州带残部三旅回榆关，与原驻榆关之魏益三开军事会议，决继郭松龄遗志，并拆榆关、锦州间铁轨，防奉军追击。推萧代全军赴张家口乞援。萧于二十七日夜回京，偕熊斌、王乃模赴张。闻驻榆郭军尚存六旅，冯玉祥令李烈钧、方声涛为总副指挥，统率唐之道师镇守榆关，并备出关进击张军。冯玉祥二十六日电鹿钟麟，谓我军集中津东，俟郭军如需援助，当立即出发。可见冯军入奉作战，迟早间事，关外战事未必即了也。

（摘自《国闻周报》第3卷第1号）

西山会议

背景介绍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部分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个反共会议，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为开会的地址在西山，所以也称为西山会议。而参加这次分裂会议的国民党右派，也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一个国民党右翼集团。它的主要人物有自称为反共“先锋者”、“先觉者”的谢持和邹鲁、林森、张继等人。孙中山逝世后，他们更以元老自居，无所顾忌地进行分裂国民党的非法活动，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后，邹鲁、林森等在广州不能立足，就以“国民外交代表团”的名义，于9月间纷纷离开广州到上海、南京等地，策划国民党右派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阴谋活动。10月14日，他们到北京“发布种种反对国民政府言论。，“破坏党、政府之信用”，并要挟北京执行部答应其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因被李大钊、于树德等拒绝，他们又“奔走联络，利用同志会之分子，捣乱北京执行部”；并改会址于张家口。但由于他们勾结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企图强占北京执行部的阴谋失败，拟在张家口召集会议的决定又被冯玉祥拒绝，11月中旬，乃由叶楚伧提议改会址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并由谢持、邹鲁、林森、张继、邵元冲、戴季

陶、吴稚晖等十五人联电通告汪精卫，决定于 11 月 23 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届期，由国民党右派策划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便托庇于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权之下，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场了！会期十天，共开了二十二次会议，但到会的只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共十二人。戴季陶、吴稚晖等虽参与其事，但以公开反共时机未到，又隐蔽下来，没有出席会议。这次所谓"全会"，远不足法定人数（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共五十一人），是一次非法的分裂会议。然而，它却通电要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停止职权；并对外发表了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言，攻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决议案，主要的有：(一)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案；(二)解雇鲍罗庭顾问案；(三)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四)决定此后对于苏联的态度案；(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李大钊等案；(六)取消政治委员会案；(七)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等。

西山会议后，这些国民党右派即在上海另立中央，设立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并由邹鲁创办《江南晚报》于虹口，为该派的宣传机构；又操纵原为叶楚伧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宣传右派主张。

材料：

- 西山会议
- 对时局宣言
- 对西山会议的反击

材料一　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这个怪名词，二、三年来，总算是妇孺皆知，中外闻名，象煞神通广大，万恶可作，罪恶弥天了。究竟什么一回事，却多莫明其妙。待我个人来说说真相吧。

"西山会议"名词的由来，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因广州中央党部被共产党把持，不能行使职权，同时洞悉共产党奉着第三国际命令加入本党，为党团作用，要危害党国，遂在北京西山总理灵前开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来谋挽救。因此人们就将此会叫做"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已是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来谋挽救党国，所以到会的人只有中央执、监委员。计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除胡汉民被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狱，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因本身系共产党，不许列席外，计实际委员只有十八人。此十八人列席西山会议的计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传贤、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伧、邹鲁等十人。李烈钧虽未列席，却来电赞成。没有列席并没有赞成的只有汪精卫、谭延闿、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图、丁惟汾七人。监察委员五人，列席西山会议的有谢持、张继二人。吴稚晖署名通电召集西山会议，并于西山会议第一次预备会出席且做主席的，所以吴稚晖说他是西山会议派，就是这个事实。邓泽如虽没有到会，却暗中助过钱。监察委员五人中只有李石曾与西山会议没有关系罢。候补执行委员则尚有茅祖权、傅汝霖等列席。这是西山会议的角色。

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庆祝讨唐大会，死伤了十几个人，所谓民众团体一口气说是邹鲁、谢持、居正、覃振主使。这几个人，都是西山会议的人，自然是有人一网打尽西山会议，"借尸图赖"，一目了然的。为问用什么东西来杀民众，他们不能答，因为西山会议的人无一兵一卒可以杀人。若说党军可由三几私人指挥杀人，那就辱我党军太甚了。此案发生后，我就在国民政府会议席上提出拿办主使及前后在大众中高唱打倒特委会、国民政府、军委会与打毁市党部的行为犯。谭延闿同志是日主席，正由沪回，他说："若单纯共产党暴动，悉予拿捕，自属易办。此事发动由上海。有人主持，实党内之争，为人所乘，愈捕愈加纠纷"。就此搁置，我乃恍然。及闻蒋介石同志在所谓预备会对于所谓民众请愿查办主使实施的愤语，说"民众已经指定某某十人为主使与实施，则主名已得，何必再查。即应将所指定之某某十人惩办"。我更恍然。因为蒋介石同志如果真正尊重民众，何以张发奎、黄琪翔在粤作乱，惨伤无数民众及黄埔学生，介石同志却不讲一句查办的话。汪精卫、顾孟馀等包庇黄琪翔等，民众用真凭实据恳请查办，蒋介石同志反为解说及保护汪精卫等出席什么会。前者何等义愤，后者又何等不义愤，蒋介石之心，路人可见了。幸亏商务印书馆搜出共产党秘密文件，有"宜乘群众集会，乱放手枪，造成南京类似之惨案"一条，始知上海主持暴动的人，徒给共产党捣乱之机，反而借来摧残西山会议的人，共产党应大快特快的说一击两中。汝说可怜不可怜呢？这就不是西山会议问题，实国民党全党的问题。

西山会议有关系的人谢持、张继、许崇智、居正、邹鲁、傅汝霖等所谓预备会定期开会就发出告同志书，一面说开所谓第四次全体会议来取消特委会的不对，同时说明特委会法律事实又极有根据，末述我们都可引退。从此后我们就没有到特委会开会，表示我们对于特委会虽主张正谊，不能由所谓第四次全体会议来取消，却完全是为党，不是为个人。那就西山会议的人区区爱党的心。西山会议的人引退，是谋党的利益，并非有所畏忌。试问目前捣乱的人比较袁世凯如何？督军团如何？共产党如何？那就可以鉴此心了。不过是我们引退，仍愿诸同志本着党的利益，固然不好拿法统不健全的所谓第四次全体会议来取消特别委员会，亦不好拿已失时效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行使党的职权，仍请本着完成整个党的目的，由

特别委员会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就我们目前最恳切的希望。否则必致为亲爱所痛，为雠仇所快，我不忍言了。

末了仍须向诸同志表明一句话，因为西山会议只有主张，没有派别，特别委员会成立，主张已达，西山会议即不存在，一切言动皆系个人党员资格，并没有什么西山会议，业经迭次声明。现在虽拿着西山会议来标题，亦不过一陈既往事实，这是不能不请诸同志谅解的。完了。

（选自《邹鲁文存》）

材料二 对时局宣言

上年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对于北伐及北上之际，均有诚挚痛切之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北伐之目的，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势力；换言之，即不仅在推倒曹吴，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必如是而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次殖民地地位，以造成自始独立之国家。并欲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乃能令中国出于不平等之国际地位，而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得以充分发展。此国民所共闻者也。

转瞬一年，反革命之势力继续不绝，帝国主义者且由压迫而进为屠杀。号称革命政府之段祺瑞政府，自由即无拥护国家及民众利益之诚意，掩耳盗铃，冀以善后会议、国民代表会议、临时参政院之类，拥护一己之地位。一方惟反革命之军阀命令是听，一方搜括民财至五、六千万之钜，供其无谓之挥霍而不足，则图二五加税而牺牲国民八千万之钜款，承认自己昔所反对之金佛郎案。五卅惨剧直道在人，正扫除帝国主义者压迫及撤废不平等条约之机会，有民众为之后盾，有友国为之声援，乃以谋达二五加税目的之故，转借此以召集关税会议，伪从民意争关税自主，而实以条约交换，增加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力，而助帝国主义者之张目。凡此皆一年以来国民所共见共闻，不徒与本党上年两次宣言之意趣相违，亦全国国民所含怒蓄愤欲待机而发者也。

今者，段政府标榜和平统一之伪意既已毕露。而事实上所呈递起递仆纷扰之象，转甚于段政府未成立之前。凡此皆足以证明，受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终必归于消灭；不建设于真正民意之政府，终不足以自存。在此现象之中，本党仍本本党最终目的，努力于三民主义之实现。一方善意的渴望今之拥有军队实力者，瞻前毖后，务各自立于真正拥护国家与民众利益之途；换言之，军队即民众之武器，必受民众之指挥。一方伪认为民意所归之政府既已为民众所厌弃，此后之政府，必须为国民所组织。国民政府之建设，本党仍本上年本党总理北上宣言之所主张，以国民会议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先行召集国民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本党于此，谨以热烈诚恳之意思，告于国民曰：十四年来国家之不宁，国民之食不得饱，衣不得暖，居不得安，间接为帝国主义者之所赐，而直接则受帝国主义卵翼之军阀所赐。今者虽国民之觉悟者日众，军阀之失败愈速，然使国民不一起而自决，复立于主人之地位，以发号施令，则一年一度之害尔生命，毁尔财产，杀尔父母，辱尔妻女，伤尔兄弟子孙者，宁能终忍乎！本党则信誓在彼，始终为拥护国家与民众之利益奋斗而不变，抑愿为民众之先锋而不辞。特此郑重宣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材料三 对西山会议的反击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近接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铣（十一月十六）电，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复电严驳。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今年四月间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未半，即中辍南下，继续开会于广州，即基于此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岂可复蹈故辙，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隐谋。况第二次全国大会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嗣因省港罢工，交通梗塞，广州扫除反革命派，战事频仍，以致屡次展期。兹者广东全省统一，广州安如盘石，纵使交通频感不便，亦无碍于开会。故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议，愿念事势，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除胡汉民同志现在莫斯科，李烈钧、柏文蔚两同志于役京外，已电徵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之主张，并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谨此宣言，诸维鉴察。

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涛。感（十一月二十七）。

观此，则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必须在粤开会不能在

京开会，已十分明湜。惟尚有一部分人不甚明湜党部组织者，以为署名通电召集在京开会者已居委员会之半数，纵使前已议决全体委员及代表大会须在广州开会，惟署名者既占多数，亦应服从。不知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原有二十四人，候补委员会十七人。执行委员除在中央党部执行职务外，余分在上海、北京各执行部谋党务之活动，其余则有监察委员五人，候补五人。其人名如次：中央执行委员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传贤、谭平山、谭延闿、杨希闵、李大钊、于树德、邹鲁、王法勤、丁惟汾、居正、覃振、李烈钧、于右任、恩克巴图、叶楚伧、石瑛、熊克武、石青阳、柏文蔚、林森。候补执行委员则为邵元冲、林祖涵、邓家彦、沈定一、瞿秋白、张秋白、李宗黄、彭素民、于方舟、韩麟符、毛泽东、张国涛、张苇村、白云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其中执行委员会张静江辞职，廖仲恺逝世，杨希闵、熊克武及邓家彦、李宗黄等皆以先后谋叛除名，以林祖涵、邵元冲、沈定一递补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邓泽如、张继、谢持、吴稚晖、李石曾。候补监察委员为察元培、杨庶堪、刘震寰、许崇智、樊鍾秀，而刘震寰因叛乱已除名。查北京署名召集开会者虽有十五人，惟执行委员仅得其九，余则为监察委员或候补委员，而监察委员则向无表决提议之权，即无冒签情弊，亦仅为全体委员之最少数。况其中多有冒签者，不日即可证明。而吴稚晖且当数日前政〔致〕汪精卫函，声明此后凡京中一切通电或函件，非经本人签字，一律无效，盖已明知京中少数不肖分子或有此等谬举矣。

（《政治周报》第一期）

历 史 内 幕

五卅血溅南京路

1925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参加的有：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代表工会）、梅电龙（梅龚彬，代表学联）、郭景仁（代表店员工会）、黄旭初（代表上海大学）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 5 月 30 日是被捕学生将受审讯的日子，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在 6 月 2 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增订印刷附律（规定所有印刷品必须向工部局登记才准出版）和增加码头捐等提案，于是就决定在 5 月 30 日这一天举行宣传和示威活动。由党团员带头，发动各校学生和部分工人组织演讲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演讲，并示威游行，号召各界继续支援坚持罢工的工人，要求租界捕房释放被捕的学生。把从 2 月以来工人的反日经济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

5 月 30 日，学生和工人 3000 多人组成几十个演讲队走上街头。总指挥部设在望志路（兴业路）永吉里 34 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由恽代英、侯绍裘负责指挥。有 30 个学生用自行车担任交通，传达命令，传递消息。

演讲原定下午 1 点钟开始，由于个别地区口头通知有误，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同文书院、复旦中学等校的演讲队上午就出动了。他们进入租界，到达指定地区演讲。总指挥部得知这个情况，一方面通知已行动的学生下午继续坚持，一方面紧急通知其他各校提前出发。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学生也都陆续到达指定地区，展开演讲宣传。每一个演讲队的周围都聚集着一两百听众。讲的人激昂慷慨，听的人义愤填膺，随即汇成队伍，示威游行。有的印度巡捕也受到感动，大概是想到自己亡国的痛苦吧，对演讲队不横加干涉。

下午 2、3 点钟，租界捕房出动大批巡捕在浙江路一带殴打和驱散演讲队员和听讲群众，有 100 多人被捕，被关进南京路老闸捕房。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所有演讲队都向南京路集中。南京路上人山人海。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店员和市民群众。人丛中旗子挥舞，传单纷飞，“打倒帝国主义！”“释放被捕的中国人！”“收回租界！”口号声如滚滚春雷，一浪高过一浪。热血沸腾的示威群众象洪水一样冲向老闸捕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胞。英国巡捕头目慌忙调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武装巡捕，在捕房门口摆成半月形，一片杀气腾腾。到了 4 点钟左右，竟悍然向赤手空拳的人群开枪。霎时间，枪声大作，血肉横飞，有 13 人被打死，几十人被打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死难者中，有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联委员、在现场担任演讲队总指挥部联络员的何秉彝。

他一面上课学习，一面从事社会活动，任上海学联委员，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部主任，每星期到党创办的平民学校上 8 个钟头课，还常为报刊撰稿。1925 年 2 月，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殴打和借故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时，党中央组织了由邓中夏等人负责的指导罢工的委员会，他积极帮助这个委员会做了不少组织工人斗争的工作。

5 月 30 日那一天，学生和工人演讲队到租界各大马路宣传，他担任总指挥部的联络员。骑着自行车，往来穿梭于各马路的演讲队之间。他自己也发表演讲，激昂慷

慨，听众无不动容。捕房出动大批巡捕殴打和驱散群众时，他及时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命令，通知各演讲队和群众纷纷向南京路集中。

到了南京路，他带几个会说英语的演讲队员，挤到人群的最前列，挺身而出，挥动着拳头，严正抗议打人抓人。巡捕悍然开枪时，他首当其冲，被子弹击穿肺部，倒在血泊中，犹愤怒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被送到仁济医院后，终因伤势严重，于第2天下午两点钟逝世。时年23岁。

6月上旬，他牺牲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成都全川学生联合会还推选他和李硕勋等4位旅沪学生，作为四川学生的代表，出席即将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得知他已牺牲的噩耗后，成都各界深感痛惜，集会决议将他的灵柩运回四川。次年5月28日，他的灵柩运抵成都，成都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另一位牺牲者，是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会执委、同济示威游行队伍的领队之一尹景伊。

5月29日晚上，同济大学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梅电龙代表学联在会上做了顾正红被惨杀经过和动员大家坚决投入反帝斗争的报告。同学们无比义愤，大会一致决定全校同学第2天到租界去参加反帝大示威，并推举陈宝聪、尹景伊等4位同学担任领队。大会到深夜11点钟结束，大部分同学都回宿舍就寝了，尹景伊和其他几个领队还带领着30多个同学，连夜赶着写标语，做旗子，印传单，准备急救包等等。

5月30日清晨，同济大学的大操场上，300多名同学整队待发。中国铁工厂的部分工人也集合了队伍来参加。尹景伊等率领着这一支学生和工人队伍，从吴淞乘小火车，到天通庵车站，又和张华浜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队伍汇合，一路上挥动旗子，高呼口号，经浙江路向南京路进发。到了永安公司门前，演讲队围聚在人行道上，尹景伊首先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号召同胞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为顾正红报仇！

在老闸捕房巡捕开枪时，同济大学的队伍已经挤到了前面。尹景伊看到陈宝聪的头部被打伤，非常危险，就一个箭步跑上前去，用力拉他一把，说："你下去！我……"话未说完，又一颗子弹飞过陈宝聪的右边，正打中尹景伊的胸部。他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中，仍断续地高呼："宣传，……斗争……打倒帝国主义！"被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于当晚7时许牺牲。时年21岁。

6月2日，在斜土路同仁辅元堂隆重地举行了尹景伊烈士入殓仪式。8月24日，烈士家乡青岛地区也开了追悼大会。半个多世纪以后，为了永远纪念尹景伊烈士和发扬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共青团同济大学委员会发动全校团员和青年集资建造尹景伊烈士的塑像，在1985年五卅运动60周年时庄严地举行了这座塑像的揭幕仪式。

再一个殉难者，是年仅16岁的南洋公学附中的爱国华侨学生陈虞钦。

5月30日一大早，南洋公学大操场上集合了400多人的游行队伍，向国旗行礼后，整队出发。陈虞钦本想骑自行车当游行队伍的纠察，总领队看他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午9点钟左右，游行队伍到达北火车站，陈虞钦就和几个同学一起走进租界，到处演讲。

中午，南洋公学同学汇集到闸北福生路景贸女校（当天南洋公学借该校设了临时办事处）休息并进茶点。因为人多面包少，陈虞钦把面包让给别人，并催大家快吃，好去游行。下午，游行队伍从福生路出发，经河南路、北京路、浙江路转到南京路，沿途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队伍汇合，浩浩荡荡。陈虞钦走在队伍的前几排，他个子不高，走得飞快，还帮助领队维持秩序。

在英国巡捕丧心病狂地开枪时，中弹者纷纷倒地，陈虞钦毫无惧色，仍奋勇高呼口号。但他自己也终于被几颗子弹打中，倒在血泊当中，鲜血浸透了他的衣衫，染红了他手中拿着的"中国独立万岁！"的旗子。他被送到仁济医院，经检查，肠部穿了7个弹孔。医生施了手术，将穿孔部分截去，然后缝合。到第2天下午，他的神志还清醒，还能同探视他的同学亲友说话。到了7点左右，病情突然恶化，双眼直视，临终前还说出"报仇"二字。

噩耗传来，全校师生为他痛泣。6月1日晚，全校开大会志哀，并决定全体同学缠黑纱，即日起罢课，全校一律吃素将节余菜金捐助罢工工人等。11月12日，全校师生员工和各界代表又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校内下半旗，敲悲钟10分钟。会后将烈士葬于万国公墓。后来南洋公学改为交通大学。今天在交大校园的绿树丛中的竖立着一座五卅纪念柱，上面刻着鲜红的大字："五卅纪念，中弹穿身而死者陈虞钦……"

陈虞钦的父母深明大义，在得到儿子去世的消息后，曾写过一封信给校方，信中说："该学生等为争回外权奋勇身先，爱国牺牲，死得其所，绝无怀怨，惟望贵校同人及上海各团体为学生等援助，坚持最后之胜利。"

……

五卅惨案是一根导火线。它使上海人民郁积了80多年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6月1日，全市人民冲破种种的压制和阻挠，不怕继续流血牺牲，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很快地席卷全国。在一两个星期里，就有北京、汉口、长沙、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用罢工、罢课、罢市、通电和捐款等各种方式支援

上海。广州和香港发动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重大组成部分。世界上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和国际友人举行集会、发出通电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

五卅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开始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它为北伐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正如中共中央在当时《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所说："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之第一页啊！"也正如瞿秋白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摘自梧沙：《65年前的一次大流血》）

西山会议派反共纪实

西山会议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去的一个反革命派别，其骨干人物大都是国民党中的老右派。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由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政治联盟，基本上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内部原有的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仍然留在党内。这些人物，不满意国民党的进步，不赞成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因此他们寻求机会，制造事端。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国民党老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其言论行动皆不忠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请求中央"从速严重处分"。"弹劾共产党案"的提出，成为西山会议派形成以前反共锣鼓的前奏。接着，二十五日，张继、谢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张、谢二人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对国民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致死之道"，扬言要解决"党中有党"问题，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分道扬镳"。

鉴于"弹劾案"的发生及其他右派的反共活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于七月三日召开第四十次会议，否决了他们的"弹劾案"。四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声明，号召党员消除误会，重申三民主义为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希望以此来解除那些保守分子的疑虑。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是一次反苏、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会议。这次会议因为在西山举行，被称之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开了四十三天，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俄国之态度案》、《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反动宣言、议案和文告。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次会议，就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十二月二日的第四次会议，又分别开除了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了他们的党籍。

"西山会议派"作出上述决定，据他们诡称的理由是：共产党员既然加入国民党，就不应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该再在国民党中"别取作用"，但是"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这是"妨碍本党之行为"；共产党员"加入之意"，"实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其信仰的主义，因主义有别也不能合作。

"西山会议"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苏联"采用帝国主义手段"，"也是本党的敌人"，并指责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同时作出了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议案。

"西山会议"为了达到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在组织上又作出下列决定：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政治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并推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通过《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并拟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地点在上海或北京、广州，等等。

"西山会议"的召开，激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各级党部，阐述了"西山会议"的非法性质，十二月，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第四次全会上，又明确指出，"西山会议派"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党籍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于十二月发出六十七号通知，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声讨北京

右派会议的声浪，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发出函电、信件，痛斥“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提出警告，责其改正。

“西山会议派”骨干人物的反共分裂活动，并没有因国民党“二大”对他们的制裁而有所收敛。“西山会议”之后，他们除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外，又集合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作为右派活动的大本营。他们操纵上海《民国日报》，创办《江南晚报》，进行反动宣传。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继“西山会议”之后，分裂国民党、叛背孙中山革命政策，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了十天，《政治周报》对头三天开会情况作了如下报导：“三月二十九日为伪代表大会开会之第一日，举定张继、居正、谢持、覃振、沈定一、傅汝霖、林森七人为主席团。张继演说，即大骂共产党，以示该伪代表大会的真面目。可惜其词未终，即因‘脑病’下台，沈定一、覃振等相继演说并纪念七十二烈士。最后有陈个民、朱乃斌报告广州三月二十日事件，大造谣言，谓广州已肃清共产分子，上海商报记载当日经过情形有谓其‘每至一段落时，全体皆鼓掌称快’。第二日则为这些叛徒腆颜接受遗嘱及说明宣言草案等。第三日开预备会议，预备‘大会移粤问题’的提案。”“西山会议派”明明知道“大会移粤”是一种空谈和狂想，但他们觉得这是用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好题目”。该提案说：“广东为我革命之策源地；亦即我国及政府所在地也。总理孙先生竭四十年之心力，造党造国，中道逝世，加入本党之共产分子，以窃据我党以破坏之，并假吾党以破坏我国”，故此，“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移至广州继续开会，以明我中国国民党为我民族纯一的唯一的革命政党，并将肃清党内任何属性之叛党分子，务使各省区歧出之恶现状，一例敉平。”寥寥数语，可见“西山会议派”抛出“大会移粤”问题的真意。

四月八日“西山会议派”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一个具有理论形态的反共、反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篡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革命精神入手，用取消反帝代替革命的民族主义，用“全民政治”代替民权主义，用乞求恩赐的阶级调合代替民生主义(参见陈独秀《国民党右派大会》一文，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响导》第一五O期)，从而达到推倒新三民主义这一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共同纲领的目的。“西山会议派”的“二大宣言”，还专门写了“关于共产者”一节。在这节中，强调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理论上无资本主义之立足点，即事实上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故由资本主义形成之阶级，不复能显著于中国”。因此，“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必须“截然其主张”。《宣言》指责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切言论行为，惟共产党机关之指挥是从，在本党内行使党团作用”，这是“共产党之失德”，妨碍了“国民革命之进行”等等。

“西山会议派”召开的非法国民党“二大”，是对国民党、共产党的又一次严重挑战。为此，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授权国民政府以全力制止其会议，并下令通辑叛党分子归案严办”。国民党各级党部也纷纷函电，谴责“西山会议派”非法召开“二大”的罪行。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治周报》、《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发表文章，严厉痛斥和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行径和言论。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政治上还处于优势，“西山会议派”显得极为孤立。“西山会议派”为了寻求反共的同盟者，竭力拉拢掌握着部分实权的蒋介石。三二O事件的发生，使他们喜不自胜，感到“吾道不孤”。于是“西山会议派”以其“二大”名义致电蒋介石及“孙文主义学会”，其中称道：“此闻诸同志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然谋变非出偶然，祛恶必须彻底，与其图蔓，莫如徙薪。盖异党分子，合则相拒，清理党籍，即所以统一军心，惟我忠勇之同志，努力为之。”此番鼓励、勖勉，并未获得正在左右逢源中想捞尽政治资本的蒋介古的理睬，相反，他以“反攻”的姿态发表通电，说他“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而“上海国民党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而不止。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既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复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言之滋痛。”“西山会议派”对蒋介石暂时不与其合作的立场是理解的，相信蒋介石会坚定地沿着反共道路走下去。因此，“西山会议派”在《告在粤同志书》中宣示：蒋介石虽宣布中山舰仅归罪于局部问题，但“事久变生，亘古如是”。并劝蒋等不要“因循自误，畏葸成风”，既使“不为是非”，也应为“利害着想”。

随着蒋介石反共步骤的加快，特别是蒋介石通过“整理党务案”等事件，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更大的权力以后，反共的首领虽已不属于“西山会议派”集团而属于蒋介石新右派，然而“西山会议派”仍作为反共的一个重要配角活动于反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整理党务案”发生后，“西山会议派”在默默称快之余，还发出了此案“结束共产党

不足"的叹息。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伐，"西山会议派"也为此惊慌，惧怕"共产党随'北伐军'之势俱长"，提出"无论北伐与否，皆当先行努力清党"的反动主张。北伐过程中，"西山会议派"分子又"变姓换名""潜入北伐军中"，破坏国共合作。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组成国民党中央，"西山会议派"竟以"反共先觉"之态发表通电，称赞蒋介石"清党"之举，召开"欢迎国民党忠实同志并促沪宁两中央党部统一大会"，邹鲁、谢持等出席演说。六月十一日，由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等口号，并恢复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党籍。

"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现合流。但为时不久，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利角逐，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一起进行反蒋活动，逼蒋一度下野，于九月十六日成立了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联合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实权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务，推倒特别委员会，攻击"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气焰顿消。一九三〇年，"西山会议派"又与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他们企图利用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军事力量推倒蒋介石，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但由于在中原大战中阎、冯军事上的失败，他们的目的未能达到。此后，"西山会议派"虽与蒋介石集团明争暗斗，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已被蒋介石的又打又拉政策逐步瓦解，其主要成员陆续投奔到蒋家门下。

(作者马维政，选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

许崇智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说起许崇智，如今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了。这除了他于1925年廖仲恺被害案发生不久在政坛上几乎销声匿迹之外，还因为蒋介石总是竭力要遏抑他。其实要研究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在前半部是少不了他的。且看他的经历：

辛亥革命光复福建之役，他是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军政府成立后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福建第一师师长，时年才24岁；

二次革命时是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任军务部长，后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副总司令；

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是粤军第二军军长、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建国粤军总司令；

国民党改组后，担任中央党部军事部长；

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创立时，是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还任广东省主席兼军事厅长，这年他也才38岁。

不难看出，许崇智是孙中山反袁、护法的主要军事辅臣，是国民党的军事首领，在建立和维护广东政权的几年中功勋卓著，在国民党历史、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军事史上，是名位显赫的大将。但是他于1925年9月竟然被他的参谋长、结拜把兄弟蒋介石逐离了广州，从此几乎默默无闻。此中原委，值得一说。

先得说说许崇智与蒋介石结拜把兄弟的事情。许与蒋原不相识，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先后流亡日本，在东京开始认识。那时蒋介石还是中华革命党普通一员，一言一行惟陈其美马首是瞻；而许崇智已是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部长，辅佐孙中山运筹武装讨袁于帷幄之中了。1916年5月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杀害，蒋顿失依恃，在办理了陈的丧葬事宜后，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此时许崇智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副总司令，驻节山东潍县。蒋往依许，凭他在日本留过学，办事又认真努力，迅速获得许的好感。经许推荐，于7月31日被任命为东北军参谋长。只不过因为袁世凯已死，蒋只当了13天参谋长，东北军即告结束，他们先后来到上海。许崇智仍任中华革命党总部军务部长职，辅翼孙中山赞划党务和军务，英姿勃发，倜傥不羁，在革命党人中堪称俊杰。经张静江之说合，张、许、蒋焚香换帖，结拜为把兄弟。不久，蒋介石又联同吴忠信再与许义结金兰。许与蒋同庚，且同月生，只是许比蒋大5天(许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十，即1887年10月26日，蒋是九月十五日生，即10月31日)，许居二，蒋居三。蒋口口声声称许为"二哥"，一时十分亲热。

1917年7月，许崇智随同孙中山南下开展护法运动。9月孙任海陆军大元帅，委许为大元帅府参军长，蒋为参军。但蒋滞留上海，不肯去广州。是年12月，孙中山以省防军20个营为基础建立粤军，陈炯明为总司令，许崇智先为第二支队司令，不久为第二军军长。蒋介石迟至次年3月才南下去粤，被任命为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参预拟订作战计划等。但是粤军将领中不少是陈炯明的亲信部属，具有浓厚的地域帮派观念，对于在粤军中没有一点根基的外乡人蒋介石十分冷漠，对他拟订的作战计划不放在眼里，对他来部队勘察阵地、检查军务等也不予礼待，有时还出言不逊，指桑骂槐，甚至以公开诋毁孙中山来侮辱蒋介石，使蒋十分难堪。蒋又是个好胜心强的人，不到半年即辞职去了上海。孙中山改任他为第二支队司令，在许崇智指挥下带兵作战。但他时时离职他去。据笔者精略计算，蒋介石自1918年3月至粤军任职，到1922年6月的4年多时间里，在职的实际时间加起来只1年半，以种种理由告假离职，滞居上海、宁波和奉化的时间几近3年。真正打了仗的，只是1918年末进攻永泰一役。他或是滞居上海，与张静江等人从事投机买卖，拜

黄金荣为师加入青帮，纳陈洁如为妾；或是在宁波等地游山玩水，葬母"守制"；或是闹着要出国留学。孙中山以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三番五次函电催促他来粤到职，甚至下达命令，许崇智亦不时劝诫，但蒋不是置之不理，便是借辞推脱，无可奈何之时到职一月半载，亦是携妾寓居，优游山水，履行职责不多。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深夜冲出枪林弹雨的包围，至白鹅潭楚豫舰避难，次日晨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指挥海军各舰讨伐叛逆。他电令入赣北伐的许崇智立即率部班师回粤镇压叛乱，同时于18日急电在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此时许崇智已率领粤军攻克赣州、吉安，正直指南昌，长驱北上。接孙电后立即掉头南下，但在韶关、翁源一带被陈炯明叛军所阻，苦战多日，弹尽援绝，被迫后撤。而赣州又被江西陈光远占领，只得退往瑞金。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冒险犯难，安顿了一番，于25日离开上海赴粤，29日登舰侍护，不过最艰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来到给予甚高赞誉，在后来为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作序时说他"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留下了良好印象。孙中山原来是期待许崇智等诸军回师广州镇压陈炯明叛军的，但许部陷于瑞金一时难以动弹，李烈钧等部亦难以近期回粤，孙中山在永丰舰难以久持，乃接受蒋介石的建言，于8月9日携蒋等人离粤经港赴沪。蒋介石在上海滞留一星期后，便去普陀山天福庵休憩了。

在瑞金的许崇智，于9月配合驻闽的王永泉混成旅，从建瓯和南平同时向福州突袭前进，一举驱逐了李厚基。10月13日，许崇智率部进入福州，占领福建，部队又扩充至2万余。正在上海沉痛回顾30余年奋斗历程的孙中山闻讯大喜，将北伐军改名讨贼军，委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所部编为3军12旅，以蒋介石为参谋长。但蒋介石此时颇为骄矜，稍不如意即擅自离职他去，孙中山多次催促、督责，11月19日电报中还告蒋"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成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至偾事"。

这年12月，孙中山策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和滇军杨希闵，组织西路讨贼军，击败陈炯明叛军，于1923年1月中旬攻占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于2月18日委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迭电催蒋来粤视事。但蒋此时对粤局信心不足，在上海又难以赚钱，心灰意懒，加之又闹眼病，不仅不想去粤，还几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

滇、桂军队进占广州后，军官忙于敛财，士兵到处滋事，军纪极端败坏。4月，沈鸿英又发动叛乱。孙中山电令许崇智回师广东，拱卫大元帅府。5月，许率部自潮梅向广州前进时，突遭叛军洪兆麟、林虎两部拦腰截击，在揭阳、兴宁一带仓卒应战，损失惨重。许崇智只身逃脱，于博罗收集残部，不足万人。在陈炯明军重重包围和不断进攻下，许无力迎战，只是紧闭城门固守待援。而于4月勉强来粤的蒋介石，7月又负气出走，辞离大本营参谋长职，经香港回上海、宁波去了。他向孙中山要求出国远游5至10年，孙严词指出，应在国内共同进行艰苦斗争。为照顾他的情绪，鼓励他好好工作。8月让他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达3月之久。这期间，许崇智仍在粤东苦战，直到11月始辗转到达广州，疲惫不堪。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参预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当时有不少人思想抵触，但慑于革命形势和孙中山的决断，只是暗中反对，公开默然。许崇智对孙中山的决策表示拥护，在发言中举起双手表示赞成。他曾说"孙先生这一决定，尽管他们表示冷淡，我还是拥护的。我是个军人，我举双手，就是表示态度坚决。"在这次隆重的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候补委员，接着在一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军事部长。其时孙中山整顿军队，将广东军队统一组编为建国粤军，辖4个军，特委许崇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

蒋介石自苏联回国后，写了个《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自己径回奉化老家去了。孙中山电蒋来粤报告使俄详情，蒋至1924年1月16日始离沪赴粤。他这时候情绪不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他连出席大会的代表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列名中央执监委员和中央党部负责人员了。一大决议建立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重视，对校长人选，先曾考虑许崇智和程潜，后经许推荐，于1月24日先派蒋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可是蒋不以为然，于2月21日给孙留了一封辞职信，就径自离穗赴沪了。孙中山于2月29日电令蒋回粤复职，严辞指出："辞职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抱怨孙轻视自己，说孙"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耳"，而"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如英士(即陈其美)与中正(即蒋介石自己)者，恐无其他之人矣"！他在信中还责怪孙中山"督责中正而欲强之回粤办学，窃恐先生亦未澡思其所以然也。"他还直截了当地说，他若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这期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一再函电催促他回粤，他则回信表白自己"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仗一时之奋兴"；"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也。

3月31日，许以兄弟情谊专程由上海至奉化，苦口婆心劝说蒋介石回粤，晓以办军校为党国造就军事骨干

之重要意义，还答允向孙举荐为粤军参谋长，以便“过问军事政治”。这样，蒋才在许的陪同下，于4月14日由沪赴粤，21日至广州。这时军校的筹备工作，在廖仲恺的主持下，已经就绪，并开始了招生工作，蒋乃于26日到黄埔视事。5月3日孙中山签署命令，正式任命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建国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这才开始忙于军校事宜。他向军校师生发表大量训话、讲演，强调军纪、军规，宣扬封建伦理观念，树立个人权威。他还把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曾国藩、胡林翼的文函，摘编成《曾胡用兵语录》，印发给军校师生人手一册，作为必读教材。他在军校重用亲信，排斥异己，为日后结成黄埔嫡系打下根基。

1925年初，盘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在粤东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广州，夺取广东政权。广州大本营决定出师东征讨伐。左路为滇军，中路为桂军，许崇智率粤军为右路，蒋介石带领黄埔军校两教导团亦加入右路，沿广九线进击。但是左路攻克博罗和龙门、中路占领飞鹅岭之后，即按兵不动、却步不前；右路成为东征主力，在许崇智及蒋介石指挥下奋勇东进。他们连战皆捷，2月14日克淡水，21日占平山，旋又攻克三多祝和海丰，在鲤湖附近击溃洪兆麟部李云复师，入普宁城后复占揭阳，控制了潮汕地区。3月在棉湖、河婆与林虎部激战获胜后进占五华，又在兴宁城粉碎了林虎部的抵抗，3月下旬光复梅县底定粤东。在东征中，许崇智对蒋介石倍加重用，军务多交蒋直接负责，又任其为潮汕督办之职。他还要粤军诸将领完全听从蒋的指挥和调遣，4月间他曾对诸将领说：“服从许总司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以后凡是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或蒋中正的印章，都一样有效。”

因为孙中山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广州大元帅府于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许崇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另4名为汪精卫、胡汉民、谭诞闿、林森)兼军事部长(另两个部的部长是胡汉民、廖仲恺，分别长外交部和财政部)，并为广东省(国民政府所属的唯一一个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权势至为显赫。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突遭刺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阴谋制造动乱，国民党中央为迅速控制局势，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并负责处理廖仲恺案。8月24日，蒋介石就广州卫戍司令职。9月5日，许崇智又被特授以监督广东境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全权。

在有关廖案的侦查中发现，案情牵连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令梁士锋等人，蒋介石立即下令拘捕，并派他的第一军(前身即黄埔军校教导团)将二梁所部包围缴械。此事使许十分难堪，不得不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作出引咎自责和负责追查的表示。这时，蒋介石对许说，粤军中很多将领牵涉廖案，粤军已不可靠，为安全计，改派黄埔学生负责许之警卫。许崇智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个与自己义结兰盟、倍加宠信的部属蒋介石，竟然要夺取自己的军权了。当他觉察到自己实际上已经遭到蒋介石的软禁时，立即电调许济(他的堂兄弟)、莫雄两师粤军精锐部队来广州维护自己的地位。但此时蒋介石抢先一步，于9月18日深夜派出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控制广州。19日，蒋在广东财政会议上又拘捕了一批许的亲信；并于当晚派黄埔学生军严密包围了许的住处东山公馆。深夜2时，蒋介石派人送了一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列数许的罪状：(一)回师广州后“百无一举”，致使“军队之散漫如故，饷糈之艰窘倍前”；(二)侵没税收和粤军饷额，“饱私囊图利己”；(三)图谋推倒中央银行“而谋自立银行以图私利”；(四)“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致使“害党叛国者均为”粤军所部，更“怂恿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而“害国殃民”。接着他吓唬许崇智：“今不惟诸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他要许“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3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信末尾他还信誓旦旦，说：“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厚土当共殛之”。许崇智眼看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还幻想3个月后能够回来，便于当天下午3时，在蒋介石派来的一支队伍“护送”下，怅然登轮离穗去沪。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由谭延闿署理，粤军总司令部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各部均被改编，许济、莫雄等师则被包围缴械。

许崇智离粤后，蒋介石取代了国民党军事首领的权位。他兴师再次征讨盘踞粤东的陈炯明叛军，自任东征军总指挥。由于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的团营连骨干许多都是共产党员)、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海陆丰等地工农民众的声援，第二次东征奏捷，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蒋介石俨然成为英雄豪杰，在1926年元旦广州30万民众的庆祝集会上，他身披拿破仑式斗蓬大衣登上主席台，接受群众的欢呼。接着他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概述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军事方面的其他成绩，着实炫耀了一番。在大会选举中，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仅比得全票的胡汉民少一票；在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中山舰事件”之后，又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早已把许崇智置于脑后了。而许崇智被逐到上海后，住在英租界一套豪华的花园洋房里，凭着蒋介石许诺他3个月复职的那封亲笔信，不断向蒋索取巨款。当时，邹鲁、张继、居正等人正谋划召开西山会议，拉许崇智

参加，许因为一心期望届时回粤，只是私下表示支持，没有公开露面活动。1926年3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许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8个军约10万人直指湘、鄂、赣、闽。北伐军未及半载，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北洋大军，继续向豫、皖、苏、浙挺进。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不敢去看望许崇智，因为一年半前亲笔许诺的“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已食言自肥而无法交代，但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于许手始终忐忑不安，曾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向许说情索取，许深知此信之重要，婉言拒绝。一次，张静江又登许门，接着报“蒋总司令到”，三“兄弟”再次聚首。蒋介石执立正敬礼之军礼甚恭，仍称许为“总司令”，说了一番好听话，并对往事表示抱歉。他看许并不动怒，便要求把那封信还给他。许托言已经遗失，依然加以拒绝。蒋无可奈何，悻悻而退。

这年7月，在武汉的汪精卫也接着“分共”，但胁迫蒋介石必须下野。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顿即活跃起来，许崇智于8月初派代表去武汉，同汪精卫商谈合作事宜。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9月上旬，汪精卫来上海，同许崇智及张继等人直接会谈，谋议合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体，以实现三派真正团结的办法。11日，许出席了三方中委的谈话会，赞成孙科建议的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的办法。谈话会决定三方共推32人组成，许被上海方面举为特委会委员。但这个特别委员会既没有满足汪精卫当领袖的欲望，又把蒋介石排挤在外，不久便呜呼哀哉。许崇智也没有怎么去南京活动。

蒋介石于8月下野回乡不久，便去日本游历一转，得到美国、日本的支持，回国后在汪精卫等各方支持下复职，重任总司令职，接着又在二届四中全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但是他没有让许崇智再出任军政要职的丝毫表示。许满腹怨恨，一再扬言要揭蒋当年在广州的“逼宫”阴谋。同时将蒋介石的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以防不测。蒋介石心虚，请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斡旋，后给许以出洋考察名义，并给旅费30万元。1928年初，许与邹鲁等人同行，到欧美各国“考察党务军务”。他在檀香山、纽约、芝加哥、柏林、巴黎、伦郭等地，以国民党元老的姿态多次发表演说，时有非议蒋介石的言辞。蒋介石虽然怏怏不乐，但终究不敢开罪于他，在这年10月以五院组成国民政府时，给许崇智以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之名义，而自己则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许不以为然，不肯去南京视事，只是每月收取薪金。

蒋介石“统一”了全国，掌握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权后，反蒋各派常常策动、争取许崇智出台反蒋，许也跃跃欲试，以泄心中之愤。1929年冬唐生智起兵反蒋，许崇智于12月6日通电蒋介石，劝他“引咎自劾”，“洁身以安国”。蒋介石恼怒异常，于12月20日以许“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的罪名加以通缉，把他的监察院副院长名义也撤掉了。第二年阎锡山、冯玉祥联袂反蒋，爆发了祸害中原千里的蒋冯阎大战，汪精卫联合反蒋各派，在北平乘势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许崇智被列名为七名常务委员之一。后因蒋介石战胜了冯、阎，“扩大会议”也就随之散去。1931年2月，蒋介石指责胡汉民“勾结汝为(即许崇智)，运动军队，包庇陈温(陈群、温建刚)。反对约法，破坏约法”，于28日夜晚将胡软禁于汤山。反蒋各派及粤桂军政首领群集广州，于5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另立“国民政府”，许崇智被迎去广州，是“非常会议”的当然委员，并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共16名)和军事委员会常委(还有3名是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许表示他可以去福建发动民军来归粤桂，拿到了20万元活动经费。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严重，宁粤双方被迫言和。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下再次下野；许崇智则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重新被任命为监察院副院长，当然仍是徒具虚名。

1932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新上台后，指使杜月笙等人多加“关照”许崇智。杜领会蒋的意图，资助许做投机买卖，倒卖棉纱牟取暴利，同时以酒色宴乐消磨他的的意志。

“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沦陷。许崇智寓居租界孤岛，苟安一时。蒋介石担心许落入日伪之手与已不利，派人给许送去5万元敦促他早日离沪。许因负债累累，未即成行；俟得蒋再汇给10万元，始于1939年夏末离沪赴港。这时汪精卫已叛国降日，正在筹划组建伪政府，欲拉许下山合污，许以高位，许不为所动，严辞拒绝，并明确声称将赴重庆团结抗日。他于次年冬天在杜月笙陪同下飞渝，但是没有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厚待，仍是个挂名监察院副院长的虚位。许过不惯山城的生活，不愿留在重庆当蒋介石的摆设，不过半个月又返回香港寓居。他与杜月笙等人合伙开了一家同德盐公司做买卖，并继续得到蒋介石的接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即占领香港。许崇智不得脱身，避居于一私人佛堂，乔装成修行的和尚。但是不久即被附敌分子告密，遭日本宪兵拘捕，被禁于香港大酒店。驻港日军少将酒井想要笼络许崇智，3个月后将其释放。不久，出任驻港总督的矶谷廉介突然登门造访，原来他是许崇智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矶谷大叙同窗情谊，还帮助许开办宏丰公司赚钱；但他的真意是要许为“大东亚共存共荣”效力，出任汪伪南京政府要职。许坚决拒绝去南京，拍案大骂：“以前是同

学，现在是敌人，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矶谷撕去伪装，把许禁闭在香港饭店，威胁利诱不止，还要许在阳台上与对街的家人见上一面以示永诀，以此来威吓他。但许不为所动。1944年美国空军轰炸香港，矶谷调离香港，许崇智得以释出，转移到澳门寓居。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许崇智于这年年底从澳门经广州回到上海。第二年5月，他应邀到南京参加“还都大典”，蒋介石只安排他一个国民政府资政的闲职，连1942年被撤销的监察院副院长的名义也不予恢复。许崇智大失所望，但已无可奈何。他回到上海后，联络居正、吴铁城、戴季陶、吴稚晖、陈仪等人，合资开办了一家成功贸易公司，设总公司于台北，专门从事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商业贸易。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参与其事，营业之兴盛自不待言。这年秋天，他迁居香港。

蒋介石赴台后，于1950年3月复任“总统”职，还聘许崇智为“总统府资政”。许不愿去台湾，仍居香港。这时他想在香港组建一个“第三路线”的政党，网罗寓居在香港和海外的各界名人隐士。便草拟组织章程，四出联络，希望大家拥戴他这个国民党元老做这个组织的首领。他还写信给当年的“大哥”吴忠信，要吴转请蒋介石对他搞“第三路线”予以支持，希望吴带笔钱来接济大家，也代表蒋介石来给大家打打气。只因为这个名为“第三路线”实是反对新中国的组织得不到什么人的赞同和支持，便胎死腹中，无声息了。

82岁的许崇智，于1965年1月25日病逝于香港，蒋介石只发了一个唁电。

（颜平）

历　史　考　证

朱德赴苏留学考

根据目前已见的有关朱德的传记资料，人们几乎无法了解朱德早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情况。史沫特莱根据朱德回忆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朱德年谱》中，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问题也只有寥寥几句话。笔者偶然在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查到了一些有关朱德从德国前往苏联学习的资料，现简单介绍如下，希望能够对读者了解朱德早年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有所帮助。

朱德为什么去苏联？

早在1924年秋天前朱德就提出了去苏联学习的愿望，但由于朱德当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执行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一时没有可能得到中共留德组（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为中共留法德组，旋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批准，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学习。朱德之所以突然被批准去苏联，严格地说，并不是他的学习要求得到批准，而他个人的去留也并非因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员会批准”。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促成了他的苏联之行。

其一，自国共合作以来，中共中央经常感到国内干部力量的严重不足，因此曾多次要求中共旅莫支部和旅欧支部选送在国外学习的党团员回国工作。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此时中共中央更加意识到人才之缺乏，因而接连致信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要求立即从西欧派遣50人，并将在莫斯科的所有没有问题的党团员，全部派回国来。旅莫支部担任训练组织工作的袁庆云曾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在上海事变发生以来，中央命令由西欧派遣五十人及莫斯科全部开拔回国工作，我们接到此命令便把不成问题同志六十人派遣回国，其余有正式工作或有病者尚留此间。”当时关于旅欧支部的人员调动，旅莫支部也专门发出信函并提出应该派遣回国的50人名单，要求旅欧支部迅速落实。旅欧支部接到旅莫支部的来信之后，立即于6月间召开会议，决定派60人回国。显然，朱德之所以能够去苏联，并不是旅欧支部同意他去苏联学习。

其二，朱德之所以能够去苏联，又纯粹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第一，根据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萧朴生的介绍，可以清楚地了解。朱德的名字最初并不在旅莫支部提出的回国人员名单上，而且因旅莫支部的来信未说明这是中央的命令，加上“当时旅欧团体实在不满意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提出的名单中又有许多是已经退党退团的，甚至搞错了名字的，以致使旅欧支部发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旅欧支部没有接受旅莫支部的名单，而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决定了派遣回国的人员名单，这其中就有朱德。萧朴生明确说：“朱（德）、贺（治华）之决定，是由旅欧（支部）决定的。第二，朱德之所以会被选中回国，自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工作不再重要了，而是因为朱德在6月18日德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声援中国上海“五卅”运动的集会上被捕，两天后虽被释放，却被吊销了护照，难以再在德国继续工作。因此在6月下旬旅欧支部第一次具体讨论欧洲回国人员人选时，上了旅欧支部第一批回国人员的

名单。

朱德怎样留在苏联？

既然朱德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从欧洲转道苏联回国工作的第一批旅欧支部的成员，那么为什么在到达莫斯科之后又留在苏联学习了呢？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巧合。

第一批旅欧党团员于7月到达莫斯科后，即在旅莫支部的安排下休整、参观，等待第二批留俄回国人员的到来，准备一同回国，但不料"随西欧同志来到，中央命令其余留俄不忙回国"，结果待8月上旬和8月中旬后两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后，这批人员究竟如何安排一时竟成了问题。

还在8月上旬，当第二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之后，留欧回国人员已经在旅莫支部的参预下，组织了党和团两个执行委员会对归国人员进行管理。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刘伯坚、武胡景和穆清等参加执委工作，朱德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党的六个小组中的第六小组组长。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德国来到莫斯科，旅莫支部决定对其开展宣传影响工作。朱德因在德国与邓演达曾有过工作关系，也接受了这方面的任务。从档案记载看，旅莫支部的这一工作安排是这样的："(刘)伯坚与他谈唯物史观，朱德谈旅莫团体精神及来莫后感想，(武)胡景与他谈阶级斗争，家辰解释俄国现状，穆清、(周)唯真、林蔚亦乘机宣传并给他一份上海事变提纲"。

当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朱德等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是"武装训练"。实际上，这就是旅莫支部提议，并得到苏联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留苏学生的暑期野营活动。这种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暑期野营活动，是苏联学生，包括中国留苏学生暑期的一种固定的安排。但对于朱德等人来说，这种短时间的训练，则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旅莫支部安排的这一训练，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对这些回国人员进行各方面能力考察的内容。

8月中旬，萧朴生带第三批人员到达莫斯科。此时到达莫斯科的计划回国的旅欧党团员，连同萧朴生已经达到61人。考虑到多数人一时不必争于回国，并且许多人还需进一步进行有关的学习与训练，因此，鉴于暑期即将结束，旅莫支部正式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一个一年期的学习班，并由军事学校教员开办一个实际工作短训班，以便培训从西欧来莫的这批人员。

同时，考虑到这三批来莫人员，各方面情况相差较大，有些岁数较大，有相当一些不大识字，也有一些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因此，旅莫支部对这61个人根据个人情况作了安排，有的回国，有的去东方大学，有的则进行短期的实际工作的培训。朱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旅莫支部决定留在苏联学习的。

朱德是在东方大学学习吗？

关于朱德等人的去留问题，是在1925年9月4日旅莫支部的党部会议上正式决定的。这次会议的议事日程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会上袁庆云代表旅莫支部解释了对于欧洲回国同志下一步去留问题的安排和考虑。他说：对于西欧来的同志，旅莫支部经过与共产国际协商，决定采取三种办法。"1.送一批人回国，有作用的人或年龄较大者；2.留一批人往东大，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3.留一批人学一短时期者，这些同志在俄经过短时期的训练有进步，但有两种缺点：一组织能力欠缺，二不知道作秘密工作。留短时期的同志可派到工会或其他组织学习，在短时期可以学习军事操及秘密工作。"

对于61人的安排，名单公布是这样的：

一、回国者(分为两部分)

派回国工作者：孙炳文　陈发兰　帅本立　史光庆　萧朴生　熊季光　曹鲁东

由红色救济会送回国者：白立贵　郭成昌

二、留东方大学者：

霍家新　陈声煜　王成荣　田悬甫　金百溶　熊正心　徐寿松　王学步　徐有富　阚尊民　李畅英　向培嘉　彭鸿章　彭　御　贺治华　杨载鲲　潘锡光　雷定琨　林修杰　资道琨　张贵源　刘傅铎

三、学习实际(秘密)工作者：

邱少元　朱　德　唐兆尼　武兆镐　房师亮　彭仲英　宋得里　杜基祥　王德林　李为栋　贺学礼　秦治鸮　谢陈常　卢政纲　周唯真　林　蔚　魏裔真　颜克玲　丁宝珍　沙居光　王佩璜　欧阳钦　钟汝梅　南炬焜　左纪常　焦　海　郑家康　徐增生　奚佐尧、蔡疾呼

通过上面公布的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派回国者有9人，其中除两人因岁数较大外，萧朴生、孙炳文等7人被认为工作能力较强，回国后在工作上"有作用的人"。留东方大学学习为22人，这些人在旅莫支部看来是属于，"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朱德是被安排在第三部分人当中的。这一部分有30人，是被认为经过短时期训练有进步，但在组织工作及秘密工作方面尚有不足者。这些人的任务，是留在苏联一短时期，专门学习军事及秘密工作的方法，而不是有的著述所说的被安排到东方大学，"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

关于朱德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的情况，《朱德年谱》一方面说朱德于1925年下半年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几个月"，一方面又说朱德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六七个月"，这显然是有误。朱德等人自9月下旬正式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到第二年5月初决定回国，前后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自然只能是在实际

工作训练班中学习，而不可能再去上几个月的东方大学。

（作者：杨奎松）

孙中山一生的任职

孙中山先生自1894年夏上书李鸿章以图改良政治的努力失败而走上革命道路，至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不幸病逝，凡30余年，其间曾先后任革命政党、团体，国家政府、军队诸领导10余职，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

1. 兴中会任职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召集反清爱国华侨20余人，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但当其成立之初孙中山并未任职。稽诸台北《革命文献·兴中会革命史料》及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等书，可知孙中山主持了成立仪式，会议还通过了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然会议公推刘祥（火奴鲁鲁永和泰商号司理）及何宽（火奴鲁鲁卑涉银行华人经理，成立会议即在其寓所举行）为正副主席。只是到翌年初兴中会总会于香港成立后，才"众议推定总理驻广州担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等佐之，以图在广州大举。

2. 中国同盟会总理

在各地革命团体纷纷建立的基础上，为了统一组织，扩大影响，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孙中山主持了会议，会议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以东京为该会本部。会议公推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分执行、司法、评议3部，黄兴为执行部庶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1912年3月初，即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会员大会，再举孙中山为总理。

3.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从同盟会建立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几年中，孙中山主要是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接到国内敦促他回国的电报后即离开法国，于1911年12月25日抵沪。享有崇高声望的孙中山归来，使南京、武汉间为建立临时政府及产生政府要员名额存在的尖锐争论暂时平息下去。26日同盟会即召开最高干部会议，决定推孙中山为大总统人选。29日孙被南京17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遂通电就职。1912年1月1日他离沪赴宁，于当晚10时在南京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为民国建元之始。由于袁世凯玩弄权术及来自各方的压力，也由于孙中山本人于革命急于求成的心理，他任职后就许诺"虚位待袁"，企望藉袁世凯之力控制时局，推翻清廷。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4月1日，孙向临时参议院正式辞去大总统职，在职仅3个月。

4. 国民党理事长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主要负责人宋教仁以本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官僚政客集团正式成立国民党，于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作了演讲，并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孙中山解大总统职后潜心于实业建设，已不热衷政治。不久，孙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5. 全国铁路督办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目标既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故力倡大兴实业，尤致力于铁路交通之规划建设，并为此北上巡视各地，又在京与袁世凯晤谈10余次，似甚投机，袁则利用孙中山表示不问政治，1912年9月9日正式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欣然从命。他还担任了北京政府交通部所属之全国铁路协会名誉会长。

6. 中华革命党总理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鉴于革命党人队伍涣散、思想纷杂，他决定重新组党，继续未竟之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于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300余人，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孙中山在会上即宣誓任职，并规定党的宗旨在于"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入党必须立誓、打手印。9月初又发表宣言解散国民党。

7. 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袁逆毙亡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权，毁《临时约法》，拒开国会。1917年7月初，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等乘军舰离沪赴穗，号召护法，又电邀各地国会议员脱离段氏政府，南下共谋护法大业。至8月中旬，各地抵粤议员达130多人，但召开正式国会尚不足法定人数，为迅速

组建护法政权，在孙中山推动下，议员们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非常会议在8月25日至9月初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9月1日孙宣誓就职，于广州黄埔公园举行受印礼，揭起护法斗争旗帜。但是由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以“护法”为名，行扩张争权之实，对孙中山的护法行动百般掣肘，甚至胁迫孙去职。无奈，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并开始醒悟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8. 中国国民党总理

护法斗争失败后，孙中山一度陷于苦闷的悲凉心境，闭门谢客，著书立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十月革命影响给孙中山以新希望，他决心顺乎时代要求，继续斗争。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冠以“中国”以区别于民元的国民党），重申三民主义政纲，亲任总理，下设总务、党务及财政三部，以期继续领导民主革命。

9. 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1920年秋，陈炯明率粤军击败并驱走滇桂军阀。在广东各界的热诚邀请下，孙中山于11月底从上海回到广州，力主平定西南、巩固国基，首先“必须建立正式政府”，要求国会认真商讨他的意见。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撤销原军政府。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再揭护法旗帜，并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这也是继1917年9月建立护法军政府后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10.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第二次护法斗争因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而告失败，孙中山痛心疾首，被迫离粤避难来沪。1923年初，许崇智、杨希闵等率讨贼军逐陈炯明出广州，孙中山得于2月21日再返广州，为奠定北伐基地，他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被推为陆海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正式成立，由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等分任财政、外交、内务等部部长，下辖军队约7万人及军舰数十艘。

11. 从中国国民党“一大”到黄埔军校建立

孙中山重建广州政权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积极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大会最后决定在保留“总理”名义下，中央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大会闭幕后，孙中山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中央组织机构及各部人选。从此孙中山“以俄为师”，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珠江口黄埔岛上创设了黄埔军官学校，并亲兼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从此，民主革命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崭新历史篇章。

（摘自《民国春秋》）

施从滨是被枪杀的吗

在1925年爆发的浙（孙传芳）奉战争中，山东军务帮办、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一线迎击孙传芳的直军，结果兵败被俘，遭到杀害。对于他是怎样被杀的这一情节，许多史料都语焉不详，只提“被枪杀”；中华书局《民国人物传·孙传芳》文中，则说是“把施处决”。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时，也都依此，说是把施从滨“枪毙”了。

实际上，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的。关于这件事，久居蚌埠的老人多是知道的。蚌埠市第十一中学退休教师仲灵生先生曾亲眼目睹施被杀的过程，他说：“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火车站南边的乱茔地玩，突然看见从东边开过来一辆铁甲车，我们赶忙趴下来，躲在坟头后边偷看。铁甲车‘咣哨’一声停下来，只见铁甲车屁股后面的铁门打开，跳下几个当兵的，有端着枪的，有拿大刀片的，凶恶的站在铁道两旁。跟着，走下来一个胖子，光头，身穿一件黄布衬衫，脚上穿一双马靴，身上被五花大绑着。他仰起脸，看看天空，这时，这一个军官走近他身旁叽咕了几句话，被绑着的人跨过铁轨向西边一条水沟走去。当他走到沟坎上时，背后一个拿大刀的士兵猛然一脚，把他踢倒跪在地上，那士兵抢起大刀片砍下去，我们吓得赶忙捂起脸……

“过了几天，就听大人们传说，张宗昌的一个师长在老坟地被砍了，收尸的人只收到尸身而头已不见了。

“又过了多少年，有人到西边沟里挖土（水已枯），忽然挖出来一个死人头骷髅，嘴里还有两颗金牙。老人们说，这可能就是那个姓施的师长的头。”

（侯鸿绪）

风云人物

顾正红

顾正红(1905－1925)江苏阜宁人。1921年到上海，翌年进日商内外棉九厂做工。后因痛打工头，被厂方开除。旋进内外棉七厂当工人。1924年加入沪西工友俱乐部。1925年2月，积极参加了上海内外棉厂的同盟罢工，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中旬，日本资本家公然撕毁二月罢工时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以停工关厂威胁工人。15日，他带领工人进厂交涉，竟遭日本资本家枪杀。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伟大的“五卅”运动。

邓发

邓　发(1906－1946)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家境贫苦。1917年夏就读于东明小学。1921年因生活所迫到上海和香港做工，当过勤杂、茶房、杂工、厨工、海员。在香港结识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在其影响下参加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1922年参加香港大罢工。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和宣传队小队长。1925年9、10月间，由苏兆征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支部组织干事。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州起义，并参加工人赤卫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任五区副指挥，起义失败后，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兼任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和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1925年任广州市委书记，香港市委书记。辗转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筹划工人运动，成为著名的香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1930年春，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4月，受省委委托去海南岛与冯白驹一起主持召开全琼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和建立了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为琼崖地区革命的重新发展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1930年秋，在香港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

1930年9月，在上海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1年7月，调入中央根据地，在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工作，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为保卫党中央作了大量工作，但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仍负责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

1936年6月，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937年在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曾到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程。1937年9月回国，1938年起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领导和组建各界抗日群众团体，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推动抗日工作。对新疆军阀盛世才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影响。1939年秋，返回延安。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整风运动中，党校进行改组，毛泽东任校长，邓发任副校长。还先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40年起主持《中国工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对解放区职工运动的发展和在经济上支持长期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去巴黎参加世界职工大会，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访问了英国、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国。1946年1月回国。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机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悼文中说：“邓发，你是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领袖。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

肖楚女

肖楚女(1893－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肖楚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秘；曾用过丑女、抽玉、丑侣、初遇等笔名。湖北黄陂人，生于汉阳。10岁丧父，在穷苦亲戚的帮助下，读了一年多私塾；12岁时当学徒。13岁以后，离开家乡，在鄂、苏、皖、浙等沿江城市过流浪生活。当过杂货店的学徒、轮船上的杂工，也在茶馆里当过“跑堂”，还干过报童、小贩、司书等苦差事。他的知识和学问，就是在与旧社会的奋斗中，靠自学得来的。

1911年，肖楚女参加了湖北新军。10月，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离开新军，考入武昌新民实业学校学习农桑，企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毕业后，曾在黄安县七里坪一个朋友家里自学了一段时间。

1914年，肖楚女由黄安返回武汉，和刘泥清等一起创办了《崇德报》，后来还在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当过编辑。1919年，在武汉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9月，到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和恽代英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加入恽代英等组织的进步团体——利群书社。1921年，又参加了"共存社"。同年底，到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任教。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秋，肖楚女到四川工作，先后在重庆联合中学、重庆公学、万县四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3年秋，经陈毅推荐到《新蜀报》任主笔。1924年1月，因奔母丧回到汉阳，旋到襄阳二师任教。1924年秋，党中央派肖楚女任中共中央四川特派员。到四川后，他仍在《新蜀报》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职。10月，他和杨暗公领导成立了"四川平民学社"，作为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公开组织。11月，领导了轰动全川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1925年初，又发动和领导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1925年5月，肖楚女被调到上海，参加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和恽代英一起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五卅运动时，他除写了大量文章，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外，还曾到南京、苏州等地为运动募集经费。8月，他又被团中央派到河南，协助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王若飞工作，创办并主编了《中州评论》。不久，又调回上海。

当戴季陶抛出《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中国共产党时，肖楚女于1925年8月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但是，该文既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又遭到党内的责难。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为此还给了肖楚女以留党察看的处分。1925年10月，他还发表了《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的著名文章，对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进行猛烈的攻击。

1926年1月，肖楚女和恽代英、茅盾等作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肖楚女应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毛泽东邀请，任中宣部干事，协助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同时，还担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讲授《十九世纪社会思想史》。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肖楚女被聘请为专任教员(即教务主任)，具体负责农讲所的教学工作，并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课程。他还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五十二种。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参加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在国民党中央举办的政治讲习班讲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等课程；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主办的劳动学院里，讲授《中国政治状况》等课程。

1926年9月，农讲所学员毕业后，肖楚女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政治教官，主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12月，又被聘请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政治顾问。1927年3月，因肺病入广州东山医院治疗。4月15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和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追随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他们派遣暴徒到东山医院，将重病在床的肖楚女用乱棒活活打死。

材料　肖楚女：不灭的生命之光

三进三出《新蜀报》

1922年，肖楚女受党的委派到重庆，先后执教于重庆联合中学、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重庆第二女子师范。他一边教书，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当时重庆各校师生为反抗军阀撤换思想进步的学校负责人掀起了大学潮，肖楚女参加并领导了这场斗争。他与一批进步学者一起创办了"重庆大学"，吸收200多名被反动当局开除的学生就读。他引导学生学习革命理论，深入社会，参加革命斗争。肖楚女又受聘为《新蜀报》主笔，辟"社会黑幕"专栏，抨击邪恶，张扬正气，并主办"社会青年问答"专栏，宣传革命，启迪新知。该报每期社论、时评多出其手。肖楚女的文辞严谨、周密、深刻、流畅，"字挟风雷，声成金石"，富有进步性、革命性和战斗力、号召力。因其口诛笔伐，向敌人发起强大的攻势，而为反动当局所嫉恨，曾两次被迫退出《新蜀报》。但是，肖楚女的思想代表了进步，他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救国救民的方法，已经被广大读者接受，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已经逐渐在读者中燃烧、蔓延。广大读者强烈要求当局把肖楚女接回《新蜀报》。就这样，他两次被辞退，两次被接收。其三进三出《新蜀报》也就传为当时报坛的佳话。

一封感人至深的回信

1924年，肖楚女曾执教于襄阳省立二师。当时，湖北老河口市学员程钦因带头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他思想极度苦闷，致信肖楚女，陈述自己染上了一些恶习惯，"一直是整日的向堕落方向走"，表示想逃避现实生活、"退隐"山乡，过"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肖楚女见信后，公开作复，教育他及其有类似心态的人勇敢地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指出：方今中国，民众的沉闷，已达极点，正待有志青年到民间去，唤醒那占中国民族

80%多的农民。信中有这样一段哲理性很强的文字，即使是现在的人读起来，也依旧感人至深，回味无穷，不乏启发和教育意义：

“真正的君子，不是怕犯罪而避开罪恶的人，乃是当着罪恶中而不犯罪的人。‘人’的意义，更不是消极做个好人所能显得出来的：是要在积极方面，不但做个好人，而且去做个奋斗的好人……。不要学那愚笨的鸵鸟，以不见敌为安全而去回避现实”。“所谓做个好人，也并不是仅仅孤芳自赏、洁身自好……。‘人格’两字，是在社会中和他人相对峙而见意义的。譬如你若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首阳山中，朝对风云，暮听寒蛩，你纵然是个白玉无瑕的孔子，那所谓人格又有什么意义？”肖楚女大声忠告：“朋友，你要磨炼你的人格，使你的人格高尚，只有在社会的奋斗生活中去获得！”

在肖楚女的恳切教诲下，程钦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走上了革命道路。

批判戴季陶主义的第一人

1925 年 5 月，肖楚女调上海协助恽代英领导共青团中央工作并共同主编《中国青年》，同 时兼任上海大学讲师。“五卅”运动爆发，肖在《中国青年》、《人权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宣传“五卅”运动意义，并为运动募集经费。当时，被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吓坏了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公开跳出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和群众的革命斗争。8 月，肖楚女调河南洛阳，协助王若飞领导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工作并创办、主编《中洲评论》，先后于该刊及《中国青年》上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戴季陶拥护掠夺弱小民族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人口问题》和《介绍正统派与戴季陶看》等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戴季陶的论调。他说：“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必然的事实”，中国也不能违背这一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眼前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试问你戴先生，难道国民党不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要去宣传组织工农群众，难道共产党照着国民党党纲做还犯了法吗？”他还旗帜鲜明地说明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的必要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维护了国共合作，被誉为中共批判戴季陶主义的第一人。

肖楚女常说：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一个人从生以后一直到死，都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正大光明的事，虽然肉体死去，而精神是不灭的。1927 年 3 月，肖楚女因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工作过度劳累而患肺病住进医院。4 月 5 日，广东军阀发动反革命政变，一群如狼似虎的反动派把肖楚女从病床上拖走，蒋介石电令“处极刑”。肖楚女在敌人的魔掌里英勇不屈，最后惨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年仅 34 岁。肖楚女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首悲壮的凯歌，他的一生犹如点燃的蜡烛，燃尽了自己。然而他那不灭的生命之光，却永远照耀着为探求真理而奋斗的人们！

（作者漫丽，选自《党史月刊》）

廖仲恺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笔名“屠富”、“渊实”，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鸭仔步村人。他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孙中山的战友。

其父亲廖竹宾是归善客家人，早年赴美国，当华工，后来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廖仲恺 1877 年 4 月 23 日（清光绪三年三月初十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至 1893 年十六岁时，陪同母亲回到祖国。

廖仲恺回国后，原准备应科举考试，入家乡私塾，从梁缉椴研读经史策论。1895 年中日甲午战后，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展开，他受到影响，遂放弃中国旧学，于 1896 年转赴香港，攻读英语，作为学习西方以救中国的手段。

1897 年 10 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 年秋，廖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廖仲恺在东京期间，结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 年 9 月，孙中山从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往中山寓所访问，聆听孙中山革命言论，极为钦服，从此，对中山发生了信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04 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天津联络革命志士，筹设机关，进行秘密活动。1905 年 9 月 1 日，经何香凝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为配合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在 1905 年 11 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他以“屠富”的笔名，翻译了亨利 · 乔治（(Henry · George)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同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8 至 1909 年初，奉孙中山指派，又先后潜回天津及吉林，从事发展革命势力的活动。

1909 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返回广州。这时，他想借取得清政府功名的办法，“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之工作”，便于同年偕同友人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之后，被清廷派赴东北，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等工作。

1921 年，孙中山回粤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用全力整

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陈囚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于8月19日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

1922年8月，苏俄派代表越飞来华，越飞的代表与孙中山就“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会谈。为进一步商讨联俄、联共等问题，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9月与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东京，继续进行详细会谈，为后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做好准备。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宣言签订后，廖仲恺又奉派与越飞再次会谈，以便把联合宣言具体化。会谈是在日本温泉地伊豆山海岸“热海饭店”进行的。这次会谈，是廖仲恺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他和越飞，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他在每次谈判后，“都是满面笑容，表示出很得意的样子”。正是通过同苏俄代表的相处恳谈，他得到了不少革命知识，如对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的各项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开始明确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竭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主张。

1923年春，叛军陈炯明败退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廖仲恺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这年10月，他受孙中山委托和李大钊等五人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从事改订党章等工作。同月下旬，按照孙中山要求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商讨改组问题。后又和许崇清等九人接受委派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及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分别召开党务会议，讨论筹备改组等问题。11月底，他奉命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组织成立了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工作。

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经廖仲恺的积极参与筹划，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于1923年年底完成。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廖仲恺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指出：“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乱源不能廓清，其故既〔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清。现在我们已有了宣言，目标算是已定。”“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倒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前进之标准，努力前进！”

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政党。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张继等公开反对孙中山改组的主张，抗拒三大政策，使用一切手法进行阻挠和破坏。廖仲恺站在孙中山一边，同右派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毫不妥协和动摇，宣称：“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他针对以“稳健”自称的国民党右派说：“实在他们口中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并提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除继续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国民党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地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无产阶级的好朋友”。他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服膺到底，并对其作了一些具体的阐述。

廖仲恺到这时期，对帝国主义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中国内部纷争不已和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他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全国人的公敌”。“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资本主义者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者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还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提出废除租界、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认为“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人民族之耻辱”，主张租界“应由中国收回管理”，“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1924年秋，当英帝国主义代理人陈廉伯发动商团暴乱时，他主张彻究严办，随后他担任镇压暴乱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平息事变，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廖仲恺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早在1923年10月，当他参与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时，就遵照孙中山的意图，把筹办军官学校列为当时最重要的议决案之一。1924年2月，他担任军校筹委会代委员长，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人力、物质等各种困难，使筹建工作顺利完成。同年5月，他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积极地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他讲建立革命军队之目的是“以武力为民众的保障，进而为民众全有的武力”。

他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俄国解决了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歌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他亲切地接待苏俄派来帮助中国革命工作的友人，诚恳地和他们共事。使苏俄友人们也都把廖仲恺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

他又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排除了右

派顽固势力的种种破坏，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起死复兴的“一个新生命”，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各单位中公开活动，并真诚地和他们维系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期间，凡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都虚心听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且本着与共产党热诚合作的精神，把领导工会的事情都交给工人部秘书、中共党员冯菊坡处理。

他在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上，也是认真的。他认识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他以工人部长兼农民部长的身份，深入群众，积极地赞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维护工农利益。1924年3月，他主持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广东工人国民党党员大会，作了鼓励推进工人运动的演说；5月，又主持了广东各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广州全市工人代表会开幕式；7月，他赞助广州工人团体筹组工团军的工作，于8月下旬开始训练第一期工团军。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中，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他为几十万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封闭烟赌馆作为工人住宿之所，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并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支援罢工工人。他也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因而主张：“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他曾经到中山、东海等县农村去访问农民，支持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告诉农民说：“如果农民想获得解放，必须同工人齐心合力奋斗。”

廖仲恺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从他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上说，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自然是有差别的。尽管从个别论点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错误，但他是真实的革命者，其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前进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地肩负起孙中山未竟事业的责任，忠实地执行其遗言，更积极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斗争。是年3月，他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争，在东江前线上亲自鼓舞将士奋勇杀敌。6月，又参加了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给了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讲述廖仲恺当时的活动情况说：“我们又亲目看见：为了东江战争，每天作十几点钟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杨刘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单独一个人还要由黄埔回到广州去办事。”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庭赞扬廖仲恺为革命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曾感叹地说：像“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正由于廖仲恺不屈不挠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战斗，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他极端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国民党右派所指使的暴徒的暗杀，为民主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廖仲恺牺牲后，遗体于同年9月1日安葬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左则，1935年9月1日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孙传芳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1904年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由练兵处以直隶官费生送往日本留学。1908年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孙留日期间曾混迹同盟会。1909年初由日回国，经陆军部考试，名列上等。11月13日陆军部奉清廷上谕赏给孙传芳“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发往北洋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步队第五标教官。民国以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驻防湖北，他又历充该师辎重第二营营长、步兵第六团团长、步兵第三旅旅长等职，深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赏识。1917年升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起，王占元拘留皖系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8月，以孙传芳代替吴职。1921年8月，“湘鄂战争”中，王占元兵败逃离湖北，28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继王兼第二师师长。时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孙遂转依吴佩孚。

1922年5月，以英、日帝国主义对华争夺为背景的直奉战争发生，直系迅即取得胜利。奉系失败后，退守山海关外。直系曹锟、吴佩孚为了赶走安福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垄断北京政权，并对抗南方护法政府，阴谋策划抬出黎元洪充当傀儡总统，并准备恢复“民六”旧国会，演了一出所谓“法统重光”的丑剧。孙传芳在这幕丑剧中充当了曹、吴的急先锋。5月15日，他领先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电文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即复，异帜可销。”28日，再次发出劝告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应同时下野的通电。6月2日，徐世昌被迫卸任，11日黎元洪被捧了出来。这是孙传芳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从此，他逐步成为曹、吴集团中的一员要将。为了夺取福建地盘，孙奉命于1923年1月率部从湖北，经江西入闽，3月20日，北京政府任孙为福建军务督理。

孙任军务督理之前，福建政局与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与奉、皖两系的结合）的形势密切联系着。在1922年5

月以后到1923年3月以前，福建境内成为皖系军人、孙中山的北伐军与直系策动的陈炯明部队错综复杂的斗争场所。孙传芳率部入闽后，经营一年，到1924年春，才把接近皖系的王永泉与臧致平部赶走。王永泉逃沪，将所部交旅长杨化昭。臧、杨部入浙江境内，接受皖系卢永祥的委任。浙卢收编臧、杨，成为直系齐燮元进攻浙江的借口。同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又打起来。孙传芳奉曹锟的命令，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当苏、浙两军在黄渡前线对峙时，孙传芳军突然越仙霞岭，占领衢州，使卢永祥迅速失败，曹锟政府于9月20日任命孙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孙由于收编了卢部五个师，实力大为加强。

奉张为了援助浙卢，出兵讨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底，由于直系冯玉祥部和奉张秘密停战议和，致使曹、吴兵溃失势。从此，北京政府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曹、吴虽倒，但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齐、孙、萧等仍在。他们通电表示拥段，段也愿挟他们以自重。但奉张怂恿前浙江督军卢永祥向齐燮元夺回江苏地盘，于是段于12月11日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办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派奉军张宗昌部随卢沿津浦铁路南下。孙传芳在浙江感受威胁。1925年1月11日，他伙同齐燮元，组成"江浙联军"，以阻挡奉军前进。段为分化孙、齐联合，于1月16日任卢兼江苏督办、孙为浙江督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孙觉得自己有了保障，即不再参与齐、卢之争。齐受孤立，被迫宣布下野。2月初，孙、卢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都惊恐不安。在此之前，奉军并未履行"江浙和平公约"，完全从上海撤兵，至是，奉军在帝国主义的纵容下，又大批地进驻上海。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杨于9月分别到皖、苏就职。奉系势力向东南的伸张，终于又使孙传芳和奉系军阀的矛盾再次激化。孙为了自保，一面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反奉，一面拉拢江苏资产阶级张謇等地方代表人物，制造反奉的舆论。10月中，孙出敌不意，突然向奉军发动猛攻。杨宇霆猝不及防，又恐战线过长，急令奉军撤退，于是孙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10月17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发布命令让孙传芳立即撤回原防。时鄂、皖、赣三省直系军人及旧苏军师旅长多人纷纷通电响应讨奉，并电请吴佩孚与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奉军见势不敌，即放弃苏、皖两省，将军队全部集中徐州，与张宗昌部汇合，准备反攻。11月初，孙又亲到蚌埠督师，与张宗昌的反攻部队交锋，在安徽固镇以南战役中，重创张部的白俄雇佣军，俘获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帮办军务、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并把施处决。11月8日，孙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同月底，他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章太炎为顾问，蒋方震（百里）及日本军从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成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的实际统治者，也成了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8月初，北伐军进抵湖南岳州。当时主要打击的对象是盘据两湖与河南的吴佩孚。这时孙传芳虽然在南京有些惊慌，但他还希冀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让他坐收渔利。因此，他暂时伪装中立，声称"保境安民"。为了对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所谓"三爱主义"，来蛊惑群众，等吴佩孚在两湖败挫，北伐军于9月初进入江西时，他才慌忙地派兵迎战，并通电叫骂北伐军"共产共妻"。9月21日，他亲赴九江督战，妄想挽回败局。但革命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孙传芳虽然在江西战场上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垂死挣扎，仍然被打得一败涂地。11月初，他狼狈逃回南京，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19日，他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化装潜赴天津，去会见了张作霖。在此之前，靳云鹏、王占元来往天津南京间，虽然已为双方撮合，但尚未合拍。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蔡园召开奉系将领会议，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使奉系将领深感惊讶和"钦佩"。孙向张作霖求救。于是，他们在反对革命军的共同基础上，化仇为友。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带一部分"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孙也表示对张的衷心拥戴。11月30日，孙传芳和张宗昌领衔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张分任安国军副司令，孙仍兼五省联军总司令。会谈结束，张宗昌把直鲁军开到浦口，孙回到南京，指挥他的部队摧垮了当时的蔡元培等搞的"浙江自治"，重新夺取了浙江地盘。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了杭州，战线渐次逼近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军，组织武装起义，遭到了孙传芳的血腥镇压。先是上年10月，当孙在江西指挥作战时，已指示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了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至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时，孙传芳又一次命令李宝章和各帝国主义的陆战队配合，对工人、学生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孙虽然镇压了上海工人的二次起义，但他的前方作战部队已经涣散无力，24日后，他不得不把浙江防线和京沪移交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孙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而造成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蒋军望风而溃，使孙军一战而夺回徐州，并把蒋军赶回浦口。8月底，孙传芳又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蒋、桂分裂的混乱局面，决定孤注一掷，分兵三路渡江，与蒋、桂军在京沪铁路沿线栖霞、龙潭一带激战五天，结果遭到失败，损失了数万人。从此，他再没有多少实力，只有仰承张作霖的鼻息了。1928年春，他奉

张作霖的命令，任鲁西前线总指挥，和蒋军激战于金乡、鱼台、丰县；和冯玉祥部激战于曹州附近。当沿津浦铁路的张宗昌所部溃退北逃后，孙部阵脚立刻混乱，他本人也逃回济南。

1928年4月10日，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向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发动总攻击。张宗昌在鲁南的防线未战先溃，孙传芳军在鲁西南的后路，被冯玉祥军截断而全线溃退。孙、张两人于30日离济南渡河北逃。6月初，张作霖逃离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的残部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由阎锡山派人加以改编。随后，孙传芳即逃往沈阳，寄食于张学良门下。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的次晨，孙害怕祸及自身，仓皇逃避大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把全家迁回天津英租界居住。经皖系政客靳云鹏介绍，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军阀，竟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信徒，过起"念佛韬晦"的生涯。1935年11月13日下午，当他正在天津紫竹林清修院跪着念经时，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背后用手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胡景翼

胡景翼，字励生，又作笠僧、立生，早年号中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人。1892年6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生。祖父胡得鼎，1867年9月在家乡因阻击捻军身亡。父亲胡彦麟，初经商当学徒，后渐次升任"领本"（经理）。胡景翼七岁入塾，十三岁就学于三原举人赵如笃处。课暇喜读兵书及名人列传，并拜师学习武艺。

1908年，胡景翼考入西安健本学堂。该校为同盟会员创办，是当时陕西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胡由此结识了井勿幕、焦子静等人，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10年春，经井勿幕、宋元恺介绍加入同盟会。

胡景翼入会后，积极赞助井勿幕联络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主张，自愿担任与新军中会党联络的任务。他为此参加了哥老会，与崔俊杰、雷贵、刘俊海等会党重要分子多次密谋于小雁塔寺。还利用假日到同州（今大荔县）、蒲城、华阴、华县、临潼等地运动刀客。胡景翼联络会党成绩显著，在陕西革命党人中很快展露头角，成为一个重要骨干成员。是年7月9日，胡景翼与井勿幕、钱鼎等，和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三十余人在西安南郊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实现了同盟会、哥老会与新军的全面联合。

1911年6月，胡景翼于健本学堂毕业。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他决定"以奔走革命为职志"，不再继续求学。随后来往于灌州（今耀县）、西安之间，进行广泛联络。随着革命形势高涨，同盟会陕西支部计划由井勿幕、胡景翼率刀客在渭北发难，钱鼎等人策动新军西安响应。井、胡遂以耀州庙湾为基地，加紧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清陕西当局颇为惊慌，密谋将新军第二标调离省城，并逮捕军中的革命党人。新军乃提前于10月22日举义。胡景翼得知消息，立即招集各方豪杰志士和刀客两千余人在药王山首先响应。不久，井勿幕在三原就任陕西北路安抚招讨使，他应召前往，被委为第一标统带。西路战事告急时，又奉命率部赶往支援，在三水张户原（今旬邑张洪原）大败清吏升允所率之甘军。

1912年3月袁世凯窃权上台后，陕西都督张凤翙投靠北洋政府，打击革命派势力。秋天，胡景翼被迫离开陕去日本，入成城学校读书。12月，外蒙古封建主在沙俄政府策动下宣布"独立"，留日学界群情激愤，公举胡景翼为代表，归国组织"征蒙军"。但袁世凯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味与沙俄妥协，胡的使命未能实现。不久"二次革命"爆发，他便在上海投入了反袁斗争。期间，孙中山、黄兴曾派人约张凤翙举兵响应，张拒绝，胡景翼愤怒指斥这是"苟安一时，助长袁氏帝制自之心。"

1914年1月，胡景翼亡命日本，入革命党人创办的浩然学社学习军事。数月后毕业，决定回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离日前，曾由于右任引荐会见了孙中山。孙以"努力革命"相勉励，他毅然回答说："俟破京后再迎先生！"

1918年1月25日，胡部补充营营长张义安愤于陈树藩步步紧逼，在三原宣布独立。27日，胡景翼与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州赶到三原，共同组成陕西靖国军，胡任右翼总司令，曹任左翼总司令。2月2日发布讨陈檄文，宣言靖国军"志在上以靖国，下以救民"，以达"政治清明，共和巩固，奸雄无觊觎之心，政府有依归之望"。随后，从东、西两路进兵西安。2月中旬，靖国军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兵临西安城下。陈树藩为挽救其败亡命运，在据城固守的同时，不惜以陕西省长为条件，与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加紧勾结。刘率部入陕后，俨然以"调停人"的身份，诱迫靖国军退兵。胡景翼鉴于西安城屡攻不下，为"保存实力"，遂不顾前方将领张义安、邓宝珊、弓富魁等人反对，连函张等撤军。结果，陈树藩与刘镇华镇嵩军乘机反扑，张义安在组织反击时中弹阵亡。从此，靖国军被迫转入节节退守的困境。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率部随冯玉祥开赴河南，在郑州、开封、彰德等地与豫督赵倜军作战。战后，所部被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驻防京汉铁路北段顺德、彰德、正定一带。期间，胡景翼去北京，经人介绍结识了李大钊。自后"每遇辄洽谈竟日"，给其思想以重要影响。

胡景翼依附直系原是借此谋求更大发展，但直奉战

争后吴佩孚不仅从服装、枪械到饷需多方加以限制，并时刻企图收编其部队，这使他对直系日益产生了不满。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同声反对，胡景翼于是感到“有再度革命之必要”，“欲有所举动。”随后，他派李仲三、刘允臣、张璧等与冯玉祥密谋；同时积极与孙岳取得联系。经频频密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遂结成反直联盟。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利用吴佩孚在山海关与张作霖作战之机，在胡景翼、孙岳的密切配合下，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通电主和。25日，宣布组成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发生后，吴佩孚率残部退至洛阳组织反扑。11月7日，北京政府免去张福来河南军务督理职，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24日胡率国民军第二军南下，与吴军战于彰德、道口，清化间。12月6日胡被特任为河南军务督办，12月胡进抵开封，宣布正式就职。接着，与镇嵩军憨玉琨部连续作战，至次年3月取得最后胜利。

胡景翼就任河南督办后，广为延揽人才，希图“以豫省为始基”，“期成清明之政治”，然后“推行主义于全国”。于是，国民党人李根源、李烈钧、柏文蔚等数十人纷纷前往；共产党人李大钊、王若飞等和苏联代表团、军事顾问，也曾先后应邀赴汴。但为时不久，胡景翼即于1925年4月10日病逝。

胡景翼病危之际，曾口授遗嘱谈及“胸中素蕴”，说：“余对世界观念，以人类互相亲善，永久和平，期臻大同郅治之降为指归。而欲达此目的，非打倒世界强权不为功。”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苏联政府对国民军的援助

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准备象援助广州革命政府那样援助国民军。为了进一步讨论援助的具体方案，鲍罗廷和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于4月21日同冯玉祥在张家口会谈，决定了苏联向国民军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以及国民党向国民军派遣政工人员的细则。于是，一个由36人组成的军事顾问组于5月初到达国民军第一军驻地张家口，顾问组组长是普特纳，副组长是普里马科夫。不久，斯卡洛夫（西纳尼）率领的由43人组成的另一个军事顾问组于6月到达国民军第二军驻地开封。顾问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援助国民军大量的枪炮弹药。据统计，从1925年3月到1926年7月国民军得到了步枪38828支，日本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带有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

1926年初，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进攻下受挫，为了缓和局势，以退为进，冯玉祥宣布下野，将国民军第一军交给张之江率领。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等人离开平地泉，前往苏联考察并寻求苏联政府的援助。

在苏联期间，冯玉祥除了在普里马科夫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访问外，还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加里宁、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苏军负责人伏罗希洛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也都会晤过冯玉祥。苏联同冯玉祥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陈潜夫天安门断指反帝

陈潜夫教授，1892年9月21日出生于嘉定府（今乐山市）平兴乡陈坝。原名绍陶，又名甫霖，后于外出求学时，改用“潜夫”的名字。少年时期他在陈坝读私塾，1905年到嘉定府城进入“草堂寺高等小学堂”，与郭沫若同学。

陈潜夫幼年读书，常有独立见解。在家乡私塾读书时，国文教师有一次出的作文题为：《马、牛、羊优劣说》。不少同学都说马、牛优于羊。马能拉车，牛力大，能耕田；羊无用，只有养来吃肉。陈潜夫却说：羊优于马、牛，羊毛能做笔，用笔写文章，安邦定国平天下，羊的功劳大多了。对这篇作文，教师评了120分，说：“见识高远，不同一般，颇见新意，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老师的鼓励、专门指点和培养，对陈潜夫后来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很大影响。

1912年，陈潜夫至成都，住成都共和大学，后同郭沫若一道去日本留学。陈潜夫读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与农业大学。在求学过程中，他于1915年参加了孙中山组

织的国民党。

从日本归国后，陈潜夫应成都高等商科学校聘请，在该校教授日文；1921年，又到南京东吴大学任统计教材编辑及教授；后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教政治经济学；后又任北京女师大的教授。当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马寅初、刘海粟等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不久，陈潜夫也参加了。1924年7月4日至8日，这个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时，陈潜夫与张伯苓、黄炎培、刘海粟（美术组主席）、陶行知（董事会主任干事）、方毅（国语教学组代书记）、邓萃英、郑贞文、余家菊、汪懋祖、孙恩元、左舜生、陈启天等一同出席会议，还被选为教育行政组书记。在会上，陈潜夫等提出了两个议案：一、请求力谋回收教育权案；二、无中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施行国民教育案，均获通过。

这期间，陈潜夫在李大钊影响下，还深入调查过工人运动，常同人力车夫和其他工人来往，有时还同工人同吃住。有几次，遇上反动政府的侦探跟踪，陈潜夫不知，车夫认识这些人，用车拉他穿胡同转弯飞跑，帮他甩掉“尾巴”。

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杀我同胞，酿成“五卅惨案”，血信传到北京，激起了爱国的抗争怒潮。6月10日，各界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满街的与会群众，臂围黑纱，胸佩白徽，悲愤激越，怒涛汹涌。会场共搭有五个演说台。每个台前，上挂白布横幅，大书“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左右张贴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的“泣血书”、京师总商会的“抵制英日，经济绝交，惨杀同胞，誓死力争”的长幅标语。参加大会的爱国团体有救国团、总商会、工会、农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人力车夫工会、印刷工会、京汉铁路工会等157个团体和大、中、小学等计20多万人。

午后1时，群众推选北京市民代表李石曾、女界代表刘清杨为中台主席。李石曾主席宣布开会后，报告开会宗旨；刘清扬说明筹备经过；上海工界代表孙孚美声泪俱下地报告英日巡捕惨杀我同胞的经过。群众一再高呼口号：“为工界同胞报仇！报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陈潜力在中台讲话。他慷慨激昂，要求国人坚持反帝，不要“五分钟热情”，不要“一盘散沙”。说到激愤难忍处，潜夫抽出利刃把左手第四指前两节砍断，在白布上血书“誓死救国”四字。不久，又血书“愿同胞猛省，勿存‘五分钟热心’。陈潜夫断指泣告”等字。当时陈潜夫左手血流如注，面色惨白，仍大呼“救国”不止。因为流血过多，演说未完他便突然晕倒。台下有学生哭泣失声，群众悲愤洒泪高呼：“若不坚持到底，对不起上海惨死同胞，也对不起今天的断指壮士！”

会后，10多万人冒雨游行示威，坚持到执政府请愿。沿途，许多人都以陈潜夫断指反帝精神互勉互励。

陈潜夫晕倒后，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等扶下演说台，他还一直坚持要同群众一起去执政府请愿。因其流血太多，不宜长途走动，众人一再劝慰，才将他强送进协和医院，由女师大学生鲍士彦等日夜看护、陪伴。北京各界中外人士纷纷到医院慰问。

11日午后2时，北京市学联五十四校代表在师大开会，决议派二中、三中、求实三校代表赴医院慰问陈潜夫、丁文安、李良韬等诸君。陈潜夫的断指，由学联保存，并轮流送各校传观。从此，陈潜夫成了北京市和全国闻名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壮举受到全国舆论赞誉，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都连续报道、评论，特别是6月11日的《世界日报》还专列标题：《陈潜夫断指雪仇》及《陈潜夫之血书》，并全文刊载了潜夫事先写好的演说稿。文曰：

数十年来吾国备受外人侮辱。侨外同胞，既不与非洲“黑奴”同等待遇（黑种人尚可任意通行，旅外同胞，则有时不准登陆），而潜居乡里者，又复时受欺凌。乃□□各地同胞，更遭英日人之惨杀。埃及、犹太之亡国民，尚得安居篱下，不谓主权尚存之中华民国，反生不能安，死不得所！同胞乎，我最亲爱之五大族同胞乎，其忍袖手旁观，其能坐以待毙耶？否则宜速起共谋所以自救之道。今谨號指血书，以告我最亲爱之同胞曰：潜夫自今以后，“誓死救国”，外侮未去，决不偷生。愿同胞共起图之，无任盼焉。

四川人陈潜夫泣告。

陈潜夫带血的泣诉，撼人心脾，更加促进了北京市和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五卅运动”中震动人心的一页。

（选自《纵横》87年4期《爱国教授陈潜夫》作者：廖友陶）

廖仲恺先生遇刺轶闻

廖仲恺先生于1925年8月遇刺于广州国民党中执会门前，事件发生后举世惊震。当时正值黄埔党军成立之初，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骤然失去革命中坚和政府台柱，当然是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全中国革命派的一个大损失。王懋功当时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黄埔党军教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第一军及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长，是处理这一要案的当事人之一。

40年代初，王懋功被任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但为顾祝同、韩德勤二人所排挤，无法上任，折腾半年，从皖南回到重庆，闲居渝郊老鹰岩游龙山何应钦公馆前院。当时笔者刚好在陆军大学学习，王懋功为笔者长辈，他自称也是陆军大学学生（王曾于1926年春赴苏联，系苏联红军伏龙芝大学即苏联红军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以及与笔者为黄埔师生关系，经常召饮笔者，与笔者无所不谈。

据王懋功谈，刺廖案发生前，他们(王及蒋介石)通过眼线人物已有所闻，据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右派国民党要人，要对廖仲恺先生采取行动，而廖仲恺先生及何香凝先生对此亦有所闻，故已有所戒备。然而，事出仓猝，廖先生不幸遇难。刺廖集团内部可能也不一致，行刺之事，连胡汉民事前也未有所知晓，可能并非计划行动，而是出于少数人偶然钻了空子，遂下此毒手。

案发后，胡汉民首先躲避起来。而广州卫戍总部当夜便逮捕了胡汉民之弟、粤军将领胡毅生以及有关的人员。王说，一举抓到胡毅生，也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王在案发后即亲自秘密派遣了得力人员和少数精锐武装，于入夜后即包围了胡毅生宅第，缴了守卫人员的械，胡毅生束手就擒，连手枪也来不及拔出，便做了阶下之囚！在王氏和笔者谈到胡毅生时，虽已事隔10余年，但他仍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而加仑将军等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成立的党军，便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干，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时，以苏联武器为主装备起来的黄埔党军，已初具眉目，有两个教导师(干部全为黄埔军校教官及学生)以及其他部队，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番号，蒋以第一军军长进而为北伐军总司令。但是，此时粤军总司令部也并未取消，蒋氏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也并未解职，以许为首的旧粤军将领，面对黄埔党军，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

据王谈，许崇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胡毅生等人则属于困兽派，是铤而走险的首领。但是，行刺之事，胡毅生也未必是事先策划了的，而在当时，王蒋均注目于胡毅生。王说，他之所以给胡毅生来了个措手不及，其原因便在于此。胡毅生这个人反应迟钝，不若其兄之精明，事到临头，依然稀里糊涂，强作镇静，其人不谙谋略，真个好笑之至，宜乎其为阶下囚也矣！

胡毅生在被捕后一口咬定他并未参预刺廖之事，但却透露出许崇智曾“暗示”要把廖除去。理由是，廖掌握财政，是黄埔之母；除掉他，黄埔这个幼儿便没有奶可吃了！

王懋功对廖仲恺先生被刺案件的评论是，当时太疏忽了保卫工作。笔者认为，旧中国武人政客常常搞暗杀活动，这是来源于亚细亚专制主义。陈炯明搞了那么大的暗杀孙中山的行动，国民党左派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岂不令人浩叹！

然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执掌兵符的蒋王二人，当时也无法弄清何人为刺廖凶手，多数人认为是朱卓文，其实也不见得。后来才知道凶手是许部一中级军官，却在胡毅生被捕之前，早已遁迹大英帝国旗下的香港，始终未能缉获归案，这是对蒋王二人一个绝大的讽刺！许崇智遭蒋面斥，自知无法对抗党军，也便趁此时机得保首领，安作寓公，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于潜之)

戴季陶三改其名

戴季陶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后期参与蒋介石反共，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直到1949年2月11日，共活了59岁。其一生曾数度更名，表现出他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

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选堂，浙江湖州人。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接受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投身反清革命活动。1909年他自日本回国，在上海主编革命报纸《天铎报》。他在这时期改名“戴天仇”，表示与清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戴氏被聘为孙先生的秘书。

到了1920年，戴季陶到上海从事经济活动。他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一起，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经营证券物品的投机生意。当时戴很想在经济活动中干出一番事业，梦想成为我国古代大商人陶朱公的嫡传与继承人，故又改名“戴季陶”，以“陶朱公第二”自居。

等到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戴季陶匆匆忙忙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了孙中山遗嘱的签字仪式。他从此以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最好解释人与最好继承人自居，遂改名“戴传贤”。但历史证明：他并没有继承与传播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思想，终于走向革命的反面。

(忻欣)

翁敬堂斗胆检举三总长

在中华民国史上，曾发生过一起国家检察官检举三名政府总长的案件，轰动一时。

此案缘起金佛郎(法国货币，今译法郎)案，因此须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金佛郎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法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从1922年起，中国在偿还庚子赔款时，改变自清末1905年以来按各国流通货币电汇的方法，而改用金佛郎折算。在采用虚金本位制的法国，金佛郎本属子虚乌有的东西，原只有来表示纸佛郎应有的含金量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纸佛郎币值下跌，根本无法与金佛郎等价，因而与中国银元的比价也大大下降。在此情况下，如采用以往的电汇方法，中国每年付给法国的赔款仅及过去每年所付的一半就可以了。到1922年，中国尚欠法国庚款4亿佛郎，按当时的电汇价计算，每佛郎合银元一角三分四厘，中国仅需支付5300

多万元；但是，若按金佛郎折算，每个金佛郎折银元三角四分，中国则需支付1.36亿元，较前者多出8000多万元。如果与法国同属拉丁币制同盟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索赔时也援引此例，则中国的损失还要大。

法国深知这种明显有损于中国利益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的；于是它以仿效美、苏两国退还庚款为诱饵；尤其是强调退还的庚款首先用于恢复中法实业银行，来诱使北京政府首肯。中法实业银行系中法合办，是法国在华控制金融的重要机构，吸收了中国大批军政要员的存款。1921年该行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倒闭，使存户的利益受到损失。这样，金佛朗案就牵涉到退还庚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问题，进而牵涉到中国军政界要人的存款利益问题。因此，从1922年开始，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历届内阁中，都有人为此而奔走说项。

由于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北京政府始终未敢承认此案。法国政府于是串通与《辛丑条约》有关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自1922年12月1日起，将中国关余、盐余(即关税、盐税扣除当年应偿还的庚款之后所余的税款，应当归中国政府支配使用)，按金佛郎所折算的赔款数，由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尽数扣留。此外，1922年初的华盛顿九国会议曾决定，各国批准该会议关于中国关税问题的协定之后三个月，由中国政府负责召集各国举行关税会议，增收二五附加税。法国则以不批准华盛顿会议的协定，来要挟中国承认金佛郎案，但仍未能达到目的。

1924年下半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政府垮台，皖系首领段祺瑞在奉系和国民军系的拥戴下，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自任临时执政。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极端困难。各省税收均为地方军阀所截留，不仅分文不解中央，反向中央催索军饷。至于“执政府的日常开支，如北京的军警费用，政府开支以及教育经费等等，主要只能靠借内外债”。

到1925年春，安格联所扣留的关余、盐余，已达到2360多万元，这对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段祺瑞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他就任后曾先后下了七次手谕，指示财政总长李思浩和外交总长沈瑞麟，与法国公使秘密谈判解决金佛郎案，以得到被扣留的税款，并增收二五附加税。为免贻口实、表示慎重，双方交涉就绪后，财政部又将全案卷宗送交司法部长章士钊，由司法部组织审查，后认为并无违法之处。于是，4月12日，外交部长沈瑞麟与法国公使就解决金佛郎案的中法协定进行签字、换文。其要点为：(一)法国政府同意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作中法两益事业之用，主要即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二)中国政府同意部分退款外的余额，不以电汇兑佛郎。而以汇兑美金方式。其实质是仍以金佛郎为标准，折合美金来偿款，偷梁换柱以欺骗国内舆论。

4月2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公布中法金佛郎协定。段祺瑞同时通电全国，解释理由。随后，财政总长李思浩又公布说明书，对协定的有关文件加以说明，强调利大于弊。但是这种辩白、解释，并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许多省议会纷纷通电反对，北京学生还连续游行请愿。

在全国人民一片抗议的声浪中，有人认为司法总长章士钊在审查此案过程中，有受贿嫌疑。京师地方检察厅在开会时，检察官杨士毅、杨绳藻等人提议对章士钊等人进行检举。6月17日，总检察厅指派检察官翁敬棠从事调查。

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翁敬棠于10月2日提出了长达八九千字的检举理由书。该报告首先指出，中法金佛郎协定使“国家损失不下八千万元，所受不利之数额，已堪咋舌，况因法国部分解决，意、比、西三国援例用求，则损失不尤可惊耶？”据此，报告书断定这是一个“不利中国之条约”。其次，翁敬棠在报告书中强调，从这个协定中得到实际好处的，主要是“中法实业银行及该行之远东存户”；而这批存款户中，仅有少数中国人，“与人民全体无涉”；尤其是“该行股东及存户，均有一部分为外国人民”，因此可以认定，这个协定是“因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而故意议定”的。

根据上述理由，翁敬棠认为，“沈瑞麟受命为外交总长，……其与法国订此协定”，“李思浩主管财务，……一手计画”，二人均触犯刑律第108条：“受中华民国之命令委任，与外国商议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故意议定不利中华民国之条约者，不问批准与否，处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他要求总检察厅“迅饬该管检察厅侦查起诉，以彰法纪”；并建议，因“本案关系重大，该总长等恐有闻风逃匿或湮没及伪造证据之虞，……并请饬令主办人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

鉴于在中国揭露行政当局的黑幕和丑行，往往要遭到暴力威胁或其他迫害，翁敬棠公开发表检举理由书之后，随即避往天津。在那里，他又于10月8日检举前任司法总长章士钊(此时章专任教育总长，司法由杨庶堪继任)。该检举书指出，章士钊在主持司法部对金佛郎案的审查时，只是将财政部的说明书给部员传观，“并不提出全卷”审议。而且与会者人数寥寥，见解各异，“章士钊以在座人均表反对”，于是表示，只需说明这次协定的内容比以往政府所议的内容更为有利就可以了，也不需用司法部的名义行文，只用章士钊个人名义呈复。但实际上，章在呈复中却声称，新协定各条“均于我国有利”，“稳妥无疵”，“士钊与各员讨论之余，意见相同”。翁敬棠据此认为“章士钊职掌司法行政”，“以促成其事”，有共犯情节，“应饬令该管检察厅并案办理，以肃法纪”。

翁敬堂两次检举三名现任政府总长之后，“一时朝野均为之震动”。外交、财政二部要人始则攻击翁“如何受人

运动"，继而沈瑞麟表示要求辞职。段祺瑞执政府则因"本案与其自身关系甚巨，阴图打消"，"施用种种手段"。因此，尽管司法总长杨庶堪曾宣言"此案决依法办理"，却迟迟不见消息。

当时的舆论界一方面要求将全佛郎案"一切经过情形，尽量的宣示国人，以释外界之疑"，反对对检举人的人身攻击；另一方面强调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的不同，反对"不论什么事情，都被牵入政治的，漩涡中"。《东方杂志》曾载文指出，金佛郎案一经检举，即为法律问题，表示希望"第一政府须重视司法独立与法院的尊严，勿以政治势力去妨碍法官的行使职权；第二承办这案件的法官，也须自审法院的地位与法官本身的尊严，勿因政治关系而有不公正的处置"。

在舆论的压力下，10月下旬司法部令行总检察厅，饬令北京高等检察厅从事此案的侦查。然而迁延数月，"未闻被告一人到案，仅延李思浩至客厅，以宾主之礼相见，略询数语"，请李提交一份辩诉书而已。后迟至1926年3月6日，北京高等检察厅下达处分书，宣布对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钊三人不予起诉。该处分书将翁敬棠的检举书和李思浩的辩诉书进行了比较，认为李思浩等"于吾国有损部分，则力求缩小，于薄有利益部分，则力予扩张"，"其有心袒护，形迹显然"。

翁敬棠不同意如此处分，于是详细列具再议理由书，依法申请再议。司法总长批复"依法办理"，仍交北京高检厅。该厅以翁检察官并非原告为理由，呈请总检察长驳斥再议的要求，总检察长遂依照该厅的意见，将此案了结。

翁敬棠于是在报纸上发表谈话，彻底揭露全案内幕。他指出，此案之初是调查章士钊受贿嫌疑问题，而章"收受贿赂，实证难求"；如果自己到此为止，"以查无实据呈复，未尝不足以博长官之欢心"，但"顾念国家受害至于此极，身居检察，所司何事？"因此，"明知一旦检举，必撄政府之怒，而良心驱迫"，不得不把问题揭发出来。他指责北京高检厅"上下其手"，包庇政府官员，"竟下不起诉处分"，又违背司法程序，"使被告经一次处分即可脱然无累"，免受检察厅的再次侦查和法院的审判。最后，他愤然表示，"吾国财政败坏久矣，而司法机关威信，复缘此而失坠无余，不尤令人扼腕叹息耶？"迟至当年12月底，翁敬棠还继续在报端检举金佛郎案于意大利、比利时两国赔款部分，中国约损失7000万元，合法国部分共2亿元以上。

翁敬棠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名检察官，不畏政治压力，毅然从国家利益出发，对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提出司法检举，确实难能可贵。在当时整个检察系统，从总检厅、总检察长到北京地方高检厅，或不敢抗拒行政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无法独立办案；或甘心为虎作伥，有意开脱，以致这一"关系国家财政至巨之案"，"竟予抹杀"。翁敬棠在这场法律与权力的较量中，虽然成为孤独的失败者，但他作为一名国家检察官，检举三名政府总长的勇气和行动，却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至今仍发人深思。

（马烈）

流行风

电影《不堪回首》

神州影片公司于1925年拍摄了第一部影片《不堪回首》，由裘芑香、陈醉云编剧，裘芑香导演，汪煦昌摄影，丁子明、李萍倩主演。影片写一个卖菜翁的女儿救了一个落魄少年，不久两人相爱。当少年找到职业后便背弃贫女，另恋富家女子。后少年被逐出富家，重游旧地时，发现卖菜翁父女已死，在尘封的破屋里探视贫女生前用过的针线，勾起"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的心情。最后少年黯然出门，茫茫然不知何往，充满了悲伤情调。故事虽属多情女子薄情郎的老套，但它细腻地表现了人的感情和情绪，起到劝戒人们忠于爱情的作用。在艺术表现上，影片注意利用电影的特殊手段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少地方运用了对照和象征的镜头，结尾是个问号，让观众思索。摄影、布景处理、字幕说明都很讲究。演员为新人，表演亦较朴素、真实。这部影片是"神州派"主张的实践。同年又以原班人马拍摄了《花好月园》，影片歌颂了忠贞爱情，拍摄上也有新颖之感。

小说《伤逝》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

作品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用手记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因为爱而结合，不久又不得不分离的过程。涓生和子君是一对男女青年，他们志趣相同，常在一起讨论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婚姻自由、谈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等。后来，他们相爱了。他们

频繁交往，引起了世俗的非议，人们常常向他们投来讥笑、轻蔑和猥亵的目光。子君毫不畏惧，坦然处之，依然镇静自若。经过半年的交往，他们结合了。他们的结合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子君和她的叔叔发生了争执，她据理力争，不惜同叔叔决裂，并声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在吉兆胡同租了两间南屋，过起了清静舒适的生活。涓生从庙会买来了两盆小草花；子君喜欢小动物，于是养了四只小油鸡，并养了一只花白的叭儿狗，取名阿随。虽然生活忙碌，但仍然充满了乐趣，子君渐渐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然而好景不长，涓生被局里解雇，两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涓生一面登求职广告，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总编辑，请他刊登自己的译文。生活艰窘，涓生和子君的感情产生了裂痕。涓生想到了分离。他告诉子君，他已经不爱她了。他预感到分离的日子已临近。终于有一天，子君被父亲接回了家，涓生也回到了寂寞的会馆。子君回家不久便抑郁而死，涓生闻讯，心情极为沉痛，他在心中默默祈求子君的宽恕。他们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为了自由地结合，他们勇敢地背叛了封建专制家庭，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然而由于社会的压力、经济的逼迫，他们的爱情很快就失去了光彩，并以悲剧告终。这一爱情悲剧说明了妇女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首先在经济上求得解放，并揭示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道理。

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

作者艾芜，主要内容：

以第一人称的写法，表现作者二十年代流落昆明的一段凄楚的经历。"我"在卖草鞋时碰壁，去拉黄包车也不成，鞋子被人偷去，踯躅街头，走投无路，被迫到客栈里去和生满疥疮的人同住得了感染，碰到一系列悲惨的遭遇。作品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工厂主、经理、老爷、太太的骄奢淫逸，和生活在底层人民的艰辛、痛苦、反映旧社会的阶级对立和世道的不公。小说在描写黑暗现实和灰黯秋景的画图中透露了"我"绝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意志："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使作品在沉郁的色调中添上亮色，增添了人们对旧社会的憎恨。

小说《潘先生在难中》

作者叶圣陶，主要内容：

小说以江浙军阀混战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卑怯自私、苟且偷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潘先生在战乱中惊慌失措，为了活命，带着妻儿逃到上海；为了生计，又撇下家小回校办理开学事务。作品通过潘先生在逃难途中的一系列情节，反映了旧中国动乱不安的现实，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卑琐的生活和自私、苟安的性格，并对这种麻木不仁的灰暗人生观予以辛辣的讽刺。作品以潘先生在逃难时的经历为线索，真切细腻地剖视了主人公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各个性格侧面，塑造了灰色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心理写得逼真传神，曲折入微；情节设置波浪起伏，语言简洁朴实，笔锋冷隽，讽而不露，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诗《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

诗歌《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甚么是生命，甚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象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锤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杨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那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象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著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徐志摩）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

时间：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地点：上海。

出席代表：二十人，其中有表决权者十四人。代表中有：陈独秀　蔡和森　谭平山　瞿秋白　周恩来　彭述之　林育南等。

党员人数：九百九十余人

主要决议：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第四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陈独秀　李大钊　蔡和森　张国焘　项英　瞿秋白　彭述之　谭平山　李维汉

候补委员：

邓培　王荷波　罗章龙　张太雷　朱锦棠

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　彭述之　蔡和森　瞿秋白　张国焘

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中央组织部主任：陈独秀(兼)

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

宣传部委员：蔡和森　瞿秋白

中央工农部主任：张国焘

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任青年团中央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欧美各国被压迫阶级，不是常常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杀么？我们中国民族的被屠杀亦非始于今日呵！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呵！

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工农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坚决了各强国的强盗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对于中国的铁血镇压政策。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

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狡猾也摆在我们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企图将此次事变的目标移嫁于英国，而德国驻沪领事亦向学生表示一种假仁假义的态度。

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这斗争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斗争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斗争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

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斗争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功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

力。

中国共产党请全国愤激的反抗帝国主义之屠杀的人民,注意四件事:

第一、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段、张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媚外是其特长;我们虽不必拒绝政府的交涉,却不可相信并倚赖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

第二、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外国大资本家、大商业家、大银行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帝国主义对付我们只有奴隶地位与铁血政策,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他们屈服我们之两条路。与其认贼为父,敷衍面子以了事,毋宁干脆的斗争,干脆的失败之光荣。

第三、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这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

第四、须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第一是用种种方法捏造苏俄和共产党主使的谣言;第二是离间商界与工人学生的一致,并企图和缓商界领袖使与商人群众分离。

中国共产党敢告全国人民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暗示与欺骗。这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的参加积极的鼓动或主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设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苏俄亦然。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挚友的帮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要大大增加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与勇气,只可惜苏俄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助中国民族一举打倒帝国主义,使他从野蛮残暴的列强中解放出来。然而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呵!

中国共产党敢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锻羽不振之打击呵!

全国工人们!农民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

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

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北京政府关于关税自主的提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查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曾提出关税自主问题,惟当时认为不属于和会范围未加讨论。迨至1921年华府会议在远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国代表以中国现行之约定关税妨碍中国主权,违背国际间均等及互惠主义,重为关税自主及过渡办法之提议。该委员会对于是项问题,虽经讨论,惜未能充分容纳。中国政府至今引为遗憾,不得已而订立1922年2月6日之关税协定。故事前中国代表于1922年1月5日,在远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席上曾宣言:关税自主问题,于将来适当机会时再行提讨论。同时并订立九国协约,其第一条第一项即首先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兹中国政府重视各国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之诚意,际此关税特别会议讨论关税问题之时期,中国政府认为1922年1月5日宣言所称之适当机会已至。故特根据九国协约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之精神,并为增进各友邦之睦谊起见,提出祛除关于税则现行条约上之各种障碍,推行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见附件)实行关税自主之办法如下〉

一、与议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

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实行,但至迟不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

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

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

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

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

(原载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公报》第53期，专件第4—5页)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第一条　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

第二条　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

第三条　国民政府设置常务委员五人处理日常政策，常务委员于委员中推定之。

第四条　公布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由主席及主管部部长署名，其不属于各部者，由常务委员多数署名，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之。

第五条　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之，委员会议出席委员不足半数时，由常务委员行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行之。

第六条　国民政府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各部设部长一人，以委员兼任之，有添部之必要时，经委员会议议决行之。

第七条　各部长依其职权得发部令。

第八条　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官制另定之。

第九条　国民政府设秘书处，受常务委员之指挥，其规制另定之。

第十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号(1925年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

一九二五年七月

中国国民党对时局之重要宣言

一九二五年五月

去年11月13日，本党总理孙先生北行之际，以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宣告天下。盖开国民会议，在以国民革命之大任还付于国民全体；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但使帝国主义无所逞于中国，尤使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失其寄生之所；此正为国民革命第一重要工作。总理北行之际，揭此二义，固在唤起国民负荷革命之大任，而对于北京临时执政有无诚意与本党合作，亦以此为试验之资。盖总理固尝明白宣言此战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天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又尝明白宣言，此战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北京临时执政于民国九年秋时直皖战争失败以后，其所持言论，对于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为患之国内现象，虽似已有所觉悟，而坐言起行，不能不属望于就任临时执政之时。总理虽怀与人为善之诚，躬自北行，与之商决国事。如使北京临时执政肯以诚意与本党合作，接受总理所提倡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原则，本党敢信，不但中国之政治的统一早已实现，而国民革命进步亦必以一日千里之势，克底于成。无如总理方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北京临时执政则甘受驻京外交团之钓饵，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承认临时执政之交换条件，置国民对于不平等条约之解放要求于不顾，且不恤以之为个人地位之牺牲。总理方提倡开国民会议，而北京临时执政则以善后会议为号召。虽经总理竭诚开那里，但期于善后会议中能容纳人民职业团体代表，俾人民得于会议中表现意思，贯彻主张，则不恤舍弃预备会议之主张，以赞同善后会议。而北京临时执政悍然不顾，仅置不完备之人民职业团体代表于专门委员会委员之列，不予以表决权。结果人民对于善后会议竟无权参与，惟听少数军阀政客自由处分。凡此二者，与总理北行之目的大相剌谬。本党认北京临时执政仍不外蹈袭历来北洋军阀之行径、与国民利益相背驰，而惟知依附帝国主义以求生存，决无与本党携手进行国民革命之可能。故决议本党党员不参加善后会议，且敬告北京临时执政，勿再以善后会议制造国民代表会议，以重罪恶。而北京临时执政则于善后会议闭幕之后，仍从事于国民代表会议之进行，且于此期间肆意与帝国主义相构结。最近于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之际，嗾使警察横加干涉，多所杀伤，其以帝国主义之鹰犬自

居，尤有目共见；其他断送权利之事，尤不胜枚举。本党至此不得不郑重宣言，本党与北京临时执政府合作已完全绝望，此后本党惟有竭其能力为民国革命而奋斗。至于奋斗之第一目标，在根据总理遗嘱，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而奋斗之方法，总理于遗嘱中亦已明示，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盖今日之民众，在帝国主义与军阀两重压迫之下，而尤以农夫、工人所受压迫为尤甚，为解除此等压迫及恢复国民权利计，不得不一致结合。全国民众应认识本党之使命在为民众利益而努力，相与奋起，以集于革命旗帜之下，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至于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苏俄始克当此称。去岁本党对于中俄协定已表示此意见，苏俄一方取消历来中俄间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一方扶助中国民众从事于废除一切不平等之运动。苏俄既以其革命之力打破前俄帝国之帝国主义，复联合世界上被压迫之民族，共同打破一切之帝国主义，总理遗嘱所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证之总理临终致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可以灼见而无疑。本党对革命先进之苏俄，乐与携手，为打破一切帝国主义之工作，以完成国民革命。至于其他各国，苟以平等待我者，则我必亲善报之。盖平等乃可言亲爱，不平等则无亲爱之可言也。于此尚有言者，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本党前此已历举为国民告，军伐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借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借联省自治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来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毋使得逞。善凡有为国民革命梗者，则必为本党所不容，无俟烦言者也。本党根据总理遗嘱，对于时局决定进行方针如此，谨此宣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民国日报》1925年5月29日）

直系讨奉通电

孙传芳、夏超、周荫人发难电　段执政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国民公鉴：去岁传芳视师江表，深感东南战祸之惨伤，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计，于是有上海求不驻兵之议，人民既历次请求，政府且特颁明令，传芳即首先遵令撤兵，盖不惟顺从民意，亦以重言责也。不料我方振旅而归，彼即乘机而入，然犹谓少数武装，用以维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国震骚，国民椎心泣血之时，为私人攘利夺权之举，人民既敢怒不敢言，政府亦熟视若无睹，使传芳独负言责，实无以对我东南人民。惟念国难方殷，深不愿再肇兵祸，以为苟能约束，犹可相安。数月以来，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彰闻，众目共见。顾传芳犹啮齿忍痛，静从公论，冀其自觉。乃人民日增饮泣之声，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视江南为私有，窃政柄以自恣，甚至长官方色喜就任，部兵即公然抢劫，事隔兼旬，曾未闻一申军法。夫沪上为东南精华所萃，友邦观瞻所系，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驻兵之议，自我言之，当自我行之，所以顺民意者在此，所以服从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六师，缴其枪械，放归田里。惟念奉方戎兵皆我同胞，万恶实由戎首，今与同志连师，当世贤豪戮力同心，唯彼祸首张作霖一人之是讨，此外皆所不问。至我军职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惟和平可以保国家，惟和平可以对友邦，见我旌麾，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其共鉴之。孙传芳、夏超、周荫人叩。铣。

临时参政院条例

1925年4月13日公布

第一条　临时参政院辅佐临时执政，设于临时政府所在地，以下列各员组织之：

（一）各省军民长官各派代表一人。

（二）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长官各派代表一人。

（三）边防督办及中央直辖或指定之总司令，各派代表一人。

（四）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满籍各旗、回部及华侨，由临时执政共派十六人，但以各该地方旗部人为限。

（五）各省省议会议长一人，各区有议会者亦同。

（六）各省区法定各团体之会长互选一人。

（七）由临时执政派充者十人至二十人。

前项各员，均为参政。

第一项第六款互选程序，另以命令定之。

第二条　左列事项，临时执政得具案提出于临时参政院议决之：

（一）关于省自治之促成及在国宪并省宪未施行前，应先规定之自治暂行条例案。

（二）关于善后会议、财政整理委员会及军事整理委员会议决之执行事项。

（三）关于消弭及调停各省间或各省内部相互间之纷争事项。

（四）关于与外国宣战、媾和或与缔结之条约案。

（五）关于募集内外公债及增加租税事项。

（六）其他临时执政认为应行谘询事项。

第三条　临时参政院关于前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各事项，得建议于临时执政，建议案须有参政十分一以上之连署，始得提出。

第四条　临时参政院议决案或建议案，临时执政认为可行时，分别发交各主管官署执行。

前项议决案临时执政认为不可行时，得于接受后二十日内交付复议。复议通过，即予执行。

第五条　临时参政院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均由临时执政就参政中特派。会议时，议长为主席；议长有事故时，由副议长代理。

第六条　临时参政院之议事，非有过半数之到院参政列席，不得开会。其表决以列席参政过半数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数时，取决于议长。但复议事件，以四分三以上之到院参政列席及列席参政三分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临时参政院议事细则，由临时参政院定之。

第七条　临时参政院行使职权，至正式政府成立之日止。参政之任期，以正式政府成立之日为限；但原派之长官有变更，或各该参政所属之会经改选时，应即改任。

第八条　临时参政院设秘书厅，掌文书、议事、速记编辑、会计、庶务等事项。

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秘书六人，事务员四十人。秘书长由临时执政特派或简派，秘书由秘书长呈请派充，事务员由秘书长派充。

秘书厅因缮写文件及襄理杂务，得酌用雇员。

第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东方杂志》第22卷，第9号）

滦州郭松龄致各省电

1925年11月22日发，26日早收

（衔略）顷上奉天张雨师电曰：张上将军钧鉴：耷龄猥承殊遇，擢长兼师，职在服从，义当报称。虎头肉食，万里不辞，马革裹尸，死而无悔。何敢苟求免难，不恤孤恩。顾仰体钧座偃武之衷，俯察辽民被兵之祸。治乱决无二门，仁勇不可两全。畏罪不言，负心更甚。窃为均座披沥陈之。

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格日亏。外币潜乘，寰省殆遍。倚期调剂，转与维持。刮我方输，易人废纸；血枯见骨，身没及颅。运转不灵，弥缝呈困，推衍所极，必至无财。

士兵苦战，将帅专圻。至于一卒，才折二缗，名为增钞，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膺宗殄绝，嫠媛流离，衅钟舍牛，藏盖埋犬。此犹不若，抑复何辜。死无义名，生有显戮。推衍所极，必至无兵。

军旅叠兴，赋敛日重。邑无仓廪，家无盖藏。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犒革载途。桀者逋逃，骚扰剽掠，宵忧盗难，昼惧官刑。哀我穷阎，宁有噍类！推衍所极，必至无民。

藐兹三省，介处二邦。宝矿毡庐，森林卉服，侨民满落，牧马成屯，陆轨分张，海航密接，朝发平壤，暮薄辽城。交通不周，责言猝至。入关竞逐，备墓必楞。盗党生中，敌兵谴北，彼若自卫，宁复戎疆。推衍所极，必至无省。

东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强交争，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尧封涂炭。谁为祸始，驯至国亡！去岁曹氏攘国，浙省构兵，足冻伤心，唇亡迫齿。钧座痛正气之不申，惧边人之将尽，钺旗所莅，壶浆咸趋。假使振旅出关，安民保境，阳樊不参，有卫无侵，岂不渣滓七雄，粃糠五霸。顾乃勉循下意，遽拂前衷，列阵淮流，耀兵江浦。比闻望燧而忧，列镇闻风而警。将欲凭陵劲旅，混一寰区耶！

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或乃安命善神，自娱暮晚；或乃寂身联省，暂庇危机。人方改弦，我犹蹈辙。微论人才既寡，地势复偏，强控长鞭，终成末弩。且天方厌祸，民久苦兵，上者固祈百姓之与能，不者亦冀六王之均势。必欲鲸吞西北，蚕食东南，方诅咒之不胜，岂讴歌之可有。试问辽阳鹤返，寄慨何如？鲁国鹃来，衔衷奚若。欲致平成，宁非梦呓。将欲多据疆圻取偿军费耶？异族相争，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谐，犒币未闻；德法之盟，载书终改。况此孑遗，孰非胞与。谓取之于邻省，则赤地久荒。谓取之于京师，则白藏早竭。甚或藉为口实，蠹我宗邦，所沾不过玉单之余，所累已胜铜山之重。狐缘虎视，鼋代猪亡。人盗其赀，我负其咎。此其失计，岂待申言。

沪衅甫开，苏师先溃，皖即风靡，鲁复土崩。伏机发于群方，战线延于数省。夫梦白蛇亘于修路，则头尾难援；巨象踌于狭途，则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讨伐，反唱调和，既属有名之师，复居难胜之数。钧座深虑颠危，力持镇定，不谓曳兵之将，犹戎卷土之心，必欲驱市从戎，倾巢赴敌？夷田于榛薮，殓成伍于沙场。松龄铜剑常鸣，铁衣未解。万里之鹤，犹随降志；八尺之龙，久殷汗血。方叙固无惧，欲一胜以何难？第以是孤军卷甲，长路馈粮，民有謡言，士无斗志。设使前逢坚壁，后遇奇兵，流马难输，悬车莫度，毕修之颈，方传起帐，伍参之肉，岂慰梦军。钧座扬县蔡之馀威，主治吴之伟绩。十年错节，讵利器之易成；三载卧薪，犹痛心之未定。万一项王歌帐，李主愁台，破竹之势忽成，绝株之忧将见。兴言及此，为愤何穷。松龄亲当戎路，熟察敌情，钧座委以节旄，乡人托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对蹇叔；纳肝之惨，死何以见懿公。盖自受命以来，无日不回肠欲绝也。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传之惇史，播为美谭。

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器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尊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莞严了，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横舍矢于普及，宝藏期于尽宣。三省富强，四邻和睦。钧座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果为衮而尽善，虽脱丽以何妨。夫市朝不改，败农夫无锻耒之忧；堂构相承，则部属无倒戈之罪。涂膏之士，蹈白刃而复苏；槁项之民，临黄泉而更苏。松龄上酬推解，下拯创夷。博采群言，更无他策。谨当扬旌东返，席橐上求，非得领颐，宁甘碎骨。先轸直言，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讵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战士也。等语。合行奉闻，伏希指示。郭松龄叩。养。

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之判决书

案据本党各级党部暨各地党员提出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案共十一件，经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详细审查后，议决应予汪委员以解职除名之惩戒，函达本会，当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判决处分：

一、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

二、开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不得在本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

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庭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其事实原委如下：

（一）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载在总章。总理逝世，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凡称“总理”不得加“先”字或“故”字，以明总理全部遗教即总理，并杜党魁之争，汪精卫在言论上必称“先总理”，实属故违决议。

（二）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临驭中央执行委员会，予鲍罗庭以操纵本党中央之权，并操纵国民政府。

（三）廖委员仲恺同志被戕后，听鲍罗庭之嗾使，放逐中央执行委员胡同志汉民，迫走中央监察委员谢同志持。

（四）违反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对段祺瑞、唐继尧、杨希闵、吴佩孚等各军阀领袖起妥协运动，且挟鲍罗庭之指使以自重。

（五）共产派之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十八个月中请假十四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中央宣传部长。

（六）共产党故别本党党员为右派、左派，借施其引拒之术，以挑拨本党同志之阋墙，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防止右倾、左倾发有训令。汪精卫竟顺从共产党人谭平山之指挥，倡言“要革命者向左去”，且师满清“宁赠朋友”之口吻，公然倡言“宁以国民党赠共产党”。

（七）运用种种机谋，破坏忠于党国之军队。

（八）凡为共产派或接近共产党者则擢用之，而抑压纯粹忠于本党之同志；并纵江苏省党部公然通令全省党员读陈独秀、瞿秋白所著之违反本党主义之《响导》丛书，而禁止戴委员季陶所著阐扬本党主义之著作。

（九）因广东大学之青年不受共产党化，汪精卫擅违校章，更易校长。

综上列各件，汪精卫罪浮叛党，行同卖国，当处严刑。但本会秉总理与人为善之诚，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予以自新，为此判决如上。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6日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外交次长沈瑞麟报告，驻京外交使团以浙沪迭次发生战事，影响外人商业，希望中国政府速将兵工厂及护军使衙门移住他处。议决由沈瑞麟向使团口头答复，政府对此一“善意”建议表示容纳，一俟时局平定，决当办理。

1月9日　“中华民国国民会议湖南后援会”致电段祺瑞，反对善后会议条例，要求立即“彻废该条例，任人民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予备会，而以政权交还人民，由国民会议予备会暂行掌握政治大权”。

1月15日　段祺瑞发布处置上海事变三项决定：一、裁彻淞沪护军使；二、停办兵工厂，移交上海总商会，改名商业制造厂，着陆军部派员到沪会同总商会办理接收事宜；三、上海永远不得驻扎军队及设置军事机关。

1月25日　上海出现反动组织“上海反共产主义同盟会”，总干事为邝宜扬。21日，该会发表宣言，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极为惶恐，大肆诬蔑诽谤共产党，

狂叫"共产主义不适于国情"，"共产党在中国，犹痨疫之在身，防其蔓延，惟有扑灭殆尽而后快。"

1月28日　中国社会党更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京设总部，省设本部，县设支部，江亢虎为总理。是日，该党发表宣言，并发表组织大纲十三条。

2月1日　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应出席会员一百六十六人，实到八十六人，不足法定人数。中外宾到二百余人，使团除美使亲到外，余派参赞。赵尔巽主席，段祺瑞致词。同日，段祺瑞发表《建设宣言》。

2月3日　孙传芳由杭州到上海与张宗昌会晤，经吴光新主持，双方签订合约，规定：孙将兵工厂交出，于三日之内彻退上海附近之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即日孙张会衔电令前敌"一律停止军事行动，所有宜兴、长兴一带驻军，着克日向后方适中地点撤退。"至此，第二次江浙战争宣告结束。

2月7日　段祺瑞令：特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派刘文辉为邦办；邓锡侯着免四川省长本职，特任赖心辉继任；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所有该省区军队均归节制。

2月13日　善后会议开第一次大会，到一百三十二人。通过"善后会议议事细则"，选举赵尔巽、汤漪为正付议长。

2月14日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就孙传芳来电所提请饬驻淞沪奉军完全彻退；请卢永祥离宁北上；请以张宗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吴光新为江苏省长三事进行讨论，议决卢永祥仍为宣抚使；奉军彻退办法，责成卢办理；苏督一席，此时决不更动；韩国钧辞应予照准。

2月15日　中华妇女协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通过宣言及简章。宣言提出女子应参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民族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等八条纲领。简章规定该会"以团结妇女，力争经济上、政治上及社会上之平等地位为宗旨"。

2月16日　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抵京，次日面见段祺瑞，陈述沪兵工厂接收经过及江浙最近形势。

2月19日　善后会议开第二次大会，讨论段祺瑞提出之整理军事大纲草案及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段到会致词，承认："环顾宇内，乱于兵，困于财"。林长民等就第一项提案提出质问，指出政府未提出具体方案，无从讨论。陆军总长吴光新出席解答，声明：政府提出此案，"时间甚为匆忙"，军队编制详细办法当提交下次大会讨论，请对此案"暂行保留"。

2月21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补充内阁问题。外长唐绍议一时不能来京，决定由沈瑞麟次长暂时署理。教、农二长由段分别函电敦促即日就职。

2月27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段祺瑞所提整理财政案。周作民等发言，谓此案与军费标准及整理军事案"甚有关系"，议决延会，俟下次开会时与军事大纲案一并列入议事日程。熊希令临时动议，请执政府代表出席，质问关于河南军事问题。段祺瑞代表、政府军务厅厅长张树元答称：政府已派员前往检查，设法消弭战事，使双方不致有重大战事发生。

3月1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典礼，到各省区代表八十余人，来宾数百人。大会宣布三项宗旨：(一)人民之自由与权力，应由人民力争；(二)人民应有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之坚强信念；(三)国民会议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战斗与夺取权力之机关。

3月2日　北京临时政府农商部在京召集全国实业行政会议，各省实业厅长出席。至本日止，会议历时二十余日，开议十六次，议决案一百六十余件，未议案数十件。

3月3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五次大会。广西代表动议，要求临时政府依卢永祥请废督电，实行废督。旋开议，第一案为"整理财政案"，议决请政府将原案彻回修正，并先征求各省代表同意，然后续向善后会议提出修正案。次议"收束军事大纲案"，以本案修正之案甚多，且散会时间已届，议决下次开会时合并讨论。

3月8日　冯自由、张继、乔义生、于右任、张知竞、卢师谛、邓家彦、徐忓、褚辅成、刘成禺、梅光培、黄大伟、朱卓文、彭养光、于洪起、李书城、吕复、贺之才、郭太祺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是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成立大会，通过简章七章二十九条。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冯自由出党。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各省，否认北京俱乐部，宣布"与本党毫无关系"。

3月10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六次大会，出席会员不足法定人数，改开予备会，亦未按原议程开议。任可澄以开会将近一月，河南战事仍未制止，动议休会。旋由陆军次长贾德耀到会报告河南战事可望和平解决，任案遂自请取消。江亢虎等提出善后会议职权问题。赵恒惕代表钟才宏发言，阐述联治案之五项纲要。

同日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开第一次正式大会，通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

3月12日　孙中山于是日上午9时30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在未安葬前，先将灵榇暂行安置中央公园社稷坛。北京临时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三日，派柏文蔚、王耒为治丧代表，"所有饰终典礼，并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意"。

3月16日　善后会议举行第七次大会，因会期已满，决定延会二十日并休会两星期，以便将重要各案开诚

协商。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长江庸报告审查“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因人数不足,时常流会,未有成绩,议决改由各专门委员联合审查,限两星期报告大会。最后讨论政府所提“拟依法团委员函请修改条例案”时,奉天代表与西南代表发生冲突,由会员调停结果,请政府酌量自决。

3月26日　福州学生界为抵制美国进口鱼倾销市场,与鱼商发生纠纷,省长萨镇冰下令惩办为首者。31日,警方捕闽江中学学生二人。4月2日,男女生九百余人往警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6日,警方又拘捕学生四人。7日学生往省署请愿,遭军警驱散。8日,各校学生数千人往省署,萨镇冰下令开枪,打死七人,伤数十人,造成“福州惨案”。同日,福州学生联合会发出急电求援。

3月28日　全国省议会联合会宣言,宣布成立理由四端:一、督促各省制定省宪;二、代国会纠正中央行政之流毕;三、调处各省争执;四、辅助政府从事和平运动,力劝各区实行自治。

3月31日　胡汉民令:派蒋介石兼理陆丰、海丰事宜。

同日　胡汉民令:任许济为建国粤军第四师师长。

同日　善后会议开第八次会议,讨论军事案。议决将政府“收束军事大纲案”承认其大体,以原案与修正各案共十七起并交军事专门委员会审查,限五日提出审查报告。

4月3日　善后会议开第九次大会,讨论财政案,议决:(一)段祺瑞所提整理财政大纲案,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及会员修正案共九案,一并交付财政专门委员会审查,限五日内报告大会。(二)咨达执政府请电各省区军民长官及各军将领限期报告最近财政军政情形。

4月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七十三次会议,根据廖仲恺提议,通过建立党军案: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成立党军,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编为党军第一旅,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兼任旅长,第二团团长为沈应时。全旅仍归蒋介石节制调遣。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此议决案。

4月16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到二百余人。会议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声中闭幕。执委会即开始办公。

4月17日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顾孟余、苏兆征、刘清扬、王乐平和七人为常务委员,议决出版会刊《国民会议》周刊,推刘鹤鸣起草为事细则,整理大会各种决议案等。

同日　广东粤汉铁路工程、机车、车务三处工人为反对无故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提出起用去年12月以后开除之工人,裁彻不熟悉路务之厶人冗员,机器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工人加薪等十一项条件。次日,政府派员解决,工人要求全部承认,于1[illegible]日全体复工。

4月24日　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成立。该会由陈诚、贺衷寒等人发起,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是国民党右派为对抗黄埔军校革命军人团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共组织,以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宗旨。该会于12月29日始行成立典礼,其组织亦由黄埔扩展至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

5月1日　北京临时政府公布修正临时参政院条例;派赵尔巽、汤漪、王家襄、徐绍桢、周学熙、江朝宗、屈映光、王印川、张广建、陆宗舆、吕公望、言敦沅、彭养光、黄书霖、王伯群、杨士聪、治格、刘传绶、凌毅、陈汉茅、邵瑞彭、乌泽声、邓汉祥、刘振生、金鼎勋、金兆棪、何葆华、李国凤、周肇祥,为临时参政院参政;特派赵尔巽为议长,汤漪为副议长。

同日　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工人代表二百八十余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人。大会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其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中国工人运动的策略和目前进行的具体方针及谋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

5月3日　段祺瑞公布《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特派许世英筹备国民代表会议。

5月4日　上海中华民国学生会总会及上海学生会两团体举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到会者千余人。恽代英等发表演说。全体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

5月7日　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纪念“五七”国耻,教育部曾有令劝阻,届时警察总监朱深令警队实行阻止。是晚,约三千人赴教育总长章士钊宅质问,章拒见。学生忿而捣毁门窗及用具。章宅急电话召大队武装警察驰至,打伤学生七人,捕去十八人。

5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工农群众,祝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号召“全国工农加紧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并表示当训令党员,“扶助工人农民团体之发展,以付全国工农之望”。

5月10日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是日举行纪念大会,到会万人左右。工人手持小旗,上书“罢工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演说者甚多,每人演说毕即大呼“工人团结万岁!”等口号。散会后结队游行并举行工会悬牌额典礼。工人高唱胜利纪念歌,弹声震天,欢声雷动。工会宣布是晚复工。

5月12日　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兼代教育总长章士钊请辞本兼各职,并于18日携眷出京。

5月16日　段祺瑞令:特派林长民办理国宪起草委

员会事宜；派王士珍、陈宧、田中玉、魏宗瀚、曲同丰、吴纫礼、林绍斐、黄慕松为军事善后委员；派梁士诒、黄郛、杨永太、卢学溥、汪士元、张嘉璈、金兆蕃、杨德森、王章祜、叶景华、黄元蔚、陈同纪、梁敬镈、王其渊、万兆芝、费保彦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特派王士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陈宧、田中玉为副委员长；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太为副委员长。

5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开幕，会期七天，于25日闭幕。会议议决：(一)接受总理遗嘱，以总理遗教为最高指导原则；(二)重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中全会关于容纳共产党员之决议。

5月中旬　联唐(继尧)派在香港皇后酒店六十号开会，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均出席，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陈炯明、邓本殷、香港当局均派有代表参加。议决马素担任外交，与香港政府接洽一切，军火由香港政府负责，谋攻广州。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潮梅党治条例十二条，以许崇智、蒋介石、邵元冲等五人为委员，组织政治局及民政局。

5月30日　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揭露日人枪杀顾正红、拘捕学生真相，并宣传反对工部局提案，又被捕房拘捕数十人。午后3时许，学生及市民近万人聚集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捕为驱散学生，举棍殴打，无效，遂下令向群众开排枪射击，当场中弹死亡十一人，重伤八人，轻伤十余人，(根据上海学生法律委员会调查。——编者注)，造成震撼中外之"五卅"惨案。

同日　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会通电全国，报告"五卅"惨案经过，吁请援助。同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开执行委员会，公决办法五项：(一)致电外交部向驻京英使提出严重抗议；(二)通电全国一致援助力争；(三)通电世界请主张正义；(四)通告工商界各团体速起援助；(五)派员赴医院慰问受伤学生。

6月1日　日本劳工联合会代表至外务省，呈递公民大会赞助中国青岛罢工工人议决案，要求：(一)停止武力干涉；(二)力戒胁迫中国政府；(三)惩罚妄图自利之日本资本家。政府答称：中国方面今无力应付工潮，故有日舰赴青岛之举。

6月2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沪案，段祺瑞主席。沈瑞麟报告上海学生被杀经过。阁员相继发言，咸谓英日等国驻沪当局对于无辜学生，竟采用武力摧残手段，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实属有侮我国国体，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当即通过先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严重抗议，并派曾宗鉴、蔡廷干等赴沪查办，并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抚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等四项议决案。

6月3日　北京百余校学生共五万余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声援"五卅"惨案。游行队伍先赴执政府递交九项意见，请向阁议席上提出，以作外交部向英使抗议之条件。嗣赴外交部，沈瑞麟亲自出见，学生代表要求向英使严重抗议，不达目的不止。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受阻，使馆界口予备水龙向群众喷射，使馆卫兵举枪威胁群众。学生忿极，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后游行队伍齐赴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议决条件：一、游行队伍即赴总商会，请即日罢市下半旗；二、请工界罢工；三、发起组织北京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四、实行经济绝交，以及向驻京使团提出严重抗议等。

6月8日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发出通知："凡洋商各航轮公司所有轮船之海员一律罢工。"是日，怡和、太古等各外轮公司海员五千余人一律登岸加入罢工。

6月10日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到一百五十七团体，二十万人，李石曾主席。

6月11日　汉口发生惨案。10日晚8时，英商太古公司过磅人殴伤码头工人余金山，各工人忿忿不平。晚9时，工人齐集口岸，拥至公司质问，与前来镇压武装警队冲突，当场捕去八名，工人忿而罢工。是日晨，数千名码头罢工工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表示抗议，并要求各界支援。肖耀南闻报，当派宪兵稽查到汉，协助武装军警镇压。群众被迫向租界转移，驻汉英领竟调义勇队及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毙三十余人，重伤二十余人，造成汉口惨案。

6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主张全体国民应一致督责北京临时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仿照前年中俄协定之例，另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专主权之条约。

6月23日　广州沙基发生惨杀案。广州工农商学兵十万人集会援助沪案，胡汉民主席，廖仲恺、汪精卫等均发表演说。大会通过沪案要求条件十六项。会后列队游行。当队伍途径沙基时，对岸沙面英、法等国外兵，突向稠密人群开枪。

6月25日　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追悼沪汉被难同胞大会，参加团体达四百余个，卅余万人，总指挥马良。上午8时开始游行，人各手执小旗，臂缠黑纱，沿途高呼口号，市民和之，极为悲壮。午后2时，游行队伍回返天安门。举行追悼会，于右任主席，议决反对政府与使团或使团所派代表直接交涉、要求政府外交公开等五条。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谦十六人为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

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是日上午在广州市第三公园举行成立典礼。胡汉民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分授各政府委员印信,委员宣誓就职。广州市十万人齐集会场,高呼"拥护国民政府"、"实现孙先生遗嘱"、"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同日,大本营及省公署宣告结束,停止办公。

7月2日　重庆发生惨杀案。是日,工人、学生集龙门浩外附近向市民宣讲各地惨杀案,英舰水兵持枪登岸,用武力驱散群众,发生冲突,市民被刺伤多人。次日,各界万余人举行集会对英水兵暴行表示抗议。当地军警借口维持治安,严禁集会,又刺伤市民十数人,并拘捕工人、学生数十人。

7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主席汪精卫。是日,许、蒋、谭、朱各率所部军队到东校场宣誓就职,并行阅兵式,发出告诸将士文。

7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于国民会议宣言,要点为:(一)国民自动的开国民会议预备会于北京,开会日期为今年八月一日。(二)国民会议以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完全依照本党总理孙先生去岁十一月十三日宣言所开列者。(三)在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中,接收上海、青岛、九江、汉口、广州各处人民之要求,及全国人民之要求,使人民意思得充分表现,并共同讨论计划一切进行方针。(四)在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中,决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审议其实行方法。

7月11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派水陆纠察队封锁省港交通,旋发出通电,宣布本月10日起,所有轮船航渡,一律禁止往港及新界,并要求国民政府予以同情与援助。

同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军事部组织法》。

同日　国民政府令:任卢兴原为总检察厅检察长;陈融为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林云陔为广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7月15日　国民政府令:任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

同日　国民政府公布《广东省政府民政厅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建设厅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军事厅组织法》》

7月17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广东省政府商务厅组织法》。

7月20日　国民政府训令裁彻前大本营内政部、军政部,所有该二部一切事务,移交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

7月22日　国民政府令:特任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派林翔、卢兴原、陈融、林云陔、曹受坤为法典编纂委员会委员。

8月11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沈瑞麟所提沪案各关系国主张派遣司法调查员重查及政府应持之态度问题,认为:沪案经六国委员调查,无重查之必要,更不待于司法调查,可由外交部与外交委员会共同决定对待办法。

8月13日　段祺瑞公布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之条约两件,即"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及"九国间关于关税税则之条约"(即九国公约)。

8月20日　上午9时50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廖仲恺在广州偕夫人何香凝乘车抵中央党部门首,遭凶徒狙击,中弹受伤,于11时在医院逝世。同车之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同时受伤。是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讣告。各级党部下半旗三天致哀。

同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特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应付时局。25日,特别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

8月23日　国民政府令:监察院监察委员陈秋霖于8月20日与廖仲恺同在中央党部遇刺,救治无效,溘然长逝,特发给治丧费五千元。

8月31日　段祺瑞令:改编福建警备第一师师长卢兴邦褫去现职,交陆军部严行通缉,务获归案惩办。

同日　国民政府令:公布《陆军测量局编制大纲》。

9月1日　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开会,议决三事:一、统一财政,设监督委员会,强迫各处解部;二、出兵东江;三、胡汉民出洋。

9月18日　淞沪戒严总司令部派出大批军队解散上海总工会,封闭会所,拘留职员二人,并出布告以"宣传共产,鼓动风潮"为由,通缉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时限令各工会即日一律自行取消。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电,说明事实真相,吁请全国各界"主持公道,予以实力之援助"。

9月24日　国民党为促进各界与国民政府合作统一广东,是日召集广东"军、政、学、农、工、商各界大会",到千余团体,十余万人。林祖涵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大会。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省政府代表陈公博、总商会代表冯芝荪、广东对外协会代表谭植棠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大会通过宣言,谓:"广东的统一,就是广东民政财政及军政的统一。"指出:"要使人民与军队结合起来,以全力做国民政府及国民之后盾,方能扫除一切障碍,方能达到广东的统一。"

10月7日　段祺瑞指令批准加入国际禁止贩卖妇孺公约三种及禁止淫刊公约。按:禁止贩卖妇孺公约三种,即:1904年5月18日及1910年5月4日各国先后两

次在巴黎签订之《禁止贩卖白奴公约》;1921年9月30日订于日内瓦之《禁止贩卖妇女儒公约》。《禁止淫刊公约》于1923年9月12日至1924年3月31日在日内瓦签字。

10月11日　广东省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历数陈炯明勾结帝国主义、图谋颠覆国民政府、摧残工农运动之罪行,声明此次出兵东征,为统一广东,扫除陈炯明,"以推倒帝国主义,完成孙大元帅为求国家独立平等之遗言"。

11月5日　国民政府分电奉直两军将领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及吴佩孚、肖耀南、孙传芳,促请拥护国家及民众利益,避免此次无谓战争,并提出四项解决时局办法,其要旨为:(一)建设统一全国之真正的国民政府;(二)于最短期间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三)发起国际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四)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

1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本年12月14日在广州开第四届全体委员会议,明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25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外交、内政、陆军、海军、教育诸部总长李思浩、沈瑞麟、龚心湛、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等全体总辞,内阁陷于瘫痪状态。

11月28日　北京国民党西山会议闭会,通过反对联共政策的决议:(一)驱逐鲍罗廷;(二)取消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党籍;(三)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主持教育行政;(四)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作官吏;(五)不准共产党参加群众运动,如青年运动、农工运动等。

12月2日　西山右派会议发出通电,宣布取消共产派中央委员的党籍,称:进"查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皆属共产党人,应依议决开除。"

12月7日　孙传芳在南京召集江苏政务会议,并发表宣言:(一)请省长历行考绩,肃清吏治;(二)统一财政;(三)警务、司法、教育、实业关系民生,应从扫除旧毕入手;(四)保卫团必须寓兵于农;(五)道尹职司监察,至为重要,防止省侵道权。次日,孙传芳回抵杭州。

12月9日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上海执行部恽代英,略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广州开会,请转苏、浙、皖、赣、川、湘各省二届会议代表早日启程来粤。"

12月11日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申孙中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根本方针;回顾党内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种种分子,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派之间播撼与坚持根本方针之斗争经过,要求全党同志识破谢持、邹鲁企图破坏孙中山根本方针之反动计划。

12月14日　国民党南京市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拥护西山右派会议决议案。声称:西山会议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本党最高权力机关",其一切决议"惟有绝对服从";如有违反者,"即系本党孙文主义之叛徒","本党唯有本'先除内奸,后攘外敌'之精神,以横扫'反革命'之挞伐对付之。"

12月20日　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山会议派)在《民国日报》刊载启事,声明开除"共产派分子"恽代英、张廷灏、刘重民、陈比难党籍。

12月25日　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各党卫同志书》,指责西山会议派"自布议案,快其驱除异己、发舒厶忿之偏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

12月29日　徐树铮在廊坊被枪杀。徐由京赴津,车抵廊坊站国民军一军防地,师长张之江派参谋长张钺率卫队至车站迎徐,徐甫下车,即被卫兵枪击身死。次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发出通电,供认"行凶","借报杀父之仇"。但此事实由冯玉祥通过鹿钟麟密令张之江执行。

外　交

1月18日　段祺瑞据外交部呈请,公布《中国玻利维亚通好条约》。

1月29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英、美、法、葡、意、比、日、荷各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正式提出召集关税会议之要求。

2月12日　驻京使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军阀把持铁路为借口。干涉中国路政,略谓:"外人利益与铁路有密切关系,各铁路不特于外商所供给及实用之装备负债数千万元,而对于各国所持中国铁路债券数万万元,亦负有责任"。照会"警告中国中央政府,迅将中国之铁路全部恢复通常状态","凡铁路收入经营等事,概移交合法管理机关"。

2月26日　加拉罕就日俄协定中承认朴资茅斯条约问题复照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认为中国在1905年及1915年两次与日本订约已承认朴资茅斯条约有效,并声明苏联承认朴资茅斯条约有效"绝不抵触中国权利"。

3月4日　驻京日使芳泽答复北京临时政府上月11日关于日俄协定承认朴兹茅斯条约之抗议,声称日在满洲所得之权利,业经中国于1905年中日条约承认,"不受中俄两国间任何协定或争议而蒙受影响。"

3月6日　苏联大使加拉罕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苏俄曾于1921年派兵入蒙,以平白匪,现"业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开始由外蒙撤兵,目前业已彻尽"并望

中国乘此时机，解决中蒙关系问题。

3月13日　各国驻京公使前往行馆吊唁孙中山逝世。驻上海、广州各国领事亦往灵堂吊唁。

4月1日　驻京英、美、日、意、葡、比、西七国公使照会法使，对金佛郎案提出质问，略谓：庚子赔款用纸用金，各国均有关系，向来交涉由八国联衔，反对法国单独与中国政府解决金佛郎案。

4月2日　驻京法使玛太尔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告以法国政府对中国施行海关附加税以赈水灾之事，予以赞同。

4月3日　段祺瑞指令：派驻西班牙公使刘崇杰为与委内瑞拉国签订通好条约全权代表。

4月7日　驻京英代办白拉瑞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谓云南缅甸边界土匪迭次扰乱，英人所受损失约数十万，驻滇英领曾向唐继尧要求赔偿，迄无回复，现奉伦敦训令，须请中央政府赔偿，附抄英领所开损失清单，希查照见复。

4月23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公布金佛郎案说明书，将中法协定与新协定比较，共列十三项要点。

4月24日　西班牙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嘎利德向段祺瑞递交国书。

4月40日　"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协定"规定日本退还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设中日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名额为中国十人，日本十人，委员会每年可支用经费二百万元。总委员会之职权规定为："不违反日本法令范围，有对于事业之计划规定及管理三项权限，但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发生效力。日本外务省之文化事业部，仍然有最后决定之实权。"

5月12日　驻沪各国领事团召集临时会议，英、美、意、日各国领事均到会。英领事巴力德报告本月6日、9日两晚中国海军炮击海关巡轮及英商游船经过，议决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于即日召集驻沪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同日，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亲赴驻沪英领署道歉。16日，英领要求赔偿损失二千两，中国当局许诺，此事了结。

5月19日　驻京各国公使在意使馆开使团会议，讨论答复北京临时政府提议之收回沪公廨案。决先由意领使电驻沪领团从速查明情况，呈具说贴，再行答复。

6月3日　加拉罕致谍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对于上海工人、学生被枪杀，向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同情与悲哀之情感"。

6月4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本月1日上海西捕又杀华人，向公使团领袖意使翟禄第提出第二次强烈抗议，声明公共租界横暴态度，已激起民情之忿懑，租界当局实负全责，要求使团速饬驻沪领事团，立即停止开火。

6月6日　驻京使团答复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第二次照会，否认英捕滥杀华人之责，并认为中国政府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决由各关系国派代表赴沪就地调查。同日，领袖公使意使致函外交部，告以"代表团赴沪查报实情，定本月8日启程"。

6月11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驻京使团第三次照会，指出：使团4日、6日两次来照将沪案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要求租界当局"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以便进行交涉。

6月12日　驻汉英领柏达对11日夜英海军陆战队开枪扫射华人一案，照会湖北督办肖耀南，声称："贵督办及中国当局如果迅速预防，不以无力量之和解办法敷衍，决无此事发生。务请禁止罢工、抵制外货、散发传单，拘拿扇惑及造乱之徒，调查排外阴谋，其为首者务须一并拿办。"

6月13日　午，段祺瑞宴驻京日使芳泽等，讨论沪案。芳泽拟单独解决，不与英并案讨论。

6月14日　驻京意使翟禄第访晤段祺瑞，谓："本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接到上海委员团调查报告，议决扩充委员团之权限，已训令该委员团，并授予就地与中国委员讨论解决之权，俾沪案从速了结。"

6月15日　驻京使团授予赴沪调查委员以就地与中国委员讨论解决"五卅"惨案之权。北京临时政府令蔡廷干、郑讦、曾宗鉴、虞洽卿与使团所派委员根据事实克日开议，并派交涉员许沅随同办理。虞洽卿接电后即电请辞职。

6月16日　中外委员在上海举行首次解决沪案谈判，到会有法、美、意、英、日、比六国委员及中国方面蔡廷干、郑讦、曾宗鉴、许沅共十人。中国方面提出：完全达到十三条，视为本案解决。六国委员认为一至五条可以磋商；其余各条，"本委员无权解决，须电京请示使团后再议"。

6月17日　中外各委员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解决沪案谈判，续议首次会议各议案。六国委员允将第六条收回公廨一项并案讨论，惟须附带条件，中国方面以第六条既并案讨论，则第十一条之三附律案，第十二条之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案，尤须先行解决。六国方面允俟京电到后，再行书面答复。

6月19日　驻京使团会议议决沪案移京办理，推举意使翟禄第、法使玛太尔、美代使迈尔为交涉专员。当日由意使亲往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访晤沈瑞麟，报告六国

议决结果，并请中国方面亦为同样之准备。

6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为沪案交涉停顿一事，照会驻京意公使翟禄第，略谓："原些双方所派委员具同一和平精神，详加审核讨论，俾得早日解决。乃甫经开议，贵方所派委员忽宣告交涉停顿，离沪回京，与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提议就地商议之本旨不相符合，当此群情忿激之时，万一因交涉停顿，迁延时日，其责任当有所归，此不得不予为声明者也。"

6月25日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外交委员会，是日公布外交委员会条例共十一项。该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外交咨询机关，孙宝琦为委员长，汪大燮、颜惠庆、王正廷等十八人为委员。7月1日，孙宝琦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6月26日　广东政府交涉署照会驻广州英、法领事，对沙基惨案提出第二次严重抗议。照会列举调查委员会报告之要点，确实证明沙面外兵首先开枪射击。提出要求条件：一、各关系国派大员谢罪；二、惩办关系长官；三、撤退各关系国驻粤兵舰；四、将沙面租界交回广东政府；五、赔偿毙伤华人。

7月1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分电驻英、美、法、日、意、比、荷、葡八国使馆，令速向驻在国政府催复修改不平等条约照会。

7月9日　驻京法使马太尔不满于英使极力袒护工部局之抗命行动，于是晚借沪工部局不遵命问题声明辞退沪案交涉代表。次日公布声明书谓："外交团与上海工部局，关于工部局董事会之权限问题及其对于使团之地位问题，解释上似已发生冲突……故认为在这种争执未解决之际，进行交涉，亦属无用。"

7月11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使团，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停止供应各厂电力一事，提出抗议，声明"倘因停电罢工发生骚动事情，该工部局应负完全责任"，要求转饬工部局照常供给各华厂电力。

7月12日　国民政府招待广州报界记者，胡汉民报告外交方针，表示："政府对付帝国主义，办理外交，决定遵守先大元帅遗嘱，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谭延闿宣布统一军民财政计划。汪精卫说明改组政府理由与原因，略谓：此次改组，废除首长制，实行委员制，"此实国民党同志所最宜注意之事也"。

7月13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意使翟禄第，要求迅速通知各关系国公使，择定日期正式开始沪案交涉。

同日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就沙基惨案照会北京临时政府。照会歪曲事实真相，否认英兵首先开枪，并将事件归咎于报纸之鼓吹。越二日，又致照外交部，且附有所谓"外人四人亲自目睹攻击沙面之证明书"，请北京临时政府将此两照登载华文诸报。外交部拒绝英使要求，并电广州国民政府请蠲弃成见，将调查报告电京。

8月3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修改湖北省署提出之汉案交涉基本条件，并于次日将修改意见致电征询肖耀南，谓："第一条收回租界，彻消领事裁判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可包括在不平等条约之中，自可并案办理。第二条与第六条均为本条责任上应有之事项。第六条改为英公使向中国政府及英驻汉总领事向湖北地方长官道歉。第三条改停泊汉口之英国军舰应即撤退，嗣后非得中国政府许可，不得在内江内海自由行驶及停泊。第四条国内用人行政权操自我，应由主管部门核办，无庸向英人交涉。第五条当在修改条约案中交涉，修改为英人在汉口及其他地方设立之工厂，关于待遇工人事项，应遵守中国法律。"

8月5日　北京外交委员会讨论沪、汉及沙基等案，议决四项：一、对外交部修改之汉案交涉基本条件认为妥当；二、使团以沪案所提修正不平等条约，须候各国司法委员调查后方能开议，系有意延宕，外部应速向使团敦促开议日期；三、推许世英、江庸速访孙科、傅秉常，询问沙基案真相；四、南京和记风潮，速电郑讦就地解决。

8月10日　驻京美使马克谟正式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略谓：本使已接本国训令，关于中国关税之九国条约批准书，于本年8月5日换文，即发生效力。请中国政府择定日期、地点，召集关税特别会议。

8月18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将邀请英、美、日、意、法、比、荷、葡八个参与关税特别会议之通牒分别送致各该使馆，首先声明："1922年1月5日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开第十七次会议，中国委员对于关税税则条约虽予承认，但曾宣言无放弃关税自主之意，将来一遇适当时机，仍欲将此问题重行讨论，提出于行将开幕之会议，并希能有一种之决定，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并通告拟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开会。

8月26日　中俄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正廷演说，希望加拉罕"返国公毕早日来华，俾中俄间久悬未决之正式条约，得以从速观成"。加拉罕答称：苏联"处处愿为中国尽力，谋两国相互间之幸福"。开幕礼成后，即由王正廷与加拉罕议决在会议中分设六个专门委员会。即晚由王通电，报告中俄会议已正式开幕。

同日　驻京英代使白拉瑞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表示英国参加关税特别会议。9月18日又致照外交部，告以英政府已决定以麻大臣、皮乐上校及中图德为全权代表，牛敦、付夏礼、台克满为专门委员。

9月4日　华盛顿会议条约各国（英、美、法、日、意、比、荷、葡）驻京使馆分别答复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6月24日促请修改不平等条约照会，复文措辞大体相同，大意为：修约须视中国能否保护外人权利与利益为准；关税自主，俟财政改革后予以特别注意；领事裁判权问题，俟

派员来华调查后决定。

同日　驻京法使玛太尔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同意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团长为驻京法使玛太尔，委员为驻京法公使参议祁毕生、法国总领事商务随员克乃德。

同日　段祺瑞指令外交、交通两总长，批准万国邮政公约。

9月6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电令驻英、美、日、法、比、意各国公使、代办，向驻在国政府声述：对于沪案司法调查，我国在原则上暂不承认，亦不派员参加。

10月1日　中意金佛郎案在北京正式换文。此案照法、比成例解决；退还三年缓付款四百八十余万，由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抵借现款，充中秋应发之军政费，前罗文干所订奥款合同，连带解决，改定新约。

10月2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驻京荷使欧登科两照会：(一)对1日来照，表示赞同，并愿继续讨论其余各问题，即：责任暨由此而生之结果问题，上海会审公廨交还问题，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内加入华董问题，务使最短期内，得一良好之结果。(二)对上月15日来照主由美英日三国各派一法律专家为"五卅"案司法调查委员一事，仍行驳复。

10月19日　北京临时政府与奥地利签订通商条约。中国全权代表、驻奥公使黄荣良，奥国全权代表、奥外交总长麻达雅，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同日　中、日、苏铁路联运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代表余序参加会议，并当选为副会长。

10月22日　吴佩孚发表外交宣言，声明对于有约各邦，前已订之条约，必加以专重；对侨居外人生命财产，必切实保护；惟望各国不售武器并与对方以经济及借款之援助。至于关税会议，声明俟合法政府成立之后开会。

10月26日　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居仁堂开幕。英、美、日、法、意、比、葡、荷、丹、瑞典、挪威、西班牙十二国派代表出席。段祺瑞致欢迎词。沈瑞麟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王正廷宣读关税自主提案，办法为：一、列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专重关税自主权，解除现行协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国定税率条例，与裁废厘金同时实行，至迟不过1929年1月1日。三、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三十，乙级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四、前项临时附加税，于本条例签字三个月后开始征收。五、前四项决议于本条例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各国代表相继致词。推举严鹤令为大会秘书长后，宣告散会。

11月4日　驻京使团开会讨论应付中国时局方针，英、美、法、日、意各公使出席。荷使欧登科主席。讨论结果，咸于7日面询沈瑞麟外长，提出如不能保证京津通车，则将由使团组织联军维持。

军　事

1月4日　段祺瑞为冯玉祥请裁陆军检阅使及开去本兼各职事，令准裁检阅使，仍着督办西北边防事宜，即日销假任事。是日，并指令：准陆军第十一师，师长由宋哲元暂行代理。

1月8日　全浙公会致电段祺瑞，揭露孙传芳联合齐燮元"占松窥沪"，请明令罢免，饬其率队离浙。

1月11日　凌晨，齐燮元联合孙传芳军队对上海张允明部驻军发起攻击，双方在徐家汇、龙华、闵行等地激战至正午，张军不支退却，张允明逃入租界。孙、齐组成浙沪联军，联衔宣布占领上海，拒奉军南下。

1月13日　段祺瑞召集特别紧急会议，讨论苏沪问题，发表四令：一、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二、派陈调元邦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三、任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四、任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1月26日　陈炯明部入侵联军驻地虎门、石滩，东江战事开始。上午10时，陈军练演雄部五千人由东莞、宝安二路向虎门进袭，与驻下岗桂军谭启秀旅接战数小时，陈军败退。同日，陈军向石滩滇军范石生部防线进攻，被击退。

2月22日　联军右路粤军在白芒花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二路进攻海陆丰，直捣潮汕。许崇智率张明达师、许济旅由三多祝进攻海丰，蒋介石率教导二团由梅陇进攻海丰。24日上午二路开始出发。

2月26日　胡景羽、憨玉琨两军在登封县激战。胡军约四旅，由李虎臣统率，包围憨军，憨部不支而退，死伤千余人。是日，胡景羽由开封专车来郑州督战。次晨，胡军进战登封县。

3月4日　滇军将领杨希闵、范石生、胡思舜、廖行超等在广州谢庐开会，研究对唐继尧作战计划。

3月6日　段祺瑞令：任韩复榘为暂编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一旅旅长，过之纲为第二旅旅长，孙良臣为暂编陆军第二师步兵第三旅旅长，张维玺为第四旅旅长，石敬亭为暂编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蒋鸿迁为暂编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3月19日　东征联军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击败五华城守军林虎部王得庆师，于是日上午9时占五华城。教导二团及陈铭枢旅冒雨进攻兴宁，次晚8时攻克。林虎部受重创，向东逃窜。联军乘胜向梅县追击。23日，梅县林军弃城而逃，遂占领之。

3月23日　张作霖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东三省国防军共编十八师，李景林、张宗昌、阚朝玺、张学良、赵恩臻、郭松龄、高维岳、蔡平本、汲金纯、齐恩铭、汤玉麟、裴春

生、张九卿、张作相、于深澄、万福麟、吴俊升、穆春分任第一至第十八各师师长。

3月29日　胡景羽下令班师，潼关、陕州各留驻一旅，余均彻回洛阳。胡憨战事结束。

4月14日　岳维峻与孙岳在郑州开军事会议，议决：(一)各军防区照议定办法分别驻守，财权政权俟省长就职日一律收归省署；(二)团结二、三军团体；(三)豫西二军全部移驻京汉铁路沿线，开封三军一律移驻陇海路沿线；(四)二、三军协同出兵三万，肃清刘、憨残部。

5月5日　"东北陆军校阅监"姜登选在徐州就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职。

5月19日　广州因驻粤滇桂军调驻大军，杨希闵、刘震寰又逗留港香，久不返省，形势聚然紧张，谣言复炽。是日，胡汉民将革命政府迁驻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办公。连日特由朱培德、李福林集中军队四千余人，屯驻士敏土厂左右各要隘，施行特别戒严，水面一带则以中山舰率同海防缉厶等舰沿河日夜梭巡。23日，帅府通令，谓现时谣言繁兴，人心未定，河南为政府暂时驻地，不论何项军队，非奉本帅府命令者，概不准渡河。

6月7日　桂军第五师师长林树巍宣布脱离刘震寰，改编为建国桂军第一师。11日，滇军第四师朱世贵率所部脱离杨希闵，改编为建国滇军第二师。

6月10日　全川和平弭兵大会成立。选邵从恩、黄美涵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并通电各军提出六项弭兵主张，即：核实枪枝；取消防区制；组织全川财政委员会；军队由人民供应军饷；兵工厂改为普通机械厂；军政归省署办理。

6月12日　粤各路联军击败杨刘叛乱，收复广州城。

7月11日　杨森部郭汝栋、白驹、何金鳌、兰文彬等师二万人，由黄毓成指挥，围攻荣昌刘文辉部，鏖战四昼夜，双方死伤数千人，刘部向永川、大足败退。14日晚，杨军占荣昌。

同日　段祺瑞令：任张联升为暂编陆军第五师师长，王宗荃为该师第九旅旅长，刘文瑞为第十旅旅长。

8月11日　国民军徐永昌旅与孔繁锦部激战于凤翔、岐山一带，孔军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却。越二日，孔军败走湃陇一带，陇南、陇东已无甘军踪迹。

8月2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军政，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改为第一军(统辖第一、二两师)，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琛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

8月29日　熊克武部川军第二军奉国民政府令向桂省富川开拔，越二日，军长汤子模启程前往。

9月15日　刘志陆部分三路向东江移动。左路指挥谢文炳率部出发海陆丰，右路指挥林烈率部出发老隆、河沅，中路指挥黎生，前敌总指挥李易标由五华、紫金击三多祝。是日，刘下达各路动员令，18日，下达总攻击令。

9月19日　蒋介石密令黄埔学生军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及铁甲车队、江固舰，解决反革命各军。次日，第二大队在虎门、太平，第四、五团在东莞，包围粤军第三师师长，前魏邦平部旅长郑润琦部，将其全部缴械；粤军陆海泉、谭曙卿、魏丽黄三旅迫石龙，粤军第三旅旅长莫雄部遂亦缴械。

9月29日　国民政府东征军组成。中路为第一纵队，纵队长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右翼为第二纵队，纵队长为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左翼为第三纵队，纵队长为攻鄂军军长程潜；总预备队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部；总指挥蒋介石在中路督战。

10月13日　东征军两路包围惠州城，第一纵队第三师谭曙卿之第八团及第二师王懋功之第四团攻惠州之北门。左翼程潜部对南门警戒。守军杨坤如部奋力抗拒，血战入夜。次日晨，飞鹅岭炮兵掩护步兵登城，战至午后，杨军腹背受敌，渐不支，遂出东门向紫金方向退去。东征军第三师八团由北门攻战惠州。越二日，蒋介石率部入城。

10月15日　孙传芳通电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同日，浙军在长兴、宜兴、湖州一带防地业已布置妥贴，前锋部队兵力达二万以上，并下总攻击令。

10月18日　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第四军司令卢香亭由陵口向丹阳前进，晚9时占丹阳，奉军退至镇江。次日，联军第二军前线总指挥杨震东部占镇江，晚又占龙潭。

10月31日　国民政府任朱培德为南部军总指挥，分兵四路前进。陈铭枢为第一路指挥，王均为第二路指挥，戴岳为第三路指挥，俞作柏为第四路指挥，陈章甫部为右侧支队。是日，第一、二路分别收复台山、开平。

11月1日　镇威军、国民军两方代表会同段祺瑞所派之姚震、曾毓隽、邓汉祥在北海静心斋开会。决定由镇、国双方代表及政府派员共同实地调查双方之军事行动及防务布置，是否有足以引起误会之处，然后谋一调解办法。

11月8日　蒋介石召各师将领在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讨论对陈军残部约二万余人窜入闽境之处置办法。议决分三路攻闽：何应钦率第一纵队从饶平出分水关；谭曙卿率第二纵队出大埔，经枫郎入平和，程潜率第三纵队出梅县入松口攻永定。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一切。总指挥部即移至隰隍就近指挥。次日，电告国民政府，谓："现我军全部集饶平、大埔，予备攻闽。"

11月10日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会同江大、龙骧、江平三舰分水陆进攻中山县城，战一小时，敌林

警魂部向西南逃窜，遂收复中山县城。

11月16日　奉方代表李景林、郭瀛洲、冯方代表张树声、王乃模在天津直督署签订和平条约八项：(一)奉军让出保、大，京汉路全线予国民军；(二)山西地盘由国民军支配；(三)国民军由海道输入之军用品，奉军不得阻碍；(四)京畿一带，双方均不驻兵；(五)津浦路全线归奉军；(六)长江下游为奉军发展地，上游为国民军发展地；(七)中央政权奉、国各半；(八)财政收入，奉、国平均分配。

11月18日　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与奉军李景林在保定发生冲突，经双方驻京代表调停休战。执政府开会议决，令"奉军速遵照和平协定，于19日前撤退京汉铁路沿线之军队；国民军在奉军未撤退完前，不得移防"。越二日，邓率部入保定。

11月22日　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主和拒战，张作霖电召郭回奉。郭即在天津与李景林商议取一致态度，是日通电倒戈反奉，请张作霖即日下野，将东三省军、民两政交张学良接管。

11月30日　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说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又胁迫张学良军，图进兵奉天。

12月7日　张作霖取消辞职下野之意，决定集兵辽河左岸与郭松龄作最后决战。吉(吉林)、黑(黑龙江)等省部队亦奉命援奉。

12月22日　上海总商会致电段祺瑞反对日本出兵东北，要求"迅与日使交涉，并电我驻日使向日本外部迅提抗议，限令彻回，恢复原状，以保国体，而平民忿"。

12月23日　郭松龄军与奉军决战于巨流河，奉军右翼张作相部占高台子，张学良部由正面猛攻，左翼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迂回袭击郭松龄背后，又有日籍顾问林大儿和荒木等邦助布置军队和指挥日本炮手轰击郭军，郭军顿时失利，全线溃退，不能成军。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乔装匿逃。

12月30日　日本增防满洲军队，因张、郭战事了结，已将其一部分陆续撤回原防，前移入奉天省城之辽阳师团司令部亦同时彻去。是日，驻京日使芳泽发表彻兵声明书，解释出兵理由，并声明未撤部分亦将于明年归国。

经　济

1月10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在国务会议上报告，阴历年关各项开支至少需一千二百万元，财政部张罗借款无着。段祺瑞通电关系省份，务于年内酌解款项，后仅山西汇来三十万元。

1月30日　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由外长沈瑞麟派员分访驻京英、美、日、荷、葡、比、意各使，请履行华会条约。召集关税会议。次日，执政府因得英、美同意，仍由外部分电驻上述各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正式提出此项要求，

3月16日　北京临时政府公布十四年八厘公债条例，总额为一千五百万元，以停付德国赔款之余款为担保，期限十年，每百元实收九十元，周息八厘，第四年起开始偿还。4月1日起发行，作为支付中央紧急政费及领使经费之用。

4月12日　中法金佛郎案协定在北京签字，并正式换文。其要点为一：法国政府承认将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自1924年12月1日起算。其1922年12月1日后二十四个月作为展缓期内所存过期未付之款，悉数交与中国政府。二，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款余额，按1905年所采用之中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一并折合美金，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债之担保。中法实业银行将收回远东债权人应得之债券，全数一次交与中国政府，作为偿还前次垫款之担保。三，中法实业银行发行五厘美金债票用途分配如下：1. 发给远东借债人以票面换回此次债权人所存之债券；2. 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 代付中国应交中法实业银行股本余额；4. 拨还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之各款。四，作为担保品之债券，应以银行自身之所得等项收入拨还。五，远东债权人所存之债券交与中国政府后，应与其他债权人享有同等利益。六，美金债票上所载文字及发行数目、票面金额，应照中国政府核定格式办理。七，中国政府以中法实业银行股东资格，派员检查该行帐目。八，关于1923年2月8日法国法律施行条件之规定，仍以1922年6月24日、7月5日、9日及7月27日两国政府之各项换文为有效。

4月22日　金佛郎案收回款项，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与汇丰银行商定分三期交款，5月10日交四百万，20日交三百万，30日交三百另四万。

5月27日　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中法五厘美金公债，发行额为四千三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美元。用途：(一)收还倒闭之中法实业银行债权者所持之无利息证券；(二)补缴中国政府之该行股本；(三)偿还中国政府之该行借款；(四)中法两国合作之教育慈善事业。以法国退还之庚子赔款作担保，年利五厘，以二十三年为期限，偿还期自1926年1月15日起至1948年1月15日止，每年还本一次，分二十三次还清。

8月26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召集之全国印花税会议在京闭幕。会议表决于9月1日起实行推销新式印花税等议决案二十余起。

9月11日　国民政府令：批准公布《修正发行广东短期金库券条例》。《条例》规定省金库券定额为二百万

元，月息六厘，三个月期满本息偿还。

9月28日　关税特别会议专门委员在外交部开会。议决将全部事务分三股办理；梁士诒为第一股长；王正廷、王宠惠为委员，专管国际条约，国定税率、关税保护政策方针；颜惠庆为第二股长，李思浩、姚国桢、蔡廷干为委员，专管二五加税，整理内外债，修改税则，评定货价，裁厘加税，烟酒税则；黄郛为第三股长，叶恭绰、施肇基、莫德惠为委员，专管关款保管，陆路关税、内河外海吨税，海内外贸易统计，海关制度。外交总长沈瑞麟总其成。

10月14日　胶济铁路民业公司正式成立。山东督办省长公署为专重黎元洪由人民筹款赎回胶济铁路之前令，是日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民业公司，任省议会议长宋传典为筹备主任。

10月21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大会，讨论关税问题。到二十二省区代表。议决：一、对关税问题务达自主目的；二、达到自主之进行计划，交付审查会审查；三、发表宣言表示全国商界意见；四、通告全国各商会，于本月26日关会开幕之日，悬国旗欢迎各国代表。

10月23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委员会通过“关税自主办法大纲”，共九条，咨达政府。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国家课税主权完全之原则，应实行关税自主。凡现行国际条约条款换文或声明书等，足以侵害中国课税自主者”，均照本大纲“各条之规定分别改正之”。

10月24日　段祺瑞公布临时参政院议决《关税定率条例》、《烟酒进口税条例》。按：《关税定率条例》凡十七条，其中规定：“进口税除烟酒及国家专卖品同类者另行规定外，其税率最高为值百抽四十，最低为值百抽七点五。”又规定：“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之《国定税率条例》，自本条例施行之日，即行作废”。《烟酒进口税条例》共四条，规定：“进口税率为值百抽五十至八十”。

10月30日　关税自主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王正廷、蔡廷干及十二国代表参加。王正廷主席，将中国关税自主提案之一二项提交大会讨论。各国代表发言宣称：对关税自主并不反对，惟对中国过渡时期所拟各项计划，颇有质询。

11月3日　关税会议第一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主席王正廷发表裁厘宣言，谓：“中国政府于熟加考量之后，须定裁彻厘金制，俾国民之幸福与外国之贸易，同受其益，国家财政巩固基础，与各国之关系亦愈加敦睦。中国于是宣言裁厘一事，将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前完全实行。”英代表声明：此会中筹议和商定各种办法，须呈请本国政府批准。日本代表及美国代表均提出具体提案。结果各国均赞成关税自主，惟具体办法交付第二委员会讨论。

11月6日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王正廷、颜惠庆、蔡廷干及十二国代表参加。推正廷为主席。颜惠庆提出“过渡时期内附加税税率案”。蔡廷干说明中国提议征收普通品及奢侈品附加税之理由。日代表芳泽声言，过渡税须受华会百分之二点五之限制。意代表翟禄第宣言，过渡税须在华会条约第三款规定以上，惟指定增收之税款应用于：（一）付还债款，（二）抵补厘金，（三）行政费。美代表史陶恩详细解决3日公布之美国提案。英代表皮乐赞同美国方案。

11月13日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自主过渡时期办法问题。英国代表麻克类提出中、美、日三方提案之折衷办法十三条，要点为：“本会议不应超过华盛顿条约以上，即输出港口运来之进口货，课以二点五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增至值百抽五。由此所得关税增收，交由海关保管。”欲使此次会议仅限附加税之讨论，而使自主案根本推翻。荷美等代表赞同。辩论无结果，定明日再议。

11月14日　关税会议第二委员会继续开会。王正廷提出三项：（一）关税自主，应明白规定于条约内；（二）裁厘是中国自动提出，非自主之交换条件；（三）自主问题解决后，方能讨论附加税问题。英代表极力反对，坚持裁厘有详细办法后，方能自主。美、日代表支持英代表之主张。会议形势险恶，最后由荷兰、瑞典等国调解，在第二委员会中另设一小委员会，重新拟定具体条文，再开第二委员会复议。当即决定推王正廷、麻克类（英）、史陶恩（美）、日置益（日）、欧登科（荷）等五人为小委员会委员。

11月19日　关税会议第一、第二委员会开联合会议。通过17日五国小委员会议决案。决定：（一）各缔约国同意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二）彻废中国与列国所结现存条约中关于关税之限制；（三）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实行中国国定税率；（四）中国政府声明实行国定税率时即行裁厘，并声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前实施裁厘。会议并组织附加税用途及税率两分委员会。附加税用途分委员会又分厘金专门委员会及其他用途专门委员会。

11月21日　关税会议附加税用途分委员会之厘金专门委员会开会。中国及英、美、日、法、意、比、荷各国全权代表参加。曾宗鉴主席。会上中国代表提出裁厘具体计划，分为：应裁之厘金标准；应裁之厘金范围；厘金之抵补范围；裁厘之顺序。下午，召开用途专门委员会。中国提出用途之具体计划为：(1)裁厘抵补三千万元；(2)国家建设三千万元；(3)内外债清理三千万元；(4)中央行政费一千万元。共每年附加税增收一亿元，如不足此数，则减(3)、(4)两项。英、日代表提出应以清理内外债为第一项，辩论无结果。

12月30日　北京特别国务会议开会，财政总长陈锦涛出席报告年关政费筹措情形，说明已筹款一百零三万，大约各机关可发月薪三、四成。次日，银行通知陈氏，

告以即日仅能凑付四十万，余六十万须以一个月后期款充数。各机关闻讯大起恐慌，各派主管会计往财部坐索。财部负责官员避不到部。

文 教

2 月 4 日　“国语统一筹备会”以近年来初级小学(旧制为国民学校)出现“倒行逆施，复其故彻”现象，函请北京政府教育部，重行申明民国九年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之法令，并禁用初级小学国文教科书。23 日，教育部准其所请，明令规定：“凡初级小学一律用国语教科书。”

2 月 13 日　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伯来沪，将在中国逗留数月，管理开设假期圣经学校事宜。据教会估计，将于今夏在十五省内设暑假圣经学校三千所，其中上海一埠将设一百所，招收华童十二万五千人，授以耶苏教之《圣经》，以毒害我国青少年。

3 月 9 日　新任东南大学校长胡敦复到校就职，遭该校学生、教授拒绝，胡及其弟刚复均被殴。14 日，东大学生维持学校委员会成立，声明拒绝胡任校长。24 日，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派王家驹、洪逵前往查办，27 日到达南京。

4 月 4 日　日政府派外务省事务官朝冈来华签订中日文化协定，是日，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王九令宴请朝冈，协商支配庚款办法。7 日，阁议中日文化协定问题由教育部与朝冈协议，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交外交部核议。

5 月 11 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开会通过三项决议：(一)修正中法基金委员会；(二)考试学生办法：中学生之初试均由各校执行，其复试由教育厅专设之考试处执行；大学生之初试由各本校执行，其复试由教育部所设之考试处执行；(三)美专 9 月恢复。

5 月 14 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章士钊辞职事，段祺瑞谓：不能因学潮而影响教育方针，决派员退还辞呈，挽章复本兼各职。29 日，段祺瑞明令再挽章士钊。

5 月 21 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中法教育基金一千万元分两年支付，另给一百五十万元分配京外国立各校。在京国立各校对分配问题意见不一致，教育部因财部提案手续不合，提出抗议。26 日，国务会议决定中法基金现款一百五十万元暂停分配。

8 月 2 日　国民政府招待报学界，汪精卫发表演说，要求教育界支持政府财政统一计划，取消教育经费独立，则政府拨一巨款，以充教育经费。

8 月 17 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召集部务会议，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女子大学，由章士钊自任筹备处长，以刘伯昭为筹备员。19 日，刘伯昭到校接收女师大，学生自治会长刘和珍等与之力争，一致驱刘出校。警察动武，打伤学生数人，前来援助之各团体代表有十四人被捕。

8 月 26 日　段祺瑞令：派教育次长吕复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事宜，以陈任中兼署教育次长。

同日　段祺瑞发布整饬学风令，宣称：“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并责成教育部拟具条规，认真整饬。”

10 月 5 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区教育局厅照行“扶助无力就学之优良学生使得受均等教育办法”。按：此办法系第十次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教部准如所请，颁行全国。其扶助办法分为“免费”、“贷费”、“补助”三项，仅施之于“成绩特殊之天才生”，并以“无力就学者为限”。

11 月 16 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六条。此次规定之后，所有民国六年、九年、十年四月间通行之教会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均即废止。

12 月 10 日　广东大学离校教授周佛海、曾济宽、肖鸣籁、杨宙康、程璟、冯友兰、刘光华、任中敏、郭冠杰、费鸿年、黄季军等三十八人抵沪后，是日发表反共宣言，诬指：“鲍罗廷阴谋破坏广大”，“共产派占据广大”，宣称辞职原因在于“反对赤化教育”。

12 月 12 日　段祺瑞指令准予加入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两种，并予公布。按：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两种：系指《国际交换公牍科学文艺出版品公约》及《国际快捷交换官报与议院记录及文牍公约》，均为美、比等国 1886 年 3 月 15 日订于北京。

12 月 28 日　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发表成立宣言。该校以行政委员治校，陈望道为行政委员会主席。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6年

导言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在出席大会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相当大的优势。大会通过了《二大宣言》和17个决议案，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三大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大会挫败了右派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但大会向新右派让步过多。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二月于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准备北伐和农民问题。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时局，确定了党的战略任务。

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大沽口蓄意制造践踏中国主权的大沽口事件。事后，国民军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而日本反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中国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士闻讯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队伍至执政府门前请愿，但遭到军警枪击，打死47人，伤189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蒋介石为夺取领导权，首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从而使蒋介石掌握了第一军军权。同时，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排挤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妥协，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攫取了党政军大权。

伪国民党“二大”也于本年在上海召开。大会完全接受西山会议各项决议，攻击共产党。这次大会是西山会议的公开化，进一步加剧了左右两派的分裂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

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召开。会议着重研究了国民革命军北伐问题，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和《关于革命军出师训令》。这次会议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保证作用。

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战争开始。五月，叶挺独立团入湘支援唐生智第八军，揭开北伐序幕。七月十四日，北伐军分兵三路从广东向北挺进。先后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扩展到了长江，，但是胜利成果被蒋介石所窃取。

九月十七日，冯玉祥组织国民革命联军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而后，解西安之围，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五原誓师标志冯玉祥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

为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计划不周，起义失败。

北伐军占领两湖后，全国革命重心由广东转移到长江流域，使国民政府迁都问题提上日程。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原则上同意迁都，二十六日正式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一九二七年元旦，正式发布命令，国民政府以武汉为首都。

年底，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我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以巩固革命联合战线。但“右”倾思想得到了发展，给以后的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广西东兰起义
- ●“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
- ●“三一八”惨案
- ●北伐战争
-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 ●中国国民党二大
- ●大沽口事件
-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 ●五原誓师
-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广西东兰起义

背景介绍

1926年1月上旬，广西右江地区东兰县各族人民在韦拔群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曾一度占领东兰县城，并组织群众打恶霸斗地主，展开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这次起义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后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

材料：

- ·革命烽火燃东兰
- ·韦拔群与东兰农民运动

材料一　革命烽火燃东兰

东兰县的拉甲山，从壮秀的西山迤逦而下，象一只雄狮，昂首在武篆和江平两乡之间的小盆地上，四周群峰叠嶂，形势险峻。山腰有个漏阳光的大岩洞，平坦宽敞，能容纳二千人左右，这就是北帝岩。

北帝岩，风景优美，山清水秀，花草茂盛，香气溢人，四秀如春。岩洞前有一条晶莹的小河，水清如镜，流水潺潺，蜿蜒曲折地奔流，飘若玉带。河的北岸有一片一里多宽、十多里长的苍翠竹林，平整如饰。从武篆通江平的大路，笔直穿过其间，是一条最好的天然林荫道。圩期来往行人，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常常愿意在此止步歇脚，浏览风景，欣赏鱼虾。

每年春回大地，拉甲山更是锦绣万千，红、黄、蓝、白色的野花，竞相怒放，百鸟争歌，花蝶竞舞。从北帝岩沿通天隧道行进，登上拉甲山顶，可以饱看奇峰佳景。北边的武篆圩，掩映在深绿色的树林中，炊烟缭绕村头，似罩上一层飘渺的轻纱。古香古色的魁星楼笔直霄汉。南面的江平，依山傍水，裹在绿油油的庄稼之中，好似一片绿洲胜岛，一排排大水车沿河伸展，巨轮滚滚，看去犹如炮兵行进，吐出白花花的清水，灌溉着肥沃的农田。北帝岩的青山秀水，红花绿草，交映争辉，好似一幅壮阔绚丽的壮锦，美不胜收。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北帝岩正式开学。韦拔群任主任，陈伯民任副主任兼管理员。学员来自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今田东）、思林（今属田东属）、果德（今属平果县）、都安、河池、南丹等十一个县，有壮、汉、瑶三个民族共二百七十六人，都是由当地农会介绍入学的农运骨干或青年学生。

农民讲习所设置的课程，基本与广州农民讲习所一样。韦拔群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用当地阶级斗争实例和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到圩场作街头宣传；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和成立农民自卫军；参加清算地主豪绅、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使学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从事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能力。

每逢武篆、江平、三石的圩日，学员们便组成宣传队列队赶到圩场宣传，敲锣打鼓，有说有唱，有歌有舞，好不热闹！赶圩的人蜂拥上来，团团围住，全神贯注地听着，久久不肯离去。

农民讲习所成了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穷人的前程。不少受苦的群众赶到农民讲习所来告状，送子女学习。农民讲习所成了穷人的靠山和主心骨。

瑶族罗卜妹，是个苦大仇深的农民，欠下了地主数不清的债。一家六口人为还债卖身打长工，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仍还不清地主的阎王债。农民讲习所成立后，罗家有了主心骨。有一天，罗家父子捆着地主来农民讲习所告状，一路上连哭带骂。

地主很狡猾，知道农民讲习所不是他讲话的地方，连连哀求：“卜妹哥呀卜妹哥，我们世代都是好交情，有话说话，有理讲理，不念今日念当初，求你别动气呀！该怎么办

我都依了你。到农民讲习所去。那里也不是谁的父母官呀!"

罗卜妹气愤地说:"我家的香炉都给你们押了债,还说什么好交情!你们的理,我们的话都到农民讲习所去见拔哥再讲。"

到了农民讲习所,自然要问地主的罪。这么一来,田地回了家,罗家一家人团圆了,一家人心里乐开了花,千谢万谢农民讲习所。次日天还没亮,父子五人就送来十担柴禾,乐呵呵地说:

"拔哥,你是大恩人!你救了卜妹一家性命!特送几担柴给农民讲习所烧,求你收下吧!"

韦拔群给他们父子敬烟敬茶,笑着说道:

"革命就是为了使穷人得翻身,我们还要共同努力干下去,不彻底消灭地主土豪,日子是保不住的。"

"拔哥,你的话我明白了,"卜妹说,"地主是害人精,不推翻他们,穷人就休想过太平日子!我也和孩子们说了,要五兄弟都跟拔哥去干革命,你看行吗?"

"你老人家有这样的胆量,很好!"韦拔群开玩笑说,"你不留个把在家养老吗?怕孩子们走远了,你放心不下啦!"

"嘿嘿!"罗卜妹笑道,"不去革命,留下就给地主'养老'啦……"

农民讲习所刚开办两个月,经费就全部用光了。为了完成学习计划,韦拔群与父老们商议,把土豪霸占武篆圩的税收,交给农民讲习所使用。父老们都很拥护,并选出代表去交涉,结果引起了一场舌战。

霸占武篆圩税收的,是大土豪杜瑶甫父子俩。其子杜伯豪是育才小学校长,杜瑶甫自命校董。父子俩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借办校为名,霸占圩场税收。当农民讲习所的代表与他们交涉时,他们借口地方款只能办地方教育事业予以拒绝。后来看说不通了,父子俩又耍出了互相推托的花招,父说子当家,你们找他去吧;子说父作主,与他无关。韦拔群看透了他们的花招,便亲自出面,给他们父子下了个通知,定好时间开"雄辩会"。杜家父子被迫同意了,连夜找亲近的土豪研究对策。商定杜瑶甫做幕后人,不出面讲话,由杜伯豪和另外几个土豪做代表,出面辩论。

"雄辩会"在育才小学校举行。还没等到开会时间,各地的群众代表就挤满了会场。这是韦拔群事先布置好的,为的是用事实来启发教育群众,打下土豪威风。这些计划自然杜家是料想不到的。"雄辩会"开始了。杜伯豪首先发言,他说:"圩场税收款转学校使用,是经过全乡父老商量决定的,如果谁主张归农民讲习所,那就违反众愿,损害地方教育事业。父老们说是不是?"

"是的,这是公理,谁也违反不得!"以土豪为代表的一方附和道。

韦拔群针锋相对,问大家:"过去有这样的决定吗?父老们说说吧!"

"没有这样决定,我们父老根本就不懂得这件事。是杜家强占公众利益。"众人齐声说。

韦拔群不慌不忙地说:"既然这样,今天怎么决定?父老们发表意见。"

"应该归农民讲习所,不能再让土豪吞食了!"

众人异口同音,声如巨雷,吓得杜家代表面失人色,不敢作声。

最后,韦拔群指着杜伯豪的鼻子说:

"由此可见,是你没有和父老们商量,霸占公益,犯下了杀头之罪!今天还敢不交给农民讲习所吗?"

杜伯豪理屈词穷,自找台阶说:"韦先生,用在小学,用在农民讲习所都是公益,只是我父亲见识少,思想固执,请韦先生少怪!"

于是,农民讲习所的经费解决了。

农民讲习所带领农民斗倒了鼎鼎有名的杜家霸,鼓舞了农民的信心,反对苛捐杂税,废除租债斗争,越闹越大,震惊了官府衙门,吓坏了土豪劣绅。

杜瑶甫恼羞成怒,与儿子杜伯豪日夜密谋暗算,想尽办法破坏农民讲习所。他们与大土豪龙显云勾结在一起,采取栽赃的方法,诬陷农民讲习所。他们派出人白天化装拦路抢劫,夜晚打家劫舍,然后大肆造谣惑众,颠倒黑白,说韦拔群和农民讲习所学员是拦路打劫、谋财害命的"土匪"。当他们的阴谋被揭穿后,又勾结伪县长黄守先以武装进攻农民讲习所。

这年十二月间,伪东兰县长黄守先,带领匪兵百余人,配合土豪武装,从武篆、江平两路进犯。一路上不见农民武装阻击,自以为诡计得逞,指挥匪兵包围了农民讲习所,拚命攻打。韦拔群早已料到敌人要下毒手,率领学员英勇还击一阵后,便悄悄地沿着洞内的"通天隧道"神速地向山后撤退了。这条秘密道路敌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只管在外面猛攻猛打,一直到农民讲习所里完全消失了还击以后,黄匪以为计就功成,喝令匪兵破门而入。匪兵们战战兢兢地摸进了农民讲习所,却不见里面有人影。黄守先开始有些惶恐,后来才镇静下来,他错误地认为农民讲习所学员无力抵抗,躲进岩洞深处去了。这个阴险的家伙,立刻想出一条毒计,他命令匪兵搬来柴草,塞满了农民讲习所,瞬间火势熊熊燃烧起来。黄守先咧嘴狞笑着:"这回可一锅煮、一窑烧了!"

夜晚,黄守先和大土豪龙显云得意洋洋地拔队到那伦村驻防,把抢劫来的牲口杀了,大吃大喝起来,庆贺他们的"胜利"。

韦拔群按照预定计划,率领农民讲习所学员和三百多名农民自卫军,紧紧包围了那伦村。敌人以为农民讲习所的人都被烧死了,毫无戒备,只顾吃喝。正当匪兵喝得

大醉不省人事的时候，韦拔群一声令下："进攻！"顿时，枪声鼎沸，杀声四起，敌人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狼狈逃命。匪首龙显云受重伤，令匪兵背他经弯坡逃到平江的山村里。伪县长黄守先方知中计，见匪兵死伤惨重，无心恋战，领残部夺路而逃，从兰木窜回县城，连续几天惊魂不定。

第一届农民讲习所原定学习时间为半年，由于敌人武装进犯，只开办了三个月，便提前结业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区、县，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期农民讲习所为东兰和右江各县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如黄治峰、韦汉超、覃逆平、黄文通、廖由宾、黄伯尧等人，以后都成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

一九二六年二月，桂系军阀派龚寿仪一个团的兵力到东兰扫荡。对农民运动恨之入骨的黄守先和杜瑶甫趁机与龚匪互相勾结，为虎作伥，对东兰农民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敌人在一天内就把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及那烈、板免、那峨、弄内、廷怀、板乐等十个屯全部烧光，疯狂叫嚷"村村要过火，人人要过刀"，"血洗东兰"。据后来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到东兰调查统计材料得知，全县被烧、抢、抓、勒索的农民有七千四百一十八家，损失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达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被杀害群众七百多人。韦拔群家的房屋不仅全部被烧毁，妻子陈兰芬和刚出生十二天的婴儿也被抓到东兰关进监狱。这就是震惊省内外的"东兰惨案"。

面对匪军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镇压，韦拔群并没有被吓倒，他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西山，继续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英勇地抗击敌人。一九二六年九月，韦拔群指挥四路农民一举攻下了东兰县城。

（选自《百色风暴》，作者：莫文骅）

材料二　韦拔群与东兰农民运动

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的领导者之一。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韦拔群在广州看到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发表的"告中国农民"一文，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一年冬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东兰县武篆乡。当时的东兰，地主豪绅称王称霸，土匪流氓横行乡里，老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韦拔群立志献身东兰的革命斗争，解救苦难中的人民。于是联络了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黄树林等十一位有志青年，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从此开始了从事农民运动的伟大革命实践，领导农民同反动地主、军阀展开尖锐斗争。东兰成了广西农民运动最早的发源地。

一九二二年二月，韦拔群带领数百名群众，清算了当地大土豪杜琨选（又名杜瑶甫，绰号杜八）的罪行，夺回了杜八侵吞百姓的全部脏款，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大长了农民的士气。同年五月，又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正式改为东兰公民会，并确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为公民会的宗旨。

东兰是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除了壮族、汉族以外，还有为数不多的瑶族。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和发动群众，韦拔群经常深入到瑶族同胞居住的西山区上段的弄台、中段的弄京和下段的弄里、弄凡等地，宣传革命道理，以打老庚（结拜兄弟）的方式进行串联，号召瑶胞参加斗争，深受瑶族同胞的拥护和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拔哥"。韦拔群还变卖了部分家产，带头购买枪械，瑶族同胞也拿出了自制土枪和许多大刀、长矛，组织了公民会，并很快成立了西山农民自卫军，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一九二三年，又建立了东兰县农民自卫团，韦拔群任总指挥，领导东兰人民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并于十月第一次解放了东兰县城。

韦拔群一九二四年秋和陈伯民来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一九二五年初，俩人一同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彭湃和阮啸仙等共产党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农民运动的理论，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注意学习各地农运的先进经验。经过学习，他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学习结束后，一九二五年四月，韦拔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分配，以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和陈伯民一起回到东兰县。回到家乡后，韦拔群不顾环境险恶，立即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农民协会，并于九月正式成立了东兰县农民协会，陈伯民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部长。

为了适应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培训农运骨干，韦拔群变卖了部分田产，在群众的支持下，和陈伯民等于十一月一日在东兰县武篆区的北帝岩（一九三〇年改为列宁岩）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任主任，陈伯民任副主任兼管理员。共招收二百七十六名学员，他们多是来自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今田东）、恩林（现属田东县）、果德（现属平果县）、都安、河池、南丹等十一个县的各族农运骨干或进步青年。韦拔群经常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带领学员进行社会调查，参加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使学员的思想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此期间，他和陈伯民等于十一月三十日发起召开国民党东兰县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同时派出代表参加省党部的成立大会。

农讲所原定学习时间为半年，由于敌人的破坏，只办了三个月便提前结业。学员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进一步组织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和农民武装，使右江地区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使土豪劣绅十分恐惧和不安。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土豪杜瑶甫勾结桂系军阀实行反攻倒算，在“血洗东兰”的疯狂叫嚣声中，一九二六年二月对东兰农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制造了震惊南疆的东兰农民惨案。“全县被烧、被抢、被抓、被勒索的农民有七千四百十八家，损失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达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被杀害群众七百多人”。韦拔群家里所有房屋和财产全部被烧毁，他的妻子陈兰芬和出生未满月的婴儿也被抓进监狱。

面对敌人的猖狂反扑和屠杀，为保存革命实力，韦拔群带领农军迁到西山区，以西山为革命根据地，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很快成立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五月，韦拔群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以东兰县农民协会的名义向广东国民政府发出了《快邮代电》，控诉桂系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请求给予援助。同时，派人到省党部进行详细汇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了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惩处了镇压东兰农民运动的罪魁祸首黄守先、龚寿仪等，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在东兰农民革命继续发展过程中，一九二六年九月，韦拔群带领农民军第二次攻下东兰县城，从此，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迁到县城办公。

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东兰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加强对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同年十月，派共产党员陈勉恕担任东兰县知事的职务。之后，又曾派共产党员严敏、陈洪涛到东兰和右江地区开展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打土豪、废租废债的革命风暴席卷右江地区和红水河畔。十一月五日，韦拔群等在东兰县城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把县革命委员会改为东兰县农民协会，陈勉恕为主任，韦拔群为军事部长。这一时期，韦拔群、陈伯民于武篆乡育才小学办起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右江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年底，东兰县共有“区农会十一个，乡农会一百三十四个，男会员七万五千六百六十人，女会员二千六百八十五人，农民自卫军有五百余人”。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夏，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同地方反动武装联合起来，向右江地区发动反革命“围剿”，东兰则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庐舍为墟，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出现了低潮。为了把已经发动起来的农民革命坚持下去，以武装斗争回答反革命势力的屠杀，韦拔群决定将农民群众重新组织和武装起来。八月，在举办第三届农讲所的过程中，于东兰县的兰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东兰、凤山、凌云等地的农军编为三个自卫团：东兰农军为第一团；凌云农军为第二团；凤山农军为第三团，韦拔群担任总指挥。

韦拔群领导农民自卫团多次与敌人交锋，终因敌众我寡，农民军损失惨重，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他当机立断，把队伍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有一定群众基础、地势险要、利于农军作战的西山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并于同年十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敌四百余，缴获大量武器，鼓舞了农民军的战斗士气。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韦拔群领导农民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桂系军阀不得不于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退回百色。右江地区的农民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始终坚持斗争。在斗争中，韦拔群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和大家同甘共苦，把汉、壮、瑶族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各族群众把韦拔群看成是自己翻身闹革命的领袖和贴心人，“拔哥”成了壮乡农民革命的一盏明灯。

（作者：于桂芬　选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

“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

背景介绍

蒋介石经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地位上升之后，政治野心更加膨胀。为了达到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目的，首先竭力排除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篡夺革命的军权。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说蒋介石有贪污”，以惑乱人心，借以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海军学校副校长），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当时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代理局长期间，曾奉命扣留过虎门要塞司令、孙文主义学会重要分子陈肇英的走私船只，陈与李结仇。李在三月二十日被捕后，写过悔过书，脱离共产党，后来李又写三二〇事变的经过，揭发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并向共产党申请恢复党籍，虽然共产党没有批准，他还是表示接近共产党。四一二后在广州被反动派杀害），称“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当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

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当日下午六时许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他们却说“中山舰无故生火戈游”，“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还有谣言说“要逮捕蒋介石送至莫斯科”，蒋介石则更加神秘地说，有人打电话追问他的行踪。蒋介石以这些借口，于三月二十日早三时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军队，派其亲信陈肇英、王柏龄、欧阳格、刘峙、吴铁城等分别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内外反动派乘机造谣，说共产党要“倒蒋”，“想推倒国民政府”，挑拨离间国共关系。“西山会议派”更无所顾忌地在上海于三月末至四月初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们为“中山舰事件”“鼓掌称快”，并以大会名义致电蒋介石及孙文主义学会，称赞蒋介石等“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西山会议派”还企图将他们大会移至广州，派遣出席会议的邵元冲等赴广州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策略，事件发生以后，陈独秀又连续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还说国民党新右派“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为蒋介石等新右派反共行为进行粉饰、辩解。这一切，使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人软弱可欺，从而加紧酝酿向共产党发起新的进攻。

正是在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一再退让，以及蒋介石政治权欲思想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事件。

四月初，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图谋夺取党权。五月十五日，全会在广州正式开幕。在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作幌子，提出了四个“整理党务”的提案。其一为“整理党务案”；其二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提案；其三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其四是关于国民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提议。蒋介石以大会主席团成员身分操纵会议，通过了上述提案，分别称作“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和“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总称“整理党务案”。

很明显，这个提案是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之后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重大步骤。

材料：

- 中山舰事件之经过
- 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
- 中山舰事件之后
- 整理党务决议案

材料一　中山舰事件之经过

三月十八日，由蒋介石盟弟欧阳格（海军学校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国民党右派）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转达蒋介石命令，要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派中山舰赴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黄埔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国民党右派就依照原计划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在广州举行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逮捕蒋介石等。

三月二十日三时，由缪斌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逮捕共产党员四十余人。同时派第二师部队去东堤包围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纠察队武装，逮捕工人领袖（因工人纠察队反抗未逞）；派第二师第五团营长李树森（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率该营赴东山，包围孙中山先生聘请的苏联顾问住宅，收缴卫队武装，逮捕他们驱逐出境（因苏联顾问据理斗争未逞）；派兵劫夺了中山舰，派人到文德楼逮捕李之龙。李是在家中熟睡，突然被蒋介石用上海流氓绑票方法捆起来，用手巾塞在口中使其不能叫唤押走的。

广州市各处宣布戒严，岗哨林立，禁止通行。蒋介石派其羽翼秘密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二十日上午十时派第二师第六团一、二两营赶赴黄埔，监视该校教职员及学生。蒋介石一方面在广州制造事变，一方面又密令何应钦将驻在潮汕之第一军中国共产党员逮捕，并取消第一军党代表制度。

（摘自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中山舰事件》）

材料二　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

（一九二六年三月）

一、派舰之经过

三月十八日晚，有三人来文德楼之龙寓所，一人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斗争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校长调遣。时适之龙外出，此三人即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留呈之龙。及之龙是晚回家启视，该函略云：“军校办事处欧阳鍾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云云。之龙阅毕，即往对门自由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该舰前

往。据自由舰长云，该舰新从海南返省，机件略有损坏，现正在修理，即时不能开行。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未几宝璧黄舰长持邹科长函来请之龙下一命令。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章舰长。该两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等语。此乃军校驻省办事处来要舰与之龙派舰的经过情形也。

十九日邹科长因派舰事向军校驻省办事处索补一公函来局，之龙已饬编号存案矣(见附件一)。未几，邹科长又对之龙说：顾问询中山舰在省否，因苏俄参观团要参观军舰。之龙遂一面饬给养科给发新军衣，一面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因是日参观团参观舰队，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当承蒋介石允许，故电该舰返省，预备参观。及是晚六时许，中山舰长章臣桐来寓报告之龙云：昨晚未得你的命令时，在海军俱乐部中遇邹科长，他曾对我(章臣桐自称)说过了。我(章臣桐自称)当时答云，如无舰可派，则中山舰亦可以去。及接你(称之龙)的命令，即行准备，次早六时许，开赴黄埔。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云不知，恐为日本商船某事，可稍待候。后得你的电报及学校通知始返省云云。此乃十九日调舰回省之手续与章臣桐之报告也。

〔附记〕作战科邹科长留呈之龙之函，被陈肇英于之龙扣留后，派人到之龙寓所搜查三次，搜去毁灭了，只有信封尚在(因之龙阅后并未装还)。至邹科长给宝璧黄舰长之信犹在。于邹科长留呈之龙信中，是否有提及"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舰"之话，尚可由章舰长返省后，来之龙私寓报告中，言及前晚在海军俱乐部遇邹科长曾提及过的话，可以证明。

派舰时，因邹科长信中谓驻省办事处来员云，系接邓教育长(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云云，之龙忖思此语，料蒋校长必在黄埔无疑，故不能径向蒋请示也。次日邹科长告之龙谓：办事处说，蒋已返省，故之龙向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回省预备参观。

二、被捕的详情

十九夜(即二十日午前三时许)，之龙在私寓，梦中被叩门巨声惊醒，听声音即先时七点钟欧阳格派来送信之前欧阳琳卫兵也。问其来此何干，答：对李局长有话说。此时之龙即知有异，盖恐欧阳格所谋不成，特夜深派人来暗杀我也。时婆妈已开门，之龙暗思两卫兵均在楼下，万一有变，我只好听之而已，遂着袜下床。出房门视之，见随来者有携带驳壳枪之兵士六七人。问何为者，该卫兵凶恶答云：欧阳校长奉蒋校长命令来捉你去。说毕向之龙手提皮匣中搜去函件(想系搜去可以证明之信，拿去灭迹也)。之龙答云："好！要去等我穿了衣服同你去。"甫穿外衣未及扣钮，众即拥之龙下楼。此时之龙见士兵服装不若第一军之整齐，料系欧阳格勾引土匪冒充军队来虏我者。行时向街上四望，以为有巡查队经过，将呼之起虏。至文德东路转角，见有一警察，之龙大呼曰："我是海军局长，他们不是正式军队，无有命令乱拿人。救人呀！救人！"士兵嘈杂曰："不是正式军队是土匪，一枪打死你。"警察低头而去。未几到监察院门前，又遇着旧时相识之党军第二营勤务兵，问为何故。该士兵答曰："他们是第二十师办事处的，你同去不要紧。"瞬时即到万福路第二十师办事处。登楼，见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先已在(章是晚并不在舰，被捕时在东堤某家宴饮)。问为什么，彼云不知。欧阳格出，故作态向之龙曰："你为什么这早起身"(因他报告我已夜起登舰将发动)。之龙答云："未有起身，是你派人到我家中把我拿起来的。"欧阳格遂不复言，命人将之龙外衣剥下，将手绑起；先将章臣桐捉下楼，复命人用毛巾将之龙的眼睛蒙蔽，又用手巾二条以驳壳枪启子塞入之龙口中，口破出血，既不使看见，又不使之龙出声。之龙想道：为什么这样不正大光明？既是正式拿办人，为什么不经审讯，这样黑暗。死不足惜，只恐死得不明白。此时全副精神，只注意到听那一声枪响耳。稍待片刻即下楼，押解在汽车上，天已渐明，由毛巾内见车经过惠州会馆向广九车站方面进行。此时之龙心中想到必是将我载到车站附近人稀之地谋害。

至第一军经理处(现时不知改作何名)，下车登楼。之龙料到必须经过审问了。到经理处长内，处长问道："你是李之龙吧？"之龙口内塞有手巾，不能出声，想先时押解之兵，常摸之龙口，恐手巾脱出，此时处长既问，想可让我自由说话了，遂以舌极力将手巾抵出，始能出声，答云："是。为什么捉我？"处长云："有什么事对不起校长未有？"答："未有。"问："你想一想。"答："只有前几天把校长的坐船江固派到梧州去了，这是打电话向校长请过示，经他许可的。先打算派到西江剿匪，又因招待苏俄参观团，送他们到梧州去了。"问："中山舰是那个派到黄埔去的？"答："是校长的面谕，叫邓教育长演达打电话到办事处来要我派去的。"问："是那个调回来的呢？"答："因为苏俄参观团定昨日午后二时参观舰队，曾用电话向校长请示，得其允许才调回的。"问："你能够指挥那条船？"答："用代理局长名义，都可以指挥，用私人的名义，一条也不能指挥。"问："中山舰上有些什么人？"答："有舰长，有兵士，另有看守该舰的第二师兵力二班。"问："中山舰上共有若干人？"答："约百三十人。"问："有枪枝若干？"答："长短枪三四十枝。"问："派了船到西江去未有？"答："军事委员会要海军局派船去剿匪，但因财政部黄埔学校各处调去的船尚未回来，故尚未派出。昨日有两只船名'安北''平南'到海南去，是军事委员会前一个星期要的，迟到昨天才出发。"问："你为什么这早就起来？"之龙一闻此语，顿时心中就明白了，就知道是欧阳格诬陷的阴谋了，遂答道："并未起床，是欧阳格派人到我家中由梦中拿来的，你看衣履都不

齐整，就知道了。"处长云："报告的人说你深夜起来上船有举动。"答云："请处长转报告校长，务必要将报告人扣留，以免逃逸。"处长云："我去对校长说，"言已遂去。此时将之龙移到一小房内，取去蔽眼毛巾，另加几条粗绳，把手腿绑得动也不能动。陈肇英时来看一看，呼云："校长的命令，绑紧一点！"监守兵又紧一次。过一刻，陈肇英又来云："校长的命令，再绑紧一点！"监守兵又拿一条绳来，竭力绑，绑得两手肿得痛入骨心。约三刻钟后，陈肇英得意洋洋，带了卫队用汽车把之龙押解到造币厂内，遂由第六团特务连监守矣。

材料三　中山舰事件之后

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刚过不久，大概是四月上旬的一天，刚吃完早饭，我们黄埔军校驻陈家祠堂的三团三营十连连部，传出了紧急集合的哨声。全连同学全副武装跑步到广州市公安局的正门，迅速散开，与其他连队的同学一起把公安局包围起来。大家将子弹推进膛内，刺刀插到枪上，准备进行一场恶战。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缴了公安局警察的械，将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等人抓了起来，随后返回驻地。

四月下旬，四期同学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以后，我们连改为二团三营十一连，奉命进驻虎门口，一边学习，一边执行勤务。由于我原来在太原学兵团、陕西陆军第一师学兵连和开封陆军训练处等地学习过军事，宋瑞珂排长就派我带七班到虎门横蹬炮台执行任务——看守吴铁城、四川军队首领熊克武和余敬塘(汉谋)等人。在我们接受任务时，上司讲：中山舰事件并不是蒋校长搞的，而是受到西山会议派影响的右派分子搞的；蒋校长要对右派采取行动，故而将他们抓起来。上司还要求我们要牢记总理遗教、校长训词、严格看管他们。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听了上司的讲话，心情都很激动，所以执行看管任务十分认真。当时只准吴等人在室内看书、看报、下棋，至多准许他们在炮台的院子中散散步。但不准他们大声说话，更不准走出院子；其家属也不得探视，送来的东西都要经过严格认真地检查，认为没有问题，才收下转交给他们。

我们看管人员一般不同他们接触，一者是要忠于职守；再者也怕受他们的影响。因为我是班长，负有主要责任，所以避免不了接触。正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他们大呼冤枉的原因。他们气愤地说："老蒋真不是东西！他凭什么拘禁我们？""我们是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合时宜、行不通。但是，中山舰事件绝对不是我们促使他干的。""说中山舰事件是我们促使蒋介石干的，那是老蒋使的借刀杀人的诡计。他一方面搞了清党，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我们。"他们还说了些老蒋这个才当了几天中央委员的后辈，为什么能青云直上，得以独揽大权的原因等等。我因为当时文化不高，对事情认识不准，不好当面批驳，就严肃地制止他们乱说乱讲，也尽量不让同学们接触他们。同时，我还考虑到这些人捕前都是官居要职的中央委员，过去与老蒋平起平坐，虽说现在被看管起来，还得好吃好喝的优待他们，谁知以后的情况会怎样。所以，也就没有向上禀报，只把听到的话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六月底，我们正式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看管他们的任务便交给了第六期入伍受训的同学。

我们离开虎门炮台之后，才得知国民党中央五月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许多共产党人、左派人士以及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几个军长，都将矛头指向蒋介石。当时蒋自视力量单薄，急忙变换策略，一方面表示中山舰事件是一种"误会"，上书军事委员会说"此事起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请求处分；另一方面采用诿过于人，借刀杀人之术，将责任推到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备司令吴铁城等人的身上，并且将他们抓起来以示自己"革命"。蒋介石施放烟雾，的确迷惑了一些人的视听，也欺骗了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结果，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抛出的《整理党务案》；蒋本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等重要职务。随后，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权。

中山舰事件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的手段大家都已清楚。而他在这次事件中所采取的欺骗蒙蔽世人的手法，知道的人并不多。现在我将这段亲身经历的史实记述出来，以使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

（选自《纵横》86年3期，作者：李立功）

材料四　整理党务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一

吾人为求革命势力之集中与革命工作之完成，深信有与国内各阶级革命分子联合进行之必要。同时在此一二年中依事实之教训，合作之经验，深知同一进程之中，一切合作的个体间，苟无互信的规约，互助的保障，以道德的基念，公忠的精神，为合作信约，共同遵守，必牵制时起，误会滋生。初则因内部不安，减少革命能力，继则因能力相消，同为敌人所摧残。吾人痛念总理当日主张合作之初衷，决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为革命集团。中国国民党亦为革命集团。共产党员认国民革命为必经之过程，毅然加入于国民党，国民党信共产党员能努力于国民革命，欣然

许其加入。持此光明正大之心理以合作，本无牵制误会之可言。乃两年以来，实际之表现竟不如此，此非合作之咎，乃不善合作之咎也。吾人须遵守总理之主张，不忍两党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坠，革命势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特提出整理党务案，如下：

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

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

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

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以上四事，吾人认为合作之理论基点，为实现此基点之意义，解除本党内部之纠纷计，特提议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其组织大纲，别定之。总期两党党员不再有违背规约之行为，而后革命集团之合作，得臻于圆满焉。

二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三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因革命进行之需要，暂设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

（二）常务委员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于本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中选任之。

（三）常务委员会主席职权如下：（甲）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其主席；（乙）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妥为保存；（丙）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之进行。

（四）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设置，应否继续，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下次开会时决定之。

四

全部党员依以下之规定从新登记：

（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从新登记。

（二）登记机关指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定为三个月，但海外党部登记时间，由海外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切宣言，及议决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者，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选自《政治周报》第14期）

“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三一八”惨案。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大沽口事件。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人，在天安门集会。由徐谦、李大钊等担任大会主席。要求政府和国民军为驱逐帝国主义而战。大会后，有两千多人向段祺瑞政府请愿。请愿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反对卖国投降！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口号。反动军队突然向群众开枪，致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惨案。李大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为掩护群众退却被打伤。共产党员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王一飞也参与这次斗争的领导。“三一八”惨案，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提高了人民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认识。

材料：

·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 “三一八”惨案纪实

材料一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一九二五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军阀)倒段(段祺瑞政府)运动。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采取了联合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策略。随着人民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们的恐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派遣舰队掩护奉系军阀的兵舰驶进大沽口。驻守在那里的冯玉祥的国民军用旗语制止，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又发空炮警告，日舰则以实弹炮击大沽炮台，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敌舰打退。

大沽口事件后，日本纠合辛丑条约关系国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防务。同时，各国军舰也云集大沽口，进行武力恫吓，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人率领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团到执政府约见段祺瑞和贾耀德，要求段政府以强硬姿态来对待外国列强的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出京。但是，媚外卖国的执政府竟下令用暴力回答人民正义爱国的要求。守门的军警用刺刀当场刺伤多人。大屠杀的序幕拉开了。

三月十八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总工会等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共十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场上悬挂着一天前受伤代表的血衣，上面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四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内容包括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在通牒上署名的公使，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会后，两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当群众队伍来到设在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东辕门时，早已准备好的军警突然开枪，并用马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人群追击砍杀，长达半小时之久。执政府门前溅洒着鲜血，人们一批批倒下，当即有四十七人死亡，二百余人受伤。李大钊头部、双手负伤，仍与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人一起，镇静地指挥在场人员退却。邓洁等人设法搞到几辆救护车，匆匆把伤员送往医院抢救。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凶残地杀了人，还诬陷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所致，军警的狂暴镇压只是"正当防御"云云。并在第二天就下令通辑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人士徐谦、顾孟余、易培基等人。

中国人民对段祺瑞政府的答复是：高举斗争旗帜、坚决驱段废约。通辑令下达当天，邓洁、陈毅同志就在北大三院组织了追悼会。鲁迅先生为追悼会送来一付挽联，上联写道"死了就算罢了，何须萦怀留恋，慈母依闾，幼儿在抱"，下联是"活着将怎样着，无非多经几次，枪声惊耳，弹雨淋头"。悲怆、忿懑之情跃然纸上。

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怒斥段枭是"彰明昭著的卖国凶犯"，号召全国人民"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得到广泛响应。三月二十一日，天津三百多团体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惩办"三一八惨案"祸首。二十七日上海举行四万多人的追悼大会。长沙、广州、桂林、南昌等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都纷纷集会、通电、游行声讨卖国政府。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著名人士也相继撰文伸张正义。鲁迅认为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四月九日，惨案发生后仅二十余天，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就在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中，被驱逐下台。

(选自《中华英烈》86年2期，整理：艾枫)

材料二　"三一八"惨案纪实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杀害无辜青年学生。我当时曾参与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惨案发生时，我也身在现场。

从三月初起，北京空气顿形紧张。公共娱乐场所及各大学所在地区，翠花胡同、南花园、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前后，布满了头戴黑呢礼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梁上架着墨镜的密探。马路上，不时有陌生的人在后面叫你的姓名。但是，爱国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为激昂。三月十二日，学生、工人及广大市民群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誓不买卖日货"，"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段祺瑞的缇骑四出，如临大敌，当时虽未动手，但杀机毕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消息传出的当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决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游行。迨十五日八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通牒提出后，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十六日请愿游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严厉拒绝"八国联军"式的最后通牒。

十六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驸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九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

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四十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十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三十余人。会议决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十七日，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制造杀人的借口，曾在《顺天时报》等报纸上大肆诬蔑昨天学生的请愿游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为"，诬蔑赤手空拳的学生"手持铁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伤警察"，等等。学生联合会为了预防敌人破坏游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组织工作：按地区分别组织宣传小组；参加游行的人预先编定小组，在游行时手挽手地前进。

十八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到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中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十二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像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

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突然听到"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大、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把我拖了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口，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五十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像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伤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四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吗！"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七个人，分别送协和医院、同仁医院抢救。

已经八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十二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洲春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铁狮子胡同。一进东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排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

有的棺材上标着姓名，有的没标。我们先查看标着姓名的棺材，都没有范士荣的名字。回头再把未标姓名的棺材，一个个揭开来看，仍然没有发现范士荣的尸体。最后发现一个标着姓张（名字记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盖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荣的衣服。打开一看，

果然是他！

当时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荣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认识和记得的只有刘和珍（江西）、李兆珍（湖南）、李敏学（甘肃）、杨德群（湖南），其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还记得，有广东国民外交团的两个白发苍苍的团员，也死于非命。受重伤的一百五十七人，轻伤的一百余人。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有删节，作者：李世军）

北伐战争

背景介绍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进一步开展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1926年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把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特别要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为北伐的基本内容。会议决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份加紧做群众工作，以便群众能够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会后，党为了推动和领导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又派遣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作政治工作，使北伐战争有了强大的群众思想基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也使北伐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显然，北伐战争的时机成熟了。

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锋，首先开赴湖南前线。接着广东国民政府在7月1日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并在广州东校场举行了五万余人参加的北伐誓师典礼和隆重的阅兵仪式。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北伐军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由于吴佩孚对革命政权威胁最大，又是北洋军阀的主力，所以北伐军确定首先向湖南、湖北战场进军，攻打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北伐军以第四、七、八三个军约五万人担任正面主攻。在湖南工农群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先后攻占醴陵，占领长沙。后又经过平江战役，于8月22日占领岳阳。平岳战役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至此湖南战场战事基本结束，战争转入湖北境内。湖北汀泗桥是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三面环水，一面高山耸立，易守难攻。吴佩孚凭借险要形势，在那里布置两万人的兵力，企图死守顽抗。北伐军向汀泗桥敌人阵地发起总攻击，连续冲锋十二次都没有攻下。后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引导下，抄小路从右翼高山往下猛攻，出其不意地突入敌人阵地，吴佩孚军队仓惶溃逃，汀泗桥战役毙敌千余，俘敌军官157人、士兵二千余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步枪1500余支。接着北伐军又占领了汀泗桥以北的贺胜桥，直逼武昌城下。攻打武昌城失败后，北伐军转而攻打汉阳、汉口，获胜。10月初，北伐军用猛烈的炮火再次进攻武昌。独立团担任主攻任务，全团战士精神抖擞，英勇杀敌，不顾敌人的阻击，用云梯登城，10月10日正值辛亥革命15周年纪念日，北伐军胜利攻克武昌。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破强敌，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北伐军主力在湖南、湖北打垮吴佩孚以后，转到江西，会同从广州进攻江西的北伐军一部进攻南昌。在攻打南昌的时候，北伐军曾两进两出，得而复失。第二次攻打南昌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教导师几乎全师覆灭。11月初，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二军和第六军，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林伯渠的指导下，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先后攻下九江、南昌。接着，北伐军沿长江东下，直捣南京。这样，北伐出师不到半年，攻占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材料：

-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
- 北伐誓师词
- 蒋介石：《出师讨吴宣言》
- 北伐战争中的铁军
- 叶剑英与北伐战争
- 贺胜桥之战
- 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序列

材料一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摘录）

（1926年7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发表）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

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帷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2日）

材料二　北伐誓师词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同德同心。毋忘耻辱，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偷尔生。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司令，唯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嗟我将士，团结精神。彻始彻终，相爱相亲。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我不杀贼，贼岂肯休。势不两立，义无夷犹。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民无安宁。国既沉沦，家孰与存。民不安宁，民孰与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嗟我将士，共赋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选自《国民政府军委会档案》）

材料三　蒋介石：《出师讨吴宣言》

广州、长沙、汉口、上海、北京各报馆暨全国军人农工商学各界同胞均鉴：

中正此次奉命出师，就职之日，业将国民革命之需要，革命战争之目的，与中正北伐之职志，略陈梗概于国人之前，余义悉详本党出师宣言中，计邀鉴察，现国民革命军将与北洋正统吴贼佩孚决战于江汉，此战关系不仅决军阀命运之存亡，即中国国家与民族之能否恢复其自由独立，胥卜于此。质言之，国民与军阀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三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已至决战最后之时期；此全国同胞，亟宜参加革命战线，共同奋斗，以争回吾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人格也。顾今日出师何以必欲讨吴？吴贼之罪恶何在？前未具举，请得更陈。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受国际帝国主义蹂躏剥削者已八十余载。初期列强对华侵略，实直接以武力压迫我国人。迨太平天国兵兴，清室知汉族之不可侮，其对内政策始易以汉制汉，而帝国主义者之对华政策，亦因而以华制华。后以曾李兵溃，乃借戈登英兵以消灭革命势力，由是满清益慑服于帝国主义之淫威，坚持其“宁赠友邦，毋赐家奴”之政策，但图博得帝国主义之欢心，不惜以国家人民为其赠品。及辛亥起义，吾党领导民众，建立共和，袁世凯因缘时会，以奸诈手段，妄窃大位：彼以为攘自清廷，而不知革命之要求，起于民众。窃位之顷，即秉承亡清之故智，勾结帝国主义，以遂其僭号自娱之伪图，妄欲以北洋军阀为政治之中心，外媚列强，内宰民众，明知为帝国主义之走狗，为中华民国之罪人，然为巩固本身之利益，夷然曾不少顾；由是帝国主义者利用满清以汉制汉之故智，又递嬗而为利用北洋派以华制华之阴谋。民国以还，由袁段以至曹吴，一脉相承，至今不替。吴贼再起，但求足以维持北洋正统之命运，以保存个人之权利，虽亡国灭种而勿恤。盖自北洋派继满清以支配北京政府，军阀与帝国主义之结托益固，即国家与人民之被侵略压迫也益烈，中国国民革命之要求愈急，而吴佩孚之摧残遏抑亦愈甚。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暗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农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而吴贼不惟不扶植助长，反大屠京汉路工，使帝国主义者慑于近年民族自觉而不敢肆其淫威者，至是由吴贼自杀国人以启其端，此帝国主义者所以绝无踌躇忌惮，而决以武力对华高压，此吾国革命运动史上所视为奇耻大辱；悬而不决之大屠杀案，所以起于五卅。全国国民今日非除吴贼，无以寒帝国主义之胆也。今吴贼又将开关税会议矣。关税会议，昔吴贼所恃以反抗段祺瑞者也。吴贼复起而又承乏，但冀获得二五加税以为大借款之抵品，不惜抛弃中国固有之关税主权。吴贼不独欲借帝国主义延长中国内乱，更欲增加吾民负担，对不平等条约再加一层保障。其尤不可恕者，则利用国人之专制传统思想，日倡复古，反抗潮流，造谣赤祸，以防民众，托偶像以树威权，藉名教以济奸诈，欲造成一系天下，遂标武力统一，使一般时代落伍之腐儒、官僚、军人、政客，结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阳式之残余腐败势力，以为反动思想之中心。言爱国而勾结外敌，断送国权；言爱民而决堤京口，屠杀民众；言纲常而拥戴贿选窃国之曹锟以为元首；其他如鸩杀萧耀南，以奖谋杀；收纳西南叛将，以奖内乱；顽劣阴险，毒乱恣睢，不仅为新时代之蟊贼，抑亦为旧社会之罪人。且吴贼自窜岳踞汉，以至今日，伪窃名号，乱发命令，初无何种根据，盖贿选以成之北方政府，虽为北洋军阀所窃据，然犹得猪仔国会，欺饰世界与一部之国民。兹则吴贼所拥护之曹锟宪法与贿选总统，不惟全国人反对之，即号称合作之张作霖亦反对之。是吴贼本身所凭藉者，今已一无所有。革命耶？吴贼

固仇视革命者。护宪耶？而吴贼所挟持者又如此。然则吴贼是何所根据以取得对外对内之资格？故严格言之，吴佩孚者，直一叛国罪犯已耳。乃彼恬不知耻，俨然以中国支配者自居，帝国主义者利用之为工具，借款助械，隐为后援，指示发纵，嗾獒噬主。于是北洋派代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之阴谋，至吴贼又进而改为以湘制湘，以川制川，以西南制西南，以各省制各省之毒计。呜呼，吴贼造乱祸国，戕杀同胞，至于此极，真食肉寝皮而不足蔽其辜矣。……吴贼今更流恶未尽，派兵入湘，摧残革命势力，煽惑反动余烬，是诚不独谋危国民革命之根据，抑亦图覆中华民国之国基。昔先大元帅诏示吾人以"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而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不仅推倒曹吴，而在使无继曹吴而起之人"。今吴贼造乱作恶，已至贯盈，本党为革命计，政府为自卫计，皆不得不出师讨贼。本军既任国民革命之先锋，中正复荷本党与政府之重托，完先大元帅讨贼除恶之遗志，尽革命军人救国救民之天职，为民请命，责无旁贷，为国杀贼，义无反顾。现已躬率国民革命军，集中长岳，即日会师武汉，靖难中原。惟愿邦人君子，鉴其吊民伐罪之忱，协力救国，一致奋斗。须知国家之自由独立，非革命不能达其目的，吾民之利益幸福，非革命不能得其保障。北洋正统，已成弩末，帝国主义，今已崩颓，取消不平等条约，今已成吾民之普遍要求，欲求中国自由平等，是在国民之努力。值此国族存亡之交，时代转换之日，所望全国农工商学兵各界，咸联合集中于三民主义之下，视革命为国民人人之责任，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良谟，一致对外，共靖国难。至革命所抱之目的：消极在消灭封建余孽，打破正统思想，铲除军阀与其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积极在遵照先大元帅十三年北上宣言，速开国民会议，以产生三民主义之统一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使国家民族永复其自由独立之基。若夫联省自治之论，早成军阀割据称雄之护身符；保境息民之说，不过为拥兵自卫之代名词。推其用意，不过假借名义反抗革命，苟延其特殊阶级之生命，终见其崩溃与自杀而已。凡以此义商确，中正绝不敢与闻。至于南北军人，皆属国家基干，除与本军甘心为敌，冥顽负固者外，如有向义输诚，倒戈来归，不愿供军阀个人之牺牲者，或同情于革命，不中帝国主义以华制华自相残杀之毒计者，中正无不视为同志，期共安危。要之今日出师，惟在讨吴，即因吴贼为北洋军阀之正统，为帝国主义之走狗，为国民革命之障碍。武力为人民之武力者无不胜，军队为个人之军队者罔不灭，此则观于军阀过去之历史而益著者也。军阀以军队为其个人之私产；国民革命军为国民全体所有之军队也，尊重民意，服从民命，以人民为基础，以主义为依归。但期全国军人，联合一致，参加革命战线，共同御侮，达到本党总理救国救民之目的。凡革命进程中，苟可缩短战期，减轻痛苦，中正视力所至，必不后人。惟革命而不彻底，姑息转以养奸；除恶而不务尽，因循祗足酿乱。中正秉承先大元帅之遗嘱，负荷党国之重托，中国国民革命一日未成，即中正之责一日未完；四万万同胞之痛苦一日未除，即中正之责任一日未解。奋我戈矛，挞彼国蠹，牺我身命，救我民生。国人有不愿国族偕亡，而视国家与民族之利益超越于其个人与党派之利益者乎？时不可再，曷与乎来。

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长沙军次。（录自"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选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

材料四　北伐战争中的铁军

一、"铁军"溯源

铁军是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的部队。第四军组成于1925年秋，其前身是粤军第一师。这个师是1920年11月，孙中山到广州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后组建的。当时，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已扩充到四五万人，但成份复杂，内部不稳，孙中山派粤军参谋长邓铿，选素质较优者组建第一师，并兼任师长。邓铿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他励精图治，用进步的军事技术、政治常识，教育和训练士兵，使第一师成为一支比较有政治觉悟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批由邓铿选配的各级军官，如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叶挺、蔡廷锴、蒋光鼐、陈济棠等，大都是有文化、有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的人物。粤军第一师成为支持孙中山的重要武装之一。

这时期，孙中山主张北伐，邓铿拥护。但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1922年3月暗杀邓铿后，于同年6月16日发动武装叛乱，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指挥部分海军在珠江戡乱，并令北伐军回师讨贼。继于1923年1月，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讨陈，第一师起义响应，参加讨伐陈炯明与沈鸿英。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随后，又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为组建新军及整编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经过两次东征及南征之战，消灭陈炯明林虎及邓本殷部，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9月，将所统辖的部队整编为三三制的6个军（第一至第六军）。这次整编的特点是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规定军队不拉夫，不扰民，不筹款，军人不准嫖赌抽大烟，进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各团、连设政治指导员。各部政治工作人员多由共产党员及左派担任。如第一军之周恩来（周在此之前就是黄埔军校及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第二军之李富春，第三军之朱克靖，第四军罗汉、张善铭（后），第六军之林伯

渠等。1926年夏北伐出师前，又建立总政治部，以左派杰出革命家邓演达为主任，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政治素质大大加强，成为具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可钰任副军长，罗汉（共产党员）、张善铭（共产党员）、麦朝枢（国民党左派）、廖乾五（共产党员）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4个师。这支部队不仅保留了粤军的精锐，又从黄埔军校补充了一批具有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基层官佐。更为重要的是，部队中有一大批共产党员起着模范作用，全军上下士气奋发，斗志昂扬。北伐时，第四军作为前驱，首先出师。当时以军长李济深率第十一师和十三师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率领第十师和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因此，所谓铁军，是指参加北伐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及独立团。这两个师共有5个团。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共产党员）。辖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叶挺独立团归第十二师指挥。还有一个第三十四团，团长许志锐，当时留守琼州，北伐军攻下武昌后，该团归还第十二师建制。

独立团是我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其前身是陆军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它是由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建议成立的。在筹建中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选派徐成章、周士第、廖乾五、赵自选、曹汝谦等五位共产党员负责。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全部和从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第三十四团，以后改称独立团。该团连以上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班排长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团成立了1个共产党支部，支部成员为团的主要指挥官或其他负责军官，党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可以直接贯彻。1926年5月间，独立团即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在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时，周恩来曾亲作动员，要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起先锋和模范作用。独立团在向湖南、湖北进军中，真正起了这种作用。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铁军就是指独立团，这是不准确的，但独立团确实是铁军的铁拳头。

二、铁军之名

铁军，意谓有战斗力的军队，它冠之于第四军，是因该军在北伐战争中有辉煌战绩。

北伐战争初期，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向两湖、江西、福建进军。第四军在两湖战场作战，这是当时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这里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以及第一军一部，而以第四军打得最好。1926年5月，第四军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途中接唐生智告急电。叶挺未待后续部队到来，即于6月2日进到湘南安仁县城。应援在敌重兵攻击下开始溃退的第八军第二十九团，经两三天苦战，打垮谢文炳独立旅4个团和赣军两个团，解安仁方面唐军之危，并粉碎了敌人占领湘南的企图。初战告捷，实为北伐胜利的先声，使四军主力及其他部队进入湘南后迅速展开，一举突破渌水防线，打败数倍反扑之敌，攻占醴陵。北伐军其他各部，齐头并进，使敌人全线败退，北伐军攻占长沙。8月，第四军又攻占平江，突破敌人汨罗江防线。在湖北境内，第四军攻破号称武汉天险门户的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奠定了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8月31日至10月10日，第四军各部队又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此役共俘获守敌湖北督军陈嘉谟、守城总司令刘玉春以下万余人，完全打败了最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克复武昌后，第四军又以主力进至江西，击败军阀孙传芳主力一部于赣北之马回岭，截断南昌至九江敌主要后方联络线，利于右翼军之攻下南昌。至此，第四军在半年时间里，奔驰数千里，转战于湘鄂赣三省，经历了7个重要战役，其战绩之辉煌，为诸军之首。1926年11月下旬，第四军从赣凯旋武汉，各界联电致贺。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把在汉阳兵工厂特制的一面铁盾赠给第四军。这面铁盾正面铸有“铁军”二字，上款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铁盾背面有一首四言题辞，全文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峰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题辞概括了铁军之名的来历和含义。

铁军，最先是群众叫起来的。1927年初，《四军周报》第8期上有一篇题为《听副军长训话后的感想》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同志在朱师长、叶副师长就职那天说：‘第四军是铁军，完全是民众中间说出来的。民众已十分认识第四军是他们的军队。’”至于铁军之名兴起的时间，大约在1926年9、10月间。1926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第四军前方破敌志要》一文中提到，第四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扬溢于湘鄂间”。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武昌城未攻克前，第四军就已被湘鄂人民称为铁军了。1926年9月，我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训练军士）毕业后，回湖南老家嘉禾住了几天，听父亲说：“四军能打仗，都叫铁军。”我们村的初级小学和区的高级小学都有报纸，我父亲是从报纸和当时社会传说知道的。我离家去前方，到武昌的时候，北伐军已攻下武昌七八天。以此推算，我父亲看到介绍铁军的报纸，应是9月的。据查，1926年9月15日、30日和10月7日、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都有报道介绍铁军。看来，铁军之名是四军在

湘鄂之间行动中传扬开的。

三、铁军将领

大革命时代造就了铁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就我接触和了解的铁军主要人物，谈点看法。

张发奎是铁军中最显赫的人物，曾任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又是二方面军总指挥。"党权运动"时期，我听过他几次讲话，那时他表现得很革命，我记得他在武昌左旗兵营集合第七十一团全体人员讲话时说："我们一定要打倒蒋介石，仅四军和十一军就有3万支枪，不怕打不倒蒋介石"。有一次军官会议，他说陈铭枢不够一个革命者，打下贺胜桥后，他张发奎本可以直进武汉，但他让陈铭枢去追，因为他知道陈想当武汉卫戍司令。他说，陈铭枢走了，蒋光鼐、戴戟也走了，让他们走吧，我们还要革命到底。张发奎就二方面军总指挥职的时候，汪精卫、郭沫若、恽代英都到了，他说："如果兄弟不革命，你们就起来打倒我……"。那时，他确实有股革命精神。

但革命处于转变之时，张发奎就掉队了，他动摇犹豫，一直堕落到参加军阀混战，镇压工农兵起义。即在我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以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时，他还在1936年1月，就任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围剿"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先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曾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12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公正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塝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付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曾对我说："张发奎不够朋友。"解放战争时期，张发奎由一贯反蒋转为以蒋介石之俯仰为俯仰，1946年春，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时，他利令智昏，初则不承认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之存在，，继则企图在东纵队北撤时将其消灭，幸被我预察其奸，及时揭露，才使他的阴谋未逞。在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之际，他还一度就任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据叶帅讲，我们曾托人劝张：当空头司令没有意思，蒋介石不信任你。他说："我再干3个月吧！"这时候的张发奎成了"官迷"，近乎小人了。全国解放后，张逃到香港，同台湾有联系，但没有去台湾，也不愿回大陆，他说，你们那里没有台湾发展快。最后死在香港。

张发奎的一生，充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他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在革命转折时期，由于阶级本质和政治条件决定，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做了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即使如此，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仍是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在他逝世时，叶剑英还发了唁电。

陈铭枢也是铁军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蒋光鼐在国民党军事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张、陈二人也作如是评价："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于北洋军阀政治上和军事上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以"蹈厉无前"的指挥作风而率部所向披靡。陈铭枢"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几个重要条件都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奇无正，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跟踪追去，而待守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城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1个师。1930年夏的衡阳大战也是如此，当张桂军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不主动攻击，而取守势，在衡阳周围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攻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在不同战争环境中有一定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被分化，但陈铭枢等继续同我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从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第四军中的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中说："陈铭枢在北伐时，公文箱中军事书很少，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据说陈以后也喜欢佛学。其实这也不算怪事。对于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我看过一

个条幅，据康生讲，1936年他到巴黎，见到陈铭枢，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铭枢进行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致使这位长期与我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不禁令人叹惋。

叶挺是我在铁军中见得最多、印象最深的人物。我到铁军不久正赶上"党权运动"，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自行离职，叶挺便由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来后，经常召集我们开会，讲"党权运动"的意义，有时还请恽代英或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和军宣传科长庄凌汉来讲演，大家都集中火力批判蒋介石的独裁和反动。那时，军队通常是政治工作人员讲政治，可是，叶挺却常是以军事指挥官身价，主持政治活动，这就给军事工作人员带了好头。叶挺穿着整洁，打着绑腿，一副威武的军人仪表，我们对叶师长都怀有敬仰之情。他少年从军，进过陆军小学、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1924年经廖仲恺派遣到苏联学习，接受了苏联红军的建军和作战思想。叶挺与张发奎、陈铭枢等是同一时代同一系统的军人，所不同的是他更倾向和接受进步思想。早在1917年他在保定军校工兵科学习的时候，就曾给当时影响很大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写信，倾诉其为国为民、自强不息的豪情壮志。在苏联学习时，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就使他在思想境界以及作风和气质上，都高于张、陈。在铁军中，他吸收共产党员和左派参加所率部队，按照苏联红军的样子带兵、用兵。他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扰民、不筹款），要求军官无"三金"（金戒指、金牙、金丝眼镜），不准连长吃空额，各连官兵出席连党部会议，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在团里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营有党小组，连有党员，使他领导的部队成为共产党最早掌握的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在北伐军中，这支部队的军政素质也属佼佼者。

叶挺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从他指挥独立团进行的湘南安仁、汀泗桥、贺胜桥和围攻武昌城以及反击夏斗寅、杨森进攻武汉政府等许多战斗中可以看出。但由于他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叫做有"色彩"，虽战功卓著，却不为当局信任和重用，北伐军攻下武昌，铁军几个主力团的团长都升为师长，只有他任副职；在二期北伐保卫武汉政府的时候，他本是卫戍司令，除指挥铁军的七十二、七十四、七十五团外，还指挥中央独立师，但战争胜利和北伐军回师之后，他仍退居原职。军队扩编为二方面军，也是如此。

叶挺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在战略上也有见地。抗日战争后期，叶挺的老同学和老战友聂荣臻元帅曾同我谈到过叶挺。他说，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叶挺都提过好的意见，但未被采纳。一次是南昌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叶挺提出到漳州去，因漳州地处闽粤边，又靠海，过去孙中山在不利时，曾到这里，经补充整理，又回师广东。但当时南昌起义军预定到潮汕，以取得国际上的支援，叶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次是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他提出撤退，但遭国际派来的代表反对，说他是"土匪主义"。到第三天，敌人从各个方向压过来，起义军被迫撤退到海陆丰，损失很大。这两次都有战略意义。如果当时采纳叶挺的意见，两次起义的结局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谈话的时候，叶挺正在国民党监狱中，二人相对凄然。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去苏联，受到党内不公正的批评，就别扭起来，长期侨居国外，这是他的错误。但他始终不投靠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接受党的领导。在新四军任职时，一心一意为部队的巩固发展而努力，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见，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皖南事变，他身陷囹圄后，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方诱降，保持了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出狱后，立即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后在去延安的途中，与夫人李秀文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叶挺的一生坎坷不平。他是个忠于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事业的人，是有才能的人，由于当时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北伐战争时期如此，在新四军也是如此，这是叶挺之不幸！也是国家的损失！

铁军人物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黄琪翔。黄在一期北伐时是张发奎的团长，二期北伐为师长，回师武汉后为四军军长。在一期北伐的各重要战斗中，黄琪翔指挥的第三十六团打得好，堪与叶挺独立团相伯仲，所以在打到武汉前，由陈可钰建议。经蒋介石批准，破格提升黄琪翔和叶挺为少将团长。在二期北伐的上蔡和临颍两次大战中，他指挥的第十二师，英勇顽强，全军闻名。张发奎的声威，得力于他不少。铁军分裂后，在张李混战中，他和张发奎同时被免职并通电下野。他参加镇压广州起义后即出国，脱离张发奎，与宋庆龄、邓演达交往。回国后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淞沪抗战，参与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尔后担任中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总书记。他不参加军阀混战和反共战争，是一位有识之士。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几个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他主张和平谈判，不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8年底，蒋介石企图将他诱往台湾。他逃避至香港，参加农工民主党的活动。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即担任新中国的高级职务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7年反右时，对他作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也和许多知名人士一样，未能寿终正寝。

（选自肖克《铁军纵横谈》）

材料五　叶剑英与北伐战争

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主张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统一全中国。

国民革命军经过整编，组成八个军。蒋介石任总司令。叶剑英在第一军第二师任副师长。

出师之始，蒋介石让何应钦率部驻防汕头，任命他的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代理第一军军长，后改任总预备队指挥，负责指挥第一、二师。王柏龄推荐叶剑英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王柏龄、叶剑英于8月12日抵湖南长沙，25日由长沙向岳州进发。蒋介石以岳州为北伐军后方，攻下岳州后，命总预备队在此镇守驻扎。

9月6日，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7日，北伐军一部向江西进军。王柏龄、叶剑英奉蒋介石手令，率预备队第一师自岳州开至浏阳集中，随即进占江西之铜鼓城，配合第六军东下攻打南昌。

9月19日，北伐军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向南昌发起进攻，王柏龄、叶剑英率领第一师声援作战，一举攻克南昌。

军阀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大为震惊，迅速组织优势兵力由南方夹攻南昌。北伐军在城内，兵疲弹尽，坚守数日后撤出。

在南昌作战中，王柏龄以蒋介石的嫡系自居，不听第六军军长程潜调遣，他指挥预备队第一师增援，与敌人打遭遇战，伤亡过半。

北伐军在南昌鏖战，蒋介石闻讯，与加伦将军亲自到前方督战。

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力主暂时不打南昌。

他找到王柏龄一再申诉自己的看法："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南昌。南昌三面环水，地势险恶，即使我部孤军深入，打到城里，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士气消沉，还是缓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叶剑英意见，为了挽回失败的面子，不顾一切组织部队连日强攻。自己还乘小船偷渡进南昌城内寻欢作乐。

当时少数部队入了城，由于失去群众的支援，加上不熟悉地形，遭到敌军猛烈反扑，分割包围，无法立足。王柏龄见状只身逃脱。

叶剑英和团长薪岳等只好组织部队连夜仓惶退出。部队遭到惨重损失。

第二次攻打南昌失败。

加伦将军向蒋介石报告战斗经过，分析这次打南昌失败多归罪于指挥不当。后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作战的唯一好处是解救了两名在南昌监狱里受苦的苏联飞行员以及蒋介石的走狗、反动地主分子王柏龄的灭亡。"

部队撤出南昌后，叶剑英奉蒋介石总司令之命，随第一师从奉新出发，参加王家铺战斗。

这次战斗经过是这样的：10月上旬，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孙传芳的第五方面军陈调元三个师在王家铺南约十里处，鏖战几天几夜，不分胜负。第七军入赣以来，勇猛作战，连克城镇。后来屡遭强敌，锐气受挫，伤亡甚大。全军又缺粮，有时一个星期连着吃稀粥。时值初冬，仍穿单衣，官兵已是疲惫不堪，士气不振。不料在王家铺再遭强敌，打得很苦。蒋介石闻讯，恐其独力难支，即派第一师连夜出发增援，并委派叶剑英协助第一师代师长王俊指挥部队。王俊虽是黄埔生，但缺乏实战经验，又刚愎自用。在南昌战场已经两战两败。第一师自白山绕出昆仑山侧背，赶到山脚下，已经拂晓。叶剑英随师到达后，即亲自观察战场。他从望远镜中看到敌军陈调元部踞守王家铺南一列高地，在梅山、覆盆山和双溪一线，顽强抵抗。桂系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

叶剑英了解了敌情和地形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稍加点法码，敌人就可退了。"

他提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正面用一小部分兵力佯攻，命炮兵向山上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

王俊急于争功，只求速决，说："那不行，时间不允许，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接上火，敌人看到增援力量到来，连忙撤出阵地。

王俊得意地喊起来："敌人退了，我们追吧！"

叶剑英看到这样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气急了，他强忍着愤怒，说："等你上去，人家已经跑几十里路了，什么也缴不到。"

就这样，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打了一个消耗战。对于这次战斗，叶剑英曾有过较为详细的回忆。他说："打江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王俊又不听我的话。……结果什么也没缴到，只缴到一个炮筒。黄埔学生气死了，把这事报告了蒋介石。"

10月下旬，蒋介石制订《肃清江西计划》，组织北伐军发起新的进攻，11月8日再克南昌。

（选自《人物》94年4期，作者：范硕）

材料六　贺胜桥之战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吴佩孚亲率刘玉春第八师、张占鳌混成旅和吴的卫队旅等生力军，由武昌乘火车赶来汀泗桥增援。当他到达贺胜桥时，汀泗桥、咸宁已为我们占领，遂决心在贺胜桥防守。其兵力为第八师、第十三混成旅、卫队旅及收容由汀泗桥、咸宁退回的陈嘉谟、马济、娄云鹤等残部共计二万余人，大炮六十门、机关枪一百余挺。

贺胜桥地势险要，西以黄塘湖为依托，东以梁子湖为依托，当时涨水，这两个大湖之间的陆地变得狭小了。敌人把两万多兵力、六十多门大炮、一百多挺机关枪配备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上，设三道防线防守，构成了十余里的防御纵深。第一线在贺胜桥以南约十里的桃林铺一带，第二线在贺胜桥以南约四里的印斗山一带，第三线在贺胜桥一带。贺胜桥南端有一条小河，因涨水泛滥，仅有一座铁路桥可以进入贺胜桥，与汀泗桥、咸宁的情形差不多。吴佩孚认为平江、汀泗桥战斗的失败，是由于我军绕到侧后进行攻击，为了对付我军这种战术，所以他亲自指导构筑贺胜桥防御阵地，不仅构成了十余里的防御纵深阵地，而且每个山头都构筑环形工事，形成周围防御，可以独立作战，各个阵地之间火力可以联系，可以互相支援。吴佩孚视察了桃林铺阵地、印斗山炮兵阵地后，曾对其幕僚说："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吴佩孚发出这个狂言，一方面是认为我军无法攻破贺胜桥阵地，另一方面是他清楚美、英帝国主义已给孙传芳许多金钱和武器，并督促他出兵抄我军后路，以收夹击之功。只要守住贺胜桥，孙传芳不久就会行动起来。吴佩孚企图再显"威名"，所以他亲自在贺胜桥指挥这次战斗。

我军是以第四军和第七军第二路担任攻击贺胜桥的任务，其部署大致如下：独立团由正面桃林铺附近沿铁路向贺胜桥攻击前进，第三十五团由左翼向贺胜桥攻击前进。第七军第二路由右翼向贺胜桥攻击前进，八月三十日五时开始总攻击。第十师炮兵营和第十二师炮兵营均集中军部，统一指挥，掩护步兵攻击；第三十六团为第十二师预备队，第十师为第四军预备队。

八月二十九日，独立团在咸宁城东北地区之驻地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支部立即进行政治动员，指出："吴佩孚已到贺胜桥，孙传芳正准备出兵配合作战，我军必须迅速攻破贺胜桥，打败吴佩孚，占领武汉，然后集中力量打孙传芳。敌人屡战屡败，士气低落，我军攻无不克，斗志昂扬。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委员会领导武汉各地人民，早已向敌军进行工作，动摇其军心，瓦解其内部，并组织武装袭扰其后方，配合我军作战。我们有广大人民支援，攻破贺胜桥是有把握的。但贺胜桥战斗与过去几次战斗不同，这次吴佩孚亲自指挥，有一部分生力军，炮火较强，防御纵深很长；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勇敢，不怕牺牲，以攻破贺胜桥，完成光荣的战斗任务。"支部和团部分别在党内和党外进行政治动员后，党员、团员都在小组会上表示了攻破贺胜桥的决心，战士们也在班、排会议上表示了攻破贺胜桥的决心。

贺胜桥地区的农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很快就接受了。连日来，敌人由汀泗桥、咸宁退逃时，沿途抢劫、强奸、无恶不为，农民恨之入骨。听说独立团要去贺胜桥，许多村庄的农民都争着来给带路去打敌人，以报深仇。独立团每个连队都有熟悉道路的农民为向导，战士们说："连里都有了参谋，我们一定能打进贺胜桥。"

二十九日黄昏前，独立团由驻地出发，途中接到张发奎的命令：敌人现向第三十五团出击，甚为猛烈，独立团应即跑步增援。独立团跑步到桃林铺以南时，敌人铁甲车正从对面冲来。但是没有工具破坏铁路，以阻止铁甲车冲进。当地农民说："把稻草堆在铁路上，它就不敢来了。"农民和战士们都去搬来许多稻草，堆在铁路上，敌人铁甲车真不敢来了。向第三十五团阵地出击之敌，遭到独立团的侧翼攻击，也退走了。

二十九日夜间，独立团以第三营在铁路西边，第二营在铁路东边就攻击准备位置，准备按照军部规定于三十日五时向敌攻击；第一营、特别大队为预备队，团指挥所在桃林铺以南铁路东侧。第三营、第二营接敌时，因为天黑看不清敌人的阵地，带路的农民熟悉地形道路，把先头连带到距敌人阵地百余米的地方才停止。连排干部亲自侦察敌人阵地和我们的进攻冲锋道路。敌人有所发觉，乃进行射击。从敌人射击的火光中，更加了解了敌人阵地的情况。凌晨四时左右，敌我双方已能互相隐约可见，敌人不断向我射击。第二营、第三营被迫发起冲锋。战士一鼓作气冲进敌人阵地，闪光的刺刀指向敌人。一群敌人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我们占领桃林铺一带敌人阵地后，继续向纵深进攻。叶挺进到桃林铺以北时，后面还有残余敌人向他射击。他一面派少数部队肃清残敌，一面继续前进。

第二营连续攻破几个阵地，忽遇刘玉春部出击，将第二营包围。第二营营长许继慎同志胸部负伤，子弹穿过肺部，还坚持指挥战斗，命令部队坚决抗击敌人。第一营和特别大队增援上去，经过很激烈的战斗，终将刘玉春的出击部队击退，独立团各部继续向敌攻击。第五连进到敌人设置有指挥阵地和炮兵阵地的印斗山附近，伤亡很大，但仍坚守阵地，继续战斗。第二营请求团部迅速增援。此时独立团的兵力已全部投入战斗，仅有向铁路线警戒、准备射击敌人铁甲车的机枪连可以调去增援。至于友邻方面，第七军第二路没有攻破敌人阵地，落后很远；第三十五团也落后很远。军、师的预备队在后面，一时也不能赶上来。

单独攻入敌人纵深的独立团三面受敌。敌人的机枪、步枪、大炮不断向独立团射击，进不易，退不许，停不宜，形势十分危急。叶挺同志接到第二营报告后，就下决心坚决往前攻，集中机关枪连、第一营、第二营兵力，专攻印斗山这一点，并叫我前去指挥。

我们六挺重机枪在印斗山西南一个山坡上响了，第一、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印斗山进攻了。第一营营附符克振同志首先率部队冲上印斗山，他向山上冲时，胸部被子弹打穿都不知道，还继续向前冲，又走出好几步才倒下。战士们勇往直前，猛打猛冲，占领了印斗山。许多敌人举手缴枪、缴炮，但有一部分敌人带着竖在印斗山顶以示威风的几面大旗往山下逃跑。独立团的战士们都很熟悉，这是敌人退却的征候，于是不约而同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东起印斗山，西至铁路西，一千多把雪亮的刺刀杀入敌人阵地，真是猛虎入羊群，只见几万敌人连跑带滚，山崩一样地垮下去了。中国共产党咸宁支部领导的农民武装，在贺胜桥以北袭击敌人，使敌更加恐慌，起了配合作用。吴佩孚的大刀队在贺胜桥铁路桥上阻拦，不准后退，砍杀不少退下来的敌官兵，并杀了旅长、团长数名，将头挂在贺胜桥街道中间，以图阻止退却。但仍然阻止不住敌兵退却，更挡不住独立团的猛打猛冲猛追。敌军个个争先退逃，仅从贺胜桥上挤掉到河中淹死的就数以千计。独立团乘敌混乱之时，冲过铁路桥。吴佩孚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途中轧死了许多沿铁路退却的敌军官兵。三十日十一时左右，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武汉最后一道大门。

独立团在贺胜桥车站缴到没有开走的火车，上面载有饼干、白面、大米、弹药和其他军用品，这是因为铁路工人纷纷逃跑，火车没人驾驶，这些东西敌人无法运走。吴佩孚原拟坚守贺胜桥并准备进行反攻，所以在贺胜桥存的粮食、弹药、枪支、军用品堆积如山，均为独立团缴获。

独立团占领贺胜桥后，仅派少数人员看守物资，部队便人不停步马不停蹄地向敌人猛追。如火的太阳在头上照射，脚下的铁轨热得发烫，战士们身上的大汗象泉水般地涌出，但是为着消灭敌人，还是用快步追击。当尖兵连（第六连）追到贺胜桥以北约三十里之涂家湾附近，团部到达贺胜桥以北二十余里之降仙桥附近，接到张发奎的命令，叫独立团不要追击，让第十师追击。张发奎的命令不仅不让独立团追击，而且指定了宿营地，要独立团即回宿营地待命。叶挺不得不下达向后转的命令。很多战士说："第十师还没有来，为什么把敌人放走呀！"都不愿意返回。几经说服，部队才返回宿营地。

关于贺胜桥之战，刘玉春写的《百战归田录》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玉春陷重围中，血战冲出，而于信臣所部未得脱。玉春复救出之时，补充团第三营又至。玉春集合后方兵力，谋再战，是时左翼一山有友军两营踞守，因命炮队依山布阵，借彼掩护。布置甫毕，敌已大至，而山上友军又无故退却，炮兵以无掩护不得退，敌兵抄袭后路，于是复陷围中。玉春以后方兵多，欲退不得，乃反进攻，肉搏冲锋者数次，前方敌兵少，竟得脱险。退至贺胜桥，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浮尸至不见水面。玉春践尸而过，昏夜还至武昌之南关。孚威亦自贺胜桥还武昌，是为八月二十五日也。集合本师查点员名，计十五旅及补充团、炮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卫生连凡五千员名，伤亡三千零五名。团长三员，陈献斌阵亡，拜伟重创，周榯被俘。营长九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七员。连长四十二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二十五员，其排长以下不能遍举。其他各部所余，陈嘉谟一师余三千名，其卫队一团余一千二百名，宋大霈一师二千名，孙建业一旅四百名，张占鳌一旅三百名，余荫森一旅二千名，孚威之卫队一旅亦仅一千零五名……"

只从刘玉春这一段话中，已可看出吴佩孚在贺胜桥损失之大、失败之惨，也可以看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和攻破贺胜桥的战功之大矣。

（节选自《周士第回忆录》）

材料七　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序列

（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总参谋长李济琛　总参谋次长白崇禧

第一军军长　何应钦　党代表　缪斌

第二军军长　谭延闿　党代表　汪精卫　副党代表　李富春（中共党员）

第三军军长　朱培德　党代表　朱克靖（中共党员）

第四军军长　李济琛　党代表　廖乾吾（中共党员）

第五军军长　李福林　副党代表　李朗如

第六军军长　程　潜　副党代表　林伯渠（中共党员）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留守广西）

第八军军长　唐生智　党代表　刘文岛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背景介绍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伟大壮举。

第一次武装起义发生在1926年10月23日，当时，孙传芳受困于江西。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进

攻上海。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仓促和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情报失误，起义失败。

第二次武装起义于1927年2月22日举行。起义前夕，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抵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2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领导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总同盟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由于蒋介石密令北伐军停止进攻上海，蓄意出卖起义，致使工人孤军奋战。起义被北洋军阀残酷地镇压下去。

第三次武装起义发生在1927年3月21日。起义前，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参加特委，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并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特委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加强了起义工人的武装和训练，制订了周密的起义计划。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21日，中共中央特委当机立断，及时发动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使用劣势的武器装备，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终于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解放了上海市。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府委员中半数是共产党员。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是北伐战争中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伐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材料：

- 名垂青史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 周恩来在武装暴动中

材料一　名垂青史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26年10月。第二次是1927年2月。第三次在1927年3月，周恩来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相衔接的，中间没有间歇。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今天的暴动。二、经过商界调和由上总（按：指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就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前两次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这个军委，同时也就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月3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他充分肯定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起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准备。”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这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针对这两条教训，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军事工作时，始终紧紧抓住两个要点：第一，起义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3月初，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一路由西向东，经宜兴取常州；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了。5日晚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宣布：“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并且说明：行动分为引翔港、杨树浦、闸北、小沙渡、南市五个区。由于军阀的兵力集中在闸北，起义队伍也“集中力量在闸北”。

起义的时机越来越迫近了。周恩来对军事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在他的领导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区分别制订出书面的作战计划。内容都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方法、时间、注意事项、治安、通信联络等。对这些问题，预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和规定。

3月21日中午12时，全市约八十万工人宣布总罢工。按照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中午1时起，起义队伍系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也涌向华界。还有人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助威。

等待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各方面都作了周密准备后开始。

起义的行动，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七个区。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有五千多人。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

起义发展得十分迅速。当时上海反动军阀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较顺利。南市最早打下，工人纠察队先取下警察局，再占领高昌庙和南火车站，把警察的枪都缴了。浦东在两小时内也拿了下来。吴淞由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占领。他们缴获了大量武器，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员。到下午4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取得胜利。

这时，斗争焦点集中到敌军兵力厚集的闸北区。敌军在闸北共设有二十多个据点，其中主要的是：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当天4时前，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的敌人先被解决。周恩来把指挥机构迁到第五区警察署。

4时左右，吴淞部委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五百人左右，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恩来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刻召集会议研究。在会上，他当机立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他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按：指北火车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指着地图宣布：选择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并亲自率领工人纠察队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一个小队到天通庵勘察地形，布置兵力。他经过仔细观察后，找到住在那里的老扳道工鲁大爷和他的儿子把路轨的道钉拔掉，又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

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翻倒。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刻以密集火力猛烈射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又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到，投入战斗。天黑后，敌军一部分士兵下了车，坚守待援。周恩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军兵心逐渐涣散，火力转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人溜走外，其他四百多人挂起白旗，丢出枪枝，全部被俘。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并将其中的轻机枪调拨给正在围攻北站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东方图书馆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这里又处在宝山路中段，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间必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守的敌军虽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并配备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充足，易守难攻。起义前，工人纠察队先去察看，已引起敌人注意。总攻一开始，敌军以密集火力顽强扼守。工人纠察队牺牲三人，受伤一人。许多工人急了，准备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这时，周恩来赶到了，他立刻加以制止，说：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露，牺牲太大。他细心地察看地形后，决定为了减少伤亡，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在它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楼上部署火力，严密监视。敌人一露头，立刻猛烈射击。并要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东侧另挖一条一百多米的交通壕，来保护总指挥部同北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线。他说：我们打下北站，这个孤立的据点，敌人自会放弃的。这样坚持了一天。到天通庵战斗结束后，原在那里参加战斗的工人纠察队开到东方图书馆来。指挥部用广播喇叭宣传天通庵的战斗已经结束，劝告守军投降，否则要用炸药爆破了。下午4时半，敌军用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外，表示投降，并停止射击。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懂得对方悬挂白旗的含义，仍在继续进攻，又牺牲了六个人。这时，周恩来又来了。他立刻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总指挥部随着也迁入东方图书馆。

这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固的据点——北火车站。敌军在这里的守备力量很强。北站的屋顶上设有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着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备有迫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设下的重机枪阵地。周恩来在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就开始指挥对北站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他作了周密的部署，在虬江路到北站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以便逐步接近并包围敌人。黄昏后，敌人的炮火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的居民住屋着火。火借着风势，沿烧开来。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衣物，一片号哭。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赶到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果然，敌军乘这个机会发动出击，准备突围，工人纠察队被迫后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的纠察队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救火工作也顺利地完成了。

22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已去，悄悄地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5时，按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队伍汇合时，周恩来站在三叉路口的高地上，对他们讲话。他叙述了各区敌人已先后被消灭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二千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6时以前攻占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猛攻。6时，攻下了敌人的这个最后据点——北火车站。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三十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

（节选自金冲《周恩来传》）

材料二　周恩来在武装暴动中

我在1927年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时是罗亦农同志的秘书。赵世炎同志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经常是一身工人打扮。罗亦农同志是做民主人士工作的，常常穿着长袍大褂。恩来同志倒是穿着一套青灰色的旧西装。恩来同志化名伍豪，我们都叫他伍豪，老伍。他一到江苏省委机关，气氛就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同志却很诚恳。

记得，第三次起义的第二天，3月22日的中午，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硝烟弥漫。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商务印书馆大楼里，浙江路的情况很严重，英国的装甲车炮火封锁了这一带。南市、虹口的工作纠察队无法前来援助。商务印书馆又不能强攻，怎么办？

大家等着北伐军来援助，可是等不来。

正在这时，领导起义的伍豪同志却差一点被国民党收买的一个工人暗杀，由于工人的掩护才脱险。伍豪同志对这个上当受骗的行刺者，进行了一番教育，劝他和工人一道参加起义。这一举动，当时我们都很感动，感到恩来同志襟怀宽阔，真有气魄。

暴动后，恩来同志和工人战斗在街垒里，生活在一起。工人群众拥护他，爱戴他，都叫他总指挥。他一刻也不离开商务印书馆和庆云里。

一个紧急情况突然发生了，敌人一列军用车从天通庵车站开来，吴淞离北站不远啊，一千多敌人的援军半小时就可以冲到总指挥部门口……可是，龙华的北伐军也不来援救工人纠察队，这是为什么？

在这紧急情况面前，大家焦急万分。这时，伍豪同志带着望远镜来到街垒前，向大家讲道：

“同志们，工人已浴血奋战一昼夜，龙华的北伐军为什么按兵不动？吴淞方面敌军正向我进军，这不是存心让军阀吃掉工人武装吗？”

“同志们，蒋介石想借刀杀人哪！”他目光炯炯，坚定地说，“我相信上海工人能靠自己解放自己！”

接着，伍豪同志举起手，果断地向大家说：“根据当前的敌情，指挥部决定：北站敌众我寡，我采取守势；商务印书馆，敌少，我防御设置好，可采取围势；吴淞敌虽众多，但是士气不振，我可取攻势；尤其一列车人，目标大，防守难，我们可利用地形优势，给它一个伏击，歼灭它！”

恩来同志分析形势的敏锐才能，大家十分钦佩。他善于在纷纭繁杂的情况中，分清形势，作出判断。他那侃侃而谈，那铿锵有力的生动语言，给同志们增添了勇气，顿时大家情绪高涨。他对战斗作了细致周密的布置。结果，经过一天的激战，集中兵力打下了北火车站，全面解决了战斗，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在总结会议上，伍豪同志向大家说：“第一次暴动是在1926年11月24日，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暴动还没有开始，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多位同志就被李宝章杀害了，后来革命军占领上海、嘉兴等地，1927年2月19日起，上海36万工人总同盟罢工，2月22日第二次暴动又失败，工人数十人被杀害，海军开炮，同情革命者扩大工人大罢工，但是陈独秀让复工。”

伍豪同志作这报告时，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受到工人、学生、店员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他[illegible]十分谦逊地说：“第二次总同盟罢工，由上海总工会领导，是秋白同志领导的，由于准备不充分，暴动失败了。现在第三次是胜利了，不过，如果没有秋白前两次的总结，没有他向党内号召今后应与群众在一块革命的思想，也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这次起义如果秋白来领导，我相信，也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

当场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没想到恩来同志的总结会对前二次的总结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对秋白同志有这么崇敬的评语。

我们第三次暴动时，的确，全市商贩，甚至卖油条烧饼的工人，都向工人纠察队、暴动队伍送饭。上海7个区战斗了两昼夜，直到敌人用竹竿插上白旗。大家跳出街垒，高兴地欢呼，“我们工人阶级胜利啦！”

恩来同志两昼夜没有合眼，他一直战斗到北站战斗结束，才下火线回到商务印书馆的俱乐部。第二天的总结会议上，他却作出这样的总结。我当时是记录，我看到罗亦农、赵世炎都愣住了，听到伍豪同志的话，我也停住了笔。可是又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使我激动，不是我听错了，而是伍豪同志以最简炼的语言，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大家说：“这次暴动如果是秋白同志领导，同样会胜利的，这胜利的取得应归功于参加暴动的全体工人、职员、学生！”

（摘自阮波《恩来同志的谦逊美德》一文。）

中国国民党二大

背景介绍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于1925年8月15日召开，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再延期，至1926年1月1日才在广州开幕。这次大会应出席各省区代表共二百五十六人。4日，大会正式开始，到会代表一百八十九人，以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经亨颐（后因缺席改推宋庆龄）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

这次大会，是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一大”宣言、政纲的正确性，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的

大会。

首先，大会一致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的议案；并向苏联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发出友好电文，表示中国国民党至诚与苏联“携手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表示坚决秉承孙中山遗教，“与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携手前进，完成国民革命”。

1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宣言》首先分析了“世界之现状”，指出：当时世界的革命形势，“民族革命运动已普及于全世界，而无产阶级实为其指导者”；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一切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有联合战线之必要”。并说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与国际革命主义，其内容实为一致”；国民党要“与以不平等待人之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对于苏联，应“以诚意与之合作”。关于“中国之现状”，《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他们内外勾结，企图“遮断国民各阶级间联合，摧残农工阶级发展，以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因此，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手段是：“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为官僚买办阶级与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最后，《宣言》还特别强调指出：孙中山“所提出于第一次大会之宣言，对于三民主义之解释，及最小限度之政纲，实为中国之唯一出路”，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接着，大会又听取了路友于“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严正地宣布：西山会议的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大会决定：把策划西山会议的首要人物谢持、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于参加西山会议的附和者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给予警告处分；对于戴季陶，虽“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但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并未与会”，仅“由大会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一误再误”。这个决定，申张了党纪，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外，大会还通过了政治、军事、党务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商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并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慰勉各地罢工工友，表扬他们“忍饥耐寒，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帮助国民政府，肃清了东江南路，统一了广东，铲除了反革命的势力。”希望海内外罢工工友，“本此次奋斗之精神，与帝国主义者拚命，以求达到民族解放之目的”。

1月16日，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等三十六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等二十四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大会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的有：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等十二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有：黄绍竑、李宗仁等八人。这次选举，由于受到陈独秀错误主张的影响，让中派和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二大”的中央占了优势。

1月19日，大会闭幕。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选举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为中央常务委员。这时，在国民党“一大”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被推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的高位。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他逐步夺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方便条件。

材料：

- 汪精卫致开幕词
- 吴玉章作代表大会经过报告
- 闭会词

材料一　汪精卫致开幕词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诸君：

去年五月十六日，本党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广州，议决在八月十五日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并议定组织法、选举法通告海内外各党部。各地党部自从接到了这个通告以后，也早经按照组织法、选举法把代表选举出来。本来在去年八月十五就可以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了，后来因为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各地交通不便，各处党部许多有函电来请求展期，一展再展，直到今年的元旦才在这里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由今天回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天，到现在已经两年。照党章规定原本是每年开大会一次的，为什么弄到两年才开大会一次呢？这并不是党务的驰缓，实在因为时局和环境的关系。当本党初次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也曾经有过宣言，这是大家都见过的。我们想起今天在这里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心上一定都感触非常的悲痛，因为第一次大会时，我们还有总理站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一切，我们事事都有他的指导，我们只知跟着总理向前奋斗，就断断没有错了。可是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不见我们的总理了，总理已经离却我们去了。我们现在能见着的，只有总理的遗

像,能听着的,只有总理的遗嘱。这张遗嘱,就是总理最后告诉我们的话,要我们继续他的精神去做的了。回忆民国十三年这一年,我们也是在很痛苦、很困难的环境中奋斗的,但是虽然痛苦困难,尚有总理同在,我们仍是很觉愉快的。自从去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后,我们遵依着他的遗嘱去努力,虽然未尝没有一点效果,但因为总理已经不在,我们在奋斗中,总抱着许多悲痛。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座中各位同志,从这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定也会想起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总理的说话。各位还记得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中间,恰是接到了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先生逝世的凶耗。总理为着这件事,觉得非常哀痛,当时曾停会两天志哀。总理并且亲自出席演说,说明他哀痛列宁先生的感想。这个时候总理有几句话,很像是预兆一般的。他说:"列宁先生虽死,列宁的党不死,俄国的革命事业也是不死。我今天在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要将本党的责任交付给全体同志,将来我纵然死了,本党却还是不死的。"这天总理的说话,今天座中同志料想许多都是在座亲耳听见的。当时各同志听了这番说话以后,心灵上都起了非常的震动。都想不到到了今年,总理的话果然是真的!一点都没有错的!他真是死了!他真是离却我们去了!此后本党的死不死,就只有看现在没有死的同志是怎样了!如果各位同志都是听从总理的话的,就应当想到究有什么方法能够使本党不死,能够使中华民国也不死。我相信总理虽死,总理的主义不死的(鼓掌)!不特是不死而已,而且还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扩充到全国民众的(鼓掌)。总理的主义就是总理的生命,总理的主义是不死的。我们继续实行总理的主义,便是继续总理的生命。故此我们敢说总理实在不死(鼓掌)!总理在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他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样的!兄弟因此更想到去年本党的同志,因为遵照总理遗下我们的种种教训、种种政策,固然是已经得了一点进步,但其中有一位同志,是帮助总理改组本党最出力的,又是和蒋介石同志一同接受总理的命令、同心合力去创办党军的廖仲恺先生,不幸也死了!

今天他也是和总理一起站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同志继续去奋斗。廖先生之死,大家明白是因为努力辅助总理改组本党而死的,是因为努力创造黄埔军官学校而死的。我们现在要想怎么样继续廖先生的工作,便要令到改组本党这一件大事不因为廖先生之死而停顿;便要令到廖先生苦心创造留下我们的党军,就是先和人民合作、后来再成为人民的军队,也不因廖先生之死而没有继续发展。这些说话兄弟固然觉得哀痛,但我相信这不是兄弟一个人的哀痛,乃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诸同志人人心中共有的哀痛,不过由兄弟代表大众说出来就是了。

原来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应该把第一次代表太会以后的各种经过情形报告的,但关于政治、军事、党务各项,几日以后当有更详细的报告。今天开会,兄弟只有很简单的说话,就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总理仍然在我们面前指导"。我们还是要继续总理的生命,要继续民国十四年我们努力奋斗的勇气(鼓掌),我们还更要把民国十五年的乐观提起来(鼓掌)。因为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我们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鼓掌)。总理已经找出了一条光明大路交给我们,这条大路是用他四十年的心血和经验从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来的。他原本要带领我们同志一齐去走的,但不幸半途死了。我们曾经跟从他走上这条光明大路的,就只有继续总理的生命,仍然沿着这唯一的光明大路猛向前进(鼓掌)。我相信座中各位同志都是不愿意落后的,都是要猛向前进的。我们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要从此以后团结同志做一体,继续向这条光明大路前进的。第一步是先求中国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更求世界革命的成功(鼓掌)。我们要牢记总理遗嘱,一方唤起民众,一方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兄弟现在敢高呼:总理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摘自《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二　吴玉章作代表大会经过报告

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一月十九〔二十〕日闭幕。其间经过情形,已有大会日刊及本党日报次第发表,若欲知详细,俟将来大会秘书处将种种报告印出后,阅之便可了然。兄弟今日不过把大会经过作一个简单概括的报告而已。如今先说:

(一)大会组成的分子

甲、出席总数:此次到会代表计二百五十六人。除代表外,出席大会者尚有中央执行委员七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三人、中央监察委员一人、蒙古政府特派员一人、广西省政府特派员二人。统计出席大会者共为二百七十人。

乙、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之人数:若依地域区分,则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之人数如下:

直隶三人,山东五人,河南二人,山西一人,陕西三人,甘肃一人,四川六人,湖北四人,湖南七人,江西三人,安徽三人,江苏五人,浙江三人,福建四人,广西九人,广东十一人,云南一人,贵州一人,奉天一人,吉林一人,黑龙江哈尔滨一人,北京特别市五人,上海特别市七人,汉口特别市三人,热河一人,广州特别市十一人,察哈尔一人,绥远一人,内蒙古二人,海外三十三人。

此外已被选而因事未到或被拘禁阻滞者尚有十一

人。除云南、贵州、热河三处代表系由中央指派外，余均由地方党员选举。计国内二十二行省、三特别区、四特别市，除新疆无党部代表外，其余均有代表出席矣。

丙、本党各界代表之百分统计：若更依性质区分，而列成百分统计，则各代表分数如下：

一、各省区党部代表一〇六人，百分之四十（弱）。

二、海外党部代表三十三人，百分之十二（强）。

三、工人党部代表三十三人，百分之十二（强）。

四、军队、军校及军事机关党部代表七十人，百分之二十六（弱）。

五、行政机关党部代表十一人，百分之四（强）。

六、中央党部代表十一人，百分之四（强）。

七、学校党部代表二人，百分之一（弱）。

其中有女代表十六人，百分之六（弱）。由上所述，则此次大会各界代表无不具备，可称为真正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名符其实者也。

（二）大会之重要决议

甲、接受总理遗嘱。开会议之第一日，全体代表即决议“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是为此次大会之春雷第一声。此案通过之后，并于翌日在粤秀山举行建筑大会接受遗嘱纪念碑奠基礼，以表示态度之严重，并垂纪念于永久焉。

乙、完全接受第一次大会所定之政纲。第一次大会所定最低限度之政纲，为总理根据主义切合时势之重要方案。两年以来，以环境之恶劣，迄未实行其百分之一。虽幸赖同志奋斗，已将广东之恶劣环境冲破，而另辟一光明之局；然盱衡世界与中国之大势，第一次大会之政纲，实有继续履行之必要，而不必再事乎更张。故大会决议对于总理在第一次大会手定最低限度之政纲，仍完全接受。今后所努力者，惟在讲求以如何方法图此政纲之实现而已。

丙、总章之修改。第一次大会所定之党章，两年以来从事试验，觉其大体尚无甚阻碍。故此次大会所修正者不过四点：其一，则为第四章关于总理一章之保留。此章以总理现经逝世，本无存在之必要，惟为纪念总理计，特为保留。并于四章之末加以附注，说明“总理已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四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接受总理遗嘱，特保留此章以为纪念。至纪念之方式，则于各党部悬挂总理遗像，凡开会时必须宣读总理遗嘱，及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其二，则为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之设立。前者中央党部秘书处虽有委员三人主持常务，然人数过少，负责实难，致往日党部开会，出席者寥寥如晨星，此于党务进行实为一大障碍。此次大会有鉴于此，故特规定中央党部设常务委员会，以中央执行委员互选九人组织之。此后凡百事务，当必以多人负责之故，而进行敏捷。其三，则为各级党部候补委员出席各该级委员会会议权限之变更。往者候补委员只可出席发言而无表决之权，故多徒挂虚名，于党无多大之贡献。此次大会则改定候补委员如遇委员缺席时，得依次递补，取得临时表决权。惟取得临时表决权之候补委员不得超过出席委员人数三分之一，以为限制。盖欲候补委员亦得根据此条章程，以取得一部份表决权，使亦能分负党中工作一部份之责任，比前此条文之呆板实超胜也。其四，则为中央党部特派员之规定。两年以来，由党务进行上所发见之缺点，最大者为中央与各级党部之联络太少。此次大会规定，中央党部可派遣特派员分驻各地，各中央委员亦得出席于各地之党的组织，而一矫从前涣散疏慢之失也。

丁、宣言之发布。此次大会宣言，于政策、政纲均仍秉承先总理之遗教，与第一次大会所定之方案本无特殊之意见。惟宣言中之最有价值者，则为对于民族主义之正当认识。先述世界之现状，次述中国之现状，次述本党努力之经过，而殿之以结论。说明本党已认清楚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实与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同其消长。（一）则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而联合世界革命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并联合帝国主义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民众。（二）则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若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与土豪；其必要之手段则在造成人民的军队，造成廉洁的政府，提倡保护国内新兴之工业，与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至于党员之训练则特别注重于革命化与团体化，互相亲爱，互相扶助，互相攻错，以期不负总理之指导与民众之期望。一言以蔽之，此次宣言，盖为吾党指出实行政纲之切实方法，而非一般政党铺张扬厉之空洞文章也。

戊、纪律问题之解决。吾党今后最重之任务，为造成一强固有力的革命党。然欲达此目的，莫要于首先造成森严的纪律。此次西山会议与各地反动分子之破坏党部，实均为徒逞意气，不识大体之举动，而正中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毒谋。本党若任其捣乱，不加制裁，实足以摇动国民革命之阵线，而予中国民族解放前途以不利。故此次大会对于西山会议及各地反动事实有关的党员，均有适当之处置。其属居心不良、根本图倾覆本党者，则加以永远开除党籍之处分；其属一时冲动、受人利用而不自觉者，则先予以诚恳之警告，而希望其改变态度，仍与吾人同走上革命的阵线。至其详细办法，则报章早已发表，毋庸于此费词矣。

己、其他各种之决议案。以时间之限制，莫克详述。举其荦荦大者：若政治报告决议案，则表示对国民政府满意，而勉励其继续努力；若关于军事决议案，则实行改良士兵生活与确定对军事上之工作，此虽非军事大计划，而实现在军事上最重之要点；若财政决议案，则实行财政统一，改良币制，改良税则，确定预算，募集公债，收回海关；

若党务决议案，则遵守总理遗教，集中革命分子，而消弭无谓之争执；若宣传决议案，则加办党报，辅助各种周报；若工人决议案，则确定劳动法规并工会与党的关系；若农民运动决议案，则禁止高利贷，规定最高租额，与禁止剥削农民之杂税；若商民决议案，则推广商民协会，引导一般商人加入国民革命；若青年运动决议案，则注意教育之革命化与平民化，并平民学校之扩充；若海外党务决议案，则辅助建设海外同志协会，与特别保护归国华侨；若妇女运动决议案，则制定男女平等之法律，并开放各职业机关；若实行对外政策决议案，则继续联俄政策，与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联络；若对北方时局宣传决议案，则维持国民军，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反对恢复约法与曹锟伪宪，并促成国民会议。凡此种种决议案，均以本党主义政纲为根据，而期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者，吾党同志固人人有其应负之一份责任也。

（三）海内外各党部发展之概况

除各种决议案以外，有当附带报告者，则为海内外各地党务发展之概况。据吾人此次接受各地党部之报告，实抱无限之乐观。在国民政府治下之区域，党务之发展固有一日千里之势；即各地党部亦以本党努力宣传之故，已取得民众相当之了解与信仰，故党员人数骤增，已至五十万。去年以总理逝世，各地民众参加追悼会者人山人海，尤为本党势力深入民众心坎之绝大机会。至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帝国主义者之狰狞面目已完全揭露；军阀甘受帝国主义者之指挥以压迫民众之暴行，尤为民众所认识与痛恨。凡此事件，均足以使本党之宣传多一重事实之确证，而民众对于本党亦自然发生热烈的倾向。吾人敢信今后之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虽极力压迫本党，然本党必不因此种压迫而退步，必且因此种压迫而更加促进革命时机之成熟。可以断言，凡我同志，倘能一致在本党主义之下努力奋斗，则三民主义之实现必不在远矣。

（四）今后应注意之点

本党主义既已渐入民众心坎，则本党今后之工作更将重要而繁多。此不特表现民众革命要求之急切，同时亦表现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末路已近。故本党今后第一要务，即须扩大其组织与宣传，俾民众了解本党之主义与政策确为谋民众之福利与安宁，则党员人数自必增加，而革命势力亦以之坚固而浓厚。第二，应注意于全国的发展，以求本党势力普及于全国。因此，则党报的宏大组织实为最要，盖党报为宣传中最有力能普遍之工具。如内地交通往返不便，则借党报之力引起革命思潮，可自动的为本党而努力。第三，应注意于农工运动。本党既系以全民革命为目的，则决不能以智识阶级从事革命为已足。中国的农民与工人占全国人口之最大多数，其所受之痛苦最深切，故农工运动尤为重要。而商人亦不可忽略，或以商人为不革命者是大错误，商人中除少数买办阶级及奸商外，亦是受压迫阶级，故此后亦不可不注意。第四，应注意于厉行纪律。上文已略述大概，盖本党二年来之种种经验实非有森严之纪律不足以使反动分子绝迹，而巩固本党之基础，作强有力的奋斗。第五，应使民众了解本党之联俄政策。联俄为本党总理之革命大策略，若不从事宣传，则无谓之争执将伊于胡底，革命前途实多障碍，故本党今后之宣传方针中，亟应将此政策普及于民众，使知中国民族解放问题，必要放在世界人类解放问题中才能解决；世界人类解放问题，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相待之民族及一切被压迫之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解放。苟大多数人了解这个意义，不但是中国革命之成功，亦即世界革命之成功也。以上所陈，愿我同志共勉之。

《政治周报》第五期

材料三　闭会词

各位同志：

今天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这次开会，从元旦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时候了。这回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不同的是，这回没有总理在场的指导。这二十天里头，总理的精神是时时刻刻在上头指导我们的（鼓掌）。然而这回的代表大会，是真真的全国代表大会（鼓掌）。除了十八省的代表以外，东三省、内蒙古三特别区域通通都派出代表来出席，还有海外的代表从国外回来。所以说这次大会，是真真实实的全国代表大会（鼓掌）。这一年来的进步，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惨淡经营的结果，也是同志们奋斗努力得来的（鼓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十三年一月举行，到现在两年的工夫已经有这种进步，因此可想将来第三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也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努力，定得更大的进步了（鼓掌）。

在这二十天当中，我们由我们所讨论的种种提案，实见着很好的精神表现出来，就是各位代表，都是一心一德，忠实诚笃的来实行总理的主义。即总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手定最低限度的政纲，也是完全继续实行，所以第二次大会对于第一次大会宣言内主义之解释及政纲没有修正。第二次大会的精神，就是在讨论实行第一次大会宣言内主义及政纲的方法（鼓掌）。

第二次大会所讨论可以分作两〔三〕大部分：第一，是接受各地党部的报告，就是把各地同志两年来的工作一起审查，并做成决议案。这种决议案就是指示党员工作的方针，告诉同志怎么去实行主义的方法（鼓掌）。二，是讨

论种种的提案，赅括说来，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实行主义及党纲的方法。三，我们革命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传与事实不能一致，尤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感受最痛苦的，就是当时的事实与我们的宣传确实不能一致。不把事实来改变，是不能宣传的，但是想把事实改变，却又必先努力于宣传。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是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事。但是我们觉得，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痛苦中感觉得的愉快，就是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宣传，许多都已变成事实（鼓掌）。固然我们现在所希望、所讨论和所宣传还未能和事实全然一致，但今后我们也惟有不断的努力，使我们的宣传成为事实，这就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我们知道自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稍有使宣传成为事实的，是全国各处同志努力的结果，因此才有这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既经闭会，以后我们便要拿原有的事实做基础，把一切现在还未成事实的种种政策，一一实现起来（鼓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统一全国（鼓掌）。我们最少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实行总理遗嘱中所说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件事（鼓掌）。现在因为我们全体党员动员的结果，已经发现了帝国主义者的裂痕、军阀的崩溃现象。这种裂痕、这种崩溃现象是什么人把他裂开令他崩溃的呢？就是我们全体党员把他裂开令他崩溃的（鼓掌）。我们又看见世界很多弱小民族的抬头，中国许多民众和军人的觉悟。是什么人使他抬头、使他觉悟呢？也就是我们全体党员使他抬头、使他觉悟的（鼓掌）。我们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至少要能够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放在本党主义领导之下（鼓掌）。我们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至少要在武昌、南京、北京举行。今天是闭会日子，大家就要分别了，我们希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汉口、北京相见（大鼓掌）。

大沽口事件

背景介绍

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张宗昌派毕庶澄率领渤海舰队窥伺大沽口，并派褚玉璞为鲁军总指挥加入战斗，一度占领静海、独流、天津大为震动。鹿钟麟、孙岳都到前线督战，经过猛烈战斗，八日才将马厂、青县夺回。也就在这一天，渤海舰队装载陆军六千人，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经冯军苦战俘获二千九百余人，余众下船逃走，渤海舰队十一艘也被击退了。冯军即日封锁大沽口，不许任何船只开入。十日，外交团向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冯军封锁海口为违反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撤除障碍，否则各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恢复海口交通。其实，冯军封锁海口是因为帝国主义轮船经常为奉、鲁军运兵运械，并且经常掩护对方舰队驶入港口，它们帮助反动军阀，参加中国内战，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继续发生，冯军提出外国轮船、军舰必须悬挂特种旗帜，通过时间限于白天，并须接受当地驻军的严密检查。十一日，冯军撤除了部分封锁，允许各国轮船、军舰在的指定范围内，按照上述办法通行。

十二日，日本驱逐舰两艘从旅顺开抵大沽口，掩护奉、鲁舰队四艘驶入港口，炮台守军用旗语阻止它们前进，日本军舰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开炮，炮台守军不得已用步枪还击，日本军舰才被迫退往塘沽。在双方互击中，日方死大尉级军官一人，伤水兵三人，冯军死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兵士二人，伤兵士八人。北京外交部派员向日本公使提出口头抗议。十三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中国。十五日，参加辛丑和约八国公使联合提出最后通牒，要求：(1)按照辛丑和约规定，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2)奉、国两军应即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战；(3)奉天舰队应退出大沽口外，国民军应完全撤除海上水雷；(4)所有航海灯塔及航行标志，必须完全恢复；(5)轮船入口，除按照条约由海关检查外，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以上条件，限于十八日正午为满意之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扫除一切障碍。同一天，日本公使单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给付五万元之损害赔偿。

材料：

- 八国通牒
- 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

材料一　八国通牒

为照会事，外交总长阁下：三月十日，本首席公使曾代表辛丑和约关系国之各使，因天津出入口水雷之敷设，及炮击各事端，有障碍及于同地出入船舶之自由交通，特行通告中国政府，请为除去。同时并曾由本首席公使对中国政府声明前记自由交通，倘未能如请得以确保，各国为拥护辛丑条约起见，应保留其执行权利。且同时并在天津奉天及济南，由各该地领事团提出同一之通告，并已对天津港出入口一切从事于战斗之各军队本部，悉行送达。虽然和约关系国闻鉴于前记要求，并未获任何效果，遂认必要于再由在津握有海军之代表各国公使及海军指挥官，以本日（三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时）对指挥大沽炮台之

军事官宪,暨指挥青岛舰队之海军将校,发如左之通告。

盖为拥护国际通商上一般协约内之权利,以及辛丑和约所定首都与海滨间关于自由交通之特殊权利起见,关系各国特行要求左列之各项也。

(甲)由大沽砂洲(Taka Bar)至天津之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

(乙)应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

(丙)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且须保证将来不再发生任何妨碍行为。

(丁)一切兵船须停泊于大沽砂洲之外,且须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

(戊)除海关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舶之一切检查。对上述各项,若于三月十八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报认为必要之手段同,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焉。须至照会者。首席荷兰公使欧登科。

(《顺天时报》,1926年3月17日)

材料二　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

(一)大沽事件发生概言　间尝读世界历史内争二字何国蔑有,因争而封锁港口,亦属屡见不鲜之事。港口既封,无论何国船舰,自在出入禁止入例。吾国则以辛丑条约之束缚,既不许建筑炮台,复不容封锁港口,以我极痛苦、极耻辱之事,而外人反视为奇货可居,每于此非常时期,故与为难。呜呼!孰谓公理战胜强权乎?甚不解此类不祥之事件,每多发见于所谓兄弟之邦之中国与日本间也!更不解吾人正高谈中日亲善,而亲善途上之障碍物愈益加多也!

(二)暂时封锁海口原因　查国际惯例,对交战团体应表示平等待遇。乃此次国奉交绥,奉方军舰滞留大沽口外,俟机登陆,为害国军。其倚仗外人而在沿海报施之种种危险行为,不少成例,而外舰复之逞兵由北塘上陆,外交团迄不制止。国军之封锁港口,盖为自卫计,迫不得已而出此也。

(三)开放海口经过情形　嗣因外人以商轮不得出入,有碍商务为词,国军乃从外人之请,开放海口,惟开放之条件如下:(1)外轮通行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之前驱,此引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军示意。(2)外船出入,必须悬持其本国国旗,不可淆乱。(3)入口轮中之华人,须经国军一度检查,方许通过。此三月十五日前之事也。

(四)日舰驶入海口情形　贵国"藤"字第十五号军舰一艘,因贵国总领事与天津当局交涉之结果,准免检查,许其即日即入口。不料十二日下午三时,该舰进口时,与贵国领事对当局声称三点全不符合,国军不得已乃施以警告,该舰即以机关枪迎击,势甚凶恶。幸潮水大落,该舰始退,此当日之实在情形也。

(五)日本应负完全责任　吾人于此有下列之四项,证明此次之责任在贵国军舰而不在国军:(1)我军在津沽布置海防,为顾全国际条约起见,对于各国轮船出进,曾与各领事商定办法,双方遵守。十二日贵国领事馆派人至我前敌总指挥部,声称是日有贵国"藤"字十五号兵舰一艘进口,当由总指挥部转知我军海防,按照商订办法手续放行。乃该舰驶进之际,又有一艘随行,我军海防官兵,见与所报舰数不符,恐系敌舰诈冒进袭,不得不令其禁止。(2)时间问题。贵领事馆原言该舰上午十时进口,而该舰迟至下午三时余始行进口,致海防官兵无从明其是否即系日舰。(3)按照原订办法,无论何国船只进口,至指定地点即须停泊,以便查检放行,而是日该舰并未遵照前约驶往应停地点,只知强行闯入海口。我军为防止敌舰之袭击起见,自不得不设法制止。(4)该舰谓我军先开炮之说绝对不确。盖既有上列三种原因,我军见该舰疾驶入口时,当然设法令其停止,并未实弹放枪,而该舰误为敌视,既用机关枪射击。我军方面因猝不及防,受伤者十数人之多。

上举理由,至为明了,想贵国人士当有同等之感想也。吾人今后不谈日中亲善则已,否则愿贵国人士持公平正大之态度,以处理此不祥事件也。

(《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全会上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作幌子,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其中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很明显,这个反动提案,是蒋介石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阴谋步骤,是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等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愤愤不平,而陈独秀又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他认为:"整理党务案"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

"有利"两党的"团结"。陈独秀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党团。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当不正确的办法要大家签名接受。陈独秀还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结果,这个反动提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被撤职。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担任了中央秘书长,陈果夫、顾孟余、邵元冲等也都代替共产党人当上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把张镇江捧出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自己做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这样蒋介石就很快地夺取了党权、军权和政权。

材料:

- 整理党务宣言
- 二十四日广州特讯

材料一 整理党务宣言

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规定本党与他党合作办法之决议案,帝国主义与反对者或将庆其挑拨之成功。此足表示帝国主义与反动者之愚蠢,对于此种决议案之革命的意义茫无所知也。

帝国主义者常希望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崩坏,为已往历史所恒见。不由于外人军队炮舰之袭击,而由于自己内部之冲突与纠纷,此内部之冲突与纠纷,实国民革命之最大障碍也。国民革命之成功须恃真正革命势力之严密团结,此本党夙昔之主张,今尤深信不渝。以世界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及反动派之强暴有力,非真正革命势力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吾人实无以战胜之。必革命势力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而可扫荡中国之三敌: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势力。

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毅然改组本党,以与一切革命势力合作者以此。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全国革命分子奔集于本党,努力革命工作者〔亦〕以此。改组以前组织既未完成,政纲亦未大备,虽有总理教率于上,而党务之散漫,党员之疲离,断不足与图成。以此之故,总理于精密考虑国民革命运动前途之后,毅然决定改组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基本,而确定与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势力决战之政纲;同时又决定与国内外革命势力合作之原则。此则国民革命运动之领袖,实为最大睿智之行动,证以后来之事实而可信其不诬也。

总理所采此有历史价值之决定,其结果究奚似乎?自此以后,本党日益取得广大群众之同情,不但在中国为然,且推及于全世界。本党今已为中国最大之政治势力,此势力且将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之目的。群众爱护本党日甚,同时敌人仇视本党亦日益深。本党盖日益引起人民之希望与反动者之恐惶,本党势力之增长尤于此可见矣。

其在广东革命之敌人逐一倾覆,彼等虽亦有反对势力响应于内,帝国主义援助于外,然终无以救彼等之死亡,革命军人与革命政党之联合势力,卒一一将其击碎。故国民政府成立未久,而人民之讴歌拥护随之。革命基础之植于广东者既非常稳固,其能力遂足与世界最强之帝国主义者相持至于一年之久。声闻所及,遍于他省。广东之在中国已不仅得革命群众之同情,凡愿见其祖国自由独立之爱国者,咸一致爱护之。甚至不愿为革命担负何种工作之人民,亦宣称中国之救主将来自广东矣。

本党改组以前,惟少数革命党人与少数知识分子略知本党;改组以后,则已为数百万群众所传诵而为其指导。总理改组本党之识力与其所定政策之效果,至远且大,无物足以磨灭之也。

帝国主义者、军阀、反动派,自辛亥革命以后,其藐视中国已久,今因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猛烈发展,遂惹起在革命史上未有之恐怖。今仅广东一省已足抵御军阀、反动派及最大帝国主义之进攻,若中国各省皆成为广东,则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命运显然将断。彼敌人见其如此,又安能束手以待国民党之制其死命?于是益出其暴力诡计,以进攻国民革命运动。其所采以攻击国民革命运动最毒之武器,厥为散布谣诼,以引起吾人内部之纠纷。彼等欲达到此阴谋之目的,乃宣称国民党为共产主义之集团。盖国民党中大多数非共产党员,敌人冀利用之,以构成多数党员对内之疑虑。疑虑既生,消释非易。而此等疑虑若任其散播,则总理所定之革命势力合作之原则将受莫大之危害,即国民革命运动之全部亦必受同样之影响。彼时反动派、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乃可引为庆幸,使今后中国之十五年仍名为共和,而实则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鱼肉也。总理所改组之革命的政党,能坐视国民革命运动之消沉而不急呼往救乎?吾人于革命遭遇危难之时,能缄默不言以重负总理之付托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党之最高机关,凡为党员者,皆须服从其决议,惟全国代表大会始对于其决议有可否之权。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对于本党党员及全国人民,亟须明示本党决不让帝国主义与军阀利用反共产之口号,以摧残国民革命,乃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以消灭对于合作原则之真正目的之怀疑。此实足表示其对于国民革命之忠诚,亦即以此摧折敌人进攻国民革命之最有利武器也。吾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凡有利于中国国民革命,能使国民革命更形巩固,不为敌人所利用,以制造更多之疑虑者,国民党无不乐为之也。

若帝国主义者、军阀与反动派对于此规定合作原则之整理党务案遽引为庆幸,实为大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深信此次决议案,决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以与世界帝国主义、军

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革命分子之团结愈坚固，即国民革命之力量愈增进也。

总理之一切革命势力合作原则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之阴谋！

国民革命万岁！

材料二 二十四日广州特讯

国民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自十五日起至二十二日闭幕，由谭延闿委员主席。闭幕仪式：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三、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四、恭读总理遗嘱；五、俯首默念三分钟；六、礼成；七、演说：首由主席谭延闿委员致闭会词；继由蒋介石、顾孟馀、吴稚晖等各委员次第演说。态度雍雍穆穆，而言下极激昂慷慨，均表示一致拥护和实现此次决议案。会场革命空气非常紧张。

谭延闿致闭会词略谓：全体会议日期虽少，决议的案子也似乎很少，但所决议的整理党务案确非常重要，把一年来的一切纠纷问题定了一个解决办法。此次召集全体会议之最重要意义及精神也全在此点。总之，此次所决议的案子，完全依据总理之二大政策：一联俄；二容纳共产分子而来。或许有人以为此次所通过的案子是排除共产分子，实则不然。本定〔党〕为巩固革命势力及集中革命团体起见，不愿见革命分子之分立，故确定一种合作的办法，是革命应有的事。在事实上在目下环境之险恶中，也不能不有一应付的办法，所以我们非但不敢违叛总理之政策主义的精神，实在替两党合作上加以保障。或许也有人以为这次议案未必能实行。二年来的纠纷，因为大家怀疑，多半将党部的决议不能切实去做，因之对于革命之途径上生了一种障碍。现在把这种误会的障碍除去，使我们革命的势力团结，一切反动派的人，一切帝国主义者，不能施其向有之挑拨离间之伎俩，同时亦将无隙可以向革命势力进攻。所以希望将来议决案实行后，愈见我们相亲相爱，把二党合作的事业永远合作到底。即使党务上有小小的问题发生，也不会再纠纷到若何程度，因为联席会议可解决此种困难。其他如各部长之不以他党分子充任，则更见二方亲爱之热忱，而免去许多误会。如果有什么人再来挑拨离间，不顾党的精神，则只以纪律来制裁他。所以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蒋介石演说大意略谓：此次会议本为予所提议召集，但予之提议，系党员的资格，决不是以军人、以有带兵的资格来干涉党政。如果存心以军人的威力而来提议的，则完全失了此会议之意义。所以予实系以党员的资格，鉴于时局及环境之需要，而有此提议。现在大会已定，整理党务案亦已定，均通过。从此以后，大家团结起来，取消一切怀疑及成见，如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之须根本消灭，如果他们用其他名目来互助猜忌，则本党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嗣后大家须依决议案去努力。此决议案乃依据总理的意志而来的。如果有谁与帝国主义者有关系，或军阀有关系者，须一律驱逐出党。但愿内部一致起来，解放中华民族云。蒋同志并述及极望汪精卫之销假，及胡汉民同志之回粤，共维持大局。其态度非常诚恳。

顾孟馀演说大意略谓：希望决议案之实行还不够，还须有机关来研究革命的理论基础，才可使纠纷一切免除。还须有一定宣传的计划，并注意不可在革命政府所在地有反动之宣传云云。

吴稚晖演说大意略谓：敬祝会后之成功。如果决议案之不能实行，则各委员实在均无面目、无资格了。实在我不是骂人，因为与其恭维，不若说坏话的好云云。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5月31日）

五原誓师

背景介绍

在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胜利前进的形势下，北方的国民军在冯玉祥的领导下，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国民革命军遥相呼应。

当冯玉祥在库伦时，鲍罗廷、徐谦、陈友仁、顾孟余等人从北京取道海参威去广州，也到达库伦。四月五日，鲍罗廷、于右任同冯谈了“国民军国民党合作事”。接着又谈了“如何救民救国及党之重要”。！冯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决心加入国民党，随由徐谦介绍加入国民党。在苏联考察约三个月期间，冯玉祥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面谈了很多问题，看到苏联的新气象，受到很大鼓舞。他“深切的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地帮助他，刘伯坚以华人协会和《前进报》等团体代表的身份与他接触。冯要求刘伯坚介绍共产党员与他会见，刘就介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作了三天的长谈，使冯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六月间，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他的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洽商国民军入党手续和共同革命的办法。刘骥在广州同国民政府的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人商谈后，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样待遇。冯玉祥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国民党中央任命冯为国民军的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

员会委员。从此，冯所部的国民军就成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了。但此时，国民军在北方处于危急之中，为了让冯玉祥早日回国督师，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去莫斯科催冯启程，于右任到苏后，与冯"接头结果颇佳"。八月十七日，冯自苏联动身回国，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同行。途中，冯多次与刘伯坚交谈，商讨国民革命问题。冯还写信给陈独秀，除表示敬慕外，还要求陈时常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冯回国后，整顿和改组了他的队伍，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副部长。并在他所办的中山军官学校中，任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小平为教育长，刘志丹、高岗等为教官。还要求中共中央派四十名至五十名有才能的人到国民军中工作。这都表明，冯玉祥与共产党的关系已发展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冯玉祥到绥远五原后，与于右任、孙岳、徐永昌、唐钟麟、宋哲元、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方振武、门致中、郑金声、阮玄武、邓宝珊等举行会议，会议推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九月十七日，冯在五原宣誓就职，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授旗。冯发表了著名的誓师宣言，表示对于"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宣言最后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誓师后，旋即对反动军阀发动进攻。

材料：

· 进驻西安
· 五原誓师宣言

材料一　进驻西安

国民二军李虎臣和国民三军杨虎城部，自一九二六年二月起，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的镇嵩军十万余众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处境十分困难。不断电五原求援。西安城内"饿殍者暴尸于市巷，甚至发生了以死尸充饥的现象，实在到了'易子而食，折骸而炊'的绝境。"

在此情况下，冯玉祥决定取道甘肃，"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分兵七路援陕。

由于甘肃成了西北军巩固的后方，因此才得以支援西安和顺利进军河南。吴佩孚不甘心冯玉祥占领甘肃地盘，支持西北军阀张兆钾、孔繁锦和吴新田等举兵进攻驻甘的"国民军"，企图抄冯的后路。刘郁芬、蒋鸿遇坚决抵抗，猛将孙良诚和足智多谋的张维玺等奋力作战，一举歼灭了张、孔、吴等部，并缴获大量战利品及孔、张军所储藏的粮食与现金，解决了部分军需。这样一来，不仅后顾无忧，而且打通了东进的大路。

七路援陕大军的前锋孙良诚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底抵达咸阳。刘镇华军弃城逃走，孙军不战而取咸阳。孙下令渡渭河，遂打败小股敌军，进军到达未央宫附近的猴儿寨。孙军仅一万余人，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一时难以到达，而所面临的强敌刘镇华镇嵩军有十万之众，双方实力悬殊。因此孙军与刘军相持多日，未有成果。

刘镇华欺孙良诚兵力单薄，以数千之众抄袭孙军后路，包围了孙军师部所在地猴儿寨，孙军奋力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包围。时遇连绵阴雨，数日不停，孙军官兵淋雨数日，以水泡生玉米充饥，孙良诚曾放声大哭，并准备暂时退却，但随军作战的苏联顾问，坚决反对退却，"孙良诚只好坚持继续进攻。"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冯玉祥派的后援部队赶到。经一昼夜激战，敌方因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别向潼关、同州、武关等处溃退。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四起，西安之围被解，孙良诚告捷电。冯军乘胜前进。

当西安被围期间，守将杨虎城对李虎臣说：如果城破了，我们弟兄俩只有在钟鼓楼上一同上吊。冯部将领吉鸿昌率部进城时，令所部官兵将随身带的干粮救济"二虎"的士兵，"二虎"的士兵感动得泪流满面。围城八个月中，城内冻饿而死的军民五万人左右。

西安解围后，所有军民遗骨安葬于城内新辟的革命公园等处。在保卫西安胜利所举行的革命大祭会上，杨虎城献上挽联一幅，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二虎"的军队在守城的最后两个月，因城内粮荒，"分段向市民征发粮食"，后来发展为闯入民家抢粮，"连一颗一粒也不肯剩留……"。有一天，老百姓"倒毙在街上的甚至有一千六百余人之多"。怨满三秦也是可以理解的。

西安保卫战吸引了十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这一胜利，使冯部国民军士气大振，扭转了自南口战败后的被动局面，在甘陕两省站稳了脚跟。冯玉祥满怀豪情，写诗抒志："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直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冯玉祥离开五原向陕西进发。抵达宁夏后，接到刘郁芬转来孙良诚的告捷电，冯认为这一胜利"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并将这一喜讯，马上分别电告中央及各路军。冯在宁夏着手训练新成立的部队，住了二十多天，于十二月二十日晨，向平凉出发，二十四日抵平凉。在平凉渡过一九二七年元旦。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冯同刘伯坚及乌斯马诺夫顾问等离平凉，于一月二十六日抵达西安。仍住在一九二二年他任陕西督军时，在旧皇城建造的督军署中。西安已由于右任"改名为红城"。

（摘自《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五原誓师宣言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以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已，遂赶快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国人：

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及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和张、韩、张、李均被递解回籍，雅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房，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第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豫、鄂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政，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执政，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业。不料他出来以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地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作得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提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故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以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革命，其缘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国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我向来是痛恨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自蹈之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肯作这种鬼祟的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瞒于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的人，无论如何作不出这种事来。他又明白离赤化离的很远，够不上戴赤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自己的私忿。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

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这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于是在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出出口货，其价值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多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去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银钱又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的政局，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上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发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它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及一切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在于此。痛苦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以及其它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

（冯玉祥选集编辑委员会：
《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背景介绍

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6日，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庭以及随员六十多人先到武汉筹备。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

10日，第一批由粤汉路北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达武汉。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由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庭为顾问。当时，蒋介石也表示“赞成”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

然而，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两面手法。按蒋介石原来计划是，企图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赋予的权力，把总司令部置于国民政府之上，实现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军事独裁。但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蒋介石看到两湖地区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特别是武汉地区革命势力的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掌握着武汉革命政权，国民政府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他的总司令部还要受国民政府节制，这就使他的各种计谋很难实现。于是，蒋介石决定另图“宏建非常功业”，一面将嫡系部队布置于江西、福建一带，并大肆收编地方军阀武装，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面向“张、谭二主席”暗示其将另有图谋，“以后必不能驻武昌”。因此，原来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一反前言，提出迁都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

“迁都之争”，实质上是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是蒋介石准备公开叛变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图谋。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7日，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重申坚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作出的原决议，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2月9日，武汉国民党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及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并推选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以党权抵制军权的革命斗争。

2月2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在汉正式开始办公”，并请南昌各

委员即日赴鄂。但蒋介石仍坚持对抗态度，22 日又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并于 26 日决定致电第三国际，要求撤调鲍罗庭回俄。后经邓演达等的说理斗争，蒋介石才不得不决定于 3 月 6 日让被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这次“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

国民政府于 1926 年 12 月从广州迁都武汉，至 1927 年 7 月汪精卫等公开叛变革命止，统称为武汉政府时期。

武汉国民政府设委员二十八人，以汪精卫为主席。下设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政、劳工、教育、实业、卫生等部，以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顾孟余为教育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刘瑞恒为卫生部长。

材料：

- 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
- 大革命时期武汉见闻

材料一　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广州国民政府对于迁都事宜作了具体的部署。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自下月一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收文件，五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工作人员分批去武汉。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分四起先后出发。一起是宋庆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六十余人，于十二月二日到南昌。四日，与蒋介石赴庐山开会。会议于七日开始，八日结束。讨论与决定的主要问题有：关于迁都问题，与会者均认为应早日迁都武汉，蒋介石亦表赞成；关于军事问题，决定联络张作霖，消灭孙传芳，但目前暂缓进攻，应整顿军队和巩固已占领地区；关于工农运动，决定工人运动可缓和，农民运动可积极进行，并提出了实行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会议上，蒋介石最感兴趣的是财政问题，他很明白，对于新改编的军队，谁能给钱，谁就能掌握这些军队，因而他提出统一财政方案，力图把财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会议后，蒋介石仍回南昌，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等去武汉。他们十日到达武汉时，受到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第二起由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及随员数百人组成，是重要的一起。十二月十一日由广州出发，到韶关转赣州，再经水路赴南昌。沿途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深受人民的欢迎，并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南昌。第三起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等，于十二月十五日从广州动身北上，亦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南昌，成为蒋介石南昌大本营的重要人物。第四起是走水路，由广州乘轮船到上海再转武汉。吴玉章等即属于这一起。

截止到十二月十日，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汉。为了不致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权力中断，到汉的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党政联席会议）。当时的成立经过，徐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报告说：

> 各种重要问题，因无中央机关，皆不能办，国民政府各部虽已到达武汉，而因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未到，无指导机关，无法开始办事，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同时于十二月五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当时同人在此开一谈话会，于此会中，各同志均认为非有一临时办法，则政治必将停顿，故决定将此谈话会改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议前，执行最高职权，即刻通知成立，并订定组织法，以为决定应付重要问题之机关。所定出席人数未能扩大，以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代表各一人为限，于十二月十三日成立。

联席会议的组成人员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于树德等。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联席会议于十二月十三日正式成立并发出通电阐明成立的理由。蒋介石在南昌得此通电后，亦认为必要，并向联席会议复电表示赞成。联席会议遂开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各重要机关的办公地点相继确定，中央党部暂设定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党部内，国民政府先设于武昌总司令部行营，后即迁往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外交部设汉口法租界前交涉署内，交通部设京汉铁路南局，财政部设汉口军警督察处，司法部设武昌三道街原江汉道尹公署内。

经过紧张的筹备，联席会议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汉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又组织委员会（指管理京兆区委员会——笔者注），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等九人为委员，统治京兆区。”武汉政府一开始办公，就显示了它的进步性。它发布的第一号布告明确宣告：“保障人民资产之安全，非依法律不得查封及没收，至逆产问题须由财政部彻查……无论何机关除财政部外不得执行查封。自此布告之后，商民人等务各安心营业，特此布告。”联席会议成立后在短时间内召开了七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并积极组织实施。如整理湖北财政；筹备全国邮

务工人代表大会；在汉口设一大规模之人民俱乐部；隆重追悼被北洋军阀残害的同志；抗议英国向奉鲁军阀贷款五百万磅的侵略罪行；责令军队退出占用学校的校舍；推定孙夫人为妇女训练班主任；设最高法院于武昌，广东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广东分院等等。对于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以及实行的各项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武汉人民表示欢迎和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连续三天进行各种庆祝活动，举行阅兵式、提灯会、演讲会等，热烈祝贺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也发表评论赞扬武汉政府："赣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之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无论其主义之是非如何，要此种果敢之精神，终觉不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到武汉，历史进入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即"第一个武汉时期"。

（摘自《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大革命时期武汉见闻

国民政府第一批委员到达武汉。这批委员中有：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以及孙中山时代邀请来华的民国政府顾问鲍罗廷。到处是牌楼、标语和宣传画，上面写着"国民革命政府万岁！献身革命的鲍罗廷顾问万岁！"游行群众达数十万人。

蒋介石的缺席是引人注意的，因为武汉一直在等着他莅临。人们的印象是，蒋介石认为没有必要同政府站在一起。

这批国民政府委员从广州到武汉途中，曾经在牯岭同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开会。但是，会议没有解决什么紧迫的问题。政府驻地问题仍旧是个悬案：蒋介石没有明确说中央政府应当设在哪里——设在武汉，还是南昌！但是，他同意必须把汪精卫从国外召回来。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二〇反革命事变之后被迫出国。

革命运动的今后计划仍不明确。牯岭会议的领袖们显然倾向于继续北伐的主张，倾向于使整个革命活动都服从于北伐的主张。

坐镇南昌总司令部的蒋介石，想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讨论改编军队的问题。其实，他是想把几个军的兵力拉到自己方面去。蒋介石利用将领们和国民党领袖们对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的恐惧心理，想把不满运动的分子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他同率部留守广州的李济深频繁函电磋商，提出"必须限制民众运动的规模，必须巩固后方"等问题。

根据武汉所得的模模糊糊的零星消息来看，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动时期。

在到达武汉地区的时候，顾问发表了一个纲领性演说，谈到必须统一国家，必须保证为民众建立廉洁的财政，必须提高工资，减少捐税，改善贸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三亿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购买力，必须把他们的产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国家的总的商品流通领域，保证全体人民的福利。

（摘自《中国大革命时期武汉见闻录》社科出版社）

历史内幕

中山陵奠基礼上的一场冲突

192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先生墓地，举行了庄严隆重的中山陵奠基礼。但是，就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奠基礼上，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冲突。

孙中山先生晚年亲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日益猖獗，他们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竭力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等10人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发表反共宣言，并通过了反共、反苏和分裂国民党的决议案。随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44号（即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所在地）设立非法的中央党部，与广州的中央党分庭抗礼。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成员中，有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葬事筹备委员林森和叶楚伧还参加了西山会议，而且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就设在葬事筹备处所在地。这样，葬事筹备处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左右冲突的政治旋涡中。

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也直接波及到南京。1925年底至1926年初，南京出现了左派和右派两个南京市党部并存的局面，右派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宋镇仑、高岳生、汤仁溥等为首，他们未经江苏省党部批准，直接听命

于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左派的南京市党部以曹壮父、翟凤阳等为首，有党员500多人。

1926年1月15日，中山陵工程破土动工，不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决定，3月12日在南京紫金山中茅山南坡举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随后向各地报馆、各省党部及总支部发出通电，希望各地派代表出席。为了搞好奠基典礼，还在南京石板桥设立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南京事务所。

这年3月12日，既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又是中山陵举行奠基典礼的日子。为搞好这次纪念活动和奠基典礼，左派市党部曾几次派人同右派市党部联系，邀请他们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却遭到拒绝。右派市党部为力争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抢先成立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筹备处。这样，左派市党部也不得不邀请一些团体成立了另一个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筹备处，两个筹备处各自分头准备纪念活动。

3月9日，广州中央党部电令上海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与江苏省党部及沪宁各级党部联合组织一个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葬事筹备处连夜开会，决定请南京的两个纪念筹备处合并为一，葬事筹备处也加入，共同筹备。但是合并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葬事筹备处决定参加左派市党部及省党部组织的纪念会。

3月10日，宋庆龄、孙科以及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邓泽如、葬事筹备委员叶楚伧、林焕廷等抵达南京，左派和右派两个市党部都派人到下关车站迎接，但两派的欢迎口号，却已互相对立。11日晚，左派市党部组织提灯会，游行队伍提着各色灯笼，举着宣传标语，由贡院出发，经三山街、中正街、花牌楼、成贤街至东大附中操场，沿途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右派市党部也聚集多人，高呼反动口号，寻衅滋事。为了防止在第二天的奠基礼上发生冲突，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杨杏佛当晚与西山会议派邹鲁商定，保证在奠基典礼上双方不喊口号，不发生冲突。

12日上午，葬事筹备处和左派市党部在夫子庙贡院举行纪念会，追祭孙中山先生；与此同时，右派市党部也在秀山公园举行纪念会。为了避免引起矛盾，这两个纪念会宋庆龄和孙科都没有参加。贡院的纪念会由葬事筹备委员林焕廷主持，宋庆龄、孙科委托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杨杏佛代表家属答谢；秀山公园的纪念会名义上是由南京市民组织，因此宋庆龄，孙科也委托沈卓吾代表家属答谢。

下午3时，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在紫金山中茅山南坡按时举行，虽然天降大雨，各界代表仍然踊跃参加。到会的有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代表邓泽如；孙中山家属宋庆龄、孙科；葬事筹备委员会、葬事筹备处成员；各省、区国民党党部代表；上海运输工会、洋服工会、纺织工会等工会的工人代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林德，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驻南京领事；江苏省实业厅厅长徐兰墅（代表江苏军政首脑孙传芳、陈陶遗）、第三师第六旅旅长斯烈（代表浙江省长夏超）以及南京、上海各机关、团体、学校的代表、各地新闻记者等，共约3000人。

典礼在中山陵墓址处举行，墓址上方设孙中山像台，像台前面是一座木质中山陵墓模型，上海大中华、百合照相馆纷纷到场摄影，上海新影片公司并架起了电影摄影机，准备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摄制成电影。3时许，奠基礼开始，由邓泽如主持典礼，叶楚伧任司仪。奏乐、升党旗后，全体到场人员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邓泽如演讲，说明孙中山葬于南京紫金山的原因，因为“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又为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地，是南京一隅，与孙公所抱之革命主张有密切关系，故有如是之遗嘱。”接着，由杨杏佛报告选择墓址的经过以及工程计划。然后，中央代表邓泽如举行奠基礼，他把奠基石上覆盖的青天白日党旗取下，露出奠基石，上刻“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为总理孙先生陵墓奠基”。随后，全体再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宋庆龄、孙科向全体到场人员答谢，大家高呼口号：“孙先生不死！”“孙先生主义万岁！”典礼在乐曲声中结束。

不料，奠基礼刚刚结束，右派市党部的队伍中突然吹起警笛，高喊“打倒跨党分子！”“孙文主义学会万岁！”等口号。左派市党部的队伍立刻回击，振臂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孙文主义学会！”这时，右派市党部的暴徒用事先预备好的铁棍、木棒在左派队伍中乱打，双方扭成一团，会场秩序大乱，许多来宾纷纷逃散，结果，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共产党员侯绍裘被当场打成重伤。

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奠基礼上的暴行引起了广大正直的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强烈愤慨，并认为葬事筹备处在奠基礼事件中负有一定责任，他们要求严惩凶手、改组葬事筹备处。奠基礼结束后，孙科与邓泽如、杨杏佛、林焕廷等于当天下午6时在南京惠龙饭店紧急磋商，决定立刻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各报馆，说明奠基礼后发生了冲突，但奠基礼已安全完成。第二天下午，宋庆龄、孙科、邓泽如、叶楚伧等同车返回上海。一到上海，孙科、杨杏佛、林焕廷、叶楚伧等立即赶到张静江家中，连夜商讨奠基礼事件的处理办法，决定以葬事筹备处的名义致电广州中央党部并在各报刊登启事，声明“葬事筹备处专任葬务，葬务以外之事概不预闻”。第二天，孙科又向葬事筹备委员会提出五点建议：(1)在沪之葬事筹备常务委员，不得兼管党务，如现任党务不能摆脱者，应辞去葬事筹备委员职。(2)筹备处职员，不准干预党务或职权以外事务，并不得兼任其他职务。(3)凡用葬事筹备处名义发出之电、函、文件，均须先经委员会议决，否则无效。(4)筹备处事务所，不得借用为他项事务之会议或办事机关。(5)凡遇重要事件，须经家属代表同意，方能执行。同时，他还在

报上刊登《孙科启事》，声明"科此次来沪专为举行先君陵墓奠基典礼，事毕即返，一切政治党务皆未暇过问。"以表白奠基礼冲突事件与己无关。

由于当时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还处于少数、孤立的地位，再加上中山陵兴建的经费还要靠广州国民党中央拨款，因此葬事筹备委员会一致同意了孙科的五点建议。不久，葬事筹备委员会还作出决议，特地声明"筹备处委员会受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之指挥"。3月25日，葬事筹备处机关迁往法租界陶尔斐斯路24号，以示与环龙路44号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不发生关系。

中山陵奠基礼事件是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一次尝试。这场风波还没有来得及平息，一周以后，蒋介石就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掀起了又一次反共的逆流。

（选自《纵横》94年4期，作者：范方镇）

反共密谋："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避难曾驻节于此，率海军与叛军周旋五十余天。为纪念孙中山蒙难，故改名中山舰。1926年3月20日，围绕这艘国民政府唯一装备完善的兵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事件……

3月19日，蒋介石从东山公馆出来，素馨花浓烈的芳香立刻冲进了他的鼻腔。远处大沙头岛方向传来"隆隆"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他看看对面不远处一幢黑沉沉的三层西式的楼房。那里还没有新房客。原住在那里的苏联顾问，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几天前搬走了。他不能容忍有人监视。

在当时一般共产党人眼里，蒋介石是对中国革命有作用的人物。他的一段话被人们时时提起："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众的支持，总理死了，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人们以为他亲俄亲共，以至于国民党右派说："蒋介石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事实上，蒋介石对苏联有很深的戒心。早在他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归来不久，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以弟观之，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对共产党，他更是百般防范。

今晚，他要采取雷霆手段，打击汪、季、共产党！孤注一掷，在交易所里也是常用的手法。

他在卫队保护下驱车来到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要来的人已经来齐了。

他坐定："茂如，你把这个，这个情报说一下。"

王柏龄今晚全副武装，神气活现，想到他不负校长重任，周密策划一切，既报了公仇，又泄了私愤（他对李之龙恨之入骨），心中非常得意。他清清嗓子："我得到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李之龙，诱使校长乘舰回黄埔途中，劫去校长，直驶海参威，送到俄国。现在中山舰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就是明证。"

蒋介石面无表情："这个，茂如把情况说了。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刻不容缓。这个，这个，我身负卫戍重任，不能不负起责任。现在宣布全城戒严，立刻平叛。各位同志都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也是本校长的忠实同志，务必遵守命令，立刻行动！"

随后，他下了一连串的命令。

陈肇英和欧阳格逮捕李之龙；

欧阳格和陈策占领中山舰，解除其武装；

蒋鼎文占领海军局，解除其武装；

刘峙负责扣押第二师中的党代表；

吴铁城率武装警察，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住宅；

惠东升包围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并解除两处的卫队武装……

霎时，全城军警子弹上膛，刺刀闪闪，分头行动。

蒋介石布置完毕，目光送走了最后奉命而去的军官，又抓起电话，命令第一军亲信的各师、团长，将各自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立即扣押。命令一俟天亮，立刻派兵到黄埔军校监守，秘密监视邓演达。

布置就绪，已是午夜三点多钟。他坐在椅子上，冥目养神，似有倦意。

经理处长徐桴和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马文东交换一下眼色，俯身轻声道："校长，您是不是休息一会儿？"蒋介石摇摇头，站了起来："我现在去造币厂，那里隐蔽些。你在这里坚持，马文东回卫戍司令部坐守。有情况，随时打电话报告。"

两人一齐立正："是！"

蒋介石走了几步，又回身道："你们注意一下其他各军和叶挺独立团的情况，明早告我。"

两人相视片刻："是！"

门敲得很响，李之龙从梦中惊醒。还夹着"李局长"，"李局长"的叫声。妻子气恼得蒙住了头。

他看看墙上的挂钟，正是午夜时分。

"谁？"

"找李局长有话说！"

"有话？"

对话间，女佣人已经开了门。六七个士兵立刻闯了进来，拧亮电灯，大声喊道："欧阳校长奉蒋校长命令来捕你！"一个卫兵把挂在墙上的文件拿起。李之龙只得说："好！要拿我行，我得穿上衣服。"话音未落，几个士兵把李之龙和妻子从床上位下来，拳脚齐上，赤身打了一顿。随后给李之龙胡乱穿上衣服，又往他嘴里塞了满口乱纸破布，捆了起来，跌跌撞撞推下楼来。过了几条街，到了万福

路第二十师办事处。

章臣桐早被捆在那里。两人正要接近，欧阳格从里屋出来，让士兵取走李之龙口中的东西，慢腾腾地问："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李之龙愤然道："我没有起来，是你派人把我从家中捉来的。"欧阳格冷笑一声，也不多说，命人将两人押走。

李之龙一上车，就被蒙上眼睛，堵上口，走了不一会，汽车停了。士兵把李之龙推下来，解开他脸上的毛巾。这时天已渐亮。李之龙认出这是第一军经理处。李之龙被推进处长办公室。处长徐桴坐在大写字台后："你是李之龙吧？"李之龙用舌头把塞在口里的东西抵出来，厉声问道："为什么捉我？"

"你有什么事对不起校长没有？"

"没有！"

"你想一想。"徐桴有点儿不耐烦。

李之龙想了想："前几天把校长的座舰江固号派到梧州去了。可这是电话请示过校长许可的。"

"那中山舰是哪个派到黄埔的？"

"是校长的面谕，叫邓教育长打电话到办事处来，要我派去的。"

"是哪个调回来的？"

"因为苏俄顾问团要检阅，我曾用电话向校长请示，得到允许才调回的。"

徐桴顿了一顿："你为什么起这么早？"

李之龙心中恍然大悟，知道被人陷害："我并没有起床，是欧阳格派人到我家中从梦中拿来的。你看，我衣履都不齐整。"

徐桴只管自己问："报告的人说你清晨起来，上舰有举动。"

"请处长不要听信诬告。转告校长务必把报告的人扣留。"李之龙心中还有一点希望。

徐桴打了一个呵欠："我对校长说。"让卫士把李之龙押到一个小房间内。

一会儿，陈肇英进来，狞笑道："李之龙，你也有今天！"吩咐卫兵："校长的命令，把这个王八蛋再捆紧一些！"

士兵又拿进几根粗绳，把李之龙的手脚绑得更紧。李之龙顿时痛入骨心，脸上变了色。

陈肇英得意洋洋，点着一根烟："现在把他押到造币厂，让校长审他！"

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寓所。

杨开慧在楼上给孩子喂了奶，管自睡了。毛泽东和秘书沈雁冰还在议论形势。

沈雁冰："这事也真奇怪。17日上午黄埔军校传出谣言，说共产党策动中山舰密谋发动政变，18日下午中山舰就准备开往黄埔。"

毛泽东："我问过李之龙，他说是校长的命令。更奇怪的是，王柏龄居然给连级以上的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我问过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沈雁冰忧心忡忡："莫非要出事？"

毛泽东自语道："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俄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门敲响了。

毛泽东起身开门。进来的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操着广东腔说，李之龙两口子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来，打了一顿，带走了。

毛泽东看看沈雁冰："现在是查有实据了。"吩咐工友去找陈延年。

工友走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默默沉思，半晌不语。沈雁冰不敢打扰，也默默相陪。

过了好一阵，工友终于回来了。他有点象是受过刺激之后的兴奋："街上戒严了！夜市没有收，当兵的正在赶散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我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答道："在文远楼附近见了，带着秘书。听秘书说是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他还想唠叨，毛泽东挥挥手："你去睡吧。"工友走了。毛泽东站起身来踱了几圈，抬起头来："我要到顾问团宿舍去。"沈雁冰关切地："路上戒严了，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点头。

顾问团住处离毛泽东的寓所仅一箭之地。远远看见许多士兵在巡逻。快到门口时，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坦然自若："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沈雁冰："这是我的秘书。"士兵陪笑道："请进，请进。"

毛泽东让沈雁冰留在传达室，独自进了里边灯火通明的会议室。

毛泽东从会议室出来时，满脸怒容。沈雁冰自然不便多问。两人回到家中，毛泽东的神色已经平静了。沈雁冰问道："润之，究竟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缓缓道："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进一间屋子。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党员。据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沈雁冰急忙问："那怎么办呢？"

毛泽东轻轻吐出一口烟："这几天我正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也是试探。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沈雁冰点点头。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

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居于劣势。第一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会反对他。况且，他和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是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我们摆开这么一个阵势，蒋便无能为力。”

毛泽东一气讲完，又点燃一支烟。沈雁冰兴奋起来：“结果如何呢？”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反对。他们以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东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的兵力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沈雁冰想了想：“您料想结果如何？”

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两人相视良久，默默无言。时钟“滴哒”“滴哒”走着，一缕铅灰色的烟雾凝固在他们的头顶上。

陈延年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部的机关。这个 27 岁的青年身材不高，体魄健壮，面色微黑，有极细微的疙瘩。骤然看上去，好象是斑麻。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粗哔叽学生装。这件衣服，他四季不换，已快三年了。

他从卧室来到二楼的办公室，翻看当天刚送来的报纸。

傅烈进来了，他是区委情报机关的负责人，主要收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傅烈打了招呼，从皮包里拿出新搜集的一份情报综述，递给延年。

延年一边看着，心里一边分析判断。

3 月 20 日下午，蒋介石从顾问团寓所撤兵，并矢口否认他曾下过这样的命令；

就在同日下午，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亲赴黄埔接出被监视的邓演达，前往蒋介石处谈话；随后两人同车前往东山顾问团住处，表示道歉；并表示要同蒋介石斗争到底；第二、三、四、六军互相联系，质询蒋介石，并准备向广州移动；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首次访问顾问团住处；

孙科设宴招待顾问团；

鲍罗廷已回国，兼程返回广州；

蒋介石请见汪精卫道歉，一面继续诬陷李之龙，一面说“专擅长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并否认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承认事件和中国共产党无关；

汪精卫称病不起；

有消息说：一部分右派正在酝酿倒蒋；

……

陈延年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他立刻叫进秘书，把以上情况急电报告中央。

秘书走了，延年独自沉思：中央会作出什么样的决策？

“中央急电！”秘书匆匆进来。

陈延年抑制住心中的激动，接过电报纸，桌上的茶杯却碰倒了，茶水“滴哒”、“滴哒”流到地上。

延年脸色苍白：中央决定实行退让政策，以维持国共的联合战线。“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

几个被释放的党代表听到中央来电，一齐跑了进来，看完电文，都不说话。

一会儿，一个同志一拍桌子：“我就不信，中国革命离不开蒋介石！咱们干！”

延年脸色已经和缓下来，犀利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屋内的人：“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现在咱们研究一下如何揭破新石派的阴谋。”

不久，蒋介石以“误会”作遁词，顺水推舟，将王柏龄、陈肇英免职，责令离开广州。欧阳格免去暂代中山舰长职务。吴铁城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软禁”，并且枪毙了包围东山顾问团寓所的营长，把自己发动事变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季山嘉等三名顾问在苏联方面“（如）蒋仍继续革命，吾将处处迎合其意，与之让步”的政策下，应蒋介石要求立即回国。

4 月，汪精卫被逼“请假休息”出走法国。

5 月 15 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公开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又打击了国民党右派，控制了广州局面；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前哨战。

（作者：史辉华，

原题《蒋介石篡权的前哨战——中山舰事件》）

大革命失败前的捉蒋计划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加快了反革命叛乱的步伐。12月31日，他公然扣留第二批由广州赴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在南昌非法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反对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联席会议，无理要求迁都南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是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蒋即指使党羽在九江喊出“打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口号；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展开血腥大屠杀；他篡夺国民政府的权力，不经批准，擅自任命各地区行政长官和数十名军长，招降纳叛，扩充势力。武汉政府又接二连三的得到报告：蒋介石正锐意经营东南，他通过黄郛、纽永建等人向帝国主义和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频送秋波，乞求支持，以便在南京建立反动的统治中心，和武汉政府分庭抗礼。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武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决定责成程潜牢牢地控制南京地区，防止蒋介石在南京建都，如蒋介石违抗，则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发落。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挥笔在一块绸料上写下了密令，交给林伯渠缝在衣缝里带往南京。谁也没有想到，那位亲手写下密令的谭延闿在会议一结束就通过陈果夫，暗中与蒋介石相勾结。蒋介石遂于1927年3月25日从安庆乘船，抢先抵达南京下关，约程潜去上海共商“大计”。

30日傍晚，林伯渠抵达南京即直奔三元巷江右军总指挥部，恰遇刚从上海回来的程潜。程潜见了密令，一改往日坚决主张对蒋的态度，连声说道：此事不可贸然而行，还须从长计议。原来，在上海程潜已被蒋介石施放的糖弹打中，蒋介石委其为南京戒严司令，并将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所提供的2000万反共经费中拨一部分给程潜。在上海，程潜参加了蒋介石所召集的会议，得知蒋下决心“清党分共”，他虽然不赞成蒋与武汉决裂的主张，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却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汉劝合”。林伯渠再三劝告程潜要认清蒋介石的为人，无奈程以“力难胜任”为由拒绝执行。林伯渠知难以挽回，只得仰天长叹。第二天，会见了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当晚和程潜一起回武汉。

蒋介石则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继而诱使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接着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从此开始了他统治中国大地达22年之久的历史。

（选自《党史文苑》93年4期）

李汉俊脱党前后

1952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亲笔为李汉俊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道：“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汉俊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但后来却脱党了。他何以能够得到毛泽东亲笔签署烈士证书的殊荣？这要从他脱党前、后说起……

脱党前　贡献卓越

李汉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不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而且由于他的理论水平和外语水平较高，在党内堪称“马克思主义老师”。

他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学工科，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其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底，他毕业归国，从日本带回大批英、德、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刊。由于他“日文很好”、“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茅盾语），便专心一意从事翻译和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短短2年时间，仅在上海一地，他就以李漱石、李人杰、汉俊等十几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劳动界》、《共产党》等报刊发表文章90多篇。在这些文章中，他以满腔热情欢呼十月革命，号召学习俄文，直接研究俄国革命经验，翔实介绍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向无政府主义谬论开火。总之，他如椽巨笔在手，是党的早期历史上，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员“大将”。

董必武曾称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是他帮助董必武在头脑里各种“主义”打仗之时理清了头绪。其实，他何止是董必武一人的马克思主义老师？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是他和陈独秀负责审核。李达翻译《唯物史观》也得到了他的助力。在“译者附言”里，李达曾专门致谢：“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

早在1919年秋，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他在《世界思潮之方向——译后的几句话》中写道：“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4月到达上海后，李汉俊通过与之接触交谈，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和苏俄共产党的情况，他即与陈独秀得出一致结论，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5月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回忆说：“我回

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发起人……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汉俊一边担任《劳动界》周刊主编，向工人通俗地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边负责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湖北的共产主义小组便是他写信给董必武，函约组建的。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即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并协助陈望道主编机关刊物《新青年》。据茅盾回忆："李汉俊此时忙于召开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够忙的了，然而他仍努力为《新青年》写稿，时常为了不耽误预定的排印日期而通夜赶写，又因维持生活，还给改革后我主编的《小说月报》写了不少稿子。"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听取了李汉俊、李达对各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介绍。经过商议，决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于是，李汉俊和李达分别起草了给各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开会通知。李汉俊还出面借下博文女校宿舍，为会议代表安排好住宿。为了保密，李汉俊建议在他和他哥哥李书诚的寓所举行会议。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他的家里。

会议期间，曾发生过一段惊险的历史插曲。7月30日，"一大"第6次会议正在举行，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的程子卿假装"找错门了"，突然闯入会场。代表们立即中止会议，迅速撤离。为掩护同志，李汉俊以房主身份冒着生命危险留下。十几分钟后，一群法国巡捕气势汹汹赶来。领头的发问："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镇静自如："我们在编辑新时代丛书，不是开会。""他们都是什么人？""北大教授。""那两个外国人呢？""也是北大教授，暑假来沪谈谈。""你为什么收藏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需要看看。"泰然若素，滴水不漏的回答，使法国巡捕找不到任何破绽，只好悻悻离去。这一幕看似有惊无险，实则需要多么无畏的精神和勇气才能化险为夷呵！

脱党事　众说不一

李汉俊为上海党小组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工作，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党。关于他脱党的事，从当时的知情人留下的文字资料看，众说不一。

包惠僧断定：李汉俊是1922年被党开除的。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持另一说法："'一大'以后，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也与国际代表，在建党问题上意见分歧，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结果，就负气脱党回武汉去了。"

蔡和森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称："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

陈潭秋1936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则说："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党的立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

到底李汉俊为什么脱党？什么时间脱的党？这两个问题都只能从其它资料整理出个大概了。

还在建党前，李汉俊就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这为他日后脱党埋下了伏笔。1921年春，筹备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将草拟的党纲寄给李汉俊征求意见。这份党纲草稿中有一条写的是集权制。由于李汉俊对陈独秀平素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不满，便认为集权制将助长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故而反对集权，主张分权制。这一争论虽未导致上海党小组的分裂，但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植下了芥蒂。不久，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李汉俊又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据李达回忆："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这次闹意见的结果，李汉俊辞去了上海党小组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代理。

"一大"以后，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分歧，加之当时任中央组织主任的张国焘，"专与汉俊为难"，知识分子高傲气质很重的他便于1922年春负气返回武汉，事实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前述茅盾的回忆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包惠僧说他1922年被党开除，显系年代久远，回忆有误。

党的"二大"召开时，李汉俊向中央写了一份意见书，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采用民主集中制。陈独秀在会前曾写信请李汉俊出席会议，但他只是托人将意见书带到会上，自己则始终没有到会。"二大"开过后，李汉俊和党在组织关系上更渐疏远。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为了做李汉俊的工作，马林建议选他进中央委员会。因此这次大会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鉴于李汉俊自动脱党，正式开除他的党籍。陈潭秋说他是在"四大"开除的，这一点没错。但说他是因一贯保持右倾观点，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党的立场，则不尽如是。他的所谓"右倾观点"不过是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有意见分歧；"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可能是指他与胞兄李书诚的关系。当时李书诚正在北京任临时执政陆军部总长。至于"放弃党的立场"，更是言过其实，他的言行可以作证。所以有这样的指控，疑为张国焘对他打击排挤所致，张对他素有恶感。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讨论开除李汉俊的时候，许多同志认为他是因陈独秀的专横才消极，因而对他表示同情。在党的早期历史上，李达、陈望道也是因与陈独秀处不好关

系而脱党的，李汉俊的脱党原因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两样。

脱党后　心系革命

李汉俊虽然从1922年就对党消极，以后又因自动脱党而被开除党籍，但他并未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未脱离革命，而是继续战斗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之中。

1922年李汉俊回到武汉以后，在武昌华中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任社会学教师，利用讲台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他积极支持了湖北女师反对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热情地投入了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教育主任委员，与项英、林育南、施洋等同为执委。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李汉俊亲自带领高师的几名学生搭车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还向大会敬献了一幅写着“大地赤化”4字的5尺红绫。“二七”罢工后，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追捕，他远走北平暂避风声。到了秋天，形势稍缓，他即返回武汉，继续在武昌高师执教。

1924年春，李汉俊因讲授《唯物史观》被攻击为“赤化宣传”，复遭军阀通缉。

1925年，李汉俊积极投身于由“五卅惨案”激起的反帝爱国浪潮，多次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参加武汉地区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1926年春，李汉俊应陈独秀之邀，回上海大学主讲《唯物史观》。这年夏天，为响应北伐，他策划鄂军夏斗寅部起义。之后，他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副团长随团长董必武到长沙，欢迎北伐军进入湖北。武汉攻克后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用郭沫若的话说，在这个由蒋介石指定人选的“鱼龙漫衍”的政务委员会里，李汉俊和他的挚友詹大悲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

1927年1月，河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出任教育厅长，和董必武、恽代英、詹大悲等人同为省政府委员。这期间，毛泽东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李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并应毛泽东之邀，为“农讲所”主讲“世界政治经济状况”。

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绞杀。李汉俊为战友牺牲而悲痛，他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的坚强信念。他说：“常有一般号称革命的同志，均自以为我是重要分子，我不能随随便便地牺牲，牺牲了必须有很大的代价，这完全是错误思想，我们必须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

5月17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叛变。虽然李汉俊与夏斗寅私交甚笃，但他力主讨伐夏逆，在好几次会上都发言谴责夏的叛变行径。

鉴于李汉俊这一时期的政治表现，湖北党组织和董必武、陈潭秋等曾向中央提议恢复他的党籍，但遭到陈独秀拒绝，使他最后失去了回到党内的机会。

“7·15”汪精卫分共后，共产党转入地下。董必武曾找李汉俊谈话，告诉他：“这次党撤退，没有布置后卫，原来同党合作的人，要留下做点工作。”李富春也曾嘱咐李汉俊要坚持革命。继续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守住摊子。于是，李汉俊和詹大悲、邓初民等继续留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政府内，运用合法身份，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非常时期，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以省党部青年部长，省政府教育厅长和中山大学负责人的职权，把一些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安排在这几个部门工作，力所能及地掩护了他们。10月，以桂系军阀为首纠合起来的南京“特别委员会”组成所谓“西征军”进攻武汉。在“西征军”到达武汉前夕，李汉俊和他的哥哥李书诚以湖北省政府的名义，将当时在武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使他们免遭桂系军阀杀害。

11月中旬，“西征军”进入武汉。南京特委会派出“党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整委会”)企图控制湖北的党务大权。李汉俊和詹大悲以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名义，在武汉三镇到处张贴”反对南京特委会派人整理湖北党务”的标语，并在《武汉民国日报》上著文抨击“整委会”。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仇恨。“整委会”便攻击他们“皆为附共”之“罪魁”，“请国府明令缉拿”。11月下旬，李汉俊、詹大悲避难住到汉口日本租界。12月16日下午5时左右，桂系军阀胡宗铎通过日本驻汉领事，派数名便衣同日本巡捕到寓所将他们逮捕。

李汉俊被捕时十分镇静。他宽慰了怀孕的妻子之后，才随军警走出家门。当时也潜伏在汉口日本租界的董必武惊悉凶讯，立即托朋友营救。李书诚也积极出面营救弟弟，但他也遭逮捕，反动军阀抓到李汉俊后根本不加审讯，随即将他从武汉卫戍司令部押到汉口市特别公安局，并于当晚9时押往刑场。李汉俊面对漆黑的夜空，只来得及怒吼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呵！”就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这时离他被捕仅4个小时。与他同遭杀害的还有他的挚友詹大悲……

李汉俊是中共早期党员中脱党后唯一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作者：彭明榜、张亚斌，选自《党史文汇》93年3期）

北伐军三攻南昌

1926年7月，蒋介石遵照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北伐军锋芒所向，势如破竹，克长沙，过汨罗江，占贺胜桥，直逼武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横扫两湖地区，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军。

蒋介石在北上攻打吴佩孚的同时，对在南京的孙传

芳尽量争取其中立。他曾几次致电孙传芳，阐明此次用兵只是讨伐人民公敌吴佩孚，要孙“不受吴佩孚伪命，不扰我革命根据地”，并希望“能顺应革命潮流，以保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孙传芳也一再表示“中立”，“坚守疆界”。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的同时，以重兵驻守赣西、赣南，监视孙军的活动。北伐军节节胜利，孙传芳极为惊恐，调兵遣将，准备随时出击北伐军。这时，正在孙传芳幕中的军事战略家蒋百里曾向孙献三策：上策为出兵长沙，腰击北伐军；中策为待蒋、吴两军相争于武汉以南，双方消耗实力后，出兵占武汉；下策为主力向江西布防，以逸待劳，寻机出击。孙传芳取其下策，于8月份将他的20万大军分五路布防于江西、福建：第一方面军以邓如琢为总司令，驻樟树、新淦、南昌、永丰等地；第二方面军以郑俊彦为总司令，自南浔路南段集中，向湘、赣边境萍乡一带前进；第三方面军由卢香亭任总司令，驻南浔路中段德安、涂家铺、武宁一带；第四方面军以周荫人为总司令，驻福建，与北伐军东路军相对峙；第五方面军以陈调元为总司令，驻武穴、富池口、石灰窑等处。8月底，孙传芳下达了作战计划，电令各部队：“湘局变化，我方亟应迅行出击。”摆出了一副进攻的态势。

这时，北伐军正在围攻武汉三镇。蒋介石闻讯，即致电孙传芳，并通电全国，揭露其反动面目：“孙氏年来因利乘便，入据江浙，犹复野心不戢，以保境安民为名，行侵略扰民之实。近复征调频繁，谋扰湘粤。其致中正阳电，实属意图挑衅。是非曲直，当世自有公论。”通电的同时，公布了孙所下达的进攻命令。9月上旬，蒋介石决定将北伐军的主力东移，打江西，攻南昌，其作战方针为：兵为三路，以第一、二、三各军为右翼，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分别由铜鼓、吉安、萍乡向南昌进击。以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组成中路军，由程潜指挥。该军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以截断南浔铁路。以第七军为左翼。由李宗仁指挥，从鄂城、大冶一线入赣，直攻九江孙传芳的司令部。

蒋介石命令赣南、赣西部队于9月5日左右向当面之敌出击。各军奋勇作战，先后攻占萍乡、宜春、赣州、赣信，第六军攻克修水，并向南推进，北伐军从南、西、北三面向南昌包围过来。9月12日，蒋介石急于求成，命令朱培德指挥前方各路军队“从速猛进南昌”。守军节节败退，北伐军又克吉安、铜鼓等地。9月中旬，李宗仁奉命率第七军由大冶入赣作战。17日，蒋介石也由鄂直奔萍乡，指挥江西战场的作战。各军进展顺利，第六军直插奉新，向南昌进逼。敌军主力南移樟树、高安，以抵抗右翼军的进攻，因此南昌空虚，守军只有600多人。9月19日，程潜率第六军及王柏龄的第一师乘虚进攻南昌，在工人、学生的支持下和省署警备队的协助下，立即攻入省垣。敌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邓如琢闻报，即由丰城回师反攻，郑俊彦部也驰援夹击。程潜见势不妙，仓皇撤退，易服剪胡须夺路逃生，全军溃不成军。王柏龄在占领南昌后即入妓院寻欢。当敌突然围攻时，王柏龄的第一师因军中无主，而在牛行车站被冲得七零八落。王脱险后，知军法难容，而逃匿后方。南昌得而复失，蒋介石十分恼火，他说：“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

9月29日，李宗仁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由阳新南进至箬溪。该地由孙传芳的精锐部队谢鸿勋部2万余人驻守。30日，李率全师出击，鏖战一日，谢部全军覆灭。李挥师东进，于10月3日攻占德安，击溃卢香亭部三四万人。蒋介石闻报发电慰勉：“刻接支电，欣悉德安克复，逆敌击溃。此次孙逆全力来犯，主力皆在德安、九江一带，今为贵部完全击破，以后敌必闻风胆落，赣局指日可定。吾兄及诸将士不避艰难，达成任务，其勋劳非可言喻。”李宗仁的两次胜仗使孙传芳坐立不安，而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讲和，蒋介石置之不理，继续部署作战。

这时，第三军在万寿宫附近大破敌军郑俊彦部四个混成旅；第八师追击至生米街一带。第六军及第一师攻击乐化至涂家埠之敌。蒋介石见军事形势不错，而移营高安，再度指挥向南昌反攻，他命令第三、六、七各军及第一师于10月7日向南浔线全面出击。并令第二师由新淦渡河协攻樟树，第二军由丰城直趋南昌。10月11日，第二、三两军及第一军第二师强渡赣江，将南昌合围。蒋介石为鼓励士气，于12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非常坚固，爬城仰攻实非容易之事。白崇禧认为，屯兵于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极不赞成围攻南昌。蒋介石个性倔强，刚愎用事，坚持主张爬城硬攻。当天夜里，正当攻城部队准备进攻之时，守军敢死队突然从城下水闸中冲杀出来。月黑风高，喊杀连天，一阵混战，攻城部队秩序大乱。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乎全团覆没。情势危急。蒋介石、白崇禧都在前线，黑夜中无法指挥。蒋急得手足无措，只是抓着白崇禧的手连连问：“怎么办？怎么办？”白氏还算镇定，建议指挥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由浮桥渡江。此役，北伐军大败。第二天，蒋介石还下令：暂时撤去南昌之围，以后待机再攻。

第二次攻打南昌失败后，蒋介石对入赣作战进行了总结，认为：“此次我军对赣作战进展迟缓之故，实缘交通梗阻，联络不易，彼攻此守，一进一退。而敌且得乘我弱点，利用敏捷之运输，集中兵力，转用于各战场，一兵可当两兵之用。”所以他叫方鼎英、陈果夫以重金购置通讯设备和搜罗技术人材。同时，他认为兵力也不足，因而下令调第四军第十二、十师和贺耀祖独立第二师星夜入赣作战。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于10月14日制定了《肃清江西计划》：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分三路进攻孙军，左路由李宗仁率领，攻击德安、涂家埠

一线，截断南浔铁路；中路军由程潜指挥，攻占乐化后北进，配合左路军歼灭孙传芳主力军；右路军由朱培德指挥，攻牛行车站，再包围南昌。计划的总目标是，占领南浔铁路，歼敌主力，攻克南昌。

10月1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表了《讨孙传芳宣言》，文中说："今孙传芳，利用保境安民之名义，取东南五省为其私产，视东南人民为其家奴，承军阀割据之风，行鱼肉人民之实。""孙传芳凭恃武力，割据东南，侵略湘粤，麻醉人民，阻挠革命，抗犯义师，仇视本党，残杀同胞，实中国内乱之罪魁，三民主义之障碍，乃吴佩孚之第二，而人民之公敌也。""政府责任所在，焉得不声罪致讨。特令我国民革命军于挞伐吴佩孚以后，移师东指。"历数孙传芳的罪恶，让全国军民都知道北伐军东攻，属堂堂正正，师出有名。

10月30日，蒋介石为鼓舞将士斗志，在发动总攻击前下达了动员令："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之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曼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得挽转，革命乃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为最后之牺牲，始博最后之胜利。"

11月1日，蒋介石指挥三路人马，向孙传芳部队发动全面进攻。11月2日，李宗仁率第七军攻德安，守军一经接仗而向东退走。3日，贺耀祖师与张发奎师夹击马回岭之守军，敌不支，溃退九江。这样，北伐军占领了南浔铁路上的两个重要据点，使九江、南昌之敌陷于孤立。11月4日，蒋介石电勉张发奎，"贵军奋勇摧敌，迭遭损伤"，"代为抚慰死伤将士"。5日，蒋介石命令李宗仁"迅向涂家埠之敌猛烈攻击"，与第一、六两军配合夹击。李与白崇禧正率军自德安南下，忽接蒋介石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孙军调动情报："刻自涂家埠开来的孙军约二师在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岭前进中。"李、白乃调德安附近部队进入九仙岭一带高地，给敌以迎头痛击，歼敌2万余人。接着，李宗仁命贺耀祖师向北挺进，一举攻下九江、湖口。孙传芳见大势已去，即于11月7日由湖口乘舰返南京。李率师南上，并派张发奎向星子追击敌人。这样，赣北敌军基本被消灭。蒋介石非常满意，即致电李宗仁说："此次南浔铁路总攻，各军奋勇异常，故能于最短期间肃清敌众。就中尤以四、七两军不避道远奉命来援，功绩独多。着各犒赏银二万元，以奖有功。"当第六、七军在涂家埠会合时，南昌方面的守军主力正南下向第三军反扑，第三军几乎被包围，蒋介石除调总预备队增援外，急令李、程南下救援。白崇禧率李、程两军各一部赴救南昌。后敌军自行撤去。这时，除牛行附近尚有孙军顽抗外，南浔路守敌均被消灭，南昌城内守敌已处孤立无援之境地。7日拂晓，牛行车站守军撤退。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率领进击队追击。白追至汉口附近，孙军正遇内河水涨，不能渡，2万余人悉数被俘。城内守敌二三千人，闭门不战，蒋即"限令克日出城"。8日，蒋见守军没有开门出城，就命令朱培德攻城。至中午，城内守军白旗高挂，陆续出城，蒋立即派警卫团入城，维持秩序，市民热烈欢迎。第二天，移大本营于城内。南昌的攻克，为北伐军消灭孙传芳反动势力，抵定东南，奠定了基础。

（蒋顺兴）

顾维钧开除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

1926年5月，顾维钧任颜惠庄内阁财政总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他的下属建议他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爵士。（自1863年以来，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担任。）此人虽是财政部下属的官员，但操纵着全权。若要发行公债，需有关税的某种保证，且均须经总税务司点头认可才行。因此历届财政总长到任后都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

"对，我要见见他。"顾维钧爽快地答应了，吩咐秘书打电话给安格联。

"噢，你应去拜访他。"

"不，我认识他！"

电话很快接通了。

"顾博士，你荣任财政部长，我谨向你表示祝贺啊！"

"谢谢，安格联爵士，我想跟你谈谈，你可以来一趟吧？"

"啊哈！我正要当面向您表示敬意哩！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呢？"

"明天下午四点，可以吗？"

"好！好。明天见！"

"明天见。"

就这样，顾维钧打破了财政总长就任后首先去拜访具有特殊地位的海关总税务司的惯例。

不久，中秋节临近。为了解决政府的开支，顾维钧向内阁建议：用对奥地利赔款豁免部分作担保，发行一种债券。内阁同意了并让海关税务督办蔡廷干电告回国休假的安格联尽快回来。一天天过去了，得不到回答。顾维钧和内阁很着急，又让蔡廷干以海关税务督办的身份查询安格联不作回答的原因。安格联没有答复蔡代表内阁打的电报，却回复了蔡本人的电报，说他还不能很快离开英国，如果准备返回中国，计划去广州、武汉访问。内阁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让蔡廷干电告安格联直接返回北京。

原来，安格联已从中国各银行得知政府要求他回来的意图。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当时五大银行的首领）

已向安格联表明了其反对发行债券的意见。于是发行债券一事就此搁浅了。

1927年初，安格联才回到北京。这时顾维钧作为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约见了张家璈，说明为了安度春节，政府打算用对奥赔款作抵押发行债券。顾维钧指出，债券发行的担保问题，一般应为政府与中国银行的代表商谈。张家璈坚持说，金融界历来做法是任何债券不论用哪种形式均以关税作担保，因而须得到海关总税务司的同意，没有他的签字作保，债券就不能在市场上出售。因此，政府应先问问安格联。结果，安格联借口中国分成两部分(南方已成立广东国民政府)，拒绝签字作保。

在内阁的会议上，顾维钧发表了意见："一个公务人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外国人，地位特殊也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联系到中秋节时他拒绝回电及故意违反政府指示访问广州、武汉，内阁同意革除安格联的职务，并公布了这项命令。

命令公布的次日，银行界头面人物来找顾维钧，说是革职令将引起严重后果。

顾维钧坚定而冷静地向银行家们表示："政府在决定革去安格联职务时，完全准备好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后果。政府的行动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银行界对此关心可以理解的，但威胁政府却不是银行家应该做的事，政府一定会知道应采取什么对策来应付局势。政府公职的任免是政府正常职权的一部分，我认为政府革除安格联职务，与任免其它高级官员没有什么不同。金融界形势是否恶化，完全看各银行自己的行动，如果你们保持镇静、尊重政府的行动，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可是，张家璈等人坚持说政府要对革职一事造成的全部后果负责。顾维钧不得不重申政府的立场，他说："政府发行债券不是以安格联的话而是以关余(注：旧中国关税中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经费等所剩的余额。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甚至规定"关余"非经驻京外国公使团的同意，中国政府无权动用，直至1929年才有所改变。)做保的，政府借债不是私人问题，各家银行应当明白，如果以正确的看法来考虑形势的话，就能够设法避免任何不幸的发展"。顾维钧觉得自己已把话说到底了，他站起身，示意还有别的约会，银行家们只得怏怏地走了。

顾维钧随即从总理办公室到外交部的大厅，接见以英国公使兰普森爵士为首的外交使团代表。顾维钧一见他们七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此，颇不寻常。在向他们问候之后，他先发制人地问道："各位先生来访有什么特殊目的？"

英国公使兰普森与邻座的那个代表推让了一番，才忸怩作态地说道："嗯，是这样的，我们想问一下阁下对安格联爵士革职这一不寻常行动的理由。"

顾维钧生气地答道："公使先生，我恐怕不能对你的问题作回答。"

"为什么？"

"因为你问到的这件事，只涉及中国政府内部的事务，是政府正常管理的问题，可以肯定，你这是想干涉中国内政。"顾维钧严正地向他们指出。

"啊！不，不，我们不是有意干涉，我和我的同事们只是想……想知道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意外的、不寻常行动的理由。"

"公使先生，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呢？"顾维钧不客气地回敬道。

"阁下，我想您知道我在中国的地位，嗯，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反问我。"兰普森煞有介事地说。

"兰普森先生，你以英国驻华公使这样官方的身份提问，我不能回答，因为这只是涉及中国政府的事务。"

"噢，阁下，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不是以英国政府的代表，而是以关税担保的中国公债持有人利益的代表来提出问题的。"兰普森还振振有词地说道："公债持有人为数很多呀！在外国许多银行也代中国政府大量发行债券，其中就有一些英国银行呢！"

顾维钧耐心地听他说完，不紧不慢地说："因为你代表英国的一些银行说话，你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你要问理由，很简单，就是：'抗命。'"

兰普森慌忙问道："'抗命'？嗯？'抗命'是什么意思？请阁下解释一下吧！"

"'抗命'，这是个英国字眼，英国政府以其良好的管理著称，凡是负责政府管理工作的人，无论使用何种语言，都可以理解这个字眼。"

"可、可是，'抗命'这个罪名怎么适用于安格联爵士呢？"兰普森继续争辩道。

"公使先生，即使你代表英国债券持有人的集体利益，也代表出席的其他公使，即代表其他国家债券持有人说话，我也没有必要去解释政府为什么要革去安格联的职务，况且我国政府这样做，决不会影响以关税作担保的公债的安全。我已说明了革职的理由，我认为这已经够了，我肯定债券持有人是会理解的。"

说到这儿，顾维钧以坚毅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坐在他前面的这些人，首先离开了大厅，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会见。

然而事情没有到此结束。北洋政府在免去安格联职务的同时，任命了易执士，这个英国人多年来是海关秘书长的秘书。易执士乐意接受任命，但没有英国公使的批准，他不敢接任。顾维钧得到可靠消息说，兰普森告诉易执士：不应接受这个职务。针对兰普森的故意阻拦，顾维钧当机立断，派蔡廷干通知易执士：他只是空缺期间代理

一下而已，如果他不愿意留在这个职务上，政府将另选合适的人。蔡廷干对此表示为难，顾维钧向他分析了问题的实质："从长远来看，如果政府想维护其合法权威，就不应容忍中国银行界、海关与安格联之间的'合作'了。"

此后，英国公使兰普森仍百般刁难，一再拖延批准易执士为新的海关总税务司，甚至希望中国政府以某种方式收回成命。

顾维钧让人转告兰普森：撤消命令绝不可能。

没几天，顾维钧和内阁又让人通知兰普森："在安格联革职的前提下，如果他有什么能使政府接受的建议，也可以考虑，但总税务司之职不能久悬，我们将通知易执士两周内到职。"同时，顾维钧以外交总长的身份，通知当时驻伦敦代办陈维城就兰普森企图干涉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向英方提出抗议。

在这样的形势下，兰普森不得不同意易执士接任新职，但为保全面子，建议保留安格联总税务司的名义，改为离职一年以缓和其被革职在海外造成的影响，北洋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革除安格联总税务司之职虽遭银行界强烈反对，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认为这是维护中国主权和中国政府权力的合法行动。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一次将洋人革职！

（李松韶）

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之死

1926年4月25日夜晚，从北京东刑场传来一声骇人的枪响，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应声倒下，然而这一幕并非是以文罹祸之惨剧的终止。同年8月6日，也就是邵飘萍横尸刑场不到100天，《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又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记者被捕、报馆被封并不鲜见，可现在两位报界名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相继喋血，实在令人震惊。顿时舆论大哗，人们惊叹，发出"萍水相逢百日间"的感慨，悲哀尽在其中。

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4年生于浙江金华。青年时代，他深为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他说："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趣，愿终生以之。"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三眼井创办了《京报》，他以"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为办报宗旨。编辑室的墙上贴有他手书的"铁肩棘手"的大字条幅，以勉励同仁"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大胆地披露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卖国丑行，曾一度被政府查封。复刊后，邵飘萍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锐意革新，在北京报界首创副刊，在《京报》上开辟了包括鲁迅先生主编的《莽原》、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第12种周刊。这时北京已是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邵飘萍却毫不畏惧，他对好友包天笑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社会，我偏要揭穿他们的秘密。"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登了一版军阀的照片，分别题上"一世枭雄众叛亲离之张作霖"、"鲁民公敌之张宗昌"、"国民公敌之李景林"等字样。"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京的外国报纸歪曲事件性质，说什么"此次违反和平、幸福、安全之轨外运动，其责任实在于华人诸士之双肩也。"有鉴于此，《京报》连续发了3次特刊，报道事实真相，并捐支持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声援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的"讨赤"主张，并多次指斥其亲日卖国行径，引起了张作霖极大的忌恨。1926年4月22日晚，侦缉队封禁了《京报》馆，将邵飘萍押至警察厅。为了营救邵飘萍，北京新闻界代表刘煌等13人求见张学良，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终生监禁邵飘萍，以免其死罪。张学良坚持此事是两位老帅（（张作霖、吴佩孚）的命令，不可违抗。代表们只得含泪而归。邵飘萍遇难后，冯玉祥将军感慨万端地说："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林白水是福建闽侯人，原名林獬，又名林万里，字少泉，中年以后自号"白水"。他是1874年出生，曾怀抱"教育救国"的梦想，1902年4月和蔡元培、章炳麟等人组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致力于改良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幻想破灭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修法政，兼学新闻。1903年回国后即开始筹办《中国白话报》。在他2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先后创办了10种报刊，5次被清政府和军阀查封，自己曾3次身陷囹圄。

1921年春，林白水与胡政之在北京共同创办了《新社会报》。翌年2月10日，因在报上刊登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及盐余公债黑幕的消息，被北京政府警察厅勒令停刊半个月。复刊后，林白水愤然将《新社会报》改作《社会日报》，以示报纸曾被斩首。曹锟贿选大总统时，林白水曾撰文讥讽受贿议员，因而报馆再度被封，他也被囚禁起来。待曹锟坐稳了总统宝座，《社会日报》才得以继续出版。

《社会日报》的时评均出自林白水的手笔。他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透骨见血，涉及权贵私德，不留余地，因此，深得读者喜爱。一位叫刘健情的读者在给林白水的信中说："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它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然林白水亦有过动摇，1925年12月1日，他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则《白水启示》言："（余）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招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的署名即由"白水"改

为"记者"。几天后，林白水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大多是青年学生，都劝他"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说话"。林白水很是激动，表示"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人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为文字贾祸，也是值得的"。

奉鲁军阀张宗昌等进入北京后，疯狂镇压爱国运动，钳制舆论，"言稍不惘其意者，必扑杀之而后快"，搞得新闻界人人自危。但林白水毫不畏惧，他以为，凡有良知的记者应替百姓说话，不能献媚于军阀。他曾讥讽见到敌人就逃跑的张宗昌为"长腿将军"，引起北京老百姓的一片共鸣。张宗昌知道后，对林白水怀恨在心。可是张宗昌决意杀掉林白水，还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官僚之运气》的署名文章，讽刺一心想作财政总长的潘复"热心作官，热心刮地皮"，跟在张宗昌身后，亦步亦趋是为虎作伥之"肾囊"。潘复与张宗昌为赌桌上的密友，时人称潘复是张宗昌的"智囊"，两人在官场上互相提携，关系非同寻常。潘复看了林白水的文章，恼羞成怒，在张宗昌面前哭诉了一番，张宗昌遂下令杀死林白水。6日凌晨，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找到林白水，诡称张宗昌邀其叙谈，便直接把他带到了宪兵第二营，当即进行了审讯。林白水的密友杨度和薛大可闻讯后，出面求情，薛长跪于张宗昌面前，央他刀下留情。最后张终于同意将"即日执行"改为"犹预执行"(相当于现在之缓期执行)。可是当命令传到刑场时，不幸林白水已成了屠刀下的冤魂。

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位报人，由于相似的原因，先后倒在奉系军阀的枪口下，而两人身后一片沉寂，直到1928年8月北洋军阀垮台后，北平新闻界才得以为两位先烈补开了追悼大会，由北平市市长何其巩主祭。

(张玉芳)

历史考证

"中山舰事件"后的妥协退让苏联顾问应负主要责任

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而制造的反动事件。事件发生后，共产党方面作了全面妥协退让，使蒋介石轻易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不久，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再次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被全会通过，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这就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埋下了祸根。

那么，对"中山舰事件"后的妥协退让，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呢？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应负全部责任。认为陈独秀害怕反击蒋介石会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因而拒绝了毛泽东等同志主张反击的正确意见，采取了完全妥协的机会主义方针，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公开为蒋介石辩护，等等。

近年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中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包括蒋介石)的几次大退让都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国民党的错误估计有关，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都应对这几次妥协退让负责。另一种观点则较为强调张国焘在妥协中的作用，认为他在1926年4月主动充当中共中央代表，到广州向国民党新右派献媚。在广州，他一面召开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蛮横压制正确意见，不准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同时，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夕，与蒋介石达成谅解，导致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阴谋得逞。这两种观点，我以为都有不尽完美之处。

笔者认为，对于"中山舰事件"后的妥协退让，共产国际、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均有责任，而苏联顾问应负主要责任。原因在于：第一，事件发生后，首先决定妥协退让的是苏共高级顾问团；第二，"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与鲍罗廷协商的结果，它不仅使蒋的反动行为合法化，而且使蒋的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不能作为陈独秀主张妥协的依据；第三，妥协决定符合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摘自86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作者：黄德林》

共产党人促北伐的历史功绩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首次联合革命战线为继承、推进与发展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进行的一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广东北伐基地和促成国民政府早日出师北伐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

实行北伐需要有巩固的后方基地。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基地广东，是国共两党共同平定广州商团及滇、桂

军叛乱和消灭陈炯明、邓本殷等军阀势力后,才得以巩固和统一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

1924年秋,在孙中山平定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严惩英帝国主义走狗陈廉伯等人的原则立场,指出广州商团军是"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的第一步,就应该是"解散商团军"。共产党人施卜、彭湃领导的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随时准备听从孙中山政府的号令,投身讨平商团军叛乱的战斗。10月10日,当广州商团开枪屠杀"双十节"游行的工农兵大众、举行叛乱之后,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反对商团叛乱的大会,成立"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誓为政府平叛后盾;中共广州地委发表了告广州民众书,号召各界民众投入平叛斗争。同时,施卜陪廖仲恺前往韶关,向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报告情况,请求回师广州平叛。共产党人谭平山则在广州参加了由孙中山任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担任监军。15日,广州革命政府军队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团军及农民自卫军等协同下,一举荡平了广州商团叛乱。

在1925年2—3月间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广东反动军阀陈炯明时,粤军及军校教导团组成的右路军是东征主力。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宣传工作,参与了东征右路军的领导与指挥工作。中共党员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胡公冕、季方等担任了营长或营党代表;两个教导团的连排级干部,"差不多一半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行军和打仗中,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冲锋陷阵,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做出了牺牲和重要贡献。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之际,正是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之时。在东征中心怀叵测的杨希闵、刘震寰此时加紧勾结滇系军阀唐继尧,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被击溃的陈炯明残部也随时可能死灰复燃。面对这种情势,共产党人多次指出:"国民党重要责任之一,便是集中全体党员之力,遵从遗策,保卫革命根据地,扫荡反革命势力",以使广东成为将来北出中原的根据地。6月初,共产党人发动东江农民和广九路工人援助东征右路军迅速回师广州,一举荡平了杨、刘滇、桂军的叛乱,消除了革命政府内的隐患。

1925年9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又从赣、闽边境反攻东江,且勾结南路邓本殷,妄图夹击广州。当时,共产党人彭湃及时建议年轻的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广州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于9月下旬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的东征联军,周恩来担任东征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10月初东征联军出师时,政治部组织了能讲广州、客家、潮州、普通四种话语的政治宣传队,四出宣传。陈赓、蒋先云、曹渊、李之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指战行列。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二师第四团,全团12个连长全是中共党员,大都在攻城战斗中英勇献身。"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在共产党人的带动下,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加上中共广东区委指派杨石魂等人深入潮汕地区,发动工农大众支持东征军作战,东征军很快就消灭了陈炯明的叛兵和南路的邓本殷,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日后北伐军出师建立了坚实的后方基地。

随着广东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与扩大,共产党多次指出尽快举行北伐以扫荡北洋军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并发动各民众团体促请国民政府迅速出师北伐。

早在"五卅"运动后不久,共产党人就认为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热情高涨,尽快地"举行北伐是适宜的",因为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上,将"发挥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潜在革命力量而创造有利的形势"。1925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团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明确地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应该"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次年1月,她在对国民党"二大"的宣言中又强调国民党应深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目前政局与党的职任问题。会议鉴于当时直奉军阀与西南军阀狼狈为奸,疯狂叫嚣要扑灭"南北二赤"——广州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的严重局面,十分明确地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时应加强对北方冯玉祥国民军的团结改造工作,使之能"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以指导和加强党的军事工作。3月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会见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军事政治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时,"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他认为国民政府"如能粉碎吴佩孚,就能赢得政治上的大胜利"。此后,陈为此有"四电一函"给蒋介石和汪精卫等,说明国民党政府应"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就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陈还解释说中共党内对于北伐事虽有"缓进急进之分",但说不到"根本推翻"。

共产党人在多次建议广州国民政府尽早举行北伐的过程中,还发动有组织的工农大众再三促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表示誓作北伐后盾。1926年3月9日,共产党人郭亮、夏曦等在长沙组织的万人市民大会上,通过了"请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等决议。4月间,共产党人刘尔崧领导的广州工代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江西的革命同志会也电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请求早日出师北伐,取道江西,把北洋军阀赶出江西省境"。5月初,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

省第二次农民大会，通过了《请愿国民政府速即出师北伐案》等，强调"我们在政治上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肃清北方的反动势力！"

中共党组织及其党员建议与促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种种努力，对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有很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国民政府代表周鳌山1926年5月在长沙对唐生智曾说过："北伐本来还未到预定期限，湖南既然发动了，中共在广东方面的人也极力主张迅速北伐，所以可能提早北伐"。显然，共产党人促成国民政府尽早出师北伐之功不可没。

（作者：康乐　选自《党史文苑》）

中山舰事件之谜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扑朔迷离，它的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蒋介石当年曾说："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现在，该是对这桩公案彻底清理的时候了。

事件前蒋介石的心理状态

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季山嘉等顾问们却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北伐应该从缓。然而，二人由于意见分歧而导致的裂痕由此肇端。

2月6日，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及至7月，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疑忌，怀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当天，蒋介石和季山嘉作了一次谈话。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季山嘉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曾于事后找到汪精卫，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态度源源本本地告诉了蒋。蒋见信后即决定辞去一切军职，13日又突然打算前往莫斯科一游。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在向蒋转述季山嘉态度的信函中，汪又盛赞季山嘉谈话时光明诚恳的态度，要蒋创造条件，使季山嘉等能够畅所欲言，以消除忌讳和隔阂。汪精卫又两次致函并亲访蒋介石，劝他打消辞意。但是，蒋介石毫不动心。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此事进一步地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他认为广东有6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七军、第八军，但是现在却将第七军的建制空下来，这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军长。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次日，将王押送赴沪。

那时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卫，所部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蒋介石在驱王之后，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然而他仍然疑虑重重，觉得自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3月5日日记云："单枪片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3月10日日记云："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诽我、害我者亦渐明显。"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他也认为是心怀叵测，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赴俄休养"本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而当汪精卫为了缓解他与季山嘉的矛盾，同意这一要求，并催其"速行"时，蒋介石却又恐惧起来。3月15日日云："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垓心〔下〕，天下事不可为矣！"在他和秘书陈立夫的赴俄护照得到批准后，他更加惶惶然了。

正是在这时候，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中山舰调动经过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还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3月18日，商轮安庆号在海上被劫，泊于黄埔上游。午后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饬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巡逻艇）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乃自作主张，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因电话听不太清楚，王学臣想当然地推测是教育总长邓演达下的命令，于是立即报告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请他向海军局交涉。至于舰只规模，这时也因王学臣的"想当然"，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

允即派舰只一二舰。当夜，有3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邹毅一函，中称：已通知宝壁舰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决定派中山舰前往。

19日晨6时，宝壁舰出口。7时，中山舰出口。9时抵达黄埔待命。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得到同意后便电调中山舰回省。

由此可见，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蒋介石也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而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此人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了解他的这一身份，将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蒋介石确信有人在搞阴谋

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一连3次问蒋介石是否去黄埔，蒋介石感到有点“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蒋介石当时表示这个“同志”的名字“不能宣布”，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下午1点，蒋介石又接到李之龙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的电话，愈发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蒋介石认定是有人要陷害他。他最初顾虑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势力，于是决定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下午5时，已经行至半途了，才在陈肇英、陈立夫的劝说下，返回广州东山官邸，决定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

20日晨，蒋介石下令：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卫队枪械被缴。

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据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记载，蒋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到黄埔开会时，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摆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蒋介石当时认定，汪精卫是“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

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22日即隐居不知去向。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3月28日日记又说：“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至于此，可不痛乎？”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的多疑心理。然而，西山会议派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互相勾结，散布谣言，在挑起蒋介石疑惧心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多次散布诸如李济深阴谋倒蒋，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等各种谣言。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异常活跃，其核心人物王伯龄很早就到处散处汪精卫反蒋，3月17日又在黄博军校内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这些谣言煽起了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

为了“使共产党和蒋分家”，西山会议派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左右吃饭。席间，他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迅速得到了报告，他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曾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想去莫斯科。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汪的同意。自此，蒋介石自信他的判断不错。他更提出第三步试探，希望陈璧君等陪他出国。陈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他动身。碰巧苏俄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决定反共反汪。陈孚木在《国民党三大秘案》一文中也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送给黄埔军校的俄国商船，不久会到广州，便编造“故事”说，苏联不日将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机要秘密通讯传给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信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

个人耳朵里了。

伍朝枢所说的苏俄商船到达并起卸军械后，停在黄埔江面，一连几天，没有什么动静。为了与自己的谣言相印证，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柏龄便与欧阳格商量，决定“设计诱使中山舰异动”。3 月 18 日，欧阳格打电话给任子欧阳钟，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说是校长要的。当中山舰升火试笛以后，欧阳格就立即向蒋介石谎报，说中山舰已出动，要逮捕校长，夺取黄埔的军火。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偶然中的必然

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苏俄顾问团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汪精卫则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这一切是国民党右派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害怕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占统治地位，害怕苏俄顾问掌握军政大权，因而极尽造谣、挑唆、破坏之能事。蒋介石在内心里也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3 月 8 日日记云：“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4 月 9 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也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

（杨雨青）

风云人物

韦拔群

韦拔群(1893——1932)　初名秉吉，后名秉乾，又名韦萃。广西东兰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的创建人之一。1908 年进东兰县立高等小学，后入宜山县庆远中学。1914 年，到长江流域各省考察，曾拜见孙中山和廖仲恺。1916 年回广西，参加了讨袁护国军，在贵州熊克诚旅任连副，旋被送到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四川滇军张毅军部任参谋。1920 年 10 月，在广州参加了受孙中山和廖仲恺支持以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担任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反军阀斗争。1921 年 9 月回到家乡，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1923 年 5 月，“同志会”改为“东兰公民会”(后改为国民自卫军)。6 月，率领农民武装三次攻打东兰县衙门，赶走了县长蒙元良和大恶霸韦龙甫。这一斗争揭开了右江农民运动的序幕。

1924 年 5 月来到广州。次年 1 月，进入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4 月，以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东兰县，领导农民运动。9 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任军事部长。1925 年 11 月，在东兰县武篆区的北帝岩(1930 年改为列宁岩)举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农讲所主任。为东兰、凤山、百色、凌云等十一个县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1926 年 10 月，在育村小学继续开办了第二、三届农讲所。1927 年 8 月中旬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将东兰、凤山、凌云的农军编为三个自卫团，任总指挥。1929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 月，中共东兰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伦村召开，被选为县委委员。

1929 年 12 月 11 日，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他率领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任纵队司令。是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右江工农兵民主政府，当选为政府委员。1930 年 3 月，同邓小平一起，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试点。1930 年 10 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将七、八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他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留下来领导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1 年 8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仍任师长。同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 年下半年，在反“围剿”斗争之际，先后派胞弟韦菁(红军团长)和儿子韦宗述找中共中央，不幸被敌人杀害。最后他决定由副师长率部队突围，自己留在西山坚持斗争。1932 年 10 月 17 日，为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带警卫员罗日块到东里屯双茶洞，当晚，与警卫员留宿洞中，被叛徒韦昂开枪杀害。人民群众将他的遗体埋在特牙山上，并筑了一座小庙，起名“红神庙”，意思是韦拔群的英灵已经化为“红神”，永远卫护着人民。

叶　挺

叶　挺(1896——1946)　字希夷，原名为恂。广东惠阳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少年就读于腾云小学、惠州府立中等农业学校、惠州中学。后入黄埔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19年参加粤军，任支队副官。不久认识孙中山，逐渐接受三民主义，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广西桂林准备北伐时，组织了一个特别警卫团，他任该团二营营长，不久返回广州。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他因保护孙中山有功，曾受到孙中山的特别奖励。1923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改组，建立革命政府，随后成立宪兵司令部，他任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

1924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十个月后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第四军三十四团团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军队。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在攻打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战功卓著，威震全国。因此，叶挺独立团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进入武昌后，他任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为维护统一战线政策，他带领新成立的两个团和两千学生兵，打败了夏斗寅八个团对武汉的进攻。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下旬，他率领二十四师来到南昌，在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参加并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从香港秘密来到广州和张太雷、叶剑英等一起领导广州起义，担任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广州公社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从德国回国。

1938年新四军成立，他任军长，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出面与国民党顽军谈判，而被扣留。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桂林七星岩、湖北恩施和重庆等地。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叶挺被监禁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同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叶挺。直到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才以叶挺换马法五为条件，同意释放。1946年3月4日恢复自由。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他给党中央发电：“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回电，盛赞他“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受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叶挺等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殉难。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沉痛悼念叶挺等遇难同志。

罗　亦　农

罗亦农(1902—1928)　字慎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幼年入私塾，1916年考进湘潭益智学校。1919年赴上海，先在一所中学念书，后到一家小报馆当校对工人。其间阅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的文章。几次登门求教于陈独秀，被介绍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8月，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担任东方劳动大学语言组的书记，并兼任翻译和在中国班讲授唯物论，领导同学们研究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等问题。

1925年3月回国。4月，被派到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结束后，留在广州，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和周恩来、陈延年组织中共广东区委“临时委员会”，策划和具体领导这场反帝斗争。这一时期，还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为揭露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共同策划暗杀廖仲恺先生的大阴谋所写的《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府》一文，曾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0月，以广东代表名义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留在北京主持了三个月的党校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1926年1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通过调查研究，主张从组织工人开展经济罢工入手，进而准备武装起义。为此，积极在各种行业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1926年8月，江浙区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了上海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3日，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和赵世炎等先后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和国民党左派的背信弃义，在军阀孙传芳的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随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人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3月21日，武装起义开始，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浴血战斗，占领了整个市区，赢得了胜利。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罗在上海各区委、各支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上，代表区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鼓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坚持战斗。不久他代表中共江浙区委前往武汉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

央委员。此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和长江局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罗当选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2月，巡视两湖工作。4月初，返回上海。4月15日，由于叛徒何家兴出卖，被英租界帝国主义当局逮捕。4月18日，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局司令部。4月21日，被杀害。

赵世炎

赵世炎(1902——1927) 字琴生，号国富。四川酉阳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11——1914年，就读于龙潭镇高级小学。1915年8月去北京考入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他目睹祖国的内忧外患，从小就立下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宏伟志愿，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他是附中学生会的干事长，负责组建了少年学会，出版《少年》半月刊，并在附中办起校役补习班，帮助工人学习文化。1919年7月，中学毕业。随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主办《工读》半月刊和《平民》周刊，著文公开主张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

1920年4月，他结束了法文专修馆的学习，5月9日从上海乘法国的"阿芒贝利"号船启程赴法，6月底到达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一边作工，一边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极大的热情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他同李立三等共同发起、创建了劳动学会，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在华工中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工余读书会等组织，领导了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拒款斗争"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从而坚定了马列主义立场，1921年初，参加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奔走于法国北方、巴黎、蒙达尼、里昂等地，领导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1922年6月3日，由旅法、旅德、旅比三国各地推选出来的代表二十多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赵世炎主持了大会，并被选举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3年3月18日，根据国内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他同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革命青年骨干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春，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多次给代表当翻译。大会结束后，他遵照党的指示，离开莫斯科回国。

1924年秋，他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后又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斗争。他主编《政治生活》周刊，宣传中共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还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研究系所宣传的反动理论进行抨击。仅1924年7月到1926年7月两年内，他写了七十多篇文章。他支持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发起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5年3月10日召开，赵世炎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团书记，具体负责组织了这次大会。

1925年，上海发生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赵世炎领导北京市委立即组织声援，成立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连续组织了几次群众示威游行。接着，他又赴天津、唐山领导当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其间，他和唐山地委一道领导的开滦五矿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3月，他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他深入群众，组织罢工斗争，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1926年10月，上海中共党组织为配合浙江的夏超部进攻上海，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罗亦农、赵世炎任起义总指挥。但因时机不完全成熟，起义未能成功。1927年2月22日，他又同罗亦农、周恩来等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他们以更大的毅力和勇气领导了3月21日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阶级仅以一百五十支破旧枪枝和三颗手榴弹，与敌人血战三十小时，终于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他对革命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曾运用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育工人提高革命警惕。他说："我们的三次武装起义和苏联的二月革命差不多，蒋介石可能是中国的克伦斯基。看来我们将来还得再准备一次武装起义，来一个中国的十月革命。"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同罗亦农、周恩来等遵循党中央"隐蔽精干，准备再干"的指示，对干部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安排。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回到上海。6月，担任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于7月2日被敌人逮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1927年7月19日清晨，他从容不迫走上刑场，英勇就义。

杨暗公

杨暗公(1898—1927) 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又名尚述。四川潼南人。早年在家塾读书。1913年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事，开始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国民党。1915年，

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活动；次年初，策动江阴炮台起义，因事机不密，起义失败，旋逃亡上海。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杨暗公先入成城学校补习日语。因参加"留日同学读书会"，曾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1918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军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留日学生及华侨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公使馆前举行示威时，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在与警察的搏斗中，他被逮捕入狱，并被判刑八个月。在留日期间，他学习了《资本论》、《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出狱后，即离开日本回国。返川后，一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活动。

1922年，杨暗公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1923年秋，经吴玉章介绍，他又结识了担任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团长的刘伯承。他们以成都高师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了工会、农会。由于四川地处偏远，消息闭塞，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而在组织工、农的斗争中，却又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因此，他和吴玉章等于1924年1月，在成都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国青年共产团"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关，并推选吴玉章、杨暗公等六人为负责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独立自主地走上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道路。杨暗公在日记中写道："欲指导群众，究竟从哪条道路走的好？……刻已认定马氏为主。"（注："马氏"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5月，又创办《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在吴玉章、杨暗公的领导下，中国青年共产团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4年5月1日，杨暗公在成都少城公园主持召开了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在会上，他还作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的讲演。

1924年5月，杨暗公离开成都，经潼南、重庆到上海。6月，他在上海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7月，离沪返渝，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杨暗公和中共中央四川特派员肖楚女接上了关系，并和肖楚女、罗世文、童庸生等组织"四川平民学社"，作为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公开组织。11月，重庆发生日本"德阳丸"号轮船私贩劣币，并把四名中国检查人抛入江中淹死的事件后，他领导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四川地方军阀政府软弱媚外的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团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亦改称为共青团重庆地委，杨暗公当选为团地委书记。1925年初，他响应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发起组织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选派童庸生等十多人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在重庆组织召开追悼大会，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组织领导重庆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1925年8月，吴玉章回到重庆，和杨暗公一起创办中法学校，吴玉章任校长，杨暗公兼任政治、历史教员。该校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同时，他们又开始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并由杨暗公负责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杨暗公和吴玉章召集四川的共产党员代表，在中法学校举行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杨暗公任书记，吴玉章任宣传部长。从此，全川的党、团工作和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各项群众运动，都有更加蓬勃的发展。

1926年1月，杨暗公和吴玉章、廖苏华等六人作为国民党四川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四川，又领导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革命群众，对西山会议派在四川组织的国民党右派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9月，英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万县，造成了万县惨案。以杨暗公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当即组织"万县惨案雪耻会"，领导全川人民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11月，由杨暗公参加组织领导的四川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山学校召开。会上，杨暗公作了政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等三个报告，并对国民党组织进行整顿，从而增强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杨暗公和刘伯承、朱德等九人，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为了保卫武汉的侧翼，国民政府派刘伯承为军事特派员，回川争取四川军阀。在此之前，党已派朱德、陈毅等回川工作。这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由杨暗公、刘伯承、朱德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并由杨暗公兼任军委书记。1926年冬，以杨暗公为首的重庆地委军委策动顺泸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7年3月，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了南京惨案。杨暗公等闻讯，立即组织领导重庆工农商学各界群众，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了群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四川军阀刘湘根据蒋介石密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死四、五百人，伤千余人，造成了重庆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时，杨暗公正在主席台上，在血肉横飞，会场大乱的情

况下，他才随群众逃了出来。第二天，他又冒着极大的危险布置善后工作，然后准备去武汉向中央汇报。4月4日，当他乘坐的"亚东"号轮船刚驶进江心时，就被四川军阀的快艇包围，将其逮捕。杨暗公被捕后，关押在重庆浮图关军阀蓝文彬的司令部里，虽严刑拷打，被挖眼砍手，但仍坚贞不屈。1927年4月6日，惨遭杀害。十多年后，他的棺木被运回老家潼南双江镇安葬。

胡汉民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父胡文照，做过几处州县幕僚，主管刑名。胡汉民幼年从师学习，读了不少经史书籍。后来，父母相继死去，开始借教书维持生活。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

1902年，胡汉民与吴稚晖、钮永健等人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吴因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事与清公使蔡钧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先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随后在广西梧州中学教书，兼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他再次赴日本留学，到东京后，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

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不久，胡汉民和廖仲恺同时入盟。在入盟前夕，他因对平均地权的口号表示怀疑，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提出，曾与孙中山辩论了一个晚上，经孙中山为他详加剖析，他才勉强同意加入。入盟后，初任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民报》创刊，被推为编辑。他在《民报》上发表过一些政论文章，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很大的软弱性，特别表现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1906年4月他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在阐述同盟会的政纲时，宣称革命"不可有妨害外国之举动"，主张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应当承认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害"。

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粤、桂、滇边境地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这些起义失败后，1909年5月，孙中山赴欧洲，委托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同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他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倪映典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后，11月，孙中山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才，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随后，胡汉民往南洋各地筹款。1911年1月，黄兴、赵声到香港设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任秘书课课长。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胡汉民和赵声、宋教仁等次晨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他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后，胡汉民于4月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广东支部长。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反袁革命斗争旗帜，胡汉民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6年4月，他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筹划反袁活动。袁世凯死后，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进行扩充北方党务及联络原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工作。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为大元帅，任胡为交通部长。不久，孙中山为桂系、滇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所排斥，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他随孙中山离广东到上海。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1919年8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胡汉民和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他写的文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任总参议，随同孙中山在两广进行活动。

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国民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胡汉民的右派面目很快暴露，随着革命日益深入发展而越来越反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胡汉民本来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后来见风使舵，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不久，他即向孙中山提议建立民族国际来对抗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年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率领北伐军到韶关，由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10月初，广州发生商团反革命叛乱，危及广东革命政府，革命派要求坚决镇压，他主张"委曲迁就"，发还扣留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谋取妥协解决。10月9日，孙中山为处理商团事变，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指出胡汉民"长于调和，不长于彻底解决"，并且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有济。"随后，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举兵镇压，但叛乱平定不久，即向商团反革命头目陈廉伯表示认错，请

陈"释前怨",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官僚政客,认为他们的反共活动从此可以无所顾忌了。6、7月间,胡汉民约集孙科、邓泽如、邹鲁、林直勉、胡毅生(胡汉民堂弟)、伍朝枢、吴铁城等经常在家中聚会,商量反共反革命对策,攻击坚决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他和邹鲁等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谢持、戴季陶等取得联系,认定国民党非清党(清除共产党)不可,并秘密商定清党的步骤。8月10日,他们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于9月15日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来解决清党问题,并分头通知右派分子齐集于广州。与此同时,胡毅生、朱卓文等结合粤军首领许崇智的部属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接受了香港政府赠送了二百万元,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主谋者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人的阴谋被揭露,胡汉民因与廖案有重大嫌疑,一度被拘留,后被释放,在汪精卫的支持下,9月间,以"出使苏俄"为名到苏联去了。

1926年4月末,胡汉民从苏联回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充满着革命气氛,人们把他划入右派,投以卑视的眼光。他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企图抵制和对抗,由于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在广州呆不下去,于5月中旬避往香港,后到上海。1927年春,当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蛰屈了一年的胡汉民,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赶忙由上海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反共清党,绞杀革命。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与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的反革命的"国民政府",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上台后制订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并开列了一百九十余人的名单,多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5月5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着手清党。6月20日,他参加蒋介石和冯玉祥合作的徐州会议。他还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作",他是南京国民党反革命罪恶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反共、反苏、反对工农运动的文章和演说,打着宣传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是对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彻底背叛。

1928年1月,胡汉民适应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需要,和孙科、伍朝枢到欧洲考察政治。9月回国后,他提出了旨在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使蒋的南京反革命政府合法化的《训政大纲》及《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通过公布。《训政纲领》(通过后改名)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把国民党中央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实行五院制。蒋介石于同年10月间"依法"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1929年到1930年,他坐镇南京,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先后打败了桂系、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等敌对的各派军阀势力,完成了反革命的"统一"。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邵飘萍

邵飘萍名振青,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京报》的创办人。由于追求进步,同情革命,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被张作霖杀害。

邵是浙江金华人,生于1884年11月1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父亲邵桂村是个教员。他弟兄共五人,其他四人都在家乡务农。邵飘萍幼年就特别喜欢读书,十四岁中了秀才。后来因受戊戌变法的影响,他丢弃了"子曰诗云"的一套,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1902年,他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在杭州,他开始读到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那时,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在思想文化界有很大的影响。邵飘萍对梁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情感"的议论,颇为倾倒,用心加以模仿,不时为《申报》写些通讯文章,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不久,他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05年,邵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回到金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继续为《申报》写通讯,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他看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便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一样,邵飘萍则可以说是一个"新闻救国论"者。

1911年的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约法》里,曾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于各地。这时,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心情非常激动,于1912年离开金华到杭州,与一个叫杭辛斋的报人合作,办起《汉民日报》。邵在《汉民日报》上,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所以,他办报还不足三年,竟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到这时,邵飘萍以其亲身经历,锐敏地觉察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

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

是年10月，邵又在北京创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中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在他的编辑室，大书"铁肩棘手"四个大字，颇以舆论界"中流砥柱"自命。然而，这毕竟带着很大的幻想成分，恣睢暴戾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听命于多少反映一些民意的舆论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揭露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段政府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馆，要逮捕邵飘萍。邵仓促化装，逃出北京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前往日本，担任该报的特约记者。

邵到日本后，一面当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在1920年内，他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邵根据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严正地指出，各国反动派所散布的对新俄国的种种诬蔑，皆属荒谬无稽；确认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锐意革新。1925年初，《京报》陆续增出各种周刊，其中《莽原》周刊，是鲁迅先生主编的。其他有《妇女》、《儿童》、《电影》、《戏剧》、《民众文艺》等共12种周刊，此外还刊行三种社会科学半月刊，这些定期专刊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期间，邵飘萍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倾向更趋明显，《京报》成为最活泼而有生气的北方报纸。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它是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广东革命政府。邵对南方出现这一新局面，自始就持欢迎态度。是年11月，趋向进步的北方军人冯玉祥率部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并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宣布废除帝号。邵对这一进步行动非常赞扬。

1925年初，孙中山为谋求政治统一而北上。《京报》上几乎每日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并以'全国景仰"为题，刊出孙中山照片，表示了对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高度敬仰，热烈地希望他北上成功。而对于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则一直持批评态度。曾指出："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邵的这种政治态度，再度激起段祺瑞政府的忌恨。当时邵飘萍曾经写信给胡适，向他指出，进步青年对他参加善后会议十分不满，同时在讲到自己的态度时说"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所惧。"

接着，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邵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口号。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五卅"反帝运动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日益奋起，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被吓坏了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在"讨赤"的黑旗下，联合起来向革命人民疯狂进攻。这时，邵飘萍又在《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然后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着信心。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下令卫队向举行反帝游行的学生群众开枪，造成又一起大惨案，全国为之震动。邵飘萍怀着极大愤慨，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严厉声讨段政府的罪行；揭露其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对爱国人民穷凶极恶的反动嘴脸；指出段祺瑞是惨案的祸首元凶，应当逮捕法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对邵飘萍恨之入骨，遂把他秘密列入通缉名单，企图进行迫害。

"三·一八"惨案过后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奉军入京后，疯狂肆虐，不但封闭报馆，箝制舆论，而且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反对"讨赤"，还曾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指名谴责奉张亲日卖国的罪行，张作霖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邵为免遭迫害，当奉军入京时，便避入六国饭店。4月24日，奉军设计将邵诱捕，当即封闭《京报》馆。然后，不经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于4月26日将邵飘萍杀害。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林白水

林白水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

学者，中年自号白水。福建省闽侯县人。生于1874年1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祖先在贵州为吏，父剑泉是纨袴子弟。林白水少年从母读十三经及古诗文，十四岁随从舅家私塾读书，爱好古文，擅长写作，惟不屑于科举功名。他受塾师高啸桐及其友人影响，向往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恨清廷腐败，力求改革。

林白水二十岁时离福建到杭州，在林伯颖家教家馆。同时阅读新书，博览报刊，眼界更加开阔。1898年，杭州知府林迪臣创办蚕桑学堂，聘林白水执教。知府幕府的知名人士，有林纾、高啸桐、高梦旦兄弟等，常与林白水交往，他们都很尊重他。林年假回闽，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创办福州蒙学堂，后又返回杭州。1901年任求是书院总教席，经常夜间召集学生一二十人，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进行革命宣传。

同年6月，林白水在《杭州白话报》任主笔，撰写《论看报的好处》为发刊词，署名宣樊子。他说："现在各省是什么风气，有了报看，自然一目了然"，"农工商三等的人，能多看报，都有好处"。他倡导用白话文写社论和中外新闻，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使大家都看得明白。他在报上撰文，鼓吹民族主义，提倡办学校、立报社。这年冬天，林白水到了上海。1902年春，与蔡元培、蒋观云等成立中国教育会，以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为己任，并推动各地兴办教育。11月，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风潮，林与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等人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集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爱国青年于一堂。并出版《学生世界》杂志，鼓吹反清革命。

辛亥武昌起义后，11月9日福建独立，设军政府。林白水回闽，任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并任共和党福建支部长。1913年初，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林到北京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籍。林白水奉命回闽，帮办军务善后。不久，因与督办意见不和，辞职入京。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林白水的友人刘师培是"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公开鼓吹帝制。另几位朋友薛大可、梁鸿志等亦为帝制活动积极奔走。林白水受他们的影响，也随声附和，撰表劝进，成为帝制派。10月，林白水被袁世凯委任为参政院参政。

1921年春，林白水在财政总长周自齐的支持下，与胡政之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报》，林任社长，胡为总编辑。该报宣称愿"树改造报业之风声，作革新社会之前马"。翌年2月10日，《新社会报》因刊登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消息，被北京政府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5月1日复刊，改为《社会日报》。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撰文攻击议员受贿，报馆又遭封闭，林被禁三月余。待曹锟坐稳了总统宝座以后，始准《社会日报》继续出版。

《社会日报》的要闻、时评都是林白水撰述，每隔一日必有署名"白水"的文章。他写作的范围很广，文章"尖刻突兀，易于动人"，"喜议论个人长短，甚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特别注意刊登社会新闻，该报的许多内容，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谈话资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林白水在《社会日报》连续发表《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林白水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在《社会日报》发表特别启事，拒绝刊登英日两国的广告。

同年夏，林白水为《社会日报》增印副刊《生春红》，自称"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专以提倡风雅，导扬文化，发挥艺术为宗旨"。副刊分有社会新评、人物月旦、都市新闻、近代艺文、金石见闻、白水读书日札等十二门类，每三日发行一小张，每刊必登《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要求社会人士资助。

1926年4月初，奉鲁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15日，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林白水对国民军寄予深切同情，在报道中赞扬国民军"秩序井井"，"态度从容"，几个钟头之内全行撤退，北京全城未受惊扰。这个报道遭到奉直军阀的忌恨，成了他们日后杀害林白水的"罪证"。

奉鲁军阀张宗昌等人进入北京后，疯狂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钳制舆论，封闭报社，"立言稍不惘其意者，必扑杀之而后快"。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下，新闻界人人自危。林白水没有惧怕，他用犀利的笔锋，揭露奉鲁军阀结党营私、贪脏枉法的罪行。

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讽刺一心想当财政总长的潘复和张宗昌。潘张原是赌场中的朋友，由于潘复的介绍，张宗昌投奔了张作霖，从此才飞黄腾达起来。林白水在文中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喻为"肾囊之于睾丸"。潘复恼羞成怒，恨之入骨，要求张宗昌把林白水处死。

6日凌晨一时许，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带副官、弁兵数人，去《社会日报》社找林水白。诡称张邀请叙谈，由副官挟林上了汽车，直接开往宪兵第二营。并立即审讯，以"通敌有证"之罪名判处死刑。林挥笔遗书："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也"。清晨四时许，林白水在北京天桥被杀害，时年五十二岁。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汪精卫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曾中举人。父汪琡，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作过多年幕僚，其后即寄籍于番禺。

汪五岁进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其母亦督促他刻苦攻读。因此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他十五岁前双亲相继病故，随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1902年应番禺县试，获第三名，接着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聘，任家庭教师。这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深重，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汪精卫考取留日法政学校速成科官费生，由于"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一年半后，汪在速成科毕业，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续自费学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汪精卫加盟并参加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汪被举为评议部评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指出："满洲政府一旦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欲消除瓜分之原因，当先扑灭满洲之政府，是谓革命以杜绝瓜分之祸。"这些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06年汪精卫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次年春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庇能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8月，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汪是该报的主笔之一。汪精卫有很好的口才，常在南洋召开讲演会，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演说"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深受当地华侨欢迎。他先后参与筹设河内、仰光同盟会分会和在新加坡设置同盟会南洋支部等活动，"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工作卓著成效，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同盟会内部又发生分裂，反清革命转入低潮，革命党内一些人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汪精卫认为，此时只有"直接激烈之行为"，才有可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于是，他在1909年约集同志数人潜入北京，"与虏酋拼命"。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与黄树中（即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在供词中斥责清廷侈谈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表示将以身为"薪"，为革命殉难。

清政府为了粉饰立宪骗局，收买人心，仅将汪处以终身监禁。肃亲王善耆对汪大施软化手腕，派人在狱中为之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倍加优待，"复赠以图史百余帙"，还多次赴监狱探视，对汪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被捕之初，自料必死，曾写过轩昂悲壮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句子。被善耆软化后，汪开始表示忏悔。他在狱中写的《有感》一诗，吟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谴责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意境情态为之一变。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汪精卫自鸣清高。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留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他不主张讨袁，同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袁对汪力主调和虽加赞赏，却不采纳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这时汪仍然游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俯首从袁，以维护"统一"。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

讨袁失败后，汪精卫又以超然于政坛之外的姿态，跑到法国去进行所谓"考察"。在法期间，他一直接受袁政府的津贴，一次竟达八万元。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讨袁，汪曾一度返国，但并无积极行动。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纷乱，汪又跑到法国去"经营其'小休'的生活"。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汪精卫在此之前也自法返国，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非常大总统职，汪任广东教育会会长。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对此，汪精卫一般是赞成的，但对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表示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

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他转而拥护三大政策，他承认：“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他被孙中山指派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宣传部长。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汪是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

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被在京国民党人推举草拟遗嘱。经孙中山同意签字认可。这件事更增加了汪的政治资本。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凭着遗嘱起草人身份、国民党左派头衔、同盟会老党员资格及粤军第一军军长许崇智等人的支持，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12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对待这些事件，汪都保持着他的左派姿态。1926年初，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逐渐提高，汪感到对自己是个威胁。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蒋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大为不满，认为损害了他的领导威信。于是愤而辞职，出走法国。由于他同蒋介石的矛盾，使他继续维持着左派的声誉。

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随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在那里设立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人的不满。当时，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为了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在武汉成立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迎汪复职”；此时蒋介石一伙也觉得有利用汪的必要，于是也迭电促驾。这就大大提高了汪的身价。4月1日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蒋介石正在上海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即拉汪合伙反共。但蒋主张立即“分共”，汪则希望暂能维持合作，主张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分共”问题。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否认蒋介石在策划反革命阴谋，要求国共两党“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亲密”。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左派身份发表激昂的演说，表现出进步姿态，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首脑人物。就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他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南京组织反动政府，汪斥责蒋破坏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他表示：“每日得看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

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主流亡分子的造谣煽惑，国民党反动将领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感到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很难攫取政治权力了。于是摘下左派桂冠，决心反共。以汪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还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强迫总工会制裁工人，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6月1日汪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为借口，说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作为公开反共的“理由”。

7月15日，汪精卫亲自主持“分共会议”，正式宣布跟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不逊色。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消除，加上国民党内还有西山会议派、桂系、粤系等派别，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激烈的角逐中，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南京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主张迎汪赴宁主持政局。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达成妥协，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党政机构，推汪为特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于特委会被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控制着，汪精卫十分不满，重返武汉另组政治分会，宁、汉再度分裂。随后汪又南下广东，在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12月，中国共产党趁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此对汪精卫进行猛烈攻击，汪不得不于12月再度出走法国。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中共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

反对贪污腐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早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现将《通告》的内容、历史背景和党在大革命高潮中反对贪污腐化斗争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通告的主要内容是:“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各地均有发现,……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这个通告发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当时,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工会、农协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罢工运动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这大革命的洪流中,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大商人、反动政客和拥有重兵的高级军官“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而这时,党的力量还很弱小。一九二五年十月,全国大约只有三千名党员,这与党担负领导革命的重任很不相称。为此,十月间,党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确定,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党员人数便增加到了一万三千多人。九个月时间增加了三倍多。但是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中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突击发展。如湖北举行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达二千人”,其中,“大概一半以上须淘汰出去”,造成了“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的情况,甚至使得一些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继而发生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为此党中央发出这个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

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内的贪污腐化现象不是我们党固有的,党对于贪污腐化问题,敢于揭露并认真地坚决地加以清除,决不姑息养奸。这个通告不仅深刻分析了贪污腐化给党的事业和党的肌体带来的严重危害,而且表明了党对贪污腐化分子坚定不移的斗争的立场和方针。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尤其是“党内工作者的坏倾向如雇佣劳动化贪官污吏化分子,自扩大会后各地均已注意清洗”,保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推动了大革命的胜利发展。

(选自《党史文汇》90年5期,作者:林文生)

北伐战争时期的迁都之争

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以此作为他的反革命大本营,并指使其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霸占地盘,扩充实力。他极力反对迁都武汉,多次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力主迁都武汉。当时两湖和武汉地区的群众革命运动十分高涨,群众基础很好,叶挺领导的北伐军担任武汉的卫戍任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掌握着武汉政权,武汉地处要冲,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以,迁都武汉对革命十分有利。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12月13日,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由孙科、宋庆龄、邓演达、宋子文、陈友仁、唐生智、吴玉章和董必武等组成,鲍罗廷任顾问,并于翌年1月1日正式在武汉办公。但是,蒋介石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的决定,1927年1月,他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无理要求。在1926年12月底,悍然截留已到南昌准备前往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其中有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张静江等),并于1927年1月3日,在他控制下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宣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改迁南昌,甚至污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这是蒋介石阴谋分裂国民党、准备公开叛变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等的坚决反对之下,蒋介石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茅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1926年元旦之夜,北风凛冽,天黑浪高。茅盾和恽代英等五人作为上海代表乘“醒狮号”轮船,离沪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闭幕后,茅盾正在住处整理行李,准备回上海,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来找他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沈先生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茅盾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活计,问来人:“何时去宣传部?”“明天就去吧。先到毛润之先生那里,他会具体和你谈的。”当时,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因汪

忙，请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东山庙前西街38号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处。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一间住着肖楚女。

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茅盾见到毛泽东和肖楚女。肖楚女和茅盾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肖楚女指着旁边的单人空床，诙谐地对茅盾说："这床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说得毛泽东和茅盾都笑了起来。安顿好后，毛泽东对茅盾说："近两三天要开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我将提议沈先生为宣传部秘书，请中常委通过。"

茅盾一听，大惑不解："宣传部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

"是的，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都是如此。"毛泽东解释道。

"这，恐怕不行吧。"茅盾一听部长之下就是秘书，担心不能胜任，有些犹豫。

"不要紧，肖楚女暂时可以帮助你处理部务。"毛泽东说到这里，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肖楚女，接着说："我呢，要筹备第六届农民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还有《政治周报》，从第五期起也由你编。"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已出版四期。茅盾接编《政治周报》后，又编又写，在第五期的"反攻"专栏中，发表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式的工具》、《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三篇文章，揭露了国家主义的反革命面目。

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上班的那一天，汪精卫、毛泽东等都到场，汪精卫讲了几句原则性的话就先走了。毛泽东讲了三点：一是要宣传部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宣传大纲，向全国民众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第二、第三点都是针对宣传部部务工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走后，茅盾、肖楚女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部署落实措施。对毛泽东所要求的宣传大纲，茅盾和肖楚女亲自动手，花一天时间起草，送毛泽东修改后交汪精卫过目，3月5日中常委通过后于次日发出。这对国共合作时期宣传贯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指定何香凝、杨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啸仙五人为审查员。同时还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事后知道，当时毛泽东是秘密往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所以实际上茅盾当时是代理部长的代理部长。

茅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期间，还有一个插曲。茅盾虽在宣传部工作，但广州文艺界仍把他作为文艺界中人，所以其间曾被广州文学研究会的人拉去会见文艺界同人，并向广州分会介绍上海文学研究会情况。后来又被陈其瑗拉去，对广州市中学生作了一次演讲。当时，陈其瑗恭读总理遗嘱后，一边请茅盾演讲，一边担任翻译，把茅盾的演讲译成广东话。茅盾在演讲中叙述了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下火种给人间的故事后，话锋一转，联系现实，高声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普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就火！"铿锵有力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广州国共两党合作的气氛骤然紧张，上海方面向广州发去电报，要茅盾回上海工作，并派张秋人接替茅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于是，茅盾向汪精卫、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嘱茅盾回上海后，办一个党报。1926年3月下旬，茅盾乘"醒狮号离开剑拔弩张的广州，也离开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选自《人物》93年1期，作者：钟桂松）

中山舰的历程

"中山"舰原名"永丰"号。自从经过甲申（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尤其是甲午（1894年）中日海战后，清朝海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殆尽。清政府为了重建海军，充实舰队实力，于1910年由海军大臣载洵和北洋海军统制萨镇冰同赴日本考察海军时，在日本三菱造船厂订造了一艘排水量780吨、满员编制136人、舰身长62米、舰速每小时13.5海里、主副炮共8门的炮舰，耗资68万日元（当时一日元约值一两白银），命名为"永丰"号。她的姊妹舰"永翔"号，是由日本川崎造船厂承建的。1913年春"永丰"号造成交船，开到上海，编入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海军第一舰队服役。

护国讨袁

1915年底至1916年初，反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孙中山在1915年颁发的《讨袁檄文》中，斥责袁世凯"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蔡锷、李烈钧等人在云南等省组成护国军，以响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旨在反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动10余万军队对付护国军。"永丰"舰在前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的率领下，与"海圻"等舰一起加入了护国军的战斗序列，宣布起义倒袁。1916年3月下旬，袁氏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病死去。护国运动在取得了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胜利后宣告结束，参加护国军的舰只，仍旧各自回军服役。这是"永丰"舰的首义之举。

护法反段

1917年6月，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并在上海运动北洋海军参加护法。7月中旬，孙中山从上海乘

“海琛”舰到广州，正式揭起了护法的旗帜。海军总长于7月22日发表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起义宣言，并率第一舰队陆续自上海浩浩荡荡南下广州。由“海琛”、“永丰”、“海圻”、“肇和”、“永翔”、“同安”、“豫章”、“舞凤”、“飞鹰”、“楚豫”、“福安”等11艘军舰，总吨位1.2万余吨，组成了西南护法舰队。“永丰”舰再一次参加了起义，并成为护法舰队的骨干。9月初，孙中山被推选为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舰队官兵一致拥戴孙中山，坚决护法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料由于钻入革命阵营里的南方军阀从内部破坏，使这一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中途夭折，实在令人遗憾。

保卫孙中山

孙中山一生两次蒙难，第一次是1896年的伦敦蒙难，被囚禁于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以被营救而获释；第二次是广州蒙难，因避登“永丰”舰而脱险。

1922年，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兼陆军部长陈炯明，出于争权夺利，反对孙中山出兵北伐，以遂其讨好北洋军阀霸占广东地盘的野心，于6月16日凌晨，在广州发动兵变，扬言要“炮打总统府，活捉孙中山”。同时全市戒严，封锁要道，严密搜捕。孙中山的左右侍从情急生智，把他乔装成一个外出急诊的医生，在天亮前的黑幕中，由林参军护送，冒着枪林弹雨，越过叛军的包围，到了海珠的海军司令部。孙中山先登上了“宝璧”舰，后转到“永翔”号。当时“永丰”舰长冯肇宪、大副梁文松、二副胡应球等与广东海防司令陈策商议，认为“永丰”舰革命基础稳固，火力强大，比较安全，乃于次日请孙先生移驻到泊在黄埔的“永丰”舰上避难。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天脱险抵舰与先生会合。

此后，“永丰”号成了孙中山的座舰，他号召海军将士讨伐叛逆。6月21日，海军官兵代表登舰晋谒孙中山，表示拥护大总统，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亲率“永丰”、“海圻”、““海琛”、“楚豫”、“肇和”、“广玉”、“宝璧”、“同安”等舰，由黄埔出动，沿珠江挺进省城白鹅潭戡乱平叛。当舰队通过叛军炮台等据点时，敌人以密集的炮火封锁江面，“永丰”舰首当其冲，连中六弹，其他舰只仅受轻伤。当炮弹从孙中山头上呼啸而过时，他镇定自若，继续指挥舰队与叛军激战，终于突破封锁进驻白鹅潭，扭转了战局。

孙中山坐镇“永丰”舰，在广州湾和珠江江面坚持了56天的险恶战斗。由于叛军方面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拥有优势装备，“永丰”舰受到了敌人大炮、鱼雷和水雷的夹击。尽管舰身负伤、全舰官兵仍然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陈炯明妄图谋害革命领袖和扼杀革命政权的阴谋。

1923年，邹鲁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联合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又回广州重建元帅府。孙先生夫妇特登上“永丰”舰与海军官兵一起隆重举行“纪念蒙难一周年”活动。1924年11月13日，孙先生偕夫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永丰”舰离省赴港，转搭邮船经上海取道日本北上，应冯玉祥将军之邀赴京“共商国是”，不料肝病复发，于1925年3月12日在京与世长辞。广州革命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与表彰“永丰”舰的功绩，乃于10月下令，将“永丰”舰改名“中山”号，这就是“中山”舰名称的来历。

所谓“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妇孺皆知的人物，他正式步入政坛，实发轫于“永丰”舰。蒋氏曾在上海充当交易所经纪人，他搞投机交易破产后，弃商从政来到广州。陈炯明叛变后，他在“永丰”舰上晋见了孙中山，并取得了孙的信任，从此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他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等显赫要职。他为了篡夺革命领导权，扩充反动势力，就开始制造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海军学校教育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致函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谓奉蒋氏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即派“宝璧”、“中山”两舰前往。当时李之龙也是“中山”舰的党代表，他曾举报过蒋介石手下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走私问题，蒋获悉后，也想乘机打击报复李之龙。19日晨，“中山”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未下达过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经请示蒋后，又将军舰于当天下午驶返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无可非议，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并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等等。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于3月20日擅自宣布广州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拘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及政工干部，把周恩来也软禁了一天。又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因其发生在3月20日，所以又称“三·二〇事件”。

蒋氏的阴谋得逞以后，甚为各界有识之士所不齿。于是他又耍了一套花招，说这次事件是受了欧阳格的蒙蔽，事出误会，就把欧阳格扣押起来，做了自己的替罪羊；他又假惺惺地给军事委员会写检讨报告，“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

蒋介石利用“中山”舰达到了排挤共产党人的目的，可是他的两面派嘴脸，从此却在世人面前曝了光。

在金口抗战殉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随着侵华日军大举进犯我重要战略城市，北平、天

津相继失守，上海、南京也岌岌可危。南京政府海军部调集了包括"中山"舰在内的49艘军舰进入长江中下游布防，以"拱卫京畿"，并遏阻日本海军舰队西进长江。迨京沪沦陷后，武汉一时成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同时也成了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要目标。

1938年秋，大武汉保卫战前夕，"中山"舰奉命由岳阳下驶，巡弋在汉口上游的江面上，担负从嘉鱼、新堤至武昌金口一线的警戒任务。由于"中山"舰上的主、副炮已被拆下，安装在沿江的几个要塞上，剩下的火力并不强，只有20毫米火炮两门，德制高射炮一门和小型英制火炮两门。

10月24日上午9时，日军一架侦察机从东飞临金口赤矶山"中山"舰停泊处上空，舰上高射炮即开炮对空射击，敌机仓惶逃遁向东飞走了。舰长萨师俊断定，日机一定不肯罢休，一场恶战将不可避免，于是全舰上下迅速转入战斗部署。中午时分，"中山"舰接到开往汉口执行任务的命令，正准备起锚开航之际，突然6架日军轰炸机迎面飞来，盘旋一周后，都朝北向大军山方向飞去，然后一个大迂回，掉转头来又扑向"中山"舰，一排排炸弹雨点般倾泻下来。这时萨舰长一声令下，全舰官兵同仇敌忾，誓与军舰共存亡，舰上火炮瞄准目标和友邻军舰的火炮一齐发射，组成了严密的火网，敌机先后被我击落两架，其余敌机暂时不敢低飞投弹。不料由于舰首的高射炮长时间发射，突然出现故障停了火，剩下四架敌机乘机自舰首方向俯冲下来，轮番进行轰炸。当一枚炸弹击中了左舷舵机舱时，舵机舱旋即被炸裂漏水，舵机顿时失灵。接着有五六颗炸弹相继命中了军舰；锅炉舱被炸穿，舱里进水；舰桥崩塌，上层建筑遭到破坏；一门高射炮被炸毁，8名炮手英勇牺牲……萨舰长在指挥台被炸时身负重伤，一条腿被炸断，鲜血淋漓，仍然抱着铁柱不下火线，并向全舰官兵高喊：坚守岗位，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更加惨烈的海军激战正在进行，飞机的轰鸣声、军舰的炮击声、炸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在军舰四周炸弹的溅落处，掀起了几丈高的水柱，舰上多处中弹起火，烈焰冲天，舰身失去平衡，开始倾斜。官兵已伤亡过半，剩下的人在副舰长吕淑奋的指挥下，在炮被炸毁、炮弹射罄且孤军无援的险恶战况中，仍用手提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坚持浴血搏斗，拼命抵抗。

"中山"舰终因受创过重，舰体倾斜度越来越大，一面顺水漂流，一面逐渐下沉。当勤务兵黄珠官背着舰长放下救生艇时，军舰已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灭绝人性的日军乘势低空飞行，用密集的机枪朝救生艇扫射，将小艇击沉。"中山"舰于1938年10月24日下午3时50分沉没在金口龙床矶江底，自萨师俊舰长以下25位官兵（名单列后）与舰艇同归于尽。尸浮洪波，骨暴沙砾，留下了累累血债。其余官兵泅水生还后，奔赴抗日的战场，为死者报仇。

艰苦的抗战，壮烈的牺牲，草木同悲，人神共愤，功昭日月，气吞山河。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被淹没在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怒涛之中。

附：中山舰抗战阵亡烈士名单

军官：萨师俊（舰长）　魏行健　周福增　陈智海　黄孝春

士兵：王兆祥　吴仙水　刘则茂　林寿祺　陈恒善　陈利惠　林逸资　郭奇珊　张培成　李　麒　洪幼官　陈永孝　张育京　江钊官　严文焕　李炳鳞　陈有中　李有富　陈有利　黄珠官

（选自《纵横》91年6期，作者：汪世喜）

第一个与蒋介石面对面斗争的共产党员

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又抛出"整理党务案"。中国共产党党员蒋先云，第一个挺身而出与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蒋先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并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天，蒋介石召开第一军军官会议，蒋在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各位，秉党务整理案之精神，军队中不能在跨党党员，退出共产党便可以保留在军队里。"说到这里，他盯住蒋先云问到："有谁退出共产党？有谁跟着共产党？"蒋先云不等蒋介石问话落音，唰地站起来，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永作共产党员！"整个会场顿时大乱，蒋介石连忙拍案大叫："安静！安静！"随即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张"党籍声明"。对此，蒋先云厉声吼道："谁脱离共产党，就是背叛革命！头可断，而共产党党籍不可丢！"说罢，接过一张"党籍声明表"把它撕了个粉碎，拂袖而去。

蒋介石以后多次对蒋先云诱以高官，蒋先云坚定地说："官，可以不做；而命不可不革。"北伐战争时，蒋先云任团长兼党代表，作战英勇，牺牲时年仅25岁。

（选自《党史博采》90年1期，周平毅摘）

"平民夜校"与景德镇第一个党小组的诞生

看到瓷器，人们就会想到景德镇。景德镇因瓷器而扬名四海。广大瓷业工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巧夺天工的双手，为全国和世界人民制造出"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瓷器。但是，在旧社会，他们却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残酷剥

削，瓷业工人哪一天不是“端着饭碗望窑烟，一粒豆豉两口咽！”正因为这样，瓷业工人的反抗精神非常强烈。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清到大革命前夕，景德镇瓷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有几百次之多。但由于缺乏党的领导，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往往是用很大的牺牲，争回一些暂时的利益。尽管如此，却也显示了瓷业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反动统治者以不同程度的打击。

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赵醒侬，曾于 1922 年冬对景德镇瓷业工人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他认为景德镇的瓷业工人“和新式产业工人性质相似”，“奋斗精神很强，常时发生罢工情事”，因而得出结论说：“昔日在江西政治上认为最可怕的工潮，就是这个地方。”1924 年 5 月，隶属中共中央的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后，对景德镇的工人运动尤为关注。1925 年夏，支部书记赵醒侬便决定派中共党员向义回镇开辟党的工作。向义又名向法宜，家在景德镇，就读于南昌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并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向义回镇时，是以小学教员身份秘密进行活动的。他结识了进步知识青年姚甘霖、何燮、陈铭珍等人。他们认为，要在镇上开展工人运动，首先必须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办“平民夜校”是最适宜的形式。当时又听说南昌已成立了“江西省平民教育促进会”，于是他们便以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为由，向浮梁县署申请创办“景德镇平民教育促进会”，经过两个多月交涉，终于得到浮梁县署的批准。这样，“景德镇平民教育促进会”便在东门头（今胜利路 78 号）公开成立了。紧接着就是筹办了“平民夜校”。

办夜校县署不给经费，怎么办？向义等人就利用镇上的同乡亲友关系，一家一户的募捐，暂时解决了夜校的开办经费。1925 年 11 月间，景德镇第一所“平民夜校”亦在东门头开学了。当时报告参加夜校的非常多，限于教室容纳不下，第一期只招收了 50 多名学员，其中大多数是瓷业工人，如周翰、余金德、洪泉水、吕林松、陈斌、刘庭显等。

夜校的课堂很简陋，只有 1 块黑板，10 几张长条桌凳。一个星期上两次课，每晚约两个来小时。讲课的教师主要是“平教会”的负责人。不久，中共南昌特支派王环心来景德镇指导工作，平教会便请王环心来夜校上课，学员们都称他为王先生。

夜校的教材是省平教会发下来的《平民千字课本》。但教员在上课时并不是一般的教认字，而是结合教学内容，对学员进行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分析“工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根源，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老板如何剥削工人。同时，还结合讲解国内外时事，以开阔学员们的眼界。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参加夜校学习的工人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懂得了以前不明白的道理，而且思想情绪也越发高涨了。有时候在课堂上，往往有人激动的喊起来：“对，对！我们也要团结起来和老板斗！”学员们散学回家时，还边走边议论着：“不打掉剥削，我们就莫想翻身！”

“平民夜校”的创办，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为在景德镇建立中共组织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6 年 1 月，向义先后发展了瓷业工人周翰和知识青年姚甘霖为中共党员。2 月，中共景德镇小组在南山沙陀庙宣告成立。景德镇第一个党小组的诞生，是景德镇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景德镇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年的红五月，以平民夜校的工人学员为骨干，在镇上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群众大游行。参加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革命激情一次比一次高。“五卅”纪念日示威游行时，参加者达到四万六七千人，轰动了全景德镇。

通过红五月的纪念活动和“平民夜校”的不断扩大，不少工人积极分子和优秀青年都要求参加中共组织。党组织根据他们的要求，先后发展了余金德、吕林松、何燮等 10 余人为中共党员。6 月，中共景德镇小组经上级批准升为党支部，同时，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也秘密成立了。这标志着景德镇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1 月中旬，北伐军胜利进驻景德镇后，市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公开挂牌办公，万云鹏任工会委员长、瓷业工人周翰任工会副委员长。镇上的工人运动越来越红火，平民夜校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选自《党史文苑》94 年 2 期，作者：闻炳焱）

邵飘萍被害纪实

邵飘萍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家，北京《京报》的创办人。由于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罪恶，被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原名邵镜清，后改为振青，字飘萍，笔名萍、阿平、素昧平生。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一日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一个教师的家里。邵幼年好学，十四岁中秀才，十八岁考入浙江省唯一的大学浙江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关心时事，热心为上海各报（主要是申报）写杭州和金华地方通讯，毕业后回金华教书，同时任上海《申报》特约通讯员。辛亥革命成功后，邵为民主思潮所感染，怀着“新闻救国”的志愿，辞去教学工作去杭州，被杭州《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聘为《汉民日报》主编，从此专事新闻工作。一九一四年，邵为避袁世凯缉捕逃往日本，入政法学校学习。在日本他联系同学三人组织东京通讯社，为京沪汉著名报纸写东京通讯，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袁世凯卖国罪行。一九一六年春，邵应上海新闻界的邀请回国。抵沪后，

先后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的主笔，经常以其犀利的笔锋发表反袁政论，影响国内舆论界。袁世凯死后，又被《申报》社长史量才聘为驻京特派记者，长住北京。一九一八七月，在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十月又办著名日报《京报》，自任社长。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京报》大量揭露曹汝霖等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于是《京报》被查封，邵被迫再度出走日本。一九二〇年段内阁倒台后返回祖国。回国后重新复活《京报》，直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以身殉报。

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即以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同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进行不懈的斗争。主编《汉民日报》时，经常揭露浙江贪官污吏的丑恶，抨击袁世凯窃国称帝，斥袁为“袁贼”，“共和其名，专政其实”，因而办报不足三年，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袁世凯死后，继续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斗争。他通过为《申报》写的《北京特别通讯》和《京报》，无情的揭露了段内阁媚外祸国残民的种种罪恶，斥段为“人类之蟊贼”，段祺瑞政府为“无益之政府”公开指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马贼”，因而引起军阀政客的恐惧和仇恨。

五四运动以后，邵飘萍潜心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在李大钊等影响下，思想日益进步。他积极支持、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声讨更为激烈。

一九二三年二月初，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后，六日，《京报》就以大字标题发表了《京汉路工人昨午起大罢工》的消息。二七惨案发生后，八日《京报》又以《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的醒目大字为题详细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怒斥直系军阀枪杀工人暴行，点名讥讽指挥镇压工人的刽子手、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的“勋业可谓能削平工潮，应铸铜像！”并歌颂了工人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九日，又刊登了《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人》的消息，无限同情工人罢工。《京报》对罢工失败后《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小册子的出版，也给予积极的援助。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开始，邵飘萍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热心传播南方革命消息，并在《京报》上刊出孙中山的讲演和巨幅照片，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成立，翌年春，《京报》在头版以出号标题称颂国民政府的开创业绩，针对北京政府的腐朽统治，邵飘萍亲自书写“广东国民政府，论政治为全国第一，”一时轰动北方，但亦为北洋军阀所忌恨。

这时在以广东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影响下，北洋军阀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先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继之出现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邵飘萍热情称赞他们的正义行动。他曾建议冯玉祥赴苏联学习，与南方革命势力相联系，将部队改为国民军，进驻西北，开发西北。一九二五年二月，又在《京报》创刊《西北周刊》，刊登冯玉祥照片，并撰文《开发西北之重要关系》，支持冯远离军阀争夺的北京，到西北去。对郭松龄到戈，《京报》不仅“全力赞扬”，而且公开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由“少帅”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当郭军因日本出兵直接干涉，惨遭失败，《京报》便将日本以“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条款为援张的交换条件和张作霖卖国内幕全部公之于众。张作霖对此恨之入骨，这亦促成了张作霖必欲杀邵的念头。

五卅运动爆发后，《京报》立即以整版篇幅报道惨案发生的经过，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激于爱国义愤，他撤掉《京报》所有的英、日商品广告，刊登了大量通讯、专刊、评论、图片等声讨帝国主义，支援上海人民斗争。《京报》对五卅运动连续作了长达两个月的宣传报道，从六月一日到七月中旬的一个月内，仅以飘萍署名发表的评论就有二十八篇之多。在评论中，他怒斥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揭露帝国主义者是“择人而噬，噬完后乃以‘排外暴动’等罪诬之，即再枪杀若干倍之良民，亦觉其野蛮行为之悉属正当”。他指出惨案发生的根本在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外国强盗”的口号。

一九二六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义愤填膺，决心将惨案真相“公之于众，唤醒各党派，一致起而讨贼”，连夜书写《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可谓强有力之政府矣——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等讨段檄文、愤怒谴责段祺瑞政府屠杀群众的罪行，警告反动派不要得意，“此项帐目必有结算之一日”，奉告青年不要大意，“徒为无益之惨死”。讽刺善于指使军警枪杀徒手青年的段祺瑞政府为“强有力的政府”。并在报上公开指责段祺瑞为惨案的祸手，应组织特别法庭，将段逮捕，“公开审判”。段祺瑞对此恨入骨髓，曾两次将他列入通缉的名单中。

在军阀统治森严的北方，邵飘萍不畏强暴，坚定地、不断地揭露、抨击北洋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胆而热情地宣传和鼓动人民革命斗争，使《京报》一时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反对派因此把他看成眼中钉，时刻企图加以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三一八惨案后，北方形势逆转。一九二六年春，张作霖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并联合山东的直鲁联军首领张宗昌、李景林一起进攻国民军。四月十五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城，奉鲁军乘虚而入。

奉军入城后，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布告二十七条，声称对“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他们以“拿办赤党”为名，派出军警，大肆搜捕爱国群众，乌云密布北京城。

一向同情国民军，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揭露，抨击张作霖卖国罪行的邵飘萍，自知与军阀积怨太深，难以逃脱，遂于奉军入城时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为了坚持斗争，他在那里开了一个房间，接待来访客人，嘱其夫人汤修慧暂守报馆，应付局面。

张作霖对于邵飘萍早已怀恨在心。但因邵是一个有才干、有影响的著名新闻界人物，因之，企图以重金进行收买为己所用，于是入京前曾汇款三十万元予邵。不为富贵所淫的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将汇款退回，并在报上继续揭露张作霖。张遂下令："打进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由于邵已避居六国饭店，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便收买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经常深入六国饭店。邵平素也认识张三。张三到六国饭店后，对邵表示异常关心，并自称"能设法向张学良疏通，张已见允"等等。四月二十四日，邵因挂念报馆和家事，决定回报馆看看，事先打电话给张翰举，请其探听外面的情况。张欺骗邵说："外面一切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邵信以为真，下午乘车回魏染胡同京报馆，不足一小时即走。才出魏染胡同，即被预伏军警截捕。

邵飘萍被捕后，北京各报立即推选代表晋竭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请他设法释放邵。张学良回答："逮捕邵飘萍一事，老帅（指张作霖）与子玉（指吴佩孚）及各将军早已有此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并横加罪名说："惟此次要办飘萍，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如此各方奔走营救无效。二十六日晨，军阀竟以"宣传赤化"罪名，不经审讯，押赴天桥枪决。

邵飘萍牺牲翌日，北京《世界日报》于头版大字标题刊登："邵飘萍以身殉报"。

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十四年，几经被捕入狱，其志不移。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憎其所憎，爱其所爱，始终勇敢地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对反动派口诛笔伐，不遗余力，不愧为杰出报人。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家乡浙江省金华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邵飘萍牺牲的五十六周年之际，北京人民政府将其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烈士墓。

（选自《中国现代史大事本末记》作者：石雅贞）

蒋介石送礼

1926年9月1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开始攻打孙传芳盘踞在南昌的部队。南昌当时有25万人口，城四周有30公里的城墙，易守难攻。北伐军第六军一度攻下南昌，但四天后即弃城西去。

据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说，在南昌决战前夜，"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加伦三番五次劝说这位容易激动且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

11月初最后一次攻打南昌。加伦在南昌西南30公里的高安蒋介石总司令部亲自指挥。11月8日，北伐军终于再次拿下南昌。此役北伐军战果辉煌，俘虏孙传芳军队官兵四万人。蒋介石顿时又"趾高气扬起来"。

蒋喜不自胜，订购了20块华贵的金表，打算分赠给各位苏联顾问，以作为对在南昌之役中立下大功的酬劳。但苏方严格禁止派往中国的顾问收受中方的馈赠，故没有一个苏联顾问接受蒋介石的金表。蒋只好把手表分赠给总司令部的军官们。

（程骏）

北伐军中曾流行霍乱

1926年7月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经过粤北和湘南时，军中蔓延霍乱。有些部队的医生没学过医，临时由熟人推荐前来任职。军中又没有治疗和预防霍乱的药物。第二军受害最重，病死1000多名士兵和一半挑夫。地方官员愚昧无知，让巫医给病人治病。巫医治霍乱的办法是用铁片刺破病人的舌根，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地方官员还组织游行队伍，燃放鞭炮，说是可以"驱邪"。为此花掉了向老百姓征收的医治霍乱的钱。有的苏联顾问也染上霍乱，他们用白兰地治病。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本体格健壮，抵抗力强，居然渐渐好了。虽然霍乱猖獗，北伐军仍向湖南、湖北挺进。

（程骏）

潘复的赌桌与官运

北洋政府最末一任内阁总理潘复，在位一年，是北洋政府32届内阁中寿命最长的。此人资历平平，庸言庸行，却青云直上，在40岁刚刚出头时，膺任中枢魁首。潘复生活豪侈，嗜赌成性，是北洋官僚中有名的花花公子。小小赌桌，在他手下变幻神奇的魔力，从而官运亨通。

潘复，山东济宁人，与国务总理靳云鹏是同乡。由于靳云鹏的母亲在潘家当过奶妈，潘复曾吃过她的奶，因而潘、靳两家关系不比寻常。1919年11月，在靳云鹏的提携下，潘复作了财政次长，这是他正式步入北京政坛之始。潘复发迹后，位尊多金，经常邀宴权贵，选色征歌，豪饮狂赌。潘在北京西四毛家湾和天津英租界小营门两地都构筑宅第，"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朝野上下，各路

政客麇集，如梁士诒、王克敏、张学良、张宗昌、曾毓隽、李景林、褚玉璞、吴毓麟、刘彭寿、张廷谔等，均为潘家常客。潘复最初投靠皖系，皖系为直系打败以后，他本应下台，但因与直系刘彭寿关系甚密，在牌桌上又与直系中坚人物吴毓麟交厚，有这两位朋友鼎力扶持，他便轻而易举地由皖系这条搁浅的船，跳到直系的甲板上，继续在宦海中航行。

1923年，贿选总统曹锟令孙宝琦组阁，财政总长一席，逐鹿者众，潘复亦跃跃欲试，请托刘彭寿、张廷谔为其奔走疏通，吴毓麟和高凌尉也极力向曹锟推荐。当时曹锟在保定，他的秘书王兰亭常来天津，吴敏麟便带王到潘宅去应酬。潘、王二人是山东老乡，此刻又成了赌友。后来，潘的二夫人小翠铃和曹锟的三姨太刘凤伟来往密切。这样，外有王兰亭、吴毓麟等人吹捧，内有枕边说情，曹锟遂决意以潘复为财政总长，并嘱咐其预备班底。不料，阁员名单公布时，财政总长易人，潘复空欢喜一场。不过，曹锟转年便倒台下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潘复又通过与"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同乡关系，攀附上奉系。

1926年4月，潘复凭藉直奉联军张宗昌、褚玉璞的力量，终于一尝财政总长之脔。张宗昌与潘复的关系，不仅是同乡，也是赌友。一次，张宗昌赌钱输了万余元，潘复二话没说，即命手下人开出边业银行支票为其垫付，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同年8月5日，著名记者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官僚的运气》的署名文章，讥讽潘复为"肾囊总长"，击中了潘复的疼处。他恼羞成怒，于是怂恿张宗昌以"通敌"罪名将林白水枪杀于北京天桥。

自1926年4月至1927年1月，北洋政府曾三次组阁，阁员变动颇大，惟潘复因有众多赌友相帮，始终稳坐财政总长一席。6月，在张宗昌和孙传芳协力推举下，潘复爬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这是他在官场上最风光的时期。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炸身死，潘复回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想当初，自己由皖系而直系，由直系而奉系，象个不倒翁，全仗牌桌上亲昵的赌友们尽心出力。如今官场失意，在寓所和旧日朋友又回到赌桌上来，同时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如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人。实际上，他那颗当官的心并未沉寂下来，只是天不假年，1936年病死北平，仅仅活了54岁。

（张玉芳）

张道藩1926年回黔被囚小记

张道藩是国民党政府时代的知名人物，曾任过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立法院院长等职。人们不会忘记他与徐悲鸿原妻蒋碧微之间的生死之恋。但张道藩在大革命时期蒙难贵州的事则鲜为人知。

张道藩是贵州省盘县人。1918年考入著名的伦敦大学美术部，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后学成返国，弃艺从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6年12月，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去贵州指导筹办党务，一行还有李益之（贵州凯里人，黄埔第四期出身）、商文立（贵州瓮安人，留法学生）、黄宇人（贵州黔西人，黄埔第四期出身）3人。

为何国民党中央要派人来黔筹划党务呢？因为当时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粤、桂、湘、赣、川、黔诸省中，仅贵州未建省党部，也没有派党代表。为了配合北伐战争，急需在黔省进行党务事宜。

那时贵州当权者是周西成，他虽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但仍盘踞省长宝座，表面上拥护、支持广东革命政府，但实际上无非借此稳定贵州政局，防止外部势力渗透贵州，抵制国民党中央染指贵州，力图巩固他的桐梓系军阀控制的独立王国，自己做一个我行我素的土皇帝。

周西成对于张道藩等人的到来表面上似乎很欢迎，并待为上宾，但暗中却派人监视，以防其"图谋不轨"。当张等人提出在黔筹办党务、改良地方政务之时，周认为这是要在自己辖地内插针泼水，当即回敬："要党大家党，拿七百万个党证来，贵州七百万人个个都是党！"

双方洽谈受挫，张等人毫不气馁，决定在贵阳的上下层人士中做工作，并选定阳明路小巷内吴桂贞家（李益之的妻姐）为联络处，把与广东联络的密电码交吴保管。之后，张、李等分头出入学校、机关、工厂，游说官绅名流，鼓动师生工人，宣传打倒军阀、还政于民，进行地下活动。

周西成对于广东代表的活动极为不满，不久截获了他们发往广州的电讯，而贵阳兵工厂又发生事故，于是恼羞成怒，下令将广东代表逮捕起来。

这事发生在1927年春，张道藩、李益之、商文立先后被捕，黄宇人闻讯逃亡。周又派出便衣搜查吴桂贞家，好在密码本已被吴藏入穿着的绣花鞋夹层内，险些暴露。

接着周西成对广东代表施加酷刑，拷打逼供。广东代表在狱中坚贞不屈，尤其是李益之更为坚定。李大骂周西成是"土皇帝！狗军阀！"周遂将李秘密处死于贵阳之螺丝山。因李给炉山两级小学教师王晓林未发出的信函中有"吾誓与此獠（指周）不两立！"等语，遂亦被周派人暗杀于炉山五里桥。贵州社会名流、老同盟会会员吴平刚先生乃到处奔走，极力保释张道藩，加之广东国民政府又催电索人，周西成只得以"保释出狱治伤"为由，释放张道藩等人。张等人一出狱，顷刻化装逃离贵州。这就是当时风闻全省的"密电码"事件。

张道藩等人筹划贵州党务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1929年周西成死于滇黔军阀混战以后，国民党中央举办贵州党务之事，遂有结果。

蒙难一事给张道藩的印象极深。1944年元月，蒋介

石命身为海外部长的张道藩奔赴黔、桂诸省，慰问华侨。张到贵阳后，邀约当年的受难者，同去拜扫李一之（即李益之别名）的墓，还在一块聚餐。张在给蒋碧微的信中这样写道："到贵阳后令我感慨万千，人家都以为我是'衣锦荣归'，可以一吐十六年前所受的冤气！其实我却并不这样想。不过这次到了贵阳，才知道十六年前对我们作威作福的那一批丑类，今后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的，我虽然并不迷信，但是也觉得冥冥中自有因果报应。……患难余生，在十六年后得能把臂欢谈，也是人生快事之一。"

（李远）

流行风

小说《彷徨》

作者鲁迅，主要内容：

短篇小说集，鲁迅著。辑入作者1924年至1925年创作的小说十一篇。即《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和《离婚》。二十年代中期，"五四"退潮，革命中心已经南移，鲁迅在北京颇感寂寞。作者写过一首《题〈彷徨〉》，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道出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彷徨》在内容上较《呐喊》沉闷，但在艺术上则更臻圆熟。《祝福》塑造了一个在旧中国族权、父权、夫权、神权交并压迫下被摧残至死的农村妇女形象。祥林嫂最初的婚姻是不幸的，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使她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死后，她又受到婆婆的残酷虐待，被迫逃出来做工，在鲁镇的鲁四老爷家落了脚。她干活卖力，"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心情舒畅，"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便被夫家发现，她被卖到深山中的贺家坳，嫁给贺老六。后来贺老六病故，儿子阿毛也死于非命，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但这时鲁四老爷已将她看成祸水，不仅祭祀时不准她动祭品，而且在精神上无情地摧残她。祥林嫂虽然捐了门槛，但还是未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她的精神完全崩溃，沦为乞丐，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寂寞地死去。《在酒楼上》中塑造了一个颓唐的时代的落伍者形象，并对主人公吕纬甫颓唐的人生观提出了批评。吕纬甫在革命时代曾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革命青年，有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志向。他敢于闯进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时常和朋友一起讨论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法。如今他奉母亲之命回乡为她那三岁上死掉的小兄弟迁葬，给船家女儿送剪绒花。这时的吕纬甫已变得行动迟缓、相貌衰瘦、精神颓唐，同革命时代的吕纬甫已判若两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形象。他属于辛亥革命前后就已开始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来自封建势力十分猖獗的寒石山，并反叛了那个社会。他轻视陈规俗礼，祖母大殓时，他敢于违背礼俗，表现了"新党"的特色，因而被视为"异类"，为社会所不容。在学校，他被校长辞退，失业的沉重打击使他不得不变卖家具和书籍，几乎沦为乞丐。后来他当了一位师长的顾问，每月有了八十块钱的薪水，他又开始接受别人的祝福和馈赠，混迹于凡夫俗物之中。他的自暴自弃，终于招致了自己的灭亡。作品通过魏连殳的毁灭，对个人主义的孤独作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伤逝》也是一部剖析知识分子灵魂的杰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中国妇女怎样才能从旧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子君热恋着男青年涓生，不顾家庭的阻拦，同涓生同居了；他们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勇敢地反叛了封建婚姻制度。然而生活的困窘、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他们不久便感情破裂，子君回到那冰冷的家，涓生又回到空虚寂寞的会馆。不久，子君便抑郁而死。如果说涓生的颓唐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动摇，那么，子君的毁灭则揭示了爱情和经济环境的关系，说明了经济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离婚》是鲁迅的的最后一篇小说，作品塑造了性格泼辣、敢于反抗恶势力的女主人公形象。爱姑被夫家休弃，她不但敢于大骂夫家，而且还靠父亲之力拆了施家的灶，甚至敢于顶撞七大人。然而毕竟孤力无援，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

小说《女娲氏之遗孽》

作者叶灵凤，主要内容：

写一个既婚的中年妇女蕙与青年男子私通而引起的心理、思想感情的变化。她的隐秘被人发觉后，先是感到周围人对她的冷漠而产生的思想矛盾，接着是接不到情人莓箴的来信而患病，最后被她丈夫揭穿了他们之间的隐情。原来她丈夫在邮局工作，早已掌握他们来往的信件。丈夫和她的关系因此处于淡漠，生下的私生子自然得不到丈夫的喜欢。就"礼教和妇道"而言，小说触及一点社会问题，在当时有一定的意义。小说不求生动的情节，着

力于细腻地刻画主人公性心理的变化，结构安排也有新颖之处。

小说《抗争》

作者叶圣陶，主要内容：

小说通过一群小学教师自发展开索薪斗争的故事，批判了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动摇、妥协的弱点，塑造了具有反抗意识的郭先生的形象。郭先生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小学教师，当欠薪消息传来，他挺身而出，号召人们为维护教员权利，办好教育事业，团结起来与反动当局作斗争。但罢教决议通过后，其他教师却妥协动摇，破约上课，斗争终于失败，而郭先生则被反动当局免职。作品揭示了由于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同时启示人们，在与黑暗势力斗争中，培养和坚持团体意识的重要性。作品围绕郭先生这一人物展开情节，并在斗争中展示各类人物的性格：郭先生的斗争热情，其他教师的怯弱动摇，反动局长的老奸巨滑，都写得栩栩如生。

小说《买彩票》

作者张我军，主要内容：

写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台湾青年陈哲生买彩票的故事。他只身在北京，学费将绝，一旦离去回家，要与恋人分别，内心极为痛苦。这时两个留学的同乡来到他的住处，议论买彩票生财之道，他听了很反感，“不想奋发作事”，却“想坐着收利”，这是何等可鄙！然而第二天，当陈哲生知道他们走后，自己却偷偷地去买了彩票。他想，得了头奖，“学业既因之而继续，又可不与爱人远别，岂非两便？”结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决意回乡了。小说通过陈哲生对买彩票前后截然不同态度的描写，反映了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的穷苦生活。小说刻画陈哲生买彩票和看中彩广告的一系列心理活动，生动逼真，颇有艺术感染力。

诗《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胡适）

诗《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的琵琶！
是谁的悲思，
是谁的手指，
象一阵凄风，象一阵惨雨，象一阵落花。
在这夜深深时，
在这睡昏昏时，
挑动着紧促的弦索，乱弹着宫商角徵，
和着这深夜，荒街，
柳梢头有残月挂，
啊，半轮的残月，象是破碎的希望他，
他头戴一顶开花帽，
身上带着铁链条，
在光阴的道上疯了似的跳，疯了似的笑，完了，他说，吹糊你的灯。
她在坟墓的那一边等，
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

（徐志摩）

电影《难为了妹妹》

《难为了妹妹》由新进公司的万籁天编剧，李萍倩导演，洪仲山摄影。它描写一个贫穷青年何大虎，因不忍见母亲病死而被迫沦为强盗，饱尝了铁窗之苦。出狱后母亲已死，妹妹为人丫环。他在妹妹苦劝下改邪归正，自食其力。后又遭诬陷、毒打，在社会终不容我的心情下，他纵火发忿，再次入狱，被判处死刑。妹妹也被东家赶出，在她追喊哥哥声中，处决的枪声响了，妹妹晕倒在地。影片通过这对兄妹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冷酷，人间的无情以及兄妹的手足之情，充满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同情心，这是“神州派”电影的一大特色。

电影《同居之爱》

史东山在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编导了第一部电影《同居之爱》,由韩云珍主演,也是写男女之情的。影片表现两对男女恋爱的故事,堆砌了许多所谓误会、妒忌和苦恼的描写,最后尽释前疑,相爱如故,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们的一种消遣品。但其艺术成就还是比较高的,导演的特殊的风格显著,受到当时舆论推崇,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接着又拍摄了《儿孙福》,它写一个母亲辛苦操劳,抚养四个儿女长大成人,而自己竟落到行乞为生,最后孤寂地死去。虽然也反映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但也宣扬了"人生牺牲太大,不如及时行乐"的消极的人生哲学。

歌曲《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
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此水几时休?
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历史档案

"中山舰事件"中的文件

一、要舰公函

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此函已由海军局作战科于会审日缴呈会审官)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二、值日官记录

海军局值日官当晚的记录(此记录除钞呈会审官外原册归海军局总务保存)。

值日官 李光鄴 吴国祥

十八日,午七时四十分,有黄埔军官学校后方办事处,派员来局,请即派有战斗力军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遣。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矣。十时,宝璧黄舰长到局面称:奉邹科长命,即开赴黄埔,但因手令无李代局长签字盖印,故欲知李代局长公馆住址,以便前往请示等语,当经查明该住址,告知黄舰长矣。

十九日上午七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于是日七时出口。七时三十分中流砥柱来电:宝璧兵舰于是早六时出口。下午六时中流砥柱报告:中山兵舰入口。六时二十五分江防司令报告:中山兵舰入口(从这一个记录可以证明中山舰不是深夜返省,而是六时三十分以前抵省抛锚了)。

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告全国人民书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自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专制,创立共和,于兹十有五年。人民始则抱无穷之希望,以为积年威焰一旦推倒,山幽谷,迁乔木,官僚苛虐,从兹可以永绝,不料事与愿违,渐失所望。辛亥革命虽已除去中国独立之一大障碍,惟种种困难复从而滋生。前朝达官遗老,藉革命之名盗窃政柄,殃国害民,不为人民谋解放。始则袁世凯帝制自为,继则黎元洪酿成复辟,此后冯、徐、黎、曹、段相继窃位,莫不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之实,兵柄所在,即政权所

归，虽有国会，不过掩饰专横之御用机关耳。先总理痛革命未成而国益颠危也，于是继续努力，以广东为根据地，起与反革命者抗。惟时敌势方张，孙总理之志卒不得遂，故至今北方民众尚呻吟于反革命派虐政之下，而反革命派更互相倾轧，延长内乱，涂炭生灵，北方军阀实为厉阶，而吴佩孚穷兵黩武，分裂中华，尤为罪魁祸首。帝国主义者乘机侵略，谋遂大欲，北方军阀日事扩充私人势力，不惟不以国家为念，反甘作帝国主义者之傀儡，以压迫同胞，爱国志士奔走呼号，促其醒悟，辄被惨杀，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尽忠于帝国主义者也。长此以往，国且不国，是以孙总理临终遗嘱，命同志继续努力，完成革命。今南方军阀次第消灭，国民政府方苦心经营，以求实施孙总理之主义，凡政府与人民之合作，人民之扶助政府，皆足征国民政府所履为正途也。国民政府对内力求廓清军阀，对外努力推倒帝国主义，力抗英帝国主义者年余未尝稍懈。北方军阀见南方军阀既已肃清，国民政府之基础已固也，乃腆颜与帝国主义者勾结，冀有以消灭革命事业。此等危害国民革命，阻障中国自由独立之贼，真我爱国人民所宜起而扑灭者也。国民政府秉总理之遗嘱出师北伐，以蒋校长为总司令，委以讨贼吊民完成革命之重任。盖用兵虽危，顾不如是，则中国难免亡于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手也。敌人拥兵甚众，据地甚广，铲除虽未易言，而革命主义之毕竟成功，大足以坚吾人之信念也。革命成功唯一之要素，在得民众扶助。前此国民政府得以成功于南方者，实赖南方民众之力。此次北伐，深望全国民众亦与以同等之扶助焉。

此伟大历史之问题，帝国主义及贪劣之军阀将继续压迫吾国乎，抑吾人之革命成功，而吾国人民将得解放而获安居之幸福乎，已无可犹豫，即当解决。结果如何，将以吾人行动断之。

吾人奋斗之初步，已令吾人获得可喜之消息，而现时人民之表同情于吾人者，亦已日渐昭彰。此种表现，实出于自然。盖无良之军阀，方予国民以无量之痛苦，而尤以农民所受者为最惨酷。盖农民之痛苦，各界人士已尽明了，而彼等生活之惨状，虽有生花之笔，亦难描写尽致。农民因受军阀与年俱增之压迫蹂躏，遂致被逼而联群结队离去生斯长斯之家乡，而糊其口于四方矣。苛细之捐税，高额之田租，放高利债者之盘剥及政治之不公，皆为农民生活艰苦之原因也。不独农民为然，即其他各界如商人、劳工及智识阶级等，亦莫不因军阀之横暴专政而受生活艰苦之祸矣。

本政府根据其昔日政策，谨郑重向吾民宣告，愿努力为全国国民解放奋斗，尤深愿农民得脱离其因担负苛税所生之痛苦。为使吾国经济——尤其是农业——得以发展，本政府谨提出修改征税法及取消额外征收二事，俾得实行，以苏民困。同时，本政府亦愿担任保护佃农免受地主之压迫。关于改善农民政治状况一事，本政府将设法消除鬻卖官职陋习，改良各法院组织，并予农民以组织团体及购置军械以自卫及防盗之自由。至于工人方面，本政府特提出保护劳工，改良劳工生活，及劳工应得组织自由权各口号。至其他各界，如商人经营大企业者，本政府亦担任谋彼等之经济发展，使国家财富亦得因而加增焉。欲达此目的，则调剂金融，实行统一各种币制，改良交通，取消厘金，保护商业各事为首要之举矣。若吾人能战胜军阀，而组织全国统一国民政府之后，将召集国民会议，以巩固革命，并决定吾国之要需焉。

总之，吾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之各种重要要求，如取消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及关税自主各项，皆当首先设法使得实现也。

中国若能消除国内之公敌，如军阀、反动派、贪官污吏等后，将能成一自由独立之国家，而其对外关系，亦可自视为有自主权及独立之国家矣。此时内部之组织如何，可由人民会议依据人民公意决定之。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吾人务须实现之，而欲实现此三民主义，则非自有全国人民拥护之统一政府建设于吾国之后不可。此时吾国吾民之巨大痛苦，亦将同时消灭矣。

对本政府之宣言，凡为吾国之忠诚公民及热心爱国者皆当奋起，以应吾人之要求。此种历史上之伟大重任，吾人必须负担，而欲完成吾人之任务，则非全国国民努力与革命军合作不可。盖吾人之敌，力强而心狠，欲战胜之，殊非易事，故吾人欲自行挽救免陷死亡，舍决志牺牲，别无他法。凡忠诚勇敢于革命者，其速来就吾人之革命旗下。吾人伟大导师吾人先总理之前轨其感格吾人乎！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北伐胜利万岁！被压迫民族及国民政府大联合万岁！

（原载国民政府公报，1926年第44号）

中共上海区委特别通讯（第一号）——准备暴动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一日）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一个革命的严重时期，上海的工人阶级已很勇毅的表示他们伟大的力量，上海的市民因为工人总的同盟罢工的震动，已经表示惶恐与紊乱的态度。目前我们唯一的重大责任，在于指示上海的市民及工人阶级创造民主的革命的市政府，只有这个革命的政府实现，才能解决上海市民的一切压迫。这一个革命政府之实现，是要人民共同的血战出来的。

今昨两天的工作，最大的缺点在于：

1. 没有指明上海的行动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的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绝对独立的危险现象。

2. 没有在组织上指挥党内与党外的一切工作。目前我们应积极做的工作是：

a. 作积极民众政权的政治宣传(口号另附)；

b. 用各种方法使各街商人罢市；

c. 组织革命委员会，建立各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

d. 扩大罢工运动，维持罢工工人的情绪，提高罢工工人的兴趣；

e. 积极准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

f. 注意内部的技术工作，不要使工会与党的机关泄漏与破坏，要使工会起整个的作用。

以上都是枢蔚最近决定的最重要而最紧迫的工作方针，各级党部赶快督促各同志迅速执行至要。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
——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日晨)

各部委、各产总：

(一)现在军事行动已经暂告一段落，上海此次运动已经是胜利了，以后工作如何的建设和发展，全赖于最近几天之工作如何，在这个局面之下，宣传工作更为重要。每厂至少要宣传队五百人，召集各厂及各车间的群众大会，作广大的宣传，区委特发下宣传大纲，望切实执行。

(二)各部委、各产总接到此项宣传大纲后，务望按照各地实际情形，依此大纲再做出极详细的宣传大纲备宣传之用，并交一份给区委。

宣传大纲录后：

一、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与上海市民，此次和直鲁军余孽巷战一日，已经把直鲁军完全肃清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放了异彩，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确实是革命的领导者，是全国革命民众争得民众政权的一个模范。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所得到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特别重大。现在上海工人阶级唯一的责任，在于继续革命的热情，运用所得到的政治地位，谋全上海人民的福利，以及本阶级群众政治觉悟之提高，与本身组织之扩大及本阶级种种的建设工作。

二、上海的工人和市民过去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之下，所受的凶横压迫和蹂躏，实是数不胜数，人民的一切自由与权利完全被剥夺了。现在上海的工人阶级及市民觉悟到人民的自由与权利之获得与保障，只有人民自己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市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市政府取得民众政权。此次上海七八十万工人的总罢工，就是为了争得民众政权而争斗，也就是此次运动之最重要的意义。所以上海工人此次之总罢工，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

三、现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已经在革命的高潮中，由全上海人民的代表会议直接选举出来了，这就是此次上海工人阶级与市民一致奋起的结果。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是上海人民的政府，是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他与过去的军阀政府完全不同，他是要解决人民的痛苦，谋人民的福利，铲除过去民众与政府的隔阂的，因此我们工人要一致拥护市政府。

四、这次胜利虽是上海工人阶级与上海市民奋斗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北伐军前进的结果，北伐军立当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所以人民应当起来慰劳他。工人亦应当与北伐军兵士互相来往，谋工兵大联合。

五、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在政治上已经有了，目前唯一重大的工作，就是要公开工会，建设各工会，使每个工人都加入工会，增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谋本阶级广大的团结，然后才能维持这次的胜利，这次运动才有价值。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正在开始，我们要有组织的继续向前奋斗！

六、宣传的口号：

1. 拥护特别市政府！
2. 民众与武力合作！
3. 工兵大联合！
4. 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
5.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6. 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7. 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
8. 实行上海总工会的总要求！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北京特别市：路友于　李国瑄　范鸿劼　郭春涛

直隶省：江著元　于方舟　邓颖超

山东省：丁惟汾　王乐平　范予遂　邓恩铭

江苏省：朱季恂　侯绍裘　董亦湘　顾子扬　张应春

四川省：吴玉章　童庸生　邓懋修　黄复生　廖划

平　谷武和　廖竹君

江西省：赵干　刘承休　许鸿　陈灼华

建国攻鄂军：程潜　林祖涵　李隆建　唐卜年　石盛祖

汉口特别市：向忠发　刘伯垂　谭芝仙

湖北省：董用威　蔡以忱　钱介盘　袁溥之

福建省：李觉民　江董琴　许卓然　王兆惠

浙江省：蒋中正　经亨颐　宣中华

梧州市：李天和　许可

虎门要塞司令部：陈英　潘祖义　李子峰

联义社：蔡修

国民政府：刘永闿

机工特别党部：冯菊坡　杨瑞轩　罗珠　简恒　沈一宇

粤汉路：杨章甫　陆枝　陈子英

电话特别党部：傅秉坤　苏炳鹂

第二军军官学校：陈嘉祐　岳森　谢晋　罗介夫

建国鄂军：詹大悲　鲍慧僧　曹振武

广州特别区：陈其瑗　杨匏安　黄国伟　锺明德　邱炳椿　沈寿桢　沈春雨　陈古廉　孙科

海军：黄天玄　舒中鎏　张汉良

第四军特别党部：徐景唐　陈可钰　谭邃　林翼中　叶挺

兵工厂特别党部：郑沃　何铿

广九路特别党部：伍昌　刘承畅

盐运署：林经农　曹倚琨　锺寿山　骆雄珠

香澳总支部：熊振文　冯敬　黄巨洲　林昌炽　文堂　黄平　李毓之　谭海山　李祝三　李野平

陆军军官学校：严重　袁同畴　曾扩情　邵力子　张元祐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　王均　朱世贵　黄实　朱克靖　顾德恒　韦杵　李正芳　顾式鼎　赵宗华

同德总工会：邓耀　锺耳　蔡九

澳洲总支部：王健海

墨西哥总支部：麦兴华

古巴总支部：周启刚　劳先鞭

日本总支部：陈季博　黄克谦

法国总支部：高语罕

菲律宾总支部：吕渭生　张伯萌

暹罗总支部：刘诵芬

暹罗第一二总支部：林超伯

三藩市支部：陈耀垣　谭赞

加拿大总支部：关素人

檀香山总支部：杨剑光

印度支部：王志远

印度吉打分部：凌棠

英属吉隆坡支部：王月波

英属巴双支部：郑受炳

英属巴双港口支部：王瑞廷

英属吉樵庇能一二支部：崔广秀

英属星架坡支部：朱拔英

英属麻坡支部：张东华

荷属亚齐棉兰支部：冯少强

荷属万鸦佬支部：邓范生

英属芙蓉支部：彭泽民　邓子贤

荷属支部：李国瑞

秘鲁华冷架支部：邬日初

河内海防支部：莫子材

安南高棉支部：冯宝锯

古巴湾支部：罗安

海防支部：周守愚

第二军特别党部：谭延闿　鲁涤平　蔡钜猷　唐支厦　李富春　朱剑帆

广三路特别党部：刘旨莘　陆镜

海员特别党部：苏兆徵　谭华泽　周福　陈权　何来

警察特别党部：吴铁城　潘歌雅　李栖云　伍朝枢　吴永生　孙扑　龚玺揆　黎庆恩　关翼周　林卓夫

广州特别市：黄士侠

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案

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党遵循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负荷领导全国被压迫各阶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在此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日益鸱张之时，环境之险恶，实足以使本党每一同志均懔然于革命势力团结之急要，知非全党之意志精神完全归于一致，必不能应付此严重之时局，以为我被压迫民众谋解放之道。乃本党自总理主张改组以来，虽一方以同志之奋斗努力，颇有益于全国民众之革命化。然同时以同志之中未能尽免幼稚与落后之弊，亦惹起甚多无谓之纠纷，以致反妨碍本党各种正当工作，有时且摇动本党革命之基础。此我全体同志所宜一致觉悟而改正者也。

本党之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为总理所特许，其时同志有因疑惑而起纠纷者，屡经总理剀切晓谕，说明本党所以容纳共产党员加入之故。十三年八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共产党员加入问题，曾有极明了之决议。其要点：第一，说明本党为代表各阶级共同从事于民国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如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第

二，说明本党章程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决议，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交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故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若其行动违反党纲章程，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第三，说明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乃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故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吾人即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本党之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十四年五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宣言接受总理遗嘱以后，又发布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引证上述三要点，而加结论。谓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盖两年以来，因共产党加入本党而引起之疑虑与纠纷，始终不绝。而本党之所以训勉各同志者，一以总理之意志为依归，一方求革命分子之集中，一方求本党最高原则之确定，亦始终不懈也。至本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第八项为下列之规定：“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以后凡有此类争议，须在党部指挥和监督之下，用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务使一切误解得到合理与满意之解决，惟不容有感情攻讦的行为，致危及革命势力集中根本政策”。我全体同志能依此进行，本不难在国民革命事业中收同力合作之效。乃数月以来，党员间之纠纷仍未尽除，疑虑亦未尽释，而环境之险恶，则更甚于前。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以未有具体之办法，足以消释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极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务案凡四。此次决议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一切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机关，尤皆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

我全体同志应知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为解放全国民众之唯一方法，非以最坚决之信心，为最奋勉之努力，无由达其历史之任务。而中国之国民革命尤为世界的革命事业之一部，吾人方求世界革命民众之互助提携，则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分子一致为国民革命努力，宁非必要。我全体同志于接受此整理党务各案之际，必以最亲爱互信之精神，确定各阶级共同奋斗之基础，永绝党内之纷争，以应付目前最严重之时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深切感受我同志之能否改善精进，实本党存亡与国民革命成败所关，深不愿于整理党务既有具体办法之后，而尤有执持私见，以梗阻国民革命进行者。不幸而竟有之，则亦惟执纪律以绳其后，愿我全体同志共勉之。

日公使对执政府反驳复文

1926年3月17日

迳启者。日本公使关于大沽事件，兹确认为三月十三日，日本公使馆根据驻津日本总领事迭次报告之说贴内开之事实，而不得不重请中国政府痛切之考虑。夫不幸而勃发之真相业已明白，兹无须重述上开三月十三日说帖之内容，惟十四日外交部说帖引用之鹿钟麟氏之报告，则殊与事实不符。兹举其重者如左：

（一）派赴大沽之日本总领事馆员，并未约定日舰在任何地点投锚受上官之指挥。

（二）关于日舰之航行，非可受何等拘束，故不惟无以汽笛示信号等义务。

（三）日本总领事馆三月十二日对于鹿钟麟氏之使者，曾否认中国方面主张由日本方面发炮之事，且开示明确事实之真相，至鹿钟麟氏报告，所谓日本总领事馆已表示遗憾之意，则全然与事实相反。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之枪击，至乘组将士负伤，始不得已而应射，乃为不可掩之事实。上开事实，日本方面实有第三者之确证。外间虽或有此日本驱逐舰溯航，违反预约之时刻，为事件勃发之原因者。然当时关于溯刻，不惟无何等航时预约，且当日白河溯航需要之满潮时刻，约在午后二时，各国商船利用上开满潮时先行溯航，日本驱逐舰之溯航，大体在诸商船之后。此事已经商定，因之日本驱逐舰之溯航时刻约在午后三时矣，其间并无何等时间之错误。总之，参照驻津日本总领事及其他各方面之报告，事件之真相益形明白，责任之所在如何，已无何等置疑之余地。日本公使因请中国政府顾念中日邦交之大局，加以痛切之考虑，为期迅速公开解决此不祥事件起见，幸尽最善之手段为荷。即颂日祉。大正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日本帝国全权公使芳泽谦吉。

（《顺天时报》，1926年3月19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对于整理党务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规定本党与他党合作办法之决议案，帝国主义与反动者，或将庆其挑拨之成功，此足表示帝国主义与反动者之愚蠢，对于此种决议案之革命的意义，茫无所知也。

帝国主义者，常希望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崩坏，为已往历史所恒见，不由于外人军队炮舰之袭击，而由于自己内部之冲突与纠纷，此内部之冲突与纠纷，实国民革命之最大障碍也。国民革命之成功须恃真正革命势力之严密团结，此本党夙昔之主张，今尤深信不渝。以世界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及反动派之强暴有力，非真正革命势力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吾人实无以战胜之。必革命势力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而可扫荡中国之三敌：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势力。

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毅然改组本党以一切革命势力合作者以此，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全国革命份子奔集于本党努力革命工作者以此，改组以前组织既未完成，政纲亦未大备，虽有总理教率于上，而党务之散漫，党员之凌离，断不足与图成，以此之故，总理于精密考虑国民革命运动前途之后，毅然决定改组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基本，而确定与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势力决战之政纲，同时又决定与国内外革命势力合作之原则。此则国民革命运动之领袖实力为最大睿智之行动，证以后来之事实而可信其不诬也。

总理所采此有历史价值之决定，其结果究奚似乎？自此以后本党日益取得广大群众之同情，不但在中国为然，且推及于全世界，本党今已为中国最大之政治势力，此势力且将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之目的，群众爱护本党日甚，同时敌人仇视本党亦日益深，本党盖日益引起人民之希望与反动者之恐惶，本党势力之增长尤于此可见矣。

其在广东革命之敌人逐一倾覆，彼等虽亦有反动势力响应于内，帝国主义援助于外，然终无救彼等之死亡；革命军人与革命政党之联合势力，卒一一将其击碎。故国民政府成立未久，而人民之讴歌拥护随之，革命基础之植于广东者既非常稳固，其能力遂足与世界最强之帝国主义者相持至于一年之久，声闻所及遍于他省，广东之在中国已不仅得革命群众之同情，凡愿见其祖国自由独立之爱国者，咸一致爱护之，甚至不愿为革命担负何种工作之人民，亦宣称中国之救主将来自广东矣。

本党改组以前，惟少数革命党人与少数知识分子略知本党。改组以后，则已为数百万群众所传诵而为其指导。总理改组本党之识力与其所定政策之效果，至远且大，无物足以磨灭之也。

帝国主义者军阀反动派，自辛亥革命以后，其藐视中国已久，今因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猛烈发展，遂惹其在革命史上未有之恐怖，今仅广东一省已足抵御军阀反动派及最大帝国主义之进攻，若中国各省皆成为广东，则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命运显然将断，彼敌人见其如此，又安能束手以待国民党之制其死命，于是益出其暴力诡计以进攻国民革命运动。其所采以攻击国民革命运动最毒之武器，厥为散布谣诼，以引起吾人内部之纠纷。彼等欲达到此阴谋之目的，宣称国民党为共产主义之集团，盖国民党中大多数非共产党员，敌人冀利用之以构成多数党员对内之疑虑，疑虑既生消释非易，而此等疑虑，若任其散播，则总理所定之革命势力合作之原则将受莫大之危害，即国民革命运动之全部亦必受同样之影响，彼时反动派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乃可引为庆幸。使今后中国之十五年仍名为共和，而实则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鱼肉也。总理所改组之革命的政党，能坐视国民革命运动之消沉而不急呼往救乎？吾人于革命遭遇危难之时能缄默不言以重负总理之付托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党之最高机关，凡为党员者皆须服从其决议，惟全国代表大会始对于其决议有可否之权。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对于本党党员及全国人民，亟须明示本党决不让帝国主义与军阀利用反共产之口召以摧残国民革命，乃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以消灭对于合作原则之真正目的之怀疑，此实足表示其对于国民革命之忠诚，亦即以此摧折敌人进攻国民革命之最有利武器也。吾人深信整理党务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凡有利于中国国民革命能使国民革命更形巩固，不为敌人所利用以制造更多之疑虑者，国民党无不乐为之也。

若帝国主义者军阀与反动派对于此规定合作原则之整理党务案遽引为庆幸。实为大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深信此次决议案，决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份子，以与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革命份子之团结愈坚固，即国民革命之力量愈增进也。

总理之一切革命势力合作原则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之阴谋！

国民革命万岁！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各地和海外代表共二百五十六名。汪精卫在开幕式上演说，略谓本届代表的任务是要继承总理所决定之政策，接受总理遗嘱，继续总理的革命精神去努力奋斗，向着总理用四十年心血和经验给我们找出的光明大路前进，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求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

1月4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10时开会，汪精卫临时主席。林祖涵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谭平山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吴玉章报告大会秘书处组织经过。通过会议规则，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巴图、经亨颐七人为主席团。

1月6日　西山会议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启事，声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列举之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多系为本党已开除之共产分子，所有该党部一切行动概与本党无涉"。

1月7日　许世英内阁勉强组成，是日举行首次国务会议，除外交总长王正廷、内务总长于右任和海军总长杜锡珪外均到会。

1月14日　许世英主持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会后宣布新内阁组成后之四点方针：(一)巩固国信，挽回国权；(二)注重民生，不尚武力；(三)庶政公开，无偏无党；(四)洁己奉公，不图权利。

1月18日　广州各界举行反对日本出兵满州示威大会，二百余团体、五十余学校共二十余万人参加，各团体旗帜书有"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收回旅顺大连"、"打倒日本走狗张作霖"、"取消不平等条约"、"请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等标语。大会通过致世界民众电、致日本民众电、致本国民众电。会后大游行。

1月22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九人为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中央党部八部长：宣传部长汪精卫，组织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胡汉民，农民部长林祖涵，商民部长宋子文，青年部长甘乃光，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宋庆龄。

1月25日　张作霖召集重要文武官吏开会，议决四项：(一)东三省宣布独立，与北京临时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实行"保境安民"；(二)以山海关、秦皇岛为界，布置防线，期永久维持；(三)热河方面亦取守势，驻兵七八万于热边；以防国民军侵入；(四)积极改编军队，编成十四个师，暂时休整。

2月24日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举行政治会议，讨论粤海关案，决定：海关检验入口各船，应负责不许货物走漏，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此时取严格监视态度而无庸检查；如欲检查，须在海关验货之后。

3月18日　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是日，北京各界群众二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上午10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徐谦主席，顾孟余演说，通过决议六项。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蒋先于18日佯令中山舰升火开到黄埔待命。是日黎明，蒋借口中山舰擅入黄埔系有异动，宣布广州戒严，并令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派人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政治部主任李之龙，继又于上午10时扣留各舰舰长及党代表，间有加锁铐者。蒋同时密令刘峙部六百余人由黄埔乘舰抵东堤于拂晓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纠察队枪械，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处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扣留广九、广三、粤汉三路车辆，并拘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第一军中以副党代表周恩来为首之全体共产党员。

3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等出席，讨论中山舰事件处置办法。会上有人提出六项：(一)将苏联人驱逐出境；(二)惩办李之龙、周恩来、陈公博等人；(三)取缔罢工委员会；(四)禁止共产党在粤宣传；(五)恢复王懋功军职；(六)不准共产党人干政。汪精卫认为此等要求太过强硬。经讨论，会议决定：令苏籍顾问季山嘉等回国；撤回第二师各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汪精卫表示消极，翌日借口就医迁居隐匿不出。

3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军民财政及惩办盗匪奸宄特别刑事补充条例》，规定凡未经政府命令允准而组织或扩充军队者，对政府有公然诬蔑之行为者，均处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或五万元以下五百元以上罚金。27日又公布《修正统一军民财政及惩办盗匪奸宄特别刑事条例》二十四条，对各种罪犯均有判刑处罚之规定。

4月9日　北京发生政变。是日夜，鹿锺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卫队受鹿改编，由门致中接收。

4月12日　北京临时政府特别国务会议，胡惟德、卢信、贺得霖、吴纫礼等出席，通电宣布“在政局未定以前，暂维现状”。

4月13日　西山会议派选出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推举谢持、邹鲁、沈定一为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居正，宣传部长桂崇基，工人部长黄季陆，青年部长张星轶，妇女部长黄复生，海外部长林森，会议决定创刊《江南晚报》为机关报。

4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4月20日　北京临时政府改组。段祺瑞决定下野离京，临行前明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特任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准免财政总长贺得霖、交通总长龚心湛、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外交次长曾宗鉴、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姚国桢本职。

4月24日　国民军张之江派张树声与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接洽和平，其条件为：(一)国民军肃清内部激烈分子及赤化分子；(二)改编国民军，受中央节制；(三)放弃热河特别区；(四)保留察哈尔、绥远、甘肃地盘；(五)保留京绥全线之管理权；(六)不出兵攻晋、陕。

4月25日　齐燮元、王怀庆与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在北京举行会议。齐提出吴佩孚处置政治军事之方案：(一)护宪；(二)曹锟下野，以颜惠庆组摄政内阁；(三)由王怀庆任卫戍总司令维持京师治安；(四)张之江等输诚，须以先驱除冯军赤化分子为前提。张宗昌等反对护宪及颜惠庆摄政。次日，张学良回奉天，与张作霖面商应付办法。

4月27日　曹锟左右草拟下野宣言稿，涉及复法与复宪问题，一再斟酌措词，屡屡修改。旧国会议员及前年帮忙贿选者，力请在宣言中嵌有国会可复之意。曹锟电请吴佩孚、张作霖定夺。

5月4日　王士珍、赵尔巽等宴张宗昌、张学良、齐燮元，调停奉直双方政见，提出折衷方案三点：(一)中枢无主，百政停顿，双方应赞成颜惠庆组阁，但声明系依《大总统选举法》复职；(二)颜复职后即召集阁议，通过新总理，替颜摄政；(三)宪法、国会事应俟军事收束再公开讨论。

5月9日　颜惠庆准备出组摄政内阁，通电各省区“暂置法律而言事实”：(一)军事“亟须设法消弭，稍留垂尽生机”，战事结束后，各省公开召开会议审量地方财力民情，以决定留存兵额；(二)中央财政枯竭，望各省“顾念政本，酌予岁供，第一要需厥为盐税”；(三)望各军放还擅扣之车辆，以利交通。

5月11日　颜惠庆与顾维钧、张志潭、张国淦在宅会议，决定先复职摄政，再改组国务院成员。

6月1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叶楚伧为秘书长。

6月5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公布《民国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陆海空各军悉归总司令统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均直属总司令部。

7月7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统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

7月17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蒋介石离广州赴北伐前线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职由张静江代，政治会议主席职谭延闿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由李济深代。

7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同时指出：“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帮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

7月29日　北京国务院举行国务会议，决定临时参政院、国政商榷会、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国宪起草委员会四机关撤销，财政善后委员会着财政部接收，军事善后委员会着陆军部接收，外交委员会着外交部接收。

8月20日　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声明：率师北伐讨吴佩孚，深望各国予以赞助。“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

8月23日　徐谦、李鸣钟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冯玉祥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国民政府决定任冯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冯为国民军党代表。

9月5日　英军酿成万县惨案。下午4时，英装甲舰“嘉禾”号由宜昌到万县，逼近被杨森部扣留之“万县”轮，乘守轮士兵不备，袭入该轮，猛用机枪扫射，毙杨森部士兵百余名。同时，英舰“柯克捷夫”号及“威警”号用大炮轰击万县城两岸陈家坝、南津街及省长行署等地，引起火灾，焚毁民房、商店千余家，死伤人民四千余。杨森部开炮还击。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10月1日起取消封锁港澳政策，即日恢复粤港交通，准人民自由来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照会英驻粤总领事普理宁，谓已与罢工委员会磋商停止“杯葛”办法。

9月30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各

工会代表一千九百余人列席旁听。委员长苏兆征宣布改变罢工政策。

10月1日　北京政府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准免蔡廷干署外交总长职，特任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10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中央党部礼堂开预备会议，十四省、四特别市、十一总支部代表五十三名报到出席。谭延闿报告筹备经过，通过议事细则，选出谭延闿、张静江、徐谦、宋庆龄、吴玉章五人为主席团。

10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继续开会，讨论国民政府主要工作发展问题，议决：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不迁武昌；现在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扩充各省人员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各部除已有外交、财政外，添设军事、交通两部，司法行政委员会改为部，军事委员会仍存在。

10月17日　蒋介石在江西高安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表示请汪精卫复出，并派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劝驾。

10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召集国民会议原则，以发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预备办法。联合会须包含农、工、商、教、学、妇、侨、自由职业者及军队之代表，分为全国、省、县市及海外各地华侨联合会，由党部发起组织。中央党部须派一委员会负责管理联合会工作，各地党部也应指导联合会之工作，努力使党之主张在各联合会通过。

10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以及从速成立湖北正式省政府案、中央派赴各军工作特派员条例，党代表任免条例。会议通过致电慰勉冯玉祥。

11月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增任李济深、李烈钧、唐生智、蒋作宾为国民政府委员。

11月6日　北京政府举行国务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中比条约及税则通商章程失效。

11月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短期内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派遣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孙科、顾孟馀五人赴武汉，筹划整理党务，统一各省财政、外交、交通等事。

11月12日　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系军事长官一百余人会议，提出三议案：(一)整顿军队，严肃军纪，恢复课操；(二)巩固防务，缉捕土匪，以安闾阎；(三)整顿吏治，军不干政，加捐增税应审度民力。对于应付时局之方针，张电邀吴佩孚、阎锡山派负责代表来津面议。

12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以及鲍罗廷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

12月25日　蒋介石电唐生智、邓演达等人：不日将召开军务善后会议，讨论划一国民革命军之编制、军费问题，对奉之作战计划等，所有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特派员、参谋长、各总指挥、各军长、独立师长、总部各处长、苏联顾问均须列席；并令各军长和处长先期集中南昌分组开会。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武昌临时联席会议议决：武昌设最高法院，广东大理院改为分院；组织接收保管湖北官产委员会；在汉口旧新市场设立中央人民俱乐部，为政府人员与人民接近谈话之场所。

外　交

1月8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驻京日使芳泽谦吉去年12月30日《撤兵声明书》所称增防满洲军队之未撤部分将于今年归国事照会芳译称：地方已渐平静，所有增派军队应请迅速撤回。

1月12日　法权调查会议上午11时在北京居仁堂开幕。中、比、美、丹、法、英、意、日、荷、挪、葡、西十二国代表出席，瑞典、秘鲁代表缺席。会议推王宠惠为临时主席，马君武为名誉会长，美代表史陶恩为会长，徐维震为秘书长。马君武致词，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收回领事裁判权。

1月20日　驻京日使芳泽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就缔结中日关税互惠条约提出意见，要求对日本货品不受征加附加税之影响，对中国向日输出原料亦须减税。27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复照表示同意开议。

1月23日　加拉罕就中东路事件致电张作霖，要求："(一)释放局长伊万诺夫及铁路职员；(二)立刻制止军事当局干预铁路寻常交通状况；(三)规定运兵时必须纳费，此项运费由将来中东路中国赢利项下核算"；并将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翟趣林致北京临时政府电文转达张作霖。

1月26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美国政府邀请德国、瑞典、秘鲁、巴西四国加入华盛顿九国公约，事前未征得中国同意，电令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政府声明不能承认。

2月3日　驻京英使麻克类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违反"辛丑条约"为理由，抗议国民军禁止外轮夜间

通过大沽口。同日，驻京外交使团秘密会议，并约天津各国驻屯军司令与会，讨论“维持交通办法”。

2月4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代表张煜全等与英、日、法、美、意五国使馆参赞开会，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及改组工部局董事会交换意见。五国参赞主张按1924年8月9日顾维钧致美使舒曼照会五项办法为根据；中国代表声明自“五卅”惨案发生后情形变迁，应根据1925年11月25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荷使照会办理。

2月12日 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抗议国民军在大沽架炮。

2月25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接驻外各使报告：扩充法权调查会议议程事，列国只允依华盛顿会议精神，渐次推行撤销领事裁判权，无谈判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余地。

3月3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正式条约，侵犯中国主权，向苏联驻京大使加拉罕提出抗议，并令驻苏代办郑延禧请苏联政府从速取消。

3月9日 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以苏德新约规定德侨在蒙古得享最惠国待遇，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令驻苏、德两国公使向两国政府提出抗议。

3月16日 下午4时，驻京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英、美、法、日、意、荷、比、西八国公使，为大沽口事件向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最后通牒。

4月30日 英、法、美、日、意五国代表与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代表在外交大楼开会，讨论交还上海会审公廨及改组上海租界内司法机关等问题。中国方面代表坚持以中国提案为讨论根据进行谈判。五国代表对中国所提交还监狱，租界特别法庭完全适用中国现行法律，处理华洋民刑诉讼并违禁事宜以及普通华洋诉讼时领事不得会审各点，声明须加修正；对外国律师出庭须经中国司法部核准，亦持异议。

5月11日 上海国民外交协会以古巴总统批准禁止华人续入国境议案，是日通电全国请一致抗争。

5月18日 驻京外交使团在荷使馆开会，商讨如何应付新成立的颜惠庆内阁，决认颜惠庆之摄政照会为交际性质，各使单独答复；至于承认问题，应以取得段祺瑞时期所订一切条约、协定、契约、合同等完全继续有效之声明作为交换条件。

6月16日 驻广州英总领事普理宁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5日照会，略谓：罢工已成过去之事，香港政府准备派代表三人，与广州政府谈判排斥英货问题。英领并声明：香港英督碍于英国制度，不能与广州政府或其他外国政府直接通文，故由本领事代答。

6月21日 国民军张之江等各将领联名发表对外宣言，并电驻京各国公使：(一)否认吴佩孚、颜惠庆、顾维钧等人有代表中华民国国家之权；(二)北京政府假借中央名义与任何国家签订之条约一律无效；(三)愿各国勿予各军阀以任何援助。

7月18日 驻美公使施肇基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速宣布关税自主，略谓：关税自主乃独立国家之权限，公理昭然，无反对之余地，故无与列国协商之必要。

7月2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比使华洛思，中比通商条约本年10月27日满期，即宣告废止，另订新约。在新约未成立前，两国政府可另定通商暂行章程。

8月1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饬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本政府声明：中日通商航海条约于本年10月第三次期满后不再继续有效，须改订新约。

8月1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谋撤换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发极密电致驻日、英、美、法各使，饬探询各国撤换驻使之先例。翌日，驻日、英使回电谓“尚无此种先例”。

9月5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照会驻粤英总领普理宁，严词抗议英舰驶进西堤占驻省港码头，要求：(一)立刻撤退码头上之武装英兵；(二)英海军立即停止干涉江面小船；(三)英舰应退至沙面外原停泊处。照会并保留要求赔偿之权。12日，英舰撤退。

9月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中苏会议委员会，以次长王荫泰为委员长，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为副委员长，宣布在北京设商务、界务、法律三委员会，在奉天设中东路、松黑航权、债务赔偿三委员会。

9月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关系各国驻京公使：请转知驻沪商务代表，请参加编订货价委员会事务，随时接洽一切。法、英、美、意、日使先后函复派定驻沪领事或参赞参加。

9月1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万县惨案事向英驻京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英方惩办肇事军官，并保留赔偿之要求。14日，再次抗议，并请暂止英舰驶往长江上游。

9月18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函驻粤英总领事普理宁：近期将解决排货风潮，决定对平常入口货品征特别消费税百分之二点五，奢侈品百分之五，出口货亦征特税若干，照关单计算。

9月29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中国对外各商约，满期后即行撤废另订，不再展期，以免援例；并电复滇交涉员，谓中法越南商约决不延期。

10月14日 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筹备重开中苏会议，议定分设六个委员会，赔偿、路务、航务三委员会在奉天开，法律、界约、商约三委员会在北京开。苏联政府派新任驻华代使齐尔内赫为中苏会议代表。北京政府财政部派蹇先骢、外交部派余序为中苏会议专门委员。

10月25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驻华代使齐尔内赫要求公开中东铁路会计事项：一、华人职员参加中东

铁路会计科；二、调查中苏两国委员之旧账簿；三、年终公布中苏两国理事的检查之收支账目；四、中东路督办得随时检查会计事务。

11月1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为中比改约交涉事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三点：(一)对解除不平等条约，自己赞同不后于人；(二)对比交涉已按既定步骤着着进行，先由国际常轨尽力向和平途径做去，须到山穷水尽时再别谋办法；(三)中比关系以商务为重，比不藉武力立国，我亦非以武力立国者。取消不平等条约乃为对各国一般之目的，非仅对于比约为然。现今尚候比使答复，待不能就我范围时，始取不得已之办法。

11月3日　比利时政府外交部向北京政府驻比公使王景岐表示：中比修约问题，比国本拟容纳中国请求，惟列国对比纷纷责难，比政府实无法完全容纳中国主张。若中国坚持，惟有付诸海牙公断。

11月10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西班牙驻京使馆：中国与西班牙之条约，明年5月10日满期，希于届满以前修改，依据平等相互原则商订新约。

11月16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复比驻京公使华洛思6日、10日两照会，指出中比改约争执之点在于以平等原则适用于中比关系，纯为政治性质，不能受国际法庭审判。比若将第四十六条解释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不过重申比国维持在华不平等制度，有碍谈判。

11月29日　驻京比使华洛思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谓按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九条，中国不能以一己权力终止中比条约，惟有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解决；比国承认提交海牙解决之法律争点，与中国提议交国际联盟并不矛盾，可以考虑于提交国际法庭后再在国际联盟提出。

12月11日　新任驻华英使蓝普森在武汉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陈向蓝普森宣布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略谓：国民政府决意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反对协定关税；对外侨生命财产，当负保全之责。

12月17日　国民政府正式通告各国政府：本政府迁武昌后，所有外交事宜概由政府负责，非本政府承认或接受之事件及文书，在中国地域概不生效。同时，本政府愿与世界各国为平等的友谊的缔交。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函各省政府实行统一外交，如各国领事迳向外交部以外各机关递公文，应即退还；各机关亦勿向外国领事送公文。

12月21日　驻京日使芳泽向日驻京记者表示，反对英国驻京代使所提之中国关税案，谓日本遵守华会条约，附加税必须由关税会议决定。

12月23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讨论中比条约交涉案，决定：比国政府虽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我国仍保持原提议，不向国际法庭应诉。

12月28日　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访晤顾维钧，面述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意见。

12月30日　张作霖亲赴东交民巷一一访问荷、英、日、法、美驻京公使，致意四事：(一)拟组织强固之中央政府；(二)安国军对外债虽不全认，亦不否认；(三)希各国援助打倒赤化；(四)修约问题，主张渐进。翌日，日使芳泽回访张作霖；荷、英、法、美等使派员持片回报张之访问。

军　事

1月10日　直鲁联军分十路进攻国民军：李景林自任第一路，二路李爽恺，三路马瑞云，四路张宪，张宗昌自任第五路，六路褚玉璞，七路毕庶澄，八路方振武，九路许琨，十路程国瑞。是日，李景林部在安陵、桑园间攻击五小时，占安陵。翌日拂晓，国民军增援，夺回安陵。

1月15日　奉军与国民军在榆关附近交战。国民军增调兵力防御，第一防线设距榆关五十里之高岭站，第二线设前所，第三线设边外，大本营设榆关，唐之道任前敌总司令。奉军主力由绥中西进。

1月20日　国民政府令准蒋介石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以何应钦继任；特任程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1月21日　段祺瑞以各军阀间战事加剧，下令"各军事长官应一律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各守疆圉，互戒侵陵。如再称兵构衅，则罪有攸归"。

1月31日　奉军舰在大沽海面游弋，国民军在大沽口南炮台安设重炮四尊，并装探照灯，入夜不准中外各轮进口。是日，驻津领事团以此举违背"辛丑条约"为理由，向孙岳提出抗议。

2月1日　国民军分三路东进攻击奉军：唐之道之第九师及三军之顾占鳌旅，由昌黎正面攻北戴河；门致中之十一师由昌黎南抄奉军左翼；郑金声部由丰润西北进攻石门寨。

2月19日　国民政府召开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议，讨论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统一事宜，并核定桂省军队改编训练之方案。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六人组成。

3月8日　毕庶澄所率舰队及奉军海军向大沽开炮轰击，守备大沽之国民军还炮抵御。由军舰载来之毕庶澄部海陆军六千人，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谋袭军粮城。经国民军门致中、庞炳勋等部截击，及驻芦台之唐之道部夹击，俘获二千九百余人，余众登舰逃走；毕舰队十一艘也被击退。

3月15日　英、日、美、法、意等国驻天津之海军司令官，在英舰"福克斯"号开会，讨论大沽口事件之处置及

此后大沽航行安全办法，决定向国奉双方提出警告，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国民军撤除大沽炮台之防备，奉军将军舰撤出大沽海面；并议定各国军舰分担区域，在16日晨9时前完成防范之部署。以上议定即请驻京使团批准。

3月19日　国民军下令前线总退却。在津浦路、京奉路前线之国民军诸部开始向北京方向撤退。翌日，驻天津之国民军各部陆续撤回到京郊及通县、固安等地。

4月1日　直鲁军及奉军将领在天津张宗昌寓所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事，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赴前线督战，李景林留守天津。

4月6日　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对北京国民军下总攻击令。东路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司令；西路阎锡山、靳云鹗分任正副总司令，王为蔚、王维城、田维勤、魏益三分任指挥。杨清臣召集旧部编制成师，加入通县方面进攻。

4月15日　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晨，奉军与直鲁联军向北京猛烈攻击，奉军占通县，吴军进抵西苑。鹿锺麟急调援军在八里桥附近堵御奉军，追援军至朝阳门外万国靶子场附近，南苑防线亦被突破。鹿遂下令总退却。

4月18日　奉军及直鲁联军开入北京，张宗昌等人以镇威军军团长名义委李寿金为京师警察总监。京师临时治安会推举之警察总监吴炳湘交出警权。徐源泉访王士珍，谓京中治安既由警察维持，无须唐之道部参预。

5月7日　刘镇华率"镇嵩军"攻西安，与李虎臣、杨虎城之陕军激战旬日，未能取胜。是日，西安市民组"和平期成会"向双方运动和平。刘表示须陕军先行出城；陕军表示须刘承认收容全省陕军，以井岳秀、麻振武任联军正副司令。交涉未洽，复战。

5月10日　北京举行各军"反赤"联合办事处成立会，张学良、张宗昌、齐燮元、王怀庆等出席，阎锡山、靳云鹗、刘镇华、孔繁锦、张兆钾亦派员参加，吴佩孚派张联棻为全权代表。决定由各方面各派全权代表一名驻办事处，谋军事上之统一。

5月23日　杨森指挥所部第三师自垫江进击占据重庆之袁祖铭黔军，是日唐式遵部攻入重庆。袁祖铭率军退南岸，下令所部由川南回黔。

6月6日　吴佩孚决以武力解决西北国民军，将"讨贼联军"所部分编四军，自任第一军总司令，直辖田维勤、王为蔚等部，任命彭寿莘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第二军总司令，阎治堂为第三军总司令，齐燮元为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副。是日下全体动员令。

6月14日　吴佩孚在保定设"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是日向所统各军下总攻击令，命立即攻击国民军。田维勤、魏益三各率军前进。

6月18日　吴佩孚组织"援湘军"助叶开鑫攻打唐生智，委任宋大霈为第一路总司令，前敌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总司令，防守右翼常德、澧县一带；唐福山为第三路总司令，率赣、粤军任左翼作战；董政国为第四路总司令，率唐之道部两旅及阎日仁师为总预备队。

7月2日　张学良、张宗昌、褚玉璞等在张宗昌宅开军事会议，讨论南口之战的进兵方略，王栋、王琦、徐源泉等亦列席。翌晨，张等同赴沙河督战。张宗昌下令限一星期攻克南口。

7月3日　驻京英、美、法、意、日、比、西、荷、葡九国公使发表关税会议停会宣言，声称"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议时，当立即继续会议"。驻京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并将上述宣言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

7月10日　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沙之右路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拂晓开始攻击，十二师向沈潭、夏家桥前进，独立团向泗汾进击，十师位于黄土岭策应。敌向浏阳退却，醴陵不战而下。

7月11日　国民革命军进占长沙。第八军第三师自湘潭追击溃退之叶开鑫部主力第二、三师，于是日晨进入长沙城。叶军正由岳麓山渡江，已渡者降，未渡者转向靖港逃逸，旅长刘雪轩及官兵二千余人被俘。周斓部在如意亭会合刘兴、钟祖培部向宁乡追击，同日晨克宁乡。

8月12日　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进攻湖北，主力直趋武汉；对赣暂取守势。其部署为：唐生智指挥第八军正面攻岳阳；李宗仁指挥第七军、第四军侧出平江，北取蒲圻、羊楼峒，合力歼敌，然后分别渡江，与沿武岳路北进之主力规复武汉；朱培德指挥第二、三军集结醴陵、攸县、茶陵防赣；袁祖铭指挥第九、十军出荆、沙取宜昌与襄阳。

8月22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拂晓击退破塘口及新墙之敌，第二十六、二十七两团向云溪前进，三十四团向岳阳前进，10时占岳阳城。第三师李品仙部在五里牌截击向蒲圻急进之宋大霈部。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向通城附近之九岭攻击前进，下午占领通城。停泊洞庭湖之吴佩孚军十余艘舰艇，仓皇退往白螺矶、新堤一带。

8月25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防御孙传芳进犯湘、粤，部署对赣作战计划：以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取赣县，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出莲花、吉安，第三军朱培德部出萍乡占宜春，第六军程潜部出修水声援；赣南方面以四十六团出上犹，第五师出大庚，赣军赖世璜部出雩都，会取赣州。

8月27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第八军一部在汀泗桥与吴佩孚军刘玉春部、陈嘉谟部、宋大霈部等约二万余人激烈搏战。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叶挺独立团等奋勇

攻击，前仆后继，是日晨8时突破敌阵，攻占汀泗桥。

8月28日　国民革命军为防止吴佩孚利用海军扰乱后方，是日封锁长江、湘江长沙至武昌一段航线，规定外国军舰、商轮如须通过，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前通知长沙交涉员，取得许可，派领江导入。

9月2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第一军第二师抵达武昌城外；第十师在保安门、宾阳门、洪山一带，第十二师在南湖、新店镇一带，第二师在街头口、徐家棚、石眼井、董家湾一带，三面包围武昌城。第七军各部抵达纸坊、樊口、五里墩。吴佩孚下令关闭武昌各城门，每日只汉阳、平湖两门开放一小时以维持武汉交通。

9月7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渡汉水攻占汉口。吴佩孚军向黄陂、孝感退却。商店鸣鞭炮悬青天白日旗庆祝。士兵四出演讲革命，散发传单。刘佐龙以蒋介石所委之武阳夏公安总司令名义出示安民。

9月13日　唐生智与刘玉春关于武昌城处置办法之谈判破裂，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攻城部队以巨炮及汉阳之排炮轰击武昌，并用飞机抛掷炸弹。

9月14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颁发封锁武昌计划：陆路由攻城部队任之，对武胜门、忠孝门、贯阳门、通湘门、起义门、保安门、望山门通城外之路及其他要道均备障碍物防敌冲出扰乱；水路由第八军、十五军队驻防阳夏部队及攻城部队协同任之；通信封锁由飞机及第八军二师驻阳夏部队暨前敌总指挥部任之。

9月18日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杨源浚部在程潜率领下转由同安向高安攻击前进，在第三军二十六团协同下，是日攻克高安。赣军谢文炳、张凤岐、唐福山等部向南昌退却。

9月19日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率第十九师杨源浚部乘胜自高安东进，是日下午在南昌工人、学生、省长所属警备队等响应下，突占南昌城。是时，第三军朱培德部在高安附近，第二军与赣军邓如琢部对峙于樟树，第十七师、第一师尚在奉新、罗坊间。

9月21日　郑俊彦率新到援赣苏军由南浔路攻南昌，邓如琢部经丰城由南路北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竭力抵御，苦守三日，终不能支，是日退出南昌。次日，又会合由奉新赶到之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部攻入南昌。卢香亭率援军赶至围攻，激战不已。

9月28日　吴佩孚受困郑州，内部离析，屡下令进攻武汉，部下皆不听。是日，吴改部属为军团制，以王为蔚为第一军长，王维城为第六军长，魏益三为第八军长，隶属第一方面军团。

10月2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六师及第一军第二师由峡江渡河，沿赣江东岸向新淦（今新干）之赣军攻击，是日拂晓迫近新淦，第四师第十团、第二师第五团分由东西两面攻占新淦城。守敌陈修爵、唐福山、杨池生等部经桑村向芗溪方面退去。

11月7日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于6日分两路向湖口、武穴跟踪追击，是日，第一旅进占湖口，第二旅进占武穴，敌分向彭泽、黄梅退去。

11月21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达同安后，独立第四师即向文斗店前进；福建民军第五路叶定国部及第二路一个支队占小盈岭；第十七军第二师向东田桥、五峰前进。闽军第一军张毅部及第二十九混成旅孔昭同部不支，向莆田退去。是日，革命军占泉州城。

12月8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在闽浙边境击溃陈炯明粤军残部谢文炳、陈修爵等，会合第二十二师向衢县前进。

12月12日　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与驻闽厦海军联合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推李任保安司令，维持省城秩序。

经　济

1月5日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新计划，内称本年收入可由二千万元增至七千万元。

1月16日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发行"春节库券"事，财政总长陈锦涛主张发行八百万元，利息八厘，以民国十七年以后之金融公债基金之一部为担保，除用以发给九六公债两年息金外，基余充作政费。寇遐等反对。次日，陈锦涛递交辞呈，离京去津。

1月17日　北京临时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商讨春节库券事，王正廷报告昨晚与安格联接洽担保库券遭拒。18、19日连续举行国务会议，许世英称已与安格联洽妥发行春节库券。19日晚，许在宅宴银行界，摊销库券。

1月29日　中日议定"中日关税互惠条约"缔结原则如下：（一）限于特殊货物数种；（二）务期从速缔结；（三）双方须含互惠之性质；（四）互惠条约与国定税率同时实行；（五）最惠国约款不适用于互惠条约。

2月6日　段祺瑞指令兼财政总长许世英，准办春节特种库券，规定：（一）定额八百万元；（二）利率周息八厘，八二折发行；（三）前两年只付息，民国十七年起偿还本息，六年付清；（四）自十七年起，以向由关余项下业经指定拨充之整理内债基金年约二千四百万元，除定案拨付各债本息外，所余之款为还本付息基金；（五）由中国、交通两银行经理。

2月10日　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八百万元春节特种库券，节前先销五百万，由各银行分摊凑认，扣净后政府实得三百三十万元；其余三百万元库券作为抵押用，经往返磋商，决照票面四折押借，实得一百二十万元。

3月11日　中苏债务会议之赔偿委员会开会，讨论

我国商民货物损失案，我方代表提出共损失三十四亿卢布，要求按《中俄协定》及苏方历次宣言照案赔偿。苏方代表谓卢布失效是出于不可抵抗之原因，不能负责赔偿。

5月20日　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联合各绸业公所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反对《中日关税互惠协定》。国货维持会会长王介安指出，所谓中日关税互惠协定，对于日货输我国者，税率为值百抽七五，而我国织物运日、韩者，仍须征值百抽百之重税。

6月25日　中苏会议之债务赔偿委员会开会，王文典以文件致苏方代表，请于最短时期内实行赔偿已经审查完竣且为苏方承认之货物损失。王并续提卢布损失案。

8月24日　北京政府拟发行新内债二千五百万元，以海关拨来偿付行将期满之"民九内债"一千一百万元为担保。是日，驻京美使马慕瑞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谓"民九内债"还清后之款，应用以偿还积欠已久之美债，中国政府无权用此款作新内债之担保。

9月26日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之十三处分行，奉巴黎总行董事会电令停业清理。该行由中俄两国合股经营，中国政府有股本五百万两，且有存放关税、盐款及发行钞票之关系。

10月4日　国民政府通过《征收出产运销物品暂时内地税条例》，规定自11日起：(一)凡两广与各省或外国所贸易之物品，无论为出产品、运销品，一律征税；(二)普通货物之征收税率，按照现在海关或常关所征税率加征半数，奢侈品加征一倍，烟、酒、煤油、汽油等已缴特别税者得免征收；(三)在海关各常关口卡或其附近征收之；(四)不依照本条例之规定缴纳税项者，除将货物充公外，应处以三年以下之监禁或该项货物所值之十倍罚金。

11月25日　潘复自津抵京，就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职，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发行军用票、巨额新库券或公债，杜锡珪等人反对。

12月5日　上海招商局举行董事会和股东维持会联席会议，因请各方放回被扣船只未获结果，决定即日起停业，各线全部停航，通电各方，并令将已泊上海及在途将归各轮一律调集浦江。

12月12日　北京政府农商部训令京沪交易所停止买卖九六公债，略谓：近日九六公债市价暴落已出常轨之外，并有奸人从中操纵，影响市面，扰乱公安。按照《交易所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所有九六公债部分营业暂行停止，听候派员查办。

12月22日　宋子文在汉口华商总会设宴招待商界代表八十余人，就整理金融事交换意见。宋谓：整理金融确有把握，公债担保亦确实，希望商界支持政府。宋并谓：工商利益相依，应互相谅解。劳资双方应放大眼光，只要工人不过分要求，商人自应谅解。工人生活得到保障，商业自然发达，商人仍一样有利。国民政府对于农工商学兵一样尊重，对于商人财产一律保护。

文　教

1月1日　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在上海、北京同时开幕。国语研究会联合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在广州、长沙、南京等一百余城市陆续召开国语运动大会，以演讲、展览、文艺演出等推行国语，促进统一方言，普及教育。上海各报是日和3日先后出版国语特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半价发售国语图书一个月。

1月28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更动北京国立各大学校长人选：聘王宠惠为法大校长，李石曾为农大校长，孙柳溪为医大校长，林风眠为艺专校长，徐谦为俄专校长。

2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孙科、宋子文、陈公博、伍朝枢为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委员；特派陈公博、甘乃光、许崇清、金曾澄、鍾荣光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19日，又加派褚民谊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

2月23日　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统计，全国有大中小学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二所，学生九十二万一千八百五十四人。教育部通令各省区教育厅，本年内各地须广筹教育经费，全国增设中等学校四百所，小学一千二百所。

2月26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开会，各方面请拨基金书共一百零五件，总数为二千二百余万元。经三天会议议决：设置科学教席，并补助设备其他项关于促进科学教学之费用；补助北京图书馆开办费一百万元，在武昌华中大学设图书馆学教席及助学金。

4月27日　广东大学部分教员反对文科学长郭沫若从事革新，认为"有侮蔑教员人格意"，22日停课罢教，要求校长将郭革职。是日，校长褚民谊及各科举出代表五人出面调停，又经学生要求，结果文科教员被挽留十一位，被辞退十五位。翌日，文科学生又组成革新委员会，宣言拥护郭之改革主张，反对罢教教员。

6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教育行政委员会提案：采用法国大学院制度，组织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及教育行政机关，并议决任蔡元培为院长。

7月1日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广州召集中央教育行政大会，出席四十七人，历时十天，议决请颁定国歌、推广工业教育、凡学校及私塾员生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外人捐资及教会设立之学校须呈报立案并不得施行小学教育及师范教育、中学校长不得兼职、注意推广小学并严厉取缔私塾、农工教育实施等二十三案。

7月4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学术院，以罗致、造就政治、建设人才。学术院分设法律、政治、交通、外交、财政、教育、工业、农业等十六门专科，入学资格为在国内外

大专院校毕业，学习二个月后即推荐各行政机关任用。

8月14日　北京政府通过《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特设委员会，聘赵尔巽等二十一人为委员。21日，委员会选赵尔巽为会长，孙宝琦为副会长。

8月19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务会议决定故宫永为国产，防止移转、变卖、抵押、借口整理迁入宫内或藉名借款等事，以断觊觎者非分之心。

9月4日　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可澄为强行将女师大等三校合并，带领军警武力接管女师大，迫令教职员于一小时内一律离校。全校教职员、校警、茶役当即一律搬出。次日，教职员集会反对三校合并，学生会亦发宣言指责教育部。

10月6日　北京政府派秦汾为代表，参加在东京举行之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各学校、团体派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陈焕镛、薛德焴、李熙谋、邹秉文、胡先骕、任鸿隽、谭熙鸿、陈方之、魏岩寿、沈宗瀚等参加。

11月18日　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通俗图书馆、上海世界语学会、中华农学会、幻社、弥洒社、创造社、妇女问题研究会、学术研究会等团体联合发表拥护人道宣言。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7年

导　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了汉口惨案。案发当晚，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向英国驻汉口领事提出抗议，示威群众冲入英租界，驱逐英国巡捕，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二月十九日、二十日，英国政府被迫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把汉口、九江英租界正式还给中国。

本年三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这份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提出打倒封建地主政权，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路线，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伟大理论。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三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和对党员的训令，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在中常委会主席团的职务。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仅3天之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政变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损失。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胡汉民任主席。

面临着紧要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确定中共在紧急时期的任务。陈独秀作《中央政治和组织报告》，极力为其错误辩护，但遭到三十多位代表批评。大会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土地问题，但没有讨论措施。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杀害。中共在北方力量被严重削弱。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爆发。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十月十四日，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制裁共产党，从而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南京政府成立后，成绩平平，在对奉系作战中屡遭挫折，蒋军内部怨声四起。在武汉方面东征的声势下，桂系联系何应钦，在8月初进行“逼宫”，蒋介石以退为进，正式宣告下野。桂系和何应钦掌握了南京政权，随后与孙传芳军激战龙潭、栖霞山，俘敌3万人缴枪4万支，取得龙潭之战胜利。

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迅速通知部队到文家市集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

国民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宁、沪、汉合流后成立，主要职责是受中央党部委托，行使中执监委职权，统一各地方国民党党部，筹备国民党三大。但汪精卫由上海返回汉口后，支持唐生智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抗。桂系联络谭延闿、程潜等人，起兵讨伐唐生智。唐生智兵败难支，通电下野。

趁粤桂军阀混战之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发动广州起义，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但由于优势敌人进攻，起义三日后失败。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收回汉浔租界
- ●毛泽东《湖南家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 ●赣州惨案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 ●李大钊北平遇害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 ●“八·七”会议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大武装起义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龙潭战役
- ●蒋介石下野
-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
-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
- ●宁汉战争

收回汉浔租界

背景介绍

1926年，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各地掀起了一个反英反奉运动。12月26日，武汉市民20万人举行反英大会。1927年1月3日，当武汉市民举行集会游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时，英帝国主义指使英国水兵登陆镇压革命群众，刺死海员1人，刺死市民数十人。当革命高潮之时，帝国主义者竟然如此野蛮屠杀中国人民，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第二天，武汉各人民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向英帝国主义者提出8项条件，其中有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正义要求。1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又举行了有4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武汉的工人群众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会后，革命群众以实际行动夺回了英租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武汉人民的英勇行为，得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政府也以外交途径与英帝国主义谈判，努力收回中国主权。

汉口人民的英勇斗争的消息传到了九江，九江人民在1月6日集会声援武汉人民。当天，九江码头工人要求英国资本家增加工资。资本家不仅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反而利用工贼破坏斗争，工人抓住了破坏斗争的工贼。英国资本家竟指使英国水兵上岸干涉，镇压工人，开枪打死1名工人，伤数人，英国军舰还开炮示威。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新暴行，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行动起来占领了英租界。这便是著名的“汉浔事件”。

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迫不得已于1927年2月2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正式承认把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个壮举。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伟大战斗力量，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材料：

- ·收回九江英租界
- ·汉浔租界收回记

材料一　收回九江英租界

九江英租界是英帝国主义从中国清政府强行霸占的。北伐军占领九江后，九江码头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向九江的英国、日本轮船公司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1927年1月6日上午，在武汉各界群众开进汉口英租界的影响下，九江工、农、学各界群众数万人在九江总工会委员长彭江、市农民协会会长吴九恩等组织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宣传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胜利，要求收回九江英租界。6日下午，九江海关的英国职员强行雇工往船上搬运行李，破坏码头工人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吴宜山前往劝阻，被英国水兵打伤，工人群众起来救护，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停泊在江边的英国军舰，连发两炮，向中国工人进行挑衅。九江工人和市民群众闻讯后，在彭江领导下冲向租界，拆毁了租界周围的木桩、沙袋、铁丝网等物，英国领事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将水兵撤到军舰上。7日，驻在九江地区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第三团和工人纠察队进驻九江英租界。同日，九江人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就收回九江英租界发表《宣言》，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要求，就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运权，收回租界，就是打倒帝国主义。8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

部主任邓演达前往九江，负责处理收回九江英租界有关事宜。10 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周雍能任委员长，赵畸等为委员，正式宣布接管九江英租界的公安和市政事宜。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事件发生后，湘、赣、鄂、粤、闽、浙、皖、沪、京、津等省市人民，纷纷举行援助汉、浔的反英示威，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洪流。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英、德、法、意等国的工人阶级，也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中国人民收回汉、浔英租界的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英国驻中国公使蓝浦生派参赞阿玛利于 1 月 11 日到达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举行谈判。在收回汉、浔英租界的斗争中，武汉国民政府执行了革命的外交政策，顶住了英帝国主义的威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维护中国的主权，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要求外国人仍各安其业。1927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继发表了《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对于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以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浔英租界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中英双方经过激烈的谈判斗争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英国驻华公使代表阿玛利，于 1927 年 2 月 19 日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20 日又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最后完成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法律手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选自《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材料二　汉浔租界收回记

一九二七年春，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壮举，是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要站在一切民众前面，援助北伐军。在北伐胜利进军的推动下，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两湖地区的工人斗争发展更快。

自从国民革命的势力到达武汉地区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无比恐慌，迫不急待地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发表了《对华新提案》。表面上对中国革命持“不干涉”态度，实际上却“急得疯狗也似的咆哮起来了，处处施展其阴谋，在北方封闭天津市党部，捕害国民党员，在汉口造谣中伤，调军舰，置沙包，布电网，架机关枪。组织暗杀队、侦探队，停闭工厂，驱逐学生；令汇丰银行歇业，封锁武汉金融，以谋破坏武汉的革命新根据地”，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革命群众一致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在这场伟大的反帝斗争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口各界群众二十余万人在济生三马路召开反英市民大会。“全省总工会、汉口学联会、妇女协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各团体联合会为主席团，李立三为总指挥”。会议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暴行予以揭露，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立即收回英租界。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武汉人民连续举行国民政府迁都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三日下午，各党部、各人民团体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员在汉口码头江汉关前面的英租界附近空场上演讲，听众很多，秩序井然。英帝国主义调来大批水兵，驱逐听讲群众，并以刺刀向人群中乱戳，“枪杀爱国同胞三人，一人伤重当场毙命，其余二人命在旦夕，伤者不知其数”，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

当时，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大会得知惨案发生后，李立三、刘少奇立即领导全体代表声讨英帝国主义暴行，并通电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各界同胞，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五项办法。

惨案发生后，“外部长陈友仁对英界凶杀案，三日晚口头抗议，请英领于二十四小时内撤退水兵义勇队，……四日晨，英水兵义勇队全撤退，正午巡捕亦撤回，午后五时，卫戍司令部派兵三连入驻英界，工会纠察队亦开到……”。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各界群众的的满腔怒火。当晚，武汉市民进行游行并召开各种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四日上午，武汉工农商学各界共二百多个团体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提出的六项要求，提出八条具体解决办法，要求国民政府执行：（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英政府须负责赔偿此次同胞之损失；（三）英政府须立即将肇祸凶手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政府须向中国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的绝对自由；（七）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

会议还议定了如果英领事对于所提八条无圆满答复，要求国民政府自动实行下列四条：（一）立即收回英租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内河航行权；（四）立即撤销英人领事裁判权。

国民政府完全接受了武汉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八项对英办法，并以此作为政府对英交涉的条件，表示要“依议作到，以为人民报仇血耻”。然后，派政府代表赶到肇事

地点向群众宣布了政府对惨案的态度和办法，力劝群众暂切解散，避免更大的牺牲。当日下午，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军队进驻租界维持秩序，公安局，总工会均派人会同维持。英租界内，英水兵等娱乐场所均一变而为华兵之临时驻在地英捕房及江汉关均高悬党旗国旗。

五日上午，召开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定委员五人，负责管理英租界各项事务。外交部就此发出布告，并正式照会英领事。

五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指挥下，武汉召开了四百多个团体三十余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大会发表通电并通过了八项议案。请求国民政府“立即自动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撤销英人在华内地航行权，撤销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杜后患”。会议发出呼吁：“事关民族存亡，望全国同胞，一致声援，与英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会后，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战斗口号，冒雨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冲入租界。“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从即日起接管英租界。

靠自己的力量夺回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殖民主义者的威风。这一斗争的胜利有利地推动了反帝运动的蓬勃发展。紧接着，九江也爆发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早在一个月以前，九江码头工人不甘心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人生活，曾向日清、怡和、太古三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成立了劳资委员会。日清公司答应了工人要求，而太古、怡和两公司坚决拒绝。码头工人被迫宣布罢工。罢工期间，“凡英、日各国往来上海、九江之轮船，悉受影响，以至停止运货”。“三日，纠察队在租界旁拘获工贼一人，英水兵即上前干涉，以大棒殴打纠察队，至于重伤”。另有几名工人被打至伤。群众见状，极为愤怒，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暴行。英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英兵舰即向岸发炮两发，群众大乱，各商店纷纷闭门，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九江惨案”。

惨案发生后，九江的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悲愤难忍。于是，以工人为主体的数万革命群众在九江中共党组织与总工会的领导下，高呼“收回英租界！”“帝国主义滚出去！”等口号，手持棍棒，拆除铁丝网，冲破了英人设置的一切障碍，象潮水般涌入英租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霸占六十余载的九江“租界”。

“事件发生后，我当局即提出严重交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即日由汉来浔，亲自调查办理”。八日，九江英租界则由革命军独立第二师接管，租界内由工人纠察队保护一切，秩序均好。革命军接管租界后，组织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租界内一切事宜，租界内“一时充满革命空气”。

租界收回后，由九江市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等有关单位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处理对英事务及工潮问题。各界团体还组织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经努力，满足了罢工工人的要求，解决了死伤工人的救济问题。“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发表了“宣言”，揭露和控诉了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信心：“九江的事件决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总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宣言》提出了解决问题最根本、最彻底的办法。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英帝国主义，湔雪我们百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江西、湖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及湖北各县，纷纷成立了“反英援汉委员会”，组织了反英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洪流。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及英、法、德、意等国工人阶级也发表通电，以示支持。

从一月十二日起，中、英双方就汉浔案问题开始谈判，主要谈判人员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英国代表阿马利。英帝国主义一面谈判，一面调大批军队来华，继续侵犯我主权。我谈判代表在各界群众斗争的强力推动下，执行了革命的外交政策，向英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并宣布谈判中止。英帝国主义不得不让步，来华英军大部分去香港，并于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分别签署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和“收回九江租界之协定”，汉口、九江无条件交还中国。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选自《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作者：于桂芬）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背景介绍

随着农村大革命的兴起，围绕着农民运动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恶毒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污蔑农民运动是“过火”了，说农民运动妨碍国民政府税收，造成国民政府财政困难；说工农运动扰害了国民革命军的后方等等，把一切罪名全部扣到革命农民头上。总之，他们认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糟

得很”。他们还制造舆论鼓动土豪劣绅反攻倒算。湖南湘乡的土豪劣绅还组织“保产党”和“暗杀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湖北有的县份反动势力勾结土匪，组织反革命武装。专门屠杀农会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也被这一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吓住了，他们倒向地主阶级一边，对农民运动进行种种责难，说农民运动“越轨”、“胡闹”、“太过份”了，并且以破裂统一战线来威胁共产党，要共产党让步。

在湖北，各种反革命势力也纷纷向农民大举进攻。他们不仅对农民协会大肆造谣诬蔑，更纠集土匪、流氓组织反革命武装，屠杀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例如沔阳的“硬肚会”惨杀农民 50 余人、天门土豪勾结土匪惨杀农民 20 余人、阳新的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竟用煤油活活烧死湖北省农协特派员、县农协秘书等 9 人。

反革命公开对农民运动发动进攻了，党是否坚决领导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决定着农民运动的前途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命运，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党如能坚决领导农民革命，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就能得到农民这个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争取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却被当时猛烈发展的农民运动所吓倒，被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但不敢起来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反而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于左倾”。还在全国农民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陈独秀就在他起草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中，大喊农民运动过“左”了。他反对农民的革命政权，主张用一种改良的绅权（所谓“正绅”）去代替旧绅权（劣绅）。对于农民武装，他认为“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而且只能“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同时，反对农民武装因权力的关系与各方面（即豪绅方面）的冲突，把农民的武装限制在地主权力所容许的“客观限度”以内。他提出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乡村联合战线”，对“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也要使他中立。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革命前土豪劣绅所操纵的机关）居于调停地位。总之，陈独秀是要制止农民为取得权力而斗争，以保持地主的权力。当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迁就资产阶级，就跟在国民党右派后面压制农民运动。

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相反，毛泽东等人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坚决支持农村的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央特别会议上发表正确的意见，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为了用事实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难和责骂，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之后，又向党中央写信反映了自己的意见。1927 年 3 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阐明了党对农民运动的正确纲领。

材料：

- 寒夜中的一声春雷
- 瞿秋白肯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

材料一　寒夜中的一声春雷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记

历史是最公正的。谁能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和引导时代潮流，后人看得清清楚楚。当年，毛泽东所成就的重要革命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诞生面世，就是一声时代春雷，但它却经历了一个极曲折的过程。

——编者

1

北伐开始后，毛泽东空前繁忙，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上层工作。1926 年 10 月，他在广州开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后，即奉中共中央之命，于 11 月，东赴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 月下旬，又南赴江西南昌视察。视察途中，又接中共中央通知，于 12 月，西赴武汉，参加特别会议。一到武汉，就听到对农民运动的一片责难之声，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直接听到总书记陈独秀对农民运动恣意攻击，因而十分不满。但他没有与陈独秀争论下去。为了取得对农运的第一手资料，以事实击退党内外攻击农运的反革命逆流，捍卫农运，捍卫革命，将大革命推向深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下手中的各种重要工作，到农运最发达的故乡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

1927 年 1 月 4 日，正是隆冬之际，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斜背一把雨伞，脚穿布鞋，在戴述人等人的陪同下，迎着凛冽寒风，从长沙出发，下乡考察了。从 1927 年元月 4 日开始到 2 月 5 日结束，毛泽东总共用了 32 天的时间，顶风冒雪，跋山涉水，徒步行程 1400 公里，先后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 5 个县的农民运动。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会、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并按事先列出的提纲，口问手记，展开同志式的讨论。在考察中，他还广泛接触了广大农民群众，并深入到他们的家庭，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27 年 2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座落在长沙船山学社后门的望麓园。毛泽东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整理调查资料；妻子杨开慧同志也不顾有孕在身，

生产在即，满腔热情地帮助抄写，分类誊清。经过几天奋战，毛泽东终于在杨开慧的帮助下，迅速整理出了一个初稿。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返回武汉，住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近都府堤41号。2月16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里，首先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首先严肃地指出："我这一次到湘潭等县，作了三十二天的调查，所见所闻几乎与所在长沙听的全不相同，感到党过去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有相当的错误作法。"接着，详细地列举了中央在八个方面的右倾错误，强调指出："现在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问题上的表示，都不能与群众的情绪相符合，K·M·T更是如此，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他告诉中央，他将在三四月内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交党中央。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奋战，这篇凝结着毛泽东夫妇心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之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在一片责难农民运动的喧嚣声中，于1927年3月上旬，象一声春雷轰鸣，胜利诞生了。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报告》没有在党中央总书记那里得到共鸣。在上海的陈独秀看了《报告》后，觉得《报告》处处与他的右倾思想相抵触，甚为不满。他对《报告》的态度十分冷淡，搁置不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只同意在1927年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经济理论刊物《向导》第191期上，刊登了《报告》的后一部分14件大事，而对报告的核心部分主导部分——前一部分，则拒绝刊登。为了扩大影响，毛泽东又将《报告》寄送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汉口国民日报》，又被禁止发表。《报告》的影响，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党外国民党右派的阻挠下，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2

就在这时，1927年3月中旬，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后补选的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同志，为筹备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由上海来到武汉，住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一楼。瞿秋白幼时接触过农民，深知农民之苦。参加革命后一贯重视农民问题，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时，在他所起草的党纲草案中，他就提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科学论断。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1926年8月，他在广州演讲《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就进一步指出当时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及彭述之均不赞成瞿秋白的正确看法，在中央常委会上，常常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瞿秋白在武汉读到了毛泽东的《报告》全文之后，很是兴奋，对毛泽东的观点倍加赞赏。当得知《向导》不愿全文发表《报告》时，深表不满；当得知《汉口国民日报》又拒绝刊登时，更是气愤："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经过斗争，瞿秋白决定以党的名义，全文发表。并决定由党在武汉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局赶快排印出来，出版单行本，发给党内同志。

瞿秋白对《报告》极端重视，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以抱病之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于1927年4月11日深夜，特给《报告》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序言总共1500多字。序言开头，首先爱憎分明地指出："'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的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

瞿秋白在序言的结尾，大声疾呼地向人们发出了号召："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当瞿秋白为《报告》题序的战斗之笔，搁到桌面之后，时钟已悄悄跨过了4月11日，指向4月12日凌晨两点了。就在这之后不几个小时内，被毛泽东在《报告》中点了名的蒋介石，悍然撕去了革命的外衣，露出了狰狞的反革命面目，在上海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以血淋淋的事实宣告了陈独秀以牺牲工农根本利益换取蒋介石向左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当天晚上，正在上海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突然接到一个从武汉拍来的电报："秋白病垂危，立即动身到汉。"并同时收到一张到武汉的船票。杨之华在4月13日上午参加了上海工人反击蒋介石的抗议示威后，于下午提着小提箱，离开了战斗的上海，怀着忧虑，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

瞿秋白见到杨之华愉快地微笑道："我们离别一个月的过程中，革命进展比一年还快。"然后走到书桌旁，以极

迅速的动作，从抽屉里取出三本文件，并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他递给杨的第一本文件，就是拟定出版单行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一篇好文章，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瞿秋白停顿了一下，忽然气愤地言道："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党报——日报，你看，这样的好材料，却不准宣传，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自己有党报，该宣传的及时宣传，这对革命有很大的作用。可是，出版党的日报这样重要的事，至今还不能解决。"流露出了对陈独秀、彭述之不重视党报建设的极大不满。

之华到武汉后，一天深夜，瞿秋白开会回来，急匆匆地在楼下叫醒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羊牧之，递给他一份厚厚的文件(即《报告》)，说了声"单独刊印"。羊牧之未领会到文件的重要性，"等闲视之"，第2天受到瞿秋白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终于在瞿秋白同志的大力赞助下，迅速出版了单行本，并迅速发给了党内同志。

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印行之后，住在都府堤寓所的毛泽东正在卧病之中。毛泽东手拿《报告》单行本，激动不已，对瞿秋白同志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表感谢之意，中共五大之后，一天夜晚，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过江来到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瞿秋白的寓所。

秋白与毛泽东，共事已非一日，他们既一同参加过中共中央会议，又一同参加过国民党中央会议，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在同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秋白对毛泽东印象很好，曾情不自禁地在好友羊牧之面前夸奖毛泽东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瞿秋白的好友张太雷同志也曾钦佩地说："还是这位湖南辣子来劲。"因此，瞿秋白见毛泽东到来后，急忙丢下手中的活，兴奋地请他落座，递上纸烟，自己也陪燃了一支。

秋白关切地问道："润之，(毛泽东的字)，你不是有病么？深夜跑这么远？"

"我今天特为致谢而来，何敢言远？"

秋白不解："啊呀，此话怎么讲？"

"我那本小册子，倘不蒙君大力相助，何能刊行印刷？"毛泽东很动情。

"言重了，言重了。这是应该的。"

"还有那篇序言写得真好，热情洋溢！"毛泽东赞扬完，便高声朗诵起其中的一段话："中国革命者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哪有你这位湖南辣子来劲，'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瞿秋白唱和了毛泽东《报告》中的两句精彩之笔。

说罢，两人都同时感奋得大笑起来了。

在那危不堪言的险恶局势下，在那一片斥骂农运的聒噪声中，毛泽东、瞿秋白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革命家的笑声，有如寒夜中的滚滚春雷，预示着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必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选自《党史纵横》92年1期，作者　汤胜利)

材料二　瞿秋白肯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瞿秋白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确信农民的伟大力量和对革命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都比较早地注重研究农民问题，写过许多论述农民问题的颇有影响的著作，并在这个问题上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瞿秋白支持毛泽东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共同思想基础。瞿秋白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充分肯定和大力传播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1926年秋至1927年春，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大革命。在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面前，陈独秀等人指责农运"过火"，实行种种限制和阻碍。1926年，陈独秀在中共四届三中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运过'左'"；限制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带政治色彩"；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这个决议案下达后，党内外许多人反映太古。瞿秋白在听取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汇报这一情况时，让杨之华从抽屉里把他的文件夹拿出来，从中抽出毛泽东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一文，递给羊牧之看。羊牧之看完后，瞿秋白对他说："要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等人规定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目前只能宣传，不能实行。会上，李维汉汇报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立即着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是，遭到陈独秀、鲍罗廷的反对。会后，陈独秀等人甚至强令一些地方党组织把充当农运先锋的贫农骨干分子当作"痞子"从农会清洗出去。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12月下旬毛泽东应邀出席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他指导下，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等44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会后，他于翌年1月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湖南农运。2月16日，他写

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从 2 月 17 日起,他用三四天时间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 1927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3 日,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连载;3 月 12 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 119 期也刊载了一部分。由于这个报告具有鲜明的革命性,陈独秀、彭述之害怕"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立即下令《向导》停止刊载。但是,报告却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特别是农运骨干的热烈欢迎。瞿秋白读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对报告内容十分赞赏,对陈独秀等人压制发表这篇文章则十分气愤。他对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章里痛斥党内外那些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明确表示:"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毅然决定把这个报告出版单行本,并于 4 月 11 日连夜为报告出版撰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农民革命,认为"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他呼吁:"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不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连同瞿秋白写的序言,由中共中央在汉口主办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单行本。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时,瞿秋白同她一见面,就拿着这本小册子高兴地对她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接着,他又忿忿不平地说:"你看,这样的好材料,却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最后,他深情地说:"你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寥寥数语,生动地表达了瞿秋白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革命檄文的赞赏之情。

(选自《人物》93 年 6 期,作者:刘武生)

材料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

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赣州惨案

背景介绍

赣州惨案即赣州总工会委员会兼江西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陈赞贤惨遭杀害的事件。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江西的反革命势力愈益猖獗。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指使其爪牙，在江西各地不断制造事端，摧残工农革命运动。1926年10月，陈赞贤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和黄埔军校学生萧韶、钟友千3人，被派到江西赣州领导工人运动。同年12月30日，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工会店员与二女师因看演新剧发生纠纷。该校校长欧阳魁等，以此为借口，召集各团体会议，公然要解散工会，肆意辱骂工人，并企图扣押出席会议的总工会代表钟友千、萧韶。随后，欧阳魁又勾结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摧残工人运动。倪弼是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一到赣州，便指使其部下打骂工人，干涉工会。1927年1月26日，倪弼召集会议，阴谋逮捕陈、钟、萧3人，幸陈等3人事前闻及，未曾出席。倪便派兵包围赣州总工会，逮捕总工会办事员4人，并扣押总工会出席代表萧诗友。同时又派兵驻守城门，通缉陈等3人；又派兵驻守邮电局，检查总工会文电。2月12日，赣州各工会代表团发表《请愿书》，历数倪弼一伙的反动行径，提出撤换倪弼；取消对陈等3人的通缉令；释放被捕工人；保障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等条件。但是，倪弼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有恃无恐，与其秘书胡启儒，勾结省党部工人部特派员贺其钛等，于3月6日晚，派军队到赣州总工会，将陈赞贤押到县公署，不经审问，秘密枪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惨案发生后，赣州、南昌、武汉等地，举行了声讨与追悼大会。各界纷纷发表通电，要求严惩凶犯，枪毙倪弼等人。3月13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的通电，要求"严行查办"，并指出摧残工运事件不断发生，"实为国民革命前途莫大危险"。18日，江西省组织陈赞贤惨案委员会，派请愿团赴武汉请愿。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信号，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奏。

材料：

- 赣州惨案经过
- 赣州工潮与陈赞贤被杀

材料一　赣州惨案经过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等执行蒋介石的密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这是统一战线内部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蒋介石集团公开屠杀共产党人、背叛革命的起点。

赣州，是江西省的第二大城市，历史悠久，地势险要，是赣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陈赞贤等共产党人来到赣州之前，这里反动军阀实行野蛮政治，土豪

劣绅横行，国家主义派活跃。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加强共产党对赣州和赣南革命运动的指导，陈赞贤被派回赣州工作。

陈赞贤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在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就学时，就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五年七月，由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入党后，他无论是在广东南雄任总工会委员长，还是在北伐军中（第二军第五师政治部）做宣传科长，或是回家乡南康任县长，都是以对革命的赤诚，卓越的才干，受到革命群众的爱戴和上级的好评。

陈赞贤来到赣州后，首先利用江西地方军队之间的矛盾，策动了赖世璜部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赶走了江西军阀杨池生、杨如轩，为北伐军进军江西做了积极贡献。一九二六年十月，陈赞贤被任命为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南党务及十七县工农运动指导员，同时，奉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命，筹建赣州总工会，于是他便全力领导赣州、赣县的革命运动。他组织力量进行革命宣传，出版了赣州《国民日报》和《青年之路》，宣传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以提高群众的觉悟。

陈赞贤在赣州的革命活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钦佩，但却受到各种反动分子的仇视，他们或是以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或是用谩骂攻击和威胁，但都不能使陈赞贤动摇。当蒋介石进入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时，赣南反动分子派代表到南昌，向蒋介石鸣冤叫屈，大肆造谣污蔑"赣州工人行凶"，"逼死人命"，"赣南也将暴动"等等。蒋介石为了打击革命力量，就以这些诬告为借口，下决心要扑灭赣州的工人运动。他调新编第一师"绥靖赣南"，以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倪弼（新一师党代表）和AB团骨干分子郭巩来赣，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倪弼、郭巩等来到赣州，倪弼"一到赣州，外间即说他受了商民协会二十万元的贿赂，作扑灭赣州工人运动之报酬。"他首先解散了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任郭巩为县长。接着又阴谋篡夺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领导权。倪弼在基层工会主席会上煽动说："赣州的工人甚好，各位也甚好，就是陈赞贤不好，你等如打到陈赞贤，我当指导你等。"但不管倪弼怎样造谣煽动，赣州工人始终爱戴拥护陈赞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洋货业几个店员工人去赣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看戏被拒，在校门外写了攻击女师学生的文字，这本是个别工人一时的错误行动，倪弼却乘机扩大事态，指使"二女师"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欧阳魁制造"二女师"事件，诬蔑陈赞贤怂恿工人侮辱女学生，并组织一些女学生上街游行，发出宣言通电，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工人们"为顾全革命利益，犹忍辱含痛，并找出在女师涂壁的店员，关禁一月有余，欧阳魁等犹嫌不足，又勾结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摧残工人运动。"一月二十六日晚，倪弼派兵包围总工会，搜捕陈赞贤等，幸而陈赞贤早已闻讯，当天化装成伙夫，在群众的掩护下，走出赣州城，率赣州工人代表团前往南昌参加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并向总司令部请愿去了。

赣州事件发生后，全国总工会多次函请总司令部查办倪弼。新编第一师自团党代表以下至干部军官，均愤倪之横暴，乃招集党务会议，倪弼见此情形便事先招集军事会议，席间有军官质问倪弼昨日的行为，是否有违总理的主张，倪弼便喝令卫兵捆起，并强令二人退席，又指一团党代表有鼓动嫌疑，也将其捆起，因此激起全体军官愤怒，乃群起打倪，同时有二百三十人联名电总司令部，请将倪撤差严办。当时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曾三次报呈蒋介石把倪弼调离赣州，蒋介石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又亲自接见倪弼，给予密令，并增派贺其钺和一批反动军官去赣。这样，倪弼等人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陈赞贤在南昌参加了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他时刻挂念着赣州的工人群众，想到赣州复杂紧张的斗争，会议没有结束就回到了赣州。三月一日，赣州总工会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陈赞贤在会上传达了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精神，介绍了赣州工人在南昌请愿斗争经过，明确表示："此次回到赣州，坚决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任何艰险，不能阻挠……"。大会在"拥护陈赞贤委员长"、"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声中结束，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倪弼等深知陈赞贤在工人中的威信，十分恐惧，急欲通过迫害陈赞贤来扑灭赣州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新一师的反动军官师政治部秘书胡启儒率兵将陈赞贤绑架到县政府。倪弼、贺其钺、郭巩、刘甲第等见陈赞贤后，如狼似虎地嚎叫："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到赣州来办工会，知不知罪？"陈赞贤据理回答：'我是奉总工会的命令，并得到国民政府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同意来的。"他还义正词严地说："我从事工农革命运动，根本没有犯罪，你们欺压民众，破坏革命，才是犯了滔天大罪。"倪弼等暴跳如雷，再三逼迫陈赞贤签字解散总工会，陈赞贤激昂慷慨地表示："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倪弼仗恃蒋介石"改组赣州总工会，严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密令，凶神恶煞地说："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话音刚落，反动军官胡启儒、陆剑鸣首先向陈赞贤开枪，接着倪、贺、郭等十八个刽子手一起朝陈赞贤开枪，陈赞贤临终前高呼口号："打倒新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赞贤惨遭杀害的噩耗传出后，赣州人民无限悲愤。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县政府抬出陈赞贤烈士的遗体，拍摄照片，换下血衣，买棺装殓。赣州总工会领导全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三天。赣州工人组织了数百人的"请愿代表团"，分赴南昌、武汉两地请愿，提出惩办凶手，改编新一师，恢复工会组织，严禁干涉工人运动，公祭烈士，抚恤烈士家属等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工农的支持和声援。

（选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作者：孙启泰）

材料二 赣州工潮与陈赞贤被杀

一九二六年冬，正当赣南革命运动普遍发展，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省里派了梁有华同志来担任赣县的工作，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又新派来一个群众运动指导员熊国珍（兴国人）来到赣州。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掀起赣州工潮。

赣州工潮就是布匹店工人与店主的劳资纠纷。

产生这个工潮的原因：

第一，党的政策有过左倾向。在赣州城理发工人增加工资斗争中，原工会委员长钟友千（后由陈赞贤接任）说，资本家如不增加工资，剃头的时候可用剃刀割死他。这样一句幼稚话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借口，使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来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

接着，钱业店罢工获得胜利，从每月十几元工资增加到十倍以上，变成每月一百四、五十元。在当时增加这样多的工资是过左的。因此，资本家对工人说："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工人。"这种过左的政策却造成了严重后果：就是剥削阶级对工农的剥削加重，间接地使工农群众的生活更苦；工资水准突出的高，影响到其它工会工资不能解决。这种弊从利生的过左政策当时不是自觉的。

第二，接着这一胜利，就是洋货绸缎布店联合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毫无问题，洋货绸缎店主是大商人，可以接受钱工会条件，增加几倍以上的工资。但是，布匹店店主就不同了，不能接受工人过高要求。陈赞贤同志在思想上犯有不自觉的认识上的错误。

当时，党已发觉陈赞贤同志和赣州工潮的"左"倾错误，决定要分别解决。但是，陈赞贤同志固执己见。虽然陈赞贤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肯执行党的决定，使结果适得其反。当时党要陈离开赣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陈不接受省委意见，又私自回到赣州去。这是更不应该的。

由于这个工潮的发生，广州来了李福林，主张武力解决。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胡启儒从广州来到赣州，抓住这一事实，联合赣州反动势力宣言：打倒赤色工会的陈赞贤。接着反革命分子从左派手中夺取新编第一师的部分领导权。

陈赞贤同志为工人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博得全国广大群众的追悼和纪念。这是工人阶级的光荣，也是赣南党的光荣。

杀害陈赞贤同志的凶手，是把持国民党省党部的AB团头子段锡鹏、周利生。所以，在追悼陈的大会后，示威群众在朱德同志领导的教导团掩护下，冲入国民党省党部，高喊打倒AB团头子段锡鹏、周利生，并抓到了一个程天放在南昌游街示众。

（选自《回忆中央苏区》，作者：陈奇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背景介绍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立即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策划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无耻地向帝国主义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帝国主义则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两万多名军队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买办阶级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他屠杀革命群众的经费，并答应在政变以后再给蒋介石三千万元作为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资本。黄金荣、杜月笙等反动流氓帮会头子答应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出打手。这样，蒋介石便加速了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布置。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举行秘密会议，策划立即动手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也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在会上力主用暴力"清党"，汪精卫因没有实力而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蒋介石还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腕，他一面在暗地里加紧准备屠杀革命人民，步步进逼；一面则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借以麻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蒋介石反革命伎俩的欺骗下，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完全放松了思想武装，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作辩护，并表示对蒋介石的信任。这就掩盖了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欺骗了革命人民，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

蒋介石在作好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后，于4月11日密令"清党"。当晚，他在上海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革命群众大举屠杀。4月12日，蒋介石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蒋介石的军队即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并和流氓打手一起屠杀工人，死伤300余人。13日上午，上海总

工会召开了 20 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下午，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提出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祸首、肃清流氓等要求。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100 多人死亡，受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市游街的工人也遭反动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对上海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从 4 月 12 日至 15 日，工人被屠杀者 300 余人，被捕者 500 余人，逃亡失踪者 5000 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共统一战线发生分化，蒋介石公开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局部失败，革命进入了紧急阶段。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蒋家王朝。这样，中国暂时形成了武汉革命政权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北京张作霖政权三角鼎立的局面。

材料：

- 四月十二日之变
- 蒋担保不缴纠察队一枪一械
-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 在白色恐怖下
- 铮铮铁骨
- 认识我们唯一的敌人
-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和伤亡人数统计

材料一　四月十二日之变

蒋介石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开始背叛革命，至北伐军克复南昌以后，即肆无忌惮地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工农运动。他以反共为南北妥协的条件，以放弃联俄为同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妥协的条件，全国各种反动政治集团如政学系、研究系、国家主义派、联治派与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代表在南昌非常活跃，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双料走狗王正廷、黄郛成为蒋介石的贵宾。蒋介石为了讨好一切反革命的派系，在三月七日南昌总理联合纪念周上讲话，提出他要制裁共产党。三月三十日枪毙《经济侵略下的中国》著者漆树棻为镇压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讯号，作为讨好帝国主义的见面礼。蒋介石的阴谋是早已开始暴露出来了，共产党人在当时还没有甚么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及时提高警惕，作适当的准备，以至铸成大错。

蒋介石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决心，从三月二十事变一直到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已经证明是急转直下无可挽救的局面，何以又拖了差不多一年才同共产党翻脸呢？共产党迁就他是一个原因，因为他同共产党人共事多年，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一个力量，他也想拖住一些共产党人不放。一九二六年九、十月之交，蒋介石第一次进攻南昌吃了一个败仗，他所用的主力嫡系王柏龄统率的第一师全军覆灭，王柏龄逃了，党代表缪斌也逃了。这个师是三月二十事变之后整训出来的，上、中、下各级干部是清一色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为骨干的所谓纯粹国民党员，他感觉到同是一个作战部队，到了没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时，就这样不堪一击了。大敌当前，他为了利用共产党人的战斗力量，才把他的反共计划延缓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第二次进攻南昌是调集二军、六军、七军为前驱。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六军党代表是林伯渠，第七军顾问是马迈也夫，这三个军的各级干部都配备了政工人员督战和维持军风纪。这些政工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在行军同驻防时维持军风纪，朝气蓬勃，颇得民心；在火线上英勇善战，所向无前，官兵一体，士气旺盛。在这一次的会战，才打下了南昌，消灭了孙传芳在江西方面的主力，俘获军师长唐福山、张凤岐、蒋镇臣等高级将领，振作了蒋介石的军威、瓦解了北洋军队的士气。接着安徽北洋军队陈调元、白宝山等投了降，浙江方面的北洋军队夏超、陈仪、周凤岐等也相继投降，东南半壁已成传檄而定之势。上海即在北伐军的包围中了。但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直鲁军毕庶澄、李宝章等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作困兽犹斗之势。蒋介石是采取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针，国民党右派张继、吴稚晖、邹鲁、居正等又奔走于蒋介石与毕庶澄、李宝章之间，蒋介石欲以反共为条件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平进入上海。他一面派杨杏佛同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当局打交道，派张继等同李宝章、毕庶澄打交道，派杨虎用青洪帮的班底组织特务处，从事破坏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工会、进步人士的阴谋活动。他对青帮头子黄金荣递门生帖子，对杜月笙、张啸林认同门兄弟，他想利用上海的一切恶劣势力来对付共产党，求得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谅解进入上海。在他们蝇营狗苟的时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领导上海各工会、各人民团体行动起来，于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市总工会下令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工人的政治要求，响应北伐军。在工人与军警的搏斗中，十八日夜晚上海总工会作出总同盟罢工的决定，发布总同盟罢工的命令。

白色恐怖的气氛，弥漫了上海，工人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冒险犯难，进行夺取军警武装来武装自己，斗争惨烈，工人的死伤更重。二十二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士兵，鉴于上海军警野蛮屠杀工人，同情工人的反抗，未得长官命令，向军警开炮为工人助战。虽然事出海军士兵的

自发运动，没有展开工人与海军联合斗争的局面，但这几声炮响，惊动了敌军，有草木皆兵之感，瓦解了敌军的士气，有的敌军士兵在巷战中放下了武器，在这次战斗中工人夺获与收获敌军步枪三千余枝，机关枪数十架，这就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的来源与组织的开始。在战斗的过程中，虽然是工人占优势，但是工人只有组织的训练，没有长期作战的训练，战争拖长了，工人所需要的粮秣与弹药都成问题。总同盟罢工运动虽然逐日有发展，因为准备不够充实，死伤日有增加，工人与北伐军联系不上，而敌军有强大的帝国主义作后援，不是短时期可以取得战果，至二十四日迫于形势，总工会自动宣布复工。

上海总工会并提出政治口号如下：(1)打倒李宝章！(2)驱逐直鲁军！(3)响应北伐军！(4)拥护国民政府！(5)群众暴动，夺取武装！(6)杀反动派！(7)为死者复仇！(8)建立市民代表政府！(9)撤退外国兵！收回租界！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二月二十四日发出《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二十五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于二月二十日发出《共产党告上海市民书》，提出十一项政治纲领。上海工人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军阀而外，并提出"武装的要求"和"政权的要求"。共产党方面虽然同蒋介石的分歧很大，总以为他不过是一个野心很大、权利欲望很高的人，至少在北伐战争中他不敢也不能背叛革命。当时的局势，北伐军总是革命的军队，共产党领导上海的工人从里面打出去，北伐军从外面打进来，杀一个里应外合，对北伐战争总是有利的。当时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言论行动有指责，而还是以同志待他和他所统率的军队。在蒋介石徘徊江浙、按兵不敢进入上海的关头，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又起，发起夺取武装消灭军阀的斗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于三月二十日又开始同直鲁军进行武装斗争，血战两昼夜，才把盘踞上海的直鲁军根本消灭。在血战的过程当中，工人纠察队发挥了无比的英勇战斗精神，掌握了全市水电及交通运输各机构。工人阶级的威力，不仅是压倒了直鲁军，即停泊在黄浦江上约九十余艘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兵舰，各国租界中约二万余人的武装军警都为之束手无策，胆战心惊地叫道："工人疯狂了！"工人纠察队及革命民众占领上海以后，总工会一面派代表欢迎北伐军，一面组织市民政府委员会，选举的委员有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未到职）、钮永建（辞职后改选北伐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王晓籁、林钧、侯绍裘、郑毓秀（辞职后补选叶惠钧）、谢福生（辞职后补选赵南公）、陈光甫（辞职后补选孙科）、王汉良、李柏之（上海总工会）、何洛（学生）、丁晓先、陆文韶（大学教授）、王景云（工人）、顾顺章（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后来叛变了）、杨杏佛（孙传芳委任的淞沪市政督办，蒋介石委任的国民党政治分会的委员）。这一次的市政委员会的选举虽然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选出来的，但是是完全照顾联合战线的精神，国民党的人数在一半以上，共产党的人数不及半数，这证明共产党对国民党是尊重的，对群众是大公无私的，对北伐战争，贡献了力量。但是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共产党的血战功劳。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情，反而招致蒋介石的嫉妒。蒋介石进驻龙华以后。大骂共产党收回租界的主张，大骂工人纠察队的战斗行动，他用以杨虎为首的特务收买流氓、地痞、工贼，组织各种各样的假人民团体，如以工贼童理璋、卢士英、郭寄生、袁正道等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以醒狮派组织的"新青年会"、"学生代表会"，以特务及青洪帮组织的"上海工界统一委员会"，以及"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等所谓人民团体与国民党的上海政治分会，都是由蒋介石口袋里拿出来的反共工具。当时共产党鉴于形势的险恶及反革命势力的阴谋活动，乃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及《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政治局势已到了紧急的关头，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反蒋，并且是坚决反蒋，已于三月二十三日由武汉政府明令罢免蒋介石。蒋介石尤其是坚决反共，他背叛革命的部署既定，于四月十二日宣布"清党"。共产党的反蒋是政治宣传的多，实际行动的少，即武汉政府的讨伐会，也是徒托空言；而蒋介石的反共，却是实际行动，血腥的镇压。在江西、广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及上海市，实行屠杀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屠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上海方面于四月十二日上午，蒋介石派出大批特务人员，在法租界会同法国捕房，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及路过上海的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捕获，送龙华未经审讯，秘密枪决；同时派出流氓工贼配合刘峙的第二师、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分向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向工人纠察队进攻；又派陈群、潘宜之、罗家伦、吴倚沧等，率领特务及军队多人，向西门林荫路上海特别市党部进行包围，欲作一网打尽之计。他们叫嚣着一定要杀尽共产党员，指名捉拿王守谦、朱义权、史鹏展、余泽鹏、杨贤江等。一时白色恐怖弥漫了上海。租界与华界在镇压共产党的关系上是打成一片，各国巡捕房包探可以越界捉人，蒋介石的特务可以自由出入租界逮捕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四月十三日，闸北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屠杀工人与市民，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游行群众一百六十四人，伤千余人。工人纠察队被二十六军包围缴械，颇有伤亡，其余在各马路、各旅馆、各住宅中捕杀的革命民众与和平居民不计其数。这样的白色恐怖，延长了很久的时间，共产党方面的牺牲很大。约在五月中旬前后，蒋介石的特务破获了上海山阴路恒丰里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机关，捕去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陈延年、许白昊等多人。据传闻捕捉陈延年是蒋介石的特务处长杨虎亲自

带队围捕，陈延年鉴于形势危急，知不可免，奋力拒捕，与特务发生格斗，以众寡不敌，陈延年的头被打破了，牙齿被打掉了，伤势甚重被俘。当时在上海有几个没有甚么政治关系的北大同学，以陈延年与吴稚晖有师生之谊，又是世交，为急救人命的关系，联名写信给吴稚晖，请他作保送陈延年到医院治疗，再设法营救，这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吴稚晖接着这一封信，即写了一封复信，在国民党右派的报上发表出来，大意是说：象陈延年这样的一个人，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到医院是多事，既然已经打伤了，倒不如杀了省事。吴稚晖是这样轻松愉快地投蒋介石之所好，赞扬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陈延年是壮烈地牺牲了，一时北大同学与吴稚晖的朋友都责骂他，都说吴稚晖是人面狗心！每逢在谈话中提到吴稚晖都以"吴老狗"代之而不名，这个称呼一直到终国民党之世，凡是正义的人士都没有忘记吴稚晖的这个徽号："吴老狗"。

安体诚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四月十二日之变，好容易由广州逃回，路过上海，在旅馆中以形迹可疑被捕，由法国巡捕房送龙华，未经审讯，执行枪决。

四月十二日之变，在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之内，各省市的白色恐怖都是一样的，而屠杀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除上海而外，以广州为最甚。据事后所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纲，于四月十五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黄埔学生被捕者数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军官学校政治教官萧楚女患肺病，正在东山医院养病，被军警提出挂在汽车后面拖死。李森（即李启汉）于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榨粉街被捕。因李森在全国总工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负重要责任，敌人对李森威迫利诱，希望由李森得到更多的线索，缉捕更多的共产党人与工会重要负责同志，李森不为所动，后不知何时将李森枪决了。

蒋介石这一背叛革命的阴谋，与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是有联系的。上海四月十二日之变，先由各帝国主义连同中国企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等，共出一千五百万元为蒋介石解决工人纠察队之奖金，此项巨款蒋介石得一千二百万元，白崇禧得一百五十万元，周凤岐等得一百万元，其余五十万元是杨虎、陈群、潘宜之等分了一大部分，雇用青洪帮流氓地痞搞特务活动用去了一小部分，蒋介石之下流，可想而知了。

（选自《包惠僧回忆录》）

材料二　蒋担保不缴纠察队一枪一械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抵沪后，昨日（二十八日）上海总工会特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往谒于徐家汇交涉使署。蒋介石亲出接见。首由赵陈述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之经过，蒋氏颇为赞许。次说传闻有将闸北薛岳师长调往他处，由第二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消息，请总司令一言以释群疑。蒋答：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复由赵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事情，蒋答此事当由余严行停止，尽可放心。

（选自《申报》，1927年3月29日）

材料三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1927年4月5日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既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全作，如兄弟般亲密，

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材料四　在白色恐怖下

一九二七年三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校党的负责人。有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还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终于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在上海大肆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清党"，扼杀革命力量。此后，内战代替了国共合作，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五月，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

为粉碎夏斗寅、杨森的进攻，由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及武昌农讲所的师生组成的"中央独立师"，配合主力部队出城击敌，归叶挺统一指挥。我们边行军。边教练作战动作。五月十六日，中央独立师赶到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军范绍曾一部包围、击溃。接着，实行追击，经金口、紫阳、丁泗桥、通海口等地，和杨森的第九师又打了一仗，把人称"川老鼠"的杨森部击溃。我们队里有个学生在川军当过兵，他协助我指挥。我们冲进街里，"川老鼠"都跑了；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叶挺的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也将夏斗寅部打垮。汪精卫等主张与夏斗寅议和，我们遂奉令返回武汉。

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我知道，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有的逃跑，有的叛变，有的消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张发奎当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称与共产党"合作到底"，所以我们的处境还比较安全。月底，部队开往九江。接着是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张发奎变了卦。那天夜里，他突然集合军官讲话，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部队不能再呆下去，连夜出去，转回武汉，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到了原来接头的地方，党的机关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我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又转了两天，仍无着落，便决心去上海，找党中央联系。我那时入党不久，也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住址。因为没有办法，又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便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我在黄埔江边找了一家旅馆——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心想，万一找不到的话，只身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天，我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问我到上海干什么？我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他叫我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来找我，接上了关系。

我，终于找到了党。

（选自《历史的回顾》作者：徐向前）

材料五　铮铮铁骨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着白色恐怖的悲惨世界。蒋介石四一二公开背叛革命，密令"清党"，刮起了一股屠杀革命人民的阴风。之后，汪精卫七一五背叛，宁汉合流。早已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军阀及其走狗，如狼似虎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猛扑了过来。他们大声咆哮："凡是参加了大革命的人，格杀勿论，""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于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被逮捕拘禁！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党、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共屠杀了三十一万工农群众，其中有二万六千多名共产党员。湖北省工委工作人员几乎捕尽；广州以中山舰运载"赤化分子"为名，将数千人活活沉入海底；许克祥在湖南焚烧了几个村县，杀戮农民千余人；国民党在广州暴动后的三天之内，便杀害了五千七百多人。更令人发指的是反动派残害革命者施用的种种酷刑：砍头、剖腹、挖心、挖眼珠、割舌头、灌辣椒汤、斩手足。有的被反动派用浸透油的棉絮捆扎起来，倒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在受尽酷刑和侮辱之后，被反动

派用钢丝穿透两个乳房，再行枪杀……真是无毒不施，残忍至极。

敌人还将种种酷刑加在身陷牢狱的共产党人身上，妄图迫使战士屈膝投降。他们哪里知道，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敌人可以砍下战士的头颅，却不能动摇战士的信仰。因为共产主义思想铸造的灵魂能够战胜一切不幸和痛苦，他们都有一副铁打的筋骨。

人们永远难忘：

李庠就戮时抗不屈膝，从容席地而坐；

夏明翰的就义诗气壮山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张宝泉新婚不久乃遭毒手。不论敌人施用"科学的刑具"——"九尾猫"，还是施用亚洲式的极野蛮残暴的刑法，虽皮肉脱裂，骨头尽露，他始终没有吐露一点党的机密。

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在狱中三次受刑，宁死不屈。第一次，敌人用竹鞭抽打至上千次，遍体流血，他还笑嘻嘻地说："我为工农利益而革命，是不怕打，不怕杀的。"第二次，敌人用一根大木棍放在杨昭植的膝盖骨上，下面垫上两块砖，令两名刽子手站在木棍的两端用力往下压。杨昭植的腿骨折断了，痛得死去活来，可敌人得到什么呢？一顿痛骂。第三次，惨无人道的敌人将烧得通红的铁桶挂在杨昭植的背上，皮肉烧得"劈拍"响，直至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昏死过去。醒来后，杨昭植咬紧牙关，忍受着巨痛，仍高呼："工农兵团结起来，打倒摧残工农运动的军阀，杀尽豪绅地主。"临刑时，敌人割其耳，刖其鼻，断其手，他还高呼革命口号。杨昭植壮烈牺牲之后，凶残的劣绅和反动商人贿买行刑士兵，又将他的遗体砍成零星小块，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英雄的肉体被消灭了，英雄的精神却永存。

周振祥是无锡农民运动的开创人之一，因领导暴动失败而被捕。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共产党的机关和负责人的姓名，但却无言可录。刽子手乃用刺刀穿其四肢，缚于公堂，然后用五寸长的铁钉钉入十指近甲处。周振祥不招。刽子手再用近尺长的粗针钉入周振祥的双膝，周振祥不从。最后，刽子手让周振祥跪在烧红了的铁链子上，周振祥仍不开口。临刑时，周振祥已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不能辨其本来模样。气息奄奄之中，他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特别值得赞颂的是那些少年共产党人。胡立乐、萧衍、张苏、吴志喜、陈祖武、柯良才……，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小鬼"，天真活泼，英俊可爱。可是当酷刑和死亡严重地威胁着他们年轻的生命时，他们却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十七岁的吴志喜在刑场上发表演说："我为共产党而死，为工农贫民而死，死也甘心……"小小年纪，一身正气，连行刑的士兵也深受感动，不忍开枪，三易其人，才杀死了这位年少的共产党人。陈祖武看去还似幼童，被酷刑逼供昏死数次，终不招供。貌似强大的敌人亦无可奈何。目睹此情此景，虽是国民党狱官也为之叹服。共青团员萧衍年方十六，受到惨绝人寰的酷刑仍不肯供出团的组织，还大声疾呼："要杀老子就杀老子，还审问做什么？"刑场上，他一连被砍三刀，气未绝，惨痛之余还不断高呼："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土豪劣绅！""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还有一位年仅十七的小张苏，在公堂破口大骂国民党反革命，高喊革命口号，吓得敌人胆颤心惊。在押解他赴刑场时，敌人不得不在他的口中放上木棍。

酷刑摧毁不了共产党人的意志，利诱更难收买共产党人的心。二十四岁的湖北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唐鉴，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他和同志谈笑风声，态度从容。国民党官僚劝其投降，他用轻蔑的口吻说："你们是军阀的走狗，我肯来做军阀的走狗的走狗么？"敌人又请他去喝酒，诱他供出某同志的住所。唐鉴怒发冲冠，一手推倒了敌人设置的酒席，厉声道："我就是唐鉴，你要枪毙快点枪毙，不要絮絮叨叨多话！"被捕仅十天，唐鉴就被处以死刑。赴刑之前，他向关在狱中的妻子告别，叫她别哭，并书写了"继续奋斗"四字相赠。

古人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今日共产党人信念如磐、意志似钢，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选自《纵横》84年3期，作者：钟碧惠）

材料六　认识我们唯一的敌人

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

蒋介石

自从我们国民革命军同心一志克复南京之后，至今得不到一个时间，和各位同志欢聚谈话；现在第二期北伐快要开始出发了，趁着没有出发以前，同各位集合一堂，讲几句我时时想与诸同志说的话。

本来我们这一次攻下南京，预定即下命令一直过江，向津浦路前进的；如果当时能照着计划实行，那时是四月一日，到现在只有一个多月，不单可以到了徐州，就是到济南，到北京，也不难的。因为敌人无论奉鲁军或孙传芳的残部，没有一个部队可以同我们作战的；我们自身已在崩溃动摇的时候，碰到我们有主义的军队，自然和摧枯拉朽一样，没有不消灭的，所以我们北伐军出发誓师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明白，目下在中国的军队，随便那一派那一个的部队，都不配做我们的敌手。北洋军阀是不配做我们敌手的，这是我在去年未出发以前，当誓师北伐时，已同各官长同志讲过，并不是现在才讲的。为什么我敢讲这句话呢？因为我们已透切的晓得：军阀的军队是没有主义的，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且没有军纪风纪，处处给人民痛苦，招人民怨恨，这样卖国害民的军队，怎能不失败！所

以我当时有句话，说是北洋军阀那一天遇到我们国民革命军，就是他的军队那一天消灭。这一句话，当时同志听着，或者以为我讲大话；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一生亦不肯讲什么大话。我们国民革命军并不是特别的勇敢厉害，我们更不是有些骄气，目中无人，看不起敌军；我们的军纪风纪不一定完全是好，器械、服装、经费，更比不上敌人，我所以敢说敌人的军队一定不能同我们打仗，是完全以现在革命时代来做标准的，因为军阀的军队，没有纪律，没有主义，不保护人民，不爱护国家，这种军队，就是我们不去打他，他自己也要崩溃消灭的，一碰到我们有主义的军队，那有不失败的道理！所以当时我敢讲"我们革命军在中国里面没有敌手"这句话。果然我们出发不多日，就打下了武汉，后来又打下了江西、福建，现在又打下了浙江、江苏、安徽，占领了南京，真所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完全可以证明无主义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一定要给我们有主义的国民革命军消灭，国民革命军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可是我们为什么到如今还是在南京，还不能按照我们的计划前进，还不能占领济南，直捣北京呢？这里面的情形，想各位已经很明白，就是在武汉的共产党怕我们国民革命就要成功，怕我们国民党就要成功，怕我们三民主义就要实现，共产党没有发展的余地，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党也就要寿终正寝，所以当我们东南没有攻下以前，他便想出种种方法，来搅扰我们，扣留子弹，断我们的接济，沟通敌人，使敌人用全副力量来攻击我们，总要使得我们在东南作战的军队完全消灭，这样他们武汉共产党就可以没有妨碍，共产主义就可以横行中国。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恶劣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呢?因为现在共产党唯一的敌人就是我们国民党，如果我们国民党成功，他们共产党就没有发展的希望；所以他们对于我们国民党没有妥协之可能，我们存在，他们就要消灭，他们存在，就要消灭我们；所以他们非决心打倒我们国民党不可，要打倒国民党非先打倒国民革命军不可，所以他们对于东南，不恤用种种凶狠的方法来败坏我们，阻止我们前进，以致到如今我们还不能依着计划前进，这是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作祟的事实。

现在在本党势力范围之内的共产党，差不多扑灭一大半了，我们就可趁此机会，专心致志的前进，向北方军阀作战，以完成我们北伐的事业。不过有一层各位要明白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在里面捣鬼，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成功很迅速；可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已不是单纯的了，不是单把北洋军阀打倒就可以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现在把北洋军阀打倒之后，还要打倒共产党。因为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是破坏国民革命，阻碍三民主义实行的；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所以现在我们武装同志的责任，也比以前加重，从前打倒了北洋军阀就算完成，现在却还要打倒共产党，打倒武汉的共产政府，才能完成责任。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更加努力，更加奋斗，早日占领徐州济南；不然的时候，我们作战时间延长一点，就难保共产党不来捣我们的乱，来谋害我们的政府。所以这一次各官长出去作战，更要迅速，更要奋斗，到了徐州、济南，再回来同共产党作战！我们真正的敌人还是共产党。刚才已讲北洋军阀不配做我们的敌人，北洋军阀本身已在崩溃，一打就破，随便那一个时候，都可以照我们预定的计划收束战事，我们预定一星期内扫清江北的北洋军阀，一定可以照预定的时间做到，至多也不出三星期之内，一定可以肃清；但是武汉的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的阴谋就天天可以来动摇我们内部，使得我们各种计划不能实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打退北洋军阀的军队，肃清江北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应付武汉的共产党。我们这次出兵，不能不迅速前进，不能不勇气百倍的努力奋斗，一定要把北洋军阀的军队赶快打破，再来解决武汉的共产党，我们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才有确实的保障。如果我们不能消灭武汉共产党，不能肃清长江一带，任他假借名义，另立一个冒牌的政府，混淆国人耳目，那我们有南京的真正国民政府，时时刻刻是可以被动摇的；所以打倒江北的敌人，简直就是打倒武汉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简单的换一句话说，无论打孙传芳打张宗昌打张作霖，都是间接的打武汉；武汉不打下，我们政府的根据时时刻刻要被动摇，而现在江北当面逆敌孙张二贼如不打倒，我们就不能移兵西向去打共产党！

各位同志！共产党如何残暴，如何阴险的种种情形，大家一定已经很明白了，用不着我再多讲；不过武汉这个地方，我们费了多少心血，牺牲了多少将士，辛辛苦苦的从北洋军阀手里夺过来，满望从此可以拯救两湖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晓得到如今反给共产党盗窃去，而且自称中央，夜郎自大，利用武汉重要的地位，来捣乱谋害我们国民党！这不单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极大损失，也是我们全体将士最耻辱的事情！如果不努力把武汉夺回来，我们不单对不起已死的同志们，实在还是两湖同胞的莫大罪人；我们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最大目的是要实现本党的主义和政纲政策，随便到那一个地方，都要救民水火，然而现在两湖的同胞，反因我们打倒军阀而更受共产党的痛苦，尤其是湖南，简直弄得民不聊生，就是我们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国民革命军将士，也不能在武汉立足！这样的情形是我们国民党莫大之耻，不把两湖同志救出，把共产党真正消灭，我们将何以对两湖的同志！何以对已死的将士！更何以对我们在天的总理！

我们一定要打倒共产党啊！对于士兵要详细的讲给他们听，使得他们明白共产党压迫两湖同胞如何残忍及其谋害我们将士，破坏我们革命，离间我们本党的种种罪恶，他们当然能勇气百倍的作战。打退江北的敌人，消灭

武汉的共产党，救活两湖的同胞，是这一次各将士所负的责任。各将士要更加努力奋斗，使得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总理革命的目的能够完全达到。这是我今天趁第二次北伐动员的时候，所希望于各位同志的！各位如有余暇的时候，总要多看总理的遗教，并且要拿总政治部现在所发的印制品、宣传品，详细的解释给士兵知道，要使他们明白主义，真正的为党为主义来奋斗牺牲！

现在将近散会，我们要呼几句口号，在未呼口号之前，还要将国民革命军能够肃清残余的军阀的原因对各位说明。

第一，国民革命军是有纪律的。国民革命军兴的时候，有很严的纪律，就是"连坐法"，从前我们所以能够发展，能得大胜利，差不多就靠这一个"连坐法"，"连坐法"简直是我们的操胜的左券，真看作一个宝贝。可是现在便渐渐的忘了，可知我们国民革命军的精神已日渐的弛缓了。这一点要请各位注意，总不要把这个"连坐法"来忘了。上级官长有命令，无论如何不能自由进退，尤其是要同士兵讲个明白。

第二，国民革命军是有主义的。我们有了三民主义，才能爱护人民，官长看待士兵，也和爱护人民一样。全军上下都能拥护人民利益，能不怕死，能够牺牲，都是有主义的缘故。有主义，牺牲才有代价，这一点更要同士兵讲明白。因为我们解救全国人民的痛苦，我们自己还是一个人民，家里的父母妻子也还是一个人民，所以不仅解救全国同胞，实在是为我们父母妻子，更可以说是为我们自己。明徬这一点，我们就是死了，也决不是为那一个人死，是为国家，为同胞，为父母妻子，为我们自己而死的。

第三，国民革命军是有精神的。官长和士兵团结一起，官长不克扣一个钱，有一个钱就给士兵，没有一点私心，这一句话在我们革命军里面，是可以讲的。又如从前第一军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个个和士兵一起吃饭，现在还是有这种风气，能与士兵同甘苦，时时刻刻记念着士兵。虽然我们不能时时和士兵一同吃饭，但吃的时候，一定想到士兵是怎么苦，这不是虚伪的，不是假意的，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士兵便不乐从，便不会效死力。所以随便快乐，不想到士兵，这就不配做我们革命军的官长！希望各位保持这种精神，并且使之发扬光大！

现在大家呼几句口号：

爱护人民！

严守纪律！

材料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和伤亡人数统计

变乱地点	参加变乱的流氓人数	参加的反动军队	指挥者	工人纠察队被缴去的武器和马匹							纠察队死亡数	纠察队受伤数
				机关枪(挺)	步枪(支)	毛瑟枪(支)	手枪(支)	小枪弹(箱)	手榴弹(个)	马匹(匹)		
上海总工会俱乐部	100余人	26军2师5团1营	邢团长	7	1500	200	80	84	700	12	15	50余人
商务印书馆	20余人	26军2师60余人	邢团长	1	100	70	10	10	40	—	17	50余人
湖州会馆	50余人	26军2师2连	邢团长	5	420	80	35	15	20	1	9	10余人
江湾路	40余人	26军2师2连	邢团长	2	410	15	10	10	—	—	2	10余人
浦东	40余人	白崇禧的特务营	周营长	—	400	—	—	10	—	10	5	30余人
华商电车公司	30余人	26军1师1团1营	徐营长	4	300	2	—	10	—	—	1	30余人
吴淞	10余人	26军驻守炮台的2连	某营长	—	107	—	—	10	—	—	4	10余人
西山会馆	60余人	26军2团1营	杨其藻	10	400	30	40	2	100	—	8	30余人
共计	约450余人	约5个营	26军	29	3637	417	175	151	860	23	61	220余人

李大钊北平遇害

背景介绍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制造了"四·二八"大屠杀事件。与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相呼应，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大肆反苏反共。4月6日上午，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公法，下令"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警察、宪特，在东交民巷帝国主义巡捕房的配合下，包围、袭击、查抄了苏联大使馆及其他苏联驻京办事机构，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及其他革命者80多人，并抢走大批文件。李大钊倍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张作霖不顾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悍然向李大钊下毒手。4月28日，张作霖在警察厅南院对李大钊等进行所谓"军法会审"，接着押送西交民巷看守所刑场，将李大钊秘密绞死。李大钊临刑前镇静自若，从容就义。同时被绞杀的还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

材料：

- 李大钊被捕经过
- 李大钊在最后的日子里
- 李大钊临刑目击记
- 守常身后事
- 轰动北平的李大钊葬礼

材料一　李大钊被捕经过

夜，已经很深了，李大钊仍然伏案处理公文。范鸿劼突然闯进，神色紧张地讲述了杨度转来的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欲要重击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李大钊长时间的沉吟，严肃地问：

"范鸿劼同志！你认为这消息有多大的可靠性？"

范鸿劼答说拿不准。李大钊站起身来，背剪着手焦急地踱着步子，非常严肃地说：

"我们只能把立足点放在'信'上，才可能免遭不测！"

范鸿劼同意李大钊的意见。但是，提出了这万一是张作霖有意放出的烟幕弹，藉我们从苏联使馆撤退之际，行中途逮捕之事怎么办？李大钊认为此见不无道理。他凝思片刻，遂提出一个自认为保险的万全之策！先行撤离一部分青年同志，然后再转移国共两党的骨干分子。范鸿劼赞同这一方案，并提出自己负责转移第一批同志。两个人很快草拟了一个先行撤退的名单，李大钊严肃地说：

"鸿范鸿劼同志！连夜把第一批同志移出使馆去，听听风声，我们再一块商谈全体同志撤退的事情。"

范鸿劼应声执行撤退任务去了。他乘坐苏联使馆的汽车，把第一批同志安全地撤离之后，又赶回了使馆，语调坚决地说：

"大钊同志！沿途没有发生意外。天亮之前，我认为您应当撤离使馆。"

李大钊微笑着摇了摇头，风趣地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老将催后阵。'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赞成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我算是一员老将了，怎么能闻风先动呢？"

"可您……不是一般的老将啊！"范鸿劼苦苦哀求地说："近来，仲甫同志明显的右倾，我认为只有您南下和他面谈，才有可能改变他的意见。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李大钊沉重地说："仲甫同志有着他的弱点，在他没有认识到错误之前，是很难改道易辙的！"

"这就更需要您南下！"

李大钊吟哦片刻，有些痛楚地说：

北方正处在最黑暗的时期，我不忍心舍下同志们离去；同时，我还担心由于我的离去，北方的党组织将会蒙受损失……"

"如果仲甫同志执意孤行，向着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呢？"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就会给全党带来更大的损失！"

李大钊沉重地点了点头。一时他想了许多，但他一想到京城的局势就又为难地说：

"范鸿劼同志！你清楚地知道，自'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方区委的领导骨干不是南下支援北伐，就是去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工作，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就剩下我们几个同志了……"

范鸿劼非常理解李大钊这种矛盾的心情，他从全局出发，近似哀求地说：

"我认为全党之急，是纠正仲甫同志的右倾错误！为了全党的利益，您必须南下。容我直言：在我们党内，只有您的批评意见，才能引起仲甫同志的警觉，才有可能避免全党蒙受更大的损失！"

李大钊历经多方面的思考，很是沉重地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撤出使馆之后，立即南下武汉，团结党内大多数的同志，向仲甫同志提出善意的批评。一俟右倾错误得到纠正，我再返回北京。"

范鸿劼听后十分高兴，拉住李大钊的手，说了一声

"走!"李大钊茫然地问:

"干什么去?"

"趁着天还不亮,坐上苏联大使加拉罕的轿车,我送您出北京!"

李大钊抽出自己的手,不容争辩地说:

"老将催后阵嘛,我是一定要最后一批撤离使馆的!"

李大钊执意退却在后,终于没有撤离苏联大使馆,落入张作霖的手里,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关于这个悲剧发生时的情况,多年之后,星华同志曾做了如下的追述: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那天正是清明节。早晨起来,天气非常暖和,我和妹妹愉快地换上新夹衣。父亲看到了,立刻说:"快到外面玩去吧,真是春天到了!"这几天父亲很忙,很少像今天这样得空和我们讲话,但今天他也仅仅和我们说了一句话,就又匆匆地去忙他的工作了。

母亲兴致勃勃地带了妹妹去兵营那边散步,连早饭也没吃。父亲在里间屋里,伏在黑色的桌子上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

"什么? 爹!"我瞪着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屋门,就看到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安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壮起胆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声,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座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鞋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有前些天被捕的王世根,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由一个肥胖的便衣拉着。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

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李大钊问王世根:

"你认识他吗?"

王世根只简单地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你他妈的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这个便衣侦探一边粗野地大声叫骂,一边掏出手枪"啪"的一声,王世根晃了晃身子,倒在地上牺牲了。

这时,那个扮做工人的暗探挤到了前面,狡猾而又阴险地一笑,说:

"哼! 李先生,他不认识你,我可认识,给我搜!"

这伙匪徒闻声拥过来,把李大钊的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这时,李大钊始终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他轻蔑地望着这群匪徒们,不屑于同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下面的事情,正如李星华同志追述的那样: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族拥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父亲临走时只深切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任何话。他那高大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拐角处。……"

(选自《中华儿女》89年4—5期,作者:王朝柱)

材料二　李大钊在最后的日子里

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九年了。我们怀着对先烈的无限景仰之情,将五十九年前那悲壮的一幕再现于广大读者的面前,以志我们对李大钊烈士的怀念。

(一)

一九二六年四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与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四月二十六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两千二百余人发展到四千三百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

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象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一九二七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师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和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李大钊同志的安全担心，多次劝说他离开，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谭祖尧同志，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同志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谭祖尧同志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二）

一九二七年初春，不知什么人推荐了一个勤杂工。这人经常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李大钊同志觉察后，第二天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人确实是反动政府派来的暗探。敌人知道李大钊同志的确切地址，更加紧了反革命的部署。局势越来越严重，李大钊同志对此作了充分准备，他托人买了两支手枪，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并烧毁了一些文件。

四月六日，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天气温暖，风和日丽。一早起来，李夫人便带着小女儿外出散步去了，李大钊同志则伏在办公室桌前办公。突然，"啪"的一声尖锐的枪声传来，紧接着院子里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喊叫声……李大钊同志知道出事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了手枪，走出院子，来到院外一间僻静的小屋里，镇静地坐在椅子上，手里紧握着那支发亮的小手枪。一会儿，宪兵、军警沉重的皮鞋声跟踪而至。"不要放走一个！"随着粗暴的吼声，一群宪兵、军警和特务冲进小屋，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敌人夺去了李大钊手中的枪，并把他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一遍。李大钊始终神情自若，轻蔑地望着匪徒。敌人见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就把李大钊绑起来带走了。这一天同时被捕的还有八十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两个女儿。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大钊同志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敌人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敌人威逼利诱兼施。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同志。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的收场。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在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国内，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营救李大钊同志，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四月九日，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十二日，北京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但是当李大钊同志得悉后，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这生死攸关头的严重时刻，李大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而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历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十九

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对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正式开庭，至十二时十分始毕。然后由军车四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当时在门前围观的人很多，街道都被堵塞了。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也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李大钊同志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要求讲话，敌人不允许，他就大声叫喊，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但是执刑的人蛮横地向他脸上挥拳，并把他推进一个发亮的金属制的长方形架子中，架子的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直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拖出，围绕刑台走了一圈，然后用冷水往李大钊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紧接着范鸿劼、谭祖尧等十九位革命志士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刽子手们将尸体装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中，待家属、亲戚来认领。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们的募捐支持下，买了一口棺材，将烈士重新装殓，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浙寺里。

李大钊同志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的《悼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指出，他"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并将为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近万名同志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报告会。李大钊同志生前曾对冯玉祥将军及其国民军作过许多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牺牲时，冯玉祥正率国民军参加北伐东进，至潼关时，惊悉噩耗，全军官兵无不悲愤泣下。冯将军当即电令全军官兵人人戴孝以志哀悼，并称李大钊烈士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是"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

李大钊烈士就是这样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他死的壮烈，死得其所。他用自己的鲜血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

（选自《纵横》86 年 2 期，作者：聂元素　东方）

材料三　李大钊临刑目击记

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五年，余在北京，由《京报》社长邵飘萍之介绍获知其人，然并无深交，且不相往来也。邵、李两人同均属英勇有为、不避艰险、不畏强暴之志士，邵为新闻界之闻人，李则系宣传共产主义之理论家，而兼有学者之风度。闻友言："李与国民革命军关系甚深，苏联协助国民革命军之饷款达银币二百数十万余元，均由李大钊经手转交而己则分文不沾，生活简朴，可谓有为有守之君子。"一九二六年，《京报》连日刊载关于共产主义之文件，不久，邵飘萍即为张宗昌枪杀。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未及兼旬，李大钊亦被张作霖逮捕绞决。此均为我国文化界之大损失。而李案同日殉义者，尚有其他一十九人，受徒刑之执行者三十余人，实为共产主义宣传以来之第一大惨案。余于一九二六年加入李大钊领导之国民党左派，因事关同志被难，当日报注意该案之演进；又因服务法曹年久，闻见亦较便利而真切，今二十有二载矣。不幸年湮事过，不无遗忘，且原集之报章及伪判决书，悉于鲍案被难时佚失，不禁感慨系之！兹为保存史稿计，特就记忆清晰而为世人所未得知者，走笔记之左方，以备史家之考证，是亦后死者之责也。至文之工拙，不暇计及焉。

一九二六年，奉天军阀张作霖乘关内军阀争权之机，由辽沈整军入关，占据京津及鲁豫苏皖各冲要地区，号"讨赤军"，发号施令，以执行其杀尽党人之反动政策。维时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所谓赤者，乃指国共两党党人而言。张作霖之爪牙张宗昌辈，则盘据济南、南京，与国民革命军相持于金陵、武汉之间（是时，国民革命军已克复武汉三镇）。李大钊领导之党部，因避敌摧残，匿设于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内。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张作霖益恨共产党人，于四月九日，竟冒国际间之大不韪，嗾派奉天留俄毕业生张某，率带军警闯入东交民巷，包围苏联公使馆，搜捕李大钊等五十余人，并劫走党员名册及其他文件。旋即托词"依法办理"，组织审判员五人合议之特别刑事法庭，以行杀戮。审判长系张作霖之军法处处长颜某，其他审判员四人则由审判厅及军、政机关各指派一个。审判厅指派者，为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审理两次，即行判决，诬以内乱罪名，科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其余三十余人则分别判处徒刑。宣示判决系四月二十日前后，执行死刑则于经伪最高行政官署令准后，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届时前往，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鹄候之职员与林立之军警，则环集于绞机之周围。机前置长案一、坐椅二，为指挥行刑官与书记官之座位。稍远处

则置小桌小凳各一，备受刑人书写函件或遗嘱。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中人也。指挥行刑官询问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住址，经一一答毕后，告知："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处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行刑人拨动机捩，铁盖立陷，此磊落奇伟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其同志，于转瞬间突然下坠，双悬井中，绞赉绝吭，赍志长逝。行刑人取芦席掩覆其上，全场寂然。逾刻许。行刑人提取被刑人之遗体，舁置他处，惨剧告终。若此者陆续推行，自晨达昏，前后十次，每次执行二人，计惨毙于绞机下者，共二十人。名士而撄横祸，非辜而被极刑，辛亥以还，无甚于此者，时公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也。余观至第三次，恨军阀之无道，痛拯援之乏术，伤心惨目不忍卒观，凄然长叹而出，傍晚，复至场外徘徊瞻顾，见舆榇者络绎于途，知执行程序已毕，益复感怆无已，悲愤莫伸。第念革命以失败而愈增力量，志士以流血益资激劝。诸烈士之死，重于泰山矣。事后，据服务看所守陈君言："受刑者个性虽殊，然莫不同具慷慨激昂，从容蹈死之慨，无一懦怯驽弱而作畏缩状者。"若是，则尤足以风厉乎天下后世也。王振南又为余言："初议，以李大钊只认'为崇信共产主义者，并组织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其他被告亦仅自由，为共产党员，执行宣传工作'，均无参加暴动之行为，只应论以刑法上之煽惑罪，而颜某则迎合张作霖意旨，谓'不严惩不足以示儆'，故初谳即绳以刑法上之内乱罪，惟议处极刑只李大钊一人。谳上，张作霖斥为失，出，复就处徒刑之前列一十九人，悉改科死刑，故审判结果处死刑二十人，处徒刑三十余人，实为张作霖所主持，至特别刑庭之审判不过形式而已。"王平日持狱廉平，且以参加该案之审判为不幸，其言非虚妄者，故并记之。以上皆实录，为余所亲历或所亲睹；惟间有脱漏不明或不详者，非为余所遗忘，即或余尚未知，俟后查明补苴匡廖焉。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后死者何隽追记于二十二年后之燕市旅中。

（选自《中华英烈》86年2期，作者：何隽）

材料四 守常身后事

1927年4月28日，北洋军阀张作霖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当天晚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及女儿李星华、李艳华由警察厅开释。

张作霖将李大钊杀害后，为了迷惑人心，在报纸上宣传说，他们已为死者装殓，一般每人给一口40元的棺材，唯独李大钊受到格外的优待，给了一口70元的棺材。赵纫兰听说后十分气愤地说："这些牲口们，人都叫他们给害了，还假惺惺地给棺材！谁要他的棺材，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买。"

经朋友们募捐，很快就将买棺材的钱筹齐。棺材铺的人听说要给惨遭杀害的李大钊先生买棺材，深表同情，特意挑选了一口柏木棺材减价卖给赵纫兰女士。5月1日，李大钊的尸首经重新装殓之后由长椿寺移往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

李大钊生前从无积蓄，亦不购置家当，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每月薪水120元，但他总要拿出一多半来接济贫寒的青年，有时甚至拿出全部工资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校长蔡元培看他如此不顾家，便告诉会计，每月发薪水时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扣除家用，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李大钊就义后，据当时的《晨报》、《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同时，李宅附近又遍布便衣侦探，有时甚至公开闯入李宅搜查，并扬言要断绝赤党的后代。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得知消息后，不敢回家，转换寄住在几位北大教授的家里。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东渡日本留学去了。

5月10日，赵纫兰女士一方面无力营葬李大钊的遗体，另一方面为了躲开特务、流氓的纠缠，带着子妇离开北京返回原籍。

1933年3月，在北大教授何基鸿等人的倡议下，为重葬李大钊先生募捐。此意一出马上得到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响应，从现存的茔葬存根上可查出，除北大的教授外，还有鲁迅、李四光等共百余人捐款，计600余元。

与此同时，举何基鸿为代表到西山万安公墓管理人员交涉，为李大钊选择一块墓地。墓地管理人员拿出墓地地图让何先生选择。何先生就图中指出，要墓地居中较南的一块地方。墓地管理人不允，指定墓地西北角的一块地方。何先生当时与之争论，执意要一块较好的地方。对方寸步不让，大有不可更改之意——若不行，请另寻他处。何先生无奈，只得勉强同意墓地管理人之所以如此固执，大概也是为了少惹麻烦。

此时，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她将北大准备安葬李大钊一事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中共北平市委得到消息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通过公葬来揭露国民党右派迫害残杀共产党人的暴行，伸张革命正义。党组织还派

人将这个决定告诉刚刚由外地赶来参加李大钊安葬活动的赵纫兰女士，并问她同不同意这么办？赵纫兰毫不迟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4月22日，举行公祭仪式，北京的进步团体、教育界和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日本和朝鲜等国的革命人士前往妙光阁浙寺致祭，送来大批挽联、挽幛、花圈。

23日晨，参加公葬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浙寺，"九时半启灵，送葬者有教育界及男女学生约×百余人。起灵时全体肃立，唱国际歌，继即静默哀悼，殡仪最前列于旗伞执事，次为影亭，中供李大钊遗像，后即棺罩，由李之子女前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见4月24日《晨报》)一路上，人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参加送葬的人越聚越多。队伍行至西四举行第二次路祭，正当青年们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时，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和武装特务捣毁了祭坛，驱散了送葬队伍，并逮捕了男女学生40余人。

愤怒的人们并没有被宪兵、特务、警察的子弹、皮带、警棍所吓倒，李大钊的灵柩被平安地送抵万安公墓。入葬时，为了避免以后引起麻烦，将北京市民革命各团体送来的石碑一道埋入了地下，墓前仅立了一块由刘半农先生手书的记有李大钊姓名、生卒年月、子女署名的暮碑。

(选自《中华英烈》89年5期，作者：辛平，有删节)

材料五　轰动北平的李大钊葬礼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将李大钊逮捕。同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当局处以绞刑，在北平英勇就义。

李大钊遇害后，北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的挚友李泰棻冒着风险委托书铺公务员那万禄为李大钊购买了寿衣、寿材，装殓后停灵于宣武门外长春寺；不久，李大钊的生前好友章士钊、李凌斗、白眉初等又为李大钊购买了上等寿衣、寿材，重新装殓后，停灵于妙光阁街浙寺之内。1933年4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李乐光为李大钊主持公葬仪式，准备将灵柩移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出殡的前两天，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找到李乐光，同他商定了举行葬礼的有关事宜，叮嘱他负责组织好出殡活动，特别是护卫好大钊的灵柩，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把灵柩安全地送到万安公墓妥善安葬。

李乐光随后便找到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征求她对葬礼的意见。赵纫兰主张按乐亭老家的葬俗办理，并约好出殡时专门由乡亲李时雨搀扶大钊的小儿子扛幡送葬。

4月22日，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北平妙光阁浙寺举行。灵堂设在该寺前殿内，正面挂着李大钊烈士遗像，上悬一为烈士举行公葬仪式的横幅追悼会标，殿内挂满了挽幛、挽联，两旁摆满了花圈。其中，北平青年送的挽联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为革命奋斗，为革命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在哀乐声中，参加公葬仪式的700多人在灵前肃立致哀。宣读祭文之后，大家满含悲愤，同声唱起了《国际歌》，气氛悲壮而肃穆。

4月23日清晨开始起灵，罩有锈着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灵柩被缓缓地抬出浙寺，在李时雨的搀扶下，大钊烈士的幼子扛着葬幡同他的母亲赵纫兰及家中亲属走在灵柩前面，前后左右紧随着数百名送葬的群众。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群众抬着李大钊烈士的画像，扛着花圈，擎着挽幛和挽联。大家都胸戴白花，臂缠黑纱，边走边高呼口号并向路旁的行人撒传单。

烈士的灵柩过了宣武门后，送葬的群众增至千余人，不少群众还在路旁摆了祭桌。到西单北大街时，参加送葬的群众更多了，街上已是人山人海，望不到头。

当送葬的队伍行至甘石桥，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覆盖在烈士的灵柩上。这时，国民党北平宪兵队突然出动，冲击送葬队伍，他们象疯狗一样踢翻了路旁的祭桌，用枪托驱赶和殴打参加送葬的群众，群众当即与宪兵队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当场打伤群众数百人，逮捕了几十人。尽管国民党宪兵队穷凶极恶，但是，送葬的队伍始终未被冲垮，大家一直坚持着把李大钊烈士的灵柩送到了万安公墓，使烈士得以长眠于香山脚下。

由于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和李大钊烈士的崇高威望，这次为李大钊烈士举行的葬礼和出殡仪式，变成了一次轰动北平的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活动，从而振奋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

(作者王占连，选自《党史博采》94年2期)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地区形成了一个声讨蒋介石、铲除反动派的工农群众运动，但就全国局势看，武汉政府却处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围攻面前如何发展革命势力，武汉政府发生争议：有的主张北伐张作霖，有的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内部也发生了东征、北伐之争，多数人则主张北伐；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并且写了"意见书"，向党中央提出迅速出师东征蒋介

石的建议，由于遭到共产国际和中央多数人的反对即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地区怎样深入革命，是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党在革命紧急时期的任务，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既没有认真总结"四大"以来党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也没有针对局势的发展提出正确可行的斗争方针，反而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他还赞同国际代表鲍罗廷关于把革命转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认为东南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基地，在这些地区不能发展革命，应退出东南地区而转到西北地区去。

大会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大会宣言等十个文件。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从党的"四大"以来，一方面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已处于领导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革命的发展，阶级斗争也加紧了，国民党内地主和资产阶级竭力夺取革命领导权，他们与本国反动派及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击败革命。根据这种政治形势，大会检查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对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批评。

在政权问题上，大会否定了陈独秀的意见，主张参加政权，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是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这就使得武汉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被压迫阶级的联盟，而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核心，所以共产党要与国民党共同执掌政权。

关于土地问题，大会指出土地问题的尽快解决是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也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但是大会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无法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

关于如何发展革命形势，大会认为东南地区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有经过很好组织的农民群众及较强的党的组织，所以党目前应该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巩固和发展革命形势。大会斥责了陈独秀等企图把革命形势转移到西北去的理论，指出这种理论是自动让出阵地，取消中国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恐惧失败情绪的表现。

"五大"还提出了一些关于职工运动的过左的方针政策，如没收一切大工业企业归国有和要求工人参加国有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监督，以及要求政府实行高度的劳工政策等。"五大"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提出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关于如何争夺领导权的办法。更为错误的是，"五大"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所以，党的"五大"未能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没有能够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重任。

材料：

- "五大"综述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材料一 "五大"综述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作了《中央政治与组织问题的报告》，为其过去的错误辩护。

五大讨论了陈独秀的《中央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以及土地问题、职工运动议决案等。陈独秀的报告在总结四大以来两年多的工作时，虽然也承认一些错误，却仍然坚持其基本的立场，特别为其在三·二〇事件上的错误进行辩解。大会代表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并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指出：五卅以来我们的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视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在三·二〇事件中使"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在这以后，党也没有提高警惕和采取措施，"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也没有"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的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并指出："联合战线作的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宗法封建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北伐战争中，"在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

大会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党的策略问题时，也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土地问题。在原则上他也承认没收地主的土地，但实际上又害怕真正实行。他说："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即他所说的小地主）保持联盟。"接着他就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底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的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他在这里把革命的扩大和革命的深入的辩证统一关系，分割和对立起来了，单纯强调革命的扩大而反对深入土地革命。大会批评了这种观点，

决议指出："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

陈独秀还提出了革命向西北去的理论。他被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蒋介石的叛变所吓倒，认为无论是广州、上海、天津、汉口，还是一切其它的工业发达地区，都不能发展革命。因为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势力最强大，革命是无力和敌人对抗以取得胜利的。所以革命应当退到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的西北各省去，在那里聚积革命的力量后，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大会决议严厉地斥责了这种错误的理论，说："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决议指出：既要扩大革命的地域，又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强调指出："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大会决议在驳斥了陈独秀的错误后指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决议指出，现在农民运动"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决议规定：要建立农民政权，发展农民武装，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派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要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并提出要普遍发展工人纠察队，使之成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决议说："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工人去当兵。"因此决议提出了"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决议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共同担负政权"，等等。

以上大会对陈独秀的批评和对党的任务和政策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党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不足，大会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深刻地批判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于革命的前途和党的任务，虽然也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了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的目标，但是并没有正确的理解和相应的措施，对摆在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有力的对策，对有一些政策的规定也不适当。特别是在最后，大会在陈独秀对批评他投降主义错误的决议表示接受以后，又继续选举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可是陈独秀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大会以后，很多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仍然由陈独秀主持，结果使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继续在全党贯彻并进一步发展，对革命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该阶级的代表宋遁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遁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

级。在三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四月十二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三、(略)

四、(略)

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百分之九十九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就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们妥协。在他看来，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六、(略)

七、(略)

八、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

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呆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能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呆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以下略)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背景介绍

党的"五大"后，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还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解决土地问题。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武汉国民党领袖们却站在地主豪绅、反动资本家一边，打击迫害工农运动，急速地向右转。汪精卫集团在湖南、湖北、江西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有无越轨行为。1927年5月8日，汪精卫发布了不准工农群众团体举行任何集会和示威游行的通告。5月20日发布了保护地主富农的训令，24日又发布禁止土地革命的命令。汪精卫集团还污蔑工人阶级幼稚，并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审查和制止工人的斗争，禁止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发出训令声称保护工商业者之利益，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在汪精卫集团的压力和欺骗下，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宁愿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不敢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跟随汪精卫集团指责工农运动，以退让求团结，在党内造成极大的混乱。

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加剧了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投降反叛事件不断出现。5月17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叛乱。叛军很快进犯到离武昌数十里的纸坊一带，武汉顿时出现一片混乱，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束手无策。叶挺率领警卫武汉的卫戍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生军同武汉地区农工武装配合，打退了叛军，挽救了武汉的危局。

正当武汉革命军追击夏斗寅叛军时，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许克祥独立团发动反革命叛乱，即"马日事变"(电报代日韵目二十一日为"马"字)。叛军在长沙收缴了工人自卫队、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洗劫省党部等革命团体机关，释放了在押的反革命分子，枪杀了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柳直荀等准备出动长沙附近十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围攻长沙。但是陈独秀害怕引起政局的纠纷，采取了"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许克祥的军队乘机反扑过来，在20多天内残杀长沙一带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工农运动遭到严重的摧残。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发来两个紧急指示，提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以保卫和发展革命。虽然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已为时过晚，但如果遵照执行，挽救革命还是有一定希望的。当时陈独秀非但不去贯彻国际指示，还把国际指示压下来，对党内秘而不宣。在汉口的国际代表罗易背着中共中央把国际指示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征求汪精卫的意见，这又成了汪精卫集团叛变的一个借口。

6月上旬，出现了明显的国共分裂局面。6月5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党最高顾问的职务；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驱逐共产党人出境，并武装搜查革命团体；6月10日，汪精卫、冯玉祥等在郑州举行反共会议；6月19日，冯玉祥又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徐州会议，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清党"反共。冯玉祥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起了极坏的作用。

当汪精卫等人赴郑州开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蔡和森在会上坚决反对北伐和东征，认为当前首要问题是解决两湖问题。6月23日，在一次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要求陈独秀公布共产国际第二次紧急指示，遭到陈独秀的训斥。6月30日，陈独秀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又提出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国共合作十一条政纲》。这个政纲以退让求团结，以牺牲革命利益取得暂时的苟安，无异于是个投降的自白书。

7月4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要保存武力，准备上山，他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工作。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揭露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行动，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同时还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公开宣布同孙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汪精卫集团决裂，退出武汉政府。当晚，汪精卫集团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又在武汉地区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国民党除宋庆龄、邓演达等少数左派外，绝大多数都

背叛了革命。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材料：

- 夏斗寅部叛变及其被粉碎
- 马日事变
-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述实

材料一　夏斗寅部叛变及其被粉碎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大屠杀后，旧军阀蠢蠢欲动，张作霖屯兵河南，孙传芳盘踞徐州。4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在南湖誓师，举行二次北伐，由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北上河南，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京方面，为了进击孙传芳亦派兵北上。正当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占领了河南汝城、项城、沈丘等地，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夏斗寅适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于1927年5月叛变革命。

夏斗寅部原是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受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指挥。北伐军抵武汉，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驻扎宜昌。夏斗寅对国民革命军在旧军队内部进行反封建的民主改造非常反感，伺机反叛蓄谋已久。二次北伐开始的时刻，四川军阀杨森所属川军第九师范绍增部已深入湖北境内宜昌县属之三斗坪。5月初，蒋介石派遣密使与夏斗寅、范绍增在宜昌密议，策定：由杨森先行发难，佯攻宜昌；夏斗寅佯示众寡悬殊，弃守该市，星夜疾驰沙市，并发电报向唐生智求援，以作掩饰，免招致唐生智怀疑。并捏造战报，说杨森有7师之众，自己的兵力不足抵御，因而后撤；又说在荆沙战退了杨森。在杨、夏完成阴谋部署之后，夏斗寅便以抢运军用物资为借口，掳掠小火烨、木船多艘，停泊沙市江边。

5月13日，夏斗寅真相毕露，发表反共通电，向武汉进军。5月14日晚，夏部原定以团为单位，乘长江涨水的有利条件顺流东下，在金口登陆，一举袭占武昌。由于万耀煌力主谨慎从事，改从距武昌较远的嘉鱼登陆。到嘉鱼后，夏斗寅指使叶蓬逮捕该师政治部主任李伯刚等数十人，并杀害了武汉国民政府派来劝止的官员任剑若，以示叛乱的决心。

叛军的兵力实有两旅四团：第一旅旅长万耀煌，辖刘绳武、潘祖信两团；第二旅旅长张术楷，辖余式谷、刘道生两团。到嘉鱼后，进袭咸宁、贺胜桥和山坡，以两团守山坡。由万耀煌另带两团于5月17日乘火车抵达纸坊火车站。一位司机在到纸坊前不愿开车北进，被斩下首级悬挂在车头，另一位司机把车开到纸坊就溜走了。从两位司机的行动看出民心是反对叛乱的。此时，既没有人开火车，叛军又不明武汉虚实，谨慎从事的万耀煌便退出纸坊车站，隐蔽在纸坊以南的丘陵地带，作好随时占据纸坊进袭武昌的准备。

纸坊，这个并不享有盛名的小镇，由于它地处京广线上，为武汉的南大门，地势险要，因而在北伐战争时期，成了南北两军争夺的要地。叛军到达纸坊，引起武汉局势的严重混乱。奸商户抢购银元，拒用中央票币；粮食商行关闭，商户停止营业；市民纷纷逃入租界或乘轮船东下。迁入租界的市民达3800户，4.2万多人。在武昌县，金口地区富豪劣绅，封锁金融，遥相呼应，值此青黄不接之时，使农民告贷无门。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动分子乘机造谣惑众，进行捣乱。武汉危在旦夕。

叛军占领纸坊，逼近武汉，使武汉国民政府受到严重威胁。在此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1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按照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提议，决定调叶挺部队和中央独立师担任攻打夏斗寅叛军的主力，由叶挺统一指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为第三营，编入中央独立师的还有武汉工人纠察队和武汉农民自卫军。

为了加强武汉的防御力量，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第二军第六师移驻武昌徐家棚一带，第二军第四师、第五师移驻武昌城区，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留守汉口，第一师移驻汉阳。在徐家棚参与防御的，还有北上的广东农民自卫军500余人；他们是从韶关转到湖南，再乘火车出发，于5月15日大雨淋漓之中到达武汉的。警卫武汉的，还有5月10日为加强军事训练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成的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由侯连瀛师长和二团团长史文桂、指导员钟复光负责。南湖学生兵团新编的第六期学生也编入二团。叶挺属下的警备部队、工人纠察队、劳动童子团参与警卫武昌城防。为警戒侧翼，由黄埔军校第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3个大队编成的中央独立师的第三团一部，开赴金口。

中央独立师的士兵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入伍才4个月，经恽代英提议改编为部队，以侯连瀛为师长，杨澍松为副师长，宗汉英为参谋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为政治部主任。作为主力的第一团团长是蓝腾蛟，指导员彭漪兰。3个营的营长分别是吴扬善、陈匡济、鲁松卿。

叶挺临危受命，当机立断，派七十二团于5月17日晚先行带近纸坊，并组织其他武装力量共同赴敌。为配合七十二团的行动，当晚以电话通知第十一军教导营营长韩浚：“夏斗寅偷袭武汉，我们一定要保住武汉，使在河南与奉军作战的北伐部队无后顾之忧。我命令你率领教导营立即上前线，也可增强锻炼。”韩浚兴奋地回答：“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叶说：“那好，马上作好准备，限两小时出发，来得及吗？”韩浚与袁教导员仅以5分钟即集合全体学生，作了简短动员，整装待发。4名学生代表向教导

营部宣誓:"誓下决心,歼灭杨、夏叛军。"韩浚以电话报告叶挺:"只等令下,驰赴战场。"叶当即指示:"那好,马上出发到徐家棚车站,紧跟许继慎团后上车。"韩又请示:"开进前线后,教导营受谁指挥?"叶答:"受我指挥!"

叶挺接受任务时,部队是分散在武汉各处担任警戒任务的,为了抢时间,控制市郊阵地,予以阻击是极为重要的。特命二十四师之七十二团与第十一军教导营自徐家棚乘车南下,当他们到达纸坊车站北边时,夏部旅长万耀煌坐过的一辆空车还停在站内。许继慎团长率第二营迂回到纸坊东北山地,监视青龙山方向;第三营以勇猛的动作击溃镇上的敌人,首先占领纸坊;第一营营长宛日平按事先的约定,只等镇上的枪响,即向火车站周围的叛军发起猛攻,并立即夺取火车站,控制纸坊。

5 月 17 日之夜,皓月凌空,纸坊周围山影朦胧。作战双方互不明虚实,待至天明,没有继续交锋。

叛军进入武昌县境,残酷地杀害革命人民。粤汉铁路交通队有 30 名宣传队员于 5 月 16 日到达山坡,宣传二次北伐的意义,5 月 17 日夜突然被叛军抓去 3 人,不问青红皂白被杀死。这 3 名队员是黄凝清、贺作湘和刘应堂。马鞍山劣绅引夏部于 17 日夜捉去小学教师姚殿臣和九乡秘书吴志帷,加以毒打,准备枪毙,幸我军进军神速,始得脱险。叛军桩桩罪行激起了武昌县人民的愤怒情绪。武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王平章 16 日还在武昌开农协扩大会,在此紧急时刻,王令各区代表相继返回全县各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参加平叛战斗。

5 月 18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夏斗寅叛变事件,决议"由党报发表夏斗寅弃防谋反事件,并由省市两党部向民众宣传,以安人心"。

武汉国民政府 5 月 18 日下讨伐令:

国民政府令

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称兵谋叛,罪状昭著,应予褫职拿办!

此令。

同一天,吴玉章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各团体代表大会上,报告了夏斗寅叛变的原因和武汉政府所采取的策略。

同一天,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的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两党部执监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议:1. 通电声讨夏斗寅;2. 发表告十四师士兵及各界宣言;3. 武汉三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夏斗寅叛变革命的罪行。在第二天讨夏大会上,董必武还指出:"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

就在 18 日这一天,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号召下,上千工人报名应征,参加工人义勇队。市民踊跃捐助面包、菜饭和毡毯,支援前方。

18 日傍晚,中央独立师一团在两湖书院大操场誓师,党代表恽代英作了战斗动员。"誓死保卫武汉!""打倒杨森!""打倒夏斗寅!"的口号,声震九霄。走出两湖书院时早已候在武昌长街的工人、学生、妇女队伍,喊着革命口号欢送他们出征。独立师一团经通湘门到宾阳门火车站上车,到达纸坊车站待命。叶挺亲率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此时北伐河南)第七十五团和湖北省警备团部分战士,以及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二期学生已先期到达这里。叛军主力虽退到纸坊以南,仍有小股叛军散布在纸坊镇和纸坊车站附近骚扰,有的还窜到五里界和官家畈一带。那时的纸坊镇和纸坊车站还不是一个整体,是两个独立的居民点。从镇西小巷口过一道垅,上熊公祠南边的山坡小路,拐过油坊湾东南的山坳口,下一道坡,才是纸坊车站。万耀煌 18 日白天探到我方只有一个团(七十二团先到,其余在 18 日晚上才来)的兵力,报告夏斗寅后,会同第二旅旅长张术楷部于 19 日凌晨 1 时 30 分,分两路向纸坊反扑,两门山炮和机关枪密集施放。叶挺命令七十二团向左翼进攻,中央独立师一团配合七十五团在右翼展开,并亲率预备队在中央督战,向叛军刘绳武团发起攻击。

独立师的战士接到命令,立即从车厢两边下来集合。有的初上战场,听到枪声密集,神情紧张。一位叫毛学禹的排长爬到车厢顶上,用江西口音大喊:"同学们!上呀!不要做怕死鬼!黄埔学生是不打败仗的呀!"不少人响应:"上呀!黄埔学生是不打败仗的呀!"

第一营第一连领先从铁路西侧跑步前进,支援七十五团的战友,当一名学生倒在铁路边牺牲时,号兵立即吹冲锋号,抢占香炉山、求雨顶等处高地,战斗越来越激烈。

叶挺将军看到中央独立师虽是新兵(七十二团、七十五团也是新兵,所以未去河南),但有党员和老战士作骨干,战斗情绪很高,加之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配合,完全可以打败敌人。为抓紧时机,他决定命令部队全面出击,并规定只准进不准退,怯战者以军法处置。激战至上午 8 时,突破敌阵,夺其炮兵阵地,缴获山炮两门,俘虏步兵一个排。敌开始不支,分途溃退,我军乘胜攻击。

许继慎团长率二营战士从东侧冲锋,冲锋号一阵接一阵,占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他小腿负伤,仍继续指挥猛攻,关山、东岳山、鸽子山、将军山都被踏在脚下。小道迂回,遍山荆棘,战士们的衣服被撕破了。为了轻装,丢掉了饭盒、挂包、军毯、包袱等物。韩浚率教导营迂回到敌人后侧猛打,夏部感到腹背受敌,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遂向土地堂方向逃窜。

夏斗寅手下的一个军官后来说:"我们真是一辈子没有打过这样的仗,你们吹起冲锋号,我们架起机枪扫,也扫不退你们,所以我们只好自己退。但是我们越后退,你们越是向前冲,简直不让我们喘气。"有的还说:"我们的

队伍没有刺刀，只要听到冲锋号，就赶快后退，不忍作刀下之鬼。”

约近午时，万耀煌在土地堂重整队伍，增兵两团，收容溃军，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政府军，并以重机关炮火力集中在铁路线上，猛烈射击。武汉政府军因前进过猛，有些伤亡。七十五团三营营长练国梁在突破敌阵地后，壮烈牺牲。为了压制叛军火力，叶挺传令中央独立师在左翼展开，派七十二团之一部，从右翼绕道至土地堂车站，攻其侧背，向两侧迂回。正面及左翼逼近敌机枪阵地，猛烈开火。敌伤亡枕藉，政府军夺得重机枪两挺；右翼前锋向铁路线靠拢，打击其主力部队。万耀煌此时惊慌失措，首先逃跑，叛军全线动摇，向南溃退，这时已是下午 2 时 20 分。

在叛军反扑时，五里界区农会主席田申之率农民自卫军扼守纸坊通往五里界的山口，终因人少而败退，田申之不幸被俘，被当场杀害。19 日下午，聂洪钧带领山坡区的农民自卫队北上，支援政府军，配合得很好。

土地堂收复后，由赵一曼、游曦、陈德芸等女战士组成的宣传队、看护队，一路上救护伤员，宣传鼓动群众，并到阵地上寻找战友的尸体妥为掩埋，还组织群众处理了敌人的尸体。

七十五团乘胜跟踪追剿，在山坡又击毙其官兵多人，这时已是下午 6 点了，当晚在山坡休息待命。七十二团及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在土地堂附近宿营，师部驻在一处小水塘边，自炊晚饭，谢绝群众招待。饭后，施存统赶来集合官兵开会，传达叶挺指挥官的嘉奖令。会上。恽代英讲话时骂夏斗寅“麻雀子也翻起梢来”。国民政府连夜派中委高语罕赶来慰问全体将士，并与叶挺商议决定下一步军事行动：七十二团和七十五团沿铁路往咸宁、汀泗桥追歼夏斗寅残部；中央独立师一团从蒲圻转嘉鱼渡江，去沔阳协助第二军鲁涤平部攻打杨森叛军。

20 日，七十五团一营在孙一中营长带领下，直取贺胜桥，打到横沟桥时已近黄昏，叶挺下令停止追击。当晚部分叛军窜到保福祠，围攻保福祠乡农民协会，打死农民自卫军 2 人，抢走农民消费合作社钱币数千串。葛鹏程带领农民自卫军奋起反击，配合政府军击退了敌人。21 日政府军占领了咸宁，在汀泗桥俘获甚多。此次战役共俘敌近 2000 人，21 日全部以列车押解到徐家棚车站。七十二团一部追击到通山，救出了被夏军拘禁在通山城里的几百名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独立师一团往蒲圻、嘉鱼。5 月 26 日强渡长江，与教导营一起先后攻占峰口，配合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李富春）西征部队迎击杨森，与第二军鲁涤平部会合于仙桃镇，击溃杨森的第十八师王文俊部，6 月 20 日收复宜昌，迫使杨森逃回四川。

纸坊之战击溃了夏斗寅叛军，粉碎了蒋、杨、夏偷袭武汉、颠覆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实现了南线无战事，使得北伐军、西征军无后顾之忧。

这次战斗，是一次保卫当时中国革命中心——武汉的重要战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联合战斗的一次尝试。

（选自《纵横》92 年 5 期，作者：孙俊民）

材料二　马日事变

长沙马日事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过火的借口之下，爆发起来的。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范围很广，参加的人很多，但是出头发难的是唐生智部下的识字不多、其貌不扬、从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象武大郎似的团长许克祥。许克祥所用的军师，也就是这一次事变的灵魂，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与蒋介石勾结到底的、声名狼藉的几个政客：萧翼鲲、彭国钧等。以这样的几个人出头露面发动起来的马日事变，使武汉政府束手无策，唐生智也好象是毫无办法似的。这一次事变的规模似乎是比蒋介石四月十二日的政变小得多，但是它在革命的高潮中起的反革命的作用确实很大，它破坏了两湖的农民运动，摧毁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瓦解了武汉政府，其中的奥妙我们在当时也是莫测高深。很奇怪的是一个其蠢如牛的许克祥和几个无聊的政客闹出了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这个局面虽是反革命联合战线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力量，何以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中央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第三国际代表团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拿出镇压反革命的有效办法，任敌人坐大，造成了革命的危机？

事实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日长沙方面，因为夏斗寅叛变，粤汉铁路被叛军截断，湘鄂交通一时阻塞，唐生智留守长沙部队许克祥等制造谣言，甚至说武汉已为夏斗寅叛军所占领，唐生智下落不明，许克祥出面宣布长沙戒严。当夜，长沙工会纠察队因为不知道戒严的口令，被许克祥部队捕获，当时长沙的军队少，工农团体人多，也有相当的武器，许克祥还没有甚么把握，次晨又将被捕的工会纠察队释放。许克祥、萧翼鲲、彭国钧等为了制造事件，多方造谣，他们自己秘密贴出“打倒三十五军”的标语（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许克祥属三十五军），散布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即将袭击驻军的空气，借此煽动军心，为搞政变创造条件。当事变初起，交通邮电机关都为许克祥等所窃踞，武汉方面只接到许克祥等单方面的情报，都在谣言蛊惑之下，认为这是农民运动过火，工农武装与驻军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不是，决定派员前往调查处理。正在武汉政府犹疑不决的时间内，许克祥借口农民运动过火，工会侵犯革命军人的家属等谎言，发动政变，突于二十一日深夜围攻长沙总工会的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以

武力压迫工农解除武装，封闭长沙总工会及省农民协会，劫夺民食维持会采购米粮的款项，驱逐不受胁从的省政府委员，抄查省政府委员的住宅，解散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仇鳌、萧翼鲲、彭国钧等组织同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发动政变一模一样的所谓"清党委员会"和"救党委员会"，提出"肃清暴徒"、"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并同张作霖在北京一样的做法：派军队查抄长沙苏俄领事馆，同时封闭学校，屠杀工农及学生，凡属剪了巴髻和辫子的青年妇女，一律格杀无论。这显然是以枪炮轰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叛变的情形比蒋介石还明目张胆，反动的程度比张作霖还有过无不及，叛乱的局势已经很显然，叛乱的部队也不过一团兵力，也没有甚么强有力的外援，武汉到长沙，水陆交通非常便利，调兵遣将并无困难，如果武汉政府不受内奸的胁持，还有一点革命的诚意，剪除叛乱，并非难事。唐生智此时是统率三军上十个师的前敌总指挥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许克祥是他小得可怜的部下，唐生智有权、有责、有力平定这个叛乱，但是唐生智阴死阳活，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采取行动，让叛乱的局势扩大。唐生智如果同许克祥没有一点默契，许克祥敢这样干吗?在那样紧急的关头，武汉政府拖了好几天才决定派第八军副军长周斓为长沙事变的调查调解专员，难道说长沙事变武汉政府真还有不明白的奥妙吗?对反革命的姑息，就是对革命的罪过，结果是许克祥挡驾，不准周斓去长沙，唐生智张弓不放箭地对许克祥发了一个电令说："长沙军队，立刻停止一切行动，发还工农的枪械，宣传三大政策。"但是许克祥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是愈干愈凶。在我们共产党方面是如何对待这一事变呢？最初是乱哄哄地说长道短，徒托空言，没有采取甚么行动，一直拖到六月四日，距马日事变已经半个月了，才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方式，提出解决长沙事变的意见。其主要的内容如下：(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的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民众共同推翻之。(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取消叛徒窃踞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自由。(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这些办法还是停留在宣传命令过程中，是如何脆弱！又是如何缓不济急，不切合实际啊！

武汉政府上层分子离心离德，形成了武汉政府的软弱无能。从三月二十三日罢免蒋介石一直发展到讨蒋运动的高潮，始终是采取张弓不放箭的办法，宣传超过了事实，行动落后于客观形势，就一切变成空话了。中原会师，冯玉祥只带着极少的卫队到郑州，开封郑州之间大多为武汉政府所属的主力四、八各军，蒋介石已与武汉政府对立，他敢于轻车简从到郑州同冯玉祥会面，同冯阎拜把结为异姓兄弟，这是蒋介石的逆焰压倒了武汉政府的革命锋芒，他视武汉政府如无物。如果武汉政府有汉贼不两立的正气，命令四、八各军将蒋介石扣留起来，事实上并不是不可能，但是武汉政府的当局没有这样做，连说都没有这样说，恐怕想都没有人这样想，因此讨蒋运动就形成了徒托空言，这就注定了武汉政府的末路。武汉政府反而把革命民众的正当要求，指责为过火。徐季龙、顾孟余等逢人便骂工农运动，这些情况，唐生智是完全知道的。尤其是唐生智的父亲是湖南的大地主、大士绅、大恶霸，他到处宣传唐生智是石达开转劫的，他期许唐生智即不能称帝也要为王，在湖南农民运动初期，曾被东安县的农民协会的农民捉住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唐生智出面讨情，才以革命军将领的家属关系从宽处理释放出来。唐生智表面上没有发作，骨子里他们父子对农民运动是恨入骨髓了。许克祥的发难，如果没有唐生智的支持，他敢这样肆无忌惮吗?唐生智挂着反蒋的招牌，利用武汉政府作为扩大他个人势力的工具来与蒋介石争雄长。他的部下用蒋介石的反叛形式"清党"来实行反俄、反共、反工农政策，他熟视无睹似的，这就说明他是别有用心的。当时的局势唐生智凭借武汉政府的优越条件，以能胜蒋介石为上策；与蒋介石打个平手平分春色为中策；即令搞蒋介石不过，还留一个投降蒋介石的后门。所以他纵容许克祥等运用蒋介石叛变的法宝——"清党"，为以后投降蒋介石下一注脚。武汉政府对唐生智非常重视，共产党对他也估计过高，把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左派的将领来对待，是一个错误。明明知道当时唐生智有权有力，可能派兵剿除长沙的叛乱，还要作出掩耳盗铃的姿态请国民政府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剿办长沙的叛乱，这真不知从何说起。长沙从马日事变起一直到六月初旬，在长沙及长沙附近各县，被许克祥等屠杀的共产党人，工、农、学生、妇女达二万余人，共产党不由正面揭穿敌人的狰狞面貌，不明白指责唐生智、李品仙、何键、刘兴等纵容许克祥、萧翼鲲、彭国钧等公然叛乱的罪恶，不及时武装自己对抗敌人，枝枝节节，徒托空言，坐令敌势蔓延，而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真是书生误国所造成的大革命时代的悲剧，使中国革命事业多走了二十余年的艰苦的弯曲的道路，长沙马日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是在毛泽东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以二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得到成功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也算是盖棺论定，受到了应得的批判，革命先烈与革命民众的血没有白流，但是长沙马日事变的主凶还健在人间，没有受到应得的膺惩。许克祥从唐生智失败之后，即投降蒋介石，当过师长、军长、总指挥，成为蒋介石的宠将。十年内战中，他同工农红军打过多次的恶仗。在中日战争中，他的军队打光了，蒋介石对他也冷淡了，他才收拾细软，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当寓公。一九四九年我

流亡在澳门，时常在中央饭店的赌场里遇见他，他还是那样獐头鼠目，精神饱满，听说他在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他的财产不仅是民膏民脂，而且是革命先烈与革命民众的头颅与鲜血所做成的，此贼不归案法办，何以安马日事变所屠杀的两万多先烈的家属之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悬案。

长沙马日事变，是豪绅地主阶级反动势力的抬头，是中国革命由高潮走入低潮的转折点。宁汉对立的局势，蒋介石得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支持，声势浩大，对武汉政府进行封锁，动摇人心。长沙事变，使湖南、湖北、江西各省的新旧军阀与土豪劣绅联成一气，造成普遍的白色恐怖的气氛，革命的工农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选自《包惠僧回忆录》）

材料三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述实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遭到了局部失败，武汉地区的局势日益复杂。

一方面，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高潮。当时的武汉政权基本上还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左右，所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几乎都集中到武汉地区工作，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继续为推动革命的发展而努力。因而在发展工农运动，举行第二次北伐，以及讨蒋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另一方面，武汉地区的危机也迅速增长。

汪精卫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从国外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立即同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等举行秘密会议。这时，蒋介石正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集团向汪精卫提出马上“分共”的问题，汪精卫则出于自己没有实力，怕在立即反共之后大权落入蒋介石手中。因此，他企图利用武汉国民党的支持，集聚反革命力量，增强实力，立稳脚跟，然后反共，以保持自己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同意立即“分共”。最后达成如下协议：汪精卫赴汉口“疏通”在汉中央委员于四月十五日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讨论“反共”，解决“党务纠纷”。在未开会之前，先规定四条“暂时应急”办法：“一、由汪通知陈独秀停止共党活动；二、武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命令暂时否认；三、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四、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否则认为反革命行为，严行取缔。”显然，这是蒋、汪取缔共产党，破坏武汉政府，收缴革命武装，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协议。

然而，此时的汪精卫，公开面目仍以“左派领袖”出现。四月五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四月十日汪精卫抵达武汉。翌日，他在《给〈中央副刊〉的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公开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政策，加以毁坏”。由于汪精卫耍了两面派的手腕，革命群众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拥戴他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

随着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等反革命势力对武汉地区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加强，共产党力量和工农运动的发展，汪精卫就日益暴露出他的反动立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对共产党进行攻击。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汪精卫事后供认，他组织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立足点是反共的，他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谋共产党的”，但他又认为当时不能立即分共，因为正在北伐，北伐军中“有不少共产分子杂在里头”，“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只提出裁制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便是此意”。

五月八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不准有反对外人的行动。

十四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训令，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逆产，违者“予以严厉之制裁”。

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向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

二十二日，汪精卫下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境。

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向湖北省总工会下达了一个特别通告，要求总工会“整顿”工人的纪律，禁止工会对不法资本家实行逮捕、罚款。

二十四日，武汉政府发出《保护军人田产令》，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挠动军心，实可痛恨”。

五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湖北省内两个最大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很好的县农民协会——黄岗和黄陂农会。

上述这些摧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的条例和法令的不断出现，说明了汪精卫从四月底开始，已在做“分共”的准备了。

与此同时，湘鄂赣三省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些反动军官，在汪精卫等的庇护下，也大肆活动起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相继发动军事政变，江西省省长朱培德在江西“遣送”共产党人。这些反动军官的叛变，更加深了武汉政府的危机。

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但是陈独秀却仍然顽固地坚持

其右倾投降主义。六月二十八日，为陈独秀所主持的中共中央，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口实，命令湖北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三十日，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的支持下，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其中规定：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的，“并不含有联合政府的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运动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显然陈独秀等企图以此让步拉住汪精卫。

这时，共产党内许多同志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同时，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到来，决定调回鲍罗廷。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由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次改组虽然还谈不上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陈独秀等人控制中共中央的局面，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的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揭露汪精卫等人“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及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是，“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宣言宣布，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

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后，七月十八日，真诚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谴责了武汉国民党领袖背叛民众、背叛国民党和孙中山的罪恶，指出，“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表明了她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正立场。邓演达也在此以前的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告别国民党同志们》离别书，斥责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蛾恶工友”，这样作，“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七月十三日，他毅然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汪精卫等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公开反共。七月十四日晚，汪精卫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主席团秘密会议，布置了“分共”和大屠杀的计划。七月十五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即“分共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会议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此案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发表)。该议案规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不准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不准国民党员加入他党，违者以叛党论。七一五的“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汪精卫集团最后叛变了中国大革命。

翌日，汪精卫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一篇报告，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伪释所谓“分共”的“理由”。接着，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清共”。武汉国民政府各部也纷纷发出通告、训令、布告，取缔共产党和一切革命活动。随之，反动军队封闭了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其凶残程度不亚于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被国民党完全抛弃；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为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权。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选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作者：马维政）

“八·七”会议

背景介绍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全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但反革命的屠杀，并没有把共产党人吓倒。1927 年 7 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7 月 13 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武汉国民党政府日趋反动、背叛革命的政策，退出武汉政府，继续进行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汪精卫公开

反共后，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和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制定党的新政策，1927 年 8 月 7 日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与会正式代表 21 人。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这次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报告，提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党的方针和任务，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在讨论发言中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许多同志还就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错误问题发了言。

这次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选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9 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3 人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刻，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会议在反对右倾的同时，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又提出了一些"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材料：

- "八七"会议始末
- 回忆"八七"会议
-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

材料一　八七会议始末

八七会议是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二十一个人。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就是我)等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处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工夫。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 41 号(现在是鄱阳街 139 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同时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因而现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尔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同志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随后发言的中夏、和森、亦农、弼时等同志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中夏并指出：甚至把谭延闿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

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领导的错误。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建议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对鲍罗廷、罗易、魏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 8 月 6 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这是因为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 1927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二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九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七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鼓公达　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8 月 9 日，由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

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篇文章是 1927 年 2 月写的，是驳斥彭述之的谬论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们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有的同志提出，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1927 年 7 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在这里附带地叙述一下陈独秀问题的处理经过。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玠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 1927 年 9 月底至 10 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直到 1929 年他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1 月 15 日，才被中央开除出党。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二次革命论"作为根源的。因此，他当时对待错误的态度很顽固，以致后来堕落到同托派相结合。陈独秀从 1921 年党的成立到 1927 年 7 月下台，前后当了 6 年的总书记（开始称书记，"二大"、"三大"称委员长，"四大"、"五大"称总书记）。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建党初期，他是为党做了工作的，我们对他要进行具体分析，是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以前某些历史书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对的，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他的照片是对的。目前对陈独秀有三种看法：一说他不是好的马克国民主义者；一说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赞成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要一分为二。

（节选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

材料二　回忆“八七”会议

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个地区住了许多外国人，有个惠罗公司，是一家洋行，专卖高级消费品，价格很贵，中国人很少去买它的东西。街上往来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楼房，建筑形式完全一样。一楼是铺面房子，和二楼是隔断的，从临街雨廊直接上楼梯就到二楼。这里是我们的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我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才由雨廊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我们机关的管理人员，我们戏谑地称她的谐音“老祖母”，其实她才三十来岁。她认识我，很快放我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三屉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三天前由“交通”带进来的。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敌人发现，很可能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我们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

会议由李维汉同志主持，他简略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上面说的成立五人常委会，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只是同国民党联系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李维汉同志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国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倾向，并改组中央，等等，他也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订7月28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今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他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二、常委代表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三、改组中央政治局。

接着，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纳兹只有三十岁左右，侃侃而谈，颇善于辞令。因为要经过翻译，他的报告占去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上午。

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记不得有什么饮料，大概只是喝茶或开水吧。吃完午饭只休息半小时左右，又继续开会了。

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自从“四·一二”以后，党内多次讨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党的五大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也没有见诸行动。这段时间里，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制订了这些文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成果了，当然还要看是否能真正实施。因此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分歧意见，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九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任弼时、彭湃；候补委员七人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有的书上写，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这不是事实。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出去一个人。我是离开得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的。

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罗明纳兹的报告中，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陈独秀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以致现在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陈独秀的理论和实际行动是“少数派的”(即“孟什维克的”)、“不革命的”和“社会民主党的”。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用很生动的事例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群众中也有不听中央命令，抓住国民党下级党部，当了房子的主人翁的，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机关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其他同志也尖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很激动地说，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他还提出家长制非打倒不可。邓中夏、任弼时同志发言时也很激动，集中批评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次猛烈的开火，宣告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八七会议的第一个功绩。

第二个功绩，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这个方针并不是八七会议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批评中国党内有人“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会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观点。斯大林也说过：“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中国共产党“应当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党的五大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推进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党内对土地问题进行多次讨论，总是没有真正的行动。

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尖锐批评过去党的政策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瞿秋白在代表常委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通过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任弼时同志尖锐地批评党中央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甚至创造一种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远的过程，而不知道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已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脚之地。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瞿秋白只是说到要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会议确定要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毛泽东同志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这句话发展成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的论断。这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胜人一筹之处。

但是，会议对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是因为会议虽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我们的总方针，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党内多数领导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

（选自陈清泉《陆定一谈八七会议》）

材料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因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决定此后之总政策。当时即先接受国际电令。宣言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七月十三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这一关键已是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不久，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但是，那时正是七月底的时候，时局紧急，因此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可是也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八月七日，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国际新代表出席报告召集这次会议之意义，——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为全党正式的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议事日程如下：

(1)国际代表报告。

(2)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3)党的新任务报告——分为四项：一、建设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的左派国民党政纲。二、最近农民争斗决议案。三、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四、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4)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结果，通过上述各议案，兹印布如下，并选举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大武装起义

背景介绍

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为军委会主任；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

党领导的武装起义。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主持成立前敌委

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决定于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见史料6），起义推迟了两天。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军队约3万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占领了南昌城。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发布了《中央委员宣言》，对国民党右派叛卖革命的行为进行讨伐（见史料7）。根据前委意见，对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三军。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叶挺兼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韦杵任第九军军长，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起义军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希冀恢复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重新举行北伐。起义军在进军途中，受到优势敌人的追赶，没有来得及整训，加之天气炎热，伤亡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失败。一部分转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敌军力量薄弱的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见史料8）。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和浏阳的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约五千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这次起义原准备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在这紧急关头，前委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向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转移。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追击，部队伤亡很大，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牺牲，起义部队处境十分困难。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次整编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建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等人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州的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共五千多人，举行了广州起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当天上午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公布了政府的各种纲领和政策（见史料9）。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的反动派，他们勾结起来向革命武装反扑，起义军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起义终于在第三天失败。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先后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广州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反动势力，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衔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彻底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并开始了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大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挫败，但它对创建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中国革命的复兴，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材料：

- “八一”枪声
- 贺龙在南昌起义中
- 诗歌：南昌起义的曙光
- 霹雳一声暴动
- 红旗高扬越王台
- 广州苏维埃宣言

材料一 “八一”枪声

8月1日凌晨2点整，“叭！叭！叭！”清脆的枪声划过南昌城的夜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起义军象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

起义军总指挥部设在系马桩附近的干家前巷女子职业学校里，总指挥部的代号为“炮兵连”。周恩来以他的雄才大略在这里指挥着一场伟大的战斗。

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驻有朱培德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属警卫团是朱培德的嫡系部队之一。我负责攻击该敌的是贺龙之第20军第1师的部队。贺龙的司令部设在章江路口西大街中华圣公会，距敌只有2百多米。由于事先得到告密，敌人仓促作了准备。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起义军的必经之路——鼓楼。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弹，从侧面登上鼓楼，占领制高点，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回院内。贺龙军长亲临第一线，沉着指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消灭敌人大部，其余全部缴械投降。

在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叶挺指挥的第24师一部，与敌第6军第54团展开了激战。敌人听到枪声，仓皇应战，刚走出松柏巷口，就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只得龟缩回去。起义军很快包围了教堂，他们一边用火力猛攻，一边喊：缴械投降不杀！最后，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吹起“敬礼

号"缴械投降。南面驻匡庐中学的一股敌人，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爬上城墙企图逃跑，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公安局警士和工人纠察队的英勇阻击，敌人进行了一阵抵抗后，见已被起义军包围，无路可逃，也只好缴械投降。

在顺化门外的老营盘，驻有敌第 79 团。第 20 军教导团负责解决这股敌人。教导团和敌人只有一墙之隔，加上侯镜如团长他们通过礼节性"拜访"，对敌人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所以，战斗完全按原计划进行。一总队从正门冲入，其余部队则翻墙冲进，顿时掀起一片喊杀声和缴枪声。起床的一部分敌兵很快被解决了，其余的大部敌军在被窝里还来不及穿好衣服，就乖乖地在床上当了俘虏。一个多钟头就结束了战斗。侯镜如团长看着缴获敌人的两匹战马，高兴地说：这两匹马是我在跟着朱胡子"参观"时就看中了的。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在贡院，攻打敌第 3 军第 23 团的是叶挺之 24 师的 72 团和朱德指挥的军官教导团。起义军很快把敌人包围，敌人企图从后门冲出来，向起义军反扑。第 72 团中队长陈守礼带领战士们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战斗中，起义军的几个战士相继倒了下去，陈守礼也身中数弹。在昏迷中陈守礼还在不断地喊：不准退！坚决要把敌人压回去。……当敌人吹起"敬礼号"，表示停止抵抗时，陈守礼才闭上双眼，他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战友们肃穆地举起右手，向南昌起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在新营房，第 24 师一部与广东农军并肩作战，迅速冲进敌第 3 军第 20 团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没来得及摸枪，就作了俘虏。

在省政府、在敌卫戍司令部、在百花洲以及在牛行车站等地，起义军同时向敌人发起了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分别解决了当面之敌。

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枪声逐渐稀疏下来，最后完全停止了。从 8 月 1 日凌晨 2 时至 6 时许，历经 4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部解决了南昌市内及近郊的守敌，起义胜利了！胜利的红旗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飘扬，一队队起义军穿着蓝灰色的军装，映衬着红领带，迎着曙光，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南昌的大街上。

（选自《南昌起义风雷动》，作者张青）

材料二　贺龙在南昌起义中

7 月 31 日清晨，前委会在二十军司令部召开，张国焘也来了。周逸群指着张国焘的背影对贺龙说："看，他就是有名的老机婆。"贺龙看着他，心里愤慨不已，要不是出于对共产党的尊敬，那他张国焘的处境也就不妙了。

贺龙对起义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是对张国焘有力的抵制。张国焘怀疑暴动的言行，受到周恩来等的坚决抵制。前委对他的愤慨情绪，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那个张国焘呀，就是不松口。

暴动的时间大事，拖延未定，破坏暴动的事件却接二连三。贺龙用罢早饭，二师副师长兼二团团长欧百川赶来报告：刚开进南昌的蔡廷锴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故意与我为难，借故生端，打死教导团队长和学员各一名，并将军部马匹完全夺走，如何处置，请示定夺，他希望暴动立即行动，并说他部下愤恨不平，主张将蔡廷锴及其不稳定的军官"一并裁决"了事。贺龙震怒不已，但隐忍未发，嘱欧回营听令。蔡廷锴见事不妙，马上写信向贺龙请示，而且"措词非常恭顺"。贺龙为顾全大局，约其来军部谈话，蔡来后，表示愿意合作，并当即写信令其二十八团团长归还马匹。但蔡廷锴仍阳奉阴违，不仅当时还有 20 匹好马没还，而且几天之后，在起义军南下途中，他率部叛逃了。

当天上午，前敌委员会继续开会，又是"辩论数小时"，对起义时间，仍然悬而未决。

当天，张发奎又来电催促："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并说他张发奎本人，"准(8 月)1 日到南昌。"形势已迫在眉睫。直到此时，张国焘仍在坚持起义应推迟一二日。眼看已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当天正午，前委再度开会，终于"决定 8 月 1 日动作"。张国焘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但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来故意拖延。周恩来断然表示，宣言"由我来改！"这样，才使南昌暴动得以胜利进行了。

南昌起义，经过三易时间，前委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最后决定 8 月 1 日 4 时动作。这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巨大胜利，可是怎么动作法呢？有人主张"采用兵变形式"，贺龙坚持必须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前委接受贺龙意见，决定由叶挺起草命令，用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公布。与此同时，还决定了"还我河山"的口令，以及部队系红领带的标志等有关规定。起义部队紧张地投入了战斗准备。

当天下午五点半，贺龙在圣公会军部召开二十军团营长紧急会议，重申起义命令，作具体战斗部署，强调起义中的有关规定。会后，各团营长飞速回营，抓紧反复侦察地形，利用各种形式接近敌人，进入战斗位置。要求连排军官人不离枪，马不离鞍；所有部队整装待发，进入临战状态；军官轮流值夜，听候命令。

散会不久，一师师长贺锦斋和一团团长刘达五赶来报告：一团三营营副赵福生，散会后跑到朱培德指挥部向滇军一个同乡团长处告密。贺龙得知这一严重情况，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向前委报告。为了确保起义胜利，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贺龙与前委研究决定将原定 8 月 1 日凌晨 4 时的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举行。并商定以二十军总指挥部连发三枪作为起义信号。

随着起义时间的提前，当晚贺龙带着警卫到江西省政府对门的二师三团部署检查。据二十军三团文书郑小舟回忆：贺军长离开后，秦师长命令他持特别通行证，带着贺总指挥给三军王军长和警备区朱司令的请帖，乘坐黄包车，专门侦察敌三军军长王均与警备司令朱世贵的驻地情况，想在起义中活捉他们。当郑小舟来到王均司令部时，卫兵阻拦，不让进门，他持证大骂卫兵，后虽经执勤队长同意入门，但王均与朱世贵均不会客，郑小舟退出司令部大门时，大街小巷都已戒严。由此看出，起义前夕，敌人也已戒备森严了。

7月31日之夜，是贺龙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自戎马生涯以来，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时刻。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此刻正在总指挥部与参谋长刘伯承一起观察分析敌情，作好一切准备，只待一声令下，新军齐涌，地覆天翻！

戒严时尽，繁星映天，暑气未消，长夜难明。远处传来低微的虫吟蟋唱，时钟嘀嗒嘀嗒地似乎越来越响。起义的时间分秒紧逼。近了，快了，到了！

"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沉寂的夜空。贺龙总指挥部打出了起义进攻的信号！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的第一枪。

古老的南昌城，顿时枪炮轰鸣，火光烛天。在南昌军官教导团的朱德，早开始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在晚9点前，他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南昌城里滇军的几个团长，当这些军官们酒足饭饱后正在兴高采烈地打麻将时，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报告："今晚贺军长那边有行动，请团长快回去！"顿时，石破天惊，在座的人"莫不响震失色"。朱德却若无其事地叫大家只管放心玩，要喝有好酒，要玩有麻将，出了事还有便衣可化装。有个刚清醒过来的团长，急得团团转，到处找手枪，可连他的武装带也不知脱挂在哪里了。真是牌输了，连枪也输了，人更输了。不久，果然听得枪声大作，众团长推开麻将牌还没站起身，朱德抢先大声宣布说："大家都不准走！我来保护你们。"就这样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决了几个团长，除掉了滇军对起义的祸害。

起义开始，贺龙的二十军第一师首先向敌第五方面军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战斗也最为激烈，而结束也最迟。该处之敌为一个精锐警卫团，加上事先得到二十军叛徒营副赵福生的告密，已有戒备。当二十军一师一、二两团分别从中华饭店和张甲门方向发起进攻，敌已依托有利地形地物，以猛烈火力封锁鼓楼洞口。因而进展不利。贺龙闻讯，急令三、五两团飞师增援，并亲临指挥部督战，还命令警卫连长黄霖带一个排先封锁敌军大门，直到增援部队接火为止。

据当时参加增援的五团一营排长李醒民回忆：大约11点左右，团长命令一营各连，全副武装，赶到军部待命。出发时，全体官兵将袖子和裤腿卷起来，不吹号，不惊动居民。在路上，听到枪声骤起，接着全城枪声大作。他问连长是怎么回事？连长回答，刚才最先响枪的地方，大概是子固路，那里离军部不远。他们跑步赶到军部时，看到周围警戒很严。这时军部一位副官传达贺军长命令说，一团已和他们打上了，命令你们支援一团，从敌人背后越墙打进去。在机枪掩护下，他们搭人梯越墙而过，冲入院中。这时，先头部队已拿下正门鼓楼，在大院展开战斗。我进攻部队逐屋占领，从四面向里压缩，最后打到朱培德军部住房时，敌人从楼上、楼顶和地面组成交叉火力网，据以死守。起义军难以进展。此时五团战士爬上屋顶，先打楼顶之敌，再集中火力，攻打楼内各屋之敌。几经拼搏，全歼朱培德警卫团。但到处找不到该敌团长张朝栋，原来当晚他到窑子里打花牌去了。从俘虏中查出叛徒赵福生，当即予以严惩；其余押往起义军总指挥部。战斗结束时，晨风习习，天色欲晓。

当晚在总指挥部的周逸群，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至晚12时半，即发现枪声，敌人预先知道，当然有所戒备。故至拂晓，始完全解决。"

在起义战斗中，二十军教导团顺利歼灭了敌九军第七十九团，还配合第六团攻敌第八十团，歼其大部，其残余向进贤逃窜；第四团在牛行车站附近，单独执行任务，也歼灭了当地小股敌人，顺利完成捍卫南昌的光荣任务。

与此同时，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首先歼灭了驻天主堂的敌六军第五十三团，接着顺利地歼灭了敌三军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并占领了敌卫戍司令部。缴获库存枪械1000多支，并打开监狱，解放出100多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当天，聂荣臻在马回岭领导第二十五师起义，果断阻截了张发奎的南进，在火车上，将其卫队营缴械，并缴获第二方面军的军旗，于次日开进南昌城。

贺龙令所部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据参加清点的三团文书后任军械股长郑小舟回忆：二十军在江西省政府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两处，共缴获步枪2480支，机枪24挺，八二迫击炮48门，其他军品无算。

8月1日，捷音报晓，红日初升。南昌之敌三、六、九军全部缴械，战斗胜利结束。起义军全歼敌五个整团又一个新兵团，共约3000余人。缴获步枪5000余支，其他军品更多。贺龙经过通宵指挥，仍然精神饱满，激情昂扬。战斗结束时，他换下被红领带和汗水染得变了色的白衬衣，同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朗声谈笑着离开总指挥部。

起义胜利了，南昌市民敞开了紧闭一夜的大门，锣鼓鞭炮、烟酒瓜果，慰劳起义军。标语布告，触目皆是。贺龙对周逸群说："你发几个电报，给九江的叶剑英，武汉的卢德铭通个气。"两湖革命势力闻捷后，日夜兼程，途经九江

转道南昌，但都遭到张发奎的武力阻截。若要等张发奎来搞南昌起义，真是异想天开。

上午9时，贺龙参加由谭平山主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讨论了《联席会议宣言》；宣布了起义后的政治纲领；决定了起义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选。贺龙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与宋庆龄、谭平山等七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和参谋团成员。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举行就职典礼，到会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5万多人，当时报纸报道说："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所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

（选自《从两把菜刀到南昌起义》，作者：宋泽云）

材料三　诗歌：南昌的曙光

周恩来穿着那身灰色中山装，
胸前系着一条红领带如初升的太阳，
领带飘动掀起红色的波浪，
革命的火炬要燃起曙光。

围在南昌敌我态势图前面，
周恩来书记和委员一起会商，
再次细致检查杀敌致果的方案，
等待座钟敲出激动人心的四响。

寂静中电话忽然叮叮响，
周恩来连忙拿起耳机，
贺龙总指挥报告发生新的情况，
凝神谛听，双眸闪出警惕的光芒。

二十一军有个姓赵的副营长，
受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
执勤的士兵暗中忽然发现，
赵营长偷偷摸摸逃向敌方。

朱培德知道了武装起义的消息，
布置准备的十分仓皇紧张，
对付贺龙和叶挺将军领导的部队，
要把自己的队伍迅速调到前方。

周恩来同时得到准确情报，
姓赵的军官已经叛变投降，
突然的变化增加了意外的困难，
象日丽风和中忽然出现冰冻严霜。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平坦，
平静的溪流途中也有激湍，
周恩来并不感到惊奇，
敏捷的思考如同闪电一般。

指挥部前后架起机枪，
前委委员立即紧急会商，
仔细分析突然发生的情况，
研究怎样对付魑魅魍魉。

周恩来英晨果断：
决定提前扬起义旗，
晚上九时戒严禁止行人来往。
委员奔赴分工指挥的战场。

东门附近敌人营房里一片黑暗，
巡逻队经过反复查看放松了提防，
露营空场中洒满了暗淡的星光，
偶尔有人睡觉换了地方。

七十二团连长和排长睡在一起，
提前两小时布置任务细声商量，
排长又要三个班长睡在他们身旁，
班长对战士轻声把战斗任务来讲。

战士迅速巧妙地悄悄活动，
扎好裤带打好绑腿穿好了军装，
战斗识别用的白毛巾缠在左臂，
静悄悄等待心中盼望的信号枪。

宫灯照着喜庆厅雕花长案上，
古老的座钟发出有节奏的音响，
周恩来盼望的眼光对着座钟，
静静地守在高脚茶几的电话机旁。

长针和短针缓慢地移动，
座钟的音响激动人心的心房，
一秒一分走向伟大的历史时刻，
在深夜里发出庄严的砰砰两响！

砰！砰！砰！城里清脆地响了三枪，
听到总指挥部起义的信号响，
七十二团的战士像是猛虎下山岗，
英勇地冲向敌人的营房。

猛向敌人营房扔去一阵手榴弹，

刀枪撞击的钢铁声音传遍四方，
战士严格命令敌人"不许动，快缴枪！"
"不要打了，我们缴枪。"敌人表示投降。

手电筒把敌人的营房照亮，
战士优待俘虏迅速打扫了战场。
敌人团部的电话不断地叮叮地响，
战士回答："二十四师在这儿驻防！"

二十四师进攻松柏巷天主堂，
住在里面的敌人听到枪响，
蜂拥而出冲到了松柏巷，
遇到七十一团伏击的子弹阻挡。

敌军遗弃了几具尸体，
慌慌张张缩进了营房，
利用天主堂钟楼制高点，
调集轻重机枪负隅顽抗。

敌人的机枪封锁了松柏巷，
巷子又窄又没有隐蔽的地方，
先头部队进攻受到阻击，
起义军遭受到不少的伤亡。

七十一团营长黄序周喘喊，
"我们的铁军是打不垮的，
我们的队伍也拖不烂，
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光！"

"共产党员们和共青团员们，
为了革命不怕反动派的刀枪！"
迅速组成了英勇突击队，
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向天主堂。

愤怒的目光盯在瞄准器上，
激烈的炮火掩护进攻的闯将，
"我们是铁军，缴枪不杀！"
突击队员像一阵旋风冲进了天主堂。

从窗口里高高举起了白旗，
士兵听到"铁军"顿时魄散胆丧，
排着整齐的队伍吹起"敬礼号"，
他们押着绑起的军官出来投降。

二十军军官教导团也提前紧急集合，
乌云遮去了星光伸手不见手掌，
紧紧包围左边敌人第九军独立团，
埋伏待命攻击敌人的营房。

城里城外枪声炮声震天价响，
无数的战士冲向敌人的营房，
敌人不是被打死打伤就举枪投降，
缴获的武器一堆堆放在操场上。

藩台衙门是敌人的总指挥部，
朱培德的警备团在这设防，
官兵训练有素装备十分精良，
进攻要道鼓洞楼口安好机枪。

贺龙的指挥部在圣公会，
两军的刀枪遥遥相望，
枪声划破沉沉的夜空，
战士们冲锋遇到密集的火网。

起义战士连续的勇猛冲锋，
一再给敌人猛烈炮火压回营房；
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袭来，
敌人闪着火光的枪弹就象发狂。

贺龙沉着镇定地指挥，
站在圣公会楼房的露天台阶上，
冒着浓厚的硝烟和枪林弹雨，
和刘伯承仔细修定作战方案。

他命令战士迅速架上长梯，
战士奋不顾身地把长梯紧靠砖墙，
机枪手轻抒猿臂迂迴攀登鼓楼顶，
占领制高点架好了机枪。

弹雨落在藩台衙门的门口，
敌人的机枪无法嚣张，
扼守大门的警备团也不能猖狂，
潮水般的战士向敌人大门里猛闯。

周恩来书记派来了增援部队，
一个个翻进了后院的砖墙，
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白刃战，
敌人遭到了灭亡的下场。

江边四团缴获了敌人的刀枪
进攻税务所敌人的部队顺利受降，
全团迅速集合到江边牛行车站，

贺团长早已准备好了渡航。

四团迅速渡过了绀碧的赣江，
守城的二十军一团引颈相望，
胜利的喜悦激动着战友，
大家紧紧握手还不断热情鼓掌。

四团分两路纵队开往市中心方向，
街上满地是扔下青天白日的臂章，
到处是三民带和国民党党证，
青天白日旗已经扯得不成模样。

红绿缤纷的革命标语贴在墙上：
“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
“实行耕者有其田！”把一切罪恶势力扫荡，
英勇的纠察队在街上熙来攘往。

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的慰问队，
举着红匾抬着西瓜和猪羊，
亲切慰问起义军的战士，
欢快的锣鼓响遍了大街小巷！

市面从未有过这样热闹浪漫，
蓝天白云也显出喜气洋洋，
罗霄山怀玉山笑逐颜开，
赣水高兴得激起层层雪浪。

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万道霞光洒遍了新生的南昌，
城里城外欢呼起义的成功，
总指挥部高楼上的红旗迎风飘扬！

隆重集会在皇殿侧广场，
工农群众踊跃参加倾城倾巷，
庆祝八一的伟大胜利，
赣江历尽沧桑没见过人心如此欢畅！

宣布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
庄严隆重地举行宣誓授印仪式，
工农群众欢呼胜利的情绪高昂！

周恩来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
批判了陈独秀路线右倾投降，
创建伟大的工农红军青史名扬。

这一枪，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气焰，
猛烈震撼蒋家王朝的殿堂，
回击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预告反动势力最后的下场。

这一枪，如同茫茫夜空的闪电，
发出惊心动魄的万丈光芒，
划破了沉沉的长空黑暗，
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这一枪，宣告陈独秀投降主义破产，
革命的火种播种在人民的心田，
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土地上，
熊熊的烈火燃烧向四面八方。

这一枪，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武装，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无产阶级的政权要诞生在枪杆上！

这一枪，谁也没法知道射程多远，
它要射到地球上黑暗的地方！
它要穿过一个又一个世纪！
它要射穿最后一个敌人的心脏！

（选自《中华英烈》86年1期，作者：周而复）

材料四　霹雳一声暴动

修水境内，原武汉政府警卫团，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正举行阅兵式。官兵们领系红巾，臂佩锤镰袖章，迈着整齐、威武的步伐，高唱《少年先锋队员歌》，意气风发地持枪行进。

临时搭起的检阅台上，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全副武装，不时含笑向官兵们举手致意。他年仅22岁，却已久经沙场，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一个月前，他奉湖北省委指示，率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前往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受阻，停滞在修水一带，和当地的农民以及安源工人自卫队合编，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正一面整顿部队，一面等待上级新的指示。站在他身边的，是年纪比他稍大一些，但也很年轻的师长余洒度。

营长张子清跑上检阅台：“报告，中央特派员毛泽东来信。”

卢德铭急忙拆阅信件：“……我奉中央和省委派遣，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全权指挥湘赣边界工农革命军，为加

强三团领导力量，现从安源直接去铜鼓，望派人前来联络。”

卢德铭早就读过毛泽东的文章，对他十分敬重。现在毛泽东将成为自己的直接上级，他不由喜出望外。他知道，张子清曾经在广州农讲所学习，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不等阅兵结束，他就派张子清作联络官，赶往三团驻地铜鼓。

中秋节的傍晚，铜鼓县肖家祠的祠堂里，革命军三团的官兵们正忙碌地准备着为出师壮行的酒宴。

“报告团长，”门卫来到苏先骏面前，把一张纸条递给他，“门外有人求见。”

“哎呀，”苏先骏看罢纸条，欣喜地说，“毛委员来了，快请，快请！”他快步走向门口。

须臾，苏先骏陪同毛泽东走进祠堂。毛泽东的长衫撕开了一条条口子，脚上穿着一双草鞋，由于脚掌磨破，草鞋已经被鲜血染红了。陈志安跟在他的身后，同样衣衫褴褛。

自从离开武汉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接连不断地召集会议，起草文稿，有时提着篮子装作买菜的，或者扮成国民党军官，在市区进行各种调查，布置工作。经过紧张的磋商，省委在几个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武装斗争要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东为起义区域；长沙的暴动需待湘东革命军兵临城下才能举行……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告别了杨开慧和3个孩子，在陈志安的护卫下，绕道安源赴湘东铜鼓亲临指挥。途经张家坊时，被地主团防以“嫌疑犯”拘留，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银元，买通团丁，跑进灌木丛生的山里。

“……走了两天两夜山路，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可就要当叫化子了！”毛泽东一边讲述脱险的经过，一边一拐一拐地走着，看见满桌果菜，诙谐地说，“嗬，这么丰盛，是为我准备的吧？”

“今天是中秋节，”苏先骏回答，“我们正在准备聚餐。”

“好，我看，把排以上官长都请到这里来……你有这一带的地图吗？”

“你还是先换一下衣服吧。”

当毛泽东换上干净的对襟短褂时，一幅普通中学教学地图已经铺在正屋里的桌上。他立即向苏先骏和其他几位指挥员部署暴动任务。

“我们的全部兵力是4个团，5千多人。一团、四团由卢德铭和余洒度同志指挥，从修水开始，”毛泽东用铅笔画出一个箭头，指向长沙。“二团由王新亚同志指挥，从安源，”他又画出一个箭头，指向长沙，“你们三团就从这里，”他画出第三个指向长沙的箭头，“三路一起进军，”毛泽东的绘图艺术并不高明，但这三个箭头却显得粗犷有力，犹如三支利箭，“兵临长沙城下，省委将组织城里5千工人……”

“报告！”门口传来张子清的声音。大家抬头望去，他正向毛泽东举手敬礼，身上背着两支短枪。

苏先骏正要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已跨上前去：“张子清！”他一把握住张子清的手，转身向大家说，“他是我广州农讲所的学生吆！”

“毛委员，”张子清抽回自己的手，继续保持立正姿势，“卢总指挥派我前来报告暴动准备情况，”他从身上取下一支驳壳枪，双手递向毛泽东，“并要我把这支枪送给你，这是他在武昌战役中缴获的最好的一支，他说：‘我们全体官兵向你表示敬意，并完全接受你的指挥！’”

“嗯，是支好枪，”毛泽东接过枪，很高兴地端详了一会，“不过，我只是在暴动期间负责政治领导，还不打算做个职业军人，不需要专门配备武器吧？”

“这……”张子清不知该怎样回答。

“当然要，”陈志安一把接过枪，“我来保管。”

“也好。”毛泽东一挥手，“就请你代劳吧。”

几十盏灯火，把祠堂照得如同白昼，起义前的聚餐开始了。毛泽东坐在首席，苏先骏和几位团、营指挥员分别陪在两边。

“诸位军官同志！”苏先骏首先站起来，面对几十个连、排官佐，“今天，党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到了我们团，现在，请他给大家讲话！”

席间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双手按住桌沿，缓缓站起，脚伤使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溃烂的脚背刚用白布裹好——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用不高的声音开始了鼓动演说：

“弟兄们，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在座的有湖南浏阳人、醴陵人，还有广东人、湖北人，今天是八月中秋，各位弟兄不在家里同亲人团聚，都跑到这里来是为什么？因为国民党要杀我们的头，我们要和他们干！”他说着，声音逐渐高昂起来，并且开始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向祠堂中央。

“……党中央最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发动秋收暴动。我们湖南，要兵分三路围攻长沙。同时，长沙工人举行暴动，里应外合，一举占领长沙！”

毛泽东来到连排官佐们中间。“……中国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工人、农民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官佐们热烈鼓掌，接着喊起了口号：“打倒军阀！”“工农革命万岁！”

“轰隆！”轰隆！”随着几声巨响，两条铁轨象僵硬的死蛇一样，被炸药抛向空中，一列飞驰而来的军车拉起了紧急制动闸，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慢慢停稳在被炸毁的路基前面，车厢里跳出了一个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

共产党“暴动”的消息立即传开了。

（选自《风云七十年》，作者：黄德明）

材料五　红旗高扬越王台

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之光的广州城，在1927年四一五政变以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广州工人骤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虽一时不能组织有力的反抗，却在酝酿着、准备着新的斗争。

11月17日，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解决桂系军阀李济深在广州的机关、部队，夺得了广东地方政权。桂系军阀不甘心丢掉广东地盘，在汕头和梧州集结两支军队，准备东西夹击张发奎。张发奎被迫把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粤、桂战争爆发。

我党决定抓住粤、桂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11月26日，省委书记张太雷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常委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成立起义总指挥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担任总指挥。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由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以及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

教导团打响第一枪。革命官兵们按照规定系起红领带，首先解决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代理团长朱勉芳，和一些反动军官，然后分三路进攻敌人。北路袭击敌军沙河步兵团、燕塘炮兵团；南路会同工人赤卫队攻击东山、粤汉铁路车站及伪公安局；另一路攻击伪省府公署、观音山敌军，抢占城北制高点。与此同时，埋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一声令下，如万箭齐发，直指各个预定的攻击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率领下，宣布起义，投入战斗。

起义的各条战线进展顺利，敌人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突然打击下，迅速瓦解。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无线电局、电话局、国民党省党部、伪省府公署相继被起义工人和士兵占领。处于市中心的顽固堡垒——国民党的广州市公安局，也被冲垮了。公安局长朱晖日只身狼狈跳墙逃走。

激烈的枪声迎来了12月11日的黎明。起义军占领大部分市区后，总指挥部由秘密地点迁到市公安局。公安局大楼顶上，冉冉升起一面铁锤、镰刀的大红旗。

12月11日上午6时，起义前秘密选出的工农兵代表们，从各个战场陆续来到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大门上悬挂着"广州苏维埃"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激励着每个代表的心。

在会议厅里，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开始了。张太雷、叶挺、周文雍、杨殷、恽代英、陈郁等，和代表们坐在一起。会议在张太雷主持下，讨论并通过了下列重要决议：一、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发表告世界人民书；二、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定于11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三、严厉镇压反革命，处决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四、迅速打通通向海陆丰的道路，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五、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号召"广州工人们立刻到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

11日中午，工农民主政府按计划在第一公园前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刚要开始，突然接到报警：敌薛兵部留驻广州陈家祠的英雄团，从大北直街向观音山反扑过来。起义军和与会群众立即停止开会，迎击来犯之敌。经过奋战，打死敌军一百多人，起义军重新占领观音山。晚上，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两个团，在炮舰掩护下，沿广九线打来，企图支援江北岸的残敌。江北岸慑于革命声威四下逃散的反革命机械工会武装"体育队"，在工贼头目李德轩的纠合下，进行骚扰，准备接应国民党反动军队。

12日早晨，敌李福林部从珠江南岸分两路渡江，在炮舰掩护下，四次发起冲击，均被起义军击退。上午11时，由韶关赶到广州的敌李福林部周定宽团，猛扑广州北面屏障、全市制高点观音山。教导团、警卫团各一部，同徐向前、沈青等率领的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在几个小时内，连续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下午1、2时，敌军曾一度占领观音山，经过激战，终于被起义军赶下山头。观音山正中的炮台，始终控制在起义军手里。

12日从早到晚，整个广州城竟日激战。敌人虽屡次反扑不能得逞，但他们的援军纷纷应调而至，新生的革命政权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12日下午，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参加西瓜园工农兵大会后，乘车返回总指挥部途中，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

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赤卫队员和起义工人们，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3时，因弹尽援绝，大部分伤亡，才忍痛撤出。整个广州直到下午5时以前，各处还有巷战。

（节选自冯建辉：《星星之火遍神州》）

材料六　广州苏维埃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切一切一切工农同志们：

在12月10日夜至11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赤卫队和教导团联合夺取了公安局及一切政府军事、财政机关。在城里几处次要的地方尚在肃清中。红军用他在公安局夺取的铁甲车、机关枪、大炮解决各反革命的反抗。

同志们：你们的胜利在革命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洲也是第一次。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

了苏维埃政府。

你们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你们的胜利，为世界革命，为你们的领袖第三国际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驱逐黄琪翔、张发奎，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与李济深、黄绍竑一样，应该逮捕和枪毙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这是我们在贪赃受贿的国民党指导之下不能做的，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才能做的。

同志们：

广州苏维埃在他的第一次会议中有下列的决议：

一、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

二、苏维埃的武力：组织三军，第一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是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作中心，加上许多走到工农革命方面的军士组织而成。

三、为保护苏维埃，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下级革命军官应该到红军中去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派。在最近几天至少应该组织五万红军，我们所有的战利品可以武装我们的红军。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是志愿的革命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的腰包奋斗的，是为给米与工人吃，给土地与农民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广州工人们即刻来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

四、应该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应该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

五、应该即刻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

六、没收一切大资本家的公馆、洋楼做工人的寄宿舍。

七、苏维埃政府应该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其需要若干，先由各自工会制定预算并报苏维埃核发。

八、苏维埃宣言：维持并增加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利益和特权。

九、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他所属的工会才有一切自由的行动，什么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和什么国民党自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其实是反革命的工会），应该即刻封闭。他们这三个工会领袖不是工人，而是白色恐怖的走狗，应该扣留起来即刻枪毙，同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工会改组委员也应枪毙；至于在这三个会下面的简单工人，他们反对他们领袖的，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同我们做一样苦的工作，得同样子的工钱，因此，我们不追究这些工人，并且希望这些工人即刻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他所属的工会。

十、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他的一切组织应即取消，若是有为国民党宣传的，应该受革命的裁判。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是革命党。以前工人倚重国民党，现在还有很大的敬重于国民党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他是帝国主义的仇敌，人民的朋友，虽然他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自蒋介石四月的政变和汪精卫七月的政变以来，国民党完全变成了反革命、帝国主义的工具，枪毙工人、农民，欺骗兵士，真是国民革命的叛徒。国民政府的军队是拿来保护资本家、地主和富农利益的，他们的领袖南京派和张发奎派都是一群反革命的、强盗的、压迫的和杀人的反革命分子。因此，现在还在国民党内留着的工农兵应该即刻退出国民党，依靠着唯一可靠的苏维埃政权。

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在广州有伟大的胜利，但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而且到处还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用我们最后一点的热血，保障广州苏维埃的政权，我们应该解放全广东和全中国的被压迫民众，我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帮我们。三千万农民开始全广东的暴动，一致与他们前进，依靠广州英勇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我们的胜利，将是不可估量的。

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李济深、朱晖日！

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工人、农民革命万岁！

共产党、共产国际万岁！

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万岁！

广州苏维埃主席　苏兆征

人民军事委员　张太雷

人民内务委员　黄　平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　挺

1927 年 12 月 11 日于广州

（选自《广州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2—115 页。）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27 年 3 月初，大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冲破了蒋介石的阻挠来到武汉。3 月 10 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胜利召开。

会议首先听取了徐谦关于武阳夏及汉口特别市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为巩固党权到会请愿的临时报告，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成立经过的报告。会议决议：全部接纳“湖北省武阳夏汉口特别市全体党员大会关于党的请愿十一条”，并追认联席会议所有决议继续有效。会议讨论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十一个议案和其他文件。会议还批准了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

例》。

这次会议，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制订了国民革命的十条行动方针：(一)“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并“设立农政部和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二)“要把一切行政立法权，集中在国民政府手里……防止个人专政，或一部分人专政的倾向”；(三)“指导城市、乡村民众作创作的革命工作”，组织“自治委员会”；(四)“以革命的方法统一中国”；(五)“继续地向帝国主义作战，直到我们达到目的”，“得到中国真正的政治的经济的独立而后止”；(六)“继续对于北方军阀的革命战争，直到我们统一了中国，肃清了封建军阀势力为止”；(七)“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于苏联的关系”；(八)指出“不要援助革命民众，不要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合作，也可以继续革命，这是错误的”；(九)“帮助国内少数民族(蒙古、西藏、回族等)的自决与解放”；(十)承认“国民革命军勇敢的荣誉的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功绩，“使人民与军队密切的结合起来”。根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宣言的精神，为了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统一革命势力案》中还决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例如：两党“共同担负政治责任问题——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等等。

这次会议，以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为中心。其《对全体党员训令》云：“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党内之昏庸老朽分子盘踞于内，官僚市侩及一切投机分子乘机而入。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谬误，妨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之权威，形成党内投机腐化之倾向；且也使军事呈纷争复杂之象，而不能收整齐统一之效。”因此，中央全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确立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取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的设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常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并在《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体会议互选之常务委员九人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全会还重订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并废止 1926 年 7 月 7 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裁撤中央军人部，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

依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会议进行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和各部会的选举。(一)改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了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等九人为常务委员，以谭平山、吴玉章、陈公博为秘书。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长，以汪精卫为组织部长(吴玉璋代)、顾孟余为宣传部长、邓演达为农民部长、陈公博为工人部长、王法勤为商民部长、孙科为青年部长、何香凝为妇女部长、彭泽民为海外部长。此外，还改选了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二)改选国民政府。会议决定扩大国民政府组织，选举了汪精卫等二十八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增设农政、劳工、教育、实业、卫生等部。

3 月 17 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发扬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产生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支持了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企图从组织上给予一定限制。这是革命左派反对右派斗争的一次胜利。

材料：

· 谭延闿致开会词
· 开会前之经过
· 对全国人民宣言

材料一　谭延闿致开会词

今天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开会的日子。本来照章三个月应开会一次，因北伐军事之耽搁，各位同志多在前线努力，所以迟到现在才开会。此番会议较前时的意义尤为重大。在去年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仅有两广地域，现在两湖、赣、闽、浙、皖均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党务问题亦随之发展，民众很能自觉起来认识革命，武汉民众对本会的希望尤为重大。因此，同人均主张党与政府迁来武汉，使党内党外，一切皆求刷新、求整理，以答复与顺应一班民众和同志的要求。一年以来，每有个人办事不周到、或一部分不周到的地方，但吾人应在全体革命利益上着眼！况且自本党改组以至政府成立，其中制度多不完备，因中国向无完善党的组织，以供吾人参考，只可就事实经验力求改进。我们试想想呵，在同一革命线上，许多同志把血换来的成绩，我们如不能发扬之，巩固之，我们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已死的同志。此次为党的胜利，巩固党力，使一切皆党的精神贯彻之表现。如此，一班民众对党的信托日益加重。刚才民众请愿，足见一班。希望本会同人能解决一切问题，始不负民众之希望。

材料二　开会前之经过

照本党总章，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半年至少

开会一次，后又决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乃自去岁五月十五开会以后，除临时全体会议及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各开会一次外，至今始得开会。其中虽因战事关系，致使迟迟，而党权旁落，只见个人意志不见党的意志，只有个人的自由，毫无党的自由，实为延缓之最大原因。此次会议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不但为本党之存亡所系，亦全国之治乱攸关。故其经过，有昭示于国人之必要。

盖自去岁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不但总理之联俄及容纳共产党政策被其破坏，即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坏，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使总理改组本党之精神及同志两年来之努力，悉付诸流水。因汪精卫同志为党军总党代表、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如此重大之军事行动，而彼毫无闻知，目中尚有党、尚有政府耶？汪精卫同志痛心之余，毅然决然引咎辞职，高蹈远引，力虽不胜，而大义已申于天下。以故一年以来，海内外党部同志请汪复职函电，如雪片飞来，不下千万通，其呼声洋溢于中外。非有私爱于汪也，实欲党权之恢复耳。三月二十事变之后，党中同志未尝不主张申明纪律，以纠正个人之错误。而一般同志以敌焰方张，宜委曲求全，徐图挽救。重以北伐军兴，战事为重，不得不隐忍迁就。总企错误同志有所悔悟，毅然改过迁善，不致隙长终凶，党国前途岂不利赖。是以去岁五月之第二次全体会议，以总章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而亦设主席，并以监察委员张静江同志任之。至七月临时全体会议，又改选蒋介石同志为主席，同时蒋介石同志因出发前方，又以张静江代理。党中同志均顾全大局，迁就事实，迭次曲予优容，其用心良苦。但忠实同志愈退让，而错误同志愈骄纵。厚爱党国同志以为不亟图补救，将失去革命意义。且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致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而政治会议与党务会议平行并列，尤易供黠者操纵。同志烛此危机，故在去岁十月十五日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场中，同志均有恢复党权、改正错误之意志。本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乃在提案委员会中讨论此案时，张静江同志意谓机关虽可统一，主席不得变更；二次讨论此案时，张同志又谓：如主席有变更，而此次又一致议决请汪复职，是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彼时前方江西军事正急，同志不忍稍有违言，致影响军事，虽多数同志怒不可遏，而二、三同志再三婉劝，终未将此案提出。至于政府地点问题，联席会议本议决仍在广州暂不迁移，及闭会未及一周，而蒋介石同志又来电主张将政府迁移武汉，政治会议仍议决照蒋同志主张办理。此种迁就，实牺牲多数同志竟志，以徇蒋同志个人意志，其顾全事实为何如者？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委员及政府委员第一批启程来汉，负有筹备党部、政府刻日开始办公之责。迨十二月五日，党部政府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即日全部迁移武汉。十二月十日，第一批出发人员已抵武汉，其时军事、政治、外交均甚紧急，而党部政府正值迁移，不可无一最高权力机关，以资应付，故由到武汉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一临时联席会议，于党部政府未到武汉以前行使最高权。十一月十二日正式成立，蒋介石同志亦来电赞成并且致贺。本年一月初旬，广州第二批出发人员均已抵南昌。咸以为不出数日党部政府人员一到武昌，即可开始办公。不料忽又有党部政府留在南昌之议，同志非常惶惑，民众尤深失望，乃起而要求政府从速迁鄂。盖其时正值"一三"汉案发生，外交异常紧急，千钧一发，瞬息万变，使无最高权力机关以指导民众，应付外交，则必立遭失败。蒋介石同志亦亲来武汉出席联席会议，应民众之要求，允于回南昌后即将党部、政府迁至武汉。乃往复磋商，迟至二月八日，南昌始决议将党部、政府全移武汉，而同时又布告取消三月一日所召集之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盖南昌前曾布告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开全体会议也。党部、政府迁来武汉后，正宜乘此时机开全体会议，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及忽尔中止此会议，殊不可解。彼时各地党部请速开全体会议、提高党权之呼声不绝于耳，中央宣传委员会乃本大多数党员之意志作宣传大纲，以表示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接受此意志，而免党内之纷纭。二月十三、四等日，迭接南昌来电，谓党部及政府职员于十五日全部启程，各委员于十六日启程。武汉各机关及民众筹备盛大之欢迎，每日有数十万人民鹄候于江干，延顶企踵，自朝自暮，未敢稍懈，其渴望为何如耶。乃十九日又得南昌电，各委员来鄂竟无期延期。在武汉中央委员当得南昌各委员定期来武汉电后，即定于二月二十一日开在武汉中央执监各委员联席会议，一面将临时联席会议结束，一面宣布党部、政府即日开始办公。盖约计彼时南昌同志必均已到武汉也。及届时又不来，实使人失望。二十一日，联席会议席上讨论此问题甚久，结果一致决议临时联席会议仍应宣告结束，党部、政府宣布即日开始办公，并建议于三月一日以前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二十二日，党务委员会接受此建议，即分别通告各地同志促其如期到会。二十四日，陈公博同志代表南昌各同志来汉视察，当经开会议决致蒋同志一公函，恺切说明武汉同志之意志；并抄送全体会议提案大纲，俾知武汉同志所欲解决者何等问题；又派谢晋陈铭枢两同志赍函偕陈公博同志前往与蒋同志面致一切。二十六日得谢同志来电，谓南昌同志对于提案完全赞同，惟望将全体会议会期展缓数日，俾南昌谭、蒋、丁、陈、何、朱、李诸同志得赴会出席。二十七日提出常务会议决议，又将会期展至三月七日，以待南昌同志之来。至七日午后三时，谭延闿、陈公博、何香凝、丁惟汾、李烈钧、陈果夫、

谢晋诸同志均到。迨六时开会，南昌初到同志述谓，蒋同志主张谓，若将会期改为三月十二，则彼亦可来武汉出席。多数同志以为人数既足，即可开会，不可以大会会期迁就个人，以损党之威权。结果七日会议作为预备会，八日开提案委员会，九日开全体审查委员会，十日正式开会。盖如此则南昌未来之同志均有余日可莅会也。同志于理论、事实双方兼顾，诚可谓委曲求全矣。至三月十日午后二时，而半年来全体党员所渴望之第三次全体会议遂于汉口南洋大楼三楼大厅正式开幕。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荣孟源）

材料三　对全国人民宣言

同志们，同胞们！

我们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北伐占领武汉以来，已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以前的时期比较起来，有下列的特性：

（一）中国全国的一半，已经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与工具——军阀——的直接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

（二）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因为他们的联盟者吴佩孚、孙传芳的失败及革命民众的奋斗，不得不应允放弃他们几种剥削中国人民的特权。

（三）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一面对于国民政府作不重要的让步；一面却借口虚造的事实，集中兵力于上海及其他各地，以援助北方的反革命势力目前对革命执力的战争；并借此摧残中国民众方兴未艾的革命斗争。

（四）中国的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广大的民众，已经逐日起来了，被压迫的民众已经渐渐的参加争斗了，这就是我们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的稳固的基础。

（五）同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反动派、买办、大地主、绅士、安福、交通、研究、外交各系，正在设法牵制国民政府的政策，使不得行，并用全力破坏革命的根据地。

（六）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除去侵略行动以外，还和他们的奴仆——北方军阀——正在设法分化革命的战线。我们的敌人不能抵抗整个的革命势力，不得已采用这种分化方法，足以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已经大有增进，但是我们也更要因此时时注意这种分化方法的危险，而预为防备。帝国主义者最近的策略是声明赞同中国人民的期望，愿意和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稳健分子合作，只是反对激烈分子。这个策略，就是很明显的要想分化革命的战线。

（七）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要干涉中国，又顾虑欧美各国舆论的反对，所以用他无数的宣传机关，传播谣言，毁谤中国的革命运动。

（八）同时，英国的反动政府正在用无理的文谍，恫吓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目的在软化中国的革命意向，并且隔离中国革命与世界的被压迫的民众与被压迫的国家。

（九）但是英国的和其他各国的被压迫的民众，还是对中国革命表同情的。虽然也有些反动派、投机派的领袖，谰言鼓惑，贬损中国革命的价值，却是各国被压迫民族与劳苦民众已渐渐的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了。

同志们，同胞们！

由上所解析的我们的革命现状里，我们要找出行动的方针。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在这个国民革命进行中的紧要时候，已经决定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行动方针。现在郑重的对全国同胞宣言，我们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要实行以下的各项：

（一）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这种争斗，不但不违反国民革命的利益，并且正足以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他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国内反革命势力。我们就要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我们同时要反对那些缓和民众运动的主张，我们要使民众运动充量的、普遍的发展。

（二）我们要把一切行政立法权集中在国民政府的手里。国民政府一定可以实行民主主义，防止个人专政或一部分人专政的倾向。只有由国民党所表现出来的民众的意志，才能确定国民政府的政策。

（三）我们要指导城市、乡村的民众作创作的革命的工作。由乡村到城市，我们要把民众组织成自治的委员会，代表民众，作国民政府的基础。

（四）我们要以革命的方法统一中国。这种统一，才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民族的真统一。由这种统一得到的政治，才是一个由上而下建设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政治。

（五）我们要继续的向帝国主义作战，直到我们达到目的；就是说，得到中国真正的、政治的、经济的独立而后止。我们反对那些对于革命厌倦的人们，反对那些对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们，这些人都是革命的敌人。我们要指出他们的谬误罪恶而打倒他们。但是我们同时可以声明：任何外国，但能对于中国国民的真正愿望容纳的，我们决不至伤害他们的合法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他们是不用畏惧的。

（六）我们要继续对于北方军阀的革命战争，直到我们统一了中国，肃清了封建军阀的势力为止。

（七）我们要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于苏联的关系。苏联是诚意援助我们国民革命、民主革命的国家。凡是愿意在民族平等原则之下与中国诚意合作的国家，一定愿意中国的统一与独立。

（八）有些人以为不要帮助革命民众，不要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合作，也可以继续革命，这是错误的。我们要在人民面前指明这个错误。这些人实在就是帮助帝国主义

与反革命，他们是与我们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无关的。

（九）我们要帮助国内的少数民族（蒙古、西藏、回族等）的自决与解放。

（十）这一年来，国民革命军勇敢的、荣誉的为国民革命而奋斗，我们要承认他的功绩。我们并且要用种种方法巩固国民革命军，使他更能奋斗。我们要使人民与军队密切的结合起来。

同志们，同胞们！

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的党要领导民众朝着上述的纲领进行。任何人或任何部分的人，如果反对这些纲领，我们便要反对他们。国民革命必须成功，我们的国家必须独立，我们的人民必须自由，帝国主义的宰割、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必须打倒，这便是三民主义的真意义。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党的纪律与党的指导万岁！

革命势力统一万岁！

（摘自《革命文献》台北出版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背景介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即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

4月15日，蒋介石按照汪精卫的提议，在南京筹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但因到会的中央执、监委员人数不足半数，改为“谈话会”。会议决定：定都南京，否认武汉国民政府及所谓“不合法”（指武汉）之中央党部，并通过恢复1926年7月所拟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等议案。

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以胡汉民、张人杰、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宣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奠都南京宣言。并请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行使职权。大会还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声称：“本政府受中央党部与民众付托之重”，“护党救国，责无旁贷”，“务使一切帝国主义，残余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断绝根株”。并宣布所谓“国民革命之方略”四条“一曰使革命军愈与人民密切的结合；二曰造成廉洁之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同时，“昭告”全国谓：“贯彻三民主义，必先肃清革命阵营内的反动势力……凡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又通电中外，表示接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咨请《查办共党分子案》：（一）各地“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二）“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所产生之机关，所发之命令，一律否认”。

南京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组织仍采用会议制，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设民政（部长薛笃弼）、外交部（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部长古应芬，钱新之代），司法部（部长王宠惠）、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部院。但实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4月21日，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表通电，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移南京，即日开始办公。4月26日，宣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成立，以吴稚晖为主任，陈铭枢、刘文岛为副主任。5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大纲》，由南京国民政府派民政、财政、交通、外交等部人员组织“战时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处理作战区内政务等事宜。

材料：

- 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在上海四一二事变前夕，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蒋介石将要发动事变的阴谋已有所觉察，并力图制止。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通电蒋介石及各军长官，须尊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总司令条例及外交、财政、交通统一等各案。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训令蒋介石：“不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四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的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同时下令中央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但是此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远在上海的蒋介石已鞭长莫及。蒋介石已抢先一步，在上海布置了事变的准备工作后，随即到南京制造了“四一〇事件”。迨四一二事变爆发，他即撕下伪装，公开叛变革命，在南京积极筹备另立中央。

汪精卫在离沪赴汉时，曾建议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这仅是汪精卫个人的意思，并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

四月七日作出迁都南京的决定后，汪精卫又于四月十三日致电通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们，二届四中全会将推迟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南京后再举行。当四一二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时，南京已成为蒋介石反革命的巢穴，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只得暂不赴宁，迁都南京之事搁浅。

蒋介石另立中央的活动却在南京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四月十四日，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并致电武汉，仍坚持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翌日，由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没有到宁，而在南京的中央委员又不够举行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二届四中全会无法举行。在这一情况下，只得决定改开谈话会，十五日的谈话会作出了非法决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否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四月十六日，南京的谈话会继续召开，为取得合法的名义，胡汉民提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而通过。十七日，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始在南京举行，蒋介石提议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等九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会议还推出胡汉民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推钮永建任国民政府秘书长。这次会议还决定：国民政府于四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标志着蒋介石独裁统治初步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等人出席了典礼。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并选出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请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行使职权。成立典礼上还举行了阅兵式。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在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讲，肆意污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竭力为其分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成立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行为辩护，要民众和北伐军士兵服从他们这些"革命领袖"的领导。

南京国民政府既告成立，即行发表《国民政府宣言》，声称："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并宣布"国民革命之方略"四条："一曰使革命军愈与人民密切的结合；二曰造成廉洁之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俨然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统自居。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仅是个空架子，由于它成立时间匆促，政府各部院都是在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四月十九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财政部和外交部，分别由古应芬、伍朝枢出任部长。五月，建立了交通部，由王伯群出任部长。六月，设立了大学院和司法部，由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王庞惠出任司法部长。八月，设立了民政部，由薛笃弼任部长。

此外，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于四月二十九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军事最高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负有军事重责及富有军事政治学识经验者若干人交由国民政府特任之"；"在战时为指挥统一起见得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军事委员中遴选一人交由国民政府特任之。"五月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编入作战军战斗序列之陆海空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指挥；未加入作战各军由军事委员会直辖，必要时总司令得咨请调遣之；"战时政务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特派民政、财政、交通、外交等部负责人员组成，受总司令之指挥处理作战区域内之政务，并任作战上各种要素之筹备调节分配。"这两个大纲赋予蒋介石以极大的权力。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河南人民出版社）

龙潭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二七年八月，北伐军退回江南岸后，孙传芳军于八月十七日开到浦口，并派一部占领南京上游江宁镇。此时孙军尚有五、六万人，改编为十个师，即第二师段承泽、第三师上官云相、第七师梁鸿恩、第八师崔锦淮、第九师李宝章、第十师郑俊彦、第十一师马葆珩、第十二师陆殿臣、第十三师王淼、第十四师刘士林（十二、十三两师均系周荫人残部）。孙到蚌埠后，鉴于津浦线上南军一击即溃，国民党宁汉两派军队在芜湖附近互相戒备，宁方蒋桂两系又不合作，认为是他重整旗鼓、恢复旧山河的绝好时机。当时奉鲁军已经决定联合进攻河南，并无南下渡江作战之意。八月二十一日，张宗昌到北京后，报告蒋介石下台及孙军占领浦口的情形，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津浦线军事完全交孙主持，另派渤海舰队助攻吴淞以张声势，奉鲁军则仍按照原定计划进攻河南。当天奉鲁军将领联名通电，威胁阎锡山卸下国民党旗帜，交还所占直南各县，并将京汉线让出以便奉军南下作战。这时，奉系军阀认为南方弱点日益暴露，前途大有可为，放弃了与蒋、阎谋和的计划，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孙军按拟定计划分由浦口、扬州、江阴三处渡江，前

两路集中进攻南京，后一路截断沪宁路并向上海进攻。海军事前联系保持中立。不料第一路在大胜关附近渡到中流时，即提早电告“强渡成功”，于是孙下令二、三两路同时渡江，孙自己到六合建立总部，指挥各军大举渡江反攻。

二十五日，孙军一、二两路渡江占领乌龙山、栖霞、龙潭、镇江。英国舰队曾炮轰狮子山炮台及沪宁车站，另有英舰四艘驶入吴淞炮台前方两千米内，此外尚有各国舰队六、七艘停泊江北都天庙附近七壕口、八壕口一带，显然具有掩护孙军渡江的意图。

南京方面，二十四日以前，对于孙军占领江宁镇以及偷渡长江的这些情况，竟然一无所知，接到陈调元的电报后，才仓皇布置应战。二十五日，何应钦再到镇江布防，第七军也由南京出发，一、七两军在危急关头表示了消除嫌怨、共同御敌的态度。二十六日，孙军第二路刘士林部又乘江面大雾由划子口渡江，海军背约施以阻拦，曾使孙军受到损失，但仍强渡成功，向龙潭、栖霞一带集中。此时第七军由西而东，第一军由东而西，与渡江孙军在龙潭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孙军死伤极多，江中到处浮尸漂流，龙潭高地两侧尸体遍地，腐秽之气熏天。二十九日，白崇禧由上海带兵赶来增援，孙军被迫退集江边为背水之阵，一直打到三十日晚十时，孙军除有一部分乘小火轮逃回北岸者外，大部分都被包围歼灭。

孙退回蚌埠后，力促鲁军增援巩固江北的阵地，张宗昌仍然假口河南军情紧急，无力兼顾，孙军不得不于九月上旬继续放弃浦口、乌衣、扬州、泰兴、泰州。

孙军败走后，一、七两军将缴获枪支各扩编为三个军。

材料：

· 鏖战三昼夜，孙军大败

· 李宗仁忆龙潭之战

材料一　鏖战三昼夜，孙军大败

大河口渡江总指挥刘士林接到孙传芳渡江命令，约在一九二七年阴历八月初六日。第一天，第一批登船渡江的，是段承泽第九师、刘士林第十三师、崔景淮第八师。渡江工具都是木船和少数小火轮，每船只能载五十人至一百人。由于船小浪高，北军又不习于乘船、用船；而且当时是渡江打仗，不是一般兵差，许多船夫都逃走了，每船只有一个船夫，所以划船的，绝大多数是由军士自己划。在这种船小、浪大、人挤、不习惯，而又在敌前抢渡的情况下，有些船因士兵乱动而翻沉，有些被子弹打沉。而且杨树庄被国民党重价收买，中途变卦。他派到大河口江面三条兵舰，虽不向孙军开炮轰击，但在江中开足马力，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乱冲，往返不停。兵舰撞到木船，固然木船要翻，就是兵舰激起的大浪头，也会把船冲翻。因此，渡江部队在与蒋军接触前，各师就淹死很多人，江里到处是浮尸，士气消沉，实力大减。木船又不能直接靠岸，因为离岸还有一里多宽的芦苇地区。长江南岸的芦苇，一般都有大拇指那么粗，稠密高大，船只无法通过。所以船到芦苇边后，只好下船。芦苇地区水有的二、三尺深，有的三、四尺深，内中坑、沟纵横。北军既不习水，还带着二、三十斤重的装备，以此在芦苇地区，又淹死很多。出了芦苇地，离岸还有里多路，到处都是国民党军战壕，在战壕里，以逸待劳射击这批疲乏不堪的孙联军，真如同打落水狗一样。彼此优劣形势，万分悬殊。但段承泽、崔景淮、刘士林等师，经过一天多的抢渡战斗，终于彻底击溃了国民党军的防线阵地，占领了龙潭车站和附近高地。

第二天（即阴历八月初七），由于孙军占领了龙潭，马葆珩师、上官云相师、陆殿臣师，本可平安渡过。但当天马师等渡江时，海军一面横冲直撞孙军兵船，一面用排炮轰击，并向龙潭孙军阵地炮轰。于是木船上孙军也向兵舰用步枪、手榴弹回击，且战且渡。就在这一天，被冲翻、打翻的船只达一、二百条之多，淹死数千人。

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渡，孙军渡江部队算是全部渡过了江。当晚，在龙潭车厢里，总指挥刘士林约了各师长开会。段承泽、崔景淮都详细报告了战斗经过和官兵伤亡情况。这三个师官兵伤亡都在半数以上，旅长赵国荫被俘，仇子川受伤。马师、上官师、陆师，各伤亡一、二千人不等，尚非十分严重。刘士林行伍出身，没有经过大战，经验能力都差，看到此次损失如此惨重，魂都吓跑了。只说：“我没有办法，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上官云相主张全力攻取镇江，即可进攻上海，亦可由镇江撤回扬州，进退两得其便。马葆珩主张由龙潭沿着过去赶杨宇霆的老路进攻南京。他说：“我对这一路熟悉，可打先锋。”这时争论的争论，打瞌睡的打瞌睡（刘、段、崔已苦战两日夜，疲乏极了），一直到拂晓，尚未得出大家一致的意见。忽由前方来人报告，白崇禧亲率部队，在镇江以西下车，在东南两方包围龙潭来了。于是大家决定马葆珩师负铁路东面战斗责任，上官云相师负龙潭南面战斗责任，陆殿臣师负铁路西面战斗责任；段、崔、刘三师暂在龙潭休息整顿，支援各路。

第三天（阴历八月初八）拂晓，东南各方面都与白崇禧和何应钦率领的军队展开激烈战斗，为夺取一个山头，进行九次拉锯战，双方伤亡惨重。单以马葆珩十一师而论，在一个上午，就有旅长康世滨被俘，刘振清受伤，参谋长陈子楠阵亡，四个团长伤的伤，亡的亡，营连长士兵死伤不计其数。有的一个营在半天内就换了两个营长，有的军士在半天中就提升到连长；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最惨的是送上木船的伤兵们，有许多船被杨树庄海军打翻了，

使几千受伤官兵都葬身鱼腹。

空前的激烈战斗，继续坚持了一个整天。双方连饭都顾不得吃。许多受伤官兵很难得到救护；因为担架队根本没法上去，就是拼命上去了，结果伤员尚未抬下，而担架人员已倒下去了。战至太阳下山时，双方前线仍在拉锯战，未分胜负。战场遍地都是死尸，受伤官兵听其惨呼，无法救护。刘士林、段承泽、崔景滙、陆殿臣、上官云相，都认为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一个一个偷偷地乘上预先准备好的小划子或小火轮，溜回江北去了。担任东路的马葆珩直到天黑仍在与桂军拼战中，他的副官长王仕甫跑来说，刘总指挥跑了，电话断了。马葆珩心慌了，立命王仕甫带一班卫队跑步到车站察看情况。回报说，不但总指挥走了，各师长也都走了，车站已拥满敌人。马葆珩对所部仅有的一个团长马承附说："崇先（马团长号）打电话通知各团，准备撤退（就是撤退命令）"。于是马葆珩带着马承附团长、刘国桢团附和卫队长田得胜，离开战线，向西走去。路中遇到撤退下来的各师成千成万的官兵，乱嚷："马师长马师长，我们师长找不到了，你指挥我们打吧！"马说："你们各师先集合在一起，自己推选一个师长或团长，我们再打。这样乱作一团，怎样能打仗呢？"官兵们七嘴八舌吵闹不休；远处枪声大作，杀声继起。在马葆珩身旁的马团长、刘团附都低声说："师长走开吧。"马便随着马团长等慢慢溜走。这时马葆珩心里很害怕，恐怕官兵们发现他要溜而不要他溜，那他岂不是等着束手被擒吗？刚走到一个江叉子，水又深又宽，无法通过。这时枪声更近，且闻"捉活的、捉活的"喊声。刘国桢说："师长，桂军有名野蛮，又杀红了眼，被俘更危险哪。"马说："我小时会游水，跳下去试试看吧，淹死总比被杀死好些。"于是把衣服一脱，只剩背心和短裤，问："崇先你怎么样？"马承附说："我不会游水。"马说："那你化装逃吧。"又对刘国桢说："跳吧！"结果还好，虽然喝了几口水，游过去了。连着游过几个江叉子后，正想钻进芦苇地躲避一下（既怕桂军来捉，又怕自己部队跟着），再设法逃过江去。芦苇丛中出来大批隐藏着的联军官兵，一见马葆珩，即蜂拥上来说："我们师长早逃回江北了，我们跟你在一块，我们跟你死活在一起吧。"马这时又害怕、又着急，暗想真糟糕，刚脱开了大部官兵的包围，可以设法逃走，现又被大批官兵发现。便无可奈何地说："弟兄们！我军完全失败了，无可挽救了，弟兄们去缴枪吧，桂军不会难为你们的；我们当部队长官投降，那就性命难保。你们跟我在一起。目标大，既害了我，也害了你们。请弟兄们还是去缴枪吧！他们不会难为你们的。"马平时感到越人多，越势派大，越威风，越神气，现在情况却不同了，感到周围人越少越好，官越小越好，不是个长官更好，可以随便藏起，容易逃命。马等慢慢地离开大部官兵，脚在向后走，眼却看着部队颜色；又钻进芦苇丛中，正遇着几个兵在煮北瓜吃，他们一见马葆珩，就拿一块半生不熟的北瓜给马吃。一天一夜没得吃东西，又游了水，正饿的要命的马葆珩拿起北瓜，就往嘴里填，但一看刘、田，便让刘吃，结果谁都没有吃，三人不约而同地都掉下眼泪来。当时正在八月节前几天，夜间气候相当的冷，而马等都等于赤身裸体，又因钻芦苇地时，被杂树苇叶刺的遍体流血，感到又痛、又冷、又饿，就在芦苇地里劈下些苇叶当被睡着了。

第四天（八月初九）天蒙蒙亮，就走出芦苇地，用手推开漂浮着的尸体去找船。刚走到一个小江叉，正有条木船，已挤满士兵正在要开。刘国桢认为机会不可失，喊"师长快上去、快上去！"马看船已上满人，又怕士兵不让他上；正犹豫中，刘国桢在马背后用手一推，叫马跳上船去。那知船已离岸，扑通一声，马落入河中；结果船没上去，反而喝了几口河水。爬上岸后，马与刘相对苦笑。马等继续沿着小河向江边走去，及到江边一看，那真惨极了。靠近芦苇边上漂浮着成千上万尸体，这个漂尸队伍南北有七八公尺宽，东西两头都望不到边；这些死尸，由于经过二三天江水冲泡，都发得象四大天王那样大。因为江边水流缓慢，死尸便一浮一沉地象有节奏似的，慢慢地向东漂流。有的服装整齐，仍死抱着枪在怀里，有的两手死抓行军锅沿（有部分人坐在行军锅里漂过长江，多系部队伙夫）；有的两个军士互相拥抱着；有的把步枪插在芦苇捆里，自己死抱着苇捆不放（这时正在收割芦苇，士兵异想天开认为可借芦苇捆的浮力，把自己带过江去的。为数很多。但芦苇被江浪一冲，就会倒转乱滚，不会游水的就淹死，落水的人抓着一棵草都不肯放手）。不知从那里飞来那么多的红头苍蝇，都落到死尸头上吃人肉。还有成群老鹰、乌鸦、野犬，它们不怕枪林弹雨，也都来啄食官兵的尸体。那时马等也顾不得尸休的腥臭，也不想这一人间的惨事，唯一念头，就是拼命逃过江去。

（摘自《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马葆玖）

材料二　李宗仁忆龙潭之战

当栖霞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我们得报，知龙潭已失守，镇江、高资之间，也有大批敌军南渡，高、镇、京、沪间的铁路及电讯交通俱已断绝。警报频传，因孙传芳此时已动员其所谓"五省联军"全部，号称十一师及六个混成旅之众，倾巢南犯。

敌军南渡的主渡点在龙潭。开始渡河之前，先由上下游佯渡，以牵制我军。实施渡河时，却先由江北的通江集、望江亭等地向乌龙山东侧登陆，以牵制我左翼部队。然后突向栖霞山、龙潭等地强度，占领各险要高地，以掩护后续部队登岸。

因此，当我方乌龙山一部分炮台和栖霞山为敌所占时，龙潭也同时失守。所幸白崇禧在自沪返京途中，被阻

于无锡、镇江之间，乃就地调集附近第一军各部向龙潭反攻，与我军呼应，形成对孙军东西夹攻之势。

白崇禧之所以能在此紧急关头坐镇镇江，指挥反攻，其中有一段微妙经过，也可说是"无巧不成书"。

先是，蒋总司令下野之后，胡汉民、吴敬恒等也先后去沪，南京方面惟剩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等数人支撑残局。然此时军饷奇绌，三军嗷嗷，不可终日。所以当我于八月二十一日西去九江时，白崇禧则东往上海，其目的是向上海商界、金融界的巨子筹借若干军饷济急。因白氏曾驻沪相当时日，与若辈大亨尚薄有往还。惟此时革命军从津浦线上，与苏北运河流域败退不久，孙传芳向京、沪人民团体声言将往上海欢度中秋（九月十日）。商民闻讯，将信将疑。故白氏去沪筹款时，各金融巨子皆托词推委，一连两日，尚无结果。白氏原定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专车返京，卒因与商界集会，不能成行。斯时上海北站有煤车一列，原定俟白氏专车西开时随之跟进，现白既不能及时离沪，站长乃吩咐此煤车先发，这是五日午夜前的事。煤车去后约一小时，白氏专车也离沪西开。谁知此煤车刚过镇江便出轨，车翻人伤，因路轨已为孙传芳的便衣队所破坏。同时京、镇间的电讯也中断，渡江孙军已于二十六日清晨三时占领龙潭车站，京、沪交通全断，镇江附近也发现敌人。

白崇禧得报，即停止前进，在无锡下车，电令驻京沪路东段的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同时电令正自常州开往杭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往援。卫立煌奉令后即率部赶往龙潭，于二十六日晨将敌人逐出龙潭站。惟敌人仍据守江边，掩护大军陆续渡江，向我反攻，我军渐有不支之势。白崇禧得讯，乃自无锡赶往镇江坐镇，并檄调驻沪杭路的第一军第一、第三、第二十一等师，星夜驰援。

惟自蒋总司令下野之后，第一军各师均无斗志。闻蒋临去时，保管，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

先是，我军将栖霞山再度夺回后，仍交第一军防守。不久，栖霞又被敌军夺去，我遂令第七军与第十九军再向栖霞山进攻，并占领之，不必再交予第一军。同时以军委会名义电白崇禧，约定三十日东西两方同时向龙潭之敌反攻。

计划既定，何应钦乃派员持军委会命令到南京城郊，制止第一军退却的部队。凡退下官兵已到麒麟门的，即在该地待命，不得入城；其尚在陆续退却中的，均各就现地停止。何总指挥并通令第一军，即刻准备反攻，渠本人且将亲赴前线指挥。号令一出，军心复振。各机关也暂停迁移，城内秩序，遂得安堵如常。

当晚东线我方第一军的第一（王俊）、第三（顾祝同）、第二十一（陈诚、等师援军均已到达龙潭附近。三十日拂晓，我军三路全线反攻。第七军的第一、三两师和第十九军的第一、二两师在夏威和胡宗铎指挥之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目标为龙潭镇及青龙山、黄龙山的敌军阵地。何应钦则亲自指挥第一军的第二、第二十二、第十四师的一部，自东阳镇进发，会攻龙潭。

此时敌军已渡江的部队，和栖霞山等地溃败之敌，都聚集在龙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六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　、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孙军官兵俱带数日干粮。船只在部队渡河后，悉数开往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的决心。我国古代名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为阵"等孤注一掷的战略，孙氏已并而有之。三军全力以赴，志在必逞。故我军于三十日晨发动拂晓反攻时，敌军也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激战终朝，敌军渐不支，乃退守山隘，我军乃逐渐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惟敌据山顽抗，深得瞰制之利，我军仰攻，死伤极大，尤以青龙、黄龙二山的争夺战，最为惨烈，我七军第一师损失尤大。然士气极旺。至下午三时，遂占领二山。敌军仓皇向江岸溃退，所有扼守山险的机枪百余挺，及山炮十多门俱不及携走，我军遂于午后五时克复龙潭。

我军因连日奋战，均已疲惫不堪，及在龙潭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孰知三十一日清晨五时，我军正在部署追击，敌忽反攻，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尤甚，幸我军将士均极奋勇。何应钦、白崇禧均已抵达龙潭督战，卒将敌人攻势阻截，并向敌反攻。自晨至午，卒将敌军迫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仅以身免。到午后二时，不及渡江之敌，遂全部被俘。孙军此次倾巢南犯，血战七昼夜，至是终于全军覆没。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下野

背景介绍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虽然在反共反人民上取得了一致，但由于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利，互争"正统"，宁、汉双方又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双方争执的焦点是谁统一谁的问题。7月18日，胡汉民等致电冯玉祥，指责汪精卫反蒋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汪精卫则以"党权"为大捧，向南京反击。7月28日，武汉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要提高党的权力，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以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并抨击蒋介石挟持党军，遂而挟持党部，为党所不容。同时，调遣部队摆出东进讨蒋的姿态。

蒋介石此时处于内外夹攻，加之津浦线上与孙传芳的部队作战失利，一时成了宁、汉合流的主要障碍。8月6日，蒋介石称南京政府内幕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8月13日，蒋介石离宁赴沪，玩弄了一次"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14日在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国民党内各派加快了合流的步伐。8月22日，宁、汉双方要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宗仁以及冯玉祥的代表在庐山开会，协商宁、汉统一问题，并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双方军队合作于9月2日取得了对孙传芳作战的"龙潭大捷"。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独树一旗，以沪方自居，与宁、汉对等讨论中央党部的组成问题，企图借机与宁、汉进行政治分脏。9月5日，谭延闿、孙科由宁赴沪，代表汉方同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等商谈合作问题，但胡汉民拒绝与汪精卫合作，西山会议派也要求汪精卫下野。在宁、沪双方的压力下，汪精卫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在上海召开谈话会，会议决定三个月内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召开之前，先成立由三方人员共同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机关，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以完成党的统一；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分会撤销；宁、汉两地中央政府合并、改组。至此，国民党宁、汉、沪三派在吵吵嚷嚷中实现了合流。

材料：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材料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蒋总司令于八月六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反共了。站在反共的立场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紧、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其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八月十二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忌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

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他。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溯自十五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象，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也得以维系不堕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意如此的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均知此事非自己担任不可，鲁涤平实材有不逮。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惟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以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京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张惶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咋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教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闿、陈调元等亲自向我口述的。孰知白氏战绩日著，蒋氏对他的疑忌也日增，甚至在和诸元老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不免闻言悚然。

为着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元老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惟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民国十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禧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作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国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时，马氏又要回部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

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比较说得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我对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来又快又好。如今他纵或有"不守范围"之处，推其原意，亦无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总司令如觉得有不合体制之处，大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

我一再诚诚恳恳地向蒋氏解说，总希望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不管我怎样的言之谆谆，他总是时怀疑忌。忠言难以入耳，实堪浩叹。所以就蒋与白的关系说，自克复南昌而后，已失和谐，还是我居间维系。故党人所传，说我的拥蒋，全是白崇禧居间促成，适与事实相反。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

背景介绍

1927年6月11日，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会议，讨论解决北方的政治问题。孙传芳、张宗昌及奉系将领参加了会议。16日，孙传芳深深地领会了张作霖的意图，在会上积极主张推戴张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和"讨赤大业"。张宗昌等均对此表示赞同。当然，对此举最感兴趣、也最高兴的还是张作霖本人。是日，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等8人联名发表拥戴电，称"天祸民国，政纲解纽，国无政府、民无元首，纷纭扰攘，累载于兹。现在赤氛弥漫，天日为昏，毒痛全国，无所不至。国民之期望，友邦之责备，皆以讨赤为惟一安国之大计。"所以，"际此存亡绝续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为了"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惟有吁恳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拯生灵之浩劫，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坚中央出令之权，一全国同仇之忾，庶可道扫赤氛，澄清华厦"。

6月18日午后3时半，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时，怀仁堂前"各架机关枪两架"，"另有飞机两架，在空中盘旋，盖可谓尽森严之能事。"放礼炮108响。然仪式进行的冷冷清清，"京师市民则似一无感觉"。参加人员也仅仅限于孙传芳及奉鲁军将领。

当天午后17时30分，张作霖在外交部召开大元帅就职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及武官列席。在茶话会上，张作霖致词后，发表了就职宣言。他在致词中说道："……关于修改与各国所订之条约，向由顾维钧经手，现在协议中，此事之大体经过，余亦知悉，是以今后可仍继续交涉。……北京之治安，绝对能维持，外人之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护云云。"

张作霖的就职宣言为："比年以来，四方多难，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机而入。作霖者睹兹赤氛日炽，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沦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18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整理内治，敦睦外交，尤为当务之急。……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

张作霖于就职当天，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主持内阁事务。同时，发表内阁部员任命：外交王荫泰、内务沈瑞麟、军事何丰林、财政阎泽溥、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交通潘复兼（由常荫槐代理）、司法姚震、教育刘哲。

同一天，张作霖还公布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

自1926年4月0日，段祺瑞执政府被鹿钟麟赶下台后，北京政府虽频繁易人，但都是以代内阁总理的形式代行政务，一直没有国家元首。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材料：

- 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袍笏登场
- 孙传芳等推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经过
- 奉张宣言

材料一　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袍笏登场

奉军退出郑州后，张作霖任命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节制由榆关至石家庄一带的吉、黑两省军队，并拟从吉、黑两省继续调兵防守京汉线黄河北岸。此时奉系旧派吴俊升、张作相仍然主张退回关外，新派杨宇霆则建议与蒋介石停战议和，问题的关键要看阎锡山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于是张作霖放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空气，并且恬不知耻地说他是孙中山的老友，一向是赞成三民主义的。

阎锡山早已与冯玉祥结盟为兄弟，此时看见奉军退出郑州，便于六月三日改悬国民党旗帜，五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他的态度是明朗化了，可是仍旧不够明朗，他对南方宣称出兵张家口、石家庄截击奉军

的后路，对张作霖又称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愿意担负斡旋南北的责任。由于阎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代表李庆芳、南桂馨在北京大受优礼。张作霖愿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企图与南方保持对等议和的地位，阎则以奉方易帜为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颇有距离。此外，张作霖愿意与蒋阎合作，而认冯、唐为"赤化分子"，这也是一时谈不拢来的原因。

六月十一日，孙传芳、张宗昌同到北京参加顺承王府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张作相、吴俊升反对投降易帜，主张退守关外，孙传芳则愿战至最后之一人，张宗昌也不甘心放弃山东。十六日继续开会时，杨宇霆强调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各省军队必须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无耻地说："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所谓"最高问题"，有的主张推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的主张仍用临时执政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用北方军事将领公推的形式产生。本来应由年龄最长的吴俊升领衔发表推戴通电，张宗昌插嘴说，"馨远老弟领衔最为相宜"，而孙传芳也并不推辞。张作霖望了孙一眼说："馨帅还有多少兵"？孙自称还有十三万人，只要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张作霖立刻承认拨发孙军军饷五十万元，子弹则可就近向山东领取。接着，他又回过脸来向张宗昌、褚玉璞问道："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否"？两人齐声回答，"进取不足，退守有余"。于是张作霖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

当天决定，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各项名义一律取消，以后统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长。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之。即日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在同一天发出所谓"讨赤"通电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前提，不特前此之敌此时成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阎二人进行反革命的大联合。在张作霖的提议下，当天孙传芳等张学良除外)重行互换兰谱结为七兄弟，以加强北方的团结。

十八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大元帅，礼炮放了一百零八响。张宗昌邀请孙传芳共同出面推荐潘复为内阁总理，张作霖即日予以发表。阁员名单如下：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政沈瑞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教育刘哲、交通潘复(兼)。

这是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的班底。这个政府的统治区小得非常可怜，不但山东、河南两省岌岌难保，就是北京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张作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立起这样一个小朝廷呢？据说非如此不能提高北方的士气，而且与南方议和也可以取得对等的资格。其实，张作霖还想以"讨赤"为幌子，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退一步保持以黄河为界的南北朝。但是帝国主义的眼光是再势利也没有的，它们看见奉系军阀三分天下已去其二，而南方国民党新军阀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张作霖之流毫无区别，就有顺水推舟、去旧迎新之意。张作霖就职的一天，曾用私人名义函请各国公使到外交大楼举行茶话，外交团为此举行会议，讨论外交仪式的问题。大家认为：来贴即未提及大元帅就职一事，自无致贺的必要，因此都着常服前往参加。事后外交部补发大元帅就职通知，他们有的回答说，"收到通知一件，当即转达本国政府"；有的说，"本使业已阅悉"。这样冷淡对待也是历届北京政府所没有碰到过的。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和大孤《每日新闻》拍来贺电，"大元帅"立刻吩咐登报，这也可以想见当时场面冷落到何等程度了。

(摘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

材料二　孙传芳等推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经过

京讯：自孙传芳来津后，即与在津奉派要人商议结合奉、鲁、晋、豫、陕、苏、皖、浙各系军队，协力对付党军；并计议在津设统帅办事处，推张作霖总制全军。同时卢香亭首先发电推戴，张宗昌、刘镇华、陈调元、阎锡山、寇英杰等相继表示赞同。张作霖当复电婉谢。上月二十八日，蔡家花园又开会议，遂决定拥张为安国军总司令。杨宇霆时亦列席，认安国军较讨赤军在名义上尚觉妥协，亦表同意。至此项安国军之组织，当时大体议决如次：(一)奉军及鲁军此后改名为安国军，凡举奉、鲁军宗旨相同，愿加入合作者，其军队亦冠以安国军字样。将来正式宣布时，则以奉军为安国第一军，鲁军为第二军，孙传芳所属军队为第三军，阎锡山部为第四军，寇英杰部或为第五军。(二)安国军设总司令，司全军号令，此席公推张作霖担任；副司令由张委派，有此资格者为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三人。安国军第一、二、三、四、五各军，均设军司令一人，由各军最高长官任之。是晚议决大纲后，即由孙传芳先拟推戴电稿，连夜分电各省。迄前日(三十)下午为止，已得各省复电，一致赞同，计签名者共十五省区。该电即于前晚(三十)发出，一面电孙传芳、韩麟春、张宗昌等代表全体将领赴蔡园向张作霖电贺，并请即日就总司令职。张稍表谦让，旋即允诺，当于一日下午在蔡园就职。

就职仪式甚为隆重，及时，张御常礼服，徐步至礼堂，张宗昌、孙传芳、张学良、韩麟春、郑谦、潘复、任毓麟、俞恩桂等重要人员数十人，分立两旁。先行告天礼，张跪拜虔祷，由郑谦良读告天文。次行就职礼，启用印信。礼成，各将领等向张申贺。张随发表张宗昌、孙传芳为安国军副

司令，并有简单演说，略谓：于此时局板荡，本人承各方推戴，勉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惟有积极负责到底，与诸军完成救国事业，同舟共济，拯此神州，决不有始无终，致辜民望云云。旋即退入后厅休息，令秘书处发就职通电。

张等就职后，即召集一重要会议。席间关于对南军事，仍以苏军担任第一线反攻；并决自即日起，所有奉军一律改称安国军。在前线无须奉军南下，前所有在天津附近奉军，暂不开动，京师亦须严密防守，以策安全。现驻京畿附近奉军，非至必要时，决不南下。至西北方面，自不容忽视，亦议定由驻察哈尔区内万福麟部骑兵师内抽调一部，开至察、绥适中地点暂驻，以备不虞之需。此外关于奉、鲁军今后内部应兴应革各事宜，皆略有讨论。至下午六时余始散。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即以现在之行辕为安国军暂时司令部。至将来正式司令部，闻有人向张氏建议设在北京，借以统制各方，对于所属各军亦可指挥如意。但张氏本人对安国军司令部建设在北京之议，尚在考虑中。另讯，北京西城顺成王府，现正裱糊洒扫，似为张料理行辕者，更有谓将来安国军司令部即设在顺成王府者，但询诸军事当局，则谓张氏尚无来京之意。

（摘自上海《时报》，1926年12月6日）

材料三　奉张宣言

概自民国成立以来，共和雏形尚未完备，而祸国之辈又复假异邦之邪说，快一己之私图，人民为其所愚，势不至亡国败家不止，是不得不为邦人君子正告焉。我中华立国，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礼义廉耻，四维素张。上古之世，人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出作入息，不识不知，以云自由，何以如此，然犹得曰尚未开化也。秦汉以降，井田之制废，而人民生计亦各有田产，以自赡其身家，并无如俄国之大地主及东西各国之大资本家贫富悬殊，显然有压迫平民之弊患。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人民皆讲让兴仁，安居乐业，但使无干戈之惊，即群相游熙之天，从无因产业不均而酿生国家变乱者。乃我国野心狡黠之匪徒，拾人唾余，宣传恶化，借不适用之共产学说，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动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以饱其欲壑。彼等日言推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迹其所为，不啻躬自蹈之；其所标之旗帜，皆该匪等之假面具、口头禅，有何国利民福之可言。昔石敬瑭附庸异种，扰乱宗邦，向契丹称儿臣，贻千古之唾骂。今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自侵入湖北后，凡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附之则捐为投机，不附则又指为反革命，仕宦则指为贪官污吏，商民则指为劣绅土豪，拘捕搜抄，侦骑四出，祸至无日，人人自危。对于武汉商户勒捐之外，又借房租，得款约数百万元，而中饱之数多至二百余万，营私肥己，殊骇听闻。其他残悖行为，昭昭在人耳目，祸且烈于洪水猛兽，惨更甚於赤眉、黄巾。此而不图，国何以国。作霖生长田间，政治虽非素娴，而民情实所深悉，安能坐视亡国之妖孽横行于光天化日之中？故首将西北之匪军先为剿灭，以期逐渐荡平。盖一息尚存，绝不忍不为民请命也。

夫政治本无绝对利害之可言，惟视是否适合时宜为断。吾国为四千余年声名文物之邦，本有治国之要素，何必取此不合国情之说而效之？何必取此世界一致反对者而行之？作霖敢为我全国父老昆季告：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然后固结团体，发扬共济之精神，泯除私心，合谋公同之利益。普及教育，为学生辟相当之用途；开拓利源，为全国倡可兴之实业。取精兵主义，以节省饷项；持自主政策，以保障国权。政见则捐小异以成大同，规为则舍目前而谋远大，鹬蚌内争而引狼入室，毋贪小利而自栽作霖不才，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亦无权利名位之心，凡志同道合者，皆为吾友，其害国殃民者，即是公敌。垂泣以道，天日可质，邦人君子，幸共鉴之。张作霖。

（天津《大公报》，1926年12月7日）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

背景介绍

九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它发表的宣言历数了沪、宁、汉三方先后反共及策划合流的经过，表示特别委员会今后"一方面继续清党，不使全党中有一不忠实之党员得厕身其中；一方面继续北伐，期于最短期间完成中国之统一"。特别委员会在宣布成立后，于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和十九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作出了以下各项决定：

（一）推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秘书长和各部部长。由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任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一人以统理部务。各部委员是：组织部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八人；宣传部戴季陶、顾孟余、胡汉民等八人；工人部陈公博、居正等四人；农民部（后改为农人部）甘乃光、陈果夫等五人；商民部（后改为商人部）褚民谊等五人；青年部傅汝霖、邹鲁等四人；妇女部何香凝、陈璧君等六人；海外部邓泽如、林森等四人。

（二）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汾、于右任等四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

钧、蔡元培、谭廷闿五人为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推定于右任、方振武等六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冯玉祥、程潜、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等十四人为主席团；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和大学院院长的人选。

（三）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执行。

（四）设立监察院。

九月二十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并在小营进行阅兵式。同日，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表示"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对于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务当为严厉之制裁，以建立革命秩序"。这个由特别委员会一手拼凑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仍然是一个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政府。

材料：

· 中央特别委员会宣言
· 申报报道
· 中央特委会风波

材料一　中央特别委员会宣言

我总理孙先生致力国民革命，组织革命团体，自兴中会始，其后有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之组织，至中华民国九年而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有收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政策。在总理之意，以中国共产党党员震于德国马克思之学说，俄国列宁之政策，以为新奇可喜，欲举而移殖之于中国，实为误解，深不忍其误入歧途，故欲一切罗致。使知三民主义实较马克思阶级斗争之主张为善，行之中国且较列宁之集产制与新经济政策为适当，而努力于中国国民党之实现，故毅然定容共政策。其时非无表示怀疑之党员，终信以总理之魄力与度量，必足以移化此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有余。且总理与苏俄代表越飞氏共同宣言中已声明苏俄协助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中国在东亚之国民革命，并不要求宣传共产。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时亦曾郑重声明，只以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之主义，故皆信之而不疑。不意总理竟于十四年之三月弃我等全体党员而溘逝，中国共产党党员遂乘此机会，渐试其纂〔篡〕党之手腕。是时有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已窥见彼等之伎俩，谋加以制裁，于是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总理殡舍前为清党之会议。而留粤中央诸同志，以笃信总理容共政策之故，对于提议裁制之诸同志不能采用其意见，于是此派反共之同志不得已而在上海召集代表大会，别组执、监委员会，组织中央党部。此粤沪两党部对立之原因全起于容共、反共意见上之不同者也。既而北伐进展，粤中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随北伐军之胜利而次第北迁，先莅南昌，次抵武汉。当是时也，共产党阴谋利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掩护，包办民众运动，勾结地痞流氓，激起各地之骚扰。多数监察委员认为党国危机，间不容发，爰警告各地忠实之执行委员，请以非常手段制止共派与附共者之破坏国民革命行动。于是粤、闽、江、浙诸省同时清党，本总理遗志，建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南京。此宁汉两方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对立之原因亦全起于容共与反共意见上之不同者也。未几，武汉诸忠实同志发现共派消灭本党之阴谋，认为与总理容共政策根本上不能相容，遂于七月十五日在湘、鄂、赣三省厉行清党。于是吾中国国民党一致取反共政策，别无何等不同之意见，当然无复有同等机关对立之必要。于是约集三方面同志推诚协商，而有组织特别委员会之建议，并定于南京各开中央执、监临时会议以决之。今临时会议业已可决，推出委员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改组国民政府，并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本会受任以后，遵总理遗训，服从全党公意：一方面继续清党，不使全党中有一不忠实之党员得厕身其间；一方面继续北伐，期于最短期间完成中国之统一，以图三民主义之实现，拯全国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完吾党之天责。谨此宣言，尚希公鉴。

（摘自《国民党史料》党史研究室编）

材料二　申报报道

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十五日下午二时半在中央党部开临时会议，至深夜始散。出席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二十人：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谊、陈嘉祐、伍朝枢、于右任、谭延闿、李宗仁、潘云超、朱霁青、李烈钧、吴铁城、朱培德、孙科、程潜、张人杰、经亨颐、周启刚、黄实、缪斌、由谭延闿任主席。先议推补委员案。主席报告中央执行委员因隶共产党籍而除名者六人：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附逆有据除名者一人：彭泽民。已故者二人：朱季恂、李大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因隶共产党籍而除名者八人：白云梯、毛泽东、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附逆有据除名者一人：邓演达。已故者一人：路有于。中央监察委员因隶共产党籍而除名者一人：高语罕。候补监察委员因隶共产党籍而除名者一人：江浩。共应补中央执行委员九人，应补中央监察委员一人。议决：彭泽民、邓演达附逆有据，均开除党籍。徐谦、陈其瑗、詹大悲、邓懋修、谢晋有无附逆嫌疑，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王宠惠之党籍应予恢复。补周启刚、黄实、王乐

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补黄绍竑为中央监察委员。

继又议决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分别行使全会职权，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为止。当推定李宗仁、杨树庄、李烈钧、冯玉祥、谢持、蔡元培、汪精卫、唐生智、蒋中正、程潜、王伯群、覃振、何香凝、阎锡山、胡汉民、孙科、朱培德、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张继、许崇智、伍朝枢、谭延闿、吴敬恒、邹鲁、李煜瀛、张人杰、居正、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刘积学、傅汝霖、缪斌、褚民谊、甘乃光、顾孟馀、陈公博、叶楚伧、茅祖权为候补委员。又推定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煜瀛、蔡元培执行监察委员会职权。

又议决对汪精卫辞职慰留，并电精卫、中正、汉民、敬恒请克日返京，参加会议。(十六日上午十一钟)。

(《申报》,1927年9月17日)

材料三　中央特委会风波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九月五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是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九月九日乘京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九月十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天，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

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宁汉战争

背景介绍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无异于取消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使桂系利用宁汉之间的矛盾控制了特委会的实权。因此，武汉方面的唐生智等深为不满，认为这是违法篡党。于是与汪精卫联合，反对"特委会"。9月21日，他们根据8月22日宁汉关于武汉中央迁往南京，武汉改设政治分会的决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推举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等为常务会，并委陈调元为皖省主席。武汉政治分会置之不理，并发表以何键代理皖省主席。双方互相指责，积极备战，宁汉"合作"，又重新变成宁汉对立。

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着即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10月21日，唐生智发出通电，痛诋特委会为"政客官僚之集合体"，是"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不可不讨，并由武汉政治分会于22日宣布与南京断绝关系。10月24日，南京特委会议决"永远开除唐生智党籍"，并发表《中国国民党为讨伐逆贼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决定由军委会组织"西征军"，任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第三、四、五路总指挥，分兵三路讨伐唐生智；并由海军、空军配合进攻。同日，占领安庆。汪精卫见机不利，于25日秘密从汉口抵上海，转赴广州，依张发奎。

南京政府的西征讨唐，立即得到两广和冯玉祥的响应。10月22日，广东李济深等以长江下游冲突，恐牵及中央党务，特电宁、汉双方，主张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克日恢复中央党部；唐生智部队即日退出安庆，皖政候中央解决。翌日，即决定与南京政府一致行动，讨伐唐生智，令李福林率第五军先行开赴韶关，并调回东江各军继续北进。接着，河南的冯玉祥也致电南京，支持讨唐。驻防鄂西之第二军鲁涤平部复与川军、黔军合组西路讨唐军临时军事委员会，推杨森为主席，沿长江两岸同时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城亦派兵进窥湘西。南京西征军乘胜进击。唐军由于朱培德投宁后，腹背受敌，退守武汉。西征军占领武穴，打开了武汉门户，而由宜昌东下的鲁涤平部亦迫迈岳州。广东讨唐军之方鼎英部进占柳州。唐生智见大势已去，乃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乘日轮逃往日本。14日，西征军进占武汉。唐部何键、刘兴、李品仙各军向湖南退却，决定"暂时保境休养，听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唐生智令。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决定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组，南京国民政府任张知本、张难先、石瑛等十三人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以张知本为主席。其退入湖南的唐生智旧部，亦于1928年2月通电表示愿意接受改编。至此"三湘悉平"。

材料：

- 桂唐之战
- 唐生智之异动

材料一　桂唐之战

一年有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航空队司令官　　张静愚　曹宝清（副）

党"为罪名，免除唐生智本兼各职，并发布讨伐令，由军委会组织西征军，以程潜为总指挥，李宗仁为副。西征军，兵分三路，海、空军配合进攻。李宗仁任第三路总指挥，白崇禧任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夏威部第七军、胡宗铎部第十九军、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沿长江北岸西进。程潜任第四路总指挥，率第六军、陈嘉祐部第十三军、叶开鑫部第四十四军，沿长江南岸西进。另以朱培德为第五路总指挥，驻重兵于湖口、九江，阻扼汉、皖交通，截击唐军；并以一部沿株萍路威胁长沙。10月24日，南京特委会发表了《告湘、鄂、皖民众书》，指责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一月之中，扩充军队至四十余团之多"；"垄断汉阳兵工厂，分割湘鄂财政，先后搜罗数千万现金，自肥其私属军队，以货币搪塞友军"；"利用时机，使何健、刘兴进占安庆、芜湖，将安徽视为征服地"；"一面以重兵屯扎安庆、芜湖，威福首都，一面勾结孙传芳，入侵南京"。同日，国民党中央特委会举行会议，决议开除唐生智的党籍，解除其党内一切职务。

10月18日，程潜的第六军向驻在宣城湾址的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进攻，宁汉遂正式开战。随后，李宗仁率第七军进入皖北，进攻三十五军何键部。由于朱培德已接受宁方委任的第五路总指挥，安徽的唐军有被截断退路的危险，因此，唐生智令刘兴、何健西军相继退出芜湖、安庆，撤回武穴一带。南京西征军沿长江西岸齐头推进，所过无阻，10月25日，不战而入安庆。次日，李宗仁乘兵舰到达安庆，指挥前线作战，宣布"唐生智十大罪状"。11月7日至10日，唐军继续缩短战线，放弃武穴、田家镇、蕲春，退回武汉。11日，唐生智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在唐宅举行会议，他以过度疲劳为名，拟即下野休息，指定李、何、刘负责，指挥全军退守湖南。当晚，唐乘日轮顺江东下，逃往日本。

蒋介石是不愿看到新桂系倒唐成功的，黄郛和蒋百里被派去汉口见唐生智，策动唐与蒋介石合作，共同反对桂系。蒋百里对唐生智说："膺白（黄郛别号）的主张，也就是蒋先生（蒋介石）同样的主张。现在是你和蒋、桂系、阎、冯、张的势力最大，蒋与桂系之间已有意见，黄膺白主张你和蒋、张合作，而以你与蒋先生的合作为中心，再拉拢阎、冯，这样桂系也不敢动了。"当唐生智收缩战线，准备下野时，蒋介石又叫陈仪和蒋百里传话给唐生智，要唐"莫离开部队，能打垮桂系则打，否则按兵不动，退回湖南，经济上由他负责接济。"唐生智自忖："桂系与蒋是迟早要决裂的，如果我不离开部队，他们会合起来打我；我离开了部队，目标就没有了。"他还估计，蒋桂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我如不离开部队，纵然打垮了桂系，占便宜的还是蒋介石。"看来，唐生智是在效法蒋介石下野观变之策略。

唐军退往湖南后，仍然保持第四集团军名义，号称有5个军和7个独立师。桂系曾经考虑用和平方式将唐部改编，但湖南唐军将领在蒋介石的拉拢下，继续反对南京特委会，整军经武，准备再战李、白遂决定用武力解决湖南的唐军问题。

1928年1月15日，南京政府电令白崇禧、程潜自武汉督师进攻湖南，以白崇禧为总指挥，分两路南下。程潜率第四路军的第六军和叶开鑫部四十四军沿武长路挺进；白崇禧率第三路军的夏威部第七军和胡宗铎部十九军由通城向平江进击，会攻长沙。不料此时蒋、唐已重新结合，蒋密令叶开鑫中途倒戈。当程潜率第六军占领岳州时，叶开鑫突然向程部侧背猛击，第六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于是，白崇禧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在南京主事的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主张檄调白氏所部回援，巩固武汉；而李宗仁则认为唐军统帅早已宣告下野，其部屡败，军心涣散，不能因为程部在武长路局部受挫而乱了方寸，坚决主张白崇禧部不顾一切，迅速向长沙挺进。经过反复讨论，谭等同意李宗仁的意见。结果，白部连战皆克，1月25日进占长沙，2月7、8日占领衡山、衡阳。这时，李品仙、刘兴、何键、叶琪等相继致电白崇禧，表示愿意停战，接受改编。3月11日，白崇禧、程潜与唐军达成协定：以李品仙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节制叶琪为军长的十二军（原十八军，周斓的十七军并入）和廖磊为军长的三十六军，两军均调至京汉路参加北伐；何键部三十五军、吴尚部第八军，留驻湖南；刘兴以"赴日考察军事"为名下台。

退守湖南的唐部正准备接受桂系改编之时，蒋介石派刘文岛秘密到达溆浦，劝刘兴等拒绝改编，在湘西和四川边界拖着，经济方面由蒋设法接济，等待蒋正式复职后，再行调动。不料刘文岛来迟了一步，刘兴等已和桂系谈判好了。宁汉战争遂以唐生智下野和唐军溃败而告终。

（摘自《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唐生智之异动

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欲动。因自南昌共产党八月一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徽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

一年有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十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十五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召覆灭。

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　　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兼)
　　第七军军长　　夏　威
　　第十九军军长　　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　　程　潜
　第六军军长　　程　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　　陈嘉祐
　第四十四军军长　　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　　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　　王　均
　第九军军长　　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　　张静愚　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
　　楚有舰　楚同舰　永健舰　永绩舰　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预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十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据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址、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惟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暧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祗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干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十月二十五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十月二十六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武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

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十一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我再破敌于蕲春，九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枝。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十一月十四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十五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止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惟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悦。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师长李品仙、廖磊等告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师长在其私宅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曾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十一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河，守长沙。何键、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京、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需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十一月十七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上海事变

蒋介石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认为"邦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陈氏兄弟的叔叔和邦会帮助蒋介石从贫困中崛起……成为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蒋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蒋介石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酝酿中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是最混乱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广州，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共产党多次举行起义，但大都失败了。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破裂了。

尽管蒋此时登峰造极，但他曾有段时间在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职务。这一年还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蒋介石辞职、蒋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结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蒋试图用自己的旗帜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存在着三大障碍。

随着吴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败，唯一与蒋对立的强大军阀是北方的张作霖。这一障碍纯属军事性的。

政治障碍或许更加严重，既有还没有完全团聚起来的共产党，也有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汪在与蒋发生冲突之后，迅速转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蒋的反共突然袭击曾使汪的职

务丧失并漂泊海外，这件事使蒋很难得到汪的好感。但在这一年的9月底，汪给蒋的来信打动了蒋。汪在信中说，对于3月份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已没有什么分歧了。蒋立即于10月3日用一种和解的语气给汪发了一封电报。

蒋在电报中说，他打算把两个同事送往法国，以便请汪回来负责党务。

但是，蒋并不知道汪的用意。后来，他才知道汪给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对汪的疑虑，并且使他确信，在适当时候汪会回来。事实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来，一回来，就开始抨击蒋。

汪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党内的调解缓和，而蒋则主要在前线忙于战事。虽然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控制着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他职务控制着党和政府，但他还必须对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该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被动、沉默，而他的对手们则主动、活跃。这个委员会并不大，只有36个成员，但其中16个是反对派。当然，只有7位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进派，他们都反对蒋大权独揽，专制独裁。

非共产党的反对派包括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他很有份量)，还有被暗杀的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的夫人，此外，还有宋庆龄的继子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姓邓，他曾是蒋最信任的助手，后来转向激进的一方，不再忠于蒋了。他最后被蒋杀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反蒋决议。该决议谴责个人专权，却不指名道姓。执委会还召请汪精卫回国，并赞同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带头满意和希望观察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进革命(这正是他们需要他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将轮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于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国顾问和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随着北伐的推进，政府仍留在广东显得不便。蒋要求迁都南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都驻扎在南昌。

但大多数中央委员愿意留在武汉。

在武汉，人们曾就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另外，共产党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业区武汉比在南昌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多数人主张迁都武汉，蒋作了让步，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

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操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办事的时候，受到了教条的束缚。

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

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一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

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等，大约有12个外国人丧生。为了躲避士兵，也为了躲避外国舰艇报复的炮火，百姓们纷纷躲到城墙脚下。

蒋来到现场，对第6军的第3师采取了无情的行动，缴了他们的械，并处决了30——40人。

后来据说共产党的政治委员插手了这一事件，(蒋写道)"他们希望挑动外国势力和革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正象吉勒麦兹所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对外国租界的掠夺会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好处，那很可能只是一次军队违纪事件。

很快，蒋在上海陷入了更严重的麻烦之中。在周恩来等人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国民军1927年3月22日攻占了上海。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接着便发生了残酷的巷战。在此过程中，约有200名工人被打死，1000名工人被打伤。随后，他们建立了临时市政府，使局势有利于自己。

蒋在南昌的司令部里，注视着这些事情，心里憋着一股怒火。开始是左派在武汉建立政府，对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表示蔑视；现在，共产党又夺取了上海。

他发表讲话，但不起作用。他时而调和，时而挑衅，在3月10日的一篇讲话中，二者兼而有之。他说：

他没有打算不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主张把他们拉进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现在已达到力量和声望的顶点，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的话，他们将给国民党带来灾难。

他说他不反共，他感激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但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内谋求优势，压制国民党中的温和派。

武汉政府没有理睬蒋的指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蒋作为政治委员的职务，使其总司令之权隶属于新的军事委员会。

他在国民党中的所有重要职务，都转给了他的对手汪精卫。那时，汪正在从法国返回的途中。该委员会还通过发表公告对他进行谴责。指责他是专制者和独裁者，说他的统治保护"官僚、商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

按照蒋的说法，是共产国际劝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的。尽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些事情，但蒋明显对汪的回国仍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老同事会因汪的回国而被重新启用。汪1927年4月1日回国后的几天里，蒋和汪在上海会晤了好几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根据蒋的建议，一个姓吴的国民党人参加了"清党"会议的讨论，此人是蒋在控制委员会中的忠实信徒。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清除共产党"的问题。当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一些远离革命的地主和富人发现他们有救了。吴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中对共产党和鲍罗廷进行了攻击。

4月5日，汪同来上海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重申共产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进行了辟谣。因为有谣言说，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军，并攻击租界，而国民党准备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共产党开除出党等。

同日，吴等人决定"清党"，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方案。6日，北京和上海是多事的一天。在上海的所有武装集团接到通知，从今以后，他们必须按军纪行事，任何反对行动，将以叛乱论处。

在北京，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使苏使馆人员大吃一惊。

他们在苏使馆中发现的东西，比张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4月28日，张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蒋依然面临着如何使在武汉的敌手溃散的问题。

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他各种职务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

李宗仁也为来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动，便离开安徽前线来到上海与蒋会面。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接到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要求辞职的电报，蒋说："如果连第一军都不能稳定的话，那我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李回答说："如果你也不干了，那么事情就糟了。当前的危机主要是共产党企图消灭国民党。"他建议蒋马上通电其他军界的支持者来上海"清党"，他自己的第七军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权在那里"清党"。蒋接受了他的建议。

4月6日，正是张作霖派警察搜查苏联大使馆的那一天，汪精卫到了武汉。

第二天，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李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临时市政会。

10日，蒋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3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随着为蒋的行为作辩护的“清查令”的施行，蒋开始准备进攻了。1927年4月11日，蒋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12日，蒋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

然而，上海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比较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让当地流氓穿着工人制服，根据约好的信号，这些假工人突然袭击了全市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无论他们是否抵抗，一律将他们打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在进入上海之前，事先与上海有权势的赌场主、鸦片商、秘密社会的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

据说，青帮流氓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共产党的官方数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在那天的战斗中和在13日的总罢工流产后被处决。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周恩来，但他与一个师长的兄弟一起逃出来了，那位师长的兄弟是周在黄埔的学生。

蒋介石本人没有把这些事件讲清楚。他的解释是委婉和隐晦的。他说4月12日，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军在当地工会和商会的配合下，缴了红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邦，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动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太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 50 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 年 4 月 12 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

（选自《蒋介石》，作者：〔美〕布赖恩·克罗泽）

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的内幕

1927 年 4 月，李大钊避居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兵营时，因夜间工作，写文章、谈话有响声，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现，法国使馆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外交次长吴晋（亲法派），同时也与日本使馆进行了联系。日本使馆位于御河桥东边，也发现苏联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但不了解夜间的情况。在法、日两国支持下，吴晋和当时的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军法处单处长，共同决定搜查苏联兵营。

搜查是在 1927 年 4 月 8 日早上八点多钟开始的。带人去搜查的是吉世安，他曾在译学馆学英文，毕业后，分配在警察厅做外事工作。去搜查的人不穿制服，不带武器。每个人均穿中式样斜大襟蓝褂子，长及膝下，打扮得象个仆人似的。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资识别。共有 20 余人，有 10 个人跳墙进去的，其余的人装做在马路边上晒太阳巡风。外国人进出一律不加阻拦，中国人则一个不准进去。他们刚闯进时，屋内正在烧文件，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起火，没有烧透，所以查出很多带有烧痕的文件。被捕的人中，有一个承认是国民党，做革命工作，这就是李大钊。当时，敌方所以看重此案的原因，不仅是捕到李大钊，而且是找到了许多文件，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我记得有的是军情报告，如王树常在哈尔滨驻军，共有兵力多少，还有其他军队驻扎情况；政治方面也有些材料。当年，我是外交部的秘书，与吉世安熟识，上述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李大钊被捕后第三天，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叫我以外交部名义参加翻译搜查来的文件，但不参加审问。我到了警察厅，陈兴亚见到我说，我们是熟人，你是搞俄文工作的，请你参加翻译工作。随后，他就谈了搜查苏联兵营的情况。他还说，我们没有损害苏联大使馆，只是搜查了兵营，抄出很多书籍和文件。捕了多少人，他没详细谈，只谈有一个名叫李大钊的承认是国民党员，做国共合作的工作。他要我领着几个人，把文件尽快翻译出来。他还说，搜查过后，吴晋次长才向张作霖报告，说国民党的北伐军是由苏联派鲍罗廷组织，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军队。他们要消灭北京政府，搞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由南方派人来，潜伏在苏联兵营内，要组织暴动；现已搜查到很多文件，又捕获到潜伏在苏联兵营中企图搞暴动的李大钊等很多人。张作霖听后，就叫吴晋把在张家口交涉总署的张国忱调来北京，负责俄文文件的翻译工作。

张国忱来京后，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翻译会”，下分二组，每组各 5 人。张是第一组组长，我是第二组组长。我们日夜加班翻译，搞了一个多礼拜，没有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无奈，就利用夜晚陪张作霖吸鸦片烟时向张做假报告，说这么重要的事，哪能很快搞完。大约在一个月后，编译会才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送给张作霖的是那套特制线装的，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张作霖一看人证物证俱全，很高兴，批准用绞刑杀死李大钊。最后，经宪兵司令王琦和警察总监陈兴亚以及军法处单处长等人决定，立即执行。李大钊烈士在临刑前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走向绞刑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我参加过翻译文件，亲自听说过李大钊被绞杀的情况，我是知道内幕的活证人。

关于对李大钊的处理问题，我在外交部听说，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主张杀；英、美则说不够判处死刑的条件，因为，没有发现有搞军事暴动的材料，可以从轻处理或释放。

我还听说，英、美使馆不同意这种搜查行动。英、美曾抗议说，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保护，无论是穿制服或是便服，去搜查苏联使馆的兵营中的文件，就是破坏了多年的传统、常规、定例，违反国际法，并要求中国外交部认真查清搜去的文件中是否有外交文件，声称外交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事在外交部内部也议论纷纷。

最后，捕杀李大钊，当然张作霖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法、日帝国主义假手军阀杀害共产党人的一面，这与推行“以华制华、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殖民政策”并无二致。这个历史教训，我们也不能忘记。

（选自《纵横》87 年 6 期，作者：王之相）

南昌起义决策的经过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大革命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的“分共”活动日趋加紧。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共中央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此期间，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中共“准备

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但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仍与中共保持统一战线关系，企图凭借中共力量，乘武汉国民党“东征讨蒋”之机，摆脱武汉国民政府控制，渐次经南昌移师回粤，排挤桂系，攫取广东，割据一方。遂令其所部由鄂东南进至江西九江、德安地区，坐观时局发展，待机行动。

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2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11军、第20军，共约3万人。其中第4、第11军是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多在第2方面军：有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副军长兼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3个团；由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由共产党员王尔琢、孙一中控制的第25师第74、第75团；由共产党员范荩任团长的第11军第10师第30团。此外，第20军军长贺龙，正在炽热追求中国共产党。这些部队，是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可以依靠和争取的正规军事力量。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变，决心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集合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即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重建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再次举行北伐。为实现上述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指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与谭平山、叶挺汇合，共同筹划“依张回粤”，并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现已抵江西。你们要积极破坏广东的财政……并须有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准备。”

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分共”后竭力拉拢张发奎“清党”反共。张发奎虽然与中共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但“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

李立三等于7月19日抵达九江后，收到党中央发给张发奎部我党负责同志的指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7月下旬，南昌、九江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急剧变化。第4军、第11军已进驻马回岭、涂家埠一带，第20军跟进集结九江；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第3军移驻樟树，第9军移驻临川，正与南京国民党李济深的第8路军对峙，奉命“东征讨蒋”的程潜部第6军，正经湘东、萍乡向南昌开进。这时，张发奎参加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后，决意在第2方面军内“清党”，电令叶挺、贺龙所部迅速集中德安，图谋解除叶、贺的兵权。面对严峻形势，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和聂荣臻等人于7月20日在九江召开会议（史称“谈话会”）。会议认为：由于张发奎日趋右倾，“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叶挺部“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南昌，是江西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大革命中，这里工农运动高涨。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后，中共仍有较强的潜在力量。城内除朱培德第5方面军警卫团及第3、第9军留守部队外，无重兵防守。在南昌起义，必将对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在全国造成重大政治影响。

第一次九江会议结束，李立三，邓中夏即上庐山征询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当即表示赞成南昌起义，同意回武汉出席中央紧急会议时，将九江会议的建议报告党中央，请求从速作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完全同意九江会议的建议，并于7月25日（一说24日）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会议根据加伦的提议，决定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积蓄革命力量，再举行二次北伐。为使南昌起义取得成功，常委会议决定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事实上谭平山自始至终参与了前委的活动）。同时决定：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隶属第2方面军建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大队，平（江）、浏（阳）农民义勇队等中共领导和掌握的武装力量，迅速向南昌开进，参加起义；约请在武汉、九江的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迅速到南昌，参加起义后的革命政权；迅速向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共负责干部通报南昌起义决定等。

贺龙于23日到达九江，谭平山即将九江会议决定告之，以探贺之意见，贺立刻表示热烈响应。接着，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起义的时间、宣言，起义后革命政权组织和土地政纲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叶、贺两部“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起义成功后，立即“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宣布“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发表起义宣言，并将会议的各项议定急电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

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抵九江，由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邓中夏及聂荣臻等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关于南昌起义和以土地革命为口号的决定。周恩

来在离九江，潜往南昌之前，指定聂荣臻到马回岭，与周士第、王尔琢、孙一中一起，将第 4 军第 25 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此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加紧反共活动。7 月 24 日，汪精卫、孙科等到达庐山，召集有第 2、第 5 方面军高级军官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策划“清党”，协谋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第 4 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得悉汪、张阴谋后，急忙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在此危急时刻，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在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开会研究对策。贺龙后来回忆说：在小划子会议上，“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小划子会议后，叶挺、贺龙置张发奎电令于不顾，毅然率领第 11 军第 24 师和第 20 军，先后开进南昌，完成起义部队的集结。

7 月 27 日，周恩来、李立三等秘密到达南昌与朱德会合。朱德曾任第 3 军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后被朱培德“礼送”出江西。此时，受党的指派，先期潜回南昌，负责接应。是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前委会议。由于起义的各项工作还未准备就绪，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由原定的 28 日晚改为 30 日晚；在其他起义领导人赶到南昌之前，周恩来、叶挺等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筹备革命政权。会后，周恩来前往第 20 军指挥部会见贺龙，把中共前委的决定告诉他。贺龙坚定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根据党的指示，彭湃、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毛泽覃、高语罕、廖乾吾、方维夏、张曙时等于 7 月底先后抵南昌。广东北江农军、武汉农政训练班部分学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部分学员、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少数学员也于月底相继赶到南昌。7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成员张国焘从九江两次急电前委：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原来，我党曾将南昌起义计划电告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讨论国际复电时一致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的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周恩来接张国焘急电后，经同前委成员商议，果断地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7 月 30 日，张国焘与恽代英抵南昌。上午，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因“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他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起义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即刻发言：“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那里现在还讨论。”周恩来坚决表示：“还是干！”恽代英、彭湃、谭平山、叶挺及周逸群则明确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一致主张起义如期举行。张国焘极力反对，并且“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前委扩大会议争论激烈，持续了几个小时，因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问题。

31 日晨，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此时，叶、贺得张发奎来电悉：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将于 8 月 1 日到南昌。在此情况下，张国焘被迫放弃错误主张，“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下午，各部队根据前委决定，立即进入起义前的直接准备。叶、贺军分别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我党中央和前委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命令。各团、营受领任务，明确各项规定和联络信号。各部队进一步侦察敌情、地形，选择进攻路线，制定具体作战方案。中共江西省委也根据前委决定，召开党、团、工会活动分子会议，号召党、团员，工人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参加起义。正当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加紧临战准备时，第 20 军一个副营长到第 5 方面军警卫团告密。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出敌不意地解决驻南昌的敌军，前委断然决定：起义提前 2 小时发动。

8 月 1 日凌晨，贺龙指挥的第 20 军，叶挺指挥的第 11 军第 24 师，以及第 3 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按照前委的部署和作战计划，突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打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枪。

（作者王淼生，选自《军事历史》90 年 4 期）

紧急惩奸

1927 年 9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安源，在张家湾召集附近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开会，讨论秋收暴动和部署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安源会议”。会议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安源三处的革命武装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其中一个团由集结在安源的武装合编，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

就在安源会议快结束时，出现一个严重而又紧急的情况：由安源党组织派到矿警队任大队长的党员陈鹏，利用同乡关系，暗中串通王雁、向先发、钟义、傅子元等七名连、排长，密谋将共产党所掌握的矿警队拉到九江，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军队。

当时集结在安源的队伍，有农民自卫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以及矿警队，总人数近 2000 人，只有 700 来条枪，其中约 500 余条掌握在矿警队里，仅有的 3 挺机关枪也

由矿警队掌握。矿警队的背向直接关系到安源革命武装力量的生死存亡。

中共安源市委得到这一情报后，果断地决定严惩这伙叛徒，并立即作出严密部署。

9月4日深夜，万籁俱寂。共产党员陈昌仁按照党的决定，带着三名同志，手持驳壳枪，埋伏在陈鹏住房的窗下。透过窗户，只见昏暗的灯光下，陈鹏正在慌慌张张收拾文件、整理行装。他已察觉到外边风声很紧，准备马上离开安源。

"砰！砰！砰！"清晨4时，从窗外射进三颗子弹，陈鹏应声倒下。

睡在三大队的连长王雁被枪声惊醒，急忙从床上爬起，去取挂在墙上的手枪。共产党员、排长杨士杰带两名狙击手向他连开两枪，王雁身子一歪，从床头滚到了床下。

连长向先发是半夜利用查哨的机会从矿警队大队部溜出来的，一出门，转身就钻进附近一家妓院。

他的一举一动被早在门口秘密监视的共产党员盯住了。两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武装便衣尾随向先发也到了妓院。只见向先发与妓院老板寒喧几句，随同相陪的一名女人进了房间。

为了等待时机，两名武装便衣买了一瓶酒和两包瓜子、花生，坐在妓院的柜台前一边吃喝一边闲聊。

凌晨三更时分，外面枪声四起。两名武装便衣火速拔出手枪，直朝向先发房间奔去。一人守在门口，一人破窗而入，对准向先发连开两枪。只听一声惨叫，向先发一命呜呼。睡在床上的那个女人吓得"哇哇"直叫。

住在盛公祠炮台上的两名排长钟义和傅子元当晚没有睡觉。打入矿警队的四名共产党员特意约他俩打麻将，并订下君子协定：每输五个子码罚一杯酒。

夜深人静，炮台上不时传来"霹雳啪啦"麻将声。。"干！""一饮而尽！"

时至半夜三更，钟义、傅子元醉得如同一滩泥，眼睛都睁不开，两条腿也不听使唤。

突然，外边传来几声枪响。别处已经动手了。四名共产党员一齐拔出手枪，对准钟义、傅子元的胸膛。

"别……别开玩笑了，当……心……走火。"钟义站起来，摇晃着身子，语无伦次地说。

"砰！砰！砰！砰！"四颗子弹几乎同时射进两个叛徒的胸膛，钟义、傅子元顿时倒在麻将桌前。

与此同时，矿警队的另一驻地——花冲那里枪声也起，另外三名叛徒也被处决。

5日上午，中共安源市委根据安源会议决定，将驻安源各路工农武装和矿警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竖起了全国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选自《党史文苑》93年3期，作者：黄爱国）

一位身份特殊的优秀地工人员
——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

1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于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的当天，上海的《申报》刊载了两则重要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布离婚的声明。在蒋陈共同生活和日子里，他俩曾通过法律手续共同领养了一个女儿——蒋瑶光，后改用母姓为陈瑶光。

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是湖南长沙人，1902年生于一个大官僚家庭。陈洁如对女儿选择的这位翩翩绅士是十分满意的，并赠陆一块珍贵的金壳打簧表。此表是共产国际鲍罗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赠送给蒋介石的。这样，陆久之也就成了人所共知的蒋介石的女婿。

陆久之早年就学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后在上海与蔡叔厚(我党地下工作者)共同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因受恽代英、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思想熏陶，为社会主义学说所吸引，继而投入了轰轰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

1927年春，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前夕，陆久之由中共党员、印刷总工会委员长徐梅坤介绍，进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身边工作。其时，在闸北湖州会馆设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4月12日晚上，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会馆。当时，陆久之等人正在开会，混乱中他跳墙而出，转入了地下活动。后来陆久之历尽艰难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并接受党的委托，利用自己特殊身份，打入大流氓陈群、杨虎为首的"工会统一委员会"任调查院干事。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陆久之毅然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地下党组织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党欢迎你，但你在党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此，陆久之时刻铭记着这些话，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重任。

因陆久之营救而脱险的我党领导人有陈赓、向忠发等，此外，还受周恩来指示营救过从莫斯科来沪的日共书记佐野学……

陆久之的行为终于被敌人发觉，1930年1月，陆久之被迫亡命日本。

2

初到日本，为团结进步学生的力量，陆久之与廖承志等人曾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读书会"。

1932年，陆久之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他与蔡叔厚经过党的批准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他们既属我党中央特科吴克坚领导，又属远东局佐尔格、华尔敦领导。远东局中方负责人为刘进中、萧炳实；陆当时是东京站的

负责人，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情报。在沙文汉、陈修良夫妇等协助下，陆久之曾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混入上野图书馆偷拍过日本军事要塞地图；此外，还通过日共获得不少日本军、政界的重要情报。这些机密情报均由当时上海站的负责人蔡叔厚带回祖国。

以后，陆久之又进入了驻日使馆任研究专员，借从事资料翻译之便，为祖国收集了更多的机要情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久之愤然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挥笔撰写了一系列抨击文章，以笔代戈投入了战斗。他还曾以《申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之名，采访了声名遐迩的张学良将军。在满座高朋的少帅府，张学良视陆久之为上宾。张学良从这位"特派记者"口中，掌握了大量来自敌国的第一手重要情报，也激发了他的民族正义感。出自对陆久之的信赖，张学良还委任陆为"东北文化社"的特约记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陆久之随大使馆一起撤回了祖国。

3

1938年，陆久之经许世英介绍混入了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在军统特务王芄生手下从事情报工作。当时陆久之曾以重庆专员的身份神出鬼没于孤岛上海。他多次将获得的情报发回重庆，同时也传到了我党手中。其中包括日寇将于1940年5月偷袭宜昌等重要情报。

陆久之的足迹真是无所不至。他利用其显赫的身份与留学日本的资历，结识了不少日本军方人士，其中有日海军武官府的木村重，经他介绍打入了由二宫丹治管理的日海军经理部所辖的"海安信托公司"，并担任经理；同时兼职于三和公司、富华贸易公司，搞到了我根据地所急需的各类物资，他再利用日海军部签发的"货物搬运证"，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

终日辗转于敌人心脏的"探险家"，事事要有惊人的胆量与置生命于度外的气魄。在一次帮助地下党刘勇（吴承芳）摆脱敌人追捕的过程中，陆久之不幸身陷囹圄。在日寇的宪兵队里，陆久之遭受严刑拷问，但仍守口如瓶；由于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并坚持以"商人"自居，使日寇一时也难以下手。在狱外朋友们的保释下，终得以虎口脱险。

4

到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已危在旦夕。此时，陆久之接到了沙文汉同志转来的地下党指示，希望他进行一次更大的"探险"——策反汤恩伯。

汤恩伯的恩师陈仪，这时也认为"国民党腐败没落，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希望汤能对今后有所打算。陈仪还派部下胡允恭以及丁名楠带有自己亲笔的"大势已去，识事务者为俊杰"的书信，来到上海。

在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同时，陆久之亦对汤加紧了行动。他曾多次找机会劝说汤"急流勇退"，向傅作义将军学习。汤似乎也有所动摇，也经常向陆久之打听傅作义起义后的待遇问题。陆久之问汤恩伯："解放军打过来，你会有何策略？"汤恩伯表示："上海为我接受，我不会用焦土政策。"于此同时，陆久之趁与汤恩伯一同视察阵地之便，将敌人的军事要塞情报送到了地下党手中。

有一次，蒋介石带了经国、纬国两个儿子亲自抵沪督战。这时，陆久之曾私下对汤恩伯说："你老兄的机会来了，现在你可一举成名天下知，你既可作第二个傅作义，但比他还将更为有利，因为蒋家父子三人都在你的手中了。"汤恩伯听罢此言，急顾左右，面红耳赤地连连摆手："不要瞎说。"

汤恩伯在离沪去台的前一天，要求陆久之能与他同行，并说："飞机上已给你留了一个座位。"但陆推说："在此等你回来"而拒绝了。

陆久之先生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美国源流出版社香港源流印刷出版公司驻我国的总代表和董事长。虽年事已高，仍整日在外奔劳。

陈瑶光1971年赴港奔母丧，供职美丽华大酒店。陆久之与她曾生一女，现在美国。

（选自《党史纵横》90年4期，作者：许承炜、周天华）

一个从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188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詹家山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年代，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此伏彼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当时的湖北是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

詹大悲在黄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秘密研读《革命军》、《猛回头》等进步书籍，逐渐倾向革命，产生了爱国反清思想，并和宛思演、方子樵、梅宝玑、何亚新等同学一起组织证人学会，积极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1908年，他因宣传革命被学校开除而离开黄州到武汉，进入武昌自治研究所续习，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在交谈中詹认为：革命活动必须要有报纸进行鼓动，以唤醒国民，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后詹被聘为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报纸《商务报》主笔。从此，他踏上新的征途——以新闻作职业的爱国反清的革命生涯，利用报纸宣传革命，以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清政府的腐败而喧腾于报界。由他主编的《商务报》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版，很快成为湖北新军中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战斗舌喉，进而大肆鼓吹革命，言论激昂，抨击无所忌讳，深得民心，风行江汉，被报界誉为"革命先锋"。

1910年,《商务报》因大力谴责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及群治学社的暴露,即遭查封,詹大悲应邀担任《大江白话报》主笔兼发行人。其时,汉口发生了英国巡捕无理打死人力车夫事件,反动当局通电全国各报不得评介此事。各家报馆噤若寒蝉,唯詹主编的该报"据实直书,无所畏惮",著文指出"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无能是分不开的",因而获罪于中外反动派。该报经理畏祸弃职,报纸被迫停刊。詹遂于1911年1月3日将《大江白话报》改名为《大江报》,充作宣传阵地,并成为他亲自发起和主持的文学社的机关报和战斗工具。

同年7月26日,詹大悲为支持和声援湘、鄂、川、粤人民反卖国争国权的保路运动,在《大江报》上刊出黄侃(署名"奇谈")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和《亡中国和平也》两篇时评,号召"爱国志士"、"救中国之健儿"造成"极大之震动",奋起进行"极烈之改革","以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抛弃和平的幻想,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该文刺中了清政府的要害,反动地方官吏终日惶惶,畏报如虎,恨报入骨。湖广总督瑞澄见报惊恐万状,立命封报捕人。于是,《大江报》即遭查禁,詹大悲和编辑何海鸣也同时被捕。

法庭上审讯詹大悲:"你为何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他义正词严地辩驳道:"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党。望治情殷,故出此忿语……"他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声明:"此文系外间投稿,经我过目后选定刊载,所以不能追问写稿之人:本人是《大江报》经理和主笔,如果有罪,全部由我承担,与何海鸣无涉!"驳得审判官瞠目结舌,宣告收场。

他虽在狱中,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与常到狱中探望他的革命党人分析形势,及时了解外间情况,运筹革命大计,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迅速联合起来,力图大举,终于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提前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组建军政分府　讨袁护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詹大悲被迎出狱。他以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为主,组建汉口军政分府,自任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领导汉口军民首当其冲支援前方战争,筹措军费军粮,组织调派民军,抵御清军的反扑和北洋军阀的进攻,屏障武昌。

他出狱后,对起义军的行动和武汉三镇的形势极为关切地说:"武、夏一衣带水,岂有闭城造反而不急遣一兵占领汉口乎?"次日,起义军迅速渡江攻战汉口,及时扫除了市内残余敌人,维护市面秩序和治安。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深受汉口军民的拥戴。然而,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等人对詹"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虑,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驻汉鄂军支部,仍以詹大悲为支部长,专管政事",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派其心腹张景良任汉口军事临时总指挥。在抵御冯国璋部时,张非但不督战力拒,反而通敌策应,致汉口30日陷落。詹依军民所请,立斩张景良而后上报,遂为黎元洪不容,密谋缉杀詹大悲。詹忍痛赴江西请军援鄂。临行前,他视街市战火焚烧,残余民军无法立足,怀着惆怅的心情对送行的革命党人沉痛地说:"汉市糜烂至此,是我等罪也,何颜以对人民?!"欲与城共存亡。侍从李文辅强行拖他而别。

詹大悲在新军中所进行的长期有效的革命活动,不仅保证了辛亥革命首义的成功,而且促进了全国的响应。他所领导的汉口军政分府,在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时人称誉詹大悲"在武汉鼓吹筹策之功,与江河不朽"。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袁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詹大悲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湖北省议员。

"宋教仁案"以后,詹大悲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兴师讨袁主张,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王宪章、温楚珩等密商在汉首先发难,议定由"詹、杨等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秘密内应",后被黎元洪侦破,并悬重赏缉拿詹大悲。"二次革命"期间,他又分别在江西和南京赞助李烈钧和黄兴的讨袁军事活动,遭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加入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后奉孙中山之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划起义,由于计划泄露,王在上海惨遭杀害,詹侥幸逃脱,再走日本。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詹再次归国,拟返鄂发难讨袁,1916年1月16日至上海后被捕,直到袁死后才获释。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詹大悲与何成浚、蔡济民、潘康时等研究护法军事斗争问题,经他与孔庚的共同努力,终使北洋军八师师长王汝贤通电停战。后詹被派往川边,从事争取川军的工作。次年,桂系军阀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迫孙中山辞职离粤。詹不满桂系军阀的专横跋扈,于1919年到上海住在李汉俊的家里。由于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二次革命"的夭亡,护法战争的挫折,因此思想十分苦闷。他同董必武、李汉俊一起研读了很多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并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受到鼓舞,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革命的力量。

1919年10月,孙中山再次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詹大悲随之转党。次年冬,詹又返粤协助孙中山重建军政府,任大本营宣传委员,并受孙的指派,二次进川,联络川军,策应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避难永丰舰50多天,詹为追随者之一,并对孙说:"革命而不置

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徒为军阀造机会而已。”孙中山深以为然，点头答是，并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后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次年，詹奉孙中山之命赴泉州，与何成浚共商讨伐陈炯明事宜。

推行三大政策　促进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帮助，在广州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詹大悲由孙中山指定为湖北代表，出席大会并参与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等工作。他积极支持和赞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保证大会任务的完成做了不懈的努力。

1925年初，詹大悲任国民政府刑事审判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事。这年秋，广东革命军东征，他奉命前往江西，联络方本仁合击陈炯明。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四面包围，方本仁对广州国民政府实行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在詹的耐心解释和劝诫下，方本仁疑团冰解，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从而使广州国民政府东北方面有了一个屏障，为东征陈炯明创造了有利条件。

孙中山逝世和廖仲凯被暗杀后，国民党新老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时，詹大悲与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联名发表《反段（祺瑞）通电》。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詹大悲与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努力，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詹作为鄂军特别党部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到会代表推为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各代表团“联合办事处”主任。会上，通过了由他负责起草的大会政治报告和由他提出的针对“西山会议派”非法活动，速予纠正居正等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等决议案，及由他提议的制止蒋介石作完军事报告全体代表起立致敬的错误作法。会上，詹大悲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与各方联络。

同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詹大悲又从上海辗转广州，一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赶到长沙北伐军总司令部。他抱病跟随胡宗铎部作战，出没枪林弹雨之中；他身先士卒，不佩带符号，经常深入到兵营和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昌时，他不时视察火线；汉口光复后，他代表总司令部慰问刘佐龙部……詹在士兵中拥有很高的威望。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詹大悲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多年的城市。从此，他在这里为了解放民众，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党权，反对个人独裁；筹划市政建设，廉洁奉公，竭心尽力地工作，成绩卓著。他先后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省官产清理委员会主任、建设科长、矿务局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

詹大悲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及三中全会上，站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边，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主张“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他号召人民“加紧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去从事国民革命奋斗”，“下决心打倒现在仇视工农运动，摧残工农组织，与军阀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互相妥协的反动分子”，“以期谋得自由平等之解放”！

他目睹蒋介石践踏党纪，无视中央，深刻认识到办党的重要性，尤其是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对待革命成败的极端重要性 。他辞去了一切兼职，集中精力领导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亲自制定详细的党务工作计划，在组织内设训练干事，对党员进行政治测验和登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清理了一些猖狂反对“三大政策”的反共分子，吸收了大批革命的工商业者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次日，詹大悲主持召开了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并与在汉的其他中央执委委员和国民政府军委委员联名通电讨蒋。通电历数了蒋介石的反共事实，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并通告下级党员一致反帝、反蒋，去此总理之叛徒，民众之蟊贼。

5月10日，詹大悲在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须加强国共两党联合的必要。针对武汉内外的国民党右派攻击湖北省政府对工农革命运动“不加制裁，致革命更加困难”的谰言，他指出：工农运动的兴起，此种现象，并不是不合于革命的需要的，因为要摧毁封建的基础，绝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量所能做到的。过去的政治环境，人民丝毫不敢反抗，我们要使民众认识自己的力量，用其力量造成新的环境，因此，对工农运动不能压抑。直到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的那一天，他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上大声疾呼要“加紧农工运动”。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詹大悲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在新的复杂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的立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市党部和政府内的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斗争，在西征军未到汉的前夕，他同董必武、李汉俊下令将当时在汉被捕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名全部释放，掩护了一大批在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党人。

詹大悲在武汉的言行，深为蒋、汪和国民党右派所仇视。9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詹大悲的“附逆嫌疑”的决议。11月西征军进汉，满城贴满了缉捕詹大悲等的

标语口号。12月27日下午5时许，詹大悲、李汉俊等被胡宗铎部以“赤化分子”、“共产党首领”和“图谋暴动”的罪名逮捕，当晚9时许詹大悲、李汉俊壮烈牺牲。临刑前，詹大悲对同捕的潘怡如、危诰生二人说：“吾辈欲与枭獍同群宜有今日！尔等如幸免，须秉承总理遗志，继续国民革命。”至此，詹大悲走完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全部历程。

（选自《纵横》88年5期，作者：陈文学）

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县长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涌现出了无数英雄儿女，其中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名字——邵振维。她是湖南省第一个，也是全党最早的一位经过民主推选的女县长。然而，正当她引导浏阳人民深入开展工农运动时，国民党右派发动了“马日事变”，她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只有22岁。

一

邵振维，乳名新春，今湖南浏阳县丰裕乡人，1905年2月生。其父亲邵九溪，是个胆小怕事的小学教员，母亲操持家务，略有文化。邵振维出生在这个和睦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1916年，在她11岁时，进入邵氏宗祠小学，成为这所学校唯一的女生。4年后，升入当时浏阳北区的最高学府卓然高小。该校进步教师郭起、罗巍振、伍志方、苏秉芬等(后来均成为共产党员)热心时事，提倡新学，对学生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刚从这里毕业的田波扬、潘心元，常从长沙文化书社买一些进步书刊寄来，还将自己办的《新民》杂志免费赠给师生阅读。邵振维从这些书刊中，初步领会了阶级斗争及共产主义学说，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社会。

1922年夏，邵振维从卓然高小毕业，考入浏阳女校师范班。这所女校是浏阳进步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场所，读书气氛很浓，思想很活跃，邵振维除了更加勤奋地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很快成了进步师生称赞的先进分子。

由于邵振维一心追求进步，工作积极认真，1925年暑期即由湘区党务特派员潘心元和浏阳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伍志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她刚刚20岁，是浏阳女学生中最早的党员。

二

1926年7月，北伐军挥师入湘，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进入浏阳。潘心元通过地下党组织，发动县城民众，箪食壶浆，载歌载舞，前往离县城数里外的集里桥迎接义师。当时邵振维已从女校毕业，她在县城找到了工作，但暂居女生宿舍。这一天，她着一件夏布衬衣，穿一条土布裙，打扮得干净利索，与女学生们组织了秧歌队，到北伐军驻地慰劳。在军民联欢会上，浏阳各界民众向北伐劲旅献了“民众救星”的锦旗，由邵振维和几个女学生送上主席台，亲手交给了叶挺。

独立团团部驻城北谭家大屋(系维新志士谭嗣同旧宅)，叶挺骑着高头大马，每天亲率铁军战士到浏阳河畔的沙洲上操练，邵振维则每天邀女学生们把茶水抬到河边，为铁军指战员们解渴消暑。当时，由于中共缺女干部，潘心元很注意对邵振维的培养，让她领导支前活动。她很高兴地发动妇女为北伐军士兵洗涤和缝补衣服，护理伤病员，还带领女校学生宣传队到部队驻地演出。

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党组织逐渐由地下转为公开。1926年9月，经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批准，浏阳设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即中共浏阳县委)，并在浏阳城北重阳山下的孔庙大成殿(今浏阳一中)内，召开了浏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其中，女代表有邵振维、黄颐、董维、邹顺四等4人。大会选举潘心元任县委书记、张启魁为宣传部长、张侃为组织部长、罗纳川为农民部长、郭起为工人部长、黄颐为妇女部长，于汉雯为秘书长。不久又以共产党员为主，成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浏阳县党部。

县委成立后，邵振维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受县委的委派，负责推销“支援北伐公债券”。她深入城乡，走家串户，并主持了十多场报告会，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接着，党组织又安排她去协助朱建盛筹建县总工会。

1926年10月14日，浏阳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有正式代表80人，邵振维是其中之一，因她既年轻又有文化，被推选出来负责会务、起草主要文件。大会选举朱建盛、周克明为县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邵振维作为唯一的女执行委员，担任了县总工会的女工部长。

三

1926年冬，邵振维奉县委指示回家乡邵家芒，推动石膏乡的妇女运动，筹建乡妇女联合会。她关心贫苦妇女的生活，一面帮她们缝补衣服、照看小孩，一面解释国民革命的政策，启发妇女的觉悟。当时浏阳农村有养童养媳的陋习，许多女孩子受到非人的待遇，邵振维建议乡农民协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帮助童养媳解除封建婚约；同时她又对几户有欺负妻子行为的丈夫和打骂媳妇的家娘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他们保证善待自己的妻子或媳妇；对于凌辱妇女的恶霸地主，则发动群众开会斗争。广大贫苦妇女都把邵振维看作贴心人，纷纷申请加入妇联。

有一次，邵姓族长在祠堂摆宴祭祖，禁止妇女参加。邵振维决定带领几十个妇女抢先进入祠堂，分头占住座位，把刚刚摆好的酒席吃光。族长气得在厅堂里跺脚，一面说着“好男不与女斗”，一面狼狈地从后门溜走了。

新春在即，已近年关，不少农民为过年发愁。邻村的

大地主詹发盛为富不仁，竟将自己的满仓积谷运到长沙高价出售，老百姓找他借粮，他粒米不给，邵振维找他交涉，也被一口回绝。于是在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的支持下，邵振维发动群众将詹发盛的谷仓打开，挑出100多担谷子，用平价卖给饥民和佃农，直急得爱财如命的詹发盛捶胸打背，他的老婆在地上打滚耍赖。但是，农民回答他们的只是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不久，北伐战争以来的第一个"三八"节来临，县妇联决定举行公开集会，进一步促进妇女解放运动。邵振维为筹备纪念会，忙了一个昼夜没合眼。她将会场选在孔庙，主席台就搭在大成殿前的"陛阶"上，并在左右分立的钟亭、鼓楼前挂起对联："三从四德打狗屁，贤妻良母是猪婆"，虽然粗俗一点，但每个字都是射向封建伦理道德的枪弹。会后，她手执一面写着"总指挥"的小红旗，率与会妇女依次走过"陛阶"，举行了游行，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过去，孔庙是禁止妇女进去的，特别是"陛阶"，只有个别高中科举功名的人才有资格经过它，从正面步入大成殿。这天来集会的妇女，居然做了普通男子汉也不敢做的事。

四

那时，县警备队和全县21个团防局的枪支不下700余枝，他们口头上拥护北伐革命，其实仍是地主武装。为了扩大工农纠察队，县委决定巧计夺枪。

2月4日，潘心元以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法团的名义，召集国共两党和工农商学妇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开会，通知各团防局的团总到会。会议责令各大团将全部枪支移交农民协会接管，并限期交出全部团练经费。那些团总平日为非作歹，是凭借了手中的枪杆子，交枪等于挖了他们的祖坟。普安团总张枚村首先跳起来抗拒，被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川下令逮捕，交县警备队看押，其他团总吓得浑身哆嗦，只得表示服从。

但是，反动分子并不肯轻易就范。县警备队长唐秉忠竟擅自从监狱里放走了张枚村，企图掀起叛乱。于是，县公法团根据湖南省国民政府颁布的镇压反革命条例，逮捕了唐秉忠。2月5日，浏阳县成立特别法庭，在县教育会坪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由邵振维宣布了唐秉忠的罪行，将他判处死刑，当场枪决。国民党右派县长肖骧出来辩护，并把这件事上升为国共两党的纠纷，引起了群众的义愤。在浏阳县各界群众团体的一片声讨声中，肖骧匆匆逃往长沙。这就是浏阳历史上著名的"除唐驱肖"事件。接着，特别法庭又在县城召开大会，公审土豪劣绅，并处决了7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城郊根冲乡的3000农民，将地头蛇邱少端捆绑来县，请求处刑。邵振维满足了农民群众的正义要求，举起特别法庭鲜红的大印，在布告上盖了章；古港区破坏农民协会的反动分子肖芳莲被农民抓获，他的妹妹曾与邵振维在女校同学，跑来请求赦免，被邵严词拒绝。从此，不法分子消声匿迹。

2月底，省政府正式宣布将肖骧免职。县公法团联席会议接受中共浏阳县委的提名，确认邵振维为共产党方面的候选人，并经群众民主投票，当选为浏阳县县长。这是该县有史以来第一位主持县政的妇女，也是我党最早的一个女县长。

五

邵振维担任县长后，即着手成立新型的革命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湘赣秋收起义的3个主力团之一，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邵振维通过募捐和紧缩地方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饷，还请县城的裁缝铺赶制了一批军服。上千名队员换上崭新的蓝色制服，肩扛钢枪，腰扎皮带，整肃的军容博得了县城民众的喝采。

邵振维在主持浏阳实际工作期间，抓紧县政建设，开拓新的局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春荒时节，她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责令地主平粜粮食，并组织清算公产委员会，清查被土豪劣绅侵吞的公共财产，令其偿还，用来兴办公益事业。她亲自下乡指导分田运动，在北区的枫浆乡、西区的白关乡、南区的孙家芒试行平分土地，由乡农民协会主持插标分田；她布置建立县、区、乡各级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扶助贫苦农民发展生产，在很短的时期内使城乡经济逐渐活跃，市场日趋繁荣。

邵振维还发布了查赌、禁烟、剪发、放足和改良习俗等命令。她倡议设置平民夜校，开办女子职业学校，自己亲临讲课，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扬。大革命时期的浏阳成了全省的模范县。

六

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5月中旬，潘心元带着五大的决议，日夜兼程赶回浏阳，向县委传达。他与邵振维以主要精力，投入了对农民自卫军及其主力工农义勇队的训练。5月21日，长沙风云突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迫事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发动长沙附近各县的农民自卫军，于5月31日围攻长沙。

浏阳县委接到通知后，立即举行了党政联席会议。潘心元、邵振维等情绪高昂，决心在全县进行军事总动员，严惩叛军。工农群众响应县委号召，踊跃参战。一夜间，上至东乡、下至北乡，沿途200里的道路上，都是络绎不绝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他们自带干粮，扛起锄头、梭标、鸟铳等武器，高举火把，向长沙开去。队伍里响起了新编的歌谣：

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标送农协。
农民兄弟暴动起，豪绅地主定消灭。
梭标亮亮光，捉贼先擒王。
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

邵振维是浏阳农军的指挥者之一。她剪着齐耳的短发，腰扎武装带，手提驳壳枪，全副武装，与潘心元来到设在永安镇的前线指挥部。

永安是浏北大镇，距长沙只有 60 里。5 月 30 日傍晚，浏阳农军在这里集结了 5 万之众，前锋已兵临长沙城下。当晚，潘心元、邵振维等人在前线指挥部举行了军事会议，决定将浏阳农军分成两路纵队。一路由工农义勇队政治部主任徐骐和干训班队长彭兰征指挥，以干训班的学员为先锋，率西、北区的农军，自黄花市经东屯渡过河，攻打长沙小吴门；另一路由潘心元和苏先骏指挥，以工农义勇队主力为先锋，率东、南区的农军从茫梨市过河，向长沙的浏阳门进攻。邵振维随第一路纵队行动。

5 月 31 日晨，邵振维与干训班的 200 人抢先赶到长沙城下，埋伏在韭菜园一带。当第二路纵队在浏阳门打响时，他们也立即向小吴门发起攻击，数万农军亦同声呐喊助阵。长沙守敌不明情况，吓得乱成一团。许克祥向上司拍发告急电称"一夕数惊，守兵殊倦，各县告急，无力援助，形势如斯，焦急万分"。

本来农军可以攻下长沙，可是此举却让右倾机会主义给断送了。由于其他各县农军接到陈独秀关于"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指令，被迫停止了进军，浏阳农军孤军深入，虽然毙敌连长 1 人、排长 2 人、士兵数十人，但缺乏攻坚武器，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更大。邵振维在小吴门外指挥攻城，跃出掩体，被流弹擦伤左臂。她稍事包扎，准备再次组织出击，不料接到退兵的命令，只得忍痛撤回永安镇集结休整待命。

1927 年 7 月 7 日，浏阳工农义勇队接上级指示，开赴平江，准备调江西编入贺龙的第二十军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后因故义勇队未能及时赶到，而退驻铜鼓县城休整，不久即开拔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义勇队离县时，邵振维被留在本地坚持斗争。

自工农义勇队撤走后，反动派卷土重来，占领了浏阳县城。邵振维和郭祝霞等一道，带领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县城四周活动，伺机打击敌人。

7 月 23 日，王紫剑从平江调任国民党浏阳县长。王听说共产党的女县长邵振维年轻能干，便悬赏 500 光洋，发誓要生擒活捉。游击队在邵振维的率领下，昼伏夜出，声东击西，贴标语、埋炸弹、骚扰敌人的驻地，搞得敌军人心惶惶。王紫剑多次派兵出剿，连游击队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得往长沙和平江搬兵。不久，国民党派阎仲儒为平浏清乡委员会主任，率部进剿浏阳，不到 1 个月，全县就有数千人惨遭杀害。

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城郊已被敌人严密控制。邵振维便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她自己则回到石膏乡，凭借家乡地形熟悉和群众掩护，在五虎山组织了一支暴动队，乘夜往来于石膏和大桥之间，打击当地的反动分子。五虎山上有共产党的消息不胫而走，受压抑的农民又开始挺起胸脯走路。

9 月 9 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三路进攻浏阳，县城又重新飘扬起镰刀斧头旗。邵振维因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事先不知，待她闻讯集合了北区的游击队赶来时，毛泽东已率队伍开往井冈山。事后，国民党反动分子在平浏醴地区疯狂报复，高叫"冬茅过火，岩石过刀"。潘心元冒着白色恐怖返回浏阳，在蕉溪恢复地下县委，并且以蒿山为领导全县斗争的中心，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不久，省委派夏明翰任平浏特委书记，也来到蒿山。10 月 3 日，邵振维接地下县委的通知，赶到砰山丰福岭芭蕉冲，与从四乡赶来的地下工作负责人一起，举行了革命低潮时期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东三里、枫林、枫浆、石膏、砰山、淳口等地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武装，发动群众抗租、抗税、抗粮。邵振维负责抓石膏乡的工作，她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斗争。

七

当上"挨户团"反动头目的张枚村得知邵振维在石膏乡活动，立即从西北区调来大批团丁清剿。邵振维带着一支手枪、一个背包，钻岩洞、住草堆，与敌人周旋。敌人抓不到她，便把她的母亲抓来，企图利用骨肉之情诱降。可是，张枚村得到的只是一阵痛骂，他恼羞成怒，将邵振维的母亲毒打一顿放了。

邵振维听到这个消息，失声痛哭。11 月初的一个深夜，她避开敌人的岗哨，摸回家里，探望遍体鳞伤的母亲。不料，她家早被暗探监视，敌人很快包围了那里，突围已来不及了。她的侄女邵国梅见状，突然冲出屋子，想把敌人引开。邵振维不愿侄女为她牺牲，随即追了出去，对着敌人大喝一声："不要胡来，我邵振维在这里！"就这样，侄女脱险了，邵振维却被敌人连夜押往浏阳县城。

垂涎以待的王紫剑、张枚村闻讯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在县署提审邵振维。王紫剑指着押解上堂的邵振维，得意地叫道："邵小姐，不，邵县长，这就是你原来办公的地方。想不到吧，在这里你变成我们的阶下囚了，哈哈！"邵振维立在堂中，昂起头坚定地说："革命正在进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枚村威胁道："你老实点，免得受皮肉之苦。"邵振维哈哈大笑，轻蔑地说："你这个手下败将，当初要不是被人放跑，早被我们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了！"张枚村气得浑身发抖，命令手下的人动刑。

敌人把她绑在老虎凳上，由两名打手轮流抽打，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烧得她皮肤吱吱作响、直冒青烟，也没听到她吭一声。敌人又往她的腿上垫砖，每加一块砖就问一次："招还是不招？"直到邵振维膝盖骨折断，昏死过去。

王紫剑、张枚村无计可施，便于 1927 年 11 月 6 日，派人将邵振维从监狱里拖出来，押往县城南门外状元洲。邵振维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她忍着疼痛沿途高呼："同

胞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一定还会回来的！”“共产党万岁！”就这样，年仅22岁的邵振维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洒尽了一腔热血。家乡人民为了纪念她，含着眼泪将她的遗体收殓回来，安葬在风景秀丽的五虎山上。

（选自《纵横》89年3期，作者：曾长秋）

宋子文为何转而赞成蒋宋联姻

早在1922年，蒋介石就在上海孙中山的寓所同宋美龄相识了。自打那时起，他就倾慕于宋美龄，这主要倒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容貌，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于是他开始对宋美龄穷追不舍，并向孙中山道出了他要娶宋美龄为妻的愿望，想让孙中山从中撮合。孙中山把此事告诉宋庆龄后，宋庆龄当即表示反对。宋子文从宋庆龄处得知此事后也极力反对。宋子文认为：一、蒋介石的流氓气味太浓；二、蒋在老家有妻室儿郎；三、蒋无论过去在日本还是后来在上海投靠陈其美，以及到广东投奔孙中山时，他都“同时有几个女相好”，而嫖妓更是宋家所不能容忍的。宋母倪桂珍老太太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她多次躲避蒋介石不肯见他。宋家唯一赞成蒋宋联姻的就是宋霭龄，她认为蒋必能成为未来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宋美龄若能成为第一夫人，自己将受益无穷，因此她和孔祥熙竭力劝说宋美龄嫁给蒋介石。

宋美龄对于蒋介石对她的追求，起初并不在意，因为她已有了意中人，这个人就是宋美龄留美时认识的英俊潇洒的刘纪文，两人的感情已发展到相当笃厚的地步，且订了终身。宋美龄对蒋介石的私生活也略知一二，所以她认为蒋和自己根本不般配。但是宋美龄毕竟年轻，在宋霭龄、孔祥熙夫妇的一再劝说下，宋美龄终于同意嫁给蒋介石。但是她不想亏待刘纪文，条件是让刘纪文升官发财，结果，刘纪文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南京市市长，并得到蒋介石给他的100万现金。

宋美龄为自己下定的决心感到庆幸，因为她将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至于二姐宋庆龄不同意这门婚事无关紧要，母亲和长兄不同意她的婚事则是个大问题。于是宋美龄到处托人为她向宋子文求情，最后找到了孙中山生前的密友谭延闿（字祖安），她在电话中对谭说：“吾兄对此举（指她与蒋的婚事——笔者注）反对最甚，望公代疏释之。”谭延闿找到宋子文，劝其不要阻拦这门婚事，宋子文冷漠地说：“此吾家事，公何涉焉？”谭说：“吾与先总理生死与共矣，君视先总理于我，究又如何？”宋子文听谭这样一讲就不言语了。因为孙中山的至交已所剩无几，宋家兄弟姐妹对谭延闿一向很尊敬，视为父辈，所以不好当面顶撞他。但是宋子文心里仍不同意蒋宋联姻，这可急坏了宋美龄，也气坏了宋霭龄。宋霭龄摆出了大姐的威严，骂宋子文“不识大体”、“不晓利害”，非要宋子文答应这门亲事不可。宋霭龄、孔祥熙左说右劝，宋子文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同意把小妹嫁给蒋介石。当蒋介石准备赴日本，向正在那里休养的宋母正式求亲时，宋子文不得不携夫人张乐怡先于蒋到日本神户有马温泉，同母亲商量蒋宋联姻之事，说服母亲同意这门亲事，免得蒋介石来后被动。宋子文赴日前，记者采访了他，宋说：“蒋与妹婚姻问题尚未决定，无从谈起。”

1927年10月3日，宋子文陪同蒋介石到宋母下榻的旅社，由蒋正式向宋家求亲。宋母让蒋介石放弃对佛教的信奉而改信基督教，并要蒋同原配夫人毛福梅和侧室姚怡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还向蒋介石谈了宋家的家教和家规，蒋都一一承诺。这样，宋母在10月10日正式宣布了小女儿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事。10月12日，宋子文偕同母亲回上海为宋美龄筹办婚事。宋子文回上海办的第一件事是在西摩路139号自己的家里为宋美龄安排了记者招待会，由宋美龄答记者问。宋美龄在记者招待会上显得极其愉快，她落落大方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她说她同蒋介石认识已有五年，决定结婚是半年前的事。结婚的准备工作将由母亲和长兄宋子文为其操持。

作为宋家的长子和宋美龄的长兄，宋子文为筹办小妹的婚事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考虑宋家的体面，又要考虑蒋宋联姻的影响。主婚人和证婚人，宋子文考虑要请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威望，而且在国民党内和蒋宋两家及在社会舆论上没什么指责和挑剔的人。最后请来蔡元培作主婚人。因为婚礼一天之中要举行两次，第一次是在宋家宅邸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将由卫理公会的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是江调查了蒋介石的婚姻状况后，拒绝主持蒋宋婚礼。这下可急煞了宋子文，对于笃信基督教的宋家来说，不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是对基督的最大亵渎。无奈之际，只好请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兼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按基督教的方式主持了蒋宋婚礼。第二次是在富丽堂皇的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传统式的婚礼，由蔡元培主持。这样实际上等于有两个主婚人。在聘请证婚人时，宋子文坚持请何香凝。因为何香凝乃廖仲恺的夫人，他们同孙中山是密友，又与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是挚友，加上何香凝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所以宋子文坚持请何香凝证婚。但是何回绝了宋子文的请求，拒不出席蒋宋的婚礼。何香凝虽然未出席婚礼，但是宋家还是硬把她与谭延闿、王正廷并列一道作为蒋宋婚姻的介绍人。

陪伴新娘宋美龄的除了女傧相外，就是宋子文了。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妹妹出嫁，兄长抱轿的说法。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臂膀，她一向视宋子文为自己的保护人，而此时的宋子文俨然是一副郎舅

的样子，当他把宋美龄领到蒋介石跟前，把小妹的终身托付给蒋以后，算是完成了长兄的任务，妹妹的终身有靠了。蒋介石身旁的男傧相却令人吃惊，他竟然是刘纪文，不知选他当男傧相时，宋美龄和蒋介石是怎么想的。

宋子文本是一个视婚姻大事为绝顶严肃的人，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赞成的。"早年在中国金融界声誉鹊起的时候，他是上海所有未婚女子痴情爱恋的中心人物，然而他丝毫没有忘乎所以。在美国期间，他依然显示了这一特征。"同盛七小姐的姻缘失败后，他一直独身一人。后来他认识了上海富有的社交界新秀张乐怡，虽然他们一见倾心，但宋子文还是多方了解了其人品才与之结婚。在宋霭龄怂恿宋子文答应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时，宋子文也考虑到了小妹与蒋介石会不会有爱情基础？他怕委屈了小妹。然而，权衡了各种利害之后，他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使蒋宋联成了一家。把亲妹妹许配给蒋介石是宋子文步入蒋介石营垒后为蒋介石帮的一次大忙，这对蒋介石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而宋子文也因此得到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职位，并步步高升。他因官发财、因官得福了。

（连若雪）

杜月笙蒋介石恩怨录

杜月笙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亲密无间的，他们之间有恩，也有怨；有合作，也有矛盾。他们因共同利益而走到一起，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矛盾，最后分道扬镳。

一、租界与鸦片
——杜蒋合作基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率领的青红帮流氓，在政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奖励，还给予了顾问、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之类的名义。特别是杜月笙，事变后被蒋介石单独召见，从此同蒋介石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如果说，早期杜月笙、蒋介石的合作是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的，那么，之后他们的合作基础主要有两点，一是租界的存在，二是对鸦片的控制。

租界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在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为了确保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纷纷在上海划地设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里面实行一套西方式的制度，西方国家在租界内享有种种特权，而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内事务。然而，当中国政府的统治力量难以进入租界时，那些社会黑势力在民国后在租界内却颇有势力。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经过多年的钻营，在租界内已形成相当的势力。那些外国人常常不买中国政府的帐，却往往买这些黑社会头目的帐。蒋介石要利用杜月笙在租界内的势力，而杜月笙也要挟蒋介石以自重，双方的合作一拍即合。

至于在鸦片方面，杜蒋的合作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民国初年，中国连年战火，鸦片的销售是军阀们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鼓励农民种植鸦片。而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没有战火的威胁与破坏，加上此地又是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因而成为各方鸦片最理想的集散地。各地鸦片经营者麇集上海。在他们多年的努力之下，上海不断有新的鸦片品种问世。上海鸦片商按其产品的来源，把它们定名为云土、川土、陕西土、亳州浆（安徽亳州）、福州浆，还有大量的外国烟土。

鸦片到达上海后，必须有销售渠道。民国以来，最先控制这条销售渠道的是公共租界内的所谓"大八股党"。他们是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最初，他们通过抢劫，夺取鸦片，渐渐腰缠万贯。有了身家之后，他们不再去抢劫了，而是当起"保护者"的角色，向鸦片烟业者、土行老板大量收取所谓"保护费"。这种情况使法租界的黄金荣一伙很看不过。这时，杜月笙经人介绍已入黄金荣门下，他向黄金荣建议暗中袭击"大八股党"的运土队伍，并经黄金荣同意，组成了"小八股党"。"小八股党"人人身怀绝技为同"大八股党"争夺鸦片控制权，展开了生死搏斗。他们每次出动之前，都作精密的调查，妥善的布置，猛如鹰隼，疾似狡兔，来无踪，去无影，使"大八股党"防不胜防。杜月笙因为在这一系列的较量中表现出色，深得一伙人的紧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逐渐从黄金荣那里脱离出来，自树一帜。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尽管在此次政变中黄、杜、张出力甚多，但不久，蒋介石同三大亨，尤其是杜月笙的矛盾暴露出来，焦点是争夺对鸦片的控制。杜月笙一伙力图继续控制鸦片走私权，而蒋介石因为财政收入的短缺，力图将鸦片贩运纳入其税收来源之一，双方因而出现了争执。1927年，国民党财政部已开始组建一个官方的鸦片垄断机构，以便在蒋军占据的地区筹款。这一机构甚至企图把官方的垄断扩大到杜月笙的鸦片势力范围。然而，蒋介石始终没有能垄断鸦片经营权，原因在于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杜月笙及其喽罗，常常和独立的地方军阀达成协议，避开蒋介石，自由扩展他们的毒品经营。1928年，杜月笙同四川军阀刘湘达成协议，由杜月笙购买刘湘在重庆的吗啡工厂的产品，弄到上海提炼，同时刘湘允许杜月笙在重庆开设一个鸦片公司，牟取暴利。这种暗地里的勾结和交易，使蒋介石无可奈何，被迫在鸦片控制问题上让步。不久，蒋介石和杜月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晤谈，双方达成了一项合

伙经营鸦片生意的协议：蒋介石将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由杜月笙包销，并为杜月笙的全部运输渠道和所有加工工厂提供充分的保护；杜月笙则同意从鸦片收入中拿出 600 万元给蒋介石政府。

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合作报之以李。1931 年 6 月中旬，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举办杜氏家祠落成典礼，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政官员们前去参加。是日宗祠落成，人争参拜，车马之盛，仪文之茂，"为上海开港以来所未闻"。一大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出席了落成仪式，如吴铁城、杨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一些因公务在身不能出席的国民党高官，或则拍来贺电，或则送来大匾，如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送来了"慎终追远"大匾；河南省主席刘峙送的是"江东望族"；外交部长王正廷送的是"本支百世"；监察院长于右任是"源远流长"等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大匾，最使杜月笙感到无上荣光。

此后，杜月笙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忠心。如 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南京政府内部乱作一团，亲日派何应钦提出要派飞机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之时，杜月笙却联络了当时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王晓籁、钱新之，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要求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意赴陕北为质，换回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和王晓籁、钱新之、张啸林专程赴南京晋谒，向蒋介石表示慰问，蒋介石很高兴，特地让杜月笙等人同自己以及西安"蒙难"诸要人合影，以资"纪念"。

二、合作之中的矛盾

然而，杜月笙为蒋介石效力，是希望得到报偿的。他野心勃勃，用尽心机，一心想做官往上爬，而不愿仅仅做一名帮会头目。然而，蒋介石心存疑忌，始终对他关闭做官大门，这使杜月笙对蒋介石逐渐产生怨尤。另一方面，史量才、黄炎培等一些进步人士同杜月笙有交往，对他做过不少工作，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杜月笙能同一些进步人士一起，违反蒋介石的意图，支持十九路军的对日作战。1932 年三四月间，杜又加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行列，与王造时等几十名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一起，联名签署一份激烈批评国民党、要求蒋介石实施宪政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蒋介石召开的不允许讨论废除一党专政问题的国难会议。蒋介石对此很恼怒，但他在鸦片垄断方面还需要杜月笙的合作，更何况杜月笙在上海租界内拥有巨大的势力和能量，因而对杜月笙政治态度上的游离飘忽，睁一眼闭一眼。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11 月上海沦陷，国民党大批人员离开上海。杜月笙从内心说来不愿离开这块发迹之地，但又不得不离开这里。他曾参加过抗日活动，害怕日本人不会予以谅解，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坚决要求他离开上海，并让宁子文送来了船票。蒋介石考虑如果杜月笙留下来"落水"，其在上海的巨大势力将会被日本人利用；而杜月笙如果离开上海，则可继续利用他对上海发挥影响。事实上，"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政要人、特务头脑等千方百计运动杜月笙留下，又威胁又利诱，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利用杜月笙在上海滩上的势力，帮助日本巩固对上海的占领。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亲自拜会杜月笙，提议同杜月笙合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银行资本全由日方所出，要同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竞争，但遭杜月笙婉言相拒。1937 年 11 月 26 日晚上，杜月笙躲开众多日本密探、特务的监视，逃出了上海滩，来到了香港。

日军占领上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是日军难以伸手之处，租界内杜月笙的势力仍有利用的价值，故蒋介石对杜月笙继续采取笼络的姿态，给予杜以一定的恩宠。蒋介石首先给杜月笙一个正式的官职，即"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后来，蒋又让杜月笙出任协调上海党、政、团关系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蒋介石又把在西南搜刮到的鸦片交给杜在香港出售。杜月笙得到蒋介石的这些恩宠，一度消沉的情绪又振作起来，开始积极为蒋介石谋事，指示留在上海的亲信万墨林、徐采丞、黄国栋等协助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为蒋介石拉拢上海的社会名流，还帮助蒋介石在沦陷区推销了几千万公债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 年初"军统"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在上海银行界展开血腥拚杀"军统"在拚杀过程中处于下风时，杜月笙利用自己在黑社会中的声望，使汪伪特务"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同意停战。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1 年 1 月，汪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印伪钞，排斥国民党"法币"。蒋介石决定由"军统"人员在上海制裁"中央储备银行"的工作人员，先后暗杀了银行的几个头目，使银行的其他工作人员宁可敲破饭碗，也不肯去上班。汪伪特务恼羞成怒，展开血腥报复，杀死了国民党在上海几家大银行的许多职员。"军统"又展开反报复，一时上海滩血雨腥风，每天都有死人。开始时杀得难解难分，然而汪伪特务毕竟有日本人作靠山，又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军统"渐处下风。戴笠受蒋介石之命，让杜月笙找汪伪行动大队长、杀人魔王吴四宝了结这件事。杜月笙随即派手下一员狠将晤见吴四宝。吴四宝一心想学杜月笙，同杜月笙攀上关系，只是在几年前连杜月笙的门都挨不上，现在见杜月笙专门派人来同自己晤谈，自然

高兴不过。最后，双方几经往来，黄浦滩上的报复与反报复终于停止。杜月笙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军占领上海租界，香港也沦陷于日军之手，杜月笙被迫离开香港赴重庆。由于租界被日军占领，杜月笙在租界内的势力遭到很大削弱；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无暇顾及上海。于是，对杜月笙开始冷落，其他权贵见状，也开始对他或明或暗地排挤、打击。杜月笙在重庆为了求孔祥熙放行一批鸦片，不得不花500万元贿赂孔。1945年3月，杜月笙和门徒利用政府官员泄漏经济情报，制造"黄金舞弊案"。国民党当局为平息舆论，毫不客气地把杜月笙、杨管北、李祖永等人点名示众。杜月笙本人虽然经戴笠帮忙，勉强避过了风头，而其他几个亲信却被送上了法庭。这使杜月笙抚膺长叹："一日无权，人人都嫌"。

最使杜月笙感到不快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漠。有一天孔祥熙把杜月笙、杨虎、范绍增请到他家吃饭。孔告诉他们三人，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红帮头子压一压，经孔劝说，蒋介石才没有真干。孔祥熙之所以把这些内情告诉他们，目的是拉拢他们，同时也是劝他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蒋介石找到借口。杨虎等听后对孔祥熙更加尊敬，但杜月笙听后很受刺激，对蒋介石的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很不以为然。出来后他便对杨虎、范绍增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他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事实上，由于蒋介石忽冷忽热的态度，杜月笙在暗地里也参加过反蒋活动。就在1941年前后，杜月笙、杨虎、范绍增、章伯钧等人被杨杰邀请到家里开会，杨杰在会上念了点东西，范绍曾没有听清是什么，但见杜月笙同意了，也跟着同意。杜月笙出来时反复叮嘱范，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事后，范绍增才知道这是一次反蒋活动。

三、分道扬镳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开始接收抗战胜利果实，杜月笙也开始活跃起来，多次向蒋介石提到自己愿意出一臂之力，帮助国民党接收上海。蒋介石同意他前往上海，但当时他气喘病严重，蒋劝他先派几个得力的人去上海布置，等秋凉后再回去。杜月笙生怕错过机会，不顾严重的哮喘，冒着盛暑长途跋涉，先乘汽车从重庆出来到贵阳，经芷江到长汀，稍事休息便到铅山去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顾当时认为杜月笙一定负责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所以对他极表欢迎。两人详谈了两天关于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杜还让顾从中多协助。之后，杜月笙又同戴笠一起在浙江淳安住了一个多月，戴笠当时在淳安的主要任务是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队进入上海、南京及其它京沪沿线大城市；杜则表示尽力予以协助，并向戴笠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况。杜月笙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他判定，蒋介石一定会把负责接收上海的工作交给他。但他估计错了，蒋介石并没有把这项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而是交给了他人，这使杜万分的失望。

1945年8月28日，杜月笙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事前，上海方面的徒子徒孙们早已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都赶到车站去迎接他，望着眼前涌动着的人群，杜月笙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他踌躇满志，想着在抗战结束后，他又能够重振往日的"雄风"了。

野心勃勃的杜月笙，尽管是帮会流氓出身，但由于地位的变化，一直想当个大官过过瘾，可蒋介石对他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尽管如此，杜月笙没有死心，抗战胜利后，他希望蒋介石会顾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把上海市长这一职给予他，为此他甚至让他手下的人制造声势。不料蒋介石宣布的上海市市长却是钱大钧，又使杜月笙失望不已。

杜月笙在30年代可谓春风得意、左右逢源，在抗战胜利后却连连碰壁，不能遂心愿。这一切的症结，在于抗战胜利后，租界已消失，上海市政归于统一。没有了租界，杜月笙的势力就没有了发展壮大的基础，蒋介石不再特别需要杜月笙这支原来对他十分重要的青帮力量。过去蒋介石力量难以到达租界，现在可以到达了，犯不上再去过分抬举杜月笙这种被社会视为黑社会头领的人，鸦片的经营也远没有过去对蒋介石那么重要。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杜月笙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地位在蒋介石心目中急剧下降。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毕竟从上海起家、发迹，他仍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这不光指他的那些流氓势力，也指他在工商界的影响。资本家们同国民党有矛盾，因而仍把杜月笙看作是他们的保护伞，他在工商界的董事长、理事长、会长等职，据估计有200多个；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多次令杜月笙失望，但杜月笙靠反共起家，在内战爆发后仍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因而有时蒋介石勉强还给他一些面子。1947年8月30日，是杜月笙的60岁生日。在这之前，各方面送来的贺礼、祝寿文等一天比一天多。杜月笙感念于30年代杜家祠堂落成典礼那气派，故他对许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等送来的东西不甚兴趣，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送他一点什么，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已不能同昔日相比，蒋介石送不送？送什么？他极为敏感，他担心蒋介石会把他忘记，这对他来说是极为失面子的事。等了好几天，一直未见到蒋送来东西，他有些着急，眼看只差一天就要过生日，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蒋已派了一架专机送来礼物，原来是蒋介石亲笔题写

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蒋介石还叫他儿子蒋纬国领着媳妇到杜家拜寿，向杜月笙行叔侄礼。这总算使他得到一点安慰。

然而，这种安慰并不很多，当涉及到蒋介石政府本身的根本利益时，蒋介石对杜月笙这个已失去利用价值的人是不会讲过去的交情和"功劳"的。1948年，蒋介石政府濒临山穷水尽，"法币"猛烈地贬值，物价疯狂上涨，整个"国统区"经济岌岌可危。蒋介石奈何不了经济规律，但总是指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他曾几次找到杜月笙，请他筹措物价平定之法。杜月笙找来了几个谋士，商量一番，决定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然而，一个星期下来，政府抛出多少，市场吃进多少，象海绵吸水，顷刻而尽。南京政府手中掌握的一些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国库券以及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眼看就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由于这一着棋的失败，引起了蒋介石的恼怒，他把愤怒全部迁到了杜月笙的头上。据说蒋介石认为杜月笙不是诚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抢购物资囤积起来。蒋介石的这种怀疑有一定的可能：上海的那些吃进官方抛售物资的奸商大户，都和杜月笙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没有杜月笙的示意，他们不敢如此肆无忌惮；而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屡次受挫，对蒋介石早已不满，因而借机搅乱一下，出出恶气，也是可能的。然而，杜月笙知道蒋介石对自己的怀疑后，还是大叫冤枉。

最使杜月笙难堪又气愤的是蒋介石同意其子蒋经国抓杜维藩一事，1948年秋，蒋介石派儿子到上海"打老虎"，蒋经国选中的第一个"大老虎"是他的表兄孔令侃，孔令侃倚仗父亲孔祥熙的势力，搞惯了不法生意，蒋经国想拿他来开刀，以震慑官宦子弟、金融者巨头和投机囤积分子，不料孔令侃得知消息后立即跑到宋美龄那边哭诉，宋美龄坚决反对拿他外甥开刀，在老蒋耳旁吹风，蒋介石无奈，转而同意蒋经国重新选择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作为目标。杜维藩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搞点投机囤积活动，在他看来完全是小事一桩，不料蒋经国知道后，在他身上"小题大作"，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杜维藩加以逮捕。

杜月笙知道后，气愤至极，差点晕过去，好几天呆在家里未出门，对蒋介石怨怒已极。有一天，范绍增去看望他，他愤愤地对范说："我捧了蒋介石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又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杜维藩案的最后结果是被判刑8个月，杜不服，提出上诉，当时比杜维藩情况严重的人多得很，但高等法庭形式上还得维持蒋经国的面子，判决仍是8个月，所不同的是，这次"准易科罚金，以金圆券三元折算一日"。杜月笙拿出金圆券720元，终于领回了儿子，而此时的金圆券，早已一文不值，只是废纸一张。

尽管儿子放了出来，杜月笙对蒋介石还是凉透了心，常常在一些失意的政客面前抨击蒋介石政府。他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蒋介石的"无情"，使杜月笙终于失去了对他的全部信心和热情。他决心同蒋介石分道扬镳。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还在为是否留在大陆而犹豫时，蒋介石于4月10日亲自出马，令他离开上海，离开大陆到台湾去。但杜月笙没有听令，而于1949年5月1日，带上家人以及一批亲朋友好，登上了荷兰"渣华公司"的万吨级客轮"宝树云"号，去了香港，蒋杜恩怨到此了结。

（黄建远）

历史考证

江浙财团在"四·一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江浙财团在"四·一二"政变以至南京政府成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只是给蒋介石以财政经济上的支持，还表现了主谋、帮凶和策划的角色。主要表现如下：

早在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以后，江浙财团即派遣虞洽卿、钱新之为代表，到南昌与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清党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阴谋。双方达成交易，蒋介石立即表明反革命态度，把工农运动镇压下去，江浙财团则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蒋介石。

江浙财团不仅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谋之一，而且是主要帮凶，自始至终密切配合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虞洽卿南昌密谈以后，蒋介石便得到江浙财团的默许，着手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因而他先后指挥捣毁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的总工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并且委任了四个上海的大

流氓为驻沪特派员，用之专门打倒“赤化分子”。与此同时，虞洽卿也在上海积极布置，准备接应蒋介石回沪清党。他纠合倾蒋的“商界闻人”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以配合蒋的反革命行动。3月26日蒋到上海后，虞即于当晚晋见蒋介石，具体落实了在南昌秘密会谈的反革命计划。随后公布了主要由宁波人组成的、专为蒋筹措反革命经费的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后向蒋提供了巨额财政援助（总额达7,000多万元）。正是这些资助，蒋才得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的南京政府才得以站稳脚跟。

江浙财团不仅为蒋直接筹措反革命经费，而且直接参与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策划。直到十年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四·一二”政变在黄金荣的花园里举行纪念宴会时，排列在首座的除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以外，还有江浙财团的代表虞洽卿，他们仍然不忘江浙财团的幕后策划之功。

（选自《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84年4期，作者：史金生）

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不是被撤销的

过去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是，据一些资料来看，我认为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不是被撤销的。

第一，八七会议的文件没有关于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决议，都是集中在政治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涉及他的职务问题，只是在选举时他自然落选了。因此，说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可以，说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则缺少根据。

第二，在7月12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改组会议上，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决定。据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回忆，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估计）鲍罗廷是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机会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来参加的。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先叫陈独秀、谭平山赴莫斯科“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又恐陈独秀疑心，明里让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实际是秘密同他一起赴庐山研究共产国际指示），然后又对五人常委进行欺瞒，没有向他们交底，只是托辞以形势紧迫，主要负责同志需要走开。同时，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27年8月11日发布的《八七会议小引》，中央派陈独秀赴莫斯科的任务，是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此后之总政策”。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陈独秀等同瞿秋白等一样是以“主要负责同志”的身分走开的，并且负有重大的使命，根本不存在什么撤职的问题。

第三，根据1927年6月1日通过的党章，当时党的纪律对党员违背党的共同意志的处分，还没有“撤销党内职务”这样明确的表述，相当于这种处分的是“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所以，即便是当时给了陈独秀相当于撤销职务的处分，在表述这种处分时，也应考虑一下党的纪律对这一处分的表述方法。

那么，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怎样去掉的呢？我认为是辞去的。理由如下：一、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里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可见，陈独秀是先提出辞职，而后落选，并没有受到“撤销职务”的处分。

（摘自1983年《晋阳学刊》第5期《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被撤销的吗？》一文，作者：景北记。）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经过

迄今为止，史学界仍有不少同志认为：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主持人是瞿楼白。而实际上，“八七”会议主持人是李维汉；瞿秋白则是会议报告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及家长式领导作风已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改组中央已成必要。因此，在1927年7月12日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义上，“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张国焘成为负责人。这时的5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已经取代了以前的中央政治局，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负责中共的领导工作。瞿秋白是提议者之一，在这次改组后，没有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成员。

既然瞿秋白不是新的5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为什么又能在“八七”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报告呢？据李维汉同志解释：“这是因为秋白在7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的事情。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时局的宣言后，鲍罗庭就和瞿秋白到庐山休息去了，7月下旬俩人回到武汉。这时，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到达武汉，鲍罗庭随即被调回国。由于当时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遂前往南昌担任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不久，共产国际又来指示，政治局常委中的张国焘也前往南昌传达国际指示。这样，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李维汉和张太雷俩人（李立三已早到南昌）。由于形势紧急，“八七”会议的召开又迫在眉睫（定7月28日召开），瞿秋白到武汉后就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八七”会议的召开。瞿秋白所以能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主要原因是他在党内的声望及坚决要求改组中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为他是中共五大时选出的中央常委之一，虽然鲍罗庭宣布改组中央后，5人新常委中没有他，但5人常委对他的意见都很重视，并多次征求他的意见。

在筹备“八七”会议召开工作中，瞿秋白虽然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但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式负责人，只是说明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上升。“八七”会议召开时，他作为“常委推定的报告人”在会上代表常委作了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由瞿秋白翻译。此后，瞿秋白作报告。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还提出了3条具体方针。最后，他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等3个决议案交大会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尤其“在讨论3个决议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这些都说明他已经是中共党内的实际负责人了，只是差个组织程序的问题。在会议最后一项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时，瞿秋白以19票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参加者共21人）。但“八七”会议只选了临时政治局，并没有完全从组织上确定瞿秋白在中共党内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因为在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苏兆征和向忠发都是以20票当选，所以，我们说“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已是中共党内的实际负责人。而在会议结束后的8月9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又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李维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罗迈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此后，瞿秋白实际上负责抓全局工全，但从来没有使用总书记名义。只有到这时我们才可以说，瞿秋白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组织上已被确定为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位主要领导人了。

（选自《党史纵横》90年4期，作者：柳郑文）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是中央的错误决策

八一起义部队之所以在南下途中，遭到失利，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挥师广东是中央的一个错误的决策。

在起义部队失利后，中央所指出前敌的五点错误，只不过是前敌的同志们在执行错误的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次要性错误，甚至是一些必然会产生的现象。起义军为何会在潮汕失败？中央只是单纯从前敌军事领导方面来追究，而没有严肃寻找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六大’对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然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了起义军没有“就地革命”是造成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央制定南下决策时，片面地认为唯有广东方能成为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这种看法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以大革命失败前的广东社会形势为依据的。

早在1927年5月，谭平山、张国焘就有南伐广东之议。当第二期北伐攻克郑州后，鲁易、谭平山“仍主张南伐取广东”。7月中旬，中央便作出了依靠张发奎回粤的决策。7月16日中央明确指出，广东省委在政治、军事上做好种种准备，以迎接四军、十一军回粤。因为此时，中央认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已控制长江流域，北方军阀又在觊觎两湖富庶之地，长江南北迟早将成为各派军阀的角逐场，我党因军事力量薄弱，无力与其抗衡，而广东则具备军事地理之优势，工农运动之核心，财政之丰裕，交通之灵便，“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等有利条件。所以，中央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即我党取广东的目的是“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7月下旬，张发奎伙同汪精卫公开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我党复于7月25日决定脱离张发奎，领导叶挺、贺龙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南昌起义，并且要“单独打到广东去”，“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再举北伐。中央决

定南昌起义的目的就在于夺取广东，故起义军南下实属中央的既定决策。

正是按照中央决策，8月1日起义军在南昌取得胜利之后，前委即照中央政纲"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土地革命为起义的主要口号。并于当天下午决定了南下广东路线。

根据中央"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的指示，起义军于8月5日过早而又仓促地离开南昌，使原准备参加起义的第二十六师的一个团、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及湖南农军一个团等共计一万人的部队未赶上起义军，从而使军事力量大为减弱。正因为起义军须急速"直奔东江"，在无挑夫、少给养而又战事不断的情况下，溽暑行军，使军队波惫不堪，伤病相继，部队严重减员，逃跑之事时有发生。

当起义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潮汕后，中央指示已至。指示命令"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要向着广州"一直杀去"。

可见，南下广东始终是中央的既定决策。这一决策在南昌起义前既已决定，起义军南下时又有更加明确的补充，数月间从未变更。南昌起义军正是执行中央南下广东的决策，不稍停懈地"直奔东江"的。

（摘自85年《江西党史通讯》第9期《试析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原因》一文，作者张英南）

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

这三次起义之所以打出不同的旗帜，是因为三次起义的领导者根据当时各自不同的政治形势和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及对国民党的认识所决定的。具体来说，南昌起义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这是因为：一是由于我党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性质及其革命力量的估计失误而导致的；二是为了争取"左派"张发奎为起义领袖，发动回粤运动；三是为了团结起义部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和争取国民党内的真正左派；四是由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开始就挂起共产党的旗帜，其原因，一是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党的组织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二是由于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深刻认识；三是由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所决定的。广州起义与上述两次起义不同，它一开始就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原因是：1."我们党对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2."起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选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江西大学学报》88年3期，作者：胡松）

第一面军旗诞生经过

1927年9月，毛泽东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缔造了第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指挥的工农革命武装，打出了我军第一面鲜红灿烂的军旗，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关于第一面军旗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在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由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与师参谋长钟文璋、参谋处长陈明义，根据湖南省委要正式亮出工农武装旗帜的指示设计的，因上级没有明确指示和现成样子，三人反复研究后，模仿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出红底、正中有白星（象征中国共产党）、星内有斧头镰刀的军旗。二是"1927年8月初，何长工、杨立三等人根据前委的指示精神，设计了我军第一面军旗。军旗底色是大红色，象征着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斧头、镰刀代表工农；旗面左侧靠旗杆的布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据查资料，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欠准确，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现谈谈我的浅见，敬请史学界同仁和知情者指正。

一、关于旗帜问题提出的经过

1927年，我党组织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举的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党的"八七"会议虽然确立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对举什么旗帜的问题尚未提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湖南省委。1927年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从信中的观点、内容及执笔人所述的情况看，此信出于毛泽东之手。这说明，我党举什么旗帜的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地认为这一问题提得过早，并批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说："你们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共湖南省委并没有接受中央的批评，而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积极进行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

据查，1927年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提出旗帜问题之后，到秋收起义前夕的安源军事会议前，未再发现其他人提出旗帜问题。中共湖南省委也只向中央提出过"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了"的意见，根本没有明确作过"要正式亮出工农武装旗帜"的指示。所以，第一面军旗是根据湖南省委"要正式亮出工农武装旗帜"指示设计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关于第一面军旗的设计

关于我军第一面军旗设计者，有人认定是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参谋长钟文璋、参谋何长工、参谋处长陈明义、副官杨立三等人，在"上级没有明确指示与现成样子"的情况下，在江西修水县城"反复研究"设计出来的。这种说法也不够准确。其理由：

第一，秋收起义的部队打的是统一的军旗。1927年9月11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各部打的是镶有白色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的火红军旗。这一史实，可以从经历者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当年在萍乡参加二团起义的刘清华老人，于1967年3月30日在回忆录中说："……部队的旗子是红的，有镰刀斧头。这次部队没有到株洲，攻下醴陵后而开往浏阳去了"。当年参加第一团起义的雷子权老人，于1966年4月27日也回忆说："我们到修水县城驻扎了约三天就奉命往湖南方面出发。打了长方形的大红旗，旗子上有镰刀、斧头。"上述回忆材料说明，当时的起义部队打的旗帜是一样的。当时，何长工、钟文璋、陈明义所在的第一师驻修水县城，与铜鼓和萍乡相距甚远。各地起义部队的军旗如事先没有统一的图案和式样，不可能在暴动时打出统一的旗子。

第二，当年修水虽然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的所在地，何长工、钟文璋、杨立三等人又是师领导，但设计军旗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的。一、平江农军和武汉警卫团在未接到前委改编的指示之前，是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修水的，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尚未发生联系，何去何从还在等待之中，至于叫什么军、打什么旗更是不得而知，直到"9月8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行决议"时，才接到部队改编参加暴动的指示。所以，他们在接到"萍乡举行决议"之前，对改编易帜等问题是难以有先见之明的。二、从萍乡张家湾军事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来看，萍乡、铜鼓也先于修水接到前委关于秋收起义的通告。安源会议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亲赴铜鼓部署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因此，起义部队的改编易帜也先从萍乡、铜鼓开始，而修水在其后。1975年5月4日，何长工回忆秋收起义时说："在修水……改为省防军。当时我当了师部参谋，后来接到党的通知，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参加秋收起义，这时部队制了旗帜。"1934年4月，署名铁心的文章《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中说："毛泽东一来，余师长便接到了……重要通告……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上述史料说明，修水接到暴动通告，不但晚于萍乡、铜鼓，而且接到通告后才制旗。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制订暴动计划、部署兵力及指挥方面未发挥全局作用，秋收起义是在中共湖南省委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进行的。1927年10月19日，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在《报告》中说："9月8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及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9月9日)取平江……。"余洒度8日接到暴动通知，9日就命部队按前委的指示行动，向修水渣津推进，准备进攻平江长寿。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钟文璋、何长工等人根本不可能坐下来"反复研究""推敲"军旗的图案，并以师部的名义，向驻萍乡、铜鼓属部寄送旗帜式样。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军第一面军旗是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的指示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了"、"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的意见，以及毛泽东的"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主张，由集体研究设计的。其理由：一是湖南省委是秋收起义的直接领导者，而抛弃国民党的招牌，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暴动，是湖南省委的主张。二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安源军事会议，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完成了建军编师的任务。三是安源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是9月5日报经湖南省委批准后实施的。所以，起义部队叫什么军、举什么旗的问题，在安源解决是合情合理的。

三、关于第一面军旗的启用时间

我军第一面军旗的启用时间，有关资料、论著说法不一，一说9月9日，一说9月11日。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更为准确。

1927年9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秋收起义"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9日开始破坏铁路是为11日各县暴动作准备的，它仅是秋收暴动的前奏。所以，安源工人在执行破坏铁路的任务时，打的是"安源工人爆破队"的旗子。到9月11日各县暴动时，才打出有斧头、镰刀图案的军旗。据查有关史料，铜鼓起义的第三团在县城没有换旗，于11日上午开到铜鼓上庄时，才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旗帜。当时，驻修水的第一团虽没有破坏铁路的任务，但因距湖南平江长寿街较远，也于9月9日开始行动，撤到修水以西渣津时，部队还没有换番号。这可从下面几则史料得到证实。

1934年4月，铁心在《从警卫团到工农革命军》一文

中说："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了。封榜已定，盼发关防旗帜。可是当时训令仍收在箱里，到偏僻地方才挂出来。"1968年11月30日，熊寿祺在《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一文中说："我记得部队出发是过了中秋，因为我是服务员(团参谋部的服务员)，要去街上买中秋月饼。另一天部队就出发了。出发时，我们换了旗子，打起了红旗。"1967年1月9日，匡义生老人忆当年的情景时说："部队驻渣津时，他们还在街上贴了安民布告……当时我们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帽花未改。"上述史料说明：第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军旗，是在远离修水县城的"偏僻地方挂出来"的。第二，部队过了中秋节后，再次出发时才换了旗帜。第一团是在渣津过中秋节的，他们从修水到渣津的这段时间内还没有换旗。第三，起义部队驻渣津时，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子，佩戴的还是国民党的帽花。

综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启用我军第一面军旗的时间，应是1927年9月11日，而不是1927年9月9日。并且驻萍乡、铜鼓、修水的起义部队是在湖南省委和前委的领导下，统一时间换旗易帜的。

(选自《军史资料》89年3期，作者：林兆福)

毛泽东是怎样选择井冈山为根据地的

近年来的资料发掘和研究表明：毛泽东同志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壮举非但不是按原定计划进行的，而且是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敌我形势，两次摒弃既定的方略所作出的决断。

秋收暴动的原定战略方针，根本没有谁提到过到罗霄山脉中段(即通常说的井冈山)去。暴动之前，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湖南省委，均是决定攻取醴陵、浏阳后直扑长沙。中央曾指示湖南省委："此时省委应一方面命令平浏一带的工农武装进攻长沙，一方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湖南省委也作出决定："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就是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也没有提出异议，曾于9月5日自安源寄信湖南省委，提出长沙城内的暴动须与前方军队配合，待各路部队逼近长沙时才能实行。

席卷湘东赣西的秋收暴动，至9月15日其军事局势就很分明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部队先后遭受严重挫折，从根本上丧失了攻打长沙的能力。这时候，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前委传令各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决定部队的下一步去向。会上，师长余洒渡、第3团团长苏先俊，强调执行上级的指示，力主再次"攻浏阳直取长沙。"而对战局有着清醒认识的毛泽东不予赞同，他认定在目前形势下，再攻长沙完全有全军覆灭之虞，主张撤离敌人重兵合围的暴动区域，部队退到湘南去，在那里实行割据。毛泽东所以提出兵退湘南的主张，这与他了解上级的战略意图有关。参加过党的"八七"会议，任过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毛泽东，知道中央曾有指示："湘赣鄂粤四省的农民暴动，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知道湖南省委在制定"湖南暴动大纲"的时候，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在出入湘粤大道的郴州实行割据，策应叶贺主力北出广东。

毛泽东的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卢德铭、余贲民等人的支持，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军退往湘南。这一史实从一些历史材料，如苏先俊1927年9月中旬的报告、《汉口民国日报》同年9月27日的报道、《民国日报》1931年8月10日的副刊等，都可以得到印证。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取道湘赣边界前往湘南。师部已派人侦知萍乡驻有赣敌朱士桂旅3个团，便绕开大道专走小路，岂不知仍然在卢溪遭到朱士桂的伏击。是役伤亡惨重，辎重尽失，牺牲了总指挥卢德铭。部队继续南行，26日中午进占莲花县城。就在当天黄昏，原浏阳县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宋任穷赶到了。他是秋收暴动爆发后受浏阳县委派遣，从铜鼓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请求行动的。宋任穷在南昌找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汪听了他的汇报，说毛部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他带队伍退到赣西宁冈去，那儿有党的组织和我们的几十支枪。接着，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要宋任穷交给毛泽东。

江西省委关于工农革命军下一步去向的指示，无疑冲乱了前敌委员会的既定方针，使毛泽东不能不重新考虑退往湘南的计划。根据中央的布置，作为秋收暴动领导机关的前委，同时受湘赣两省省委的领导，而且"入境随主"，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得受哪省省委节制，毛泽东相信江西省委对赣西宁冈一带的各方面情形是熟悉的，其指示不会有错。除了组织上的观念，另一方面，汪泽楷的口信和密信，就象雷电火石从心中闪过，触发了毛泽东的灵感，使之有感而发地萌生了上井冈山的念头。

在这之前，毛泽东通过两次机会，了解到井冈山的有关情况。

1927年3月间，毛泽东在湖南衡阳一带开展农运调查。向湘南区委的同志介绍目前的政治局势时，他说如果国共分裂形势恶化，就带领农民上山，到江西的安沅山去。在场的水口山机械工人李少山听说毛泽东去江西上山，便插话说："江西有个山很好，叫金刚山(井冈山)，山上有好几口井，我有一个表亲，被迫逃到那里当锤子兵

（即土匪），地主豪绅抓了好几年都没有抓到他。那地方山高林密，地势险恶，又离安沅不远，只要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推荐了一座山，将来我就带安源工人到那个山上去。

时隔半年，即在秋收暴动爆发之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又了解到井冈山的一些情况。当会议研究确定了各团的行动计划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提出：如果起义失利的话，部队往哪里撤？面对这一严峻迫切而又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与会者沉寂了一会儿，只见第二团团长王兴亚说道："要是打输了的话，就往我两个'老庚'那里跑。"他见大家听得莫名其妙，解释说："我的两个老庚在井冈山上，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他们那儿到处是高山大岭，扎得下千军万马。"毛泽东突然想起李少山所讲的"金刚山"，问王兴亚怎样结识袁王两位老庚？去过这井冈山没有？王曾是井冈山毗邻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与袁、王两部一起攻打过永新县城，又同袁文才、王佐结拜为兄弟，便把这些情形说了。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会后，他又找过王兴亚，进一步打听井冈山及袁、王的情况。

促使毛泽东决定到宁冈（宁冈为井冈山区域的中心地带）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日趋成熟的"上山"思想。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敌我形势洞若观火，这时候已经先于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敏锐地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无产阶级要积蓄力量以利再战，就得退出敌人长期占据的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转到敌人鞭长莫及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实行武装割据。

思想基础的具备是极为重要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思想要在一定的时候，受到一定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才得到新的升华，事情才能水到渠成。江西省委的指示和李少山、王兴亚的举荐，恰到时候地促使毛泽东又一次摒弃了退往湘南的方略，作出了上井冈山的决策。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毛泽东决定部队停下来一则进行整编，二则设法与宁冈、永新两县县委及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取得联系。1927 年 10 月 3 日，工农革命军移驻宁冈古城，前委在文昌宫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工农革命军不再往前走了，"和袁同志在一起"，在宁冈为中心的区域的湘赣边界实行武装割据，创立根基之地。

以上为毛泽东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历史过程。引兵井冈山和紧接着开展的井冈山斗争，堪为我党第一次战略转变的成功的创举，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新的正确之路。这一历史过程也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他的与众不同和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灵活地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之中，能够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修正原来的认识，从而作出有利于革命的新抉择。

"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秘谈达成协议了吗

1927 年 4 月 1 日——5 日，刚从欧洲返回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密谈。5 日，《汪陈宣言》发表，12 日，蒋介石突然对中共及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这些接踵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哪些内在联系？特别是汪蒋在反共问题上是否达成某种默契？这关系到这一时期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对许多问题的评价，不仅牵涉到汪精卫当时的政治态度，也牵涉到武汉政府初期历史的研究。然而多年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不避浅陋，将这段史实重新整理，分析如下。

一、蒋、汪算盘各异、分歧难消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过后，在蒋介石操纵下，于 5 月 15 日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迫使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张静江、谭延闿等随之瓜分了被迫离粤赴欧洲的汪精卫所遗之党、政、军各职。不久，北伐开始，蒋介石军事独裁和反共面目一概暴露，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决定把飘泊在欧洲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请回主政，以制约蒋介石。1926 年 10 月 15 日，广州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暨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吴玉章提出"迎汪复职"案，获得通过。12 月 7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之一是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发生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叫嚷要驱逐鲍罗廷，迎汪复职运动更高涨起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纷纷拍电报"请汪销假"、"回国视事"，这使蒋介石异常惊恐，多次要求制止这一呼声。他一方面假惺惺地拍电催请汪回国，另一方面设置障碍，对陈公博声称："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还向陈暗示中山舰事变时汪先生要害我。然而，汪精卫还是在函电交驰的邀请下，经莫斯科踏上了归程。

1927 年 4 月 1 日，这一天蒋介石命令第一军刘峙的第二师于晚间包围并收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不意就在当天，汪精卫乘船抵达吴淞口，蒋介石不得不撤消这道命令。武汉方面派到上海接管财政的宋子文到码头迎接汪精卫，汪在询问宋后，知道武汉方面尚无指示，又得悉蒋介石也在沪，便决定小住几日摸摸情况。吴稚晖对人描述说："渠（指汪精卫）本即赴汉，因知蒋总司令在此，特留沪一晤"。蒋介石等一群人不失时机地包围了汪精卫，企图拉他一起反共。

当天黄昏，蒋介石、吴稚晖和李石曾在孔祥熙的住宅会晤了汪精卫和宋子文。吴稚晖激烈地指责共产党，对汪精卫说："陈仲甫(即陈独秀)他言廿年就要把中国变共产国了"。汪精卫也附和说："那里要二十年呢？两年罢"。第二天早晨，汪精卫还对李石曾、蔡元培等说："我过木司科(注：莫斯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预定的，断不能为了我们变的"。谈话中，汪精卫还说到："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这些话表明汪精卫也颇不以共产党为然，但吴稚晖等对共产党的指控到底是一面之辞，而邀汪返国的又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所以汪精卫不愿看到此时国共分家。提出自己愿负调和之责，目的在于超脱于矛盾以外，操纵两方，控制局面。吴稚晖觉得汪精卫缩手缩脚，以为"盖汪委员初自外国归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也"。他又对汪说："武汉方面欲罢免蒋总司令，"汪表态道："倘事果实现，我亦与大家共同反对"。话虽这么说，可心里却未必这样想，毕竟是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变"迫使汪精卫在国外流浪了一年。所以，吴稚晖便要求汪精卫答应三件事：(一)倘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二)能否负责阻止上海发生暴动？(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或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不过，吴未说明汪是否明确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积极活动。应他的邀请，广东实力派李济深、黄绍竑于4月2日抵沪。下午，蒋介石召集他俩和先期到达的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东征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蒋介石首先发言，大意是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怀好意的，北伐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了分化或劫持，同南昌对立。因此如不立刻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国民党就要被篡夺等等。随后，与会的人大都发言议论各地情形，对蒋介石表示支持。白崇禧还提到上海帮会很有力量，且又坚决反共。这样，蒋介石对会议参加者们的态度有了底。当晚七时，又召开了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其时在场的不过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5人，而全体中监委则有20人。会上由吴稚晖提出所谓"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写成致中央委员会咨文，咨文中竟然将根本未出席的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3人名字写上，把蔡元培说成是会议主席。该文送至蒋介石处，他便一本正经地复函："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讯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真是一出自编自导，自欺欺人的把戏。

蒋介石等很清楚，以"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如能为己所用，就如虎添翼；反之若汪去武汉则必大大增强武汉方面的力量，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4月3日，蒋介石发表了拥汪通电，奉承说："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并表示："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通电掩盖了蒋介石的反共倾向，故意制造汪蒋再度携手，分掌党政、军队的假象。通电也是蒋介石向汪精卫所作的一个姿态，即并非只有武汉方面拥护汪，只要汪能与自己合作，愿将党政大权重新交还，自己"唯司军令"。已经吃过苦头的汪精卫当然不会被这一纸通电捧得昏了头。

4月3、4日两天，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李济深、黄绍竑等"群集汪寓"，多次开会。"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希望汪精卫能领导反共。起初，"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汪又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汪精卫第一次看见中监委的所谓制裁中共的提议时"着急非常"，说如此做法，"我宁自杀"；"第二次看见时，更着急说，请你们各位将我枪毙"。那班热情反共的人不啻被浇了一头冷水，吴稚晖骂汪："狗不如"，"滚蛋"。李宗仁回忆当时情况说："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为。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诉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为辩护"。除宋子文沉默不语外，"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即便如此，汪精卫仍不愿向蒋介石妥协。

蒋介石也亲自出马，与汪精卫"数度晤谈，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必须实行'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提到清党，汪颇为踌躇道："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蒋介石反驳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末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我都可以同他合

作。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又劝导汪：“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真可谓是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可是，汪精卫主意已定，不肯成为早已是自己对手的蒋介石的傀儡。因为蒋曾对汪说：“我可以服从你，但你要听我的话。(一)要将共产党及接近共产党的人看起来；(二)改组中央委员会”。汪精卫拒不就范，会谈陷入僵局。

二、《汪陈宣言》导致蒋汪会谈破裂

而导致会谈最终不欢而散，则是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后，在《申报》上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汪精卫为何选择这个时机与陈独秀发表共同宣言呢？汪精卫4月11日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是这样解释的：他初到上海与蒋介石等“讨论过时局问题，知道上海对中央有许多不明瞭的地方，而是谣言很大。兄弟一到上海，他们就说：上海总工会要向龙华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攻！这种无意义谣言，他们居然相信”，“有一天晚上，李石曾同志来报告，说是总工会要在三日进攻龙华，兄弟就极力辩白，说是谣言，乃决不会有的事，但他说一定要发生，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告诉他约束纠察队不要到龙华附近去，免得发生误会，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每晚十点钟禁止通行的原故，这封信当天晚上并没有送到，等到第二天可以证明是谣言了，他们又说是兄弟写了信的功效，但是到那天晚上还是睡的很好，因为知道一千多工人，是决不会向两师人进攻的。不过蔡元培、吴稚晖那一般同志依然还是相信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的鬼话！到后来，他们又说：纠察队不攻龙华了，要去进攻租界，也还是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更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这些人专门在那里制造谣言，闹得满城风雨，要使革命军同民众冲突起来，要使国民党与共产党起冲突。不得已，就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同志，联名发了一篇辟谣的宣言……”。

几个月后，汪精卫在广州演说中又补充了一些细节：“当四月一二三日，吴蔡李诸同志曾对兄弟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要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听得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兄弟以之转告吴蔡李诸同志，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可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书，并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

史学界一般对《汪陈联合宣言》评价甚低。李新主编的《通史》和刘继增的《武汉国民政府史》等著作认为“汪蒋协议后，汪精卫立即行动，执行决定的第一条”，与陈独秀发表了宣言，该宣言“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揭露，反而为之掩饰”，“抬高了汪精卫的身价，起了麻痹群众，解除革命人民思想武装的作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诚然，宣言发表后，汪精卫的身价确实抬高了，更被人目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但《宣言》并没有掩饰蒋介石为首的上海地方当局与中共及工人纠察队之间的矛盾，而是将吴稚晖、李石曾等一再散布的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话斥为“造谣中伤离间”，也不隐讳上海军事当局与中共是“有些意见与误会”。针对这些谣传，陈独秀策略地表示：“共产党方面……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由于吴稚晖曾广泛散布说，陈独秀与其谈话中提到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为二十年，据此，吴指责共产党急于“取得国民党的生命”。《汪陈宣言》中，陈独秀解释道：“无产阶级独裁制(专政)，……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于发生”。

由此看来，可做如下分析：汪精卫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可他也并不会相信吴稚晖等人的反共宣传，并且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想立即加入蒋介石一伙反共，使蒋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汪精卫利用吴稚晖赞同他负起调和国共争执的责任，与陈独秀单独会谈，发表共同宣言以牵制蒋介石。从宣言的内容看，汪精卫也未欺骗陈独秀，掩盖蒋介石等反共倾向。此外，中共方面虽对宣言发表感到欣慰，可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放松了对蒋介石的戒备，关于这一点郭绪印在《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一文已有论述。当然，由于蒋介石的拥汪通电，汪精卫和陈独秀可能都过高估计了汪精卫对蒋介石的驾驭牵制能力，这笔帐自然也应算在《汪陈联合宣言》上。《工部局警务处情报》称：“据报蒋介石正利用汪精卫以消除共产党之对抗，汪在蒋介石与陈独秀之间的调解甚为成功”。此说显然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因为汪蒋内部种种冲突此时尚不为外人所知。事实上，蒋、汪没有达成反共协议，且汪精卫是背着蒋介石与陈独秀发表宣言的。

4月5日上午，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会上吴稚晖提出“检举共产党谋叛呈文”。大约十点，他们看到了当天报上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顿时，“与会人士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稚晖责问刚到达的汪精卫：“这是甚么一回事？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汪精卫解释，全部宣言“仅言两党之误会不可

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吴稚晖又攻击中共，并说："不是请他共治中国，更不是容许他们来鼓吹共产主义"。第二天，这些对话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见报，公开披露了汪精卫与吴稚晖等人的分歧。争论中，吴稚晖当众讽刺汪精卫"以国民党党魁自居"，还说："我相信你终有一天来同我相对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马上加入我们一边来"。这一番话使汪"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4月6日晨，汪精卫悄悄登上了去武汉的客轮，在船上写下了致蒋介石、张静江和李石曾的三封信。在给蒋的信中称："抵沪以来，痛苦万状，今日散会后尤甚。总理所遗留之国民党果从此已耶"。又说："改组之精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在致张静江书中表示："党事至此，以铭之愚，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在《寄李石曾书》中表示："五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在解释自己"何故一人而敢于坚决反对许多师友之意见"时说道："改组之政策，是总理所手定，弟以为不可轻言更改。"认为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做法"岂非中监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得粉碎"！以上这些信函证明，汪精卫离沪时，双方分歧依然如旧，汪精卫"虑蒋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吴淞口后，始致书于蒋"。当蒋介石得知汪不辞而别时，气恼地说："我早已料留他不住，留他不住。"由此可见，董显光所言汪精卫"欲与左派协商"，"故拟赴汉口一行，疏通左派。介石不便阻止，只得勉其成行"纯属臆测。毫无疑问，蒋汪上海会谈在不信任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三、"铁证"难证

但是，《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上发表了李庆东的一篇文章，该文引述了档案馆所藏的一封电报，依此认为蒋汪取得妥协，达成了反共协议。这份电报档案一般被人视为铁证。该电报拍发时期为：1927年4月5日下午4点30分，由蒋介石签发，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拍给新编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第三路指挥谭曙卿、独立第二师长兼福州卫戍司令张贞和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方声涛。电报通知这三人：4月3日在上海莫利爱路总理遗宅开了谈话会，"讨论共产党近日把持国民党情形并汗(汉)口之命令"。"各有建议，且各诉困难。最后乃依汪同志主张，望再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全主要办法即迅速召集负责之会在上海讨论。在讨论前，汪同志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内最要三条。……望于需要时即依照来电施用，并望转告各军队，各党派、各机关为盼：一、共同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共产党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碍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之前，不用接受上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共产分子阴谋捣乱者，其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党部各机关，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止"。4月8日，《民国日报》报道了蒋汪会谈经过，除上述三条外，又增加了第四条："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刘继增等著《武汉国民政府史》等相当一批论著和文章因此认为汪精卫向蒋介石妥协了。

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见解，认为电文有两个疑点。其一，电报是5日下午拍发的，其时汪精卫尚在上海，因为蒋介石等人联汪反共正是想借重汪的名望作为号召，若汪精卫确实同蒋介石达成了上述协议，为何电报没有汪的署名？其二，本文前已列举了当事人的回忆及当时的往来信函，看不出蒋汪达成任何谅解的迹象。另外，1927年11月，汪精卫因争权失利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作《武汉分共之经过》的演说，其中讲到在沪与蒋介石会面时说："回到上海的时候……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从四月一号至五号，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的以为必要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是时，正值汪派、蒋派与西山会议派争反共头功之时，若汪曾与蒋达成上述反共协定的话，他是决不会不大肆宣传的。事实上，汪精卫除了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党的组织原则的捍卫者外，只能哀叹："在兄弟当时看来，以为蒋同志等是不对的。……兄弟事后批评，不说蒋同志不对，而说兄弟不对，这是事实，并不是什么违心之论"。

关于《民国日报》的报道，亦有两点值得推敲。第一，与电文相比，又增加了第四条协议，真实性已大打折扣；第二，4月6日，陈群以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公告，"奉总司令蒋谕：从本月起，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有故意违抗者，在戒严期内，应按戒严条例惩办"。那时，上海新闻界都认为在控制舆论方面，蒋介石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鉴于此，可以这样分析：由于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内众望所归的人物，加之蒋介石在拥汪通电中把自己说成是汪的拥护者。蒋急于反共却又无法拉汪上贼船，只得

假借汪的名义蒙骗他人，同时操纵舆论，给人一个假象即汪精卫虽不答应立即分共，但仍愿意实施几条反共措施，这是蒋介石瞒天过海的一招。这与数日之后，广东“四·一五”大屠杀时，广州黄埔军校假借汪、蒋名义反共如出一辙。

以上史实足以说明了当时蒋汪之间并没有达成反共协定。冯春明先生文章中的基本论点是接近事实的。当然，笔者决无意为汪精卫辩护，汪之不愿立即分共并不意味他的“左倾”，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正如李宗仁事后分析说：“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应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考察汪精卫的大半生，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个权欲熏心者。虽然口口声声的“主义”呀，“党”呀，实际上总是风云际会，反复无常。当中共和苏联顾问支持他为领袖时，便“左”的出奇，可到了所谓“争船的时候”，“争把舵的时候”，其反共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蒋介石。又曾几何时，为了当领袖，竟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成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汉奸！

（摘自《民国档案》1990 年第 1 期）

宋美龄生于何时

宋美龄的年龄，在蒋介石去世前，一直被台湾列为“最高机密”。她本人从来不提自己的年纪，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她的年龄。

近年来，关于宋美龄年龄秘密，主要有三种说法：有的说她生于 1901 年，比蒋介石小 14 岁；有的说她生于 1899 年，比蒋介石小 12 岁，还有的说她生于 1897 年，比蒋介石小 10 岁。1987 年 10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海外博览栏转摘了美国《民主与法制》杂志上一篇考证宋美龄年龄的文章。这篇文章作者为美国传记文学作家斯德林·西格雷夫，他考证宋美龄的生日是 1897 年 3 月 5 日。

宋美龄的生日果真是 1897 年 3 月 5 日吗？不是。根据蒋介石和宋美龄本人提供的材料，宋美龄的确切生日，应为 1899 年 3 月 23 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已亥二月十二日”。根据如下：

一、1948 年，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武岭蒋氏”重修宗谱，蒋介石与毛福梅、宋美龄的关系，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的位置摆法，成了难题，修谱大总裁吴敬恒（稚晖）、总编纂陈布雷均无法下笔，最后只好请蒋介石亲自撰写。

蒋介石也感到很不好办，非自己动手不可。于是，费了一番脑筋，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亲手写成，面交修谱编纂沙文若（孟海）带回溪口。原文如下：

周泰（笔者注：蒋介石谱名）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笔者注：即毛福梅，蒋经国生母），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笔者注：即蒋介石母亲王采玉）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光绪二十五年已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经国纬国。”

这里所写的宋美龄生日“光绪二十五年已亥二月十二日”就是公元 1899 年 3 月 23 日。

二、1947 年 4 月 2 日至 11 日，蒋宋夫妇回故乡奉化溪口镇扫墓，停留 10 天，其间巧逢宋美龄生日。他们在溪口主办的武岭学校（蒋任校长，宋为校董）逐日记载了他们的行踪。其中 4 月 3 日这一天记着：“夫人四十九岁生日，晚看《群仙上寿》古装话剧。”按奉化习惯，寿辰按虚龄计算，且以农历出生日为准。查之万年历，1947 年的 4 月 3 日，正好是农历闰二月十二月，从 1899 年算起，那天正好是宋美龄 49 虚岁寿辰，与宗谱所写相符。

（王舜祁）

风　云　人　物

朱　德

朱德（1886——1976）　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5 年在云南参加讨袁护国战争。1917 年在四川参加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俄国十月革命后，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去德国留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即去苏联学习军事，1926 年夏回国。1927 年在南昌创办军官教导团，为党培养一批革命军事骨干。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 年初，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举行湘南起义，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同年

4月，率领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和毛泽东等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秋开始，和周恩来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指挥，深入敌后，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1940年冬，提出屯垦南泥湾。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定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八年抗战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各个解放区战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亲临华北前线指挥作战。在战略决战阶段，协助毛泽东指挥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从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起，当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11月到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作出巨大努力。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无私地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材料　萧三忆朱德

他出生于四川省，是一个中农的儿子。在乡村私塾里受的启蒙教育。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这种考试是选拔在清朝政府里担任公职的官员的)，但没有考上。

早在青年时代，朱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到了农村中到处存在的压迫和不平等。早年的印象是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动力。

后来他到了云南省，投军当了一名士兵，很快就显露了出众的才能。他被选送进云南陆军讲武学堂。他的同学中有范石生和朱培德。这两人后来成了国民党著名将领。

从讲武学堂毕业后，朱德的军阶提升得很快，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他年纪轻轻便显示出非凡的军事天才。在讨伐袁世凯(他想复壁帝制)的战争中，他指挥"敢死营"，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朱德从未打过败仗，老百姓称他为"四大金刚"之一，赞扬他在军事上的忠诚勇敢。

朱德回到自己的故乡四川省时，已经是威名煊赫的军官了。但在家乡，他却不得不再次面对人民忍受不幸、压迫和穷困的现实。

还在讨袁战争(1917年)中，朱德已经看到，老军阀如唐继尧、顾品珍等人无休止地互相残杀，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至于老百姓的利益遭到践踏，那是谁也不关心的。

朱德渐渐明白，社会制度不变革，中国人民的命运就不可能改变。朱德还认为，中国缺少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事技术。30岁时，朱德采取了对他的年龄来说和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同寻常的行动。他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道路，告别亲人，脱离军界，去到上海。在上海他想方设法与革命者接触。后来，这位30岁的将军同一群年轻大学生一道被派往巴黎，坐在了学校教室的长凳上。

朱德研究军事，同时也接触到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熟悉了它的历史。他的眼界大为拓宽。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给朱德的思想以新的启发，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

年轻时朱德曾目睹祖国在帝国主义奴役下惨象丛生。在云南，他曾看到四万名男女青年被卖为奴。他对社会不公深感痛苦，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倍觉耻辱。

在国外留学时，朱德比他周围的年轻人在学习上更加持之以恒、求知若渴。他看到，这些年轻人即将踏上他走过的生活道路。

尽管很有钱，可是朱德这位著名的中国将军的生活

仍然是相当简朴的。他的钱都用来资助党的活动和同志们了。

他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朱德深受鼓舞，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

用新世界观和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德回到祖国，正赶上1925—1927年的大革命。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正在为反对北洋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奋斗。按照党分配的任务，朱德负责在四川军阀部队里开展工作。当时川军的头头是朱德从前的同事、国民党将领朱培德。在复杂的形势下，朱德将军的军事声誉和威望常常帮助他完成党交给他——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任务，吸引各个部队参加到民族革命中来。

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几千名共产党人被杀害。

1927年8月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它是共产党人公开反抗反动派斗争的开端。起义的领导人是贺龙、叶挺和朱德。

南昌起义前夜，朱德被派往起义指挥部。卫兵因为不认识他，将他逮捕了。朱德被押送到指挥部，贺龙和叶挺认出了他，并且高兴地欢迎他。

起义向南方推进。朱德带着他的部队始终担任前锋。在八小时之内朱德的部队以一个团打退了敌人三个团的进攻。另一次三个营在朱德的指挥下在九个小时内击退了敌人五次猛烈的进攻。还有一次，朱德师长率领一个师连续作战三昼夜，打退了敌人三个师的进攻并击溃了这三个师。

朱德精通在运动中退却的战术并擅长打后卫战。

起义部队向福建省转移途中，曾遭到钟绍葵的土匪部队的阻击。朱德亲自带领一支20人的小部队，登上5000米高的极难行走的山脊，绕到敌人后方，向土匪发起猛烈进攻，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为起义部队杀开一条出路。

（作者：萧三）

卢德铭

卢德铭（1905——1927）　又名继雄，字邦鼎，号又新。四川宜宾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1921年入成都公学读书。毕业后，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由于旅途耽搁，误了考期。后经介绍见到了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破格录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毕业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

1925年11月，调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次年6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卢随军参加北伐。在此期间，参加了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重要战役，指挥果断，累建战功。在武昌攻坚战中，一营营长曹渊不幸牺牲，卢升任一营营长，率一营官兵，奋勇攻城，终在10月克复武昌。北伐军进入武汉后，独立团改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卢升任团参谋长。

1927年4月中旬，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的再次北伐，率部进入河南上蔡与奉军作战。5月中旬，夏斗寅部叛变，卢奉命回师武汉，参加了讨伐夏斗寅的战斗。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筹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卢调任警卫团团长。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率部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行至途中，获悉起义已经爆发，部队也已南下。便与江西军阀朱培德交涉，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名义，进驻修水县城。在此，一面休整和扩大部队，一面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进行联络。他亲往武汉，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获悉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准备组织秋收起义的计划。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坚持斗争，准备参加秋收起义。回到修水后，便与正在组织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并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任起义总指挥。起义受挫后，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改变进攻长沙计划和向罗霄山脉进军的主张。9月20日，和毛泽东一起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军。23日，部队在到达山口岩地区时，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所部的保安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为掩护后续部队进入山口岩，带领一个连的兵力抢占路旁高地阻击敌人。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张太雷

张太雷（1898——1927）　原名张曾让。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幼年丧父，家境清贫。少年时代，在别人资助下获得上小学、中学的机会。1915年，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结业。1916年进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学习勤勉，才华出众。尤以英文成绩为突出。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迅速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在天津组织“社会建设会”。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魏金斯基一行来华，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作为英语翻译，积极参加了他们在北京和上海的活动。同年6月，在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前往上海与俞秀松等一起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

起组的活动。回天津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10 月，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嗣后，到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小组，任小组书记，并创办小型日报《劳报》。1920 年冬，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活动，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1921 年春，受党的发起组委托，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担任中国科书记。同年 6 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来华，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奔忙。接着，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第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共产国际会议的使者，随后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大会筹备者的身份出席了大会。1922 年 2—3 月间，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2 年 3 月回国，与瞿秋白等一起负责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 月，青年团一大召开，张太雷主持了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8 月，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西湖特别会议，主张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1923 年夏，在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6 月，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8 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旋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考察。10 月，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之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 年春，奉调回国，接替刘仁静担任团中央书记。同年下半年，在国共合作创办的《民国日报》工作，担任主笔兼社论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为《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撰写文章。

1925 年 1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秋，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主编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曾受聘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1926 年 3 月和 5 月，蒋介石连续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他立场坚定，对蒋介石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1926 年底，国民政府迁武汉，他到武汉工作，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极为不满，主张掌握革命领导权，建立革命武装，发动群众，支持农民运动。1927 年 4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瞿秋白等一起严肃批评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调任湖北区委书记。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改组，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的中央领导职务，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太雷为成员之一。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他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会议，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 月，到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并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工作，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配合当时已南下到广东的南昌起义部队的斗争。10 月底，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有关广州起义的问题，出席了 11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月底，肩负领导广州起义的重任回到广东，积极进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爆发，为起义总指挥。随即成立苏维埃政府即广州公社，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陆海军委员。12 日下午，乘车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李 汉 俊

李汉俊（1890——1927） 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02 年东渡日本，1918 年底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1920 年 4 月，和陈独秀等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同年 8 月，与陈独秀、李达等七人发起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9 月，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将《新青年》月刊改为党的机关刊物，他是该刊编委之一。12 月，陈独秀应孙中山邀请去广州任教育厅长，他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哥哥李书城寓所召开。他作为上海小组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一大”以后，积极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 年，由于同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而脱党。他脱党后，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任教，讲授历史、社会学，仍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反帝反封斗争。曾组织和带领学生代表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二七惨案后，他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1926 年，北伐军抵达长沙后，他曾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副团长（团长董必武）抵达长沙。此时他参加了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次年 1 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4 月，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七一五政变后，在湖北省国民党党部改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青年部长。值此非常时期，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27 年 10 月，南京政府中桂系李宗仁与汪精卫、唐生智发生冲突，桂系组成西征军，于 11 月占领武汉。12 月 17 日下午，桂系军阀胡宗铎会同日本巡捕将他逮捕，当晚九时被枪杀。

1952 年 8 月，毛泽东为李汉俊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

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蒋介石

蒋介石是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生于武岭玉泰盐铺内之祖宅。官名中正，字介石，少年时名周泰，字瑞元，十五岁改学名志清。后来他的外号很多，如特务称之为“大老板”，罗斯福叫他“花生米”，蒋家官书多称“蒋奉化”等等。

蒋家世代务农，直到他祖父蒋斯千（字玉表）成为盐商时，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渐亨。蒋介石的父亲叫蒋明火，字肇聪，号肃庵，是两兄弟中的老二，在蒋斯千八十一岁去世后，接替家政，经营数载，使蒋家的财势越来越大。蒋介石父亲前后取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后，续取肖镇孙氏为继室，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取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瑞莲姊妹四人，其妹瑞菊和弟瑞青夭亡。

蒋母王采玉之父王有则，是大地主兼大商人，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主武装团首。王采玉自小读书识字，受过封建教育的熏陶。十六岁时，初嫁奉化县下畔驻曹家田村，十八岁原夫即故去。二十岁时经堂兄，在蒋家当掌柜兼总帐房的王贤东撮合，再嫁给四十四岁的蒋肇聪做第三填房，结婚十年蒋肇聪死时，王采玉不满三十岁。此时十九岁的蒋介卿是挥霍自如的花花公子，闹着分了家。蒋介石名下分得一批遗产：老宅房屋和银号存款、三十亩稻田、几百亩竹山和部分商号的投资。王采玉管理这些家产，抚养九岁的蒋介石和六岁的瑞莲，深得乡邻赞誉。1921年6月16日，王采玉病故，终年五十五岁。蒋对其母感情特别深厚，在他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中，除了抗战时期在重庆外，几乎每年清明节，都要偕同宋美龄回家乡扫墓。

蒋介石十六岁从毛思诚读书。其间，他常“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十七岁到锦溪凤农学堂读书，在这个乡下小学堂里，他喜欢玩中国史上封建战争的武戏，而自己为战争领袖，多使先生讨厌。在凤农学堂住了两年，后来又回家闲住了半年。1905年赴宁波，在箭金公学随顾清廉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和中国的哲理著作，想当一名军人。

二十岁时，进了奉化龙津中学。只呆了三个月，即剪掉辫子交给他母亲要求出国学军事。尽管他母亲同意他的要求并提供了出国经费，但到日本后，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只能在东京清华学校读书，于是只好回国。此时恰好袁世凯在保定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在浙江招生。投考者六十多人，蒋介石考取了。由于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深受校长和教官的赏识，第二年就成为了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

1908至1909年，蒋在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习炮科。这是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张群、陈其美（陈英士）。经陈其美介绍，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比他大十一岁，成了蒋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受到蒋的重用。1910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日本作短期停留，陈其美将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

1910年，蒋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士官学校。和张群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其时适值天气寒冷，驻地积雪数尺，早操刷马，晚归刮靴，所服苦役，一如新兵，蒋在此学会了日本军阀那种蛮横的作风。他大权在握以后，要求部下对他“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真是“不负师教”（1927年蒋介石写给日本长冈外史的四个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由长崎趁日轮回国，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陈其美夺取了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蒋参加了这些活动，得到已成为上海督都的陈其美的赏识而被提升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他的顶头上司，师长是黄乳，旅长是张宗昌。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蒋在日本学习德文，准备去欧洲，还出版了一份昙花一现的《军声》杂志。1913年春，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受命攻击江南制造局，两番攻击均告败，并被英国巡捕缴械。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蒋被迫逃进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氏没有生孩子，就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因日妇已死去），这就是蒋纬国。后来蒋续家谱时又将蒋纬国列入宋美龄名下。解放前夕，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孙中山和陈其美去日本后，蒋即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清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期间，蒋娶了一个有点积蓄的妓女，不久抛弃。

1914年6月，蒋再度到日本，向反袁失败追随者纷纷离去的孙中山宣誓效忠，并受命去上海和哈尔滨活动反对袁世凯，但均告失败。又返日本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的著述，并研究军事战略。

1915年中，蒋随陈其美回国，重新筹划把袁世凯的势力逐出上海，未成功。次年春，跟着杨虎反袁，曾袭取江阴炮台。5月8日，袁世凯刺死陈其美后，蒋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当参谋长。

1918年3月，蒋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因受排挤，于7月辞职。两月后，被调到福建长泰当陈炯明的第二支队司令，因与原驻军吕公望浙军

发生火拼，蒋介石只身逃到一位平时给他缝补衣服的农民家里。农妇是一位江西人，名叫谢娘。浙军追踪而来，她把蒋藏在一只大缸中，缸上用蒸笼盖着，上面散放着衣物，帮蒋躲过了搜捕，后来民国福建省长陈仪视察长泰县时，题书吹捧："武德是扬，蒋公尝驻节于此。"离开福建后，蒋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商品交易所。由于他对投机的奥妙了解得非常透彻，在重重迭迭的证券起落中，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蒋介石承担了孙中山交给的率黄埔学生平叛的任务。11月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陈炯明叛乱，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东征部队进行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次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5月间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变，东征的学生军即刻回师广州，取得了胜利；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去世，汪精卫（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蒋介石组成"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蒋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在最有实力的粤军统帅许崇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24日，蒋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26日，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第一军，蒋自任军长。10月间，黄埔学生军和部分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肃清了军阀陈炯明的势力。至此，蒋成了广东的实力派。一天，蒋由广州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城内军校，乘了一辆插有青天白日小旗的轿车，汽车刚发动就出了故障，蒋不耐久等，改乘随从小车匆忙离去，而修好的插旗小车却被驻军击毁，车内六人全部毙命。蒋暗地庆幸神明保佑了他。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攫取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要职。

两广统一后，蒋介石极力主张北伐。1926年5月31日，设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总司令部。6月4日和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蒋介石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典礼，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至第八军各军长分别为：何应钦、谭延闿（由副军长鲁涤平代）、朱培德、李济深（由副军长陈可钰率）、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为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27日，从广州出师北伐，苏联顾问随军出征。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政治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他把总司令部搬到南昌后加紧同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官僚的勾结。他公开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同时派吴铁成、戴季陶去日本谋取支持。帝国主义代理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封建买办阶级的政客，纷纷前往南昌，出入蒋总司令部。奉系军阀也一再表示："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浙江财阀虞洽卿也到南昌与蒋商谈提供反共经费。南昌成了蒋介石拍卖革命的场所。与此同时，蒋自食其言地反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截留路经南昌赴武汉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包括代理政府主席谭延闿、代理国民党中委会主席张静江等人。1927年1月3日，召开所谓"中央临时会议"，作出改迁都南昌的决议，但遭到武汉政府的反击，图谋未逞。3月6日，蒋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尔后相继以武力捣毁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活动，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的决定，规定凡重要军官的任免和出征动员令，都须军委会决议，并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后才有效，撤销中央军人部长，以此削弱蒋的权力。蒋没有出席这次全会，但仍被选为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并继续担任革命军总司令。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又分任蒋介石和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下设四个方面军，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总指挥。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在帝国主义利诱、威胁下，蒋介石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示"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29日，到美国旗舰"匹茨堡"号上和帝国主义分子商谈"维持"秩序的办法。4月1日，派专员"拜访"英国领事，为"南京事件。表示歉意。上海大资产阶级向蒋表示资助军饷，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工界联合会"配合蒋"清党"。从2日开始，蒋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等在莫里爱路孙中山遗宅开会秘谋"清党"，把同情革命的薛岳师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队进驻上海市区，成立以白崇禧为司令的戒严司令部。在磨刀霍霍的同时，蒋又召集工人代表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6日，还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一切布置就绪后，于9日离沪去宁。上海反革命政变由白崇禧、杨虎、陈群具体执行。

15日，蒋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之指令，下令通缉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余人。按蒋的指令，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清党"，白色恐布笼罩了蒋、桂等反动派控制区。

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

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18日，蒋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对抗的政府与党部，并举行阅兵典礼，发表杀气腾腾的反共演说："要晓得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消灭他，他就要消灭我们。"

19日，武汉政府开始第二期北伐。6月1日，唐生智与冯玉祥会师郑州，提出希望冯倒蒋。而冯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2日，南京政府也占领徐州。20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为拉拢冯，投冯所好，冯到徐州时，蒋远迎于黄口车站，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对蒋产生了好感。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呼吁宁汉"通力合作"，并应"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7月15日，武汉政变后，宁汉两方在反共问题上已经没有分歧，趋于合流。8月8日，蒋、李、胡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方面汪精卫、唐生智等力主"倒蒋"的声浪仍很大；桂系与蒋又貌合神离，何应钦也想取蒋代之，于是，8月13日，蒋突然宣布下野，以暂避锋芒。

9月29日，蒋携带张群等人离沪抵日本长崎。10月3日，到神户，随即与宋子文乘车前往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诺与宋美龄结婚。四十岁的蒋与二十五岁的宋婚约成交之后，蒋在日本各地漫游了二十天。23日到达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11月5日，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会谈中，蒋谈了三点：第一，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不再以北洋军阀而应以国民党为对象；第二，继续北伐，完成统一使命，请日本不要干涉，望以助之；第三，反共。田中义一反对继续北伐，要蒋"专心于南方统一"。7日，蒋离东京，8日，乘船回沪。

11月10日，蒋抵上海。16日，汪精卫、李宗仁到上海与之商谈取消特别委员会和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事。蒋、桂实现联合。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唐生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生。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父亲唐承绪，在东安办过天锡矿冶公司，在湘西管过盐卡。唐生智1907年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接着进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和保定入伍生队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离校参加革命，先后在上海都督府及烟台都督府担任科员、参谋。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见习军官、代理排长、代理连长。参加过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赶下台后，唐在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任营长。经过湘南独立战争和援鄂之役，他次第升为第三团团长、第二旅旅长。当时，湖南内部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明争暗斗。1920年11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当了湘军总司令，唐旅虽编在倾向谭方面的宋鹤庚师，却属于赵派。1923年8月谭、赵战争发生，唐参加赵的"护宪军"，击败了谭派蔡巨猷部。11月底，谭、赵战争结束，谭延闿率领一部分队伍退往广东，赵把留在湖南的湘军整编成四个师，唐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移驻衡阳。

从1923年底到1926年初，唐生智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将队伍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部队。此时，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向他学佛。并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令官兵一律摩顶受戒为佛教徒，佩带"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革命浪潮迅速波及湖南。唐生智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亲去洛阳会见吴佩孚，了解吴对湖南的意图，请吴支援。同时，又派人前往广西和广东联系，窥测南方形势。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唐生智想利用时机取代赵恒惕，加入了驱赵行列。但他的态度并不坚定，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一面派代表见吴佩孚，请吴谅解他去赵的"苦衷"。赵恒惕于3月12日通电辞职，委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唐于25日在长沙就代省长职。接着，诱捕了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铏，免去了第三师师长叶开鑫职务，并派兵占领了叶部所据的岳州。

唐生智进入长沙后，广州国民政府派陈铭枢、白崇禧同他联系，共产党湖南省委也对他作争取工作。他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职务。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以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迅速占领了长沙。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成立省政府，率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鉴于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对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为了巩固在湖南的统治，他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开展工农运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8月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唐被选为执行委员。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然后向长沙下游发展。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统率第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8月

底先后突破汀泗桥、贺胜桥。9月上旬攻占汉口、汉阳。10月10日攻克武昌。第四、第七两军随即转入江西战场。第八军则留驻两湖整训。1927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负责巩固武汉，俟机进攻河南。辖有由第四军扩编的第十一军、第四军及由第八军扩编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等军，实际上控制了武汉的军事大权。这时，他向各方进行拉拢，对共产党表示友善，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

早在1926年11月9日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就在这里安下了他的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分庭抗礼。12月13日，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唐生智站在武汉反蒋阵线一边，以军事实力支持武汉革命政权，被推为"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1927年2月，一度被增选为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唐生智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所辖之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蒋记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局面。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下令通缉。唐生智为扩大地盘，极力主张东征讨蒋。但因奉系张学良进兵河南，武汉政府决定先进行北伐。唐生智率领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六军及贺龙独立第十五师等部约六万人，在河南境内与奉军作战。奉军大败，于5月底全部撤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10日，唐参加了汪精卫与冯玉祥等举行的郑州会议，策划南下反共和东征讨蒋。

正当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时候，两湖境内的右派势力在蒋介石策动下，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事变。5月17日，驻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企图袭取武汉。21日，驻长沙的何键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进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部、省党校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时两湖地区的反动气焰极其嚣张。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伪装，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的禁令，准备"分共"。冯玉祥也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这时，唐生智因他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怕激起两湖人民暴动，无法控制局面，于24日从河南前线电代理湖南省主席张翼鹏，指示驻湖南各军不许再有任何行动，要他们发还收缴工农武装的枪枝。他还公开演说，表示拥共反蒋，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对马日事变"派员查明处理"，并因许克祥是他的部下而自请处分。但是，25日，他又电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严惩"侵扰"军人家属财产的"暴徒"；派副军长叶琪、周斓回湘"镇慑"。

6月26日，唐生智奉武汉政府之命回湘处理许克祥反革命事件。他一面继续表示遵守三大政策，解散了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救党委员会"；一面又指责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应即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以'激于义愤"，从轻处理。不久，唐返回武汉，仍遥领湘政，以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代行省主席职权。

8月下旬，汪等到南京进行政治分赃。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取得暂时妥协，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唐生智被推为特委会委员。但是，由于分赃不均，汪精卫、唐生智等未能取得党政实权，乃借口特别委员会为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于9月21日返回武汉，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峙。10月初，南京方面再派代表与汪精卫磋商合作。但宁方所提条件为唐生智所拒。南京政府于20日以"通敌叛党"罪名免唐生智本兼各职。24日，特委会又决议永远开除唐的党籍，解除其党内一切职务。11月初，南京政府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三、四、五路总指挥，率领西征军进行讨伐。同时，冯玉祥部樊钟秀、方振武等由鄂北挺进，鲁涤平由宜昌顺流东下，李福林、方鼎英、范石生等从广东进兵湖南。唐部四面受敌。为了保存实力，唐生智在11月12日通电下野，当晚离开武汉前往日本。唐军大部被改编归桂系统辖，由白崇禧率领进驻唐山、开平一带。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白 崇 禧

白崇禧，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一个回族农民家庭。白原籍为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明朝落籍桂林，后搬迁四川开县，其出生前再次迁至桂林山尾定居。他的父亲白志书，别号友三，自幼耕读，十九岁时因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墟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三十五岁时与西乡罗锦墟马全记之大女、二十四岁的马氏结婚。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三男一女。长成者四男，即崇助、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即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博。

白十四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一百二十名，他名列第六，与李宗仁、黄绍竑同学。蔡锷为总办。入陆军小学不及三个月，因患恶性疟疾而申请退学。十六岁，与弟崇祜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以第二名录取。入学后，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而被选定为领班生。当时，有个叫何树信的同学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之竞争，则常以"乡下人"取笑白氏兄弟俩。白崇禧以为大

丈夫不能受辱。一日，借故将何打倒在地再踢两脚以示惩罚，被校方记大过处分。

在师范年余，辛亥革命爆发。白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并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迫其回家。白崇禧乃私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穿便装从西门出城，绕道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广西北伐学生军自备费用随协统赵恒惕水陆交替行至湖北汉阳参加南军阵营，与北军相峙。未几南北停战，调至孝感，学生军个个发蓬面垢，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为捉虱繁忙之时。南北议和成功，各省之学生军均奉命解散。白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白被派往北苑卢永祥第十师熟悉军营生活半年，尔后即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同学中有黄绍竑、夏威。

保定毕业时，白崇禧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多人，自愿请求分发至新疆当见习官，以期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北京政府接受了申请，并发给国币五百元。后因俄国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无路可至新疆，遂改分广西原籍见习。

1916 年，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广西为了“护法”，与湖南组织湘桂联军，以桂省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出师援助湖南。白崇禧随部队行至汨罗江以北，被吴佩孚打败。此后谭甚感桂军缺乏训练，谋求改良，由督军署成立模范营，委马晓军(日本士官第十四期毕业生)为营长，白调至模范营任代理少尉连副。见习半年，升少尉，不久升中尉，年后晋升第一连上尉连长，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训练期间为一年半，此营之学兵大都成为广西建军之骨干。

1927 年 4 月 2 日，蒋介石自九江乘舰抵沪召见白崇禧，面示“清党”决心。蒋问白清党需要多少军队，白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岐之第二十六军便够了。”蒋问白需时多久，白说：“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4 月 8 日，白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逮捕了十九名政工人员。9 日，上海宣布戒严，白任戒严司令。白在部署“清党”工作中，采取调虎离山、内外策应的诡计，把薛岳师调至镇江后，即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帮会分子，化装成工人混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工会所在地——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以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事前，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交涉，请其准许“清党”部队经过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的一条捷径)。4 月 11 日，授意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诱骗至杜宅，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主要领导。12 日凌晨 5 时。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而埋伏在周围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而收缴“双方”的枪械，从而上海的二千七百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接着，里应外合地占领了商务印书馆工厂。13 日，上海十万工人向白部请愿，第二师用机关枪扫射请愿队伍，当场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莫斯科发动百万人抗议大游行，反对白色恐怖政策。在“白”字下面，还注明了白是白崇禧。

淞沪抗战时，白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到前线视察战况。因冯玉祥不亲临前线指挥，他向蒋建议，把冯调离负责淞沪作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职，任其为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新辟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采纳。

对保卫南京，白崇禧因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揣有一点建议：“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但在会议席上，见蒋介石宣布防守南京而未抛出。蒋令白协助唐生智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

南京失守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津浦南段作战中未战而走。白向蒋建议：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蒋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开会，决定拿办韩复榘的计划。随后，白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随蒋从武汉至开封部署捉拿韩复榘的军事会议。至武汉机场，蒋对白说：“最好两人各乘一机。”白深知蒋恐遭敌机，白表示愿乘机先行。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蒋将至开封，特坐镇开封布置保护措施，采取“举烽火以戏诸侯”之方式，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报纷纷躲避。然而未事先通知机场高炮部队，待白座机临空时，高炮部队以为敌机，纷纷发射。白愤然，俟降落机场，刘峙惊恐万状，求白勿告蒋。白说：“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命中，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1938 年 1 月 24 日，韩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 年，白崇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并以国民党执行委员身份参加负责台湾党务改组工作的一个委员会。

1952 年的一天，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被蒋经国派人去检查。白的家被检查人员翻箱倒箧，连地板都被撬开搜查过，搜走不少黄金和美钞。白打电话质问蒋经国时，蒋经国说：“并非我的意思，你们打电话问总统好了。”白、薛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知道此事，不

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实际上，只对白、薛两家如此。此后，每当台湾当局开会攻击李宗仁时，他就赶紧随声附和一通。1954年3月10日，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罢免李宗仁的“逼总统”职时，白竟高高举起双手，表示赞成，唯恐对蒋不忠。

1964年，当李宗仁在美国纽约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效法戴高乐政府时，在台北息影多年的白崇禧于3月18日致电李宗仁，云：“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前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立场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翻然悔悟，以全晚节。”

自1963年2月开始，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采访，直至去世前八天止，被先后访问一百二十八次。其谈话内容被整理陆续发表于香港《中报》月刊1980至1985年间。南昌陆军学院又将《中报》五年多来的连载资料编纂成《白崇禧回忆录》一书，并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5月出版，次年又再版。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终年七十四岁。时遗有子女十人（七男三女）。五子白先勇是台湾著名作家。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陈 友 仁

陈友仁，英文名 Eugene Chen，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兴梅地区。父亲陈阿金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先是当剃头匠，后开杂货铺，成为小康之家。陈友仁从小在特立尼达受英国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

1899年，二十一岁的陈友仁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因得到华侨和印度侨民的信任，律师业务进展顺利，不久便自设律师事务所。由于收入丰厚，他曾投资于可可种植园和油田，但仍以律师工作为主。他业余多在家中读书、写文章，常向当地报纸投稿。平日颇为关心国际政治和中国局势，曾研读有关日俄战争史料。他虽然只受过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民族意识强烈。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度假，激于爱国热情，毅然与马来亚华侨伍连德（1879—1960，著名防疫专家）等结伴回国。

1912年春，陈友仁回到北京，被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施卸任，由于赏识陈的英文水平，转介绍他担任新创办的英文《京报》（Peking Gaztte）总编辑。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各报不敢登载，唯有《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陈友仁的胆识也为人们所称道。1917年5月，他因撰写《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借款一万万元的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捕下狱，判处徒刑四个月。虽不久便获释，但《京报》被封闭。陈友仁遂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为孙中山的一名亲密助手。1919年，陈参加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并游历西欧各国。第二年夏天回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在上海创办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继承《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不久，为筹措办报经费，他出国到伦敦，嘱其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其全部产业，倾囊办报。

1922至1923年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并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这次会谈对陈的政治思想，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同北上。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陈在孙的病榻前，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以及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决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中英文对照的《民报》（People Tribune）主编。由于刊载了不利于张作霖的消息，陈于1925年8月又被捕解送天津监禁，至当年12月冯部进驻天津时才获释。陈随即南下广东，参加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他继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的外交方针，在大革命高潮中，先后主持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开国民外交的新纪元。陈友仁以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革命立场而著称，被时人誉为革命外交家，并称赞其铁腕外交。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分共、清共，宁汉趋于合流。在14日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陈友仁极力反对“分共”，并代表宋庆龄发言，指出“抛弃三大政策

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因反对无效，他便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离开武汉至上海，与宋庆龄等同乘苏联轮船至海参崴，转乘苏联政府特派列车抵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陈友仁的名字同宋庆龄、邓演达一起，被列于革命委员会名单。这年冬天，他和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联名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行径，倡议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

1931年2月，陈友仁游历欧洲后回到香港。5月，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另组“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议和于上海，陈友仁与汪精卫、孙科等作为粤方代表出席会议。同年12月，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任外交部部长。但不到一个月，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支持，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底，陈友仁支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兼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陈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国外，定居法国。此后，他虽身居巴黎，仍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积极活动，通过他的儿子陈丕士同国内多方联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助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1938年春天，陈友仁离开巴黎，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同年10月，他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建议四项抗战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由于蒋介石的忌恨，陈终于未能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陈友仁被拘捕并转押至上海。日方曾多次劝诱他参加南京汪伪政权，都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还严正地斥责汪精卫的“和平政策”为傀儡的和平。从此，他被软禁在上海。

1944年5月20日，陈友仁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不容青史尽成灰
——记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清党”

清党的预习和行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兼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说是共产党要赶走他，二十日凌晨突然宣布戒严，共产党人受到逮捕和监视。听说共党陈延年等人主张武装还击，但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劝阻”，最后不了了之，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其他一些共产党要人也被撤去要职。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序幕。此后，蒋介石的清党排共独裁行动，已在明白人的意料之中，只是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管清党的组织机构。

七月十五日，广州誓师北伐后，我被委为总部军法要职，跟随蒋介石的北伐军一直打到上海。一九二七年二月总部进驻上海龙华。三月，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要人周恩来，领导、组织、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使正在与上海滩头面人物和洋人频频接触的蒋介石十分不安。当时我并非核心人物，对其幕后交易不知其详。据内部传闻，这突然袭击的“四一二”事件，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金荣和杜月笙帮了大忙。四月十二日这天，黄、杜控制的大批帮会人物、流氓泼皮，扮成工人、学生模样，袭击工人纠察队武装。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即奉命神速进入预定地点，以“工人内讧”为由，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冲突中当场击毙纠察队员三十八人，打伤约三百人。仅十一、十二、十三三天就有三百人被杀，近七百人被捕，失踪者超过六千人。当时我是总司令部手执军法大权的执法、监狱两科的科长，突然而来的大量审讯、监禁和执行工作，使我无法应付，许多案件只得草草奉命执行，有的连真实姓名都未搞清楚就枪杀了。据我所知，被捕杀人大部分是一些出头露面的普通党员和工人，真正共党要人并无落网。这期间，我配合默契，办事果断，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倍受蒋介石赞许。这大概就是不久后，我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官的政治资本。

明白人　喜得糊涂官

“三二〇”事件的成功，“四一二”政变的得逞，使蒋介石基本上控制了局势，我们开进南京，四月十八日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清党在继续大规模进行，但还来不及组建专门负责清党的机构。所以，第二天匆匆宣布的第一号通缉令，是以国民政府名义签发的。名单也是蒋介石亲自圈定的。记得被通缉的全是共产党的头面人物，还有国民党中知名的左派人士，包括原北伐军政治顾问鲍罗廷、军

事顾问加仑将军、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等一百九十人。

四月二十日,AB团头目邓泽如告诉我,他同段锡朋组织了一个清党委员会,只有九名成员,蒋介石自兼主席。这是钦定的核心组织,我并无跻身其中的奢想,不料二十七日上午接到通知,我被委为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好象是十五人,骨干有刘伯龙、伍瑾璋等人,除我而外,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军人。我这个谙熟蒋介石内幕的明白人,居然就此糊里糊涂登上权压朝臣、手操生杀权柄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不过,我这个非嫡系人物何以能不费吹灰之力雄居高位?令人纳闷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细细品味起来,大概与下列原因有关:一、清党审判委员会其实是清党委员会的执行机构,除了侦查、监禁、审讯和执行既定清党对象外,并不是权倾朝野的核心组织,说穿了只不过是蒋介石清党反共和独裁的一柄大砍刀而已;二、起用我这个也算民国元老又非嫡系的人,可以在外界造成清党并非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军人一统天下的印象;三、我是由蒋介石的好友吴稚晖推荐的人,自然是可靠的,也是买吴稚晖的面子;四、北伐以来我随军执法不遗余力、配合默契、紧跟不舍,深得蒋介石青睐,况且我也是浙江人,算是大同乡,很合蒋的"用人原则";五、还有一条,当时连国民党内也确实难找象我这样专攻法学、科班出身而又信得过的人选,由我出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自然会给这个旨为戮杀革命志士,并不需要法律的"鬼门关"披上了依法行事的外衣。以此而言,这个"刽子手"的席位真是非我莫属了。

下马威　通缉郭沫若

我和委员们偶得高官,不胜侥幸,弹冠相庆,遂由我作东畅聚一番,此举初衷,我无非是笼络人心,以利彼此和衷共济,干点名堂出来,以报效党国和蒋总司令提携之恩。上任第三天,伍瑾璋偕刘伯龙(还有一位已忘是谁)三位委员匆匆来到我办公室:"这是要你签发的,你过目一下。"瑾璋递过一本用毛笔写的名册,原来是"钦定"的通缉名单,开卷第一名"郭沫若"三字赫然在目,连邓演达都在其中,共约二百一十名。见到这北伐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都上了黑名单,不禁令人愕然。但想到自己是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而郭沫若是共产党要人,既然清党,连陈独秀都通缉了,他郭沫若当然难脱干系,况且我是奉命行事,签发之举不过是过过手续而已,所以就顺理成章地以主席身份签发了通缉令。这大笔一挥,不知使多少革命志士和有为青年惨死于血泊之中;至于我管辖下的各大监狱,非人的折磨和暴满之状,更是难于言表了。

连续的日夜审讯,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经手审理的一批青年人,好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我这堂堂法官的提问,一问三不知,对我的指控,矢口否认,尽管用尽酷刑也无济于事。更可笑的是,我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无法搞清楚,根本难以形成口供笔录。我以为这有悖法律,加之对这些人的铮铮侠骨暗自佩服,不忍就此操刀,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陆续将他们取保释放。事实上,那时我不是、也不敢真正去开脱"异党",更多的是从法律角度考虑。事后得知,这些人倒真正是共产党,确确实实由于我的"开脱"而免遭杀害。对人民来说,这是历史赐给我的"功劳"。

唱反调　糊涂官干"糊涂"事

六月的一天,清党审判委员会举行全体例会,我以主席身份,对同僚们前一段工作做了一番嘉勉后说:"我主张被捕之人必须有证据,而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方可扣押坐牢,如被诬告,应审明立即释放,决不可随意杀人。"这班正襟危坐的委员们嘴上唯唯诺诺"是的,是的"。唯独刘伯龙有异议,一本正经地说:"诸位,校长(指蒋介石)在南昌说过,对共党……"

"我知道!"不等他说完,我就接过话茬:"从法律程序而言应该这样。我自有主张。"此刻,经刘伯龙提头,我始知自己说滑了嘴。蒋介石在南昌确实说过"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个"的口谕,刘伯龙被我打断的半截正是这句话。明知自己健忘,干了糊涂事,与蒋介石唱了反调,但自恃依法而断,法官之道无懈可击的。为维护自己这个主席的尊严,我硬着头皮,不容委员们插话,把我的主张正式抛了出去,要他们照此执行。就为这句话,我这个威赫一时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顷刻间从高位上摔了下来,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

提起这个刘伯龙,不愧为"地煞星"。此人黄埔三期,陆大特别班二期毕业。年轻时就嗜杀成性,或以睚眦之怨杀人,或以无故杀人为乐,算得上杀人不眨眼。据说后来在康泽麾下泡制过几桩戮杀平民的'政绩",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和无辜平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下,故世称刘伯龙为杀人狂。一九五〇年初在北京时就听说,刘伯龙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贵州被谷正伦所杀,暴尸于野,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想当年,我虽是他的顶头上司,也险些死于他手。

吃耳光　瞬间丢官下狱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该我倒霉的事终于到来。七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紧急召见,我匆匆来到他办公室。只见蒋介石绷着脸,背着双手在屋子踱着方步,旁若无人,室内笼罩着一派杀机,我感到有点不对头。自古道"伴君如伴虎",观此气势,我直冒冷汗。正想开口报告,只听"呯"的一声巨响,蒋介石击案训斥:"对共党格杀不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你为什么要放走大批共党分子?你清党是怎么清的?嗯!"

"我……"虽想斗胆回禀原委,却已无此勇气,只听"拿下"一声怒吼,便被侍从们捆绑结实推了出去,投入监狱。直到年底才由张群讲情释放,算是了却了半年牢狱之灾。

自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荣登高位到七月锒铛入狱，我在这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上总共坐了九十三天，这段人生浮沉，也弄不清是历史的误会还是误会的历史。该不是宦海奇梦吧！

（选自《纵横》86年5期，作者：胡兔民　魏椲整理）

三次拒绝的波折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退党"主张

大革命时期，在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面前，陈独秀曾数次提议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以执行中共自己的独立政策，但屡遭共产国际与苏联领导人的拒绝。

1

早在国共合作酝酿之初，陈独秀就对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提出过异议，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中共中央为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

陈独秀首次提出"退党"主张是在戴季陶主义出笼以后。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印行后，陈独秀就尖锐指出：这本小册子"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故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退党"的建议，他认为：戴秀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控制。

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严厉反对陈独秀的意见，认为：提出"退党"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

2

陈独秀再次提出"退党"主张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在陈独秀看来，中山舰事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地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又一次提出了"退党"的建议，理由是：只有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才能执行中共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

共产国际见到陈独秀的报告后，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认为：在国际共运中"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

3

陈独秀第三次提出"退党"主张是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认为："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在马日事变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又提出"退党"建议，理由是："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婉拒了陈独秀的建议，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笔者认为，共产国际方面之所以再三拒绝陈独秀的"退党"建议，一是缘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斯大林将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以反帝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革命；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以反封建为主的土 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即行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国共合作的广州时代正处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上，因此，共产党一切工作、一切政策均需服从于反帝及其在华代理人这一最高目标。共产党员如果退出国民党，将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二是斯大林认为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按斯大林的观点："中国本国的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比俄国1905年时期的本国资产阶级更为软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利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农民的领导。"显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估计过于乐观，对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又过低。所以在国民党新右派发起对共产党的进攻后，斯大林的策略是："必须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去。"三是斯大林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混为一谈。"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批驳中共的"退党"主张时说："反对派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说这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方法。这只是1905年俄国孟什维克主张的那种极端可疑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只有变成了国民党内或国民党外广大的劳动群众中间的领导分子时，它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领导权。所以中国共产党底任务，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在国民党党内党外，都保持自己的领导作用。"在斯大林看来，中共退出国民党，不仅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并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只有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选自《党史纵横》95年6期，作者：王建科）

任弼时同陈独秀的一次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大会开幕那

天，陈独秀竟把当时伪装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当做贵宾请上了主席台。会上，陈独秀在报告中继续推行妥协退让政策，指责党内有些人的"过激行动"，"换来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当时有很多同志还不能识破陈独秀的面孔，再加他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所以没能纠正他推行的错误路线。对此，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代理书记的任弼时却忧虑万分。他和团中央的一些负责人认真分析形势之后，决定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一份《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同陈独秀错误路线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6月13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一开始任弼时就站起来要求发言，陈独秀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不管陈独秀同意不同意，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意见书，庄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越听意见书越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大叫："住嘴！"然后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大吼："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

23岁的任弼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浩然正气，继续口头报告："撕掉意见书，表明有力量吗？不！这正说明心虚理亏，没有真理！"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该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4.12"事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7月15日，汪精卫露出了真面目，突然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一位俄侨家里，党中央举行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新上任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握着任弼时的手，夸奖了他和团中央的觉悟及胆识。

（摘自《青年工作者》）

帝国主义拉拢蒋介石的经过

1927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对华声明中说："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它希望在我们对华条约中所规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他还说："美国政府曾尽一切努力，在所有互相争持、图谋控制中国的各党派间，保持极严谨的中立态度。"他表示"愿意以最宽大的精神同中国办交涉。"凯洛格还表示，只要蒋介石能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是愿意谈判的。本来，自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美帝国主义就把侵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这时，为了进一步引诱蒋介石，美国还派代表前往南昌与蒋进行会谈。

在帝国主义唆使下，买办豪绅阶级代表政学系政客、亲日派黄郛、张群和亲美派王正廷等人，相继云集南昌，出入于蒋介石的公馆，密谋破坏中国革命的计划。1927年1月，奉系军阀代表郑洪年和日本顾问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蒋介石代表李石曾也到北京和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进行"协商"。杨宇霆依照张作霖的旨意公开宣称："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1月27日，日本电通社报道说："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这表明，蒋介石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加紧勾结，妄图共同镇压革命。在这期间，同英美帝国主义勾结有素的江浙财阀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表示支持蒋介石，答应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借给他6000万元作为其反革命的活动经费。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之下，资产阶级右翼日益动摇和反动，蒋介石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而逐步加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勾结。由于他在北伐开始已经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要职，控制了军事、民政、财政等大权，并在北伐期间收编了大量军阀部队，迅速扩大了他的反动武装力量，现在又有帝国主义作靠山，因而他的反革命气焰就越来越高，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日益猖獗起来。早在1926年11月下旬，蒋在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时，就公开对美帝国主义表示"友谊"，乞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同年冬，蒋又密派戴季陶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前往日本，和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进行勾结。并派吴铁城从南昌前往日本东京，"向币原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卑躬屈膝地要求日本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事业。1927年2月4日，蒋介石又在南昌与美国代表会谈，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此外，蒋还派代表到北京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商谈"南北妥协"的条件。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周恩来四·一二脱险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周总指挥一直留在闸北总指挥部整编部队和开展部队教育活动。为了进一步团结北伐军，周总指挥又指示我们普遍开展军民联欢活动。这期间，北伐军多次换防，最后换上的是二十六军，这个军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孙传芳残部周凤歧的部队。周总指挥专门指派总工会赵子敬和我去做周凤歧的工作，

我们就通过二十六军的党代表赵舒，一起做周凤岐的工作，对他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和三大政策的宣传，要他同工人纠察队合作，虽经多次接触，但周凤岐贪钱如命，开口就要50万军饷，他的目的当然不能达到，后来终于成为蒋介石反共叛变、镇压工人武装的刽子手。

1927年4月5日，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陈独秀和汪精卫联合发表了"国共继续合作"的宣言，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蒋介石反共的企图和分裂革命的阴谋丝毫不提，使广大工人丧失了革命警惕。而这时蒋介石却来到了上海，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直接谈判，他为了麻痹上海工人阶级，口头上说支持工人武装，并敲锣打鼓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背地里却在帝国主义卵翼下，收买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组织什么中华共进会，在租界内武装了大批流氓，准备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总指挥虽一再提出要大家提高警惕，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人们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面前没有来得及应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

4月12日凌晨，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大批武装流氓手带黑布白字的袖套，有计划地从租界各地冲向华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地，敌二十六军则尾随武装流氓，掩护他们向工人开火，当时，武装流氓首先进攻湖州会馆，遭到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时二十六军提出什么"你们两方都是工人，为什么要发生武装冲突，可以坐下来谈判，为了维持秩序，我们不允许你们长时间的武装冲突"，假惺惺地建议双方将武器交给他们，并威胁谁不接受谈判的建议，他们就要"实行武装调停"。当时我们工人纠察队因缺少经验，信以为真。但当双方把枪交给二十六军后，他们就撕下了"调停"的假面具，马上占领湖州会馆，赶走徒手的工人纠察队，紧接着又收缴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刷厂工人纠察队的枪支。12日黎明前，当时我在宝山路十号的机关，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继续抵抗，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江浙区委罗亦农同志直接打给我的，罗告诉我："恩来同志被二十六军扣留了，望即找赵舒前去营救至要。"我接到电话后，心如火燎，立即将指挥任务交给另一个同志，直奔赵舒住所，就当夜二十六军叛变，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了周恩来同志等情况向赵舒作了汇报，并请他即去找斯烈。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不是总理的信徒吗？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头说："我也是奉命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周总指挥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和坚强意志。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它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同志办公所在地。

（选自黄逸峰《周恩来同志指挥我们战斗》）

青红帮小史

青红帮，又叫清洪帮，是清帮和洪帮（洪门）的合称。它们原是明末清初民间的两个秘密结社，民国年间才归于统一，所以人们简称为青红（或清洪）帮。

寻根觅源，红帮本出于"洪门"。"洪门"原是天地会的对内名称，据传说，它缘起于明末。1644年清兵入关后，南明福建延平郡王郑成功率兵攻取台湾时，为了团结对敌，与台湾地方人民结成异姓兄弟，并于顺治十八年（1662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这就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也有人持"洪门"创立于1674年即康熙十三年的观点。）因为它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为教育，故称为"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它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同时根据明太祖的年号"洪武"的"洪"字，对内称"洪门"。"洪门"的成员多为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游民。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反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主张，深得明末遗老们的同情和下层人民的拥护，发展迅速，势力逐步由福建、台湾等沿海地区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在此影响下，黄河南北、云贵地区以及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也都有这种反清组织建立起来。不过，各自有不同的名称而已。例如：西北地区便有以拥戴顾炎武为首领的"汉流"组织出现。又例如：发展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洪门"分支被称为"袍哥"，或叫"哥老会"，势力也很大。因为"洪门"与清政府势不两立，故清政府对它防范很严，一旦发现谁参加了"洪门"，就要逮捕甚至杀头。因此，为了生存和扩大组织，"洪门"还在城市里另设"礼门"，借戒烟、戒酒，戒赌、戒嫖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密传"反清复明"的宗旨。这样，"洪门"在种种外衣掩护下，仍在各地不断发展。此外，"洪门"还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发展组织，以致如小刀会、大刀会，匕首会、红灯照、红枪会、双刀会等也都属于"洪门"；甚至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响马，各地的保镖，也大都属于"洪门"的支系。

"青帮"，创立于1726年（雍正四年），是由翁雍、钱坚、潘清等在清政府的授意下组建的。他们原来是"洪门"派往北京坐探清廷消息的，后来被清廷捉拿而投降变节了，以致"青帮"成了满清政府的鹰犬。青帮有自己的帮规和仪式，以按辈分收徒的方式发展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南北运河的漕运船夫为清廷护运军粮，充当间谍人

员。因此，在这一时期，“洪门”视“青帮”为叛徒，两个帮会便成为仇敌。当时流传的“由青转红，挂彩披红；由红转青，剥皮抽筋”的谚语，就是两个秘密结社之间互相仇杀的反映。以后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青帮”就在上海、天津等地、长江下游及其它通商口岸建立帮会组织，以致“青帮”由原来的封建行帮逐渐变成了城市游民组织。

“洪门”在成立后，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洪门”曾参与和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该帮各派中有不少人都参加过早期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洪门”的反清意愿实现了，这类秘密团体的组织形式涣散了，形成了诸多的江湖流派。于是，一部分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些流派作为个人势力，使之逐渐成了城市流氓团体，改变了它原来的进步性质，并逐步同“青帮”合流了。而“青帮”从它一创立起就决定了其反动的性质，开始它为清朝统治集团效劳，成为维护清政府统治的行帮。辛亥革命期间，“青帮”在上海成立中华共进会，曾受袁世凯的指使，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1927年更为蒋介石所利用，充当屠杀上海革命工人的急先锋，直接参与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在此期间，青红帮首领黄金荣之流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其反革命的帮凶嘴脸昭然若揭。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地方的“青帮”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利诱下，又成为出卖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流氓、汉奸集团，从而遭到人民的唾弃。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青红帮”才彻底土崩瓦解。

（选自《历史大观园》）

邓小平主办“第二黄埔”

1926年10月，冯玉祥采纳李大钊密信中建议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率国民军由绥远出发，绕道宁夏、甘肃，向陕西进军。国民党入陕和西安解围，标志着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自五原誓师后，我党人员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与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开创国民军各部队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学校培养军政骨干。1927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号称“第二黄埔”、“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了。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并担任过教育长），高文敏（克林）为中共支部书记。这所中山军政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与直接领导的。中山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党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我党选送的革命青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劳工神圣》、《新三民主义》等多门政治理论课，直接向广大青年军官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在中山军校的影响和带动下，国民党先后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重要城市，开办了很多所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形成了一个种类齐备的“军校群”。

（摘自85年《党史通讯》第4期
《李大钊、邓小平与冯玉祥
——记大革命时期的北方战场及
国民军政治工作》一文，作者：阎稚新）

陈赓在南昌起义前后

一九二七年二月，陈赓在苏联完成了保卫工作的学习，从海参崴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三月初，他被派往北伐军总司令部驻地南昌。他曾在总司令部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奸诈成性，虽然暗中已经磨刀霍霍，准备着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大屠杀，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对陈赓态度非常客气。在总司令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对陈赓说：“蒋介石要叛变了！”叫他赶快离开南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在街上遇到陈赓时，也劝他迅速走开，免遭蒋介石的暗算。陈赓征得党组织同意，便从这里转往武汉。

陈赓到达武汉不久，党中央也从上海迁到武汉。党组织通过上层统战关系，把他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特务营任营长。这个部队军官中有很多共产党员，战士都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当时，武汉市工人武装纠察队，名义上归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实际是由陈赓指挥的。他在这里负责保卫党的中央机关的安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赓同在武汉的黄埔学生组织了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了声讨蒋介石的宣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内部以投机政客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也动摇起来。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通过“分共决议案”，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民党军阀何键看中了特务营的新式机关枪，派部队用机关枪对准陈赓的门口。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人也逼着陈赓把特务营交出去。七月下旬，他便离开特务营，过江来到武昌，跟随周恩来乘船秘密前往九江，于七月二十七日抵达南昌，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开始的时候，陈赓在起义总指挥部担负肃反工作。他跟李立三等连夜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且接管了江西省银行，把没收的大批钱财用汽车运往总指挥部参谋团。

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陈赓到贺龙

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第一营担任营长，跟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八月下旬，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在会昌地区和反动军阀钱大钧、黄绍竑的部队进行了一场激战。本来我军预定拂晓开始攻击会昌城，因为部队走错了路，推迟到早晨八点钟才开始。陈赓带领第一营的部队，八时起由正面发起攻击，一气攻下三个山包。原计划在两翼发动攻击的部队没有按时赶到，这时敌人派四个团来堵截他们，我军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弹尽援绝，我军只好后撤。

撤退的时候，陈赓走在部队最后面。下午一点钟，他的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负了重伤。他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发觉他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他的副官卢冬生也跳下来照顾他。不久敌人便到处搜索，他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快走。卢冬生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丛里藏起来。陈赓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在敌人走近来的时候，他把牙齿咬紧，屏住呼吸，敌人以为他已死掉，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他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叶挺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了。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他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他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的脖子上都挂有红带子，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这时，前边我军已经占领会昌，他在城里见到了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等。此刻重逢，格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部队未照原计划直下寻邬、梅县，而改折向福建的汀州、上杭一带。陈赓因为伤势很重，便坐船顺贡水前往汀州。部队很快进军东江，陈赓的腿还没有痊愈，但因形势所迫，便即随军行动。九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潮州，他便和部队一起进城。

我军占领汕头后，陈赓和一些受伤的同志被送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但在我军占领汕头的第一天，日本陆战队就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而登陆上岸；一队英国水兵也以保护教堂为借口，强行登陆。因陈赓是起义军的军官，日本人对他的态度非常不好。九月三十日我军从汕头撤出时，周恩来曾派人送钱给陈赓他们，结果没有送到，所以撤退的事他完全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叫卢冬生到总指挥部住的畸庐去看看，卢冬生一出门，只见国民党军队正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带子的起义部队了。陈赓的伤势很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要把他们赶出去。他指着陈赓说："你是共产党，我们对你的安全不负责任。"这时，医院有个护士李小姐和一个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我军，便偷偷地把他藏起来。国民党军队进来搜查时，陈赓才得免于被捕。日本院长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开除了这个工人。后来国民党军队又来搜查，李小姐便把陈赓藏在厕所里面，后来又设法把他送到开往香港去的轮船上。

陈赓坐的这条太古公司的轮船，是我军在汕头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条船，许多同志都在这条船上。快到香港时，船上挂出一种标志有危险的信号旗，要岸上的巡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巡捕就涌上船来，一气抓走了几十个人。没被认出的一些同志都迅速离开了。陈赓因伤重留在船上。卢冬生急中生智，找来一把椅子抬他下去，检查的人问他负的什么伤，并且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陈赓用讲得不很熟练的潮州话哄骗对方说，他是在潮州电报局做事的，在双方争夺潮州的战斗中，流弹飞进他的办公室打中他的腿，由于潮州没有医院，他就到汕头的博爱医院医治。检查人员见他回答很准确，便信以为真，放他上岸去了。

陈赓上岸已找不见一个熟人，只有卢冬生陪伴着他。卢冬生对革命忠诚老实，在这段艰险的旅程中，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使陈赓无限感激，以后一直念念不忘。

陈赓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了一会儿，香港巡捕就用棒子来撵，不准他们在街上停留。他们曾经住进一家旅馆，但有许多人围上来看"从汕头跑来的红军"。他怕出事，忙从旅馆出来，又坐黄包车到一家医院里去要求治疗，被医院拒绝。陈赓又到一家中医那里挂了个号。医生发现陈赓是打仗受伤的，便又逼他出去。卢冬生只好背他到马路旁边一个厕所里去坐。这时肚子已经很饿了，陈赓看见不远有家西餐馆，就和卢冬生开玩笑地说："这时候能叫客西餐来吃多好啊！卢冬生为人老实，信以为真，真去叫来一客西餐。人家跟他走到厕所跟前，不仅饭没给吃，反而骂了他们一顿。那时陈赓身上有二十块钱，想去上海，叫卢冬生打听一下，恰好一小时后就有驶往上海去的船。有汽艇上人家发现他是打仗受的伤，又被敲去五块钱的竹杠。上了轮船，坐在甲板上面，外国人又说他是传染病，不卖给票。这时有个穿工人服装的人走来，很同情地告诉他说："再有人问，就说不是传染病，腿是跌坏的，每顿还可以吃三碗饭。"工人帮忙买到船票，又找来一只行军床，和卢冬生把陈赓抬到货舱里。舱里左边堆的香蕉，右边堆的桔子，陈赓的行军床就藏在里面了。

陈赓所坐的这条船，恰好又是我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当时一片白色恐怖，自己刚刚逃出来，忽又折到这里，陈赓的心中一阵紧张。船刚靠岸，又有许多起义军的人员上船来了。这中间还有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他是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没被认出来才逃出的。周逸群一上船，挟着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倒头就睡。陈赓正躺在那里看报纸，见他进来非常惊喜，就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纸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把周逸群吓了一跳，竖起耳朵，立刻听出这是陈赓的声音，两人一阵好笑。以后他们一起到上海找到了

党。

说来也巧，二十二年以后，正是陈赓指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南昌。六月六日，陈赓重访南昌，感慨万端。这天夜里，他无比兴奋地在日记里写道："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历史上第四次到此。第一次一九二七年，蒋匪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八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起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一九三二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匪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第三次。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六月八日，他又写道："……过百花洲，入南昌图书馆。此处三十年代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指挥对我中央苏区之第四次围剿；我在沪被捕，蒋曾在此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回忆昔年此室，我曾为人阶下囚，受人审讯，今则我已为此室主人矣。盖我三十七师师部驻节于此。兴奋之余，特志入日记内。"

这年十月，陈赓又指挥部队解放了他在那里开始革命军事生涯的另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州。继又挥师雷州半岛追歼广州逃敌，穿过十万大山协同友邻部队歼灭桂系蒋军，西进滇南穷追全歼云南逃敌，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边疆。

（选自《中华英烈》86年6期，作者：穆欣）

南昌起义中的外国人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在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中，有位名叫莫·弗·库马宁的苏联顾问，他是南昌起义中唯一的外国人。

库马宁生于1897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加入苏联红军，是苏共老党员，在第一次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炮兵营长、团长和步兵旅长等职。1926年奉派来华，担任黄埔军校军事顾问，并以"齐冈"作为自己的中国名字。北伐战争时任李宗仁部第7军第二任军事顾问，参与指挥攻打临淮、蚌埠等地战斗。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后，库马宁改任贺龙部第20军军事顾问，协助贺龙率部扫荡吴佩孚残部，击溃张作霖的部队，取得许昌、郑州大捷。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贺龙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率第20军南下，库马宁随军来到南昌。贺龙出任南昌起义总指挥后，库马宁积极出谋划策，为南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贡献。8月5日，起义部队按原计划分兵两路向广东进军、库马宁随贺龙的部队南下，不幸在9日的汤坑遭遇战中被俘。库马宁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保持了一名苏共党员的气节。由于库马宁在黄埔军校和李宗仁部担任过军事顾问，加上苏联政府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营救，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于1928年秋将其释放。库马宁回国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苏联海军领导职务。

后来，库马宁以其亲身经历写成南昌起义回忆录，刊载于1961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斗》一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南昌暴动虽没能挽救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但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独立武装，向反动势力打响了第一枪，从而诞生了中国人民的军队。"

（选自《党史博采》，作者：列世杰）

从武汉到井冈山
——红军生长史第一页

光荣的征程

武昌准备行动——是七月的天气，在被焦灼的阳光烤卷了层的操场上，闷热的风刺得人象针钻一样难受，汗水从脸上分成无数的洪流直泻了下来。人们是很紧张地受着训练，动作是那样整齐，一颗心被一种严肃的心情束住，忘却了脚下烫人的泥土，火样阳光烤得人身子象要爆裂了！

这时我们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较二次北伐时加强，人们漂亮的脸晒成一团漆黑，那些从大学校跑出来的文弱书生都一变而为纠纠武夫了。虽在短短一个月当中，这些受过革命洗礼的战士们，莫不义愤口天，慨慷激昂，养成了在长途行军中艰苦斗争的精神。

当时警卫团长是卢德明〔铭〕，副团长余洒渡，参谋长韩铮，团指导员辛汉文。

出征——1927年7月30日，警卫团同武汉分校新收编之军官教导团，奉命向南昌开拔。叶挺"八一"已在南昌举行了伟大的革命暴动，继续前进至武穴、田家镇之线，知悉朱培德、张发奎在九江对我军已有戒备。警卫团卢德明〔铭〕同志很机动的即令队伍折回蕲州对岸阳新县属之黄山口登陆（当时因为同行之军官教导团，在该团团长杨树森的阴谋下直赴九江缴械），徒步急行军，采取备战姿势向阳新、武宁、靖安、樟树前进，企图与贺、叶会师。

夜渡阳新湖——由黄石港日夜兼程，两日后占领阳新城。时山洪飞涨，水势汹汹，阳新已成泽国。阳新湖畔大水道均为水所淹，房屋、田野、树林，浸没在金色的狂浪中，孤零零地在白热的阳光下显得异常悲凉。无数民船也为水覆沉了。

船驶进阳新湖已经是夜里了，沉静的凄冷的夜，稀稀的闪烁的星星伴着昏黄的眉月，从云层里凝视着像醉了一般的大地。和暖的温风从辽远的原野，从睡梦的人家，隐约的黑黑的丛林，带着村庄的犬吠，掠过湖面吹过来了。湖水漾着轻波，远山蹲伏在灰白的雾里。弟兄们都兴奋起来了，快乐的雄伟的少年先锋队歌从人们胸中像一般热血样流放出来，激昂地冲破了静夜的沉寂，拂过湖面荡漾开去。他们代替了水手，使劲地把船划向前去，在一片快乐的自由的歌声中，人们忘去了几日疲劳，自然地欢笑着，夜也就很快地悄悄地度去了！

两日夜，安然渡过了阳新湖。深夜，船驶进了牌市小港，眉月穿过芦苇，轻烟锁住河面。人们正沉萦此自然之美景时，忽闻山寺钟声嘹亮，灯火辉煌，锣鼓频敲，剌叭声音过丛林，顿时惊惶了这些初过军士生活的战士，以为红枪会与土匪袭击，张惶失措，手足忙乱。幸有支部书记和指导员，梭巡详为解释，大声呼喊："山上是庙会，大家莫惊慌，鼓着勇气，勇敢前进，迅速通过此荒塘僻路，明天到龙港休息！"好久，大家才镇静下来，紧张地度过了这一夜，黎明，至一村庄，即在此休息。午饭后，疲劳恢复，继续前进。次日正午，在万千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燃放着的鞭炮浓浓的烟雾下，到了龙港。

晚上在幕阜山麓一村庄宿营。次日，翻越幕阜山，狂风暴雨，道路泥泞，瀑布飞洪，衣物尽湿。然人们仍兴高气采，高唱先锋队歌，不慌不忙地越过了这险峻的幕阜山最高峰，高入云霄的三十五里高的双雀山，夜半到武宁。

会合平浏自卫军——武宁为土匪所扰，县长在逃，群众正在恐怖中。在此休息一日，作了些宣传工作，逃跑的群众均纷纷回来了。走向靖安途中，与马夜〈政〉变后围攻长沙之工农武装平浏自卫军会合了。警卫团弟兄听得自卫军围攻长沙胜利的消息，快乐之状，不可形容。歌声奔腾，狂呼乱叫，摩拳擦掌，专等敌军来临。士气之盛，有如澎湃之怒潮，不可抑止。自卫军首长余贲民来团会商行军方针，不幸，结果双方未得一致。平浏工农自卫军折回修水、铜鼓。警卫团一部分身体不好，须要修〔休〕养的随去。

警卫团继续向靖安原定目标前进，企图在樟树渡河与贺、叶会师。靖安沿途交通便利，商旅云集，居民繁多，地形开阔，物产丰富，道路平坦，给养容易，较之武宁山境，实有天壤之别。战士们沿途进行宣传工作；情绪很高，颇受群众欢迎，虽为盛暑行军，亦不觉苦。三日即达靖安。

靖安肃反，整理部队——一营三连连长是国家主义者，在警卫团中阴谋破坏部队，企图刺杀领袖，组织反革命暴动。幸事先发觉，即将该连长捕获，当众公审。弟兄们愤慨万分，齐声大呼："枪杀反革命，打倒叛徒！"以致动武最后终于枪决了。在阴湿的墙边，暴徒淌下了罪恶的血！

我们决意要巩固部队，因为前途是万分艰难与困苦。于是我们开始整理部队。有些身体不好的，征取本人同意，准许离队伍；吃不得苦、耐不得劳的也可离开。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愿为革命斗争到底者、有坚决意志者、愿干者来，不愿者随意。"警卫团共有三千多人，脱离了一百多。从此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团结，行军速度也就更加快了！从此我们更相信，靠了我们的党，靠了群众的力量，我们足以肃清一切反动者，毁灭任何反动的力量！我们艰苦奋斗、英勇的精神，将震撼着历史上任何时代！

向奉新前进——从靖安行一日夜到奉新附近宿营。闻涂家埠有朱培德部企图堵截，奉新城也有戒备。当即将部队党积极分子，分成几个侦探小组，命向涂家埠、高安县、樟树镇一带侦察地形与敌军情况。此时始知悉贺、叶部队已离开南昌，转向江西东南去了。

探报回来，知奉新无敌，民团也很欢迎我们。遂于次日抵奉新，休息一日，落伍掉队的都回来了（因此时阶级分化还不分明，我们仍打着青天白日旗帜，故能安全归来）。

在奉新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今后行动方针：樟树朱培德有严密布置，企图堵截我军，故应改变原定〈与〉贺、叶会师方针，转移方向，向修水、铜鼓前进。

当时我们的口号：会合平浏自卫军！打进长沙去！恢复湖南农协工会！开展湖南新的斗争局面！

此后，我们就向修水前进。

卢团长、韩参谋长、辛指导员离开了我们，向中共中央请示去了，约定在修水会合。团长职务由余洒渡代理。

红旗的第一次出现——革命势力准备在修水

为了恢复疲劳，决定在此地休息两礼拜。得到湖南省委的指示，改编我们的队伍，把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取消，改换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把反革命的青天白日旗撕毁，挂上代表工农镰刀斧头交叉着的红旗，当时的帽徽却没有换上红五角星，仅仅把青天白日的帽徽弄掉不用。

编制　以警卫团为中心，将在此地会合的平浏自卫军，萍乡、醴陵的工农纠察队及鄂南的崇阳自卫军一并编成一师，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包含了四个团；当时军事上的负责人师长余洒渡同志、副师长余贲民同志；第一团是警卫团，团长钟文钊；第二团团长邱国轩（土匪出身）；平浏自卫军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黄埔军校第四期）；萍乡、醴陵自卫军为第四团，团长王新亚；鄂南的崇阳自卫军及修水县警卫队编为师部的特务营，师有参谋处、副官处、供给处、卫生处及辎重队等部门。

政治组织　当时师没有师指导员，只有师党委员会，团有团指导员，连有连指导员，各连有共产党支部组织，经过党的领导进行政治工作。这时的政治工作非常幼稚，因为这时政治工作是萌芽试验时期，工作弄得忙无头绪，没有通盘的计划，又加之政治训练很简单，工作的表现仅仅是上下级的政治工作汇报而已。下级党支部组织不健

全,少开会议,即就开会议也是所谓照例行事,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很缓慢、迟钝的。

我们编制妥当后,进行一切的政治军事训练。虽说是我们一切的设备没有,革命的热情却填满在每一个人的心坎。每当号角一吹,东方仅微露白色,操场上的黑影蠕动,整齐的步法、宏亮的吼声,振动这茫茫的黑夜。这是象征着光明的图画、快乐的世界的来临的前奏曲。

教员上课布满了紧张的空气,闷人天气并不觉得使人困倦。有的教员说了一两句笑话,更提高了大家的精神与注意力。我们学习不是机械的是灵活的,不是"打针"的而是讨论的。教员从来没有说他是"呱呱叫",他说"我还是向你学习"。教员教学生,同时学生也教教员。这是我们学习的精神,我们革命队伍中应有的精神。我们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坚强革命的执行者,这也算是原因中的一个。

又或夜月当空,宇宙已是寂静无声。个别多情种子的同志,独自散步庭中,远远吹来桂花的清香,秋委的蝉声如怨如诉,对此情地追忆往昔与心中人携手□携,对月高歌,两心相印……的往情,能无动于心乎!——当时革命队伍中有一部分大、中学生,——但是转一念头"只有革命才能有美满的幸福的生活,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恋爱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劳苦群众"的道理出现在脑海中,恋爱的念头被打下去。苏联革命成功更鼓励了这一群革命的战士的勇气,坚决为革命而奋斗着,为光明的中国而向着黑暗的恶魔斗争着。

秋收暴动

"秋暴"的序幕

虽说在修水训练了短短的时间,我们队伍的精神、革命的热情却日益增强,不可截止。又加以当时湖南一带反动势力高度压迫之下,工农运动受了极严重的打击,工作人员比较积极的不是被杀,便是被捕。有一部分是逃走暂时躲下。工人、农民等急望革命军队的来临,来解放他们。"秋收暴动"的计划与行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我们计划着把从新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为基础,配合湘东各县工农望湖南长沙进攻,分三路进兵。

在修水出发誓师的那天(一九二七年阴历八月十五),成千成万扶老携幼的来到会场参加来欢送,热烈的祝我们成功。他们的代表致辞,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但从他那真诚的态度、热忱的希望,就这简单的几句话中表现出来。我们和战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动身,马上赶到,早点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

如何完成"秋暴"?——军事行动

在一九二七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出发,由修水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界一带进发。当先行部队抵渣津、马憬遇着党中央派来领导"秋暴"的军事领袖卢德明〔铭〕及陈浩两同志。卢同志任总指挥之职,余洒渡副之,陈同志为参谋长。兵力分三路进攻:第一、二团向平江、长寿街前进;第二团由铜鼓向浏阳前进;第四团由萍乡、醴陵向浏阳前进,目的是先占领浏阳、平江,会师长沙。

"秋暴"的经过

第一、二团行抵平江之龙门、金盆一带。第二团邱国轩在至金盆时叛变了,沦为土匪。此团邱乃土匪出身,借革命名义,行其自私之举动,致使第一团亦稍受损失。后将第一团开到平江之官山改编;第三团在浏阳、白沙受敌袭击,未得前进;四团虽然占领了萍乡、醴陵,并已进占浏阳敌后方,但因警戒的疏忽,情报不明,受敌包围,全军覆没。王团长新亚失踪。三团部队与一团在浏阳、铜鼓边境会合,折向浏阳文家市转移——秋暴是这样消沉下去了!

追念井冈山

本来湖南党省委派毛主席泽东同志往铜鼓领导"秋暴"工作,及毛主席至队中我们已失败向文家市前进,在文家市遇及毛主席。在毛主席未到队时,曾为铜鼓民团一度所获。毛主席到队后,我们的领导加强了。在文家市休息一日,召开了党扩大干部会议,决定此后军队行动方针及斗争地区。井冈山成红军最光荣的一页,便是这时决定的。毛主席并召集了全体同志训话,鼓起大家的勇气,并严明纪律,因当时失败后,多日的疲劳,致使纪律相当的松懈。

当我军向井冈山前进,经过萍乡之泸溪时天气已晚,在离泸溪街六七里的一个村庄宿营。当时得确报称萍乡先我两日已由江西开到朱培德部队一师,企图扑灭我们。决定次日拂晓我们部队向莲花县前进,以第一团作前卫队,向莲花县已开拔;第三团做后卫队,但因第三团苏先骏迷失方向,折回向泸溪街前进,将接近街时,受敌的伏击。敌以整个一师兵力向我第三团猛攻。卢同志亲自指挥,敌人从我左侧面迂回攻击不支而退,奋勇不顾身的革命领袖卢同志牺牲于是役,使我们受很大的损失。将残余部队整理后,继续向原定计划经莲花向井冈山前进。

(刊自中央历史档案馆原稿,无作者署名)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特殊贡献

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中,叶剑英同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南昌起义作出了特殊贡献。

南昌起义前夕,汪精卫、张发奎等密谋策划,妄图在庐山扣压贺龙、叶挺等,解除他们的兵权。当时,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由于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叶剑英便利用这种特殊条件,将敌人的这一阴谋计划及时送出,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发动。

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首先确定了在北伐战争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的指挥员叶挺、贺龙为南昌起义的指挥者。国民党反动派已察觉到叶、贺二人的行动有异，害怕他二人被共产党争取了去对他们不利。因此，1927年7月23日左右，汪精卫亲自去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开会密谋，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等上庐山开会，企图假借开会的名义，扣压他们，解除他们的兵权。

叶剑英得知敌人要扣压叶、贺等人的阴谋后，急速找到叶挺、贺龙等人，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将听到敌人密令的消息告诉大家。经过大家谨慎而又周密的商议，决定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尽快赶往南昌。第二天，叶、贺率领其部队次第向南昌开拔。

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在庐山进一步密谋，除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外，还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并密谋逮捕第四军政治主任廖乾五等共产党人。叶剑英闻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告知廖乾五等人迅速转移。7月30日，廖乾五、高语罕等秘密离开九江奔赴南昌，并向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报告了九江的形势。廖乾五、高语罕等人随即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廖乾五担任了第二十军党代表，为南昌起义增加了领导力量。

叶挺率领的第廿四师是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参加起义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这支部队在共产党员周逸群同志的帮助下，有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这两支部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假借张发奎"东征讨将"之机，向九江集中，准备参加南昌起义。

这两支部队在开往九江的途中，引起了反动派的严重注意和警觉，必欲去之而后快。张发奎令第二十军、第廿四师两部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集结待命，策划以另外三个军的兵力，围攻歼灭之。

叶剑英同叶挺、贺龙等在甘棠湖小船上密议决定：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集中德安，不能照办，把部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的第廿四师第二天即行开拔，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这两支部队迅速次第转移，沿着南浔铁路从九江向南昌进发，7月27日，叶挺部队到达南昌。随后贺龙也率部队到达。这两支队伍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

此外，叶剑英还保护了准备赶去参加南昌起义，中途被张发奎扣留的军官教导团。

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各派军阀，他们派大批兵力向南昌包围上来。面对严重的局势，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按照预定的计划，将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瑞金经寻乌、梅县直取东江，在广东东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农民运动正在那里蓬勃发展着。同时那里又靠近海口，可以取得国际援助，以便党重新积聚力量进行北伐。

1927年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进入南征途中。蒋介石发现起义军矛头直指广东，急令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李宗仁令黄绍竑将两广反动军队编组在左、右、中三路进行堵截。汪精卫则在一天内数次电报从武汉发出：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肃清南昌驻军。

张发奎、黄琪翔（时任第四军军长）等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追击南昌起义军的部署。这时张发奎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是第二方面军的主将，南昌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又是从第二方面军中分化出来的，他为了表明自己反革命的决心，对起义军非镇压不可。但是，叶贺部队的实力和战斗力，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又不敢也不愿与善于打硬仗的叶、贺部队硬拼，过份消耗自己的实力。他想保存实力回粤同李济深争夺广东地盘。

叶剑英从维护南昌起义军的利益出发，在张发奎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向张发奎献策："向华（张发奎的字）公，我们还是开往广东不追叶、贺为好。总指挥早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然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已退回潮梅，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革命！"张发奎顿觉叶剑英言之有理，随之放弃了尾追叶、贺的企图。为避免通共之嫌，张发奎遂派一小股部队佯装追击，虚张声势。

南昌起义军到达抚州（临川）后，起义军在东，张发奎部队在西，两军平行向南，后来，起义军沿粤闽边趋潮汕，张发奎部队则由南雄入广东。对张发奎的这一行动，国民党各派军阀一直迷惑不解。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献出的锦囊妙计。这一"计"表面上是投张发奎入广东之所好，实质上是解除了起义军南下途中的后顾之忧。使得南昌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对付钱大钧部的堵截，打开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澎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总之，叶剑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他在敌人的营垒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叶挺、贺龙等南昌起义的指挥者和领导者；保护了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解除了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的后顾之忧。对南昌起义的顺利发动和保存南下部分革命武装，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刘忠良，选自《党史文汇》91年10期）

毛泽覃受命找长兄

1927年8月初，毛泽覃在南昌机智地脱险后，急匆匆地南下追赶八一起义大军。一路上，历尽艰险，脚走烂了，钱用光了，只好卖掉那件长衫，换回几块钱做盘缠，继续赶路。快到临川时，起义军的哨兵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将他扣留。他被押解到临川时，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他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立即安排他在叶挺领导的十一军所属二十五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

当起义部队转战到广东的潮州、汕头一带时，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被打散。毛泽覃随一部分队伍转移至饶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从三河坝撤下来的部队会合。此时，一位年约40开外的军官快步向大家走来。毛泽覃得知他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第九军副军长朱德。

此时起义部队又被敌军围困，朱德率领部队与敌激战三昼夜，终于突出重围。毛泽覃随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信丰。在此他们获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这给正处于孤军转战的朱德部队以极大鼓舞。10月底，朱德、陈毅率部转战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后，再一次得知毛委员率部到井冈山的确切消息，遂决定上井冈山找毛泽东。派谁去联络呢？陈毅建议：“派毛泽覃去最合适。”

毛泽覃听说首长准备派他去井冈山找大哥，喜出望外。武汉一别，已有半年多，很想知道大哥的近况。毛泽覃启程时，朱德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尽快赶往井冈山和毛泽东联络。你可以化装成国民党军。”毛泽覃满怀信心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毛泽覃已有躲避敌人的经验。在从南昌追赶八一起义大军时，他曾被敌卫兵带去见上司。他壮着胆说自己是奉第四军军部命令到此，负有重要任务，谁敢扣留，将来定要严加惩处。敌人见他神色镇定，唯恐错抓，以后难脱干系，就客气地放了他。

11月中旬，张子清、伍中豪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在崇义县上堡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会合。毛泽覃曾受朱德委派，前往第三营驻地鹅形，找到了张子清、伍中豪，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毛泽东进军井冈山的情况，为寻找秋收起义部队提供了信息。

11月下旬，寒风袭人，蜿蜒的群山罩着低沉的阴云。毛泽覃身穿一套国民党正规军的军官服装，佩带着国民党正规军的符号，并带着注明是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副官“覃泽”的证件，顺利地通过国民党一道又一道的关卡，由崇义、上犹经湖南的桂东、茶陵、酃县直奔井冈山。

这一天，毛泽覃抵达茶陵坑口。坑口位于茶陵与宁冈交界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它是井冈山第一个红色政权。为了保证工农革命军前线和后方的交通联络，掩护与接送伤病人员，通过宁冈袁文才同当地一些人的关系，派出一个没有暴露工农革命军身份的连队，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驻扎在坑口。连长陈伯钧听说来了一位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人，立即警惕起来。

住在坑口的国民党民团团长罗克绍，闻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位长官来到这里，立即率领一班土豪劣绅出来迎接。他看了毛泽覃的证件后，又听毛泽覃讲话的口气很硬，不敢怠慢，命令摆酒接风，设宴招待，晚上还陪着打了几圈麻将。毛泽覃在与敌人周旋中，听说有井冈山的一个连驻扎在这里，便去找该连驻地。陈伯钧了解到来人与毛委员的关系和他所受的特殊使命后，立即派人送他上井冈山去见毛委员。11月底，毛泽覃到达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边界，是毛泽东亲自开辟的我党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势险要，可攻可守。工农革命军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火红。毛泽覃随向导来到团部，见到长兄毛泽东正从屋里走出，疾步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大哥，想不到在这儿与你见面！”毛泽东惊呀地看着小弟：“泽覃，你怎么来了？”“是朱德派我来和你联络的。”毛泽东急切地询问南昌起义部队情况。听了泽覃充满激情的汇报后，毛泽东深受鼓舞，兴奋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朱德、陈毅部队的消息，正要找他们呢？前些天派何长工赴长沙，通过湖南省委设法与你们取得联系，没想到朱德派你先与我们联系上了。”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你就留在这儿工作，我派一个连的部队去郴州，找朱德部队。”

1928年3月，毛泽东部奉湘南特委之命，调往湘南，在酃县中村集结待命，随后又在桂东沙田一带发动群众插牌分田。期间，闻讯湘南暴动失败，随即派毛泽覃带领特务连专程去郴州与朱德进一步联系。4月初，毛泽覃不顾路途之遥远，行军之艰难，率特务连披荆斩棘。追赶朱德部队。当得知朱德已率部北上耒阳，泽覃便带着特务连，从郴州急行军赶到耒阳，后又东去，终于赶上了朱德部。部队由毛泽覃带路，直奔井冈山。

与此同时，陈毅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亲率中国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接应湘南农军，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敌，掩护部队向井冈山转移。4月25日，朱德、陈毅部顺利到达砻市。毛泽东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于28日到达砻市。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砻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这里进行了历

史性的会面。

5月4日，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周年之际，宁冈砻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部队会师大会在这里召开。红军指战员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先后进入会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如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诞生，中国革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望着眼前这一切，毛泽覃感到无比欣慰。

（作者：王勤，选自《党史纵横》）

耿飚巧计撒传单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醴陵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了醴陵。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斗志和士气，党的地下组织决定派人进城去散发一批传单。派谁去呢？这是个重要的，也是很危险的任务，需要胆大心细的人去才能完成。经过商议，党组织决定派16岁的共青团员耿飚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因为耿飚年纪小，不易被敌人注意，他幼时练过武功，遇到危险可以防身，而且他机智过人，又有胆量，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

耿飚接受任务后，化装成一个到城里收账的少东家，把传单伪装成账簿，藏在身上，在黄昏时分，来到了县城。

当时醴陵县城已成为虎狼之地，进城的各个路口都有保安团的士兵站岗，任意盘查行人，看谁不顺眼，不论男女，就叫住搜身，动辄就把行人抓起来，当作嫌疑犯投入大牢。马路两边到处张贴着悬赏缉拿共产党人、工会和农会干部的告示。

耿飚神色自若地来到城门口，站岗的哨兵看他一身阔少打扮，没有盘查就放他进城了。耿飚进城后，正在琢磨怎样散发传单时，就听见保安团的"净街锣"响了起来，原来，自从醴陵农民军扑城失败之后，每到天黑，城里都要实行宵禁，严禁老百姓上街走动，违者格杀勿论。耿飚看到主要街道都布满了保安团的巡逻队，急忙拐入一条小巷，三转两拐，跑到了城东北角的城隍庙。他望着街上敌人扫来扫去的手电光和晃动着的灯笼，暗想，看来只好等这帮家伙回去睡觉时再下手了。

突然，他发现城隍庙后殿有蜡烛光，就悄悄地走过去看个究竟。原来，在城隍庙的后殿里聚集着一群"丐帮"弟子。这些叫花子是被保安团从城中各个角落驱赶到这里来的。这会儿，他们正一面骂骂咧咧地诅咒世道不好，一面清理白天的收获。

"好好的，短命的保安团，害得老子米都没得讨。"

"今天到刚开张的药店去'讨喜'，该天杀的老板，只给了半碗剩菜。"……

听到这里，耿飚不由心里暗暗一动，他想，如果等保安团放松警惕，离天亮也就没有多少时间了，自己一个人怎么来得及把传单撒满全城呢？不如让这些"丐帮"弟子助我一臂之力。想到这里，耿飚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了城隍庙后殿，冲叫花子们一抱拳：

"各位发财！"耿飚的突然出现，把叫花子们吓了一跳，一个个直愣愣地看着他。

耿飚对他们说："明天我们茂源米号开张，掌柜的请各位赏光，前去讨喜。"

"丐帮"弟子们一听，都来了精神，七嘴八舌地问耿飚：

"是不是阳三石后面的那一家？"

"正是。"耿飚知道阳三石在车站附近。顺势应答了一句。

"怪不得这两天那里油漆门面呢！"

"嘿！"米店比药铺仗义，去吃他娘的一顿饱饭！"又一个叫花子说道。

这时，一个穿破长衫的瞎子，走上前来，向耿飚一抱拳："先生，在下有礼了，请回贵老板，明天我们一定去，保证让贵店火爆兴旺。"

耿飚眼珠一转，问道："各位有没有认得字的？"

这下子，这些叫花子全傻了，都望着那位穿破长衫的瞎子。显然，这些人都是"睁眼瞎子"。

穿破长衫的瞎子问："先生的意思是……"

"明天讨喜没得说了。今天夜里，想请各位帮帮忙，把这些'开市大吉'的帖子帖出去。"

"丐帮"弟子们有些失望，穿破长衫的瞎子倒来了兴致："你是想来个'五更喜'？"

耿飚本不知道什么叫"五更喜"，但他脑子反应很快，马上接住他的话头说："对，对，还是这位有见识。"

这下，瞎子更得意了，他伸出一只长指甲满脏的手，掐算了一会儿说："知道了。今年太岁正南，眼下正行秋令，虽然节气未过，然太阳星出辰入申，犯于卯而冲于酉，财神当移朱雀，而朱雀在寅，不犯天光。且寅者，银也，大吉，大吉！"。

耿飚暗暗算了一下，寅时，正是凌晨三时至五时。于是他连声说："对，对！干完了当即给赏钱。"

叫花子们一听，都争着要去。

耿飚拿出那些传单告诉他们，大张的是告示，要贴到十字街上；小张的是请帖，要拣大户人家从门缝里塞进去。末尾他说，都不许偷懒，我要检查的，一个地方没贴到，让我发现，明天可莫怪敝店不肯打发。"

"要得！要得！"。"谁不仗义，让他出门撞上保安团，进门碰上挨户团！"他们赌咒发誓，接受了耿飚分派的"任务"。

那个穿破长衫的瞎子，是这个"丐帮"的"帮主"，他给叫花子们分了工，谁去哪块地盘，谁去什么区域，都安排

得明明白白。耿飚一听很高兴，因为都是闹市区。于是，他故意把口袋里的铜板摇得哗哗响，对他们说："各位可以动身了，不要误了时辰，赏钱我交这位先生给你们分了。"其实他衣兜里的几十枚铜板是同志们凑来给他买饭吃的。

叫花子们走了以后，耿飚把剩下的宣传品自己帖到县公署周围，连保安团长家的房山头也帖了一张，然后回到城隍庙。不久，叫花子们都陆续干完来领赏钱了。

耿飚问了一下情况，将口袋里的铜板都交给了穿长衫的瞎子"帮主"，让他给叫花子们分一下，便离开城隍庙，凭着一身轻功，趁黎明前敌人戒备懈怠之机悄悄地溜出了城外。

翌日，天刚一亮，醴陵城就沸腾了。人们见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传单，一些土豪劣绅还收到了警告信，便纷纷议论："昨晚共产党大队人马进城了。"连保安团的士兵们也互相告诫："兄弟，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听说昨晚共产党进城不少人呐！""可不嘛！咱得留条后路哇！"一班官吏、劣绅、土豪全都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广大的贫苦群众个个喜上眉梢，斗志更高了。

（作者：刘喜发，选自《党史博采》94年5期）

红军名称的由来

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仍沿用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称工农革命军。同年11月13日，潘恰汝、吴光洁等领导的黄麻起义部队称"农民自卫军"。14日清晨，黄安城解放了，吴兰阶先生非常高兴，写了一副出色的对联贴在县衙的大门上："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城，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是第一次呼出的"红军"称号。

年底，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时就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

（摘自《中国青年报》）

鲁迅在黄埔军校的一次讲演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乘船去国民革命中心的广州，18日到达。旋受聘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当时，刘弄潮（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88年11月去世）从北方来到广州，住在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政治部主任孙炳文家中。孙炳文要刘弄潮到黄埔军校去担任政治教官，并介绍刘去黄埔找政治部主任熊雄谈谈。

1月初，刘弄潮去黄埔校本部，熊雄热情接待，对刘到黄埔任教表示热忱欢迎，同时也坦率地对刘谈了他所知道的当前革命形势和军校的详细情况，并说："现在军校补一名政治教官，都要请示南昌总部，这是一种新情况。我马上打电报去，一有回电，即告诉你。"

月中，熊雄来到广州市内孙炳文住处，答复刘弄潮任职一事。熊雄说："总部回电'不予同意。'这是我意料中的事，他们就是不让共产党人进黄埔。"接着，熊雄谈到报载鲁迅由厦门大学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提出要请鲁迅到军校做讲演，和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孙炳文商量，并且亲切地询问了刘弄潮的意见。刘弄潮说："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写的《火与剑》一文即可说明；二是他同意办黄埔军校，他曾介绍他的好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请他来黄埔讲演，他是不会推辞的。"于是，熊雄考虑到在当时尖锐斗争形势下，请鲁迅来讲演，会不会有发生问题，便关切地问刘弄潮："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山大学任教？会不会影响他的人身安危？"刘回答："只要他同意，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接着，便商谈如何邀请。什么时间来，讲什么题目等。并请刘弄潮去征询鲁迅的意见。

当月25日，刘弄潮访鲁迅，谈及此事。当鲁迅听到刘受黄埔军校政治部熊雄和孙炳文之托，请他到黄埔讲演时，即爽直地回答："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刘说："黄埔学生，尤其是第五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他们听过你的课。"鲁迅便说："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充分表示了鲁迅的廉虚而又负责的态度。

以后，孙炳文打电话到黄埔校本部，告诉熊雄："鲁迅已同意到黄埔讲演。"熊雄非常高兴，而且即来广州市内孙炳文住处，了解刘去联系的情况，表明了熊雄对鲁迅的了解与仰慕心情，而且考虑了鲁迅的影响和做黄埔的工作。熊雄临走时还说："约一个时间，我们专人去正式邀请。同学们一定会欢迎的。此次，熊雄还关心地询问了北方革命的情况，谈了怎样作军事运动等事，谈得很详细。

4月8日，鲁迅在黄埔校本部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讲演。这是在革命紧要关头去的，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鲁迅这种大无畏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个讲演对革命青年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这个讲演里，鲁迅论述了革命和革命文学的问题，热情讴歌了革命，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平民的世界"。讲演中讲到："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提出"闭口杀人，开口被害"的名句。并举鹰与雀、猫与鼠的关系来说明，在实际 行动上论证了革命武装的必要。鲁迅和熊雄、孙炳文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时间斟酌上也是苦心孤诣的（四天以后，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天以后，广州发生大屠杀）。同时也说明了鲁迅和熊雄、孙炳文也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肝胆相照，患难之交。

鲁迅的这篇著名讲演，是由黄埔军校政治部吴之苹记录的，初发表于1927年6月12日《黄埔生活》周刊第四期，后经作者修改，收入1928年10月北新书局版的《而已集》。

（作者：熊巢生，选自《历史大观园》）

见过列宁的工人领袖邓培

邓培，1884年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石湖洲村一个贫苦的家庭，他是一个见到过列宁的优秀铁路工人领袖。17岁时，由于家贫，他背井离乡北上，辗转来到唐山的京奉铁路制造厂（后改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当旋工。在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厂里，邓培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迅速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唐山，是当时北方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地区。1921年春，邓培在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同志的指导帮助下，在工厂里建立起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同人联合会”。这个工会规定只有工人才许加入，入会者不限籍贯、工种，但工头、员司、警务段的人均不许参加，组织比较严密。邓培被大家推选为委员长。与此同时，他深入铁路沿线组织工人，并与山海关、长辛店等地铁路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第二年，他以铁路工人代表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第一次盛会，邓培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会议期间，列宁带病接见了三个中国的代表，他是其中之一。当他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时，列宁立即从隔壁的办公室走过来。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列宁专门向邓培询问了工作生活以及工人运动的情况，并紧紧握着邓培的双手，勉励他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作用。”邓培频频点头，衷心感谢伟大导师列宁对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关怀和鼓励。在会前会后，他还参观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对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他更加积极地领导唐山地区工人的斗争，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唐山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北方工人中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4年“二七”惨案一周年的时候，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邓培代表当时的京奉铁路总工会出席了大会，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他均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作为中共中央特派代表常驻唐山，领导唐山地区的革命运动。1925年2月7日，邓培出席并主持了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会后往来于广州、唐山等地，领导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后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是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主要负责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邓培又由北京调到广州，作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总代表并兼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主任，积极领导广东铁路工人运动，大力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反动派也紧跟着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广州城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在广州工作的邓培虽然接到党组织要他暂时隐蔽的通知，但他为了清理焚烧有关文件，4月15日仍然到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办公，在办事处工作未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就将办事处包围了。这时邓培依然坐在办公桌前，面无惧色。穷凶极恶的反动军警破门而入，把邓培捆绑起来，装入黑布袋，秘密押到广州公安局。在狱中，敌人企图用金钱利诱，要邓培供出铁路系统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名单，遭到他的严词痛斥。敌人又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使他遍体鳞伤，但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不畏威吓，不为利诱，不怕严刑，宁死不屈。6月22日夜间，这位我党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铁路工人领袖终于惨遭敌人秘密杀害，时年仅43岁。

（作者：胡绳玉，选自《历史大观园》88年10期）

蒋介石的四个老婆

蒋介石先后娶过四位夫人，已为人所共知，但是，蒋介石与这四位夫人怎么相处，产生过哪些欢乐与烦恼，却鲜为人知。而有些作者的文章，或者过于简单，或者道听途说，任意猜想。最近，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发现了蒋介石家庭的许多真实情况，又参考了奉化地方资料，特撰写此文，供研究者参考。

从发妻到义姐

蒋介石于15岁那年，由母亲王采玉作主，表伯陈春泉为媒，与比他大5岁的奉化岩头乡山村姑娘毛福梅结婚。开始，夫妻关系尚好，蒋介石几次到奉化县城和宁波市区读书，都把她带在身边，并让她学习文化。

1905年，蒋介石到宁波箭金公学，从顾清廉读《周秦

诸子》、《说文解字》和《曾文正公集》，把毛福梅带到宁波，住在城北西河沿附近的植物园，请其同学林绍楷的妹妹瑞莲教她读书识字。次年正月，蒋介石转学到奉化县城龙津学堂，毛福梅也进了竹新女校。据毛福梅的同学(后为结拜姐妹、蒋家教师)陈志坚回忆：1906年，陈还只有13岁，而毛氏已有25岁了，两人同在奉化唯一的一所女校——竹新女校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由奉化著名闺阁诗人王慕兰任校长。为了开放女子上学的风气，吸收学生不限年龄，毛氏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入学之后，她感到自己年龄太大，与小姑娘坐在一起读书很难为情，因此，只读了几个月，就借口身体不好回家去了。以后，蒋介石又把陈志坚请到家里，教毛福梅学写家信，课文就是当时出版的《尺牍》。

蒋介石去日本留学以后，夫妻生活不正常了，见面时有口角相争，甚至不愿共枕同席。据林绍楷(同在日本留学，林学工程)的后人说：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家度暑假，不愿与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绍楷做了许多劝说之后，毛福梅才怀了孕。林家这位后人由于世交关系，常在蒋门走动。有一次曾率直地对蒋经国说，你是在我们林家的帮助下出生的。蒋经国听后含笑不语，未加反驳。蒋毛不和，知情好友多有所闻，连他的亲生儿子也曾公开揭露。蒋经国在留苏学习期间，撰文谴责其父背叛革命，内中提到蒋毛交恶情形：“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给母亲的一封信》，原载1936年1月列宁格勒《真理报》)

此后，蒋毛关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趋恶化，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据蒋介石1921年4月3日日记云：“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指毛氏未经蒋同意，将儿子经国从县城锦溪学校带回家来事——笔者注)，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第二天，他写了千余字的长信给毛氏胞兄毛懋卿“缕诉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接着，又把毛福梅逐回娘家。但毛氏在蒋母王采玉的庇护下，几天之后又重返丰镐房。4月19日，蒋介石在县城听到这一消息，不禁大为恼火，且怨及其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正抵城舍，见颖甫(蒋氏世交，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来讯，知毛氏又回我家，心甚忿忿。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5月3日，蒋回溪口，不愿回家住宿，“外宿于武岭庵，蚤甚扰，愁集，反侧不交睫”。武岭庵位于溪口镇上的武山之脊，当时庵宇破败，周围杂草丛生，比较荒凉。1930年，原庵拆除，兴办武岭医院，今为奉化县中国旅行社办公室。蒋毛吵架，波及蒋介石母子关系，这使蒋介石无法任性而为，因而感到非常苦恼，几次萌生出家为僧的念头。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术：“家家如沸，思之郁闷，非出家远遁不克免尘俗之累。”“环境难打破，只有出俗为僧而已。”

蒋介石与毛福梅吵闹虽然很凶，但清夜扪心自问，也有自我检讨的时候。他在1921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问题，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愤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弥孽也。”这恐怕是蒋介石未在此时与毛氏决裂的原因吧！以后，蒋介石到广州奔走军务，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家庭，夫妻很少见面，也就暂时相安无事。

到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毛氏最后未坚持己见，同意离婚，两人关系有所好转。蒋介石允许毛氏仍为丰镐房主妇，并且在每次回乡时，都到丰镐房会上一面。有时偕宋美龄回乡，住于文昌阁时，清晨乘宋美龄晚起之机，悄悄去丰镐房尝尝毛氏做的早点。毛氏擅长烧家乡菜，如霉干菜、芋艿头等等。蒋介石每次回乡，她都要派人送菜，并嘱咐亲手交给“先生”，蒋介石也总是亲手来接。毛氏去世以后，蒋也曾亲往墓前悼念。据原武岭学校训导主任虞寿勋回忆：1947年清明，蒋介石回溪口扫墓，一天清晨曾独自一人来到毛氏坟头，察看一番之后，行三鞠躬以表示敬意。然后，又携宋美龄同来，宋也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1948年，溪口蒋氏续谱，毛氏名分成了难题。最后，蒋介石大笔一挥：“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正式确定了她在蒋家从发妻到义姐的地位。

娶妾的烦恼

1911年，蒋介石居上海，与姚怡诚相识，不久纳为侧室。1920年以后，蒋介石把她带到家乡，先后住过奉化溪口簟墙弄王昆生的空房子、县城西街岭墩周家房子、宁波江北岸花墙弄钱家房子等处，乡中邻里多人见过，蒋姚关系亦有所闻。最近，陆续有人撰文，写到蒋介石与姚怡诚的关系，一片赞美之辞，如云：“姚阿巧(姚怡诚小名阿巧——笔者注)与蒋介石感情甚笃，……蒋对她怀有感激之情，终生对她十分敬爱”等等。事实不然，蒋姚感情并非始终“甚笃”，更谈不上“终生敬爱”，而是时起波折，以至濒于破裂，这在蒋介石本人的日记中反映得很充分，它比任何外人的推想都准确可靠得多。

姚怡诚，苏州人，明眸皓齿，体态丰腴。蒋姚结合之初，二人感情堪称“甚笃”，但据蒋1919年以后的日记记载，他们的感情已到了尖锐冲突的地步，其表现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蒋介石恨姚怡诚嗜赌成性。据其1919年10月18日日记云：“怡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又据其1920年1月1日日记云：“早晨未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怡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

二是蒋介石恼姚怡诚不关心体贴自己，甚至连他生病住院还去纠缠，益加烦恼。据其1920年5月16日日记云："近日以怡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又据同年5月23日日记云："昨日怡诚来院，余见之心甚愤恚，病症加剧，因即迫令回寓，不欲其在旁侍候也……余夙世孽重，遇此冤家也宜哉。"

三是蒋介石怒姚怡诚出言尖利，缺乏教养。据1921年5月3日日记云："晨起，怡诚故态复萌，其成心之忍，掉舌之尖，令人愤恚无尽，痛斥移时，犹不足平我怒气也。"又，1923年7月24日日记云："怡诚咒外人，终非大家规范，心滋不悦。"

由于以上这些矛盾的发展，蒋介石曾多次考虑另寻住所，与姚怡诚分居。如其1920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不得已乃迁至一品香居住。"又，5月31日日记云："处置怡诚事，离合两难，乃决定暂留而析居，以观其后。"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下不了与姚怡诚分道扬镳的决心呢？这在蒋的日记中也有披露："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此外，1919年12月21日，蒋介石搬入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第369号居住以后，蒋姚吵骂之声惊动了四邻，传到蒋的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居正等人的耳朵里，引起了他们的关心。当时，戴季陶住同益里，张静江住环龙路，与贝勒路相距不远，他们俱来劝解。这在日记中也有记述，如1920年5月31日日记云："静江、季陶、觉生（即居正——笔者注）诸兄俱来商量此事。"他考虑再三之后，还是听从朋友们的劝说，继续与怡诚保持同居关系。因此，直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才正式公开宣布脱离关系。

黄埔时期的良伴

1921年，蒋介石经张静江夫妇介绍，结识了陈洁如。不久，由张静江证婚，江一平律师经办，娶为第二侧室。仪式虽不隆重，但也并非如蒋以后所说的"本无契约"。

陈洁如，苏州人，高挑个子，四方面孔，当过小学教员，学得一口俄语，虽无过人容貌，但也称得上精明能干。蒋介石在广州任长洲要塞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时。陈常跟随帮他翻译、应酬，两人感情甚好。这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述。1923年1月10日记道："披阅洁如笺，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1925年4月26日日记云："下午，携洁如赴汕船次，为情魔缠绊，怜耶，恼耶，殆无已时。"1925年陈洁如去广州，4月18日大清早，蒋介石就到码头去接，没有接到，非常懊恼。他在日记上写道："晨六时起床，往码头接洁如，未到，甚为懊丧。"第二天再去接，"晨六时起床，往接洁如，同回长洲司令部"。并未因头一天的失约而责怪。蒋介石为了取悦于陈洁如，经常设身处地加以体谅。1925年11月27日，姚怡诚带蒋纬国去粤，适陈洁如在汕头。蒋介石陪姚氏母子路过该地时，深怕两妾相遇，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同怡诚将经汕，心殊怦怦，恐洁如不悦也。"

由于陈洁如在广州经常随蒋出入交际场所，参与社会活动，故常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当时，蒋介石与廖仲恺共同负责黄埔军校，因此，陈洁如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常有来往，何香凝深知陈洁如为没有生育子女而苦恼。1924年的一天，何香凝参观广州平民医院，正好有一位华侨眷属生下一个女婴，因此人接连生了多胎女孩，不愿再要，意欲送人。何香凝就把她抱了回来，给陈洁如一看，陈十分喜欢，征得蒋介石同意，收为养女，起名"陪陪"，意思是希望她带一个弟弟作陪伴，她就是后来的蒋瑶光。

蒋介石对陈洁如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陈追求享受，不讲节约。如1926年11月12日日记云："得洁如书，知其迁赁月租七十二元华屋，不胜恚恨，奢靡超俗，招摇败名，年轻妇女不得放纵也。"

但陈洁如的好景不长，在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夕，就被迫与蒋介石脱离关系。蒋派秘书陈舜耕送陈洁如去美国。当时陈洁如正值盛年，孤居异国，思想十分苦闷，唯有苦读英文，学习养蜂、园艺以解闷。1933年回上海。据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陈洁如曾经给蒋介石写过几封信，蒋介石亲自批给她5万元钱。50年代以后，陈洁如寓居香港，据她的外孙陈忠人（蒋瑶光之子）前几年两次到溪口谈起："过去，外婆和母亲的生活费都由舅舅（指蒋经国——笔者注）从台湾寄来。"晚年生活尚称惬意。

1962年，蒋介石已届75高龄，还特派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转给陈洁如一封信，内云："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在1971年2月21日临终之前，给蒋介石写了最后一封遗书，吐露了心头长期的积郁："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至此，蒋陈之间，虽说不上"始终不渝"，但也可以说是"善始"、"善终"了。

"后进山门为大"

中国有句俗话"先进山门为大"。而在蒋介石的四房妻子中，却是第四夫人最占上风，所以，有人戏称"后进山门为大"。宋美龄在蒋家占上风的事例很多，举其要者有三次：

一是蒋宋联姻。1922年，蒋介石在广州孙公馆见到风姿绰约的宋美龄，一见倾心。在持续了5年的追求之

后，经宋家大姐霭龄撮合，宋美龄与蒋介石同游镇江焦山，大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27年9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到日本，向正在神户疗养的宋母当面提亲。宋母知道女儿已经答应，也不再阻拦，按基督教义向蒋介石提出两先决条件：一、实行一夫一妻，原夫人必须离婚；二、宋氏全家信奉基督，女婿也必须皈依上帝。蒋介石一一答应，蒋宋联姻就这样确定了。

消息传到溪口，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配夫人毛福梅，结婚已经26年，儿子经国也已18岁，正在苏联留学，正宗嫡嗣，谁也不能否认她在丰镐房的地位。蒋介石提出离婚，毛氏坚决不同意，乡里亲朋故旧也都表示反对，事情闹成僵局。蒋介石没有办法，请萧王庙孙琴风娘舅做工作。孙琴风考虑蒋宋结合有利于蒋今后的政治前途，就把毛福梅和姚怡诚接到萧王庙镇家里暂住，多方劝说，要她默认离婚，办了一个表面登报离婚手续，并在奉化县政府备案。又将蒋毛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一份转交给宋家，事情就算办完。毛福梅仍旧回丰镐房主持家务，逢年过节，亲友往来，乡间应酬，一如既往，溪口人对她"大师母"的称呼也未改变。对二夫人姚怡诚，蒋托吴礼卿(即吴忠信，曾任贵州省主席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按月给生活费抚养纬国，回苏州居住；又着侍从秘书陈舜耕陪同三夫人陈洁如去美国游历。宋美龄见手续齐备，也就装个糊涂，于1927年12月1日高高兴兴在上海举行了宗教和世俗两个婚礼。

二是蒋经国回国。1937年，蒋经国携俄国妻子芬娜(后改名方良)和儿子孝文回国。蒋介石知道经国脾气固执、倔强，担心给宋美龄难堪，若思冥想两全其美的办法。经国一家到杭州断桥边的澄庐，进门就喊"爹！"父子稍谈几句，蒋介石就叫经国上楼，说"见你娘去！"蒋经国对生母毛氏有很深的感情，13年来时时思念，听说娘在楼上，顿时喜出望外，奔上楼去，老远就叫"娘！"宋美龄正冷坐在房里，听经国叫得如此亲切，大喜过望，柔声应答着迎出来。当经国知道喊错，改口也来不及了。芬娜跟着也叫了娘。这事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很高兴，宋美龄取出500元大洋作见面礼，为经国夫妇置办"行头"，并择定农历三月十八日蒋经国生日那天回溪口老家，还电汇老家丰镐房法币10万元作为经国荣归的特殊开支。事后，毛福梅对儿子先拜宋氏、后会亲娘的做法很不高兴，但也只能徒呼"奈何"而已。

三是续谱正位。溪口蒋氏修谱按惯例30年一次，1948年又到了大修之期。这届修谱非比往昔，是在蒋介石当了"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举行的，尽管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反攻，蒋家王朝开始动摇，但修谱仍然稿得非常隆重。蒋介石特派儿子经国主持其事，并聘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担任总裁，"文胆"陈布雷为总编纂，秘书沙文若等为编纂。这些人处事作文素称高手，但碰到蒋氏家庭成员的名位安排，特别是毛氏和宋美龄在谱中的地位，谁都感到棘手难办。最后，还是由蒋介石自己动手写了周泰(蒋介石谱名一条，原文如下：

"周泰，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经国，纬国。"

这段文字为宋美龄争足了面子，不仅肯定其正室地位，而且把非她所生的两个儿子也列到了她的名下。对此，毛氏族人，蒋经国兄弟均有意见，但文出"御笔"，也只好委屈顺从了。

(王舜祁　胡元福)

对宋子文的几次未遂暗杀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以后，他的专制统治和消灭异己的政策激起了众怒，国民党内的各反蒋派系抱着不同的目的，纷纷起来反对他。并且一些反蒋派系开始酝酿如何干掉蒋。其中尤以广州反蒋派主张最烈。广州反蒋派与分布在南京、上海一带暗杀集团的头目王亚樵取得联系，为他提供了20万元经费，让他组织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广州反蒋派在与王亚樵商议刺蒋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第二个方案，即万一刺蒋不中，就采取断绝蒋介石财源的办法，把"筹款有方"的宋子文干掉。于是在一次刺蒋未遂的情况下，开始谋划行刺宋子文。

王亚樵等人利用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之间的机会，埋伏于上海北火车站，待宋子文一下火车，就开枪向他射击。王亚樵暗杀团体中的一个行动小组事先潜伏在南京，了解宋子文的行踪，然后用暗语及时电告上海。王亚樵接到电报，连夜布置行动。由孙凤鸣、萧佩伟、许志远、张玉华等组成第一战斗组，在月台上行动；龚春浦、刘刚、龙林、唐明等为第二组，在候车室行动；谢文达等五人在火车站外马路接应。7月23日晨，三个战斗组各就各位。王亚樵在天目路沿街的一家旅馆租借了一间房子，坐观战斗情况。早晨7点，宋子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北火车站，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前来欢迎宋子文的上海各界要人拥向车厢门口。宋子文由秘书唐腴胪陪同缓步下车，然后由众人簇拥走出站台。第一战斗组原打算待宋子文下车后开枪，见此情景，无法下手，便急向第二战斗组发出暗号。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都穿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只是宋空手而唐拿着公文包。当他们走出车站门口时，刺客刘刚突然向唐开枪，他误认此人就是宋子文，其他人也集中向唐射击。宋子文的卫士立即进行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在一根柱子后边。一

时间，站台上警笛鸣叫，军警们向候车室冲击。龚春浦以为大功告成，便投了两颗烟幕弹，趁乱逃走。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

7月24号的《上海报》上登载消息说，宋子文乘车抵达上海北火车站后，"突有暴徒数人，意欲行刺，抛掷炸弹开放手枪，约数分钟，一时炸弹手枪之声不绝于耳。车站乘客仓惶逃奔。炸死客人数名及随宋氏卫士二名，而暴徒亦伤二人。幸宋部长先下车至站长室，未遭毒手，可谓吉人自有天相。所有站房玻璃，均已炸碎，死伤三人，血流满地，惨不忍睹。车站两侧，原有第三师某营驻扎兵士，闻声赶至，时凶徒业已逃逸，即将受伤暴徒抬回营部，再转道警备司令部严讯。……"

宋子文在上海遇刺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又惊又怕，他训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失职，要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抓获刺宋凶手。于是戴笠亲自指挥特别行动组到上海捕捉凶手。与此同时，上海各报登出"悬赏缉拿凶犯"的通告，最初赏格是1000元，并说"如有人知凶犯而藏匿不报，一经查出，与该犯一律严惩治罪之。"在这以后，各大报纸都先后刊出捉拿凶犯的赏格，且一次比一次高，有2000、5000、1万、2万等等。

上海的三大亨之一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的行动，把各路"弟兄"和打手聚集一道，扬言非把"刺宋"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杜月笙的帮徒们与上海治安局和军统特务们三管齐下，逮捕了许多嫌疑犯。其中有参与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还有王亚樵的弟弟、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王述樵，以及与王亚樵暗杀集团沾边或不沾边的人若干，这一行人统统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逐个加以逼审。

刺宋案的发生，也使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们惊恐万状，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们在这一段日子里，不敢轻易露面。宋子文险些被刺，唐腴胪当了替死鬼，谁知此类事何时也会降临他们头上呢！为了搜捕案犯和防止刺杀事件的再次发生，南京、上海火车站一连数日对每个旅客进行搜查，连旅客所带的瓜子和罐头食品也不放过，唯恐里面藏有炸弹什么的。然而事隔三年，又接连发生了刺蒋案，也该着汪精卫"倒霉"，子弹偏偏打在了汪精卫身上"虽然未致命，也够他受的，若干年后，他还是死在这伤口上。

1937年4月12日，南京法院公审刺宋、刺汪案。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刺宋是王亚樵主使，而行刺者旨在杀宋而误杀了宋的秘书，属于打击错误，应负杀人未遂及过失致人死之责任。又说犯罪日期是民国21年(1932年)3月5日以前(国民党政府曾颁布了一个所谓特赦令，民国21年3月5日以前的一些犯人部分特赦——笔者注)，刺宋又出于预谋，因此不能因大赦减免其刑。还有人说既然是过失致人死，最重刑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南京政府和法院最高负责人认为：此种为犯人开脱"罪责"。之行为是置"党国利益"于不顾，王亚樵等人多次企图"谋杀党国要人"，且已造成严重后果，非处极刑不可。结果，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等人经南京法院公审后，处以死刑。在上海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唐明等人已先于他们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

宋子文大难不死多亏了他的秘书唐腴胪。宋子文的家人为宋子文庆幸，说是不幸中之万幸。宋子文自己也说由于他的身量高过唐秘书，竟能幸免。对于唐的死，宋子文自然是深感"悲痛"和"内疚"，他亲自过问唐的丧事，对唐的家属进行慰问和表示"歉疚"，并且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塞给了唐家属。

自宋子文遇刺未遂后，他有如惊弓之鸟，不敢出头露面。恰在这时，宋子文的母亲倪太夫人去世了。宋子文一向讲孝道，可是母亲死的不是时候，要大事操办吧，怕有危险；办的一般吧，又太说不过去。宋子文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考虑结果还是要大办。南京政府颁给宋母"教忠报国"四字匾额。为了安全起见，从为宋母守灵到宋母出殡，宋子文周围都是严严实实的保安措施。1931年8月18日宋母出殡，送葬的党国要人车水马龙。宋子文为自身安全起见，演了场"空城计"，先以三辆空车为幌子，引走了记者，然后再登车急驰而去，待记者再回过头来找宋子文时，他早已不见了。

办完宋母的丧事，宋子文仍是惊魂不定。实际上宋子文的危险也确实没有过去。1932年11月28日，宋子文在南京的公馆突然起火。这座公馆靠近南京的北极阁附近。当时的报纸上说，宋子文为给自己豪华的公馆添上一点儿野趣，硬是在房顶的瓦楞上铺些个茅草。火势冲天，房顶上的茅草一烧连成一片。后因扑救及时，损失不大，只烧了两间房子。这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12月12日上午，位于南京铁汤池的财政部又起火，不到一小时就焚烧楼房五幢，损失达一万余元。当时宋子文正在上海养病。南京政府对上述两起火灾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有人说纵火者的目标就是冲着宋子文的，却让他躲过去了。在这以后，宋子文仍不断接到警告信和恐吓信。1932年1月2日，宋子文在上海法租界的住宅里又发现了炸弹，因发现早，未造成任何伤亡。1933年8月，宋子文乘船由美返华途经日本横滨，一法西斯党徒曾企图利用宋子文登岸时刺杀他，结果未能得手。

(连若雪)

唐生智测字

唐生智原是湘军的一个师长，1926年向广东国民政府投诚，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在北伐中势力有很大

发展。1927年10月，南京政府发动讨伐唐生智的战争，经过20多天的战斗，唐生智败退武汉。

唐生智平时好参禅礼佛，自称是萧朝贵转世。在军中养有一个密宗方士顾伯叙，人称顾和尚，唐生智闲暇时，常和他抵足长谈，顾和尚的话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这时，顾和尚叫他去测字，得一"道"字，唐生智一见这个字心就凉了，因为"道"字从"首"从"走"，意思是首领应该走了，看来必败无疑。于是，唐就把军队交给了刘兴、李品仙、何键，自己带了顾和尚、龚浩、张翼鹏等人，用重金雇用了一艘日本船，于11月11日，沿江东下，逃往了日本。

（祁州）

朱家骅关于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

《而已集》中有一篇《忧"天乳"》的文章，对当时广州的一出所谓"天乳运动"闹剧加以评骘。何谓"天乳运动"？1956年版十卷本《鲁迅全集》无注，显然是因为没有找到根据，无从注起。新版《全集》补充了这一条重要注释，文曰："1927年7月7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7月21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这就大致把事情说清楚了。注中提到，事情是由朱家骅的提案引起的，但只引了提案中的几句话，未见全豹。朱的提案是一篇很值得"共欣赏"的"奇文"，任其埋没，实在可惜。现将全文刊布如下，以飨读者：

"为提议事，查吾国女界其摧残身体之陋习有二：一曰缠足，二曰束胸。缠足之痛苦，二十年前经各界之痛陈，政府之严禁，业已解除，现粤省三十岁以下之妇女，已无受此缚束者，惟间接感受之痛苦比缠足为甚者，厥为束胸。盖缠足陋习不过步履不便，其痛苦只及于足部。若束胸则于心肺之舒展，胃部之消化，均有妨害；轻则阻碍身体之发育，易致尪羸，重则酿成肺病之缠绵，促其寿算。此等不良习惯，实女界终身之害，况妇女胸受缚束，影响血运呼吸，身体因而衰弱，胎儿先蒙其影响。且乳房既被压迫，及为母时乳汁缺乏，又不足以供哺育，母体愈羸，遗种愈弱，实由束胸陋习，有以致之。年来女界风气已开，但仍有(以)束胸为美观者，不知欧美各国女子无不注意胸部发达，并以丰满隆起为合卫生而美观者。厅长有见及此，思亟将女子束胸之陋习，严行禁革，拟请由省政府布告通行遵照，自布告日起，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并通行本省各妇女机关及各县长，设法宣传、务期依限禁绝。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伍拾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庶几互相警惕，协力划除，使此种不良习惯永无存在之余地。将来由粤省而推行全国，不特为我女界同胞之幸福，实所以副先总理民族主义之精神，以强吾种者强吾国也。是否有当，理合提出会议，敬候公决施行。提议者代理广东民政厅长朱家骅。"

这个提案刊登在1927年7月8日广州《国民新闻》第3版，题曰《朱家骅提倡天乳》。

束胸不利于女性发育，是明显的，"厅长有见及此"，大声疾呼"提倡天乳"，其爱民如此，似应博得百姓拥戴。而由此搞成一个"运动"，闹得沸沸扬扬，则又可以转移社会视线，使百姓忘记刚刚过去的那场血腥屠杀。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朱厅长可谓用心良苦。鲁迅先生却不留情面，在文中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军阀一样，反动本质并无二致，他们在指挥刀下所玩弄的种种"革新"花样，"招牌旗帜，尽管不同"，都只能给人民群众不断带来新的灾祸。真是目光如电，一枪中的！

（江　立）

冯玉祥悼李大钊诗碑

1927年5月1日，国民军同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惊悉李大钊等22人在京殉难，他立即命令全军静默致哀。9日，写了一首挽诗，并刻石竖立在潼关县城。此碑现存潼关县文化馆。碑文全文如下：

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

何故被绞兮为革命，

何故被捕兮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是帝国主义倡首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咷。

为最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非为同志等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将更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兮为全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亏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者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　　一六、五、九、于潼关

（铭三）

“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

唐生智，曾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第八军军长、国民党军一级陆军上将。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沙，为壮大革命声威、鼓舞士气，在长沙校场口举行前线将士阅兵仪式。唐生智任军长的第八军阵容壮观、训练有素。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莅临检阅主席台，东道主唐生智(时兼任湖南省省长)把自己健壮的坐骑让给他骑。检阅至第八军时，技艺娴熟的前排军乐队立时奏乐，乐器金光闪闪，齐声共鸣，蒋的坐骑因受此喧闹受惊扬蹄，后蹄一蹬，马首一甩，蒋竟坠落马下，狼狈不堪，为树立统帅军人形象，蒋介石一颠一跛，勉强坚持检阅完毕。当时第八军中曾流传“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后来，唐部两番倒蒋，蒋为形势所迫，也两度下野。

（邱行洲）

何香凝确实为蒋介石证过婚

廖梦醒女士在母亲何香凝逝世后不久写的回忆录中，有关于何拒绝为蒋介石证婚的忆述：“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结婚了，邀请母亲去做‘证婚人’。因为蒋介石不接受劝告，不肯放弃屠杀共产党的罪行，母亲拒绝了，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婚礼。后来蒋介石找了另外一位女士做了证婚人”。此后，研究何香凝的论著引证这一史料者，不下10余种。

现有史料充分证明，何香凝不仅出席了蒋宋的婚礼，而且还是证婚人之一。据报载，1927年12月1日下午3时5分，蒋、宋在上海西摩路宋公馆举行宗教式婚礼，何香凝与李德全、谭延闿等人出席；随后何又出席了4时10分蒋宋在戈登路大华饭店舞厅举行的现代新式婚礼，当司仪邵力子宣布“请主婚人、证婚人入席”后，“蔡元培君即登台中立，何香凝、王正廷、蒋锡侯等向左立、李德全、谭延闿、余日章等向右立，形式颇为庄严”。后蒋、宋两人入席，在蔡元培、何香凝、李德全等面前举行婚礼仪式，并以鞠躬礼谢过主、证婚人后，于4时40分礼成。

由上可知，何香凝确实参加了蒋、宋的婚礼并为其证婚，廖梦醒女士的追忆是不准确的。既然如此，为何又有众多的论著将廖的回忆文字误为信史材料一再加以征引呢？个中原因，除了研究者疏于查证外，更主要的是一般论者都认为何香凝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已认清了蒋的反动面目，采取了坚决的反蒋立场，而不了解何香凝在“四·一二”前后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何香凝一直将蒋视为孙中山、廖仲恺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予以信赖和迁就。“四·一二”政变后，何愤然而起揭露蒋的罪行，参与发起讨蒋运动。这期间何香凝的反蒋立场是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反蒋共进退的。因此，她的反蒋立场日后也因国民党内派系矛盾的缓和而变化。她对汪精卫此间及后来压制共产党人活动的行径，未进行过认真的斗争。7月14日，何香凝参加了汪召开的反共分共会议，并附和会议决议。这说明何香凝在国共合作分裂之际，考虑较多的是国民党自身的利益，她有反蒋讨蒋的正确言行，也有附和汪氏反共分共的失误举措。

1927年秋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内蒋、汪、西山会议派三方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何香凝在政治上由反蒋一度转变为拥蒋。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她赴上海参加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和为准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而举行的预备会议。在12月10日的第四次预备会上，何与汪精卫领衔提出了《促蒋复职案》。此案被预备会议通过，为蒋重新上台开了绿灯。从何香凝当时拥蒋复职的态度及其与蒋的关系来考察，她于谈话会及预备会之间的12月1日出席蒋介石的婚礼，并为蒋当证婚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何香凝1927年秋冬发生的政治失误，无损于她作为国民党革命民主派杰出代表的形象。

（唐志摘自《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作者周兴梁）

流　行　风

电影《王氏四侠》

史东山编导了自称浪漫派武侠古装片《王氏四侠》，它描写王家寨的寨主作恶多端，激起乡民愤慨；最后被王氏四侠联合乡民，将寨主铲除。思想内容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在艺术表现上仍是唯美主义的。他极力追求画面、布景、服装和造型设计的“美”，为此甚至达到了不顾剧情和生活真实性的程度，致使有些场面给人不中不西的感

觉。但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当时有人说到其导演特点时，就赞美他“注意图案，无论内景外景，都当得上一个‘雅’字”；“光线的远近，也非常恰当，不致模糊不清，或强烈刺目”，说他“注意于小部表演，无论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加以细密的研究”等等。所以，《王氏四侠》影片确实不同于流行的武侠片，它更富于艺术性和电影化，有一定审美价值。

小说《幻灭》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幻灭》是长篇小说《蚀》三部曲之一。发表于1927年《小说月报》9、10号。作品以第一次大革命为背景，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章静的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静女士在上海初恋时因为军阀的暗探所欺骗，感到生活的空虚；后在大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燃起追求光明的热情，到武汉投奔革命。不久，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对革命工作失去兴趣，当看到雄壮的北伐誓师典礼的情景时，又鼓起勇气。随后，因环境逆转，又引起她的怀疑，终于失望。小说通过静女士“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幻灭”的描写，反映当时一部分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的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批判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揭露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热情歌颂北阀战争的胜利。作品情节单纯，主线突出，人物心理刻画细致，相当真实地反映大革命时代一部分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面貌。

小说《沉船》

作者王统照，主要内容：描述了农民刘二曾一家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沉没大海的悲惨遭遇。四十多岁的刘二曾在租税、天灾的重压下，随着一群衣衫褴褛的难民，坐上了日本小火轮，去关东寻找出路。不料，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小火轮，把三、四百条生命葬身海底，刘二曾一家只留下一个变得痴呆的儿子。作品通过刘二曾一家的遭遇，细致生动地展开了一幅幅旧中国外侮内患、天灾人祸的画面，控诉了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外国侵略者的罪行。作品文笔细腻，语言委婉；人物心理变化和周围环境的气氛烘托，融洽协调。直接描述刘二曾一家闯关东的希冀和间接转述他们遇难的灾情，前后对比，突出了整个作品的悲剧气氛。

小说《新坟》

作者台静农，主要内容：写军阀混战时期一个惨遭不幸的老妇人的悲剧。四太太的丈夫死后，好不容易盼到儿女长大成人。眼看女儿就要出嫁，儿子就要迎娶，谁知遇上了军阀兵匪，女儿被奸死，儿子被打死，家产又被老五霸占。四太太疯了，整天拿着细竹竿满身泥土地在大街上凄惨地叫喊。最后，一把火把儿子的棺木连同自己一起烧掉。而四太太这一悲惨遭遇竟成为人们闲谈、嘲弄的资料。作品反映了下层社会人民的不幸，揭露了反动军阀的罪恶。作者以阴冷、凝重的笔墨，写出了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揭示未觉醒者的愚昧和麻木。

小说《夜》

作者叶圣陶，主要内容：小说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残杀为背景，写老妇人在悲痛和恐怖中等待她的弟弟回来，后从弟弟叙述中得知女儿、女婿被反动派杀害的确实消息，从而产生强烈的复仇愿望，并从亲人的遗言中受到教育和鼓舞，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实现烈士遗愿，担负起抚育遗孤的责任。作品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血腥罪行，深情地歌颂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的高贵品质。小说细腻地写出老妇人从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觉醒的思想感情变化过程，有力地说明中国人民是杀不尽、压不垮的。以“夜”作题，寓意双关，点出事件发生时间，又暗示白色恐怖如黑夜一样，光明总将到来。作品正面写老妇人，侧面勾勒革命者，以一夜的短暂时间概括深广的社会内容，构思极为精巧；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紧相结合，传达了处于风雨如磐的暗夜中的低沉黑暗的时代气息。

诗《我只能》

我只能为你歌唱，
歌唱这音乐的黄昏——
它是空际的游丝，
它是水上的浮萍，
它是风中的黄叶，
它是残絮的飘零：
轻飘飘，没有爱情！
轻飘飘，没有生命！
我也敢向你叙说，

叙说这夜半的音乐——
拉琴的是窗外的寒风，
独唱的我心头的微跳，
没有一个听众，
除了我眼儿睁睁的魂灵：
死沉沉，没有爱情，
死沉沉，没有生命！
我最怕为你想起，
那正午的一套大曲——
有红花，有绿叶，有太阳，
有希望，有失望，有幻想，
有坟墓，有婚筵，
有产生，有死亡，
欢腾腾，都是爱情，
欢腾腾，都是生命！

（冯至）

诗《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闻一多）

歌曲《春思曲》

潇潇夜雨滴阶前，
寒衾孤枕未成眠。
今朝揽镜，应是梨涡浅，
绿云慵掠，懒贴花钿。
小楼独倚，怕睹陌头杨柳，
分色上帘边。
更妬煞无知双燕，
吱吱语过画栏前。
忆个郎远别已经年，
恨只恨，不化成杜宇，
唤他快整归鞭。

历　史　档　案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白色恐怖

1927 年中国因参加革命而牺牲者、被捕者和逃亡者统计表

此表仅就报上所记载者、各地济难会所知道的而报告到济总者之材料而制成，其秘密处决或被捕未经报纸揭出者，及在各地暴动后被反动军队杀死或被压迫而逃亡而无从统计者，不在其内。故此表只能算作一个大概记载，不能视为完全统计。

制表者识

省　分	被捕者	被处死刑者和被反动军队屠杀者	特别的记载
江苏	5,657	1,836	重要革命分子之被杀者约 850 人
浙江	1,805	932	
福建	1,305	(四月二三清党事在内)569	
广东	7,563	7,896	革命领袖之被杀者约 200 人
广西	411	511	
湖南	5,540	21,353	
湖北	2,690	1,271	现在狱中所拘禁者约 2,500 人
江西	435	513	
安徽	325	200	

四川	2,500	1,200
云南	300	120
贵州	200	70
山东	500	350
河南	723	450
山西	531	50
甘肃	423	65
东三省	513	120
陕西	50	200

禁在狱中之重要人物约350人

在暴动后被杀者约35,000人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26期，1928年8月20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摘录）

（1927年7月13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利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三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样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这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它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则，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它却不是如此，它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份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它，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及资产阶级完

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份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对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份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75页。)

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通过)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份,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疑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加超越。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系统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分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农的生活。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武装，而武装农民。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所等类办法)。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当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八七”会议档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了党中央紧急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参加者：

中央委员　邓中夏　任弼时　苏兆征　李维汉　张太雷　陈乔年　罗亦农　顾顺章　蔡和森　瞿秋白

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　李震瀛　陆　沉

中央监察委员　王荷波　杨匏安

青年团代表　李子芬　杨善南　陆定一

军委代表　王一飞

湖南代表　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中央秘书处负责人　邓小平

共产国际代表　罗明纳兹　纽　曼

临时中央政治局：

委员九人：苏兆征　向忠发　瞿秋白　罗亦农　顾顺章　王荷波　李维汉　彭　湃　任弼时

候补委员七人：周恩来　邓中夏　毛泽东　彭公达　李立三　张太雷　张国焘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瞿秋白　苏兆征　李维汉

周恩来与罗亦农(11月补入)

(摘自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1页)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机构和主要组织

一九二七年八—十二月

1.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1)党中央前敌委员会：

书记　周恩来

委员　周恩来　李立三　彭　湃　恽代英

谭平山(后参加)

参谋小组　聂荣臻　王一飞　颜昌颐

中央代表　张国焘

(2)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仍沿用国民党左派称呼)

委员二十五人：周恩来　李立三　彭　湃　恽代英

谭平山　张国焘　叶　挺

苏光征　林伯渠　吴玉章　江　浩

徐特立　贺　龙　郭沫若

宋庆龄(女)　何香凝(女)　陈友仁

邓演达　彭泽民　张曙时

经享颐　于右任　张发奎　黄琪翔

朱晖日(后十一人均非共产党员)

朱德(南下时补入，张发奎除名)

主席团委员七人：

宋庆龄(女，未到)　谭平山　贺　龙　恽代英

郭沫若　邓演达(未到)　张发奎(未参加)

主　席　谭平山

秘书厅：

秘书长　吴玉章

秘　书　高语罕(后变托派)　许苏魂

常务委员会：

主　席　张曙时

委　员　徐特立　韩麟符　林　钧　陈日新

参谋团：(即军事委员会)

参谋长　刘伯承

委　员　周恩来　贺　龙　叶挺

蔡廷锴(后改邓演达)

农工委员会：

主　席　张国焘

委　员　李立三　彭　湃　陈荫林(病故)　郭　亮

宣传委员会：

主　席　恽代英

委　员　廖乾五　方维夏　黄日葵　曹汉璋

财务委员会：

主　席　林伯渠

委　员　恽代英　姜济寰(非共产党员)

政治保卫处：处　长　李立三

国民政府：(1927年10月于汕头对外用过)

主　席　谭平山

东江行政委员　周恩来

(3)起义部队序列：(共约两万一千余人)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仍沿用原来番号)

代理总指挥　贺　龙

前敌总指挥　叶　挺

参　谋　长　刘伯承

总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8月5日到任)

代理主任　恽代英

副主任　章伯钧(后脱党)

第十一军：

军　长　叶　挺

党代表　聂荣臻

第十师师长　蔡廷锴(非共产党员，出发后率部脱离)

第二十四师师长　古勋名

(后)董仲明(即董朗)

党代表　颜昌颐

第二十五师师长　周士第

党代表　李硕勋

参谋长　张云逸

团长有：黄浩声　孙树成　孙一中(即孙德清)

第二十军：

军　长　贺　龙(兼)

党代表　廖乾五

第一师师长　贺锦斋

党代表　方维夏

副师长　欧学海(后叛变)

第二师师长　秦光远(非共产党员)

党代表　陈　恭

第三师：(起义南下时新建)

师　长　周逸群

党代表　徐特立

团长有：傅维钰(牺牲)　徐成章　侯镜如等

第九军：

军　长　韦　杵(非共产党员，未参加)

副军长　朱　德

党代表　朱克靖

教导团团长　朱　德(兼)

党代表　魏瑾钧(后投敌)

教育长　陈奇涵

南昌卫戍司令　彭干臣

2.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

(1)湖南省委任命领导秋收起义的组织: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

中共中央特派员、书记　毛泽东

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

书　记　易礼容(后脱党)

湖南省委9月8日任命秋收起义部队干部:

第一师师长　毛泽东

第一团团长　朱少连

直辖第一团团长　李子骥(牺牲)

直辖第二团团长　滕代远

直辖第三团团长　王相烈

直辖第四团团长　郭泳泉

直辖第五团团长　谢南岑

直辖第六团团长　袁　健

直辖特务营营长　潘词岩

湖北特派员　何资深

(2)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共约四千余人)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27年9月初组成)

总指挥　卢德铭(牺牲)

师　长　余洒度(后叛变)

副师长　余贲民(后牺牲)

参谋长　钟文璋

副　官　杨立三

第一团:(原武汉政府警卫团)

团　长　钟文璋(失踪)

指导员　辛汉文

第二团:(安源、萍乡工农武装与平江农民自卫军)

团　长　王新亚(脱队)

党代表　张明山(脱队)

第三团:(浏阳农民自卫军,曾称"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

团　长　苏先骏(后叛变)

副团长　彭兰珍

党代表　潘沁源

(后)徐　麒

3. 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

(1)领导机构与参加起义部队和工人武装:

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　员　张太雷　黄　平　周文雍

书　记　起义总指挥　张太雷

军事指挥部:

总指挥:叶　挺

副总指挥　叶剑英

参谋长　徐光英

副　官　陈　赓

参加起义部队:(共约五千余人)

第四军教导团:(共三个营)

团　长　叶剑英(兼)

一营营长　叶　镛

第四军警卫团团长　梁秉枢

广州工人赤卫总队:

总指挥　周文雍

副总指挥　梁桂华

共六个联队,联队长有:徐向前　刘楚杰　沈　青　邓　发　黄　苏　林锵云

(2)广州公社:(1927年12月12日宣告成立,仅存在三天)

主席　苏兆征(未到)

代理主席　张太雷(牺牲)

人民内务委员　黄　平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　杨　殷

人民劳动委员　周文雍(牺牲)

人民土地委员　彭　湃(在海丰)

　　代理委员　赵自选(后牺牲)

人民外交委员　黄　平

人民司法委员　陈　郁

人民经济委员　何　来

人民海陆军委员　张太雷

公社秘书长　恽代英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　挺

工农红军总参议　徐光英

(摘自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6页)

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民国十六年三月十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军事委员会设立之目的，在巩固国民政府统治下之疆域，扑灭国内反革命武力，以谋全国统一。并筹划国防，使不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军事进攻之危害。

第二条：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第三条：军事委员会有管理全国水、陆、空兵力及军事制造机关之权。

第四条：军事委员会因负战事准备之责，须采取适当方法，并加以适宜之指导，以强固水、陆、空军事之战斗力。

第五条：军事委员会规定国防军之数额、组织法及设备，并管理军事教育事务。

第六条：军事委员会得规划新军队之组织。

第七条：军事委员会规定军队之制度及所需军械之数量与种类，并购办军事制造机关所需之机器及材料。此项机器及材料如向外国购买时，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第八条：军事委员会分配兵工厂自造或向外国购买之军械于各军队。

第九条：军事委员会制定维持全国各军队所需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一切军事教育机关及中央总政治部之预算，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分配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给发之款项于上开军队及机关，并监督用途须为合理之支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决算。

第十条：军事委员会管辖并养成水、陆、空干部人员及高级军官并军事技术人才。现有或将来开办之各种军事学校及一切军事教育机关，均须受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第十一条：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议决之重要议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已通过之决议及办法，由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交军事该管机关执行之。

第二章　组织

第十二条：军事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高级军官中选出委员九人至十三人，并于不任军职之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选出委员六人，共同组织之。

第十三条：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平时一月开会二次，战时至少每两月开会一次。

第十四条：全体委员会议，以有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为法定人数。

开会时至少须有不任军职之中央委员三人出席。

第十五条：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七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之。

主席团须有不任军职之委员三人。

第十六条：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之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

第三章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第十七条：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定，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

第十八条：主席团会议每星期至少开二次，但开会时，其他委员得列席。

第十九条：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名，方生效力。

第二十条：在战时为指挥战事行动，及使各军队为战事准备，指挥统一起见，得设立总司令于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之。

第四章　军事委员会下各部处

第二十一条：为便利军事进行及指挥国民政府所有一切武装势力起见，于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下列各部处：一、总政治部；二、参谋处；三、军事制造处；四、海军处；五、陆军处；六、航空处；七、军事经理处；八、军事审计处；九、秘书处；十、军事学校及教育机关管理处。

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及各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五章　革命军事裁判所

第二十二条：军事委员会为镇压反革命及裁判军事

犯,设立革命军事裁判所。

第六章　高级军官及各处长之任命

第二十三条:军事委员会提出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命之。

第二十四条:师长及同等级军事长官,及以下各军官,由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任命之。全体会议不开会时,得经主席团通过任命代理。

关于军事委员会之决议:

(一)军事委员之任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于必要时执行任免权,但须经下次全体会议之追认。

(二)军事委员会委员,因有任务在外,不能出席会议时,经军事委员会之许可,得派代表一人列席,但无表决权。

(三)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不得派代表代行职权。

中国国民党清党条例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

为通告事:本会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令办理清党事宜,业已于五月十七日在中央党部正式成立,并推定邓泽如同志,为本会常务主席;所有各地自动组织之清党委员会,限于五月三十日以前将组织经过及工作情况,详为呈报,以凭核办。嗣后各级党部凡关于清党事宜,应查照清党条例迳向本会接洽;祈转知各级党部一体遵照。条例如下:

(一)本条例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月五日第八十八次常务委员及各部长联席会议议决之清党原则六条订定之。

(二)清党事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之。

(三)中央清党委员会得任命清党委员组织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各地清党事项。

(四)各地清党开始及终止时间,由中央清党委员会决定之。

(五)在清党区域之党部,从清党开始之日起,一律停止入党。

(六)各地清党时,应先发通告,使各党员明湜清党之意义。

(七)各县市党部于收到清党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属全体党员于半月内填就审查表,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

(八)党员填交审查表后,每半月将其工作报告于所属区分部;经区分部、区党部、县党部迅速审查后,即将报告连同各级党部审查意见,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

(九)各地清党委员所接到各地党部审查意见后,即将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分子清除之;(但必须将其名册呈报上级清党委员会转呈中央)再将合格之党员,呈报其上级清党委员会审查决定之。

(十)经各上级清党委员会将审查合格之党员呈报中央清党委员会再行审查;汇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发给新党证。

(十一)在清党区域内遇有反动分子捣乱本党阻碍清党进行者,当地清党委员会得直接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严行缉拿;但即须呈报上级清党委员会。

(选自《革命文献》台北版第69辑)

武汉国民党:《告中国共产党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本月十二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十九日再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对于本党肆行抨击。妄加丑诋。

本党容共经过。已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公布。我们一方面很痛心共产党同志不能体念本党总理容共之深心。一方面更痛心共产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我们本着总理遗训。本党的政策。深信在革命时期须由国民党来统一指导权。因为两党或两个以上的党来指导革命。结果必至革命的政策不一致。革命的力量不集中。必至革命失败而后止。这个统一革命指导权的理论。不独我们肯定。就是共产党负责的同志们口头上也承认。无如革命军到了长江以后。共产党的同志居然发挥两党建国论。在莫斯科同志中更昌言中国国民党是由共产党领导。是则不但共产党间接要分裂本党的领导权。并且直接要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了。我们要知道中国有中国的需要。中国有中国的历史。中国国民党是孙先生所创的党。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和经验。决不是象爪哇以共产党制造的国

民党。中国国民党。要本着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来完成国民革命。决不能以无条理的暴动的方法来没收一切。

当湖南事件未发生以前。为着土地问题。本党曾继续开会讨论求一解决的方法。当时共产党同志也有许多参加。当日共同讨论只为政治上的没收。而共产同志居然在湖南自行召集所谓两党联席会议。自布一种经济没收的办法。共产同志既然不能接受本党的决议和纪律。是共产党自绝于本党。表现不愿与本党合作。

不但如此。我们发见许多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指导本党的共产份子一切重要问题。只要报告共产党的农民部。不必报告本党的农民部。在共同革命的时候而有此种急秘的行动。更表现共产党不愿与本党合作。

至莫斯科决议希图消灭本党以后。共产党更积极向本党攻击。我们明知共产党的方法不能适应于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决计不受本党的指导。我们为中国整个革命前途计。为全国的贫苦人民的利益计。对于共产同志。不能不加以制裁。然而犹复承认共产党为革命的友党。不惜迭次训令保护其自身自由。以表示本党依然认共产党在革命上立于友党之地位。

现在迭次发现共产党对于本党攻击的文件。捏造事实。恣肆诋諆。我们很诚恳的愿接受别党的批评。但决不能忍受别党的诬蔑。如果共产党承认中国有国民革命之必要。及当承认共产党还须努力于革命。则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于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自《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一期)

蒋中正、冯玉祥徐州会议后通电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海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台鉴：我总理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当辛亥之岁，遂覆满清，创造中华民国，实为四百兆民族解放之基本。乃满清之遗毒未除，帝制变形之军阀遂起。自袁以来，外与帝国主义为缘，内则肆其荼毒，使吾民罹火热水深，十余年于兹。民众感其痛苦，亦既觉悟而奋兴。我国民革命军受继总理之遗志，应民众之要求，誓师北伐。中正、玉祥偕吾同胞，转战数万里，前此猖獗一时之军阀，已次第崩摧。惟帝国主义之工具一日未尽除，即吾同志、同胞之责任一日不能去。兹当会师鲁豫、更益进行之际，谨掬诚悃，为海内外告：“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武力为民众之武力，成功即民众之成功。惟我同胞、同志实共鉴之！蒋中正、冯玉祥叩。马。发于徐州。

(选自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

蒋介石正式辞职电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

限即到，南京总司令部秘书处转胡主席转国民政府钧鉴。(逸密)。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未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牲。而民生凋敝，国计困穷，尤甚于昔。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准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是为至祷。蒋中正叩铣印。

(选自《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以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并指定财政、外交、交通三部长，武昌、汉口二市长及武汉卫戍司令等九人为京兆区委员会委员。

1月3日　武汉各界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鄂及北伐胜利大会。是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前演讲，英帝国主义故意寻衅，突派大批水兵武装登陆，驱逐听讲群众，并以刺刀冲戮，当场伤我群众五人，内重伤二人，全市震愤。

1月7日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议决：一、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改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长组织，以外交部长为主席委员；二、电九江贺耀组转工商各界，对英交涉由外交部长负责办理，民众运动应避免直接冲突；三、电统辖各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同日，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就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职。

1月8日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在贺耀组师师部召开九江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向英领事抗议并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等项决议。

1月10日　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用威（必武）、徐谦为分会委员。后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讨论，认为武汉已有代表中央之机关，毋庸成立政治分会。

1月12日　中共中央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事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公开表明对国民政府的赞助；要求英国人承认汉口。

1月15日　广州民众声援汉浔事件示威周第一日。民众五千余人集会，并有宣传队数十组，分赴市内各处演讲。沙面特别戒严。同日，广东省府主席李济深答日本森田总领事称：蒋总司令鉴于近日情形，严令勿使在后方发生事故，故决不使示威游行队伍通过沙面附近，如强行通过，则严予取缔。

1月26日　武汉中央联席会议议决，由省市党部通知总工会、商民协会等各约束会员，不得自由捕人及其他越轨行动，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事件，须报告政府办理。

2月3日　日本政府派到国民政府活动的条约局长佐分利，是日离北京经东三省返国。

2月8日　南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蒋介石仍继续阻挠南昌中委赴汉，后因二届三中全会订于3月间开幕，在各方面压力下，南昌中委才于3月6日赴汉。

2月15日　广州工商纠纷仲裁委员会开会，讨论仲裁范围等问题。各工会因所提要求未能解决，乃封锁商店，停止营业。公安局长邓彦华奉李济深令强加干涉，并拔去商店门前纠察队小旗。

2月18日　上海总工会为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上海革命民众政权，是日召集工会代表大会，议决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

2月19日　下午7时，《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由陈友仁及欧玛利在汉口正式签字。协定规定：3月1日（后改至3月15日）英租界当局召集纳税人年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由华人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次日，《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亦在汉口签字。

2月22日　上海工人总罢工人数激增至三十六万以上。下午6时，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海军“建威”、“建康”两舰响应，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工人与军警发生巷战。因发动起义时间过迟，部分罢工工人已在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残酷镇压下复工。北伐军先头部队在沪郊莘庄停止前进，工人纠察队陷入孤军作战境地，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

2月23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五名政治委员，在武汉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

2月28日　胡若愚、龙云等通电主张改组滇省政府为会议制，先组划一军政机关，再改革民政、财政。唐继尧答允三条件：一、改组省政府；二、查办宵小；三、维持省长职权不中断。胡等认为无诚意，率兵由蒙自进逼滇垣。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以云南已内变，拟以十六军军长名义让胡，自任党代表，呈请国民党中央核办。

3月10日　武汉国民党员在血花世界开恢复党权运动大会，孔庚任主席，通过巩固先总理联俄等三大政策、反对军事专制、纠正个人独裁的封建制度等十一项决议案，由主席团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愿，经徐谦、谭延闿、顾孟余、孙科代表答复，表示完全接受，并在最短期间切实执行。

3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扩大会议讨论南昌、九江事件处置办法：一、电令蒋介石报告真相；二、训令江西各驻军绝对保护江西各级党部及一切民众团体；三、对于非法选举之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严加处办。

3月21日 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常务会议，汪寿华主席，通过紧急命令，号召全市各界人民从本日正午12时起，一致行动，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

4月13日 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各业工人不顾蒋介石高压，热烈响应号召，参加罢工人数约计在二十万人以上。

3月24日 帝国主义制造"南京事件"。北伐军大队进入南京城后，城内反动分子乘秩序混乱，煽动溃兵及流氓进行抢劫，波及外国领署及侨民。美英帝国主义者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侵害，下令驻下关各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死伤军民二千余人，毁坏房屋财产甚多。

3月28日 蒋介石指使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等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会议，通过吴稚晖所提"纠察共产党行为"案的反革命提议。

3月29日 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成立。蒋介石借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函令市政府暂缓办公。

4月2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全体紧急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八人出席。通过吴稚晖所提"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决定通知军警机关对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一百九十七人分别实行看管监视。对汉口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之决议，认为有疑问，应请中央执行委员按酌事实分别接受或搁置。

4月5日 汪精卫与陈独秀协商结果，是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即告两党同志书)。宣言竟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吴稚晖见此宣言，对汪斥责，声称"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连了共产党来共治之可能"。当晚，汪愤而离沪，秘密乘船赴汉口。

4月7日 蒋介石到上海后即商由法租界青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另组"中华共进会"专事反共。是日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警务处获得情报，称共进会正准备奇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并解除居住在内人员之武装。奇袭将由青帮分子负责，由便衣士兵协助。

4月10日 蒋介石任命冯轶裴为南京戒严司令，宣布自本日下午6时起，南京一带实行戒严，并公告《戒严施行条例》十二条。

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 广州发生"四·一五"惨案。李济深自上海赶回广州积极布置清党，是晨2时起广州戒严，大屠杀开始。

4月16日 汪精卫在武汉致电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中央命令，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反抗中央。

4月18日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上午9时，政府委员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邓泽如、李石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伧等举行就职典礼。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建都南京宣言》。

4月20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支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关于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

5月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通过成立上海劳资仲裁委员会(后称劳资调节委员会)，并订定《上海劳资仲裁委员会暂行条例》及《解决工商纠纷条例》。

5月9日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三项法令：一、《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二、《处分逆产条例》；三、《佃农保护法》。

5月14日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取缔擅行逮捕令》，规定逮捕须依以下手续：一、司法机关依法执行；二、武汉公安局奉上级机关命令执行；三、当场拿获之现行犯，须交由政府之法定机关审讯。

5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令》，规定：凡不依《处分逆产条例》而擅行没收人民财产者，政府当予以严厉之制裁；其为团体行动者，解散其团体，并对于负责之个人加以处罚。

6月20日 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等专程到徐参加。

6月21日 徐州会议结束。会议决定蒋介石与冯玉祥合作反共及蒋、冯、阎、唐各军继续"北伐"等问题。

6月23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电各省市速办清党，限派定之各省及特别市清党委员于7月5日以前成立委员会；已成立者限同日以前报告工作，违者以懈怠工作处理。

6月24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改组广东省政府，省政务委员全体免职，另任李济深、邓泽如、李文范、陈可钰、陈融、古应芬、冯祝万、张难先、曾养甫、李禄超、朱家骅十一人为委员。

7月2日 南京政府训令军政司法各机关饬属解散各地共产党机关，并分别逮捕看管共产党员，"毋稍宽纵"。

7 月 3 日　武汉学生在武昌举行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封锁武汉。恽代英代表中央到会演讲称：现在武汉金融之所以如此困难，完全系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所造成，中央认为欲革命成功，必须打倒蒋介石。大会通过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讨伐蒋介石等决议案。

7 月 8 日　南京政府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由“国民政府”任命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组织省政府委员会行使其职权；省政府下分设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各厅，必要时得增设教育、农工、实业、土地等厅分管省行政事务。

7 月 15 日　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共”。

7 月 22 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 8 月 15 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之《统一本党政策案》，凡未除名之执行委员均通知参加。

8 月 8 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

8 月 18 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要求武汉继续清党，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照在广州未迁移前状态改组。

8 月 19 日　武汉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通电宣布迁都南京，并以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

8 月 23 日　杭州受南京政局变动影响发生政潮，周凤岐系在省渐占优势，杭州市长邵元冲乘南京政局变动之际，将公款七万余元汇沪保存，被公安局扣留，交省府查办，是日邵呈请辞职。

9 月 5 日　宁汉合作大致商妥，是日汪精卫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何香凝、朱培德等自九江抵南京，惟南京遍贴反汪标语。同日，武汉代表谭延闿、孙科自京赴沪，与胡汉民等协商合作办法。

10 月 22 日　武汉政治分会发表宣言，否认南京特别委员会，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成立前，政治分会辖下各省党务、政治、军事完全独立。

11 月 29 日　西山会议派谢持、张继、居正、许崇智、邹鲁、傅汝霖发表《告同志书》，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声称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产生，系由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之正式决议，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外，断不能以一方之意思变动。一方之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欲凌驾三方成立之中央特别委员会，无一毫容许之理由。

外　交

1 月 4 日　陈友仁照会驻汉英领事葛福，谓此次肇事英舰，在本案未解决前不得离开汉口，否则遇有事故，国民政府概不负责。

1 月 5 日　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英租界内一切公安市政事宜。该委员会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代表、卫戍司令部代表及党代表共五人组成。同日，外交部宣布：所有界内中外居民生命财产，概由国民政府完全保护，希望民众协助维持秩序。晚，外交部正式照会英领事知照。捕房招牌已撤下，改换中央联席会议特派党代表办公处招牌，并改悬党国旗。

1 月 5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驻苏联代办郑延禧向苏联政府抗议率先承认广东政府。

1 月 9 日　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成立，通电中宣布保护租界治安。

1 月 10 日　九江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外交部委赵畸、周雍能为委员，管理租界，恢复交通秩序，并知照外侨照常居住，毋自惊扰。

1 月 11 日　驻京英使蓝普森遣参赞欧玛利及书记官达曼乘津浦路南下转道到汉，与国民政府交涉汉口事件。汉口民众满贴“打倒帝国主义”标语，以示坚决抗议。

1 月 17 日　中比改订新约会议在北京外交部正式举行。顾维钧致词，谓新约当以平等及互尊土地主权为基础。比使华洛思致答辞，谓尊重协调精神，在交涉期内，决不将条约破弃问题付诸国际法庭裁判，并准备将 1902 年条约规定之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顾维钧告以日内即派专门委员接管租界。中方专门委员为钱泰、朱鹤翔，比方为杜佛、兰勃脱、克慈。

1 月 20 日　驻北京比国使馆参赞到汉口会见陈友仁，探询武汉政府对该国政府与北京政府交涉修改中比商约及交还天津租界宣言的反应。

1 月 31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就英国借口保护英侨及上海租界派遣陆海军来华事，照会英使提出抗议，劝告该使转请英政府迅速撤回来华军队。

2 月 7 日　驻华荷使欧登科、英使蓝普森、美使马慕瑞、日使芳泽、法使玛德、意代办法勒斯，同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晤顾维钧，面交节略一件，抗议征收附税及安格联免职事。顾答称：安格联屡次违抗政府命令，不能再事宽假，惟各国既认为重要，亦可予考虑。

2 月 10 日　北京政府准外交部呈请组织“接收天津比国租界委员会”，并派张煜全、徐谟、庄景珂为接收委员。

2 月 24 日　北京英、法、美、日、荷、意、德、葡、比、瑞

士、巴西、智利、西班牙十三国公使对上海海军开炮事件发表联合宣言，宣称对地方各党派间的政争，保持中立，盼中国当局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3 月 9 日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设立条约委员会，担任关于条约改订之研究及规划事宜，并公布条约委员会规则六条。

3 月 16 日　北京政府欠发驻外使领馆经费已二十个月，驻比公使王景岐是日抵京索款。先后回国的尚有驻奥黄荣良、驻日汪荣宝等。

3 月 20 日　北京政府派外交部参事刁作谦等抵天津，与英使馆代表詹姆生等开始商谈交还天津租界事。

4 月 4 日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汉口"四·三"惨案方针：一、避免冲突；二、调查事实真相；三、严重交涉。同日，汉口当局鉴于日兵登陆，形势严重，除派兵防守日租界周围外，由唐生智亲访日本总领事高尾表示歉意，并声明极力维持治安，请日本撤退登陆水兵。日总领事断然拒绝。

4 月 6 日　张作霖派武装军警三百余人，串通外交使团，包围北京苏联大使馆，搜查苏联远东银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及其他官舍，逮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六十余人，抢去大使馆大量档案。驻华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于事件发生后，亲至外交部访顾维钧提出抗议，因是日适为假日，未晤；午后 6 时，又派人赴警厅要求立刻释放所捕大使馆人员，警厅未予承诺。

4 月 10 日　驻汉英国领事以英、美、日、意、法五国代表名义至国民政府外交部，约期面晤陈友仁部长。陈答须遵守三条件方允接见：一、非联合通牒；二、接见不能认为是接受通牒；三、此次接见不能成为后来的成例。

4 月 11 日　苏联代使齐尔内赫向顾维钧提出抗议，要求撤退使署军警，释放被捕职员，发还文件，并声明撤回驻华大使，但仍维持和平。

4 月 17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为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令郑延禧复照苏联政府，诡称：苏联外交等机关人员图谋颠覆驻在国政府，破坏驻在国秩序，故不得不取断然之处置，且按国际法遇事实上必要时，检查使馆亦非绝对不许之事。

4 月 30 日　收回天津英租界交涉，驻津英领事詹姆生提出二条件：一、工部局所发行之六百万元公债，须中国承认偿还；二、以前所有英国人职务，租界交还后一律蝉取，不得更动或降黜。是日安国军外交处处长吴晋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应付办法。

5 月 2 日　驻华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在北京开会讨论宁案，美国拒绝参加第二次通牒，决定单独对华交涉因此五国共同抗议破产，四国公使将此事请示本国政府。

5 月 9 日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职，宣布外交方针为：一、对外不采取暴动手段；二、于适当时期提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三、打倒帝国主义，但非排外性质。

5 月 12 日　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外交部令大裁驻外领事馆十二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汉堡、苏联列宁格勒等领事馆皆在内。所有领事职务或归所在国公使馆办理，或归附近领事馆兼理。

5 月 27 日　北京外交部接驻苏代办郑延禧电，称苏联政府要求将在东交民巷所捕苏人十五名、鲍罗廷之妻等四名所犯罪名告知被告人。是日外交部电复称："该俄人等现已移交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现正从事侦查预审，在此期间应严守秘密，不便向外宣布。"

6 月 7 日　驻华英使蓝普森及驻沪英军司令官邓肯等抵北京。是晚即召集在京英军长官开重要会议，讨论华北英军布防、英使馆迁移海滨及上海英军北调等问题。

6 月 10 日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英使蓝普森，抗议英国飞机迭在广东黄埔军校上空及上海警戒区域飞行。

6 月 11 日　北京外交部就美国在天津增兵事向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要求立即撤退所增军队，内述理由四点：一、违反辛丑条约规定；二、华北外侨向无受害情形；三、未得中国政府同意，违背华会精神；四、侵犯中国主权。

6 月 29 日　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在北京开会讨论警备华北及保护侨民问题。英使主张划出华北相当区域为各国保卫区，双方军队作战时不得侵入四十华里以内。保卫区域由各国分段担任警备，均以天津为根据地。美使提议"护侨"办法，即在京津增兵，并声称此系"根据辛丑条约"。结果决定由各使向本国政府请示。

7 月 16 日　驻北京英法日三国公使对中国扣留盐税事，向北京政府总理潘复提严重抗议，要求北京政府反省。

7 月 26 日　日驻安东副领事田中作率日兵五百余名，携机枪九挺、山炮两尊，武装入侵临、江县，强行设置安东领事馆临、江分馆。是日临、江民众万余人聚集江边誓行抗拒，并组拒绝日领团，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次日拒绝日领团及临江县知事袁葆真等电北京外交部请示对付办法。

8 月 4 日　驻奉日总领事吉田茂与奉天省长莫德惠开谈满蒙交涉，吉田态度蛮横，对东北当局"着手进行的满铁并行线问题(即关于吉海铁路和打通铁路之敷设)及用暴力阻止(日本)在帽儿山设领事分馆等事，要求中国方面反省"；否则停止京奉路军车通过满铁附属地。

8 月 13 日　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反对宁汉合作，是日借赴日内瓦国际联盟为名离汉。

8 月 30 日　南京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通知英美等十二国驻沪领事，称因时局关系，暂缓裁厘加税，至关税

自主政策则始终不变。

9月1日　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上海外交交涉公署，以英舰连日无端炮击乌龙山、幕府山等炮台，令速向英总领事严重抗议。

9月7日　东三省反日运动扩大，是日日使芳泽奉政府令向张作霖面提警告，要求严重取缔。同日，张作霖电奉天省长莫德惠设法阻止定于10日举行之对日示威运动。

10月5日　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致日公使芳泽照会，抗议日本对华政策，谓日本对华之满蒙新政策，似系复活“二十一条”，甚或变本加厉，此种政策必至引起中国人民之公愤，恐将酿成阿尔萨斯、劳伦问题于远东，危及世界和平。

10月15日　汉口英国总领事波特致交涉员甘介侯通牒，谓英美烟公司罢工以来，英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损失，应由国民政府并地方官宪负责。

11月12日　北京外交部致西班牙驻华公使嘎利德照会，通知前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初十日所订中西天津条约及附属专约期满，宣布自11月10日起失效，另与商订平等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新约。

军　事

1月1日　蒋介石令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将衢、严、宁、绍各路军队即日调集富阳，迅速向杭州总攻。

1月6日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北京举行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催直军前进，奉军大举入豫，止于郑州，为陇海、京汉两路策应；津浦路及长江下游鲁军适当集中，俟直军攻鄂，鲁军即攻浔，收夹击之效。

1月15日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命张学良由京汉路、张宗昌由陇海路大举入豫援助吴佩孚。是日，张学良视察京汉沿线驻军，为入豫援吴作准备。

1月19日　孙传芳重整部队，以图再举，将所部编为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兼司令及第二师师长孙传芳；第二方面军司令兼第十师师长郑俊彦；第三方面军司令兼第八师师长孟昭月；第四方面军司令兼第五师师长白宝山；第五方面军司令兼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

1月25日　蒋石介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认为北伐军战线延长，应配备兵力五十五万人，每月军费一千六百万元。

1月28日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由闽入浙，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留守福州。何应钦临行以张贞为福州卫戍司令。

1月30日　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师长何璧辉、参谋长朱崧等因与吴佩孚勾结，屯兵观望，在常德被唐生智派师长周斓诱杀。

2月2日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何键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周斓为副军长；刘兴为三十六军军长，叶琪为副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副军长。同日，又明令废旅，师下设团。

2月13日　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吴佩孚命第二十二军集中郑州，以备万一，又派毅军一部及王维城师、张治公部对付归德(今商丘)方面鲁军。指挥于珍赶回北京报告，张作霖即召集各将领开紧。

2月20日　张宗昌在北京与张作霖商定：河南方面军事完全由奉方主持，专任京汉路；鲁军全力力援助宁沪，担任津浦路；援苏事交张宗昌、褚玉璞主持；由陇海路入豫鲁军将开浦口。

2月24日　驻上海之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因22日发生两舰响应上海工人起义，炮击兵工厂事件，下令黄浦江中各舰一律开出吴淞口，集中三夹水。

2月26日　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抵抗入豫奉军。以靳云鹗任北路，守京汉线，巩固黄河；田维勤任东路，由陇海路进展；王为蔚任后方，策应两路；魏益三任南路，维持信郑间交通；张治公任西路，严守陕洛。

2月27日　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以安庆既定，即令主力进取芜湖，分兵由宣城攻溧水。

3月2日　孙传芳与张宗昌商定：前线军事交直鲁军负责，任毕庶澄为前敌总指挥；孙传芳部开通州(今南通)、扬州、清江、海州(今东海)等地整训。同日，南京城由直鲁军接防。

3月18日　北伐军第二十一师严重部克吴江，向苏州进展。

3月26日　冯玉祥奉国民政府命令在西安发布总动员令，分三路向河南出动，沿陇海路东进，以京汉线为目的。于右任为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陈希圣为第二路司令，李云龙为第三路司令。

4月8日　蒋介石由沪赴宁，临行前颁布《战时戒严条例》，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淞沪戒严司令，并通电各军声称邓演达援引私人，把持总政治部，要各军注意此类分子之羼入。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及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大会。

4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召集武汉各界在阅马厂举行讨蒋大会，除全体学生外，第四军、第八军、第十一军、第十五军及武汉各团体百余，共四十万人参加。

4月24日　蒋系海陆军将领由何应钦、杨树庄领衔在南京发表陆海军会议宣言，公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反共、一致完成“北伐”等六项议决案。

4月25日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阎锡山

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4月29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凡十二条。该会为南京政府军事最高机关，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交“国民政府”特任；互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中选一人为主席；在战时得设革命军总司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于军事委员中遴选一人，由“国民政府”特任。

5月7日　冯玉祥部由河南阌乡东进，昨克灵宝，是日又克陕州。刘镇华部向洛阳溃退，即在车站悬旗投降。刘通电就东路军司令职。同日，冯玉祥抵潼关，致电武汉政府，盼唐生智督率所部从京汉路向郑州攻击。

5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去杨森第二十军军长职，遗缺以郭汝栋继任。另委王缵绪为二十一军军长，李家钰为二十二军军长。

5月30日　张作霖亲访驻华日使芳泽，询出兵事件。芳泽当即口头通知日本出兵山东理由，谓“全在保侨”。同日午后，芳泽至北京外交部将同一内容通知顾维钧，“希望谅解”。顾表示“日本出兵，殊违常轨”，“自未可默认”。

6月5日　山西各界二万余人在太原集会。经阎锡山御用党部及民众团体奔走劝进，大会一致公推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通过电请省党部厉行清党及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等议案。

6月11日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一、豫军樊钟秀、梁寿恺、任应岐、蒋世杰、王乃文及王耀珊所部，归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节制指挥；二、河南保卫军应予裁撤，归冯玉祥严行编组。

6月14日　阎锡山发表北方“国民革命军”各军司令人选：第一军商震，第二军杨爱源，第三军徐永昌，第四军傅存怀，第五军傅汝钧，第六军丰玉玺，第七军张荫梧，第八军谭庆林，第九军郑泽生，第十军李维新。

6月29日　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对官兵发出反共训令，要求武汉中央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宣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

7月5日　日本政府决定将驻青岛日军全部开赴济南，并由大连派兵二千维持青岛及胶济路治安。

7月9日　南京政府任命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汝钧、丰玉玺、谭庆林、郑泽生、李维新分别为北方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各军军长，张荫梧为北方第七军副军长。

7月11日　日本续派军队两千名自大连到达青岛。同日，北京外交部致牒驻京日使馆再提严重抗议，要求速撤济南、青岛两处日兵，并中止再由大连增兵青岛。

7月30日　渤海舰队(第二舰队)司令吴志馨被东北舰队(第一舰队)司令沈鸿烈在青岛拘捕，肇和、华甲两舰舰长同时被扣。

8月6日　张发奎传檄进攻南昌起义军。次晨最后一批起义军自南昌撤走，下午张之第四军二十五师李汉魂部及十二师缪培南部、十一军二十六师许志锐部开入南昌城。

8月9日　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通电讨蒋，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操纵党权、军权、政权于一人之手，以反共为名，叛党抗命，自立政府，屠杀异己，要求海内共起平乱。

8月14日　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商宁汉合作，内称蒋已离宁赴沪，总司令职权交军委会接收，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至因争持期间所发生之诸问题而必须先解决者，仍由代表赴浔面商。

8月16日　武汉政府任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第四集团军江左军前敌总指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前敌总指挥。

8月20日　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余等乘轮东下，次晨抵九江，下午至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与前方军事领袖程潜等会商军事及政府迁宁等问题。

8月21日　南京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不重要军事机关，归并杂色军队，缩小政治部范围或取消政治部，整顿兵站，以节省经费。

8月29日　孙传芳五省联军十个师四个混成旅约五万余人聚集龙潭一隅，向何应钦第一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8月31日　南京军事当局以吴淞、镇江炮台附近均有外国军舰商轮停泊，有利孙军掩袭，令交涉员郭泰祺向领事团抗议。

9月14日　蔡廷锴第十师由蒋光鼐接统，由雩都(今于都)、瑞金兼程入闽边夹击贺、叶起义军。

9月20日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并在小营阅兵。同日，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

9月26日　何应钦通电即日起解除第一军军长兼职，专任第一路总指挥；并称第一军部队有十师以上，已奉准编为三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11月9日　唐生智在汉口召集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弃鄂守湘。长江下游退汉唐军纷转武长路退湘。

12月13日　第四军新编第二师薛岳部自西江回师广州，与第五军李福林部会合，进击广州市区，反共最力之机器工会工人约千人亦组敢死队应援李军，在广州市内与起义部队短兵相接，巷战甚烈。

12月23日　日本以护侨为由，特派长良号巡洋舰载陆战队二百名，于是日下午2时半驶抵青岛。同日，日

白川陆相在阁议中声称，此后济南地方之日侨，若有陷于危险状态之形势时，得随时命令熊本第六师团出动。

经 济

1月1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通告，湖北省境内本日起实行征收暂时内地税，税率与广东所行者同，普通品征二厘五，奢侈品五厘。

1月3日　北京政府内阁总理顾维钧召集临时关税委员会及阁员联席会议，通过梁士诒所提立即实行征收附税案，并决定由内阁命令公布。

1月13日　顾维钧就2月1日起实行征收附加税决定，照会关系各国驻华使馆，内称：关税特别会议常处于停顿状态，关税自主延不宣布，附税不克实行，中国财政经济之发展无从促进，不得已自动宣布关会已议决之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日期及实行增抽进口附加税。

1月14日　武汉政府为补助国库，调剂金融，公布发行国库券九百万元，分三个月发行，六个月后偿还本息。

1月18日　广州千余人开促进开辟黄埔商埠大会，议决请政府督促殷富按抽租捐办法认缴股款。19日，广州政治分会议决政府月拨黄埔商埠股款十万元，分期拨足一千万元。

1月19日　湖南省政府公布《湖南省银行派募股款章程》，规定省银行资本为一千万元，凡人民有资产五千元以上者，即派募五十元，多者递加；其财团法人如祠、庙、寺等以及地方公产，凡值二千元以上者，亦派募五十元，多者递加。

1月21日　武汉政府是日起实行征收下列新税：一、在上海关免除附税之输入品，汉口仍征附税；二、现行船舶吨税之外，再课吨税半额附税；三、新课关税五厘为堤防税；四、对一、二特别区（即旧德俄租界）之房屋所有者特别征收房租一个月；五、对中国船客以船票价格为标准，课以通行税同样的税。

1月22日　北京政府国务院函告各机关附加税暂以二千五百万元为额，其分配为：一、整理内外债四百万元；二、教育建设费一百五十万元；三、司法改良费一百五十万元；四、平民生计费一百五十万元；五、国际联盟会费五十万元；六、中央政费八百万元；七、各省建设费六百万元；八、使领经费二百万元。

1月26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奥国赔款担保二四库券规则》，该库券用作年关政费。

1月28日　汉冶萍煤铁公司新向日本八幡制铁所及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借款二百万元，充作整理费。是日由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孙宝琦与制铁所长官中井励作、正金银行总裁儿玉谦次、兴业银行总裁小野莫二郎在上海签订合同。规定年息六厘，由汉冶萍公司每年供给日本生铁三万吨，铁砂四十万吨，抵偿债务。另由正金银行添派常任视察员一人，对汉冶萍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

2月21日　直隶省银行因滥发纸币发生挤兑。该省当局以"扰乱金融"罪，杀害挤兑商民二人。事后为维持钞票流通，财政厅通令各县，于向省解缴粮赋等税收时准搭省钞五成，省钞多的县亦可全部解缴省钞。

3月1日　北京农立银行开业，总行设北京，各大商埠设代理处。该行通告称：为协助农民事业，集股二百万元，实收股本一百万元，专营定期存款，着重经营不动产抵押放款。

3月13日　中国棉业银行以国内战事频繁，是日经临时股东会议决解散。该行于民国十年开办，总行设上海，资本总额一百万元，专营纱花押汇押款及汇兑业务。

3月17日　北京政府财政部发现前总税务司安格联串同现任总税务司易纨士，从内国公债基金项下擅拨四十万镑与伦敦汇丰银行，是日特发表长篇宣言，叙述事情经过及与现任总税务司易纨士交涉情形，并指出"此种恶例断不可开"。

3月22日　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是日该会成立，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等六十余团体参加。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顾馨一、荣宗敬、王一亭等十五人任常务委员，虞洽卿、吴蕴斋、王一亭任主席。该会宗旨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

3月27日　武汉国民政府为统一财政，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至上海主持，是日电令上海各机关，所有江浙财政均须经过宋子文办理，否则概不承认。

4月9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奉武汉政府命令到沪，设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接理江浙财政，宋兼任江浙财政处长。同日，蒋介石另委陈光甫等组织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亦在沪正式成立，陈任主任委员。

4月20日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委员会主席陈光甫暨委员陈其采、钮永建、虞洽卿、汤筱斋、汤济沧、吴震修、王晓籁宣誓就职，即开首次会议，讨论整理江苏省财政事宜。

5月10日　南京政府令准上海中央银行副行长钱永铭辞职，遗缺由张寿镛兼任。又准中央政治会议咨开财政部长钱永铭未到任以前，所有部务暂由江苏财政厅长张寿镛代拆代行。

5月18日　南京政府公布《中央财政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会依中央政治会议之议决指导全国财政；由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三人及财政部长、次长共五人组织之。

5月31日　南京政府财政委员会成立。以古应芬、钱永铭、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为委员，成立会上讨论财政整理及建设事项，订于下月15日在宁召集各省财政厅长会议讨论一切。

6月22日　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开幕，广东、广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六省财政厅长、海关监督、烟酒印花税局长、两淮两浙广东盐运使等以及中央财政主管机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统一及补救预算问题。

6月23日　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自本年7月1日起实行值百抽五十之卷烟统税，废除卷烟旧有一切捐税。同日，财政部公布《全国卷烟统税暂行简章》凡十二条。

6月29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财政部长古应芬提议，发行民国十六年盐余国库券六千万元，以江、浙两省盐税全部收入作抵，自7月1日起发行。

7月1日　武汉金融因受下游封锁影响，陷于困境，国库券已发九百万元，是日纸币价格跌至六折，普通物价概涨四成，粮价涨至一倍，殷实商界广帮、宁(波)帮避匿，土著商家亦多停业。

7月7日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致函公董局，就增税等事提出三条件：(一)尊重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凡关于法公董局一切设施，须经纳税华人会承认或否认定之；(二)此次公董局所增房捐、地捐及车摊杂捐，要求一律免加，仍照旧额收取；(三)公董局之华董须由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产生。

7月8日　南京政府公布《财政部民国十六年盐余国库券条例》，规定该项国库券用于整理事业，补助国库，定额银元六千万元，以江、浙两省全部盐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7月1日开始发行，六个月后分月偿还，至民国二十一年2月底偿清。

7月18日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9月1日实行裁厘，同时宣布关税自主，将苏皖闽浙粤桂六省境内一切通过税全裁撤，进口货物改照国定税率征收，工厂制造货物照《出厂税条例》征收。

8月15日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准财部整理国库券办法三项：(一)人民手中之现金，准在政府辖境以内自由流通，车船输送千元以上须得财部许可；(二)特税、盐税及内地税应付现金，此项税收所得拨归整理国库券之用；(三)11月15日以抽签办法收回国库券三百万元，11月15日以后，每月收回一百万元，至收完为止。

8月27日　广州官商会议讨论维持中央纸币，决组“商界临时存款中央银行经理委员会”，由该会封存纸币三百万元，贷与政府，政府以二五附加税作担保。总部令禁军人挤兑，并在繁盛市街设市民兑现处，每人限兑一元。

9月6日　广东省金融风潮，省政府查出财部、财厅重要职员乘机操纵，有获利数十万者。是日广州政治分会查办此案，则部禁烟处长李海云等古应芬系人物数十名被逮捕监禁。古因此辞财政厅长职，由冯祝万继任。民政厅长李文范、司法厅长陈融等亦相继辞职走避香港。

9月27日　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废止中央财务委员会，改中央党部农民部为农人部，商民部为商人部。

10月8日　国民政府公布《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发行总额二千四百万元，充作本年军需政费预算不足及归还短期借款之用，以二五附税全部收入作为本息基金，月息七厘，10月1日发行，至1931年12月底本息全部还清。

9月28日　中东铁路理事会开会，中国代表依原条约要求退还中国股本五百万两，连三十年利息共一千五百万两。俄代表认此为政治问题，应由两国政府解决。

10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特定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资本总额定为一万万元，由国库支给，其一部分经政府核准，可由国内银行分认。并规定该行特权如下：(一)发行兑换券；(二)经理国库；(三)募集或经理公债事务；(四)铸造及发行国币。

11月3日　财政部长孙科通电全国各团体、各银行，称北方军阀拟以比国退还庚款作为基金，发行美金公债五百万元，并以延长旧约若干年为互利条件，实属增订不平等条约，应据理力争，不使实现，要求各界万勿承受该项公债，倘有私自押借购买情事，国民政府概不承认。

11月16日　财政部长孙科以戒烟药品专卖包商浙江中兴公司、江苏信远公司行贿有据，决定予所撤销，改归该部自行设局办理，并没收其保证金，严办公司代表。

12月5日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有奖公债条例》，定额五百万元，用作补助国库，指拨教育、储蓄银行基金及兴办实业。此项公债前两年定为月息一分，即以两年利息全数拨充奖金，两年以后每三个月抽签偿还本金一次，两年内分八次偿还，不另给息。

12月18日　上海茶商二十余家，年售苏联茶叶达一千四百万两，以中苏绝交，营业大受影响，百余万恃茶为生之人将有失业之虞，是日特推代表陈兆焘向外交部请愿，请示维持营业办法。

12月21日　上海处理苏俄在沪商业临时委员会决定处理在沪苏联各商业机关，监视清理之机关计五处：远东银行、苏联义勇舰队公司、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处、乌苏里铁路运输处、苏维埃政府保险管理处。

文　教

3月27日　上海艺术协会成立，以黎锦晖、田汉、陈

望道、欧阳予倩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5月9日　北京各学术团体与瑞典人斯文赫定组成之西北科学考察团，是日由北京起程。该团体系根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会章第七、八两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调查采集时，以不伤害主权、不以物品报酬为原则组成。

5月10日　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呈准北京教育部立案。该协会以采集保存国境内所有学术材料为主旨。

8月4日　北京阁议通过教育部所拟改组北京国立九校计划。九校教职员忠告教育总长刘哲，勿使国校随政潮而转移。

8月6日　南京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省区教育行政机关，所有学校采用校长制，废除委员制。

8月10日　安国军政府将北京国立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师范大学、女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教育总长刘哲自兼校长。是日教部派参事陈任中、司长刘风竹等分别将九校接收。

11月20日　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筹备委员及专门委员谌湛溪、曾昭抡、吴涧东、蔡元培、李石曾、周鲠生、王世杰、彭学沛、张乃燕、张奚若、杨杏佛等三十人参加。通过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研究院院长，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并推定各所常务筹备员。

11月23日　国民政府核定大学院制定之《教科书审查条例》，规定中、小学教科书，非经大学院审定者，不得发行或采用。

12月1日　东省特区教育厅与苏联成立《学务协定》五条，规定路立教育苏联子弟各校之管理及教授，应照中国现行学制及地方法令办理，中东路局学务处裁撤，中国收回该路教育权。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8年

导　言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主要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国民政府组织案》等决议案。这次会次使党、政、军大权都落到蒋介石手中，并修改了孙中山的三民政策，确立了国民党新的理论纲领。

井冈山根据地——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块根据地，在本年初开始形成，井冈山根据地以井冈山为中心，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和吉安一部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本年，蒋冯阎桂取得了一致，组建了一、二、三、四集团军。二届四中全会决定继续北伐。四月七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五月1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后遭到日本干涉，发生了“济南惨案”，蒋介石命令军队不许抵抗并撤出济南，绕道北伐，直逼京津地区。在帝国主义干预下，张作霖退出北京，六月八日，阎锡山进入北京，十五日，国民政府宣告“北伐”完成。

张作霖退出北京时，没有满足日本的全部侵略要求而与日本发生冲突，因而关东军决定谋杀张作霖、企图制造混乱，然后出兵东北。六月四日，在关东军精心策划下，在皇姑屯站预埋炸药，炸死了张作霖，即为“皇姑屯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六月于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共产国际协助下召开的。会议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现阶段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这次会议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

八月八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会议宣布依照孙中山遗训，开始做训政时期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于1929年3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之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矛盾斗争更加激烈。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继任奉系首领。此时，国民党决定对东北采用“和平解决方略”，张学良也表示希望和平统一。其时，日本也逼迫张学良维持东北割据局面。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阻挠，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各地武装暴动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井冈山会师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井冈山《土地法》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 ●"二次北伐"
- ●济南惨案
- ●皇姑屯事件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 ●东北易帜

各地武装暴动

背景介绍

从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二八年底，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各地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对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著名的有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起义，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起义，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的黄麻起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弋横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王维舟、杨克明、李家俊、李光华领导的川东起义，刘志丹、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贺龙、周逸群、贺锦斋、段德昌等领导的湘鄂边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贺国中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叶季壮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上述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并扩大了革命影响，也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材料：

- ·方志敏领导弋横起义
- ·弋横起义
- ·湘南暴动

材料一　方志敏领导弋横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南昌市区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贴出了许多反革命标语：

"欢送共产党员出境！"

"共产党员如不走，就不客气对付了！"

……

事实说明，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已经投向反动营垒，南昌市的天空顿时布满了乌云……

6月的一天，朱培德派出一营兵力，缴了省农民自卫军的枪，查抄了方志敏的住房。他就这样被"礼送"离开了南昌市。根据党的指示，方志敏到吉安开展农民运动。不久，由于形势日益严重，吉安的党组织转入了地下，他与党组织又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回弋阳找党组织。这时，南昌市到处张贴着反动标语和杀人告示，上下码头和出入城门，都要经过严格检查，一片恐怖气氛。8月中旬，方志敏取道鄱阳、乐平、德兴，辗转回到家乡弋阳。

方志敏到达弋阳漆工镇，时值黄昏时分。昔日风景秀丽的可爱家乡，已是满目焦土，到处断壁残垣。目睹这凄凉景象，方志敏不由悲愤难禁。次日，他就秘密地通过各种关系，把潜伏在各地的同志一个一个地找回来。其中，有从黄埔军校回来的邹琦，有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配回省的彭皋，还有坚持在弋横山区打游击的方远辉、黄镇中、雷夏、吴先民、邹秀峰、黄球、黄端喜、黄怀仁等人。大家聚到一起开了个会，同声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先从下层群众做起，分头到各村去发动群众，仅仅7天，就组成了20几个党支部和相应的群众团体。这里的群众早在大革命前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大革命中又受到锻炼。特别是在"四·一二"后，这里已被打倒的土豪劣绅组织了一支反动地方武装——靖卫团，在6月中旬血洗弋阳九区，20多个村庄的房屋被烧毁，耕牛财物被抢劫一空，弋阳九区的群众充满了仇恨。一经宣传组织，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武器太少，方志敏决定到鄱阳去搞枪。鄱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100支，团长为共产党员胡烈，可以说这个团是共产党的。方志敏从吉安回弋阳途径鄱阳时，曾提议要他们将警备团拉到弋阳去，以保存实力，他们答应下来。所以，方志敏这次去鄱阳，准备将这个团带回来，至少可以带来一部分。不料他到鄱阳后，情

况已发生变化，警备团已被反动派所断送，他只将一个负责同志保存的10支枪带了回来。方志敏这次到鄱阳见到了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刘士奇同志，听到了关于中央“八·七”会议的传达报告，知道党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精神给方志敏以极大鼓舞，他急速将枪支运回，准备秋收暴动。

1927年9月，方志敏在湖塘村召开了弋阳九区各村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如何组织秋收暴动的问题。到会代表300多人，李穆任大会临时主席，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彭皋、余汉朝、邹琦等参加了大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大劣绅张念诚运动了一营白军开来，放火烧屋，全村80余人家有50余家被烧个一干二净，结果“秋暴未成村先毁”。但方志敏没有因此而气馁，继续为暴动做准备。当进攻湖塘村的白军退去后，方志敏、方远辉、黄镇中等人领导九区农民300多人，联合沿途各地农民3000多人，一举攻下了张念诚的老巢——烈桥。从此，九区就成了赤色区域，成为赣东北最巩固的工农革命根据地。

1927年11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县窖头村的祠堂里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决定组织弋横武装暴动，起草了武装暴动宣传大纲，制定了武装暴动纲领。会议决定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革命团，团下设排，排下设班，3人一班，10人一排，每团约在30人以上，经过秘密串联组成，每个团员都要宣誓忠诚于革命事业，遵守革命公约：

1. 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 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团员；
3. 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器；
4. 大家齐心努力，听从上级指挥。

会议还决定成立五县的党委会，下设起义指挥部，方志敏任党委会书记兼总指挥。窖头会议正式打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为武装起义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会后，方志敏等分赴各地积极组织农民革命团。到1927年12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弋阳、横峰两地农民革命团发展到千人以上，弋阳漆工镇和横峰青板桥等中心地区农民都组织起来了，纵横数十里，联成一片。他们就依靠这些组织开展革命活动；采用农村的旧形式，吃鸡血酒宣誓，秘密缝制了暴动的大旗；以打猎为名制造和购买了土枪土炮，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这时各村的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农民革命团手中，群众革命情绪极为高涨，加之这时全国各地起义的消息不断传来，更激发了弋横地区群众的斗志。1927年12月，以楼底兰家（楼底和兰子坂两个比邻小村的总称）为起点，揭开了遍及百余里弋横武装暴动的序幕。

楼底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迫于生活，和同村的几个贫苦农民，用土法在西山挖了一个小煤窑，每天钻进窑洞里挖出的煤，可以卖一两元钱。为着这点收入，他们要脱得精光，在漆黑无光、水蒸臭气的窑洞里，每天累死累活地劳动十几个小时，而且随时都有被砸伤、砸死的危险。真是一分钱一滴血。可是，横峰县衙门连他们赚得这点血汗钱，也要横加勒索，每个月还要交五块钱的捐税，名为“上煤捐”。

1928年元旦这天，县衙门里收煤捐的委员又来逼捐了。闻讯而来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把收税捐的委员推翻在地。这个委员见势不对，爬起来就跑，一边跑一边扬言要派兵来抓人。第二天，果然来了10多个警察，气势汹汹用武力勒索捐款，还要拘捕殴打收税委员的“肇事农民”。早有准备的农民革命团员在张松茂等的带领下，手执梭标、鸟铳蜂拥而至，十几个警察全部束手就擒。

消息传开，楼底兰家一带沸腾起来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农民革命团员肩扛梭标、鸟铳，到土豪劣绅地主家训话，宣布废债，罚款，分粮分财物，镇压少数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

一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楼底兰家暴动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远近各村。

当方志敏决定在楼底兰家实行武装暴动时，已经得知黄道、邵式平、吴先民、黄端喜、程伯谦等在弋横其他各地做了大量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于是，他以暴动总指挥的身份发出通令：凡是组织了农民革命团的地方，立即统一行动，举行暴动，并积极支持邻村。暴动的各村农民群众，自动起来进行革命户口登记，扩大农民革命团组织，成立农民革命军，向土豪地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烧借据，毁契约，废除债务，劈仓分粮，搞得热火朝天。在周围没有建立农民革命团的村庄，群众也自动挨户“上名字”建立农民革命团，组织革命队伍，纷纷派代表来到暴动的村庄要求支援。有些封建势力较大的村庄，豪绅地主妄图组织反抗，周围的村庄就联合起来，组织农民联军，坚决进攻。几天之内，暴动区域纵横百余里，参加暴动的群众达六七万人之多。

这时，正值蒋冯阎桂新军阀对北方的老军阀张作霖展开争夺地盘的“北伐”。弋横城内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面对着波澜壮阔的农民暴动，有限的地方军只能龟缩在城内，不敢迎击农民军，总指挥部决定以楼底兰家、青坂桥、漆工、樟树墩、枫树坞为中心，分兵五路向外出击。五路大军，齐头并进，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当时，赣东北各地传诵着一首歌谣：

湖塘塌塌岭，出了方志敏；
领导共产闹革命，都是为穷人！

（选自《纵横》87年6期，作者：王永春、陈芷遐）

材料二　弋横起义

1928 年 1 月，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人的领导下，江西弋阳、横峰等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6 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撕下了伪装，开始"清党"。江西省到处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27 年 8 月下旬，方志敏回到家乡江西弋阳漆工镇湖塘村。此时，中共弋阳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方志敏也遭敌通缉。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方志敏不顾自己肺病复发，冒着危险积极进行活动，先后与共产党员邵式平、黄道、黄镇中、方远辉、方志纯等一起，在弋阳、横峰等地建立起了 20 几个党支部，成立了一些秘密的农民协会和群众团体，从而使弋横地区的斗争重新发动了起来。

方志敏等人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在前往鄱阳搞枪时，与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相遇，得知了"八七"会议精神，立即返回弋阳，准备举行秋收暴动。

1927 年 11 月 25 日，担任中共江西省横峰区委书记的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 5 县共产党员联席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发动农民举行 5 县年关暴动，以弋阳、横峰作为首先暴动地区。会议还制定了发动群众起义的宣传大纲，拟定了起义纲领，确定以自然村为单位，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团。为了加强对起义的统一领导，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方志敏为书记，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邵棠、方远辉、方志纯等 7 人为委员的 5 县党委会。党委会下又设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方志敏任总指挥。

窖头会议后，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地发起了参加革命团运动。到 12 月底，仅弋、横两县就建立了革命团 80 多个，有成员数千人。1928 年 1 月上旬，横峰县楼底兰村的群众，在革命团的领导下，开始了抗煤窑捐的斗争，把前来镇压的 10 几名反动警察缴了械，揭开了弋横武装起义的序幕。

起义指挥部决定配合楼底兰村群众的斗争，提前举行年关暴动。这样，在几天的时间里，弋阳、横峰的五、六万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举行起义，镇压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土地，粮食、财物。革命的烈火，在弋横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为了扩大起义的范围，起义指挥部决定起义武装分 5 路向外发展。第一路由花春山、邹秀峰、黄端喜等人指挥，以楼底兰村为中心，向横峰、弋阳两城发展；第二路由吴先民、黄球、钱壁等人指挥，以青板桥村为中心，向铺前、霞坊等地发展；第三路由程伯谦、黄立贵、邱金辉等人指挥，以枫树坞为中心，向葛源、横峰等地发展；第四路由黄镇中、方远辉、方远杰等人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中湖板、芳家墩、姚家一带发展；第五路由雷夏、余汉潮等人指挥，以樟树墩为中心，向杨家店、花亭寺发展。

5 路分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半个多月时间里，控制了大片地方，摧毁了许多地方反动政权。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5 县党委会改组为中共弋横中心县委，方志敏任书记。

弋横革命斗争的发展，使整个江西为之震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急忙调集了 1 个团的正规军，在地方靖卫团的配合下，向起义农民进攻，进驻弋阳、横峰县城，占领了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葛源，各路农民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损失。1928 年 2 月，起义指挥部集结了 5 路农民共万余人，准备夺回葛源。结果，由于消息泄露，起义军在进军途中被敌伏击，损失严重，不得不撤出战斗。

起义指挥部总结了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停止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整顿和健全组织，建立精悍的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定在农民革命团基础上建立乡村民众政权，保护暴动成果；被敌占领的村庄采取"白皮红心"的策略坚持斗争；农民起义军回到各村，一边生产，一边镇压反革命，保护革命群众；挑选一部分骨干力量，集中分散在各路起义军中的几十支步枪，建立 1 支精悍的脱产游击队，寻机消灭敌人。把起义由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变成隐蔽的、更富有成效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1 个月肃清匪患"的梦想。1928 年 5 月，弋阳、横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选自《革命起义录》，作者：范圣予等）

材料三　湘南暴动

1928 年 1 月，在朱德、陈毅等领导下，湖南南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湖南南部耒阳、宜章、郴州、临武、蓝山、永兴、汝城、嘉禾、安仁、桂东、资兴等县的群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革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1926 年 11 月底，普遍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农民协会通讯处等群众组织，加入农民协会的群众已达 14.6 万多人。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湘南宜章、汝城两县的工农武装和从广东撤出的一部农军共 600 余人，汇集汝城，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反击许克祥反动派的斗争。中共中央军委很重视这支农民革命力量，派陈东日等人前往协助训练指挥。中共湖南省委也指示他们准备举行秋收起义，并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何举成任团长。这支农民革命军成为后来湘南暴动的重要力量。

1928 年 1 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

军队，转战江西、广东等地后进入湘南的宜章县。中共宜章县委派胡少海等前去迎接。他们在宜章莽山接到了部队，介绍了湘南一带的形势。朱德、陈毅与宜章县委的同志具体商定了在湘南开展革命活动的总方针和政策，决定利用湘桂军阀在湘南混战的有利时机，举行年关暴动。

暴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拿下宜章县城。宜章城内驻有地方民团近 400 人，没有国民党正规军扎驻。朱德、陈毅等决定智取宜章。1 月 11 日，胡少海率领伪装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先头部队的两连革命武装开进了县城。进城后，胡少海主动“拜访”官吏豪绅，商议“防共防匪”事宜，取得了该县官吏和地主豪绅的信赖。第二天，朱德、陈毅率大部队进入了宜章县城。趁举行招待宴会之机，将反动头目一网打尽。接着，部队包围了县政府和团防局，缴了团防局的枪，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开仓分粮，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

1 月 13 日上午，工农革命军和中共宜章县委召开了 5000 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号召大家起来革命，彻底打倒反动派，实行耕者有其田，当家作主人。大会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场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前后两任敌县长杨考斌、黄得珍和土豪劣绅刘秉钧、肖期若等人。

宜章暴动胜利后，朱德、陈毅的部队正式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隆重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宜章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区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组织了赤卫队和暴动队，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县。1 月 22 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攻破了宜章城西南的黄沙堡，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 300 多人。

起义军在宜章取得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蒋介石急令湖南省主席何键，调 1 个师的兵力进驻郴县，又命令粤北国民党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率 5 个团的人马进驻坪石，形成对宜章南北夹击的态势。许克祥进驻坪石后，以两个团留守，主力从坪石北上，企图夺取宜章。面对骄横的许部，朱德、陈毅等决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于是，部队主动撤到宜章城南 80 多里的笆篱、山门、圣公坛一带，捕捉战机。当敌人进入粟源、岩泉圩时，工农革命军从正、侧两面迂回包围了敌人，将处在松散麻痹状态的敌人打得措手不及，并乘胜追击，一直把敌人赶回坪石。此次战斗，消灭了许克祥军 1 个整师(5 个团)，占领敌坪石后方仓库，俘敌 1000 余人，缴获步枪近 2000 支，轻重机枪 100 余挺，迫击炮、山炮 30 多门，弹药、被服无数。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乘胜北上，向湘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郴州发动进攻。1928 年 2 月 3 日，工农革命军在郴州以南、宜章以北的折岭与敌军交战，敌军败退良田。良田是郴州的屏障，有敌人 1 个团的兵力把守，工农革命军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很快打败了良田的敌人。郴州守敌弃城而逃。2 月 4 日傍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顺利占领郴州城。第二天，中共党组织在郴州召开了县党代会，建立了中共郴州县委员会，夏明震任县委书记。随后，成立和恢复了县工会、农民协会和女子联合会等群众组织。2 月 6 日，成立了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选举李才佳为主任。2 月 8 日，郴州县委召开了两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起来革命。郴州广大劳动群众很快掀起了“插标分田”的群众运动。他们惩办恶霸劣绅，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烧毁地契、帐薄。整个郴州，工农群众扬眉吐气，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在工农革命军的帮助下，郴县的农民武装力量也发展到 2000 多人，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为师长。

为了尽快把革命发展到湘南其他各县，朱德、陈毅等决定，把工农革命军和农民武装分批派到资兴、永兴、耒阳等县，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暴动成果。2 月 10 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从郴州分两路出发，一路侧击永兴、资兴，很快解放了这两座县城；另一路由朱德率领，北上直捣耒阳县城。16 日，部队在圩园里给反动地主和挨户团以沉重打击，耒阳城里的敌人望风而逃。当日下午，革命军进入耒阳城。19 日，成立了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刘泰被选为主席。全县 18 个区、300 多个乡也先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工会、农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也先后得以建立和恢复。接着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革命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建立，大长了耒阳工农群众的志气。他们烧毁了敌县政府，枪毙了县挨户团主任杨旷萱，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

湘南暴动的烈火，燃遍了整个湘南地区，除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以外，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成、衡阳等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镭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都发动了武装起义或其他形式的群众革命斗争。

1928 年 3 月，粤、湘、桂 3 省军阀混战暂告结束。4 月，蒋介石从湘粤两省调集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 7 个师的兵力，对湘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行“会剿”。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实力，工农革命军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根据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制定新形势下的路线和政策，决定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

怖，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

瞿秋白代表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18个文件。

大会修改了党的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批判了“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议决案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达到中国真正的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见史料1）；议决案认为当前的形势还不是“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是在两个革命的高潮之间，所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团结群众，领导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见史料2）；议决案还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脱离群众的最危险的倾向（见史料3）。

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但是，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错误理论，认为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因而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和中间阶级的两面性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把中间阶级看成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主张一概打倒；片面强调以城市工作为重点，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外，还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人化。这些缺点成为两年后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原因。

“六大”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

材料：

- 周恩来与中共“六大”
- 有关中共“六大”的实况
- 王德三与中共“六大”

材料一　周恩来与中共“六大”

六大的召开，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会议的主题是要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制订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会前不久6月12日左右，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是：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中国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

17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晚，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6月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讨论政治报告时，周恩来在6月27日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然已想了很多。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都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

对革命性质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周恩来说："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

对革命形势问题，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看法，明确地说：我们不必在名词上去争论，总之，"现在不象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和高涨。"同时，他又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他要求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他这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比六大召开以前已有了很大提高。

他在这次发言中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连。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仍是十分可贵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他还充当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人：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

6月30日，他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七百三十四个锐减到八十一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在会上，瞿秋白和张国焘发生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在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后，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若飞等十人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

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作补充报告。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9日、10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的真

理，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7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节选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材料二　有关中共“六大”的实况

1928年4月下旬某天，任弼时告知我准备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我要经过大连、奉天（今沈阳）、吉林、哈尔滨、满州里秘密走出国界，沿途有很大危险。他又告诉我到了哈尔滨，落下旅馆后，到哈尔滨一家电影院门前看电影片广告，见有一人手搔左耳，即上前装着问路，告诉他我们住的旅馆房间号数，他就会来找我们，交代如何到满洲里，下车后会有人引我们到联络站，即作偷越国界的准备。

这次同去的人很多，两人一组，见面时互不通言语。我的同伴是纱厂一位青工，名叫胡均鹤（后来叛变），动身前一晚，我睡在他家。我的中学同学曹亮（基督教徒）在上海青年会工作，思想很左，同情我们，写信介绍我们去哈尔滨青年会，找他的大学同学门某接洽印刷圣经一事。这就是我们的护身符。我们乘船到大连港时，日本特务上船对乘客逐个盘问。我拿出曹亮写的介绍信，特务见信封上是上海青年会的头衔，对我和胡均鹤瞟了一眼，同时拆信阅读，我和胡两人装着用于在胸前划十字架。这样，特务对我们稍微问了几句，就走开了。但对其他同志盘问得寻根究底，并且搜身，检查行李，连热水瓶都拆开，仔细翻腾。据说，周恩来被检查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号称商人，坐的是一等舱，特务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是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只要你不在南满活动，我大日本宽宏大量，让你过去。”

我们经过奉天、吉林、哈尔滨，只在旅馆落一下脚，并不住宿。到哈尔滨后，在电影院门前，果然见到那位搔左耳的同志。他来到旅馆后，要我们把手表等物品通通留下，我有一只瑞士怀表也被扣下。他为我们买好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当晚我们就上车，对号入座。车厢里早有一位青年坐在那里，见了我们，一句招呼都不打。第二天下午，车到满洲里，那位青年对我们说：“下车后跟我走。”

至此，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他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子，内有一位中年男子招待我们洗脸喝茶，然后要我们沿着他指的路一直朝前走，到了有几个士兵站岗的地方，又要我们散开，放慢步子。如士兵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只答“溜达”即可。后来才知道，“溜达”是东北土话，即“散步”。走过这里，再一直往前走，见到有部马车，即跑去爬车。车夫是一位苏联人，他等我们坐好后，把鞭子一甩，两匹马便疾跑如风。大约走了半小时，他回头用中国话对我们说：“现在是俄国地界了。”

掌灯后，车到一所小木房子门前，我们下了车，没付车费，连连向马车夫握手致谢。我说一句俄语：“波尔若也，司巴西波（大大的感谢）！”车夫含笑离去。

随后，我们走进火车站里，有一人用黑面包和茶招待我们。此人会英语，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小站，当晚由哈尔滨有火车开来，车票已买好，你们乘火车至赤塔，那里有会说英语的苏联同志来接。

大约晚上10点钟上车，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到赤塔。下车后，果然有一位苏联同志和一位朝鲜同志来迎接，把我们带到一所房子，里面已经住了好几位同志。大家都不认识，迎接我们的苏联同志给了一些卢布，要我们自己上街买所想吃的食品。因我能说几句俄语，就当了采购。赤塔显得很荒凉，风沙厉害。我买了粉条（中国式）、面包、牛肉、鸡蛋、包心菜等，由另一位同志背回。

我们的房主人为一小军官，结了婚，刚生一个小孩。晚上，那位苏联同志又来了。我们在国内时，每人发了一张美钞，他要我们把美钞交出，由他收回。原来美钞上面有数目次序号数，他收到美钞后便知道由中国来了多少同志。据说，瞿秋白不知怎样把美钞丢了，几经交涉，最后还是莫斯科来电报，才允许他继续前进。

当晚，我们全部人马由赤塔乘火车去伊尔库次克，大约两天到了目的地。车站上有位矮胖的苏联同志和一位中国同志（四川人）前来迎接。我们分乘几部马车到乡下一所大房子，里面早已住了许多同志，邓中夏、蔡畅、王若飞等人都在其内。在这里，我们住了很长时间，记得举行了“五卅”惨案纪念会，后来学习俄文。不久，去莫斯科的日子终于到来，我们乘火车出发。那时西伯利亚铁路还是单轨，火车速度不快，每站必停，大约费了两个星期，距莫斯科还有一站之远，火车停了。我们下车，有中国同志和苏联同志来迎接，吉塔诺夫与其他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老友都在其中。大家握手欢笑，彼此问好。然后乘马车至一所大院，据说原是一个大地主的住宅。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苏兆征、向忠发、项英等领导早已到达。

第二天，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约是1928年8月初旬的一天。到会代表（包括团员）大约100多人，工作人员很多，单是翻译人员，除我之外，还有陈绍禹（即王明）、卜道明、沈雁冰的胞弟（我忘其名）。此外，记录员、打字员、勤杂人员也有几十个。

会场设在一间大厅里，座位一律为长条凳，主席台后悬挂斧头镰刀党旗，台前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横幅，两旁无标语，台正中有一张长方形桌上面蒙白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挂在台后墙上。

大会由瞿秋白主持，当时天气较冷，他着一件浅黄色粗呢长大衣。他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第三国际直接指导下，正式开会。”随后全场鼓掌，并起立唱国际歌。我原以为斯大林代表第三国际到会，结果是两位意大利同志代表第三国际。布哈林代表苏联党。

瞿秋白致大会开幕词后，代表第三国际的一位意大利同志讲话，向大会祝贺，并祝大会成功。接着，布哈林讲话，他痛骂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包括冯玉祥在内。说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日子里跑到莫斯科来，苏联是怎样帮助他们，不料他们丧心病狂，反而以怨报德，如此如此。继之向忠发发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毒杀我们的同志，手段残忍，惨不堪言，把受害同志一一点名指出。全场顿时哭声震耳，其中尤以妇女同志泣不成声。

大会休会后，晚上讨论主席团名额和成员，并决定周恩来任大会秘书长，分别成立几个小组，如工人组、妇女组、农民组、青年组、济难组，选出各组组长，组员由代表自动报名参加。

次日开大会，由瞿秋白作政治报告。报告很长，占了一整天和一个晚上。我对秋白的学问很崇拜，他懂英文、俄文，中文水平极高，他改过我的译文。但是他的报告中有什么精彩处，我一点也记不得。我只记得在他作报告时，中途王若飞站起来，声辩几句，有的还站起来打断秋白的讲话，要他放忠实一点。秋白有什么不忠实的地方，我不知道。项英也站起来几次，批评秋白只是坐在房内写暴动文件，而不晓得外间实际情况，逼得秋白当场认错。秋白报告的主要精神，是说革命处于高潮，这一点当场无人反驳。

在第三天大会上，代表们分别发言，每人限定讲两小时。有些工人出身的代表，文化水平较低，简直无话可说，能讲话的还是几个知识分子。张国焘发言，首先就攻击秋白的报告无一是处，特别点出中山舰事件。当然，他的话两小时说不完。当值日主席提醒他时间已到，台下就有代表站起来，说：“我的时间让给你。”这样，张国焘上午讲了四小时，下午又讲了五小时，还想讲下去。周恩来说：“你已经讲了九小时了。”此时张国焘才快快不乐地走下讲台来。这是“六大”最精采的一幕。

以后一些代表发言，有的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有的认为革命还处在高潮阶段，对高潮低潮争论不休。再就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部分代表认为，现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另一部分代表坚决反对，认为现阶段纯粹是无产阶级革命。持此论者，以李立三最为突出。于是，如此争争吵吵，大会开了十几天。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台上那两位意大利同志，他俩一个中国字不懂，只看见代表哇啦哇啦发言，也没有人替他们翻译，但他们镇定自若，我真佩服他们的能耐。

各代表的发言，当时由懂俄文的同志翻译出来，由苏联那些女同志记录的记录，打字的打字，一句话都没有漏掉。后来，汇集送与布哈林审阅。布哈林住在我们住处旁边一所别墅里，他每天就审阅送去的代表发言译本。代表们夜间分组讨论，他有时也来旁听。

最后一个大会发言的是周恩来，他着浅灰色夹袍，脚登圆口布鞋，发言时间很短。大意是不分高潮低潮，中国革命总是要进行的。不能在高潮名义下再来盲动，也不能用低潮字眼，消极悲观，逃避革命。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依然猖獗，不平等条约仍未废除，除汉口英租界外，其他租界也未收回。这些事本来应该由国民党来做，但国民党已经变质，这些事只得由我们共产党人来做。应不应当做，也就是应不应当革命？经他一讲，许多代表都彻底明白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懂得革命目标。他语言温和，态度从容，博得全场热烈掌声。有一位北方同志起来说：“恩来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会由布哈林作总结报告，王明当翻译。布哈林批判“盲目暴动”，他说这是赶羊上屠场的政策。又说中国共产党不讲科学，许多行动还是原始社会的形式，并举了一例说，你们暴动，要放火烧毁敌人的房屋，就需要一盒火柴，但是火柴是科学的产物。最后说，你们争争吵吵，大闹派别，你们当中，我看没有一个抵得上列宁同志。(周恩来插言：我们岂敢与列宁同志相比?)最后还讲了几句勉励中国共产党的话，说要挽救古老文明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大会至此结束，接着选举中委，由向忠发任书记。选举时凡工作人员都得离开会场，哪些人当选中委我不知道。“六大”之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关向应主持，英、美、德三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派有代表到会祝贺。这次大会时间不长，但我这时工作很忙，会上翻译工作和其他琐碎事全由我一人承担，弄得精疲力竭。在我们开会期间，第三国际召开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三同志代表中国出席。

这次大会之后，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又要开世界大会，我和部分团员留在莫斯科国际旅社，等待出席大会。周恩来也住在国际旅社，我接触次数较多。他平易近人，无话不谈。我还在旅社见到各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如德国台尔曼，日本片山潜，也有幸见到国际歌的编者。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斯大林。同时，我们瞻仰过列宁的遗容。列宁仰卧在红墙地下一间小房内的水晶棺材中，身上盖着斧头镰刀的党旗。我们对列宁遗体行三鞠躬，绕棺材一周而出。

在共产主义少年世界大会上，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尖锐。这次大会结束后，周恩来问我愿不愿在莫斯科大学念书？我因苏联气候太冷，受不住，表示要回国。周恩来没有说什么，拿出一本英文书，书名是《经济学》，作者为罗素，英国人，要我将这本书带回上海交党中央，嘱我路上小心保管，千万不能丢掉。我回答说："人在书在。"

我回国时，是苏联同志引路，于夜晚偷偷越过国界。到了哈尔滨。这时我是一个人，从哈尔滨经过吉林、奉天、大连，回到上海，我立即托人将《经济学》一书送交党中央，没有辜负周恩来所托。

（选自《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作者：王翘（王翘，又名王剑龙，大革命时参加中共，是党团中央工作人员））

材料三　王德三与中共"六大"

1928 年 6 月，王德三同志代表云南地下党出席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党的"六大"。当时，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转入低潮时期。但是革命火种没有熄灭，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探索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革命道路。党的"六大"的召开，就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和党的"八七"会议以后的经验教训，以确立新的革命路线。王德三同志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结合云南革命斗争实际，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客观上的条件，不能不使革命向前发展"；"虽有客观的条件，但是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并指出"八七"会议后，党的领导有感情用事的表现，"不估量当时的实际情形"，把"小区域的农民暴动或某工厂发生很小的罢工事实，即认为革命高涨了"。这是一种"以局部事实为全部政策的前提的主观病"。由于"中央未能指出暴动条件，影响各地而发生盲动主义。"发言中还反复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党的问题，如何抓住群众的问题。""若不能强固我们的党，不能抓住群众，否则一切策略都是空话。"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一是能够在革命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是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的联系，有了这两条，就能使自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中，王德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方法，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中国的农民与土地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认为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不可笼统规定"，"而应按照各地的情形来决定"，"以当地实际情形来分。"他按土地关系把农村阶级划分为地主（附豪绅）、自耕农、佃农、雇农四种，并认为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雇农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农民组织的基础是佃农"，"佃农是很广大的群众"，"我们要以佃农为农民组织的基础"，"这样才能得到对整个农村的领导"。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王德三同志的这些分析和阐述虽还不完整、不系统，但在当时已从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的问题。

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各地党组织和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同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英勇无畏的武装斗争。但这时的党中央仍强调城市中心、工人运动的决定意义，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偏向，致使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武装起义大部分先后遭到失败。而有的起义队伍退却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虽处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仍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王德三同志在发言中突破"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出发，确认"游击战争"，"是今后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出路"。

党的"六大"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八七"会议以后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特别是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大会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德三同志的发言对大会任务的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选自《党史月刊》91 年 3 期，作者：刘毅）

井冈山会师

背景介绍

1928 年 1 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湘南地区举行了"年关暴动"（即"湘南暴动"）。由于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湘、粤两省敌军向湘南进攻，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 3 月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与此同时，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于 1928 年 3 月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指责前委"太右"，烧杀太少。取消前委，改组为师委，调任毛泽东为师长，强令工农革命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致使湘赣边界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毛泽东率领的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得悉敌军追击向井冈山转移的湘南起义部队和农军的消息，随即率军支援。4 月中旬，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 2000 多人及湘南农军 8000 多人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 1000 多人，先后到达井冈山根据地的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胜利会师。

5 月 4 日，在砻市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一个师六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共约1万多人。

材料：

- 毛泽东、朱德砻市会师
- 朱毛井冈山会师亲历记

材料一　毛泽东、朱德砻市会师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2千多人，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下，突破敌人的封锁，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到达了宁冈砻市。

毛泽东听说朱德已经安全来到砻市，住在龙江书院，心里非常高兴。他不顾征途的辛劳，马上邀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满心欢喜地朝龙江书院走去。还未到门前石桥，朱德就偕同陈毅、王尔琢等主要干部出门迎接。毛泽东远远地看见了他们，一边微笑着招手，一边加快了脚步。朱德、陈毅等同志一看到毛泽东，也微笑着招手，赶紧抢前几步，笑呵呵把手伸向毛泽东。就在这一瞬间，毛泽东、朱德两双扭转乾坤的巨手，便亲切地、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毛泽东和朱德的手，握得那么紧，那么热烈，那么的深情，给所有在场的同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两双紧紧相握的巨手，概括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记载了朱德找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紧跟着毛泽东，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光辉篇章。

毛泽东走进龙江书院，就同朱德一起来到了文星阁。在这里，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次长时间亲切交谈，商讨了建军的有关问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决定在“五四”纪念日召开庆祝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

（选自《革命文物》77年6期）

材料三　朱毛井冈山会师亲历记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他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相机也同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何长工和我当初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我们俩又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先后两次下山联系，三次见到朱德和陈毅等。第一次是1927年10月上旬从井冈山出发，到达长沙同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根据省委指示，他又绕道粤北，于12月中旬辗转到达广州。由于赶上广州起义，湘赣两省敌军大都向广东集中，镇压起义。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到了韶关。不意在澡塘洗澡时从两个敌兵的对话中，得到了朱德在犁铺头的消息。老何便星夜赶往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还有蔡协民和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

何长工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第一次见到朱德、陈毅等，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下旬。何长工向朱德报告了来意，并将朱德也正要找毛泽东、已派毛泽覃（毛泽东胞弟）去井冈山联系和将要举行湘南暴动的消息，于1928年1月上旬带回了井冈山。

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遂于1928年3月上旬，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上山，一路由何长工带领二团（即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经彭公庙向资兴前进；一路是毛泽东亲率一团作为左翼，入桂东、汝城之间，那时我正在一团任副连长（即副大队长）。当时的背景是不令毛泽东乐观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连续派来代表周鲁、杜修经等，批评毛泽东右了，即不执行所谓“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大烧大杀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见，并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怎奈两委代表态度傲慢，不予理睬。毛泽东很生气，在部队集合队前讲话时他气愤地说道：“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我们这次下湘南要大烧（房子）大杀！……”果然在从遂川撤回井冈山向湘南出发时，沿途写的标语都是“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真是一片烧杀的气氛。当时我们都疑虑重重，觉得中国的革命这样烧杀下去能够成功吗？但谁也不敢流露真言，否则就有被梭标杀死的可能。当时子弹奇缺，为节省子弹平常杀人时多用梭标执行。但一些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严重的同志却不以为然，在经过酃县、中村镇到桂东的路上，连烧了几把大火。到了桂东，毛泽东专意看了看八面山，这是他率部上井冈山后经常提到的地方。八面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地跨湘赣粤，距广东东江和潮汕海口较近，东江地区有革命基础，也可以取得海外联系。这里地形地势险要，也是个适于军事割据，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在桂东得知朱德率湘南暴动的部队已经离开，便决定原路返回，也为朱德的部队断后掩护。当部队回到中村镇时，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了，那正是我们部队去桂东时自己烧掉的。面对一片断壁余烬的惨状，毛泽东就以这一事实教育大家，他说：“你们看，我们比兔子还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我们竟把自己的窝都给烧掉了！”这使一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同志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途中获悉何长工已回到彭公庙，毛

泽东指示，要他立即撤回井冈山，由毛泽东率一团在后掩护朱德。

这次长工同志带领二团行动比较顺利，到达资兴附近时，就碰到朱德的一支部队，即以邓允庭为师长的第7师。两军合并统一指挥，掩护朱德率领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在经旧县滁口时同范石生的第16军遭遇后，迅速北撤摆脱了范部的追击。北撤中意外地在资兴附近遇到陈毅率领部分暴动农军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同志，由郴州退到这里，他们共同商议到资兴以北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无奈湘南特委的负责同志"左"得厉害，拒不上山，也因井冈山是江西省地区，不愿离开湖南，不久便被敌人包围残酷杀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彭公庙，何长工接到毛泽东要他撤回井冈山的指示，遂同陈毅率领部队到达酃县，在沔渡就见到了朱德和他率领的部队。会面后，朱德急忙问到毛泽东的情况，何长工一一向朱德作了报告，吃过饭便先足回到宁冈，为两军会师作准备工作去了。湘南暴动组建的部队经过茶陵县随后也来到了宁冈。

二次下山，何长工一会陈毅，二见朱德，时间相近，都在4月中下旬。4月24日，何长工率二团回到砻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等率领部分直系部队也进山来到砻市。我们到达沔渡时，得到朱德业已上山的消息，时隔两三天，我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赶回砻市，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进山来。当时我听说有的部队开始不愿意进山，后经朱德、陈毅等再三做工作，而且朱、陈率先进了山，主力部队便随后跟来了。但朱德并未去茶陵，而是经酃县的沔渡直接上山的。

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三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都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见和其所属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师。毛泽东率一团在资兴的龙溪洞与肖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再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用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三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一团团部和一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不到一个月，仅一团就同这支收容的部队相遇两次，这种偶然的相会在当时是经常出现的。像这样，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是否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决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一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说就是1928年的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的记得，这天天气很好，砻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地热闹。就在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砻市东边广场即红四军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11师师长，朱德兼第10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显得非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既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却并不喜欢带枪，这倒很有意思，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选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作者：陈士榘　刘恩营整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井冈山《土地法》

背景介绍

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首先，着手恢复、整顿和建立边界各级地方党组织，加强对工农革命军和边界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建设。与此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并在茶陵、宁冈、永新、莲花等县相继建立了工农兵政府。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部队正式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井冈山会师与红四军的建立，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革命根据地。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提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与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选举毛泽东为书记。这次会议有力地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从四月到七月，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打败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尤其是六月龙源口大捷，歼敌一千余人，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到一九二八年七月，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和遂川、酃县、安福、吉安各一部。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造成了八月失败。毛泽东领导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十二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同月，毛泽东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经过艰苦奋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材料：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井冈山土地法

材料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起义军向湘赣边界进发。开始走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经过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使工农革命军成为执行共产党革命政治任务的工具。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10月7日，工农革命军一部到达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发动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恢复和建立地方与军队中党的组织，坚持了长期的斗争。1927年11月中旬，乘湘桂军阀混战，边界各县守敌空虚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派宛希先率部向茶陵游击，占领了茶陵县城，11月下旬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28年1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大坑打败了肖家壁的靖卫团，乘胜占领遂川县城，于1月下旬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农民王次淳为工农兵政府主席。2月中旬，毛泽东率部打宁冈新城，活捉国民党宁冈县县长张开阳，俘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支，并于2月下旬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农民文根宗为工农兵政府主席。工农革命军打到哪里，就在那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共产党的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建立了茶陵县委、遂川县委、宁冈县委、永新县委，以及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前委和万安县委也发生了联系。同时，还在永新、遂川、宁冈、茶陵建立赤卫大队，区、乡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3月中旬，酃县也建立了赤卫大队。并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进行改造。把袁、王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徐彦刚任参谋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扩大到1500余人。这样，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地建立起来了。

从1928年5月起，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5、6月先后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战斗的胜利，三次占领永新县城。根据地有很大扩展，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5月在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的队伍有很大发展。5月20日在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

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红军两度冒进湘南，造成根据地3月和8月的两次失败。为了挽救8月失败

的形势，夺回失地，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亲往湘南迎回井冈山后，于9月13日一战遂川，攻占遂川县城。10月1日二战坳头垅，收复宁冈全县。11月9日三战新城和龙源口，进占永新县。三战三捷，收复了边界的大部分失地，造成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的南北狭长的区域，使边界割据又重新恢复。

为了总结湘赣边界一年来的斗争经验，10月25日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边界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进一步巩固边界根据地。大会选举了第二届特委委员，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11月间，根据中央指示，重新组织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一领导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14日，红四军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军委委员。朱德任书记。会后，红四军进行月余冬季大整训，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这时，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从湘鄂赣边转战到井冈山，12月10日在宁冈同红四军会师。两军会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武装斗争的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是同土地革命运动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广东海陆丰地区开始的。随后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陆续展开。其中以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比较好。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斗争，主要是在1927年冬至1928年冬，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开展起来的。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先是打土豪、斗恶霸、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农民组织；同时进行社会调查，摸清土地占有情况和农村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于1928年2月新城大捷后，在宁冈大陇等地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分田。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边界出现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宁冈全县，永新、莲花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都普遍分了田。10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一年来的土地斗争经验，于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但由于经验不足和受中共中央过“左”政策的影响，这个土地法存在三个原则错误：(1)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2)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3)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它在土地革命史上却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此后的土地法，大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不断进行修订而成的。

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土地政策作了原则性的正确决定：第一、改正了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规定为“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第二、贫农、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第三、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第四、对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而区别对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但要防止富农夺取领导权。在贫农与富农斗争时，绝不能对富农有让步。六大的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但还存在若干缺点、错误，如对富农和商人的政策没有明确地具体规定；对豪绅地主继续采取“杀戮政策”；主张土地公有。虽然有这些缺点、错误，但它对土地政策的原则规定，为各个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依据。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井冈山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

(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

(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

(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

(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知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15%;二、10%;三、5%。以上三种办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开会,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有:张静江、李烈钧、蔡元培、朱培德、何应钦、宋子文、于右任、邵力子、陈果夫、蒋介石、李石曾、丁惟汾、谭延闿、郭春涛、李宗仁等31人。

这次全会,是对国民党一大和二届三中会会的全面背叛。全会由执、监两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负责审查宁、汉双方之决议案。审查的主要原则是:"(一)凡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二)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

这次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

(一)关于整理党务问题。在《整理各地党务案》中规定: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在《各委员依次递补案》中,决定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夏曦、韩麟符、高语罕、江浩、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邓演达和已故的李大钊、朱季恂、路友于等人的党籍、职务。停止徐谦、陈其瑗、邓懋修、谢晋等人的职务。在《制止共产党阴谋案》中,决定停止联俄政策。

(二)关于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问题。会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等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以戮斌等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等12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郭春涛等4人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分别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并选出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会委员原定9名,余4名额留待胡汉民等归国补选)。在《改组中央党部案》中,还以"妨碍本党代表国民之利益",易受共产党利用为理由,决定取消原中央党部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个部,另设民众训练委员会;并以蒋介石为组织部长。在《政治委员会议改组案》中,决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仍保留中央政策会议及各地的分会,缩小四个政治分会的职权,以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辖两广地区;以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辖两湖地区;以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辖豫、陕、甘三省;以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辖晋、察、绥三省。其他地区由中央直接指导。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国民党各实力派割地自雄的现状。会议之后,蒋介石还于3月17日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三)关于改组国民政府问题。在《改组国民政府案》中规定:国民政府的任务:"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据2月13日通过公布的《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其中5人至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会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内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同时,还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掌管全国海、陆、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总司令是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而特任的,凡属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负责"。据此议案和组织法规定,会议推举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李宗仁、白宗禧等73人为委员,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为其实行专制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材料：

- 蒋介石致开会词
-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材料一 蒋介石致开会词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各位委员：

今天是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的第一天。总理去世已经三年，本党改组亦已四年，而总理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于今一点也没做到。死了的同志，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总算有数万之多。国民革命军势力已达到黄河以北，在中国本土内，在本党国民政府治下的有十六省。可是北方的残余军阀尚占据北京，我们想实现总理的主义与政策，但至今还不能实现。我们做党员的非常之惭愧，我们对于总理、对国家、对一班已经死了的同志，都抱着不安。但我们为何不能实行三民主义，革命为何不能成功，残余军阀为何还能盘据在北京呢？各位委员及来宾都知道完全因为共产党在本党内破坏、操纵，使本党分裂，直到今日才能团结起来，来开今天的四次全体会议。从前是共产党来妨害我们的革命及本党的主义，我们已经晓得了他们的阴谋，把他们推翻了。至今纯粹的忠实同志，绝无其他参杂其间来开今天的会，可以说今天的会是本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会。

以后我们的唯一工作，就是会开成后，希望能够遵照总理的遗嘱，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这都在我们身上去做。此外，我们本身上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亦在我们本会身上。以后工作，尽在今天开始进行。希望第三次代表大会与全国国民会议由此成功，希望总理遗嘱由此实现。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开会很大的责任，也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但是，我们要达到使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的成功，全凭全体中央委员领导一班同志去做，而惟一的方法，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我们不仅反对他的主张，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至于我们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总要认定总理的建国大纲为最高原则，唤起国民，团结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同志，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着，以国民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国民革命。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倘若共产党仍然存在，他们的理论与方法还未清除，我相信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国民革命仍旧不能成功。所以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有坚定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此一点须注意。为什么要消灭共产党，因为他破坏本党的国民革命，所以要反对他，消灭他。但对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做军阀的后盾来破坏我们革命势力的，我们仍然是同反抗俄国的一样来反对他。今天是四次全体会议开会的第一天，希望本党从此切实地将总理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实行。这是今天最大的意义，也是最大的目的，今天开会还有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本党并不会因共产党离间而灭亡，而且还能团结起来，共同一致来领导国民革命，整理本党的理论与方法，使革命前途放一光明。这是兄弟的一点感想，也就是安慰总理在天之灵。希望各位同志同心协力，促成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国民会议，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

（摘自《革命文献》台北书局）

材料二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中国民族，为世界民族中文化最古而贡献最大之民族。人口之数量，在前两世纪占全世界人口之半数以上。此一百年来，因文化落后与经济落后，受欧洲帝国主义东侵之压迫，日趋于衰微；而中国民族独立自中之革命运动，亦即与帝国主义东侵之历史相因而起。是以此一百年间，在形式上为中国民族势力衰颓之时代，而五千年文化民族生命之复兴的努力，亦即在此衰颓堕落之时代中不断的继续前进，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国民革命，即领导中国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救国运动，而从事于革命建国之伟大的努力也。

此一百年间，中国革命运动随时代之进展变化，而时有变迁。然而其唯一的精神绝无二致者，则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要求是也。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综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与进步，其政治、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是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

过去百余年间，由生产的进步与民族的发展变化流转而成之现代的帝国主义，于不断的战争与压迫之中，终至造成十年前之欧洲大战。死于战场者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于瘟疫、饥馑、流离以及宗教的残杀者数千万人。全世界十数万万之民众，无不受此战祸之影响。而最悲惨之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遂发生于战前专制最烈、文化最低、战时受害巨大之俄国，而蔓延于中欧、南欧。集中于俄国之共产党人，踞民族统治之榻，而枕共产之枕，继帝俄南侵之野心贪欲，而变其策略。于是百年来受压迫于帝国主义之亚洲民族间，亦受此强暴的赤色恐怖影响，各民族之崇高而伟大之革命的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的运

动在一时期中，一部分之经过往往失其正确健全之进展，而变为革命的发狂。土耳其与中国，皆经验最深之国民也。

上列各项，皆本党积痛苦之经验，应革命之需要，而确认为今后努力之纲领；亦为达到救国目的，实现本党政纲之必不可少的条件。荦荦大端，特为提示，誓竭全力，导引民众，努力实行。至于其他党纲、党章所已列举之事项，义应遵守，无待赘述。夫人群目的，一曰生存，二曰发展。横尽在宇，竖尽古今，心理从同，蕲向无二。徒以觉有先后，识有偏全，取径有正斜，意量有广狭，遂令和平乐利，猝不可期，而错误创残，复演无尽，积本党改组以来之经验，证以世界一切治乱兴亡之陈迹，益令吾人确信三民主义为综合中国民族数千年历史经验，及全世界最进步之科学的理法而成之人类进化，世界大同之最高指导原则。必须此主义光大发扬于世界，而后世界人类乃可减少无数和不必要之牺牲，实现普遍永久的和平与进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若能奉此主义，彻底指导其政治的、社会的一切施设，则此民族即可发扬无量之活力。而中国之国民革命则更惟有以坚强的自信，刻苦的努力，奋勇迈进，以实现总理遗示吾人之主义，乃足以避免一切错误、盲从、迷旧、迷新之失败；竟革命之功，成凝命之德，那里国民于政轨，奠国基于永固。自今以往，吾党之全体同志，其痛自彻悟，精诚团结，急起直追，于间生死，以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建设世界最大最善最美之中华民国者，解世界人群之大厄，立世界大同之基础。今日之痛苦牺牲，即他日之庄严灿烂。前进！努力前进！

三民主义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次北伐”

背景介绍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1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着各总司令刻日会师幽燕令》。2月9日，蒋介石赴徐州视察后，将原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2月19日，蒋介石又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后来，又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是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四十余军七十万人。其部署：以何应钦为北伐全军总参谋长，留守南京，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三集团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当时奉张的安国军，兵力亦号称百万，其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参加作战兵力约六十万人。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首先，由第一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的第一方面军担任先行，攻击张宗昌所率鲁南及济宁一带的鲁军。4月10日，北伐部队分左右两翼包围攻击鲁军，先后攻占韩庄、枣庄、台儿庄、临城、滕县等地。20日前后到达兖州、济宁之线。第二集团军驻防在山东单、曹各县的冯玉祥所属孙良诚部，以歼灭孙传芳部为目的。4月10日向巨野，郓城、嘉祥、汶上、宁阳攻击前进。15日占领了巨野；16日又占领济宁，给惊慌后撤的孙军以重创。20日，先后克复兖州、宁阳，基本上解决了津浦线上的孙军。自此，蒋冯两军一从鲁南北进，一从鲁西向鲁东北开进，4月22日在泰安会师。

西线，北伐部队打垮了张、孙两军主力，迫使对第三集团军阎部发动三路进攻的奉军转为防御。张作霖为挽救危局，急忙再调吴俊陞军星夜入关，加强防御。以德州、保定为第一线，以马厂、长辛店为第二线，据守顽抗。4月29日，第一集团军贺耀祖、刘峙部在泰安以北围歼鲁军，陈调元军亦截断胶济线，第二集团军孙良诚、方振武部抵达济南近郊，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30日，张宗昌弃城逃往德州。孙传芳也率残军落荒北走。5月1日，北伐部队进入济南。

惨案“济南惨案”发生后，5月12日，南京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对日继续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接着，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决定退出北京。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即呈请委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6月8日，北京各界推代表欢迎商震入城接收。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以商震为省政府主席，并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

材料：

- 完成北伐
- 捷足后登

材料一　完成北伐

第四集团军的编制是直辖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等基本部队，以及唐部改编的各军。我既担任总司令，白崇禧也奉派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四月中旬，整编就绪，乃由白崇禧率领李品仙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

那时，北伐战事已接近尾声。（北洋军阀中所余的唯一实力派张作霖，已无心恋战，华北传檄可定。）先是，当我军于十六年底发动西征时，孙传芳残部仍在津浦线蠢动，有乘我西征时向南京发动反攻模样。军事委员会为减少后顾之忧，乃决定同时命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循津浦线继续北上。十月中旬，何应钦部遂向徐、蚌及淮河两岸发动攻势，并电约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会攻孙军。

孙军一经接触即向北溃退。十一月十六日我第一路军遂克复蚌埠。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向孙传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双方相持经月，我第一路军卒于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徐州，俘获甚众。直至十七年春初，蒋总司令复职，四个集团军重行部署之后，才继续发动攻势。

完成北伐的最后阶段的战略部署，大体上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

此时敌军应战的策略，系以张宗昌的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据守津浦线，以阻截我第一集团军的北进。奉军主力则后撤，以缩短战线，并以保定为轴心，向西线集中，拟乘我第四集团军尚未到达正定时，一举将我突出的第三集团军包围歼灭，然后回师截击其他各路革命军，以达其各个击破的战略目的。

我军攻势系于十七年四月中旬发动，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方振武两军于五月二日克复济南。孰知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竟出兵阻扰，围攻济南。蒋总司令不欲与日军扩大冲突，乃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福田师团部交涉，希望和缓此一严重局面，不料蔡等竟为日军所枪杀。我军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围。日军旋在济南城恣意捕杀平民，遭难者数千人，酿成“五三”济南惨案。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战领沧州、德州，因之颇受稽延。时我三、四两集团军已克京、津，第一集团军遂未续进。

攻势发动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冯军既无意急进，我第四集团军尚远在豫南，奉军乃是乘隙实行对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的包围。五月中旬，阎部几陷入三面被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部之危。冯氏此项通令，后来在北伐军中传为笑谈。因在向敌人发动总攻时，“擅自前进者，枪决！”实是骇人听闻。

冯玉祥见友军危难而不救，实在出于意气用事，欲报阎锡山的旧恨。原来当民国十四年冬，冯军在南口战败西撤时，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因而冯氏怀恨在心，得机乃一泄私愤。

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我军即北势追击，于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并向北京挺进。

我第四集团军原定于四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惟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编）、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奉荣）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后，乃沿京汉路直捣北京。第三集团军也于六月一日占领宣化、花园，向怀来追击。第二集团军也向高阳、雄县、永清、固安、河间挺进。第一集团军同时占领沧州。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孙传芳知大势已去，乃于六月三日通电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革命军投诚。张作霖不敢恋战，于孙氏下野的次日，偕吴俊陞等文武官员出关，车至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佐预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军仍由“少帅”张学良统率，继续向关外撤退。六月八日我军遂进占北京。六月十一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

唯此时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中央外，尚有三万人稽留于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撤入东北，但是奉方因宗昌部队纪律废驰，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宗昌所部乃麇集于滦东一带，要求我军收编，同时准备作困兽斗。此时蒋总司令与我已抵北平，知该部已无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逞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蹶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捷足后登

五月间，阎、冯在石家庄会议决定：冯担任京汉铁路以东地区，阎担任铁路以西地区，并肩前进。当阎军打到离保定不远的方顺桥车站附近时，战事进入紧张阶段。阎军伤亡惨重，要求韩复榘向前推进以牵制敌军，解阎部之危局，但韩忽然接冯密令，率部撤向石家庄。使阎军右侧背受到敌军威胁。这实际上是冯对阎在南口战役时对冯恩将仇报的报复。因此，当阎军受奉军攻击，保定方面告急时，冯以阎事先的“关照”为口实，按兵不救。后由桂军开上去解救了阎部之危局。可见，“北伐”过程中，新军阀之间已是矛盾重重了。但冯的这一部署，却给了阎后来独霸河北和京、津两市的大好机会。韩复榘奉令后撤之后，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也进至石家庄。冯见阎军占保定后欲进取京、津。急忙又令韩复榘部急速北进，企图抢先占领北京。

冯为了鼓励士气，迅速进军，曾效法管仲作歌要士兵唱着进军。

“北伐”迅速向前推进。孙传芳看到大势已去，乃于六月三日通电下野。所部由郑俊彦率领向国民党军投诚。张作霖不敢恋战，于六月二日发表出关通电，并于孙传芳下野的当日夜间，悄悄离开北京，逃回东北。张作霖所乘列车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预埋炸药包炸死。关内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陆续向关外撤退。

当国民党军即将占领京、津之际，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看到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已是大势所趋，决心“换马”，即抛弃北洋政府，而支持南京政府。借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问题，谴责日本，企图削弱日本在华的势力。而这期间南京政府加强了对美国的外交活动，积极争取美国的支持。五月十七日，美国驻华领事泼来司负责奉美国政府之命，出面调解“中日争端”。当天，美国人在济南声明：“为保持东亚和平，禁止日军在青岛登陆。”五月十七、十八两日，日本先后将日本政府的《觉书》(即备忘录或照会)分别交给北京、南京政府，扬言进行武力干涉。北京政府于五月二十一日答复日本政府的《觉书》时指出：请日本政府尊重中国主权，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同时接受日本的要求，拟撤回东北。南京政府于五月二十四日也发表了一份答复日本《觉书》照会，措词比北京政府还要软弱。这时，美、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制止日本武力干涉，也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保护侨民”，也表示准备动用武力。因而制止了日本在京、津地区的武装干涉。

五月三十日，蒋曾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蒋与阎会晤时，却背着冯玉祥、李宗仁等与阎秘密达成了政治交易。即蒋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以争取阎对蒋的“统一”领导的支持。六月二日，蒋又返回新乡与冯会晤。借口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上同意蒋的安排，但内心颇不愉快。北京的“上层社会和外交使团”，对蒋介石其人不熟悉。尚无感情，向来不喜欢冯玉祥。他们比较欢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

虽然蒋已任命阎接收北京、天津，但冯却认为自古以来攻城掠地总以“先入关者为王”。因此，冯令其先锋韩复榘自彰德率二万余人，兼程“追击敌军”，令三昼夜，徒步行程八百里，真乃急行如飞。

当韩复榘部两万余人到达南苑后，阎锡山派遣的先锋部队徐永昌部尚未抵卢沟桥。韩复榘不失时机地选拔三百余精干人员，乘汽车抢先入北京，但是，王士珍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却以蒋介石已指令阎部第三集团军接收北京等理由，拒绝韩部接收北京，韩部三百余人只得又撤回南苑。韩愤愤不平，在见到治安维持会所派代表和新闻记者时，正是怒形于色，牢骚满腹。

老奸巨滑的阎锡山除了和蒋介石的秘密政治交易之外，早已向北京上层社会和洋大人方面打通了“关节”。

阎锡山事先已派人与外国使团、北京商会等方面取得联系，特别是与日本驻屯军进行了勾结。日军驻屯军司令新井担保“阎军如果占领保定，保证北京、天津不用再放一枪，垂手可得”。又通过新井的支持，南桂馨与溃退到天津附近的张宗昌等部取得联系，委任了各种名义。南借日本电台与阎不断取得联系。日本使馆参赞崛义贵于六月七日对上海《新闻报》记者的谈话中，也透漏出日本使团对阎部入京“尤为满意”。

当张作霖的军队从北京撤退时，留下鲍毓麟一旅维持治安，以五国公使(外交团)和商会作保，等阎锡山部接收北京后，保证鲍旅安全返奉。

六月四日上午八时，以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为首的北京临时维持会正式成立。同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六月六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表宣言，全市悬挂国民党旗。

六月八日，阎锡山部商震、张荫梧军开进北京城，分别驻扎在天坛、旃坛寺等处。同一天，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职，六月九日，阎锡山部正式接收北京城防，北京临时维持会宣告撤消。

六月十五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到此时为止，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个政权覆灭了，尚存在于东北的奉系政权，属于地方性政权，因此，南京蒋记中央政府宣告了完成“统一”。

六月二十日，南京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设北平政治分会。

国民党政府四个集团军的联合“北伐”，至此基本结

束，此后滦河一带虽有围歼张宗昌残部的战争，但已属余波了。

（摘自《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

济南惨案

背景介绍

一九二八年五月，当北伐部队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4月19日，日本紧急临时内阁会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案》。同日，第六师团五千人海运青岛；并电令天津日本驻屯军三个中队，沿津浦路南下。于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便跟着发生。

5月3日，日军向刚进入济南的北伐部队挑衅，肆意屠杀中国军民，甚至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将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捆绑毒打。蔡提出抗议，被日军割去耳鼻；蔡大义凛然，继续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人全部被日军残杀，其状惨不忍睹。接着，日军又转到外交部办公处行凶，部长黄郛事先避去，日军遂烧毁办公处。当晚，还用大炮轰击北伐部队。7日，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还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北伐部队有关军事长官；在日军前解除对抗日军之军队的武装；北伐部队撤离济南及胶济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外等等，限十二小时内答复。8日，福田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复令日军炮击济南城，炮火延烧千余家。李延年等部被迫自卫反击，奋战三昼夜；5月11日济南陷落。据事后调查，中国军民死亡六千一百二十三人，伤一千七百余人，财产损失严重。

日军任意残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也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严正谴责。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仅留第一军李延年和第四十一军邓殷藩所部两个团驻守济南。

材料：

- 五月三日大屠杀之详情
- 蒋介石、黄郛情况报告

材料一　五月三日大屠杀之详情

（甲）枪杀军民之情况　五月三日晨商家仍照常营业，尚显出太国景象之色彩。不料九时许，我方第四军宣传员在济南魏家庄粘贴标语，日兵竟无理阻挠，正当双方争执时，日兵大队蜂拥而至，直至开枪射击，伤亡数人。同时复有一徒手士兵行经日警备区域，因言语不通而发生误会之冲突，日兵又开枪将其射杀。各地日兵闻枪声起，乃纷纷放枪乱射，一时秩序大乱，日兵遂乘此机会，架炮包围我方驻扎牌照税局之革命军一营，勒迫缴械，该营恐糜烂全市，且无命令抵御，故不愿与之抵抗，日兵遂将该营枪械完全抢掠，并将全营人马掳去，复鸣炮南行，又将南仁义里与五大马路东首之革命军小部分，包围缴械掳去。至是更继续开机关枪向我方射击，凡遇中国人，不论军民即开枪乱杀，一时残酷伤枕藉，尸体满街，工人商贩学生兵士等牺牲于此役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者达一千人以上。入晚更炮声隆隆不绝，商埠附近房屋炸毁焚烧者不知凡几，且开炮轰毁我无线电台及新城兵工厂等建筑，烟火冲天，大劫遂至。蒋总司令方卫戍司令，见日兵如此蛮横无状，乃下令一律停止还枪，勿之理会，并即派熊式辉师长等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以免荼毒地方。又由驻济美德英各领事出任调停，然日兵仍为所欲为，继续开枪向我方扫射不已。外交部长黄郛赴日领事馆交涉停战，反被日军扣留。旋出馆急返外交部临时办公处，又被日兵一大队将该所包围搜索，幸黄部长闻警避去，日兵无所获，只勒令黄之卫队缴械，其后乃纵火焚烧该处而去。

（乙）惨杀我军交涉叽的蛮状　五月二日，总部移驻济南，各军均已驻城乡内外，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则寓津浦宾馆，受战地政务委员会命，筹备接收济南各机关事宜，翌晨三日，蔡即支配人员分头四出，本人同时受命往就交涉员职，即于上午八时许约集同志张某谭某等同赴交署，迨十一时许，中日遽发生冲突事件，蔡等在署，军书帝午，聆及枪炮间作，知有事变，初不之理，直至下午三时，方在署随意治餐，且展设行军铺以备休息，入晚枪声益紧，蔡等仍持镇静态度，相率息灯就睡，迨蔡与署员相继熟睡，而门外忽有喧嚷之声，传达见日兵约三十人荷枪来袭，即以入告，蔡谓深夜可不灾之应，而日兵等已破户直入，且至内室，遍以手电宁肯照耀。蔡本谙日语，蔡惊起问何所为，日兵称系来缴械者，蔡答以此间系交涉署，吾即交涉员，乃系文职，并无武器，日兵不之理。同时即驱起睡者，率加紫缚，以四人为一组，是日留署者计十六人，外有勤务兵炊夫等四人，则合五组缚之。蔡加诘责，日兵不理，而日兵已翻箱倒箧，搜索一切，并无所得。维时署员等咸动奇愤，互相争持，而日兵即以枪上刺刀向群人头面乱斫，咸受重伤，日兵肆搜之后，未置何词，即取蔡之公事皮包同去，少时复来，似有一官长在暗隅指挥。蔡聆日兵之语，即告群人曰：日兵此来，将裸缚而尽毙我等也。于是群情骇愤，相与挣扎对抗，日兵再用刀狂舞乱斫，蔡之耳鼻悉被割去，张某亦被刺刀割其双耳，痛号彻天，余人各有创伤。于是日兵果重行分缚群人，一一裸之。即以第一组之四人，押赴空地，蔡即在第一组之内也。"既至空庭，排枪齐发，饮弹尽亡！盖各人所受不止一枪，乃更及第二三组，其时勤务兵有名张汉儒者，

会得隙脱缚，因密语同组之人，共自暗隅越墙图遁，署中入夜早无灯火，日兵虽有电筒，多赴空庭，故屋内人逃未之先觉，及越墙之际，骤为日兵所觉，又开排枪，张汉儒时已攀登垣际，腰部受弹擦过，幸未重伤，而墙蒺藜刺手，流血负痛逃出，得免一死。即驰赴总部报告目击之惨状。

与蔡交涉员同时殉难已查得姓名者有：参议张鸿渐，科长熊道存、谭显章、黎煜基，庶务张麟书，书记王炳潭，办事员周惠和、袁家逵、刘文鼎、姚成仁、姚成义、康某，及勤务兵王立泰等。

（摘自《近代史资料》73辑）

材料二　蒋介石、黄郛情况报告

蒋介石的报告

蒋中正、黄郛四日下午二时，由济南拍来无线电，分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及各委员，报告日本军队在济南向我国军民横加暴行经过。略谓此次肇事原因，系一华兵由日军自行划定之防区附近经过，日军即开枪将该兵击毙，旋派大部军队至交涉公署，蜂拥入内，将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员蔡公时，用麻绳捆绑，割去耳鼻，继开枪将蔡击毙，并纵火焚烧交涉公署。事后又转往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黄郛闻耗避去，彼等穷搜不获，遂纵火又将外长办公处烧去。日军于此种暴行之下，一面以有组织之枪炮，向我军民扫射，我国军民死者不计其数；一面大部军队，至我国军驻扎直喋，勒令缴械，此三日上午事。至晚我国高级军事长官，与日本高级军事长官，会商救济办法，正磋商间，日军又向我军用大炮轰击，将无线电轰倒，炮声隆隆，至发电时尚未停止。此次事变，日军竟施此种凶顽至极之暴行，我国军队为正当防御计，当然不得不开枪抵御。综计我国军民死伤人数，实在一千余名以上，黄外长业已拍电田中义一，提出特别严重抗议，内容约分三段：（一）在济日军向华方挑衅之原因。（二）日军惨杀战地政委会交涉员蔡公时之经过。（三）结论，谓日军此种事件不但大反国际条约，抑且违背万国公法，为天道不容。应请迅速制止日军无理擅以枪炮向中国军民轰击之暴行，并立即训令撤退破坏国际条约之在鲁日本军队。关于日军逞凶之种种问题，应从根本讨论，用正当手续解决云云。

外交部长黄郛的报告

外长黄郛八日向各报记者报告济南事变经过，谓我军于上月三十日午后占领济南。蒋总司令于一日夜到济，予因事先得蒋总司令电约，到徐一行，商洽各项要公。至徐蒋已前进，乃追踪往，至二日晚十时半赶到济南，维时已深夜，乃寓商埠津浦路局办公处，予之同行诸君及卫队二十余人，均寓于此。蒋主席作宾，率战委会诸人来徐，同车北上，故多同寓于此。三日晨入城，晤蒋总司令，沿途商铺多已复业，景象极好。及抵总部，询悉日兵在商埠所布沙包铁网等物，已于昨夜撤去。谈顷，适日本驻济总领事西田，驻在武官酒井及天津派来之驻屯军队长小泉与其参谋河野等，来总部谒蒋，谈话颇洽，小泉队长并辞行云，拟即日率队返津。因津浦北段不通，故已请胶济局备车，将由青岛返天津等语。予以我军入济两日，中外相安，正深欣慰。不料至十一时左右，由总部出城返寓，途中忽闻枪声四起，路人奔走相告，谓日兵已到处对我方军民射击。予车冲过火线，返抵寓所。是日步枪机枪声，时杂以炮声，断续发放，各处交通断绝，但是得电话报告，谓路上被击毙者甚多。予在路局所设之临时办公处，其短栅栏外，亦有日兵团立，予正在用电话与各方面筹商，先行止射，再查实况办法，而栅栏外之日兵已突向予寓所，猛烈射击两次，一拥而入，寓中数十人麇集，全场大乱，窗上弹痕极多，点点可数，予乃上楼开窗，劝令停射，然后下楼至庭园，与其宪兵福田增一谈，出示予之名片，燕说明予之职位，及此处系予之临时办公处，请其考量，惟彼声称有枪弹发自予寓，要求将卫队军械交出，予不之许，并告以予之卫兵，自始即经告诫，不许出外，不许放枪，其纯属误会无疑，于是富田宪兵要求入室打电话请示，彼遂乘间察视一周，见卫队枪支搭架聚于一处，先有刘队长负责，日宪兵旅亦退出。未几日宪兵富田，复持河野参谋名片来谓，目下两军互击，联络全断，恐酿大变，拟邀我面谈办法，同时总司令电话，亦请予就近与日方先商联络方法，方可以谋息火，遂不避邓验，赴正金银行楼上，与日军参谋菊池河野等，商定双方各派两人，沿线巡行，阻止射周全收交，而枪声自此即渐稀少。予复一面由电话与总司令随时商议，知已严令我方官兵不准射击，并限令速与日军所占地域隔离，并由总司令电托与日方交涉。为便利联络计，凡总司令派人往来时，规定一种特定旗号，以资认识，要求日军通饬全线日兵，对此旗号坐车不得加以射击。交涉毕，予又重冒火线入城，至总部已傍晚七时，是夜遂改寓总部。予在津浦局之临时办公处，本在日兵警戒线中，自予行后，日兵即勒令军装人员一律迁出，所存枪支则以保管为名，遂亦携之而去。同时我军小部分驻扎商埠内者，悉被包围，甚至津浦局所属铁路巡警之械，闻亦补缴，现在确数尚未可知。二十日夜十一时，蒋总司令派熊师长式辉再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正在筹商间，突闻炮声及炸弹声甚厉，探原因系日军毁我无线电台而去，守台兵士亦被炸。四日上午八时，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之仆张汉儒，来部报知昨夜十一时，交涉署突来日兵二十余人，将蔡及合署职员十二人，一律捆出枪杀，并将蔡耳鼻割去，张仆乘间越墙逃，日兵射之，肋旁受有弹伤，现在死

者姓名，已托战地政委会外交处调查。五日晨，得电知冯总司令已过泰安，将抵济，予与蒋总司令乃于上午十时乘马赴党家庄迎之，及冯到后，蒋总司令与冯总司令及各路总指挥商定继续渡河北伐事。并由蒋致福田师团长一函，告以我方力顾大局意（其函已另见报载不赘）。又云，此次起衅原因，其说不一，日人方面当然专为有利于日方之宣传，但我方所得某有力之报告，确系日兵先行开枪。现为周密起见，当局已责成卫戌司令部、公安局长、外交次长及历城县长等，分别详查，并极力从事搜集证据，以为异日交涉之根据。此次事变，双方死伤不少，惟我军自总司令严令后，并未还报一枪，而日军仍时时发枪，故我方死伤实多于日方数倍。且因日军在市街开枪，并非野外射击，故毫无抵抗，不及躲避之行人，死伤尤多。现在我军已分别渡河，济南城内仅留相当部队，以维秩序，商埠附近必无两军对峙之形势，至其他各国外侨，幸均平安，而前方将领，尤均一致以继续北伐为重，为持隐忍与镇静态度，故此后事态，或不致扩大。予因在济交涉，究属临时应急办法电报又多阻碍，故于六日晨乘车返都，以便就近兼呈政府继续交涉。惟连日所受精神苦痛，至难言状，而回想在济种种经过，真令人感慨万分。上面所述，仅能言其概要而已。云云。

（摘自《近代史资料选辑》16辑）

皇姑屯事件

背景介绍

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资本势力，伸入东北。这为日本所不能容忍。当南京政府北伐军云集畿近郊时，日本决心抛弃张作霖。

1928年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员黄郛、王正廷分致“觉书”，书明“战事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并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入奉天省城，部队在锦州、榆关一带加紧布防。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5月25日答复日本“觉书”，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亦准备接受日本要求，将奉军撤回东北。5月30日，张作霖在举行军事会议以后向奉军下令总退却。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以不忍“同室操戈，喋京畿”为借口，将中央政务交国务院摄理，率部退出北京。6月3日凌晨乘专车离京。6月4日晨，当专车穿行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老道口交叉点处的桥洞时，被日本预埋的地雷炸死。

张作霖被炸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6月17日，张学良化装秘密回到沈阳，由于张作相等元老扶佐，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他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7月1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并派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络绎不绝。

材料：

- 张作霖被炸皇姑屯
- 我杀死了张作霖
- 炸死张作霖的真相

材料一　张作霖被炸皇姑屯

张雨帅于出关前夕，闻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漏夜谒雨帅，谓万不可在京郊作战，公使团深以为虑，希望顾全大局，引师出关，以待时机。雨帅本已决定出关，当即容纳其意。有人说芳泽是晚谒张，是劝张氏仍镇守北京，日本必为后援，是否事实，不敢揣度。芳泽是我老友，为人和平正直，向主与中国和平亲善，谅不至与军人一般见识，劝张氏据北方独立，以抗南军。惟公使是奉命而行，日军已在济南有阻止南军之举，芳泽又漏夜晋谒，难免外人有此猜疑。有人说，张末了还说，我张作霖决不做吴三桂，我亦不怕死。

第二日，张氏即启程出关，留杨宇霆、张学良等在关内集中师旅，引退出关。张氏行动向守秘密，这次竟一反常例，行程时刻，一律公开，行时且令不必戒严。夜间上车，送行者廖廖。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切记须在日间到达奉天，已露暗示（町野为张作霖顾问甚久，忠于张氏，反对少壮派侵华政策）。张氏不以为意，真是一反向来的举动。人每反常，即非好兆。专车到皇姑屯，尚未天明（是处为京奉与满铁交叉点，由关东军驻守）。关东军大佐河本大作在该处预埋炸弹，等到张氏一节专车经过该处，炸弹爆发，车辆粉碎，张老将就此殉国。然尚有一息，说了一声，这是日本人干的。因无临时救急设备，到府已气绝。吴俊升与雨帅同坐一车厢，同时被难。

张氏坐镇东三省，对付日人，内外并进，刚柔互胀，关东军无所施其技。少壮派恨之入骨，非去之不可，遂以非常手段，致丧其命。

奉天省长臧式毅，以事出非常，大军尚未回沈，地方治安有关，秘不发表，只发表大元帅受伤疗养。日本方面，

大起疑心，本庄夫人及林总领事夫人以慰问为名，突然到府见张五夫人。见帅府一切如常，自内到外，毫无变动，五夫人还盛妆出来招待，看不出一点痕迹，只好请慰问大元帅而归，想见当时布置之周密。等到杨、张两氏将关内奉军完全撤回奉天，始行发丧，日人大为惊异。

日本对东三省久存野心，因张应付得宜，无从寻衅。然关东军对付张老将，煞费苦心，张氏随机应变，应付裕如，关东军亦无可奈何。少壮派恨张氏尤甚，随时想出于暗杀，夺张氏防备素严，无从下手。这次出关，竟一反常例，毫无预备，不理会町野顾问之暗示，遂至遇难，其命也欤？然亦可称为殉国。

闻日军以军纪太弛，拟将河本大作大佐付军法会议惩处，军部以恐摇动军心，请求免议。夫以现役军人、对友邦大员，肆无忌惮，行此非法行动，而犹以摇动军心为庇护，可想那时日本军人之跋扈，日皇亦无法駉。假使张老将坐镇东北，谅不至掀起九一八事变。即使关东军寻衅，必能设法弥缝，使大事化小，似可断言也。

张学良被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继承父业，日本特派重臣伊集院彦吉为吊唁专使（伊与张是老友）以学良的父执自居，劝学良仍以保境安民，继承父志，不必服从中央而易帜，幸而学良怀了国仇家恨，竟不接受。河本暗杀张老将一手，虽是大胆目无法纪的行为，却无意中帮了中国一个忙，使南北即成了统一之局。

后北伐告成，东北易帜，当时劝张老将为大元帅的孙传芳、张宗昌两人，亦先后结果，张宗昌为韩复榘诱至山东，在济南车站枪毙。孙传芳在天津信奉佛教，在居士林一同念佛，被坐在孙后面的施剑翘女士用手枪击中后脑，当场毕命，施女士为施从滨师长（为孙枪毙）之女，声言为父报仇。北洋军阀，从此告终。

（摘自《张作霖被炸皇姑屯》曹汝霖）

材料二　我杀死了张作霖

计划并实行炸死张作霖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上校。只要干掉排日的巨头张作霖，其余的将领都是类同土匪的头目，因此可以挽回日本的势力。

“干掉巨头，我认为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方法。只要杀掉张作霖就行。”河本参谋在其最近的手记这样写着。河本原是直情径行之士，对于奉天军阀的排日气势非常愤慨。

正当此时，由于革命军的北进和日本的劝告，张作霖不得不撤退北京，所以这是干掉张作霖的良好机会。张作霖之下野，不仅为河本参谋所主张，也是村冈司令官以下关东军首脑共同的见解。在中央，川陆相和阿部军务局长等也赞成。

可是，政府的方针似乎要让张作霖回到东北，以保存其势力；而且，最重要的出动京奉沿线的“奉敕命令”也没下达。因此，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将失去杀掉张作霖的最好机会，由之整个东北将再次受到张作霖军阀排日运动的威胁。于是河本遂下定决心，要以独力来实行对张作霖的暗杀。

河本只告诉他的几个亲信，并要他们协助实现这个计划。他派竹下参谋到北京去调查张作霖出发的时间和列车的状况等等；建川少将在北京做武官；田中隆吉上尉也做了很详细的列车编制的调查；他更派人到山海关、锦州等京奉沿线的各要地去侦察。他们所选择的爆炸地点是皇姑屯与沈阳车站（京奉线是奉天车站）之间，满铁线与京奉线交叉的铁桥。

张作霖部也很注意这个交叉点，因此金宪兵中尉便于六月三日面会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少校，要求在交叉点陆桥附近，满铁线堤防上派遣中国兵，但为三谷所拒绝。所以变成铁路桥上是日方的警戒区域，桥下为中国方面的警备区域。又警备陆桥附近的日方负责是独立守备步兵大队中队长东宫上尉，而这个东宫就是爆炸的直接指挥人。

东三省当局在沈阳车站和皇姑屯几乎无立锥之地地排列士兵，以防万一，在这两个车站之间大约一个英里里，配置了五十名左右的骑兵和宪兵。陆桥下面附近，金中尉也带几个宪兵在那里担任警戒。

可是，日方龙山工兵队的一部分，却偷偷地在铁桥脚下装上炸药。同时事先准备了两个中国人，拉至其附近，以他们行动可疑，而予以刺杀，并在死人身上塞进与南方有关系的信，以便令人相信这是南方便衣队所干的勾当。

张作霖的专车，以贵宾车、展览车、餐车、卧铺车为顺序。这时张作霖和吴俊陞、嵯峨少校一起在展览车。列车通过陆桥的瞬间，与轰隆的爆炸声音，黑烟垂直地往空中飞舞，爆炸完全命中。于是，河本所准备的第二、第三预备计划也就成为不必要了。

河本参谋的这个计划和实行，斋藤参谋长和村冈军司令官完全都不知道。但在希望采取军事行动，以解决满蒙悬案，以及要令排日巨头张作霖下野，并埋葬其政治生命这一点，关东军首脑部门实具有一致的见解，同时政府里头的白川陆相、森恪等不少人也赞成他们。所以，实施爆炸的虽然是河本本身，但在其意图，河本与关东军首脑部和白川陆相等陆军的中央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基于这个观点，这个事件可以说是田中内阁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凝聚点。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河本大作）

材料三　炸死张作霖的真相

张作霖刚被炸死时，6月4、5两日，中日双方进行了

共同调查，结果是真相不明。6月12日，陆军省公布了大致如下的公报：

“当张作霖返回奉天之际，中国方面于6月3日提出，拟在京奉、满铁两铁路交叉地点和满铁沿线配置中国宪兵以资警戒的要求。我守备队虽接受了在京奉、满铁交叉点配置宪兵的要求，然而拒绝了在满铁线路上配置宪兵之要求。因而，桥梁系由日本守备队警戒。4日午前3时左右，有三名形迹可疑的中国人企图潜入满铁线路堤岸，当我士兵欲对其进行盘查时，彼等竟欲向我士兵投掷炸弹，因此，我军当即击毙其中二人，另一人逃走。检查尸体时发现炸弹两枚、书信三封，其中一封为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信件之残片，当系南方之便衣队员无疑。4日拂晓时，我方警戒士兵正了望监视中，当京奉线东行列车驶至交叉点时，随着一声爆炸巨响，桥梁附近黑烟与灰尘即冲天而起。”

当事件发生时，中国的报纸自不待言，英文报纸也都报道此事件有日本陆军幕后操纵。不过，无论在日本内地还是在满洲当地，一般都没有想到这一离奇的暗杀事件就是由日本人一手制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东军的嫌疑最大”的传闻，逐渐广泛流传起来。据日后证实，当时两名中国人被杀，另一名逃掉的情节是属实的。致于说他是国民党派遣来的便衣队的说法，则纯属捏造。在爆炸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夜里，关东军的狗腿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抓来了三名吸食鸦片的“浮浪”。把他们带到在奉天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浪人安达陆咸的家里（此人于昭和7年1月在日军进攻锦州时，与大阪每日的茅野特派记者一起作为军队的前导首先进城，与茅野一起被杀）。这三名“浮浪”在附属地内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浴池洗过澡，换上了新衣服，天还没亮就出去了。结果两名在爆炸列车的现场被杀，其中一名侥幸逃跑。据当时担任吉林省长要职，并因办理铁路交涉等事宜，与日本公私各界都有过密切接触的刘哲，对森冈正平领事透露：幸未被害的人后来跑到张学良那里，把事情的原委都揭露出来。所以，张学良对于张大元帅的横死完全是日本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内情，在事件刚发生后就已经完全知道了。但是，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东方道德观念来讲，如果由学良亲口透露出是日本人杀害这一事实的话，会影响到张学良本人与日本直接打交道，所以他就把这一切都埋在内心深处了。

在中国，有的人有嗜好鸦片、海洛因、吗啡的恶习，凡是中毒者多属寡廉鲜耻之徒，他们不顾一切的要把这种麻醉品弄到手。所以，我们在中国任职期间，就曾经利用他们易受金钱诱惑的弱点，成功地把他们当作搜集情报的工具。像上面谈到的三名“浮浪”，就是运用诱饵最典型的事例。我并不是只从中国方面来探察爆炸的真相的。往满铁桥梁下安放炸药的，是当时派往奉天地区的朝鲜军工兵队的一部分人干的，而按电钮的人，就是后来为在华日人所熟知的并被称作“北满移民之父”的已故东宫大佐（当时是奉天独立守备队副官东宫大尉），至于阴谋的策划者，则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这些内幕都是东宫本人在背地里透露给我的。在列车爆炸的时候，和张作霖同坐在一个车厢的顾问嵯峨诚也少佐（华北事变发生后，曾以少将身份充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在唐山任职期间病故），是在受伤后跳下车来的。再从町野竹马顾问在天津中途下车的迹象来看，又像是关东军搞的阴谋。但是，嵯峨毫无所知确属事实。直接策划爆炸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两三个人。当时，现役军人作张顾问的只有土肥原贤二大佐和嵯峨少佐两个人，但是，由于土肥原为人阴险，一般多对他敬而远之；反之，嵯峨为人开朗，所以，在东三省的官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正是由于他在中国享有这种威信，所以，他在关东军的参谋中间声誉也最坏。因此，当策划爆炸列车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以国家大事为重，就是牺牲嵯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从在满洲的时候开始，我就和嵯峨交往很深。昭和12年（1937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我在唐山会晤他的时候，曾问过他从那以后军部对他的印象如何，他苦笑着对我说，现在总算解除了对他的不满和怀疑了。

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主要目的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的死亡而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列车爆炸后，在奉天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几处连续发生的投弹事件，也无一不是为了给日本出兵制造借口。当然，这些都不外乎是关东军的走狗干的勾当。虽然，在旅顺设有关东军司令部，在满铁沿线配置有守备部队，但是按规定平时是不准许随便向关东军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除非突然发生紧急事件。平时需要由关东厅长官向军方司令官提出派兵要求，而在满铁沿线各地，则需要由领事提出派兵要求的时候，才可以采取行动。当列车爆炸和连续发生向侨民会投掷炸弹等事件后，军方就曾多次打电话问领事馆：“需要出兵吗？”“治安工作只靠警察能维持得了吗？”等等。但是，总领事馆始终持冷静态度，完全依靠警察的力量维持附属地内的治安并承担了保护侨民的任务，没有为军方部分参谋策动的出兵阴谋所利用。昭和6年（1931年），以爆破柳条沟铁路为借口，在没有等待总领事馆提出派兵要求的情况下，关东军独自决定出兵的事例，可能就是考虑到避免重演炸死张作霖时的失败教训吧？

（摘自《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三十四人出席了全会。会议首先改选了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推选蒋中正、戴传贤、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孙科、胡汉民为常委。

会议宣称依照孙中山遗教，颁布、训政时期约法，14日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议决：(1)“军政军令必须统一”，“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2)“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内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3)完成“国军”军事统一教育；(4)“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实现总理(孙中山)“化兵为工”的主张；(5)发展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会议案》，规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会由中央执委会推定，凡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并推蒋中正、谭延闿等四十六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全会通过的《政治分会废存案》规定各政治分会限于当年年底一律取消，并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任免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但此案遭到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冯玉祥、李济深指出：二届四中全会对于政治分会已作出保留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的决定，不可以推翻四中全会决议；中央决定分区“剿共”，现在取消政治分会即削弱“剿共”。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政治分会延期至1929年3月15日前取消。

8月15日，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的宣言表明，蒋介石通过这次会议已达到“整理军事”和“实施训政”的预期目的。

材料：

- 蒋介石致词
- 会议经过
- 闭会词

材料一　蒋介石致词

各位同志：

今天是五次全体会议开会的第一天。总理自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以来，将革命与建国的责任交给本党的同志，不幸总理中道逝世，一般后死同志，继续总理的意志与精神，努力奋斗，到今天北伐才得完成，国家也进和于统一。回想自从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七年八月八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就是从五次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现在五次全会的责任比以前更大了！我们要继续总理的精神，实行总理的主义，贯彻总理的主张。要以最诚恳、最忠实的态度来在总理的面前接受总理的遗训，继续努力，共同奋斗。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只有亲爱精诚，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安慰总理在天之灵！我们要继续总理的精神，接受总理的遗训，从此开始工作了。今天中正被委托致词，中正不敏，唯谨以个人所想到的来贡献于全体委员会之前。

材料二　会议经过

第二届第五次全体会议，本由中央常会决定于七月十五日举行。嗣因委员分处各方，未能如期齐集，故展期至八月一日。

八月一日下午三时，在中央会议厅开谈话会，主席谭延闿。决定：(一)本月四日上午八时开预备会；(二)由谈话会将邀请冯、阎、杨三总司令列席五次全会意见提出预备会。

八月四日上午八时，开第一次预备会，主席蒋中正。决议：(一)程潜业经第一四八次常会决议停止职权，应予追认，以候补执行委员缪斌递补。(二)本月七日上午八时，开第二次预备会；(三)提案审查委员会以谭延闿、蒋中正、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五人组之。(四)推王陆一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秘书长。(五)通知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三总司令列席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再电上海各委员从速出席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

八月七日上午八时，开第二次预备会，主席于右任。决议：(一)推谭延闿、蒋中正、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五委员为大会主席团。(二)八月八日上午八时，举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开会式。(三)各种提案分三组审查：第一，党务及民众组：推谭延闿、蒋中正、恩克巴图、丁惟汾、王法勤、周启刚、王乐平、陈嘉祐、缪斌、吴稚晖、李石曾、柳亚子、陈果夫、郭春涛、朱霁青等十五人为审查委员；由谭延闿召集开会。第二，党部与政府之关系及其权责组：推于右任、经亨颐、何香凝、刘守中、黄实、丁超五、陈树人、陈肇英、蔡元培、邵力子、李宗仁、潘云超等十二人为审查委员；由于右任召集开会。第三，政治及军事组：推朱培德、宋子文、析文蔚、戴季陶、李济深、李烈钧、白云梯、何应钦、张静江、李福林、冯玉祥、杨树庄等十二人为审查委员；由戴委陶召集开会。

八月八日上午八时，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全会开会式。

中央委员到者:〔略〕等三四人。观礼者有中央全体职员、各级机关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约四百余人。开会式秩序:(一)开会奏乐;(二)主席团谭延闿、于右任、蒋中正、丁惟汾、戴传贤就席。(三)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四)静默三分钟。(五)于右任恭读总理遗嘱。(六)蒋中正致开会词,其词曰:〔略,见前《开会词》〕。(七)摄影。(八)奏乐。(九)礼成。

九时,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主席谭延闿。议决:(一)中央执行委员递补案。(二)安葬总理案。(三)奖励北伐将士案。(四)蒋委员中正临时提议:对于阵亡将士及本党先烈应抚恤遗族,建立公墓及专祠,并优抚残废兵士案。(五)分组审查提案办法案。(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日期案。(七)本日下午及八月九日均开审查会,十日上午八时继续开正式会议。

八月九日,各组继续开审查会。

八月十日,各组审查未竣,继续开审查会。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主席蒋中正。议决:(一)统一革命理论案。(二)民众运动案。(三)革命青年之培植及救济案。(四)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取缔军政机关人员干涉民众运动案。

下午二时开第三次正式会议,主席蒋中正。议决:(一)上海商业请愿团请愿案。(二)训政时期颁布约法案。(三)训政开始应否设立五院案。(四)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

八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开第四次正式会议,主席蒋中正。议决:(一)中央政治会议案。(二)政治分会存废案。(三)审查会后收到提案及建议案十一项之处理。(四)戴委员季陶临时提议:由常会派定专门负责大员审查编制各种提案。

下午二时,开第五次正式会议,主席蒋中正。议决:(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日期案。(二)政治问题案。(三)党务政治问题其他各案。(四)整理军事案。(五)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六)各种建议案并交常务会议分别处理案。(七)蔡委员元培临时提议:废止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所有反革命及土豪劣绅案件,均归普通司法机关审判案。(八)集中全体中央委员于中央,不得散居各地案。(九)本月十五日上午十时举行闭会式。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各委员齐集中央会议厅,商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全文。十一时半,齐到中央大礼堂举行全会闭会式。中央委员到:〔略〕。列席者:冯玉祥。闭会式之秩序:(1)开会奏乐。(2)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3)主席恭读总理遗嘱。(4)静默三分钟。(5)谭延闿致闭会词,词曰:〔略,见前《闭会词》〕。(6)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读毕,全体呼口号。(7)奏乐。(8)礼成。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三 闭会词

今天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体会议闭会之日。会议期间,自八日起至本日止,共八天。此会之举行,适在国内统一,军事终结,训政开始之顷,世界各国、及国内民众,对于本会皆在严重地注意与热切地希望。同人等出席会议,经过慎密深长之讨论,始有此次的决议,大旨说来,系集合党内同志的意见,并适应人民的需求,慎重决议。凡诸决议,注重原则,而不为详细这规定,因我们要注意到事实;且行政之历程,亦非短时间事;政治的变迁及其运用,要以党的宗旨为依旧,却勿须预为细微之规定,只是本着总理的遗教,定出方针,以全力赴之。这回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皆能化除个人意见,而趋向一致,这是很觉得可以安慰的。闭会之后,一切决议由中央常务委员会督促在政治、军事上负责的人进行;更要全体同志及全国民众共同努力,以求实现。希望大家于此训政时期,同心一德,造成一个安乐的三民主义之国家,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以卓立于世界。延闿承同人委托,敬献勉词。

(摘自《革命文献》台北书局)

东北易帜

背景介绍

1928年6月3日夜,张作霖乘火车出关,6月4日,当专车到达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处的桥洞时,日本关东军事先埋下的炸药爆炸,张作霖身负重伤,送回沈阳后死去。

张作霖死后,他的长子张学良6月17日从北京秘密赶回沈阳,执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

张学良,字汉卿,祖籍辽宁海城,生于1901年。其父张作霖为了使他能继承父业,聘请鸿博名儒,教张学良学习四书五经;聘请博学外人,授以外文与科技。在外国教师的熏陶下,张学良从少年时就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他因不愿意关在室内读书,遂弃文习武。初在沈阳迎军讲武堂学军事,毕业后当了陆军炮兵上校。1919年12月,被任命为奉天暂编第3混成旅第2团团长,第二年10月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晋升陆军少将。1921年秋,他赴日本考察,激发了立志图强的心愿。1922年直奉战争时,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在榆关一带作战得力,从而名声日震,成了他父亲的得力助手。1927年春,他率部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当奉军战败北退时,他下令保存了郑州的军火库,并给国民革命军留下书信一封,以示并无敌意。

张学良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愿意吸收进步思想，凡是有助于巩固张家权势的思想主张，他都愿意听取和尝试，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不甘心做屈从于日本人的奴仆，而要做堂堂正正的东北最高统治者。皇姑屯事件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想摆脱日本的控制，单靠东北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全国的力量，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才能与日本相对抗。为此，张学良同国民党达成默契，一旦张学良归顺国民党中央，即在沈阳设政治分会，以张学良为分会主席，全权统治东三省。6月20日，张学良发表了四项执政声明，即：停止内战，采取睦邻主义外交，冀达共存共荣目的；采取精兵主义，收缩军队；整理财政，免除苛捐杂税。7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称"决不妨碍统一"，同时密电南京政府，说明他目前处境困难，换旗(国民党旗)一事不得不暂缓实行。请国民党军队勿再进攻东北军。7月4日，张学良正式宣誓就任东北保安司令。

此时，日本方面加强了对张学良的工作，8月4日，日本政府派中国通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为名，向张学良施加压力，阻拦他归顺国民党政府。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甚至威胁张学良"我们就是不准你挂(国民党)旗"。与此同时，国民党代表方本仁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到沈阳，劝张学良要及早换旗。东北人民也支持张学良，坚定了他换旗的决心。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第三次赴南京，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18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

1928年2月29日，张学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毅然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30日，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正式任命东北各省行政长官。至此，日本策划的东北独立阴谋彻底破产。

材料：

- 实行易帜
- 国民政府任命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职官
- 张学良艳电

材料一　实行易帜

田中外相召林总领事于9月6日来到东京，向他询问炸死张作霖的事件，并协商今后对满政策。9月24日林返回奉天时，田中又作如下训令：

为确立我在满洲经济活动的基础，应先行开放该地，使日人居住营业，并享有土地利用权。为此，日本也准备放弃治外法权。当前，则以实行大正四(1915)年日中条约规定的在南满居住往来自由及商租权，与张学良进行交涉。(《续对华回忆录》)

同时，关于拖延不决的铁路交涉问题，负责交涉的满铁社长山本也请求田中设法促进。根据山本、张的协定，有关铁路交涉已由8月中旬就任的满铁新理事斋藤良卫负责。然而商谈迄无进展。山本为解决自己经手的铁路交涉问题，向林总领事提出了以缩短商租权的期限，放弃课税权、警察权为让步，与张学良作交易方案。在林返奉以前，山本在满铁总裁宿舍与吉田次官、森政务次官、有田亚洲局长、松冈副总裁就该方案进行了协商，但因森次官反对，山本的方案未能通过。

林总领事返回奉天后，立即开始了交涉，但仍无进展。

此时，为反对延长吉敦线的协约，吉林学生运动高涨。张学良和张作相借口学生运动，继续采取拖延政策，但在其背后仍有张作相与奉天派之间相互牵制的关系。东三省内部与外部政治关系的错综复杂，已很明显。

进入10月后，商租权及铁路问题毫无进展。山本总裁于11月初返回奉天，但几次会商均因保安会强烈反对，未获任何进展。加以张学良借口须得国民政府同意，推托了日方的要求。

大量悬案不能解决，田中外交已面临穷途。对此，田中首相极为焦虑。因为在本(1928)年的11月10日即将举行新天皇即位大典。无论对臣子田中以及日本国家来说，都必须在大典以前将迄无进展的济南撤兵问题、关税问题以及满洲的各种悬案全部予以解决，以加强内阁的政治地位。

已经看出田中内阁趋于衰弱的国内势力，尤其是极端强硬路线的陆军与政敌民政党之间，结成了所谓反田中的奇妙的统一战线，威胁着田中。

特别是对5月济南出兵的善后问题，在两国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困难。国民政府未正式承认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结果，仅1928年6月和7月间，就使日本的贸易损失达1,700万日元。(见关宽治著《满洲事变前史》、《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根据10月1日和3日张群与田中首相在会谈中的决定，自10月19日开始在南京进行了解决济南事件的谈判，在谈判中矢田总领事虽找出与中国方面要求的妥协点，以期结束谈判，但因陆军强调山东驻兵的必要，外务省也因周围的压力，不同意对中国方面的要求让步。国民政府则仍坚持以济南撤兵为先决条件。

为解决上述问题。10月末田中派有田亚洲局长携带致蒋介石的亲笔信赴南京。

有田的提案是以7月间制订的撤销治外法权与土地

所有以及内地杂居为交换条件，因而蒋介石未予理睬，使之与王正廷交涉。国民政府提出，如日本想以济南撤兵与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交易，必须日军首先无条件由济南撤退。但是，陆军仍然强硬反对，民政党也对政府的此种僵局进行猛烈攻击。

在此情况下，12月29日晨7时，奉天城内外的官厅乃至全东三省，一齐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所谓易帜，无疑是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公开示威。

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的任命。

（摘自《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材料二　国民政府任命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职官

任命翟文选、张振鳞、王毓桂、刘鹤龄、彭志云、高纪毅、王镜寰、王树常、邢士廉为奉天省政府委员，并指定翟文选为主席。此令。

任命张振鳞兼奉天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王毓桂兼奉天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刘鹤龄兼奉天省政府农矿厅厅长，彭志云兼奉天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此令。

任命张作相、章启槐、荣厚、王莘林、马德恩、诚允、孙其昌、钟毓、王之佑、熙洽、刘钧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张作相为主席。此令。

任命章启槐兼吉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荣厚兼吉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王莘林兼吉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马德恩兼吉林省政府农矿厅厅长。此令。

任命常荫槐、马景桂、庞作屏、潘景武、高家骥、陈耀先、孙润庠、李彭年、孙炳文、宋文郁、万国宾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常荫槐为主席。此令。

任保马景桂兼黑龙江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庞作屏兼黑龙江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潘景武兼黑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高家骥兼黑龙江省政府农矿厅厅长，陈耀先兼黑龙江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此令。

任命汤玉麟、邴克庄、梁国栋、李元著、金鼎臣、佟兆元为热河省政府委员，并指定汤玉麟为主席。此令。

任命邴克庄兼热河省政府民正厅厅长，佟兆元兼热河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梁国栋兼热河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此令。

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此令。

（摘自《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12月31日）

材料三　张学良等艳电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役，先大元帅赞助尤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第共党横肆险谋，流毒海内，不特人民皆为疾首，即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主义而亦几为之不彰。先大元帅发讨赫之师，首先述明与中山先生合作历史，词旨恳切，首注反共，本无黩武之意。五月佳日又有息争通电，临行复以和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苦心远虑，益复昭然。现在国府诸公反共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彻，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帜易旗。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盼祷。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艳。印。

（摘自《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

历史内幕

国共分裂后的铁军

正当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革命军阵营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共；5月中旬，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政府；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事变（史称马日事变）；6月，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反对工农运动。7月15日，一直打着“左”派旗帜的汪精卫等在武汉决定反共。一连串的事变，使中国上空阴霾四布，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开始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种还在继续燃烧。1927年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讨论并同意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要是第二方面军中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五六百人。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中的各派势力分道扬镳，铁军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一支是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有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团），第十一军二十四师3个团以及贺龙的第二十军6

个团。南昌起义后，这支部队南下广东，在土地革命旗帜下，于赣南击溃蒋介石北路军钱大钧部及由广西前来堵截起义军的黄绍竑部，顺利到达东江之潮州汕头一带。但主力第二十四师于汤坑战斗失利，损失很大，仅剩千余人枪，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进入海陆丰地区，与该地农民运动结合。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10月3日也遭强敌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余部由朱德率领，转战粤赣湘边。二十军溃散。

另一支是蔡廷锴的部队，有第十师的3个团。本来在这支部队中，我党力量也不小，其中第三十团团长以下军官多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8月5日起义军离开南昌返粤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中共党员在部队的职务，率部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新参加军阀混战。说到蔡廷锴的行动，不能不联系到陈铭枢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北伐出征时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第二十八团团长，以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为军长，蒋、蔡分任下属之第十、二十四师的师长和副师长。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和袍泽关系。"党权运动"中，陈铭枢、蒋光鼐离开铁军，到南京去了。蔡廷锴虽未出走，但与陈、蒋在思想感情上是一脉相承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社会基础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在革命中显示出了两面性。他们在广东战争和北伐的第一期是积极的，当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时，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发展，先是陈铭枢、蒋光鼐投靠蒋介石，后是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脱离革命。这支部队在参与军阀角逐中，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地位。

第三支是张发奎的部队，当时还保持第四军的番号。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后，宁汉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争夺正统而展开了激烈斗争。"七一五"以后，汪精卫尽管撕下革命的伪装，但没有停止反蒋。当时革命阵营分裂为三大势力：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真正革命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所谓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右翼）。此时，张发奎尚在这三者之间犹豫观望，他倾向于汪精卫方面，但也表示反对压迫工农革命的唐生智。南昌起义前，张发奎借东征讨蒋之机，移兵九江、南昌，窥测政治、军事气候，并暗图南下广东，割据一隅。1979年叶剑英同我谈话时曾说到。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有人主张要追赶叶贺军。这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放叶贺到东江，我们则以"援师"为名，趁机返粤。此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采纳了叶帅的意见，放弃追赶叶贺军，率部南下广州。1932年张云逸同志在江西时也对我说过，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南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打李济深，至少分化要迟一个时期。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想争取张发奎，继续承认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他们未到职前，分别由贺龙和叶挺代理。暴动第二天，贺龙、叶挺曾分别电告张发奎，并欢迎他到南昌，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张发奎是七个主席团成员之一。但张发奎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他等待观望，不过是为拥兵自重寻找机会。因此，当政治形势明朗化后，他即反共，并在汪精卫"护党救国"的旗帜下作新的军事投机。

铁军三分后，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最后的结局也迥然不同。

先说张发奎的部队。张部回粤，是要把广东作为重新起家的根据地。但广东这时为李济深、黄绍竑控制，张与李、黄为争夺广东展开了明争暗斗。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趁李济深赴沪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之机，发动广州事变。12月11日，我党在广州举行暴动，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大部参加了起义。这不仅削弱了张发奎的军事实力，而且使他在蒋、汪、李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张发奎率部血腥镇压了广州起义，但南京政府还是下令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并委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返粤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新来粤之陈铭枢部，讨伐张、黄。不久，张、黄失败，被迫下野，所部第四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任师长，调往徐州参加新军阀反对老军阀的所谓第二次北伐。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张发奎讨桂，委任张为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他借此扩充军队，使第四师名为师的编制，却保持军的规模和实力，这使蒋介石十分忌恨。这时期南方又酝酿的军阀混战，汪、桂两系勾结反蒋，使蒋更急于解决张发奎部。9月初，蒋令张师移防陇海路沿线，企图将该师在途中缴械。张发奎窥破蒋的意图，于9月17日通电反蒋，将由武汉船运至宜昌之蒋军夏斗寅3个团缴械，并与桂军弃前嫌合作，第四师复称第四军，南下到桂林，与桂系共同反蒋。由沙市、宜昌经湘西南下广西。这是一次地形、给养都不利的长途急行军，张军克服困难，多次挫败何键的堵截部队，仅1个多月便到达桂林，张发奎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与桂系联合反蒋。这年12月，张、桂军联合进攻广州，桂军沿西江东进，张军由桂林进到北江下游。据一个当时在张部当班长后转入陈济棠军，在南雄被我俘虏的军士讲，张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不理发，不剃胡须，说要打到广州才理发。作为一个指挥官，气势可谓盛矣。张发奎军与粤军在花县混战，张军大败，损失惨重，余部向广西退却，退到北流，与追击军再战，遭到更大损失，不得不将其3个师合并为2个师，仍称第四师。1930年2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军举

兵策应冯玉祥、阎锡山讨蒋，张发奎又以前敌总指挥身份率军入湘占领衡阳；6 月初占领长沙、岳阳。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杨敬 3 个师乘虚夺取衡阳。张、桂军回师攻衡，又败，于 7 月底退回广西。第四师仅剩两团，张发奎意志消沉。于年底去香港，改由吴奇伟任师长。后吴奇伟投靠蒋介石，虽然恢复了第四军番号，但这支部队在军事、政治上却失去独立性，影响不大了。1932 年夏，第四军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1935 年 3 月在追击红军长征时，乌江一仗，大败于红军之手，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作为。这支军队，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

再说蔡廷锴的部队。蔡部走到赣西、福建，很快得到陈铭枢、蒋光鼐的欢迎与接济，部队扩编为两个师，仍属陈铭枢之第十一军。陈铭枢与广东李济深关系甚密，此时，李正与汪精卫、张发奎进行争夺广东的混战，李电请第十一军回粤，同张发奎的第四军作战。十一军回粤后不久，在潮梅一带与第四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两支部队北伐时为同壕战友，同称为铁军，此时竟成为沙场上生死对头。蔡廷锴后来曾回忆说："战斗中所掳获及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十一军战胜四军后，即驻守广东南区(高雷、钦廉、琼崖)。1929 年后调东江。同年夏，蒋介石组织闽粤赣三省军队围攻闽西苏区，蒋光鼐派陈维无率两旅参加，占领苏区南石永定、湖雷、坎市地区。八九月间，"会剿"军的东面被红军打破，陈维远部退回广东。10 月，红四军去东江，在松源击溃蒋光鼐部 1 个营。不久，红军进攻梅县不利，退回闽西苏区，十九路军继续控制东江。1929 年底，按全国编遣会议要求，十一军缩编为粤军第三师。适值两广军阀发生战争，第三师参加倒桂混战。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十一军改为第六十师和六十一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奉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大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大战。1930 年底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加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为十九军军长。在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围剿"中，第十九路军驻兴国，工事筑得好，兵力又集中，红军不好打也没有机会打它。第三次"围剿"，十九路军因蒋介石长驱深入的战略方针下，寻找决战。我避其锋芒，直至反"围剿"后期敌退却时，我乘机出击，双方在高兴圩大战。这支部队打仗有特点，他左翼防御，右翼进攻，双方恶战 1 日，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对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情况下碰这个硬钉子，我们都感觉到，这支部队在战斗作风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

1931 年 11 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十九路军毅然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这支北伐名师重振雄威，在第五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信心，可惜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了这次抗战运动，第十九路军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忌恨，被调到福建去打红军。陈铭枢极力推荐蒋光鼐为福建省长，而蒋介石却任蔡廷锴为福州绥靖主任。绥靖主任可以指挥省长，而蒋光鼐一直是蔡廷锴的上司，蒋介石企图用这个办法造成蒋、蔡矛盾，分化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接到命令后，迟迟不肯就职。蒋光鼐就劝他赶快就职，意即你有军权，我有政权财权，有利于十九路军。蒋光鼐识大体，维护了十九路军将领的团结，也使蒋介石的阴谋不逞。十九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陈铭枢与蒋、蔡)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由拥蒋逐渐转变为反将，这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转变。1933 年 11 月，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军队不稳定，以及我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对这个同盟军没有积极援助，"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战斗力很强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这支军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共产党领导的铁军，虽然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遭到失败，但却保留了很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其中第二十五师保留得更多一些。1927 年 10 月 16 日，从潮汕方面撤退下来的第二十四师零散部队，与第二十五师余部在广东饶平会合，加上第九军的部队，尚有 2500 余人，在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率领下，于 10 月下旬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在这里整顿了部队，初步克服了普遍存在的失败情绪和混乱状态。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进至赣南大余和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朱德在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协助下，又进行了两次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并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 1200 余人到达湘南，在湘南特委及各县委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实际兵力为 1 个团)。1 月下旬，起义军在当地农军配合下，于粤北乐昌砰石及其西南山区，打垮了国民党军许克祥部 6 个团，缴获了许多枪炮子弹。这一仗，再显了共产党领导的铁军的威风。1928 年 4 月，这支部队和湘南农军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并重新打起第四军的旗号，其中第二十八团，是由铁军部队整编的，他们发扬铁军的光荣传统，在井冈山连打胜仗。5 月 6 日在遂川五斗江打垮国民党杨如轩部第八十一团。不久，又协同秋收起义部队 1 个营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消灭了杨部第七十九团，并在永新城打掉了赣敌 1 个师部。6 月下旬，又以 1 个团打败朱培德部杨池生两

个团等等。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1930年6月扩编为红一军团。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这支由铁军基础发展起来的红军，继承了铁军承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陈毅曾赋诗赞道："铁军真是铁"。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红四军以"英勇冲锋"的锦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辟了晋察冀和山东两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编为第四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现在有两个集团军，还保留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各1个营。

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共产党所进行的是共产主义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于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具有不可避免的两面性和软弱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事实胜于雄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选自肖克《铁国纵横谈》）

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哈尔滨接待站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鉴于国内形势紧张，最后确定把这次会议安排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议之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批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对此党中央研究了行走路线问题，认为已经形成的通过中东铁路这条红色之路是可行的。于是决定，代表去莫斯科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外，其余大部分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然后由哈尔滨护送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

为了保证中共"六大"代表的安全，使"六大"会议准时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决定在哈尔滨设立秘密接待站，并与中共哈尔滨县委协商做好安排。县委经过研究决定，指派中共哈尔滨县委党委、共青团县委书记李纪渊（又名李纪元）负责接待站的工作。此外，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有阮节庵（又名阮昌、魏仲仁，时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沈光慈（阮节庵的夫人）、小白（朝鲜人，时任县委交通员）。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今红专街）14号，这是阮节庵、沈光慈夫妇的住处，曾为党的秘密机关，这里比较安全。

此外，党中央还派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解放后曾在全国妇联工作）带着小女儿独伊到哈尔滨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护送"六大"代表工作。

杨之华由上海出发时，同行的还有3位代表，一位女同志叫李文宜（罗亦农的夫人），两位男同志为四川和湖北代表。一路上他们小心谨慎，到了大连还是受到警察的盘查，把他们扣押了一天，警察反复追问他们的来历。当时，他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他们是出席"六大"的代表。当追问到独伊是不是杨之华的亲生女儿时，杨之华才放了心，原来警察见杨之华带个小女孩，怀疑他们是人贩子。杨之华说："她是我的亲生女儿嘛，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警察相信了她的话，就放了他们。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吃到饭，上火车后，又见奉系军阀的警察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注视着旅客。他们都是南方人，怕说话出问题，所以不敢在车上购买食物。大人还可以忍受，可杨之华的小独伊哪里受得了，饿得哇哇直哭。坐在同车的一位妇女，见小独伊哭得可怜，送给她一块点心吃，小独伊才止住了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站，正好天黑了下来，他们才在站台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吃。终于熬到哈尔滨。当时，杨之华母女被安排住在阮节庵家里，随时接待来哈的"六大"代表。

从4月初开始，关内的中共"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后便按着接头地址和暗号与李纪渊或小白会面。接头地点设在道里区中央大街的一处卖故衣的商店里，小白在那里以店员身份作掩护，随时会见来哈接关系的"六大"代表。暗号是：从一盒火柴中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杨之华。然后安排食宿和决定出发日期。

当时安排代表有一个原则规定，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块住，对外就说是"夫妻"。杨之华的女儿小独伊当时只有6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果有人问就说是"爸爸"。小独伊曾奇怪地问杨之华："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爸爸？"问得杨之华无法回答。如果来的代表人多时，就另作特别安排。有女代表的就同男同志安排在一起住，没有女代表时，就由哈尔滨地下党另行安排女同志掩护。住处有时在接待站里，有时安排住在同志家里，也有时住旅馆。

每次来代表，在哈尔滨一般只住两天，稍加休整，即护送出境。去苏的路线在哈尔滨又分两条，一是由哈乘火车去满洲里，二是由哈乘火车去绥芬河。大部分安排走满洲里线路，极小部分安排走绥芬河线路。据杨之华回忆，走绥芬河这条路线只安排过一两次，有蔡畅、龚饮冰、瞿秋白等代表。他们到达绥芬河后，通过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先后排在他家休息吃饭，到了晚上，再由这个俄国人带路过境，需要翻山涉水，走很长一条路才能过去，晚上起程得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然后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火车烧

闸子，由海参崴去莫斯科差不多要走一个多月。

走满洲里路线，临行前，由接待站交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晚上，在车站附近就会看见有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着，马车的车夫座上挂着一个灯，一个车上为67号，另一个车为69号。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牌交给俄国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马车夫扬起鞭子，马车很快消逝在夜幕里，偷偷越过边境。边境那边，苏联方面也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当时，中共"六大"代表是分3批出发的，而到哈尔滨后又重新编组，分期分批地安排出境。通过哈尔滨接待站安排去苏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有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夏曦等。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第二批由上海出发的，因路上遇到点麻烦而耽误了时间。同时，到哈尔滨接待站的证件已经毁掉，无法同接待站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的，周恩来知道，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记得有李立三。于是，周恩来让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等了数日，最后终于等到了。后经李立三的联络，周恩来邓颖超才与杨之华接上头，由接待站安排护送出境。

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接待站，一共接待了40多位代表安全出境，保证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在莫斯科顺利召开。杨之华在完成接待任务后，也随最后一批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会议。接待站随之取销，李纪渊、阮节庵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又投入新的战斗。

（选自《党史文汇》94年10期，作者：张福山）

毛泽东：红色政权建设的高手

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为我国工农政权的初创阶段，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建设，"县"必躬亲，殚精竭虑，不断地发现问题制定政策，独创性地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政权的建设，探索出极为珍贵的乃至今日仍可借鉴的经验。

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个政权将为哪个阶级服务？怎样服务？……

夜已深沉，遂川县城在静谧中渐入梦乡。

邱家厦所右侧的厢房里，一盏马灯的灯光从纸糊的窗格中射出来。

毛泽东全神贯注地在灯下阅看一份材料——中共遂川县委书记起草的《施政大纲》。他已约定明日要和陈正人讨论这一《大纲》，得抓紧时间研究这些旷古未有的革命政权的章程。

工农革命军是7天之前，即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的。部队从宁冈龙市出发前，毛泽东对官兵们说："山那边的遂川县，老百姓被土豪劣绅压迫得很苦，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打翻反动派豪绅阶级的统治，去了后一是筹款子，没收土豪的这个，"他两手合成银洋的圆圈，接着说，"二是把那里的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政权"。部队在城中共驻两天，各连便以班为单位进入雩田、新江、草林等农村开展工作。毛泽东与宛希先几人忙碌了数天，协助建立了遂川县委，现在又考虑怎样成立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去年11月底以来，经常萦绕在毛泽东脑际的一个问题是：代表国民党豪绅阶级的反动政权一旦推翻，如何建立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就是边界上一切军事的政治的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又巩固政权的。有了政权，什么也就有了，丧失了政权，什么也就随之失去了。马克思、列宁都是这么认为的。感性认识又使他从理性上悟觉到：政权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也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基础，在湘赣边界来说，要领导割据区域的民众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然而，这是一件不曾实践过的事情，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在与陈正人和一些工农积极分子一起商议的时候，提出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个政权将为哪个阶级服务？怎样服务？为什么要叫工农兵政府呢？顾名思义，大家都是很明白的。加上个苏维埃，那是俄国革命政权的叫法。这一名称，我是寻思了很久才想到的，也可以说受了教训的启发，这次教育好深刻呐！"

毛泽东所说的教育是指茶陵"人民委员会"，那是去年11月中旬，毛泽东生脚病，新任团长陈浩带领部队打下茶陵县城。黄埔军校出身的陈浩，只晓得军事教条，让部队驻在城里，除了上操就是派岗。政权方面，搞了一个茶陵县人民委员会，除从部队派了个人任委员长，办事人员多是旧政府的文吏，章程也是按旧衙门的一套升堂审案。部队的给养是通过商会摊派。陈浩和副团长徐恕还认为二三百亩土地的人算不上土豪，不准农民抄家分东西。一些豪绅暗中高兴，送上金银进行贿赂。这种压制群众斗争形同国民党政府的现象被宛希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吃惊不小，写了一封口气严厉的长信，指示陈浩撤消人民委员会，成立"工农兵政府"，部队分散到农村领导农民斗争土豪，没收浮财，建立农民协会。

受到指责的陈浩，按毛泽东的布置开展动作。半个多月后，李宗仁、唐生智混战结束，湘敌第8军一部反攻茶陵，对革命已经丧失信心的陈浩欲将部队带到安仁方鼎英13军去，其阴谋又被宛希先察觉。得了报告的毛泽东率领一个排星夜上路，天亮之际追上部队，逮捕了陈浩等

人。部队回到宁冈龙市，在官兵大会上，毛泽东根据部队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现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其中第三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讲完这件往事，陈正人说：“教训是值得记取的，不把广大的民众发动起来，这个政权就象没根的浮萍漂在水上，陈浩他们在旧政权的基础上建立所谓的革命政权，当然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

“没错！”王次淳，这个大革命时期遂川县第一个农民协会的主席接上说，“要是我们也照旧章程办事，不为穷苦农民谋利益，那我们的政权也会同茶陵的人民委员会差不多。”

毛泽东又听其他人讲完，说道：“成立工农兵政府，这是遂川人民自古未有的大事，肯定有好些群众对这个正权不大了解，我看，唱戏先打锣鼓再拉幕布，我们要先把主张宣传出去，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政府是干什么的？正人呀，你是满肚子墨水的人，能不能起草一个文告，……叫‘施政纲领’也行吧，写好后石印成布告。”陈正人一怔，有些畏难地说：“我恐怕写不好。”

毛泽东说：“这又不是考状元写文章，怕什么？只要把工农政权的宗旨、施政内容等等，如怎样分配土地？苏维埃政府应设立什么机构？区乡怎样建立赤卫队？怎样开展禁赌、禁鸦片烟，开宗明义地写清楚就行。我们不但要砸烂旧政权的机构，还要把旧章程废除掉，建立革命的新章程，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见毛泽东讲得如此的具体，望着他的信任的目光，陈正人不再犹豫了，点头说：“我再同大家商量一下，写出初稿交你过目。”

相隔了两天后，陈正人把费尽心血写好的《施政大纲》，兴冲冲地送到邱家厦所。

第二天上午，警卫员兼勤务兵龙开富把陈正人请来了。毛泽东说：“正人，这个《大纲》我仔细看过了，写得蛮不错的。”

听了夸赞，陈正人心里才踏实下来，同时有几分高兴，回话说：“奖誉太过可不敢当，肯定有不妥之处，还望你来把关。”

“嘀，这把关的美誉也不敢当，有两个方面与你商量一下。”毛泽东坐下后说：“《大纲》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土地、生产和群众生活 7 个方面，共有 36 条，我看条款太多了，群众不容易记住，能不能内容集中一些，文字简洁一些？”

陈正人谦虚地点头，毛泽东又说：“再者，有些地方写得不够通俗，群众不容易看懂，能不能多用一些群众语言？比方说，上面写的‘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就可以写成‘讨老婆不要钱’，这‘反对虐待儿童’，可以改成‘不准大人打小孩’，还有这‘废除债务，焚烧租约债契”；不如写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总之，文皱皱的文字尽量少用。”

陈正人觉得心里豁然开朗，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从桌上拿过毛泽东已做了眉批的《大纲》，说：“我改好后再给你审阅。”

1928 年 1 月下旬，由陈正人起草，毛泽东几经修改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石印成布告。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部为无产阶级政权所实行的施政纲领从此诞生了。这部以保护人民利益为主的革命纲领，一扫旧政权的污泥浊水和欺压工农大众反动法规，充分体现了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心愿，第一条都是维护工农阶级的切身利益的。1 月 24 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在两万多民众狂热的掌声中宣告成立，鞭炮、锣鼓响罢，陈正人宣布“由毛委员讲话”，顿时，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毛泽东穿了一件半新的士林布便衫，脚下是一双麻筋草鞋，神采奕奕地走到台前，挥动了几下手，向人们高声说道：“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是庆祝大会，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我们穷苦工农掌握政权了，要坐天下了。这个县主席不再是国民党政府委任的，而是我们自己推选的，喏，就是他，他叫王次淳，不少人认得他的。”

这时候，会台上站起一个 30 出头的农民，微笑着走到台前。毛泽东从陈正人手里接过用红布包着的印章，放到王次淳手上，然后向人们说：“大家看，王次淳同志昨天还是作田佬，打赤脚挑粪桶，可今天是县苏府的主席了，穷苦农民当主席，要为穷苦工农办事，大家要拥护自己的政府，大家要团结起来，团结才有力量哇！才能打倒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哇！比方说，一根筷子一下就断了，而一把筷子合在一起就谁也折不断了。”

毛泽东讲完话，王次淳庄严地宣读了《施政大纲》，强调各区乡的工农政权，今后都要按照《大纲》的条款开展工作。

1 月下旬至 2 月中旬这段时间，毛泽东以主要精力在乡村了解，指导区、乡政权如何以纲施政？他与王次淳来到黄坳，区苏府主席范家骥说：“亏得有这个《施政大纲》，不然好些工作咱们不晓得怎样进行？就说这分田，咱们照着大纲的条款，先组织各村的农民斗争劣绅，勒令交出田册地契，债约帐本，一把火烧掉，再拆除那些田桩界碑，然后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田地。而今不管大人伢崽，哪个都分得了一份土地，作田人别提有多高兴，区里布置下去的工作都很顺利。”

斗大的字认不上一箩筐的小行洲乡苏府主席李焕成，大着嗓门对毛泽东、宛希先说：“毛委员，论文化咱可是‘光眼瞎子’，可是我做起工作来就象走路有拐棍。可不，咱们照着《大纲》的章程组织赤卫队暴动队，斗倒那些土豪分配田地，乡亲们还自动地禁赌禁鸦片烟，还办了识字夜校呢？”

在出产朝廷贡品"狗牯脑"名茶的荡湖，上了年岁的乡苏府民食委员翘起拇指，对毛泽东、陈正人赞道："自古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光景，作田人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先前那些摆脸露阔的族佬绅士，而今威风倒尽，同咱们作田人打招呼让座，这真是穷人坐了天下，工农兵政府真是我们的政府！"

从荡湖出来的路上，毛泽东对陈正人说："正人，你感觉到了没有？世界上的一切斗争，革命的也好，反革命也好，都是为着争得政权，又巩固政权的。"

"是这样的！"从"五卅"运动遭到敌人通缉后投身革命的陈正人，深有感触地点头。毛泽东的话久久地印在他的心上，直至1970年12月，他在接受访问时，对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党政分开的提出和实施，始于井冈山，始于毛泽东的倡导。

在遂川的日子里，毛泽东着重注意了工农政权如何执政？亦即如何发动群众斗争的问题，而在宁冈领导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则发现、纠正了以党代政的倾向，开创性地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原则。

工农革命军是2月16日回师宁冈的。18日上午，与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在上千群众的配合下，攻克宁冈县城新城，全歼了上个月乘虚占据宁冈的赣敌1个营及1支靖卫团，生擒了反动县长张开阳，武装夺取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下一步是建立革命的新生政权。在研究县苏府主席人选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须由苦大仇深，斗争勇敢的工农分子担当，几经筛选，大江边乡的暴动队长，在这次战斗中捉到反动县长张开阳的文庚宗，任了县苏府主席，又是一个"泥腿子"登上了无产阶级政权的舞台。

县工农政府的成立，犹如春天的第一声响雷，在罗霄山脉中段山区荡起回音。只几天的时间，全县4个区39个乡，全都成立了红色政权，一场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全民实行军事化的斗争蓬勃兴起。

时令已过雨水节，天气逐渐转暖，毛泽东仍是一双草鞋，一只挎包，背上还多了一顶斗笠，带着龙开富到几个区察看工作。他们先到了古城、新城，7天的了解和查访，毛泽东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些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委包揽一切，把苏维埃政府搁到一边的倾向，不少党组织直接处理行政事务，抑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原先打算从这儿去茅坪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吃过午饭，便同龙开富回到龙市，要人把龙超清和刘辉霄几人找来。

颇有西欧教堂风味的"刘德盛药店"的楼上，毛泽东与宁冈县委的部分常委，半是开会半是聊谈，他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并举例说明：

"古城区委完全和区苏府搅在一起，胡白凡党政事务一把揽，连长溪乡分田扯皮的事都要他到场，忙得个上茅坑都不得空。这样还要区苏维埃政府干吗？难怪苏主席文春开尽做些不痛不痒的事，你区委书记抓党务就是，何必去揽政？你就是天天喝人参汤也没这么大精力哇！反而把自己拖进事务堆里。"

"新城区的黄夏、焦陂几个乡，都是以党支部名义张贴布告，召开会议，甚至连赤卫队长也由书记尹其章兼任，这样岂不是捆住了乡苏府一帮同志的手脚？挫伤了人家的积极性？要分清党委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不要弄得党政不分。"

待毛泽东说完，县委书记龙超清和几个常委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有的人不大在乎，并不隐讳地说："哪里分得格么清楚？反正都是做工作，党也好，政也好，手背掌心都是肉。"

那时候没有分明森严的上下级关系，说话随便些。毛泽东听了这些反调也不恼火，只是心里很着急，他知道在一般同志的头脑里，这党政分开，各司其职的观念实在淡薄得很，也在思想上理解不过来，应当普及这方面的观念。于是，把党的领导、监督作用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说了一遍，着重阐述了党组织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强调指出那种认为党即政府的观念是错误的。

听了毛泽东条理清晰，理论和实际都联得上的论述，这些常委的思想方转过弯来，知道党政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也理解到党政分工不明带来的弊端。龙超清说："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县委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同志们党政分开的观念。"

宣传部长刘辉霄说："我看县委应该先做示范，尽量不要干政，事务工作让苏维埃政府发挥作用。"

"辉霄说得对！这一点很重要。"毛泽东大加赞赏，少倾又说："不单是宁冈，今后其他地方也要克服这种倾向。"

党政分开的提出和实施，始于井冈山，始于毛泽东的倡导。这是一个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此后不久，他又从实际中增加了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苏府执行委员会作用的认识，提出了"要发挥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主张方法，除宣传外，执行必须通过民众的组织。"

红色政权建设的关键，是让印把子掌握在真正的贫苦工农分子手上，能够起到领导群众斗争的作用。

毛泽东一方面以遂川、宁冈几县建政的经验对新辟政权予以实际指导，另一方面在基层了解实情，发现新的倾向，提出克服的政策。1928年5月中旬，他在永新南乡作了多天的调查，发觉有的红色政权不是真正地掌握在工农阶级手里，而是被混进党内投机革命的坏人操纵着。他来到县城，找到县委书记刘真和是苏府主席彭文祥等人，对他们说："不晓得你们发现没有？有些地方的乡政权，小地主和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

心，钻入政府把持一切，使贫农主席只当配角，你们去查查看。”说到这儿，毛泽东掏出小本子，打开说：“七岭乡的乡苏府，委员多数叫小地主、二流子占了。那个古力胜是劣绅古岳的堂弟，赖重山又是赖重朋的胞弟，彭志堂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有这一伙人，泥腿子乡主席有什么咒念？大权旁落了。这几人表面上尽做应付，实际上吃喝玩乐，心眼向着豪绅地主。一次布置要打王华远的土豪，早就通风走水，结果王华远脚底抹油走了，贵重的财物也藏过了。”

毛泽东翻过一页，接着说：“洲上有个李学全，肚里装了些墨水，当上了乡苏府的文书，乡主席目不识丁，印把子实际掌在他手上。他倒好，拿了乡苏府打土豪的钱大花水用，勾结劣绅李泉德威吓贫农，延宕分田，全乡的分田运动被他搞得冷冰冰的。”

刘真和彭文祥没想到底下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听毛泽东讲完后，都好不着急，表示马上派人去两个地方进行查处。

毛泽东说：“红色政权建设的关键，是让印把子真正地掌握在贫苦工农分子手上，能够起到领导群众斗争的作用。问题我看不只是南乡才有，其他地方怎么样？县委、县苏府近斯的主要工作是巩固各级赤色政权。”

也是贫苦农民出身的彭文祥说：“我们明天就组织人下去做这项工作，我到南乡去，查到问题就处理，对李学全这样的坏人决不手软！”

毛泽东点首，转向刘真布置说：“县委要协助开展整顿各地政权的工作，自身的问题也要检讨，这些地方搞成这样子，党组织到哪儿去了？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值得引以为戒的问题。”

刘真满怀感慨地点头称是。

1928 年 5 月下旬，筹备已久的湘赣边界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仓边村召开。彭文祥带着永新县的 15 个代表参加会议。晚上他特地找到毛泽东，汇报前段时间查处问题的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南乡七岭和洲上两个地方，确实由小地主、坏分子架空了乡苏府，把持了权力，后来还查明李学全暗自向豪绅勒款。县苏府根据李学全、古力胜、彭志堂等人的罪恶，已经把他们处决了。

接着，彭文祥又讲起其他区乡的这方面情况。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心情有些沉重地说：“文祥同志，斗争还很厉害呐！地主豪绅阶级是不甘心贫农阶级掌握大权的，会想尽法子进行作梗，真正地让印把子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不那么容易呀！”

少时，毛泽东又说：“开会讨论的时候，你把这些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提高大家的认识。”

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成立井冈山割据区域的最高红色政权——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选举主席的时候，多数代表提出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站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边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还是由出身当地，在民众中具有崇高威信的同志担当。再说，我前几天才任了边界特委的书记，党和政府要分开，不能搅在一起，我在政府一边，也顾不过来，大家还是重新考虑。”

入情入理的心情诚挚的推让，使得代表们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大家重作酝酿，一致推选为井冈山武装割据作出重要贡献的袁文才，担任边界政府的主席。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辖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 6 县的苏维埃政权。看到这些代表着边界各县 90 万民众的代表们，齐刷刷地举起了赞成袁文才任边界政府主席的右手，毛泽东的内心感受到一种通体的欣慰，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意。

（选自《党史文汇》91 年 9 期，作者：刘晓农　晓敏）

张秀熟舌战王陵基

1928 年 10 月的一天，重庆《新蜀报》头版刊出一篇专题报道，题目以木刻大字标出《张秀蜀舌战王灵官》，立时引起社会轰动。尽管四川当局百般封锁，有关此事的消息仍不胫而走，远布全川。

“王灵官”系国民党川军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后曾任四川省主席，解放战争期间为我军俘获关押），由于 1927 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残酷屠杀革命志士，获了个凶神恶煞的绰号“灵官”；而张秀熟（时称张秀蜀则）是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刚刚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两位冤家对斗的所谓“舌战”，实际是一场对簿公堂的生死搏斗。

当时，四川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农暴兵变频频发生，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活动也一阵紧似一阵。1928 年 4 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被杀害，党内出了叛徒，身任代理省委书记的张秀熟处境更加危艰。

10 月 1 日，张秀熟和一名文书、一名交通员留住重庆七星岗附近的吴师爷巷。那晚天降大雨，夜色漆黑，张秀熟刚上床就寝，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喊道：“章友三收电报。”张秀熟一听，知道坏了。这是他佃房子时用的一个代名，没有对外用过，也不可能有什么电报送到这里来，一定是出了问题。等他披上衣服，已经有两个当官的和十几个当兵的冲上楼来，用枪对准三人的胸膛，并对三间住房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屋内藏有全省 70 多个特委、县委、特支和个别党员的通讯名册，是张秀熟用蝇头小楷抄录在几张二指宽的薄纸条上，折好装在一个火柴盒里，放在一个盛杂物的藤包中，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张秀熟急中生智，对两个当官的说：“副官，我跟你们走。但我穿的是一双新鞋，小了，穿不上脚。外面正下雨，行走不方便。藤包里有个鞋溜跟，让我取出来，把鞋拔上，便于走

路。"两个副官本来以为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定是彪形大汉,手持双枪,左右连发,因而紧张得不得了,此时他们看张秀熟是个斯斯文文的书生,又不抗拒,松了一口大气,也就不大在乎,点头同意:"可以。"张秀熟在取鞋溜跟时摸着火柴盒捏在手里,乘弯腰拔鞋之机,用力把火柴盒捏碎,接着又连声咳嗽,要求吐痰。"好罗嗦,快点!"副官只求不出事,早点把人弄回去交差,也同意了。张秀熟转身走到窗口,躬身向外,连咳带吐,顺手把火柴盒丢入窗外的污水坑。张秀熟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大为坦然,回转身轻松地说:"走吧!"

王陵基听说抓到了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张秀熟,喜从天降,迫不及待地要连夜来一个下马威。他特意等在通远门公馆客厅里,两旁坐满了军部高级幕僚。张秀熟长衫布履,双手锁铐,由卫兵押着,慢慢走进客厅。王陵基看见张秀熟,不由怒从心上起,大声吼叫:"张秀熟! 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阶级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说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

轻描淡写几句话,弄得王陵基气极败坏,拍桌子,挞凳子,暴跳如雷。他跳,张秀熟也跳;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悻悻地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王陵基本想给张秀熟迎头来一个煞威棒,把他镇住,使之屈服,不想当着那么多幕僚的面,反而受到一顿奚落,着实于心不甘。

王陵基经过几番筹划,在十几天之后,安排了一出"公开审讯",并放出话来:"本司令这一回要是把共产党整不住,我的卫戍司令官就不当了。"

切莫小看了王陵基。他虽身为武将,号称"灵官",却是文人出身,清朝末年的秀才,后来又到东洋留学,学军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四川速成军官学校作教官,不仅会打仗,还作文赋诗。他特别自负辩才,从不让人。他自认上次和张秀熟对吵对闹有失身份,是一败着。这次他要紧紧抓住一个"审"字,既主动又占了先着,加上这半个月加给张秀熟的铁窗之苦,定会将张治得老老实实。

但是,张秀熟却并未就范。在关押待审期间,他和同案同志取得了联系,商量了对策。他作为省委书记,是被叛徒出卖,敌人指名的,无法隐讳,必须挺身而出,公开斗争;其他没有被拿到真凭实据的同志则一概推脱,不予认帐;敌人的审问,由张秀熟来对付。

10 月 14 日,王陵基在重庆商业场(现重庆市工商联)卫戍司令部大厅外廊上摆下公案。他全副戎装,居中高坐,两眼圆睁,八字胡上翘,显得气派十足。在王陵基背后,环坐着一层层高级军政官员,颇壮声威。公案前面摆着一副副刑具,一批副官和打手伺候问案,随时准备动刑。外廊台阶下面有一场空场,环绕着一道高高的围墙,围墙内外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的主要对手便是张秀熟。

"公审"开始,全案人犯带到。王陵基重点是要制服张秀熟,故审讯其他人花的时间不太长,也没有取得什么"有罪"的口供。轮到张秀熟了。他面对王陵基,双目平视,略微斜身站定。王陵基稳住神,一字一句地开口道:

"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明知故问。

"是的。"

"哪里人?"

"四川平武"。

"是受共产党中央委派的吗?"

"是党代表大会选举的。"

头开的不错,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正好"乘胜追击"。

王陵基于是来了一套准备好的花招,平和地问张秀熟说:"我在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他以为这一个攻心战术,将使张秀熟思想上发生动摇。殊不知张秀熟正在寻找机会,要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演说台,于是从什么是圣贤,什么是孝道,从孔夫子谈到马克思,声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是大圣贤、大孝道。王陵基无法应付,几次制止张的发言,但又按不下去,只得抢问:

"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 组织情况怎样?"

"共产党员多得很! 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

王陵基感到有点不对头,缓和一下,慢慢问:

"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 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

"共产党人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

"你们那点钱,够吗?"

"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

王陵基有些坐不稳了,提高了嗓门:

"你们为什么要造反? 要搞暴动?"

"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

"什么?"王陵基怔住了。"你是啥意思?"

"好,你说不出口,我来帮你回答。现在是民国十七

年，但是你们的田赋已经征到了民国五十六年了。你们军阀年年混战，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土豪劣绅盘剥无已。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共产党怎能不领导民众造反？民众怎能不起来暴动呢？”

可以看出，王陵基在尽量克制自己：

“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罗？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罗？”

“当然是的！就像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制度一样。我们现在做的就类乎当年孙中山做的工作。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不过数年，我们的力量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主张将来必定有一天要实现。”

王陵基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你就真的不怕死吗？”

张秀熟激昂地回答：“死对我们来说，是很荣耀的事。试看孙中山先生为缔造中华民国，带领大群仁人志士，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牺牲了多少党人的头颅，才取得胜利。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急了，咬紧牙关叫道：“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到我们革命实现的时候，对不起，我们也要依样画葫芦哩。哈哈！”他不由笑出声来。

至此，王陵基再也按奈不住，撕开硬绷了许久的面孔，破口大骂：“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帐……”

张秀熟不屑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

这场从晨至晚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审讯，毫无所获，只得草草收场。

王陵基本想按军法立即把张秀熟杀了，但他的上司刘湘有顾虑。当时各界人士获知此事，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呼吁大力营救。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从成都急电刘湘，叫他千万不能杀张秀熟等国家人才。加之，国民党这时颁布了一个《危害民国治罪条例》，规定共产党案件交高等法院审判，不归军事审判。刘湘只得指令卫戍司令部把此案移交给法院。

在法院，重庆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熊福田先生自愿义务为此案辩护。由于各方面的正义呼声，法院于1929年判处了张秀熟10年徒刑，其他同案的人也分别判处了各等徒刑或释放。到抗战爆发前夕，刘湘接受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张秀熟被释放出狱。

（选自《纵横》92年3期，作者：石化）

党的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过一位19岁便担任中央部长的女革命家，她就是周秀珠。

在大革命洪流中

周秀珠，1910年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的海员家庭。天资聪明的小秀珠，幼时读过几年书。由于父亲的微薄收入难以养活母亲及弟妹们，她被迫辍学，10岁出头就入纺织厂当童工。在那中国人毫无人权尊严可言的殖民统治下，那超负荷不安全的沉重劳作，给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火种。

1925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周秀珠同父亲投身于罢工行列，全家搬到广州。6月23日，她跻身于广州各界10万人反帝大游行。这个年仅15岁的女童工，尽情高呼口号，沿途散发传单，蹦蹦跳跳地随大队前进。当密集人群途经沙基时，突然从河对岸沙面射来英国殖民军猛烈的枪弹，刹那间，上百人死伤，鲜血染红了马路。小秀珠顿时惊呆了，目睹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发起她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她积极参加海员总工会宣传队的活动，经常在街头闹市地段进行宣传，散发传单，演出粤曲、“白榄”小调等，以说唱形式向民众通俗地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宣传大罢工的意义和必胜的决心。周秀珠多次站在凳子上演讲，热情奔放，慷慨激昂，吸引了众多群众围听。她积极做罢工工人家属的工作，组织儿童们学习，维护食堂秩序，给有病家属送饭菜，帮助缝洗衣服，工人及家属们十分喜爱这个天真活泼、聪明能干的小姑娘，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袖也几次表扬她。在斗争中，小秀珠很快地成长起来。

1926年3月，周秀珠被推选为省港劳动童子团筹委会委员。不久，周秀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25日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她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女童部部长。随后，还不到16岁的周秀珠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从事女工运动的工作。虚心好学的周秀珠并不满足，她经常聆听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等人的教诲，在高恬波、陈铁君等大姐影响带领下，进工厂、登轮船、串街巷，向工人及家属进行宣传，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迅速提高，学会了组织发动群众的本事。

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这热火朝天的革命事业的时候，风云突变，1927年夏，大革命的逆流骤然冲来。周秀珠再次目睹了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惨状，她敬爱的李启汉、萧楚女、刘尔嵩……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短短的几天，残酷的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使她长大了许多。

最年轻的六大代表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无数革命同志的壮烈牺牲，激励周秀珠坚定地投入新的战斗。她先后在广州市委、广东省委从事妇女工作。12月11日，她参加广州起义，冒着枪林弹雨走街串巷，带领青年女工们送给养、抢运伤员。在那枪林弹雨、极其悲壮的三昼夜血战中，她崇敬的张太雷和大批并肩战斗的同志们壮烈牺牲。火与血的生死考验，使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起义失败后，她同省委常委杨殷、罗登贤、陈郁等转移到香港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春，周秀珠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1928年5月，周秀珠随李立三、杨殷、阮啸仙等，躲过巡捕的跟踪离开香港北上。6月初，他们途经大连转道苏联海参崴，平安抵达莫斯科。来到十月革命故乡的周秀珠，心情非常激动。出于保密的要求，代表们不能随便上街，不能漫步红场、参观访问，一下车便被直接送到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作为广东省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周秀珠不仅是广东代表团年龄最小的，也是六大84名正式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活泼坦诚，能歌善舞，热情地为会议跑来跑去，帮代表做这做那，与会代表们很快熟识并喜欢上这位"周小妹"。周秀珠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是六大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成员，肩负代表们重托与期望，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她除被指定为大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外，还是政治、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及广州暴动问题等委员会委员。从6月18日开幕，到7月11日闭幕，她参加了大会的一切活动，先后参加了15次主席团会议和22次全体会议。她曾同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大姐讨论起草妇女运动报告，研究如何加强全党妇女工作问题。她曾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在大会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

会议期间对周秀珠来讲是难逢的学习好机会。她天天能聆听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话，直接领受他们言传身教，学习他们的作风，思想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迅速提高。她的少年老成、政治上早熟，也深受主席团成员及代表们喜爱，成为六大期间几个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是女代表中最突出的人物。正是这种情况，使年仅18岁的周秀珠当选为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8月17日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是共产国际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19岁当中央妇女部长

1928年深秋，周秀珠满怀充实奋发的喜悦，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妇委秘书。由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因事未到上海任职，中央妇委的日常领导工作重担，就由周秀珠挑了起来。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由项英、周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项英忙于中央工委工作，中央妇委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秀珠主持。1929年后，19岁的周秀珠正式担任了中央妇委（妇女部）书记（部长），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部门领导人。

处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周秀珠把生死置之度外，投身于地下斗争。她尊重和依靠邓颖超、蔡畅等大姐，认真贯彻六大路线和方针，研究改进秘密斗争策略，从日常经济斗争入手，采取多种灵活的形式，逐步恢复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她经常机智地甩掉"尾巴"，身着女工装束，深入纺织厂做青年女工工作。1929年7月，上海虹口区20余家丝厂女工共1.1万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等要求。这次罢工是与她的工作分不开的。周秀珠同兼任省妇委书记的蔡畅等人深入罢工工人中间，实施了强有力的领导。她态度诚恳，平易近人，深深地同情女工们的疾苦，在与女工接触中她发挥了擅长讲演的特长，委婉动听，言中要害，每次演讲都激起女工们的共鸣。她走车间、串住户，很快获得工人及家属的信任，许多青年女工亲切地称她为周大姐。在她们的坚强领导下，这次罢工坚持了三个月之久。

转战南北，出生入死

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周秀珠与早已相爱的战友罗登贤结成革命伴侣。1930年春，罗登贤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周秀珠伴随他返回阔别3年的香港，这儿有他们的亲人和熟悉的街道、工厂、码头。同时调来的还有李富春、蔡畅夫妇。周秀珠与蔡畅并肩战斗，负责妇女工作。同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罗登贤为书记，李富春为组织部长，周秀珠兼做交通和情报工作。尽管他们无所畏惧，勇敢积极，经常深入工厂开展女工运动，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终因执行的是错误的"立三路线"，斗争一再受挫，后来省委的交通员被捕叛变，致使几十个同志被捕，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9月下旬，周秀珠同罗登贤秘密回上海，出席六届三中全会。斗争的实践使她清醒了，会上她拥护批判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支持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会后罗登贤返回南方，周秀珠留在上海继续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她同杨之华、张金保和邓颖超等，领导了恢复正常的妇女运动的工作。

1931年夏，罗登贤被指派为中央驻东北代表，周秀珠又一次伴他北上，沿途巡视指导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周秀珠亲身经历了东北的沦陷，亲眼见到日军铁蹄践踏下东北父老家破

人亡的惨状。她怀着对侵略者无比仇恨，积极组织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参与领导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1月，满洲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被捕。党中央指定罗登贤兼任满洲省委书记，周秀珠负责省委妇女工作。在冬暖如春南国长大的周秀珠为了抗日救国，迎着扑面如刀割的凛冽寒风，耐着零下40度的严寒，奔走在白雪皑皑的北国冰城，经常随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到电车厂、烟厂，向女工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发展反日会等组织。有时，为躲过日寇军警的搜捕，她不得不拖着怀孕的身躯，不顾疲劳，不避危险，穿行在石头道上、霁虹桥下。而忙于组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丈夫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临产在即、行动异常不便的妻子。10月27日，周秀珠生下了儿子罗伟民。听着儿子呱呱落地的响亮哭啼声，罗登贤、周秀珠热血沸腾、斗志愈坚，为了下一代免受亡国之苦，他们要战斗下去。

哪曾想到，在东北积极地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罗登贤，却被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临时中央"指责犯"右倾错误"而撤职。同年底，周秀珠怀抱仅两个月的婴儿，又伴随罗登贤到达上海。1933年初，罗登贤留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周秀珠独自带儿子到香港，在罗登贤的姐姐罗才家隐居，哺育营养不良的孩子，恢复她那虚弱的身体。

尽管她的行动十分谨慎，狡猾的巡捕还是发现了她的行踪逮捕了她。审讯时周秀珠镇定自若，无论敌人如何威逼恐吓，她咬定是商人的妻子，来港走亲戚。殖民当局因查不到证据，不得不将她取保释放。

周秀珠同所有的年轻母亲一样，从心眼里喜爱自己的宝宝，然而，铁蹄蹂躏下东北父老的哭泣呻吟，浴血奋战反"围剿"火线上红军将士们的拚杀呼喊，倒在雨花台血泊中战友们的响亮口号，声声呼唤着，使周秀珠坐卧不安。她毅然将儿子托给罗才夫妻，秘密回到上海。然而她听到的竟是一个比抛下儿子更悲痛的消息。她日夜思念，渴望早日相会的丈夫、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罗登贤牺牲了！再没有比这一打击更重的了，但是，丈夫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的事迹，又深深地激励着她，她擦干眼泪，忍着巨大悲痛，为实现烈士的遗愿，很快便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

由于"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上海地下党一再遭到敌人破坏。1934年她又一次被捕入狱。由于叛徒供认，她的身份暴露了。周秀珠受到残酷的严刑拷打，被判刑监禁。直到1937年1月获释出狱。

军需生产战线的女厂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秀珠几经辗转找到周恩来，回到了党的怀抱。随即拖着虚弱的身体，奔波千余里，随周恩来到达延安。在那里，她又见到久别的蔡畅、李富春、任弼时等战友，聆听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教诲。不久，她愉快地投入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这期间，她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了在狱中的表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一年后她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机关，当托儿所所长。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计较职位高低，干一行爱一行，干就要干好，是周秀珠一贯的行动准则。随后的岁月里，她在延安印刷厂、难民厂等单位当保管员、会计、文书等，1939年被调入延安被服厂。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她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多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工作者。1946年，周秀珠用自己的行动争取，经过党组织慎重讨论审查，又经刘少奇等批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周秀珠，满怀喜悦，又踏上了战斗的征程。1946年她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东北，被分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佳木斯被服厂军代表、厂长的工作。在东北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她领导被服厂的工人，克服困难，日夜奋干，保证了东北解放军百万雄师按时换装，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辽沈战役和第四野战军入关的进军中，都凝结着周秀珠和战友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用汗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周秀珠担任中南军区军需部二〇一厂党委书记。她不曾喘息便接受了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生产被服的任务。战争进行了3年，这期间，周秀珠以身作则，经常带领工人挑灯夜战，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军装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6年9月，为表彰她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的功绩，周秀珠荣获了二级解放勋章。随后她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了武汉第一针织厂党委书记、武汉市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武汉市妇联副主任等职务。

无论干什么工作，周秀珠从来都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自居，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坦诚热情，毫无官气。同她并肩工作过的无数工友们，哪里知道她18岁就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岁担任了中央妇女部的部长。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在那动乱的岁月，她受到无情的批斗，长期带病的身体，更被折磨的愈加虚弱了。终于，在1970年12月的一天，她默默地走了，这位当年投身大革命洪流中的女童工、活跃在六大会议上的"周小妹"、战斗在白色恐怖中的妇女部长、穿行在北国冰天雪地中的地下工作者，终年忙碌的"女实干家"，无声无息地走了……

然而，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她。1979年4月20日，在为周秀珠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党、政府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选自《人物》92年3期，作者：王健英　何锦洲）

皇姑屯炸车案秘闻

1928年6月4日清晨，一列从北京开来，满载卫兵戒备森严的专车，呼啸着驰过夜雾初散凉意犹存的辽河平原，向奉天(沈阳)疾驶。5点20分刚过，当专车正要穿过皇姑屯附近，距离奉天车站仅1公里远的京奉线与南满铁路交叉点的跨线桥沿时，突然亮光一闪，接着发出一声震撼大地的沉闷爆炸声。顿时硝烟弥漫，烈火冲天。专车前部的6节车厢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出轨，挂在中间的了望车和餐车炸得面目全非，只剩下车轮与地板，顶棚、窗户全被摧毁。蓝色钢皮车身上嵌有"津浦"两个金字的豪华贵宾车(据说是前清慈禧太后的御用座车)，已支离破碎不成车形，并且燃起了熊熊烈火。后面的两节蓝钢皮头等卧车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贵宾车上的东三省最高统治者，一度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的风云人物张作霖身负重伤折断一臂。特意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迎接张作霖，与张氏同车返回奉天的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吴俊升因头部穿入一枚大铁钉而当场毙命。其他同车的奉系要员刘哲、莫德惠、于国翰和日本军事顾问嵯峨诚也少佐等人均受轻伤。张作霖从炸毁的车厢中被抬出来后，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躺在宪兵司令齐恩铭开来的一辆汽车内急返大帅府。虽经立即延医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当日上午9时30分去世。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事件。

精选暗杀小组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在1928年初就奉命拟定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后，便着手物色参加暗杀小组的成员。他吸收的第一个组员，是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关东军不久的川越守二大尉。此人平时沉默寡言，干起事来却异常果敢，因此被河本看中，引为臂助。另外两名组员是工兵科出身的菅野大尉和从朝鲜龙山派来的独立工兵第20大队的中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这是因为河本与川越商议暗杀方法时，一致认为采用爆炸专车的手段最为有效。要炸车，就要选择爆破地点、计算炸药用量以及安装炸药、操纵引爆等，都离不开工兵作业。所以这两名工兵军官，便被他罗致入伙。此外，还有一个是担任南满铁路跨线桥上警备任务的独立步兵第二纵队守备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暗杀小组成员名单中本来没有他，但他见到工兵队的神田中尉多次在他负责的警备区域内徘徊而产生怀疑，于是把神田带到守备队哨所进行盘问，从神田口中知道了炸车计划。东宫原本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少壮军人，当即找到河本那里，慷慨陈词要求参加这一行动。河本被他的热情所感动，经过一番谈话考核，终于接受东宫为第4个组员。据日方资料，当时为炸车事件出力的人真正知道河本计划内容的却只有上面这4个人。

储备炸药，选择爆破地点

爆炸列车需要大量炸药，河本原可以从关东军的兵器部或所属工兵部队直接领取，但他顾虑太露形迹，一旦事不机密将会把关东军牵连进去。于是决定采取迂回手法从关东军那里得到炸药。当时正好关东军应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要求，在旅顺工科大学设立了炸药讲座，关东军派遣教官，作炸药的一般知识与操作实习教育。结业后由关东军发给许可证。

川越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和河本商量，自荐担任这个炸药讲座的学科教师，让工兵出身的菅野大尉指导实习课程，并且提出应由兵器部供给教学所需的炸药。这些要求都被关东军一一照准。于是菅野大尉就利用指导实习之便，把"教学实习定额外"的炸药逐渐存蓄起来严密保管。当接到河本实行计划的命令后，菅野大尉即将这批积储的炸药秘密运到东宫大尉的宿舍，暂时寄放在他家的存煤库里，以备到时使用。

剩下的问题是选定实施爆破的地点。最初，河本他们看中了远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沙河站桥梁，但因那里的有线通信网不够完善，担心由于情报不灵，错过爆破时机而作罢。接着选择了靠近辽河的巨流河铁桥，也因此地奉军部署的岗哨严密，难以接近，而不得不舍弃。于是考虑第3个地点，这就是奉天站西面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点。

这个交叉地点的下面是京奉铁路，跨线桥上通过的是南满铁路，但此处奉军的岗哨警卫松懈，而且负责桥上守备任务的正是东宫铁男大尉的部队，对于掩护和接应爆破行动有许多便利条件。此外，东宫的守备队哨所与奉天城内的关东军司令部有军用电话相通，河本可以用电话直接指挥现场行动。因此，最后确定在皇姑屯附近实行爆破。

河本大作布下"必死之阵"

在确定爆破地点后，河本就命令工兵军官菅野大尉精确计算进行爆破所需的炸药数量。要求是，即要保证彻底摧毁张作霖乘坐的车厢，又不致于损坏桥上通过的南满铁路，避免因危害满铁会社的利益而遭到日本政府责难。菅野经过多次实地勘测和反复计算，决定使用200公斤黄色炸药实行爆破。

但是，如何把这200公斤炸药秘密运到爆破地点，而且要保证在有奉军哨兵巡逻的情况下安装起来，不被发现，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一般资料都记载河本选定的爆破地点是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点的跨线桥下面。其实更准确地说，爆破地点是在桥墩前面15米远的路轨旁边。那里排列着垒成3层的几十个沙袋。在近处堆放有满铁会社作为担保物的抵押品的洮昂铁路的铁轨、枕木等筑路器材，这些沙袋是作为围墙来防盗用的。河本在侦察地形时偶然发现了那些沙袋，又看到距此200米远的南面高粱地中，有一间守备队的哨舍，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出偷梁换柱的妙策，顺利解决了炸药的安装和引爆两大难题。

河本对守备队长东宫大尉面授机宜，东宫便命令部下在夜晚把10个沙袋偷偷地运到自己家里，倒出沙代里的泥土，由菅野大尉亲自将200公斤炸药分别装进这10个麻袋里，用麻绳缝严了袋口。然后再秘密运回原处，依照原来的样子码放在其他沙袋上面。河本对这项工作异常细心，他指示东宫派几个士兵用排子车把沙袋运来，换装炸药后，再另派几个士兵把装着炸药的麻袋运回。其目的是不让参加搬运的人知道这些麻袋的来源、去处和里面装填的东西，免得走漏消息。这些活动都是在奉军哨兵一小时巡逻一次的间隙中完成的，干得迅速而隐秘。

炸药的引爆装置就设在那间200米外的守备队哨舍里。为了万无一失，特意安装了两个起爆按纽，连接在通往炸药袋的电线上。

河本又考虑到如果炸药威力不够，一旦张作霖伤而未死，就会误了大事。所以他还指示东宫大尉组织突击队，准备在列车遇炸脱轨，烟火弥漫、人员惊慌的混乱时刻，趁机冲上专车将张作霖杀死。东宫果然从数百名守备队员中挑选出12名精于射击和白刃格斗的勇士，预定当炸车时，埋伏在铁路旁的高粱地里待命行动。后来只因张作霖的车厢被完全炸毁，确认张已毙命无疑时，才没有把突击队派上用场。这样，河本已殚精竭虑，布成了谋杀张作霖的“必死之阵”。

河本在打发竹下议晴武官前往北京探听张作霖离京返奉时间后，又召集情报参谋樱田少佐和川越大尉，商议收集准确的情报，认为除在北京有竹下外，还必须在京奉铁路沿线要地配置人员，以便随时核实张作霖是否在专车上，有无中途下车或换车等情形。后来又在山海关部署了从参谋本部派来的作为“中国研究员”石野芳男大尉。在新民部署了进驻奉天的抚顺独立守备队小组长角田市郎、武田丈夫两名中尉。这几个人除川越外，只负责提供张作霖所乘专车的情报，并不知道河本的具体炸车计划。

大摆疑阵　转移视线

河本不仅布下了谋杀张作霖的必死之阵，为了逃避罪责，嫁祸于人，还在炸车事件发生前后故意大摆疑阵，企图把水搅混，转移世人视线。

早在1928年初，老谋深算的河本及其助手川越就找到一个名叫中野洋平的日本浪人。中野当时是活动在齐齐哈尔一带的马贼头领，手下有几百名喽啰。河本因中野熟悉北满地形，便让他担负爆破中东铁路桥梁的任务，并且叮嘱“只须炸毁铁桥，不可损坏列车”。此后不久，2月18日哈尔滨东面二道河子附近的铁桥即被炸毁。一周之后，齐齐哈尔西面的李家屯又发生了同样的炸桥事件。于是哈尔滨的俄系和奉天的日系中文报纸都纷纷报道这些“原因不明的铁桥爆破事件”，日本国内的报纸也作了报道。所有报纸的论调，都认定“这些奇怪事件可以理解为民众对张作霖政权推行暴政的抗议”，并推测是杨宇霆、吴俊升或张作相的部下所为，没有一家报纸怀疑关东军与此事有关。

河本一一地看着这些报纸，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满意地看到已经造成了一种假相：杨宇霆、吴俊升等张作霖的股肱之臣，出人意外的也是反张派。河本预料这将进一步加剧满洲民众对张氏政权的反感。只要做好伪装工作，就可以把炸车事件假冒为反张分子的行动。

河本决定把炸车事件伪装成南方革命军便衣队干的。这就需要几个替死鬼。河本委托在大石桥经营煤炭、滑石生意的商人伊藤谦二郎，由他转请当时在奉天作特务的日本浪人安达隆盛出面，要求在奉天开妓院的黑社会人物刘戴明以每人300日元的代价，找到3个吸毒的无赖。并且约定事成之后，另外酬谢刘2万日元。

皇姑屯炸车事件发生的头一天6月3日早上，刘戴明把3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无赖带到伊藤的秘密住所。这3个人都相信自己已被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为密探，立即理发、洗澡、换上新衣服，还各自拿到50日元的预付金，都显得很高兴。

在这3个人中，有个名叫王谷生的逐渐觉得事情蹊跷。他感到在日本人的殷勤款待后面，似乎隐藏着某种令人恐怖的阴谋。所以当伊藤领他们出去吃饭时，他便悄悄地从饭馆里逃跑了。伊藤只得把剩下的两个人带到河本下榻的沈阳宾馆，交给了川越大尉。

行动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把由安达起草、经刘戴明修改过的伪造南方革命军暗杀张作霖的密令装进那两个人衣袋里。等到夜晚，川越用汽车载着两个“替死鬼”运到独立守备队的驻地，两人一到即被等候在那里的东宫和十几名队员刺杀，抛尸于路轨旁边，尸体衣袋中除伪造的密令外，还塞着一颗生锈的俄式手榴弹。这一切伪装工作完成后，接着便是等待张作霖专车的到来。

半载策划　一朝得逞

6月3日凌晨，竹下义晴中佐在北京东车站匆匆送走了张作霖的专列后，立即驱车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

馆，用暗号给奉天的河本拍发电报“——3日，午前1时15分，特别列车从北京发车。是20辆蓝色车厢编成的列车，‘那人个’在第8号车厢”。

竹下的电报像是一道行动命令，立刻启动了河本计划的整个机器。山海关的石野大尉，新民的角田、武田两中尉等配置于京奉沿线主要车站的情报人员，也都陆续电告张作霖所乘专车的通过时间。河本最重视的是来自新民车站的情报，因为从新民到奉天仅有60公里的距离，只要张氏的专车过了新民，到达奉天的时间就容易测定了。一般不会出现故意加快、减慢速度或中途换乘的意外情况。事前河本已把新民总领事馆的电话线直接接通到自己的房间，以便及时掌握情报，坐镇指挥。

6月4日凌晨4点来钟，已经确认是张作霖乘坐的专车离开了新民车站，5时18分驶过皇姑屯车站，这里距离终点奉天车站只有10分钟路程，列车速度降低为每小时10公里左右。

早已接到河本电话命令的东宫大尉，这时紧张地站在铁路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手中的夜光表。远处地平线上隐约露出一丝灰白暑色，天就要亮了。

5时20分，随着铁轨的颤动声远远望见一条黑色长龙亮着前灯喷着白烟，徐徐驶来。东宫叫了声“来啦!”举手一挥，埋伏在路边高粱地里的10余名突击队员立即散开隐蔽，待命行动。

东宫急忙跑进哨舍，把手指放在起爆按纽上，屏息注视着迫近的列车。好容易等到第7节车厢进入爆破地点，便用力捺下按纽，可是丝毫没有动静。急得他大嚷“糟了！备用电纽，快捺备用按纽!。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的神田中尉已经捺下预备按纽，顿时轰隆一声，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鲜红的火球立即冲向天空。爆炸声中，车厢的碎片和火星像雨点般纷纷落下。东宫注视着被烈火包围熊熊燃烧的车厢，判断张作霖已经丧命，认为没有必要再使用突击队，于是立即下令总撤退。

东宫又来到现场，只见铁轨已像麦芽糖似的扭曲翘起，枕木破碎而凌乱。在爆炸的大坑旁边倒着两具尸体，那就是被伪装成放置炸弹，杀害张作霖的南方革命军便衣队的“刺客”。

东宫大尉完成了爆破任务，马上命令部下卷收引爆用的电线。部下退去后，他还沉着地用长靴的靴底，仔细擦起被引爆电线压倒的野草，直到完全消除了电线留下的痕迹，才从容不迫地离开现场，去向河本复命。

（何林荣）

民国两次南北建都之争

在民国时期的38年间，围绕着是建都南京抑是建都北京这个问题，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争论。

第一次争论发生于1912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政府。1911年12月29日，独立各省代表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翌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但这个新生的政权基础非常脆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妥协退让。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同时推荐北洋军阀集团的头目袁世凯接任大总统职务。他在辞职咨文中，向参议院提出了辞职的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自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孙中山提出建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其目的是想把袁世凯调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孙中山的这一主张，首先引起同盟会内部的一场争论。章太炎、宋教仁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一些议员都强烈反对建都南京。他们认为建都南京，无异于放弃满蒙。2月13日，章太炎致书参议院，力主建都北京。章太炎声称：“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在宋教仁、章太炎的影响下，一些参议员也倾向于建都北京。2月14日，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投票者28人，主北京者20票，主南京者5票，主武昌者2票，主天津者1票。孙中山接到参议院的议决案后，异常气愤。一面依法咨交参议院复议，仍主定都南京；一面急召参议院中的同盟会员李肇甫、黄复生等，严责他们不应为袁氏张目。黄兴尤其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在孙、黄的严责下，参议院于2月15日举行复议。投票者27人，以19票多数通过建都南京。此外，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6省则始终主都北京。终于通过了孙中山的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争论首告结束，与北洋派的争端又起，而且日趋激烈，最后终于败下阵来。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深知北京是自己的势力中心，他岂肯轻易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老巢北京，而到南京来受革命党势力的约束?早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就明白电告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在参议院通过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一再电催其南下就职。工于谋算的袁世凯表面上并不拒绝南下，却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置”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一味拖延。2月18日，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纽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

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知硬抗难以奏效，转而又玩弄了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与蔡元培等谈话中，袁世凯诈称"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到"。接着又假惺惺地召集陆军各统制和民政总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欢迎团被袁世凯的这番虚伪表演蒙蔽了。大家对袁的南下深信不疑。正当欢迎团正在庆幸大功即将告成之时，袁世凯却于29日唆使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城发动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抢掳。欢迎团驻地更是首当其冲。变兵"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蔡元培等于仓皇之中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3月1日、2日，保定、天津等地的北洋驻军也如法炮制。北京兵变发生后，中外反动势力借机发难，一致叫嚷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地声称"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也与北洋派遥相呼应，纷纷指责孙中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副总统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至此，孙中山不得不再次向袁世凯让步。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袁世凯不必南下受职。3月6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南京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4月2日，南京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这场建都之争以北洋军阀集团的获胜而告结束。

第二次建都之争发生于1928年，其结果与前一次相反，主南京者获胜。

这次南北建都之争是由北方实力派阎锡山、冯玉祥挑起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1927年6月，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等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移樽就教，前往徐州与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以拉拢冯玉祥。在徐州会议期间，冯玉祥对吴稚晖说："我们将来还是迁移北京去吧？"冯的提议，当即遭到吴稚晖的反对。吴回答道："很好，不过你可愿东交民巷存在吗？"冯玉祥一时为之语塞。不过当时北京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之下，北伐还未完成，所以，这次争论也就没有继续下去。随后，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南京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天津、北京，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驱逐到关外。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委阎锡山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华北各省成为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的势力范围。阎锡山接收平津后，旧话重提，再次挑起建都之争。阎锡山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称："首都问题，北伐完成后，东三省满蒙之应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方，北京为便。"由于这次建都之争是国民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执，所以阎、冯不便自己出面与中央政府争论，只是暗中指使北方派的文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张建都北京。所以，这次建都之争更多地表现出学术探讨的特点。1928年7月，《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发表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国都问题》一文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代表作。白氏的文从"历史的观察"、"地势之评判"、"外侮之应付"、"现状之宏隘"等4个方面，对北京与南京两城作了全面的比较，其结论是建都北京较南京为宜。文章指出，历史上北京建都800多年，在此建都者，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夏期湿热，民风文弱。历史上，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委靡之气太重。南京建都400余年，在此建都者平均每代不过45年，而且除明朝外，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非偏安邓年促"，是亡国之都。白氏并断言："国都迁此，自决失败已耳。……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接着，叶叔衡也发表文章，支持白眉初的观点，并且针对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首都这一理由指出，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建都南京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北京；孙中山临终遗嘱的时候，北京还在张作霖势力控制之下。因此，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是因时制宜的一个措施，并非不可改变。其实，孙中山的眼光极为远大，他的"建国方略"是注重向北发展的。文章要求国民党政府效法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故事，舍南京而立都北京，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础"。

为了维护南京的首都地位，蒋介石集团的政客和文人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对建都北京的言论进行驳斥。1928年6月4日，蒋介石的策士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的演讲中，阐述了建都南京的理由。吴稚晖指出：第一、建都南京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安葬在南京；第二、从地理位置看，南京与北京同在中央。从陆上看，南京似乎偏东，但从海面上说起来，南至新加坡，东面和日本划分起来，也不少；第三、北京虽然较为整齐，不过只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红墙头，黄墙头，不能就可算是首都。南京虽然暂时简陋，但南京临近上海，投资巨大，建设起来容易；第四、上海是一个欧美往来轮船必经过的地方，又是舆论的中心，首都在宁，有上海作为传达处，更是好上加好。总之，"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张继也在上海报刊发表文章，反对在北京建都，支持吴稚晖的论调。接着，《申报》总编龚德柝秉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意旨，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的文章，对北方派文人建都北京的议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文章一开头即指责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之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世纪以前之理论来论现代之国都，根本上已属错误。他指责白氏文章本身"或误因为果，或误果为因，或冠履倒置，或牵强附会，或互相矛盾，或支离破碎。……并滥引似是而非之历史道理，以炫其淹〔渊〕博，图欺世人，不知识者已窃笑于旁矣。"并且在攻击白氏

文章中“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两段，与“日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武断地认为这是为“外人作说客，为帝国主义作走狗”。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定都南京“不特可免脱各国之平时占领，长受城下盟之苦，且可除旧布新，一扫恶习，以渐入于振拔强感之域”。“总理独见及此，固非庸欲所能窥！其深远也”。龚德析的文章，火药味甚浓。这种以高帽子压人的论战方式就足以使人免开尊口。此后，南北文人的笔战开始沉寂下来。

在南北文人引经据典，大打笔墨官司的同时，国民党一些地方党部和要人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定都南京。6月18日，李济深致电南京，主张定都南京。28日，广州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电，指出“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当南北冲要，于军事、政治、文化、商业，均占重要位置，非北京可及。，请国民党中央迅速决定定都南京，“讵容再有异议”。

这次建都之争是国民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阎、冯等北方实力派，因为北京在他们势力范围内，建都北京，便于他们插手和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而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财团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是蒋介石集团的大本营，他们当然要像昔日袁世凯死抱住北京不放那样，坚守石头城了。在这场南北对垒中，由于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可以开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而且又有总理遗训作为根据，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阎、冯等北方派见事无可为，遂不得不偃旗息鼓。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张学继）

历史考证

关于朱毛会师的新见解

多年来党史界一直认为朱德、毛泽东会见和会师的地点是江西宁冈龙江书院。张曲等人通过考证提出新的见解是：两支部队会师有一个过程，先是朱、毛两部的部分队伍在湖南资兴城郊和龙溪洞会合，全部会合则是在酃县沔渡圩。朱、毛第一次会面地点是在酃县十都圩。而宁冈砻市则是后来召工会师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的地点。其简要过程是：

1928年元月，朱德、陈毅和湖南特委发动湘南暴动。3月上旬应湘南特委要求，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动，接应和支援暴动。由何长工、袁文才率第2团为右翼，向彭公庙、资兴县城方向前进；毛泽东亲率第1团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掩护朱、陈向东转移。

4月初，第2团开到资兴县城附近，与邓允庭带领的郴县农七师4000多人会合。这是朱、毛部的第一次会合。第2团和农七师在资兴县城附近遇到陈毅带领的部分农军和地方党政干部4000多人及黄克诚带领的永兴农军1000多人，这是第二次会合。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第1团在资兴龙溪洞与肖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600多人会合，这是第三次会合。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第1团从资兴龙溪洞出发，完成掩护任务后，经瓦铺、坂溪、石洲进到十都。朱德听说毛泽东到十都，便专程赶去与毛泽东会见。随后，毛泽东率部到宁冈砻市，又从宁冈赶到沔渡慰问和欢迎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这时沔渡会合的部队共约17000多人。由上可见，朱、毛第一次会见地点是酃县十都圩，第二次会见地点是酃县的沔渡。时间不是1928年5月1日，而是4月底。

摘自《湖南党史月刊》88年1期

“乡村包围城市”战略是谁首次提出的

党史界一般认为，是李立三、周子敬（何孟雄）等人在1930年春首次提出“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周少华在《关于“乡村包围城市”战略的首次提出》一文中认为，早在1928年8月，湖北省委在第二次“秋暴”总计划中，即已提出这一战略思想。1928年2月23日，湖北省委第26次常委会围绕“割据中心”与“政治中心”、“农村工作”与“城市工作”展开激烈争论。多数常委从鄂南、鄂中、鄂西的秋收暴动，黄麻起义和武汉等地工人罢工的失败和挫折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反对“割据中心就是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和割据区域应合二为一”的观点，主张：(1)政治中心主要指经济、文化较为发达，靠近交通要道，敌人势力十分雄厚的城镇或县市；割据区域则主要指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或区乡，两者应有区别；(2)创造割据区域是暴动的首要任务，夺取政治中心则是暴动的目的；(3)创造割据区域向政治中心发展，变政治中心为割据中心是斗争的发展方向。根据这一思路，湖北省委于同年8月制定了《关于湖北秋暴的总计划》和《秋暴行动大纲》，进一步提出了分别发动、联合暴

动、创造割据、包围城市、逐步发展的基本步骤和具体的实施计划。湖北省委的这一战略思想和计划还带有朴素、直观和实践的性质，但其思维方式已接近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为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归纳、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摘自《中共党史通讯》91年18期）

入党誓词的演变

早在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党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对入党誓言作过规定。那时，采取了十九世纪欧洲很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裁。例如其中的三个问题是：

你是否确信仰财产共有制的原理是真理？

你是否愿意承担义务，始终不渝地以言语和行动为传播财产共有制的原理并促其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而努力？

你是否愿服从同盟的决议？那么请向我们许下诺言作为保证。

凡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必须对上述提问一一答复说："是的"，并在最后亲口许下诺言，才被宣布为盟员。

我党红军时代的入党誓言比较简要，计六句话，24个字："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入党时的誓言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载明入党誓词，这个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

（选自《党史博采》89年8期）

《田中奏折》怎样为张学良所获

《田中奏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一个总战略、总规划。它曾被张学良所获，其译文于1929年在南京《时事月报》第二期上首次披露后，震惊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直到现在，《田中奏折》还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值得记取和研究的课题。笔者最近查阅了有关省（市）的文史资料选辑和港澳的一些刊物上关于《田中奏折》的有关文章和史料，尤其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对我颇有启发。这些史实对进一步研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内幕以及张学良获此密件的具体经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依据。

首先从日本近现代的"大陆政策"，说起，所谓"大陆政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大陆，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侵略计划。早在19世纪末山县有朋为日本首相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大陆政策"的初步纲领。山县有朋是近代日本最有实力的政界、军界元老之一，曾在1889—1891年、1898—1900年两次组阁，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担任军事要职，积极推行侵华政策。张学良对此问题说过："大陆政策"是日本的传统国策，从山县有朋时代已有具体内容，那时的"大陆政策"可以分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吞并朝鲜为目标；第二个阶段以确保东北既得权益为目标；第三个阶段，在利欧战期间各国不能顾及东亚的时代，以武力胁迫袁世凯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张学良又指出："到了田中义一时期，完成了'大陆政策'的全部纲领"。这个全部纲领即是揸田中义一一手炮制的《田中奏折》，它的内容比山县有朋时期更加完善具体，野心比山县有朋大得多了。

那末《田中奏折》又是怎样出笼的呢？

1926年底，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严重，关东平原大地震又给日本一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当局为了摆脱国内困境，选择了向外扩张转嫁危机的道路。所以，1927年起用陆军大将、长州派军阀田中义一为首相，推行更为强硬的侵华政策。

田中义一此人，在1918—1921年和1923—1924年两将任陆相，是继山县有朋之后的陆军、长州派的巨头。当时日本规定，首相必须是非现役军人。为了当首相，田中义一宁肯牺牲了陆军大将军衔，另参加了日本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政友会。

田中义一上台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策划向我国扩张，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之间，他又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秘密研究侵华的具体方法和步骤。自始至终主持会议者乃是以对华强硬派著称的、拨款有外务省实权的外务政务次官森恪。历时11天的会议终于炮制出一份充满火药味的文件《对华政策纲领》。文中明确表示"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造成特殊地区，把它纳入日本政治势力范围之内。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日本裕仁天皇对"东方会议"寄予莫大的期望，会期内作了两次"垂询"。所以会后田中义一即令秘密整理会议记录，以便向日皇上奏。1928年7月24日整理完毕，田中义一便把此件上奏天皇，就是后来被张学良获取的《田中奏折》。

张学良在《抗日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把《田中奏折》看成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全部纲领。《奏折》全文共2.4万余字。文中说："我对满蒙权力真实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为假面具……获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与南洋各岛，以及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及欧洲。我大和民族之欲耀武于大陆者，摄执满洲权益，乃第一关键。"又云："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

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

《田中奏折》还述说了吞并我国东北的策略方针：“扶植一亲日政府作傀儡，日本其操实权，威胁利诱，使为我用。迄酝酿成熟，于是出其不意，揭示外幕，正式宣告满蒙归并日本！”其侵略实施步骤分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征服台湾；
第二时期：征服朝鲜；
第三时期：征服满蒙；
第四时期：征服全中国；
第五时期：征服全球。

张学良强调《田中奏折》从各方面看都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他之所以强调《奏折》的真假问题，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因为，1929 年当张学良获此密件公诸于世后，日本当局急于用种种借口抵赖，说《田中奏折》是伪造的。当时“伪造”一说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接着“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还有伪满洲国政权的建立，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按《田中奏折》制订的侵略步骤，在推进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俱在，任何人已不能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张学良悲愤地回忆道：“‘九・一八’事变前，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后对日唯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同时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再也不能容忍了，所以他在 1936 年底同杨虎城一道发动“西安事变”，也是历史的必然了。

张学良说：“《田中奏折》是本人在东北时获得的”。张学良觅取这个密件的过程，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神奇色彩，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1928 年，日本军国主义着手第三个时期的侵略计划，加快灭亡满蒙。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他们妄想灭亡东北的第一步，原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局势必然混乱，可趁机侵占全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年仅 27 岁的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们辅佐下，稳住了东北的局势，用张学良的话来说“我们年轻人干的也不赖！”日本帝国主义改变对张学良的策略，用拉拢威胁的手法来鼓动张学良搞所谓“东北独立”，要张学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使东北成为在日本完全控制下的一个傀儡政权。为此他们对张学良软硬兼施。从张学良宣布为父张作霖治丧的时候开始，日本政府就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有名的中国通曾任中国公使多年。日本派他为吊唁专使，实际是来探虚实，拉拢张学良的。他在日本领事馆设宴招待张学良时说：“日本政府经过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的地方，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关心。”林权助面责张学良企图在东北挂青天白日旗，要与南京政府“同流合污”。张答曰：“这是我们的内政。”会谈争吵了几小时。在东北尚未正式易帜前，日本千方百计对张学良拉拢诱逼。田中义一也亲自出马，在东京官邸宴请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家桢时说得更为露骨：“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铁产、气候也不差，从各方面看，满蒙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就不知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了，张将军是想蒋介石，归顺国民党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呢？还是想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一番事业呢？”田中义一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全力支持张学良搞东北独立。日本大特务土肥原送张学良一部《日本外史》将书中若干段落标出，暗示张学良要根据日本意图办事，若不听摆布，就会遭杀身之祸。但张学良在日本的利诱、威胁面前果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28 年 12 月 29 日东北当局正式宣布，拥护国民党南京政府。

张学良与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无法同日本硬拼，但亦不肯屈从杀父的敌国。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与日本在外交上周旋，了解日本对东北的新动向和政策底细。为此，张重新组织对日外交班子，起用了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的王家桢等一批年轻人。正巧在 1928 年 12 月，田中义一的政敌、日本政友党的一个头目床次竹二郎到东北进行访问。床次在国内参加竞选，缺乏竞选经费，到张学良处要钱，说如果他们竞选获胜，对东北问题可作出让步。张学良认为这是利用日本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极好机会，欣然答应支持床次竞选。随即令东北官银号总裁鲁穆庭先支付 50 万元给床次。但这事被东北军总参谋长杨宇霆得知。田中议一是杨留学日本时的老师，杨很受田中议一赏识，据说田中义一暗中想策动杨去取代“小孩子”（指张学良）。再加上东北军中的其它矛盾，促使张 1929 年 1 月 10 日下午处决了“杨常”两人。事发后，张深恐日本当局趁机制造事端，派王家桢去日本领事馆进行解释，以摸清日方的反应。并派一位得力人物去东京搜集情报，此人叫蔡智堪。蔡得到了床次竹二郎的帮助，不久就搞到了绝密文件，由蔡从东京分批发送东北，共十余次发完。张学良与王家桢等对密件加以译述整理，觉得这不是伪制品，因为文件的内容与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政策和实际采取的步骤都完全吻合，张学良知道这就是“东方会议”的阴谋，会后经过整理后由田中义一奏呈天皇的密件，按中国的习惯称之为《田中奏折》。张学良把译文交东北官银号印刷所付印，以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 200 册，发东北简任级军政官员，还送南京国民政府 4 本。1929 年在南京《时事月报》上披露的

《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就是张学良送去的那个译本。

然而日皇宫中的密件又怎么被蔡智堪所获呢？原来日本国内存在尖锐的派系斗争，这给蔡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时担任宫内省大臣的是牧野伸显，他是日本萨摩派核心人物，颇受主张中日友好的西园寺公一先生的影响，与田中义一代表的长州派是对立的两大派，由于日本历史上的原因，前者控制着海军，后者控制着陆军，这时他们的斗争已经发展到顶峰。当时牧野伸显这一派已控制了天皇，但他们害怕掌握陆军的长州派推行侵华政策成功，导致陆军势力的膨胀，危及天皇和萨摩派的统治地位，所以牧里利用自己的权力经常去打击田中义一。牧野伸显掌握了田中义一侵略满蒙的全部秘密，下决心把《田中奏折》透露给中国，利用中国问题来牵制田中义一的势力发展。而受张学良利用的床次竹二郎与牧野伸显是同朝大臣，彼此很熟，牧野很快同意了床次的请求，要蔡智堪装扮成装订工人进宫补册。于是蔡把《田中奏折》从日皇书库里抄录到手。后来事情败露后，日本当局十分害怕，日本外务省出面反驳，说《田中奏折》纯属"伪造"，床次竹二郎也被指控犯了"叛国罪"。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第六十五届理事会，中国代表再次在会上公布了《田中奏折》。这就成了会议上的热门话题，有一个记者问中国代表："一个岛国如何能有与其国力不相称的野心？"当时中国代表回答道："……你或许觉得这样一个小戏院，怎么可能演出一些大节目呢？可是幕已拉开了，演出的正是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节目，那么你对节目单上后面的节目还有怀疑的余地吗？"一席话赢得满场的掌声。

（吴志明）

风云人物

夏明翰

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曾用名陈日习。湖南衡阳人。1921 年，夏明翰进衡阳县石鼓国民高等小学堂读书。1917 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第一班。他在体育老师、老同盟会员邱海岚的帮助下，联络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蒋先云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砂子会"，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五四运动期间，他和蒋先云等发动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19 年 6 月，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他当选为学联第三任总干事，主编和发行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后以学联为主，会同各界人士，成立抵制日货的爱国组织，并和蒋先云带领学生到各处清查日货，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焚毁日货大会"。

1920 年，在衡阳领导学生运动，引起富商、绅士的忌恨，被学校开除学籍，并受到祖父的斥责。遂与祖父决裂，离家出走。

1920 年秋，在何叔衡、易礼容的帮助下，来到长沙，认识了毛泽东。在这以后近一年时间里，他刻苦自学，参与社会活动。1921 年 8 月，入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1921 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 9 月任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务主任，1923 年 11 月，到中共湖南省委筹办的湘江中学教数学。1922 年 1 月，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与庞人诠领导工人罢工被杀害，中国共产党派夏明翰、郭亮等出面组织长沙广大工人和各界代表，召开追悼大会，率领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1922 年 10 月，夏明翰领导和组织了长沙人力车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3 年长沙发生了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六一惨案，党派郭亮、夏明翰以"外交后援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召开了有六万人参加的大会，提出八项条件，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 年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后兼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努力培养农运干部。1926 年 12 月 1 日，在他和郭亮主持下，联合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夏明翰和易礼容、柳直荀共同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四十个决议案（包括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等问题）交大会讨论通过。这次大会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1927 年春任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非常悲愤。他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927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调夏明翰回湖南工作，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7 年 10 月，调任中共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在平江组织了秋收暴动，又在浏阳组织扩大了暴动队的武装。

1928 年初，夏明翰到湖北，担负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1928 年 3 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在狱

中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28年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刽子手押到刑场。临刑前挥笔写下了一首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英勇就义后，一些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遗体安葬于湖北汉阳城畔汉水之滨。

材料一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在革命的征途上，常有风云的变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在困难、艰苦以至生死考验的时刻，革命队伍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消极、颓废、叛变。有的面对敌人的刀枪，巍然屹立，视死如归，夏明翰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夏明翰出身名门望族，他青年时期渴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背叛了原来的阶级，于1921年冬，由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事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对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1928年不幸被捕。

在狱中，夏明翰受尽酷刑，仍然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敌人审问他："有没有宗教信仰？"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不象你们的蒋总司令，又当基督教徒，又当杀人刽子手！"敌人企图使他回答没有信仰，以便宣布他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夏明翰识破敌人的险恶用心，理直气壮地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当他赴刑时，执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讲没有？夏明翰大声说："有，给我纸和笔！"于是他饱蘸浓墨，在纸上飞快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然后，将笔往地上一丢。夏明翰高大的英姿，使第一个行刑者两手颤抖，许久扳不动枪机，反动派不得不另换人……

夏明翰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人民的英雄。他用热血谱写了无产阶级的战歌。

（选自《龙华烈士史迹选编》）

材料二 讽联

夏明翰

洋衣洋帽洋袜子，头发亦有洋气；
卖国卖民卖祖宗，江山也快卖完。
横批：ABCD

这是一九一八年夏明翰烈士在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写的一副讽联。当时衡阳某校有个教务长，曾到过日本，回校后大肆鼓吹"洋化"，不准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夏明翰知道后，写了这副讽联，趁夜深人静时贴在那个教务长办公室的门上，对卖国的洋奴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夏明翰烈士写完上、下联后，当时有个同学说："少了一个横批。"夏明翰听后略思片刻说："就用'ABCD'这四个字母作横批。"同学们问："是何意思？"他说："莫看洋奴们满口洋文，其实只知道读几个字母，不过装腔作势、吓唬别人罢了！"

（选自《纵横》84年2期）

向警予

向警予（1895—1928）原名俊贤。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后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因思想倾向进步的校长朱剑凡被免职，毅然退学，转学到朱主办的周南女校。受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薰陶，投入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年毕业后，在流行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回到家乡创办溆浦女校，开始从事妇女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她备受鼓舞，1918年秋，只身前往北京，寻找"真事业"。五四运动爆发时，带领溆浦女校师生上街游行响应。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同周南女校的一批新会员一起创办进步刊物《女界钟》。她是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1920年2月，同蔡和森、葛健豪、蔡畅等三十余人到法国勤工俭学。一面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一面努力学习法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无产阶级斗争的读物，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1920年5月，给国内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妇女问题。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与蔡和森结为知己，称为"向蔡同盟"。1921年，因参加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领导的勤工俭学学生反对北洋军阀驻法公馆和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被驱逐回国。

1922年初，向警予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在中共的三大、四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协助党中央制订了有关指导妇女运动的文件，撰写了大量文章，对妇女运动发表了很多卓越的见解。1924年领导上海闸北丝厂和上海南洋烟厂大规模的女工同盟罢工。随后，又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支持孙中山北上。五卅运动中，带领妇女积极分子到南京路闹市区进行募捐和讲演。主张知识妇女

与劳动妇女相结合，鼓励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到女工、农妇中去工作、学习、宣传。发起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会员达三十多万人。同年10月，受党中央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后到武汉，任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6月，汉口市委并入省委，被安排到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先后在市总工会宣传部和湖北省委工作，负责主编湖北地下省委党刊《长江》，接待来自各地的地下工作人员；代表省委给来汉寻找党中央的卢德铭等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明确指示他们率部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她还通过地下交通员与武汉地下党组织的骨干联系，重建党的秘密区委和支部。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宋若林的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化名易夏民。4月12日法租界当局将其"引渡"给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5月1日，在汉口英勇就义。

滕代远

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幼时读过私塾，放过牛。在县高小念过三年书。1923年，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麻阳新民社"，创办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锦江潮》。1924年10月，在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由于参加组织领导学生与校内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被开除学籍。经常德中共组织介绍，到长沙与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到平江县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到1927年初，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五、六万人，中共党员发展到三千余人。

1927年8月，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会长。不久，调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1928年6月，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7月22日，遵照省委指示，与当时担任驻防平江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一团团长、共产党员彭德怀等组织和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他任党代表。部队起义后，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一带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为了粉碎湘、鄂、赣三省敌军的"会剿"，12月，同彭德怀一起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的茨坪与红四军主力会师。后参加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5月，参加了中共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根据决定，红五军、红八军编为红三军团，成立军团总指挥部和中共军团总前委，他任军团总政治委员。8月23日，三军团同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副总政委，参加组织和领导了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一、第三、第四次"围剿"的战斗。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1934年6、7月间，离开瑞金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参加了一个专为中国办的军事学习班，学习战术。1935年7月，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受到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见。随后同陈云等到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初，同陈云等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参与了争取新疆盛世才联共抗日以及营救西路军的工作。

从新疆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0年5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1942年5月，调任八路军参谋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一面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坚决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一面组织领导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工作。1945年6月，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他以顾问名义，到北平协助叶剑英工作。1946年初，回延安，后去重庆协助周恩来与马歇尔、张治中进行谈判。全面内战爆发后，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工作。1948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任军区副司令、中共华北局常委。1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成立，任部长兼党委书记。为了抢修、恢复和建设铁路，支援前线，恢复生产，保障供给，在1949年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铁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全力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力号召。在1949年一年中，率领全国铁路职工和铁道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以惊人的速度修复了八千多公里的铁路干线，通车全程达两万一千多公里，不仅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而且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铁道部长、党委书记。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中共第八、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冯白驹

冯白驹(1903—1973)原名布文、继周。广东琼山人。中国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琼崖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八岁入私塾，十三岁入云龙高等学校，十六岁就读于琼山中学，1923年毕业。1924年下半年离家到南京、上海求

学。1925年夏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与进步同学广泛来往，阅读了《向导》、《中国青年》等传播马列主义的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初，回海南担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受命担任琼山县委书记，负责组建琼山县委，发展农村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坚持斗争。是年9月，琼崖特委将各县工农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军，准备发动全琼大暴动。他任第七路军党代表。1928年5月，在琼崖党和军队的主要干部相继遇害、特委机关被破坏的危急时刻，他联系各县委负责人商讨重建特委事宜。9月，发起召开了各县委联席会议，组建了临时特委，被指定为临时特委负责人。11月下旬被选任特委书记。1930年2月，秘密前往香港和上海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年4月，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选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后领导了红五月大暴动。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琼崖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使琼崖苏区和红军受到了严重摧残，他仍带领幸存的革命战士，坚持斗争。

1936年下半年，他根据华侨带回的报纸所刊登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精神，向国民党海南当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全琼团结抗日。1937年初，琼崖特委与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恢复了联系。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派出代表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

1938年11月正式建立了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5日，根据谈判协定，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被任为队长，辖三个中队三百多人，1939年2月10日晚，日军大举进犯海南岛。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属下六千多官兵一枪不发，而冯白驹率独立队一中队阻击日军，打响了琼崖抗战第一枪。此后，他指挥独立队在文昌、琼山一带英勇机智地打击敌人。1940年秋，中共中央派出干部加强海南领导，并明确指示由冯继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长兼政治委员。1944年秋，琼崖特委将独立总队改为琼崖抗日纵队，冯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5年8月，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当选为主席。

抗战胜利后，领导琼崖纵队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950年4月，解放军渡海南征，他积极配合，为海南的最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历任中共海南区委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9月授予中将军衔。1973年7月19日逝世。

邵式平

邵式平(1899—1965)，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出身农民家庭。只读过两年私塾，便于1916年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在校三年，与方志敏为同班挚友。1919年从弋阳县立高小毕业，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学。1922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经陈毅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运动时，邵式平在北京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10月，他又参加了李大钊等领导的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当时，他是北师大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在这次示威游行中，他的头部被反动军警打伤。后来，党组织派邵式平为"北京沪案后援会湘鄂赣特派员"，回江西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

回江西后，邵式平协助赵醒侬、方志敏等在南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赣东北开展农民运动。他首先在他的家乡弋阳邵家坂成立了"益友社"，接着，又发展一批青年入党、入团。不久，中共弋阳县党支部成立，邵式平任第一任书记。后来，他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赣东北特派员的身份，往来于南昌和赣东北间，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大革命时期，邵式平还担任过南昌《民国日报》记者、江西省农民协会干事、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干事等职。

1927年6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公开反共，宣布把共产党人"礼送出境"。邵式平也是"礼送"的对象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便化名余艳王，回到弋阳、横峰、贵溪一带农村，隐蔽下来，坚持斗争。11月，方志敏在弋阳县窖头村召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的共产党员联席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邵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中共横峰县委书记。会后，被派到横峰、弋阳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12月，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在弋阳、横峰举行武装起义，开展了游击战争。由于强大敌人的"围剿"，农民军遭到失败，退入山中。

1928年6月，弋阳、横峰两县党的干部召开会议，决定将两县武装力量交由邵式平统一指挥，采取"避实就虚，以多打少"的办法，打破敌人的围攻。两县全部武装共四十六支枪，组建了土地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6月，在邵式平指挥下，一举击溃弋阳靖卫团，农民武装得到进一步扩大。后来，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9月，攻占横峰城，全歼守城靖卫团。12月，邵任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和军委书记。

1929年底，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当选为主席，邵式平当选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和信江苏维

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方志敏、邵式平的领导下，赣东北地区的红军迅速发展，1930年8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十军政委。1931年3月，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邵式平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党内，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常委。1933年5月，调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后又兼任该省省委书记。

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邵式平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1934年10月，邵式平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1935年11月，张国焘率部南下川康，在芦山成立大金省时，他被任命为大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初，又兼任大金省委书记，后任金川军区政委。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邵式平历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等职。1945年3月，他和汪金祥等十四位参加过赣东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在延安写成《闽浙皖赣党史》一书，是研究赣东北革命斗争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邵式平历任中共辽吉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中共嫩江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西满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邵式平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二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江西省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3月，在南昌病逝。

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人称少帅。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树林詹家窝铺村。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在八个异母兄弟中他排为长兄。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旧中国军阀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问鼎中原"，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曾统治东北、华北达十三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张作霖权势显大，门第低贱，他希望改换门庭，决心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既能承袭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来继位。光宗耀祖。为此，特聘请鸿博名儒，教张学良以《四书》《五经》；聘请博学洋人，授以外文与科技。

张学良七八岁开始读书。在名师的指导下，从小系统地学习了经史典籍。他颖司异常，十二三岁时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十五六岁时，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学会了开汽车，驾飞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由父亲为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他被张作霖任命为卫队旅的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张学良在学习期间，不以身份特殊而自异于同学齐辈，自觉地遵守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校冬季组织军事演习，住在野外，异常辛苦，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当时，教官中多有奉迎纵容者，唯有战术教官郭松龄对他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郭松龄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常向张学良讲述救国救民的思想，使他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时起，张学良和郭松龄结成了莫逆之交。

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授炮兵上校，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不久升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6月，升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时为19岁的张学良，就晋级为陆军少将。

1921年秋天，张学良去日本参加日军秋季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激发了他立志图强的决心。回国后，他提议在奉军中进行改革，并与担任第八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紧密合作，对三、八两个旅进行了严格整训。他们与下级军官和士兵接近，保证军队的生活供给，不准"喝兵血"。所以，他和郭松龄带领的部队成为当时东北军的精锐。

次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组成镇威军，张学良被任命为镇威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战端一开，奉军即败，几乎溃不成军。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不但未溃，反而略有小胜，于是颇受其父器重。

奉军失败后，张作霖决定"整军经武"。张学良协助筹划，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他任第二旅旅长，兼整理处参谋长、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将原有东三省巡阅使署合并改组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将二十二个旅扩充为二十七个旅；骑兵由三个旅扩充成四个旅；炮兵由野炮四个团，扩充为两个炮兵独立旅，一个重炮兵团。全部兵力号称三十万，能战之兵，不下二十万人。还扩大奉天的兵工厂，每年能出大炮一百五十余门，步枪六万余支，机枪千挺以上，而当时该厂制造的迫击炮成为关内各军之冠。空军也得到了扩充，向法国、意大利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全部空军

拥有飞机三百多架。他把训练高质量的飞行员作为航空处第一位的工作，并以重金聘请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和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为航校教官。1925 年他又从东北军军官训练班的学员中，筛选出二十八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送到法国最新式的毛兰纳航空学校和高特龙航空学校训练。1926 年，这批学员毕业时，南京方面和其他军阀都派代表去法国进行拉拢。张学良得知后，立即打电报给机构处处长徐世英："请你马上通知姚锡九，让他把在法留学的二十八名航空学员，全部由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并请姚锡九和学员们讲清楚，回国后不用几年，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当这批学员回到香港时，他派徐世英远道到香港迎接，防止学员被他方拉走。他还添设航警处，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

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正面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苦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打败直军后，他统带京榆驻军，设司令部于天津。

1925 年 11 月，郭松龄在滦州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有强烈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立足于社会，故未敢接受郭的建议。

张学良对郭松龄之反戈，早有觉察，但没料到郭动手这样快。当时张与郭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为驻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郭为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据有步炮精兵六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他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 11 月 29 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至兴隆店设立临时司令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郭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为名而回师关外的。追出关后，郭之部下知杨没有叛乱，而是出关打老帅，立即军心涣散，不战而溃了。郭见大势已去，化装逃走，被马占山的骑兵追及俘获。郭与夫人韩淑秀一同就义。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是很痛惜的。后来，他经常怀念郭松龄，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字)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 年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南方的革命势力。张学良统率第三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同年 11 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 月，张学良升为陆军上将。次年 5 月，他奉命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当时，他并不仇恨国民党，当奉军战败北退时，下令保存了郑州附近的军火库，并给北伐军留下了书信一封，以示并无敌意。

同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三、四方面军团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 月 12 日，晋军师长傅作义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这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围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了空前残酷的地步。涿州之战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与傅作义的成名之役。

1928 年 1 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 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奉军败局已定，便下达总退却命令。

6 月 4 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回奉乘坐的专车，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 6 月 17 日将长发剃光，身着灰色士兵服装，搭乘兵车驰返沈阳。6 月 19 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 月 4 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他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路线，励精图治，致力于开发东北，做了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使东北富强的事情。

他毅然实行东北易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在决定东北易帜时，内受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轻易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之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之招降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6、7 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三次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 月 4 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干涉三省易帜。6 日，他向张学良递交了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地申明：我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他警告林氏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却恶狠狠地说：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日本政府竟然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

一面不断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六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他易帜与统一的决心。

东北换旗，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都反对换旗，害怕换旗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对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元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就这样，张学良冲破了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于 12 月 29 日，通电宣布东三省易帜。31 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之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张作霖在时，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就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凡事说了算。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不仅不稍自敛抑，专横更甚，对张学良以父辈自居，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在稠人广座之中，予张以难堪。1929 年 1 月 10 日下午，在张学良的帅府客厅，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杨、常说：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这件事涉及到外交，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又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此时，张学良已感到杨宇霆的专横，认为不制止杨、常的势力，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决心为保持集团内的统一，巩固易帜成果，以便推行新政而处决杨、常二人，于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帅府的客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陈　公　博

陈公博，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生于 1892 年 10 月 19 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六岁起，即开始阅读《水浒传》、《封神榜》等旧小说，并涉猎《唐诗三百首》，到九岁时开始读四书；家中雇有拳师教习棍棒。幼年即"淘气不过"。

陈父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1897 年解职后住广州。早年从军，曾结交会党，受会党的反清思想影响。1907 年春陈致美在革命党人支持下，联络会党和旧部，筹划在广东乐昌举行反清起义，陈公博受其父影响也参与起义活动。起义计划失败后，陈致美被判处永远监禁。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又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做校对工作。1908 年回广州，考入育才书社，学习英文，1911 年毕业。

1911 年 11 月广东光复，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这时的陈公博，本来也是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又在报馆工作过，"会写几句短评，会做两首歪诗，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靠了他父亲的名气，也成为乳源县的挂名议员。但陈致美认为陈公博的年龄小，阅历不够，让他辞去县议员，投入广州的北伐学生军。1912 年 2 月学生军解散，陈致美又要他弃武习文。9 月陈致美病死。陈公博回育才书社任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还为香港的一家报馆写通讯。

1917 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北大三年，自称"养心性，寡交游"，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鼓不起我兴奋"，"没有努力的参加"。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下，陈公博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曾给他"一些思想上的影响"。在北大，他和谭平山、谭植棠等广东同学过从甚密。他们组织"十人团"，以陈公博为首，提出"制造新贵人"的口号，即"抓着机会便要向上爬"的意思。

1920 年陈公博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任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这时他已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受陈独秀委托，在广州主办宣传员养成所，又和谭平山、谭植棠一起筹办《群报》，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堂等，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次年 3 月，他们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还参与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参加。在会议过程中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情况，他遂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不等大会开完就到杭州度密月去了。是年，汪精卫在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陈以文字见赏于汪，和汪接触较

多，并任教育会评议员。

1922 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上海中共党组织认为陈公博与陈炯明有勾结嫌疑，需要审查，陈大为不满，于是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先是准备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他坚持己见，后来被开除党籍。是年 11 月陈公博去日本，翌年 2 月由日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在这里，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论也是片面的观察”，他根本否认马克思的学说，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 18 日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宁汉分裂。7 月，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合流。陈公博追随汪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9 月，宁、汉两派加上西山会议派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分赃不均，汪精卫又回到武汉组织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立，宁、汉再度分裂。陈公博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结合，打起反对特委会的旗帜，电请汪回粤共商大计。11 月，汪率领顾孟余、王法勤等不满南京特委会的中央委员到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电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这时广东在桂系控制之下，汪精卫、陈公博利用张、黄与桂系争夺广东地盘的矛盾，策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桂系，控制广州。陈公博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 月 11 日，共产党趁广州空虚之际发动起义，陈公博与张发奎、李福林等调动部队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口广州起义对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激烈攻击，汪被迫于 1927 年 12 月出走法国，陈则于次年 1 月到上海。2 月，蒋介石利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机会，排除了汪精卫，拉拢胡汉民为他支撑政治门面。陈公博、顾孟余等汪派人物不甘心失败，麇集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是年 5 月、6 月，他们先后办起了两个刊物：一个是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另一个是顾孟余主办的《前进》。《革命评论》以恢复，1924 年国民党以改组精神相标榜，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有所抨击。但是陈公博在高喊恢复改组精神的同时，仍公然反对联共，目的仅在于抬高汪精卫的身价，以便与蒋争夺权力。由于人民厌恶蒋介石反动独裁，《革命评论》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曾发生过一些影响。

经《革命评论》鼓吹，各地有些刊物起而响应，形成了一股反蒋思想浪潮。1928 年冬，反蒋派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总负责人。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何成濬

何成濬，字雪竹，湖北随县人，1882 年 6 月 20 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五）生，家庭“薄有资产，自幼生活裕如”。何五岁延师就读，十四岁时赴武昌投考武备学堂，因年小体弱未被录取。十九岁时，参加县学考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湖北学政蒋式棻的赏识，被保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不久经心书院合并于两湖书院，后改称两湖高等学堂）。时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武昌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何受其影响，倾向革命。

1904 年 3 月，何成濬得官费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何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7 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 年毕业回国，初在湖北督练公所任职，年余后在陆军部军制司任科员。

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何充任陆军总副官长。4 月，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何任留守府总务厅长。11 月，黄兴受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何担任黄兴驻北京代表。1913 年 3 月，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何觉得北京“非革命党人可以安居之处”，离京到沪，帮助黄兴作“二次革命”的发动工作，在沪、宁间进行联络，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何随孙中山、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何随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

1914 年夏，何成濬奉黄兴之命改名换姓潜回上海，作再次讨袁的准备。他通过与陈其美的交往，结识了一些帮会人物，学会了与各方面人物打交道的本领。1916 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邀黄兴至京共商大计，何受黄派遣先行到北京察看形势。在京二月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即离京南下。不久黄兴病逝于上海，何转而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于 1925 年 9 月出任东征军总指挥，起用何成濬为东征军总部总参议。从此以后，何紧紧追随蒋介石。

1926 年 7 月北伐开始，何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蒋介石利用他擅与军阀打交道以及与孙传芳在日本同学的关系，派为驻沪代表，竭力游说孙传芳与北伐军一致进攻吴佩孚，但没有达到目的。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何受蒋命赴湖北，任鄂北绥靖主任。蒋介石原本指望他到湖北操纵领导权，以对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但在武汉革命声势的压力下，他难以施展其伎俩。不久，何便赶到南昌，参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何成濬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他继续充当蒋介

石的说客，赴山西拉扰阎锡山，向阎转达蒋决心反共的旨意。

1928年初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开始，何成浚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派何与日军师团长福田交涉解决办法。在日军淫威下，他不肯屈服，拒绝在福田提交的屈辱条款上签字。后蒋介石改道北进。何先在重庆京津游说奉军东撤，由阎锡山部接收北京各机关并维持治安；后又留驻北京作一些善后工作，收编了张宗昌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和孙传芳的残部郑俊彦等部。10月，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任主席，何被任为参军长。此后，何成浚追随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中不断效力。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之先，何被蒋派为北平行营主任，取代桂系白崇禧；取得唐生智合作，由诏接收了刘兴、龚浩、廖磊等部，拔掉了桂系在北方的据点。3月蒋桂战争爆发不久，桂系便失败了。5月，何被蒋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相互间的争权夺利蒋介石在北方的权势仍然受到威胁，何成浚没有立即到湖北上任，而继续衔蒋之命往山西拉拢阎锡山。10月，蒋冯(玉祥)战争爆发，何奉蒋命率第九军攻冯。12月，唐生智讨蒋。何在鄂被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并奉命入晋襄助阎锡山，到郑州对徐源泉、王金钰等作争取工作，瓦解了唐生智的后路。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何成浚奉蒋命兼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九、十两军在平汉线许昌各地布防，阻冯军南下。这一线虽然不是大战的主要战场，何统率的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夏斗寅各部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们的向背对全局关系重大。何施展手腕，加以金钱收买、权势艉，把一批难以驾驭的杂牌军头目玩弄于股掌之上，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

抗战胜利后，军法执行总监部撤销，何成浚在失意中回到武汉，凭借他多年在湖北的旧关系，当上了省参议会议长。他俨然以“湖北家长”自居，不仅对党、政、军各部门均插手过问，而且先后在一些银行、商号、报社当上了董事长。这年年底，他趁汉口第一纱厂董事们争权夺利之机，坐收渔利，当上了该厂的董事长。从此“一纱”成为他进行经济活动和巧取豪夺的重要基地。

何成浚在湖北最后三年的统治，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他感叹“备位三载，历尽酸辛”。1949年春何逃往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担任过伪“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名义职务。1961年5月7日死于台北。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绿林”将军
袁文才、王佐纪事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两位重要领导人。他们为中国革命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劫富济贫　除暴安良

袁文才、王佐是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前，活跃在宁冈的茅坪、砻市与永新的茨坪、遂川一带两支颇得民心的绿林武装首领。

袁文才出生在宁冈县茅坪附近的马源坑，上中学时因家境日下，被迫辍学回乡务农。由于不愿受地主的压迫剥削，他带领群众公开与当地的土豪劣绅谢冠南斗争，被官府通辑，家中房屋被官兵烧光，其母被杀。走投无路的袁文才为了报仇，毅然投奔当地的绿林队伍“马刀队”。在“马刀队”里，袁文才凭着非凡的才干，很快当上了首领。手握兵权的袁文才，在报复心理的驱使和共产党员龙超清、刘辉霄等人的教育影响下，积极开展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活动。他率部消灭了宁冈县的反动地主武装——谢家述的清乡局；赶走了宁冈县的四任反动县长；协助共产党建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废除不合理的契约；指挥队伍攻克永新县城，解救了被反动派关押的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和50多名共产党员。1927年2月，袁文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文才的义举，使他赢得了宁冈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宁冈人民把他当成穷人的保护神，主动给他送情报，提供食宿，冒着生命危险协助他消灭反动派。

王佐出生在遂川县下庄村下水坑(今井冈山市下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后来家中仅有的一块山林也被土豪劣绅强占。童年时的王佐靠给地主放牛和伐木烧炭维持生计。12岁学裁缝，在行艺过程中，王佐目睹了地主豪绅盘剥劳动人民的罪恶，立下了“要把哪些贼牯

(土豪劣绅)斩尽杀绝"的誓言。成年后，他便投奔到绰号朱聋子的绿林队伍。后因与朱聋子发生意见分歧，开始独立组建绿林队伍，并在茨坪一带公开竖起了"劫富济贫"的义旗，决心实现自己早年立下的誓言。他频频组织部下到附近的土豪劣绅家"吊羊"(把土豪劣绅绑走，责令其家人拿大洋换人)，将"吊羊"得来的钱物救济当地穷苦百姓；设计杀死迫害穷人的反动税警，免除穷人的债税；率队伍袭击反动地主武装和军阀的小股部队，维护当地穷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同意将其领导的绿林武装改编成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形势下，他没有向国民党屈服，积极协同袁文才和王新亚(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从永新县城的监狱中救出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他同袁文才结成"老庚"(同年出生的结拜兄弟)，共同抗击反动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由于王佐维护穷苦农民的利益，所以穷苦农民的心向着王佐。他们不仅帮助王佐除内奸、杀仇人，甚至连红白喜事也要请他坐上席。

袁文才和王佐的义举，激发了井冈山地区人民团结起来跟国民党和豪绅斗争的勇气。他们同情、支持、帮助共产党闹革命的行动，使井冈山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这就为后来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家和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慷慨解囊　大力援助工农革命军

1927年9月爆发的秋收起义失利后，参加起义的部队处境艰难。面临严重减员(由开始时的5000多人减至1000人左右)、敌人堵截和疾病流行的威胁，形势万分危急。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生力军，中共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为起义部队安下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当时，井冈山地区是袁文才和王佐控制的势力范围，要在此安家，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为此，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的三湾村后，毛泽东便立即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表达了工农革命军要在宁冈一带建立根据地，请袁、王二人大力协助的愿望。

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虽然存有疑虑，但根据平时对共产党的了解，他提出了和工农革命军高层领导人毛泽东直接会谈的要求。会谈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惊人胆识和诚恳态度，打消了袁文才的疑虑。毛泽东深刻而又无懈可击的道理，使袁文才既十分钦佩，又深受教育。特别是毛泽东答应送给他100支枪，鼓励他抓紧发展队伍的坦荡胸怀，使袁文才更为感动，当即表示欢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他的大本营茅坪安家，并答应全力协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吃穿问题和做好王佐的工作，还当场赠送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以解决急需的经费。次日，袁文才就率领队伍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帮助工农革命军摆脱了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危险境地。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的几天时间内，袁文才组织人员筹集了上万斤粮食和一批布匹，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吃穿问题。袁文才还资助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从此，工农革命军安下了革命的家。

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和说服下也打消了顾虑，于1927年10月下旬派出代表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上山。2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王佐杀猪宰羊予以款待。随后，他又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并通过打土豪的途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和财物，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袁文才和王佐在工农革命军最困难，最危险的紧要关头，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了最及时、最宝贵的支持。正如当时担任前委委员的熊寿祺后来回忆所说的："记得毛主席说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的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以茨坪安定伤病员，没有袁文才、王佐联合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很难站住脚，就像红军长征到延安，同刘志丹的作用一样。"

英勇杀敌　赤心报党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家以后，尤其是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以后，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片恐慌。为扑灭井冈山的革命火种，国民党军连续发动"会剿"，根据地内和边境的反动地主武装也不断进行袭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等的率领下，奋起反击，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肃清了井冈山境内的反动地主武装，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武装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袁文才、王佐率领队伍密切配合红军主力，英勇打击敌人，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立下了战功。1928年2月，王佐在工农革命军的协助下，在旗锣坳歼灭了永新境内的反动地主武装尹道一靖卫团，并将永新、遂川、宁冈、万安、泰和5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击毙。8日，袁文才、王佐率部与工农革命军一个团协同作战，攻克了宁冈新城，歼灭敌1个正规营和1个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此后，袁文才、王佐又率领第32团配合红四军主力，粉碎了湖南、江西敌军联合发动的两次"会剿"。在6月粉碎敌军的第一次"会剿"中，由于袁文才、王佐率部袭击了敌人设在白口村的指挥部，对红军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当时，江西的敌人在总结这次"会剿"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导致这次战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在白口村的指挥部"突被冲破，而行退却，前线部队，旋受牵动。"8月底，袁文才、王佐率

部以扼守要地和派小股部队袭扰、牵制敌人等手段,有力地支援了黄洋界保卫战。

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不久,袁文才、王佐就主动请求毛泽东派能干的"先生"帮助他们训练部队,毛泽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派遣一批军政素质优良的共产党员前往指导。袁文才、王佐不仅热情接待,而且与战士们一起训练,一同听课,使其领导的"绿林"队伍在较短的时间内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军事素质有了相当的提高,成为工农革命军的得力助手。

与此同时,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袁文才、王佐又主动要求将他们率领的农民武装改编成工农革命军。于是,前委决定将他们领导的队伍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并任命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使这两支农民武装得到了新生,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绿林武装获得新生的同时,袁文才和王佐在革命的道路上也迈出了新的一步。袁文才主动申请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王佐也于1928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袁文才又兼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王佐也兼任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自担任根据地党政领导职务以后,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了更多的工作。他们发动根据地的群众加固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哨口;修建了可容纳几百名伤病员的小井红军医院;组织部队打土豪,发动军民下山挑粮,解决了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经费和军民的供给,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不畏艰险　坚持斗争

1929年初,湘赣两省的敌人集中18个团的重兵,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分散敌人的兵力,打破敌军的"会剿",前委决定由王佐率领红四军第32团配合红五军坚守井冈山;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随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第32团密切配合红五军,在给敌人以重创后,因兵力悬殊被迫突围。红五军撤往赣南。王佐率第32团部分部队退守荆竹山一带的原始森林。

王佐率部退守荆竹山后,敌人在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反革命政治宣传,妄图动摇第32团的军心,逼迫、利诱王佐投降。当时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40多天的大雪,使第32团处境更加艰难,饥饿、寒冷、伤病一齐向官兵们袭来。在险恶的环境面前,悲观、失望情绪和急躁冒险思想开始在部队产生。针对这一情况,王佐首先抓骨干,强调骨干要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沉着冷静的言行影响其他官兵。随后,他又对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做思想工作,引导官兵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不屈不挠同反动派斗争。从而,很快稳定了部队的思想情绪。在此基础上,王佐又亲率小分队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主动出击,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敌人驻有重兵的斜源村,处决了带领敌人偷袭小井,杀害了130多名红军重伤员的富农分子陈开恩。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不久,王佐会合第32团党代表何长工带领的部队,并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取得了联系。在特委的领导下,王佐率第32团与地方武装一起,不断打击敌人,恢复了茨坪、宁冈一带的根据地。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后,第32团被编为红五军第6纵队,王佐任纵队司令员,率部为进一步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新的功劳。袁文才从红四军返回井冈山后,在白色恐怖形势下,为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当然,由于长期绿林坏习气的影响,袁文才、王佐也难免存有一些缺点。但是,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功臣,是红军早期出色的领导人。他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巩固和恢复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润芝　武刚,选自《军事历史》94年6期)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5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天,袁文才摆了一桌酒席,请了红军的几位首脑。来者心照不宣,频频向毛泽东敬酒贺喜。那酒杯伸向毛泽东,也伸向毛泽东之侧的一位白净皎美而目光刚毅的姑娘。

那姑娘是永新城里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名叫贺子珍,年方十八,瓜子脸,乌亮的眼睛,光彩照人。

贺家原本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有了些积蓄,买下二百来亩油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识字知书,成了读书人。

那时,可以花钱买官。有了钱,贺焕文想当官,也就捐了个举人,当上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叫欧阳氏,生一子,名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娶广东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土秀长得俏丽,原是广东梅县一户大家的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

温土秀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1926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1927年加入中共。1931年7月20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结婚。1949年11月死于车祸。

贺敏仁参加红军，当司号兵。在长征途中被错杀。

贺先圆又名贺仙竑，和贺敏振一起，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

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共，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1971年死于安徽合肥。

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

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县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

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

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19世纪末，便已伸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1926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小学的国文教师。

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1922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5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共党员。

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

1927年3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6月10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似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

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7月26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

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

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

10月3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

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

10月6日，五、六个男子汉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大约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

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

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

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中说：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1928年4月—5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大约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1928年古历4月27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

1928年“古历4月27日”，亦即1928年6月14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1928年6月23日。

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1989年9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

1928年5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

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

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之前，1928年春，朱德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朱德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1928年4月底，她跟朱德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

(选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者：叶永烈)

周恩来大连脱险记

1928年5月初的一天，一艘日本客轮从上海港启航，驶往当时被日本占领的大连。在头等舱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男的约30岁，英俊的面庞，灼灼有神的眼睛，留着黑黑的胡须，西装革履，显得精明干练，化名王某；其夫人则显得温柔贤慧，他们自称是古董商。其实，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及夫人邓颖超。他们将经大连、哈尔滨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邓二人在上海上船时，由于很想了解5月3日在济南发生的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惨案情况。就买了许多报纸。船在青岛停靠时，他们又上岸买了各种报纸带回船上。不料，他们的行动引起了隐藏在船上的日本特务的注意。

客轮停靠在大连码头。周恩来夫妇正准备上岸，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日本水上警察来到船上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他们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为什么买这么多报纸，周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警察又问他们去哪里，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警当即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继续接受审查。邓颖超不放心，提出要跟周一同去。周恩来假装大怒：“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他的用意是想保护妻子。周当即让警察帮邓颖超找到一家旅馆，先把她送进旅馆住下，然后才随日警去水上警察厅。

到警察厅后，日警又详细审问周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接着进行了一场紧张的盘问。问：“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答：“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答：“在我们中国，舅舅与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国人，舅舅与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问：“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坦然自若地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日本警察仔细端详周恩来的手，见手掌无老茧，手指也无扣板机的痕迹。感

到果然不象当兵的手，但他们仍不放松，忽然打开抽屉看卡片；因周恩来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又领导过南昌起义，日本警察早就藏有周的材料，对周讲："你就是周恩来！"周反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日警无言以对。对日本警察一系列的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毫无破绽。他们不得不将他释放了。周恩来抬腕看了看表，说："十二点过了，你们可耽误了我去长春的时间。"日警表示歉意，并为周恩来夫妇代购了当天下午 4 点去长春的火车票。

周恩来离开邓颖超，大约经过两小时，才回到旅馆。进房间后，他没有说什么，显得安然无事的样子。一会儿，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立即毁掉！"邓立即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当天下午，周、邓乘坐火车前往长春。上车后，发现坐在对面的乘客是一名跟踪来的日本特务。此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周、邓便不动声色地同他聊天。到长春下车时，此人又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意欲交换。周没有名片，就装着找的样子。说："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他装出到箱子中去取的手势；对方忙说："不必了。"他终于将此人打发了过去。

到长春后，夫妇俩找到一家旅馆住下。周恩来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又把胡子刮掉，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然后，他们乘火车去吉林市。到吉林后，他们没敢立即到伯父家，而是先住进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一看信，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就立即来到旅馆把兄嫂接回家。停留了两天后，周恩来先离开吉林，去哈尔滨二弟周恩溥家住下。再隔一天，邓颖超由三弟陪同去哈与周恩来会合。

但是，由于到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周恩来夫妇已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好去苏参加"六大"的代表是分批出发，在周、邓后面还有一批人要经过哈尔滨，其中有李立三等人。于是，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一连等了数日才见到李立三。通过李，又与在哈的苏联代表取得联系，终于顺利地踏上了去苏联的旅途。(参考《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及邓颖超同志的回忆录)

(选自《历史大观园》90 年 9 期，作者：经盛鸿)

夏明翰烈士之母——陈云凤

夏明翰烈士的母亲陈云凤，1870 年元月 9 日出生于衡东金花乡合桥村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父亲陈嘉言(号梅生)是清末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陈云凤小时聪敏过人；稍长，在父亲的影响下，博览群书，文思敏捷；后来许配衡阳礼梓山夏绍范为妻。夏绍范是清末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员，先后在湖北省几个县任过知县。他曾赴日本考察新政，接受了民主思想，主张变法维新。陈云凤在协助丈夫整理文稿的工作中，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很快从封建主义思想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1911 年，武昌桥头炮声一响，在南漳县任上的夏绍范迅即高举义旗，拥护湖北新政府。陈云凤坚决支持丈夫的起义行动，并成为直接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少数女性之一。

当时，南漳县一些顽固分子，反对辛亥革命，发动了一次反对夏绍范的叛乱。叛乱头目是县衙里的官吏，颇有蛊惑能力；夏绍范力量单薄，处境危险。陈云凤支援丈夫，甘冒风险，单独出马。她先是对叛众晓以利害，警告他们："犯上作乱，罪莫大焉！义师即刻开到，作乱者若不悬崖勒马将要身首异处！"几句话从心理上震慑了叛匪；其次是分化胁从者，陈云凤宣布："夏大人素以仁爱为怀，胁从者概不究问。"她规劝胁从者要上念父母，下怜妻室幼儿，不要触犯刑律，自投法网。最后她历数叛乱头子贪赃枉法、鱼肉乡民的罪恶，使之陷于孤立，经陈云凤晓以大义，荷枪实弹的胁从者立刻散了伙。

1914 年，夏绍范不幸逝世。陈云凤悲伤之余，带着儿女归来，住到阿翁夏时济(与陈嘉言是同榜进士)在衡阳江东岸购置的"萧顺吉堂"寓所。这时，陈云凤内心很痛苦，她同夏时济的守旧思想常常发生矛盾。当然，夏时济不可能把陈云凤压服，相反，倒助长了她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精神。

陈云凤特别注意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从小就培养他们的正义感、是非感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她给子女讲岳母刺字教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又督促子女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赞扬代父从军的民歌《木兰辞》。孩子们有一次问母亲："曾国藩是好人，还是坏人？"她回答："曾国藩对外媚敌，对内残杀同胞，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鲜血，是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孩子们喜欢看《水浒传》，她引导说："一百零八个好汉造反，都是因为深受压迫，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的。当今的世道也是如此！"由于子女们受到良好的家教，潜移默化，思想进步，所以时常同祖父发生冲突。于是，夏时济就给儿媳加上了"教子忤逆长辈"的罪名。陈云凤没有被这一罪名所吓倒，仍然言传身教不懈。

1918 年春，军阀吴佩孚屯兵衡阳，为寻求耆宿名流的支持，很快就与夏时济勾搭上了。陈云凤和子女们都很恼恨夏时济趋炎附势，孩子们对吴佩孚更加痛恨。夏明翰曾经给吴佩孚画了一幅漫画，题上一首讽刺诗，挂在书房供弟妹们作笑谈资料，陈云凤看见后，只抿嘴一笑，认为正义在子女们一边。有一次，吴佩孚题写了巨幅大字送给夏时济，夏时济受宠若惊，将巨幅挂在中厅北墙正中处。刚挂稳，夏明翰就把它扯了下来，撕得粉碎。这下可闯了大祸，夏时济声言要把明翰打死。陈云凤大声说："吴佩孚算什么东西，区区一武夫，一幅字值几何？中厅北墙正中

是供奉祖宗和圣人神位之所在，挂吴佩孚的几个字，岂不玷辱祖宗，怠慢圣贤！我夏家儿郎，乃金玉之质，将来必成大器，岂在毫无节操的吴佩孚之下！"陈云凤所言字字铿锵有声，夏时济眼睁睁望着她，一言未发，好久喘不过气来。

"五·四"运动引发的风暴席卷全国，衡阳成为当时湘南斗争的中心。夏明翰兄妹象脱缰的骏马，奔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查禁日货，是当时反帝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夏时济藏在书房夹墙中的日货被明翰、明衡兄妹搜出烧掉了，富商官绅们隐藏的日货被明翰和爱国青年搜出来烧掉的更不计其数。商绅们要挟夏时济管束孙子，夏时济气上加怒，如火上加油，把明翰囚禁起来，并声言要将他投塘，"灭了这个孽障"。陈云凤决定帮助儿子冲破牢笼，远走高飞。她进城去召回在校读书的明震，一面请老家礼梓山来的友人到酒馆设宴，调开夏时济，用酒灌醉夏时济的耳报神；一面预先雇好供明翰外逃的小船。一切安排妥当后，陈云凤指示明震拿斧头砍开囚禁明翰的小房间的房门，然后亲自把明翰送上隐藏在湘江边的小船。儿子逃出了牢笼，陈云凤无比喜悦。1920年临近中秋的一个晚上，夏明翰到了长沙，立即投入了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成为该省最早入党的少数党员之一。

夏明翰出走后，陈云凤领着身边儿女搬离"萧顺吉堂"，住进了江东岸河街的一所平民住宅，过着粗茶淡饭，荆钗布裙的平民生活。她的新居别有一番景象，女儿明衡、儿子明震、明霹就象出笼的鸟雀在蓝天中展翅翱翔，从陈云凤新居出出进进的不是长袍马褂瓜皮帽的官绅，而是孩子们的学友。一班学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烈士的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陈芬、毛泽建等人，也有在解放后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的少年们。他们常常通宵达旦挤在陈云凤的小屋里"做功课"，有的来去匆匆，有的一住数天。少年们的信任使陈云凤感到愉快、充实，她把这些从事革命活动的男女少年当做自己的孩子，辛勤地照料他们的食宿。为了支持子女和他们的学友，陈云凤在生活紧迫、经济拮据之时，变卖了首饰，连丈夫留下的心爱遗物也拿去典当了。

儿女们满怀壮志，朝气蓬勃，陈云凤深感后继有人，觉得自己好象恢复了青春。她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出现在青少年们的各种集会上。1922年，陈云凤以自己的学识和威望，当选为衡阳县议会议员，成为在衡阳参政的第一个女性。她曾发表演说："今日之中国，军阀混战，万民涂炭，沉疴痼疾，非共产主义莫可医治也！"陈云凤作为议员，为她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同志提供了许多方便，只要查一查夏家所作出的响亮的回答。

夏明翰兄妹殉难后，陈云凤迁回衡阳县礼梓山老家余佳堂，这几间老屋是乾隆年代建的。这时，陈云凤身无长物，生活很困难，但是她拒绝接受所谓社会贤达的施舍，鄙视国民党当局假惺惺的怜悯，唯以授徒糊口。闲时她读书作文，仍望以学问文章正世道、净人心。

1944年，衡阳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偏僻的礼梓山也未能幸免。陈云凤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保持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昂首怒对日军的刀枪，身上仅有的一件御寒的皮袄也被掠夺去，以致后来病倒了。1946年10月，这个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四个优秀儿女的英雄母亲，这个一生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女杰与世长辞了！

（选自《纵横》88年5期，作者：黄秋华）

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间银行

在素有"东井冈"之称的江西省吉安县东固镇的集市中心处，座落着一幢古老的青色砖瓦结构的两层房子，房子正面墙上保留着当年东固区委书写的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全体动员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这里，就是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间银行——东固平民银行旧址。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就是发行于此。

1927年11月，在中共东固区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此后国民党对红区的经济实行严密封锁，造成红区食盐、布匹、药材、煤油等日常必需品的紧缺和昂贵；木材、稻米、豆子、茶油等土产品不能输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沟通与白区的贸易，中共东固区委决定建立"东固平民银行"。

1928年上半年，中共东固区委筹集基金3000元银洋，筹办东固平民银行。是年8月，由黄启绶、刘经化（区委书记）、汪安国（区委组织委员）等7人负责筹建，东固平民银行成立，黄启绶任行长。从此，开创了红色中华的金融史。当时，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使用的是一种蜡纸刻版印制的纸币，称"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早期的货币。纸币面额分为铜元10枚、20枚、50枚、100枚四种。纸币发行总额为所筹基金的两倍。1929年春，银行基金增加了8,000元银洋，印发纸币20000元。接着，又印发了1元、2元等几种纸币。后来，把油印改为木版印制。

当时，银行规定：纸币可兑换银洋，坚守信用，随到随兑，兑进兑出一个样。从而极大地鼓励了白区商人到东固革命根据地进行贸易活动。白区商人每到东固经商，都乐意以银洋兑换东固平银行纸币，以便携带。白区商人冒着"通匪"杀头的危险，秘密将大量食盐、布匹、药材、煤油等急需品贩运到东固销售，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所需。同时，商人把东固的稻米、豆子、茶油等土产品销往白区，增

加了东固群众的经济收入。此外，更重要的是支援了革命战争。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视察了东固平民银行，对银行建设十分关心，肯定了银行的工作，称赞中共东固区委建立平民银行一事办得好，并希望银行办成中国红色政权的金融"大本营"；为发展革命力量，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贡献。后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商范围逐渐扩大到永丰、吉水、泰和、兴国等地，活跃了东固红色苏区的经济，使东固成为独立的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成为赣西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石。东固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贺龙式并列的)"李文林式"的"赤色割据"，被陈毅同志誉为"东井冈"。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两台石印机。毛泽东同志得知后，指示部队将这两台石印机留给东固平民银行使用。从此，纸币由木版印制改为石印。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东固平民银行改组为东固银行，归辖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即停止发行使用，开始发行使用"东固银行铜元票"。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和日益扩展壮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在1931年，东固银行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后来，江西工农银行又与闽西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在国民党军队对我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区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的时候，东固平民银行号召全区群众购买公债，筹集了大量银洋。同时，还积极配合区委调剂粮食，发展贸易，有力地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支援了红军反"围剿"的斗争。1931年4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东固与泰和县交界的白云山一带地域，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交锋的主要战场。当反"围剿"的序幕拉开后，银行的同志把先前筹集的银洋送给红军作军饷，并协助区委组织赤卫队，冒着枪林弹雨把征集的军粮和用稻谷从外地圩场上换回的食盐、布匹、药材等必需品，送到红军手中。红军把仗打到哪里，他们就把物资保障到哪里。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毛泽东同志赞扬过的模范乡)发生夏荒，银行便及时筹款购进大米近百担，使长冈乡群众得到了粮食补充。

如今，东固平民银行旧址，仍庄严地屹立在东固这块红色的大地上，恰似为在峥嵘岁月里对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东固苏区人民树起的一块丰碑，成为东固苏区人民革命历史的见证，现已作为名胜，被收录入《中国名胜词典》。而现在唯一的一张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纸币，被珍藏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成为一件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

(选自《历史大观园》88年8期，作者：温谨春，钟婧)

人民军队第一个教导队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这个教导队，是我军最早的训练基层干部的机构，它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为了缔造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毛泽东开始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从此，这支队伍便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军事素质也亟待提高。我们的战士，昨天是农民，今天入伍就要打仗，军事技术太差，加之战争中死伤太大，连队的骨干越来越少，无论干部和战士都急需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术。但是，当时红军还处于幼年，战事频繁，不可能建立正规的军事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提出创办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要任务的教导队的措施。

1927年12月，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在宁冈县砻市的龙江书院开办。学员开始只有百把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50人左右。学员多为参加部队不久的学生、工人和农民，都是班排骨干和积极分子。教导队下设4个区队，毛泽东亲自选定吕赤任队长，另外还任命了两个教官。

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就一直非常关心。他亲自给学员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同时，他还根据当时的战争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战术训练课目，并亲自给学员讲解有关战术训练知识。在这里，他提出了"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十八字诀战术原则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游击战术原则。后来在中央苏区他又加了4个字："敌疲我打"。发展成为著名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军队和群众关系问题，向教导队的学员们指出："我们的军队包括军官，都是老百姓的儿子。""我们工农红军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做一切事都要先想想老百姓。"他以请向导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他说："比如说请向导，请来后先要同他谈心，使他不怕你，感到你这个红军是打白匪的，是帮老百姓办事的，他就会同你讲心里话，给你带好路。要老百姓说心里话是不容易的。老百姓历来受到军阀拉扶、抽丁之苦，是害怕军队的。我们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同老百姓不能摆官架子。"

毛泽东的政治课和军事课给了学员们很大的启发，学员们称之为"毛委员发饷"，意即象给士兵们送来了精神食粮。在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教导队还把学员们从课堂和操场的训练拉到野外去摸爬滚打。后来教导队便跟

着部队一起行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游击战争的实践之中。而且每到一地，一起参加打土豪，筹粮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和赤卫队。教导队的军事训练、管理教育、官兵关系等，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红军第一期教导队历时半年多，到1928年6月结束。学员都分配到部队，担任基层指挥员的工作，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促进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选自《党史月刊》作者：伍第政）

人民军队第一部政治工作大纲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军委制订和实施的党代表工作大纲，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大纲。

《大纲》形成于1928年五六月间。它是在逐步摸索、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中产生的，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爆发了秋收起义。起义军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迅即作出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部队改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部队行进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营、团设党代表，是这次整编的重要内容之一。部队上井冈山后，党代表不仅在红军中积极开展政治工作，而有前委还派何长工等人到袁文才、王佐部队任党代表，改造袁、王部队。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后组成红四军。两军会师和红四军成立，人员增多，建制扩大，需要众多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战斗频繁，伤亡剧增，需不断补员，更需加强政治工作。因此，系统地总结党代表工作经验，使之成为条令化、制度化，被提上议事日程。

《大纲》条文共5大项，主要是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明确了党代表的性质、地位；二是规定了党代表的职责和任务；三是党代表要做好民运工作。

（选自《军事历史》92年3期）

“洗党”与党员登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为适应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清除叛变投敌分子，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于1928年9月决定厉行“洗党”。

“洗党”的主要对象，一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起党员作用的消极分子；二是叛变投敌或被捕后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嫌疑分子；三是出身不好，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重点是清除叛变投敌分子。

“洗党”采取秘密召开支部大会的方式进行，上述三种人不通知本人出席，宣布他们的问题后，在支部大会予以除名，既不通知本人，也不公开宣布，但不再让其参加支部活动和组织生活。保留下来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上报，开创了中共党员重新登记的先例，也是中共党史上的首次整党。

在进行“洗党”，纯洁组织的同时，还举办党、团员训练班，学习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课程，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

通过“洗党”，党员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党的战斗力却大为增强，不仅对壮大、发展党的事业，坚持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选自《党史博采》）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

1926年，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为迎接大革命的胜利和准备组织上海武装起义，中央决定加强宣传出版工作，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由毛泽民负责。机关设在大统路大统里；秘密印刷厂设在新闻路斯文里；另有一处用来储藏印刷好的报纸、刊物、书籍及宣传品的房子。“秘密作坊”设在山海关路。工作人员负责从这个“发行基地”将文件、报纸、刊物秘密通过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由海员中的党员或红色工会会员携带到全国各地后再转运发行。

1928年12月，廖如愿奉满洲省委派遣来到营口，负责建立中共中央发行部营口转运站。

廖如愿通过内兄黄韦钦（当时是奉天海军司令部航警处少校处员，他曾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出过一些力）的社会关系，来到设在营口的奉天省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稽查科当了一名额外科员。他以这项公开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开始在营口进行建党，建立中央发行转运站的工作。

廖如愿到渔业局不久，就熟识了行政科科长傅继方和傅的同乡、财政科的年青雇员（文书）夏凤洲。傅继方本名傅立纲，湖北省天门县石河区周嘴村人，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关系极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逃来东北，经奉天海军司令部航警处处长宋式善（湖北省天门县人，傅的同乡）介绍来营口水产学校

任语文教员。校长李安人升任渔业局长后，傅随李到渔业局任行政科长。夏凤洲是湖北省天门县石河区石庙村人，大革命时在家乡搞过农民协会。1928年8月经傅继方介绍来营口渔业局财政科当雇员(文书)。

经过一段熟识和了解后，廖如愿代表满洲省委为傅继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发展夏凤洲为共青团员。经省委批准，组建了党支部，廖如愿为支部书记。党支部的任务就是建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廖如愿说："转运站的任务就是接收中央运来的文件、书籍，转到全省；同时将满洲省委的报告及时转达上去。转达的方式是通过海员来进行的。"

1929年3月后，辽河开始解冻。转运站积极准备接收开航后由上海运来的书报文件。廖如愿也准备在营口扎下根，深入到海员、码头工人中去，坚持长期做好党的发行转运工作。

1928年12月间，中共满洲省委遭敌破坏。满洲临时省委调廖如愿回奉天担任满洲省委秘书长。

翌年春，廖如愿离开营口后，中央书报转运工作由夏凤洲负责。1929年上半年内，夏凤洲曾先后三次接收由上海运来的书报文件，再转送到满洲省委。转运的大部分是成册图书和报刊。前后三批约三百余册。此间，廖如愿还曾代表满洲省委来营口巡视转运站的工作。下半年后，因"中央书报转运工作困难大，南满路不容易通过，营口船上也有问题"，营口转运工作被迫暂停。

(选自《党史纵横》90年4期，作者：张海平)

革命根据地第一家武器制造厂

1927年11月10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江西省吉安县东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农民武装暴动。这是我党"八·七"会议以后发生较早的农民暴动。暴动后，即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这是吉安地区建立最早的一个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陈毅同志曾写诗赞誉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东井冈"。随着革命武装的扩展，人员的增多，武器需要量激增，尤其是枪支修理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为此，在1928年下半年，党组织决定由谢云龙同志负责在东固淘金坑筹建了兵工厂——这就是我国革命根据地的第一家武器制造厂。

东固，位于江西省吉安县的东南部，介于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之交。东固山峦叠嶂，地势险要，军事上易守难攻。当年就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说。而淘金坑则是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主战场白云山的山腰间，那里山高路陡，森林茂密，村庄小，人口少，群众基础好，与外界接触也少，便于荫蔽和保密。此外，更重要的是东固经过第一次革命风暴的洗礼，建立了党的组织，广大群众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有较坚实的革命基础。于是，兵工厂就选建在这个隐蔽、安全的地方。

东固淘金坑兵工厂，起初叫铁工厂，正式投入军火生产后叫兵工厂。兵工厂内设铁工厂、熬硝制火药厂、木炭烧制场。兵工厂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地抽调思想素质较好，打铁技术较强的同志组成。共40余人。谢云龙同志担任总负责。

兵工厂组建后，即投入了武器和火药生产。当时，军火生产的重点是制造土枪和土炮。同时，兼制梭镖、大刀，以及修理枪支。土枪是按照"来复枪"的构造进行仿制。它由木托、枪身、枪机三部分构成，战士们称它为"猪兜枪"。土枪的有效射程为50至100米。土炮的"炮弹"内装火药、铁砂或铁器碎片，战士们称它为"猪兜炮"。土炮全重30至35公斤，需要两人抬着或于固定位置进行发射，射程为1公里左右，发射面较宽，杀伤力甚强。

在那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东固淘金坑兵工厂在极为简陋的生产条件下，通过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生产了一大批军火，土枪、土炮、梭镖、大刀等简单的武器，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战斗，支援了赣西南革命斗争。1931年4月，国民党调集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将士就在东固的白云山一带地域摆开战场，与敌激战。在战斗中红军就地取材，及时得到了军火补充，兵工厂为保障反"围剿"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根据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固淘金坑兵工厂迁往中央红色首都瑞金。随着岁月的流逝，东固淘金坑兵工厂的史实现已鲜为人知了。然而，她作为我国革命根据地的第一家武器制造厂，曾为巩固和发展中央红色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和"东井冈"人民的功绩一同铭刻在我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

(选自《历史大观园》88年4期，作者：温谨春　钟婧)

刑场上的婚礼

1928年1月的一天，周文雍同志和陈铁军同志在广州拱日路的地下机关里同时被捕了。当时，周文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陈铁军是中共广州市委的干部，他俩遵照组织上的指示，假扮作夫妻，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党的秘密机关。

周文雍被捕后，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经过审问，判处他死刑。宣判后，伪法官问他临刑前还有哪些希望和要求，他只要求同多年战斗在一起的亲密战友陈铁军合照一张照片。这样，他俩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庄重地拍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帧遗照。

1928年2月6日，敌人要对周文雍、陈铁军下毒手

了。在前往市东郊红花岗刑场的路上，他俩态度从容，沿途高喊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感动得许多群众掩面哭泣。在刑场上，就义前的几分钟，陈铁军满怀激情地高声对周围的群众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亲爱的同胞们，姊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到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遗憾！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的工作合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还顾不得来谈私人的爱情，因此，我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还没有结婚。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地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陈铁军讲完之后，走到周文雍身边，将自己最深的爱吻送给周文雍，周文雍微笑着，愉快地接受了战友的爱吻。随即，这对双双获得纯真爱情的战友加伴侣，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年青的生命。

（选自《不屈的共产党人》）

陈铁军为什么改名

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年轻的共产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将赴刑场，他们在敌人的铁窗前照了一张临刑前的合影，最后以敌人的枪声作为礼炮举行了"刑场的婚礼"。

他们倒下了，但他们的事迹已传为人间佳话……

这里我们不讲他们一生的英雄事迹，也不讲他们在狱中的动人故事，只就陈铁军一生的一个小插曲——名字的来历介绍给读者。

旧社会的妇女，都好用"花"、"珍"、"芳"、"云"等来命名，陈铁军过去同样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燮君。

一九二四年秋，广东归国华侨的名门闺秀陈燮君，考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

当时的广州，是大革命的根据地，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但形势是复杂的，共产党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在那里聚集，而投机家、野心家和右派也在到处钻营。中山大学犹如广州的缩影，学生中的左右派也逐渐界限分明。

当时的左派组织主要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以及"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助国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鲜明的民主革命活动团结了多数同学。右派组织主要是"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派"醒狮"及"女权运动大同盟"。它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先后担任校长的邹鲁和戴季陶。"孙文主义学会"以提出所谓"反对跨党分子"，来反对共产党人；"醒狮"派多是官绅子弟，拥护陈炯明，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男女同校与妇女解放；"女权运动大同盟"则与"孙文主义学会"、"醒狮"派沆瀣一气。这三个组织虽然人数不多，却有后台，肆无忌惮。

燮君入学不久，上述那些右派学生团体纷纷向她围拢，拉她加入，她不理睬，但又因不了解情况，十分苦闷。这时燮君常与前来探望她的师友谭天度、区泽生谈论此事，分析学校各种政治派别的情况，当她知道了各派学生的政治态度，辩清了各种政治团体的性质后，便毅然参加了"新学生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并且成为这两个组织的积极分子。

她参加了配合省港大罢工的游行队伍，目睹了"沙基惨案"中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她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左右派学生的辩论，以"新颖而富有说服力的话语"，坚决反对尊孔读经和不问政治的主张，批驳鼓吹中国革命效法日本和走西欧道路的谬论，满怀信心地宣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式的道路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吸引着同学们昂首谛听。她还用尖锐的词锋，揭露了右派学生勾结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等反动势力，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使右派学生在交锋中，理屈词穷，狼狈地败下阵去。

后来，由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右派加紧勾结，作为反动势力鹰犬的"孙文主义学会"、"醒狮"派、"女权运动大同盟"的分子，在校内更为嚣张，横行霸道。如选举全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和出席全国学联会的广州学联代表时，他们都凶蛮地在会场上用"士的"（英文 stick 的音译，即手杖）打不同意选他们做代表的人。

十月间的一天，学生会改选，"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又人人手拿"士的"（人们因之称"孙文主义学会"为"士的党"）进场，还勾引几个侦缉到场监视，已经毕业离校的何觉甫也带着人员在走廊接应。当宣布"新学生社"成员得票最多的选举结果时，"士的党"便高声咒骂，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并且挥动"士的"乱打，冲向主席台；"女权运动大同盟"头子沈芷芳乘乱窃取铃钟，摇铃叫喊散会。"新学生社"女同学罗毓文冲上前去抢夺铃钟，二人扭作一团；燮君见状，立即带领几个进步女同学上前帮手，大多数同学也协助，一起把捣乱的"士的党"赶出会场，使大会能够胜利结束。在这场冲突中，燮君被"士的党"打伤脸部，眼眶下瘀血成块。事后，"士的党"沈鸿慈竟在《醒狮》小报上发表文章，说要"高举'士的'从广东大学打遍广州，打遍中国，把共产党打垮。"

在养伤中，燮君从"沙基惨案"帝国主义的罪行，想到"士的党"行凶和"打垮共产党"的叫嚣，从烈士们的鲜血，想到这次被打伤的同学，感到无比气愤，她认为绝不能示

弱和退缩。你要“打垮共产党”吗？我就是要铁了心肠永跟共产党走、和反动派斗争到底！她断然决定，把名字改为“铁军”。

她改名叫“铁军”，连启蒙老师谭天度同志也不太理解，在一次到医院看望她时，对她说：“搞革命工作不在乎叫什么名字，很多人都认识你是燮君，改了这个名字人家就以为是另一个人，这样做群众工作反而不便，如果有些人胆怯，听了‘铁军’这个名，不敢接近你了，这样对开展工作更不利。”铁军很气愤地说：“本来我也没有想到要改名的，但那些‘士的党’既不讲道理，又不想解决问题，经常捣乱，拿棍子打人。”她指着脸上的伤口说：“你看，打得我好厉害呀！她们以为这样打我，我就会害怕，不敢出来活动，但这是梦想，我绝不会屈服，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直到斗出个新天地来！所以，我就改名‘铁军’了。”

这时，天度同志感到陈铁军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

过去，谭天度同志曾把燮君要求入党和表现的情况，向中共两广区委妇委负责人蔡畅和邓颖超同志作过介绍，并介绍燮君认识了蔡畅和邓颖超同志。经过广东大学一年多的考验，党组织更加了解了燮君，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陈燮君正式改名陈铁军。

从此，陈铁军把一生交给了党，最后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

（选自《纵横》83年1期，作者：翟兰文）

孙殿英东陵盗宝

孙殿英，字魁元，乳名金贵，诨号孙老殿。1887年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杨楼村。其父孙玉林，偷鸡摸狗，村人屡欲逐其出村。后因口角杀人，被囚县城，于1912年死于狱中。

孙7岁时曾一度入私塾，从业师张景泰课读。旋因与同学斗殴受责，衔恨在心，放火将塾馆烧毁，被开除出塾。后随其母乞讨度日。此间，孙患天花，病后留下一脸豆瘢麻。后来人都称他“孙大麻子”或“麻将军”。

孙10多岁时便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起初在赌场做些“传宝盒”、“看台子”一类的杂事，进而对探窥赌博奥秘发生“特别的兴趣”，经常把麻将牌、天九牌等赌具当作研究对象，用棉布擦拭牌的背面，察其纹理，辨其异同，很快精熟其中诡秘，久而学得一套保赢不输的“绝技”，不管什么牌，他只要短时间摆弄，就能记清每一张牌的暗记、特征，不看牌面，能知牌名，信手拈来，绝少差误。

此后，孙殿英浪荡江湖，到商丘、洛阳、西安、亳州等地开设赌局，骗取钱财。每到一处，广结地痞、流氓、胥吏、军警等。他还常常设宴招待一些银行、钱庄经理、掌柜，酒宴之后，照例有麻将、牌九之类的娱兴。他诡计多端，巧于应付，往往一局终场，赢得几千几万，然后又命这些得之甚易的浮财，广结狐朋。对于一些权贵、豪门等，常以赌博作为交结手段。他又以赌场上赢得的巨款，从事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等毒品的活动，又以此赚得的不义之财去贿赂勾结官府。当时，从甘肃、陕西、安徽到上海，到处都有他的狐朋狗友，如亳州的“座山雕”、“龇牙雕”、白方太、陈静斋等不法之徒，都是他贩运毒品的团伙。

1928年，孙部在河北遵化马兰峪一带驻防，距清朝东陵很近。这片陵寝规模很大，有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5座皇帝陵和慈禧等皇后陵、公主妃嫔园寝10座。孙殿英久闻慈禧地宫内藏有稀世珍宝，贼心蠢动，密订计划，要掘墓盗宝。7月上旬，为掩人耳目，孙殿英先在附近村庄贴出布告，声言要举行军事演习。30里内禁止通行，并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不时鸣枪恫吓居民。后于黑夜亲自带少数亲信到陵地，悍然炸开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陵墓。

据传闻：墓中坠道全系精工雕琢之汉白玉砌成，有石站四道。寝宫为八角形，上覆圆顶，雕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寝宫面积约与故宫中太和殿相等。墓中殉葬品除金银元宝和玉器外，均为罕见珍宝。慈禧地宫部分殉葬品中珠宝翠钻多不胜举；七星板一揭开，霞光满室，熠熠生辉，有神形各异，雕刻精湛的翡翠马；有情态毕肖、栩栩如生的18尊金罗汉；一枝红艳艳的大珊瑚树上，绕着一串连理樱桃，青枝、绿叶、红叶，树上还落着一个珠玉镶成的斑翎翠鸟；一枝玉藕上长着绿玉荷叶，粉玉莲花，旁边还吊着几颗黑宝石的荸荠；一棵翡翠白菜嫩芽绿叶白心，青梗上落着蝈蝈和振翅鸣叫的两只马蜂。棺椁四角，有4个宝石西瓜，绿玉皮，紫玉瓤，从中切开着，瓜子是黑色宝石镶嵌；一个晶莹透亮的羊脂玉碗中，放着一串紫玉雕琢的葡萄；一个寿山福海的爵杯上镶着如星的宝石；摆在水晶盘中的是红宝石枣子，黄宝石李子，晶光闪亮。慈禧头顶翡翠金助大荷叶，枕着2尺长的玉枕，发着光台湾泽；头戴九龙戏珠凤冠，用纯金线穿大小不等的夜明珠制成，金光闪烁；口含大如雀卵的夜明珠，发着白光。衾被有一朵用珍珠金线堆制的大牡丹花；手镯上有用大小钻石镶成的一朵大菊花和六朵小梅花，光采夺目；手里握着一柄用翡翠制成的降魔杵，约3寸多长；脚上穿着一双珍珠鞋，脚下踩着翠玉碧金大莲花；身边摆着17串珠宝缀成的捻珠，还有几对备用翠质手镯，……

孙殿英用了整整三夜的时间将墓内奇珍异宝、稀世文物悉数掳掠。并将知情的士兵杀死灭口，填尸墓穴。

旷古未有的盗墓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全国哗然。各地报刊纷纷揭载，各界人士要求惩办掘陵蟊贼。孙殿英见势不妙，多方设法，力求开脱，并从赃物中挑选一部分稀有珍宝贿送权要，乃受到庇护，连最高当局也不予深究，

最后仅以“警戒失职”为名，调防移驻延庆。

（高秋萍）

“说客”当上陆军一级上将
——何成浚宠辱记

何成浚字雪竹，湖北随县人。国民政府时期，他一无嫡系军队，二无显赫战功，却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同军阶，并长期成为蒋介石在湖北的代理人，号“湖北家长”。但曾几何时，何成浚一着不慎，荣宠尽失。

东北易帜，作说客不辱使命

何成浚早年就读于湖北经心书院，后赴日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有同学之谊。“二次革命”时，蒋、何一道投奔陈其美。陈其美为袁世凯暗杀之后，二人远走闽南，同入讨袁军，自此过从甚密。此后何随蒋鞍前马后，出力不少。但蒋介石真正重用何成浚，则自“东北易帜”始。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六七月间战线推至平、津一带，北洋军阀的主力——奉系已向关外撤退。为避免给日本造成侵略的借口，国民政府决定对奉系采取和平手段，以实现全国统一。这时，主政东北不久的张学良也有统一的意愿，但他立足尚不稳固，内部意见不一，且对蒋介石心存疑虑，又怕日方从中作梗，故迟迟难下定见。南京方面能否选择合适的谈判代表，就成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之一。

是年6月至8月初，国民政府先后以孔繁蔚、方本仁等为代表同奉方就“易帜”问题举行会谈；奉方也派邢士廉、王树翰等赴北平、南京商议具体事宜。在前景看好的时候，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接连三次向张学良递交“警告书”，反对他服从南京政府；沈阳郊区的1.7万名日军也剑拔弩张，形势骤然紧张。奉系老派人物如张作相、袁金铠等十分恐慌，力持保境安民，不管关内事。张学良进退维谷。7月22日，东北当局开会，决定易帜缓办，同时电蒋介石，表示拥护统一的初衷不变。

南京方面对张学良很不满，训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方抗议林久治郎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委何成浚为代表前往东北，继续商洽易帜问题。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何成浚作说客，一来何成浚与直、奉军阀多故旧关系；二来何成浚精于此道，北伐军进军江西、围攻天津时，何成浚就是以钱权相诱，使直系方本仁、徐源泉等大将背主投蒋。

此次何成浚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前往东北的一切活动经费不受限制。蒋介石满口允承，先拨10万银元作开路之需，日后用款，随时汇寄。

就这样，何成浚携带巨款及蒋介石致张学良的亲笔信，潜赴沈阳。开始，他并不急于会晤张学良，而是同张的亲信如杨宇霆、吴俊升等新派人物打得火热，不多时，何成浚便以施财慷慨在东北人士中得了个“孟尝君第二”的称誉。

见火候已到，何成浚遂逐渐接近张学良，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在一次水灾募捐会上。何代张学良为东北某著名舞女认捐赈款40万元。据南京《新京日报》社长石信嘉说，蒋介石有一次公开透露：“贺耀组招待东北代表出席国民会议（1931年5月）用了20万元，他嫌多，退还了10万元。雪竹到东北，一次花了300万活动费，他还嫌不够。”这话出自蒋介石之口，足见何成浚是肯花血本做买卖的。

何成浚在东北游说了一番之后，张学良的“易帜”意向再趋明朗。10月18日，蒋介石对奉方驻京代表胡若愚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应付，不使汉卿为难。”这一允诺，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何成浚在得到张学良“即行易帜”的口信之后，欣然南返。11月初，何成浚又在南京与邢士廉、王树翰等就东北军事善后、东北三省省政府改组、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蒋介石同意东北所提方案，要何成浚复电照办。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东北宣布服从南京政府，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值此皆大欢喜之际，蒋介石对何成浚恩宠有加，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1929年初，国民政府授衔，何成浚被封为陆军一级上将。

蒋桂战争，赴北平釜底抽薪

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集团为争夺两湖地盘，发生了蒋桂之战。时白崇禧驻北平，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守武汉，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度，因此，北平、武汉和桂系老巢广西，形成“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之势。

蒋介石决定采取收买与打击兼施的对策。他首先选择桂系力量薄弱的北平地区作为突破口，当时北平虽在桂系手中，但驻平部队是李（宗仁）唐（生智）战争中改编的唐生智旧部，这给了蒋介石以可乘之机。这一回，他再度起用何成浚。他对何许愿：撤消北平政治分会，任命何为北平行营主任。

何成浚领命，在国民党三全大会（1929年3月）以前，腰缠巨金，赶赴香港，向寓居香港无所事事的唐生智进行游说。他双管齐下，一面致关钱财，一面又向唐生智说明蒋汪合作（即宁汉合流）后的政治情况劝唐东山再起。唐最初以手中没有力量推辞，但经不住何成浚的反复劝说，遂写亲笔信三封，分致其驻平部队负责人刘兴、龚浩、廖大夫，嘱其拥护“中央”，大力协助“何主任”。何得到

唐的信件之后，急速抵平，向三人递交了唐的信件，又以巨额贿赂，并进行秘密策划。事情商洽妥贴，何成浚公开宣布就职，明令撤消北平政治分会，驻平三将领同时通电拥护。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白崇禧瞠目结舌、只有黯然离开。至此，孤立于北方前线而为蒋军武汉后方威胁的桂系军事据点，被蒋、何不损一卒，不耗一弹，连窝端掉。

何成浚为蒋介石最后赢得这场战争立下了首功。蒋桂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北坐"楚村"军舰来到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参加"汉口市民庆祝讨桂战争胜利大会"。在会上，蒋不等向行政院提出保荐，就径自口头调任何成浚为湖北省主席。随后不久，又授何成浚兼任武汉行营主任。自此，何成浚开始做起了"湖北家长"。

中原大战，打糖弹冯军败北

1930年4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反蒋方面人多势众，几乎包括了各派各系的联合力量，蒋介石政权面临着诞生以来的最大一次险情。战争一开始，蒋亲率嫡系血战津浦一线，顶住阎锡山的晋军；而以何成浚驻漯河，指挥第三军团，布阵陇海沿线，牵制冯玉祥的西北军；以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何刍的第四路军，共同对付南方的桂张（发奎）联军。

何成浚下辖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师，杨虎城的第十七师等杂牌部分，投蒋不久，在装备待遇上远不及蒋的嫡系。该部随时都有动摇倒戈的可能。这其中，以徐源泉的部队战斗力最强，动摇性也最大。

徐部原系军阀张宗昌的旧属，其中许多人与冯、阎所部熟识。当漯河一线激烈拼杀的时候，冯、阎都派人策动徐源泉阵前反蒋。何成浚得悉后，马上对徐源泉进行拉拢，他每天陪徐打牌喝酒，并从汉口雇名妓和名京剧演员往漯河"慰问"徐军。徐源泉深感何成浚对他优礼有加，一改狐疑，唯何之命是从，徐部日后成为何成浚在湖北的基本军事力量。

何成浚除笼络部属为其卖命，还分化、瓦解冯玉祥的部队。冯军一向英勇善战，在战争初期曾给何成浚以沉重的打击，但西北军生活艰苦，待遇极低，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何成浚看准西北军这一弱点，着力发动糖弹攻势。他在陇海线上办起了许多战地俱乐部，用火车或汽车布置成许多流动商店，其中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并以武汉妓女担任接待，供西北官兵尽情享用。临别时还根据其职务大小各赠数额不等的银元和糖果烟酒等物品。何成浚的一番"糖弹"，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冯部的许多官兵，有的公开投降，有的消极作战，有的甚至当了坐探。当冯军斗志松懈之后，何成浚遂在陇海线上发起了全面进攻。西北军只得急急退回陕西。

中原大战给广大贫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何成浚却因"保驾"有功而更得蒋介石的宠用。1931年初，何成浚连任武汉行营主任，兼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真正成了蒋介石在湖北的代理人。

西安事变，耍滑头桨折船翻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做出不同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以宋氏家族和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此时的何成浚，频频收到各派的急电：孔祥熙、陈立夫，电请他代向张、杨进言，请求先放蒋介石，一切条件容后商议，并催他亲往西安一行；张、杨方面，根据他在各方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邀他前来西安，面商大计；何应钦方面，则以出兵潼关，炸平西安相压，阻他西安之行。

何成浚不敢贸然行事。他想以多年缮就的处世之方，静观事态的发展。于是，他以病体未愈，容愈后西行，来敷衍孔、陈，并应付何应钦；又以婉言回复张、杨。其电文有云："……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等等，谁知电文在报上发表之后，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他隔岸观火，不能响应张、杨的救国主张，亲赴西安，促成团结抗日；有的认为他见危不救，不忠于蒋。"何人斯"——何成浚的这个外号也因此而产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随同蒋介石被扣留的文武大员对何成浚的复电深感不满，多加指责。陈诚最为激烈，他攻击何成浚只享安乐，明哲保身，对蒋介石忘恩负义。蒋介石本是心胸偏狭、睚眦必报的人，由此而对何成浚疏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残年末路，落水凤凰不如鸡

何成浚一宝押错，输尽老底，遂年年跌跤，步步下滑。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派何成浚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何成浚看守这个"清水衙门"，直到抗战结束也始终没有挪位。不惟如此，蒋介石、陈诚还给他出难题。他们借口徐源泉作战不力，将徐禁闭，撤了军职，并由蒋介石亲批："交军法惩办。"徐部是何成浚手里唯一的一点本钱，这时竟被蒋、陈吃掉，何成浚本已痛心十分，还要假他这位军法执行总监之手，对他的老搭档处以军法。"怎样议处？"何成浚黄连在肚，苦衷难吐。最后，他不得不乞求何应钦出面"缓颊"，才保全了徐源泉的一条性命。

1946年，何成浚心绪沮丧，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北。这时的湖北早为陈诚的"土木系"把持，眼看自己在蒋家王朝中已成多余之人，何成浚一气之下辞去所兼各职，并退

役脱下了陆军一级上将的军服，住进了汉口中胡同领德里 2 号。不久，蒋介石由陪都“凯旋”南京，路过武汉。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少将陈纳德乘另一架飞机同时抵达，武汉当局发动各界前往欢迎。何成浚身着长袍马褂，也黯然神伤地夹在其中。当蒋介石走下飞机的时候，何成浚随武汉行营主任程潜首先迎了上去。蒋介石一见何成浚就说：“雪竹兄，你当老百姓了？”何答：“老朽了，不顶用了。”蒋介石哼了几声“这个……这个……”，遂无下文。

何成浚并非已皈依林泉，甘作寓公，相反地，他无时不想东山再起，再做“湖北家长”。果然，就在回武汉的这一年，他鼓动旧部推他当上了河北省参议会议长。但时运不济，不久，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何成浚凄凄惶惶收拾细软，逃往上海，再转香港，最后于 1961 年 5 月病死在台北。

（张军）

悲喜剧《子见南子》引发的风波

1926 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胡适、鲁迅、沈从文、许寿裳、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大批文化人纷纷南迁。时任北京女师大教务主任和《语丝》、《莽原》杂志主要撰稿人的林语堂因遭军阀通缉，也加入了“大迁徙”的行列。当时上海成为文化人“大迁徙”的中转站或落脚点，不少人辗转于此。1927 年，林语堂抵达上海。1928 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奔流》月刊在上海问世，鲁迅、郁达夫联袂主编。发表于《奔流》1 卷 6 期上的林语堂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使该刊声誉大增。它是林语堂根据《论语》和《史记》改编成的一出新编历史剧，也是林语堂一生唯一的戏剧作品。素以小品文见长的林语堂，在戏剧创作上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祖师爷，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使这尊偶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倾斜，但他仍挟数千年的“余威”，顽固地占据着“圣人”的位置。于是复古派思想在“尊孔”的旗帜下开始回潮，这是站在新文化阵营一边的林语堂所不能容忍的。林语堂决定釜底抽薪，彻底推坍“圣人”偶像，以恢复孔子的血肉之躯，把孔子从九天之上接回人间。

林语堂开始从“人”的角度切入孔学研究，正是这一独特的视角，使他从孔子身上发现了“幽默”在中国古文化中的“根”。林语堂说：“只有从他（指孔子）的幽默方面看去才能达到对孔子性格美点的真正领略。”“孔子是怀才不遇者，怀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及出发处”。林语堂的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这毕竟是孔学研究中的一种崭新思路。在这种思维动力的驱使下，林语堂开始创作《子见南子》。他将春秋时期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史实，编成一出新编历史剧。剧中的孔子抵卫国欲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而卫国是否接纳孔子及其思想，关键不在卫灵公，而在南子。这就形成剧中的主要矛盾冲突——孔子与南子无法回避的接触。孔子欲兴乐复礼，言必称尧舜文武周公。然而年轻貌美的南子，对复古之道兴趣索然，而对男女欢愉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她不顾有悖“周公之礼”，热心创办方便男女交际的“文艺研究社”。孔子惊诧无比，无法接受。但在南子的宏论面前却又觉言语苍白。面对南子咄咄逼人的唯情利剑，孔子唯一的甲胄——周公之礼，终于不能抵御。他第一次感觉到语困词乏。南子则施展女人的全部本领，与歌女一起弹唱起舞。那婀娜的身姿与妩媚的风韵，使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感受到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一种难以自抑的兴奋和惶恐。剧本的结尾是十分滑稽和精彩的：

子路　夫子的意见如何？可以留在卫国吗？

孔丘　（答非所问的）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要相信南子的。

子路　那么夫子可以留吧？

孔丘　（坚决的）不！

子路　因为南子不知礼吗？

孔丘　南子有南子的礼，不是你所能懂的。

子路　那么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孔丘　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狂喜）……啊，不！（面色黯淡而生严）不，我走了。

子路　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　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林语堂不仅揶揄了一代圣人孔夫子，更主要的是借此讥讽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南子显然是林语堂着力塑造的，她虽然身穿古装衣裙，却完全是一个现代的摩登女性，充满着全新的观念和意识。作为讽刺与幽默，《子见南子》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历史剧。

剧本发表后，这期《奔流》被抢购一空，众人皆以先睹为快。随后各地学校争相排演，当数千年来被神化了的孔子第一次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人走上舞台时，观众耳目一新。然而此剧却触痛了复古派的神经，他们认为这是对祖师爷的极大不敬，是大逆不道。当 1929 年 6 月该剧在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会的游艺会上演出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席卷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甚至震动国民政府的轩然大波。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位于孔子的老家曲阜，而校址又恰恰在孔庙与衍圣公府之间。这里原本是孔教思想的发祥地，然而该校校长宋还吾曾就读于北大，受新文化影响

较深。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发表后，宋还吾积极在学校组织排演。宋还吾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守旧势力所不能容忍的。早在《子见南子》上演前，这里新旧文化的冲突就很尖锐。《子见南子》的演出，则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当时曲阜孔氏 60 户族人联名呈状教育部，控告校长宋还吾。呈状写道：

讵于本年 6 月 8 日该校演剧，大肆散票，招人参观，竟有《子见南子》一出，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先？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对于此非法侮辱，愿以全体六十户生命负罪渎恳，迅将该校校长宋还吾查明严办，昭示大众。感盛德者，尚不止敝族已也。激愤陈词，无任惶悚待命之至。除另呈蒋主席暨内务部外，谨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

具呈孔氏六十户族人（名略）

时教育部长蒋梦麟立即派参事朱荷勤去山东济南，会同省教育厅所派督学张郁光赴曲阜调查，结果发现事实非呈状所控。况且所谓 60 户族人，具名的 21 人并非户首。而幕后操纵者乃是曲阜的孔祥藻和孔教会长孔繁朴两人，加之宋还吾又以长篇答辩书据理力争，新闻媒介积极参与，公开了宋还吾的答辩书和二师学生会的通电，揭开了事情内幕。社会舆论纷纷为宋还吾鸣不平，认为二师排演的新剧并无侮辱孔子的情节，孔子族人不应小题大做。这样，朱荷勤与省教育厅将调查结论会呈教育部核办。此中惊动了国民政府许多要人，工商部长孔祥熙站在孔氏宗族一边，主张严办宋还吾；而监察部长蔡元培则表示异义，因而此事一时难以定夺。最后教育部做了大量工作，否定了孔子族人呈文所控告的内容。为息事宁人。还是将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

事后，林语堂对《子见南子》引出的风波颇感滑稽，他说："……这出戏居然能在曲阜上演，扮演孔丘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二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刘小清）

张元济主张禁止黄色电影和书刊

1928 年 5 月 15 日，国民政府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在南京召开部分省区教育会议，院长蔡元培在开幕词中提出实行教育科学化、劳动化和艺术化的教育方针。次日这个讲话见诸于报端。

当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董事的张元济（字菊生）先生和蔡元培都是光绪壬辰（1892）年殿试，并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当他看到报纸上关于教育会议召开的消息和蔡的开会词后，十分高兴，当即给蔡修书一封，赞扬他"忧深虑远，真老成谋国之甘心"，同时陈述了对当时社会教育所存在问题的看法。他说"近来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一是黄色电影，从欧美译制引进的电影，情节大多诲淫诲盗，"偶赁数椽，便可开演。今且推行及于内地，取赀极廉，故人皆趋之若鹜，冥冥中我少的品性不知被破坏几许矣"。这些不堪入目、十分肉麻的影片对"少年品性"无疑有极大的腐蚀性；二是黄色书刊充斥市场，泛滥成灾，这些书刊"冒哲理之名词，行诲淫故技"，"报章广告几于盈篇累幅"地刊登，公开宣扬性学，以上两事若不严加取缔，予以"禁遏"，必将"导致教育于破产"。

旧中国黄色电影和书刊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委实不浅。张元济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大声疾呼废止黄色电影和书刊。确属真知灼见。

（张鸿基）

流　行　风

电影《火烧红连寺》

是明星影片公司所拍武侠片中的代表作。它取材于向恺然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8 年拍摄第一集，由于卖座赚钱，于是就连续拍摄到 18 集，时至 1931 年，在电影界掀起了大拍"火烧"武侠片的狂潮。

20 年代后期，武侠小说极为流行，写这类小说的有 160 人。济阳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发表于 1923 年，共 134 回，它采用民间传说，运用虚纪手法，写了一个比一个武艺高强的人物，结构上故事套故事，引人入胜。张石种正是从他儿子（中学生）床头发现了这部小说，拿来一看便要郑正秋给他改编，拍成了电影。这部影片的拷贝现今已残缺不全，难窥全貌。

《火烧红连寺》的主要情节是：湖南浏阳县的地方把

头陆凤阳之子陆小青在崆峒派大师金罗汉门下，终于练成武艺。在回乡途中投宿于“红连寺”，不慎落入机关。幸被昆仑派高手甘农珠等救出，并会同官兵，攻下培养院，救出被寺中淫僧知园和尚所囚之总督，放出受害的良家妇女，火烧了红连寺。这是第一集的内容。后来的续集越拍越差，内容虚妄，情节离奇，专以打斗场景和神怪手法取悦观众，并宣扬了封建意识，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后在观众和舆论界强烈呼吁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映。但是，这部电影在摄影技术、技巧上尚有可取之处①拍红莲寺时，运用了“接顶”的技巧，即采用透视合成方法，将搭建的没顶的红莲寺与绘制的寺顶，拍在一起，构成一座完整建筑；②采用演员和卡通合成办法，表现了“剑光斗法”的情景；③运用钢丝吊演员的特技法，表现角色在空中“驾雾飞行”。总之，影片在特技摄影上有发展意义。

小说《倪焕之》

作者叶圣陶，主要内容：

小说以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背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倪焕之的生活道路。倪焕之在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时与校长蒋冰如志同道合地实行“理想教育”。不久，便遭到校内外各方面的责难和干涉，终因势孤力单而失败。倪焕之在事业上的伴侣金佩璋，婚后沉缅于家务，失去了改革教育的兴趣和勇气，使他深感寂寞和痛苦。正当倪焕之心灰意冷地败下阵来之际，革命潮水开始冲击他的狭小的天地，在王乐山帮助下他到上海某中学教书，积极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开始认识工人阶级的力量，抛弃过去那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以及王乐山的牺牲，使他陷入极度的悲愤和失望之中，最后患“肠窒扶斯症”死去，但在弥留之际，他还渴望光明。小说表现了辛亥革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主人公的命运与十年来变化的时代相联结，表现从乡镇到城市的广阔社会生活，并从倪焕之的一生道路中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史”，显示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曲折性与艰巨性。作品主线突出，结构完整，笔触细腻，语言洗炼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小说《老张的哲学》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

以“五四”时期的北京为背景，着力塑造市民知识分子老张这个反面形象。老张是个军官，同时又经商，还兼办学校，在北京为非作歹。他借“督学”捞钱，家长被竹杠；借为人“说亲”，从中渔利，并拆散两对青年的婚姻。为人贪婪吝啬，精于打算，迷恋金钱，还虐待妻子，他的人生哲学是小市民的极端利己主义，即“钱本位三位一体”的哲学。为了金钱，他什么都干，是市民世界中政客、兵痞、腐儒、奸商和流氓的混合体。作品写他为所欲为，飞扬跋扈，甚至作了教育厅长，暴露了封建军阀统治下政治和文化的腐败。作品还塑造了另外两类市民形象，一个是车夫赵四，他爱憎分明，助善除恶，是市民阶层中的英雄救世的理想人物。另一个是游手好闲的孙八爷，是一个“傻好人”，常受坏人拨弄跟着干坏事，是作者否定的另一个反面形象。人物形象生动，但未能揭示其性格形成的原因。纯熟地用北京话讲故事，采用白描手法和漫画化的夸张来描画人物，语言风趣、幽默，是作者早期反映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小说《动摇》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

小说以 1927 年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前夕为背景，描写了湖北某县城里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武汉大革命时期的动乱。随着大革命风暴而来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劣绅胡国光在革命的高潮中施展两面派手法，混入革命队伍，篡夺了领导权，向革命势力进行猖狂的进攻。在革命阵营内部，以李克为代表的革命派，坚持原则，支持工农运动，大胆揭露胡国光的卑劣行径；而以方罗兰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领导人，自命为“左派”，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动摇不定，妥协退却；以县长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力主解散党部、工会和农会，甚至派人逮捕农协委员。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不久，发生了夏斗寅叛变，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猖狂反攻，反革命军队袭击了县城，许多革命党人纷纷撤退，假革命派匆忙脱逃，预示武汉国民政府必然崩溃的趋势。

诗《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

歌曲《玫瑰三愿》

玫瑰花，玫瑰花，
烂开在碧栏杆下，
玫瑰花，玫瑰长，
烂开在碧栏杆下。

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
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
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
好教我留住芳华。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国民党的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李济深屠杀广东工农，已经有九个月了；国民党的唐生智屠杀两湖农民（马夜事变），汪精卫屠杀汉口工人（七月三十一日），也已经有半年了。国民党的宁汉两中央"合作"，宁汉两政府合并等类的滑稽戏也不知扮演了几多次了。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在这期间杀戮各地工农民众，摧残罢工禁止抗租，严禁抵制外货，……凡是一切反革命卖国的勾当早已应有尽有，应做尽做了。广州工农兵群众暴动失败之后，国民党自己宣布已经屠杀广州工人兵士农民到5,700多人，并且对俄绝交，杀戮驻华的苏联外交人员。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宣布"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并"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党的反动事业，到此已经告了大成。

国民党的所谓反共清党，说是可以肃清恶化腐化，完成北伐，解放中国，改善民生等等。如今事实上怎样呢？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这总算是反共清党的成绩！这种"成绩"的表现，不但使全国的经济金融陷于破产崩溃的地位，一般工农民众受着不堪言状的剥削压迫和屠杀，不但新旧南北各省大小军阀的混战破毁全国糜烂全国，甚至于国民党内的纠纷也是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已经是死尸，而且是早已烂得发臭的死尸了。

国民党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召集他的第四次中央会议，但是他召集了五个月，至今还是开不成。或是说不足法定人数，或是连法定人数也不能确定（究竟是十五人还是二十人）。形式上的理由多得很，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是甚么统一的党，他内部的政客派别军阀系统多得很；这些派别和系统之间，正在冲突矛盾战斗，如何能一致的开甚么中央会议呢！

最近伍朝枢、孙科辞职，汪精卫被逐，何香凝等所谓粤方委员被人提议通缉，胡汉民李石曾吴稚晖等声言"没有办法"，蒋介石自己说"民众怀疑"，说"党国威信日堕"。

国民党自己以及帝国主义的报纸，都说：(一)国民党已经不是统一的党，国民党的统治和北方军阀的统治毫无二致；(二)北伐了两年，结果仍是四分五裂，各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军阀的混战不已；(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都不能发展甚么革命解放中国，而是发展反革命破坏中国。这些情形是全国人民所共见共闻的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向中国一般劳动民众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与一切工农民众破裂，就是背叛革命，这种结果一定是使国民党变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这已经铁一般的事实了。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纲口号，已经完全拆穿西洋镜。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了。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党员完全退出国民党，并且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对这种背叛革命卖国殃民的国民党，根据下列的罪状：(一)国民党是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的党；(二)国民党认为"粮从租办，租由佃出，是千古不易之定理"，压迫禁止农民的抗租和没收土地，他是维持地主封建式的剥削的党；(三)国民党禁止罢工，封闭革命工会，他是维持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党；(四)国民党认为"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他的政府，如蒋介石则与日本勾结，秘密向日本借款卖国，如李济深则向英国香港政府借款千万，作为他屠杀广州民众五千七百人的尝金，他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五)国民党北伐了两年，不仅没有打倒甚么军阀，而且是造成许多新军阀，这些新军阀就是国民党的主人，互相以救党护党的"理由"，实行争权夺利的混战，如今广东福建两湖山东直隶等省，到处都是这些军阀混战、战祸的蔓延，使一般工农失业，兵士牺牲，使一般民众受着苛捐重税。公债省债库券等的压榨或者不兑的纸币军用券剥夺一般贫民的生计；——根据这些罪状，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国民党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兵士群众的公敌！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已经是同样的反动势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众！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继续广州暴动的事业，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中国最大多数民众自己的政府，然后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后才能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15期，1928年1月30日出版)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苏维埃政权。盖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主要的任务是要实行彻底的民权革命，即绝对地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的政治基础，以肃清封建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在革命的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极急迫的需要。去年十一月的中央扩大会议对此曾有极明晰的决定，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更曾给各地以不断的指导和督促。可是各地党部在其所领导的不断的暴动中，对此种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任务，执行得异常之迟缓，而且充分表现出来各级党领导机关没有决心。除开海陆丰以外，各地农村暴动，大都只做到杀豪绅，烧地主房屋，进一步做到烧田契债券，而于没收土地的工作，则一点没有做。湖南之醴陵事实上在我们手里，江西之万安，已经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湖北之黄安曾建立了二十余天农民政府，但是土地依然没有开始没收，甚至江西党部对此还有一种解释，说万安自耕农占农民百分之八十不便没收土地。河南省委亦以河南自耕农占多数为理由，不敢提出焚烧一切田契的口号。就是海陆丰对土地的分配也还延迟没有执行。至于苏维埃的建立，在广东只有海陆丰和琼崖的一部分建立了，湖南省委才开始命令醴陵执行，湖北的农民暴动可算是比湖南更深入了，但除开黄冈两个区苏维埃之建立外，一般还没有开始。就是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也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苏维埃代表中工人的成分过少，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微弱而农民原始的意识对政权的影响极大，简言之，就是带了不少的农民政府的精神；第二，许多乡村苏维埃，只是从原有的农民协会换过一个招牌，因此他的内容也就是旧的农协的内容，甚至有许多乡村苏维埃与农协的组织同时并存。海陆丰苏维埃的两个缺点在别的地方也显然是不可免的症候，譬如湖南江西河南的党部最近在宣传苏维埃的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农民协会宣传和组织，这就是表现在这重要省份的党部也还没有了解苏维埃的对面不容有农协存在的意义。不过这个缺点是容易矫正的，只有头一个缺点，在各省斗争发展的局势上面，已经是一种很严重的危机，就是在斗争发展的省份，如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同样只是创造了农村势力而没有城市的基础，换言之就是只有农民的基础，没有工人的基础。这样一旦暴动发展到占领城市，

即使名义上不如黄安一样把政府正式叫作农民政府，事实上也会成就一个工农兵其名而农民其实的苏维埃。所以造成这种非工人领导的农民政府的原故，固然也有客观的原因，如城市工作较乡村难于发展，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各地党部没有争城市的决心，而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如果这种主观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迅速的纠正，那么暴动的发展，只是造成了代表小农私有观念的"平产"政府而已。例如湖北的汉川县，在那个地方党的组织比较普遍而具有组织的形式，斗争也比较普遍，游击战争，已经从黑夜的斗争渐次发展成为公开的群众斗争，但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观念则代表了落后的农民的意识，如要烧城市（系马口烧去半边），如杀豪绅则注意要分配其财物，甚至党不将没收之现金分给群众则有些同志表示革命于个人没有好处……等等，这种现象一方面告诉我们是由于汉川的党没有注意城市（甚至主张根本焚烧城市），另一方面则告诉我们是由于汉川的党仅仅把斗争停滞在杀豪绅焚屋子的游击战争中，而没有领导群众进一步的实行分配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总之各地党部在执行暴动策略的当中，对于暴动的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般的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也没有充分的决心去执行。同时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作，减少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因此各地斗争，除了极少的地方如海陆丰而外，一般的还停滞在杀人放火的游击战争状况而不能有更广大更深入的发展，造成深厚的革命基础，而且这种迟慢的发展，还有受农民均产观念所支配的趋势。因此中央特训令各级党部更有决心更正确的执行中央暴动的策略，主要的是对于没收土地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执行。同时中央对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决定下面的纲要，为各地执行时的根据：

关于没收土地

（一）没收一切地主祠宙〔庙〕等土地，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凡是能耕种的都可以分到土地。

（二）一切土地于实行共有后，从新分给农民耕种，由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给土地使用证（县苏维埃未成立时由当地最高苏维埃发给）。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宣布废除，土地不能买卖，并打破耕者有其原来耕地之观念，既从地主没收土地交给原佃和自耕农土地不摇动的观念。

（三）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为标准。以年满十六岁能自耕种的人为一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平均使用土地（酌量各地情形决定亩数），其余的土地按照各劳动单位所属的四岁以上的人口之多寡平均分给于劳动单位使用。

（四）赤军之现役军官和兵士之有家属者其本身亦为一劳动单位，分给之土地得雇人耕种。

（五）雇农愿意自己耕种者必须分给土地。

（六）颁布雇农保护条例，以保护继续受雇之农民，主要在增加工钱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等，比例于农民没收土地后所得之利益。

（七）增加手工业工人及苦力之工钱并改良待遇。

（八）土地之分配暂以一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自己分配，区苏维埃指导帮助之。

（九）土地没收后，凡无倚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而不能从事劳动者，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

（十）土地使用人须向县苏维埃缴纳农产品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国税（由县苏维埃以所收入之税额百分之二十缴国家苏维埃，百分之三十缴省苏维埃，百分之二十津贴乡苏维埃，百分之三十归县苏维埃支配——区苏维埃用费由县苏维埃津贴。）

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以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机关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

（二）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代表中须尽可能的引进非同志参加。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选权。

（三）在一个乡村中（旧日乡农协的范围），一有群众起来，即须从群众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可观望其他邻近乡村是否起来，因而有所等待。

乡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其中须尽可能做到有兵士代表和工人当选。执行委员之外选举候补执行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会互推常务委员三人（内主席一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并须推选财务委员一人（必须由常务委员兼），文化委员一人（管教育宣传等），裁判（裁判群众纠纷）兼肃反（肃清反革命）委员一人，粮食委员一人，赤卫委员一人（管赤卫队）。

执行委员中互推三人组织土地委员会，受理分配土地事宜，乡苏维埃常委每两天开会一次，执委每周开会一次。

（四）一区内（旧区农协之范围）有二个以上之乡苏维埃时，即须召集由群众直接选举之代表会议（农民群众代表大概每五百人选一代表，赤卫军或赤卫队选举人之单位则不能至五百人而须斟酌情形减少，有工会组织的地方须有工人代表参加），选七人至九人组织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五人），其中须尽可能有工人和兵士代表当选。执行委员会之组织除常务委员可扩充至五人外，与乡苏维埃之组织同。执行委员会之下还须组织经济委员，以执行委员一人为主席，计划本区范围内之经济建设事宜。

区苏维埃常委每周开会二次，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开

会一次。

（五）一县之内城市工人运动有相当基础，并且乡村有了两个以上之区苏维埃时，须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十一人至十七人组织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七人）。代表会议代表数目，按照当地斗争发展情形和环境决定之，代表成分工人代表至少须占百分之三十，兵士代表至少须占百分之五。

如果没有城市工人代表参加，只有乡村二个以上之区苏维埃联合起来组织之县苏维埃，只能称为临时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互选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五人至七人（执行主席在内）组织县行政委员会，县行政委员会之主席，即由县执委之主席任之。县行政委员会之下，得组织财政、经济、文化、裁判兼肃反、土地、赤卫等委员会。各种委员会之人数三人至五人，以县行政委员一人任主席（如财政委员主席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主席文化委员会）。

县苏维埃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二次，执委每月开会一次。

乡村中重要的市镇可独立成立镇苏维埃，直接于县苏维埃。

（六）凡省会所在的城市或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在经常的工人运动中，须运用种种机会，召集各种工人代表会议（如罢工工人代表会议，失业工人代表会议，某业工人代表会议，某厂工人代表会议，全市工人代表会议等），以发动工人斗争而提高工人群众的指挥能力，并且设法使附近的士兵和农民派代表参加，促进工农兵的联合战线。一旦全省的斗争发展成总暴动的局势而该城市要事实上成为总暴动的中心枢纽时，即须召集全市各厂各业的代表和近郊农民代表及士兵代表开全市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暴动的指挥机关。代表人数按照当地实际斗争情形和环境中定之，但代表的成份，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和兵士的代表各百分之十五。

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上项代表会议选举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组织之（候补委员七人）。组织法与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同。

（七）一省斗争的发展快要达到全省总暴动的局势时，如现在之广东湖北湖南，应召集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全省总暴动的指挥机关。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人数按照当时斗争的发展情形和环境决定，至少须满四十人。代表的成份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四十，兵士代表占百分之十，农民代表占百分之五十。

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代表会议选举二十一至二十七人组织之（候补委员十一人）。

由省苏维埃执委互选七人至九人组织常务委员会，省苏维埃执委之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由省苏维埃执委会议选举之。

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海陆军委员会、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各委员会以行政委员一人兼任主席（如海陆军委员任海陆军委员会主席，外交委员任外交委员会主席）。

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每月开全体会一次，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

省会之外之重要工商业中心而非县会所在之地（如湖北之沙市），可独立成立市苏维埃，直接于省苏维埃。

（八）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须议决一切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各级苏维埃一经成立，即须正式议决一切公布一切执行一切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下级苏维埃绝对服从上级苏维埃之指挥。

（九）全县境内之赤卫队归县苏维埃指挥调遣；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为指挥作战之方便起见，于海陆军委员会之下设总司令指挥等职，指挥调遣作战军队。

（十）各级代表会议有撤换该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权，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有撤换该执行委员会之常务委员或行政委员之权。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序列表

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

军　　长　朱　德
党 代 表　毛泽东
参 谋 长　王尔琢
政治部主任　陈　毅
第十师：师　长　朱　德（兼）
党代表　宛希先（牺牲）
第二十八团：（南昌起义部分）
团　长　王尔琢（兼）
党代表　何长工
第二十九团：团　长　胡少海
党代表　龚　楚
第十一师：师　长　张子清（负伤由毛泽东兼）
党代表　何挺颖
第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分）
团　长　张子清（兼，后牺牲）
（后）朱云卿
（后）伍中豪
党代表　何挺颖（兼，后牺牲）

（后）邝朱权
第三十二团：团　长　袁文才
党代表　陈东日
副团长　王　佐（后牺牲）
第三十三团：（五月底编散）
团　长　邓允庭
党代表　邝朱权
第十二师：师　长　陈　毅
第三十四团：团　长　邓宗海
党代表　刘泰
第三十五团：团　长　黄克诚
党代表　李一鼎
第三十六团：（五月底编散）
团　长　李奇中
党代表　黄义藻
特务营：营　长　宋乔生
党代表　敬懋修

（摘自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

一、军队方面

甲、注意士兵教育和管理

1.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所以对于党的主义及政策，应该随时使士兵了解，并须每天上课，随时讲演，参加士委工作，猛力使士兵文化程度增高。

2.党代表不但只管士兵的教育，并且还要注意士兵的管理。关于纪律，应该向带兵官随时随地督促士兵遵守，并使士兵与官长关系密切。

乙、作战时党代表之工作

1.在未战之先，应该使士兵了解战争的意义和目的。

2.在指导上，党代表应该帮助指挥官指挥。

3.在战争上，党代表应该站在士兵前面，领导士兵向前猛进。

4.在言论上，应该随〈时〉指出敌人缺点，增加士兵勇气。

5.战时或战事结束，应该注意抬护伤兵，即调查战斗经过情形。

二、民众方面——说明士兵与民众之关系

1.向士兵说明：士兵就是工人、农民、贫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与被压迫民众同处在被压迫地位。

2.向民众说明：本军是工会，农会，共产党的军队，与被压迫民众一家人。

3.如遇有了民众运动的地方，党代表应该领导官长、士兵积极参加工作，将党的政策在该处实行。

4.如遇没有民众运动的地方，党代表应该领导士兵、官长唤起群众，领导群众，施行党的政策。

三、党的方面

1.党代表一切行动和言论，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去施行党的主义政策。

2.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与团为群众核心。

3.党代表应为各同志模范，并使各同志，以及非同志，在本党政策之下，都积极工作。

四、做报告

1.党代表的一切工作，应该随时报告。他除了每周二报告一次之外，若遇有重大事务，须立即报告。在该事件未解决之先，应该请示方法；已解决，应报告解决经过。

2.党代表应注意民间调查及官兵的调查。

现在规定每周工作报告事项及军队内部调查，现在规定每周工作报〈告〉事项及民间调查报告事项如下：

（1）讲演题目及其要点。
（2）听者人数及其要点。
（3）在士兵委员会上报告些什么，提出些什么。
（4）士兵生活状况怎样。
（5）士兵心理怎样。
（6）士兵有些什么要求。
（7）士兵群众中党的发展怎样。
（8）官兵参加民众运动的情形怎样。
（9）纪律遵守的程度怎样。
（10）党在民众中发展怎样。
（11）已解决问题经过。
（12）未解决问题。
（13）其他事项。

五、民众的调〈查〉

（1）当地政治状况：A、政治区划。B、旧政治机关的组织。C、政治机关经费来源。D、武装。E、政治机关的罪恶。F、其他。

（2）当地经济状况：A、田地分配（收租的占百分之几十，自耕的占百分之几十，收租的又可分地主、宗族、神道、政治四项，看其占若干）。B、田租。C、利息。D、苛税。E、生产。F、工价（长工、月工、电工、泥水匠、裁缝、理发、女工、童子〔工〕、其他）。G、地价（当地各种农产品与外来产品之价格逐一列成一表）。H、新式工业品浸入（例举名称并数目）。I、民众运动情形及其人口之数目。J、党的情形。K、地理（给〔绘〕出详细地图）。L、土豪劣绅及反动派之姓名住址，资本家之罪恶（内分已提〔捉〕获及未提〔捉〕获）。M、妇女儿童状况。N、其他。

注：此件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42--445 页。目前尚未发现原件。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

一九二八年七月

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二十三人:

杨福涛　顾顺章　向忠发　彭　湃　徐锡根

卢福坦　李涤生　张金保(女)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　殷　周恩来

李　源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王藻文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

徐兰芝　王凤飞　王　灼　刘坚予(即刘愿庵)

唐宏经　史文彬　李子芬　周秀珠(女)

甘卓棠(牺牲)　邓中夏　夏文法　罗章龙

王仲一

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委员　刘少奇　阮啸仙

孙津川(牺牲)

候补委员　叶开寅　张昆弟

书　记　刘少奇

中央政治局:(于莫斯科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出)

正式委员七人:

向忠发　周恩来　苏兆征(1929 年春病故)

项　英　瞿秋白　张国焘　蔡和森(1928 年冬撤销,补入李立三;后又补入彭湃、罗登贤)

候补委员七人:

李立三　彭　湃　杨　殷　罗登贤　关向应

徐锡根　卢福坦

主　席　向忠发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向忠发　周恩来　苏兆征　项　英　蔡和森(1928 年 11 月被撤销,后补入李立三)

候补委员　李立三　徐锡根　杨　殷

主　　席　向忠发

(摘自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7—99 页)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节选)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一、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的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段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他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二、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

(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权独裁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推翻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都必须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农民权独裁方能完成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方式。

四、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摇动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1927 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

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

因此，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级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政纲

一、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

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他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耕地归农民；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

一、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便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他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生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之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只有争斗，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四、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

(十)革命高潮过去后的形势

一、革命高潮过去

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都遭着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丧。

二、现时没有革命高潮与工农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亦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农民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之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打击最重。

三、帝国主义实行瓜分政策

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暴动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 1925 年至 1927 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四、帝国主义现在比中国革命的力量大

瓜分政策的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的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既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大战但是现在列强之间还没有如此剧烈的冲突

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的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的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新的关系。

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的反对中国革命的。

六、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间虽有矛盾仍能一致压迫革命

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势力，因此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的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之意义

一、中国反动统治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革命的新的高潮不可避免

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进攻：（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能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的抛弃自己的对华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的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粮食的价格不断的高涨，劳动的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雇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的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能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二、国际形势能够帮助高潮的生长

革命潮流生长的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的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生长以及中国邻近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印度）。

三、新的高潮的象征已见但不可过分的估量

第六次大会认为：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自动的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的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的，城市工人阶级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的现象。

四、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而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

一、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

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暴动，认作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二、现时全国范围内只要宣传武装暴动的必要以准备新的高潮

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使群众了解，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和帝国主义的统治，那就决不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并向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

三、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

现在第一个革命的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的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四、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

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里的冲突，农民与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小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号召武装暴动），扩大群众的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导者。

五、准备武装暴动正要争取群众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须前提，也就是将武装暴动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五三”惨案应付方案

（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
中常会第134次临时会议通过）

在此北伐进行顺利中，突然发现日兵在济南空前之暴行，杀害吾交涉员，杀伤吾同志同胞千余人。此种不幸之遭遇，爱国同胞何能忍受？苟雪此耻，虽粉身碎骨亦所甘心。第念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之创痛至深且巨，非集全民之财力、武力，出以有训练有计划之斗争，不能摧此强暴，固我国权，若激于一时之忿为无训练无计划之动作，不特于国无益，势必堕其术中更增困辱，因此三固，本党对此惨案应以较远之眼光，作积极之准备。下列方案即基于此，愿吾同志以坚忍刻苦之精神执行之。

一、五三惨案及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本党必以是后最大之努力彻底解决之。欲彻底解决，须积极为武力、体力、财力之准备，同时同志应唤起民众于日本问题之研究及现势之了解。

二、力求民族之独立自由，须先充裕民族之富力，欲充裕民族之富力，须增进国货之产额，故提倡国货以抵制日货，使日本经济力无法再垄断中国之市场，实为今日以及将来之要着，故提倡国货自有相当之范围。如封闭商店，烧毁存货等，有害无益不宜采用。

三、本党对五三惨案已罗列事实，宣告于世界，求公理正义之援助，此种有利益之宣传本党应不断进行，并指导全国人民与本党一致。

四、共产党无所忧一地济南被害之同胞，且不愿中国之统一，于此时期或将利用同胞之爱国心煽动暴动，直接摇动北伐后方，间拉引起更大之寇祸，故本党应劝告全国民众要整齐严肃，准备最后最大的奋斗，不可有无计划无组织甚至于无目的之动作。

五、五三惨案之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意在挑衅，其目的：一、为镇压其国内政潮，二、为延长中国残余军阀之运命，蒋总司令暨全体同志已烛破其奸，故虽备受横逆仍力持镇静，惟能忍人所不能忍，乃能成人所不能成，愿本党同志与爱国同胞体念前敌同志之苦心，及时局之严重，勿中日本军阀之奸计，且更注意于日侨生命生产之安全，使日本军阀无可借口。

六、本党于日本出兵胶济时，曾制定应付方案八条，颁布于各级党部，现因五三惨案之发生，特举前方案所未及或及而详者制定以上五项，但前方案仍继续有效。

七、五三惨案之事实，及外交状况，本党将随时布告于民众，使中央的政策与民众的意思息息相通，以一致精神共济当前之危局。

注意——严守秘密！完了。

（国民党党部档案（九）8001--1）

蒋介石上国民政府辞军职呈文

（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

呈为军事告毕，恳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及军事委员会主席，俾遂初志事。究中正自十五年七月受命中央，统军北伐，幸赖总理之灵与钧府之威，屡挫逆军之焰。洎乎去夏，师次江淮，党国多难，补苴乏术，爰自劾去中正，期促党内之团结，而利大计之进行；徒以时机迫切，未俟核准而去，得罪海外，负咎弥深。嗣承中央之督责，以杀敌补过，勖其自效，后奉钧府电令，督劝备至；闻命感激，不敢再稽，遂忘谫陋，重效驰驱。复职以来，夙夜兢兢，搜简师旅，料量军实，筹策粗定，誓师北征。赖将士用命，同志努力，两月之间，戡定齐鲁，收复燕京，虽革命全功，有赖继续之努力，而军事程序，已去最后之障碍。此后统一区宇，肃清遗敌，唯赖中央以政治力量渐谋收束。顾瞻大势，已无待于用兵；轸念民瘼，应早息乎金革。伏查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制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是作战目的完成时，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中正本年二月复职之际，亦经剀切陈明：一俟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息坏在彼，当蒙昭鉴。为此沥陈缘由，恳予明令俯准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解除，并准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有各军悉令复员。此后军政统归均府军事委员会输，以一事权，而专责成。至前方出力官兵，应行奖叙；战死遗族及伤病残废应予抚恤，及其他军事收束事宜，仍当条举，以备采择。庶国府开始建设，与人民以深切之观感，而军职及早解除，在中正得稍慰乎初志。所有恳准解除总司令职权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各缘由，理合备文呈候鉴夺施行。谨呈国民政府。

（选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上海《中央日报》）

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公布）

（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进以立宪政之基础。

(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

(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

(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改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选自《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三十九期)

统一革命理论案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理由:

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凭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分岐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建立。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则宣传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力量不能集中。数年来,党内纠纷百出,实源于党员对一地革命理论未能统一。现在本党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其思想立场,微有出入者有之;绝对异趋者有之;其中最令人忧惧不安者为;党员之间,都有以意气而分派别的倾向,甚至有剑拔弩张,形成敌对团体危险。对党取批评的态度,缺乏拥护的真诚。偏重于吹毛求疵的琐屑的攻击,鲜有具体的建议。

这样推衍下去,必至将整个的党捣成粉碎,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我们不能说谁的动机是对或不对,只有及早定出一个言论标准来,令全体党员遵照标准发表,免得大家凭着意气来做真理,庶几思想统一,则党的团体容易坚固了。为此提出,请求公决。

决议:

统一革命量论案交常务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若干人,组织理论审查委员会,将研究结果提交下次全体会议通过公布。

(选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

张学良号电

1928年6月20日

军民长官各报馆均鉴:本日致奉省各县父老宣言一通,文曰: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巨。当此任务之始,敬以至诚之意,倾叶素抱为我父老陈之:

一,学良束发从戎,屡亲行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闾舍残墟;列郡则捐税烦苛,商民鹄。贫者将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于何有?学良上年战胜渡河以后,即有弭兵之电,言之綦详。事变相乘,夙志未达。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事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一。

二、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交邻亲善,古有明言,东省地界边陲,尤宜讲求外交亲睦,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阴谋,务达共存共荣之目的。此为我父老敬者二。

三、东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然古有明言,兵在精不在多。比年因战事发生,编制不无冗滥,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但使田亩中多一耕农,即社会上少一游惰,自时生产之力日增,军费亦因之自然日缩,袍泽同爱生存之乐,而饿需亦无竭蹶之忧。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三。

四、奉省金融困滞,公私痛苦同深,勉事补苴,终非善策。自今以往,当励行开源节流主张,实事求是,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使民治早日完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四。

五、至于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企同风。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五。

以上所列,上之秉承于庭训,内之则发动于良心,端绪虽繁,精神不贰,志愿所在,生死以之。敢布腹心,敬希人鉴,谨请明教。张学良。号。印。

(摘自《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

出席列席第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名单

出席者

陈树人、丁超五、白云梯、朱霁青、朱培德、王乐平、何得凝、经亨颐、黄实、谭延闿、于右任、褚民谊、陈肇英、宋子文、王法勤、缪斌、丁惟汾、何应钦、蒋中正、李烈钧、周启刚、析文蔚、戴季陶。

列席者

潘云超、张人杰、蔡元培、李宗仁、邵力子、郭春涛、李煜瀛、陈果夫。

附录

(一)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十七年二月补白委员等十人

汪兆铭、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顾孟馀、经亨颐、宋子文、析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刘守中、萧佛成、孙科、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

候补执行委员

缪　斌、吴铁城、陈肇英。

(二)中央监察委员名单

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黄绍竑。

候补监察委员

李宗仁、郭奉涛、李福林、潘云超。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集会庆祝民国开国第十七周年,国民政府常委谭延闿、李烈钧及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党政军官员约千人参加大会。

1月3日　蒋介石通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级党部,主张恢复最高党部,速开中央全体会议,以结束过去党内纠纷,树立国家大计之新基;并表示"即日驰赴首都,负责筹划一切,务使会议开成,党基重奠"。

1月6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开第三十次会议,议决将查办汪精卫、陈公博等九人案移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邓泽如、古应芬呈复通缉严办汪精卫案,亦一并移送该委员会。

1月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开临时会议,谭延闿主持,蒋介石出席,到会委员十三人。会议决定通电各省党部报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业于去年12月28日结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本日在南京开会,中央党部即日开始办公,并电请各执行委员来京参与第四次全体会议。

1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开第一二四次会议,谭延闿主席,蒋介石等十五名在京委员出席,决定政治会议业已开始办公,一切提案均查照惯例办理,至于各地政治分会应否恢复,留待第四次全会讨论;于右任、易培基加入政治会议为委员,叶楚伧被推为秘书长。

1月17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军委会呈送陆军编制草案准予备案;财政部拟具征收卷烟统税条例即予公布;司法部呈复审查最高法院修改民事、刑事诉讼律意见照案通过。会议决议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五次会议加推杨权庄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六次会议议决要项为:令三十八军军长龙云在云南厉行清党;浙江省党部呈送"共产分子自首条例"六条,议

决交组织部审查决定办法;派陈希谊、洪陆东接收浙江省党部。

1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整理党务根本计划审查会开会,丁惟汾主席,中执监委丁超五、白云梯、王乐平、郭奉涛、朱霁青、何香凝等参加,通过整饬党纪方法提案十三条、整理各地党务提案九条、训练党的人才方法提案五条等。

2月1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在南京开会,出席中执委十九人,列席中监委六人。蒋介石主持。决定2月2日上午10时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式,3日开会;推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为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主席团。

4月1日 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声讨张作霖罪行,要求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同日又发表《告北方同胞书》。

4月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五次会议决定任命冯玉祥、郭奉涛、邓哲熙、凌勉之、李兴中、张吉墉、何其巩为政治会议开封分会委员;张励生、祁志厚为太原分会委员;朱家骅、陈可鲸为广州分会委员;吕志伊、孙光庭、周鍾岳、卢锡荣为云南省政府委员。

4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二五次会议,修正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伐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案。

4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七次会议通过《省政府组织法》;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任胡宗铎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刘郁芬、宋哲元为政治会议开封分会委员,缪培南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子文、易培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

4月20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宋子文、易培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张群继任上海兵工厂厂长;议决令各部院制订施政纲领。

4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对付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要求党员严格保持秩序,遵守纪律,使前敌将士一意向前,无内顾之忧,个人言论行动,务当遵照中央所指示之标准,不得稍有违背。

4月2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三〇次会议就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告世界民众书》及《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世界民众给予中国以正义之援助,要求日本国民力谋遏止田中内阁之侵略政策。

5月9日 蒋介石全权代表何成浚,几经跋涉,是日始抵济南,旋与日领事吉田、师团长福田谈判。何向福田说明日军所提五个条件都已兑现,请求停止攻城。日方提出须于日军面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何以条件苛刻,谈判卒无结果,反兖州复命。

5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谭延闿主持,讨论应付张作霖息战通电,因奉张通电并无诚意,决定置之不理,惟对诚意来归之奉军将领,当允其自新;通过为济案致美总统柯立芝电文;任命谷正伦为首都卫戍司令,并决定明令优恤蔡公时。

5月15日 北京军政府准于新疆省喀什噶尔道莎车县回城地方增设叶尔羌县。

5月22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议决准以李品仙、叶琪、陶钧等九人为军委会委员;公布修正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各部及大学院组织法八项决议。

5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法》、《国民政府财政部组织法》、《国民政府交通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司法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农矿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工商部组织法》、《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

5月2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议会通过复日本党书牒文,并推谭延闿、张静江、陈果夫赴徐州与蒋介石晤商,如无异议,再行发出。次日,谭延闿抵徐州晤蒋介石。

6月2日 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政府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听国民裁决。"所冀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党赤化,不自我而兴。"

6月3日 张作霖出京归奉。凌晨1时15分,张乘专车离开北京,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莫德惠、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三十余人,日本顾问仪我诚也、町野武马同行。至此,统治民国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政府遂告覆灭。

6月4日 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遇炸。凌晨5时23分,张专车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南满与京奉路交叉处之铁桥下,被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指挥日工兵二十二联队预埋的炸药(一百二十公斤,分装三十座袋内),用电流控制引爆爆炸,张作霖受重伤,抬回沈阳大元帅府后于上午10时身亡。

6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八会议讨论蒋介石函辞中政会主席职务事,一致议决恳切慰留。

6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七次会议议决派蒋介石赴北京为祭告总理代表移灵南京事由蒋到北京后斟酌决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

6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九次会议通过《经济设计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区党部划分办法》;议决五次全会议予备案(如依照建国大纲规定实施方案、决定国防计划案及结束

军事整顿军队案、统一财政案等十二项议案),分别交军事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起草。

6 月 27 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六次会议议决:一,撤消战地政务委员会;二,修正通过《土地收用法》;三,指定李济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6 月 28 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五〇次会议以北伐完成,军事结束,议决禁止招募新兵;修正通过《政治设计委员会组织法条例》。

7 月 5 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五二次会议议决追认民国刑法展期两月,由原定之 7 月 1 日展至 9 月 1 日施行案;通过停止新闻检查案。

7 月 9 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五四次常务会议议决,第五次全体会议延期至 8 月 1 日,原定 8 月 1 日召开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因筹备不及,亦延期召集。

7 月 10 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议决:《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通过;民国十六年以前旧欠田赋豁免;任命朱兆莘为外交部次长;通缉安福系余孽王揖唐等十二人。

7 月 28 日　国民政府公布《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施行条例》及《土地征收法》。

8 月 3 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案研究会开会,于右任主席,对中常会讨论起草之"依照建国大纲规定训政时期施行案"、"统一财政并确定预算案"、"建设程序案"、"澄清吏治案"、"促进党务进行案"、"确定民众运动方针案"等十二项提案进行审查。

8 月 4 日　日首相田中特使林权助携田中秘密训令赴奉为张作霖吊丧,是日抵沈阳。"训令"反对东三省与南京谋妥协,"万一敌(指北伐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

9 月 3 日　胡汉民由香港抵沪,蒋介石派张群前往码头迎接。当晚,胡汉民与蒋介石就改组政府事交换意见。

9 月 12 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议决:(一)本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关税等差税率;(二)《法院编制法》、《法官惩戒法》、《法官委员会审查规则》等交付法制局审查;(三)集宁县划归绥远省;(四)加入非战公约事,推王正廷起草电文答复美政府。

10 月 3 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二次会议,通过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训政纲领》;陈果夫辞代理组织部长照准。

10 月 11 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四次会议推胡汉民、谭延闿、李石曾、王宠惠审查修正《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及《立法程序法》;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额数及人选标准。

10 月 12 日　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司法院组织法》、《考试院组织法》、《监察院组织法》。

11 月 7 日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军事委员会,所有该管一切事宜限 11 月 10 日以前结束,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等。

11 月 28 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六五次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组织法》;议决程潜解除监视,免予查办;参谋部改称参谋本部;凡未经正当手续,在出版地之行政官厅注册,无确实负责人营业出版品,由国民政府令饬主管部严加取缔。

12 月 6 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八五次会议议决修正通过《党员无故不出席区分部党员大会惩戒条例》,规定党员无故连续二次、或三个月内间断三次不出席所属区分部党员大会者,由该区分部执委会去函诘问,诘问无效后警告,警告无效后停止其党权,停止党权三星期仍无效后,开除党籍。

外　交

1 月 3 日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和伍朝枢任赴美改订条约特使,部务着次长郭泰祺代理。

2 月 9 日　驻华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因北满中国当局于去年 12 月 2 日布告不承认中东铁路土地局发给外国人之借地权一事,向张作霖提出严词抗议,指责此系违反各国侨民既得权之保护声明,请予撤回。

2 月 13 日　中俄地方当局签订黑龙江、乌苏里江航行新约,未呈北京军政府批准。中方签字者黑河道张寿增、黑河税务司铎斯、东北航务局长陈文让;俄方签字者黑河领事米拉美得、俄水道局长吉阿诺夫、技术米拉依罗夫。

2 月 26 日　驻华美公使马慕瑞在上海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会谈宁案问题,驻沪美总领事克银汉、外交部司长何杰才参加。双方表示俱愿早日解决此案,美使并同意黄郛所提宁案谈判与修改中美旧约结合进行之主张。旋美使西行,黄郛急须回宁,遂各委克银汉与何杰才在沪继续谈判。

3 月 21 日　广东省政府照会各国驻穗领事,谓华盛顿会议所议之附税今增为百分之十,自是日起开征,以六个月为限;且已令海关自 5 月 11 日起征关税百分之二十,亦以六个月为限,所征入之款,供救济粤灾之用。

4 月 13 日　驻华日公使芳泽与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干会商结束,因北京方面妥协,是日就中日奉海路交涉案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恢复奉海满铁两路之联运协定;(二)归还奉海线借用洮昂线之车辆。

4 月 20 日　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就日本出兵山东事

电汪荣宝转知日本政府，略谓：据驻日公使汪荣宝报告谓日本阁议，已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如果系事实，务望从速取消，以敦邦交。

4月2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事向日外交部严重抗议，要求"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是晚该抗议书寄达日驻宁领事署。

4月26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第二次严重抗议日本出兵山东。是日下午、江苏、江宁两交涉员分别将抗议照会送达驻沪、宁日领事。照会要求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动。

5月14日　日内阁正式通过陆、海、外三部联合提案，决定向中国提出蒋介石正式谢罪、惩办贺耀祖、赔偿日本军民所受损失等五项条件。同日，日陆军参谋总长铃木电告福田，若南军承认五项要求，则可通过济南。

5月29日　美国务卿凯洛格接见中国赴美专使伍朝枢，重申美国愿与任何中国的统一政府谈修约问题。

6月10日　驻华荷兰公使欧登科偕英、美、日三使抵南苑晤韩复榘，对鲍毓麟被缴械提出质问，请即释放。欧登科急电国民政府，要求保证鲍旅安全离京的驼奉。

6月14日　北京使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转外交部，要求向北京进发之华军各司令注意北京外侨及人民之安宁，并使鲍毓麟旅安然退走。

7月8日　外交部照会丹麦驻华公使高福曼，1863年7月13日中丹《友好通商航行条约》已届期满，应即废止，提议两国各派全权代表，另缔新约。

7月12日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公使芳泽，声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日所缔《通商航海条约》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缔《通商航海续约》，至民国十五年10月8日第三次满期，要求即刻改订。

7月18日　上海日总领事矢田抵南京，与王正廷谈判济案，提出惩办济案中国方面肇事者、赔偿经费等五条无理要求作为谈判原则，遭王正廷拒绝。矢田当晚返沪，即电北平日公使芳泽，报告谈判无结果。

7月19日　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南京领事冈本，转交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之通告，声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国通商行船条约》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国通商行船续约》业已逾期，应予废止。冈本表示照会中事实可以电呈芳泽公使，但照会则不便收下。

7月21日　日首相田中在内阁会议说明中日条约废除问题，称政府已通告国民政府，中日通商条约不能依国民政府之单独的废除通告即行失效。依据该约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自前年10月20日起继续有效十年。若中国以真挚之诚意求改订条约，则日本表示同情。

7月23日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发表宣言，谓意政府根据南京政府外交部最近之对外宣言，已训令驻华外交代表与国民政府开始磋商，讨论废除中意间旧有各种不平等条约，并成立新协定。

7月25日　葡驻华公使华安琪照复国民政府外交部，答复7月11日照会，声明"敝国政府不得不驳斥是项宣告，并不承认适用'临时办法'"，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敝国即派代表与中国缔结新约"。

8月9日　《中英宁案协定》在南京签字。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驻沪总领事巴尔敦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其内容为：国民政府对于去年3月24日南京事件，向英政府深示歉意，赔偿损失，深望英政府对英舰炮击南京城之举动，表示歉意；英政府将委派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

8月13日　驻华美使马慕瑞赴朝鲜旅行取道沈阳，杨宇霆即赴美总事馆相晤，要求美谅解东三省与日本关系，并望美政府援助。

8月16日　驻日公使汪荣宝赴外务省向亚细亚局长有田面交国民政府关于要求改订条约应从速开议修约。

8月21日　古巴外交部会中国驻古巴公使馆，赞同中国政府于7月17日会所提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主张，并告古巴总统照度将军已派定河些哥米斯柯理格为驻华代办，将于最短期内特派全权公使常驻南京。

8月23日　外交部长招待各国记者报告最近外交，其要点为：(一)中葡订约谈判下月开始；(二)中西、中意正在接洽修约；(三)中法、中意宁案不日即解决；(四)罗马天主教皇对中国统一希望甚殷，并望得到国际平等地位，外交部已复承致谢；(五)我国拟即加入废战公约。

10月4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向记者宣布：我国明年1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将以明文规定。

10月29日　王正廷在上海接见中外记者，谈中日交涉等问题：(一)条约问题与济、宁、汉各案，必将同时解决，务于最短期间订定新约；(二)济案亦必与其他各案同时解决，而解决济案与撤退在鲁日军亦属连带关系；(三)宁案有中美、中英、中法、中意各案之先例，故解决极易。

11月5日　美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11月8日　美国共和党胡佛7日当选为总统，是日外交部长王正廷电胡佛表示祝贺。

11月12日　中挪《关税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挪威驻华代办欧勒在上海签字，其内容要旨为撤销中挪旧约内税款各条文，适用关税完全自主原则；关税问题上，彼此给予最惠国待遇。挪威同意以平等互尊主权为原则，同意全部修订新约。

11月22日　中比《通商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比利时驻华代办纪佑穆在南京签字。其内容要旨为，比方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缔约双方征收进出口货物之关税，与其他各国享同等待遇。

11月27日　中意《友好通商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与驻华公使华蕾在南京签字。其内容要旨为:关税各以国内法规定之,缔约双方于关税问题上,与其他各国平等待遇。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11月27日　外交委员会在南京王正廷官邸开会,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宠惠、孔祥熙、王正廷到会,通过对国际宣传办法及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伍朝枢、施肇基分任驻美、英公使等议决案。

12月6日　外交部分别照会比、意、日、美、葡萄牙、挪威、丹麦、西班牙八国驻华领事,宣布实行关税自主,并附"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新税则"各一份,由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分别递交各国驻沪总领事馆。

12月9日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则》业已明令公布,定于民国十八年2月1日实行,附"海关进口税则表"送请查照。

12月19日　中荷《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与驻华荷兰公使欧登科在南京签字。同日,中葡(萄萄牙)《友好通商条约》由王正廷同驻华葡公使毕安琪在南京签字。

12月20日　英国驻华公使蓝溥森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国书。蓝溥森致颂词,蒋介石致答词。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

军　事

1月4日　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应安国军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之邀入京,讨论前方军事。津浦正面防务仍由孙军担任,孙军饷项军装及枪械则由北京军政府供给。

1月6日　国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军事委员会呈请,议决改编西征部队为十八军及独立第八师,任陶钧为十八军军长,刘奉荣为独立第八师师长。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1月13日　军委会各级政训主任联席会议闭幕,通过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一、促开四中全会;二、继续贯彻清党;三、拥蒋复职;四、完成北伐。

1月14日　何应钦、贺耀祖因处置苏沪桂军问题意见分歧,是日何不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谈话会,贺亦表示不问津浦线战事。蒋介石对此事极为愤懑,向谭延闿等谈称:倘各方互挟己见,不改畴昔态度,本人唯有再下野以谢党国。

1月20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议决颁布"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令",规定北伐全军由蒋介石统辖指挥。

2月8日　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长孙传芳召集直鲁将领在济南开军事会议,张宗昌、褚玉璞、寇英杰、张敬尧、程国瑞、王栋、李藻麟、马敦源等出席,讨论军事问题,决任褚玉璞为西路总司令指挥大名、曹州军事,结果各方意见未获一致。

2月8日　李济深在第八路总指挥部开粤省军事及政治会议,到会陈铭枢、徐景唐、邓彦华、闰祝万等人,讨论统一财政、肃清共产党及进兵援湘等问题。

2月13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席人选: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权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指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2月16日　蒋介石于下午2时由徐州抵开封与冯玉祥会商北伐大计及作战方略。结果冯同意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议决彰德、大名方面及山西方面先取守势,集中兵力以解决山东。

2月2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四次全会议决改组,推定委员及常务委员,是日开成立会,到会常委蒋介石、于右任、谭延闿、李宗仁、委员李烈钧等二十余人,蒋介石主席,议决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业。

2月25日　蒋介石召开军事委员会及总部各厅处长,重要官佐会议整军节饷办法,决定:自3月1日起,(一)军人自总司令至士兵一律着布制军服;(二)国府直辖军队,饷银一律减折支发,士兵八成,尉官七成,校官六成。

2月28日　北伐军编组正式决定: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兼)(辖十八个军,二十九万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辖二十五个军三十一万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辖十一个军,十五万人);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四个舰队)。

2月29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3月4日　湘军李品仙、刘兴、周澜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及长沙程潜、宝庆白崇禧求和,表示不愿以民众之武力作无益之牺牲,谨率所部集结湘西,听候命令,移师北伐。

3月8日　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郑俊彦、褚玉璞、刘志陆、寇英杰、师景云等出席,商讨对晋、豫、宁三方军事,决鲁西主攻,鲁南主守。

3月9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地政务委员会条例》,共九条,其中规定该会任务是"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指挥,处理战地民政、财政、外交、司法、交通各政务"。

3月16日　蒋介石颁发国民革命军北伐总方略,分为"方针"、"前期作战任务及部署"、"后期作战任务及部

署"三个部分。

3月21日　蒋介石将16日颁发之北伐总方略要旨,电达上海海军司令杨树庄,令其统率海军警戒江苏以南海面,努力防范外国军火济敌,并须相机制服敌舰,掌握直鲁海权。

4月7日　蒋介石下总攻击令,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同日,蒋发布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

4月8日　军事委员会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参加北伐。

4月9日　蒋介石下令第一集团军,今后占领区内所有民政、财政等事概归战地政务委员会处置,各军官不得干涉。

4月22日　蒋介石、陈调元、刘峙抵兖州。总司令部徐州行营即日移兖州办公,何成浚、邵力子留守徐州。次日上午,蒋介石至曲阜瞻仰孔庙、孔林,召见孔子七十四代孙孔德成,下午回兖。

5月5日　上午,蒋介石偕黄郛离济南退驻党家庄(距济南约三十华里),令第一军李延年团及第四十一军苏宗辙旅之一部(计三千人)留守济南城内,维持秩序,并于同日函告福田彦助,盼其停止特殊行动,俾维持两国睦谊。

5月7日　日本南满铁路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奉日本首相田中命秘密抵北京晤张作霖,表示日本当局决定掩护他撤回关外,阻止北伐军出关。张当即允诺在日本"满蒙新五路密约"上签字。

5月19日　蒋介石由徐州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进兵京津策略,决定一、二两集团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担任京汉线,分兵三路向京津进兵。限京汉、津浦两路之第一、第二集团军,于本月25日前,在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将主力集结进攻,分别由朱培德、鹿钟麟主持。

5月24日　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政府为避免北伐障碍。济案决用外交解决,各军队应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不遵约束者以反革命论罪。

6月14日　国民政府发出指令三项:(一)蒋介石呈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未便照准;(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以病呈请开除本兼各职,碍难照准;(三)薛笃弼呈请开去内政部长,应无庸议。

6月30日　国民政府以平津收复已久,军事告终,河北省政府及北平、天津特别市政府委员、市长亦已次第任命,是日明令取消战地政务委员会。

7月4日　张学良在沈阳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东三省联合省议会初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辞不就,故改推张学良继任。

7月22日　烟台事变。投降北伐军之张宗昌部钟震国(张宗昌义子,投降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刘志陆部教导师师长兼东海警备副司令,调驻烟台),奉张宗昌之密令,于是夜突然袭击烟台驻军刘志陆部施中诚团,解除施团三千余人武装,次日占领烟台。旋出布告,自称奉张宗昌委任为烟台警备司令,改悬五色旗。

8月13日　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王钧在江西省府纪念周报告,"五路军裁兵分两期,改编七、八及二十八三个师,编竣开赣西、剿共";将赣西之九、二十七、赣东二十九师调回改编,遵令缩成两师。

7月29日　蒋介石以烟台事变发生,委第三军团总指挥方鼎英解决胶东军事。旋方率第四军、二十七军、四十军由沧州出发,开赴胶东。

12月4日　全国编遣委员会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何应钦任主席。决定《国军编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以陆海空军总司令为会长,各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政部长各派三至五人为委员,并推张群等四人为编制起草委员。

12月31日　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官。

经　济

1月1日　天津中原公司百货商店正式开幕。创办人为黄文谦、林寿田、林紫垣、陈军海、赵泽苓、何逸洲等人,官僚资本有陈耀珊、陈光远、陈希晃、徐善伯等人,海外华侨有蓝赞襄、鲍翼君、黄启功、王重山等人。股东一千余户。

1月8日　宋子文在南京召开财政紧急会议,讨论年关筹款办法,决定苏、浙、皖各征收机关认解四百二十六万五千元,限本月15日以前分两批解缴。

1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总额为四千万元(去年11月旧券二千四百万元,新增一千六百万元),月息六厘,1933年4月底还清。

2月3日　北京国务院总理潘复邀外财两界要人及以前参与关会各人物,在宅内会议关税事务。

2月4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特设湘鄂赣皖四岸食盐济运总局,委松江盐运副使陈绍妫为局长,是日公布组织简章,设总局于南京,四岸各设分局;总分局运销盐斤,由淮北各盐场配运,定额暂以二百万担为限,从前临时官盐商盐一律停止。

2月5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禁止重征赋税。同日,又通令恢复盐务稽核机关(根据民国二年善后贷款而设),其前任财长孙科任内所设之上海稽核总所及江、浙、

闽、粤、赣、鄂稽核从员一律停止工作；至于外债问题，俟通盘筹划，再定办法。

2月6日　北京国务总理潘复召集关税自主委员，正式会商关税自主与增收税率问题。专门委员钱泰等人提出二五附税改由海关征收一事，应商洽日使克期开征等四项意见，顾维钧、梁士诒赞同在沪开兑率会议。

2月13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抵杭州解决浙省财政问题，即日与省府各委员磋商，达成浙省每月解部之款由原五十万元增至七十万元等五贡有关国税、省税协议。

2月18日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开成立会，到会有谭延闿、李石曾、黄郛、郑洪年、陈立夫、王征、叶楚伧、吴稚晖等委员及苏、浙、皖三省建设厅长，张静江主席，讨论职权问题，决定由秘书处草拟暂行条例，俾资依据。

2月29日　北京军政府关税自主委员会于国务院开会，潘复、罗文干、吴晋、顾惟钧、王克敏、梁士诒、王荫泰、沈瑞麟、英德惠、颜惠庆等十三委员及专门委员出席，讨论未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前应采取之过渡办法。

3月5日　北京军政府令设置关税自主委员会，任命顾维钧、梁士诒、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罗文干、阎泽溥、沈曹麟、英德惠、夏仁虎、吴晋、朱有济、马素、潘复为委员，潘复以国务总理资格兼该会主席。

3月7日　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闸北商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团体召集会议，到会有虞洽卿、林康侯、赵晋卿、冯少云、邬志豪等十人，讨论上海商界劝募二五库券进行办法，议决成立上海商界劝募二五库券协会，推林康侯为主任，并设相应机构，即日开始办公。

3月9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通电各地财厅关所，凡执有部照运行之盐，经过沿途关卡，应尽先查验，立即放行，勿得稍延。

3月30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前为救济四岸盐荒，曾设立济运总局，嗣因盐务署派员调查，认为尚无设立必要；又据四岸运商呈请仍由商运，借以维持盐业，经财政部呈请国民政府于是日会议核准，将四岸食盐济运局撤销，仍由淮商照旧案办理。

3月23日　国民政府发布《卷烟税国库券条例》，定额一千六百万元，以财政部郑烟统税为担保，言明充军政费，月息八厘，定4月1日发行，至1930年11月30日本息如数还清。

3月31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召集财政会议，讨论北伐筹款问题，江浙皖三省财政人员六十余人到会，宋子文主席，宣布各财政机关每月解款数。次日，续开会议，各财政机关分头与宋子文接洽认定解款数目，作最后之决定。

4月11日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复函工部局，提出会董席数之确定应以捐税比例为原则，租界华人教育经费、组织设施等问题亦应尊重纳税华人代表意见，以示合作诚意。

4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卷烟税国库券条例》，定额一千六百万元，以郑烟统税为担保，用以抵充政府预算不敷之用。

4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军需公债条例》，定额一千万元，以本年5月1日为发行期，利息为周率八厘。民国十八年起偿还，至第十年全数偿清。

5月21日　国民政府令财政部，凡北京伪政府所订条约税则，概不承认，由外交、财政、工商三部拟定宣言，提出政治会议核定，并令财政部转饬税务司，凡北京伪政府修正税则，不得实行。

5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劳资争议法》，交国府公布；“筹设全国国民储蓄银行”案，交建委会酌办。

6月5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发行第二期军需公债简章》，债额为四百万元，年息八厘，自民国十八年起，开始偿还本金二十分之一，至第十年止，如数偿清。

6月7日　李济深召开西南联办建设事业会议，桂、滇、黔代表均列席，决定拟组织西南贸易公司，开发四省实业，并设西财实业银行，定额资本洋二千万元。

6月9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煤油特税短期公债条例》，债额四千万元，利息周年八厘，自发行之日起，每六个月抽签还本一次，至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底全数偿清。

6月10日　国民政府会议，决议组织敌产委员会，设委员五至七人，内、财两部长为当然委员，加入高等法官一人。各省市设分会，所没收敌产用于办理地方慈善、教育、工商事业，不得作军政费。

6月11日　内政部、外交部、司法部会拟《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七条，呈请国民政府鉴核施行，是日国民政府批准予以备案。

6月15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发出通电，宣布7月1日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要求中央和地方主管财政机关派出全权代表，参加会议，共商全国统一后之财政大计。

6月20日　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开幕，到会委员六十一人，宋子文任主席。讨论事项：一、整理财政，统一币制，巩固金融；二、巩固国内外公债信用；三，改革税收。会议分金融、国债、税务、贸易、国用五股进行讨论，为期十日。

6月27日　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部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规定库券发行总额为九百万元，月息八厘，自十七年十月起每月月底还本三十分之一，至二十年三月底本息如数偿清。

6月30日　中日《洮昂材料煤价短期借款合同》由洮昂铁路工程局局长许文国，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在沈阳签字。借款日金四十二万二千六百六十元另五十五钱，煤价并利息四十万另六千一百另九元八十钱，共日金八十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元，自民十七年7月1日起三年为期。

7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善后短期公债条例》，定额四千万元，为完成统一全国之用，利息八厘，至民国二十二年6月底全数偿清。同日并公布《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保管基多条例》。

7月6日　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新闻界，提出整理交通事业政策，其要旨为：(一)统一事权，凡路电邮航四政，任何重要机关，不得任意支配；(二)会计独立；(三)减轻电费及路费负担；(四)保护商旅；(五)罗致人才；(六)组织财务、购料、法规各委员会，制定法令，以资遵守。

7月9日　财政部接收北平各机关办事处为募集津海关二五附加税库券垫款事，致函北平总商会，告以北平各钱号应垫银元二十五万元，限五日内缴清。

7月11日　外交部照会法国驻沪领事梅里蔼，声明中法《越南通商章程》及其附约中法《陆路通商章程》(1886年4月25日订于天津)、中法《续议商务专务》(1878年6月26日订于北京)、中法《续议产会专条附章》(1895年6月20日订于北京)于7月7日起概予作废，并提议中法两国政府各派全权代表，另订新约。

7月12日　国民政府着内政、财政两部通行各省政府豁免民国十六年12月31日以前旧欠田赋。

7月15日　为贯彻全国财政会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是日裁厘委员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18日，该会讨论裁厘方案，决定裁厘后以整理田赋、营业税、特种消费税所得款抵补各种经费。24日，裁厘委员会闭会，选出贾士毅等五人为常委。

7月25日　中美签订关税条约。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京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此约由伍朝枢在美国同国务院直接商洽，其约文由华盛顿拍发到平，由宋子文与马幕瑞签字。

8月17日　中德《关税条约》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和驻华德公使卜尔熙在南京签字。

8月20日　全国禁烟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委员李烈钧、何应钦、薛笃弼、钮永建、王正廷、钟可托、李登辉、陈绍宽、张之江九人在国府大礼堂宣誓就职。主席张之江。谭延闿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致训词，张之江致答词。

8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预算委员会组织条例》。次日特任谭延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蔡元培、于右任、宋子文、王伯群、蒋作宾为预算委员会委员。

9月4日　全国预算委员会开会，确定全国军队不得超过六十师，由财政部速筹裁兵费。宋子文提出9、10、11月预算额一千五百万元，除各省二五库券二百万元，尚少一千二百万元，若各省将国税上缴中央则可相抵。谭延闿主张，俟冯玉祥、阎锡山到京后再从长计议。

9月21日　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开会，推谭延闿、于右任、宋子文为该会常务委员谭延闿为主席。宋子文报告。现在全国每月收入约五百万，支出达九百万，不敷数四百万，讨论结果，决定实行节流，核减军政各费及裁减兵额，一面设法开源，使收支平衡。

10月5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通过《民国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条例》；任命中央银行理事及监事。

10月10日　吉(林)敦(化)铁路通车，全长一百三十英里。该路于1926年6月1日开工，由北京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于1925年同满铁理事松冈洋右订立包工契约，金额一千八百万元，两年零四个月全部建成。

10月25日　江西省会议通过进口消费税则，自11月1日启征。江西省原有收入，月共一百八十余万，自将米捐、商捐、禁烟局及厘金局二十六所一并裁撤之后，每月收入减少一百万元左右，致省库如洗，军政各费统无办法，故有此项决定。

10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凡二十四条，规定资金为国币二千五百万元，二十五万股，政府认五万股，余由人民承购，总行设上海。

10月3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条例》，凡十二条，规定公债总额为四千五百万元，周息二厘半，至民国四十二年9月底还清。

11月1日　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资本总额两千万元(银元)，总裁宋子文，副总裁陈行，总经理顾立仁。上午9时，举行开幕典礼，蒋介石主席并授宋子文总裁印。下午，正式开始营业。

11月6日　全国商会以广东汕头内地税局擅订苛例五项，致商货停运两月之久，工商失业不下数万人，金融枯竭，华侨失望，是日呈行政院请求取消汕头税局五项苛例，仍以旧章施行。

11月10日　国民政府令京内外各机关，对于中央银行发行各项兑换券计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须与现金一律行使通用。

11月13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外交、财政、工商部，略谓七级差等税为军阀时代各国关税会议所议决，足制商人于死命，商民万难承认此自杀之税率，务恳毅然宣布，自十八年1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

11 月 16 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表盐务稽核所对外宣言，宣布为使盐政纯由财政部完全管辖起见，须修改盐政旧章，按照新规章，中国政府按照 1913 年善后借款合同设置之盐务稽核所，嗣后除由财政部长拨付偿还借款应需之款外，不再负保管任何款项之责任。

11 月 21 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至驻沪日总领事馆，与矢田正式商议关税问题。矢田表示：(一)对中国 1929 年 1 月 1 日实行关税自主，碍难赞同；(二)要求中国切实整理所借日本之无担保债款；(三)以裁撤厘金为实行关税自主交换条件。

12 月 6 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于国民十八年 2 月 1 日施行，以一年为有效期。

12 月 15 日　国民政府颁发统一财权令：嗣后各省市政府以国税抵借国内款项，或募集省市公债，均应将需募债额及基金办法条例等，咨由财政部核明，呈候政府批准，方准发行；其于各项税款，如有指定抵借款项者，未于事前呈准核定，概不发生效力，各省管理国税机关长官如未奉有财政部命令，亦不得擅许抵押。

文　教

2 月 21 日　国民政府大学院明令废止祀孔，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着将祀孔旧礼，一律废止。

4 月 13 日　国民政府第五十四次会议，内政部长薛笃弼提议，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之旨，由政府颁发明令昭示国人，以端趋向。在教育方面，由大学院厘定普通人民应具有之德育编为公民常识课本，责成各学校实地训育。决议通过。

5 月 14 日　国民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细则》。

5 月 15 日　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开幕，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席致词，提出大会应当研究之问题为：第一，注重科学；第二，注意学生运动；第三，教育经费独立；第四，教育方案。十六省代表及来宾百数十人出席，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通过大会议事细则二十八条及审查会规则十四条。

6 月 19 日　国民政府准免国立中华大学校长蔡元培兼职，任命李石曾为国立中华大学校长。

8 月 17 日　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蔡元培任主席。李石曾提议在北平实行大学区制，蔡元培反对无效，通过北平大学区组大纲案。

9 月 19 日　四川教育厅奉大学院令饬筹设四川大学，特组织筹备国立四川大学讨论委员会连日召开会议，议决将国立成都大学等十个大学校改组为国立四川大学。

9 月 21 日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议决任命孙连仲等四人为青海政府委员，孙兼主席；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

10 月 21 日　中美就安德思盗古案成立协议。是日，安德思在内蒙盗掘古物八十六箱在协和医院开箱受检，各有关专家出席。马衡代表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张继与安德里在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历史学、考古学古物留华；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平分；有脊椎动物化石送美国，留一份在华；无脊椎动物化石留华，送一份与美，但嗣后得允许中国学者前往从事研究。

12 月 11 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及《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

12 月 16 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及《考试院铨叙部组织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29年

导　言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主要讨论裁减全国军队问题。由于各派军阀都想保存自己实力，并不执行会议所作的裁军决定，此次会议非但没有达到裁兵的目的，反而激化了新军阀之间的矛盾。

三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代表406人，80%为蒋所指派。会议追认和通过了早已公布的《训政纲领》，并确定开始实施。这次大会后，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激化，各派新军阀混战加剧。

蒋介石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首先向桂系集团开刀。三月二十七日，蒋桂战争爆发，各路蒋军迅速攻入湖南，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南逃广西。6月间，李、白、黄通电下野，蒋军进入广西、李、白等逃往国外。

三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推举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等9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毛泽东根据六大精神和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经验，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政策作了新的规定，反映了党对土地革命认识的发展。

因为争夺山东地盘，蒋介石和冯玉祥发生军事冲突，韩复榘、石友三被蒋收买，冯玉祥无法再战，只好通电下野，另谋他图。后又与阎锡山联合企图反蒋，但由于阎坐观成败，冯玉祥部又以失败而告终。

五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逮捕、遣送苏方高级职员。十月，东北军进攻苏联，遭到惨败，十二月，双方签订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仍由两国共管。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于六月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党、政权、军事、建设等具体方案，规定训政时期为六年，至1935年完成。

九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正在中央参加军事会议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起了关键作用，为红四军九大召开指明了方向。

陈独秀在八·七会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鼓吹取消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行动上从事反对中央的小组织活动，经一再教育、帮助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在广西右江地区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中国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召开，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兴国土地法
●中央开除陈独秀等人党籍
●百色起义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古田会议
●编遣会议
●国民党三大
●蒋桂战争
●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
●蒋冯战争
●中东路事件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

兴国土地法

背景介绍

1929 年 1 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 4 月红四军在赣南兴国颁布的土地法，称兴国《土地法》。其主要内容有：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分配后的土地严禁买卖；分配土地以人口和劳动力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可多分一倍土地；分配土地的区域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茶山、柴山按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使用；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如砍伐 50 根以下竹木须经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经区苏维埃同意，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批准；土地税分别为 15%、10%和 5%，如遇天灾人祸，经批准后可免交土地税；乡村手工业工人，如愿意分田者，可分给每个农民的田地数量的一半；还特别规定红军及赤卫队官兵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均享有分配土地之权，耕种有困难的，苏维埃政府可雇人代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结合赣南土地革命的斗争经验，将 1928 年 12 月的《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条十分重大的变化。

材料：

·第一等的工作
·兴国土地法

材料一　第一等的工作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兴国模范县”的高度评价。

兴国成为苏区模范县，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兴国的革命实践，同毛泽东同志对兴国的工作指导分不开的。

早在一九二九年春天，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到兴国时，就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亲自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红色政权，亲手起草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明确提出：1. 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2. 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3. 建立革命武装——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4. 烧毁田契借约。5. 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草拟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写在《井冈山土地法》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土地法是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同志为了推行这一土地法，在兴国文昌宫里举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为兴国的土地革命斗争培养了干部。

（选自肖华《模范的兴国，英雄的人民》）

材料二　兴国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

(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

(3)以区为单位分配。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所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15%，二、10%，三、5%。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井冈山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1930年才改变的。

中央开除陈独秀等人的党籍

背景介绍

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即取消主义的观点，并且在党内组织所谓“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植根于1928年至1929年期间，直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在苏联的少数中国留学生。1929年下半年、陈独秀等受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影响，开始于彭述之等一批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组织所谓“左派反对派”。8月5日，陈独秀就中国革命问题致党中央的信中，提出取消民主革命的主张。10月10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总的政治口号”。10月15日，中央政府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和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把革命都取消了”。决议号召全党要坚决“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但是，陈独秀等对党的警告置若罔闻，并且拒绝去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仍继续进行托派活动。12月25日，陈独秀等81人联名发表了托陈取消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继续鼓吹他们的取消主义观点，大肆宣扬蒋介石夺取政权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无产阶级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取消革命运动。

材料：

-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产生
- 陈独秀转向托派前后
- 中国托派组织的建立及其破产
-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节选)

材料一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产生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最早产生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主要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直到“四·一二”之前，联共党内托季联盟同斯大林的斗争对中山大学没什么影响。导致学生大量投入反对派的，是大革命失败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托洛茨基思想的趁虚而入。

据当时反对派组织者之一的王文元和当时属于二十八个半之一的盛忠亮回忆：从1927年初开始整整三个月，《真理报》都在宣传“蒋介石是服从群众意志的”，“共

产党人需要能干的右派军事领袖”,“右派如果不服从纪律我们可以开除他”等等。这种宣传使学生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一当事变发生,学生思想就发生极大的混乱。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讲话后学生思想有所稳定,但是“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使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事变再一次证明斯大林在“中大”讲话时提出的“武汉是革命中心”论断的完全错误。人们开始怀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完全正确。

这时反对派的文章传到了中山大学。王文元说:这些文章“谁看了都要叹服”,有些人“在反对派文件的攻势面前几乎是毫无抵御能力”,许多学生几乎“凭直觉”就同意反对派的主张。于是在1928年秋天在莫斯科效外正式建立了中国反对派组织。中国反对派当时直接受俄国反对派领导。

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中国留学生接受反对派主张并加入反对派的直接原因。

从1927年底到1930年,留俄中国反对派先后都回到国内,分别组织了《我们的话》、《十月》、《战斗》三个组织。成员全是留俄归来的学生,人数在二百左右。这些人自称为正统的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

在国内,1929年夏,陈独秀等人接受了托洛茨基主张并自动组织起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无产者》派。但是正统派三组织都不承认陈独秀等人的《无产者》派,认为陈独秀等人都是一些老机会主义者,“因失宠于斯大林才投靠托洛茨基”。正统派三组织都写信给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陈述自己的看法。但是陈独秀等人并不因留俄学生的非难而犹豫。他们从政治主张上、组织上和思想理论上一步一步的向着反对派的路上走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独自在家闭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及当前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的问题。”党的六大以后也相继撤去彭述之的顺直省委书记和尹宽的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原省委书记汪泽楷,中央没有再分派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回上海后中央也没有再派工作;中央还撤去郑超麟的《布尔什维克》主编职务,撤去蔡振德、马玉夫的江苏省委委员职务;这样,原来的这些陈独秀派此时都没有职务,于是便常常聚在一起议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他们都认为“八·七”会议的中央对陈独秀的指责不公平。这些人在大革命中都有错误,革命失败后又都不愿认识自己的错误,对“八七”和六大后不再分配给工作不满。带着这种情绪,他们就都很容易接受反对派的意见。

1929年夏,陈独秀等人便组织起来,分成三个小组,宣传由尹宽负责。组织工作由马玉夫负责,他很快地争取了一个报馆支部、一个绸厂支部和一些个别工人。彭述之、汪泽楷则找外省来沪的党团员做工作。不久就成立了支部、区委、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玉夫和杜培之五人组成领导机关。机关报为铅印的《无产者》。至此,中国反对派中的“无产者”派正式成立了。

(摘自85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全的主张及影响》一文,作者刘志强)

材料二 陈独秀转向托派前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表现消极和不满,对革命更加悲观、失望。

正当陈独秀在苦闷中探求大革命失败的“真实教训”和寻找“新的出路”之际,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了中国。约在1929年5月间,托洛茨基的著作,又通过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某些成员,传给了陈独秀。从这时起,陈独秀的“个人反省期间”结束了。他,以及和他“意见相同的人”,同托派结合起来。首先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与责任这个为陈独秀所苦恼的问题上;他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发生了共鸣。正是托洛茨基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归过于共产国际的阶级联盟政策,指责斯大林文过饰非,把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陈独秀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宣称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所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方针策略这两个关系中国革命方向、道路和前途的极为现实的问题上,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两篇为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著作中,找到了“新的出路”。陈独秀宣称: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由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那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只能等待“将来的”所谓“第三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去一并完成;党和无产阶级应当放弃毫无出路的“盲动”,即放弃武装斗争,转入以“召集国民会议”为主的合法运动。这就是陈独秀所找到的“新的出路”。这是一条取消革命的道路。

如前所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从1929年5月开始,接触到当时国内唯一的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散发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后,经过约两个月的思考和讨论,就基本上接受了托派观点。陈独秀在8月5日信中,即以此为蓝本“开始向党发表意见”,要求中央“公诸全党讨论”,以它“改正”党的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不能接受他的错误路线和无理的要求。于是,他即以中央不允许公布他的这封信为理由,开始进行小组织活动。不仅如此,他还同时(8月份)与尹宽一起,作为本派代表,和“我们的话派”谈判加入托派组织事宜。9

月，陈独秀拒绝“我们的话派”所提加入该派组织的“三个条件”，决定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常务委员会，陈自任总书记，并请刘仁静帮助起草纲领。刘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的草稿经陈独秀本人修改后，于12月15日以“八十一人”签名发表，即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6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8月13日，当陈独秀等人向党中央提出托派路线，在党的会议内外宣传他们的托派主张，并背着党与托派组织谈判“联合”时，中央专门发出了《第四十四号通告》，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于是，他在9月份采取了上述“升级”的行动——自行组织托派小组织（后来因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而被称为“无产者派”）。

陈独秀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中央还是努力挽救他，于10月6日，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并表示他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一个共产党员如此目无组织，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见的。党中央显然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在10月1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一）“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其成员如“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很清楚，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警告了。陈独秀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竟然在10月26日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

就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12月10日，陈独秀就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要党员“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和国际的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前后，一再拒绝党对他的争取和挽救，并且公然进行非法的、分裂党的派别组织活动。这样，就使他同党的矛盾，由“开始向党发表意见”，“在性质上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走向“不可调和”的对抗。1929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摘自83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
《陈独秀转向托派和被开除出党问题剖析》
一文，作者张君、唐宝林）

材料三　中国托派组织的建立及其破产

中国最早的托派分子，来自少数直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中国留苏学生。二十年代，当联共布党内出现托洛茨基反对派时，中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开始追随托洛茨基主义。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对托派进行清洗，有些中国留学生也被揭露出来，并被遣送回国。1928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区芳、梁干乔等回到中国。当年冬天，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翌年，在上海出版刊物《我们的话》，故其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该组织不过百余人，在上海、华东和华南一带活动。

1928年8、9月间，又有一批托派学生从苏联回国。其中刘仁静途中绕道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带回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托派纲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反对派的纲领》。回国后，他们于1930年1月在上海组织了托派小集团“中国共产党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该组织不足百人，出版刊物《十月》，亦称“十月社”。

另几个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赵济、王平一等，也独

树一帜，于1930年12月成立个不过三十人的小组织。他们出版机关刊物《战斗》，被称为“战斗社”。

中国托派较大的一股势力，是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的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代表的取消派分子。

1929年9月，托陈取消派暗中在党内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2月，他们在上海召开会议，在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有几个支部百余名成员的派别组织，称“无产者社”，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他们的《无产者》月刊，提出两个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中国的托派队伍一开始就是四分五裂的。从1928年到1930年先后建立起来的四个托派组织，均以正统或嫡传自居，都想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联合，彼此相互攻击，进行激烈的宗派斗争。托洛茨基经过考察了解，认为中国的几个托派组织的政治纲领是一致的，应当统一起来。当他看到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对其特别青睐，称陈是“杰出的革命者”，表示愿意与陈“一起工作”，这就提高了陈独秀在中国托派中的地位。在托洛茨基再三督促与撮合下，1931年5月1日，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会议，正式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统一组织。会议产生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被选为中央常委，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成为中国各托派组织的总首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不过是怀有各自私利的一种暂时的结合，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派的认识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起来。

中国托派“统一”后，除了极端“革命”的高谈阔论以外，没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提出什么有益的实际措施，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实际步骤。相反，他们一直以自己的主要力量，攻击艰苦斗争、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因此，同其他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处境一样，中国托派在人民群众中也是极端孤立的。1931年各托派组织“统一”时，不过二、三百人，这以后惨淡经营十多年，队伍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更减少了。中国托派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有分量的政治派别，始终不过是个狭隘的宗派小团体。

1931年至1932年间，国民党特务对托派进行了三次搜捕。1932年10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一批托派骨干分子也因同伙告密而被捕，遂使中国整个托派组织陷于瘫痪和瓦解状态。1932年，美国人伊罗生同另一个南非籍美国人格拉斯一起，集合起没有被捕的几个中国托派成员，在上海组成反对派临时中央。1934年后，刘家良等人曾与外国记者李福仁组织托派临时领导机关。1935年，陈独秀从狱中写信出来，主张重整托派组织。“临时委员会”换了几个，都很快夭亡了。1936年初，中国托派不再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仍不能起死回生。第四国际成立后，曾派人来上海联络，也没能把残局收拾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彭述之等托派分子也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不满上海托派领导机关，没有再参加托派活动，未再与托派组织保持联系。但陈独秀一度以托派身份与托洛茨基有书信往来，思想上、行动上仍有某些联系。抗战初期，陈独秀曾派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一致抗日。但他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的理论与实践，不愿公开地以明确态度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失去了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的机会。后来，陈独秀进一步堕落，公开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的立场上，发表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彭述之等人出狱后，继续在中国鼓吹托洛茨基主义，出版发行托洛茨基著作。1941年夏，在由托派多数派召开的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被选为中央机关领导人，有的托派分子出狱后抛弃托洛茨基主义外衣，投到国民党反动派羽翼之下，充当其爪牙，在胡宗南、蒋经国指挥下，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甚至成了可耻的“反共专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在中日战争的性质和策略问题上，托派发生分歧，并于1942年5月，分裂为两派。以彭述之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不管中国抗战如何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然不变”，主张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王文元、郑超麟等“少数派”，认为“中日战争是日本天皇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从属于美帝参谋部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双方都是反动的，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策略。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托派分子王凡西又提出“抗战性质改变论”，否认中国抗日战争具有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性质，认为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就会被纳入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也有的托派分子诬蔑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放弃阶级的立场”，“把革命群众交给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鼓吹“只有打倒民族资产阶级，打倒国民党，才能得到抗日的胜利。”托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散布这些混淆战争性质、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失败主义的奇谈怪论，正好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实际上起到了充当日伪汉奸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托派企图在上海、广东等地重建据点。1948年底，“多数派”召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称“中国革命共产党”，企图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少数派”也于1949年4月召开代表大会，宣布自己叫做“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其成员，都寥寥无几。不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彻底破产了。

（摘自86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文，作者刘沛汉）

材料四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节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托陈取消派纲领）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孟塞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其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蒋介石政变，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缔〔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

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它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它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象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者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

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重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令各级党部改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以下略）

百色起义

背景介绍

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要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到他的部队里工作。1928年8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代表到南宁同俞接洽。接着，又派张云逸、叶季壮、李谦、冯达飞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广西的政府和军队中去。张云逸到南宁后，俞聘他担任广西教导总队总队长，不久又聘他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同时，俞又委任他弟弟俞作豫（共产党员）担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排一批共产党员在这三支部队里。经过短短一个多月，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出兵反对蒋介石，由于部下反叛，不战而败。形势变化，党决定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转入右江地区，和韦拔群在当地训练的农民革命武装力量汇合。李明瑞、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开往龙州。部队到达百色后，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武装起义。1929年11月，党中央批准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在左右江创建红军，创建根据地；由邓小平任中共右江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于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起义。1929年12月11日，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全部及教导总队一部，与当地农民群众配合，举行百色起义，胜利地占领了右江地区。张云逸部和当地农民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全军5000余人，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同时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为军事委员。

材料：

- 百色风暴
- 百色起义

材料一　百色风暴

邓小平、张云逸率部进驻百色之后，地主豪绅坐卧不安，把第四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帮家伙心狠手毒，

一面明来暗往地纠集反动民团，占驻据点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和熊镐率领的警备第三大队互相勾结，妄图吃掉警备第四大队，镇压革命群众。

原来，警备三大队和四大队，表面上是"兄弟"部队，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熊镐这个家伙原本是个土匪大头目。他的警备第三大队，原系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的，本质很反动。在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熊镐立刻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了。这时，桂系军阀眼看警备第四大队挺进右江，如同"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密令熊镐带上他手下一千多名喽罗，象警犬似的紧紧跟踪我党领导的第四大队，妄图待机一举消灭。

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一眼看穿熊镐包藏的险恶用心，感到熊镐部进驻右江，来者不善，如果不连根斩除这条"狗熊"，不但百色起义的计划要落空，而且右江革命群众也会遭到严重摧残。在这关键时刻，奉议农军截获到一份黄绍竑拍给熊镐的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邓小平、张云逸同志果断决定，消灭警备第三大队。

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第四大队在大队长张云逸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有计划地包围、袭击第三大队的主力和首脑机关。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第三大队主力被歼灭了，大队长熊镐在战斗中被击毙了。

在消灭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的同时，东兰、凤山、向都等县的农民武装，在中共右江特委的领导下，也向反动的地主武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各县地主民团武装有的被击溃，有的被缴械，有的集中到寨子里据守。从此，右江各县完全为我革命部队和农军所控制，在百色由红军政治部暂时代管政权。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县将县农会改为县革命委员会，成为临时的政权机关。至此，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

十一月，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与李明瑞谈话，谈到了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请他也参加，并担任总指挥。李明瑞欣然同意了，不日他返回了龙州。

这时，派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水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带回了党中央批准的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颁给的部队番号是红七军，任命邓斌(小平)同志为政委，张云逸为军长。

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召开了部队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部署了起义的具体工作，决定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邓小平同志把一切工作安排就绪，便带领一部分干部到右江地区部署龙州起义去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个值得庆祝和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又一支工农红军在百色胜利诞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继南昌起义、广州暴动、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就是邓小平、张云逸同志。

百色，是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小山城，人口一万左右，杂居着壮、汉各族人民。它是右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控制着云南、贵州交通孔道，是云、贵土特产集散之地，也是往南宁、梧州、广州等地的物资转运站。虽然地处桂西山区，却相当繁华。城内有电灯，每当华灯初放，银火耀山川，煞是绚丽壮观。全城有条十多米宽、不到半华里长的大街，路面铺着石板条，两边盖有一幢二、三层楼的建筑物。在商业热闹区的大街南边，有一幢粤东会馆，这就是第四大队的队部驻地。

这天早晨，霞光万道，旭日东升，山城沉浸在一派振奋人心的革命气氛之中。粤东会馆门前，升起了一面镰刀锤头的大红旗，上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十一个大字，鲜艳夺目，迎风招展，象团烈火在燃烧。市街里贴满了热烈庆祝红七军诞生的标语和红七军宗旨的布告。布告庄严宣告：红七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红七军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拥护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

百色城的工人、学生、居民、劳动群众和城郊农民，高举着大刀、长矛、锄头，敲锣打鼓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热烈祝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欢庆自己的解放。

红七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个人都领到一套崭新的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颈上系着红领带，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都同样领到第一个月的薪饷——二十块银元。个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表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红七军军部的大厅里，召开了部队排级以上的干部和军部直属队共五百多人的大会。红军指战员们在火红的军旗下，举行了壮严的宣誓仪式。袁任远宣布开会，大会由军参谋长龚楚主持，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代表党委讲话。

大会号召全军官兵要经得起艰苦环境和残酷斗争的考验，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消灭反动派，为完成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成中国革命而奋斗！

这一天，百色山城，人如潮涌，欢声雷动，一直沉浸在无限激动的狂欢之中。

(选自《百色风暴》作者：莫文骅)

材料二　百色起义

百色位于广西省西部的右江流域。这一带主要聚集着壮、瑶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里的少数民族劳苦群

众，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削剥，多数被迫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靠红薯、南瓜、野菜充饥，处境十分艰苦。长期残酷的压迫，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

早在1922年，百色附近的东兰人民，在韦拔群的领导下，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组织革命武装，3打东兰县城。1925年，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后，又在东兰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促进了东兰及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8月，右江地区中共第一个支部——中共恩奉特别支部成立后，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广西革命运动受挫。但是，左右江地区的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坚持着。1928年初和1929年初，中国共产党两次派人恢复和发展右江地区的组织，加强对这一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

1929年春，正当蒋桂战争处于关键时刻，桂军将领李明瑞、李品仙等先后倒戈拥蒋，促使桂系军阀在战争中失败。5月，蒋介石为稳住广西局势，任命李明瑞为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司令，(一说李任第四编遣区主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并不信任，派人秘密监视他们的行踪。李明瑞、俞作柏比较接近共产党人，倾向进步，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即派邓小平(邓斌)为特派员，以后又派张云逸、陈豪人、袁任远、龚鹤村、叶季壮等到广西，开展工作。邓小平到达南宁后，与李明瑞、俞作柏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使"清党"中被反动派关禁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及革命进步分子获释；许多共产党员还被吸收到广西军队和政府系统工作。张云逸还担任新成立的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和教导总队副主任；俞作豫利用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的关系，担任了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省会南宁公安局局长，等等。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在军队中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建立发展中共党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另外，加强了农民运动。1929年8月，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省农民协会，雷经天为主任，韦拔群为副主任。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各县农会主席和委员。农民武装也逐渐恢复。1929年9月，在南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准备武装暴动等决议。

1929年9月27日，主政权3个月的李明瑞、俞作柏，看不清自己权力尚不稳定，反动势力隐患尚未清除，经济也有困难等不利处境，公开宣布反蒋，发出"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通电。中国共产党是不赞成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这种行动的，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失败局面，经过一再说服，李明瑞、俞作柏同意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留守后方。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把共产党掌握的这两支武装，拉到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为建立根据地作好准备。并派龚饮冰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10月17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警备第四大队，从水陆两路，沿右江前进，于22日到达百色。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前往龙州。

到达百色以后，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接管了地方政权，同时，加紧了对军队的整顿和改造，打击地主豪绅和反动势力，消灭了勾结反动民团企图镇压革命的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

11月上旬，龚饮冰从上海回到百色，带回了中共中央有关左、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同意建立左右江地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颁发了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命令。党领导的右江地区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为军长。左江地区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为总指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队党委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两周年时，在百色举行起义。之后，邓小平又带领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干部，前往龙州，布置龙州起义事宜。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参加起义的有张云逸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和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共约5000人。红七军正式宣告诞生，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下属3个纵队；原警备大队为第一纵队，李谦任司令，沈静斋任政治部主任；原机关枪营、特务营、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农军和百色等地工人赤卫队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任司令，袁任远为政治部主任；东兰、凤山一带农民武装为第三纵队，韦拔群任司令，李朴为政治部主任。部队党委改组为党的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龚鹤村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七军和红八军以及右江地区地方中共党的工作。

第二天，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参加大会的有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东兰、凤山、隆安、向都、镇结11个县的工人、农民和红七军士兵代表共80多人。大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土改等问题，通过了政治纲领，选举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雷经天，军事委员韦拔群，陈洪涛任肃反兼保卫委员，黄治峰任右江赤卫军总指挥。此后，右江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赤卫队。壮、瑶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

百色起义后，为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红七军军部和第一、第二纵队，从东兰、凤山出发，先后占领河池和怀远镇。5月1日，消灭王家烈军的1个团，攻占了黔东南军事重镇榕江县城。缴获山炮4门、步枪6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以及其它许多军用品，扩大了革命

影响。接着，红七军回师，到达黔桂边境的富绿镇。6月初，再次解放百色等右江沿岸各县，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

（选自范圣予《革命起义录》）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背景介绍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历史上称为"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

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及政治影响。"九月来信"还列举了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产生的原因及纠正的办法。

根据中央指示和广大干部的要求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重新主持工作。11月28日，在长汀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朱德、陈毅的积极支持和协助下，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作了认真的充分的准备工作。

"九月来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材料：

- 中央九月来信侧记

材料　中央九月来信侧记

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加以红军建立不久，其主要成份是北伐军的雇佣士兵、大量的农民以及解放过来的兵员，旧军队作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便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和红军中来。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都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有些干部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感到受约束，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干部认为军队只管打仗，对建立苏维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并不关心或不大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部队中打骂士兵现象也比较严重，甚至有的还采取枪毙逃兵的错误作法。这表明，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当时党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本来打算总结红军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以便使其担负艰巨的战斗任务，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会上发生了争议。有的人由于经验不足或受旧式军队的影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缺乏认识，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重视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权威。有的人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决定，前委和各级党的领导不应先提出计划和方案。有的人强调"走州过府"，攻打大城市，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地建立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的工作。这次会议偏离了毛泽东自井冈山斗争以来关于建党建军的一些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则和政策，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给红四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会议进行选举时，陈毅当选为党的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被派到闽西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闽西周围很少敌军，前委决定红一、二、三、四纵队在龙岩、永定、上杭、连城地区，作近距离的分兵，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总的目标是造成闽西的红色割据。7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党的前委书记暂由朱德代理。

7月末，赣、闽、粤敌军"会剿"闽西红军。当时红军中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破敌，有人则主张打出去。最后，前委认为在闽西不易取胜，决定打出去，从外线打击福建地方军阀，留红四纵队守卫闽西，红一、二、三纵队挺进外线闽中。于是，红二、三纵队在龙岩、白砂集中(红一纵队因在回龙一带未赶上队伍而留闽西)。8月5日，红二、三纵队开往宁洋，8日攻占漳平，休整8天后向大田、德化进军。沿途荒山峻岭，特别是群众又不了解红军，缺乏必要的军需补充，行进极端困难，结果损失300余人，100余支枪，被迫返回闽西龙岩。9月21日，红二、三纵队与红一纵队会师，攻占上杭，一举消灭敌卢新铭部1000余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开上杭，除掉苏区西部的大白点，就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9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召开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大会。陈毅赴中共中央开会尚未归来。由于前委机关不健全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全军在政治上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大会开了3天，争论不休，毫无结果。对此，大家表示不满，纷纷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10月中

旬，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粤桂两系军阀在广东发生新的冲突，红四军要立即开往广东，帮助东江广大群众进行斗争。10月下旬，红四军便改变在赣南、闽西应付敌人新的"会剿"的决定，涌入东江，攻打梅县。由于孤军深入，无群众配合，且敌强我弱，匆匆攻入，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最后终于失败。11月初，部队离开东江转入赣南之寻乌，后向闽西游击，撤退到新泉、古田一带休整训练。此次冒进东江，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红一、二、三纵队缩编，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之后红四军第一次比较重大的损失。

10月下旬，赴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陈毅从上海返回，带来中共中央9月28日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9月来信）。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和周恩来。自1928年8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不幸被捕牺牲后，中共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兼管。9月来信，是中共中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全面汇报后，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9月来信共讲了九个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首先，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指出红四军在这种形势下，应采取坚决斗争的精神，团结广大群众，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条件"。信中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前委应该以教育的方法坚决地予以肃清。

其次，规定了当时红军的根本任务及其前途。来信指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有三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来信肯定红四军两年的斗争中，对于实现上述任务做出了巨大成绩，"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来信同时指出，在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或游击队应"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是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来信还指出，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是正确的，但"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第三，指出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及其战略。来信说："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信中肯定当时红军主要采取在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对于较小之敌，应坚决歼灭；对于较强之敌，不应作殊死战。

关于红军战争中的分兵与集中问题，9月来信实际上改正了中央2月和4月来信中关于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隐匿大目标的不正确意见。信中强调"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是"右倾思想"，"有极大危险"，并且指出，"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

此外，来信还就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提出：要加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要设立政治委员制度，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反对极端民主化、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要坚决废除肉刑，等等。

来信强调指出，前委和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应该团结一致，加紧对敌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毛泽东、朱德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这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战员了解和接受。

9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来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奠定了可靠基础。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古田会议

背景介绍

古田会议，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为"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红四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新型人民军队。但是，由于这支部队的成份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少军事干部也多为旧军队出身，加之连续作战、生活艰苦，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军队内部滋长起来。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的妨碍着红四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统一四军党内的思想认识，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本想通过这次大会总结经验，

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会上虽然对过去的争论问题，作出原则上正确的结论。但由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对一些错误思想的理论分析不够深透，缺乏具体纠正措施，以及组织处理过于简单。因此，有些分歧未能完全消除，一些错误思想，未完全得到澄清，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完全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在会议选举时，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随后，毛泽东根据前委决定，到闽西蛟洋养病，并指导闽西地方党的工作。

1929 年 9 月，陈毅到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陈毅如实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汇报了红四军党的七大的争论。中央领导同志对红四军的许多经验，尤其是建党建军和政治工作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些"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周恩来尤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此信经周恩来最后修改审定。来信强调指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指定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9 月下旬，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11 月，陈毅回到了部队。朱德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听取了中央指示，决定部队返回闽西整训，并派陈毅亲赴蛟洋请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11 月 28 日，在福建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议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时，已经有条件全面总结两年来红军建设的经验，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朱德、陈毅的积极协助下，深入基层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研究部队存在的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同时，还召集红四军各级党代表的联席会，发扬民主，揭露各种不良倾向，找出根源和解决方法。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集中集体的智慧，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草案，为大会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2 月 28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120 多名。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与会同志讨论了中央指示和上述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恒、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 11 人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 3 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会议召开两天胜利结束。

材料：

- 古田会议前后
- 毛泽东党建与红军建设思想的形成——古田会议

材料一　古田会议前后

1929 年 11 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 月开到上杭的古田。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士兵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士兵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着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泽东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

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泽东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象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此期间，毛泽东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12月底，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泽东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泽东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部队反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二纵队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署。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做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象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

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住下，战士们便自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否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4、5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鄠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迈进。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象一支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

（摘自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

材料二　毛泽东党建与红军建设思想的形成——古田会议

1929年11月18日，当红四军脱离东江地区，安全撤退到上杭官庄的时候，前委召开了官庄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决定扩大闽西红色区域，建立闽西红色政权。23日，红军占领长汀，前委决定由陈毅邀请毛泽东返回红军复职。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从蛟洋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28日在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利用作战间隙，召开地方群众座谈会和各支部、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了一部分干部、战士进行谈话，仔细了解和检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基本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一起草工作。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著名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共开了3天，毛泽东作了报告，并有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该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党的建设。

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能否把党建设好，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只有把红四军的党建设好，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使红军担负起创造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至完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伟大使命。

决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途径，就是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从组织上进行建设。决议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深刻地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及其危害性，并指出，以上种种错误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大会还专门就"党内教育问题"作了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决议还明确规定要学习关于当前的政治分析和上级指导机关的指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则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阅读党报，举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召开各种会议，等等。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决议强调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等"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大会还专门作了"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重申连设支部、班设小组的正确做法，重新规定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强调党员的核心作用，要求严格党的纪律，严密组织生活。决议还规定了各级党委负有教育党员的重大任务，明确了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指导作用，等等。

关于军队建设。

古田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的根本思想。毛泽东认为，红军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根本思想。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发，决议强调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决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必须将军事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而军队中不论担任什么职务的党员均须参加党的会议，向党报告工作，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古田会议重申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实现，决议不但着重地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走州过府"，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的错误。决议指出，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因而必须加紧教育，从思想上肃清，从制度上纠正。

此外，决议还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外部关系，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和废止肉刑、优待伤兵、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适应中国情况和特点的建军原则。在工农红军创建初期，共产国际要求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指导中国红军的建设。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中共六大的布哈林在大会上作结论时提出：不能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认为要将中国的红军"分散到各个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中共中央也受了布哈林这个思想的影响，192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就提出要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少，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布哈林的思想和中央的"二月来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这部分同志原来就有单纯军事观点的倾向，认为军队只管打仗，不必要担负三大任务；他们"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此时则更助长了这种单纯军事观点和"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错误倾向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于红军的建设的。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胆地"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中国党和红军的建设史上最早地也是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而正确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仅是党员的成分，根本上还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卓越认识，强调了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重要性。到了古田会议时期，他又抓住了体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特征的八种错误思想，进行分析批判，提出纠正的方法，这就进一步抓准了党的建设中问题的根本关键。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党的建设以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为主，同时也从组织上进行建设；而对于错误思想的纠正，主要又采用加强党内教育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这都说明，毛泽东此时已清醒地认识了红四军党内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的特点，提出了适应这个特点的解决的方法。

党的建设问题解决了，军队建设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由于长期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不仅红四军党内而且军内也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为基础的。因而，"红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也即是军阀主义偏向与小资产阶级偏向的各种表现"是相当突出和严重的，这"对当时红军是根本问题。"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也同样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真正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为领导，坚持"进行经常的反偏向斗争"，我们是能够将这支军队建设成为完全属于党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抓住了党内军内这个共同的关键问题进行解决的。决议坚决重申红军建设的根本思想、红军的三大任务和"支部建在连上"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指出军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丰富经验，解决了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对此次大会的召开非常满意。正如 1930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所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党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从此，部队纪律更为加强，内部团结更为巩固，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全军面貌立即为之一新。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编遣会议

背景介绍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蒋介石、吴敬恒、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胡汉民、张人杰、蔡元培、戴传贤、孙科、李济深、何应钦、宋子文、白崇禧、商震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等二十二人出席了会议，张学良的代表王树常，杨树庄的代表陈季良等二十六人列席了会议。蒋介石为会议主席。

会议于1月12日通过《国民编遣委员会条例》，正式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以"编遣"全国军队内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

在会议期间，蒋介石把上述冯、阎两个编遣方案同时付予讨论，结果阎案得到多数的赞同，冯案遭到反对。冯、阎为此相互攻讦，各派争吵不休，蒋介石却坐阵观火。几经讨论，最后于1月17日第四次会议才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其要点如下：

(一)"由国民政府即发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之后，即设编遣区"，负责办理编遣工作。在编遣期间，"各部队原有官长，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编遣时期，非呈明编遣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现有各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住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之命令，不得移动"。

(二)"编遣区"的设置，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进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集团军各部队为第一区；第二集团军各部队为第二区；第三集团军各部队为第三区；第四集团军各部队为第四区；山东省各部队为第五区；川、康、滇、黔各部队为第六区。

(三)"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八十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全部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限。

(四)各省区"得就编余官兵，改编地方警察、保安队等"，"其人数以三千至六千为限"。

1月25日，编遣会议闭幕。这次编遣会议加剧了蒋介石与冯、阎、桂的矛盾，由于各派的抵制和反对，会议通过的宣言、大纲、条例等，都成了一纸空文。

材料：

- "削藩"
- 编遣番号

材料一 "削藩"

国民党新军阀于1928年6月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阀集团间为了分配地盘和权力，矛盾尖锐化。当年7月11日，蒋介石接受政学系智囊杨永泰建议的"削藩"策略，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主要军官在北平汤山举行会议，讨论缩减军队的方案，提交8月初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审议。五中全会除决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取消武汉、开封、太原、广州等政治分会议案外，并通过了缩编军队议案。次年1月，举行编遣会议。编遣委员会经理部主任宋子文在会上根据当时财政收支情况说明裁减军队的急迫性，指出：当前全国军队二百余万，年耗军费三万万元，而国家全年收入只有四万万元，除偿还外债一万万元外，全部移作军费也不够，更谈不上从事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根据编遣会议的决定，各个集团军缩编方案如下：蒋介石第一集团军原有五十余万人，减去十余万；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原有四十二万人，减去十万；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原有三十万人，减去七万五千人；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和李济深第八路军，亦按比例裁减。全国兵额定为陆军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共计八十万人。四个集团军初步编成的兵额各为十二个师。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编遣决议案，其宗旨为"破除军人拥兵据地之恶习，树立全国建设之始基，使国家军队真正党化，完全为人民之武力"；并确定"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作为编遣的公共信条。但在执行过程中，蒋介石为了保护自己在实力上的优势地位，坚持除按照四个集团军设四个编遣区外，另设一中央编遣区。对于编遣方案，一开始蒋、冯、阎、李各系军阀即各怀鬼胎：冯玉祥为靠拢蒋介石，在蒋去汤山召开编遣会议前，冯即发出歌(7月5日)电，提出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8月冯到南京出席二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取消总司令名义，军事首脑人物到南京供职，加强中央威信等主张。并以身作则首先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职务。但冯对编遣会议是有个人私心的，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接着冯即在会上提出一个具体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冯的方案取悦于蒋介石，却得罪了阎锡山、李宗仁。冯认为自己军队兵员多，素质好，战功大，一定可以得到蒋的支持，殊不知蒋介石早已下了削弱冯的决心，对冯的方案未置可否。阎锡山看透了蒋的心意，提

出了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以不属于各集团军的部队亦编十一个师，设一中央编遣区。而中央编遣区，理所当然要为蒋介石掌握。蒋看阎案对自己有利，便授意何应钦在会上积极支持阎案，李宗仁、白崇禧也看到阎案对己有利，表示同意，遂在编遣会议上一致通过。冯玉祥在编遣会议前后的活动原意是和蒋介石靠拢，拟以蒋、冯联盟控制其他军阀。结果被蒋拒绝，又遭到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和地方军阀的反对，感到极其恼丧。遂召鹿钟麟到南京代理其军政部长职务，于1929年春节假托养病，返回河南。1928年底蒋、桂为争夺湖南地盘矛盾白热化，蒋介石各个击破各集团军的阴谋，被阎锡山识破，阎亦称病不去南京参加编遣会议。本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第二年6月底将全国军队编遣完毕，但3月间即爆发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争夺两湖的战争，国民党新军阀的大规模混战从此开始，编遣会议不但未收到效果，反而变成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线。

（摘自《民国军事史搞》中华书局）

材料二　编遣番号

编遣会议确定的军队番号和长官姓名、部队沿革列下：

番号	长官	兵额	历史沿革
第一师	师长刘　峙	三旅	蒋军嫡系二十二师、一师一部分及张克瑶鲁军。
第二师	师长顾祝同	三旅	蒋军嫡系三师、十四师、二十一师及李明扬赣军。
第三师	师长钱大钧	三旅	蒋军嫡系二十师。
第四师	师长缪培南	三旅	粤军张发奎第四军。
第五师	师长熊式辉	三旅	蒋军旁系，原赖世璜赣军十四军。
第六师	师长方　策	二旅	蒋军旁系，原周凤岐浙军第二十六军。
第七师	师长王　均	三旅	蒋军旁系，原朱培德滇军第三军。
第八师	师长朱绍良	三旅	蒋军旁系，原贺耀祖湘军第四十军。
第九师	师长蒋鼎文	三旅	蒋军嫡系，原王柏龄第一师。
第十师	师长方鼎英	三旅	蒋军嫡系，原黄埔入伍生及王天培黔军残部。
第十一师	师长曹万顺	三旅	蒋军嫡系，原南京警卫师及曹万顺十七军。
第十二师	师长金汉鼎	三旅	蒋军旁系，原顾品珍滇军及彭汉章黔军残部。
第十三师	师长夏斗寅	二旅	蒋军旁系，原石星川鄂军残部。
第十四师	师长张定璠	二旅	桂军，原白崇禧十三军及唐生智、靳云鄂残部。
第十五师	师长夏　威	三旅	桂军，原桂军李明瑞、钟祖培等旅。
第十六师	师长胡宗铎	三旅	桂军，原桂军胡宗铎旅吞并刘佐龙残部。
第十七师	师长陶　钧	三旅	桂军，原桂军一部分吞并湖北地方杂军
第十八师	师长鲁涤平	三旅	蒋军旁系，原谭延闿湘军主力第二军。
第十九师	师长何　键	三旅	蒋军旁系，原唐生智湘军三十五军。
第二十师	师长韩复榘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韩复榘第六军。
第二十一师	师长梁冠英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孙良诚第三军。
第二十二师	师长吉鸿昌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孙良诚第二路第二、第十九两师和佟麟阁第十一师。
第二十三师	师长冯治安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秦德纯二十三军，靳云鄂旧部。
第二十四师	师长石友三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石友三第五军。

第二十五师 师长张自忠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刘骥第三十三军。
第二十六师 师长田金凯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韩占元第一军，国民三军梁寿恺旧部。
第二十七师 师长张维玺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张维玺第十三军。
第二十八师 师长宋哲元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宋哲元第七军。
第二十九师 师长程希贤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鹿钟麟第十八军。
第三十师 师长刘汝明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刘汝明第二军。
第三十一师 师长孙连仲	三旅	冯玉祥西北军，原孙连仲第十四军。
第三十二师 师长李培基	三旅	阎锡山晋军旁系，商震第一军。
第三十三师 师长孙　楚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杨爱源第二军。
第三十四师 师长徐永昌	三旅	阎锡山晋军旁系，原徐永昌第三军。
第三十五师 师长杨效欧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傅存怀第六军。
第三十六师 师长李生达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张荫梧第七军。
第三十七师 师长王靖国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傅存怀第六军。
第三十八师 师长李服膺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张荫梧第七军及直军残部。
第三十九师 师长赵承绶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杨爱源第二军。
第四十师 师长关福安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傅汝钧第五军。
第四十一师 师长张会诏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傅存怀第六军。
第四十二师 师长冯鹏翥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谢濂第四军。
第四十三师 师长傅作义	三旅	阎锡山晋军嫡系，原谢濂第四军。
第四十四师 师长方振武	三旅	冯玉祥军旁系，方振武第三十四军。
第四十五师 师长阮玄武	三旅	冯玉祥军旁系，鲍刚第四十一军。
第四十六师 师长陈调元	三旅	蒋军旁系，原齐燮元苏军和王普皖军。
第四十七师 师长郑俊彦	三旅	蒋军旁系，原孙传芳、周荫人、邓如琢等直军。
第四十八师 师长徐源泉	三旅	蒋军旁系，原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残部。
第四十九师 师长任应岐	三旅	蒋军旁系，原樊钟秀河南绿林部队。
第五十师 师长谭道源	三旅	蒋军旁系，原谭延闿湘军第二军分出。
第五十一师 师长李品仙	三旅	湘军唐生智部，原李品仙第八军。
第五十二师 师长叶　琪	三旅	湘军唐生智部，原叶琪第十二军。
第五十三师 师长刘　兴	三旅	湘军唐生智部，原廖磊第三十六军。
第五十四师 师长魏益三	三旅	蒋军旁系，原郭松龄奉军。
第五十五师 师长程汝怀	三旅	桂军旁系，原湖北收编的杂军。
第五十六师 师长张义纯	三旅	桂军旁系，原为皖军马祥斌师。
第五十七师 师长杨腾辉	三旅	桂军嫡系，原胡宗铎旅。
第五十八师 师长	三旅	

第五十九师	师长余汉谋	三旅	粤军，原李济深留粤的陈济棠师。
第六十师	师长蔡廷锴	三旅	粤军，原李济深派出北伐的陈铭枢师。
第六十一师	师长蒋光鼐	三旅	粤军，原李济深派出北伐的陈铭枢师。
第六十二师	师长香翰屏	三旅	粤军，原李济深留粤的陈济棠师。
第六十三师	师长李扬敬	三旅	粤军，原李济深留粤的徐景唐师。

第五十师以下番号为陆续编成者。此外尚有以下各派军阀部队未有列入编遣之列：

四川刘湘等川军八个军及退入四川的胡若愚、张汝骥滇军两个军；

云南龙云滇军一个军；

福建张贞、卢兴邦两个师；

西康川军两个旅；

辽、吉、黑、热张学良东北军三十八个旅(编制另见下表)；

冯玉祥出潼关后收编的直系残部及陕军十个师；

阎锡山的警卫旅、骑兵旅及保安队等；

湖南地方军陈汉章、陈渠珍、周朝武及黔军罗启疆师、滇军范石生军；

山东李景林旧部刘珍年师；

广西黄绍竑部五个旅。

东北国防旅编制表

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将原安国军各军师的番号一律撤销，除编制了三十六个国防旅外，另外每个省还有四五个省防旅。国防旅每个步兵旅辖三个步兵团，骑兵、炮兵、通迅各一个连；每个团步兵三营，炮兵一连；每营步兵四个连。全旅六七千人，相当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省防旅一般步兵两个团。有的一个旅又步、骑各一个团，火力和人数一般都不及国防旅。

东北国防旅编制如下：

番　号	主官姓名
步兵第一旅	旅长王以哲
步兵第二旅	旅长丁喜春
步兵第三旅	旅长何柱国
步兵第四旅	旅长刘翼飞
步兵第五旅	旅长董英斌
步兵第六旅	旅长李振唐
步兵第七旅	旅长赵维桢
步兵第八旅	旅长李桂林
步兵第九旅	旅长李　杜
步兵第十旅	旅长张作舟
步兵第十一旅	旅长
步兵第十二旅	旅长张廷枢
步兵第十三旅	旅长吉　兴
步兵第十四旅	旅长徐永和
步兵第十五旅	旅长梁忠甲
步兵第十六旅	旅长缪镕流
步兵第十七旅	旅长韩光第
步兵第十八旅	旅长丁　超
步兵第十九旅	旅长孙德荃
步兵第二十旅	旅长黄显声
步兵第二十一旅	旅长赵芷香
步兵第二十二旅	旅长富　春
步兵第二十三旅	旅长马廷富
步兵第二十四旅	旅长黄师岳
步兵第二十五旅	旅长孙旭昌
步兵第二十六旅	旅长邢占清
步兵第二十七旅	旅长刘乃昌
步兵第二十八旅	旅长
步兵第二十九旅	旅长王永盛
步兵第三十旅	旅长于兆麟
骑兵第三十一旅	旅长郭希鹏
骑兵第三十二旅	旅长程志远
骑兵第三十三旅	旅长张树森
骑兵第三十四旅	旅长常尧臣
骑兵第三十五旅	旅长李福和
骑兵第三十六旅	旅长白凤翔
炮兵第一团	团长王绍云
炮兵第二团	团长黄永安

炮兵第三团	团长谢绍哲
炮兵第四团	团长王和华
炮兵第五团	团长张福山
炮兵第六团	团长汲绍岚
炮兵第七团	团长刘翰东
炮兵第八团	团长张思恭
炮兵第九团	团长朴炳珊
炮兵第十团	团长穆纯昌
教导团	团长吴克仁

（摘自《中华民国档案史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三大

背景介绍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开幕式，16日至17日召开预备会议，18日大会正式开始，27日结束。这次大会代表共计四百零六人，其中由蒋介石指派者二百一十一人，圈定者一百二十二人，所谓选出者仅有七十三人。这是一次"包办式的大会"。因此，不少省区代表拒绝出席会议或中途退场，以示抗议。当天到会的正式代表仅有二百四十七人，中央执、监委员二十人，列席代表三十八人。

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陈果夫分别作了党务、政治、军事和中央监察工作报告。大会通过的决议主要有：

（一）"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公然在孙中山主要遗教中抽去《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是对孙中山遗嘱的公开篡改。

（二）追认《训政纲领》，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通过了《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由"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中国国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

（三）追认全国编遣会议决定的编遣方案为合法方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规定："国军之最高统帅权"，"完全统属于国民政府"，"一切军政与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

（四）会议指责桂系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决定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党籍，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汪兆铭予以书面警告。会议还通过了《明令禁止叶琪部队在湖南抗命称兵案》，并明令派兵讨伐桂系"护党救国军"。

（五）追认二届四中全会的非法决议，宣布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中的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于、徐谦、陈其瑗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同时又追认第九十七次中常会关于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居正等十一人党籍的决议。

（六）会议通过的《外交决议案》，批准了关于南京事件、济南惨案的处理案，并撤销俄国领事馆。

大会选出蒋介石、谭延闿、戴传贤、胡汉民等三十六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王伯群、孔祥熙等二十四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等十二人为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陈布雷等八人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28日至4月8日的三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胡汉民等九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材料：

- 开幕词
-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

材料一　开幕词

各位同志：

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会了。在今天庄严伟大的仪式之中，这一次的代表大会是本党统一全国以后空前未有的盛会，凡我同志，心上应该都有一种莫大的感想。汉民承同志们推为临时主席，谨将这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抒陈于在会各位同志之前。

本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离第一次大会已阅五年，离第二次大会也差近三年了。五年以前，我们同志在总理耳提面命的指导之下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确定了本党的组织和政纲，并且发表了宣言。以后大家便在本党新定的组织之下，以实现本党的主义与政纲为目的，努力于革命的进行。虽然中间经过不少的艰难困苦，可是有总理亲自指挥着、率领着，终于收得很多很大的效果。及至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总理已经逝世，同志们在开会之中，也曾发表宣言说："本党同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无间生死……确信总理所定之主义及政纲，实为今日中国唯一的生路。"结论且言："吾人循此路以前进，若总理时时指导于吾人之前，使吾人之热诚弥以奋兴，吾人之信念弥以坚固，吾人唯有一致遵守总理之遗嘱，以奋斗不懈。"果然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本党一面

如此的受着总理精神的指挥与率领，一面便与全国众多的国民共同奋斗，数年之间革命的工作便得了极长足的进展。至于今日，便能在全国统一之下召集海内外各地代表，在首都来开第三次大会。我们缅怀往昔，大家对于总理的崇高与仁智将具何等深远的景仰之念！

在今番的大会中，同志们都应该格外凛凛于总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训。这两句遗训，在一般同志固应常常有很深的观感，而在这次大会的全体代表，实在尤其应该刻刻在念。就党国两方面说，这次大会各位代表的责任实在非常重大。本党总章很明显的规定着全国代表大会为全党的最高机关，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党与整个中国革命，都要代表大会来领导而指挥；尤其是对于过去种种工作如何检查批评，对今后种种工作如何确定计划，全体党员应该如何努力进行，完成总理所谓革命的建设。这一个继往开来的责任，今天整个到了代表大会的肩上来了。再就国家的政治方面说，我国现在已到了训政时期，所谓训政，是以党来训政，是以国民党来训政。在训政时期中，国民大会的政权乃由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所以凡政治上一切最高的方针与原则，无论是外交的、财政的、军事的、内政的、教育的……都有待于大会决定。以前因为在军事时期，本党一切政纲没有能充分的实现，今后既进到建设时期，当然要力图实现。至于如何图谋，就全赖这次大会确定进行方针了。总之，大会代表是受全党的嘱托，尤其是直接继承总理的遗教的，大家要将总理所交给全党的责任确实的负起来，指挥全党今后的努力。这个责任便是总理遗嘱上所说的“务须依照余所著”种种，在“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总理的全部遗教，当然是以三民主义的实现为依归的。我们从民族一方面看，现在是否已经使中国达到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和各国共同站在世界上无逊色呢？是否已经将我们民族的精神充分的表现出来了呢？这两点谁都知道，统统还未做到。我们国民革命的对象原是帝国主义，而民族主义的最大的敌人，格外明显地是帝国主义。这两点至今未曾做到，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在那里作梗。连以往的军事时期所以延长和三全大会的开会所以延迟到今日，也同是受了帝国主义者之所赐。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只希望我国国民革命不能成功，因而破坏我国的统一，破坏本党的信用，都不遗余力。所以在这次大会中，我们必须确定方针，指挥全党同志去负民族主义方面的责任，以应付一切新旧的帝国主义者。关于民权方面，总理所主张的是我们将来不只要行间接民权，而且要行直接民权。同时总理就民权行使的情形，把国家的政治分做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期内是谈不到民权的，必须到了训政时代，才可以训练国民行使四权。但是在这个时期假如我们不能尽训导的责任，就会使民权失了基础，再蹈民国元年的那种只有虚名，并无实际的共和之覆辙。我们欲求直接民权能够训练成功，使真正民意能够表现，并且能够在深厚的基础上度过了训政时期，而达到宪政，那末，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实现总理所详细规定的地方自治了。地方自治实在是人民的一种基本团结、基本组织。有了这个组织以后，众人才能变成人民，才能谈到一切民权的行使。所以这次大会，便须领导全党同志去负起民权主义方面的责任，把方针确定出来，以推进今后的地方自治。其次说到民生方面，以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一百多年的中国，早已到了总理所谓次殖民地的地位，把国家和人民的一切经济力量发展起来，首先要将总理所谓民族生存、社会生活、国民生计、民众生命的四种根本事业着实的注意。对于目前民生凋敝的状况，应该速谋救济。要达这个目的，除掉努力进行革命的建设，增加生产，逐渐满足国民物质的要求以外，还有何法可行！在总理所谓心理、政治、经济种种的建设中，经济的建设最为迫不及待。大会谋所以指挥全党同志去尽民生主义方面的责任，又何能不从这急于燃眉的经济建设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呢！总之，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这一点各位同志应该都要注意。在过去的两次代表大会前后，本党无论所遇的环境怎样，所经的事实怎样，一切工作所以总能够有相当的效果的，就是因为大家仅仅在总理所定的主义、政纲之下努力，全党始终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如果党中同时有两种以上的主义与政纲，意志和行动便不能统一。虽然各方面不断的努力，也终于彼此互相抵消，甚且生出无限的纠纷，把党的一切都停顿或退后起来，那还有今日吗？所以在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总理曾再三教训我们，个个党员的聪明才力应该归之于党，不应该为自己用，应该为党用。个个党员的自由应该为党而牺牲，党有了自由，然后革命才可以成功。这是总理很郑重、很恳切的教训我们的。至关于代表大会的开会，总理又曾说过，大会中应该讨论的事情，原非短短的十天时间所能讨论完毕，但是事实上既不能延期，大家就得格外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提纲挈领的务将一切重大的问题切实讨论出一个结果来。这些话都是我们同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里亲自听见总理教训的，汉民现在敢将总理这些教训向各位重述一下。在各位讨论一切问题之中，汉民觉得还有最要紧的一点不可不注意到，就是健全党的本身。所谓本党最高权力的代表大会，原是为全党确定一切、领导全党的。事实上如果不能领导全党，那么，国民对于大会，对于本党的希望和信用都要减少了。本来国民所希望于本党的，就在率领他们去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希望先要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里充分的着落。同时我们全体同志都是想来完成革命的使命的，都是信仰总理革命主义和政纲，以亲爱精诚的精神来结合的。如果大家对党尚不严

守纪律、勤慎工作，全国人民还肯相信本党能替他们建设新中国吗？帝国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动分子就肯死心塌地停止他们破坏与捣乱的工作？已经做得不少，总是当本党自身有什么弱点表现出来时，他们便乘机工作一下。直到最近，他们所梦想的新弱点是此时具有本党最高领导权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开不成，开不好，不能充分的尽责，他们便又有隙可乘了。所以我们在这次大会里，必须要一心一意、有始有终的做去，充分表现我们整个党的能力，实现我们革命的主义，发扬我们革命的精神。汉民追随同志，并且追随总理，始终抱持的是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党，总理去世，汉民便以党为总理。因此，汉民今天并无特殊的感想，只是将总理在第一次大会里教训我们的大意，向各位重述一下，希望各位以总理的精神负荷这次大会所有的使命与其职责。

（《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

材料二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

……这一次大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妥善地筹备，得以在三月十五日如期开幕，由临时主席胡汉民致开会词，希望各代表根据总理的遗教，努力节省光阴来讨论一切重要的问题。

三月十二日举行预备会议，仍由胡汉民主席。除抽定代表席次外，并推定胡汉民、谭延闿、蒋中正、孙科、于右任、古应芬、陈果夫、潘公展、陈耀垣为大会主席团。次日，潘公展辞职，经大会慰留无效，乃改推朱家骅继任。

第一次大会是在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举行的，先举行纪念周。次，正式开会，由胡汉民主席。由蒋中正作中央党务报告，由二全大会至三全大会，共分五个时期。次，大会通过段锡朋之提议，全体起立静默三分钟，向北伐中死难同胞同志致敬。

第二次大会是在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时举行的，由蒋中正主席。先通过何应钦之提议，静默三分钟追悼阵亡将士。次由何作军事报告，历二小时。主席并提议发电慰劳全国国民革命军将士遗族。决议：照办。

第三次大会于三月十九日上午九时举行，由孙科主席。首通过以王宠惠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以叶楚伧等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以何应钦等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继由谭延闿作中央政治报告；倪弼作江苏省党务报告；段锡朋作南京特别市党务报告；周炳琳作浙江省党务报告。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根据中央第一七二次常会所公布之训政纲领，确定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

决议：付审查。

第四次大会于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时举行，谭延闿主席。先由马洪焕作广东省党务报告；马超俊作广州特别市党务报告。次，讨论事项：一、中央常会提出：确定施行政纲之方略及程序，以定政治之实行标准案。决议：付审查。二、中央常会提出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决议：付审查。三、中央常会第一七二次常会决议训政纲领请追认案。决议：追认。四、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央执监委员因共产党关系开除党籍及停止职权案，请追认案。决议：无异议追认。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程潜停止职权案，请追认案。决议：无异议追认。六、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七次常会决议因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等十人先行恢复党籍案，请追认案。决议：无异议追认。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八三次常会决议变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请追认案。决议：无异议追认。

第五次大会于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举行，由朱家骅主席。先由邵华作安徽省党务报告；陈德徵作上海特别市党务报告；丘河清作福建省党务报告。讨论事项：一、中央常委会提出：确定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决议：付审查。次，变更议事日程，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十七年一月七日中央常会临时会议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函：为汪兆铭等九委员迹近踪〔纵〕祖弄兵，酿成广州共变一案，经议决应暂停职权，听候彻查，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四委员情节较重，应检举其可疑之点，请常会决定留请三全会处分；其何香凝等五委员，倘四次全体会议认为无惩处之必要，可即停其行使职权案。经决议接受监委会提案，留待审查，函国府复监察委员会并将此议决案电广东军政长官知照，请讨论案。决议：一、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二、顾孟馀开除党籍三年；三、汪精卫由大会予以书面警告。

第六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举行，由古应芬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整理本党组织，以巩固党基案。决议：付审查。并决议以七月九日为北伐永久纪念日。

第七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二〔一〕日下午二时举行，由陈果夫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并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决议：付审查。次，变更议事日程，决议用大会名义慰劳蒋中正同志。并讨论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训政纲领，确定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审查报告结果，照审查意见通过。

第八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举行，主席陈耀垣。先由陈果夫作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次，李敬斋作河南省党务报告。并通过本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及其选举方法。

第九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举行，由谭延闿主席。决议：一、追认国军编遣程序大纲；二、国府对湘事处置认为适当，叶琪等如再抗命，由国府从严处置。

第十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举行，由孙科主席。除通过数种审查报告，并决议国府补行登记及特种登记即日截止。

第十一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举行，由胡汉民主席。先由张禄作云南党务报告。次，通过确定教育方针案。

第十二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举行，由胡汉民主席。先有刘不同作辽宁党务报告；刘广瑛作吉林党务报告；单成仪作黑龙江党务报告，祁公立作三藩市党务报告。次，决议党员分预备党员及党员两种，预备党员须年在十六岁以上，党员须在二十岁以上；凡预备党员须经一年以上训练，经审查合格者，始得为党员。

第十三次大会于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举行，由朱家骅主持。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在这次会议里通过了修改过的本党总章草案，并投票选举中央执监委员。下午二时举行开票，由蒋中正主席。结果选出吴敬恒等十一人为监委；蒋中正等为执委。不足数次日再选。

第十四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举行，由蒋中正主席。继续选举中央执、监委员。结果当选执委者杨树庄等十一人；当选候补执委者王伯群等二十四人；当选监委者恩克巴图一人；当选候补监察委员者褚民谊等八人。

第十五次大会于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由谭延闿主席。决议：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党籍。并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政治报告决议案，军事报告决议案，外交报告决议案，以大会名义奖慰海外各党部对党忠实、历久不渝之各同志。并通过大会宣言，要在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未议各案交中执委会办理。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举行闭幕典礼，由谭延闿主席并致闭会词。胡汉民、蒋中正等各有演说。结果呼口号散会。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31日）

蒋桂战争

背景介绍

1929年2月，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当时，桂系因蒋介石运给湘省主席鲁涤平大批军火，决定先发制人。遂由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以“潜运军械，阴谋破坏”为由，于2月19日，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以何键继任；并派五十二师叶琪部、十五师夏威部由鄂入湘，赶走了鲁涤平。蒋介石则针锋相对，以军队“编遣”期间，政治分会无权任免有关特定区域内官员为口实，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同时调动军队，由南北两路合击武汉，令缪培南、方鼎英师由江西逼取鄂南，夏斗寅、刘峙师自豫皖进击鄂东北。为了迎击蒋军，桂军分别集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师于鄂东北，何键师和张其雄、吴尚两独立旅于湘东北。

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其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的《讨伐令》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28日蒋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三、第五两军，从九江、南昌西攻武（昌）长（沙）路，以截桂军退路；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二两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取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率第六、第七两军，由南阳、信阳出发南袭武汉；陈调元为预备队总指挥。蒋设讨逆军行营于九江，亲自督师；并制定了分两期实现的作战计划：第一期以攻略武汉为目标，第二期为肃清湘南、两广之桂军。蒋桂战争遂于月底正式爆发。

各路蒋军迅速攻入鄂境，进逼武汉。同时，蒋介石又采取分化手法，派员收买了桂军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4月2日，当蒋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杨腾辉即率所部连夜撤到孝感、花园一带，于3日宣布服从“中央”。桂军见大势已去，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撤退。4日，蒋军进入武汉。5日，蒋介石以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接着，一方面由张发奎、朱绍良分任第一路、第二路追击司令官，对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部实行武力追剿；一方面又以金钱、官职相收买。在其软硬兼施的逼迫下，胡等联名通电下野，所部亦被收编。武汉桂军遂全部瓦解。

在集中力量，解决武汉桂军实力的同时，蒋介石又通过重新起用唐生智，收拾了平津的桂系实力；通过诱使李济深北上，拆散了粤桂联盟。

为了将散处滦东的白崇禧部队赶出平津地区，蒋介石派唐生智携巨款去河北，由天津赴唐山，收编被白改编的旧部。3月20日，唐旧部李品仙等发表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白弃众逃亡，由天津经海路南下香港，所部重归唐节制。蒋旋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前第四集团军移驻石家庄。

其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借口调停湘案，电请李北上赴京。李于3月13日抵南京，21日即被囚于京郊汤山。蒋又在广东策动陈济棠、陈铭枢，陈策倒李，削夺了李的党政军大权，使广西陷于孤立。

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和平津的桂系实力后，于19日、24日，先后下达命令，发布了“以根本铲除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作战计划，并任由桂投蒋的何键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率湘军由湘南攻

桂林;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率粤军由广东肇庆、英德一线直取梧州;龙云为第十军总指挥,率滇军由滇北经贵州攻占柳州。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均已逃回广西,并积极组织力量反攻。5 月 5 日,李宗仁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发出反蒋通电。其所部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分两路进攻广东。双方经剧烈战斗,桂军不支,退回广西。至 6 月下旬,粤军在蒋介石援军配合下,先后攻占桂林、梧州;6 月 24 日,粤军直攻南宁,黄绍竑、白崇禧败走龙州,后与李宗仁相偕逃往香港。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蒋桂战争遂告结束。

材料:

- 两湖之战
- 白崇禧全军尽失
- 武汉事变

材料一　两湖之战

蒋介石在采用“削藩”策略的编遣会议来削除各派新军阀实力的手段失败以后,便积极策划施用武力来消灭异己的力量,蒋介石当时心目中的劲敌本是冯玉祥,但冯玉祥的实力较强,割据的地盘又联成一片,特别是对冯玉祥部下的收买瓦解工作尚未奏效,因此一时难以下手。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不仅兵力较小,而且摆成了从广东直到冀东的一字长蛇阵,力量分散,大部分部队又是收编的唐生智湘军,蒋介石对桂系军队内部的策反工作也已见成效,加上鄂籍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骄横蛮干,四面树敌,也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因此,蒋介石决定对桂系首先开刀,并作了一系列的部署:首先通过汪精卫拉拢在日本的唐生智,给以巨款使他回国去冀东收回被桂系吞并的部队,扣留白崇禧;拉拢张发奎,使他从江西本部侧击粤汉路;通过杨永泰拉拢俞作柏,鼓动其表弟李明瑞倒戈;通过郑介民收买陈济棠、陈铭枢等反对李济深;派黄郛、邵力子贿赂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讨伐桂系。

本来蒋介石在上年讨唐胜利后,委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即寓有牵制桂系之意。1929 年 2 月,桂系发觉南京秘密向湖南输送军火,认为蒋介石显然已决心对武汉用兵,即派亲桂系的湘军将领叶琪、何键等进兵湖南,这更给蒋介石发动讨桂以借口。是年 3 月中旬李济深率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的粤方代表到达上海,为应各方之请,入京谋调停蒋桂之争,21 日到京即被蒋扣留。至此,蒋介石消除了粤桂联合的顾虑,遂于 1929 年 4 月初对武汉桂系部队下了总攻击令。

在蒋介石一系列的策划下,唐生智到唐山收回自己的军队,白崇禧在廖磊保护下逃回广西;李宗仁在南京获悉叶琪进兵湖南,即微服逃沪;桂系驻鄂军队群龙无首,再加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未经战斗即土崩瓦解了。以后李、白即逃回广西与黄绍竑、张发奎联合,重建部队,与陈济棠粤军及蒋介石中央军进行混战。

(摘自《民国军事史稿》中华书局)

材料二　白崇禧全军尽失

被桂系“逼宫”而下野的蒋介石,1928 年 1 月复职后,对桂系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当时他给何应钦的信函中说:“现在政治情况复杂,革命环境险恶,应付之道,须小心审慎;桂系野心甚炽,不惜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庆父不去,鲁难未已’,革命必难成功。”在蒋介石的词语里,“革命”就是反革命独裁,桂系已被他看作是实行反革命独裁的心腹大患,就非动武不可了。蒋介石及其亲信精心策划的消灭桂系的计划,包括拆散粤桂联盟、瓦解河北白崇禧部、分化武汉李宗仁部等方面。诱骗李济深入京加入软禁,就是拆散粤桂联盟的关键一着,上节已作了叙述。

桂系首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向以善于治军出名,黄绍竑留守广西后方,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桂军主力向外发展。西征唐生智胜利,李宗仁部兵驻武汉,收编的唐军除部分留在湖南外,大部分由白崇禧带到河北。桂系的防线自广西经武汉延伸至河北,恰像一条长蛇阵,很容易被蒋介石腰斩。而桂唐旧将的矛盾,也容易被蒋介石所利用。如果说,蒋介石打败桂系是“三分武力,七分策反”的话,那么,他瓦解河北白崇禧部,完全是策反的成功”

白崇禧多年来在蒋介石军中与之运筹帷幄,可说不遗余力。1927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不随军北伐)。蒋介石直接率领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五军(李福林)一部分、第六军(程潜)由广东进攻江西,是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的。占领南京后组织东路军也是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但指挥的都是蒋军,白崇禧没有自己的部队。占领上海后,经蒋介石准许成立的第十三军,由白崇禧兼任军长,下辖第一师(师长熊式辉)、第二师(张定璠)和一个教导团(团长黄瑞华)。西征唐生智时,第一师师长熊式辉借口饷械问题,不服从白崇禧的调遣,白只好顺水推舟,电请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就近指挥,从此,第一师便脱离了第十三军。对张作霖作战,白崇禧被蒋介石任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领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张定璠的第二师也随白崇禧行进,参加解决张宗昌、褚玉璞部的冀东战役,即回驻北京南苑,师长职务从广西调韦云

淞前去接理(后遵照编遣令改为旅)。第十三军军长由王泽民接充,教导团团长黄瑞华调到白崇禧的总指挥部工作。

蒋介石见白崇禧有将才,既敬之,又畏之。由蒋的嫡系何应钦任军长的第一军,白崇禧亦能指挥自如,不能不使蒋介石疑窦丛生。奇怪的是,蒋对白既已产生疑忌,何以还请他当参谋长?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评论说:"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的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蒋就必然是弃之如敝屣"。当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领第十三军和由唐生智旧部改编过来的第八军(后整编为五十一师)、第三十六军(后整编为五十三师)驻屯河北省唐山一带后,白部便与李宗仁部、黄绍竑部南北呼应,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坐卧不安。蒋介石复职后亲自指挥第一集团军,首先把白崇禧踢开,另委何应钦为司令部参谋长,已经显示了对白的疑忌。

后来,蒋介石不发一枪一弹,仅仅抬出个唐生智就解决了白崇禧的军队,这也是蓄谋已久的。据唐生智回忆说,在南京军队开始进攻武汉时,宁方黄郛同蒋百里来汉口见唐,蒋百里曾单独对唐说:"膺白(黄郛别号)的主张,就是蒋先生(蒋介石)的主张。现在你和蒋、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势力最大,蒋与桂系之间已有意见,黄膺白主张你和蒋、张合作,而以你与蒋先生的合作为中心,再拉拢阎、冯,这样,桂系也不敢动了。"唐生智自恃兵强,拒绝与蒋介石合作。待到谭延闿反戈,唐生智知道败局不可挽回,决定暂时离军到日本去。这时蒋介石又示意陈仪和蒋百里,由他们二人通过汪翊唐劝告唐生智不要离开部队,能打垮桂系则打,否则按兵不动,退回湖南,经济上由蒋介石负责接济。可是唐生智考虑到,如果他留下跟蒋介石合作,这么多军队回到湖南去,供应方面大成问题(过去湖南军费不足,还要靠湖北、安徽等省的税收接济)。再则桂系与蒋迟早要决裂的,如果他不离开部队,纵然打垮了桂系,占便宜的是蒋介石,桂系把他打垮了,最后占便宜的还是蒋介石。暂时离开一下部队,估计凭私人感情的维系,可以拖住两三年不垮。事实证明,唐生智在他的部队中的影响是很深的,桂系改编唐生智部队时,不得不允许唐部原有的绝大部分军官担任旧职,这就给蒋介石"立唐倒白"提供了条件。

当白崇禧侦悉蒋介石将要用武力来对付他的时候,他自揣难以控制新改编的唐生智旧部,计划潜赴唐山去掌握廖磊(廖与白是保定同学)的第三十六军,以便有所依赖。白召廖磊来北平开会,旋又称病进德国人办的医院,借口总指挥部要送廖军长回防,饬铁路备专车,白崇禧便秘密乘该车赴唐山,住在廖磊的开平寓所。据廖部译电员杨仲愚说,白在开平 10 余日,经常通宵达旦不睡,在房里踱来踱去。内心之焦躁,可想而知。白在开平,原计划令五十一、五十三两师经徐州直趋浦口,而武汉胡宗铎、陶钧两部则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但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官兵,大部分都是湖南人,又都是唐生智的旧部,他们原来就认为被桂系改编是一种耻辱,盼望唐生智能回来。五十三师旅长凌兆尧掌握了这一思想情况,在纪念周上公开宣布反对桂系,并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这些标语贴在开赴天津、北平的火车车辆上。这时,白崇禧已不能掌握自己的部队了,军心已归于唐生智。

1928 年冬,唐生智从日本回到香港,即与蒋介石达成政治交易。次年初,唐寓居上海,与蒋的联系更加密切。蒋介石"立唐倒白"的部署是:先派何成濬前去北平,接替吴忠信的行营主任职务;又派刘文岛到上海与唐生智联络,请唐去唐山接收白崇禧所指挥的军队,唐先进入部队,然后再给予名义。对唐生智来说,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了解旧部的真实情况,恰好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正以军事代表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去南京向蒋输诚并设法找到唐生智。周在新乡车站遇到邵力子,托他向蒋报告,旋即赴上海同唐生智会晤。随后周武彝又到南京会见蒋介石,表示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全体官兵对蒋竭诚拥护,希望仍派唐生智前去指挥。那时,白崇禧尚逗留开平,蒋介石很不放心,要刘文岛催促唐生智速去,抓住部队,避免发生变故。白崇禧发现军心变动,便秘密化装,由廖磊亲自护送到塘沽,3 月 21 日搭乘轮船南下。

唐生智会晤周武彝,知道部队仍倾向自己,才决定搭乘由日本开来上海转赴塘沽的轮船去天津。白崇禧正是由塘沽搭乘这艘返航轮船的,白上船,唐下船,没有照面。唐生智在天津住了几天,五十一、五十三两师的旅团长,有的亲自前来,有的派代表欢迎,唐生智偕同欢迎的人群前往唐山,住魏镇凡旅部。廖磊求见唐一面,唐拒不接见,廖就在这时脱离了五十三师。何成濬把唐生智顺利进入部队的情况电告蒋介石,蒋即发表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在北平设总指挥部,接管白崇禧的军队。白自兼军长的第十三军第二旅和教导团的旅团长,见大势已去,自行离职南归。唐生智利用李品仙与第十三军将士的同籍关系,由李出面周旋,将该军改编为第五十一师一百五十一旅,委广西人陈良佐接充该旅旅长。桂系的第十三军也被拉过去了。

(摘自《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武汉事变

四位元老和我们足足谈了两天之久,第二天竟自上午十一时谈到夜半十二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我一再阻止李任潮去京,简直是气愤填膺。最后还是李济深软化了,他告诉我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我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自由，战祸就免不了！"但任潮是好人，他终于在四位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三月十三日自沪去京。

任潮和蒋先生接谈之后，才知中央已决意用兵，西征军事正在积极部署。他的一切行动已有大批密探在跟踪。同时南京放出空气，所有李济深的旧部，只要服从中央便官加一等。蒋氏并派粤籍党人古应芬、孙科等，四出疏通各粤籍将领背叛李氏。至于蒋先生以前的诺言，则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济深到此才知上当，乃企图逃出南京。事实上，已无此可能。李的左右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接洽，派一法国军舰泊在下关江面，李氏才可乘人不备，驰车往江边，跃上汽船，登兵舰驶往上海。但是李济深认为此计不妥，因恐未抵江岸，已为蒋的密探用机枪射杀了，终将这计划放弃。三月二十一日，蒋乃公开将李济深幽禁于汤山。原来向李氏担保的四位元老，到此也箝口结舌，莫知所措。蔡元培一怒去沪，其他三人则常往汤山向李济深抚慰，然究有何用。

中央大军数十万已向上游移动，大战迫在眉睫。这时冯、阎驻沪代表都来看我。冯的代表是其前参谋长刘骥春，阎的代表是赵丕廉。

我向刘、赵二人解释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三人的轻举妄动，自应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也束身待罪，一切处罚我都愿接受，只是希望不打仗。但是目前蒋先生显然是借题发挥，目的在消灭异己，摧残对革命有功的部队。战事一旦发动，则第四集团军必全部瓦解无疑。第四集团军的毁灭不足惜，然此例一开，蒋先生必将以同样方法消灭其他部队，第二、第三集团军势必遭受同样命运。蒋先生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内战不已，则外为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机会，内为中国共产党造机会，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纣为虐，应出来调停，讲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己，请转报三思之。

陈仪此时也来看我，这是我和陈氏第一次的私人谈话。我也把这套理论说给陈仪听。陈很感动，未发一言而退。

我知道中央已决意消灭第四集团军，而武汉方面军中无主，断难和中央大军相周旋。我乃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如中央见制胜不易，事或另有转机。

我于三月二十五日乘轮抵粤。粤方将领陈济棠、徐景唐等，对我还算客气，并准备飞机，让我直飞汉口。谁知春雨连霄，飞机无法起飞。乃暂时回桂，再作打算。

就中此时，蒋对武汉的战事已急转直下。蒋命刘峙等率大军数十万，西上直捣武汉。蒋本人也于三月底赴九江坐镇。

武汉此时军中无主。胡、陶二人自成军以后，自认为湖北人，每视第七军为"客军"，颇引起七军中将领的不快，因此中央的反间计乃得乘隙而入。蒋氏原先即派俞作柏秘密活动第一师师长李明瑞输诚中央，反对胡、陶。

俞作柏为人，贪污性成，野心勃勃。渠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时，曾对鲍罗廷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并指斥我李、黄、白三人为"不革命"。因此，渠殊不为广西上下所喜。嗣后，我乃和黄绍竑商量，褫其兵柄，让他担任中央军校南宁第一分校的校长。十六年夏，清党事起，俞氏自己心虚胆怯，潜逃香港，使人劝其归而仍不归，绍竑乃解除其校长职务。俞乃受蒋收买，为其活动李明瑞反对武汉。

蒋同时又派郑介民秘密赴汉活动杨腾辉倒戈。杨腾辉原为林俊廷部下，嗣经我军收编，委为团长，以战功累升至师长。渠和胡、陶有隙，而和郑介民有旧，故接受郑氏建议，私下向蒋氏输诚。

四月初，中央大军西进。夏、胡、陶也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真是无巧不成书，夏威在出发赴黄陂的前夕，忽患白喉，乃临时将前线指挥交李明瑞负责。李于黄陂召集前线指挥官开军事会议。当各师、旅长齐集后，李便即席宣布他主张服从中央，反对胡、陶。同时将与会各指挥官拘留，并立刻回师武汉。

李明瑞既倒戈，夏、胡、陶三人一阵惊惶，竟决意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刘峙等军遂兵不血刃进占武汉，蒋氏也亲到武汉坐镇，追击夏、胡、陶等。夏、胡、陶等见大势已去，几经和蒋电议，乃于四月二十一日联合通电下野。所余部队，(除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外)竟被蒋军悉数包围缴械。这一支对革命有特殊功勋的部队，终以不能见容于蒋氏而横被摧残，言之可叹。

当汉口战事急转直下之时，我自粤赴梧晤黄绍竑，筹商善后之策。白崇禧此时刚自华北化装潜返广西。因白氏在华北所指挥的全系唐生智的旧部，未予丝毫更改。十八年初，蒋即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活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津，秘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氏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熊式辉原为赖世璜旧部，经白氏一手提拔至于高位，然式辉此时只好执行命令。这一消息幸为上海市长张定璠所悉。张君江西人，曾在白氏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和健生有旧，乃将此消息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德洁遂商诸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迳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后来新闻界盛传白氏藏于衣橱内脱险，并非事实。

白氏抵粤后，适粤方将领陈济棠、陈铭枢已背叛李任潮而分别就任南京所派广东绥靖主任及广东省主席之职，有图桂的打算。白崇禧乃又化装潜回广西梧州。我们

李、黄、白三人遂在梧州重行聚首，都百感交集。不久，我们又相偕同往黄绍竑故乡的容县小憩，一面由黄绍竑出面，通电向中央交涉。

中央此时如器度宽宏，自觉不为已甚，乘此休兵，则和平原可立致。无奈蒋先生决心彻底消灭桂系，各路大兵已纷向广西合围，同时发表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迫令黄绍竑将我和白崇禧"解送"中央。前方部队人员转返广西原籍的，一概不许黄绍竑收容。广西现有的第十五军只准缩编为一师一旅，多余武器一概缴归中央点收。在上列三项命令彻底执行后，黄绍竑可就任广西编遣区副主任。

此项条件，可说欺人太甚。第十五军当时尚有十三、四团兵力，人数虽少，然全军激于中央蓄意消灭异己的公愤，士气很旺，足堪一拚。我们乃决定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部队旋即由黄、白二人亲自指挥兼程东下，我本人则自梧州遄返香港暂住。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当天（3月28日），即举行第三届中委第一次中央全会，4月8日闭幕。主要决定了工作分配、中央党部组织和消灭桂系问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38人出席。会议推举蒋介石、胡汉民、谭诞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等9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推举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长，刘芦隐为副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部长，何应钦为副部长、陈立夫为秘书长，组成中央部。会议还通过了《整饬党纪之通令案》、《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系统图》等文件。

材料：

- 整饬党纪通令
- 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草案

材料一　整饬党纪通令

民国十八年四月四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承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义当依党的系统与纪律领导全国同志，接受大会一切决议案，切实执行。此次大会关于党务之决议案，乃罗列过去事实，根据总理遗教，深思熟考，以求党的生命由危迫而健全，党的力量由涣散而团结之关键。中央而不严毅执行大会决议案，为不忠于党；各级党部以及各个同志而不以服从大会者服从中央，亦为不忠于党；中央与各级党部以及各个党员而有不忠于党者，则党之生命无由健全，党之力量无由集中。此理至明，无待烦言。

关于党务之决议，在总章修改案中列举綦详，如"党内各问题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绝对服从"，"勿得于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各权力机关应接受上级机关之命令，并执行其决议案"，"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党员不得有小组织"等。凡此明著切要之规章，应为全体党员所共守。乃就最近事状言之，有至足痛心者，如区党部不受上级党部之指导，擅自组织非党章许可之联合办事处，以截断党的系统也。如以一个或数个区分部、区党部之名义，不循组织系统建议中央，而擅发抗议，以破坏党的统一也。如挟持一部份盲从之徒众，为其私人组织之武器，沿袭共产党伎俩，叫号跳踉于党内，以分散党的力量也。如不受中央实际建设之指导，好唱高调，调愈高则离实际愈远，小则使地方行政无所措手，大则使训政事业无从进展，直接间接以斫削人民对于本党之信仰也。如对中央不为好意的陈述，而向个人作恶意的攻讦，匿名不负责任之传单、小报等，皆为其挑拨谩骂之利器，有意无意授敌人以进攻本党之机会也，诸如此类，皆为党员自戕以戕及于党之行为。方今一切反动势力，如改组派、第三党、垂败军阀、共产党徒以及失意政客等，正勾结呼应，向本党环攻而来；本党同志宜如何相亲相爱、相谅相助，一致奋斗，以战胜群魔；而同志中，乃有欣然以自戕为快心之举，若恐敌人之无隙可乘，而遥应于内者。此实吾党之大憾，本会所不容膜视者也。

其有关于目前之时局者，李、白等称兵谋叛党国，全国代表大会为伸国法，以立党纪，全场一致决议讨伐，而一切反动分子及失意之军人政客，又认此为捣乱之机会，造谣滋事，挑拨离间。中央对于此种坏法乱纪之徒，惟有与叛逆同科，执法以绳。盖法纪乃立国之根本，亦是维持正义之要道，当此建国肇始之期，更不能有丝毫假借。此则我同志之更宜认真明了、互相惕砺者也。

本会受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付托之重，一方面须使党的生命健全，党的力量集中，以完成总理所指示之训政工作；一方面负指导各级党部训练党员之全责。各级党部或其所属党员，苟有纪律所不许之行动者，本会对于总理，对于本党，均负重疚。在训练指导之中，与全体同志谊若弟兄，正维视同志如弟兄，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亲爱精诚之遗教，以刻苦督责其弟兄，不避怨以误党，不姑息以资敌，生死安危可不计，而此志不可或渝。故于此承受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付托之时，列举党务决议案之关于

重要纪律者，党员过去行为之有重大错误者，以申告诫。自今以后，务望各自警省，各级党部尤当随时考察其所属党员，如发现仍有上述之出轨言动，应立即制止；制止之不从，则中央当以本党所付与之职权处分之。特此通令。

（摘自《中华民国史料丛刊》第二历史档案馆）

材料二　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草案

说明：

(1)统计处设主任一人。

(2)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七人(三部一处各派一人，其他三人为专任委员，由常会就专任委员中指定一人为主任委员)。

(3)财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以常务委员兼任之。

(4)组织部设评议委员会，评议员五人至九人。他部缓议。

(5)各部副部长由部长就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中介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6)组织部设秘书三人，宣传、训练二部各设秘书二人。

(7)各部处关于统计科取消。

(8)旧交际科事务并庶务科。

(9)旧卫生科取消。

(10)各部处关于法规审查事项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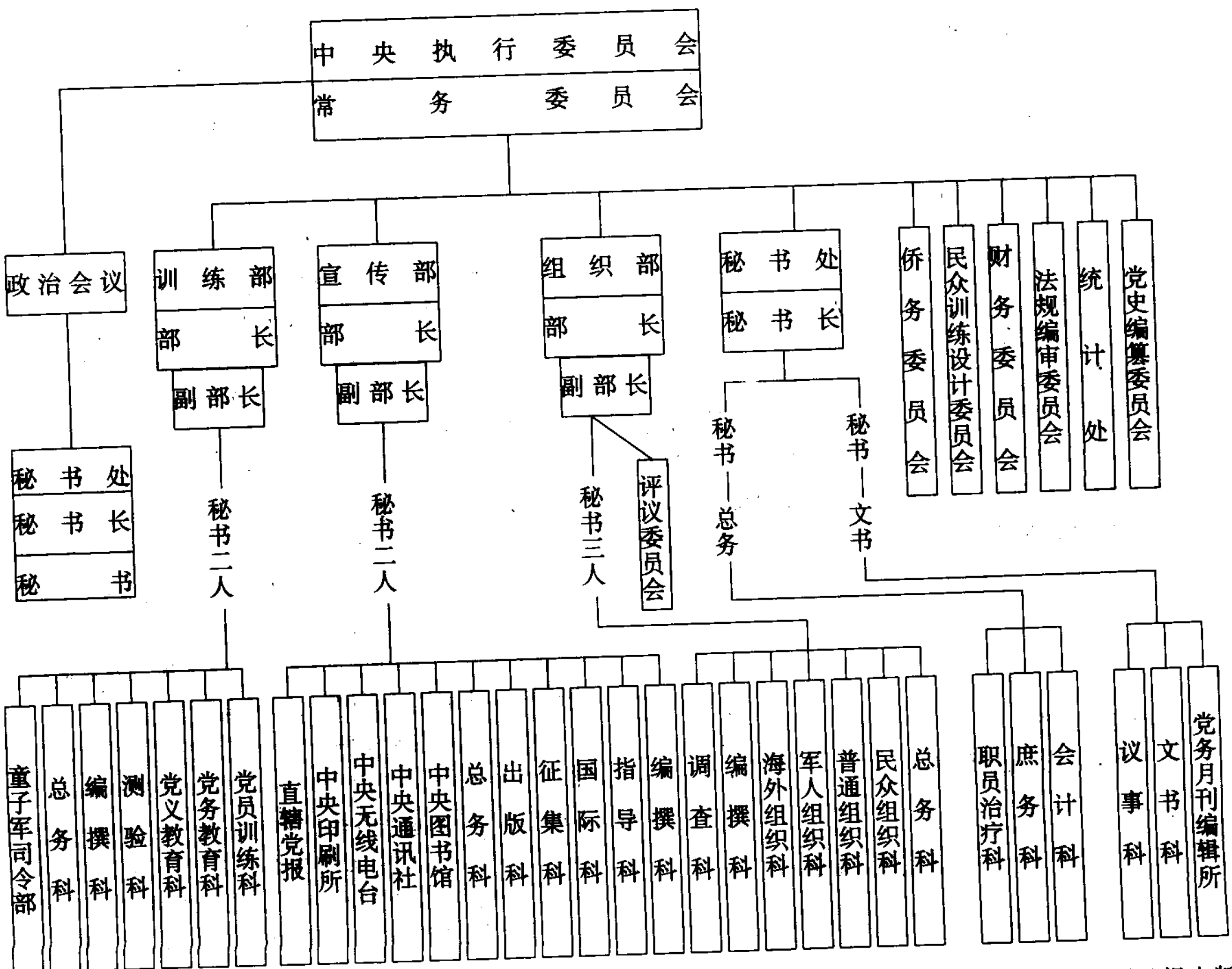
(11)民众训练设计委员会仍直辖于常会。于训练部设民众训练科，于组织部设民众组织科。

(12)省县党部民训会之事务，分别交省县党部之组织部、训练部办理。特别市、普通市之民训事务，由中央酌量当地情形，另行分别规定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系统图

十八年四月四日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蒋冯战争

背景介绍

1929年3月28日，中日签订解决济案协定。其中规定日军应即自胶济路沿线撤退。蒋初电令冯系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勿入济南，后虽令孙部"按原定计划接防"济南，但又另派陈调元部驻节胶东。山东问题，使蒋冯矛盾，更趋激化。

冯玉祥预感到，蒋在打败桂系之后，将向西北军开刀。于是他在北联晋军拉阎锡山共同反蒋的同时，大力调整军备，收缩鲁、豫兵力，集结河南。4月24日，冯玉祥在开封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撤退山东部队。接着，首先是孙良诚电辞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将其部队撤离山东；旋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也奉令率部由豫入陕。冯部还将武胜关隧道和陇海线上的重要桥梁炸毁，以延缓蒋军的调动，阻其进攻。冯玉祥坐镇华阴指挥。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护党救国"，请冯率部反蒋，推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第二集团军二十八名将领也联电请蒋下野。蒋冯战争，迫在眉睫。

面对蒋冯间的紧张局势，蒋介石采取了边用兵、边分化的办法。一方面，制定了"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计划，令朱培德的第一路军集中于徐州、开封之间，刘峙的第二路军在信阳、襄樊一线待命，唐生智的第五路军集结于洛阳、郑州一带；另一方面，则以金钱收买冯部。该年4月，蒋即以巨款买动韩复榘、石友三，使其萌叛冯投蒋之志；后又策动韩、石破坏冯的西撤计划。5月22日，韩、石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蒋即在军事上，委韩当西北军总指挥统率驻陕甘部队，任石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在行政上，任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同时，蒋还策动冯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委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马鸿逵为第十五路总指挥、杨虎城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这样，在蒋介石的一手策动下，西北军发生了激烈的分化。

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决议开除冯玉祥党籍；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褫夺冯本兼各职，严缉拿办。这时，阎锡山发起太原会议，商讨和平解决办法。阎劝冯下野出洋，表示愿陪冯一起出国。冯处此困境，决定以退为进，于27日在华山发出"入山读书"之通电；6月16日，又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出国。

冯玉祥通电下野，即为保存实力，亦为争取时间，再次与阎共谋反蒋。阎锡山表面称愿意与冯联合，实际欲借冯势以压蒋。于是，阎诡称共商反蒋大计，邀冯入晋。冯于6月下旬抵晋，先住太原晋祠，后被移至五台县建安村软禁。

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强行削减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称不愿接受编遣者为"反革命"、"不革命"和"假革命"。各实力派人物，人人自危，阎锡山也感到自身难保。这种形势，促进了阎、冯再次结合。同时，冯玉祥虽被软禁在建安村，但西北军仍拥有广大地盘和雄厚实力，服从他的调遣。冯为防止蒋、阎的新勾结，决定拆散其联盟。经过8、9月间的秘密策划，西北军一面与蒋方接近，由鹿钟麟赴南京任署理军政部部长，李鸣钟任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一面积极进行军事布置。冯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使阎警觉到自己与蒋关系上的微妙变化，并意识到冯尚有较强的实力。于是，阎锡山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在中秋之夜亲往建安村访冯，表示愿和冯共同反蒋。冯也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双方约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随即响应。

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电反蒋，列举蒋六大罪状，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谨率四十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为国杀贼"。接着，兵分三路，直指河南。北路由孙良诚指挥，沿陇海线东进，进潼关以入豫西；中路为孙连仲、刘汝明所部，出紫荆关，东取南阳；南路由张维玺、吉鸿昌率领，从汉中、兴安出鄂豫边之老河口。宋哲元的总部也于13日由西安移至潼关。11月，蒋介石下令讨伐，决计将冯军"歼灭于潼关——紫荆关——白河以东地区，直驱长安，一鼓而荡平之"。蒋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参谋总长；以唐生智所率第五路军的第八、第五、第十军等路，在郑州以西进击冯军，阻其由潼关东进；以方鼎英所率第一路军的第三、第四军等部，集中于叶县、舞阳、西平、郾城一带，西击冯军；以刘峙所率第二路军的第一、第二军等部，集结于鄂北广水、花园及樊城、襄阳、老河口一带，相机北进；并调四川杨森部至荆州、沙市一带以为后卫。从10月下旬到11月，蒋冯两军在洛阳东南的临汝、登封、黑石关一线和豫西的淅川、紫荆关一带发生激战，"肉搏相接"，"苦战经旬"，"战斗极烈"。蒋介石亲至许昌督师。就在蒋冯两军鏖战正急之际，阎锡山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不仅违背诺言，按兵不动，而且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阎、冯又再次分离。11月底，在蒋军的强大攻势下，西北军孤立无援，军事指挥又不统一，其主力遂退回陕西。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告失败。

材料：

- 豫西之战
- 韩复榘叛冯投蒋记

材料一　豫西之战

在编遣会议期间，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矛盾已经激化。1929 年春节，冯不告而别，由南京回到河南，双方矛盾就表面化了。4 月初，蒋介石进兵两湖讨伐桂系时，冯在邵力子的疏通下，表面上虽打出了拥护中央的通电，暗中却部署重兵豫东和豫南，其意图是蒋战败即派兵渡江夺取南京，桂军败则派兵出武胜关夺取武汉。桂系在鄂失败后，韩复榘、石友三两军曾一度推进到鄂北花园。蒋介石并在武汉召见韩、石，以犒赏军队为名，进行收买。

桂系失败后，冯玉祥在陕西华山玉泉院召集将领会议，认为桂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战线过长，李、白对将领失去控制之故，遂决定缩短战线，放弃山东、河南地盘，将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等部撤退到陕西和豫西。不料潼关以东驻军除孙良诚部遵令撤回陕西外，韩复榘、石友三早已对冯不满，在蒋介石收买之下竟通电拥护中央，率部叛冯投蒋；接着刘镇华、马鸿逵、杨虎城等也纷纷通电脱离了冯玉祥。

冯玉祥遭此重大挫折，在走投无路之下，委宋哲元代理总司令，只身去山西谋说阎锡山共同反蒋。阎却将冯软禁在五台县西会村，作为与蒋谈判要价还价的筹码。

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分化西北军后，为了控制中原局势，即派其嫡系将领蒋鼎文率第二军驻扎武汉地区，南控湘赣，西制川鄂；命顾祝同率第一军驻屯徐州，南掩京沪，北控苏鲁；对于冯玉祥西北军，则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起用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其久经战阵的第八军及何成浚、杨杰率领的北伐期间收编的孙传芳、张宗昌等旧部，开赴豫西扼制西北军东出潼关，并加紧物资封锁，图将冯军困毙于西北荒寒地区。

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背信弃义扣留冯玉祥极为愤慨，再加上陕、甘、宁、青地方贫瘠，给养极其困难，都愿意投蒋打阎以打开出路，遂由鹿钟麟出面拉拢韩复榘和石友三。这时，韩、石叛冯不久，虽由蒋介石分别任命为山东、安徽两省主席，但他们周围均驻有蒋介石嫡系部队，颇不自安，时思摆脱困境。他们在鹿钟麟劝说之下，均表示同意合力攻晋。鹿旋去南京向何应钦表示说，蒋收买他们的将领，虽是敌人，阎扣留他们的总司令，则是仇人；为了报仇，愿与敌人和好。何应钦当即答应马上接济军火，阎锡山闻讯，极其恐慌，又加上宋子文派人来华北接收平津税收，又不准阎锡山发行公债，更使阎不满。阎遂向冯表示，只要西北军出兵，他就马上出兵响应。这样，西北军将领就由攻阎改为攻蒋。

1929 年 10 月 10 日，退驻陕、甘的西北军在代总司令宋哲元指挥下发动了反蒋的战争。当时策定的作战方略为：石敬亭、孙良诚、庞炳勋、宋哲元率西北军主力打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直下郑、汴；孙连仲、刘汝明率两个军出紫荆关直扑南阳；张维玺、田金凯两个军出武关，循白河东进，威胁襄樊。后两路得手后进取武汉，与两广的张、桂联军取得联系。蒋军方面的部署是：唐生智、何成浚、杨杰等军担当陇海路正面，构筑坚固阵地阻止孙良诚等军东进；方鼎英指挥的几个军部署于舞阳、叶县、西平，保护京汉路；刘峙指挥的蒋军嫡系两个军放在武汉，策应各路对冯军作战。

冯军三路出动后，初战甚为得手。孙良诚指挥的正面各军很快打败守洛阳的徐源泉军，进抵登丰、密县；宋哲元指挥的冯治安等军攻下临汝，刘汝明军也进抵西峡；张维玺军更进出于老河口一带。宋、孙两路军在防守陇海线黑石关要隘庞炳勋第二路军配合下，正待部署军队夺取许昌和郑州。不料这时蒋介石给阎锡山拨来月饷六百八十万元，并委为海陆军副司令，阎在蒋重价收买之下，又倒向蒋介石方面，使西北军士气受到很大打击。又加唐生智、杨杰、方鼎英督率蒋军拼命阻击孙良诚军，孙遂放弃密县、登丰后撤。宋哲元侦知孙良诚正接洽投蒋，恐腹背受敌，遂下令前线的本路军及庞炳勋军向潼关撤退。因掩护撤退的魏凤楼军过早放弃龙门，被徐源泉军截断后路，致孙良诚第二路军受到很大损失。嗣吉鸿昌率军由宁夏赶到潼关就任潼关警备司令，西北军始稳住了形势，得以重整旗鼓。

（摘自《民国军事史稿》中华书局）

材料二　韩复榘叛冯投蒋记

一九二九年夏天，冯蒋破裂，西北军由山东、河南向西撤退，为了行动保密，都是夜行军。我是时任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带着军校学生由洛阳西行，某日清晨，到达豫西陕州，听说第二十师师长李兴中驻在那里，我去看他，想打听一下大局的情况。他说："韩向方（韩复榘字）刚由华山回来，中午他请客，何不一同去看看他。"十一点多钟我们就去了。韩住在铁路旁边蓝段长的一个小房子里，我们一进门见有许多手枪队站列两旁，感到很奇怪。在座的有七、八个人，除我和李兴中外，还有兵站总监闻承烈、副监莫润田、兵站监部参谋长张钺，其他记不清了。吃饭时韩郑重地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现在宣布我的大政方针吧！我已决心不向西去了，西北那么苦，并且连年荒旱，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冯先生还想拉着阎老西儿打老蒋，这些年一直在打仗，打的精疲力尽。我看仗是不能再打了，再打仗军队和老百姓全受不了。对不起实甫兄（李兴中字），我已和二十师的官长们都商量好，即日开回洛阳（二十师原是韩的基本队伍，不久以前冯为解除他的兵权，将他调为河南主席，师长职务交由石敬亭兼代，后由石交与李兴中，为时不久）。"当时我们全都楞住了。李兴中首先说："您有意见可以向冯先生提呀！"韩说："冯先生

这几年的作法，我看全不对头。我在华山已经和他老先生说过，他的脾气您还不知道，脸一红，眼一瞪，哪容你分说呢？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是谁愿意打谁就打，我是不干啦。”李还说了许多道理，大意是：“总司令（指冯）多年来待我们不薄，怎么能离开他呢？他固然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从长计议；至于蒋介石的为人，阴险狡猾，绝不能长久共事；再则您把二十师带走，叫我怎么交代呢？也请替我想一想呀！”韩显出了不耐烦的样子说：“我已命二十师开回洛阳，事已至此，只有一不做二不休，把脑袋挂在腰里干。”闻承烈也接着说：“我也认为这样办不好，怎么啦？你又犯了老脾气啦，这样不好吧？”韩说：“我已决心这么干了，您看怎么办才好呢？通电里还有您的名子哩（此时通电尚未发出，韩拿这句话来试探他）。”闻一听也楞住了。李又接着和韩争论下去，他二人闹得面红耳赤。我见韩既决心这样干，很难转圜，并深知韩的性情残忍。常常翻脸不认人，此时闹翻了，没有益处。我便说：“先吃饭吧，饭后再慢慢谈。”饭后韩出去了，我问韩的人，据说二十师的队伍今早已出发，知事已无法挽回，也未再谈。看当时情况，我也没法走开了，便对韩说：“我带的军官学校，官长们全是总司令的亲信，留他们在这里也不方便，最好让他们继续西开。”韩很同意，我马上给副校长张知行写了个条子交韩派人送去，内容是：“军校今晚继续西行，因韩主席留我有事，随后再走，请把我的行李送来。”原打算借此透露一点消息出去，但张来时被阻于门外，未起作用。韩扣住李兴中，是为了要拉他的队伍，闻承烈那时正在灵宝召开兵站会议，韩由华山回来，碰见了他，当晚以电话坚邀他来陕州一谈，第二天也就来了。因为韩打算把运集到陕州的军粮统统运走，以断西北军的军粮，同时他与闻的私交很厚，也想拉他一同干，所以把他邀来，后见闻不赞成，当下也未免强。至于莫润田、张钺，与韩已有默契。我则是自己撞上门去的。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韩请我们一同上了火车，向东开行，走在中途，火车忽然停住，我们不知怎么回事，心情有些紧张，还以为韩在那里要处决我们呢。韩起来说：“扒毁铁路再走。”韩下车约半小时才继续上车开行，我们受了再一次的虚惊。随后到了一个小站，站上停着一列车，一问是河南省政府的专车，由民政厅长邓哲熙带着一批省政府的人员，还有财政厅长傅正舜、高等法院院长张吉墉、公安局长李炘、总部军法处长徐惟烈以及梁式堂、余心清、查良钊等。他们下车与韩见面，韩说：“过不去啦，铁路断啦。”邓问：“怎么回事呀？”韩说：“我看西北几省连年闹饥荒，军民都没有吃的，况且这几年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在这里一横，谁也过不去。”邓依然笑着说：“你不想干了，我们还得往西去呀。”韩说：“到处是土匪，过不去了。”后来知道铁路已断，两列车一同开回洛阳。徐惟烈因与韩素有嫌隙，怕韩对他不利，中途溜走，跑到庞炳勋那里。庞炳勋也与韩不睦，他的队伍最后由河南西开，此时正到巩县，闻悉这一情况，并知韩带出来的队伍不多，乃决心在黑石关设防截击。韩在洛阳下车后，住在西工营房之内，把我们十个人安置在“广寒宫”内（当年吴佩孚所修的阅兵台曰继光台，台下的地下室曰广寒宫），派兵守卫，行动不能自由。

韩于此时，一面与驻南阳附近的石友三和马鸿逵二人进行联系，一面向蒋介石接洽投诚。他所带的二十师，在陕州发动时，只召集了他几个亲信的团、旅长，每人送了一两万块钱，对部下骗说是奉冯的命令东开，到洛阳后才表明态度，同时对内部加以清理。李文田旅原即驻在洛阳，李是石敬亭委的，当即将其扣押，并撤换了石、李所派的几个中下级官长，但内部仍有些动摇不安。韩不时带着他二太太纪甘青到广寒宫来，问寒问暖，并说已与石友三、马鸿逵等联系好了，故意显示出同我们亲近的样子，意在拉拢我们。但我们这些人都是跟冯多年的，当然不为所动。第三天下午韩又来了，连问“李师长呢？”待把几个人全叫来之后，韩才说：“现在我要走啦，听说少云（孙良诚字）的队伍追下来了，庞瘸子（即庞炳勋）也在东边截着，我不能在此久停；你们各位若愿跟我走，我是很欢迎的，否则我也不勉强。”接着大家说：“那么我们留在这里好了。”韩虽没有说什么，可是把脸色一沉，对他的随从说：“去告诉他们，把金谷园车站上的那几列车粮食全都烧掉。”当时李炘说：“大家全没吃的，怎么把粮食烧掉呢？”梁式堂老先生接着说：“现在老百姓全没有饭吃，如果主席用不着，何不叫老百姓取走呢？我为老百姓请命。”韩说：“那也可以，就叫老百姓快点去取吧。”梁马上给韩叩了个头说：“谢谢主席。”

韩走后，卫兵也撤走了，我们十个人，还有些随从人员，均搬到另一个营房之内。当晚大家正在计议韩走后如何布告安民的问题，李兴中的副官王革非出外探听消息回来说，韩还没有走，大家又将笔墨收起。这时有个营长随同来说：“韩主席拉队伍走，大家纷纷议论，有几部分队伍不想跟他走，请示师长怎么办？”李说：“韩不久就走，不愿走的可将队伍拉到一边躲避一下。”次日上午，韩尚在洛阳车站，下午忽然有位军法官（是洛阳军法学校的学员，姓名记不清了）满头大汗地跑来说：“你们大家快快躲开此地，韩主席已派兵来抓你们，并说要把你们杀掉。”我们得此消息，毫未迟疑，马上出了大门，走到门口一看，还缺少闻承烈一人，只有他的一个随从跟来，当即叫他回去告知闻总监，此人回去就出不来了。我们出门之后，不知往哪里去好。我说：“这里的情况我最熟悉，快跟我走。”我带着他们穿过路南的营房，到了洛河北岸的一个土坎下隐蔽起来，由一个人向北监视着。停了一会儿，余心清、查良钊两人说：“我们装作老百姓，去看看去。”不久回来说：“我们住的营房已被兵包围，不让接近。”后来才知道，当

日韩在洛阳车站上集合他的队伍，总到不齐，有人向韩说西工的几个人在那里勾引队伍。韩勃然大怒，立即唤手枪队长来，大声嚷道："西工他们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想拉我们的队伍，快去把他们全杀掉。"恰巧那位军法官正在旁边，听得很清楚，立刻跑来报告。再说闻承烈因未和大家住在一起，住在另一栋房子里，听说外边有事，出来一看，队伍已将营门把住，不让出去，闻对士兵说："我是闻总监，你们的官长呢？"一会把他们营长请来了，就是从前跟闻当卫士很久的杨树森。闻一见面就说："是你这小子呀？怎么回事呀？"杨说："主席说有人在这里勾引队伍，主席急了，叫我来把他们全杀掉。"闻说："这全是我们自己的人，怎么能这样办呢？"杨走了不远，闻又把他叫回来说："可不许杀一个人哪！"杨连声说："是、是。"搜查结果，只把跟李兴中的一个手枪队排长陆振武抓住。有人说："这小子是李师长的红人。"杨为了向韩交差，遂命将他拉出去杀了。但手枪队士兵都是新兵，没杀过人，一刀砍去，陆向旁边一闪，用膀子一搪，刀砍在胳臂上。陆撒脚就跑，手枪队士兵没有追上，打了几枪也未打中。结果这次事变未死一人。

我们在河边呆了几小时，不敢再回营房，研究今晚往哪里去。我说："河南岸到处是土匪，绝对不能去：沿河向东走有个大庙，是我们的残废军人教养院，院长是宋邦荣。大家和他都很熟识，决定先到那里再说。到后宋招待我们吃晚饭，但见其神色不安，仔细一问，据说河南岸有一百多土匪，今夜要来抢枪，所以要准备一下。大家感到刚刚逃出龙潭，又入虎穴，均一夜未睡。结果土匪并未来。第二天听说韩已走了，我们才进了城，住在地方法院。此时闻承烈于恢复自由后也进城来，十个人又见了面，各道经过，惊喜交集。不久孙良诚来到，我们问他为何来得这么慢，孙说："我们在华阴听说韩变了之后，大伙全很气愤，我主张立刻追下来，可是先生(指冯)哭哭啼啼地说：'算了吧，让他们走就走吧！'你看糊涂不糊涂。"我们说："您早来一天，他的队伍全带不走。"孙说："据前边的报告，庞瘸子在黑石关截着，韩没有打通，部队全散了，他本人只带着点卫队落荒而逃。这个倒霉的家伙真该死。"我们回到华阴，见到冯玉祥，他的样子很难看。我们报告了事变经过和韩的情况之后，冯问："韩在河南当主席，你们有没有难为他的地方？"邓哲熙说："用人、行政，事事全听他的呀！"傅正舜也说："韩要用钱，我们一向如数照给，并没有迟误过呀！"冯接着说："全是由于我一个人昏聩糊涂，叫大家受惊。可是韩这回事，你们全打算把我装在鼓里，把我的眼睛、耳朵全堵得紧紧的，叫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知你们是什么意思？"最后叹了口气就散了。冯怪大家不向他报告，可是大家全觉着很委屈。"韩、石全像你的亲儿子一样，这件事又怎好对你说呢。"那几天冯的精神受了极大的刺激，不时地掉眼泪。有次左右的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指着外边的卫兵说："当初石友三就和他一样，常替我站岗，我看这个卫兵将来也靠不住。"这时冯对于他带了多年的西北军，已经失掉了信心。没有过几天，他竟过河赴太原，钻进了阎锡山的圈套。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中东路事件

背景介绍

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政府受蒋介石的指使，令哈尔滨特警处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对苏联总领事及馆员加以监禁，并对副领事施以暴行；没收领事馆来往文件，逮捕来馆的苏联人有三十九名，公然进行劫掠。事后，反动派捏造了共产国际在哈埠俄领馆开会准备在中国组织暗杀等违反常识的谰言，以淆惑听闻。因此苏联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斥责它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道义。这时蒋介石本人亲赴北平，指使张学良一面调东北军队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备战的姿态；一面扩大事态，于7月10日命令中东铁路理事长兼全路督办吕荣寰以非法手段下令解除苏联铁路局长、副局长的职务，而以中国副局长代理局长职权，免去苏联各处处长职务，大部分代以白俄分子，并将撤职的苏联人员驱逐回国。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公然破坏了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武力手段非法地霸占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

苏联忍无可忍，乃于7月14日以最后通牒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解决的三项办法：(一)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2)中国当局应立即取消对于中东路之一切非法之行为；(3)一切被捕苏联人民应立即释放。但国民党政府不仅毫无和平谈判的诚意，而且集结军队向苏联进逼。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手腕并无甚特别，我们须先取中东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苏联迫不得已，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命令驻苏的中国外交人员离境，并声明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的一切权利。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各帝国主义乘机干涉。中苏邦交断绝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即与驻华盛顿的日、英、法使节会谈，19日又亲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对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挑衅行为加以鼓励。美国国务卿还曾进一步与英、法、日大使商讨，建议委派一国际仲裁委员会，调查关于中东路的整个局势，妄图向苏联施加压力。英国当即向美国递交照会，表示赞成美国进行干涉；日本则更加积极煽动，企图趁火打劫，宣称"史汀生发起之提议，将受日

本欢迎”。7月25日，史汀生致秘密通牒于英、日、法、意、德五国，提议组织联合委员会，实行对中东路的调查和干涉，并主张在中苏冲突未彻底解决以前，仍照1919年的先例，暂时将中东路收归国际共管，共同推一中立国代表为该路局长。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抢劫阴谋，立即遭到苏联政府的严词拒绝，苏联政府声明：决不容许第三国干涉！

美国于策动干涉失败后，又策动中国反动军队进攻苏联。1929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八万余人开赴绥芬河，开始了对苏联的进攻。苏联调动海、陆、空军向东北军展开猛烈反攻，给东北军以歼灭性的打击。由于军事的失利和美英干涉的落空，东北地方政府在国民党暗示下，派哈尔滨交涉员前往伯力与苏联谈判。12月3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草约”（又称“伯力协定”），其要点为：仍按照1924年所签订的中苏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状态，包括恢复苏联人员一切职务，恢复东三省苏联领事馆及中国在苏联远东领事馆；至于中东路争议问题及中苏国交全部恢复问题，另由中苏会议解决。中苏会议于1930年10月开幕，至翌年10月共开会二十余次。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无理取闹和帝国主义的阻挠，会议毫无成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苏会议因而停顿。

材料：

·伯力交涉始末记

材料　伯力交涉始末记

哈尔滨为东北外交中心，各国领馆均驻于此。尤其北满国境，处处与苏联接壤，又有合办之东省铁路，关系最大。余任滨江道尹兼外交部交涉员八年，对中苏关系当然了解。一九二九年春，东路理事会因管理局正副局长权限问题（按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正局长是俄人），争执甚烈。此事本不在外交范围以内，余认为中苏友谊不宜发生裂痕，遂以第三者资格，会同苏联总领事从侧面调停，承苏方好意，正副局长可共同签字办事。自谓此一争端已可解决，不料五月间又有搜查苏联领馆事件，关系突然恶化。（当时由特区派军警包围苏联总领事馆，严加搜查，指为宣传赤化，立即逮捕苏籍路局的高级职员五十九人。）同时特区长官张景惠、东路督办吕荣寰召集会议，驱逐苏侨，更换苏方正局长。是日适东北政委会莫德惠由双城子来访，余告以今日开会各机关均参加，独以余不赞成未请列席，眼看着要闹出国际大事，但这是特别区职权，我不能干预，你也不能过问，咱们都是局外人，只好到江边走走吧！谁知事起以后，我二人都是事中人，且成为重要角色呢。未几苏外长发表宣言，断绝国交，领馆下旗回国。总领事梅尼立果夫来署正式声明后，余就大局立论，认为东北处两大国之间，如中苏失和，某国必趁火打劫，与中苏均不利。我自信尚有力量向张司令长官和吉林张督办去说，照我们调停的办法可以了结，请梅氏密电政府。梅氏亦以为然。余即连夜赴奉天。张司令长官和张督办均以为是，遂密电李理事绍庚，陪梅氏同车到长春，张督办亦同时到长，见面秘谈。此事为长春日本领事所闻，是晨曾到车站向车上查看，未遇梅氏，快快而去。张、梅旋即会见，相谈甚欢。约定梅氏回国在苏联国境上十八里站暂住，余回奉取正式文件，亲到满洲里交换。当时张督办回吉林，余偕梅氏回哈。曾记在车中谈及东北情势。梅氏极诚恳的说，东北有两个强邻，一是有野心的，一是无野心的，苏联只希望北满作个缓冲地带，好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愿与某国接触。假如北满无苏联支持，某国必来，那时领土必被侵略云云。此言今犹在耳。不及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果丝毫不爽。我们一路长谈，以为化干戈为玉帛，已有把握，很作乐观。梅氏到哈即动身，彼此约定满洲里再见，临行并密告留馆员两人，托为照料。余又连夜赴奉。政委会即照余所定的办法起草，共四条，前三条系恢复东路原状，第四条为正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起草时已有人主张不写第四条，为争华方正局长地步。余以正副局长权限一样，是苏方好意让步，且已经张督办向梅氏郑重表示，不能失信，始照议写成。余即携此文件直赴满洲里。不料甫抵满站，哈满司令梁忠甲来迎，即交奉天一电，谓外交部有电，所携文件缓交，另换文件送来等语。余已知必在第四条发生枝节，将败于垂成。次日洪秘书送到文件，果如所料，只好通告梅氏，乘专车入苏境送去。梅氏谓政府必不容纳，只好俟奉电再达。余回满站不二日，梅氏通知来会，到时声明，奉政府电，认为华方无诚意，不能再谈云云。余招待梅氏，彼此相对黯然，眼看两国风云立即掀起，握别时，只有互相痛惜而已。梅氏甫行，外交部派驻芬兰公使朱绍阳来满，欲与梅氏继续交涉，照外交部方案自然是不说局长问题，一再通知梅氏，不得答复。适王之相参赞亦同来，渠素主持中苏友好者，认为外交部方案与实际不合，主张由朱氏出名，向外交部建议，仍照余定的办法。遂由渠起草一长电，洋洋千言，用密码拍发。旋得复电，内开：所陈各节，虽不无见地，但仍应坚持收回铁路管理权，即正局长万不能让于苏方云云。简直未加采纳。但此时在满洲里已十八天之久，并无交涉对手方，亦不能再候，遂商同回哈。

此时国境上已备战，临行梁司令极兴奋；车过海拉尔站，韩旅长光第来迎，亦极兴奋；此两将军与余为最后的一面。可惜！可惜！余甫抵哈，两军即入交战状态。从此国境数千里，均炮火连天，沿边沿线实行战时职权，枝节横生，余一人几成众矢之的，各方面纷纷责备。余以坦然态度处之，不问亦不辩。一日，二舍弟运昌密告梅氏所留之馆员，因生活困难在市场变卖家具。余立刻备款，嘱其密交，并告以随时接济。计由八月至十一月，经过多少次

激战，我军全线及江防上舰队均失利，苏军已分路入境。（当未决裂时，张学良曾派军令厅长王树常到南京力陈不宜作战实情。胡汉民说廷午你是军人，怎还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已弱，决不敢动。蒋介石说："你不必再说，我已有电令给汉卿了。王只好快快而回。）吉林张督办到奉与张司令长官商定和战方针，认为不应再战，应邀余议和，即急电余到奉。余以战事正在剧烈进行，不知苏方意思如何。当即回哈与两馆员秘商，请他们回国说明，如肯言和，余即入苏境会谈。两馆员慨然说道，由绥芬战线出境，此时战事愈加激烈，梁司令被俘，韩旅长亦阵亡，此两军都全军覆没。两馆员到海参崴，见负责人说明一切苏政府表示对余极端信任，一定接待；惟闻曾询两馆员回去的时期，在梁、韩兵败之前或后，如在前是华方先有和的诚意，如在后是兵败求和，情形大有区别。两馆员举事实证明在梁、韩兵败以前，遂定前往会谈之议。两馆员为两国事不避艰险，出入火线，令人佩服。渠等一回，余立刻赴奉报告，将动身日期电知莫斯科，匆匆就道，由绥芬乘专车开入苏境，（此时苏军进兵甚快，我一入苏境，各路即停止前进。）有苏方代表西曼诺夫斯基冒雪来迎，在双城子谈判数日，大致妥协，定明在伯力正式会议，再在莫斯科会议，最后在北京换文。只一先决条件，苏方希望东路督办吕荣寰自动辞职，苏方会办亦换人，载在纪录上边。照事实上说，吕督办当然辞职，但载在纪录上，我方必认为与用人之权有碍。又唱高调，一再商讨，不得结论。战局正迫，又不能久待，遂动身回国，约在车中商量。余在车中一再考虑，认为回奉受攻击事小，因此破裂再有战事，双方牺牲许多，此事极大，遂决心由我个人负责。即通知西代表将纪录缮清签字。十二月三日西氏送至绥芬，约定伯力再见。余即回奉相告，张司令长官很愿接受，定次日在北陵别墅会议。余闻各政委意见颇不一致。王秘书树翰素主张中苏不宜失和者，亦以为虑，谓袁洁珊（即袁金铠）遇事敢言，可与他先说说。余走访袁氏，渠闻知内容，认为满意，谓会议时如有反对者，渠必力争。次日开会，顾维钧亦列席，余报告毕，大家即议论纷歧，有赞同者，有反对者。反对的理由皆集中于吕督办辞职载在纪录一项。顾维钧谓答应此条件，将来与外交史上亦有关系，此议一发，愈难解决。正辩论间，适黑龙江省派人报告军情，张司令长官在别室接见。据称苏机已临省区上空，和战立待决定。张司令长官回坐说明目前军事状况，问大家有何意见，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袁氏遂发言，谓战败媾和，苏政府并未提何条件，吕督办辞职是当然的事，品山办的本好，此时只有请品山赶紧赴伯力会议，不必再加考虑。至此这番争论才算表决。余即当场声明，谓我现已筋疲力尽，预料由伯力回来，身体必更不支，需要休养，将来莫斯科会议全权代表，我绝不再行担任。现在危急时期，我不敢辞，莫斯科会议是和平时期，请另选贤能。又说此次在国外会议，不能事事请示，须予我以全权。张司令长官对此两点，均允所请，当即电请南京政府派我为伯力会议中国代表。准备出国，回哈收拾行装。日本驻哈总领事八木元八来署正式声称，中苏战事，必不能停。北满的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关系甚巨，政府为保护侨民，要派四千兵来等语。余即郑重答复，我在双城子已将议和大体决定，此次伯力会议，必能圆满解决。至于地方治安，现有王树常总司令统兵在此，对日本侨民可负完全保护的责任，请转告贵政府，不必派兵云云。八木无言而去。日本此举早在意中，幸和议尚早，未致酿成另一严重事件。（英、美、法、日四国，在事先事后极力挑拨中国反苏反共。在交战时，都有电报向苏联干涉。日本素认东北为其口中物，想趁此独吞，所以急于出兵。）

十二月十一日，余乘专车赴伯力，夜间过阿城车站，正在展望室看窗外雪景，忽有人投一大石头进来，将车窗撞碎，余幸未受伤，此亦一个不平人反对我甚烈者。余由窗中尚望见其人徐步东行，亦置之不问。开车南行至绥芬，西代表来迎，直达伯力，到时极受欢迎，旋即开始谈判。双方均以诚相见，不用任何外交词令，很顺利的将条款作成。忽接美国政府的喉舌《纽约时报》一电，希望我不签字。余阅完一笑毁之。随员李绍庚问是何意，余谓中苏议和，与美国无关，我是奉本国政府命令的，不能听美国的高调。李深以为然。（其后莫督办到南京时，外长王正廷谓品山签字可惜太早，如迟延几天，美国就要说话了。莫告以实地情形，王始释然。）西代表来商签字日期，余问及撤兵日期。西代表郑重相告，政府已决定的方针，俟莫斯科会议完成才撤兵。余谓中苏失和，为全世界关心的一严重事件，我们虽是两个人在此会议，可是为全世界所注目，能否恢复和平，全在双方能否撤兵。如不撤兵，即是未恢复和平，我们费了许多精神，我认为是白费事，失了签字的意义。而且就条款而言，承贵国的好意，都是公平的，并不像帝国主义定些苛酷或压迫条件为我方所不能履行者。如陈兵以待，摆出一个强迫的形势，亦与贵国态度无益。西代表谓政府决定的军事，我无权答复；但是贵道尹的意见，我必一句不漏请示政府。次日西代表欣然而来，谓奉政府电，原定的方针，本不能撤兵，为尊重道尹的意见，签字后即撤兵。西代表正式说完，又亲切的说，能变更我们政府决定的方针，非贵道尹谁都办不到，这真是特别事情。（闻苏军原定攻下哈尔滨为止，及和议成，亦预定屯驻中国境内，俟莫斯科会议完成才撤。我认为不撤兵，仍是交战状态，日本正伺机出兵，必有意外事件。且大兵压境，各地枝节甚多，所以力争撤兵问题。苏联政府对于我的意见，一经提出，立即更改原定方针，实令人感佩。）余闻之深佩苏联政府的大国襟度，对自己特别见重，尤深深地感动。当即亲笔添一条文，定明立即恢复中苏国境之和平状态，双方随即撤兵。西代表亦一字不改通过，商定次

日签字(十二月二十三日)。届时举行签字典礼,宾主举杯互祝,至此两国风云才算化为和平。回忆在满洲里与梅氏握别时景况,不禁百感交集。签字第二日晨起,西代表即来正式相告,谓奉政府电,自今日起通令全线撤兵。余闻此数语,当时心情的欣快,实非任何言语所能形容。自觉所抱中苏和好之见解,始终不差,虽挨骂受累,终能将这场险恶的风波扭转过来,问心可以对得起国人,至于是功是过,只好任国人评判。此时苏方新路员均在此等候同行,西代表设盛宴饯别,并为余照一像放大,想至今尚悬在伯力,很可作为纪念。西代表仍送至绥芬而回。

一入我国境,沿站受各界欢迎。余在车中招待苏方数十人,一一干杯,不觉大醉,车抵哈尔滨,甫入站,乐声大作,一片欢呼,中苏两方齐集,站台内外,几乎万人空巷,半年来战时的气象,立刻变成极亲睦的气象。尤其新来的苏方人员,皆格外和霭,绝不带丝毫曾打过仗的形迹,真是友好精神的充分表现。周旋很久,即同车赴奉,余亦未及回家。计半年以来,余过门不入已数次矣。到奉时(十二月二十八日),苏方人员极受张司令长官的热烈招待,政委会开会,余报告伯力会议经过,全体赞同无异词。此时东路新局,正亟待成立,新任督办亟待发表。一日王秘书长来,谓政委会开会已派你为东路督办,余谓何以事先未征求同意。王谓你当督办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不用征求同意,今日已办公事,任命状就要送来。余谓早知汉卿必派我当督办,可是我绝不当,我若先说此话,大家反倒疑惑,我是专等今天才说我的意思,汉卿对我诚厚,但半年以来我挨骂受累,不惜牺牲个人,全是为国家,丝毫不为自己。东路督办位尊而多金,我岂不知。可是受了这个报酬,好像是为了这个督办才肯奔走的,我蔡品山太不值钱了。我已早有决心,请为力辞。王闻之非常赞成,谓想不到你有这种意思,这是真辞并非谦让,我必向汉卿力说。隔一日王晤面告知,谓汉卿对你的意思很赞成,昨天开会已改派柳忱(即莫德惠)为督办,交依照你的前议,莫斯科会议全权代表亦电南京以柳忱兼任。余以张司令长官能了解我的意思,极为欣快。未几柳忱偕苏方人员赴哈尔滨就职,余仍留奉。一日王秘书长又来传达张司令长官意思,谓你虽不当督办,可是张叙五(景惠)对此次事件应负责任,不能再当特区长官,要请你去接任,先与你说一声。我谓我不当长官,与不当督办是一样理由,此次事件,张叙五自己无主见,绝是上了南京反苏反共派的大当,好在他为人忠厚,将来与苏方相处亦必能好。外交立场上已经换了一个督办,再换一个长官,亦不好看,请与汉卿说,不必再派别人。此话不啻为张景惠加一层保障,至今日张氏并不知道。王秘书长问你什么都不当,打算做什呢?余谓我已作官多年,希望藉此离开休养一下,在政治上从旁帮帮忙。王遂与汉卿说,委为参议闲职,将道尹交卸。

(摘自《近代史资料》等 71 辑蔡品山)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29 年 6 月 11 日至 18 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和列席的中央执、监委委员、候补委员共 45 人。会议通过了党、政权、军事、建设等具体方案,规定训政时期为 6 年,至 1935 年完成;通过《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规定了党与政府对于训政的权限和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的关系;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人民团体的组成必须向国民党党部申请许可,必须不违反三民主义,接受国民党指导,服从政府命令等;还通过了《振刷政治决议案》、《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完成县自治案》,要求 3 个月内充实和完成五院组织,1933 年底以前,完成县自治;以及《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确定行政事项之统属案》等决议案。会议决定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免去本兼各职,通缉拿办。

材料:

-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
- 会议纪要

材料一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

民国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训政期内,本党最主要之工作在于确遵总理遗教,实施三民主义之具体建设,训练人民行使政权,以竟革命之全功,而立民国巩固之基础。现在国家之统一,总理之奉安,均已告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承全国代表大会付托之重,全国国民属望之殷,特召集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举党、政、建设之各种根本问题,为更精详之讨论,以立具体确实之方案,而期于切实之执行。

本会议之任务如此,故一切议题均以根本建设为中心,一切决议尤以积极具体为原则,各个问题务为极纤悉之剖示。而凡所决定,皆期立时可措之施行。开会以来,经讨论决定者,如党务进行之规划,训政期限之确定,人民组织之方案,地方自治之推进,治权行使之规律,五院组织之充实与完成,皆就党国大计定其切要方略。而关于外交、军事、财政、交通、教育、内政、农矿、工商、经济、建设以及治河、剿匪、禁烟与振兴蒙藏之各种行政,皆确定其分期实施之时限,划清其应尽应守之权责,以策训政工作之实效,宏根本建设之规模。盖中国之现状,本党之责任,早已进于统一训政之阶段〔段〕。人民之所望于本党者,惟

在于负责力行。斯本党之领导全国期于共同努力者，亦应有详细切实的具体方案之规定。本会议确信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凡洞识中国所处之现状与革命实际之需要者，必能以全部之精诚，拥护本党之决议案，而促其实施。故本会议犹有为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告者：

一、欲求本党主义之实现，必须保持全国之真正统一；欲保持中国之真正统一，其根本方法，固在以遵奉总理遗教，推行具体建设，改造国家精神物质之环境，俾割据自私之军阀思想无由缘附以滋生。三次代表大会所阐示之原理，诚为全党之所确认。惟推行建设之始，若非国家有和平统一之根基，全国有一致拥护之诚意，则政令之推行，触处皆生阻碍；而民志之摇动，又在足以影响于各种之建设。故本党一面固当致全力于治本之建设工作，而同时仍须继续以革命精神努力扫除一切有形无形之封建余毒与反动势力。因果既相贯连，标本所宜兼顾；凡破坏和平统一、挠乱训政建设者，无论出之以何种之形式，皆须全国一致以公敌视之。此其一也。

二、本党主义之实现，其又一先决条件，即在国家之自由平等。苟不平等条约一日存在于中国，无论有如何美善之建设方案，独立国家之主权既有偏损，即一切设施亦受限制。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端在吾人之奋斗与实际之努力。自本党统一全国一年以来，此义已充分证明。今后之急起直追，更不容缓。本会议认为于实施一切决议案之际，应本实现国家独立平等之目的，以切合实际之方法，正当坚决之手段，积极进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济之以全国一致不辞任何牺牲之决心。此其二也。

三、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实施地方自治，为训政时期主要工作。总理遗教，如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言之已详。苟地方自治无积极进行之实施成绩，则本党政府所总揽之治权部份，纵令百废具举，亦将无过于普通国家贤明执政者之所为；训政二字意义，将全无归着；而人民痛苦之解除，三民主义之建设，亦将无由实现。本会议确认以推行地方自治为训政工作之重心，故一面规定推进地方自治及限期完成县自治案，而同时复决定以促成地方自治为党员必要之工作。凡吾全党同志，苟自认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即应以全副精神、全部能力贡献于地方自治之推进。此其三也。

四、训政时限之确定，本会议兹依据总理遗教，定为六年，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之。夫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民程度之不齐，反动势力之环布摇惑，本党实惴惴六载光阴之短促与实际任务之繁重，而唯恐稍有怠驰。惟同时我全国人民尤须切实认识者，即本党革命建国之目的在于完成训政，实施宪政，奉政权于人民。此一使命，不独本党应竭全力以赴之，尤须全国人民觉悟于国家之需要，一致为积极之努力，始能迅速奏功。苟全国人民不能服膺本党之主义，相与积极努力，实现训政完成之先决条件，日月易逝，坐令总理革命建国之大业不能如期告成，岂惟本党之疚戾？而国家民族之前途将不堪问！本党所愿为全国人民剀切道之者。此其四也。

上之四端，本党在最近期内所戮力自矢之中心工作。本会议以为军阀余孽不足平，反动势力不足畏，封建遗毒不足除，患在我全党同志不能确认总理遗教，勇猛精进，一致努力于革命之建设。本会议又认为帝国主义之侵略不难排除，国际平等之目的不难达到，患在我民族不能刻苦黾勉，示人以不可侮之力量。本会议更认为危机无过于散漫，腐化无过于怠驰，苟本党能扫荡军阀之武力于前，而不能克制民族之惰习于后，则革命成绩将无保障。苟本党不能以主义政策解除人民之痛苦，不能以实际建设巩固人民之信仰，则过去牺牲为虚掷。目前中国非和平无以纾民困，非统一无以致和平，非铲除割据自私之军阀余毒，无以巩固统一之基础，非努力训政与建设，无以防止军阀之再起；而尤非厚集全国之一切力量，不足以言建设。因果倚伏，如环无端。将欲突破一切之困难，自求奋斗之生路，唯有全党同志、全国人民淬励奋发，向前迈进，以主义为先驱，以牺牲为后劲，誓以坚毅之决心，一致完成训政与建设。人民实际痛苦之解除在此，民国基础之巩固在此，即一切反动势力之消弭，国际平等之获得，亦莫不系乎此！愿失忠矢勇，一德一心以图之。谨此宣言。

材料二　会议纪要

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即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惟以时间所限，对于大会一切决议案之推行未及十分具体的讨论。自总理奉安典礼告成，中央最主要之工作，乃为确立训政时期之党、政、军事、建设方案，使在一定期间见诸实施；爰定于六月十日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完成此任务。

十八年六月十日上午十时，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会式，到委员林森、蒋中正、叶楚伧、胡汉民、戴季陶、谭延闿、林云陔、刘峙、刘纪文、杨树庄、孙科、王伯群、古应芬、周启刚、恩克巴图、朱培德、孔祥熙、邵力子、王柏龄、丁超五、克兴额、王正廷、赵戴文、刘文岛、张群、赵丕廉、方振武、陈肇英、陈果夫、陈立夫、刘芦隐、张道藩、朱家骅、方觉慧、吴铁城、桂崇基、余井塘、程天放、邵元冲、缪斌、李文范等，及政府各机关代表等共二百余人。主席胡汉民。仪节：(一)中央委员就位；(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遗嘱。(六)静默三分钟。(七)主席致开会词。〔开会词略。见前《开幕词》〕。(八)奏乐。(九)礼成。礼成后，即在中央第一会议厅开会。主席胡汉民。如仪开会，主席报告：本日出席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已足法定人数，但议案尚少准备，故先开预备会一次。

决定事项：(一)冯玉祥业经开除党籍，并革除其中央委员，应以王伯群递补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二)推叶委员楚伧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秘书长。(三)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分为以下四组：党务组、政治组、军事组、建设组；其人选下次决定。(四)推蒋中正、胡汉民、谭诞闿、戴传贤、孙科五委员为第二次全体会议主席团。(五)全体会议会期定为五日至七日；上午七时至十一时开会。(六)明日上午七时开正式会议。

六月十一日上午七时正式会议第一日。主席蒋中正。议决：(一)冯玉祥业经革除中央委员，应由王委员伯群递补。(二)推定分组审查委员。推吴敬恒、陈果夫、刘芦隐、张道藩、余井塘、周启刚、桂崇基、克兴额、邵力子为党务组审查委员；由陈委员果夫召集。推赵戴文、李文范、程天放、方觉慧、缪斌、古应芬、林森、朱家骅、邵元冲、王正廷、丁超五、陈布雷为政治组审查委员；由赵委员戴文召集。推杨树庄、朱培德、王伯龄、刘峙、鲁涤平、方振武、陈肇英、赵丕廉为军事组审查委员；由朱委员培德召集。推张人杰、王伯群、孔祥熙、吴铁城、刘纪文、陈立未、陈耀垣、张群、恩克巴图、刘文岛、林云陔为建设组审查委员；由孔委员祥熙召集。(三)常务委员所提各案分交四组委员审查。(四)从明日起，开审查会三日；星期六继续开正式会议。

十五日上午七时，正式会议第三日。主席孙科。议决：(一)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二)分区剿匪案。(三)继续执行编遣会议决议案。(四)确立农业政策为发展工商业之基础案。(五)训政时期之规定案。(六)完成县自治案。(七)普及教育案。(八)二五减租案。(以上各案全文均见决议案)同日午后五时，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开第三次会议。

十六日上午十时，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开第四次会议。

十七日上午七时，正式会议第四日。主席戴传贤。议决：(一)拨用庚款发展建设事业案。(二)改善工人生活，改良工作制度案。(三)积极进行导淮治河工程案。(四)关于矿产之开采案。(五)确定行政事项之统属案。(六)关于大学区制之存废及建设委员会之归并问题案。(以上各案全文均见决议案)

同日下午三时继续开会。主席戴传贤。议决：(一)人民团体组织方案案。(二)关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本党总章各级权力机关产生方法之解释案。(三)关于司法制度之完成及其改良进步之规划案。(四)治权行使之规律案。(五)关于蒙藏问题案。(六)于最短期内整理铁道行政案(以上各案全文均见决议案)。

十八日上午九时，正式会议第五日。主席蒋中正。议决：(一)常务委员会报告关于处置冯玉祥叛乱事件之经过案。(二)整顿并发展教育案。(三)本会议宣言。(四)所有大会未及讨论之案均交常务委员会。十一时举行闭会式，胡委员汉民致闭会词，散会。

(摘自《中华民国史资料》文史出版社)

历史内幕

井冈山的诉说——袁文才、王佐被杀冤案真相

两条“绿林好汉”成了红军团长

袁文才、王佐，原都是“绿林好汉”。

袁文才，又名选山，1898年生于宁冈县的茅坪。读过初中，在当时算个不小的知识分子。25岁时，为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家被查抄，老母被害。为报仇雪恨，他带领妻、儿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组织——胡亚春的马刀队。与胡结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马刀队与宁冈县政府谈判，马刀队改编为县保安团，改编的条件是：受编不受调，下山不交枪，保持组织独立，行动自由。袁文才任团长。大革命时期，袁文才率部起义，保安团改为农民自卫军，袁任总指挥。在此期间，袁文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占据井冈山的大门——茅坪，占山为王。

王佐，又名云辉，绰号南斗，1898年生于遂川县。家境贫寒，不到10岁就出去打短工，帮助母亲做豆腐卖，12岁时跟别人学裁缝。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曾随武师学习拳术。20岁时，参加了当地的绿林组织。1925年，由于国民党军队进剿，王佐等被迫接受了“招安”，王当了“新遂边陲保安团”的团长。后因保安团内有人要谋害他，逃到茅坪，找到袁文才，在袁的帮助下，在井冈山的中心茨坪重新掌握了武装。袁文才、王佐脾气相投，一见如故，同为绿林首领，遂结拜为盟兄弟。1927年初，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王佐把自己掌握的武装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王任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在赣西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王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后国民党军队对农民自卫军进行大规模“追剿”。在强敌压境、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袁文才、王佐分别撤到井冈山下的茅坪和山上的茨坪，以高山密

林为屏障，与敌周旋，坚持斗争。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向罗霄山脉的中段转移。10月3日，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决定与袁文才、王佐联系，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为解除袁文才的疑虑，10月6日毛泽东徒手进山，向袁介绍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革命的前途，还送他100支枪。袁文才深受感动，回赠1000元大洋，并帮助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了医院、留守处和教导队，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下茅坪安了家。

此后，毛泽东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王担心苦心经营的武装被工农革命军吃掉。毛派何长工做王佐母亲的工作，因王是个孝子。毛泽东送王70支枪，王回赠500担谷子。王佐的疑惑消除后，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经袁文才、王佐同意，1928年2月，毛泽东将他们掌握的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后称三十二团，袁、王分任正、副团长。

毛泽东热诚关心两位团长，袁、王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由于人员混杂，又有浓厚的绿林习气和封建落后意识，经常在编不听调，不太好管理。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耐心教育、积极改造、诚心团结的态度，使这两支绿林武装终于成为革命军队的一部分；袁、王二人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逐步完成了由绿林好汉向革命者的转变。

袁文才有文化，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与毛泽东谈得来，两人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鲜为人知的是，袁文才还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的促成者。

袁文才、王佐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创建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提供了立足之地，使井冈山成为革命的摇篮，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立下的大功，做出的重大贡献。

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初期，对外仍称保安团，经常深入白区，保护革命军的行动，暗中开辟交通线，配合革命军运送物资和转移伤病员。

1928年3月，王佐率部随军去湖南迎接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王佐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消灭了敌人的两个团，使朱德、陈毅的部队顺利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由于王佐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政治觉悟不断提高，这年5月，参加了共产党。

1928年7月，红军主力开赴湖南，袁文才、王佐留守井冈山。这时国民党军队乘隙而入，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会剿"，占领了永新、莲花边界地区。袁、王率领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实行坚壁清野，四面出击，敌人找不到粮食，没有饭吃，处处挨打，穷于应付，最后不得不撤出井冈山地区。

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袁文才、王佐率领三十二团的部分部队，在朱砂冲、桐木岭、双马石、八面山四大哨口，以竹钉、滚木、礌石等原始武器，击退了两个团的民团的进攻，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指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1929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解决根据地军民经济给养上的困难，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到根据地外围打击和牵制敌军，由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出征。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守山的红军浴血奋战三昼夜，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等哨口先后失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五军撤出井冈山，由王佐率领三十二团和红五军的一个大队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王佐率领部队不断袭扰敌人。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王佐及其家属和部队夜宿山洞，身盖树叶，毫不动摇，坚持斗争。直到三四月间，时局发生变化，大批敌军撤离，王佐集结部队出击，井冈山才又回到人民的手中。

此后，王佐先后担任宁冈、永新、莲花三县独立团团长、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他率部狠狠打击地主武装——靖卫团、挨户团，开展游击战争，连续攻克几处县、镇，解救了很多革命同志和受苦群众，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他坚守根据地，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使井冈山这面红旗始终不倒。

为了加强井冈山根据地的防务和建设，王佐与又返回井冈山的袁文才悉心筹划，积极工作，先后办起了小井红光医院、上岭被服厂、茨坪军械处、各团留守处、粮库、公卖处等，还进一步修筑了黄洋界等五大哨口，使之成为凭险据守的御敌阵地。他们还筹集了大批粮食、油、盐、布匹、棉花、弹药等。这些对发展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袁文才、王佐对革命事业的功绩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他们除担任上面讲到的职务外，还担任了其他重要职务。如：他们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正、副主任，袁文才还担任过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军军委委员、红四军参谋长等。

"土""客"籍矛盾蕴藏着危机，"左"倾决议为发生悲剧提供了根据

在湘赣边界、鄂南和闽、粤北部，长期存在着"土"、"客"籍之争。土籍是祖居此地者；客籍是几百年前从北方迁来的居民，繁衍相传，已有几百万人。一般来说，土籍居

平地，客籍占高山。由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土、客籍成见很深，经常发生争斗。往往是土籍掌权，客籍受压迫。大革命时期，宁冈县广大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由土籍劣绅控制的政权，两者关系有所缓和。大革命失败后，地主豪绅恢复了统治，土、客籍矛盾依然如故。

这种矛盾也反映到共产党内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中。宁冈县素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即土籍掌握党组织，客籍控制枪杆子。袁文才、王佐都是客籍，都有一部分武装。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则多是土籍。

袁文才、王佐自恃手中有枪杆子，对边界特委有时不够尊重，不太服从领导；边界特委则认为袁文才、王佐"图谋不轨"，想占山为王，是潜在的敌人。因此，袁、王与地方党组织之间蕴藏着危机，潜伏着矛盾，迟早要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内出现了"左"的情绪，在组织上的表现是要求革命队伍纯而又纯、不能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人。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县，在古城开会研究如何进入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掉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批评了这种主张。毛说：袁、王与统治阶级有矛盾，他们同情贫苦百姓，袁文才还参加过大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对他们应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态度。当时，这些人虽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

1928年6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但也有"左"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了充满"左"倾色彩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在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中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对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1928年12月，红四军前委传达这个决议时，因袁文才、王佐也在场，前委常委决定，不传达上面那段内容。此时又有人提出，根据这个决议，应杀掉袁文才、王佐。但再次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说：他们已是红军的指挥员，都参加了共产党，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不应这样对待他们。

当时，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认为："危害边界的第一势力就是土匪，……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处处对我们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由此可以看出，"六大"的那个决议，已成为某些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根据。这是袁、王被杀的根本原因。

袁、王被杀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悲剧终于发生了

1929年1月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会剿"，红四军主力决定进军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由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王佐率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根据地。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出征。

红四军行军至吉安县东固时，袁文才在军政治部看到了"六大"那个决议的全文。他非常不满，又深感不安。加之对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一时没有经得起考验，擅自离开部队，潜回井冈山。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躲在王佐家里不敢露面。王坚持原则，将袁的情况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对袁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袁也作了认真检查。宁冈县委根据袁文才的一贯表现、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和认识错误的态度，给了他党内口头警告处分，并让他继续工作，担任宁冈县委常委。此后，袁文才在扩大武装力量、发展红色政权、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当然，中共"六大"的那个决议，对袁文才、王佐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袁潜回井冈山后，对王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此后，袁、王时时警惕，处处提防，生怕出现突发事件。如某日，彭德怀到三十二团，黄昏后，红五军来人接彭回去。王佐很紧张，立即拿出了手枪，其部下也都把枪端起来了。由此可见，关系相当紧张，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发生悲剧的导火线终于出现了。

1930年2月中旬，袁文才、王佐率部袭击茶陵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俘虏了国民党五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袁、王想趁机把罗掌握的一个兵工厂搞过来，未请示边界特委，就将罗带上井冈山劝降，也未收缴罗部下的300多支枪。边界特委负责人认为袁文才、王佐勾结地主武装，要叛变投敌，遂下决心杀掉袁、王。

2月22日，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县城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源罗织罪名，说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地主武装、破坏苏维埃政权等。袁文才不服，据理辩驳。彭清源拿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强逼袁承认这些"罪状"。王佐是个烈性子，也拿出手枪放在桌子上，与彭清源对峙，互不相让。

边界特委要除掉袁文才、王佐，但手中没有武装，不敢贸然行动。于是，他们想向红五军借兵。联席会后，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来到红五军，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边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上，强迫边区特委把边区地方武装由他们改编，如不答应这个条件，参加会议的人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还说：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往桌子上一放，态度十分蛮横。朱昌偕提出要求：事情万分危急，请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险局势。彭德怀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一个营和红五军共同行动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

样快?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擅自离队潜回井冈山后挑拨起来的。

事情如此突然,且时间十分紧迫。彭德怀立即召开红五军军委临时会议。会议决定派四纵队一部分,先接近永新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和袁文才、王佐谈判,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23 日夜,四纵队党代表张纯清率部到达永新县城的浮桥,被袁文才、王佐察觉,袁、王即率部分人从城内冲出,双方交火,袁在桥上被打死,王坠入河中溺死。袁、王部有 20 多人逃回井冈山,其余在城内未动,边区特委将他们改编为湘赣边区独立团,由特委直接领导。

袁文才、王佐被杀害后,井冈山即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几次想收复,均未能攻上茨坪。

关于袁文才、王佐被杀害情况,还有另一种说法: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于杀袁、王之夜,召集一些人开会,宣布特委命令:今夜解决袁、王的部队,缴他们的枪。23 日拂晓,从红五军借来的一部分部队赶到永新城,包围了袁、王的住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闯进袁文才的房间。袁听到动静,急忙摸枕头下的手枪,未来得及开枪,被朱昌偕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立即冲出房门,越城逃跑,欲奔回井冈山。由于必经之禾河的浮桥已拆掉,在涉水渡河时被溺死。

杀掉袁文才、王佐,当时很多人就有意见。何长工等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说:杀错了,要平反,并批评了坚持杀袁、王的那些人。

全国解放后,1950 年,中共江西省委为袁文才、王佐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深情地回忆了 30 多年前那段往事后,特意将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和王佐的家属接到井冈山宾馆,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并合影留念。这是对生者的诚挚慰勉,也是对逝者的深切怀念。

(作者赵友慈,选自《人物》95 年 4 期)

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创建始末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鄂西苏区除洪湖红 6 军外(军长孙德清,后旷继勋、段德昌),还有鄂西长阳县的红 6 军。长阳红 6 军是一支以土家族优秀儿女为主体的正规红军武装,也是中国红军史上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

长阳县,地处清江中下游,东与宜都接壤,南与五峰相连,西接巴东县,北与秭归、宜昌毗邻。面积约 4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25 万,土家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70% 以上。

1925 年"五卅"运动后,在武汉、宜昌等地求学时入党的土家族青年知识分子刘继和、郑乃亦、李子俊等人返回长阳,利用教员职业和社会关系,开展党的活动。1926 年冬和 1927 年春,中共湖北区委和宜昌地下党组织,先后指派长阳土家族共产党员田进武、李勋、龚良鹏、陈泽南、郑良品、胡荣仁、胡荣本等人回长阳,利用国共合作和北伐军胜利造成的革命形势,以筹建国民党长阳县党部的合法地位,发动工农运动,建立了中共长阳特别支部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并初步掌握了工人纠察队和县警备队。

大革命失败后,长阳的工农革命运动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党的组织受到相当的破坏。中共"八·七"会议以后,鄂西特委派罗正品、龚良鹏等前来长阳和五峰,帮助整顿恢复两县党组织;同时指示张国清、胡荣仁、陈泽南等长阳党员,恢复或新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农民武装队,准备举行秋收暴动。不久,鄂西特委又派段德昌前来长阳巡视指导,并与陈泽南、张国清、胡荣本等长阳党员计定,以流溪、都镇湾地区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秘密组织武装小组,准备武装暴动。

1928 年初春,打入国民党第 43 军的土家族共产党员李勋,被委任"督导员"回长阳督导"清乡"。长阳党组织决定,利用当地驻军派系矛盾和李勋的影响,派党员干部打入各级"清乡委员会"和团防,顺势发展武装。陈泽南利用社会关系,以"防匪保家"为名,在流溪组织了"人民自卫团"。土家族共产党员李进川、李步云等在都镇湾以办"团防"的名义,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到 7 月底,长阳的党员发展到 100 余人;"长阳游击战争已经发动","在党的引导下可以参加行动的有一千人"(参见《中共鄂西特委及曹壮父的报告》,1928 年 8 月 17 日)。9 月间,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派陈寿山到长阳,协助组织武装起义以策应红 4 军的行动;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亦派罗正品亲往长阳指导党的工作。10 月,长阳党组织将向泉山、向高龙等共产党员掌握的西流溪等地的"神兵"、"大刀会"与陈泽南领导的"人民自卫团"合编为长阳农民游击队。此后,游击队"屡与军队接触,曾获得多次的胜利"(参见《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1 月 15 日),进而锻炼了游击武装,扩大了党的影响。

1929 年 2 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决议,总结工作经验,着重讨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3 月,中共长阳县委乘"蒋桂战争"爆发,鄂西敌正规军锐减之机,发展革命形势,控制了县"保卫团"、"常练队"和重点区、乡团防武装。时任县"保卫团"副团长的李勋根据县委指示,加紧开展地下活动:以加强县"常练队"的名义兼任"常练队"大队长;安插党员与骨干分子担任区、乡团董;将我党掌握的团防武装集中"军训";派人外出购买枪支弹药。

1929 年 5 月,中共长阳县委决定由李勋以"剿匪"为

名将县“常练队”拉出县城开到西湾，有意造成县城空虚。尔后由陈泽南带领游击武装乘机攻入县城，救出一批被捕同志和革命群众，镇压了一批反动分子，打败了专与游击武装为敌的第三区团防，旋即全队开到西湾与“常练队”会合。7月9日，长阳县委在西湾召开工农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参见《鄂西巡视员万涛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4日)。李勋任军长，陈寿山任副军长，李子俊任参谋长，陈泽南任军法处长，李步云任政治处长，陈兴垣任军需处长。组成了由罗正品为书记，李勋、陈寿山、陈泽南、李子俊等为委员的中共红军第6军前敌委员会。全军约1000人，400余支枪，编为1个师，下辖3个团。向泉山任师长，涂龙任特务团团长，姜梦雄任炮团团长，向高龙任神兵团团长。

红6军成立后，随即在资丘、麻池、马连、城五河、卜岭、水竹园等地展开，宣传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破仓分粮，筹措军饷。广大青年农民踊跃参军，部队迅速扩充到1400余人。经过短期整训，这支红军武装的军政素质有了长足进步，深受工农群众的拥护。红6军的成立及其斗争，引起了长阳土豪劣绅与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恨，他们蠢蠢欲动，伺机进攻红军。红6军前委决心先敌而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红军游击活动。7月底，红6军突袭沿头溪反动团防48大家之一的邓甲山、邓世泽部，击溃团丁100余人，邓甲山只身逃窜，邓世泽当场毙命，红军缴枪30余支。首战告捷，军心大振。红6军前委决定乘势东进，攻打长阳县城。途中，与敌正规军陈凤诏团遭遇。红军仓促接战，给敌以杀伤后撤出战斗。敌军紧追不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6军前委率部向五峰、桑植方向转移，试图寻找红4军会合，伺机重返长阳。

8月初，红6军进至资丘镇作短暂停留以筹措给养时，因失去警惕，被敌第4师所部三路包围。红军三面受敌，一面临水(清江)，被迫背水一战，损失惨重。军参谋长李子俊率队20余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时全部牺牲。军法处长陈泽南与师长向泉山等70余人被敌捕获后遭集体杀害。副军长陈寿山带少数战士突围后，在长阳、巴东边界被土匪所杀害。军长李勋带黄超群等近50名战士突出重围后，转到鹤峰邬阳关一带，建立了红6军第38团(后编入红4军)。9月，李勋带十几名战士返回长阳准备重建红6军，被榔坪反动团防诱杀(参见《鄂西巡视员万涛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4日)。

军政治处长李步云和团长姜梦雄带部分战士拼死突出重围后，转移到清江南岸长阳中部地区，陆续召集部分失散的战士，组成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不久便发展到200余人。10月下旬，中共湘鄂西前委鉴于鄂西敌人兵力空虚，决定率红4军东进五峰、长阳，扩大游击战争，于12月攻占长阳县城。在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前委的指导下，长阳县党组织将李步云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和茅坪起义的农民武装队的500余人编为长阳红军独立师，由黄超群任师长，姜梦雄任副师长，李步云任党代表。1930年2月，红4军离开长阳东进洪湖苏区，长阳独立师在中共长阳县委和长阳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为巩固鄂西苏区做出了贡献。

(作者：茂生，选自《军事历史》91年2期)

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

1929年初秋的一天，一辆别克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中央巡捕房，由福州路经河南路折入法租界，然后畅通无阻地开至毕勋路梧桐树浓荫深处。车门开处，走下一位头戴礼帽、颇具风采的中年男子。此人正准备将一份刚刚获得的紧急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一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祖籍广东，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十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就在此时，杨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的初春，蒋介石在总司令的盛装之外又戴上了军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政会主席的桂冠。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翦除政敌，蒋指令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与军统齐名的中统的前身。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擢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集共产党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外，还拟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为了在上海这个“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经慎重考察，决定由杨登瀛出任上海特派员。于是，杨剑虹代表陈立夫两次拜访杨登瀛，正式要他出山。

此时的杨登瀛，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看透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与腐败政治，不愿意为其卖命，但政治信

仰又与共产党人有距离，因而举棋不定。时陈养山因农村暴动失利而由浙返沪，暂居杨宅。杨与陈养山多次倾心长谈后，意识到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勇敢无畏，将来之天下必定是共产党的。经再三考虑，便向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便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抓住这一良机，与杨合作。周恩来得悉此事后十分重视，派陈赓同杨面谈。

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杨登瀛依约走进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要与传奇人物陈赓会面，杨起初不免有点紧张，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陈赓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不禁渐渐地松了一口气。双方约定：杨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忠诚卫士连德生充杨的保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经费。不久，为提高杨的社会地位，地下党又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杨登瀛也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二

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杨登瀛根据地下党的布署，制订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入其核心圈。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达上海滩，杨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当他得知张道藩在国民党内有一政敌时，便设计将这个政敌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从此张对杨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当然，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须经常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报。经党中央特准、连德生定期将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杨。每当国民党或租界方面刚刚侦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地下党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有时，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杨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杨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事泄和青帮内讧而自杀，但此事并未妨碍国民党对杨登瀛的重用。陈立夫亲自到上海，慎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1929年12月，陈立夫以表弟徐恩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也视杨为台柱，特准杨可自由支取经费，还派人常驻杨登瀛办事处，以便随时转送最新的情报。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杨登瀛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将触角伸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特工。

三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租界内，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视租界为活动基地。因此国民党指令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联络，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杨登瀛便动开了脑筋。他想到了同乡——公共租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获，谭请求杨设法营救。杨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应承，言明日听回信。是日下午杨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谭、杨见面时，那两个工贼已返回捕房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极为感激，请谭赠200银元给杨。杨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此后，兰普逊也与杨熟识。不久，租界方面要杨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兰普逊如获至宝，并得出结论，杨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更看重杨登瀛，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合作。

在兰普逊的眼中，杨登瀛不仅是只手通天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1927年田中奏折出笼后，日本便准备发动对华战争，为此，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活动猖獗，租界内的英日矛盾也日趋尖锐。当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杨登瀛时，杨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其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警务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公共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兰普逊的寓所。后来，兰氏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到杨登瀛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杨登瀛，基本掌握了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动向。

四

站稳脚跟后，杨登瀛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四方汇拢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

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杨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化险为夷。

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宋启荣）经杨登瀛介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 5 万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地下党，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镇压了。1930 年 4 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国外返沪，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哪知黄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周恩来，以换得荣华富贵。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徐恩曾经办，徐让杨登瀛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接头。杨马上紧急通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地下党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向国民党自首的证据，便将这个叛徒抓获并处决。

有一次，杨登瀛接到南京特务机关的密电，称在共产党内部物色到一个告密者，时机成熟时，他会提供重要情报。过了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杨将一公函送往公共租界警务处，杨送去后谭绍良拆开一看，正是这个告密者的报告，巡捕们立即出动，破获了平凉路一地下党秘密机关，当场逮捕 7 名共产党人。情报由自己的手送去，又目睹共产党人入狱的惨景，杨登瀛恨得咬碎钢牙，发誓抓住这个内奸。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四处查访，却一无收获。也是这个内奸合该命绝，竟自己找上门来了。在他看来，杨是党国大特务，投靠杨一定会有好处。一天，杨登瀛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手下人领了一个人进来，口称有要事报告。屏退左右后，此人神秘地对杨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报，并不无得意地描述着自己的“功绩”，杨这才知道上次送情报的告密者就是眼前这个人。他不动声色地把告密者送出门后，立即通过最便捷的联络渠道，向中共地下党报告。得到杨的消息后，地下党立即行动，除掉了这个内奸。

五

营救被捕同志，是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经他救援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 年 9 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外出开会时，被公共租界密探抓住，关入西牢。敌人将他绑在电椅上受刑。这种电刑可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致使神经系统混乱而招供。但这种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制成的野蛮刑具在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任弼时身上完全失效了，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正负电极在任的背部烙出了两个窟窿，但他没吐半个字。中共上海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令杨登瀛出面营救，杨即找到兰普逊，称任是他手下的人，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出狱后，任化妆成画师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长江局组织部长。

1931 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绝密性质的。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文件；而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似乎也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员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考虑来考虑去，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于是，杨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捕房鉴定文件，刘鼎与杨合作，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均为“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已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他配合杨登瀛的行动，装得庸庸碌碌，悲观消极，从而把敌人敷衍过去。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行释放。关出狱后即去香港，旋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就这样，杨登瀛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革命者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回到党的怀抱。

1931 年 4 月 24 日，中共地下党驻沪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即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的所有秘密。由于打入敌特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央和上海党组织才及时转移。28 日，陈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要杨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赓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杨自恃有张道藩这把“大红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两天之后，杨被顾顺章出卖而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诬陷好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被保释出狱。1934 年还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选自《纵横》91 年 3 期，作者苏智良）

中东路事件始末

中东铁路全名“中国东省铁路”，干线西起满洲里以西的国界，与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联轨，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然后入俄境达海参崴。支线自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旅顺。中东铁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政府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中国东北的铁路修筑权，然后以“中俄合办”为名，由沙俄修筑而成，该路 1897 年动工修筑，1903 年全线通车。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1905 年俄国把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其余仍为俄国控制，仍称中东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政府将中东路守军大部调赴欧洲参战，留守中东路的军队为数不多。1917年3月俄国"二月革命"后成立临时政府，中国北京政府表示承认。11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中国北洋政府，视"布尔塞维主义"为洪水猛兽，生怕这种"瘟疫"传染到中国来，又看英、美、日等强国眼色行事，因此迟迟不承认新生的苏俄。中东路俄方留守的军队及铁路员工分为两派，一派赞成并拥护十月革命，一派忠于旧政权，两派间屡起磨擦和冲突。帝俄死党、把持中东路管理大权20年之久的中东路"坐办"霍尔瓦特(D·L·Horvath)自称"全俄政府代表"，宣布中东路及其属地"独立"。"布尔塞维克"党人发动拥护苏俄的铁路员工和守备兵士反对霍尔瓦特，霍氏无法支撑局面，请求中国派警协助维持中东路治安，这是中国真正参与管理中东路事宜的开端。

霍尔瓦特仇视十月革命，他勾结俄国国内与苏俄为敌的谢米诺夫军队，试图以中东路为根据地，策应支持谢米诺夫军队进攻苏俄。苏俄红军反击，谢米诺夫叛军溃败，霍尔瓦特陷入走投无路境地。时值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出兵进攻苏俄，日本乘机派兵进驻哈尔滨和中东路沿线，不断和中国守军发生冲突，造成中东路一片混乱。协约国方面遂在哈尔滨设立"中东路监管委员会"，管理中东路，并委托作为协约国之一的中国就近负责维护中东路治安。1919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吉林督军鲍贵卿为中东路督办兼护路军总司令。9月总司令部成立，护路权完全由中方掌握。鲍贵卿上任之后，立即正告霍尔瓦特："中东路为中俄合办事业，中国对俄国新旧两党无所偏倚，在我国领土以内不容任何党派利用该路作政治运动"。霍尔瓦特暗中仍在密谋策划，积极活动，旋即自称中东铁路总长官，沿线张贴布告，宣布霍氏有权总理一切路务，中方司令部立即下令制止，俄籍工人本就反对霍氏，乘机举行大罢工。1920年初中东路俄籍工人屡屡罢工，霍尔瓦特调动自己掌握的军警镇压罢工，搜捕路界"革命党人"。罢工工人代表和"革命党人"上书中方司令部，请求释放政治犯，撤换中东路旧有"首领"，"取消其军队及侦察局"。借助工人罢工之势，中国军队解除了驻哈尔滨俄国军队、警察的武装，并包围了俄方"护路军首领办公室"，"勒令传谕沿线俄兵营同时解除武装，交中国官吏点收，不得违抗。"中东路全线俄国军警缴械以后，中方又施加压力，迫使霍尔瓦特辞职。至此，帝俄及其死党把持中东路的时代宣告结束。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俄面临叛军和干涉俄国革命的协约国军队的疯狂进攻，处境困难，希望与中国交善，以避免中国成为进攻苏俄的军事基地和敌视苏俄的"白俄势力"的据点，因此于1919年7月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及其他租占的矿产、森林和各种产业。北洋政府对苏俄宣言置若罔闻，不作任何接受表示。1920年7月，苏俄政府派全权代表优林到北京，谋求与中国开议两国平等通商谈判。优林重申了苏俄对华宣言精神，并宣布帝俄政府派遣的公使、领事等所办事务，苏俄政府不负责任，希望中国政府驱逐中东路界内的"白俄"党羽。北京政府竟然拒绝接待苏俄使节优林，除了下令停止旧俄公使和领事的"外交官待遇"外，由于害怕协约国干涉，对苏俄代表的友善表示和通商要求未作积极响应。

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的基本精神，但是关于中东路问题措辞有所变更，申明有关苏俄对中东路之需用事宜，允订专约。时苏俄境内叛军已经溃败，进攻苏俄的外国军队除日本外、美、英、法、意四国已经撤兵，苏俄压力大减，形势看好。北京政府仍不能认清形势，抓住时机与苏俄谈判，收回中东路自办，却与敌视苏俄的势力继续交往，与仍未归属苏俄的"俄亚道胜银行"(由华俄道胜银行改组的中东路投资银行)交涉有关中东路的事宜，坐失了中东路归还中国的良机。

苏俄政权基本稳固以后，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1922年4月5日苏俄在致中国政府外交部的"节略"中，虽然仍重申已经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依然有效，但同时声明："悬案"在"中俄自愿协商解决以前，则俄国在中国之权利尚未失效"。北京政府觉察苏俄对华政策开始"变味"，并由于此时国内民众尤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苏俄宣言"表示热诚欢迎，要求与苏俄交善的舆论压力很大，因此在4月15日致苏俄代表的"节略"中表示：本政府对贵政府""一变前俄政府攘夺政策"，"深表满意"。这个声明比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晚了近3年，比第二次对华宣言晚了近2年，时过境迁，此时的"深表满意"已无法收到当时的效果。

1922年8月，苏俄派越飞来华，继续谋求与中国谈判通商问题。和谈未成，越飞"关于中东路否认前次放弃宣言，且声言该路应归苏俄管理"。道胜银行联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倡议中东路国际共管，中国和苏俄一致反对。列强意欲攫取中东路"共管"，促使北京政府采取与苏俄接近的政策。1923年2月，中苏双方决定举行谈判协商。8月，苏联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来到北京，中国派王正廷督办中苏事宜。9月双方开始谈判，中国代表要求先解决中东路等问题，再谈恢复邦交；苏方代表则要求先谈恢复邦交，然后再谈其他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几至破裂。法、美、日三国乘机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保留中东路原股东及债权者的权利，履行义务；俄亚道胜银行也提出"抗议"，"思图破坏"谈判以保旧权。中国政府为防"横生枝节"，乃向苏俄让步，同意"承认复交与中俄

会议同时举行，并由双方共同宣言否认第三者有干涉中东路之权”。双方继续会谈，中方代表更换为顾维钧。经过谈判，1924年5月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

上述两项文件关于中东路的内容是：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其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备、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东铁路的前途，只取决于中苏两国，不容许第三者干涉；苏联政府同意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其所属一切财产，其款额、条件以及移交手续，另行召开会议决定；在此之前，由中苏两国各选派5人组织理事会，并由中国政府派定华理事1人为理事长（即督办），苏联政府派定理事1人为副理事长（即会办），共同管理经营。并规定10人理事会法定最少人数为7人，议决事项须得6人以上同意。监事会由5人组成，华监察2人，苏监察3人，铁路局长由苏方派人充任、副局长中苏各1人；各处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时，副处长须用苏方人，反之亦然。5月31日，中苏邦交正式恢复。

此时自称东三省总司令的张作霖已宣布东北地区自治，抵制中苏间的达成的两项协议的实施。苏联政府派代表与东北当局会谈。于9月签订了《奉俄协定》，基本内容与上述协定相同，并作了一些补充，如改订1896年所定80年后将中东路及附属产业无偿归中国的期限为60年。至此，中东路实现中苏共管，客货运输繁忙，盈利大增。但是，中苏间纠纷也不断发生。理事会法定人数至少7人，议事须6票赞成方能通过。而各方只有5名理事，这等于各方都拥有1票否决权，一旦认为所议事项有损本方利益，即可行使否决权令其不能通过。这样一来理事会纠纷迭起，形同虚设，铁路事务则全由苏方局长把持。“行政与经济实权，仍操诸俄人高级职员，目无华人”，连苏方“下级职员，亦不受我方高级人员之指挥”。双方各谋利益，磨擦不断发生。

1927年中苏关系“交恶”，中东路方面的纠纷也随之升级。苏俄对外奉行“输出革命”的政策，20年代后又把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中苏关系“交恶”后，在华苏方人员中仍有人暗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1929年5月，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曾召开“共产主义宣传大会”，中国哈尔滨地方政府以此为由，派警察搜查苏联领事馆，查出一些“宣传赤化”的文件与中东铁路苏方人员有关，于是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命令苏方局长：以后局长发布命令，均须由局长和华方副局长共同签署。车务、机务、商务、财务、电务各处原设苏方处长的均交由华方副处长管理。其他原为华方管理的部门不变。苏方局长拒不遵命，7月11日，吕荣寰下令“对于中东路执行紧急处置”，停止苏方正副局长职务，派华方副局长暂代局长职务。并以“反抗命令”为由，遣送59名苏方铁路员工出境。纠纷扩大，冲突升级了。

1929年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等种种要求，限三日内答复。国民政府声明，请苏方派代表协商解决纠纷，未作“惩凶”、“道歉”之表示。苏方发出第二次通牒，并于17日召回苏联驻中国东北的领事人员及苏联委派在中东路工作的职员，要求中国驻苏代表和领事人员离开苏联，还断绝中苏间一切铁路交通，正式宣布与中国绝交。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向边境地区调遣军队，扣留中方车船，派遣飞机进入中国领空侦察。10月，两国军队在满洲里和同江两地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取得胜利，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从磨擦升级至双方兵戎相见，史称“中东路事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日本乘中苏冲突之机，向长春集结军队，窥视中东路，国民政府在与苏战不能胜、相持则日本渔利的情况下，呼吁“非战公约”签约国英、法、美出面调停，遭到拒绝，不得已暗示东北地方当局相机直接同苏联交涉。东北当局派代表与苏方代表在伯力会谈，于12月签订了《伯力会议草案》（苏方称为《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中苏冲突前状态，中方撤去吕荣寰中东路督办（理事长）职务，苏方停止军事行动，重新派正副局长到哈尔滨任职，中东路恢复“中苏共管”运营。

按照“伯力草约”规定，中苏两国正式会议定于1930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新任中东路督办莫德惠为全权代表，但“一再坚持中俄会议仅限于解决中东路，不及其他悬案。”苏联鉴于中东路已恢复原状，“深恐会议一开中东路行将根本解决，于俄不利，故再三延宕”。经中方多次催促，苏联才答应接待中国代表。5月，莫德惠抵达莫斯科，但直至9月正式会议也未举行。因为中国主张会议以有关中东路的“中俄”、“奉俄”两协定为准则，苏联坚持以“伯力草约”为准则，争执不下，致使正式会议搁浅。10月正式会议开始举行，到1931年4月先后举行三次会议，中方提出作价赎回中东路案，苏方提出承认“伯力草约”及通商、黑龙江和松花江航行权、复交等项要求。双方意见相左，会议毫无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东北沦陷，中国已无法保持中东路主权。苏联对中国东北事变表示同情，声言俟中日间东北问题解决之后再继续中苏会议。时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对外主要矛盾，为广泛谋求国际声援，国民政府作出亲苏表示，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关系。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中东路处于日伪包围之中，日伪与管理中东路的苏方人员不断发生磨擦冲突。1935年2月，苏联与日本及伪满洲国在东京签订了买卖中东铁路协定，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竟以1.4亿日元的代价把中东铁路出卖给伪满洲国，等于卖给日本。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义正言辞地指出：“关于中东路之一切事宜，

就继续依照一九二四年中俄两国所订之协定处理，由中俄两国取决，而不容第三者干涉"。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但无法改变中东路为日伪所攫取的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就中东路再次作"交易"，战后苏联"收回"已"出卖"的中东路。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从而控制了东北全境的铁路，拆走了1500多公里铁路线，中东路（时称中国长春铁路）名曰中苏共管，实操于苏联人之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完全回到中国人手中。

（李占才）

张学良枪杀杨宇霆

"东北易帜"之后的第13天，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突然令其部下，在他的公馆"老虎厅"枪杀了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史称"杨常事件"。

张作霖在世时，"少帅"即与杨、常存有芥蒂。

杨宇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初在奉天兵工厂当一名副官，因长于揣摩上意，逐渐取得了张作霖的赏识，倚之为左右手，宠信不衰。他自命诸葛，骄纵恣睢，不可一世，认为除张作霖外，东北系统中应以他为首。为此，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即开始在奉天省中安插党羽，并处心积虑要将奉天全省警察掌握在手。1927年，张作霖于北京就任大元帅，主持军政府，杨宇霆一面俨然形同太上阁揆，阁员多半由他推荐；一面又策动奉天省议会议长范朗清纠合一些省议员，组成请愿团到京，要求张作霖任命杨宇霆主政东北，以固根本。虽然这一建议终为张作霖所拒绝，但杨要取少帅而代之意图，不能不引起了张学良的反感和警惕。

握有大权的常荫槐与杨宇霆深相结纳，成为死党，更使张学良感到是个严重的威胁。

张学良对于杨、常的狂妄行径和野心极为不满，但格于乃父，亦无可如何。这样，张作霖在世时，张学良与杨、常之间，虽无明争，但却暗斗不已，于是双方矛盾也就愈来愈深了。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与杨、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28年6月3日夜一时，张作霖专车离京，清晨抵津，常荫槐上车同行，至皇姑屯前一站，常即下车，皇姑屯出事后，常又驰至现场。张学良尚未得知皇姑屯出事时，杨宇霆即对他说："老帅恐怕出事了"。张学良问杨从何得知，杨说是得自法国公使馆的消息。杨、常的上述情况，不无掩护日本人谋害张作霖之嫌。这是后来张学良将杨、常一并处决之肇因。

张作霖去世后，杨、常取张学良而代之的野心，日炽一日而且逐渐表面化了。杨俨然以父执自居，视张学良为暗弱的纨袴，极度蔑视，以致语言态度，毫无顾忌，对张的官称，杨当众常用小字眼呼之，甚至存在着"就算我要造反，你又其奈我何"的想法。有一次张与杨谈及要执行国民党中央政策问题时，杨竟直言不讳地对张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张学良要杨接替吴俊升遗下的黑龙江军务督办或担任吉林方面重任，杨皆拒之。他在自己公馆内频繁接纳各方面官僚政客，指手划脚，气焰逼人，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概。一时间奔走钻营之士从者如云，此时日本信使更是频繁出没于杨府，杨公馆几乎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此事引起外间种种揣测，张学良当然极其反感。

那时东北军政要员中新老两派基本上对张学良都是忠实的。杨以为老派垂垂老矣，不予重视，而认为新派是他夺取东北大权之障碍。因而千方百计想把新派调离张之左右。但这一阴谋为张所识破，计不得售，于是杨改变方法，凡新任县局长以上的官员，他都一概召见，优礼有加，进行拉拢，且在交谈之间故意流露出东北军政大事概由他来决定之意思。杨之举动，当然使张学良甚感不安。

当时日本人在沈阳所办的《满州报》，突然搞了一次所谓民意测验，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杨宇霆、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并附选票，让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寄给该报馆。杨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并在选票上填上杨的姓名，纷纷寄给该报馆，每天达数千份之多。事后，由杨家卖出的这种废报纸多达数千斤，秘密外泄，更激起张学良的愤恨。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为紧缩开支，首先将军长以上的将官一律改为军事参议官，成立参议官会议，决定裁减兵员办法。每当参议官开会期间，张离开时则由杨担任主席，每遇张询问情况或有主张之际，杨辄露骨加以制止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喧宾夺主情况何等明显。另外，杨经常在背后咒骂张学良说："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并非阿斗的张学良对此岂能容忍！

与杨宇霆紧密勾结的常荫槐既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又兼黑龙江省省长，飞扬跋扈，专横擅权，也极具野心。他一方面在东北铁路上满布党羽：奉山铁路局长顾振、沈海铁路总办刘荣国、吉长铁路局长赵镇、洮昂铁路局长许文国等皆属之。另一方面，以设立黑龙江省山林警备队为借口，将前军法执行总处官兵作为基干，编组队伍，向张所报兵员较少，但实际扩弃很多，武器则由杨掌握的东北兵工厂充分供应。东北兵工厂总办臧士毅，私忖杨、常此举必有他图，乃据实秘报张学良，这加深了张处置杨、常的决心。

东北元老们，受杨、常之排挤，本已痛恨，又鉴于杨、常野心越来越大，且势力急遽增长，甚恐危及张学良和自身，也不时劝张学良处置杨、常。

东北易帜之后,张与杨、常之间矛盾更加尖锐。皇姑屯事件之后,蒋介石屡派代表劝张学良"易帜",归附南京国民党政府,1928年7月中旬,双方代表在北京"六国饭店"达成了"东北易帜"的协议。消息传出,日本侵略者既急又慌,于是千方百计地干涉和阻挠"东北易帜"的实现。国耻家仇交织一身的张学良,不甘心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重蹈其父覆辙,于是在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杨、常站在日本帝国主义一边,竭力阻挠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拼命反对东北"易帜",使张学良与杨、常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1928年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副之,杨宇霆建议"宜设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三人,分驻辽、吉、黑,掌理各省军务",意即由他出任驻辽副司令长官,张愈感芒刺在背,坚拒所请。双方矛盾日益公开化。

易帜前后,杨迭次逼张给兵工厂拨发2000万银元,那时,吉、黑两省经济勉强自给,张与东三省官方银号实际负责人总稽核宁恩承、辽宁省财政厅长张振鹭会商,一时皆无从筹此巨款。当时东北的主要收入,来自各铁路局,因而张又令常荫槐拨付,常竟以各路储备自用为词予以拒绝。杨、常如此明目张胆地对张进行刁难、作弄和要挟,逼使张学良只得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

但真正促使张学良下决心处决杨、常的,是端纳的告密。为疏远之计,张学良曾任命杨宇霆当黑龙江省主席,由于杨宇霆企图想当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进而掌握东北全权,因而予以拒绝,后来黑龙江省长就改由常荫槐担任。前面谈到常借口成立黑龙江省山林警备队,与杨宇霆暗自扩充武装队伍,其武器由杨自东北兵工厂充分供应;另外杨又向捷克订购了3万枝步枪,那时任张学良顾问的端纳,向张学良告密。张学良当即查问了杨宇霆,杨居然坦承其事,张学良质问杨宇霆说:"咱们兵工厂不是有的是步枪吗?"而杨宇霆居然回答说:"没有人家的好啊!"由此看来,杨宇霆不但暗自组织和扩充武装,且要自己掌握的部队装备超过东北军的其他各部。杨、常用心愈加明显,而张处决杨、常之决心也就更为坚定了。

1927年1月7日,杨宇霆在私邸为父祝嘏,一时杨府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盛况空前。东北文武大员咸集,蒋介石、白崇禧、唐生智、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甚至连日本政界要人都派代表到沈祝贺。祝寿之日,张学良亲临道贺,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相待。当时杨宇霆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各方面的贺客,对杨也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心里已经不是滋味,入席时,杨又让直鲁余孽褚玉璞坐居首席,令张学良陪末座,席间张始终以手支颐,闷闷不乐,出于愤慨,未终席而退。这样"杨常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了。

杨父庆寿后的第3天——1929年1月10日,日本人町野武马奉田中之命,以原经手人之资格,第四次向张学良提出"建造"满蒙五铁路之要求,张学良如前以"外交问题为中央之权限"的理由而坚拒,"町野退访杨宇霆,欲将当日在北平商洽结果,拟一公布办法。"这必大损张作霖之"英名",也许是杨宇霆借此对张进行要挟之意。另外,当天下午、杨、常相偕见张,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为督办。张学良托辞拒绝,杨、常仍坚持原意,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逼张立刻签字照办。张学良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命令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数名卫士,于当晚在老虎厅(因有两只老虎标本陈列其室,故名)内,枪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

张学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内部原因。张学良处决杨、常后,既扫除了东北的"变乱之萌",打击了日本的侵略阴谋,也稳固出售部的统治。从此,张学良成了名副其实的"少帅",东北取得了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

(孙长妹)

李济深被蒋囚禁以后

1929年3月12日,李济深受蒋介石之邀,从上海前往南京调解因"湘案"发生而激化的蒋桂矛盾。

李济深到宁后,就去见了蒋介石,建议蒋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希望一切问题通过谈判解决。蒋当面答应,表示赞成和平解决。李济深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等,告知蒋的态度,并劝告李、白有所抑制。3月15日,李济深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8日,在"三大"举行第二次大会时,刘文岛在发言中谈到了"湘案"问题,指责武汉方面李宗仁部叶琪等人,违法抗命,进兵湖南,要求国民政府责令该部退回原防区。李济深亦起立发言,表示赞同。刘的提议获得通过。此案的通过,似乎表明蒋介石对"湘案"问题的态度已经缓和,而实际上蒋介石却仍在向两湖地区调动大军,准备向桂系部队发动进攻。李、白见蒋继续调兵,不顾信义,便致电李济深提出责询。李济深知道受骗,遂复电李、白,内有"如蒋军继续入湘相逼,可予迎头痛击"等语。但此电尚未拍出,就被蒋介石的特务截获。3月19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严斥武汉李宗仁部将领胡宗铎等人。3月20日,李济深公开表示:自己对湘案的处理没有成见,只是希望中央能宽恕一些,使大事化小。现双方军队已经逼近,若过于认真,武汉方面不能忍耐,必然造成严重后果。21日,蒋介石发表声明,表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不许有任何条件,亦不应有什么调停的问题,态度

十分强硬。此时蒋对桂系用兵的军事布置已经完成。同时,从特务截获的电报中,蒋认为李济深是"桂系的首领",遂于3月21日将李济深逮捕囚禁。

据李济深副官龙飞群的回忆,蒋介石逮捕李济深是采用了欺骗手段,其过程是:当天,"蒋介石来贴邀请李济深在蒋介石公馆晚宴,时间将到,曾电话三次催请,故李与副官及警卫人员等,前往蒋公馆赴宴。一到现场,顿觉气氛不同,戒备森严。及入蒋公馆时,由蒋的人员作向导,先叫李的随从副官龙飞群坐在外厅等候,把李济深带入内厅"。接着,"外厅突然进来两个军人,叫龙飞群把公事包交给他们",龙说要亲自交给李本人,"话未说完,两人便强行动手,迅速将龙的手枪与公事包夺去"。与此同时,在门外的李济深的随行警卫,亦被人缴械用汽车押走。李济深被捕后,即被送往"汤山官员招待所"囚禁。后由于龙飞群的一再要求,数日后,龙被准许去汤山,侍候李济深。李济深的警卫人员则被关押一星期后释放。

蒋介石将李济深无理囚禁后,便于3月26日以国民政府名义,对桂系下了《讨伐令》,指责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均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国民革命之障碍",是"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除决定免去他们的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3月27日,国民党三全大会又根据蒋的要求,决定永远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同时蒋介石派遣由朱培德、刘峙、韩复榘率领的三路大军,向桂军发动进攻,向武汉挺进。蒋介石还在九江设立了所谓"讨逆军"行营,亲自督师。此外,蒋介石又采取分化手法,派员收买了桂系高级将领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在桂军内部发动倒戈。在蒋大军逼近武汉时,桂军将领胡宗铎等人见大势已去,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川撤退。蒋介石一面派大军继续追击,一面又以金钱、官职收买桂系将领,在其软硬兼施的逼迫下,胡宗铎等人联名通电下野,所部被蒋军收编。武汉地区的桂军遂全部瓦解。与此同时,蒋介石又通过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携巨款去河北积极活动,收编被白崇禧改编的唐军旧部,瓦解了在河北的桂军。白崇禧被迫逃往香港。蒋桂战争终于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

(姜　平)

历 史 考 证

对"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同看法

陈独秀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一生复杂多变。他早年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五四运动。在党的一大被选为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却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发展到纠集反党小派别,理所当然地为革命所抛弃,在动荡和贫病之中度过余生。许多论者依据他曾参加并领导的托派小集团,认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有的论者提出新观点,认定陈参与托派活动的前因后果极为复杂,不能轻下断语。

参与托派活动的动因。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1929年9月间,被大革命失败搞得惊魂未定,理论上陷入混乱,政治上感到迷茫的陈独秀,通过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的传递,读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文章、讲演稿和书信。他惊喜地发现,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大有相识恨晚之感。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和某些托派分子的劝诱,陈终于加入了托派的行列,并为首组织中国的托派小集团;同年8月5日、10月10日和10月26日,他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述自己对革命的立场和主张,信中观点几乎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稿,足见此时陈已是一个名付其实的托派分子。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和活动,并非出于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信仰,而仅仅因为感激托洛茨基为他开脱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把责任归于中共及其领导人陈独秀。对此,陈强烈地表示不服。并一再拒绝了去莫斯科申辩的邀请。唯有托洛茨基为陈抱不平,在共产国际"六大"和其他一些场合,公开替陈开脱和辩解。陈独秀因此感激涕零,不惜拜倒在他的门下。

有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堕落为托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一向是以"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主张在民主革命时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把两者截然分开,主张"二次革命"。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定条件下,他们却走到一起去了。第一,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断定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开始时提出国共合作的方针就是错误的,由此造成大革命的失败。方针本身就是右倾的,当然就不能指责陈独秀在执行这个方针时犯了右倾错误,这个观点

为陈所乐意接受;第二,托洛茨基认为大革命虽失败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过去,下一次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目前形势尚未成熟,所以必须放弃武装斗争,这与陈独秀的想法如出一辙。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说陈与托有共同思想基础是牵强附会。首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俄国当时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唯一能领导的却是无产阶级。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则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在理论上走的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其次,由于托与陈两人的理论基础的南辕北辙,在实施过程中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左倾,另一个则是右倾。

出狱后是否有联系。1932年10日,陈独秀因同伙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抗战爆发后才获释放。有的论者认为,陈出狱后尽管在组织上没有继续托派活动,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托派还保持着某些联系。如:当他出狱后,党中央为争取他,提出了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三项条件,其中包括要他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加入托派的错误,但没有被陈接受;抗战初期,陈独秀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一方面表现出有抗日的爱国心,另一方面则又在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等根本问题上反对我党主张。

有的论者认为,陈出狱后完全与托派分道扬镳了。如:抗战爆发后,托洛茨基曾指示中国托派,在政治上准备扼翻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对这一左倾口号陈表示愤慨,并公开反对;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的态度上,托洛茨基提出:"保卫苏联"、"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等指示,陈却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指责苏联"站在希特勒方面",公然与托洛茨基大唱反调。

(摘自86年《解放日报》6月18日《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吗》一文,作者达观)

张绍曾被刺探秘

1929年3月21日晚8时许,坐落在天津日租界地旭街利津里的彩凤班楼上客厅里,突然传出了"嘭!嘭嘭!"三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一个仆役打扮的彪形大汉,提着带有硝烟味的手枪从容下楼,出大门向南拐,钻进一辆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汽车里,扬长而去。

这时,彩凤班里乱作一团。那些被枪声惊扰了歌迷酒梦的妓女和嫖客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楼上楼下,互相询问、窃窃议论着。在二楼客厅中央,一个年约50岁左右,身穿古铜色缎皮袍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之中。屋里的人个个丧魂失魄。只有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忙得团团转。他一面虚张声势地叫喊捉拿凶手,一面声嘶力竭地给各处打电话;时而通知医院来人抢救,时而报告检察厅派员检验,直到一辆汽车把受伤者拉走,一场惊乱才告平息。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二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张绍曾昨夜遇刺殒命"的新闻。详细报道了现场情况,而对于行刺原因却讳莫如深。一时间,各种猜测纷纭,有的说是仇杀,有的认为张绍曾既然死于青楼,多半是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稍明底里的人则认定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

张绍曾被害究属何因。谁人指使?这要从头说起。

1923年6月,张绍曾从国务总理任上被逐下台后,虽息影津门,仍关心着国家的和平统一。由于他对北方军阀已经失去信心,便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9月,冯玉祥誓师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后,于1927年率部进入河南,配合北伐军与直系军阀作战,势力逐渐扩大。冯玉祥后来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北伐,直指山东、河北、对张作霖奉军形成严重威胁。在此期间,张绍曾与冯始终保持信使往来。他利用其特殊地位与身份,在天津组织薛笃弼、丁春膏、刘之龙、刘治洲等人,积极收集奉军的军事动态和部署。为了及时把得到的情报提供给冯玉祥,张绍曾不惜重金买了一部电台由丁春膏负责,每天与冯部联系。有时一日数电。他自己也常写信给冯玉祥,询问战况,为冯出谋划策。张绍曾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一旦暴露,必然会引起张作霖的忌恨。所以与冯的联系非常秘密,自己的社交言谈也格外谨慎。尽管如此,还是在一件事上被张作霖看出了破绽。1927年,他的胞弟张绍程(字敬纯),从法国留学回来,想在政界或军界谋个差事,要求哥哥为之引荐。张绍曾认为,当时北方军政界被军阀政客所把持,整个北洋政权在摇摇欲坠。在他们手下没有前程可言。于是,便劝弟弟暂时在家中复习学业,以后有机会再谋职业。张绍程知道哥哥与冯玉祥友谊素深,便要求介绍他去河南投奔冯的北伐军。绍曾不便明言,劝阻说:你要替为兄着想,暂时不可去冯部。"绍程见哥哥这也不允,那也不同意,产生了误解,顶撞说:你已功成名遂就不管弟弟了。好吧,我去闯自己的路,请哥哥不要妨碍我。"张绍曾见弟弟不理解自己的苦衷,只好嘱咐:"凡事谨慎,千万别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张绍程去河南,冯玉祥为他在军中安排了个职务。此事被张作霖探知,对张绍曾与冯玉祥的关系引起了注意。

这时,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投靠了张作霖。孙在1925年任浙江督理时,经张绍曾派人从中联络,曾与冯玉祥约定共同起兵攻打奉张。但浙奉战争在南方打响后,冯在北方却按兵不动。为此,孙传芳以为是张绍曾与冯玉祥合谋欺骗他,想坐观成败,借刀杀人,

因而对张、冯深为不满。他投靠张作霖后，经常在张面前挑唆，说张绍曾代冯玉祥运筹帏幄，而且和冯系一班人秘密往来，策划反奉。这就使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疑起来。

张作霖为了试探张绍曾，派邢士廉到天津，假意请张绍曾出面调停他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息争修好。邢见到张绍曾说明来意后，张听了气愤地说："你告诉大帅，叫他先把军队都带出关外，再来和我商量。"邢士廉碰了钉子，回北京如实汇报。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恨，遂生杀心。张绍曾也知道张作霖必不肯善罢干休。一些朋友劝他离津南下暂避，张绍曾却认为：冯玉祥所率北伐军已打到山东，很快将进入河北境内，急需自己提供奉军方面的情报，在此时刻自己不能抽身他去；况且假若奉张有杀人之心，必然早有部署，走出津门必不容易；加之家人也阻拦他离津，所以未能成行。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格外加强了戒备。他在英租界44号路公馆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再参加应酬活动。

随着北伐战事的顺利进展，京津形势日益紧张。张作霖在都署军事总撤退的同时，也加紧了阴谋杀害张绍曾的策划。张作霖经与直隶督办褚玉璞秘谋后，于1928年3月派亲信王琦到天津，由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出面，在3月21日在天和玉饭庄宴请住津朝野名流。他们怕张绍曾不来参加，事先安排谢玉田、刘茂正两人找到张绍曾的门婿吴道时(吴佩孚继子)，由他带领前往张公馆送请柬。届时，赵景云让绍曾的同乡族叔张觉五(字会卿)亲到公馆邀张一同赴宴，并答应事成之后保荐他为道尹。张觉五曾任江北道尹，赋闲已久，多次投奔赵景云想谋差事。这次见赵当面许愿，自然竭力效命，21日下午5点便到张公馆，催促绍曾同往。绍曾当时因身体欠爽本不想参加，但碍于族叔情面，只好吩咐备车。不料汽车刚开出车库，前轮胎坏了一个，张就嘱咐差役打电话辞谢，表示不能赴宴。张觉五着急地说："瑶蕴(赵景云字)叫我代他诚意奉请，你不去，我怎对得起瑶蕴！"绍曾无奈，只得命司机王以达换上备胎，与觉五同车前往，另有卫兵苏以行、刘富友二人随车护卫。宴后，赵景云又约靳云鹏、张绍曾、张文生、李厚基等十几人，到彩凤班名妓花玉宝(湘阁老六)处喝茶小坐。随从卫士们都被引开去。

这时，有个仆役打扮的人手持信件直径上楼，说有要函面交张总理，急候回信。张绍曾闻报从屋内来到客厅，一面问哪里的信，一面伸手去接。那人迎面就是一枪，张绍曾用左手一挡，子弹穿透手掌。接着又是两枪，一枪由左耳穿入头颅，一枪打进肺部。张绍曾当即昏倒在地，在送回家中后第二天凌晨死去。时年49岁。

张绍曾被杀后，官府大肆张扬，要缉拿凶手。事发第二天，天津县知事兼督署军法官王士申下令把彩凤班的老鸨、妓女、杂役人员一齐逮捕，逐个审问，关押多日。直隶督办公署也通牒日租界警察署协助缉捕凶手。但这套欲盖弥彰的把戏是无法欺惑世人的。日租警察署侦探长刘寿岩一句话揭穿了他们贼喊捉贼的真相。他说："他们杀人却叫我们缉凶，假戏做得跟真的一样，亏他们装的像。凶手下落我们倒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叫他们到大元帅府里缉拿去吧。"张绍曾家人也知道是张作霖派人所为，因惧怕祸及余亲，不敢认真追究。就这样，张绍曾被杀真相一直沉沦下来。

(顾恒敬)

风云人物

张云逸

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人。中国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师参谋长。1929年6月，同邓小平等一起到广西开辟工作。到广西不久，任桂军李明瑞师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10月，率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到达百色，控制了右江局势。12月11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在邓小平和他的领导下，联合韦拔群领导的当地农民游击队，举行了有名的百色起义。随后，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他任军长。到次年6月，建立了拥有11个县苏维埃政权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决定，红七军奉命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但在执行这一错误决定的过程中，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主要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未执行攻打广州的计划。他们在离开革命根据地后，转战广西、广东、湖南边界，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归红三军团领导。红廿军编入红七军后，他改任红七军参谋长。同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他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副参谋长。以后，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博古、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国民党方面于1937年10月达成协议，将原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他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同年11月，他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将地方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敌后抗战任务。1939年5月，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任指挥部指挥和指挥部前委书记。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部在淮南歼灭敌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并任中共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1月19日，因病逝世。

罗登贤

罗登贤(1905—1933)，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原名罗光，亦作罗广，曾用过光生、达平等化名。广东顺德人。出身农民家庭。早年父母双亡，随姐姐流落到香港，在那里读过几年书。后为生活所迫，11岁时就进五金厂当学徒，后又到太古船厂和码头做工。1921年3月，参加苏兆征等发起组织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1925年春，罗登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香港海员工会秘书。6月，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6年，任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市委常委，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12月，罗登贤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香港、广州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在此期间，曾被香港当局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28年6月，罗登贤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罗登贤回到上海，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曾组织领导了上海纱厂、邮务、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此后，又担任过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职。1931年1月，罗登贤参加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对东北的领导，党中央派罗登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东北指导工作。同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罗登贤缺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春，中共满州省委在沈阳遭到敌人的破坏后，他在哈尔滨重建了中共满州省委，并兼任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

罗登贤到东北后，根据东北的形势，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村去，组织民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先后建立了吉辽反日游击队，海伦反日游击队、汤原反日游击队等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后来，这些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了抗日联军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共产党员和先进的工人及爱国知识分子，到李杜、马占山、王德林等部队中去进行抗日工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罗登贤领导下，东北人民建立起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这就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并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了十四年之久。

1932年12月，罗登贤奉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他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开展了反日罢工；同时，他还组织领导铁路工人，开展了反对蒋介石运送军队去进攻苏区的斗争。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的告密，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参加全总秘密会议时，和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一起被帝国主义逮捕。后来，又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在南京监狱。罗登贤被捕后，党曾多方营救；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宋庆龄也曾发表声明，要求蒋介石予以释放。但是，蒋介石还是对他下了毒手。8月1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张发奎

张发奎，字向华。二级陆军上将。曾任师长、军长、方面军总指挥，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在北伐中，参加过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等重大战役，有“铁军英雄”之誉。1927年8月1日，所率第二方面军的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及第三军的军官教官团等，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

“武昌起义”后，张发奎投入广东模范团当兵。次年春，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14年，升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5月，回粤参

加讨袁之役。1917年12月，随“援闽粤军”去福建漳州。1920年8月，返粤任督战队队长，参与驱逐盘据广东的桂系军阀。11月，粤军整编，组建第一师，以邓铿任师长，张发奎升任少校副官。

次年5月，孙中山于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1921年，从第一师抽出三个营在广州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4月，孙中山回师广州，决定改道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张发奎移驻韶关。

这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并进兵韶关。张发奎战败，率该营退入粤北始兴仙人岭。随后，同粤军第一师一起归附陈炯明。9月，调至广州整训，第三营被整编为第一师辎重营，驻番禺官山。不久，改驻肇庆。11月，改隶第一师第二团的第三营，继任营长。

年底，孙中山联络滇桂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张发奎与工兵营长邓演达一起起兵响应，共同组成讨贼联军。1923年1月15日，率部进驻广州。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以李济深为第一师师长，张发奎为该师独立团团长。次年春，独立团改称第一团。1925年春，他率领本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以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叛乱。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驻粤各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扩编成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该军独立旅旅长。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南征讨伐邓本殷之役。年冬，升任第十二师师长，率部渡海占领琼崖，歼灭邓部残余。

8月下旬，张发奎率部随第四军向湖北挺进。这时，叶挺独立团归其指挥。25日，经过通城、崇阳，抵达汀泗桥附近。汀泗桥是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南、北、西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易守难攻，历次军阀内战，均为必争之地。这时，吴佩孚在此布防不下二万余人。

27日，张发奎率领第十二师在右翼高山地带，配合左翼的第七、第八军对据守汀泗桥之敌发起猛烈攻势。苦战一天，进展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当晚8时许，他采纳了所部团长黄琪翔的建议，令该团乘夜渡江插入敌后。同时，以叶挺独立团从东侧夹攻。10时左右，全线同时突击，枪声杀声，震撼山谷。经过彻夜激战，吴佩孚部腹背受敌，无力抵抗，纷纷败退。28日，北伐军攻下了汀泗桥。

10月底，汪精卫从上海到达广州，召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成立政府，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可是李济深是桂系的老大哥，在政治态度上与李宗仁、白崇禧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坚决不同意。而第四军的将领却支持张发奎、汪精卫的主张，但又感到李济深是多年的老上司，不愿与之兵戎相见，于是便发生了一次“护党运动”的政变：

11月16日，张发奎与黄琪翔以前往上海商议国民党重新团结合作为理由，用兵舰把汪精卫、李济深送离广州。在这之前，刚从日本返国到沪的蒋介石，来电请汪精卫北上，会商党事。南京方面的谭延闿、孙科等也再度致电汪精卫，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张发奎与汪精卫便以这两项邀请，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同时，电邀黄绍竑从南宁到广州一晤，商谈和李济深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可是，李、黄不知是计。

在送走李济深的当天晚上，张发奎、黄琪翔就发动了反对李济深的政变。未几，广州市到处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一类标语。李济深的留守部队被包围缴械，黄绍竑的寓所和其他军政机关被包围。黄得报后，连夜化装潜出寓所，逃出广州。17日，张发奎等宣言反对南京特委会，得到蒋介石的支持。19日，他行使广州军事委员会公会主席职权，集结大军于东江、西江、北江，准备与李济深、黄绍竑的部队作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起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他就率部进驻湖北宜昌、沙市。9月初，蒋介石下令调第四师移防陇海沿线，企图在途中将该师缴械。张发奎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便拒不从命，决定再次反蒋。

这时，汪精卫、陈公博等在上海组设“中国国民党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号召反蒋。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于9月17日发出反蒋通电。随之，被委任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再次发出反蒋通电。当时，由于反蒋的共同利害，桂系对张发奎的举动表示欢迎。汪精卫也给李宗仁发出电报，希望捐弃前嫌，共为改革本党而奋斗，并着张发奎军改易番号，归李宗仁节制。这样，双方重新合作，共同反蒋。

1935年春，张发奎从欧洲回国后，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决心抗日。未几，他在南京面见蒋介石，说：“今后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当即口头答应，并许他“日后抗战充先锋”。

次年春，张发奎任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1937年春，改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驻嘉兴县，负责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揭开了序幕。最高统帅部适时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任左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并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三个师，以及张肇基的独立旅、炮兵第二旅第二团。同时，刘建绪之第十集团军也归入右翼军之序列。当即，他令张旅推进浦东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务，李师移往上海方面，使其适时策应左翼军之作战；以刘尚志师推进至松江附近，控制为集团军之总预备队；刘建绪部则由衢州向杭州推进，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宣告撤销，张发奎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

这年1月5日，国共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根据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执行停战令。当三人小组前往广州，要求把中共在广东的曾生东江纵队和在海南岛的冯白驹纵队调往北方时，张发奎断然拒绝调处，说广东方面根本没有中共的军队。马歇尔认为他破坏了调处，便告知了蒋介石。

辽沈、淮海战役后，张发奎与薛岳等广东派，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子文被迫辞职，余汉谋、薛岳分别被蒋介石委为广州"绥署"主任、广东省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总司令之职。

1949年2月，张发奎又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相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企图在广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割据局面。

3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张发奎就任陆军总司令。他劝李宗仁代总统清除蒋介石的掣肘，以两广为基地反蒋反共。他还建议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起来，但计谋未成。7月，他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于香港。3月13日，叶剑英元帅向他的家属发了唁电。唁电全文如下：

香港

张向华将军家属礼鉴：

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

叶剑英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李济深

李济深，于1885年出生在一个亦耕亦读的富农家庭。他的先代是江苏人，约于明朝时迁移到广西苍梧县，祖父是清代秀才，父亲是廪生，都以教书为业。他六岁时父亲去世，跟随叔父读书，放学后便参加田间劳动，或上山放牧，自幼养成勤劳朴实的作风。十二岁时入大馆（指乡下请有功名的老师教书），学做八股文。"维新变法"废八股后，改学策论。兴学堂后，他进入梧州中西学堂就读（梧州知府庄蕴宽主办）。当时一般人都认为该学堂与外国教会有关系，故非常厌恶，把入学堂的人名之曰："入教仔"。李的岳母也反对他在这所学堂读书。他十八岁那年被庄蕴宽选入黄埔陆军中学读书。两年后，该校被陆军部取消。他随班并入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来调到新军学兵营任排长，与连长、著名的同盟会会员邓铿成为莫逆之交。在新军任职不到一年，他又入讲武堂学习。1910年，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来改为陆军大学），要各省选人去深造，他被选送入校，攻读高等军事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和校内师生一起投入反清斗争，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浏河铁路桥，以阻拦清兵南下。翌年，广州光复，组织北伐军，姚雨平任军长。是年，他在上海遇到姚，便到姚部任作战参谋，参加了固镇、宿州、徐州等战役。不久，南北停战议和，副总统兼大元帅黎元洪通电解甲锁兵。李济深调任第二十二师参谋长，随部回广东。1913年，保定陆军大学迁至北京开学，李重返陆大完成了学业。当时广东是在镇守使龙济光控制下，李济深不愿回粤任职，以优异毕业生留校任教。在陆大任教五年，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如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

1920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当时，李济深正南下省亲，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邀请到了广州，先后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参谋长。1922年4月，孙中山在韶关设大本营，部署对掌握北方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作战。5月初，第一师在右翼总指挥许崇智的指挥下，从韶关出发，经江西全南、龙南、信丰、王母渡向赣州攻击前进。6月5日，攻占赣州。当部队正向南昌进军时，广东内部发生陈炯明围攻总统府的反革命政变。李济深和师长梁鸿楷奉孙中山的密令，率部随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返粤靖乱。但第一师成分复杂，有四分之三的力量是陈炯明的旧部，所以他与梁商量：无论拥孙讨陈，或拥陈倒以广东军务督办之职。于是，刘、杨称兵作乱，背叛广东革命政府。6月5日，胡汉民以代帅名义免除杨希闵滇军总司令、刘震寰桂军总司令及韦冠英桂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并密令东征联军许崇智部回师广州。李济深奉命率第一师协助湘军谭延闿部经三水、新街向广东前进，配合许部及黄埔学生军，于12日收复广州，杨希闵只身逃往香港。接着，他又率部协助朱培德部，在西北江地区将刘震寰部包围缴械，刘兵败遁逃。

8月，李济深奉命同冯祝万，李民欣、邓世增等人到广西南宁，负责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共同议定了两广军政统一事宜。军事方面，两广共同出兵消灭南路军阀（陈炯明部）申葆藩、邓本殷部；政治方面，广西按照广东国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组织省政府，党务方面，广西设立省党部。经李济深一番工作后，李宗仁、黄绍竑等都向他表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恰在此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遭歹徒暗杀，李济深闻信后，于当月20日赶回广州，当机立断将廖案涉嫌的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扣留，并接替其军长职务。是月26日，以汪精卫为主

席的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军政，决定编组国民革命军，李济深正式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新一代军阀脱胎而出，国共两党合作濒临破裂。1927年初，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李济深亦追随蒋介石在广州进行“清党”反共活动。4月2日，他与李宗仁、黄绍竑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开会，策划反共方针和叛变革命的步骤。在会上，他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并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即“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名义，命令各个部队清除中共”，并电告广州留守人员“清党”决策。随即他由沪返粤，委钱大钧为戒严司令，实行“清党”。15日凌晨，钱大钧指挥军队和反共的“工会组织”向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同时发动攻击和搜捕，并派部监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余，封闭工会团体二百多个。他还组织广州特别委员会，宣布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通令全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并亲自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布置“清党”。对代理校长方鼎英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学校。”此后，他又在军校特别党支部内成立了“清党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后方留守部，以胡靖安等极端反共分子为执行委员，任意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6月，他又在广东进行第二次“清党”。总计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二千一百多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肖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都是在这次“清党”中被杀害的。他以后在回忆中说道：“可恨我当时认识不够，听从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张静江等人怂恿赞成了清党主张，及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赞成了宁汉分裂之势，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李济深便与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等多次酝酿讨论成立国民党民主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他被选为主席。9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召开伪国大，颁布“戡乱”动员令。李济深拒绝出席会议，公开支持各地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运动。1947年2月，他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转赴香港，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的声明：(一)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自动将军队撤回1946年1月13日以前原驻防地，以示结束内战之诚意。至双方军队撤出地区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暂由当地人民实行自治自卫，为过渡办法。同时全国停止征兵征粮，以保证内战之不复发生。(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费巩等一切“政治犯”。肃清特务，开放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三)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根据民主原则，经过普选方法，产生真正国民代表。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四)切实遵照总理民族主义之遗教，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撤退一切外国在华驻军。切实保护爱国运动，及海外华侨。(五)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从事垦殖及其他生产，并停止通货发行，对现在飞涨物价，作釜底抽薪之计，以安定民生。(六)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并救困乏农民、失业工人、灾民、伤兵、公务人员及海外侨胞，动员全国力量，从事建设。(七)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重选各级领导机构，废除党内独裁；培养民主作风，并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他将此发表于香港《华商报》上，引起国内外人们的强烈反响，给了蒋介石反动政权以沉重打击。8月16日，他就魏德迈来华发表声明，严厉指责“美国政府资助大量武器金元给中国独裁政府以助长内战”。的种种罪行；严厉抨击蒋介石为首的独裁政府，“不顾人民的饥饿死亡而进行内战，服从美国“恢复对日贸易”的主张，“是不惜丧权辱国，以换取独裁统治之延长”。指出：“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是由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号召中国人民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

李济深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便以“对总裁失敬和侮辱国民党”的罪名，第三次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登报通缉。对此，他一笑置之，说：“我所需要的不是一块招牌，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朱德迷阵破宁都

1929年2月间，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宁都。守敌国民党团长赖世琮闻风而逃。红军走后，赖世琮带着他的团又窜了回来，扬言："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并吹牛说："上次便宜了红军，如果红军再来宁都，就要把朱、毛的脑袋悬在宁都城门脑上。"

4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回到赣南。4月下旬，红四军第一、二纵队奉命向宁都进发，准备拿下宁都，全歼守敌赖世琮团。

4月24日傍晚，宁都城外四周的几座山丘上，突然间红旗招展，枪声大作，呐喊震天。赖世琮以为红军来了，吓得要死，一边催手下的士兵上阵应战，一边叫"民团"逼老百姓把城统统堵上，慌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拂晓前，枪声渐渐稀疏了。天亮时，城外一切如常，好像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赖世琮觉得奇怪，壮着胆子爬上城垛，睁大眼睛向城外窥视，结果连红军的影子也没见到。可是到了黄昏，头天晚上的那种情况又重现了，而且枪声更紧、喊声更响。赖世琮吆喝士兵们赶快登上城垣抵抗，擅自离开者枪毙。赖部士兵躲在城垣下，头也不敢抬，拼命朝外乱开枪。第三天清晨，城外仍如往常。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赖世琮整日在屋里踱来踱去，识不破红军这两天摆的是什么阵。其实，密集的枪声是由枪声和煤油箱里的鞭炮声组合成，呐喊声主要靠的是游击队和工农群众。

一天又过去了。夜幕遮住了山丘和宁都城廓，城外除了鼓噪的蛙声、虫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赖世琮和他的部下以为红军是来吓唬几下就跑了，满以为今晚可睡个好觉。可是到了半夜时分，除东门外，其余南、西、北三方又响起了震耳的枪炮声。赖世琮从梦中惊醒，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冲出屋，让跑回来报告情况的手下给碰了个四脚朝天。待赖部士兵跑上城垣时，既见不到人影也听不到枪声。为了把城外情况弄个明白，赖世琮花了12块大洋，雇了一个赌徒，用粗绳从城垣吊出去侦探情况。第二天，这家伙跑回来报告，说来的不是红军，是游击队。然而，赖世琮仍心悬石头放不下，担心勒索来的几十担银元保不住，派手下赶紧抓来几十名民夫，偷偷把银元送往石城老家……

敌人上了几天连续佯攻的当后，变的更加凶残。赖世琮强迫城里所有老百姓日夜在城垣防守；不能参加防守的按人头每人出小洋40块（一块小洋够两人一天的伙食）；既不出人又不出钱的，就皮鞭棍棒责打，如有谁敢反抗，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攻打宁都的红军按照原部署，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准备战斗。转天拂晓，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委员下令发出展开政治攻势的信号枪声。霎时间，四面八方都向宁都城里发出一阵阵喊话声："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都是工农出身的穷苦人，赖世琮是压迫工农的地主、军阀，你们不要替他送死卖命！""赖世琮是喝兵血的，你们几个月都没发饷了，忍饥挨打的，再也不要为他当炮灰！""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工农谋利益的队伍，欢迎你们拖枪到红军中来，一块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们！放下你们的枪，投降吧，红军优待俘虏，要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到家里有田分！"……

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城西、城北一线火焰冲天，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犹如决口的洪水，向宁都城涌去。赖世琮慌忙将守在东门、南门的兵力调去城西、城北一线，加强火力。战斗在东门、南门的红军见敌人火力突然减弱，便率领群众背着柴草、谷壳，冲到城门下，堆在那里，浇上油，燃起熊熊大火，城门上的敌兵被迫弃门逃窜。赖世琮只得又从城西调来援兵，到南门和东门来灭火。敌人顾此失彼，一片混乱。

城北、城西的敌人顽抗了一阵之后，发现弹药不多了。赖世琮叫部下赶快从仓库搬来弹药。撬开箱子一看，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赖世琮见状，浑身软得像一滩稀泥。原来，前几天赖世琮派夫子挑回老家的不是银元，而是由地下党组织巧妙地安排将弹药运出城外，把银元留在库里。

这时，城西城北的红军都先后爬进了城，扒开了城门。大队红军、地方革命武装及工农群众，浩浩荡荡地涌进城里。城里的群众也纷纷协同红军俘虏敌人。赖世琮无计可施，只好换上便装，企图蒙混逃跑。但是群众已经领着红军冲到他的"天后宫"，从他的小老婆床底下把他拖了出来。

宁都城解放了，全歼守敌赖世琮团，缴枪几百枝。朱军长和毛委员及红四军军部再次进驻宁都。

朱军长到驻地不久，两名健壮的红军战士便把赖世琮带了进来。朱军长喝道："有30个小老婆，还想把我的头挂在宁都城墙上的家伙原来就是你！"两边红军战士一阵哄堂大笑。赖世琮脸色铁青，浑身筛糠似地发抖。

"听着!"朱军长对赖世琮说:"你本来应该枪毙,只要你服从命令,我们就可以不执行。你要把藏在石城家里的枪支、银元,从农民手里抢去的大米,拖欠你队伍的薪饷,全部运到我们这里来;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张药品单子,要你设法买来。这些东西交到我们手里以前,你是我们的俘虏,东西交齐,放你回家。听到没有?"赖世琮哆哆嗦嗦地打躬称是。

朱军长教训赖世琮的情景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在红军和群众中传开了。大家听了笑痛了肚皮。一些群众就编了一首顺口溜:

大炮砰砰碰,
捉到赖世琮。
赖世琮吓得脸墨黑,
捉去见朱德。
朱德喊他不要慌,
交出你石城老家的银元和洋枪。
东西未交差,
便把你当俘虏带。
……

赖世琮写了一封信,叫他的一名部下送到石城。过了几天,他的大老婆坐着轿子,带着一大批力夫,把枪支、银元都运到了。三个月以后,赖世琮的家里又把药品送来了。这时,朱军长信守诺言,开了一张通行证,把赖放了。释放前,朱军长严肃地说:"如果再抓到你,绝不会再像这样便宜了!"

以后,赖世琮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红军为敌,终于在瑞金黄柏被红军击毙。

(选自《纵横》91 年 2 期作者:曾吉川)

朱德脱险记

这是一九二九年年初的事情

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离开了井岗山,向赣南进军,江西敌人派出两个旅的兵力跟踪追击,广东军阀派出一个旅沿途堵截。红四军经上犹,进崇义,占大庾,连续行军,几经恶战,不但没有摆脱尾追的敌人,反而与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有时只隔一天路程。形势有些危急了。

一天,天刚蒙蒙亮,红四军沿着南岭山脉江西一侧的崎岖小路,向寻邬疾进。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右前方传来,紧接着一队人马冲了过来,把红四军一下子截成两段。原来,赣敌李文彬十五旅避开我军后卫营,插到前方,从右侧发动攻击。敌军人多势众,来势凶猛,我军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军长朱德被断在后面,与先头部队失去了联系。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朱德同志临危不惧,沉着果断,立即指挥部队绕过敌人的主力,迂回前进,与前面的部队尽快汇合。他亲自率领一个警卫班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迅速脱离险情。

敌人端着枪,嚎叫着,一窝蜂地冲上来,子弹似雨点般地倾泻在阵地前沿。朱德同志指挥警卫班,集中火力,近距离杀敌,连续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战斗持续了个把小时,朱德同志估计大部队已走远,便带着警卫班撤离阵地,且战且走。敌人拼命追击,警卫班的战士一个个倒下了,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

面对严酷的险境,朱德同志坚定地勉励两个战士,一定要坚持到底,他亲握花机关枪,迎着蜂拥而上的敌军,不断地扣动扳机,……

敌人也遭到了惨重伤亡,进攻的节奏明显减弱,朱德同志便乘机带领两个战士,走一阵,打一阵,最后,踏上一条淹没在草丛中的小路,潜入山里,……

当汇合的红军部队翘首张望,急切盼望朱军长平安归来的时候,朱德同志赶到了!毛泽东、陈毅等同志迎上前去,和他紧紧握手,祝他胜利脱险。

(选自《纵横》83 年 2 期,作者张东霞)

智脱虎口

1929 年刘少奇担任了刚刚遭到严重破坏的东北满洲省委书记。他一到沈阳,便投入了发动奉天纱厂工人罢工的斗争。

8 月 22 日,天气十分闷热,少奇和省委常委孟坚同志来到了纱厂附近的小树林里,等着和纱厂支部的同志碰头。但是,由于崔凤翥的出卖,少奇他们被捕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少奇镇定自若,很快想好了对策。

审讯开始了,少奇拒不吐露真情,他为自己编了个假名,一口咬定是个工人,是因失业从武汉来这里谋生的。卫队头子听了之后,瞪着一双狡猾的贼眼,上下打量着少奇,突然喊道:"把手伸出来!"

那家伙掰着少奇的手看了看,发出了一阵冷笑声,然后得意忘形地叫嚣着:"工人?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老子。看你这手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就敢跑到这里来冒充工人!"这家伙把少奇的手一甩,突然两眼射出凶光,吼道:"老实交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少奇从容不迫地说:"我是个排字工人,若是你们这里有排字的活儿干,我可以干得蛮好哩!"卫队头子一下子被噎得没词儿了。敌人又轮番进行了审问,无论是打手板还是灌凉水,任凭敌人怎样折腾,少奇和孟坚始终守口如瓶。

后来，少奇他们被押送到了奉天高等法院检查处看守所。而敌人唯一的把柄就是同时被捕的奉天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的一点“口供”。常宝玉曾说是孟坚让他闹工潮的。敌人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少奇凭着他多年白区工作的经验，认为此案有翻供的可能。于是，少奇让孟坚多次做常宝玉的工作，终于使他改变了口供。

常宝玉翻供后，敌人终因抓不到什么过硬的证据，只得对少奇和孟坚做了“不予起诉，取保释放”的结论。

1929 年 9 月中旬，少奇终于顺利出狱了。随即他便带领着省委的同志投入到斗争的洪流中，很快便打开了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选自《刘少奇佳话三百篇》，作者：刘学琦）

吴德峰运金记

1929 年 1 月至 1931 年 10 月，吴德峰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当年，设在上海的秘密交通总站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各省甚至国外的同志来上海和中央联系；每一件情报机密的传递；每一批重要物品的接收、转运，都要由吴德峰具体组织实施，甚至亲自执行。

那时，党中央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苏区打土豪积累的零金碎玉支持，由于遭受敌特破坏严重，刚刚恢复工作的东北、平津、两广等省区，很需要党中央在人、财、物等方面周济，以解燃眉之急。但因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各省有时收集到了经费，却运不到上海，中央领导对此十分着急。1930 年秋，党中央忽然接到中共江西省委要中央派得力人员去取一批黄金的电报，周恩来立即指示吴德峰尽快派党内最忠实的同志执行这次不寻常的任务。那时，我党工作的重点在农村，而水陆交通和邮电线路均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执行任务全靠一双脚板，负重奔走，才能绕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吴德峰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事关重大，决定亲自去执行这一任务。吴德峰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这次黄金数额大，路途遥远；敌人封锁严密，到处布满陷井。由你亲自出马，我就放心了。”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吴德峰化装成商人，一路风尘仆仆，直奔江西。水路有险走陆路，大路有险走小道，小道有险攀悬崖；他时而隐身于密林，时而藏身于青纱帐中，或干脆隐伏于墓穴。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吴德峰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打听，终于在牯岭附近找到党的一个秘密联络人，对方是一个茶店老板。他们对上了暗语，但对方仍然吱吱唔唔：“你有事先去办，太阳落山你再来。”说罢自顾自走了。吴德峰无奈，也只好出去转了一圈，才又回到店铺。此刻室内已空无一人。

天渐渐黑了，忽然门外跨进来一个满脸胡须的老者。来人从头至尾又盘问了吴德峰一遍，随即转身离去。吴德峰估摸着这个老者可能是向导，就与之相距 50 米，跟着上路。哪知待到东方破晓，吴德峰发现摸黑走了一夜，又回到了老地方，吴德峰要找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正在联络点等他。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只身跑到江西来。白狗子频繁出动，正悬赏重金通辑你呢！”省委书记见是吴德峰，大吃一惊。

“我得了财迷疯的病，再危险也要来。只是这位‘江西老表’进武汉，绕襄阳，硬叫我摸黑多走几十里路。你们的迷魂阵也摆得太那个点了……”吴德峰拍着向导的肩膀，风趣地回答。化装向导一面作揖，一面笑着说：“环境残酷，敌特不断抓人，不得已哟！”说完退了出去。

“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待会儿我把情况汇报一下，你帮助指导指导。”省委书记说。

“我来的任务，你晓得，中央没给我这个任务，除了黄金，只字片纸不带。”

“那也得过个夜，打顿牙祭再走。”省委书记恳切道。

“不行！中央在经济上，犹如涸辙之鲋，急如星火，就是龙胆凤肝，玉液琼浆，我也咽不下。我得连夜起程。”

说罢，吴德峰打点行装连夜赶往上海，将 10 斤黄金亲手交给了周恩来。第二天，周恩来把吴德峰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去江西的情况，而后无比感叹地说：“三天三夜只吃了一斤菜包子，难怪你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你腰缠万贯，不取分文；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德峰同志，将来我们党管理了全国，就是要培养出千千万万像你这样对党忠诚、不徇私利的人。”

（选自《纵横》91 年 1 期，作者：宋进和）

韦拔群智赚花红

1929 年 12 月，韦拔群和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一起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胜利以后，创建了红军第 7 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第二年 11 月，红七军奉命在河池改编北上，红 21 师师长韦拔群率部返回东兰、凤山一带，发展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斗争。

右江根据地，从它诞生那天起，国民党桂系统治集团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红 7 军大部队转移以后，他们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白崇禧披挂上阵，第 7 军军长廖磊亲自出马，指挥当地和周围地区的民团驻剿，督率第七军进剿，疯狂至极，残酷之尤。

1932 年 5 月 17 日，广西省政府应东兰县县长李明熊的请求，悬赏 1 万光洋通缉韦拔群，悬赏 5000 块光洋通缉红 21 师政治委员陈洪涛。廖磊以第 7 军军长的名

义，亲自签发了通辑令。

隐藏在东兰县武篆巴峒的韦拔群得知廖磊签发命令通辑自己，心中十分坦然镇定，异常蔑视廖磊，他笑着对同志们说：

"我的头太值钱了！的确，我们每个革命者的头都很值钱。狗官廖磊的头能值几个钱！我也可以发出告示，谁砍下廖磊的脑袋，特赏花红钱5个铜板"接着，又十分诙谐地对陈洪涛说，"洪涛同志，廖军长太慷慨大方了，他送来赏银，我们就收，不收，他们会怪我们的！"

另一个战士听了韦拔群刚才的讲话，非常纳闷："拔哥，他们送来赏银，我们就收，你说我们怎么接收呢？"

韦拔群成竹在胸，扫视了身边的几个同伴，然后一五一十地叙说了早已揣摸好的一套办法。

大家听了，一致称道："妙计！妙计！"

过了两天，红军释放了俘虏的几个桂军士兵。释放前，请他们吃了一顿颇为丰盛的饭菜。正当他们狼吞虎咽地吃饭时，忽然传来"哎哟"，"哎哟"的惨叫声。几个桂军士兵出门一看，只见被倒绑双手的红军战士韦华跪在地上，旁边的几个战士挥舞着鞭子，不停地抽打着他，连续地质问："你为什么开小差？你说！""开小差就要受惩罚！"……

其中的一个红军战士落下手中的鞭子，气狠狠地斥责道："哼，你这小子，想叛变投敌，出卖拔哥，出卖红军，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正在这时，突然涌来十几个红军战士，七嘴八舌地说情，为韦华解围。他们推开持鞭的战士们，拉韦华站起来，松了绑，把他带走了。

几个桂军俘虏看了红军对韦华的处罚，个个不寒而栗。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色刚刚发亮，韦华来到民团局局长梁旭秋家里。梁旭秋走来，韦华主动上前，叫了一声"老爷"，气喘吁吁地说："我们把韦拔群捉起来了！"

"在哪里捉到的？"梁旭秋问。

"在西山。"

"真的？"

"我要是说假话，该杀头！"

梁旭秋还是不相信，唯恐上当，突然拔出手枪，对着韦华："哈哈，好一个拔匪，今天你走错门了！"

韦华推开他的枪口，气愤地说："你梁大爷不识货，好，就算我韦某走错了门，我自己去找廖军长。"说着，转身就走。

"站住！"梁旭秋喝斥道。

一个门卫走过来，轻声轻气地对梁旭秋说，韦华曾被韦拔群的人打过军棍，严厉惩罚过，建议他再盘问盘问韦华，如果真的捉到了韦拔群，这倒是他梁旭秋报功请赏的好机会。

梁旭秋思忖着，廖磊督率重兵打"共匪"，急切地等待着捉拿韦拔群，若是带着韦华晋见廖磊，禀报捉到韦拔群的好消息，不记头功也记二功。于是，便满脸堆笑地对韦华说："小弟，莫见怪，因为这里是我们民团的团部，作为民团局的局长，我不得不这样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再细说说。"

"我过去在你家打过工，被韦拔群逼着钻进山沟几年，如今有要事来报，没想到你不但不念及旧情，反而把我当成外人！"韦华十分生气的样子。

梁旭秋恐怕韦华亲自去找廖磊，于是连忙再加劝说："我梁某心宽如海，莫计较，莫计较！"

韦华见梁旭秋作了让步，进一步逼进说："我们昨晚捉到了韦拔群，今天一大早就来向你报告，你不相信，误了时间，怎么向廖军长交代！"

这时，梁旭秋确信韦华的报告，于是立即带着韦华绕过几道廊檐，去见廖磊。

廖磊躺在藤椅上，半闭着眼睛，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听到有人来，不慌不忙地问："哪一个呀？"

"我是梁旭秋，有要事见军座。"

梁旭秋和韦华一起走到廖磊面前。

"什么事呀？"廖磊问。

"廖军长，我们把韦拔群……"韦华说。

没等韦华把话说完，梁旭秋抢先禀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廖磊听后十分高兴，但又将信将疑，问韦华："你们确实捉到了韦拔群？"

"廖军长，我不敢说谎。你们如果不信，可以先派人去看看，我在这里作人质。"韦华回答。

廖磊转过头来，喊叫："来人哪！"

不一会，进来几个士兵，全是前几天红军释放的俘虏兵。廖磊问他们："他就是被韦拔群绑过打过的那个韦华吗？"

"是，是的，没错。"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出去！"廖磊一挥手，几个俘虏兵退了出去。

这时，梁旭秋唯恐廖磊还不相信俘虏兵的证明，又添油加醋地把事情的经过罗嗦了一遍。

廖磊确信无疑，命令梁旭秋先派人去看个究竟。梁旭秋立即派他的胞弟梁日五、梁日六随韦华前往验视。叛徒陈守先认为韦拔群已经成为网中之鱼，没有任何能耐了，因此也随同他们一起验视。

梁日五、梁日六、陈守先跟随韦华来到现场，看见韦拔群背剪双手，被牢牢地绑着，头上裹着绷带，满脸血糊；3个女青年各执葵杆为棍，痛击着，交口呵骂着。还听见韦拔群不时呻吟，不断求饶不再毒打，而且央求不要把他活解上交，宁可击毙解其首级。梁日五一伙看了，都认为没错，他就是韦拔群。

"来，把韦拔群抬出去！"梁日五说着，就要动手。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你们把人抬走了，变了卦，我们拿不到赏洋，怎么办！"守候的红军战士阻拦着。

"我保证……"梁日五发誓。

"你空口无凭。"红军战士毫不让步。

经过双方协商，梁日五答应出具条据，红军派人持据索钱。他写好了条据，上面写道："现将韦拔群送押，我们正在峒里搜索藏枪，望送钱到鹰嘴山腰，人钱两清，永无瓜葛。梁日五。"

东兰县县长李明熊、民团局局长梁旭秋见了梁日五的条据，好一番筹措，备足了花红赏银，差人挑着，并派军警民团六七十人护送，前往约定地点。在鹰嘴山腰，双方进行着人、钱交换。交换刚毕，忽然枪声骤起，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指战员蜂涌袭来，接收花红的红军战士趁势挑着银元飞奔而去。送红诸人及护送士兵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几个抬着躺有韦拔群的担架的人抬起担架，拔腿便跑，觅处躲藏。

一场混战之后，抬担架的几个人惊魂稍定，揭开担架上的盖被一看，根本不是韦拔群，竟然是梁日五那满身血污的尸体。原来是，韦华演出苦肉计以后，韦拔群自己又演出了那一幕活剧；梁日五看过韦拔群的"表演"，确信无疑韦拔群已经被捕不料写过索钱条据后即同梁日六、陈守先一起，被处决。

韦拔群为增加党的活动经费，秘密与红军指战员利用苦肉计，不惜以身为诱耳，赚取花红。廖磊和李明熊捉拿韦拔群本期大功，顾盼可成，到头来反为红军所戏弄，白白损兵掷红、其羞愤之情不可名状。

（选自《党史文汇》，91年9期，作者：刘传增）

张云逸智设空城计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在广西百色宣布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使广西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百色的红色风暴，震动了敌人，严重地威胁着省会南宁。敌人惶恐不安，千方百计想扼杀红七军于襁褓之中，扑灭革命的火种；隐藏在根据地内的反革命势力，包括周围十多个县的土匪也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偷袭百色城。

百色附近有个大土匪头子，叫杨胡子，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两头蛇"，因为他每次打劫行抢，总是把他的队伍分为一头一尾，进攻时前头杀人后头抢物，得手后前头挑担后头掩护。1930年1月的一天，他通过密探得知红七军主力部队已外出围剿大股土匪，便纠集了附近的各路土匪队伍3000多人，伺机进攻百色城，并抓了不少民夫准备挑战利品。

当时，百色城里只有3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其中还有不少未打过仗的新兵。消息传来，红七军军部的参谋干事们急得团团转，从前线调回主力部队吧，需要一二天，鞭长莫及；撤退吧，城里的辎重和老百姓又不能一起带走，打又不能打，走又不能走。山城的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一时之间，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可军长张云逸这时却镇定自若，没有丝毫惊慌的神情，他对着参谋干事们习惯性地一捋胡子说："诸葛亮一座空城，吓退司马懿几十万大军。我有300军马，谅他两头蛇也没有司马懿高明！"说完，便吩咐军部的参谋干事们和社会科的黄科长分头准备。

张云逸命令特务连李连长集合特务连全体人员，加上从新兵连抽一些新兵，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都带四套衣服（黄的、黑的、新的、旧的，因当时红七军成立不久，服装尚未统一），于第二天一大早，个个荷枪实弹，穿着崭新的军装，在李连长率领下大张旗鼓地出了山城；同时，让军部的炊事班长张七从街上买了20只小猪花赶回来饲养；张云逸自己则坐在军部门口，请人理发、刮胡子，没有一点紧张的气氛，更没有撤退的迹象。于是大街上逐渐人来人往，店铺开门，小贩摆摊，挑水卖茶，好不热闹。

"两头蛇"纠集了土匪队伍，本想即日进攻山城，忽听探子回来报告说山城买卖兴隆，人心稳定，红军按兵不动，毫无动静，不但没有急于班师保城，反而派部队出城，"两头蛇"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害怕张云逸这个著名北伐将领设下伏兵，引诱自己上当，便急令土匪们停止行动，密探继续探听消息。

黄昏时分，土匪密探刚走到离山城10多里的七圹村，就见远处从山上走来一队红军，约二三百人，穿着黄军装，背枪扛炮，急急忙忙进了村，可功夫不大，又从村里走出一队穿黑衣的红军，也约二三百人，背着武器走上山头。密探潜回山城，在红七军军部对面的一家客栈中住了下来。天黑不久，只见从军部又有200多红军开出，第二天凌晨还开出了一批，黑压压的一片，使躲在客栈窗户旁的密探也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人。天亮以后，密探又亲眼见到200多穿旧军装的老兵队伍从军部走出来。他粗略地一算，军部竟有近千名红军士兵的部队，便赶紧溜出山城向"两头蛇"报告。

"两头蛇"听了探子的报告，胆颤心惊，暗暗庆幸自己昨天没去攻城，并命令土匪立即解散，各回各的山头。

其实，整个山城的红军加起来，也就300左右。李连长按照张云逸的计划，带领特务连和一些新兵，穿着军装走到七圹村里，换一套军装走出来，装着到山上换防的样子，秘密来到河边，由航运工会的工人们再秘密用船运回军部，再换一套服装出去一趟。这样来来去去，走一次换一套服装，土匪密探不知道每次出去的是同一批人，数来

数去，就成了上千人。

但天有不测风云，红军内部的一个奸细把真实情况漏了出去。此人长着一双老鼠眼，是个又油又滑的老兵痞，人们都叫他"老鼠鱼"，他在百色起义前是警备第四大队的一个排长，起义后因打骂士兵被撤职当战士。他本想逃跑回家，后因遇见潜伏在山城里的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接受了对方的钱财，故而留在红军里探听消息。他这次也随留守部队行动，开始，他并不知道部队把军衣换来换去的目的，等他悟出这是张云逸的疑兵之计时，一天已经过去了。天一黑，他就装着肚子疼，偷偷跑到县党部书记那里去报告，并赶紧溜出城报告了"两头蛇"。"两头蛇"发现自己上当，一面叫"老鼠鱼"回城作内应，一面急忙去追回走散的股匪，疯狗似地向山城扑来。

"老鼠鱼"刚赶回山城，就被逮捕了。原来，他的行踪早已被总工会赤卫队发觉，并报告给了红七军军部的社会科。社会科立即向张云逸作了汇报，建议立即逮捕他。但张云逸决定将计就计，等"老鼠鱼"把山城空虚的情报送给"两头蛇"以后再抓他，因为，这时红七军主力已经完成了剿匪任务，天一亮即可回师山城了，只要拖住"两头蛇"，就能将这股顽匪一举全歼。

百色城三百临水，一条陆路。"两头蛇"带着土匪和民夫来到山城外，他把队伍分成一前一后两部分，将挑着箩筐的民夫夹在中间，指挥着土匪慢慢摸着向城里开进。刚进城街，忽听一声枪响，正前面的屋子里顿时吐出了无数条火舌，打得土匪队伍死伤一片。这是张云逸军长亲自指挥的军部干部和新兵连战士正守在当街的房子里，给了土匪队伍迎头痛击。"两头蛇"连忙命令前卫发起冲击，可房子里喷出的火舌压得众土匪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正在这时，从旁边的屋里又横冲出一彪人马，把"两头蛇"的土匪队伍斩成两截，这是特务连李连长率领全连，拦腰截断了土匪队伍，用机枪火力横扫竖穿，打得土匪首尾不能相顾。忽然，民夫队伍中有人大喊："中埋伏了，赶快逃命！"1000 多民夫纷纷扔下箩筐、扁担，向后便跑，一下子把"两头蛇"的后军队伍冲散了。土匪见冲来无数人马，以为都是红军，也纷纷丢盔弃甲，各自向后逃命。前面的土匪见后面阵脚大乱，以为大势已去，无力再发动进攻，赶紧后撤逃跑。但几千只箩筐、扁担扔了一街，筐上系着长长的绳子像绊马索一般，满地横七竖八的扁担，土匪们脚踩上去，不是被绊倒就是滑倒，正好成了埋伏在屋顶上红军战士的活靶子。很多土匪逃也逃不掉，藏也无处藏，只好纷纷举手投降。原来躲在屋子里从门缝向外看的老百姓这时也都跑出来，帮助红军抓俘虏和收缴枪支弹药。

"两头蛇"率领残兵败将一口气逃了 10 多里路，刚停下来休息，忽听队伍中又有人放枪，并听见有人喊叫："红军追来了，快往阳圩跑！""两头蛇"也顾不上再喘口气，赶紧向阳圩方向拼命逃跑。这时，天已大亮，"两头蛇"率队还没有跑多远，正好遇上了从阳圩剿匪班师的红七军主力，想回头逃跑业已插翅难飞了。

原来，军部社会科黄科长按照张云逸的计划，带领十几个战士利用夜暗和土匪混乱之机，混进了民夫队伍，在队伍中喊话并制造紧张失败之势。当估计我主力红军快到时，他们便脱离了敌人队伍，赶紧在路上垒起了临时工事，与主力部队一起对土匪队伍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土匪们见此情景，一个个乖乖缴枪投降，只有"两头蛇"想跳水逃跑，被击毙于河中。

山城保住了，危害人民的土匪被消灭了，张云逸智设空城计的故事，在百色人民中间一直传诵着。

（选自《纵横》作者崔建环）

周逸群在石首

周逸群，字立风，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8 年 2 月，党中央派他同贺龙一起，到湘鄂西领导开辟革命根据地，1931 年 5 月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在以石首调关、小河口等地为中心的广阔区域，周逸群为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不顾当时的白色恐怖，四处奔走，足迹踏遍了石首的山山水水。

寻找李兆龙

1928 年夏，湘、鄂、川的反动军阀部队，麇集重兵压向湘鄂西，在江防重地荆江一带，与地方"铲共团"、"返乡团"一起，四出清剿、残酷屠杀革命群众，妄图扑灭革命火种。在此形势下，石首和荆江两岸的工农武装被迫转入隐蔽活动。

恰在这个时候，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荆江，打听鄂西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的去向。有一天，他混入敌人重兵驻防的沙市，在市中心看到了一张门板大的"沙市清乡委员会"的布告。布告上写着："鄂西共匪头子张计储、张善孚、曹壮文（均为中共鄂西特委负责人）煽动工人暴动，被我一网打尽；另一匪首李兆龙只身潜逃。有知其下落者，通报本委员会赏银洋五百块；捉拿归案者，赏银洋一千块……"形势急剧恶化，沙市城内不能久留，周逸群强忍住内心的悲愤，决定前往石首，去寻找当时任中共石首中心县委书记的李兆龙同志。

周逸群乘渔舟到达石首调关的当天，刚刚住进客栈，便遇到敌人挨门挨户清查人口。敌人闯入客栈，见到周逸群衣冠楚楚不象一般平民百姓，便客气地细声问道："先生从哪里来？"周逸群若无其事地递上事前准备的省府特派员证件。敌人未敢细看，慌忙点头哈腰讨好地说："今晚戒严，防备共匪头子窜过江来，请长官不要外出。"未曾想他们恰恰向周逸群透露了李兆龙同志在江北的消息。

第二天，周逸群更换装束乘上小舟，渡过长江。他刚

刚登上小河口的江堤，就被敌团防哨兵拦住盘问，不由分说，带进了小河口团防队部。他们把周逸群关入一个小房子里，通身上下检查以后，见没什么可疑之处，才被迫放行。

周逸群穿林过滩，沿荆江下游寻找李兆龙。他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在芦苇丛中整整穿行了两天两夜，正在徘徊间，忽然发现对面来了两个人。周逸群闪到一旁定睛一看，正是自己要寻找的同志。未等他走拢过去，李兆龙和同来的彭国材便惊呼："老周！"纵步上前，紧紧抱住了他。

三人席地而坐。李兆龙、彭国材把周逸群、贺龙同志走后，洪湖、荆江一带发生的情况做了简要汇报：当地三个游击大队，二大队在沔阳几乎全部覆灭；一大队在桐梓湖与敌遭遇，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三大队在小河口被敌人包围，突围中牺牲过半。石首中心县委机关也受了损失，县委书记李兆龙赶到沙市找鄂西特委汇报敌情，不料沙市工人暴动失败，特委负责人被捕。李兆龙好容易才找到了彭国材，于是结伴回到荆江下游寻找被打散的同志。彭国材兴奋地说："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旷野芦苇丛中，能够碰上了为我们掌舵的人！"周逸群简短地总结了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眼前敌人的情况，最后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奋勇向前，这是无坚不摧的保证。常言道：失败为成功之母。好吧，我们重振旗鼓，继续干！"

经李兆龙、彭国材多处奔走，找回了不少被打散的同志。各地隐蔽下来的农民自卫军听到周逸群回来的消息，也很快集中起来，与县委取得了联系。在周逸群亲自带领下，农民革命武装重新又活跃在洪湖水域。1929年5月，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了沔中敌人据点峰口镇，缴获了大量枪支和银元，并处决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

深入桃花山建党

1929年秋，鄂西特委机关从宜昌三游洞迁到石首。特委书记周逸群化名"海涛"，带着石首农运领导人李恒久，提着小木箱，化装成走街串巷的理发匠，来到石首桃花山北麓的九佛岗。

桃花山地处湖北石首和湖南华容的交界处，国民党军队曾多次来此"清剿"、扫荡。当地还设有敌人的团防关卡，团总是个走江湖出身的伪君子，名叫孟勋功。周逸群和李恒久刚刚接近九佛岗，便受到两名团防哨兵的拦截。哨兵听周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便强行要打开箱子检查。周逸群不慌不忙地打开箱子，哨兵一看果然是些理发工具，一时无话可说，但仍不肯放行。这时，家居本地的李恒久跨上前去，赶忙大声喊道："他是我们山上请来剃头的外乡人，吃在口里，穿在身上，没有什么油水可让你们榨的。"喊叫声惊动了正在附近的孟勋功，他走过来先是喝了一声："吵什么？"紧接着又把周逸群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狡黠地说："过来给我刮刮胡子剃剃头，试试你的手艺。"周逸群知道这是敌人在试探自己，便操起刀熟练地刮了起来。就在这时，桃花山地下交通员吕桃山、农运领导人傅朝正等接到特委通知，化装赶到了九佛岗。他们没见过周逸群，只认识李恒久，经李用眼色暗示，才知道给敌团总剃头的就是他们要接的特委书记，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只见周逸群一边给敌团总刮胡茬，一边与之谈天说地。孟勋功见周逸群果真刀法熟练，也就去掉了疑心，随口问道："你今天从哪里来呀？"周逸群闻听灵机一动，回答说："本来，今天我是到调关去赶集的，可还没进街，就听说来了不少的共军，满街都是，结果我就提着箱子往回跑……"话刚说了一半，孟勋功就急了，待剃完头，撒腿就往营房窜，召集部下准备逃跑。周逸群等乘机离开了险境。

由傅朝正、吕桃山带路，周逸群来到了九佛岗以东十里的青竹沟。他到当地烧柴炭的土窑，和为地主烧炭的农民一起干活，扯家常，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起来与地主斗争。没有多久，以烧炭农民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便建立起来了，其中有13名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秘密组成了桃花山党支部、傅朝正、吕桃山分任正副支部书记。

桃花山的农民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起一支有50多人参加的乡暴动队。他们打土豪、惩劣绅，配合江南游击队拔掉了九佛岗的团防关卡。镇压了孟勋功，建立起乡苏维埃政府。不久，桃花山党支部又在石华堰、三菱湖、章华港设立了三个秘密交通站，使华容游击区与江、石游击区之间的联系畅通无阻，成为红色交通线，桃花山亦成了石首的"赤色山"。

到藕池组织工运

在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的同时，周逸群领导的鄂西特委也注意了加强城市的革命工作，藕池即被列为开展工人运动的中心。

1929年入冬后的一天，周逸群带领五六名同志，打扮成商人模样，摸到藕池，住进一家客栈。不巧，正遇国民党军队戒严搜查，对他们的身份起了疑心，一行人便被强行带到了敌人连部。敌连长见周逸群颇有派头，神情可畏，怕当面发问惹出麻烦，就吩咐手下人把周逸群带到后房休息，而只对周的随行人员进行盘查。"那先生是你们的什么人？"敌连长逼问道。"东家。"随行人回答。"叫什么？""一穷。""哪家的商号？""四川杨森督军的商号。"随行人一边回答，一边故意把一块标有"四川督军"的袖榜露出来。敌连长一见袖榜，顿时软了下来，赶忙装出一副忏悔的面孔，叫手下人把周逸群请出来，并卑躬献媚地说："先生受惊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只怪部下不识泰山。以后有什么事要帮忙，只管通知鄙人，自当效犬马之劳"。

此后，周逸群白天假作找一些商号谈生意经，夜里便化装成平民，深入到码头工人和船员中了解情况，宣传革

命道理。当他了解到码头上的把头克扣工人工资，并将一名工人鞭打后赶出码头时，便借机鼓动工人起来罢工。那把头勾结敌连长，妄图威逼工人复工，周逸群则以“打抱不平”的公正人身份要敌连长“调查解决”。敌连长如得圣谕，立即以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将把头捉了起来，令其立即补发克扣的工资，把被赶走的工人召回，并向全体工人道歉。

自这以后，工人们都把住在客栈的“一先生”看作是“自己人”，有什么事都去找他。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工人经常议论的特委周书记。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藕池码头工会”很快地组织起来了。不久，在周逸群同志领导下，藕池又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

（选自《纵横》87年5期，作者：平植义）

七条半枪的来历

1929年秋，江西武宁县全家源、洪家源、周家源、戴家源等村，收集了所有土枪、土铳、梭标、大刀等武器，秘密组织了抗租抗债委员会和土枪队，由张则然担任抗租抗债委员会主任，全维和担任土枪队队长。9月间，洪家源、全家源、戴家源、周家源等地土枪队员就发展到100多人，均是贫苦青年。从此以后，这支地方武装——农民土枪队便活跃在苏区的土地上。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使土枪队这支农民武装更加觉醒，感到这些土枪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要改善装备，只有乘机夺取敌人的枪支来武装自己。

土枪队员戴征富、戴希明和聂由日（路口人，在洪家源的上洪招亲）打听到国民党团防有一个排的兵力驻在石桥汪家祠（即现在的金水），并有枪枝弹药。他们三人与路口的聂国清、聂华考、聂道盛等人商量，便在下洪召开了土枪队员会，研讨夺枪之事，经研究决定智取。

一天夜里，20余名土枪队员左臂系一条白毛巾，腰里扎一个禾草结作为标志，身佩短刀，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石桥国民党团防驻地汪家祠，包围了营房。汪家祠除大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哨兵，屋内带班的班长房里有一盏灯，还点着一支记时的香，其余士兵已全部进入梦乡。这时，聂由日一个箭步将打盹的哨兵按倒在地，铁钳似的大手，紧紧地卡住了他的喉管，几乎是同时，另一个队员迅速将毛巾塞入哨兵的口中，没等哨兵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解除了他的武装。戴希明、聂道盛等化装成哨兵，手拿武器，装着“换班”模样，走到班长面前，班长刚张嘴说还差两寸香，怎么就换班！一名土枪队员便吹灭了油灯，举枪将其击毙。枪声惊醒了士兵，房内顿时乱作一团。土枪队员齐声高喊：“你们被包围了，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这伙酒徒、赌棍一枪未还，乖乖地跪下求饶。土枪队员缴获了长枪7支、独子枪一支和一些子弹后就迅速撤退。因独子枪只能算半条枪，故此，人称之为七条半枪。土枪队员得胜归来后，斗志昂扬地活跃在洪家源、戴家源一带。

国民党驻在横路镇的三〇〇团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和金水团防翻越天尊山，经月台、杨岭，直扑第二乡苏维埃政府驻地——下洪祠堂。土枪队退到洋坪山，用夺来的七条半枪，阻击敌人前进，洪科锡躲在杨岭的下高梁，瞄准团防队尾部的一个敌人，一枪而中。敌人不知我方的虚实，认为腹背受击，仓皇向高乾山撤退。这就是当地流传的“洪科锡一人打退敌人一个团”的故事。经过这次战斗后，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革命的信心。

（选自《纵横》88年5期，作者：戴利金）

第一所军校

1929年10月17日，中共江西信江特委在给江西省委的一份文件中报告：一、我们感觉军事政治工作人才的缺乏，决定开办信江军事政治学校。二、学校名称即为信江军事政治学校，学校由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创办。三、学校由各县苏区选送共计140多名学生，组成1个大队，下设2个中队、6个支队、18个小队。四、训练科目为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五、学校组织校长1人，大队长1人，政治部主任1人，军事教官3人，政治教官若干人。六、入伍期1个月，训练期2个月，共3个月毕业。七、本月23日考试，25日开学。经江西省委同意，信江军事政治学校正式成立。这是我军挂牌最早的军事学校。

军校校址设在江西弋阳县九区吴家墩村。校长兼大队长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后任北伐军某部连长的邹琦。政治部主任由信江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邵式平兼任。学员从红军和苏区青年学生中选拔，需经组织推荐、文化考试、体格检查方可入学。第一期共招收学员170余人，其中女学员10余人。学习期由3个月增加到6个月。10月26日，信江军政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到会讲话：“同志们，我们这所学校不是普通学校，它是一所种子学校，是一支学兵大队，是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熔炉。你们这批学员，先用三个月时间，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再用三个月的时间到连队实习，经受战火的考验后，你们将成为我们红军优秀的指挥员、战斗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吴克华就是军校的第一批学员。

军校的学习主要分为军事和文化两大类。文化学习有文化课，由文化教员教识字、算术，提高学员文化水平。政治课学习内容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音乐课教唱革命歌曲。军事学习由军事教员教军事知识，内容有步兵操典、战斗条令、野外勤务、进攻和防御等。军事操练课由讲堂到操场、由理论到实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第一阶段操练单个散兵的作战要领。第二阶段进行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要领训练。第四阶段进行战斗演习。毕业前夕，学员加入红军队伍上前线实习。

由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信江军事学校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

信江军政学校于1931年3月迁往赣东北苏区首府横峰葛源。同年秋，为纪念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杨殷两烈士，学校易名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初，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接后，"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1934年10月，赣东北红军反五次"围剿"失利，红军离开根据地北上，军校结束最后一期。

军校从创办到红军北上，共办了8期，培养红军骨干1500余人。旧址现已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修葺一新，供人瞻仰。

（选自《纵横》91年3期，作者：衡峰）

第一个把毛泽东写进小说的作家

1929年，一个青年作家大胆地把毛泽东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小说，他就是徐雉。

徐雉1921年在浙江宁波读完中学，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后，参加了"文学研究会"，1925年，他奔赴广州，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第六军中共产党员较多，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是林伯渠。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徐雉所在的第六军政治部终于遭到袭击遣散，他只好逃回了浙江老家。第二年他流落到上海，从事小说创作。在《嫌疑》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因写了篇《毛泽东的名片》的文章而受到嫌疑和迫害。小说从侧面穿插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轶事。毛泽东与小说主人公对话时的音容笑貌写得颇为传神。这个情节，是徐雉根据自己在第六军政治部工作经历写成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的毛泽东形象。

（选自《党史文汇》91年5期，作者：刘泽洪）

四川军阀饮酒故事

川酒，自古有名。"美酒成都堪送老，当炉仍是卓文君"。民国时期，仅蓉城的饭馆、酒肆，即不下四五百家。军阀们每当庆胜利、过节日、办喜事，照例要去大吃大喝；或请名厨在公馆做席，或去大餐馆设宴，或找著名的包席馆正兴园、姑姑筵包席。将领们在长年累月酒席征逐之间，一个个都迷上了酒。那个时期，尽管川军吸食鸦片成风，甚至外省人把川军叫做"双枪兵"，但一些高级将领却不好吸烟。比如，军长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都不抽烟，但他们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有"挥兹一觞，陶然自乐"的雅兴。

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喝酒是颇有名气的。邓为人豁达、大度、豪爽。每逢酒宴，60度的白酒，不论三巡五遍、七杯八盏，他是不会醉的。1929年春，刘文辉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而同为军长、同驻成都的邓锡侯，却只当上个委员，而且还是挂名的。为消胸中不平之气，邓锡侯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带上夫人、千金乘车去灌县春游。一行人朝过二王庙，看罢都江堰，就在宝瓶口旁、伏龙观下参加宴会。席间，他在当地士绅们的恭维、逢承声中，一杯一杯又一杯，咕噜咕噜喝个不停，一个时辰不到，畅饮了40杯，竟然头脑仍很清醒，说话仍很流畅，几无醉意。师长范绍增，是著名的酒坛子。每遇知己或有喜事时，总要喝几十杯才能尽兴。一次，范师的戏班子在安岳龙台场唱戏。班里女主角很有几分姿色，被当地一位富家子弟看上了，他待戏唱完跑到后台，硬要女主角出去陪他喝酒。这事被在外面喝茶的范绍增知道了，派人把他"请"来，说："今天女角不空，老子陪你喝。"随即叫弁兵抬来一坛烧酒。他接连喝下几大碗，而面不改色，神态自若，把个富家子弟吓得瞪目结舌，跪地求饶，才算了事。

川军将领因纵酒损害身体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刘湘就是一个，他生于大邑安仁镇，镇上烤酒业发达，他的伯祖父刘公赞就是酒坊老板。刘湘自幼学会了饮酒。及至置身戎行，官高位显，为应酬、联络、助兴、消愁，这位别无它好的将军，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杯中物"做为自己的伴侣。平日，闲居家中，独斟独饮，喝个半斤八两是不会醉的。遇到节日盛事，亲朋相聚，举杯倾壶，乐其所乐。有时，兴之所至，也有饮至夜漏更残的时候。20年代中期，他与贵州军阀袁祖铭合驻重庆。袁祖铭出生于茅台酒的故乡，是个有名的醉鬼。二人为筹商联合倒杨森，频繁交往。今日你置席，明天我设宴。密商于餐桌之上，策划于杯觥之间。有时谈到投机处，更是"干杯"之声不绝于耳。在川军中素有沉稳、持重之称的刘湘，常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弄得酩酊大醉。正像久病可以成良医一样，久饮也可以成为品酒专家。刘湘的味觉对酒特别敏感，能于细微处辨别出各种成色、香型、度数的酒。1935年，他在邛崃一次酒宴上品尝文君酒（时名邮酒）之后，备加赞赏，称誉它为"赛茅台"，酒以人贵，不久，文君酒更名为"邛崃茅台"。由于刘湘爱饮酒，常过量，故很早就患下贫血症、胃溃疡。及至抗战军兴，刘湘身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领川军出川抗

日，在军情孔急、席不暇缓之余，也常借酒解乏，致胃病加剧，无药可医，年仅 47 岁就谢世了。

每遇春节，军阀们把相互的矛盾搁置起来，正打仗的把战火停了下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共庆佳节。1925—1933 年，成都由保定系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合驻。省城贵胄汇聚，将领云集。为庆贺新春，联络感情，各部队从军长到中级以上文武官员，都要轮流请客。按惯例，大年初一，师、旅、团长们都要到本军首脑家拜年，赌钱、会餐，大喝特喝。从初三到初五，将领们互相拜年。席间，碰杯声、祝酒声、划拳声、吵嚷声，如雷贯耳。一个个醉得人仰马翻。初五以后，又互相请吃春酒。每次少不了一二十桌。一直要吃喝到青羊宫赶花会。

富贵人家讲究"做寿"、"做生酒"，尤其 40 岁以后逢十那年更为隆重。1925 年，拥有 10 余团的师长罗泽洲在广安做 40 大寿，为接待成千上百的来宾，专门选择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三圣宫做寿堂。其堂皇，其气派，其豪奢，在广安实属空前绝后。光部属送的寿联、寿幛，就密密麻麻挂满了几条街。两拨戏班子，日以继夜，演个不停。席桌，摆满庙内的旮旮旯旯。喧声震九天，酒香飘十里。持续五六天之久。广安偏僻小县，尚且如此，省城成都自是更胜一筹。1929 年 3 月初 10，是二十九军教导师师长兼成都兵工厂厂长王思忠 50 寿辰。这位靠喝兵血、倒军火聚敛了万贯家财的军阀，为显示豪华、阔绰，好几天前就在九眼桥至雷神庙的几条街上，搭起彩棚，用绫罗绸缎制的幅幅寿幛、对对喜联，上绣松鹤龙凤，五色斑烂，花团锦簇。乐队三起，有土有洋，管弦丝竹，洋鼓洋号，吹奏不息。流水般的酒菜，在雷神庙的厅堂、厢房、走廊，满满当当摆了 200 桌。如果说，一般富豪"做生"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的话，那王思忠这些席面是绝不止一万钱的。届时，不仅贵宾如云，高朋满座，就连全城乞丐，也派出二三百名代表，高举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红布寿标前往祝贺，借此讨得一餐终生难遇的酒席。

旧礼，客至需置酒洗尘；客走，需摆酒送别，官绅豪富甚至设席于十里长亭。崇尚儒教的川军将领也是很讲究这一套的。1929 年夏，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下台后，经三长入夔门，杨森部师长范绍增毕恭毕敬迎吴至大竹县风景区云雾山，日日置酒宴款待，好酒、好菜、好风光，"吴大帅"高兴之余，作诗吟道："竹阳城外有高台，把酒登临曙色开"。后来，吴氏到了成都，下车伊始，受过他恩典的邓锡侯、田颂尧就在"姑姑筵"包了一桌满汉全席，亲自为之把盏洗尘。其后，冷寅东、黄应乾、马德斋等高级将领，又分别在小福建宫、卧龙桥设盛宴欢迎，把个老将军喝得醉醺醺，乐陶陶，诗兴泉涌。

军阀们饮酒误事，时有发生。1922 年夏天，亲北洋军阀的杨森率领第二军与熊克武的一军作战失败后，率残部退到夔府(今奉节)。正沮丧之际，适北军张汝明旅自湖北来援。杨大喜过望，当晚设盛宴为张部接风。主客在大雨倾盆声中，喝得醉沉沉，意昏昏，竟然忘记了城外可能发生的敌情。这时，一军第一路指挥官刘伯承正率先头营冒急风骤雨，轻装疾驰，尾追至城外。刘伯承在川军中素以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著称。他料定值此恶劣天气，敌必不为备，遂挑选出会水的士兵一个排，借雷声、风声、雨声作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城墙脚排水沟鱼贯潜入城内，砍开城门，大部队随之涌进。在震天价响的喊杀声、枪炮声中，守军魂飞魄散，纷纷缴械投降。杨森从醉乡中惊起，于慌乱中狂奔到江岸，搭船逃往宜昌。此役，刘伯承仅以三四百之众，俘获了近万人枪。

军阀混战时期，将领们为了广结人缘，求得必要时互相提携、支援，常常仿照古人结义办法，共饮血酒，结为金兰。这种事，在四川军阀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其荦荦大端者，如一军军长但懋辛先后与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的结义，潘文华与范绍增的拜盟，刘湘与吕超、石青阳的结拜，杨森与刘斌的换贴……正如酒毕竟是用水制的一样，在勾心斗争、尔虞我诈的军阀时代，许许多多的结拜，尽管烧了香，磕了头，赌了咒，喝了酒，但所结成的"义"、编织的"情"，都如同"酒"一样是"水"货。上述一对对的盟兄盟弟，曾几何时，几乎都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比如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时，开宗明义第一仗，就是攻打他盟弟刘斌的防地，使之猝不及防，大败亏输。还有比刘斌的下场更糟糕的。1931 年 1 月底，十一师的高级将领陈光藻、刘殿戡、王元虎等六人，同驻南充城内的独立旅旅长李俊聚义。这次，大约参盟的人多，仪式特别隆重，在师部院内，诸将领面对关羽画像，共同发誓：同心力，共生死。誓毕，将一只大雄公鸡的头砍下，滴血酒中，由每人各饮一杯。但事隔不久，陈光藻等就将李俊击毙于其宅内。更甚者，还要祸及子孙。1933 年，刘文辉部驻西昌的第十一旅旅长羊仁安同团长邓秀廷合谋，借结义，设圈套，除掉企图夺取旅长职位的另一个团长蒋如珍。一天，在邓家后花园，红烛高烧，香烟缭绕，蒋如珍和羊、邓二人正在向着圣像三叩首、一鞠躬的时候，突然背后枪声大作，蒋连中数弹殒命，羊为解胸中之恨，又举枪向尸体补了几枪；后来，又乘他儿子蒋伦从成都回来奔丧之际，派人将其暗杀于归途中。

俗话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在你争我夺，人欲横流的年代，饮酒也要当心的。1926 年春，杨森部师长白驹奉命从隆昌东下归建。出发之前，白为了最后再大捞一把，便以临别酬谢地方父老为名，在县文庙大摆筵席，邀请县城各界头面人物共 200 人赴宴。大家接到请贴，喜不自禁，感到白师驻隆昌期间虽干了不少坏事，但临走还备席致谢，也算懂人情。平时一腔怨气消了大半。当日，大家跨进文庙正厅，但见一张张桌上挤满了鸡鸭鱼肉，各类酒料，不禁眉梢露喜，嘴边垂涎。谁料，菜还没有动一箸，酒

还没有呷一杯，白驹就高声宣布："我部开拔在即，需军饷二十万元，请在座诸公大力相助。"大家一听，惊怒交加，纷纷喊怨，表示不胜负担。白勃然震怒，大吼道：如有违命者，一律以军法从事。此时，场内外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直到每个人在捐款簿上签了名，画了押，才准举杯动箸。但这时美酒佳肴如同嚼蜡，不饮自醉，不唊自饱。那一次，隆昌全城像遭洗劫一样，所有现金被搜刮殆尽，连小孩过春节存的压岁钱也不能幸免。

古兵书"三十六计"中有"美人计"，却没有一个"美酒计"，似乎是个疏漏。其实，历史上以请酒为名达到目的的故事是不少的。军阀时代，此类事情也屡见不鲜。1914年初，杨森还是校级军官时，在滇军将领黄毓成处待职。这时，速成军官学堂的同学、国民党人吴行光等四人，因参加反袁失败遭通缉逃到昆明被逮捕。当时，卫戍昆明的邓泰中、杨蓁两位团长都是国民党员。黄毓成、杨森请他们设法营救，遭婉拒。黄、杨情急智生，忽然想起邓、杨好饮酒，且逞强，何不以酒赚之。于是，黄、杨以请吃酒为饵将二人请来。席间，轮流向对方敬酒，你一杯，我一盏，劝个不停。待两人醉态毕露时，才以话激之。果然，二人乘醉同赴警察厅，硬是逼着厅长李家修把人放了。

自"鸿门宴"以来，请人喝酒以谋其性命的故事一再重演，四川军阀也不例外。下面讲两桩事情：第一件是刘存厚设的鸿门宴。刘存厚是川中宿将，一度任过督军。1918年任二十一师师长时，与二十二师师长钟体道一同在逐鹿中失败，退居陕南汉中。按说，两人既是武备学堂学友，又是日本士官校同窗，且同被逐出四川，本该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但却因争权夺利，常闹矛盾。1919年11月初，刘存厚以一林难藏二虎，决心搞掉钟体道，独霸陕南10余州县。一天，他借着北洋政府嘉奖二人巩固陕南有功的名义，在城北清真寺设宴邀钟参加，并在寺内两厢预埋伏兵。头天，当钟接到请柬时，有人告诫他：刘居心叵测，所部近日有异动，需加意提防。钟认为自己与刘同过学，共过难，他绝不至于下此毒手。次日上午，钟准时赴宴。传杯换盏，酒过数巡，刘即借肚痛需行方便，离席向后面走去。与钟同赴宴的参谋长罗纬有疑，尾后见其从后门走出，同时发现来往官兵脸上充满杀机。当即返回附耳向钟禀告一切。钟这才觉得大事不妙，匆忙离席而去。刚走到街口，砰！砰！砰！一阵枪声从侧面射过，身边一弁兵立刻毙命。钟顿时脸色煞白，怒气填膺。好在他久经战阵，处变不惊，加之身手矫健，趁另一个弁兵向对方还击之际，一个鹞子翻身，转身向前猛跑，飞身投入一个熟识的点心铺。店员们见是钟师长，迅速将他藏匿于烤点心的炉灶下面，虽弄得一身尘土、满脸污垢，但总算躲过了追兵的搜索，保住了一条性命。

第二件是刘文辉设的鸿门宴。1932年下半年，刘文辉与乃侄刘湘在川南鏖战时，同为保定系的邓锡侯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乘火打劫，在后面捅开了刀子：袭击他的部队，侵占他的地盘，把刘文辉恨得牙痒痒的，发誓不搞垮"邓猴子"，不在四川立足。于是，召集亲信密谋策划：决定在将军衙门设宴，借商讨两部合作，诓邓赴宴将其扣留，用麻袋密运雅安。之后，乘邓部群龙无首、军心涣散，一举解决他的部队。计策虽好，无奈事机不密。刘部有个号"五独司令"的旅长黄鳌，与邓相交甚深。当晚，黄摇通了邓的电话，用隐语告诉他：今晚请你看一出好戏！邓问：啥子戏呵！黄答：川戏《四望亭》(内容是花碧莲捉猴子)！邓心领神会。次日拂晓，即借郊游为名，乘汽车去了新都防地。刘文辉这席鸿门宴虽然没有开成，但因这事发生在省城，又是一位保定系军长谋害另一位保定系军长，可称得上特大新闻，消息不胫而走。巴山蜀水，传为笑谈。

（元江）

杜月笙与黄金荣的合合分分

清末民初，上海滩青帮势力急剧发展，到二三十年代，在青帮首领中涌现出势力最大的"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而在这"三大亨"中又以黄、杜二人的社会影响最显著。笔者在此并非阐述黄、杜二人历史的全貌，仅介绍他们二人之间的主要关系。杜的年龄比黄小20岁，杜是在黄的提携下发迹的，但杜的势力后来居上，并有排挤、打击黄门的迹象，引起了黄对杜的不满。黄暗中想方设法进行搞垮杜的活动，但事与愿违。

黄金荣的起家与村月笙的起家

黄金荣字锦镛，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祖籍浙江余姚，黄父炳泉原是余姚县衙门里一名捕快。同治年间被调到苏州破案，遂在苏州府当捕快，娶邹氏女为妻，生了黄金荣。1880年黄金荣12岁时，举家迁居上海南市，在三牌楼开设一爿小茶楼。1892年，黄金荣24岁时，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黄为了博取洋主子的信任，在侦缉破案方面玩弄了许多手法。他一方面收买一批惯盗窃贼，纵容他们在租界内作案；另一方面，再利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眼线，进行破案。采取以贼捉贼的办法。黄金荣一面指挥盗贼连连作案；另一面经常将案件的线索密报给租界当局。租界当局依靠黄金荣去破案的破案率总是很高的。黄金荣以此受到洋主子的器重，被吹嘘为"租界的治安长城"。黄金荣不仅取得租界当局的信任，而且通过流氓渠道造就了自己的社会势力。他常唆使小流氓向富商阔佬寻衅取闹，同时他又常以法捕房的探捕身份巡逻各处，每当碰到小流氓对商店敲诈勒索或对阔佬寻衅时，总是当面惩罚小流氓，造成了

租界的小流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黄大人来巡察”的假象。黄金荣俨然成了商界老板与殷实富户的“保护神”。总之，黄金荣靠了阴阳两手巧妙配合，造就了自己在租界中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势力。

当黄金荣在法租界已经有相当势力时，杜月笙还是个小瘪三。杜月笙的发迹与黄金荣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而黄金荣得到杜月笙襄助之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势力方面都获得了大发展。这里仅叙述一下，杜月笙的起家及其投靠黄门的过程。真实的历史情况与文艺小说、电影剧本中那些虚构的情节大差甚远，但也不乏传奇性。

杜月笙，又名杜镛，1888年(光绪十四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时父母死去，由姐姐抚养。因偷钱赌博，姐夫把他赶出家门，姐姐托人送他到十六铺码头张垣大水果行当学徒。但杜月笙混迹于流氓群中，不务正业，被老板开除。张垣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怜悯杜的遭遇，常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低价批给他。杜月笙有时也伙同十六铺一带的小流氓，上外地来的水果船上偷抢水果，并将弄到的水果在茶楼、烟馆、赌场和大街上叫卖。因而十六铺一带人称他为“水果月生”，他发迹后改“生”为“笙”。

这期间，杜月笙拜青帮“通”字辈的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也是下层社会的青帮流氓，以“套签子”为生。“套签子”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赌主将三根竹签中的一根系以红线，赌客把制钱套上系红线的一根为赢，套不上这一根为输。

杜月笙青年时期，正是上海租界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租界人口的增多、范围的扩张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烟馆、赌场、妓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华界。租界内没有户籍制度，加上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治安管理上不统一，为各种黑社会人物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当时法租界与华界南北分界处有个郑家木桥，杜月笙结识了郑家木桥一带的流氓。他在流氓团伙中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30岁时，在流氓界的名声引起了黄金荣及黄金荣的老婆阿桂姐的注意，将他收留在黄门。当时黄在法租界巡捕房中已经颇有势力，杜月笙起初为黄的跟班，不过是拎拎皮包而已，由于杜为人乖巧、勤快、机灵，深得黄的老婆阿桂姐的赏识。当时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私下集资开了个包运和贩卖鸦片的公司，杜月笙认为投资于这个公司，有军阀为后台，发大财有保障。他连忙鼓动阿桂姐，以黄金荣的名义参加了一股。不到二年，果然发了一大财，黄分到200多万元。阿桂姐要黄给杜5万元作为酬金。从此杜有了发财的本钱，他将这笔钱和别人合开赌场和烟馆。此后，黄又推举杜在法租界包销鸦片，使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本来上海滩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被称为’三大亨”，三者势力相差无几。但从30年代起，杜月笙的势力已大大超过黄、张二人。

杜月笙掌握三鑫公司的实权之后，首先在租界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连法捕房中的法籍捕头，都争取投拜到杜的门下，充当杜的徒弟。如当时法租界嵩山捕房捕头“鹅牌”、小东门捕房捕头“马松”，这两人都拜杜为“老头子”，每月可获得杜的赌场中500元津贴。在帮会中与杜的地位本来相等的青帮流氓如顾嘉棠、芮庆荣、孙嘉福、荣炳根、袁珊宝等受杜笼络，甘心充当杜的助手。黄金荣于1927年从法租界督察长的职位上退休，在流氓界的地位相对减弱，而杜月笙的势力则大有发展。

黄金荣与蒋介石的渊源比杜深，早在1921年，蒋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抢帽子”(投机交易)破产后，通过虞洽卿的介绍，投贴拜入黄门，充当黄的门生，得到黄资助的路费才赴广州投入孙中山的护法阵营。而杜月笙是在北伐后期与黄金荣等帮会流氓界人物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才与蒋搭上关系的。但对蒋来说，杜月笙在帮助南京政府巩固统治方面，作用远超过黄金荣。他不仅大力协助蒋介石镇压共产党的活动，而且通过与蒋合作经营鸦片贩卖和制造海洛因，以及协助蒋绑架勒索富商，为蒋解决财政困难。

杜月笙在政界、工商界的发展，具有排挤黄金荣势力的迹象。如杜的门徒陆京士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杜的门徒王兆槐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陆京士还操纵着上海工会。黄的门徒在上海军、警界都没有担任要职，其门徒陈培德在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时，竟被陆京士指控有共产党嫌疑，遂遭警备司令部拘押。这件事使黄金荣大为恼怒。黄金荣为此气愤地对别人说：杜月笙“吃饭忘记种田人”，意思是说杜不应该忘记他这位恩人。

黄金荣与杜月笙之间矛盾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以黄金荣为首的“忠信社”与杜月笙为首的“恒社”的对立。恒社成立于1933年11月22日。宗旨初为“联络感情，互相扶助”，后来修订为“进行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而事实上是为杜月笙效力的帮会团体。它采用了近代社团的形式，恒社成员大部分为金融、工、商界投拜杜门的老板，其次为投拜杜门的政府机关的官员，再其次为投拜杜门的自由职业者和军警。从恒社成员的成份来看，它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化的帮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式的以农民、游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恒社的出现，反映出杜月笙已掌握了一支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打入社会上层的帮会力量，这是黄金荣所无法容忍的。帮会本来就有传统的盲从性、冒险性、排外性，在上海滩白相界(即流氓界)号称老太爷的黄金荣，把杜月笙的恒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想把恒社搞垮，但是始终未找到切实的办法。到1936年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以“社”来对付“社”的方案，指使其门徒秘密组织了忠信社。它的取名是借重于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的六角亭上树立的由蒋介石题的石碑上

的“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中的“忠信”二字。该社既没有成文的宗旨，也缺乏如同恒社那样的章程、组织机构等明文规定。实际上它的秘密宗旨就是千方百计搞垮杜月笙的恒社，它的成员既没有杜月笙的恒社那样达324人之多的庞大阵容，更没有那一批上层社会的人物。忠信社仅有少数上、中层社会的人物如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如松、陈福康、鲁锦巨、潘瑞生、龚天键、胡憨珠、杭石君、吴王荪、黄振世等，称为该社委员。社员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入社手续，也从未开成立大会。黄为名义社长，但从不亲自参加该社集会，仅在幕后指使门徒对付杜月笙的恒社。

忠信社从规模和活动能力上，都不是恒社的对手，不久就自我感到力量单薄。于是联络了与黄关系较好，与杜有矛盾的青帮首领、国民党党政界人物杨虎共同对付杜月笙的恒社。1936年夏秋之际，忠信社与杨虎领导的兴中社的骨干分子，每逢星期日在半淞园以聚餐形式密商对付杜帮的方案。所商定的方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帮，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等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由黄金荣向蒋介石告状。但经过六、七次秘密会议，工作进展不大，当“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忠信社陷入瘫痪，遂自行瓦解。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由浙江淳安返回上海，恢复了恒社总社。此时杨虎任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领导的兴中社改名为兴中学会，吸收1万多海员参加。黄金荣也不甘寂寞，在其门徒的建议下，将原忠信社改名为荣社，采取了公开办社的形式。但黄金荣所依靠的邱于瀛等门徒的组织能力与活动能力都不足与恒社对抗，又加上黄门的下层流氓以荣社社员名义对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荣社名声扫地，自趋衰落。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虎”，黄金荣的心腹黄振世宴请蒋经国，想当面告发杜月笙在暗中煽动抢购物资。但是蒋经国未能亲自赴宴。此后，黄金荣又通过善于交际、精明能干的儿媳李志清打电话邀请蒋经国到黄家赴宴。宴席间李志清热情招待蒋。蒋于席间宣传自己“打虎”的决心，并向李询问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的养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李本人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她为了帮助公公黄金荣打击杜月笙，就故意回答说：“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指杜月笙）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根。”李志清巧妙地告了杜月笙父子两人一状，黄金荣得知后，哈哈大笑，赞赏儿媳有招头。

不久，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以破坏平定物价的罪名锒铛入狱，这件事见诸报端，轰动上海，使杜月笙十分难堪，杜曾怀疑是黄门人员暗中捣鬼所致。

黄金荣与杜月笙的矛盾始终未公开化，他们只是暗中斗法，表面上保持了和气。据说杜月笙在上海解放前夕，出走香港之前曾到黄公馆看望了黄金荣，既是向黄告别，也是想劝黄一同赴港。当时中共地下党已通过杨虎向黄做了工作，要黄关照徒众不要对人民政权捣乱。黄向杜表示年老体衰，不愿客死他乡。杜月笙由于当年汪寿华等血案的思想包袱，又知道蒋介石决不肯允许他留沪，而他也看透了蒋介石一再拿他“当夜壶使”（杜自述）的伎俩，故虽不留在上海，也拒绝随蒋赴台，他选择了避居香港一着。

（郭绪印）

陈济棠献玉琢制“民国之玺”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授印，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受印。当时尚无国玺。

印与玺，在辞典中意有不同。印泛指图章、印信。玺、宝、印、章、记等统称为印。玺，在秦汉以后，惟皇帝印才能称玺。

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北伐，底定北平。不久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集团军司令至西山碧云寺，名为告祭总理，实则确定其正统地位。是年10月10日国庆，蒋正式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11月2日，他召开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

1929年1月，蒋介石召集各地方实力派至南京，开编遣会议，实行削藩政策，激化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不久，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会议改组湖南省政府，年少气盛的大将叶琪、夏威二师入湘撵走亲蒋的省主席鲁涤平，蒋桂冲突在即。

3月5日，蒋介石为分裂两广军事首领，电邀粤系陈铭枢、李济深、陈济棠入京，参加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铭枢途经香港，宿皇后酒店，遇火警从楼上跳下，摔折一条腿，遂留港休养。李济深风尘仆仆，于3月11日抵上海，旋转道南京。而陈济棠则“慢慢走”，以观风向。

3月15日，三全大会开幕。次日，李济深便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讲话。他说国民党一大时有中央委员24人，二大时发展为36人。现在全国统一了，中央委员人数应增加到48人或60人。显然，他在抨击蒋系独揽中央的局面。此时蒋桂大战已一触即发，蒋介石明令将叶琪免职查办，所部归何健调遣，夏威免职，以所部旅长李明瑞升师长。李济深欲去蒋桂之间调停，向蒋直言，不要派中央军

增兵湖南，防止蒋桂战争爆发，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事变，蒋介石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蒋已同意和平解决湘事。熟料中央军大兵入境，李宗仁、白崇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出尔反尔也十分气愤，为与广西保持一致，他电告李、白"如蒋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的特务截获。于是李济深遭到迎头痛击，被囚禁于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被永远开除党籍，褫夺一切职务。李济深春夜独思，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哀吟。

而此时陈济棠仍滞留沪上，在做帮蒋还是助桂的选择。不久，蒋介石委陈为广东特派员，"嘱即返粤，不必入京"的命令，将两广大权交给了陈济棠。

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就职通电，接受中央所派编遣任务，命令桂军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理完竣。

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二系分裂。不久，桂系调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军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二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夺取了广西的地盘。两广遂成为陈济棠的天下。

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济棠绞尽脑汁，要献给蒋一份大礼。他派人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了一块缅甸产的青翠玉石。立即"以九千五百元之代价"购回，并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蒋收到后，请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传国玉玺"，了却夙愿。陈济棠后来辩白说献玉之举，是为"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蒋介石将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由周负责刻玺工程。为此，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由他自己督治、王禔负责监工并篆文，施震华担负设计绘图；唐源邺、刘云逵任监工助理，玉工陈世科、陈燮芝父子担负琢刻任务。该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琢刻完竣。周仲良特为此题识——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棠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赍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可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纽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纽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纽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后来，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纠正了周文中不确之处云：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惟诠释纽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制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国民党迁台时，带走了"民国之玺"。

（洛华）

流行风

电影《故都春梦》

联华公司的出世作《故都春梦》——罗明佑、朱石麟编剧，孙瑜导演，黎民伟、黄绍芬摄影。影片表现一个私塾教师朱家杰（王瑞麟饰），靠妓女燕燕（阮玲玉饰）之力往上爬，当上了税务局长，便贪污腐化。后因政局突变，他的后台倒了，本人也因劣迹暴露，丢官入狱。待他刑满出狱后，妓女倦逃，女儿（陈燕燕饰）被骗为娼。这时，他如梦初醒，悔恨莫及。最后落魄归乡，又回到妻子（林楚楚饰）身边。颇有宦海沉浮，前尘如梦之慨。影片对北洋政府的官场黑暗、生活腐败，作了无情的暴露，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刻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有着严肃认真的艺术处理。体现了罗明佑所说的制片宗旨，"彻底改革神怪武侠迷信凶残打杀的国片作风"。影片在上海公映时，果然轰动一时，打破了各大城市的卖座率，让观众有一种新锐之感，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

小说《灭亡》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小说以1925年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社会为背景，描写青年革命家杜大心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以生命殉了“信仰”的故事。杜大心信仰“自由社会主义”，性格孤僻、偏激、忧郁。他带着严重的肺病坚持开展宣传工作，甚至为信仰而牺牲爱情。但由于寻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使他几乎失去斗争的勇气。后来目击了革命工人张为群被反动派杀害的事实，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复仇，与敌人同归于尽。最后，在暗杀戒严司令中事败，不幸被捕牺牲。作品通过杜大心的悲剧命运，热情赞颂为自由而牺牲的精神，愤怒地揭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控诉了旧制度的残暴。同时，它以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宣告了依靠个人的奋斗与反抗，必然导致斗争的失败。作品采用梦境、倒叙、回忆等手法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充满强烈的抒情色彩和悲壮气氛，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在当时青年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小说《炸弹与征鸟》

作者白薇，主要内容：

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背景，写出身于旧官僚之家两个性格各异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女性的不同生活道路。主人公余玥、余彬是同母所生的姐妹，她们各以“征鸟”和“炸弹”自命，决心用“炸弹去炸黑暗”，投身革命。余玥在封建包办婚姻下，饱受精神痛苦后冲破重重阻力到广州、武汉参加革命，先后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她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在革命者马腾的影响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后在参加革命活动中被捕。妹妹余彬热情活泼而慕虚荣，在汉口妇女协会里被当作“花瓶”沉溺于交际、舞会、演戏、应酬，后由怀疑而意志消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伐时期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分裂的历史侧面，以及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生活。故事穿插爱情内容过多，显然受当时“革命的浪漫蒂克”小说影响，削弱了主题的严肃意义和作品的思想深度。

小说《旧时代之死》

作者柔石，主要内容：

写一个贫病交加的知识分子朱胜瑀在他生命最后八天的变故和心理。朱胜瑀出身于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死后，中途辍学就业。他憎恨吃人的旧社会，不愿仰人鼻息，就辞去C社小职员的职务。失业后又得了肺病情绪抑郁，性格偏狭，心理开始发生变态。这时传来母亲要他与谢家女子结婚的消息，他便由愤懑而产生狂乱，返回故乡后身心憔悴。在听了尼姑的一番佛学说教后，精神被感化。当传来谢家女子因他拒婚而缢死的消息，又使他受到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以至迷乱狂癫。最后服鸦片自杀。作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无法摆脱黑暗现实的重压，最终为旧制度所吞噬的悲剧。小说受《狂人日记》的影响，通过丰富的想象，抒写人物的潜意识的精神活动和反复回旋的内心冲突，真切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具有一定时代意义和艺术特色。

小说《田野的风》

作者蒋光慈，主要内容：

大革命前夕，广大农民饱受地主豪绅压榨，渴望生活变革。后革命党人张进德、李杰来到家乡，向农民散播革命火种，把农民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下，展开打倒土豪劣绅的反霸斗争。阶级敌人制造各种谣言，收买落后农民，暗杀农会干部，于是开展了一场生死搏斗。马日事变后，地主反革命武装卷土重来，农民群众组织自卫队，冲出重围，奔向金刚山（暗指井冈山）“入伙”。小说通过热情歌颂农村土地革命的正义性，真实地再现了这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农民开辟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问题，在客观上批判了当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作品较为成功地塑造了矿工张进德和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李杰这两个党的干部形象，写不同类型农民的觉醒过程，也各有个性。刻画人物、描写场面细致生动，安排情节颇有层次；但也存在着叙述多于描写、缺少提炼情节等缺点，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受到影响。

小说《追求》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

作品着重描绘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失去了革命高潮时的那种热情，过着悲观灰色的生活。他们精神苦闷，思想混乱，却又不甘了此一生，在幻灭痛苦中各自有所追求。张曼青为继续追求生活的真谛决心从事教育，寄希望于新的一代；但黑暗的社会却处处压迫无辜的学生，使他改革社会的憧憬成为幻影。王仲昭想改革报纸并借此获得理想的爱人，当婚期将近突然传来爱人病危的消息，从此一蹶不振。女青年章秋柳想竭力

振作，追求光明但又自暴自弃，把追求享乐和肉欲刺激作为她向她所厌恶的现实报复的手段。厌世主义者史循经过坎坷的人生不仅革命理想已经幻灭，而且完全丧失了生活的欲念，只求以自杀了此一生。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各有所追求，而均归于失败，说明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远离革命和人民群众，必然敌不过环境的压迫，终究不能幸免消沉和堕落的命运。

小说《春明外史》

作者张恨水，主要内容：

小说以报人杨杏园的恋爱史为情节主干，展示了军阀时代北京纷纭的人生画面。作品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二十二回写杨杏园钟情于妓女梨云，直到梨云病逝，杨杏园始终以情相待。二十三回以后写杨杏园在梨云病故后与家庭教师李冬青相爱，但李因暗疾不能婚嫁，遂引出寄人篱下的史科莲相代。全书所写的是"贞情的三角恋爱"的悲剧。在主人公身上虽带有平民主义色彩，但所写爱情离不开才子佳人旧小说的窠臼，缺乏时代气息。作品的主要意义在于其中穿插了不少官僚军阀腐朽糜烂生活的描写，这些达官贵人贪婪成性，任意侵吞公款肥私；他们捧旦狎妓，玩弄女性，挥金如土。但作品对他们的揭露局限于私生活的糜烂，很少触及政治问题，并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未能反映社会本质。艺术结构比较松散，但文笔流畅，吸收了新小说的技法，注重细节描写、环境气氛烘托和人物心理刻画。

诗《议决》

在幽暗的油灯光中，
我们是无穷的多——合着影。
我们共同地呼吸着臭气，
我们共同地享有一颗大的心。

决议后，我们都笑了，
像这许多疲惫的马，
虽然，又静默了，
会议继续到半夜……

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
我们将要叫了！
我们将要跳了！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殷夫）

诗《我们》

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
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
我们转动着地球，
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
我们是流着汗血的，
却唱着高歌的一群。
目前，我们陷在地狱一般黑的坑里，
在我们头上耸着社会的岩层。
没有快乐，幸福，……

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
我们一步一步的共同劳动着，
向着我们的胜利的早晨走近。

我们是谁？
我们是十二万五千的工人农民。

（殷夫）

历史档案

红四军司令部布告①

（1929 年 1 月）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增兵湖南，防止蒋桂战争爆发，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事变，

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那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甲　党的组织路线

一　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　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

三　红军原有小组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的将各种工作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的混合编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乙　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　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一）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二）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开得非常少。

（三）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的放松了。

（四）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五）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的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　纠正的路线：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
2. 忠实；
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 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察是

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的举行起来。

（四）严格的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的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

丙　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　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一）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我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二）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三）负责人事前没有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四）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作声了。如发言有错误，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五）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　纠正的方法：

（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遏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是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丁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　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　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为单位经常有计划的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　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部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戊　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员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的工作的任务。

己　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庚　士兵会党团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中央常务会议决议开除汪兆铭党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监会来涵，为第十一次常会决议，汪兆铭永远开除党籍。抄同决定书，请查照公决执行案讨论。（甲）事实。缘

汪兆铭自前年嗾使张发奎称兵广州，酿成焚杀惨剧。本党同志，无不痛恨。三全大会之间，虽经各方代表一致请求惩办，以本党总理素以宽大为怀，仅予警告处分，冀其悔悟。乃汪不自惜，竟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欺骗无智青年，日以反对中央为能事。近以中央议决实施编遣以来，各地反动，遂有桂系及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相继叛变，其目的不外欲割据自私，阻挠编缱，遂利用汪为傀儡。汪自甘暴弃，竟于此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联合桂系冯系张发奎唐生智，及其他北方军阀余孽齐燮元等，希图破坏中央，颠覆党国，并发出各种宣言，诋毁本党。经各地党部：如粤省党部、广州市党部、京市党部、苏省党部、黄埔军校特党部、鄂省党部、汉市党部、皖省党部省政府、三藩市、古巴、新嘉坡、一二三四分部、芙眷支部、第一分部、庇能支部、香港支部、利物浦总部、墨西哥参迫订支部、武汉军校特党部、闽省党部、暹逻总部、马达克斯加直辖支部、秘鲁利马支部、南洋英属马都巴克支部、新嘉坡五七八九各分部、黄埔政治学校特党部、及本会委员萧佛成等分电检举，请予开除党籍。并能缉严惩。经中执会第五六次常会讨论，认为应予开除党籍，并通缉送本会议处。（乙）审查意见。基上列事实，则汪之叛党祸国，事迹昭著，若不严行惩戒，非特无以伸张党纪，抑不足以对本党同志，为镇压叛变，明辨顺逆，严肃纪律，应依总章第八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永远开除党籍。爰议决如下：（丙）主文。汪兆铭永远开除党籍。

（选自《国闻周报》第六卷第五十期）

对于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置冯玉祥叛乱事件之经过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大会接受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置冯玉祥叛党乱国事件报告后，认为此项处置，于严申纪纲之中示宽仁待人之意，至为妥善。以后对于本事件，国民政府仍应以本常会意旨，迅速办理。

附：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置冯玉祥叛乱事件之报告

冯玉祥破坏统一，背叛党国，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由国民政府通令拿办。此项处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认为，为以主义统一全国，以纲纪遏灭乱祸计，必迅速执行；若一迟徊，必成燎原。故毅然决行，不敢怠慢——当此项处分未执行以前，中央本欲示以宽大，辑其野心，乃冯玉祥非特无心悔过，且蓄意称兵，黄河铁桥、武胜关隧道及平汉、陇海铁路之炸毁，勾结桂系及共党之阴谋益著。至此，其逆迹暴露殆尽，不得不辑拿严惩，以申党纪而彰国法。但其所统部队本为国家之军队，且对于革命曾著勋劳，中央不忍以冯氏一人之叛变累及全体有革命历史之将士，且深知各将士亦不愿自隳其革命之历史与冯氏同趋于灭亡。自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诸将士实行拥护统一，服从中央，中央益信此着观察之未误。即其尚无明白表示者，大率为环境所劫持，假以时日，必能与韩、石、马诸同志步趋一致，是宜应谅其苦衷，勖以来日。故除将韩、石等分别嘉奖外，凡继是以表示忠诚者，均应一律优遇。拟派阎委员锡山就近宣慰，免致胁从。至于西北之军事善后事宜，亦拟任阎委员锡山就近办理，俾西北军民得早脱军阀之涂毒，沐三民主义之福利。所有关于处置冯玉祥叛变事宜，理合报告经过，谨候核示。

（选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名单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一、国民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

委员长　蒋中正

委　员　吴敬恒　谭诞闿　冯玉祥　阎锡山　李宗仁　李济深　张学良　杨树庄　何应钦　宋子文

二、国军编遣委员会出席委员

委员长　蒋中正

委　员　冯玉祥　阎锡山　李宗仁　李济深　何应钦　朱培德　鹿锺麟　商　震　白崇禧　吴敬恒　张人杰　蔡元培　胡汉民　李煜瀛　谭延闿　戴传贤　王宠惠　宋子文　孙　科　赵戴文　王伯群

三、国军编遣委员会列席委员

委　员　王树常（代表张学良）　陈季良（代表杨树庄）

张　群　葛敬恩　朱绶光　周亚卫　刘汝贤　曹浩森　陈绍宽　俞飞鹏　贺国光　李　铎　陈　仪　古应芬　何成浚　陈调元　王正廷　易培基　孔祥熙　薛笃弼　贺耀祖　熊　斌　贾景德　李仲公　张华辅

国军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

（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

本会遵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之决议，依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之条例而组织。宗旨在编遣国军，整理军事，解军额过剩之弊，谋统一建国之实。兹当开会伊始，谨以爱护党国之赤诚，实现中央军事之使命，决心所在，兹发其凡。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关于军事负责同志切实筹办之语，即本会条例所规定之职责。有如军制军额军费之议定，卫戍区域之画分，此皆根本要图，动关百年大计，而目前全国希望最切之事项，当为战后散乱之军事如何整顿画一，以统属于中央，全国过剩之军额，如何切实缩编，以免除国家人民无底之殃。换言之，即以裁编遣置点验校阅之成绩，卜本会全部事业之成就是也。本会负此使命，敢不努力以赴之。虽研究条目，自有待于会议之决定。而下列数项，则为本会所公认为必守之信条，敢先负责宣言以答邦人之望。

（一）曰不偏私本会关于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诚以此次缩编，决不同于国际之裁军，国际裁军之不能彻底，在于各国利害之本位，发为相互之呼应。若我百馀万之国军，同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同属青天白日旗下，故此次裁编之标准，惟当依于国家实际之需要、与国用所能负担之程度，合全盘以统筹，为整个之整理。如有以集团或地域为单位，而倡为均衡裁遣之说者，是在制度上将延长封建之恶习，为革命主义所勿宥，而在实际上足以引起军阀之割据，亦为国家利益所勿许。本会列席之军事同志必不有此主张，即中央各同志亦必本据党议而监督之也。

（二）曰不欺饰。军阀时代之最大恶习为虚报兵额，隐秘军费而不公开，所谓空报军额，有出于冒领军费之目的者，有出于规避遣散之目的者，亦有名为裁遣而阴图扩张，故虚报遣散之兵数以从事者，凡此皆军人过去之自私自利恶习，至人民切痛军队，本党革命救国，将使武力为人民之武力，决不容有此现象。本会此次集议，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我军事同志各有革命之贡献，自当不与军阀同病，遵守中央之意旨，听会议之决定，而本会将依条例规定之职责，负责施行严格之点验与检查，务使此次裁遣名实表里绝对一致，上可对总理在天之灵，下可告慰国民望治之意。

（三）曰不假借。昔日军阀时代亦常有以裁兵运动为口号，而希图对外举债以利私斗者，总理在民国十一年时力昌兵工政策，直系军阀未能接受，然一方面裁兵运动之呼声，又屈服于军阀之戎幕，真意所在，国民早已洞烛其心，而历年割据状态之小军阀，乱招兵士，一方面高呼遣散，以图从中取利。本会此次遵从第一次代表大会殊遇革命军人决议案之精神，对于裁编遣置决不使国家款项，分文乱用，以使被裁军人各得其所，以完成应尽之使命。

（四）曰不中辍。国民革命之战，时越三年，动员数过百万，值此建国伊始，不惟十三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状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制度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加以根本之澄清。本会承中央重大之负托，惟有以忠诚奋斗之精神，期全部目的之贯彻，不为难行之提议，亦决不以空言而自画，且不惟裁遣士兵、厘定军制而已，尤将以财政之统一，立建国之基础。本会负责军事诸同志，悉感于现状之不可久，认为本会成立以后国家所有之税收，皆应统一于中央，国军全体士兵之薪饷，分文皆应仰支于国库，必如此方可不陷军阀之覆辙。掬诚相约，义无反顾，所以保障革命者在此，所以表现实际建国之力量者亦在此。

右之四端，虽未足以尽本会全部之使命，而实本会所愿奉以周旋之精神，深维我国百年来之军事历史，不惟贻祸于国家人民，亦以自相犯残，授帝国主义者以侵略之机会，此实民族之不幸，亦为军人之耻辱。今当军阀清除，国家前途始有一线之曙光，是当急迅直追，不容再误。本会敬以革命之决心，痛切自誓于党国旗与总理遗像之前，务本上述四项之原则，贯彻整理军事之全功，爰昭告我全国同胞同志，惟相与戮力以助之。

（选自《国闻周报》第六卷，第三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七一次会议，通过统一外交案，规定“所有各省对外交涉应归中央办理，由外交部通告中外，无论何国凡与各省长官订立协定，中央不能承认，不能发生效力”。此外并通过土地法原则等案。

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通过中比、中意、中葡、中西、中丹商约；并通过《国民

政府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编遣委员会常委及各部人选和孙科所提电饬广州政治分会执行铁道部施政方针，将广九、粤汉、广三各路局统归铁道部管理等决议。

1月24日　国民政府特任张静江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曾养甫为副委员长，并聘吴稚晖等三十七人为委员。特派冯玉祥、马福祥、王瑚等十七人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以冯玉祥为委员长，马福祥、王瑚为副委员长。

1月30日　国民党中政会第一百七十三次会议，推谭延闿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追认蒋介石等为国防会议委员；通过《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及《蒙藏委会员驻平办事处规则》；决议奉天省改称辽宁省(2月5日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知照)。

3月20日　三全代会第五次会议，朱家骅主席，安徽、上海、福建代表报告党务；中央常委会提出确定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决议交付审查；临时讨论监委会十七年1月7日检举汪精卫等一案，决议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由大会予以书面警告。

3月28日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谭延闿致闭幕词，蒋介石发表演说，称本党应绝对禁止小组织，并要求各省党部必须与省政府共同前进，避免纠纷。同日，第三届中执委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为常委，决议取消民众训练委员会，主管事务归训练部办理。

4月4日　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二次大会，修正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草案；决议国府侨务委员会改归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整饬党纪通令。

4月11日　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决议推谭延闿、胡汉民等审查政治会议组织条例之修正与人选案；戴季陶、孙科等审查三全代会交下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与未及讨论各案；常委会秘书处日常事务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秘书长陈立夫未就职前推叶楚伧负责。

4月15日　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修正中央政治会议条例和建都南京纪念办法；并决议中央党务学校党部改归中央党部直辖；解散湖北省党部及汉口市党部，所属党员重新登记，分别去取，分别派夏斗寅、邱鸿钧等为该两党部临时整理委员。

6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八三次会议决议，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辞职照准，以张荫梧继任。

6月6日　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三全大会未及讨论各项提案之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各级党部工作考核条例草案；蒋介石提请任命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并撤销其处分案，决议先恢复俞之党籍，候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议决《字林西报》已改变态度，取消禁止邮递。

6月8日　国民政府以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不私一人一系"，通电拥护中央，讨伐冯玉祥，特予明令嘉奖，尤冀韩等早日清除反侧。

6月10日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开幕，接开预备会，出席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四十三人，到各机关代表数百人。胡汉民主席，议决：冯玉祥业经开除党籍并革除其中央执行委员，应以王伯群递补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孙科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

6月11日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开第一次大会，蒋介石主席，通过预备会决议各案，推出党务、政治、军事、建设四组审查委员，决定自12日起开审查会三天，常委提案分交各组审查。

6月21日　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任命石青阳为滇康垦殖特派员。

7月3日　蒋介石以河北省党务复杂，是日在平发表党务政治谈话，称党内不应有小组织，并声称"国民政府之基础已十分巩固"。同日，陈果夫抵平与蒋会商整理北方党务方针。

7月26日　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特任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任命刘大白为教育部常任次长；公布《考试法》、《禁烟法》。

8月10日　国民政府令，山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阎锡山准免本兼各职，遗职以商震继任；徐永昌继商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8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通过征求预备党员实施办法；(二)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一律撤职，另派陈访先等七人为该省党务整理委员。(三)停办河北《民国日报》，由中央派员接收。

10月9日　国民政府颁令，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启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同日，又令定自本年10月10日为乡镇自治施行法及区自治施行法施行日期。

10月18日　哈尔滨警察局派警察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哈埠分行，并逮捕苏联职员二人。据称该行自停业后，仍拟收回华商贷款，华方认为非法，故予封锁。

11月12日　中国驻日公使馆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到留学生及华侨八百余人。会中蒋(介石)、冯(玉祥)两派军人发生冲突，蒋派少尉丘士深拔剑刺伤冯派中尉王保畀，双方武斗，伤十余人。

12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依中常会决议，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案。

外　交

1月11日　蒙古代表团前曾向中央请愿，提出热、察、绥、青四省省委蒙人居半、四省各设一蒙旗自治委员会、四省各旗设立旗政府三项要求。是日，该团二次派代表玛尼巴达拉等十人抵南京，促政府早日解决。

1月28日　中日悬案交涉开始，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使芳泽在南京首次晤谈，中国方面外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山东交涉员崔士杰，日本方面使馆秘书堀内、翻译有野、参赞驻沪日领事上村列席。芳泽表示诚意解决各案，提出先自济案谈起。王表示同意，请日方早撤驻济日军，双方就撤兵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芳泽对汉水案希望以大化小。

2月2日　国民政府令派外交部长王正廷为商订中法越南新约全权代表。同日，王正廷与法使玛德在沪继续会谈，法政府已原则同意前在南京所议各事，本日双方依草约逐条讨论。法方同意中国在西贡、海防、河内设领事及修改滇越路章程，但关于护照问题不允废止原办法，只允减轻护照费。

2月17日　外交部照会英、美、法等十二国公使馆，通告新关税项下每年提出五百万元整理内外债。

2月27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郭泰祺为驻意大利国特命全权公使；诸昌年为驻瑞典国特命全权公使，兼挪威国特命全权公使；戴恩赛为驻巴西特命全权公使。特派施肇基、刘书蕃为万国邮政联合会代表。

3月28日　驻美公使伍朝枢向美国总统胡佛递交国书，胡表示对两国外交当以合作精神出之。

4月2日　中日双方接交胶济委员在济南开会，日方已准备交待。3日，日方派松室赴泰安谒孙良诚，希望中国早日接收，孙决定派程心明、梁冠英等四师约六万人接收胶济。

4月16日　外交部以法国驻云南交涉员诋毁我特派云南交涉员，并干涉我国任免官吏，令驻法公使高鲁向法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该驻云南交涉员撤换。

4月26日　北平外交团领袖公使欧登科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废除荷、比、丹、巴西、西、美、法、义、日、英、葡十一国1919年5月5日对华禁运武器协定。

4月27日　外交部照会英、美、法、荷、挪威、巴西六国公使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

5月2日　中日宁、汉两案解决，外交部长王正廷、驻华日公使芳泽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5月8日　外交部国际司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照会，送达英、法、美、荷、挪、巴西六国公使。

5月17日　汉口交涉员李芳以水案觉书送到日领馆，内容大致为日本撤驻汉水兵，中国同时劝阻反日运动。

5月27日　哈尔滨当局借口第三国际执委会在苏联驻哈领事馆内集会，入内搜查，抄走文件、书籍及物件两车，并拘捕驻沈阳苏总领事库兹涅佐夫（旋被释放）、驻哈领事梅里尼可夫及馆员等三十九人。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当即向黑龙江省长官公署提出抗议。

6月3日　日本公使芳泽、意大利公使华蕾、德国公使卜尔熙分别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

6月5日　驻辽宁苏领事馆就哈尔滨当局无理搜查苏馆事向辽交涉署提出抗议。同日，东铁苏理事长齐尔金访张景惠面致抗议，张借口齐非外交官予以拒绝。

6月17日　中比庚款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款项用途原则：（一）华人留比学费；（二）中比学术交换；（三）在华在比中比间学术事业；（四）比人在华经营之慈善事业；（五）中比在华卫生建设事业。

6月21日　中英会商接收威海卫和修约等问题，中方王正廷、徐谟、刁敏谦，英方蓝普森、福克司、台克满参加，中国要求无条件收回设在刘公岛及威海卫全湾英人建筑及炮台，英国则主张保留，修约问题亦无结果。

6月26日　外交部照会驻华瑞典代办雷尧武德，以《中瑞友好通商行船条约》至本月14日期满，请即各派专员重订平等新约。

6月29日　中法越南陆路商约交涉续在南京谈判，中方王正廷、张维翰、徐谟、胡世泽，法方玛德、粤期特鲁、阿拿大、茄乐参加，法使玛德报告法国政府研究前订草案情形，谓补充修改甚多，并提出书面意见，中方须详加研究未能即议，遂散会。

7月3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复照驻华使团领袖公使欧登科，谓收回临时法院系外交问题，应由外交部与关系国公使直接交涉，不宜委诸地方代表审议。同日，王正廷赴沪，与法使玛德继续会商中法越南陆路通商条约。

7月10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及驻苏代办朱绍阳等抵平与蒋介石会晤。下午，蒋、阎、张（学良）、王举行会议，讨论西北问题及东北外交。当晚，蒋、阎、张先后离平。蒋行前招待报界宣称：与阎、张晤谈结果，一致认为应服从中央，遵守命令；编遣军队，各区同时举行；返京后将立即召集编遣主任会议。

7月17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与中国绝交。

7月18日　下午，苏联二次照会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召集高级干部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决定对苏来照不予答复，准备发表宣言请各国主持公论，并公布前从哈尔滨苏领事馆所获之文件。

7月23日　外交部宣称：中苏邦交虽然断绝，但不无和平之途径，故不能视为完全决裂。同日，朱绍阳语记者：俄事确已和缓，决不再兵戎相见，二次来照亦无答复

必要；并宣布即将北上，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交涉。

7月24日　中波修约会议在南京外交部举行，双方决定废弃北京政府所定之商约草案，重订新约。

7月25日　苏联政府发表文告，详述白俄在远东之活动，谓此种白俄得到中国当局之直接援助。

8月4日　孙科抵沈阳与张学良、朱绍阳及东北政务委员等举行会谈，对苏方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问题，决定依照《奉俄协定》进行交涉。朱于是晚赴哈尔滨。

8月7日　中东路副局长李绍庚以电话邀苏领事梅里尼可夫到满站接洽，被其秘书米海伊诺夫藉词拒绝。同日，外交部电嘱朱绍阳"除商议正式谈判日期及地点外，其余概可拒绝讨论"。

8月9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与朱绍阳通电话，对派代表会议表示同情，但谓必须以彼方之最后通牒为基础条件。

8月16日　外交部电非战公约签字国宣布对苏交涉经过及中国态度。同日，另电驻德公使蒋作宾，请德政府代向苏联询问此次苏军入境是否奉有政府之命令，若无即请加以制止。

8月19日　外交部再电驻美公使伍朝枢，令向各国宣布"苏俄破坏非战公约，向中国开衅情形"。

8月21日　外交部电驻日公使汪荣宝，嘱向日本政府转达国民政府同意日本政府以佐分利任驻华公使。

8月27日　蒋作宾电外交部，谓接苏俄政府正式答复：(一)华军不攻俄军，俄军决不攻华军；(二)须中国负责将在华白俄军一律遣散。

8月29日　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就中东路问题语记者称，中国始终以无条件先开正式谈判为言，外传苏已新任中东路局长，完全不确。现在边境形势已渐和缓，如苏联愿与我直接谈判，则交涉前途数日内或有进展希望。

9月1日　外交部电令驻德公使蒋作宾向苏驻德大使窦克森提出答复苏联政府之照会，质问苏方对华军事行动，声明中方并未利用白俄，望互派代表，会议解决中东路发生后之纠纷，并解决中苏间已往之悬案。

9月4日　蒋作宾自日内瓦电国民政府，谓中苏交涉连日无进展，因苏未加入国联，无代表在日内瓦，故无从接洽。同日，伍朝枢在国联发表演说，希望贯彻盟约第十九条之规定，将不适用之条约加以修改，并称"联盟成立十年，未能引用，深为可惜"。

9月5日　外交部发表英、美、法、荷、挪五国关于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复照，内容皆反对中国收回领判权。同日，外交部决定根据五国复照，分别发出第二次照会，重申撤销领判权之意旨。

9月12日　国民党中宣部招待报界，刘芦隐声称：中东路问题"决不变更对俄宗旨，仍遵守非战公约，希望以和平方法解决。"

9月17日　苏联政府答复南京政府有关委任中东铁路副局长之复文，是日已送驻苏之德大使，内称："南京政府既否认其自己条件，则谈判地点问题直无意义，此后冲突责任须由南京政府负责。"

9月28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驻苏德大使，谓齐齐哈尔苏籍路员三人被枪击事，请德政府向南京与辽宁省当局切实抗议，并谓苏联将采取适当方法，以保护在华之苏联人生命。

9月30日　铁岭事件，日本反提出条件，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三十万元为日兵治伤，并要求将广裕大街(即肇事地区)划为铁路附属地。沈阳交涉署严加拒绝。

10月3日　外交部电驻德公使蒋作宾，就苏军进攻满洲里事向驻德苏大使提出质问，声称中方所受损失须由苏方完全负责。

10月9日　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在南京与王正廷会谈两小时，佐分利语记者称："本日会见系一种普通谈话，对中日修约事未多提及，至正式会期约在一月以后。"

10月21日　中苏交涉无进展，王正廷电令蒋作宾中止与苏谈判，并电张学良加强边防；另方面整理交涉经过，准备公告国人及外邦。

10月30日　苏联政府就中苏交涉问题发出第十次宣言致各国政府，对国民政府25日宣言有所答辩，并主张与东北当局依照1924年俄奉协定进行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

11月19日　驻沪日总领事重光葵由沪抵京访王正廷，要求早日继续进行宁案赔款委员会之调查事务。王大体承认，并要求日方从速解决青岛纱厂罢工问题，胶济铁路问题，及各地方不正当之课税问题。

11月26日　中国驻德公使馆发表中国外交部托德转致苏联政府之照会，提议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调查中苏冲突真相，以明边境冲突责任，并要求各自边界撤退军队三十英里，以免再起冲突。中国政府准备将全般事件交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宗旨之中立公正机关解决。

11月29日　王正廷招待记者报告外交，谓中俄交涉外传地方与中央意见不一致，完全不确。同日，王否认中国已承认苏方"三项条件"说；并称苏要求中国代表赴伯力谈判，倘与我条件相同，可以照办。

12月2日　美、英两国政府为中东路问题照会中、苏两国政府劝履行非战公约，两国边境军队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解决两国纠纷。

12月16日　中苏预备会议在伯力外交员公署开幕。苏方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及前驻哈苏领事梅里尼可夫提出中东路局长为鲁迭意、副局长为简尼索夫，征求华方理事同意，并称待通过理事会予以任命后，再续议其他两项，未任命前停议。

12月17日　中苏预备会议继续举行，苏方对铁路警备权允在最后讨论，其他各件无甚争议，撤兵一事无结果。

12月19日　中苏预备会议自17日至是日，着重讨论新任正、副局长就任手续，及恢复东铁7月11日以前原状、释放被拘侨民等问题，是日议决：正式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双方释放侨民，定十九年(1930)1月1日开始，至于中东路局长及双方人民与军队损失，待正式会议解决。蔡运升即返宁，莫德惠在沈阳待命。

军　事

1月13日　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以张学良已通电宣布杨、常阻挠滦东撤兵、交还滦东五县、放回关内各路机车车辆等罪状，令河北省政府电询奉方撤兵及交还车辆日期，以便派员接收。

1月17日　编遣会议开第四次大会，何应钦报告各提案审查结果，冯玉祥报告《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决定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的审查意见，提出将《实施办法大纲》并入《进行程序大纲》之内，决议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月26日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王正廷、宋子文为国防会议委员。任命冯玉祥、刘骥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冯为委员长，刘为副委员长。

2月5日　国民政府据编遣委员会呈请，训令军政部、海军总司令部等称：海军总司令部取消后，设海军编遣办事处，原有第一、二舰队编为第一、第二舰队，渤海舰队改为第三舰队，广东各舰队改为第四舰队，统归编遣委员会管辖，由海军编遣办事处分别编遣。

2月12日　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表示服从编遣。

2月22日　已入湖南之武汉李宗仁军叶琪率何宜、危宿钟两旅向常德谭道源部进攻，谭部往辰州上游退去。同日，李明瑞、杨腾辉两旅移株洲，向浏、醴追击鲁涤平部。

2月26日　蒋介石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刘峙、顾祝同、缪培南、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夏斗寅各师长于3月3日以前完成出师准备。

2月28日　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设宴为鲁涤平洗尘，谭延闿、朱培德等在场，鲁于席间报告湘主席任内各事。同日，蔡元培函李宗仁，商查办湘事办法。

3月3日　蒋介石电令第一集团军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准备对武汉用兵。南京市公安局本日起开始征夫。

3月26日　蒋介石改订战斗序列，以编遣会名义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刘峙为“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讨逆军”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

3月27日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与桂系武汉方面军队在武胜关发生冲突，数小时后桂军南退。同日，海军通电拥护中央，各舰队先后西上参与对桂系作战。

3月29日　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何成浚为第九军军长，第五路以第八、九两军编成之。4月4日，唐、李、何联名通电拥蒋反桂。

4月2日　蒋军第二路刘峙部与桂系胡宗铎、陶钧、夏威部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冈、黄陂之线，是晚刘部已占领距离武汉数十里之青山。

4月1日　蒋军第二路刘峙部攻占黄冈，罗霖旅降，夏威受重伤，其部归李明瑞指挥。同日，蒋军又占领麻城；海军楚观、楚同等舰已向刘家庙发起攻击。

4月3日　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在黄陂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守为攻，即日下令于4日进行总攻击，但因夏部已不听命令，胡、陶遂分途退却。4日，胡部退往夏口、柏泉，陶部退往蔡甸，胡、陶本人通电下野，师长职交李石樵、郑重接代。张知本、潘宜之等亦同时离汉。

4月19日　胡宗铎、陶钧派代表谒蒋介石，商定准胡、陶等投降下野，并给十万元，所部军队悉予解散。但前方仍有战事，蒋军夏斗寅部占领荆门，桂军退当阳，蒋军飞机队继续轰炸沙市，炸毁桂军船支两艘，并散发传单促桂投降。

4月23日　张学良召开军事会议整理东北军，决定改师为旅、淘汰老弱残疾、开除吸鸦片及嗜好者、招补空额、官兵一律识字、多添骑兵、兵饷改洋等项整理办法。

4月24日　冯玉祥在开封召集所部师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时局与军事问题，会后即撤退鲁西、豫南部队，将主力集中于潼关一带。同日，韩复榘之第三路指挥部由信阳移至郑州。

5月11日　徐景唐部李务滋、云瀛桥两旅进占石龙，威胁广州，李并令王道团向虎门前进，陈济堂急调蒋光鼐部蔡廷锴旅沿广九路抵御。

5月14日　冯玉祥任命韩复榘为郑州及信阳警备司令，孙良诚为开封及兰封警备司令。又令驻武胜关、信阳之张允荣部开往泌阳、南阳；驻遂平、驻马店一带军队开往洛阳集中。

5月15日　豫南冯军韩复榘部纷纷后撤，张允荣二十九师临行将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炸毁，此外东双河、漳河铁桥均被冯军破坏。同日，孙良诚部扣留陇海路客车

准备运兵西行。

5月16日　冯军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指责蒋介石外交上卖国、指派三全会代表为不合法及用人不当等，促其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统五十万大军与蒋周旋。

6月3日　李明瑞率部抵梧州，布告安民，并通电称即向南宁进军，全省肃清为期不远，念祸首仅为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诸人，其余非甘心附逆，翻然来归者自当一视同仁。

6月2日　粤、湘军联合攻梧，与桂军战于封川，桂军退往桂平，陈策海军陆战队和范石生部相继进占梧州。

6月9日　唐生智、何成浚在太原谒阎锡山，转交蒋介石促阎对冯用兵函。阎对时局仍主和平，并表示蒋决不能卸肩，对冯用兵问题，决定以冯去留为转移，去则罢兵，不去即讨伐。

6月12日　阎锡山、唐生智、何成浚等在太原会议，初步议定对冯问题善后办法：(一)冯服从中央，于十日以内外游；(二)国民政府于冯出游时即取消通缉令；(三)冯之军队归阎指挥，由中央改编；(四)冯之部下一俟时局安定，改由中央重新任命。

6月16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徐景唐军已退入闽西，本日电令粤军蒋光鼐师由潮汕溯韩江而上，闽之张贞部向连城、龙岩进攻，江西之十二师金汉鼎部及七师王均部由瑞金向汀州进攻，三面夹击徐军。同日，外交部令广东交涉员向香港当局交涉引渡徐与邓世增等。

6月20日　蒋介石接阎锡山告冯玉祥将抵运城电后，即邀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等商应付方针，命军政部筹三百万元作为冯出洋旅费及所欠冯部军费，并电阎请先垫付，面交给冯。

7月12日　国民政府下令，宣称现在大局敉平，全国军队除"剿匪"区域外，均应复员。关于编遣事宜，"着国军编遣委员会依照议定原则，迅即分别编遣"。

7月28日　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为国防司令，万福麟为副司令，熙洽为参谋长。

7月29日　驻达普里亚之苏军司令部电满洲里东北军司令部，略谓：中东路问题希望和平解决，苏现已委梅里尼可夫为全权代表，请中国速派交涉员蔡运升前往接洽。同日下午6时许，蔡运升与东铁理事李绍庚及英、法领事前往满洲里。

8月11日　苏军与东北军在满洲里冲突，交战两小时，东北军伤六十余名、死五名。张学良召开紧急会议，对前线军队发出避免冲突令。12日，蔡运升为两军冲突事向苏方提出抗议。

8月15日　朱绍阳、蔡运升、李绍庚等抵哈尔滨。张学良奉令派兵六万赴西伯利亚边界，派王树常为西路总指挥，设司令部于满洲里；胡毓坤为东路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绥芬河。

8月18日　苏军占东宁县城，守军退大绥芬。晚，曹团、保卫团、商团反攻，鏖战一夜，19日拂晓苏军被击退。

8月23日　苏骑兵千七百余，由第五卡架浮桥渡河猛袭札兰诺尔。经东北军第十八旅死力抵御，激战一昼夜，是晨将苏军击退。

9月3日　桂军编遣已告完竣，共编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三个师及梁朝玑、蒙志两独立旅；此外警备军改编为警备队五个大队，归省府直辖。

9月5日　何成浚抵平，过京时对记者谈，称苏军在前线仅四师兵力，另有预备队四师，粮食缺乏。东北军在前线约八万人，近又开去六个混成旅。苏联态度并不强硬，而是某国故意挑拨离间，目前有和平谈判希望。

9月6日　苏军与东北军在满州里和绥芬河前线激战。札兰诺尔地区战斗持续到7日苏军被击退为止，共战斗二十小时，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万福麟、张作相并慰劳诸将士。

9月8日　晨2时，苏军与东北军在绥芬河激战，至晚7时始息。东北军退守小绥芬站。

9月9日　苏军猛攻守满洲里十八里小站之东北军梁忠甲旅，战斗至晚始结束，苏军被击退。

9月10日　中东路两端战事已平静，绥苏各机关职员是日下午返回办理善后。满洲里之战争已于9日晚停止。

10月5日　国民政府任命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分区办事处主任委员，黄权为第十五师师长；原任李明瑞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10月8日　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偕师长毛炳文等抵广州，晚与粤军将领李扬敬、陈铭枢等会商军务，决定朱部以北江为防地。

10月12日　苏联以陆海空军袭击三江口，占同江，东北军退守富锦。同江之役，江平、江安、江泰三艘被击沉。苏联军舰亦被击沉三艘。

10月13日　东北江防司令沈鸿烈偕依兰镇守使李杜由哈赴富锦督战。同日，辽宁航空二、三队飞机九架，由长春飞哈尔滨支援前方。

10月15日　拂晓，中央军在豫西向西北军发动第三次总攻击，唐生智等临阵督战，蒋介石赴白沙(位于登封之东南)视察。

10月19日　西北军孙良诚部向豫西巩县之洛河桥附近，用大炮向唐生智第五路军猛攻；驻孝义之姚永安部炮兵团用大炮还击。洛阳以南临汝一带亦发生战斗。

10月20日　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陈仪、周龙光及东北军政要员五十余人出席，议决：(一)饬令前方

严防苏军进攻;(二)东北出兵防苏,对西北军作战决不参加;(三)诚意拥护中央;(四)请阎锡山劝息西北战事。

10月22日　“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方鼎英率指挥部人员由蚌埠过徐州西上,参谋长贺国光偕行。贺语记者称:“西北军事可于最短时期解决,因西北力量薄弱,我军一总攻,即可各个击破敌军。”

10月24日　张治中在武汉行营召集各处科长开会,讨论作战方略,略谓:作战地点当在豫南、陕南、陕东各处,鄂省决无战事。前敌作战计划须待刘峙返汉后再作决定。

10月25日　阎锡山在五台建安村晤冯玉祥,劝冯檄告西北将领停止军事行动,实行编遣,并将进入豫南各军退回潼洛。冯以部下渐大,恐不听话,表示可姑发一信。

10月29日　蒋军分三路进攻西北军,唐生智、方鼎英、何成浚、杨杰均赴前方督师,在黑石关、登封、临汝、禹县、郏县以西激战终日,至晚6时,西北军向洛阳退却。

10月31日　苏联军舰九艘,冲破东北海军防线,进入富锦江岸用炮猛攻县城,同时派步骑兵登陆与东北军激战。

11月16日　何应钦离太原南下许昌谒蒋介石,报告与阎锡山接洽经过,并携有阎致蒋函。据何对记者称:“此行结果圆满,阎就副司令职后,已予西北军莫大打击。”

11月20日　苏联军队攻占满洲里,守军梁忠甲旅力战数日,因后路被苏军截断,图取道呼伦弛往海拉尔退却,道阻仍回满洲里。旋接受日领事劝告停战,苏军即俘梁送往后方。

12月5日　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劝蒋介石下野,并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职。

12月10日　西北军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通电即日东下,声明倘有阻止前进者,定以敌人对待。

经　济

1月19日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财政部取缔各省县属地方钱庄商号不得再发行兑换纸币或类似纸币之票券,已发行者限一个月内呈查。

1月29日　行政院第十三次会议依据宋子文提议,通过发行民国十八年裁兵公债五千万元案和请在新关税增加收入内年拨五百万元专作整理国债之用案。

2月1日　财政部所颁海关新税则开始实行,内地税局及煤油统税征收局裁撤。同日,蒋介石发表《对于关税自主之感想》一文,略谓:“今日为新税则实行之日,亦即差等税率实施之日。吾国关税至于今日犹不能完全独立,而行此不得已之过渡税率,……欲求关税之完全自主,全在吾人自强奋斗,猛进不已。”

2月3日　南京总商会以特种消费税病商甚深,议决呈请财政部暂缓施行,呈文中提出不应以抵补裁厘作为举办特种消费税的原因;特种消费税所列品目,若油类茶类纸类木植药材矿产黄豆棉花等无不与平民日用有关;财政当局日以统一全国财政为言,而特种消费税为何仅在五省实行,按地设局,恐所谓裁厘成为狙公赋芋之故智。

2月9日　国民政府训令各省政府:煤油税已拨归海关征收,自2月1日起照新税率实行,原有煤油税局一律撤销,以后煤气油运销各地,各省政府毋得另立名目再征任何税捐。

2月11日　王正廷与玛德举行中法商约第七次会议,讨论人头税、营业税、通过税、过埠证等问题。中方要求与欧美日本一律待遇,法方仅对通过税允向政府请示,人头税允改去人头二字;营业税各国侨民均有,过埠证则殊坚持,只同意凡持有护照之华人及居留该地之侨民可以废除打指模,但行迹可疑经当地法庭认可者仍应打指模。

2月1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九八次会议决议:确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费预算为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八元;通过扩充中央广播电台计划案;推胡汉民、李石曾、戴季陶、陈果夫讨论河北及平津两市党员补行登记事宜。

3月13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召集全国各省总商会代表会议,各代表均主积极反对特种消费税,决向三全会请愿,务达取消目的。同日,全国商联会通电,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对汉口水案迅予严重抗议,非有满意之惩凶、赔偿、道歉保证,万勿轻易了结,商会誓作外交后盾。

3月15日　财政部咨江苏省政府制止该省增加田赋,并令财政厅拟定革新田赋办法,在新办法未定以前,凡田赋已超过地价百分之一者,一概免予增加。

3月25日　广东省政府代财政厅长沈载和召集各商会代表讨论中行挤兑风潮,决用封存中央银行纸币办法进行救济,自27日起三日封竣。

3月27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续发卷烟税国库券条例》,规定发行总额二千四百万元,以充国民政府预算不敷之用。

4月20日　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签订之航空邮务合同发表,该合同规定由美公司代为开办上海经南京至汉口,南京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汉口经长沙至广州三条航空线,限六个月内办成。

5月20日　铁道部令裁撤陇秦豫海铁路督办(该路督办为冯系刘骥),并函比公司代表郎柏尔与荷兰银公司,称5月20日起无论何人以该路督办名义向贵公司订立契约关系文件均属无效。同日,铁道部又电平汉路局停

止支付第二集团军协饷及军事附加捐。

5月25日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结束，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本日正式成立。

6月6日　中国垦业银行上海总行开业，该行董事长秦润卿，总理由秦兼，经理王伯元。

6月18日　财政部电全国关税局，着以后所有收入按月缴解中央，各机关借款亦须呈财政部核准后才能拨付。

6月24日　东北当局公布并开始施行整理奉票办法，规定：（一）以奉票大洋五十元作现洋一元，由官银号充分准备现洋兑现；（二）凡属省库征收机关所有课赋捐税及一切收入税一律按照定价征收奉票；（三）凡属商民交易私人买卖一律按官价使用奉票，违者重办；（四）为充实汇兑基金，特发行第一次卷烟统税公债二千万元。

7月8日　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邓泽如、范其务、许崇清、孙希文、林云陔、曾蹇、林翼中、金曾澄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陈铭枢为省政府主席。以陈、范、许、邓分别兼任民、财、教、建各厅厅长。原任徐景唐、冯祝万、伍观淇等均免职。

7月11日　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与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交涉规定局长权限，要求双方平均用人，并用中苏文字，及建立中苏局长会签制度，遭到苏局长叶穆善诺夫的拒绝。吕荣寰即将叶撤换监视，以范其光为代理局长。同日，张景惠要求在哈埠及中东路沿线之苏联人全部于十二小时内退出国境。

8月8日　国民政府国道设计委员会定全国国道干线十二条：（一）京桂线；（二）京滇康线；（三）京藏线；（四）闽浙线；（五）京蒙线；（六）京黑线；（七）张绥线；（八）甘藏新线；（九）绥新线；（十）黑蒙新线；（十一）迪疏线；（十二）陕桂线。

9月18日　宋子文发表盐务借款宣言，谓现在盐税收入渐有起色，每年应还外债可以按年偿还，积欠之数亦可按计划清理，英、法借款于1931年可以还清；1912年克利斯浦借款，拟从1932年起分年偿还。19日，英、法、日盐税借款团对宋之宣言，认为时机尚早。

9月23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外界谓其复任后发行债券已达四、五万万元，专供军政费消耗之用，特公布任内所发债券详表进行解释，声称除已还本外，因军政费用而所负之债额总数仅一万三千八百余万元，裁兵公债用于军政费者仅五、六百万元。

11月8日　谭延闿在京召开全国民食问题会议，到会者有戴季陶、孙科、赵戴文、叶楚伧、陈果夫、易培基、邵元冲等，决定组织粮食研究委员会，以五院长及农矿、交通、铁道、财政、内政、工商各部长为当然委员；另聘专家为委员，讨论具体方案，呈请政府办理。

12月8日　全国农政会议开幕，到会六十人。农矿部长易培基为主席，并致开幕词，宣称："训政时期工作分配年表，农政一门列有项目一百三十余项，若能认真办理，不过十年，即做到家给人足，耕者有其田，使总理民生主义完全实现。"

12月26日　外交部接张学良电，谓根据最近中苏议定书恢复外交关系的规定，请转电驻海参崴总领事许熊章、驻黑河领事韩述曾、驻伊尔库次克领事管尚平，驻阿拉木图领事杨德善等，即率领事馆人员回馆复任。

12月31日　苏联新任中东铁路正副局长由长春回哈尔滨。午刻，东铁开理事会，正式任命苏方推荐之鲁迭依、简尼索夫为正、副局长。午后新局长到路局视事，以局令发表机务、车务、电务、会计各处苏籍处长及职员，各复原职。华方副局长郭宗熙亦复任，范其光回任理事。

文　教

1月19日　西北学术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在北平大学报告考察经过，谓该团共有中外学者二十余人，于1927年5月自北京出发，前不久从迪化归来。此次考察结果成绩极好，袁希渊所发现之恐龙最有价值，为亚洲第一次发现。

3月5日　国民政府发布整顿学生令，略称：学校风潮迭起，甚至离常突轨，有妨治安。着教育部严令教育行政机关督率各校注意严格训练，必使尽纳轨范，如有侵轶轨范即行纠正。地方行政长官于学生举动妨及治安者，宜协同教育行政机关严予裁制，务使学风丕变，蔚成良模。至教育经费为教育生机所寄，着财政部及各省财政机关尽先拨付，毋得悬欠。

3月5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未到任前以该校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代理。任命张群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原任张仲苏免职。派易培基兼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张继兼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庄蕴宽兼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3月23日　中医药代表团就卫生会议提议取消中医药事分别向三全代会、国民政府和卫生部请愿，卫生部次长胡毓威表示"本部正在提倡，使中医药有进步"，对取消中医药之提议，认为不能行于现今之中国。

4月3日　中央大学区所属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陈述大学区制各种弊害，要求取消并弹劾。

4月23日　教育部通令公布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规定各宗教团体设立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或各种补习学校、民众学校，应照私立学校规程或教部有关是项法令办理；为传播教义设立机关，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学校名称；集合社会研究教义或学术，得遵行学术集会结社手续；设校或办学术团体均应呈教育行政机关立案或

备案。

4月28日　教育部布告，规定现有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无庸呈报教育行政机关立案，其考核办法应候内政、卫生两部商订通令遵照。

6月8日　中国佛教会代表数十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请愿，要求取消《寺庙管理条例》，另颁包括各宗教之适当条例。

6月18日　中央大学区中校联会开会，议决分呈中央及教育部即日取消大学区制。下午，出席会议的全体校长赴教部请愿，蒋梦麟表示浙江大学区立即取消，江苏半年以后取消，河北与李石曾商后定期取消。

6月25日　行政院第二十七次会议，依蒋梦麟提议，准照教育部拟定办法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浙江大学区及北平大学区限本年暑假停止，中央大学区限本年底停止。同日，浙江大学电教育部，谓浙江大学区拟即日开始结束，7月底取消，请求核准。

7月21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设科学研究补助金当选名单揭晓：甲种补助金获得者，丁文江、赖其芳、张春霖、严济慈、吴定良、饶毓泰六人；乙种补助金获得者，王竹泉、赵忠尧等十四人；丙种补助金获得者，汪敬熙、戴芳兰十九等人。

8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考试法》。

8月21日　中国科学社在北平燕京大学开年会，到会社员任鸿隽、王琎、白敦庸及来宾李石曾、吴雷川、罗家伦等五十余人。余泽兰、吴有训等十五人在会上宣读科学论文，会议于24日闭幕。新增理事有胡刚复、竺可桢、杨铨、赵元任、翁文灏、胡先骕六人。

9月2日　中央研究院向李盛铎购回前清大高殿之内阁档案数千麻袋，是日运到历史博物馆清理，月拨三千五百元为整理费。

10月3日　参谋本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测量会议，决议：(一)各省测量局经费独立；(二)测量教育取三级制，分简易、本科及研究科；(三)航空摄影测量招生标准，取人才主义，不归各省分派；(四)拟订整理全国测量计划大纲。

12月2日　北平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是日下午4时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完整的"北京人"头骨化石，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重要依据。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0年

导　言

一九三〇年一月，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这封信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三月一日，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党务工作方案》，指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指导地方的社会事业和民众的训练。指责了阎锡山策动各反蒋派参加反蒋战争行为，为与北方反蒋联合战线兵戎相见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三月二日于上海成立。会上通过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纲领。"左联"在国统区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四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混战——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由于蒋介石先后翦除异己，引起各派军阀不满；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派系也和冯、阎联合，拥阎反蒋。四月一日，四方调集军队百万，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战线上展开大战。后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冯、阎通电下野，冯玉祥部就此一蹶不振。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五月展开，中共影响下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托派取消分子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论战，揭露了托派企图取消革命的反动实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军阀混战，何健部南追张发奎和李宗仁之时，攻占防守薄弱的长沙。俘敌、缴枪甚多，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八月，当何健集结重兵反扑时，红三军团主动撤出长沙。

在中原大战激战之际，反蒋派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决定成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九月九日在北平宣誓就职。十月随着东北军入关，扩大会议垮台。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九月于上海召开，由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是，党内"左"的情绪，仍然存在着。

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铲共剿匪"为最要急务，限于3个月到6个月办理完峻。并推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

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部署第一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10万人由北向南分路进击。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龙岗伏击敌人，生俘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彻底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红军攻打长沙之战
-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 ●富田事变
- ●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
- ●左联成立
- ●中原大战
- ●扩大会议
-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

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背景介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 1930 年 1 月 5 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针对当时红军党内一部分同志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及提出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群众工作做好了，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举行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的主张，该信指出，这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适合的，是缺乏用“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的表现。信中强调，这种理论产生的原因，是没有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样一个国情。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才会明白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最重要因素。该信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全面考察了中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坚信“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势必形成燎原之势，革命高潮的到来将是没有疑义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材料：

- ·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
- ·给林彪的一封信（节录）

材料一　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革命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在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红色政权能否在敌人包围中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提出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前进。

1928 年 10 月到 1930 年 1 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回答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阐明了建立红色政权的重要性及其伟大意义。

首先，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革命不可能很快地在城市中取得胜利，为了避免在力量不足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在那里建立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革命战略基地，借以抵抗敌人的进攻和发展革命力量，在长期战争中争取革命的胜利。

其次，只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它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一）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的农业经济”，革命的主要力量不是集中在城市，而是蕴蓄在农村；革命的农村

可以不依赖城市，为坚持长期的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削弱了反革命的力量，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可乘之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遗留。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曾经有过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潮，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红色政权首先能够在这些地区存在和发展。

（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建立了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统治，但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而日益激化。无论是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或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都比以前更加发展和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红色政权是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和反革命军队的经常进攻情况之下的，"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紧要的条件。只要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就能够使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的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土地革命，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达到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巩固。因此，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三者的密切结合，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个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给林彪的一封信（节录）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鲜明。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中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扯开了话匣，说的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的写了这一篇。

末了还有两点须要作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

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冠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于上杭古田

红军攻打长沙之战

背景介绍

1930年7月上旬，红三军团利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的指挥下攻占湖南岳阳，又转兵平江。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部集中七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反扑。7月23日，红三军团在晋坑迎击该敌，经激战歼敌一部。7月25日，红三军团又攻占金井，残敌逃往长沙，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于7月27日突入长沙城区，午夜完全占领长沙，敌何键残部向沅江、湘阴、湘潭溃逃。红三军团在晋坑、金井、榔梨、长沙等战斗中，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这次战役，红三军团五天连打四仗，给何键部以沉重打击，占领长沙扩大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月6日，在何键集中兵力反扑时，红军撤出长沙。

材料：

- 三战三捷克长沙
- 彭德怀攻打长沙的回忆
- 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前前后后
-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追忆
- 攻打长沙
- 攻克长沙城
-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材料一　三战三捷克长沙

1930年6月，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平江起义后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经过登上井冈山，重返湘鄂赣的艰难曲折斗争，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下辖第5、第8军）。红3军团成立后，在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的指挥下，先后打下了大冶城、黄石港、鄂城、保安、岳州等重要城镇，并于7月27日，趁长沙城敌人空虚，一举攻克长沙。

一、攻克长沙

敌人一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看不起刚刚建立不久的年轻的红军。何键老贼把他的看家王牌李觉旅共4个团部署在七里港、乌梅岭一带坚固工事里，构成了数道防御阵地，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他狂妄地叫嚣："我长沙城固若金汤，你们乖乖地当俘虏吧"。

7月26日上午，红3军团强渡朗梨河，乘胜前进，向长沙城猛扑。他们突破敌人的一层又一层的防御阵地，很快突破了长沙外围防线，直逼长沙城下。下午，彭德怀指挥第5军开始向敌主阵地乌梅岭、七里港进攻。敌人凭借坚固的阵地拼死抵抗，第5军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由何长工指挥的第8军担任侧后迂回任务。他们组织了3百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搜集了几十条小船，船的前面用铁皮、沙子、棉花等搞成几层向坦克炮塔一样的东西，保护机枪手的射击，战士们称为土坦克。战斗发起后，在第二纵队司令谢振亚统一指挥下，敢死队驾驶着小船在前面一边划船前进，一边猛烈向岸上敌人射击，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部队在他们的掩护下，很快到达对岸，一上岸就勇猛地冲向敌阵。岸上的敌人顿时混乱，我军趁势一阵猛打猛冲，很快夺取了阵地。接着，第8军从侧面向七里港、乌梅岭敌主阵地攻击。敌人受到第5军和第8军的前后夹击，顿时慌了手脚。原来，敌人主力都部署在前面的一、二道防线坚守，后边都是一些警察和杂牌队伍，第8军从侧后一打，又经过政治宣传，敌人纷纷投降，有的拼命向城里逃跑。一部分红军就按照上级的作战计划立即换上敌军的服装，跟随逃跑的敌人一起混进长沙城里。守门敌人也分辨不清，因此，毫无阻拦。

在乌梅岭、七里港，第5军和第8军主力与敌人又经过激烈战斗，反复争夺，最后终于攻占了敌人主阵地，从东面开始向长沙城内敌人冲击。由于已经有一部分红军混在逃跑的敌人队伍中进入城内，里应外合，红军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分别从小吴门、四十九标、韭菜园、浏阳门等处，陆续攻入长沙城内。城内敌人一看红军进城，更加混乱，有的只进行了轻微的抵抗就举手投降，有的敌人一看大势已去，就慌忙逃跑。红军迅速占领了湖南省政府及清乡督办署，并向南追击逃敌，扩大战果。何键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一看红军进城，只身跳入湘江，逃往西岸，后来从俘虏口供中得知，红军只差几分钟没活捉到何键，真是太遗憾了。

至7月27日拂晓，红军控制了长沙全城，长沙宣告解放。此役，我英勇的红3军团三战三捷，以8千多人打败了3万余优势的敌军，一举攻克了湘军何键盘据的老巢——长沙。歼敌近5个旅，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弹药。

8月1日，红3军团在长沙组织召开了1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庆祝胜利。同时，成立了湖南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广泛宣传了"六大"的十大纲领。在这之后，红军扩大了约七八千人；还筹款40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等困难；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政治犯。红军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他们帮助红军运输物资，抢救伤员，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人民群众的热情也深深地感动了红军全体指战员。

二、撤离长沙

红3军团攻占长沙后，何键集结约15个团的兵力，向长沙反扑。8月3日，在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的掩护下，敌人分别从上、下游渡过湘江，开始南北夹击长沙市。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红3军团决定撤出长沙。

8月6日拂晓，敌人从大北门、小北门等地陆续攻入市内，红军边阻击边交替掩护向城外撤退。彭德怀率第5军一个师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指挥部队撤退。天明后，南北两路向我合击之敌，北路进展快速，在只距5华里即可与南路之敌合扰的危急情况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连阻击由南向北进攻之敌，并集中该师主力突击由北向南进攻之敌，歼敌一个团，将军团政治部和省行动委员会接救出城。全军安全向浏阳撤退，并掩护数十万群众安全撤离。

三、再战长沙

8月中旬，红3军团进驻长寿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整训补充。8月23日，由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的红1军团开到浏阳永和市，与红3军团会师。会师后召开了两个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朱德同志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政治委员，朱云卿为总参谋长，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1、第3军团，总兵力约3万人。在总前委会议上，方面军决定第2次攻打长沙。

8月底，红军分两路向长沙推进，第3军团沿第一次打长沙路线，在乌梅岭一线占领阵地，第1军团在长沙东门、南门和3军团形成围攻长沙的态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长沙敌人虽然城内有近30多个团的兵力，红军只有十几个团，但因为敌人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所以再也不敢在城外恋战。只是加固工事，凭借工事顽强坚守，不敢越雷池一步。红军围城半月，估计敌人出击的机会不多，敌人援兵也逐渐赶来，红一方面军决定撤围长沙。9月12日，红军发布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进攻长沙遂告结束。之后，红一方面军回师江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支骨干力量。

（选自《百战图》作者：张青）

材料二 彭德怀攻打长沙的回忆

第一次打长沙

大约七月十五日回到平江，准备改编、补充、休整短期。八军以五纵队编为两师四个团，军长李灿，政委何长工。李灿伤发，密赴上海医治（通山会议前去的），被敌发现遭杀害。由何代军长，邓乾元任政委。五军也辖两个师四个团，我和代远兼军长和政委。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军长孔××，政委余××。孔叛变后，徐彦刚为军长，徐阵亡后，肖克继任，王震为政委。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举行起义两周年纪念。

这时，湖南头号反革命、杀了几十万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以刘建绪为指挥。七月二十二日，敌先头梯队进到瓮江镇，离平江城三十里，二梯队进到金井，三梯队进到春华山，各隔三、四十里，摆成长蛇阵。我军窥破了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我主力于二十三日拂晓前，进到离瓮江五里处埋伏（待伏）好，在敌人向平江前进时，两翼奋起夹击，该敌大部被歼，小部逃散。当日即赶到金井，击溃敌之第二梯队，消灭过半。二十四日继续进攻春华山，击溃敌人之第三梯队，消灭一部。我跟踪猛追，二十五日强渡捞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突破一层又一层防御阵地，从午至夜半。最后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拂晓前攻破守敌约五个团的阵地，拂晓占领全城。

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英勇顽强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共同特点。

占领长沙的第二日晨，由八军留守长沙，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总政委滕代远、总政主任袁国平均留长。我率五军两个师（我兼军长）向易家湾追击，残敌已退湘江西岸。我在昭山下，找到救难之罗六十老倌。罗年近七十，须发均白。给予土豪财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我当时三十有二岁，前后已隔多年。

易家湾到长沙四十华里，虽有电话线，电话总是不通。第三日他们离开长沙市，到郊外同我通了电话，说反

动派到处打枪、放火、割断电话，他们要撤出长沙。我说不行，立即清查户口，捉拿反革命分子。清查出大批何键部的反动军官、特务等。我率第四师立即赶回长沙，警备司令部出布告枪毙反革命。枪毙了不到百人，市镇秩序井然，贫苦人民热烈拥护。这说明，夺取政权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对反革命不镇压也是不行的。

八月六日拂晓退出长沙，实际上占领长沙十一天。十一天中做了大量工作：二十八日午正即开了前委会，决定邓萍为市警备司令，并出了布告；出版了省苏维埃日报；"八一"召开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广泛宣传了"六大"的十大纲领；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兵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政治犯。这些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特别白区地方工作的损失。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

红军退出长沙的情况：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十五个团，于八月三日晚，在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掩护下，从长沙市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市。我十六军约二千人，位置于捞梨市，维护后路安全（主要是捞梨市浮桥）；一个师在长沙市西门沿岸，一个师在北门外，一个师主力在浏阳门外及天星阁附近、小部在城南四五里对猴子石方面警戒。军团总指挥部在浏阳门附近。另一个师在易家湾，对醴陵、湘潭警戒。四日四时，敌军开始攻击，拂晓接近浏阳门（即东门）。直至天已大明，还不见军团总政治部和省行动委员会出城。我率五军一个师三千人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眼见南北对进之敌将要合拢，相距不过五里了，由北南进之一个团，进得比较快。我以两个连阻击由南北进之敌，集中师全力突击由北南进之敌，消灭敌之一个整团，才把总政、行委接救出城。全军安全向浏阳撤退，并掩护边区十数万群众安全撤退。

成立一方面军　第二次打长沙

约在八月中旬，五、八两军集结长寿街及其附近，准备整训一个星期。刚到两三天，某晚接到万载县委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移到万载县境。我们当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联络、报告情况和请示。我们接到袁国平带回之指示信，一军团前委要我们向永和市之敌进攻，他们准备向文家市之戴斗垣旅进攻。由长寿街到万载往返须四天，我们得信后立即出动，到达永和市时，敌已先两天退向长沙去了。

第三天，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〇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会而没有核心。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进迫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向长沙增援，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围攻月余未下，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又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选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三　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前前后后

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进攻中心城市的指示和赋予的作战任务，利用敌人处于战略守势之机，积极主动地发起攻势作战，先后取得攻占大冶县城和黄石港(今湖北黄石市)的胜利。6月15日，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在大冶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进攻武汉的指示。

在军团前委会议上，前委书记彭德怀总指挥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认为武汉有敌军重兵据守，且有坚固的城防工事，长江又正是涨水季节，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通向城墙的大堤。国民党军钱大钧部的12个团驻守岳阳，罗霖部驻守阳新，红军如进攻武汉，钱、罗两部必然尾追而来。红军前有坚城，后有重兵，侧有长江、背有南湖，前后受敌，左右无路，处境十分危险，搞不好就会全军覆没。当时，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也指示红三军团占领中心城市，并规定红五军沿长(沙)武(昌)铁路南北向武汉发展，红八军从长江下游向武汉发展。为执行中央军委和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彭德怀从实际出发，决定先消灭鄂东南6县(鄂城县、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相机占领岳阳，作为进攻武汉的实际准备。

此后，红三军团即分兵向鄂东南的通山、鄂城攻击前进，并作出进攻武汉的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侦知红军动向后，急调驻岳阳钱大钧部的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以加强武汉防务，使岳阳守军仅剩何键第4路军王东原旅的直属队和1个团的兵力。彭德怀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指挥红军避实击虚，发起攻势，先后攻占通山和崇阳县城，并控制咸宁县的大部地区。6月25日，红三军团前委在通山县城再次召开会议，前委书记彭德怀认为，岳阳钱大钧部已调往武汉，岳阳城内兵力薄弱，防务空虚，红军应不失时机地攻占岳阳，尔后再相机行动。会后，红三军团主力进抵崇阳，与红八军一部会合，留2个营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向岳阳方向攻击前进。红军每到一处均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工会和农会，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解放当地劳苦群众，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留在鄂东南的2个营，不久与鄂东、赣北游击队编为红八军第4、第5纵队，这2个纵队后又北渡长江，开辟了蕲(春)黄(梅)广(济)游击区，并于10月扩编为红军第15军。

1930年7月4日，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向岳阳守敌发起总攻，经2小时激战，击溃守敌，歼敌2个营，残敌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君山方向逃窜。红军遂进占岳阳，完成了切断武(昌)长(沙)铁路的作战任务。

红三军团攻占岳阳后，彭德怀根据国民党增强武汉防御力量的实际，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军委关于进攻武汉的指示；他从驻守长沙的湘军何键第4路军主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联军已至湘桂边界、长沙防务空虚的情况出发，决定挥师南下，准备攻打长沙。

7月6日，红三军团主力由岳阳转兵南进，于中旬进至湖南平江及其周围地区，并在平江地区补充新兵5000余人。为研究攻打长沙的作战部署，红三军团前委与湘鄂赣特委在平江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在平(江)、浏(阳)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于7月25日向长沙进攻。

当红三军团进至平江地区时，国民党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急令第15师第45旅和第19师第55旅等部约7个团的兵力，在第15师师长危宿钟的统一指挥下，向红三军团驻地平江县城进逼。何键的企图是，或一举消灭红军；或阻滞红军的西进，待追击张。

李联军的主力部队回援，再合击红军。这样，敌人留守长沙的兵力就更加薄弱，为红军进攻长沙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危宿钟受命之后，将进逼平江县城的部队分成三个梯队，各梯队间隔为30—40里，摆成一字长蛇阵向前推进。7月23日，敌第1梯队进至离平江不远的晋坑、三角塘一线，第2梯队进至金井，第3梯队进至春华山一带。彭德怀在侦知敌人的这一态势后，抓住其兵力部署上的这一弱点，决心利用有利地形，在瓮江公路两侧设伏，待机歼敌。彭德怀以红五军为左翼，以红八军为正面和右翼，在双江口(一说在瓮江镇)构成袋形阵地。红军待敌一天，未见敌人前进，遂于7月25日，按照原定计划，沿通向长沙的大道向敌军发起进攻。这天清晨，红八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圣桂尖后，向三角塘、晋坑一带的敌军发起猛攻，后续部队迅速占领周围的有利地形，同企图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激战。红五军从左侧向敌后迂回包围，切断敌人的退路。红军前后夹击，英勇冲杀，歼敌1个团，残敌向金井方向逃窜。7月26日，红三军团沿平江至长沙公路乘胜追击，向金井之敌发起进攻。金井，距长沙约60公里，敌军能否保住长沙，这是很关键的一仗。敌人用3个团的兵力在金井地区"扼要堵截"，"齐头出击"。彭德怀仍采用迂回包围，正面突破的战术，命令红五军从左翼向金井东南迂回包围，迅速占领金井以东阵地，并以一部兵力从左侧向敌后包抄、以切断敌人的退路；令红八军从正面发起攻击。双方激战16小时，红军在湘鄂赣独立师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攻占金井，歼敌大部。27日，又在春华山、永安市一线击溃敌人的阻击，直逼浏阳河东岸的㮾梨市。彭德怀命令红五军从正面攻击㮾梨市，令红八军从杉木港渡河向㮾梨市侧后迂回攻击。红五、红八军前后夹击，战至午后，攻占㮾梨，突破敌浏阳河防线，歼敌一

部，残敌不顾一切向长沙逃窜。红军乘败退长沙之敌立足未稳，惊慌万状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当晚 8 时，突破敌城东阵地，由小吴门、四十九标、韭菜园、浏阳门等处攻入长沙城内，国民党政府在湖南的统治中心长沙宣告解放。

红军攻占长沙，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这是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一度攻占的唯一的省城。

攻占长沙后，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和中共湘鄂赣特委相继召开两次 10 万多人的大会，热烈庆祝长沙解放和“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并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和湖南省工农革命委员会。旋又成立长沙市苏维埃政府，公布《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政纲》和《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等政策、法令。

长沙之战，是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巧妙结合。红三军团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当然，攻占长沙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但它对红三军团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在红军军事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选自《军事历史》93 年 1 期，作者：王中兴、郑理）

材料四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追忆

1930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我作为一名当年参加攻打长沙之役的战士，对战斗中的许多生动情景，战友的英勇行动与流血牺牲精神，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国民党在长沙驻有守军四五万人，凭着坚固的城墙与防御工事，以及帝国主义的军舰支持死守长沙市；而红军既无强大炮兵支援与炸药爆破，也缺少先进武器与弹药。可是，党中央李立三等不顾第一次占领长沙，后又被迫退出的教训，却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要红一、三军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再次进攻长沙，并指责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内心并不赞成再去夺取长沙，可方面军总前委的多数同志支持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也只好以少数服从多数，执行攻打长沙的指示。但是，毛泽东在布置这一战役时，经过精心思考，于命令中未用“攻占”或“坚决”夺取长沙的字眼。

那时，我们红三军团是攻夺长沙的中路军（左路军为一军团，右路军为十六军）。部队由平江出发向长沙进军途中，因未遇到敌人坚决抵抗，很快就进抵长沙近郊，向马王堆进攻。我是红五军三师七团四连一排一班的战士，同全连同志渡过浏阳河后，又继续攻占了浏阳门的马王堆，歼敌 20 几人。不久，我们遇到五里碑敌人的几次反击，战友们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搏杀。有一次，30 余敌军在一名少校军官指挥带领下，竟然气势汹汹地冲进我一排阵地，匡排长端起花机关枪（即冲锋枪）向敌群猛扫，立即击倒十余人。剩下的敌人仍不甘休，在那个军官指挥下端着刺刀向我们刺来。我们也不示弱，抄起第一次打长沙缴来的新刺刀迎敌。顿时，阵地上的刺刀声与喊杀声响成一片。我虽然不满 18 岁，体力差，但杀敌决心大，敢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混战中，我同堂兄裴云桥刚将那个少校军官刺死，突然又有一敌兵从背后向我刺来，幸好我的另一堂兄裴德生跑来将其截住，才使我免遭不幸，可是他又被另一个敌人从背后猛刺了一刀而倒地。经过一番厮杀，敌人被我们全部击毙，这是我们红三师七团有史以来，首次用刺刀刺死这样多的敌人。不幸的是，待我跑去从地上抱起裴德生呼叫时，他已奄奄一息，后经医生抢救无效而光荣牺牲。这次战斗，全连有十多个同志伤亡，但没有一人被敌人吓倒。

红军虽经过一天的激烈攻城，但未能奏效。毛泽东决定撤下攻长沙的部队进行休整，以待敌人出击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狡猾的敌人，并未向我出击，仅长沙南边的敌人，利用湘江的有利地形作依托，9 月 3 日以陶广的三十一师两个旅在猴子石向左路军出击。当敌人进入一军团阵地时，被一军团一举歼灭两个团，俘敌两个团长及 1000 余名士兵，毙敌六七百，缴枪千余支，余敌逃奔长沙市。而三军团方向的敌人未出城池一步，每天只用炮火无目标地射击。有一天我连吃晚饭时，我班 9 个人围着一盆菜正吃得香时，敌人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菜盆中，顿时全班人丢下饭碗，不约而同地向后仰倒，等候炮弹爆炸。1 秒、5 秒、10 秒过去了，还未见炮弹爆炸，大家迅速脱离。当大家爬离十几米回头一看，菜盆子被打飞出好几米，地上打了一个大洞。每个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只因炮弹未爆炸，才使我们免遭不幸。

我们红五军在长沙阵地上等待了十来天，没有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也未向我出击，同时加强了城防工事，补足了弹药，并放弃了一些外围据点。

我军积极筹划再次攻城，除了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外，还作好了攻城的物质准备。由于当时部队中既无强大炮兵、坦克开路，又无工兵与炸药爆破，全靠战士们的英勇与智慧来战胜困难，所以上级对攻城的准备工作考虑得非常认真与周密：

要求前卫连每班准备三五捆稻草，出发时由战士背上，以便接近敌人外壕沟时，填满壕沟，利于部队通过；

每班要筹备几块木板，作为铺在铁丝网上的桥板，以保证部队安全通过铁丝网；

购买水牛，准备用水牛阵或水牛火攻，作为向敌人进攻时的开路先锋。

用水牛作为攻城破铁丝网的主要手段，老兵都认为

是兵书上从来未见过的奇事，我这个新兵就更不知水牛参加打仗的作用，也不知怎样组织水牛参加战斗。正在大家议论纷纷、手足无措时，上级派人来进行示教，并分配给我连 20 头水牛。大家马上照葫芦画瓢，每天抓紧学习研究水牛阵，训练水牛攻城。我们为每头水牛准备棉花、麻绳或铁丝、煤油、火柴四件宝贝，练习在水牛尾巴上绑棉花、点火，以保证水牛因火烧痛时，而不将所绑棉花甩掉；同时还用放鞭炮演练水牛冲锋的胆量，并迫使水牛冲破铁丝网与踩响地雷。经过两三天的训练，大家对水牛破敌阵的信心提高了，技术也熟练了。对这种水牛破敌阵的战术，红军战士都觉得新奇，有人还编了这样一首歌谣：

红军打仗真奇怪，
水牛排成冲锋队，
尾巴点火向前冲，
吓得敌人称“神兵”。

部队完成一切攻城准备工作后，红军总部于 9 月 10 日发出向长沙市进攻的命令，以期一举夺取长沙。各部队的进攻地区与任务同第一次攻城相同，左路军在浏阳门以东一线，红五军三师担负再度夺取浏阳门与五里碑的光荣任务。

10 日白天，太阳当头，但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小雨。黄昏前部队向马王堆前进，很快进入冲锋出发地，人员与水牛排成进攻队形，并立即将牛尾巴上的棉花浇上煤油。待攻城信号发出后，我连的火力一齐向敌射击，并点燃水牛尾巴上的棉花，尔后向水牛屁股上连刺几刀。水牛冒着敌人的枪弹发疯一般地向敌方阵地冲去，终于有两头冲破了铁丝网。我全连与三连的一个排沿着水牛冲破的铁丝网口，冲进敌人的阵地，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经过拼杀，我们将一个连的敌军大部毙伤，抢占了这个阵地，俘敌 10 余人，缴枪近百支，其中水机关枪（即重机枪）两挺，还有大批子弹。据俘虏说，他们发现前沿阵地火光四出，以为红军请来了“神兵天将”，一时吓得手脚发抖，竟不敢放枪，更想不到红军会这样快就冲破铁丝网。

可是，我连占领阵地都半个小时了，还不见友邻部队冲上来，反而枪炮声也稀少了。有经验的老兵说：“这次攻城又失败了。我们得赶快冲出去，不然要挨敌人的打了。”原来，我连夺取的是五里碑东侧的一个前沿阵地，与其他部队的攻击目标不同，不仅铁丝网上没有电，而且有几百米地段是斜坡，也没有外壕与深沟，所以水牛能够冲进铁丝网。这时敌人已发现其他红军部队被阻，已在准备集中力量向我们反冲锋。战斗经验丰富的连长吴光看到我们孤军深入敌阵，马上命令大家组织防御，并将缴获的机关枪架好，瞄准敌方。果然，不一会儿，好几百敌人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与探照灯照耀下，向我们阵地发起反冲锋。我们以猛烈的火力给了进攻之敌以痛击，打死敌人一大片，使敌人的第一次反冲锋失败。吴连长乘敌人两次冲锋的间隙，命令我们排坚守阵地，其他人员立即撤出阵地。不久，又有几百敌人向我们阵地冲来，大家凭着轻重机关枪的猛烈火力，迫使敌人减慢进攻速度。这时匡排长下令全排向铁丝网豁口处撤退，由于天黑，山坡又高低不平，铁丝网的出口也太窄小，再加上敌人快冲上阵地，把以我们 20 几人退到铁丝网口，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拥挤。我被一个战士挤到右边的铁丝网上，腿被铁丝网上的倒刺勾住，流血不止，疼痛难忍。我一咬牙用力从肉中拔出倒刺，并扯掉一条裤腿，甩掉草鞋，光着脚板，爬出了铁丝网。这时，我发现左边卧着一个从长沙刚俘虏来的新战士，也被铁丝挂住裤腿与布鞋，拔不出来，索性就装死不走了。我又赶忙过去，帮助他脱草鞋，扯掉一条裤腿，将插进腿里的铁丝倒刺拔出来，扶他一起爬出铁丝网。待我俩连爬带滚脱离铁丝网几十米，敌人已占领了阵地，正以猛烈的火力向铁丝网口射击。好险！我们只要迟一点儿，不是当了俘虏，就会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击中。就在我们脱出危险地界不远，我又发现一个伤员横卧在田沟里，过去一看，正是同我一道参军的堂兄、三连战士裴友员。他是腿部中弹，我将他扶起来，搀扶着继续向前赶路。虽然我们三人已到了安全地带，但天已大明，攻长沙的红军大部队已撤退向南转移。我们只好艰难地向原出发地去赶大部队，因伤口疼痛，行动缓慢，直到第二天才在株州附近找到连队。连首长一见到我们，惊讶地说：“你们还活着回来了！”接着便流出了热泪。其他同志也纷纷拥上来询问我们脱险归队的经过，并向我们三人欢呼祝贺，指导员还表扬我带回了两个伤员。

60 多年一晃过去了，可我心里总忘不了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

（选自《纵横》94 年 6 期，作者：裴周玉）

材料五　攻打长沙

一九三〇年七月我在红五军四大队工作时，李立三决定打长沙，提出了三个政治理由：

第一、打长沙、攻南昌、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第二、要使江西、湖南、湖北的老百姓彻底翻身，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改善人民生活；

第三、打开湖南后，可以有四十五万党员参加队伍。这些是在打长沙前，动员战士的政治口号。

李立三要彭德怀同志打长沙，彭德怀同志就带领三军团的五、八两军去打长沙。开头，三军团人数不多，枪支也不多，顶多三千条。后来，发动平江、浏阳农民参加战争，一下来了两三万人。我们把这些老百姓编成队：五十人为一小队，一面小红旗；一百二十人为一大队，一面大红旗。武器是大刀、梭镖、土炮、鸟铳、松树炮（有几十门松

树炮，一百多斤一门）。红军和地方武装几万人，由长寿街出发，浩浩荡荡向长沙开进。我们共打了三仗：第一仗打金井，另一仗打郎利市，第三仗打长沙。七月二十七日晚上，长沙市总暴动。二十八日我们就打进去了。一夜没得休息。二十九日，在长沙市开庆祝胜利大会。彭德怀同志当了湖南省主席。接着，我们又去打靠近岳阳的城陵矶，抓了几个美国鬼子，向他们要钱、要东西、要武器弹药，还缴获了四十支盒子枪、几担西药。

八月间，第二次打长沙。这次不同了，国民党反动派有了准备。那时，长沙不大，只有二、三十万人口。何键占领长沙后，用大水树打桩，用铁丝架电网，周围还挖壕沟，工事搞得很坚固。我们打了几天，打不进去。后来，我们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绵花，棉花上浇洋油，火一点牛尾巴就烧着了。牛怕痛，乱冲乱撞。结果，把电网碰开了。以后，我们抓了几个俘虏，问他城里有多少人？俘虏兵告诉我们：不要打，打不得啦！城里埋伏了四个师，城外有八个师。城外八个师分三路向你合围：一路从岳麓山猴子石过河来，二路从长沙北捞刀河走丝茅冲来，三路从东屯渡、阿弥岭来，每路配有两个师。还有两个预备师，是专门准备追击的。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毛泽东同志耐心说服红军中的干部，要我们马上撤退。接着，我们就离开长沙，向江西进发。

部队分成两路前进：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军团从浏阳出发，经醴陵、萍乡、安源、宜春、安福等地，去打吉安；彭德怀同志带领三军团从醴陵、萍乡、袁州、新余、临江府往樟树方向去。十月，打开吉安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罗坊召开了会议。会后，我们经峡江到吉水，与红一军团会合，共同实行战略退却。

（选自《回忆中央苏区》作者：孙鹤一）

材料六　攻克长沙城

1930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党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万人发展到12万人。经过3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10几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此时，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的人是李立三。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省长汀县举行联席会议，根据5月全国红军会议精神，决定将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

全军团共2万余人。

同时，红军第五军、第八军在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合编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共17000余人，下辖第五军、第八军。

随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还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组成领导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计划规定：红一军团“以主力侧击南浔路”，“攻南昌，取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红三军团“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爆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逼，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红三军团成立后，党中央再三催促攻打武汉、长沙等大城市，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彭德怀认为：“武汉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进行，粤军、桂军击溃何键所部后占领长沙，湘军主力大部被粤军、桂军吸引在湘中湘南地区。我们暂时放弃打武汉的计划，率领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游击，向湖南推进。”

为扩大鄂东南苏区，彭德怀乘机发动攻势作战，6月13日晨，指挥红军将士攻占大冶县城，歼敌第二十军郭汝栋部一个团。下午，又乘胜攻克黄石港（今黄石市），将敌第二十军另一个团击溃，缴步枪300支，机枪2挺。红军进抵石灰窑时，游弋长江中的日本军舰开炮轰击红五军司令部，红军用迫击炮还击半小时，撤回黄石港。

14日，红军撤离黄石港。

北进的一路红军，在迅速占领距武昌只有50公里的鄂城、金牛之后，声言攻打武汉。此时，湖北省的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游击队正在武汉东面积极活动；湘鄂西红四、红六军也在石首、公安、松滋地区不断打击敌人，有东下武汉之势；鄂豫皖边区的红一军红一师已逼近武汉以北的平汉路。各路红军逼近武汉城下，引起敌人的恐慌。国民党武汉行营急将驻岳阳的钱大钧部星夜船运武汉，岳阳守敌仅剩第十五师第四十五旅的直属队和一个团。

彭德怀见敌人已中红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遂于6月25日在通山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乘机夺取岳阳。会后，彭德怀率主力进抵崇阳，向岳阳方向运动。30日，占领湖北省蒲圻县重镇赵李桥、羊楼洞。7月1日，又分别夺得湖南省临湘县城和羊楼司、城陵矶，完成了对岳阳的包围。

4日，红三军团向岳阳守敌发起总攻。

红八军组织一小分队隐蔽地从北门爬上城墙，用机枪向下俯射，城内敌人乱作一团。城外红军又搞到几节火车皮，战士们乘车进入城内，一下火车就向敌人猛打猛冲。经过2小时激战，歼敌2个营，攻克岳阳城。残敌在外国军舰掩护下，逃往洞庭湖的君山。红军炮击了进行挑衅

活动的外国军舰。此役共缴获了长短枪500多支，机枪18挺，75野战炮14门，山炮12门，子弹250余担，以及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红三军团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还将一部分缴获的弹药、物资支援了洪湖苏区。

红军攻占岳阳，切断了武汉至长沙的铁路交通。敌急调长沙第十五师一部及咸宁罗霖、钱大钧两部，联合向岳阳反扑。彭德怀、滕代远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率部主动撤出岳阳，重返平江苏区。

7月中旬，彭德怀率部从岳阳到达平江，守敌见红军兵强马壮，弃城逃往长沙。

这时湘军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其主力南下衡阳、宝庆地区与张（发奎）桂（李宗仁）联军作战，以7个团的兵力迎战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连克岳阳、平江后，直逼长沙。

7月23日，红三军团与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主席何键所指挥的部队在长沙与平江之间的晋坑打了一场遭遇战。

7月27日凌晨5时，按照军团的部署，红五军向浏阳河东岸的朗梨发起攻击。朗梨是进攻长沙的最后一个关口，河宽水深流急。何键集中第十九师一部、第十五师残部及独立第九旅等兵力，凭借浏阳河顽抗。在红军猛烈进攻下，敌终于不支，向河西溃退。

彭德怀指挥部队架设浮桥，追敌至长沙近郊的七里巷、乌梅岭。该处有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等部4个团防守，筑有4道防御阵地，火力很强，不宜正面攻击。彭德怀命令红八军绕道朗梨，顺河直下杉木港，迂回到敌后进攻。红八军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搜集了几十只小船，战士们一边划船前进，一边用机枪向岸上敌人猛烈开火。主力部队在敢死队掩斥下，通过船渡、泅渡随后跟进，很快到达杉木港，夺取了敌军阵地，歼敌一个团。接着，又组织火力从左后方向七里巷、乌梅岭敌人猛烈射击，掩护红五军主力正面进攻。在红五军、红八军两面夹击下，敌浏阳河防线被突破，纷纷向烂泥冲、猴子石方向溃退。至此，敌在长沙城的外围防线全部瓦解。

下午，红三军团在东屯渡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经五里牌、马王堆，猛攻长沙城，攻破城东守敌约5个团的阵地。

长沙守敌凭借坚固城防工事和优势的武器装备，以猛烈火力向红军扫射。红军武器装备很差，又没有攻城器材，在攻城作战中，受到很大伤亡。

20时，红军各部由小吴门、四十九标、韭菜园、浏阳门等处攻入市区，占领了湖南省政府及清乡督办署，平浏农军1万余人也纷纷涌入。午夜，红军控制了全城。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攻占的唯一省城。

何键残部向沅江、湘阴、宁乡、湘潭败退。

长沙之役，红三军团以8000兵力，在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的配合下，打败了3万多的优势敌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李立三欣喜如狂，于8月1日和3日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要求各路红军迅速向武汉推进；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南方局要组织广州暴动。并于5日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要求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要求苏联蒙古直接出兵支援中国革命。

材料七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一九三〇年七月

毛泽东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背景介绍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被迫退出。8月，红一、三军团再次围攻长沙。这些行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也确实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以，在蒋、阎、冯军阀混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就调兵遣将，对我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这时，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不断消除党内“左”倾错误影响的过程中又获得了一些发展，到1930年冬，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红军的正规性有所提高，打运动战、歼灭较强敌人的能力不断增强。

11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以上共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地形和群众条件对我有利的瑞金龙岗一带，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9千余人，活捉了张辉瓒。这一胜利吓得各路敌人纷纷退逃，红军乘胜追击，又歼敌谭道源半个

师。五天之内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一万多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材料：

- ·确定反“围剿”策略的罗坊会议
- ·打破敌人“围剿”图谋
-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 ·我在第一次“围剿”时的经历
-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材料一　确定反“围剿”策略的罗坊会议

“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两支革命队伍在井冈山会师后，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红军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片恐慌。1930 年 8 月下旬，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混战即将结束前，即派其手下的得力干将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的“绥靖”会议，策划对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何应钦在会议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在过去，各省都有“省界观念”，故使红军得以“东击西窜，不能根株净绝，反而愈延愈广”，“地方事件”日益严重，这次行动，则要集三省之力“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捷”之后，更是得意忘形，踌躇满志，12 日，他便迫不急待地跑到江西南昌，亲自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围剿”。为了统一指挥，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 9 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即“围剿”军总指挥，负责“督办”这次“围剿”行动，任命第 9 路军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并调集了大批军队，计有：第 6 路军，总指挥朱绍良（辖毛炳文的第 8 师，许克祥的第 24 师，张贞的第 45 师，刘和鼎的第 56 师，周志群的新编独立第 14 旅）；第 9 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辖张辉瓒的第 18 师，谭道源的第 50 师，罗霖的第 77 师，公秉藩的第 28 师，路孝忱的新编第 13 师）；第 19 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辖蔡廷锴的第 60 师，戴戟的第 61 师，刘夷的独立第 32 旅，马琨的第 12 师第 34 旅），以及三个航空队等部，共 11 个师 3 个旅，约 3 万余人，企图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蒋介石所驱使的这些军队都是一些杂牌军，有的则是在中原大战的战场上刚刚从其他军阀手中收编来的。蒋介石想来个“一箭双雕”，既想消灭红军，又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因此，在蒋介石的“围剿”军中就形成了各保实力、各怀鬼胎、互相猜忌、矛盾重重的局面。

1930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在攻占吉安时缴获了敌人司令部的一份文件，就已得知蒋介石正在积极策划并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10 月底，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县的罗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面临的形势和红军应采取的行动。罗坊会议中讨论的重点是，面对强敌，红军怎样进行反“围剿”战争？从哪里打破敌人的“围剿”？是前进到白区去打，还是退到根据地内部去打？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讨论异常激烈。有的同志主张主动出击，深入到白区去与敌人作战；有的同志甚至主张打向南昌、九江，他们以红军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以及打烂坛坛罐罐会对外产生不良影响为理由，反对实施战略退却。毛泽东以其雄才大略，纵横捭阖，通过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红军历来的对敌斗争经验，摆事实讲道理，对与会者进行耐心说服，提出了撤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诱敌深入的实质就是实施战略退却，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战争开始阶段所采取的惯常办法，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战机，准备反攻。这是因为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由于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才采取这种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泽东同志又指出，红军通过战略退却，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红军可以利用熟悉根据地内的地形和人民群众拥护红军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而敌人则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后勤供应不济，再加上红军可以层层阻截敌人，敌人必会疲备饥饿，红军就可以寻找战机，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叫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毛泽东同志的一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敌我双方的利弊关系和红军战胜敌人的要诀，使与会者心明眼亮，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们无不佩服毛泽东同志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罗坊会议终于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11 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犯。他们来势汹汹，急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从吉安到建宁，摆开了一个长达 8 百里的弧形围攻线。在这 8 百里的战线上，以乐安固冈圩至安福圩为界分东西两路，西路归第 9 路军负责，这是敌人“围剿”的主力，东路归第 6 路军负责。罗霖的第 77 师和刘和鼎的第 56 师分别把守吉安和建宁两端。他们拉开了“架式”由北向南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扑来。而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约 4 万人，正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开展工作。罗坊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罗坊的园前村发布命令，决定实施“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的方针，命令红军主力立即收拢部队，东渡赣江，开向樟树、抚州、乐安、永丰一带地区。红军的这次主动撤退，使进攻赣江西岸的敌人扑了一个空。接着，红军总前委决定红军主力向根据地中部实施“求心退却”，使企图会攻东固的敌人又一次扑空。到 12 月 1 日，红军主力已退却到黄陂、小布、安福圩一带，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红军主力在主动撤退的同时，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采取分散的、虚张声势的方式，边阻止敌人边退却，并装作狼狈溃逃的样子，故意在退路上乱扔饭菜、烂草鞋、破军锅、斗笠等东西，不

断地袭扰、迟滞、迷惑敌人。敌人的兵力不断分散，加之几次扑空，他们已由骄矜而变疲惫，由怠惰而变松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敌人的许多弱点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红军的战略退却把防御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虽然根据地缩小了，但却换来了红军的主动。红军转入反攻的条件正在逐渐形成。

（选自《天兵怒气冲霄汉——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作者：王洪武）

材料二　打破敌人“围剿”图谋

从 1927 年秋冬到 1930 年，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不断混战所造成的空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期间，蒋介石不是不想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势力，但他认为，1927 年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已经被他杀得七零八落，剩下一点小小的力量，依靠各省军队的“清剿”和“会剿”，足可根株尽绝了。更主要的是他要集中兵力对付各派新军阀，以求尽快打破各地军阀的割据，完成他的“统一”大业。1930 年 5 月，蒋介石几乎调集了他的全部兵力，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展开了一场中原大战——这是新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场大战。当激战正酣时，1930 年 7 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等率领下，竟一举袭占湖南省会长沙城，国民党报纸并报道江西省会南昌亦被红军占领。这使蒋介石十分震惊。国民党报纸惊呼：“共党得占省会，今为第一次，昔日可认为地方疥癣之疾者，今后得成为政治上严重问题。”报纸并评论：“因长沙数十万人之省会，陷共党之手，……宁府势不能再弃置不问，……放置愈久，则裹胁愈众，故势不得不从速大举堵剿。”这正画出了蒋介石的全部心态，他下决心要“剿共”了。

10 月，中原战事结束，蒋回师至上海，立即声言：“肃清匪共”为当前“刻不容缓”的第一项任务，扬言“期以三月，至多五月”，务将共产党力量“歼灭根株”，并分别任命了各地的“剿匪”、“清乡”、“绥靖”督办、司令、总指挥等。11 月中旬，又召开国民党中央四中全会，决定政治方面的任务是“从速剿匪”，提出了“三个月内肃清共匪”的提案。“围剿”的重点是中央苏区的红军，即红一方面军。12 月，蒋介石下令调集 10 万大军，亲自带同新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赴南昌，并亲自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剿匪”会议，具体部署“围剿事宜”。同时，蒋介石还亲自悬赏 5 万大洋缉拿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

蒋介石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精心部署后，自以为以 10 万大军对付红军 3 万余人，当可稳操胜券、一鼓而荡平“匪共之祸”了。于是，他将指挥大权交给了鲁涤平。他自己则带着他的一班幕僚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等游了一趟庐山，于 12 月 26 日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去了。

北国烽烟刚熄，南天战火又燃。国民党、共产党之间一场势不可免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大幕终于拉开了。

我们仅以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为主线，简略介绍一下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况。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开始于 1930 年 12 月 16 日。调集的军队共 12 个师又 3 个旅，共约 10 万人；蒋介石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第六、第九、第十九路军分三路向苏区中心区进攻，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的袁水流域两岸地区，“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当时，红一方面军 4 万人，辖一、三两个军团和一政卫团。一军团（方面军总部兼军团部）下辖三、四、十二、二十和二十二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下辖第五军和第八军。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从 1930 年 10 月起就作了反“围剿”的准备。10 月 30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罗坊召开会议（史称罗坊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根据这个方针，红军主力一再向苏区中部退却，当时叫“求心退却”。11 月间，当敌军开始向苏区推进时，红军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敌军在袁水流域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近，红军再退一步，转移到东固、龙冈地区隐蔽待敌。红军于退却的同时，在根据地军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依靠根据地的地利（熟悉的地形）人和（群众的拥护）之条件，集中兵力，充分准备，寻找战机，以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方面军总部原拟选择富田、东固地区作为反“围剿”的战场。但 12 月 7 日却发生了“不幸的富田事变”（周恩来语），使总部不得不改变计划。12 月 16 日，误将东固当作红军大本营的鲁涤平下达了总攻击令，命令各师同时向东固推进，以围歼红军主力于东固地区。方面军总部将计就计，决定主动放弃东固地区，诱敌向根据地中心区再深入一步，同时分散敌人兵力，便于各个击破，红军主力则秘密移至宁都北部之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集结。敌右翼公秉藩之新编第五师、张辉瓒之第十八师进展最快。12 月 19 日中午，公师先占领了红军主动放弃的东固山。公秉藩大喜过望，当日直接飞电向蒋介石告捷。公秉藩在电报中夸大“战果”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其电云：“共匪盘踞经年之东固总巢穴，效（19 日）经职部五旅分兵两路进攻，激战甚烈，仰托德威，业于午刻攻下，毙匪甚多，毛泽东亦在内，并夺步枪、迫击炮、刀矛等无算，残匪向古龙冈逃窜，正跟踪追击。”骗得蒋介石也相信了，通电向全国“告捷”，并下嘉奖令云：“公秉藩功破东固匪巢，着奖银一

万元，并提高该师番号为陆军第二十八师，以资鼓励。”

由于公秉藩未通报消息，张辉瓒呆头呆脑于20日晨率师倾全力向东固猛攻；公师则以为红军反攻，亦集中火力抵抗。两军在大山迷雾中激战4小时，直等听到号声，才知道是误会了，自家人打了自家人。

12月下旬，红军总前委果断地决定反攻。采取“中间突破”的方法，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分敌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26、27日，在小布设伏两天，想打运动中的谭道源师。因消息走漏，谭师固守源头阵地未敢出动。根据可靠情报，红军又紧急决定改在龙冈及君埠之间的黄竹岭设伏，准备包围歼灭张辉瓒师于龙冈。红一方面军的三、四、十二军及三军团全体出动，毛泽东、朱德也到设在前沿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亲自指挥战斗的进行。

12月30日晨6时，龙冈地区大雾漫天，千山万壑，一片迷栟。张辉瓒师不知路径，闯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勇猛冲锋，激战一整天，将张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包括师长张辉瓒、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纬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人，几乎全部俘获。仅该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乘乱混在伤病兵中，逃出龙冈，潜回南昌。鲁涤平当日在亲拟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哀伤地说：“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在龙冈歼灭战的震撼下，深入根据地的其他各路敌军纷纷收缩。谭道源师奉鲁涤平令从源头向东韶夺路奔逃。红军乘退追歼，挥戈东向，于1931年1月3日追上谭师，歼灭其一半。

这样，红一方面军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毙伤俘敌一个半师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选自《革命战争卷：长征》）

材料三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0年冬，国民党军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蒋介石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调集8个师约10万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法，妄图消灭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毛泽东、朱德则采取“撤开两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领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向南转移，退却到根据地中部捕捉战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这次围剿中，张辉瓒指挥着十八师、公秉藩二十八师和谭道源五十师。他神气十足地对下级官兵发誓说：“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11月中旬，十八师占领永丰县，不久在我诱敌部队的诱惑下，又率部向距永丰县南部龙冈60华里的东固进发。在东固，他实行“三光”政策，将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医院、农工银行焚烧无遗，到处搜刮民财，屠杀群众。张的这种法西斯行径，激起了东固人民的无比愤慨，导致了他后来被东固人民所杀的可耻下场。

12月29日，张令所属五十四旅以领取下月军饷和汽油为名留守东固，自己亲率五十二旅和五十三旅以及师部共计9000余人进入龙冈。此时红军4万人也转移到龙冈附近隐蔽待敌。这天晚上，张辉瓒召集副旅长以上人员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围绕全师的去留争吵不休。由于张急于寻找红军主力作战，专横地拍案大叫：“附近即使有红军，也只不过是黄公略的六七千人。我师人多武器好，怕什么？眼下形势紧迫，不宜迟疑，本师断于明日继续开拔，各部须遵令前进，不得延误。”红军经过周密侦察，摸清了张师的底细，也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迅速下达《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击龙冈之敌张辉瓒部命令》。

12月30日，龙冈一带漫天阴暗，群峰锁雾。毛泽东、朱德登上距龙冈街20华里的黄竹岭战地指挥所。毛泽东拿起望远镜，远眺龙冈方向一片雾海，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来看，真是天助我也！想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大败曹兵，而今天我们要乘晨雾全歼张敌啊！”朱德点头称是，两人爽朗地大笑起来。

早上7时，张辉瓒师开始移动，当前锋行至距龙冈街13华里的小别村时，即与红军主力相遇，两军对峙，愈战愈烈。战至下午3时许，红军包围圈大为缩小，朱德总司令一声令下，对敌人发起全面攻击。经过大半天鏖战，红军全歼张师9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

在清点俘虏兵时，未见张辉瓒。红军战士便上山四处搜查。原来张为了保全性命，仓卒化装乘轿逃往附近的万功山，企图越山突逃。可是轿夫并不卖力，张仍掉轿子，一步一步爬上山去，当他爬到半山腰时，抬头一看，红军军旗已插上山顶。张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又急又怕，连忙仍掉虎皮大衣，不顾死活地钻进约一人深的土坑里。

几个红军战士在万功山上进行紧张的搜索。当走到这片树林边，听到沙沙响声，便穿过茶林，轻轻走去，只见地上有件大衣，拿起一看，印有“张辉瓒”3个字，战士们又兴奋又气愤。一个战士在坑旁慢慢地将茅草拨开，突然惊叫起来：“里面有人！”其他战士闻声赶紧围了起来，几支枪口一齐对准土坑，厉声喝道：“谁？快出来！”这家伙不肯动弹，两手抱着头缩成一团，吓得哆哆嗦嗦。战士们火了，就将他猛力拉上来，摔在一边。只见他肥头胖脑，个子不高，肚子很大，上身穿着一件窄小的灰色士兵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黄色哔叽裤，脚上穿着靴子。战士们厉声问他：“你是什么人？”张答道：“我是书记官。”一个战士抓起大衣狠狠摔在张的面前，愤愤地说：“还不老实，这不是你的么？”张知道再也瞒不过了，低着头轻轻说：“我是张辉

瓒。”

战士们将张捆绑起来，押到龙冈街。由于张长期克扣士兵军饷，俘虏兵纷纷骂他，有的指着张的鼻子说：“你这个老贼，次次扣压我们的军饷，害得我们连抽黄烟的钱都没有，这回不怕你了，要找你算帐！”说完“啪啪”两巴掌，打得张辉瓒十分狼狈。

这时朱德走过来劝阻，并吩咐松绑。朱德质问张：“国民党为什么要派十多万大军围剿红军？”张不但不认罪，反而傲慢地说：“你们红军要我出多少钱才放我？”朱德见他还这样横蛮，就严肃地说：“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你带兵侵犯根据地，红军和群众决不会饶恕你。我们要在你自己这支失败的部队面前公审你。”张的反动气焰立刻被压住，他感到无法侥幸过关，低着头不停地转动着双眼。

毛泽东在黄竹岭得知张辉瓒被擒，便从指挥所跑向龙冈街。张在北伐时曾与毛泽东有过交往，一见面便连连打拱，口称：“润芝先生！久仰，久……”毛泽东打断张的话，用幽默的语气审问张：“师长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从湖南到江西，又从南昌到龙冈，今天就叫你进到龙冈为止啊！你气势汹汹叫嚣要围攻我们，你可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你的‘围剿’反而被我们给围剿了。你在东固搞‘三光’政策，我们没有会到面，想不到今天在龙冈见到你。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呢？”张辉瓒吓得全身发抖，面如土色，直打哆嗦，连说“有罪！有罪！”他非常害怕红军杀他，苦苦求命，一再表示只要免他一死，情愿捐款、捐枪、捐西药赎命。毛泽东同张席地而坐，向他宣传了红军政策，询问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并给他讲解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

周围的群众也纷纷来到龙冈街争看张辉瓒的丑态。有人编了一首歌：“龙冈小圩场，红军打胜仗，活捉张辉瓒，全师被缴枪。”

夜幕降临，红军总部在龙冈万寿宫开了一个短会，扼要地总结了龙冈战斗胜利的经验。会上有的认为可按群众要求把张杀掉。毛泽东则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是共产党人，比起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不能一擒就杀。”朱德提议可将张放到红军即将开办的学校里当训育系军事教员。于是决定交地方政府看管。

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失败和红军活捉张辉瓒的消息很快传编全国，引起南京政府的一片恐惧和叫骂。张的老婆朱性芳，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想在上海设法找到中共中央，决心倾家荡产用巨款赎回其夫。蒋介石也派人送信要求释放张，条件是：只要放回张辉瓒，他就释放大批在押“政治犯”，并愿付20万元现款以赠。

但人民不肯饶恕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召开的有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上，张辉瓒被盛怒的群众枪毙，并割下头颅，放在一块木匾上，写上“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字样，丢入赣江，让其顺流至南昌。2月2日，被驻防吉安的国民党军哨兵发现打捞。头颅送至坐镇吉安指挥的鲁涤平。鲁见状，如丧考妣，声泪俱下，迅即报告蒋介石和何应钦，蒋、何也为失去一个死心踏地的反共干将十分痛惜，命令按陆军仪式大殓。鲁以大楠木棺材将张的头颅配上樟木雕刻的身子收殓，在南昌举行追悼会，还“公祭”3天。后又在长沙岳麓山半山腰，用巨款修建了横跨1丈3尺的牌坊、直径1丈的六角亭、300平方米的寺庙，占地150平方米的水泥墓，高9尺宽3尺的墓碑。但无论怎样鼓噪，这场30年代初期轰动全国的历史丑闻，永远为人嗤笑。

（作者：冯都，选自《风云七十年》）

材料四　我在第一次“围剿”时的经历

一、防卫吉安

蒋、冯、阎恶战中原的时候，中国的红色区域已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〇年秋，江西红军大举出动，威胁武汉、长沙，围攻南昌。十月初，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国民政府为之一震。吉安是江西重镇，为江西经济、文化要地，与抚州并提，有“金吉安、银抚州”之称，在外士绅官僚很多，著名人物如刘峙、刘芦隐等，都是吉安人，熊式辉也是江西显宦。吉安一失，在外地的江西籍宦绅大为震惊，纷纷责难鲁涤平防守不力。这时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回到南京，听说吉安失陷，十分恼怒，去电南昌痛骂了鲁涤平一顿，并限期收复吉安。鲁涤平在四面八方的责难之下，惶恐已极，急电高安，要我立即带领队伍往分宜集中。我一到分宜，随即又接到命令要我火速向吉安推进，限令收复吉安。

我从分宜出发南下，还没走出一、二十里，周围景象使我大吃一惊，旧的道路都没有了，茅草长得一人多深，莽莽一片，既看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我一想，糟了！一无人，二无路，三无吃的，连水都不敢喝，瞎子摸路还有棍棍子，我们简直连棍棍子都没有。这个仗怎么打呀！我感到再往前走很危险，便立刻下令宿营。入夜，四面高山，黑巍巍地矗立着。人马正待安歇，忽然喊声四起，只见这里一阵“杀呀！杀呀！捉活的呀——”，那里一阵“杀呀！杀呀！捉活的……”部队闻声惊起，准备迎战，我知道，这一出击必然有失，便马上下令：不许妄动。这样闹了一夜，直弄得全师官兵人心惶惶，通宵未睡，第二天连眼皮都睁不开。我一看这情况，心里很慌，知道如果往前直走，红军掌握了我军动态，一定会以伏兵袭击。于是我便决定声东击西。开始部队故意朝安福前进，走到中途忽然折转向东南以急行军往吉安迅跑，赶到吉安已是十一月十八

日。吉安虽然赶到，然而已是一座空城。原来，我们的行踪早已被红军掌握，所以有意放弃了吉安。国民党却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吹嘘，说什么我军获得大胜，于是"罗霖师克服吉安"的大字标题，便见之于南京、武汉等地的各大报纸了。蒋介石来电嘉奖，颁发我"二等宝鼎勋章"。鲁涤平高兴得不得了。当初他见我自分宜南下后一直没有讯息，以为我被红军消灭了，收复不了吉安，无以复蒋介石的命，直急得每天搓手顿足，几乎要哭起来。现在，忽然听见我"收复"了吉安，他不禁拍案而起，叫道："这真是神兵呀！"不久，他来到吉安，和我经常往来，待我十分敬重。他身躯高大，派头也十足，颇象个大官僚样子。鲁涤平是"谭派"（谭延闿）人物，最讲究吃鱼。一桌菜总有好几盘鱼，鲜鱼、腊鱼，吃法多种多样。

"克复"吉安以后，蒋介石感到红色政权壮大得如此迅速，对他形成威胁，心里很是恐慌，于是决定布置军事"围剿"。他亲自飞抵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各师长都应召前往。我则托辞吉安防务重要，离不开身，派师部驻南昌办事处主任唐文简代表出席。我为什么不去呢？其中有段原因：

当蒋、冯、阎大战中原时，蒋介石曾有意调我去中原。我素知蒋对非嫡系部队不怀好意，调我去中原，无非是想借冯、阎之手消灭我的实力，以达到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目的。因此，我借故没有去。这次，当然也不好去南昌了。蒋介石大概也揣摩出我这个心理，没有勉强要我去南昌，反而来电慰勉一番。在南昌军事会议上，蒋为了鼓励其部属为他卖命，举出我"收复吉安"的例子说："罗某能以一师之众，收复如此重镇吉安，可见消灭红军易如反掌。"他还踌躇满志地说："红军的主力集结在东固，只要一举攻下东固，红军就完了。"蒋介石这番话，说得大家心痒痒的，尤其是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更是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攻下东固，立功受奖。南昌军事会议一结束，各路大军纷纷出动，我则因被吉安士绅挽留，同时也怕到红色区去找亏吃，便仍留在赣江西岸防守吉安。我为什么会受吉安士绅的欢迎呢？这是因为在我之前守吉安的邓英师太坏了，士兵犹如盗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邓英本人则嫖妓女，抽大烟，勒索富商大贾，吉安人对他真有谈虎色变之慨。而一当红军攻吉安，逃得最快的便是他。我守吉安，军纪较好，军民比较相安，吉安士绅当然会欢迎我了。

二、"围剿"经过

南昌军事会议的布置是这样的：蒋介石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将参加"围剿"的军队编为以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含四个师）、以鲁涤平为总指挥的第九路军（含四个师）、以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含两个师），沿公路向东固、龙冈、小浦一线围歼红军，并将主要责任放在第九路军肩上。

南昌军事会议对当时红军的力量及国民党本身力量的估计是荒谬可笑的。蒋介石自中原凯旋归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视红军力量。虽然他也感到红色区域在日益壮大，忧心忡忡，但其心目中，却满以为有了十万大军就可一举击溃红军。蒋介石的骄气，助长了他部下的轻敌。张辉瓒、公秉藩在南昌会议上就各自暗暗盘算，如何抢夺攻取东固的头功。南昌军事会议一结束，两人便争先恐后杀奔东固而去。当时，我在吉安，见公秉藩匆匆而过，便私下对他说："这个仗不好打呀！"他却毫不在意地离去了。随后，张辉瓒又匆匆而过。我和张辉瓒见面是在一个早上。那天日高三丈了，他才起床，肥肥胖胖的脸，结结实实的身材，起床便是一个哈欠。然后一只脚往床旁凳子上一搁，副官连忙跪下一条腿，蹲下身子替他扎绑腿。我看到他这种情形，不禁一怔，心想："这个样子怎么能和红军去打仗啊！"但是我和他是初次相识，不便对他直言。

一个多月后，大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底，我的一个部下忽然来报告，说有个哨兵在神冈山附近河面上发现一个东西在漂流，远远望去，似乎有面小红旗在晃动，连忙把船划拢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头钉在木板上，上面插着一面小红旗。我听了一惊，连忙叫副官去看。副官回来说："这个人头是张辉瓒师长的。"我听了吓了一跳，心想，糟糕！连忙对他说："赶快打电话到总指挥部（设在吉安）报告鲁涤平，只说捞了一个人头，莫说是张师长的，请他派人来看看。"隔不多久，鲁涤平打发人来了，一看果然不错，是张辉瓒的头，于是连忙护送到南昌去了。

原来张辉瓒渡赣江后，红军主力早已转移至黄陂、小浦（即小布）一带，东固只留下小股兵力，虚张声势，诱敌深入。张辉瓒完全不知有变，依旧分路包围东固。他这一路走到离东固大约还有四、五十里的地方，忽又下令休息、准备次日继续前进。当时有人提醒他说："各路兵马都已按原进程表向东固推进，如其中有一路忽然在中途改变计划，进程不一，恐怕将来彼此发生误杀。但张不听，坚持要休息。第二天清晨，大雾栩栩，对面不见人，张辉瓒领着队伍浩浩荡荡杀奔东固而去。将到东固遇到伏兵，两下便混战起来，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四野。杀了半天，雾也渐渐消了。这时，经过联络，知道糟了，原来相杀的正是已于先一日"攻克"东固的公秉藩师。公秉藩气极了，一个电报打给蒋介石，蒋介石大怒，打了一个电报给张辉瓒，将他大骂一顿。公秉藩则以"攻克"东固的大功受到重赏。东固事件之后，公秉藩再也不肯接受张辉瓒指挥了，他把队伍开到富田。

张辉瓒到东固后，便派第五十二旅（戴岳旅）进驻南垅（即今南龙）。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命令五十二旅由南垅开往龙冈。张本人则率第五十三旅及师直属各营、连于同日午后五时由东固开赴龙风，全体官兵都在龙冈

宿营。晚上,张在师部召开军事会议,强调要援救谭道源师,便悍然下令,次日各部遵令前进。就这样,张辉瓒便于第二日在龙冈被俘,全师有九千多人马被红军一网打尽。

张辉瓒被杀后,鲁涤平哀恸极了,终日以泪洗面。因为张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第一次"围剿"前任南昌警备司令,残杀革命志士最多,是鲁涤平最得力的干将。张师全军覆灭,形势骤然紧张。这时我深感形势对我不利,估计谭道源师已成孤军,有被红军消灭的危险,于是匆匆去见鲁涤平。一进去就碰见鲁的参谋长谢慕韩。我忙问:"形势很紧张,总指挥打算怎么办?"谢说:"总指挥怕吉安有危险,打算要谭道源师立刻开来吉安防守。"我一听心里很着急,便对谢说:"红军主要不是占地方,而是要消灭我们的队伍,能吃就吃,不能吃即走。如今谭师已成孤军,如果往西开来,红军必定会来袭击,只有赶快往东向洛口的许克祥师靠拢,头陂还有毛炳文师,加上谭师,有三个师,就不会挨打了。这样谭师才可保住。"谢慕韩信以为然。我又对谢说:"请总指挥赶快下令叫谭师向许、毛二师靠拢,电报赶快拍出去,要快,不能超过三十分钟。"谢便立刻往鲁涤平的房间走去,转身又对我说:还是请你去说说,总指挥这两天脾气大得很,不大好和他进。"我心想:"这样的指挥怎么能和红军对敌啊!"我看时间紧迫,便三步变两步跨进鲁的办公室。鲁正哭丧着脸,一见我进来,连忙起身。我对他说:"现在情况紧急,总指挥打算怎么办?"鲁说他准备要谭道源这一师开来吉安增防,我当即把对谢慕韩说的话对他重述了一遍,他一边听,一边点头。最后,我又强调说:"这个电报必须马上发出去,不能超过三十分钟。"鲁连连点头说:"好!好!"我就退出来了。等了好久,仍不见动静,我又走进办公室,鲁靠在椅子上,正紧锁双眉。我问:"总指挥电报拟好了吗?"他回答说:"我在考虑。"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真叫人着急。我便对他说:"事不宜迟,再迟,恐怕谭师有被消灭的危险。"鲁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万一红军来攻吉安,又如何是好呢?"我见他这样狐疑不决,心中极为焦灼,便对他说:"现在红军在对岸,要渡江还得不少的船,一时哪里去找?我们只要把船只控制起来,还怕他飞渡不成?"然而,他还是半天不出声,我见他这样子,知道他害怕,便把胸脯一拍,对他说:"吉安,我负责好了,请总指挥赶快拍电报!"这一下,他才立刻提起笔,一挥而就,叫谭道源赶快向许、毛二师靠拢。

谭道源接到电报后,马上率师于一月三日经东路向东南转移。红军在消灭张辉瓒师后,果然又来打谭道源师,由于谭道源跑得快,没有全军覆没,然而也打掉了一半,损失枪支二、三千。第一次"围剿"就这样结束了。

(选自《纵横》86年5期,作者:罗子雯)

材料五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一九三一年春

毛泽东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背景介绍

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当时所以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是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在1927年前后,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作出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封建压迫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但是,从1927年上半年开始,托洛茨基趁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失败之机,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发起攻击。他认为:在中国,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另一个俄共党内反对派头目拉狄克,则把商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一直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

1927年革命的失败,也促使人们对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而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又都离不开对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六大"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都肯定第一次大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现阶段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推翻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两大任务。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派则主张托洛茨基的观点。

材料：

- 何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谈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材料一　何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次重要争论。这场争论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关联的。1927年前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作过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分析和论述。认为中国社会封建压迫是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余。然而当1927年中国革命发生危机，以致失败之后，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提出疑义。认为中国封建关系在中国已是“残余的残余”，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地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地位”，商业资本在中国已经蚕食了封建势力，中国社会已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主张中国应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的这种争论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领导者，早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就有了正确认识，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第六次代表大会都肯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然而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了取消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腐蚀和资本主义深入农村，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已占支配地位，农村经济实际上已资本主义化，农村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富农与农民的矛盾，中国社会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中国工人阶级只有等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主张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争论直接影响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并形成了《新思潮》派和《动力》派之间的大论战。前者以王学文主编的《新思潮》杂志为中心，其代表人物是王学文、潘东周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后者是以托派分子主编的《动力》杂志为中心，其代表人物是任曙、严灵峰等一些托派分子。1930年3月，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一文，着重批判了托派的理论观点。同年4月《新思潮》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将来》、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6月，潘东周在《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又发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以及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指出，帝国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的输入，不但没有帮助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相反地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并阻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占优势地位，而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上述论点都比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但1931年初，任曙发表了《中国经济研究》一书，6月严灵峰发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后又发表《追击与反击》一书，却认为“中国毫无疑义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1931年6月，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1933年4月刘苏华《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严灵峰》一文，都对托派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在这期间，吕振羽等比较确切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正确概念。1935年，钱俊瑞、薛暮桥等与王宜昌、张志澄等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上述论战，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正确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它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材料二　谈三十年代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围绕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农村经济性质问题而展开，中心是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1930年3月，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李立三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判了托派理论。同年上半年，进步刊物《新思潮》连续刊登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5月出刊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载了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发展及其将来》等文。潘、王等的文章登在《新思潮》杂志上，故一般称其为“新思潮派”。6月，潘东周又在《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发表《中国国民经

济的改造》一文。这几篇文章，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其中又以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一文更为重要。

潘文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相互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寇中国以后"，一方面，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使中国经济组织，走上了新的途径"，另方面，则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中国就只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而不能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文章列举事实，批驳了托派"残余之残余"说，指出：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是，封建关系仍然占据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优势，而中国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封建关系"实际上就占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王学文在文章中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和主要地位的，是封建半封建经济。

李立三和潘、王等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其中主要人物是托派分子任曙和严灵峰。1931年初，任曙发表《中国经济研究》一书，6月，严灵峰发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本书由三篇文章组成，前两篇曾于1930年7月和9月发表在《动力》杂志第一、二期上。一般称严灵峰等人为"动力派"。后又写《追击与反攻》一书。他们的主要错误观点是：

第一，抛开对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研究分析，宣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严的共同认识是：封建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侵华以来，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所以，"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这里，他们不但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而且对中国商品经济状况也做了极度的夸大。任曙更进一步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他根据对外贸易的某些统计资料，断言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了优势"。

第二，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上，鼓吹"绝对破坏论"。严灵峰的逻辑是：既然"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而资本主义同封建的经济制度又是"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任曙也极力反对"帝国主义维持封建残余"的观点，攻击这是"荒谬绝伦"。他们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内和侵入到一个丧失独立的国家内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抹煞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

第三，在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上，鼓吹"一视同仁"论。任、严都否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宣扬：两种经济都是"中国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国经济"，即使是帝国主义排挤民族资本而扩张其在华的经济势力，那也同样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主张对华洋资本要"一视同仁"。

第四，曲解农村的阶级关系。严灵峰说：中国旧式地主已经破产，"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即"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任曙也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严、任的这些论断，完全否定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

第五，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

对于托派分子的攻击，马克思主义阵营予以回击。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1931年6月)、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1933年4月)等。

刘梦云指出：任曙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他认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刘梦云既肯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又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针对严任曲解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谬论，刘梦云分析了地主经营土地和剥削农民的租佃方式，指出"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这种封建的剥削。刘苏华在文章中揭露了任、严等托派分子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实质。他指出：把目前的中国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托派"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托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口号来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口号相对立"，"反对现阶段的革命运动"。他们对华洋资本的所谓"一视同仁"论，"根本上就是要取消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刘梦云、刘苏华及"新思潮派"的文章，虽然也有立论错误的方面，如对封建关系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估计不足，而对资本主义成分则有些夸大，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等，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但是，从总的方向上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宣扬了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

思想，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1932、1933年间，虽然继续有刘境园说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严的继续“答辩”和“反攻”，但他们的阵地和影响是愈来愈小了。1933年前后，吕振羽等比较确切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1935年，又有钱俊瑞、薛暮桥等与王宜昌、张志澄等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钱、薛等人继续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样，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这被更多的人所承认了。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富田事变

背景介绍

富田事变是1930年12月12日，由于对抓“AB团”问题发生利害冲突，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率领红二十军一部，由驻地东固冲到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机关，缴了警卫人员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一批在肃“AB团”中被捕人员的事件。1930年春，赣西南苏区开始的反“AB团”斗争逐步在党群机关和部队中开展起来，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杀害了一些被误认为“AB团”的人。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率领一个红军连队到富田，帮助省行委肃反，拘捕一些领导人。随后，李韶九带领一个红军排，押着被捕的谢汉昌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刘敌被怀疑是“AB团”。刘敌立即发动独立营包围了军部，捆绑了军长刘铁超，李韶九逃脱，释放了谢汉昌等人。随后，刘敌、谢汉昌率部到富田，缴了警卫部队的枪，释放了在肃“AB团”中被关押的人员。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队伍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在国民党1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的严重时刻，对领导机关肃“AB团”的错误，既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又提出分裂口号，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对于富田事变是什么性质问题，总前委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有不同看法。总前委认为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6日作出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和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认为在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并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将红二十军动员回到赣江以东。4月初，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根据中共中央3月28日《关于富田事变的 决议》的精神，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这就使中央苏区的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将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处决，并将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1931年8月30日，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封《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指出中央苏区在反“AB团”斗争中犯了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央指示信后，11月初，在中央苏区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检查了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讨论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6号，对肃反工作作出了9条规定，是纠正简单化、扩大化错误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此，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逐步得到了制止。

材料：

- AB团问题与富田事变
- 回忆富田事变
- 我在富田事变中的经历

材料一　AB团问题与富田事变

关于AB团问题。远在北伐战争时期，段锡朋就组织了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一九三○年十月，红军打开吉安后，地方党发现了他们的旗帜、印章和暗号，就把段锡朋捉来杀了。这时，AB团分子窃据了党政军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们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楚。当时，总政治部秘书长李绍九担任了肃反委员会主任。李绍九在富田被AB团捉去，后说服看守卫兵，逃了出来。他因为对AB团非常仇恨，就采取了逼、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我当时是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

不久，我们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待。但他们写了一下，写不下去。我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像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我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待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

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慌话,我们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现在来看,过去在肃反中,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是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肃反扩大化。他们这些人都不是AB团,在党的“七大”时,都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在整个肃反过程中,搞肃反扩大化,在第一阶级是李绍九(后查明是一个叛徒)。第二阶段是王明路线,而毛泽东同志当时则是很慎重的。

富田事变是怎么一回事呢?当AB团被发现以后,李绍九到二十军抓AB团分子。该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是“六大”中央委员。李绍九抓到该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审问,刘敌就乱供,供出了大部分军队干部。刘敌这个人有流氓习气,他一方面转移视线,把凡是他不满意的人,都说成是同伙的AB团分子;另一方面,又煽动战士捉拿李绍九和刘铁超,将他们捆绑起来。后来,李绍九说服看守战士,对他们说:“我是来肃反的。”卫兵听到他是来搞肃反的,就把他放了。刘敌深怕李绍九报复,便蒙蔽战士,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了,但没有打白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受到鼓舞,便派人送信到红军总部,说要把部队带回来。但信里却说什么“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并将信直接交给了彭德怀同志。当时,考虑到刘敌是在搞分裂,属于叛变性质,总部就回信要他回来。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那时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

AB团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我们从两个迹象可以看出:1.红十二军成立之初军长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就是AB团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谭敌发觉,也是由于AB团告密。这就说明有反革命。但在左倾路线统治下,肃反搞得过头了。

(选自《回忆中共苏区》
作者:郭化若)

材料二 回忆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起因很复杂。那时,赣西南苏区因为土地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农民彻底地分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分子,虽然不敢公开反抗,但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和动摇其子弟的革命斗争意志的事情却是不断发生。例如在攻打吉安时,就发现过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活动,也发现了反动传单、标语;在机关和青年干部学校中还发现了反动组织。当时曾在陂头开过一次两万多人的群众公审大会,公审以后还杀了两个AB团分子的组织者。但那时为了全力打开吉安城,以图把赣西南苏区打成一片,所以未能进一步深入进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后是主力红军内部也发现了反革命AB团的破坏活动,所以进行了肃反。肃反中牵涉到地方省苏部长级的一些人中,也有AB团分子。总前委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了巩固部队和地方党的组织,以利粉碎敌人围剿,决定帮助地方肃反,这才派李绍九率领一个连来富田。

李绍九来时带有总前委的指示信,由我和陈正人同志亲收。来信中说: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军事部长万金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都是AB团。因为当时敌人第一次“进剿”的反动部队已迫近苏区边界,形势十分紧张,要我们立即解除他们职务,把他们监视起来。当时省行委同意了总前委意见,于是把李白芳、万金邦、周冕等人暂免现职,监视审查。并决定陈正人同志带一个排去河西赣西特委传达总前委的指示。后来,总前委又派古柏同志来省委一道协助肃反。古柏同志到省委以后,李绍九带一个排到东固去找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和军长刘铁超,商量在红二十军直属部队内进行肃反。而且把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捕起来,进行了审查。这才发现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也是AB团分子。此人和李绍九是同乡。李绍九找他谈了话,但没有逮捕他。刘敌回去便鼓动全营战士说:“李绍九这个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并率领全营部队攻进军部释放了谢汉昌,把军长刘铁超捉了起来。政委曾炳春看形势不好,离开军部回了家。李绍九也逃走了。后来二十军军部直属部队由谢汉昌和刘敌统领进攻富田,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包围省苏和省委机关。我见势头不对,便迅速离开了省委机关。古柏同志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简要情况。

我离开机关以后,听到省苏完全被打毁了,就走回自己的家乡去暂住,并把富田事变情况向这里的党组织作了说明。

谢汉昌与刘敌打了省苏以后,就把红二十军拉到赣江西边永新一带去了,并在沿途张贴了许多反动标语:“打倒××”、“拥护××”,并说“××是谁的走狗”等,造成当时苏区群众思想混乱。这时,国民党反动部队由张辉瓒统领,趁我苏区内部发生叛乱之机猛烈向我东固进攻。当张辉瓒主力深入龙冈时,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朱、彭、黄等红军主力在龙冈附近包围了张辉瓒师,歼灭其二个旅和一个师部,张辉瓒也被我活捉。自粉碎了敌人第一次进攻,活捉了张辉瓒以后,苏区人民才不相信谢汉昌、刘敌等人的欺骗了。特别是省苏维埃政府恢复工作,在东固举行了万人公审张辉瓒大会,当场杀掉了张辉瓒,苏区人民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谢汉昌、刘敌等人是混入革命营垒的真正反革命分子了。

反动分子谢汉昌、刘敌把部队拉过赣江西边到达永新以后,即追击省委委员陈正人同志。陈正人同志迅速离开了赣西特委,到湘赣省委,并把谢汉昌、刘敌等反动分

子的反动行为告诉了湘赣省委。

当时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同志也受到谢汉昌、刘敌等人的影响，后来与他们结成了一伙，还召开了所谓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指出红二十军在富田举行事变打省苏维埃政府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反对农民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打垮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以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恢复工作，领导各地苏维埃政府积极准备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第二次大进攻。而谢汉昌、刘敌、段良弼（省行委委员，前团省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人，则继续在河西苏区宣传他们的所谓党内正在进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谬论，使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渐渐模糊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党中央派项英同志来到赣西南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成立以后，即通知赣西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攻击，听候处理，并要他们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来。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恢复工作以后，我到东固找曾炳春同志出来，担任省苏的一部分工作。

以后项英同志又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他们以为富田事变仅仅是党内斗争，并且认为他们可以得胜，同时更错误地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所以，除段良弼做贼心虚，拐了大批现款，借口到上海党中央去告毛泽东同志而逃走以外，其他人都过河东苏区来了。王怀同志也来了。这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在苏区中央局领导下举行各县苏维埃联席会议，并通过了以周以粟同志（长江局派在总前委的代表）为首的审判富田事变首要分子的审判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进行公审富田事变的几个头子谢汉昌、李白芳等。由周以粟同志主持公审，各县都派有代表参加，我也参加了。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

（选自《回忆中央苏区》作者：曾山）

材料三　我在富田事变中的经历

古柏同志系江西寻乌人。我是广东人。古柏同志和我原在寻乌县委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来到寻乌分兵发动群众。在红军离开寻乌时，古柏同志调总前委任秘书长，我也跟随古柏同志到前委秘书处工作，随总前委到了福建的南阳，然后到了汀州。在汀州住了一段时间，再从汀州经瑞金来兴国。毛泽东同志住在城外。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往往就在田头和群众谈话，帮助群众车水。红一军团从汀州向长沙进军时，我和康克清、彭儒同志没有去，留在吉安陂头。红一军团回师江西以后，我们又跟随总前委走了，经东固、富田、到革命根据地中心黄陂、小布一带集结。总前委在黄陂、小布一带住了很长时间。

一九三〇年的冬天，古柏秘书长和我从黄陂去富田。那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富田。我们去江西省苏帮助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中午到富田。晚上，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会议不久，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不知出现什么事，结果，发现河西的二十军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我们带的一个警卫班被冲散了。于是，我们三人（古柏、陈正人老婆彭儒、我）便从省政府后门跑出来，钻进房子附近的一个茅草蓬里隐藏。幸好天黑，雨雾朦朦，便于隐蔽。方向不明，我问怎么办？古柏说不要怕，不要作声，跟着敌人走。我说，跟敌人走多危险呀？古柏解释说：只要不作声，不一定被敌人发现。因为我们人地生疏，方向不明，只好找他们当向导，带我们出村去，就有办法了。果然，我们听信古柏的主张，跟着敌人哨兵后慢慢走。走到叉道口再分路，他们朝东、我们朝西，他们朝南、我们朝北。这办法真灵验，听见叛乱士兵发牢骚说：叫我们抓古柏捉曾山，不知他们高也矮、胖也瘦、黑也白，什么长相都不明，抓个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在我们前面几步远。走出村，到岔道口，遇见一条河。古柏说过河去。我刚坐月子，彭儒正要生孩子，时值寒冬，半夜泅渡，真是急难人。钻了大半夜，才走五里路。转到一座高山庙里，碰见一个斋婆子，我们要她带路。这人说带路可以，但要给三块光洋。古柏给她五元苏区纸币，她不肯接，说："红军票子不要。你们杀和尚斋婆，我得了红军票子，也不敢下山去买东西。"当时，我挺身而出说："我有，我给。"古柏说："你不能吹牛，骗她惹出事来不好。"我实在是有。在吉安戴济民家（医生）生孩子时，老戴给我五块银洋，给我缝在一条便裤头边上。这事古柏自然不知道。

待我付了钱，斋婆子把我们领到兴国边界就不肯带路了。她朝山下指了条路，告诉我们那里有房子的地方就是兴国县的圩镇。她还说，苏区的人看见她穿斋婆的衣服，会关她的牢，杀她的头。任我们如何劝说，她也不肯再带路了。我们进入高兴圩苏维埃政府附近，发现前头竹林里有儿童团的步哨。古柏赶紧藏进路旁一间茅厕，拿出铅笔（蓝色变色铅笔），在一个香烟盒般大小的嫩草纸上划了几个字，拿出事变时从桌子上捡进衣袋的省苏政府公章及曾山的私章，就开起介绍信来。那几个儿童团员见我们有路条通行证，就向我们敬举手礼，并将我们领到乡苏政府见领导同志。

在高兴吃了午餐，招待可谓热情。下午，由高兴区苏政府派两名赤卫军队员，领着我们去兴国县城。到了兴国县，接见我们的是县苏主席钟世斌。他三粗五大个子高，麻脸，赤里透红，神态很威严。古柏把临时路条拿出给他看。钟世斌也不说什么。我们便把富田事变的经过大要讲了讲，他仍不表示什么看法，只是吩咐人做晚饭给我们吃。吃罢饭，世斌却说在政变情况未弄清以前，要把我们三人绑起来。我着急地说："我们死里逃生，不能绑！"古柏主动出来说，要绑就绑我一人，她们两个都是女的。可是麻子主席脾气很蛮，硬要绑，只得把古柏绑了双臂，我与彭儒因为是女人，只绑了一只手。三个人不明不白地坐了一夜的牢。尤其怪的是，当夜牢头看守又端了一大碗鸡汤、猪肉、鱼子和一壶水酒招待我们。既把我们当囚待，又把我们当客人，使我们莫明其妙。看守吩咐我们："喝醉吃饱来，不要怕！"我和彭儒转念一想，觉得问题严重，可能这是最后的晚餐。这麻子县苏主席大概想仿效古人办刑餐，待我们喝醉吃饱之后拿去开刀处决。我们这一想不寒而栗，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哪里有心思吃饭喝酒呢？独有古柏给我们壮胆，叫我们吃就放量地吃。第二天县苏主席亲自给我们松绑，只是古柏不松绑，派了十几个赤卫队员护送我们到宁都黄陂、小布总前委驻地。彭儒因生孩子，仍留在兴国。后来碰到陈毅同志才被放出来。

到了小布，天已擦黑。自富田事变发生后，小布戒严了。我们在村头就遭到山上的哨兵盘查询问了。对方看不清我们的脸，见有几十人的队伍，便子弹推上膛，不住拉动枪机，警告我们不要靠近。我们声明各自的身份，对方仍然不答应放我们进村。兴国的赤卫队员性子急，发起了脾气，说："肚子饿得咕咕叫，走了这么远的路，还要阻路！"便也拉枪机推子弹，想硬冲进去。古柏慌忙招手制止这个鲁莽行为，说不要发生误会，否则要出危险。古柏拼命地喊叫说："我是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对方不理，还开枪鸣警。幸好被查哨的总前委秘书谢唯俊同志发现，才叫哨位上的红军士兵把枪放下，迎接古秘书长。士兵说早晨都给古秘书长他们开了追悼会，还有什么古秘书长，莫是灵魂归来了。谢唯俊说："是古秘书长回来的，我听出了声音是他的。你们没有事。"岗哨这才放我们进村去。这一下彼此在灯光下相见，都拥抱起来，狂跳起来。谢唯俊叫古柏立即去向毛总前委与朱军长汇报去。兴国的赤卫队也被留宿受到热情接待。这就是富田事变后，我们安全脱险的经历。

（选自《回忆中央苏区》作者：曾碧漪）

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三〇年3月1日至6日，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执、监委员44人出席开幕式。胡汉民致开会词，于右任致闭会词。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党务工作方案》，指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指导地方的社会事业和民众的训练。因此，会议又制定了《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训练党员工作方针》、《推进党务工作方案》等。会议修订了《中央政治会议条例》，明确指出中央政治会议是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会议指责阎锡山策动各反蒋派参加反蒋战争的行为，并准备予以制裁。会议限令国民政府于三个月内建立五院机构；通过了《实业建设程序案》，送国民政府提交国民会议通过执行。会议还通过了《限制官吏兼职案》、《扶植同志增加工作效能案》、《厉行节约运动案》等。全会为与北方反蒋联合战线兵戎相见作了准备。

材料：

- 会议经过
- 开会词

材料一　会议经过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三月一日上午十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会式。中午各委员聚餐。下午二时开预备会议，推定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二时半续开第一次大会。详情分志于后：

开会式

三中全会一日上午十时举行开幕式，到执委〔略，见前《三届三中全会到会委员名单》〕、各机关来宾、本部职员共五百余人。按照规定仪式，中央委员就位；奏乐；唱党歌；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由胡汉民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当由主席致开会词（见下）；嗣即奏乐礼成。散会后，齐到中央党部二门前摄影，以留纪念。十二时各委员在中央会食厅聚餐。

预备会

三中全会一日下午二时开预备会，到执监委员四十四人（同午前）。临时主席胡汉民。决议事项如下：

一、推荐中正、于右任、胡汉民、谭延闿、孙科五委员为大会主席团。

二、推陈委员立夫为大会秘书长。

三、大会共开会五日。

首次大会

一日下午二时半，续开第一次大会，出席委员同前。主席蒋中正。决议事项如下：

（一）中央执委汪兆铭业经开除党籍，以候补执委丁超五依次递补。

（二）审查委员会分为党务、政治、经济、教育四组，并推定各组委员如下：一、党务组：推戴传贤、陈果夫、周启刚、刘芦隐、吴敬恒、邵力子、张道藩、桂崇基、余井塘、克兴额、苗培成、马超俊为审委；由戴传贤、刘芦隐两委员召集。二、政治组：推王宠惠、宋子文、戴传贤，何应钦、朱培德、吴铁城、李文范、邵元冲、朱家骅、陈肇英、方觉慧、古应芬、林森、丁超五、王正廷、缪斌、陈布雷、焦易堂为审委；由王宠惠、宋子文两委员召集。三、经济组：推张人杰、孔祥熙、吴铁城、陈立夫、刘纪文、曾养甫、王伯群、陈耀垣、恩克巴图、刘文岛、林云陔、宋子文为审委：由张人杰、孔祥熙两委员召集。四、教育组：推吴敬恒、叶楚伧、戴传贤、邵元冲、朱家骅、刘芦隐、蔡元培、邵力子、李煜瀛、程天放、何应钦、陈布雷为审委；由吴敬恒、叶楚伧两委员召集。

（三）阎锡山受党国之重任，并为中央执行委员，乃于最近联合武人，倡为谬说，违反党纪，动摇人心，并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应即设法制裁。本会特派李委员煜瀛、张委员继、赵委员戴文切实查明真相，是否仅系言论背谬，抑更有弄兵谋叛行为。并令赵委员戴文就近先行查实，克日呈报。

（四）所有提案由主席团分别性质，交付各组审查。

（五）二日分组审查提案，三日上午八时继续开会。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2日）

材料二　开会词

民国十九年三月一日

自去年五月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阅大半年之久，在此经过期间，关于过去之工作应须检查，未来之工作亦须规定，故有此三中全会之召集。在三中全会所决定之方案，完全以总理遗教为根本，求三民主义之实现，乃是普通全民所希望早日达到之目的。依以党治国原理，有党而后有政治，凡一切军事应受政治之支配。乃训政开始时期，为何而犹有不断的军事发生，以上累国家，下苦人民，一般人多不知其蕴而难免怀疑。但缘故上年两次召集之编遣会议所决定方案，乃期遏除一般封建思想，领导其入于正轨，使一切军队成为党与国家之整个军队，乃是和平统一无上之妙策。奈素抱封建野心之军阀，其脑筋不明党之真谛及国家纪律，冒着本党招牌，实行其破坏政策，以为编遣如果成功，则其封建势力即将完结，故不惜甘心反动，为最后之挣扎，以背叛党国。故中央为巩固党国基础，对于不受领导蓄意破坏之反动分子，不得不以武力为制裁。故一方谋训政之建设，一方作军事之设施，以促一切反动之消灭。证诸数月来军事之结果及全国人心之向背，可断定凡违反本党纪律及人民心理者，愈反动则消灭愈快，不啻自寻绝路。国内用兵，原属不幸，但为维护党国起见，实事之无可如何者。若辈图野心之倖逞，其思想比一般人民还要落后，即非法理所能喻〔喻〕，不为〔得〕不于武力上求最后之和平。在此开会期间，凡我同志应先责备自身，如何未能使反动派无形消弭，或者方法未善，或者指导未良，工作上有如何缺点，随时检查。力谋以后组织之健全，方法之完整，使一切建设大计充分进展，不任其有任何恶势力之妨碍。建设注重于事实之表现，不徒在文字之宣传，即有方案，又有方法，则反动势力必可于最短期间解决，不致于党国发生何等影响云云。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2日）

左联成立

背景介绍

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鼓舞了革命文学工作者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讨论，给革命文学工作者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又由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发生了在同一目标下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鲁迅等人的努力，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和深入，标志着中国革命作家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的重大指导作用和胜利。

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有：鲁迅、茅盾、郁达夫、沈端先（夏衍）、蒋光慈、田汉、柔石等五十余人。联盟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专门机构，发展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发起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等提案。

大会并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这个纲领规定：“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的战线上，攻破一

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同时并声明："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其内容。"此外还要"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

"左联"在理论纲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

"左联"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建立了分部，展开了工作。先后主办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北斗"、"文学月报"、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等。这些刊物流行全国，打击了敌人，提高了自己，哺育了许多革命青年。

材料：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材料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自动解散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三月二日正式的成立了。

成立会是下午二时举行的，当时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鲁迅，画室，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五十余人。

宣告开会以后，推定了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成立主席团。先由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接着就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讲演。往下由鲁迅，彭康，田汉等相继演说。然后通过筹备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至四时，开始选举，当选定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往后为提案，共计约十七件之多，主要的是：组织自由大同盟的分会，发展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组织各种研究会，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

当时所确定的这个组织的行动总纲领的主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同时决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针，是：(一)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二)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四)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五)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

当时所通过的纲领(行动纲领是附在这后面的)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统治之工具，便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唤喊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地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在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　　*　　*　　*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中"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　　*　　*　　*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

一直开到七点钟，才宣告散会。

现在，社务是在向各方面积极的进行着。(记者)

(选自《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

材料二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

"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 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股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 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即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

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可能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进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 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摘自《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

中原大战

背景介绍

一九三〇年春，冯玉祥和阎锡山达成谅解，决定与桂系及各杂牌军组织讨蒋联军，起兵反蒋。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一)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任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二)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铁路的作战任务，分头向徐州、武汉进攻；(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律浦铁路南下，直捣南京；(五)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六)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内定四川的刘文辉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为第六、第七方面军；后来又加定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

四月一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职。同一天，冯玉祥在陕西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就任副总司令职。这时，讨蒋联军已经集中了七十万大军，积极作好进攻的准备。

在讨蒋联军调兵遣将的同时，蒋介石也在作迎战的准备。首先，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接着，他又操纵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在军事上，蒋介石也妥为布置。他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战场上拒守黄河两岸，阻止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分防徐州、砀山一带，并沿陇海路两侧西进，长驱归德(今商丘)；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在南各地，牵制西北军主力；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蒋介石带领庞大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坐镇徐州指挥。

从五月十一日起，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蒋、冯、阎、李新军阀的大混战爆发。因双方的主力都部署在豫东、皖北和鲁西的三角地带，陇海路位于中央，津浦、平汉两路是它的两翼，主要战场在中原地区，所以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后，因蒋军来势凶猛，又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向徐州进攻的冯、阎军队节节后退，蒋军占领归德等地。在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冯玉祥把预备队孙良诚部投入战斗，同时又令吉鸿昌部协同孙良诚进攻。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一经投入战斗，就使蒋军主力陈诚部无法抵敌。陈诚率部突围而出，孙、吉两部紧紧追赶。与此同时，反蒋联军各部亦有进展。激战十多日，蒋军全线为之动摇，直到六月上旬蒋介石增调的援兵到达，才稳住阵脚。

正当两军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出现在永城、夏邑一带，给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五月底，郑部骑兵奇袭归德飞机场，击毁飞机十二架。这时蒋介石正在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因郑部没有掌握这一情报，才使他免当俘虏。

五月十六日，蒋军的第三军团在平汉路上发动了总攻击，向许昌进逼。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介石的空军炸死。冯玉祥到许昌督战，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并令孙连仲部驰援许昌。这时桂军和张发奎部已进入湖南，先后占领了长沙和岳阳。平汉路上的蒋军腹背受敌。冯玉祥部全线发动进攻，蒋军纷纷溃退，最后两军相持于漯河一带。冯玉祥不主张继续追击，和桂军会师武汉，而是把主力调到河南东部，这就使桂军等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六月十日，桂军"后方交通重心的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桂军"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不得不全线撤军，回救衡阳。"衡阳久攻不下"，"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

沿津浦路南进的晋军为张荫梧的第二路军和傅作义

的第四路军，张任两路联军总指挥，傅任副总指挥兼济南行营主任。五月下旬，晋军南下，迅速进入山东境内。韩复榘未作有力抵抗。即退到黄河南岸防守。晋军出奇不意地从侧翼渡过黄河，于六月二十五日占领济南。

为了扭转在北方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蒋介石策划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多人，由杞县、太康间攻入，准备奇袭开封。冯玉祥侦知这一部署后，将计就计，命孙良城、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蒋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挺进。冯玉祥令孙、庞、吉部从正面阻击，又调动部队在右翼兜抄和后方扰乱，左翼则由晋军负责防堵。蒋军进入口袋后，很快被截成数段，损失惨重。

七月上旬，蒋介石又抽调部队向兖州增援。在蒋军的猛烈冲击下，傅作义部全线崩溃，向北败退。在胶济路上，张萌梧部也被韩复榘打败。晋军军心大乱，望风而逃，于八月中旬放弃济南。

阎锡山特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粮秣到郑州，请冯玉祥在陇海路上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支援晋军。八月上旬，冯玉祥在陇海路上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向徐州进逼。在西北军发动猛烈进攻时，蒋介石严令各战略要点固守；凡是固守要点不失的，提升三级职务，赏金五万元。时值大雨滂沱，遍地泽国，西北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蒋介石在津浦路上打败晋军后，从津浦路抽调兵力增援陇海路，迫使冯玉祥不得不停止进攻。

晋军丢失济南和冯军陇海路“八月攻势”的受阻，是中原大战的转折点。此时，张学良经过几个月的观望之后，于九月十八日发表出兵华北通电，并发表谈话说，希望“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以促成国家的“统一”。张学良貌似公允，而实际上他已经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东北军大举入关，先后占领天津、北平，整个战局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阎锡山看到大势已去，下令把晋军全部撤回山西。冯玉祥要求阎坚持到底，在郑州一带与蒋军决一死战，但遭到阎的拒绝。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西北军很快瓦解，有的被蒋介石收编，有的被张学良收编。十月六日，蒋军占领郑州。十一月四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即日释权归田”。蒋介石不准他们留在国内，要他们“出洋”。南京国民政府则对他们发出了通辑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逃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大连，冯玉祥隐居到山西的乡下。晋军虽然也被张学良改编，但后来阎锡山东山再起时，不仅重整了晋军，而且仍然据有山西的地盘。冯玉祥则地盘尽失，惨淡经营二十多年的西北军全部瓦解，从此一蹶不振。

材料：

- 八月攻势
- 晋军溃退
- 战斗序列

材料一　八月攻势

阎锡山在津浦线指挥晋军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占济南。七月上旬，蒋介石即由各方面抽调大部兵力，陆续开到津浦线，一部由海运在青岛登陆开往胶济线，于七月中旬开始反攻。津浦线晋军首先受挫，节节后退。阎锡山为了挽救颓势，特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指挥陇海线各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当时冯的幕僚私下里议论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那里会有今天的情况。”冯对阎这种作风虽然也很不满意，但他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的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是在八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的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在陇海路以南，以冯军为主分为左、中、右三路，左翼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出睢县，向宁陵以北地区进攻；中路孙连仲部由太康进攻归德；右翼孙殿英部由柘城进攻马牧集。并令铁路正面的晋军、铁路以北的刘春荣部及鲁西的石友三部同时出击；郑大章部的骑兵深入敌后，展开活动；以宋哲元部为总预备队。八月六日，全线开始总攻。中路孙连仲部首先将防守河堤岭之蒋军击溃，进至勒马集；孙殿英部亦逼近马牧集，迫使蒋军左翼不得不变更阵地，向后转移。惟宁陵一带因靠近陇海路线，蒋军有重兵防守，加以连日大雨，宁陵以北，河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以致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较慢。冯玉祥随即将宋哲元的预备队加入左翼(冯治安军是宋哲元的基本部队，因受冯直接指挥，控制在郑州附近及其以南地区，故未参加此次战役)，协同孙、吉两部冒雨进攻，在泥水中展开猛烈的战斗。终以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遂胶着于宁陵以北、归德以西、以迄野鸡岗、内黄之线。蒋军阵地被迫由原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一个直角。

在冯军全线猛烈攻击的时候，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乃分电各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郭阳、蒙城、永城、夏邑和亳州各城，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三级，赏洋五万元，借以激励士气。蒋介石并在柳河召集会议，他看到柳河、归德岌岌可危，准备由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地区退却，缩短战线。参谋长杨杰和军政部陆军署长曹浩森(曾任冯的参谋长)均在会上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退却极为不利，应再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曹浩森夙知冯玉祥作战向主稳扎稳打，非有十分把握，决不敢冒险深入。他们研究结果，都主张将控制在柳河附近的仅有的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看情况的发展变化，一面调留守南京的教导

师火速开来，解除左右后方的威胁，然后再作新的部署。当时参加会议的陈调元向蒋自告奋勇，建议从右翼反攻，以分陇海线晋军兵力，即可保正面无虞。至此，蒋始中止了执行退却的计划，并悬赏全线各军，固守原阵地。恰逢大雨不止，冯军停止进攻，蒋军颓势才有了扭转。

当冯玉祥布置这一次总攻的时候，曾经对整个战局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战场在陇海线，其次是津浦线，再其次是平汉线。徐州是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极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如将徐州攻下，则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影响所及，平汉线的"杂牌军"必将发生重大变化，那时，最低限度，大江以北将无蒋军立足之地。因此，冯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把所有的兵力都使用在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没有料到：晋军在陇海线正面虽然配备了不小的兵力，又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的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攻取徐州的时机便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断送。当冯玉祥谈到这些情况时，真痛心到了极点，不由得说出这样一句话："阎百川（阎锡山的别号）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在这以前，冯的幕僚认为阎锡山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无论在军事的配合上，械弹、粮饷的供应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阎对西北军的进展是在有意识地"扯后腿"。冯对这些话原不同意，可是从这次战役中得到的教训，使得他也有了这样的感觉，不像过去一样，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而是说："阎百川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了。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材料二　晋军溃退

津浦路的战事变化很快，攻下济南后，张荫梧率李服膺、王靖国、秦绍观三军指向胶东，追击韩复榘，傅作义则率冯鹏翥、李生达及傅兼领的一个军南下，攻曲阜、兖州。这一路遭蒋军反攻，先行败退，蒋由广东调去蒋光鼐、蔡廷锴等部增援津浦线，又调李韫珩部由海道运到胶东登陆，直趋济南。在济南附近的封玉堂、张会诏两军不支，济南又为蒋所夺去，胶东的部队也先后退回黄河北岸。当津浦路紧急时，阎迭电陇海路第三方面各军要发起进攻，声援津浦，我们又在内黄一带，实行猛攻。我师攻破了蒋军的一个缺口，稍有进展，上级知道了这件事，调了两旅来人，想再来一次夜袭，但是敌已有备，徒遭了一次伤亡。接着蒋又调来蒋鼎文师及俞济时旅，在陇海正面来了一个反攻，蒋介石并亲自到了进攻的部队作了鼓励。这一战役持续了四天，在我师正面的俞济时旅一开始是先攻我师的警戒阵地。这个阵地工事筑了很久，又因为本阵地前面村落很密，敌人很容易接近，过早地撤退，会给本阵地带来损失，所以我派了一营人，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抵抗任务，使俞济时攻这个阵地多用了时间。天将破晓，警戒阵地完成任务才撤退回来，但是没走预定的道路，这样，阵地上开始射击就很迟，进攻部队见阵地上队伍不开枪，误认已攻破我师阵地，一直扑来，直到外壕边沿。阵地都是高胸墙有外壕，所以攻击部队伤亡很重，有一个重伤的营长也丢到外壕里，共遗尸百余具。这一仗是有决定性的，如果阵地被攻下来，全线都要动摇。俞济时又继续增加部队连续攻了三天，没有攻动。我师工事坚固，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次激烈战斗之后，双方都很疲惫，又因津浦路败讯已传到各军，陇海路上的部队便开始逐步地撤退。石友三在考城附近控制有渡河器材，先渡过河北，刘春荣也有部分跟过去。第二方面军虽然在平汉路还有一定的力量，也不能再投入这一方面。因此，我师决心缩短战线向黄河以北退却。

战场上的撤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在津浦线失败以后，蒋军又可以抽出兵力向陇海线压迫，屡次转进，最易引起溃乱，因此事前曾作了细致的计划。从内黄附近起，每日退却的行程并不大，黄昏开始，夜半到达新阵地，预先有人来分配好地区，天明以前做成能射击的散兵壕，天明后左右扩充，完成简单易阵地。退过兰封以后，只剩下山西出来的几个军紧紧地靠在一起，伤病员有铁路输送，部队都是徒步行军，且战且退，在开封也没有停留。到了中牟县附近，已经是九月下旬了。我右翼的马延守师先行撤退，没有正式命令，只是他的一个营长告诉了我。我师担任的正面在这时并不很大，我派了一部接了他的阵地。孙楚为了保存他的部队，已将第一军各师完全撤到后方，杨耀芳军也逐步撤下去，前线只剩下杨效欧、关福安两军。原来打算由杨效欧军抽周思诚师，杨耀芳军抽方克猷师，关福安军抽我这一师，留在黄河南岸担任掩护，将大军收容完毕以后，再行渡河，当时以为任务重大，并且悬了重赏。但是我们退到荥阳县附近的一晚，冯部梁冠英军已投降蒋介石，从后方开了炮，抢了兵站，人心很慌乱，同时听到黄河桥方面枪炮声很急，有人传说石友三在黄河北岸向桥上打炮。我为了弄清情况，赶快派了少校参谋王恩灏前去了解，天明王参谋回报，说是大桥南岸车站附近各军堆集的弹药被骡夫们烤火引着了，所以时紧

时稀断断续续地爆炸，没人负责救火；人马都聚积在车站附近，那一方面的也有；徐永昌尚在黄河南岸等大家去报告情况，控制着一列车，随时可以开车，铁桥上也铺上木板，有铁板的的地方铺上了十公分的土，因为火车不够用，人马都需由桥上走过去。我得到这个情况，比较安下了心，认为渡河还是很有希望的。

渡河后，在詹店车站附近整理部队，尚有六七成人马。在新乡的后方人员大部分归了队，少数辎重行李被石友三劫去。徐永昌留给我的命令内容是，所有第三方面军的部队，分两路回山西：总司令部与第二军、第六军走路工口这一路；第一军、第七军走薄壁口这一路。他命我在通过道清铁路时，停在获嘉以东掩护，各军通过铁路后我再走薄辟口最后跟进，主要是对付石友三，但是地方团队也起来卡枪卡人，均须有足够的戒备。我在沿途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为本师也征集了一两天的给养，因为荥阳县的兵站被梁冠英抢了，新乡的兵站也被石友三劫去，部队得不到正式补充，不得不向地方直接征集。走了两天多，回到山西陵川县，阎锡山已有电报分配了驻地，让我仍回运城。我们经晋城、阳城、沁水、翼城、侯马、闻喜，十月二十五日回到运城。军长关福安免了职，第七军与第十六军杨澄源部合编为一军，杨澄源任军长，留我仍任师长，并兼任运城警备司令，拨了樊钊的一个团来补充。我把第五十五团郭辅唐团并编到第五十六、五十七两团内，以樊钊部编为第五十五团，卫戍运城附近十三个县，防范通往陕西、河南的黄河上的各渡口。

阎锡山在山东军事快要失利的时候，于九月九日在北京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他这个主席是由国民党的扩大会议产生的，领导扩大会议的，名义上是汪精卫，集合了一些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学良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电后，即派兵入了关，这些人就都逃走了，阎锡山只作了九天的国府主席。虽然也有人想转移到西北继续反蒋，但是那些从上海、香港、广东来的政客们，没有真正的政治主张，更不是什么为民请命，形势一紧，就四散奔逃。阎锡山以奉父命为词，通电下野。我在他回河边村以前赶回太原看了看他，他告诉我好好维持部队等他回来。他表面上说去苏联，并且还派人去绥远探了道路，而实际上却是取道天津去了大连。阎走后，蒋通过张学良改编了山西的部队，留了四个军，军长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由八个师编成；一个护路军由孙楚任军长，实际只有一师和三个独立旅；炮工兵分属各军师。我编在三十三军六十九师里，缩编为第二〇二旅旅长。这一场反蒋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材料三　战斗序列

这次大战的双方战斗序列列下：

甲、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军方面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阎锡山　副总司令冯玉祥　李宗仁　参谋总长刘　骥

前敌总司令鹿钟麟　副总司令徐永昌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前敌总指挥张发奎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吴奇伟

第十二师师长薛　岳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莫树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廖　磊

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梁朝玑

第四十五师师长韦云淞

独立第一师师长韩彩凤

第八军军长周　斓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鹿钟麟　参谋长秦德纯

第一路军总指挥张维玺　副总指挥刘汝明

第七军军长张维玺

第八师师长张维玺

第十六师师长倪玉声

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

第五军军长田金凯

第七师师长田金凯

第二十四师师长阎廷俊

第　师师长吴振声

第十二军军长刘汝明

第　师师长刘汝明

第　师师长李金田

第　师师长王志远

第四军军长阮玄武

第一师师长阮玄武

第二师师长鲍　刚

第三师师长张人杰

第二路军总指挥孙良诚

第一师师长梁冠英

第二师师长王和民

第三师师长谢惠三

第二军军长程心明

第二师师长张印相

第三师师长安树德

第六师师长张自忠

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
第三路军总指挥庞炳勋
第五师师长庞炳勋
第　师师长马法五
第四路军总指挥宋哲元
第十四军军长宋哲元
第二十四师师长田春芳
第二十五师师长赵登禹
第三十八师师长周永胜
第十一军军长冯治安
第九师师长冯治安
第三军军长魏凤楼
第　师师长魏凤楼
第　师师长葛云龙
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第八军军长孙连仲
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
第十三师师长长董振堂
第十五师师长长李松昆
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季振同
后方军总指挥刘郁芬
第二十二军军长刘郁芬
第二十五师师长戴靖宇
第　师师长雷中田
第　师师长蒋雨生
第十九军军长石敬亭
第　师师长陈毓耀
第十七师师长赵席聘
第三十师师长佟麟阁
骑兵集团总指挥郑大章
第一骑兵师师长张行顺
第二骑兵师师长张占魁
第三骑兵师师长关素人
第四骑兵师师长刘凤岐
第五骑兵师师长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徐永昌
第一路军总指挥孙　楚
第一军军长孙楚
第一师师长孟宪吉
第二师师长陶振武
第三师师长马延寿
第七军军长关福安
第二十师师长鲁英麟
第二十一师师长刘添贵
第十九师师长郭宗汾
炮兵司令周　玳
炮一旅旅长辜仁发
炮二旅旅长
炮三旅旅长
炮四旅旅长曾延毅
炮五旅旅长卢　珖
炮六旅旅长周俊杰
第二路军总指挥傅作义
第十军军长傅作义
第二十八师师长苗玉田
第二十九师师长叶启杰
第三十师师长白儒清
第三保安总队司令周士濂
保安七旅旅长王弼
保安八旅旅长刘逢吉
保安九旅旅长马良
第四保安总队司令秦绍观
保安十旅旅长刘濯清
保安十一旅旅长樊赓灿
保安十二旅旅长黄士桐
第三路军总指挥杨效欧
第二军军长杨效欧
第四师师长周思成
第五师师长徐岱毓
第六师师长李乐滨
第六军军长杨耀芳
第十六师师长方克猷
第十七师师长赵廷英
第十八师师长温玉如
骑兵集团军军长赵承绶
骑兵一师师长孙长胜
骑兵二师师长原屏藩
骑兵三师师长彭毓斌
骑兵四师师长郭凤山
第四路军总指挥张荫梧
第三军军长王靖国
第七师师长田树梅
第八师师长杜　堃
第九师师长田绣章
第五军军长李服膺
第十三师师长朱珍
第十四师师长安锡嘏
第十五师师长贾学明
第五路军总指挥冯鹏翥
第八军军长张会诏
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原健
第二十四师师长于振河

第二十五师师长杜春沂

第九军军长冯鹏翥

第二十五师师长楚溪春

第二十六师师长高鸿文

乙、蒋介石军方面

讨逆军总司令蒋中正　参谋长杨杰

第一军团总指挥韩复榘

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冯玉祥部队叛归蒋者)

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　58旅旅长长展书堂　59旅旅长徐桂林　60旅旅长万国桢

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　64旅旅长宁春孝　65旅旅长唐尧逊　手枪旅旅长雷太平

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　84旅旅长李汉章　86旅旅长乔立志　87旅旅长荣光兴

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原系直系回军,投冯又投蒋者)

第六十四师师长马鸿逵　191旅旅长马宝林　192旅旅长李毓英　独1旅旅长马全良　骑兵旅旅长马腾蛟

第二十六军军长范熙绩(原系齐燮元苏军、皖军)

第四十六师师长范熙绩　136旅旅长王普　137旅旅长陈九畴　138旅旅长陈众孚

第五十五师师长阮肇昌　163旅旅长岳盛宣　164旅旅长李松山　165旅旅长张彬

第十七军军长刘珍年(原褚玉璞旧部投蒋者)

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　1旅旅长刘珍年　2旅旅长梁立柱　3旅旅长张銮基　骑兵团团长张秉权　炮兵团团长苏仰贤

第二军团总指挥刘　峙

第一军军长顾祝同(蒋军嫡系北伐期间一、九、三十一三师编成)

第一师师长刘　峙　1旅旅长胡宗南　2旅旅长黄杰　3旅旅长彭进之

第二师师长顾祝同　4旅旅长楼景越　5旅旅长　6旅旅长郑洞国

第三师师长陈继承　7旅旅长　8旅旅长李玉堂　9旅旅长李仙洲

第三军军长王均(原朱培德滇军和王天培黔军)

第七师师长王均　19旅旅长曾万钟　20旅旅长陈学顺　21旅旅长李文彬

第十师师长杨胜治　28旅旅长陈明仁　29旅旅长李伯华　30旅旅长李正华

第八军军长叶开鑫(蒋利用叶收编唐生智湘军)

第五十二师师长叶开鑫　153旅旅长孙常钧　154旅旅长张忠頫　155旅旅长李永安

新二十一师师长李云杰　旅长李必蕃　李英第十一师师长陈诚　31旅旅长桂永清　32旅旅长罗卓英　33旅旅长周志柔

第四十五师师长卫立煌　133旅旅长李默庵　134旅旅长刘戡　135旅旅长李树森

第五师师长熊式辉　13旅旅长胡祖玉　14旅旅长刘士毅　15旅旅长周浑元

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　教1旅旅长张诚　教2旅旅长杨步飞　教3旅旅长王敬玖

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　教4旅旅长汤恩伯　教5旅旅长关麟征　教6旅旅长张联华

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杨杰

骑兵第二师师长张砺生

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原刘镇华军叛冯投蒋)

第六十五师师长阮勋

第六十六师师长徐鹏云

第六十七师师长武庭麟

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

右翼军司令官王金钰(原系蒋收编的孙传芳和郭松龄部队)

第四十七师师长王金钰　139旅旅长郭华宗　140旅旅长苏桂荣　141旅旅长唐奉珍

第五十四师师长魏益三　160旅旅长贾　161旅长魏　162旅旅长王

中央军司令官杨虎城

第十七师师长杨虎城　49旅旅长冯钦哉　50旅旅长马青苑　51旅旅长孙蔚如　补充1旅曹释文　补2旅　补3旅姚丹峰　补4旅王乃文　补5旅

左翼司令官徐源泉(原系张宗昌投蒋部队)

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　142旅旅长张振汉　143旅旅长徐继武　144旅旅长韩昌峻　警备旅旅长容景芳　新2旅旅长刘培绪　新3旅旅长徐德佐

第二军军长蒋鼎文(除蒋师为嫡系外,赵师为浙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　25旅旅长甘丽初　26旅旅长李延年　27旅旅长苏荫森

第六师师长赵观涛　17旅旅长樊松甫　18旅旅长陈时骥　19旅旅长

总预备军团总指挥陈调元

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陈耀汉

山东警备一旅旅长施中诚

山东警备二旅旅长陈孝思

山东独立一旅旅长宋润田

山东独立二旅旅长梁鸿恩

骑兵第一旅旅长张乔龄

国府警一旅旅长俞济时

国府警二旅旅长蒋伏生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第五十三师师长谭道源

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
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
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
第十五师师长何键
第十六师师长罗潘瀛
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
新三十一师师长陶广
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
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22 旅旅长向超中　24 旅旅长陶峙岳　23 旅旅长
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
新编第二〇师师长许克祥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
第五十九师师长余汉谋
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
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扬敬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
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　34 旅旅长马昆　35 旅旅长唐淮源　36 旅旅长周志群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52 旅旅长朱耀华　53 旅旅长戴岳　54 旅旅长王捷俊
新编十三师师长邓英(原系陕军李纪才部)
第十三军军长夏斗寅(原鄂军石星川旧部)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　37 旅旅长万耀煌　38 旅旅长卢本棠　39 旅旅长葛
教导第三师师长钱大钧
襄樊警备司令范石生
第五十一师师长范石生
第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　130 旅旅长陈永　131 旅旅长辛明利　132 旅旅长王金镛
骑兵第一旅旅长张乔龄
豫西警备司令岳维峻(原胡景翼国民二军旧部)
新编第三师师长李云龙
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
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

(摘自《民国军事史稿》中华书局)

扩大会议

背景介绍

1930 年 7 月 13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和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等,联合反蒋,在北京怀仁堂召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 月 7 日开正式会议。“扩大会议”以“依法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为号召,组织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相对抗。“扩大会议”以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扩大会议工作;以阎锡山等七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以阎为主席。后来由于讨蒋军事逆转,阎冯节节败退,1931 年 9 月 20 日“扩大会议”由北京搬到太原,继续制订约法草案。10 月 27 日发表约法草案,共八章,二百十一条。此后“扩大会议”即烟消云散。

材料:

- 汪精卫与扩大会议
- 扩大会议的始末
- 扩大会议灭共驱蒋宣言

材料一　汪精卫与扩大会议

阎冯合作,兴兵讨蒋,李宗仁在南方响应,形成了原来的二、三、四三个集团军的大联合,一致行动,声势浩大,讨蒋军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蒋方。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为数不多全仗杂牌队伍支撑局面,这些杂牌队伍,到形势稍为对蒋不利的时候,是可以倒向反蒋方面的。至于关外的张学良,已有接洽,目前保持中立态度,如果反蒋军队能打几个胜仗,张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冯总司令以为这次反蒋,不止是军事上的斗争,还必须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因此郭请先生到北平去主持大计,组织政府,号召全国,完成反蒋建国的大业。”汪倾听以后,大为兴奋,他说:“焕章先生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不过我在这里,还需要做些安排;百川先生的代表,日内也到香港,等他来时,我们共同研究进行的办法。”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到港,汪在香港凤辉台一所住宅里大摆筵宴,招待阎、冯的代表,把他所赖以骗人的政治资本都搬出来陈列了一下,顾孟余、曾仲鸣之流以及在港的改组派各省代表都出席了宴会。当时冯对汪只是笼统地表示请他北上领导反蒋,并没有说出请汪到北平后的具体办法,也没有表示支持汪关于国民党党统的主张,因此,汪对北上一节,有些踌躇。汪正在忸怩作态、讨价还价的时候,忽然接到刘茂恩胁裹万选才背叛阎、冯投降蒋介石,蒋军因而占领了归德的消息,这一叛变,打乱了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影响颇大。汪闻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更不作确切的表示,戈定远遂先行北返,向冯复命。

此时,陇海、平汉两线上军事互有进退,冯一心搞军事,对于党务、政治诸问题,悉推阎锡山主持其事。而改组

派与西山会议派间因国民党党统问题，在太原、平津各地互相攻讦，各不相下，几经周折，迁延三个月之久，才商妥合作的办法，于七月十三日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的成立大会。汪精卫随即于七月二十三日由香港乘轮到津转平，旋赴石家庄晤阎。冯正在前方督战，派邓哲熙到石家庄向汪致欢迎之意。汪在八月六日回到北平，邓与汪同行，此后，邓就和黄少谷代表冯玉祥、鹿钟麟二人(冯与鹿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出席扩大会议。

汪既到北平，商承阎意，筹组国民政府，但国府委员和部长名额的分配，各方面意见分歧，争执甚大，无法解决。有一天，邓哲熙接到冯电，说石友三电保萧振瀛为部长，盼向汪提出并促其实现等语。这时，石友三是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担任河南考城一带的军事任务。他在一九二九年间曾叛冯投蒋，这次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好容易才把石友三拉了回来，给以很高的名义(冯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阎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石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遇事总是迁就石一些，因此，石推荐部长，冯命邓力促其成。邓持冯电见汪说："冯总司令希望先生同意石的保荐，其理由很简单，就是此时需要敷衍石友三，否则怕石恼努，难免又生变化。"汪答："我对此没有成见，马上请位负责的人来商量，他们来时，请你把焕章先生的意思说明一下。"言毕，召集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人商谈此事。邓就向他们说明冯来电转达石友三推荐部长的原意，希望大家支持。他们也知道石友三向来反复无常，同意接受石的请求，以示笼络

扩大会议虽已开成，但讨蒋军事进行得并不顺利，特别是津浦线上节节败退，八月十五日济南为蒋军攻占，晋军退守黄河北岸。阎为了挽救颓势，增强号召的力量，决定不等待国府组成而先行就任国民政府主席。阎素极封建，他就职的时间，选定在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零九分，据说，这样适为五个九数，符合帝王"九五"之尊的传统说法。就职仪式在怀仁堂举行，礼毕，阎约邓哲熙到他家谈话。阎对邓说："我马上到津浦线去督战，听说石友三派代表四出活动，颇有问题，你赶快电告焕章大哥予以注意。"匆匆谈了几句话，距离怀仁堂就职典礼还不到两小时，阎就登车出发了。

这时候，打到湖南的桂军，早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无力再出；陇海线上的全面攻势，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津浦线上的晋军，凭河扼守，势甚危急；整个反蒋军事，已成强弩之末，各方人心涣散，将士渐有离心。霹雳一声，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巧电"，并先于十七日进军关内，北平立即紧张起来，于是扩大会议自汪精卫以下仓皇取道平汉路离开北平，有的则避匿天津去了。汪到石家庄晤阎后，与阎同赴郑州和冯会谈。此时，石友三虽已把部队从考城撤至黄河以北，自由行动，但冯部其他将领尚未明白表示异动，冯见汪、阎时，还主张继续再打下去。阎表示："仗是不能再打了，只好退到山西再说。"于是就在郑州联名通电收束军事。至此，扰攘一时的扩大会议，随着反蒋战争的失败而烟消云散了。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16辑)

材料二　扩大会议的始末

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在倒蒋的目的上虽然是一致的，但两派一向势同水火，互相倾轧，这次双方因沪、粤二届的党统问题，意见纷歧，汪清卫在香港授意在北平的陈公博、王法勤力主恢复广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在北平组织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推定常务委员会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产生政治会议和政府。邹鲁、谢持等拥护阎锡山"整个的党"的意见，希望改组派牺牲党统的主张，双方争执甚烈。赵丕廉代表阎往返于平、津、太原之间，奔走调停，屡议屡辍。一九三〇年四月中旬，陈公博、王法勤和邹鲁、谢持等先后由平、津到太原，邹、谢住在傅公祠，陈、王住在山西大饭店。一天，我往山西大饭店访陈、王，适赵丕廉亦在，我劝双方应以大局为重，捐除成见，倒蒋第一。王法勤竟动了火，举起手来要打我，幸为赵丕廉所拦阻。陈公博坐在一旁看报，一声不响。两派在太原协商破裂后，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双方人员在北平报纸上互相攻讦，甚至谩骂。警备司令楚溪春、警察局长王锡符，曾为此事招待各报记者，要各报对党务问题慎重登载，即此可见两派矛盾尖锐之一斑。当时在太原有各方军事代表团的组织，该团见党务纠纷无已，有人提出先立政府，后决党务的建议，其办法是：先在北平成立军政党代表联席委员会筹备处，然后召集会议产生政府。阎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缓组政府，理由是：应该依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黄少谷曾陪同陈公博、王法勤赴潼关征询冯的意见，冯表示一心专问军事，党政一听阎命，望汪早日北来。两派明争暗斗，一直拖延至七月间，各军代表团向阎促请迅即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希望两派把"党统"和"届"定丢开，并说我们并非不尊重党，党自身僵僵，不能怪我们另想别的办法。接着有人劝邹鲁，谢持不要坚持沪二届，以示让步。邹、谢表示如能保证粤二届通电不提党统，我们愿与合作。覃振也发表谈话说："汪精卫既主张开扩大会议，应请汪自己北来主持，否则函电往返，究多周折，汪来，一切可共同商榷。"经赵丕廉邀同双方会商，由陈公博电汪，于七月十三日得汪复电，同意邹、谢意见，但对何时北来，仍无表示。赵丕廉、冀贡泉等以汪既赞同邹、谢意见，应乘机赶快组成扩大会议，以免夜长梦多，遂与两派商定于当日(十三日)下午二时在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大会，出席的有赵丕廉、陈公博、王法勤、谢持、邹鲁、覃振、傅汝霖、白云梯、张知本、郭泰祺、潘

云超、冀贡泉、麦焕章、刘况、黄少谷等十五人，由王法勤主席，赵丕廉宣读开幕宣言。除当日出席者亲自在宣言上签名外，汪兆铭由郭泰祺代签，阎锡山由赵丕廉代签，辟冯玉祥由黄少谷代签，赵戴文由冀贡泉代签，薛笃弼由赵丕廉代签，鹿钟麟由黄少谷代签，商震由冀贡泉代签，茅祖权由谢持代签，陈树人由刘况代签，朱霁青由潘云超代签，柏文蔚由白云梯代签，郭春涛由白云梯代签，陈璧君由郭泰祺代签，陈嘉佑由刘况代签，熊克武由覃振代签，李宗仁由麦焕章代签，顾孟余由陈公博代签，黄绍竑由麦焕章代签，许崇智由谢持代签，邓泽如由白云梯代签。驻太原的军事代表团电请扩大会议赶催汪清卫及列名宣言的人即日北上产生政府，不宜再因循误事。如列名者不及到平，尽可由代表列席。

扩大会议成立后，以陈公博为中心的青年党员群集北平，遍贴标语，宣传民众运动，如醉如狂。汪精卫于七月二十三日乘轮抵塘沽，同行的有顾孟余、李锡九等，贾景德和我分别代表阎、冯到唐沽迎接，赵丕廉、邹鲁、傅汝霖等亦往迎。汪当晚抵北平，发表了一套欺骗民众的话，说什么要集中人才，整理理论，恢复群众运动。八月三日汪赴石家庄晤阎，冯遣邓哲熙到石晤汪。汪于六日返平，主持七日举行的扩大会议，出席者二十二人，通过下列四个议决案：一、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二、扩大会议成立宣言；三、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四、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宣传、组织、海外三部与民众委员会的人选。扩大会议经费支绌，而各方谋求职位者纷至沓来。至九月十九日张学良通电主张息兵，命东北军入关，拥护"中央"，扩大会议在北平就站不住了。阎拨了一万元给扩大会议作资遣费，并派赵戴文于二十日到北平，传达阎意决守山西，邀汪、陈、邹、谢等赴晋。汪等即偕赵同去石家庄。吵闹了许久的扩大会议，从七月十三日草草成立至九月二十日不过六十七天的寿命就垮台了。

（摘自《近代史资料》第 35 辑）

材料三　扩大会议灭共驱蒋宣言

最近蒋中正以图最后挣扎之故，尽调湘鄂赣诸省驻军开赴津浦、陇海、平汉诸线，以致湘、鄂、赣三省防守空虚，共产党徒联合土匪乘间窃发。兹闻长沙省城已经失守，南昌省城亦居危急，花园、孝感相继沦陷，共匪以杀人放火为目的，所至糜烂。三省人民遭此浩劫，实所痛心。数年以来，蒋中正处心积虑，惟知滥用武力，摧锄异已，对于共匪之蹂躏地方，久已熟视无睹，朱毛小丑听其跳梁，不加剿戮；今更放任共匪聚众数万，攻陷东南重要省会，助乱之罪真不容诛。同人此次讨蒋，原望其个人深自觉悟三年以来贻害党国之罪戾，及时引退，以图补救，而保和平，蒋不反省，致起战祸，良非得已。惟各路将领均知互相约束，防乱保民，未尝稍懈。例如第一方面军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数月以前与蒋军相持浔贵之间，战事极烈，而对于龙州共匪分兵往剿，虽因此分薄前敌兵力亦所不辞。诚以共匪为全国人民最大之患，亦全体军人共同之敌，不能不绝其根株，俾勿滋蔓。蒋中正对于同袍何其惨酷，而对于共匪何其宽大！望我全国民众一致奋起，速拯湘鄂赣三省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扑灭共匪，勿使燎原；并速驱除纵共殃民之蒋中正，勿使凭借兵柄重祸党国。谨此宣言，惟其鉴之。汪兆铭、阎锡山、王法勤、谢持、冯玉祥、柏文蔚、邓泽如、陈嘉祐、邹鲁、覃振、赵戴文、李宗仁、黄绍竑、许崇智、朱霁青、潘云超、陈树人、赵丕廉、陈璧君、张知本、茅祖权、熊克武、陈公博、顾孟馀、鹿钟麟、商震、白云梯、薛笃弼、郭春涛、傅汝霖。

（摘自《民国史资料选编》文史出版社）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0 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委员及特别代表 59 人，张学良列席了会议。会议重要决议有：(1)于 1931 年 5 月 5 日召集国民会议；(2)"铲共剿匪"应视为最要急务，限于 3 个月至 6 个月办理完竣，于必要之地区，设总指挥机关；(3)取消编遣会议；(4)永远开除参加扩大会议分子的党籍；(5)推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会议还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确定国民政府主席兼任海、陆、空军司令，国民政府院长、副院长均由国民政府主席任命。

材料：

· 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之训令

· 闭幕词

材料一　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之训令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吾党之使命，在于实现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为求确实能成就此伟大之使命，必须全党同志人人努力充实其聪明才力与人格，以成社会之模范，同时即须以聪明才力与人格，贡献于本党，使吾党得举全体党员聪明才力与人格所集而成之伟大力量，措三民主义于实施。故吾人所负荷之使命，当以牺牲一己造福人民为始终一贯之精神。使此精神失堕或竟消亡，于个人则必陷于落伍，于党则必陷

于失败。若此精神日益振拔，于个人则生命常新，于党则成功锐捷。辛亥革命之成就，前年北伐之完成，与夫最近两年来迭次戡平逆乱之胜利，此皆无数以服务为目的之先烈志士所得之成绩，而一般以夺取为目的之假革命者固无与也。

本会检查各级党部与各地方党员过去之工作，发现其中种种错误，有与吾党所负革命使命及历来一贯精神大相刺谬者，竟至不胜枚举。兴言及此，实可痛心。细察过去一切错误之总因，由于制度之运用不善者，占其小半。而由于党员本身之不健全者，乃占其大半。错误之由于制度之运用不善者，本会已于此次就组织上及工作方针上加以具体之决议，切望今后各级党部严格遵守而为适当之运用。错误之由于党员本身之不健全者，则非吾党同志人人努力、各从其身作严格之省察而互为切实之纠正不可。党员本身所应纠正之最大错误，归纳而举之，厥在三端：

一曰对党之误解。一部分党员，往往因其自身未尝经历吾党过去缔造艰难之苦境，而亦绝不涉想革命建设前途之如何任重道远，以为目前之革命已获成功，而希冀吾党为其个人生活取资之具。以此妄念，遂致欲望日奢，能力日减。党若课之以责任，则气焰甚炽，而工作不力；彼若对党有要求，则稍不如意，反动随之。此种党员，经过此次逆乱荡平之后，当已成为绝对的少数，然其残余之习尚，仍隐然流布于各地。吾党同志，今后不特务宜严防此种恶风之侵袭，尤须力除恃党为生之恶念。盖吾党唯有主义足以给与全党之同志，而全党同志则当人人以其余力给与全党，使精神上与物质上确立党员养党之基础，而不致陷于党养党员之苦境。必须人人具此牺牲之决心。有此深切之认识，然后吾党始能成为不可抗之革命政党。此其一。

二曰对于党部之误解。过去多方面事实之观察，则知党员往往误以所在地之党部与政府为对立之机关，而人民则反往往误以所攀仰之党部与政府为同级之衙门。由此两种奇谬见解辗转发生之弊端，实有非吾人之所忍言，而为吾党同志自身所当深恶痛绝者。须知吾党既拼绝大之牺牲，以取革命之政权，则于吾党主义之实施与政纲、政策之推行，当完全透过党之最高权力机关而付托之于政府，决无敢于党部对于每级政府施以节节之干涉，甚或加以事事吹求。吾人必须以代表各级党部之整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督责代表各级政府之整个国民政府以施行党治，乃足达到政令一贯之目的。若欲以每一级党部督责其同级政府施行党治，则不啻视各级党部为各个离立之政党，而以之督责各级政府施行其各有所见之党治，则亦不啻视各级政府为各个离立之政府，岂不大谬！是故党部决不可自跻于政府相等之机关，而当努力为人民有组织有能力之一种中心团体；不可自趋于与政府对立之地位，而当努力以国民之资格推进社会，协助政府，以求实行吾党主义、政纲、政策。此其二。

三曰对于人民之误解。各地党员往往有失检之言论行动，甚或因袭以民众为工具之恶化气习，而要之皆由于不明吾党为人民忠仆之义，以致原在民间之党员，反与人民相隔离，最亲近地方民众之党部，转与社会相扞隔。殊不知吾党同志最大之努力，在于深入人民与社会各种事业及团体之中，以救人、救国之热忱，立人立已之人格与能力，取得社会之信仰，指导人民各自努力于其己身对社会国家应尽之责任。必如此，始不愧为吾党之党员。吾人若求革命之效用，决不可使党员自异于人民，而当使人民融协于吾党之主义，庶建国之伟业，得因全国人民之共同努力而早企于完成。此其三。

总此三义，不特为吾党同志今后所宜深切体认，而尤当戒慎恐惧，在一已之聪明才力与人格上，作充分之修养，务期能恪遵此三义而力行勿失，凡我同志，其共勉之。此令。

材料二　闭幕词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是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行闭幕礼的日子。此次大会的宣言，刚才已由主席于委员朗读过了，所以兄弟也毋庸多说。现在乘大会行闭幕礼的时间，在宣言以外再补充说几句话。

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召集过四次了。在历次会议中，有很多的决议案，也有很多的宣言，都是要我们去切实实行的。但是我们审察一下，现在四中全会的时候，且看看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下来的案子，究竟有几多已实现了呢？想到这层，我们觉得非常惭愧，非常难过，不只是要受国内同胞的责备，并且连外国人也讥笑我们，说是我们中国人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各种方案方法固然规定得很具体，很确当，而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了几分之几。以后希望同志们，尤其是中央党部各部会的同志和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的同志，大家统要照着决议案和宣言努力做去。须知道这许多决议案和宣言，要能不能实行，就是本党三民主义能不能实现的一个生死关头，我们万不能再因循下去了。此次大会对于政治和建设方面，又决议了许多重要的案子，兄弟很希望大家把此次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悬诸座右，每天或每星期检查一回，自已所应办的决议案和宣言究竟办了的多少，未办的多少，如果没有办，就赶快去办。大家能这样做去，兄弟相信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一定有实现的希望。在从前还可以说有军阀捣乱，我们不能进行一切建设事业，人民可以谅解；而现在军事已结束了，军

阀已消灭了，我们更不能有所借口了。如果大家还是从前那样，还不能一条一条的努力实行，则非但对不起总理，而且也对不起全国的人民啊！总理讲“革命先要革心”。如果我们不能革心，不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不能改正，那完全是欺人自欺的行为，决不是我们革命党员所应有的。此次会议的提案中已指出了我们从前许多的错误，固然这些错误不过仅举几端荦荦大者而言，此外没有举出的和我们没有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希望同志大家要一一改正才好，然后我们才负得起建国的重任。

今天兄弟在闭会的时候没有旁的话讲，就是只贡献这一点意思。希望各位同志今后都能革自己的心，改正以前一切的错误，使会议中所决议的案子和宣言一一见之于实行，这是兄弟所补充的几句话。愿与各位同志互相勉励！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内幕

“富田事变”真相

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终于腾出手来了。10月7日攻占郑州之后，平定中原，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把屠刀砍向湘赣边区了。11月间，国民党召开的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狂妄宣称：要在6个月内“肃清共匪”。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湘鄂赣3省主席会商“讨伐方针”，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何健为副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了杂牌军7个师约10万人，在东起建宁西至吉安一线上，分8个纵队，准备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略，向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正当红一方面军抓紧准备对付蒋介石10万大军第一次“围剿”的时候，祸起萧墙，中央根据地内部发生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这次事件是由肃“AB团”引起的。

“AB团”的全称是ANTI－BOLSHEVIK团，是反布尔什维克，即反共产党的意思。这个组织是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由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王礼锡等人在南昌组织的一个反共组织。那时蒋介石设总司令部于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策划反共。“AB团”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27年4月20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打击，“AB团”即行解体。红军中不存在“AB团”。

1930年初，赣西南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分子的指示，在赣西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府中逐步地开始了肃清“AB团”为主要对象的肃反斗争。同年11月初，又在红一方面军中肃“AB团”。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中央的错误指导，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加之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斗争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1930年11月，龙超清（赣西南特委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汪克宽（赣西南特委干部）在逼供下供出：江西“AB团”总机关设在中共江西行委内部。毛泽东得悉这一情况后，下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领一个连，于12月7日包围驻在富田的江西行委和省苏维埃，将两机关负责人段良弼、李柏芳、金万邦、周冕、马铭、任心时等70余人一齐逮捕，关在二十军军部。在残酷的刑讯下，造成人人自危，段良弼等只好承认李文林是“AB团”的首领。

李文林是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始人，这年30岁，江西吉水县人。他是李立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但不是“AB团”。早在8月底，他就被作为“AB团”的重大嫌疑犯关押起来了。

李韶九逼供之后，又乘“胜”追击，把打“AB团”之风刮到了红二十军，逮捕了该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12日，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放与一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砸开监狱，将被拘捕的段良弼等人放出，逮捕了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中央提款员易尔士。这时红军学校部分武装人员奉命来制止他们，被他们解除了武装。然后，他们把队伍拉到赣江以西的永阳去，另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们还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分裂口号，声明脱离前委的领导。这就是所谓的“富田事变”。

12月中旬的一天夜晚，红三军团来了一位信使，交给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一封送给彭德怀的机密信件，彭德怀在松油灯前展开一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那是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一封亲笔信，内容如

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地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 C 干与地方 C 干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限你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毛泽东

12 月 10 日

除了那封毛泽东密信之外，还附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一句话便触目惊心："党内大难到了!!! 彭德怀叛变投敌!!!"一大串罪状。

彭德怀反复琢磨这封信，字体像毛泽东的笔迹，因为毛字另成一体，往来书信常见。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杀我彭德怀和黄公略、滕代远，甚至还要杀朱总司令，这可能吗？不可能！这是彭德怀看信以后的初步结论。

彭德怀冷静地思考着，思考着，蓦然，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发现了一个疑点，毛泽东平常写信，日期一律写汉字，这封信月日是阿拉伯数码。哦！想起来了，红二十军的业允中会摹仿毛体字，听人说他仿摹的已达到乱真的地步。富田事件叛乱分子贴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就是他写的。这封信的目的不就是拉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反对老毛吗？这是个大阴谋，分裂红军、分裂中共的大阴谋。

彭德怀对周高潮说："马上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

不一会，3 人来了，彭德怀把信给他们看以后，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

彭德怀说："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要立即写一个不到 200 字的宣言。这个宣言的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12 月 17 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在黄陂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18 日，又发表了《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曾炳春是第二十军政治委员，卷入了"富田事变"。公开信指出了"富田事变"的严重性及其在客观上造成的恶果，呼吁苏区工农群众、红二十军广大官兵及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

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对"富田事变"采取了正确的态度，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的领导，增强了红一方面军的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对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选自《天下第一军》，作者：魏在田）

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
——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上海。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实行疯狂的屠杀政策，全国充满了白色恐怖。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了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通讯等科。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了情报科长。1927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在第 25 号通告中指出：经过我党支部决议，可派遣一、二位忠实同志，到国民党党部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中央特科成立后，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决策下，选送了最机智、勇敢、忠诚、可靠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同志，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核心要害部门。他们在敌营数年，创造出许许多多惊人的业绩，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深入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三杰"。

1

钱壮飞，原名壮秋，亦名钱潮，浙江吴兴人，1896 年出生。1919 年与妻子张振华（安徽桐城人），同时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于 1925 年经张进中介绍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壮飞在京绥路附属医院工作，张振华则在北京天坛传染病医院服务，两人均利用医生身份做秘密工作。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钱壮飞夫妇无法再在北京安居，于 1928 年转往上海，住上海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路新兴路兴顺里四号。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钱壮飞则考取徐恩曾所办无线电训练班后，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

李克农，又名李稼轩，安徽巢县人，1899 年 9 月 15 日生，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11 月李克农任中共沪中区宣传委员。在上海巧遇同乡胡底，经胡介绍认识了钱壮飞，由钱推荐，李克农于 1929 年 12 月考入无线电管理局，以后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凡是党组织所列名单，一律加以录取。

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人，与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同乡。曾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在"安徽会馆"结识了钱壮飞夫妇。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长住在钱壮飞家中，胡底年轻，而有才华。1926 年，胡由张进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移上海，在某电影公司工作。因他和钱壮飞相熟，他也打入敌人的特务组织。

徐恩曾继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发现小同乡钱壮飞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对其倍加赏识，视为左右手。1929年，徐恩曾转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他把钱壮飞也带到了杭州。钱壮飞帮他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更显示了其卓越才华和组织能力。为徐争了光，深得徐恩曾的信赖。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后，要钱壮飞扩大调查科组织，以配合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派员潜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嘱钱协助进行。钱壮飞即将徐恩曾的意图向党中央报告，请示如何工作。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意钱壮飞继续留任“效忠”徐恩曾；李克农进入无线电管理局任编辑；胡底打入调查科；将三人编为一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受中共特二科科长陈赓单线领导。

2

徐恩曾上台后，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负责人事及各地基层组织的建立。钱壮飞趁此机会安置若干共产党员进入调查科。徐恩曾新设了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为保安全，移至南京中央路305号新址。徐恩曾视钱壮飞为最亲密的战友，所收的一般的机密文件、电报、各地发来的情报，及科内日常事务都由钱壮飞代为处理。凡须由徐恩曾亲自处理的机密文电，必须先由钱壮飞过目；凡应由徐恩曾亲批的文电和各种情报资料，须由钱壮飞事先审阅签出处理意见后，再送呈徐恩曾签批。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的手中。

虽徐恩曾把钱壮飞当做心腹，非常重用，但他和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密码本却始终不肯放手，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命令，由他亲自保管和使用。徐恩曾常到上海夜游，钱壮飞为了获得这个密码本，苦心规劝：外出不宜带密码本，如有遗失影响严重……。徐恩曾听从规劝，外出时，则将密码本锁藏在办公室机要保险柜内。钱壮飞利用机会打开保险柜，偷摄全部密码本。从此，国民党的许多高级机密文件不断地被译出密送李克农转报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江西“剿共”会议，26日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南昌行营主任，负责“剿共”军事，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这第一次“围剿”情报，钱壮飞译好后，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派地下交通员连夜赶赴上海送李克农转送周恩来。国民党军队尚未采取军事行动，而江西的工农红军已做好了准备。1931年4月1日的第二次“围剿”情报，钱壮飞用同样方法处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徐恩曾为扩大情报来源，嘱钱壮飞除尽量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外，兼及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情报。钱壮飞和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名为调查科实为我地下党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一些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情报机关。设在南京的有“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钱壮飞负责两社的工作。不久，钱壮飞将胡底和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妻弟张家胧，派往天津日本租界建立“长城通讯社”，胡底任社长，张家胧任记者。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定期在南京中央饭店、“长江通讯社”交换情报，所获情报，均由李克农通过陈赓转报周恩来。

1930年4月，徐恩曾让钱壮飞率员前往沈阳调查东北军事。钱壮飞与陈赓、胡底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则由陈赓领导，带着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前往东北。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协助下，巡视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并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属国民党，实际上可向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双重秘密组织。

3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奉令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从上海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返回武汉后，违反秘密工作纪律，住进汉口大智门大智旅馆，并以“化广奇”艺名，在汉口新市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赚钱，被叛徒王竹樵认出，顾顺章与陈莲生同时被捕。王竹樵当时为调查科两湖调查员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少将处长蔡孟坚手下的工作人员。

顾顺章被捕后押在行营侦缉处，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随即对他进行审讯。他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赶快送他到南京去，要面见蒋介石，以便一网打尽共产党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第二，要保密，不要打电报给南京；第三，保护他的安全。何成浚邀功心切，当天就连发六个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请徐恩曾转报陈立夫和蒋介石。这一天恰逢星期六，除恩曾早去上海度周末去了。电报落到了钱壮飞手中。他见这些绝密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字样，知道在武汉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他忙将电报译出，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钱壮飞见报后大吃一惊，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又名刘正风，湖南人，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一直充当与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将这一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报告给中共中央。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立刻转告在“民智通讯社”工作的所有地下党人迅速撤离，另急电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等人迅速撤离隐蔽。第三天（星期一）早晨钱壮飞象往常一样，亲自驾车前往下关火车站接徐恩曾自上海返回南京。到办公室后，钱壮飞告知武汉有急电，徐恩曾要钱壮飞用徐专用密码本将武汉译电当面译出，钱壮飞译

一封呈一封。译完后，钱壮飞对徐恩曾说："来电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徐恩曾不信，认为有人栽赃。钱壮飞也不再多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家休息，然后转往火车站搭乘去上海的火车离开南京。待徐恩曾醒悟，派人在上海车站堵截时，钱壮飞早已在上海郊区真如火车站下车，绕道进入市区。

周恩来收到这一特急情报后，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指挥中央特科全体人员同叛徒和特务们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当天夜里，党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各种机关，全部搬了家。从而，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4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撤回上海后，陈赓亲自为他们安排住所，严加保护。1931年8月左右，他们先后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钱壮飞被任命为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任该局执行部长，胡底任侦察部长。1933年，钱壮飞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不久，胡底调往鄂豫皖苏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均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在贵州息烽地区，因病掉队，化名夏树云自称是营部秘书，被当地反动区长宋子桢和罗少安等人害死。胡底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李克农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深入敌巢，屡建奇功，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几十年后，特务头子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哀叹说：中共"对于渗透工作亦极注意，所派人员，常能运用机缘，占据要害或掌握机要，随时向（中共）特工总部通报消息。"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深切地怀念着钱壮飞等同志，他多次深情地表示：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等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李克农逝世时，周恩来又专门指示：过去没有机会为钱壮飞、胡底同志举行追悼仪式和给予应有的评价。在这次李克农的悼词中应加以说明。所以在李克农的悼词中，特意加写进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党和人民对"三杰"一生的英雄业绩，所作的高度评价。

（选自《党史纵横》94年6期，作者：杨新跃）

赣西南红二十军始末

赣西南之红二十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永新、吉水、泰和地区的地方赤卫队（特务队）合编而成的一支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以后，赣西南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举行武装起义，先后建立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组建了具有较强战斗力的红二、红三、红四团等地方武装力量。1930年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遂川。1月18日至21日，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雩田圩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集中江西红二、红三、红四、红五团，合编为红军第6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后改由陈毅担任），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纵队，以红二、红三团编为第1纵队，柯武东任纵队长，李韶九任政治委员；以红四、红五团编为第2纵队，罗炳辉任纵队长，王如痴任政治委员；以永、宁、莲等赤卫队及西区游击队为第3纵队，徐彦刚任纵队长，刘作述任政治委员。

1930年2月，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特委，在吉安的陂头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强调扩大红军与建立地方武装，是目前争政权、分土地，反帝反军阀的主要任务。在此精神指导下，赣西南地区又先后涌现了不少称为赤卫队、游击队、红军纵队等地方革命武装。3月15日，在吉安县的富田成立以刘士奇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并决定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交通部下，分别组建赣西、赣南赤卫军总指挥部。4月下旬又决定扩大赤卫军纵队，成立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曾炳春任总指挥，下设中路、西路、东路、南路、北路指挥部。

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把武装统一起来，组建和扩大红军是当时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夺取武装斗争胜利的急切需要；积极进攻、夺取吉安是当时赣西革命斗争的总目标。当时，主要由地方武装参加的七次攻吉战斗，虽然队伍斗争情绪很高，打仗很勇敢，但都没能攻克。在此形势下，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将地方武装整编为正规红军的指示，于6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赣西南地方武装扩充编为红二十军。7月上旬，在吉安县陂头，正式把赣西地方武装红四、红十一、红三十、红二十纵队改编为红一、红二、红三、红四纵队（后改称团），组建成红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参谋长。全军约2500人。下辖第172团，由吉安、兴国、赣县、宁都、于都的游击队和

万太、遂川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第173团,由永丰、吉水、安福、峡江等地游击队组成;第174团,由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及安福部分游击队和湖南茶陵、攸县等少数游击队组成。红二十军过赣河以西苏区后,又新扩编组建第175团。

1930年8月5日,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横江渡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撤销刘士奇的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军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刘铁超任红二十军军长,曾炳春任政治委员。

由于吉安所处地位重要,是当时斗争的主要目标。前七次攻打吉安虽然失利,但积累了许多经验,加上当时群众攻吉斗争情绪高昂,因此赣西南特委决定继续攻打吉安,并组成前委,成立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和总指挥部,统一军事指挥;由红二十军和红校、青年干校担任主力,动员10万"精勇工农"配合作战。

8月24日夜,前委和红二十军从横江向吉安进发,于25日在吉安西郊高沙击溃敌军一个营,缴枪百余支。26日,正当部队在开往神岗山展开围攻吉安时,获息高沙方向枪声再起,敌军从背后袭击过来。于是红二十军折向高沙与敌一个团展开激战,缴获敌军步枪300余支,机关枪1挺,俘敌100余人。

9月5日,红二十军在地方武装和数万群众配合下,发动第八次攻吉战斗。红二十军和北路群众攻击真君山。他们以土坦克(棉絮裹装的独轮车)掩护部队冲到铁丝网下,与敌展开肉搏,虽然夺得不少武器,但也伤亡200多人,总指挥李学深英勇献身。由于敌军兵力强大,工事坚固,吉安一时难以攻克,于是特委决定红二十军撤往峡江休整。

红二十军撤出战斗后,转战曲汰、安福、分宜和袁州,并在分宜、袁州一带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的滋扰,发动群众打土豪,参加革命。

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总结攻打长沙的教训,决定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发布了《进攻吉安的命令》。据此,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于26日发布紧急通告,要求各级政府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攻吉,作好九打吉安的组织工作。红二十军赶往峡江集中,担任打下吉水、断绝吉安交通和粮食出路的任务,使吉安陷于绝对孤立的地位。

30日,红二十军汇合红一军团左路军从袁州出发,经分宜、安福、吉水,于10月3日同其它部队一起抵达吉安城郊。次日,总部在城北发布攻吉命令,红二十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之敌佯攻;红四军从左翼、红三军与红十二军从右翼向城区攻击。

4日晨,红军与10余万赤卫队和少先队员,奋勇向吉安城发动总攻。红二十军奋战一天,攻下真君山。5日晨,战斗取得胜利,红军大部队和群众武装,进驻吉安城。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红一方面军在吉安进行整编,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所属各军纵队、支队分别改为师团建制。红二十军归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参谋长钟效蔚。下辖第172团(一团),团长萧大鹏,政治委员刘黎;第173团(二团),团长刘承禄,政治委员陈松宜;第174团(三团),团长李学俊,政治委员刘敌;第175团(四团),1931年元月组建,团长朱子云,政治委员刘秋子(后廖子清)。

1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指示,决定将红二十军暂留驻吉安,其它各军即行北上。红军主力北上后,红二十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加紧扩军筹款、补充给养,以武装保卫刚刚诞生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刚刚结束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见红军主力北上,便以其精锐部队围攻在江西的红军。为避开敌人锋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改变北上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南移。11月5日,毛泽东率部由峡江返抵吉安,部署全军撤退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18日,留守吉安之红军及机关工作人员、赤色群众主动从吉安城撤出。红二十军军部率第172、第174团行动,攻下吉水县城,打垮吉水乌江一带的反动武装"红枪会",攻克永丰。后即转师到达吉安东固地区,军部及直属队驻东固,第172团驻值夏,第174团驻藤田,第173团驻吉安县北路。其主要任务是在东固地区发展红色区域,牵制和迷惑敌人,以掩护红军主力移至宁都北部地区。

1930年春,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分子等指示,在赣西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中逐步开始以肃清"AB团"为主要对象的肃反斗争。到下半年,在中央苏区的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一方面军中普遍开展了这场斗争。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从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中得知驻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以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为首要分子。于是前委派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率一个连来到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工作,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秘书长马铭等人,并进行刑讯。

12月11日,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通知该军第174团政治委员刘敌从前线回军部,告诉有人供他是"AB团"分子,刘敌否认,并表示愿意追随李韶九。李韶九即把刘敌作为骨干派回红二十军,肃清"AB团"分子。刘敌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返回部队后,于12日清晨率一个营来到富田,包围了军部和江西

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逮捕了李韶九(后逃脱)和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近百人，收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枪械。当夜，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错误口号(3天后，他们检讨了公开宣传这一口号的错误)。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12月14日，"富田事变"领导人把红二十军拉到赣江以西的永阳地区，脱离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段良弼、李白芳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自行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把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抵制、纠正和对他们的批评说成是"一贯反对中央"和"取消革命斗争的右倾路线"，并伪造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破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1931年1月，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参加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但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根据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在此情形下，红二十军官兵并没有动摇革命意志，仍然坚持革命斗争。他们与兄弟部队联合作战，先后在永阳镇、横江渡、安福蒙岗岭、廖塘桥等地打了几次大仗，取得重大胜利。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二十军继续在赣西和湘赣边等地，打土豪，筹款子，发展革命武装，保卫地方革命政权，袭扰敌人，拖住敌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共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二十军的主要领导人在斗争中也努力改进自己的错误，增强革命纪律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斗争中，红二十军逐渐发展成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之一，为建设湘赣苏区、推动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根据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决议，重新按"反革命叛变"事件审理"富田事变"案，以开会名义将曾炳春(当时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红二十军主要领导人召回河东，旋即被扣。7月，红二十军奉命全部调回中央苏区，由红七军护送，从永新出发，经遂川县草林、太平，南康县唐江，兴国县永丰镇，直达于都县平头寨。在那里，对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等事变领导人进行公审，处决了刘敌，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被关押了近一年之后，虽受酷刑，仍拒不承认是"AB团"1932年5月30日，以"AB团要犯"罪被杀害于吉水县的水南。使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

红二十军的干部被处置后，部队奉命解散，番号被取消。原红二十军的战士分别被编入红七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还有一部分被编入湘赣独立师。

(选自《军史资料》作者：郭继国、王善志)

红色娘子军战斗历程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怨仇深，
古有花木兰，
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
扛枪为人民！
……

一唱起这支雄壮的歌曲，就会使人回到《红色娘子军》电影的银幕前，想起那些飒爽英姿的红军女战士，想起那悲壮的战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描写了一支战斗在祖国南疆海南岛的红军女子军连——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女子军特务连。

那是一九五三年，在北京马列学院，周恩来总理听了琼崖纵队干部汇报"红色娘子军"的英勇事迹时说："它是世界革命的典范，要拍电影。"后来，《红色娘子军》终于拍成电影和搬上了舞台，名扬中外。

一、琼崖妇女的觉醒

在万恶的旧社会，由于生活所逼，琼崖不少男人只得抛妻弃儿，漂洋过海奔向南洋谋生。因此，琼崖的妇女除了同全国广大妇女一样，备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枷锁的束缚以外，许多妇女还受尽家庭的虐待和丈夫遗弃的折磨，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不仅使她们在现实生活压迫下产生了反抗精神，而且锻炼出她们吃苦耐劳的坚韧毅力。"五四"运动以后，琼崖妇女受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启蒙。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琼崖的妇女运动也随之蓬勃地开展起来。妇女解放协会成立以后，广大妇女强烈要求解放，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她们剪掉辫子，解开裹足布，上夜校，取名字，参加各种政治性协会，投入反土豪劣绅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尽管琼崖妇女骨干如妇协会负责人陈玉婵等被杀害，但广大妇女并没有屈服，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广大青年妇女的迫切要求，琼崖特委考虑到当时红军只有三个团，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够调出外线作战，同意在乐万地区组织女子军，让她们担负起保卫机关，看守监狱，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任务。

当成立女子军连的通知下达到各乡时，广大妇女热烈响应，踊跃报名参军。但此举随即遭到反动的封建势力疯狂反动，反动家伙王开甲等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竭力污蔑攻击女子军。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扫除妇女参军的思想障碍，在女子军连成立前夕，乐万县苏维埃政府和琼崖第二独立师红一团在苏区红军操场，召开诉苦大会，批斗了封建头子王开甲，从而大大鼓舞了青年妇女的革命热情，增强了信心，报名参加女子军的青年妇女达七百余人。红一团领导根据各区、乡苏维埃政权对申请人的鉴定意见，逐个审查，最后选出了九十名优秀青年妇女组成女子军特务连，这个连后来发展到一百二十人。

二、第一支女子军

一九三〇年五月的一天上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女子军——琼崖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以下简称女子军）成立大会在乐会县第四区文市内园村隆重举行。乐万地区各乡的代表、当地的劳动童子团、少先队、先锋模范队、赤卫队和群众一万多人及红军一团的全体指战员参加了大会。大会由乐万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符良清主持，红一团团长王天骏向女子军连连长庞琼花授旗，旗上绣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写着“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一团女子军特务连”。女战士穿着整齐服装，佩戴写着“女子军”三个大字红袖章，个个紧握手中枪，英姿飒爽地站在军旗前庄严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女子军隶属于红一团领导，连队建立了党支部。王时香任指导员（由特委指派），庞琼花任连长，何万鸾任副连长，符业兰、王振花当传令，嫚清当号兵，王开媛当看护员，林党熊当庶务长，谢式梅当炊事班长。全连分三个排九个班，一排排长冯增敏（庞琼花调往母瑞山后，冯接任连长，李昌香当一排长），冯增忠当旗兵；第二排排长覃学莲（后调师部，由王增梅当代排长），覃国花当旗兵；第三排排长黄墩英（后调往师部学习，由曹家英代理排长），黄盛轩当旗兵。

女子军成立后，马上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她们立下“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宁愿头落地，不受敌人欺”的誓言，苦练杀敌本领。她们整天摸、爬、滚、打，中午不休息，晚上练夜战，只是在晚饭后才有一点时间休息，进行一些文体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女子军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和群众的赞扬。原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同志在回忆“红色娘子军连”的事迹时，十分赞赏地说：“娘子军活动在苏区和群众结合得很好，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农民干活，很受群众拥护。作战很勇敢，有一次女子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打败敌军，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数量，女子军还占第一位。”

三、誉为“红色娘子军”

女子军主要活动在琼东、乐会和万宁县红白区交界一带。那里是我们特委和苏区机关所在地，敌人经常前来围攻扰乱，所以女子军经常和敌人发生战斗。有一次，根据情报，有一个反动乡团长从加积镇回家来。女子军决定将他处决。于是她们派人化装成赶集和探亲的农民，身藏驳壳枪，到反动乡团长住宅附近先行侦察。一俟天黑，她们就跳越围墙，跃入反动乡团长家的大院，“砰”的一枪，把守门的团丁打死。当时，这个反动家伙正在和小老婆喝酒，听到枪声想取出手枪抵抗，但三位女战士已将枪口对准他的胸膛，当场结束了他的狗命。

女子军不仅经常派出小股部队惩治“南霸天”一类坏蛋，而且还整连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其中最有名的是沙帽岭伏击战。一九三一年六月，乐万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带领数百名敌兵驻扎乐会县中原圩，伺机进犯我革命根据地。但敌人闻我乐万县苏维埃机关驻地有红军一团主力，不敢妄动。为了歼灭这股敌人，六月二十六日白天，我红一团虚张声势，把主力部队调离根据地，开往万宁县龙滚一带。当天夜间又悄悄地返回，埋伏在沙帽岭各个山头。敌人以为该地只剩女子军防守，偷袭时机已到，于是在六月二十七日早上集中兵马向我乐万县苏维埃驻地进犯。陈贵苑亲自率领两百多名敌兵来到沙帽岭，我军只打了些稀疏的枪弹，当他发现我方是女子军时，便得意洋洋，顾不得同另一路进犯的反动民团联络，狂叫着：“谁抓到婆娘兵，就赏给谁做老婆！”敌兵蜂拥地冲上来。女子军机智勇敢、沉着应战。打了一会，女子军按计划佯装“退却”，把敌人诱进主力部队的包围圈。顿时枪声大作，飞弹直泻，敌人措手莫及，呼爹叫娘，乱作一团。此时陈贵苑始知中计，妄图带兵突围，但已是枉费心机。另一路进犯的敌兵则听到枪声紧密，连忙龟缩回据点得免送命。这次战斗，一共毙敌一百余名，俘敌七十多人，缴获机枪三挺，长短枪一百四十六支，子弹一千多发，敌总指挥陈贵苑和中队长陈传美也当了俘虏，而女子军则无一伤亡。此役大获全胜，既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又大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从此女子军的威名也到处传扬，而被誉为“红色娘子军”。

四、摧毁“乌龟壳”竞赛

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在各个战场上给敌人惨重创伤后，敌人便强迫民众为他们建筑碉堡，盘踞着大小圩镇和交通要道，以及一些重要村庄，继续为非作歹。尤其

是乐会一带碉堡里的反动民团更为凶恶，他们经常出扰附近村庄，见鸡抓鸡，见猪抢猪，见牛宰牛，见粮劫粮，见女奸污，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人民群众不堪其苦，对敌恨之入骨。

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一团，为了为民除害，决定摧毁敌人的"乌龟壳"。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组织一次摧毁敌人"乌龟壳"的战斗竞赛，命令一个男子红军连，一个女子军连，一个赤卫队，在乐会地区各自围攻一座敌人碉堡，看谁先能得手。女子军连接到围攻中原圩碉堡的命令后，当晚趁着没有月色的好时机，连夜赶到目的地。她们采用红军二连用"土坦克"摧毁琼东县旧村敌人碉堡的经验，在八仙桌上面铺满泥巴和稻草作为掩护，向碉堡推进。敌人发觉后开枪射击，战士即藏在桌子底下，伤亡很少。当"土坦克"，靠近碉堡时，即把柴草堆在碉堡周围，大声喊话："你们已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宽待俘虏，缴枪不杀！""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敌人起初以为女子军没有多大能耐，仗恃碉堡坚固，拒不投降。女子军爆破队立即拿起铁钎、十字镐和铁锤，在碉堡下面凿开了一个地洞，塞进柴草，撒上辣椒粉，浇上火油，点了一把火。霎时浓烟四起，辣味刺鼻，火光冲天。同时拉响了土炸药包，碉堡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三十多个敌人走投无路，只得乖乖举起白毛巾，全部当了俘虏。此役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三十二支，胜利地结束战斗，比男子红军连早半天攻下了碉堡，得到红一团司令部通令嘉奖。

五、业绩长存

一九三二年七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配合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遂派他的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带领所部和空军第二队一个分队来"围剿"琼崖工农红军。当时为了掩护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撤退，面对优势之敌，特委决定作战略转移，由女子军和红军一营担任掩护，在后面阻击敌人。这次的阻击战一连打了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十月十日，阻击任务完成后，女子军和红军一营立即向母瑞山撤退，只留下女子军连第二班作为掩护。全班八位同志在弹药断绝的情况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部队退到母瑞山后，陈汉光部步步迫进，女子军同敌人激战数天，最后，弹尽粮绝，一些同志英勇牺牲，一些失散，连长、指导员等八人被俘。至此，女子军连宣告解体。

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等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虽然只战斗了二年多时间，但是它在海南武装斗争的史诗中写下了壮丽光辉的篇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女子军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了表彰"红色娘子军"的功绩，毛泽东主席还授予冯增敏同志一支冲锋枪，勉励海南广大妇女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选自《纵横》83年1期，作者：欧英钦）

策划"北洋派大同盟"的土肥原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主要是"以华制华"，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对象，作为侵华的傀儡工具。所以，每在形势动荡时，日本特务就加紧活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一、二年内，日本特务土肥原策划"北洋派大同盟"便是一例。

1930年2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土肥原认为有机可乘，在华北大肆活动，策动原属北洋军阀的一批旧军人，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领袖组织"北洋派大同盟"。打着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幌子，制造华北混乱局面，以混水摸鱼。经过土肥原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阎锡山首先入彀。土肥原又派柳孟庄到绥定访问吴佩孚，请吴联络四川军人出剑阁，共谋反蒋。不料这年9月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冯、阎联合反蒋旋告失败。

1931年3月，南方发生"两广事变"，7月，石友三在顺德通电反蒋。土肥原又乘机提出汪（精卫）吴（佩孚）联合，并得到山东韩复榘的赞同。韩复榘之所以同意拥戴吴佩孚，是因地盘、军饷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尖锐矛盾。对段祺瑞，韩复榘则表示如果段能断绝与安福系的关系，将来组织政府，军政分开，由吴主持军事，段可主持政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反蒋空气浓厚。当时有人曾向土肥原说，吴佩孚虽然反蒋，但他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不会受你的利用。土肥原认为"只要他的行动有利于我们，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这年秋末，以北洋派旧军人为中心的反蒋派在济南举行会议。阎锡山也派了代表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由北方军人联合拥戴段、吴合作反蒋。会议推吴为"北方抗日联军"总司令，阎锡山、韩复榘为副司令。吴随后就在大同就职，并通电拥段在沈阳组织政府。而段在11月会见土肥原后便甘心为日人所利用了。在土肥原的导演下，"北洋派大同盟"算是勉强凑合起来了。

直系与安福系由于矛盾很深，根本无法合作。段的内部又分赃不均，吵得不亦乐乎。而蒋在得知日、段勾结的内幕后，趁段南下上海之际将其"留"沪。又通过汪将阎拉了过来。吴佩孚的乌合之众则在兰州被杨虎城击溃。土肥原策划的"北洋派大同盟"至此寿终正寝。

（谢茂权）

历 史 考 证

红军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第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第三方面军，原有何在呢？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原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四个方面军，后来因为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第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第三方面军缺编。其实，据历史档案资料考证，缺编是另有原因的。

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还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1929年5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了。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的红军编为一至八军。6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按地域组成三个军团。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该计划作了调整，决定组成四个军团，即三、四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第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看，在此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同年8月23日，朱德、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需要，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自发组成了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

中央在得知此情后，仍然没有发出组织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提到："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并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

这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编为红四军。中央在此期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

1931年11月，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

诚然，1931年底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按照该计划，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将基本上被编入第一、二方面军。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行。因为鄂豫皖地区没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早已成立了红四方面军(中央本来计划让他们成立红二方面军)。后来，他们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红二方面军，可是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行。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重要原因。

尽管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已成事实。在那个年代，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因而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些组织。

作为主力红军，徐此两大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这两个军团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于是，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

(作者，袁春荪，选自《南京周末》报)

"十六字诀"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

我认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最早比较完整的提出者，不是毛泽东或朱德，而是张世熙(曾任中共万安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党的六大代表。1930年牺牲于南昌)，"十六字诀"最早比较完整提出的时间不是1929年及其以后，而是1928年1月上中旬："十六字诀"的最早记载，不是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而是张世熙1928年7月12日在苏联列宁格勒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万安暴动的报告。

1927年11月20日至1928年1月上旬，爆发了江西万安暴动，在敌人围攻下，暴动于3月失败。不久，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张世熙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六大闭幕后，张世熙于7月12日应邀在列宁格勒向共产国际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三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报告说：万安暴动后，我们"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这里明确提出了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它与以后毛泽东等同志概括的"十六字诀"含意

完全一致，后者不过将“敌来”改为敌进”，“敌走”改为“敌退”，“敌少我攻”改为“敌疲我打”。

张世熙提出的“十六字诀”，是万安游击战争斗争实践的产物，并成为反抗敌军进攻的斗争策略。因此，它的形成，提出和系统化的时间应是 1927 年冬至 1928 年 1 月上中旬。1928 年 1 月，毛泽东召集并主持遂川，万安两县党的联席会议，听取两县的工作报告，并指示说：“希望万安同志很好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准备与反动派作战”。他在这里提到的“十二字诀”不是另外新提出或概括的，而是对万安游击战争策略的复述和赞赏，希望他们今后还要“很好运用”。因为当时形势是敌强我弱，遂万联席会议主要是布置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向农村实行战略退却，而不是进攻，因此毛泽东在复述中未提“敌少我攻”，有人误以为毛泽东在遂万联席会议上复述万安经验而提到的“十二字诀”，是他最先提出的，是对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不符合事实。

（摘自《军史资料》第 4 期
《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
一文，作者王阿寿）

立三中央何以看重攻占长沙

1930 年 7 月 27 日，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下，乘蒋冯阎中原大战和湘桂军阀混战之机，一举占领长沙，并随之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这是我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占领的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省城。但当时我军占领长沙对整个局势的影响甚微。毛泽东认为：“把长沙当作一个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略上的错误”。

然而，当时立三中央对此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大肆渲染占领长沙的意义，称“这是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垮台的象征”，“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8 月 5 日，彭德怀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率领红三军团主动撤离长沙。对此，李立三大为恼火，斥责彭德怀的举动“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也是政治上极大损失”，并要求红三军团重取长沙。显然，在立三中央看来，占领长沙举足轻重。

攻占长沙这一局部胜利何以值得立三中央如此看重？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把它看作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奏

1930 年初，革命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军阀混战又给革命斗争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在这种情况下，立三中央便对革命形势作出错误估计。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差别”，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剧烈程度”，中共中央当前的任务“就是坚决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决议认为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基于这种认识，立三中央就把突破口选在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制定了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立三中央一方面要求武汉、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工人暴动，另一方面命令全国工农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紧邻武汉的长沙被红军拿下后，立三中央就自然认为这不仅使“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明显”，而且“摇动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甚至断言“军阀的崩溃，已经到了可以时日计算的地步”，“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李立三不无得意地说：“两个月来的政治生活完全证明了 6 月 11 日决议的正确。”8 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布置全国的武装暴动工作；并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至此，立三中央的“左”倾冒险行动达到了高潮。

二、把它看作是“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道路的实证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走什么道路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认为中国革命必须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等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艰苦实践，到 1930 年，已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城市中心论”始终在中共中央占居支配地位，立三中央尤其如此。李立三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死命。”因此，他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指责以农村割据包围城市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指责注重农村工作是“农民意识”，是“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背道相驰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立三中央在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便不顾一切地发出了“更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的命令。

三、把它看作是排除异己、抗拒批评的有力武器

立三中央在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时也遇到了种种阻力。如党内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毛泽东等在实际行动中予以抵制；共产国际要求停止"左"倾冒险政策的实施等等。然而，对于这一切，李立三皆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与拒绝，并强调"目前主要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号召全党"应当坚决的与这一右倾倾向作斗争"，同时，还不断罗列各种借口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打击。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使立三中央更加理直气壮，声称"客观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党的路线之正确"，并强词夺理地说"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工作，这确实是全党在今天的总任务"，"假使在今天我们不积极的准备暴动，会成为断送革命的罪人"。这样，立三中央便以"怀疑党的路线"，"极严重的右倾观念"为名，给何孟雄等人纪律处置，撤销其领导职务；同时也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扬言"等占领武汉以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等等，公然摆出一副与共产国际分庭抗礼的架式。

总之，立三中央推行冒险政策是由其"左"倾路线决定的，然而在立三中央冒险政策受到非议，"城市中心论"因毛泽东等倡导的农村土地革命蓬勃发展而影响减弱的时候，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无疑给其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因此立三中央紧紧抓住这一"活证"，把它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夸张，大肆渲染其意义，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服务。几十年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彭德怀意味深长地说："这一局部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路线在全国其它方面的损失，……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可胃一语中的。

（选自《党史文苑》93年5期，作者：高继民）

王明是怎样去苏联留学的

王明是1925年10月28日第一批由上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对王明出国苏联的问题，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说是由当时中共湖北党组织选派的；有的说是上海党组织选派的；有的说是高语罕推荐的；有的说是王明硬挤上火车或爬船偷渡去苏联的。

王明究竟是怎样出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呢？笔者最近查阅到唯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姜长林同志在1986年的回忆材料，姜当时是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是处理王明留学莫斯科中心大学的唯一当事人，他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历史的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的名义分配给各省10个名额。此时，已加入中国国民党的王明正就读于湖北商大，很想赴苏深造。湖北省去中山大学留学的10个名额已满，没有轮到王明。王明得知后，立即往南昌找商大同学许凌青，请他帮忙保荐他去苏联。许便以江西干事会的名义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写信，推荐王明。然而，陈独秀未受理王明的申请。王明只好专程赶往上海，找湖北省的有关负责人和当时江苏省国民党部秘书长、专门办理出国留学事宜的姜长林交涉。

在上海，王明同姜长林大吵大闹，说："你们不让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姜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厉害！"王问："为什么？"姜说："我不去苏联不要紧，你要去苏联，帝国主义就会抓你。"王明不吭气了。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姜长林把此事向中共浙江区委作了报告。区委的回答是不能让王明去。然而，王明仍不顾一切三番五次地找到姜长林交涉，甚至痛哭流涕恳求。姜再次向江浙区委反映。最后，江浙区委终于同意：如果别省有空额，就可考虑王明的要求。姜长林经核查各省的留苏名额，发现正好有空额，于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批准了王明的要求。这样，湖北省就去了11个人。

（摘自《党史博采》）

民国时期的婚姻礼俗考

在人生的历程中，从摇篮到坟墓，有种种礼俗相伴。其中较为重要的礼俗，有诞生礼、成年礼、结婚礼、葬礼，等等。而婚姻礼俗，可说是礼俗这所大花园中的奇花异草。

婚姻礼俗中的"礼"，指的是婚制、婚仪；"俗"，指的是民间婚姻的风俗习惯。在历史上，俗先于礼，礼本于俗。婚嫁必出之以仪式，这便成为礼俗了。

民国初年的婚制，是前清沿用已久的一夫一妻及妾制，男子娶妾得以继续。帝制时代的指腹为婚与割襟为亲的规定，则自此基本取消。1915年时，司法部附设的法律编查会，先后制定民法草案，其中《亲属编》有关婚姻制度方面，有一些规定，主要有：男子未满16岁，女子未满15岁，不得成婚；同宗男女、近亲之间，不得结婚；有配偶的，不得重婚；结婚须得父母的允许；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婚的，得离婚。但男子不满30岁、女子不满25岁而离婚的，必须得到父母的允许。由于这一部民法草案没有成为正式的法典，所以自1912年起，至1931年民法公布止的一段时间内，在男女婚姻方面并无法律为依据，即既可

以适用前清的规定，又可以参考1915年订定的亲属编，同时还可以依各地的习惯。1930年12月26日，公布了民法第四编“亲属”，并定于翌年5月5日施行。在婚姻制度方面，正式规定男子未满18岁、女子未满16岁，不得结婚。并且规定：未成年男女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结婚，必须有公开的仪式，和二人以上的证人；夫妻两愿离婚的，准许自行离婚。但未成年人离婚，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两愿离婚采取书面的方式，并应有二人以上证人的签名。其余条文，与1915年完成的亲属编大同小异。

男婚女嫁的礼仪，就是婚姻所必须遵行的仪节，也是婚礼进行应有的程序。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婚嫁礼仪繁文甚多，铺张浪费更甚。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当时的南京，结婚前后男女双方都要经过许多步骤。关于男家方面的有13道手续，关于女家方面的亦有10道手续。在云南省一般有6道手续，在辽宁省营口则有10道程序。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上虽提倡新式结婚，但仍以旧式结婚为主。特别是在西北、东北省分，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上笼罩着帝制时代的流风余习，男女结婚礼仪，有的为了保持门第排场，仍然沿用六礼中的每一细节，美其名曰崇尚古礼。南方各省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西方国家所谓男女平等和伸张女权的思想的影响，社会风气比较开通，新式结婚中的文明结婚，就在此时期出现。

在民国时期，旧式结婚的手续仍很繁杂，一般有8项：

一、请庚：男家向女家介绍，女家如同意，则送庚贴至男家。

二、探问：探问两家境况及人品，探问不足则继之以卜筮。

三、定亲：择吉日，男家以首饰、茶叶、果子、礼贴送女家，女家并还贴及喜糕。

四、报期：报知结婚时日。

五、行盘：婚前数十日或一、二日，男宅送礼至女宅，女方说定首饰、衣服、礼服及银币等，男方送去后，女方还以新郎礼帽、礼鞋及喜糕。

以上程序也有简略为说媒、订婚二步的。媒人在男女二家往来说合，等到女家答应了仪婚，就接着举行订婚仪式。通用的礼仪不外二种：(1)男女双方订婚当事人，到指定场所，行简单的订婚仪式；(2)由男方指派一位平辈的人到女家致送聘礼，表示订婚，并举行简单的接纳聘礼的仪式。不论采用哪一种礼仪，男女订婚当事人依礼节向祖宗行礼，以及邀请亲戚朋友参加酒宴等等。

六、收奁：结婚前一日，女宅所办的妆奁必须送到男家。妆奁的内容要看女家的财富而定。女家亲友长辈们赠送新娘的贵重礼品，都一并放入妆奁送过去，叫做添箱。送嫁妆的时候，通常请一位年长的人代表女家做使者去男家。到达男家，挑夫们将嫁妆陈列在大堂上，男家接受后就搬入新房，女方使者与男家迎接的人寒暄时，随将女家准备好的嫁妆礼单交给男家的人照单点收。

七、迎娶：结婚之日，男用执事花轿或马车等迎新娘。新郎至女宅揖岳，轿至女宅，女宅必索银若干，名曰门包，否则花轿不得入门。轿入门后，新娘服礼服，披红纱，阿弟扶上轿，女哭。

八、结婚：轿回宅，新郎衣礼服，喜娘引新娘出轿与新郎并立，连新丝长巾、点花烛、奏乐、唱礼。新郎新娘由礼傧以及引礼的人引导先向天地礼拜，叫做拜天地。有的家庭奉行古礼；第二天才双双出洞房拜祖先、拜父母和拜见亲戚长辈，以及跟平辈行见面礼；第三天拜祠堂，以后还要到男家祖墓拜祭。时代愈发展，婚礼愈趋简化，新郎新娘拜天地以后，接着就拜祖先和拜高堂，然后被亲友们送入洞房。有的在洞房中先与同辈亲友见面，第二天才正式拜见男家的亲戚尊长。

在婚俗方面，男子入赘女家的婚姻方式，在清代以前就已有之，到了民国时期则不少见。指腹为婚和冥婚等恶习在有些地方也并未绝迹。早婚的陋习在不少地方更是较为盛行。童养媳的习俗，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塞北的贫苦家庭中较为多见，其他省县的偏僻乡村，也有收养童养媳的习俗，童养媳的丈夫的年龄有的很小。即使在近代工商业较发达的上海地区，童养媳的习俗依然存在。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说当时上海的工人当中，从最封建的“指腹为婚”一直到最进步的“自主婚姻”都是有的。其中买卖婚姻还是流行在工人中主要的婚姻方式。女工婚姻的身价从几十元到二三百元，有的甚至500元以上。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多分布于我国边远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到民国时期，各种婚姻形态，对偶婚、亚血缘婚，甚至血缘群婚的残迹都有所保存。古时节日的野合遗风，在汉族地区也未绝迹。陕西临潼县行者乡的娘娘庙，每年3月3日为“单子会”。当天，附近地区的婚后不育妇女可赴会。是时身上揣着个布娃娃以为标记，可与单身男子在外留宿一夜。

新郎新娘入洞房后的婚俗各地也多有不同。有的双双对坐吃新娘园(汤园)，有的吃交杯酒。新娘入洞房时，抬子孙桶的人念着吉语将子孙桶抬入，新郎当场散发红包给抬子孙桶的每一个人。新郎新娘结婚的当晚的闹房婚俗，各地十分普遍，俗语亦有“三天无大小”之说。但各地闹房的婚俗不尽相同。有的地方，为了引起新娘一笑，做出许多的恶作剧。浙江永康闹新房的风俗更为特别，他们不着重戏谑新人，而着重偷新人的东西，普通是在新婚的第二夜，贺客们必设法把新人灌醉，使他们神志不清而

后已。有些好事的人，躲在新床下，或趁夜之便，撬开新房门户，将新人的衣服偷出来，然后在房中燃放鞭炮，惊醒新人，大家欢呼，庆祝成功，次日便拿偷到的东西，要新人以糕饼取赎，需都由女家照定数交出方可。

在礼俗行政方面，1912年时，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置民俗司，翌年并于政事堂设置礼制馆，从事草拟礼制。礼制馆议定的婚礼草案规定：结婚礼仪多有9道程序之多。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内政部曾拟婚、丧、祭及相见四种礼制草案，送经教育部交由国立礼乐馆审核同意后，于1942年11月由考试院院长约集内政、教育、社会及司法行政部，以及立法院代表，在重庆近郊北碚国立礼乐馆举行礼制讨论会，结果以"暂缓审核"一语，被搁置起来。

中国由于民族众多、地域广大，生产和生活方式各异，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婚姻礼俗差异极高，故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同时，婚姻礼俗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这就不免有糟粕、也有精华；诗情画意和陈规陋习掺杂在一起，健康纯朴和不堪入目共融一炉的现象了。

（李学明）

蒋介石信上帝还是信菩萨

蒋介石信佛，又信基督上帝。

蒋介石信佛主要是受其生母的教养与影响。蒋母王采玉，本是浙江奉化县下骅驻曹家田村一家庭妇女，不幸夫亡，归娘家寡居，茹素念佛，也粗通文字。时值溪口镇盐商蒋肇聪妻亡，经人撮合，乃娶王采玉为填房，1887年生蒋介石。由于蒋母家境尚较宽裕，又笃信佛教，读经念佛，成了她精神世界的主要寄托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蒋介石自幼耳濡目染，深受影响。蒋九岁时，父蒋肇聪病卒，蒋介石的教育和抚养就由其生母完全承受下来，这也培育了母子间至为亲密的感情。蒋母清心寡欢，带着对菩萨的虔诚，含辛茹苦地把蒋氏兄弟拉扯成人，直至1921年去世。蒋之信佛，正是受其母亲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蒋母病亡后，蒋介石为择地建坟而煞费苦心。他请了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到处勘察坟地，最后才选中了白岩山鱼鳞岙中垄这块宝地。风水先生说这是最好的"龙脉"，整个地形象座弥勒佛，坟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为了不压坏"龙穴"，坟茔不宜过重，尽少用石板等物。蒋遵此嘱，将母坟建成一座馒头状的普通坟墓。

在蒋介石看来，菩萨确曾多次保护和襄助过他。1925年秋的某天，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从广州城郊赶回市内军校办事处。他那插有青天白日旗的座车刚要发动时，马达发生故障，司机只得下车检修。蒋介石不耐久等，就改乘一辆随从的汽车匆匆离去。而他的几名卫士则等到蒋扔下的座车修好后才乘车往回赶。出乎意料，这辆插有小旗的校长座车行至东坡楼附近时，突然遭到当地驻军的猛烈射击，汽车被打翻起火，卫士或死或伤。蒋介石侥幸脱险，暗自庆幸，认为自己得以安全归来，此乃神明保佑。此后，他信佛之诚有增无减。1926年冬，北伐军围攻南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城外的牛行车站。战事发起之前，蒋介石携白崇禧到附近的庙中求签。他抽一支竹签交请老和尚破解，询问战事是胜抑败。和尚看后答称：战事大吉大利，但有一事甚重要，应预防剪刀叉，以免切断后路。蒋回总司令部后立即调来两团兵力预伏在司令部周围。第二天深夜，果然发生了从南昌城内潜行而至的孙传芳部突袭司令部的事件。幸而事有所备，才将来敌全歼。在审问一被俘的团长时，他说此次行动意在切断蒋之后路。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介石还派人送了许多钱给那位和尚，以修缮庙宇。蒋的卫士宓熙回忆说：蒋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回奉化后，曾访四明山区名刹雪窦寺，请主持僧依据他的生辰测知下野后的前景。这位僧人面对经文掐着手指算了一番后笑曰："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所以交秋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必然东山再起。"1928年春，蒋介石便"东山再起"了。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是在与宋美龄结婚以后。宋美龄父亲宋耀如曾在美国攻读神学，1886年来上海做牧师，从事布教兼营印刷。他的子女都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1928年9月，蒋介石乘下野之隙东渡日本，一方面在日本政军各界寻求支持，另一重要"使命"便是正式向在日本神户休养的宋美龄母亲提出求婚。由于蒋介石的苦苦哀求和宋美龄的坚决态度，宋母才勉强同意这桩婚姻。但又提出条件：蒋必须与原配夫人正式离婚，结束与姚冶诚、陈洁如等侧室的关系；必须改信基督教。对于前者，蒋介石明确表态同意。对于后者，他则含糊地答称"以虚心的态度研究基督教"，将来会"自然成为信徒的"。1929年12月1日，"辉煌显赫"的蒋宋婚礼在上海举行。婚礼先在宋宅按基督教仪式进行，而后又在大华饭店依中国传统方式举办。在宋宅的婚礼仪式本由宋家友人、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他得悉蒋非自由再婚后拒绝执行主持，故只好改由并非牧师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宣布蒋宋结为夫妇。婚后，蒋介石一直对接受基督教入教洗礼一事延搁不问。直到1930年10月，蒋才在上海由江长川牧师主持洗礼入教。江长川回忆说：这年夏秋他在美国时，中国正在发生蒋冯阎中原大战。蒋军被困于开封附近，情形危急。蒋无计可施，祈求上帝保佑，并称苟能遇救。必正式作一基督教徒。隔日天下大雪，为此季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后

援又及时赶至，蒋才化险为夷。所以江长川回上海后即被邀为蒋洗礼。之后，蒋介石尽可能定期去教堂作礼拜，每天一早作虔诚的祷告，常与宋美龄同案研读圣经，甚至每天写日记前也要口诵祷文。

又据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说，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张学良等扣留西安后，宋美龄积极设法营求，又亲飞西安面见蒋介石。见面时，蒋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毕潸然泪下。宋慰言相劝，蒋才转悲为喜：“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蒋还颇想能回宁过个安宁的圣诞节，他认为上帝这一次又拯救了他。蒋25日飞离西安，借道洛阳径飞南京。不过，不论是菩萨还是上帝，都没有改变他后来的可悲命运。

（朱坤泉）

风云人物

黄公略

黄公略（1898－1931），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军事指挥员之一。

黄公略原名汉魂，又名黄石，号公略，湖南湘乡人。出身湘中世家。1914年，在永丰镇高等小学毕业后，即在家乡教私塾。后来，投笔从戎，参加湘军，与彭德怀同在湘军第二师第三旅第六团服役，历任文书、司务长、排长等职。后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5年，升任连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任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因功升至营长。1927年初，被选派到广东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8年2月，黄公略在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后，返回湖南南县，任湘军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校长。不久，调任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根据党的指示，黄公略和彭德怀（该师第一团团长），贺国中、黄纯一等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8年7月，黄公略和彭德怀、滕代远等一起领导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第三团第三营和随营学校，共三千多人，在平江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党代表，黄公略任中共红五军军委委员兼红五军第二团党代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红五军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一带开展了游击战争。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参加井冈山的革命斗争。黄公略则奉命留在湘鄂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任红军支队长（红五军上井冈山时，留下了六个大队的正规红军归黄公略指挥）。1929年秋，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由井冈山回到平江后，黄公略任副师长。

1929年10月，红五军在湘鄂赣边区进行整编，下辖五个纵队共三千余人，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1930年初，赣西南的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和罗炳辉领导的吉安起义的部队，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调任军长。后来，红六军改称为红三军，仍任军长。7月，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黄公略任第三军长。此后，他便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后，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任总前委委员。

黄公略出身地主家庭，其伯叔兄弟均在湘军中任职。1931年夏，其叔父受国民党派遣，窜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找到黄公略，企图劝他“归正”。黄公略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并押送政治部审讯，还将此事电告了毛泽东、朱德，请将其叔——国民党奸细处决。从这件事情可看出黄公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义灭亲的崇高品德（其叔后被红军教育释放）。

黄公略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红三军于1930年12月30日在龙冈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九千余人，并生俘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他于1931年5月16日指挥红三军在东固和富田间的将军帽，全歼敌第二十八师；敌师长公秉藩化装潜逃，仅以身免。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红三军在老营盘战役中，全歼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鼎文的第九师独立旅。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1年9月，黄公略率红三军进行转移的途中，在江西吉安东固遭敌机扫射，不幸中弹负伤，9月15日光荣牺牲。

黄公略牺牲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特划出以东固、富田等地区为中心的十个区，成立了“公略县”，以东固为县治。1933年10月，中央军委又发布命令，将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怀念。

向 忠 发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曾用过特生、科发、独用等化名。1894年以后,相继当过汉阳兵工厂学徒、造币厂工人、轮船水手和码头工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大力推进全国的工人运动。这时,向忠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8月,汉阳钢铁厂工会成立,任副委员长。12月,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向忠发任副委员长。同年,经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二七惨案后,向忠发参加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主管工运。在大革命时期,他也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1月,他和董必武等三人,作为国民党湖北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担任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10月,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项英任副委员长,负责领导武汉和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1927年4月,向忠发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6月,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8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忠发随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向忠发、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他们还负责带领由一百七十余人组成的学生团,前往苏联学习。1928年2月,他和李震瀛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4月,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8年6月,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人成份,在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识字不多,水平不高,政治上也不成熟,后来党的主要事情都由李立三负责。

党的六大结束后,向忠发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此外,他还兼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另外两人是周恩来、顾顺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常务委员、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职。这时,他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物质享受,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并和妓女杨秀贞住在一起;而党的工作,则交由李立三处理,后来形成所谓"立三路线"。1930年9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作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和周恩来、瞿秋白一起,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继续执行。

1931年1月,向忠发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但是,他完全听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控制,把王明等人选进中央政治局,从而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得以统治全党。同年春,关向应、余昌生等被捕后,他和周恩来积极进行了营救工作。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出卖同志,供出我党我军大量机密,企图以此保全性命。但蒋介石并没有放过他。6月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被枪杀于上海龙华监狱。

王 明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就读于上海、武汉等地,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没有毕业就作为米夫的翻译到共产国际工作。1927年毕业后,留中山大学任翻译,同时协助米夫研究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1929年4月回国,先后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全总党团秘书、《劳动》杂志编辑。1930年1月在上海被捕,违反党的白区工作纪律,让巡捕带信到党中央宣传部的接头机关找人保释,中央给予警告处分。1930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六届三中全会后,在米夫支持下,打出"反对调和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宗派活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决议案,补选王明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同年6月,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9月组成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于10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1931年到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由于他的错误路线指导,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90%,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7年11月回国。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和次年召开的3月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共产

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38 年 9 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长江局，调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稍后任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45 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本着对他教育团结的原则精神，仍选他为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职。建国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他以就医为名移居苏联。1956 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苏联发表一系列文章，歪曲和篡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辩护。1974 年 3 月 27 日在莫斯科病死。

材料 王明其人其事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1925 年在湖北参加五卅爱国学生运动中入了党。同年秋天，湖北党组织送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王明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并不注重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满足于对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的教条式的背诵，夸夸其谈，沾染了极其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习气。然而他却得到了当时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欣赏。1928 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期间，由于米夫的安排，王明参加了大会的重要的译员工作，并企图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未成)。此后，王明又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反对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驻国际代表团，在农民问题、工人运动策略问题、党内倾向等问题上，照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有关言论，而把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的正确观点说成是错误的、“机会主义”的。当时，王明等在中山大学进行宗派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的宗派小集团。他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引起了中共广大党员群众的不满和反感。王明等不仅不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归咎于有人在幕后搞“阴谋活动”。为了压倒自己的反对者，他们捏造了一个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事件，把对米夫和他们有意见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明等同班同学说成是所谓“第二条路线同盟”。把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说成是“工人反对派”。王明等人并向校党委控告了俞秀松等成立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于是，米夫派人调查，硬说这个组织确实存在。这就引起了中山大学学生的不满和反对，中大学生向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申诉，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等经过调查，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是属于经济互助性质的，作出了不是反革命组织的正确结论。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曾经审理这一结论。王明、博古等又乘中山大学“清党”运动开展之机，追随米夫等人给李剑如、余笃三等加上“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罪名，还公开指责瞿秋白、邓中夏等是“机会主义”，要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负责。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也相应的通过了错误的决议案，要求中共中央调换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最后，瞿秋白、邓中夏等相继回国。

1929 年 4 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党先后分配他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工作。1930 年 1 月，王明在英租界附近参加上海工联的会议上被捕。王明为了自己获释，竟向一特务暴露了党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接头机关，由那特务将他的信送到接头处。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党中央鉴于王明这一泄密的严重错误，决定给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动了他的工作。

1930 年夏，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时，王明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与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是相同的。可是，王明却硬说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李立三的观点是错误的。7 月，在党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王明、博古等人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对 6 月 11 日的决议案提出意见，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等等。他们并坚持自己的意见，王明被李立三等给以留党察看 6 个月的处分，博古等 3 人被处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李立三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党内很多人的反对，并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左”倾错误的执行。本来，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来到中国之前，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的决议的，并接受党组织分配他们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的任务。但不久当夏曦、何凯丰、陈昌浩等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关于反对三中全会的消息后，于是，王明等加紧进行小组织活动，互相串联，大反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11 月 13 日，王明和博古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指责“三中全会最大缺点是对立三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三中全会后中央没有采取必要方法迅速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11 月 17 日，王明、博古再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撤销我们的处罚”，企图逼迫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他们拒绝党分配的工作，呆在上海不走，并且忙于拼凑他们的意见书——《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以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和十月来信为蓝本，由王明起草，经其宗派小团体传阅、讨论，最后修改定

稿。王明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拥护国际路线”旗号，猖狂地提出三中全会的决议“无效”，要“重新决定政治决议”，要“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要“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要“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表明，王明等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的夺权活动，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积极支持。米夫一到上海，即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并将国际十月决议的内容事先透露给王明。王明在积极炮制《两条路线》的同时，又于12月14日在《实话》第三期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公开向党煽动反对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的活动，为推翻三中全会的中央作舆论准备。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16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即王明——引者注）、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宣布“过去对韶玉等四同志的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这样，使王明等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米夫又向党中央建议，让王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博古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这就为王明等夺取中央领导权作了组织准备。接着，米夫向党中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茅　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雁冰，又名鸿。浙江桐乡人。我国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杰出的文学家。父亲沈永锡，晚清秀才。母亲陈爱珠，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是他的启蒙老师。

1913年在北京读书时，就开始接触新思潮。在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提倡现实主义文学。接办和改革了《小说月报》，使之成为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

1921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1926年底，中国共产党派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1927年4月，负责主编汉口《国民日报》，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1928年以后，同中共失去组织联系，但他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艺工作。1928年7月，旅日，1930年4月回国。在此期间，写了许多小说和散文。1930年，同鲁迅一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发展革命文艺，团结和壮大革命文艺队伍，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亲自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到过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讲过学。抗战胜利后，不顾国民党的压迫，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中，作出了贡献。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他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次全国文化大会。在1949年7月第一届文代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几十年来，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晚年，经受了十年内乱的严重考验，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最后的几年里，不顾重病，努力写作回忆录，为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在病危之际，决定将自己积存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作，作为设立一项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根据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中共中央于1981年3月31日作出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自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六十余年中，创作了《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还撰写了大量文艺论著，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

韩复榘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父韩静原，在本村私塾当教师。韩随父在塾读书。1910年，因家庭困难，他辍学投军，入陆军二十镇冯玉祥营，为司书生。1911年11月，韩在冯玉祥营当队官，随冯等参加滦州起义，事败后被递解回籍。

1912年春，冯玉祥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韩复榘再投入冯部。以后随着冯的升迁，韩也得到不断的提拔，自排长、连长至营长。当时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十余人，都是冯的亲信，有“十三太保”之称。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韩由团长升任国

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5年春，升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5月，当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大战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韩复榘任前敌总指挥，和石友三等率部往援晋北，韩在大同、天镇一带同晋军作战，非常卖力。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败，退向绥远，并拟续向甘肃撤退。韩复榘、石友三见军心散乱，乃与晋军将领商震联系，接受晋军收编。

1926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到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召韩归来，韩初不敢归，经解释后，率部回到冯处。9月下旬，冯玉祥出师甘、陕，任韩为援陕第六路总指挥。1927年6月，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韩任第六军军长。7月，韩代方振武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出潼关，在豫东一带打垮奉、鲁军各部。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韩复榘奉令率部沿京汉线北上，6月6日首先进抵南苑。7月，河北省政府成立，韩自认为战功不小，但仅得一河北省政府委员职，很不高兴。10月，第二集团军缩编，韩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不久，韩部又改编为第二十师，韩任师长，回驻郑州。12月，冯玉祥荐韩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把他兼任的二十师师长开了缺，改由与韩素有矛盾的石敬亭接任，使韩深受刺激。他常觉得自己过去有"投晋"的一件事，怕冯对他有怀疑。现在韩丢了二十师的实力，只当一名空头主席，越认定冯对他不信任，对冯渐怀不满。

蒋桂战争于1929年3月爆发。蒋介石以中央名义任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令其率部讨桂。而冯玉祥则令韩屯兵信阳，暂不进兵，以观时局变化。4月，桂系失败，冯玉祥急电促韩率部向武汉推进。行至孝感，蒋介石立即电韩停止进兵，并派人携款至孝感，借劳军之名，对韩进行收买。韩又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至汉口见蒋。蒋以优礼相待，极表亲切。这与冯有时对他粗鲁的责骂对照起来，大不一样。韩遂对蒋抱有好感。5月，冯玉祥在华阴开会，策划反蒋。冯将原驻山东、河南之西北军撤至陕西和河南西部。韩复榘反对冯的西撤计划，被冯痛斥，遂召集他的二十师旧部将领密议，率部东去，叛冯投蒋。5月22日，韩在洛阳发出"养"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23日，又连发两电，表示拥蒋。

1930年4月，中原大战正式揭开。韩复榘向蒋介石要求，把所部调往山东抵挡晋军。4月15日，蒋任韩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境内与晋军作战。9月，冯、阎失败后，韩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6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被任命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8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从1930年9月至1938年1月，韩复榘统治山东近八年之久。他在山东的统治与以前督鲁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同样是土皇帝式的，但外表上不一样。他摆出一副"急于求治"的架式：严禁部下穿丝绸衣服，不准士兵上街游荡，他常到各地"巡察"或"私访"，随个人喜怒滥用赏罚。他可以把彻夜赌博的小职员误认为"能早起"而提升为县长，也可以据一封匿名诬告信而惩办他的僚属。他喜欢自己审，当时流传着他判案的笑话："左立者开释，右立者枪毙"，人们戏称他为"韩青天"，他很高兴。他成百的诱杀降俘，手段非常残暴。从1932年至1933年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捕共队三次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山东省委员会，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共产党人发动益都、博兴、诸城、日照、荣城、海阳等地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和韩复榘的残暴统治。这些暴动都先后被韩复榘所镇压。

与此同时，韩复榘又利用梁漱溟在邹平、菏泽等专区推行旨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用欺骗的手法来强化其封建统治。

1932年9月，韩复榘指使山东省府参议郑继成（郑借口为他叔父报仇）刺杀了应邀回到山东来的前山东督军张宗昌。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对蒋介石的"中央"保持半独立关系，韩与蒋之间矛盾重重，韩复榘害怕蒋介石向山东插手，两次截留"中央"税收；有时也明里暗里打击国民党党部，甚至暗杀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因之，韩又暗向张学良拉拢合作。1932年9、10月间，韩复榘在张学良的炮兵援助下，向盘据在胶东的第十七军刘珍年部进攻，迫使蒋把刘部调往浙江。1935年后，随着华北形势的变化，韩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为求自保。为此，他一方面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竭立讨好日本，与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交往密切，挟日本势力不让蒋介石的"国军"进驻山东；另方面，他也不完全听日本摆布。1935年后，日本几次诱使他参加"华北自治"时，他怕被人骂作"汉奸"，而不肯干。日本驻济领事怕他"蛮干"（一次，日领事邀他"赴宴"，他调炮队巡守在使馆外），也不敢过分胁迫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12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并准备派兵袭击由何应钦率领攻陕的"中央军"的后路。韩的这一举动，深为蒋介石所痛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韩一方面表示对日"决绝"，限令日领事与日侨即日撤走；同时在其第三路军政训处内，容纳进步青年，作出要对日抵抗的姿态，但实际上他对抗战持观望态度，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8月，蒋把韩的第三路军和东北军于学忠部编为第三集团军，任韩为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要韩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认定蒋介石借抗日为名，意在消灭异己部队，故只派少数部队过黄河与日军周旋，遂即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

安和济宁，径自退到鲁西南的钜野、曹县一带。

1937年冬，蒋介石退出南京，到达武汉，准备入川。韩复榘与刘湘密谋，企图由刘湘封闭入川道路，不让蒋介石入川；韩则准备向南阳、襄樊、汉中一带撤退，并派人联络宋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然后由刘、韩、宋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了这一策划的密报，遂决心杀韩。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借口在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到会，将他逮捕，押解至汉口。24日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将韩处决。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阎锡山

阎锡山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阎六岁丧母，寄居舅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经手高利贷业务和参与金融投机。1900年阎书堂投机失败，钱铺倒闭，阎锡山随父躲债流落太原，曾在裕盛店（客栈）当店员。

1902年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加入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9年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习，后升监督。同年10月到北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清廷赏给阎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回省升任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升任标统。阎在任职期间，秘密参加同盟会的反清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山西支部积极策划响应。驻防于太原城外的新军八十五标二营中的同盟会员杨彭龄等于10月29日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总司令，率起义军攻城。当时八十六标驻防于城内，阎闻起义军由新南门攻入城内并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后，始率部参加，当日午被举为都督。11月4日，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令其带兵入晋镇压革命。吴早已秘密参加革命，到石家庄后，邀阎在娘子关会晤，商定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共图直捣北京，颠覆清室。惟吴旋被袁世凯收买其部属暗杀，"燕晋革命联军"遂告失败。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第三镇曹锟部进犯山西。12月12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率部北走，副都督温寿泉与杨彭龄、景定成等则率部南下。南北议和时，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继续进攻太原，12月20日太原为清军占领。在民军代表伍廷芳的交涉下，袁世凯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才得重返太原。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但此时，阎见袁世凯势大，渐疏远孙中山而对袁表示恭顺，一面贿买袁的左右，一面送其父长住北京意在作为"人质"，以消除袁对他的疑虑。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积极执行袁的命令，在三日内将山西全省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阎本人亦声明脱离国民党。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

"五四"运动后，阎锡山于1920年召开"进山会议"，研究对付人民革命的策略，他声称共产主义是"人人为圣人始可办到"的制度，另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限制工商业、实行"村本政治"等主张。他强调以村为政治本位，选举地主豪绅分任村长村副外，还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他建成可以制造枪炮弹药的小型军火工业，并将晋军扩编为四个混成旅。

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进行政治投机，先是联冯（玉祥）拥段，继而附奉（张作霖）对直（吴佩孚），又同奉、直讨冯。在战争中他据绥远为己有，并把军队扩充为十二个旅，野心一步步滋长。

北伐战争开始前，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7年6月6日，阎自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推他为政治会议委员。在此期间，他将军队扩编为八个军十七个师，又收编了国民军第三军，实力进一步增长。随后，阎锡山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积极支持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密切配合，杀害共产党员王瀛，还成立自新院（后改反省院）迫害革命人士。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蒋介石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张作霖奉军的作战。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命他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还兼任了平津卫戍总司令，把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长。1929年7月，又任命阎锡山为西北边防长官，阎当时因与蒋的矛盾日益加深，辞而不就。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借"编遣"为名，削弱异己部队，激起其他派系军阀的不满，阎锡山受到威胁，便与冯玉祥联合以出洋要挟蒋介石。1929年唐生智

谋联阎倒蒋，阎耍两面手法，同意联合倒蒋，当唐发表倒蒋通电后，阎又出尔反尔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1930年元旦，阎锡山亲赴郑州，自任讨唐总司令，准备对唐作战。蒋介石表面上欢迎阎锡山参战，委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内心则怕阎乘机扩张实力和地盘，遂指使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密谋在郑州活捉阎锡山。此计被驻在电话局的阎军代表侦悉，阎遂化装逃回太原。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在日人协助下，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家乡河边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蒋系分子枪杀请愿学生穆光政，受到舆论谴责。阎锡山深恨国民党对他的攻讦，便在河边村密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派兵将省党部负责人员逮捕，表示"支持"学生运动，但不久又以易地审判为名，将省党部的负责人员解往郑州释放，以讨好蒋介石，不过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则被他勒令解散。

1932年3月阎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下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公开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不久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时他铩羽新起，又回到"保境自守"的老路上来，想集中力量搞本省的经济建设，发展自己的实力。他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将各项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到1937年，西北实业公司已形成一个由采矿、冶金、采煤、发电、化工、机器制造、军火、造纸、印刷、皮革、火柴、毛织、水泥等部门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修建了同蒲铁路(窄轨)，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成立了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这些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共约二亿二千万元。他为了发展官僚资本，拒绝为私营工业提供贷款；为了发展本地工业，又成立土货商场，抵制外地货。后来又成立"经济统制处"，企图垄断全省经济。他还借口为同蒲铁路筹集资金，玩弄禁烟的花招，成立"禁烟考核处"，以鸦片制做戒烟药饼，公开发售，六年获利达二千万元，给山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阎锡山为了维护他的政治地位和官僚资产，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这是他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

1935年冬，中共中央声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阎锡山拒绝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的要求。1936年2月20日，红军渡河东征，阎军惨败，蒋介石乘机派援军五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而蒋军却赖着不走。

1945年8月9日，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无条件投降，于次日在取得日军同意后，派军向太原前进。8月17日，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商定：日军在原地堵击八路军，听候阎锡山受降；八路军如攻取太原，由日阎双方共同阻击。当日，阎军楚溪春部进驻太原。8月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窃取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他委任汉奸苏本仁、梁上椿为高级顾问，冯司直、王骧为高级参事，改编伪军四万人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三千余人，准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同年8月17日，阎锡山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解放区进犯，结果三万余人被歼，援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泽波等被生俘。

1946年上半年，在蒋介石被迫停战期间，阎锡山却积极备战，在太原、大同、临汾及晋中铁路沿线修筑钢筋水泥碉堡七千余个，企图顽抗。7月，蒋介石重开内战，阎倾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击下，山西大部地区均告解放，阎锡山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少数县市。

在此前后，阎锡山继续推行"兵农合一"暴政，大肆抢粮抓兵，又在城市进行编组抽兵，仅1946上半年，即在城乡抓兵两万多人，后又抓走五万多人。同时加强特务统治，于1946年4月成立特种警宪指挥处，在太原和晋中各县组成严密的特务网，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千余人。在军队中则由"政卫组"派遣特务，深入连队"肃伪"。1947年至1948年夏，阎锡山更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个人中要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十个人中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杀人极多，仅据阎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在太原市郊和晋中各县即残杀群众三千余人。女英雄刘胡兰(文水县)、尹灵芝(寿阳县)就是在此期间被阎军用铡刀铡死的。在经济上推行的掠夺民财的"平民经济"，则弄得私商倒闭，民不聊生。

1948年5月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他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在太原成立了"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组织了"民卫军"，驱赶市民为他卖命，同时却将山西各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和山西省银行的库存金银运往上海转运台湾，营造新窟。

人民解放军为了减少战争的伤亡和破坏，曾多次倡议进行和平谈判，都被阎锡山拒绝。1948年11月，阎还将密谋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晋夫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一向以狡猾欺诈著称的阎锡山看到大势已去，一面叫嚷要与太原共存亡，一面暗中运动他在南京政府中的亲信贾景德、徐永昌等人，建议代总统李宗仁邀阎赴京商讨"国是"。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接到来电，急乘飞

机逃往南京。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阎锡山逃离太原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南京解放前夕，他又逃往广州。1949年6月3日，就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曾提出一个反动透顶的"扭转时局方案"，制订了"全面作战计划"，与一些反动头子联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在人民解放军的进击下，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10月14日，广州解放。阎锡山窜逃重庆、成都等地，12月18日逃往台湾。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被免去行政院长，改充"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埋头于《大同之路》等反动著作的写作。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死于台北。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陈 绍 宽

陈绍宽，字原甫，福建闽侯人，出生于士绅家庭。幼时上过私塾。长成后，在办洋务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倾心于海军事业。1907年自福州马尾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舰艇上历任二副、大副、舰长，获得海军上校军衔。1916年，任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武官。在任期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舰作战任务频繁，而中国加入作战后与英国有盟国关系的机会，广泛考察学习英国海军作战技术。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陈作为中国代表团海军代表出席会议。同年，还代表中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航道会议。1920年由英返国，在海军负责训练工作。此后三年，先后指挥过教练舰"通志"号和"英士"号。192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1926年任北洋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1927年，陈率第二舰队投向南京国民政府，旋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春，在李宗仁为主席的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任委员，不久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海军编遣办事处委员。1929年秋辞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职务，改任国民政府海军部政务次长。1930年升任海军部部长。1935年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陈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次年，再获出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以副特使身分赴英，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礼。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迅即由英回国，指挥以江阴要塞为中心的对南京上海间长江水道的封锁战。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海军舰只几乎全部毁于日军轰炸。稍后，海军部撤销，另行成立了虚有其名的海军司令部，陈被任命为司令，同时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2日，陈代表中国海军出席了在美舰密苏里号举行的盟军对日受降仪式。1946年1月，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出席了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同年6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战时军事机构撤销，由行政院下设国防部主管军界事务，陈亦退休回闽，所遗海军事务由不谙海军知识出身黄埔系的桂永清主持。1949年底福州解放前夕，陈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决定留居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陈绍宽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副省长、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还长期担任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职务。1969年7月30日，这位旧日中国海军耆宿在新中国工作20年之后，因病逝世于福州。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珍 闻 轶 事

一则误发的讣告
——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字

1930年3月20日，作为世界共产党总部的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讣告，宣告毛泽东同志因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去世。

38年后，即1968年美国学者施瓦茨发现了这一讣告。他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后来，法国记者卡罗尔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和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也分别提到了这一讣告。但是，讣告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上述3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国内学者也一直未能找到讣告原文。

不久前，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该馆新从国外购进的《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的缩微胶卷，终于找到了这篇讣告的原文。现原文翻译如下：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

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是目前发现的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字。在此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杂志第33和34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是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字。

讣告全文的发现，纠正了上述看法。讣告全文的发现，有利于我们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特别是与毛泽东的关系。至于毛泽东死于肺结核这一错误的情报是怎么传到共产国际总部的，这一讣告是谁起草的、谁签发的，则尚待历史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选自《党史文汇》92年4期
作者：袁南生，申长友）

特殊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

我是一位业余考古工作者，走访过程中，在一位红军老战士家中，征集到一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

此证底白色，黑字，红印章，是土造的毛边纸，石印、印刷质量较好，字字句句明了。此证虽然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没有在票面上留下一点痕迹。

证件宽10.4公分，长17.9公分。该证分上下两段，上小下大，上沿高3公分，开头是月牙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左右两边上角在1.7×1.7公分的圆圈内各有一个五角星。靠近两个五角星的下沿各有三个小五角星。横标写“红军临时借谷证”。

下沿是10.4×12.3公分。开头是：乾谷壹百斤。接下正文是三条直书使用此证的规定：

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

二、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

三、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领还谷子，或作缴纳土地税之用，但在仓库领谷时，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谷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落款著名者，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在三条规定的黑体文字上，盖有一枚三道圆圈的圆形红印章。第一道圆圈5×5公分，上沿文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五角星。下沿写：人民委员会。第二道圆圈3×3公分，由两组麦穗组成的图案，上端正中有一个小五角星。第三道圆圈1.5×1.5公分。图案是地球上绘制锤镰。

在三条规定明文下沿，盖有一枚4.7×4.7公分的正方形空印框架。中心的直书黑体文字是：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向××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为证。在这些文字上，还盖有一枚4.7×4.7公分的红色正方形印章，印章的文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师供给处。此证没有具体时间。

为此，我走访了很多苏区老干部和红军老战士，特别

是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老同志。据老人们回忆:"此证券主要是适应战时流动性极大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的粮食需要而印制的一种特殊证券。多为定期有价证券。持本券可向当地政府粮食仓库、粮食合作社领粮、借粮、吃饭。被借者和供伙者凭票即可兑粮、兑款。也可托交公粮或作缴纳土地税之用,非常方便。""此证的印制发行,是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批准,时间是1930年至1932年,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二位领导人签名,由中央苏区印制发行"。据老同志讲:这也是中央根据地在粮食制度供给上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

这张证件使用时间不长,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证券依然色泽鲜丽。白、黑、红清晰入目,由于主人的精心收藏,目前仍完好如初,证券号码是055912号。

在战争年代,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部门,为了保证军需,先后发行过许多种面额的粮食票证,大到百斤,小到几两,有的只限军用,有的仅限在本部队使用,有的可以在地方上作支付流通的手段,主要是发给部队行军沿途向群众借谷的凭证。这样发挥了根据地粮票的应有作用。特别是在动荡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在供给制度条件下,这些粮食票证在保证军队、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的粮、伙食供给上,加强革命纪律,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选自《历史大观园》作者,左进亮)

中共最早建立的军团

中共最早建立的军团是1930年6月中旬在闽西长汀成立的红1军团。该军团是以红4军为基础并集合闽西和赣西南的地方主力红军合编而成的。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先后转战赣闽边界,进入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相继成立。4月,中共闽西特委将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组成红12军。1930年6月,红军第4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闽西长汀举行联席会议,根据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精神,决定将红4军、红6军、红12军合编,组成第1军团(6月19日组成时称第1路军,不久改称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所属第4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任政治委员;所属第6军(不久改为第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治委员(不久蔡会文继任政治委员);第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2万余人。随后,赣西南地区地方部队先后组成第20军和第22军。第20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兼任政治委员;第22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这两个军也属第1军团建制。

(摘自《军事历史》91年5期)

"世界""开明"版权讼

中国虽向无出版法,但在习惯上总是承认和尊重作者的著作权的。书店、出版社得到著作人允许而出版的书籍,也就有了这本书的出版权,如果别的出版社擅自印行,就是侵犯了原出版单位的版权,因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凡是偷印盗印乃至改头换面的抄袭、冒效,也属于侵犯版权之列,于是引起争执,有时就难免要诉之于法律,变成讼事,就是打官司了。

上海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曾因为两本英语教科书而涉讼,闹得沸沸扬扬,一时轰动了出版界。那是1930年夏秋的事了。

开明书店是1926年7月开办的。创办人章雪村,原是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的编辑,因为提倡新女性思想而被排斥,离开了商务。他得到朋友的鼓励和帮助,自己出版了一份《新女性杂志》,接着索性开办了开明书店。后来营业发展,逐渐出起教科书来了。他请林语堂编了一套3册的《开明英文读本》,因为编辑得新颖、质量好,被许多学校采用,成为一本畅销书,是该店的一棵摇钱树。世界书局的主持人、大股东又是经理的沈知方,觉得这项生意好做,就请林汉达也编了一套3册的《标准英语课本》,想争夺开明的生意。教科书是一宗大生意,需要有大本钱才能经营,因发行数字大,备货要多,须垫付巨额的造货成本。世界书局的实力雄厚,论资本比开明书店要大,是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大书店外,坐第三把交椅的。开明书店资本少,以几千元起家,那时才有资本5万元,实在不能同它们相比的。所以开明虽然也出了教科书,因为不能大量造货,大量发行,所以商务、中华虽然有部分销路被抢了去,但一点也不感到威胁。但是如果开明书店的生意被世界书局抢了去,那对开明却是致命伤了。因此,世界书局出的英文读本对开明书店来说是极大的威胁。

正好这时有人来告诉章雪村,说"世界"的那本标准英语课本同"开明"英文读本很有相似之处。于是章雪村去买了一份标准英语课本来,送交林语堂去研究,看是否抄袭冒效了。林语堂检查了一下,发现了不少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两人在商量之后,并同夏丐尊等人讨论,取得夏等的同意,决定向世界书局提出抗议。他们请熟识的朋友世界书局编辑徐蔚南去转告负责人沈知方,要求世界书局把那本林汉达编的《标准英语课本》停止出版发行,进行改编,以免侵害"开明"的版权。"开明"方面认为此事

的责任，主要在编辑者身上，对世界书局还是表示了尊重，以图保持同行之间的友谊，所以只能托徐蔚南去向沈知方说项。但是沈知方却对此置之不理。他对徐蔚南说，这本标准英语课本，已经造了一批货，下了不少本钱，怎么能停止发行呢？他说：书是由著作人负责编写的，与书店无关；书是新编的，也没有抄袭“开明”的。就这样拒绝了开明书店的要求。徐蔚南当然据实回报了“开明”方面的夏丐尊等人。对此，林语堂和章雪村主张强硬对付，一定要与世界书局争一争。开明书店请来书店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律师相商，决计由律师出面致书世界书局提出严重警告，认为《标准》这本书已经侵犯《开明英文读本》的著作权，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并赔偿损失。可以说这是要提出诉讼的先声了。

沈知方在接到袁律师的信之后，没有再叫徐蔚南去跟“开明”方面接触洽谈，却把那封律师信交给了著作人林汉达，要他去负责解决。他也认为著作权的争议，是编写者、著作人之间的事情，让林汉达去同林语堂谈，就可以解决的。沈知方自己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事业家，也许还有点轻视这些书呆子读书人。他本来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民国成立当初，乘时代改变的潮流，跟同陆费逵等人从商务分裂出来，开办了中华书局，经营得不坏，发展到了可同商务相抗衡的地步。沈知方在中华书局又嫌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以后又分裂出来开办了世界书局，而且经营得也很好，快要赶上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店了。他有点目空一切，把著作权、版权之类，只当作具文，认为只是小事一桩，只消叫林汉达去同林语堂说几句好话，就可以解决的。当时世界书局还有一个名义上的编辑所长范云六（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徐蔚南）也跟沈知方意见相同，认为林汉达以著作人身份去谈著作权是合于正规的。范云六在商务印书馆与章雪村同事过，所以特地为林汉达写了封介绍信给章雪村，叫林汉达带了介绍信去看章雪村、与他商谈。

林汉达当时只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读书很用功，成绩不坏，也有能力来编写英语教科书，但是社会经验缺乏，没有教课的经验，所以，他编的这套书是参考了中外各种英文读本，综合而成。他是初出茅庐，涉世不深，要他去办理这项交涉，确有困难。他先去开明书店拜访了章雪村，呈上了范云六的介绍信。章雪村看到了信上有“敝局出版之《标准英语课本》与贵店《开明英文读本》有雷同之处”的话，认为世界书局已经承认了这个抄袭的事实，十分得意。他说：“这个著作权的问题，这封律师信，出自林语堂的主张，只要林语堂愿意和解，书店没有什么意见。”就写了张条子，让林汉达去找林语堂。

林语堂此时寄居上海，是以写作卖文为生的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由任职清华学堂去美国又去德国留学之后，回国任北大等校教职，又去厦门大学任教务长，曾介绍鲁迅去厦门大学教书，后又在武汉政府外交部任职，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崩溃之后，他来到上海租界作寓公。此时为开明书店编写了这本开明英文读本，是初中用的3册一套的教科书。原先他思想也比较进步，曾写了一个《子见南子》的反封建的剧本，在教育界引起了激浪，赢得了相当声望，又有语言学博士的头衔，因之林汉达把他当作前辈待。他去拜访这位前辈先生，两次没有见到。于是在一张名片上留了些字，大意是说，来了两次，见不到你，十分遗憾。那个课本，你认为哪几处应当修改，请告诉我，我愿意接受等等。

过后，林语堂把那张名片上的留言及谈话的经过，告诉了章雪村，他们商量决定，对沈知方这种推诿拖拉的作法，必须要加以有力的打击。竟想出一个办法，把范云六的来信及林汉达名片上的留字，制成锌版，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课本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标题，写成了一则广告，在上海各大报上刊登出来。开明书店本来要为这本教科书登广告的，借了这个机会刊登出来攻击世界书局侵犯版权，同时也就为“开明”英文读本大作宣传。真是一箭双雕。“开明”方面认为律师信是写给世界书局的，而世界书局置之不理，分明是对于“开明”的严重抗议不当一回事，所以采取了这个办法。

“开明”这个“广告”见报后，沈知方看了又恼又喜，因为“开明”这样明显责骂世界书局，是构成诽谤罪的，沈知方可以提出申诉，控告“开明”。沈知方认为“开明”作法是授人以柄，因为书本的抄袭冒效，可以多方辩论，很难得出结论，而诽谤却是明白的事实。所以沈知方特地去请了郑毓秀博士来作世界书局代理人。郑毓秀是个女律师，又是上海法学院长，是以包打赢官司出名的。郑毓秀社会关系好，在司法界中是无人不知的，她丈夫魏道明也是司法界要人，而且她跟中国司法界元老王宠惠私交很好。这些人都是在南京司法部当权的。上海的特区法院属于南京政府的司法部管辖，因而一纸命令下下，就可以决定人员的去留。那时上海法院里有一句众口一辞的说法，说“院长电话到，推事别别跳”，说明上海特区法院的审判官怎样惧怕这个女律师。于是，世界书局先下手为强，出了3000两银子的律师费，请郑毓秀律师办理此案，在上海特区法院提出自诉。此外还在报纸上登广告驳斥“开明”，否认有冒效的事。

在第一次开庭审讯时，承审的法官一味偏袒世界书局，使得代表开明书店的袁希濂气得发抖，回来把皮包向桌上一扔，说：“毫无把握，敬谢不敏。”律师打退堂鼓了。看到这种形势，章雪村十分着急，开明书店的人都有点紧张，看来诽谤罪就难逃脱了。他们想不到解脱的好办法，只好一方面仍在报纸上登广告，驳斥世界书局，另一方面，又向南京教育部求助。他们把两种课本的形式和内容有相似的书页撕下来，剪贴起来对照，并加以说明，装成

册子，呈请教育部鉴定，以坐实世界书局本的抄袭冒效。那时世界书局正在把林汉达的《标准英语课本》送请教育部审定，想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危局。教育部的编审们为此也开了几次会，却得不出一致的意见，也有人支持世界书局，说林汉达的做法，不能作为抄袭，因林语堂课本中有不少材料，也是从外国课本上抄袭来的。也有人主张林汉达明显是抄袭模仿，不能姑息宽容。因为两造议论相持不下，主管人就建议让编审人员开会以多数意见决定。表决的结果，对世界书局林汉达编的标准英语读本的批语是："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教本之处，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在上海特区法院对此案最后一次开庭的前一天，这个批语送达到了开明书店。章雪村乐不可支，立即把批示制成了铜版，连夜送稿在上海各大报登了广告。这时，法院早已拟好了判决书，判定开明书店所指的抄袭冒效是诬枉，只等开庭宣读，看到了早报上的广告以后，法官大吃一惊，手忙脚乱地改了判决书，判决开明书店所刊登的广告，有污蔑侮辱林汉达之处，按诽谤罪判处罚金 30 元。开明书店一面向法院申明要上诉，一面抓住教育部的批示，在全国各地方报上，也刊登了《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效》的广告，大事宣传。这样一来，已经采用世界版的《标准英语课本》的学校，纷纷向世界书局要求退款，使世界书局受到重大打击。世界书局沈知方被迫无奈，只得央请徐蔚南把教育部副部长刘大白请出来进行调解。刘大白以前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夏丏尊同事过，跟章雪村是同乡，再加上他是教育部次长的地位，不能不给点面子。结果世界书局允许赔偿开明书店损失，并把课本的纸型送交"开明"销毁了事。"开明"和"世界"两书店的版权讼事，使得林语堂的书销路分外的好，也使得开明书店从此走上了更加发展的道路。

还要带叙一笔，当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诉讼时，沈知方另有准备。他要求林汉达再迅速另编一本英语教科书。林汉达也真年轻气锐，精力旺盛，就用了一个进步英语学社的名义，编了一套《进步英语读本》3 册，送请教育部审定。世界书局就靠这套《进步英语读本》来代替了被禁止发行的《标准英语课本》，并完成了自己的教科书配套。不久之后，教育部长易人，世界书局趁机改书名为《英语标准课本》也得到了教育部的审定。这样林汉达的两种英语课本，都在世界书局发行销售了。世界书局在这年年底，因为受到了这种挫折，书店几乎要被挤垮。于是由李石曾来参加投资，由陆高谊出任经理，沈知方退居监察理事的地位，业务又重新振作起来。尤其在印刷方面由于设备精进而后来居上，超过了"商务"与"中华"两书店。

还应当提到的，林汉达因为受了这件讼事的刺激，也到美国去勤工俭学了。因为有人对林汉达讲，你不过大学毕业，林语堂是博士，你要去冒犯他，太不自量了，林汉达下定决心，也要去捞到一个博士头衔。他自己只准备了 300 元美金，冒险出洋去美国半工半读。在美国他还做了巡回的收费演讲，以筹学费，终于也获得个博士学位。赴美前世界书局只给 5% 的版税，而且还要他分担这一次打官司的费用，逼他写了一张预支版税 1 万元的收据，该项预支由他以后应得的版税中扣除，所以他能得到的钱就不多了。林汉达得到博士学位回来后，写了一本历史通俗读物《上下五千年》，成为畅销书，因之也大大出了名。这也许是由那一场讼事逼出来的。这是后话了。

（辛古木）

卓别林与梅兰芳的会见

卓别林这位名震全球的美国影坛巨匠，深为广大中国人民所喜爱。他主演的影片，早在 1915 年 9 月就开始在上海公映，20 年代初已风行全国。他对中国素怀友好感情，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笃厚交往更是艺术史上的佳话。

1930 年初，梅兰芳率剧团赴美访问演出，5 月的一天，来到电影名城洛杉矶。当晚，剧场经理举行欢迎酒会。宾主刚刚入座，一位神采奕奕的壮年人迎面走来，梅兰芳觉得似曾相识，正在思索之中，剧场经理站起来介绍道："这位是卓别林先生！"卓别林紧紧握住梅兰芳的手，热情洋溢地说道："我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今日可算幸会。啊，你原来这么年轻就享有这样大名，真可算是世界第一个可羡慕的人啦！"当时梅兰芳 36 岁，卓别林也才 41 岁。

那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电影《城市之光》。他抽暇出席了好莱坞为梅兰芳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在梅兰芳参观好莱坞时，他又竭诚相待，介绍拍摄电影的情况，两人手拉着手合影留念。

卓别林与梅兰芳再次相会在 1936 年。这年 3 月，卓别林和宝莲高黛在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到亚洲蜜月旅行。船抵上海停泊两天，卓别林特地上岸，与梅兰芳再次会晤。卓别林兴致勃勃地提出想看京戏，凑巧当晚梅兰芳没有演出，就亲自陪同他去观赏马连良在新光大戏院演出的《法门寺》。卓别林一边听马连良的大段唱腔，一边在膝头试打节拍。卓别林对剧中丑角贾桂的表演艺术极感兴趣，很想试扮一下贾桂和马连良合影，但因他次日凌晨就要乘船离沪，时间不允许他化妆而作罢。

在这以后，虽然卓别林与梅兰芳没有机会再见面，但互相一直很关心和支持。1941 年春天，卓别林的影片《大独裁者》将到香港上映。"皇后"、"娱乐"和"利舞台"三家影剧院都想争夺首映权。因为三年前梅兰芳曾在"利舞台"演出过，该院经理就去找当时正留居香港的梅兰芳想办法。梅兰芳答应拍个电报给卓别林试试看，不久就得到

卓别林"同意"的复电。那时,美国影片在香港通常都在外国人办的"皇后"、"娱乐"两家影院首映,而这次《大独裁者》影片却在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剧场首映,在香港引起了轰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卓别林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离开他居住40年的美国。梅兰芳对于卓别林的境遇愤愤不平,时常打听他的处境,对他十分怀念。1954年,梅兰芳听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宴请卓别林,并邀请他观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感到非常高兴,以为卓别林可能会重访中国了。直到50年代末,梅兰芳还深情地对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林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比当年如何?"遗憾的是,梅兰芳不幸于1961年溘然长逝,两位伟大艺术家一直没有机会再欢聚一堂重叙友情。

(朱安平)

1930年蒋介石荣归乡里

1930年秋,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取得了完全胜利,于10月25日回到溪口老家"休养身体"。这次是"凯旋"回里,上海、宁波、奉化都组织了欢迎活动,《申报》、《时事公报》、《奉公日报》等都作了连续报导:10月23日,"晨六时到沪",10月24日下午五时"偕宋夫人登新宁绍轮特舱赴甬",25日晨五时半"宁绍轮抵甬","即乘汽车径驶溪口"。

溪口镇上的气氛也大不一样,武岭门上用彩柏扎成"欢迎蒋主席凯旋"字样;武岭学校大门前搭有彩牌楼,上有白棉扎成的"欢迎"两个大字,约有4尺见方;蒋氏宗祠正门和东首亦搭彩牌楼各一座;武岭公园大门上悬彩扎成红底白字"普天同庆"四字,沿途扎彩悬灯,万国小旗临风飘扬。27日召开了全县各界欢迎大会,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泰荣记载:"下午一时入会场……各界及就近居民人数达二千余,仪式如常。由章(骏)县长致欢迎词,继由主席致训词,其要旨激励青年耐苦服劳,尽力乡村事业……散会三点许……"

蒋介石在家乡办的最大的公益事业是武岭学校,从1928年12月至1930年12月,拨款几十万,造了占地百亩的新校舍。他对这个学校十分关心,从选择地点、设计图纸、承包施工以至门窗式样,油漆颜色等都亲自过问,到他这次回乡时,学校主要建筑已经完工,学生也已搬入新教室上课,他不时偕宋美龄到学校视察。一次,他看到教室进门处门档染有污迹,便责问道:"新房子刚造好,为什么弄得这么脏?"宋美龄说:"这门窗奶油颜色太淡,染上污迹很显眼,不如改漆深灰色。"蒋认为有理,就命将所有门窗改漆一遍。当时校长张明镐见蒋很高兴,就请他为刚完工的武岭门楼题字,蒋也不推辞,提笔一连写了五、六张,最后挑出一张比较满意的交给张明镐。还写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作为武岭学校校训。武岭门的题字,正中为"武岭"二字,上首书"十九年",下署"中正"。以后,又送来了于右任的题字。当事者征求蒋的意见,两幅题字如何摆法?蒋不假思索地回答:"于右任是书法家,他的题字应放在外面。"所以,蒋介石题的"武岭"刻在朝里一面。又有一次,孔祥熙送来八幅湘绣,白底黑字,是岳飞写的诸葛亮《出师表》,外镶红木镜框。蒋到校命张明镐将其挂在大礼堂台旁两壁上,他在下面亲自指点,评定位置高低,直到满意才离去。还有一次,蒋介石偕宋美龄到学校检查卫生,学校虽然作了准备,花去不少工夫大事打扫,但总还有一些缺陷。蒋戴着白手套,专拣死角检查,在门窗角落和天窗上摸到一些灰尘就加以批评,命以后注意。蒋介石在离开溪口以前,还为武岭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财政厅长周枕琴等均来道贺。蒋介石对学生讲话,夸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刻苦勤学,他的母亲如何严格督促教导等等,他还把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加以解释,特别是"忠孝"二字反复讲了好几遍。

奉化县城有一所孤儿院,蒋介石、宋美龄分任正副名誉董事长。11月3日下午,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该院,"携来饼干、糖果六十余盒"送给孤儿。宋美龄与院内负责人具体商量"添办工厂及整顿孤儿院等事。"蒋介石去中山公园,瞻仰总理纪念堂,参观奉化图书馆(1933年5月1日改名中正图书馆)和锦山东麓的周淡游墓地。周淡游是蒋介石在凤麓学堂读书时的结拜兄弟,又是他与陈英士相识的引见人,辛亥革命期间,同在陈英士手下共事,蒋任团长,周任军需。1919年5月5日,周淡游在四川省长杨庶堪(即仓白)处任庶政(相当于今民政厅长)时病逝于成都,孙中山先生曾致电吊唁。他身后只留下一箱书籍,两袖清风,家人把他的遗骸运回奉化,葬于锦屏山东麓,黄土一抔,荒草萋萋。蒋介石看了不觉有些伤感。这时,他见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阔气的坟墓,便问随从人员:"这是谁的墓?"答称:"是朱守梅父亲的。"蒋早就风闻朱在北伐军需处长和南京政府军需署长任上贪污中饱,大兴土木,建造"梅园"。今观其父亲坟墓如此豪华,十分不悦,正好朱守梅亦在家休息,便下令"把朱守梅叫来。"朱到后,蒋劈头就问:"给你父亲修墓花了多少钱?"朱一听话音不妙,深怕查问帐目,便以多报少?",说:"花了五千。"蒋接口说:"淡游献身革命,死后如此凄凉,你借我一笔钱,数目也是五千,给他造一座象样的墓。"朱守梅唯唯而退,掏腰包为周淡游重建坟墓,并在旁边造了一座纪念碑和一所"淡游山庄",墓碑由蒋介石题写,上书"周

故同志淡游之墓"，纪念碑四周有黄郛、谭延闿、戴传贤、邵元冲等国民党要人的题词和墓表。蒋介石向朱守梅借的这笔钱始终未还，朱守梅也不敢去索讨。以后，有人在朱家作客，席间朱妻问："总司令借的钱还了没有?"朱答："还提这笔钱，差点连脑袋也借去了呢!"奉化人风趣地说："是蒋介石敲了朱守梅一记竹杠。"

（王舜祁　胡元福）

阎锡山自鸣得意的"驭下"术

在民国时代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阎锡山盘踞山西，俨然以土皇帝自居，成为军阀中独一无二的不倒翁。阎锡山何以能稳住地盘，统治山西38年之久？除了他本人熟谙世故，老练圆滑，善于在各派军阀纷争中利用矛盾、保存自己之外，还在于他有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

阎锡山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任人唯亲。他本人是山西五台人，凡五台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左右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都是五台人。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之，也是五台人。此外，山西省政府的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晋南人，虽同属山西籍，却往往受到阎锡山的排挤、压制。傅作义将军是今山西临猗县人，任绥远省主席，阎锡山对此耿耿于怀。1932年，阎重新统治晋绥两省后，曾活动五台人王靖国接替傅作义。抗战初期，阎把傅留在山西，参赞戎机，派五台人赵承绶代理绥远省主席。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

阎锡山对五台同乡是这样，对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与阎锡山是姨侄关系。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身居山西省银行经理。山西贸易公司经理徐士珙则是阎锡山的内弟。阎锡山以同乡、亲属为纽带，结成了一个得失相连、荣辱与共的宗族关系网。

阎锡山用人的另一特点是把他和部属之间的关系，变成封建宗法式的父子、长幼、尊卑、主仆的人身依附关系。他常常对官吏训话，要求他们"将私欲按按，将平日胆大妄为之心意去去"，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为他服务。他还把"服从"、"忠勤"写入政府的官吏服务令中。为向官员灌输奴化思想，培植奴仆，他在抗战中期实行了"洪炉训练"。所谓"洪炉训练"即是把训练机关比作"洪炉"。把受训干部比作"矿石"，组织所有军队连级以上和行政区级以上的人员分期分批参加训练。阎锡山自任会长，亲定会训，编写"洪炉歌"，歌词中有："组织领导，决议是从，自动彻底，职务维忠"；"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总之，一切唯会长之命是从。阎锡山还仿效封建社会设坛立盟，结兄拜弟的陈习陋规，于1933年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法西斯铁血团的铁军组织，凡参加者均要对阎锡山宣誓效忠，以血立印。阎锡山利用封建迷信、江湖义气为他的独裁统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谙于世故的阎锡山也知道，在变化莫测的政治生活中，这张封建宗派关系网并非牢不可破。为了巩固统治，他在用人上还有一大绝招，即所谓"中"字哲学。他认为："一件事有过和不及，过也不对，不及也不对"；"须从过和不及两方面去求得恰好之中"。"中是理之极则，对立之本质"。为此，阎锡山将"中"字哲学奉为治世准则，在用人中采取不偏不倚、模棱两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手法，从中求得"稳妥"，把握平衡，进而左右政局、驾驭属下。他有一句话叫"使功不如使过"，意思是任用有过之人，比任用有功之人还靠得住。他十分重用犯有过失的人。曾任山西平遥县长的孙焕伦，有严重的贪污行为，而阎锡山不仅赦其死罪，而且大升其官，先授以冀宁道尹，后擢升为省民政厅厅长。阎锡山称这种方法为"以贵养贱"。采取这种方法，可以使有过失的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地为阎锡山卖命。阎锡山深知"管人必须服其心"，"服其心"的办法，一是"感情的争取"，二是"政治的争取"。也就是要以"黏人的热情、悦人的态度、动人的言词"跟部属相处，"使人愿意与你接近"。如此感情的和政治的争取，就能和属下结成"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阎锡山还利用一些官员的名利思想，投其所好，大搞封官晋级。抗日战争中，他曾发过一种布质徽章，以此为标志，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风行一时，时人有云："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对部下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所谓"恩威"并用。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一律"坚决铲除之"。第七十师师长刘墉之等人都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严密控制。他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抗战初期，他颁布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各派一组视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威力。

制造对立、分而治之的策略也是阎锡山用人的妙方之一。他在政府中同时使用两套人马。一套以邱仰浚为首（倾向于南京政府），另一套以李冠洋为首（山西土生势力）。对邱，他表示："咱们要靠南京"；对李，他说："咱们与南京不同"。两派都觉得阎锡山是自己的后台，相互监视，相互告密，争着向阎锡山邀功请赏。在军队中，杨爱源、孙楚、赵承绶是一派，王靖国是一派，双方都得到阎锡山的纵容和利用。于是争先恐后地在阎锡山面前大献殷勤，为阎锡山东征西讨。此外，阎锡山还搞所谓地区平衡，将各部门大权平均分配给各个地区。抗战前，任山西省政府

民、财、建、教四厅厅长和秘书长的分别是晋东南沁县、晋西隰县、晋南解县、晋中汾阳和晋北大同各地方成员。这样，各派势力相互对立，相互监视，势均力敌，谁也不可能羽毛丰满，取阎锡山而代之。阎锡山超然于各派之上，居高临下，在各派的争宠、争斗中坐收渔翁之利，稳坐"土皇帝"之位。

阎锡山苦心孤诣的一套任人唯亲、恩威并施、分而治之等用人之术，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人民解放战争还是把他赶跑了。

（刘云虹）

柔石的一段恋情

在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前后，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问题是一个异常活跃，冲击着社会各个阶层的问题。广大被现代性爱意识唤醒的青年男女不仅要求在家庭生活中取得平等地位，而且勇敢挣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桎梏，热烈追求以互爱为前提的爱情。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革命者在努力寻求时代义务、社会责任与恋爱婚姻的一致性，要求把爱情的圣堂构筑在共同的革命理想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就是这种恋爱观的信仰者。

刚满17岁不久，还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柔石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宁海西乡东溪人吴素瑛成了亲。吴勤劳朴实，为人贤慧，但没有文化，和柔石没有共同的语言和追求，因此婚后的生活使柔石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苦闷。1929年，柔石在上海结识了青年女共产党员冯铿。冯铿被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具有红梅一般火热而奔放的感情以及一般女子少有的顽强性格和斗争精神，因而对柔石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两人在参加"左联"和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并肩战斗中，相互之间的感情更与日俱增"冯铿也十分赞赏柔石的文学才华。她在致柔石的一封信中坦诚地说："自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弄得自己莫明其妙，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这就是恋爱么？为什么呢？……"（1930年10月14日）

纯真而炽烈的爱情能给人以巨大的动力。冯铿在给柔石的同一封信中表示："我相当佩服你的强毅，你委实比我高明，不过，也还差得远，离我们所需要的人性。努力呀！太阳是光明的，血是鲜红的，跃动起来呀，我们的心脏！我们大家都是好兄弟，好朋友，我们互相策勉，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创造和寻求真理的道路。"在冯铿的激励下，柔石于1930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心"转换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迅担心地问："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柔石信心百倍地答道："只要学起来！"（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见《南腔北调集》）柔石讲的并不是空话，他精心构思了一部反映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因刚开头即被逮捕，未能遂愿。鲁迅博物馆至今仍珍藏着一张柔石遗稿，题为《长工阿和传》就是这部长篇的提纲。

然而，爱情的道路往往是不平坦的。横亘在柔石与冯铿之间的，不仅有柔石的前妻吴素瑛，而且还有一度跟冯铿同居过的许峨。

冯铿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教师家庭。她姐姐为自由恋爱，倍受封建势力摧残，悒郁而死。姐姐对冯铿说："要学武松的气概，将来替女人们向旧礼教复仇。"冯铿坚定地回答："我不学武松，要学秋瑾！"19岁那年，母亲又忙着张罗为冯铿物色婆家。冯铿不愿重演姐姐的悲剧，于次年跟《岭东民国日报》记者，许峨同居。1929年春，冯铿与许峨同来上海。

关于冯铿跟许峨感情的变化过程，没有留存可以作为直接依据的文字资料。但在鲁迅博物馆保存的冯铿遗稿《重新起来》中，可以约略看出一些端倪。诚然，《重新起来》是一部中篇小说，不能完全作为冯铿的自传看待，但文中的确包含着自传性的因素，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情感的投影。小说的主人公小苹跟她的爱人萍君曾经有过一段一同生活、一同创作、一同战斗的历史，但分别两年之后，双方的情感却产生了一道奇异的膜痕。请看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我说，小苹！你为什么不爱我了呢？"

"萍君呀！问题并不是我们间有谁不爱了谁，而是你我间罩上不同的幕幛了！……你忘怀了革命，你把我们间一同生活着的要素抛弃掉了！"

"革命？……唉！为什么它会在你脑里像生了根般固结着呢？它委实太使我伤心了，我厌恶了它，我对它绝望哩！……几多高贵的生命为它牺牲，为它受尽残酷的灾祸！但现在有芥子般大的成效吗？到头它能给我们一点什么呢？

"不对呀，不对呀！你，你何以会幻灭到这般田地呢？勇敢的牺牲正有他们伟大的代价，整个的劳动群众不是天天在向上，革命的高潮不是重新就要到来么？萍君呀！你离开了革命的怀抱，离开群众的怀抱！可怕呀！你已忘记了我们的事业，而它也把你遗弃了！"

"是的，我的热血是退却了，我只渴望着我们温婉的爱情！"

"你还说我们的爱情吗？完了，完了！我只有爱我们的事业，它才是我伟大的爱人！"

政治思想的深刻分歧，往往是爱情破灭的重要因素；

而爱情一旦破灭，离异则成了合理的归宿。冯铿与许峨从相恋到分手，看来就是循着这一规律发展的。

当冯铿面对爱情道路上的这一重大抉择时，柔石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十分难得的是，柔石1930年10月20日致许峨的一封信完好保存至今，为我们了解他的这一段恋情，了解他的爱情观提供了史料。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学，许峨兄：

我们相见虽只有三数次，但我们早有互相的了解，所以我不辞冒昧的写给你这封信，希望你安静地读完，如有错误的见解，更希望有所指正。

你现在或者在怨我，在骂我，我都接受。因为在这个时代，紧要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争斗上。"一谈恋爱，便无聊了。"我往常常是这样说。这并不是诅咒恋爱，轻贱恋爱，因为恋爱多半有角，有角便有纠纷，有了纠纷便一定妨害事业，贤明如兄，想早知道的。

在我，三年来，孤身在上海，我没有恋爱。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但我的主旨是这样想："若于事业有帮助，有鼓励，我接受，否则，拒绝！"我很以为这是一回简单的事。

一月前，冯君给我一封信，我当时很踌躇了一下；继之，因我们互相多于见面的机会的关系，便互相爱上了。在我，似于事业有帮助但同时却不免有纠纷；这是事实告诉你我，使我难解而且烦恼的。

你和冯君有数年的历史，我极忠心地希望人类的爱人，有永久维持着的幸福。这或许冯君有所改变，但你却无用苦闷，我知道你爱冯君愈深，你亦当愿冯君有幸福愈大；在我，我誓如此：如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再见冯君。我是相信理性主义的，我坦白地向兄这样说。兄当然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亦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欲。这其间，存在着我们三个人的理性的真的爱情，希望兄勿责备冯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在我们，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我相信一定可以解释明了，满圆结束的。所以我向兄写这封信。

闻兄近来身体不好，希望珍摄！并祝努力！

弟柔上

十月二十日

柔石在这封信中表述了以下四个主要观点：一，恋爱是青年的正当要求。二，爱情应于事业"有帮助，有鼓励"。三，恋爱是革命事业的辅助品，革命的位置高于爱情。四，当发生爱情纠葛时，应保持清醒的理性，以对方的幸福为重，决不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的肉欲。柔石的恋爱观，是他"损己利人"的道德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现了烈士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崇高的道德情操。

令人痛心的是，柔石与冯铿爱情的幼苗刚从心灵的沃土上滋生，即被白色恐怖的魔爪摧折。1931年1月17日，柔石约冯铿出席党内一次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秘密集会，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案的还有其他30余名革命者。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备加折磨，狱中生活极为惨苦。柔石2月5日致同乡王育和的一封信中说："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按：即冯铿)脸堂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转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

信中所说的"大先生"指鲁迅，"蔡先生"指蔡元培。然而，各方面的营救都没有希望。2月7日凌晨，柔石、冯铿等24位革命者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刽子手秘密杀害于龙华刑场。柔石头部和胸部连中10弹，终年30岁；冯铿身中7弹，终年24岁。这一惨案震动了全国，在国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鲁迅沉痛地感到他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他不顾个人安危，奋笔写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悼念和抗议的文字。他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陈漱渝)

流行风

电影《野草闲花》

《野草闲花》由黄绍芬摄影。它描写一个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的有钱少爷(金焰饰)，爱上一个街头卖花女(阮玲玉饰)。在少爷帮助下，卖花女成了有名的歌女。但她与少爷的爱情，却遭到老爷的阻拦，于是，少女忍痛与少爷断绝关系。后几经波折，两人终于打破门第观念而结合。孙瑜自称这部影片受《茶花女》和美国影片《七重天》的影响，表露了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抗议和对下层社会的同情；但他回避了本来可以发展下去的现实矛盾，缓和

了“茶花女”式的悲剧，而安排了老爷的妥协，以大团圆结尾，从而也表现出他的主观意识或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艺术处理上，总的来说，和当时绝大多数影片相比，导演手法有不少新颖之处。如对比手法的运用，风景镜头的穿插，都有自己的特色。影片中的《寻兄词》是中国第一支电影歌曲（制成唱片，在影院配合影片播放），很受观众欢迎，并广为流行。这部影片为联华公司奠定了基础，令人看到中国电影的转变和希望。孙瑜也被誉为“新派”导演。

小说《虹》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作品以梅素行在四川和上海生活经历为主线，展示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代的面貌和青年思想发展的历程。主人公梅素行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为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离开成都，但黑暗的现实激起了她的憎恨和复仇情绪。“五卅”革命浪潮来到时，她在革命家梁刚夫的帮助下，学习革命理论，踏上了通向理想天国之虹。小说揭露了在“五四”时期那些借标榜新思潮以谋私利的旧军阀的种种丑态；描绘了“五卅”前夕革命工作者热情宣传马列主义，与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以及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权而斗争的情景。作品还充分地反映了“五卅”运动的历史过程，揭露帝国主义罪行，热情地歌颂了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

小说《啼笑姻缘》

作者张恨水，主要内容：写以樊家树为中心的多角恋爱故事。大户少爷樊家树在北京读书时与天桥卖唱姑娘沈凤喜相爱，后因军阀刘德柱从中插手，拆散鸳鸯，酿成悲剧。小说还写浪漫女子何丽娜和卖艺人关秀姑两人同时爱上樊家树，其中又插入关寿峰父女为樊、沈锄奸报仇等情节，使缠绵悱恻的言情故事添上武侠传奇的色彩。作品通过这个悲欢离合的情节，揭露了封建军阀、达官贵人为非作歹、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同时，歌颂了樊家树在爱情上不依重门第观念和金钱权势的平民化思想。描写弱女子沈凤喜的悲剧亦有社会现实意义。书中把对封建黑暗势力毫无抗争精神的樊家树当作理想人物加以赞扬，把对封建权贵势力的反抗寄托于豪侠的单枪匹马的暗杀，反映了作者的小市民意识，未能从阶级矛盾中观察和描写社会本质，是作品的思想局限。情节环环相扣，曲折动人，结构严密，不少人物个性鲜明，是作者带着旧派小说痕迹向现代小说过渡的代表作，在当时社会上颇有影响。

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徐志摩）

歌曲《采桑曲》

晴采桑，雨采桑，
田头陌上家家忙。
去年养蚕十分熟，
蚕姑只着麻衣裳。

历史档案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一、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海军会议以后，各国战备的竞争更加急剧，法意冲突的尖锐，英日美极力操纵中国军阀战争，显示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更加迫切。日本极力利用白俄扰乱的阴谋，白里安组织欧洲合众国以一致进攻苏联的企图，美国指使美洲各国对苏联绝交，环绕苏联各小国波兰、立陶宛等在美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军事的动员等，更表现着帝国主义一致向苏联进攻的紧迫。这是由于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从它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产生出这样不可解决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的汹涌，失业斗争的扩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绩，更增加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社会民主党以及他的左派日益丧失他在群众中的地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起来，尤其使我们严重注意的，普遍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革命的高潮，安南的暴动，以及其他各殖民地的扰乱，中国革命急剧的发展，这样一切，都是在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的基础。因此帝国主义更加紧迫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以挽救自己的危机。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这样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便是说明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这一国际形势，无疑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时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

（二）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激剧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革命最深入的地方，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最易于尖锐化——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及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假如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末日到临。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一致的用尽一切的可能极残酷的来镇压中国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必然要遇到与帝国主义的极残酷的战争。可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到了这一残酷战争的逼临，我们不只是可以动员国内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对帝国主义作激烈的斗争，并且可以号召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

（四）对于这一形势认识的错误，成为取消思想与一切右倾思想最主要的根源。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才有可能"，以及一切右倾同志认为"现在革命固然是在发展，可是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和估量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条件，要选择在"帝国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的省区"，都是不了解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而掀起全世界大革命，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可能的客观条件，而勇敢的争取这一前途。我们必须明确的指出这一悲观的右倾观念的错误。

二、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

（五）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两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国内军阀混战，已进到异常剧烈的恐慌。金融紊乱，产业衰败，失业的危机日益增加。百物昂贵，劳苦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农村经济更是空前的破坏。普遍全国的灾荒兵祸，使千万

群众陷于饿冻流离死亡的境地。南方大部分的区域都处在农民与地主的残酷战争当中。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已经无法挽救这样的危机，无法统一全国，而且都必然要更加瓦解，更加崩溃。另一方面，工农劳苦群众处在无法生存的境地，只有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这就完全说明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回答了取消派"资产阶级统治正在稳定"的谎言。并且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的向前发展，工人罢工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广大工人群众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经过今年红色五月——五一与五卅，普遍各地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农村斗争，无疑的已经进到极广泛的高潮，不只是使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在农村中崩溃起来，而且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统治全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对立起来。经过这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必然要有更迅速的扩大。加以红军的猛烈发展，与军阀军队士兵群众的革命化，自觉叛变的增加。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

(六)这样一方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极明显的指示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并且只有工农群众的革命暴动的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斗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七)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革命的先进阶级，一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中爆发起来。可是如果只看到现在城市与乡村发展尚未平衡的表面的形势，而忽视着工人斗争，阶级对抗的异常尖锐化，广大群众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正在飞速的增加与统治阶级统治力量的日益削弱与破产，这样形势之下，在每一个事变上都有爆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可能，那末必然要形成严重的右倾甚至取消思想。工人罢工运动尚未形成革命高潮的主要原因，决不是工人革命觉悟的落后，尤其不是工人不需要革命，而是由于正在崩溃的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白色恐怖与欺骗，极力来镇压工人斗争，所以城市的斗争比乡村要更加严重，更加残酷，这就说明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于城市工作，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现在工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工人斗争的怀疑悲观的右倾观念，肃清这样的动摇，是推动工人斗争高潮迅速到来的主要条件。

(八)就一般的说，并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大的斗争，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不仅如是，而且在现在的形势，如果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斗争，这就是统治阶级不只是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无力镇压革命斗争，无法统治的时候了，这就有了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指出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要紧接着武装暴动。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只是要注意政治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而且就要加紧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认清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会犯到策略上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忽视武装暴动准备的必要，而且无疑的会成为群众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

(九)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所以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首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与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义是极端错误的。

三、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

(十)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十一)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要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定要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的条件，积极争取这一胜利的实现，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可是要注意革命已经或者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国帝国主义，要暂时抛弃他们互相的冲突，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第一次大革命时，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马上遇到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所以必须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革命政府才能很迅速的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拼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和一致斗争，以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只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斗争，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所以在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全国工作，同时加紧，并且要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

（十二）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更要注意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这残酷斗争必然比乡村更加厉害，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在主要城市，尤其是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强固的基础，唤起广大群众拼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十三）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取消红军，无疑的是企图削弱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农民在革命中伟大的作用，在中国有更严重的意义；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红军，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样认现在城市的工人斗争，尚未进到高潮，要农村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士兵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表现着不够，所以我们是要特别注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同时要抓住农民暴动的发展，士兵暴动的爆发与红军猛烈的扩大。

（以下略）

中共中央通告（第八十四号）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一切事变的发展，都在证实或已经证实六月十一日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对于政治局势估计的正确。已经成熟了的中国政治经济与革命的危机，都在加速转变的过程，军阀战争高度的发展，造成的更大混乱，与经济破碎，工人失业，农民极度的贫困化，城市贫民大量的增加，再加食粮的恐慌与生活程度的激昂，这样的把广大群众都卷入反军阀战争的战线。工人罢工示威，农村斗争的高潮，地方暴动与兵变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革命高潮前夜的形势。这一个形势，一般的都在猛烈的向前转变的推进，向着更高的形式发展。在这一个形势底下，党的任务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组织总同盟罢工，是目前的中心策略。

二、对于这一个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目前党内主要的右倾危险。因为对于革命形势转变估计的不够，对于策略的执行动摇的右倾，并且有的省份不能站在整个革命形势的立场上来坚决地执行党的策略，而发生一种地方的“例外观念”，以及对于工作布置，不能抓紧革命形势的转变而更加展开。这一切都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转变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右倾危险。这一切右倾危险，就是机会主义的前提，我们应当坚决的与这一右倾倾向斗争，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正确执行。

三、在革命形势加速的向前转变，党应当夺取广大的群众，更实际的加紧准备全国武装暴动，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实际布置。加紧反对世界大战，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在这一个总任务下，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执行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策略战线。为能充分的实现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所决定的策略战线，应加紧以下的工作布置：

（一）各省须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使同志能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

（二）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煽动工作。党应该印刷各种宣传品，每天经常的向群众中散发，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一定要认清楚，今天如果能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煽动，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广大群众都能在党的政治影响领导之下，而作坚决拼死的斗争。

（三）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在今天一定要认清革命形势的转变，与斗争形式转变的迅速，在一个前提下来发

动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目前斗争形势，客观上已经早已具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的条件。没有能很广大发动起来的原因，主要的是执行策略上的右倾倾向：(1)对于革命形势转变认识不够的动摇；(2)不能坚决的提出政治口号来发动；(3)组织同盟罢工，缺乏整个的布置来抓住中心发动，而是组织中心斗争来推动同盟斗争的观念。应当坚决以政治要求来组织斗争，并应运用合适的同盟罢工的新的斗争方式。

(四)为适应总同盟罢工与同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采取新的组织斗争的方式。组织同一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各纱厂、市政等)，这一个委员会是一个群众系统，同时集中党的力量。各个产业的行动委员会，直接在市总工会的指导之下，若因地域不集中，可以建立分会(如上海沪东、沪西的纱厂委员会分会)，每一个工厂同样建立委员会，在他的下边团结群众的及党的活动分子于其周围来行动。每一个行动委员会，党派出得力同志参加或主持。如果该区区委所属的重要工作对象是纱厂，那末，区委重要工作负责人应参加主持该区分会。每一个行动委员会应当每天开会，计划与指导这个产业的同盟罢工的工作，只有这种方式，才能适应目前新的斗争形式。

(五)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是组织斗争的先决条件。极力纠正群众组织的狭隘的右倾观念，应以赤色斗争纲领，运用公开的群众路线，广泛的发展与建立赤色工会，经过赤色工会来扩大建立工人纠察队的组织。

(六)赤色先锋队与党员军事化。赤色先锋队是准备武装暴动的具体的军事组织形式，他完全是军事系统，属于军委。每一个支部以及青年团支部及工会党团，都应有军事特派员，负责建立赤色先锋队，每一个党员都应负责建立赤色先锋队，党员除在支部内受特殊的军事训练以外，一般的应在赤色先锋队内受军事训练。

(七)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目前应当猛烈的扩大与大规模集中，消灭当前的敌军，向主要战略目标进逼。目前红军扩大与发展最困难的问题，是地方党部、苏维埃与红军关系不好，现在在战区内应立即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最高政治军事的指导机关，集中统一指挥。

(八)组织地方暴动。在今天组织地方暴动，应是中心产业区域武装暴动的联接点。目前应加紧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使其与整个革命转变的形势配合，与城市武装暴动相衔接。

(九)加紧士兵运动与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士暴动。目前士兵运动一定要与我们准备武装暴动的主观力量来对比，以加紧军阀体系的中心部队工作，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士兵暴动，必须要与整个革命形势转变来配合。

(十)农村中与苏维埃区域工作，应当有极大的转变。积极发展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苏维埃区域应站在急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立场上。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领导，广大的动员，普遍的武装群众，猛烈的扩大红军，建立雇农工会与贫农委员会的组织，巩固与中农的联盟，镇压富农的反动。

(十一)城市贫民工作。组织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应建立贫民群众组织与武装组织。

(十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是党的组织主要路线。在大产业中发展党员，坚决执行向产业工人开门，建立支部生活，是目前党的主要组织任务。在农村中巩固阶级领导，建立党的基础于雇农群众之上，坚决肃清在党内的富农成分。

(十三)最后，各地对于工作布置，应当站在全国革命形势的立场上，与全国首先胜利的形势配合。

中央

阎锡山劝蒋介石下野之蒸电

(一九三〇二月十日)

南京蒋总司令钧鉴：佳(九日)申电奉悉。中国危亡，已达极点，诚如钧论。锡山前由郑北返，深虑党国前途，非有切实办法，不易收拾。反复筹思，每至昼废其食，夜失其眠，终无法以纾党国之难，解钧座之忧。继虽有一得之愚，屡欲与钧座言之，尚未敢冒渎聪听者。诚以党国前途，关系甚大，尚欲再加考虑耳。今读钧电，肝胆照人，沁入肺腑，情不自已，敬为钧座陈之。窃念钧座受先总理付托之重，艰难缔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而后功成身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休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助钧座者，区区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变乱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战)日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忧国之心，不易表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疑谤丛生，此锡山所以忧心如焚，终夜徬徨而不知所措也。以钧座爱党之切，忧国之深，负责之勇，锡山非惟不忍与钧座进消极之言，抑亦不敢自言消极也。继思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锡山以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原为先总理在天之灵所殷望，亦即钧座与锡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我总理以中西文化精神，创造三民五权之最高原则，实足为世界开大同先例。不幸粤沪分裂，三全

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个之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议决案。如有跋扈军人，违抗国家命令者，仍由钧座以党国元勋之资格，负责纠正。锡山不敏，窃愿追随钧座之后，略效绵薄。抑锡山尤有进者，前此西北事起，锡山自思，即不能解决西北军饥寒之苦，有失信约，又不能为国家消兵戎之祸，有愧职责，日夜彷徨，无以自解。曾两次派员购得船票，意欲离国他游，藉请愆戾，而迟回却顾，迄未能奋然而去者，诚恐孤钧座殷殷图治之苦心也。今者锡山确认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于民主党治之下，锡山决意下野，以遂初衷，实不敢以不忍孤钧座者，致负钧座。且礼让为国为黄种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日救国唯一之途径。钧座以仁让风全国，岂特树党国亿万年之基，导全国亿万人礼让之路。从此钧座之苦心即可大白于天下，锡山以驽骀得附骥尾，亦与有荣焉。披洒上陈，敬祈垂察。阎锡山叩蒸（十日）印。

（选自《国闻周报》第七卷第六期）

蒋介石复阎锡山电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

限即刻到。阎总司令百兄勋鉴：蒸（十日）电奉悉，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语。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筹办编遣，悉取公开，苟非反动派运动一部分不退之武力，以为扰乱之工具。全国兵戎早息，中央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对于凭藉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有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中正绝非贪恋权位之人，去年四月讨桂，曾宣言军事结束，即行辞职。不幸叛变迭出，责任未尽，遂使弟又不得不继续尽瘁，存死而后已之心。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而革命救国之本怀，则未忍须臾背弃。我兄革命元勋，党国安危所系，不可隐遯鸣高，轻卸救国重任。窃谓目前党国艰危已极，但我辈能一德一心共谋匡济，消弭反侧，实非甚难。一俟和平统一真正完成。国民革命进行无阻，兄如有四海漫游逸兴，中敬当追随同行。今则绝非其时，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极，取消下野之意，同竞救国之功。临电迫切，敬候赐覆。弟中正叩文（十二日）印。

（选自《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七期）

阎锡山等四十五人通电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限即刻到。北平、上海、天津、香港、广州、汉口各省会各报馆，转全国各省、市、县、区暨海外中国国民党党员诸同志均鉴：慨自党内纠纷迭起以来，由党争而变为兵争。士兵则死亡枕藉，人民则困苦颠连。对外无御侮之能，对内失统驭之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党将何党。夫今日之争，纯系煮豆燃萁，不当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所争者，三届续统与二届复统两点。而主张息争者，拟由一、二、三、届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党员外组织临时国民党党员干部会议，于最短期间，成立四届。锡山等窃思党的主权，在全体党员。无论如何主张，果取决于党员，何者亦可。若纯以武力决胜负，非特不当，实亦不必。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否则各是其是，乱不能止，何以置党国于磐石之安。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先为党国至理，丝毫不爽者也。彼不妥协三字，乃是对外适用之精神。若在同党，允宜整个团结，以国家为前提。体先总理在天之灵，必不愿其党徒分争，而深盼其党徒合作也。全体党员为本党主人，果能贯彻全体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场之干戈，为会场之表决。如荷赞同，尚盼早见实行，以息党争，而定国是。特电陈词，敬祈鉴察。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鹿钟麟、何键、韩复榘、刘文辉、毛光翔、宋哲元、李培基、金树仁、徐永昌、商震、杨爱源、刘郁芬、王金钰、石友三、白崇禧、胡宗铎、孙良诚、孙连仲、孙楚、黄绍雄、张发奎、傅作义、杨效欧、庞炳勋、田颂尧、孙魁元、杨森、万选才、邓锡侯、赖心辉、刘春荣、刘存厚、林忠、林寿昌、高桂滋、高义、杨虎城、杨汉立、刘珍年、刘桂堂、卢兴邦、陈国辉。漾（二十三日）印。

（选自《国闻周报》第七卷，第八期）

鹿钟麟讨蒋通电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

（衔略）慨自蒋氏祸国，海内骚然，各方问罪之师，前仆后继。残民以逞。凶焰愈张，一夫横行，全国同愤。今者阎、冯两总司令，不忍党国沦亡，人民痛苦，毅然兴起，倡义讨贼。兹经各方公推阎公总长陆海空军，冯公焕章、张

公翰卿、李公德邻，共奠党国联合各军，同伸挞伐。钟麟谬膺军寄，仗义不敢后人，现已奉命伐罪，督师前进，为国锄奸，义无反顾。惟有应为我武装同志郑重声明者，幸垂察焉，祸国殃民，蒋氏实独负其责，义师所加，亦惟独夫一人，以讨贼为目的，以救党国救人民为主张。但知尽我天职，毫无权利思想。使蒋能朝去，而夕可罢兵。回想年来蒋氏外假三民主义之名，内实以党皇帝自居，骄奢淫夫，暴戾专横，阴谋操纵，挑拨内战，非除异己，摧残革命，滥发公债，扣留赈粮，伤天害理，苦我商民，同在青天白日旗帜下，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何莫非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主义，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残害者何莫非总理信徒。同为中华民国人民，而横被压迫剥削，甚至遭旱灾而饿死，遇兵祸而惨亡，死亡者何莫非蒋氏倒行逆施所致。是善言为其说完，而恶事为其做尽。凡我国人，疾首痛心，已非一日。今兹讨贼，凡我袍泽，如在同一战线，皆我忠实同志，即皆我亲爱友军。以主义为结合，不以疆域而歧视。虽昔时主张偶异，而今者精神皆同，殊途同归。成功则一，耿耿寸衷，当可共鉴。且军队乃党国人民之武力，而非个人之武力，蒋氏罪贯满盈，自绝于党国人民，我武装同志，出生入死，为革命而流血所得之国家，将断送于蒋氏一人之手。人之爱国，孰不知我，谁肯甘心屈伏，为彼傀儡。昔者慑于淫威，迫于环境，隐忍含怒，莫敢先发。今则顺逆之势既明，去从之途宜择。我知各方袍泽，义愤填胸，投袂而起，有不俟终日者矣！抑尤有进者，国人苦战祸久矣。钟麟酷爱和平，岂忍轻启兵端，惟以蒋氏党国罪魁，人民蟊贼，蒋氏不除，党国日危，人民日苦，故为一劳永逸计，不得不忍痛一时。殆所谓毒蛇在手，壮士断腕者也。尚望全国袍泽，一致奋斗，共救党国，共救人民。否则一日纵敌，张彼毒焰，使得顽抗，延长战祸，陷党国于阽危，增生灵之涂炭，是皆我武装同志之责也。爱党国爱人民者，当不出此。凡此愚昧之见，皆国人心理所同，然俊杰识时，明哲见几，猛着先鞭，共矢澄清，以至诚之精神，作最后之努力，谨此宣言。鹿钟麟叩。

（选自《国闻周报》第七卷，第十二期）

蒋介石：以整齐严肃的治军精神治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国府大礼堂讲）

中正遵奉中央命令，兼任行政院院长，今当就职到院之始，谨将此次四中全会决议，改善制度，刷新政治之用意，与中正受命以后矢志尽瘁之决心，及其所期望于本院暨所属各部会各省市政府诸同志者，撮要言之。

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至今日，行政效率不佳，国事旷废如故，事实公睹，无可讳言。顾在今日以前，我同志犹得执两说以自解：一为反动频起，军事未定，百废莫举，此为总因。行政界虽思鼓其热诚，而效率终小；一为制度未臻完备，权责不尽分明，本院各部会长官不出席国务会议，不直接对国府负责，遂至行政会议不能为系统之研究，各部会间亦失却密切之联系；即或有局部之振作，仍难救全盘之散漫。此二说者，固皆有一部份之理由，然真富于责任心之同志，仍应各自检查其本身之过失而不得悉诿过于外缘之障碍；何况今日以后，叛逆既已铲除，民治应上轨道，制度又复改善，权责悉可分明，更绝无诿卸躲避之余地乎！此次四中全会对于过去政治之实际工作，为严密之考查，认为非改正制度，无以谋密切之联结，非减少机关，无以期工作之紧张，尤非以整齐严肃之治军的精神治政，无以振颓靡之风气。爰就中央之制度系统，加以相当之修改。其最重要者即将以前之行政会议改为国务会议，俾本院各部会长官皆得对政府直接负责，而本院院长之人选，复以责之中正。诸同志于此，应知中央重视本院与厚望各位同志之切实，不能再蹈荒废松懈之恶习。当此军事善后，着手整理，且注全力于剿灭匪共，完成地方自治之时，倘行政部份，仍不免有泄沓因循纷歧凌乱之现象，则政治之革新，终不能与军事之进步相应；匪共终不能肃清，地方自治，更无从推行。盖铲共剿匪之工作，军事祗能治其标，政治方能清其本；而地方自治之推进，尤必以中枢政治之修明为之基础。行政效率低落，即不啻为匪共造机会。中枢政务废弛，又何以为地方作楷模！不幸至此，我同志非特无以副中央期望之殷，直将为总理及诸殉国先烈之罪人矣！中正德薄能鲜，所以受命而不乱者，深惟总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遗训，尤有鉴于数年以来，牺牲无数将士之生命，损害无数人民之财产：其最大原因，厥为未能举革命政治之实，以与军事之进步相应，实不敢稍自暇逸，放弃其革命之天职，而不能不于致力军事之际，兼致力于行政。尤愿以整齐严肃之治军精神，用于治政。此志能否达到，尚赖诸同志之勖勉督促，而本君子爱人以德之旨，中正对于诸同志之责勉，殊亦未敢稍宽也。今日以前，政治风习之宜矫正，设施之宜改善者，中正会于四中全会提案中撮要列举：一曰、权责未尽分明；二曰、任用宽严无准；三曰、不尊重系统；四曰、弛怠而不负责；五曰、贪污之风未能尽绝；六曰、不明政治体要，而迹近织苛，与民争利；七曰、因循顾忌，徇情而不能任怨。凡兹七者，诸同志以后应随时切实审查，严密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诸同志应首先自知其为整个政府中之一体，对于其主管事项，固应恪恭将事，同时尤须顾及整个政府之施政方针，而不可专为各顾本身畸形之发展，而不顾全般情状，甚至攘夺与侵占他人权利。至对于财政出纳，尤必确守中央颁布之试办预算章程及审计办法，其主管部分之收入，更不得视为其部之专有而别为保管，任意支配，缩小国计之收入，破坏会计之统一。诸同志尤须明

湜其自身为革命政府之一分子，任人必求公平，律己必求廉洁，勿稍有贪污之行为，商业化之趋向，而贻贱丈夫垄断罔利之讥，贻革命政府以莫大之污点。勿以市恩私室之故，而贻害国家，拘牵情面，袒庇贪污，祸国殃民，莫此为甚！中正所用以自勉，并勉诸同志者，厥在毋忘其自身为整个政府之一体，为并革命政府之一分子。今后本院第一重要之工作，既在确立施政之整个的计划。以后各部会皆须于此整个计划之中，分工合作，以求进步。其次，为督率各部会切实造具预算。各部会所造预算，经本院核准者，本院必为负责筹拨，勿虞短欠，其预算所未具而非为确实需要，提经本院核准之临时用款，各部会长官应负责清理。为严密考核各部会之用人有无偏私，施政有无弛怠，用款有无浮滥，各部会长官更当以此严密考核所属各机关，果有溺职徇私、舞弊罔利者，必当尽法惩处，不稍徇纵。各部会长官，更应视其所属员司之失职，既为其自身之失职。必如此，而后政治有清明之望。自今日起，本院及各部会诸同志，本此方针，可各安心任事，果能无忝厥职，决不随便更动。其或怠弛职守，侵越权限，浮报预算，蔑视法纪，其或敢为舞弊营私之举者，中正为奉行革命政府之职权，肃正革命政府之纪纲，无论何人，皆必破除情面，按照情节轻重，分别惩治，决不稍有宽假。对于在各省市政府工作之同志，今日未能集合一堂，相见谈话，但亦望其共体此意。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但同志间之规勉，不敢不尽其意，甚愿诸同志遵守四中全会议决各案，实力奉行，并随时督促中正，共同努力，俾无愧对总理及诸先烈在天之灵，实党国前途之大幸也。

（选自《蒋总统集》台北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3日　阎锡山、何成浚等抵郑州，四日开军事会议，方本仁、刘镇华、韩复榘、魏益三、万选才均列席。五日，阎委大批讨唐军官。

1月5日　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信给林彪，批判林的右倾悲观思想，指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

同日　中东路督办莫德惠抵哈尔滨就职。

1月6日　福建军阀内部矛盾加剧，卢兴邦在福州发动事变，驻龙岩"会剿"红军之敌刘和鼎五十六师撤离，参加对卢兴邦的战争。

同日　安南华侨四十人，以无力缴纳人头税，被驱逐回汕头。

1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内部刊物《军事通迅》创刊，发表了《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及周恩来的按语。

本月　下旬，红四军四个纵队在江西宁都东韶胜利会师，同时以纵队为单位在赣南广泛分兵发动群众。

2月6日　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军五军、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举行联席会议，至九日结束，讨论了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分配土地问题。

2月9日　蒋介石电阎锡山，谓平定两广确有把握。十日阎复蒋电，高唱礼让为国，力言武力不足以统一全国，诸共同下野。十四日蒋发表谈话，谓目前正吾人努力奋斗之日，绝非高蹈远引之时。

2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决议通令禁售《清史稿》，十九日行政院发布禁售令。

2月20日　沪报发表北平全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李济关于在河南安阳掘出殷代古物之谈话。

2月23日　冯阎李等四十五人通电，主张投票解决国民党党统问题。

2月25日　上海纱厂联合会提出，中日关税条约中不得以日制棉纱布作为互惠物品。二十六日，上海面粉公会反对中日互惠关税条约。

3月1日　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会，六日结束。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制定三民主义伦理标准；实施三民主义乡村教育等项。

同日　张学良劝蒋介石、阎锡山息争。二日，阎复张赞成和平，三日，蒋电张详述阎联合武人、倡为谬说及各种军事行动之情形，及三中全会派员查办之原由。五日，阎通电下野出洋。

3月6日　上海法租界已停业之祥昌棉织厂失业工人千余，因要求开工，与法工部局巡捕冲突，被枪杀三人，伤二十余人。

3月15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三十余县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同日　晋军商震通电阻阎出洋。西北军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司令。

3月17日　梁启超之家属将梁所遗藏书四万二千余册赠予北平图书馆。

3月18日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二十四日闭幕，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检查了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问题，宣布成立闽西工农民主政府，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等三十五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邓子恢任主席。

同日　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红军合编为红一军。

同日　蒋介石的北平总司令行营卫队被晋军缴械，行营被接收，其在平宣传机关均被查禁停止活动，党政机关亦被派员接管。

3月19日　阎锡山、冯玉祥拟于北京组织军政府，派员访问各国公使、代办，探听各国态度。

3月20日　西北军向郑州集中。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

4月2日　陈公博抵太原，宣称推阎主持政治，冯、李赞治军事，汪主持党务。

4月7日　国民党中央将阎锡山永远开除国民党籍。

同日　南京卫戍司令部查封陶行知创办之晓庄师范学校。十二日，国民党复下令通缉陶行知，谓陶"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

4月12日　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取缔集会结社。

同日　上海公共租界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将一周，电车工人继起罢工，以为援助。

5月1日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发《土地法暂行条例》。

同日　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阎、冯会于彰德。

同日　阎锡山令津海关将关税及附税扣留，分存中、交两银行。

5月5日　阎锡山所委的前敌总副司令鹿钟麟、徐永昌就职。

本月　平江起义的红五军第四、五两纵队抵鄂东南苏区。

同日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等问题，制定出"土地暂行法"。

5月29日　《新思潮》月刊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载潘东周《中国的经济性质》，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从中国经济的性质，土地关系，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批判取消派宣传的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的社会，封建势力已是残余的残余，中国资本主义正在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等论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从此开始。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主持，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形势已具备了在全国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订出了立即组织全国各中心城市起义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立三"左"倾路线出现。

同日　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长汀南阳（今上杭）召开联席会议，十三日结束。会议对闽西党的土地、婚姻、财政、经济等政策，作补充和修改，通过《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在分田办法中，除了原来的"抽多补少"原则之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这一原则。

7月7日　蒋介石极力拉拢东北军以增加其倒阎实力。六月二十一日、任张学良为海陆空军副司令，后又委于学忠为平津总指挥。

7月13日　经赵丕廉、冀贡泉之调停，西山会议派与粤派关系缓和，在北平组成扩大会议。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陈公博等三十余人联名发表汪精卫五月七日之党务宣言稿。同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委汪精卫等发表发起扩大会议宣言，谓现在讨蒋期间"组织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凡前中央及现在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均应一致参加组织"。在沪第二届中委及西山会议派发表赞成宣言。

7月18日　辽宁省风雨成灾。浑河、辽河暴涨，北宁路新民、白旗堡一带因河水泛滥。冲毁良田，平沈铁路交通中断。

7月19日　阎锡山电汪精卫促其北上。二十三日，汪精卫、顾孟余抵塘沽，冯、阎之代表及陈公博、邹鲁等迎之。

7月27日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击败蒋军何健部，占领长沙，宣布成立湖南临时苏维埃政府。长沙城内成立了市苏维埃、区苏维埃、党区委。新政府没收富户粮食，分给贫民，没收反动军阀及阴谋不轨的外国公司财产，保护安分外侨生命财产。释放了政治犯。

7月28日　北平扩大会议开会通过七项基础条件，重要内容为：筹备召集国民会议，按照建国大纲制定基本大法；倡导地方自治；党部对于政府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

7月29日　红三军团政治部在长沙出版《红军日报》，共出六号。

8月1日　长沙举行十万群众大会，会后红军主力向南出动。萍浏赤少队进驻长沙。

同日　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

同日　湘军阀与英、美、日、意军舰协同炮击长沙。

8月3日　彰武大雨为灾，山洪甚大，深丈余。台安、开原、法库、西丰均被灾。

5日　红三军团退出长沙。

7日　改组派汪精卫等与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通过"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

11日　蒋介石派代表张群、方本仁陪同张学良从葫

芦岛赴北戴河。三十日，张自北戴河回沈，方本仁、吴铁城与之同行。

15日　蒋军进入济南，晋军向黄河以北退却。

15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上海创办，系由原《红旗》《上海报》合并而成。

8月21日　台湾宜兰东南海中发生七级地震。

9月8日　阎锡山电张学良，以北平政府各部长之半数归张支配，请求赞助，否则请发和平通电，出任调停，均为张拒绝。

9月9日　北平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汪精卫、谢持等为国民政府委员。十一日，冯玉祥在郑州就北平国民政府委员职。

9月24日　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二十八日结束。周恩来作报告，瞿秋白作总结。这次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

9月30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问题》的报告。

10月16日　中共中央为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受打击的何孟雄平反。

同日　陈济棠在梧州召集会议，决定对张、桂军以武力解决。

10月17日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举行会议，对时局、土地、资本诸问题作了决议。取消打南昌之原计划，决定向袁水流域进军。

10月23日　红一方面军到达新余县罗坊。

同日　国民党在汉口开鄂湘赣三省"剿共"会议，会议主席何成浚、鲁涤平、徐源泉、何健皆参加，商谈其军队配备、经费、联络等事。

10月30日　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11月3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电影检查法。

11月4日　阎锡山、冯玉祥电张学良，声明即日释权归田。

11月8日　贺龙率部进攻津澧。

11月12日　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吉安举行。会议研究赣西南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根据到会代表发言写成《赣西土地分配情形》。

同日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会。张学良列席。重要决议有：一、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二、"铲共剿匪"应视为最要急务。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办理完竣，于必要之地区，得设临时之总揽指挥机关；三、取消编遣会议；四、永远开除参加扩大会议分子的党籍；五、蒋介石兼行政院长。

11月15日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吉安举行扩大会议。到会的有省委常委，永新、吉安、太和、万安、吉水、安福、分宜、峡江等县苏维埃主席及二十二军陈毅，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着重讨论了"分青"和"租田"两个问题。

11月18日　国民党会秉藩、罗霖两师侵犯吉安，红军退出。

11月24日　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行委，提出要加紧筹办红军给养，做好反"围剿"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2月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会议上作《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报告。

12月初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宁都黄陂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反"围剿"问题。会后发出《八个大胜利的条件》

12月4日　蒋介石电汉口行营，限三省"剿共军"于一个半月内夺回已失城池，否则以违令论罪。五日，蒋视察湘鄂赣三省"剿共"军队。发表告误入共产党民众书，谓此次"剿共"大军三十余万，兵舰二十余艘，飞机数十架"四面围堵，无异网罗"。

12月9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师以上军官开"剿共"军事会议。十日，蒋与张辉瓒磋商"剿共"事宜。十三日，蒋在庐山策划湘鄂赣三省"剿共"方略。

12月10日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接受黄绍竑劝告，致电古应芬、陈济棠、陈铭枢，提出和平解决条件：(一)南京给黄绍竑主持军政民名义；(二)从新指定张、桂军集中地点。南京主张上述两事决定，李、白即须出洋。

12月中旬　赣东北特委扩大为赣东北省委，以唐在刚为省委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同时成立赣东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以方志敏为主席，邵式平任省军委会主席。

军　事

1月3日　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转战江西。毛泽东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转移。

1月10日　朱德率红四军一、三、四纵队从清流进入宁化。

1月16日　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从明溪进入宁化。

1月20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在六安成立。

2月1日　广西警备五大队在左江龙州发动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邓小平任红七、八军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

2月3日　红四军占领会昌、南丰等县。

2月5日　鄂西红军一、二纵队在湖北临利会师，成

立红六军，军长孙一中，政委周逸群，一纵队司令段德昌，二纵队司令段玉林。

2月24日　红四军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复、施家边消灭敌唐云山一个旅约三千人。

3月23日　红四军与江西军金汉鼎部激战，红军克大庾、南康。

同日　贺龙部在华容与湘鄂国民党军开战。

4月1日　红四军解放南雄。

同日　阎锡山就中华民国总司令职，通电称："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必起而讨伐之。"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司令职。

4月23日　冯玉祥以副司令名义，颁布命令，向蒋介石军队作战。

4月25日　湘鄂西红军占领仙桃镇。

4月26日　阎锡山总部发行战时通用票六百万元。

4月30日　蒋、冯、阎、李中原大战之前哨战在砀山开始。

5月10日　蒋、阎、冯、李在陇海路马牧集及鲁西皖北两翼开始交战。十一日蒋下总攻击令。十五日蒋赴归德督战。

5月20日　平汉路蒋军上官云相、赵观涛等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颍，并进迫许昌。蒋第三集团军总指挥何成浚由驻马店赴漯河。二十三日，津浦路北段也发生战争。二十五日，陇海路兰封、柳河间双方激战。三十日，阎赴沧州督战。

6月8日　桂军白崇禧部占长沙岳阳，蒋介石调兵防御。

6月13日　西北军吉鸿昌部在亳县与蒋军作战。

6月17日　蒋军攻入长沙，白崇禧、李宗仁之桂军退往醴陵。十九日，何应钦到长沙，指挥其部队围攻湘赣边境之桂军和张发奎军。

6月中旬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成立，军团长彭德怀，滕代远为政委。全军团一万七千多人。

6月22日　红四军、闽西红十二军和赣南红三军在福建长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为朱德。毛泽东为政委，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团约三万人。

6月27日　晋军傅作义部进入济南。

7月1日　红军黄公略、罗炳辉率部万余人分五路围攻吉安。

同日　中共宁化县委员会成立。

7月2日　张发奎军及白崇禧、李宗仁桂军退湘南永州，一部回桂边。

7月4日　湘鄂西红四军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总指挥为贺龙，政委周逸群，下辖红四军和红六军。红四军番号改为红二军，孙德清为军长，朱逸之为政委。红六军军长为邝继勋，政委柳直荀，副军长段德昌。全军团约一万人。

7月6日　浙赣红军解放景德镇。

7月14日　蒋军韩复榘、李景林、蒋伯诚与阎军王靖国、李服膺，在淄河激战。

7月31日　红一军团迫近南昌，抵牛行车站。

8月1日　蒋介石以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韩复榘为胶济路总指挥，调动十五万军队与晋军争夺济南。四日，冯军为牵制蒋军对津浦路的进攻，在陇海路进行猛烈攻击。

8月23日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永和会师，组成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成立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总前委决定再次攻打长沙。

8月26日　方志敏、邵式平指挥赣东北红军占领鄱阳。

8月30日　红一方面军向长沙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9月11日　蒋军以洛阳、郑州、开封为目标在平汉、陇海两线发动进攻。冯军自兰封迄许昌布弧形阵对峙。

9月13日　红一方面军久攻长沙不下，毛泽东说服中央代表周以栗和指战员，自动撤出长沙战斗，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红军遂分兵攻占茶陵、攸县、醴陵、萍乡等县。

9月19日　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

9月20日　邓中复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前委军事会议，决定南下渡江。

9月21日　张学良为蒋所诱，派东北军十二万人入关，占领天津。二十三日复占领北平。晋军撤退。

9月22日　红二军团攻克监利。

9月27日　晋军以受张学良威胁之部撤退保黄河北岸及陕州。蒋军在各战线均获胜。

10月3日　蒋军占领开封，六日占郑州，九日占洛阳。冯、阎军十余万人多被俘。

10月4日　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赣江两岸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七日，在吉安正式成立江西省工农兵政府。

11月5日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在湘鄂赣纠集十万兵力，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11月6日　红一方面军从峡江渡赣江向永丰、南城前进。毛泽东到吉安布置向根据地腹地撤退。

12月20日　国民党军公秉藩部侵占东固。

12月24日　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围剿"作战计划。

12月30日　红一方面军开始反攻，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五天之内打了两仗，第一仗战于龙冈，全歼张辉瓒两个旅、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活捉了张辉瓒；第二仗

战于东韶，又歼谭道源师一半。两役共歼敌一个半师，一万六千余人，缴获武器一万三千余件，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外　交

2月15日　国民党政府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解决中东铁路善后问题。

3月7日　国民党政府派王正廷、宋子文与日本大使重光葵在上海商谈关税协定，十二日签订中日关税协定草约。

4月18日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使蓝浦生在南京签定《收回威海卫专约》及《英国展租刘公岛协定》。

4月24日　英使蓝浦生与王正廷议定英国退还庚款新协定。英庚款共五千四百六十余万两，此次退还约两千余万两。

5月6日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关税协定正约五条，各项附件换文四种，日在华除仍享最惠国待遇外，并将最惠国待遇扩张至船钞、关税各事项。又于换文附表中规定，中国对进口日货给以暂不加税之优惠待遇者计一百一十种，但中国输日享此待遇者则仅十一种。

6月14日　中苏交涉中东路的估价问题，定铁路财产为五亿元。中方代表主张依该路中俄合办之性质，由中国付苏半数，即二亿五千万元。苏方代表认为此五亿元为俄国投资，应加三十年利息，全额为十五亿元。

10月1日　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及租借刘公岛协定在南京互换批准。

10月12日　中苏会谈正式举行，苏联代表加拉罕，中国代表莫德惠互换证书后，因伯力协定承认问题发生争论，无结果。十八日苏联致牒莫德惠，要求实行伯力协定。二十九日中苏会议由停顿转恶化。

12月4日　中苏会谈开第二次会议，组织三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讨论(一)中东路问题；(二)通商问题；(三)复交问题。二十二日莫德惠回南京请示。

经　济

1月14日　工商部向行政院提议，发行兴业公债五千万元。

同日　立法院通过一九三〇年关税公债条例及整理晋省金融公债条例。

1月15日　国民党政府令，所有海关进口税一律改收金币，以值六〇·一八六六公厘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

1月25日　北宁路局长高纪毅代表东北当局与荷兰海港工程公司在天津签订建筑葫芦岛海港合同，建筑费六百四十五金元，定五年半完工，如届时不能完工每天罚一千元。

1月31日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受外货竞争影响，宣告停顿。

3月15日　邮政储金汇业局在上海成立，后迁南京。它经营储金、邮政汇兑、人寿保险等业务。

3月26日　上海米荒，米价每石逾二十元。

6月16日　阎锡山以津海关税务司拒绝其截留新增税款之命令，且将款转放汇丰银行，乃改委其英籍顾问辛博森为津海关税务司。国民党政府表示反对，鼓动原税务司率关员封关罢工。

6月30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不得收取押租。"

7月23日　粤海关宣布中山港为无税口岸。

同日　北平邮工因要求增薪未达目的实行怠工，平信一律盖"怠工期间免费寄递"戳寄出。

9月30日　万全县大饥，米价每斗涨至大洋三元。

11月7日　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正式成立，阮山任行长。其任务是巩固金融，保存现金，发展国民经济，实行低利借贷。

11月25日　国民党政府内外债整理委员会开会，银行界发起组织内债债权团，十二月一日成立。据调查，内外债总数为十三亿元。内债占十分之三强，外债占十分之七弱。

11月27日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第四号"通令"，"要准备充分的经济"，粉碎敌人"围剿"，决定创设江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一百万元"。

12月7日　东三省决定实行火柴专卖。

同日　陕西引泾工程举行开幕典礼。

文　教

1月1日　《萌芽月刊》在上海创刊，鲁迅、冯雪峰编辑，后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出至第5期被查禁，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又被查禁。

1月10日　《拓荒者》月刊在上海创刊，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编辑，后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出至第4、5期合刊被查禁，第6期改名《海燕》，又被查禁。

2月13日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发表由郁达夫、鲁迅等50余人签署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

盟宣言》。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于3月19日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和郁达夫等人。

2月22日　洪深在上海大光明戏院抗议放映含有辱华内容的美国影片，被拘捕，经各界人士声援获释。洪深此前已加入南国社；本年创作剧本《农村三部曲》之一《五奎桥》，于1932年出版。其后，又于1931、1932年创作《农村三部曲》之二、之三《香稻米》、《青龙潭》，于1936年出版。

3月2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沈端先(夏衍)、洪灵菲、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李初梨、彭康、殷夫、柔石、潘漠华等40余人。大会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左联主办的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旬刊(鲁迅主编，4月创刊，共出5期)、《世界文化》(9月创刊，仅出1期)、《前哨》、《十字街头》、《文学月报》等。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方左联(北京)、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广州、南京小组等，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3月　左联成立以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等刊物上开展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鲁迅、郭沫若、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郑伯奇等。后于1931～1932年和1934年，继续进行讨论。

3月　张恨水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开始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至11月载毕。

3月　老舍自英国回到上海。途中曾因筹措旅费于新加坡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创作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次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4月　田汉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总结南国社和南国戏剧运动的历史。

4月　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成为左联成员，并一度担任左联的执行书记。

6月1日　王平陵、范争波、朱应鹏、黄震遐等在上海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并先后创办《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次年发表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万国安的《国门之战》等。

7月　王平陵、钟天心等在南京组织"中国文艺社"；8月，创办《文艺月刊》(王平陵主编)。

7月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上海成立，由左联、社会科学家同盟、新闻记者联盟、左翼剧团联盟、电影演员联盟等团体联合组成，并于北京、广州等地建立分盟，推进左翼文化运动。

8月　国民党政府查禁左联刊物《萌芽》、《拓荒者》等；10月，密令"取缔左联，通缉鲁迅等人；12月，颁布《国民政府之出版法》44条。

本年　马其昶去世。马其昶(1855～1930)，近代散文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清末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民国后曾任清史馆总纂，继姚永概、林纾后成为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作家。有《抱润轩文集》。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1年

导 言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操纵和"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压迫下召开的。会上王明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错误地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主要危险。通过这次会议，王明等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了更加完备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总工会主席罗章龙在全国总工会党团组织中公开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从事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王明取得领导权后，罗章龙加紧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罗章龙党籍。

四月一日，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中央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分兵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方针，在15天中横扫七百里，共歼敌三万余人，彻底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五月二十日，公布政府组织大纲11条，推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邹鲁、孙科五人轮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

六月十三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国民党内部之间矛盾，集中力量进行"剿共"战争。会议通过了《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确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决定十月十日召开四大。

七月一日，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以嫡系5个师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战略方针，在莲塘、良村、黄陂三胜敌人，歼敌3万余人，痛快地粉碎了第三次"围剿"。

九月十八日夜，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下，19万东北军撤入关内。一周之内，东三省全部沦陷。这是蒋介石妥协让步的恶果。

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进行了江桥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打击，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影响。

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决定改瑞金为瑞京，为红色政权的首都。

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广州、上海举行。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四大在三个地方同时举行。三方会议召开后，南京电邀粤沪来宁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迫于压力，蒋介石第二次宣布下野。随后，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宣告国民党"统一"。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 ●开除罗章龙党籍决议
-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 ●赣南会议
- ●宁都起义
- ●《红色中华》报创刊
- ●非常会议
-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
- ●马占山抗日
- ●国民党四大
-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以“执行国际路线”为旗号，强调要反对立三路线，要反对所谓“调和主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和主张党在全国范围采取进攻路线等一系列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还要“左”的观点。全会接受了他们的主张，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改选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王明等人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职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写的《两条路线》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总纲领，直接实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两项相互联系的错误主张：即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为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材料：

-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经过

材料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经过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的情况下，由米夫等人直接扶植王明“左”倾教条宗派集团取得党中央领导地位的一次会议，也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全面推行国际路线的开始。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指示精神，对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及其在全国的推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在事过三个月后，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却一反常态地把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的错误说成是与共产国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并把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罪名强加给三中全会。共产国际一方面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点名批判瞿秋白；另一方面却对王明倍加称赞，委以重任，并且在远东局代表的特别“关怀”下，使他能够按照国际来信的基调修改他《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提出推行国际路线、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而为通过四中全会扶植王明上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共37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2人，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15人。会议议程有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革命战争及白色恐怖下牺牲的战士；三、推选主席团；四、由向忠发作政治报告；五、讨论（有30多人发言）；六、国际代表作结论；七、补选中央委员，改选政治局委员；八、闭幕。

会议一开始由向忠发主持。接着推选了主席团，主席团成员有：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等五人。会议是由主席团成员分别轮流主持进行的。

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党内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批评了立三路线的“理论系统”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指责了三中全会“没有真正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强调了“目前时局更加重了我们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同时，还检讨了自己在立三中央错误时期应负的责任。

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

会议的气氛是紧张的，争论是激烈的，在30余人的讨论发言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会议的性质。这次会议是属于紧急会议还是四中全会？罗章龙、韩连会及何孟雄等力主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认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没有站到“国际路线”上来，不能领导全党进行战斗，必须召开紧急会议才能解决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国际代表和会议主席等人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召开四中全会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它可以解决“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问题，不必召开紧急会议。

第二，关于如何评价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特别是《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的问题。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不管是哪一派、持哪种观点的人，他们的发言都异口同声地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都表示拥护“国际路线”。而分歧在于怎样评价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它是否已经改正错误站到“国际路线”上来了。两种不同意见分歧的实质，仍然是关系到未来中央领导班子的人选问题。

第三，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选问题。这是会议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上述两个问题争论的目的、实质的集中反映。

会上首先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提出了一个改选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是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共同商定的，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所以被称为国际名单。这时与罗章龙等持有同一观点的韩连会又提出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他们不同意国际名单，罗章龙一再表示，如果用国际名单他拒绝表决，并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袁乃祥因吵闹会议而被通知退出会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候选人名单的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国际名单，这样就按国际名单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原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瞿秋白、罗迈落选，新增补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陈郁、任弼时、陈绍禹、刘少奇、何克全。总计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何克全。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补选进来的有韩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绍禹、沈泽民、夏曦、曾炳春等9人。选举结果，犯了“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和所谓实行“调和主义”的瞿秋白同志都退出了政治局，罗章龙也没有进入政治局，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进入了政治局，并实际上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代表在会议所作结论发言中，重申了在党处于“混乱状态”和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召开党的四中全会，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以及提拔那些“拥护国际路线”的干部到中央来的作法是完全必要的。四中全会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1931年9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是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中央按照《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的基调，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错误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全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形势之下，存在着“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从而提出了“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中去，以便“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的任务。并且要求全党“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坚决反对作为“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这表明王明“左”倾中央执行的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一条路线。12月11日，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2年1月1日，临时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2月26日，又作了《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

这样，在共产国际帮助之下，以王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为纲领的“左”倾错误，以四中全会作为起点，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开除罗章龙党籍决议

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当中共中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人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变本加厉地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党中央。1931年1月1日，他们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领导机关。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了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了。会后，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但是，罗章龙等人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应立即停止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

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于是，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中央的这些措施是正确的，是为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需的。

材料：

· 罗章龙与“第二中央”

材料　罗章龙与“第二中央”

1931年1月7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大体上包括有：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会系统的代表，共三十七人。会议由向忠发主持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与向忠发报告内容相一致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它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集中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并要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坚决转变。它主要的不是批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而是批判立三路线“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批评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右倾，并告诫全党“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这就使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不仅不能克服，反而更加扩大了。二是打着坚决实行“国际路线”、反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旗帜，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得以夺取了党的领导权。

会议最后由共产国际代表作结论，并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拟定的，共有十六人。为了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吹嘘了王明等人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的。说四中全会就是要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人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并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以保证党的领导。但是，许多与会代表不同意王明等人参加中央领导机构，米夫即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强调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坚持要把王明等人选入中央领导机构。在激烈的争论中，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被通过。选举的结果，瞿秋白、李立三、罗迈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罗迈、贺昌的中央委员资格也被取消。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补选进中央政治局。中央的职能部门，除周恩来仍任军事部长外（由于王明宗派集团的重要骨干都是些根本不懂军事的教条主义的书生，军事工作只好仍由周恩来同志继任），组织部长是赵容（康生），宣传部长是沈泽民。四中全会后不久，青年团中央也进行了改造，秦邦宪由团中央宣传部长接任团中央总书记职务。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9月又建立了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会议内容的安排，同何孟雄等人的主张是相矛盾的；与罗章龙等人计划通过召集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以取得领导权的打算也是相违背的。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围绕会议的性质、议程和改造中央机构等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会议的性质上，何孟雄和罗章龙等人都主张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至今没有转到“国际路线”上来，不能领导全党进行战斗，必须召集类似“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才能解决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则认为：召开四中全会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是可以解决“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等急待解决的问题的，不必召开紧急会议。接着罗章龙等人又在会议的议程和时间上提出不同意见，也被米夫否决了。最后在改革中央机构问题上，斗争发展到了高峰，也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所在。与国际代表提出的十六人政治局名单相对抗，罗章龙等人提出了一个打倒一切、彻底换班的九人政治局的名单。在米夫的坚持和压力下，罗章龙等人的名单也被否决了。罗章龙一派的人虽然大闹会场，但大局已定。王明等人从此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是在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把持操纵下进行的。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全党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并没有解决党内的矛盾，相反，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并激化了。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人并不甘心失败。会议刚刚结束，他们就加紧了反对四中全会的非组织活动。他们打着为召集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而斗争的旗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召集了一部分对六届四中全会不满的代表和非代表十几人，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等五人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干事会，由徐锡根任书记。这实际上就是另立中央，也就是人们通称的“第二中央”。

临时中央干事会成立后，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的活动就更有组织地进行了。1月中旬，当王明宣布改组江苏省委时，王克全声明退出，并召集了第二次江苏省党代表大会选出的部分省委委员，成立了以王克全为首的第二江苏省委，形成了在一段时期内，两个省委并存的局面。随

后，江苏省委的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外县来沪的干部中进行活动并宣告外县工作脱离新省委的领导。与此同时，王凤飞在上海的闸北区，蔡博真、彭泽湘在上海的沪中区，也成立了第二区委，参加第二省委的分裂活动。

在江苏省委改组以后，王克全还纠集了一些人闹了一场占领省委机关的闹剧。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老靶子路10号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要接收省委文件。负责省委财务工作的彭休士和我都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就吵吵嚷嚷不肯罢休。后来，管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同志赶来，他说，这样争吵，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可不行。王克全他们怕出事情，就溜走了。

除了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等活动之外，他们还派人到各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罗章龙等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违反党的组织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在白区险恶环境下的党组织的安全，在对他们进行劝阻无效之后，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

（选自《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作者：刘晓）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背景介绍

1931年4月，蒋介石又调集18个师以上共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将主要兵力开进中央苏区的宁都、广昌一带，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稍有减少，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周旋。5月间，在富田一带，对敌军力量较弱的两个师发动猛烈进攻，将敌大部歼灭。接着红军乘胜利之势，从富田向东一直打到福建境内的建宁，十五天内走了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五个师，俘虏三万余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材料：

- 第二次反"围剿"述略
- 青塘会议，确定反"围剿"策略
- 第一仗
- 粉碎第二次"围剿"
- 横扫七百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 歼灭公秉藩二十八师
- "横扫千军如卷席"

材料一　第二次反"围剿"述略

蒋介石原以为第一次"围剿"稳操胜算。特别是公秉藩攻克东固报捷后，蒋介石喜气洋洋地正忙着召开国民会议，预备在胜利声中登上总统的宝座。龙冈败讯传来，南京的欢乐气氛顿消，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出"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引者)，魂兮归来！"的哀叹。而鲁涤平也连电国民党中央请辞江西省主席及"剿共"总指挥职。国民党中央临阵换帅，1931年1月29日，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全权负责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2月始，蒋介石从湘、鄂、赣、闽四省调集20个师、4个独立旅共约2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并断绝匪一切物资之来源，期于一举而歼灭之。"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必须积极执行这一方针，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军"，必须于5月5日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报捷，以便给他即将戴上的总统桂冠上添上一道炫目的光环。

4月1日，何应钦指挥国民党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其部队在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长的战线上，构成了一条没有完全连接的链形阵线，步步向苏区进逼，妄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赣南地区。何应钦于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说："限各路于月内克服各县，会师广昌，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

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略有减少，约3万余人，但已有4个月的养精蓄锐，士气旺盛。在此期间，以项英为代书记(周恩来为书记，未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已于1931年1月间宣告成立；4月中旬，四中全会代表团(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组成，亦称"三人团")亦到达中央苏区，开始传达王明路线。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究竟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苏区中央局从3月18日到4月31日曾一连召开四次扩大会议讨论。经过40余天的激烈争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最后终于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制定的计划是：第一仗先打已进到富田地区的王金钰第五路军之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及第四十七师之王景德旅；胜利后，再打郭(华宗)、打孙(连仲)、打朱(绍良)、打刘(和鼎)。

第二次反"围剿"从5月16日开始至31日结束，红军连打五仗，均获胜利。

1. 富田战斗。公秉藩师从富田向东固进犯。从富田到东固相距40华里，中间要经过九寸岭、观音崖、白云山等几座大山。红一方面军以三军团及三、四、十二军在山区三路设伏，布置好一个铁口袋，等待敌军。公秉藩是二

到东固山。第一次“围剿”中，他首占东固山，得到了甜头，后来又是张辉瓒给他当了替死鬼。这次他倚仗兵多势众，忘乎所以，岂知竟一头钻进了红军的铁口袋。5月16日清晨，红军三路大军从白云山上用战斗队形向中伏的敌军横压下来，如高山滚石，势不可挡；如飞将军从天而降，打得敌军晕头转向。经一昼夜激战，将公秉藩师、王景德旅大部消灭。公秉藩在逃出重围后曾被我地方武装俘获，在释放俘虏时，被他化装混在俘虏群中逃脱。

2. 白河战斗。5月17日至19日，在吉安水南市之白沙打第五路军郭华宗之第四十三师，消灭其一部，并全歼逃向水南市的王景德旅残部。

3. 中村战斗。5月21日至22日，在乐安之中村打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高树勋之第二十七师，歼灭其近一个旅。

4. 广昌战斗。王、郭、孙三路敌军败退后，敌第六路军朱绍良部慑于红军声威，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红军大队于5月27日直逼广昌城下，歼守敌第五师一部，打伤敌师长胡祖玉(后因伤重死于南昌医院)，占领广昌县城。

5. 建宁战斗。广昌战斗后，敌第六路军刘和鼎第五十六师约7千人，仓惶自安远逃回闽北老巢建宁。红军在新组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临时总前委指挥下，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为主力挥师东进，日夜兼程，远途奔袭，于5月30日出敌不意扑攻建宁城。刘和鼎措手不及，于31日化装脱逃，其制服及徽章均被红军缴获；红军消灭敌人一个团，占领了建宁城。

总计此役，从5月16日开始到31日结束，红军15天中走700里，从赣江之畔到闽北山区，连打五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毁坏敌人工事四、五百里，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闻讯，气得痛哭流涕，在南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当面大骂他的军官们无能。

毛泽东在这次战争刚结束时就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材料二　青塘会议，确定反“围剿”策略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革命根据地遭到失败以后，顿觉事态之严重，再也不说红军是什么“地方事件”了，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焰，他又一次疯狂地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1931年2月初，蒋介石再一次派何应钦去江西，代行总司令的职权，重新组建南昌行营，在第一次“围剿”兵力的基础上，又把大批参加中原大战的杂牌部队调入赣南，计有：王金钰的第5路军，辖5个师(公秉藩的第28师，郭华宗的第43师，王金钰兼师长的第47师，郝梦龄的第54师，罗霖的第77师)；孙连仲的第26路军，辖3个师(孙连仲兼师长的第25师，高树勋的第27师，关树人的骑兵第4师)；蒋光鼐的第19路军，辖两个师和一个旅(蔡廷锴的第66师，戴戟的第61师，马琨的第12师34旅)；朱绍良的第6路军，辖4个师(胡祖玉的第5师，毛炳文的第8师，许克祥的第24师，路孝忱的新第13师)，共计20余万人，气势汹汹地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围剿”，并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国民党的20万大军，虽然表面上很有气势，咄咄逼人，但其内部依然是矛盾重重。同第一次“围剿”一样，这一次蒋介石仍然是想采取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伎俩，把其在军阀混战中收编过来的一些杂牌军又一次推到了第一线，而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却很少动用。因此，参加“围剿”的各路敌军依然是各怀鬼胎，疑心重重，都想保持自己的实力。参加过第一次“围剿”的部队，这一次更加小心谨慎，不敢与红军打硬仗。就兵力大小而论，王金钰的第5路军的兵马最多，堪称此次“围剿”的主力。但以兵力强弱而论，蒋光鼐的第19路军为最强，其装备比较精良，战斗力较强，而王金钰的第5路军则战斗力最弱。孙连仲的第26路军原来是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被蒋介石所打败，其几十万军队全部被蒋介石所收编，孙连仲率领3万余人的部队，也不得不重投主子，追随蒋介石。蒋介石把孙连仲的部队改为第26路军。这次“围剿”根据地，蒋介石把孙连仲赶到江西，使孙连仲忧心忡忡，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怕在参加“围剿”的路上被蒋介石缴了械，彻底失去“老本”，甚至丢掉脑袋，另一方面又怕被红军打败，而被蒋介石以其战败而法办。孙连仲真是走投无路，左右为难，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江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就开始准备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工作。1931年1月18日，红军总部便发出了关于《红军第一方面军继续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继续筹款粮的命令》，指出各筹款部队“主要的任务，是用最大力量继续筹足三个月的给养，准备敌人再向我们移动时大举消灭它”。红军各部队立即分头行动，积极筹款筹粮。于是，红

3军团总指挥机关以南丰城为中心,红4军以康都圩为中心,红12军以广昌为中心,红3军8师在南丰通建宁及黎川之大道一线,9师以枫林为中心,分别进行筹款筹粮。红军各部队还在根据地的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动员,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进行战前准备工作,坚壁清野,成立各种支援红军作战的担架队、向导队、运输队和俘虏收容所。红军总部为便于领导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所,并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分配了作战任务,要求各游击区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多种方式,积极打击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一次以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为游击战争提出了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方法,使游击战争又有一个新的指导思想。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队以江西的宁都为主要目标,开始了全线进攻。这一次蒋介石改变了战术,他认为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兵力之不足,包围之未严,而部队急进亦一主因也"。他吸取了第一次"围剿"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失败的教训,不再敢快速突入,猛进猛追,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规定部队每天前进5里、10里或20里,而且在大队人马前进的头一天,必须先用一小部分兵力实施侦察,等一切安全之后,才能前进;部队每到一处,必须立刻构筑工事,力求坚固持久。敌人估计红军主力在宁都附近,企图先占领富田、东固,然后进攻宁都,意在闽西地区与红军决战。敌人一路小心翼翼地前进,王金钰的第5路军,除罗霖的第77师仍驻在吉安外,其余4个师均已进到富田、水南、白沙一线,向东固、藤田等地进攻;孙连仲的第26路军,集结于宜黄、乐安一线,向东韶、小布等地进攻;朱绍良的第6路军,由南丰、崇仁向广昌、黄陂等地进攻;蒋光鼐的第19路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进攻。另外,位于建宁、宁化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向根据地进攻。同时,蒋介石派出大量部队对通往根据地的各公路、水路进行严格把守,对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一切物资进入苏区。

红军总部根据敌人的上述行动,于3月23日下令红军主力从永丰、乐安、宜黄、南丰等根据地边沿地区,向根据地的南方转移至广昌、石城、瑞金、古龙冈等地,积极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兴国周围,监视和困扰敌19路军。

4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在青塘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这次会议比第一次反"围剿"的罗坊会议更加紧张、激烈地争论问题,因为此次会议不仅有关于如何打击敌人、选择歼敌目标的争论,而且还有抵制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党的6届4中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3月2日,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向中央根据地发出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在青塘会议上,王明路线的代表们过重地估计了敌人,认为国民党20万大军步步为营,包围圈很紧,红军不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并认为红军应"分兵退敌",甚至主张退出江西,到"天府之国"的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参加过第一次反"围剿"的同志在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并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情,指出:虽然敌人兵力多,但仍然有许多弱点,比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敌人到苏区后遭到群众的反对,地形不熟,给养困难等等。又指出了红军定能打败敌人的诸多优势。他们坚决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反对王明路线的右倾逃跑主义,坚决主张依靠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在根据地内斗争。

会议的第2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各军军长、政委都参加了会议讨论。这些亲自率领红军打败了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指挥员,积极发言,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反"围剿"方针。经过激烈的争论,王明路线的代表者终于在事实面前作出了让步,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终于成为第二次反"围剿"的主导思想,又一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随后,会议开始讨论怎样歼敌的问题。第一仗的目标应选择在哪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延锴的第19路军,然后由南向北打,理由是蒋光鼐、蔡延锴被打败后红军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双手到湖南、到赣南去发展胜利。但他们却忽视了第19路军是善战的广东军阀部队,战斗力强,并且它的两个师紧密地集中在一起,在兴国又建立了一些坚固的防守工事,驻守了三四个月之久。若先打第19路军,无异是先啃硬骨头,与敌人拼消耗,因此红军不易打下兴国,没有胜利的把握,况且若直攻兴国,还会使北南各路敌军趁机南下,红军会遭到四面合围、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又一次高瞻远瞩,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认为在当前的敌人中,蒋光鼐、蔡廷锴是比较强的,红军应选择敌人的弱点打,打蒋光鼐、蔡廷锴没有胜利的把握。红军应首先打王金钰的第5路军,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各个击破敌人。毛泽东又做了详细分析,指出:王金钰的第5路军从北方调来,劳师远征、士兵对南方水土不服,不惯爬山,并且害怕被红军歼灭,一心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军心动摇。王金钰所驻扎的地区附近,群众条件和地势均对红

军有利，有利于红军打歼灭战。因此，毛泽东主张红军应从富田打起，先击破王金钰，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处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下一次再打破敌人的"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则会受到赣江的限制，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会劳师费时。毛泽东的这番精辟的分析，使参加会议的同志心明眼亮。最后，红军总部作出了战略部署，并精心规划了一个完善的、连续作战的计划：即先打王金钰、公秉藩，然后由西向东打郭华宗、孙连仲、朱绍良、刘和鼎，整个战局结束后，在江西和福建边界扩大根据地。4月19日，红军总部下达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强调"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并命令在宁都周围的红军主力立即东移，到东固山区隐蔽集结。红军各部遵照命令急行军到达龙冈、上固一带，而后夜间出发，秘密地进入东固地区，在深山丛林中严密地进行伪装，隐蔽待命，准备打击王金钰右翼进占富田、固陂圩一带的公秉藩的28师和上官云相的第47师。

（选自《百战图》作者：王洪武）

材料三　第一仗

观音崖在富田和东固之间，周围山峦起伏，丛林密布，是个险要的隘口。我们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的。

那时我是十一师师部特务连的连长。师长是曾士峨同志，政委是罗瑞卿同志。

战前，我们十一师的三个团都布防在观音崖一带。观音崖在群山中虽算不得异峰突起，却也是踞高临下，地理位置很好。师指挥所就设在山顶稍下的一间房子里。这房子战前大概是老俵们看山歇脚，或者避雨挡寒用的，矮小，破旧。罗政委个子高，进进出出都要低下头，很不方便。特务连就砍了些树木，另外搭了个棚子，曾师长和罗政委就在这里指挥。

眼下敌人是"围剿"军第五路军王金钰指挥的公秉藩（二十八）师。这支部队从北方初到赣南，又时值五月，对炎热潮湿的气候和山林作战都不适应。他们进入我根据地两个多月，虽没有同红军正式交战，沿途却不断受到赤卫队的阻挡和袭击，已经相当疲惫了。到富田一带后，他们又赶紧修筑碉堡、工事，摆出一副阵地战的架式。显然，我们是不会同他打阵地战的。我们部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部署，耐心等待战机，以求诱其脱离巩固的阵地，在运动中聚而歼之。

公秉藩终于脱离阵地，向我们开来了。

公秉藩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武器装备比红军还是好得多。特别是重武器：山炮、野炮、轻重机关枪，占明显的优势。他们靠着这个优势，向我占据的山头猛烈轰击、扫射，妄图夺路前进，一口吃掉我们。战斗打响，山头上炮火连天，浓烟滚滚，树倒枝断，乱石纷飞。师指挥所小屋旁刚搭起来的棚子也被炮弹击中倒塌了。曾师长和罗政委这时幸好在硼子外边观察敌人的动静，否则也会压在里面。不一会，敌人的一路，在炮火掩护下，向我们右后方的山头攻去。

罗政委站在小房门口，说："敌人想攻占三十三团的阵地，从左翼包围我们。"

曾师长同意地点点头，说："不要紧。你看，三十三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要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三十三团。"他停了停，转脸命令我说："杨得志，派人告诉聂鹤亭同志，一定要挡住敌人！"

聂鹤亭同志是三十三团的团长。我这里刚把人派出去，一阵密集的机枪、步枪子弹朝我们飞来。只见罗政委一转身，手没有扶住小房的门框便倒下了。我跑上去一看，子弹从他脸颊的一边射进，穿过口腔飞出。他满脸是血，当时就不能讲话了。看样子十分危险。（我们后来看到罗瑞卿同志的嘴部稍微有些歪斜，就是观音崖战斗留下的伤痕。）

"杨得志！"我正在罗政委身旁，听曾师长喊我，声音很大。

"到！"我立即站到曾师长面前。

他一手搭在我的肩上，一手指着进攻的敌人说："看到了吗？敌人要抢占那个山头。你带特务连上去，一定把那个山头先抢到！抢不到我杀你的头！"

曾士峨同志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指挥打仗有魄力也有水平。他那只压在我肩上的手虽然有点残废，但分量是很重的。他的脾气我了解。抢不到山头杀我的头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他是说到做到的。

我们连的张指导员，当时不在我身边，不可能和他商量了。我把腰间的驳壳枪一举，喊了声："特务连的，跟我来！"来不及再看罗瑞卿同志的伤情，便冲了下去。

红军作战，干部在前面一冲，不用讲话，不用动员，战士们会自动地跟上来。这是个光荣传统。我带着部队冲下山，顺着山势仰望前面那座山头的时候，三班长捅了我一下，说："连长，你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敌人黑压压的一片，从我们连的左侧也往小山头运动，最靠前的离山顶只有一百多米了。我回头对刚跟上来的指导员喊道："老张，组织火力打敌人的半腰，我带三班先上去！"话刚落地，部队就开了火。三班长带着他那个班已经冲到我前面去了。

公秉藩的队伍虽然不适应山地作战，但两军对垒，谁都知道，这是生死搏斗，所以他们爬山的速度也不慢。待我和三班抢占了小山山顶时，他们的前哨离山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米了。这小山上长满了深深的茅草，树木不

高，但很密。我们一到山顶，根本来不及做什么工事，因为敌人离得太近了，讲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先敌开火”是我从当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以来常用的打法。我钻进一丛茅草里边，举枪向敌人开了火。我那支驳壳枪是打十发子弹的。一排子弹打出去，那些接近山顶的敌人停住了。我一边压子弹，一边对三班长喊：“开火！”那时候班以下虽然都是单打一的步枪，但十几支同时开火，又处在敌人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威力还是满大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趴在原地不动了。我趁敌人还没摸清我们的实力，赶紧对山下的同志喊：“快呀！快上来！”这时，我看得很清楚，山下的敌人少说也有两三个连，而我们山上只有一个班。我也看得很清楚，战士们确实可以说是在不要命地往山上攀登！三班长运动到我身旁，摸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他娘的，脚心都叫汗湿透了。”眼看已经有二十几名战士登上山顶，只是因为爬山的速度不同，班、排的建制已经打乱。为了站住脚，我立即组织现有兵力进行反击。大家知道，运动战中，重要的是利用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是我指挥战士们一齐动作，甩出手榴弹。随着那“轰！轰！”的爆炸声，从山顶往下冲。此刻，兄弟部队也在进行火力支援，压着敌人打。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抬不起头，不得不转身逃窜。很快，整个观音崖一带就响起了我们追击逃敌的声音。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歼灭了正面的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后来听说，公秉藩在战斗中本来被我们生擒了。但由于他已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群里，没有被认出来。那时红军对愿意回家的俘虏，一律发三块银元作路费，予以释放。公秉藩就钻了这个空子，潜逃了。

（选自《横戈马上》，作者杨得志）

材料四　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七百里。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华里。有人说，这是钻牛角。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选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五　横扫七百里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主力移到龙冈地区后，为了便于捕捉战机，全军又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伺机歼灭富田之敌王金钰部。

这时，在东固西面四十华里的富田陂下一带有王金钰部的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北面水南、白沙地区为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南面蒋光鼐、蔡廷锴两师仍在兴国县城。红军按预定计划是先打王金钰部，“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五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得知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分三路由富田向东固前进，郭华宗师由水南、白沙进至上坊、南坪。根据这一情况，“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五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十六）日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十五日，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红三军团（附三十五军）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令十五日进至江头村隐蔽，严密封锁消息，十六日向固陂、富田攻击前进；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前进，迫击公秉藩部；红四军附六十四师和十二军为右路军，以四军担任第一梯队，分两路抢占东固到富田之间

的九寸岭和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总司令部设在东固通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上。

五月十六日，打响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这天，公秉藩率第二十八师进至中洞，准备进攻东固。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队首先与敌先头部队遭遇，担任中路军的红三军相继投入战斗，红四军亦占领九寸岭高地，将敌四面包围。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极为激烈，多次白刃相接。下午三时结束战斗，歼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全部，俘副师长王庆龙及官兵四千余人，缴获机步枪三千余支、无线电台一架。敌师长公秉藩率少数人逃出重围，被红色地方武装俘获，后在释放俘虏时，被其化妆混入俘虏中误释逃脱。在歼灭公秉藩师的同时，担任歼灭富田王金钰部上官云相师（第四十七师）战斗任务的红三军团，于十六日午夜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红四军亦赶到。十七日晨结束战斗，歼敌上官云相师一个旅的大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机步枪一千余支、山炮两门。红军旗开得胜，取得了第二次"反围"的首战胜利。

中洞、富田战斗胜利后，红军挥戈东进，追歼逃敌，在水南追上逃出的上官云相师一旅残部和由沅头逃往水南的郭华宗师。水南无险可守，敌军企图逃往泷江河北岸，但桥梁已被红色地方武装拆除，只得转向白沙。十九日，红三军、红四军在吉水的白沙歼灭郭华宗师一部和上官云相师一旅之残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打了第二个胜仗。郭华宗师残部向永丰逃窜。郝梦龄师闻讯后，也由藤田逃回永丰。第十九路军也因畏打，于十七日由城冈圩撤回兴国。

白沙胜利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五月二十二日在永丰的中村与敌第二十六路军的高树勋师打第三仗。是役由红三军团任左翼，红四军任右翼，红三军、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红三军团一部先向敌攻击，敌军凭借山上工事顽抗，自晨至午，战斗极为激烈。午后一时左右，红四军从右翼包抄敌人，附近的赤卫队和群众亦赶来助战。敌军狼狈败逃，红军乘胜追击，歼灭高树勋师一个旅，俘敌旅长一名及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步枪二千余支、机枪十余挺和无线电台一部。高树勋师残部逃回乐安，红军追至宁都的南团。

红一方面军五月二十三日进驻南团后，为加强领导，在南团恢复了总前委。在这以前，苏区中央局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有关作战的重要决策，均由中央局讨论决定。"中村战争以后，中央局即离开红军回到中心地区固定起来，对于红军作战指导组织临时总前委来领导。"五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南团得知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已于二十三日由东韶撤回宜黄，第六路军之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师有经广昌向南丰逃走之势，于是决定取捷径先敌占领南丰城，以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红一军团为右路军，分两路取南丰。二十五日，方面军总司令部随右路军到达宁都洛口附近的严场，从电台中得知毛炳文师在头陂，有退守广昌之势。当晚，总前委在严坊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作战行动问题，认为我如以一军团攻头陂，虽可退敌，但追到广昌时，与在吴村的三军团相隔百里，兵力分散，不易消灭敌人。因此决定全方面军开赴广昌之苦竹，集中一、三两个军团的兵力进攻毛、许、胡诸敌。二十六日，方面军总司令部在苦竹得知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师已退至广昌城，并有经千善向南丰退却之势。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研究作战计划。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许、胡，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形势，然后猛追该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总前委决定改变全力攻取南丰的计划，以少数兵力取南丰，大部攻广昌。具体部署是：以红三军担任攻取南丰的任务，二十七日经甘竹向南丰急进，在敌路孝忱没有集中全师和准备坚守的条件之下，夺取南丰城，使毛、许、胡三师败走时不得不退回抚州，我军在胜利后可多获得几个筹款的县城；全方面军（缺红三军）于二十七日分两路攻广昌城，红四军任左翼，红十二军任右翼，红三军团为总预备队。

五月二十七日，红军从广昌城北、城南两面攻城，广昌红色独立营和赤卫队在城外助战。经过一天激战，给城内守敌第五师以很大杀伤，并重伤敌师长胡祖玉（胡于六月三日死于南昌医院）。当晚九时，红军攻占广昌城，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第四仗的胜利。

广昌战斗胜利后，总前委因敌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师已向南丰退却，料已追赶不及。同时，从战略上考虑，为便利胜利后筹款计，决定集中兵力打刘和鼎师，夺取建宁城。为了迷惑敌人，又命红四军的第十师向南丰佯动，尾追胡、许两师，以不接触为原则，主力则以迅速动作向建宁进发。五月三十日晚，总前委在里心圩开会，对攻打建宁的战斗作了部署：以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准备必要时挖地洞用炸药炸城；红十二军（缺第三十四师）为攻城预备队。五月三十一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出敌不意地出现在建宁城下。城内守敌刘和鼎师不知是红军主力，贸然迎战，被红军消灭三团之众，残敌争相夺桥向东逃窜，又被拥挤落水不少。红军当日攻占建宁城，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无线电台一部，并缴获可供全军半年之用的大批西药。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从五月十六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十五天中，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选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材料六　歼灭公秉藩二十八师

5月16日早晨，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在早饭后，按计划率师部各单位出发。特务营为前卫，后面就是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的3座四抬大轿，再后是机关人员、无线电队、驮载骡马和输送队、野战医院人员等，共有1000多人，行军纵队达五六里长。

公秉藩正要上轿，担任预备队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从富田赶来送行。彼此见礼后，王懋德说："八十三旅出发3天以来还未遇见红军，后方各地平静得像水一样，可见从九寸岭逃出的红军排长所说情况与事实不符。"

公秉藩叮嘱："虽然未发现敌情，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上。"说罢上轿登程。

公秉藩率师部走的路线就是八十三旅出发走过的路线：固陂圩——山坑——中洞——头陂——东固岭——东固。既然八十三旅出发3天未遇敌情，说明这条路是安全的，所以浩浩荡荡，人马嘈杂，放心大胆地前进。上午10点，到达山坑，这里有一条街，约四五十户人家。特务营刚刚通过，公秉藩的绿呢大轿行至街心，只听一声炮响，步枪、机关枪从两侧山上劈头盖脑扫下来，山鸣谷应，响彻云霄。

在山坑伏击公秉藩二十八师师部的是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14日晚毛泽东部署了第二天的作战行动后，夜不能寐。山坑两侧，路狭、山高、林密，是理想的伏击阵地；如果红三军晚到一步，二十八师过了这个地段，就打不着了。想到这里，他半夜起身，特地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到附近村子里去找向导。在向导的帮助下，选择了从东固到中洞大道南侧的一条小路作为红三军主力的前进道路。

二十八师遭伏击后，死伤一大片，人马乱作一团。师长公秉藩命令机关人员和通信队进入路旁的民房避弹，由特务营一、二连猛攻西面高山，三、四连猛攻东面高山，自己进入一座坚固的民房，作为临时指挥所，命令紧急架设无线电台，联络前后方。

公秉藩口授拍发中洞北面八十三旅旅长柴乔松的电报是："我率师直属部队行抵山坑，遭到两面高山红军夹击，势甚凶猛，着该旅立即停止前进，速派一团驰援山坑。"

立得柴乔松旅长的复电是："我一六五团进至桥头冈附近，第二营与红军总司令部相遇，正在战斗中，营长郭钟麟受伤。我率一六四团抵达中洞以南，遭受红军伏击，激战甚烈，无法应援。"

原来，毛泽东到红三军去以后，朱德要到前沿阵地去指挥作战。15日夜晚，朱德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和警卫连指战员一起，从坳上沿通向中洞的大道西进时，突然同敌第二十八师八十三旅一六五团一个营遭遇了。朱德立刻命令大家往山坡上散开，边打边退。天太黑了，敌人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红军，还以为进了红军的伏击地带，行动极为谨慎。山谷里，枪声时而激烈，时而消失，朱德和警卫连一起同敌人战斗了近3小时，阻止了敌人向公秉藩靠拢。

公秉藩于是又给富田以南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发报："我率师直属部队进抵山坑，遭遇红军伏击，势甚危急，着该旅长速率所部增援山坑。"王懋德旅是师预备队，解师座之围义不容辞，公秉藩把脱险希望寄托在出发时给自己送行的王懋德身上。吸了一支烟，迫不急待，又给王懋德发了第二个电报："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援山坑，勿失时机。"

此时八十二旅已被林彪指挥的红四军所包围。王懋德给他的师长回电说："我第四十七师九寸岭、观音崖一线已被红军击溃，大部队从左右两翼绕到后方，固陂圩通山坑的山口已被红军占领，我旅正在原地与敌激战，请示办法。"

公秉藩接电，见自己手下2个旅都已动弹不得，自身难保，心中凉了半截，只有向五路军代总指挥齐向辰求援了。他夹着纸烟的右手微微颤抖着，口述电稿：

"十万火急。富田右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官齐向辰：我率师直属部队进至山坑，遭受红军夹击，情势危急，请速派得力部队增援，勿失时机。"

齐向辰手里的部队是四十七师，代师长唐云山率师主力进至九寸岭、观音崖。

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按照红一方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在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

罗瑞卿打仗向来勇敢。只要枪声一响，罗瑞卿总是一边组织部队战斗，一边提着手枪奋不顾身地往前冲。

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当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一起把部队带到观音崖时，国民党军队正纠集在一起，凭借自己的武器优势猛烈地射击。观音崖地区易守难攻。罗瑞卿和曾士峨师长都在前沿指挥，敌人的子弹从他们的身边嗖嗖地飞过。山路陡峭，战士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往山顶上攀登。

短兵相接了，罗瑞卿挥起手枪，高喊一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上！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观音崖上，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突然罗瑞卿感到脸上受到沉重的一击，鲜血立刻涌出来，眼前模糊，罗瑞卿什么也看不到了，那魁梧的身体不知不觉地倒下去了。战士们用担架把罗政委抬下阵地。

罗瑞卿被抬下来以后，林彪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人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这时候，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迂回到富田东边，从后面向富田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各部队迅速歼灭了中洞和观音崖、九寸岭之敌。

公秉藩知道二十八师已陷入天罗地网，于下午5点多钟开始突围。山上红军以步、机枪猛烈扫射，未堵住这群作困兽之斗的溃兵，红一方面军便撤到后边一座高山上去了。

公秉藩举目望去，山上随处可见自己部队士兵的尸体，这是中午攻山时三、四连爬上山顶时被红军打死的。他在山顶环顾一周，发现仍在强大红军的包围中，检查一下冲上山顶的士兵，只剩50余人了。

副师长王庆龙对公秉藩说："屏轩（公秉藩字），你赶快逃命吧，我们实在爬不动了。"

参议韦捷生说："师长你去吧，我就在这里听天由命。"

公秉藩让卫士把他们背上走，他们坚决不肯。公秉藩这才化装和士兵一起逃走。

国民党第四十三师惧怕被歼，由水南撤退。

17日，红三、红四军进抵富田。

富田战斗，红一方面军歼敌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大部，大约有1万多人，俘敌410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0多支，机关枪50多挺，迫击炮20门，山炮2门，电台1部。

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国民党士兵每人发2块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块大洋，发大洋的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看见其他士兵都上了通往吉安的大路，心里着了慌，连声说："一块就够用了。"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公秉藩那部100瓦特的电台，也被完好无损地缴获，还缴获了6部15瓦特电台。从此，红一方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一方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苏区也可以直接和上海中央通讯了。

（选自魏在田《天下第一军》）

材料七 "横扫千军如卷席"

南昌，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

1931年2月22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

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1908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人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1929年，当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

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

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

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

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

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

了4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将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看中了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竟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曰：“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

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之外，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

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菜蔬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在终日捉摸，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公秉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是他，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的也是他。上一回，幸亏他逃得快，才算未曾全军覆没。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未免心惊胆战。

5月8日，公秉藩麾下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极端重要的情报，该旅步哨抓获一红军排长，说毛、朱、彭、黄皆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那排长据云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重罚，乘监视疏忽之机逃了出来，过来投诚。

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

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

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

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

于是，5月11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

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

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

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功夫！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发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

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1963年至1978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宣告成立，台长为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十二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

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架起空中通道，而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

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

正在这节骨眼上，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着重要情报！

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碌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

5月16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

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

下午3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至于红军“垂羡”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电台，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电台。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第二次“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写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自云，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入”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乃指蒋介石也。

(选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背景介绍

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还聘用了德、日、英军事顾问，调用他的嫡系部队10万人，非嫡系23个师以上，共约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办法，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当时，红军只有3万人，苦战后又未得休息。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朱德等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作战方针，率领主力从建宁绕道千里转到敌人后面的兴国集中。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形成对红军的半包围。红军选择敌军之间的空隙地带突然向东出击，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毙伤敌人一万余。各路敌军连忙掉头东进，以大包围的态势扑向红军。这时，红军却以小部兵力继续东进，吸引敌人，主力则从敌人两军空隙中巧妙地钻出来，又向兴国集中。等敌人发现红军西进时，红军已经休息了半个月。敌人则被牵着鼻子转了两个大圈，到处扑空，饥疲沮丧，弄得“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只好下令全线退却。红军乘胜追击，又歼敌一个多师，蒋介石损兵折将3万余，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了。

从1930年冬到1932年夏，在曾中生、蔡申熙、许继慎、徐向前、旷继勋等领导下，也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使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都有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万多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迄安徽舒城，西至平汉路，南抵鄂东的黄梅、广济，北临淮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鄂豫皖根据地最发达的时期。同时，在周逸群、贺龙、邓中夏、董朗、段玉林、段德昌等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湘鄂两根据地的"围剿"。此外，赣东北根据地在唐在刚、方志敏、邵式平、涂正农领导下，湘赣根据地在滕代远、张云逸、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领导下，湘鄂赣根据地在孔荷宠、黄志敬、李宗白等领导下，陕甘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领导下，把红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集中兵力打击和歼灭"围剿"的敌人，扩大了红军和游击队，保卫和发展了各革命根据地。

材料：

- 千里回师，"磨盘"神勇
- 打垮上官云湘
- 千里回师，莲塘、良村、黄陂大捷
- 粉碎第三次"围剿"

材料一　千里回师，"磨盘"神勇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发出命令，以宁都为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围剿"军全线进攻。敌人的"围剿"开始了。各路敌军迅速向南侵犯，来势凶猛，相继占领中央根据地兴国、富田、固陂圩等大片领土，并继续向东固、龙冈、小布、黄陂一带推进。蒋介石的嫡系师最为猖獗，大有"灭此朝食"的劲头。陈诚率第14师，罗卓英率第11师一马当先，7月2日便占领了黎川，13日占领了广昌，19日占领了宁都，然后又转向西北，经龙冈、富田直到赣江东岸，在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地域绕了一个大圈子，一路上疯狂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但均未遭红军打击，因此，他们断定红军早已流窜了。

当时，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正在带领红一方面军在闽西和闽赣边界一带地区做群众工作，部队分散在以建宁为中心的泰宁、宁化等地。红军总前委于6月下旬在康都召开了扩大会议，针对发现敌人要再次发动"围剿"的迹象，号召红军和根据人民总结战争经验，积极开展军事训练，加紧备战。7月5日，总部电台收到赣南后方红军发来的急电，得知敌军正向我根据地大规模袭击。敌人来得如此之快，并已占领我大片地区，真是料所不及。红军在这种万分危急的形势面前，沉着冷静，方面军总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分析了敌我态势后，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及敌人急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的心态，决定红军立即千里回师，集中红军主力于兴国地区，仍然以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来对待敌人的突然袭击，并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和赤卫队的配合下，不断迟滞、钳制、消耗敌人。

兵贵神速，红军主力立即出发。红军打运动战，远程奔袭靠的是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和对战机的及时捕获，靠的是指战员们的"铁脚板"。红军从闽西北出发后，为了避开与突入根据地的敌人遭遇，隐蔽行动企图，决定绕道先下西南再急转西北，直奔兴国。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此时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红军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经常吃稀饭、野草充饥。指战员们忍着饥饿，背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奔跑，他们以"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为口号，坚韧不拔地向前挺进。终于，红军历时10天，经福建的安远、宁化、长汀和江西的瑞金、曲阳、银坛等地，到达兴国。全程约一千多里。完成了千里回师的战略行动，又一次向胜利走去！

红军回到了老根据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兴国县的地方干部、广大群众热情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地方政府早已把支前工作安排妥当，妇女们手提篮子拿出鸡蛋、草鞋慰问战士，洗衣队为红军战士洗衣、缝衣，赤卫队四处巡逻放哨；运输队帮助红军运输物资。红军指战员们心情无比激动，无限感激人民的支援。他们个个吃得饱、睡得香，精神百倍，纷纷写请战书，决心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杀敌立功，保卫自己的家园。

中间突破，红军三战三捷

红军经过千里回师，大踏步地后退，终于避开了敌人的锐气，保存了自己的实力。红军总部经过周密侦察，逐步获得了敌军各部行动的准确情况，毛泽东、朱德等召开紧急会议，经过仔细研究，根据以往对敌战斗的经验和当前敌军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方针避开国民党的主力，让他们深入赣南，无用武之地，红军则由兴国经万安向富田突破，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打其可打者"。

7月底，红军主力从兴国出发，渡过了都河，避开了敌人主力赵观涛师和卫立煌师，从敌军的间隙中穿过，经老营盘向北，来到了泰和县的沙村，准备首先打击富田之敌。这时，红军抓获了两名敌军侦察员，经审讯得知，敌已从空中侦察到了红军的迂回行动，陈诚和罗卓英的两个主力师已奉命赶到了富田，准备与红军决战。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则，立即决定放弃攻打富田的计划，命红军主力立即折回，返回高兴圩一带的山村地区隐蔽待命。并命令肖克同志率独立第5师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在北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红军主力又按原路，以急行军的速度返回高兴圩，密

集在高兴圩圩场及其周围几十里的地带内。这里西临赣江，东、南、北三个方向上都有敌人的重兵，处境十分险恶。敌人的飞机不断地从红军上空飞过，盘旋。然而，红军战士们却从容不迫地进行夜行军的各种准备工作。

突然，红军总部的电台侦听到何应钦发出的一份密报，"限十天扑灭共匪"，其中有敌"围剿"部署的详细情况。电台报务员曹丹辉同志兴奋地将电报全文交给方面军领导。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当机立断，根据敌上官云相的第47师和郝梦龄的第54师已脱离富田一带的巩固阵地，正向南移的可靠情报，决定从敌人的中间突破，命令红军主力向兴国县的莲塘、永丰县的良村和宁都县的黄陂方向突进，迂回到敌人的背后，第一仗在莲塘打上官云相，第二仗在良村打郝梦龄，第三仗在黄陂打毛炳文，为防止敌人察觉，红军总部命令主力在夜间运动，同时命令红12军35师及地方部队向西运动，佯装主力，诱惑敌军向西面的良口、万安方向追击。

红军实施中间突破的第一个大胆行动就是要穿过敌第1进击军赵观涛师和敌第4军团蒋光鼐师、蔡廷锴师所在的崇贤、方达地域之间的40华里的空隙。天黑以后，3万红军开始行动了。他们偃旗息鼓，急速潜行。为了秘密行军，一切能发光、反光的物品都被隐蔽好，或用烟熏黑，连白马都穿上了伪装服；能发出响声的用具也用布包好，马嘴用马口叉塞紧，防止嘶鸣，队伍前后的联络以每人左臂扎上的白毛巾作识别，一路上，不设任何路标……，就这样，经过了一夜的急行军。拂晓，红军停止前进，在茂密的山林里伪装隐蔽，尽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侦察，却始终没有发现红军的任何迹象。夜幕再次降临，红军似离弦之箭迅速出山林、跨沟谷、翻山脉，急速向前驰骋。又经过一夜，红军终于穿过了兴国、崇贤之间敌军40华里空隙地带的8座大山，秘密地跳出了东、南、北三面敌人22个师的包围，到达莲塘地区。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后方。莲塘是敌人前进的必经之路，此时，敌上官云相师派1个旅的兵力接近莲塘。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首长观察地形后，选定了距莲塘约5华里的地域作为歼敌战场，并迅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具体的作战任务。红军的一切准备均已就绪，胜利就在眼前。

上官云相的部队，原来是王金钰的第5路军。在第二次"围剿"中，王金钰被红军的7百里横扫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被蒋介石罢了官，改由上官云相接任。上官云相在上次的"围剿"中也挨过红军的铁拳，所以他杯弓蛇影，处处小心。这次，他率队伍向南进发，又在根据地遭到了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寸步难行。上官云相所部的郝梦龄师由永丰县向滕田开拔，沿途发现大道已被破坏，路面上到处是坑以及被砍倒的大树，又不断遭到永丰县独立营的袭击，短短的四五十里路，郝梦龄师竟走了十几个小时。一连15天，天天如此，把郝梦龄折腾得精疲力尽。尽管如此，上官云相还自以为这是红军惯用的战术。由于上官云相的邻近各路兵力强大，所以他有恃无恐，认为可以左右逢源，见机行事。因此，他命令全部队伍慢慢前进，继续沿沙溪、龙冈南下。途中，他遇到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陈诚，陈诚吹嘘说他在根据地中心绕了一圈，未碰见红军。上官云相象吃了一颗"定心丸"，告别了陈诚，又放心大胆地前进，并且作了一些安排，以永丰县的良村为据点，构筑一些坚固的防御工事，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良村以南30里的莲塘担任警戒任务，另派一个旅的兵力占领良村北面的各个要点，向东、西两个方向警戒，再派郝梦龄师向兴国方向搜索前进。上官云相认为自己部署的兵力很恰当、稳妥，他哪里知道前面等着他的却是行将覆灭的罗网。

傍晚，敌上官云相的谭子钧旅进入了红军设下的伏击地段。敌人在大摇大摆地走着，红军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发起袭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喊杀声吓呆了，红军难道是天兵天将？红军很快就完成对该旅的包围，逐渐缩小包围圈。上官云相万万没想到他的一个旅竟被红军包围，急忙又派出一个多旅的兵力企图为其解围，可又遭到了红军阻击部队的迎头抗击，溃败逃回。7日清晨，红军向被围的敌谭子钧旅发起总攻，枪声、喊杀声、白刃战兵器碰击声响遍整个山谷。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敌人三次对根据地的进攻早已使战士们仇恨满腔，他们勇敢向敌人扑去。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至上午9点左右，即全歼敌人。

莲塘一仗，上官云相损兵折将，急令正向兴国方向搜索前进的郝梦龄部回援。7日下午，郝梦龄急急忙忙地赶回良村。红军对此早有预料，莲塘战斗刚一结束，红1军团立即奉命向东，直奔良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第3进击军指挥部和郝梦龄的第54师紧紧地包围在良村，上官云相怎么也想不到他自己竟成了瓮中之鳖。红军再次集中了兵力，向良村发起总攻，在"活捉上官云相"、"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战士们奋勇地向敌人冲去。敌人纷纷向后退败，不顾一切地逃命。上官云相和郝梦龄急忙向北90里外周浑元驻守的龙冈逃窜。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红军就将敌郝梦龄师大部歼灭，结束了战斗。

红军在一天之间，连打两个胜仗，生擒敌旅、团长以下官兵3千5百多人，毙伤敌1千多人，并缴获了步枪、迫击炮、机关枪、电台、子弹以及马匹等大量武器装备。

按照原定计划，莲塘、良村两仗之后，红军要转而打龙冈之敌。但此时，红军总部根据侦察的情报得知，崇贤方面的敌第19路军和兴国方面的敌赵观涛师，以及青塘、古龙冈方向的敌孙连仲部都在向我军目标前进。而且，敌周浑元的4个团已在龙冈构筑了工事。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的败兵4个团这时又已窜至龙冈。所以红军总部决定不打龙冈方向的有准备的敌人，而改变原计划，以红

3军佯攻龙冈，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第1、3军团和红7军向东挺进，星夜兼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远程奔袭敌毛炳文师。

红军广大战士再次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不顾连续两仗的疲劳，用了3天时间，神速地飞到了黄陂。8月11日清晨，红军就包围了敌军。毛炳文师占领黄陂后，以为红军尚在远方，便放心大胆地将兵力分散到各个"清剿"点上活动，后来，听到上官云相处吃紧，又急忙将兵力收缩到黄陂周围。占领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工事，居高临下以自卫，以为万无一失。哪里会想到红军竟突然来打他。11日正午，在瓢泼大雨中，红4军和红12军发起总攻。第3军团和红7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红军很快占领了黄陂外围的制高点——罗山寨，广大指战员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和1百多支冲锋号的伴送下，分路突向敌军阵地，两个小时后，占领黄陂，全歼敌军4个团。有趣的是，敌军的两个预备团队正在黄陂街上的一座大庙中集合，还未来得及出门，就被红军全部缴了械，另有一个骑兵连，虽然马匹都已备好鞍子，还未来得及逃走，也都当了俘虏。

红一方面军从8月7日莲塘战斗开始，经良村战斗至黄陂战斗结束止，历时5天，3战3捷，共缴获步枪6千多支、机关枪150多挺，迫击炮25门，电台3部，子弹70余万发。红军战士风趣地说：汉阳兵工厂也有红军的份，蒋介石慷慨地把大批武器装备送到红军手里，咱红军能不接受嘛？

（选自《百战图》作者：张国良）

材料二　打垮上官云湘

红一方面军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8月6日，在兴国县的莲塘地区，红三军团抓住国民党上官云湘的第四十七师谭子钧第二旅孤立冒进的时候，对其发起了突然的攻击。

红一师师长李实行指挥第一团并亲率1个连迅速抢占了安风山制高点，扼制了莲塘战场十万洲至半迳之间狭长山谷的中心地段，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军心脏。军团主力分两路由右翼侧包围敌人，红七军迂回蜈溪水口，切断了敌军退路。敌军一时人马阻塞，进退维谷，成了瓮中之鳖。

傍晚时分，枪声大作，杀声阵阵，国民党军队被打得晕头转向，英勇的红军战士趁敌混乱之机，猛打猛冲。

7日拂晓，红三军团在红四军配合下，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紧张激烈的白刃格斗，敌大部被歼，部分仍继续顽抗。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四十七师第二旅情况不妙，急忙派出飞机，对红军进行拦截轰炸。红军当时尚无防空武器，只能用快速奔跑的办法躲避敌机的袭击。敌机飞得很低，就在红军的头顶上盘旋，投弹轰炸。

担任攻击的红三师第七团在团长龙昌汉、政委李志民指挥下，勇敢逼近敌人。敌机只好盲目轰炸，准备反扑的敌人被炸死不少，受惊的骡马到处乱蹦乱窜。

突然，一颗炸弹恰好落在了红三师政治委员黄克诚的脚下，黄克诚想，这次可逃不掉了，定死无疑。事情就偏偏那么巧，这颗炸弹落地后，把地面砸了一个近1米的大坑，可是竟然没有爆炸。黄克诚又一次从死神的身边溜了过去。

9时，全歼国民党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1个多营，毙敌旅长谭子钧。第一次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红七军，由于作战勇敢，行动迅速，用刺刀杀出了威风，被彭德怀军团长誉为"猛如虎、精似猴"的英雄部队。

莲塘战斗，歼灭敌四十七师第二旅，是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打的第一个胜仗。红一师师长李实行身负重伤，送医院后光荣牺牲。

到8月7日晚上七八点钟，上官云湘才给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发电报，令该师2个旅连夜返回良村。郝梦龄令一六二旅旅长李大同率部先回，一六二旅连夜急行军赶回良村。李大同见了上官云湘，上官命令李旅接替一六〇旅在良村四面山上的防务，叫一六〇旅驰援谭旅。李大同遵令接防，一六〇旅在旅长张銮韶的带领下准备前往莲塘。

上官云湘正在抽大烟过瘾，译电员送来十九路军的一份情报，接过来边看边对李大同说："友军来电，有2万余敌军向我们方向窜来，要我们多加注意。"

李大同说："2万多，力量这么大，谭子钧怎么受得了？再去1个旅也不行，顶不住哇！"

上官说："这怎么办呢？裴同野（裴昌会字同野，时任四十七师旅长）旅在后面还没上来呢。"

李大同说："这里东面要紧，西面没情况，我把防守西边的六团撤下来，叫他们跟张旅一起上去。"

上官说："只好如此了。谭子钧犯了行军大忌，哪有山地行军不搜索两边的道理。他这一被围，搞得全军都被动了。

一六O旅走了半个小时，六团还没有出发，只听前方枪声激烈，一阵骚乱，一六O旅退下来了。原来，莲塘战斗后，红三军团和红三军、红四军乘胜北进，同一六O旅前半截遭遇，歼敌1个团，打死敌旅长张銮韶，后半截回头就跑，溃败下来，回到良村。

这时，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带着师部机关以及担负后勤运输的骡马车辆也开进了良村，人困马乏，机关急着号房子，运输队人员骡马在街头巷尾横躺竖卧，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郝梦龄问明情况后，急忙拉李大同到了村外，用手往东指着说："你看，东面这个大山口子，十分重要，必须派重兵把守。第五团防线过长，兵力分配不过来，守山口的人太少。共匪如果从这个山口冲进来，就全完了。你去传我的命令，把工兵营和特务营都拉上去，守住这个口子。"李大同去传达命令，工兵营遵令上去了；特务营营长说先埋锅造饭，吃了饭再上去，实际根本没有执行命令。

郝梦龄没有料到红三军团已经迅速攻占良村外围构筑的制高点楼坳栋，封锁了良村通往钓溪的下马坳山陵，继而集中兵力，勇猛突击敌军。一时间，枪声大作，军号齐鸣，红军高呼"活捉上官云湘"的口号，像潮水一般涌上来了。

双方短兵相接，战线犬牙交错，索性退了子弹，抡起大刀。一时间，寒光闪烁，血花飞溅。黄克诚此时也手持两把大刀，左砍右杀，却又往往砍得不是地方。

"政委，你一边去，你看不见！"一位副连长一边喊，一边挥动大刀，向戴着眼镜赤着脚的黄克诚靠拢。

"别管我，我专拣身上没血的杀！"黄克诚虽然动作不那么利索，但精神抖擞，英气逼人。

敌人纵然嗷嗷乱叫，也无法靠近黄克诚，他的两把大刀呼呼生风，水泼不进。

突然，一颗手榴弹从 20 米外飞向黄克诚，黄克诚放下大刀，弯下腰去，摸索着把手榴弹拣起来，凑在鼻子底下，似乎要看个究竟。

手榴弹正哧哧冒着烟。

"那是手榴弹！"一个战士失声大叫。

黄克诚终于也看清楚了，他像被火烧了似的，一个转身，把手榴弹扔了出去。

手榴弹哪里来哪里去，在敌群中爆炸了。

这时又一股红军队伍冲过来，大兵压境，敌人溃不成军。上官云湘一看形势危急，立即下令拆电台，收拾行李，准备撤退。

一六二旅旅长李大同见状问道："军长，这里怎么办？"

上官说："裴旅怎么还没有到，我去找他们去，叫他们马上增援上来，你在这好好顶住吧。"

李大同转身去找顶头上司——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郝梦龄已经不知去向。

李大同举目四望，满山遍野都是四十七师和五十四师溃退的官兵，谁也不理谁，只顾个人逃命。李大同大喝一声："架起机关枪来，谁退就打谁。"

一六二旅参谋长宋肯堂说："旅长，现在没法守了，指挥系统全乱了，连军官都找不着了。你遇见五十四师的，他硬说是四十七师的，连长不承认是连长，排长不承认是排长，你怎么指挥呀！眼看敌人进来了，现在不退，我们就得当俘虏了。"

李大同愣了一会儿，低声说："军长、师长都走了，我们也走。"说罢带着特务连和旅部人员加入了溃退的洪流。

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红三军密切协同，与敌激战 4 小时，歼敌上官云湘第五十四师大部，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等。

莲塘、良村两仗，红一方面军共歼国民党第五十四师和第四十七师大部，俘敌官兵 3500 多人，缴长短枪 3100 多支，机关枪 40 多挺，迫击炮 14 门，子弹 30 多万发，电台 2 部，马 200 多匹，其它军用品甚多。

（选自魏在田《天下第一军》）

材料三　千里回师　莲塘、良村、黄陂大捷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总前委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免同强敌正面作战，决定红军主力由闽西北回师赣南，在根据地的后部集中，并令在赣江西岸活动的红七军到瑞金附近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七月十日左右，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从建宁出发向赣南根据地前进，经过长途酷暑行军，到达瑞金北面的壬田，与红七军胜利会师。红七军原是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后突围东进，经广西、广东、湖南边界，转战到江西。瑞金会合后，总前委决定红七军暂归红三军团指挥。接着，红军主力由瑞金到于都的银坑，复由银坑向兴国前进，于七月二十八日集中于兴国西部的高兴圩一带。至此，红军主力经过半月行军，千里回师赣南，完成了战略退却任务。这时，敌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蔡（十九路军两师）、韩（德勤）、蒋（鼎文）、孙（连仲）、高（树勋）、二李（云杰、抱水）、毛（炳文）、许（克祥）、上官（云湘）、郝（梦龄）、周（浑元）等十七师之众，由东向西长驱直入，尽占苏区要地。但良村、黄陂、宁都、广昌一带，敌兵力较弱。"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向北，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这个方针亦称"自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战略。"

根据这个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七月三十一日在兴国高兴圩发布了《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计划由红一军团攻打富田，红三军团（包括红七军）攻打新安圩。于八月三日凌晨二时发起攻击。当部队向富田移动时，根据多方面的情报，判明富田一带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罗（卓英）纵队。原来敌人已发觉我之企图，急调其精锐两师到

富田阻止我军北进。红军根据“避敌实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为避免与强敌作战，当即决定改变计划，于八月三日退回兴国的高兴圩。这时各路敌人均以迅猛动作向红军合围：敌第十一、十四、五十二师由富田一线向南前进，第六十、六十一、二十三师占领崇贤、方太，第五十四、四十三、四十七师由龙冈向莲塘、良村前进，第八师占领黄陂，第九师占领江背洞，第六师向兴国进攻。红军处于西有赣江，东、北、南三面受敌十二个师包围的不利境地，仅剩高兴圩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几十平方里的地区可供我军集中。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决计采取中间突破战法，向兴国东部之莲塘、永丰南部之良村、宁都北部之黄陂突进，楔入敌人后方，迎歼正向兴国前进的战斗力较弱的第五路军，横扫龙冈、黄陂敌后方联络线，伺机歼灭增援之敌。八月四日晚，红军主力近三万人利用夜幕掩护，秘密地通过敌蒋鼎文师驻地江背洞和蒋、蔡、韩三师驻地崇贤、方太之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从高兴圩经文溪、塘石、花桥、龙冈头，于六日转移到兴国的莲塘地区，突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

红军到达莲塘后，当日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亦进至莲塘以北五里的大坝，与红三军团遭遇。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则进至良村、城冈一带。上官云相师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曾被我歼灭一旅，是敌军中较弱的一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决定第一仗在莲塘先打上官云相师，实行中间突破。七日拂晓，红军向敌发起攻击，上午九时结束战斗，歼敌第四十七师三个团，上官云相仅带几名随从逃回龙冈。

莲塘首战胜利后，红军乘胜进攻良村（距莲塘三十华里）之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于七日下午一时结束战斗，歼敌四个团的大部。红军追至龙冈附近，敌残部退回永丰。莲塘、良村两次战斗，共俘敌三千五百余人（内副旅长一名、团长两名），毙、伤敌一千余，缴获步枪三千余支、机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十四门、子弹三十余万发、马二百余匹。

红军两战两胜，军威大振。这时得悉北面的龙冈驻有周浑元的第五师，东面的黄陂为毛炳文的第八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兵力歼灭黄陂之敌，除令红三军向龙冈佯动外，主力挥师东进，以三天行程赶到黄陂。战斗部署是：以红四军、红十二军担任主攻，红三军团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打击增援之敌。八月十一日晨，红军出敌不意地包围了黄陂之敌。十二时发起总攻，红军以密集火力压制凭工事顽抗之敌。时逢天降暴雨，红军乘雨突破敌人阵地，冲进黄陂圩，正在集合的敌预备队两个团全被缴械。下午一时结束战斗，共歼敌四团，俘敌四千余人（内团长两人），毙伤敌一千余，缴获步枪三千支、机枪三十余挺、迫击炮十一门、子弹四十余万发。毛炳文残部向洛口、宁都方向逃窜，红军追击二十余里始回。

经过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敌由主动转为被动。蒋介石仓猝转变战略，分左、右、中三个纵队，由西向东急跟我后，深恐我军东出抚州。这就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为夺取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乘退追歼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黄陂战斗后，红军主力集结在永丰的君埠地区作短期休整。这时，敌军各师已纷纷向君埠逼近，寻我主力决战。八月十五日，敌第六、第十、第二十七、第二十四师占领黄陂，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五十二师进到南坑、北坑地区，第十一、第十四师由富田经龙冈、陂头逼近君埠，又一次对红军形成了三面包围，这是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最困难的时刻。正如苏区中央局当时所说的：从七月敌人发动第三次“围剿”以来，“我军由闽返赣，绕道长汀瑞金；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猝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

在这关键时刻，总前委当机立断，决定改变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战略，“转为由东向西，以一部诱敌东向，主力从敌之中左两路间潜入兴国附近休息整理”，以逸待劳，待敌疲惫时歼灭之。

八月十六日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从宁都、永丰交界的尖岭脑山地出发，偃旗息鼓，衔枚疾走，依靠人民条件、有利地形和严格的行军纪律，秘密地通过了敌第十一、十四师和第十九路军之间二十华里的空隙地带，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西部的兴国枫边、白石地区，隐蔽休整。与此同时，又令红十二军（缺三十五师）佯装主力东进，诱敌东向。红十二军一路扬旗鸣号，白日行军，每到一处则以红一、三军团的番号书写标语和铺撒路标，浩浩荡荡直逼乐安、宜黄。敌果然误认红十二军为红军主力，立即尾随红十二军向东“追剿”，并急调第十师到抚州防堵。八月底，敌在南团合围扑空，才发觉红军主力在枫边，于是敌军皆转旗向西。九月初，红军主力由枫边、白石地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西部的茶园冈、均村山区隐蔽休整，使由君埠地区西进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十二师又一次扑空。这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有余，养精蓄锐，士气旺盛。而敌则东西奔突，在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和日夜袭扰的情况下，日食不饱，油盐告绝，饥疲已极，士气沮丧。原来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敌人，在根据地吃尽了苦头，这时已到如同“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敌人已无力继续进攻红军。加之当时蒋、粤、桂军阀冲突加剧，粤、桂军进攻湖南，蒋介石需调兵防卫。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

九月初不得不下令"围剿"根据地的军队实行总退却。其部署为：第五十二师由枫边向崇贤地区的第十九路军靠拢；第九师在第十九路军掩护下由兴国北撤吉安；第十一、第十四、第六、第五十三等师由龙冈、东固地区撤吉安；第二十六师和第六路军由黄陂地区分别撤往宁都、广昌、南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得知敌人总退却的消息后，决定乘退追歼，首先歼灭由兴国北撤之敌，并视机扩张战果，以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九月七日，敌第十九路军的第六十、六十一两师，掩护第九师由兴国北撤经过高兴圩、老营盘地区。红军分三路向敌施行攻击：左路红三军进攻老营盘之敌第九师；中路红四军（附三十五师）进攻高兴圩之敌第六十一师；右路红三军团进攻敌第六十一师，红七军牵制兴国之敌第五十二师。七日晨，红三军首先在老营盘与敌第九师的先头旅发生战斗，激战至下午二时，全歼该旅三个团。与此同时，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也在高兴圩地区向第十九路军两个师发起攻击，血战两昼夜，因兵力不集中，与敌成相持局面，敌我伤亡各二千余人。红军为争取主动，除以红三军和独立第四师在老营盘阻敌北撤外，主力撤出战斗，转移到茶园冈地区待机歼敌。老营盘、高兴圩战斗规模很大，红军约三万人与敌七万之众作战，战线长达七十里，共毙、伤敌四千余，俘敌二千余人，缴获步枪二千余支、迫击炮十门、子弹六十万发。

敌军在老营盘、高兴圩受重创后，乃改变退却路线。九月十二日，第十九路军带着大批伤兵由兴国退赣州，第九师和第五十二师则经崇贤向东固、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北逃东固、吉安之敌进行追击。十五日佛晓，红军在东固南面的张家背、方石岭附近截住敌第九师的一个炮兵团、一个营和第五十二师全部，当即分两路攻击（红一军团在南，红三军团在西），十二时将敌全部歼灭。是役俘敌五千余人，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亦被俘获（后混入俘虏中逃脱），缴获步枪四千五百余支，机枪七十挺，子弹一百二十万发。

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东固六渡坳因指挥部队防避敌机空袭，不幸中弹牺牲。黄公略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湘乡，一九二五年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和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第二团党代表、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在战斗中屡建奇功。毛泽东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写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曾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词句，高度赞扬黄公略坚持湘鄂赣边斗争的卓越功绩。为了纪念黄公略，一九三二年春在瑞金叶坪建立了公略亭，并把黄公略牺牲的东固地区命名为公略县。

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各路敌军不敢与我接触，纷纷逃窜。敌人退却时，将东固、崇贤、枫边、方太、龙冈、君埠、南坑、黄陂、小布、东韶、中村、石马、大九竹一带房屋焚烧殆尽。敌军所过，稻谷充作军食，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达十余万家，激起了苏区人民的极大愤恨。我军因长期作战，需休整补充，除以地方武装追击逃敌外，主力则移至瑞金休整。

从七月一日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到九月十五日方石岭战斗，在七十七天中，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千里回师赣南，两次出入敌军重围，取得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五次战斗胜利，击溃敌军七个师，共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步枪一万三千余支，机枪一百七十余挺，迫击炮五十五门，无线电台六部，骡马五百余匹，子弹二百五十万发，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选自戴向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材料四　粉碎第三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以后，不出两月，蒋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兵分几路记不清了，约三十万人，以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熊式辉等为各路总指挥，长驱直入，齐头并进，将我苏区县城尽占。我方面军仅三万二、三千人，被迫绕道闽西之将乐、连城到瑞金，经兴国至老营盘，企图从赣江边之富田突破敌之薄弱部分，被敌发觉。我军改从良村突破，进攻黄陂。两役消灭敌三个师，吸引蒋军向黄陂回击，我军从间隙中转回兴国境内。待敌发觉，再向兴国时，我军已取得半月休整。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乘其撤退时，消灭蒋鼎文一个旅，在东固、白水地区消灭某师（似韩德勤师），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选自《彭德怀自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背景介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的中央政权组织。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省瑞金的叶坪召开有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六百多人出席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63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1 月 27 日，在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为副主席。下设外交、军事、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检察、最高法院、政治保卫局、邮政总局、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总务厅等部门。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下设红军总政治部、军委总参谋部、军委总经理部、军委总供应部、军委总卫生部、军委抚恤委员会等部门。将红军改称为工农红军，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全国红军统归军委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从这时起，瑞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都。

材料：

- “开国大典”
- 欢呼红色中央政权的诞生
- 六十五年前的“开国大典”

材料一　“开国大典”

1931 年 11 月 7 日

中央苏区瑞金叶坪村。

工农群众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初冬的凌晨 6 时，天还很黑。从江西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琼崖苏区、赣东北苏区以及白区、海员和红军部队选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国的朝鲜、越南族代表（湘赣、湘鄂赣的代表还未到）共计 610 余名早已列队来到了广场，瑞金及从长汀赶来的数千名群众也打着火把涌进了广场。

检阅台上正前方悬挂着两盏明晃晃的汽灯，左右两侧沿广场四周的竹杆上、树叉上挂着一盏盏灯笼。广场中央，竖立着五根二丈余高的竹木旗杆，检阅台的横梁巨幅写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台中央摆着书桌和长条板凳，检阅台后幕上悬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边是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检阅台布置得庄严大方。

6 时 30 分左右，毛泽东、朱德、项英、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张鼎丞、周以栗、陈毅、邓广仁、何叔衡、徐特立、陈正人、曾山等健步进入广场，顿时，广场内外数千人欢腾起来，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大会执行主席朱德站在检阅台正中前方，亮着他那高大的嗓门庄重地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司号队奏起了雄壮的红军歌。

锣鼓声、鞭炮声一齐震响起来。

伴随着军乐和欢呼，毛泽东指挥升旗，五面红旗在广场中央迎着朝霞冉冉升起。

雄壮的军号声嘹亮地长啸起来，响彻了绵江两岸的山野和一片晴空。

倍受艰难的苏区军民有的摇着帽子，有的高举着枪和刺刀，有的挥舞着手中的小彩旗振臂呼喊着，眼里溢出激动的泪花。

七时整，阅兵典礼正式开始。受检阅的有中央红军各军、军团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警卫部队的代表，闽赣两省附近各县的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等。检阅部队成四路纵队由南向北行进，他们披着战火的硝烟，沐着东方的曙光，扛着汉阳造轻重机枪、小钢炮、迫击炮，喊着宏亮的口号，在军乐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检阅台，向毛泽东、朱德行注目礼。赤卫军和少先队也都穿着列宁装，挂着红飘带，拿着梭标、大刀整齐地通过检阅台。看到这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大家无比自豪，无比振奋。整个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雷鸣般地回响在广场上空。

此时，正式会场的布置已经完成。会场主席台正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党旗，台上摆长条桌凳，桌的前沿挂着“工农炮垒”的布质标语，台上左边支撑着一块小黑板，右边桌上摆着一架座钟，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空挂着彩球，中间门上嵌着金色五星，横书“全民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左右台柱上有一对联：“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台沿挂着“民主专政”的布质标语，上下厅内三角

彩旗交错，"拥护全苏大会"的条幅标语举目可见，长条板凳布满全厅。

下午2时许，代表们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项英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说："全苏大会的成功，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继续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东方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她将领导中国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团结在她的周围，完成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她将使东方无数万的被压迫工农劳苦群众在她影响之下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成全世界十月革命胜利。……"

项英的讲话，声音洪亮清晰，令人精神振奋。

一阵掌声过后，任弼时走到主席台前沿，他微笑着向代表们提议说："现在，我们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好不好哇?"

一霎间，代表们被"毛主席"这一称呼惊愕住了。片刻之后，代表们热烈地鼓起掌来，异口同声地喊着"毛主席!"这时，毛泽东站起来含笑向代表们点了点头，尔后提笔挥毫，写下了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代表们激动万分，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经久不息。

夜晚，瑞金军民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与代表们一起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提灯庆祝晚会。此时，会场内一片光亮。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也来到会场，与群众一起唱歌、鼓掌、呼口号。在会场外的红军广场上，灯流云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和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各式灯笼，争辉斗艳；火把、灯笼一排排，犹如长龙起舞。各区、乡庆祝队伍演出的龙灯、茶灯、活报剧等，精彩活泼，令人目不暇接，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晚9时许，会场的庆祝活动达到高潮。此时，红军代表黄克诚登上主席台朗诵诗歌：

"十四年前的今日，
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
今年的今日
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
这是中俄工农头颅热血的结晶！
……
今日是十四周年的十月革命，
今日是中华苏维埃的诞生，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工作
到街上去——庆祝，游行，
因为她呀！是我们奴隶们的救主！
因为她呀！是我们无产者慈爱的母亲！"

在一片叫"好"声中，成仿吾又登上了讲台。他高扬着手，开始了他发自肺腑的朗诵：

"我们是苏维埃新中国的创造者，
我们高举着红旗，
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统一，
为了阶级的解放与利益，
领导着最大的革命战争。
让敌人在大会的号召下颤惊，
让地主与资本家咒骂纷纷，
苏维埃新中国大踏步前进，
我们是新中国的创造者。
看呵，我们全苏大会的这个会场！
苏区人民的新创，
他们充满了新的光芒，
它是新中国的缩小模样！
纵然它还是有点儿狭小，
在这里响着群众代表的高叫，
在这里准备了英勇的战斗，
更使得一切敌人更恐慌发抖，
战斗呵，苏维埃新中国的创造者！"

热烈的庆祝晚会，一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选自《红都记事》）

材料二　欢庆红色中央政权的诞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光荣的被选为红四军特务营的代表之一，到红色首都瑞金去参加庆祝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闭幕仪式，欢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多少年来，政权一直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我们工人农民被人踩在脚下；而现在，我们就要有自己的中央政权了，工人农民就要当家作主了。想到过去的苦难日子，想到今天革命形势的发展，想到今后日益美好的远景，我的心头像波涛一样汹涌奔腾。那一晚，我激动得很长时间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这支由与会代表组成的队伍，便沿着蜿蜒的山路，快步向瑞金走去。同志们今天的服装比往日整齐，步伐也比往日更雄健。不一会，我们就要和中央首长、根据地人民一道，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

还没有到会场——松山岗子时，前面的欢笑声、歌唱声已飘了过来；远看数百面红旗像红色的海浪在滚动……一切都显示出节日的景象。走近会场一看，成千上万的群众早已挤满了。岗子尽头，坐东南朝西北的主席台口的两旁，装饰着翠绿的松柏树枝，中间还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的上沿有醒目的庆祝工农代表大会闭幕的字样；台上正中高挂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一群捧着鲜花的儿童团的孩子们，面对台口在歌唱；一个小女孩舞动小

手在指挥，头发上的大红蝴蝶结，被风吹得一飞一飞的，简直像活的。赤卫队、青壮年、老人们也穿上了打土豪时分到的新衣，喜笑颜开，逢人就打招呼。到处充满兴奋、欢乐，人人都是喜气洋溢。我们中央红军各部队的代表，便整齐地排成六个方块，坐在人群的后面。

下午三点钟，会议主席宣布开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主席讲话了。他告诉我们：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和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个幸福的时刻。我紧抱着怀里的枪，仰着脸，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那魁伟的身躯，和那温厚、纯朴的脸，听着他那平静而充满自信的声音，我觉得浑身都充满力量。就是他，创造和教养了我们红军，并指挥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消灭了大量敌军，从而建立、巩固和扩大了红色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是他，将领导着我们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记下了他的话，并以雷样的掌声表示对自己领袖的热爱。

接着，朱德总司令等首长也相继讲了话。当会议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整个会场立时欢腾起来，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大家都为中国人民第一次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兴奋、而欢呼……。

游行开始了。我们红军战士们穿着灰色军衣，领口缀上黑边红底的领章，胸前佩着椭圆形红色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符号，戴着八角帽，手持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枪，排成六个方队，整齐、雄壮、精神抖擞，以刚健的步伐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通过主席台时，毛主席亲切地向我们频频招手，全场群众也热情地向我们欢呼。这是领袖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荣誉和奖赏。我们把手臂甩得更直，步伐也更加整齐和有力。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不仅能消灭敌人，开辟革命根据地，而且还能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新政权。接着通过主席台前的有儿童团、红军大学、赤卫队等等。当我们离开会场很远时，还听到人群中"毛主席万岁！""工农民主政府万岁！"的呼声，如波涛奔腾，久久不息。

入夜，半弯明月爬上了东山头。我提着五星红灯，随着队伍，赶到松山岗子上去参加"提灯晚会"。啊！会场里，简直是一片灯的海洋。"灯"把我们围住了，人们向我们红军"提灯"队伍问好，还有的燃起了鞭炮。

灯，各种各样的灯。六面都画着人民胜利图的跑马灯，团团直转，惹得一群孩子哈哈大笑。一条数丈长的龙灯，弯弯曲曲忽上忽下，像游动在自由的大海中。锣鼓的声音吸住了我，往人群里一看，原来是一群技巧熟练的舞花杆的人们。一阵悠扬的乐曲又把我引入了另一个场面：人堆里，"老渔翁"正要下网打蚌，"小蚌精"直按手中的电筒，像明珠在夜中闪闪发光。唢呐的乐曲伴着踩高跷的歌舞；坐旱船的姑娘还在唱着："……今天的人民呀嗨哟，当了家呀划哟。……"

人们沉醉在狂欢中。红军指战员和工人、农民群众在灯火和歌声中欢度了自己幸福的节日。

一夜的歌舞，没有使我们疲倦。黎明，我们又精神奋发，走向自己的战斗岗位。在回队的路上，我不时回过头，望着那个被薄雾笼罩着的山头，想着昨天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和狂欢的会场情景，不由得心中万分激动："红色政权呵，我一定终生为你战斗！"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二》）

材料三　六十五年前的"开国大典"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建立全国性统一的苏维埃政权，让劳苦工农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和准备。从1930年2月起，中共中央就先后决定在上海、长沙、宁都等地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临时政府，由于时机不成熟而没有实现。直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和闽西苏区已经联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拥有1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于是，中央苏区中央局选定瑞金叶坪村作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点，瑞金城便成为即将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村，一片欢腾。村外浓荫覆盖的大樟树旁，新辟出一片宽阔的红军广场。广场靠树林的一端，新搭起一座红军检阅台，对面是一座炮弹型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检阅台上方，悬挂着纸扎彩带，一条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横幅悬挂在检阅台前，格外醒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就在这里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和议程是：讨论和通过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决议；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参加大会的有江西中央区、闽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苏区和红军、全总、海员的代表共610人及朝鲜的来宾。

黎明时分，在红军广场首先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在军号声中，一队队威武雄壮的红军将士，精神抖擞地列队通过检阅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在检阅台上，挥手向红军致意。阅兵完毕，在万众欢呼声中，大会正式开幕，项英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

当天晚上，瑞金县军民提着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村全苏大会会场，举行隆重热烈的提灯庆祝晚会。毛泽东、项英、朱德等同志，站在主席台上，兴高彩烈地与台下群众一起唱歌、鼓掌、呼口号。在会场外的红军广场上，灯流云集，各种颜色和五角星、镰刀锤子开关的各式灯笼争辉斗艳；火把、灯笼一排排，犹如长龙起舞。各区、乡庆祝队伍演出的龙灯、茶灯、活报剧等，精彩活泼。

大会期间、毛泽东、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分别作了政治、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草案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处问题等决议草案。

11 月 19 日，大会进行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等 63 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0 日大会举行授旗授章典礼和闭幕式，毛泽东、项英先后致闭幕词，并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江西正式成立了。"

11 月 2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执委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执委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选举了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同时委任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 15 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各部分红军的领导，为推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奠定了基础。

赣南会议

背景介绍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1931 年 4 月"左"倾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4 月 17 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及"左"倾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量，并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这个决议无端指责 1930 年 6 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犯了许多严重错误。8 月 30 日，党中央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并罗列了这种错误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解决土地农民问题、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方面、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及党内和群众中思想教育等 5 个方面表现，并且认为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根源是受"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影响。"同时还指责苏区同志对上述的根本错误，"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还犯有富农路线的错误。此外，指示信还指责"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

为了贯彻中央八月指示信的精神，对照总结检查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等 5 项决议案。

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批评毛泽东，把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斥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议案"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列入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传统"；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则进一步提出，要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

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了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会后，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

局书记。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到达瑞金，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材料：

· 赣南会议，毛泽东挨批

材料　赣南会议，毛泽东挨批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忙碌的，可是他的心境并不舒畅，因为他在党内刚刚蒙受了一次"高强度"的批判。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可是，在全苏"一大"前夕，却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

正因为这样，全苏"一大"由项英主持，任主席团主席。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全然由于他在红军、在苏区那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

关于项英重新取代毛泽东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对此说得颇为坦率：

三中全会（引者注：指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派项英同志来到苏区。项英对立三路线进行调和，认为李立三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蒙受了沉重的一击。那是在"提灯游行"的前夕——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人团"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

王明在1931年初上台，到了这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更进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引者注：指共产国际）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最初是想拉一把毛泽东的。他很快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决不是拉一把就能拉过来的人。何况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急欲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不早不晚，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那台一百瓦特收发报机，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那天深夜，值班员刘寅首先听到上海秘密电台的信号，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刘寅马上报告曾三（后来成为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拟了个密码电报发过去，上海秘密电台收到了——这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曾三是从上海派来的，原本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电台工作。那个秘密电台，是周恩来花了气力建立的。周恩来派出中共党员李强、张沈川改名换姓，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得了收发报技术，于1929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建立了秘密电台，跟香港的中共地下电台发生联系。1931年3月，上海秘密电台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只是中央苏区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仍无法与上海联系。直至在东固歼灭公秉藩师，缴获了那台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发报机，这才终于架起了"瑞金—上海"无线电之桥。

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这下子，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当时求之不得的！

这时候的王明，正准备去苏联。他在10月18日动身前，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那王明路线强加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那是在于双方是平起平坐的对手，尽管蒋介石人强马壮，人多势众；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却不能不居于劣势，因为王明代表上级，代表中央，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而他碍于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10月，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第四号电报，又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

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

另外，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样，11 月 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当选。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这样，也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此后他专做政府工作了。

就在瑞金举行“提灯游行”那天，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于接通了“莫斯科—上海”和“上海—瑞金”的无线电联系，王明坐在莫斯科，“遥控”着上海以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

（选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者，叶永烈）

宁都起义

背景介绍

宁都起义是 1931 年 12 月 14 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江西宁都举行的起义。1930 年 10 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收编冯玉祥西北军之第五路军为第二十六路军。早在 1924 年至 1927 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就在西北军中建立了组织，开展工作。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随蒋介石之后在军队中“清党”，大部分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西北军，少数共产党员留在该部继续坚持工作。1931 年春，第二十六路军由山东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7 月又参加第三次“围剿”。9 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留在宁都防守。此间，中国共产党派王超、袁血卒（当时名袁汉澄）等共产党员到第二十六路军，与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刘振亚等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苏区的巩固、扩大，给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以深刻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及其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他们提出回北方抗日的要求，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促使该部官兵加深了同蒋介石的矛盾。在第二十六路军秘密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对此因势利导，积极发展组织，该部参谋长赵傅生也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展为共产党员。同时在官兵中进行准备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12 月上旬，中共特别支部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的紧急情报后，遂即与赵博生商定，乘该部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之机，举行起义。并派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得到了军委的批准。接着，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之固村圩就近联络指导，令红军第四军进至宁都、广昌之间地区支援起义。12 月 14 日，第二十六路军约 1.7 万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等率领下，逮捕了抗拒起义的军官和国民党宁都县长等官吏，胜利地举行了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肖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军团辖三个军：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宁都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促进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使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新的力量。

材料：

- 兵运奇迹——宁都起义
- 宁暴经过（摘录）
- 李青云给刘伯坚关于宁暴经过的报告（摘录）

材料一　兵运奇迹——宁都起义

1931 年 12 月 14 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17000 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了武装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像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还是第一次”。

宁都起义的根本原因

1930 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连续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军事“围剿”。1931 年，在蒋介石准备第四次“围剿”前，参加“围剿”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 12 月 14 日突然在前线宁都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既有其内部原因，也有其外部原因。主要有：

（一）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二十六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二十六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1930 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失败，蒋介石将冯玉祥一些余部收编为二十六军（下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任命孙连

仲为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为二十七师师长，赵博生为总参谋长。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后，仍与冯玉祥暗中往来。蒋介石恐其留在北方生变。便于 1931 年春，调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前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以达到其既消灭红军又消除异己的险恶目的。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籍，不愿到南方，更怕到江西后，一被红军消灭，二被蒋介石缴械。蒋介石以数十万巨款收买了孙连仲和一些军官，欺骗逼迫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前线。

二十六路军到达江西后，被迫投入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二十六路军退驻宜黄，士气低落。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二十六路军被驱赶到红色区域包围中的宁都，随时都有被红军消灭的可能。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蒋介石下令部队后撤，唯独不准二十六路军撤离宁都，甚至连唯一后退通道的广昌，也被蒋介石派其嫡系朱绍良部堵死。二十六路军完全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二十六路军是非嫡系部队，本来就倍受歧视，而今又被逼入绝境，这就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极大不满和愤恨。

（二）为官不仁，官官相争，使军队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国民党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只是此时的二十六路军更显突出，士兵景况更惨。二十六路军广大士兵的月饷本来就少得可怜，经过一些军官的层层克扣，到了士兵手上更是所剩无几。如米津一项，孙连仲以三万人向蒋介石索取，每人每月两元，共六万元。其中大部分便落入孙连仲等人的私囊。部队驻宁都数月，更是粮饷不济，不仅吃发霉米，还经常不给菜，只好就盐水下饭，广大士兵怨声载道。

二十六路军多为北方籍士兵，初到江西，水土不服，疾病流行，生病者达 5000 余人。更有甚者，一些反动军官为吃空额和侵吞棺材费，把尚未断气的士兵活埋掉，或把两个死人合装一口棺材，或抛尸荒郊喂野狗。生病士兵目睹种种惨状，悲愤至极，便扶病组织了“天理良心委员会”，向外诉苦求救。士兵因无法忍受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而自杀的事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军官之间的矛盾也更趋激烈。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内部采取离间分化的手段，拉拢高树勋，委任其为十七军军长，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这两个师本来由孙连仲管辖，而且孙还兼二十五师师长。蒋介石此举无非是想从孙的手上夺走二十五师，以消弱孙的实力。孙连仲对此极为恼火，接到命令后，不仅不给高树勋设立军部，反而把高架空，逼得高树勋只好跑到南昌去“医病”。高树勋在南昌大骂孙连仲，孙连仲在宁都反唇相讥；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又瞧不起孙连仲，更对孙提升其亲信李松昆任二十五师师长不满，对李加以鄙视，常出言不逊，孙连仲对他也无办法，相互矛盾很深，由于矛盾重重，孙连仲感到部队难以控制，加之形势不妙，便也告假去了上海。

总指挥孙连仲与高树勋都跑了，部队没有人管，更陷入混乱，广大官兵更加陷入了绝望与痛苦的深渊。

（三）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为痛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当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全国各界人民纷纷起来。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一些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领，也强烈要求抗日，他们强烈要求北上抗日。士兵们普遍的情绪是，宁肯与日军战死，也不愿死在江西喂狗。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一批爱国将领，代表广大官兵的正义要求，联名通电要求北上抗日，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和训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激起了更大不满和痛恨。

（四）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组织工作，争取团结了一大批官兵。

早在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就有过与我党合作的历史。1926 年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他的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我们党还先后派了陈延年、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等著名共产党员在冯部担任政治和军事工作，帮助开办军事学校，培训干部，整顿部队，使冯部有了新的发展。二十六路军中的许多官兵从国民联军时起，就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进入江西苏区后，苏区党加强了对该军的工作，如张贴和散发“穷人不打穷人”、“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以及有针对性的“白军兄弟，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二十六路军兄弟们，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欢迎白军士兵打土豪分地”等标语传单，不仅在士兵中有影响，甚至一些军官看了也有感触。二十六路士兵被俘后，受到红军优待，有伤的治伤，有病的医病，组织他们了解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和红军生活的情况，然后释放欢送他们走。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通过耳闻目睹以及亲身的感受，逐步了解到党的政策，了解到红军才是真正的革命队伍。当时就有不少士兵逃跑去当红军，在一些军官中，也孕育着当红军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公开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了冯玉祥的部队，但仍有少数党员留了下来。二十六路军中，就有七十三旅参谋刘振亚等地下党员。当时他们虽然还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军内也尚未建立起党的组织，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

1931 年 5、6 月间，设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

工作。他们与地下党员刘振亚等接上关系后，就积极开展工作。不仅发展了李青云等一批下级军官和士兵入党，而且发展了高级军官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赵博生入党对于地下党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在军中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委员袁汉澄、王铭五。同时分设了军官支部和士兵支部。到起义前，党员已发展到20多人，中共地下党组织实际上已基本控制了总指挥部，并掌握了学兵连等几个连的武装，争取团结了一大批官兵。

党的影响和党的工作，促进了二十六路军官兵向革命方面的转化。所有这些都是促成其举行起义，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

宁都起义经过

1931年10月左右，王超奉调离开二十六路军，途经南昌被捕，敌人从中获得了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材料。12月初，蒋介石南昌行营密电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查获共党分子，并派飞机投送来王超的供词和地下党的文件材料。当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名义上李松昆是代理总指挥，实际上总指挥部为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所掌握。因此，密电和材料都落到了赵博生手中。赵博生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在地下党组织面临遭受破坏的紧要关头，赵博生与袁汉澄等立即研究了应变办法，并决定：一、马上派人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二、积极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以七十三旅为主举行暴动。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受党的影响较深。早有投奔红军的愿望，且与赵搏生关系甚密。因此，通过赵博生联络他率部起义是不成问题的；二是争取七十四旅，扩大暴动。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主力团团长黄中岳与孙连仲、李松昆之间有矛盾，根据他们早年曾受过党的影响，现在又有北上抗日的要求，加上队伍在宁都的困难，争取他们共同起义是有可能的。

赵博生等人研究后便分头行动。袁汉澄连夜奔赴苏区，在叶坪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报告了二十六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以及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设想；与此同时，赵博生当夜，首先找董振堂，商讨今后的出路，提出了起义投奔红军的主张，当即得到了董振堂的积极支持。接着，赵博生和董振堂一起到七十四旅找季振同。他们向季振同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困难处境，谈到了全军广大官兵北上抗日的正义要求和遭到蒋介石拒绝的情形。提出了要想北上抗日只有加入红军的主张，得到了季振同的赞同，同时也取得了黄中岳的同意。于是大家当即决定共同率部举行武装暴动，加入红军，并商定联名写信给他们的熟悉和信赖的、曾任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现在中央苏区的刘伯坚同志表达他们起义加入红军的诚意和决心，并即选派七十三旅参谋郭如岳到苏区送信。郭如岳到瑞金叶坪见到了刘伯坚。从此，二十六路军起义将领开始了与中革军委的直接联系。

中革军委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来信，研究同意在二十六路军组织武装暴动。12月7日，刘伯承代表中革军委给季、赵、董等人写了回信，表示热切地期待他们到苏区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同时，提出要他们互推起义领袖，并建议再派代表到苏区作进一步洽商。

袁汉澄、郭如岳先后回到宁都后，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在官兵中的宣传鼓动和争取团结的工作。七十三旅、七十四旅，以及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八十旅的董俊彦、卢子美连，都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军事训练，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根据刘伯坚的意见召开了秘密会议，推举了季振同为宁都起义领袖，并决定选派七十四旅营长卢寿椿为代表，去苏区进一步洽商起义。

卢寿椿到达苏区后，中革军委代表刘伯坚除与其当面洽商外，还给季、董、赵、黄写了一封信，转达了中革军委的决定，并根据我们党的兵运工作经验，对他们组织发动起义提出了具体意见：一、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二、暴动过程中必须坚决解决军官中的反动分子。红军将在胡咀岭、东山坝和会同、安福一线配置强固兵力予以接应；三、暴动时间必须在十三号拂晓；四、暴动胜利后即把部队拉出城，到指定地点驻扎；五、代拟了暴动时的政治口号；六、起义部队编制暂由季等决定；七、旗帜和符号随后发给；八、原议季振同与刘伯坚的会面，因在时间和行踪上都有妨碍，推延到暴动成功之后。要不失时机，不容有丝毫犹豫，等。

卢寿椿从苏区回到宁都后，原计划按中革军委规定时间举行暴动，因准备尚未完备，而且全军的军饷、冬衣到了广昌，13日才能运到宁都，故临时决定将暴动时间推迟一天，于12月14日举行。

12月12日晚，赵博生、董振堂、袁汉澄和李青云等开会，讨论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研究了暴动的行动方案。13日晚，进一步研究落实起义行动计划，并作了具体部署：一、14日黄昏，赵博生以总参谋长名义，在总指挥部（耶苏堂）二楼，宴请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借以解决军官中反动分子，使各部队失去指挥；二、城内城外全部警戒，西北东南四面分别由七十四旅和七十三旅担任；三、由七十四旅派部队负责包围总指挥部，解决反动军官，派七十四旅卢寿椿营负责解决二十五师师部，捉拿代总指挥、师

长李松昆，派七十三旅学兵连和特务连负责解决二十七师师部；四、由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分别派兵解决总部及各师部的电台，并派总部特务排解决特务电台；五、由党内袁汉澄、王振铎、杨履元等人于暴动开始后，负责破坏各处电话线和应付意外事变；六、由赵博生出面以请宁都县靖卫团团总严惟慎和县长谈话为名，捉之；七、统一于晚八时行动，口令“解放”；八、暴动一旦发生，对驻在城外由反动军官控制的部队，应尽力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由七十五旅参谋长边章五负责七十五旅，由董振堂负责七十九旅贾团，二十七师其余部队由李锦亭、王鸿章负责。

12月14日，各行动部队按预定计划，以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为掩护，作好了武装待命的准备。当夜幕降临宁都城时，赵博生所宴请的军官们除李松昆外均已到齐。军官们在总指挥部二楼喝酒，其传令兵被安排在楼下也受到了好酒好菜的“招待”。与此同时，各起义行动部队进入了指定位置。晚8时，正当军官们酒兴正浓之时，赵博生庄严地宣布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一些反动军官起来反对，事先埋伏在外的行动队员听到预定的信号，立即冲进，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全军暴动就此开始了。各起义行动部队按预定计划迅即行动起来，除代总指挥、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逃脱外，整个起义行动基本上按计划顺利完成。二十六路军全军17000余官兵举行的宁都起义成功了。

15日晨，起义队伍开出宁都城。在共产党员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赴苏区。当天，由刘伯坚起草的宁都暴动宣言，通过苏区电台，正式向全国广播。随即，起义部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政治委员，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王如痴为十三军政治委员，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为十四军政治委员，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左权为政治委员，从此开始了红五军团的光辉革命历程。

（选自《党史文汇》92年2期，作者：邹林春）

材料二　宁暴经过（摘录）

宁都兵暴的二十六路军在大革命时期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更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惟有共产党才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解放到底。1929年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开江西，我同博生在山东济宁东北郊外开了个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江西来加入红军，并以李青云到中央去，这一去空去了未找到。回来队伍已到江西了（1930年1月底）。这时候我们找到刘振亚，同青云到河南，到南京才找到了向导，青云才同中央接上头。中央并派人来领导和训练。当时党决定在二十六路〔军〕的工作大纲和宣传大纲，并拟定了暴动的办法，以七十三旅学兵连作基干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其教育和训练，然后将这批党员分发七十三旅各连，在各连建立党的组织，以作暴动的主力军。到9、10月，党有迅速的发展，建立了两个支部。10月底王某（王超——编者）回中央报告，走到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蒋电孙（孙连仲——编者）查拿，蒋并将王某供辞和一切文件由飞机送交孙连仲。恰好此时孙到南京开会，电报文件全落在赵博生手中。当时党即开了个紧急会，决定：一、与中央苏区取联络；二、积极准备暴动；三、积极扩大暴动。当时派袁汉澄到中央苏区取联络。对七十三旅的学兵连李青云、特务连姚鸿春，二十七师八十旅董俊彦连、卢子美连，加紧这四个连的训练和武装的准备。当时二十六路〔军〕一般士兵病的很多、死得〔也〕多。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党就拿这两点在群众中宣传：二十六路〔军〕在宁都终久得全病死完，我们在这里病死完，不如到东三省同日本拼拼。群众说：我们11月联名（除孙连仲、李松昆外）打通电去打日本，谁不让我们去谁就是卖国。电报打了，蒋介石大骂孙连仲。孙连仲就来电说：你们太猛浪，又说了许多不是。这个电报领头的是季振同，碰了钉子后，季心里就产生不安。我们说：“孙连仲回来，我们不得了，我们要结团体一齐同他干才行。”就想了个组织的名字“同志会”，并指派人起草会章。我同博生与季说：我们北去，蒋介石的军队挡着，过不去长江，我们与红军连合连合怎么样呢？季说可以。我们就给伯坚写了一封信，派郭如岳送的。回信说：一、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二、派代表来商。接到这封信后，12月12日午前十时，我们三人到宁都城南山上开了一个会。一、共推季为革命领袖。二、派代表二人。我的代表是袁汉澄，季的代表是卢寿椿。回来后当甚满意，中革军委说愈快愈好。12月12日晚八时党内开会，博生、振堂、青云、血卒到会，根据中革委会代表的指示决定，我们就决定了12月14日午后七时，宁都兵暴就爆发了。

（选自84年《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作者董振堂）

材料三　李青云给刘伯坚关于宁暴经过的报告（摘录）

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的第五路嫡系军队，由孙连仲率领。1930年蒋冯军阀混战，冯玉祥失败后，孙连仲投降蒋介石，除其所部十二、十三师以外，又将冯之手枪旅编为十四师，在济宁改编为二十五师、二十七师、骑兵师，合编为二十六路军。士兵大部分为陕甘籍，其余为直、鲁、豫人。大部分是派门头兵派来的，一部分是连年旱灾没有饭吃而来的。二十六路〔军〕士兵在河南苦战数月死伤大半，不但没有饷发，就是吃的东西亦是从群众家中征发来的。

归蒋介石后，在名义上虽然是说发饷，但七折八扣再加上各层官长的剥削，士兵还是得不到任何利益。

孙连仲投蒋后，暗中仍与冯玉祥勾结，经常派代表来往。1931年2月二十六路〔军〕住山东济宁时，蒋介石即不放心：孙连仲如久住北方，又有仍归冯玉祥之危险；乃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调孙连仲部到江西"剿赤"。

南调的命令下来以后，孙连仲就召集旅长以上的秘密会议，决定是否听命。这一会议结果，决定了决心不到江西，其原因：(1)因为红军的胜利到江西来怕交(缴)枪给红军；(2)怕被蒋介石交(缴)枪；(3)与冯封建关系还未割断。后经蒋介石派刘郁芬、贺耀祖等小走狗携大批贿金，经过各种花样的游说收买(这次孙连仲又得了几十万)，于1931年1月28日才从济宁陆续开动。士兵都不愿意，所以在出发时候，就开一大批小差。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正当二次战争(指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编者)开始。这次战争蒋介石惨败，该路〔军〕亦交(缴)了一旅人的枪给红军。自这次战役后，士兵受了革命很大的影响，所以从二次战争到三次战争前后，整班及零星开小差当红军的陆续不断。

三次战役(指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编者)蒋介石又惨败了。二十六路〔军〕溃退到距广昌五十里之胡岭咀，又被蒋介石强迫折回宁都。此时二十六路〔军〕全部麇集宁都城。周围尽是赤色区域，米菜买不到。每天由兵站发一点糟坏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更加上官长无限度的剥削，此时士兵生活上、精神上痛苦到了极点。大家一致的呼声，就是要回北方，甚至无论如何亦不愿再在宁都。

上海共产党中央1931年6月派王超、袁血卒、李肃来建立二十六路〔军〕的党。此时正当三次战役开始，二十六路〔军〕正是由宜黄开往东陂的时候。在宜黄介绍李青云、赵博生入党。因队伍行动亦未成立支部，当时即派李青云到上海报告二十六路〔军〕情形。8月李青云回来(到)宁都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成立了干部支部、士兵支部及特别支部。此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党抓着这一事实，深入宣传，使士兵倾向于革命。并抓紧二十六路〔军〕各派的冲突，实行挑拨离间。高树勋因军长未当成，坐到南昌骂孙连仲贪得无厌。孙连仲骂他没有良心。季振同向来就看不起孙连仲，自河南归孙连仲后常说：我是总司令的手枪旅，那能听你孙肉头的指挥？孙连仲亦感觉无法指挥他。李松昆虽对孙忠实，但为季振同等所忌恨卑视。利用这些矛盾，用全体士兵的名义，与孙连仲去了一封促其觉悟的信，孙连仲经过战争的失败，对进攻革命的胜利心早就没有了，又加上自己内部不一致，更加无法指挥，就请假到上海去了。

当李青云从上海回来时，党中央即调王超到驻江西各师去巡视工作，到南昌被捕叛变。当王超被捕消息传到宁都时，党即召集一次支委会，认为党的组织有破坏的可能，即准备暴动。以后蒋介石的飞机又送来一个密令："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查拿外，仰即该路〔军〕严密防范为要，此令。"孙连仲赴上海时指定李松昆代理总指挥，但事实上仍由赵博生代行，所以这一训令为赵所得。赵看此训令后，召集李青云及董振堂开一紧急秘密会议，讨论应急办法。即决定一方面派同志与苏区中央接洽，一方面利用季振同之不满，煽动其与我们取一致行动全体暴动，他如果不同意，七十三旅亦要在一、二日内暴动。当晚取得季振同之同意，即决定季、董各派代表一人，党秘密派一人。季振同派卢寿椿，董派郭如岳，党派袁汉澄(即血卒)，到中央苏区接头。中央将二十六路〔军〕编为五军团，请董、赵、季互推首领，尽可能于12月13日暴动。当时即推季振同为总指挥，因13日一切还没有准备好，且去南昌运棉衣的亦于13号才能到，故延至14日才动作。

在13〔日〕夜拟定暴动计划如左〔下〕：

(1)由赵博生准备酒席两桌，以总参谋长名义邀请全路〔军〕团长以上军官吃饭，时间为14时〔日〕17时。并特别给跟班的传令兵预备好菜好酒，派人好好招呼，使他们都喝醉了为最好。

(2)由七十四旅派手枪队一连包围总指挥部，并捆反动军官。同时派后一营，包围二十五师师部，解决该反动师长李松昆。均于八点钟动手。

(3)城内外警戒，由七十四旅派兵一连，七十三旅派一营人断绝交通，改换口号——"解放"，口令不同者，一律不准通过。

(4)总部无线电队由七十三旅派一排人监视，二十七分队(即二十七师无线电)，由七十四旅派队监视，禁止发报。

(5)以袁血卒、王振铎、杨履元三同志组织一个特务队，动作开始后即破坏各处电话，并应付不意事变。

当时请酒，赵博生起立发表意见略谓：现在士兵痛苦到万分，为士兵计，我们应取革命行动，大家去当红军。团长以上的反动官长大家都不同意(事前已有规定，听桌子一响，外面同志即进来下手)，桌子一响，外面的同志就拿着绳索手枪进来。反动官长看事不对，就想逃跑，被守门的孙步霞、孙芳贵、张博泉等迎头几枪，将二十五师的王参谋长一枪打倒，怕死的反动官长们就躲到墙角、门后、桌子底下乱作一团，都被捉起。

15日五时二十六路〔军〕全部两万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出宁都东门全部开到赤区来了。

(选自84年《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李青云给刘伯坚的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一文，作者李青云)

《红色中华》报创刊

背景介绍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2月11日，在纪念广州起义4周年的时候，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铅印大报。

《红色中华》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刊起至1934年10月3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出版。开始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从第五十期起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4个单位的联合机关报，共出240期。第二阶段，从1935年11月25日至1937年1月29日，在陕北瓦窑堡出版，期号紧接着在瑞金出版的最后一期，即从第241期起，至324期。这时期的《红色中华》是1张油印的4开报纸，开始为了缩小目标，只标明是西北中央局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的机关报，以后才改称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也曾出版过《红色中华》报，一个是留守中央苏区的原报社工作人员出的，坚持至1935年2月才停办；另一个是在长征途中出版的《红色中华》油印版。不过，这后两个《红色中华》报，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保存下来的原件。

《红色中华》创刊伊始，毛泽东即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名义委任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为主笔，周亲笔为《红色中华》题写了报告，但因体弱多病，长期住院，便由项英兼任代主笔。周以栗去世以后，项英正式担任主笔。而实际上，《红色中华》的具体编务是由主编负责的，第一任主编是王观澜，继之是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到陕北复刊后，主要的领导人是廖承志，负责主编的有任质斌、向仲华等人。其他参加过《红色中华》编辑工作的先后约有一二十人。

《红色中华》创刊时是周刊，自第五十期起改为3日刊，第一百四十八期起改为2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即发行号外。在瑞金时期，《红色中华》一直是4开的铅印报纸，每期至少出两版，一般出4至8版，最多时出至10版。它设有以下栏目："社论"、"要闻"、"来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还设有不定期的文艺副刊《赤焰》。内容相当丰富，版面新鲜活泼。

材料：

- 《红色中华》发刊词
- 王观澜主编《红色中华》
- 《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

材料一　《红色中华》发刊词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目前它的工作：

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这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能运用自己的政权，达到镇压反革命的阶级，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目前改造苏维埃，特别是建立乡苏维埃，以及纠正过去土地革命及现时肃反工作的非阶级路线，对于经济政策的忽视与错误等都成为目前建设苏维埃的急要工作，须经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指示各级苏维埃有计划有日程的进行工作，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

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的方法，而成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勇敢的战士。

本报在初出版时期，印刷，及各项物质条件，都有不少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来进行上列工作。要求阅读本报的同志们，将他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罢！

（《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

材料二　王观澜主编《红色中华》

中央苏区时期，在红都瑞金诞生了一份名噪一时、颇有权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而最

早筹备创办并兼任首任主编的，就是王观澜同志。

王观澜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与肖劲光等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12月，经组织批准，他结束了在莫斯科三年多的学习生活，秘密回国。1931年初，他奉命前往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他受命筹备创办和主编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创办之初，编辑部仅有三四人，工作量很大。王观澜和同志们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竭忠尽智，呕心沥血。经过紧张筹备，一份新型的无产阶级报纸终于在这年的12月11日（广州起义四周年纪念日）创刊面世。

从1933年2月7日（第50期）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执行局的联合机关报。它的宗旨是："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为了将《红色中华》真正办成党和政府宣传、发动、组织革命战争的重大阵地，王观澜对该报的性质、任务，以及该报的工作原则、方法和文风进行了精心细致的研究。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文告和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王观澜都坚持予以登载，使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及一切决议，及时贯彻到苏区人民群众中去。《红色中华》一创刊，就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号布告，报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人选，刊登了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的文章《纪念广州暴动》，号召苏区人民"要在纪念广州暴动运动中，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组织大规模的红军，配合全国正在展开的反帝运动，灾民运动，来武装拥护苏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迎接伟大的革命潮流。"第二期头版头条刊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项英的文章《地方苏维埃的建设问题》，阐述了加强地方苏维埃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明地方苏维埃建设的基本工作。这一期还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外宣言、关于苏维埃建设的重要训令、对政府人员的委任命令及婚姻条例。《红色中华》的各期报纸，几乎都刊有临时中央的文告、命令、决议、宣言，及临时中央给各地方苏维埃的指示。有力地发挥了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作用。

《红色中华》还积极组织和指导苏区人民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红色中华》创刊时，正是中央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扩大到赣南、闽西等20多个县，而国民党又在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因此，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就成为党和苏区人民迫在眉睫的工作。《红色中华》从第五期起，开辟了《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苏维埃建设的情况，介绍各地进行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指出苏维埃建设中的缺点与问题，阐明进行苏维埃建设的方法。从第六期起，又增加了《中央苏区消息》专栏，专门刊载中央苏区振奋人心的喜讯，以展示苏区人心所向，向全国全世界人民表明：苏区是中国的灯塔和希望。

《红色中华》还把大力报道红军的胜利消息，作为重要宣传内容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坚强支柱，红军的胜负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存亡。苏区人民自然十分关心红军作战的情况。王观澜把及时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情况"看作是《红色中华》报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一期报纸，都在醒目的标题下，刊载数条红军战斗胜利的电讯稿。如创刊号上刊载《会昌攻下　活捉县长史丞汉》；第二期上刊载《红军胜利　国民党喊救命》。在这个标题下，刊登了三条红军胜利的电讯；第三期上刊载《皖赣边红军攻下婺源　围攻休宁　威胁皖南》；第四期上刊载《鄂豫皖红军攻克黄安　打死白军师长赵冠英》、《石城红石寨攻下土豪全数活捉　靖匪全部消灭》等等，大力报道红军英勇作战的胜利战绩，这些短消息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活泼，内容激动人心，鼓舞着苏区人民积极参加和保卫苏维埃建设，参加红军，支援红军。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因此，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和一切政治内幕，也就成为《红色中华》义不容辞的责任。王观澜组织编辑部的同志们广泛搜集资料，对帝国主义的每一步侵略，国民党的每一次让步都在《红色中华》报上及时准确地予以揭露，以激励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家卫国的抗战热情。

王观澜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使《红色中华》报越办越红火，受到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关注和称赞。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陈潭秋、李富春、谢觉哉、蔡畅、凯丰、陆定一、邓颖超等经常给该报撰稿。宁都起义后，毛泽东还陪同宁都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参加访问了"红中社"。《红色中华》成了苏区军民人人喜欢的一份报纸。

王观澜在主编《红色中华》期间，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收集积累群众对该报的反映、群众的先进事迹以及群众语言。他曾兼任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云集区九个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经常能看到他与区干部商研春耕、支前、选举、组织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等，苏区的干部群众都称赞他说：看不出王委员是个"吃洋面包的大知识分子"。

1932年夏，在王明"左"倾肃反政策的影响下，王观澜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置，被悄悄地撤销了主编职务，调任

中央政府土地部秘书，在叶坪乡搞“查田”试点。此时，他虽然人不在《红色中华》报社工作，却时时关心着《红色中华》报编辑工作，对每一张新出版的报纸都要认真地研读几遍，发现有什么不妥就会跑到“红中社”去谈谈看法，充分表现了他对《红色中华》报浓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选自《红都记事》）

材料三 《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

李富春

一、一年来的《红中》

要清楚的估计《红中》一年的奋斗成绩，我们应肯定的说，《红中》是随着党和苏维埃工作的进步而进步的！

党和苏维埃从一年的艰苦斗争中发扬和组织了苏区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开展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党的本身也就在这一年特别是最近半年来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而日益布尔什维克化，苏维埃也锻炼了自己而日益成为革命战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我们的《红中》咧？它最近半年来不但在篇幅上编印的形式上，特别是在内容上表现了它伟大的显著的进步。

它建立了通讯网和发行网，它能反映全苏区群众斗争情绪，它能发散到苏区版图内的任何地方，为群众争先恐后的阅读，它已成为苏区千百万群众斗争积极性发扬的广播台，而得到广大群众所拥护！

它根据党和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和口号更具体的宣传和号召广大群众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得到了千千万万群众的有力回答，退还公债，节省经济，扩大红军等等战斗任务的具体号召，已收获了伟大的果实，它成为党和苏维埃的政策口号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成为党和苏维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战争的有力助手！“无产阶级的铁锤”粉碎了许许多多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发扬了党和苏维埃反机会主义、反官僚主义的火力，另一方面它又表扬了鼓励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扬了党内党外群众的创造性！

总之，它已经成为苏维埃运动中一个最有力的战士！

二、学习《红中》的斗争精神

《红中》的伟大进步是从艰苦的坚定的向一切困难作残酷斗争而获得的！

向敌人封锁作艰苦的斗争，来克服印刷和材料的困难！

努力建立通讯网和发行网，克服发行和编辑工作的困难！

努力为适合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不断改良编辑内容！

愈是因为《红中》的进步，销路的增加，愈是带来着编辑上、发行上、印刷上的困难，而《红中》却愈能克服发展中的困难来争取困难中的发展！

《红中》的所以能在困难中得到伟大进步，正是《红中》了解了我们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把握了新的困难的本身就包含着战胜这些困难的先决条件与基础，所以能够从坚决的斗争中征服一切困难！

《红中》这种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同志学习！

《红中》这种向困难斗争的精神，应当使一切向困难投降屈服的机会主义者警觉起来！我以为《红中》应当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发扬斗争的精神，向一切对困难投降的机会主义动摇分子开火！

三、我希望的百期后的《红中》

在《红中》百期纪念中，我对《红中》有下列希望：

第一，《红中》目前在组织者的责任上说还赶不上宣传者的作用大，我以为《红中》今后不但要经过通讯员来扩大订阅组织读者，更要有系统的介绍各种群众性组织（如突击队、耕田队等）的作用和工作以及其经验，在一定的党的任务和苏维埃具体的号召中，同时提出完成这些号召的方式和组织的方法！

第二，对于各地斗争情形的登载，我以为不仅要有新闻，还希望经常有介绍斗争经过、斗争经验的有系统的通讯发表，抓紧推广模范事例和模范人物，以便更有力的号召全部动员。

第三，《红中》对一切反革命派、对苏区内外敌人的罪恶及其无能的揭发，以及反革命面目的撕破做得还不够，这里特别表现在对暗藏在苏区里面的敌人，我以为此后在《红中》上适时的将这些无情的充分的揭发出来是必要的。

第四，因此《红中》在进一步改善发行的条件下，应当向着准备成为日报而努力，现在应当扩大篇幅每期两大张！发行应当力求迅速！

这是我对今后《红中》的要求，最后在文字上我还有点小的意见，就是应当适应目前苏区群众文化水平，比如“拿马温”这个名字，在现在的《红中》上尽可不用。

四、为拥护《红中》而斗争

我以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和群众团体应当清楚的认识《红中》的伟大作用，和已经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条件，进行拥护《红中》的运动，具体工作是：

一、健全通讯网：每个支部每个乡苏维埃指定通讯员并完成执行通讯员的责任。

二、健全发行网：每村应该找到推销者，每个大的乡或集场均应有叫卖队的组织。

三、向群众宣传《红中》的作用,发动群众订买和阅读,完成《红中》的号召,发展读者四万!

四、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校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的主要内容。

五、党、苏维埃及群众团体中,应当根据《红中》所提出的任务,提出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及国际的全国的政治消息,讨论和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积极性,更加发展全部工作的胜利!

经过《红中》自己的努力,经过党和苏维埃对拥护《红中》运动的努力,我们相信百期后的《红中》更当发扬其灯塔一样的光辉,成为千千万万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红色中华》,1933年8月10日)

非常会议

背景介绍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胡汉民扣留于汤山。以此为直接导火线,5月27日,国民党中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以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以唐绍仪、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汪精卫、邹鲁、许崇智、孙科、林森、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蒋尊簋、唐生智、李宗仁、陈济棠国民政府委员,并以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李文范、刘纪文、郭泰祺、傅汝霖、区芳浦、冯祝万、麦焕章、邓青阳、陈中孚国民政府政务委员,并以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常务委员。下设外交、财政两部和军事、组织、宣传、海外党务、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外交以陈友仁、傅秉常为正副部长。财政以邓召荫、吴尚鹰为正副部长。军事委员会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叶琪、唐生智、许崇智、胡宗铎、刘兴、张惠长、陈策、陈济棠、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李福林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以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常务委员。

1931年"9·18"事变发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压力下,宁粤双方议和。粤方于1932年1月5日宣言取消由"非常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另成立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

材料:

· 非常会议宣言

· 非常会议前后

材料一 非常会议宣言

中国国民党,负历史上之使命,以完成国民革命,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中华民国为其职志。全党同志在总理孙先生指导之下,同心戮力,从事进行。辛亥之役,为民国前驱,以颠覆满州帝国,建立中华民国。上经袁世凯之篡窃及北洋军阀之流毒,中华民国名存实亡。总理乃统率同志为不断之奋斗,以十三年一月开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确定以本党之主义及政策为治国之大本。为唤起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则努力于民众之组织及宣传;为使本党同志真能为民众之先导,则努力于严密本党之组织,申明其纪律;为实行以党治军,使革命得循军政、训政、宪政之阶级〔段〕,以为进行,则努力于党军之创立及军队之政治训练。由是对外则抗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对内则消灭军阀,以求政治之解放。总理既逝,后死同志接受遗嘱,继续努力。十五年秋兴师北伐,北洋军阀望风瓦解。至十七年夏,全国已告统一。当此之际,全党同志全国民众莫不以为障碍既除,建设开始,欢欣踊跃,以期本党主义政策之得以实施。不图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施之于党,则民主集权制为之破坏;施之于政,则民主势力,为之摧残;施之于军,则"使武力与国民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之精神为之败坏。党中同志,有起而反对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已。于是数年以来,前仆后继,无有宁日。迄至最近,则全党同志、全国民众无不奋然而起,以与此个人独裁之蒋中正为敌矣。同人等丁事变之方殷,念责任之未尽,爰相与聚集,检查过去之工作,协议今后之进行方针。回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有总理在,全党同志得赖其指导,同人之参列中央委员者,即使对于党事,彼此意见偶有差池,然据总理最后决定,即已得共同之方向。不幸革命未成,导师遽逝。当十五年一月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之际,国民革命之势力固积极发展,然清共迟早问题已惹起党内纠纷,此可引为痛心者。十八年三月,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开于南京,因蒋中正之横行专断,纠纷更烈。一部份同志尤以举国望治,和平久待,虽于蒋中正之野心久已窥破,仍主张委曲求全,以冀其改悔。一部份同志,则已驱于救护党国之热忱,以打倒个人独裁为不可缓之事。多年同志,久共患难,心如金石,而一旦分张,势成对敌,可哀之事,孰逾于此?呜呼!共贼未除,蒋中正之个人独裁未倒,总理遗志尚未贯澈,人民痛苦尚未解除,国民革命势将中断,全党同志及武装同志相与投袂而起,以期共负此责任者,尚未得一适当的领导机关,此诚同人等所忧思彷徨不能一刻安心者也。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

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又以事机紧急，不容濡忍，故由现在广州之各委员即行发起，宣告成立。其他各委员有现尚散在各处者，有因环境关系，一时未能即来者，深盼陆续参加，共济艰巨。待至依据党章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日，非常会议之任务即告终了。望我同志共体此意，今日之事，以精诚团结为第一义，过去之纠纷，付之淡忘，当前之障碍有待于扫除，未来之投艰遗大，有待于担荷。其一德一心，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总理在天之灵，实式凭之矣。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二　非常会议前后

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云云，孙不为所动。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

中外闻名，以最滑头、最没有骨气著称的老官僚王宠惠也因胡案而力辞司法院长之职，不再在宁鬼混，去海牙做国际法官。王离京时，蒋特赴车站亲送。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蒋看到孙有反蒋活动，又派所谓四元老（蔡在蒋扣李济深后，大为后悔，此时我推测他是被另外三个老头生拉活扯才勉强跟着走的）拉孙回宁一行，力说可以从长商量释胡等鬼话。

由于四个老头的力劝，对孙花言巧语地说了许多有感情的话，孙本人有些动摇，有答应回宁一行看蒋是否真有释胡之意。我们一批朋友，加上孙太太，都从旁着急，怕孙上当。最有关键的一天，孙在事先通过麦朝枢约定邓演达在夜间到孙宅秘谈。邓闻知孙有去宁一行之意，想不去孙宅了。麦先赴孙宅看动静，住在孙宅的余铭、简又文力促麦把邓拉去见孙，希望邓对孙最后进言，千万不可上当。因此麦拉邓赴约，他们一见面，邓就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谈话间陈友仁也到，同样主张坚决反蒋。这时四个老头又来了，邓、陈、麦等乃上楼，楼下客厅让孙接待四个老头。老头们从九点钟对孙纠缠到十二点，仍想拉孙入京一行。此时简又文忽然出了一个主意，请孙太太在楼上装病（她身体也真有些不适），从床上滚到地板上，卜通的声音，楼下客厅也听得到。简即刻下楼对孙报告太太病得厉害，已从床上滚下地了。孙乃借口太太病重实在不能入京，表示送客态度。四老头于是只得离开孙宅，也感到事情办不成了。老头们走后，孙同邓、陈又谈了些时，打消了赴宁之意。那几天我们兴高采烈，因为老头们碰了一鼻子灰。孙一跃而为时局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完全是扣胡之后形势造成的。孙五月下旬离沪赴港转粤，不但自己反蒋，又叫听他话的张惠长带走南京航空处的飞机多架，飞往广州，参加非常会议。蒋当时十分恨孙，但对铁道部长一职，始终叫孙的亲信次长连声海代理，并不开缺，对孙还留一线余地。表面上，蒋又叫何应钦在粤府成立后，通电大骂孙，要算铁道部的贪污帐（后来何对人说该电是蒋代发的）。这此地方，可见蒋的阴狠处。

这年四月底，粤方即由国民党四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非法扣胡案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指出他种种独裁的事实。此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锣鼓一响，汪精卫、孙科从香港一同到广州。五月二十七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张，同时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同宁方对立起来。非常会议开张后，声势的确不小。因为除胡本人以外，国民党汪派、胡派、孙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南北军人，都有代表在广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本同陈济棠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一变而为好友，李、白亲来参加，可谓集全国几年来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于一堂了。照陈济棠事先的想法，只想开府，不把门开得太大，但由于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人极力坚持必须广揽一切反蒋派，古应芬、陈济棠对此只得依从。党的方面，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蒋，一律是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国民政府下暂设外交、财政两部，由陈友仁、邓召荫分任部长。此外设一政务委员会，采委员制，古应芬负责实际责任。全国舆论，对扣胡事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宁方气象立于不利的地位。

非常会议真正主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本人态度还好，可是对改组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仍算旧帐，持一种排拒的态度。如不是孙科、李宗仁、覃振等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已有一两次发脾气要走了。我们几个

朋友，认为非常会议既以“精诚团结”各方面同志为最大号召，就不应该排斥汪派。王昆仑在他主编的《中央导报》上，有《招我们的流亡弟兄们》一文，大家认为写得文情俱茂。因此，陈济棠颇不满意我们，企图撤消我们在非常会议中的职务，分别给资出洋读书。后因古、陈怕孙科发脾气，加以广州的元老邓泽如也力持反对，此事才作罢。蒋看破粤方内幕，乃派宋子文暗中拉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顾孟余也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此时蒋、汪再度合作的暗流已经存在，只看日后在什么时机，什么条件下实现而已。（汪以粤方代表身份到上海后，就接受宋子文的钱，乃是公开秘密。）

在军事上，粤方也积极筹划武力讨蒋，内定唐生智为前敌总司令。宁方局面，的确有些动荡不安，北方阎、冯势力犹存，蒋的大部兵力，用于江西与红军作战，不惟不得手，且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蒋真到了寝食不安的日子。当时，我同陈剑如（此人在我三年前离港时，知道他在港替蒋帮做不利于我们祖国的特务工作）在上海，受非常会议之命，拉拢反蒋人士。我们曾同邓演达见面，并转手交邓一笔钱，为策动黄埔军人之用。（邓不久即被捕，邓说陈诚是拥护他主张的，不过大家看到后来蒋那样重用陈诚，有人怀疑邓被陈所出卖。）吴铁城看到非常会议气势很好，又不满蒋没有给他做大官，暗中同我们不时接头，答应秘密就广东派他的国府委员职，俟军事行动一起，他就以非常会议代表身份再去东北，拉张学良加入倒蒋。我记得有一天，吴同陈剑如及我见面，他突然郑重表示，取消他所答应的预定计划。他说，陈铭枢已从日本秘密到京，同蒋秘议多次，两广出兵计划将遭到很大困难。吴并叫我们密电广州重新考虑，不要自招失败云云。陈铭枢回国动机，是以十九路军为其资本，帮蒋对付非常会议，无怪乎蒋当时要同他结拜为弟兄了。七月二十三日，宋子文在上海车站被刺，宋逃脱，其秘书唐腴庐身死。陈剑如同我乃搭日本货船离沪去广州。

不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中外震动，政治局面起了根本变化。大家都知道不容许宁粤长期对峙，更不容打内战了。陈铭枢立即以双方调人姿态出现，从帮蒋一变而为宁粤间的“调人”（两面派），他拉出蔡元培、张继两人做他的陪衬，以宁方代表身份到广州谋求和平。他对蒋说些什么私话，大家不知道，他到广州在非常会议主要人士的集会上（在退思园），表现出痛哭流涕、十分沉痛的样子，暗示十九路军到达京沪以后，同志们如果要他如何对付蒋，他一定忠于老同志们的立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在场所有的人都笑他眼泪是假的，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不过当时局面，也的确需要有人从中周旋，打开僵局，他首先抓住这个时机，大耍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粤方人们一致认为让十九路军拱卫京沪，总比蒋军在那里好，蒋也只得答应粤方的要求。后来使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十九路全体将士，能够替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不管蒋介石暗中的阻挠（可能还有陈铭枢），不顾一切，进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造成了这样一件大大好事。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1 年 6 月 13 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第五次中央全会在南京召开，15 日闭幕。时因蒋介石扣留李济琛、胡汉民，引起两广反蒋，削弱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我红军力量和中央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发展。第三届第五次中央全会主要是为了缓和国民党内部矛盾，以便集中力量进攻红军。

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 32 人。会议通过了《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剿匪工作和根本扑灭赤匪”的 9 项任务。讨论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广东事变经过并请决定方针案》，确认了蒋介石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和其它中央各机关的领导人选，并决定于 10 月 10 日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材料：

- 开幕词
- 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

材料一　开幕词

今日为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开会之日。深念总理伟大遗教之指示，其于国家开创建设之程序，民族生存繁荣之需要，循革命途径，以致力于此巨大工作之完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所负职责之重，在革命发展之每一时期，皆先决定适合事宜之纲领及其施行方案，以为全体党员意志、行动之准则，而其以沈毅精勤之成就。外则盱衡国际形势，内则适应于国民之所企求，以确定一时期中之中心工作。每次中央全体会议之招集，皆本斯旨，故能斟酌至当，践履翔实，政府则循事致切，国民与党员则一其心力，相与奋进。

年来戡定祸乱，救济灾危，每于沉痛裹创之余，不忘淬厉兴复之业。近者国民会议已遵依总理遗嘱开议完成，此总理谆劳顾命于党人、国人者。日月不居，山陵在望。民生所急，国命所关。制根本之法，宏久远之图。凡会议接受

总理全部遗教，而承奉本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治者，与夫训政时期约法之实施，乃会议所决，应由党与政府领导处理之事，首当详悉规划，推之于实行。举其要者，则训政时期约法实为国民以其革命需要及政治上之抉择，承认本党政权之行使，能完成其蕲望，因建国、治国之责，信托于本党；本党亦以所应负荷者郑重与国民相约，期以岁年，可观成效。国民于此时期中之权利义务，一以本党所服行之主义及所趋赴之目标，剂重、轻、缓、急以为断。至于政府职责，则规制务欲其详。诚以国民生计、国民教育诸端，为革命中心问题所在，俾政府殚其所能，为国民忠实之任使；则革命利益乃能归之于国民，而经济、政治诸实际施设，乃能以革命之政府完成革命之要求。社会内部所蕴蓄之危机，及国际所加遗于吾国家、民族之侵进，乃能因此根本大法之施行，悉蠲弭于和平乐利之境。至于会议移付之其他事案，如实业建设程序、教育设施趋向等，皆本党视为当务之急，而政府决当坐论起行者，又仍与约法精神歆合符契。故此后之党治，实全国之民治；而此后之政府，实全民之政府。此为国民会议完成后，中央亟应集议纲领，以领导政府与人民者一也。

国民政府根据约法，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既公布，则政府组织亟应依法完成。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是此次中央全体会议之召集，关于政府组织之法案，实为施行约法之要端。必有良善之制度，乃有良善之政府，中枢巩固，全国统一，关系极为重大也。至于约法所举各项法律之制定，大会交付各项决议之执行，训政时期中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及一切建设事功，胥赖强有力之政府总揽而策其成。此中央关于约法公布之政治制度亟应集议规模，而完成组织者二也。

吾国家、吾民族以赤匪频年之扰乱，诚极有史以来之惨酷。人民生命丧失，及农村、城市生产事业之全部破坏，赤匪固以此为阶级斗争所应尔，而我国家及民族之创夷已不堪问矣。此则本党穷于感化，敝于补苴，决不得不出于用兵戡定之一途，否则人民万不能保其生存，更遑论安居乐业，共跻约法之治。顷自广东事件发生，据得自前方之报告，赤匪极引以为庆幸。此诚关系我国家之存亡，民族之兴灭。苟非同志戮力一心，全国人民、战士一致动员，而整齐以中央统一明决之指挥，督促以公忠勤国之将帅，势将滋蔓难图，陷国计民生于不复。革命之人民，革命之政府，其何以自救自存？而革命之本党，其将何以自全其职责？故中央为督励剿匪，绥靖地方，指授机宜，戢止助长祸乱计，亟应集议方略，戒励图功者三也。

此次中央全体会议责务之巨大，时机之严重，自当深凛总理教命，审察党国所急，群策群工，以大慰国民与同志之望。今当开会，敬谨致辞。

（于右任）

材料二　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

赤匪秉其残忍之性，乘我社会之多故，倡乱迄今，忽逾岁月。杀人放火，势渐披猖。夫以中国文化之优美，民族之纯良，总理遗训之昭垂，本党拨乱之往绩论，挞伐所及，扑灭何难。徒以军事频仍，使若辈得乘机啸聚；闾阎穷困，使若辈得乘机勾煽；政府未尽剿治之能，民间未尽自卫之力，以致星星之火，若将燎原。鄂、赣诸省，匪焰尤炽。本党以解救民困为职责，对于罹匪区域同胞之死亡流离，靡日不引为疚痛。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以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同时由本会训令各级党部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同遏乱萌，示以方略，严其考成。如此悉国内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歼此丑虏矣。但念赤匪之患，有如肺菌，其潜伏焉至深，其暴发焉至烈，且挟其一切残酷伎俩以临吾乡邑柔和之同胞，吾同胞或有苟求宁息，而不悟罹患益深者，爰就"一致协力除恶务尽"之义，为吾同胞详切言之：

其一，愿吾同胞勿存侥倖之心理。今日国人皆已知赤祸之烈，而多数居住于匪区以外者，犹或以袖手旁观之态，作幸不我及之想。不知赤匪之背后，既有赤色帝国主义为之发纵指示，其所欲得而甘心者，实为我整个之民族。而其入手之方法，则在造成不可收拾之流寇。此时若不觉悟，则流窜所及，势将同被其祸。此其一也。

其二，愿吾同胞勿存畏怯之心理。赤匪之所以造成空前恐怖，及采用所谓游击式的暴动者，其目的即在震摇人心，胁制良善，使有所怯而不敢与抗，然后彼得逐渐以施其宰割。此中狡毒，最宜认清。须知天下事唯有决死之心，而后始有必生之望；唯有不夺之气，而后始无可乘之机。赤匪实力本无足数，其在匪区以内，种种惨无人道之举动，固由其残暴成性，亦欲以先声胁人耳。我若烛其奸谋，示之以不摇不惑之决心，无畏无却之奋斗，则彼寡我众，彼怯我定，彼虚我实，以石击卵，歼之必矣。此其二也。

其三，愿吾同胞勿存推诿之心理。今日国人群知赤匪与我不两立，然终以为权不我操，责不我属，征剿防守，军队主之，绥靖侦缉，官厅主之，于吾人民若无与焉。夫官厅、军队职责所在，自无旁贷，但亦赖人民有自救之勇气，自卫之决心，而收效以宏。譬如军队欲搜索残匪，乡民匿匪迹而不以报；政府方举办清乡，村落知有匪而不敢以闻。则剿办虽力，而肃清匪难。此其三也。

其四，愿吾同胞勿存消极观望之心理。多难兴邦，古有明训；自求多福，唯在人为。赤匪之势虽张，而其残忍狠毒，毫无人理。被裹陷贼者，已日有觉悟，而群思自新；曾被蹂躏者，亦奋志复仇，而誓不两立。罪恶日昭，末日已近。吾同胞若能奋民族自卫之伟力，起而为一心一德之驱

除，凡区、镇、乡、村之间，同尽守望相助之职，张网以伺，严阵以待，使匪出入无所遁形，奔走不得宁息，则根本扑灭指日可期。否则震其宣传，惑其声势，袖手待变，唯事咨嗟，苟安之望未必终达，鱼烂之势遂以形成，则正赤匪所求之不得者。此其四也。

上述四事，本党非对同胞为过量之求，实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赤匪既为吾民族之大患，自非集全国一致之力量以扑灭之不可。本党秉承总理遗教，并受国民会议委托之重，靖难剿匪，自属责无旁贷。而吾同胞亦必须以自救、自强之心，尽卫国保种之力；或修缮保卫，安定闾阎；或敌忾同仇，协助剿伐；或纠正邪说，遏其披猖；或侦索匪踪，杜其隐伏。群策群力，咸以扫此妖孽为急务，则岂有以四万万人之协力，而不能灭此卖国祸种之穷寇者？爰于告诫党员、督责政府之外，对吾同胞为恳切之叮咛，唯吾全国同胞察焉。

（摘自《国民党资料选编》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占山抗日

背景介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抗日。是日，日军以修复黑龙江嫩江桥为由，要求中国守军撤离江桥18华里的大兴车站，并要求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将黑龙江省政权交给汉奸张海鹏。日军在其无理要求遭马占山拒绝后，立即伙同张海鹏伪军向江桥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马占山率部抵抗，江桥抗战爆发。中国守军在马占山指挥下，英勇战斗，工事战壕均被日军飞机大炮轰毁，仍坚守阵地。4日、5日两天，击毙日军167人，伤600人，伪军死伤700人。6日，日军又增兵力，大举进攻，守军殊死抵抗，再次击退日军进攻，日本滨本联队几乎全部被歼，高波骑兵队死伤殆尽，中国守军伤亡600余人。是夜，为保存实力，中国守军撤出嫩江桥阵地，在乌黑马、新立屯、昂昂溪地区节节抵抗日军。马占山抗日，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的打击，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

材料：

- 嫩江桥的激战
- 三间房的激战

材料一　嫩江桥的激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时，日军铁甲车两列，士兵三十余名，开到江桥，并有飞机五架飞翔天空，实行以武力掩护修桥。我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即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退到本阵地。日军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炸弹，伤我士兵九名。天黑时，日军百余名渡过江桥（破坏处用木材垫好），对我阵地施行射击，并用飞机投弹，伤我士兵七名。至夜深时，因我方力求避免冲突，未与抵抗，日军始行退去。

四日早五时，日军少佐林义秀、日领书记早崎、我方秘书韩树业，为了避免两军冲突，乘汽车到昂昂溪，会同石兰斌（石驻昂站，负中间指挥部责任）到前方哈尔葛江桥视察。石向我驻军讲话，林少佐亦向渡过江桥的日军讲话，彼此训诫士兵严守纪律，避免冲突。当石正在训话之际，林竟迫石签字承认将驻军撤退，并迫石立即下令。石谓本人是步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正交涉中，日军突进入我防地，捕去我哨兵三名，虽经石再三交涉，终未放回。日军此举，显系挑衅。是日午间，日军百余名在我左翼渡江，向我军猛攻，并来飞机五架掷弹，我军死伤数十名，大兴车站亦被炸毁。至是，我军忍无可忍，不得已实行正当自卫，给以还击，日军乃退。下午六时，日军复以炮火掩护步兵一大队渡江，并携带山炮多门，另有飞机七架、铁甲车四列配合向我猛攻。我军正面是徐宝珍卫队团阵地，官兵皆激于义愤，奋勇杀敌。左翼是骑兵连防守，该连少校张连长阵亡。在炮战中，我炮兵也阵亡连长一名。是日我方官兵计伤亡数十名。日军连日苦战，迄未得逞，乃于五日变更阵容，驱使张海鹏的军队在前，由日军督饬向我军猛攻，张部不支败退。是役我军伤亡百余名；敌军死伤数目据日方发表，死者一百六十七人，伤六百余名，张逆部死伤七百余名。日军素藐视黑军，认为黑军装备较差，但我卫队团自补充捷克式轻机枪以后，发挥了极大的战斗力量，出于日军意料之外。自此，日军广播中说，黑军也有新式武器云云。六日拂晓，日军向我阵地大举进攻，据闻是役有步兵两联队、野炮四十余门、重炮八门、飞机八架、铁甲车四列，自早至晚，终日激战。我军伤亡太重，又遭敌机连续轰炸，运输断绝，为了保持余力，于六日下令江桥部队乘夜撤到大兴站以北整顿补充。

自十一月四日以来，日军开始向我进攻，以六日最为激烈，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是役敌军伤亡亦重，闻有滨本步兵联队几被完全歼灭，高波骑兵队亦死伤殆尽。这是日军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我军伤亡约六百余名。自与日军冲突以来，我方随时将战况向北平报告，新闻记者也发表消息，从此各地贺电有如雪片飞来。我军虽放弃江桥阵地，而全军士气仍极振奋。马占山十一月七日将连日战况和退保三间房阵地的苦衷，以及誓与敌周旋到底、绝不屈让的决心，通电各方。

（摘自《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谢河）

材料二　三间房的激战

三间房距江桥约五十华里，距龙江约七十华里。十月下旬，马占山下令暂编步兵第一旅开驻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布防。十一月初，我率领参谋同苑崇谷旅长视察该线地形，作为我军第二道防线。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据点工事，并指派苑崇谷为该线指挥官。

十一月六日江桥守军奉令撤到大兴以北整顿补充后，当派步三旅李青山团、步二旅吴德林团接大兴吴松林骑兵旅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我军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侧攻。

马占山于十一月七日早晨，率参谋处长金奎璧等乘汽车到前方视察，对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等加以嘉奖鼓励，并在昂昂溪中间指挥部指示收容补充等事宜。马于八日下午回省，派我赴前方主持。北平副司令行营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因马捍卫省土有功，来电奖誉，并令全 权主持军政，各将领对马亦愿听命一切。惟省府委员赵仲仁别有阴谋，极力阻挠马的军事计划。他谬称黑省代表，暗中曾与驻黑日领清水、驻哈日领大桥秘密接洽，欲使马让出省垣，由张海鹏主政。乃日领已允，而战事忽剧，赵自此被日领拒绝往见。

十一月八日起，战事较缓，一由于日军不敢轻视我军，一由于国联对日有严重的劝告。但同时日军少佐林义秀又向马占山送至本庄繁强迫马氏下野的通告，限时答复，林并以个人名义用书面表明日方真意，兹译录于次：

本庄繁通告(十一月八日)

马主席如欲避免日军之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试意，希速于八日夜十二时以前提出回答。此致黑龙江主席马占山。

林义秀短札

考察现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为唯一之方法，即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

马阅后均置之不理。

日军在江桥一战损失颇重，竭力补充实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九日晨自长春转往洮南规划一切，旅顺驻屯军的重炮队于十日上午开抵公主岭，即晚由四洮路赴洮南。洮南近郊辟有飞机场。当时洮南方面发现救国军，为蒙边四旗七县所组织，集众三千余人，在东平、镇东起义，张逆部队进攻失利，日军遂拨炮助战，因此进攻黑省暂时停止。日军侵黑的损失，实出于意料以外，深恐消息传出，对其军事不利，因此宣传黑军得到苏联军火接济。日军经过这次失败，对于黑省的侵略，除调重兵以外，并采取用少数飞机更番投弹的手段，以疲劳我军，另以骑兵迂迴我军侧后，进行扰乱。景星、朱家坎方面曾发现过少数日军，我方派程旅骑兵一部开驻景星，右翼已无所顾虑。

十二日午后一时许，日军先以骑兵五六百名向我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处吴旅防地进攻，激战历四十分钟敌始退却。午后三时，日军大部来攻，有长谷旅团在我左翼，森连满铁守备队在我右翼，并飞机数架投弹助攻。经我苑旅竭力抵抗，至午后六时，敌军改为炮战，我军亦以炮还击，八时停战。是夜程旅骑兵两团奉令满洲里、扎兰诺尔开到昂昂溪待命。十三日拂晓，日军攻我新立屯阵地，飞机数架投弹助战，几次进扑，经我抵抗，均未得逞。十四日拂晓，日军骑兵扰我汤地、蘑菇溪间的骑兵防线，并用重炮向我射击，大兴方面战斗亦烈，并有坦克数辆助战。我程旅骑兵涂全胜团向前增加，士气一振。萨力布骑兵团亦继续开到增援，蘑菇溪方面调卫队团两营增援，三间房阵地派步一旅孙鸿裕团两营增援，我全线阵地与敌激战一日，敌军均未得逞。

十五日早三时，马占山乘载重车带参谋、卫兵赴前线督战，先到昂昂溪指挥部。适驻黑日领清水于十四日夜由省到昂候车，谓将赴哈，临行马曾挽留，并谓："领事离黑，应按外交惯例签字再去。"清水谓："此行是本人私事，其他一概不知，故未照办。"其余馆员亦均撤退。这是日军大举进攻省垣的信号。当日晨，洮昂线战事稍停，但日军后方大部援军开到。我方令绥化一带的保安大队王克镇部二千名编为一个独立团，加入大兴正面。是日午日军坦克袭我前线阵地，我军稍退。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日飞机一架在富拉尔基上空投弹，有数枚落在东铁工房附近，东铁当局大为恐慌，急电哈总站请示。同时日军以步、骑、炮、空、坦克约四千余名向我全线猛攻，我军奋勇抵抗，双方鏖战，极为猛烈。我军以装备太差，死伤甚重。日机数十架飞我上空，适天气骤变，大风突起，尘土蔽天，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敌飞机失效。午后三时许，日军攻势渐缓。十七日，日军利用飞机轰炸和重炮射击，以疲劳我军。当时参加的张逆海鹏的部队，除被击毙者外，多数潜逃，战场上完全由日军作战。十八日晨，日骑、步、炮约三个联队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激战至午，多门师团前来增援。我军伤亡过重，不得已乘夜向昂昂溪方向撤退，大兴方面同时亦向后撤，沿途被飞机轰炸，死伤的极多，步二旅团长吴德林在乌呼马站身受重伤。当十八日激战中，马占山由昂昂溪站用军用电话调省垣某团，限一小时乘车开到前方，该团迟到了三小时，马愤极，当场将该团长枪决。连日以来，部队伤亡过重，马下令全军退保省垣，当夜电告北平，并向各方面发出撤兵通电。

十九日四时，马率军、政两署人员退出省垣，由商务会组织商团维持地方秩序。日军前锋于是日午越过东铁乌黑站，见我军业已撤走，午后二时骑兵一部入城；晚间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大部进入省垣，分驻城内外

各地，我方军用物资，一无所得。多门驻于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城内街上满布日军，张贴各种标语，路绝行人，凄惨万状，惟见日旗满街飘扬。二十日下午，日骑兵五百余名沿齐克路追我到宁年站，经我骑兵迎击，退归黑垣。至是，日人委张景惠兼任伪省长，成立黑省伪政权，并迫龙江各界筹备欢迎。自此，龙江即陷于傀儡政治的局面。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文史出版社）

国民党四大

背景介绍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至12月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举行。这次大会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的形势下召开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谈判，决定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分别召开，依照比例分配名额，选出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并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中央政府。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在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等400多人。会议进行了2次预会议，9次正式会议。林森、蒋介石、蔡元培等分别主持大会，于右任致开幕词。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制定有关对外"团结御侮"和对内政治、经济、党务等方面的政策。大会决定建立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授权国民政府采取一切正当防卫手段，抵抗日本侵略。并把"九·一八"定为国难纪念日。大会决定召开国难会议，共商"救国方略"。大会还决定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加强军事、经济和教育方针的实施。大会还讨论了"剿共"问题，恢复了李济深、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冯玉祥等312人的党籍。大会通过了《团结御侮办法草案》、《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对外宣言》、《对于中央政制之改革案》、《国家建设初期方案》等文件和议案。与此同时，1931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广州方面的国民党人在广州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孙科、邓泽如、萧佛成、陈友仁等520人出席。大会由孙科主持。大会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大会期间，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三派在协商委员侯选人时，斗争激烈。汪精卫派的代表前往上海，于1931年12月3日，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另开四大，汪精卫、王法勤、顾孟余被推选组成主席团。12月22日，国民党宁、沪、粤3方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国民党的统一，并改组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72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家寒、白云梯、龙云、陈树人等60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陈璧君、谢持等24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黄绍竑、郭春涛等22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暴露了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以及各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情况。

材料：

- 开幕词
- 大会宣言
- 广州四大宣言
- 上海四大情形

材料一　开幕词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各位同志：

今天总理诞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适在今天开幕。总理的生日，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生日，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生日。由此我们知道，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党的生日，是凝结的，不是分开的；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党的生命，是整个的，不是单独的。总理领导我们为三民主义的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进而求世界的大同。总理奋斗毕生所遗留给我们的，就是负有历史伟大使命的中国国民党。总理虽已逝世，而总理的精神，总理的教命，尚式临于大会。所以大会同志，即应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检查过去工作，发挥总理遗教，以求党的领导能适合训政时期政治的进步。这次代表大会是要深念总理在我们当中的指导与督促，求本党主义的实现，与政治设施的完成。大会全体同志，自必同此感想，同此希望的。此次大会本定十月十日开会，后来因为要谋党内的精诚团结，永远消除已往纠纷，所以展期至今天了。此在早期来京的代表方面，也许感受小的损失，但在整个民族、国家和党的方面利益上，并不因此有所损失，这是要请代表同志谅察的。因今天的大会，我们回想到总理当时在艰难困苦之中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外受国际的压迫，内受军阀反动的牵掣，还有少数不了解意义的不赞成，结果终以总理坚强不挠的精神，努力奋斗，卒完成开创本党第一次大会的任务，而使党的基础稳定，党的组织严密。总理当时对一般代表同志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开成了，以后这一个党交给各位同志，靠各位同志去努力奋斗，就是说把革命责任付之众人"。这些话，想今天与会的同志中间，也有很多听到的。第二次大会在广州开会，党内便有许多纠纷，却赖本党同志的奋斗，得完成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使命，由北伐以至中华民国的统一。前年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首都，其后也经过许多困难的事件，但训政纲领却在此时期确定的。今

年五月本党依照总理遗嘱，召集国民会议，公布训政时期之约法。到了现在，又做了一件重大的工作，就是将党内从前一切纠纷，使之完全结束。所以今天四全大会开会，是为党开一新生命，为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开一新生命，确是本党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生机。张溥泉同志说这一次奔走南北，很有把握。怎么样有把握呢？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大家的心都是以总理的心为心。由此我们确实晓得，无论在南在北的同志，都曾在总理领导之下奋斗过的，所以无论如何，精诚团结，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张同志认为有把握。这不是简单如此说说的，实在是总理遗教督促我们，我们非大团结无以救党，更无以救国。我们看看会场所悬之总理遗训，"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是告诉我们非但要有德，更要有心，非但要有心，更要有德，所谓一，就是不二之谓，如果大家不一心一德，而离心离德，则国民革命决不能完成，而党所负的使命，也就辜负总理的付托了。大家先要有"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精神，然后由三民主义之实现，以进世界大同，才可有希望。现在这一个重大责任，完全在各位代表同志身上。中央的同志，固应如此，全党的同志，尤应如此。求国民革命的完成，三民主义的实现，非从"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做起，一切都成皮毛。今后求党务政治的进步，更要从这八个字切实做工夫。尤其在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候，我们开这四全大会，责任非常巨重，更要自己勉励自己，努力奋斗。党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是真正党的利益。今天大会开幕，兄弟承中央之命，敬谨贡献这几句话，希望各位同志见教。

（于右任）

材料二　大会宣言

自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迄今，历时二年有八月。在此期中，本党与全国国民所共同努力者，厥为实现训政时期之建设，与巩固和平统一之基础；以障碍纷乘，党国多故，致使民生国力受无量牺牲，训政工作未按预期而实现。迄今年五月，始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当国军方在赣鄂各地从事于戡定赤匪之时，全国忽遭空前未有之水灾，流离荡析，死亡遍野，举国呼号，尽全力于救恤工作；而横暴之日本，突于此时乘我之危，肆其侵略，强占我土地，残杀我人民，轰炸我城市，勾结叛徒匪类，以继续不断之暴行，破坏我国家之完整。国难之深，于此为极！大会举行于此国难严重之时期，认为我中国民族若不以决死之心求生路，则国族将永陷于沦亡；本党同志若不能团结一致，完全担负救国之重责，誓死前驱，则革命之绪业，将自此而中斩。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特以基本之要义，竭其至诚为我全国同胞同志道之。

总理有言："吾人必须团结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设三民主义的强固充实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世界。"救国真理，唯在于此。故欲求全国一致之团结，必先自本党有真实之团结始。任何国家，当复兴建国之际，凡全国人之心志，与革命中心势力相坚固结合者，靡不成，反之则靡不败。吾人今日试一为坦率之检察，敢言全国人民对于三民主义之信仰，实历久而无渝，而对于本党之期望，则渐见其淡薄。此种无可讳饰之现象，固由于本党内部散漫分离之迹象，与国民以痛心；亦由于本党各个之同志未能以坚苦之实际工作，起国民之爱敬。今当国难严重之时，实为自反自赎之机。大会谨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志为志，泯灭已往一切之睽离，力求全党之精诚团结。我全体同志，应一德一心，恢复互信，过则想恕，劳则相先。遵循总理牺牲自由贡献能力之遗训，造成不可摇动之精神结合，披发缨冠，共御外侮，则可以谢人民，可以纾国难。同时尤必痛切检查已往工作之错误，防止散漫因循重形式而轻实际之缺点，随时随地，以牺牲为全国倡，以力行为天下先，以尽忠职务为实行主义，以达救国救民目的之唯一责任，确立见危授命之决心，表示革命党人基本之道德。则国民尊重本党之心理，必日见其浓厚，挽国运于垂危，期主义之实现，转祸为福，非异人任。此大会愿为吾全党同志告者也。

近世立国之基础，寄于统一之巩固与国力之充实，尤赖国民有勇猛精进之决心，立共信而一致以求其实现。总理垂留于吾人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与建国方略，实为保持民族生存之最高原则。苦心创制，期策成功于后死之吾人。乃数载以还，建设之实效未彰，国力之增进犹鲜，最近复来此空前之外侮，凡举国同胞之所责难于本党者，本党诚无所自逭其责任。而今后之所以谢吾全国者，亦唯尽力所及，与吾同胞共为救亡御侮之牺牲。深信以吾全国之一致努力，必能战胜任何之艰难，而保持国家之安固。唯吾国同胞既共喻国势之阽危，自必能省察责任之重大，应变御侮，必须有牺牲个体以全群体之精神，而根本图存之策，尤必剑及履及，造成真正之力量。旷观并世诸国起衰振敝之史迹，罔不以极端之刻苦，任加倍之劳役，捐弃个人自由权利，以贡献于国家之建设。此等艰苦卓绝、急起直追之精神，实为我国所必当取法。大会以为今后国家之建设，亟须从军事、教育、经济三方面，就物质精神同时为彻底猛进之改造，一扫侥幸之心理，造成巩固之国防，以确保民族永久之生存。切望吾全党同志，遵守决议，团结全国同胞，实行全国总动员，以一致之步骤，最大之决心，完成我建国之大任。

（摘自《中华民国资料选编》文史出版社）

材料三　广州四大宣言

今吾党之纠纷已至再无可以延长之时，政治日非，已至再无可以苟安之日，而国难日殷，亦已至再无可以诿谢责任之境。故全党同志须于目前下一大改革之决心，将党内之纠纷与失当之政制同时谋根本之解决，始足以纾当前之国难。然谋根本之解决，则必悉反吾党数年来之所为而力矫其失。详言之，即吾党过去分裂之史迹，今后必须一反而为团结之历史。过去以军握政以政握党之故辙，今后必须反而为以党训政以政治军之坦途。吾党所以救国难于当前，固决于是，所以完成总理遗教于来日亦系于是。兹当吾党大团结之际，谨将吾人过去在和平奋斗中所确认为党军政三方面必要之改革分述如下：

一、为求达到本党实行国民革命之目的，吾党同志今后必须以总理遗教为意志，统一精诚团结之中心，尤须本总理天下为公之精神，矫正党内之组织与其所用之方法，消弭党内一切斗争，使党确实成为强大有力之革命集团，以率领 国民实行三民主义之建设。

二、凡关于党政之重大纠纷，非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有委员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员无记名表决三分二以上之可决，不得以兵力解决之。必如此，始足免除过去轻启内战之祸端，而辟今后政治和平进展之途径。

三、于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双方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议案，确定今后本党整理之计划，并依据建国大纲斟酌实际情形，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

四、力求国民政府能切实对党负责，实行主义政纲，必须依据最近上海和会所议中央政制改革案之原则，使五院能独立负责，行使职权，以实现五权制度之精神，同时必须使政治制度系统一贯，组织简捷，责任分明，以期增加政治上之效能。

五、中央政治机关应参加民选分子，使政府与人民切实合作，以期民权日渐发展，循序达到宪政之目的。

六、训政时期之首要任务在完成地方自治，使国民获得行使政权之训练，以循序参预中央政事，建立民主政治之基础。至于人民权利，如身体、居住、营业、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之自由，尤当以法律为之保障。

七、力求国家之和平发展，必须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而为扶植民权充实国防之保障。其原则为军权必须决之于党，而由政府负责执行。军政隶于行政院，军法及军需均须独立，并于全国设置军区。其区域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而使国防隶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以防军人干预国家行政之患。

八、财政必须公开，使政府及人民经济团体得以共同整理财政，审核预算决算，监理内外债及中央与地方之收支。凡军费之提供与负担，须以国防保安剿匪之用途为限，而不得滥耗之于内战。

九、今后一切建设，必须依据总理遗教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纲政策。其未行者，努力蕲其实行，其已行而实施之方法错误者，予以纠正。

十、外交政策必须秉总理遗教，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打倒帝国主义之目的，以期恢复民族之自由，完成我国家之独立。此次东三省边患发生，政府与官吏举措失当，遂致日本帝国主义益形猖獗，今后补救必须依照总理外交政策之遗训，斟酌国际公约及国际机关所可据为资援之种种情况，确立外交方针，进行正当于雪耻自卫之工作，务使暴日屈服于正义，以达我国恢复主权保全领土之目的而后已。

以上十端，深信为改革内政之必要政策，亦为救济时艰之急要方法。若能立见实行，则其他教育、经济、社会、文化之改进，方能有所措手。益非如此，不惟不足以谋本党之团结，符国民之责望，抑且不足以继承总理之遗志，赓续三民主义建国之大业。自兹以往，吾党同志当据此而泯除以往之成见，团结今后一心一德之精神，以期同为国家服忠实之义务。全国国民亦当据此而消除频年之内战，永奠国家真实之和平与统一，庶几同心努力，靖大难于今日，上下辑睦，策福利于无穷，我全体同志，全国国民，愿共勉之。谨此宣言。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四　上海四大情形

昨日上午九时，各代表先后齐集共和厅，即正式开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首由主席团汪精卫报告开会宗旨；提议来沪广州四全大会代表即时选举中央委员，经大众一致通过，遂即开始选举。推汪精卫为监选员，至二时始选举完毕。当即决定电粤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即宣告散会。

汪氏报告

开会后，由主席团汪精卫报告云：

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兄弟想先把开会之目的向大家报告。我们在上海接到广州各同志退出四全会的消息，从悲痛当中我们感觉得有无限的愉快。此次上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满意，但在现在国难当前的时候，和平会议的议案既然最低限度可以达到实现

民主政治的目的，则我们应当以退让为精神，大家一致来共赴国难。因为此次和会议决案，对于将来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已经有了中央政治的改革案将军、党、政三者分开，又根据《建国大纲》的规定，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在建国中有所根据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部份同志以为训政时期不应有国民代表大会？如果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则训政时期如何有保障民权的基础呢？其他关于军事、财政，和会中亦得有改良的决议。这虽然不是完全使人满意，但对于实现民主政治已经稍有途径。这都是我们几年来奋斗的结果。不料此次广州一部份同志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翻。此不仅全党的同志痛心，即全国的国民亦失望。此次各位代表毅然不顾一切退出四全会，通电全党同志与全国国民，使他们都知道各位的奋斗是为和平而奋斗，这是我们所应该表示敬意的。

当选中委

选举人数决定后，当即开始选举。结果，计得票最多者，计唐生智得一四七票，张发奎得一四三票，王懋功得一二五票，谷正纲得一一〇票，邓发黄得六十七票，刘文辉得五十七票，唐有壬得五十七票，范予遂得五十五票，黄少谷得四十六票，萧忠贞得四十五票，陈孚木得四十五票。萧忠贞与陈孚木因票数相等，当场抽签决定，由萧忠贞当选。以上十人，当选中央委员。次多数之陈孚木、郭春涛、赵光庭、刘叔模、邓介松、延国符等十四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电粤报告

各代表于选竣后，即电广州四全会主席团报告。原电云：广州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诸先生并转代表诸同志均鉴：同人等行抵上海，汪精卫先生出示马超俊、李宗仁诸先生束〔东〕日来电，知大会对于上海和会议决案已予通过，并由马李两先生赴港迎接胡汉民、孙哲生诸先生暨退席诸代表遄回广州出席大会，以便选举。逖听之余，至慰所怀。

（摘自《民国日报》1931年12月4日）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背景介绍

1931年11月18日，反蒋派则在广州、上海分别召开四全大会。广州四全大会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并表示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会议在协商委员候选人时，由于陈济棠等排斥孙科和汪精卫的势力，引起纷争，会议分裂。一部分人到了上海，在汪精卫主持下，另开四全大会。广州的四全大会在胡汉民主持下，提出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等政治主张，并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宣布广州中央党部正式成立。

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迫于大势，决定批准蒋介石辞职。22日，国民党宁、沪、粤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并推选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不负实际行政责任。

国民政府改组，孙科执政，是南京政府内部蒋、汪、胡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操纵军政大权。此时，广州国民政府虽已于1932年1月5日宣布取消，但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陈济棠在策动西南五省"大团结"，企图扩张地盘；何成浚发起九省"联防"，与陈对抗；张学良也纠合冯、阎旧部提议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孙科内阁面临这种局势，一筹莫展，于1932年1月24日被迫宣告辞职。1月28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临时中政会，改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接着，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介石独掌了军权。至此，国民党形成了由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暂告结束。

材料：

· 蒋介石被迫下野
· 促蒋下野

材料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四全会结束后，主要议程就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仍不愿入京开会。自胡南下后，广东方面的态度更转强硬，粤曾用中常会名义作出决议："至二十日（十一月）若蒋下野事未办到，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至此，蒋方表示愿意立即下野，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其时，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全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波澜壮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巨流。首先是北平九大学的学生二千多人，发起赴京请愿，要求搭车南下，路局拒

不开车。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宁可停车,不许通行(可见蒋是何等的怕学生请愿)。"僵持达数日,平、津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后张再与蒋电商,始行挂车运送,高举起抗日救亡旗帜的学生,胜利地到了南京。不久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九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共达一万多人。他们到国民政府请愿,逼着蒋硬着头皮出来接见,后又到中央党部请愿,值中央常会开会,大家推蔡元培同我去接见,在群情激昂中,蔡同我均被殴。

在学生到中央党部请愿前,蒋已决定辞职,他曾约于右任谈话,并派我同何应钦赴沪,促粤中委入京主持一切。

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主席,决议案:

"(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

会后蒋发表辞职通电,略谓:"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同日,林森同我联名发表就职通电,大意为:"对于施政大端,一切维持现状,无所更张。即望第四届第一次全会早日开会;政府正式改组,俾完成党国大计。"

我之被推为代理行政院长,全属于粤方的主张,而蒋亦要我来缓和双方的争议,且早已说明是过渡时期的"看守政府"性质。此种趋势,客观上早已形成,无可记述者。惟林森之代理国府主席,且由此一直蝉联到他的死,为时竟达十二年之久。在他被推选时,是出人意外的,因林与蒋本不甚密切,在宁粤分裂时,他还是弹劾蒋的四监委之一。因其中尚有一段史话,外间尚鲜有知者,特在此记述之。

当第二次讨袁(世凯)失败,我同林森相识于上海,他同我的几位朋友都很相契,我很喜欢其恬退淡泊及其山林隐逸的风貌。我以后无论在南京或上海,总喜欢同他清谈,有时同逛夫子庙(南京)、城隍庙(上海),看他蒐集了许多假骨董。宁粤分裂时,他本在海外,被列名参加弹劾蒋的提案。上海和谈时他始归国,随即到南京,不预闻宁粤任何一方的争议,表现了他的超然地位,但并未被蒋重视。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初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故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所提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林森字)。"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我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我劝说,他答应了。事后我才知道,蒋早已属意于右任,且有种种迹象,如汪、孙初到沪时,蒋即派于为欢迎的首要人员;蒋、汪、胡在上海会见时,参加者名单,于名列前茅;蒋辞职前夕,特约于密谈,等等。因我心粗,且因和谈事双方奔走,故未暇注意及此。后来闻于因未登上主席"宝座",还流了老泪,我感到有些歉然。林自正式任主席后,参军长吕超是由我推荐的,侍卫长由我的侍从副官充任。

蒋被迫下野前,早有卷土重来的打算,故设下重重陷阱,使后来者难乎为继。就在他辞职那天,他还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苏、浙、赣、甘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军人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因孙蔚如部入甘,孙兼任甘肃省主席,杨虎城因某种原因,觉得困难,故电蒋荐邵为甘省主席,此时乃一并发表),贺耀祖任甘宁青宣慰使。

最阴险毒辣的是他还枪杀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邓在上海被捕时,我正在江西指挥军事,距离我同他密谋合作的时间甚近,但他的被捕消息,是我到了京沪后才知道的。其兄演存累向我探讯消息,我还说:"照目前蒋的情况(逼着他要下台了)看来,他还不敢下毒手。"且我十分相信择生对我说的,"陈诚是他的人",以为陈总会暗中维护,故很放心。同时我又深知蒋之残忍成性,凡被他扣押的人,若有人出面营救,只会促其早死(实例甚多)。有人曾这样设想:在和谈中若果由粤方代表出面营救,蒋会被迫接受。但应知粤方诸人,特别是汪精卫恨邓之深,并不下于蒋(邓曾公开骂汪,说汪除"倒蒋拥蒋之外别无主张"),他们不送"催命符"已算好了,遑言营救?我事后得知,蒋杀邓时,曾组临时军事法庭,由恨邓最深的吴稚晖、戴季陶、何应钦审讯。我闻择生凶讯后,惊悼异常,只得给资交其兄演存,收殓遗骸葬于南京麒麟门外,并亲书"故友邓择生之墓",竖碑志之。

我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为时甚短,约有数事可纪:

行政院各部部长及重要司长,莫不纷纷辞职,无论是否批准,是否有人接收,都先一走了事。外交部长顾维钧,留下辞呈迳赴上海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向我提出辞呈,声明只负责到一中全会开会时为止。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都同时总辞职,各署长已不到机关办公,纷纷作鸟兽散。

在此期间(或以前),行政院曾接到溥仪自天津来电一通,表示内向,并请示行止。我记得在行政院国务会议

（或中政会议）讨论过。记得当时大家都以溥仪为一"皇室"，"扈从"人员必多，政府很穷，没有这笔钱来做接待费，竟搁置起来，并不答复。最近我曾托载涛委员询问溥仪对此事的回忆，据复，溥本人对此已记忆不起。又查"中外历史年表"载明："日本特务拥清废帝溥仪至东北"，为十一月间事。此事如不在我代理行政院长期中，则当在以前，因我为中政会议委员及国府委员，重要会议我均参加，至今对此事记忆犹新。这是国民党对人民的一大罪行，也反映了当时南京政府的腐朽以及当权者之昏庸误国。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

材料二　促蒋下野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军阀政客之间的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乘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击。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前，在广东就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立。九月下旬，宁粤双方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开始举行谈判，协商和平。粤方提出必须释放胡汉民，蒋介石"通电引咎""立即下野"等条件。

冯玉祥和广东方面来往频繁，南北呼应——极力促蒋下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表示"和平"诚意，主动致冯电，邀其入京开会。广东方面为增强自己阵容，也希望冯南下倡导和平。冯曾摇摆不定"对于南京如果真能诚心悔改，诚心为民，真意为国，我当然以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起见，来共同御敌人。"但在部属们的反对之下，冯又坚定了反蒋抗日的观点，在十月九日他打给在天津的薛笃弼、邓哲熙和李炘的电报中又说"……至于同到南京开会一节，在此兵临城下之严重时期，恐不为蒋之俘虏，亦将为日之俘虏。"

这期间，冯认为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障碍。十月八日他分别写信给孙科和陈济棠等人，希望"促蒋下野以后，国人另组统一政府，以匡既往失，而救当前之祸。"在十月二十二日，冯写给刘德明的信中，明确表示："此时欲言救国，非先倒蒋；而救国之障碍不去，一切举措，皆属徒劳而已"。当他得知李济深被蒋介石释放到达上海后，除致电慰问外，又托李济深的代表带一封长信南返，信中回顾了两年前编遣会议时蒋介石的手段，以及李所受的迫害。那时就预料，象蒋介石这样专横独裁下去，必定会出政治上的乱子，给国家民族造成无穷的祸害。所以才不顾牺牲个人的一切，希望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可是蒋听不进去。时至今日，"不幸之事（指日寇入侵）果然不出我所预料。"同一天，冯又给李济深写了第二封信，希望李"共起而赴之"讨蒋，以达"救亡而图存"的目的。

当冯得知宁粤和平会议决裂，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仍然讨论"剿共"问题，继续要求国联制裁日本的侵略等消息后，冯对蒋介石痛恨尤加，进一步促使他不遗余力地反蒋。在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之内，他一口气写了十三封信，分别寄给二十五位名流。十三封信的内容主要为如下三点：一、力主蒋介石下野。给胡汉民、汪精卫等的信中指出，"蒋氏包藏祸心，毫无诚意，只有力促蒋氏引退，完成健全中枢，始可巩固国本，消弭外忧……"在给柏文蔚、胡宗铎等人的信里，则直接指出："弟意以为非蒋去，则和平统一无望；非统一则对内对外皆无办法。"对白崇禧则说："尚望吾兄，本以往之主张，促成推倒独裁之实现。"致两广要员的信，都是极力促蒋下野的。二、希望北方反蒋力量加强团结。在给阎锡山等人的信中说："此事欲促成真正统一之实现与健全政府之产生，华北各方，实有团结之必要"。对徐永昌和杨爱源，除通报蒋在和平会议中"作梗"情节外，特意指出："华北局面已渐入严重时期，如吾弟（兄）必会善处之，不仅可以巩固华北，亦且可以促成全国之真正统一。"言外之意是促山西将领应和其他反蒋力量合作。三、要求薛笃弼等部属们再接再厉，继续反蒋抗日。此后，又分别写信给孙殿英和方振武，强调"华北各方，实有团结一致，以资应付之必要"。冯在短短的一两天中，写了十数封信，目的是向各方敲起警钟：蒋不下野，"救亡图存"难以实现。

为迫使蒋介石下野，冯不遗余力。十二月上中旬，继续派亲信部属持亲笔信从山西到全国各地拜访熊希龄、李根源、李烈钧和汪精卫、胡汉民等名流。"祥意以为今日所急者，在于健全政府之产生。"需要大家，"共同赴之"，才能谈得到"转危为安，救亡图存"。十二月七日，当冯得知胡汉民由上海转赴广东时，非常高兴，再次命笔疾书，"尚望先生以过去之奋斗精神，领导而策励之，共济时艰，以挽危局。"果然，胡到广州，立刻给冯回电道："夫蒋氏必欲恋位苟存，不惜委曲媚外。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蒋下野为先决条件。"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不久，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

（摘自《孚国将军冯玉祥》郭绪印　陈兴唐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中执委员、

中监委员均到会参加，宣告国民党的"统一"。会前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中执委被迫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各部改称委员会，增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会议选举胡汉民、蒋介石、孙科、于右任等九人组成中常委，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三十三人为政府委员，孙科、张继、伍朝枢、于右任，分别为行政、立法、考试、司法、监察等院院长，伍朝枢兼代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承认宁、粤、沪三方选中的中执、中监委员。三方合计有中执委七十二人，候补中执委六十人，中监委五十四人，候补中监委二十二人。

材料：

· 四届一中全会

材料　四届一中全会

自蒋介石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入京，孙科偕粤方中委同日到中山陵谒陵后，并与蒋晤谈，惟汪、胡均称病不来。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到有中委九十人。蒋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以后，就带着宋美龄偷偷地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去了。蒋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钜。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此为蒋、汪后来在烟霞洞会议的伏笔。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次日，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蒋走后，一部分中委力主蒋回京，有主以大会名义"速驾"者；惟另有一部分中委认为可遵蒋意，予以"休养"机会。

在首次大会那天，有名在案的"某中委"吴稚晖又大放厥词，他说："蒋一再声明亲自北上，收复失地，而北上种种亦有相当布置，今被辞职还乡，个人认为实不该准其辞、让其走，今日上了他的当"云云。在讨论东北事件时，吴又说："东北事件非张学良酿成，系由于国内有卖国贼，此贼即在眼前。"粤委认为吴是指责粤委中人，又因吴曾电张学良为蒋打抱不平，中有"外不见容予强盗倭寇，内不见容于卖国之贼"等语，故认为吴语言闪烁，用意奸险，显然别有用心，因而群起表示不满。孙科于散会后，愤然乘车赴沪，随即发表谈话，说吴"含血喷人，蓄意中伤"，并表示如蒋、汪、胡不入京，"只有暂不问党事"。

自蒋离京，汪、胡又裹足不前，孙科已成了南京唯一重心人物，且宁粤双方早已协议由孙组"统一政府"。现孙拂袖而去，京方中委亦感不安，故即派于右任、何应钦、蒋作宾等人赴沪劝孙回京；一面又派人劝吴稚晖不要再随便发言，一场意气之争，始告平息。

二十六日开第三次大会，决议要案："(一)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案；(二)通过国民政府主席选举标准，以年高德劭者选之。"

二十八日举行末次大会，通过决议案如下：

"(一)推举胡汉民、汪兆铭、蒋中正、于右任、叶楚伦、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并以叶楚伦为秘书长。

(二)选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案，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提出声明两点：(1)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委员长不兼国委；(2)现任军人不兼国委。众无异议。

(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选任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唐绍仪、张人傑、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伦、宋子文、王柏龄、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享颐、孙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等三十三人为国府委员。

(五)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1)中央政治会议以中执监委组织之；(2)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

(七)选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

(八)关于国难会议、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决议：(1)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内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由中常会筹议办理；(3)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

一中全会闭幕时，冯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说："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责骂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识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帐。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这种坦率的语言，为全会带来了新的气氛，引起了我对他的好感。

会后，第一次中常会决议：新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定于次年(一九三二年)元旦举行宣誓就

职。接着，中政会决议行政院各部人选如下：

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梁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干、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至此始正式成立。

（摘自《陈铭枢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历史内幕

把中共中央从死神手里拉回来

一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周末之夜的南京；尽管淫雨霏霏，织就了一张铺天盖地的雾网，但五彩缤纷的灯火仍然顽强地破网而出，勾勒出六朝古都金陵的豪华风貌。

如同往常一样，徐恩曾早已去泡舞场、玩女人，欢欢乐乐度周末了。只有钱壮飞留在“大本营”里值夜班。年轻的机要员刚送来6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处是武汉绥靖公署主任。

他安静地坐在空无旁人的办公室里，细心地用从徐恩曾身上搞到的密码翻译着密电。当他将全部密码电报译出，组合成完整的内容后，白净的脸陡然变得更白了。

第一封电报：“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

第二封电报：“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第三封电报：“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

第四封电报：“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京。”

第五封电报：“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指徐恩曾)禀报。”

第六封电报：“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每一份电报都标有“特急”两字，直译得钱壮飞心惊胆寒，脑门上沁出许多汗来。

二

黎明何许人也？他就是顾顺章的化名。

顾顺章，又叫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上海宝山县白杨乡人。少年时入南洋烟草公司烟厂学徒，后做钳工，凭着善于观言察色、见风使舵的本领和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慢慢地混上了“莫拿温”——一个小工头。熟悉顾的人曾形象地描绘他说：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眼光凶恶，杀气腾腾，满口上海腔，带点流氓相。对于顾顺章，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在《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中生动地描述过“顾顺章的特点”：

1. 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2. 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 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 生活浪漫。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顾顺章参加过烟厂工会的领导。南洋烟草公司是英商办的，工会工作有点基础。当时顾在厂里领导工人罢工，表现勇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专职搞纠察队，对于玩枪、打架很有兴趣；打叛徒、工贼、内奸他都参加。1926年，曾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从苏联回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在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四·一二”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从武汉搬至上海，顾顺章也调往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参加了，成为中央特科三个负责人之一，并兼任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在保卫中央地下机关，惩除叛徒方面做过一些工作。

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他知道中共许多机密，例如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和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地址，蒋介石、徐恩曾身边有中共特工等内情，幻想以此作为他出卖灵魂的资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升官发财。因此顾顺章被押到武汉行营侦缉处后，盛气凌人地用命令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

孟坚呢？”

蔡孟坚一愣，在他身边转了一圈问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顾顺章得意地一笑：“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蔡孟坚说：“我就是蔡孟坚。”顾顺章根本不把这位“铲共专家”放在眼里，冷冷地对蔡说：“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你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介石。”蔡孟坚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将军。”顾顺章说：“不必，我见他也是这句话。”蔡孟坚将审讯情形告诉何成浚。何成浚听后心里一动。为了急于向南京表功，何成浚、蔡孟坚连续六次向南京发了密码电报，要徐恩曾转告陈立夫、蒋介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三

钱壮飞译出电文、大吃一惊以后，马上镇静下来。他想，如果不及时把情报送出去，必将延误大事，党中央驻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将被破坏，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将被投入血泊之中。

他急忙翻出列车时间表，查出晚上还有一班特快列车，11点开，明早6点25分到上海。除坐飞机外，这是南京到上海最快的速度了。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离开往上海的沪宁特快开车发车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看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夜色凝重，钱壮飞急步跑到正元实业社隔壁自己的家里。他的女儿钱椒椒和女婿刘杞夫正准备睡觉，钱壮飞一下子将刘杞夫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叫刘杞夫星夜赶往上海去找李克农。

钱壮飞依然忧心忡忡。他该不该转移呢？这6份急电中，最后一份已经写明了：此事千万不可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这徐恩曾身边的人指的不就是我钱壮飞吗？他苦笑了一下，终于下定了决心：走！做完该做的一切，钱换上便服，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 .

再说刘杞夫。4月26日清晨，他到达上海后，马上按照钱壮飞给他的地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克农。李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找到了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在陈云的帮助下，又迅速地找到了陈赓，紧接着又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

当周恩来从陈赓那里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时，一下子惊呆了。平时绝少抽烟的周恩来，破例地要了支烟，抽了几口，让烟味呛了好一阵子……

四

面对当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在陈云、陈赓的协助下，以冷静周密的估计，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了敌人的前面。为了全部粉碎敌人破坏中央机关的罪恶企图，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避难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换，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者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尽快地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上海的都要转移住所，隐蔽起来；

第三，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果断处置和切断顾顺章在上海一切可利用的亲属和社会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第五，立即迁移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地址。

当天夜晚，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机关全部秘密搬家；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特科人员在周恩来指挥下，经过几天不休不眠的紧张战斗，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终于抢在敌人前面，使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及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完全打破了顾顺章及其主子的如意算盘。

4月27日，在顾顺章将他所知道的全部有关中共的情报出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后，徐恩曾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上海军、警、宪、特及英法巡捕房从28日早开始在全上海进行大搜捕。

4月28日晨。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了大上海的宁静，一队队特务，巡捕扑向了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和一些领导人的家，可每到一处，都是人去楼空。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敌人又一次遭到了惨败。

当远在南京的顾顺章得知他的“大计划”落空时，恼羞成怒，心里大骂：“钱壮飞，你坏了我的大事！”他象疯狗一样到处乱咬，蔡和森、恽代英、邓演达等一批革命志士被他咬了出来而惨遭了国民党的毒手，中共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特情关系杨登瀛也被他咬了出来……但叛徒终逃不脱历史的惩罚。他后来在国民党内部闹派别，拉山头，结果被大特务头子陈立夫送上了西天，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事实证明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中共中央的对策是英明的。在关系到中共中央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镇定自如，沉着应变，英勇果断及时将情报送给党中央，为保卫中共中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徐恩曾在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不无懊悔地自怨：“一生中所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他的上司和表弟陈立夫也以充满埋怨责备的口吻追忆：“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

不入，可均兄（指徐恩曾）录用钱壮飞实为一大疏忽。”

（选自吴江雄编著《大策反》）

坠落中的余生
——叛徒顾顺章之死

顾顺章，化名黎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1931年，他奉命送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返回时，他违反地下工作纪律，在汉口民众乐园表演魔术，时间是4月25日。

1930年，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头头徐恩曾派出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31年3、4月间蔡孟坚利用叛徒黄佑指引，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均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中共长江局负责人龙崇新，此人在多方威胁利诱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蔡又安排他化装成另一模样，将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别人不易认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各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员。结果，这个叛徒无意中发现了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这时，顾已逃避不及，遂为尾追的特务所逮捕。

蔡孟坚为了对顾进行软化诱叛，亲自接待，敬烟敬茶，但顾却一言不发，当时蔡曾对顾说：“我们虽未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接着，又进行威胁说：“你我为人彼此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仍无表示，最后，蔡又对顾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蔡在向南京汇报后，便当即按照陈果夫、徐恩曾的指示，率领中统特务3名，将顾押上江轮，送往南京。当顾被押到南京时，陈果夫、徐恩曾、顾建中、张冲亲自乘坐小汽艇来到江心接顾，然后将顾送往“正元实业社。”陈、徐等与顾谈话。当顾说：“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时，陈等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优待室内，进行收买。

听说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一事，徐恩曾惊恐万状。因为据顾顺章说，当时调查科的组织人事及一切罪恶活动，共产党都是知道的，如1930年蒋、冯、阎混战时，调查科在天津租界所说电台与调查科之间所有来往的电报，共产党地下电台都收到了。徐恩曾听后，追悔莫及，当即派出中统特务四出侦察搜寻钱壮飞，但始终无所收获。因为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数小时，钱壮飞就突然失踪。在发觉钱壮飞失踪后，徐又表现得十分紧张而惊恐，调查科人员大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从徐的神色上看出必有重大事件发生了。

原来，1928年4月，陈赓就任了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要职。他到特科后，一改过去顾顺章那种单纯热衷于暗杀等恐怖的活动方式，而着力于情报网的建立。他把情报人员钱壮飞派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并成为当时的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所信赖的机要秘书。钱对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是干才，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极好的工作条件，周恩来、陈赓又把情报科的李克农、胡底调到南京与钱壮飞配合，多方搜集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钱壮飞还机智地搞到了徐恩曾随身携带的电报密码本，连续译出从汉口发来的五封密电，从而截获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他立即连夜赶赴上海报告了陈赓。

顾顺章在关押中，徐恩曾、顾建中都曾多次对顾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背叛革命。助理干事张文亦曾三次受徐恩曾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另外，徐恩曾还交给张文一个任务，替顾顺章作笔记，要顾口述一些中共地下工作活动情况，作为中统特务破坏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参考资料。

在敌人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情况下，最后顾顺章完全叛变了革命，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以至恽代英遭到反动派的杀害；其次供出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秘密机关；同时供出了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

恽代英是1931年春在沪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的监号知之甚详。在顾供出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恽代英照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在查对证实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到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恽代英进行了一系列威胁利诱，企图迫使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中共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但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外，无其它任何供词。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行刑时的目击者顾建中曾对人说，恽代英就义前态度从容，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还说：“共产党人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真是可怕！”

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织保卫之下。中共中央得知顾顺章为国民党逮捕并叛变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

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得悉情况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的大多数机关已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迁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遭到了中统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幸在特务们到来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事后据张冲、顾建中对人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定能一网打尽，周恩来亦难幸免。"此次在上海的破坏是由徐恩曾亲自率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执行的。据顾建中对人说：当时徐的劲头极大，一连三天不眠不休，真可谓死心踏地了，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在被捕后从容就义，但亦有少数人在顾的影响下叛变。

顾顺章叛变后，还供出了鲍君甫与陈赓的关系，致鲍遭国民党逮捕，鲍系日本留学生，"五四"时回国，就职于日本洋行并参加过国民党左派和五卅运动。"四·一二"时他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国民党人保释出狱。当192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最早的特务机关，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部后，鲍在五卅运动中结交的同乡挚友杨剑虹，便被派到上海来建立特务组织，有意吸收鲍入伙，是鲍家常客。鲍将此情况告诉了陈养山。陈为共产党员，他是1926年春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向鲍学习日语而结识鲍的。陈按江苏省委之嘱，向中央请示。陈赓与陈养山多方研究并考察了鲍的情况，征得周恩来同意，同鲍见面进行了了解，不久就果断地确定使用这个关系，并建立了单线联系，为了巩固鲍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陈赓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包括部署一些假机关让敌人破坏。考虑到鲍经常要陪同杨剑虹、张道藩出入公安局、巡捕房，陈赓请求给鲍配备了一部轿车，并派去特科连德生(共产党员，曾蜚声于五卅运动)担任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的联络，为拉拢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劳伯森，陈让鲍送给劳伯森很多东西。本来，劳伯森就把鲍视为专家，有疑难都找鲍商量，这一来，劳伯森那里的材料更向鲍公开，中共中央特科因而对英巡捕房的情况了如指掌。

1928年7、8月间，鲍即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鲍于1928至1931年化名杨登瀛，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如中共在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的人员，就是陈赓通过鲍的关系打入的。有的共产党员叛变了，陈赓就让鲍指斥他与共产党仍有"勾结"，是"假叛变"，以借国民党之手把这个叛徒除掉。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被捕，陈赓通过鲍去营救。鲍对巡捕房说任是他手下的人，使任很快获释。193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等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许多机密文件被抄，陈赓派刘鼎伪装为鲍请去鉴定文件真伪的专家，把重要文件拿了回来，并由鲍出面与租界当局周旋，让他们拒绝引渡，关向应等乃被释返苏区。我党如此重要耳目也被顾顺章毁了，叛徒真是可恶！

由于顾顺章案的顺利进行，徐恩曾顿时成为蒋介石最忠实的鹰犬。蒋还亲自召见，对其备加奖励，并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实有效。从此，中统特务组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顾顺章成为中统特务血腥发家的关键人物，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恩曾和张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9月，陈赓同志被党中央派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工作。1932年9月5日，在新集西北的胡山寨战斗中，他的右腿膝盖处负重伤。这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他的伤势日益严重，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治疗。11月初，他到达上海，当天就找到了上海中央局，他汇报了边区的情况，就进了牛惠森骨科医院医治腿伤。经过精心治疗，他腿上的伤很快就治好了。1933年5月，他准备返回苏区，行前，他决定拜访一次正在丽都大剧院作爱国歌舞表演的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即当时名闻全国的明星黎丽丽。3月24日，他刚走进丽都大剧院，就被叛徒陈连生跟踪，虽经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巡捕包围，不幸锒铛入狱。3月31日，上海第2特区法院举行了一次"审判"。"审判"结束，陈赓等就被"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

陈赓刚到拘留所，叛徒顾顺章遵照主子的叱咤，手提贵重礼品，来到陈赓囚室。尽管有楚楚衣冠，却不能包藏住他那颗忐忑慌乱的心。他对陈赓太了解，已预感到这是自讨没趣。"我给你带来一个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消息！""委员长听说你被捕了，表示非常关心，已从江西发来电报，让对你要特殊关照。看来，你也会得到委员长宽恕的。"见陈赓未予理睬，顾自我解嘲地接着说："你不要再固执了，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失败，说明共产主义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陈赓愤怒地喊道："我绝不会象你那样无耻！"顾顺章在被痛骂中，底气已经耗尽，但仍有鹦鹉学舌，而且还把几个叛徒的口供拿给陈赓看，陈赓把这些东西全扔在地上，痛骂顾顺章是无耻叛徒，叫他滚蛋，使他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但顾还不死心，以后连续不断派人来"劝"，都被陈赓骂跑了。

中共叛徒加入中统，始于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革命，其后还有陈庆斋(又名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特务头子徐恩曾对于这些中共叛徒的态度可概括为："用其才，不信其德。"对于大叛徒顾顺章，中统也未加以信任，尽管给予较高薪金，但也只是叫他担任训练特务的工作和编写一些特务教材，顾顺章也提出过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各级特务机构；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付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二陈及徐恩曾等特务头子

认为此建议十分重要。特工总部在1932年至1933年开办过特工训练班3期，每期训练时间约3个月，各期训练内容以侦察情报、行动破坏为主，外加头头陈立夫、徐恩曾等的所谓精神讲话。第一期的主持人就是顾顺章。顾顺章还曾被宪兵司令部聘为校官，讲授密电、密码、化装等技术。1934年左右，戴笠商得徐恩曾的同意，并请蒋介石批准借调顾顺章参加军统在南京的训练工作，担任训练班的顾问和教官。这些年，徐恩曾又指派徐政、章智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顾整理编撰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并整理出一套工作丛书共六册，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顾还曾向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

顾顺章的叛变，可谓为国民党反动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徐恩曾并不放心，派有亲信特务暗中加以监视。1934年，顾与戴发生直接关系后，戴为与徐争功邀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组织，用金钱地位对其引诱，顾也因得不到徐的信任，逐渐倾向于军统。这当然是徐绝对不能容许的。更为徐所不能容许的是，顾阴谋组织"新共产党"。1935年初，顾到上海视察，他个别对那些自首的人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是比较好的，能耐劳吃苦。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地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为此被顾找去个别谈话的人有朱秋白、詹连吾、朱宣之、李典等人。结果，顾阴谋组织"新共产党"的活动遭揭露，被软禁在南京细柳巷，后移明瓦廊。在那时，由顾的后妻张永琴与戴笠暗中来往。看守顾顺章仍是他以前的左右手童国忠和张文农。他俩见顾失势，对顾夫妻监视严密，随时向特工总部反映情况。

1933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视察工作，先后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说："有人野心不死，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1934年，中统把顾顺章易地软禁，关入苏州反省院。传说他会魔术、催眠术。在押解途中，怕他施术逃跑，行前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压邪术。1935年，徐恩曾指示顾建中在某次会议上，以顾"不服从命令，企图独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顾顺章这个叛徒终于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选自《党史博采》，作者：盛显辉）

秘密工作在国民党二十六军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和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形势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经过党的艰苦工作，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红军。

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刚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宣布西北军脱离军阀系统，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冯任总司令，并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聘请苏联乌斯曼诺夫将军为政治军事顾问，发表《冯玉祥五原誓师宣言》，响应北伐。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为策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经宁夏进入甘肃，一九二六年底进驻西安。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采取刘伯坚和乌斯曼诺夫提出的"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建议，兵分两路挺进中原，六月一日在郑州与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会师。这时，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营垒内部正在发生分化，大革命处于紧急阶段。六月十日和十九日，冯玉祥分别同汪精卫、孙科举行郑州会议和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公开投靠蒋介石。

冯玉祥投蒋后，因军阀内部矛盾激化，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爆发了蒋、冯军阀混战，一九三〇年四月到十一月，又爆发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军阀联合反蒋的蒋、冯、阎、桂军阀混战。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将西北军残部交鹿仲麟指挥，鹿又将其交给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孙在焦作收容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董振堂的第十三师、季振同的第十四师、李松昆的第十五师和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共约三万余人。蒋介石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山东济南整编。整编以后，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七师，以孙连仲为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旅，由董振堂、季振同、李松昆分任旅长；以高树勋为第二十七师师长，辖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旅，由池峰城、王恩布、施积枢分任旅长。

一九三一年春，蒋介石出于反共和消灭异己的双重目的，下令在山东济宁的二十六路军开往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大革命时期受党的影响较深，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七月，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进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都，并令其不消灭红军不许后撤，使二十六路军陷入了被红军和红色区域四面包围的困境，更增加了士兵群众怕与红军作战和对蒋介石内战政策不满的情绪。

党分析了二十六路军的状况，决定加强该军的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宜黄后，打进该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共产党员袁汉澄（袁血卒），与原在该旅任上尉参谋的共产党员刘振亚接上了关系。刘当时只与中共河南军委有组织关系，与中央苏区党的组织没有联系。为了打通中央苏区党的关系，开展兵运工作，刘派袁到开封向河南军委请示。经河南军委介绍，袁汉澄与在河南新接上关系的原西北军官学校同学、共产党员王超同赴上海，参加中央军委举办的兵运训练班学习，并发展了李肃（原西北军官学校毕业）入党。学习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派王超、袁汉澄、李肃去二十六路军工作，任务是争取该军到革命方面来；如需红军援助，在来不及请示中央时可直接与红军联系，接头的关系是"朱瑞叫来的"（朱瑞当时是中央军委兵运科负责人）。

王超等人于五月下旬到达二十六路军的驻地宜黄。通过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王超打入该军的总指挥部，袁汉澄到七十九旅二团团部，李肃去七十四旅。他们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地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方法是抓住矛盾，利用关系，广交朋友，物色中坚分子，寻找发展对象。总的目标是发展中坚，联合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奸顽，争取全军起义到红军中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发展党员时，既注意发展出身贫苦的士兵群众和下级军官，又注意发展一些忠实可靠而又掌握要害部门的中级军官甚至高级军官入党。王超首先和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罗致中）接上了党的关系。罗与王是同乡，一九二五年曾同在鄂西从事农民运动。袁汉澄与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共产党员熊伯涛接上了关系。接着，袁汉澄发展了七十四旅二团三营副连长王铭五和上尉执法队员王振铎入党，李肃发展了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秉仁入党，刘振亚发展了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和学兵连教官李青云入党，李青云又发展了学兵连王际坦（王幼平）入党。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后，又发展了总指挥部执法队员孙步霞、杨履元，学兵连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仲，七十九旅二团田玉珊、李春华等入党。到"九·一八"事变前后，党在二十六路军中已发展党员二十余人。发展党员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初期不形成组织，由介绍人单线领导。后来由于党员人数增多，中央即决定在二十六路军中成立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以刘振亚为书记，袁汉澄为组织委员，王铭五为宣传委员。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军官中的党员和士兵中的党员分别成立支部，互不联系。由刘振亚兼任军官党员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党员支部书记。

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成立后，经过严密的考察，发展了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特支分析了赵博生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态度，认为有争取他参加革命甚至参加党组织的可能，于是决定先写一封信对他进行试探。信的内容是讲"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前途，由王超执笔，罗亚平将此信放在赵博生的桌上。赵得信后，对罗亚平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的关系。说得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你们分析得很好。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刘伯坚），没达到目的。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特支决定发展赵博生入党，由罗亚平作介绍人。十月，经中央批准，赵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博生的入党，使党控制了二十六路军的要害部门和领导机构，为宁都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的组织在二十六路军中扎下根后，抓住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加紧了争取二十六路军的工作。二十六路军是在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下被驱来江西"围剿"红军的，它与蒋介石有着尖锐的矛盾。在收编之前，它与蒋介石曾血战数年之久，百战余生的士兵群众，同蒋介石结下了深仇大恨。被收编后，蒋介石把它视为"杂牌军"，待遇上十分苛刻，经常数月不发饷。在发饷时，又要大打折扣，将官只发百分之四十五，校官发百分之六十五，士兵发百分之七十。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加之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初到南方，不服水土，天气炎热，疾病流行，病死者甚多，使二十六路军频临绝境。党组织抓住这些矛盾，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和红色区域对白军的宣传工作，对争取二十六路军也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调二十六路军来江西时，曾把红军说成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青面獠牙的怪物。但当他们进入苏区与红军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很奇怪，"红军既然那样的坏，为什么所有的群众却帮助他们呢？又看很多红军贴的'穷人不杀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标语，更加怀疑起来"。后来经过红军释放回来的俘虏的宣传，"才把这闷葫芦打破了，红军苏维埃与他们说的完全相反。红军是工农阶级的武装，在他得到胜利的地方，农民分得了土地，不完粮税，不还帐了，工人加了工钱，改善了生活与待遇，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红军分得了好土地，还有人帮他耕种，红军内的生活官兵一律平等，没有长官的打骂与压迫，有些红军士兵居然做起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腐败和红色区域的进步，蒋介石对"杂牌军"的歧视和红军对俘虏的优待，鲜明的对比，使二十六路军的士兵懂得："在中国有新旧两个世界，一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界，这个充满了灾难、死亡和封建式的压迫剥削。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工农群众新开辟出来的苏维埃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

国民党军阀封建地主的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兵掌握着政权，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一切的政治自由。”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二十六路军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极为愤慨，强烈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侵略军，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官兵曾联名写请愿书，敦促总指挥孙连仲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孙连仲为了摆脱在苏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的困境，一面致电蒋介石，一面率部离开宁都北拔。但到达宁都北部六十余里之胡嘴岭时，即遭到蒋复电训斥，朱绍良部亦奉蒋令在广昌的头陂一带阻其北进，于是只得率部回宁都。二十六路军对此非常不满，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此后，孙连仲即将军务交总参谋长赵博生主持，前往上海治牙，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亦去南昌养病。二十六路军的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事变后的有利形势和孙连仲离开部队的良好时机，加紧了争取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赵博生利用总参谋长的合法地位，集合全体官后指着地图讲解日寇侵占我东北的形势，以激起官兵的爱国热情。许多党员利用谈心、上课、点名甚至打牌的机会，巧妙地向二十六路军官兵宣传这样的道理：“我们是贫苦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卖命！反对出卖东三省给日本的蒋介石卖国贼！”“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苏维埃是人民的政府，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去！”在“回北方，打日本”这一合乎潮流、顺乎人心的口号下，争取了二十六路军的大批爱国官兵同情革命，为宁都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党组织抓住敌人矛盾，利用有利形势，采取正确的策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底，争取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起义的条件已趋于成熟。十二月十四，二十六路军奋起起义，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选自戴向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王明是怎样上台的

王明是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党内一次“左”倾路线的头子。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是怎样突然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回顾其“发迹”的历史，令人深省。

王明原名陈绍禹（又名陈韶玉，1931年底在莫斯科化名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个小商人家庭。1924年秋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当年秋，他和博古（即秦邦宪）等50多人一起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很快得到了列宁主义课教员、中大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视。1927年初，米夫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中国工作时，就把还没有毕业的王明带在身边作翻译，从1月到7月，在广州、上海和武汉活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明曾经在党中央宣传部担任过两个月的秘书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他又跟着米夫返回了莫斯科，留在中山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翻译和联共党史课教员。

不久，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米夫利用党内斗争的机会，得以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劳动大学校长，俨然成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人”。王明等人因为打着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又为支持米夫上台出了力，所以更得到米夫的信任和重用。米夫专门把王明等所谓“苗子”挑出来，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准备培养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指派布哈林和米夫出席指导，米夫又挑王明当重要译员，让他参加大会的一些秘密会议。米夫在六大筹备选举的会上说，中国党负责人理论很弱，现在有些理论上强的同志，如陈绍禹、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王明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因遭到中央委员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

1929年4月，王明等人陆续回国。中共中央先分配王明在上海一个卷烟厂任党支部书记。但他强调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肯去，要求留在党的秘密机关里工作。中央同意了，先派他到沪东区委在区委书记何孟雄的领导下做了几个月的宣传干事；以后又到中央宣传部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担任《红旗报》的编辑。王明心中不服，埋怨未得重用。

1930年1月中旬，王明被捕，竟向敌人供出了党的秘密机关。被保释出狱后，中央审查他，给他以警告处分，并调离中央机关，派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全总机关报《劳动》三日刊的编辑。5月，调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王明一时难以抬头。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开始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7月，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讨论决议案时，本来附和过李立三“左”倾观点的王明，却与博古等人一起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而指责李立三是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他们在会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你呼我应，喋喋不休。王明在发言中还提出这样荒谬的主张，说是要把“苏维埃的中国，……变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卫，变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所有这些都使李立三、向忠发等人十分恼火。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王明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不把李立三、向忠发等放在眼里。7月10日他写信给党中央，继续坚持他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李立三等更加恼火，于是宣布给王明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王明等人极为不

满。

1930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指派瞿秋白、周恩来由苏联回国，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的精神，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9月24日，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一切职务，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当时瞿秋白、周恩来等认为，立三已承认了错误，所以不主张在全党“公开辩论”，只向全党解释清楚立三的错误就行了，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关于“六月以来政治局即走上反国际道路”的夸大的意见。由于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从而使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三中全会上和会后，仍然浓厚地存在着。特别是三中全会没有为王明等人“平反”，更未将王明等人提到重要的甚至中央领导岗位上，不但王明等人不满，更主要的是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和反感。当时的共产国际负责人不是认真帮助中国共产党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反而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完全打乱了三中全会后纠正“左”倾错误的正常发展过程，掀起了一场反三中全会的轩然大波。

首先是10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完全同意和接受共产国际7月决议的通知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一面肯定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且说是“反国际路线”的；一面又指责三中全会(主要指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路线”的错误。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执委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点名攻击瞿秋白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搞“小团体活动”，完全否定了三中全会纠正立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不行了，瞿秋白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又看不上周恩来，那么谁来当中国党的领导人呢?由共产国际精心培养的干部王明等人，就成了他们当然的意中人选了。

在共产国际10月信到前，沈泽民、夏曦、陈昌浩、何凯丰、李竹声等人从苏联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对三中全会的消息。王明很快把这一消息在宗派小集团内传播，一时在党内造成了“立三反国际”和“三中全会包庇立三”的舆论，掀起了一股反三中全会的恶浪。王明公然打出“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起劲地向党中央进攻，并积极进行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各方面准备工作。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向党中央政治局写信，攻击三中全会犯一系列的所谓“错误”，并硬说“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继续”，揭开了反三中全会错误活动的序幕。11月17日，王明、博古又联名给政治局写信，把立三路线上升到吓人的高度，说立三“代表的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的混合物”，“是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足以吓倒当时还缺乏理论修养的党内大多数同志)，同时又公开标榜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一贯的“绝对正确”，要“坚决地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而斗争到底”。他们竟公然责令中央要“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象，撤销我们的处罚”，要“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气焰十分嚣张，简直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另一方面，从11月下旬起，王明就开始拼抄他的后来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作为他们路线的纲领；又四出联合，造成声势，逼迫中央要召开中央全会，重新改选中央。

这时，原来反对立三主张而遭到打击的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也纷纷起来反对三中全会，许多出于对立三路线的愤慨的同志也卷了进来。这就更加助长了王明等人的声势，掀起了反对三中全会的巨大风潮。王明和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就是要召开象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来解决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党中央顶不住这股压力，只好接受这个意见，于12月9日通过了《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正在此时，共产国际突然派米夫来华，王明等人喜从天降。米夫此行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直接扶持王明上台。米夫到上海后，不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却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并逼迫党中央公开为王明等人“平反”。中央被迫于12月16日通过《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宣布“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于12月22日又发出《中央紧急通告》(即中央通告九十六号)，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承认中央犯了“调和主义路线”的错误，接着又发出了“为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的问题的《告同志书》和《中央关于反对立三路线的讨论大纲》，同意在全党“公开辩论”。这就等于宣告了三中全会及中央的垮台。而米夫却已在暗中起草好了彻底改造中共党中央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内正式召开。米夫一手操纵了这次会议，，他不但在会前起草好了决议案，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竟然由他圈定了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与会37人中，竟有15人不是中央委员，立三中央的负责人只有7人出席。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又使用突然袭击的手法，通知代表到会；有的代表是在开会前一、二十分钟才得到通知，大多数人在会前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和内容。会

议在向忠发报告后，两个国际代表轮流发言，历时二、三小时。他们一致强调四中全会的召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批准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声言"当前中共中央全党右倾，迫切要求改组"。米夫在会上作结论，大讲王明等人"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事实已"证明"王明等人把莫斯科"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强调要"引进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又说，立三是反对王明的，而瞿秋白和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来反对"这些"正确路线的代表"。米夫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为王明上台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全会被迫解除了瞿秋白(还有李立三、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全会选举时，米夫竟肆意践踏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非法宣布：凡参加全会的都有选举权。在强令将王明等补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接着选举政治局，王明又顺利地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分工结果，向忠发虽仍为总书记，而有共产国际当硬后台的王明，却以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书记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控制了中央领导大权，向忠发更加傀儡化了。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就成了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王明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预谋实现了。一个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革命斗争，六届四中全会前只是中宣部的一个秘书、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就这样一步登天，一跃而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选自《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邓演达遇害前后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而流亡欧洲，并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活动方便，他们彼此往来均在偏僻的马路上用英语交谈，使特务无计可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区的代表30余人。邓演达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他起草的政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并推举他为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大会结束后，邓演达从上海到东北、华北等地考察，并抓了几项工作：一、举办干部训练班；二、组织黄埔同学会；三、进行军事策划。邓演达的积极活动，在国内迅速产生了广泛影响。南京、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地14个省市先后迅速成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区别于蒋介石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对蒋介石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极为忌恨，以30万元悬赏捉拿邓演达，伺机对他进行迫害。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出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的干部训练班结业式，宣讲国内外形势。与会者正听得入神时，叛徒陈敬带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中西包探突然闯进来，邓演达立即明白了敌人的来意，便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但敌人还是把邓演达和10余名同志脚镣手铐押到英国巡捕房，关在一间只有1丈见方的临时囚室里。下午3点多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一点水泡饭。邓演达鼓励难友们："打起精神来！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做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在巡捕房受审时，邓演达写下了一篇自述，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并表明他的奋斗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

8月18日上午9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邓演达进行了审判。下面摘引一部分审讯记录：

审判长问：你赴愚园坊20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昨日是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时被捕的。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体现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

接着审判长问辩护人意见。律师张志让和蔡六乘先后指出：这是一个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案件。如果将被捕者交警备司令部，将给外人攻击中国司法制度以口实。其次，邓演达是研究经济的，昨天讲的是经济问题，全无"危害民国"之言论，他在公共租界内被捕，管辖权属于江苏高等法院，请勿移送警备司令部。但审判长仍宣布将邓演达移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为此，辩护人提出抗诉，但又被审判长驳回。19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到法院将邓演达押走。

8月21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三元巷军委会内。临行前，他托人转告难友们，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这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安排了一个营救计划：邓演达有一个学生叫许沅圃，也是"行动委员会"成员，他有一个排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每星期日晚

轮到他的亲信卫兵值班。他认为这是营救邓演达出狱的良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行动委员会”还筹措了5万元经费,作为卫兵眷属的转移费用。不料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蒋介石又将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一所空屋内(后来才知道是富贵山炮台废址),这就使营救计划全部落空。邓演达移解后,通过看守传出一张亲笔字条,上面用红铅笔写道:“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茅屋内,以后通信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蒋介石抓到邓演达之后,起初觉得难以处置,即所谓“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孙科等人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的教育长——邓演达,受邓演达影响的黄埔各届学生至少有5000人以上。于是,下野前的蒋介石下了决心:秘密杀害邓演达,以免动摇作为他统治根基的黄埔力量。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诡称要将邓演达转移到汤山。囚车开到南京城东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司机佯装汽车抛锚,王世和要邓演达下车,邓刚走出车门,身后枪声突起,这位忠勇奋发的一代英杰成了蒋介石阴谋的牺牲品,死时年仅36岁。牺牲前,他在狱中书写了一幅对联:“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表现了他不断进取的精神。

1931年底,从何应钦那里传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宋庆龄将信将疑,于12月14日赴南京质问蒋介石,并强烈要求跟邓演达见面。她不住国民党的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的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她也拒绝乘坐国民党当局预备的小轿车,而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原想敷衍一下宋庆龄,但最后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出了一句实话:“这个人你见不到了。”宋庆龄悲愤至极,一下子把茶桌掀翻,面斥蒋介石祸国殃民,蒋介石慌忙躲上了楼。

12月19日,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然后由“行动委员会”中央直属区的负责人杨杏佛、谢树英译成中文。“宣言”严正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宣言”深刻揭露:“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的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宁粤合流的实质是:“和平分赃,统一作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道。”这份“宣言”,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后又登载于12月20日的上海《申报》。在宋庆龄的激励下,北平、天津等地举行了悼念邓演达的活动,不少人表示要响应宋庆龄在“宣言”中提出的“消灭军阀官僚,实现社会主义”的号召,化悲恸为力量,跟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先生在《哭邓演达先生》诗中写道:

“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
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陈漱渝)

上海站刺宋和庐山刺蒋

1930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开除了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的国民党党籍,改组行政院,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以其妻兄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蒋介石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达到最高峰。

蒋介石的独裁引起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恐惧与不满。为了对抗南京蒋介石集团,西南反蒋各派召开“非常会议”,于1931年5月底成立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同时陈兵湘境,宣布要讨伐蒋介石。

西南反蒋派在进行军事反蒋的同时,策动王亚樵及其党徒实施对蒋介石及其他南京政府要人的暗杀,以配合军事行动的进行。

王亚樵自1923年11月成功地暗杀了淞沪警察厅厅长、直系军阀的重要干将徐国梁后,先在浙江卢永祥部任游击纵队司令,后投奔广东革命政府,在北伐中任安徽宣慰副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王亚樵愤而他去,从事反蒋活动,来往于上海与香港之间。1931年四五月间西南反蒋派集中广州,宣布起兵讨蒋,王亚樵十分兴奋,起而响应,他派其亲信干将洪耀斗、余立奎作为自己的代表,去广州正式参加“非常会议”。两广反蒋派十分欢迎王亚樵参加他们的阵营,并要求王及其党徒配合两广军事行动,尽速实施对蒋介石的暗杀。不久,广东方面秘密派人到上海,一次付给王亚樵活动经费20万元。

王亚樵开始部署刺杀蒋介石的行动。

王亚樵及其党徒经过侦察调查,发现蒋介石在南京居于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内,戒备森严,暗杀根本无从下手。王等计议,决定退而求其次,先设法暗杀蒋政府的第二号核心人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去蒋膀臂,断蒋财路,在精神上打击蒋。然后伺机刺蒋。

王亚樵决定暗杀宋子文后,乃于1931年夏的某一

天，在上海浦柏路大华公寓召集亲信核心人物华克之、龚春蒲、谢文达、郑抱真等人密议杀宋行动计划。他们根据搜集到的情报，研究了宋子文的活动规律与警卫情况，感到在南京下手很困难。但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与当时全国金融与经济中心的上海关系十分密切，几乎每过几天就到上海一次，去时必乘沪宁客车，这正是暗杀的好机会。王亚樵决定在宋子文乘火车到上海时，在上海北火车站动手。一来这里戒备较南京要松；二来上海情况复杂，刺客动手后便于逃匿隐藏。

王亚樵派出几个精干人员，到南京专门侦察宋子文的行踪，务必要先期打听到宋子文抵沪的准确时间，用暗语密电向上海总部报告。

对暗杀行动人员作了如下分配：

第一组，由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成诚、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人守车站月台，在宋子文走出车厢时即行狙击。此为第一道狙击线。

第二组，由龚春蒲率领刘刚、尤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倘第一道狙击线没有成功，则由他们实施暗杀。

第三组，由谢文达率领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人把守车站大门外的天目路一带，组成第三道狙击线。该组人员负责策应，到时切断通讯线路，并掩护全体人员撤退。

王亚樵届时将亲临北站现场，负责总指挥。

1931年7月22日，南京潜伏人员打到上海联络点的一份急电及时送到了王亚樵手里，急电上写道："康叔于今晚由南京乘夜车来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康叔"即是王亚樵给宋子文取的代号。王亚樵等人阅电报大喜，立即紧张行动起来。掌管总务的郑抱真给三个小组的行动人员每人分发手枪一把，子弹若干，烟幕弹一个。当日晚，他们即分别潜入北站附近各预定地点，天明后，部分行动人员设法进入车站内。

王亚樵本人到天目路沿马路的一家旅馆租了一间临街的房间住下，观察与指挥整个暗杀行动。

1931年7月23日上午7点多钟，从南京开来的沪宁夜车经过一夜的行驶，终于到达了上海北站。在旅客洪流过去以后，财政部长宋子文方带着秘书唐腴庐及几个随从警卫人员走出专备的卧车车厢，来到月台上。因宋常来上海，故没有安排上海要人来站迎接，只是在月台上多加了几道岗哨。这就使得王亚樵的第一道狙击线华克之等人无法接近月台下手。华克之急忙向候车室的第二狙击小组发出信号。

宋子文一行走出月台后，经过车站东大楼，准备向站口大门走去。这天宋子文及其秘书唐腴庐均身穿白哔叽西装，头戴白色拿破仑式的帽子，两人衣着一样，面貌高矮又相似，一般外人一下子难以分清。宋子文让其秘书唐腴庐走在前面，自己走在中间，侍从警卫人员簇拥在后面。正当他们经过车站东大楼时，预伏在大楼楼柱后的第二狙击组成员刘刚等人突然跳出来向他们猛烈射击，唐腴庐首先被击倒在地，其左肋、右腹、右臂等多处中弹，伤及要害，血流满身满地。在他身后的宋子文听到枪声后，知道有刺客，立即机警地摘下帽子，急急躲避到大楼北首的一根柱子后边。这时宋的卫士已拔枪还击。从后面赶上来的第一狙击组华克之等人也加入战斗，投出几枚手榴弹，只爆炸了三枚。一时间，北站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车站附近的路警听到枪声，狂鸣警笛，纷纷赶来捉拿刺客。宋子文在众人护卫下，快步登上大楼上层，脱离了险境。暗杀行动组的成员不敢恋战。华克之命张玉华扔出几颗烟幕弹，掩护全体队员迅速撤离现场，消失在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王亚樵等人听到部下报告后，满以为刺宋成功。但当日晚从晚报上看到报道："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子文财长未遂，秘书唐腴庐当场毙命"，方知误中副车，刺宋失败。

北站刺宋失败后，王亚樵下决心全力以赴刺杀蒋介石。这时西南反蒋派闻讯，也不断给王亚樵来电来信，要他迅速直接刺杀蒋介石，以瓦解整个南京政府。

王亚樵经过反复思考及与亲信密议，对刺蒋行动重新作了部署。他派遣郑抱真亲自到南京坐镇，另派遣最能干的华克之率领一个精干的行动小组潜赴南京执行暗杀。以郑、华负责全面指挥，华克之领导暗杀行动。

郑抱真、华克之等人到南京住下后，经过侦察，知蒋介石为避暑，时时往来于南京、庐山间。他一般居住江西庐山，有军国大事才回南京处理。华克之就想到庐山下手。

华克之率领助手成诚等人乔装游客，来到庐山，秘密侦查蒋介石的行踪与警卫情况，前后来往于南京与庐山间几次。当时庐山因蒋介石驻跸，上山盘问检查甚严，尤其是武器很难带上山。华克之苦思多日，得到一法：他购来几只金华火腿，用刀切开，将几支手枪拆开成零件，与子弹分别藏入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由王亚樵的妹妹王亚瑛与刘小莲两个妇女携带上庐山。

暗杀组人员与武器上山后，就开始实施暗杀。当时，龚春蒲、萧佩伟与成诚等人化装住在庐山新旅社内，严密监视蒋介石的行动。一天，蒋介石的座车突然疾驰而来，守候在路旁监视的成诚突然遇到，来不及回去报告，就急忙向身上掏炸弹，正举手之际，从车内射出一弹，成诚当场死亡。原来蒋介石的卫士发现路边的成诚行迹可疑，早就戒备，在其正要动手时，抢先射击，蒋的座车飞也似地驶往别处。

此后，蒋介石戒备更加严密，不久就下山回南京。华克之等人无法实施暗杀，只得撤回上海。

王亚樵策划的北站刺宋、庐山刺蒋行动，在南京政府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与恐惧。蒋将戴笠多次找来大骂，限戴笠迅速捉拿王亚樵，但王亚樵早就撤到香港，戴笠在上海以重金悬赏，先后捉到了尤林、唐明、刘刚等人，送淞沪警备司令部严刑逼供，审问结果秘而未宣。王亚樵却始终没有抓到。这使蒋介石与戴笠十分不安。戴笠的亲信沈醉说："王亚樵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1931年天津便衣队暴乱始末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把军事行动扩展到我国东北全境。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寄希望于当时的国际联盟的裁决。国际联盟作出一项决定，要求日本必须在11月16日以前撤兵。一纸决议，对侵略成性的日本当然谈不上什么约束力，但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策划推出一个傀儡国家，来扭转国际舆论的视听。至于人选，没有比废帝溥仪再合宜的了。当时溥仪蛰居在天津日租界，韬光养晦，伺机复辟，已经偎依在日本人的怀抱里，如今粉墨登场的机遇似乎已经到来。为此，日本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密谋，在天津策划一场暴乱，趁机劫持浦仪到东北，而时间必须赶在11月16日即国际联盟规定的撤兵时限之前。

此次暴乱史称"天津事变"，其幕后导演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的秘密使命

1931年10月中旬，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命，潜往天津，设法诱引溥仪出逃。几天后，本庄繁便收到土肥原从天津拍来的电报，内称："溥仪确有逃往满州之意，并拟在吉林成立政府亦大体属实，惟天津总领事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因之，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

日本外务省与军方在扶植溥仪问题上的分歧，在于选择什么时机与在什么条件下"拥立"溥仪"出山"为宜。老谋深算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担心操之过急"将更加深国内外之疑虑"，而关东军却已经迫不及待了。电文中所说的"采取特殊手段"，指的是搞一场暴乱。土肥原在天津停留数日后返沈复命，而把制造暴乱的任务留给天津驻屯军去完成。当时，在天津有一代号为"三野公馆"的日本特务机关，其负责人三野友吉是天津驻屯军少佐参谋，他的任务是监视控制溥仪的行动，同时大肆网罗那些卖身投靠日本的民族败类，诸如下野政客、失势军人、汉奸、帮会头目等。这些人也就是三野友吉策划暴乱的班底。为纠集一支暴乱队伍，天津驻屯军一次拨款5万元，并提供一批枪支弹药。由三野公馆的常客张璧、李际春2人出面，在社会上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游氓、青帮分子以及吸食毒品者，不下2000人。因为他们没有番号，又不穿军装，故自称为"便衣队"。

张璧，何许人也？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身为京师警察总监，曾协同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后来冯玉祥失势，张息影津门，过起寓公生活，转而与溥仪气息相通了。李际春系行伍出身，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担任过奉系骑兵军长，后来奉军退出北京，他蛰居天津，投靠了日本人。这两个民族败类野心不死，幻想东山再起。日本人对他们封官许愿：一旦事成，张璧就是天津市长，李际春掌管保安队。张璧向日本主子夸下海口，说他在保安队中有内线，可以收买一批人作内应。结果恰恰相反，保安队总队长王一民接到密报后，将计就计，派人打入便衣队，随时掌握张璧、李际春等人的动态，并及时向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汇报，均有所指示，嘱令加强戒备，并由公安局以"地方不靖"为由，于11月1日起宣布提前施行冬防，一时风声鹤唳，剑拔弩张，恶战迫在旦夕。张璧、李际春利令智昏，不晓得保安队已经陈仓暗渡，还在大作黄粱美梦哩！

制造暴乱趁火打劫

11月2日，土肥原贤二再次秘密抵津。经过一翻紧张的策划，决定起事时间为11月8日，就在8日这天的上午，保安队接到密报，得知便衣队将在当晚10时以海光寺日本兵营钟声为号，分3路出击：一路由闸口沿海河进攻公安局；一路沿南马路、东马路，抢占金钢桥，夺取省政府；一路由海光寺兵营出发进击各区警察署所。张学铭、王一民当即作出部署，动员全体军警人员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并沿着日租界通向华界的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王树常又命令第二军独立第十五旅旅长姚东藩，立即将驻扎在塘沽、军粮城一带的部队调入市区，必须在当夜11时到达指定地点待命。8日这天，正好是张学良之三弟张学曾举行婚礼，整个下午贺客盈门，欢声盈耳，毫无备战气氛，大概对日本人也起到了麻痹作用。

夜幕降临，王树常、张学铭等军政领导人伫候在指挥机关，沉着应变。当钟声响过10下以后，未见丝毫动静，人们互相交换着狐疑与不安的眼色。良久，王树常说："可能由于我们有了戒备，把事情压下去了。"话音未落，就从海光寺兵营方向传来了密集枪声。随后，王一民频频打来

电话，报告便衣队出击及保安队反击的战况。这一夜，便衣队倾巢而出，沿日租界与南市、南门外、南马路接壤地带猛攻，先后占领了警察一区一所、一区六所及二区六所，并企图袭击闸口电话局与金汤桥公安局。在保安队与警察的强有力的反击下，便衣队被迫退却，夺回了一区一所与六所；二区六所因地处海光寺兵营左近，因那里挂上了日本旗，未敢贸然袭取。一夜激战，便衣队溃不成军，黎明前纷纷逃回日租界。

一夜之间，击毙便衣队匪徒3名，俘获61名，就地正法枪决了10名，枭首示众。在战斗中还缴获了一批武器，皆为奉天兵工厂制造，因上面未加盖火印，说明系"九·一八"事变后的新产品；在缴获的手榴弹上，镌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足以证明匪徒使用的武器皆为日本人供给。

俘获的匪徒被押送到第二军军法处审理。据供称：暴乱总机关设在日租界万国公寓楼上，司令是张璧、李际春。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秘书、军医5个处，编为5个支队。每一支队下辖4个分队，每一分队下辖8棚或10棚，每棚有1个头目和10名士兵。暴徒都是招募来的无业游民，入队先发给安家费4或5元，每天发给饭费五、六角。枪支是从海光寺兵营领来的。暴徒们受过日本军官的简单训练，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和跟谁打仗，只被告知打胜了有财发，给官作。他们于8日晚上集合后，日本宪兵用枪在后面逼着向中国地界进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有的因为退缩当场被日本宪兵开枪打死，云云。

便衣队的骚扰活动，从8日夜晚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是暴乱的第一阶段。在暴乱开始的第3天即11月10日，趁全城混乱之际，在日本特务的裹胁下，溥仪从住地静园化装出逃，乘船偷渡海河，出大沽口后改乘"淡路丸"驶往营口，踏上了日夜梦想复辟之乡。

幕后操纵者狗急跳墙

便衣队是乌合之众，只消一击便溃不成军。原在幕后操纵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气急败坏地从幕后跑到前台来。在11月9日晨5时，便衣队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之后，香椎浩平竟向王树常提出口头警告，胡说什么保安队的流弹打死打伤了日本兵，并危及日租界侨民的生命安全，蛮横地要求中国军警必须在早6时以前后撤300米，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王树常为避免事态扩大，立即命令保安队从封锁日租界的各路口后撤。但香椎浩平的上述警告不过是虚晃一招，6时刚过，日军的大炮轰鸣，连续向华界打了30多发炮弹。

9日晨，香椎浩平抢先散发了一篇妙不可言的声明，签署的日期为8日，显系在暴乱发动前拟好印就的。声明称"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为此声明，日军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态度，凡不企图损伤日本国家与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者，日本皆当力予保卫。"这一声明暴露了日军为虎添翼的丑恶嘴脸。便衣队手持日军发给的武器从日租界冲出来，肯定不会损伤日本军队之尊严，不会危及日本人之生命财产，而日军"当力予保卫"恰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王树常、张学铭则寸步不让。4日上午，除了向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提出抗议外，并由王树常召集驻津的各国领事谈话，通报情况，揭露真相。同一天，张学良以副司令的名义发出通电，谴责日军支持便衣队暴乱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宣告成立天津戒严司令部，在全市通衢要道张贴布告，大张旗鼓，震慑匪徒。

为了缓和局势，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缘后撤了300米，这却为便衣队的出击提供了方便，成为匪徒出没无常、短兵相接的战斗激烈地带。日军又藉口"流弹飞入租界"，不断发出扩大事态的叫嚣，并从塘沽紧急调兵来津，发动日侨组成义勇队，摆出一副介入战斗的姿态。

从11日开始，在桑岛主计的建议下，中日双方就恢复和平秩序问题进行磋商。日军坚持划日租界外沿300米地带为缓冲区，拆除一切防御工事，恢复8日以前状况。后来桑岛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市区，违反《辛丑和约》，王树常对此概不承认(实际上调入的部队均换成保安队或警察的服装)。在中日双方会谈期间，便衣队的骚扰活动始终不停，时而频频出击，时而昼伏夜出，时而声东击西，日军大炮也不时轰鸣以为助阵。保安队严阵以待，屡屡打退便衣队的攻势，且不断击毙及俘获来犯之匪徒。14日，保安队在南门外宁家大桥又将10名便衣队匪徒就地正法，以示我方镇压暴乱之决心。

14日，国民党政府训令王树常"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御工事"，对日军退让。王树常接电报后表示："我老家辽中，未放一枪就叫小日本给占了。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天地良心，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继续。"仍与张学铭一道坚持原则与日军交涉。17日，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全部撤除距中日交界300米内之防御工事，保安队不得进入这一区域，改由警察设岗警卫，准许佩带武器。18日上午开始撤防，下午撤尽，中日双方派出联络人员视察。同时，戒严司令部宣告解除戒严。至20日，市面恢复正常。至此，便衣队暴乱告一段落。

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在中日交涉过程中是与日军沆瀣一气的。他在11月17日拍给日本币原外相的"机密"电报中，是这样写道："土肥原来津之目的，系奉关东军之命，以满洲独立之前提，急速诱出宣统皇帝，推翻张学良之势力，不顾任何人之劝告与干涉，根据关东军之立场，一意采取独自之行动。以即使有背国策，亦在所不惜之决心，且在政界有力分子之支持下，玩弄一切策略，又不择手段，于8日发动暴动，因计划不周，而告失败。"这位伪

善谲诈的外交官，也只有在这封“极机密”的电报中才得以吐露实情，并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狼狈相。

以妥协退让而告终

狡黠的香椎浩平背信食言，在11月26日晚8时又策动便衣队再次从日租界出击，并以大炮助攻，向电话局、公安局、省政府等要害部门轰击，当即炸死保安队员数人。日本义勇军也随之出动。香椎发动便衣队再次骚扰，是为了配合关东军进攻锦州，迫使中国军队后撤到山海关。便衣队的第二次暴乱持续到30日。

27日，香椎浩平向王树常又提出新的要求，主要是中国军队必须撤离外国军队驻地20里以外，保安队必须退至南运河与金钢桥以北，驻河北省内之军队一律中止移动。28日，日本军舰“朝颜号”载日本陆战队500余人与大量军火抵达日租界码头，香椎亲率侨民前往欢迎，故意制造临战的紧张气氛。29日，香椎通知各国驻津领事团谓：中国方面违反了《辛丑和约》，日本不能容忍，即将执行惩罚手段云云。桑岛也于是日通知各国领事，转告侨民限于当日晚7时以前离开华界，以免危及生命。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以此进行战争讹诈。各国领事为此进行紧急调解，于是约定中日双方皆停止攻击，继续磋商。张学良也派出参事周龙光来津与日军斡旋。

自从便衣队暴乱以来，南京政府虽然也曾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过抗议，但始终没有制定必要的对策，主导思想仍是妥协退让，而日军又不断寻衅，天津地方当局承受巨大压力，进退维谷。最后不得不被迫接受日军的无理要求，将保安队撤退到南运河、金钢桥以北地区。历时20多天的便衣队暴乱，最后以中国的妥协退让而结束。12月4日，张学良以周龙光暂代天津市长，亦为对日迁就之表现。

在此次暴乱中，中方官警阵亡6人，受伤37人。无辜民众也有多人被流弹击中或伤或亡，流离失所的贫民多达1万余户，至于商民的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天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的第一个信号，此后华北政局更加动荡，日本加快了鲸吞华北的步伐，直至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杨大辛）

历史考证

张学良为何不认“‘九・一八’不抵抗”的帐

编者按　“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即将来临。60年来，对张学良在这一事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现发表《张学良为何不认“‘九・一八’不抵抗”的帐》一文，以期引起进一步深入讨论，取得更多的共识。

是是非非　非非是是

——题记

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要紧的是搞清楚两个字：是与非。最难弄清楚的也是两个字：是与非。

研究争议了60年的“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亦如此。

抵抗　不抵抗

在张学良90多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段，最为坎坷曲折：

皇姑屯老帅被炸，东北易帜，处决杨常，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下野出洋，在湖北和西北“剿共”，西安事变。

短短数年，这位传奇的少帅在历史潮流中急剧地沉浮起落，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浪尖或卷入漩涡……

张作霖被炸亡，使张学良与日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他以生就的血性和硬骨，拒不屈服于日本的引诱和压力，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动因之一。

事变前夕，面对日方大军压境，肆意挑起事端，张学良曾多次要求中央政府“与日本开战”。

1931年7月上旬，张学良向在庐山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郑重提出，应“对日采取强硬态度”，施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但终被蒋氏以不抵抗的主张所说服。

同年7月23日，蒋介石首次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口号。

8月16日，蒋致张铣电明确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

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日，蒋在汉口又称：“中正唯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可见，执行“不抵抗”命令，并非张学良的本意。“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既定政策的制定者，正是蒋介石本人。

根据有关史料和史实对此作深层探析，人们就会发现，蒋介石主张不抵抗主义的主要原因是：

1. 为全力“剿共”，安内攘外，以维护其统治。

2. 他有“恐日病”，认定“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3. 他始终存在对日妥协思想。

4. 他依赖国际联盟和美英法等国，幻想他们能象190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一样，制约和制止日军侵占东北。

张学良一时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复杂原因如下：

1. 他事先对日军侵略东北虽有所预料，但没有完全料到。

2. 他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军人认识不足，判断失误。认为从日本本国利益出发，日军侵华，不但对中国有害，对日本也不利。因此，日本政府会干预、控制关东军的侵略行动。

3. 日本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掉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东北，是张学良始料未及的。他当时发给南京的电报即称：“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由于他最初对这种严重局势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还是象以往那样制造一般“寻衅”的“地方事件”，因此想以退为进，不作匆忙抵抗，观察一下日军动向后再从长计议。

4. 他听信蒋介石的主张，企图依靠中央和国联，防止“事态扩大”，解决这一“地方事件”。

5. 他在事变之初受蒋介石影响，一度存有对日妥协思想，以为委曲即可求全。

6. 张学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他当时还未完全认清不抵抗主义的危害。

7. 他习惯以机械地听命中央，服从军令为军人的天职。

8. 他认为虽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古训，但敌情不明，不知己知彼，乃仓促应战，也是自古兵家之大忌。

9. 张学良始终主张，以东北人力物力，不足以与日本抗衡。只有举国一致抗日，方能战胜日本侵略。因此，他在最初的不抵抗中，避免以卵击石，想在放弃部分城地的撤退中，保存东北军实力，以求在未来的全国抗战中一马当先，收复东北。

10. 他驻节北平后，一度踌躇满志，贪恋享受，影响了抗日斗志。

11. 东北军16万精兵都在关内，远水难救近火。

12. 张学良当时远在北平，对东北前线危局只能摇控，对有效地速解燃眉之急，感到力不从心。

历史证实，尽管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最有权势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的政见明显不同。围绕抵抗、不抵抗，蒋顽固主张“安内攘外”，张则一直坚持应“攘外安内”。这种政见之争相持五年之久而越发尖锐激化，终于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执行不抵抗方针和尽其所能抗战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时，德、意与日本沆瀣一气。英、法、美在经济大萧条中自顾不暇，想让日军把战火烧到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怕引火烧身，对日军侵略东北，采取“严格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国联派出的调查团也企图与日本坐地分赃。

没有人愿意帮中国的忙。

在国内，蒋介石率领他的百万雄兵，正忙不迭地“围剿”红军。

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去了苏联。博古在上海发号施令，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予正确的领导和支持。红军主力均在南方与蒋军激战。红一方面军于9月15日才刚刚粉碎国民党大军的第三次“围剿”。

当时没有人能帮张学良的忙。

在华北，阎锡山、韩复榘都在看张学良的笑话。他们一面表示爱莫能助，一面图谋趁火打劫，从张学良背后捅一刀，以报一箭之仇。

在东北军内，汤玉麟、张景惠等老臣都拿少帅当小孩子。这伙各怀鬼胎的人与张学良明争暗斗，使张学良的权威和实力着实打了折扣。加之他当时吸毒成瘾，骨瘦如柴，正处于心力交瘁、内外交困之中。

此时，东北的乡亲们和全国的老百姓是支持张学良率东北军抗战的。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张学良又不可能彻底地发动和依靠人民抗战，他只能陷入孤军无援、孤掌难鸣的尴尬困境。

他深感凭自己的作为，既难以遏制日军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也难以逆转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不抵抗吧，要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唾骂，成为千古罪人。抵抗吧，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且势必横遭蒋介石们的谴责；违抗上峰命令，惹恼日本人，

致使事态扩大，战火蔓延，其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到底怎么办？老实说，换上别人到张学良的位置上，恐也很难作出选择。

在60年前“秋雨秋风愁煞人”的那个凄冷的多事之秋，张学良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于是只好折衷，只能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得在执行“不抵抗”方针的同时，进行一些抵抗。

在这里，“不抵抗”是违心的、消极的、有保留的、有限的。“抵抗”才是真心实意的、积极的、尽心尽力的。尽管在强敌面前，它是显得那么苍白、单薄、软弱、无力。

众所周知，张将军的一生，在“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人生信条下，丧权辱国、苟且偷安的事一件也不曾干过。

日军的疯狂进攻，使他在“不抵抗 ”的痛苦中猛醒。他的思想由“息内争，御外侮”迅速转变为“全民抗日”，“举国抗战”。这种思想与几年后中国共产党完整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谋而合。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就在东北军重要将领会议上指出：“抗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不久，他又明确表示：“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

大量史实表明，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九·一八”事变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领导和全力支持数十万东北军、抗日义勇军和各界爱国民众，对日军进行了尽管畸形但却是顽强的殊死的“不抵抗的抵抗”。

事变后，奉张学良之命，先后在锦州、齐齐哈尔，宾县迅速重建或改组了东北三省新的抗日政府和三支东北军抗日部队。他组织指挥东北军进行了北大营突围战、长春突围战、江桥抗战、平定天津一一八暴乱、锦州退军之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海满抗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1933年初，他直接领导和指挥了榆关之战、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竭尽全力地支持和援助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各地义勇军抗日。

锦州战役中，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与日军“激战十昼夜之久。前赴后继，死伤蔽野”。

双城阻击战中，张学良严令赵毅率东北军第二十二旅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毙伤日伪军千余人。赵旅中上至团长吴永和，下至排长刘金胜，光是军官即有20余名壮烈殉国。

榆关血战中，张学良以“咱们拼了”的誓死决心，亲自指挥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官兵用大刀与日军白刃格斗，反复厮杀。“天下第一关”上，血肉横飞，空前惨烈，该旅六二六石世安团伤亡过半，该团第一营营长安德馨和关景元等四位连长先后战死，全营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

热河抗战中，由于汤玉麟等败类的丑行，承德失陷。张学良速派王以哲军第七旅上古北口，派商震军到冷口，续派中央军关麟徵师增援古北口，令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罗文峪口，稳住了全线溃退局面。使整个战线出现转机。然而，就在宋哲元军在喜峰口出奇制胜，王以哲军、关麟徵师在古北口重创顽敌，张学良决心亲率其余未参战的东北军反攻热河，与日军决一死战，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一腔热血，壮志未酬，竟被免职下野了。这给他领导的抗日斗争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张学良领导东北和华北军民进行的浴血抗战，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于，弘扬了民族的抗日救亡精神，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日军的侵华步伐，使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一区用了4个多月，到热河抗战失败，东北四省一区完全沦陷，日军用了16个月。

1990年。台北。张学良，这位一辈子老老实实、实实在在、为国为民甘愿受尽了人间大苦大难大冤大屈的可怜的人，终于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开口说话，为历史证言。这位90高龄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中国那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他说得是那样坦然，那样坦率：

“当初未料到关东军会发动‘九·一八’事变，想看一看情形。日本国内有许多问题，有俄国的条约，这样做对日本不利。大家责备我，说我不抵抗，我不承认。我认为这是我判断错误，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

“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

不抵抗　谁之过

东北丢失，人们在怨愤之时，骂人是可以的，骂“不抵抗将军”也是应该的。但是，骂人应该分清是非，骂准对象，骂得公平，骂得合理。显然，60年来，骂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纯属冤骂错骂。

如前所述，蒋介石主张的“安内攘外”与张学良主张的“攘外安内”，不是做事的顺序不同，而是做事的目的不同。

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张学良执行不抵抗命令，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因此，对丢失东北，蒋应负全局的主要责任，张应负局部的一定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二人都有过。不过，在蒋介石是罪过，在张学良则是过失。二者是有本质区别和严格界限的。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这段历史的真象被掩盖了，这种本质的区别被抹煞了。究其原委，主要有四：

1. 东北失守，锦州失守，热河失守，蒋介石每每善于把罪责推给张学良。张则不辩一辞，多次代蒋受过，他太善良了。

直到去年，张学良在对日本记者谈到涉及别人的复杂敏感问题时仍然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他是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而台湾1974年正式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仍把"不抵抗"的责任栽到张学良头上："盖坚持不抵抗以防突发事件扩大，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的方针。"

2."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新闻媒介便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东北守将张学良展开新闻攻势。他们凭空捏造出有关张少帅的种种桃色新闻，他们在上海等地办的报刊上广为传播，以混淆视听。他们大肆宣传少帅不仅在北平六国饭店于"九·一八"当夜与女影星胡蝶相伴跳舞，且二人过从甚密，张还馈赠胡十万大洋作为酬报，并刊登胡的玉照，把少帅与胡的大名并列报端。

3. 当时，与张学良结有宿怨的汪精卫之流，乘人之危，不失时机地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抨击"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的运动。他们或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对少帅极尽讽刺、挖苦、造谣、中伤之能事，真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一时间，一切污水都泼到了少帅的头上，"国人皆曰可杀"。历史被颠倒了。是非被颠倒了。

国人不明真相，一时之间，多对张学良表示愤慨。有人公开提名少帅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让日本人和平地吃了东北。有人则公演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的戏剧。马君武教授根据谣传写下脍炙人口的讽刺诗，把少帅与胡蝶共舞的事写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此诗一见报，南京政府立即授意各报广泛转载，把这场"臭张"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些年来，大陆多家报刊一再发表文章，替从未见过一面的张学良和胡蝶洗涮冤枉。《民国春秋》杂志1990年第2期就刊载过《马君武的打油诗和胡蝶的辟谣启事》一文。可去年台湾出版的《时代杂志》第65号发表署名士居国慧的文章，题为《冯庸先生接芳驾翩翩胡蝶入京来：胡蝶与张学良共舞之谜》。该文一口咬定，少帅确与胡蝶共舞，而且其中说到的几位历史见证人均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儿。

可叹人言可畏。谣传重复一百遍就成了事实。

为此，少帅当年不无神伤地说："中国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一天呢？"

4."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主要是组织指挥在北平，运筹帷幄于千里，而没有轰轰烈烈地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在蒋介石不抵抗军令的高压下，张学良这种不代表中国官方的民间的对日抵抗，大多是半秘密或秘密进行的。其内情逐渐被当年的战乱和流逝的岁月所淹没，变得鲜为人知。不少人不去认真全面地研究东北沦陷根本的主要原因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而被夸大歪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张学良部分执行不抵抗主义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形成各种历史偏见。

其实，热河失守，张学良于1933年3月11日发表的下野通电中已经说清楚了："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作出了最后的牺牲。"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

张学良此文通篇只字未提自己不抵抗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字里行间充溢着虽尽了力，却无可奈何，有苦难言的沮丧之情。

但是，对这段历史，却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正如1932年10月出版的《九·一八周年痛史》一书中对张学良亲自领导，大力支持的由马占山直接指挥的江桥抗战的正确评价："沙塞孤军，苦战半月，开我国反日民族战争之先声，振全国抗日救国之精神，所关甚大，虽败犹荣。"

"九·一八"事变四年后的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在《红军愿意向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盛赞："东北军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这段抗日的光荣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别人，正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及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

在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联合政府》中作出定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这是对"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军领导东北军民局部抗击日军的英勇斗争的公正肯定和历史评价。

（鲁汲胜）

风云人物

罗章龙

罗章龙(1896——) 原名罗璈阶,曾用名章龙、文虎、沦海。湖南浏阳人。1912年至1917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1918年春加入新民学会。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经济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五四运动行动小组的成员之一。1920年参加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大学的负责人。1921年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曾参加领导1922年的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和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24年作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事,同时在上海中共中央主持工委工作。1925年1月出席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北伐军进至武汉以后,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兼汉口市委书记。1927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搞工运工作,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曾出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副秘书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此后,坚持搞分裂活动。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校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授,写了《计划经济原理》等著作。1979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刘伯坚

刘伯坚(1895——1935),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指挥员之一。原名永福,曾用过刘永固、刘铸、刘铁侠、毅伯等别名。四川平昌人。早年曾在家乡的金山寨高等小学、巴中县立中学、万县川东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等校学习。1920年6月,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半工半读。1921年,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开展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他还参加了李立三、赵世炎等组织的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等革命团体。

1922年6月,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成立。刘伯坚作为比利时先进青年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1923年2月,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书记,刘伯坚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欧支部比利时党组织的负责人。8月,他和熊昧根一起介绍聂荣臻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初,又和赵世炎一起介绍聂荣臻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曾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1926年3月,在军阀混战中失败的冯玉祥通电下野,取道乌兰巴托赴苏联考察。当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部任职的刘伯坚曾多次与之交谈,促使其明徬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表示愿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冯玉祥请求第三国际派刘伯坚和他一起回国重整旗鼓。经第三国际同意,他们俩人遂于1926年8月离苏回国。9月16日,抵达五原县(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17日,举行誓师大会,参加国民革命。刘伯坚作了演讲。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此后,他把党派来的刘志丹、宣侠父、安子文等人安排在国民军联军内做政治工作。协助他大力进行联军的改造工作,使濒于瓦解的旧西北军变成了较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使党在西北军广大官兵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跟着右转。他解除了刘伯坚的职务,押送出第二集团军(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冯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刘伯坚便到了上海。1928年,党又派他到苏联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同年6月,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0年,刘伯坚从苏联回国,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1 年初，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命令原属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剿共”，进驻宁都。这支部队属冯玉祥时，曾受到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有所觉悟；入苏区后，看到苏区的巨大变化，受到教育；再加上蒋介石对杂牌军的歧视，因而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强烈不满。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领导下，他们筹划起义，并与我党取得联系。党派刘伯坚、左权、王稼祥具体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12 月 14 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宁都暴动成功，加入革命行列，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和董振堂、赵博生等一起，领导红五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 年 2 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3 月 4 日，在突围时，刘伯坚左腿中弹被俘，关押在大余县监狱。面对敌人的利诱和酷刑，他坚贞不屈。3 月 11 日，敌人押他到绥靖公署受审。在赴审的途中，他带镣挺胸，志气轩昂。回狱后写下了著名的《带镣行》一诗：“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1935 年 3 月 21 日，刘伯坚英勇就义。

赵 博 生

赵博生(1897——1933)　乳名连科，学名思溥。河北黄骅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七岁入本庄私塾读书，1914 年因家穷辍学。旋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旁听。半年后以合格成绩到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1917 年夏毕业，任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成第一师三团二连见习官。直皖战争后转到直系军中，学习无线电，担任无线电中队长。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又落入奉系军中。不久，他投入冯玉祥的国民军，由于他的德行和才能，职位逐步迁升，历任团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1926 年 9 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委任刘伯坚等为国民军联军要职。从此，赵博生获得了与共产党直接接触的机会，受到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27 年 6 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对共产党。他对此感到茫然和愤慨，表示“活一天就坚决地为工农劳苦群众奋斗一天！”1929 年，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西安城防司令。次年，蒋、冯、阎大战。他不愿继续干军阀混战的事，决心另寻革命出路。开始，他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组成“三民主义救国军”，自任军长，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随后，投奔河南吉鸿昌部。接着，受孙连仲邀请，入山东担任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但不久，二十六路军奉蒋介石命令入江西参加反革命“围剿”，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围宁都，官兵思乡厌战情绪十分强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赵博生逐渐认识到革命的出路在找到共产党。他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伯坚，未果。而这时，中共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的历史和现状，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兵运工作。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决定发展他为中共党员。1931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特支决定。他在特支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心理，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1931 年 12 月 14 日，遵照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同董振堂、季振同等一道率部起义，一万七千名官兵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接着，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毛泽东、朱德任命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后来，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率领所部同国民党军英勇作战，屡立战功。1932 年 1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级红旗勋章。

1933 年 1 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十四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牵制三倍于己的敌人。他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积极指导构筑工事，缜密布置兵力。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人多次疯狂进攻，扼守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不幸在战斗即将结束的 1 月 8 日，中弹牺牲。

董 振 堂

董振堂(1895——1937)　字绍仲。河北新河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从小在家务农，到 13 岁时才到邻村的初级小学读书。19 岁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22 岁到北京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即清河预备学校)。1919 年 12 月 1 日，毕业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开始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后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炮兵营当新兵。1920 年夏，进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学习。1922 年春，毕业分配到冯玉祥部当见习官。后任炮兵连排长、连长、炮机教导队大队长、陆炮营营长。1926 年 9 月 17 日，冯玉祥五原誓师，他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当冯玉祥部攻占郑州后，吴佩孚率残部退驻襄樊。这时，他率一个旅，以两天一夜急行军直插樊城西南的竹篌铺，迅速围歼了吴佩孚的警卫旅和他的司令部，吴本人侥幸逃脱。因这一战功，他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后任十三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29 年任第五师师

长。他生活简朴，对下级军官和士兵重义轻财，被人称为"不爱钱将军"，"傻司令"。

1930 年蒋、冯、阎混战，结果西北军失败。1931 年初，蒋介石把原西北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十三师改编为七三旅，他任旅长。随后，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围剿"红军，企图使之两败俱伤。二十六路军进入江西后，奉命参加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不仅打仗受挫，而且困守宁都，官兵思乡厌战情绪十分强烈。这时，中共在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军参谋长赵博生被批准入党。在赵博生的影响下，他决心起义。

1931 年 12 月 14 日，他同赵博生等领导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携带武器两万多件，参加工农红军。12 月 16 日，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毛泽东、朱德任命董振堂为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起义后不久，部队党组织一致讨论通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 4 月，上级党组织批准了这一决定。由于后来他和所部功勋卓著，1932 年 12 月荣获中华苏维埃红旗勋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率领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掩护中央机关撤退。

毛儿盖会议后，根据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五军团被编为左路军。这时，担任红军总政委、左路军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实行分裂主义，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董振堂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 年 6 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于是，董振堂率领红五军(1936 年 1 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第三次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历程。长征胜利后，他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6 年 10 月底，红三十军、九军、五军次年渡河西进，组成西路军。董振堂率五军担任后卫。西路军向凉州、甘州、肃州方面进发。遭到西北军阀部队围攻，损失惨重。1937 年元月，红五军在高台遭到八倍于己的敌军的大规模的进攻。1 月 20 日凌晨，高台城沦陷。董振堂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壮烈殉职。

秦邦宪

秦邦宪(1907——1946)　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无产阶级革命者。幼年在无锡上小学。十七岁在苏州省立第二技术学校中学毕业。1925 年到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因中山大学停办和王明等一起回国。12 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宣传部长。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取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4 月，秦邦宪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

1936 年 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10 月王明离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行前指定秦邦宪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1933 年 1 月正式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局总负责人。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中央总书记。自 1931 年 10 月至 1935 年 1 月，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政治上接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军事上依靠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织上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导致了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先后丢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5 年 1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揭发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他与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取消了他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后，他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5 年 7 月曾任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6 年冬，任中央组织部长。12 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937 年 2 月至 9 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等参加了和国民党的西安谈判、第二次庐山谈判、第三次南京谈判。

193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会后，设立长江局，任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此间，又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1938 年 9 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撤销长江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11 月南方局成立，任组织部长。1941 年 5 月，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在延安整风期间，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944 年 5 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成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1945 年 4 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犯错误的几个发展阶段，找出了犯错误的根源，并认真改正了错误，受到了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 年 2 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4 月 8 日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在山西黑茶山遇难。生前，精通俄文，曾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经典著作。

材料　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博古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时，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太浅，难孚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二十四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二十四岁？”

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

博古是绿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讲富有煽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博古是个热情、直率的人，是个头脑聪颖的人。

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义于“博古通今”，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

博古怎么会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他取名Боянов，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Боя”，俄文原意为“上帝”！

他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桥巷二十三号）。他的父亲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他是长子。母亲朱氏是续弦。他属“邦”字辈，弟弟叫秦邦礼，妹妹叫秦邦范。

最初，他在无锡的“秦氏公学”就学。十四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5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

这年7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

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1922年10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1923年4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共产党人。

翌年10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奉联军总司令部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

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打下了基础。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他面前。

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

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

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

就这样，彼此深深相爱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

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

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

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是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

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

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

1927年"四·一二"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

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

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

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

（选自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 又名子毅。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武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少年时家贫、好学，1913年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两年后转文科哲学门（系），1918年毕业，以成绩优秀被留校任附中教员兼教务主任至1920年。五四运动时，他积极组织武汉学生罢课和示威，协助建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和出版《学生周刊》，是武汉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1919年至1921年，先后在武昌、黄冈创办了"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并和肖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引导青年参加社会活动上，很多青年受他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曾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编委、上海大学教授。国民党改组后他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926年初，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月，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时，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课。1927年春，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主持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工作。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夏斗寅叛变革命偷袭武汉时，他率领武汉政治军事学校的学员坚决予以反击。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时他是党的前委成员之一，并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参加广州起义后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后转到香港工作。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秋，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29年6月，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由于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被扣上"机会主义"帽子。1930年4月调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

1930年5月6日，他在上海杨树浦怡和纱厂门前被怀疑而遭逮捕。7日被押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31年2月，被押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4月29日在狱中被杀害。

1950年在他殉难十九周年时，周恩来在题词中写道："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谢觉哉

谢觉哉（1884——197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司法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湖南宁乡人。别号觉斋，字焕南，笔名见心、马彬、敦夫、不平、古公、闲闲、飞飞等。早年在宁乡"小金陀馆"读私塾；1904年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中秀才。曾随岳父学过二年中医。青少年时代，他就对家乡地主豪绅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因而被本县土豪劣绅目为大逆不道。为寻求新知识，探索改造社会之路，他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考入湖南省立商专。环境的改变，使他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视野更加广阔。1913年夏商专毕业后，在宁乡云山和玉潭学校教书。

从1913年秋到1917年冬，1924年秋到1925年夏，谢觉哉两次在宁乡云山学校任教。他和姜梦周、王凌波等在该校改革教育，提倡学科学、学白话文，提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政治相结合，反对关门读死书和复古守旧，使学生毕业后就能在家庭和社会做事。谢觉哉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大革命前，云山学校的学生成绩，实为全省冠，学生参加革命的很不少。"甘泗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肖述凡（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团省委书记）等都是他的学生。宁乡早期的党团员大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其中不少后来为革命牺牲。

1920年8月，应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的邀请，谢觉哉担任《湖南通俗报》总编辑，主持该报工作，并结识了毛泽东。在谢觉哉、何叔衡等的共同努力下，《湖南通俗报》宣传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封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等进步思想，成为推动湖南新文化运动和提高湖南人民觉悟的有力工具。1921年1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

同年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了何叔衡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谢觉哉的《湖南通俗报》总编辑的职务也随之取消。

1921年秋到1925年夏，谢觉哉先后在湖南省立一师附小、宁乡甲师、宁乡云山学校任教。1925年秋到1926年夏，在中共湖南区委主办的湘江学校担任教员，并于1925年秋经何叔衡、江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创刊，谢觉哉任总编辑。该报虽名为国民党的报纸，但却"极力为共产党张目"，在揭露敌人和教育人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发行量达八千份，深受工农群众的欢迎。从1926年秋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谢觉哉历任《湖南民报》总编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省党部工人部部长、省政府代秘书长、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秘书长、特别法庭委员等职，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促进湖南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参加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1926年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谢觉哉当选为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3月，他还发表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一文，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他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湖南农民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日事变后，谢觉哉在长沙县和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的秘密机关隐蔽了半年。1927年12月，经岳州赴汉口，主编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

1928年夏，谢觉哉到达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负责编辑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和《上海报》。……在此期间，他曾写了《马夜事变的一周年》、《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湖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已死亡的国民党之五次会议》等文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歌颂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

1931年秋，谢觉哉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工农日报》主编、党校教务长等职，积极参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32年9月，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攻占，谢觉哉不幸被俘，被囚禁了一百天。后来，他寻机逃出，回到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1933年5月，谢觉哉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等老人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干部连。以坚强的毅力，徒步行军到达陕北。到陕北后，谢觉哉历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等职。积极参加了中央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937年7月，谢觉哉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还恢复了甘肃地区停顿多年的党组织，成立了甘肃工委。1939年9月以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参与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领导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选举。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中国法政大学校长，积极从事法律研究，主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大力培养法律人才，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长，195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对建立和健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对我国的法制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6月，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 学名瞻岵，字玉衡。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十二岁上私塾，在思想比较进步的塾师姜方谷的影响下，开始萌发忧国忧民的思想。

1902年，考中秀才。1909年春，应聘到云山高等小学任教。

1912年春，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期间结识了在一师就读的毛泽东。1914年毕业后，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1915年，受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经常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进步问题。1918年4月，成立了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11月学会改选，被选为执行委员长。后来，该会内部在"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组织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反对温和革命。同年底，与毛泽东一起开展声势浩大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并在斗争中逐步由信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参加湖南共产主义小组。9月，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了文化书社及俄罗斯研究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介绍任弼时、肖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学习。这时，受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派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以此合法身份，与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等人一同编辑《湖南通俗报》，揭露旧制度腐败，宣传新思想必胜。1921年6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

名撤职，报纸也被勒令停办。

1921 年 7 月，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长沙参与创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组织委员。1921 年 8 月，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自修大学，主持校务。1923 年 11 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又立即开办了湘江学校，担任校长，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1924 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参加了重建湖南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二届执监委员。1927 年 4 月，还被选为中国救济总会执行委员兼财务委员。马日事变后到上海，与谢觉哉、徐特立、毛泽民等一道筹办了中共的聚成印刷公司，担任经理。同时任上海互济会书记。在工作中，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28 年，去苏联学习，6 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 月，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已年过半百，但仍刻苦学习。1930 年 7 月回国后，为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1931 年 8 月，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1 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最高法院院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他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肃反政策。因不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而受到批判和迫害。1933 年冬，被撤销中共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他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 1 月，中共决定他与瞿秋白等人转移到白区去。其时年近六十，且疾病缠身，但仍以顽强的意志跟着大家爬山涉水。2 月 24 日凌晨，当行至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时，被敌人突然包围，在突围中被敌人杀害。

材料一　红都法官

1931 年冬，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衡从上海转入中央苏区。1931 年 11 月，他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不久，他又兼任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班主任、代理内务部长、最高法庭主席等等。面对一个个重大任务压过来，何叔衡二话不说，都一一愉快地接受下来。他说，有毛泽东领导，担子再重也能干好。

办事认真

何叔衡身上随时背着三件宝。哪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他的布袋子是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袋子中分成几个小袋子叫做"袋中袋"，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中间一个较大的是放实物的。如从某仓库里抓来的一把霉烂变质的谷子。有一次，他还偷偷地将毛泽东穿过的一双补钉加补钉的线袜塞进了袋子里。他的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他说，人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这三件宝伴随着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户，一路下来，回到瑞金，他的布袋子就满满的，好的差的都有，人证物证齐全，检察工作、司法工作、内务工作、干部教育情况"一锅端"，条理清楚，杂而不乱。

在这众多的工作中，何叔衡对工农检察工作是特别细心和重视的。在中央工农检察部成立不久，他就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他说，检察要从各级领导干部检察起，检察领导要从上层领导检察起。会后，他就背上他的三件宝出发了。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功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通过汇总整理，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

1932 年 2 月 1 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有事实，有根据，使到会者不禁惊愕。他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这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以后，何叔衡又一次率领人马深入各省、县、区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何叔衡尽力进行争取教育，他用毛泽东的那双破袜子，教育干部，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他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他予以严厉打击，使苏维埃政权的威望更加提高。

执法如山

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职务的何叔衡，执法严明，裁决准确。1932 年 2 月 25 日，临时最高法庭在中央政府大会场举行第一次公审。开庭之前，何叔衡对每一个受审者的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了调查分析，尔后又征得犯罪者本人承认核准。因此，在这次公审大会上，何叔衡审问有条有理，裁决有款有据，使犯罪者口服心服，参加大会的群众也深受教育。

1932 年 5 月 24 日，中央直属县瑞金县苏裁判部送来第二十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何叔衡接过判决书一看，"……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县壬田区人，……判决：朱

多伸处以枪毙。”看到这里，何叔衡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一个瘦小干练的老人形象。何叔衡到壬田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其接触过。这位朱老头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后来又随暴动队员一起加入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为革命立过功。壬田区苏成立后，他关心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那些不称职的区苏干部进行过多次举报，对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不同看法。这一次他怎么会犯死罪呢？何叔衡背起袋子立即赶到瑞金县苏裁判部，然后又来到壬田区进行调查核实。原来，朱多伸虽有罪过，但主要是他的多次举报惹恼了一些区苏干部，他们企图报复。另外县苏裁判部的人反映，枪毙朱多伸是某某领导交代的。

何叔衡心里清楚，由于“左”倾政策的推行，加上宗派主义的影响，使乱杀错杀的情况比较严重。这次枪毙朱多伸，又是某些领导点了名的，如果“逆水行舟”，对自己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状况，何叔衡并没有丝毫动摇。他拿定主意：人民叫我当法官，我就要为人民当好这个法官，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于是，他大笔一挥，将“朱多伸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

1932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群众，联名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有严重问题。接到告发信后，何叔衡亲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发现陈景魁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任组织部长期间，利用手中的职权拉一派打一派，对上腐蚀拉拢，对流氓亲信重用，对军烈属实行打击报复，手段恶劣，民愤极大。问题查清楚后，有一些领导出来说情，并拿出“××讲了不能杀陈部长”的话相挟。何叔衡心一横，管他呢，这样的人不枪毙，人民不答应。何叔衡硬是将陈景魁依法逮捕，经过公审后执行枪决，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果然不出所料，何叔衡一次次“不听话”的行为，激怒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1933年底，何叔衡遭到接二连三的批判和打击。1934年初，他担负的全部领导职务都被撤消了。

离情别绪

刚来瑞金不久的谢觉哉得知何叔衡被撤职的消息后，曾多次试图向毛泽东打探其中的缘故。第一次问，毛泽东没有吭声；第二次问，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第三次谢觉哉直截了当地问：“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毛泽东仍然一声不吭，并躬着背缓步走开了，似乎怕被继续追问。谢觉哉哪里知道，毛泽东此刻心中有多大的不平。他对叔衡是最了解不过了，可是，现在他连参加会议的权力都没有，又怎能挽留得了何叔衡？为了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对许多重大问题保持沉默。

1934年9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败局已定，中央红军不得不准备战略转移。

9月中旬的一天，董必武来到叔衡的住处闲谈，何叔衡突然问起董必武：“假如红军主力转移，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

董必武回答：“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有半成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策者们”列入到留守的圈子里了。

一天，周恩来急匆匆赶到于都，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央实行转移的决定，并要他在出发之前给于都的党员干部开个会，布置一下今后的工作。

毛泽东乘机向周恩来了解被决定留守人员的名单。毛泽东没有过多的问，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被留下的很多是与他关系较为密切，受他的影响和牵连的人。

不久，毛泽东在返回瑞金时，专门去看望了何叔衡。就要离别了，毛泽东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关切地说：“叔衡，革命的路还很长，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两人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毛泽东感到叔衡的手是那样的冰冷、坚硬……

既然决定留下，何叔衡也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9月底的一天，何叔衡到集市上买了点肉、鱼，杀了一只自养的鸡，加上几样新鲜蔬菜，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为谢觉哉饯行，两位老人默默相对。他们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为分离后的前景而挂虑。什么话都讲过，又好象什么话都没有说，仅仅是三番四复地相互祝愿。临别，何叔衡将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交给谢觉哉说：“觉哉，我这两样东西你带上可能会有用，祝你一路平安。我的一切请你放心，从我投身革命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了，我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红军长征以后，根据地很快便沦陷了。1935年2月何叔衡等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突围中，何叔衡壮烈牺牲。

在红都瑞金，何叔衡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他的形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这块红色土地上的后来人。谢觉哉老人在《回忆叔衡同志》一文中曾说：“如果说叔衡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那他不仅是给人以模范，而且善于使人学习他的模范，而且很热情的希望大家赛过他的模范。”

（选自《红都记事》）

材料二　回忆父亲何叔衡在中央苏区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岗山地区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首府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庄严宣告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父亲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在政府的九个部中兼任了其中三个部的部长职务，即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代理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父亲当时已经五十五岁，是中央苏区"五老"中年龄最大的一员。三项领导职务涉及到各方面的几十项具体工作，从检察、司法到民政，到对政府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从对纵火烧山、偷税漏税及违法和反革命犯罪的处理和惩办，到对干部的教育和训练；从对行政区划的增设撤并，根据地人民婚姻、死亡、土地契约、工商业登记、拥军优属、修路搭桥、邮政传递、禁杀耕牛，到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等，无一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有一位当年和父亲在一块工作的老同志曾这样评价父亲在检察部的工作情况："工农检察部是一个大部，有七、八十个干部，经常分批轮流下到各地检察各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控告材料。每批人员下去前，何老都要详细交待下去后应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检察部是有威望的，下去的干部不能对群众发脾气，否则，就会影响群众关系，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每批下去的干部回部后，他都要亲自听汇报，干部有什么事做错了，他就指出错在哪里，今后应注意什么。何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和干部在一起时谈笑风生；他批评人，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在部里他的威望是很高的。"

在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这个职位上，父亲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高法庭主席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要执法，首先要有法律，当时世界上真正的人民革命政权还只有苏联，照搬苏联的法律当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方面，父亲和根据地其他同志一道，是做了创造性的工作的。在根据地父亲参与制订了一套人民自己的法律和条例：婚姻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优待红军条例，刑法，惩治贪污犯的决定等等。在侦破和审判方法上坚决废除肉刑，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区分首犯和协从等等。父亲运用人民的法律，审判了一批重大案件，并把这些案件在当时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公布。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苏区关于《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中，曾评价父亲和其他同志在这方面有"相当成绩"，"苏维埃法庭在群众中已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司法机关已见了雏形"。

一九三三年初，正当中央根据地人民不断取得反"围剿"重大胜利时，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迁入了苏区。他们"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同时，父亲也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等人为什么要整我们父亲？父亲和王明路线之间有什么原则分歧？最主要的就是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左"的肃反路线。

王明路线对苏区的最早影响，大概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苏区党的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的宁都会议上，他们以反对"富农路线""游击主义"为名，做出错误决定，使毛泽东同志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保留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职务（实权由"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掌握）。在父亲主管的工农检察部临时最高法庭这两条战线，毫无疑义，也受了"左"的肃反政策的支配，特别是影响到下面，使一些省县的司法机关产生宁左勿右的思想，认为多判死刑保险。当时父亲主管司法大权，而他所采取的恰恰是审慎的稳妥态度，不够杀的坚决不能杀。例如：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在审批瑞金县苏裁部第二号判决书时写道："关于朱多伸判死刑一案不能批准。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走私等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七十二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又如：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他在对江西省裁判部字第二号关于温×、余××等六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的批示中写道："余××判死刑不能批准，因余××的罪状不很明白。需把全部案卷详细报告前来才能决定"。同年十月十日，他在给会昌县苏裁部的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对于父亲这样审慎的批复，王明等人却认为："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份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替反革命份子辩护或减轻罪行"。

但事实上，父亲对真正证据确凿的反革命份子是从不心慈手软的。例如：一九三二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和群众，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有严重问题。他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发现所报非虚，随即亲自去调查了解，查出陈××是个隐藏的大恶霸地主，混入革命队伍后，又利用职权，打击陷害好人，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他毫不犹豫地排除各种阻力，将陈××依法逮捕，经过公审后实行了枪决。

王明等人对父亲敢于公开抵制他们的一套，显然不会放过。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六、七月，他们利用父亲只言

片语上的失误，无限上纲上线，开始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打击。

一九三三年七年，《斗争》周刊发表文章，提出"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父亲，说他有"十足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是小资产阶级份子在新的困难面前表示张惶失措的狂叫与胡说。"同时，说由他领导的工农检察部变成了最标准的"官僚主义机关"，而"这种官僚主义"又同他的"政治动摇不能丝毫分离"。还说父亲的观点是属于"罗明路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做斗争。"正如谢觉哉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何叔衡同志本来处理得对的案子以为不对，这种领导不可能培养好的司法作风。"

尔后，批判不断升级，甚至提出要在工农检察部组织群众的法庭来审判所谓官僚主义者。到一九三四年初，王明等人撤掉了父亲担负的全部领导职务。

对这一切，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反对的。但是，他的处境也极其困难。他当时担负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职务，实际上已经被架空。谢觉哉同志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回忆："叔衡同志被撤职时，我问：'是否须下撤职令？'毛主席举目望我一阵，不说话。我站着等回答，他忽然起身走了。'大概就这样罢'，我想。后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撤职都没下令，我也没再问……。我太钝了，竟没想到里面有那么多文章。"

面对错误的批判和撤职，父亲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但是，强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父亲是不接受的。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声明："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由于王明等人在中央苏区推行错误路线，终于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情况一天天危急起来。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父亲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依然充满信心，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没有丝毫的减少。正如谢觉哉同志所说的那样："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和坚定，是超人一等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出发前，父亲迫切希望参加。那时他和董必武同志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他这样问董老：

"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老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半新。"

但是，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长征前，在讨论决定谁去谁留的时候，尽管毛泽东同志希望瞿秋白和父亲等能一道随军出发，但是，在中央继续掌权的"左"倾领导者不同意。父亲和瞿秋白等同志被留下来了。

红军西征后，根据地沦陷，父亲和其他同志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中。李六如同志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致谢觉哉同志的信中真实地再现了父亲等同志坚持斗争的情景：

叔衡同志于三五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雩都县公馆乡一短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晚归，虽很辛苦，但他却无半点怨言。已近六十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就在该乡派他同秋白、张亮、周月林出白区时，脚上没有鞋子穿(穿一双破鞋子)，当动身的头晚来问我："六如，你有鞋子么？"话犹未了，眼眶就红而湿了。我随即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的一双灰色新胶鞋给他，他长叹一声："唉！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流下泪来。他一面说一面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秋白同志接着说了一句："事已如此，夫复何言！"

张鼎丞同志曾听邓子恢讲过，他们在福建某处渡河时，敌人追来了，何老头跑不动，邓子恢扶着他也跑不动。他怕邓一同牺牲，定要邓跑，并责邓："你快跑，莫连累了，我没办法，只有为共产党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一九三五年春天，父亲中弹牺牲于福建长汀县水口镇河边。

父亲就这样牺牲了，时年五十九岁。记得一九三一年深秋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姐妹俩(我们都在上海地下印刷厂工作)叫去，告诉我们：由于蒋介石对红军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连遭失败，国民党在白区更加疯狂地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上海环境空前险恶，党决定他去苏区。父亲还说，作共产党员，就应该不怕死，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共产党。父亲最后鼓励我们说："你们将来也有机会到苏区来的，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由于王明等人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葬送了用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根据地，父亲希望我们父女能在苏区见面的遗望当然也未能实现。上海一别竟成永决，这是多么遗憾的呀！

父亲在中央苏区所遭受的错误打击迫害和最后的不幸遇难，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悲愤。父亲的老战友董必武同志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得知父亲确已牺牲的消息时，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说："在中央苏区，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称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扫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种，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阻碍住我们，我们都随着大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苏区，落到了反革命手中，竟成了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

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耻辱的柱子上。”

谢觉哉同志这样回忆父亲：

“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险震憾、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毛泽东同志又说过：‘何胡子是感情一堆。’不是一堆骨和肉，而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实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徐特立同志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到头绪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我们政治上总跟他走的。

“叔衡同志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他的诲人，似乎摆着正经面孔而又不摆着正经面孔，似乎他向你请益，而实则你就在他的陶熔中。

“如果说叔衡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那他不仅仅是给人以模范，而且善于使人学习他的模范，而且很热忱地希望人家赛过他的模范。”

熊瑾玎同志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曾发表了一首怀念父亲的诗：

蜀道怀亡友，无时不叔衡。
新民倡学会，通俗放贤声。
阶级成仇憾，船山作斗争。
可怜闽北去，壮烈被牺牲。

值此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之日，仅撰此文，遥祭父亲在天之灵。

（选自《中华英烈》86 年 3 期，
作者：何实山，何实嗣）

邓 演 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 年 3 月 1 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先世务农，兼做船夫。父亲邓镜仁是个秀才，在惠阳县城教书。邓演达幼年随父学习，1909 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是年级中最小的学生，他的勇敢引起了老师邓铿的注意。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以陆小学生参加了姚雨平的革命军。1914 年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1916 年升入保定军校。在这里，他除学习军事外，并研讨社会科学。1919 年军校毕业后，被派往西北边防军见习。这时，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援闽粤军，作为国民党基本武装力量，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1920 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到福建漳州，统率宪兵。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

同年夏，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旧桂系。11 月，粤军第一师在广州成立，邓铿任师长，邓演达任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随后又调任工兵营长。1922 年 3 月，邓铿被暗杀。5 月，孙中山调第一师参加北伐，他拥护北伐主张，并从中进行了策动，使部队得以迅速出动。北伐军经始兴、南雄向北推进，他指挥的工兵营勇敢作战，首先进入赣州。6 月，陈炯明所部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调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在向信丰途中，一师上层分子发生动摇，邓演达表示拥护孙中山到底。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后，邓由一师革命军官推派，秘密到上海会见他，请示以后行动计划。12 月，孙中山调广西的滇桂军东下，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各部，在西江策应，配合滇桂军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 年 2 月，第一师工兵营扩充为第三团，邓升任团长。他率领三团参加了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随后被派负责大本营警卫工作。

1924 年 1 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拥护者。国共合作后，他是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的七人筹委之一。5 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在军校初创阶段，他积极工作，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训练，受到学生的拥护。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是蒋介石的心腹，对邓演达进行排挤。1925 年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在那里，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结识了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地发展起来。邓演达生长于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对农民革命运动显示出来的力量也有所领悟，因此，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能够采取赞助与支持的态度。邓演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问题解决了，即解决中国问题百分之八十。在北伐途中，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努力调查沿途的农民生活状况及土地分配情形，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支援北伐。占领武昌的第二天，他就把政治部的工作转向农民运动方面。1927 年初，他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目前的农民运动，不过是民主主义的初期表现，农民自然要进一步和工人联合，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联合，把目前的盘剥的社会秩序推翻，造成新的社会。”他还指出，“农民问题是我们的量尺”，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

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便是反革命。”

3月10日，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由于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此外，他还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负责人。

邓演达在农民部长任内，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当国民党右派叫嚷“农民运动过火”，肆意攻击农民运动时，他对农民运动仍然表示支持。他主张农民要有武器。

1927年4月下旬，武汉政府为了击退张作霖的奉军从北面来的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邓演达随第四军出发。5月末，在河南临颍大战中，他亲临前线，往来于炮火中，与士兵同战斗，博得军士的爱戴。临颍之战击溃了奉军主力，接着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混进武汉政府中的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革命会议后，形势进一步恶化，邓演达在愤怒和忧虑中从河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已处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产生的恶果，反动派的气焰嚣张，武汉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也迅速转向公开反对革命，准备和南京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合流。邓演达看到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大革命已面临无可挽救的失败，6月30日，他写了一篇《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对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行径进行谴责，随后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查电线杆工人，沿平汉路步行到郑州，转到陕西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汽车队，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

同年11月1日，他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指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虽然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他们提出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随后他往欧洲去游历考察。

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创办了《革命行动》月刊，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为总干事。随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寻找出第三条道路来。邓演达标榜要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其实是幻想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人们称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

1930年夏秋间，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起来反蒋。同时，他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军事集团如杨虎城、冯玉祥、阎锡山等，也有联系，企图与他们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进行军事投机。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他与陈铭枢、蔡元培等商定，利用蒋介石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的机会，准备在军队开进广东后，急入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等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分裂的办法，建立第三种势力和第三种政权。

邓演达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忌恨，特别是他的军事策划被蒋察觉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即四处搜捕他，必欲置之死地。1931年8月19日，行动委员会各地受训干部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结业式。邓演达出席了这一结业典礼，由于叛徒告密被逮捕，并被解送南京关押。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省长春县人，生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家贫，父名玉琨，当长工，赶大车。石友三年少时，经人介绍到长春一家粮店当徒弟，后进当地小学读书。其时，商震在该校当教员。1908年，石因家庭生活困难，弃学从军，投到驻在长春的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当兵。1912年春，在北京改投左路备补军冯玉祥营当马夫。1914年冯玉祥入陕，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见石机灵敏捷，颇为赏识，提为贴身护兵。此后石升迁很快，1919年升任模范连连长，不久升营长，与韩复榘同为下级军官中“十三太保”之一。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石由团长升任国民军一军第八混成旅旅长。1925年春，又升任第六师师长。1926年5月，当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大战时，阎锡山出兵抄袭国民军后路，石友三、韩复榘等奉令率部往晋北。石在雁门、左云一带同晋军作战，很卖力气。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败，向绥远等地撤退，时雁北国民军受前后夹击，军心离散，石、韩等乃与晋军将领商震联系，接受晋军收编。

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到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颜淖尔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召石归来，石深怀疑虑，经冯派人解释，石才率部回到冯处，被冯任命为援陕第五路军总指挥。1927年5月，冯玉祥由潼关出师攻豫援鄂，任石为北路援军副总指挥。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石任第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进占郑州。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石率部在山东鱼台大败孙传芳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石密派其秘书长刘郁周到徐州

谒蒋，蒋赠以巨款。1928 年"北伐"结束后，经过"编遣会议"，石部缩编为第二十四师，石任师长，驻防河南南阳地区。

1929 年 3 月，蒋桂战争爆发时，冯玉祥令石友三部进驻襄樊，暂持观望态度。4 月，桂系失败，冯电促石友三率部急向武汉挺进。蒋介石立即电石停止进兵，并派人携款赴襄樊，借劳军之名，再次对石进行收买。蒋邀石到武汉见面，石怕冯见疑，不敢亲往，派其亲信副官李志明密赴汉口见蒋。

1929 年 5 月，冯玉祥策划反蒋。5 月 22 日，韩复榘在洛阳发出"养"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把石友三的名也列在通电上。石与韩的叛冯投蒋，是早有默契的，因为他们对冯都怀疑惧，又都受蒋收买。蒋介石见韩、石通电喜出望外，立委石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即率部到郑州与韩会合，共同投蒋。7 月，蒋介石委石友三为河南省政府委员。10 月安徽主席出缺，蒋改委石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0 月下旬，石率部进入安徽境内，尚未就职，蒋介石又以广东地盘相许，命石南下，去和广州方面的李宗仁、陈济棠作战。这时，驻河南的唐生智和广州方面先后派人向石游说反蒋。他们都向石说，蒋可能趁他南下途中，把他的部队分割消灭。石很相信这个分析。1929 年 12 月初，他率部到浦口后，突然与蒋决裂，以大炮轰击南京；蒋事先毫无准备，于是南京城内乱成一团。石于炮轰南京后，自知终无法敌蒋，赶紧率部从浦口北撤，退入河南商丘，时韩驻兵河南，得韩复榘的帮助，暂驻豫北新乡一带。

1930 年春，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逐渐成熟。冯事先派人与石疏通前嫌，阎又许以山东省地盘，要石采取一致行动。石既已得罪了蒋，乃又与冯、阎携手。并与韩密约，暂时各投一方，以便于胜负决定之后，互相提携。4 月 2 日，石在新乡就任阎、冯加委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接着宣布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派秦建斌暂时代理。5 月至 8 月，石随冯、阎在中原地区与蒋方大战。8 月中旬，晋军溃退，济南失守。石探知张学良即将派兵入关帮助蒋介石，时局将急转直下，即放弃阵地从前线撤兵，并电张学良，"服从东北，愿效前驱"。9 月 18 日，张学良"拥蒋"通电发出后，石立即通电响应。当石擅自撤兵时，陇海线上，蒋、冯双方尚处于胶着状态，石的行动，给冯军以重大打击。10 月，大战结束，石退据河北与河南之间，收集了一部分溃散的晋军和大批物资，实力反而加大。经张学良、韩复榘从中斡旋，蒋介石复任石友三为十三路总指挥，受张学良节制，驻顺德(今邢台)。

1931 年 5 月，汪精卫、李宗仁等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集中广州，促成粤、桂合作，在广州另组成"国民政府"，再与蒋介石集团相对抗。粤桂方面派李汉魂到顺德与石友三联络，许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联合反蒋。此前，石曾到沈阳谒张，张以优礼相待，但石好猜疑，反疑张将不利于自己。他还认为东北军将骄兵惰，不值一击。待返回顺德，得到广州方面许给的条件后，他经过一番布置，于 7 月 18 日在顺德就任广州政府所委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决定先行北指，把东北军逐回关外，然后挥兵南下。但东北军在于学忠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把石部诱至保定附近，然后反击；同时南京方面，也派刘峙率军北来。在东北军和蒋军南北夹攻下，不到半个月，石部六万余人，全军覆灭。8 月初，石逃往德州。后寄居济南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内。

1932 年秋，石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潜往天津，与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并勾结土匪、汉奸，组织伪军，在冀东一带活动。1933 年 8 月，被国民党华北当局改编为河北战区保安队，驻扎冀东玉田一带。1936 年 1 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委石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哲元将石部扩编为一八一师，石任师长，隶属宋之第一集团军，随宋军逐步南撤，辗转于冀、鲁边境。他收集了些散兵和各地自发的游击队，于 1938 年 2 月，扩编为六十九军，得任军长。5 月，徐州撤守后，石部进入沂蒙山区，又扩编为第十军团，石任军团长。

石生平反复无常，又嗜杀人，动辄把人活埋，因得"倒戈将军"绰号，又称"石阎王"。抗战初期，为了发展势力，他还一度表示进步，并得到进步力量的帮助。但到 1938 年武汉失守后，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投降活动。他于 12 月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遂专门进攻八路军。1939 年初，石率部由山东入河北，驻枣强、南宫、宁津、盐山一带。不久石部扩编为三十九集团军，石任总司令。此后，石友三伙同张荫梧、朱怀冰等不断向八路军冀南部队寻衅，逮捕、活埋八路军政治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偷袭八路军部队。石又经常密派其弟石友信等前往北平、天津、开封等地与日寇进行勾结。为了制止石友三的投降活动并打击其反共气焰，1940 年 2 月间，八路军冀南部队在山东馆陶下坡寺将石部包围，予以沉重打击。石率残部逃至濮阳。3 月下旬，又移驻山东曹县。6 月初，石派石友信和参议黄广源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了所谓"防共协定"。7 月初，石部遵照日军命令，回驻濮县、濮阳一带，与日军实行"联防"，专门对付八路军。不久，石又派代表向济南日军接洽投降条件。日军准备给石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名义，要石公开投降，宣布与华北伪政权合流。石的投降活动，为所部多数将领所不满。蒋、石矛盾本已很深，蒋介石早有除石之心；石部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石也有矛盾，同时，石的总参议毕广垣又为蒋介石所收买，石已处于众叛亲离之境。1940 年 12 月 1 日，高树勋、毕广垣与蒋介石派来的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共同商定，乘石前来濮县柳下屯

高军军部时，将石扣押，当夜将石活埋，第二天又将石友信杀死。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马 占 山

陈宁生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省丰润县。1885年11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辽宁省怀德县（今属吉林）。父亲务农，家境贫寒，马占山稍长，即为地主放马。1903年，因放牧时丢失地主家的一匹马，被迫逃亡在外，沦为胡匪。他好骑射，娴于枪法。后为官军收编。1905年怀德县衙门游击委为哨官。

1911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充任四营中哨哨长。1913年，吴部改为中央骑兵第二旅，马充任三团二连连长。1918年，因剿匪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赴黑龙江省，升任骑兵团长，驻防黑省东部。1925年，升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吴俊升被日军炸毙。17日，张学良任命第八军军长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不久，马被任命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长。同年冬马占山改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10月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吉两省，进而侵入黑龙江。日军以大批军械武装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唆使他进攻齐齐哈尔。此时，担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万福麟正在北平，当地群龙无首，人心慌乱，形势危急。万福麟为了卸却责任，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10月10日任命正式发布。13日，张海鹏派其少将徐景隆率伪军三个团沿洮昂（洮南至昂昂溪）路向江桥（嫩江铁桥）进犯。16日拂晓，进抵江桥南端，当即遭到军署卫队团徐宝珍部的坚决阻击，伪军被击溃，徐景隆被击毙。日军利用张海鹏部进窥黑龙江的企图受挫。

19日，马占山经由哈尔滨抵达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职。在爱国军民抗日热情的鼓励下，马占山当众宣称："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并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亲自视察防地，进行布防，准备抵御敌人的袭击。此时，以劣绅赵仲仁为代表的亲日派企图劝马向日军投降，迎张海鹏入省。马坚决拒绝，并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

27日，日本关东军以所谓洮昂路系用满铁借款修筑，日方负有护桥责任为借口，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并保证日方修桥人员的安全，当即遭到马占山的拒绝。

11月4日晨，在七架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千三百余名以保护修桥为名，直趋江桥我军驻地大兴站，驱赶我方修桥人员，迫令守军后撤，并强行抓去我方哨兵三名。是日午间，又悍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抵抗，我方将士立即英勇战斗，迅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也是中国军队不顾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奋起抗战的先声。

江桥首战告捷后，士气大振，马占山当即赶赴前线犒赏官兵，阵地上同仇敌忾，守土卫国的气氛十分热烈。

由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在一群汉奸、卖国贼的怂恿下，幻想以妥协投降求得苟安。1932年2月28日马重返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长。3月8日，赴长春迎接溥仪。9日，参加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并当了伪满的军政部长。

马占山的背叛行为激怒了全国民众，爱国群众团体纷纷向马索还捐款；上海烟商愤怒地停止出售"马占山牌"香烟；他的部属中坚决抗日的军官如苑崇谷、金奎壁、徐宝珍等均不辞而去；黑河驻军、马占山的卫队和学生军等甚至抄了他的家。其实，日本侵略者也只不过视马占山为傀儡，对其防范甚严，控制很紧。在马占山就任伪省长的次日，日方即发出公函，要求马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作主；凡是重要法令、规章制度、用人、预算等等事项，必须取得日本顾问同意始能实行。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方进而要求各省设立之总务、警备两厅长必须由日本人充任。马对这些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迟迟不予照办。为此，日本顾问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马占山甚感日本主子咄咄逼人，难以自存。同时，日方还要求编遣他的军队；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在江桥抗战时所领军费和所得捐款的下落。马占山处此名誉、地位、权力、财产均将失去的境况下，疑惧交织，惶惑不安，遂起反正之心。适在此时，张学良派前黑龙江省税捐局长韩立如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并许仍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遂下决心挣脱日方羁绊。3月底，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到东北的时机，一面向调查团揭露伪满内幕，暴露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嘴脸；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准备再战。4月1日，他带领亲信随从二百余人离齐齐哈尔。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再揭抗日旗帜。

马占山随即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设总司令部于哈尔滨，自称总司令；又传令各县组织义勇军，集中于黑龙江东部各县，配合作战。初期，抗日联合军转战于黑、吉北部铁路线

上，与日伪军相周旋，虽间或取得小胜，但由于指挥不统一，力量分散，不能有效地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7月中旬被迫离开铁路沿线，退入山林作战。28日，马占山率部至庆城罗圈店南森林附近，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时被日军射杀，血肉模糊，日军误认为马之尸体，立即拍照登报，大肆宣传。马于混战中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奔入大山，辗转四十余日，至9月9日始出山至龙门。接着奔赴讷河，设立义勇军总指导部，筹组三路义勇军围攻省城。10月20日，马占山发出总攻命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各路义勇军终因势单力弱，于11月28日退至拜泉。12月1日撤离拜泉。4日，苏炳文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7日，马占山亦相继退入苏境。

1938年初，敌伪拟在东胜成立自治政府，于3月初分三路包围挺进军。马占山亲率所部，以夜袭方式于16日进占河口镇。又于17日晚克复托克托县城，乘胜击退三路来犯之敌。4月1日，马部由高隆渡口渡河，进至绥北敌之后方。中旬，敌伪军将挺进军四面包围于大青山，鏖战七、八昼夜。20日夜，马部突围至固阳黄油干子。22日与敌遭遇，骑六师师长刘桂五阵亡。马占山率余部转至安北。5月中旬，总部移至陕西府谷县哈拉寨镇。

马占山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委曾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东北大学学生参加挺进军。共产党员邹大鹏任挺进军司令部中校军械官，栗又文任上校秘书主任。他们帮助马占山抵制国民党特务刘广英制造的反共磨擦罪恶活动。

1940年5月3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命令改组辽、吉、黑、热四省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41年8月4日，黑龙江省政府在陕西榆林成立。此后，马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进行抗日复土活动。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马占山被任为委员。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两个骑兵旅在楚溪春统率下为蒋介石死守大同，并于9月21日突围至得胜堡与傅作义部会师，接着又进攻张家口。9月23日，马占山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公开表示将他的两个骑兵旅交由傅作义指挥。

国民党为了利用马占山收编胡匪，扰乱东北解放区，又任命马为松北挺进军司令，但马长期避居北平未去长春就职。军统特务机关借用马的名义滥发委任状，收编胡匪，进行所谓策反活动。

1948年底，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形势下，马占山认识到和平解放北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为此进行工作。北平中共地下党通过马占山，邀请邓宝珊来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1949年1月上旬，马、邓、傅三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号召，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11月20日，因患肺癌去世。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淮安。自幼入塾读书，15岁中秀才。早年与他人合作，在上海创办农学社和东文学社，从事搜集翻译国外农学著述。学生中有王国维，才学出众，罗非常欣赏，与之结下终生之交。罗、王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物收藏家和研究者。但是，他在政治上极其保守，先是反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成为清室的亡命遗臣。“九·一八”事变后，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成为著名的汉奸。

1906年春，罗振玉被调入京，在学部充二等咨议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在此期间，他曾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并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古文物。这些文物史料后来有相当部分成为他的私有之物。宣统年间，他又大力搜购安阳出土的甲骨，先后得三万余片，从而确立了他日后从事考古研究的基础。1912年12月，罗振玉同当时也在学部做官的王国维携眷逃往日本京都，直至1919年春才回归故国。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利用大量收藏，先后著录成《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殷墟书契菁华》等书。又在王国维协助下，撰成《殷墟书契考释》与《流沙坠简考释》。罗早年即留心于古器物的鉴别，一生从未间断。可见，他为中国古文字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每收购一批文物，经过考校之后便卖掉，然后再买一批，如此反复，又对古文物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正如鲁迅所说，他“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

罗振玉与日本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98年创办东文学社时期。当时，他延请日人藤田丰八等在社中任教。1901年，他又由刘坤一和张之洞奏派去日本考察教育，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小村寿太郎、长冈护美等交往甚密。长冈向他提出劝诱清政府在东北另立“满洲帝国”的计划，企图分裂中国领土。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罗在归国后密招近卫笃磨来华为此事奔走。

1924年11月，清室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时任清室善后委员的罗振玉见此情景，痛不欲生。据他自己说，曾“欲投御河自沉”，但觉“不可徒死”，未行。他因此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和陈宝琛等策划，将废帝溥仪从醇王府护送到日本使馆，又由日本大使庇护送至天津日租界，

居"张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认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已到。他对日本军部说："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办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治民望。"此计为日本军部赏识，他便大肆活动，频频奔走于东北汉奸与日人之间，为分裂中国制造伪满洲国卖力。是年11月日本武装士兵护侍溥仪偷离天津到东北。罗振玉本想溥仪一到东北就重新登上皇帝宝座，自己则以"开国重臣"位居显要。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决定暂不行帝制，迫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任罗振玉为参议府参议，罗消极不就职。1934年3月，溥仪"登基"，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罗振玉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1937年6月，罗振玉退休，1940年6月19日去世。

（摘自《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

珍 闻 轶 事

抗日第一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使辽宁和吉林二省兵不血刃地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咄咄逼人的日寇又进图黑龙江，只是因为黑龙江与苏联接壤，距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较远，不得不有所顾忌。

此时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已经叛变，日寇拟假手张海鹏占领黑龙江。于是，为张逆提供大批枪支弹药，支持其宣布"独立"，并秘密策划进袭黑龙江。

消息传到省城齐齐哈尔，全城大为震惊。当时的省主席万福麟远避北平，一时群龙无首，秩序混乱，省军政两署也莫衷一是。

张学良设在北平的行营根据黑龙江省请示，先电令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代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总指挥；后又电令："如张海鹏进犯图黑，应予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

张逆海鹏迫不及待，趁马占山上任前，于10月13日至15日派少将徐景隆带三个团进攻江桥。江桥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嫩江之上，是通往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我驻防守军英勇还击，徐景隆触我地雷而亡，进攻之敌败溃。为防止敌军再犯，守军把江桥破坏三孔。与此同时，张逆亲率部分伪军欲从泰安镇方面攻击省城，又遭我省卫团徐宝珍部的迎头痛击而败逃。日寇对张逆海鹏的无能十分不满，靠其夺取黑龙江已无望，图穷匕首见，决意亲自出马，加紧进犯步骤，企图趁马占山刚上任立足不稳之机，一举侵占黑龙江省。

马占山受命于危难之中，他虽知省内兵力单薄，武器不精，但国难当头，不能退缩。"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10月20日马占山在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官典礼上强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即维持地方治安，望各位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其事，各尽其职。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在会上当即发表朴炳珊为省城齐齐哈尔警备司令，并分别通电各方。

马占山刚举行完就职典礼，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和领事清水突然求见，说是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要求马占山将黑龙江省政权和平让与张海鹏，被马占山斥之而去。本庄又致书说："考察现之时局，为欲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其唯一方法为马主席即行下野，同时江省政府交与张海鹏，双方应于和平中行使政权之受授，此外决无良策。"张海鹏还无耻地托本庄代说，愿出美金500万元请马出国游历。对日寇的无理要求及张逆的卑鄙行径，马占山极为愤慨，断然拒绝，并说："马占山决不能出卖黑龙江。你回去告诉本庄，他如想得黑龙江，可拿血来换，不要看不起中国人，拿钱来迷惑我。"

马占山到职后所采取的坚决抗日措施和断然拒绝日寇多次提出的无理要求，使日寇极为恼火。于是赤膊上阵，进行一系列露骨的挑衅：10月26日，日军借口"匪患"进占我四洮铁路全线；次日，又向我方提出限期恢复洮昂路嫩江桥的蛮横要求；11月2日，竟以"代"我修桥名义致我最后通谍，无理要我军撤退至距桥梁10公里以外，否则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同时，日军派铁甲车3列，载重炮两门及日军一小队由洮昂路向江桥进发。

面对日寇多次挑衅，马占山召集党、政、军、绅、商各界，共商应敌措施。会上以参谋长谢珂为代表主张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而劣绅赵作仁、李维周等人却认为"黑省库空如洗，兵无利器，为顾全地方，和平应付……"，主张撤出阵地。马占山听到此投降言论，不禁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厉声说道："我为一省之长，守土有责，决不能将寸土尺地让予敌人……""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马还说："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请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

罪。"马占山话音刚落，卫队团长徐宝珍立即站起，拔出手枪，大声喝道："谁再敢说降，就杀了谁。"至此投降论者再不敢发言。最后会议决定：断然拒绝敌寇无理要求，严阵以待，抵御敌人的入侵。

11月3日，日军通谍的"期限"一到，上午11时果然有日寇两列铁甲车开到江桥，在5架飞机掩护下，30余名士兵武装抢修桥梁。此时我军仍十分克制，为避免冲突，拟将防守江桥的部队撤退到大兴站驻防地。但是，正当我军撤退时，飞机突然向我阵地投掷炸弹，当即伤我士兵9名。当日天黑时，日军百余名渡过江桥（破坏处已用木材垫好）向我阵地射击，又用飞机投弹，再伤我士兵7名。我守军一忍再忍，未与抵抗，日军方退去。

11月4日拂晓，日本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和书记官早崎，会同我方驻军负责中间指挥部责任的石兰斌及省府秘书张林业等，到江桥前线视察，商定各自训诫自己的士兵严守纪律，避免冲突。谁知正当石兰斌讲话之际，林义秀竟然迫石签字承认将驻军撤退，并要石立即下令。石说，他仅为第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正在争执中，日军突然进入我防地捕去我哨兵3名，再三交涉，不予放回。接着数百名日军渡江，在5架飞机轰炸的配合下向我驻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我守军悲愤填膺，实在忍无可忍，在马占山指令下实行正当自卫，给予还击，日寇乃退。下午6时，日寇又以飞机7架为掩护，派兵四千，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大炮的配合下，对我守军驻地大兴站发动全面攻击。至此，全面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

从11日4日到7日，为江桥抗战的第一阶段。守军全体将士在马占山的亲自指挥下，斗志旺盛，视死如归，与敌争夺，寸土不让。虽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却能屡屡挫败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11月4日，当四千敌军，以飞机7架、山炮数10门、铁甲车4列为掩护，气势汹汹向我阵地蜂拥而至时，守军卫队团徐宝珍部遵照马占山"设井擒虎"的战术，沉着注视敌人进入我有效射程内，齐起猛攻，使敌人的锐气顿挫，然后乘机全线出击，冲至敌人队内，展开白刃战，短兵相接，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和铁甲车都难以发挥作用。敌人被迫向江桥溃退，我勇猛围歼追击，使敌人遗尸遍野。

是日晚，不甘心失败的敌军又以重炮向我守军阵地猛轰，并用探照灯侦察嫩江北岸，掩护其百余只船的偷袭。等敌船将靠近岸时，我伏在北岸芦苇塘中的守军突然集中火力扫射，敌死伤及落船者不计其数，余者狼狈逃回南岸。

每当战况危急时，马占山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士气受到异常鼓舞。5日拂晓，8000多敌人在20架飞机、100多门大炮的猛烈轰击的配合下，强行渡江。我江岸守军顽强抵抗，虽毙敌甚多，但终因敌众我寡，我守军阵地被突破。正在这万分危急时，苏炳文部与吴松林部各一个团赶来增援。马占山乘车冒着3架飞机的追击赶到前线，进入正在厮杀的阵地。他一面指挥正面部队进行反攻，一面调动骑兵自两翼包围，血战至傍晚，敌人开始溃退。我一直追击至江岸，敌遗尸700余具南逃，我亦伤亡200余人。

11月6日战斗最为激烈。凌晨约4时，敌近万人冲过江桥，飞机川流不息轮番轰炸和扫射，大炮则连珠般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全体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直坚持到近午。猛烈的炮火将我阵地摧毁，将士们干脆跳出战壕与敌肉搏，敌气竭不支，抱头鼠窜。此役，死敌数百人，我方亦损失惨重。

至此，我士兵已连续作战三天三夜。马占山考虑到我大兴阵地已被摧毁，士兵又无援军替换，遂于6日午后下令守军转移阵地，将主力撤至距大兴站18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阵地进行休整。

敌军经数次大的挫败，需要增援，遂由江桥南退60里，江桥抗战第一阶段结束。

黑龙江省守军退至三间房后，趁敌人等待援军之间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敌斗争策略，并重整军队，加强防守部署。鉴于敌人增援后，敌我力量的对比更加悬殊，决定电请中央政府，火速增援，同时通电全国报告江桥战况，揭露日寇穷凶极恶的侵略面目，表明前线将士们的抗战决心。

抗战枪声唤起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特别是给东北人民以极大鼓舞。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官兵。各种慰劳会、救国团体以及援马抗日团体亦随之成立。首先行动的是东北人民和各界人士，各机关团体发起捐款，抗战物资和捐款不断送往前线。许多青年学生、农民、工人主动拿起枪杆，走向抗日战场。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侨读到江桥抗战的消息，奔走相告，握手道贺，为东北军民的不屈精神而自豪。

退至三间房的我黑龙江省守军在国内外爱国同胞的热情支持下，以"矢忠卫国"为己任，士气十分旺盛，被誉为"抗日英雄"的马占山更是信心百倍地同日寇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日方无耻地制造谣言，如说："马部与苏俄密结"，"日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等等，妄图挑起我抗日武装内部的混乱和制造国际事端。这些谣言被马占山一一戳穿后，日寇又以武力相威胁。三次通谍，胁迫马占山立即下野，军队由省垣撤退，将黑龙江省政权移交张海鹏。马占山义正辞严地痛斥日寇的无耻行径，并下令将日领馆人员一律驱逐出境。

这些正义行动，立即得到全国同胞的赞助和声援。张学良也来电嘉奖，赞誉马占山将军"亲临阵地，威声传播，中外交推"，并提升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写下《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

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规，十二金牌召不回。”

蓄谋已久要鲸吞我东北三省的日寇，待援军一到，便从11月12日起开始了更加强大的攻势。其主力为装备全新、训练有素的劲旅——多门师团，尔后又从日本本土和朝鲜调来飞机队以及两个混成旅团等。而我方虽在此役的第一阶段有大量伤亡，所能增援者仅民团一千余人，但凭我全体官兵守土抗战的决心，在马占山的率领下，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英勇善战，竭尽全力，连续挫败敌人的攻势，大量地消灭了进攻的敌人。

三间房之战以17、18两日打得最为激烈。17日，敌军已增至三万余，由多门亲任指挥，分三路向我三间房主阵地进攻。一路以长谷旅团旅顺炮兵联队攻我阵地正面，我守军为苑崇谷全部及马属三旅二团李少峰部，敌猛扑十余次均被击退，从拂晓至深夜，战事未停；一路是以朝鲜混成旅团骑兵联队攻我右翼，我守该地者为骑二旅程志远部；一路以天野旅团全部，附坦克车4辆，攻我左翼，我守军为骑一旅吴松林部刘斌、萨立布两个团，战事激烈异常，萨力布团长负伤。

战事直至18日晨2时，我防御阵地均被摧毁，敌人的坦克车冲了进来，我各团营被分割为十数处，这时敌人的骑兵又包围上来。我军不能立足壕内，只好跳出战壕同敌人肉博。敌机低空扫射，我战士则仰卧以枪还击。在此期间，涂全胜团曾奉令迂回到大兴阵地，出其不意，将敌司令部包围，击毙敌军官30余，多门亲乘汽车被我缴获。此次出奇之计，动摇了在三间房阵地的敌人。马占山率手枪队督率反攻，士气振奋，将敌击溃，乘势恢复三间房阵地。在这次血战中团长吴德林受重伤。

在夺回三间房阵地后，我军曾乘胜向大兴阵地反攻数次，但未能成功。马占山见官兵连续激战两天一夜，未得饮食，疲备不堪，伤亡奇重，不忍再做无谓牺牲，遂下令退却。

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江桥抗战虽以我军的撤退而结束，但我全体将士誓死报国，勇敢杀敌，使日冦付出了伤亡三倍于我的高昂代价。打击了日寇侵略的气焰，振奋了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写下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选自《炎黄春秋》作者：岳峨）

黄公略大义灭亲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这是毛泽东于1930年夏在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热情赞颂黄公略的著名词句。

黄公略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他从广州暴动、平江起义、转战湘鄂赣边区，直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一贯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威慑敌胆，屡建奇功。在江西老区，曾流传一个“黄军长大义灭亲”的故事，尤其感人至深。

1930年岁末，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取得龙冈大捷的胜利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南移至宜黄、南丰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做群众工作准备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龙冈丢掉了张辉瓒这个王牌师以后，如丧考妣。在加紧军事进剿准备的同时，又生一毒计，派员到江西苏区红军将领中进行策反。根据蒋的旨意，何键许封黄枚庄（黄公略的亲兄）为少将参谋，赏了1500元为招抚费，并言明事成后再赏光洋10万块，带着蒋介石致黄公略的亲笔信，前往江西苏区。

进入苏区边境后，黄枚庄被带到了红五军指挥部。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一面摆酒招待了这位“客人”，一面电告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候示。毛泽东电复：“这个问题由公略同志自己处理。”

时黄公略正在宜黄深入开展扩红、支前工作。一天深夜，接到总政委和毛泽东的电报，知道自己的大哥充当了蒋介石的说客，到苏区策反，怒不可遏，即对身边的参谋长陈奇涵说：

“黄枚庄！我们不是兄弟，是誓不两立的仇敌！蒋介石、何键这些蠢才，要招抚我吗？那是痴心妄想，办不到，永远办不到！”

陈奇涵听后，恳切地劝道：“军长，夜深了，你去休息，让我为你代笔作复吧！”

“不，这事非同小事，必须我自己来。”黄公略身披军衣，浓眉紧锁，沉思片刻，立即挥笔拟了给总前委和毛泽东的电报稿：

“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采取了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反顾，与黄枚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枚庄处以死刑，将黄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

根据黄公略的意见，黄枚庄被我处以死刑。他的脑袋，被装在煤油桶里，用石灰密封后，送回长沙。何键一见，大惊失色，慌忙让人将他入葬。

事后，红三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数千群众在宁都青塘召开了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前几天，蒋介石派黄军长的哥哥来诱降他。黄军长毫不动摇，大义灭亲，把他的反革命哥哥杀了。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我们的事业有这样的同志为之奋斗，还能不成功吗？”

1931年9月15日，红三军在向瑞金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黄公略为指挥、掩护部队隐蔽，不幸在东固的六

渡坳中弹牺牲，年仅 33 岁。次日，毛泽东在兴国莲塘主持召开了公略同志的追悼大会，朱德等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主席台两侧写着一幅挽联，高度赞扬了黄公略的一生：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尔后，中央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为纪念黄公略，以东固、富田为中心设立了公略县，将一所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在瑞金叶坪建立了公略亭。

（选自《红都记事》作者；余作流）

日本领事馆被炸之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即 9 月 21 日夜里，在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日本人经营的朝鲜银行，《哈尔滨日日新闻》社等处，均分别发现炸弹；除日本领事馆炸弹未炸外，其余都发生了剧烈爆炸。9 月 25 日夜，设在南岗的日本文化协会、日本居留民协会，又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两机关的门槛、石阶被炸坏。对此，当时哈尔滨的中外报纸都发出消息，特别是日文报纸《哈尔滨日日新闻》和日本人经营的中文报纸《大北新报》，都用显著位置发表了日本机关被炸的消息，声称这是哈尔滨的反日分子所为。

当时，哈尔滨的市民对日本在哈的机关被炸事件，无不拍手称快，认为炸得好。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在撰写文章时引用这条消息。殊不知，这是日本侵略者为占领哈尔滨制造借口，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一次所谓"反日事件"。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向东北各地发动进攻，相继占领许多城镇。唯独对哈尔滨未敢进犯。这是因为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管理中心，苏联的许多机构设在这里，哈尔滨关系到苏联方面的权益问题。当时，苏联通过一些报纸媒介，不断表明中东铁路任何地区不可侵犯。鉴于这种暗示和宣传，日本方面未敢立即采取武力占领哈尔滨。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不甘心放弃哈尔滨，于是阴谋策划出这次人为的"爆炸事件"。

9 月 19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遣原大特务、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浪人出身）和预备役中尉吉村宗吉由沈阳来到哈尔滨，立即与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密商，策划日军出兵哈尔滨的借口。于是于 21 日夜采取行动。他们把日本人装扮成中国人，待夜深人静时，分别在上述之处放了炸弹。炸弹爆炸后，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立即以哈尔滨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发电报要求关东军出兵。在他给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朗的电报里声称："……万一当地出事，我侨民因无力自卫而处境危急，，根据形势发展，必要时请求派兵，望了解上述情况，而做出适当准备，……亦望告军司令官"。接着，日本关东司令官也向本国政府发出电报。声称"哈尔滨是我在北满唯一的经济根据地，也是满铁的发展基地，哈尔滨岂可丧失。"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叫嚣。但是，当时仍未敢轻举妄动，直到探实苏联的真实立场后，才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建议利用汉奸于琛澄指挥的吉林军打头阵，发动了对哈尔滨的进犯。2 月 5 日，占领了哈尔滨。

（选自《党史纵横》92 年 4 期，作者：付尚）

毛泽东的一次战前动员讲话

1931 年夏季，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他气急败坏，在相隔仅一个月后，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并且亲自担任总司令。

中央红军闻讯后，迅速从建宁回师苏区的腹地——兴国、宁都一线集结，准备迎敌。

8 月初的一天早晨，中央红军特别训练大队的战士们奉命随三军团出征，部队已经集合完毕，正整装待发。队列前方，军旗飘扬，100 余名胸前配有"花机关"的战士更是格外显眼。"花机关"是当时红军战士对冲锋枪的别称。因为中央红军特别大队负有培训红军基层骨干的任务，因此装备较好。一个团队里集中这么多的"花机关"，这在当时红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就在这时，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缓步朝队伍走来。他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长得老长。走到队列前时，他用手掀起军旗的一角，看了看旗子上书写的部队番号，然后向迎过来的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赵品三请毛委员给部队讲几句话，毛委员很爽快地答应了。

毛委员站到一块稍高一点儿的土岗上，操着他那特有的浓重湖南口音，用缓慢而有力的声音说道：同志们！敌人这一次对苏区的进攻改变了方法，他们在江西筑了许多乌龟壳（指碉堡），想用这个办法消灭红军，占领苏区，他们对红军说：你来！你来！毛委员边讲边伸出右手向下做招手状：想引诱我们上当。可是我们不上他的当，我们说：老子不去！你来，你来，老子在这里等你！说到"你来你来"时，毛委员把手心翻过来向上，向里勾了两下，说到"老子在这里等你"时用右手食指指了指脚下的土地，幽默风趣的比喻把战士都逗乐了。然后他又继续说下去：在苏区我们有群众拥护，打起仗来有人给我们送弹药，送饭吃，挂了花又有人给治伤，行动起来有群众掩护，反动分子都被监视起来，不敢活动。敌人的情况我们了解得一清

□楚，我们的行踪敌人却一无所知，敌人到苏区来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好像掉到了井里。同志们，我们有这样好的群众条件，你们说我们能不能打赢啊？战士们齐声回答："打得赢！"这时，毛委员抬起左手开始作总结性发言，他用右手扳左手的手指，一个一个地向下按，一边说道：我们是必胜的。第一，我们有群众的支持；第二，我们有熟悉的地形好利用；第三，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第四，我们有前两次反围剿胜利的作战经验。同志们！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你们说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战士们用比上一次更大的声音齐声吼道："有！"毛委员接着大声说：对！这一仗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看见战士们个个情绪激奋，人人摩拳擦掌，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选自《纵横》94年4期，作者：赵品三）

闽浙赣苏区的文化生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苏区的文化事业，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开展得蓬蓬勃勃、有声有色。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文化设施齐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读书识字 早在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中就强调"提高贫苦儿童、成年群众和妇女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认识"。为了培养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赣东北苏区于1931年创办了红色教员养成学校，后改为列宁师范学校。学校实行免费教育，课程设有国语、算术、政治、体育、自然常识、军事训练七门学科，学制为18个月毕业。毕业生由省教育部分到县，由县派往各乡小学任教。省苏维埃所在地葛源还办有妇女职业学校和省属列宁小学。苏区各乡有列宁完小，各村有列宁劳动小学。各级列宁小学均实行免费教育。为扫除成人文盲，苏区还办有工农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岗等。列宁小学的学生担负识字岗的教学任务：凡路过识字岗的人，必须认字，不识字的要跟读，直到会认字才放行。

"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文化工作决议案"中指出："扫除文盲是目前极重要的工作。除本年上季310所工农补习夜校完全建立与健全其工作以外，下季全闽浙赣应开办400所，在今年一年中，参加工农补习夜校要达到2万人以上。识字班是识字运动的补助办法，应在各村普遍建立起来，大的村需组织30人至40人的识字班，小的村组织20人至30人的识字班，在本年参加识字班的，要达到8万人。"可见当时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省苏对识字扫盲运动是何等重视。闽浙赣省苏文化部还编印了识字课本，如工农读本1、2、3册，劳动算术1册，各种劳动小学教科书。

读报活动 闽浙赣苏区各村辟有阅报室，室内放有苏区出版的各种报刊，如《红色东北》、《工农报》、《青年实话》、《互济生活》等，供识字群众阅读。列宁小学的老师经常到阅报室为群众读报。各区、村还配有读报员，"区读报员每一期报来，应召集村读报员开联席会，解释报的内容，讨论读报的技术，并有计划的轮流检查各村读报工作。"

赣东北省1932年5月还制订了《指导群众读报条例》，条例规定："每村组织一读报会，凡是革命男女群众自十岁以上均须加入。"每村设读报委员1人，每区设读报指导员1人，每县设读报总指导员1人。村读报委员□天要参加全区读报委员会1次，回来即召集全村群众开读报会，清晰明朗地把报纸读给群众听，同时详细解释，务使群众明了报纸上所载的文章的内容。读报后，将报张贴在阅报室。对于社论等重要文章，还要结合实际组织群众讨论，如扩红支前、开展节省运动、帮助战争经费等，读报后，组织群众谈体会、表决心，并付诸行动。

壁报工作 当时在各县、乡、村和机关均开展壁报工作。"工农群众的言论，当地实际生活情形，红军的地方的斗争消息，以及工农群众、青年儿童、文艺绘画等工作"都经常搜集在壁报上披露，起着配合斗争中心内容、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省苏维埃政府还要求"区文化部每月举行全区壁报展览会，好的壁报，应用各种方法奖励之。"

唱革命歌 获得了解放的苏区人民，放开歌喉纵情歌唱在共产党、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团结一致、武装起来闹革命的伟大斗争，歌唱他们为革命"万众同一心"的坚强意志，苏区到处是一片歌声：田头地角唱，台上台下唱，会前会后唱。唱的形式有对歌、拉歌、赛歌。歌的内容有的是唱革命前的痛苦，如《妇女解放歌》、《可怜的秋香》，有的歌唱当红军的光荣，如《当兵就要当红军》、《恭喜做个红军娘》，还有歌唱苏维埃、歌唱方志敏等的歌曲。

演文明戏 早在赣东北苏区时期，省苏政府就不准演旧戏，提倡演新戏，也叫文明戏。形式一般是独幕剧、歌舞、演唱、快板等。剧本除省文化部提供外，大多是自编自演，内容是紧跟形势、配合中心。如扩大红军、扫除文盲、讲究卫生等。1931年10月，赣东北省成立后，省苏文化部成立了一个"红色新戏团"，后改为"赣东北省工农剧团"，1933年又成立了"闽浙赣省工农剧团二团"，农村、机关、学校和红军部队，普遍建有俱乐部，演员分别从列宁师范、列宁小学、机关、农村选调，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十分关心剧团和俱乐部工作，经常到剧团和俱乐部指导工作。方志敏亲自创作过四幕话剧《年关斗争》，并曾经同赣东北革命领导人邵式平、黄道等一起参加演出，博得群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剧团的活动，除参加省苏维埃政府在葛源召开的庆祝会、纪念会、祝捷会外，很大部分时间都在山区，为群众和红军战士演出，有时剧团还深入

到游击区为群众演出。当时演得较多的剧目是独幕小戏《婆媳扫盲》、《红光在前》;舞蹈《苏区红军》,小演唱《送郎当红军》,活报剧《消灭白狗子》等。

丰富多彩、形式活泼的文化生活,在闽浙赣苏区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有效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宣传了闽浙赣省委、省苏的方针政策,诸如阶级斗争的对象、方法,红军的建军宗旨、战争目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等,广大干部群众都很明确,他们读书时会读到,唱歌时会唱到,看戏时能看到,读报时能听到。当时三岁孩童都会唱"打倒土豪,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妇女同志对"送郎当红军""嫁给红军真光荣"等歌曲感到最亲切、最有感情。广大青年在革命歌曲的鼓舞下,参军参战的热情很高,闽浙赣省委、省苏所在地葛源,70%的青年都在热烈的"扩红"运动中加入红军,妇女、少年、儿童也参加了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组织起担架队、慰劳队。他们一面生产,一面协助作战,葛源成为闽浙赣省的模范区。

各种学校、识字班的开办,苏区人民有了学文化、受教育的机会,广大青少年扫除了文盲,提高了文化水平。据 1933 年 6 月 24 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第二次县教育部长及直属区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上统计,当时闽浙赣苏区共建立乡俱乐部 357 所,参加工农补习人数达 2 万人,参加识字班人数达 4 万人,列宁小学学生数达 1 万多人,固定读报者达 10 万余人。

(选自《党史月刊》,作者:黄国诚)

工农检察委员会与苏区廉政建设

1931 年 11 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何叔衡当选为工农检察人员委员,建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1934 年 2 月改称工农检察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建立是我国人民民主监察制度的最早尝试,它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政权在农村中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探寻出一条正确道路。但在农村环境中发展力量,党政机构成员的绝大部分都并非来自产业工人,加上各种制度还不健全,于是形形色色的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便在部分工作人员中滋生蔓延。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会计唐仁达,贪污各种款项合大洋 2000 余元。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挪用公款做生意。在他影响下,城市区苏三个主席九个部长,就有三个主席六个部长做投机生意。不少干部到处吃喝,万泰县苏一些区乡工作人员,在乡村中作威作福,他们无论到那里,便要群众预备酒肉供他们吃喝。为了克服和纠正苏维埃政权机构中产生的这些不良现象,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其机构中的制约机制,建立起专门的监察机关。

苏维埃监察机关的体系,是在中央、省、县、区设立工农检察委员会。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由同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站在人民的立场,正确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检举机关、企业中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它有权向同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销或处罚机关或企业的工作人员,对于违法犯罪案件,则交司法机关处理。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下设有控告局,负责接受群众对机关、企业工作人员的控告并进行调查。为了便于群众控告,在群众集中的地方设置控告箱。根据需要,又设立土地分配检察委员会、租税检察委员会等专门检察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还通过开展检举运动以及组织检察突击队来开展监察活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中说:"工农检察部应该极大的发挥它的检查一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战斗作用。"

何叔衡同志十分负责地主持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工作。"工农检察部是一个大部,有七八十个干部,经常分批轮流下到各地检察各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控告材料。各批人下去前,他都要详细交待下去后应注意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检察部是有威信的,下去的干部不能对群众发脾气,否则就会影响群众关系,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每批下去的干部回部后,他都要亲自听汇报……"(《革命回忆录》第五册,第 32 页)1932 年 9 月 27 日,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第 2 号训令,决定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军事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贪污腐化分子,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并组成临时检举委员会进行具体领导。何叔衡同志亲自处理重大案件,"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和群众,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有严重问题,他立即派干部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很大问题,随后又亲自去调查了解,查出陈××是个隐藏的大恶霸地主,混入革命队伍后又利用职权,打击陷害好人,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他毫不犹豫地排除各种阻力,将陈××依法逮捕,经公审后执行枪决。"(同上引第 35 页)1933 年 12 月 15 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 26 号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规定处理:贪污公款在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

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对于这一时期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种人员的错误，而且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工农检察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央苏区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随着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的减少和克服，人民群众对政府更加拥护和信任，这就大大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表扬了江西的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那里的干部廉洁奉公，关心群众疾苦。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为了渡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这两个乡政府得到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为政清廉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得到群众的拥护政府就有力量。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所在。

（选自《历史大观园》，作者：周淑）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翌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即将开始，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就在这时，苏区内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其它歪风，给党、红军和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贪污受贿，不仅有纸钞、银元，还有金银首饰、谷物、谷票、实物、公债券等；二是铺张浪费，几乎遍及每一个苏维埃政府乃至中央机关，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局面；三是化公为私，乱用公款，或挪作私用，据为己有，甚至坐地分赃；四是大吃大喝，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利用职权吃喝玩乐，有的公然提出要吃"洋参炖鸡子"，致使"有些政府好象变成了一些客栈、饭店，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政府食堂大吃"；五是摆阔气，讲排场，动用大量公款购置生活设施，新建办公用房；六是官僚主义泛滥，命令主义、长官意志、消极怠工、玩忽职守、执法犯法交错发生，成为腐败的保护伞，严重损害了苏维埃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共产党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出现腐败现象呢？分析当时的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1)思想上受了封建剥削阶级"做官发财"的毒害，使一些出身于小农经济而又意志薄弱的政府工作人员自私自利的思想膨胀；(2)组织上混进了少数动机不纯的分子，他们处心积虑地为个人谋取私利；(3)缺乏严格管理制度，许多单位纪律松弛，帐务不清，导致腐败现象乘隙滋生。面对这种情况，临时中央政府为了铲除贪污、浪费和不正之风，推动苏区的廉政建设，于1932年2月颁布第三号通令，断然采取一系列对策，拉开了反腐倡廉的帷幕。

一、加强组织领导　分段开展斗争

在反腐败斗争之初，中央检察委员会发布训令，大张旗鼓地宣传反贪污浪费的意义，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都要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临时检举委员会，由工农检察部长任主任，职工会、雇农工会、军事、少共等部门派人参加为委员，确定分三步进行，即1932年2月至9月为第一阶段，斗争重心是统一财政，堵塞漏洞，挖掘腐败分子；1932年10月至1934年2月为第二阶段，斗争重心是发动群众，首先肃清官僚主义，然后将各条战线的斗争引向深入；1934年3月至10月为第三阶段，斗争重心主要是准确打击经济罪犯，教育绝大多数群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二、颁发治理文件　制定处理政策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为尽快查处犯罪分子，先后颁发了有关检举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和指示，其中包括1932年2月人民委员会《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通令，1932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训令，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提纲，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等。这些文件都要求各级政府在清查治理中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份子要无情揭露，从严从快惩处。在处理政策上，按照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的，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的强迫劳动；贪污公款在100元至300元之间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同时还规定，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浪费而使国家蒙受损失者，一方面依照财政条例进行罚款，一方面视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职、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不等的监禁。

三、发动群众检举　强化舆论监督

中央工农检察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建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并依靠积极分子，组织突击队，协助政府查清群众所检举揭发的问题。同时运用《红色中华》报这一宣传武器，开辟“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等专栏，大造反腐败舆论。“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披露那些严重的贪污浪费案件。通过舆论渠道，达到公诸报端，昭示天下，从而弘扬廉政正气，揭露腐败罪恶。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苏区首府瑞金县一次便查出罪犯六、七人，很快追缴了贪污公款六千多元，其中有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壬田区军事部长、区苏主席等。

四、领导机关带头　狠抓“先正上梁”

中央政府对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多次强调要从领导机关抓起，领导干部带头，按照十九号训令，“首先进行中央各机关的检举贪污运动，在发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开展反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经过两个月的查找，中央一级的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总务厅、粮食局、招待所、印刷厂、造币厂、合作总社等机关共揭发出会计科长与会计 10 个，管理科长与科员 8 个，总务处长 3 个，计贪污公款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中央机关以身作则，在运动中带头作出表率，极大地推动了基层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如瑞金县贪污案、于都县的挪用公款经商营私案，都是在这种形势下很快被揭发出来。

五、严格依法制裁　惩处腐败分子

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步步深入，使一些大案要案在群众中纷纷“曝光”。为了惩治腐败分子，1933 年 12 月 15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 26 号训令，决定对举发的贪污分子，一律由纪律处分改为按法律程序处置，任何组织和个人，其贪污腐败一经查实，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一严格规定，首先将一些重大贪污犯判处死刑，如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都因严重贪污公款、支报假帐或企图叛逃而被公审处决。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也因贪污渎职，于 1934 年 3 月 6 日被逮捕法办。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刘道彬，生活腐化，工作不负责任，又有贪污行为，被开除职务并送法庭惩处。此外，通过反腐败斗争，还清洗了一批其他犯罪分子，如“江西乐安县一级和增田、善和两区乡共清刷了 72 人，万太县区各机关中清刷了 60 人，石城县清刷了 49 人。”毋可讳言，由于当时受了“左”的影响，以上案件在处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扩大化偏向，但苏区政府坚定地打击邪恶，执法如山，捍卫国家利益，则是受到广大群众普遍的衷心拥护。

六、建立审计机构　加强监控管理

为了对各机关经费进行有效的监督，并揭露所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审计工作。1931 年 11 月成立最初的审计机构——财政审查委员会；1932 年 8 月在人民委员会部下暂设审计处；1933 年 9 月筹备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到 1934 年 2 月正式成立。在此期间，先后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和十九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依照法规，认真清理经济、整顿财政纪律、统一会计制度、查处贪污浪费。如在审计邮电局经费收支时，发现邮局工人自 1932 年以来，每月节约经费一千元左右，但一直到 1934 年 4 月止，国家却未收到分文，如此巨款，邮政总局竟不知其下落，当问题披露后，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得到及时处理。总之，审计委员会成立后，卓有成效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审查和稽核了中央政府和各省以及瑞金直属县的预决算；二是审查了各机关、革命团体的财政收支；三是审查了国家企业和财务收支；四是帮助各地总结经验教训，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从而发挥了审计部门对整个经济的监控作用。

七、广泛厉行节约　促进廉政建设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克勤克俭，厉行节约，减少开支，保证前方供给。为了付诸行动，中央领导同志首先带头节衣缩食，做出榜样。如陈云、邓颖超、陆定一、博古、毛泽覃等 23 人，身体力行，联名提出“每人每天自愿少吃二两米，不领热天衣服，把全部个人需要服从革命战争利益。”《红色中华》报 1934 年 3 月发起节约八十万元资金运动，得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团体的热烈响应，如少共中央局全体同志决定，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胡耀邦、张爱萍等外省籍同志提出不领热天衣服，李才莲等本地同志则提出从家里自带一个月的伙食费来办公等。从而培养了苏

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为中央各部门节省了行政费用一百三十余万元。在中央机关的有力带动下，江西邮务工人节约开支一千零六十元，博生县政府节省伙食费一千二百余元，为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上述历史回顾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和深刻反思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有这四点：一是认清腐败现象来源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二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使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检察机关对处理严重腐败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三是各级党政部门要坚持从严治党、治政，强化思想政治工作，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四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敢抓敢管，并在廉政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94年2期，作者：冯都）

宁都起义部队的整编及其功绩

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光荣起义后，进入中央苏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来到石城整编。通过整编，这支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劲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初到石城的起义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和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接连取得胜利的影响下，受蒋介石之命调驻宁都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二十六路军中中共地下组织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城举行武装起义。

翌日，起义部队从宁都县城出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域——石城进发。当日，抵达固厚，受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以及刘伯坚、左权等欢迎。16日晨，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同时，还传达了中革军委关于红五军团到石城横江、秋溪、龙岗地域整编的指示。17日，红五军团到达指定地域。十三军驻龙岗，十四军驻秋溪，十五军驻横江。

二、艰苦卓越的整编工作

宁都义军原属冯玉祥将军的旧部，虽然大多出身贫苦，且受过大革命烽火的薰陶，但他们毕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其思想意识和作风，也并没有因为起义而有［较］大的改变，他们的军阀作风还普遍存在，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亦时有发生，因此，对其进行彻底整编改造，使之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宁都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起义部队到达石城前夕，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即从瑞金专程来到石城，指示石城县委、县苏要做好起义部队经过地区和驻地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组织干群做好迎接起义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在秋溪罗云山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和石城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与部署起义部队整编的有关问题。与此同时，中央还送来了银元和棉衣，派来了医疗队，办起了五个临时医院。

中共石城县委、县苏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和罗云山会议精神，立即向各区委、区苏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迎接起义部队的到来。各地闻风而动，横江区委、区苏在秋溪上排子村召开了全区村代表以上干部会议，就迎接起义部队到石城整编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会议决定：动员与组织干群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的到来，向人民群从宣传宁都起义的重大意义，教育人民群众要爱护起义官兵。

罗云山会议后，毛泽东、朱德等随即来到秋溪红家垅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部，召开红四军军部科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就等于断了蒋介石一条腿，号召红四军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

12月22日，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在秋溪背屋［岭］召开了"热烈欢迎二十六路军官兵光荣起义大会"。毛泽东、朱德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毛泽东、朱德在红四军军部接见了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晚上，举行了文艺晚会，慰劳起义官兵。23日，毛泽东等还到医院探望了起义部队的伤病员。

为了把这支部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做了周密的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有：

1. 加强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从军团部到连队，各级都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到红五军团做政治工作。肖劲光任军团政委，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张南生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担任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政委，欧阳健、刘

型、程子华、李翔梧、高自立、唐天际分别担任上述三个军所属六个师的师政委。派去担任团政委的有:余化民、王紫凤、李山关、赖毅、谢良、邱创成、袁子钦、王平山、刘绍文、钱益民、黄子云、曹家庆、姜启化等。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同时,还着手抓了在起义官兵中的建党工作,将那些在起义中表现好的符合入党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力量。董振堂就是在龙岗整编中由何长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2. 加强对起义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各级干部都把做好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经常深入连队检查思想政治工作情况;(2)抓好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教育。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还特地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发至各连,宣传革命道理,向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3)选派一批起义官兵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4)请根据地地方干部到起义部队介绍苏区的大好形势;(5)组织起义官兵到瑞金和红军中参观,学习红军的战斗作风;(6)召开诉苦会,组织起义官兵诉在白区受压迫、受剥削之苦,揭露国民党军队中的种种弊端;(7)搞好生活福利,尽力办好伙食,为伤病员治好病;(8)严肃处理武装哗变事件,首恶必办,一般成员经教育后编散到其他连队去。

3. 开展三大民主运动,废除军阀作风,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

4. 进行组织整顿:(1)实行混编,各军之间师与师对调,各师之间团与团对调,有的各团之间营与营对调,以打破原来的封建军阀体制。(2)削弱一些中上层军官的个人势力,动员其亲信回家。(3)提拔一批思想进步、技术熟练的士兵和下级军官。(4)实行留去自愿,愿留者欢迎,愿去者欢送,发给路费。

5. 加强军事训练。对起义官兵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教育,以及加强各兵种的技术训练。

6. 组织起义官兵学习做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

通过近两个月的整编,起义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革命积极性、军政素质均有了很大提高,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没有了,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出现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苏区人民目睹起义部队整编前后的巨大变化赞叹不已,罗云乡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感慨地说:“共产党内有能人,红军是座大熔炉,废铁也能炼出好钢来。”

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宁都起义部队在石城整编的胜利,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一个光辉范例,整编后的起义部队和其他红军兄弟部队一样,成了铁的红军,为保卫中央苏区,保障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红五军团整编结束后,于1932年2月下旬离开石城,配合三军团攻打赣州。赣州撤围后,又与兄弟部队一道参加了龙岩、漳州、水口等重要战役和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广大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长征途中,红五军团担负着后卫的重担,与尾随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红五军团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红五军团的将士,与他们合影留念,亲自在照片上题字:“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并书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的题词,对红五军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选自《党史文苑》93年3期,作者:温昌义)

何谓“飞行集会”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群众运动,采取过一种叫飞行集会的斗争形式。这种形式始于20年代末,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期达到高峰。它的活动方式是,领导者事先准备好宣传鼓动材料、标语口号等,规定好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布置参加活动的群众,按约定的时间分散到集会地点的附近,埋伏在马路两旁或附近商店人群中。指挥者按约定时间以放爆竹、甩酒瓶、吹口哨或摇旗呐喊作信号。参加活动的群众见到信号即迅速向指定地点集中,进行简短的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等口号,然后迅速散开。这种飞行集会几乎在各种纪念节日都要举行。正如刘少奇批评的:纪念节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他们不管当时的条件或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只要是纪念节,“左”倾错误领导者总是照例组织群众到市中心马路上或到引人注目的地方去举行飞行集会。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掌握了中国共产党每逢纪念节举行飞行集会的规律,便在节前就宣布戒严,出动大批警察监视活动。但“左”倾领导者照样指挥群众进行飞行集会,致使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领袖在这些飞行集会中暴露目标,遭到逮捕和镇压,革命团体遭到破坏而垮台,这种惨痛的失败竟被他们曲解为“胜利”。

(选自《不平凡的七十年》)

1931年"信丰事件"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信丰境内曾发生过一起"反毛事件"，也称"信丰事件"。

当时有一个赣南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是由党特委、团特委、总工会联合组成的。党的特委书记是郭承禄、团的特委书记是肖国璋、总工会主席是马荣澜。由郭承禄任行委书记。这个行委是根据立三路线搞起来的，执行立三路线。行委机关当时驻信丰的黄泥垇。一九三〇年底以前，郭、肖、马就在搞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活动。他们以反对"富农路线"、"农民意识"、"游击主义"为借口，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以至发展到这次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事件。

当时，我在三十五军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三十五军打开大余县城，三、四天后回信丰，走到离信丰城四十里的禾秋陂，郭承禄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天晚上，他同我和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谈话，说毛泽东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和他作斗争。并说要发表宣言，召开群众大会。他们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要我们在宣言上签字，要三十五军支持他们这个行动。我和邓毅刚当时就和他们发生了争吵。我们争论说："要打倒毛泽东怎么行?! 我们不相信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们不签字!"吵过后，他见我们没有签字，也不支持他们，就走了。第二天(一月五日或六日)早晨，我们的队伍开往信丰城，沿途看见他们贴了许多标语、传单。进城后，看见到处都有标语、传单。他们已经摆开场面，准备召开群众大会了。于是，我们三十五军立即在城里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我们向全体干部说明，他们这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阴谋。干部们一致表示不参加这个反革命行动。之后，我们动员干部、宣传队把那些内容反动的标语、传单撕掉或刷掉；派宣传队给群众作解释，叫群众不要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不要上敌人的当。经过宣传，群众不相信他们，都走了，所以会没有开成。当天下午，我们派了一个营到黄泥𡋾去，连夜把行委机关包围起来，把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三人抓来，押到了军部特务营。过了二、三天，我们以三十五军军委名义发了通知给周围各县，把暴动总指挥部和地方上的负责人召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了郭、肖、马的反革命罪状，向大家讲明了这件事的经过，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当时行委已经没有了，就组成了一个临时行委，由陈致中任临时行委书记。开完会以后，队伍就离开了信丰，把郭、肖、马三人也一齐带走。经过安远、寻乌、会昌，到了宁都，把郭、肖、马三人交给了总前委处理。

这就是"信丰事件"或叫"信丰事变"的经过。这个事件是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的。但郭、肖、马由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反革命阴谋行动。

(选自《回忆中央苏区》，作者：罗贵波)

中共兵工企业的"始祖"——中央红军兵工厂

1931年9月底，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在兴国、吉安交界的方石岭大山中，中央红军歼灭了国民党韩德勤部，缴获了国民党军骆驼辎重运输队，获得不少枪支弹药。于此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红军总部联合向地方各级政府发出号召"发动群众，清扫战场，收集武器"。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当地群众，男女老幼连日连夜，从各个山坑、河沟、田头、路旁，找出了被敌人遗弃的大批枪支、火炮。这时，中革军委通知红军总部后方留守处负责人杨立三，指派吴汉杰去兴国筹建兵器修械所。吴汉杰带领六七个年轻人携带几把锉刀、钳子，到兴国白石村办起了"小打小闹"的"中央红军总直修械厂"。6000多支坏枪象老百姓堆柴那样高高码在一个大祠堂里。他们花了20天工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修理好10多支枪。这时，中央军委命令他们与江西苏维埃军事部修械所、红三军团修械所合并，更名为"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习惯称呼为"中央红军兵工厂"。

三厂合并后，管理人员、保卫人员和工厂职工迅猛发展到300多人，吴汉杰任厂长，张健任党支部书记，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先是陆宋昌，后是谢石林。创建初期，厂址设在兴国县的官田村。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村子里居住着300多户人家，中间有条波光粼粼的小河蜿蜒穿过，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环境。尽管当时国民党的飞机曾多次光顾这个地方，但却始终发现不了这个秘密场所。中央苏区中心腹地，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国民党的特务、侦探无法通过重重岗哨接近这里。

初创时的中央红军兵工厂设总务、枪炮、弹药、利铁等科，并有一个特务连(护厂警卫武装)。厂部有一个五匹马力的发电机。枪炮科分设修理、机枪、步枪、木壳和修炮五个股(1932年4月改为机械、修配、打铁、木工及皮革五个股)。弹药科分设弹头、制火药、翻造和马尾手榴弹等四个股。而后，兵工厂又增扩造弹、枪炮、杂械三个分厂，分别由邓亚祥、郝希英(朝鲜族人)、李志云担任分厂厂长。

中央红军兵工厂是艰苦创业的典范，不仅操作工具简陋，而且技术力量薄弱。除少数是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兵器修械员和党中央从沈阳、上海等地兵工厂用高薪雇聘的兵工技术人员，以及一些由白区党组织推荐

介绍而来的技术工人外，大部分工人是刚刚丢下锄头的农民和木匠、铁匠、皮革匠。多数人从来没有修过枪，有的甚至连枪也未摸过，如今却要修枪造枪、制造弹药，真是困难重重。

为了稳定技术队伍，中央红军兵工厂对一切技术人员实行优惠照顾。对聘请来的兵工特种人才和俘虏过来的修械人员另开"小灶"，单独为他们造了一栋较好的宿舍，并保障供给他们每人每天一包"哈德门"香烟，同时还根据他们的技术职级实行档次工资，其中最高月工资为65块银元，而对身为中共党员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如枪炮科科长刘球(从井冈山下来的参加过秋收暴动的老同志)、弹药科科长郝希英，每月只发12块光洋，其中还要将大部分拿出来缴纳党费。这种待遇中的差别政策，使党外技术人员深受感动，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中央红军兵工厂里，边干边学、互教互学蔚然成风，全厂掀起人人学习、钻研技术的热潮。厂长吴汉杰与党的书记张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鼓励大家："铁匠没样，边打边象。"号召大家"虚心学习，快快进步，宁可自己平时多流汗，不能叫阶级兄弟在战场上多流血"。他们将全厂职工按照文化水平的高低、技术强弱、体力大小，分组搭配，让懂技术的人教不懂技术的人。他们还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俱乐部、文化室、列宁活动室、图书室，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经常组织业余演出和邀请各地"蓝衫团"来厂表演文艺节目，举行赛歌、赛舞、赛球和象棋比赛。这一切，对稳定职工情绪，激发职工斗志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了国民党军张贞部的收械厂，动员争取了20多名技术工人，带来了两台车床、一架30马力的发电机、一个鼓风机、一批汽油和原材料。接着，党又从沈阳兵工厂调来共产党员技术工人韩日升等人。这时，中央红军兵工厂的规模已发展到500多人，不仅能修理步枪、驳壳枪、机枪、迫击炮，甚至还能自己生产步枪、子弹。中央红军兵工厂规模最大时，职工有1000余人，刘广臣为厂长、陈友生为副厂长。下设左龙岗、于都桥头、宁坑三个分厂。中央红军兵工厂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总供给部领导。

中央红军兵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一共装配生产了4万多支步枪，40多万发子弹，修理了2000多挺机枪，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造了6万多枚手雷弹，5000多个地雷。这些武器弹药，大大装备了红军。

(选自《党史文汇》90年4期，
作者黄健民，梁志仁)

苏区"新银元"的诞生

1931年冬，当时中共湘赣省委刚刚建成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有不少物资，如西药、食盐和制造枪弹的原材料等，都得用银元到白区去购买，但因省委拥有的银元有限，不能满足战时物资购买的需要。于是中共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决定在省委所在的江西省永新县黄岗村，创建中共苏维埃区域的第一座银元铸造厂。

铸造厂开始只有42名工人，这批工人大都是由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从各部队中选调来的掌握了基础的铸造技术的工人战士。全厂分为四个部，即模型部、翻砂部、打料部和凿坯部(对花纹)，造银元(当地叫造花边)的原料主要是收集打土豪得来的银器、首饰和铅器、锡器，由省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各县派专人送来，其数量很可观。但因铸造工人大部分原来只当过银匠、铜匠、铁匠，造银元不是他们的本行。所以，原料虽然解决了，但技术上的困难却仍然不少。

为了初步掌握铸造技术，工人们首先进行研究和试制，有的用铁板，有的用铜板，按老版银元的花纹图案、厚薄、雕成模型。三天后，模型凿好了，熔化银水去铸，结果很快就铸造出了第一块银元。可是令人不满意的是质量太低劣了，不仅花纹粗细不匀，而且图象模糊，使人看上去很不象一块银元。银元上的人头像呆头呆脑的。显然，这样的银元拿到市场上去是根本不能流通的。怎么办呢？铸造工人们没有因失败而气馁，他们又相互研究，认真找出问题的原因，提高工艺技术。经过几次反复，铸出的银元质量有了提高。于是省苏政府就把这批自制的银元，拿到白区(国统区)去试用。起初，粗心的人也被"蒙混"过去了，但细心的人，却不肯接受。特别是时间一长，流通一广，它的影响大了，注意的人也多了，慢慢地大家也就识出了它是"假"的。

但由于前方战事很紧，一天几个电报，要后方政府赶紧补充食盐、药品和其它必需要的物资。事情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于是他们又重新刻版试制，然后试来试去，银元还是难以造好。

一次，厂长袁汉新站在一块已烧红的铜板面前观察着。此时，厂党委书记毛清顺同志，也从凿坯车间踱过来，仔细地凝视着这块发红的铜板，一不小心，把捏在手中的一块老版银元掉下去。老银元不偏不斜，恰好掉在这块烧红的铜板上。厂长慌了，急忙把这块老银元钳出来。不料，却发现在这块铜板上，清清楚楚地留下了老银元的花纹。这么一来，制模型的办法有了，再不必费那么多时间去凿模了，只要把老银元放在烧红的铜模上印一下就成了。这样，制造出来的银元谁也识不出破绽来了。

然而，模型问题解决了，新制造出来的银元其外表看不出异样，但一敲起来，声音却又很不理想，"噗、噗、噗"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多方考察分析后，才发觉银元的响声好坏关键在于掺铜多少。于是，工人们又立即用新办法制造银元，即一块银元用八成银子，然后掺进两成铅、锡、铜。这样造出来的新银元，响声比老银元还清脆得多。不管是白区或苏区的群众，都赞扬这种银元质量好。为了与老银元有所区别，人们就赐给它个美名——"新银元"。

（选自《历史大观园》作者：龙顺林）

赣东北根据地银行的纸币

1930年，红军攻下景德镇，得到了一批印刷机和印刷工人。又接连攻取了几个城镇，获得了大批纸张和印刷材料，为纸币的印刷提供了条件。同年10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正式成立。当时红色政权虽有充足的资金，却没有自己的货币，市场流通除银元、双毫和铜元外，还充斥着各种伪币。主要有"中国银行"、"中南银行"、"交通银行"和各商会的纸币。因此红色政权很难控制和调节根据地的金融市场。为此，在方志敏同志的关怀下，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规定："严禁私人银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并决定发行苏区货币。

发行纸币，首先遇到了没有印票板的困难。这时，在财政部工作的谢文清同志想起自己参加革命前当学徒时，曾看到河口镇（铅山县）商会会长朱充明集股开银行，印过石印钞票。他向方志敏同志作了汇报。方志敏立刻写信，派银行出纳刘长根前去联系。朱充明见到方志敏主席的亲笔信，一口答应。1931年春，石印就从河口运到了葛源，交给省苏印刷局。当时印刷局及铅印厂在葛源枫树坞。为印刷钞票，省苏印刷局又在离葛源15里的山坳黄粟坑成立石印厂。并于这年4月正式印制钞票。钞票的面值有1元、5角、2角、1角4种。根据特委指示，银行还印制了对外贸易交流用的兑换券，面值50元和100元两种。开始由于制度不完善，曾出现过差错，以后逐渐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印刷时每种面值的纸币印多少，都由财政部下达指标，正品、废品都要上交，由银行验收，交财政部入库，然后发行。

1931年12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改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原有"贫民银行"的纸币全部收回。1932年重新印制发行了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纸币，面值有5元、1元、5角、2角、1角5种。同时继续印制50元和100元的兑换券。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纸张非常紧缺。方志敏同志提出用自己的纸来解决纸币印刷困难。派银行干事陈显东（造纸出身）到上饶李家滩造纸厂学习造纸技术，并带回了一些"剥皮柴"、"毛冬瓜"等造纸原料，在葛源造纸厂经反复试制，终于造出一种6层厚的棉纸。这种纸浸水后仍然可用，质量很好，只是印刷时化墨，便又从乐平印刷厂请来两位师傅给纸张上蜡石磨，解决了化墨问题。

1932年下半年，石印厂由黄粟坑迁到离葛源20里的山谷"山帽凸"。同年10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又重新印制和发行的钞票，面值有5元、1元、1角3种。5元的发行后又收回，并烧缴。同时也逐步收回旧钞票，因当时市场铜元流通不够，省银行又印制了"铜元十枚"纸币，并为充实银行基金印制了1元的股票。1932年共印制1元币70万张，1角币80万张，"铜元十枚"20万张，股票5万张，钞票总额有100万元。

1934年，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财政部在铅印厂印制了1元决战公债券10万张，并通过银行发行。11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北上，战局紧张，省银行逐渐向德兴转移，转移前将未发行完的两担公债券在葛源枫树坞山上烧毁。1935年春，银行驻扎德兴小源，形势越来越紧，便将库存钞票全部烧毁。共烧毁1角币3担，1元币3担，破币1担。之后省银行并入财政部，银行工作就此结束。

赣东北苏区银行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不仅在苏区群众中拥有很高威信，即使在白区也有一定的信誉。它对苏区的金融货币统一管理和经济建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选自《党史纵横》95年3期，
作者：左进亮，赵玉平）

"三清财魁"毛泽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泽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1933年，毛泽民兼任闽赣省委常委、财政部长。

在那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身为"财神爷"的毛泽民，严格执行财经法纪，一尘不染，铁面无私。

有一次省委领导到黎川县执行公务，县委书记方志纯破例请上面来的同志每人吃了一小碗米粉肉，报帐时毛泽民执意不答应，他明言："志纯同志，你要从自己的伙食费里扣除这笔请客的钱。"

还有一回，闽赣省委开会至深夜，大家肚子饿了，省委领导邵式平笑着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肚子都要造反了！"毛泽民笑答："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嘛！"给了邵式平一个"软钉子"。

这位“财神爷”被誉为“头脑清醒、帐目清楚、心地清白”的“三清财魁”。他任职期间，所辖上下，未发生任何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摘自1992年9月5日

(选自《法制日报》)

救亡歌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的爱国师生不禁义愤填膺，走上街头，或宣传抗日救亡，或为正在抗战的东北义勇军战士募捐。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炮声震撼了上海乐坛。以黄自为代表的爱国作曲家，率先写出了表现人民团结抗敌、奋起救亡的爱国歌曲《抗敌歌》和《旗正飘飘》，用“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的激情，进行了公开宣传演出，推动了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发展。随后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越烧越旺，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开展。此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左翼音乐运动蓬勃兴起，音乐家们纷纷深入民众教唱革命歌曲，举办大型音乐会，有时多达千人，声势浩大。冼星海、聂耳、任光、孟波、张曙、麦新、吕骥等革命音乐家云集上海，先后以百代唱片公司和联华影片公司为依托，创作出《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打回老家去》、《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彪炳音乐史册的不朽歌曲，在抗战前期起着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巨大作用。

(选自段晓静《气吞倭寇，声遏行云》)

用假封皮作掩护的中央机关报

《红旗周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中央机关报。它于1931年3月9日创刊，至1934年3月1日停刊，历时3年，共出64期，另出刊13期。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决议、宣言、工作报告，转载了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报道了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消息以及国内外政治形势，对指导全党的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该报的《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专栏，大量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失败的消息，给了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共产党的刊物严禁发行。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躲过敌人的检查和破坏，《红旗周报》巧妙地用各种假封皮作掩护，秘密出版发行。该报从第1至第9期是以报纸形式出版的，从第10期始便以书刊形式出版，并从第10期直到最后一期，都是用假封皮作掩护发行。

该报从第10至17期、第19期至22期和第26期，封皮均为“实业周报”，伴称“上海实业周报出版社”。并注有“中华邮政认为新闻纸类特准挂号”的字样。以体现该刊的合法性。从第18期和第23至25期，封皮均为“时事周报”。封皮背面注有“中共党部宣传部特准发行”字样(此处“中央党部”指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为了避免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和破坏，《红旗周报》还用过“平民”、“光明之路周报”、“现代生活”、“晨钟”等封皮。在三年的时间里，《红旗周报》总共用过16种假封皮。

(选自《党史博采》90年6期，
作者：湘潭唐，正芒)

邹韬奋与王保婚事风波

1931年6月18日下午，位于上海康脑脱路的徐园一派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园内彩棚高搭多处，千余幅喜幛挂满棚内外，绮罗满目，宛若道道凌空而下的彩瀑。各式各样的大花篮，装满五彩缤纷的鲜花，粉团簇锦，芳香四溢；或高达数尺，或矮仅几寸的银杯银盾，摆满两间大厅，银光闪闪，灼灼生辉。男女贺客盈门，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这些贺喜的宾客内，上海的大名人杜月笙、虞洽卿、张啸林及一些显贵如蒋介石的副官长贺耀祖、上海市长张群，全国济赈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等赫然其中。同时，不乏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徐园门外，装饰一新，各种型号的小汽车几断交通。数百名执事忙得不亦乐乎。看这排场阵势，便知结婚者绝非常人。

下午4点30分，军乐响起，身着蓝色长袍、外套玄色马褂，年近50，满面油光的新郎，手挽身着白缎绣花礼服、披长纱、绽笑靥，仪态万方，楚楚动人，年方20的新娘徐徐步入礼堂。

结婚者，新郎为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新娘系大夏大学应届毕业生、被誉为校花的保志宁。

王保婚礼的排场讲究奢华，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均称之为“盛极一时”，“蒋宋婚礼无此旖旎”。二人的婚事，也在上海、天津等地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人言啧啧，舆论大哗，群起而攻。

本来，在国民党官僚中，白首倚红颜者屡见不鲜；老师与学生结为伉俪亦非王保开其先河，何以舆论偏偏注意到王保婚事？原来，除王伯群官高位尊外，其重要原因是，王保婚事尚在议论中时，恰值王在南京萨家湾为交通部大兴土木，兴建宫殿式大厦。外间盛传王在其中有重大贪污行为，其赃款用来下聘金、盖藏娇楼。而保志宁先前

系沪江大学学生，因生得貌美，又颇具才华，追求者若鹜，保不堪其困扰，转学就读于大夏大学。一入大夏大学，“校花”桂冠便落其顶。争相追求献媚者不少于沪江大学。因而外间颇疑保无视于年龄差异，抛开那些如云的年轻追求者，心甘情愿投向大过自己父亲六岁的王伯群怀抱，这中间定有威逼利诱的曲折。比较详细的说法是，除王伯群赠保志宁嫁妆费10万元外，保还提出出洋留学，其出洋费由王氏另外支付的条件，王则满口答应了保的条件，但要求保须结婚生子后再出洋留学。

由邹韬奋所主编的《生活》周刊因好管“闲事”，积极为一般读者群众反映呼声，已成为主持正义、勇于鞭挞黑暗势力的舆论机关，在上海备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高达10几万份，影响甚大。故有不少读者在4月份便致函《生活》周刊，要求刊物派人调查王保婚事，并予以披露和抨击。但是，一方面，韬奋认为说王伯群有重大贪污行为仅为传闻，缺乏事实根据，舆论应持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再者，只要王保婚事系双方自愿，法律手续齐全，旁人不便贸然置喙。另一方面，《生活》周刊整个编辑部从总务到跑印刷厂排印校对仅三人，实在太忙，一时无法抽出人手进行调查，便暂时没有发表意见。

王保6月18日举行盛大婚礼，各大小报争相见诸报端，《大公报》驻上海记者从上海发回一专电描述报道王保婚礼盛况后，国人更是为之忿忿。须知，当时时局十分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国内内战连年不断，水、旱、蝗之灾肆虐横行，正是国难当头，民穷财尽之时节，身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王伯群，如此大张旗鼓地挥霍享受，国人焉能为之无动于衷？于是，国民党监察委员周利生发表演讲，对王进行抨击。国民党北宁特别党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连日召开会议，决定向其中央弹劾王伯群，要求中央调查王伯群婚费之来源。更有不少读者写信给《生活》，其中，不乏言语过激和猜疑者。有的读者甚至说，一贯主张正义的《生活》周刊竟一反常态地对此事一再表示沉默，是因为其主编邹韬奋与大夏大学某副校长过从甚密等。

韬奋为消除读者猜疑，便派人调查王保婚事。6月24日即在《生活》周刊第6卷27期“每周新闻”栏里，以“久惹事非之王保婚礼”为题，对王保婚事予以报道并进行评论，同时阐明自己的态度立场。

见刊后，一些读者来信又陆续寄到了编辑部，主要是就《生活》周刊对王伯群花数十万元结婚一事仅轻描淡写地报道和评论表示不满，要求给予舆论鞭挞。韬奋当即决定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封署名“清华大学梁展如”的读者来信在《生活》第6卷30期上刊出。此信付排后，又收到由保志宁亲写、王伯群署名的申辩信。信中称天大冤枉，外界所说他与保志宁花数十万元及“威逼利诱”保与他成婚实属有意造谣中伤。做出一副委屈之极的样子，痛心疾首地说：“伯群自问生平未尝侮人，一举一动，他人必中伤而后快，午夜深思，实觉大惑不解。”继尔又自吹自擂道：“伯群素尚俭约，虽备员中央数载，自顾实无此多金。”

韬奋本着舆论公正、实事求是的办刊宗旨，遂将王氏来信亦在同一期刊出，并加注说明。同时，对王伯群做了进一步评论。

由于韬奋在《生活》27期上报道评论王保婚事时，说了一句“可见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者做人之大不易也”，被王本人抓住利用，抬高自己身价。在梁王二人的信公布后，读者信函雪片般地飞往《生活》编辑部，普遍表示不满。认为《生活》有维护王伯群之嫌。有一位叫陈淡泉的读者，自告奋勇进行义务调查，得知王氏新盖藏娇楼确有其事，楼在愚园路，门牌310号，并摄下该楼侧影照一幅，连同地址门牌号一同寄给韬奋，要求对王进一步抨击。

韬奋收到藏娇楼地址、照片后，立即派人前去调查核实。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获知王伯群的确在愚园路建有一座四层洋楼，由上海辛峰记营造厂建造。楼房巍峨宏丽。记者前去调查时，尚有营造厂办事员2人及工人10多个在做清理工作。为慎重计，记者专门请了位极有经验的内行去估计造价。认为，此宅非四、五十万不能修。记者还特地从不同角度摄下五张照片。更为重要的是，查明了在南京萨家湾为交通部建楼的工程承包者，正是给王建私宅的承包者。他们用移花接木之术，用给交通部修楼的材料、修建费来修建王的私宅，王仅象征性的付了一点款，甚至连从外国买进的、交通部大楼用电梯都装到王的私宅上去了。

真相大白后，韬奋即拟在第6卷34期《生活》上将调查结果、王伯群新豪华住宅照片刊出。

在这期间，外界关于《生活》周刊却流言纷纷。说王伯群多金，钱可通神，韬奋是不是被王用钱买通了。其实，外界不明真相，王伯群行贿是有的，但韬奋却义正辞严地拒了贿。那是在王伯群得知《生活》已详尽调查到事情真相，并准备公之于众时，连忙派人携款10万元去找韬奋，说：“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对上海各大小报馆都有补助。因为《生活》周刊是王部长最喜好的刊物，所以补助经费特别多些。”他们还假装关心韬奋的生活，提出让韬奋在交通部担任一个只领薪、不干活的挂名差使，企图以此来捂住盖子。殊不知韬奋听了他们的话，非常气愤，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当即予以拒绝。当时，《生活》正打算公开招股充实资金。这两人又改口说要把这笔钱投资《生活》做股本，韬奋以这样投资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不合为由拒绝，还不无讽刺地说：“王部长既然如此慷慨，不如替他捐助给同仁堂，救助几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来关心我一人之生活！”来人无奈，只好悻悻而去。

韬奋公布了王伯群假公济私建私宅后，并没有声明自己如何拒贿，只是在公布调查结果后面说：“在做贼心

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王伯群只得装模作样地呈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自己进行侦查。

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对此不了了之。但最终，还是在这一年抓住了王伯群以政府特使名义入川，协调川局进行鸦片走私的尾巴大加弹劾，使其跌下交通部长的宝座。

（阿静）

张学良与胡蝶

中国电影史上最著名影星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抗战时期从香港逃到重庆）有声继续经营，往来昆明、重庆间，除了日用品、医药用品，也兼做木材生意。随着他也有很多社会应酬，关于这一段生活，也很有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这是一段真实的表白，明眼人一看就知其内情。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讲到了胡蝶和戴笠的那段短暂的同居生活，后半部分就是指轰动一时但又纯属子虚乌有的胡蝶、张学良“九·一八”之夕共舞之事。胡一生耿耿于怀而不能情随事迁的也就是这桩事关“民族大义”的旧案。这件公案是由马君武的诗作引起的。

1931 年 11 月 20 日，上海《时事新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这位广西名流的两首诗。

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马诗一经刊出，即不胫而走，风靡一时。

以当时情势民心而言，张学良身为守土保国之封疆大吏却不战而退，数日间丢失东北三省，任铁蹄蹂躏、生灵涂炭。消息传来，国人大哗，皆因不知事变真相及张替蒋受过之内情。该时，不仅国内舆论一致谴责张的“不抵抗主义”，且国际舆论也不利张。德国报界曾提议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有裨于东亚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浅”云云，不乏讥刺。

从作者和诗作而言，马君武早年系辛亥革命党人，在政界历任要职。后又投身学界，曾主持大夏大学，创办中国公学，在政、学两界都有很大影响，且颇有诗名。马君武在“九·一八”后坚主抗日，这两首《哀沈阳》笔触犀利，淋漓酣畅，遣词通俗浅显，明白如话。此诗适应了当时舆论界谴责张学良的要求，一出便流播四方。

1931 年春，张学良自奉天来北平视事，因嫌在平官邸顺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不甚舒适，故而下榻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财政部印铸局局长沈能毅代找的。5 月底，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诊治。该院特为张腾出一所隔离病房供专用，装有外线专用电话，并由内科医生霍尔负责专门治疗。9 月初，张学良病始痊愈。由于长时间发烧，头发脱落大半，身体十分羸弱，所以仍在协和医院休养。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许，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按照预定之阴谋，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一段路轨炸毁，遂以中国破坏铁路、袭击日军为由，悍然炮击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就是举世惊骇的“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携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当即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话，了解详情，终宵让人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曾亲自与南京通话。他迅即召来顾问端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紧急开会，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几乎没有休息，后记者招待会毕，方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尔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九·一八”当日，蒋介石正乘军舰赴九江途中，他于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自然千夫所指，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恶名。连“九·一八”之夕观剧，舆论也颇多责难，认为张身为陆海空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千钧一发之际，竟有闲情逸致去看戏，真可说是叔宝无心。当时有人替张曲为辩解，否认张观剧之实。理由是协和医院存病志，注明他已发高烧（38.6 度），哪能去看戏呢，云云。言之凿凿，实是为尊者讳。

其实，张学良对日立场是十分坚决的。1931 年七、八月间，东北险象环生。日军先后蓄意制造长春万宝山事

件、中村事件，张洞悉其奸。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蒋在8月16日训诫张："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这份"铣电"，便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事变前一星期，蒋密电召张至石家庄车站秘密会晤，再次重申不抵抗："……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凡此种种，公众当时自然无从知悉，而马君武的打油诗迎合了当时情势，各界就宁信其有了。其实，张学良战和两难，替蒋受过，屡遭骂名，而又不能明言，内心痛苦万分是不用说的了。面对群情激愤的社会各界人，张只能再三表白自己"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倘有"卖国行为"，"将我打死"、"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主要当事人胡蝶女士。

1931年9月中旬，胡蝶随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率领的外景队离沪赴平，抵达天津时，沈阳早已丢失。也就是说，"九·一八"之晚，胡蝶尚未到北平。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9月下旬。外景队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这是先期离沪北上负责筹备工作的洪深预先租下的一王府旧宅。据称，剧组抵平后第六天开始在中山公园、北平公园、颐和园拍摄外景，前后约两月。在当时，电影演员更是新闻人物，其生活起居、一举一动，备受观众瞩目，更兼某些小报捕风捉影，推涛作浪，失实传闻在所不免。直到80年代，还有人撰文称："据当时张学良（北平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与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说，一九三一年胡蝶到北平拍摄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片，曾拜访张学良，……"（笔者曾查阅洪先生所撰回忆录，并未提及此事，不知引者何据。）由此观之，好事者编造胡蝶曾去顺承王府拜会过张学良，进而"想象"、渲染胡、张在王府相拥跳舞的细节，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最能说明问题真相的，也许是以下事实：胡蝶一生从未和张学良谋面。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展，曾有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当年胡蝶由平返沪后，即闻知上海数报登载胡、张相与跳舞、过从甚密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庶几天方夜谭。所以她在上海《时事新报》刊出马诗次日，连续两天在《申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张石川、洪深、夏佩珍、龚稼农等全体演职员也仗义执言，一致为胡蝶作证，也登启事于报端。这两个启事实际上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兹全文照录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胡蝶辟谣》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申，忽闻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日。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之个人之名誉，以逐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镇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

胡女子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在国难当头之际，胡蝶顾全大局，不以牺牲"个人之名誉"为念，这是值得称道的。马诗见报后，有人曾建议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对簿公堂。胡蝶终能以民族大义为念，洞察敌寇之奸，未在小事上纠缠。殊属不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逝者长已矣！重捡60年前旧报，令人掩卷长思。

（宗道一）

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院

1931年夏初，有一天，一位装束朴素、态度有点拘谨的东方青年，来到巴黎音乐院的门前。他就是前来投考的中国青年，后来创作出惊世名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

巴黎音乐院是全世界音乐青年为之瞩目、为之向往的世界最高音乐学府，也是当时世界音乐中心。许多考生为有机会光临考场终生引以为荣。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公子哥儿纨绔子弟，更是挟巨资涉重洋，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要到这所学校来"镀金"，而不可得啊！

生活贫困的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院既是他的夙愿，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在考试前几个月，他才接受老师的建议，辞去饭店跑堂，腾出身子，专心温习功课。巴黎音乐界的名流和各国旅法艺术家，比如世界三大印象派作曲家之一的巴黎音乐院名教授保罗·杜卡斯先生，世界著名的俄国旅法大音乐家普罗柯菲耶夫，都被冼星海的奋斗精神所感动。有的给他补习功课，有的给他送来衣服，有的给他免费提供各音乐会的头排入场券。这一切使冼星海深受鼓舞，冼星海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行动与来自五大洲的音乐青年一争高低。他要用自己的成绩来证实：中国青年就是有志气，以此回答国际友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和殷殷期望。

考试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巴黎音乐院所在的马德里街人流不绝。那所古老肃穆的教堂式建筑——巴黎音乐院大门口，呈现出一片难得的热闹景象：一个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青年，一手挟着漂亮的琴盒，一手提着盛放乐谱的崭新提包，俨然以未来音乐家身份，神态轩昂地走进校门。可是冼星海却穿着临时借来的袖子过长的旧西装，随着人群来到音乐院门口。门警一看他那套别扭的服装，立即走上前来伸手把他拦住，厉声呵斥道：

"干什么？"

"报考的！"冼星海不加思索地回答。

"什么班？"门警睥睨着眼睛，不屑地问。

"作曲班！"冼星海提高嗓音回答。

门警听了大吃一惊，方打量起这黑眼睛黑头发的东方人，他摸不清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你是日本考生吧？"门警知道，日本考生路途遥遥往往来不及整治行装，说来也情有可原。

"我是中国考生，姓冼名星海！"冼星海用流利的法语理直气壮地回答。

门警听完，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苦力打扮的中国人"来者不善"，居然宣称报考巴黎音乐院作曲班。他想，打从巴黎音乐院创办至今，仅有一名叫马思聪的中国人报考过提琴班，而且在报考前，在巴黎从名师学过多年小提琴，才算有幸应选，然而中国人报考巴黎音乐院作曲班，他压根儿也没听说过。再说闻名世界的大音乐家中有哪一位是中国人呢？学校从未接待过如此"寒酸"的考生。于是，门警进一步催促说：

"快拿出准考证！"

门警接过冼星海手中的准考证，顿时傻眼了，原来上面分明签署巴黎音乐院作曲班教授杜卡斯的准考意见，怪不得这位考生答话口气不软。他重新拿起准考证件反复查看杜卡斯的笔迹，审视良久，难于找出任何破绽，更讲不出拒绝对方的任何理由。于是他以冼星海服装不合考生规范，还是不让走进校门。这时一位担任钢琴伴奏的法国女作曲家走来为冼星海分辨解释，甚至抗议，门警依然拦住冼星海不让进门。

正当冼星海被门警纠缠得一筹莫展的时候，巴黎音乐院作曲班主考老师杜卡斯教授坐着私人汽车来了。他见冼星海被堵在门外，眼看考试时间将到，于是不等汽车驶入校内停车场，便在校门口招呼司机"停车"。门警手执着冼星海的报考证件，恭恭敬敬的迎上前去，准备向杜卡斯说明原委。只见杜卡斯诚挚地拍拍冼星海的肩膀，说："这是我的中国私人学生，准考证确是我亲笔签写的，是我提议他报考由我执教的巴黎音乐院作曲班的。"说完便从门警手中接过证件交还冼星海。又紧握着冼星海的手，鼓励冼星海沉着应试。门警看他们亲切交谈的情景，凑上前去想听个明白，可是杜卡斯已经移动脚步，与冼星海肩并肩地走进了巴黎音乐院。

因有名师指点，加上自己特具的禀赋，冼星海的入学考试进行得很顺利。他很快答完了各科试卷，每次答完试卷，许多老师都对星海的答卷点头赞赏。最后，他被通知来到考试大厅，这是由巴黎音乐院会同法国音乐界名流组成的主考席，席上坐着杜卡斯、拉威尔、里昂古特等名教授与作曲家，正中坐着巴黎音乐院院长昂利·彪塞先生。担任作曲课考试的里昂古特教授迅即以严肃的口吻，向在座诸位轻声汇报：

"我已看完试卷，中国考生冼星海无论是作品分析、旋律写作、配置和声以至音乐理论，成绩都出类拔萃，同时，他的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现在就请各位教授验看他的报考作品《风》。"

教授们都清楚，早在报考前，这首作品经杜卡斯教授推荐，破例入选巴黎音乐院新作品音乐会，经梅耶女士演唱，这首歌曾作为优秀作品由巴黎电台录音向法国全国播送。冼星海的名字从此在巴黎音乐界盛传一时，人们都为杜卡斯教授发现了一位中国音乐天才而向教授先生表示热烈庆贺。如今，主考大厅里的教授们，听说可以一睹《风》的原稿，大厅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教授们轮流看过《风》，又交头接耳议论了一番，彪塞院长见大家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便把目光投向杜卡斯，暗示他代表巴黎音乐院

考试委员会发言。杜卡斯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会意地站起身，面带微笑向冼星海宣布：

"中国考生冼星海，现在巴黎音乐院考试委员会授权我向你宣布：你已被正式录取进入我们巴黎音乐院作曲班。还要通知你，由于你考试成绩优异，我们决定给你颁发考试荣誉奖。这是所有考生中绝无仅有的。按照我们学校的惯例，享受荣誉奖者有权自由选择奖品，你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

冼星海面对主考席，凝视着如此众多的法国音乐界名流，神情十分紧张。听完杜卡斯向他宣布录取消息，他才如梦初醒，待听完本人可以自由选择奖品，一时又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说实在的，自己一向过着贫困的生活，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正在无所适从之际，因为饥肠辘辘，这才想起腹中空空，对了，眼下已好久没有饱餐了，于是他羞涩而惭愧地低下了头，道了声："饭票！"

在座的巴黎名音乐家无不大为震惊，唯有杜卡斯会意地点点头，马上侧过身向彪塞院长作了汇报，然后面向冼星海：

"我们决定请昂利·彪塞院长亲自发你一本饭票，为了让你入学以后能够安心学习，巴黎音乐院还将破例免费供应你的膳食。"

1931年盛夏，冼星海终于进入巴黎音乐院学习。

（秦启明）

陈济棠测字

陈济棠是粤军将领，号称"岭南王"。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公开反蒋，就是凭借陈济棠的兵力。以后广东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北上抗日"为号召，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两广事变"。

陈济棠平日最敬佩其大哥陈维周，而陈维周又笃信阴阳命相风水之说，他曾去花县看过洪秀全的祖茔，认为洪家祖坟正埋在"活龙口"上，所以洪氏能做天子，可惜埋的高了一点，没有埋在"穴"上，因而只拥有半壁江山。于是，陈氏兄弟强买了洪氏坟地，将其母葬在该处。两广事变发动之前，陈济棠、陈维周请来了术士翁半玄，为他们卜卦测字，得"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看后非常高兴，认为反蒋时机已到，不可失去，立即打出了反蒋旗帜。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派陈诚、罗卓英率3万大军由江西进攻广东，一面用反间计，拉拢余汉谋背叛了陈济棠。同时，又命戴笠、郑介民用重金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黄率数十架飞机全部投降了蒋介石。不到半个月，陈济棠就彻底失败，逃往香港。原来"机不可失"，指的是飞机不可失，"机失"只好亡命了。

（祁州）

流行风

电影《歌女红牡丹》

《歌女红牡丹》——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胡蝶主演。故事写一个歌女红牡丹嫁了一个无赖丈夫，她以演出所得供其挥霍，还受其虐待；她对丈夫始终宽厚忍让，甚至在他杀人入狱后，还设法营救，不咎既往，最后，终于感化了丈夫，使之改邪归正。影片暴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毒害，抨击了封建遗少的无耻寄生生活。利用有声条件，影片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和《拿高登》四个节目的片段。此片由明星公司与百代公司合作录音摄制，共制了18张蜡盘，质量并不够好，再加创作者没有经验，他们只注意对白，却忽略了音响效果。尽管如此，1931年3月上映时，因能使观众第一次从银幕上听到戏曲唱白，而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

电影《虞美人》

《虞美人》——徐碧波编剧，陈铿然导演，刘亮禅摄影。其内容是以虞姬与项羽的戏为中心，中间穿插了剧中男女演员的后台生活和恋爱纠纂。在配音技术处理上，它与《歌女红牡丹》相反，先在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好了唱片，然后让演员按唱片的发音演戏说话。这虽比"明星"的拍成影片后，再要演员对口配音技术上少一些困难；但拍戏时，由于无音画同步设备，唱机传出的声速和摄影机的转速，总难取得一致，同样有声、画不能吻合的现象。1931年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首次上映，也颇受观众欢迎。

电影《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由大中国和暨南两影片公司合股摄制。他们是利用日本发声映画公司的有声摄影设备制作的。于 1931 年 3 月由导演夏赤凤带演员去东京拍摄，5 月返回上海。摄影师是美国人 K. 亨利。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名义出品。影片写一少女王爱莲因丈夫陈小英另恋荡妇丽娜而遭抛弃。后几经波折，丈夫痛改前非，夫妻和好。内容陈腐，仍属家庭、恋爱故事的老调。影片上映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因此片利用日本有声片器材摄制，遭到同业和观众的抵制，不承认它是中国有声片，引起一场风波。

电影《歌场春色》

《歌场春色》——由天一公司摄制。天一拍有声片进行得很早，第一次也采用蜡盘配音，拍了一部短片《钟声》，因摄影场失火，此片被毁未能公映。后来，公司从美国聘请了摄影师凯恩、收音师白立登和札林等人，租借他们的有声器材，拍摄了片上发音的故事片《歌场春色》。剧本由姚苏凤根据“笑舞台”新剧《舞女美姑娘》改编，邵醉翁、李萍倩导演，杨耐梅、宜景琳等主演。它写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骗得妻子首饰，与一歌女同居，事情被发现后，造成家庭悲剧：妻子被车撞死，他也被判死刑；而歌女则受到良心的谴责。影片穿插了大量歌唱场面和上海阔人的演讲。1931 年 10 月 10 日影片在“光陆”、“南京”两家影院上映时，相当轰动，在南洋市场更受欢迎。

小说《家》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小说以“五四”运动以后的四川成都为背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及其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这里有封建代表人物的虚伪、残酷和道德败坏的丑恶面貌，有弱者的眼泪和死亡，有吃人的礼教造成的恋爱和婚姻的惨剧，也有青年一代的觉醒和反抗。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封建专制的高老太爷，性格懦弱的觉新和叛逆者觉慧等众多人物形象。作者站在被压迫的弱者的立场上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提出了血泪的控诉，热情歌颂了以觉慧为代表的年青一代的反抗精神。作品层层深入地揭开封建地主家庭的“诗礼传家”的帷幔，把它的血淋淋的罪恶和朽败的命运展现在读者面前，细致地表现了这个大家庭中众多人物的不同性格和遭遇。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抒情色彩浓烈，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封建长篇名著之一。

小说《象牙戒指》

作者庐隐，主要内容：

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传记体小说。写作者好友石评梅和高君宇之间的一幕爱情悲剧。女主人公沁珠（即石评梅）被一个有妇之夫骗取了爱情，她带着初恋受伤的悲凉的心走上了社会，蔑视人间的一切“自私浅鄙”。革命者曹长空（即高君宇）向她献出了真挚的友谊和火一般的恋情，但沁珠却迟疑不决，难下决心。直到高因得不到她的爱，肺病日益严重，终于咯血致死。这才使沁珠大梦骤醒，痛感到自己失去了一颗无比珍贵的心，悔恨无已。自己亦不幸染疾，戴着曹生前所赠的象征纯洁爱情的象牙戒指离开人间。友人们将她埋葬在北平陶然亭曹的墓旁，让他们忠贞的爱魂在天国相会。小说揭示了旧社会的新女性在世俗观念包围下的悲惨命运，歌颂了青年一代的纯真高洁的爱情。作品写得凄凉悲壮，哀婉动人；小说发表后，曾使北平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感动。

小说《地泉》

作者阳翰笙，主要内容：

第一部写华南某农村在大革命中农民暴动的故事。以汪森为首的农会，组织农民反抗政府当局的镇压，带领农民攻打地主庄园和警察局，枪毙了地主豪绅，组织军民委员会，给贫苦农民分了田，取得了非凡的胜利。第二部写知识分子林怀秋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消沉颓废，后在梦云、寒梅帮助下参加革命，救出了寒梅，投奔汪森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军。第三部写梦云到 H 埠纱厂成为总工联的委员在罢工斗争中与刚参加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回来的林怀秋重逢相爱，一起投入工人运动。作品企图表现农村革命的“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换”和工人运动的“复兴”，从而反映白色恐怖下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胜利。由于作者受“左”的社会思潮影响，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加以叙述多于描写，人物的思想转变缺乏根据，概念化的倾向相当严重成为当时“革命浪漫蒂克”小说的一个标本。作品成书后革命作家曾借此撰序文，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诗《预言》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馨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停下你长途的奔波,
进来,这儿有虎皮的褥你坐!
让我烧起每一秋天拾来的落叶,
听我低低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象火光样沉郁又高扬,
火光样将落叶的一生诉说。

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古老的树现着野兽身上的斑纹,
半生半死的藤蟒蛇样交缠着,
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
你将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一定要走吗?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足知道每一条平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你的足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象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何其芳)

历史档案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借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芦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1. 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国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斗争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斗争之严重,罢工斗争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进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

2.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地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得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地使日本帝国主义恐怖惊慌。尤其是苏联的存在给全世界的无产阶

级与劳苦群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斗争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使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威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俄无区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

3. 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的屡次溃败与复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斗争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二十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分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

4. 而促进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变时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上实行的。他的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地压榨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之下，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地疯狂地进行反苏联战争准备的情势之下，日本公开地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各地之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南段的强占与路员工人的屠杀，到处表露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反苏联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部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反苏联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战线战争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态度紧张的现象，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三）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的饥荒与土地斗争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斗争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敌人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斗争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斗争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在军事上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斗争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反对革命及苏维埃斗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更加残酷的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斗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紧张，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一步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

（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

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

1. 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动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惊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

2. 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斗争。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分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的革命斗争。

3. 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苏维埃政府的宣传以及全国苏区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

4. 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的。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方法之一。

5. 在灾民斗争中（不论在城市与农村中的），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的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斗争，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

6. 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7. 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工作，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附注：关于苏区党目前的任务，中央另有决议。

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演讲

（1931年9月22日）

……据中正意见，此次日本暴行，可得下列两点之试验：（一）国际间有无道德或公理，及世界各国有无裁制凶暴确保世界和平之决心，……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鉴定国，对于日本破坏公约之行为，必有适当之裁制；（二）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证明其观察之错误，唯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德一心，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断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日本暴行发生后，中央政府已作严密之研究，决定应取之步骤，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我全体同志，服从三民主义，革命救国，自当有不顾生死之决心，以保民族之生存，但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目前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吾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尚望全体同志，知此意而普告于我国民。

（《大公报》1931年9月23日。）

动员广大群众争取二次战争胜利——中共苏区中央局紧急通告天字第二号

一九三一年三月

各级党部：

目前据各方的报告及特区委来信，蒋介石军阀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又想卷土重来，因蒋张战争快要爆发了，蒋介石为着要安全去对付张学良，无疑义的要先调一部分杂色部队来进攻革命，企图对革命来一个镇压，故最近调添孙连仲已抵抚州之崇仁、胡祖玉部已抵距离乐安二十里之公陂市，吉安增加了王金钰，罗霖部已向水东开动，横江渡及曲濑昨天均到有敌人，(约一团上下)在此情形之下，二次革命战争无疑义的快要爆发，固然拿敌我形势来对比，及根据客观条件，二次战争我们无疑义的要胜利，但我们只靠客观条件，在主观力量准备不充分，那末就不能巩固继续这一胜利，故在二次战争快要爆发的现在，我们应动员党内外群众一致行动去进攻，使敌人这次有计划有决心的企图完全归于失败，那么我们的工作无疑的要加紧起来，况赤化数年来的莲花处于湘赣交界之地，敌人要用全力来对付我红军一方面军及进攻苏区，难道敌人不入莲花骚扰或经过。在这个形势之下，我们目前的工作布置应该是：

一、军事布置

1. 独立第一营和一区武装群众以陆公陂一带为中心，独立第二营和二区武装群众，以白尼湖一带为中心，三区武装群众，以二区西东一带为中心，但须分一部分到安萍边界警戒，四区武装群众须以满山鬼村一带为中心，但须分一部到攸边去警戒，五区的武装群众须以南湾一带为中心，城区武装群众以郭修陂及杨视后背一带为中心，赤卫军独立第一团以三区为中心，以上沿途的布置如敌到来时须给以迎头射击，全县组织一指挥部去指挥全县武装，以彭寿范担任指挥官刘秉常担任政委、吴集传为参谋长、王亮为副官长，以谢家柱为秘书长，对内组织一行委，以贺志远、彭寿范、朱义祖、谢家柱、刘秉常五人组织之，并以刘秉常为书记(如敌到来时不分日夜，要采用神出鬼没的战术去射击敌人)。

2. 硝矿要多准备，武器更须整添，并要派专人负责主做。

3. 如敌来时各区须注意捕拿敌方侦探及宣传员、落伍士兵等。

4. 各区武装群众的行动由各师部去指挥之。

二、坚壁清野工作

1. 自陆公陂至龙山口沿途的村落须迅速执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如搬开粮食用器等)。

2. 各区的村落在未执行坚壁清野时，当地乡政府须召集群众大会解释坚壁清野的意义，区政府须派人参加之。

三、宣传工作

1. 各区须利用老头子及劳妇做士兵运动，如敌到时深入去做宣传工作，但事先须加紧对老头子及劳妇的训练。

2. 各区乡及各村各户须将发下对白军士兵运动的标语口号用石灰粉写于屋外屋内。

3. 各区尽量制备各种对敌方宣传品用技术散发到敌方里去(如写了标语传单宣言等须用石头包在纸内丢去或用弹弓射去或用石灰写标语于板子上，放在河中流去或放风灯)。

4. 各区乡在敌人到来无论进攻了敌人或未进攻时，对外天天须召集群众把争取二次革命胜利的宣传大纲详细解释，以便鼓动群众的斗争精神，对内须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

5. 凡对白军士兵运动的宣传工作，须根据中央局政治部对敌方士兵宣传纲要去做。

四、经粮问题

1. 各区所捉拿的土豪须迅速催其缴款。

2. 各区党政机关应日常注意节省费用。

3. 各区应尽量设法去捉土豪，以便解决经济问题。

4. 二区四乡须快将谷子搬六百担之普到五里山田家冲大段里一带。

五、交通侦探问题

1. 各区委须快整理秘密交通处报告此间。

2. 各区须注意整理各级赤色邮政局。

3. 各区须组织一侦探队以三人至五人组织之，并须坚定忠勇同志充当队员，限每天要有一消息报告到县委，侦遇紧急消息时，不在此例。

4. 如敌到来时，县委办公地点以三区为中心。

以上各项希各级党应提到会议热烈的讨论，迅速遵照执行为要。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3)，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75—77 页)

中国国民党告全国同胞书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

本党自去年消灭反动，戡平叛变，即于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召集国民会议，以实现总理之遗教。经六阅月之筹

备，卒于五月五日如期开会。全国国民代表，自蒙藏以迄海外，咸秉其信仰三民主义之热诚，共与此决定建国大计之盛会。会议提案，踊跃异常。而于接受总理全部遗教，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与夫废除不平等条约，尤以满场热烈之精神，表示全国一致之意志。本党于此，益信国民革命之方案与三民主义之建设，实完全契合于全国国民之要求。而总理生前所欲提示本党主张，期得国民澈底的明瞭与赞助者，至于今日，全国国民已有彻底之认识。此诚总理与革命先烈数十年奋斗之精诚所感召，亦建国大功必成之保证，足令吾人感奋兴起者也。国民会议以后，革命建国之工作盖完全进于一个新阶段，训政时期约法，既已制定，总理粗心创制之学说制度，以及建国大纲之一切规定，以前仅由本党负倡导力行之责任者，今后已为国民相约共守之信条。约法之根本精神，不仅在规定政权治权行使之方式，而尤在确定训政期中政府与人民所应分担之工作。自今以往，训政完成之早迟，与建国事业之成败，其荣辱得失，全国国民实与本党共之。而就本党及政府以言，自令以往，若不能积极完成训政建设，以适应国家之需要，则对于全国国民所负之责任，更有在道德的责任以上者。是以约法颁布以后，国民之责任愈重。而本党之必须督率政府，专心一志，积极猛进于训政建设之工作，其责任亦愈重也。

由国民会议之经过，以测全国民意真正之要求。有足使本党欣幸者，则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所决定关于训政建设之方针，及第四次全体会议所决定以安定秩序与培养民力为中心之施政纲要，实完全符合于全国真实之民意。而尤足使本党警惕者，则内外环境之需要，已不容本党及国民政府对于训政建设与安定民生有斯须之迁延或怠忽。国民会议中最重要之决议案，对外曰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中国之完全平等与自由。对内则实施建设与剿灭赤匪之二者，尤为全场一致所迫切要求，而愿竭全力以观成。诚以中国非早日完成训政建国之工作，无以脱国家于危险艰难，致国家于自由平等。而欲及早完成训政建国之工作，则第一必须铲除为民族最大祸患之赤匪，第二必须实施各种政治经济的建设。唯此二事，既为国家民族兴衰存亡之所系，即应不问环境之险夷难易，而当集中心力以共图过。训政建设与剿匪工作之未能迅捷奏功者，半由于政府与人民尚未得密切之合作，半亦因于反动迭兴，障碍宏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政府既疲于障碍之扫除，反动者即利用此点，以阻挠建设之大计。遂使本党与政府往往因顾及治标之必要，而不得不稽延基本之工作。今则全国人民既已明白接受总理之遗教，誓与本党一致为救亡图存之努力。则本党今后之自效于国家与人民者，自唯有专心一志努力前进。不问环境之如何，而始终积极于剿灭赤匪与实施建设之基本工作。不挠不懈，不偏废，不旁骛。以期必达目的，而不负国民之期望。其进行须利，而一无挫阻也，固极智尽忠急起直追以图之。其感横逆困阻之无可免也，亦必以加倍艰苦之奋斗勇猛精神以赴之。盖人民之期望国家之要求，乃至国际之视听，已使本党对于当前之基本工作，无稽延停顿之可能，亦更无旁虑却顾之必要也。夫唯民族最大之祸患为赤匪。则凡附和赤匪或与为策应以牵制剿匪之工作者，皆为国家之公敌。全国最切之要求，既为完成训政建设。而训政建设之基础在于和平与统一。则凡有危害和平与破坏统一之举动者，亦当然为国家之公敌。国民革命过去所迭次遭受之困阻，一方由于个人主义的封建思想之为祟，一方亦由于革命目的能默契于一般国民真切之要求者，其成败利害适与存心破坏国家之反动份子之希望相反。今革命大义既已深入人心，完成训政已为全国迫切之要求。而过去反动集团之摧毁，尤为昭然之事例。苟稍有明辨是非之良知，宜不致深入歧途而忘返。其或悍然不愿，甘与国家人民之利益为仇，则国民已澈底认识建国之意义，当不能坐视国家大计之横被阻挠。本党亦自当督饬政府，以芟夷当前之障碍。然有欲重言以申明之者，则吾人决不因任何艰难而怠忽应进行之基本工作。此则国民政府与全国国民所应共喻者也。

世上任何之国家，当其努力复兴与开始建国，必然历尽无数之艰难。而历史愈悠久、环境愈复杂者，其所遭之困难必愈多，而其所成就则愈大。百物之成长，有不畏风雹摧残而依然发芽滋长者，必其生机充实，而组织坚密者也。三民主义之建设，必达最后之成功。爰于约法颁布之际，披沥本党之意思，昭告全国，愿吾同胞共勉之。

（选自《国闻周报》第八卷，第二十二期）

中国国民党中央告全国学生书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今日当存亡关头，政府受人民之托，合人民之力，负折冲御侮之责，政府不尊重人民之意思，则人民必唾其政府而国乃亡，人民不服从政府之指挥，则政府不能约束其人民，步骤错乱，为敌所乘而国亦亡。呜呼！时至今日，而谓尚可不一心一德，披肝沥胆，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同赴亡国灭族之难耶？全国学生，血气正盛，爱国至殷，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可有救存亡决于几微，死生定于俄顷，故愿竭其诚为我学生诸君告也。

所谓统一指挥者，上下一心，步骤一致，牺牲个人及一部分之成见与利益，以贡献于国家也。学生今日为主张对日作战者，则即以战言。近世之战，非犹夫历史之驱士卒以相搏矣，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

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以整个的国力，应作战之需要，甚至毁吾庐墓，不为不孝，夷吾室家，不为不仁；试问在此时期，尚能人各一主张，人各一利害，而不听命于统一指挥者耶？不特战时为然，即当卧薪尝胆，生聚训练之时，亦必有统一之指挥，乃能有充分之准备。即如全国学生，今无一不愿荷枪前敌，为国捐驱者，然义愤固可薄天，平日苦无训练则必施以短时期之军事教育，在此受军事教育期中，即须牺牲其平时所享之自由，俾成为整齐严肃之战士。若曰是尚未至于战也，约束可以不行，作辍可以无定，是则灞上棘门，直如儿戏，一旦临阵，仓皇失措，既为无益之牺牲，复无补于国家之危亡，吾知明理达义之学生，于此必能憬然悟统一指挥之必要，且及未战之时，尤当磨厉及此矣。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伍者，有热血愤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其尤为坚苦卓绝者，则全国民众于热烈激昂之中，仍能刻励沉着，不予敌以可乘，不示人以皇敌；以文明民族之人格，作敌国野蛮行动之反映，因是益得世界之同情。吾人固知存亡大计，决于自身，但求同情，等于依赖，惟深信只有刻厉沉着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伟绩，惟有步伐整齐之纪律，乃能决胜克敌于疆场；故全国民众最近所表示者，不仅消极的使敌人无隙可乘，且积极的可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愿全国学生于此良好之基础，益相勉励，以底于最后之成功。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最后之一课”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拚命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敌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厉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

今乃有以不宣战不开课为揭示者，有以出兵与读书并提者，其发于热诚，固难厚非，衡诸事理，实多绌误。夫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其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惟一之权能，以定惟一之大计耳。若政府于此，而可不计国家利害，轻徇请求，或筑室道谋，踌躇不断，则为溺职为误国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抑更有进于是者，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者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爱国之学生乎，磨厉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政府决不负国家也。

呜呼！今日之事急于星火，今日之国危于累卵，吾人盥沐总理救国救民之遗训，负此无可旁贷之责任，苟于国家有利者，则必身先人民而死，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竭诚相告，惟全国学生共鉴之。

（选自《革命文献》(台北版)第六十九辑）

蒋介石辞职通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万急，南京各部院，各级党部，各省市政府，各机关，各团体，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同志公鉴：本日上中央委员会呈文一件，文曰，谨呈者，中正自十七年受命中央，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黾勉从事，三载有馀，无日不思竭其愚庸，实现总理之遗教，无负党国之付托。乃心馀力绌，屡遭挫阻。以国内忧患之迭兴，致强敌侵陵之日亟，抚躬循省，夙夜忧惧，深维临危不宜苟勉，则负荷无可轻减之理，而循侮必期统一，则国内须泯阋墙之争。爰于中央力谋团结之际，暂维中枢，强忍待罪，以俟全体同志践约来京，精诚结合，然后引咎自劾，避位让贤。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昔因顾虑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强忍以负责于一时者，将转为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无负责之批评，莫衷一是。现在国是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于总理之教训，沥陈下情，务乞俯如所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语。中正受命党国，兹国难，职责所在，义当生死以之。唯欲策对外之胜利，必先求国内之一致，今一中全会尚未举行，内外要计亟待决定，爰呈辞本兼各职，避位让贤，以促成党国之统一，而达我救国之目的。兴亡有责，无间始终。此后仍当以解职之身，勉效驱策，谨先电闻，唯希公鉴。蒋中正叩删（十五日）。”

（选自《国闻周报》第八卷，第五十期）

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胡汉民的自由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

各位同志：胡汉民同志因为约法问题与多数中央委员意见不合，称病辞职。这件事本席于上次纪念周已经向各位报告过了。中央当时在星期一开了一个临时常务会议，议决准其辞职，以遂其个人之志。并推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这些事情大概各位同志已在报上看见了。胡同志辞职后，次晨即与邵元冲同志迳往汤山养病。这就是胡同志辞职赴汤山的经过情形。本来一个政治上的负责者，因为政见不合，引退辞职，乃是一件极普通极平常的事，用不着奇异。在政治上了轨道，人民政治知识较高的国家，遇着这一类的事件发生，人民都是看做很平常。决不致大惊小怪，捕风捉影。乃自胡同志辞职以后，在上一星期之中，竟生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谣言。甚至于说胡同志病势沉重，温度到了一百零五度。且说一日竟晕倒了两次。其实据卫生署刘署长当日正式诊断报告，胡同志在汤山静养，体温九十九度，脉搏七十二至九十，皆如常人。惟其向来有后脑神经痛病及血压过高之症。据医生推此病源，由来甚久，至少得之于一年以前，故亦非短期间所能痊愈。其在汤山所作的诗文，报纸上也曾经登载。前日又据刘署长报告，胡同志现在已复常态，温度脉搏均没有异状。但是有些人竟要把这件极平常的事，故意说得非常严重，而且还要无中生有的造出许多危词耸听的消息，骇人听闻。这种人的心理，惟恐天下不乱，实在卑劣极了。至于反动份子以及某国报纸，惟恐中国不乱，自然要借这机会，捏造事实，散布谣言，以遂其淆惑听闻动摇人心的阴谋。各位同志应该要看清事实，不要轻易的为谣言所蒙蔽，至中奸计。我们且可由此测验我们主义的基础稳固。因为某国报纸造谣的利害，更觉得我们政治已上了轨道，党员对主义的认识与对公私是非的分明，不会如往年以个人的情感而忘了他党员的责任，以牵动整个的政治，此实足以使帝国主义者为之惊恐不安。胡同志昨日已回到他南京的私邸了。至于胡同志今后的行动如何，今天也应该向大家报告。有一部份人似乎开心于胡同志的行动是否自由。关于这一点，似乎应该有向各位说明的必要。照理说，革命党员个人的行动，谁也不能自由的。就是中正个人的言行，亦无时不受中央与国府的制裁与拘束，绝无自由的余地。总理常常说过，我们所争的自由，是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如果个人要自由，则国家民族就不能得到自由。这是总理常常所诏示于我们的。这些道理，就是胡汉民同志在上一月国府纪念周中讲读遗教时，亦会说官吏与党员是没有自由的，实在是革命的精义。所以一个革命党员，他的思想行动都应该受党的规律和束缚，绝对没有丝毫的自由。党的命令要服从，党的纪律要遵守。进一步说，一个革命党员因为革命的需要，固然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同时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政府，因为革命的需要，也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个人的自由。一个革命党员，不管他在党的地位如何，不管他在党的历史久暂，也不管他负党的责任轻重，都一样的要受党的约束，限制个人的自由。胡同志追随总理甚久，对于总理的遗教有深刻的认识，对革命的大义，当然是会忠实的实行的。他常常勉励同志，要服从总理的遗教，牺牲个人的自由，去争民族和国家的自由。党和政府因为革命的需要，时时刻刻可以限制我们自由的。所以胡同志的行动是否自由，不是甚么重大的问题。一个革命党员，原来就不能有个人的自由的。至于在事实上来说，诸位可看胡同志的文字言行，在各报上仍旧照常登载。由此一端，可知前日一切谣言皆可不攻自破，亦无待本席详说了。胡同志因为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他如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全他过去的历史。中国二十年来，变乱相循，纷扰不止。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政治上的负责者一旦下野，就去租界居住，或到各地捣乱。即使其本人要安居修养，而他左右的环境亦要来群起包围。于是兴风作浪，惹是生非，使社会人心永无安宁之日。而且他自己已往的历史，亦不能保存，甚至于随着身败名裂。这种前例甚多，已是屡见不一见了。我们既然为这些旧同志可惜，所以更为胡同志担心。胡同志在党是有深久的历史，他的革命的历史，乃是几十年奋斗的成绩，不是容易得来的。我们实在不忍见胡同志几十年的历史毁于一旦。所以我们为公为私，都要设法来保全他。因此，胡同志实在以不离开南京为是。中央各同志都是这样想，胡同志本人也是这样想。所以胡同志虽然辞去政府的职务，然而仍是不会离开南京的。总而言之，政府中一个人的进退去留，是一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如果我们自视中国乃为一有纪律有组织的文明国家，则对于这件事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倘若我们自暴自弃，不当作自己国家是一个国家，不当作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以此而大惊小怪起来，就是予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以造谣的机会，这一点各位同志是应该注意的。

（选自《国闻周报》第八卷，第十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5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本年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工作，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

1月11日　胡汉民召集国民会议方案起草委员会开会，审查《国民会议组织法》。胡宣称，召集国民会议的目的在于"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打倒列强政治经济的侵略"，"博采国民对今后政治的意见"。

1月15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施行法》。2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2月19日　内政部为整理全国警政，将公安局改为警察局，省警务处改为厅，分咨各省市遵行。

2月28日　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问题矛盾激化，蒋极力坚持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则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议及"约法"。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指许崇智)、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宁粤分裂自此开始。

3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全文二十一条，规定省府委员七至九人，省府主席及委员不得兼任他省行政职务，省府设秘书处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必要时增设实业厅及其他专管机关。

3月29日　班禅派代表罗桑囊嘉到京，向国民政府各机关呈送信件、公文，接洽班禅进京事。是日罗桑招待报界记者五十余人，报告中藏历来关系，并望国人一致注意，以固边陲。

4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告海内外党部，略谓按本党总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应于本年4月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近因召开国民会议，本党亦要选代表出席，两会不能同时兼顾，特依据总章同条第二项规定，通告展期，俟国民会议完成后再筹办。

4月22日　国民党中央规定庆祝国民会议办法：一、5月5日由各地高级党部召集该地各机关、团体开庆祝会；二、全国各地于5月5日一律悬旗志庆；三、各报于5月5日一律加刊国民会议文字；四、国民会议期间，各级党部要扩大庆祝宣传。

4月24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凡二十八条。该法规定国民会议由各省市之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及蒙古、西藏、海外华侨所选出的代表组织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均得出席会议；设代表资格审查、提案审查及特别审查三委员会；国民会议之决议案由国民政府分别办理。

5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及《首都建设案》，张学良列席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北方治安负完全责任。

5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略谓对内消灭红军，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今后两大主要任务。自今以后，"当积极完成训政建设，凡有破坏和平统一者，皆为国家之公敌"。

5月25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追述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之反共历史，指责汪精卫纠合右派在广州反对政府，破坏统一，"罪大恶极"，望政府同人一致声讨。

5月30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决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告全国民众书》，声明国民党今后的任务是完成训政建设，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红军。

8月25日　甘肃发生政变。该省驻军原冯玉祥旧部现新十八师师长雷中田会同国民党中央派赴视察甘肃之特派员马文车将省府主席马鸿宾扣留。

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晚10时20分，日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制造了所谓"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守备队。

9月20日　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决议三项：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沈阳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

9月22日　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演说，谓日本侵华暴行必将受到国际公法制裁，全国民众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9月28日　国联理事会讨论中日"满洲争端问题"，主席勒乐希望两国"和平解决争端"。施肇基再三请求国联援助，只要理事会规定日兵完全撤出新占领区之日期，中国即放弃国联派调查团入满要求。因芳泽坚持反对，理事会未作出日军撤退的具体规定。

10月3日　全国各地民众抗日运动不断高涨。是

日，南京各校学生停课一日，组织讲演队深入各街巷进行抗日大宣传；天津市民九十一个团体的代表开会，决议与学生工友联合起来，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武汉大学学生赴武汉行营请愿，要求中央对日宣战，并要求行营发给学生义勇军枪械；南昌数千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清华大学停课，进行三周军事训练。

11月9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决议：一、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为京方四全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另二人由代表中推选；二、推定丁惟汾、陈立夫、周启刚为四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另从中央监委中再推二人参加；三、推定叶楚伧为四全大会秘书长。

12月12日　张学良在北平发表宣言，略谓日军事当局诡称东北军对日军发生威胁，纯属造谣，欺蒙世界，并声明若锦州附近有任何严重事态发展，其责任将由日本完全负责。

12月13日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全市市民大会，决议：反对锦州设立中立区；反对共管天津；反对中立国调查团赴满调查；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对日宣战；否认国联对满州问题决议案。

12月22日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八十九人，于右任主席，林森、伍朝枢发表演说。下午预备会议决议：一、推举孙科、丁惟汾、顾孟余、居正、伍朝枢、何应钦、于右任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二、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教育六组；三、全会会期定为五天。

12月27日　南京各界万余人召开拥护和平统一督促国民党中委共纾国难大会，李烈钧、经亨颐、商震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通过"通电拥护和平统一，永远制止内战"；电请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即日到京共主中枢；请中央电张学良力守锦州；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请中央严禁军人干政等多项提案。

12月29日　国民党中政会议定对日外交方针：一、信赖国际公理，防止事态扩大；二、正当防卫，如遇侵犯，则抵拒之；三、将东三省版图确实置于国民政府管理之下，任何时候不得变更。

外　交

2月1日　中苏会议中方全权代表莫德惠自沈阳经天津去南京报告中苏交涉情况。是日莫在天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本人奉命使俄已逾八月，正式会议虽仅开两次，而与俄方代表加拉罕非正式谈判，前后共数十次，双方同意组织中东路、通商、复交三项委员会，并指定专门委员。现在会议已入正轨，今后继续会议，当能顺利进行。

2月18日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外交部长王正廷关于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的报告，决议由外交部与英、法两国交涉，由驻美公使伍朝枢与美接洽，务求短期内解决。

2月23日　莫德惠定24日离京赴沈阳，是日在京招待新闻记者，略谓：中央对俄方针已定，即将赴俄继续交涉，俄方只要尊重1919、1920年对华宣言精神及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各条，会议进行自能顺利。

3月4日　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由沪抵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谈判中日宁汉两案中国赔款问题，议定汉案赔款三十万元，宁案赔款七十五万元。

3月12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驻华代使重光葵会商法权问题，重光提出大纲：一、治外法权为渐进撤废；二、以开放内地承认日人在内地杂居权及土地商租作为交换条件。王正廷主张无条件撤废，决不能承认渐进主义。

3月17日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自北平抵京，谈判中荷法权问题。欧登科称，如各国均愿解决在华法权，荷政府亦愿放弃在华各地领事裁判权。

3月28日　中苏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莫德惠等一行三十二人应苏方代表团长加拉罕电邀赴俄参加中苏正式会议，是日，莫等一行抵达莫斯科。

4月6日　中苏会议苏方代表加拉罕在莫斯科对莫德惠谈，中苏正式会议宜先议复交问题，再议通商、东路两项。

4月15日　日本渔轮潜侵江浙海岸案，外交部向日代使重光葵照会请饬令日渔轮退走，日政府反派员来华交涉，要求维持，我国政府除严拒外，即令海关自5月1日起，令在华一切外国渔轮概行退出我国海岸。

4月23日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分别与挪威公使欧伯、荷兰公使欧登科签订中挪、中荷撤销领事裁判权协定。

6月5日　王正廷在京对各报记者谈外交情况：伦敦购料委员会已成立，英政府已拨庚款三百五十余万镑，将在英国购车辆、机车及钢轨。法权问题，中国方面已告一段落，司法行政部正积极筹备十个专庭及监狱之建筑。外交部本年的主要任务是收回租界，现正积极进行准备。

6月11日　《中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由波兰驻华代办魏登涛与外长王正廷在南京换文，该条约自本年7月9日起生效。

6月22日　外交部为收回租界，前派李锦纶、王家桢、徐谟分别组织公共、英美、法日三租界情况调查委员会，分赴长江、黄河、珠江三流域调查后，已制定收回租界交涉方案。是日，外交部分别照会各关系国派代表协商。

7月7日　外交部就朝鲜暴力排华事向日代使提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制止韩人暴行，同时保留要求赔偿权利。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8月13日　国民政府免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蒋作宾本兼各职，任蒋为驻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任王广圻为驻波兰特命全权公使。

8月22日　外交部就朝鲜暴力排华案照会驻华日代理公使重光葵，提出第三次严重抗议，声明日本政府应对该案负全责，要求日政府正式道歉，处分负责官吏，严缉暴徒，赔偿损失，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

9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议令外交部分令驻外各使馆，对俄籍或无国籍人民来华者，除确有国家证明者准予签证外，如仅有地方许可证者，均不得签证。

9月19日　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同日，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入侵东北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22日　苏联外交委员会正式通知驻苏日本大使及中国代办，声明苏联政府对于满洲方面之冲突不能坐视。

9月23日　外交部接国联理事会紧急通知，内称为解决满洲问题，务请中日政府避免一切足以使事态扩大或足以妨碍和平解决之行为，由中日代表会商切实办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希两国政府能答应此提议。同日，王正廷电复国联，对国联提议表示满意，重申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已严令中国军队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告诫全国人民持严肃镇静态度。

10月6日　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请国联在满洲事件调查范围内加入日军修筑吉会路一项；并向国联声明，日军仍然占据沈阳、吉林、长春、辽源、新民屯、牛庄、安东、抚顺、敦化、凤凰城、昌图等处。至是日止，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正式送交日军侵占东北的文件已达四十一件之多。

10月7日　国民党中政会加推罗文干、刘哲为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同日，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并电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本派大批舰队来华事提出抗议。

10月8日　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递交请求书，请求放还被扣日货，取缔民众反日运动。市政府当即口头驳复，次日又正式致函该领事驳复。

10月9日　国联主席勒乐会同秘书长德鲁蒙分别致电中、日政府，谓东三省与中国其他各处发生意外事件，足令两方感情日趋恶化，解决更加困难，请双方在国联理事会重开以前注意遵守前次理事会所商定彼此约束勿令事态更严重之成约，履行各自在理事会上的诺言。

10月11日　国民政府照会英、美等国驻华公使，请派员调查日军轰炸锦州事件。同日，张学良电施肇基，声明锦州驻军并无扫射日本飞机之事。

10月17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岛为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王广圻兼驻捷克斯拉夫国特命全权公使，张志良为东三省盐运使。

11月2日　外交部将政府所派接收东北委员名单致电施肇基转告国联秘书长；并称中国政府正在履行国联关于满洲问题之决议案，请国联对日本撤兵态度及日军在占领区之行动严加注意。

11月3日　外交部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驳复日本10月31日拒绝商订撤兵细目照会，告以中国政府已派定接收委员会，仍请日政府速派代表共商日军撤退及中国接收之细目。

11月10日　外交部就日军进攻嫩江桥事致牒日政府严重抗议，要求日政府立即制止日军进攻，日军在黑省所造成之损害，应负完全赔偿责任。

11月14日　外交部就日人在天津组织暴乱事向日使重光葵提出抗议复照，要求日政府迅令天津日本租界当局制止一切暴徒，如不幸再有上述情事发生，日本政府仍应完全负其责任。

11月21日　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抗议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并望日政府急速改变武力侵略中国的既定方针，与中国政府所派东北接收委员商定撤军办法及接收细目。

11月25日　外交部就日军集中沈阳西南谋攻锦州，并于22日协助土匪攻击新民事向驻华日使重光葵提交抗议照会，声明："锦州、新民一带，如有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应负重大之责任"。

11月27日　法国驻日大使马戴尔通知日外相币原，谓张学良已向驻平法使声明，准备将锦州驻军撤入关内，并准备设立中立区，警务与民政由中国负责。日政府答复：日本欢迎张学良撤兵，但中立区警务与民政须由中日双方协商，无须外人干涉。

12月4日　外交部在全国各界人士及各地学生坚决反对下，被迫以紧急训令致电施肇基，告以日本向国联所提在锦州设立中立区案不能接受，日军如进攻锦州，我国将不能不采取自卫办法。

12月20日　外交部长顾维钧为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对世界宣言，谓"满洲问题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一国际问题"，《非战公约》、《国际盟约》均受到最严重之考验。

军事

1月3日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令谭道源第五十师及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继续向龙冈红军进攻。谭师在东韶被红军包围，团长黄敬、团附谭济康被击毙，弃步枪千余支，机枪四十余挺，残部突围到南丰。至此，国民党对

江西红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结束。

1月13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原第十一师师长陈诚任第十四师师长，原任第十一师副师长罗卓英代理该师师长；第十四师师长钱大钧调武汉军校任教育长。

1月16日　蒋介石、张学良联名代电，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为陆军第三、四、五、六、七军军长；委任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冯鹏翥、孙楚、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分别为陆军第一至第九师师长，傅作义兼任第十师师长。周玳为炮兵监。至此，西北编遣问题告一段落。

1月20日　蒋介石在京面谕何成浚，湘鄂赣三省“剿共”事宜，统归武汉行营全权办理，并面授“清剿”机宜四项：一、招集流亡；二、实行连坐法；三、扶植自卫力量；四、实行推进办法。并限令各军两个月内务将湘赣共产党完全肃清。

1月27日　蒋介石为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剿共”事宜，特令军政部长何应钦任“湘鄂赣闽剿匪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四省“剿共”部队及武汉、南昌两行营。同日，蒋电令鲁涤平兼任第十八师师长。

2月6日　蒋介石颁布豫鄂皖边区“绥靖”计划，并召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到京面授机宜。

3月25日　蒋介石令各军总指挥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务将各地红军彻底消灭。同日，蒋再令各部队，拿获红军者发奖金；藏匿红军不报者与“匪”同罪。

3月31日　第四路军总部令陶广、陈光中、王东原等各师长督饬所部联合进攻平江、浏阳、铜鼓、万载等处红军孔荷宠部。

4月1日　国民党军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围剿”开始。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之第二十五师及二十七师分左右两路从宜黄、乐安出动，向东韶、小布（今小浦）进攻。同日，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率区寿年、张炎、刘占雄部向宁都进攻。

6月4日　海军部奉令将海筹、海容、逸仙、应瑞、永绩、永健各舰，扫雷舰建康、豫章，练习舰通济，运输舰华安等全部能在海上作战的战舰调往福建，以应付粤局，必要时令军舰占领汕头。

6月8日　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讨论时局，决以“剿共”为前提，全力责成蒋介石在短时期内肃清赣南红军，并认为在蒋“剿共”之际，粤方不至乘机为难。

6月9日　陈铭枢奉蒋介石电召由日本回国，是日抵赣州，召集第十九路军将官训话，勉以维护和平统一，努力“剿共”。同日，陈在赣州通电重任军职，督率第十九路军努力“剿共”。并电陈济棠，劝其息兵，共同“剿共”。

6月11日　蒋介石为入赣“督剿”红军，在总司令部下设党务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专司设计指导各“剿匪区域”的党务及政治。党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中央执委程天放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由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担任。同日，蒋委熊式辉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参谋长。

6月12日　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各党部各民众团体以及陆海空军将领均参加，全场观众达十万人。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至一百五十团，桂军李宗仁部扩编至七十二团。

6月16日　蒋介石拟定“剿共”计划，即一个月肃清，随后立即开始办理清乡，限三个月内完全恢复各地秩序。是日，蒋召集赴赣“围剿”红军的各参议、处长、主任、秘书讨论出发事宜，并分配工作。晚，总部参谋、副官、机要、交通等处人员集合南京下关乘轮出发。

6月21日　蒋介石离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其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剿”，以主力分由南丰及永丰方面进攻，以一部守备吉安、泰和、万安、赣县等地，先击破红军主力，再逐一“清剿”。

7月1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第三次“围剿”江西苏区红军的命令，三十万国民党军即日开始行动，何应钦之左翼集团军赵观涛部、陈诚部及卫立煌部向南城以北地区攻击前进，陈铭枢之右翼集团军上官云相部由永丰向沙溪前进，孙连仲部由招携向宁都、黄石之线推进。

7月4日　国民政府公布《剿匪期内各级行政人员奖惩条例》；任命顾祝同为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该军第一师师长；派焦易堂、刘光华、胡仁源等十二人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

7月21日　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加推邓泽如为国府常委，并特任伍朝枢为最高法院院长，陈融为国府秘书长。同日，颁布《国民政府剿共讨蒋令》，动员第一、四两集团军北伐讨蒋，以与北方石友三反蒋战争相策应。

7月22日　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剿赤军总预备军团总司令”，马鸿逵、孙桐萱、曹福林分别任总预备军第一、二、三军团总指挥。

7月24日　国民政府以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带兵叛乱，反复成性，特下令递夺石本兼各职，着各省市军民长官一体拿办。石所部军队，弃石投新者，中央当一视同仁，甘心附石者，痛加剿办。

7月27日　蒋介石电令何成浚与何键“协剿”湘鄂边红军。同日，蒋又电令在赣前线“剿赤军”各将领，自本月28日起，限一日内将东固、兴国、雩都、瑞金等地红军根据地全部攻克，完全肃清红军。

9月6日　国民政府电令甘肃驻军师长雷中田、兰州公安局长高振邦等将甘省政变主谋马文车拿办，恢复省主席马鸿宾自由，主持省政，胁从人等一概免究；并分电宁夏、陕西、青海省政府及陇东第一路警备司令陈珪璋、陇西第二路警备司令鲁大昌知照。

9月20日　江西红军主力一部向兴国老营盘蒋鼎

文师发动猛攻，另一部向高兴圩毛炳文师进攻，赵观涛师、周浑元师向兴国驰援，激战竟日，双方伤亡甚多。蒋鼎文师退墩田，赵、周两师退守东固。至此，第三次“围剿”结束。

11月27日　日关东军司令本庄令混成第四旅团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三十九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天，迅速集结，出击锦州，进入山海关。

12月31日　日军大举向沟帮子、大虎山等地进攻，驻该地东北军第十九旅孙德荃部、第十二旅张廷枢部及民团义勇军与日军战斗后，向山海关内撤退，该地遂为日军占领。日军距锦州仅四十里。

经　济

1月7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应张学良电邀，由南京启程赴天津，与张商洽北方各省裁厘后军政费用抵补及晋绥军善后费用诸问题。10日，宋在津对记者谈，全国裁厘后损失约九千九百万元，中央办统税五种、特种消费税十九种，各省所受裁厘损失当由中央酌补。

1月8日　财政部令撤销苏、浙、闽、皖、赣、湘、鄂、川、豫、鲁等省财政特派员公署，惟广东、河北两省暂准设置；本月下旬开征特税；特税总局设于南京，各省及商业繁盛地区设分局。

2月4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严惩商店与政府机关交易私给回扣案》及《贪赃惩治法案》，公务员回扣者，以舞弊治罪，共同舞弊之商店，亦以犯罪论；《共产党自首法》因办理大赦案对自首范围发生疑义，交法律组审查。

2月9日　国民政府公布《倾销货物税法》及《民国二十年湖北省善后公债条例》；改组禁烟委员会，任命刘瑞恒、张学良、李基鸿、钟可托、罗运炎、伍连德、张树声、田雄飞、胡毓威、陈炳光、史赞铭、陈绍宽、马寅初为禁烟委员会委员。

2月11日　张学良主持召开的北方各省财政会议闭幕。共开大会十三次，各省区市预算案收支相抵悬殊，议无结果，其他各类决议共七十六案，未决各预算案另提东北政委会取决。

3月3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市商会，鉴于裁厘后改办营业税，各省政府所颁营业税征收条例与商情不符，为核议品类税率妥筹办法，各省、市商会应组织营业税研究委员会。

3月11日　河北省财政特派员荆有岩到南京向宋子文报告华北八省财政会议情形，称“华北因情况特殊，对中央裁厘制度，事实上难以施行，请予暂时便利”。

3月17日　上海钱业公会以现行《银行法》窒碍难行，特通告国内各埠同业，希望一致向国民政府请愿，另订钱庄法。

3月18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所提修改现行出口税则草案原则；决定发行民国二十年短期关税库券八千万元，以补民国十九年度收入之不足。

3月21日　立法院通过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自由卖买；盐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设立、采制；产盐场区及年产量由政府限定；食盐每一百公斤征税五元；中央设盐政署及稽核总所，各地各场设公署及分所，掌管一切。

3月28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管理英国退还庚款董事会章程》；派朱家骅、叶恭绰、王家桢、陈其采、李书华、黄汉梁、程振钧、曾熔甫、宋子良、曾养甫、马锡尔、卜隆、贺耐、端纳、康德利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指定朱家骅为董事长。

3月30日　山西钞价暴跌，社会极为不安。省府主席商震为安定人心，决定将每日收回中签晋钞分批焚毁，并于是日在中山公园将2、3两月陆续收回中签的晋钞二百五十万元焚毁。

4月1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各项特种消费税税率。家蚕干茧、竹、桐油、纸、药材、生漆、麻、干果均抽百分之五；木材、茶叶、皮袭、鞭炮等抽百分之十；锡箔抽百分之二十五；野蚕干茧、棉花、豆、芝麻、花生均抽百分之四。

4月3日　国民政府以前曾明令限于本年1月1日裁撤厘金，另办特种消费税，现恐此项新税沿袭积弊，成为变相厘金，是日下令宣告免于举办。同日又令：各省政府尚有对裁厘命令阳奉阴违，或巧立名目擅自征收各项类似厘金之捐税情事，应责成监察院派员实地查明，呈候惩处。

4月5日　国民政府令总税务司通告上海、汉口、九江、天津、芜湖、山海关、闽、浙、粤、潮、汕头各海关税务司，转令各地五十里内常关于文到之日即停征税，办理结束，所有赔款担保部分俟出口新税则公布后，一律转于出口税收。

4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各省征收营业税大纲及财政部所订补充办法原则，并决定在营业税法未颁行以前，已办营业税之各省，暂照财政部已核准者办理。

4月16日　财政部咨各省市政府，解释征收营业税办法五原则：一、凡厂或公司已纳统税或其他捐税者；二、凡未营盐业已由中央征收盐税者；三、凡未营烟酒业已由中央征收烟酒牌照税者；四、凡交易所由中央征收交易税者，以上四者，各省均不得再抽营业税。但各营业商店仍须交营业税。五、凡营业证应贴用印花税票，资本在五百元以下者，每证一角，资本在五百元以上者，每证五角。

4月18日　财政部长宋子文电国联秘书处，谓奉蒋介石令，决定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统筹规划全国一切经济建设事宜，拟请国联各专门组为顾问，派干员来华协助委员会工作。

4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民国二十年江浙丝业公债条例》，定额八百万元，年息八厘，4月15日发行，每半年抽签还本付息一次，共七年六个月全部付清。

5月7日　国民政府公布《海关出口税则》，自本年6月1日起施行。该税则共列商品二百七十种，分六类。最高类征税百分之七十五，最低类征税百分之五。茶叶、丝绸、茧、蜜饯、花边、绣花、图书杂志、报纸、草帽、石膏、漆器、伞、包装用品等免税。

5月16日　财政部令全国各海关代理征收一切统税，原统税机关驻海关办事处一律裁撤。

5月18日　中国银行公布1930年度营业情况，该行活期存款余额为四万万一千六百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十五元五角六分，定期存款余额为六千九百六十八万八千九百零二元三角，获纯利二百零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元七角七分。

5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盐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自二十年五月十八日起再予展限六个月。

6月20日　实业、外交、财政三部会商保护沿海渔权办法，决议：制定取缔日渔轮侵入我领海捕鱼办法，除由海关派员巡查外，再由外交部照会日使；实业部7月1日执行取缔日轮办法。

7月18日　立法院会议，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万案、韩案情形及交涉经过。决定交付审查，并指定王用宾等六人为该案审查员。同日，立法院秘密会议通过《民国二十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债额二千万元，由财政部主管发行，8月1日开始发行，至民国三十年7月底还清本息。

7月22日　外交部照会驻华日代理公使重光葵，请其转饬即将万宝山日警撤退，并谕令韩农一同退出。同时声明：万宝山非韩人垦居区域，韩农与郝永德佃种契约应根本取消，农民所受损害，应责成补偿，至契约内补偿问题，由特派员钟毓与驻日领事商洽处理。

7月31日　外交部照会日使馆，以东三省日侨无理要求停止大虎山、通辽间中国铁路运输，东三省日侨“自主同盟会”提议封锁沈海铁路交叉点，并反对撤废领事裁判权，拒纳中国政府规定的四项统税，促日当局切实注意，采取适当处置，免生纠纷。

8月1日　财政部制定扶植新闻事业办法：一、不征收报馆或通讯社营业税；二、印报用纸，凡系外国进口，分别减免税率，如系国产，一律免税；三、由国库提出指定款项，补助全国新闻事业；四、国际通讯机关由政府倡办。

8月8日　国民政府公布《河南省民国二十年善后公债条例》，总额三百万元，年息八厘，分十次还清本息，每半年一次，8月10日发行。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公布《蒙古盟旗组织法》。公布《民国二十年江苏省运河工程短期公债条例》，该公债总额五百万元，于本年11月1日发行，年息八厘，票面按九八折发行，分五年偿还本息。

11月9日　伪辽宁地方维持会财政整理委员会决议，废除木植、票照等六种税捐，出产税、豆税、油粮税、茧丝税等减半，田赋等八种直接税拨归县、市自治会自收；借此推行所谓“善政主义”，为筹建伪满洲国张目。

11月11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选任施肇基、钮永建为国民政府委员。发布实现团结之通电。同日，临时全会闭幕。

11月15日　全国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主席蒋介石。何应钦报告军费状况，宋子文报告财政状况。决议：一、军费每月不得超过一千八百万元；二、党政费每月不得超过四百万元；三、除每月不敷一千三、四百万元应由公债抵补外，不再发公债；四、政府全力巩固各公债信用；五、竭力提倡国内实业。同日，该委员会发表紧缩预算宣言。

11月18日　铁道部制定建筑国道计划，第一期先筑京桂线及京滇康线、京藏线、闽新线、绥新线之一部分，约长一万六千里，计划六年内完成。所需费用，计划以全国汽油税、汽车牌照税及汽车夫执照费之收入除应抵拨公债基金外，其余专供筑路用。（按：全国公路民国十五年仅二千里，到民国十九年已有五万一千多里。）

12月1日　财政部拟定取缔现银出口办法，令各海关及上海银行公会照办。该办法规定由银行公会组织登记现银调查团，各银行各商家即日起将现银出入用途、存储数按日汇报银行公会；海关严厉检查，外运之银如无护照证书，一律扣留归公。

12月24日　东北财政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兼任委员长，王克敏为副委员长，执委张振鹭，常委臧式毅、周大文、荆有岩等。

文教

1月8日　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冲在京对各报记者谈考试问题，略谓欲使国家吏治澄清，“必须拔取专门人才，服务专门之事”；自本年起，将实行各种考试遴选官吏。

1月9日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在上海举行年会，董事长蔡元培、董事胡适、蒋梦麟、司徒雷登等九人到会。会议以该基金至1945年即将用完，为预筹财源，决议

凡以后从该基金中取款时，提存三分之一作将来基金。并决议为资助北京大学的革新事业，每年捐助二十万元，以五年为限。

1月16日　教育部公布《华侨中、小学规程》，令驻外各领事转饬所属中、小学一体遵行。

1月21日　国民政府据考试院呈以《考试法施行细则》业经公布，自民国二十年起，所有各省呈请举行考试，应一律停止；各项考试概由考选委员会按照需要，随时呈考试院核夺施行，是日训令行政院转行所属知照。

1月30日　教育部训令国立各大学、专科学校暨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各公、私立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规定军事教育修习期为二年，每周三小时，各校校长应亲自负责指导，认真办理。

2月4日　训练总监部决定在南京、汉口、北平、辽宁、广州各设陆军中学一所，招收初中毕业学生，每校每期二百至五百名，并议定学制大纲、组织条例及毕业后派往东、西洋各国陆军大学肄业办法。

2月7日　教育部派顾树森等为整理中国公学临时委员，该校所有非法团体一律解散，前发各教员聘约停止发生效力，开学延至3月1日，所有职员另订聘约，学生入学手续另俟布告。

2月11日　教育部训令整理北平大学，办法为：一、女子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合并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二、俄文法政学院自本年起逐年结束，不再招生，暂属北平大学；三、艺术学院照前令切实办理结束；四、女子学院自本学期起改称女子文理学院。

2月22日　考试院长戴季陶由港抵沪，对记者谈，考试院现拟对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省所举行的各种考试录取人员加以复核，及格者给予文凭，北京政府时期之各种考试及格人员不能承认。

3月1日　中国语言文字学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之宗旨在于研究中国语言及文字之种类问题，研究政府公布的国语罗马文字，提倡上海、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兴化、厦门、汕头、广州客家及其他处之罗马字为注音之用，并提倡广用注音符号。

4月5日　亚洲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高丽、印度、暹逻、安南、缅甸均有代表参加。中国代表黄绍美任主席团主席，并致开会词，称：该会最近的任务是"宣扬亚洲文化，发展亚洲文化"。

4月28日　教育部颁布《乡村小学充实儿童学额办法》及《繁盛都市推广小学教育办法》，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遵行。

5月28日　清华大学教授、学生掀起反对校长吴南轩风潮，指责吴："大权独揽，不图发展校事"，要求吴立即离校，请教育部另简贤能主持校务。29日，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议驱逐吴南轩，由学生会电教育部请改任周诒春为校长，新校长未到任前暂由教授会维持校务。

6月3日　教育部公布修正学校休假规程，本年8月1日开始实行。第一学期为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第二学期为2月1日至7月31日。暑假专科以上学校以七十天为限，小学以五十天为限，寒假各类学校均为十四天。年假三天，春假七天，孔子诞辰（8月27日）、国庆（10月10日）、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中华民国成立（1月1日）、孙中山逝世（3月12日）、革命烈士纪念日（3月29日）、革命政府纪念日（5月5日）、国民革命军誓师（7月9日）以上各日均休假一天，并开纪念大会。

6月6日　京沪教育界三百余人在中央大学庆祝教师节，决议：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规定6月6日为教师节；组织全国教师联合会，推选邰爽秋、马客谈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

6月25日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举行落成典礼，由馆长蔡元培主持，到中外来宾二千余人。新馆址占地七十余亩，建筑费七十万元，建筑师丹麦人莫律兰，采中国宫殿式，书库容五十万册，阅览室同时容二百人。现藏普通中文书籍一千四百余种，十四万三千九百余册，蒙文书籍七十六种，三千七百十三册，以及外文书刊多种。

7月15日　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在南京开场。参加者共二千一百人。其中或为大学毕业生，或为委任官三年以上，为取得资格，以图进身者均去投考。

8月20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孙本文在中央广播电台报告"近三年来全国大学及专科学校概况"，称全国根据大、专学校组织法办理之公、私立大学共五十八所，专科学校二十七所。

9月12日　国民政府令：商震、耿翼翘给予一等宝鼎勋章；公布《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任用规程》及《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规程》。

9月24日　国民党中央公布《义勇军教育纲领》，规定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组织童子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纲领。

10月18日　国民政府令教育部通令南京各学校整饬学风；又令各机关禁止公务员参加民众抗日运动。

10月24日　教育部核准四川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三校合并，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

11月2日　教育部转发训练总监部拟订之《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通令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各省市教育厅局遵行。

12月11日　特种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关于各地学生请愿事宜由该委员会负责办理，其他教育方面之重要设施，由该会决定原则，交教育部处理。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2年

导　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蓄意挑起武装冲突，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奋起抵抗，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开始淞沪抗战。不到2个月时间内，击毙日军1万余人，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不予任何援助，抗战失败。五月五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中央军委下达攻取赣州作战命令，在城内守敌和城外援敌配合下，攻城部队陷于被动地位。战斗历时三十三天，给国民党军队以一定杀伤，但红军也遭受很大伤亡。

三月一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由汪精卫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恢复军事委员会，并推蒋介石为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从此开始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合作共管党的局面。

三月九日，伪满洲在国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日本为躲避国际舆论指责，抬出清废帝溥仪任临时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就日本侵占东北事件正式向国联"申诉"。国联批准组成五国调查团调查日本侵略东北事件，以李顿为团长。调查团公然袒护日本，企图以国际共管来取代日本独占，遭到全国人民反对。

蒋介石为加强法西斯统治，于三月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镇压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活动。其核心是黄浦军人组成的"力行社"，专门设有特务处，残杀中共党人和民主人士。

红一方面军在四月发动攻克漳州战役，占领漳州，歼敌大部，俘敌2000余人。漳州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闽西苏区，对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地区有重要作用。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十月上旬于江西省宁都县举行扩大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以王明为代表的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解决临时中央和毛泽东在反"围剿"军事方针上的分歧，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通过这次会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于1935年3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实行"宪政"，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鉴于汪精卫和蒋介石没有出席，决定组织中执委常委会为中央政治常务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会议确定了"安内攘外，兼顾两难"的国策，再次强调对红军围剿。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赣州战役**
- **●宁都会议**
- **●“一·二八”淞沪抗战**
- **●国联调查团来华**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 **●伪满洲国成立**
- **●中华复兴社成立**
- **●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赣州战役

背景介绍

赣州战役是 1932 年 1 月至 3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赣南进行的一次攻城战役。1932 年 1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指导下，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企图攻占赣州后进而夺取吉安、南昌等城市，争取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1 月 10 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攻取赣州的训令，规定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闽西军区的七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后增调红五军团参加攻取赣州的作战。一月下旬，红军向赣州城下开进，随后开始攻城作战。但是赣州系赣南中心城市，三面环水，地形险要，又有坚固设防，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据城顽抗，红军于 2 月 23 日和 3 月 4 日两次实施爆破攻城都未成功，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一、第十四师约二万人又增援赣州，3 月 7 日红军被迫撤出战斗，向赣州以东以南地区转移。这次战役，因在指导上未能正确估计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攻有敌重兵固守的中心城市，结果以失利告终。

材料：

- 回忆攻打赣州
- 红一方面军赣州之败

材料一　回忆攻打赣州

一九三二年三月间，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去攻打赣州。赣州城三面环水，是个易守难攻的坚城。从当时来说，攻赣是错误的。参加攻赣的有三军团、五军团的十三军、一军团的三军。十三军是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新编不久。辖三个师，即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三十八师，政委刘型；三十九师，政委慕容楚强。凡师以上军官和司务长均是我们派去的。这次攻赣州，十三军三个师都去了。开始，三军团的六师用炸药爆破南门，未打进去。后来，十三军从赣州城的西南面攻城，当我们三十七师攻入城内时，埋伏在城脚下战壕里的敌人就从我们的背面打来。这样，我们的三十七师腹背受敌，师政委欧阳健同志牺牲了。这时，十三军的另二个师（三十八、三十九师）从外围打进来，三十七师从内打出来，消灭了敌两个团左右。这次攻赣未胜，三军团的三师长候中英同志被俘了。敌人在城内仍有二个师的兵力，加上陈诚、罗卓英的援军已到，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攻赣部队只好撤围赣州城。

部队撤围赣州后，毛泽东同志在江口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一军团的三军军长徐颜刚、政委蔡会文，三军团的彭德怀、滕代远、张纯清、邓平，五军团的李振同、肖劲光、刘伯坚。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围城打援还是攻坚，碰不碰赣州这个钉子。毛泽东同志是一贯主张围城打援，不赞成攻坚。会议决定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决定一军团、五军团和七军（这时的军长是李明瑞，政委郭跃山）沿赣江东岸向粤北发展，三军团沿赣江西岸往北发展，打通与井冈山的联接。会议结束后，各军按会议决定行动。

（选自《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作者：何长工）

材料二　红一方面军赣州之败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共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共临时中央颇受鼓舞，头脑热了起来。

1932 年 1 月 9 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

胜利。”

周恩来是在1931年12月中旬进入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一接到中央的决议，就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凭借这几年跟蒋介石多次交锋的经验，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办量远比红军强大，攻打这几个中心城市，势必会失败。”

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就复电中央：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24岁的代总书记博古一心要打下一座大中城市作首都，将来作为中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不察战场形势，不问敌情我情，在回电中蛮横地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中共临时中央已经算是退了一步，因为南昌属大城市，而抚州、吉安、赣州属中等城市。

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

没有办法，周恩来只好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来决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项英、任弼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等，列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

会上讨论的主题已经不是打不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因中央一定要打，所能讨论是在抚州、吉安、赣州3个城市作出选择。

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的10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相比之下，只有赣州守军较少，且与周围驻军关系不密切。所以，很快就转到了打赣州的问题上。

毛泽东在会上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一定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调动敌人，打野战，打运动战。”

军委主席朱德也反对打赣州。

项英极力主张执行中央决议，并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时，我问过彭德怀，能不能拿下赣州？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旅有6000人，地方靖卫团2000人，共8000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来的。”与会者多数附议项英的意见，最后表决，多数通过打赣州。

这是执行王明路线决策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

应该站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势力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要任务上，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地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

于是，彭德怀被任命为攻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打赣州”，便轰轰烈烈开始了。

“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都刷上了这样的大字标语，到处喊起了这样的口号。

2月4日，红一方面军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城下。

彭德怀的攻城部署是：以第七军（军长李明瑞、政委葛耀山）和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担任主攻，第一师（师长侯中英、政委黄克诚）位于沙石埠为预备队，第四军之第十三师（政委张际春）位于塘江及其以北地区监视可能增援赣州之国民党军，并截击可能由赣州北逃之敌，第四军之第十师（师长王良）第十一师（师长周昆，政委张赤男）及第三军团之第三师（师长彭鳌、政委徐策）分别位于南康、新城、杨眉寺及王母渡地区，阻击可能增援赣州之粤军。江西军区、闽西军区共6个独立师以游击战配合。红军总兵力为1.4万人。

2月4日至6日，受领任务之各师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地区进抵赣州附近。到处涂写巨幅标语，“夺取赣州，活捉马昆！”“只杀马昆一人，不杀守城官兵！”。

彭德怀原以为可以一鼓而攻下赣州，不料，一打才知赣州是块硬骨头，“啃”不动……

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座落在章水和贡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东南侧是陆地。四周城墙坚厚，高约7米，守敌长期设防，易守难攻，俗称“铁赣州”。赣州又是粤赣2省的重要军事重地，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都想占领这个地方。毛泽东极力反对打赣州，不仅因为他吃过打长沙、攻南昌的“苦头”，而且他在两年前——1930年3月中旬，也打过赣州，当时他一看赣州易守难攻，迅即下令红军撤围。他有过这一系列亲身经历，所以认定打赣州非输不可。

驻守赣州的国民党军为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滇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辖六十七、六十八2个团及1个独立连，共3000余人。正规军之外，尚有赣南17个县地主武装组成的民团5000余人枪，由民团头子萧升犀指挥，协助守城。马昆见红一方面军声势浩大，经反复考虑，撤守东门外的天竹山和白云山，将城外防御工事毁坏，缩短防线，撤兵进城，建立火力点，构筑工事，挖掘坑道，以固守内围，等待援兵。实战证明，马昆的缩短防线、固守内围的方针是正确的。

赣州城池坚固，不炸城墙，难以攻克。彭德怀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东门。

围城一周后，红一方面军以坑道爆破攻城。红一方面军当时没有重炮，只能用这种办法。攻城部队全靠手工进行坑道作业，条件十分艰苦。敌人发现红一方面军挖掘坑道后，疯狂地向坑道口扫射。指战员冒着弹雨，在狭窄的作业面上，3人1组轮番昼夜操作，终于把坑道伸展到城下。

2月13日和17日，红三军团两次组织红七军和红二师用土硝、木炭、生铁块制成的土炸药包爆破攻城。红

七军曾炸开了东门月城的城门洞，由于敌人火力封锁严密，伤亡很大，两次突击均受挫。

23日，红三军团组织第一次总攻。这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攻城战斗。9时，主攻南门的红二师组织了1支200人的突击队，由第五团团长叶长庚指挥，预先埋伏在城墙脚下。由于药量计算不准确，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员被压在城墙下全部遇难，待重新组织后续部队攻城时，因敌火力复活，又未得手。红一师爆破队炸塌了西门月城左角城墙，乘机向城内猛冲，遭敌密集火力拦阻，激战1小时后撤回。主攻东门的红七军，在东门月城右侧爆破成功后，在3米宽的突破口附近与敌展开激烈争夺战，一度攻上城楼。敌旅长马昆指挥部队疯狂反扑，突入城内的红军与敌激战4小时，大部壮烈牺牲，一部撤下城楼。为了解除红军突上城楼的威胁，马昆亲自指挥从城楼上用绳索吊下迫击炮弹，撞击城门洞石板铺成的地面，产生猛烈的爆炸，造成攻城部队很大的伤亡。第三次攻城又告失败。

这时，红一方面军中有两个投敌，这两个人是南昌起义时被俘的滇军，一个姓唐，原是排长，一个姓马，原是上士，曾在马昆手下干过。他们向马昆报告说："3天以内，红军将第四次爆城，已装好3个炸药包，东门外的城墙将全被炸毁，正在调炮兵上来配合攻城作战。

马昆获此情况后，连夜火速进行部署，决心弃守旧城墙，构筑新城墙。他不顾百姓的死活，悍然下令将东门内整条铁匠街房屋全部拆毁，并强令每户做一个沙包，构筑一条新的防御工事。当时赣州布店的布匹，不分颜色全被买光。有的老百姓无钱买布做沙包，就用裤子扎成沙包送到阵地。当夜，第二道新城墙就筑好了，成为新的战斗屏障。

鉴于此，彭德怀、腾代远马上致电中革军委，指出："攻城希望很小。"

中革军委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1日，中革军委总部移到赣州前线，直接指挥作战，并向部队发出了《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同时，重新调整部署，增调原在石城、瑞金地区整训的红五军团参战，命令第五军团、第四军担任配合攻城、截击援敌、阻敌突围等任务。

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红军战士书》，号召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下最大决心进行持久战争拿下赣州"。

当日红三军团组织第二次总攻。拂晓，红七军以3个棺材炮(用土硝、木炭、生铁块制成的炸药装在棺材里引爆，称棺材炮)去爆破。

当第一个棺材炮点燃时，药烟冲天，但没有起爆。

这时马昆手下的一个亲信营长李自林大喊："共产党倒霉了，炸药包丢了，第五连前进，占领原有城墙。"当他带领第五连到城墙根时，另外两个炸药包连续起爆，泥土砖石横飞，炸开东门城楼和左右两侧城墙60多米，李自林和他带领冲锋的第五连无一幸免。但马昆率部坚守新的防卫工事，红军连续4次冲锋，付出很大的代价，仍未攻入城内。战斗进入相持状态。

何应钦见赣州危急，下令第十八军3个师和2个独立旅，统由第一师师长罗卓英指挥，从吉安出发，经遂川到达赣州的对河，集结在赤主岭。由于沿江上下游都被红一方面军封锁，无法渡江，马昆夜间由北门用绳索吊出城外，偷越临时浮桥，跑到赤主岭去见罗卓英，商议解围之策。

马昆提出："解围不一定要大部队渡江。支援我2个团和1个工兵营，再补充些弹药，我从城里可以突围出来。"

罗卓英照准，派1个工兵营连夜随马昆由北门浮桥偷越进城，又令十一师三十三旅旅长黄维率2个团跟进，秘密潜入城内，受马昆统一指挥。马昆指挥工兵用1天1夜工夫在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挖一条出城坑道。

3月7日凌晨2点，马昆带2个团从东南角坑道冲出，黄维带2个团从西南角坑道冲出。围城红军连日作战疲劳过度，处于沉睡状态，仓促应战，城外敌军一部由西南面的杨梅渡、南桥间渡过章水，从侧后配合，夹击固守南门到西门的红三军团第一师。

红一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听到枪声大作，急忙叫醒正在酣睡的师长侯中英，他们判断是敌人开始发起攻击了。黄克诚和师长急忙去组织部队抗击。但外边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部队的建制指挥已开始发生混乱。红军在敌人内外夹击之下，受到很大损失，不少部队被冲散。

黄克诚一边收拢部队，组织抗击，一边用电话向上级报告所发生的紧急情况。他建议下令红一方面军各部队迅速组织撤退，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但上级重申不准撤退，就地坚持。

当局面变得更加危险时，在师长侯中英等陷入敌人重围之后被俘遭杀害的情况之下，黄克诚冒着抗命的风险，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乘夜指挥第一师余部撤到城南关，抢占山头，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激战中，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军赶到，在天竺山、白云山一线以大刀同敌展开肉搏战，掩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已成定局。毛泽东的预言，被一个多月冷酷的现实所完全证明。红一方面军在攻城中伤亡惨重。

(选自《天下第一军》，作者：魏在田)

宁都会议

背景介绍

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奉命从樟州千里回师北上。8月，后方中央局与前方领导人对打不打南城问题发生分歧。中央局不满意前方领导人决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筹款的主张，要求按临时中央给予指示，将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并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联名致电中央局，一再说明：在现有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25日，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要求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26日，周、毛、朱、王再电中央局，说明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训令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我军的战略任务以及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做了部署。中央局认为训令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部署。”

由此，前方的周、毛、朱、王于25日、26日和30日，三次提议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30日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4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

会上，“左”倾领导人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以及乐(安)宜(黄)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还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并无视周恩来提议，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责主持战争责任”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材料：

- 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无情打击
-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
- 宁都会议始末
- 免职、复职——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前后

材料一　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无情打击

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在宁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有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

宁都会议竭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和批评“积极防御战略”，在政治上讨论临时中央7月份要求红军“积极进攻”的长信，在组织上讨论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从“左”倾盲动的“积极进攻”战略出发，总结这年二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工作，对几次战役作出错误估计，并错误地批判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和红军主力早应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

对于攻打赣州问题。在宁都会议前8个月，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曾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赣州，毛泽东一开始讨论时就不赞成。后来知道前线红军久攻不下，后被敌人援军反包围，伤亡严重时，他又顾全大局，中止休养，抱病下山，建议起用红五军团，并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共商解围之策。在红五军团的猛力进攻下，红军主力安全撤围。攻赣严重受挫，事实已经说明，夺取强敌防守的中心城市的“进攻战略”是错误的。宁都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该攻打赣州。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并非战略、战役方针有错，“攻赣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这样，把未攻克赣

州、反受严重损失的责任，归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上了。

对于如何估计攻克漳州问题。赣州之役结束后不久，1932 年春，周恩来在长汀组织领导、毛泽东在前线指挥红军东路军攻克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漳州。这一仗打乱了蒋介石调动粤军进犯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筹集了大批款项和物资。实践证明，打漳州是正确的。可是，中央长信指示却说："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宁都会议主要从战略方向上提出指责说："进占漳州曾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关于发展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早在 3 月中旬赣县江口苏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并且把红一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斥之为"守株待兔"。会议"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同时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作会议结论：中央局全体会议"一致接受中央指示信"和"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指出：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敌人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后方同志"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少注意"，但"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
会后，后方同志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不满："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会议讨论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问题。

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后方同志以"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为由，"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提议取消"最高军事会议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上，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会议经过相当困难的讨论，因大多数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区中央局会议上就主张，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方志敏苏区逐步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大块地区，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造成较为巩固的阵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而会议未予采纳。但毛泽东仍坚持这个发展战略方向，后来在给项英的信中曾提出早应向赣东北发展的批评。项英在讨论中揭发批判了这个问题，一些人也指责这是"向偏僻区域发展"、"上山主义"、"东北路线"等。会议《简报》是这样写的："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

会议还批评前线同志从实际出发，在取得乐安、宜黄胜利后不硬攻南城而改为发动群众的正确部署。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指责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批判毛泽东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开始讨论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方针指示电时，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结合前线实际作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的报告，解释前方致后方的电报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的基本观点。这是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前线客观情况的。事实上，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也是在 4 个月以后的事。

但是，后方来前方开会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表现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说他的报告连"积极进攻"的字眼都没有。后方同志更集中地反对毛泽东的所谓"等待敌人来进攻的主张"，指责他公开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方案。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周恩来去看望即将离开前方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将去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并说："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开完才几天，苏区中央局依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就改变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10 月 12 日，由中革军委发出通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 26 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这样，就解除了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尽管不断受到指责、排挤和打击，但仍坚持正确原则，不赞成"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询问时说："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可见，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进攻路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于是，临时中央把毛泽东坚持正确原则提高到路线上来批，并进一步从组织上剥夺他的一切工作权利。11月发的《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泽东在长期斗争中尤其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一套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加以批判，要"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把执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指挥员和干部指责为"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要加以排挤和打击，以扫清推行"进攻路线"的障碍。"指示"还特别明确说："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否则"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这就是说，临时中央不仅否定宁都会议决定毛泽东"必要时到前方"助理军事指挥，而且又否定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撂在长汀福音医院里闲了起来。

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会同苏区中央局一起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采取既使用又批判的方针，即"对于毛泽东同志，需要最大限度的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以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中央局的领导之下，担任负责的工作。"对于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他们采用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办法，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3年6月上旬，博古在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也可说第二次宁都会议），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认为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恰恰是受猛力攻击的"训令"中预定战场上取胜的，于是在会上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被否定，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又一次病倒。宁都会议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路线，进一步打击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党、政、军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选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作者：黄允升）

材料二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

1932年10月上旬，宁都，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次贯彻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精神的会议。也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斗争的产物。

披着战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刚从首府瑞金赶来的中央局其他领导同志坐在一起，讨论着红军行动方针和发展方向等一些重大问题。

会议开始，从后方赶来的中央局领导同志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行无理的指责和错误批评，"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几乎被"左"倾冒险主义控制，形成一边倒的局势，对毛泽东发起了凌厉的攻势。

这时，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在前线，未能赶来出席会议。

持"左"倾冒险主张的人把红军撤围赣州归罪于毛泽东等人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把红军撤围南城，分兵做群众工作，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战场的行动，指责为"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候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批评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把毛泽东据理表明自己的观点，指责为"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主张毛泽东"专任政府工作"。

许多同志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时，经过深思熟虑的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斗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早在1931年4月中旬，王稼祥就以中央代表团员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此后，他一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职。这次他力排众议，出语惊人，完全出于革命利益的需要。

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的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鹊无声，静得令人不安。

一位持"左"倾冒险主张的参会者打破了沉默，用嘲讽的语气对王稼祥说："我看你的高见，除了毛泽东本人外，未必有人支持。少数服从多数，你不会不知道吧?!"

王稼祥稍稍涨红了脸严肃地说："少数当然应该服从多数，不过多数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在我党历史上以及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

有好心人提醒王稼祥，不要再犯那种立三路线时反对中央决议的"错误"了。

王稼祥说："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当时的意见本身并没有错误，倒是在组织纪律上确有错误。这次情况不同，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个人意见，这是合理合法的。"

这时，周恩来赶来参加了会议，他与王稼祥同样据理力争，坚持请毛泽东留在前线"负主持战争责任"。于是，会议形成了一个折衷方案——周恩来留在前线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作"助理"。

会议结束后，后方中央局改变了宁都会议决定，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仍调毛泽东回后方专作政府工作，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的最后一点军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

毛泽东由警卫员扶上他心爱的黄骠马。周恩来、王稼祥把他送出宁都城。

临别时，毛泽东握着王稼祥的手说："你和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就也同我一样，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右的，……哈哈！"毛泽东话没说完自己就笑了起来。

（作者：邹书春　选自《党史纵横》）

材料三　宁都会议始末

红军撤围南城后，敌人为抑制我军北上，集中了约二十个师的兵力，企图与红军主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继续采取攻城或围城打援的战略，显然都于我不利。前方指挥机关及时把握敌情的变化，并采取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在八月底致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并转鄂豫皖、湘鄂西分局电中，即明确指出敌人的战略已有变化，目前正注重于固守城镇，因此我们不应攻打敌人重兵守备的坚城，而应诱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致苏区中央局并转湘鄂西分局的另一电中，重申了这一指导思想。但是，苏区中央局无视敌情的变化，仍然坚持红军攻打敌人固守的坚城或急于向敌人主力出击。因此，在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同前方指挥机关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八月二十八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前方，对红军撤围南城的正确决策极为不满，认为未占领南城是没有取得"圆满胜利"，撤围南城是错误的，不同意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要求红军主力绕至乐、宜一带迎击准备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二十九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里塔圩发出《红一方面军对部队部署训令》，决定："我军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赣东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决心首先打击敌人之一翼，即远道东来的敌军——陈诚部，乘胜掩击崇仁会合之敌，再行相机进取，以求得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红军依令向宜黄行动，在宜黄遭敌袭击，乃撤至广昌、宁都、东韶一带集结休整。由于苏区中央局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一度处于被动局面。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反复陈述不能与强敌作战的理由，认为在"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则慢"。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提出"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以此行动"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九月二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前方，对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表示反对，不顾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不利于我的情况，仍要求红军"积极的出击敌军"，并要红军对重新占领乐安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吴奇伟师立即"给予打击"。二十六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陈述不能攻打乐安之敌的理由："乐安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

前方指挥机关抵制了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向强敌出击的错误意见，决定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以创造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条件。九月二十六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正确地分析了敌人"围剿"苏区的策略，指出敌人的行动计划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进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的准备着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很快的向中央苏区实行大举进攻"。基于这一正确分析，训令确定红军在乐安、宜黄、南丰地区分兵工作，以十天为一期，其任务是："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训令对反"围剿"决战的战场作了正确的预测，认为："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这一训令体现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形成的正确的作战原则，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勾画了一幅胜利

的蓝图，但却遭到了坚持"左"倾错误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九月二十九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错误地指责红一方面军九月二十六日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九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向红一方面军转发中央来电，表示不同意二十六日训令的部署。同日，中央局又电告周、毛、朱、王："坚决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布置"。在这期间，在宁都的小原召开了红军军事及政治工作会议。为了解决苏区中央局与前方指挥机关在反"围剿"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分歧，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下旬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和发展方向，并解决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于是有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召开。

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左"倾的指示精神，对一九三二年二月红军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曾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宁都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会议虽然肯定红军攻占漳州"有很大政治影响"，但又错误地指责漳州战役"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红军在乐安、宜黄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乐宜战役后分兵工作也是正确的，但宁都会议却错误地认为"乐宜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对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九月下旬作出的分兵赤化的正确部署，宁都会议却从"左"的方面指责在南丰、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这样，宁都会议就对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正确领导下半年多来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都从"左"的方面给予了否定。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左"倾指示精神，把红一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说成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要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宁都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同苏区中央局所推行的王明"左"倾错误的政治军事战略长期斗争的总爆发。在这次会议上，推行"左"倾错误的同志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批评，"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推行"左"倾错误的同志却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提出由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意见，坚持要毛泽东"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亦在前方负责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又以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为由，要毛泽东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即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十月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导和控制下召开的宁都会议，是继赣南会议之后又一次具有严重错误的会议。它错误地批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排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了进一步贯彻，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造成了极大困难。但由于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支持毛泽东正确战略方针的周恩来、朱德等仍在红军中担负主要领导责任，又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斗争提供了胜利的保证。

（选自戴日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材料四　免职、复职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前后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撑腰而上台。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路线"王明向全国各地派出诸多"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其中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团，正式名称叫做"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顾作霖和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被赋予的使命是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并参加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要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取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因此，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在中央苏区的主要活动，也就不能不集中反映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

既打又拉

1931年4月，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一行3人化装成商人，带着四中全会的文件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转江西，来到了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墟。

他们一到，就立即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为苏区中央局在这3人到达前刚开过扩大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又叫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作了关于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提出了对于富田事变的意见。会议按照代表团的意图，通过了5项决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关于CY工作的决议》。这些决议除了表示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外，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工作进行了许多违背实际情况的指责，武断地说当时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对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对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做批评与纠正"，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实行"改造"与"充实"。

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开始贯彻，同时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开始否定。但是，根据王明的旨意，对毛泽东还要拉一把，使其站到他们一边。再说，这个时候，蒋介石军队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军事上的反"围剿"还要依赖毛泽东。所以，他们暂时不但没有采取排挤毛泽东的组织措施，反而在这次会议后让毛泽东接任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起初成立苏区中央局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未到任时由项代理)。与此同时，任弼时兼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顾作霖兼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全盘否定

毛泽东并不是王明所期望的那种一拉就过去的人。他出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经常在党的会议上阐明自己的正确主张，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在红军作战问题上，毛泽东常常说服大家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策略，按照正确的作战方针行事。结果，在毛泽东指挥下，在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又接连取得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的声望与日俱增，王明对他的忌恨也与日俱增。

这年的8月30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向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发出了"指示信"，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严厉指责毛泽东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根据这封信的精神，从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县叶坪村，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主持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这次会议除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外，还分别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红军问题、关于苏区工会运动、关于青年团工作等决议案。这些决议完全是否定和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各种正确主张的，给他扣上了一大堆帽子，其中主要有：

"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富农路线"——对抗王明和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搞了"以人口平分"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政策；

"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对抗王明和中央关于"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实行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搞的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这次会议集中火力猛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后提出："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由此，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仍然由项英重新担任此职。同时，又根据王明的电报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中统率各军"，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这样，就把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免掉了。

这时，项英在名义上是党在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权力却完全操在了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手里，代表团成了中央苏区真正的权力核心。

但是，这时王明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还是留有一点余地的。按照王明给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交待，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仅隔一天，于11月7日召开的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王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明考虑到他们在中央苏区还没有完全站稳，拥护他的人并不多；相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有一批坚定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同时，王明还没有完全放弃把毛泽东拉过去的幻想。

坚决支持

赣南会议之后，王明到莫斯科去了。而这年的12月底，周恩来来到了中央苏区，就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的代理书记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不顾赣南会议刚开过，就到瑞金东面的东华山上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他还不顾毛泽东因反对和抵制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攻打赣州的指令而再次受到严厉批评，据理力争，恢复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并同时成立了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这个最高军事会议，名义上是周恩来任主席，实际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

周恩来到了前线，由留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

这样，随着毛泽东军职的恢复，苏区中央局前方与后方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就开始了。由此，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也开始了分化。

在红军作战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前方与后方领导人的分歧越来越尖锐。周恩来提议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加

以讨论，后方领导人又拒绝。无奈，为了确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前方领导人置后方的错误意见于不顾，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向部队发出了《训令》。这样，后方领导人不得不同意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

在宁都会议上，前后方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有临时中央的支持，后方领导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右倾主要危险”，提出要再次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时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就在这时，王稼祥站了出来，讲了一番使与会者大为吃惊的话。

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看法的客观性，王稼祥又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志、老同事甚至同乡……”

最后，王稼祥旗帜鲜明地反对撤销毛泽东的军职。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正当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之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了会场。为了避免中央局的分裂，又要让毛泽东能参与指挥作战，周恩来作了艰苦的说服工作。会议最后决定“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虽然这实际上仍然是要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却又为周恩来必要时请毛泽东回前线留下了余地。

宁都会议之后，任弼时在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认为排挤毛泽东是不对的。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这一组织形式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此时的任弼时，对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进一步排挤打击毛泽东，进一步推行宗派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由此，他也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王明路线不力，同样也受到了排挤，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职务，改任湘赣区省委书记。

就这样，被派往中央苏区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的成员，除顾作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外，王稼祥和任弼时都在实践中先后摒弃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站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张良友　选自《党史文汇》95年2期）

“一·二八”淞沪抗战

背景介绍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馆派驻上海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其信徒共五人故意向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人义勇军抛石挑衅，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僧人死于日本医院，乃指使数十名暴徒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破坏，煽动日侨集会、游行、捣毁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三名。日本驻沪总领事于20日向上海市政府发函抗议，提出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尽管上海市政府函复日本总领事馆，表示完全接受“四项条件”，但日军仍于28日夜二十时，在闸北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自动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迫于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激昂情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2月8日、23日两次致电全体参战人员，称赞其“忠义之气，照耀天日”，“节节抗战，所向无前”，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以竟全功”，并拨款犒劳抗战将士。为加强抗战力量，军政部任命张治中兼任第五军军长，统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与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淞沪抗战的进行，得到了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上海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等纷纷组成各种义勇军、敢死队，或直接参战，或开展战地服务工作。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义勇军，也活跃在淞沪战场上，运送弹药、粮秣、参加救护工作，慰劳部队。上海各界人民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据统计，在淞沪抗战期间，海内外同胞共捐给十九路军七百余万元。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鼓舞下，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英勇奋战，迫使日军不断增兵，三易主帅。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仍然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淞沪战事爆发后，1月30日，仓皇宣布将国民政府机关迁洛阳办公。何应钦又迭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何应钦甚至密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

3月初，日军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强行登陆，驻沪日

军同时发起总攻。第九师团进入大场，第十一师团进占浏河。中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严重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地，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

3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议中日双方实行停战。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结果，于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域。依照这一《协定》及其附件的规定，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英、美、法、意等国为维护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促成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妥协，还设置"共同委员会"，以"监视"《协定》的"履行"。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又答应取缔抗日活动，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派往福建"剿共"，这就背离了蓬勃兴起的中国抗战运动。

材料：

- 一月二十八日夜
- 防守太仓简记

材料一　一月二十八日夜

由于预知日军图谋进犯，故我军也在各个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至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两方对峙之态势，已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上午九时，从横浜路附近的日本小学校，调来二百几十个海军陆战队员，继续与我们对峙着。江湾路的日军司令部附近，也有日兵四五十名，机枪三挺，向我江湾方面警戒。我军也密切注视事态之变化，因为在这一两天，日军当局曾一再声明将采取"必要的手段"，以实现他们的五项要求。

但是，这时却出现一个在转折，把我们脑海里准备去接受一场血战的幻影统统一扫而光！下午三时，我们接戴司令的一封密电：

1. 奉参谋部长朱、军政部长何感午参电开，统密，查上海闸北一带防务，已令派宪兵一团，即日开往担任，所有该地之第七十八师部队，着即移驻真如、南翔，希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又准宪兵谷司令感午电开，已派宪兵第六团准于明(二十七)日晨到沪接防各等因。

2. 第七十八师第六团应即遵命将闸北一带防务，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收，俟防务交替完毕，即移驻真如或南翔附近。

我当即将上述命令转饬第六团团长张君嵩遵照办理。

张团长一看这命令显然感到愤慨。因为这时日军进犯的企图更加明显了，日军司令部附近警戒更加严密，并配备了五辆铁甲车和三十几辆马达自由车，呈现进攻姿态。窦乐安路口也置有机枪四挺，武装马达自由车十余辆，士兵三四十人。同时日本小学的海军陆战队也增加到三四百人，日侨纷纷从闸北区域搬出；租界当局因觉察事态严重而于下午四时宣布戒严。日本的便衣队等更四出活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时二十分，张团长用电话报告，已遵令依原配备，饬各营进入阵地；另饬第三营营长吴履逊派兵一连防守宝山路，协同驻北站的宪兵第一团之一连，及铁道炮队，固守北站，为我军左翼据点。并报日军已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车站一带集合。我当即告诉他说："好好准备，杀敌机会快来了！"

十一时三十分，在寂静而又紧张的气氛中，忽然听到一阵极清亮的步枪声，接着便听到密如连珠的机关枪声。……这时又接到张团长的电话："日军已开始向我们攻击了！他们由虬江路、广东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用铁甲车掩护，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打吧！不许退走，守住原有阵线……"

这便是战斗的开始！

我一方面令第六团奋勇作战，一方面令第五团准备增援。

战争打响约莫半个小时，混乱的激战渐渐稳定，枪声一阵阵加密。这时大部日军，以铁甲车数辆掩护，由虬江路、宝光路、广东路等处向我正面阵地进攻，横浜路、天通路、青云路等处敌军，约莫六七百人，也以几辆铁甲车掩护，向我们阵地冲锋，来势极为凶猛。日军跟在铁甲车后，从容不迫地前进。

我军士兵初次看见日本侵略军，一个个眼睛都红了。想到这是侮辱我们的国家，欺凌我们四万万同胞的敌人，现在又来屠杀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大家忍不住愤怒高喊："杀哟！杀哟！……"卟卟卟卟……，一阵机枪扫射之后，眼看敌人仓皇失措，随后一个个倒了下去。……

铁甲车在突然停下片刻之后，又冲过来了！五十码、三十码，……一排手榴弹雨点一般地飞出去，一阵巨响震耳欲聋，一团团烟尘飞腾起来。铁甲车这时转了头。惊慌失措的敌人，争先恐后，抱头鼠窜。卟卟卟……，我军的机枪又活跃起来。刹那间，在阵地前面，敌尸骸枕藉。……

当时，我们在战报上写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令人惋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缴获敌人的铁甲车，只是炸坏了两三辆。

同日军初次的交战，使我们发现："我们的士兵不可思议的勇敢，而敌人却出乎意料的懦怯！在这次战斗中，我第五团第一营第二连下士班长潘德章，当敌人在广东路街口用铁甲车冲锋时，他沉着地用机枪扫射，击毙数十名日军，后来一颗敌弹打中了他的左臂，他仍咬紧牙关继续射击，终使敌人人狼狈而退。同连上等兵伍培、伍全兄

弟二人，在闸北宝山路奋不顾身地和敌人肉搏。他们左冲右突，见一个刺一个，刺毙约十几个之后，终为敌人所害，而敌人比他们多十倍！第三连中尉连附谭绍平和上士班长张桂林，在闸北宝山路宝源路口，当敌人冲来时，他们酣战如狂，在击倒十几个敌人之后，自己也受了伤。同伴请他们退下，他们却反而冲上前去，终于在一阵敌方的炮火之下，以身殉国。其他如第二营第五连连长钟国华，第三营第八连少尉连附（忘其名），都在截击敌人的铁甲车时，表现出特殊的勇敢。其他奋勇杀敌、慷慨牺牲的英雄事例不胜枚举。

我们预料，日军经过一次挫折后，必将发动更加凶猛的冲锋。这时，除正面力量足资支撑外，我又另调驻在江湾附近的第五团第二营，推进至江湾前的劳动大学附近，并由该营派出一连至八字桥，对敌人作佯攻之势，以牵制敌方兵力，同时掩护在天通路、青云路一带的第六团第二营的左翼。

突然，敌铁甲车直冲过来，突破了我军阵地，将我士兵分成两截，我士兵非但誓死不退，反而跑上前去，向车上抛掷手榴弹。为了炸毁敌人的铁甲车，他们不惜自己粉身碎骨；此情此景，真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有时敌铁甲车猛冲过来，他们毫无畏色，从容地将一颗颗手榴弹抛向跟在车后的敌人。有的敌人冲到了眼前，他们便端着刺刀冲上去肉搏。以致到后来，敌人就是有铁甲车掩护，也畏缩成一团，不敢前进了！敌铁甲车一连冲锋五六次，都无法将我阵线冲垮。就这样一次，二次，三次……，我军伤亡虽重，但敌之伤亡更重。最后，我先后炸毁敌铁甲车五辆，敌军冲锋才被迫停止。

在危急时，第一营的预备队也被调来增援。我遂占领各路口商店楼上，用机枪向敌射击，并向下抛掷手榴弹，给敌以极大杀伤。但在敌军狼狈退走时，我军也不追赶，一则因是深夜，二则自身损失也确实不小，最可痛惜的是，机枪连连长张金山和该营营附陆彬均在这一战役中阵亡。张连长和陆营附都是我军最勇敢的份子。陆营附在中弹后，仍继续前进，口里在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了几十步，才猝然倒地牺牲。张连长被敌弹射中臂部后，仍负痛指挥，大呼杀敌，直至不能支持时，才仆倒于地。

与此同时，天通路、青云路、横浜路等路口我左翼阵线，也遭受敌人猛烈攻击。敌军人数约在五六百左右，同样用铁甲车掩护冲锋。经过几次肉搏之后，青云路和横浜路两处路口我防御工事都被敌铁甲车冲毁。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便此时，我战士并没有退走，他们敏捷地攀登到两旁的屋顶上，继续用手榴弹和猛烈的枪弹阻止敌军前进。横浜路医院和光明玻璃厂都是最扼要的据点。敌在遭受相当死伤后，纷纷向来路退却，他们误以为中了我军埋伏，不敢恋战。我恢复阵地后，又重筑起防御工事，依险据守。

各处的枪声，疏一阵，密一阵。敌人虽然不再一次接一次地猛烈冲锋，但仍企图以猛烈炮火将我压退！我军则乘机进行更坚强的布署，在虬江路附近配置两门迫击炮，归第六团第一营营长利长江指挥；在青云路也配置两门迫击炮，归同团第二营营长吴康鉴指挥；另外又令第五团团长丁荣光派第一营（缺一连）开赴闸北，归张君嵩团长指挥。第一营于二时许到达嘉兴路。由于该团第二营死伤甚众，兵力单薄，张团长便令丁团第一营在宝兴路和横浜路一带接防；第二营则向左面缩短防线，警戒天通庵路和青云路两处。旋令新开来的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熊彪，将一连的兵力并配机枪一挺，接防宝兴路，右方与第六团第一营联络，其余的兵力均留作预备队，控制于中兴路附近。这时我想，日军决不会就此罢休。因此，约莫三时，我便下命令第五团团长丁荣光，把该团第三营全部率来闸北增强兵力。丁团长于三时五十分率兵抵达青云路，令第三营营长陈德才，将兵力增至青云路至八字桥之间，右翼联络第六团第二营，左翼联络原驻守八字桥之一连，张团长又将所属第二营，拨归丁团长指挥。这时丁团长的阵地是从宝兴路口，沿天通庵路、青云路，直至八字桥一线。这种布置是很恰当的。整体布署完成之后，我军严阵以待，准备迎战敌之主力部队。

除正面战线外，这时仍有少数敌人在盲目地攻击，其他方面均转归沉静。我军在正面的力量是可保无虞的。

二十九日晨四时四十分左右，敌开始出动飞机。他们对我阵线投下炸弹和燃烧弹，但命中率很低。我阵地未受丝毫影响。炸弹大多落在民房上，倏忽间，广东路、横浜路和宝山路一带的商店民房纷纷着火，并迅速蔓延开来。我军这时一面积极应战，一面派人救火。然收效甚微，东边的火扑灭了，西边又烧了起来。

在几次战斗中，我阵地有失而复得者，特别是天通庵车站为争夺之要点，最初车站曾一度被日军占领，少顷，当我第五团赶到后又夺了回来。此外，广东路口等处阵地，也一度被敌铁甲车所突破，由于我军苦战不懈，终于迫使敌人退却，并遭受重大损失。为了对付日军拂晓时发动总攻击，我军必须有相当后备部队以资调遣。但是我们这时我第五、六两团之兵力，已全部投于前线阵地。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师长，请求加派后备兵力。师长遂令第一五五旅第三团第二营归我指挥，该营于七时左右抵大场待命。为了振奋士气，便利指挥，我留镇闸北第六团部，并随时出外巡视各处工事，勉励士兵。并令参谋主任丘国珍暂在大场指挥新到的第三团第二营，策应后方。

这时天已微明，敌机又在天空出现，肆无忌惮地侦察和投掷炸弹、燃烧弹。我阵地除在湖州会馆内的军警联合办事处中一弹，第六团第一营营部中一弹外，其余都中在民房上，引起猛烈的火灾。我高射炮和步枪、轻机枪，先后

对空射击。据报，敌机两架受伤，一中机翼，一中机身，但都安全遁去。

在猛烈的粉火和轰炸之后，敌又以铁甲车为掩护，出动千余人向我们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锋，妄图占领北站。在宪兵退去之后，我北站兵力十分空虚，张团长急调该团第三营营长吴履逊率师部(缺一连)预备队，布署在虬江路口和宝山路口等处，兼顾北站方面。我正面阵地极为坚固，加上士兵屡次抵抗获胜，极大增强了自信心，越战越勇敢，越坚定。因此，在敌人的猛烈炮火和冲锋下，仍能沉着应战，毫无惧色，直到敌人气尽力竭时，又转守为攻。自开战端后，眼看不少战友壮烈牺牲，不少战友遭受残害，士兵们对敌人都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坚守在阵地上，没有一个先行退走。有的甚至在长官下令撤退，宁愿违背命令，仍继续坚持作战，直到击退敌人，或者壮烈殉国！冲锋时，他们争先恐后，发狂呼大喊，肉搏时，他们目眦欲裂，奋不顾身。

战斗最激烈时，适值宪兵第六团第一营从真如赶到。我即令他们归张团长指挥，并令该营营长李上珍率所部赶赴北站，完全占领，另以一部占据附近洋房，据险死守。这样，我几濒危急的右翼据点才得以恢复！

这时，正面阵线炮火仍然猛烈，日军一次接一次地向我冲锋，每次照例是先来一阵猛烈的炮火和轰炸，接着是以铁甲车掩护步兵。这样反复六七次之后，直打到下午一时左右才沉静下来。在这次激战中，敌死伤二百余人，我们伤亡一百多人，无辜平民被炸死炸伤没有确数。我还牺牲了一位勇敢的上尉第六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林玉。他被子弹射中头部，当即身死；所部战士义愤填膺，反守为攻，使当面之敌不支而退！

第六团第一营第二连二等兵宋德洪，射击非常准确。他在虬江路与强敌对抗，一连击毙十几名敌人。敌军纷纷溃散时，他一跃而起，去缴敌军的枪械，冷不防被一个受伤的敌人所袭击。在负伤之后，他仍将敌人击毙，拿回一批枪枝。

还有一个连长，在酣战时，兴奋得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一直向前冲去，奇迹般地竟没碰到一粒子弹。……

下午六点时，我接到师长转达的军长命令，将第六十师第二团第一营归我指挥。该营于六点三十分赶到闸北，由我拨归张团长指挥，在宝兴路附近各阵地增防。同时，中央铁道炮队也从后方开回北站附近，当即配置于共和新路路口附近，警戒北站西南一带，掩护我右翼阵地。

七时三十分，敌约一百人，向八字桥附近之日本玻璃厂发起进攻。我守军一排用机枪向敌扫射。战争仅持续十余分钟，敌便向天通庵路方面退去。其他阵地也有小的冲突，敌死数人，其余均溃散。

八时左右，我接到军长电话说：敌人托英、美各国领事出面调停，要求停战。我尊重各国领事的请求，已予应允，着我前线兵士停止射击。我即转令各团：

1. 奉军长蔡电话，着即停止战争。

2. 如敌不向我攻击时，除严密监视外，应即遵令停止放枪；倘敌来攻，务就地扑灭之为要。

这时，全线虽奉命停战，但敌小部队仍不断向我各阵地进袭。我官兵当然不会示弱，给进攻之敌以回击。事实上，敌人这种举动，不过是出于怯弱，他们担心我乘虚进攻。我军恪遵上方命令，只要敌不来犯，我亦不主动出击。至十时，战争又急剧而起。

从这天拂晓敌机参战，狂轰乱炸以至引起极大火灾。敌军又在广东路、横浜路和宝山路一带纵火焚毁民房，火势凶猛，终日不熄。我原有阵地前后，几乎全被焚毁。火焰所及，使士兵难以立足，只得将阵线向后略为移动。不料敌却以为有隙可乘，于晚十时又大举来犯。我官兵深知敌之狡诈，虽在暂时停战期间，我们亦未曾稍懈戒备，除一面奋起迎战，一面即令大场参谋主任丘国珍率第三团第二营开抵闸北待命。基于浏河未见敌踪，故将守备浏河之一连调回。丘参谋主任十一时先行赶到，第三团第二营官兵于午前(三十日)一时，开赴闸北太阳庙为总预备队，驻嘉兴殡馆，浏河之一连则在午前二时归回原营。

激战一直持续到拂晓，北站和虬江路一带炮火最为猛烈。然双方阵地并无变化。敌舰也向我开炮，通宵达旦，然未对我造成重大损失。仅天通庵和青云路一带战事稍安。

(摘自《淞沪血战》翁照垣)

材料二　防守太仓简记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我团奉总指挥蒋光鼐命令，着我团自真如徒步至南翔，转乘火车至昆山，再徒步经太仓增援浏河，并限三月一日下午五时以前到达浏河。我当即遵命率部于当日下午四时到达南翔。由于敌机骚扰，白天不能行车，直到夜九时半始行开车，南翔至昆山仅有五十余华里，但因车行速度过慢，至夜十一时始到昆山。三月一日晨七时，即率所部取道太仓向浏河前进(太仓距昆山三十六华里，距浏河亦三十余华里)。上午十时半行至太仓时，宋希濂已率部退至太仓。宋是第八十七师旅长。我即命部队在西门外停止待命，自己进城向宋报告我部是奉蒋光鼐命令增援浏河的，并向他询问前方情况。宋说："浏河业已弃守，现在不能前进。"我即回西门外团部，用电话将浏河业已弃守和宋旅至太仓情况向总指挥部报告，并说明我团暂留太仓待命。当时城内情况很乱，我部未进城，即在西门露营。天黑时，又有第四十七师一部开到，据说是一个团，我没有见到带队人。当天晚上，我又去宋的旅部，对宋说："太仓不能放弃，要守太仓，就要守六渡桥之线。"我又说："宋旅长有三团人，我只有一

团人，我愿意和宋旅长各负一半防守责任，你认为哪里较危险，即交给我防守。"宋说："我们明早开一个军事会议来决定好吗？"我说好，这样我就回来了。

在当夜三点多钟时候，第四十七师一部分部队即在西门街抢了一家皮鞋店后拉走了，天明时宋旅亦全部开走了。我当即追至湖川桥，将宋追着，我说："宋旅长你怎么开走了？我们太仓就不要了吗？"宋说："我奉到命令要我开常熟。"（当时我并没有说留下任何部队守备太仓。）我无话可说，只好回到西门外，将宋旅撤走情况向蒋光鼐报告，并向他请示太仓究竟还要不要？蒋说："你的力量不够呀！"我说："我不管力量够不够，我来就是准备牺牲的，牺牲了就算尽了我的责任。"蒋说："那很好，你就相机进驻太仓吧，不得已时你就退巴城。"这样，我就率部进入太仓城。但这时太仓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保卫团长都已走了，商店大部分关门，老百姓亦多数逃走，只有一位电话局赵局长还在城内。我和赵联系后，即请赵转请他们回来。我即率部至六渡桥一线构筑工事，向敌警戒。布置妥当后，即由中校团附何自坚留在前方负责，我于晚间回到城内。这时公安局长、保安团长、商会会长均已回来，我就和他们开了个小会，向他们说明我决心坚守太仓，但我的部队全部放在六渡桥（距城十二华里）一线，城内治安须请公安局和保卫团负责维持；一面请商会通知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一定要开门，否则没有饭吃如何作战。商会会长当即表示：前方所需物品保证充分供应。次晨（三月三日）所有商店全部开门，秩序很好，老百姓亦陆续回来。我于三日下午回到六渡桥前线。四日上午十时敌即来犯，但人数不多，仅百余人，打了三个多小时，在下午一点多即行退走。五日又来，人数稍多一点，但还是打了几小时就走了。

这样连续打了十八天后（在约是三月二十三日），军长蔡廷锴到太仓前线来视察，同来的有英国驻苏州的总领事、法国大使馆参赞以及一些其他外交人员和几位高参。他们是上午九点多钟到达太仓的，这时前线还正在打，我一方面恐怕发生意外，另一方面当时法国人是同情日本的，我亦不愿使法国参赞了解我布置情况，所以没有同意外宾到前线，只是蔡和几位高参到前线看看。蔡看后对我说："你的兵力太单薄，要增加些部队。"我说："有部队增加当然好，没有部队增加也没有关系，我估计敌人是不会作重大牺牲来夺取太仓的。"下午三点多钟，蔡和外宾等就回去了。

过了三四天，第七十八师第六团张君嵩团开来太仓协助，我们又继续打了二十多天。有一次敌人来了约一个营兵力猛攻，经我们两团协力痛击，敌不支溃退，还遗下两具尸体，以后也就未再来犯。这两具敌尸在淞沪协定签字后，敌人来向我们要，我们不给他。后来他们说："你们中国还有二十几个活人在我们那里，你们还我们的死尸，我们放你们的活人。"这样，我们才又把死尸挖出来由太仓公安局夏局长送往上海交换。四月下旬张团调往后方整补，又调第六十师第四团杨昌璜团来填防。在卖国的"淞沪协定"签字后，我们在七月间全军开往福建。在我们离开太仓时，太仓人民还办一个"三一"纪念馆纪念我们。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联调查团来华

背景介绍

九一八事变前，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了"不与闻满洲事变"的纵容政策，企图让日本通过东北去进攻苏联。可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武装占领了整个东北，而且在1932年初继续向锦州进攻，扣华北大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行动，破坏了列强在中国的均势，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日本外务省，声明："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力……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这就是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在这一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把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希望寄托于英美控制下的国际联盟。

1931年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理事会上，建议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国际联盟一开始，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主张双方撤兵，消弭战火。而日本政府在侵占东三省的过程中，也竭力阻挠国联派遣调查团；至其对东三省的占领，已为既成事实后，便转而同意此举。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议决，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英国的李顿伯爵、美国的麦考益中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德国的希尼博士和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李顿为团长。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和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参加调查团工作。

调查团于29日抵东京，3月14日抵达中国，4月21日至6月4日往东北调查了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7月20日在东北起草报告书。调查团在七个多月活动中，会见了中、日双方的政府首脑以及伪满洲国傀儡溥仪，汉奸郑孝胥、张景惠等。东北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向调查团送达书信函件一千五百五十余件，陈述事变前后所见之事实。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名《李顿报告书》）于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首都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三地，同时公布。

国联于1932年12月12日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

国家参加的“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了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书中仍坚持不应侵犯领土主权、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观点，于1933年2月24日的国联特别大会上，以四十二票对一票获得通过。但日本政府竟于27日声称：国联特别大会通过的报告书，“以九一八事件当时及其后日军之行动，独断为非自卫权之发动”，“漠视‘满洲国’成立之真相，而否认帝国承认该国之立场”，并通告以退出国联相威胁。

材料：

- 日本对调查团的接待说明
-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报告书通电

材料一　日本对调查团的接待说明

帝国政府为迎接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一行，任命驻意大利大使吉田为参与委员，其随员有：

大使馆一等书记官　盐崎观三
公使馆一等书记官　堀内干城
公使馆二等书记官　林出贤次郎
大使馆二等书记官　森乔
外务省事务官　吉富正臣
步兵大佐　渡九雄
炮兵中佐　澄田四郎
海军大佐　佐藤市郎
外务省事务嘱托　贯部根康吉

日本政府有关各省磋商决定为帮助调查委员理解并认识中国及满洲问题，事先准备好关于满洲事变前日中纠纷事件的说明文件和有关资料，向调查委员提供。主要是陆军省，在陆军大臣同调查委员会谈中，其根本方针是坦率地阐述帝国对中国问题的真正意图，尤其要暗示帝国对满蒙问题的坚定决心。特制定如下会谈要纲：

陆军大臣同调查委员的会谈要纲

一、维护远东和平，发扬东方文化之精髓，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为创造新文化而奋斗，借以为世界人类永久的安宁和幸福作出贡献，此乃明治开国以来始终一贯的帝国对外政策之根本方针。

二、过去，帝国在远东问题上，或同各国合作，或独自采取各种对策。其间，偶而在表面上也曾出现矛盾，但这完全是由于远东政局，特别是中国和俄国政情变化而导致的必然现象，同上述根本方针决无背戾。尤其对中国，为贯彻上述方针，对于该国进行健全的国家建设曾寄予极大的同情。或同各国合作，或以睦邻之谊给予真诚的援助，今后也将始终不渝。然而，中国自民国革命以来，执政者频频更迭，而彼等执政者在革命的过渡时期，又都迎合各种内部情况，收买群愚之欢心。其结果，以恶意对待旨在稳定政局的帝国之善意援助。对此，帝国深表遗憾。

目前，中国的舆论机关几乎全部被官方所控制。而此等舆论机关的对日无礼甚至诬蔑之言论，甚嚣尘上。此诚然是以日中共存共荣为信念的帝国无法容忍之事态。帝国希望尽快使此种不快之言论不再出现。

（摘自《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

材料二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报告书通电

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早已向全国的民众们宣告：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它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的主要任务，便是计划瓜分中国与镇压中国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一切革命运动。

现在帝国主义强盗联盟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瓜分中国的报告书已经发表了，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而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完全同意接受的！

李顿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明白地宣布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华北、上海是正当的不得已的行动。号召各帝国主义都来瓜分中国，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就是要更残酷来进攻中国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来消灭满洲义勇军的反日战争、全国的反日、反帝运动与抵货运动。无耻地主张满洲应作为“自治国”，设立国际宪兵，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去积极向苏联进攻。同时用一些“宗主权属于中国”等名词，来企图解除中国民众反帝的武装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再三命令国民党更要积极地去进攻红军，更忠实地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更努力的镇压反帝运动、抵货运动，凶残的去屠杀中国民众！

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苏维埃政府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区、进攻苏联的新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武装保护苏联，建立中国劳苦群众与苏联亲密的联盟。

苏维埃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宣言，要真正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压迫民族战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完全忠实地拥护接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告书，承认作为谈判根

据，国民党各派政府一切的讨论研究及口头上对报告书某几点之不满意，无非是掩饰它出卖中国的面具、欺骗中国民众的把戏。国民党宁肯将东三省、上海及整个中国送给帝国主义，而对于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实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工农红军，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和协助之下，动员百万的兵力来进攻，企图消灭真正反帝、民众的苏维埃政府，阻止红军及反帝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同时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满洲的义勇军，压迫全国反帝运动，制止抵货运动和工人的罢工，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以效忠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我们才能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苏维埃政府正在领导全国的工农红军和苏区的广大劳苦群众，残酷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胜利地去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革命战争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国民众们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推翻帝国主义走狗的国民党统治！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的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实行民族战争的民众武装！

全国的工农红军战士、苏区的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们！积极的进行革命战争，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坚决进攻来粉碎第五次的"围攻"！白区各地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劳苦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举行罢工，进行抵货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斗争。一切的革命民众们！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摘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临时迁至洛阳。1932年3月1日至6日在洛阳举行第四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全会讨论了上海战事，决定对日方针，并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以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居正、顾孟馀为大会主席团，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汪精卫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共78人，蒋介石未出席。会议通过了恢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后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并推蒋介石为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还通过了《剿匪根本对策》，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誓就职，从此开始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合作共同管党的局面。

材料：

- 开幕词
- 慰劳淞沪抗日将士电

材料一　开幕词

各位同志、各位来宾：

今天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此开会，正值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初搬到洛阳之际，各种事情未有妥当，各种头绪还待整理；而前方的武装同志，则正在枪林弹雨里头，使我们不断的听见炮声，看见阵亡夷伤的惨状。所以今日在此开会，是显然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正因为现在国家危急存亡之关头，故此各位同人不惜放下自己重要的职务，从远道跋涉而来，以求共同担负当前困难及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在此开会，必须得有良好的结果，然后不虚掷宝贵的光阴。现在兄弟想先将此次开会的意义，向各位作一个概括的报告。

此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议决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前次第一次会议，是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自从一中全会之后，一个月以来，我们正在进行精诚团结，而国难则日加严重，到了一月三十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决定迁到洛阳办公，当时林主席同兄弟已经通电将此事的经过报告。因为日本一方面以海陆空军猛攻上海，一方面派大批军舰开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签字于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事机是非常危急，如果错过了，则将至挽救不及。所以我们即日开紧急会议，决定迁至洛阳，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使职权。政府搬到洛阳以后，由中央常务会议追认此事。因为迁都的事情，关系非常重大，所以我们希望再由全体会议加以追认。至于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期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这种重大问题，是有开全体会议来决定的必要，这是此次会议的第一意义。

第二，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已在军事的时期了。我们抵抗日本的横暴侵略，虽然自己知道我们财政和军备上未必能及得敌人；但是我们在不可避免之时，要有最大抵抗的决心，运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奋斗，我们有了这种决心，则必应有相当的准备。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出兵东北，因为不抵抗的结果，二十四个钟头之内，便丧失了辽宁、吉林两省数千方里的土地。但今年的淞沪方面的军长，因我能够决心奋勇抵抗，在三十日的苦战期中，可以不失尺寸的土地。这种事实，是表示虽则我们的力量未必及得日本，但我们已经有抵抗的决心了。我们知道，日

现在还要继续派兵来中国，因为他有商船运兵，有兵舰掩护商船，所以他派兵来中国是很容易的。现在他已经开有六师的军队到来，所以中国方面亦应该有陆续增援淞沪的必要。以前因为军事的秘密，有些人不明白此种情形，但现在的事实，已经使大家知道我们陆续增援淞沪了。在现在的情势之中，我们是需要有统一的军令，充实的军备，和整个的军事计划。那种问题，是关系非常之重大的，所以我们来开中央全体会议，以决定军事的方案，来指导武装同志在艰苦危急关头中进行。至于现在国难时期，我们相信无论那一省、那一部的军队，都断不会先有保存实力、保存地盘的问题，而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反置于后。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决不能容许他存在于中华民国之内的。（鼓掌）

第三，是外交的问题。此次日本侵略中国，破坏了国际联盟条约、华盛顿九国公约及海洛格非战公约，在公理方面我们是有最充分的根据的。不过在强权方面，我们是缺乏力量。所以我们现在根本是要抱定抵抗决心，同时亦要注意到外交方法，但我们决不空唱高调。对于各国的调停，如果在不丧失国家人格、损害国家主权最低限度之下，我们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超过这个最低限度，则我们只有死力抵抗。现在两天之后，三月三日国际联盟便开在会，讨论中日的问题，现在外交部和外交委员会已在努力进行，但一切外交上的方针，仍希望由此次中央全体会议决议，来作他们的指南。

第四，是财政的问题。在前次一中全会之时，我们就已经知道中国的财政是异常困难了，不独全国的行政经费没有着落，而且军队中的饷食亦没有继给。自从二月上海战事发生以来，因为上海是金融的枢纽，所以财政上的困难，更达于极点，幸而上海的战争激动全国人士的义愤，其结果是通过了从来所做不到的延付公债本息的议案。虽然如此，但现在财政上仍然是十分困难。而财政的问题，实为持久抵抗的关键。所以我们需要开此次全体会议，以求解决今后财政困难的方法。

如此看来，我们知道此次全体会议的任务，是非常之重大的，除了定都的问题之外，军事、外交、财政各种问题，均须在此解决。此外还有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件事，我们知道现在日本对于中国虽无宣战之名，而有战争之实。因此我们只有在正当防卫的意义上，从事抵抗。战争在所不避，然战争的胜利，不是专靠军事的力量，同时还要将整个的民族意识领导起来，将社会各种力量组织起来，然后军事上能得最后的胜利。日本人以前在国际联盟诬蔑中国，说我们是没有组织的国家。根本国联的规定，以为这种没有组织的国家，是不配受国际联盟的平等待遇。这种说法，真是对于我们绝大的污辱了！我们要湔雪这种奇耻大辱，则我们必须使中国的组织更臻于完善！现在中国要与日本抵抗，我们自己知道不但物质不如敌人，就是组织亦不如敌人，但我们有民族意识的存在。虽则物质条件非一时所能补救，但国家的组织，社会的组织，是精神的条件，整顿改良，全在自己的决心。所以在此次全体会议中，我们要决定本党的组织及全国组织的方案，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国家是到了一种最严重的时期了，所以我们此次的会议，是负有最重大的任务。上述的各种问题，均须在此解决，以使全党的同志、全国的同胞得所遵守进行。在现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当中，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汪精卫）

材料二　慰劳淞沪抗日将士电

（一）

上海吴市长转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张军长并转全体将士鉴：

自暴日狂驱陆海空队，挟其利器，凌迫淞沪以来，已逾一月，我淞沪武装同志，奉命守土，秉总理精神教育之遗训，为民族生存而牺牲，喋血赴难，视死如归，肉搏冲锋，昼夜无间。总理以忠义仁勇之精神勉吾子孙，吾同志必誓死发挥之；吾祖宗以庄严灿烂之山河贻吾子孙，吾同志必誓死保障之。淞沪将士已舍身以赴之，中央决倾全国一切之物力人力以继之，为国家争生存，为国际公约谋保障。此次变更战略，部勒整肃，闻报之余，尤殷切念。中央愿与我将士，申以明誓，与共生死。大会本此意旨，于三月四日敬向阵亡将士默念志哀。吾将士为国奋斗以致死伤者，交国民政府分别从优议恤外，特先电慰。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支（三月四日）

（二）

分送蒋总指挥憬然同志、蔡军长贤初同志、张军长文伯同志、戴司令孝悃同志及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各师、旅、团长同志及全体武装同志均鉴：

本日下午三时，全体会议开会之际，接诵江（三日）午来电，聆悉之下，感痛实深。此次我武装同志在沪淞一带抵御强暴，保护疆土，于国家民族实有极深之影响。去岁九月十八日东北边防军以不抵抗之故，二十四小时以内丧失两省之土地，今则以抵抗之故，以淞沪一隅支持至三十余日之久。使全国之内处处如此，人人如此，日本暴力安所得逞。且也第十九路军先发于前，第五军踵至于后，无日不在枪林弹雨中，悉力苦斗。两军将士所流之血，凝结为一，使强邻挑拨离间之技无所施，金壬操纵捭阖之谋无所用，此种精诚团结之最高表现，尤足为袍泽之模型。

而保国保种之基础，亦于是乎奠。日本此次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兵舰驰突于长江上下，更以公共租界为陆军之登陆地点与作战根据，于是大批军队，源源运至，绝无阻阂；而我方则以交通不备，运输不便，当十九路军苦战之际，除第五军驻在苏浙犹及赶紧赴援外，其余各处部队尚在长途跋涉中。坐是之故，众寡悬殊，我忠勇之将士，遂不能不为战略上之退却，此诚中央同人之所歉然于怀，而深愿循省弱点，亟图补救者也。今日之事，岂但一时进退与战局无关，吾人既以最大之决心，为长期之奋斗，则胜亦不足喜，败亦不足悲，惟知牺牲为民族复兴之代价而已。愿以此自勖，并以慰我忠勇之将士。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麻(三月六日)。

(摘自《中国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二历史档案馆)

伪满洲国成立

背景介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策划下，日本帝国主义立即抛出了一个在中国东北建立“独立国家”的统治方案，即在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10月6日，在《本庄关东军司令官和内田满铁总裁谈话纪要》中，则将上述“方针”更进一步具体化为“三条根本原则”，即：“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

于是，在日本的导演下，东北各地的伪政权纷纷出现，1931年9月24日，辽宁成立了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为副委员长。9月27日，原“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使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11月19日，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又指使李维周等于该地建立“地方维持会”。

接着各省先后成立伪省府。9月26日，熙洽合并吉林省原军、政两机关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吉林省长官；声明同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11月7日，沈阳地方维持会遵日本关东军之命改组为临时省政府；15日，复改组为奉天省政府，以臧式毅为省长。1932年1月1日，张景惠按日人意图发表“独立宣言”，组织黑龙江省政府；6日就职黑龙江省主席。

在各地陆续建立伪省政府的基础上，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于1932年1月6日，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决定将各省伪政权逐步“联省合并”，并相机建立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新的统一政权”。2月16日，东北四省在沈阳召开联省会议，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凌升、齐王、汤玉麟为委员；宣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5日正式改名为“满洲国”，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3月9日溥仪粉墨登场，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汤玉麟副之；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日人驹井德三任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掌管各部一切实权，凡有命令，不经该厅签字盖章，即不能执行。各部门副职及中层各职，均有大批日人充任。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满洲国领域内”，享有“一切权利利益”；“日本国军队，应驻扎于满洲国内”。

材料：

- 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节录)
- 臧式毅供认成立经过

材料一　满蒙自由国设立大纲(节录)

(一)序言

通过此次事变，张学良一派奉天军阀被推翻，新政府即将诞生，我国应指导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实属事关重大。如若方针有误，则必将导致我满蒙政策之彻底失败，从而不得不放弃我在满蒙之权益。进而危及我国防，事关国家之存亡，此形势已洞若观火，不言自明。

关于新政府之形式问题，方案有二：一曰满蒙独立政权说；一曰满蒙自由建国说。而其目的则是一致的。即根据我帝国国策之需要，彻底保持在前两次战役中，以国运为代价所获取的帝国满蒙之地位。为达到这一目的，现提出两个方案。目前的问题是在二者之中如何取舍。为此，首先必须明确，我在满蒙之地位陷于如此危局的原因究竟何在。

纵观导致我在满蒙之地位濒临危机原因有二：一为内部原因；一为外部原因。

关于内部原因，因同本问题无直接关系，姑且不论。但最重要之原因应归咎于满铁之无所作为。对于执行满蒙政策负有直接责任的满铁会社，在过去二十年间，仅拘泥于其公司的营业立场，从不着眼于满蒙经营，从而导致今日之危局，对此，恐无人能予以否认。

其次，关于外部之原因，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曾发

生种种变化。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俄国之威胁。在明治四十二,三年之前,曾估计可能爆发第二次日俄战争,因而一度引进美国资本,采取将满蒙作为日俄缓冲地带之方针。第二阶段为日俄合作,竭力阻止美国及其他第三国介入之时代。此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之状态。换言之,在第二阶段中,以美国为首的第三国干涉构成我帝国在满蒙地位之威胁。第三阶段即为欧洲大战期间。这一期间我地位略呈小康局面,为了永久巩固我在满蒙之地位,再次提出二十一条的第二项,而结果引起排日风潮,中国当局拒绝签定条约,从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第四阶段为欧洲在战后至今。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军阀政权,践踏条约,实行排日侮日,以致发展到最近之严重局面。当然,在上述四个阶段内,中国一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政策,始终玩弄我国之外交。

由此可见,以往导致帝国在满蒙之地位陷于危局的外部原因,始为俄国之威胁;继而为以美国为首的第三国之干涉;最后则为中国军阀之阴谋策划。就最近而言,在满蒙地区外国之威胁与干涉已不严重,主要是中国军阀的阴谋活动。因此,目前如欲使帝国之地位得以安如泰山,必先排除第三国再次介入,进行干涉乃至构成威胁之余地;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彻底摧毁中国军阀之势力。对此,估计任何人都不会持有异议。

既然如此,则从这一要求出发,就上述两个方案,哪一个符合上述目的问题,有进行探讨之必要。

……

(四)结束语

以上仅就满蒙必须从中国本部完全独立的理由,该独立国家的构成以及建设手段等问题略加陈述。这些,不仅就帝国的自卫立场而言绝对必要,而且从满蒙三千万民众之幸福与东洋永久之和平而言也属必须解决的问题。

上述事态不仅出现在满蒙,欧战后出现了波兰、捷克等大批独立国家,邻近的大国负责其安全保障。又如美国协助古巴、巴拿马等中美各国独立,并为之谋求加强国防之道。诸如此类,在其他世界各国,其先例并不罕见。换言之,当世界各国在尚未拥有同一程度的文明和同一程度的国土、国力和兵力,尚未完全居于平等地位时,上述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而将上述国家间的不均衡认为是平等的,认为所有国家都是同样地恪守国际信义,这一见解正是国际联盟和巴黎和约之苦恼所在。

对于此等弱小后进的国家,应善加引导、保护和监督,根据情况予以膺惩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符合真正的国际正义,如果勉强地与之平等相处,任其为所欲为,则不仅对该国自身不诚恳,而且会给其邻国带来麻烦,甚至成为引起国际纠纷的诱因。正因为如此,在国际联盟的章程中有下述规定:"本章程对于……如门罗主义等以及在一定地区达成谅解,确保和平为目的的规定之效力无任何影响(章程第二十一条)"。

帝国"在远东的特殊地位",通过日英同盟以来的各种条约,已为各国所承认,而且帝国以"确保东洋和平"为其崇高使命,为此曾前后两三次以国运为代价诉诸干戈。其重要意义决非美国之门罗主义所可比拟。

此外,在缔结巴黎和约之际,英国曾提出如下保留意见,"世界某一地区的治安,同英国利益皆有密切关系,因此,应承认英国在该地区的自由行动"。帝国亦不受巴黎和约的束缚,保留行使自己的权力。

如上所述,国际联盟及巴黎和约亦没有例外的规定,说明关于对弱小国家行使某种干涉是被承认的;说明对于世界各国不能平等相待。

中国国土辽阔,没有作为国家的统一领导,缺乏维持国内治安的能力,这是不言而喻的的事实,甚至不能称之为国家。在华盛顿会议上,法国代表曾提出质问:"何谓中国?"从而导致纠纷。实际上,外蒙早已在赤俄统治下实现独立;西藏也依靠英国的势力正在实现彻底独立;东三省事实上早已具有独立的形态。民国十三年张作霖向中央发表独立宣言,同赤俄缔结奉俄协定。中国本部的各地军阀,俨然处于独立的形势,基本上不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

人所公认,同帝国拥有最为密切的特殊关系,可以称之为帝国生命线的满蒙,置于如此混乱的中国统治之下,实非维持国际和平之道。使之从中央独立出来,善加引导,保障其安全,全世界任何人亦恐无异议。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的有识之士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满蒙的历史与现状是否有正确的认识。

(摘自《日本侵华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臧式毅供认成立经过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亲自与我谈及召开各省长会议东三省组织问题。我表示同意后,彼亲赴吉、黑召集两省长来奉(汉奸张景惠已早在奉),遂在二十八日(九)日晚,开始举行左记各次会议:

当晚会议地点为伪奉天省长公署。出席人员为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伪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日寇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及日寇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当由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提议,以我们四个大汉奸组织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大汉奸张景惠为和委员长,余为委员。我等同意后散会。

翌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奉天省公署正式成立，并举行祝宴后，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指定东北行政委员会应以委员长及委员名义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其电文内容大致为：张学良在东三省的虐政，日本商民亦颇受其害，日本以同文同种的友谊膺惩张学良，驱逐其势力，为拯救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于水火，并拥护日本之既得权，有建设王道乐土、新政权、新组织的必要。

第三日晚，我等四大汉奸和日寇板垣征四郎及土肥原贤二，在奉天市长赵欣伯私宅集合，汉奸赵欣伯亦列席。首由日寇板垣征四郎宣称："东三省政权以溥仪为元首建设新国家。"次由日寇土肥原贤二说："这个国家是满洲人的独立国家，日本人处于指导援助地位，并无领土野心。"我等俯首听从与以同意而散。

第四日，熙洽、马占、臧式毅等人，和日寇板垣征四郎，在大汉奸张景惠私宅集会。日寇板垣征四郎提议，伪省长和长官于会议后可速回任所，由大汉奸熙洽负责在长春筹备溥仪和伪政府中央各机关的厅舍，奉、黑、哈派员协助之。更提议留派代表于奉天，会议国名、国体、国号、国都、国旗各问题。熙洽、马占山二人留派代表后，即于当晚回任。所有留派的代表如下：

奉天省伪代表：伪实业厅长冯涵清、伪省公署参议金毓黻。

吉林省伪代表：伪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伪外交署长谢介石。

黑龙江省伪代表：伪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

哈尔滨伪长官公署代表：伪长官公署咨义葆康。

尔后，各留派的伪代表，即在奉天伪教育会约举行了一星期的会议。除各伪代表及日寇板垣征四郎外，每日更有日寇军部法务官松木侠和参谋和知(忘其名)中佐主持会议，大汉奸张景惠和我亦常列席。该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日寇板垣征四郎的下记提案而闭会：

国名：满洲国；国体：君主；国号：大同；国都：改长春为新京；国旗：黄色带五色。

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命派遣代表赴旅顺请傀儡溥仪为伪新国家的元首。当时即以会议的各代表前往请愿，傀儡溥仪辞不肯就。更依据日寇板垣征四郎的意旨，带去我等对于君主制度的意见(熙洽意见是皇帝制；张景惠和我的意见是委员制；马占山赞同委员制)，做第二次的请愿，傀儡溥仪允就一年。于是又赴汤岗子(傀儡溥仪已先期到汤岗子)做第三次迎请。该傀儡于三月八日自汤岗子乘专车出发(我从奉天上车随行至长春)，而于九日就任伪满洲国傀儡执政。

关于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经费及代表迎请傀儡溥仪的旅费，均由日寇关东军司令部支给。计伪代表的旅费每人为三千元；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经费为二十万元。这种经费，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奉天伪留派代表冯涵清和黑龙江省伪留派代表赵仲仁到伪省署对我说："现由日本军部给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经费二十万元，交与大汉奸张景惠的公馆，经各留派代表的协议，分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四万元，委员长办公费一万元，下余七万元归委员长所在地哈尔滨等语。我因既已分配，不便交还，将该四万元交省署秘书处保管。伪满建国后，将该款分给奉天伪留派代表冯涵清、金毓黻、省署伪秘书长赵鹏等各五千元，伪市长赵欣伯一万元，高等检察厅书记官二千元，及出席推举溥仪为皇帝大会代表商务会长方旭东旅费数千元。对于该款我虽分文未取，但系由筹建伪满背叛祖国而来，我甘愿负其责任。

伪满洲国政府最初成立经过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在奉天与我接洽伪总理问题，因大汉奸熙洽和我皆不肯就，遂找大汉奸郑孝胥任伪总理。又在各部伪总长问题上，他最后决定张景惠、熙洽、马占山等三人和我除分任伪中央的部长外，更兼任原有的伪职务，至于次长由我等推荐。其后，我同他赴长春与大汉奸郑孝胥(已先在长春)、熙洽会见，且一同视察为傀儡溥仪准备的厅舍后，集会于伪吉长铁道警备司令部。当时列席的汉奸人员为郑孝胥、熙洽、荣厚("九·一八"时吉林财政厅长)、金壁东(伪吉长铁道警备司令)及我。日寇板垣征四郎宣布大汉奸熙洽为伪财政部总长、臧式毅为伪民政部总长，其余各部伪总长由日寇军方指定等语，而散。

三月十日为宣布伪满洲国政府的成立，举行第一次伪国务会议。我到场后，在前面放置的纸袋内，看到伪政府的组织表，有如左的记载：

总理：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臧式毅　次长：葆康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次长：未设

财政部总长：熙　洽　次长：孙其昌

军政部总长：马占山　次长：王静修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次长：未设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次长：未设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次长：未设

教育部总长：郑孝胥兼任　次长：许芬

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贝勒　次长：日寇菊竹(忘其名)

总务厅长：日寇驹井德三(日寇军部统治部长)　次长：阪谷希一(日寇拓务省官吏)

参议府议长：张景惠　副议长：筑紫熊七

立法院长：赵欣伯

监察院长：于冲汉

该组织表上载明各部各司的组织(因不记得不能举出)，凡中国人的汉奸任司长者则标以黑圈，日寇任司长者则标以红圈，更载明各伪部所用日寇职员的标准数字

为十分之三(后来则无标准)。

关于采用日寇各伪部职员，事前并无联络，故大汉奸熙洽曾当场以事前未向伪执政报告为词，提出质问。而日寇驹井德三的回答是："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等语。未出三日，即由日寇军方命令将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改为伪总务长官。

十日更在报纸上看到伪满洲国的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的公布，其经何手续产生则不详。总之，伪满洲国傀儡卖国政府，就是这样产生成立起来的，而给人民带来十四年史所未有的灾难。

(摘自《审讯满伪汉奸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华复兴社成立

背景介绍

一九三二年二月，蒋介石再次召集他的黄埔系爪牙，讨论正式建立组织问题。他审议了贺衷寒、康泽、酆悌等人分别起草的方案。最后由他决定组织名称为"中华复兴社"。一九三三年初，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召开成立会，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经蒋介石亲自审批，吸收了贺衷寒、酆悌、桂永清、康泽、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戴笠、郑介民、邓文仪、邱开基、梁干乔、侯志明等约四十人为社员。制定了社章，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入社要作"如违誓言，愿受极刑"的宣誓。蒋介石为复兴社亲手制订行动纲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在成立会上，经过推选与呈报蒋介石审批，确定了领导机构：(一)设九人制的中央干事，即：贺衷寒、酆梯、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设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二)设立中央监察三人：田载龙、肖赞育、李秉中。候补监察一人：甘国勋。又由蒋介石指定：(一)常务干事三人：贺衷寒、酆梯、滕杰，以滕杰为书记。(二)常务监察一人：田载龙。(三)设四个处：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特务处，处长当时未任命。三月下旬，蒋介石在陵园别墅召开复兴社核心分子会，突然宣布由黄埔六期骑兵科的肄业生、蒋介石的同乡戴笠为特务处长。戴在黄埔系中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由于他不仅奴性十足，而且狡猾刁钻，阴狠毒辣，是蒋介石难寻的看家狗，遂一跃而居特务处长的要职。杀人魔王戴笠由此开始发迹。

复兴社在各地建立支社，第一批建了四个支社：南京支社，任觉伍为书记；上海支社，叶维为书记；北平支社，贾毅为书记；武汉支社，甘国勋为书记。

为了招揽人马，扩大组织，蒋介石亲自向其核心成员交代吸收新成员的条件。中央干事会开办三种训练班，按照社长的意图训练、吸收党徒。第一种，在南京中央军校设立"特别研究班"，招收当时流落在南京的军校学生。复兴社从中选择认为将来可以为他们利用者，经蒋介石批准，拉入特别班，训练三个月。康泽为班主任，肖赞育为副主任。这个班招收的二百七十多人，百分之八十多被吸收入复兴社。结业后派往各地担负特殊任务。如有的派往南京附近的军校任训政工作，有的派往武汉鄂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有的派往"厚生消费合作社办财贸，有的办刊物，有的被戴笠选中，经过再训练当特务。第二种，由军委会政训处长刘健群主办"军委会政训班"，招收大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人数约五百人，以六个月为期，毕业后分配到军委会所辖各级政训工作。第三种，戴笠办的特务训练班，戴笠为总务组长，郑介民为教务组长，专门训练特务。

此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复兴社还在南京的朝天宫办了"宪警训练班"，为期四个月，以孙常钧为主任，其中大部分成员也被发展为复兴社员。

材料：

- 复兴社内幕
- 组织内部情况一斑

材料一　复兴社内幕

一九三二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投机政客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切要建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来作为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公开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他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也就没有敢于采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酆梯、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为外围组织；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由蒋介石自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停止吸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一期的为最多。力

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者市分会负责人，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及各级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员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此外便是各级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士。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级组织的骨干自小组长以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则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的社员。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也有个别被吸收加入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员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入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入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入会的。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于层层控制。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数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处的牌子，职工都佩带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以更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十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一九三五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那里，并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一九三六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象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来，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然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津贴的。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

的人中，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还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材料二　组织内部情况一斑

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不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书记职位便成为组织内部进行争夺的焦点。一九三五年酆悌任总会书记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书记贺衷寒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经酆提出以我继贺任。蒋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轮西上。一到汉口，邱开基（汉口区缉私处长，黄埔三期，云南人）就告诉我说："丁柄权和阮齐他们听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书记，都很不服，说你还只二十多岁，年纪太轻，又是六期学生，资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书记难以服众。他们联合了许多人电请总会另行简选，也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没答应。现在总会已复电严词申斥。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恐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看来，他们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话后，因年少气盛，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们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我即拒不接见；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在会议中对他们的意见也表示不重视。按照惯例，每逢书记召集会社员讲话的场合，要由主持会场的人于书记到场时喊立正口令，并向书记报告人数；散会后书记离场时，又要喊立正口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迳自离场，而他们也就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脏枉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管理所主任。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显得松驰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基层小组会议，有许多并不按照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表报也很简单潦草。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周低头。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命精神"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坚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尤其在当我一提到"领袖"或"委员长"时，便都自动立正，比听到立正口令还更迅速更

整齐(这是复兴社组织的一个最大特征,也是普遍推行到陆海空军部队、军训学生及一切为复兴社所控制的组织中一个显著的法西斯标记),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即在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亦所不免。外间对复兴社的恐怖,实际上却是害怕复兴社的特务处系统。一般人以为复兴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的组织纪律较之复兴社的一般组织严密得多,对所属一切人员有掌握控制的绝对权力,它的所有各级人员又都是有职有薪的职业特务,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许有什么纠纷,而对外却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复兴社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事实上早已成了半公开的秘密,而作为特务处系统的掩体,这本来也是当然的。但复兴社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组织,毕竟还有其进行迷惑群众的基本任务,一旦被人发觉它与特务处系统原来是一个东西,是专门实行暗杀的特务大本营,这样一来,复兴社想以所谓"复兴革命、复兴民族"那一套自以为冠冕堂皇的宣传来迷惑群众的企图,就不能不遇到极严重的障碍。河南的情况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安处副处长),陈祺为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赓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祺胡作乱为,竟将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祺和吴赓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陈祺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务站的猎犬。吴赓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入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悚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害人装入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人一听到"东华门的"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教育界的一些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员们,也都为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谁都不敢阻拦他们,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去闹事。萧洒、陈祺等又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朵,CC团也乘机向他打小报告,来打击复兴社。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赓恕等人。特务处便改派刘艺舟任河南特务站长,并将其机关迁驻郑州,同时复兴社总社也就提出以我去任河南分会书记,负责整顿河南的组织。我到河南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情况才改变了些。

(摘自《复兴社述略》萧作霖)

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一百余人出席。

为时一周的会议讨论了五十余件提案,但重要议案只有两件:一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常会提出的《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案》,一为孙科等二十七人提出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的修正案。

蒋介石的提案一方面规定"训政时期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参政会",其性质"为训政时期中试行宪政之初见",并"于民国二十二年内召集之";另一方面又规定"国民参政会代表之产生,采用选举及延聘两方法",它的职权"应以训政时期约法为基础"。这些规定,表面看来国民党中央开始为宪政作准备,而实际行动仍未改变"训政保姆论",所谓民意设施因"采用选举及延聘两方法"产生代表而否定了它的民意性。不过,这项提案给主张实行宪政者留了面子,又坚持了继续实行训政的主张,因而调和了蒋孙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亲自登台说明这项提案,得到全会通过。

孙科等三十余人的提案初稿尚有不少棱角,如指出对日外交的失败,国民党"难辞误国之咎","今日最重要待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要求中央"对外确立抗日方案,对内政治开诚布公"等等。由于蒋介石向孙私通款曲,孙的提案几经修改,参加提案的人也减少一些,最后通过的提案已没有棱角,成了对蒋介石议案的补充案。

甚至蒋介石不便提出的内容在孙案中也写了进去，如孙案规定："各地以不设政务委员会为原则，原有之政务委员会至事实上无必要时即行取消"，为蒋介石喊出了取消西南、北平两个政务委员会的呼声。这表明孙科已改变原来在野时的立场，一转而与蒋介石共沉浮了。

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宣言，集中表达了国民党"循已成之轨，迈进不息"的执政方针，只不过将"已成之轨"的"攘必先安内"改成"安内攘外兼顾两"而已。

三中全会决定孙科出任立法院长，蒋孙之间训政与宪政的争吵停止了。但是由于全会没有改变对日本侵略的根本方针而引起冯玉祥、李济深等决心抗日的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冯玉祥决心走抗日救国之路；李济深从香港再电中央，请辞本兼各职，声言要回广西老家"务农"。两广方面因全会通过了要取消地方政务委员会的议案，与中央的隔阂加深。全会刚刚闭幕，粤省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邹鲁断然表示，西南政委会与西南执行部是四全大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全会无权取消，三中全会此项决议对两广无效。胡汉民主张，不管南京如何规定，西南政委会照常存在。由此，粤省中委与孙科间产生矛盾。

蒋介石原想拉孙科进入政府，可以统一国民党的步调，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国民党内分歧如故，"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如故。

材料：

· 四届三中全会宣言

· 闭幕词

材料一　四届三中全会宣言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首都。开会以来，咸以和衷共济之精神，共赴艰危，凡全国国民所蕲求于本党，与本党所应自效于国家者，无不精诚规划，力求实践。兹综举决议要点，郑重宣言：本党负建国之责，系安危之重，总理遗教，寤寐未忘，全民呼吁，相需益亟。大会于此，敬先以共具之决心，昭告国人：

一、本党之责任，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以巩固国家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苟有侵犯及于此者，誓与国人以全力抵御而恢复之。

二、本党之责任，为集中国族之全力，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其有危害世界之和平者，誓领导全国国民与世界尊崇信义之民族，共同努力，以弭弭之。

三、本党之责任，为训政完全以后，实施宪政，以归政权于全民。凡一切有效而又正确之途径，誓秉总理遗训与约法成规，以全力赴之。

大会既具此决心，并深信必全国一心一德，乃克有成。故首先遵循总理遗训及约法规范，决定国民参政会纲要及宪法起草、国民大会召集之时期等，以示国人以至诚。惟以中国土地之广大，民情之复杂，经济状态之悬殊，知识程度之参差，欲依此程期，推行无阻，实攸赖于全民之奋然兴起，确信总理遗训，实行自治，以与本党推诚相与，而后能竟革命之全功，成建国之大业。纲领已举，则节目虽略而不遗；根本已安，则枝叶顺理而自茂。故所决议如关于政治制度者，关于外交政策者，关于军事设施者，关于人民生产者，关于教育方针者，关于团结国族者，关于整饬吏治者，关于改进党务者，无不同归于集中民意，培养实力，树立国本，共赴国难之一途。大会深信转危为安之道，必须于实践中求之。负责力行者，固不在多言，明理达义者，当亦无待乎负责者之多言也。

欲策将来之力行，必须严过去之检阅。大会于此，乃鬼五年以来之重要决议案，而类别其已经执行者，在执行中者，因种种关系有待于执行者；检察其难易之故，症结所在；知庶政之推行，御侮之策进，胥赖乎民生繁荣，地方绥定。以我国民性之诚朴，土地之丰饶，生聚教训，宜有可观。乃因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藩篱不治，遂致安内攘外，兼顾两难。本党一年以来，所徬徨忧思者，莫过于此。大会开会之日，值剿赤告捷之时，匪区善后，亦已开始进行，苟循已成之轨，迈进不息，必能收肃清余孽之功。内憝既歼，民力渐裕，以是为国，始可有为。此大会所深望于国人共同戮力，以竟全功者也。

（摘自《中华民国档案资料》第二历史档案馆）

材料二　闭幕词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是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的日子。在历次全体会议中，惟有此次会议最能表现出全党一致的精神，并且更能表现出全国一致的精神。本党的责任，在本党的党名上已表现得很明显，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奉行三民主义，总理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所以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负救国的责任。自从去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国家已到了危难的境地，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但我们越是处此种危难的境遇，本党的团结，越加坚固；同时全国国民，亦都能惕然警悟起来。惟有一德一心，确实奉行总理的主义，才能够把国家从艰难困苦的危险当中救济出来，才能够完成本党和全国国民对于国家的任务。此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大会中已有充分的表现，更能如总理所期望于我们的。第一，我们要救国，便先要恢复我们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种道德的精神，便是中国国民的基本。大会在很短的期间，所有会内同志，都能在这种精神之下，来一致团结，一致努力。并且我们看到在此大会开会当中，全

国国民远至蒙古、西藏，统统能够知道信奉总理的主义，和中国国民党一德一心的来完成建国的任务。就这一点看，可知道总理这种精神，已完全惯注在全国国民的当中。此次大会所经过的时间虽短，所决议的案件虽比过去任何一次全会少，然而此次大会的精神，比过去任何一次全会更加能够充实。相信闭幕以后，全党同志更能团结一致，来完全中国国民党所应负的责任；全国国民必定能信奉总理的主义，在本党领导之下，与本党通力合作，来排除中国的国难，来恢复中国已失的权利，以完成建国的大业。今天在大会闭幕时，敬祝全党同志和全国国民的健康，一致努力，以促进救国建国事业之完成。

（戴季陶）

历史内幕

诡计·诬陷·笑柄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真相

1919 年 9 月，根据斗争的需要，天津学联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起来，成为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这就是觉悟社的由来。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 10 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 20 人。觉悟社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觉悟》。次年 1 月 20 日出版《觉悟》的第一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撰稿人的姓名，按抽签的号参与顺序，采用谐音来代替。邓颖超抽到“一号”签，用“逸豪”作笔名，意为“一号，周恩来抽到“五号”，签用“伍豪”作笔名，意为“五号”。“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对周恩来用“伍豪”作化名，还不太清楚，后来，周恩来用“伍豪”的化名多了，国民党也就清楚了。从而利用“伍豪”的名字，制造了一起攻击、陷害周恩来的假案。

1931 年 4 月 25 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在捕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知道党内很多机密和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址。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因还在武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没有能立刻获悉。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献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所以顾的叛变对在上海的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但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星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受党的委托，勇敢挑起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任务的重担。他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采取一切紧急措施：焚烧大量机密文件；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为顾所熟悉和可能侦察到的干部迅速转移；废除顾所知道的一切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法；对顾在上海可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作了审慎、果断的处置。经过几个不眠、不休的日夜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动手之前，一切转移停当。顾顺章带领一伙国民党特务前往上海搜捕，结果却扑了个空，我党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敌人“一网打尽”共产党领导人的毒计未能得逞，他们把仇恨完全集中在周恩来一人身上，周成了敌人搜捕的主要目标。1931 年 9 月，国民党以悬赏 8 万元的高价，发出通缉周恩来的密令。同年 11 月，敌人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的《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等报纸上，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敌人见悬赏缉拿无济于事，便施展造谣诬陷周恩来的卑鄙伎俩，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伪造了一份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材料。送交上海的各家报纸，于 2 月 16 日至 21 日连续刊出，企图是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党涣散瓦解。敌人所以写二百四十三人，则是企图把脱离共产党说成是当时的一股潮流，使他们伪造的启事具有更大的煽动性。但敌人造谣的伎俩是十分拙劣的，《启事》有着明显的不真实性和漏洞。称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除却伍豪一人具名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具名。敌人如果真的掌握了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人员名单，怎么会只刊出伍豪一个人的名字呢？敌人不会在笔墨上吝啬到这种程度！

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两个多月了。他这时正在江西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并且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一文是《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一文是《红军十二军占领抗武的意义》，分别于 2 月 3 日和 3 月 2 日，刊登在中央苏区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署名时间是 2 月 18 日，这一时间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时间，有着明显不可调和的矛盾。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

周恩来这时已远离上海，未能亲自参与揭穿国民党

伪造启事的斗争；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上海负责中央工作和特科工作的同志身上。在国民党反动派抛出《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第二天，他们就以当时所可能采用的公开的办法，写了一个辟谣启事，利用我党在《申报》馆内的关系将这个启事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启事的原文是："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这是一种曲折的辟谣方式。当年处理这事的陈云后来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未能登出。用这个广告使白区和全体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为了配合白区的党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中央苏区的党利用自己有利的条件，在1932年2月27日出版的机关刊物《斗争》第四期上，也刊出了一则《伍豪启事》，公开地直接地向党内的全体同志说明《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真相，并揭露说："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而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在同期《斗争》上，又以《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之中所用的最无耻与卑鄙手段的模范之一"，它"只能证明反革命派之无力与破产，而不能挽救国民党之死亡！""伍豪同志将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一致地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之下，以坚决英勇地打倒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来回答敌人的污蔑与造谣！"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对周恩来和我党的造谣污蔑，使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的反动丑恶嘴脸，党又用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的办法，于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的内容是："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完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亲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为左。"(巴和是担任《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使用的一个别名。)这一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澄清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事实真相，明白揭露了敌人的伪造手法，又使敌人无法抓到启事人的把柄。这一手着实厉害，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把敌人弄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面对敌人对周恩来和我党中央机关的污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感到事关重大，不能置之不理。于2月下旬，他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公告，郑重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经过白区红区、党内党外，与敌人伪造"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斗争，至此，敌人阴谋诬陷周恩来、攻击我党的毒计，便遭到了完全破产。

事隔30余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一方面向造反派抛出了国民党反动派1932年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材料，为造反派提供炮打周恩来的炮弹；另一方面将这一材料整理上报毛主席，对周恩来进行诬陷打击。毛主席批示："此事重提，不阅。"周恩来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任何反对、诬陷周恩来的企图和活动，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选自《党史纵横》94年1期，作者：盛永年)

苏区反贪纪实

1932年到1934年，红都瑞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斗争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之时就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是一个斗争异常激烈而又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但是，在当时还很幼弱的苏维埃政府内部，却混进一些不顾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唯利是图的不纯洁分子，造成根据地内极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

当时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一次，谢觉哉奉毛泽东之命到瑞金县苏去检查工作。这一查，可发现了大问题。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利用职权，贪污公款2000余元；县苏维埃搬房子，虚报伙食费1000余餐。于都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县军事部长、县苏财政部副部长等人贪污案件23起之多。这些人采取吞没公款、涂改帐目、销毁单据、造假凭证等各种手段进行贪污，有的还用赃款大做投机生意，倒卖苏区内最急需的物资食盐和粮食，从中牟取暴利。浪费现象也很严重，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因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仅购置棉衣料一项，就因预算不实，浪费公款1万余元。从中央到县、乡的机关中，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当时党政领导人中间引起极大震

惊。它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那一时期，毛泽东、张闻天、项英、何叔衡、谢觉哉等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歪风，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

在商讨中，何叔衡等人指出章法不全不严的问题。1932年2月人民委员会发布《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已份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份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指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随着文件指令的公布实施，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开展起来了。

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强调：要"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于是，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到处可见到一种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

控告箱一般是长28、宽15、厚16厘米。箱盖呈倾斜式，前高21、后高28厘米。箱顶中间开了一条投控告书的狭缝。箱正面与顶部之间，钉有插销可锁。控告箱正面上书"控告箱"三个大字，下落"×××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箱盖上书："各位工农群众们，还是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完了。"箱的右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据说控告箱四面这些密密麻麻的注意事项，是何叔衡亲自拟定的"说明文字"。在反贪污浪费运动的开始，这些控告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工农检察部每天都要派人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等大量的贪污案件都是通过控告信的检举查出来的。在群众的及时检举揭发下，仅瑞金县苏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光洋。

为了在全苏区造成勤俭节约的风气，1932年3月，中央机关带头开展每天吃二餐饭、多吃杂粮少花钱的运动。具体由中央政府警卫连首先实行。3月14日起，警卫连的干部战士每天只吃二餐稀粥；少共江西省委实行了"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伙食尾子交红军"的运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人员将自己的"酬劳金"1100余元交给了红军总供给部。1933年9月，瑞金、兴国等县苏提出了"节省一个月伙食"的运动，工作人员一律自备伙食，大家自带干粮办公。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群众见到苏维埃干部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无不赞叹夸奖。

1934年3月18日夜晚，《红色中华》报的编辑们正在煤油灯下为下一期的报纸忙碌，一封特殊的联名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红色中华》报编辑同志：

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饭，好打胜仗；

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签名人：左觉农、陆定一、余长生、邓颖超、博古、刘群先、陈云、毛泽覃、朱琪、覃伯益、林恺、郭香玉、刘自升、彭儒、廖昔璜、成仿吾、刘素珠、罗迈、阿金、潘汉年、赵婉媛、陈一新、贾拓夫

1934年3月17日

看到这由23位领导同志签名的短信，编辑部的同志激动不已，他们即以《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为题，组成一篇短文，发表于3月20日的第164期《红色中华》报上。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看到这封特殊的联名信，深受教育。

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群众纷纷投入节省运动。仅瑞金县苏在1934年3月间就裁减闲员280多人，节省粮食4000多斤；江西妇女节省大洋2600元，三、四、五3个月全中央苏区节省光洋80万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高兴地说："在节省80万元的号召下，各级行政经费一般的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又一个铜板。"

对运动中举发的犯罪分子，开始只限于纪律上的处理，自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第26号训令后，改为按法律程序处理，严厉制裁犯罪分子。中央工农检察部在《怎样检查贪污浪费》的文件中强调，"在艰苦的国内战争环境中而有贪污浪费现象发生，完全是一种罪恶。……反贪污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分子从严从快惩处，任何人不得隐瞒、庇护，否

则，就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要求杜绝一切浪费现象，对于浪费者，除依照财政条例罚款外，责令其所在机关赔偿。

1933年3月，宁化县雇农工会组织部长谢浪金贪污现洋30余元，福建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浴湖与大队长黄士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没收物资。这两案在《红色中华》报披露后，群众议纷纷。大家说，在反贪污浪费的运动中，竟还有人敢做这种事，这股风不刹，将使运动流产。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决定将此案进行调查公审。经过调查核实，3月17日在宁化县苏广场对谢浪金、王浴湖、黄士辉进行公开审判，谢浪金受到撤职处分，王浴湖、黄士辉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三个月的苦刑。这是苏区首次运用刑律判决贪污罪犯。此后，各地方裁判部按照中央裁判部的规定，对发现的贪污犯查出一个判决一个。该年12月，查出瑞金县苏财政部长参与贪污；中央政府管理处左祥云贪污公款百余元；福建省苏文书贪污公款；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贪污儿童捐款；福建省军区互济会主任吞没公物金戒子；少共中央局巡视员郑茂强私卖公家的马去上馆子吃喝……，这些案件一经查实，均由各级法庭予以审判，有的开除党籍，有的开除公职，有的判处苦刑。

1934年春，中央苏区检举揭发、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进入了高潮。2月28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对于“二苏”大会基建工程处长左祥云等人贪污案、中央政府总务厅管理处贪污案进行判决，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前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6年监禁；判处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运输司务长刘兆明各半年监禁。前总务厅长赵宝成浪费公款1万元，违抗中央政府扣押左祥云的命令，纵其出逃，判处苦役1年。3月25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在于都县苏主持召开了一次审判会。这是一次自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规模最大、判刑最重、牵涉面最广的一次审判会，会场内人山人海。项英宣判说：于都县贪污案件特别多，几乎各级机关都有，贪污分子由县苏主席至乡代表，贪污成为风气，大家不以为异。县苏主席熊仙壁强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拉股做生意谋利；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冒领总供给部发下的动员费410元贪污归己；组织部长高兴赞拿公家保险金做生意；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少共县委书记等贪污公款及群众捐助买飞机的100多元大吃大喝。全县查出贪污案件23件之多。为严肃法纪，判决熊仙壁监禁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判处贪污首犯刘仕祥、刘天浩、李其芬死刑。审判会后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特别法庭判决书第一号。伸张了正气，打击了邪恶，深受苏区人民的衷心拥护。

为了严格财政纪律，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合理使用资金，杜绝贪污浪费，中央在各级政府和红军内部建立了审计委员会，建立健全了审计监督制度。到1934年5月，苏区各级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肃清。这场斗争，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加上缺乏经验，有一些过激和不当的处置，但它的功绩是主要的，为苏区思想组织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进行提供了保证，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为建设廉明政府起了积极作用。

（选自《红都记事》）

贺龙怒劫法场

1932年秋。

这天，天刚刚亮周老嘴便喧哗起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都临时设在这个乡村小镇里。

晨雾中，一位拄着拐杖的年轻红军干部拖着伤腿，一步一拐地朝周老嘴走来，鲜血和泥水把他侵了个透，仿佛从血水里捞起来一般。他就是红三军警卫团年仅18岁的营长张德。别看他脸上还残留着孩子般的稚气，却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了。前不久，在攻打沙市的战斗中，他的左腿中弹负伤，被送进了红军医院。这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放牛娃，一日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战友，就睡不好，吃不香，伤还未好利落，他便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然而，当他刚走到街口，便发觉今天的情况有些异样：以往训练场上，红军战士龙腾虎跃，冲刺声震天响，如今却冷冷落落；昔日担架队、军鞋队、宣传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如今好象都被一阵风刮走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乡亲们三五一堆窃窃私语着什么，也有红军战士不时地擦身而过，但一个个大都愁眉不展，匆匆而去……

张德万万没有想到，他离开部队不到一个月，眼前竟然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在他惊疑之际，一群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着一干人犯走了过来。他以为是红军又打了胜仗，抓到了国民党俘虏。可当他走近前一年，不由得吓了一跳：这被押着的一干人哪里是国民党俘虏，原来是红四师政委陈协平、警卫团团长江南等领导同志！

这个被大伙称为“小老虎”的年轻营长，在敌人的枪炮面前从未惊慌过，此刻却惊呆了。等他缓过神来，陈政委、江团长等同志早已被押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急忙向身旁一位小战士打听：小同志，陈政委、江团长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

小战士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轻声说：“夏书记说他们是改组派。”

张德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个名词，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改组派是搞么子明堂的？”

“是反革命啦，你还不晓得呀！”小战士见前面几个肃反队员耀武扬威地走过来了，便给张德递了眼色，慌忙走了。

几年来朝夕相处的陈政委、江团长会是反革命？不可

能，不可能！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张德伤残的腿更加沉重，几乎挪不动步了。

张德走着走着，忽见前面有个饭铺，便掏了几个铜钱，买了3个包子。他走了一天一夜，粒米未进，这会儿肠子正在"闹革命"呢。谁料到他刚咬了两口，几个肃反队员一涌而上，不由分说，用黑布蒙住他的双眼，押起便走。张德愤怒地质问他们："我到底犯了么子法？"

"你是吃喝团！"肃反队长神气活现地说："夏书记讲，吃喝团便是改组派，改组派便是反革命！"

押到万春店时，正好遇到军参谋长唐赤英，张德便把自己被抓的经过向首长作了汇报。唐参谋长一听，不由火冒三丈，指着那肃反队长怒斥道："你们简直晕了脑壳，给我立即放人！"

肃反队长态度十分傲慢："参谋长，咱们是在执行夏书记的指示，您如果有意见，请到他那儿去提！"各级肃反组织不受各级党委领导，直接控制在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手中，因而他们成了党中之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你们这样胡搞，红军是要被你们搞垮的！"唐参谋长看着一个个红军干部被他们抓走，十分痛心，却又无能为力，只好骑马赶到军部，向贺军长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

张德被押到周老嘴西北侧一个破庙里，肃反队马上进行突击审问：

"你是AB团么？"

"AB团是么子东西？"

"妈的，还不老实！"

"咱没念过书，不晓得那些洋码子是么子意思。"

"那你是不是吃喝团呢？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下馆子大吃大喝？"

张德又气又急："我，我一天没吃饭……我是掏了钱的，你们可以去调查么！"

夏曦控制的肃反委员会，从来不搞调查研究，总是凭着他们的主观臆测胡搞。红军战士在外边吃了点什么，便说他们是吃喝团；发现几个人在一起小声说话，便怀疑他们是反革命小团体。而且，抓住必杀，不容别人申辩。他们深知张德营长与军长的关系不一般，怕夜长梦多，便胡乱在审讯录上批了"改组派张德"几个歪字，便把他押到庙后树林里准备秘密枪决。

在这十万火急的关头，贺军长策马赶到。隔老远就对着树林怒喝道："谁敢开枪，我贺某就先嘣了他！"

尽管夏曦把贺龙排斥在肃反委员会之外，但贺军长在红军和苏区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肃反队长一见贺军长策马来到，往日的神气劲儿早已吓跑了，嘴里象含了个热萝卜，说话结结巴巴："他他是吃喝团……"

"娘的，老子看你才是个吃喝团！老子先崩了你再说。"盛怒之下，贺龙拔出了手枪。

"我、我是执行……"肃反队长浑身乱抖。

"老子问你，你天天不是呷的饭，难道是呷的屎么！"

……

这时夏曦慌忙赶来。他见了贺军长，满脸堆着笑说："老贺，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在肃反这个严肃的问题上，可不要感情用事！"贺军长义愤填膺，指着夏曦的鼻子尖儿厉声问道："许多同志出生入死，没在国民党的枪炮前倒下，却成了你们刀下的屈死鬼！你们这样胡搞，国民党、地主老财会拍手叫好的！"

"贺龙同志！"夏曦拉下脸来，用威胁的口吻说："你说话要向党负责！"

"我是要向党负责！"贺军长指着被吊在树上的张营长说："请问，逮捕张德同志是经哪一级党组织批准的？他干了么子反革命勾当？"

"这个、这个……"自湘鄂西"肃反"以来，夏曦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师、团干部身上，营以下干部则是由肃反队自行处理。再说，他刚才接到"贺军长怒劫法场"的小报告后，来不及细问，便匆匆赶来，所以被贺军长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你不了解情况，那我就告诉你！"贺军长异常激动地说："他14岁死了爹娘，给地主老财放牛，是我贺某带他参加了红军。打起仗来，他不怕掉脑壳，你瞧他的腿！他拖着腿走了一天一夜没呷饭，买了3个包子，可你们……"贺军长越说越激动，竟然拍起胸脯来了："却说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反革命，那我贺龙就是个大反革命！要杀就先杀了我吧！"说罢，把手枪扔给了夏曦。

夏曦听后，感到情况有些不好收拾，只好陪着笑脸把手枪还给了贺军长，继而怒视着肃反队长："胡来！还不放人……"

张营长就这样得救了。

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娃娃营长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每当他回忆起贺龙军长怒劫法场的情景，禁不住热泪盈眶……

（选自《党史博采》94年9期，作者：罗永常）

毛泽东三让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直接相处与交往的日子并不多，但却受到王明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打击。而作为党的领导者之一的毛泽东对王明却始终采取了谦让、团结、教育的同志式态度，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充分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和博大胸怀，堪称全党借鉴学习的楷模。

忍辱负重 顾全大局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县（今金寨县）金家寨人，生于1904年，比毛泽东小11岁。他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4月回国。之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一手提携下，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年仅26岁的王明在米夫扶持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此时，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于闽赣边界，并接连打垮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在闽赣边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特务向我党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仅1931年1月17、18日两天就有30多名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捕，24人遭枪杀。这时的王明躲进了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明也没有忘记如何把江西苏区的领导权夺在自己手里。但是，王明深知毛泽东对他推行的“左”倾路线，存在重大的分歧意见，他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搬开这块“绊脚石”。于是，决定派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赶赴中央苏区，以全面推行“中央路线”。在代表团出发之前，9月1日，王明以中央名义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10月，王明又向苏区中央局接连发出指示电，再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发了一通批评指令后，王明便携妻子去了苏联，临行之前，他再三叮嘱被临时推上中央领导岗位的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处在紧张反“围剿”战斗中的毛泽东，还未曾相识这位身居高位的总书记，便迎来了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实际是王明）的指示，由中央代表主持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按照王明的旨意，清算并猛烈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他们将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三条“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还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有了这三大“错误”，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便不“适宜”了，于是，通过改组苏区中央、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以上的职务便不罢而免了。

然而，苏区军民深深了解毛泽东，他们于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时，依然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对中央红军的主要指挥权，但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扩大中央苏区、夺取战争胜利献计献策。他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受命率领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一个月内便先后攻取龙岩、漳州，为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游击战争及以后红军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纠正党内错误须得“瓜熟蒂落”

毛泽东虽然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职务，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依然坚持党性原则，畅抒己见，从不趋炎附势。当中共临时中央依据王明旨意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时，毛泽东毫不隐悔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红军主力攻打赣州失败后，毛泽东又提出向赣东北广大农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再度被拒绝接受。1932年8月，在周恩来等支持下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乐安、宜黄两战两捷，歼敌约两个旅，俘战5000余。这时，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后方的负责人在如何继续应敌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此事传到上海、传到莫斯科，王明火了。于是，他通过住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向中央苏区发出一连串的指令、密电，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对毛泽东不能采取“迁就”的态度，应作为“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坏的残留”予以马上解决。

王明一道道“马上解决”毛泽东这个“危险”人物的指令，迫使他的路线的执行者深感不安。于是，他们抓住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还未开战的时机，以讨论红军行动总方针为题，匆匆赶到前方，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按照王明的旨意，会议列举了毛泽东所犯的“一贯错误”，认为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虽然周恩来力主毛泽东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终归无济于事。就这样毛泽东又被从重要岗位上撤了下来。

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的毛泽东，面对这一次次的人身攻击，深知是来自王明其人。但是，他考虑到当时共产党和红军正处在反对国民党大规模“围剿”之时，如果共产党和红军内部闹起来，必被蒋介石所打垮；再则，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三中全会和六届四中全会，党的团结和统一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其三，鉴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可能很快为党内大多数人所认识，为维护党的团结和

统一，他服从了党的决议，并做到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1933 年 1 月，博古在上海呆不下去率中共临时中央转来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瑞金，便起草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责令罗明停职反省。相继又批判“罗明路线”的执行者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并撤了他们的职。

对此，毛泽东很清楚，博古这一切都是按照王明的旨意行事，而矛头都是对着自己的。其目的是不仅撤销他的党内和在红军的职务，而且是要把他从威信上搞臭。从此，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再次退让离开红军，去从事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自从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也直接取代了对红军的领导与指挥。博古遵照王明的指示，与李德共同提出一整套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终于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归于失败，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而实行大搬家式的长征。

往日的胜利和现实的惨痛失败教育了临时中央及红军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于是有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有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正如毛泽东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错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认识提高了，认识一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遵义会议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让而有度，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

1937 年 11 月 29 日，王明自苏联乘飞机回到延安，同机回国的还有陈云和康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张国焘等数百人一起到机场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热情洋溢地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毛泽东的欢迎词赢得欢迎队伍的阵阵掌声。是啊，6 年前，王明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如今，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 900 里、东西宽 800 里的红色区域，而且还拥有十几万人的红军部队。在苏联的 6 年，使他躲过了上海中统特务的搜捕，躲过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躲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如今，他尚且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于是，他洋洋得意地开始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除以领导者自居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外，便是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出于王明还挂着共产国际的牌子，更出于帮助及挽救王明，让他体面地从错误的胡同中走出来，毛泽东再一次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几天后，毛泽东便提议增补王明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又建议由王明为书记，自己为主席。

然而，王明的权欲未减，他仍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得中共最高领袖的职位。于是，他潜心谋划着，一步步逼向毛泽东。

12 月 8 日，王明从延安赴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从此，他又以武汉为阵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闹起独立性来。他首先以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独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并通过“交通”转往延安。其次，他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统一的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

之后，王明还在武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多次对外发布宣言，有时甚至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

王明的这些举措显然是要取中央而代之，在延安党政军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毛泽东面对大家的议论，大手一摆，说：“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

1938 年 6 月，毛泽东将自己写的《论持久战》文稿派人送往武汉，并由《新华日报》发表。王明扣下了这份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知道：欲取毛泽东而代之，关键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于是，他“恶人先告状”，想以此一举将毛泽东告倒。

可是，此时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在与王明共事期间，发觉这个人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并常常谈论中国国内领导人的不是，对此十分反感。当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这封告状信后，越加对王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8 年 7 月 6 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他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极为重要的指示。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是基于他本人对王明的逐步了解，也是他通过调查研究先后倾听了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人的汇报后作出的决定。

毛泽东让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而一心要坐党内第一把交椅的王明却复电王稼祥：一、请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国际指示；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应当在武汉召开。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面前，为了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发脾气了，决不能让王明走张国焘的老路。于是，他让王稼祥给王明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收电后即感到大势不妙，他提心吊胆飞赴延安。果然不出所料，季米特洛夫支持了毛泽东。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毛泽东却以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私胸怀，对王明没作任何的批评，只是重申了党的纪律，提醒大家不要上"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从而给王明改正错误留了一条退路。

王明认识到大势已去，于六届六中全会后来了个急转弯：10 月 20 日，他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作了《学习毛泽东》的专题演讲。

其实，王明对毛泽东是口服心不服。在尔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 1942 年 2 月 27 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的提法想不通。

不管王明想通想不通，"王明路线"还是要提的，因为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毛泽东并未因提"王明路线"而把王明其人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在中共"七大"、"八大"会议上，均是经毛泽东提议和做工作，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

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对不承认错误的人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除了他领导中国走出了困境，走向了胜利外；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象王明这样的人。

毛泽东三让王明的磊落历史早已大白于全党，成为全党学习效仿的楷模！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决然须要大加称赞与发扬的。

（选自《党史博采》94 年 2 期，作者：刘良）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

1932 年 4 月 29 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这天，上海日占区的虹口公园既热闹非凡，又戒备森严。原来，日军将在这里举办所谓"中日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庆祝他们发动"一·二八"侵沪战争的"战功"。届时，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都将到会发表演说，日本上海驻军与日本侨民都来此狂欢，会前还将举行日军阅兵式，借以鼓舞士气，向中国人民示威。

这天清晨，天气阴沉，不时落下一阵小雨。虹口公园门口日军岗哨林立，严格检查进入公园的所有人的证件。为防止中国抗日军民进入会场"破坏"，庆祝会严格规定只准日本人与朝鲜人进入公园。

庆祝大会开始，主席台上有日本上海驻军最高指挥官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癸、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海军司令野村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瑞、书记长友野等日本军政要人。白川大将先骑"武藏"马巡视了陆海军官兵整齐划一的队列，然后到主席台上第一个发表演说。正当他吹嘘此次淞沪大战，皇军战功煊赫，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主席台下面爆炸，犹如天崩地裂，连台带人被掀至半空，一时血肉横飞，人声鼎沸，参加大会的人争相逃命。炸声停息，一查，白川大将与河瑞委员长当场被炸死，重光癸公使、植田师团长、村井总领事、野村舰队司令等被炸伤，共炸死炸伤日本军政高级官员 13 人。"庆祝大会"一下子变成了丧事大会。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立即轰动了上海，中国抗日军民喜不自禁，奔走相告；同时也震动了日本当局。但"庆祝大会"事先有"中国人不得参加"的禁令，所以尽管损失惨重，日本当局也不便向中国政府兴师问罪。他们只是派出特务与汉奸，四出调查炸弹案的肇事者与主使人。

虹口公园炸弹案是中国著名的"暗杀大王"、抗日志士王亚樵与朝鲜爱国志士安昌浩、尹奉吉等人一手策划与实施的。

1931 年 9 月日本侵略军发动沈阳"九·一八"事变，1932 年 1 月又挑起淞沪"一·二八"事变，向中国猖狂发动战争。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淞沪战场打得尤为激烈，十九路军威震敌胆。王亚樵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在上海召集门徒与同志，组织中国国民抗日铁血团，又称铁血锄奸团，下设小斧头队、剪衣队、杀鬼子队等，开展锄杀汉奸与日本军人、收集情报、抵制日货等运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后又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自任司令，下设 20 个大队，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王亚樵与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蔡廷锴等很熟，与陈铭枢关系尤密。

在淞沪战争中，王亚樵所部英勇战斗，战绩辉煌；他

们曾组织敢死队，潜入黄浦江中，用水雷轰炸停泊在江中的日本军舰；王亚樵的学生胡阿毛被日军抓去开汽车装运军火，胡阿毛驾着满车炸药开入黄浦江中，以身殉国；他们曾配合十九路军袭击了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

1932年4月，中日双方在上海停火，并开始外交谈判，准备签订停战协定。日本军方以战胜者自居，狂妄骄纵不可一世，宣称在4月29日天长节那天举行"祝捷大会"。中国军民凡有爱国心的，无不义愤填膺。王亚樵发誓要干掉日军侵华头子白川大将。恰在这时，陈铭枢到上海，找王亚樵密商破坏日本祝捷大会之计。考虑到如采取军事行动，势必战火再起；如发动中国民众冲击虹口公园会议，定会惨遭重大牺牲；于是决定派人携带炸弹潜入会场。但日本当局明令规定"中国人不得入内"，王亚樵想到只有请流亡上海的朝鲜爱国志士协助实施。

在上海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宝康里住着一批朝鲜爱国志士，他们属于一个名叫"独立党"的组织，在朝鲜从事反日复国活动失败后流亡到中国，与中国帮会各组织都有联系。他们中的首领安昌浩，时年近60，人称"安老"，曾是朝鲜反日独立运动领袖，流亡上海有年。早年曾与王亚樵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与王亚樵早就相熟。

王亚樵约请安昌浩到上海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密商，向安转述了他们准备爆炸破坏虹口公园庆祝会的计划。安昌浩听到需请他们朝鲜同志参加实施时，慨然应允，说：日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对付日本即使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们决定采用定时炸弹轰炸，并商定炸弹及所需费用由王亚樵负责，实施爆炸由安昌浩负责。

王亚樵旋即赶至愚园路陈铭枢处，报告与安昌浩谈话情况，并请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十九路军领导人一齐商量，由陈铭枢与王亚樵各捐助1万元，从十九路军慰劳金中拨出2万元，凑足4万元给安昌浩送去，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与善后经费。

安昌浩回到住处后，经过深思熟虑，选定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三人入虹口公园实施暗杀。

尹奉吉，时年20余，是个热血青年，苦工出身，仇视日本，复国心切。

金天山，人称金九，或称金九爷，时年50余。从事反日复国运动20余年，历经风险，机警善变。

安昌杰是安昌浩的弟弟，时年30余岁。

安昌浩与这三人密商了入虹口公园的方法与实施爆炸的计划，最后想出一个妙计：购置10磅大竹壳热水瓶，装入定时炸弹进入会场。金天山与日本浪人有来往，由他与日本人周旋，先进入会场，打听会议程序。

一切准备就序时已近4月底。

1932年4月29日晨，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改着日本和服，扮作日本侨民，进入虹口公园，尹奉吉任主要执行人，他一手提竹壳水瓶，一手拿着茶杯，先从容进入会场，坐在靠近主席台的草地上。他装着要喝水的样子，把暗藏在水瓶里的定炸弹扭开，放到主席台的台肚，然后坐在一旁观看。金天山与安昌杰暗携一手扔式炸弹，坐在近旁，准备万一定时炸弹失灵，由他们向主席台上掷炸弹。

离预定爆炸时间还有两分钟，尹奉吉站起来悄悄离开会场。两分钟后，炸弹爆炸了，会场上乱成一片，三名志士乘乱离开虹口公园，安全撤回驻所。

王亚樵激于同志友情，当日即与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庆澜、吴迈等人计议，从抗日慰劳金中又拨出四万元赠朝鲜志士，又嘱人买下一家印书社交给他们经营，以资生活。

爆炸案发生后，日本特务四出搜捕，终于抓到安昌浩与尹奉吉及许多朝鲜驻沪侨民，后安昌浩与尹奉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引渡到汉城处死。金天山（金九）被王亚樵密送到十九路军保护起来，幸免于难。为防止日本对广大朝鲜侨民残酷报复，王亚樵与金天山密商，以金九的名义写了一份《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声明这次爆炸事件"由金九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译成英文，从外埠寄给在沪日军以及各报馆。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扑朔迷离的案中之案

1932年9月3日下午6点22分，正是初秋的黄昏时分，济南火车站里里外外，人声、车轮声、汽笛声响成一片。一列从浦口开来的202次快车正升火待发，即将开往北平，还有3分钟就要离站了。这时，在208号头等客车里，送行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代表程希贤、张受焘和石友三等人见开车时间将到，就起身告退，向车下走去。那位被送的客人生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这时也按照常礼送客到车厢门口，与众人握手告别。

车站里凡是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位被省府大员送行的贵客不是别人，乃是四年前威风凛凛的山东督军，全国闻名的直鲁军总司令、大军阀张宗昌。

那张宗昌正与送客们握手告别，站在车厢门口。突然，在车下送行的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举枪高喊："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说着，就向张宗昌连开三枪，但三枪均未响。机警的张宗昌一见有刺客行刺他，急忙避入餐车，并往怀里掏枪。这时才发现他那支心爱的德造最新式左轮手枪昨天在酒宴上被好友石友三要去了，现在无法还击，只得往餐车那一头狂奔。那刺客也尾随着追上餐车，并上了子弹。见张宗昌逃到餐车那一头，正欲启车门而出，就随手一枪，又未击中。这时张宗昌的承启官刘怀周从后面追上来，将刺客一把抱住，刺客情急力大，一下

子挣脱了身，继续猛追张宗昌。张宗昌在刺客被承启官抱住的一刹那间，早已打开车门，跳下了火车。

张宗昌跳下火车，没有想到迎面站台台柱的后面，又闪出一个刺客，向他打了一枪，幸好这一枪没有击中要害。张宗昌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前狂逃。车上的刺客也跳下了火车向前猛追。张宗昌的承启官刘怀周及张的几个卫兵紧跟着追了上来，一齐向刺客开枪。枪声响成一片。突然，隐蔽在站台台柱后面的那名刺客对准刘怀周打了一枪，刘应声倒地。其他卫兵吓得四散逃走。接着车站四周的房屋与空车厢里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向张宗昌射来。张宗昌跑到第三站台北面第七股道上时，被一颗步枪子弹击中头部倒地。后面追赶的两名刺客跳到张宗昌跟前，恐其未死，又向其打了三枪。

不可一世的张宗昌就这样被刺身亡。

张宗昌被击毙后，两名刺客中比较年轻的那一名大呼："我是郑继成，乃郑金声之子！我杀死张宗昌是替父报仇！"言毕，急急钻入在铁道上的一列钢甲车以避危险。人们一看，此人果然是山东省政府的参议郑继成。等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执法队开来弹压时，郑继成即向他们自首，随即被执法队押走。郑先被押在第三路军军法处，9月24日转送山东省高等法院，旋又交济南地方法院。另一名曾追上车去的刺客名叫陈凤山，也向执法队自首。由于郑继成全部承担责任，不久，陈获释。

张宗昌死后，随其同来济南的参谋长金寿良、秘书长徐晓楼、副官长程榕等人抚尸大哭。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重金备棺厚殓，于9月11日将张的尸体运回北京家中。

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一事成为当时全国的头号新闻。南北各报纷纷竞相采访，连续报道。张宗昌曾是民国初期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大头目，独霸山东三年多，他与北伐军在中原大战，枪杀被俘的冯玉祥部西北军高级将领郑金声，乃是北伐史上的著名事件。他被郑继成刺死自然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

张宗昌，山东掖县人，1881年生。家庭窘困，十五六岁时随其母到东北营口谋生，为赌棍帮闲，日与扒手小偷为伍。后来流落北满当胡匪。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乘民党在关东招兵之机，由关东率胡匪百人到烟台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又到上海投陈其美，当到沪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他背叛民军，投靠北洋军阀冯国璋。1916年张宗昌派部下暗杀了陈其美，深得冯国璋的信任。经冯提拔，先后升任旅长、军官教育团团长、侍从武官长等，积极参加军阀混战。后兵败潦倒，曾投靠直系曹锟，因吴佩孚反对，未受重用。1921年，他到关东投靠奉系张作霖，以战功升至副军长、军长。1924年底，第二次直奉大战，直军战败，张宗昌率部攻抵上海。1925年4月，张宗昌出任山东督军，独霸山东三年整，横征暴敛，杀人如麻，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山东人民称张有三不知，即"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又因其豪赌成性，赢得"狗肉将军"的绰号。1926年4月，张宗昌率军与冯玉祥国民军作战，攻入北京，逮捕杀害了著名进步报人林白水等人，还想炸毁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张宗昌成为全国人民切齿痛恨的混世魔王。1927年南方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协同作战，从江苏、河南两面夹攻山东。张宗昌在张作霖的支持下，率直鲁联军与冯玉祥部在豫东兰封一带进行了两次恶战，在第一次兰封会战中，冯部第八方面军刘镇华的军长姜明玉阵前叛变，诱捕了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冯部高级将领郑金声，将其送给了张宗昌。1927年11月6日，张宗昌在第一次兰封会战失败后，恼羞成怒，悍然下令杀死了郑金声。

1928年5月，张宗昌终于被北伐军彻底战败，逃出山东，一路溃退到德州、天津至冀东。9月，在张学良与国民党白崇禧部的双方夹攻下，张全军覆没，其残部被白崇禧全部改编。张只身逃往大连，寻求日本的保护。想不到在事隔四年后的1932年9月3日，他死于仇敌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之手。

郑继成为父报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又是杀的万人痛恨的张宗昌，因此，不仅未引起人们指责，而且赢得了社会的广同情与声援。当时，除少数与张宗昌有关系或感到兔死狐悲的人，以郑继成是预谋杀人，要求对其重判外，大多数人都视郑为除奸复仇的英雄人物。社会各界还掀起了"援郑运动"，给关押中的郑继成送来慰问品，拍来致敬电。许多社会团体与个人还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及济南省政府请愿，认为张宗昌祸国殃民，国民政府对其通缉令尚在，人人得而诛之；今郑继成杀之，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前被张宗昌杀害的青岛《公民报》社长胡信之之女胡玉华在致韩复榘电中称：张宗昌祸鲁三载，翻北海之波，不足涌其恶；"伐南山之竹，不足罄其罪。况复残害革命先进？今次回鲁，又包藏祸心。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郑继成杀之，为党、为国、为父、为山东、为天下复仇。"故坚决要求对郑继成特赦。正在泰山幽居的原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特地让人写了一本《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添枝加叶地描写了郑继成的生平事略与除奸复仇的英勇行为，并附录了济南市72个同业公会请求特赦的电文，广为散发。一时间，郑继成成了誉满全国的英雄。郑在狱中也备受优待，法院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继成的临时会客厅，看守所所长还特地让出自己的住室作为郑的寝室。

一个多月后，1932年10月7日，济南警方方对郑继成以"预谋杀人罪"提起起诉，10月15日在济南地方法院进行公审。在审问中，郑继成侃侃而谈，供认不讳。10月19日，法院判处郑继成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民权利七年。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经行政院核准，南京司法行

政部责令济南地方法院，将郑继成予以"特赦"。于是，郑继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

刺杀张宗昌的事件似乎到此可以结束了。案件的起因与结果好象都十分清楚。然而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疑窦：张宗昌与韩复榘、郑金声原属两个敌对的集团，双方恶战多年。1928年，张宗昌就是被西北军击败而离开山东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其通缉令尚在，张在韩复榘部仇人很多。他为什么在1932年9月突然来到这个对他来说危机四伏的济南呢?张宗昌来到济南仅只一天时间，行踪诡秘，仅和山东省少数上层人士周旋，何以郑继成等人知其行踪呢？张宗昌武艺高强，枪法极准，若有一支手枪在手，几十人难以近其身边。郑继成等人非其对手，何以在张宗昌离开济南前夕护身手枪突然被石友三要去呢？尤其发人深思的是，据法院验尸报告，张宗昌头部致命的一弹，系步枪子弹，而郑继成等两名刺客拿的是手枪，因而真正的刺杀凶手，不是郑继成，而是预伏的另外什么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刺张内幕才渐渐披露出来。真正暗杀张宗昌的，不是郑继成，而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车站刺张乃是韩复榘预谋与策划的一次成功的暗杀行动。

原来，张宗昌自1928年5月兵败退出山东后，是年9月，所部又在滦东地区全军覆没，张只身逃往日本与大连，颠沛流离，时时图谋东山再起。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紧张，张宗昌认为有机可乘，乃又回国，寓居北平铁狮子胡同私邸，积极开展活动。张是山东掖县人，又督鲁三年，在山东有较强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必然要把山东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据点。1931年6月张宗昌派王庆棠去青岛招集其旧部，并颁发旅长等委任状多件，企图重新拉起部队，结果被青岛公安局查获。这时，韩复榘已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张宗昌在山东的活动必然成为韩复榘的心腹之患。同时，张图谋再起，也使蒋介石十分不安，因为张的一些旧部如徐源泉等均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张的活动势必对蒋构成威胁。因此，蒋介石派驻山东的代表蒋伯诚与韩复榘密商，认为必须尽快除掉张宗昌。如何杀张?他们考虑如派人去北平行刺，诸多不便，不如将张诱来济南乘机杀之。

历史考证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决定并非张国焘张皇失措之举

关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21页中写道："张国焘张皇失措，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多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我认为，这段叙述，不够客观，有失公正。

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决定。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进攻鄂豫皖的军队有三十多万。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也由于鄂豫皖分局主要领导人战略指导思想存在着错误，红军苦战两个月，终未能扭转战局。1932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向皖西转移，在燕子河曾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鉴于"围剿"之敌已从四面八方深入根据地的腹地，红军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都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如果继续受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沈泽民、王平章不同意红军跳出外线，积极主张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蔡申熙则认为，如果红军暂时跳到外线作战，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并说明理由。讨论的结果，决定放弃出潜太的计划，主力红军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会后，红四方面军拟攻英山，未获战机，遂向黄麻地区转移，受敌军截击，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牺牲。红军急向黄柴畈转移，复与敌人血战至黄昏。此时，红军处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10月10日晚，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红军留在根据地，分散打游击。张国焘是前一种意见，与会绝大多数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赞成这种意见。最后，张国焘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决定，留少数部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主力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以上史实可以说明：第一、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的决定，不是张国焘的个人主张，而是分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

果。第二、红军主力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正是燕子河会议时蔡申熙的建议。

二、红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是正确的战略决定。

关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的军事行动，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曾有过严厉批评。1933 年 3 月 15 日，《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委信》中写道："在这次'围剿'中，你们起初只是逞一鼓之勇去冲锋，并没有作战的计划，和广大群众的动员，追后遇着顽强抵抗，遭受一些挫折，便'张皇无所措手足'，乱兜圈子与无目标的西逃。""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显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延用了这种说法。本人认为，若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张国焘"张皇失措"，并不为过；但若说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决定也是"张皇失措"，则实在不敢苟同。

第一、只有跳出根据地外线作战才能保存自己。

在黄柴畈分局会议时，红军正在敌人新的合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正如徐向前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是保存力量的唯一办法。一年之后，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先后几次提出红军主力跳到外线的主张。这两件事情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反"围剿"失利时，提出外线作战，也都为"左"倾中央所否定)，但党史上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令人难以信服。

第二、正确地选择了突围方向。

黄柴畈分局会议决定，向平汉路以西突围。选择向西突围的主要考虑是：在当时，东、南、北三面都去不得，只有平汉路以西的少堡垒地带，是较理想的转移方向。那带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不难突破；地势有利，可借桐柏山、大洪山作依托；又是红三军活动的地方，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这个突围方向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转移，才能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离开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打了走，走了打，目的是为了求生存、争胜利，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追堵截中，返回鄂豫皖的预想不能实现，但东方不亮西方亮，红四方面军终于在川陕边站稳了脚跟，建立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能胜利突围并建立川陕根据地，都与正确选择了突围与发展方向有直接的联系。如果认真考察几支主力红军的长征，就会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向西突围，向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不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大都取得胜利。

第三、保持了部队高度的机动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黄柴畈分局会议决定暂到外线作战确实很仓促，全盘计划考虑不周到，对可能出现的逆境缺乏充分估计，分局的意图没有全面向下传达，部队思想不够统一；但却抓住了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打不赢了，带着部队就走，保持了高度的机动性。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敌人前堵后追，红军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后来徐向前很有体会地写道，"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与红四方面军相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的准备则充分得多：大约在 1934 年 5 月就开始了计划工作，接着是大规模的扩大红军，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这些准备的结果就是长征开始时的大搬家，红军失其速度，失其灵活机动性，损失惨重。

第四、符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可以作为衡量红四方面军该不该撤离根据地以及西征转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红四方面军从被迫撤离鄂豫皖到进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屡历险境但终于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一万四千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因此，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不是张皇失措之举，而是正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选自《党史研究文汇》作者：刘明钢)

赣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

李文林这个名字，毛泽东在 1930 年 1 月 5 日的通信《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中提到过："……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

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当时这封信油印发至红军党的基层支部。到延安时期印发时篇名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依然保留了这段话。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入此文时，“李文林式”4个字被删去了。1989年版的《辞海》增列了李文林的词条，新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把李文林列入条目，称他为“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李文林对于赣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

领导创建红军独立第2、第4团

1900年5月，李文林生于江西省吉水县水田乡石鼓村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周金堂，曾改名周郁文。青年时代到南昌求学，在省城结识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等进步青年。1923年李文林在公立法政学校读书时，参加“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群众团体，并被选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努力学习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曾对吴佩孚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暴行进行声讨，对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表示声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当教官，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州）汕（头）作战失利后，李文林奉命返吉水开展武装斗争。回乡不久，他了解到吉安路口山里有一支被国民党政府裁撤下来的北伐军武装流落在那里，即派人去联系，将他们争取过来，编成了游击队。接着，他参与指挥游击队攻打阜田镇保安团，收缴一些枪支，壮大了队伍。1928年1月，李文林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9月，为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共赣西特委派李文林到部队驻地阜田主持召开军民大会，宣布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第9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李文林担任团委书记兼团长。从此，李文林领导红2团开始在阜田、延福、新余、分宜、安福一带打游击，多次与反动地主民团作战，获得胜利。不久，他以一部兵力留吉水、吉安之间牵制敌人，以主力转战乐安、永丰、兴国数百里地区。12月初，李文林指挥红2团攻战乐安县城，大败乐安靖卫团，俘毙敌人23名，缴枪57支，镇压劣绅游高祥和元传宗，焚烧了县衙门。撤出乐安后，李文林率红2团行军半个月，红宁都圳上，到兴国东村与赣南红军第15纵队会合，于20日凌晨攻克兴国县城，俘敌30人，抓到县商团团长吴大鹏，并利用其换户收缴商团100多条长短枪；处决少数反动分子，占领县城3天。兴国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

李文林领导红2团连克乐安、兴国，引起国民党军吉安守敌的震惊，急忙派出6个连，纠集永丰、兴国各地靖卫团等地主武装赶来围攻。李文林当即指挥红2团兵分3路，冲出敌人包围，击毙靖卫团长刘明德以下20余人，俘敌多人，缴枪20余支，于12月底胜利回到吉安东固。红2团返东固后第5天，便遭驻吉安的国民党军两个连和各县靖卫团的袭击。由于没有准备，初战失利，李文林率部撤到养军山。当晚他召开全团干部战士大会，总结教训。第二天，红2团轻装上阵，英勇奋战，在地方武装，人民群众支援下，大败敌军，毙伤其60多人，缴枪30余支，夺回一部分马匹辎重。敌人妄图消灭红2团的计划被粉碎。

1929年1月，红2团在东固稍作休整。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各县靖卫团配合下，分4路进犯东固。李文林带领红2团迎击“五市联防靖卫队”，杀死其队长，缴获少量枪支，后主动转移到兴国、于都一带，使敌人扑了个空。至此红2团共有官兵800余人，枪430多支，分为5个连另有一个特务队。

2月初，红2团和赣南红军第15、第16纵队在兴国莲塘会师。根据中共赣西、赣南特委指示，为适应斗争需要，李文林等主持召开这3支武装中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讨论部队合编问题。决定以第15、第16纵队为基础，加上崇贤游击大队和东村、桥头、莲塘等赤卫队，正式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4团。全团400多人，300多支枪。红2团抽调大批党团骨干分子编入红4团各连。不久，红2、红4团组成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兼红2、红4团政治委员。

李文林对红2、红4团的政治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部队中领导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制订纪律和民主制度，团里有中共团委，每个连有党支部，这时红2团共有160多名党员。团设政治部和团士兵委员会，营连有指导员，连队也有士兵委员会。他要求连队坚持早晚点名，做思想工作；强调部队做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每到一地张贴标语，分发没收的衣服谷物，给工农群众以实际利益；注重民主，强调官兵地位平等，密切官兵之间的感情，每月的生活补助也是一样开支。经过努力，部队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红2、红4团成了赣西南战斗力较强的两支地方红军部队。

李文林式的根据地成为红4军的策应地

从红2团成立到1929年初，在中共赣西特委领导和李文林指挥下，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不断摧毁各地豪绅地主阶级的武装靖卫团，先后攻克乐安、兴国等县，打破了反动军队的多次进攻，形成了整个赣西的大好形势。

为扩大革命武装，李文林常常将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送给当地的赤卫队，选派团里优秀干部帮助地方政权

培养和训练农民武装。仅在兴国古龙岗,红 2 团就留下七八十名战士和 19 支步枪,由 1 名连长负责,建立地方游击队。

为扩大红色区域,李文林率领红 2、红 4 团以东固根据地为依托,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他们再次攻占兴国,乐安县城,先后攻打宜黄河口、广昌、峡江、新余、分宜等地,组织当地农民武装,建立地方政权和农民协会,开辟了宜黄东陂、南丰洽村等若干游击根据地。为支援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李文林还筹集资金 4000 元,开办了东固平民银行。

红 2、红 4 团游击范围内的吉水、永丰、兴国、于都、泰和等县是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火的地方,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有党员 100 多名,以村为单位建立了 24 个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达 1.4 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纵横达 80 余华里。这是我党领导的又一个聚集革命力量,锻炼斗争骨干、争取革命胜利的立足点和出发地。当地工农群众称"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李文林得知红 4 军将途经东固的消息,当即带 1 个连从兴国出发去迎接。第二天,红 2、红 4 团全体出发,快速行军,急返东固。2 月 17 日,李文林等团的领导人在东固罗坑见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并将红 2、红 4 团的军事、政治、组织状况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介绍了红 4 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2 月 22 日,在罗坑的沙坝上,红 4 军同红 2、红 4 团及当地群众举行会师联欢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在会上讲话,称赞红 2、红 4 团和东固人民的正确斗争方向及取得的成就。联欢大会后,红 2、红 4 团和红 4 军互赠了礼物。毛泽东还在东固坳上的云汉堂主持召开有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有关决议精神,并对当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李文林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感到心里亮堂多了。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以红 4 军为榜样,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执行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大提高了红 2、红 4 团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红 4 军利用东固革命根据地这个落脚点,进行 1 个星期的休整,解决一些经济困难,安顿伤病员,振奋了士气。陈毅曾说过,红 4 军从井冈山下来,"直到东固和二、四团会师,耳目才灵通了"。红 4 军同红 2、红 4 团在东固的胜利会师,为开创赣西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局面,为后来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 年 1 月,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红 5 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江西独立第 2、3、4、5 团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6 军,李文林兼任第 1 旅政治委员。此后,李文林曾担任中共红 4、5、6 军前委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和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在此期间,他犯过一些"左"的错误,但对赣南红军的成长壮大,对赣南苏区的巩固发展,仍做了大量的工作。从 1930 年冬开始,李文林被诬为"AB 团重大嫌疑犯"及其它问题遭受扣押、审查,于 1932 年 5 月 30 日在万泰县古坪村(今属泰和县)被错杀。临刑前,李文林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时年 32 岁。

萧克同志 1982 年在回顾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情况的谈话中说,当时所打的大批 AB 团和社会民主党分子,特别是一些著名人物,他们不仅与 AB 团和社会民主党无关,而且大多数是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及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领袖,有的是从大革命时期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的好党员、好同志。李文林就是这样一位好党员、好同志。

1989 年 11 月在江西吉安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学讨论会上,许多同志认为,以往在谈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基础问题时,一般只讲它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 4 军开创的,忽视了当地党组织和地方红军的作用。红 2、红 4 团开辟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应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块基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抵估的作用:一是为红 4 军进军赣南、闽西提供了歇脚点,二是为后来大块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前进基地,三是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四是红 2、红 4 团后来发展成为红 1 军团的一支主力部队——红 3 军。

李文林作为红 2、红 4 团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者:姚仁隽,选自《军事历史》90 年 3 期)

当年红军的经费开支标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铲除贪污、浪费和不正之风,推动苏维埃区域的廉政建设,于 1932 年 2 月颁发第三号通令,在党政军系统和其他战线,拉开了反腐倡廉的帷幕。当时反腐败斗争分三步进行,即组织发动阶段,检举揭发阶段、廉政建设阶段。1933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文件,在广泛深入整改的基础上,制定了红军经费的开支标准。

(一)伙食费:每人每日 8 分(银洋,下同)。(二)出差费:8 人以上自带伙食及炊事员,自起炉灶,不给津贴;8 人或 8 人以下每人每日 1 角。(三)客饭费:每人每餐 3

分。(四)马干(草)费:每匹马每日8分。(五)马匹分配:连队无马,团部2匹,军部5匹,军政治部4匹,军区总指挥部5匹,军区政治部4匹,师军需处1匹,师卫生队1匹,军经理处2匹,军军医处2匹,特务营部2匹,军区经理处2匹,军区军医处2匹,无线电分队马匹视情况而定。(六)办公费、宣传费和添置设备费:连百人以上每月10元、百人以下每月6至8元,团部、担架队、运输队每月6元,军经理处和军医处每月10元,军区经理处、军医处、无线电分队、独立师师部、独立师政治部、红色医院办公处、兵工厂每月20元,军部、军政治部、军区总指挥部、军区政治部每月40元,各地方之分区指挥部每月20元,各独立团团部和独立营营部每月10元,各后方留守处每月10元。(七)擦枪费:山炮每尊每月3元,迫击炮每尊每月5角,机关枪每挺每月5角,步马枪、手机关枪、花机关枪每支每月5分,驳壳枪、各种手枪每支每月3分。(八)杂支费(即除了上述费用外的其它费用):军区一级每月1200元,军一级每月1000元,师一级(含独立师)每月600元,独立团、独立团每月100元(部队编制不足酌减)。(九)挑夫:除供伙食外,苏区每日每名1角,白区每日每名5角,群众送信、做向导的与红军待遇相同。(十)药费:每剂中药不得超过3角,原则上一律不准吃补药(重病经医官验明不在此限)。(十一)休养费:因病送入后方医院休养者每人发1元至2元。(十二)埋葬费:无论指挥官,战斗员每人不得超过10元。(十三)官兵回家旅费:家在苏区者每人每日1角,白区者因路远和乘车乘船视情况决定。(十四)无线电队:每夜值班点心每月10元。(十五)新兵入伍费(供买碗筷、毛巾、斗笠之用)每人5角;俘虏兵费(不论遣送回籍或在红军中工作)每人发3元;投诚费(白军士兵拖枪投诚红军者)每人发13元,没有拖枪的投诚者与俘虏兵相同。(十六)开办费:新成立的军部、军政治最多不超过20元,新成立的师部、师政治部最多不超过15元,其余新成立的各伙食单位开办费均不超过10元。(十七)负伤费:负伤者,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每重伤一名6元,轻伤一名4元。

[资料依据《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部训令(第一号)》(1933年2月)]

(选自《党史文苑》94年6期,作者:冯都)

一起离奇的"中日交涉案"

水户夫妇突遭惨杀

1932年1月初的一个深夜,福建省政府接到一个日本人用生硬汉语打来的电话:"我是日本总领事,要求立即约见省政府方代主席。如贻误,将引起重大事端,恐难以收拾……"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日本总领事馆为什么急电代省主席方声涛?事情是这样的。

1月3日,正是周末。夜深了,日本的一所小学的教务长水户和妻子光子尚未就寝,3岁的小女儿也刚刚睡着。突然,水户夫妇听到"咚"的一声闷响,这是一个成年人翻墙时跳下来的声音。几秒钟后,一个壮实的男子窜入屋内,水户正要上前阻拦盘问。男子手持利刃对着水户左胸就是一刀,左手食指又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水户头部中弹,"扑咚"一声,就象一截断了的木头倒在了地上。光子在里屋听到枪响和异常声音,急忙抽身进屋看个究竟。这时,隐在门侧的男子又向她连扎两刀,一刀刺中左胸,一刀扎入右肋。光子怀有身孕8个月,当场毙命倒地。水户挣扎了几下,也气绝身亡,小女儿已经醒来,只是吓得不敢作声,才得以幸免。

水户的居室靠近小学校,校中有日本职员听到枪声和水户的惨叫,急忙赶来察看,只见门虚掩着,推门一看,两人倒在血泊中,没气了!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这个日本职员吓得赶紧向日本领事馆及日本警部报案。

天不亮,中国官员就赶到了现场。

附近的日本侨民整夜没有休息,情绪非常激动。他们纷纷拥到水户居室门口,有些日本青年公然叫嚷要以"武士道"精神向中国人报仇。

日方的验尸报告马上就出来了。水户头颅偏右处中一弹,右胸刀伤,伤口达9厘米,下颏骨受伤粉碎。子弹由前射入由后贯出,创深12.9厘米。水户光子左肩胛关节部外侧,有深达7.6厘米伤口,右上腹部创口出血甚多,内脏严重受损,腹腔内仍有大量淤血。致死原因,刀刺加枪击。

说来也怪,就在水户夫妇被杀的次日凌晨,日本台湾总督已集结了部队,做好了渡海登陆作战的一切准备;海军驱逐舰队已驶至福州湾一带游弋……就象是早已知道的那样。消息来的如此之快,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凶杀现场,日本总领事田村手持两份电报,急匆匆地跑来。林委员一看,真是非同小可。一份是台湾日本陆军的,措辞极为强硬,咄咄逼人;一份是日本海军驱逐舰队的。均要求中国政府限期答复,否则兵戎相见。

中国政府官员手捧电报,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田村总领事挨上前去,凑在林委员身边低声说:"贵国公民残杀我日本侨民,已激起日桥和日本陆海军人的愤慨,请阁下人速决定处置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官员感到,事情确实棘手,近日来,因"九·一八"事变日军霸占东北,中国公众反日情绪极为高涨,就在案发的前一天(1月2日),驻福州的日本军舰、北上"

号舰长草鹿任一大佐、炮术长杉野少佐，以及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田村等人，穿着便服到西湖公园闲逛。正巧，中国学生几百人高举着戚继光戡平倭寇的文物和标语，在公园中举行反日集会讲演。几名日本人躲避不及，被中国学生认出，一名中国学生大喊道："倭贼来了，同学们，上去揍他们啊！"立即，石块纷纷向日本人砸去。草鹿大佐、杉野少佐头上脸上挨了几块砖石，只好赶紧逃跑。中国学生哪里肯饶了他们，一起追了上去猛砸一气。最后，三名日本人跑入了福州市公安局，几百名学生、民众包围了公安局不肯离开，情绪极为激动。直到晚上10时许，中国官方的戒严司令部才派出专车，趁学生及民众不注意，将三名日本人送走。

日本方面，警备员（警察）及侨民对舰长和领事被击伤之事，情绪也很激动，纷纷要求停泊在福州湾的海军"北上"号军舰和"圆岛"号水雷艇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形势极为严峻……

3月下午，日本侨民300多人又召开大会，向中国政府提出惩办反日"元凶"，处罚中国方面治安负责人的议决案。中国群众岂肯示弱，立即作出了针锋相对的行动，福州城中，到处是愤怒的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就打，日本人根本就不敢迈出家门一步。这几百个日本人的声音，完全被中国人的人海淹没了。

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经中国官方的一再调解，天将黑时，中日双方的人群已逐渐散去……可令人蹊跷的是，日本警部的警官的宿舍，日本巡查部长等4位日本官员的住宅，以及台湾公会，又发生了纵火事件，烈焰迅速吞没了整座房屋。真是火上加油！

不多久，又发生了水户夫妇被惨杀的恶性大案。

日方为何急于解决事端

凌晨，日本总领事田村又拿着两份刚刚收到的电报，急匆匆地赶来。他悄悄地把林委员找到一边，把电报递给他。

一份是台湾日本陆军军方的，口气仍然十分强硬，以训斥的口吻质问领事馆，事态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了？并声称这一凶杀巨案，就是中国在南方排日的开端。一副好战的姿态。

而舰队的电文，口气则恰恰相反，只是以温和的语调，要求领事馆通告国人（日本人），力持镇定，静待政府交涉的结果。但舰队已奉上命令，不得已战备入港。

中国政府官员看了两份电报，只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样是一个国家的陆海军的两个军方，态度为何迥然不同？问田村总领事，他只是避而不答，只说："赶快处理善后，这才是上策，否则……"

接着，田村总领事以令人惊奇的高速度，于当日上午就提出了解决这一凶杀案的办法，内容是这样的：

一、福建省方面派官员代表中国政、军、警三方，来日本领事馆正式道歉；

二、凶手处以极刑；

三、惩办汉安负责人；

四、抚恤死者5万元（死者水户夫妇还遗有一幼女）；

五、付给日本小学校1万元；

六、保护日本侨民，添设巡逻警察及驻所，派出军队加强保护措施。

田村把这六条交给了中国官员后，又心急火燎地催促："快，快，快拿出方案，时间来不及了……"

上午8时，是中国政府官员的上班时间。但这时，官员们早已在府邸会议室正襟危坐了，大家都感到事态确实严重，认为日本驱逐舰队一旦入港，所提条件必然更加苛刻，甚至可能到我们无法接受的地步，到那时，就更麻烦了。于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先答应日方的条件再说，只是认为5万元要价太高了，手头一时拮据，拿不出来。于是，中方与日方在短时间内进行了讨价还价，日方最后答应中国方面出2万元，一次付清。就这样，中国政府在日本总领事的一再催促下，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全部条件。可回过头来细细一琢磨，这第二条"对凶手处以极刑"，如何实施呢？

中方官员好象醒悟过来，急忙问田村，这第二条如何处理？

田村欲言又止，只是说："我可管不了这么多了。你们只要一答应下来，我马上就给台湾军方发电报，说事件已基本解决。诸位仁兄，我田村只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只是今天，这件事要尽快解决才是啊！"

听完田村这一席话，中国官员好象坠入五里云雾之中，凶手没有抓到，也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对谁"处以极刑"呢？

日本领事田村根本不作解释了，只是急匆匆地赶回领事馆发电报去了。

8时许，中方官员携带了东拼西凑的巨款2万元，赶到日本领事馆交给了田村总领事。田材当场签字收下，脸上显露出十分满意的神情，然后爽快地说："这就好，这就好！电报已经发出了，请诸位放心，事情到此为止。各位请相信，只有军人才醉心于战争，我们外交官嘛，只要还有外交途径可循，决不主张诉诸武力。

敝人在华任期就要到了，不日即回东京，请相信我的呼吁，以各国人民为重，不走战争的途径……"说罢欲言又止。

中国官员说："阁下有这种想法，实在是幸会，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位官员想向田村进一步问个究竟，但又感到田村似乎有些隐衷，不便细说，也就不再追问了，

只是说："依阁下意思，这件事今后应当如何处理呢？"

田村不加思索地答道："既然凶案是发生在贵国领土上，不管凶手是什么人，贵国就要自认晦气。你们不是有名谚语吗，叫夹着尾巴做人。这样，事情就简单了，也好办多了。中国还有句古话，叫'破财消灾'，破费一笔钱，生者死者都安心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你们说呢。"

中国官员越听越糊涂，但嘴上仍不断地在说："是，是的，阁下说得有理。"

下午 2 时，日本小学校的操场上，已经聚集了 1000 多人，多是日本侨民和台湾人（台湾当时被日本侵占，日方认为台湾是自己的属地）。中国官员数人也神使鬼差地来到了小学校。

悼念仪式开始了，中国官员一一向死者鞠躬，一位官员还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悼词。

就这样，凶犯未缉获、事件的真相未揭出，中国官方就答应了日方的全部条件。凶杀案的审理暂时告一个段落。

第二天上午 10 时，日本驱逐舰队司令官亲自前往福建省政府拜会了代主席方声涛。当晚，田村总领事在总领事馆为驱逐舰队司令官一行举行宴会。中方一些高级官员亦应邀赴宴。

这一切，都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双方共同举杯祝酒，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几天前的凶杀案和那一触即发的危机。

几乎酿成一场战争的水户凶杀案，就这样平息下去了。

田村总领事临时别一席话

日本驱逐舰队驶离了福州湾，陆军军方的战争叫嚣也就无声无息了。

日本总领事田村在离任回东京的前几天，特为邀请省府林委员到领事馆便餐叙谈，三杯酒下肚，二人攀谈得越来越热火，越来越投机。

田村呷了一口酒说："敝人马上就要离任，调职令已到，我们合作共事一向很融洽，今天，我们作最后一次恳谈，请老兄畅所欲言。"

林委员对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水户凶杀案及其处理经过，一直是耿耿于怀，今天既然田村已经这么说了，也就一古脑儿把疑问统统倒了出来。"水户凶杀巨案，我一直感到很奇怪。案发后，贵国陆海军欲大动干戈，气氛如此紧张，几至令人窒息，舰队一走，一下又变得如此平静，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恕我直言，我有个感觉，这个气氛好象是你们有意制造出来的。"

田村环顾四周一番，然后低声说："当时形势确实严峻，我确知是有人在暗中制造这个严重的事态，而且在不断加剧。水户凶杀案，可大可小。大，可以在贵国东南再来一个'九·一八'，那时，贵国东南就如同东三省了；小，则是偃旗息鼓，风平浪静，你看，不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吗?！我要阁下争分夺秒，不就是图个风平浪静吗?幸亏贵方通力合作，忍辱负重，不然……"田村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林委员陷入了沉思之中，好半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就着这个话题追问下去。

这次便餐后不几天，田村就打道回东京了，接任的新总领事叫宇佐。

从此，水户凶杀案，也就再没有人提起。虽然在 1 月 28 日的上海，中日双方又开了一仗，但在福建方面，双方倒是相安无事。

酒后吐真言——真凶露脸

一天，一位中国官员与一台湾来的朋友谢某人聊天，无意中又提到了水户凶杀案。这位中国人把水户事件的前后经过大致叙述了一下，谢某惊讶地说："怎么，你们在大陆还不知道这事，我在台湾日本海军那儿听说，水户被杀，是李炉己干的。这件事，在日本方面，人人都知道，不少台湾人也清楚，你们怎么还蒙在鼓里呢？"

忽然又冒出一个李炉己！

谁是李炉己！

中国方面立即着手调查李是何许人，以及他的背景。水户凶杀案又重新列上了日程。

很快，李炉己的案卷就送到了省府的案头。

李炉己是台湾无业浪人，在台湾岛上小有名气。28 岁，妻儿均住在台北，不久前迁到福州居住。李本人平时靠招摇撞骗、贩毒吸毒和抽头聚赌为生，作恶累累，劣迹昭彰，多次被日本军方拘禁。后不知何故放出。此后，更加有恃无恐，嚣张之极！

忽然，又得到一个情报：李已于近日返回福州。

中国官方立即着手布置。警方一特工伪装成浪人，约李炉己到他经常光顾的妓馆赴宴。这家妓馆，多是日本陆海军人和日本台湾浪人出入，因此李毫无疑心，况且又有吃喝，遂慨然赴约。

入座后，中国特工特为高价雇了二名日本高级妓女陪酒，于是，李炉己兴致极高，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起来。两瓶酒见了底，李炉己的话匣才算打开来。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胡吹起来。忽然，李冒出一句话："日本领事馆这帮人，光吃饭拿钱不干事，都是他妈的文弱书生。"特工立即引出水户被杀的话题："怎么，领事馆与水户先生被杀有关吗？直是够惨的了！"

李炉己忽然又默然不语了。

又灌了半瓶酒，李才原形毕露。

他继继续续地唠叨起来："水户事件嘛，如果……只

是领事馆一班人的主张，我们决不……决不干休。到后来，我们总算让了一步，要明白，这可是军部……军部的既定方针，他们关东军，……在东北，吃的可肥啦，我们就不能……就不能啃它一口吗？那帮领事馆的书生，嘿，懂个屁……”“那天晚上，我一下就搞掉他们几个人，哼，他婆娘还拦在路上不让我走呢，我……我他妈的不客气了。”

中方特工故意说：“这不是太惨了吗？”

李炉己越说越来了劲。“这事算不了什么，去年袭击我们自己的领事馆，……还有，烧警察宿舍，杀内地人(即日本人)，……还不都是老子一手策划的吗！我一动手，军部就称赞我，说我干的好！……中国人，经营的那家鸦片烟馆，哈哈，那 170 多支烟枪、押金什么的，都被我……被我抢走了，谁敢放个屁！还真的发了一笔呢！”

不自不觉，已经吃到了深夜，烂醉如泥的李炉己被人架着送回了寓所。中国特工则立即赶回将李吐出的话向上司汇报。

终于水落石出

中国警方经过几天的周密调查，又结合李炉己的自供和获得的一些日方文件，终于将水户事件的真相全部弄得清清楚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10 月初的一天，台湾日本陆军军方的情报官浅井大尉突然潜来福州，秘密约见了豢养多年的台湾浪人李炉己。

浅井开门见山地说：“大日本帝国的既定国策，你是明白，关东军已在东北得手，我们也要乘势立即向中国的东南进兵，形成南北呼应的战略态势。但一定要找个借口，制造一个重大的事件，你是帝国的忠实臣民，这一次，就要看你对帝国的忠诚了。比如，中国‘双十节’就要到了，他们开纪念会游行时，你可以混在里面狠狠搞一下日本领事馆，越狠越好！游行的人情绪一起来，领事馆就要报销了！”

李炉己见日本军方对自己如此信任，顿时受宠若惊，浑身的血要沸腾了！他决心要搞一次大动作。但“双十节”游行已迫在眉睫，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准备，李炉己就没有轻易下手。

“双十节”后，李炉己又回到台湾。日本军部司令官真崎、参谋长小杉武司，以及浅井等人，又召见了李炉己。这次的规格更高了。

这次会见，议妥了一个“更高方略”，其内容是：由李炉己出面，在福州杀死三四个日本侨民，纵火焚烧日本领事馆，以及几个有选择的日本人的机构，至于烧死什么人、烧死几个人，完全无关紧要。然后，就以中国军警方面治安力量薄弱为借口，一举出兵福州、厦门，以至上海、天津……

浅井大尉狠狠地说：“杀的对象，可以是日本总领事、领事馆的书记官，一定要有点身份和地位的。这样，事情才能闹大。也可以杀几个日本警官，或者台湾总督府驻在福州的官员，最好能杀十几个日本兵舰上的水兵，海军一旦闹起来，我们的日子就更好过了。”

真崎司令官补充说：“要从速干，要快。同时，要拉起一批人，主要是反中国政府派系的十二个团体的中国武装人员，先开打倒中国政府的秘密会议。一旦闹起来，日本陆海军会用武力协助你们的。这一次，趁杨树庄、方声涛、刘和鼎等实力人物不在，策动卢兴邦闹他个福建独立……至于武器装备和经费，我们如数拨给你，一分钱不会少，你好好去干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够你一辈子享用的了……”

11 月底的一日，李炉己乘日轮悄然回到福建部署，不几天，又回到台湾汇报。

日本军部又向他面授机宜。浅井召见他说：“关东军已占领锦州，中国全国上下群情激昂，我们适时在东南出兵，正是打击中国人反日情绪的大好时机，也可以实现南北军事上的呼应。具体时机就由你掌握了。”

这个由日本人豢养的浪人李炉己，于 12 月底再次窜到福州、正巧在 1 月 2 日，日本海军军官和总领事被中国群众打伤，日华双方矛盾急剧恶化。李炉己瞅准了这个好机会，认为行动已刻不容缓。

3 日上午，李炉己召集浪人流氓 10 多人开会部署。李说：“今夜，福州城一片混乱，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必须下手了！我看，先杀死两三个日本人再说，你们不用担心，国家(指日本)对此早有安排，杀了立即离开福州。如果到了晚上 9 点还找不到合适的人下手，你们就到我家去，把我的妻子和儿子给杀了，你们放心，责任由我来负，你们一定不要手软，要利索点。为了帝国，这点牺牲我是在所不惜的，事成之后，再到日本总领事馆扔炸弹，再烧几间日本人的房子，尤其要烧商会这些机构，多浇点油，烧旺一点，让他们无法救……”

李又说：“反对中国政府的 12 个团体，也在今晚举事，还有中国军队的倒戈，大日本帝国的陆海军立即进兵福州……成功与否，在今夜一举了！”

李炉己对日本军部布置的杀死日本领事和军警的决定，一直很犹豫，迟迟不敢执行。到了晚上，时间来不及了，他就避重就轻，拣了一个日本教师下手，于是，就发生了水户夫妇惨遭李炉己杀害的特大凶杀案。

案子查清后，中国警方立即作出案情的分析报告：

刺杀水户夫妇的真正凶手，是台湾浪人李炉己；指使李等行凶的，是日本台湾军部。日本陆军的少壮派军人想藉此进兵福州、厦门，甚至上海、天津；日本方面对此次行动极不协调，日本陆军想独吞果实，实施这项计划根本就

没让海军知道；而海军早已对中国海军的发祥地福建，以及沿海的良港垂涎欲滴，也想独霸福建，因此对陆军的行动持抵制态度；而台湾的日本总督府则成了局外人，对此次行动一无所知，因此也不同意陆军独吞；水户事件的真相，在日方和台湾已是公开的秘密，因中国方面消息闭塞，情报工作落后，居然一无所闻……

案情既已查清，中国警方立即签发了逮捕李炉己的命令，并在各地通缉。然而，当中国的警车呼啸而出时，李炉己已经坐在驶往台湾的日轮"太和丸"号的头等舱里了。他正被日本警方"押解"着回台湾哩！

李炉己受到日方保护。不久在奉天的日军特务机关中担任要职。以后，又得日酋板垣征四郎的提携，充当了《天津庸报》社的社长。

1943年7月的一天，他终于交上了恶运，被异己毒杀在一家酒馆中。死时的军衔是伪满洲国中将。

（凌肖）

风云人物

李文林

李文林（1900～1932）　江西吉水人。原名周金堂，又名周郁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在南昌从事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春在朱德军官教育团任军事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1月领导路口山区失散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1928年1月指挥部队配合延福党支部领导农民武装攻打阜田获胜。不久任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7月、11月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任第二团团长兼两个团的政治委员。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定纪律和民主制度，对提高部队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曾率部攻克吉水、峡江、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支撑点和策应地。毛泽东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六军，任第一旅党代表。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去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会议。8月任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年12月因"富田事件"被逮捕监禁。1931年2月被释放，由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派到江西省河东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工作。7月被拘捕。1932年5月30日因肃反扩大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万泰被错杀。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毛泽民

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曾化名周方、周彬、杨杰等，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湖南湘潭人。由于毛泽东和毛泽覃离家较早，他留下随父务农，操持家务，因此未能读到多少书。1921年春，离开韶山到长沙，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到湖南自修大学任庶务，并兼任省学联庶务，同时在该校附设的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担任该会秘书，参加领导了笔业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被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他先在工人夜校担任教员；1923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他是负责人之一。7月，消费合作社大整顿，他任营业主任，后任经理。

1925年4月，党派毛泽民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冬，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他负责领导了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等党的刊物、文件、内部读物和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积极在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党的指示，毛泽民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民国日报》经理，和报社社长董必武及主编茅盾一起，从事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化名周方，回湖南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同年底，被党中央调往上海，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经理，并主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后来，由于敌人的破坏，印刷厂由上海转移到天津英租界；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出版发行党的刊物和文件，历时三年。在天津期间，他还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并兼管中共顺直省委的财务。

1931年7月，毛泽民经过辗转曲折，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受命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行长。他坚决执行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毛泽东"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统一货币和财政，粉碎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过闽赣省委常委、财政部长和省党团副书记等职。

1934 年 10 月，毛泽民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军第十五大队政委。这个大队，实际上是中央苏区财政系统和国家银行的大搬家，携带 160 多担红军钞票及黄金、白银。遵义会议后，第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林伯渠）。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成立总供给部，毛泽民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中，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担负着管理运输、兑换钞票、筹措粮款、解决全军经费、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为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6 年秋，各国工人阶级为了支援我党我军的抗战，筹集了一笔几十万美元的巨款，由法国寄到上海。党中央决定派毛泽民负责把这笔钱取回来。1937 年 4 月，他与钱之光、钱希钧等四人化装前往上海，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这笔巨额捐款。然后，采取分批兑换（由美元兑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分批运走的方针，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全部兑换并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成物资转运到延安。这对解决我党我军的财政困难起了重要作用。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身体累垮了。当他到达西安时，严重的支气管炎又发作起来，党中央批准他离开西安，经新疆去苏联养病。

抗战初期，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抗日。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同意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并由陈云、邓发、陈潭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38 年初，在毛泽民赴苏途经迪化时，党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工作。他与党代表邓发（1939 年 7 月以后为陈潭秋）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后又任民政厅厅长。他和邓发、陈潭秋等一起，对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整顿财政金融，进行币制改革、税制改革，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兴办工矿企业，改善公路交通，扩大对内对外贸易，促进农牧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 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追随蒋介石反共，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发动进攻。9 月 17 日，他出动反动军警，把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三位八路军驻新疆负责人非法逮捕；不久，又逮捕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在狱中，毛泽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3 年 9 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盛世才杀害。

蔡廷锴

蔡廷锴是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1892 年 4 月 15 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亲蔡天明，字晚东，除力事农作之外，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会做裁缝、看风水，还能做兽医、替人治病。蔡天明虽是两代单传，因家境贫穷，直到二十九岁，将祖传一亩田典当给人才成亲。他的母亲彭氏非常勤劳和温和，样样农活都会干，终年劳碌，难得空暇。蔡廷锴的姐姐乳名叫大妹，大弟为达锴，小弟名朝锴。

1910 年，蔡廷锴投入广东新军当兵。1911 年，武昌起义，广东独立时，他转入省警卫军。在一次剿匪中，蔡冲在前头，击毙一名土匪，缴获步枪一支。统领贺蕴珊见蔡勇敢，长得高大，甚为欣悦，提他当班长，并赏五元钱。1918 年，蔡廷锴任宝安县大鹏警察所警长。1919 年，蔡先在罗定县罗镜商团任副队长，后被编入李耀汉的肇军陈铭枢营任中尉排长。此为蔡廷锴和陈铭枢结交之始。1920 年，陈营改编为护国军第二军陆军游击第四 十三营，归属于肇罗阳镇守使林虎。是年 8 月，陈保送蔡到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1921 年，陈铭枢率四个营在阳江独立，所部改为粤军第六军第一纵队。蔡于这年 9 月从讲武堂毕业，回陈部任上尉副官。1922 年，陈部从阳江调往广州，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蔡初任团部中尉旗官，参加讨伐桂军沈鸿英后，调升第三十一营连上尉连长。

是年 5 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西在攻占信丰城战斗中，蔡廷锴奉命星夜追击退却的北军。蔡带领全连突进袭击，不顾饱饿和疲劳，一日行军一百多里，终于将敌军击溃缴械，北伐军遂占领信丰城。此役，蔡被记功一次。

不久，北伐军向赣州城发起攻击。敌军方本仁第九混成旅，凭藉黄八岭的坚固工事顽抗，激战十日，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一师挑选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队长，归工兵营营长邓演达的指挥，继续攻击敌军。蔡率领敢死队成员一百多人，于凌晨四时向方本仁部防守薄弱之处冲击，至七时左右，就将敌阵地突破。后继部队立即跟进。第二天，北伐军就占领了古有“铁城”之称的赣州。

1923 年 5 月，粤军第一师和友军第三师合攻盘踞肇庆城的沈鸿英部黄镇邦、张希栻两个旅，血战五六天，仍攻敌不破。这时，蔡廷锴又被挑选为先锋队队长。18 日凌晨，当地雷队将东城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时，蔡身先士卒，带领先锋队沿着缺口猛冲上去，与敌展开肉搏战，并消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接着，配合后继部队扩大战果，全歼守敌，俘虏了黄镇邦，克复了肇庆城。战后，蔡廷锴升为少校连长。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更下定为了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车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三十六师等部队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平难以固守，竟于翌日派人接洽投诚。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以坚守，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敌军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敌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的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先入城，福州便陷入敌手。

1939年初，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夏威任总司令，不久蔡又接任总司令职。迨日寇在防城、龙门、白沙等处登陆，南宁形势危急，蔡又委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备战于桂南、粤西一带，旋参加桂南会战。这年7月22日，蔡廷锴和罗西欧在贵县举行了婚礼。

1940年4月，第二十六集团军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任总司令。就职月余，蔡即呈准辞职，以上将参议官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又回乡居住，直至日寇投降。

1946年初，蔡廷锴完成了《自传》的写作任务，这本书前后写了七年多的时间。

就在《自传》一书脱稿不久，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往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见了面。这次会见，使蔡心头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更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后来，他积极地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治斗争。4月15日，他和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广州，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被推举为主席。

1947年，蔡廷锴和李济深在香港协商，提出七条反对蒋介石的纲领，要求蒋"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等。

1948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宣言"，同时，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是年9月12日，蔡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乘苏联邮轮"宝德华"号北上。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阻挠，蔡与同行都化了装，他扮作轮船上的水手，而沈钧儒由于蓄着一大把浓密的胡子，只得扮作一位水手的父亲。经过十六个昼夜的颠簸，他们抵达了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蔡廷锴即和由香港及各地陆续到达的民主人士一起进入北京。这时候，蔡整日沉浸在喜庆欢悦之中，他以全副精力，投身到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之中，经常忙到深夜。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后来，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蔡廷锴除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外，几乎每年都要出国一次。蔡到过朝鲜、日本、缅甸、瑞典、波兰、苏联等十几个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1957年，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领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取得圆满成功。1961年初，他随同周恩来总理赴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在北京逝世。

蔡廷锴逝世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登门，来到他家进行慰问。周总理详细询问了罗西欧生活上的安排后，劝慰她说，"贤初兄七十六岁了，也算高寿了"，并鼓励她积极从事蔡廷锴未竟之事业，临出门时，周总理又说，"颖超和你是老朋友了。她这两天有病，过些时候再来看你。"不到一个星期，邓颖超同志又到了蔡廷锴家，粉碎"四人帮"

后，罗西欧当选国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参与讨论国家大事。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蒋光鼐

蒋光鼐于1888年12月17日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新基村（今名三蒋村）一个衰破的书香世家。祖父蒋理祥，清咸丰年间进士，被钦点为翰林，村前为其立了功名大石牌坊，家里摆设着咸丰皇帝御赐的物品，盛极一时。父亲蒋子敏，清光绪年间举人，以教书为业。至蒋光鼐出生时，家道已趋衰落。

1903年11月19日，蒋光鼐母亲郑氏病危。临时终时，她把蒋光鼐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阿憬，你爸爸读了一世书，也教了一世书，虽然满腹经纶，却无所作为。将来的世界是军人的世界。你还年轻，既然文字不足以救国，你就弃文从武，发奋做人吧！"十天之后，蒋光鼐的父亲由于郑氏的早逝和自己的不得志，加上生活的窘迫，也在郁闷中随妻而去，时年仅四十八岁。

从广州陆小毕业后，1909年蒋光鼐升入学制两年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第一期。在陆中，他和从广州陆小一道来陆中的陈铭枢等人，投身于同盟会的秘密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校内发展组织，一方面积极联络当地新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消息传到南京陆军四中，同盟会员立即行动起来，连续数天召开秘密会议，准备乘机响应。当时第一期学员已届毕业，经常在野外举行演习和实弹射击，所用武器弹药都集中保管在学校礼堂后面的武器库。同盟会盯上了武器库，派人轮流监视。哪知校方早有防范，一天深夜，趁学员熟睡之时，偷偷把武器弹药转移了。这使他们大失所望。于是齐集校园墙边的菜园开会，一致认为既然没有武器，在南京起义已不可能，那就奔赴武昌，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去上海，向同盟会总部请求前往武昌参战。陈当夜未经请假便翻墙而出，逐被校方开除学籍。两天后，陈自沪返宁，无法回校，便约蒋光鼐、李章达等同学到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开会。大家商定分三批前往武昌。蒋光鼐、李章达、陈果夫等十几名陆中同学为第一批。在陈铭枢的率领下，于1911年10月下旬乘一艘外轮奔赴武昌，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战争。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不久即遣散军队。蒋光鼐在这时接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入学通知书。利用报到前的空闲，蒋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与二十三岁的同乡女子谭妙南举行了十分简朴的婚礼，了却了八年来告慰父母双亲亡魂的一桩心事。原来，其父蒋子敏在北京任教时，与同乡谭之斌过从甚密。在他们知道各自的妻子都有身孕时，曾约定：同生男，拜为兄弟；同生女，结为姐妹；一生男，一生女则结为夫妻。结果，蒋家生了光鼐，谭家生了妙南，为此事两家曾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今日完婚，正好告慰九泉父母。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后，刚刚改组的国民党人请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6月下旬，李烈钧酝酿江西发难讨袁的消息传到保定军校。蒋光鼐和季方、吴艺五、陆铸东等三十多位国民党人，不顾个人的前程利禄，毅然离校，南下千里到江西湖口，参加起义。7月12日，李烈钧通电讨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蒋光鼐被任命为方声涛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当天就在八里坡与敌军相遇展开激战。苦战十余日，湖口失守。他跟随司令部且战且退。方声涛原想率部入闽，为福建都督孙道仁拒绝，致使义军无路可退，追兵紧逼，部队无法掌握，四处游散。蒋光鼐随着一伙散兵行进，一路上餐风宿雨，历尽艰险。几天后遇上一群土匪，被洗劫一空。蒋由于事先已脱掉军装，一副当地百姓打扮，加上他身材矮小，土匪居然把他当作小孩，未仔细搜索就放行了。遭此劫难，大家垂头丧气，为以后的旅程担忧。蒋光鼐见状却不紧不慢地从鞋子里面掏出了几块银元，微笑着举在手里。原来，蒋光鼐一路上十分警惕，和土匪刚一遭遇，他就迅速把身上的钱藏进了鞋子。靠着这些钱，他们到了福州，然后又乘船到了上海。

"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镇压下，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在国内已不能立足。1913年，蒋光鼐和几名同学一道从上海亡命日本，来到东京，聚集在孙中山先生周围。时孙中山等在东京郊外的大森设立了军事学校，以"浩然庐"为代名，蒋即在其中学习。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蒋在该党核心机构和中山先生左右工作。"中华革命党"，在沿海各省展开了一系列的反袁军事活动，在香港设有活动机构，蒋被派往该机构协助邹鲁从事军事策反工作。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蒋光鼐任军政府警卫营连长，后又调任巡监缉私舰舰长，协助朱执信从事军事联络工作。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蒋光鼐先后担任大总统府警卫团副官、团附。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宣布转入"讨贼时期"，锋芒首指称兵背叛的陈炯明。当此用人之际，蒋光鼐在讨贼军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参加讨贼战斗。是年底，营长缪培堃升任第四团团长，蒋即接缪任第三营营长，开始了他领兵作战的戎马生涯。

在香港，蒋光鼐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活动。1935年，他与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任最高干部之一，并出版发行《大众报》，为反蒋抗日而奔走呼号。同年，他还联合原十九路军将领发表反蒋通电，公开

主张联共抗日。

1936年5月间，两广西南政务委员会酝酿发动反蒋抗日运动，蒋光鼐与蔡廷锴等人士联诀来粤，参加了两广发动的“六·一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蒋光鼐当即回国参加抗战，任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1939年，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长1940年，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监察委员。秋，日本无条件投降，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三人回到广州商议今后的行动。蒋决定仍留在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任副司令长官，进行策反工作，得到蔡、李的赞同。10月，获胜利勋章。

194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蔡廷锴等在广州光孝路祝寿巷44号李章达住所召开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筹备会，会议决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同时宣告成立；会议还决定由李章达征求蒋光鼐参加，蒋光鼐欣然赞同，并捐助巨额会费，还答允当尽力协助民促成员的地下活动。后余汉谋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旋任蒋光鼐为绥署副主任。1948年8月，蒋被免去衢州绥署副主任职务，改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秋，蒋光鼐与蔡廷锴代表民主促进会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蒋光鼐任北京市政府委员。此后，他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并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在北京病逝。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郑孝胥

郑孝胥，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60年5月2日（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他的先世原籍福清县，父亲郑仲濂，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吏部稽勋司主事。郑孝胥早年由叔祖郑虞臣教读经史。二十岁，补博士弟子员。

1882年，郑孝胥中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1885年，赴天津入李鸿章幕。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同年秋，改官江苏试用同知。第二年任镶红旗官学堂教习。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日筑领事，不久升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爆发，郑回国居南京教敷营，后为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练自强军，擢升至监司。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广求人才，郑孝胥在乾清宫独奏练兵之策，光绪帝遂派他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变法失败后，郑至武昌。次年，张之洞奏办京汉铁路南段，命郑孝胥为主办京汉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郑孝胥佐张之洞筹划所谓保全东南半壁之策，由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江海关道余联沅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1906年9月，清廷为的抵制革命，下诏预备立案。12月，郑孝胥与朱福诜、张謇、雷奋等苏浙闽三省名士及实业界二百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言以“奉戴上谕立宪之旨趣，开发地方绅民之政治知识为目的”。但清廷空言立宪，缺乏诚意，加之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于是立宪派开始把活动重心由开通绅民知识宣传转向为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08年7月，郑孝胥等为了“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联名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发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党人，约于是年8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清廷乃发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颁布宪法召集议会之诏。

1909年，郑孝胥由岑春煊推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任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埠事宜，居天津颜氏园，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次年，随锡良入京。不久锡良去职，郑孝胥遂赴沪。1911年夏，郑孝胥至长沙任湖南布政使甫十日，湖广总督瑞锵因厘定颁行外省官制派郑孝胥赴京陈述，郑遂于9月入京，居舍饭寺，等待召见。10月，武昌起义，郑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长沙已为革命军光复，道阻不行。不久，中华民国成立，郑孝胥遂韬晦上海。

郑孝胥自认是对清王忠心不二，以不作民国官、不拿民国钱的遗老自居，隐居海藏楼，以诗酒自娱。他嫉恶共和，闭门不与世事。室中花瓶犹插清朝黄色小龙旗，凡诗文简札题字，均用宣统甲子，未尝书民国年号，以示对清室的忠心。

郑孝胥工诗善书法。1913年在上海组织“诗经会”；1917年在唐元素所创的“丽泽文社”讲学（1920年该社改名“晦鸣文社”）；并创立“恒心字社”。郑孝胥诗主崇孟郊，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书法，出入汉隶北碑间，中年以后，自谓去肉存骨，变为瘦削，尝鬻字自给，岁入数千元。

1925年2月，溥仪由日本驻京使馆书记官池部保护，出走天津，居日租界“张园”（后移“静园”）。郑孝胥不久亦赴津。在天津期间，郑孝胥认为要复辟成功，惟有“列强”帮助“共管中国”。他对溥仪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按指北伐战争），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因此，郑孝胥主张“用客卿”、“门户开放”，同任何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他认为：“对外国人只要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外国人绝无不来之理”。当罗振玉劝溥仪出洋到日本去联日复辟时，郑孝胥则力劝“留津不动，静候共管”。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用溥仪名义派人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活动。他代溥仪起草了一封给南次郎的信，谓："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三星期后，日本关东军派军部参谋土肥原至津引诱，郑孝胥则从中协助，竭力唆使溥仪赴东北复辟。11 月 10 日，郑孝胥父子陪同溥仪乘日军司令部运输部"比治山丸"轮船偷渡白河，后转乘"淡路丸"渡海至营口，旋入旅顺。

1932 年 2 月，郑孝胥两次赴奉天，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一伙，密商建立伪满洲国。3 月 8 日，在日本关东军导演下，溥议粉墨登场为伪满洲国"执政"，次日，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5 月兼任伪军政部总长，未几卸军政部总长职，8 月兼任伪文教部总长。9 月 15 日，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地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大将正式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次年 3 月，又签订"委任经营合同"，规定将东北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财产，全部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 社"。此外，他还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灌输"顺天安民"、"亲仁善邻"、"王道政治"等反动谬论，并亲自兼任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4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改"执政"为帝制，溥仪正式"登极"，郑孝胥改任伪国务总理大臣。21 日，郑被派赴日本进行所谓"修聘"，"朝觐天皇"以答谢所谓"友邦援助之盛意"。回来后，被叙勋一位，并赐伪景云章。

郑孝胥虽是伪满国务院的总理大臣，却要事事听命于其部下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郑曾因发牢骚惹恼了日本主子。1935 年 5 月 21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另换了一个对主子更为忠顺的张景惠接替了他。但为了掩盖矛盾，郑孝胥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1936 年 1 月，郑移居长春柳条路自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同年底，日本帝国还赠他"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38 年 3 月 6 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 "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 3 月 28 日死于长春，结束了他的一生。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华侨对"一·二八"抗战的支援

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素以爱国爱乡而著称于世，对祖国各个时期的革命事业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他们对"一·二八"抗战的支援就是突出的例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1932 年 1 月 28 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违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

海外近千万侨胞对十九路军一洗四个月来的政府忍辱含垢的英勇奋战，热血沸腾，喜不自禁，备受鼓舞。菲律宾华侨拍电给蔡廷锴，赞扬十九路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之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有个人和团体拍发电报支持上海中国军队抗战。旧金山、芝加哥等地"唐人街上之灯龙，竟作大蹈步之舞，而中国锣鼓声、呼喊声，震耳欲聋"，华侨以祖国传统的民族形式欢呼十九路军为祖国争气，为民族争光。美洲一位侨领欣慰地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全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十九路军，赠送了一块金匾给蔡廷锴，上面刻着"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一位华侨托人把一枚镶嵌着一块椭圆形宝石的戒指带到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赠给蒋光鼐，以示侨胞对他们领导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敬佩之意。中国致公党"即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

海外侨胞在鼓动十九路军抗战的同时，从金钱和物质上援助淞沪抗战。2 月 2 日十九路军收到第一笔华侨捐款，继后华侨捐款"更加络绎不绝，无日没有款。"从战争爆发到华侨捐款的到达，其间不过相隔三、四天时间，足见侨胞报效祖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华侨捐款速度不仅快而惊人，而且数额也很可观。旅菲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捐款达 250 万元（国币，下同）之多。侨胞募捐形式多种多样，情绪热烈。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

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深为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所感动，极力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全军听到这个消息，都受到极大的鼓舞”。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一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月下旬，他再汇去一万元。当时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为此他又汇去一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侨胞捐献的战需物质也运往上海助战。美国旧金山女侨胞赶织绒衣寄赠十九路军官兵，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还购买了大量的钢盔运回国内捐赠十九路军。广大侨胞知道十九路军缺乏汽车和飞机，仅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15架飞机助战，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联合捐赠载重汽车两辆。同时，海外侨胞抵制日货活动更趋活跃。

华侨对淞沪抗战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返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仅在2月7日就有约200名留学生搭乘横滨出帆的法国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造就救伤人才回国服务，参加受训者达200余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50名中国留学生，于2月4日急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还有一些华侨在当地侨团和救国组织的资助下零散回国参战。为了发挥归国华侨和留学生的积极作用，华侨救国会在上海法租界永安街普安里5号设立办事处，并在2月16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凡海内外侨胞倘有文电，见报均请迳寄本会；如有回国投效之侨胞请即到会接洽。”

当时，还有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到上海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他们是“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从海外归来的。他们早在1931年11月间抵达南京后，就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给予改编和军训。直至“一·二八”事变后，才被集中训练并开赴上海，编号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为总队长，设总部于西门大吉路91号。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渎，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他们表示以身卫国的决心，虽“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泣。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爰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衡，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地，战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望海外侨胞之助。”真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勋功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的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南京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电慰华侨义勇军，“并盼努力奋斗，杀贼救国，以副海外侨胞之望。”

一些华侨志士在淞沪抗战中忠勇可嘉，奋勇杀敌，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归侨飞行员黄毓荃的感人事迹就是一例。“一·二八”事变时，日寇飞机在淞沪上空狂轰滥炸。黄毓荃和他的战友们义愤填膺，他率领9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向日寇机群扑去。在激烈的空战中，黄毓荃以高超的技术先后击落数架敌机，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2月5日成批的敌机又来骚扰，并以数倍的力量围攻黄毓荃，在空战中黄毓荃不幸阵亡，时年仅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抗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

海外侨胞支持和援助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在淞沪抗战中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仅以捐款一项，据蔡廷锴司令部统计，在总收捐款1,068万元中，有3/4为华侨捐款。如果没有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有力支援，十九路军这支悬沪孤军要血战兼旬是不能想象的。正如蔡廷锴将军所说：“海内外人民知道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抗战后，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也有的寄衣服、食品等慰劳我们。人民群众对于我军的热烈支援，鼓舞和激励了前线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这是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抵御全副现代化军队的关键所在。”十九路军为了感谢侨胞的支援，特制抗日纪念章分赠各地侨胞；蒋光鼐、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3人还将他们的合影照片，亲自签名盖印，分送海外各地侨团。

（选自《历史大观园》88年5期，作者：曾瑞炎）

贺龙的对联故事

贺龙常常自谦对人说：“我是个没吃墨水的大老粗。”其实，他不仅武略惊人，战功赫赫，而且文才也出众，令人赞叹，尤其是善作对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趣益兼备的对联故事。

1931年4月20日，红3军军长贺龙和政治委员柳直荀率领部队由洪湖进驻武当，与武当道总徐本善结为好友。徐本善将紫霄宫道院让给红3军作医院，把紫霄宫后边的“父母殿”两端，作贺龙的卧室兼红3军司令部办公室，并派弟子暗中保护贺龙的安全。由于红3军伤员很多，后方医院十分缺乏医护人员和医药，徐道总立即安排道人投入医院的护理工作，还组织道人采挖药草。当徐道总得知红3军的子弹不足时，还组织弟子配合红3军战士去截缴敌军的子弹。贺龙对武当道人深表谢意，并拜徐道总为师，习练武当拳法。贺龙和柳直荀临走时，为表示

对武当道人及徐道总的一片深情，特撰联以赠，联曰：

伟人东来气尽紫；

樵歌西去云腾霄。

这副对联的联首，巧嵌了徐本善道总之号"伟樵"，联尾巧嵌了"紫霄"宫之名。这就更加深了贺龙和柳直荀与徐道总之间的情谊。

南北墩是湖北和湖南两省共辖的一条小街，两省以街中"东西井"为界。1931 年土匪头子朱疤子与罗效之各踞一方，挑起两省土汉两族人民进行械斗，他们从中渔利。贺龙带领红 3 军进驻南北墩后，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土司，可是碰到了一个问题：北街的土司，南街群众斗不得；南街的土豪，北街群众也不得批。贺龙发现这一情况后，召开了两街的群众联合大会，他还亲自作了一副对联贴在大会会场的台柱上：

打恶豪斗土司何分南北；

闹翻身求解放哪管东西。

横批是：团结对敌。

这副对联不仅对仗工整，寓意深刻，而且十分巧妙地将两个地名嵌了进去。从此，南北墩土汉两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33 年夏天，贺龙率领红 3 军来到了湘鄂川三省交界的台市、百福司和河口一带。这一带方圆百里都是崇山峻岭，又是三省边缘地区，有大小 10 多股土匪，各踞山头，称王称霸。其中势力最大的一股土匪的头目叫罗金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恨之入骨，纷纷要求贺龙将军为民除害。

罗金彪的父亲罗梓文，是个大土匪头子，自封"通天大将军"。罗梓文被军阀联合围打，身负重伤，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了，就把在外地念书的儿子罗金彪叫回来。他有气无力地对儿子说："金彪，'子曰'、'诗云'不要念了，就继承我的事业吧！我死后，你在孤山顶上修座将军庙，为我雕刻一尊神像，在佛台两旁刻一副对联，对联的上联叫做：孤山独庙单枪匹马一将军。我不行了，下联由你应对好了。万一应对不上，就广求各方文人应对。"说罢，这个"通天大将军"就归西天去了。

罗金彪有钱有势，孤山上的将军庙很快建成，罗梓文的匪像也很快雕好了，可是那对联的下联，罗金彪绞尽脑汁，并求访各方人士，但都对不出来，所以他决定于农历端午节举行应对会，公开求对下联。

贺龙听到了这个消息，决定去应对。端午节那天，贺龙化名张英智，与王连长装扮文士，前往罗金彪的住地五里寨应对。到了匪巢的"八宝堂"不久，应对会便开始。罗金彪出了一上联：

阖门起屋移多补少变两间；

在座的人个个闭目冥思苦想这一稀奇古怪的上联。恰在这时，在楼下地坪里，一个匪兵左手提着一捆干枯的棘树柴，右手拿着根有刺的灌木树桠枝，向伙房走去。贺龙马上受到启发，触景生"联"。他同王连长交谈了几句，就站起来，走上台去，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样的下联：

枣棘为柴砍断辟开成四束。

在座的人听了个个拍手称绝，罗金彪为了考一考贺龙是否确有真才实学，又出一上联让贺龙应对。这上联是：

五里寨上欣逢张先生应对；

贺龙随口对答：

八宝堂前喜见罗老爷招贤。

于是，又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罗金彪说："张先生对答如流，佩服！"罗金彪的师爷看到罗对贺龙如此恭维，产生了嫉妒之心，说："罗老爷，让我也出个上联请张先生应对。"他出的上联是：

牛屎虫吃尽牛屎；

湘鄂川边境一带称壁虎为"狗屁蛇"贺龙随口对答下联：

狗屁蛇专放狗屁。

这不仅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引起了哄堂大笑。那土匪师爷被贺龙挖苦得哭笑不得。罗金彪趁机打圆场说："好了，现在言归正题，请张先生和在座诸位应对先父遗留下来的那个上联。"他的师爷就用粉笔把那上联写在黑板上。

孤山独庙单枪匹马一将军；

随后，一连上台的 20 多个人没有一个应对得好，都被土匪的师爷指出其中的毛病。贺龙站了起来，装作大有文人风度的样子，满面春风地拿起粉笔写道：

夹江两岸双炮对虎二英雄。

罗金彪和在座的人无法挑剔出毛病，一齐连声赞好。罗金彪拱手作揖，感谢两位"博士"为父亲了却了一桩遗愿。

第二天，罗金彪和他的副官、师爷、老婆、儿子等及 60 多个匪兵到孤山举行家祭。贺龙也应邀参加。进佛台时，贺龙对罗金彪说："罗老爷，弟兄们背着枪下跪磕头祭祀，有点不严肃吧？"；罗金彪觉得这位"博士"说得有理，便马上对匪兵下令说："把枪支集中在一起！"就在罗金彪俯首伏身哭念祭文时，埋伏在佛台里的王连长和红军战士悄悄走了出来，大声喊道："不许动！投降不杀！"罗金彪和 600 多个匪兵乖乖地就擒了。

两天之后，贺龙在罗家大院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罪恶滔天、民愤极大的罗金彪等人，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在长征途中，贺龙带领红军路过慈利县的金岩乡乐园村时，由于敌人的造谣挑拨，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跑到深山岩洞中躲藏起来。有一位名叫楚狄知的教书先生，

虽有点文墨，但胆小怕事，也躲进了岩洞中。他白发银眉，年迈体弱，经受不住岩洞中的艰苦生活，于是悄悄地溜了出来，躲进村边的小树林里探听动静。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和留在村里的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亲如一家，心里倍受启发。他想跑回山洞动员群众回村，但被一红军哨兵发现，把他当作奸细抓住。楚狄知连声叫苦，说他是个教书人，哨兵却不肯放过。站在旁边的贺龙把这一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走过来说："既然你是教书先生，我且问你，我作一对联你能对上吗？"楚狄知认为一个当兵粗人，没有多少文化，我教了一辈子书，还能被你考倒?！便连声说："请长官赐教！"贺龙看看他那一副饱受饥寒的狼狈相，脱口而出：

白眉白须披白发，钻山钻洞，

白受一番惊吓，吓煞吓煞，望先生

今后莫听白匪鼓吹邪说；

楚狄知一听，大为震惊，没想到这位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竟有如此出众文才，一口气用了 5 个"白"字，真乃妙联绝对。望着站在眼前的这位头戴红五星、挂着红领章的贺龙，他急中生智，对出了下联：

红星红牌打红旗，分田分地。

红得万民欢喜，喜也喜也，愧老朽

如今才知红军伸张正义。

楚狄知用 5 个"红"字来对 5 个"白"字，对得工整得体。贺龙笑着，连连称赞："果然不假，是教书先生，先生才学过人。接着，贺龙自我介绍："我是贺龙，让先生受惊了。抱歉，抱歉！"

楚狄知一听与自己面对面站的是身经百战的贺龙将军，竟如此和蔼可亲，于是感动万分，反赠一联：

两副对联识得将军是英才，敬仰，敬仰！

贺龙当即回敬：

一场误会错将先生当奸细，休怪，休怪！

两人哈哈大笑，交成了朋友。贺龙还派人送他回家去。

（选自《党史文汇》93 年 3 期，作者：黄子云）

独臂将军贺炳炎

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黑冲子口，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子。这儿既没有名山，也没有胜水，有的只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还有那一片简陋的农舍。然而，这里却孕育了一位身经百战、遐迩闻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

投身革命

黑冲子口的老人们都知道，贺炳炎 1913 年 2 月 5 日降生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贺炳炎家里也仅有几亩薄田，一间破屋。9 岁那年母亲病死，贺炳炎由父亲贺学文抚养成人。贫穷悲惨的生活，使他从小就深知穷苦人的痛苦，养成了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每遇富家子弟欺侮穷人孩子，总要挥拳相助，抱打不平。

有一年冬天，贺炳炎和几个穷孩子在河边滑冰，突然来了几个富豪子弟横冲直撞，把一个穷孩子撞倒，鼻孔顿时流出鲜血。贺炳炎见此霸道行径，十分气愤，上前讲理挨了一拳。这可惹怒了他，只见他大喝一声，挥动双拳打得几个富豪子弟头破血流，逃之夭夭。

1928 年秋，贺龙率中国工农革命军转战到松滋，打土豪、惩团防，救济贫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穷人起来革命，对贺炳炎影响很大。从此，他便产生了参加部队反抗土豪劣绅的念头。当 1929 年春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再次来到松滋时，贺炳炎和父亲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贺炳炎刚去时喂马，后来当了勤务员，因打仗机智勇敢，不久又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并很快提升为班长。1930 年 12 月，在松滋杨林市地区，红二军团遭敌重兵围攻，虽经激烈战斗，终因敌我悬殊，难以取胜。贺炳炎和手枪队的战士护卫贺龙、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突围，与尾追不舍的敌人奋力拼杀，伤亡甚重。在这维系全军覆灭的紧要关头，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堕地，撒满路面。敌人见钱眼红，顿时你争我抢，挤成一团，早把追赶的事丢在脑后。待敌人主力扑来之时，贺炳炎等早已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三军七、八两个师在 1932 年 8 月 13 日向沙市、草市进攻。八师首先攻进草市，主力进入镇内，以一部向西警戒，与荆州守敌对峙。军部直接指挥七师进攻沙市，因敌人以沙市四周高地为依托，构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各种掩盖工事，并组成火力网封锁控制了整个街巷和道口，我军未能攻克，被阻在外围。午后，敌人猛增大量援兵，将攻入草市的八师团团围住，敌众我寡，万分危急。贺炳炎闻讯，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军部汇报他去援救的计划，一面冒着枪林弹雨亲自率领手枪大队急驰草市。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压向各个要冲道口，战士们接连中弹负伤，倒在血泊中。贺炳炎见此情景，急红了眼，不顾一切顺着墙根冲上去，夺了敌人手中机枪，扫倒一片敌人，控制了一条道路，战士们乘势占了制高点。敌人并不甘心，蜂拥反扑，战士们英勇拼杀，与敌激战半日，终于打破敌人包围圈，杀出了一条血路，将八师接出重围。贺炳炎因此受到军部嘉奖，调任骑兵大队担任大队长。

身陷囹圄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吃尽苦头，部队屡败不胜，遭受严重损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夏曦不仅没有从挫败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坚持错误，下令解散红军中的党组织，取消军队的政治机关。对此，贺炳炎坚决站在贺龙同志的一边，对夏曦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2年夏天，夏曦在红军内部搞肃反扩大化，凡是对王明路线有异议的人，无论军长、连长都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有的部队指挥员几乎全部被杀完，连贺龙也险遭迫害。部队处于极端混乱之中，失去了战斗力。1933年初，贺炳炎的父亲贺学文在鹤峰牺牲，他痛心疾首，含着眼泪掩埋了父亲的尸体，奔赴杀敌战场。当时他已是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虽处境维艰，但他仍带领部队斩关夺隘，转战在湘鄂边区。当贺炳炎率部打到鹤峰的时候，他被诬称曾与"改组派"分子一起吃过饭，而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在押期间，他受尽严刑拷打毫不屈服，一次又一次申辩，赤子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当众质问夏曦："我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许多将士替他申辩，非但无济于事，甚至也同样遭受打击和迫害。后经贺龙冒着个人安危保释，贺炳炎才结束了29天不明不白的铁窗生活。解除关押后，贺炳炎无限欣喜，怀着急切的心情回到战友们中间。可他哪里知道，虽然释放，却仍不被信任，不久即被派去新兵大队任大队长。这个大队是刚收编的帮会兵丁，野蛮好斗，工作很难开展。贺炳炎衔冤受命，忍辱负重，深入战士中间，因势利导，耐心教育，很快使这个大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被群众誉为"铁壳大队"。

1934年6月，红三军进攻贵州，为开辟黔东苏区，在沿河县成立独立团，他担任了团长。由于他具有较高的独立指挥能力，作战屡胜，在广大将士中享有盛名，因而整编黔东独立师时，又被提升为师长。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贺炳炎虽然提拔，仍不受重用，不久，他又相继调任总指挥部任管理科长兼作战参谋。半年之间，他变动四次职务，哪里有缺就去哪里补缺，不少战友常常为他抱怨，笑称他是"补缺官衔"。可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始终兢兢业业。

右臂截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贺炳炎和战友们一样欣喜若狂，部队士气高涨，又恢复了战斗力。

8月初，红二、六军团准备在板栗园围歼从江西增援鄂西的敌八十五师。贺龙命令贺炳炎带领十八团作"瓶塞"，堵敌后路。部队从拂晓前即进入阵地，严阵以待，一直等到上午11点多钟，敌人才气势汹汹向龙山开来。待敌进入包围圈，贺炳炎一声令下，十八团首先开火，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群，手榴弹也在敌人中间开了花。敌师长谢彬立即组织反击，拼命顽抗。红军各部队冲入敌群，与之展开了白刃格斗。混战之中，我军伤亡颇大，部队有些混乱。这时，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命令贺炳炎代理前沿指挥。贺炳炎毫不推辞，奉命上阵，指挥红军不断向敌群冲击，经过两个小时激烈的拼杀，将敌人大部歼灭，敌师长谢彬亦被十八团战士击毙。这次伏击战全歼敌八十五师部及两个团、一个特务营，缴获甚巨。

1935年10月，蒋介石对湘鄂黔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调动多达130个团的兵力，逐段筑碉推进，对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在龙山、桑植、永顺这一狭小地区一举消灭我军。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贺龙、任弼时等决定于11月下旬突围，进行战略转移。突围前夕，部队进行整编，贺炳炎升任新编红五师师长。12月22日，我军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战斗中，贺炳炎不幸右臂中弹，伤口血流不止，骨肉碎烂，必须立即截肢，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贺龙、关向应接到卫生部长贺彪的紧急报告，决定推迟转移，马上手术。这时，手术器分散各处，来不及收取，贺彪只得用修枪械用的钢锯给贺炳炎截肢，然后又用钢锉将截面锉平。因为麻醉药缺少，贺彪把一块毛巾塞在贺炳炎口里，让他咬牙忍痛。待手术做完，那块毛巾已被咬得稀烂了。由于药物十分紧缺，贺炳炎截肢后只能用吗啡止痛。贺龙担心长期使用吗啡止痛，会使贺炳炎终生丧失战斗力，便来到卫生所关切地询问医生有无其他办法。不料，谈话被躺在隔壁的贺炳炎听到，他猛然抓起起吗啡药瓶，将其摔得粉碎，并大声呼喊："我不能成为残废，我要上战场，我要杀敌……"贺龙和医生闻声跑进他的房间，耐心地进行安慰。贺龙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将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曾落泪，可此时此刻却两眼充满了泪水，拣起两块贺炳炎手术时锯下的碎骨，用红绸包好，装进衣袋。多少年以后，贺龙曾多次打开红绸告诉人们："这就是我们独臂将军贺炳炎的骨头。"

过雪山草地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以后，飞跨鸭池河，转战乌蒙山，于1936年4月下旬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7月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经过整编，贺炳炎又调任红六师师长。这时，他的伤口仍然十分疼痛，可他拒用吗啡，咬紧牙关硬顶着，实在支持不住就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不久，进入雪山草地，他率领红六师担任全军后卫。雪山草地气候恶劣，道路艰险，加上粮食奇缺，给行军打仗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贺炳炎经常走在部队的后卫连，帮助连队干部解决粮食和收容问题。遇到伤病员不能行走，他就用左手把伤员扶上

马，一个一个送到宿营地。爬雪山时，他让重伤员骑在马上，叫轻伤员扶着马身，拉着马尾，自己牵着缰绳，一步一步往上爬。因为长期徒步，他的鞋子和战士们一样常常烂得不能穿。于是，他学着用一只手打草鞋，用嘴代替另一只手，门牙竟因打草鞋咬绳索磨出了深深的槽痕。过草地前，部队只筹到很少的粮食，途中没有补给，大部队走过后能吃的野菜亦很难找到，后卫部队只得找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为了避免中毒，贺炳炎一到宿营地，就和政委廖汉生一起找野菜品尝，证明没有毒，才向全师推广。有些野菜又苦又涩，少数战士吃不下去，贺炳炎就把野菜送他们嘴边，恳切地劝说："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你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被劝的战士总是流着热泪把野菜吞下去。

1936 年 10 月 20 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贺炳炎和红六师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选自《纵横》89 年 3 期，作者：中崇辉）

瞿秋白与郭沫若

同是新文学界高手

1939 年 3 月的一天，由重庆回乐山探亲的郭沫若，在峨眉师资培训班作了关于抗日时局的讲演后，有位记者到他的住处采访，其中问道："瞿秋白同郭先生同是新文学界高手，瞿秋白被杀，而郭先生荣任厅长，有何感想？"郭沫若回答："有幸，有不幸。"这位记者将瞿、郭相提并论，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同是新文学界高手"，而且还因为他俩都是共产党方面的重要人物，更因为两人有着很深的感情交往。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0 年 10 月，他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赴苏联采访，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著名散文集和一本《俄国文学史》，成为很有影响的文学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郭沫若的诗稿也不断地从日本寄回上海发表，1921 年 8 月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他们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称他们"同是新文学界高手"，是当之无愧的。

推动郭沫若走上革命道路

郭沫若奔向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策源地，是由于瞿秋白对郭的器重。

经历了 1925 年"五卅"惨案后的郭沫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与国家主义者展开的论战，引起了瞿秋白的注意。这一年，有化名为"灵光"者（即林筌），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咒骂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郭沫若奋起反击，连续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等文章驳斥之。正当他与国家主义者的"孤军派"、"醒狮派"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1925 年冬日的一个下午，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在作家蒋光慈（1901 年—1931）的陪同下，到上海郭寓访问。这是两位互相久仰的"新文学界高手"的第一次会面。郭沫若在自传中记载了这次见面的情形：

只记得是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后，秋白戴着一副药片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秋白的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早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

从"他有肺病，我早是晓得的"可以看出，郭沫若对瞿秋白是相当了解的。那时候，郭沫若的意趣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总是想着怎样去破除国家主义的迷信及其催眠力，所以他向瞿、蒋二人大谈国家主义者中"孤军派"与"醒狮派"观点的区别，批驳他们的荒谬之处。并说他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之路，只有效仿苏联的办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瞿秋白默默地认真听着郭沫若滔滔不绝的分析，说郭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孤军派"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便是学习日本和土耳其。对于日本郭沫若是很熟悉的。但对于土耳其方面感到隔膜。他希望瞿秋白能给他提供些有关土耳其方面的资料。瞿爽快地答应了，并说随后捡出，由蒋光慈交来。

那时候，瞿秋白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他希望郭沫若和创造社的朋友们也做些文章去。之后，他们又零碎地谈了些俄国文学。一个钟头后，瞿秋白和蒋光慈告辞了。

不久，瞿秋白到了广州。1926 年 2 月，郭沫若收到广东大学聘请他担任文科学长的信件，他欣然同意。随后，广东大学的聘书和郭沫若等赴羊城的旅费，都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祖涵）委托他的弟弟林祖同带到上海，面交郭沫若。3 月 18 日，郭离沪，于 23 日抵达广州。后来陈豹隐对郭沫若说，到广州的事出于瞿秋白的推荐，但瞿从未向郭提过这件事。1979 年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在乐山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题为《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的发言，证实了这件事。王引用阳翰笙同志的回忆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的推荐，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没有问题的。"从林伯渠经手送聘书和旅费，并负责接洽，也可充分说

明，此事的确是由党组织认真安排的。应该说，瞿秋白的这一推荐，对于郭沫若一生的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这一推荐，郭沫若能否到广州去就很难说了。那么郭沫若 1926 年以后的历史就得重新改写。

最强烈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后，留在江西的瞿秋白于 1935 年 2 月被国民党俘获，关押在福建长汀 36 师师部。负责为瞿秋白看病的 26 师军医陈炎冰早年曾是共产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有时到囚室小坐，与瞿闲谈。有一天，他们两人聊天时，瞿说自己对于翻译苏俄文学有兴趣。随后陈炎冰提到郭沫若，因为他年青时喜欢读创造社的文章，大革命失败后也曾流亡日本，知道郭在日本千叶市川。他问瞿秋白是否认识郭，瞿答认识。这时陈说："郭沫若在日本，你要是写信给他，我可以设法转交。"瞿秋白欣然同意，立刻提起钢笔来，一口气写了千把字。兹将这封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全录于下：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罢？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在那[哪]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是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的]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了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还记得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个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廿八、汀州狱中

这封信写于《多余的话》完稿后 7 天，就义之前 20 天，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一般的问候、对往事的回忆，还抒发了当时内心的感慨。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瞿、郭之间心心相通的感情交往。由于写得比较匆忙，信中有漏字，错字和个别不很通顺的地方，也无信封（文中方括弧中的字，系本文作者所加）。

信中"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指日本政界元老，曾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1849—1940），十分器重郭沫若有关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瞿秋白信中提到这件事，提到郭沫若有关甲骨文和创造社的著作，说明他平时很关心郭沫若的动向，推崇郭的论著。

"还记得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这事当在 1926 年 9 月北伐军胜利到达汉口时，那时候郭是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瞿是国共合作的核心人物之一。

瞿秋白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留恋。"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的]欧美名著，心上觉着说不出的遗憾。"他热爱文艺，却被中国革命的潮流推上了政治领袖的地位；既已从事政治活动，却又对政治表示厌倦，并渴望重操文艺。这是由于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政治斗争旋涡后屡遭创伤的缘故。他厌恶王明路线支配下的政治，希望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文艺方面得以发挥，这是十分必然的。他十分羡慕郭沫若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他与陈炎冰闲谈时说过：当时闲着，如有可能系统地翻译苏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在这封信中，他再次提到想翻译俄国文学，并为"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而深深地遗憾。早在 1925 年冬拜会郭沫若时，他就曾劝郭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拿破仑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当时郭沫若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因为郭认为托尔斯泰是贵族，还

倡导无抵抗主义，对托尔斯泰不感兴趣。但是三年后，郭流亡日本时，还是遵照瞿秋白的劝说，译了《战争与和平》，可惜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当时郭为了生计，卖稿换米，译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著名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恰好这时上海书局托人来交涉翻译《战争与和平》，他答应了。因他不懂俄文，从德译本转译，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后来又改以为英译本为蓝本。上海书局急于出版，他只好边译边寄译稿。从 1931 年 8 月初到 1933 年 3 月，出了三个分册。后来由于书局营业困难而停止出版，剩下的尚未出版的书稿，寄存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里。

这封信中最为精辟的要算关于创造社的一段话，瞿秋白读过郭写于 1932 年的《创造十年》前半部，他本人也了解创造社的历史，所以对创造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劝郭"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后来郭于 1937 年果然把《创造十年续篇》写出来了。

两年后方见友人遗稿

这封信经过多人传递，历经两年多，才辗转到郭沫若手中。瞿就义后不久，陈炎冰还来不及将瞿信转送，36 师就奉命从汀州移防瑞金。陈不便携带此信出发，将它连同瞿赠送给他的诗词手迹和题赠照片，一同托付与 36 师另一位倾向革命的医官王廷俊妥为保存。为了安全起见，这年 10 月，王廷俊将这三件遗物，从南京用双挂号寄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劳伦斯大学，交给他的好友、正在这个学校留学的柳无垢(1914—1963)。柳元垢视之如珍宝，特意为此事去纽约，与当时担任华文报纸《先锋报》周刊常务编辑、后来成为致公党领导人的陈其瑗(1892—1970)先生，商量如何处理。陈将瞿致郭的信件发表在《先锋报》上。随后，柳无垢通过她的父亲柳亚子探查到了郭在日本的地址。她想把原信取来寄去，但不知何故，没有取到。她从美国写了一封信告诉郭这件事，寄到中国，由柳亚子转到日本。郭收到后即去函纽约索取，未果。柳无垢只好将刊有这封信的《先锋报》寄到日本去，另抄一份妥为保存。这说明郭沫若在归国之前已从报纸上看到这封信。1937 年 4 月，柳无垢带着抄件回到中国，交给父亲柳亚子保管。柳亚子十分珍视，设法拍成照片，分送他认为必要的朋友。7 月，郭沫若从日本回上海，与柳亚子相会时，曾问起原件何在。后来郭在广州(或香港)见到从美国归来的陈其瑗，又提起这封信的原件，陈郑重地交给了郭。至此，郭才看到瞿的手迹。

(选自《党史文汇》92 年 6 期，作者：魏奕雄)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

侯外庐(1903—1987 年)同志是山西省平遥县人；1924 年，他在汾阳中学毕业后，赴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同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历史专业。1925 年通过友人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因感于李大钊的品格和学识，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6 年在一次同李大钊会面时，他就坦率地表白想翻译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一则自己可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则又可以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原著学习出点力。对此，李大钊同志表示十分称赞。但是，在当时封建军伐的统治下，国内不仅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就连中文以外的其它译著也少得可怜。为此，他决定取道苏联赴法国巴黎，去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哈尔滨等候签证期间，偶而在街头的书摊上，他发现有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出卖，便各买一部，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就是在这时，他确定了旅法的宗旨——学习德文，翻译《资本论》。

1927 年夏天到法国后，他立刻开始学习德文，同时在巴黎大学听布克莱教授的"唯物史观"课，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自学《资本论》。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于 1928 年起步试译《资本论》。同年春，成仿吾、何肇绪两位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党支部组织有一个读书会，还定期请他讲解《资本论》。所有这些，都使他对翻译《资本论》的决心和信心倍增。

1930 年春天，他把《资本论》刚刚翻译完 20 章，但由于经济无法维持，决定回国。在归途中，路经德国柏林时见到了成仿吾同志。他的愿望是想通过成仿吾同志争取一个留在苏联完成翻译《资本论》的机会和条件。于是，成仿吾写信给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张闻天同志。侯外庐带信直奔莫斯科，找到张闻天。张闻天表示愿意支持和帮助；但后来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而未能遂愿。

1930 年 4 月，他回到哈尔滨，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一方面教书，一方面重理《资本论》译事。1932 年初，侯外庐辗转回到北京，并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王思华同志。两人一见如故，仅二三次会面，就约定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王思华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住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1932 年整个暑假期间，他每天一早到王思华宿舍去"上班"。就在这一假期中，"春秋书店"登出发行他俩《资本论》译本的预告，他们的翻译工作就更加紧张了。他终日伏案，一干一个整天，工作效率很高。

为了让译本早日和读者见面，他俩决定将《资本论》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出版。1932 年 9 月用"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上册，译者署名慎明(王思华)、侯外庐。

1932 年 12 月，国民党北平（北京）政府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为罪名，将侯外庐逮捕判刑。他为继续翻译《资本论》，在狱中坚持自修德文。1934 年出狱后，回到山西。1936 年 6 月，他得知王思华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全译合订本，译者署名为右铭（王思华）、玉枢（侯外庐）。大约在 1936 年底，侯外庐将这个译本托周小舟同志（当时驻太原的红军代表）带了四部，回延安呈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他的老战友成仿吾。

侯外庐回到山西后，独自继续翻译《资本论》。为了对付阎锡山的“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等所谓理论，侯外庐没有按《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顺序来译，而是首先翻译了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共 11 章。由于当时阎锡山反共气焰日炽，侯外庐译出的地租部分未能先行出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迫使他终止了《资本论》的翻译。太原沦陷前夕，他在汾阳把《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部分译稿及其它书籍、笔记装好一小箱，托付续范亭将军帮他带到延安。当时，因战事紧张，续范亭赴延安的计划一再推迟。但无论部队开到那里，续范亭和南汉宸同志总是把这箱书稿带在身边。有一次，部队在离石遭到敌人包围，突围时，这箱书稿既不可能带走，也没有时间深藏，只好塞进一个老乡家废灶的烟囱里。不久，我军收复该地后，续、南两位特地亲自寻找书稿，发现书稿已经化为灰烬。

当初，侯外庐把书稿托付续范亭同志时满以为把译稿全数交付了，他后来才发现《资本论》第二卷前十五章译稿，由于遗忘而没有装进箱子里，结果这部分译稿反而保存下来。解放后，应北京图书馆的征求，将它交给该馆收藏了。

侯外庐同志虽然只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它却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译本。

（选自《党史纵横》作者：王志毅）

辣椒引起的风波

一九三二年六月，红一军团成立了保卫局，罗瑞卿同志任局长，我在保卫局里当管理员。

红一军团辗转在武夷山区，部队连日风餐露宿，生活十分艰苦。看着同志们每日尽吃野菜、南瓜汤，我这个当管理员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有一天，保卫局弄来一头大肥猪，是打土豪分的果实。我可乐坏了，心想：首长和战士们有好多湖南、江西、四川籍的，都爱吃辣椒，明天来个辣椒炒回锅肉，包同志们满意。

谁知第二天一摆上饭菜，竟出了漏子。

辣子回锅肉一摆上饭桌，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的同志一叠声欢呼，可是刚从福建来的几个新战士不爱吃辣椒，却噘起了嘴巴。我心想：你们事儿还挺多呢。顺嘴就没好气儿地说：“将就点儿吧！这比野菜、南瓜汤强多喽！”

两句话不打紧，惹火了福建的同志：“你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辣椒，这不是故意整人嘛！”

两方面言来语去地争起来了，若不是同志们劝开，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真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

费力不讨好，心里真别扭。午饭后我正躺在床上生闷气，通讯员通知我到局长那里去一下。心想，找我莫不是又要排节目？因为我还是文娱骨干训练班班长哩。

“你们今天打牙祭了吧？”一见面，局长边叫我坐下，边问。

“是啊，局长，你吃起味道怎么样呀？”

“我吃起来当然要得响！我是四川人嘛！”

听到局长的话，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是罗局长那微笑的面孔倏地阴了天：“你先别高兴！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表扬你的！”

局长平时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一起打球，同台演戏，从不拘束。此时第一次看到他愠怒的表情，我心里直犯嘀咕。

“福建的同志不吃辣椒，你晓得吗？”我听了一震，糟了！一定是有人向局长告了我的状。

“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低下了头。

“加点儿味道，这也是好心，我不否认；事先考虑不周，也是可能的。但在饭堂里吵起来，就是你的不对了！”局长声音愈加严厉了。

我哑然了。真没想到局长发火了。我觉得委屈，又无言可辩，半天才轻轻吐出三个字：“我错了！”

局长站起来，端给我一杯水，我双手接过，慢慢抬起头，却意外发现局长在笑，依然那么和蔼、亲切。他抱歉地说：“你瞧，我又发火了！”

我心里不由得一热，眼睛湿润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象海浪一样博击着我的心。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参加红军闹革命。几位福建同志新来不久，对艰苦生活环境可能不太适应，我们更要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他们，照顾他们。管理员的工作可不简单呀！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这里面有政治学问哩！你是老同志了，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做团结的模范嘛！”

听了局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心里悔恨莫及，我站起来说：“局长，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今后你看我的吧！”

翌日，天不亮我就起来忙禾。开饭了，每个餐桌上放着一盆香喷喷的红烧肉，旁边单摆一盘炒辣椒。我先走到几位福建同志面前，诚恳地表示了歉意，福建的同志也请

我原谅。顿时,几双大手纷纷伸过来,同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饭堂里一片团结气氛。有人说"感谢管理员",我激动地大声说:

"不要感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选自《纵横》84年1期,作者:潘振武)

革命家雅号佳话

刘九书柜: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刘少奇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同乡都以"九满"和"刘九"称之。他少年好学,手不释卷,十几岁时就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村里人见他好学深思,读书很多,便对他以"刘九书柜"称之。

铁人:周恩来(1898—1976),江苏淮安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周恩来幸免于难。此后,他以顽强的毅力亲赴南昌策动八一起义,被同志们尊称"铁人"。

徐二外婆: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革命家和教育家。由于徐老对青年象对待外孙一样的慈爱,既认真而又耐心,把自己所有的劳动所得全部贡献给社会,自己却过着类似"叫化子"的生活,被尊称为"徐二外婆"、"徐二叫化"。

真伢子: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彭德怀乳名钟伢子。年幼的钟伢子为人忠厚耿直。他平素沉默寡言,不讲则已,讲必真话。湘潭方言中,"钟"与"真"谐音,人们便干脆称他为"真伢子"。建国以后,彭德怀还乡时,当年的伙伴还象以前那样亲切地称呼他为"真伢子"。

小马克思: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留法期间,他曾靠一本字典的帮助,勤奋攻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此而得同志们的这一誉称。

小列宁:陈延年(1898—1927),安徽安庆人。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年,陈延年与王若飞等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平时不太多言,但在讨论问题时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见解,常常为此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同学们见他与平时判若两人,便问他原因,他答道:"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同学们佩服他的精神,称他为"小列宁"。

贺胡子: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贺龙青年时代就蓄了胡须,大革命时期,家乡百姓尊称其为"胡子"。1928年春,贺龙率部回乡建立根据地,一时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果然转故乡"之称。

何胡子:何叔衡(1875—1935),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早年就读于船山学社,由于数他年长,又蓄须,青年人尊称他为"何胡子"。毛泽东对何老十分尊重,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陕北活地图: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西北红军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了解陕北的社会情况、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都十分熟悉,被人们称为"活地图",为指挥作战奠定了基础。

马天安:马骏(1895—1928),黑龙江宁安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他任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曾领导各地请愿代表大闹天安门,被周恩来等战友称为"马天安"。

小白龙:白乙化(1911—1941),辽宁辽阳人。传奇式的抗日英雄。1932年,他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从几个人几条枪发展到3000多人,屡战屡胜,百姓均以"小白龙"称之。抗战期间,他任八路军团长,转战丰滦密。一时间,"小白龙"、"白大个儿"、"白大胡子"成为人民爱戴、敌人恐惧的名字。

父母同志:冯白驹(1903—1973),海南琼山人。琼崖革命领导人。冯白驹在领导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期间,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黎族、苗族同胞的爱戴。他们尊称中共为"父母党",纵队为"父母军",冯白驹为"父母同志"。

王胡:王荷波(1882—1927),祖籍山西太原,生于福建福州。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王荷波在浦口铁路工会工作。他严以律己,办事公正,深受群众信赖。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亲昵地称为"王胡"。他40岁生日那天,工人们还敲锣打鼓地送给他一块大红匾,上书"品重柱石"4个大字。

飞兵团长:王尔琢(1901—1928),湖南石门人。红军著名将领。王尔琢英勇善战,曾于1928年5月率部急行军130里,攻克江西永新。战后,红军宣传战士编了快板演唱,赞颂他作战神速,他也被何长工等战友称为"飞兵团长"。同年8月,王尔琢不幸牺牲。毛泽东闻讯后,题联哀悼: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山东张: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抗日英雄,杨靖宇曾化名张贯一,深入抚顺煤矿组织工会。他见矿工中山东人居多,就自报是山东曹县人。矿工们都觉得这位山东来的张贯一为人耿直、忠厚、主持正义,都把他当作自家人和主心骨,亲切地称他为:"山东张"。

飞毛腿:向钧(1906—1928),湖南衡山人。杨开慧的表弟,湖南党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向钧任中共衡山地委书记。他精力充沛,常常一天跑几十里山路开展工作,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飞毛腿"。在他的努力下,衡山农运风起云涌,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书憨子和肖大汉:肖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著名将领。肖劲光年幼时读书很用功,每天往返20里地去镇上学校上学。放学后上山砍柴,也不忘带着书读,

被同学们称作"书憨子"。后来，肖劲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在学校里，他酷爱体育运动，又长得高大结实，被戏称为"肖大汉"。

中国的蔡特金：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向警予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由于她在妇运史上的卓越贡献，人们把她和"三八"妇女节的创立者蔡特金相比，称其为"中国的蔡特金"。

（选自《党史博采》92年7期，作者：裴耀军）

湘鄂赣苏区兵工厂

湘鄂赣苏区兵工厂，于1929年9月2日根据湘鄂赣边境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陈功任厂长。他上任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武汉、长沙等地聘请了3名技术员，购买了一些机械设备，在红五军和湘鄂游击队中挑选了30多名骨干，厂址设在平江县的南桥乡永联村。不久，因敌人进攻，工厂便搬到平江漆树洞和到寺坦，年底又搬到平江的芦头孔家洞、朋托内等地。

1930年8月，由于敌人疯狂"围剿"，技术人员有的牺牲，器材损失严重。湘鄂赣边区兵工厂改名为湘鄂赣军区后方修械处，调万载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曾国旗任特支书记兼保管（后改任兵工厂政委）。当时厂房困难，他们就临时搭了个茅棚子；没有原材料，便找来破铜烂铁；没有车、刨、钻等机床和铸模，就用土办法造；缺乏修械技术，则开办短训班，请技术人员讲课传授。到1931年，后方修械处扩大为湘鄂赣军区兵工厂，工人增加到160余人，设备也不断完善。不但能修理大炮、机枪、步枪等武器，还能翻砂制造手枪、花机关枪及多种弹药。

1932年1月，敌人又一次"围剿"苏区，湘鄂赣军区经理处负责人叛变，兵工厂遭到严重破坏。据此，省委决定："集中各县懂机械的技师组织一个兵工厂。"当年春，即在浏阳东乡桃坪马家场又重新建立了湘鄂赣省红军兵工厂。

兵工厂受湘鄂赣省军区司令部供给部和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双重领导，主任向仕俊（不久吴道丰继任），政委吴德藻（后为向仕俊）。全厂起初有技师和工人60人（其中女工40余人，主要是造子弹），设有翻砂、烘炉（打铁）、修械、制药、子弹、木工、木炭、保管、接洽等9处。能修理各种机械，制造手榴弹、追击炮弹及各种枪弹和刺刀、马刀等。工人们生产积极性很高，除完成以上任务外，还经常尝试自制枪炮。他们造的手提迫击炮能打八九华里远，威力很大；自制的驳壳枪虽然不能自动退壳装弹（打一发子弹要扯一下机筒），但命中率高，杀伤力强。后来，全厂职工齐心协力，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制造了一尊射程两华里，专打敌人碉堡的大炮。在攻打神仙岭的战斗中，一炮就轰掉了敌人一个碉堡，吓得其余20多个碉堡的守敌纷纷逃跑，不攻自破。

由于形势不断变化，兵工厂在桃坪驻了一年时间后，迁到浏阳金坑的合楼麻子窝，后又迁平江的芦头。

与此同时，1932年9月1日，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在江西万载小源召开的全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省委枪械局。中旬，枪械局在平江黄金洞的栗山正式建立，有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170多人。枪械局的技术骨干，主要是通过教育改造的敌军俘虏。其主要任务是修理枪炮，其次是制造弹药，当时江西、湖北、湖南边境几个县革命武装的枪械修理与弹药供应都由枪械局承担。

1933年枪械局与省红军兵工厂合并，仍称湘鄂赣军区兵工厂，由胡兆丰任厂长，向仕俊任政委，厂址设在黄金洞内，人员发展到300余人。9月，省军区决定派出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到江西修水、武宁、湖北崇阳等地建立分厂，兵工厂发展到1500余人。

1934年湘鄂赣苏区红军游击队进入了艰难的3年游击战争时期，该厂无固定地址，经常活动于平江县的黄金洞、连云山、徐家洞、辜家洞和浏阳县的宝盖洞、金坑、鹤岗、燕子崖以及修水、铜鼓、万载县境内的深山老林中。尽管环境恶劣，兵工厂仍有100多个工人坚持生产，工厂仍设子弹、炸药、修械、铁工、木工、技术、事务、保管等8个处。

中央红军长征后，敌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更加厉害，兵工厂则是"进剿"的重点。为了保存兵工厂，他们在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黄金洞深山老林内挖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山洞，洞口用树枝和土砌了一道一米厚的隐蔽墙，洞顶挖了几个小洞作为通气口，里面亮着汽灯，工人们用毛巾捂着鼻子，赤着膊，挥着铁锤在里面捶打，即使到了山洞前，也听不到任何响声，洞内煤烟从空气孔里散出，只有少量烟雾，这就不易被敌人发现，比较安全。

但是，洞里烧的煤过多，煤炭味过浓，并且有毒，非常呛人，如果长时期在洞里生产，人会有中毒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用易燃无烟的竹炭做燃料。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湘鄂赣苏区兵工厂虽然规模不断缩小，但生产一直未停。1937年国共合作时，该厂迁到平江嘉义，改名为新四军军械修理处。

（选自《党史文苑》93年3期，作者：徐许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家银行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家银行，是根据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决议，于1932年

3月在瑞金叶坪成立的。毛泽民任行长，李六如任副行长。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担负着筹措红军的军需物资、苏维埃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以及苏区300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繁重任务。然而，它几乎是白手起家办起来的，全部财产只有从土豪那里没收来的几担银元和一些纸币，银行的工作人员不懂业务，是靠边学边干，逐渐熟练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短短的几年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发行了苏区货币。根据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的经济政策决议，苏维埃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7日，发行统一使用的货币。除印制纸币外，还铸造了可以到白区流通的银元和两角的银毫子，及一分、五分的铜板。新的货币在苏区发行后，就使中央苏区获得了财政的自由和统一。

其次，统一财政。1932年12月，中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布第十二号训令，统一会计制度和建立国库制度。苏维埃国家银行代理国库，掌管国家所有现金项目的收入、支出以及保管等项业务。统一财政后，克服了各自为政、分散财力物力的现象，保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开支的供给。

第三，发行建设公债。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其中三分之一用作红军作战费，三分之二供给合作社、粮食调济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用来发展生产和同白区进行贸易。当时，苏区人民深受投机商人的盘剥，例如，5只鸡或100多个鸡蛋才能换到一斤食盐。苏维埃国家银行支持合作社、外贸局等单位与白区进行贸易后，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商人对苏区群众的盘剥，改善人民生活等，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提倡储蓄运动。为了发展储蓄，积累资金，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给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支持。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及时向苏区广大工人群众发出号召，在各级工会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与下，储蓄活动迅速在苏区开展起来。

(选自《党史月刊》92年4期，作者：李崇雨)

陈独秀案

1932年10月19日晚上，上海北火车站戒备森严，闸北五区警署派出的保安大队持枪肃立，喧闹的车站顿时笼罩在阴森的恐怖气氛中。11时，一辆市公安局的汽车嘎然而至。车上走下一位50多岁的犯人，衣着淡蓝色的哔叽长衫，头戴浅黄呢帽，唇蓄微髭，在军警的押解下，缓缓地移动着脚步。他就是1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此刻，他将被押往南京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

这起轰动全国的陈独秀案，是因托派组织被破获而发生的。陈独秀在1929年11月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首领。1932年10月，他们匿居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处，筹谋宣传等活动。因叛徒泄密，机关为国民党破坏，托派的一些骨干分子被一网打尽，15日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逮捕。这个案件，立即成为一条特大新闻，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

陈独秀一生数次锒铛入狱，饱尝铁窗滋味。这已是他第五次被捕。前四次都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几乎每一次都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但都没有诉之法庭，最后也未以刑法论罪。关押时间多者3个月，少者10来天。都以罚款保释的形式获释的。此次被捕已非昔情况可比。一来，时值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又处于激烈的内战之中，而陈独秀虽被中国共产党除名，但他首创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身份路人皆知；二来，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坚持反对国民党的立场，托派组织和宣传刊物均为国民党查禁的对象。这些因素，使陈独秀的此次被捕凶多吉少，结局难以预料。

陈独秀解至南京后，先归国民党军法司羁押。军法司两次作了审讯。何应钦亲自将陈独秀提到军部传讯。蒋介石对此案也甚为重视。国民党中央特派组织委员会干事黄凯，携带陈独秀案有关文件专程赴汉口谒蒋面陈。南京政府拟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按照惯例，特别法庭禁止旁听，同时也不公开罪行。这种特殊的处理，对陈独秀是极为不利的，而社会上主张处以极刑的舆论也有传闻。

陈独秀被捕时正患盲肠炎，体力虚弱。入狱后即接受医治。关押期间，不准会客和接见新闻记者，读报通信的要求也遭拒绝。陈独秀曾向外透露，此案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但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予以公开审判。

陈独秀案发生后，社会上展开了营救陈运动。上海的《晨报》、《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纷纷刊文披露案情，有的对陈独秀表示同情，主张公诉法庭，伸张正义。国民党中委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及林语堂等社会名流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南京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师生起来声援、设法营救。著名律师章士钊等人表示愿为陈独秀辩护。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取消了原先拟定的组织特别法庭的决定。蒋介石电令将陈独秀交司法机关审理。10月26日，军法司派监狱科官长两人率军警八人押送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移交法院。依法第一审属江苏高等法院，因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故暂押位于南京的江宁地方法院。11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派检察官朱偶前往南京办案。

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江宁地方法院刑二

庭三次开审。每次庭审辨认激烈。座前座后，旁听席场场爆满。第三次庭审，陈南京外，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也有人专程赶来。旁听者达200多人。法院拟草的起诉书以“危害民国”罪加之陈独秀。陈独秀的答辩非常巧妙。他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他援引孙中山、黄兴领导同盟会、国民党推翻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为例，辩明反对政府和反对国家是两码事。如果说反对国民党政府就是危害民国，那么国民党岂不已叛国两次？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应首先科以叛国罪？这机智且带讥讽的辨语使审讯官甚为难堪。陈独秀的辨护律师章士钊、吴之屏、彭望邺、蒋豪士、刘祖望等人出庭辩护，力辩陈独秀的言行不能构成“危害国民”罪。章士钊的辩护词中，针对起诉书所列罪状，一一加以驳斥。其大意谓，陈攻击政府，但尚无推翻政府的行动；陈倡言暴动，但指将来，仅是理想而非事实，陈宣传共产主义，实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容；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但并非“首尾一贯之共产党”；陈领导的托洛茨基派也与中国共产党为敌，“有功于国民党也”。要求法庭依据法律条文，谕知无罪。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词不以为然，起而作补充方明，说章律师的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法院对陈独秀及辩护律师的驳词不理睬。4月26日宣告判决。陈独秀仍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当庭表示裁判不公，声明上诉。5月27日，判决书送给陈独秀后，他在狱中拟成上诉状，由律师蒋豪士携带赴沪交章士钊律师研究后递交最高法院。7月2日，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朱偶作为原告提呈上诉答辩书，声称：“原判根据论罪，洵无不合，上诉意旨，自非有理，应请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事情就这样拖下来，最高法院迟迟不作裁决。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将有期徒刑13年改判为8年，判决文中，取消了原判“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组织团体”的语句，保留了“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终审判决后，陈独秀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服刑。在狱中，陈独秀曾进行绝食斗争，争取到一些阅读史籍，著书作诗的权利。《东方杂志》上曾发表过他这时所作的有关文字学研究方面的论文。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的谈判中，要求以民族利益为重，一致御外，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8月21日，蒋介石兑现了他的保证，由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发表呈文和训令，称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国民政府将该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25日，陈独秀获释，针对国民党政府司法院的呈文和训令，陈独秀在写给《申报》馆编辑部的信中说：“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鸣冤之余，大有奚落之意。

陈独秀从1932年10月被捕至1937年8月获释，囚禁近5年之久。5年以后，他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冷僻村落里悄然病逝。与很多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未加审讯便被秘密处死的中国共产党烈士相比，陈独秀这样一个曾是中国共产党的要人，被诉之法庭，并“享受”判刑之待遇，大概算是一种例外，一种侥幸了吧。或许，他在1929年与中国共产党的离异使他幸免于难；或许，他作为文化界名流的声望赢得了社会乃至国民党政府一些要人的同情，使他免于暴尸刑场。但这一案件仍不妨看作一个历史冤案而载诸史册。

（齐卫平）

旧上海电影院趣语

电影是综合的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的观众。电影在我国，最早发源于上海，十九世纪末，由于各国商人的频繁来华，电影也随之传入我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滩出现过一件新鲜事，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电影，当时人称“西洋影戏”。这个新鲜玩意儿的出现，立即成为轰动全市的新闻，吸引了不少观众。此后，徐园经常放映电影，多为法国影片。1897年7月，上海的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也开始放映由美国商人雍松带来的影片。内容有《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黎府》、《骑马大道》、《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印度人执棍跳舞》、《西方野番刑人》、《以拳术赌输赢》等等。天华茶园还在《申报》上刊登广告：“此戏使用机器转动，灵活如生，且戏目繁多，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许多市民感到新奇，争相先睹为快。这以后，许多外国的“冒险家”，见放映影片有大利可图，便都纷纷接踵而来。不过这些外国商人的影片放映，大都没有固定的场所。一些茶楼、酒店、饭馆、戏园、游乐场、溜冰场，便成了他们放映影片的地方。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来到上海，先后在福州路升平茶楼、乍浦路跑冰场以及湖北路金谷香番菜馆放映电影营利。1903年，加伦白克回国前将陈旧的影片和残破的放映机转让给他的朋友雷玛斯。雷玛斯开始仍在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经过周密筹划，他将放映场所选择在福州路的青莲阁楼下。青莲阁是当时全市闻名的茶楼，二楼是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堂的小型游乐场。雷玛斯在青莲阁楼下租赁了一

间小房间作放映室，又雇了几个印度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门口拿着喇叭、铜鼓大吹大擂，以此招徕生意。果然观众云集，雷玛斯因此而财源大开，赚了大钱。1908年他在海宁路乍浦路口用铅皮搭建了一座只有250多个座位的简陋影戏院，这便是我国也是上海的第一家电影院，定名为"虹口大戏院"。其原址，现在是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到了1910年，又有一个叫郝思倍的葡萄牙人在北四川路开设了爱普庐影戏院。后来，雷玛斯又在海宁路、北四川路修建了另一座设备较完善的维多利亚新戏院。随着国外影片在上海的倾销，雷玛斯发了横财，他又先后兴建了恩派亚（今嵩山）、卡德、万国、夏令配克（今新华）等电影院，成为势力最雄厚的电影商人而招摇于十里洋场。1926年他卖掉大部分电影院回国时，已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了。

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兴起，许多外国电影投机商人纷纷来上海经营电影事业。一些南北财团、地方势力、流氓大亨、洋场阔少见开影戏院有利可图，也蜂拥而上，更造成了电影业的大繁荣。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短短时间里，上海电影院连带兼营放映影片的剧场有近百家，许多设备先进，建筑豪华的一流电影院都出现于这一时期。1933年大光明电影院的落成，达到顶峰。宽敞的售票厅、富丽堂皇的休息厅、浅绿色的盥洗室，以及多达2000个舒适的沙发座位，都显示出当时最现代化的气派，被称为远东第一大电影院。当时的上海电影院，按建筑设备和放映轮次，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头轮有光陆、大光明、大上海、南京（今上海音乐厅）、卡尔登（今长江剧场）、国泰、美琪、夏令配克、大华、新光、奥迪安等，设备考究，座椅舒服，冬有暖气夏放冷气。大光明、卡尔登等楼上设有包厢，大光明还备有"译意风"，看电影戴上耳机可以听到英语中译，开我国翻译西片之先。头轮电影院的票价为小洋6角（当时银行1元合小洋12角）。只有光陆一家，一直维持最高票价1元。二三轮有北京（今贵州）、兰心（今上海艺术剧场）、巴黎（今淮海）、恩派亚、黄金（今大众）、辣斐（今长城）、奥飞姆（今沪西）、百星（今泰山）、上海、中央、新中央、蓬莱、九星、山西、东海、光华、武昌、卡德、中华、福星、荣金、明星、爱普庐、新爱伦等。这些电影院大部分放映外国原版旧片，另打汉语幻灯说明，只有中央一家是专映国产片的。二三轮电影院的票价为4角或2至3角不等，个别电影院的票子有实行买一送一的。四轮电影院有的买一张票进去可反复看而不再收费。当时电影院的场次和今天差不多，不过，每场有十分钟的幕间休息。一般上午都不放映电影，少数电影院星期日上午有早场，逢圣诞节和新年、春节，另加半夜场。电影院一般是不设小卖部的，只有在休息时间由电影院童工携筐在场内兜售糖果点心等食品。这些电影院中，只有爱普庐等少数几家放映连场，一张票可连看数场，进出不受限制。说到电影院的秩序，头二轮较好，三轮大都很糟，嗑瓜子声、谈笑声，甚至吹口哨声，常不绝于耳。二十年代前期放映的电影大都是黑白默片，头二轮电影院请有乐队伴奏。有声片风行之后，几乎每部影片都有插曲，并在电影院当场出售精印的曲谱，每份售价小洋2角，一般简单的中英文剧情说明任人索取，不另收费。

在旧中国，上海的所有电影院仍然在外国电影公司的绝对控制之下，所放映的影片，绝大多数是美国好莱坞出品，西方文化通过电影院大量渗透进来。除极少数文艺片外，绝大多数是色情荒诞片，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半殖民地的上海更加殖民地化。1929年由美国滑稽明星罗克主演的美国电影《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在大光明上映了。这部影片把中国人描绘成抽大烟、讨小老婆、拖辫子、裹小脚的无恶不作之徒。影片一上映便激起广大观众的愤慨，结果掀起一起轩然大波。有一天，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复旦大学教授洪深闻讯前来观看，看着看着，洪深再也不能忍受，影片中中国人受洋人的侮辱的镜头把他激怒了。他义愤填膺，毅然走上舞台，慷慨激昂呼唤在座的观众抵制这部侮辱中国的影片，一时观众大哗，群情激昂，电影放不下去了。电影院的洋经理眼见停映，马上纠集打手，要把洪深拉下台来。洪深的士林布长衫被扯破，眼镜被打落，可是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洋经理恼羞成怒，暗中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法庭，以破坏租界秩序罪为名，将洪深逮捕，这可把上海市民激怒了。当时一些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沙千里、史良等马上出面干预。租界捕房与法庭慑于民众压力，又因几次开庭，均被洪深驳得体无完肤，不得不判决原告败诉。这件轰动一时的事大快人心，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姜斌）

流 行 风

电影《小玲子》

《小玲子》——欧阳予倩编剧，王士珍摄影。它描写了一个农村少女小玲子（谈瑛饰），不安于农村的清苦生活，幻想找到个人幸福，于是被一个"爱好艺术"的少爷带进城市，让她住在洋房里，教她煮咖啡、插花等。不久，少爷厌弃了她，跟另一个女子结婚；而小玲子沦为舞女，生活陷于绝境，后经挣扎，摆脱舞女生活又回农村，并与原来情人结婚。影片通过这个农村少女的遭遇，暴露了城市生活的黑暗，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欺骗，同时也善意地批评了女主人公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幻想。编剧欧阳予倩过去创作的电影大部分是以反封建为主，而这个剧本是着重暴露资产阶级的罪恶的。《小玲子》的创作，表现了作者视野更为开阔了。

影片的导演是成功的，把握住了剧作的内容和特点，表现出一种内涵、幽默的轻喜剧风格。从剧作结构来看，"这个戏也不是情节戏，而是不落俗套的细节素描戏。在简单的大情节中，充满了丰富结实的细节"，所以，影片在细节的描写上，刻意求工；在艺术处理上，力求上乘，避免庸俗。把握住了剧中讽刺、诙谐的特点，让观众看了笑声不断。

小说《雾》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描写周如水与张若兰的爱情故事。周如水从日本留学回来与一个新女性张若兰相爱，希望与她"共同创造一种新的事业"。但当张直接向他表示爱情时，他因早有妻室而犹豫、动摇。在封建观念的驱使下，终于逃离了张若兰的爱，结果张另嫁他人，而周想回家去尽孝道的意愿也未见诸行动。他遇事优柔寡断，一生无所作为。既失去了爱情，又做不成孝子，也写不成著作，更当不了革命的青年，成为社会的"多余人"，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作品受屠格涅夫《罗亭》的影响，塑造了周如水那种外表新、思想旧，有思想而无行动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有典型意义。书中还塑造了勇于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者陈真，与近似"雾"一般性格的周如水相对照，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爱憎和理想。作品在热情地描叙人事过程中，注重细节的刻画，景物的渲染，文笔流畅精致。

小说《子夜》

作者矛盾，主要内容：

小说以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力图振兴民族工业，合股组织公司，吞噬一批中小企业，以实现自己的"鸿图"。但却遇到美国掮客、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经济压迫，加以军阀混战、农村破产、日用品销路停滞，濒于破产。虽作种种挣扎，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大搞公债投机，终于在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下，以公债市场失利而彻底破产。作品以吴荪甫的奋斗，挣扎直至失败的命运为中心，通过各种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画面的描绘，充分表现当时中国社会的重大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新军阀的大规模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历史真实。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精神和农民举行武装斗争浩大气势，并通过侧写、暗示手法，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光明前景。小说以艺术的笔触形象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从而回击了托派的谬论。书名"子夜"，暗示了子夜过后即是黎明。全书结构宏大，情节纷繁，多线并进而自主线贯串，构思严谨。在人物描写上，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等众多典型形象；语言生动，笔力雄健，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革命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品。

小说《金粉世家》

作者张恨水，主要内容：

描写以内阁总理金铨为族长的豪门贵族的兴衰史，反映金府一家悲欢离合、荒淫无耻的生活，其中以金燕西和冷清秋一对夫妻的爱恋、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贯串全书，揭露了以金铨为代表的封建官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腐败；那些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勾心斗角、骄奢淫逸；一群寄生虫们如何醉生梦死、糜烂堕落。但作者立意是写冷清秋与金燕西的爱情悲剧。书中多

处暗示冷、金爱情悲剧的原因在于两人出身不同，未能门当户对。由于作者把婚姻悲剧归结于贫富悬殊，未能从中揭示反封建反礼教的积极内容，且书中对金铨的同情多于批判，主题的格调不高。在写法上模仿《红楼梦》，结构庞大而得体，穿插照应细密而无枝蔓，在艺术描写上亦颇见功力，是作者早期社会言情小说的代表作。

诗《瓦西庆乐》

我的儿子小阿郎
我今天送你到瓦西庆乐来，
我心里高兴得非常，
我心里无限地悲哀。

记得一九二三年，
"东大"的学生在这里歇伏。
王，罗，二陈和世炎，
于今一个也没留住！
瓦西庆乐！你成了历史的地方。
你可说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想多少亲爱的兄弟、同志们，
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而丧亡。
当年在你这里合唱革命歌曲时，
一个个多么慷慨而激昂！

到现在不觉已有八九年。
这八九年呵，作战血流长。
这八九年呵，世事多变迁。
我于今复来此地重游，
你山川依旧。
我半信半疑，
到今天再能和你见面！

巍峨的松柏耸入云宵。
迎风招展的枝叶频频向我点头。
木桥跨着小河两边，
好象故友重逢，张开他的臂膊——
栏杆——想拥抱着我，
叫我的车儿慢慢地走。
一间间的亭子。
一处处的院落。
从前是"东大"的辊墅，休养处，
现在是共产主义后代的培养所。

我儿，我儿小阿郎，
你且住在爸爸从前住过的住处。
这儿有赵，苏等同志遗下的儿女，
这儿有黑，白，黄……
一共三十多种民族。
这是细六十，这是阿古思，
这是独伊，丽华和楚楚……
一群天真烂漫的花果！
我要一个个地紧抱着，
瞧他们多么象他们英勇的父母。
阿郎，阿郎！
你和他们一块儿玩要。

呵！幸福之花的孩儿们，
你们生长在这苏维埃自由的乐土，
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小兄弟姊妹们，
在那边饥寒而号哭！
一块儿相处！
你不要挂念，
你不要哭，
待你们长大时，
叫全世界没一个孩子再饿肚！
待你们长大时，
一块儿加入爸爸伯叔们斗争的队伍！
你们和我们，
共同高举着国际的旗帜，
狂歌又欢舞！

我今天送你到瓦西庆乐来，
我的亲儿小阿郎，
我虽有无限的悲哀，
我心里却高兴得非常！

（萧三）

歌曲《山在虚无缥缈间》

香雾迷蒙祥云掩拥，
蓬莱仙岛清虚洞，
琼花玉树露花浓。
却笑他，
红尘碧海，多少痴情种？
几许恩爱苗。
离合悲欢，枉作相思梦，
参不透，
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

历史档案

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的中国资本家；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交给工人灾民的组织；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的代表会议，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原编者按：此文件未觅得全文，只有后一部分，文件标题是编者加的）

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的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楷、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原载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出版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选自《革命文献》台北版第三十六辑）

蒋中正告全国将士电

（一九三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限即刻到。各总指挥、各军师旅长、各将士、各军官学校师生诸同志均鉴：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厉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党国幸甚！蒋中正印。（原载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出版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选自《革命文献》（台北版）第三十六辑）

国难会议宣言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国难会议,于东北三省沦胥,被暴日强占,及上海战事挫折之后,开会于行都洛阳。到会同人,深知今日国难之构成非由一日外来之侵略,与内地之病根,相因并至,已数十年,自非举全国四万万民众之力,与世界上以平等待我及主持正义之民族相携并进,莫由达到国际自由平等及国内统一和平之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太平洋之和平及中国之独立,受重大之威胁。一九一五年之所谓之条约,即日本乘大战之 时,忽胁迫签订。

欧战以后,华盛顿之九国会议,以最大之努力,和平局势,始再现于太平洋,然东三省所受一九零五年中日条约之束缚,早已潜伏太平洋战祸之根,或不幸将扩大为第二次世界战争,对于一九一五年危及我领土及行政完整之胁迫签订条约,固始终未予以承认,方以为太平洋及世界之争端,或因中国国民之容忍,得暂免于爆发,并欲乘此时机,致力于政治之革新,及社会之改进,使中国得渐跻于国际之平等自由,则太平洋及世界之和平,又长期维持于不断,不料近两年来,世界各国,遭逢空前未有之经济恐慌,日本政府,以为欧美各国无力维持太平洋之均势,遂蔑视国联盟约,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向我东三省开始军事占领之行为。

当此时期,我国遭值长江流域巨大水灾之后,农业破产,遍地流亡,猝遭此空前之暴力,国民忍无有忍,不得不向日本消极抵制,促其反省。日本政府,竟以此为口实,于天津青岛福州汕头等处,迭为有计划之大规模暴动,最后并以彼海陆军侵我淞沪。我国之淞沪驻军第十九路军,尽守土之责,不得已而为正当防卫,抵抗一月,至国际联盟开会之前三日,乃将全线军队,退至昆山,以待世界各友邦依据国联约章作公允之裁决。乃日本军队,复日益增加,撤兵会议虽开,百般刁难,毫无诚意,扰害世界和平,破坏国联盟约,其谁信之?本会议以为中国在此严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国才力,共作长期抵抗,无以图存。而长期抵抗,必须举国一致,为军事政治经济财政上之充分准备。深愿全国国民,不分党派阶级,精诚团结,牺牲一切成见,共图抵抗之方策。本会议以为抵抗之方策,对外必须有独立自主之外交,对内必须有充实国防之军备。以言独立自主之外交,消极的应革除以往因循敷衍之积习。积极的应有确定始终一贯之方针,而联合世界上主持正义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尤有切实之需要。以言充实国防之军备,当以军制改革为要图,而依据民众武力之原则,打破以往循环内战之局面,实为国人今后努力唯一之途径。

顾民主国家,主权在民,非全国国民合力同心,则救国御侮之效,仍不可得而见。本会议以为欲达此目的,必须确立民主之政治,奠定民权之基础。而国民无行使政权之机缘,即难得行使政权之训练,故在中央应有民意之机关,在地方应谋自治之促进。为求民权之发达,宪制之生长,国民须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本会议以为民意机关之组织,必须与自由之获,相随俱来。在宪政未完成以前,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为全国国民切迫之需要。抑犹有进者,中国社会经济之衰落,为一切混乱之源,而衰落之征,于农业破产工业凋敝见之。由此而饥馑洊至,盗匪横行,由此而国势陵夷,外侮日亟。本会议以为发展生产,自是要图,而在发展生产之期间,救济失业,尤为切要。本会议深知中国社会及政治发达之前途,必不止于此境,中国四万万民众,自有其远大之要求,对外要求民族之独立,对内要求痛苦之解决,决不以上述数端为满足,惟当东北三省及淞沪横被蹂躏之余,御侮尤为急务,本会议深愿政府接受此最低限度之要求,采纳此最低实际之见解,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及主持正义之友邦,共同排除破坏太平洋及国际和平之日本暴力。本会议更须追随全国民众之后,发扬民治,享受自由,培养一线之生机,使社会与政治得走上光明之途,则本会议在此极短期间之努力,为不虚矣。谨此宣言。

(选自《国闻周报》第九卷,第十五期)

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外交次长　郭泰祺
陆军中将　戴　戟
陆军中将　黄　强
陆军中将　植田廉吉
特命全权公使　重光葵
海军少次　岛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　田代皖一廊

见证人：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

驻华英国公使　蓝浦森
驻华美国公使　詹森
驻华法国公使　韦礼德
驻华义国代办使事伯爵　齐亚诺

（选自《革命文献》台北版第36辑）

汪精卫告别书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

行政院长汪精卫氏卧病多日，医士称：宜迁地疗养，氏决于十月二十二日赴欧就医，起程前一日，发表一长篇告别书，并述及对于报告书之感想，全文如下："当九月初旬，兆铭患病增剧，请假调理，以为静养旬日，即可全愈，及十月初旬四医生诊断书发表后，始知病势严重，且有出国疗养之必要，中央遂宽假期，俾得从事医药。当此国事危急，恝然舍去，实乖素愿。但与其困卧床褥，因循无补，不如从医听言，暂时出国，以谋专门治疗，或得康复以继续为国事努力也。卧病以来，时承同志垂问，久稽答复，至歉于怀，今当暂别，谨述鄙见数事，以当面谈，兆铭自去岁十月由广州至上海，今岁一月入京以至于今，共赴国难之志，始终未有变易，惟政治设施，十未达一，内疚神明，非言可喻。夫政治不修明，则虽欲共赴国难，亦苦无所藉手。然政治上之张驰缓急，各同志间见解容有异同，则又不可不以共赴国难之念驱之于一致，此两者似相矛盾，实则相成，所愿诸同志精神不懈，而审慎从事也。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本为蒋胡两同志及兆铭三人，胡同志久未赴京，兆铭今又因病旷职，致蒋同志独任其难，思之戚然于心。而兆铭抱病以来，行政院长职务，得宋副院长毅然代理，且得安心疗养，诚不胜其感谢，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病中已得披阅，兹述其感想如下：第一，中国政府此次将日案件提交国际联合会，立场与方法实为最合理及最合法者。盖国联盟约，为今日世界会员各国及赞同国联盟约者所应共同遵守之惟一法律，惟世界各国能共守此约，然后世界之和平得维持，中国政府始终不忘保持，故将此案件提交身负保障和平责任之国联。第二，实行国联盟约，为国联所负之责任。自中国政府提出此案，国联历次决议案，亦皆根据国联盟约之原则，此次调查团之派遣，在调查事实之真相，及决定责任之谁属。第三，调查团报告书对于事实之叙述及东北事件因果之观察，明白公认，对于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以遂其侵略政策，认为该国预定之计划一点，尤为明确，值得吾人对调查团之努力及公平判断，予以赞赏。惟于此尚不能无憾者，调查团叙述事实后，而建议之解决方法，似觉与其自述之事实不相符合耳。第四，由报告书立言之意旨言，调查团似明白以法律政治及道德上之全副责任加诸日本，且知调查团于日本过去在东三省所作为及所图谋者，认为远东一切祸乱之源，而于所谓满洲国者，亦明认为仅由日本武力哺育而成之傀儡组织，然调查团于此不敢责令日本担负此项事变之完全责任，乃不惜迂回曲折，以提出所谓和平的和解方法，倘使调查团此种建议而为国联所完全接受，则适足表现国联虽有公平之观察及对于正义之同情心，而其制裁力不足以副之，不仅世界和平全失保障，即国联所引为职志之消弭国际纠纷，亦无从贯彻，中国为和平前途计，对于此点不能不唤起世界对此之举深切注意。第五，我国今应郑重考虑者，当前问题之对付方法，战争乎？和平乎？由前之道，则凡日本用武力攫夺而去者，亦由武力恢复之，此由武力以求公道也。由后之道，则由和平以求公道，其最要方法，在接受国联对于我之同情心，而于其制裁力之薄弱，则求所以矫正而增益之，以期得最后之胜利。惟无论如何，均须政府人民团结一致，否则，言和平则乱唱高调，无裨实际。言战争则又不能自整其一致之阵，是益促吾国家之危亡而已。过去失败之造成，其原因殆不外乎此，今后能不蹈覆辙，则所获多矣。第六，团结即是力量，今日救亡之道，团结一致而已。同志与同志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均当视此为天经地义，而一致以赴之。至于方与地方之间因地盘冲突而发生内战，则尤不容于中国。彼身冒大不韪而甘为戎首者，适足自灭耳。以上鄙见所及，聊述梗概，惟垂鉴之，幸甚，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汪兆铭谨启。

（选自《国联周报》第九卷，第四十三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3日　日军侵占锦州。

1月5日　陈铭枢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到南京执政。

同日　广东国民党中央政府宣告取消，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

1月7日　上海特别市总工会与上海市总工会合并成立上海总工会。

1月8日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不承认日本侵占东北。翌日，美国国务院宣言又表示不干涉日本在满洲的权利。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开始“城市堡垒战斗演习”，命令红军“急攻赣州”。

1月10日　鄂豫皖苏区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

1月12日　日军分三路侵犯热河。

1月13日　东北义勇军由新立屯进占大虎山。

同日　上海各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成立。

1月17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谓决心维持债券信用。并电王晓籁、杜月笙等，请每月助国民政府一千万元，以两个月为限。

1月18日　刘少奇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二十八期发表《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

1月20日　日本特务机关联合日侨焚毁三友实业社，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二十四日复纵火焚毁日公使重光公馆。以此作为进攻上海的借口。二十七日日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赠偿损失及解散抗日团体，吴铁城答应照办。

1月22日　东北义勇军与日军在兴城激战。

1月23日　日本派大批军舰，陆续集结上海。二十四日，日海军在沪示威。

同日　孙科辞行政院长，二十八日汪精卫继任。

1月27日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抗日救国会。

1月28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天通庵车站。并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驻淞沪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奋起抗战，是谓“一二八”事变。

1月29日　上海市商会发表《征集现金物品慰劳十九路军将士》公告，至六月十九日共募款七十七万余元。

1月30日　上海总工会通告全市工人自即日起实行总罢工。

同日　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

1月31日　上海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工人四万人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

同日　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五百余名陆续开赴闸北前线，协助十九路军抗战。

同日　上海虞洽卿、王晓籁等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四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增援十九路军。

同日　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纵火焚毁。

2月2日　上海日舰队炮击吴淞各地，国民党海军部长陈绍宽奉蒋介石命，“不准还击”。

2月3日　上海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支援十九路军，自二月三日至五月三十日共募二十七万元。

2月4日　日海陆空军攻吴淞失败，日海军省调野村中将代盐泽任驻沪舰队司令。五日，日军全力攻闸北，仍大败。

2月7日　日将野村率新到陆军力攻吴淞，又失败。

2月8日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互助耕牛站，解决春耕中耕牛、农具不足问题。

同日　上海著作家抗日会宣告成立，戈公振为主席。

2月12日　宋庆龄赴吴淞慰问十九路军。

2月13日　日本增调金泽第九师团精锐陆军一万两千人到沪，改派植田谦吉任攻沪日军总司令。二十二日，日军二万人进攻庙行镇，受重创。二十五日，日又增兵，并改派白川大将抵沪指挥。

2月14日　国民党军令部令张治中率第五军到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

2月15日　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

2月16日　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在沈阳召开，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参加。十八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东北地区“独立”。

2月24日　川陕边区游击队一部分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陈潜任军长。

2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

议，主张建立武装的工农兵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2 月 28 日　何香凝在沪金神父路创办伤兵医院。

3 月 2 日　十九路军与近二十万日军相持三十三天，以孤立无援，浏河后路也被日袭击，乃实行撤退。

3 月 3 日　驻沪国民党粤方中委通电指责国民党政府不接济十九路军。

3 月 4 日　《生活》周刊社创办伤兵医院。

3 月 5 日　宋庆龄、何香凝在交通大学内设立国民伤兵医院。

同日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通过成立军事委员会。六日公布以蒋介石任军委会委员长。

3 月 9 日　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布成立。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任总理。翌日，溥仪根据日方提出名单，任命伪政府官员。

3 月 14 日　国联调查团来华，由英国李顿率领。

3 月 18 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

3 月 20 日　中国左翼记者联盟在上海成立。

本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行长。

同日　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成立，蒋介石任社长，贺衷寒、酆悌等人为书记，戴笠为特务处长。

4 月 1 日　毛泽东率主力红军再次抵长汀。

4 月 2 日　红一方面军在长汀召开攻打漳州的军事会议。

4 月 3 日　磐石县汉、朝两族农民举行反日大暴动。

4 月 7 日　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议决“救灾、绥靖(按：即“剿共”)、御侮”三方针。

4 月 10 日　由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的东路军在龙岩考塘歼灭军阀张贞旅的一个主力团。

4 月 12 日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合作社暂时组织条例》，提出合作社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形式。

4 月 14 日　鄂豫皖红军解放蕲春。

4 月 15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同日　马占山宣布成立黑龙江省政府，继续抗日。

同日　粤方发行国防公债三千万元。

4 月 17 日　广州政府通告各报，禁止登载反日文字。

4 月 18 日　西安学生举行抗日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市党部，遭到反动军警镇压。

同日　上海各团体及各界民众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

同日　马占山、苏炳文、丁超联合吉黑义军三路进攻日军。

4 月 20 日　红军解放漳州。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漳州召开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讨论战役地方和战区总检查问题及第二次行动计划。

4 月 24 日　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在漳州宣告成立。

4 月 26 日　国民党西南党政联席会议陈济棠等声称，在抗日“剿共”事件未结束前，不就国民党政府所委职。

5 月 1 日　宋庆龄发表宣言，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牛兰时为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同年八月引渡给国民党。

5 月 2 日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三日该会代表四十余人痛殴郭泰祺。

5 月 7 日　国联调查团到吉林，调查日本侵占东北实况。

5 月 8 日　鄂豫皖红军在皖西苏家埠战役获胜，歼敌三万余人。

5 月 9 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

同日　粤方宣言，反对停战协定。

5 月 11 日　日本松冈洋右到沪，活动设立上海自由市。

5 月 14 日　广东陈策在琼崖设海军总部行营，十七日，陈济棠派陈章甫出兵八团攻之。

5 月 21 日　蒋介石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公司”，赴汉口筹划第四次“围剿”。

5 月 22 日　上海邮工实行总罢工。二十四日，平、津、济南、杭州、苏州、福州、安庆、郑县邮工均罢工。二十六日各地宣告复工。

5 月 23 日　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宋庆龄等联合发起组织国际非战大会。

同日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调十九路军赴闽“剿共”。

5 月 25 日　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二十八日，京市商会、津钱银两公会响应沪商会废止内战运动。

5 月 31 日　国民党政府任蒋光鼐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6 月 1 日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印刷工人罢工，反对《时事新报》开除大批工友。

6 月 3 日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财政与经济问题决议案》等。

6 月 4 日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统一军队编制，军为直辖单位，共编四十八个军。

6 月 10 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文学月报》

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六期合刊时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6月12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鄂豫皖赣湘五省民政厅长会议，商讨“剿共”。

6月18日　日军进攻朝阳寺，热河形势紧张。

6月19日　蒋介石继续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何应钦、夏斗寅、何健、钱大钧、陈诚均与会，提出“标本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议决拨三千五百万元作“剿共”年费，设立“剿共”总部于汉口。蒋自任总司令，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专对湘鄂西，中、右两路对鄂豫皖区采取包围形势。第四次“围剿”开始。

6月20日　吉林抗日义勇军反攻哈尔滨，与敌军激战于香坊。

6月24日　中共“北方会议”通过关于《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

6月25日　鄂豫皖红军出击京汉线，二十六日取陆家山站，二十九日占鸡公山。

6月27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作出取消红军筹款和做地方工作的错误决定。

7月1日　中央根据地四周均发生战争，南路与广东军叶肇、李振球部激战于南康大庾间。二日占领南雄，歼敌一个团。西路，红军在八日与李汉魂等部激战于水口圩，相持三日，将敌全部击溃。并挺进韶关。东路，八日，红军克宁化。北路，十七日，红军击败孙连仲之二十七师，克乐安、宜黄。二十日，击败毛炳文、许克祥部于南丰。

同日　生活书店创立。

7月13日　中央红军总部发布《水口战役后部队分散整理筹款的训令》。

7月17日　江苏省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的民众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遭特务破坏，八十余人被捕。

7月18日　浙江各地发生抢米风潮。

7月19日　日军由锦州向热河进犯。

7月21日　伪满洲国强迫接收东北各邮局。

7月23日　松花江大水出堤，冲断中东路轨、哈尔滨市进水，有的街道可以行船。

7月24日　中央红军撤离南康、大庾。

7月27日　国民党军政会惧怕根据地消息外传，扣留根据地邮件。

同日　沪棉布公所及洋纱交易所收到血魂除奸团警告。

7月28日　国民党政府训令其机关公务人员不得讥评政府施施。

本月　北满一带、吉林、梨树、德惠、农安、双阳等地水灾，罹难灾民六十万。

8月1日　英、美、意三国同意蒋介石缓付庚款一年，荷兰允将庚款退还。

8月3日　蒋介石返汉，宣称限六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共军。

8月6日　沪“血魂除奸团”团员十六岁的青年恽惠芳用炸弹警告运日货商店，被捕，各团体极力营救。

8月11日　国民党军队进犯黄安，激战两日，卒为红四方面军击败。卫立煌、陈继承部又犯七里坪，红军与之激战三日，战争陷入僵持状态。

8月12日　沪市商人通电全国，共起制裁奸商，剥夺其人格名誉。

8月13日　皖北灵壁农民抗纳烟捐，集二千余人暴动。

8月15日　井陉矿工四千人罢工，迫使资本家在九月七日发放拖欠工资。

8月20日　蒋介石下令封锁根据地，禁止盐粮输入。

同日　蒋介石委张学良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8月21日　日军大举侵热，南岭战争激烈。

8月27日　“废止内战大同盟”在沪开代表大会，四百余团体代表出席。

8月30日　日本议会通过第一次向满洲移民五百名的计划。

本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总结一九三二年前七个月的工作，讨论如何粉碎第四次“围剿”。“左”倾路线进一步得到贯彻，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

同日　东北义勇军分别向沈阳、鞍山、营口、海城等地日军发动攻击。

9月4日　南京市府奉蒋介石电令，禁止示威游行及一切群众运动。

9月9日　东北义勇军在大石桥附近炸毁铁路路轨，日军用车颠覆。

9月14日　红四方面军占领商城、英山。

9月15日　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

9月16日　日本与其傀儡政权满洲国签订军事协定，关东军司令部移到长春。

9月17日　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部进攻吉林城。

同日　山东军阀韩复榘、刘珍军发生战争，双方激战于昌邑一带。

9月19日　红二军团政府部主任柳直荀在湖北监利被“左”倾路线以“改组派”名义杀害。

9月22日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送达国联。

9月25日　中央红军西渡赣江，克遂川。

9月26日　粤发国防债券三千万元。

9月27日　东北义军克复锦西县城。二十八日，收复通辽。

10月1日　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田颂尧、戏锡侯等以争夺防地，发生战争。

10月2日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提出国联共管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

10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反对国联调查报告书，揭露其出卖中国以取好日本。号召工农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民族战争，推翻国民党，完成中国民族独立解放。

10月8日　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河口受挫，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牺牲。张国焘率部撤离根据地，西进川陕地区。

10月9日　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等指摘国联报告书之谬误。

10月15日　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

10月20日　韦拔群在坚持右江斗争中，被叛徒暗杀牺牲。

同日　东北义军冯占海部直逼长春。

10月25日　辽东义军唐聚伍部与日军激战。

10月27日　国民党训令国联中国代表，原则接受李顿报告书。

同日　马占山督师围攻龙江。

10月28日　四川省南部县升钟、保城农民举行起义。

10月30日　东北义军董荣之部进攻锦州。

11月1日　吉救国军王德林部克复宁安。东北民众救国军朴炳珊部克泰安镇。

11月2日　蒋介石在汉口召集七省公路会议，决定兴筑京黔、京闽等路，协助军事“剿共”。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发出“查禁侮视任何宗教之刊物”通令。

11月11日　据日关东军发表，十月中对义军作战二十八次。

11月15日　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为“反动”；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一律禁止”。

11月26日　吉林日军强制各县，限日伐除铁路两旁森林，防义军出没。

12月1日　国民党政府由洛阳迁回南京。

12月4日　东北义军苏炳文等通电“弹尽援绝”，率部退入苏联国境。七日，马占山也退入苏联。

同日　黔省军阀毛光翔与王家烈混战，相持于遵义、新城一带。

12月6日　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激战。十日成都巷战，刘文辉退出成都。

12月9日　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小河口。十一日，渡过汉水。

12月15日　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一九三五年三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

12月17日　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2月19日　东北义军包围并全歼日本鞍山守备长冈部。

12月24日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宜君成立，王世泰任团长。二十五日该军开始建立照金根据地。

12月25日　甘肃玉门昌马发生七点五级地震。

12月29日　中共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于通江，邝继勋任主席。

外　交

1月15日　国联调查团正式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

1月18日　国民政府决定派颜惠庆为出席国联代表。

1月19日　国民政府派顾维钧参加国联调查团。

2月2日　英、法、美、意、德五国公使要求中、日两国停战撤兵，划上海为“中立区”。四日，国民党外交部复牒表示同意，日方拒绝。

2月13日　中国代表颜惠庆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请求国联召开大会。

2月20日　国联经中国代表请求，决定于3月3日举行临时大会。

2月28日　中日双方代表在停泊于黄浦的英国的“肯特”号军舰上会晤，商议停战事。中国代表为顾维钧、郭泰祺，日本代表为重光葵、松冈洋右。

3月4日　国联对告中日两国立即在中立国代表参加下举行谈判。

3月19日　中日停战谈判会议在英国驻华领署举行，出席者为郭泰祺、重光葵，英、美、法三国公使。

3月21日　中日停战会议议定三原则：(一)华会暂留现防；(二)日军按一定程序撤退至1月28日以前原防；(三)由参加各友邦在内合组委员会，证明一、二项之实行。

4月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抗议日本唆使伪东北组织，强接海关。

4月20日　国联十九国委员会决议，请日本从中国东北速撤军。

4月28日　国联特别委员会决定上海停战修正决议案。

5 月 5 日　“上海停战协定”由郭泰祺、重光葵在沪正式签订，内容共五条，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

5 月 11 日　国民政府委任郭泰祺为驻英全权公使。

5 月 20 日　中苏进行复交谈判，苏表示冷淡。

6 月 1 日　中国代表颜惠庆向国联送备忘录，望注意日军进攻北满情形。

7 月 28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任命驻满洲特使事提出抗议。

8 月 16 日　国民政府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联第十三届大会代表。

9 月 3 日　国联调查团总报告书在北京饭店签字，内容严守秘密。

9 月 16 日　中国为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向日本提严重抗议，电颜惠庆代表致牒国联，请作有效处理。

9 月 30 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送达国民党外交部。

10 月 6 日　中国出席国联代表团发表宣言，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表示遗憾。

11 月 25 日　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向各国公使否认中日直接交涉。

11 月 28 日　国联行政院一致通过满洲调查团李顿报告书交大会讨论。

12 月 6 日　国联特别大会开幕，中国代表颜惠庆、顾维钧痛斥日本侵华暴行。联盟理事会委托十九国委员会提出解决提案，会议于 9 日闭幕。

12 月 12 日　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同时宣布中苏即日起恢复邦交。

12 月 29 日　国民党外交部电驻日内瓦代表，向国联报告日军侵略行动，万一发生事故，由日本负责，完全依靠国联。

军　事

1 月 4 日　日军进占绥中。

1 月 6 日　国民政府令任命蒋光鼐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

1 月 10 日　东北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四旅在锦西与日军激战。

1 月 17 日　日军猛攻热河省边境五顶山等处，被东北义勇军击退。

1 月 28 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中国上海驻军，强占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

2 月 8 日　十九路军在吴淞闸北重创日本海军陆战队。

2 月 20 日　日军下总攻击令，吴淞全线激战。

2 月 22 日　第八十八师俞济时部，在庙行镇一役固守不退，战事激烈，日军电东京支援。

3 月 3 日　十九路军被迫放弃吴淞，日军通告谓保卫日侨目的达到，可以停战。

4 月 19 日　国民政府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公司。

4 月 20 日　红一军解放漳州。

4 月 29 日　马占山进军松浦镇。

5 月 13 日　侵沪日军第十四、十八师团调往吉林、黑龙江两省增援。

6 月 13 日　东北义勇军猛攻哈尔滨，在东南部与日军发生激战。

6 月 17 日　日本在沪海军陆战队全部撤退。

6 月 24 日　东北大通线义勇军攻入通辽。

6 月 29 日　马占山突破呼海路日军包围圈。

7 月 18 日　东北义勇军攻营口。

8 月 19 日　东北义勇军攻占牛庄，击溃王殿忠伪军。

8 月 29 日　东北义勇军夜攻沈阳，烧日飞机场，毁飞机 27 架，巷战终始退。

9 月 1 日　东北义勇军大举进攻沈阳，袭击抚顺，包围长春。

9 月 6 日　伪满军于芷山部千人在沈阳北大营兵变。

9 月 23 日　达赖率武装力量停攻青海，与青海军阀和解，回军攻西康。

9 月 24 日　吉黑抗日联军攻哈尔滨，日伪震动。

10 月 7 日　外蒙古受日本指使攻内蒙古。

10 月 24 日　辽东义勇军唐聚伍部与日军激战。

10 月 29 日　蒋介石抵长沙，争切部署“剿共”。

11 月 9 日　马占山军在兴安岭与苏炳文军联成一片，共同抗日。

11 月 19 日　国民党赣粤边区“剿共”总司令部，令其第二、四、八、九等路军向赣闽边区红军主力“围剿”。

12 月 2 日　黑龙江省两路战事激烈，马占山抵兴安岭指挥。

12 月 24 日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决心抵抗日军侵犯热河。

12 月 30 日　日军制定侵略热河计划：第一步消灭东北义军；第二步分三路进攻凌原、朝阳、赤峰。

经　济

2 月 12 日　国民政府特任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

2 月 28 日　宋子文在沪与银行界商妥，减轻公债利息，延期还本。平时每月内债还本息一千八百万，今每月只拨还八百六十万，余九百万发行救国公债。宋又与英、美等国会商。请求援助，自三月一日起，赔款全部停付一年。每月交付汇丰之关税全部。概归中央银行收取。宋在沪活动，扣留各方援助十九路军捐款。

3 月 16 日　上海社会局发表此次战事损失 14 亿元。

3 月 21 日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发表东北损失概计，官方财产损失达 170 亿元。

4 月 17 日　苏联撤回东北经商机关。

7 月 7 日　宋子文召集银行业，商谈废西攻元问题。

8 月 20 日　蒋介石下令封锁红军根据地，禁盐、粮输入。

11 月 8 日　国民政府宣布将招商局收 归国营，实现对轮船航业的国家垄断。

11 月 22 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暂行条例》，统一财政收支管理。

文　教

1 月 28 日　“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2 月 3 日，鲁迅、茅盾等 43 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一·二八”事变的暴行。

2 月 13 日　刘大白去世。刘大白(1880～1932)，诗人，原名金庆棪，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浙江绍兴人。长期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晚年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还著有《白屋说诗》等。有《刘大白诗选》。

4 月　瞿秋白在《文学》月刊创刊号(仅出 1 期)上发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自上年冬至本年秋，《文学导报》、《文学月报》等刊物陆续发表鲁迅、茅盾、周扬、郑伯奇等人的文章，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再次展开讨论。

5 月　《现代月刊》在上海创刊，施蛰存编，后与杜衡合编。注意发表不同倾向作家的作品，并提倡和刊载“现代派”色彩的诗歌小说；至 1935 年 5 月停刊。

6 月　《文学月报》在上海创刊，姚蓬子主编，第 3 期起由周扬主编；出至第 5、6 期合刊时被查禁。

7 月　苏汶在《现代月刊》上撰文为“自由人”胡秋原(参见 1931 年 12 月)辩护，并自称“第三种人”继续进行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

7 月　艾青因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组织“春地画会”被捕入狱；次年在狱中写成抒情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托人送出发表，开始登上诗坛，后于 1935 年出狱。

8 月　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至次年 4 月载毕。

9 月　“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等；主办《新诗歌》旬刊、半月刊、月刊(1933～1934)，并于北京、广州、青岛及日本东京建立分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停止活动。

9 月　《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提倡“幽默”与“闲适”的小品文；主要撰稿人有林语堂、周作人、邵洵美等，被称为“论语派”。

11 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宣传品审查标准》。

本年，郁达夫的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她》、短篇小说《迟桂花》，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农村三部曲》之一)，沙汀的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戴望舒的诗集《望舒草》，鲁迅的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陈伯吹的童话《阿丽思小姐》，郑振铎的文学史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发表或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3 年

导　言

一九三三年，日本在九·一八之后，在东北进行了一年的扫荡，将东北军和义勇军基本打垮。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也基本站住脚，随即把侵占矛头指向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触即溃，热河很快沦陷。

中央苏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错误地断言闽粤赣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由于罗明背离“左”倾路线，遭到打击，被隔离审查，同时也打击排斥了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二月，红军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陈诚为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调兵50万，分三路分进合击。红军继续执行正确的策略，作战两次，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粉碎了第四次“围剿”。

日本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一带侵犯。三月九日，占领长城喜峰口。接防的西北军二十九军夜袭敌营，夺回喜峰口，并在长城线上各口战斗中屡次击败日军进攻。长城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英勇气概。

五月初，宋子文与美国签订了棉麦借款协定，而借款方式极为奇特，借方不能自由使用贷款，只能以贷方的条件用美棉、美麦支付，不知究竟是“美援”还是“援美”。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主张武装抗日，收复失地。七月中旬，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声威大振，但在蒋介石分化威胁下，同盟军在10月初被击败。

根据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北平政务委员会派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国民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和热河，并使华北门户洞开，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条件。

六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中央革命根据地查田运动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经过查田运动，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解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实行了“左”的政策，给苏区土地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

九月下旬，蒋介石调兵百万，对各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用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令红军处处设防，处处被动，不敢主动诱敌，奋战一年，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

十九路军在驻守福建后，与红军达成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开始与红军合作。十一月二十日，福建事变爆发，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袭击福州、厦门，并对十九路军将领进行分化收买。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 ●“反对罗明路线”
- ●查田运动
- ●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
-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热河之战
- ●长城抗战
-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 ●塘沽协定
- ●棉麦大借款
- ●福建事变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背景介绍

1932年5月，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集中了50万军队，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先进攻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得手之后再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企图以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消灭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26个师另5个旅，约30多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和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红四方面军虽然英勇作战，但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10月，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年底经陕西进入川北地区，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又以10万兵力向洪湖根据地进攻。同样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拒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领导，致使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被敌人占领，红三军被迫转战湘鄂川边。

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就调集兵力，把“围剿”的重点转向中央苏区。1933年2月，敌军30多个师约16万人，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的7万人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应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材料

-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先声
- ·南丰之战
- ·从南丰失利到黄陂大捷
- ·排除干扰夺胜利
- ·粉碎第四次“围剿”

材料一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先声
——黄狮渡、浒湾战役纪实

黄狮渡与浒湾，位于南城、金溪境内。1933年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这里向国民党军接连发起进攻，取得巨大胜利。这是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先声。

1933年元旦这天，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县城举行再度北进、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的誓师大会。2日，红一方面军三个军团共计3万余人，在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率领下，从兴国、黎川、资溪等地出发，进入金溪县境。

4日，红军进军黄狮渡，由红三军团、红二十二军担任主攻，红一、五军团密切配合。黄狮渡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混成旅，以及由金溪开来增援的独立第三团。由于国民党军已在黄狮渡及其四周挖了8000多米的战壕，构筑了工事，红军遂以主力攻击其较弱的两侧，并以少数兵力牵制正面，大批预备队亦置正面。当日下午2时战斗打响，激战至黄昏，因天雨路滑，部队运动极为困难，入夜遂停止攻击。5日拂晓，战斗继续展开。红军包围了敌二十五团，击毙该团团长张廷，残敌从王村突围，向南城方向溃逃。红军一面派主力部队追击，一面继续对黄狮渡的残敌进攻。下午6时，红五军团和红三十九师在礼西赵附近截住由王村突围的国民党军队，俘敌400多名，其中有旅长周士达和二十六团团长。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师占领了金溪县城。

这次战斗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的进攻部署，严重威胁着驻守抚州的国民党军。然而红军主力也被敌人发现。

6日起，国民党重新部署兵力，调动第二十七师之一旅加强抚州的城防，令第八师坚守南丰、二十三师固守南城，并随时监视黄狮渡；另一方面，将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及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之大部共14个团的兵力集结于浒湾。7日，国民党军队即由浒湾出发，兵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方向扑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浒湾东南地区。

早在黄狮渡战斗中，红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搭上电话线冒充敌人军官与敌人通了电话，获悉抚州、浒湾的国民党军将向金溪、黄狮渡进攻的重要情报。于是，红一方面军在7日下达了截击歼灭浒湾之敌的命令，部署红一、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红三十一师为右纵队，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由浒湾东进和南进之敌，坚决消灭运动中的国民党军队基干兵团。部署停当之后，红一、三军团迅速集结于金溪县城。

8日凌晨4时，两个军团全体指战员在县城北门外誓师，随后分数路纵队出发，拂晓前抵达崇麓、黄坊、城上一线。9时30分，红一军团在枫山埠附近与孙连仲、吴奇伟各一旅共6个团的兵力遭遇，遂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周恩来亲临阵地鼓动战士斗志。此时，红三十一师加入一军团作战，红二十二军作预备队。国民党军抢先占领了公路北侧制高点——崇岭，居高临下，还有8架飞机和大炮助战，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和扫射，红军虽然勇猛冲杀，组织几次进攻，但都未能奏效。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光、第十师师长李锡凡先后负伤，部队伤亡较大。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领导人迅速赶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战斗。彭德怀还到红四师十团二连阵地亲自组织几挺机枪掩护冲锋。国民党军队经不住红军的不断猛烈攻击，伤亡惨重，号称"铁军"的吴奇伟师终于向西遁退。11时，红军终于拿下崇岭主峰。

下午1时许，吴奇伟为了挽回败局，由浒湾增兵两个团，在长岗埠、枣树一带汇合溃退之部队，据守大仙岭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反击。红军总部决定乘胜对大仙岭一带敌军采取围歼战术，将所有战斗部队分作四路，向大仙岭发起进攻。下午3时，大仙岭总攻开始，国民党军虽有增援部队赶到，但红二十二军投入战斗，猛烈攻击，激战1小时后，敌军开始全线溃退。正在这时，3架敌机和两辆装甲车从抚州方向窜来。红军战士为避敌机轰炸卧倒在地，眼看敌人就要跑掉，朱德急呼："同志们快追呀，只要我们和敌军咬在一起，敌人飞机就没有用了，绝不能让敌人跑掉！"战士们看到总指挥朱德身先士卒往前冲，都从地上跃起，向溃退敌军猛追。果然敌机无可奈何，胡乱扫射一阵飞去。溃退的国民党军经过浒湾不敢停留，直向抚州逃窜。与此同时，红五军团将自浒湾南进的国民党军周至柔师六个团阻于黄狮渡西南长源庙附近地区，后在红三军团和红三军的配合下将其击溃，残敌亦向抚州方面逃窜。9日凌晨，浒湾战斗全部结束，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黄狮渡和浒湾战斗，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击溃三个多师，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挫败了国民党军计划在金溪围剿红军主力的企图，为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自《党史文苑》93年1期。作者：许克茂、刘智勋）

材料二　南丰之战

1933年1月，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白区党组织遭敌人破坏，博古（秦邦宪）和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随后，"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福建开始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接着又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错误地批判。因为这些人执行的都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的著名主张，因此，虽然没有公开点毛泽东的名，但大家都清楚，批罗明，批邓谢古，实际上是批毛泽东。

毛泽东此时被架空了，但是他的军事思想仍然得到朱德和周恩来的重视。

1933年春，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得手以后，解除了其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侧后威胁，便调集近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

何应钦组织左、中、右3路"围剿"军，采取"分进合击"、主力集中于中路的作战方针，企图包围和歼灭红一方面军于黎川附近地区。其编组和部署是：

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12个师为主力，在抚州、浒湾地区集结，向广昌进攻。

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共6个师又1个旅，自东而西向莲城、瑞金推进。

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由南而北进取兴国、雩都（今于都）、会昌。左、右两路军主要担负就地"剿办"任务，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进攻。

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2个独立旅，在南丰、南城、乐安、崇仁、永丰、抚州、万安、泰和等地担任守备任务，防堵红军并维护后方交通。第三、第四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四、五师，总兵力约7万人，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

得知蒋介石又调重兵，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朱德

和周恩来便一起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商议对策。

毛泽东点燃一只香烟，对着作战地图沉思了好一会儿，他才分析说："敌人虽然有20多个师，近50万人马，分3路而来，其实只能当3个师，4万人枪。"

周恩来不解的问："此话怎讲?"

毛泽东便说："敌人3路军中，右路军余汉谋部，都是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向与蒋介石不和，出兵助战，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一定不肯为蒋介石尽力。左路军蔡廷锴部都是十九路军班底。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进攻红军。因此，这两路军都不足为惧，交给地方红军去应付就行了。"

朱德会意，周恩来也醒悟了。

毛泽东又说："中路军是敌人围剿的主力。然而总指挥陈诚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人骄狂，排斥异己。先是吞并郭华宗四十三师，后又改编川军五十二师。所以中路军12个师中，只有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等3个师，自成一个纵队，听命于陈诚，其余各师，都害怕被陈诚吞并，一定不肯卖力。可利用敌人派系冲突，设法消灭陈诚的这3个师，那么敌人近50万大军就会自行瓦解。因此，我说敌人近50万军队，只能当有4万人。"

"如果先打陈诚的3个师，不就犯了兵家大忌了吗?"朱德疑惑地说，"孙子兵法，最讲究避实击虚。敌50万大军中，以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第十一师3个师战斗力量强，其中第十一师居冠。据说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本钱，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出色，为蒋介石屡屡嘉奖。"

毛泽东回答说："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十一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十一师，便摧毁了陈诚意志；摧毁了陈诚意志，敌军自然就会再无斗志了。"

朱德、周恩来听了这一番话，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就心中有数了。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蒋介石每次进兵中央苏区，便以南丰为军事支撑点，屯积粮草弹药，作为大军补给地。

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本来是不愿意强攻南丰坚城的。周恩来向苏区中央局报告说：

"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苏区中央局决议已下，朱德、周恩来等只好布署攻南丰。

南丰守敌为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1万多人。

担任主攻的是第三军团第三师。

2月12日黄昏，红军乘夜幕降临之时进至南丰城下，四面围定，便开始架炮攻城。一时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整个南丰城激烈地动摇起来，枪弹和炮声的凶猛、密集，恰似是疾雷狂雨卷带着暴风倾盖下来。子弹狂飞乱舞，烟雾连着烟雾，火焰接着火焰。一切地面上的万物，都在颠簸、颤抖起来。

毛炳文一面下令死守，一面向陈诚呼救。

陈诚回电说："固守待援！"

毛炳文接着回电，臭骂陈诚："尽说屁话，固守待援，关键是个'援'字！援不至则难固守！"

红一方面军与守敌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红一方面军歼敌不足1营，损失却过300，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遨和2名团长壮烈牺牲。敌据城固守待援，使用了强大的火力。城外是一片开阔地，红军无法接近城墙。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研究后认为，红一方面军被吸于坚城之下，敌增援部队已由乐安、宜黄东来，相持下去红一方面军有被夹击危险。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到东韶、洛口待机，待查清敌行军路线后，采用大规模伏击战法消灭敌人。

来援南丰的是陈诚部第一纵队3个师。罗卓英率第十一师沿宜黄大道开进；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指挥沿乐安山路东进。李明率本师为右纵队，令第五十九师为左纵队，平行前进，中间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联络不易，更无法相互救援。

情报局长曾希圣弄清援敌行进路线后，立即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经朱德、周恩来判断商议，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伏击第五十二、五十九2个师，随即作了战斗部署。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一方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到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翼红军右侧。

林彪作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到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黄陂地区，山连岭，岭连山，绵延数十里，是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敌行军于群山之中一条15公里长的狭谷地带，正逢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行动艰难，士气低落。又误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疏于戒备。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埋伏于狭谷南侧的高山，地形、天候、群众等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利。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1000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国民党军队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2个旅4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林彪仍然冷静地说："等护卫团。"

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红一方面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

"呼！呼！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谷间的宁静。顿时，狭长的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伍就像蜿蜒10几里的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很快被截成数段，然后数万红军将其团团围住，使其行弹不得。经过3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

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师长陈时骥判断是第五十二师进行实弹演习。14时，行到霍源以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右翼部队前卫遭遇。陈时骥下令就地占领阵地，与红一方面军对峙到天黑。

28日清晨，红一方面军右翼部队将第五十九师四面包围。8时发起总攻，激战竟日，到19时，歼敌4个团。陈时骥率残部逃走，在登仙桥附近被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

（选自魏仕田《天下第一军》）

材料三　从南丰失利到黄陂大捷

1932年2月，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了，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直接干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左"倾统治的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坚持实行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进攻敌人中心城市，以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然而，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红军指战员深知前三次反"围剿"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和指导意义，因此此次反"围剿"，红军广大指战员仍要坚持"诱敌深入，打运动战，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起草了红军的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兵力"的伏击战和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这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是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翻版，他们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坚持要红军主力勇猛地主动攻击敌人所占据的城镇。

2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遵照中央及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从黎川兵分三路向驻有重兵把守的南丰城攻击。守城的敌第8师陶峙岳部依城凭坚固守，负隅顽抗。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未能攻下南丰，且伤亡达4百余人。敌中路总指挥陈诚见红军主力攻击南丰城，急忙派兵向南丰袭来，敌人的第2、第3纵队分别向南丰、黎川逼进，对红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周恩来、朱德针对红军所处的危险情况，致电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根据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攻打敌人固守的城市，不仅不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进入部署，反而捆住了红军行动的手脚，便利了敌人的行动，这样对我军非常不利，因而建议中央局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红军先行撤退，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改变敌动我静的关系，等待有利的战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中央局在战争严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采纳了周恩来同志的正确意见。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但此时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红军指战员得知中央局改变攻城计划后，非常高兴。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下令红军主力向根据地内撤退，并调红11军在黎川一带迷惑、牵制陈诚的第2、第3纵队，红军主力向根据地宜黄、乐安以南的东韶、洛口一带转移。

敌中路总指挥陈诚在红11军的迷惑牵制下，认为红军主力仍在建宁、黎川一带，他命令其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以堵截红军西进和南进的归路；命令第2纵队由南城向东推进，以侧击红军的东端；命令第3纵队出击黎川，攻击红军的正面。于是，敌军的3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黎川、广昌扑来。

此时，红军主力由于行动迅速，秘密前进，已经回到了东韶、洛口、吴村一带，隐蔽集结，作好了随时出击敌人的充分准备，等待着有利战机的到来。

2月下旬，红军总部召开了军事会议，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同志通过详细分析敌情，发现敌第1纵队的第52师和第59师在开往黄陂的行进途中，有一脉高耸绵亘的大山岭——摩罗嶂，将这两个师隔断，使他们之间的联系、协同都极为困难。因此，红军总部经认真研究，决定集中兵力在敌第1纵队进犯的必经之地黄陂一带，选择有利地形，以大兵团的伏击战围歼这两个师的敌人。伏击阵地选择在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

地区。2月26日，红军总部作了最后的作战部署：红军主力编成左右两路纵队，红1军团、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路纵队，由彭德怀、聂荣臻、滕代远等同志指挥，由苦竹、玉都一线分两路平行北进，侧击敌人；红5军团、红12军、红22军和独立师为右路纵队，由董振堂、罗炳辉、陈毅、朱瑞等同志指挥，经东陂、黄陂向霍源兜击敌人。红军总部还特别指出：各部队在行进途中和进入伏击阵地后，一定要严密隐蔽伪装，封锁消息，务必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取得反"围剿"的首次胜利。

红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当时，天正下着大雨，道路非常泞滑。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斗志昂扬，歼敌心切。右路纵队的红1军团，经跃龙坪、小口等地，向蛟湖、大龙坪、登仙桥疾进，红3军团经玉都、下堡、南湾等地，向下庄、桥头等地疾进；右路纵队的红5军团、红22军和红12军等部，先后从侯坊、界上等地出发，向黄陂、霍源一带疾进。各路红军克服天雨路滑、山高路狭、冷风刺骨的困难，士气旺盛，一路不顾休息，一天只吃一顿饭，力求迅速占领阵地。经强行军，各部红军均已进入阵地，作好了战前的最后各项准备工作。5万红军指战员保持着严格的肃静，准备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罗卓英的第1纵队，是北路敌军的右翼，是蒋介石的"掌上明珠"，其所辖的第11、第52和第5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他们所装备的武器都是外国造的一些自动火器，并且各师的兵员充足，给养供应非常充分，战斗力十分强大。作为第1纵队指挥的罗卓英本人则刚刚被陈诚所提拔，这个"暴发户"因此十分猖狂，一心报答主子的恩宠，来不及宣誓就职就匆匆奔向前线，并叫嚣打下广昌后再补就职典礼。他率领第11、52、59师，一路上疯狂"进剿"，直奔广昌袭来。

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自恃他们部队的装备精良，火力猛烈，兵员充足，给养优裕，气焰十分嚣张，一路打头阵，横冲直撞地向根据地的黄陂一带闯来。为了抢头功，他们强迫部队冒着大雨向前推进。他们还以为他们这两个精锐师可以互相策应、协同作战，哪里会想到摩罗嶂这个大山岭把他们完全隔断了。

红军为了迷惑敌人，以乐安军分区司令致乐北军分区司令名义，写了一封密信，并有意让敌人得去，信中说："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大危险。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李明和陈时骥本来就认为红军主力在南丰一带，得到此情报以后，如获至宝，更加确信在他们的周围没有红军主力，因此骄矜懈怠，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向前推进。

2月28日，天下着蒙蒙细雨，而且大雾弥漫，好似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张辉瓒时的天气。敌52师在师长李明的率领下沿着大平圩、固岗的崎岖山路，向登仙桥、大龙坪一线走来。此时，我红1军团、红3军团的指战员们正隐蔽在登仙桥、大龙坪一带的密林中，他们精神抖擞，勇气百倍，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来的敌人，就等着指挥员下达进攻的命令了。中午，敌军的大队人马渐渐地进入了大龙坪一带的狭长山谷中，其先头部队已到达桥头，师部随后，后卫部队还在登仙桥地区，队伍拉开一条线，首尾不能相顾。敌人漫不经心地向前走着，山谷中传来了敌军人员的喊叫声和骡马的嘶叫声，以及机械的碰撞声。敌师长李明依然那样悠哉悠哉地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在他周围红军的千军万马。

突然，高山上出现了红军指挥部发出的进攻信号，刹那间，几百支冲锋号一起奏响，早已按捺不住杀敌激情的数万名红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将敌人的队伍拦腰截成了几断。分割包围，展开了一场大的歼灭战。枪炮轰鸣，杀声四起。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晕头转向，惊惶万状，过了好长一阵，敌师指挥部才命令敌军就地抵抗。红军炮兵营的火力立即指向了敌师指挥部，一阵猛烈的轰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垮台了。敌人本来就首尾不接，互相不能照应，加上指挥系统的瘫痪，一时间，象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跑、乱窜，东碰西撞，乱成一团。红军以压倒的优势向敌人猛攻，敌人丢盔卸甲，纷纷举手投降。敌师长李明在战斗中被红军的枪弹击中，身负重伤，被俘后被送至苦嘴坳，因伤势过重，不久便死去。

太阳快落山时，战斗已临近尾声，敌军大部被歼，红军战士仍在山谷、密林中搜寻敌人残余，那些东躲西窜，狼狈不堪的敌人，被红军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到28日上午，战斗全部结束，敌左翼第52师基本被歼灭，红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再说敌陈时骥率第59师，一路直奔黄陂，与李明的第52师成两线分别排开。沿途陈时骥的第59师不断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扰，陈时骥还以为这是红军乐北军分区的阻击部队，因而更觉大有加速前进的必要。他命令部队快速闯过红军的阻击，向前疾进。红军小分队将计就计，一面阻击敌人，一面装作溃逃的样子，因此，陈时骥更加骄横，对红军毫不在意。2月27日中午，敌人进到了霍源地区。霍源位于黄陂西北15华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十分险要，在群山之中有一条狭谷是通往黄陂的唯一道路。红22军、红5军团等部队早已按照作战计划在这里选好了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准备伏击敌人。上午12时，敌人进入了山谷，红22军立即与敌人打响，随后战斗逐渐展开。红军为了全歼敌人，派出部队绕道至敌人的侧后，将敌人分割成数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指挥瘫痪。敌人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急忙进行抗击，当时正有大雾，敌人对地形又不熟，找不到目标，胡乱放枪，敌人前队打中队，中队打后队，互相厮杀，乱作一团。

霍源一带的山谷里到处是喊杀声、枪炮声。红军发起了总攻，战士们个个勇猛无比，奋勇向前冲击。敌人全线崩溃了，纷纷夺路而逃，陈时骥带领着不足一百人的残兵败将，急忙向密林中逃去。慌忙中，陈时骥写了一封信给第52师师长李明，信中说："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他哪里知道，此时的李明早已成为阎王爷的府下之客了。陈时骥派了一名卫兵前往送信。不久，送信的士兵被红军抓获，红军立即前往搜索，终于在一座小庄里抓到了陈时骥。此时山谷中的战斗早已结束，敌第59师大部被歼。

中央红军经过两天的激战，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分别歼灭了敌第52师和第59师，共击毙俘获敌师长2人，旅长2人，正副团长10余人，俘敌士兵1万余人，缴获枪械1万余支，火炮40余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弹药、粮食、银元，以及红军极为缺少的药品、通信器材等等。这次胜利，使红军拥有了许多外国制造的自动火器，增强了红军作战时的火力密度，提高了战斗力。红军战士风趣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从第一次"围剿"就送给我们大量的武器装备，一直送了四次，还真舍得花本钱，我们真应该"感谢"他呢。

敌军两个现代化师被红军痛痛快快、干净麻利地歼灭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立即给陈诚下了手谕"唯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更是惊恐万状，大骂罗卓英。罗卓英也垂头丧气，大声哭泣，这个"暴发户"再也没有庆功典礼加就职典礼的"荣耀"了。

（选自《百战图》作者王洪武）

材料四　排除干扰夺胜利

7月，敌人开始实施其第一步"围剿"计划，在向鄂豫皖、湘鄂西两地进攻的同时，对中央革命根据以重兵从东、南、北三面进行包围，并采取守势和钳制性的攻击，企图牵制和削弱中央苏区的红军力量，并为下一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红军总部根据敌人的行动和意图，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速调红一、五军团由福建回师赣南，将红军主力集中，以便有力地对付敌人；紧急动员苏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做好迎击敌人的一切准备工作；为配合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反"围剿"战争，中央红军主动出击，以牵制敌人大批军队不能北调。7月间，正当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上述两根据地时，中央红军在南面赣粤边界的南雄、水口圩等地，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连打两仗，均获胜，并占领梅关，从而达到了巩固中央苏区南线，以便移兵北上出击的目的。8月，红军主力北上发动乐安、宜黄战役，击败敌孙连仲的二十七师，攻克乐安、宜黄，继而攻占南丰、资溪等地，造成进逼抚州，威胁南昌、九江之势，以便调动蒋介石的部队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压力。在根据地的东面，红军主力于10月间东进入闽，连续攻克清流、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归化等城，而后北上攻克金溪，又再克资溪等地，并在浒湾击败敌三个师。这一连串的胜利，大大的扩展了中央苏区地域，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打通了中央苏区、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三地形成犄角之势，从而，在敌进攻时，红军就处于便于相互支援和机动作战的有利局面。

1932年10月，鄂豫皖、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利，红军部队转移，根据地失陷，蒋介石遂完成其第一步"围剿"计划，开始转入其第二步计划的实施准备。国民党反动军队大批南调，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周边境集结。12月末，敌"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制定了对中央苏区改守为攻的作战计划，组织左、中、右三路"进剿"军，从东、南、北三面向红军发动围攻。由于其南路余汉谋部和东路蔡廷锴部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蒋存有戒心，均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对待"围剿"，观望不前，以致敌人的全面围攻形成了只是北面的敌中路军陈诚部单独进攻的局面。

1933年1月末，蒋介石到南昌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2月上旬，蒋设行营（即其"围剿"军总部）于南昌，改任顾祝同为"围剿"军总司令，决定以陈诚的中路军为进攻主力，下编为三个纵队，组成三路强大的突击兵团。采取分进合击战法，企图以左、中、右三路，向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实行围攻，将中央红军主力截断在广昌到建宁一线进行包围决战，予以歼灭，而后再转向南进，进攻苏区中心瑞金一带。

在面临敌人大举围攻的严重形势下，中央红军的反"围剿"部署和行动却一直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直接干预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左"倾统治的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坚持实行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进攻中心城市以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导下负责起草了红军的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兵力"的伏击战和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是，由于这个计划基本上和毛泽东的主张与指导是一致的，因而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攻击，被指责为"纯粹的防御路线"、"游击主义"。"左"倾冒险主义者仍不顾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对比，坚持要红军主力勇猛地主动攻击敌人所占据的城镇。

因此，1933年2月，敌"围剿"进攻开始时，中央红军的主力正遵照党中央及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从黎川一带

的集结地向驻有敌重兵的南丰开进，并强攻南丰城。2月12日，红军分三路向敌发起全线进攻，连续两天激战，未能奏效，且伤亡达四百余人。

南丰守敌依据险要的城防工事闭门不出，固守待援。红军强攻失败的实践已证明进攻南丰的决定是错误的，如继续执行下去，必然使红军陷于敌援军四面围歼的严重局面。周恩来、朱德等军队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13日夜，红军总部除布置一部分兵力担任佯攻南丰外，红军主力迅速地撤离南丰，向根据地的宜黄、乐安以南的东韶、洛口、吴村一带秘密转移，同时，命令红十一军伪装成红军主力，于几日后，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一带活动，以迷惑和调动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西撤。22日，红军主力集中于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

撤离南丰，待机歼敌，这一决策是极其英明的，不仅使红军免遭失败的厄运，而且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处于寻机歼敌的有利局面，为遂后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战机。2月26日，敌五十二师与五十九师分两路从南丰、乐安出动，计划到黄陂会合，再向广昌推进。敌人出动前后一直误认为红军主力还在黎川、建宁一带，由于红军的周密隐蔽和根据地人民严密地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觉察到附近就有红军的大部队埋伏，因而没有进行仔细的搜索和警戒。

红军各部在敌尚未出动之前，就在集结地作好了随时出击的充分准备。2月下旬，方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详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红军集中兵力，在敌第一纵队进犯的必经之地苏陂一带，利用有利地形，采取大兵团伏击战围歼敌人。伏击阵地选定在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区。攻击发起时间定于2月27日。红军总部于26日下达了准备作战命令，指出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即将出动和到达黄陂附近的时间，要各部迅速行动，提前进入预伏阵地，准备围歼敌人。红军各部受命后立即行动，于当日夜分别进至指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紧张的准备。五万红军指战员保持着严格的肃静与隐蔽，准备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

27日中午，敌李明的五十二师沿着太平圩、固岗的崎岖山道，向登仙桥、大龙坪一带成一路纵队走来，其先头部队到达桥头，师部随后，而后卫部队还在登仙桥地区，队伍一线拉开，首尾不能相顾，且敌整个纵队远离其第一、第二两纵队，在西端孤军深入，翼侧完全暴露并迫近红军的设伏地点，处于兵家所忌的险局。在这个战机极其有利的时刻，红军左翼队发出攻击信号，指战员们立即跃出阵地，向敌猛烈地开火、冲锋，将敌军队伍拦腰截成几段，分割包围，展开歼灭战。敌军登时大乱，几千人马被红军压在狭长的山谷，各部联系中断，指挥系统瘫痪。28日上午，左翼红军将敌五十二师基本歼灭，俘敌师长李明。李明被俘时已负重伤，不久毙命。

与此同时，红军右翼部队亦在霍园一带的狭谷中展开对敌五十九师的猛烈袭击，并于次日上午向敌发起全线攻击。这时左翼队的红三军团也赶来参加战斗，经过两天的激战，敌五十九师大部被歼，敌师长陈时骥带领小股残敌向蛟湖方向的荒山逃窜，被红一军团抓获。至此，黄陂战役以红军的辉煌胜利而结束。

28日，敌十一师从宜黄赶来援救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红军本拟乘胜歼灭敌十一师，但侦悉陈诚已急调其第二纵队西进增援，因此，红军总部决定停止战斗，迅速打扫战场，主动撤离战地。遵照总部命令，红军各部秘密转移至东韶、小布、洛口一带，继续严密的隐蔽，待机歼敌。

敌罗卓英的第一纵队损失了两个精锐师，一时无法补充，原来的进犯计划已打乱。敌总指挥陈诚便将原来的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任纵队长，带领其第五、九、十一师和五十九师残部一个旅作为后纵队；第二纵队以吴奇伟任纵队长，带领其第十、十四和九十师为前纵队。在战术上，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两个纵队梯次轮番推进战法，两个纵队一前一后，交相掩护地推进。敌人判断红军主力于黄陂战役后已转至广昌地区，便决定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奔广昌，企图在这里与其东面（福建）的蔡廷锴部和其西南面的余汉谋部一同，将红军主力包围歼灭。

此时，红十一军见敌庞大兵力逼近，立即转向东南快速行进，将敌前纵队拉跑，致使敌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首尾又处于难以策应的状态。当敌吴奇伟的前纵队到达甘竹时，敌罗卓英的后纵队才到东陂、徐庄、草台冈地区，两处不仅相距很远，且后纵队又处于孤立、突出的挨打地位。这一带地区与黄陂战役地区的地形相似，也是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敌军在山路中进行，只能采取一路纵队的拉开队形。敌后纵队的前卫十一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其九师（后卫）尚在东陂，两处相距约八里多地，中间又隔着一架高耸的雷公嵊大山。敌整个后纵队各部相互联系、协同又出现极其困难的局面，这就又造成了红军伏击歼敌的良好战机。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围歼敌第十一师，于3月20日凌晨下达作战命令，命令红一、三、五军团、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宜黄的四、五两个独立师，立即进入草台冈附近地区隐蔽，于21日凌晨，向敌发起突然的攻击。

21日拂晓，红军各部以神速的行动，展开对敌十一师的大包围。红一军团绕道东陂，经过敌第九师的前沿阵地，未向其攻击，仅以一部钳制敌人，其余各部会同全部红军将敌十一师紧紧圈困于霹雳山、雷公嵊、黄柏岭、观音山一带山地，并发起猛烈的攻击。敌人依靠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敌机投弹扫射的配合进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敌第九师企图增援敌十一师，但被红十二军占据有利的高

地进行阻击，未能得逞。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红军全歼了敌十一师，敌师长肖乾负伤后潜逃。驻东陂的敌九师闻十一师被歼，企图当夜逃窜。红军于草台冈歼敌结束后，立即向东陂之敌进攻，歼其一部，其余溃不成军，向黄陂、宜黄方向败逃。

敌前纵队闻后纵队败讯后，全军震惊，官兵惶恐不安。陈诚急忙下令向北撤退，经南丰向抚州逃走，从而，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宣告失败。

（节选自刘仲林：《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材料五　粉碎第四次"围剿"

从赣州撤围后，集结江口地区，中央局赶到前方来开会，毛主席也来了。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中央局主张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见是，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和赣东北打成一片。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会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江口会议后，三军团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主席率一军团占领漳州，后出广东在南雄以东某地和粤军十余团打一个相持战，三军团赶到时，敌我都已退出战斗。象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雩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蒋介石把南丰看作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唯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

（选自《彭德怀自述》）

"反对罗明路线"

背景介绍

1932年底至1933年初，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时，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被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求红军采取"进攻路线"，并大力扩大红军，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干部群众的要求，并和在汀州养病的毛泽东交换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于1933年1月，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报告》。他反对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巩固的地区。要保留一定的地方武装力量，逐步扩大红军。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积极行动，向外游击，以打击进攻苏区的敌人。罗明的意见被王明路线的领导者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张惶失措"、"逃跑退却""取消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撤销了罗明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予以隔离审查。并从省委到基层支部与小组，从地方到部队，层层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排斥了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邓、毛、谢、古"、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肖劲光、余泽鸿、方方、李坚真、杨文仲等，都受到株连，遭受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责难。这场斗争，从福建开始，发展到江西，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在中央根据地得到全

面贯彻。白区个别省委也开展了类似斗争，如中共河北省委开展的“反对李铁夫路线”的斗争，也打击了一些赞同李铁夫正确意见的同志。

材料：

- 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节选）
- 反罗明路线的真相
- 批“罗明路线”
- 邓小平在 1933 年

材料一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节选）

罗 明

在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近年来，不少同志问我关于“罗明路线”的由来和发展的情况；我还看到一些关于“罗明路线”的文章。这使我感到一些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由于对历史情况不甚清楚，对党的历史经验也就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现在，我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历史的回顾，以供同志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作为参考。

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当时，我任中央苏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曾经提到：“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因为我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一起，从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中，已经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从当时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他对福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指示，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反“围剿”斗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紧急措施，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此外，并不存在另外的一条什么“路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且总结了这方面的斗争经验，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在这场斗争中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一位“最好的领袖”。“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极为恼火，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说我“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说“闽西在罗明同志这一长期的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们把我贯彻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说成是什么“罗明路线”，是所谓“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和“取消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歪曲和违反客观事实的攻击。

材料二 反罗明路线的真相

反罗明路线这个历史问题，产生在福建苏区，以后波及中央苏区各地。时间是从 1933 年春开始，一直到红军长征，才不了了之。当 1933 年，王明路线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受到抵制和非难之后，为了贯彻这一条错误路线，他们大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是执行紧急任务的仇敌，必须打倒。“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就是指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其实他们所谓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是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什么不公开反呢？因为毛主席在党内外、在红军中威望很高，所以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变换个手法，先从罗明搞起。罗明是广东大埔人，早年在福建从事革命活动、在党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期间都是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的委员、代理书记。他们就把罗明当替罪羊。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形势紧张。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进犯苏区的部队已到达龙岩的大小池。广东军阀陈维远部，又占领了永定上杭。豪绅地主阶级密切配合，矛头指向新泉、连城。当时毛主席正在汀州养病，罗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到岩、永、杭边区发动群众打游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亲自前往新泉前线，检查布置工作。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整个反“围剿”的部署是主力红军在北线广昌、宁都一带，福建主力红军在上杭、武平，以对付广东军阀。新泉、古田、大小池一带则由刚成立的地方红军独立八师、九师堵住敌十九路军的进犯。为此，中央向福建省委提出三个任务：一，根据当时形势，要福建省委，特别是要前线指挥部，把地方武装很快变成正规红军，要执行进攻路线；二，新泉要扩大主力红军一千名，而且要限时刻完成。八师、九师要成为正规军；三，不要惊慌失措，退却就是逃跑。罗明在前线接到党中央指示，认为这些要求不合乎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在 1933 年 1 月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罗明认为独立第八、九师是临时搭起来的，装备差，不能正面挡住十九路军的进攻，只能打游击战，相机消灭敌人；边界区域和苏区腹地不同，扩大红军也应有区别，边界群众参军已经不少了，余下的青年不愿离开家乡参加主力红军，要求在地方，武装保卫自己的家乡；战争时期，特别是前线，不能强调正规化，机关庞大，搞八小

时工作制等等，不适合游击战争的环境。罗明对党中央给的三条任务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信，是正常的党内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态度也是积极的。罗明建议中央派红十二军一个团的兵力，配合地方红军，首先消灭钟屋、古田的土匪李七子、华仰侨和地方武装，解决对苏区腹地危害最大的敌人。同时，消灭敌人的先遣队，以配合主力北线作战，鼓舞士气。当时，谭震林是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东南指挥红十二军作战，他对罗明的建议是赞同的，但中央没有点头，没有办法执行这个正确的建议。从当时的情况看，十九路军是强敌，我们以独立第八、第九师在正面抵抗它是很困难的，避开与十九路军正面作战，而转去消灭分散之敌，以小胜积大胜，增强战斗力。在敌人的后方神出鬼没，打击敌人，这样做是正确的。但这样做必然会在某一些地方后退，在某一些地方前进，这一条就与王明路线相对抗，因为王明路线是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的。罗明的意见使执行王明路线的一些同志大为恼火。罗明在信中还写道：在边界扩大主力红军，离开家乡不好办，扩大地方武装好办。并且还说，那就请我们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来，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溪南或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演讲三天三夜，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后来，这些话被党中央斥之为不相信群众、是反国际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对罗明说的“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更为恼火。这时，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支持罗明的意见，也主张边界机关要精简，被当作取消主义的典型来反。

1933年4月，党中央负责同志到汀州，在省委机关会议上，公开宣布：“罗明路线”是反国际路线的右倾主义，杨文仲是典型的取消主义，当场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斗了罗明三天三夜，连吃饭也由炊事员领到伙房去吃。后来把罗明调到瑞金去了，这个斗争却继续进行下去，斗一次换一批人。后来，中央又派了一位负责同志来到福建汀州，召开斗争会议，说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撤了他的职务，把省苏工作一概否定。省委宣传部长刘晓和军区司令谭震林都被指责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撤了职务，调开了。而早已离开福建调到瑞金担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的邓子恢，也被指责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被撤了职务，搞大换班。中央另派了陈寿昌当福建省委书记，钟循仁当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万永洲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反罗明路线从福建开始发展到江西。后来实际上发展为全党性的斗争。

（摘自《广东文史资料》第41辑《回忆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艰难岁月》一文，作者温仰春）

材料三　批“罗明路线”

在“洋房子先生”们的领导下，批判“罗明路线”、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声浪，震撼着闽赣两省红区。

随着批判的“深入”，打击面不断在扩大着。

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谭震林，抵制批判“罗明路线”，在1933年6月被撤除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

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因同样的原因，遭到撤职。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省委常委郭滴人、团省委书记陈荣，也遭批判，受到打击。

打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责为“右倾”。1933年月7日，《斗争》发表张闻天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何叔衡。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及红区各县委的许多干部，受到批判。除了“会寻安”、“永吉泰”受到《斗争》、《红色中华》点名批判外，在这两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被点名的还有“宜(黄)乐(安)崇(仁)”、“建(宁)一黎(川)泰(宁)”中心县委以及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数以百计。“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此人人过关，造成人人自危。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决议》还规定：

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有两篇批判邓小平、火力颇猛的文章，署名“罗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那两篇文章是《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李维汉曾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在1927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曾一度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后来，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苏联去学习。他在1932年底回国，1933年3月他才到达中央苏区。起初，他连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毛泽东都不知道。所以新来乍到的他，被什么“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弄得稀里糊涂。张闻天带他去“会寻安”，他也一时闹不明白。

李维汉后来这样回忆往事：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

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亦即工作队）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时年不过三十岁。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底，在进军保安途中，谢维俊作战阵亡，终年二十七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选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者：叶永烈）

材料四　邓小平在1933年

1933年3月，邓小平告别了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两个月后，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是邓小平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等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为期5天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

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邓小平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于是，“左”倾领导人便强行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

此时，毛泽东也已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在党和军队里的发言权被剥夺了。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到处是脱离实际的空话、大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站在低矮的屋子里遥望窗外，所见所闻，忧心如焚。对自己的不幸，邓小平以博大的胸襟忍受着，他担忧的是根据地的命运，红军的命运。

这年，邓小平仅29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左”倾领导者之所以紧紧抓住邓小平大做文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决心在“检查”上阐述自己的意见。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到“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阐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阐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具体，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

显然，这样是不能使“左”倾领导者满意的，他们又责令邓小平：必须向党交出一份“象样的”申明书。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者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叫喊：“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三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说完，摔过去几张纸，要邓小平就地将“问题”交待清楚。

邓小平铁青着脸，强压住心中燃起的闷火，站起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但是，每次提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逐渐，看守人员送来的饭菜也降质减量。邓小平仍顽强地坚持着。

几天后，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不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这天，当邓小平被看守人员从“审讯室”押回“拘留室”时，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从对面走来。这位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唐大夫，看着邓小平又黄又瘦的脸色，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朝自己走过来时，一下子被惊呆了。两人对视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邓小平轻声对唐义贞说：“我饿极了，吃不饱。”

唐义贞的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她回到家，急忙从枕头底下摸出唯一的一块银元，到老乡家里买了两只鸡，炖熟后浇上一点盐水。唐义贞趁夜色赶到“拘留室”，给看守人员说清缘故，并请求给予方便，然后让他们把邓小平带到自己家中。

唐义贞端出炖好的鸡，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吞咽起来。吃了一只，怎么也不忍再吃第二只了。唐义贞再三劝说，邓小平才将这只鸡带回“拘留室”，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狠狠地咬上一口。

过了一段时间后，“左”倾领导者在这个硬汉子面前感到无法可施了，加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极力保劝，最后给邓小平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乐安县南村区是苏区的前线，红白交界，情况复杂。邓小平去时正是盛夏6月，天气炎热。

邓小平心情是极为沉重的，但为了革命事业，他甘愿忍辱负重，把个人得失抛置脑后，乐观而精神抖擞地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工作。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乐安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等同志说：“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革命嘛，哪能一帆风顺呢！……”

“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邓小平语）随即又将邓小平押送回瑞金等候处理，说是放在省委不放心。此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养伤，得知邓小平的处境后，从病床上爬起

来，摇通了给党中央负责人博古的电话，指名要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来工作。

于是，正受打击的邓小平意外地被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邓小平"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改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此时是1933年8月前后。

邓小平调总政后，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仍在全省继续开展，直到1934年4、5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根据地中心区域时才被迫停止。

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主编着《红星》报，从采编、选稿，到校对、刻印，费尽心血。他接任主编后，改原32开本油印期刊为4开铅印报纸形式，并开辟了《红星副刊》，增设了许多栏目，诸如《列宁室》、《军事常识》、《俱乐部》、《铁锤》、《法厅》等，报纸版面为之一新，内容丰富多彩，发行量达17300份，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喜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邓小平"在乌云压顶的情况下开始长征"，时年30岁，仍为《红星》报主编。

查田运动

背景介绍

查田运动是1933年6月至1934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清查土地分配情况的运动。为了解决土地分配中的错划和漏划问题，1933年6月1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6月2日发布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查田运动由此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查田的目的不是查田亩，而是查阶级、决定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是上述决议和训令中的有关政策，错误地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的政策，从而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并没收了富农土地，扩大了土地分配中的打击面。为了指导查田运动的正确开展，1933年6月17日至7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八县区以上负责人查田大会和贫农团代表会议上，指出查田运动的政策和方针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为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1933年10月10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与《怎样分析阶级》一起，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把过去提的"反对富农"口号，改成"限制富农"。但是1934年3月15日，发布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指责前一时期的查田运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推翻了1933年10月10日中央政府的决定。随后竟提出要用赤色恐怖去对付地主、富农，并错误地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5月20日人民委员会发出第三号训令，规定和实行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过左的方针政策。把地主、富农逼上绝路，增加了革命战争中的阻力。由于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查田运动是在"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领导者的直接干预下进行的。所以，"左"倾错误不但未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给各地的土地革命造成严重后果。

材料：

· 查田运动的来由
·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
· 叶坪乡的查田运动
· 朱开铨与瑞金云集区查田运动试点

材料一　查田运动的来由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土地革命斗争也不断深入。但是，土地革命是一场极其复杂而又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一帆风顺。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那样：地主富农"在第一个时期被革命群众打败，他们中间许多分子。就从那个时候起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革命，也赞成分田，自称贫苦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乘机偷取土地革命果实。无数地方的事实，证明他们在把持临时政权，钻进地方武装，操纵革命团体，比贫苦农民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企图保持他们政权上的与土地财产上的权利，保持他们残余的封建势力。"又由于封建半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中根深蒂固，所以"要真正打倒封建势力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还要打破房界、姓界，要反对包庇破坏活动，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只有斗争取得了胜利，才能做到合理分田"。

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瑞金土地革命情况的基础上，于1933年2月正式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并且解释说："'查田'不是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田亩，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

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根据地的查田运动。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强调指出："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

线上来。"为查田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还亲自在叶坪乡等地搞了查田运动的试点。为了在整个苏区中开展彻底的查田运动,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第二天,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瑞金县沙洲坝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八个县、区的苏维埃负责人的查田运动大会。同月25日至7月1日,在瑞金县叶坪召开了上面八个县、区的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这两次大会上,分别作了《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和《为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等报告,为查田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步骤和方法。从而推动了整个苏区的查田运动。

在1933年的查田运动中,毛泽东"主张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也要分田,富农的财物不动,多余的部分(如房子田地)分给农民,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剥削的不划富农;保护地主兼工商业;以缩小打击面,缩小敌人的队伍,争取和扩大团结力量"。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调查工作,所调查来的情况(如原有土地,是否雇长工、短工,原来阶级,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剥削等)为确定阶级成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时决定确定一个地主、富农成份,必须经过党支部和乡查田委员会讨论,整理材料,贫农团大会证实通过,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报上级查田委员会审核批准。没收也是一样,须经过支部和贫农团讨论决定,再经全村全乡大会讨论同意,报上级批准后才能实行。

对查田运动中提出来的问题,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以及时的指导。如1933年7月13日,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曾给瑞金黄柏区写了一封信,对于决定阶级成份的问题,具体地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并将错定的成分加以分析。7月27日,中央又强调要巩固与中农的联盟,首先就要不侵犯中农的利益。10月10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决定以毛泽东6月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阶级标准。中央在分布这两个文件的第四十九号命令中规定:"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份有不合本决定者,立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把查田运动完全纳入他们的轨道,极力反对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1934年3月15日,他们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的训令,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公然明文规定,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在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的口号下,把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一律称之为"阶级异己分子",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到处制造"赤色恐怖"。这样一来,查田运动便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随着"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战局日趋紧张,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查田运动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

(摘自84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红都瑞金的查田运动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作者罗添时)

材料二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罗明路线",放了第二把火——批"邓、毛、谢、古",紧接着,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泽东。

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他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安排张闻天出任"总理",亦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用博古的话来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实权全然操在斯大林手中……

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了三个多月,回到了瑞金叶坪。

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得服从,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去。

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亦即"查田运动"。

于是,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然后,在中央苏区推开"查田运动"。

5月,毛泽东忙于率中央政府代表团去武阳墟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文章:《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6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到了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政——中央政府主席兼"总理",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却只能

分管"查田"——这项工作，本来只须"土地人民委员"(即土地部部长)去做就可以了！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甚嚣尘上。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烈。

前线，司令部里见不到毛泽东高而瘦的身影。繁忙的司令部里，朱德作为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总政委、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指挥战斗。

如彭德怀所言："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照旧"，也就是照毛泽东的一套。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着毛泽东的策略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役、东陂战役中大胜蒋介石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5月8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决议增补项英、博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由项英任中革军委代理主席。

毛泽东呢？他在领导"查田运动"告一段落之后，8月16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会决定，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在那里给学员讲《乡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选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者：叶永烈)

材料三　叶坪乡的查田运动

江西瑞金叶坪乡的查田运动，是土地革命时期，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中的一个试点。

记得一九三三年初春的一天，天气很好，没有风，温暖的阳光照着大地，野草已经开始发绿了。我决定把已经写好的"春耕运动指示"草稿，先拿给本乡的党支部、乡政府代表会和贫农团的同志们看看，请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并加以补充、修改，使它不但切实可行，而又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员文件。

乡政府办公室的门紧锁着，谁也不在。我一连去了四次，才碰上三个人：叶坪乡的乡主席朱先祺，乡政府秘书兼党支部书记刘守富，还有一个又胖又高、不像庄稼汉的人——他姓钟，据说是乡俱乐部主任。我拿着指示草稿，满怀热忱地想和他们仔细研究研究，谁知大家都不关心。约好时间召集的会议，到时谁也不来。这是为什么？

叶坪乡即瑞金县云集区的第四乡，划分为叶坪、洋溪两个行政村，有十多个自然村，两千七百多人口，是我们军事、政治的中心地区，是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军委的所在地。但是，这个地区的生产等却一直搞得不好。目前春讯已动，乡干部们对春耕生产的指示，竟如此冷漠，难道不是奇怪的事吗？对刘、钟两人，我不清楚，难道朱先祺对这样的事情也不关心？是别人不来呢？还是没有通知大家？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翻腾着。

当我走访了几家贫雇农之后，更加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群众把我当作客人，只闲谈一般家常，叙寒道暖。当我问起分田的情况，去年打多少粮，够不够吃，以及村里哪些人好，哪些人一贯凶狠刻薄等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有些人不言不语，有些人吞吞吐吐。

这样就更使我急欲找朱先祺谈谈。找到他，和他谈一般工作情况，他还兴致勃勃，说东道西。谈到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他也赞不绝口。可是问到乡里的具体问题，诸如为什么第四乡每月扩大红军的任务都完不成，支前工作做得不好，地主富农有几家，分田分得是不是公道，群众有什么意见等等，他似乎非常苦恼，并含糊其词地说："也很难说。总之我能力差，办不了事……"这使我想起当初他为什么宁愿当伙夫，坚决不愿当乡主席的事情来。我决心要把底摸清："你害怕国民党回来？还是怕大家心不齐，工作做不好？"他一言不发，呆呆地瞧着我。我又问："难道你是怕地主、豪绅和他们的狗腿子？"这句话好像打中了他的心坎。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说："我有顾虑。"我见他直言了，就对他说："顾虑什么？你是雇农出身，受过压迫剥削，有过很多痛苦。红军就是贫苦工农组成的，是自己的军队。如今红军一天天更强大了，有他们给我们撑腰还怕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断动员群众补充它、扩大它、支援它，使它打更大的胜仗，消灭反革命势力，巩固后方，使前线红军更安心地奋勇作战。"这一下把他的闷葫芦敲开了，他说了真心话："那好，我说吧。扩红，嘴唇磨破了也没有人去；支前，叫来了这个，跑了那个。一句话，分田没分好。给逃跑的地主还留着田；有些过去收租、放债、雇长工、摆架子不做活、又吃好穿好的人，如今钻进我们的组织，摇身一变也成'贫苦工农'了；给贫苦农民分的田少，还把坏田、中田当好田、上田分给他们。许多人公开不说，背地里有意见。"他仍然表现忧虑，最后谈到："在我以前的两任主席都是被陷害的。我知道他们都是贫苦工农，是好人，工作也积极；可是有人给他们硬加了个罪名，叫'乱打土豪'，就这样被陷害了。"

问题已很明显，这个乡的封建、半封建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倒，他们还在暗地利用狗腿子、亲信继续兴风作浪，广大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情况总算闹清了。我心想：还是召集乡党支部会议、乡政府代表会议、贫农团会议，大声疾呼地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解决呢？还是采取个别串连，通过朱、谢他们，

首先找些穷苦的、阶级觉悟比较高，经过他们自己揭发问题，起来斗争呢？最后决定两者都采用。可是开乡党支部会、乡政府代表会、贫农团会议时，还是没有到几个人，所以工作重心就放在串连穷苦的比较积极的人上边了。

朱先祺第一次召集的会议到了八个人。我在会上主要讲了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指出穷苦工农要提高觉悟，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斗争目标要明确，要分清敌我。并按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道理，把农村应该怎样分析阶级的方法，也详细讲了一遍。这样就启发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大家的团结，并且使每一个人都觉得有了不断扩大斗争队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必要。朱先祺和谢标在这个会上，也把自己的委屈，淋漓尽致地说了一番。当场就有人发言，讲他们过去分了房子不敢住，分了坏田或少分了田不敢说是不对的。也有人揭发了有些逃跑了的地主的田还留着没有分。最后大家决定分头去找贫苦、勇敢、正直的人来开会，至少每人找一个。

过了五、六天，八个人串连了三十多。朱先祺告诉我，这里面有党员，有团员，也有乡代表，都是贫雇农。他把他们组织起来，问我叫什么名称好，是否就叫贫农团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以后大家也都同意了。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我们按照重新划定的阶级成分，先没收了谢某等三家地主的房屋财产及两家富农的多余部分，分给了贫苦群众。这样一来，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起来了。有钱的人也惊慌了，有的诉“苦”装“穷”，好衣服不穿了，好东西不吃了，并且还可以时常听到他们自家吵架的声音。不知为什么，那姓钟的俱乐部主任也不见面了。

新组织的贫农团很快发展起来，一下就扩大到七、八十人，成为一个有力的战斗组织。

我们在叶坪村有了一点经验，便趁热打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相邻的洋溪村去。也是先从组织贫农团，展开宣传工作着手，大讲怎样分析阶级、打倒豪绅地主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重要。在许多老贫农团员、党员、积极分子带动下，很多人在会场上吐出了苦水，斗争劲头更大了，地主、富农历年来进行剥削的材料揭发得更多了。会议决定除把在会场上说的材料记录下来以外，没有说的可以在会后个别向政府报告。大家都同意，并提议成立查田委员会，以朱先祺、谢标等七人为委员，负责收集和整理材料，处理查田工作中各项问题。

整个乡沸腾起来了。要求加入贫农团的人越来越多。洋溪、叶坪两个行政村，各自以老贫农团员为基础，在乡领导下成立了村的贫农团，下面还分设组。斗争更加深入了，查田、查阶级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谈论话题。为了不致于错定一个和漏掉一个地主、富农，积极分子采取两种方法：自报和调查。这时查田委员会工作越做越细致，朱先祺和谢标变成了大忙人。受剥削的人向他们报告材料；剥削者也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每天早起晚睡，搜集、整理和甄别材料，忙个不已。为了有系统地掌握材料，决定被查的对象一律都填写“阶级成分调查登记表”，以便核对。

封建、半封建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群众心花怒放。参军、支援前线的革命热潮起来了。生产劲头也很大，这样土地、耕牛、劳动力等问题，就需要迅速解决。我正在这样考虑的时候，朱先祺开口了：“这次没收的土地共七百多亩，除补足少分田人家的田地和留足红军公田外，全乡平均每人增加了一石二斗田（一亩合三石），中农也得到了利益。我想上午开个会，解决生产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一并讨论怎样处理没收来的牛。查田运动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以后可以多搞支援战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工作了。”我非常赞成他的意见。这时的朱先祺已经不是几个月以前的朱先祺了，敢出主意，敢提不同意见，也能大胆地干了。

时间不长，面貌大变 。乡政府的代表会、党支部的工作，都逐步地纳入了正轨，能够按时开会讨论问题了。青年、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兴修水利和消灭荒地的工作，也逐渐开始。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还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又以没收来的耕畜作底子，成立了犁牛合作社。俱乐部在洋溪、叶坪两个村，也都很快地成立了。文化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去列宁小学、认字班读书的人也多了。徐特立同志为此非常高兴，他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中央教育部帮助他们解决桌子、凳子、灯油、书本等困难，没有人来念书；现在不声不响地有这么多人来念革命书了。可见肃清封建势力，提高群众觉悟，是个根本问题。”

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潮也掀起来了，叶坪乡每月都有十几个、几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红军，当担架队员。群众踊跃地交公粮，运军粮，交还政府发放的公债票，作为红军作战费用，不要政府还钱。

叶坪乡查田运动的完满胜利，对四周乡、村影响很大。许多人都在私下议论，说是做得对，做得好！埋怨他们自己的乡、自己的村为什么没有人来领导搞一搞。第八乡的一些负责人跑来跟我说：“观澜同志，你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好不好？我们八乡本来和四乡是一个乡，你不能厚此薄彼呀！”我当时就答应了。晚上我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主席很高兴，认为应该帮助他们，并决定组织工作团去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叶坪乡的战果，取得更多的经验。

工作团在云集区、壬田区工作了四、五十天。那里的问题更多，斗争更复杂、更曲折，地主豪绅利用氏族关系进行反抗活动更突出，谣言更多。工作团做了许多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了群众，情况才大有转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大村子的恶霸地主，钻进乡政府当秘书，掌权。该乡群众谁都害怕他，知道他的劣迹的也不敢说。及至邻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才把这个恶霸地主的真面目

揭露出来。没收他家财产时，查出了伪造区、乡政府和赤卫军的各种印章及许多反动证件和田契。政府宣布了他的罪状，召开了全区性的群众大会，进行了公审，并根据群众意见，枪决了他。到这时，他本村的群众也起来了，先后揭发出了许多家地主、富农，消灭了开展工作的阻力。

经验证明：查田运动，除了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势力，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对于发动群众发展生产，肃清反革命，巩固区、乡政权，扩红支前壮大革命力量，也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方法。这成了当时做好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毛主席紧紧地掌握了问题的关键，决定把查田运动扩展到更大范围去，亲自主持并首先召集了石城、宁化、长汀、瑞金、雩都、宁都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接着江西、福建等省及粤赣边也都召开了所属县的查田运动大会。至此，深入土地斗争的广大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在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了。

由于查田运动的胜利，虽然战争频繁，后勤忙碌，但整个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都很快。赣南、闽西地区，一九三三年收获的谷物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闽浙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江西省管辖的许多县增长的幅度也不小。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红军的需要，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二，作者：王观澜）

材料四　朱开铨与瑞金云集区查田运动试点

1993年1月16日，92岁高龄的革命老前辈朱开铨阖然辞世。他是毛泽东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干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瑞金县云集区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建国后，他要求返回家乡，建设江西，历任宁都专署专员，省民政厅厅长，省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江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是江西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老战友、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称道他"是一个忠心耿耿、壮心不已的老战士"，把他的一生写照为"一身肝胆德高望重，百年奋斗鞠躬尽瘁"。（见习钟勋为朱开铨著《六十六的革命生涯》一书的序）

本文所写的只是朱开铨革命生涯中一个小小的片段，这就是1933年朱开铨和王观澜一起，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在瑞金县云集区各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试点工作，取得瞩目的成绩和成功经验的情况。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在叶坪办公，中共苏区中央局也随之迁来叶坪。从此，瑞金被称为红色首都。

1932年4月，朱开铨被选为新成立的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由于叶坪是云集区的一个乡，所以云集区的地位十分重要。按当时关于中央机关党的组织关系由驻地党委领导的规定，云集区不仅要领导驻叶坪的中央单位的党组织，还要担负中央单位和部队2万人的粮食供应。朱开铨一方面感到身上担子很重，要想方设法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又觉得很幸运，"有条件接触中央的领导同志，更能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帮助。"

当初，云集区的工作是很落后。就拿叶坪乡来说，"扩大红军、经济动员、参战工作等都非常差，贫农团及各种群众团体，连会议都召集不成。""徐特立同志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教育部副部长，在叶坪试办一所学校，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周恩来初到苏区时，就及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中央所在地是一个落后区的落后乡，必须改变这种局面。32年4月至10月，云集区先后换了4个区委书记，局面仍未改观。

朱开铨兼任区委书记后，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终于了解到真情：一是群众对1930年和1931年两次分田不满意；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还是三等田。而隐瞒成份的地主、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二是有些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分子混进了区、乡党政组织，经常诬告打击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

朱开铨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向中共瑞金县委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那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朱开铨想，看来要解决问题，非找毛泽东主席不可。

1933年2月13日，朱开铨得知毛泽东已从福建长汀回到了瑞金叶坪乡陂坞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到云集区当苏维埃主席已经10个月了，什么工作都开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分田不合理，干部队伍不纯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我想向毛主席写个书面报告，但是，因为我文化水平太低，想向您作口头汇报，不知毛主席有没有时间，这样做是否方便，请批示。"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派警卫员陈昌奉给朱开铨送了回信，约他到办公室面谈。2月15日，他应约去见毛泽东。在他汇报了云集区的基本情况后，毛泽东问："为什么工作开展不起来？"朱开铨如实地报告了他调查的情况。毛泽东边听边问："云集区9个乡，哪个乡最难开展？"朱开铨说："叶坪乡最难开展。"他列举叶坪乡前两任乡苏主席因被人控告，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撤职查办，现任乡苏主席朱先祺是个雇农，也因为害怕控告而不敢大胆工作，毛泽东问："控告的都是什么人？"朱开铨答："控告的多是地主、高利贷者的亲友，或是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毛泽东接着问："各乡是否都有积极分子

小组？都有多少积极分子？”朱开铨说：“各乡都有积极分子小组，每乡四五人，共39个。”

毛泽东对朱开铨的汇报作了肯定，并把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1930年和1931年两次分田是和平分田，土地革命不彻底；第二，主要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去斗争地主；第三，基于前两点，使得一些地主、富农分子隐藏起来，有的还混进了党、政、群众团体中来，混进贫农、中农队伍中来，造成阶级阵线不清，干部队伍不纯。”毛泽东表示：“阶级敌人控告积极分子，就是向革命队伍进攻，这些严重问题必须解决。”他要求朱开铨回去把39名积极分子召集起来，他亲自去听取汇报。

2月16日下午5点多钟，各乡的积极分子都来到区政府。毛泽东带着王观澜到达后，朱开铨主持了汇报会。各乡积极分子争相发言，汇报漏划地主、富农情况及他们的破坏活动。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点。毛泽东认真地听了每个人的汇报后，要求朱开铨等抓紧办好三件事：第一，扩大积极分子队伍，每个乡要扩大到二三十人；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地调查，核实地主、富农的罪行材料；第三，要广泛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揭发地主、富农的罪行。毛泽东最后说：过10天再来听取大家的汇报。

送走毛泽东之后，区委领导又接着开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第二天，区委就派干部到各乡去帮助工作。几天时间，各乡的积极分都扩大了1倍，一些漏划地主、富农的情况得到核实，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10天以后，即2月26日晚，毛泽东又来到云集区政府，听取工作汇报。这次到会的积极分子比上次多了几倍，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情绪非常热烈。毛泽东时而插话，时而记录，最后作了重要指示，正式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他说：“查田不是要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亩田，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不管这些人是混进乡苏维埃里，还是混进区、县苏维埃里，都要查出来。要搞清楚他们的剥削情况，核实好他们的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同时，他还强调要团结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有点偶然剥削，不能算富农；地主也要分给田地，让他们自食其力。他要求云集区把生产搞好，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使每个乡都变成模范乡。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宣布他自己要亲自在叶坪乡搞查田运动试点，并且要组织力量帮助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

云集区的查田运动，是从2月下旬开始由点到面展开的。先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叶坪乡搞试点，接着毛泽东又派罗镜瑞带70多人的工作团到一、二乡工作，云集区委抓第三乡，朱开铨还负责其他5个乡的面上发动工作，推广点上的经验。

在查田运动的日子里，朱开铨隔两三天就去毛泽东那里一次，向他汇报各乡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聆听指示，然后又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各乡去贯彻。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云集区4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进展顺利，仅1个多月就结束了。紧接着，其他5个乡的查田运动，也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

经过清查，全区共查出地主91户，富农23户，没收地主的土地都用来分给贫农。仅叶坪乡每人平均多分了9分地。

这次查田运动，使云集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培养了300多名积极分子和干部，建立和扩大了贫农团组织，划清了阶级阵线，肃清了封建势力和半封建势力，解决了1930年和1931年分田不合理的问题，纯洁了党、政、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加强了经济建设，扩大了红军，支援了革命战争。尤其是叶坪乡，在扩大红军、筹借军粮、妇女做军鞋慰劳红军、退还公债票、建立犁牛合作社等方面，都走在前面。《红色中华》报表扬它“已由最落后的乡，一跃成为云集区的模范乡。”

1933年“红五月”扩大红军时，瑞金县分了2500名指标，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说完不成。毛泽东把朱开铨找来，问云集区能完成多少。朱开铨说：“400人有把握”，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要朱开铨在瑞金县扩红动员会上介绍经验。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说：“瑞金要扩大2000名红军，云集区承担了400名，你们别的区各承担200名行不行？”朱开铨回区后，又进一步作了动员，结果，云集区实际扩大红军1020名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当时，中央苏区粮食库存不够，长汀、瑞金粮食供应困难，以致影响红军军需。毛泽东派通讯员送一封信给朱开铨，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要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3升米，全区28000多人就可以节约840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朱开铨把毛泽东的指示在区里传达后，全区掀起了家家捐献、人人出粮的热潮，仅仅3天时间就捐粮1000多担。为此，《红色中华》报发表评论文章：《学习瑞金云集区的模范》，号召大家“学习云集区为解决粮食的战斗精神”。在云集区的带动下，瑞金县28万人民在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三升米运动”。

在查田运动的日子里，朱开铨经常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到朱开铨忠实积极，便在理论上、政策上、文化上言传身教，在工作上放手大胆地使用，这使朱开铨很快成长起来，193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任命朱开铨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

云集区的查田试点工作，是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先

导。云集区查田试点的成功经验，推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开展。1933年6月，毛泽东在云集区的叶坪乡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和八县贫农团大会，并邀请朱开铨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着重阐述开展查田运动的任务，交待查田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介绍云集区特别是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情况、成果和经验。会后，中央政府组织了包括从云集区抽调的400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内的大规模的工作团，到中央苏区八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

同月，毛泽东派朱开铨到长胜县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毛泽东选调王首道、周月林、朱开铨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4月，朱开铨调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兼会安工作委员会主任。10月，中央组织部调朱开铨到中央军委第五局工作。10月15日，朱开铨奉命离开瑞金云石山。他告别家乡的父老乡亲，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选自《党史文苑》95年4期，作者：刘勉钰）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

背景介绍

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党中央积极领导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等文化教育、革命文艺、体育卫生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材料：

- 中央苏区的邮政建设
- 根据地的财政金融
- 工农业余教育
- 根据地的革命文艺

材料一　中央苏区的邮政建设

中央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由赣南、闽西两大块根据合成。党的“八七”会议后，赣南和闽西地方党组织先后发动农民暴动，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并逐步发展为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先向赣南后向闽西进军，这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到1931年下半年，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根据地最大时辖有21座县城，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1930年底蒋介石开始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配合军事围剿，1931军初蒋介石下令根据地内的邮局及邮班一律停办。为打破敌人的封锁，搞好根据地内的通信和对外联系，中央苏区逐步创建了自己的邮政——赤色邮政。

中央苏区赤色邮政有个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央革命根据地未形成前，赣南、闽西两省就各自创办了自己邮政，成立了管理机构赤色邮政总局或赤色交通总局并各自发行邮票，制定通邮办法和细则，1931年下半年，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原不统一的邮政工作，已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为此，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九次常会专门研究讨论了根据地内的邮政工作进行整顿。4月13日以何叔衡为代部长的内务部发布第一号布告：决定中央建立邮政总局，各省设立邮政管理局，统一发行邮票。随后又发出训令，对如何进一步整顿邮政、邮政经费及组织办法统一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22日人民委员会12次常会决定杨岳彬为邮政局长。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和补调各区的邮政工作，24日至27日召开了由各县邮政局长以上负责同志参加的闽赣两省邮政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前段邮政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制定了统一的邮政规则和实施办法，对新的邮路干线的开设做了具体规划，并决定5月1日起执行新的规定。会议的圆满结束，标志着中央苏区赤色邮政的正式建立。

中央苏区的邮政有一套严密的管理系统和明确的邮路干线。邮政总局在内务部具体领导下，各省设邮政管理局，各县城按地域的宽窄、军事交通的需要与否，分设甲乙两种邮局。县以下设分局或邮政代办所，局所间的距离，主要干线30里至40里，支线为60里至80里。中央苏区按军事重心和交通要道，以瑞金和长汀为中心，共开设六条邮路干线。即瑞金——宁都——广昌；瑞金——胜利——兴国——万泰；瑞金——会昌——寻邬——安远；瑞金——长汀；长汀——上杭——永定；长汀——新泉——龙岩。同时还开设了其他邮路支线。干线和支线邮路的开设，保证了中央苏区邮路的畅通。

邮政总局成立后，立即着手邮票的设计和印刷工作。中央苏区第一套邮票由中央政府总务厅的黄亚光设计，一套三枚，半分，壹分、叁分。后又发行一套邮票共四枚，贰分、伍分、捌分、壹角。邮票及其它收入一律上交邮政总局。

中央苏区在招收邮务人员时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对从前两省的邮务人员进行一次全面考查和审核，而后决定是否留用。新收的邮务人员，首先是政治上可靠，主要招收那些忠实于革命的工农。具体的程序是，由群众团体推荐，当地政府担保，才能录用。其次是忠于职守，体格健壮，乐于吃苦。富农、流氓、豪绅家属及患各种危险病症的人概不得录用。

中央苏区邮政信函分为四种：剪角信（限印刷品），邮票1分；便信、邮票3分；单挂号8分；双挂号16分。各局

所每天开班两次，上午6时半，下午12时半。节假日平信停办，普通快信和特别快信照常传递。遇有军事要件随到随送。

临时中央政府对邮政工人的利益十分关心。1932年苏区正式成立了邮政工会，全体邮工订立集体合同。政府明文规定，邮工每月的薪水最低8元，每年递加1元。每天工作8小时超过工作每小时增加7分5厘工资。连续工作半年以上者，规定休息两周，如不休息工资加倍。政府的关怀，调动了广大邮工的工作积极性。1933年6月全区邮工广泛开展了革命竞赛活动，为昼夜传递距离超过90公里而努力。7月，又开展节省运动，邮工节约工资伙食，支援红军打仗，将6月份工资及以前存的全拿出来，捐助给前方的红军。8月，他们又集体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自动要求在一年内既不休息，也不领取加倍工资，以支援前方的战争。

为适应苏区军事斗争的需要，1932年7月，内务部又将原来的六条邮路干线，扩展为十五条特别快递信件。即瑞金——胜利——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瑞金—宁都；瑞金——于都——赣县；瑞金——会昌——重石—信丰（临时线）；瑞金——汀州；会昌——寻邬；汀州——河田—旧县——白河；白河——上杭——永定；白河——龙岩；胜利——宁都——广昌；兴国——万太——公略；兴国——永丰——乐安；兴国——于都——会昌；兴国——赣县，这些快线的开通，不仅保证了根据的内邮政的畅通，也充分体现了邮政为军事斗争服务的特点。

为鼓励人民参加红军，中央苏区对红军指战员及家属间的通信一律免费优待。内务部制定的《红军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凡现役红军指战员及其家属无论寄信、包裹等均予免费优待。信分别由部队直属机关和当地政府盖章，即可寄出。后又将红军战士免费戳记改为"红军家信免贴邮票"字样。这一传统规定一直沿用至今，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对子弟兵的关怀。

总之，中央苏区赤色邮政的建立及其发展，不仅为苏区人民邮递信件、包裹、报刊提供了方便，而且在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中，胜利地完成了党政军的通信任务，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后，部分邮政职工和中央后方办事处一起，坚持斗争到1935年1月，后改为秘密交通。其余随红军长征北上，为我国邮政事业的开展保留了骨干，打下了基础。

（作者：马修毅，《党史纵横》）

材料二　根据地的财政金融

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在革命战争时期，财政金融问题必须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财政收入主要是靠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即取之于敌。取之于敌不仅能很快地筹措革命经费，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而且是推翻地主豪绅反动统治的政治任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革命斗争所需要的。但是，割据时间长了，根据地内及其附近的土豪就打光了，战争缴获也不可能是经常的和每次战役都能大量得到的。为了奠定苏维埃财政来源的稳固基础，在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苏维埃政府迅速建立了人民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即在取之于敌的同时，亦取之于民。这时土地革命斗争已经开展，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具备了建立人民税收的条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指出："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暂行税则》规定："税收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为促进苏区的工业发展，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但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地的商业税，是在一九三三年才开始全面征收的。苏维埃税收的基本原则，与国民党的财政政策相反，是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税收中以农业税为主。征收农业税时，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和红军家属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在工商业税中，工业税低于商业税，公营和合作社企业税率轻于私营企业税率。商业税主要是关税和营业税，关税是以按照苏区的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营业税即商业所得税，按照商店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根据地扩大巩固时期，发展国民经济逐渐成为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即取之于己。这个时期，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国营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直接经营出口贸易和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从而为政府提供了财政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财政的支出，根据节约的原则。苏维埃政府要求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并且号召各级政府开展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仅一九三四年四至七月，中央苏区经费开支就节省了一百三十万元。同时，还实行精简机构，据一九三四年三月《红色中华》报道，当时党中央裁减了通讯、杂务人员百分之三十五，挑夫百分之十；中央政府各部门

减少工作人员百分之二十，地方各级政府也精简了大批人员，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金融方面，为了改变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在《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宣布了在银行、信贷、货币和金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苏区银行的职能是："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苏区国家银行的创办，使苏维埃政府有了独立的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的经济斗争的重要支柱之一。国家银行成立后不久，同年七月七日即开始发行纸币，统一苏区的货币。苏区的纸币可以兑换银元、银角，携带方便，币值稳定，在苏区市场上畅行流通。而任何杂币、伪钞却禁止进入使用。同时，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少量的苏维埃银元和可以流通到白区的"大头洋"、"小头洋"、"老鹰头"银元，促进金融流通，贸易便利。苏维埃国家银行还通过信用合作社实行低息贷款，扶助农、工、商业的发展。信用合作社是在苏区取消了高利贷后，农民群众需要生产资金而一度发生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吸收群众存款和发放短期贷款，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代替物。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国家银行的扶助下，苏区的信用合作社得到较快的发展，有效地打击了高利贷剥削，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资金和生活困难。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支持革命战争及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决定发行短期革命公债六十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脱离苏区实际，实行了一些过左的财政政策，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忽略了根据地内的经济建设，加重了中小商人的税收负担，以至一度造成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使经济建设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

（选自戴向清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材料三　工农业余教育

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业余教育的目的，是在工农群众中扫除文盲，提高阶级觉悟。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由于工农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后对于文化翻身的迫切要求，使工农群众业余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工农群众业余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形式有："夜校"、"星期学校"、"半日学校"，"识字班"。在根据地7岁到15岁的儿童入"列宁小学"，15岁以上的青年、成年入"夜校"、"星期学校"、半日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业余的，但是时间比较固定，它也是以扫盲为主，但程度比"识字班"稍高。有的"夜校"把学员按程度分成甲、乙、丙三个班，甲班有"读报"、"算术"；乙班读"成年读本"；丙班读"儿童读本"。根据地的"夜校"都是群众自己办起来的，经费有的是募捐而来的，有的则是群众义务劳动解决。教师有一部分由列宁小学的教师兼任，有的则是请村中稍识文字的人担任。"识字班"在程度上比"夜校"低，但在形式上比"夜校"灵活的多，其特点是规模小而又灵活多样，它多则十人，少则三个就可以成班。按住所接近的情况编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这样带小孩的、年纪大的、在家看门出不去的都可以开识字班，再忙的人也可以学习。因此，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识字班"的作用，指出"识字班"是一种用最灵活的方式，在各种工作万分忙碌中，教育最大多数革命群众的最有效的形式。"识字班"由当地的"扫盲协会"领导，教师有的是列宁小学的教师，有的则是列宁小学的学生。

"夜校"、"识字班"虽然以扫盲为其主要任务，但是它和白区那些资产阶级教育家们办的"平民教育不同，它不仅仅是为了识几个字，对于'夜校'和'识字班'的要求是看红中（红色中华报）为毕业标准"。说明"夜校"和"识字班"不是为扫盲而扫盲，而是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从而提高政治觉悟。所以，从学习内容上来看，是从生活需要和一些常用的工具名称开始，如"桌椅板凳"、"猪牛鸡鸭"逐步地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的。在"夜校"乙班和丙班使用的《成人读本》、《儿童读本》、《初级读本》中，思想性和战斗性是很高的。如：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编的《初级课本》第二十九课：

凉风吹我衣，香花扑我鼻，
农村苦耕田，豪绅加利息，
老幼男女七八口，忙到终年无饭衣，
层层剥削真难当，若不革命老奴隶。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翻印的《群众课本》第二册第十四课：

我们有眼睛，要看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我们有耳朵，要听清同胞们的痛苦的哀号，斗争的声音；

我们有舌头，要唤起全体被压迫的兄弟；

我们有手足，要和全体被压迫的兄弟携手前进。

这些课本是识字课本，也是政治教材。这种"识字课本"和同一时期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编写的《农民千字课》相对照，其革命性就更鲜明更强烈。晏阳初在定县编的《农民千字课》本里有一课名《知足歌》：

一群少年去赶集，
人家骑马我骑驴，
回头看见推车汉，
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

显然晏阳初是在用剥削者奴役人民的传统观念"知足者长乐"来维护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用这种传统观念来消灭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安于被剥削的牛马生活。革命根据地的识字课本则完全相反，它是教育人们破除旧的传统观念，起而破坏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率领红四军开辟闽西根据地时，曾一度住在连城新泉的"望天草堂"，当时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个地区的广大劳动妇女还没有真正的从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就指示地方干部要在新泉办一所妇女夜校，组织妇女学政治、学文化。1929年7月新泉妇女夜校在张家祠开学，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新泉妇女夜校"，由区苏维埃组织干部和红军战士编写识字课本，教员也由地方干部和红军战士轮流担任。在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再次率领红军到新泉整训时，曾两次去夜校看望夜校学员，了解她们的学习情况，并亲自给她们讲课，号召她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新泉的妇女通过夜校的政治、文化、军事学习、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她们剪掉了长头发，摘掉了耳环，放开了缠脚布，勇敢地走出家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组织草鞋组、洗衣组为红军做草鞋洗衣服支援前方。她们有的还动员丈夫和亲人参加红军，有的自己参加了红军。

（选自李桂林著《中国现代教育史》）

材料四　根据地的革命文艺

由于解放了的根据地人民对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苏区的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在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苏区就已产生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如歌谣、演唱、活报剧等。但当时无论在部队或地方，都没有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一九三一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为苏区文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开始成立了文艺性的机构和团体，有了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干部和演员，苏区的文学艺术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苏区的文学艺术，最为突出的表现在戏剧方面的发展。当时的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戏剧管理委员会，经常组织晚会，演出短小精悍的戏剧节目。红校周围的群众和住在叶坪的中央负责同志都常去看戏，颇有影响。后来，戏剧家李伯钊、沙可夫以及钱壮飞、胡底等相继到达中央苏区，促进了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冬，遂成立了八一剧团，赵品三为团长。八一剧团是革命根据地诞生的第一个剧团，它一成立便成为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于是，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戏剧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戏剧活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六日，党团苏区中央局在汀州水东街举行招待漳州工人参观团的茶话会，周恩来、罗明等出席。八一剧团在茶话会上演出了文艺节目。剧团回到瑞金后，一些戏剧文化工作者即着手在红军学校筹备成立工农剧社。但在六月间起草《工农剧社章程》的过程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章程草案被认定为"偷运了托洛茨基的政纲"，八月份展开了"反托派斗争"，负责筹备剧社的张爱萍、左权、郭化若、危拱之等受到了错误的处置，有的同志甚至被开除党籍，这就是所谓"工农剧社事件"。直到九月二日才宣布工农剧社正式成立。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苏区戏剧运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工农剧社召开第四次全体社员大会，讨论决定设立第一届训练班，由少共中央与全总执行局征调青年同志组成蓝衫剧团，受相当训练后出发往各地公演。大会一致通过今后接受全总执行局的领导，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各部。工农剧社除积极开展本社工作外，并决定与各地俱乐部发生关系，经常供给剧本歌曲，予以指导，创造工农大众艺术。随后，少共中央局即从兴国、瑞金、博生、公略、赣县、永丰、胜利、汀州、上杭、长汀、新泉、武平等地，征调了四十名十五至十八岁的活泼青年（其中男的占三分之二，女的占三分之一），组成"蓝衫团"。四月四日，蓝衫团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并演出了八场戏剧《我——红军》。五月间，汀州、叶坪、红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六处，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会员约六、七百人。分社在总社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各地晚会，培养戏剧人才，进行热烈的宣传鼓动工作。七月三十日，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的盛大晚会，演出了活报歌舞和三幕话剧《谁的罪恶》。九月十四日，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汇报演出了话剧《胜利》和哑剧《武装保卫秋收》。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后，就任中

央政府教育部长兼管艺术局工作，加强了苏区戏剧运动的领导。瞿秋白将蓝衫团改名为苏维埃剧团，将蓝衫学校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并领导制定了戏剧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制度，颁发了《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和《俱乐部纲要》等，详细地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和组织原则，从而使苏区戏剧运动走上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道路。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中央及地方的苏维埃剧团经常深入城镇、乡村、部队巡回演出，既满足了苏区军民文化娱乐的需要，又交流了演出经验，提高了演出水平。在全国"二苏大"的晚会上，苏区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表演了"极为精彩"的村女舞，上演了沙可夫的七场历史戏《我——红军》，李伯钊、胡底、赵品三、王普青、钱壮飞、王桑、李克农等苏区明星，"表演极为努力"，"特别是王桑、李克农两大滑稽博士，一举一动，一声一笑，无不令人捧腹绝倒"。为了繁荣戏剧创作，瞿秋白亲自编辑了苏区剧本集——《号炮集》，并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发表剧本和戏剧评论等。

正当戏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剧社的领导骨干李伯钊、钱壮飞、胡底随军长征北上。瞿秋白将工农剧社按部队形式编成三个剧团：火星剧团（由石联星、王普青率领）、红旗剧团（由施月娥、刘月华率领）、战号剧团（由赵品三、宋发明率领），直接由工农剧社总社领导，由赵品三任社长。三个剧团分赴前线巡回演出。后来，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剧社的同志分散投入游击战争。

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红色歌谣是苏区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被解放的人民以真挚、深厚的感情，热情奔放地歌唱苏区的新生活。真是："红军打来晴了天，红色歌谣万万千，唱起歌子走天下，一人唱过万人传。"在这成千成万的红色歌谣中，有歌颂党和革命领袖的，如"灯火不算光，太阳亮堂堂；爹娘虽然亲，不及共产党。""朱德毛泽东，好比是东风，吹起满天下，到处都是春。""松树开花排是排，湖南来了个彭德怀，带领红军到江西，贫苦农民心花开。"有反映农民参加红军的，如："高山顶上一棵茶，郎当红军唔（不）会差，在家顶多一人好，去当红军好大家。""下定决心当红军，哪怕山高水又深，山高变鸟要飞过，水深变鱼也要行。"有表现不怕牺牲革命到底的，如："树大不怕狂风吹，堤高不怕大水冲，工农有了共产党，坚决革命没二心。""杀了老子有儿子，杀了儿子有孙子，儿孙代代当红军，坚决消灭白匪军。"如此等等。在工农红军中，歌谣活动也很活跃。红军战士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创作了《红军歌》、《放哨歌》、《摸哨歌》、《冲锋歌》、《工农兵联合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和《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歌》等大量作品，紧密地配合了革命战争。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人民斗争生活和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生动记录。

苏区的革命文艺，除戏剧、歌谣以外，还有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新诗、散文、歌曲、美术等。为了创造工农大众的文学艺术，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红色中华》号召苏区的通讯员和读者"努力地去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的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在文艺的形式中写作出来。"此后，便在《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上出现了许多以战地通讯为主的报告文化作品，如《吉安的占领》（子任），《战场上的片断》（刘志坚），《大雄关的战斗》（罗瑞卿），《矮子岭的战斗》（舒月），《新桥战斗中的英勇事迹》（陈伯钧），《三甲嶂上的英雄》（彭加伦），《从火线上来》（梦秋），《明口战役纪实》（仲华），《乌江之战》（孙钦），《飞鸢洵口战役的经过》（饶人），等等。这些来自战斗最前线的战地通讯，真实生动地记述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经过和英雄事迹，很有感染力。此外，苏区报刊的文艺副刊和专栏，也都办得较出色，如《红色中华》的"赤焰"、"红角"，《青年实话》的"工农大众文艺"，《红星》的"山歌"、"俱乐部"等，发表了大量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创作的小说、诗歌、小戏剧、故事、歌曲、警句、讽刺、漫画等文艺作品，短小精悍，朴实无华，充满着苏区战斗生活的新鲜气息。逢重大活动或纪念节日，还要另出专号或增刊，如"赤焰"文艺副刊主办的"三八特刊"、"五一纪念专号"、"五卅纪念专号"等。一九三三年纪念"广暴"六周年时，苏区工农美术筹备社还举行了"工农美术展览会"，是为中国无产阶级美术运动的新生。

苏区文艺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文艺。苏区文艺以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为特征，完全做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较好地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朴实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真正地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从而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选自戴向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背景介绍

蒋介石为了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用半年时间，作了各方面的准备：他向美英等帝国主义借到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装备；研究采用"逐步深入，堡垒推进"的战略战术，并聘请大批外国军事顾问，筹划作

战计划；举办“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千多人；在中央根据地周围修筑几千座碉堡，设立经济封锁线，并在居民中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首先以50万兵力分四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紧迫根据地，消耗红军力量，寻找主力作战，妄图消灭红军。

形势虽然严峻，但红军仍有粉碎“围剿”争取胜利的可能。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党和红军又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人们对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充满信心。如果党能正确地估计形势，灵活应用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采取积极防御路线，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红军打破这次“围剿”是有可能的（见史料1）。但是，当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已完全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和博古掌握。在错误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多次决策失误，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黎川，他们惊惶失措，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洵口一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偶然胜利之后，就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构筑坚固阵地的地区进攻，结果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见史料2）。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 陈铭枢、蒋光鼐领导下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进攻十九路军。这时，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乘机向敌人后方苏、浙、皖地区出击，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粉碎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但“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这一正确主张，既不敢向敌人后方出击，又没有尽可能地在军事上支持十九路军，致使蒋介石集中力量打败十九路军之后，又全力进攻红军。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结果屡遭失败（见史料3）。1934年4月，广昌被敌人占领。7月，敌人分兵向根据地中心进攻，李德、博古等又命令红军实行“全线防御”，结果是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穷于应付，使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局面。10月，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相继失守。红军转战一年，元气大伤，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被迫退出中扭，进行长征。

材料：

- 从黎川失守到团村战斗
- 李德是怎样“指挥”的
- 李德治军，反“围剿”失利
- 广昌战斗
- 南线谈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五反“围剿”，痛遭失败

材料一　从黎川失守到团村战斗

蒋介石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隔断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红军的联系，敌人乘我红军主力东、西分离之际，首先以北路军第三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之第五、六、九、十六个师进攻黎川。九月二十四日，敌在黎川以北之硝石集结，二十五日向黎川挺进。

当时，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肖劲光。这个军区是由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发展起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肖劲光根据敌我进攻的态势，估计敌人极可能进犯黎川，曾给前总发电，“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不应死守黎川。”但这一正确意见，被“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所否定。闽赣军区的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在敌人进攻前的一个星期又调往峭石，归前总直接指挥。当时守备黎川的“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敌人进攻的前几天，中央又命令闽赣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随即，顾作霖（省委书记）、邵式平（省政府主席）两同志率党政机关撤出了。为不致引起群众恐慌，只留一个合作社没撤。”当肖劲光率领部队在城外围与敌周旋回到城里时，黎川已是一座空城了。面临周浑元部的三师之敌，“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肖劲光同志才带着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命运。”

九月二十八日，敌进占黎川，并继续南进。黎川失守后，闽赣省委、省苏迁至德胜关，黎川县委、县苏迁至宏村。

在江西北线敌情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为集中兵力对赣敌作战，我东方军第三、五军团奉命回师，于九月二十八日分两纵队从延平、顺昌、将乐前线撤回泰宁集中，向黎川方向前进。十月七日，当东方军疾进到川东北的洵口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我三军团消灭了敌赵观涛第六师的第十八旅（三个团缺一营），生俘旅长葛钟山。敌十八旅残存的一个营据守在山顶土寨子，虽然山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如再围困半天至一天时间，即可消灭。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在茶亭侧击敌周浑元第九十六师的增援部队，因兵力未集中，仅消灭其一部，使溃敌得以缩回黎川，洵口遭遇战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

洵口遭遇战是胜利了，但主张“单线防御”的“左”倾

领导者不看洵口一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并根据变化去诱导战争朝胜利方向发展，而是震惊于黎川一地之失，急于企图去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他们不待洵口困死之营被消灭，于九日至十三日命令红三军团攻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白区的硝石，钻进硝石这个死地。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当我军奉命进入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宁进攻模样；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有向硝石夹击消息。在这危急关头，彭德怀当机立断，"速电反对上述命令，算是得到复电，允三军团撤回洵口，幸免被歼。"这种"不肯退却，仓猝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

硝石战斗不胜，"左"倾错误领导又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去打黎川东北敌人巩固阵地、白区的资溪桥。十月二十二日，红十三师奉命从资溪桥北面山地向敌周浑元部之碉堡外目标袭击，并牵制敌薛岳部向资溪桥移动，红十五师、三军团在潭头、石峡等地配合行动。虽然我红军英勇杀敌，因敌阵碉堡巩固，凭优势顽抗，红军终又不胜。至十月三十日，红十三师东移以来减员过半，要求调红校学生补充该师。

十一月间，我红军主力曾攻击洪门、浒湾、枫山埠等地，辗转寻战于敌人主力与堡垒之间，东奔西突，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此期间，红一军团虽然在西线打了些小胜仗，但对全局来说，不起大的作用。

十二月十二日，敌第八纵队周浑元部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第五、六、九十六师)进攻团村，并有第五纵队罗卓英部三个师(第十一、十四、九十四师)掩护，大举向江西，福建交界的德胜关推进，企图进取泰宁，策应入闽援军，断我红军归路。时红三军团担任主要突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掩护。红三军团预先在半路埋伏，当敌进至团村我伏击圈时，我主力部队三个师同时猛烈突入敌之第二梯队，手榴弹声，机、步枪声、喊杀声震撼山谷，敌第二梯队大乱，波及第一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乱，急向黎川城内逃窜。我军四个师约一万二千余人，击溃敌三个师十五个团约四万余人。仗虽打胜，俘虏不及一千，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一仗，由于"两个拳头打人"，一、三军团分散作战，因而未能全歼敌人。敌人在团村战斗后，经过整顿继续向南推进，紧缩苏区。于是红军退守德胜关、大杉岭等地，以掩护建宁、泰宁苏区。

(选自戴向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材料二　李德是怎样"指挥"的

那时，我作李德的翻译。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常到"独立房子"来，李德也常步行到军委去参加会议。他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倒是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密切。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但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部，两人相互支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都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事。

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

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西克特等人策划下,吸取了他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企图逐步蚕食苏区,最后吃掉我们。部队每推进一步,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往前推进三、五公里,再停下构筑堡垒,就这样一步一步向我逼近,迫使苏区一点一点缩小。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建议,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爆发的福建事变时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或转战湖南中部,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按照这个打法,本来可以甩开正面敌人,从侧后打击蒋军。但是王明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仍然坚持李德的打法,反对游击战,硬打正规战。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指挥下,部队只得同正面的强大敌人硬顶。当时发生的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件,更没有很好的加以利用。有一回李德曾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那时,我们本来应该将部队向闽北开动,威胁蒋介石侧后,支援和挽救受到蒋介石围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却反而指挥红军向西去,不打蒋介石的侧后,不支援蔡廷锴,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反转过来集中了全部力量向中央苏区进攻,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高虎垴,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个胜仗。这次战斗是三军团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打得很顽强,给了敌人很大打击。当时曾把这次战斗当成胜利的例子广为宣扬,文艺工作者还编了支歌子,唱着"高虎垴战斗,我们胜利了!"但是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整个的不利形势,当时进行的广昌战斗,却没有成功。战斗中李德和博古曾经到前线视察,战斗失利后,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当面说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说李德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我开始没听清,杨尚昆同志给解释了一下,我才弄明白这是一句湖南俗语,批评李德造成了红军的不应有损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李德听了,他大为恼火,连声骂彭老总是封建脑筋,但是他知道彭老总不好惹,也只得听着。

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不一样。李德到一军团时,林彪专门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请李德讲课,李德特为讲了"短促突击"。他讲完后,林彪马上说李德讲了很好的一课,大家要很好的学习、研究和贯彻,以后他又亲自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深得李德赏识。不过我当时对林彪的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善于打运动战,而彭德怀同志善于打阵地战。事实上中央当时也是这么使用这两个军团的。高虎垴的阵地战,在福建沙县的攻城作战就是彭总指挥的。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李德被免职无权了,他还是对林有兴趣,主动要求随一军团行动,只是林彪已不大接近他了。

(选自伍修权《为李德当翻译》)

材料三　李德治军,反"围剿"失利

蒋介石精心策划,并动用了他大量嫡系部队,经过长期准备,所发动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被中央红军痛痛快快的粉碎后,气急败坏,坐卧不安。他不甘心自已的失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贼心不死,立即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

蒋介石为了发动新的"围剿",作了长期的、多方面的准备。1933年4月,他派宋子文去美、英、法、德等国,乞求借款,并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大量印行钞票,增加了各种苛捐杂税,加强对人民财富的掠夺。用巨款向国外购买了大批飞机、火炮、汽车、弹药,以扩充军备。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训练团团长,以陈诚为副团长,聘请美、意、德、英、法等国的军事教官,分期分批地对各军军长实施反革命的军事、政治训练,讲授"剿匪要诀"、"战时政治工作"、"剿匪手本"等反动课程,研究堡垒战、山地战、搜索战等作战方法。在精神上,贯注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如每逢提到"委员长"或"领袖"等称呼时必须立正等。另外,蒋介石还规定军官必须佩带"军人魂"短剑,学习日本武士道精神,鼓吹"不成功便成仁",让他们为"党国"誓死效忠。同时,在军队内部的编制、装备、运输及军队的行军、宿营、搜索、警戒、战斗行动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变,以便于轻装、机动,尤其注重宿营地的阵地构筑和武装便衣搜索队的加强。在军队内部实行连坐法,互相监督、侦察、告密、钳制士兵的言行,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防止发生兵变,

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蒋介石于1933年9月,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向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围剿"。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明的"左"倾主义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才使工农红军能够创造性地遵循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此次,敌人"围剿"规模虽然很大,但中央苏区的革命力量在经过了四次反"围剿"后,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不仅有正规红军10余万,还有赤卫队近20余万人。面对几倍于红军的敌人,红军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就应该先进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以少部兵力迟滞、疲惫敌人,然后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的方针,实行外线

的进攻战，逐步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粉碎敌人的“围剿”。也就是说，只有遵循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才能取得胜利。

然而，此时王明的“左”倾主义路线已经完全统治了中央和红军。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对军事全然不懂，将反“围剿”作战的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并全力支持李德对军事决策的独断专行，以致取消了红军军委的集体领导。

李德又名华夫，他的真实姓名是奥托·布劳恩，生于1900 年。1919 年他参加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1926 年被捕，1928 年越狱成功，逃向苏联。1932 年他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同年秋天，共产国际派他到上海担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于 1933 年 10 月随中共中央一起进入中央根据地。他进入中央苏区后，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结合，军事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极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进攻面前，他们却盲目轻敌，推行冒险主义方针，提出“不丧失根据地的一寸土”、“与阵地共存亡”、“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以及决不打烂根据地人民的“坛坛罐罐”等方针，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硬要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企图在根据地外消灭敌人。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没有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而且失去了集体领导。李德名义上是顾问，但博古对他百分之百信任，言听计从，坚决照办，实际上李德独揽了对红军的指挥大权。因此，党中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组织指挥，实际上是根本不懂得军事的博古，通过他所谓的外国“智囊”李德实施对军委和全国红军发号施令的。李德常常凭借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得的书本知识，运用所谓“正规程式”，不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下达指示和命令。他经常蹲在自己的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而当时的地图都比较简单，地形、地貌、地物等都不准确，误差很大。李德不问前方的地形是平原还是山地，也不考虑部队是否食宿，不考虑敌情、气候的变化情况，单凭用比例尺在地图上量出距离而定下红军运动的路程和到达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任何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9 月下旬，敌人为了切断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切断红军 1、3 军团互相协同，决定首先进攻江西黎川。敌第 8 纵队周浑元的 4 个师，9 月 25 日向我红军闽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黎川发动进攻。当时，红军各部均远离黎川，黎川一带兵力空虚，仅有一个 70 余人的警卫队驻防。面对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考虑到红军一时来不及支援而敌人又会很快切断后路，所以他当机立断，率领机关及警卫队撤出黎川。肖劲光同志的这一行动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震惊于黎川失守，认为这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战略方针，于是对肖劲光同志大发雷霆，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了党籍，在红军内进行公开审判，说他是“极右倾机会主义者”。

敌第 8 纵队占领黎川后大吹大擂，说“黎川之克复，实为我军战略上之一大收获，为五次围剿胜利之先声。”接着，敌人便继续南下发展进攻。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为了夺回黎川，不顾敌人重兵在前，命令在东线作战的红 3、5 军团，迅速回师。9 月 30 日，红 3、5 军团奉命由福建返回江西，10 月 17 日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军遭遇，红军立即投入了战斗，经过 3 天对敌人的围歼，红 3 军团歼灭了敌第 8 纵队第 6 师的第 18 旅，生擒敌葛钟山旅长；红 5 军团给敌增援部队第 96 师以重大杀伤。

洵口战斗的胜利虽然打击了敌人，但未形成对敌全局的破坏，此时，红军应利用初战小胜的这一有利时机，积极行动，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然而，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把洵口的胜利视为他们战略方针的伟大胜利，因而坚决反对诱敌深入，顽固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他们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敌人不堪一击，便极力轻视敌人，决定冒险出兵敌占区，实行全线出击。于是，红 3、5、7 军团奉命到外线去攻打黎川以北的硝石，企图截断黎川、硝石之间的联系，孤立黎川之敌，然后收复黎川。硝石位于黎川、南丰、南城三地之间，与三地各相距三四十里，敌军在黎川拥有三四个师的兵力，南丰、南城也各有约 3 个师敌军，而且敌人在这一三角区内设有许多坚固堡垒，硝石恰恰处在群垒之中央。敌第 24 师依据坚固阵地，坚守硝石。红军没有较多的重型火器，只凭轻武器进行攻坚战，又缺乏爆破器材，在敌群垒之中无法施展野战特长。纵然红军不畏牺牲，几度硬攻，敌人却钻进碉堡中，凭坚抵抗。硝石久攻不克，王明路线的领导人着急了。10 月下旬又命令红 5 军团去攻打敌第 11 师固守的白区阵地资溪桥，又未能攻克。接着，红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辗转于临川、黎川、金溪地区，在敌人的主力和群垒之间寻机作战，东突西击，南打北攻，完全陷入了被动。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红军始终未能在白区和敌我交界处打败敌人，虽然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给敌人一定的杀伤，取得了个别战斗的胜利，但只是战术上的胜利，而敌人却步步为营，消耗了红军。“左”倾主义的领导人和李德在他们冒险主义进攻失败后，又被敌人优势兵力和坚固堡垒吓得惊慌失措，赶紧放弃了冒险进攻，但仍顽固地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却又采取了保守主义的防御方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抗敌，反对必要的转移和后撤行动，提出“不丧失寸土”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在强敌进攻面前，丧失了大片领土。

（选自《百战图》作者：王洪武）

材料四　广昌战斗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陂圩集结。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拚硬打，当然吃亏。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拚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实际对他的错误，只是举例说的。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从广昌战斗后，同敌人一直顶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他们抓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之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上述等等，使我慢慢理解到，除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加上他们推行的那种过火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冒称布尔什维克化，都是贯彻了四中全会这条完全错误的路线。

（选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五　南线谈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驿前战斗失利后，我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等县及其他零星地区。根据地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和优势兵力冲破了，据守西线兴国老营盘、高兴圩一带的，只有陈毅率领的江西军区地方武装和红三军团的第六师在阻击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兵力比较单薄。八月二十六日，红五军团（缺三十四师一个团）奉命西移高兴圩以北阵地。九月二日，一军团组织了温坊战斗，实行夜间突击，俘敌一千六百人左右，缴获轻重机枪三、四十挺，迫击炮数门。九月八日，一军团（缺十五师）亦奉命西移圩一线，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仍留河田、长汀一带箝制与抗击敌李纵队。红一军团移至高兴圩后即以第二师实行夜间突击，没有成功就调走了，只剩红五军团与敌周纵对峙。敌人趁势加紧筑碉堡修路，步步进逼，红五军团与敌周旋了一个时期，即奉命撤至兴国以南待机。

在南线，战事较为稳定。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矛盾较深，陈曾三次通电反蒋，与十九路军暗中有联络；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千方百计地拉拢陈济棠，委任他为南路军总司令。陈为保存实力，对我红军停停打打，持观望、应付态度，占领筠门岭之后，就没有前进一步。我驻守中央苏区南线的是粤赣省军区所辖的红二十二师及地方挺进游击队。红二十二师是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人师和粤赣的地方部队升编组建的，师长程子华（后为周子昆），政委方强（后为王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下辖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三个团，在澄江、吉潭、寻乌等地担负着守备中央苏区南大门的任务。筠门岭战斗失利后，红二十二师退驻站塘李官山一带。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省军区所在地——会昌文武坝。毛泽东在南线一面养病，一面视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和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和红二十二师的干部们一起，研究了南线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分析了陈蒋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示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要善于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我们的力量。当然我们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

在会昌，毛泽东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出席了粤赣省会议，作了有关指示：巩固苏区工作、深入土地革命，纠正只分坏田给富农的错误；扩大发展游击区，向安远、寻乌发展，向兴宁一带创造游击区；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正当商人，执行正确的工商政策。五月间，毛泽东登上会昌岚山岭察看，回到文武坝后，即填写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一词：

>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筠门岭战斗失利后，粤赣省军区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红二十二师因在前线未参加会议。毛泽东给红二十二师打来电话，详细询问了筠门岭战斗的经过后指示：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牵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七月，毛泽东亲临前线站塘李官山，召见了前线部队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和当地边沿县区干部，多次召开了调查会，同干部共同研究敌情、民情、作战部署以及对敌斗争、扩红、支前等问题，对巩固南线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粤赣军区和红二十二师的干部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消灭了一些敌人，巩固了根据地。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批评粤赣军区存在着脱离战争、和平训练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扬言要"无情打击"这种观念。接着，便派去中央工作检查团，对南方战线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结论。

为了稳定南线局势，保证瑞金大后方的安全，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曾应陈济棠之邀，派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为总代表，到筠门岭附近同孙济棠的参谋长黄幼民三人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四）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在现在战线上后退二十华里。谈判结束后，中央苏区南线出现了一个时期的稳定局势。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仅粮食、弹药和物资十分缺乏，而且部队内部的思想也较混乱。对此，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等忧心如焚，曾公开向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说："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因此争论起来，此事激怒了李德，很快被博古知道。博古立即找刘伯承谈话，接着便撤销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去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敌军逼近了兴国、古龙冈、石

城、长汀和会昌。我红军主力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力日少而地日蹙。九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将红二十一师、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以周昆为军团长，黄苏为政委，担任阻止古龙岗之敌；我一、三、五、九军团从九月二十六日起，投入了保卫瑞金的战斗部署。实际上，这时红军继续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之“围剿”已不可能，但完全可以用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实行战略进攻，仍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正如毛泽东所建议的：“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彭德怀同志亦曾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其他兵团，进占溆浦、石溪、源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主张，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于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进占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线，在“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下，我红一方面军英勇奋战历时一年，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自己亦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终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

（选自戴日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材料六　五反“围剿”痛遭失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而就在此时，早在上海成立的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无法存身，便迁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到莫斯科去当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后，这个临时中央现在是由秦邦宪（博古）负责。他们在上海，这里完全可以做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但现在他们就在你的面前，你如不听，他们就撤你的职，革你的命。他们一意孤行，乱抓乱管，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埋下了隐患。

1933年7月的一天，蒋介石对陈诚说：“我准备在庐山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让你去任团长。我们从许多国家聘请了一些军事顾问，你可以帮着他们训练一下我们的指挥官，以备将来‘围剿’红军之用。”这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专门用来训练“围剿”红军部队的指挥官的，他亲自规定了军官训练团的学习内容，其中的军课包括堡垒战、山地战、搜索战等。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尤其注重军官们对政治的学习，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做法。在军官团训练期间，他还亲自跑到山上，对受训的军官们说：“你们要效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作战中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绝不能当共产党的俘虏。”并给每个人发了一柄“军人魂”短刀，要他们败后自杀成仁。

蒋介石调整了部队部署，改变了战术，见一切准备就序，便于1933年9月向红军根据地发动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围剿”。这次共出动了兵力近100万人和200多架飞机，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人之众，约300个团。面对敌人的进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盲目轻敌，推行冒险主义方针，提出“不丧失根据地一寸土”、不打烂根据地人民的“坛坛罐罐”，硬要御敌于“国门”之外。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在北路军第8纵队对驻黎川的红七军团发起进攻，黎川失守。博古等人便大为震惊，急令在东线作战的红三军团和红五团迅速返回江西抵御敌人。10月7日，由福建的建昌地区回师江西的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歼灭了敌第8纵队第6师的第18旅，生擒其旅长葛钟山，获得了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一个重大胜利。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对红军的作战进行正确引导，粉碎敌人的“围剿”也不无可能。但是，那些人却急于收复黎川，致使红军部队在敌人的主力和坚固保垒之间东突西击，陷入被动。

此后不久，一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人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此人原名奥托·布郎，是个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德奥军队中服役，在同俄国军队的作战中被俘，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当过骑兵师参谋长，还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过军事。1932年共产国际派他来中国上海，于是，他便在临时中央迁到中革命根据地后不久，也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年仅26岁的博古长得很瘦很瘦，但他鼻梁上戴的那副高度近视眼镜并不能说明他具有渊博的学识，他对军事一点也不懂。于是，李德一来，他便把军事指挥权统统交给他。李德虽说在正规的军事学院里学习过军事，但他对中国的客观情况完全不了解，只能根据地图来指挥作战。

就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却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有利打破这次围剿的事情。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发动“福建事变”，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这第19路过去曾多次参加过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后调到上海，又奋起抵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亲自看到蒋介石破坏了上海的抗日，还要把他们调往江西去打红军。从此，他们便看清了蒋介石真反共、不抗日的真面目，产生了对蒋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在蒋介石要他们打红军时，调转枪口，向蒋介石开火了。此事一出，蒋介石便从进攻根据地的部队中抽调了9个师的兵力，去打第

19路军，而对根据地则采取守势。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提出了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的老巢，迫其调动军队回援，在广大无保垒地区寻求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其"围剿"，并响应福建革命政府的正确建议。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抓住了敌人的要害，是扭转战局的关键一招，但此时不仅没有人听他的，博古、李德等人却说什么："让第19路军去挨打吧，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同我们合作时降低条件，对我们有利。"第19路军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终于失败。红军也就又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围剿"的机会。

待蒋介石在福建收拾了第19路军后，便在福建成立了以蒋鼐文为首的东路军，形成了对根据地的四面合围。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等人又从反"围剿"初期进攻的冒险主义转而成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出击"，企图以此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指战员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却没有阻止住敌人的进攻。

到1934年6月，国民党军队便兵分六路，开始向根据地内大肆进攻了。以李德为首指挥红军作战的人却命令红军"六路分兵"来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兵分六路"。一路是红三军的两个师，抵抗从泰和向兴国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一路是红八军团所部，在古岗以北抵抗敌人的进攻；一路是红五军团所部，在头陂抵抗敌人向宁都的进攻；一路是红三军团的其余部队，在白水镇与石城之间抵抗敌人的进攻；一路是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等，在连城、朋口以西抵抗敌人向长汀的进攻，一路是红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抵抗敌人的进攻。这种平分兵力的做法，只能给敌人以各处突破的机会，而不能集中兵力各个消灭敌人。

战火已经烧向了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情况非常危急了。这时，毛泽东又提出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的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此计又不被采用。至此，博古、李德等人一错再错，失去了三次大好时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不可能了，摆在红军面前的出路也就只有长征一条了。

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了红二十四师和地方独立团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红军主力分别向雩都(今于都)以北和瑞金、古城地区集中的命令。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转移。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地方独立团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又充满危机的道路。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热河之战

背景介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进行了一年的"扫荡"，将东北军和义勇军基本上打垮。日本炮制的伪满傀儡政权也在辽、吉、黑三省站住了脚。于是，日本军阀又进一步把矛头指向热河，于1933年2月23日发动了侵热战争。

当时热河省主席是昏庸老朽的奉系军阀汤玉麟。汤玉麟(绰号汤大虎，出身捕盗营士兵，和张景惠、张作相同为张作霖清末四方台起兵的绿林伙伴)，从1926年起即成为热河的统治者。日军侵占辽、吉、黑三省，招降张景惠、张海鹏等后，曾通过这些汉奸利用盟兄弟关系以伪满"开国元勋"为饵，策动汤玉麟附逆。经张作相劝诫，张学良又以大宗军饷接济，汤玉麟始未敢投敌。当日军"扫荡"吉、黑两省时，张学良即指示汤玉麟整顿部队，构筑国防工事，并拟派王以哲等东北军青年将领率军入热，协助汤防御日军入侵，但汤玉麟向来视热河为其禁脔，拒不接受。1933年初，日军侵热已部署就绪。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由张学良陪同于2月17日到承德表示中央抗战决心，促汤积极准备抗击日军入侵。张学良除委张作相为华北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六军团长外，并委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兼华北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当时任热河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除辖三个国防步兵旅外，还有东北的一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及热河省的一个骑兵旅，共有三万人，而且装备有捷克式步枪、轻重机枪和炮兵团，在当时国内部队中，这些东北军的装备是首屈一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拟定的防御方案是：汤玉麟军团防御赤峰、建平、朝阳一线；万福麟率其黑龙江的两个旅及奉军三个旅防守北票、朝阳、凌源、平泉一线；孙殿英第九军团及冯占海、邓文、李海青等义勇军以及汤玉麟收编的山东巨匪刘桂荣等部，防守开鲁、林东一线。

2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攻热军总司令，控制板本政右卫门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部署于辽西绥中至义县一线；另配备茂木谦之助骑兵旅团及张海鹏、程国瑞等伪军两万余人于开通、通辽一带。

战争开始后，守朝阳的汤军董福亭旅，由于团长邵本良在前线叛变，丧失南岭、北票，朝阳很快失守。万福麟军团王永胜二十九旅守平泉和三十家子；于兆麟三十旅守凌源和叶柏寿。董旅在朝阳溃散后，日军川原旅团及饭田骑兵旅团即猛攻叶柏寿，激战三昼夜，于旅渐不支，王旅增援，又坚持了两天，因日军炮火猛烈，终于败退平泉。万福麟掌握的丁、缪、孙三个旅也在凌南被西义一师团击

败，退进喜峰口。日军快速部队一路无阻，直驱承德。至于热北开鲁、鲁北、林东一线，日军骑兵配以坦克发动进攻后，鲁北一带的刘桂棠部即纷纷溃逃；守开鲁的崔新五旅，由于团长李守信率部投敌，开鲁不战而降；布防在开鲁一带的冯、邓、李等部义勇军本属乌合之众，更不战而逃，退到赤峰。幸久经内战锻炼的孙殿英部一个旅及时赶到赤峰，阻击敌军骑兵七昼夜。板本师团攻占朝阳后转向赤峰、围场方面，孙军且战且退，在猴头沟被板本师团切成数段，激战七八天，终于冲出重围，退往察东沽源。3月初，汤玉麟在承德闻日军已击败万福麟军西犯，即命张从云旅及直属部队两个旅布防于承德外围各山隘。但该两旅士兵闹饷，不听命令，当日军迫进时，汤即率卫队逃往滦平。日军先头部队一百二十八骑于3月4日晨进入承德。

承德失守前，张学良在北平总部闻热军连失要地，即急催张作相赴热督师。张拟以其子张廷枢任旅长的东北第十二旅及其甥冯占海从吉林带来的义勇军编成军团，但张、冯两部还未及集中，日军攻热已开始。张作相到承德后不久，汤玉麟即逃往滦平。张手中无兵，只好回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立命其亲信王化一等带大令到古北口将汤玉麟就地正法，以振士气。不料汤已收拢起张从云、刘香九、富春几个旅退往察东沽源。以后汤部石文华、赵国增两个骑兵旅被孙殿英吞并，其余部队和装备均被宋哲元收编。

张学良拥兵三十余万，不战而失东北三省，今又不战而失热河，受到了全国舆论的严厉谴责。3月11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材料：

· 日本陆军省《热河讨伐经过概要》

· 热河溃败

材料一　日本陆军省《热河讨伐经过概要》

讨伐前夕的反满军情况

关于热河省内及华北的反满军情况，已见二月四日本班发表的《满洲的扫匪与治安状况》一文。以后的形势变化大体如下：

汤玉麟正规军　二万

汤玉麟自卫军　一万二千

冯占海军　一万五千

邓文军　六千

李海青军　三千

刘震东军　二千

冯庸军　三千

其他杂军　一万三千

孙殿英军　二万

沈克军　八千

张学良正规军（步兵五师、骑兵一旅）三万三千

第一线抵抗阵地以开鲁、兴隆地区至朝阳一线为主，由义勇军负责；第二线是由赤峰经凌源至北章营子、干沟镇一线，这是主要的抵抗地区，配备主力；第三线设于承德附近。

山海关方面，张学良的二万四千名正规军（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部署在最前线；第二线滦河右岸地区部署杂军，即商震所率一万六千人和四万宋哲元军，计八万大军。第三线，即北平附近有张学良的二万五千军队，还备有二十余架飞机和十余门高射炮。

日满军的情况

1. 从开始行动到占领赤峰、承德

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密切配合，从二月上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至二月下旬各方面均进入行动。

（1）茂林部队于二十三日从通辽附近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开鲁，驱逐李海青军。二十六日傍晚，以部分兵力击退下洼附近的冯占海义勇军约一万人，并占领该地。

主力从兴隆地区继续西进，追击匪贼，三月二日拂晓到达赤峰以东高地，击退占领该地之敌，上午十一时，太阳旗已飘扬在赤峰上空。

（2）坂本部队的大部兵力于二十三日，主力从通辽出发，部分兵力从彰武出发，冒着暴风雪和零下二十余度的严寒进行强行军。二十七日其先头部队到达下洼，未事休息，驱逐数千敌军。二日傍晚，其挺进部队进入赤峰。坂本部队之一部，即松田支队，于二十三日从朝阳寺出发，经朝阳，三日占领建平，四日同在黑水附近占领阵地的约两千兵匪展开激战，敌军向西方溃逃，五日进入赤峰，与主力汇合。

（3）西部队之一部于二十一日先发制敌，占领北票，继而以三列纵队向义州、锦州方向进发。途中，排除了在朝阳东南方高地设有阵地的张学良正规军的顽强抵抗，于二十五日进入朝阳。经过休整，于三月一日出发。其间，川原部队于三月二日占领凌源，三日进入平泉。未经喘息，继续西进，四日晨到达承德郊外。上午十时击溃承德东侧高地之敌，下午二时五十分入城。在此之前向古北口方向败退的敌军，遭到我方空军的袭击，受到歼灭性打击，向南方及西方溃逃。

（4）服部部队于二月二十六日从绥中开始行动，以二列纵队前进，因途中山岳重叠险峻，又有近月以来敌军修筑的阵地，战斗相当艰苦。最后突破沙帽山、白庙子的堡垒，继而夺取北章营子。其先遣部队即米山部队于二日中午到达凌源，继而南进，击溃石桥子之敌，向冷口前进。鲇江部队在北章营子同主力分手，在该地以南喇嘛洞附近，同数倍于我，拥有优势的张学良正规军交战数日，借以掩

护主力部队的行动。

(5)满洲国军中,由张海鹏将军率领的洮辽军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开鲁升起满洲国旗,从三月一日开始继续行动,扫荡各地匪贼,九日其司令部进入赤峰。

其他,李寿山军、程国瑞军、丁强军等也都追随皇军之后,一面扫匪一面前进。

2. 进至万里长城一线

(1)由坂本部队组成的高田支队四日离开赤峰,途中击溃敌军,六日占领围场,配合茂本部队扫荡附近一带匪贼。九日在卡伦附近发生激战,孙殿英军遭到严重打击,向西方溃逃。

此外,残敌集中的乌丹城也于九日傍晚被我占领。

(2)占领承德的川原部队的部分兵力,于四日傍晚进入滦平,从七日起,与川原部队主力共同进攻长山峪(在古北口东北约七里)附近的坚固的敌军阵地,经过激战,追击至长城线古北口,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占领该地。随后,又击退拥有优势的张学良军和中央军。十二日,古北口一带要地全部被我军占领。

(3)服部部队于九日傍晚夺取了喜峰口。然而,这一地区敌军仍不断反攻。

在此之前,米山部队快速南进,驱逐石桥子之敌,四日已在长城冷口升起太阳旗。继而向长城董家口方面转进,十日占领该地。

(4)中村部队作为军的总预备队在奉天待命,二月末转移至绥中附近。较一般部队稍晚,从绥中开始作战行动,以二列纵队向干沟镇前进,九日攻陷该地。然后立即南下,猛攻长城的界镇口,十五日将该地攻克。此外,东方义院口要地已于十三日为我军占领。

(5)关东军司令部以武藤大将为首的领导机关,于三日到达锦州,亲自指挥前线,鼓舞士气。后因我军已进至长城一线,作战即将告一段落,于十一日傍晚返回新京。

到十六日为止,热河方面作战伤亡情况如下:

战死　一百一十八名

负伤　二百七十一名

合计　三百八十九名

反满军情况

1. 热河省内

张学良的四个师正规军和汤玉麟军的二个师固守在从赤峰经凌源至干沟镇附近一带,素以热河省内的中间阵地自诩。但鉴于第一线的义勇军李海青、冯占海、冯庸等已经溃败,深感震惊。曾在北方的孙殿英、石文华、高春军等基本在热河西部边境;凌源以南的军队已退往承德、冷口一带。汤玉麟见此情景,战意全无,弃承德望风而逃,不知去向。张学良、蒋介石等得知后不禁愕然,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便将热河失守之责转嫁汤玉麟,下逮捕令,要处以极刑。

热河省内败军比比皆是,热河西部边境的丰宁附近有汤玉麟军,赤峰西北方地区有冯占海、孙殿英败军集团,据说通过多伦从华北接受物资补给。由于积雪即将融化,同后方联系困难,今后的扫匪任务将十分艰巨。

2. 华北方面

张学良连续收到热河战败的消息,企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下令确保长城一线。但是,杂军为了保存自己,都不想作日满军的进攻目标。如宋哲元只以部分兵力应付,主力仍固守长城以南的玉田及三河一线。

山西军之一部与其说是抗日,莫如说是乘火打劫。他们从张家口进入古北口或接近热河西部边境的多伦一带,企图扩大地盘。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军正在向华北进发。已有两个师北上,其中一个师已用于古北口方面。蒋介石的目的,一是为了对华北诸军进行督战;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华北各种动摇与混乱。

(摘自《九·一八事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热河溃败

一九三二年夏,日军准备夺取热河,东京特派高原卡见等来华,向热河主席汤玉麟诱降,并煽动内蒙王公喇嘛组织内蒙自治军,作为进攻热河的别动队。驻北平的东北军将领曾集体到热河边境视察地形,准备抗击日军,并向热河汤玉麟指示机宜。在华北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指挥下的华北第四军团(军团长万福麟)开始动员。向热河边境前进的部队为丁喜春独立第八旅、缪澂流独立第十六旅、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王永盛独立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独立第三十旅。我当时任东北军独立第二十九旅第六八四团少校团副,率部参加了叶柏寿之战,熟悉王、于两旅作战情况,现将经过情形作一简单的回顾。

这年十月间,万福麟率第二十九、三十两个旅由喜峰口步出关外,进入热河。军团部和第二十九旅大部驻平泉县(即八沟),第二十九旅以一个团(第六八四团,团长刘纯和驻三十家子。第三十旅驻凌源城和叶柏寿,在城东面就山上南北之线构筑防御工事,右翼与第十六旅相连,左翼经朱利科村与守赤峰的孙殿英部队相接。构筑工事由十月初旬开始,经过三个月之久,因隆冬地冻和岩石坚固,锹镐用坏若干,士兵两手震破出血的甚多,而工事尚多不堪用。军团部曾组织阵地视察组(我是参加视察组者之一)到叶柏寿视察。于旅阵地仅按北平军分会指示防线构筑直线式的工事,未能按当地地形地势置防和作纵深配备。于兆麟强调上级指示不能更改,因于与万的关系,视察组内也有随声附和的,结果这个视察组毫无作用而归,军团部也是以不了了之。朝阳至叶柏寿一百七十华里,叶柏寿至三十家子一百四十八华里,三十家子至平泉

二百三十六华里，平泉至承德一百零四华里。在这样的距离徒步行军，都需二日至四日以上。这种配备，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处处露出弱点，被敌一摧即破。并且师以上的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二百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无法察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以通辽、绥中为根据地，集中兵力分三路进犯：北侵开鲁，南攻凌南，中犯朝阳，总计日军、伪满军约在十万人以上；附有飞机、坦克车、装甲车、山野炮等精良武器；并有运输汽车八百余辆。我方也分三路应战：北路开鲁方面为第九军团孙殿英部战斗地带，有孙部两个师、义勇军冯占海、李海青、刘振东、邓文等部和热河军崔兴武（战斗开始即投敌）部，二月末即将开鲁、赤峰丢掉。第四军团左翼已受敌人的威胁，中路董福亭旅守南岭、北票，因董旅团长邵本良投敌，董军溃退。邵本良在投敌前曾到密云县第二十九旅第六八四团，蛊惑第二营营长张执军同时投敌，被张拒绝并将邵赶走。南岭、北票失守后，朝阳也相继失陷。日军直趋凌源，第三十旅在叶柏寿首先应战。当面敌人为川原旅团组成的快速纵队配合骑兵第三旅团，有飞机九架，装甲车三十余辆，陆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激战三昼夜，于旅伤亡甚众，第三八八团团长失踪。于兆麟向军团部求援，军团部令二十九旅第六八四团向凌源东叶柏寿增援第三八八团，归于兆麟指挥。三十家子距叶柏寿一百四十八华里，第六八四团由三月九日早上急行出发，花费了十三个小时的时间，徒步抵达叶柏寿的左侧蹦碌科村，已在夜里十时左右，连夜向叶柏寿东方高地，即第三八八团的主阵地增加。本人以少校团副的职务，奉团长刘纯和的命令，先带各营长、副营长到第三八八团阵地接洽换替阵地的一切问题。到达高地后，看见仅有少数士兵在阵地内警戒（敌人夜间不攻击），当向第一连中士赵某询问情况，他答连长、排长均于白天阵亡，士兵亦伤亡殆尽，其余情况不知。我告知他们，第二十九旅第六八四团来此增援，赵等极为兴奋。但全阵地无法接洽，仅按于旅长命令上的指示，把第三八八团阵地验收好，开始布置队伍，以一、二两营为第一线，第三营为预备队同团部位置于左后方蹦碌科村南端，十一时许方始布置完竣。十日拂晓，飞机三架在我上空侦察两周，投掷炸弹，地上步兵亦即开始进攻。我第一线两营予以抗击，激战两昼夜，双方各有伤亡，战斗激烈，但敌未得攻进我阵地一步。十二日夜间阵地前方有大喇叭声音传来，高叫“皇军邵本良部队到此，欢迎六八四团第二营张执军参加皇军”，始知此路敌人进攻，系由邵逆本良引路，当被第一线我军击退。十三日上午八时，左翼发现敌骑兵向我左侧进攻甚烈；正面敌人除原有人数外，又增加坦克车、装甲车共三十余辆，山野炮二十余门，飞机九架，由上午八时起集中火力向我团猛攻。我官兵亦奋不顾身，猛烈迎击，自早至晚，几次冲锋，伤亡甚众（连长伤亡已超过全团连长的半数），所有我方阵地大部都被摧毁。午后四时许右翼于旅不支，向平泉撤退，敌人以一部包围第六八四团，主力向西追击于旅。于旅和第二十九旅主力在平泉汇合继续抵抗。此时丁喜春、孙德全、缪澂流各旅全线动摇，退入关内，万军团亦由平泉撤退到喜峰口（以后交宋哲元部队接替）。第六八四团在十三日下午被围后向于旅告急，但电话已失去联络，方悉于旅已退走，并未给第六八四团命令。到十三日夜十二时许，全团开始反攻，突出重围，撤到八里罕店子。十四日正午敌人骑兵追来，受我严重的打击后退走。十四日夜我团退到八里罕以西，才脱离敌人追击的范围之外。敌人主力已集中向喜峰口方面追击我主力，我团决定撤到多伦，再转道张家口。

十五日下午二时许，我团由八里罕店子西进到烧锅营子村西，逢孙殿英部某师孙旅，在烧锅营子村西三里许两山之间，通往多伦的道上构筑防御工事，禁止通过。我团即宿于烧锅营子村，晚间团长刘纯和派我到孙旅联络，拟次日早西去。我到孙阵地前，以手电信号和口令通过步哨，递次转到孙旅旅部，说明联络的情形，并交出证件。孙旅长（名忘记）最初很客气，说明天拂晓请刘团长和师参谋长袁克征来，大家谈谈。袁系旅长派来到叶柏寿视察阵地的，我团被围转进时同来。我回团报告，于十六日拂晓，同刘、袁两人到孙旅旅部。孙旅长说：“现在张学良已下野了，听说准备出国。你们是没主人的军队，希望参加我们一起来抗日。请刘团长和参谋长暂在旅部休息休息。你们队伍暂由王理寰团附去带领，由左侧高山下转到大拉火沟口停止待命，刘团长与袁参谋长再回团不迟。”刘团长当时暗示我以颜色，并说：“理寰你快带队，到达指定地点火速给我们俩送信来，无论什么时候你不要离开团。伪军太多，注意警戒，不管他是伪军还是日本军，来了就打。”我当时明白这是以团长和参谋长为质，立即出了孙旅旅部，急急回团部。将出孙军阵地外壕，敌人飞机两架即到孙旅阵地上空盘旋，然后以炸弹数枚指示炮兵射击目标，相继炮弹射来，均落孙旅阵地内，枪声四起，顿现混乱。我以快跑的速度进入烧锅营子村，村内四处火起，枪炮弹到处乱飞，到团部后三个营长已联络不上，中校团附不知去向。我随即指挥团部官兵到烧锅营子村后山北侧集结，又以第九连中尉排长张广德（代理连长）在山顶上射击敌人背侧，使敌人不得前进，掩护全团官兵集结山后。随后又增加第七、八两连上山。激战到午后一时许，敌人主力攻孙旅阵地，右侧亦发现骑兵威胁，炮火增加，并以坦克车数辆摧毁孙军阵地，孙军不支，向独石口撤退。我团亦即撤到头二把火，到午后四时团长及袁参谋长等亦相继回团。十七日经刀把梁、王爷庙、围场，十九日抵多伦城与挺

进军刘恽飞部队相遇，一起撤至张家口。热河战役至此告终。三月底集中北宁路线、廊坊和武清县，重新整编。万福麟因热河战败，撤换了王、于两个旅长，第二十九旅改编为第一二九师，任周福成为师长；第三十旅改编为第一三〇师，任朱鸿勋为师长，归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指挥。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城抗战

背景介绍

1933年初，日军占领承德后，即进抵长城各口。驻长城内外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给骄横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光荣。

驻守喜峰口、罗文峪一线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于3月9日至4月中旬，与敌展开了浴血奋战。面对日军的飞机、装甲车和大炮的猛烈轰击，中国守军在“行则堕指裂肤，息则卧雪嚼冰”的冰天雪地里，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沉着应战，拚死肉搏，使喜峰口阵地失而复得。他们“咸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裹伤出击，率众与敌肉搏相拚。3月中、下旬，罗文峪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经血战十日，敌溃不成军。喜峰口、罗文峪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仅喜峰口一役，便虏获敌轻便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六辆、步枪六千余支，俘敌方余名。连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喜峰口的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由第十七军徐庭瑶所部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三个师驻防。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中国守军在这里英勇抗击了日军的猛烈进攻。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虽被手榴弹炸伤，仍继续指挥战斗。古北口一役，守军三个师先后接替，经三昼夜紧张剧烈的战斗，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才被迫撤至南天门。第二师与第八十三师在南天门，复与日军血战二日，“直至高地全化为焦土”。5月13日，中国军队奉命自南天门撤退。

此外，商震部第三十二军和傅作义部第五十九军，也分别在冷口、怀柔等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长城内外的民众，积极参加了抗击日军的战斗。据载，有王三举人者，曾“率民团、保甲等二万余人，在冷口外二道河子、三道河子至五道河子截断日人后方联络，因是冷口及建昌营，敌人绝援”。

长城抗战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气概。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必安内始能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日军的抵御，遂坐失战机，终至失败。日军在相继占领长城各口后，于5月11日强渡滦河，旋侵占密云、遵化、蓟县、丰润、唐山等冀东二十二县，平津危急！

中国军队在长城线上的英勇抵抗，英、美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以及日苏关系的紧张，迫使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政治攻势。南京国民政府则因“剿共”心切，慑于日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恫吓，急于同日本妥协。5月3日，长城线上的炮声未息，南京当局便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并令其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材料：

- 激战喜峰口
- 长城各口的战斗

材料一　激战喜峰口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占领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震动，华北当局急调第二十九军移防平东。于是宋哲元以华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所部由山西开驻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总指挥部初设通州，继移蓟县，后来设在遵化。由于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华北当局对抵御日军的整个部署，丝毫没有准备，而只是千方百计向日军谋求妥协。因此第二十九军在一月二十日部队陆续到达平东的时候，竟没有继续奉到准备作战的指示。二月二十五日日军陆空全面进攻热河，宁军不战而退，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就以百余轻骑占领了承德。这时华北当局手忙脚乱，命令第二十九军，以一部分兵力出冷口御敌。宋哲元奉令后，命我率骑兵两营到冷口执行警戒掩护任务。另命王长海团开到建昌营，以为策应。

三月四日，我们到了建昌营，即遇沈克所率领的第一〇六师，遭到日机追击轰炸，从冷口向南溃退，枪炮辎重，遗弃遍地，零乱不堪。我们就在冷口布防，扼守要隘，并帮助沈克收容溃兵。到了六日，第二十九军奉令防守冷口西至马兰峪止，长达三百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隘，而将冷屯营（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第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师长张自忠、冯治安也已经到了这里。第二天下午，奉令接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距离热河的平泉一百九十里，这里原由万福麟部驻扎，万部在热河的凌源、平泉溃败后，乃退保宽城、喜峰口一带阵地，士气沮丧，不堪再战，遂商由第二十九军接防。我在九日下午和副师长刘自珍到达喜峰口，口里口外驻有万部一个旅，我

们和他们约好,我们的队伍在天黑以前,一定可以到达一部分,等我们的部队到了阵地,他们就撤至口内休整。我和刘自珍视察了阵地,决定把先头部队一个团放在口外约二十里的孟子岭,来确保喜峰口的安全。四点钟左右,我们刚从山上下来,前方炮声大作,从望远镜里看到万部纷纷由孟子岭方面退下,旋接报告,敌人服部、铃木两个旅团的步骑炮联合部队,中杂伪军一部跟踪南下,铁甲车十余辆开到孟子岭附近,万部抵挡不住,望风而逃。傍晚,敌人占领口上高地,居高临下,控制了口门。这时,我第三十七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人炮火猛烈,该营又在洼地,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中弹阵亡。王长海团随即到达,天已昏黑,双方在山上山下混战。夜间,我军由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才把敌人压住,稳定了口上的战局。我将战况反映给在三屯营的冯治安,冯叫我立即到喜峰口南约二十里的滦阳城指挥。我到滦阳城,已过午夜,宋哲元由蓟县总指挥部来电话,询悉前方战况后,指示说"一定要坚守喜峰口,我已经调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去增援,他们离你处约有百里左右,跑步前往,预计天明以前,可以赶到"等语。

十日一早,赵、王、佟三旅先后到达滦阳城。此时,喜峰口我军一部分部队向后退下,赵登禹立即带队上去,将敌人堵住,赵的腿部受了弹伤。王、佟两旅分向左右两翼增援,战至上午十一时,东面王旅告急,西面刘景山团告急,陆续派队援应,转危为安。十日一整天,在喜峰口附近激战,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杀声震天。我军士兵,多数都不愿携带步枪,因为背着步枪上下山地,行动不便,他们只愿多带手榴弹,提着大刀,便于杀敌。由于两军的士兵白刃相接,距离很近,因而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十一日拂晓,敌人发动进攻,企图抢夺我军占领的山头,我军沉着应战,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相距百米以内,突然出击,以手榴弹大刀冲杀,敌不得逞,遂以飞机大炮,更番轰击。两天多的战斗,双方的死伤都很重。晚间,我与三屯营张、冯两师长通电话,大家都感到如此拼杀下去,敌人器械精良,对我甚为不利,应当运用我军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遂请得宋哲元的批准,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下赵、佟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赵在十日攻击敌人时,腿上被炮弹片擦伤,这时自告奋勇,裹伤出发)率领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及仝瑾莹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王治邦旅俟赵、佟两路袭击得手,即行出击。部署既定,夜半,两路分头出发。赵旅出潘家口,距目的地较近,拂晓前即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地区。这一带地方和喜峰口内外,在八日这一天都下过雪,到处还结着冰,官兵深夜在冰雪中急行军,情绪非常高涨。董团到达三家子、小喜峰口,王团到达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他们正在高卧,不及还击,多数被我军砍杀。夺获敌人的大炮、坦克车,无法携回,都予以炸毁(只携回炮镜和轻武器等),辎重粮秣悉予焚毁。此时,驻在老婆山的敌人看见火光冲天,知道有变,驰来应援,敌我两军,遂相混战,适佟亦已到达,将敌击退,仍由原路而回。此役毙敌甚众,击死敌指挥官一人。我军也伤亡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附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二人;受伤者团附一人,营长二人,连长七人。敌既受创,十二日喜峰口沉寂了一个上午,下午敌机四架到喜峰口、潵河桥等处轰炸,投弹二十余枚,我军略有伤亡。董家口方面在十二日晨,有敌来犯,被我军击退。这一带的战事,从九日下午开始,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此后,两军对峙,不时有些接触,战事重心,由喜峰口移到罗文峪方面去了。

罗文峪在遵化北十八里,东北距喜峰口一百一十里,其地适当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长城凹入处,倘被敌占,则喜峰口的左后方受到威胁,势必无法站脚,不战自退。因此,我方在这方面驻有刘汝明师担任防务,并与原驻口外的东北军李福和的骑兵第五旅一部取得联系,互为策应。不料当日军由热河向罗文峪挺进的时候,李部骑兵擅自向西撤退,也不通报我军。幸而当地民众激于爱国热忱,连夜向罗文峪我军报告日军南犯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军还在峪口外,抓获一名往官阶级的敌探,在他身上搜出文件,知道敌人从朝阳、平泉、滦平一带,抽调第三十一联队、第八联队协同一部分伪军,经由兴隆县东北六十里的鹰手营子进犯罗文峪。我军得悉情况,严阵以待。十六日拂晓,敌人先头部队沿半壁山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夺取三岔口高地;我军祁光远团跑步绕出黄崖口,予以截击,经激战后,敌始退去。第二天,敌大举向罗文峪、山渣口、沙宝峪进攻,炮火猛烈,并有飞机助战。我军诱敌迫近,突出阵地,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冲杀。战斗竟日,阵地得失数次,我方复调李金田旅增援。傍晚,敌向鹰手营子方向退去。此役敌伤亡甚重,有少佐指挥官一员被我军击毙。十八日晨,敌步骑炮混合部队约一个联队之众,猛攻罗文峪、山渣口、沙波岗。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以机枪手榴弹抵御,待敌接近,挥刀砍杀,活捉其骑兵大尉一人,余众仓皇退去。至午刻,敌复向山渣口进攻,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两侧挺进。我军李金田旅长率李曾志团,祁光远团长率王合春营,先后驰至增援,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敌损失甚巨,我李曾志团长受伤,王合春营长阵亡。是夜,我军派李金田旅长率兵一团由沙宝峪口绕攻敌侧背,连越七个山头,摸至敌的机枪阵地;相距约四五十米时,被敌觉察,向我军猛烈射击。适祁光远团由左翼绕攻敌后,亦已到达,合力攻入敌阵。此时,正面

我军见敌后业已打响，急令全线出击，前后夹攻，战至天明，敌全部撤退，罗文峪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

罗文峪战后，敌人又从喜峰口西边进攻了几次，均未得逞。四月初，敌经由南北团汀，达到潵河桥以东距三屯营约十里之处，经我军迎击，敌始退去。此后，第二十九军在防区里筑成坚固的阵地带，敌从任何地点进攻，都须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而第二十九军自作战以来也有很大伤亡，计全军官兵伤亡共达五千余人，因而战事逐渐形成胶着状态。四月十一日，敌人从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入，接着迁安又告失陷，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腹背受敌，不得不转移阵地，随即奉令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在撤退的一个夜间，蒋介石驻北平的代理人何应钦以电话向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询问前方情况。张答："我军已经按照命令，到达指定地点，严阵待敌。惟右翼防地的商震部队，联络不上，现在我军右翼距通州约二十余里的地方发现敌人。"何闻讯大惊，以为敌兵迫近，北平危急，立命备车南逃，旋悉战争形势没有继续更恶化下去，始罢。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就此结束。

（摘自《何基沣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材料二　长城各口的战斗

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第一一六师扼守界岭口及其以东两小口，右与原来在义院口及其以南之线占领防御阵地的第五十一军部队相连接，左与扼守界岭口以西三小口的第一一九师队伍相衔接。此时，商震（启予）所部第三十二军从后方开到，把守冷口及其两边的峪园口。商震还兼充第二十军团总指挥（上将），司令部驻在京榆铁道上的开平车站。在商军左方扼守长城喜峰口和罗文峪等处的为宋哲元（明轩）所部第二十九军三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和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各师系两个旅（每旅三个团）和一个特务团的编制。我回北平见何应钦后，逗留两天即回前线。旋得何的电令，第五十三军归商震节制指挥。我又到开平见商震。

十日后，敌之步炮兵在其飞机协同下，开始对我军攻击。东北军虽名为"师"而只有三个步兵团和临时配属的山炮兵（营）连。步兵团能上火线的战斗兵不过千来名。长城线上除了正式的口子而外，坍塌的缺口不知若干。孙子兵法云："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因此，长城线上到处感到薄弱。"火力主义"的日军，是轮番以空中轰炸和地面炮击作战的。为了防备敌军冲入，充实阵线起见，第一〇八师未待整顿就绪，即由卢龙前来加入火线。不久，北平军委分会拨来重炮兵（十生的加农炮）一营（八门）归第五十三军使用。

各口开火个把月（四月上旬），把守冷口的第三十二军部队抵抗不住，而放弃了冷口，越过建昌营退守迁安。这一下子就使第五十三军左翼发生一大空隙，日军钻入，异常活跃。我向北平何应钦告急，说明第五十三军三个残破师俱已摆在第一线，没有控置预备队，无法堵塞左翼空隙。何乃派第一〇六师沈克所部和第一一七师翁照垣所部前来增援。但沈部行至沙河驿野鸡坨附近，说是因为某方情况紧急被追了回去，只第一一七师开到滦河东岸。我闻讯于某日黄昏由燕河营到卢龙城与翁照垣相晤。告以商军撤离冷口后，我无力堵塞两军间的空隙，只于某小山派了一个步兵连据守，以掩护第五十三军的左侧背。翁当即要求明日将第一一七师加入火线。我答道：在情况上现无加入火线之必要，暂作预备队，控置在卢龙附近吧！因为正面火线踞守长城，居高临下，一时不易被敌突破。现下问题，不光是第五十三军正面，而关系到右边的第五十七军。如果第三十二军不能恢复冷口，日军以重兵包围压迫第五十三军左侧背，后边既有滦河横阻，那么，第五十三和第五十七两个军俱有被吃掉的危险。第三十二军、第二十九军也将难保。这是全局关系，不光是一个军的问题。翁才安心呆下来。

某日我得何应钦的电报称：已嘱令第三十二军即日举行反攻，恢复冷口。我请示：如商军不能恢复冷口，第五十三军将如何处置？旋得何应钦复电指示："四月×日×时为止，如商军不能恢复冷口原阵地，则第五十三军可以撤离长城退守滦河西岸之线。"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某日拂晓系商军预定反攻前进的日子。殊知到了那时候，毫没听到什么枪炮声。于是，我依据何应钦的电令，到了所定的时刻，就下令把第五十三军全部撤离长城各口，退守滦河西岸 。同天，第五十七军也退过滦河。铁桥炸毁一孔，舟桥全毁。第五十三军退守滦河西岸不几天，即奉令与从古北口开来的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换防，而撤至稻地镇南北一线，构筑第二线阵地，借以整顿休息。五六天后，日军继续进攻，第五十七、第六十七两军又由滦河岸退至丰润一线。我所亲历的东北军长城战役至此结束。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背景介绍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发出通电，宣告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吉鸿昌为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冯玉祥

声明将“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次日，抗日同盟军颁布了免除苛捐杂税、释放政治犯和党费不得由公帑开支三项新法令。

参加抗日同盟军的部队，有察省的地方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方振武在晋南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和从东北各地撤退到察省的义勇军等。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也成批参加抗日同盟军。短时间内，这支抗日武装便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6月15日至19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大会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抗日同盟军的组织与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合作。

6月20日，抗日同盟军任命第二军军长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接着，又任命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克日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先后克复康保、宝昌和沽源，并经血战五昼夜，光复察东重镇多伦，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多伦光复后，冯玉祥又表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7月27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亲任委员长，下设秘书、政治、军事、经济等局。

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军、民众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上，与抗日同盟军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竟决定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与武力镇压相结合的绞杀政策。

冯玉祥在腹背受敌，政治、经济等方面又都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全国，忍痛收束军事，交出察省军政大权；9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4日，离开张家口赴泰山“休养”。后来，方振武、吉鸿昌率领近万人的部队，又在热河、长城一带与国民党、日伪军队转战两月，历尽艰辛，终因寡不敌众，于10月中旬失败。

材料：

- 血战多伦
- 还隐泰山

材料一　血战多伦

1933年六月十五日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六十一人，主席团为冯玉祥、王化三、张砺生、武绳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九人，秘书长为陶新畲。会期五日，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作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的要点是：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主张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肃清汉奸国贼，实现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大会并通过决议，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处理军区内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事宜。第一届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九人，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孙良诚等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兼总司令。在这次会议之后，军中的革命青年立即根据纲领，展开了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对于组织民众武装、协助军队运输和救护伤员以及筹措给养等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会闭幕后，冯对军事又作了新的部署：任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翼副总指挥，李忠义为右翼副总指挥，率领大军克日北进。为了统一指挥，特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所部进出张北，相机进击，地方武装，均配合活动。二十二日，察省自卫军第一支队王德重部首先克复了康保，伪军崔兴五部东退。二十三日，邓文、吉鸿昌、张凌云等部及察省自卫军之一部直趋宝昌，李忠义部直趋沽源。七月一日，在两地外围一度激战，宝昌方面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等部即向多伦溃退，我军收复宝昌。伪军刘桂棠部原踞沽源，至是反正，加入抗日同盟军。由于抗日同盟军声势浩大，许多被迫胁从的伪军也都相率来归。康保、沽源收复后，即以大部兵力向多伦前进。

正在各部乘胜前进的时刻，何应钦看到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将对人民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不利于他们屈辱投降的反动政策，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对冯施加威胁和利诱，除一面鼓动庞炳勋对张家口进行军事压迫外，一面对冯的代表孟宪章表示，希望冯(1)即日结束军事；(2)通电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3)宋哲元返察；(4)请冯就全国林垦督办职。冯为了缓和对他的压迫，以争取抗战的时间，电复孟宪章说：抗日军已在多伦附近发生激战，收复多伦指日可期，平方所提四项办法，如多伦攻下，一切不成问题。

多伦是察省的商业重镇，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日本帝国主义把它看作是攻掠察、绥的战略据点，日军茂木骑兵第四旅团二千余人及炮兵部队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丰宁属之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在这一线并且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是一个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的四战之地。因此，冯决定乘胜收复多伦，为进一步向

热河进攻开辟道路。

七月四日，张凌云部在七里河孤子山驱逐敌人前哨，吉鸿昌、邓文、李忠义等部均进抵榆树沟一带。五日，接刘桂棠报告：据夏军长（可能是夏子明，确否待查）由承德脱险归来说：蒋介石与日军取得默契，由日方出兵夹击同盟军，索华岑部接到日军命令，即将有所举动，围场、大阁一带均有日军开到。吉等得此情报，立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进攻多伦，以收先发制人之效。乃以张凌云部任左翼，李忠义部在中央，刘桂棠部苏师任右翼，吉、邓两部为总预备队，七日下总攻击令。为了避免敌人飞机大炮的火力，决于当日夜间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至八日拂晓，攻克敌人战壕两道。天明之后，敌因获得大炮支援，战斗益趋激烈，吉、邓、李三人均亲临前线指挥，激战至下午六时，迫敌退入城内。九日拂晓前，继续进攻，敌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涎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度爬城突袭，阻于敌人猛烈火力，未获成功，伤亡二百余人。十日拂晓，又开始猛攻，因日机轰炸，伤亡甚众，乃在原地休整。十二日晨一时，再次总攻，吉鸿昌袒臂冲锋，士气益振，连克数垒，直逼城下。在总攻的前一天，吉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伪军，潜入城内，追城外我军接近城垣时，即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并四处开枪，造成城内秩序的混乱，日伪军闻变大惊，开始向城外溃窜，同盟军乃由南、西、北三门冲入城内，巷战约三小时，日伪残部由东门逃走。沦陷七十二天的多伦，经五昼夜的苦战，终被抗日同盟军所收复。在收复宝昌、康保和多伦三县的战役中，共击毙日伪军千余名，同盟军亦伤亡一千六百余名。

当同盟军进攻多伦之时，汪精卫电冯说，在察抗战，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劝其早日赴京，徐图救国根本之计。冯复电说：“我决心抗日，本来就是找死，但是死在抗日旗帜之下，良心是平安的。”追同盟军收复多伦后，汪便造谣诬蔑，说“多伦已告收复，唯非取之于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于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又说：“多伦方面本无日军驻守，仅有伪满收编原来热军崔兴五之残部李守信部，约二千余人，所以一经接洽，一部分便服从收编了，一部分便站不住脚了。而吉鸿昌等部便进驻多伦了。”汪精卫这种贬低抗日同盟军战绩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的荒谬无耻的言论，立即遭到各方的驳斥和谴责。与此相反，收复多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义勇军后援会、天津民众救国联合会、上海教育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西南各省人民对外协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以及其它省、市的人民团体，都纷纷来电祝贺。

在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之后，东北的爱国军人和青年金典戎等多人纷至张垣投效。于是集议成立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借以广泛吸收爱国人士。为了准备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并扩大抗日战争的影响，又于七月中旬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内分四个局：秘书局主任余心清，政治局主任温晋城，军事局主任阮玄武，经济局主任张允荣，抗日同盟军高级人员均为该会委员。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还隐泰山

到了七月初旬，不料这一轰轰烈烈已经兴盛起来的民众抗日新阵容，从北平、上海传来消息，蒋介石、汪精卫放出毒箭，制造藉口，叫嚷什么“张家口赤化了！”要把这一新生的婴儿、真正抗日的力量扼杀在摇篮里。何应钦驻北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刘戡等师向察哈尔进逼，声言要解决张家口的问题。原来驻扎在平绥铁路沿线曾表示过愿接受冯的指挥调遣的孙殿英部已开始向西移动，让开大路方便国民党中央军接防，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冯一面动员在张家口外围，向南深挖战壕，准备防堵；一面抗议并揭露南京政府加罪爱国抗日的无耻谎言。对这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局势，冯一时陷于进退不得之苦。如硬抗下去，面临打内战的威胁，与枪口一致对外的主旨相违背，实为亲者痛，仇者快。加之孙殿英已表露不可靠，复传鲍刚等已被收买，将拆台内应。冯氏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乃于八月中旬，乘宋哲元回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之日，也给宋留个面子，秘而不宣地登上火车转回泰山旧居。至此，在张家口燃烧起来的抗日烈火，终于被熄灭，遭夭折，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纪录。

就在冯决定还居泰山的那天下午，叫去张克侠副校长，面授机宜，说明不得已要离开张家口，当即发交张硬币二百元，花机关枪四挺，卫士四人，每个学员配发手榴弹两枚，嘱令率领干部学校全体人员于翌晨出发，向北撤走。次日清早大家在悲愤之中撤出口外，行军到了万全县遇见前敌总司令方振武，我请示今后行止，他亦茫然不知所答。看来他亦在惊惶中有说不出的痛苦。我们只得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干部学校这一支队伍盲目地游食于张北、康保一带，就地无偿地索粮，使老百姓闻风逃避，几至十室九空。一日抵达一个村庄宿营时，不见张副校长来到。据说是他尾随大队之后，被地方枪兵抓去了。一时群龙无首，我更忧心如焚。深夜得讯，知张的下落，我就随同一个老百姓去找张。由这位老百姓提着灯笼居前引导，到了一个土城围着的寨子，叫开城门，走进了一个院落，步入房间，看到一伙横七竖八倒在大炕上抽鸦片烟，云雾沉沉，臭味薰人，真是一个黑窝子，令人生畏。一个大胡子站起来问我来干什么的？他明白了我的来意后就指向另一间房，我走进去，只见张副校长孤独一人坐在土炕上纳闷。他告诉我：由于我们队伍路过此地时，把当地放牧的马拉走了几匹，他殿后被赶来的地方武装抓住了，作为人质关押着的。我立即找到头人交涉，说张是我们队伍的负

责人，要求把他放回去好进行查办，由我替换呆在这里。再三恳求，没有变通余地，只能是放马回来，才能放人。我只好跟着原来的带路人走出寨子折返。途中突发狂风暴雨，灯笼息灭，迷失了方向，寻不到归路，就在原地打转转，直到天亮后方回到原来的宿营地。查明是一位副官带头干的，把马送还，张副校长也就归队了。对这种无纪律的行动所造成的事故，张副校长宽大为怀，没有加以追究，不了了之。

往后过了几天，宋哲元派来的部队节节进逼，勒令我们的队伍归顺接管。我们仅有的四挺花机关枪，也打不响，只是摆着看的；各人所带的手榴弹没有试掷过，也不知是否管用。二百余人等于都是徒手，无法与之抵抗。继续流亡么，北走草地或西去河套，转眼入冬期近，缺衣缺粮，那只有冻死饿死之一途。张副校长和我商量，势逼处此，为了爱护青年学生，免遭无意义的牺牲，只有我俩不告而走，先引离队，好让他们去接受接管。天未见晓，正是塞外秋高气爽之时，我俩各自骑上马，归心似箭，快步加鞭地奔驰，整日途中没有停憩，行程百余里，傍晚时分，安然逃到张家口，住下旅店，立即改的装束，正是“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衣”。有如一场惊梦醒来，深感“何处是归程”，茫然不知所措了。第二日一早搭上火车回到北平，正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布满爪牙，到处捕杀可疑之人，风声鹤泪，草木皆兵，看来呆不下去了。决定南归，路过泰安，下车上山晋谒冯先生，汇报别后情况。他默默地听着，既不垂问什么，也不见有何指示。似有“无可奈何春去也”之感。寒暄之余，再也不留我们食客了。下得山来，暗然伤神，有如失群孤雁。……

（摘自《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

塘沽协定

背景介绍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密谈彻夜，达成协议，写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并迅速得到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承认。25日何应钦的代表、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一行去密云向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郎正式提议停战，并在备忘录《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志》上签字。30日，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白河口的塘沽，开始停战谈判。31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并立即生效。协定规定：（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塘沽协定》是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了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使我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为以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方便。

材料：

- 黄郛与《塘沽协定》
- 塘沽协定

材料一　黄郛与《塘沽协定》

一九三三年黄郛到华北以前，日本东京方面曾派人到上海向黄郛说：“倘蒋介石找您办理华北对日交涉事项，日本因为您的关系，愿意让步，先处理长城以里的战区，可以停战，并可将日军占据的地方交与华方。至于满洲国的溥仪，我们既能请他来，也可以请他走。”黄郛得此底蕴，故敢毅然接受蒋介石命令，到北方来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处理华北对日的交涉。

黄郛所带来的人，都是当时所谓日本通，如殷同、袁良、李择一、刘石荪、殷汝耕等，与日本都有历史关系。殷同是日本军需学校出身，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陆军部科长。袁良在日俄战争时曾在日本鸭绿江军川村大将部下，充任陆军少尉翻译，改姓清水。李择一经手买过日本军舰，与日本海军方面颇为熟悉。黄郛未到华北前与日本海军来往，都是通过李择一的关系。刘石荪是日本洋行买办。殷汝耕幼年就在日本读书，归国后与日本关系甚密，故郭松龄反奉时，请他办日本外交。

黄郛启程到华北时，即派殷同去大连，与伪军头子李际春接头，又去长春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洽，就停战预备工作，交换意见。

这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接到驻北平日本大使馆原田参赞电话说：“中山代办拟今日拜访何应钦军政部长谈要事，请联系，确定会见时间。”我先找何应钦由南京带来的陈楚雄科长，不料陈拒绝传达。又找何的随从王副官，才约定当日午后三时会见。中山代办见何时，我也在场。中山首先发言说：“我早就接到我政府训令，如华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前此贵国有几位来我方谈和的，都是以个人身份，并非代表中国任何方面的。现在事态紧急，日

军东至通州，北到密云。若是我们谈和，请问阁下：我应找贵国哪一位去谈？"何应钦说："请你就找黄郛委员长去谈，我请他随即与你联系。"中山走后，何立刻与黄郛打电话，说明中山代办来访之意，请黄抓紧时间办理。黄即命李择一联系，约定当晚在丁香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官舍与中山代办会晤，在场的人还有日本大使馆海陆军辅佐官，直谈到深夜方散。商谈的结果，就产生了五月三十日关东军代表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中国军代表熊斌在塘沽仓库楼上的会谈，次日便谈判具体停战的条件——所谓塘沽协定。

因为二十二日夜间黄郛与中山谈的很好，把原定将中国军队退出北平撤赴保定的紧张情况，无形打消。可是二十三日何应钦忽接北平日本在使馆卫队长粟饭原亲自送来天津日本驻屯军五月十九日发出的抗议书一件，其内容大意为："蒋介石派军官赵京时，把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卫队门岗刺伤，有意威胁，使我军忍无可忍，将取断然行动"云云。昨夜黄郛与中山谈的已有结果，今日忽发生这样的枝节，使何应钦莫名其妙，把我找去，将抗议书交我，并问此事应如何处理。我详细阅后说："此抗议书若在黄委员长与中山会谈以后发出，无异最后通牒。查其发出日期为十九日，乃在会谈以前，无甚关系。按一般外交惯例：此项抗议应通过天津总领事馆交给河北省交涉员或省公署，今既送到部长这里来，也不能不理它，但不必由部长直接办理，可交给平津军事当局去办，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最相宜；一则他是地方武职官，二则他与粟饭原在日本陆大同学又是同班，可以向粟饭原说私话。"何应钦说："昨夜彼此谈的很好，今日又有此举，意义何在？并且由日方得来传闻，粟饭原屡想与老同学王树常见面。"时黄郛也在场，他连说："陶参事说的对，这事就交给王司令办吧。"王树常也来中南海见何，何就把我的建议告知他，并说："这事就请你来办吧。"王树常叫我立刻给粟饭原打电话联络，粟饭原复电话，约王二十四日早九点到日本大使馆他的官舍晤谈，但请王不可走兵营大门。次晨王树常带我往访粟饭原，解释说："赵京时实非蒋的军官，乃个人行动，把贵军门岗守卫刺伤，不胜遗憾。"而粟饭原仍本驻屯军抗议书妄说赵某是蒋指使出来的，语时辞色严厉。王与我见情形不对，不能再继续谈下去，只好告辞。粟饭原请我与王树常等稍坐，令人重献茶点，顿改前态。粟饭原接着说："今把两国置于最恶劣的场合之下是很不幸的事。若能将原因消灭，这类小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的。"粟饭原所说的意思是倘能停战言和，这件交涉案件，是不成问题的。这件抗议书的交涉，就如此结束了。

黄郛因赵京时是一个爱国青年，叫殷同找日本大使馆柴山武官要求引渡，柴山回答遇有机会即行引渡。过了几天，日本皇后产生太子，柴山给殷同来电话说：请他去引渡赵京时。赵京时见到殷同时说道："我见日本在我国横行，气愤已极，遂到打磨厂王麻子刀铺买了一把尖刀。当时又看见日本飞机在空中乱飞，一时感情冲动，雇了一辆汽车，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向门岗日兵拼命刺去，当即被擒"云云。

黄郛与中山谈和停战，在原则已达成协议，应通知双方军队停止活动，免把事态扩大。中国军队由中国方面通知，在通州的日军由日本大使馆通知。但在密云的日军须经周转，方能通知。黄郛为了赶快停止战争，于二十四日派李择一随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通过中国军队防区，到达密云，与铃木美通旅团长见面，传达中日双方已经商妥停战之事，请他的军队暂停活动待命。

塘沽协定签字后黄郛即令河北省政府在天津组织了一个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我与民政厅长魏鉴和殷同、殷汝耕、刘石荪等为委员。殷同在去长春与冈村宁次接洽时，曾往大连与李际春晤谈，李要求在河北省归他委派十个县长二十个县公安局长。殷同回答说："假若当初您成功，您便是河北省主席，全省县长和公安局长都归您委派。按现在的事实就不然了，连何部长和黄委员长关于河北人事问题，完全河北省当局主持，决不保荐一人。"因为李际春有过这样的要求，并且李是日本关东军别动队的头子，殷同为敷衍李和整理这些杂乱队伍就在战区成立了一个杂军编遣委员会，以李际春为委员长。所谓杂军即帮助关东军侵略中国的别动队，号称一万人，实际上仅有四千余人，其余五千余人的编遣费都归李际春包干为办。李原想当战区保安司令，却在此时被冈村宁次把他召回伪满，仅给了他一个银行董事，使他下台。这些别动队经过此次的编遣，缩为四千人，称为保安队，分成两个总队，每队二千人，队长为刘佐周和赵雷。赵雷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生，原为东北军缪锵流独立第十六旅的营长，因长城抗战失职降为上尉，赵便把队伍拉出关外当了胡匪；后经李际春拉拢，作了李的基本队伍。刘佐周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也在东北军当过中下级军官，并且当过东北义勇军，后来投降日本。

这个所谓战区接收委员会自成立后从未开过一次会，对于接收事项，从未讨论研究，只有殷同和我一面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菊地办理一切接收的交涉，一面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洽派队伍和派县长的问题。根据塘沽协定不得将正规军派入战区，惟有把东北军两个步兵团连夜换上警察服装，称作保安队。一个团准备开入昌黎，把赵雷和刘佐周与关外的日本军隔开；另外一团预备开赴蓟密一带驻扎。六月间殷同率该保安队两个团和县长十一名赴榆关以西接收各地方。我率县长十名、卫队二十名先与驻密云日军铃木旅团长商洽妥协，定七月一日接收各县。都山县和兴隆县皆未接收过来，因该两县都在长城以外；临榆县这次只接到海阳镇，山海关仍在日军之手。

因战区新收回的各县还同日本有关系，与河北省其余各县情形不同，黄郛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妥，设立两个专区，一个是滦榆区，一个是蓟密区，各设专员一人。原拟的人选：蓟密专员派我，滦榆区专员派殷同，殷还想兼两个专区的保安司令；黄郛不允，拟派袁良为两专区的保安司令，黄郛自兼北平市市长。李择一向黄郛建议说："北平市长不能比上海市长，不如给袁良吧。"因此，把原定人事计划推翻，蓟密专员派了殷汝耕，滦榆专员派了我；因为我与驻山海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仪我有旧关系，彼此可以说私话，并且赵雷和刘佐周与东北有关系，我也是东北系的人，作滦榆区专员比较适当。后来派殷同为北宁铁路局长。这年十二月间，经我与仪我几经交涉，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才把临榆县所属的山海关接收过来。但是山海关突出的瓮城圈，日本方面始终不肯交出。它说："这瓮城圈是在长城以外。"

一九三四年春，黄郛为整理战区内未了的事项（如都山县和兴隆县尚未接收），特别设立了一个战区善后委员会。黄很盼望冈村宁次来北平作一次进一步的恳谈。冈村倒是来了，先到外交大楼拜会黄郛；黄也到扶桑馆回拜了冈村。可是没达到黄郛的愿望，中日双方只在日本大使馆武官室举行了三天的会议，而黄郛和冈村均未出席。中国方面以殷同为首，我和殷汝耕参加，日本方面以喜多大佐为首，根本博中佐、柴山兼四郎中佐参加。双方每日会议情形分别汇报各方长官，中国方面汇报给黄郛和何应钦，日本方面汇报给冈村。第一日开会关于双方谈判记录，有"先把日军撤至长城以外"的字句，日本要求把"先"字去掉，为此"先"字双方辩论了有两小时之久，结果还是把"先"字去掉。黄郛指示殷同等无论谈什么，以不承认满洲国为原则。中国方面提出通车、通邮两项问题；日本方面提出通商、通航空两项问题。通车、通邮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中国决不承认满洲国，不能与伪满洲国的机关打交道，由中国北宁铁路局和满铁在山海关共同成立一个转帐转运中间机构，名东方旅行社，一切通车的事宜由该旅行社承办。中国方面说，通邮问题，邮票上的满洲国字样，是惟一的问题，如果入关的信件贴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有引起全中国邮政罢工的可能。对方听到如此的议论，答应把通关内的邮件，将邮票上的满洲国字样去掉，倘有去关内信件，贴上有满洲国字样邮票，由发信局扣留。故伪满邮票有两种：一种是"满洲国邮政"字样，通行于伪满和日本；一种是"邮政"两字通行于关内。日本提出通商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满洲民间所需要的商品，商人可以自由到关内来买，运输机关应与普通货运同等待遇，不得留难。"日本提出的通航空的问题被中国拒绝了。后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还说："中国太小心了，怕我们空中照像，但中国重要地形图，我们早就有了。"

黄郛聘根本博充他私人的顾问，根本每日与黄郛见面，彼此处的很好。黄常对根本说："黄埔这些小弟弟们迟早与你们少壮派要冲突的。此时我还能与蒋介石讲话，到了紧要的关头，告知蒋介石设法能制止得住。"（黄郛死后，这话根本也曾向人说过。）黄郛到华北两年，感觉到日本的欲望无止境，遇事棘手；南京各方面对他不谅解，华北地方当局也不与他合作。因此他无法再干去，就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托病到莫干山休养，把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事交与总参议王克敏代理，从此就一去未回。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塘沽协定

（1933年5月31日）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

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况。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

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

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印。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

华北中国军代表　熊斌

棉麦大借款

背景介绍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宋子文一行八人，由上海赴美，以求得美国借款，并遍游欧洲，吁请西方各国援助中国建设。

四月下旬宋子文一行到达美国，立即同曾任弱平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相晤。宋子文向司徒雷登详述了请求美国援助以对抗日本之意。司徒雷登向宋子文表示，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本部，认为这不仅违反国际条约，而且也破坏了国际公法程序。他还对宋子文说，如果美国以强大的政治及经济力量作中国后盾，日美亦无发生战争之可能。这就为罗斯福与宋子文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五月六日，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赫尔等人的欢迎。八日，宋子文应罗斯福之邀到白宫共进午餐，然后举行了中美会谈。南京方面除宋子文一行外，驻美国大使施肇基参加会谈。美国方面除罗斯福总统外，国务卿赫尔、国务部远东司司长洪贝克、上议院议员毕德门、国务次长菲利浦及其他委员十余人参加会谈。会谈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经济与稳定中国政治。罗斯福认为，中国政治的安定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以提高银价为诱饵，推进美国向中国倾销商品。双方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措施。白宫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公告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谈判结束，宋子文从美国向南京报告他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五千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五千万美金，合中国币二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的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五项统税收入为担保。借款的使用办法，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货物起运时要尽量租用美国船运输。偿还办法，约定货物从货栈起运时算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价的百分之十。以后，于九十天内再支付百分之十五，余额在三年内分期偿还。如果延期偿还，给息五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子文美棉麦大借款。

材料：

- "美援"还是"援美"

材料　"美援"还是"援美"

美国热心向中国借款，是它的全球竞争计划的组成部分。自从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三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一、军备竞赛。二、关税战争。三、货币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全球竞争中，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占重要地位，而且新上台的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工业资本家的政治代表，而不象前总统胡佛，是美国金融财团的代表。所以，罗斯福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推销商品，热衷于货币战。在他身边的经济顾问，几乎都是主张放弃金本位，实行银本位的坚定派人物，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便是坚定的白银派人物，也是美棉麦借款的怂恿者。宋、罗谈判后，关于银价的具体问题便是毕德门及其他白银派议员与宋子文会谈的。

罗斯福上台后，为摆脱经济危机，便发起了货币战，而中国则成了美国倾销商品的重要市场，因此他大力拉中国加入美国的白银集团。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书勒决议案，训令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美国代表，设法订结复用白银为货币的国际协定。五月十六日，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发出共同申请书，要求缩减军备，绝对废止用于侵略的武器，制止武装军队偷越国境，冀以挽救军缩会议的失败，促成世界经济会议的成功。南京政府于五月十七日下午五时接到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裴克送来的罗斯福申请书。十八日，南京政府立即开会讨论，决定无条件接受美国的申请书。五月十九日，宋、罗发表了联合宣言，称："关于解决今日世界主要问题所必须采取之种种实用办法，彼此意见一致，颇堪引为欣慰"。六月三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采用银本位案。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指在中日纠纷中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宋子文的美棉麦借款，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愕然，立刻舆论大哗。因为众人皆不知晓宋子文赴美负有此项借款使命，且此次借款方式奇特。既为借款，借方又不能自由支配，只能按贷方的规定以美棉、美麦支付。这样一来，名曰贷款，实际是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垫款，是美国以借款的名义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这必然要引起全国各界的不同议论。南京政府行政院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地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胡汉民六月七日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重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能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者。立法院有监督外交、财政之权，不审兄等此云何。（二）宁国府发行国内公债已十二万万，政府成立二十二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须秘密借款至二万万之巨？（三）谷贱伤

农，为去年长江上下游最惨绝之景象。今此巨量棉麦之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国民党中很多人发表谈话，写文章，论述此项借款既属非法，又有害于国家，应当否定。

宋子文于七月八日到达日内瓦，又去巴黎，达成了美棉麦借款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对南京政府可算是立下了一大功。但是，“美援”实际是“援美”因为按借款合同，美国九十万包棉花、一千二百万斛小麦等剩余农产品，将转化成白银流入美国的金库。欧洲各国通过技术合作委员会的成立也捞到一些好处。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表示它要与西方各国在中国展开一场争夺战。当时世界各国共分成五大金融财团，即：英镑集团资本；美元集团资本；欧洲金本位集团资本；德、意、奥、匈四国的法西斯金融集团资本与日元集团资本。宋子文的行动，以加入美元集团为开端，将世界五个金融集团的势力都引到了中国，使中国出现为帝国主义列强新的投资战与倾销商品的竞争，中国的政局更加复杂。

在全国反对声中，南京政府急忙采取三项措施以安人心：首先，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孙科说明：“此举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要求我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提出一些罗斯福会谈的方针。决定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第二项，急忙补行法律手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借款，提交立法院审议。六月十四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十五日，两委员会组成九人小组，审理守峻。十六日，立法院召开第二十二次大会，讨论通过，借款案合法化。第三项，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既不用于战争，也不能滥行拨用。立法院在通过借款协定案时特规定：“借款收入全部之用途，不得移充任何对内用兵或其他消费之用，必须限于下列生产事业，即(1)创办及发展基本工业。(2)复兴农村经济。(3)兴办水利。(4)发展重要交通事业。”国民党的事情，往往有法而不循法，违法而又“合法”。宋子文的美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中央如此一番安排，便完全合法了。

（摘自《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张同新）

福建事变

背景介绍

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战前线撤退后，即被调往福建去和红军作战，屡遭失败。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的消息传到福建，更激起了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他们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反蒋。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以互助合作为原则，恢复商品贸易；福建方面，释放政治犯，赞同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的活动，允许出版、言化、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酝酿，于11月20日在福州隆重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全国二十五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八十余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了大会。当日，代表大会发布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大会的宗旨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特宣言：“(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在经济方面，大会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大会议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福州；国旗图象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红色五星。代表大会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人民革命政府以“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为其重要合作。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于11月27日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条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及不得驻军的“中立区”，并对双方之间的通商、交通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此后，福建人民政府给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紧张物资，实际上解除了南京当局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新政府还下达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命令，镇压了蓝衣社特务的活动，颁布了《大赦令》，使包括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的一百五十余名政治犯获释。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在福建人民政府建立伊始，蒋介石便在《告十九路军将士书》中指责其“联共勾日”，“毁党叛国”，煽动十九路军官兵“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挠于乱命”；命令各有关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不日敉平”，并“严密防范，消

弭祸端。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的党籍；中政会决定褫革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各职。其后，行政院又决定褫夺蒋光鼐本兼各职。南京当局还调集蒋鼎文的第二路军、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共十五万人，开拔入闽，对仅有五万军队的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实施“讨伐”。第十九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经反复争夺，南京国民政府军队于1934年1月上半月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古田，16日进驻福州。21日，第十九路军重要将[illegible]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通电，“脱离人民政[illegible]中央”。不久，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闽。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遂告失败。

材料：

- 蒋介石平定福建之战
- 张治中忆挥师入闽

材料一　蒋介石平定福建之战

事变爆发前，蒋光鼐、蔡廷锴曾召集十九路军高级将领讨论成立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军问题，戴戟、邓世增、黄强等均持有异议，而毛维寿、张炎等则因已早与蒋介石挂好钩，皆默不表态。但陈铭枢等在第三党人和神州国光社成员怂恿之下，贸然作出了发动事变的决定。因此，这次事变是在十九路军内部尚未取得一致同意、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爆发的。至于争取其他反蒋派系共同行动方面，人民政府成立的次日，即由陈铭枢、李济深等联名致电粤党当局，要求采取一致行动。22日，胡汉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复陈、李，对于陈、李“揭橥讨贼”虽表示同情，但对于闽方“宣言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工农政府相号召”则认为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表示“不忍苟同”。

南京国民党中央于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即由中常会决定以“背叛民国”的罪名，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嗣又于12月15日由国民政府明令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褫去本兼各职。蒋介石旋即亲自率领大军向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原来蒋介石得到十九路军酝酿事变的情报后，认为十九路军在全国享有相当号召力量，如蒋、蔡一旦发动事变，两广的李、白、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北方的阎、冯都将起而响应，因此颇为焦虑，及至看到福建人民政府宣言内容以及所作的退出国民党、改换国号和国旗的决定，并且了解到各方面对十九路军怀疑丛生，无响应表示，而工农红军也未配合福建方面积极在浙赣闽边开展攻势，始觉形势有利，遂抽调十五个师的嫡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法扑灭这次事变。

当时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委蒋鼎文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设司令部于浙江衢州，调动军队部署作战事宜。首先派工兵监督民伕限两个月内修通从江山通往建瓯的公路，接着从后方和江西抽调大军部署于浙赣闽边各个军事据点。其具体作战方案是：卫立煌为右翼总指挥，指挥汤恩伯等五个师沿金溪、资溪进入闽西邵武、顺昌一带集结，俟与张治中的中路军取得联系后，即以主力强袭延平；另将两个师隐蔽在顺昌、沙县地区，配合蒋鼎文左翼军在沿海登陆成功后，截断十九路军的退路。张治中为中央军总指挥，指挥王敬玖等两个教导师附属两个卜福斯炮兵团，经衢州进入闽北浦城、建瓯一带，在刘和鼎师内应配合之下，击破十九路军的抵抗，夺取延平，围攻古田，向福州挺进。蒋鼎文兼任左翼总指挥，除派李玉堂师在海军掩护下在厦门登陆外，自率李延年等两个师越仙霞岭进攻水口，威胁福州之背。另外还收买福建的杂牌军刘和鼎、卢兴邦、陈齐煊等师作内应，并派杜起云深入闽中、闽南收买当地的土匪部队叶定国、高义等扰乱十九路军的后方。

福建人民政府负责军事责任的蔡廷锴和参谋团主任黄琪翔等人，既存有仰仗红军牵制敌人的思想，而对蒋介石能以如此大的兵力压向福建的形势又估计不足。他们错误地以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红军所牵制，抽不出足够的兵力进攻福建，而且福建背靠江西中央苏区，又面临大海，蒋军也无法进攻。因此，蒋、蔡一直把十九路军的几个主力师配备在闽南沿海一带，福州门户延平、古田只有谭启秀以新兵编成的赵一肩、司徒非两个师。及至接到蒋介石集结在军于浙赣闽边，即将对十九路军发动进攻的情报后，对于如何粉碎蒋军的进攻，蒋、蔡和参谋团又发生意见分歧。蔡主张将部队主力部署在延平、沙县、永安一线，背靠闽赣苏区，以闽北山区为依托，在闽北与蒋军决战；蒋光鼐认为蒋军兵力雄厚，不宜决战，应放弃福州，撤向闽南，向广东靠拢，以保存实力；以黄琪翔为首的参谋团则认为福州系人民政府的首都，不能放弃，主张在福州外围决战。多数将领支持黄琪翔的意见，遂将驻沿海的部队向福州集结。由于事先既估计不足，又因几次变更作战方针，坐失战机，因而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形势。

12月28日，由于驻寿宁的闽军陈齐煊在蒋鼎文争取之下，接受了蒋军新十师番号，蒋鼎文指挥的几个师不战就通过泰顺迄仙霞关防线进入闽北，指向古田。同日，厦门市长黄强投降，接应李玉堂师登陆。素以动作敏捷、指挥若定、有蒋介石的鲍超之称的卫立煌，指挥所部三个师通过三百里的苏区未遇到任何阻拦，于1934年1月4日到达延平地区，与刘和鼎会师。翌日清晨，卫开始向守延平的司徒非部攻击。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卫部宋希濂师攻下延平外围要塞第四、第五等峰，十九路军防线顿告

瓦解，司徒非向刘和鼎投降。同日，张治中指挥的王敬玖等师围攻古田；蒋鼎文指挥的李延年等师围攻水口，于7日突破十九路军水口防线，谭启秀乘装甲轮逃走。8日，蔡廷锴亲率刘占雄、阮宝洪、云应霖三个主力师向大湖、白沙疾进，企图夺回水口，解古田之围。不料，12日守古田的赵一肩即向蒋鼎文投降。

1月10日，人民政府在福州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放弃福州。政府要员纷纷乘飞机、轮船、汽车向广东和香港逃走。由于古田失守，蔡廷锴遂率援军中途折回，处理撤退的善后事宜后，于13日率部撤离福州，决定将剩余的四个军集结在泉州。这时，卫立煌指挥所部在卢兴邦引导下于尤溪口渡过闽江，前锋直插仙游、郊尾，与区寿年军遭遇，双方打了一夜。次日蔡到达郊尾，令区掩护全军通过后，即迅速摆脱敌人南撤。蔡乘汽车南行至涂岭即遭敌人阻击，汽车开足马力始冲过。张炎、沈光汉各一个师，区寿年两个师，丘兆琛先遣队两个团，均被敌人截住。区寿年率所部经过激烈战斗，击退阻击的敌军，使全军得以安全通过涂岭隘口。

蔡廷锴到达泉州后，即命令先撤退到泉州的毛维寿率部把守洛阳桥等地，毛借故推托，不听指挥。蔡知毛已投蒋，遂去龙岩。沈光汉、区寿年到泉州时知蔡已去龙岩，即率部随后追赶。毛诡称蒋军已追抵洛阳桥，将沈、区两军诓回泉州。及至沈、区率军回到泉州，毛又诡称包围之势已成，不能再战，并说蒋介石已委他为第七路军总指挥，所有十九路军归他改编。沈、区无奈，只好交出军队，自行离开泉州。

（摘自《民国军事史稿》中华书局）

材料二　张治中忆挥师入闽

一九三三年冬，在“一二八”战役之后，调往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忽然宣布独立，组织“人民政府”。这真是一件意外的事。蒋那时驻在江西抚州，指挥反共战事。闽变一起，蒋电约我到抚州，说前方将领不够支配，要我担任第四路总指挥，统率由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扩充的两个军及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入闽从浦城、建瓯一路进军“讨逆”。

我在本章第二节里曾提到“古田释兵”这一句话，就是我在“征闽”一役里，小试我自己的理想，用和平的努力，化干戈为玉帛，免得生灵涂炭。这一个经过，我应该把它朴实地记下来。

我的军队到了古田附近。那时“逆”军守古田的一个师长，是“一二八”时候当蔡廷锴的参谋处长的赵一肩，我是熟识的。这个城池的防御工事筑得非常坚固，以我当时的兵力，攻占虽不是什么难事，但损失必大。我就想试用和平的努力把古田拿过来。一个深夜，我亲自起草了一封信，与幕僚两人妥慎商酌，一直到天亮，才把这封信写好。这封信是劝赵一肩投诚。这封信稿已遗失了，不过信中的大意，不外以大义相责，以利害相劝，望他悬崖勒马，及早归顺中央。这封信居然把他感动了，他派他的副师长陈任之出来接头。我们就开诚布公地开始谈判，来往商洽。

商洽的进程，现在想起来，可以看出我在当时的一点点魄力。那时候，蒋鼎文是第三路总指挥，在我路的右翼，迭次责问我：为什么屯兵城下，还不进攻？同时，我的军长王敬久也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说蒋总指挥催促攻城。后来蒋鼎文竟直接要王敬久进攻，王敬久又来请示，问我为什么不发攻城命令，表示焦灼为难的样子。当时，只要我稍微迟疑一下，就炮火连天了。我这样想：赵一肩一共有三团人，有几十挺机关枪，而且工事筑得非常坚固，实在不容易进攻，攻必死伤重大。我就对王军长说：“我是总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上面由我负责，不关你们的事。上面要砍头，砍我的头；但你们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开枪，我就要砍你们的头！”这样，前线才安定下来了，否则一枪放出，即无法挽回。这是我对于部下的制止。对于上面如何答复呢？我在蒋鼎文传达命令限即攻克古田的时候，电蒋表示绝对负责的态度：“乞钧座勿问职所用者为和平方法抑军事进攻，总之，在明日正午十二进以前必将古田解决，如违愿依军法伏罪！”这一个电报上去后，我的部下，尤其是幕僚人员，大为愕然，替我深深地捏一把汗。但我就在这个时候，把握现实，加紧与赵一肩接洽。同时，在赵一肩方面，因为听到了上面的消息，知道并相信：我之驻兵城下，按兵不动，确属诚意讲和。我又派参谋长祝绍周亲自到对方去磋商。祝和赵一肩是熟人，而且我所派的是一个重要的参谋长，赵乃无话可说，表示完全接受了。

就在献城这一天早晨，赵一肩亲自到我们总指挥部来，我当然对他很客气。我要他即刻把军队撤出城外，指定地点驻扎，等候中央命令。他一切应允了。我们的军队，于是从从容容地进了古田城，不折一兵，不耗一弹，达到了我当初的和平理想。

赵一肩把他的军队带出城外驻扎，静候收编，我事前已有电报告，以为不成问题，不料接到蒋的回电，一定要把赵一肩的部队缴械。原来蒋有他的看法：征闽的战事尚在进行，如果把这一师人收编了而放在旁边，还需用两师人来看守，这个仗如何打法？我接了这个命令，心里虽是难过，但我想蒋的看法也是对的。没有办法，只好明白地对赵一肩讲：“现在总司令来电，有这样一个意见，请你把枪缴了，兵仍然改编，官长另外安置，决定从优待遇。你的兵愿编，自然可以收编，不愿意编，就给资遣散。”赵一肩接受了。他这一师的枪全是好枪，整个一师人缴枪，在多少次战役中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觉得赵一肩这人坦白而识大体，特为向蒋保举他，随后他到了南京，蒋送了

他一笔钱，出洋考察。一九四三年底，我曾小住重庆中央训练团五周，这是党政班第二十八期，赵一肩也在这期受训。一天，我约他吃便饭，谈起十年前古田释兵的那一幕，大家都不禁为之一笑。

我更想起一件有趣的事。赵一肩的部下有一个团长，是军校第五期的学生（名忘记），当我们围困古田的时候，城里忽然送出一封信来，好象古时两军阵前所下的"战书"，就是这个团长写的。大意是这样：如果不解城外之围，即将与夫子周旋到底！我觉得一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终是可教的，而且还是我的学生，就回了他一封信，剀切地劝他，用师生的感情打动他，使他由忏悔而觉悟。后来知道赵部的输诚，这个学生有促成的力量。以后过了几年，他在一个地方做事，还和我通过一次信。

在赵军撤出城的时候，我巡视古田城一次，看见他们的机关枪及沙包、铁丝网等坚强的防御工事。我如果用两师人来打，一定大流血，三两天也拿不下，拿下来也要受惨重的牺牲。不但我军牺牲，敌方也必牺牲。不但军队牺牲，人民也必牺牲。如果有避免军民牺牲的办法，我何乐而不为？在和平解决的那天晚上，我心中似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

把古田这一关和平地打破后，一路就没有战事，长驱直入福州。我们五路在军，本是分路合围的。我到福州后，再由福州进军闽南。我军进到中途，其他友军已把十九路军残部完全解决了，闽变遂告结束。我即电蒋表示辞职，仍然愿回到军校原任，不久到了南昌，见蒋复命。这一次战役经过很快，前后刚刚两个月吧。

（摘自《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历史内幕

红都的"太上皇"李德

红都瑞金郊区的沙洲坝，有一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稻田中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称之为"独立房子"，主人就是红都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的军事顾问，中文名字叫李德，意即"姓李的德国人"，在华发表文章署名华夫，意即"中国男人"。李德在"独立房子"里指挥了长达近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红都的"太上皇"李德，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1932 年春，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李德被派遣来华，其原因大体有 3 个：李德有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懂俄语、德语、英语，便于在外国工作；李德是德国人，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对可疑的人动辄屠杀，日本与德国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

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的前两个译音作为他来华时的化名，他身穿西装，坐上一列由莫斯科发出的特别快车，穿过广袤而荒凉的西伯利亚，到达中苏边境上的满洲里后，继续乘车抵哈尔滨。日军侵占东北后，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密探和白俄分子遍布各地，加上东北生活艰苦，李德无法立足，只得于该年秋天离开哈尔滨南下大连，改乘轮船来到上海。

起初，李德住进一家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礼查饭店。由于李德既不经商，又没有其他足以证明身份的职业，而上海又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不引起怀疑，几星期后，李德又迁到公共租界一幢美国人的公寓。

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以前与李德一起在德共党内工作过的德国人阿瑟·尤尔特取得了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与其他苏区也有信使往来，消息比较灵通。尤尔特和李德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洛甫见面一次，他俩定期前往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看见窗台上放了一盏台灯或房间的窗帘打开半叶表示安全的信号后，才放心地推门进去。博古和洛甫都在苏联学习过，以前在莫斯科就与李德相识，懂俄语，洛甫曾留学美国，也会说英语，因此，不需要翻译，他们也能很随便地交谈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尤尔特还介绍李德与当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时报》驻华特派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正在上海为她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素材。博古和洛甫安排史沫特莱与从中央苏区来的人秘密见面，使她了解红军斗争的情况。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也有联系，宋庆龄向她提供了许多有关 19 路军及两广军阀等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李德看了史沫特莱撰写的报导，从中又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

李德来华时间不长，对中国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自然，他获得的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甚至于自相矛盾的

情报。李德将搜集的有关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工农红军的军事情报，写成报告，拍摄在微型胶卷上，并附上草图，几次通过信使送往莫斯科。

1933年初，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请求尤尔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

经尤尔特批准，李德一路辗转，于该年秋天，来到了红都。

李德是红都的第一位外宾，又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然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被安排在瑞金郊区的沙洲坝居住。早在临时中央刚迁入苏区时，博古为迎接李德的到来，就下令在沙洲坝大兴土木，在一片开阔平坦的稻田中间，修建了一栋约100平方米客家人称之为"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所房子离军委总司令部约2华里，前门正对着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仅200—300米，离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有田间小路可通，与党政军机关的联系都方便。由于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

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称之为"中共中央小伙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后，自己对军事指挥又一窍不通，正感到束手无策，李德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到来，对他来说，犹如下了一场及时雨。李德刚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独立房子"与李德秉烛长谈，粗略地介绍了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目前严峻的军事形势，并商定由李德主持军事工作。

李德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也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的"新战术"。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即敌人修建白色堡垒，红军就修建红色堡垒与之对抗，待敌人离开白色堡垒推进200—300米时，红军则实行短促突击。消灭敌人。李德先后以华夫作为笔名在中央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等8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李德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4所军事大学宣传他的短促突击战术。李德还在红1军团的师、团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个通宵的短促突击课，并召开了部分指战员座谈会，进一步推销这种错误的战略战术。

李德就在"独立房子"里，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绕着地图，指挥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争，李德因此又得了一个"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每当接到前线的电报，不论白天黑夜，立即送到"独立房子"，先由参谋在堂屋挂 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电文所指的地点，并根据内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方向，附在电文后面，译成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李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着墙上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苦思冥想，不时地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然后，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根本没有实测过，大都是问测，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李德又不留任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时间，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战机。因此，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不断地打败仗，丧师失地。可李德却不认为这是他瞎指挥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其短促突击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李德成了红都颐指气使的"太上皇"。

（作者：谢一彪，选自《名人传记》95年7期）

兵败广昌

广昌地处闽赣交界的赣东南方向，是中央根据地北部的门户，是两军的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 企图占领广昌，首先在其北路实施战略突破，打开一个进攻根据地腹地的口子。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李德命令红1、3、5军团开赴广昌，部署是：1军团集结在城东北；3军团集结在城西侧翼；5军团的14师坚守正面。李德这种"死守广昌"的意图，正中蒋介石意在广昌与红军决战的下怀。蒋介石立即部署行动，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由北向南，以其第11师、第14师为先锋，并派从德国请来的军事顾问西克特去陈诚的前敌总指挥部，协同指挥"空、地、炮"联合作战。

4月10日，决战开始了。双方打的均为书本上的"正规战"。敌方是西克特按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指挥作战，我方是李德按苏联军队的战斗条令指挥作战。敌人首先以飞机、山炮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红军的工事不坚固，因此未与敌人直接接触就有很大伤亡。敌人炮火延伸后，地面步兵开始向红军阵地实施集团式冲锋。红军在将近10华里的防御正面上全线防御，不断实施全线的"短促突击"。"短促突击"是一种阵地战中向敌人实施的短距

离反击，即红军战士在自己的防御阵地后面不远的地方隐蔽，待敌人离开其（阵地）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时，红军立即出动，向敌人发起短距离的反冲击。这是一种机械式的防御战法，李德和“左”倾领导人不顾客观条件，死搬硬套地大力推行这种脱离红军实际的战术，把它当成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并寄托于以此战术来粉碎敌人整个进攻战略。红军在这种错误的战术指导下，虽然不畏牺牲，英勇奋战，但终因敌人的火力太猛，地面兵力太多，而不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经过一两天的战斗，红军的伤亡非常惨重，有的战斗连队只剩下一二十人，许多部队都把司、政、后的机关人员派到了前沿阵地上。红军的弹药消耗也很大，储备量急速下降，阵地上的火力明显减弱了。

从甘竹到广昌约 40 里的地段上，红军节节抵御。与敌人在甘竹激战 5 天，与敌人在罗家堡、大罗山、杨家岭、马坊塞、长生桥等地激战 10 天，红军多次的阵前突击均未奏效。面对严酷的现实，李德仍坚持原计划，不实行大踏步的战略退却，“左”倾领导人一再下令“死守广昌”、“寸土必争”。李德把红 13 师部署在广昌城东南一带继续抗敌，令红 1、3 军团在城西设防，红 14 师在广昌城内坚守，准备与敌再次决战。4 月 26 日，敌人以两路纵队向广昌袭来，27 日便完成了夹击广昌的部署。28 日，敌人已在广昌城的第一线集结了十几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激战一天，敌罗卓英部的 3 个师占领了广昌城，红军被迫撤退。

敌人占领广昌后，气焰更加嚣张，蒋介石把整个“围剿”军的部署再次调整，兵分六路，目标直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在近 3 个月的时间内，六路敌人依然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缓慢前进，逐步消耗红军。李德等人仍然不汲取广昌失利的教训，又决定在头陂、贯桥等地带布防，阻击敌人，并三令五申地要求部队修筑坚固工事，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死守阵地。在兵力部署上，李德、博古以红军的“六路分兵”去对付敌人的六路进攻：红 1 军团被调至东线闽西一带，抗击敌东路军对长江的进犯；红 3 军团退至广昌和石城间设防，以阻止敌人向广昌以南进攻；红 5 军团在广昌和宁都间的头陂一带设防，以抗击敌罗卓英 3 个纵队的进攻；红军新成立的第 8 军团在兴国东北古龙冈一带设防，抗击敌约两个纵队的进攻；红 3 军团的第 6 师与部分地方武装，在西线抗击敌向兴国的突袭；红 22 师防守会昌南面的麻州、站塘一带，抗击敌南路军陈济棠的进犯。这样的作战部署是典型的军事平均主义的表现，违背了集中兵力的原则。

敌人与红军在阵地上的反复交战，使国民党了解了红军的作战特点，因此敌军改变了战法。以往敌人的阵地进攻，先用飞机轰炸，然后用大炮轰击，如此反复七八小时后，才用步兵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冲击。现在，敌人在进攻前，先利用夜暗将步兵运动到距我阵地三四百米的地方。敌人火力准备后，步兵便开始冲击，敌人步兵在炮兵逐渐延伸火力时向我阵地发展进攻。在敌人火力下，红军的掩体、交通沟、战壕都被摧毁，敌人进攻的速度明显加快，红军伤亡十分惨重。8 月 27 日，进行了广昌大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这一天，敌人共突破红军三道防线，向前推进了 10 华里。8 月底，红军被迫后撤。整个广昌大会战，我军仅俘敌 130 余人，而自己却伤亡了 5600 余人。

其它方向上的红军也连连失利。东线，红军在丘家堡、驻马店等地，节节抗击敌人，敌人进攻猛烈，红军只好后撤。至 9 日，各路敌军均有较大进展，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路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南路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

节节退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4 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会昌指导工作，他同红 22 师指战员一起分析了战场形势，并分析了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和蒋介石早就矛盾重重，陈济棠是广东军阀，曾先后三次反对蒋介石。这次“围剿”中央根据地陈济棠知道蒋介石任他为南路军总司令是一箭双雕的诡计，所以他采取“明打暗通”的政策，派人与我党谈判。我党及时派人与陈济棠接触，并与之确立了反蒋四项协议。毛泽东根据当时形势，提出了一项有意义的建议，主张红军主力向没有堡垒体系的湖南中部挺进，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株洲、湘潭等地，这样就可以迫敌回师湖南，红军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扭转整个战局，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然而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又一次被“左”倾领导人拒绝了，红军打破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被断送了。

在李德和“左”倾主义领导者的错误领导下，红军在各个方向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向根据地腹地步步紧逼，相继攻克了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等重镇，将红军紧紧围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狭小地带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向西实施战略转移，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由此开始了。

（选自《百战图》作者：王洪武）

红军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

1933 年夏天，蒋介石在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 50 万。蒋介石采取堡垒主义方针和步步为营、四面合围战略，委任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何建为西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9

月中旬，蒋军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进。

陈济棠早年跟随邓铿参加国民革命，后来成为广东的实力派，号称“南天王”，曾有“广东是陈济棠之广东”的民谚。陈济棠曾三次公开反蒋，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很深。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棠虽被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他深知蒋介石是绝不会信任他的。所以，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他既想防御红军进入粤、桂，又不愿为蒋介石所利用，更不愿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夺占他的地盘。

1934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性别，联合在反帝统一战线内，一致抗日。这一倡议赢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6 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号召白军的广大官兵：“不要打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联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7 月，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济棠急于同红军取得联系，首先找到了在广州做生意的罗炳辉的内弟，请他同红军接头。1934 年 9 月，陈济棠又秘密派李君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联络停战谈判和共同反蒋事宜，受到周恩来、朱德的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讨论形势和反蒋的办法。9 月 27 日，陈济棠授意其驻筠门岭的第 3 军第 7 师给红军去电：“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对于同陈济棠进行谈判，秦邦宪、李德等表示怀疑，并不热心。但周恩来很重视，在他亲自主持下，进行认真准备。

9 月底，朱德起草了一封给陈济棠的复信，经周恩来修改后，交来人带给陈，同意在筠门岭与其代表谈判。在信中还向陈济棠提出谈判协商的五条意见。信中还要陈济棠“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最后表明：“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

11 月 1 日 13 时，陈济棠通过其驻筠门岭的第 7 师给红军来电，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问题，并催促我方“速派出军事负责代表去广州面商”。周恩来、朱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派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代表。为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周恩来还抽调钱壮飞、伍云甫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当天，周恩来起草复电，催促对方迅速对朱德去信给予答复，“以便我方依此根据准备协商”。对方收到这一电报后，答复同意在寻乌会谈。周恩来便立即召集潘汉年、何长工到瑞金交待任务。为介绍潘汉年、何长工去谈判，他还代朱德给陈济棠的心腹爱将第 7 师师长黄延桢写了一封短信。

红军代表同陈济棠的谈判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的进行的，双方都只有少数人知道。为保密起见，对方特地给红军谈判代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红军代表一路畅通无阻，走了 40 里山路，到了寻乌县境的一个小山村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小洋楼前停下。小楼四周环境十分幽静，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潘汉年、何长工被安排在楼上，对方的谈判代表住在楼下。

第二天，秘密谈判在小楼上开始，双方代表各抒己见，经过三天三夜的长谈，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互相通商，解除对盐、布的封锁；（四）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并同意予以代购；（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通告，陈部撤离 40 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这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周恩来特地派人在会昌等候谈判代表归来。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十分满意。

10 月 16 日，陈济棠的代表向我方转达了陈的两项决定：（一）暂时拨给红军弹药 10 万余发；（二）盐、布准予放行。要我方设法从筠门岭转运到苏区。同时，要求我方迅速订出反蒋的整个军事计划。当时，中央红军已开始转移，陈济棠的这两项决定由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电告了周恩来。

10 月中旬，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突围的企图之后，多次下令陈济棠阻截红军，说红军突围决不是战术动作，而是战略转移；也不是南侵广东，而是突围西进。要求陈济棠大胆地堵截红军。陈济棠不敢公开对抗蒋介石，就在第一道封锁线上，以其第 3 军李扬敬部驻守会昌一带，派黄延桢坐镇筠门岭，摆出个阻止我军南下广东的姿态。又以其第 1 军余汉谋部驻守赣州、信丰和安远之间。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根据同陈济棠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一面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借道；一面于 10 月 20 日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陈济棠得知中央红军突围时，即令李扬警撤回粤境，余汉谋军从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总撤退，没有堵截红军，让出了一条 40 里的通道。所以，当中央红军 21 日开始突围时，未经激烈战斗就突破了安远、信丰之间的封锁线。25 日，红军全部渡过了信丰河，从南康、大余的边缘地区进入了广东境内。当时，国外传闻红军付给陈济棠 5 万元的买路线，才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其实是由于红军同陈济棠秘密谈判成功，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才得以借道，突

围西进的。

（作者：刘学良，选自《军事历史》91 年 3 期）

“少共国际师”始末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月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

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摘自《少共国际师歌》

“少共国际师”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以后，正纠集它所能调动的兵力，准备向我发动第五次进攻。天空被阴云笼罩，形势十分严重。“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成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战斗口号。根据地里掀起了炽烈的扩军运动，青少年的参军更是热火朝天。父送子、妻送郎，整排、整连、整营地武装上前线。在这轰轰烈烈地参军热潮中，先后就有七个少先队模范团涌入了红军，相继成立了“工人师”、“兴国模范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满足根据地青少年的革命要求，决定成立“少共国际师”。这一决定公布后，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兴国、瑞金、宁都、长汀、建宁……等县的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们，在各地团委负责干部的带领下，高举红旗，手拿梭镖、长枪，成群结队地向宁都集中。不到三个月，就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少共国际师”，其中青年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九月三日，“少共国际师”便在宁都正式成立了。

“少共国际师“成立以后，就开赴石城，开始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开始，我们的武器几乎全部是战士们各自带来的红缨枪和大刀。恰巧红三军团打下福建的沙县，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就用他们缴获的武器，装备了我们。有了新武器，大家的学习情绪就更高了。经过短短的一个月，战士们便基本上掌握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这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于是“上前线去”、“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土地革命利益”已成为战士们一致的呼声。十月初，年青的“少共国际师”便开赴北线，接受了一次艰苦的战斗洗礼。

当时，敌人采取了碉堡政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依靠着坚固的碉堡，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地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要红军与敌人死打硬拼，打消耗战。因此，当北路蒋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向建宁前进时，“少共国际师”便奉命配合五军团十三师在黎川城附近的将军殿扼守隘口。敌人的步兵，每次都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猛扑。这种对峙的攻防消耗战斗，对我们装备很差、粮弹不足的红军来说，尤其对我们新成立的部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虽然我们的战士都是以共产主义精神培育起来的青年，战斗中，表现了无比的英勇顽强，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严重的打击，每天前进不到几公里，但我们花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团村战役。

这天，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从早上七、八点钟，就向我发动了进攻。我五军团十三师负责在德胜关正面抗击敌人，三军团从敌人右翼、“少共国际师”和三师的一部分从敌人左翼猗击敌人。经过多次反复冲杀，最后终于将敌人的三个师全部打垮了，并把他们歼灭了一部分，缴获了许多胜利品。

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恼羞成怒的敌人又派飞机向我军阵地轰炸、扫射。这时候，夕阳已快落山，我和吴高群同志正在师指挥所旁的一棵大树下观察敌情。忽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吴高群同志的头部和腰上负伤七八处。但他还是不肯下去。当我们把他抬到绑扎所时，已经无法救治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战友，我大概不行了，不能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共产主义事业要全靠同志们去完成。希望同志们为我们‘少共国际师’争光，为我报仇！”说完，便和我们永别了。吴高群同志参加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牺牲时只有二十三岁。他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位年青勇敢的指挥员。他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英雄榜样，却永远活在“少共国际师”每个指战员的心里。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全师掀起了更高的歼敌热潮。在七月二十一日的大脑寨战斗中，敌人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向我阵地猛扑。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经过反复冲杀，终于挫败了敌人。在以后的十几次防御战斗中，“少共国际师”也都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树立了良好的战斗作风。

一九三四年初秋，“少共国际师”配属三军团指挥，参加了驿前战役。

八月三十一日，陈诚以最精锐的五个师，在国民党中央炮兵团的配合下，向我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驿前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战斗异常激烈。在这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中，“少共国际师”又一次得到了锻炼。

部队一面作战，一面还要修碉堡、挖工事。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大家都露宿在阵地上、战壕里。生活也极为困难，几个月闻不到肉味，油、盐也很少吃到。没有菜吃，白天就在阵地上挖竹笋，拔野菜，晚上点上火把到水田里捉泥鳅，摸田螺。长期睡在战壕里、碉堡里，很多人生了疥

疮，染上疟疾。没有药品。就用硫磺合了石灰煮沸，给生疥疮的同志擦洗，自己采集草药为患疟疾的同志治疗。战士们由于过度疲劳，营养不足，体力大大下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相反地，上下之间，同志之间更加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互相关照，互相鼓励，团结得好像一个人。根据地的人民对我们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送草鞋，送黄烟，派人到部队来慰问，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最困难的要算是弹药。由于连续战斗的消耗，得不到补充，每人十发子弹早已打光了。谁要是有一两颗手榴弹，简直看得象宝贝一样。为了弥补弹药的不足，战士们想了许多打击敌人的办法：阵地前沿布满了锋利的竹钉，筑起一道道鹿砦，阵地上堆着大量的石头和一截一截圆木。战斗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敌人向我轰击时，我们都隐蔽在工事里，不还击，当他们进入我设有竹钉的地带时，忽然杀声四起，圆木、巨石滚滚而下，直奔敌群。趁着敌人惊慌混乱的一刹那，我们便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把敌人击退。

有时候，敌人缩在乌龟壳里几天不露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想办法把敌人逗引出来，在野外消灭他们；或者派出侦察员到敌人后方去捉俘虏，袭击、扰乱他们。一次，师侦察连长化装成敌人的副官，混到敌人驻地附近，正碰上敌人的一个司务长和两个采买人员在捉老百姓的鸡。我们的侦察连长立刻喝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为什么到我的防区来捉鸡？"三个家伙见"副官"气势汹汹，吓得目瞪口呆。侦察连长把他们训斥了一顿，又命令他们跟着走。快走到我军的警戒线时，他把帽子一脱，自问自答地说："你看看我是什么人？老子是红军！"三个家伙听到"红军"二字，便吓酥了骨头，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像这种神出鬼没机智歼敌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部队虽然无比的英勇顽强，灵活机智，但这并不能挽救错误路线所带来的失败。敌人步步逼进，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为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我们"少共国际师""又在石城一带与敌展开了激战。经过连续苦战，原有一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了五千多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夜晚，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最后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征。那时候，我师改归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任务。

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贵州，冲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这些封锁线上碉堡林立，敌人用钢骨水泥筑起了防御工事，还布下了层层的队伍，构成了绵密的火网。形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圈。我军迅速通过了赣江，占领了城口，接连冲过了第一、第二道(在赣南粤北之间)封锁线。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先头部队攻占了宜章城以后，我们就掩护军委机关纵队以强行军连续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这样就引起了敌人的严重注意。湘桂道上，一片丛山峻岭，蒋介石四处抽调的几个纵队已经赶到，对我们前阻后截，打算趁我们渡江之际，一举消灭我们。即将到来的激战，对我们担任后卫的部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湘西十一月，阴雨连绵，河水骤涨。湘江上游的水面虽然不宽，但水深过顶，不好徒涉，渡口又只有两座新搭的浮桥。为了掩护军委机关纵队和其他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我们开始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湘敌四个团的追击。接连打了几天，等大家过去以后，追击的敌人已经逼近了，而且集结在全州桂林两地的敌人，拚命地沿着湘江西岸向我们出击，企图强占湘江渡口截断我军。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军团交给我师的任务是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渡湘江，通过全州、桂林公路的第四道封锁线。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曾派出了一个团，直扑全州城东南的鲁塘圩，配合已渡江的红五团佯攻牵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拚，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一连几昼夜的激烈战斗，战士们都打红了眼，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进，在浓密的炮火下，用刺刀和手榴弹等待敌人。从早上直打到黄昏，敌人不敢靠近我们。十二月一日下午，全州、桂林两路的敌人，沿湘桂公路向我军渡江地段猛攻，到天色快黑的时候，相距我们的渡口不过三公里了。这时情况十分紧张，我师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当我们率领师的主力从咸水圩渡江以后，忽然发现一个团没有过来，而敌人却快逼近渡口了。这真把我们急坏了，可是当我们翻越了下几十里的大王山，到达油榨坪集结的时候，原来那失掉联络的一个团也已英勇地抢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并在当晚以强行军赶上了师的主力。

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翻过险峻的越城岭，过了通道城以后，便分成二路前进。一路以四十三团为右翼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占湘桂公路上的镇远城，歼敌一个营，担任对湖南方向敌人的警戒；我师的主力为左翼，经过大苗岭向北挺进。

在迎接一九三五年到来的时候，红军先头部队渡过了乌江天险，以战斗的胜利庆祝了新年。元旦那天，我们和一师的部队会合在余庆城。进入黔北之后，我师就经遵义、桐梓到达了松坎，担任四川方向的警戒。

这时候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变了过去的不利局面，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遵义会议以后，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便于机动作战，全军进行了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合并，继续北上抗日。这时候，这支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的队伍，已经过了一年半的艰苦战斗的锻炼，尽管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部队曾遭受了许多挫折，但是，"少共国际师"这个光辉的名字和她的革命的战斗传统，却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二》)(作者：萧华)

"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阵前倒戈

一九三三年，正当我工农红军开展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势力内部出现了重大裂缝，十九路军在福建加紧谋划反蒋部署。十九路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部第十师，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扩编为第十一军，后被蒋介石升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十九路军参加过对我中央苏区第二次和第三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后调戍京沪，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沪之役中曾负盛名。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在国难当头、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客观形势下，十九路军将领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的行径和翦除异己的手段甚为不满，在进攻闽西、闽北苏区时又连吃败仗，感到"防广兵单，捉襟见时"，蒋介石又一味追究责任，再加上十九路军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越来越高。这种严峻的局势，推动十九路军领导人下决心走上了联共反蒋抗日道路。

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旬，继陈公培与彭德怀王台会谈之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商定，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我党正式谈判。徐名鸿到瑞金时带来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信，再次表示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党中央经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并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即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进行具体的商谈。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等曾多次接见徐名鸿等人。十月二十六日，潘汉年代表我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共有十一条，主要点是双方停战同盟，共同反蒋抗日。协定条件有：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抗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等。《初步协定》的草签，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合作关系正式形成。随后，潘汉年、黄火青等相继抵福州，秘密驻在十九路军总部工作。

十九路草签《初步协定》后，解除了西顾之忧，加紧策动"福建事变"。十一月上旬，国民党中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及其幕僚，陈铭枢及其"神州国光社"同人，"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彭泽湘，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等相继云集福州，"八一"起义将领叶挺也应蒋光鼐之约前来帮助策划。十一月十八日，事变领导人在鼓山召开秘密会议，作最后决策。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举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言痛斥"以蒋中正为灵魂之卖国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痛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宣言提出：(一)否认南京民国政府；(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卖国政府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内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宣言还宣布了"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行彻底的民主解放"；"否认一切帝国主义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等项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求的政纲。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设首都于福州，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改升上红下蓝二横条组成、中嵌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政府委员会之下设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任主席)、经济委员会(余心清代理主席)、文化委员会(陈铭枢兼任主席)和财政部(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陈友仁兼部长)、最高法院(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李章达兼局长)等机构。举事后不久，所有参加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员宣布脱党，"第三党也宣布解散，另行组织了"人民生产党"，由陈铭枢担任主席。十九路军扩编为一、二、三、四、五等五个军，蔡廷锴任总司令，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等升任各军军长。将福建省改建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并委任了各省省长。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还派尹时中为代表往驻瑞金，我中共中央亦派军事代表张云逸驻福州联络。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是进步的抗日反蒋运动。但是，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在对我红军的态度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的力量，以为蒋介石不可能于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守延平、古田、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调十万重兵入闽，进行镇压。最终，十九路军兵变失败了。

（选自《风云七十年》）

杨杏佛之死内幕

1933年6月18日是星期天。早晨，繁华的上海法租界条条马路上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居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楼下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象往常星期日一样，准备乘汽车去大西路的马厩，骑马往中山路一带驰骋郊游。这已经是他多时的习惯了。这天清晨，杨杏佛身穿鹿皮上衣和骑马裤，头戴灰色呢帽，携带着刚14岁的长子杨小佛，登上了一辆纳喜牌篷盖车。抬呼一声，车子开出了中研院的大门。

汽车刚开出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突然，从四周的隐蔽街角里，跳出四个人来，其中两人手提毛瑟枪，另两人掏出是盒子枪，从汽车四周一齐对车上人猛烈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后，不顾一切打开车门狂奔逃命。杨杏佛听到枪响，立即知道是有人要暗杀他，他用尽全身力气将儿子小佛推下座位，推倒在车厢底板上，并扑到儿子身上加以保护。顷刻，密集的子弹向他射来，杨杏佛 连中三弹：一弹由左肋射进，由右肋穿出；一弹击中左腰，留在腹内；另一弹射中心尖，成为致命的一弹。还有一颗子弹穿透了他头戴的礼帽，将一缕带血的皮发粘到帽子上。杨小佛由于有父亲身体的护卫，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

枪声响起时，坐落在中央研究院对面362号利汉汽车公司的俄籍职员贝柯克闻声从二楼奔下，冒险跑到杨杏佛汽车边，询问倒卧在血泊中的杨杏佛出了什么事情，这时杨虽未气绝，但已不能答话。于是贝柯克跳上汽车发动马达，将杨杏佛父子送往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抢救。

约在这同时，四个刺客目睹杨杏佛中枪倒于血泊中后，立即呼啸着向附近预候的一辆汽车奔去。那汽车早已发动，等刺客们一上车，就慌忙逃窜。哪知有一个刺客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已离得很远，他一面狂奔一面狂喊："等一等我！"这时附近警笛狂鸣，法租界的大批巡捕正从四面向这里围捕过来。已上车的刺客们见时机紧急，顾不得停车等候，反从车上向这个落伍的凶手开了一枪。这一枪只击中他的右臂。此人受伤后仍挣扎着逃命，逃至环龙路钱家塘弄口，见无路可逃，巡捕又已迫近，便用手枪向自己左颈射击，企图自杀。顿时血流满身，负伤倒地，巡捕赶来将他捕获，也将他送到广慈医院。

杨杏佛入院不久，因伤势过重，于9点20分就气绝身亡了。那名刺客经医院急救后，到下午即能说话。在巡捕们的追问下，他自称名"高德臣"，山东人，因投亲才到上海一星期，这天他欲往西摩路访友，路过此处，被流弹误伤。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刺杀杨杏佛的凶手。法租界巡捕房准备第二天继续审问，不料，此凶手突然在当晚"伤重不治"死去了。于是，"刺杨"案一时成了一件"悬案"。一段时间以后，此案的真实内幕才逐步披露出来。

刺杀杨杏佛是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指使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干的，具体执行者是复兴社的华东区行动组的赵理君等人。

杨杏佛，原名杨宏甫，又名杨铨，杏佛是他的字，江西玉山人。1893年5月4日生。幼时家贫，随家先后迁居江苏扬州与浙江杭州。清末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读书，胡适曾做过他的老师，张奚若、任鸿隽是他的同学。这时他年不满20，血气方刚，好发议论，言谈中常常流露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心情。1911年8月，他考入河北唐山路矿学堂预科，被编入第六班，与茅以升同班同学。这一年中秋，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一般同学多回家中，杨却赶去武昌投身革命，亲历战阵。这时他已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的收发组长。

不久，南北议和，民国政府北迁，袁世凯窃居临时大总统。杨杏佛不愿在袁世凯手下做官，就经孙中山批准，由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杨于1912年11月乘船赴美，这时他刚满20岁。

杨杏佛于1912年12月1日抵达美国纽约州绮色佳，进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毕业生又到哈佛大学商学院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在美期间，他与胡适、任鸿隽、梅光迪交往密切，被称为"四俊"。

为了提倡科学，他与胡明复、赵元任、章元善、任鸿隽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杨任该社编辑部部长，编辑和出版《科学》杂志。

1918年10月，杨杏佛与新婚妻子赵志道一同回到了祖国。先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会计处任成本科科长，后又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任工科教授。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与陈去病、顾实等人在南京东南大学内成立了国共合作的地下组织，其中有共产党员吴肃、宛希伊、董觉新等。杨在东南大学交往的共产党员还有恽代英、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等人。由于杨杏佛坚持进步的政治观点，并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忌恨，郭通过校董会取消工科，迫使杨杏佛离职。

这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杨杏佛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担任孙中山秘书，并随孙中山北上参加国民会议，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后，他担任“总理葬事筹备处”的总干事。1925年“五·卅”运动中，杨在上海主办国民党左派的报纸《民族日报》，宣传反帝反封建；参与组织“济难会”，营救革命同志。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杨杏佛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设立秘密电台，逐日将有关情报电达前方，后为军阀孙传芳侦悉，派人会同法租界捕房将杨逮捕，赖进步女律师郑毓秀营救获释。杨杏佛出狱后，全力支持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杨又一度被国民党右派杨虎扣押，经营救脱险。1927年以后，杨杏佛协助蔡元培先生，先后担任大学院的副院长与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力倡教育改革、学术自由，罗致与保护进步学者。当时蔡元培先生年逾六十，性格宽容迂缓；杨杏佛则年富力强，精悍机敏。蔡元培说：“正可以杨杏佛之长补我之短。”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日益专制与腐败，杨杏佛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与义愤。他与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人一道，对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31年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连续发起“围剿”时，杨杏佛亲自到江西进行数星期的实地考察，搜集到大量资料，写成《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在报刊发表，在国统区第一次比较客观真实地介绍了苏区与红军的情况。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就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才萌生了采访苏区的念头。同时，他不顾白色恐怖，协助宋庆龄、蔡元培，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学员与民主人士，如共产国际的牛兰夫妇、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丁玲、潘梓年以及陈独秀等人。1932年底，杨杏佛追随宋庆龄、蔡元培，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担任总干事，负责该会的主要日常工作。该会一成立，杨杏佛等人就发布新闻，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与特务罪行，呼吁民主、自由。1933年1月，杨杏佛亲自到北京，组织“同盟”的北京分会，营救被捕的进步教授许德珩等人。1933年2月，北平举行公祭李大钊的游行时，杨杏佛特地撰写了一副情长谊深的挽联：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

北李犹在，那用吾辈哭先生。”。

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杨杏佛公然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李大钊烈士与正被国民党政府迫害的陈独秀伸张正义，向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提出抗议，这需要多大的胆量！

1933年3月，杨杏佛与宋庆龄一道组织了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目的更为明确的革命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其中心任务就是购买枪支武装民众。1933年4月，杨杏佛又一次随宋庆龄去南京，探望被关押的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政府废止法西斯式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越来越使国民党反对派感到恐惧与暴怒。1933年5月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分别收到特务们寄来的恐吓信，信里还夹着子弹，威胁他们立刻退出同盟，否则将断然处置。宋、杨等都置之一笑，“同盟”照常工作。国民党政府又派人向杨表示，要派给他一个名义出国考察，使他脱离国内的政治活动，他没有同意。

国民政府当局决心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下毒手。由于宋庆龄与蔡元培的崇高威望与特殊地位，反对派一时不敢对他们下手。于是，他们决定对“同盟”的实际主持者，活动力强、影响大的杨杏佛开刀。

1933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把暗杀杨杏佛的任务交给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

复兴社是1932年3月间正式成立的以蒋介石黄埔系为核心的秘密政治组织。特务处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专搞情报、绑架与暗杀，处长为戴笠，副处长为郑介民。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就将刺杨的任务交由复兴社的华东区行动组赵理君负责执行。赵理君，化名赵立君、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负责国民党特务行动工作多年。他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设立了行动组总部，以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为行动组员。他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这时与妻子赵志道离异，独居在亚尔培路331号中研院内。他嗜好骑马，骑术娴熟，在大西路的马厩中饲养了两匹名马。每逢星期日早晨，他常骑马驰骋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且常常携其长子杨小佛一同郊游。特务们认为在杨到中山路骑马时对杨进行狙击，有成功把握，且刺杀后易脱身。暗杀计划汇报到蒋介石那里，蒋却不同意，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又增加国民党政府的麻烦，怕引起各方面指责。便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内宋庆龄寓所的附近执行，这样既可以显示特务的力量，又可以不负责破案。戴笠只好命令赵理君改变计划，决定在中研院附近，趁杨杏佛出外散步或去宋寓途中执行暗杀。1933年6月初，戴笠亲自赶到上海指挥布置。行动组的成员举行了宣誓，保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被捕，即自杀。

特务们本准备在1933年6月17日早上动手，因他们刚到达中研院附近就碰上一辆法捕房的巡逻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他们不敢动手。次日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又带着特务们坐汽车来到中研院附近。赵理君留在汽车上任现场指挥，汽车停在亚尔培路向西爱威斯路的转角处。凶手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身着灰色劳动服，分散隐伏在中研院附近，另有两人在两头巡风掩护。等到8点左右，才看到杨杏佛领着儿子走到中研院院中准备登车，特务们便走近门前。但杨氏父子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杏佛已发觉，正想冲进去时，见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一会儿，汽车徐徐驶出331号中研院大门，正准备开足马力驶向马路时，四个特务的

枪一齐响了。

被捕的特务过得诚，在医院中谎称"高德臣"。当晚，戴笠就通知潜伏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长的复兴社特务范广珍，以毒药结果了过的性命。

杨杏佛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只是国民党内部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只是孙中山先生学说的信徒。他只是追求民主自由，捍卫中国人民的人权，反对法西斯恐怖，因此招来杀身之祸。特务们本想用暗杀来吓退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们，但结果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杨杏佛的鲜血却激励更多的中国人民投身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斗争中去。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批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在公祭杨杏佛时，年迈的蔡元培哽咽地说："今先生以勇于任事、努力服务之人，而死于非命，同人等之哀悼为如何！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鲁迅、沈钧儒、洪深以及外国友好人士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不顾危险，亲自去殡仪馆悼念。鲁迅先生为表示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参加追悼会离家出门时有意不带钥匙，准备踏着先烈的鲜血慷慨赴死。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七言绝句《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日人藏本失踪案始末

藏本失踪　平地惊雷

1933年6月9日清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于8日晚往下关车站送有吉之后失踪，请帮助查访下落。藏本的失踪，给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不安的迷雾，一时间成了舆论的中心。

警宪齐出　悬赏查找

南京政府得到消息，立即下令警察宪兵一齐出动，尽力查找。警察厅长陈焯赶紧派督察长陈独真往日本领事馆访问，并我方调查，了解藏本平时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问题，同时向日本领事馆索取藏本照片，翻印多张，分别向藏本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站埠四出查访，又将从日本领事馆至阴阳营藏本寓所及自领事馆至下关一带沿路岗警，逐一查问，没有找到线索。

同日，陈焯召集各局、队、所负责人，研究扩大调查办法，明确各部责任。

11日，警察厅又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人员报告连日查访经过，研究继续侦查办法，命令各警，不分昼夜，努力查找，以便尽快找出线索，寻得藏本下落。

同日，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在南京各报登出广告：无论何人，如能将藏本直接找到，赏钱1万元，能知道藏本的下落，报告警察厅或警备司令部，因而找到者，赏钱5000元。

晚上，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几项紧急方案：南京四郊的搜查，由宪兵警察联合编成九组，共同搜寻；实行户口总检查；派便衣队携带照片四出查访；请江宁县政府协助查找；派人分别向苏州、无锡、镇江等处搜寻。

12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对藏本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下令督促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严密搜查。在江西前线指挥剿共的蒋介石也致电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详细询问了藏本案的情况，并下令军警严查。外交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三机关为了便于查找，决定各派一人组成联络组，交换情报并决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真相未明　日方进逼

南京政府连日努力，竟然找不到一丝线索，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妄加揣测，步步进迫，通过各种手段，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11日早晨，日本外相广田认为南京政府对于藏本事件的调查缺乏诚意，致电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训示与南京政府交涉的三条原则：①在中国首都发生的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仍然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与责任之所在，这是近代国家从来没有过的事件；②南京政府如果确实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能力，那么日本政府就很难相信它的警察力，而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加以"重大考虑"。③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松调查的情况，日本政府将提出"重大抗议"。

同日，日舰"苇"号驶向南京。12日晨，日本又增派"对马"号军舰驶向南京，进行威胁，日使馆参赞有野及日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冈野也从上海来到南京。

下午三点，须磨、有野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后须磨声称：要求迅速查明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当然由中方担负；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

倘若中方仍然没有诚意，那么将实施第二、第三步方案。

同日，日本外相广田与外务省高级官员协议，决定命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国民政府竭诚调查事件真相，速谋解决方法；国民政府如果对此事件处理失当，因而发生不测事件，责任必须由中方负担；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等权利。

当天，日本舆论界也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

东京新联社通电说，日本政府认为藏本失踪案是义和拳运动中杉山书记官被杀以来的又一个重大事件，对南京政府应绝对采取强硬态度。

《朝日新闻》社论说，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好转，因此采取了这一行动；南京政府对此难辞其责任，南京报纸所作的自杀等类的推测，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

日日新闻社社论认为，藏本失踪不可能是遭受匪贼，例如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关的某社，也似乎与这一案件不无关系。

南京电通社电：对于藏本案，中方只以否认这一事件为目的，仅仅作表面上的调查，因此，用外交手段没法解决这一事件，应该采取实际有效的手段。

此外，驻留南京的日本人也集会，扬言如果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全体日本人将退出南京。

日方的威逼恐吓，使南京政府压力倍增，南京政府一面要求日方保持镇静，一面下令严密查访，"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待"。

藏本寻获　真相大白

正当南京政府被藏本案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3 日上午 9 点，警察厅接到陵园负责人张燕亮的电话。据张燕亮讲，早晨有一个人来喝水，年纪约四十几岁，中等身材，留小胡子，穿半新半旧的西装，喝完水后就一个人慢慢上山去了。警察按照这一线索，向山中寻找，11 点左右，终于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后面，找到了藏本。起初藏本不肯下山，经过再三劝说，才乘车回城，到城里时已是下午 2 点多了。

在警察厅里，藏本讲了这几天的情况，本来他想去送有吉的，因为人多汽车坐不下，所以没有送，而是一个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在中山陵附近上山，意欲自杀。起初想喂狼而死，后想绝食而亡，继而想掘坑自埋，但终于没有死成；至于自杀的原因，则不愿告诉别人。

总计从 8 日晚 11 时失踪到 13 日中午 11 时寻获，共 108 小时。

藏本找到后，日方气焰顿消，14 日下午，须磨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道谢；藏本本人也于 20 日从上海乘船回国，藏本事件就此结束。

就这样，一度被认为是"中村事件第二"或"杉山事件第二"的严重事件，因藏本自杀未遂而真相大白于世，使这一事件的结果染上了喜剧色彩，避免了中日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冲突，时人戏称为"朱太祖"和"孙总理"在天之灵的保佑。

然而，藏本案虽然结束了，藏本自杀的原因却终成难解之谜，据日方声称，这是由于藏本精神衰弱症的重犯，毫无其他原因，显然，这一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樊伯欢）

"塘沽协定"前后的何应钦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积极向华北进行新的侵略扩张，于 1933 年 1 月侵占山海关，2 月下旬进犯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退，日本侵略军于 3 月初占领承德，华北局势日趋恶化。

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宗旨的蒋介石，一方面不肯放弃重兵"围剿"江西红军；另一方面力图通过和谈妥协的方式，缓冲中日矛盾，便派刚在江西被红军打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与黄郛去北平周旋。3 月 12 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何以黄绍竑为参谋长，秉承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以期阻止日军进攻。驻喜峰口、古北口的中国守军，虽一度重创日军，但终因国民党政府消极防守的战略，两地先后失守，日军遂侵占秦皇岛、昌黎。何应钦在 4 月 24 日的"为日军由滦东撤至长城线致各军电令中"提到"敌因国际关系，似不由平榆铁道进兵，并为缓和国际视听计，已宣言将滦东军队撤至长城附近，并转移兵力，由兴隆县(应为密云县)古北口南侵，以达成其攻略上之目的。"何对形势看得很清楚，迫于日军的压力，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交涉"上。4 月 18 日何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求施"一暂时缓兵之处置"。4 月 26 日，何应钦在北平召集军分会会议，会上多数人同意于学忠的"平津名流主张缓和，对于华北暂行休战事。"并决定日军撤出滦东后，"不轻易推进"。

日本关东军于长城各口的战斗得手后，了解到国民党政府有准备接受停战的意向，为使其停战谈判的地位更为有利，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强硬方针："中国方面必须单方面后撤相当距离，以表示其诚意，否则决不与其进行停战交涉。"5 月 3 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日军进逼关内。何应钦乃于 5 月 6 日致电行政院和蒋介石，要求速定妥协方案，谓若"一旦平津既失，大军后撤，财政枯竭，兵怨民困，外援不至，赤匪披猖，将何以善其后？"蒋介石很快复电同意何的看法，并指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委员长黄郛相机行事，设法缓和华北局势。

5月10日晚，日军向新开岭一带中国驻军发起猛攻，战斗激烈。何应钦、黄绍竑密电汪精卫，意为“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名，指定某一线上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同时电告尚在南京的黄郛，望其多方“运用”，以“寻得和平途径”。次日，黄郛密电何应钦，建议“大胆下一决心，用极快速度撤至密云后方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寨一带，从事整理，则无益之牺牲可以减少，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5月13日，何应钦命令南天门守军撤退，又令冀东一带国民党军队向唐山、丰润线以西地区撤退。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攻击”，至5月20日，先后侵占密云、牛栏山、平谷。同时，其第六师团渡过滦河占领唐山、玉田、三河等地，危及平、津。

这时黄郛已由南京到达北平，与日方频繁接触，并于5月22日晚经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辅佐官藤原喜代间少佐介绍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进行谈判，经彻夜密谈，23日晨达成停战案概要，何应钦表示同意，可同时又担心日本人失信。24日午后，何应钦把北平军分会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叫到居仁堂，说通州已经失守(误传)，嘱熊同他于当夜撤出北平。当晚10点，熊再至居仁堂，张群、俞飞鹏、黄绍竑等均在座，何应欠十分紧张，说日本武官约黄郛谈话，等至11点黄郛仍未归。何怀疑黄被日方扣留，便要撤退，熊说再稍等，何却说：“此时不走，明日拂晓，敌机若将芦沟桥炸断，则我辈都成俘虏矣”。12点后黄郛来到，何才稳住神。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争，并希望在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何与张、黄等传看了日军的条件，何犹豫不决，见多数人同意黄绍竑的一面布置北平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的意见，才决定答应日军要求，与日本方面正式谈判。

经黄郛与日方联络，何应钦于25日派北平军分会作战处长、上校参谋徐祖诒为军使，到顺义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与西义一师团长商谈停战办法。同日，何应钦派黄绍竑去江西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并电令前方部队按日方指定之路线撤兵。5月31日，何应钦派熊斌为全权代表，与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会谈。谈判开始后，熊斌首先提出恢复战区(撤兵地区)原状，维持治安等意见书。冈村宁次则傲慢地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的性质，只需质问中国方面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的协定案，故中国方面的提案，没有回答的必要。”熊斌未再坚持，他在日方提出的原案不允许改动一字的情况下签了字。协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而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把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的主权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据此，日本军队可以在冀东的“非武装区”自由行动，窥测整个华北；而中国军队反而不能在属于自己的国土上驻军。所以这个协定一公布，国民党政府及北平军分会就遭到爱国舆论的强烈谴责，斥之为“屈辱求和”。何应钦对此却大为不满，同时又认为和既和矣，政府不必过多解释。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此次停战协定，日方表示已系十分让步，而我方报纸之宣传，对日本仍多加以侮辱。现日军尚未开始撤退，万一因此又生枝节，前途将益陷于不可收拾之境。闻中央为顾虑舆论计，有主张对于协定力加解释，并非屈服妥协之说。此种办法，不独增国人虚骄之气，并可重陷华北于更危之地，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惊魂不定、自相矛盾之心态毕露。

作为蒋介石、汪精卫在华北的代言人、华北最高军事长官的何应钦，在1933年春天《塘沽协定》签订前后的表现若此。那末事过两年，即1935年夏天，他在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时，对其“备忘录”中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史称《何梅协定》)，便不足为怪了。

(李仲明)

历史考证

中国工农红军

红一军

1930年3月18日，党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军第31、32、33师师委及全体的信中指出："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下联合起来，将这三个师编成第一军。"

同年4月，在黄安北部之箭厂河，召集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开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通过了改编红军的决议。会后，即组建了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

红二军

红二军是由湘鄂西的红四军改编的。

1930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湘西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7月，湘西红军正式改称红二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朱勉之。

红三军

一、赣西南之红三军。

中央在扩大红军的整个计划下，决定集中赣西南二、三、四团红军及第一、二大队，组成红军第三军，并决定蔡申熙同志为军长(中央1930年3月10日给三军前委的信)。然而，早在中央指示下达前2个月，这几支武装已合编为第六军，并由黄公略同志任军长，刘士奇同志任政委。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930年4月26日写信给红军总前委，信中说："最近五军政委滕代远同志来，得悉你们已将中央原来计划编成第三军的部队成立了第六军"，"你们现有第六军的名义，仍应按中央规定改为第三军，军长一职由你们会议最后按情况决定。"根据中央的意见，红六军在同年7月改称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蔡会文任政委。

二、湘鄂西之红三军。

1930年10月，中央曾计划将全国的红军重新组编为7个军。湘鄂西的红二军团被编为第三军。1931年3月21湘鄂西中央分局写信给二军团前委指示：二军团改为第三军。似以云清(贺龙的别名——原编者注)为军长，赤英代政委。

红四军

一、井冈山之红四军。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会师。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江西省委给中央的信——录毛泽东同志关于永兴，宁冈等根据的情况》，1928年5月19日)，四军的名称，最初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以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按照湘南特委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

二、湘鄂西之红四军。

1928年3月上旬，周逸群、贺龙等同志到达桑植洪家关，领导武装斗争，着手建立游击队。3月下旬，由贺龙出面联络当地的土著武装，先后在桑植、石门、咸丰、鹤峰等县建立了十数支游击队，总数3000余人，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进占了桑植县城。7月中，在桑植洪家关召开了红军改编大会，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军长贺龙、政委恽代英(未到职)、参谋长黄鳌。

三、鄂豫皖之红四军。

1930年10月18日，党中央写信给鄂豫皖边区特委及红一军、红十五军军长，决定将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1931年1月中旬，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

红五军

1928年7月22日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的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彭德怀同志率领的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和第三营及师的随营学校。起义胜利后的第3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同志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

红六军

一、鄂西长阳之红六军。

1929年7月在鄂西长阳县西湾成立。军长李勋，副军长陈寿山。8月间，在资丘遭敌伏击，军长李勋遇难，部队溃散。

二、赣西南之红六军。

1930年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遂川。1月18日至21日，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雩田圩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三团、四团、五团编为红军第六军。

黄公略为军长，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为政治委员。

三、鄂西之红六军。

大革命失败后，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在鄂西洪湖地区建立了几支革命武装。1929年底根据中央指示，这几支革命武装合编为中央独立师。1930年2月5日，按照鄂西特委的指示，中央独立师于监利汪家桥编为红六军。军长孙德清，政委由周逸群兼任。

红七军

红七军是1929年12月11日在广西百色起义时建立的。1929年初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庄等同志到广西开展工作。逐渐争取了广东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并掌握了李部武装。同年秋，专程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同志回到广西右江，传达了中央决定起义的指示。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纪念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爆发了。起义后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1927年12月鄂东军曾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之第三十一师。)

红八军

一、广西龙州之红八军

1930年2月1日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广西龙州起义，起义部队编为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委，下编三个纵队。

二、鄂东南之红八军

是由李灿、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转战鄂东南之后发展壮大起来的。

全国红军会议之后，何长工等同志由上海返鄂，按照中央决定，1930年6月正式编成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下辖一、二、三纵队，分别由刘文祺、程子华、谢振亚任司令员；彭雪枫，郭一清、黄克诚任政委。

三、湘赣之红八军

根据中央指示，湘赣省委以红军独立第一、三师为基础组建红八军。1930年10月，中央派蔡会文、肖克两同志来湘赣领导军事工作，10月底组建军部。11月初又组建司令部。红八军军长肖克、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兼政委。

红九军

一、鄂北地区之红九军

由襄、枣、宜等地红军游击队组成。1930年6月20日中央军委长江局办事处决定："鄂中、鄂北的红军，迅速在斗争中建立第九军。"1932年春，红九军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木千，参谋长韦克铎。不久，红九军大部由房县转移到洪湖地区编入红三军九师，其中二十六师改编为各县游击队，红九军番号即取消。

二、闽西之红九军

1930年3月，根据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闽西各县赤卫队集中改编为红九军。军长邓韦、政委高静山(后邓子恢)。

三、红四方面军下辖之红九军

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于川北之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于7月上旬开始整编，原红四方面军下辖之十二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

红十军

一、赣东北之红十军

1927年冬，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弋阳、横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武装。1928年夏正式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4月发展到1000多人，改称江西独立第一团。1929年7月赣东特委决定按中央指示，将江西独立第一团改编为红十军。22日举行了红十军成立典礼。周建屏任军长(后邵式平接任)胡庭铨代理政委。

二、闽浙赣地区之新的红十军

1933年初，原闽浙赣红十军奉命与中央红军会师后，该地区原有的游击队、赤卫队、赤色警卫师共1500人，重新组建起红十军。军长、政委均由中央派来的王如痴兼任。

红十一军

一、鄂豫皖之红十一军

1927年11月中旬，鄂东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2月，鄂东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7

月，红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党代表。1929年5月初、商南起义爆发，成立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徐其虚。1929年11月初六霍起义爆发，成立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

二、东江之红十一军

1927年广东东江地区先后爆发了三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成立了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古大存任总指挥。5月底，根据中央会议精神，东江工农红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古大存，政委胡丙春。

红十二军

一、鄂东南之红十二军

1929年春，鄂东南地区建立了大冶中心县委。在中心县委领导下，阳兴、大冶、通山、鄂城、咸宁、蒲圻等县，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1929年7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中央派谢振亚总负责。

二、闽西之红十二军

1930年4月10日，中央给福建省委军委写信指示：闽西六团红军，中央决定你们立即集中起来建立红军第十二军。"当时，闽西各县的赤卫团，已集中起来成立了红九军。按中央的这一指示，又将刚成立的红九军改为红十二。军长伍中豪，进军江西后由罗炳辉代军长，政委邓子恢(后为谭震林)。

三、闽西之新的红十二军

1930年6月，闽西红十二军随一军团进军江西，留在闽西的红军和地方合编为红二十军、二十一军。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把二十一军、二十军编为三个步兵团，番号改为十二军，共2600人。贺沉泽代军长，施简为政委。闽西新十二军改编不久，中央派左权前来任十二军军长。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新十二军与老十二军会师并合编，仍称十二军。游瑞轩代军长，黄苏为政委。

红十三军

是由浙南地区农民武装改编的。1929年冬，党中央派金贯真同志为浙南巡视员，不久又任命他为浙南特委书记，担负建立红军(第十三军)并组织地方暴动之使命(《红旗》1930年6月11日。1930年6月间，浙南特委决定在一个月内集中力量扩大到一万人，正式建立十三军，6月25日将这一次定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7月8日，中央军委回信，批准浙南特委的报告。8月间，红十三军在温州楠溪(今属永嘉)成立。胡公冕任军长，陈文达(又名柴连福)任政委。

红十四军

1929年冬，江苏省委先后派何昆、徐德、黄火青等大批熟悉军事的干部来到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决定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农民武装改编为红十四军。1930年3月，组建了红十四军军部，军长何昆，政委李超时。

红十五军

一、徐海蚌地区之红十五军。

1930年7月上旬，徐海蚌地区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陈资平。

二、鄂东南地区之红十五军

1930年7月，在鄂东南成立的红八军第一、二、三纵队参加攻打长沙，鄂东南各县游击队和赣北的部分游击队及红八军后方医院已经痊愈的伤病员整编为红八军第四、五纵队。10月间奉命于黄梅县考田镇正式改编为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

红十六军

1930年7月间，中共湖南省委为配合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决定"以湘鄂赣边境的红军，集合平、修、铜、密各县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胡一鸣为军长，孔荷宠为副军长。

红十七军

1933年2月，湘鄂赣省委在中央正确指示之下，以红独立一、二师编为红十八军，配合红十六军、红十七军成立红六军团，以适应革命战争发展需要。这里所指的红十七军即是湘赣红八军。因为此时在湘赣地区只有十六、八、十八三个军，红六军团成立时，这三个军没有按计划编为十六、十七、十八军，而是分别编为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

红十八军

是由湘鄂赣根据地的浏阳、宜丰、万载、平江、铜鼓和修水各县游击队发展起来的。1933年2月10日，红十八军在浏阳县正式成立。军长严图阁、政委徐洪。全军三千余人。七月底奉中央军委命令，南渡袁水、到湘赣根据地与六军团之十七师会合，编入第六军团。

红十九军

一、河北完县之红十九军

1930年8月，河北完县五里岗地区的群众，在葛占农的领导下，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军"揭起红旗，号称红军第十九军，四乡农民、云集响应。立即扩充到三四千人。"(《红旗日报》1930年9月15日)

二、闽西旧县之红十九军。

1933年3月6日，由闽西上杭、南阳、旧县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组成红十九军，在旧县成立。据《红色中华》1930年3月15日第3版载：3月6号"旧县工农群众举行庆祝红军空前伟大胜利，庆祝红十九军成立、欢迎新战士的群众大会，到会的红色战士和工农群众将近五、六千人，"军长、政委分别由叶剑英、杨尚昆兼任。

红二十军

一、闽西之红二十军

1930年5月间，闽西十二军出发东江之后，闽西后方又开始组织第二十军。已经组织起来在龙岩有六、七百人(第一纵队)，上杭、永定各有二百余人(第二、三纵队)，共计一千二百人。军长胡少海。

二、赣西南之红二十军

1930年6月底，赣西南特委率领农民赤卫队同红六军一、三纵队准备向吉安发动第七次进攻。为便于统一指挥遂将赣西"第二十纵队、第十一、十四纵队以及东路的三十纵队改编为四个纵队，成立红军第二十军。曾炳春为军长，刘士奇兼政委。

(作者：梁德忠，《党史文苑》)

蒋介石聘请了哪些德国军事顾问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蒋介石驱逐了所有在华苏联军事顾问，转而开始聘请德国军人为军事顾问。朱家骅因先后在德国柏林矿科大学、柏林大学地质系留过学，与德国人素有交往，便积极充当了穿针引线人。

首任德国军事顾问为鲍尔上校博士(Oberst Bauer)，于1927年底来华。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有一个设计大兵工厂的计划，由朱家骅委托德国工程师学会长马脱勖斯代为设计。朱家骅与马很熟悉，便委托他物色军事顾问。不久马脱勖斯向朱家骅介绍了鲍尔上校。因为是首任军事顾问，朱家骅不敢草率，在鲍尔来华之前，提出要对鲍尔的才能进行了解。1927年8月底，马脱勖斯让鲍尔整理了一份中国陆军发展的计划书，交给当时在德国的朱家骅大侄子朱谦，由朱谦转交给朱家骅。朱家骅看过计划书后遂决定将鲍尔引荐给蒋介石。1927年12月初，鲍尔到了上海，朱家骅亲自陪同他去见蒋介石，并自任翻译。鲍尔向蒋介绍了当时国际上新兵器的发展状况，对自动步枪和两声平射炮的性能作了详细说明，还谈到了飞机发展的趋势和作用。鲍尔建议蒋介石用空军统一中国。蒋介石听了颇为赏识，决定聘请他为军事顾问。

1929年4月初，鲍尔病故，军事顾问团暂由克里伯尔(Oberst Kribell)代管。5月初，蒋介石要朱家骅再找一位接替人。朱家骅即致函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请他代为物色。朱将亲笔信函交给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水利局长戴恩基，请他在去德国采购测量器材时当面转交鲁登廷夫。1930年1月，鲁登道夫收到了朱的信，他想亲自来华，但因德国政府受凡尔赛条约限制，不能如愿。于是他推荐了德国参谋总部作战部主任魏采尔将军(General Wetzell)。朱家骅向蒋介石报告了魏采尔的情况，蒋介石同意立即聘请。1930年5月初，魏采尔来华，朱家骅陪他到中原大战的前方去见蒋介石，随后就留在前线任军事顾问。

1932年秋，朱家骅向蒋介石提起德国国防部长塞克特将军(General Oberst Von Seckt)已经退休，可以请他来华游玩，对国民党政府也许有益处。蒋介石表示同意。朱即请魏采尔向塞克特一级上将转达邀请之意。1932年冬，塞克特复信答应来华。次年2月初，塞克特应邀来到中国，由朱家骅陪同到庐山面见蒋介石，朱仍自任翻译。当时德国政局动荡，希特勒快要上台。蒋介石同塞克特谈起了德国政局，蒋问：假如希特勒上台会怎么样？塞克特说：他那一套我是不懂也不赞成的，我动身前他组阁要我在军事上帮他忙，我因和他不能合作，所以婉言谢绝了。交谈中，塞克特认为，中国常备军有60个师就够用了。又说，练兵要有自给的兵器工业，不能依靠向国外买。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塞克特将他创立德国国防军的经验都说了，他向蒋介石建议建立军事学校，并编列一个示范旅，然后调各个部队轮流来训练，逐步地将全国的部队都革新。塞克特下山以后，到北平等地游历了一个多月，于3月底回国。回国前，他留下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很重视。11月初，朱家骅在上海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宋向朱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即设法请塞克特将军来华担任军事总顾问。朱家骅立即行动，费了一番工夫，塞克特才答应。他提出要带两个助手，一个是法勃儿将军(General Faupel)，还有一个是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leutnant Von Falkenhausen)。当时法肯豪森已经在华，他是在魏采尔任军事顾问团长时受聘来华的。魏采尔辞职后，军事顾问团由法肯豪森暂时代理。1934年3月初，塞克特将军二次来华，正式接任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并任蒋介石的委托人。1934年9月，塞克特因病必须回国治疗，辞去了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他向蒋介石推荐法肯豪森将军继任。法肯豪森任总顾问一直到1938年德国

军事顾问团撤回。

上述这些军事顾问，都是德国退役军官，当然军事顾问团里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专家。他们受聘后与国民政府均签有私人合同。表面上看不带任何官方色彩，也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并得到德国工业界人士公开支持的，也得到柏林政府的默认。比如，塞克特在华仅半年时间，就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大做军火生意，并促成德国银行分五年贷款一亿马克给蒋介石购买军火。魏采尔来华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是经德国军政部默认的。鉴于这种情况，曾经有人建议把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德官方军事合作机构，但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实现。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人数逐年不断增加。首任军事顾问鲍尔来华后不久就成立了由 46 名德籍专家组成的顾问团。1935 年，军事顾问团达到 70 人。到 1938 年希特勒勒令军事顾问团撤回前不久，仍有 30 人。在 10 年左右时间里，国民党政府聘请的德国顾问共计 137 名。

1938 年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德关系紧张。同年 4 月，德国军政部长戈林下令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立即返回德国。但这些军事顾问提出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私人合同要到 1939 年甚至 1940 年期满，以此拖延时间。最后，希特勒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下达命令：虽有合同在先，也必须遵命，立刻离华返国。否则就是：明目张胆对（德）国不忠，此地（德国国内）立即进行判决，开除国籍，没收财产”。蒋介石曾向陶德曼大使提出，至少让法肯豪森将军在华停留一段时间，德方没有同意。作为酬谢，原打算在德国军事顾问离华前安排到中国华南游览一番，也被否决。1938 年 7 月 2 日，蒋介石设宴为德国顾问饯行。7 月 5 日，军事顾问团除斯坦因与通讯顾问史杜尔茨两人抗命不返外，其余人由法肯豪森率领搭乘一列专车离华回国。

（梁立成）

对段祺瑞“病死”之说的质疑

1933 年，段祺瑞应蒋介石邀请南下养病，在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其子段式巽在《上海文史》季刊上撰文，追忆其父段祺瑞的暮年生活，并对段氏“病死”之说提出质疑：

1933 年，先父段祺瑞南来养病，在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三年。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三次执政的政治角逐。此时病体的羸弱，老年的疲惫，世事的纷乱，都使老人希望暂离北方这个是非之乡，换一个安宁的环境，过几年平静无扰的生活。正是受这种心理的驱使，他欣然接受了蒋介石邀他南下养疴之请来到了上海。三年中他除了去过一次庐山之外，没再离开过上海。他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座花园别墅里，庭广院深，环境幽静。平时杜门谢客，只几位至亲好友时来探望，如当年在执政府当过总长、后来在上海挂牌做律师的章干钊等人。而与国民党政府当时在上海的一批党政军头目很少接触，一般老人是不接见的。上海闻人杜月笙曾不止一次向我舅父吴光新示意，想派几名他的得力门徒到我家充任保镖，屡遭先父拒绝。他不喜欢周围有陌生人。一直到后来我才得知：当时曾有戴笠手下的人担任警戒，暗中保护。

贵客中，除了执弟子礼的蒋介石来过我家之外，张学良过沪时亦以小辈身份前来拜谒。他一见先父，口称老伯大人在上、便下跪叩首，表现得十分恭敬，非常有礼。

我父在南下之前曾经大病一场，几乎不治。我深受《孝女经》的影响。见老父病重，忧心如焚。计无他出，便效法“割股疗亲”故事，割下臂肉一小块投入汤药之中，祈求父病早愈。后来，终于能在扶持下下床走动，为之欣慰不已。

不料 1936 年春，先父胃病复发。不知是谁向我大哥推荐了一位洋医生（不知是哪国人，后来关于此人的来路竟然谁也说不清了）为父治病。共为病人打过 18 针，而在注射最后一针时，针头突然戳断，父亲即倒地不起。医生则趁我举家惶乱之际溜之大吉，后竟寻不到他的去向。

父亲死后的脸色极其难看，右半个脸几乎色如黑土。父亲原是好端端的，怎么会一针下去突然不治？可是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应追究医生，查找有无失误之处；更不曾怀疑其中是否另有蹊跷。只在时过境迁的后来，才感到疑团难释。联想到父亲在世时，在政治上不免结下一些仇怨，故对他喜爱吃的一些食物都由家里人亲自做给他吃，生怕有人会在食物中下毒。

大殓后未正式开吊，一切从简，不事铺张。仍有众多亲朋戚友及官方人士赶来祭奠。

数日后，即挂专车扶灵柩北上。抵北平后暂厝于三叔墓畔。后在西山卧佛寺旁修筑先人茔墓，竣工后移棺安葬。半个世纪以来，人间已几经沧桑。幸先人茔墓至今完好如初。

（唐志摘自《上海文史》季刊 1991 年 4 期，作者段式巽）

风云人物

李　德

李　德(1901—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中国的化名李德、华夫。德国慕尼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192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成为秘密组织的成员,曾同苏联秘密机关联系。1926年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监禁。1928年4月,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出到苏联,不久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参加苏联红军后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以后被送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1933年10月经上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顾问,他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中,都是按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他既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反对红军支援蔡廷锴。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结果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也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去了取得胜利的机会。

1934年春,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10日,军委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行动迟缓,部队沿途消极避战,使兵力很快损失了三分之二。在这期间,李德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他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推行者。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在受到会议批判后,被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从此,李德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在那里帮助训练过骑兵,后任延安军事学院教授。

1939年夏,李德离开延安经兰州回到苏联,随后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把苏联的一些政治和文学著作翻译成德文。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4年病死在德国。

李富春

李富春(1900—1975)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一九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参加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进步组织"工学励进会"、"工学世界社"。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五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地下斗争,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随后转到军队工作。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经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根据中共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全国解放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在北京病逝。

毛泽覃

毛泽覃(1905—1935),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之一。湖南湘潭人。字润菊,毛泽东之弟。早年在家乡读书。1918年春,毛泽东把他带到长沙,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和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到水口山铅锌矿从事工人运动,任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工人学校教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回长沙,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负责人,从事青年

运动。

1925年秋，毛泽覃跟随毛泽东到达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单位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开广州，经上海到达武汉，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时，毛泽覃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接着，随军南征，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突出敌人包围，向湘粤赣边界转移。11月，当部队到达大庾时，得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部队已上井冈山。于是，朱德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联系。他化名"覃泽"，带着国民党第十六军副官的证件，通过国民党的道道关卡，终于到达井冈山，完成了联络任务。

此后，毛泽覃便被留在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营党代表、中共宁冈乔林乡党支部书记等职，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初，又参加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战斗。战斗结束，随部队留遂川，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共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等职。2月，率遂川游击大队参加宁冈新城战斗，并担任新成立的宁冈县工农民主政府宣传部长。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已到达耒阳一带。于是，毛泽东又派他带领一个特务连到耒阳迎接。1928年5月4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召开会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时期。毛泽覃对这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会师后，他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

1929年1月，毛泽覃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由于在大庾战斗中负伤，被留在吉安县东固地区，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东固区委书记，边养伤，边工作。1930年初，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成立，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后陈毅调任红二十二军军长，毛泽覃任代理政委。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中心县委书记和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此后，又担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公略县委书记、红军独立第五师政委兼师长等职。

1932年1月以后，毛泽覃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负责人，在中央苏区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同时，对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福建，他们开展了反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斗争。在江西，他们又批判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四人小集团"，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四人。毛泽覃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组织上受到处分以后，被分配到"中央工作团"，负责扩充红军的工作和粮食征集工作，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地武夷山区。1935年4月25日，由于叛徒告密，毛泽覃率领的游击队在瑞金县黄膳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袭击。他在组织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古　柏

古柏（1906—1935），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之一。江西寻邬人。其父是乡村私塾教师。由于家境贫寒，古柏小时被寄养在外祖父家。1920年，小学毕业后，到广东梅县广益中学（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924年因参加广益中学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学潮，被学校当局赶出学校。之后，他和一些进步学生创办了学艺中学，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25年，他领导梅县学生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在此期间，他曾联络广东读书的寻邬青年，在梅县成立了留粤校友会、寻邬平民合作社等组织，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12月，古柏在梅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古柏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回寻邬开展革命工作。他和刘维锜、刘维锷等人建立了寻邬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寻邬支部，并任支部委员，接着，又创办中山学校，并建立起秘密农会。1928年3月，古柏、刘维锜等领导寻邬的学生和农民，举行了"三·二五"武装暴动，攻占寻邬县城。不久，因敌人大举进攻，暴动队乃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以待时机。古柏也转移到广东梅县，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

1928年夏，古柏重回寻邬，把"三·二五"暴动的骨干分子重新集结起来，组成游击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过寻邬，会见了古柏。之后，他将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一纵队。10月，中共寻邬县委员会和寻邬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寻邬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古柏任县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30年5月，攻占寻邬县城，成立了寻邬县苏维埃政府，古柏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再次到寻邬。在古柏协助下，毛泽东召开一系列调查会，写下了著名的《寻邬调查》。寻邬调查结束后，古柏被任命为中共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工作。当时的前委是赣西南、闽西革

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四、五、六军的共同指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后，成立了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古柏仍任秘书长。1931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苏区中央局改组，毛泽东任代理书记，古柏任秘书长。后来，他又先后担任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党团书记、裁判部长兼内政部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部和劳动部秘书长等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1933年1月，党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对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也进行了打击迫害。在福建，他们开展了反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斗争。在江西，他们又批判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四人小集团”，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四人。古柏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并受到“最后严重警告”的错误处罚。他仍然坚持原则，以革命大局为重，努力为党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古柏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春夏之交，古柏带领两名游击队员从赣南出发，去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途中，由于交通站叛徒的告密，在广东龙川鸳鸯坑，遭到国民党民团的包围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何　柱　国

何柱国，广西容县人，生于1898年。幼年丧父，无依靠，赖伯母扶养成人。

清末，何柱国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五期。1914年冬，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初，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队。这年春，与钱大钧、邹作华、徐景唐等人被选送日本留学，嗣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隶骑兵科。

1919年5月，何柱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旋即束装回国，被分配到南苑陆军第九师见习。8月，调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上尉分队长，其受业学生为第八期，陈诚就在这期的炮科学习。次年春，他又兼任该校编译员。

这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保定军校停办。10月，在北京筹备复校，何柱国与钱大钧、杨正治、毛福成同时奉命为筹备委员，参与复校的筹备工作。1921年秋，升任少校骑兵队队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得势，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结果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何柱国经同学邹作化介绍，与杨正治、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前往东北，投向奉军。

何柱国投入奉军后，任东本省陆军讲武堂少校战术教官，兼骑兵科术科主任。这时，奉军正开始整军经武，讲武堂是实施这一任务的重要机构，由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何柱国参与了整军经武的全过程，工作认真负责，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1923年冬，晋升中校，改任第三队队长。

东北易帜后的第二年冬，何柱国奉命率部进驻冀、热两省边区，清剿股匪。1931年1月，东北陆军各旅统一改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他所率第三旅改称为陆军独立第九旅，仍任中将旅长，奉命将部队由朝阳、北票、义县一带推进到山海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何柱国驻防石家庄。在这一星期之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分别从汉口、北平乘专车到石家庄车站交会，在车厢里举行秘密会谈。何柱国提早在车站外围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会谈后，张学良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话：“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当时，东北军许多高级将领都以为“不抵抗是上策”。在锦州失陷之前，何柱国趁吊丧之便，询问张作相是否应日本的要求出面办理东北全局的交涉。张作相告诉他决不能做对不起张老帅的事情。并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他认为，张作相的话，代表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东北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幻想。

何柱国在与八路军共同对敌战斗过程中，不仅学会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能与强敌周旋不懈；还懂得了怎样处理好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友军关系等。在一二〇师的影响下，其部也注意与晋北地区的群众打成一片。他还尝到了深入基层，向群众讨教的甜头。他说，这是我们东北军从来没有的好作风，从而深切地体会到张学良将为什么叮嘱我们要和红军友好相处的苦心和用意。

这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话。何柱国得到贺龙送来的一百份后，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干部会议，认真学习《论持久战》，总结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随后，又举办全军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排以上干部学习《论持久战》的基础理论，以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在学习班里，教员们教唱

《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用以激发学员们的爱国热情。这时，外面传说："骑二军变色了！"有些政工人员向何柱国提出质问，他却郑重地反问他们道："我们现在既然以共同抗战为前提，那末宣传鼓动抗日有什么不好！"

何柱国率领骑兵第二军在晋西北山区，既打正规战，又打游击战，转战数千里，经过大小战役数百次，人员、马匹、械弹损失及半，难以继续作战，奉命渡过黄河，在陕北府谷、神木一带集结待命。

次年初，何柱国所部改属第八战区。当时，日军大举侵犯绥远。他奉派为护灵专使，将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榇迁至甘肃兴隆山。

不久，何柱国调往豫皖边区，兼任游击副总指挥，所部沿黄河布防于周家口、界首一线，防阻商邱、亳县之敌进犯。其间，常与日军佐久间部、伪军张岚峰部交战。次年5月，获三等云麾勋章。

1941年春，何柱国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隶属第五战区，辖第九十二军和骑兵第三军，以及辖区内的游击部队。不久，第十五集团军改属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指挥。1943年10月，他获三等宝鼎勋章。次年夏，日军再度打通平汉路。其第十五集团军被阻隔于平汉路以东，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之地面联系也被割断。12月底，国民政府划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为第十战区。次年1月，成立长官部于安徽，何柱国兼任副长官和第十战区长官部临泉指挥所主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7月7日，在河南周家口与日军将领今井武夫进行秘密会晤，洽谈日本投降事宜。次日，返回部队，即将洽谈情况电告国民党中央，使之有所准备。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不久，何柱国奉召赴渝，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参谋长，拟先赴长春，与苏军将领洽谈苏联军队撤退及筹划东北接收事宜。就在这时，他的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去成。

何柱国的眼睛经过多方治疗未能复明。10月10日，获抗战胜利勋章。1948年5月，奉令退为预备役。

解放后，何柱国居住杭州。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85年9月3日，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盛世才

盛世才，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辽宁省开原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属汉军旗人。早年在西丰县小学、沈阳农林中学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得到亲友资助，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盛世才受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举，返沪参加爱国活动。同年考入韶关讲武堂，盛在讲武堂期间，与该校教官郭松龄过从甚密。毕业后，随郭返奉，在郭任旅长的奉军第八旅担任排长、中尉连副等职。后升为东三省镇威上将军府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1924年，盛世才由郭松龄推荐保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邀盛参与其事，盛乃归国，在其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即仓惶返日，后被张作霖取消官费留学资格。

1927年盛世才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1929年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恰逢新疆督办公署秘书长鲁效祖在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设法与之结识。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

盛世才初到新疆时，由于金树仁素对南京参谋本部的军官怀有戒心，只委盛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初来新疆，人地生疏，唯金之命是从，博得了金树仁的好感。不久，被委兼任军校战术总教官。盛以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教育学生，颇受学生欢迎。他即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

1931年2月，新疆省政府对哈密维王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引起民变，维族上层人士、哈密王府侍卫队排长和加尼牙孜、哈密王府大都统尧乐博斯乘机率众暴动，是为哈密事件。同年5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部应和加尼牙孜之请，率骑兵入新，直趋哈密，威逼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南、北各地维、回人民也纷起暴动。金树仁派鲁效祖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开赴哈密，迎击马仲英，结果大败。金树仁又改派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前敌剿匪总司令，仍委盛世才为参谋长，联合以巴品古特为团长的白俄"归化军"，驰援哈密。9月，马仲英部失败，退回甘肃，和加尼牙孜率众退入八大石山。

马仲英部退回甘肃后，得陕西省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扶持，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任师长。他派遣部将马世明、马占仓再次窜入南疆，与和加尼牙孜取得联络，以图再战。1932年春，和氏袭击哈密，同年7月，金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和部。经过大小四十余次激战，攻破八大石

山，摧毁和部主要根据地，迫和氏逃亡外蒙。8月，和加尼牙孜在得到外蒙一批军械援助后，又潜回南疆，与马世明相策应，进占鄯善、吐鲁番，南疆告急。盛世才奉命南征，迅速夺回鄯、吐两地，迫使和、马联军败走焉耆。

1933年1月，马世明等纠集维、回等族民众数万人，绕天山小道，攻陷迪化之咽喉要地达坂城，于旧历除夕，围攻省城。盛世才又挥师北上，在六道湾与马军遭遇，马军败走，遂解迪化之围。在连续两年战乱中，盛世才在军事方面崭露头角。

南京国民党政府久欲直接控制新疆，但鞭长莫及，乃趁新疆内乱未息，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以图伺机取而代之。黄在督办公署院内，设立宣慰使署，同迪化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提出废除督办制，改设军事委员会新疆分会，欲邀郑润成等东北军将领参与军政工作。"第一次新变"的发动者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各怀已志，亦力主废除督办制。盛世才见黄等的活动威胁他的既得权位，便舍弃马仲英不予追歼，于6月25日匆匆回师。6月26日，盛世才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设宴庆祝胜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将陈中等三人枪杀。接着，又故作姿态，表示不恋居高位，欲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者在震慑之余，对盛、刘表示慰留。是时黄慕松已陷软禁处境，只得电告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维持督办制。7月7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致电盛世才、刘文龙，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疆方，平定叛乱之劳绩"；劝慰他们"万不可自生携贰"；要求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至是，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便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黄慕松也得以解脱"人质"地位，于7月9日离开了新疆。是为"第二次新变"。

同年8月1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外交兼司法部长罗文干入新视察。欲造成盛世才、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南疆马仲英的鼎足之势，使三方互相牵制，以利南京控制全疆。盛世才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于10月10日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勾结回匪二千余人，分扰西路"；声称要"率师出发，以张讨伐"。10月14日，盛军进攻达坂城。盛、马之战再起。盛世才又委派和加尼牙孜为南路警备司令，以孤立马仲英。马军势孤力单，由吐鲁番退守哈密。

11月，盛世才又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将郑润成和东北义勇军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后均被秘密处死)，将省长刘文龙软禁，捧出已是高龄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这样，新疆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操于他一人之手。

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策应，两面夹击，兵临迪化近郊。盛世才派外交处长陈德立、航空队长姚雄赴苏联请求出兵援助。苏联红军分由霍尔果斯和塔城两路进疆，次年1月26日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部逃往喀什。马仲英后来带其幕僚亡命苏联，余部由其部将马虎山率领，退驻和阗。盛世才曾请求苏联红军派一加强团进驻星星峡，以控制内地入新的门户。

和阗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趁盛世才、马仲英激战无暇南顾的时机，于1933年6月8日在墨玉县暴动，继而勾结和加尼牙孜于11月12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以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为国务总理，定喀什为首都。他们抵制马虎山部进入和阗，被马虎山击败。和加尼牙孜为保全自身，亲自将沙比提押送给盛世才，盛遂委和氏为新疆省副主席。盛世才利用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借助马虎山消灭了南疆这支敌对势力。至此，除南疆尚有马虎山部与盛抗衡外，全疆基本统一。

1939年以后，盛世才随着权力欲不断增长，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了他的独裁统治。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遭受严重的困难；同时，国民党反对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靠不住了，企图另找靠山，逐渐走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41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诬陷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被牵连入狱者达一千二百余人。著名文化人如张仲实、沈雁冰、赵丹等均遭到迫害。

蒋介石对盛世才的百般笼络，加快了盛公开反共的步骤。从1941年冬到1942年，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曾五次到迪化。1942年春，蒋发表盛世才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秋，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新，对盛表示抚慰。1943年7月，国民党任命盛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九分校主任，以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席。盛踌躇满志，随即取消六大政策，并把六星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公开宣布反苏、反共。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满载在新疆搜刮的金银财物，在朱绍良、徐恩曾的护送下前往重庆。当时有一首童谣："盛贼世才讲清廉，八十汽车没拉完，三架飞机还不算，二千骆驼在后边。"9月18日，盛世才就任农林部长时，蒋介石曾亲临授印。但是，深受其害的新疆民众掀起讨盛浪潮，发布"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盛世才祸新纪略》，送向国民党政府控告盛的罪行。1945年，国民党政府撤去盛世才的农林部长职务，责成法院查办。但盛以重金行贿，此案不了了之。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于台北。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黄琪翔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生于1898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家中世代务农，父亲黄富霖因家计困难，远赴南洋经商，以后家庭经济逐渐寻转。

黄琪翔童年在私塾就读。1910至1911年，入梅县务本中学、广州优级师范附中学习。1912至1919年，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1919年毕业后，任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炮兵队队长。陈诚是他队上的学生。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922年，黄琪翔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广东参加革命。到广州时，正值孙中山率师北伐，他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参谋。同年6月陈炯明叛变，黄改任第一师第一团副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沈鸿英之战。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加入国民党。次年任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黄任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黄琪翔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三十六团团长。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同时又进行南征，一直打到琼崖，统一了广东根据地。战后，十二师留驻琼崖。

1926年5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湖南支援唐生智作战，7月正式誓师北伐。黄琪翔随第四军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平江、汀泗桥、马迴岭等战役中，击败直系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颇有战功。

8月1日，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5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9月初，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中没有掌握实权，企图据有广州，另组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对抗。于是勾结张发奎，命黄琪翔带领第四军回粤。这时，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八一起义军入粤威胁下，表示欢迎第四军回广东。9月中旬，黄琪翔部到达广东。李要黄出兵协助打贺、叶。黄提出交换条件是李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四次中执监委全会。李济深不同意，黄便不肯出兵。李因与贺、叶作战将广州的兵力抽调一空，广州便为黄琪翔所控制。

在汪精卫的策动下，11月17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发动政变，以"护党"为名，驱走李济深，计划捕捉桂系首领黄绍竑，将驻广州的桂军和李济深留守广州部队包围缴械。18日，张、黄接收了军事委员会，以张发奎为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李济深亦调动两广和福建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广州。

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主力调到东江和西江布防。12月11日晨，共产党发动了广州起义。张、黄逃到广州河南李福林第五军军部，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调东江和西江的部队全部回师广州。13日拂晓，薛岳、黄镇球、李福林等部配合第四军进攻广州，起义被镇压下去。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铭枢为东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西路军总指挥，由李济深率领会攻广州。并下令查办张、黄。张发奎为保存实力，决定将部队撤出广东，自己出国游历。黄琪翔也逃往香港。1928年春到日本。7月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

这时，邓演达、叶挺、宋庆龄均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赞助邓在中国组织新党，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1929年5月，黄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8月，行动委员会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被选参加干事会，并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为蒋介石杀害。黄主持该党中央工作，负起与各地联系的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防京沪一带。黄琪翔同蔡时相过从，在抗日、反蒋问题上获得默契。1932年"一二八"事变，黄曾到前线参加作战，并发动上海行动委员会的同志支援战争。淞沪抗战失败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攻打苏区，被红军击败。黄琪翔认识到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才有生存立足的可能。曾在上海奔走，推动十九路军与苏区发生联系。

1933年9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酝酿组织福建人民政府，联共抗日反蒋。黄琪翔应邀参与其事。11月中旬，他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议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黄琪翔是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下设参谋团主任。他为了协调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矛盾，表示第三党政纲与中华共和国的人民权利宣言之基本原则相同，无单独成立组织的必要，于12月11日宣布解散。

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大规模军事进攻下失败。黄琪翔于月底逃到香港。6月，再度赴德国。次年初，在柏林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与蒋介石派遣的留德学生展开斗争。

1937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由陈诚引荐和蒋介石见了面。不久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炮兵监。同年爆发上海"八一三"抗战，他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右翼军副总

司令参加作战指挥。11月，上海抗战失败，全国西撤。冬，黄到达武汉。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蒋介石为了点缀"团结抗日"，又任命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但是，政治部中反共势力日益嚣张。8月间，黄、周先后去职。之后，黄被调到军训部任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

1939年秋，黄琪翔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湖南邵阳，准备应付日本侵略军进攻长沙。不久又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设指挥所于湖北枣阳，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防守随、枣地区。1940年5月，日军向大洪山区进犯，图占领宜昌。第五战区在随、枣、当阳、荆门一带布防，由黄琪翔和汤恩伯、张自忠分别担任正面和左右翼作战。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黄不得不撤至襄樊。张自忠被包围，在激战中牺牲。黄琪翔满脸悲愤，撤退时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在办公室黑板上。撤退后他沉着指挥，积极反攻，7月收复了枣阳。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

同年冬，黄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第六战区辖长江南岸鄂西、湘西地区。为了把湘西的粮食抢运到鄂西供应部队，战区成立了湘谷转运处，黄兼处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

太平洋战争在这年12月爆发。1942年，中国组成远征军，准备协同盟军进攻缅甸日军的基地。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昆明，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黄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负责油管警卫。1946年司令部撤消，黄回到重庆。

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黄琪翔不愿参加，又无挽救办法，便回避现实，主动要求担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于1947年6月起程赴德。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阶段。蒋介石政权濒临复灭，寄希望于美苏冲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8月，由于西柏林换新货币问题引起美苏矛盾扩大，形势颇为紧张。10月，黄琪翔接到蒋介石要他回国报告美苏关系的电报。黄到南京见蒋，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的因素，劝蒋停止反共内战。蒋大为失望。黄又劝他恢复和谈，蒋更为不满。这次会见，使黄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便不愿再去柏林。年底，由上海转广州，潜赴香港，决心归附人民。

1949年8月，黄琪翔以特邀代表名义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参加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10日，黄琪翔病逝于北京。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方振武

方振武，字叔平，安徽寿州(今寿县)瓦埠镇人。其父系当地一名正直爱国的乡村塾师，方因此自幼得以遇于文墨。稍长，在接触到一些革命书刊后，开始倾向于反清革命。成人后投入清末的新建陆军，在安庆武备学堂学习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并于1908年在安庆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新军马炮营起义。辛亥革命时，加入由上海革命党人和沪浙苏军政府合组的沪浙联军，参加了光复南京之役。两年后在"二次革命"时，又在山东参加了讨袁军事活动，于徐州率一营兵力与袁军激战。讨袁失败后，东渡日本，进入孙中山委托李烈钧办的军事训练班"浩然庐"学习。1914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建的新党——中华革命党。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非常国会上当选为大元帅，组护法军政府时，方振武已回到国内，旋被孙委以海军陆战队司令职。翌年，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和政学系分子排挤下辞职赴沪，方亦于不久后去职。此后，在无所凭依的彷徨苦闷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观望，他进入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部任职。1926年初大革命高潮行将到来之际，已在张宗昌部直鲁联军中担任军长的方振武，毅然率部脱离张宗昌，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统，受编为国民5军，继续任军长。不久，在国民军与奉直军阀的大战中，他又被委以口北镇守使兼东路军第2军军长等重要军职，奉命率部掩护国民军从北京撤退及参加大同一带与晋军的作战。同年秋，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后，方部被统编为国民联军第2军，方受任为国民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兼援陕部队第一路司令。随即率部从左路进军，解西安之围，兵锋直指潼关。翌年4月，国民军系统部队被武汉国民政府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方出任该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奉命率部出潼关，经洛阳挺进郑州一带。7月，方部在湖北襄樊一带宣布脱离第2集团军。

宁汉合流反共后，新军阀战争纷起。当年9月，在桂(系)唐(生智)大战中，方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为"讨逆军北路军总指挥"，受命率部由襄阳会攻武汉。但因战事很快即告结束，方部未参加实际战斗。1928年2月，方部正式列入南京方面直属的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编制序列，方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第4军团总指挥，随即奉命率部沿津浦路北上，会攻奉系军队和直系残部。在战败直鲁联军后，方部进驻北平。同年底南京召开"编遣会

议”后，方振武部奉命编遣，于1929年初缩编为两师，方担任第45师师长，其老部下阮立武被任命为第44师师长，方仍握有该两师的实际指挥权。同年3月蒋桂之战爆发前夕，蒋介石扶助唐生智再起，策动被桂系收编的原唐系湘军还唐反白（崇禧），欲将白扣留于北平。方得此消息后急告白崇禧，使白得以及时采取对策脱险南下。蒋桂之战正式爆发后，方被南京委任为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这时方已无意助蒋，因欲得到山东省地盘徐图发展，乃不得不与蒋虚与周旋，是以出兵并不积极，也未参加实际战斗。蒋潜知方之态度后，于是年5月将方委任为安徽省主席兼第六路军总指挥，准备对方部予以相机解决。此时方对蒋削弱异己之举措已十分警惕，为免遭桂、唐前车之辙，他在赴皖上任之前曾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人暗中进行反蒋酝酿，以为后路。但蒋事先已在安徽省府中安插好CC分子及特工人员多名，不久，方反蒋之事遂被蒋侦泄，9月，蒋以在南京召开会议为名，将方召开南京予以扣留。经审讯后，方被投旋汤山陆军监狱，一度几遭杀害，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才得机脱离缧绁。

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作战不利，冯玉祥乃于张家口召集旧部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方振武闻讯后，悉数变卖家产，筹得十万余元，随即秘密潜赴山西，拉起旧部张人杰、鲍刚两个师两万余众，宣布加入冯部同盟军。但因南京方面禁止用火车载运部队并拟予以截击，方部不得不长途跋涉，至5月始抵达张家口。随后，方振武被冯玉祥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7月，方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一起指挥抗日同盟军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声震中外。不久，抗日同盟军遭到何应钦指挥下的黄杰、关麟征、万福麟等部队的“讨伐”，同时还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日军的攻击，陷入危境。10月抗日同盟军在北平郊区昌平、顺义一带最后失败，方振武、吉鸿昌为商震部队所获，后经商震暗中营救，二人始得于押解途中脱险，潜赴天津。嗣后，方转赴香港，以后又流亡英国、意大利，在海外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他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同盟”，并出版了《国民公认》刊物，呼吁停止剿共，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他还亲自开展募捐活动，对国内的抗日救亡活动予以资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回到祖国，希图重返抗日战场率部杀敌，但仅被委以军事参议院参议的虚衔，并未获准重新带兵。方失望之余，由桂林再度转赴香港寓居，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很快为日本侵占。此前国民党人员安排撤离香港时，方竟未获撤离机会。香港沦陷后，日军开始对抗日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在港人员进行搜捕，方因一向力主抗日，处境万分危险，急迫之中，他将家眷安顿后，于同年12月中旬化装成农夫秘密离港。进入广东境内后，遇到国民党军统局系统“忠义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方告以其真实身份，不想以后竟至杳无音讯。一代英豪就此含恨冲天。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珍闻轶事

一名日本兵与十万发子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33年春，东满“抗日救国游击军”刚刚成立，李延禄军长带领第二、第三团骑兵营共500余人转移到了汪清县嘎呀河区的马家大屯。敌人纠集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四县的3000多名日军由傲肉村一指挥尾随“清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游击军做好了战斗准备，当地的群众也组成了担架队，朝鲜族妇女用中日文字写了大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你们的母亲、孩子天天盼望你们回家！”等标语传单，贴在敌人进山道路两旁的树上或压石头下面。

3月30日战斗打响了，从拂晓到黄昏，敌人一直用飞机大炮猛轰孤独山，被困在山上的游击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最后弹药耗尽了，敌人仍不断攻来。没有弹药，军长李延禄心急如焚，只好命令部队到战场上去捡敌人丢下的子弹。午夜时分，战士在嘎呀河下游大肚子川附近一片隐蔽的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日军汽车，车上满载着步枪子弹，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战士们从来没有想过能得到这么多的子弹。再仔细地搜查发现，汽车发动机被破坏了，在离松林不远的嘎呀河边发现了一具日本士兵尸体，离这具尸体十几步远，有一块石头压着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条，上面用日文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河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决心自杀了。我把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

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游击军的战士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向他的遗体默默地围拢过来，一行行眼泪从人们脸上流下。伊田安祥地闭着眼睛，浓黑的眉毛舒展着，满脸鲜血和泥土丝毫未能改变他庄严的遗容。战士们挨个去握他的手，轻声地呼唤着："伊田助男同志！"

敌人的"清剿"粉碎了，孤独山上的战士们得救了。伊田助男和游击军烈士一起被埋在一片幽静的青山翠谷中。3天后，游击军的同志和马家大屯的群众在伊田助男的坟前举行了追悼大会，并且把马家大屯小学改为"伊田小学"，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事件发生以后，日本特务机关曾在傲岗旅团内部进行大搜捕，后调往延吉全部解散，该团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傲岗村一也被撤职。

（选自《党史博采》89年8期）

阮啸仙审计稽费

阮啸仙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曾和毛泽东、彭湃等一起办过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我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

"一苏"大会召开时，阮啸仙虽不在中央苏区，也未参加会议，仍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1月，阮啸仙偕同冯桑等人来红都瑞金。在翌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阮啸仙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职责是审核苏区政府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苏区政府预算的执行。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二苏"大会一结束，阮啸仙就到审计委员会就任。

当时的审计监督机构是随着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1932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随后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审计法规。不久，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了审计委员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红军内部建立审计委员会稽查员。

阮啸仙一上任，就将这一批人马集中起来系统学习审计法规。他说：中央政府制定的审计条例，是基本审计法规，具有全面性、稳定性和指导性，是制定其他审计法规的依据，也是指导审计工作的根本依据。他要求每个审计员和稽查员必须逐章逐条逐款弄通弄懂。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干部队伍中的少数人，有的怕过艰苦生活，有的是混入革命队伍中投机分子。于是出现拿公家物品私用或浪费贪污，基层政权收入不上交，自收自用，支出不决算等现象。为了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收入，严格经济开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阮啸仙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同志们首先深入各单位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经过调查，掌握了基本情况。阮啸仙说："我们的审计监督必须抓住重点，把精力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全局的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问题上。抓重点，从面上看，确定重点审计对象，从点上看，要抓住重点审计问题。"

3月，阮啸仙率领大家来到中央机关这个"重点单位"，着重审查中央机关预算、开支这个"重点问题"。通过审查中央总务厅、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部、内务部、粮食部等中央各部本月份的预算帐目，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为各单位编制了预算决算制度。通过统计，2月份中央各部共有工作人员849人，机构臃肿，导致开支过大。阮啸仙将这些情况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后，中央下决心将各部人员减至680人，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接着，阮啸仙先后召集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检查他们的经济收入状况，指出他们"不考察产品的成本，不知道计算盈亏，有钱就用，没钱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的弊端，要求他们加强成本核算，健全会计制度。

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有重点的审计监督，苏区政府觉察和发现宏观管理和决策上的问题，从而加强了财政管理和监督，严格了财政纪律。

阮啸仙说：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必须实行公开审计。

此后，中央审计委员会对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后，都形成一种书面审计报告，报告审计工作的结果，在肯定他们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被审单位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报告写好后，张贴在该单位醒目之处，供大家审查。

1934年3月底，阮啸仙率同志们对瑞金县苏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束后，贴在县苏大门口的审计报告反映了以下情况：瑞金县苏在反浪费斗争中取得很大成绩，"去年(1933)10月全县用7466元，今年2月，减到4616.1元，节省五分之二强"；在节省过程中，县区工作都有进步，"县苏从前300人的，现在104人。有些区从前50—60人，现亦作到大区30人，小区22人"。报告还指出瑞金县工作中的缺点："1.县苏本身预算制度相当建立了，但区一级虽有决算，而预算是县苏代做的，没有发扬区级工作

同志对于执行政策的积极性，节省运动也未深入到区乡去。2.裁减人员未有很好的联系到改善工作方式和增加工作效能。3.检举贪污浪费，追缴贪污款子达6万多元，但没有把发生贪污的根源和防止贪污的方法，来教育广大群众。"

4月1日，阮啸仙在互济会反帝拥苏大同盟审查财政收支后指出：互济会财政状况的严重缺点是：1.拿救济费做机关开支，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事；2.会费一塌糊涂；3.各捐款没有去检查；4.开支项目不适当。阮啸仙严肃地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一是要认清互济会本身的特别任务，为要达到他的任务来检查各级的用费和捐款，使所有款子都用在发展工作和救济上；二是建立各种会计制度，收款支款和经手的救济款项，都要有详细的计算和检查……。

阮啸仙还特别重视发动群众参加审计监督，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如中央印刷厂会计杨其兹的贪污帐目，开始查了很久未查出。后来阮啸仙发动该厂的少共轻骑队与全体工友参加审查，终于将他的贪污帐目完全查清楚了。

由于审计委员会的稽核、审查，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在财经制度和机关作风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中央苏区军民交口称赞苏维埃政府是"空前廉洁的政府"！

1934年8月，阮啸仙受命组织赣南省委，以于都、安远、兴国、信丰等县为中心区域，领导赣南地区的军民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阮啸仙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苏的形势更加严酷，敌人以重兵设置重重围圌。阮啸仙身患重病，仍投入了紧张的突围准备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部署工作，指挥战斗，鼓励红军游击队员说："那怕剩下一个人，只要突围出去，就是活路，就是党的一份力量。"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阮啸仙还亲自起草了一份给林匡支队长、刘英政委的指令，要求他们以连为单位突围。1935年3月6日，当阮啸仙，刘伯坚等率部突围冲破敌马岭、牛岭间的封锁线时，阮啸仙在信丰小埂被一颗流弹击中，当场倒下，壮烈牺牲，年仅38岁。

陈毅惊悉阮啸仙牺牲后，含痛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存。"

（选自《红都记事》）

一张经历不平凡的朱德照片

在我国军史资料中，有一张红军时代的珍贵照片《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它并非出自哪位名记者或摄影家之手，其作者是如今已83岁高龄的红军老战士、原四野副参谋长苏静将军。他说这张照片从拍摄到冲出胶卷，洗出照片历时三年余，并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消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缴获了一批他们刚从外国进口的轻机关枪等新式武器，这种轻机关枪红军还不会使用。一军团在江西遂川办了一个机枪训练班，请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来训练红军。苏静当时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员（参谋）。他是1932年从福建龙海参加红军的，此前曾出国到缅甸谋生，并且学会了照相。他参加红军后成为当时红军中唯一会摄影的人。红军从遂川的天主教堂里弄到了一部120照相机，就归他保管使用。那时胶卷比黄金和人命更珍贵，仅有的一个胶卷又不敢轻易拍，得留着有重大事情时用。机枪训练班开学后，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告诉苏静：朱德总司令要在训练班上讲话。苏静觉得，这可是件大事情，应该拍摄下来。就趁朱总司令在树林里给学员们讲话时，拍下了当时场景。那时用的是6张一卷的120胶卷。为了节约，只给朱总司令拍了一张，以后又照了一张。从此，这个胶卷就再也没有动过。当时的苏区，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的"围剿"，有时连食盐都没有，胶卷自然是一种"奢侈品"，更没有冲洗胶卷的起码条件，只得把照过的胶卷带在身边。反"围剿"失败，撤出根据地时，苏静带着这个胶卷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贵州遵义。苏静在遵义城里找到了照相馆，冲洗出了胶卷。他本来担心胶卷坏了，没想到冲洗出来后底片效果挺好，但在遵义没能洗出照片。苏静又带着底片继续长征，经历千山万水一直带到陕北，此时已是1936年底。一张记载当年红军生活和朱总司令形象的历史照片，从拍摄到洗出照片，历时三年多，更经过了几万里长征，又经历了60年的风雨，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了一件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

（摘自《历史大观园》）

倔大爷三考毛泽东

1933年的春天来得早，大地生机盎然，树枝已挂上了片片绿叶，稻田里长出了绿地毯似的秧苗。山间田野，青翠碧绿，生机勃勃。

一天，毛泽东带领几名警卫人员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瑞金武阳区，实地调查研究，了解春耕生产情况。

毛泽东身穿灰白色旧军装，上衣的四个口袋显得比别人的大，这是特制的"毛泽东式"的衣服，为的是好随身携带笔记本、书和材料等。他脚穿草鞋、肩背斗笠，尽管一

个多月前，他被恶性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现在大病初愈，脸庞还明显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头发已盖过耳垂。但他不听警卫员的劝阻，执意要深入第一线。因此，他故意把脚步迈得大而有力。警卫员不得不连走带跑才没有掉队。

到武阳后，毛泽东白天同群众下田劳动，则利用饭前饭后，田头地畔休息时和晚上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早上，毛泽东等人来到另一个村庄搞调查，住在一家人少房子较宽敞的邹大爷家里。这位邹大爷在村子里小有名气，他办事认真，性格耿真，乐于助人。他有个怪脾气，就是凡事都要赢，认准的理九牛拉他也不回头，村里人送他个雅号"倔大爷"。邹大爷对此雅号觉得不错，慢慢地村子里没人叫他邹大爷，都称他"倔大爷"了。倔大爷见来了干部住在自己家十分高兴，热情招待，但他不知道住的竟是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这天早上，毛泽东走得很急，加上病后体质虚弱，感觉很疲倦。警卫员看到后打开行李，请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不料，毛泽东看见"倔大爷"正蹲在院子里整理稻秧，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便打消了休息的念头，擦把脸，招呼警卫人员一起帮着倔大爷挑着稻秧到田里给他插秧。

倔大爷连忙推辞，并张开双手阻拦说："不行啊，这活累啊，还要有真功夫的！"说完又不禁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

毛泽东看出倔大爷有意要考考他们，便来了兴头，笑了笑说："累倒不怕，技术倒要请您老多加指教。"说着，就脱掉草鞋挽起裤脚对警卫人员说道："来，咱们来个竞赛，看谁插得快，插得匀，插得直。"

竞赛就这样开始了。

倔大爷看着他们干活的那股麻利劲儿，心里十分惊异，自己不由得从田畦上跑上跑下为他们送醮好了肥料的秧苗。他眯起眼睛一会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发现他们插得又快又好，当真是个内行时，乐得一颠一颠的。不久，一丘田就插完了。倔大爷拔脚就往家里跑，叫老伴赶快打点酒多弄几个好吃的菜准备早饭。他返回田里叫他们吃饭时，顺便牵了头牛，肩扛犁田工具，准备再犁好剩下的两丘田。倔大爷放下农具就叫毛泽东他们吃饭。毛泽东看见老人扛来的用具，忙问："还有田没有犁吧，干脆一鼓作气把活干完再填肚子好不好？"不待他们回答，毛泽东又熟练地牵过水牛，套上车耩就下田了。

犁田耙田是田间活里难度最大的活儿，掌握不好犁头深钻到地下把犁头都会折断。倔大爷想到这，立即上前抢过牛绳："哎，同志，这牛挺犟，还是我来，做顺手。"

毛泽东一听这话，就哈哈大笑："老大爷，你是信不过我吗？我也有两下子呢！"

倔大爷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们去了，自己站在田埂上当"看官、监官"。看着看着，他不由地咧嘴笑了，竖起大拇指夸赞开了："呵呵，看来你们都是种田人出身，才有这呱呱叫的本事啊！"

田犁好了，而时候也的确不早了。倔大爷强行把毛泽东几个拉回家里吃早饭。耙田的事只好等饭后再说了。

五月的太阳，虽然没有炎夏的太阳那么毒，但晒起人来也是火辣辣的。早饭后，倔大爷无论如何不让他们再下田了，而毛泽东盯住倔大爷看了几秒钟不说一句话，倔大爷不知怎么回事停住也看着毛泽东。毛泽东故意沉下脸来说："我们知道您是有名的倔大爷，看不起人，今天这些活我们包了。我们就是要在你面前露一手的！说定了，就这么办！走吧。"说完领着警卫员就走了。"

耙田这活，看起来挺容易，两手执着耙柄，赶着牛跑即可，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把田耙得平整不露坎坷，没有几手真功夫是不行的。转眼间，只见毛泽东挽起裤管衣袖，大大咧咧地下田了。随即又对两位警卫员说："这次我耙这边，余下的让你们表演表演，看哪个的手艺更高？"

约半个多小时，一块象镜子般平的田出现了。这回倔大爷和警卫员都一起吐出了舌头，对毛泽东这一手佩服得不得了。

毛泽东上了田畦对警卫员吴吉清说："看你的啦，可不要给我丢脸啊！"

小吴会意地点点头，一个箭步就下了田，操起了耙具。

趁这当儿，毛泽东揩了一把汗，与倔大爷聊开了话。

这时，小吴喊起来了："啊，主席，我的技术怎么样？"毛泽东抬头望了一眼小吴，看了看他耙过的田说："行呀，小伙子！倔大爷今天都倔不起来了，我们赢了！"

小吴这一喊，倔大爷大吃一惊。"啊呀，你就是毛主席。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怎么当得起呀！"不觉两眼湿润了……。

（作者：范敬如，选自《党史文苑》91年5期）

谢觉哉与中央苏区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1933年5月中旬，一位头发花白老人，从上海辗转到达苏区瑞金。他就是谢觉哉，人们习惯地尊称他"谢老"、"谢胡子"。他文绉绉的，平时讲话不多，却整天笑呵呵的。人们都说他心地善良，可亲可敬，是个没有脾气的好老头。可是，谢老在苏区瑞金，的的确确发过一次火。

谢老发火，是在1933年11月。当时，毛泽东派谢老

到瑞金县苏检查工作。经过几天了解，谢老听到一些群众反映瑞金县苏某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现象严重。谢老决定蹲下来认真地查一查。

一天吃饭时，炊事员特地在谢老的菜碗里加了点油和盐水，并另用酱油泡了一碗辣椒。谢老从菜碗里发现一些“名堂”，便笑呵呵地对县苏主席杨世珠说：“世珠，咱们换碗菜吃吧！”

“不啦！”杨世珠急忙回绝说，“我的菜已经吃了一半，怎好与你的换。”

谢老从世珠的碗里挟了一口菜，送进口里，边吃边说：“你碗里的菜清淡无味，我碗里的菜却油盐到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老，你年纪大了，我让炊事员在你的菜碗里稍微加了点油花和盐水，这也算不了什么啊。”

谢老摇了摇头说：“群众都说，苏维埃好，好就好在官兵平等，干部带头，你们这样对待我，不就把我推到群众的对立面去了？！”

谢老将一碗菜和辣椒分挟给一起吃饭的同志们，自己留了几只辣椒，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第二天，炊事员端给谢老的菜依然同昨天一样。谢老脸一沉，将菜碗重重地往杨世珠面前一放，一字一句地冲着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非要饿死我这个老头不成？”

杨世珠吓了一跳，他急忙找到炊事员，原来炊事员并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一场虚惊。谢老又将菜分挟给大家，自己也留了点。

这天晚上，谢老将杨世珠和财政部长蓝文勋留了下来。灯光下，谢老的脸绷得紧紧的，慈善的眼睛突然冒出一股火焰。谢老的神情使杨、蓝二人战栗了，他们呆呆地坐着，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你……你们还算是一个共产党员吗？你们还配做一个苏维埃干部吗？面对残酷的战争，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节省一个铜板一口饭支援前线，你们这里却大行挥霍浪费、贪污营私。会计科长唐仁达所作的账目是真是假，你们都检查过了吗？他所贪污的款项数目之大，你们知道吗？同志，这是犯罪啊！”谢老越说越激动，责令他们向组织作出深刻的反省，并要他们立即将唐仁达隔离起来审查。

谢老的火已在心头积压了许久，几天的清查情况越来越使他惊怒难忍。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单只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节省款、群从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 34 项，合计大洋达 2000 余元，还在未行累计的贪污浪费数目。这简直是一本罪恶账。苏维埃政府中竟然用群众的血汗养肥了这样一个“贪官污吏”，谢老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说起贪官污吏，谢老是一贯深恶痛绝的。还是在 1910 年 4 月，湖南发生米荒。可是官绅富商以及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平时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涨到七八千文一石。长沙城外一乡民，只有 70 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忧愤交加，全家 4 口人投河自杀。这件事激起了群众的义愤，要求官府开仓平粜。可是清朝官吏先是欺骗，而后是镇压，终于激起了公愤，发生了 2 万余人参加的抢米事件。这一事件在年轻的谢觉哉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振动，他当即写了一篇小评论。他说：“民以食为天，这是古之道理。灾民有难，官府不但不管，反而和豪绅巨商串通一气，敲诈勒索，这是官逼民反。”由此，谢觉哉同志更加深切理解到了人心民意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巨大的作用。

年近半百的谢老来到苏区后，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每天只有 3 钱盐，2 钱油，12 两米（16 两为 1 斤）。每餐只那么一小碗饭，伴着清汤菜水，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仅几口就吞咽完了。每当此时，谢老总是强忍着饥肠辘辘，笑着将自己碗中的饭拔一些给毛泽东。谢老陪伴毛泽东办公，常常到深夜。为了对付饥困的折磨，毛泽东有时找个南瓜来，切上一片，和皮一起煮着吃。

谢老将他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也十分气愤。唐仁达被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蓝文勋也被撤职查办，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谢老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拟订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训令指出：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1. 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

（甲）贪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乙）贪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

……

4. 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见《红色中华》第 140 期）

这个训令一经公布实施，一些贪污犯罪分子被群众检举出来了，苏区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风气形成了，谢老脸上的笑容又出现了。

（选自《党史文汇》91 年 5 期，作者：刘良）

孙殿英一生中的小光点
——热河抗战

1933年1月1日日军制造榆关(即山海关)事件后，张学良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所属第四军团万福麟部在平原、凌源、叶柏寿等地布防。张电令孙殿英率部驰援热河。孙殿英通电领命，率部北上。

2月下旬，孙殿英率部3万余人，经古北口进抵热河围场，以围场为司令部驻地。于3月初抵达赤峰以北布防。日本茂木骑兵旅纠合伪满蒙军共四五百人从下洼直奔赤峰而来。3月1日晚，当孙部急行军进抵赤峰部署未定时，日军已控制赤峰东面高地并向孙部发起攻击，伪满蒙军夹击策应。孙殿英率部反击，所部官兵浴血苦战，打退日伪攻击，日军复增兵向东南、东北进攻，配以坦克、大炮及10余架飞机狂炸，孙率3个团奋勇抵抗，一度夺回东北建昌营子等五六个村镇，与敌鏖战相持7昼夜，"毙敌四五百名，孙军阵亡团长两名，伤营长以下军官19名，士兵伤亡170余名"，二团一营全体官兵殉国。6日，赤峰失陷。7日，日军第六师团茂木骑兵旅团及高田支队奉命由赤峰往围场追击孙部，在广道河西北高地展开激战。孙部与敌苦战，并于同日电北平军分会请求接济。翌日午后，孙部不支，向沽源、多伦一带撤退。至此，热河省全部失陷。不久，孙部移防沙城一带。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英的防地与同盟军壤地相接，蒋介石为杜绝冯、孙联合，使出调虎离山计，委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诱其移军西上。孙原以西去能摆脱各方掣肘，遂欣然领命。

孙殿英率部西进的军事行动，使青海、甘肃、宁夏各省的地方军阀大为震动。西北地区久为马氏仲昆天下，针水难进。蒋介石诱使孙殿英西开，除防其参加抗日同盟军外，本意还在借力翦除异己，故在孙部西上的同时，蒋先已密令马鸿逵对孙部予以中途截击，并委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兼西北地区绥靖主任，节制西北三省军务。马氏兄弟与朱绍良先后发表通电反对孙军西进，并调兵三旅布防磴口。

孙部兵进五原后，获悉二马阻其西行的情报，遂停兵整补。但五原一带属晋绥势力范围，阎锡山对此如芒刺背。正在这时，阎接到蒋介石令：俟宁夏打响，阎部立即相机行事，断孙后路，彻底解决孙部。阎竭力劝孙及早西进，孙推说枪枝弹药不足，屯兵不前。阎不得已，准备了一些枪弹为礼，"送客"西行。孙殿英心里明白，他对部下说："阎老西不愿我们在这里过冬，给我们补充弹药，是叫我们赶紧走路。"

孙殿英偏促绥西，进退维谷。为摆脱困境，采取"联纵"办法，四出求援。一时间，孙的司令部来了各路人士，有反蒋派的广东国民党执行部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汪精卫改组派的代表；国统派的C·C分子及伪满溥仪的代表。孙殿英同时派人和中共联系，希望和西北军杨虎城及陕北红军建立西北统一联盟。

经过一番筹措之后，1934年1月12日，孙殿英正式发出移防通电，谓："官民饥寒交迫，实不能坐以待毙，只有本屯垦令西行。"克日率部向宁夏推进。农历正月廿日，孙部到达石咀子，与马军交火。战况十分激烈。开始，孙军进展顺利，一周内连克石咀子、五响堡、馒头桥，兵临宁夏(今银川)城下。马鸿逵向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甘肃西北绥靖公署朱绍良通电告急。朱绍良迅即调兵增援。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孙、马停止军事行动，原地待命、静候处置。1月20日，阎锡山改变以前支持孙军西开的许诺，电劝孙部停止前进。孙殿英对西北边陲垂涎已久，不肯罢休。为了速战速决，孙定下"明攻李岗堡，暗袭宁夏城"声东击西作战计划。攻城战开始，很快占领城外两道堤岸，居高临下，胜券在握。不料孙部旅长杨干卿为马收买，将攻城计划暗通，致先后4次攻城失利，孙军元气在伤，双方战况胶着，形成对峙。2月9日，朱绍良派飞机助阵，马军转守为攻。激战经旬，至2月13日，孙军伤亡惨重，有损无补，师老兵疲，军心涣散，无力再战。2月19日，何应钦一面宣布停发孙部饷项、给养；一面授意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北平军分会委员胡毓坤、戢翼翘等联名致电孙殿英，促其遵令停止军事行动，交出军权，离军引退，解甲归田。同时，国民政府又明令撤消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3月20日，孙部在晋绥、甘、青、宁等军四面夹击下，陷于瓦解，孙殿英被迫通电下野，后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晋祠。

1936年2月，孙应宋哲元之邀，潜居北平，租住后门帽儿胡同端王府公馆。这时，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成立了一个"进德社"，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级官员俱乐部，内设有中西大餐、各种赌具，歌舞清唱，无所不有。一些失意闲人、名士、政客、寓公如吴佩孚、王揖唐、齐燮元、王克敏、江朝宗、潘毓桂等，都经常出入此社。孙是"进德社"中活跃分子，不久，宋哲元委他"察北保安司令"，是个空衔。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召集在平赋闲的各方将领，成立抗日国军总司令部，任孙为冀北民军司令。28日夜北平失陷，宋哲元部撤守保定。孙带着邢肇棠等200多人退往房山，并收容散兵和平津流亡青年达千人，加以编练。蒋介石委孙为冀察游击司令。日军沿平汉线南犯，孙率部南撤，继续收容散兵游勇，发展实力。

1938年，孙部退驻河南林县一带活动，与日军有过数次交战，缴获了一些马匹枪枝。蒋介石又委以新编第五军军长，辖2个师。邢肇棠任副军长。建制上归第二十四

集团军庞炳勋指挥。此后三四年间，孙殿英纵横捭阖，力保实力。他利用庞炳勋的庇护，避免和国民党嫡系军队发生冲突；他极力表现抗日姿态，向八路军默契互不侵犯，争取八路军的援助；他同时又暗地与日伪势力秘密勾搭，并派亲信路传远（涉县警备司令）率所部300余人降日，编为汪伪和平军第二十三师，充当他同日伪联络的牵线人。他又配合蒋介石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迫害所部进步分子。

1943年春，日军发动第2次太行山大扫荡，进犯林县、陵川。孙殿英竭力避免同日军接触。5月，孙部在林县被围，继而孙被俘，即投降日军。所部改编为伪新五军，孙任军长驻防新乡，并带人到莲花山引诱庞炳勋率部投敌。庞投敌后所部第二十四集团军番号不变，庞仍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兼豫北保安总司令。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于8月11日任孙殿英为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受命率部在京以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之间，掩护和策应蒋军北上抢夺受降权。1946年7月，孙殿英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官，隶属胡宗南指挥，驻防汤阴。1947年4月22日，与刘伯承将军所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接上火。县城被炮火轰开后，孙殿英夺路逃跑，5月2日化装成一名士兵被俘。因鸦片烟瘾发病死狱中。

（摘自《民国春秋》）

吴稚晖笑话一则

1933年，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参加五省铁路通车典礼剪彩，顺便到安徽黄山游玩，路过宣城。当时宣城县的县长名叫周君南，湖南人。此人在任县长期间的最大"政绩"，就是不顾宣城市政建设的客观实际和需要，耗资修建了一座鳌峰公园。周君南获悉吴稚晖到了宣城，便率领社会各界名流到火车站迎候，邀请吴稚晖下车休息。

可是当时这座皖南古城市政建设极差，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地方。在当时县一级的城镇中设有公园的也很少，所以周君南避开破旧不堪的县城，也不请吴稚晖到县政府暂憩，却请他一行游览由自己一手建造起来的鳌峰公园，以博元老一笑！吴监委听说宣城还搞了个公园，顿生雅兴，于是欣然前往。

周君南当初建这座鳌峰公园，就是想替自己树碑立传，标榜德政的。他让人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茶室式样，建造了一座辉煌壮观的楼阁，并以他的名字中的"南"字，命名为南亭。亭内左右壁上点缀了几幅名人字画，陈设也十分讲究。周君南此人要名心切，厅的中堂上极为醒目的位置，悬挂上一幅在玻璃匣内的他本人的半身肖像，但麻烦也就出在这里。

一路石阶登级而上，周君南小心翼翼的陪同吴稚晖步入南亭正厅。这位吴监委尚在喘息，突的抬头看见中堂上挂着一幅大画像，顾不上认个清楚就连忙脱帽肃立，然后对着肖像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原来他以为是孙中山先生像哩！陪同的随员在一旁却认得清楚，肖像上的人正是这位陪同的周县长，不知吴先生何故要给小小的县令肖像行大礼？脸上显得十分惊诧。站在近旁的周君南则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尴尬地连忙阻挡说："这是我的像，我的像。"吴稚晖正在鞠第二个躬，听见有人解释后抬起头定神仔细一看，果然搞错了！吴稚晖暗自思忖道："这个小县令也是太可气了，有什么资格在中堂上挂这么大一幅肖像?！我吴稚晖年轻时就追随先总理，如果此时连孙先生像都认错了，这叫我如何下台？转念一想，就是有气现在也不能发，传将出动岂不让世人笑话？只有将错就错，巧为掩饰。吴晖不冷不热地答道：没关系，没关系。"他就势又行了第三个鞠躬礼。

老于世故的吴稚晖自己闹笑话，反将了周君南一军，窘得周君南当即命人将自己的肖像取下放置一边。原想观赏风景的吴稚晖和巴结高官的周君南都弄得兴趣全无，鳌峰公园一游草草收场了。如今鳌峰公园已毁而不存，吴、周两人均已作古，但吴稚晖闹的这场笑话当地还在流传。

（郭画）

冯玉祥造福泰山

1931年底，隐居山西的冯玉祥应汪精卫之约来南京参加救国会议，准备与汪精卫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并实行自己的抗日主张。冯到宁不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冯玉祥为第十九路军的抗战捷报欢呼雀跃，联合国民党内有识之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要求政府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给予第十九路军军事、财力及道义上的大力支持，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然而，蒋、汪重新使命的南京国民政府，却不作抗战的积极准备，反而对十九路军多方掣肘，竟决定迁都洛阳，终以屈辱的淞沪协定获得了苟安。冯玉祥的抗战主张得不到实现，因此，愤而辞去蒋、汪许诺的要职，毅然称病北上，息影泰山。

从1932年3月到1935年6月，除去1933年冯去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上，冯在泰山住了三年多时间。冯的住所在泰山西麓山腰的普照寺，后来又移住更高处的五贤祠，这里林木秀丽，气象奇伟。冯玉祥"隐居"于此静观形势，终日读书习字，孜孜不倦。但是，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悲愤的，他读书的房间墙壁上刻着一行诗句"救民

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当是他心情的写照。为此，他聘请了一大批知名人士来泰山讲学，他学的功课可谓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从《春秋》、《左传》到辩证法唯物论，从白话到英文，从修辞学到心理学、生物学，各种书籍，无不研读。不过，他最大功夫的是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阅读了《资本论》在内的一批马列著作，在李达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辅导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悟出“若不信辩证唯物论，是我民族不能复兴”。1935年8月3日，冯特地把上述16个字写出来，在普照寺旁的林中空地上，立了一块石碑，把这16个字镌刻其上。

读书学习之余，冯喜欢早晚在山间散步，他穿着蓝布做的棉袄棉裤，腰袄长仅及膝，这种装束，象个普通的农民，遇到泰山上下的轿夫、种地的老头子、送饭的老婆婆，经常精心他们亲热聊天，周围的老百姓都亲热的称呼冯为“老先生”。

“老先生”一直是以老百姓之心为心的。他的卫队驻扎在泰山西麓，从未动过百姓一根草，还经常打扫街道。过年过节，“老先生”还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匹一匹的老蓝布分送给他附近的老百姓。那些平日吃野菜，窝窝头，能有点大葱、韭菜吃吃就算不错的穷苦百姓，对这位“老先生”真是说不尽的感激。

那是冯玉祥刚到泰山时，他来到普照寺下的老百姓家访问。春寒料峭的时节，那些穷人的破草房四面漏风，一家老少蜷缩在烂棉絮里瑟瑟发抖。更穷的人家，连破棉絮都没有，地上垫一层干草，席地而卧。看到这样的情景，穷苦出身的冯玉祥不禁潸然泪下。联想起在南京看到的那些新贵和权要人物，住着温暖的洋房，摇着躺椅，抽着雪茄烟(那一支雪茄得花几块大洋，足够一家农民生活一个月的)。两相对照，更激起他对穷苦百姓的无限同情。他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终年劳动，竟不能一饱，实极可怜，拟即设法救济。”

冯在泰山的生活主要靠韩复榘和宋哲元月馈数千元资助。他规定他和家人每人每日菜金一角；一家人穿的都是粗布衣服，孩子们的布鞋都由冯夫人亲自衲鞋底、亲手做。为节省开支，由厨房自己磨豆腐。冯自奉节俭，对百姓却慨然相助。一次保险公司给冯送来他本人的保险费5625元，当时北京求知学校急需资金，他捐赠5000元，余下的全部周济了附近的老百姓。

冯对泰山西麓的农户常有照顾，时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很了解农民，和农民聊起天来谈笑风生。为确实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他曾将身边人员刘德纯等组成一个调查组，到普照寺周围八个方向八户佃农家调查，冯亲自制订了一份详细表格，要求刘德纯将调查结果逐项填写，尔后冯玉祥自己写了一份综合性的调查报告，充分反映了佃农受剥削的状况：“佃农以纳租为对地主(和尚)应尽之义务，若遇天灾，纳租之事，也不可免”。“到收获之后，除纳租及奉还欠债之外，所余不多，仅可维持年前之生活，以盾生活，不打柴、不讨饭，即要饿死。”“若佃农抗租，而地主有赶走佃农之权。”调查报告还反映了农民的生产状况、生活贫困状况以及受教育的状况：“百分之九十九不认识字”，“保守，并甚迷信”，“只知作奴隶的生活，被田主驯服”，“不敢反抗……”只好认穷命而已。”通过这样的调查，冯玉祥掌握了农民群众受压迫、剥削的第一手资料，更加同情贫苦农民，并且认识到“中国受大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影响到农村经济破产，若不变更中国社会制度，恐永久陷于穷境中而不可拯救”。对所学的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还在与农民的接触中进一步懂得了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曾在193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若能在耕者有其田上努力为之，惠及农民者岂不更多”。但是怎样才能使耕者有其田，他却很少考虑。他在泰山只是以帮助和施予的方式惠及附近的贫苦农民，思想只能停留在自上而下的变革上，而不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33年岁末的一天，朔风怒吼，本该是阖家忙碌迎新岁的景象，可普照寺下一些佃农家里，却无米下锅了。冯玉祥知道后，立即派人给严、葛、安等9户已断炊的人家各送去两袋面、20斤肉、上百斤白菜。除夕之夜，又派人给25户最穷的人家，每户送去一袋面，5斤肉，2盒茶食，断炊断粮 的人们终于度过了一温暖的年节。

冯玉祥自幼失学，仅入私塾一年零三个月，靠刻苦自学获得了大量知识，来泰山后更是每日读书不辍。在泰山的几年间，曾拿出一大笔经费，陆续兴办了15所武训小学。收容农村贫苦儿童入学。冯玉祥接受了陶行知对武训办学的宣传，并对武训推崇备至，认为武训以行乞所行，集腋成裘，兴办义学，值得效法，因此把自己捐资兴办的学校都定名为武训小学。他聘请当地名士范明枢作总校长，张雪门作教导主任。冯主祥提倡半工半读的教学方针，为穷学生设木工、铁工班。有的学校还设艺术班、刻字班，邀请著名画家赵望云前去指导。学校的日常开支由冯玉祥负担，学生学费全免，还为他们提供书、笔、纸、墨等文具，定期为小学生做制服。在1935年7月的毕业考试中，有个叫孙志发的孩子名列第一，冯玉祥高兴地将他找来，赞扬勉励，并赠给他50元作回家的路费。冯玉祥还创办了作为小学生习艺的小手工场。他自己学物理、化学时曾买了一批科学仪器，后来用这些建立了小型图书馆、科学馆，供小学生参观使用。一有空闲，这位高大魁梧的将军爱到附近小学校去与教员和孩子们交谈，了解学生们学习、生活情况，并不断向孩子们宣讲抗战的主张，他在泰山举行的抗日及有关纪念活动，如滦州起义纪念会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纪念会，武训小学的全体师生都来参加。师生们在他炽热的抗日爱国思想影响下，大都思想进

步。抗战爆发后，很多师生都投入抗日工作，去泰山东南方的组徕山打游击。范明枢老人就是典范。

泰山孤贫院，是冯玉祥捐助的又一对象，每月捐助额都在150元以上。冯氏夫妇将孤贫院的孩子视为骨肉，经常去看望他们，1935年中秋，冯氏夫妇带着大批月饼和水果，与孩子们共度了个花好月圆的良宵。每逢孤贫院的孩子毕业或结婚，冯氏夫妇也带着礼物去看望。

1935年7月13日，黄河在山东决口，鲁西鄄城、巨野十余县受灾，难民多达200万人。冯玉祥闻讯后焦虑万分，立即派人到灾区调查，命令卫队营长风楼治办枣馍，每天送到灾区。仅7月31日这一天，就送去馍3600斤。秋风渐起，冯玉祥又派人去济南做了2000件棉衣送到灾区。冯上山后，各方要员如李烈钧、孙科、陈公博、陈铭君、王造时、曾琦等都曾来访，孔祥熙这时也来电拟到泰山看望他。冯得知孔欲来泰山，便风趣地复了一个欢迎他来山东赈灾的电报："来电敬悉，为灾民北业，诚万家生佛。此时政府应全力救灾，即可赎以往之罪，并可收拾已失之民心。请竭力主持，我为千万灾民三叩首矣！"孔祥熙接到这样一份电报，吓得不敢到泰山来了。

从冯玉祥的住地到小王庄，有一条小河，平日水不大，人们可以踩着石块通过。可是一到夏秋雨季，水势猛涨，附近来往农民深深以此为苦。冯玉祥知道山民这一困难后，立即指示卫队营搭了一座木桥，哪知山洪势猛，很快冲垮了木桥。于是冯又去察看地形，重新选定造桥地点，从泰安城里请来石厅，开山取石修筑石桥。他还写了一首"丘八"诗："石匠正开山，开来开去打开了半山边。不是为修桥，不是为铺路，盖起洋楼财主住。两臂已疼痛，打起了石头并不作公用。不为自己，只为那家富人用，你说公不公？"桥建成了，冯亲自书写了"大众桥"三字刻在桥上。

冯出身农家，在山上经常从事养鸡、种菜、种果树等农事活动。他到泰山不久，即在五贤祠不远建造了革命烈士祠，供奉王金铭、施从云等滦州起义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阵亡将士的灵位。在烈士祠附近，建造了"梅花岗"，种植了上万株腊梅，在腊梅丛中有一块巨石，冯题了"梅花岗"三字刻在石上，为泰山平添了一景。1935年这一年，冯带领部属们开荒植树，共栽植茶树17000余株，杨、榆、柏树共12000余株，核桃树200000余株，栗子树100000余株。他在日记中写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种树的责任在我，这些树将来的收益如何，我就不应当过问了。"

（陈晓清）

流行风

电影《压迫》

《压迫》——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也是表现工人失业痛苦的。影片写纱厂工人赵寅生（龚稼农饰）因工厂倒闭而失业。他的妻子秀英（夏佩珍饰）在金融资本家董宝善（徐莘园饰）家作女佣，被保镖（王吉亭饰）夺去；母亲和孩子也因冻饿先后死去。后来，赵寅生夫妇又遭保镖陷害，被诬为罢工的煽动者，而被捕入狱。

电影《压迫》通过赵寅生一家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帝国主义者、资本家的层层压迫，给工人造成的种种苦难，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影片中赵寅生的性格过于软弱，缺乏应有的反抗意识，形象不够典型。特别是最后，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压力下，导演给影片增加了一个消极的尾巴，即让赵寅生夫妇在法庭的裁判下被释放了，字幕上写道："伟大的法律是不受压迫的！"这就歪曲了原作的主题，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意义。

电影《姊妹花》

《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董克毅摄影，胡蝶主演。故事主要讲生长在贫富不同的家庭的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胡蝶兼饰姊、妹两角。跟父亲在外的妹妹二宝长大后，作了军阀钱督办的七姨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留在乡村母亲身边的姐姐大宝，嫁给一个一起长大的农民陶哥（郑小秋饰），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不久，因为天灾战祸，老少一家流落到城市。迫于生计，大宝放下自己的孩子应招当了二宝儿子的奶妈。三天后，母亲（宣景琳饰）来告知陶哥摔伤，需钱求医。大宝向女主人二宝予支工钱，反招来一记耳光，为救丈夫，在情急无奈中，大宝偷摘了小主人的银锁。不巧，此事被督办的妹妹发现，大宝害怕欲逃，在撕扭中失手将对方推倒，不料，督办的妹妹被撞落的花瓶砸在头上，并当场死亡，于是大宝成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母亲闻讯赶来探监，碰见的军法处长原来是其丈夫赵大。这时，她向丈夫说明真情，并迫使他让母女三人相见一面。最后，赵大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场面，母亲说明真

相，证明大宝、二宝是同胞姊妹，并要二宝设法救出姐姐。大宝当场对黑暗的现实、不平的人生进行揭露和批判。于是二宝有了转变，答应救出大宝。可是赵大怕丢官职，不让二宝这样做。结尾是母女三人离开赵大，乘车去找督办……。这一结尾是符合剧情发展和人物心理的，柯灵评论说："夫妇重见，姊妹相认，知道了可恨的仇人原来是骨肉之亲，却依然唇枪舌剑，不同的立场和心理交错纠结，这场精心布置的戏剧高潮，现在看来，还很有感染力。在郑正秋的创作历程中，这无疑是明显的转折和飞跃。"

电影《铁板红泪录》

《铁板红泪录》——洪深导演，董克毅摄影，完成于1933年11月，明星公司出品。

影片表现四川某农村姑娘小珠（王莹饰），与同村青年农民周老七（王征信饰）相爱，另一青年二蛮子（陈凝秋饰）因没得到小珠的爱，气愤之下投靠了恶霸孙团总（谢云卿饰）。孙团总以"买枪防匪"为名，向农民勒索枪捐。周老七反对枪捐而遭迫害，被逼流亡外乡。这时，孙团总也企图霸占小珠，二蛮子竟帮助孙团总抢来小珠、打伤其父。后孙团总又进行收租收债，激起全村农民不满，并在已回乡的周老七带领下进行了抗租抗债的斗争。最后，二蛮子在小珠被孙团总鞭打致死后醒悟过来，他亲手枪杀了孙团总，他自己也中弹身亡。

影片概括有力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表现了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斗争。所描写的抗租抗债斗争和向地主恶霸射击的枪声，正是当时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电影中的曲折反映，闪耀着浓烈的反封建的革命光焰。

洪深的导演是成功的。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再现了剧本的思想主题。《铁板红泪录》是他导演的影片中最好的一部。

电影《香草美人》

《香草美人》——原由复旦大学学生马文源所写，后由洪深加工改编；成为他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高涨时期的代表作。由陈铿然导演，周诗穆摄影。影片写农民王阿大（谢云卿饰）一家，因破产来到上海，进了大中华卷烟厂当了工人，但因洋烟的倾销，使烟厂面临危机，资本家便实行裁员和降薪。这样，王妻及其女儿（夏佩珍饰）先后失业，王阿大和弟弟工资减少，一家生活日益困难。于是，弟弟王老二主张罢工，哥哥王阿大怕失业而反对罢工，为此兄弟两人闹翻。后老二以"鼓动罢工"罪名被捕判刑，烟厂也很快倒闭，老大失业，生活更为困苦。女儿被迫卖淫一事被他发现后，妻子留下小的孩子带女儿远走。两月后小孩病死，妻女不见归来，在残酷的现实打击下，王阿大象做恶梦一般奔跑在街头，砸毁摆放外国香烟的橱窗，因而也被捕判刑。在狱中兄弟两人相见，这时哥哥觉悟了，认识到弟弟的主张是对的，可将来怎么办？弟弟自信地说："外国也有穷人和苦人，只要大家齐了心，将来一定会有好日子的。"

通过王阿大一家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过着贫困、失业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醒过程和斗争要求。影片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农村因经济破产流入城市，城市工人因失业更加贫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家又把企业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造成工人的失业、贫困，以致不得不起来反抗斗争。这些生活描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有典型意义的。

电影《母性之光》

《母性之光》——剧本写于1931年，影片摄成于1933年8月，部分有声。仍由卜万苍导演，黄绍芬摄影。

影片写一个革命者丁家湖（金焰饰）被迫逃亡南洋，当了矿工；其妻慧英（黎灼灼饰）迫于生活，带女儿小梅（陈燕燕饰）嫁给音乐家林寄梅（史鲁饰）。小梅在林家教养下成为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娇小姐，并远嫁南洋矿主儿子黄书麟（何非光饰）。后丁家湖从南洋归来，与慧英重逢。他与朋友要创办一座托儿所，培养一代新人。这时，在南洋的小梅被丈夫遗弃、又产后病倒，慧英在家湖资助下赴南洋探望、并接回女儿，告知家湖是其生父，同时慧英也脱离林家与家湖重归于好。最后，小梅支持父业，为托儿所筹款义演，此刻她的小孩不幸病死，她怀抱死婴唱道："孩子，你也别怨你的爸，你也别怨你的娘！你要恨那吃人不见血的大魔王，大家来打倒那大魔王，让黑暗中的孩子们看见阳光，让贫苦的孩子们得到教养！……"

影片《母性之光》抓住两代人的爱情纠葛，在悲欢离合之中展开故事，在生活对比之中揭示思想。影片颂扬了革命青年丁家湖在北伐时期勇于参加矿工斗争行列的可贵行动；同时将他与资产阶级音乐家林寄梅作了对比表现。通过慧英改嫁与小梅婚变，谴责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现了贫富对立已是当时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影片最后，又安排了小梅之女病死的情节，揭示全片的主题，号召大家来打倒那"大魔王"（即万恶的旧制度）。但作为一个革命者，丁家湖回到上海后创办托儿所，这一情节似欠典型，毋宁说是他"到民间去"的余响，这正反映出田汉转变时期的艺术特点，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当时思

想认识分不开的。

《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是他第一支电影歌曲)。

"我们在流血汗，
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
人家在餍膏粱；
……
我们大家的心，要象一首铜墙，
我们大家的手，要象百炼的钢。
……"

歌曲以对比的诗句、鼓动性的内容，再配以聂耳谱曲的深沉激昂的旋律，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向往，深化了阶级对立的主题思想。在歌声中，出现南洋矿工劳动的画面，更给人以鲜明印象。

由田汉作词、任光谱曲的《母性之光》主题歌与插曲《春之恋歌》和《南洋歌》二首，也很好地烘托了人物的情绪，深化了影片的主题。这部影片的歌曲，开了我国30年代进步电影音乐之先声。

电影《三个摩登女性》

《三个摩登女性》——联华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左翼电影，由卜万苍导演，黄绍芬摄影。对这个剧本的创作，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中有着生动的说明。现实生活暗示给了他这样一个主题：怎样的女性才算是摩登的？人物的构思也是现实生活提供的。陈若英是从金焰的影迷来信中发现的；虞玉式人物在当时有闲阶级中很多；周叔淑是作者亲眼见到的参加罢工的女接线员；张榆则是金焰的化身影片的故事正是围绕着一个男性青年电影明星，描写了三个妇女的不同性格和生活道路。青年大学生张榆(金焰饰)因抗婚由东北逃往上海，后成了明星，专演无聊的爱情片。"九·一八"后，未婚妻周淑贞(阮玲玉饰)与母亲流亡上海，作了电信局的接线员。这时张榆正与南国姑娘虞玉(黎灼灼饰)热恋，每天出入歌台舞榭。有一天，张榆突然接到一个劝他改变创作方向的电话，当得知电话是周淑贞打的时，很受启发。"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张榆参加了前线工作，这时，一个崇拜他的影迷、痴情少女陈若英(陈燕燕饰)来找他，当面表示爱慕之情。后张榆负伤住院，在病房中遇见了参加战地救护的周淑贞，令他十分感动，并向周表示愿恢复婚约。停战后，已成为富孀的虞玉从香港归来，又找张榆游乐；张对陈若英的一片痴情难酬，便答应与之合作拍一部影片作为纪念。在拍摄女主角自杀一场戏时，陈若英假戏真做而殉情。这时，周淑贞又回到电信局工作，并参加了电信工人的罢工斗争。陈的自杀，周的斗争教育了张榆。使他认识到"只有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他拒绝了虞玉的引诱，紧紧握住周淑贞的手。

影片中作者批判了那个追求官能享乐的资产阶级女性虞玉和思想空虚、爱情至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陈若英；肯定和赞扬了热爱劳动、追求进步，并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女性周淑贞。在周淑贞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美学追求。而张榆虽在结构上是个中轴人物，贯串始终，但其思想性格却是个转变人物；影片正是展示了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时代感召下和在工人阶级的教育下，逐渐转变，走向进步道路的，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电影《城市之夜》

影片《城市之夜》(贺孟斧编剧，金焰、阮玲玉主演，洪伟烈摄影)。影片比较真实地暴露了当时都市社会的黑暗，抨击了有钱人对穷苦人的欺压和剥削，有着进步意义，显示了他的导演才华。费穆很注意布景、道具、镜头和光线设计及其综合运用。影片结构严谨、节奏舒缓，画面优美，气氛浓郁，把握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与特性。

电影《狂流》

电影摄成于1933年3月。明星公司摄制，导演程步高、编剧丁一之(夏衍化名)，摄影董克毅，无声片。它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的空前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汉口附近的傅庄农民，在小学教员刘铁生(龚稼农饰)带领下，为筑堤防洪与贪污赈灾物资、欺压村民的地主傅柏仁(谭志远饰)作斗争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地主女儿秀娟(胡蝶饰)与小学教员相爱，而地主傅柏仁为攀附县长势力、却将女儿许配县长公子李和卿(王献斋饰)的爱情纠葛。最后，终因暴雨袭来，江水决堤，傅柏仁和李和卿被洪水狂流所吞没……。《狂流》的剧作，结构严谨，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刻划细致，细节描写真实，语言精练概括，台词富于个性化。导演程步高在其《影坛忆旧》中说"这个剧本，思想性高，形象性强，戏剧性足，目的性明，是我国当时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十足电影性的电影摄制台本，比较完备细致，在电影阵地上它是开路先锋。"

《狂流》是明星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左翼电影。它的拍摄，意义重大。由于剧作者世界观的进步，它一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调和思想的影响，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一次在电影里描写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它以鲜明

的主题、深刻和思想以及先进的艺术形象，开辟了我国电影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标志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转变与进步，它是党在电影阵地上揭起的第一面旗帜。

电影《春蚕》

夏衍以蔡叔声的化名，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仍由程步高导演，王士珍摄影。

夏衍的改编，忠实于原著，又发展了原著，加进了原小说没有的一些情节。剧本和小说一样，通过描写老通宝一家为养蚕而辛苦、奋斗和挣扎，但又终于失败的过程，揭示了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造成江南丝绸业倒闭、养蚕农民破产的历史真实，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剧本的故事情节是：浙东某村，老通宝和大儿子阿四、小儿子多多头以及四大娘等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夜辛苦，为育蚕而忙碌。最后，果然丰收，全家喜悦。但到卖茧时，各处茧厂关门，茧行也难开称。结果，老通宝一家辛苦一年，反倒又添了新债。影片的结尾：收税的、讨债的都来了，……喻示农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面临着破产的命运。

小说《山雨》

作者王统照，主要内容：

作品以北伐前后山东农村为背景，通过描绘陈家庄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新旧军阀和官僚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特别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才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蔽，表现了老一代农民眷恋土地、安本守业思想的破灭和青年一代农民挣扎、奋斗和觉醒，显示了中国社会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变形势。是三十年代中国农民血泪生活的真实感人的纪录。它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忠厚朴实的奚二叔、乐天知命的陈大爷、消极避世的徐秀才、逼上梁山的徐利、离家投军的宋大傻、沉着老练的杜烈等。作品着力描绘了由传统守业思想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奚大有这一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画卷广阔，文笔细腻，风格浑厚，人物性格鲜明，地方色彩浓郁，表现了作者浓厚的艺术功力。

小说《电》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着重描写李佩珠等青年在革命活动中如电火一样凌厉闪光的性格。李佩珠和慧、敏、明等一群革命者，以工厂、学校、妇女协会、报馆等为阵地，向以某旅长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时，由苦闷与彷徨变为沉着、冷静的革命者吴仁民也参加了她们的斗争行列，并与李佩珠产生了爱情。由于内奸告密，他们的组织被破获，战友们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们决定除一部分人坚持城内斗争外，大部分人转移到农村去开辟新的工作。作品描写革命组织内充满集体主义的温暖与友爱，抨击了反动派残杀青年的罪行。女革命家李佩珠每当革命活动发生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战友，在狱中受尽酷刑，即将死去时一心想着革命的前途，视死如归。但在她身上带有较多的理想化的成份。《电》在《爱情三部曲》中革命色彩最为浓烈，曾遭到反动当局的查禁。

小说《离婚》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

通过在北平一群小公务员灰色生活的描写，批判了市民性格的无聊和形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作品着重描写财政所里的科员老李、张大哥和小赵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老李出身农家，大学毕业后在衙门里当科员，本有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但由于性格的软弱，在官场上总是失败者和受害者。当他把旧式女子的太太接到北平后，却无法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他所得到同事们的“援助”，却是小赵等的嘲弄和羞辱，张大哥的敷衍苟且和太太们的暗中挑拨，以致长期陷入苦闷之中。最后他在苦痛中觉醒，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得首先改变目前无聊灰色的生活，于是抛弃衙门里的高级职位，到乡间去干切实的工作。张大哥是一个无聊庸俗的“傻好人”，他一生的使命是为人作媒和反对离婚。结果被坏人作弄，他的儿子被当成共产党的嫌疑抓了起来，自己也被解雇而失业。小赵是强人，神通广大，到处为非作歹，就是上司也怕他三分。最后被侠客式的人物丁二，用暗杀方法把他处决掉。作品反映旧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表现作者对被压迫的弱者的同情和对特务流氓的不满 。但作品中老李的觉醒和反抗写得比较含糊，采用简单化的暗杀方法来解决矛盾也缺乏典型意义。

诗《地之子》

我是生自土中，
来自田间的，
这大地，我的母亲，
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

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湿软软的，
我的襁褓；
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野草，
保姆的怀抱。
我愿安息在这土地上，
在这人类的田野里生长，
生长又死亡。

我在地上，
昂了首，望着天上。
望着白的云，
彩色的虹，
也望着碧蓝的晴空。
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
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
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
因为住在天国时
便失掉了天国，
且失掉了我的母亲，这土地。

（李广田）

诗《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象我一样，
象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象梦一般地，
象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象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

歌曲《开矿歌》

噢嘀！噢嘀！开矿！开矿！
开出来黄金黄。
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
人家在餍高粱；
我们终年看不见太阳，
人家还嫌水银灯不够亮。
开矿！开矿！
开出来黄金黄。
我们大家的心，要像一道板墙；
我们大家的手，要像百炼的钢；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我们大家来享。
开矿！开矿！

历史档案

论短促突击

（一）敌人在五次围剿中，在军事上，放弃了他过去长驱直入并进穷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持久战略与堡垒政策的战术。敌人深知红军有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深知红军勇不可挡，行动迅速，长于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等。故敌人在其战略战术的决定上，极力避免与红军的长处斗争，与红军在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斗争，而极力抓着红军在物质上和兵器技术上的弱点来进攻，极力夺剥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这是敌人在五次战争中他在战略战术的决定上的最基本要点之一。但“战争的最终命运不是由技术来决定的（苏联的仇敌曾以大批军火供给台尼金和高却克），而是由正确的政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来决定的”。（斯大林）这个真理是那些国民党走狗和蠢猪们所不能够了解的呵！

在持久战略与堡垒战术下的敌人，他为着首先缩小苏区，以便最后与红军决战，他依照其总的计划，分路向着苏区军事政治上的要点前进，（不是向着红军主力所在地前进）。每路约三师以上的兵力，其每一次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如：陈路军进占广昌以后，汤周纵队进占建宁以后，他们的前进，较其过去在边区要进得慢的多了，较其在白区前进时则更慢了。最近薛路军在龙岗，一遇到我主力，和给予他的打击；以后他就不进，而采取在其堡垒火力完全可以掩护下的推进。又如：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而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而占领广昌。

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连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路的连络与策应，以裁割和封锁苏区，以取得后方的接济。

敌人在其前进中，非常注重侦察警戒。在其与红军战斗中，则极力发扬其多量轻重机枪及炮兵火器的威力，和极力利用集团飞机的侦察与轰炸。在战斗中，虽然达到占领某个地点，但并不积极向与其对战而退走的红军追击。敌人在苏区前进，是短距离的前进，他每次前进大约走十里左右。行进时多半是沿着制高的地点向着他预定的目标前进。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

敌人的这些动作方法，都是根据他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的。为了避免同红军进行运动战，为了抑制红军的猛烈冲锋，为了避免红军的突然袭击，为了对付苏区群众的坚壁清野，为了避免陷于孤军独战和被红军截断后路的危险，所以敌人才采取以上的种种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并将其过去在战术上缺点极力纠正（如侦察警戒之疏忽，筑垒之迟慢……等）。

短促突击的战斗，是从上述的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种主客观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战斗有很多特点，这种战斗，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我们应如此来了解这个问题。

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

如：洛阳堡战役，新桥战役，都有求得战役胜利极大可能的。因为，敌人士兵的动摇，战斗力的薄弱，他不得不采取多量人数的密集队形。同时，他利用我军火力的薄弱，故亦敢采取密集队形。所以有时虽在短的距离，窄的地域内，却拥挤了敌人大的兵力。如果我军能迅速击溃敌人，并截断其退路，则可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这种战斗需要最好的配合，最好的组织，在这种战斗中如发生小的缺点，都会造成失去胜利的恶果。

敌人现在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了，今后敌人在苏区中当更彻底的，更标本式的，运用他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了，我军以后将更会要多遇到要采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去消灭敌人的战斗。我们在这种战斗中，应该不以取得些战术上局部胜利为满足，而应极力为取得伟大的战役上的胜利而斗争。

（二）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在战斗前，应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对于敌人前进的时机，到达地点，经过的道路和阵地，兵力部署，和动作方法等，予以确切的判断。

2. 在战斗前，指挥员或派得力参谋，应实地的绵密的侦察敌情地形，并由参谋处进行实地测图，如单凭调查路线，和现有地图(不详细并有很多错误)，在进行这种战斗，是万万不够的。洛阳堡战役，某兵团事先不实地侦察地形与道路，等枪已打响了，临时仓卒把队伍出动，把大的兵力拥塞在一条隘路上，被敌人一部兵力将进路堵住，以致结果没有达到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这种教训，是不应当忘记和再重复的。调查路线和请向导也是战斗前必要的工作。

3. 根据地形侦察和敌情判断的结果，受领战斗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应预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这种方针和计划，要判断到敌人有哪些可能的变化，而其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自己的方针和计划要能适应各种可能的情况，但不可以平均主义的精神来决定自己的计划，而应以适合主要的可能为主。在根据计划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工作时，亦不应犯着平均主义，而应当准备应付主要的可能。部队待机的位置和部署，亦应当是以应付主要的可能为主。这个计划为了使部属能事先进行准备，和战斗中在通讯联络万一中断时也能适合上级的企图，独断专行和协同动作，须将这个计划通知所属的必要的指挥员。

4. 必须注意的，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这只能作为战斗前进行战斗准备的根据和战斗中独断和协同时的一种参考材料。战斗的实际指导，则仅依照一个明确的方案以命令行之。如各部单凭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去动作，则最容易发生错误，和动作的不协同。因为敌情的变化，有时不是事先所能料到的。并且有此情况，介乎两个或三个预料的情况之间的，有的指挥员在他看的情况是相当于预料的甲种情况，如是他采取对甲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在同时同一情况下，有的却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属于预料的乙种情况，他如是采取对乙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错误，岔子，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5. 如果是在山地，则在这种战斗中敌人是沿着制高地前进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根据情况的判断，占领敌人前进方向而在敌人堡垒火力以外的制高地点，配以少数兵力(一营左右)固守之。占领这个阵地，应当极端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这个阵地上有我们的兵力。守兵进入阵地不应过早，免致暴露企图。这种阵地的火线，应设在山顶的前斜面上，以便万一放弃时，敌人不能利用我们现成的工事，在山腹、山脚，应设重层的射击。这种阵地要有极好的伪装，使飞机与地上之敌不能发现，要有充分的障碍物，使敌人停在我障碍物的下面，受到我火力的严重杀伤，掩蔽部和战壕，要能抵抗敌人炮弹和飞机的轰炸。担任守备的要是政治上坚定的，有顽强战斗力的部队，如守阵地的部队是质量差的，不能达到固守任务的部队，则在战斗时将使主力失去突击敌人的有利条件，并且有时还有受到敌人打击的危险。担任守备的部队，事先应进行充分的提高政治情绪的工作，要有在敌猛烈的、野蛮的，飞机轰炸炮兵机枪的射击下，和步兵进攻中死守阵地，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时须进行守备的战术训练，并须补充守备队的子弹，特别是手榴弹，如没有现存的子弹，也可从突击部队身上抽拨。

6. 在预定突击敌人的地域，如没有现成的，便于突击部队用平行路前进的道路，而又为非要路不能运动的地形，(如密林……)则须预先开路，但所开之路的末端，不应太接近敌人的行进路，因为这种自己开的路，多半是在敌人前进路的侧方，如太接近敌人的进路，则有暴露企图的可能。但不应因无道路，放弃执行机动，而要用战斗队形在道路外前进。

7. 对于预料敌人前进路附近的原有工事，如旧寨子、堡垒，应先拆毁，以免被敌利用。在我军所占的制高点前的高地，应以我制高点上的火力控制之，如在我火力外，则须设以竹钉自发地雷等障碍物于向敌方之斜面上，并应有很好的伪装以免被敌人过早发觉，使敌人不易占领等方法控制之，或作能迅速恢复之准备。

8. 这种战斗需要有最敏捷的通讯组织，因为战斗动作须要迅速和很好的配合，过去历次的短促突击，大部分由于动作的配合不好，而未取得圆满的胜利。电话应为主要的工具，而以其他通讯工具为补助工具。这些通讯工具应并行使用，使通讯无断绝之可能。

9. 在适当的高地上，应设观察所。有些观察所，如有好的地形，能将数十里以内的敌情地形，了如指掌。观察所应派参谋携带望远镜去观察，并与司令部保持电话的联络。

10. 对于前进之敌，应采取利用敌人仰攻我制高点时行反突击的方法，抑应采用单纯的埋伏的侧击夹击，或采用让敌人占领某些不难攻的地点后，乘其立足未稳时而攻击之，或采用其他种战斗方法，这要根据地形，敌人离开堡垒地远近，敌人的数量、质量，及其他条件来适当决定的。

11. 敌人前进的时机，可以根据他堡垒马路完成的程度，兵力的调动，及其他谍报材料判断之。在判断敌人将前进时，则须将部队隐蔽的进入进攻出发地隐蔽起来。这个出发地，要能保障部队能在一小时，至多两小时以下的时间，即能到达预期的地域突击敌人。但敌人并不能一定恰如所料的时间来进攻，所以这种待机有时成为空待，有时接连数日都是早出晚归的空劳往返，这当然使部队有些疲劳，但不能因此而发生动摇，而避免疲劳，而松懈起来，而不作紧张的待机准备。否则，如果一旦敌人前进，临时才从远的地方出动去进行突击，则往往已失时机。但在判断敌人确在其时极少极少前进的可能，则亦不应天天将部队进到进攻出发地，以免无益疲劳和暴露企图。

并且应估计到逼敌待机过久，企图必被暴露，故敌有改变前进路线的可能。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不致暴露秘密之下，应当进行教育的工作，这种教育应与当时战斗任务连系起来。

12. 敌人前进的目标，他是有预先的确定的。在当地之我军，当时的任务如不是迟滞敌人的前进，而是在求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则应让敌人按照其原定计划前进，用不着去抵抗他，阻滞他（但并不取消以原任守备部队的游击侦察与引敌前进）。因为敌人一遇到我军的阻滞，他即停止不进而做堡垒，这就减少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但也有例外），使敌人更远离其堡垒的条件，消灭敌人。如待敌人向其原定目标前进，待其进至我军预定的突击地域再行突击，这样就更能干脆的消灭敌人。这种方法不算是诱敌深入，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

13. 如敌已进至我预定的突击地域，或敌停止前进，或敌仰攻我制高点，已受我火力的严重杀伤，和已吸引了他多的兵力在我制高点的下面，在至少有了这些情况之一时，且在我军所选定突击的地域，已不会受到敌人的堡垒有效火力射击时，则应依照命令，开 始进行突击的战斗。这时无论敌有无后续梯队，无论他的后续部队是否已完全脱离了敌堡的火力掩护，都应不迟疑的开始突击。

14. 战斗的部署，通常应以一部与敌的先头部队战斗，吸引敌之先头部队，以主力取平行道路（但不一定是走路上），突击敌之某一侧面，如在我兵力优势，及不致分散兵力条件下，最好采取夹击敌之侧面，另外须以精干有力之一部队，担任截断敌人的归路。如不将敌人退路截断，则全部胜利是极少保障的，因为敌仍能退回堡垒，这种战斗消灭敌人主要不是靠在追击中，而是靠包围敌人于战场就地歼灭之。在我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如虽已脱敌堡之有效火力射击，但距敌堡仍不甚远时，则我主力不可在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因这样很容易被在堡垒继续出来的敌人，将我主力抓住，致陷我主力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部署中，如估计我突击敌人时，敌人还有后续部队来包围我在战斗中的部队的可能时，则须留出足够的兵力，保障战斗中自己翼侧的安全。

15. 突击时机成熟后，最好首先以担任截断敌人退路的部队，出敌不意的突然的插断敌人后路，主力接着或与插断敌退路的部队同时动作，突击敌人的侧面。担任在敌正面战斗的部队，必须等待担任在突击敌侧面和截断敌退路的部队，已开始突击，才配合着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无论如何在正面部队不应单独过早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只有在为着巩固自己必要的阵地，有时才可行局部的反冲锋动作。

16. 突击开始以后，应最迅速的动作，最猛烈的连续冲锋，乘敌人在立足未稳时，未做好工事时，和后续部队增援未到时，迅速干脆的歼灭之。在这种战斗中，动摇、犹豫、迟缓，都是不应有的。在广昌战役中，和洛阳堡战役中，都曾有过这种严重的现象。在今后的战斗中，是决不可再发生这样的错误呵！

17. 突击部队的第一线的战斗队形，应当采用以班为单位并列的战斗群，或排的并列战斗的队形，应当避免用大队伍走一路前进的行军队形，或用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在第一线应展开优势的兵力，以期一举决战。

18. 在敌侧面突击的部队，通常应不经过预先火力的准备，而直接冲锋。在敌退路上战斗的部队，主要是用火力阻止敌增援，阻敌后退，和准备在胜利条件下向敌堡追击，以火力向敌堡射击并夺取之。

19. 当战斗胜利时，如已消灭敌之主力，如敌堡垒守兵动摇，应乘胜向堡垒追击并夺取之。如胜利不大，敌堡尚无动摇和夺取之相当可能时，则应毫不迟疑犹豫的结束战斗，将主力迅速脱离敌人。

20. 敌人的侦探，和侦察部队经常出来活动，我们应当布置我们的侦察员捕捉敌人的侦探，并最好以埋伏的方法去捕捉。对付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应经常有消灭他的准备，最好采用值班部队的方法，每个值班部队（一营以内的兵力）担任一个区域，在那个区域内发现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即由他负责立即出动，去以包围迂回的方法消灭之。如不用值班部队的方法，待发现敌侦察队出来以后，才临时命令某部队出动去打，则往往已失时效。这个值班部队，还有对付敌人突然来袭击作用。

21. 敌人在构筑工事的时候，多成连成营成团的密集队暴露在阵地上，我们应派出一、二挺机枪，以伪装与隐蔽的动作接近敌人，予以短兵式的火力袭击，这也是有意义的。

22. 对防空问题，应有很正确的方法，各时机各部队除注意伪装和隐蔽外，担任扼守制高点的部队，应构筑防空隐蔽部，应有对空射击设备。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待机时对空以隐蔽伪装为主，若到突击开始，则无论飞机凶猛到如何程度，都不应停止自己的冲锋和追击，这时只有与敌进入肉搏，方不致失掉战斗的胜利，才不致受到飞机的猛烈轰炸，对空射击在这种时机也是必不可少的。

23. 狡猾的敌人，往往故意先以一部在某方向进行佯动佯攻，待将我军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之后，则以其主力遂行其本面目的战斗，因此我们要经常明察敌人的真伪，切勿受其欺骗。三溪战役，王都寨东华山的失守，是不应当忘记的教训。“不应被吸引于次要方向使我们屈从意旨与他作战而应征取并保持主动权在我们手中”（见《革命与战争》四期十一页华夫文）（华夫即李德，德国人，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24. 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在于能保持军事秘密。在我主力兵团企图进行这种战斗时，则必须使敌人不知我主力兵团在其附近。封锁消息，捕捉投敌分子，捕捉敌探，对空隐蔽与伪装，都必须严重的注意，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和布置。部队在正式战斗前的一切准备动作，都要注意不致泄漏秘密。

25. 进行这种战斗，必须对敌情有经常的明了，故必须用观察所窥望敌人的一举一动，或派侦察不间断监视敌人。另外应当注意警戒的问题，防止敌人乘我在待机中，因久而发生松懈中，而向我军行突然的袭击。

26. 由于敌人离开他后面的堡垒并不甚远，堡垒与出堡垒的敌人之间的地域不宽，容不下我军过大的兵力进入战斗，正因敌人前进的距离不甚远，他一发即至，我军须乘其立足未稳，与兵力劣势时突击他，所以战斗的发生是突然的，战斗的经过是短促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战斗，是用不着要过大的兵力的。否则就发生部队拥挤，遭到无益伤亡，及减少在别方面寻求机动的部队，和发生协同配合的更大困难。

（三）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

“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见《革命与战争》四期第七页）

中央红军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简表

名称	时间	指挥		兵力		战术		战况
		我	敌	我	敌	我	敌	
第一次反“围剿”	1930 年 12 月底	毛泽东、朱德	鲁涤平	4 万	10 万	撤开两手诱敌深入	分进合击	红军歼敌一个半师 19000 余人，活捉前敌总 指挥张辉瓒，缴枪 13000 余支，以红军全胜而告终。
第二次反“围剿”	1931 年 5 月	毛泽东、朱德	何应钦	3 万	20 万	在运动中各个歼灭集中兵力先打弱敌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红军五战五捷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	毛泽东、朱德	蒋介石	3万	30万	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	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红军歼敌三个师一个旅两个团3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又被我军粉碎。
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2月	周恩来、朱德	蒋介石	4万	50万	敌积极防御、声东击西，首创大兵团伏击法，集中兵力歼	分路合击、分兵三路	红军歼敌三个师，俘敌两个师长，缴枪万余支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又被粉碎了。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言论摘录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

《外交为无形战争》(1931年11月30日在外长顾维钧举行宣誓就职时讲演。)

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帝国主义一向是幸灾乐祸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所以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各位官长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也不论是大战小战，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决不能希望胜利，何能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总之我们就客观的情形与主观的战略看来，今日救国的途径，只有照着古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来力行；我们必须先把后方与内部安定起来，然后攘外才有办法，才不致处于内外夹攻的危急。

《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在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官长讲话)

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大家总要记住我们革命的生死成败，我们国家的绝续兴亡，在目前完全系于剿匪，剿匪如果失败，那就一切都要失败，都不可挽救，你想匪都剿不了，那里还能抗日，这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我们既明白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那就不可徒慕抗日的虚名，以为剿匪没有荣誉，没有功绩，亦没有人知道，要晓得剿匪一旦成功，主义就可实现，这样我们革命军人才可以得到历史上最大的光荣，也才可以求得国家民族永远的生存。进一步来说，即使剿匪真是得不到什么勋名，而我们革命军人亦必须认识自己的责任；只要剿匪是为国家民族打开生路之唯一要图，是革命现状最迫切

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只有勇往直前的来拼。

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存死亡的关键，剿匪成功则可按照总理的主义与计划，实行建设事业，国家前途也有无限希望，万一这次剿匪仍无效果，则中国必将趋于灭亡之途，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并且现在的匪区，是中国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真是国家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复兴，惟有灭亡而已。……

《剿匪的成效如何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
(1932年6月22日对豫鄂皖湘赣军政长官讲演)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

所以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剿理论与实际》(1933年4月7日
对剿共军高级将领训词)

中正来赣督剿，实本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1933年4月10日在南昌国民
党省党部对各将领的训话》

中央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红军的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了。敌人不但把所有军队集中到江西、四川、鄂豫皖等省周围，去向红军大举进攻，而且动员一切力量从十一月一日起依次在白区各地进行所谓“剿匪运动周”，以便在政治上准备对红军苏区的“围剿”。但是，我们的各地组织，不管中央屡次的指示，对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战斗任务的执行，表示出不可容许的消极。江苏党的组织，除了上层机关稍为讨论一下以外，至今还没有把中央关于五次“围剿”决议传达到支部中去，至于中央决议的实际的执行连谈也谈不到。还有许多省委甚至还未讨论过中央决议。这种情形，是再不能忍受了。在非苏区各地的组织，为开展反对五次“围剿”的斗争，除了执行中央决议及《斗争》上所指出的具体任务外，必须立即进行下列的工作：

(一)动员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去进行反对五次“围剿”的运动，以对抗和粉碎国民党所进行的所谓“剿匪运动周”。在上海要用一切力量组织工人、失业工人、罢工工人、革命学生和贫民在十一月六日到市商会(即所谓上海“各界宣传日”集会地)门前去示威，并要求将“剿赤”经费拿来救济工人与失业者。

(二)召集各种群众会议，首先是在厂内、工房内、学校内、寄宿舍内、兵营内、农村中、机关中，举行飞行集会以庆祝红军的胜利，在这些会议中通过拥护红军苏维埃和反对五次“围剿”的通电宣言，进行广泛的鼓动，解释红军胜利的意义及苏区工农群众生活改善等，并且进行二次苏大会的选举。国民党所召集的会议，凡有群众参加的，我们应当加入，在会议中揭破国民党欺骗，并使这些会议转变为反对“围剿”的会议。

(三)用各种群众团体的名义，制定宣言、传单、标语，散发到群众中去，这些宣言传单必须通俗而清晰的指出反对五次“围剿”的意义，揭破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与反对民众的罪恶，粉碎国民党对红军苏维埃的一切武断宣传，号召群众以实际的斗争，以工人罢工，失业者、饥民、灾民的斗争，士兵哗变，来拥护和配合红军的胜利。

(四)出版工人小报、壁报、画报和通俗小册子，以推广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回答反对报纸对红军的污蔑和武断宣传。利用我们所影响下的一切公开与半公开刊物，去进行反对“围剿”的抗议。

(五)组织种种宣传队、演讲队、化装演讲队、活报、蓝衫剧团等，为拥护红军而作公开的演讲或表演。

(六)进行广大的募捐，收集金钱物品以慰劳红军，在工人和劳动群众中，提出“每人募捐一个铜板”帮助红军，“捐助一天工资”购买飞机送红军等的口号。不拿一文钱给国民党支进攻红军。

(七)成立“红军之友”、“苏维埃之友”、反对“围剿”委员会、抗议团、码头工人警卫团等的组织，并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

(八)征调工人、失业工人、革命学生、知识劳动者、医生、工程师、技师、专门家等去当红军和在苏区服务。

(九)发动学生的罢课，反对“剿匪运动周”，反对“临时剿共教材”，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进攻红军的军费作为教育基金。

(十)动员报馆印刷等工人反对反动报纸登载“剿匪”评论，不印一切反对红军苏区的宣言传单，反抗称红军为“土匪”。

（十一）在农村中动员农民群众、灾民、饥民、难民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剿匪捐”，反对保甲制，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

张学良辞职通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张氏返平，十日晚召集东北各将领及各机关长官开会，陈说晤蒋经过，并嘱弃蠲私见，精诚团结。关于东北军问题，闻将编为四军由于学忠，王树常，何柱国，万福麟分任军长。十日发表最后通电，原文如下：“天津，上海，太原，济南，北平，汉口，南京各报馆转全国同志均鉴。余父与余历以保持中国在东北之主权为已任，余父且以身殉焉。追余就任以后，仍本先父遗志，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道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民国十九年秋余奉命入在，拥护中国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盖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侮也。九一八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脞，而余本心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自计也。张学良叩真（十一日）。”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十一期）

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由张家口发出通电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其全文如次：“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且扣留民众之义捐，禁其使用。要之，政府初无抗日之决心始终未尝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力，自动奋战，获得一时的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断而挫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安定人心之词自欺欺人。前此前敌将士为抗日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仅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份子的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冯玉祥叩宥印。”二十九日西南执行部电冯贺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又电奖方振武彻底抗日。二十七日阎锡山委孙楚为晋察绥边防司令。晋北及绥远驻军均归孙指挥节制，孙已偕随员赴大同，组边防司令部，开始办公矣。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二期）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上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

中央十月二日晨八时举行九八次纪念周，汪主席，并作报告，略谓本人将最近一周重要事件，向各位逐件提出报告：（一）中央决议五全大会展期一年，原因已在决议案内说明，不必再作报告。但是五全大会最重要之目的，是讨论国民大会应否提前召集，本为国民大会决定在二十四年三月召开，如言提前，至少也得一年，当移至二十三年三月，但是国民大会之筹备，决非短期间所能办得到，若到十一月决定提前，则筹备一切，时间上已不许可，率性不提前为是，因此五全会之延期，与国民大会毫无障碍，这是应该声明的。中央决不变更初意。吾人在此一年中，亦应将训政时期应做之工作，努力完成，但是“精神团结共赴国难”八字之精神，九一八以来，同志间仍未完全

做到，不能不认为缺点。凡具有主张者，有排挤亦必有相当，若对中央仅有不满意之表示，但又不具担当之责任，非常错误。我们在没有人担当以前，总是依据这八个字之精神，努力牺牲去做。（二）内蒙王公要求自治问题，中央对此极为注意，但是必须考虑是不是有分离运动与傀儡运动掺杂其间，万一有之，还是要制裁的。自治问题，不仅内蒙，全国亦应推行。可是自治先决问题，还是平难与整理军队。内蒙情形固与内地不同，但是平难与军队两种困难为自治之先决事项，是与内地一样的。其次开垦问题，在内蒙亦属重要，欲求蒙人生活日趋安定，亦必须使蒙人多有开垦之机会，中央对蒙古并不因无人要求而不顾，也不能因有人要求而敷衍委屈求全。现此事已责成内政部负责商议办理。（三）最近方吉骚扰华北，在意料之中，本来察省散军太多，如不设法安置，则察省永不能平靖。中央对察事，应先安置散军，但方吉毫不就范，愈走愈远，另作企图，并非中央不顾念他们，实是他们甘作傀儡。幸大部分发散军，早经安置，其余最近可解决。（四）经济委员会及财政问题，目前甚为重要，经委会本早已成立，原系蒋为委员长，最近棉麦借款，归经委会办理，蒋已坚辞此职，由余与宋孙三人负责筹划。外间谓经委会如何扩充，则非事实。近因我国棉纱业，急应救济，特设一棉纱业统制委员会，又因为国内麦产滞销，设一食粮管理机关，这是人民衣食问题，不能不特别注意。财政问题，自九一八以来，总是不敷，政费只仅能维持，军费犹不足，军事当局财政当局，均各感到困难，但决不因困难而消极。这两天在沪对财政已商有救济方法，困难可渐减少。总之，希望全体同志，在此时期，抱定牺牲努力苦干精神，担当一切云。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期）

福建《政府成立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应全国人民之要求，宣告于公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于福州。谨将其成立之原因及其任务贴告全国：自蒋中正凭藉其御用之国民党系统，及其祸国残民之武力，背叛革命攘据政府以来，中华民族益趋于灭亡之危途，全国人民，更陷于无以为生之绝境，外患内忧，同时侵迫，危机之深，情势之恶，较诸亡清末造及北洋军阀当国之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族因帝国主义者侵略而发生之危机，虽不自今日始，然自蒋中正当国以来，此危机之深刻实为前此所罕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四省，相继沦丧，滦河东西，实际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掌握，天津察绥以及华北各省，均有随时被吞并之可能，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亦莫不岌岌可危；同时李顿报告书中之共管计划，则由所谓技术合作，而渐趋于实现；行见中华民族不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独占，即亡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共管。或一部分领土被日本所独占，或一部分被国际帝国主义者所分割与共管，总之，灭亡景象不唯呈露目前，且已局部实现矣！全国人民死于蒋中正所制造之数次大规模内战与死于由政治腐败而酿成之天灾中者累数百千万人；其幸而生存者，或则欲耕无地欲工无所，或则虽耕虽工，而仍不得一饱，致有极廉之布帛而不得以为衣，有奇贱之米麦而不得以为食之稀有现象。然而人民所受之痛苦，尚不止此，南京政府不特对于此饥寒交迫之广大群众，不加救济，且不容其自救，凡主张人民自救者，不目为反动，即指为赤化，罪名一出，剿杀随之，数年来，人民被其残杀者，不知凡几，于是全国人民，除待毙讲壑外，求生无路矣！

举凡上述民族之危机人民之痛苦，以及其他经济之破产，社会之紊乱，其所以趋于如此严重者，莫非蒋中正所造成，盖蒋中正所御用之南京政府，实为一切反革命派这大集团，其唯一之任务，即剥削与压迫全国之生产人民，不仅人民生死非其所计，即民族存亡，亦非其所计；且为主持其反动政权起见，不惜欢迎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以镇压国内革命民众之反抗运动。故九·一八事变之初，即令张学良不加抵抗，十九路军淞沪抗日之际，又绝其后援；驯至一送热河，再送滦河流域；复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近更派使交涉，实行降日，同时对东北义勇军之活动，则多方破坏；对民众同盟军之抗日，则直接威迫；对粤桂闽，出兵援热，则百端阻抗；对各地之爱国志士，则肆意迫害，对于内地之工农解放运动，则尽力摧残，对于思想进步之文人，均在不赦之列，由此可知蒋中正所领导之南京政府，实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之工具。

故欲挽救中华民族之灭亡，开辟全国人民之生路，首先必须推翻南京政府。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之产生，即系应此种迫切之需要。本革命政府以最大之诚意，向全国宣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之使命，在：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农工劳苦群众。以上各端实为本革命政府更之中心任务，本革命政府，决以最大之努力促其实现。本革命政府有为全国生产人民告者，在蒋中正统治之下，政治黑暗，官吏贪污，纲纪废驰，骄奢无度，此虽蒋中正等祸国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本革命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当即彻底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厉行法治精神，并领导全体公务人员，节衣缩食，刻苦任劳，以贯彻根本之主张，树立兴国之规

范。

本革命政府尤愿表示其求和平而奋斗之决心，蒋中正政府之亡国政策，即扰乱世界之和平，而其残民政策，又扰乱国内之和平，本革命政府为保障世界及中国之和平起见，不得不坚决反对蒋中正亡国残民之政策。因此本革命政府竭诚希望全国人民及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深切和平之决心，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坚决与蒋中正政府作殊死战，以实现中华民族当前迫切之要求，谨以宣言。

（选自《福建事变资料选编》）

西南执行部政委会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略）故闽省当局，宜幡然改图，中央军政当局，亦应退避贤路，使全党全国，得恢复自由，以公同解决当前之纠纷，而重定今后之国策。同人等于前月养日复闽电，及感日致中央电，既已言之。昨晨读胡汉民先生对时局宣言，尤为洞鉴时局症结，痛切尽言，而所条举今后推进政治之具体方案，洵为解决时局弭乱救亡不易之办法。盖十余年来纷乱之局，揆其总原因，在以武力挟制政治，凭藉武力，势必出于独裁，方兴之民主势力，断非独裁势力所消灭，纷纭对抗，遂无已时，根本济救之途，惟有一面扶植民权，一面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在此训政期间，应以政权属诸党，治权属诸政府，绝对听政府之指挥。监督，不能干预政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权限，则遵依总理遗教，切行划分，然后一切纠纷，可以消弭，统一行政，兴利革弊，不受掣肘，乃有培养民力，乃有抵抗外侮，肃清匪患之可能。故同人等对于胡先生之主张，极端赞同，而竭诚以促成实现也。总理有言，为公仆者，受国民之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权相持。杀一不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纵一己之欲。国事危殆，莫过于今日，深望当局者，屏除成见，采纳善言，并盼鼓诸同志、全国同胞，共起而督促，为祷。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分会叩马（二十一日）。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二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日军制造榆关事件。上午，绥中日军往榆关调动，驻榆日宪兵守备队将榆关日侨迁至南海日兵营。下午，日军在南关外鸣枪并爆炸手榴弹，瞬向我南门外步哨射击，迫其退入城内，经我驻军第九旅派员诘问，反诬为我驻军挑衅。晚，日步兵守备队第五联队一个中队出动南关外，由绥中开到之日军停在站附近待命。驻临榆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在北平闻报，星夜回防。

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以纪念"一二八"为名，是日起至28日，举办"航空救国"宣传周，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均召开大会，号召人民捐款购机。

2月2日　西南政务会组西南国防委员会，公布该会组织条例。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林云陔为委员，并电请川、湘、滇、黔等省加入。国民党中央疑西南此举别有作用，曾指示在粤之黄绍竑疏通可否暂缓组织。西南表示此会系为巩固国防，决意组织。

3月9日　蒋介石召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先授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张提出两项办法：（一）各路东北军由张率领，克复承德，中央负责接济；（二）准张辞职，中央负抗日全责。宋转达蒋旨意，劝其辞职，张表示接受。蒋随即与张晤面，准其去职。

3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法》、《县参议员选举法》、《市参议会组织法》、《市参议员选举法》，均自12日起施行；又公布《公务员任用法》及《公务员任用法施行条例》，4月1日起施行。

3月20日　汪精卫、宋子文、褚民谊、曾仲鸣、陈公博、唐有壬等一行由沪到京。上午10时，汪出席国民党中央重要会议，商讨国防、外交。

3月30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是否如期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照常举行及中央委员改选等问题。

4月7日　英政府向日政府提出照会，严重要求日方应维护《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能发生战事，否则英海军陆战队将登陆维持治安。

4月12日　西南政务会召开临时会议，蔡廷锴要求西南当局努力抗日、"剿共"，陈济棠表示愿负"剿共"全责，推蔡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对粤出师抗日取消极态度。

4月13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拟具之《电影事业奖

励条例》及《文艺创作奖励条例》。

5月27日　张家口工人、贫民、士兵、学生三千余人在共产党员带动组织下召开群众救亡大会，提出"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察哈尔"、"民众与士兵联合"、"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铲除苛捐杂税"等要求和口号，会后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惩罚汉奸分子及蓝衣社特务分子。

5月31日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上午9时，中日停战谈判正式会议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日方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由冈村宁次声言这是最后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中国首席代表熊斌披阅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

6月3日　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通过追认《塘沽协定》。又讨论冯玉祥组抗日同盟军问题，责成华北军事当局就近查察，否则中央当谋相当之处置。

7月21日　蒋介石为策划对红军第五次"围剿"及镇压抗日同盟军等问题，决定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是日，汪精卫偕顾孟余、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乘舰离京赴赣。戴季陶、黄绍竑、张治中、陈仪、孔祥熙等已于前一日前往。

8月7日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电冯玉祥，促其离察入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9日，冯复电拒绝。

9月3日　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联电蒋介石、汪精卫，要求：(一)停止召集五全代会；(二)公开厘定棉麦借款用度，必须用于生产事业；(三)公布《塘沽协定》全案；(四)维持察省抗日部队，停止中央部队前进压迫。

9月6日　蒋介石、汪精卫电复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称：停止召集五全代会问题，可由陈、李以中央委员资格向中常会提议，以符手续；棉麦借款，中央政治会议早已决定用于生产事业；《塘沽协定》全案早已尽行公布，此外绝无任何秘密附件；对察省部队，按何应钦、宋哲元1日报告所提办法处理。

9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陈济棠、李宗仁电请五全大会延期，且华北战区各事尚未就绪，各地"剿共"尚未完成，决定五全大会展期至明年11月召集，国民大会仍定1935年3月举行。

10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以"方振武假借名义，纠集散兵，抗命窜扰，行同流寇，实属目无法纪"，决议免方振武国府委员职并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严议处分"，并补任陈立夫、黄复生为国府委员。

10月17日　行政院通过《变更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方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及《蒙古行政用人之标准案》，要点为：规定设边务部或称蒙藏部，直隶行政院，为处理蒙藏之最高机关；在蒙人聚居省分设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办理地方行政，受边务部指挥监督；地方政务委员会设蒙古代表会议，为蒙古人之民意机关；行政用人尽量容纳蒙人；并就适宜地点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翌日，中政会原则通过。

10月19日　西蒙各盟旗首领电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等称："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议决案，已有特许外蒙自治之先例"，要求"采用高度自治，建设内蒙自治政府"。

11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讨论行政院有关部所拟之通车、通邮、设关等方案，同意交付审查。又通过《修正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

11月18日　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由港到福州，即日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邓世增、沈光汉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政纲政策以及军事、财政等问题。决定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有关宣言、政纲草案；决定派李超恒、叶少泉分别接收福州、厦门两地中央银行，以防南京国民党政府断绝财政。

11月20日　李济深、陈铭枢等在闽发动反蒋事变，是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推举黄琪翔、徐名鸿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黄琪翔为总主席。

11月23日　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会议规程》、《最高法院组织大纲》。

12月1日　福建泉州各界召开庆祝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国民党军飞机三架向会场投弹十一枚，死伤群众二十余人。同日，厦门各界亦召开庆祝大会，通过拥护《人民权利宣言》、讨伐蒋介石等提案多件，并致电林森、陈绍宽勿作蒋介石傀儡。

12月3日　福建人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号召认清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恶，分别革命的战争与内战，共同担负中国革命的责任，在人民革命政府旗帜指导下，联合广大农工群众，对帝国主义者和出卖民族利益者作殊死斗争。

12月6日　福建人民政府布告通缉蒋介石及其党羽汪精卫、何应钦、杨永泰、黄郛、张群、熊式辉等，列举蒋等卖国殃民罪恶，宣布凡能捕杀蒋、汪、何、黄等诸逆及破获蓝衣社党徒者，均属拥护人民革命，自有重赏；其有匿藏不报者，即以通逆论罪。

12月18日　北平各界召开讨闽大会，国民党中委张厉生、苗培成等出席，通过提案四件：(一)电中央党部、国府，明令讨伐陈铭枢、李济深；(二)电蒋介石积极"剿共"；(三)电粤桂中委即日出师讨闽；(四)电各地中委尅日赴京，翊赞中央。

外 交

1月4日　外交部就榆关事件照会日驻华使馆，要求日政府迅饬日军退出榆关，严处肇事者，嗣后不得再有此种举动，至我方一切损失，保留要求赔偿之权。同日，该部发表宣言，指出日军侵榆为其预定计划，要求国联迅即以最有效方法予以制裁；并电令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将日军侵榆情形报告国联，要求采有效措施。

1月11日　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戮该城数千和平无辜中国人民，促请注意日方行动。

2月9日　外交部公布与英、美、法、荷、巴西公使及挪威代办互致照会，同意1930年4月1日与上述各国在南京所订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自本年4月1日起延长有效期三年。

3月14日　蒋介石为准备对日直接交涉，派外交部长罗文干在平征求英、美、法、意等国使节意见，各使均表反对。是晨，罗偕蒋作宾到保定向蒋介石报告，商定对日直接交涉暂取慎重态度。同日，罗在保定对路透社记者谈称，外传蒋介石北来与中日直接谈判有关，"实系谣言"。

3月28日　外交部长罗文干为日本退出国联发表宣言，指出："中日争议在国际联盟下之公允处置，毫不因日本现所采取之步骤而受有任何不良之影响"；表示深信国联"将采取紧急有效之方法，以应付日本宣告退出国联后之新局势"，"中日问题终必得公平之解决"。

4月4日　中荷庚款经双方迭次会商，外交部长罗文干与荷兰驻华公使杜培克本日在外交部正式换文，规定荷兰政府将1926年1月1日后应得庚款全数退还中国，用于中国水利及文化事业。

4月25日　外交部照会日驻华使馆，抗议汉口日海军陆战队擅设电台，私与长春等处通报，妨害中国电政特权；日本电政局未经中国方面同意，擅将长春日电局名称改为"新京"，违反中日电约规定，要求日政府迅速制止。

5月8日　法国驻日大使玛尔泰访日外务次官有田，查询中东路售卖问题，并提出法国曾投资道胜银行，中东路与法国有极大利害关系，提请加以充分考虑。

5月13日　行政院会议，由外交部长罗文干报告关于中东路问题交涉经过，经讨论，决定由外交部提抗议书，当晚电驻苏大使颜惠庆送致苏人民外交委员会。

5月14日　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遵外交部令，向苏副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递交抗议书，内称：中国政府受武力压迫，暂时不能行使中东路管理权，故不能影响中苏协定之效力及中东路之地位。苏拟将铁路出让，是不啻承认伪国，援助侵略。声明该路为中苏共有，非得中国同意，不能处理。

5月20日　国民政府任命胡世泽为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原任吴凯声免职；张乃燕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原任傅秉常免职；金问泗为驻荷兰特命全权公使。

7月14日　驻华日使馆武官柴山访何应钦，声言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有违塘沽停战协定"，要求中国方面注意。同日，驻承德日军第八师团一部往热察边境调动。

7月27日　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指出香港英当局限令九龙城居民迁居，改建公园，与1898年中英两国所订展拓香港界址专约原意不符，要求转饬香港政府取消成议。

8月4日　外交部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声明对法占南沙群岛九小岛，中国政府在未经确实查明以前，对于法国政府7月25日之宣告，保留其提出异议之权，并要求将各岛名称及经纬度查明见复。10日，法使照复外部，告以各岛名称及纬经度（九岛位置为北纬7点52—11点42，东经110点55—114点25之间）。

8月19日　驻法日代办泽田向法国外交部口头抗议法占南沙群岛九小岛，以日商磷矿公司曾在该诸岛经营为借口，要求由日、法两国直接谈判解决所有权问题。

9月14日　日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崛内有野在南京与汪精卫及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晤谈。日方宣称于中日外交有所商谈外，拟向中国提出中日商约谈判。唐有壬否认谈及中日商约。

9月19日　外交部训令出席十四届国联大会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应重申原有主张，仍信赖国联，盼能以最善努力解决中日纷争。

10月12日　驻日公使蒋作宾在东京访日外相广田及次官重光。翌日，访首相斋藤，称谓中国政府已在庐山会议中决定对日方针，本人为期使中日关系恢复常态而回任。

11月29日　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转告各该国政府勿对"闽变"予以任何接济。

军 事

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以川军刘湘、刘文辉战争结束，为调解四川各派军阀内哄，一致"剿共"，是日中政会决定派张群赴川办理善后。

1月24日　川省各军自签订停战协定后，二十四军刘文辉部集中眉山、彭山、新津、双流等地，准备回驻成都，为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及驻成都之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等部所阻。嗣经双方协商，田、刘、李等同意撤军。是日，二十四军由新津回驻成都。

1月25日　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连日在锦州

召开攻热军事会议，日伪军重要将领铃木、程国瑞、于芷山、李际春，日参谋本部梅津少将以及各师团大佐以上人员出席。

1月29日　蒋介石置热河危急，民族危亡于不顾，是日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1月31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拟订“剿共”具体计划。前敌总指挥陈诚、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第二纵队总指挥吴奇伟、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等均参加。

2月12日　蒋介石任陈诚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赣东各“剿共”部队属之，抚州前敌总指挥名义取消。是日，陈在南昌就职。所属原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升任第五军军长，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任第五军副军长，该师副师长霍揆彰升任师长，第十一师副师长萧乾升任师长。

3月5日　张学良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递职严办。

3月18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令第八师团负责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附近的筑城及师团补给；令混成第三十三旅团复归第十师团隶属；令第六师团作向多伦作战准备；令第十、十四师团各准备一联队随时供关东军司令部使用。

3月19日　国民党赣粤闽边“进剿”军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奉蒋介石令，继续部署进攻赣南中央苏区。以第一纵队为主力，将第三纵队五、九两师配属一纵交罗卓英指挥，再次向广昌进犯。是日下达进攻令，由十一师萧乾部为先头，九师尾随，向宜黄县东陂、黄陂一带推进。

3月24日　蒋介石偕杨永泰等由保到平，召何应钦、蒋伯诚、杨杰、王树常等开军事会议，听取各方军事报告。杨杰要求蒋介石调部增援长城各口，蒋指示要以现有兵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

3月27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重要会议，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叶楚伧、李烈钧等三十余人出席。蒋介石报告华北军事情况，于右任、孙科提统一全国军事案，李烈钧提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案，因李案着重于开放政权与集中全国力量御侮，以事关重大，议定交中常会“从长缜密讨论”。

4月21日　日陆军省发言人为滦东撤军发表谈话，宣称日军自4月10日战于长城以南，以图终止华军对热边之压迫，及逐之至长城炮程以外，今已奉命不再追击；如华军不再进攻，日军即退至长城。

4月27日　豫介石电令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兼任鄂西“剿匪”总指挥，毗连鄂西之湘省团队及鄂西驻军均归其指挥。

4月29日　多伦在日伪军优势兵力进攻下，守多伦晋军赵承绶骑兵旅不支，是晚弃守多伦退沽源。日伪军占多伦后分两路向沽源进犯。

5月1日　国民政府特派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蔡廷锴为总指挥；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总司令；刘峙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

5月10日　日军第八师团步兵第十七、三十一联队各一部在炮火掩护下进犯南天门附近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守军阵地。刘部奋起御敌。夜，日增加兵力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大举进犯。同日，日军六师团常冈部队攻占永平。

5月12日　日军渡滦河西犯。第六师团主力松田、高田部队及服部旅团分由东寨庄、西寨庄、小营、吴庄、潘家口等处强行渡河，突破何柱国、王以哲等部阵地。

5月16日　日军服部旅团攻遵化。宋哲元部王团抵御，团长王淦尘受重伤，该团官兵伤亡逾半，傍晚遵化失陷，宋部西撤。同日，日军占唐山，开滦矿停工，何柱国部撤至卢龙等地。

6月8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湘、鄂、赣各“剿共”部队副军长、副师长、参谋长出席，粤、桂、闽各军派代表参加。12日通过党务、政治、军事、教育、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后结束。会后分发《作战手本》、《“剿匪”手本》、《孙子吴子兵略问答》等书。

6月21日　伪军李际春等伙同津变祸首郝鹏、石友三等在战区成立“华北民众自治联军军政府”，在唐山、秦皇岛两处设军政最高机关。“唐山派”李际春、程国瑞、郝鹏、李甲三等称“自治军”；“秦皇岛派”马廷福、石友三则称“安国军”。两派人数共达万人，粮糈就地取给，军械由日方暗中接济，活动地区十一、二县。

7月12日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吉鸿昌部自7日开始围攻多伦后，9日晨将城外据点占领，10日晚，吉鸿昌等亲率敢死队攻城。11日开始总攻，是日，同盟军分由南西北三门攻入城内，复经巷战，肉搏三小时，伪军始由东门逃窜，多伦遂告收复。

7月23日　蒋介石、汪精卫及各军事将领在庐山集议第五次“围剿”，决定华北驻军除一部分留驻外，悉南调江西参加“剿共”，并确立五次“围剿”实行碉堡政策、经济封锁。

7月25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朱培德、唐生智、陈仪、张治中、杨永泰、陈绍宽等二十余人出席，

讨论军队编制、空军建设计划等。午后，汪精卫、顾孟馀、朱家骅、朱培德、黄绍竑、曾仲鸣等会商时局。

8月8日　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自本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同日，宋部卫队二百余进驻宣化，抗日同盟军开张北。

8月9日　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宋哲元派秦德纯、过之翰等到张家口接收察省民政、财政两厅。同日，冯治安部由宣化开入张家口，四十一军军部由沙城移驻宣化。

8月16日　北平军分会决定察省善后办法四项：(一)改编察省杂军为十八个团；(二)任方振武为北平军分会委员；(三)吉鸿昌、孙良诚仍任上将参议原职；(四)张砺生部枪支皆得自地方，应照数发还。以上交由宋哲元与方、吉等代表协商办理。共产党员吉鸿昌，联合方振武等坚持抗日，反对收编，并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同日，方在张北通电出任代理总司令职。

8月21日　蒋介石电汪精卫转中政会，称"鄂豫皖赣'剿共'军事或已分头进击，或方厉行封锁"，"标本兼治，非财莫举"，提出需治标费一百八十万元，治本费一千五百万元，要求汪力予主持，提请中央核议定案，并先拨治标费一百八十万元以应急需。

9月4日　吉鸿昌率部越南都西行，为晋军赵承绶部所阻，遂东趋独石口谋与方振武部会合。宋哲元命张凌云、乜玉岭、赵登禹部三路围堵。

9月22日　日武官柴山根据关东军司令官菱刈复电，派驻密云日军官赴怀柔向方振武提出"警告"，限26日晚以前撤退至非武装地以外，否则即派兵进攻。翌日，日机飞平及顺义、怀柔散发"警告"方振武部传单。

10月2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剿共"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提出战略要点为"严密封锁，发展交通，稳扎稳打"；战术要点为"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等。

10月29日　蒋介石颁布《"剿匪"区临时施政纲要》，令各省政府通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并责成各路总司令各总指挥各纵队司令严切督促实行。"纲要"包括清乡、编查保甲、整理民团、封锁"匪区"、筑碉、公路、财政、教育等十三项。

12月9日　川军"剿共"部队除刘湘部在东线行动外，其余各路因迭遭红军打击，心有余悸，加之内部矛盾重重，仍按兵不动。是日，蒋介石再电令刘湘转促邓锡侯、田颂尧两部迅速行动。

12月23日　国民党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李孟斌率舰进驻马江，占领长门塞。同日，海军部正式封锁闽江。

经　济

1月10日　上海银行公会兼办之票据交换所开幕，中国、交通　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四明、金城等三十二家银行均加入。

1月20日　上海八十余同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及财政、实业部，要求废止本年5月16日期满之《中日关税互惠品目协定》，并推代表晋京请愿。

2月14日　行政院通过实业部所拟创设硫酸铔厂招收商股办法大纲，规定该厂资本一千一百万元，英、德或其他外国公司投资五百万元，实业部投资三百万元，中国商人投资三百万元。每百元一股，利息与红利，官商股同。

2月20日　宋子文在平与银行界商定发行救国公债二千万元，月息七厘，以冀省烟酒印花税收入作担保，债票未印就前，由平津银行界先借垫一千万元。宋以任务完成，24日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

3月1日　国民党中政会原则通过行政院制定之《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及施行办法。财政部发布命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并定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同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银元。

3月6日　上海标金市场受美国金融风潮(截至本月9日，当时美国四十八州中有四十四州银行全部停业)影响，价格大跌。2日，上海标金价为七百七十四两(银)，3日，落至七百五十六两半，是日更加狂落，开盘为六百九十八两，最低降至六百六十两。14日，美金潮略平，上海标金价始回升。

3月10日　上海各业开始实行银元本位制，银钱业取消洋厘行市。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合组之兑换管理会开始办公。同日，海关税收亦改收银元。

4月5日　交通部与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美国太平洋公司水线合同于1930年期满，是日三公司代表偕英美驻南京领事及丹麦驻沪领事与交通部代表颜任光签订新合同。原合同系前清与北京政府时期迭次与三公司签订，各种合同不下二十余起，丧权辱国，利权外溢。新订合同亦仅取消水线登陆专利权，收回直接收发电报权，收回地缆及架空线等。

5月16日　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即日起恢复征收进口货物之关税附加税和救灾附加税。中日关税协定是日期满，进口日货亦一律照征上列两项附加税。

6月1日　中原公司与英商福公司在河南焦作签订合资经营煤矿业合同，合资期限十年，流动资金一百万元，中原公司五十一万，福公司四十九万。21日，国民党

中政会加以批准。

6月4日　中美棉麦借款成立。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美国与美国财政善后银公司签订棉麦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财政善后银公司贷款于中国政府，总额美金五千万元；棉花借款五分之四，麦及面粉借款五分之一；年利五厘；五年内还清本息；中国以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统税作担保。

6月16日　立法院财政、经济两委员会于14日审查通过棉麦借款案，是日提交立法院全体委员会，经长时间讨论，始附条件通过。其条件为：设管理委员会，负保管、支配、监督之责，由五院院长充任政府代表，再由农、工、商各界推代表六人组成；借款用途限于发展工业，复兴农村经济，兴办水利，发展重要交通，不得移充任何对内用兵或其他消费之用。

6月22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在京召开苏、皖、湘、鄂、赣五省防汛会议。决定五省划分为六大工区，各区分段进行防汛工程。定经费百万元。次日闭会。

6月28日　宋子文自伦敦致函国联秘书长亚普诺尔重申1931年4月25日中国向国联提出之技术合作六条件，并请求国联派技术合作接洽员来华，从事国联与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之联络。

7月21日　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分农赈、急赈、财政三组，章元善任农赈组主任；于学忠任急赈组主任；卞白眉任财政组主任。决定先办急赈。行政院拨赈款一百万元，另由河北省政府发行公债四百万元以充救济经费。同日下午，黄郛邀宴平津银行界，要求对发行公债予以协助。

8月31日　财政部总税务司报告，本年1至8月底止，江海关进口总额共计五亿三千二百七十万五千五百四十三元，出口总额共计二亿一千四百三十九万六千八百七十七元，入超三亿一千八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六十六元。

9月12日　国民政府批准财政部发行库券四百万元，作华北战区施赈补助农村之用，以续征芦盐附加农田水利基金为还本付息基金，自本年11月至廿七年7月止分期偿还。

9月13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范围，直隶于国民政府，采常委制，以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委；棉麦借款交全国经委会支配，另组监督与保管机关。

9月30日　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在沪与宋子文商谈财政及经委会事，次日续商。孙科谈话称：现军政费每月需三千余万，不敷千余万，筹款极感困难。

10月3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民国二十二年关税库券条例》，发行额一万万元，充作国库周转之用，10月1日起按九八发行，月息五厘，到1946年3月底偿还全部本息。

10月4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通告成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就常委职。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拉西曼列席，决定任秦汾为该地秘书长，推定该会委员；拟定棉业统制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其委员人选。

10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人选，除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为常委外，派黄绍竑、顾孟馀、朱家骅、陈公博、蔡元培、钱新之、陈光甫等三十二人为委员。翌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10月22日　南昌行营召豫、皖、鄂、湘、苏、浙、赣、沪八省市代表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行长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杨永泰主席，通过杜绝外米倾销、限制田赋附加、组织粮食运销机关等各案。次日闭会。

10月25日　国民党中政会原则通过赣省发行玉萍铁路公债案，数额一千二百万元，年息六厘，指定以中央拨还地方盐附税为还本付息基金，1934年1月发行，1943年6月底偿清。

11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二年华北救济战区短期公债条例》，总额四百万元，定11月发行，至1938年7月本息偿清。

11月4日　据《申报》本日长沙通讯：湘省发行救国库券以来，因各县市纷起反对，省府减为六折，实募三百万，以二百五十万改充西路军'剿匪'费用，五十万为征工筑路补助费，原限三个月募足，现已阅六月，仅募得六、七十万，尚系从严追催而来，衡阳一县被系在狱者人为之满，长沙则派枪兵驻店坐索。长沙各业代表会议决定政府不收回派兵勒派成命，各钱商即与政府实行经济绝交。中旬，驻店坐索之枪兵撤走。

11月14日　行政院决议：(一)与日方交涉通车通邮、设关事，送中政会处理；(二)交通部部长朱家骅请拨一千五百万元整理国营招商局案，送全国经委会核办；(三)准宋子文辞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及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常委职，遗缺以孔祥熙继任。

11月18日　上海市商会通电中央、省市政府党部，要求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立定方针，确立"靖外安内"原则，靖外"应先认清利害，勿以一隅之幸全误将来之大计"；安内"必须痛自反省，各就其军事政治职守所及，实践躬行"。

11月20日　上海证券市场因"闽变"大起波动。各种证券跌一元左右。翌日，大户纷纷抛售，多者跌二元三角。公债亦出现新低价。

12月3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拟具统一国库四项办法，呈行政院审核。办法规定中央各部、会及其所属营业机关收入款、盈余款、非营业之经费款等均解交国库核收。

12月7日　苏、浙、皖、豫、赣、湘、鄂、沪八省市政府及粮商代表在沪举行粮食会议，按10月八省市会议所作决议，设立中国粮食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粮运局)，推顾馨一、吴恒如为正副筹备主任，办理设置堆栈、运销粮食业务。设总公司于上海，各省市设分机构，资本一百万元，由各省市粮商认付，另由中央拨借一百万元作辅助金。

12月19日　行政院会议决定东北难民救济办法，一般难民之救济由政府就北平现有私人设立之东北难民救济机关予以津助，不另设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其筹备处即行结束。

12月24日　汪精卫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电各省市，以“必须废除苛细捐税，而后可言复兴农村”，令饬将各该地方捐税情形“切实查明，据情胪报”。

文　教

1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新闻检查法》及检查标准，规定：各大城市一律设立新闻检查所，由党政军警机关派员组织；凡关于军事外交秘密以及治安方面足以“动摇人心，引起暴动”之新闻，一律扣留或删改，各地新闻机构违者依法处分。翌日，内政部宣布，凡未经申请登记而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省市政府有权停止其发行。

1月28日　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以“研究改进教育为宗旨”，选刘廷芳、刘湛恩等十五人为理事。

2月9日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沪成立，选出执委及候补执委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聂耳、沈西苓等三十一人。协会发布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在今日已更见严重”，号召电影工作者“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运动。

2月15日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戴季陶等提议，设立建国奖学委员会，其条件规定：设总裁三人，考试院长为当然总裁，余二人由国府简派；奖学金来源为中央拨款、政府机关补助、社会团体或私人捐助。

3月12日　中山文化教育馆在南京成立，以林森、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二十九人为理事，蔡元培、戴季陶等八人为常务理事，孙科为理事长。

4月21日　教育部呈请行政院准予印行《四库全书》珍本，将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之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

5月14日　中国考古会在沪成立，以“搜考古迹、古物，发扬本国文化”为宗旨，选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杨杏佛等十九人为理事。

5月25日　国民党加紧实行文化“围剿”，鲁迅经常投稿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受到压力，是日刊登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6月起鲁迅换用虞明、桃椎、丰之余等笔名继续在该刊发表杂文。至11月，汇集六十四篇，题名《准风月谈》，借以揭露和讽刺国民党当局不准谈政治、只能谈风月的罪恶，于1934年由上海兴中书局出版。

6月2日　教育部训令北平大学将艺术学院结束，商学院停止招生，女子文理、法学二院裁并学系，平大高中停办。训令到平后，学生及教职员群起反对。19日，平高、艺院组联合护校会，发表宣言反对部令。校长徐诵明愤而向教部呈辞，平大校务停顿。

6月17日　教育部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在上海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

8月31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审查中等学校公民教师资格条例》及《审查训育主任资格条例》。9月18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遵照。

10月10日　上午，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开幕。林森任名誉会长，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孙科、宋子文任名誉副会长，王世杰任会长。林森、汪精卫、孙科、戴季陶等出席，汪精卫致训词。参加单位三十三个，选手二千余人，费用近八万元。

10月15日　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与山东古迹研究会王献唐负责发掘山东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古物，是日董抵济南，谈工作任务称：(一)考察春秋战国古城址及其文物；(二)考察汉画、石刻、汉墓。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4年

导　言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省瑞金召开。会议在王明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不顾“左”倾教条主义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次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最终对红军反“围剿”斗争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同月在南京召开。会议指责福建事变领导人“毁弃本党”，“毁弃中华民国”。会议推选林森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决定把省政府委员制改为省长制。会议还就西南地区改革政治，中央与地方均权等进行了讨论。

蒋介石在江西南昌行营指挥第五次“围剿”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发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任会长。

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溥仪在吉林长春“称帝”，将伪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三月一日举行称帝仪式，溥仪任命郑孝胥出任总理大臣。实际上伪满“皇帝”依然只是日本手中的傀儡。

七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作战。到达闽浙赣根据地时，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在继续北上中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1935年1月在赣北被包围，方志敏被俘，不久牺牲。

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开始进行长征。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逃跑主义错误，在连续突破湘江四道封锁线后，伤亡过半。

中央红军长征后，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及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保存了留在南方的部分有生力量。

十一月十三日，上海《申报》总经理、报业大王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由于史量才抨击国民党内外政策，言行触怒了蒋介石，遂遭毒手。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于十二月十日在南京召开。全会共开5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06人。会议中心议题为讨论“围剿”红军，反对共产党。全会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 **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六、红二十五军团西征**
- **中央红军长征**
- **南方三省游击战争**
-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 **新生活运动**
- **史量才被暗杀**
-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
- **溥仪称帝**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代表。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这三个报告，1月1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以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分析，不顾当时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和面临的艰难，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为完成这一任务，全会规定了党在苏区和白区的各项任务。全会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在两条战线的斗争，认为党"最后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继续强调"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等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顾作霖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材料：

- 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材料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通过）

（一）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

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

一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十二次全会的论断之正确。全会以后事变发展之总和，正是明显的带着过渡到新的战争与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飞速的跃进着，它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集体化与文化革命的计划，正向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大踏步的迈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之成功，不仅在经济上，更大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性，而且在国防上亦大大的提高了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联的国际意义及其对于世界劳苦群众的革命影响，日益增高。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之愤恨与蔑视。他们正在进行各种的阴谋挑衅与军事准备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正在疯狂般的准备反苏联的军事冒险。同时正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国防力量之增高与彻底的和平政策，使得许多帝国

主义的国家不能不在苏联和平政策之下屈服，而与苏联订立不侵犯条约及恢复邦交。

经济危机之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系统更进一步的崩溃，而且明显的带着战前的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企图用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同时亦即是准备新的战争的手段。罗斯福的复兴运动的"试验"遭受到完全失败。德国法西斯诡诈阴谋，并没有减少失业工人。资本主义世界中剧烈的进行着经济战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证明帝国主义放弃了谈判与外交辞令，而代之以剧烈的关税壁垒与货币战争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准备，而日内瓦"军缩"会议的"结果"则是美、日、英、法、意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大军备的宣言，法西斯蒂德国要求的合法权利的喊叫，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机大炮轰炸雷鸣和新的反苏联战争的准备。英美，美日，英日间的冲突，首先在争夺中国方面，在太平洋上，正在迅速的增长着。希特勒的登台增加了欧洲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在增长着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前面，国际联盟正处在分崩离析与解体的状态之中。战争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口实之下爆发起来。同时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暂时和缓自己之间的生长着的矛盾，以便首先爆发一个反苏联的战争。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正逼临着战争的威胁。

波兰、捷克斯拉夫、英国、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工人之顽强的罢工，波兰农民暴动，西班牙土地革命之发展，中国苏区之扩大和巩固，印度北方之农民暴动，斯脱拉堡之巷战，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士兵与海军中之骚动，证明虽然革命运动之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但明显的带着走向新的革命与战争的过渡性质。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则以更加利害的压迫剥削，更加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更加以剧烈的战争，进攻中国民众及苏维埃政权，来回答这个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

第二国际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亚姆斯国际的黄色工会，更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前进了几步，不但德国的"社会主义"法西斯蒂和黄色工会领袖完全投降希特勒，而且在法英及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亦公开的替法西斯蒂做清道夫的工作，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

第二国际正在崩溃着，投降各个独立的法西斯蒂政党，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因为战争还没有爆发。这种崩溃的过程，正是反映着过渡时期之特点。各国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持，正在各自为了自己的主人准备战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胜利，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的增长，经济战争，扩张军备，反苏联战争准备，革命运动之发展，及第二国际之崩溃，都证明着"走向革命与战争新阶段"的过渡是迅速地加紧着。

（二）一年来事变之开展，证明十二次全会之论断——在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之完全正确，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影响到民族生命之一切形态。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高的阶段——即是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保证着这个政策之加速度的进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满洲与热河，而且已经实际地统治了华北。正在经过它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及组织内蒙的王公，而准备最后地点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领土。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猛烈地巩固它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及依据台湾为根据地加强着它在福建的阵地，准备着在一个适当的口实之下，分开的占领福建，它的努力亦正深入于广东。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全力来争取自己在中国的优势，并将中国变成为自己的奴隶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步骤与军事布置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及争取太平洋上主人翁地位的帝国主义战争。

英国帝国主义赞助着日本侵略，只不过企图将日本的刀锋离开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转向北方进攻苏联。同时它公开的经过西藏的傀儡进攻四川和青海。在新疆事变的幕后亦明显的看到英帝国主义的血手。虽然英日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增加着，但是这不会减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反地，帝国主义所遭遇着的增长着的困难，只有增加他们侵略的贪欲。

法帝国主义一样的利用安南的优越地位而操纵云南、贵州、广西的统治，并时刻准备着分开地占领这些区域。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狂热的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太平洋霸权的强盗战争。同时它在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的挑衅与战争准备上成为更加积极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尽力的企图维持和加强它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经过这个工具来奴役中国民众，使中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以棉麦借款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众，摧残中国经济，奴役中国民众。

国际联盟积极的参加和组织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计划及反苏联战争准备。"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联盟尽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领土，摧残和屠杀中国的民众。国联的一些"反日"的决议，与日本之"退出"国联的滑稽戏，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和用来欺骗中国民众及世界劳苦群众的烟幕弹。

可是不管在瓜分中国上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冲突是怎样的剧烈，但是他们都一致地积极地指挥和组织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的疯狂的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中国之存在，是帝国主义者进行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的计划的最大障碍。为着实现完全瓜分与奴役中国的计划，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一致的组织反对苏维埃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供给国民党以金钱枪炮飞机与军事专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及几千万苏区劳苦群众沉没在

血海之中。

(三)中国经济状况是一幅崩溃破产失业饥饿的悲惨的图画。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之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更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度的恶化起来。

农村的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极点,农村经济在完全毁灭的状态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与掠夺,洋米洋麦与人造丝的倾销,军阀的搜括,内战与强迫种鸦片,巨大的水灾和其他灾难,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饥饿死亡,流离失所。丝茶与其他的特殊的生产品,是全部的毁灭了。家庭手工业是被资本主义的倾销消灭了。米麦及其他基本的农产品,在洋米洋麦倾销之下,即使在良好的收获状态之中,亦不能够抵偿成本与劳动力的消耗,及满足军阀地主高利贷的贪欲。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饿饭。几千百万农民没有饭吃,没有地种,没有地方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漂泊的难民队中挨冷受饿,忍受着非人的痛苦与死亡。

民族工业也在崩溃的状态之中,重工业差不多全部都被帝国主义霸占着,棉业、丝业及其他轻工业是在破产的状态之中,许多工厂关门,许多工厂减少工作的日子,中外资本家同样毒辣地减少工人阶级的饿饭工资和恶化他们工作的条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人是失业了,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救济,在都市中街道上流浪着,过着悲惨痛苦的非人的"生活"。

农村经济之浩劫,民族工业的衰落,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影响到整个国内国外贸易之惊人地锐减,入超更大大的增加,国内市场的缩小,更使国内商业处于停滞和破产的情况之中。

与国民经济崩溃与浩劫并驾齐驱的,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激增。巨额的入超在数量上超过了整个中国的出口数,大批的投资于准备战争与镇压革命运动的军事工业,长途航空线的设立,重工业甚至轻工业中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占取着垄断的地位。大批的借款,不仅在财政上资助反革命的统治来屠杀中国民众以尽其清道夫的作用,而且更进一步加紧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和巩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

(四)暴风雨般的群众的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燃烧着。不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残酷的恐怖和压迫,然而城市中的工人更多集合于他们自己革命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战斗。不管黄色工会领袖的出卖,而反对中外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罢工却时常爆发起来,罢工的人数是逐年的增加着,最近两年来的罢工人数远超过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斗争的性质是异常坚持与顽强,常常为着达到自己的要求,工人群众不惜接一连二的利用罢工的武器。罢工工人的热烈战斗热情,更加明显的显露了罢工的革命反攻的性质。工人群众常常以革命的自卫来回答资本家、国民党当局、军警与工贼这残酷的恐怖,罢工工人与军警之肉搏冲突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罢工斗争不仅在地域上普遍到全中国,而且牵动到一切的生产部门,浓厚的政治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更加清楚的显露了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中之领导作用。

农民的抗税抗债抗租分粮的斗争,往往发展到武装暴动,发展到游击队的建立。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旗帜非常显明地高举起来。为着挽救自己的死亡与饥饿,农民群众坚决的平民式地没收和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与土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及土地革命的影响之下,国民党部队的瓦解,是在急速的成熟着,广大的士兵群众的反对进攻红军要求抗日的斗争是在开展着,兵变与暴动不断的产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及自己的封建剥削者压迫之下的少数民族,亦开始被吸引到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来。为争取弱小民族的解放,为争取土地,为推翻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官僚和自己的封建剥削者而斗争。

国民党的投降与卖国,及其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残酷的压迫,非但不能阻止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而且相反的使反帝运动正在脱离对民族主义的幻想与国民党的影响,坚持自己的队伍,驱逐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与反动领袖,而团结在共产党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周围。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游击战是越发发展起来了,满洲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决的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

(五)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苏维埃运动增长,胜利与成功,它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有力的柱石,成为一切国民党区域中群众斗争所环绕着的太阳,并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革命的先锋队。

苏区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土地,工作与自由,真实的改善与提高了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了建设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工作之中,卷入于神圣的保卫苏维埃领土的革命战争之中。伟大的常胜的铁的红军是创立起来,接连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集其全力进行的四次大举进攻,不仅保卫了原有的苏区,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苏维埃版图,在广大的中国西北部创立大块的川陕苏区。得着全中国几万万劳苦群众拥护的苏维埃运动,是坚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区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成功与胜利的经验,给全中国的民众指出:只有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中国的确立,才能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脱离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役,脱离剥削压迫饥饿失业和非人的法西斯蒂恐怖。

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前面尖锐的摆着一个问题：或者是直接的和经过国民党的工具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殖民地，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确立。

在屡次失败之后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动员其所能动员的一切力量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进攻，这个进攻已经继续了几个月。但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由于全中国苏区与国民党区域中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发展，蒋介石的变更作战的部署，只是为了他能够最迅速的经过福建来从东方侵入基本苏区，继续他的五次"围剿"，决定胜负的决战还在前面。每个工人农民，每个赤色的战士，每个革命者，在这个紧张与负责的关头，必须以一切办法来准备迎接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取得其胜利。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以下略）

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六、红二十五军团西征

背景介绍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长征以前，由于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人反复"围剿"的形势下，为了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依靠帝国主义打内战的罪行，在军事上调动敌军兵力，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就派红七军团北上，以后又派红六军团西征，红二十五军进军西北，揭开了工农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

寻淮州和粟裕指挥的红七军团辖三个师6000余人，由福建、浙江、安徽转入赣东北，和方志敏领导的第十军会合，组成红军第十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经过多次战斗，取得了很多胜利，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减少了主力红军长征的阻力。这支抗日先遣队虽然后来失败，但余部由刘英、粟裕率领，在浙南坚持游击战争，成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组成部分。红六军团西征时，有9000余人，不久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会师。红二、六军团长征时，已发展到17000多人。红二十五军西进时，只有2900余人，这支部队在几十倍于己的敌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英勇奋战，途经四个省，长驱3000多公里，到达陕北，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北上。

材料

- 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 往事依稀话西征
- 红二、六军团长征记（节选）
- 西征第一关

材料一　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已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

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出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三个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个掌握。…………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八，作者：粟裕）

材料二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红六军团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兵团之一，也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奉中革军委指示于1933年6月，在湘赣根据地中心区域永新县沙市组成，辖两个师：第十七师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八军改编，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后王震）；第十八师由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八军改编，师长严图阁，政治委员徐洪。军团未成立领导机关，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到1934年8月才正式公布红六军团领导成员：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

红六军团组成后，中心任务是保卫湘赣苏区和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下，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战一年，虽取得过沙市战斗的局部胜利，但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危殆，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遵照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要其“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同红三军（红二军团）取得联系的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侦察道路，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1933年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他向外大量借款，购买军火，扩充军备，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准备。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路合进”的战略战术，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术，在我根据地周围筑碉建堡，加强军事、经济封锁，企图逐步紧缩苏区，消耗红军有生力量，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9月底，蒋介石用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湘赣苏区的主要是湘敌何健指挥的西路军第一纵队刘建绪的7个师和1个补充总队，总兵力为8个师计10万余人，红六军团兵力不足1万人，敌占绝对优势。

中革军委根据党中央的“进攻路线”和作战方针，于1933年7月26日发布了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作战纲领，规定：红军应“首先迅速给河（赣江）西湘敌和闽西闽敌以打击，目的在消灭其主力，建立在抚河以东、赣江以西的两条作战线，来辅助方面军的主力作战，以造成战略攻势和与敌决战的有利条件”。命令红六军团于第一阶段（9月底之前），在永新、宁冈、莲花和茶陵地区，机动地消灭敌西路军第一纵队的实力，以消灭湘军第六十三师和第十六师为主；第二阶段，以一个师北渡袁水，与留在湘鄂赣根据地活动的另一个师会合，威胁樟树和南昌，并消灭“围剿”湘鄂赣根据地的敌西路军第二纵队的实力。

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领导苏区军民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诸如扩大红军、动员和编制地方武装、储备军粮、赶造弹药、修理枪械等方面作了较充分准备。在军事行动上，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时间里，经过大小战斗逾百次，主要的有梅花山战斗、路田战斗、红十七师北上行动、沙市战斗、田里战斗、金华山战斗、松山战斗等，打击和牵制了敌人，较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但是，自金华山、松山战斗后，敌人采取堡垒主义，向我军实施三面进攻。而我军则单纯防御，构筑碉堡，碉堡

对碉堡，与敌拚消耗，使红军损失很大，苏区渐渐缩小，同时被分割为很多小块，军需给养更困难，群众情绪也很低落。为着保存有生力量，红六军团主力十七师和十八师撤离永新，进到关背、牛田一带山区活动，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县城被敌占领。

1934 年 6 月下旬，湘赣省级机关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一带，省委驻双源村吉昌兴木行，省苏维埃政府驻岭上村善居堂，省军区驻岭上村三声堂，省军区供给部驻岭上村诗书义知府，省军区医院驻岭上村承庆堂大祠，湘赣红军学校驻香翁祠，任弼时驻悟道草舍。红六军团 7 月 4 日进到牛田村，肖克、王震驻牛田街生茂号货栈。全军团几千人分别驻扎在上自金鸡石下到牛田村方园十多华里的村庄里。此时，反敌人第五次"围剿"已进入最困难阶段。根据 7 月 23 日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的指示精神，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下，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西征前的准备。

一、组成了红六军团最高指挥机关—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担任，肖克、王震为委员，领导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二、由陈洪时(后叛变)、谭余保、彭辉明等组成中共湘赣省委领导班子，陈洪时任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谭余保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行麟任副主席，彭辉明任省军区司令员，刘发云(后叛变)任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王用济任少共省委书记，旷金媛任省委妇委书记，领导坚持在湘赣根据地的游击斗争。

三、在任弼时主持下，召开了湘赣全省政治工作会议。他作了题为《争取新的决胜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省委和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周密研究：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附近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湖南的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

四、扩大红军，发展红六军团的军事力量。红六军团驻扎在牛田、津洞、碧江洲地区的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军团首长没有放松对部队的整训，除加强操练外，还妥善安置了重伤病员；同时依靠地方各级党政军，动员和组织青壮年参加红军。7 月下旬，在牛田组建了红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计 1200 多人，并且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等诸多方面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了精兵简政，充实部队。还从地方党政机关中挑选 250 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这时，红六军团总人数(包括轻伤员、担架队员、辎重队员在内)达 9758 人。

五、加强后勤，筹备物资。红六军团供给部依靠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就地筹备粮食(大米)14 万斤，每个战士做干粮 20 斤(自带 10 斤，其余交辎重队运输)；规定每个战士自备雨具 1 件(少部分油纸伞，大部分用斗笠)；每人自编草鞋，多则 10 双，少则 5 双；还发动妇女组成"洗衣队"、"缝补衣物队"，为红军战士洗衣服、缝补衣物。除此以外，还筹集到不少西药，赶造子弹、手榴弹，修理枪械，准备了较充足的弹药等军用物资。当时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

1934 年 8 月 7 日下午 3 时，红六军团在独立第四团的引导下，由碧溪、新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前进，先后从衙前至五斗江间、遂川至黄坳间、遂川至七岭间、寒口至广东桥间，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 8 月 11 日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在寨前圩召开西征誓师大会，向外公布成立军团的领导机关。

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在发现红六军团突围后，立即调兵追击、堵截，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我军于郴县、汝城和桂东一带。广西军阀为防止我军入桂，也令其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8 月 23 日，我军赶到零陵以北、蔡家埠以东的湘江右岸地区，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此时，敌急忙调动部队沿江布防，同时督令追击部队尾我追击。根据这种情况，军团决定迅速向东转移，进到阳明山地区。由于敌从南北西三面向我逼近，以及地形、民情等原因，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于是经白果市急转南下，由嘉禾折转西进，经湘桂边境的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的文市附近，击退桂敌和湘敌 8 个团的进攻，于 9 月 4 日在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占领西延县城。

9 月 8 日，红六军团在西延车田接到中革军委补充训令：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城步、绥宁、武冈山地。红六军团至少要于 9 月 20 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为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尔后，再沿湘黔边境转移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根据地。这一训令虽未提及中央红军准备突围之事，但目的是以红六军团的积极行动，吸引与调动大量敌人，直接配合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主力红军的行动。

9 月 9 日，红六军团由西延地区西进，进至城步、绥宁地区。但因敌人集结 6 倍于我的兵力防我北进，遂改变计划，袭击通道县城，接着在靖县的新厂击溃湘敌两个团，向西进入贵州的清水江流域。10 月 4 日，我军占领猴场，遵照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应到黔东之印江与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合的指示，于 10 月 5 日向黔东北的江口地区前进。

入黔的湘敌和桂敌，发现我军改向东北前进，立即集结兵力，企图围歼我军于石阡地区。10 月 7 日，我军在石阡西南的甘溪与桂敌作战失利，一部被敌截断，在李达的率领下，转至沿河地区，与红三军会合。主力被迫向东南

转移，利用当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于石阡、施秉、余庆一带。经过10余天的艰苦转战，打破了湘、桂、黔敌人24个团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在印江的木黄同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进至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两军会师后，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 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三团，约3300人，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两军团一起，转入了创建湘鄂川黔连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从1934年8月7日离开湘赣苏区，到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师，历尽了千辛万苦，战胜了湖南、广西、贵州敌军的围追堵截，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作者：左行鸿、尹运，《党史纵横》)

材料三　往事依稀话西征

红二方面军，是由湘赣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在黔东会合后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应当从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讲起。我跟随弼时长征，从湘赣出发到甘肃会师，整整走了二万四千多里。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依稀，但弼时在长征中的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一

1934年8月7日，我们离开湘赣突围西征。因为离开根据地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早两个多月，后来人称红六军团的西征拉开了长征帷幕，是中央红军的先遣队。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央红军失利，我们湘赣根据地形势很严峻。5月间，湖南的敌军占领了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省委机关撤到牛田墟。这是一块方圆不过数十里的狭小地区，敌机天天来轰炸，弼时心里非常焦急。7月23日，接到中央命令突围西征，他日夜忙着开会，改编部队，配备干部，布置主力转移后的地方工作。同志们忙着打草鞋，备干粮。

一天，弼时告诉我，大部队要撤离根据地，转移到湘中去发展游击战争，和贺龙同志的队伍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要随军行动。他说，这一去要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沿途都是敌占区，又没有后方，途中一面战斗，一面行军，一定很艰苦，要我做好思想准备，这时，我的孩子湘赣才三个月，还没有断奶，我说孩子怎么办呢？他沉默了一会说：“带着孩子行军作战不方便，只能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这是不得已的事！”他当然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是1928年在安徽被捕时，我抱着苏明去营救他的过程中，不幸得肺炎夭死的。现在，湘赣又要离开父母，他怕我感情上受不了，开导我说：“如其让孩子一路上受折腾，不如托给老乡，以后环境好转了，我们设法把他领回来。”他是非常钟爱孩子的，但是情况不许可，我们只好和孩子分离，我便收拾孩子的衣物用具，把湘赣托给老乡，随着弼时出发。

这一走，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回湘赣，但弼时经常挂念着孩子。直到1949年12月，他在莫斯科养病时，给我的信中还说：“湘赣的消息望继续去打听。可惜经多方寻找，至今没有下落。在旧社会，有多少穷人的子女，冻死饿死，为了使劳动人民的孩子过幸福生活，共产党人应当牺牲个人利益，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

二

离开湘赣根据地时，正是大热天，常常遇到雷雨。白天行军怕敌机扫射，只好晚上走。雨后的泥路又湿又滑，急行军时经常滑倒，这不算什么，有一次，遇到敌人堵袭，队伍钻进一个林子里，我是做机要工作的，身上带着电讯密码。队伍走得急，我个子矮小，虽然紧赶慢赶，还是掉了队。我正倚在一棵树下喘气，忽然来了一个女战士。她惊讶地说：“小麻雀，你怎么样啦？”我说“鞋子掉了！”她叫陈罗英，是做宣传和收容工作的。她挑着担子，二话没说，便连推带拖地把我带走，她知道我带有密电码本。我们赶了十多里地，才追上军团部的队伍。弼时高兴而诙谐地说：“哎呀，真感谢你呀！我丢老婆是个人的不幸，丢了机要员是革命的损失啊！”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最困难的是和贺龙同志会合的前几天，那是在快到贵州石阡的时候。因为情报不准确，部队到了甘溪，和白崇禧的队伍遭遇上了，我们措手不及，队伍被切成三截，前后失去联系，只好钻进梵净山区。这时情况很严重，弼时的马也丢了。在林子里风餐露宿，蚊子又多，了得了虐疾，冷一阵，热一阵，全身无力，只得躺在担架上指挥。担架由四个人抬。因为长途行军，大家体力都下降，担架员病的病，掉队的掉队，最后只剩下毛少先一个人。毛少先就背着弼时爬山，警卫员帮扶着，我抬着弼时的脚，一步一步地翻过山去。这时弼时沉着地对我们说：“不要紧，翻过山头，到了大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队伍。”我以为大地方是村镇，谁知到了那里只有三四户人家，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只好饿着肚皮赶路。肖克、王震见弼时安全翻过了山，十分高兴。他们商量后，将电台的充电器埋了，把警卫排收拢，在大山里转了一星期，终于在一个老猎户的向

导下，连夜穿过一条夹沟，在敌人的眼皮下，冲出敌人的封锁线。

毛少先是江西安福人，肃反时被打成AB团，罚他抬担架。弼时一路上详细地询问他的情况，后来他说："哪里有这样的反革命啊！他要真是AB团，还能背着我，不把我扔了才怪！"从此，毛少先摘了"帽子"。弼时处处注意调查，讲实事求是，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三

与贺龙的队伍会合后，红三军改称红二军团，红二、六军才在湘鄂川黔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一年。

1934年11月，敌人调集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包围上来，敌强我弱，二、六军团奉命撤离湘鄂川根据地，入湘中，经黔西，准备在云南的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时，全国抗日形势高涨，二、六军团便渡金沙江，准备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途中翻雪山，过草地，作战任务虽然少些，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特别是过草地时，沿途居民很少，粮食和盐巴都非常困难。这时，弼时任西北局副书记，随红军总部行动，和朱德总司令经常在一起。偏偏在物资条件最困难时，我又分娩了。产后不但没有营养品，连粮食都困难。这时，电台的彭富九说，他们没有粮食吃了。电台是部队的耳目，弼时对电台工作一直很关心的。他知道电台的同志是不分昼夜工作的。他们断了粮，怎样坚持工作呢？弼时就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了他们，叮嘱他们和着野菜吃。鼓励大家说："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我们怎么办呢？他说：钓鱼吃，草地水深的地方有鱼，他便和朱总司令一起去钓鱼。好在钓到一些，就熬鱼汤给我吃。就靠着野菜和鱼汤，我们走出草地。

长征是艰苦的，但越是艰苦，越能看出弼时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风格。

（选自《红六军团征战记》，作者：陈琮英）

材料四　红二、六军团长征记（节选）

我们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三五年十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十一月十九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 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二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一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

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我们到毕节后，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我们问他"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还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虢，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夹击之势，迫我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遵照指示会师和北上抗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后，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腕。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他们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派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数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作者肖克，选自《长征回忆录集》）

材料五　西征第一关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我们三千健儿，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的领导下，从大别山出发，日夜兼程，越过平汉铁路，横穿河南，冒风顶霜，受冷忍饥，长途跋涉。敌人见我转移，立即组织萧之楚、庞炳勋数路大军，分头阻击；同时集中东北军及刘镇华六个师紧紧尾追，企图在行军中消灭我们。斗争非常残酷：我们一动脚，敌人便扑过来；往往是刚打完一个仗，还来不及吃饭，第二个仗又开始了……真是六千里行程，上千次战斗！打过的仗数也数不清，其中数独树镇、拐河、鸡头关几仗为最激烈。提起河南独树镇，确实，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当年战斗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

这天正是大雾，十几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部队正越过河南平氏、泌阳，进入方城东北地区，在通往独树镇的公路上行进。

那时，我在二二四团一营二连任指导员。我和连长带着二连走在前面。当我们快到独树镇时，突然，那里传来了一声枪响。

"你听！"连长一听到枪声忙叫住我。接着又是"砰砰"两声。

一忽儿，前面的尖兵也气喘喘地跑了回来，说前面确已发现敌人，但它是什么样的部队，一共多少，因为雾大一时还摸不清。

敌人的情况起来越清楚了：既有机枪，又有小炮；伏在地上还能听到"的的笃笃"的响声，经验告诉我们，敌人还有骑兵。现在我们才知道进了敌人的埋伏圈，看来一场恶战即将在这里进行。

敌人冲入我们的伏击圈了。"打！"连长一声命令，几十条步枪都"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随着枪声前面的敌人倒下去了，可是后面的还继续向前涌。就在这时候，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了。

根据侦察到的消息，敌人的援兵正在源源开拢。显然，他们准备在独树镇摆开来与我们决斗了。

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见机行事，势必危及全军。为了避敌锐气，闯过关去，军的领导上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去从正面吸住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不用说，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我们前卫连身上。军首长临走再三嘱咐，要我们连续坚持两、三个小时，待主力一跳出圈子，马上跟上去。

我们立即向战士了战斗动员，并把全连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

果然，敌人发现我们大部队后，组织了更多兵力向我们扑来。一场殊死的战斗开始了。敌人步兵加骑兵，交叉地进行猛攻；我们用大刀、手榴弹与他们厮杀。战士们人人勇敢顽强，奋不顾身。当敌人的骑兵冲过来时，我们的一个突击组迅速行动：他们握着大刀从地上滚过去，只见刀光闪处，一声马叫，骑兵连马带人倒在地上；战士们眼快手快，一刀砍去了敌人头颅。一个战士揭开手榴弹盖，向冲过来的一股敌人步兵奔去，吓得敌人退了回去，但他却不饶，飞也似地追了上去。手榴弹响了，一群敌人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英勇战士，也终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珍贵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紧紧地拖住了大批大批的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但是，正当主力开始转移后一个小时，我们准备组织下一次反冲锋的时候，敌人却很快很快地压过来了。这一阵可紧张！待我们用肉眼看到敌人时，正前方已是黑压压的一片。

一场混战，打得难解难分。也就在这混战中，我们与连长他们冲散了。

混战结束时，我们被压到了公路的一角。我们不但与连长冲散了，而且与主力也失去了联系。

薄雾退尽了，月亮偷偷地露出半个脸来，夜既冷又静。我们派人前去那个小庄子作了周密的侦察，知道那里有一个牢固的围子，足可供我们隐蔽。于是，我们很快地从公路边撤过去了。

我们来到了小庄子，全体人员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借着油灯浅绿的灯光，我看到战士个个困倦不堪。而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一百来个战士中间，半数已经负伤，有的还伤得很重。现在他们也坐在这里：挺不住的，就蹲在地上；再不行的，就躺着。

我们知道这里决非久留之地，必须设法在天明前离开。正当我们在工事边召开临时支委会研究怎样突围时，一班长匆匆忙忙地跑来告诉我：敌人又发起攻击了。

"敌人又来了，打，坚决打回去！"我一面命令，一面跑了过去。

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地扫过来，北面围子边一片火红，我们部队的喊杀声与敌人的枪声混成一片。看来敌人决心要攻下这个庄子。也许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只有小股部队了。我冲到围子前，却不见二排副。正在射击的小战士指着前边告诉我，二排副带着突击队出去了。

敌人的攻击又失败了，借着淡蒙蒙的月光，可以看清阵地前沿留下的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

"指导员，敌人退了！"二排副一回来就兴奋地向我报告。

"太好了！"我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但是，我发现他的手有粘糊糊的东西，定睛一看，啊，全是血！

"没什么，一点点。"他一边说一边又用那只手抹去肩上正在涌出来的鲜血。他伤得不轻，而现在谁都是个硬

汉！我心中暗暗起敬。

当我刚回到屋里，二排长气喘喘地从门外冲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兴奋地叫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们，我们与军部联系上了！"

"主力安全转移了吗？"我等不及他报告，打断他的话。

"报告指导员，全部转移了，首长命令你们赶快撤回伏牛山！"哦，原来军首长正在等我们呢！此刻我们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竟奔了出去，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战友们。

"同志们，主力与我们联系上了，顶住这一次，我们立即突围！"

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振奋极了。就这样，我们一个顶两个，每人用双倍的勇敢，向敌人猛烈反扑，敌人终于又给我们打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

战斗一停下来，支部就决定立即带着伤员，按军部通讯员跑来的方向突出去。我们收拾了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把轻重武器组织在一起。又在准备突围的方向东北围墙上掏个大洞，先用火力作试探性的射击。

突围开始了。"冲啊！"随着二排长一声喊声，战士们就象出了笼的小老虎，一个个猛向东北方向突去。跑在最前面的是一排副，他是个高个子，一面射击，一面带着突击组员猛跑。

我们已突出去了，蒙在鼓里的敌人，还以为我们在老地方打转，一股劲地把火力集中到围子那边。子弹象大雨倒在地上。可是，他们已经白费心了。

我们整整跑了一夜，天明来到了伏牛山。路口，远远看见徐副军长骑着马在观察地形。他看见我们，意外地怔住了。我带着三十几个战士走近他。

"报告首长，我们都回来了！"我站在他面前吃力地喘着气。

"都回来了，好，快休息。小李啊，你们做出了榜样，冲过了第一关！"徐副军长说完激动地弯下腰来，热烈地与我握手。我握着他粗壮、火热的手，象有一股电流传到了我的全身。我刚回过头，吴焕先政委正在旁边，"政委！"我激动地扑到他的怀里。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一个革命者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我们终于回来了！"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就在山上造饭。但正当我们吃完一碗饭时，山下吹响了集合号，原来敌人又撵上来了。于是我放下正在吃的饭，嘴一抹，朝着二排长说："老刘，走，咱们过一关又一关，痛痛快快干它第二关，干完二关再吃饭！"

冲锋号吹响了，我们又投入了另一场激烈的战斗。

（选自《戎马生涯》，作者：李国厚）

中央红军长征

背景介绍

1934年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留下3万多人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及中央机关8万多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雩都等地出发，计划转战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这时，"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没有争取时间摆脱敌人，把战略转移当成了大搬家，命令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所以部队行动迟缓，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红军经过艰苦作战，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却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左"倾领导者不顾部队的安危，仍然主张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领导者的支持，红军于1935年1月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立即挥师北上，在两个月里，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与敌人展开了灵活机动、有声有色的运动战，于3月21日四渡赤水，折回贵州。然后以小部队向东佯攻，主力则以急行军南渡乌江，直迫贵阳城下。这时蒋介石 命令云南部队火速增援贵阳，红军乘机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当敌人调兵防守昆明时，红军又以急行军直奔金沙江。5月上旬，红军在皎平渡渡口依靠7只小船，7昼夜全部渡过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使长征出现了新的局面。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休整数日，于5月下旬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6月，红军又以顽强的毅力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到达四川北部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此后，中央军委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拒不执行，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立的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南下的错误主张。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张国焘拒不执行沙窝会议决

议，为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但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却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强令原四方面军部队南下。9月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军委，坚持南下主张。同时他发密电给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要“右路军回头南下”，并说“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叶剑英及时发觉了这个密电，立即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党中央当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区，迅速北上。11日，中央电令张国焘北上。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号召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9月中旬，红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的哈达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行军途中，得悉陕北红军的根据地仍然保存着，于是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张国焘不听中央的劝告，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见史料4)。并以红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转战在川滇边界的红二、六军团北上和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不知道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分裂党的活动，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知道后，指示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由于中央的批评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伪中央，但仍和中央分庭抗礼。他妄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指战员赞同他的反党活动，遭到坚决抵制，朱德、任弼时、贺龙在甘孜会议上同张国焘作了坚决的斗争，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彻底破产。7月，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10月，先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材料

- 回顾长征
- 红军不怕远征难
- 翻越党岭山
- 红军“瓦基瓦”(万岁)
- “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
- 前无古人毛泽东走通大渡河
- 抢渡大渡河第一船
- 生命
- 毛泽东话长征

材料一　回顾长征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的壮举? 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会全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

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作者：刘伯承）

材料二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利，10月初，敌人继续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域推进。从10月7日起，中革军委陆续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主力红军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晚，党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

党中央、政府机关、军委总部、直属队及干部团，编成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第一纵队为军委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部队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下辖一师、二师和十五师，共九个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下辖四师、五师和六师，共九个团）；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下辖十三师和三十四师，共六个团）；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下辖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共六个团）；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潘，下辖三师和二十二师，共六个团），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组成野战军，在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组织领导下进行转移。毛泽东、王稼祥因病随红军总部行动。陈云、凯丰（何克全）、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五、八、九军团工作。总参谋长刘伯承到五军团任参谋长。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邓颖超、蔡畅等，随中央纵队做具体工作。

为了阻截中央红军转移，蒋介石相继在沿途筑了四道封锁线。红军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10月21日在江西安远、信丰之间与敌人激战，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摧毁了敌人构筑的碉堡，沿江西、广东边界向湖南进军，一路上没有经过大的战斗。11月初，在湖南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跨过了粤汉铁路；11月15日在湖南郴县、宜章一带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目标。蒋介石急忙调集15个师近四十万大军，拼凑了五路所谓“进剿军”，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沿江一侧修筑了很多碉堡，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敌人的部署是：一路为何健湘军和中央军薛岳所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和全州一带沿江布防；一路为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他们采用既防共又防蒋的对策，将部队集中在兴安、灌阳之间，形成袋状阵地，以阻击红军南下进入广西腹地；另部中央军周浑元和湖南李云杰、李韫珩等部在红军后面追击，黔军布防于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入境。当红军向湘江前进时，敌人的飞机撒下传单，疯狂地叫嚣：“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红军的前面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我中央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重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

面对敌人的重兵，“左”倾 路线的领导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是命令红一军团向前冲击，红三、八、九军团在两侧进行甬道式的掩护战，红五军团作后卫，节节抗击尾追之敌，不惜一切代价夺路前进，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当时，本来可以利用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抢渡湘江的。如当时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的湘江两岸，在这段地区里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11月27日到达文市、桂岩一带。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路，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

央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按照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湘江边，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惨重代价。

红一军团一师和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脚山铺一带，阻击敌人的四个师。敌人倾巢出动，在十多架飞机的轰炸配合下，向我正面猛扑。敌人向我阵地连续冲锋，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红军战士虽然已经三、四天没有睡觉，一天多没有吃饭，但面对强敌，仍然高度发挥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追敌激战。三军团五师的十四、十五两个团，在灌阳的新圩附近抗击敌人的两个师。他们在“只要还有一个，就不能让敌人进到新圩”的誓言鼓舞下，与数倍的敌军浴血奋战三天三夜。……

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在激战中也伤亡很大，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一千余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走在部队的最后头，他们正要过江时，被敌人重重包围，一直打到弹尽粮绝，除师长率一二百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突围出来的，也不断遭到敌人追击，师长陈树湘负重伤，英勇殉难，余部经过十来个月艰苦战斗，也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在湘江东岸经过七昼夜的艰苦奋战，才使中央纵队于 11 月 29 日从界首渡过湘江。湘江战役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过了湘江，红军已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了。

湘江战役的失败，是王明军事路线的最后破产。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怀疑和不满达到顶点，从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了。

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仍然准备经湘、桂边境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的企图，为了阻挡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五六倍的兵力扼守去湘西的要道，布置了又一道封锁线，妄图以重兵围歼红军于湘桂边境地区。同时，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于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西进贵州。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打算已无法实现。但是，中革军委此时并没有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行动方针，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当时，红军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如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要去同十几万敌军决战，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打几个胜仗，摆脱被动局面，创造新的根据地，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于 12 月 11 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临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12 月 12 日，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走右翼，三军团走左翼，分两路进入贵州，红军的行动路线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通道会议并未深入的讨论，实际上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仍然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北出湘西的战略方针仍然没有改变。12 月 14 日，军委仍电令二、六军湘西北发展新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12 月 16 日，在红军突破黔敌第一道防线，占领黎平、老锦屏以后，中革军委仍然命令一、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区，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前出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区的二、六军团会合。这说明中革军委直到抵达黎平的前一天，仍未改变原定计划。12 月 16 日，中央纵队进至贵州黎平。

为了纠正“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2 月 18 日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据周恩来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仍争论得很激烈。李德坚持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则主张向黔北走。到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情况，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作出转兵的最后决定，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1935 年新年的第一天，红一军团二师的四团担任先头团，在师长指挥下直趋江界河渡口。进行侦察后，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一条与渡口大道相通的傍山小路。当天下午，组织部队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以吸引敌人；工兵部队则赶制竹筏，为主攻部队强渡和架桥作准备。

1 月 2 日，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地冷。上午 9 点钟，渡口方向的佯攻一开始，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工事，又是打机枪，又是打迫击炮。就在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渡江部队组织了以三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八位善于游泳的勇士试渡。这时朔风凛冽，冷雨潇潇，别说是在水中，就是穿着衣服站在江边，都觉得寒风刺骨。可是八位勇士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的一捆绑好的手榴弹，跃入急流中。纵然江水冰冷，头上炮弹呼啸，八位勇士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泅渡。但游到途中，八位战士拉着的

那条用作架桥的缆绳，被敌人的炮弹打断了，没有拉过去，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只得游回来。但是，一检查少了一名，这位战士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上在水中冻了两个小时，风大浪急，被江水冲走了。他是为强渡乌江献出生命的第一位战士。

第一次试渡失败之后，决定实行夜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晚上组织了十八位勇士，分乘三个竹筏偷渡，约定到了对岸之后，以电筒光或火柴光为联络信号。这三只竹筏，只有毛连长率领的第一个竹筏偷渡成功，第二、三两个筏都渡到中流被卷回来。但当时并不知道第一个竹筏渡河成功，以为他们是被激流卷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敢盲目再发竹筏，偷渡只好暂停。

次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四团。他说，追踪红军的薛岳纵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督促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就有背水作战的危险，那时情况将更加危急。他还带来一个工兵连，协助完成渡江任务。于是，四团又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以三个竹筏为先导，立即强渡。敌人开始并没有发现红军，当竹筏距敌人约五十多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不是朝着竹筏，而是往崖上打。当竹筏快到北岸时，敌人已经乱了阵脚，枪不知往那里放。竹筏上的人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象把钳子似地紧紧咬住敌人，敌人的气焰被打下去，纷纷向后逃窜。

原来，崖底下的人正是头天晚上乘坐第一个竹筏的毛连长等。他们晚上上岸后，总不见后续部队上来，只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是敌人在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又怎么能打手电、划火柴呢？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在敌人工事底下潜伏着，等待时机。第二天拂晓，当强渡的大队竹筏快接近岸边时，这五位勇士才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跃出来，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第一批强渡的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后，一营的第二梯队，撑着剩下的几十个竹筏，向对岸驶去。这时二营的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轻、重机枪和军团炮兵，一齐吼叫起来，向敌人压去。一营过江了，神速地占领了阵地。忽然，敌人的预备队开到，齐向一营压来，他们夺回了一营占领的阵地，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江边。在这紧急关头，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打三发炮弹。炮弹在敌群中爆炸，顿时掀起一股浓烟，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这时，滩头部队乘势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才使敌人全线溃退。

浮桥架起来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

这次渡江中，最先打过江的二十二位勇士，后来被大家称作“二十二个红色英雄”。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一师的先遣团——一团，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于1月3日上午11时也胜利地渡过乌江。

慑于红军的声威，茶山关渡口守敌不战先逃，红军左纵队的三军团不费一枪一弹，1月3日也安然渡江。

（节选自璞玉霍、徐爽迷：《铁流两万五千里》）

材料三　翻越党岭山

1936年2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方面军部队依依不舍地告别乡亲们，陆续撤出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途中再次翻越人迹稀绝的夹金山和被人们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又一次经受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磨练。

我们在雪山脚下，吃了一餐用为数甚少的土豆、青稞和野菜煮成的饭，然后整装出发。

没想到雪山的天气变化特别快，大约一刻钟工夫，暴风雪就来了。霎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刮得人们站不住脚，睁不开眼。紧接着，鹅毛大雪越下越大。

因为天黑、风急、雪大，难以继续行进，只好原地休息。我们要求部队，选择避风的地方，以连为单位围在一起休息，这样可以较好地抵御风雪的袭击，用人们自身的温度相互取暖。

好不容易俟到风停雪止，天色微明，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冻得失去了知觉的双脚已不听使唤，走一步跌一跤，爬起来再走，走出二二十步才慢慢恢复了知觉。不少同志的脚冻裂了，鲜血渗透了裹在脚上的破布和草鞋，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印。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政治工作发挥出特有的威力。王建安政委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不断地给部队做鼓动工作。各级干部以短促有力的口号，宣传队员敲响锣鼓，打起“呱嗒板”，活跃气氛，鼓舞部队的士气，激励大家战胜困难。

过了主峰，倍感轻松，队伍里谈笑风生。王建安政委风趣地说：“孙大圣大闹天宫，蟠桃、仙丹，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我们是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大闹天宫’的。看来，孙大圣在我们红军面前也要甘拜下风了。”

其实，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不过是文人构思的神话，而真正创造人间奇迹的，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我们英勇无畏的红色战士。

（选自许世友《草地漫谈》）

材料四　红军“瓦基瓦”（万岁）

我们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之后，继续北上，经西

昌、礼州、泸沽，进入冕宁。

一进冕宁城，只见街上商店照常营业，家家户户挂着红旗，满街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欢迎红军的标语。乡亲们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欢迎我们。有的还端来茶水，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红军先生，请吃茶。"

我们婉言谢绝，继续前进。不久，看到在欢迎群众中夹杂着几个身材特别高大的人，他们有的头上扎着很大的包头，有的披头散发，身上披着象麻包片一样的衣服，赤着脚，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支队伍，咧开嘴憨厚地笑着。听同志们讲，这是彝族同胞。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彝族地区。

宿营以后，我们直属队党支部召开了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康克清同志作了进入彝族地区的工作动员讲话。她说，彝族同胞历代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住在深山老林里面，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和压迫他们，一些汉族奸商也对他们敲榨勒索，贱价收买他们的皮毛、山货等土特产，高价出售日用品。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使他们对汉族有着很深的民族隔阂。我们经过这一地区，一定要认真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向他们做好宣传工作，不进入他们的村寨。同时号召每个同志都要准备一些东西，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散会后，我刚回到驻地，周副主席看见我问道："小魏，今天开会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把康大姐动员讲话的内容简要复述了一遍。

周副主席又问："那你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我回答说："我正为这件事发愁呢。在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找礼物呢？"

周副主席笑着说："又不是要你象江西老俵办喜事那样，准备多少提盒。彝族同胞因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很困苦。送他们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嘛！"

我问周副主席："在云南打土豪，我还分到两件衣服，送给彝族同胞作礼物行不行？"

他点点头说："可以。"

我们继续出发了。过冕宁就上了山，我们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进。路两边山势嵯峨，山坡上长着密密层层的树林。走了不远，部队忽然停了下来，听见前面山上传来"呜呼"、"呜呼"的呼喊声。不一会儿，先头部队来人报告：在前面的山口子上，彝族同胞不让我们通过，他们从山上打枪、放滚木擂石，我们有的战士负了伤。周副主席指示：一定不要还击，等待找通司同他们谈判。于是，部队就在原地休息。

过了约莫半天时间，先头部队来人向周副主席报告：刘伯承参谋长已经同彝族沽鸡家支的头领小叶丹结盟为兄弟，谈判成功了。我们送给小叶丹一部分枪支弹药，小叶丹也送了不少娃子来红军学习，学会军事好回去打"刘家军"（彝族兄弟对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队的称呼）。小叶丹已经派出向导为我们带路，并负责同其它家支联系，一程一程地护送我们通过彝族地区。

一天，我们正在前进，只听见两边山上又响起了"呜呼""呜呼"的呐喊声。经过为我们带路的彝族向导前去联络，喊声才停下来。接着望见许多男女老少彝族同胞从山上跑下来，站在道路两旁欢送我们，并且欢笑着呼喊："红军瓦库（万岁）！""共产党瓦库！"有的青少年还插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同我们一起前进。

这时，忽然从路旁走出来一位彝族老汉，拦住了周副主席的乘马。老汉半跪在路上，低着头双手捧着一盘鸡蛋高高举起。周副主席看见，急忙下马。我们几个警卫员赶过去把老汉搀扶起来，告诉他我们红军不收老百姓的东西。老汉一面把鸡蛋往我们手里送，一面叽哩哇啦地说个不停，我们都听不懂，看样子他非常着急。周副主席吩咐我请来通司。经过通司翻译，我们才弄明白，老汉原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冕宁监狱里，红军把他救出来了，并且送给他衣服粮食。老汉感谢红军的恩德，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救了我的命，送了我那么多东西，我送这么几个鸡蛋，你们为什么不收？"

周副主席听了通司的翻译，笑着说："看来，这鸡蛋是非收不可了。"他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谁还带着礼物？"

"我这里还一件大褂。"我一面说一面解开包袱，取出大褂，交给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也用双手捧着大褂，送给老汉。老汉不住说着"红军瓦基瓦"，笑呵呵地接过衣服。

红军部队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

（节选自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一文）

材料五 "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

大渡河，古名铁江，当地人又称铜河，发源于青海省东南端，流入四川后，注入岷江。这条河，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逢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惊涛拍岸，震得山鸣谷应；巨浪翻滚，有如万马奔腾。既因水势凶险，不易架桥；复以水寒彻骨，难以泅渡。从前两岸之间，只有少数渡口和铁索桥可能通行。真可谓我国西南有名的天堑。

现在石棉县属安顺场，据《越西厅全志》记载，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前，称为紫打地。是年秋，大渡河水泛滥，紫打地被洪水冲没，另建新场于北面的中坝，称安顺场。

安顺场及其周围地区，在旧中国的时候，由于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这里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彝汉人民杂处。真是"化外"之地，"不毛"之区。

安顺场是一个小镇子。它背枕巍峨挺拔的营盘山。营盘山的名称，是人们为了纪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而命名的。它对面北阻大渡河，这里河面较宽，水势十分凶险湍急。过去渡河时，通常都要由渡口沿岸溯河而上到好几十丈的地方，然后以三十度的斜角，顺流横渡，船象离弦之箭，斜冲对岸。安顺场西濒大渡河支流松林河。河面比大渡河自然要窄，但还是比较宽，可是水量不大，乱石满河。枯水季节，河水从石缝中流注，人们可以涉浅而过。涨水季节，水石相激，一片浪花，有如瀑布，人们既不能涉浅，又不能行船。安顺场东西二十余里处是大渡河的另一支流老鸦漩。满河怒水，遍布乱石，到处都是又深又大的漩涡，任何飘浮物掉在这里都会立即被大漩涡吸没冲走，舟渡人泅均不可能过河。站在岸边的高入云端的峭壁陡崖往下看，令人心惊目眩。安顺场的东南面，都是高山壁立，形势险仄。这个古战场，确实是一个兵力难以回旋，易遭包围和伏击的险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几万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率领下，在四川强渡金沙江后，北经西昌、冕宁，来到了越西北境、大渡河以南的安顺场，进入了这个险境。

在离安顺场还有五、六里路的一个大山脚下，红军部队稍事休息时，发现前面有几棵参天古树，旁边立着一块石碑。战士正在猜想这块石碑是为什么事立的，毛泽东同志走近看了看碑文，然后对战士们说：

"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当时称紫打地——笔者)渡河。正遇上山洪瀑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围：前面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悬崖绝壁，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四十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听了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段故事，红军战士们都感慨地说：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能够越过天险大渡河！"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说：

"是啊！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石达开当时的情况，说道：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他们以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毛泽东同志讲这些话时，围来很多战士，战士们回答：

"哼！敌人是在作梦！"

是呀，同样的五月，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渡口，同样的围追堵截，同样数量差不多的军队，蒋介石见到这样的巧合，大喜过望，不禁发出"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幻想历史重演，红军重蹈覆辙。但是，巧合毕竟只是外表的相似，呓语终于成为对反动派自己的讽刺。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安顺场后，选择好了强渡大渡河的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一座紧贴山麓的石垒瓦房里，二层楼，坐南向北，北、东、西三面都有窗口，通过窗口，大渡河南北两岸一览无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在安顺场及其附近地区，刷写了许多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北上抗日的宗旨、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至今仍清晰可见的有这样一些：

"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

"红军是帮助干人谋利益的！"(四川方言，"干人"即"穷人")

"工农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不替军阀打仗大家当红军去！"

"反对卖国的国民党！"

"红军优待白军俘护(虏)兵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欢迎！"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这些标语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广大战士和当地广大群众。

在作好强渡大渡河的一切准备之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不顾渡口水势的险恶和对岸敌军的堵截，在刘伯承总参谋长、政委聂荣臻的指导下，开始顽强的渡河战斗。红军在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得仅有的一条渡船，船老大帅士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摆渡，一师二团二连的十七名勇士，在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从上午九时发起强渡，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拚搏，终于冲破对岸一营敌军的火力封锁，乘船强渡登岸成功，并消灭和击溃了北岸渡口的二百多敌人，为部队前进打开了第一条通路。

红军战士及时把这一胜利喜讯报告给了毛泽东同志：

"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

毛泽东同志听了，高兴极了，他大声向战士们说：

"敌人的好梦是作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

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

毛泽东同志的话音一落，战士们更加活跃起来。得到继续前进的命令后，大家便迈开双脚向安顺场奔去。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来到安顺场。毛泽东同志在安顺场的住地，是所座落在街区的普通板壁房子，紧邻一家中药铺，距红军强渡大渡河指挥所也不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一到安顺场，即刻听取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左权等同志的汇报，研究了如何使全军越过大渡河的问题，布置了新的任务。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师正在继续渡河。但是，这里的水流太急，经过几次试验，架桥的希望不能实现。当地群众的船只都被敌军毁坏，红军只寻得[illegible]小木船。每船往返一次，至少要花几十分钟，要使几[illegible]马全部摆渡过河，大约需时一月左右。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尾追红军，已于二月二十六日进抵西昌以西的礼州，并抽调二十四军第七师师长刘元璋率所部三分之二兵力，协同中央军一道由南向北追击，离红军只有几天行程。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就任大渡河守备指挥。杨森奉蒋介石之命也正由川南叙府（今宜宾市）兵分两路赶赴大渡河堵截：一路经犍为、乐山沿大渡河北岸向清溪（当时汉源县城）、富林（今汉源县城）前进；另一路经洪雅、夹江向雅安、荥经等县前进。形势十万火急。如果红一方面军不能尽快全部越过大江河，旷日持久，非但不能实现进军川西北地区会合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略目标，还有被分割在大渡河两岸遭敌歼灭的危险。为了迅速粉碎敌人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放弃原拟从安顺场全军渡河的想法，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夹河北进：红一师为右路纵队，从安顺场渡河后，由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指导，沿东岸溯流北上，策应左路执行夺桥 任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同志亲率其余红军组成左路纵队，沿西岸北进。担任左路纵队先锋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第二团，由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同志率领。军委指示左路纵队先锋团三天内夺取离安顺场三百二十里的泸定桥，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全部红军顺利越过大渡河天险。五月二十七日，右路纵队红一师渡河完毕，左路纵队红二师四团先锋出发，向泸定桥奔袭。

正当红四团沿河西岸向北疾进的时候，敌情发生了新的变化。红军先头部队夺取安顺场渡口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便急急忙忙由重庆飞往成都，督促“剿匪”一事，频频向泸定桥方向调兵遣将。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命令，将原定部署提前一天，限令红四团在次日拂晓前赶到泸定桥，迅速完成夺桥任务。红四团接到军委电令以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行程二百四十里，终于在五月二十九日早晨六点多钟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下午四时，飞夺泸定桥总攻开始。黄昏，红四团全部飞越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打下泸定桥的第三天，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到了。第四天，红军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并乘胜挺进，旋经汉源、荥经、天全、芦山、宝兴等县，六月中旬翻过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到达懋功（小金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选自《纵横》84年4期，作者：邱远猷）

材料六　前无古人毛泽东走通大渡河

会理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到达了泸沽等地，准备渡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 越西到大树堡，由此过河后便是富林，这是通住雅安、成都的正道。一条是经冕宁、大桥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山道，而且还要经过彝汉民族隔阂很深、汉人一向难以通行的彝族聚居区。

蒋介石估计红军不敢走彝族区，肯定走越西到大树堡的大道前进，因此，他把大渡河守备的重点放在了大树堡方面。没想到红军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而且先头部队冒着大雨飞速地赶到了大渡河南岸上的渡口——安顺场。由于守敌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之快，所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红军先头部队打了措手不及，全部被歼。5月25日凌晨，红军控制了安顺场南岸。但是这里仅有一条小船，对于大部队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刘伯承和聂荣臻赶到河边后，组织部队进行了强渡，占领了对岸渡口边上敌人的工事，并又找来了两条船。但船少人多，直到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才全部通过。红军在这里架桥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红军的大部队要在这里通过是不可能的了，怎么办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来到安顺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行程，要求在两天半赶到。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完成夺泸定桥这个光荣面艰巨的任务，两路纵队夹河而上，互相支援，互相鼓励，消灭和驱逐了沿途的敌人，保障了对岸部队的安全，加快了前进速度。

左纵队的红四团一天之内消灭了沿途敌人，走完了240里的路程，准时赶到了泸定桥边。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它架在急浪滔滔、礁石耸立的大渡河上，形势异常险要。桥上有十三根铁索从河的东岸拉到河的西岸，每根铁索有碗口粗细，以四根作为扶手，九根作为桥面，上面铺以木板，以通行人。

早在红四团到达前的28日傍晚和夜间，敌人两个营的兵力已经到达了这里，拆除了桥上的部分木板，放置到了桥的东岸。当红四团到达后，敌人狂妄地喊道："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吧！""为什么不过来呀？"

红军战士对敌人喊道："老子不要你的枪，要你们的桥！""你们等着缴枪吧！"一场争夺泸定桥的战斗开始了。挑选出来的22个突击队员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勇士们在敌人的火力下冲过了敌人点燃的大火，在后继部队和右路纵队的配合下，终于控制了泸定桥，使红军的主力部队顺利地通过大渡河。

中国近代史上，1863年，太平天国的名将、翼王石达开曾在这里全军覆灭。但是，中央红军却走通了这条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红军在大渡河一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一路北上，打退了阻拦的敌人，翻过了神秘莫测的大雪山——夹金山，终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七　抢渡大渡河第一船

1931年我在红一师一团担任司号员，1935年跟随杨得志团长、黎林政委、耿飙参谋长、谭政主任，从江西出发，一直转战到大渡河边。抢渡大渡河第一船，是我吹的冲锋号。

红一团在回里、见昌、德昌、大树堡等地打了四个恶仗之后，甩开敌人，大踏步北上，于1935年5月中旬接受新任务，命令我们连夜赶赴大渡河。一天中午，部队到达各麻子附近的海子里边。这里是大小凉山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三个民族，一个罗洪族，被国民党利用打我们；一个叫老伍族，守中立，比较同情我们；还有一个沽基族，武装比较多，头目叫小叶丹四叔，本来小叶丹是头目，但由于年纪小，实权被小叶丹四叔掌握。

由于历史的原因，小叶丹四叔对汉人很仇恨，不管国民党、共产党他都打。当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号角，角音一叫，接连各村各寨的号角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吹拢几百族兵，从各个山卡来堵截我们北上。于是，在这里打了一个小仗，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两个族兵，同时我们自己也牺牲了几个战士。这件事，把许多红军战士惹怒了，都气愤地喊着要为战友报仇，有的说："谁阻挡红军北上抗日，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有的说："一路上多少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都被我们消灭了，难道还怕你们这几支'单打一'不成，打！"团首长见大家情绪不对，大吼一声："谁说打的？有种的站出来给我看看。在朋友面前称什么英雄汉！"队伍里立时鸦雀无声了。首长接着讲："真正的敌人是大渡河的刘文辉，人民子弟兵是不会打人民的。同志哥，这道理都忘掉了吗？"大家都你看我，我瞅你："是呀，懂是懂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凭感情用事呢。"接着，部队开到了海子里边一个大草坪里，马上集合整队，检查军容风纪。这是干什么呢？大家正在莫明其妙，忽见刘伯承总参谋长骑着一匹大红马来了。跟随他来的是小叶丹四叔，也骑着一匹马，身背"单打一"，头盔上还着一支野鸡毛哩。据说他和刘总长、聂政委在寨里已经谈判成功了。此刻，他们是到这里来喝血酒和互赠礼品的。会上，他赠给我们几担红薯和麦子，我们送他一些枪支弹药和光洋，俘虏也交还了他们。刘总长高声说："同志们，少数民族和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等一会沽基族兄弟就要带我们去安顺场打敌人了，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说着，与小叶丹四叔各饮了一碗血酒，把碗一扔。此时，我看呆了，耿参谋长在我背上猛击一掌说："还愣什么，快吹号出发！"

幸亏族兵们对小路很熟悉，带着我们爬山越岭，大路不走走小路，提前到达安顺场。大家都深深感到：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北上抗日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的。他们估计红军至少要到25日才可能到达这里，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在24日半夜12点就响枪了。

部队从海子里边出发时，就兵分三路：杨团长带一营，黎政委带二营，耿参谋长带三营和直属队。黑夜行军，加上横风斜雨，路又滑，肚子又饿，在艰苦的行程中，大家传颂着"四不怕"的口号——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就凭着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着我们飞奔安顺场。半夜12点，听到先头部队的枪一响，疲劳立即消散，部队开始跑步了，这力气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时的敌人还在安顺场的东西两头构筑工事设防呢。我们的先头营，像一把尖刀，从安顺场的中间插了进去，把敌人分割成首尾不能呼应的两段，迅速扩大突破口，给这些只相信"武器第一"的敌人当头一棒，不少敌人从睡梦中当了俘虏。敌人的反扑虽然很猛，但时间延续不长，只有一个多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消灭了敌人两个连。

当我们来到河边一看，只见茫茫洪流翻滚，浪头在咆哮，哪有船呀？团首长在着急，战士们也在发愁。

正在这时，一班长刘长发押来了一女一男两个俘虏。

"报告营长，这女妖很狡猾。她是个营长太太，还撒谎说是老百姓呢。她和这个勤务兵准备逃过河去，很可能有船，你问她要吧。"营长把他们带到营部进行审问，那个女人一口咬定没有船。我在旁边一听心急了，拔出白刷刷的"马页子"吓她："你不说真话，我就宰了你。"她一下瘫倒在地，连忙喊叫："唉呀呀，我确实不知道呀！勤务兵可能知道，你问问他吧。"

我们向勤务兵交待了政策，限令今晚立功赎罪。勤务

兵开始有了觉悟，说："营长昨天走时，说为太太准备了一条船，可能停在南湾河岔子里。"

当晚，营长派了几个人，提着马灯，跟着这勤务兵，顺大渡河而下，走了约5里路，在一个小河岔子的草丛里，拉出了那条船。大家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宝贵的"胜利品"，它比缴获一门大炮的作用还大哩。

5月25日清晨，雨停了，太阳露出了红脸。昨晚这一仗打得真痛快，胜利品得了不少，除了枪支弹药大米之外，我们连队还缴获了两头大肥猪。早晨8点，朱老总来了。大家一齐拥了出去，见连长正提着一个猪肚子交给老总的警卫员说："朱老总最喜欢吃这东西，拿去搞把干辣子炒一炒。"我一见朱总走来，就迎上去说："老总，您今天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哎，小鬼，你对我有意见啦，我要是不快来，猪肚子就没有我的份啦。"朱老总满面笑容的言谈，使我内心感到温暖。一看他后面，还有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等好几位首长都来了。我们这些老兵一看这情景，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肯定有一场关键性的恶仗要打了。

"欢迎首长给我们作指示！"大家都鼓掌了。首长说："没有什么指示，昨晚你们团打的不错嘛，一个多小时就消灭了两个连，大渡河边第一仗，开门红啦！"首长们讲话是闲谈似的，你一言我一语，我只记得个大意：一是说，抢渡大渡河是关系到红军北上抗日、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小看它，麻痹不得；二是这地方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二十多万人马，就在这里全军覆没，我们不能走石达开的老路；三是蒋介石狂妄得很，想利用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的地形，动用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企图把我们卡死在这里，这是妄想。首长们的讲话，鼓舞了战士们斗志，众口同声地喊道："请首长快下命令吧，我们坚决完成渡河任务！打垮蒋介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天。同志们纷纷跑回连队，把连长、指导员围得水泄不通，要求作战任务，都争着要上渡河第一船。

团首长跟随中央首长到河边了详细勘察部署之后，回到营地就向大家传达任务和兵力布置，并宣布了命令：

渡河先锋连：一营二连

第一船：连长熊尚林

排长曾会明

班长刘长发

班长郭世苍

副班长张克表

副班长张成球

战士张桂成

战士肖汉尧

……

共17名勇士。名单宣布后，没有争到上第一船的同志，都跑到领导跟前说："为什么不批准我？"政委说："一个'小划子'装了17人，还有船工，再加人就会不打自沉呀。下面还有第二船第三船，大家都得过去，放心吧！全团每个同志都要在这里写下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杨团长对炮连连长赵章成说："今天你一定要把对岸渡口上面那两个乌龟壳给我炸掉。"赵章成最懂得团长的脾气，便笑着说："团长呀，我只有三发炮弹了，你要是再有两发，我拿脑袋给你换，行不行？"把大伙都逗笑了。

赵章成是全军著名的神炮手。当第一船出发时，他把三发炮弹连连打中敌堡。这时，敌人的其他轻重机枪和炮火向着渡船集中扫射了，子弹在河水里激起了无数浪花。敌人的火力发射点充分暴露，我们这里早已准备好的20多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对准敌人火力发射点一齐开火；集中全团的18支军号（包括我在内）也一齐吼叫，惊天动地的声浪，压倒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敌人的火力点一个个变成了哑巴和瞎子。英雄的第一船，像飞箭般的驶向对岸。大渡河的浪涛一起一伏，小船左摇右摆，敌人对它无法构成正确瞄准线，子弹在小船前后左右倾泻了不少，就是无法击中目标。有一发炮弹落在小船的左侧，一股巨流把小船淹没了。但一瞬间，英雄船又在爆炸的"死角"下前进了。当17名勇士快要登岸的时候，杨团长放下望远镜，喘了一口粗气说："他娘的，蒋介石妄想把我们变成石达开第二，纯粹是吹牛！"

上岸后的17名勇士，他们每人都带有1枝冲锋枪、1个盒子炮和6枚手榴弹，如此优良的装备，加上勇敢不怕死的精神，真是如虎添翼。只听得枪声哒哒地响，手榴弹轰隆隆地炸，杀声震天，白狗子闻风丧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占领了滩头工事，两岸遥相配合，力量更大了，打退了敌人五次反扑，使渡口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接着，第二船、第三船……陆续登岸。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全团已胜利完成了抢渡任务。军委首长发来电报，通令嘉奖全团指战员。

（选自《纵横》91年2期，作者：汪森林）

材料八 生命

我的伤口还没好，忽然又害起伤寒病。

部队又要出发了，师长杨朝礼同志见我病情严重，决定留四个同志抬我走。他摸摸我的头，安慰说："小鬼，在后边慢慢走吧！"在我身边的司号长这时也嘱咐我："快点跟上来呀，可别掉得太远了。"我正在发烧，没说什么，只是含着泪水点点头，看着他们走远了。

我躺在担架上，每天烧得不省人事。十几天之后，我清醒过来，只见四个担架员剩下了三个——有一个同志因为饥饿牺牲了。三个担架员轮换抬着我，在茫茫无边的草地上行走。

这天，来到马塘山。爬到半山腰，大家都累了，便停下

来休息。刚坐下，有个同志忽然眼睛翻了两翻，说："同志，我不行啦，对不起，我不能送……"话没说完就倒在地上了。

"对不起"这话，是应该我向他说的，可他……。我一阵心痛，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那两个同志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对我说：

"不要难过，放心吧，我们两个人，也一定要把你抬过去。"

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紧紧地握着他俩的手，表示千言万语表达不出来的感激。

我们继续爬山。越往上雾越浓，整个山岭陷入阴沉的迷雾中。我感到象有块石头压在胸上，闷得厉害；也听到他俩急促的喘气声，担架不住地左摇右晃。看样子，他俩是坚持不住了，我说："咱们休息一会吧！"他们同意了，把担架放在一棵大树下。这时，我的伤疼痛难忍，打开绷带一看，左腿溃烂一大片。要是有点药，不，哪怕有点开水洗洗也好呀！一个同志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意，强挺着站起身来说："找点柴禾，烧点开水洗洗吧！"

他在附近这转那转地拾干柴，每次哈下腰，都是咬着牙才挺起身。我实在不忍再看他那吃力的样子，几次劝阻，他都笑笑拒绝了。我后悔不该让他们看到伤口。

他怀里的柴禾足够烧一盆开水了，可是就在这时，他一头栽倒，一动不动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撑起身子爬过去。摸摸他的鼻子，我心凉了半截：又一个同志为我牺牲了。

我们弄些石头和树枝，给这位战友筑了个"坟墓"。我心里实在难过：几个同志为我倒下了，可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由得扭过头来，对身旁仅有的一个同志说："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把那个同志弄迷惘了。愣了一小会，他似有所悟地说："我叫刘宏，巴中人。"说着，他用手拍拍胸脯，"不要紧，可结实啦，还能顶一阵子。"这分明是安慰我。其实呢，他瘦得皮包骨，面色铁青，两眼深陷，嘴唇干裂得挂着血丝，三十来岁的人简直象个老头子了。

"刘宏同志，趁你还有点力气，你先走吧！"

"走？丢下伤病员一个人走？那算什么红军！"他摇摇头，"同志，我会把你带出草地的。"

山下传来枪声，我俩大吃一惊。怎么办呢，如今我俩手无寸铁，抵抗是不行的；走吧，别说我有伤有病，就是刘宏也没有这个力气啊。刘宏同志想了一会，象下了决心似地说："就在大树里过夜吧？"说罢，他把我抱进大树窟窿里，然后也爬进来，用石块和树枝把洞口堵严。

夜风吹得树枝飒飒作响，寒冷刺骨，肚子也饿得咕噜直叫。我俩挤在一起，熬着这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听听外边没有动静，我们便爬出树洞。我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棒，撑起身子，试着迈出脚步。脚刚一着地，就象踏在刀刃上一样，疼痛钻心，头上滚下豆粒大的汗珠，双腿一软又倒在地上。刘宏同志急忙过来，又关切又埋怨地说："不要逞强啦，现在还不行，我来背你吧！"

他背起我向山下走去。山陡路小，东倒西歪地跌倒了好几次。每次跌倒，他都负疚似地投过抱歉的眼光。他有什么错呢，是我连累了他呀！

一天只能走十几里，有时宿石洞，有时住树林，什么也找不到时，就只好睡在露天地里。至于吃的，是全凭老刘找些野菜什么的充饥。有一次他空手回来，坐在地上闷头不语，半天才自语地说："吃了吧！"我问："什么？"他指指自己的脚："我这双牛皮草鞋。"满山都是荆棘棱石，没鞋怎能走路，我阻止他。他说："脚好说，肚子要紧。"

以后，他就光着脚扶我，有时甚至背我走路。步步咬牙，脚脚皱眉，除非是木头人，谁也不会再安心趴在他的背上。我想：这样拖下去，不但我走不出去，老刘也够呛。于是我说：

"刘宏同志，休息一下吧，咱们谈谈。"

"好，休息吧，有啥子谈的？"

"半个月过去了，我的伤寒病也好了，你可越来越瘦。我看这样下去，咱俩谁也出不了草地。"

"看你又来了，我们都是阶级弟兄，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堆，我怎能把你丢下呢？"

"不，听我说完。我的伤一时半晌也好不了，我想你先快点去赶部队，然后派人来接我，这样，咱俩也许都能得救。"

这话可能打动了他的心。他默想很久，又摸摸我的腿，说：

"你说的也是个办法，可是人多的时候你怎不说呢，现在把你一个人丢下……"

我又劝说了一阵，他才含着眼泪，在身上乱摸一阵，看样子是想找一点有用的东西留给我。但他什么也没摸着，无可奈何地嘱咐一句：

"顺着这条道走，我们好来接你。"

他走了，低着头不住擦眼睛，脚步是那样迟缓。

只剩我一个人了，整天忍着疼痛和饥饿往前爬，每前进一尺都要下一番决心。我几次想到死，可是我没有这个权利。我的生命是几个同志的宝贵生命换来的，我要坚持，坚持，为了回答死去的同志也要坚持！……

一天黄昏，我小心地摸到一个村子附近，伤口疼痛难忍，渐身无力，实在走不动了。恰巧在这时候遇上了一位老乡，他也是四川人，是从刘文辉部队里逃出来的，在藏民区安了家。当他知道了我是红军的战士后，好心好意地把我扶到他家里，作了周密的掩护，给我换上藏族服装。

在这位老乡和群众的帮助下，我的伤口渐渐地好了。一天，我忽然打听到丹巴有红军。我兴奋得立刻辞别了老

乡们，赶向丹巴。

又经过不少饥饿的日子，我终于找到了我们师部。可我也实在累坏了，饿坏了，坐在石阶上一步不能动了。记不清那天是什么节日，人们出出进进，十分热闹。一个人从里边走出来，问我：

“小家伙，哪个单位的？”

我模模糊糊认得他是我们的指导员，可能因为我瘦得变了样，又换了衣服，他却认不得我了。

我刚想回答，指导员又向身旁一个同志说：

“快给他搞点吃的，看样他是饿坏了。

正说着，师长杨朝礼同志走出门来。司号长也跟在师长后边，他仔细端祥了一会，对师长说：

“好象是咱们那个小书记。”

师长啊了一声，板起我的头，望了好一会，连声说：“邓仕俊！真是你！真是你！怎么瘦成这样子？”说着连忙叫人扶我进房去。

晚上，我向杨师长倾诉了分离后的经历，象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舒畅极了。可是，我又想起在我身旁倒下去的不知姓名的战友，还有刘宏同志，他怎么样了，为什么没看到他？一想到这，我就越发感到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

（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作者：邓仕俊）

材料九　毛泽东话长征

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准备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选自杨成武《忆长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背景介绍

主力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分局，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项英兼任司令员、政委的中央根据地军区，当时有红军、游击队、机关工作人员共3万多人。

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集了近百万军队，实行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残酷毒辣的手段，向各游击区进行反复的“清剿”。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红军和游击队以英雄的革命气概，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没有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迅速组织退却，开展游击战争，反而在绝对优势的敌人包围中集中兵力与敌人硬拼，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1935年2月，党中央两次电示中央分局：改变斗争方式，以小游击队的形式分散行动；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依靠群众，为群众利益而斗争。从1935年春到1936年底的两年间，是南方游击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采取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游击队指战员遵照中央指

示，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使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得以保存和发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已同共产党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仍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疯狂的"清剿"，妄图在三个月内全部消灭游击队。各地游击队进行了有力地反击，同时经过复杂曲折的国共谈判，终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

在国民党极其残酷、野蛮的"清剿"下，我党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高级领导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阮啸仙等许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慷慨就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北上抗日的红军，保存了革命骨干，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材料：

- 艰难的一九三五年
- 敌不防备我偏来
- 到敌人银行去取款
- "黄色村庄"
- 赣南游击词

材料一　艰难的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

敌人加在赣粤边的压力是很大的，除了广东军阀余汉谋的一个军外，还有江西省保安团，以后又调来四十六师，有时集中到十几个团，对游击区重重包围。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虽然长达一百多公里，但不开阔，是狭长的带形地区。东面是桃江，北面是章水，南面是浈水，敌人扼守渡口，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油山的南面、西面、西北面、东面都是公路。敌人在公路上密筑堡垒，构成了第二道封锁线。又从公路到山脚下，村村筑堡垒，安据点，又把堡垒线从山脚伸进山里，构成了第三道封锁线，把油山、北山、上犹、崇义区、信(丰)、(南)康赣(县)区分割包围在当中。敌人不断搜山、伐林、烧山，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并且采取经济封锁政策。首先是并村，强迫山里人民搬到敌人据点里去，企图断绝我们与人民的联系，困死和饿死我们。其次是严格控制墟场上的买卖，规定了一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菜油盐和日用品，多买了就以"通匪"论罪。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控制了保甲制度，加强了基层反动统治力量，到处撒传单贴标语，污蔑我们是土匪，到处张贴布告，说什么捉到陈毅"赏洋三万元"，捉到特委负责人，也可得到一笔大赏钱；再就是用欺骗手段来瓦解游击队，如说拖去一支枪给多少钱；一发子弹、一颗手榴弹给多少钱；有时抓我们的家属又故意释放，企图动摇我们的意志。我们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结合。山里的年轻人，大都参加了游击小组。游击小组主要有四个任务：一是配合游击队活动。游击队每到山下活动时，就带领一些游击小组的人员，一起去打土豪，袭击敌人。二是担任站岗放哨，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哨。白天，在很高的地方放着了望哨，看见敌人来即发出信号：开始是放炮(土铳)，以后改为打暗语。如果是晚上，就烧火为号。三是作侦察。这是以革命群众为主的普遍活动。群众赴墟镇进据点，总要带些情报回来。山里群众经常通过外山的亲戚去探消息，敌人何时进攻，多少人马，分几路等，只要有一点响动，马上就来报告。四是保护群众，保卫生产。

游击队的武装活动，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敌人来搜山，常是拂晓来黄昏走，游击队就事先隐蔽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选择到有利地形时，也打整股敌人，趁敌人在村子里只顾抢劫的时候，枪弹和手榴弹突然落到他们头上。他们清醒过来，我们早无影无踪了。在敌人重重封锁和包围的困难情况下，游击队就跳到敌人的封锁线以外去活动，奇袭敌人的中心据点和后方，因为这些地方比较空虚。游击队曾对南雄的乌迳、大庾的青龙、池江等据点进行过奇袭。乌迳战斗的影响很大，当时是敌人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地下党的呼应下，隐蔽急行一百多里，在拂晓前赶到乌迳，全歼了敌自卫团和区公所，击毙了自卫团团长丘桂兴。又用几支队、几大队等各种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再加上群众有意识的推波助澜，闹得敌人草木皆兵。国民党不知道究竟到了多少游击队，只好在里山收兵，开回来进行防守。等国民党部队开回来以后，游击队却一个都不见了。战斗经验多了，办法也就更加巧妙，象秘密埋伏在敌人堡垒周围，然后派人把敌人逗引出来，突然占领敌人的堡垒，迫使其无依托作战，消灭敌人；化装成小商贩诱敌人出碉堡，然后歼灭之……。采取了这种战斗手段，就使我们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性，在暂时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小部队的灵活动作不断的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达到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

这种战斗手段牵涉到一连串行动方式的转变。游击队改穿便衣，头上裹着毛巾，穿草鞋，就象当地农民一样。背长枪困难，把枪把子锯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行动要精确的算好时间，要在当夜能够回到隐蔽地点，否则离开了革命群众的掩护，敌人联络迅速，随时可以调集部队赶来包围，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行动中需要过河，就必须控制渡口，派人到船夫中进行工作，否则渡口被切段，就会遭致损失。

敌人为了寻找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动，看烟

火，跟脚迹。我们也随机应变采取各种新的斗争方法。比如走路，由于敌人常在交通要口伏击，我们由大路改走小路，以后敌人改变到小路上设伏，小路也不能走了，就改走没有路的地方。特别注意消灭脚迹，踏过的草扶起来；在上山时反穿鞋子，扰乱痕迹，迷惑敌人；在溪水里走，不易露出痕迹，下雨就更好了。开始，还可以在偏僻处找些小房子住，以后敌人把小房子都放火烧了，我们就用竹子、杉树皮、茅草，搭成棚子。敌人到处搜山、烧山，草棚目标大，也不能住了，每人就发一把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子。天睛就找古坟，坟前有石板，往石板上一躺，也是很好的住处。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采取了多种办法。经济封锁给予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敌人并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就在这里。然而在并村时，我们的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也并到大村据点里去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粮食、油盐和日用品出来支援我们。他们把东西放在鱼篓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我们派人在那里给钱。国民党军队来搜山时，逼着群众一起来，群众就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盐。进了山，乘敌人不防备，一面把竹竿丢在山里，一面唱着山歌通知游击队。每到耕种季节，群众要回来耕田，也可以带些粮食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关系，深入据点去购买。留地是个大据点，敌人对这里不太注意，我们就驻在离留地五里的山上，晚上就进去买一批粮菜油盐和鞋子、电池等。有时也利用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商人就愿冒险。另有一种"商人"，事实上是给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做生意的，虽然他们恨透我们，但只要有大钱可赚，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很好的"采办员"。

再是靠打土豪劣绅解决。打土豪劣绅的主要意义是为了在政治上打下他们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对人民为非作歹。对于那些特别反动的坚决予以镇压，以便于发动群众。一般的则不杀，抓住以后，只要肯悔过，肯缴纳战争经费，仍然放他回家。较大的土豪，都和官僚军阀勾结在一起，或者本身就是官僚，都有武装。但多少只眼睛盯住他，总是有机会的。大庾有个大土豪郭德清，是全县的联防团总，敲诈勒索也是全县闻名的，我们多次下不得手。那次他刚回到池江墟野老婆那里，就有人赶来报告，我们手枪队连夜赶去捉了来。群众就反映："共产党壁头上也有耳朵，郭德清好久不回来，刚一回来就捉去了。"郭德清的民愤太大，我们一连收到许多封几十人具名的控诉信，为了满足群众要求，我们把他枪毙了。大庾人民说："杀了郭德清，等于打了一场太平醮。"在南雄邓坑，捉到个大土豪江碧山，就给我们送来了几十匹布，二、三十支驳壳枪，大批西药和款子。土豪劣绅最爱惜金钱，然而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大罪恶，更怕杀头，总是愿意罚款，愿意给我们代办违禁品。

此外就是袭击军用汽车。虽然公路上到处是堡垒，然而堡垒之间总有空隙，只要依靠群众把情报弄确实，突然袭击总可得手。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曾彪同志率领油山游击队在雄庾公路上一下子就截获了三辆国民党的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我们又向司机进行了宣传教育，释放时给了他许多宣传品带回韶关。由于司机的转辗传说，弄得韶关满城风雨，到处都议论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有些土豪竟吓得搬到广州去了。在这次缴获的汽车上，有一个土豪他要回大庾，以为有兵押送非常保险，花钱找门路才坐上这个汽车，却被我们顺手牵羊弄了来。游击队员们诙谐地给这个土豪取了个诨名："老霉子"。这个"老霉子"，以后给我们代购了不少布匹和胶鞋。

虽然这样，在"清剿"最紧张的时候，还是常常没有饭吃。在平时，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游击队员，都五斤干粮，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动，只有在最困难时才可食用。但是连续"清剿"，很少空隙，常常得不到补充。好在山是大山，可以充饥的东西很多，春天就挖竹笋吃，夏天摘野杨梅吃，冬天就找山果。如果能捉到些小鱼、虾子和石鸡，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游击根据地经过敌人严重的摧残，房屋烧毁，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在反复的斗争中，群众经历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积极支持游击队，使我们终于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胜利的度过了一九三五年。

（选自杨尚奎《艰难的岁月》）

材料二　敌不防备我偏来

陈毅等率领红军游击队突围后到了油山，在高山上插上一面革命红旗。国民党反动派咬牙切齿，四下里调兵遣将，妄想把油山这面红旗拔下来，除掉眼中钉。1935年春夏之际，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被占后，蒋介石派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驻扎在赣州、南康；派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三个师，分别驻扎在大余、信丰、南康和南雄一带，军部设在大余。江西保安第十一、十二团及赣粤边各县铲共团队等反动地方武装共三四万人，从东、北、南三面对油山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妄图"清剿"赣粤边游击区，消灭红军游击队。敌军长余汉谋夸下海口说："这次不把共军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他们还放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

敌人"清剿"红军游击队是非常疯狂而手段又十分残酷，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围困、欺骗和封锁外，还采取从游击队内部引诱叛变等卑鄙而又毒辣的办法。

在军事上，敌人用重兵围困游击区。首先，在东面的桃江、北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把守所有渡口，构成第一道封锁线；在油山东、南、西和西北面的公路上密筑碉堡、

设据点，构成第二道封锁线；在游击区周围的圩镇、交通要隘、大小村寨、大小坑口派兵驻扎，并把碉堡线从山脚引进山里，设下埋伏圈，严密封山封坑，构成第三道封锁线。然后，采取篦梳式的频频搜山，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敌人经常分兵几路，带上猎犬、探照灯进山，或者在山林倒上煤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麂子、獐子、长蛇等到处乱跑乱窜，敌人子弹多，到处乱打枪。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此种景象，正如陈毅所说：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
敌人屠杀空前古，
人民反抗气更高。
再请把兵交。

此外，敌人还经常采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的办法，搜寻游击队人员。

时间长了敌人慢慢晓得哪些村庄、哪些路口有游击队来往，或哪些山口常有游击队员出入，他们就派叛徒或反动民团躲在路旁草丛里或有水的地方侦察动静。所以，游击队的行动需要十分秘密，不能随便和老百姓搭话，不能大声讲话或嗽咳。为了提醒大家，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
前面嗽咳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敌人有时爬到高山上观察游击队煮饭的烟火，一见冒烟就派军队去搜。所以，游击队白天不能起火煮饭，晚上煮饭还不能有火光。一下要煮三餐，留两餐冷饭带着第二天吃，夏天冬天都一样。真是：

冷食充肠消永昼，
禁声扪虱对山花。

游击队的活动还不能留下痕迹，只能拣没有路的荒地走，走过后还要把压倒的草扶起来。下雨天走路，往前走走又退回来或者把鞋倒穿行或者干脆在水沟里走，天寒地冻也这样。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狡猾多端，在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面前，他们的“清剿”计划却频频破产。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陈毅胸有成竹。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采取了以游击队为骨干，和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及革命群众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指挥游击队，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四方活动，牵着敌人鼻子转，灵活机动地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敌人要打找不着，我们要打看得准。游击队跳出封锁线，袭击敌人的后方据点，让敌人偷鸡不得反失一把米。

一天，陈毅收到地下党的一个报告说，敌人这些日子一心想消灭游击队，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山里去了，后方十分空虚，只驻有邱桂兴的靖卫团。陈毅得到这个消息，决定派一支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捣他的老巢，逼着敌人撤退。

在一个万籁无声的漆黑夜晚，一支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向山外急进，当雄鸡叫过三遍时，这支队伍已神速地走了近百里的路程，来到乌径附近隐蔽下来。乌径是粤军的后方据点，敌区公所就设在这里。

“啪、啪、啪！”轻微的几声巴掌声刚刚响过，地下党的同志就来接应了。接着，游击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镇子里的区公所。

这里，反共靖卫团团总邱桂兴和国民党区长，正在打麻将。守卫在门口的团丁，喝醉了酒，这时正在酣睡。游击队迅速地进了区公所，捉住了一个靖卫团副官，问他：“邱桂兴在哪里？”

他指指旁边那个大屋子说：“邱团总和区长在……”

十几个游击队员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靖卫团总和反动区长。当游击队员用短枪逼在他们胸前时，他们还摸不着头脑。这时游击队员严厉的声音使他们头脑清醒了一点：“没想到吧，团总先生，快跟我们走，叫靖卫团和区公所的人快集合！”

邱桂兴摇晃着吓软的身子，在游击队的押送下，来到靖卫团驻地。路上都是红军游击队的岗哨，一挺机枪正对着靖卫团的大门。邱桂兴一看，心里全凉了，只好乖乖地发出命令，叫靖卫团向游击队缴械投降。整个战斗只用了半个小时。天亮前，游击队撤出了乌径。

第二天早晨，乌径的居民们打开大门一看，呵，到处贴着红绿标语，有的署名“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有的是“第五支队”，群众看到标语后很快就传开了。有的还推波助澜，大张红军游击队的声势。江西老俵们原来就想红军、盼红军来，现在亲眼看到标语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很快传遍赣南，吓得国民党反动派赶快从山里把“清剿”游击队的兵力调回乌径来对付“红军大队”。

粤军余汉谋被弄得手忙脚乱，恼羞成怒，他下令驻南雄的一个师，会同驻信丰一个师、驻大余一个师及军部，再向油山“进剿”。

陈毅得此消息，乐得哈哈大笑，说：奇袭乌径捅了敌人的“马蜂窝”，我们再点几把“火”，他们就更会晕头转向了。于是，陈毅立即指示特委派出两个小分队，分别前往南山、北山，还命油山地区各个小分队要乘敌人调动的空隙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奔往南山的游击小分队在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带领下，在进军途中，袭击了信丰崇仙，活捉了“剿共”团总张振麒和白师爷。接着，他们乘胜深入到青龙山一带开展

游击战争，又用"老鹰抓鸡"的战术，捕杀了陂头镇最反动的吴保长，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民团，镇压了那些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

离青龙山下陂头镇不远的大刘庄，虽距离游击区才十几里路，但由于当地姓吴的恶霸保长，鱼肉乡民，无恶不作，群众受他的威胁，不敢接近游击队而没法开展工作。游击队到南山后，吴保长吓得要死，怕得要命，在圩口路边，设岗派哨，盘查行人。同时，他自己经常变换住址，日夜由保镖跟随。

这年中秋节前夕，一个老俵向游击队报告，说吴保长要回家过节。第二天，十几个游击队员化装成卖柴的、走亲戚的，夹在人群里，陆续来到大刘庄。晚上九点钟，只见一个狗腿子歪着身子守卫在吴保长家的门口。一个游击队员假装前去问路，出其不意将挑柴扁担对准他的后脑勺打过去，那家伙"咕咚"一声倒在门边。其余游击队员立即夺门而入，冲到吴保长的堂屋里。那个坏蛋做梦也未曾想到游击队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全家正围坐在八仙桌上吃团圆饭呢！吴保长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求饶。游击队员迅速地收缴了他的枪，当场宣布他的罪状，立即执行枪决，并把事先写好的一张大布告贴在显眼的地方。不一会，那里就围满了群众，人们的眼睛都盯在"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司令部"的大布告上。大家拍手称快，说："红军回来了！"就这样，大刘庄成了红军的游击区。

去北山的小分队首先袭击了大余县城附近的游仙圩。游仙圩有个又高又厚的土围子，四周的碉堡很坚固，布满了枪眼，外面又横着一条很宽的水沟。1935年5月的一天晚上，游击队员偷偷地隐蔽在土围子附近的树林里。然后，派出一部游击队员故意从土围子不远的地方通过。通过时，又是大声讲话，又是打手电筒。果然，土围子里的敌人朝游击队开枪了。随着枪声一响，一个游击队员就"哎唷"、"痛啊！"大声呼喊起来。随后，游击队员大声说："不好了，大队长带花了，快背着走！"土围子里的人信以为真，立即打开土围子的门，越过壕沟，冲了出来。这时，事先埋伏在附近的游击队员见"蛇"已出洞，立即开枪猛击，直打得敌人哇哇叫。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班，缴获步枪十余支，炸毁了碉堡，顺利结束战斗，游击队无一人伤亡。接着，游击分队化装跑到普河圩，乘敌人不备，袭击了伪乡公所，又缴得步枪四支。

敌军长余汉谋看到南山、北山都起了"火"，以为游击队的主力离开了油山到了那里，慌忙调驻南雄的一个师"进剿"南山、调驻大余的一个师"进剿"北山，只留驻信丰的一个师继续"进剿"油山。

根据敌情变化，陈毅和特委商量后，把油山游击队转移到南雄的邓坊和大余的新城、池江一带，乘敌军调动时，袭击敌后。

在邓坊活动的游击小分队捉拿了大土豪江碧山，强迫他送给游击队二三十支驳壳枪和几十匹布及一批西药、款子；活动在新城、池江一带的游击小分队，在地下群众组织配合下，捕捉了大余县"剿共"团总郭德清。

与此同时，陈毅派油山游击队大队长曾彪带领十几个游击队员，袭击余汉谋驻大余军部的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一天，游击队员头戴斗笠，腰束布巾，肩上套着绳索，吊着饭袋、烟斗，化装成挑钨砂的短工，悄悄地来到矿警队附近的树林里隐蔽起来。另外，派出两名游击队员，装扮成卖糖果、香烟、花生的小贩，到矿警队驻地做买卖。天近黄昏，矿警队照例在操场集合听队长训话。当队长刚开口训话时，隐蔽在树林里的曾彪，"叭叭"两枪，那个队长应声倒地。游击队员立即冲上把矿警队团团包围起来。曾彪厉声喝道："快举起手来！"矿警们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这时，曾彪手执双枪，对俘虏们说："我们是红军游击队，特奉命前来收获枪支，不要你们的狗命，但谁敢抗拒，莫怪我子弹不留情！"然后游击队员把俘虏们反锁在一间房子里，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张贴了标语，悄悄地离开了钨矿局。消息传到了敌军部，惊得余汉谋叫苦连天，哀叹说："北山明明有一团游击队，就是找不到他们！"矿工们则高兴地说："红军游击队真神呀，搞得白军团团转。"为了安定人心，余汉谋只好火速把"进剿"北山的部队调回大余城防守。

1935年9月的一个夜晚，南雄县委给陈毅送来一份紧急情报，说粤军有三辆满载军火的汽车，明天要经过这条公路开往大余军部。陈毅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来得正巧，我们正缺乏枪弹，那就打张'收条'把它收下吧！"当晚，他派曾彪率一支游击队巧妙地穿过敌人的碉堡群，于次日拂晓前赶到里栋附近公路边一条狭长的小山沟里埋伏下来。中午时分，果然三辆军车在国民党士兵的护送下开了过来。曾彪指挥游击队向军车猛烈射击，车上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个被打得东倒西歪，游击队员如猛虎下山，向公路冲去，三辆军车全被游击队缴获。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背的背，抬的抬，不一会功夫，车上的所有军用物资全都搬上了北山。陈毅树起大拇指表扬游击队员们干得利索。然后看着那一箱箱的枪支弹药，高兴而幽默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千里迢迢给我们送来这么多军火，我们应该怎样感谢他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袭击，游击队还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俘虏了一个土豪。他满以为搭上军车便进了"保险箱"，万没有想到当上了俘虏。经过陈毅做一番思想工作后把他释放了，不久后，这个"老霉子"给游击队代购了一批布匹和胶鞋。

国民党反动派被游击队搞得晕头转向，不得不把原来大肆宣扬的所谓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期限改为半年，以后又把半年改为一年。陈毅看到敌军这种被动局

面，欣然命笔：

讲战术，

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选处张日新、李视荣《红军时期的陈毅》）

材料三　到敌人银行去取款

眼看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来临了，我们坚持在闽南的红三团，冬衣还没有着落。这时候，敌人正集中兵力向坚持在平和一带的我军主力进攻，对我们独立营略微有些放松。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去袭击云霄城。

云霄城里驻着敌人一个保安团，战斗力不很强。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党的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经理，又是个罪大恶极、群众恨之入骨的坏蛋。我们的打击目标就选择了交通银行。我们想，国民党都是爱财如命的，打了他的银行，一定要调兵回来保驾。这样，既可以趁机弄到一笔钱，解决冬衣，又可以达到配合主力粉碎敌人进攻的目的。

我们决定化装奇袭。从全营挑选了四、五十名精明强悍的班、排干部和战士，组成了一支便衣队，由我率领进城；其余的部队由政委率领，埋伏在离云霄城七、八里路远的甘蔗地里和稻田中，如果敌人敢于出城追击，便狠狠打击他一下。

在一个风和日暖、万里无云的早晨，通往云霄城的路上，男男女女挑着柴，提着篮，络绎不绝。我们四十几个人，有的把驳壳枪插在柴草中，有的放在篮子里，扮成“阔佬”的就干脆插在腰中……夹在人群中，也向去霄城走去。

也许因为云霄城是敌人的腹地，所以岗哨没有严格检查，就放我们进了城。

一进城，我们便在向导的指引下，由陈连长带领一部分人，秘密地包围了敌人的交通银行。其余的人，分散在银行周围，夹杂在赶集的群众中，很快占领了街头巷尾的有利地形，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之后，好掩护陈松他们完成任务，并顺利撤出。

云霄城象往日逢集一样，十分热闹。战士们有的摆开了柴摊，同老乡们争论着价钱；但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在警惕地注视着周围。我选择了一个便于指挥的荫蔽街口，停了下来，心里很急，盼望时间快一点过去。

这时，远远看见陈连长在这个小摊上看看，到那个小摊上搭讪几句，慢慢向我走来。

“啊，赶集来啦！好久不见啦！”陈松走近我的身边，象老熟人久别重逢一样和我打着招呼。我也假意寒暄了几句，便和他并肩向一条行人稀少的胡同走去。

“营长，恐怕斧头治不了保险柜！”陈连长低声说。

这个问题出发前就研究过，计划先找经理和出纳，强迫他们把保险柜的钥匙拿出来；如果找不到他们，就用斧头把保险柜劈开。这两个办法实行起来都有困难，可是再也找不出更恰当的办法来。我只是压低声音对陈连长说：

“派人在银行门口盯着，注意有没有人叫经理和出纳。如果有，那就把他的模样记住，一动手就先捉住他。如果找不到，那就强找，只要能找到，枪口点着他脑袋，看他敢不拿出钥匙来！”

陈连长点了点头，又寒暄了几句，便和我告别，慢慢向银行走去。

陈连长走后，我又看了一次表。呀！八点多了。太阳也升起多高了。不久以前还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可是这时，又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担心找不到经理。

忽然，赶集的人乱跑起来。我正感到奇怪，一眼看见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

“有个同志买东西，一弯腰，不小心把枪从腰里掉了出来。老百姓一见就轰动了！”

“盯到了经理和出纳没有？”我急促地问通通信员。

“还没有。”

这新的情况，使我更加紧张起来。我一看表，还不到九点钟，规定的行动时间还没有到。也就是说，政委带领的队伍，还没有做好准备。可是，秘密一旦暴露，敌人会很快发觉。如果不立刻动手，那就有可能捉不到鱼，倒沾一身腥！于是，我急促地命令通信员：

“告诉陈连长，马上动手。一定要把经理和出纳找出来，一定要把钱拿到手！”

通信员穿过人群又跑了回去。大街上，人们到处拥挤着、呼唤着自己的亲人，向城门口跑去。我迅速向周围的同志发出准备战斗的暗号，占领了十字街口的一座小楼。当赶集的人们差不多全跑散了的时候，我们就把满街的柴捆堆放在路口上，构成了一道障碍。然后在楼窗上端着枪，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来路。

不一会，远远的一队敌人，提着枪，沿着大街向我们跑来。“陈连长他们找到了经理没有？拿到钱没有？……”我正着急地想着，通信员跑到我们面前，兴致勃勃地报告我：“成了。钥匙拿到手了！”

一听通信员的话，心里就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根据情况判断，敌人还不可能切断陈连长他们的退路。于是，我没等通信员说完，便急促命令他：“通知陈连长，马上按计划向西北城门转移！控制城门，接应我们！钱要保护好！我带人掩护。

原来，我们的人，涌进了敌人的银行后，陈连长把驳壳枪“砰”一声向柜台上一放，厉声喝道：“谁是经理？我们是红军，来借一点军饷。”

银行里的人，立刻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十几支乌黑

的驳壳枪吓呆了。虽然没有谁说话，但是目光却不约而同地偷偷斜视着一个胖胖的家伙。陈连长是非常机警的人，他立刻认出那胖家伙是经理，一翻身跳过柜台，一把抓住经理的衣襟，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厉声地说："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把保险柜打开，饶你的命；否则我的子弹就不留情。要死要活由你拣。"银行经理吓得象雪地里的狗一样哆嗦不停，立刻乖乖地把钥匙拿了出来，……

敌人在继续向我们的方向跑来，战士们的枪口也在逐渐移动。当敌人拥挤在我们设下的障碍面前时，所有的驳壳枪，一齐向敌人扫去。前面的敌人搬障碍，还没直起腰来就倒下了。后面的敌人，立刻进行还击。根据时间判断，陈连长他们还不可能转移出去，我们还必须再坚持一会，拖住敌人。敌人的密集子弹，打得房子上的瓦片乱飞；我们有的同志负伤了，但谁也没有喊叫一声，包扎一下伤口，仍旧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静静地等待敌人接近。敌人打了一会，见我们没有还枪，便在火力掩护下，喊叫着，一窝蜂地向我们涌来。我们的手榴弹好象冰雹，压头盖脑的落进敌群。敌人疯狂的呼喊，立刻变成了惨叫。

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忽然从西北城门的方向，传来一阵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估计可能是陈连长他们占领了城门；也可能是政委听到我们打了起来，带领部队前来增援。敌人听到背后响起了枪声，更加混乱了。我想：该转移了。于是，便趁敌人犹豫不定的时机，向敌人打了一个排子手榴弹，利用烟雾的掩护，敏捷地穿过敌人，直向西北冲去。

我们冲出了云霄城，找到了陈连长。还没等我问他，他便拍着一大包钞票说："一万多元，外加一个经理。"我正在考虑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钱，陈连长高兴地建议说："我们全团也用不了，应该分一部分给根据地的老百姓。"

这时，又传来一阵枪声，战士们幽默地说："这次提款没有带支票，他们发脾气啦！"

不久，敌人果然调了一部分部队回来看家，敌对我平和一带的进攻很快便被我们粉碎了。

（作者：卢胜，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二）

材料四　"黄色村庄"

在赤白交界区，我们根据项英、陈毅同志的意见，主要是搞"黄色村庄"。这是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依靠群众先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然后，在漆黑的夜晚或阴雨天，对他们突然进行"访问"，坐下来同他们谈判，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利害；给他们讲约法八章：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并且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队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同时，要他们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谈判告成时，要他们签字盖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浑身颤抖、魂不附体的大人先生们，只好满口答应，乖乖地照办。限定的时间到了，药品、粮食等，一样不差地送到了指定地点，我们也按价付了钱。这样一来，所谓"通'匪'、济'匪'者杀"的命令，也就被丢到茅坑里去了。经过多次工作，这些人有的几乎完全听命于我们，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派"——皮是国民党的，心属共产党，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为共产党干事情。

王坑的王保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两面派"。

王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去池江的必经之地。王坑的王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的安全为名，强迫老百姓出钱买枪支弹药，并开设工厂，自造土枪土炮，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充当国民党的帮凶。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就叫地主武装封锁交通要道，盘查从游击区到池江去的群众，并经常威胁群众说：见"土匪"来了，不打锣吆呼，要杀你一家子。因此，红军游击队在王坑一带开展工作就感到特别困难。

陈毅同志亲自和我们分析研究了王坑的情况，说："王坑的群众大部分是向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只要我们除掉王保长，或者把他争取成为"两面派"，王坑一带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他决定亲自带几个同志去审问王保长。

一天夜里十一点钟。陈毅同志带了几个游击队员，悄悄地摸进了王坑，敲开了王保长的门。陈毅同志对惊魂未定的王保长说："王保长，你不是常带国民党兵上山找游击队吗？现在我们主动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王保长的嘴皮哆哆嗦嗦，答不上来。陈毅同志当即警告他："今晚我们游击队是来和你谈判的，你要放聪明点。如果你要耍弄点什么名堂，就别怪我们游击队对不起你。"

王保长耷拉着脑袋，说："是，我有罪，………"

于是，陈毅同志在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来，开始了对王保长的审问。陈毅同志问他：你给"剿山"的国民党兵带过几次路？抓过多少老百姓？向老百姓敲诈了多少钱？抢过老百姓多少东西？为什么要组织地主武装，自造土枪土炮？……对这一连串问题，王保长一个也不敢作答。最后，陈毅同志问他："你够不够死罪？"

王保长听了，"啊！"地大叫一声，瘫倒在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陈毅同志站了起来，正言厉色地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我们都见过，你这个小小的保长，几支土枪土炮能消灭我们吗？！我问你：你愿死还是愿活？"

王保长叩头如捣大蒜，连声哀求说："愿活，愿活……"

陈毅 同志正告他："要活的话，必须答应四个条件：
一、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剿山"；
二、游击队员到坑里来，不准打锣吆呼，不准报告；
三、游击区群众去池江买东西，不准盘查扣留；
四、经常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准有半点掺假。"

陈毅同志每说一条，王保长就答一句："一定保证"，"一定效劳"。

经过这次审问之后，王保长被迫履行诺言，以后逐渐成了"两面派"，王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当然，我们在搞"黄色村庄"时，也遇到了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对这些家伙我们也决不客气。象大余梅山的反动保长廖桂山罪行累累，顽固不化，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的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杀掉廖桂山后，游击队即叫群众去向国民党报告，使群众免受牵连。我们把这些最反动的保甲长整掉了一两个，其他保甲长也就规矩些了。

（选自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材料五　赣南游击词

陈毅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天放晴，对月设野营。
拂拂清风催睡意，
森森万树若云屯。
梦中念敌情。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
敌人屠杀空前古，
人民反抗气更高。
再请把兵交。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勤学习，落伍实堪悲。
此日准备好身手，
他年战场获锦归。
前进心不灰。

莫怨嗟，稳脚度年华。
贼子引狼输禹鼎，
大军抗日渡金沙。
铁树要开花。

（选自《陈毅诗词选集》）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大礼堂召开。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孙科等四十四人，列席监察委员吴稚晖、林森等九

人、候补执行委员张苇村、陈树人等三十三人，候补监察委员黄绍竑、郭春涛等九人。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二日从福建返回，二十三日出席全会，报告反共战争与讨伐十九路军的战况。

一月二十日，汪精卫作开幕词，咒骂红军在"谋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真较洪水猛兽尤为重大"。为签订塘沽协定辩解；他美化国民党的统治，称从福建事变的失败可见，"无论怎样平日有名誉的军队，一脱离了本党的立场便不能存在。"汪的讲话与蒋介石二十三日的军事报告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子文作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情况报告，着重说明从事建设的重要性，追述争取美棉麦借款、国际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称，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后的工作，在于制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他宣布，"自子文回国后即改组本会为委员制，以蒋、汪、孔诸公及子文为常务委员"。"常务会议日内必可开成，一切计划皆可于此会决定"。"自是而后，将入于实施时期，当为国人所乐闻也"。宋子文的报告给人们带来一些兴趣，不管是否会出现使国人乐闻的事情，国民党中央总算提出要搞建设了。

讨论各项提案，本是会议中心议题，但却没有认真进行。特别是两广方面联合其他中央委员酝酿已久的提案，根本未作任何答复。肖佛成等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推进政治以实行三民主义案》，经审查修正后，决议交中政会在研究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时一并讨论。这样一来，西南政委会方面当作重型炮弹打出来的方案，便束之高阁了。

一月二十五日会议闭幕。大会宣言中心内容在于反复说明汪精卫的那句老话："救亡图存之大计，条目万端，要之，一曰，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救亡图存。二曰，非充实国力不足以救亡图存"。"由国家政治言，则统一与建设俱为绝对必要也。凡妨害统一与建设者，即为妨害救国图存之大计"。不论什么人，"凡不能实践团结与努力者，即为稽延救亡图存之大计"，当以扫除。然而，"集中国力"的核心是一切听命于南京中央，"充实国力"则为借外债以发展官僚资本。

四中全会发出了《嘉勉剿匪讨逆将士》文，大肆宣扬蒋介石反共内战与剿平十九路军的"功绩"，强调继续进行反共内战与武力讨平"叛逆"，是"集中国力"的最有效手段。这就把宣言鼓吹的"新局面"说得十分明确了，即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以武力实现其"集中国力"，加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材料：

- 会议经过
- 开幕词

材料一　会议经过

中央自二十一年十二月举行第四届三中全会后，距今已届一年。依照总章规定，第四次全体会议应在二十二年六月间举行，惟以剿匪工作未竣及闽省叛变，一再延期，至本年（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经中央第一〇二次常会决议，方确定于本月（一月）二十日召开会议。是日上午八时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会式，计到中央委员汪兆铭、孙科……褚民谊等九十五人，及中央全体职员、各机关代表共计千余人。开会秩序：（一）开会。（二）中央委员就位。（三）奏乐。（四）唱国歌。（五）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六）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七）静默三分钟。（八）主席致开会词。（九）奏乐。（十）摄影。（十一）礼成。由汪委员兆铭主席，领导如仪行礼后，即席致词。

预备会议

二十日上午十时，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孙科……。列席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苇村、黄实……。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张人杰……。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郭春涛、陈布雷……。临时主席于右任，记录王子壮、王启江、王子弦。如仪开会。决议要案有：推定蒋中正、汪兆铭、孙科、戴传贤、于右任、顾孟馀、居正七同志为第四次全体会议主席团；推叶楚伧同志为秘书长。余见决议案栏。

第一次会议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戴传贤，秘书长叶楚伧，记录王子壮、王启江、王子弦。如仪开会。重要报告有：（一）党务报告；（二）全国经济委员会报告；（三）军事委员会报告。主席声明所有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报告，分交提案审查委员会各组审查。——众无异议。午后三时，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各组分别开审查会。

第二次会议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二次会议。主席蒋中正，秘书长叶楚伧，记录王壮、王启江、王子弦。如仪开会。重要决议有：主席团临时提议：慰劳讨逆剿匪将士，并对于抗日剿匪讨逆各役阵亡将士默哀三分钟案；黄绍竑等六委员提：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案；汪兆铭等二十三委员提：中央大学移筑郊外，由行政院月拨建筑设备专款八万元案；及其他各案，均见决议栏。又，主席团临时提议：推戴传贤、顾孟馀、梁寒操、陈布雷四同志为宣言起草委员，并由戴传贤同志召集，亦经决议通过。午后三时，政治、经

济、党务各组分别开审查会。

第三次会议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孙科，秘书长叶楚伧，记录王子壮、王启江、王子弦。如仪开会。重要决议有：党务组报告审查常务委员会及组织、宣传、民运指导各委员会工作报告之结果，请公决案；李敬斋等五委员提：拟请在国库或棉麦借款内，迅拨一千万元办理黄河下游善后工程，以防灾患，并每年拨发五百万元，以为治本工费案；邵元冲等三委员提：重设国史馆案。此外又决议其他各案多起，均载决议栏。午后三时政治、军事二组联合开审查会；党务、经济各组及宣言起草委员会分别开会。

第四次会议

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顾孟馀，秘书长叶楚伧，记录王子壮、王启江、王子弦。如仪开会。重要决议有：主席团提：选任林森同志连任国民政府主席案；萧佛成等二十六委员提：改革政制，推进政治，以实行三民主义；及分区促进训政，以增加工作效率两案。宣言起草委员会提出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草案，亦经决议修正通过。余案均见决议栏。

二十五日午后一时，举行闭会式，到中委蒋中正、汪兆铭、叶楚伧、居正、戴传贤、于右任、陈果夫等及中央全体职员、各机关代表约数百人。闭会式秩序如下：(一)中央委员就位。(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静默三分钟。(七)致闭会词。(八)宣读全会宣言。(九)奏乐。(十)摄影。(十一)礼成。由主席团居正主席，汪兆铭宣读大会宣言。主席致闭会词 如下：[词略]

（摘自《民国日报》1934年1月25日）

材料二　开幕词

各位同志：

从二十一年十二月三中全会闭会之后，以至今日，整整的一年了。这一年中，国难继续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以来的趋势，而日益严重。去年三月以来，我国军队在长城一带拼命苦斗，经过了三个月的血战，而共匪忽于此时图袭南昌，至五月而有华北停战协定之成立。自是以后，并力于清除共匪，至十月、十一月间，江西方面才得有显著之进步，而陈铭枢、李济琛等，又忽于此时发难于福州。统计这一年中，对外对内，艰难危险之状不可殚述，可以说是本党执政以来最困苦的时期，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期。

国难的发生，原因于最近数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之落后。这种落后的现状，本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挽回，而在此过程中，国难实有随时发生的可能。本党执政时期，遭遇此等国难，在一方面说，固然责无旁贷；在又一方面说，却正因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之故。所以方兴的势力如萌芽乍苗，即横受风雨之摧残。本党为中国自由平等的前途计，亦惟有力保此萌芽，使于风雨飘摇之中遂其发达。

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时候，本党同志，精诚团结，一致努力，能否挽回尚未可必；而陈铭枢、李济琛等反于此时以本党中央委员而为毁弃本党之行动，且进一步而毁弃本党所艰难缔造之中华民国。这种非常叛变，使本党同志于痛心内忧外患之外，又多一层痛心。然而福州乱事之得以早日告一段落，固由军事同志奋其忠勇，扫荡逆氛，亦由十九路军兵士自知叛党毁国失了作战的勇气，故不旋踵而成了土崩瓦解之势。由此可见，无论怎样平日有名誉的军队，一脱离了本党的立场，便不能存在。这差可以为本党同志告慰的。

四中全会于今日开幕，各位同志有些是原在南京担任工作的，有些是分在各地担任工作的，如今相聚一堂，检阅一年来内忧外患之经过及本党努力奋斗之事实；同时并决定以后工作的方向及努力奋斗的一切规律。我们所共同的期望是四中全会开会以后，使目前压迫着中国的内忧外患得以解除。

现在中国的一切情形是不能满意的，不但本党同志不能满意，全国民众亦不能满意。但是不满意是进步的一个推动原因，因为不满意，故求进步。我们不要忽略了不满意的事实，尤其不可隐讳了不满意的事实，我们要想出方法，求得进步，以弥补一切不满意的事实。

本党所负历史上的使命，是很重大的。总理所指示我们努力的前途，是很光明的。总理所留遗于我们的未了工作，是很复杂而繁重的。我们要拿十二分的勇气来担当一切，拿十二分的虚心来接受一切。当今日四中全会开幕之日，谨以虚心勇气四字为一般同志勖，为本党前途祝，为中国前途祝。

（汪精卫）

新生活运动

背景介绍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复于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总会会长，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六篇长篇演说，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这些演说和文件，为新生活运动立了一套理论和方针。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基准。蒋介石宣称，“务使一般国民的食衣住行统统能合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他还强调，“礼”为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第二，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扣”；“住”，要求“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等。第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蒋介石声称，只有做到这六件事，“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第四，以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为追求目标。在“三化”中，蒋介石又特别强调“军事化”。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所谓“军事化”，即要求做到“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全国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省、市、县，农村、工厂、学校，均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或单位负责人主持，并受当地促进会的指导。1935年11月，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次年2月，于总会之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为指导长。至1936年，全国共有二十个省、四个直辖市成立了新运会，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县设立了分会；另有十二个铁路新运会，十个华侨新运会。

材料：

- 美龄献策

材料　美龄献策

作为蒋介石内助的宋美龄，跟随蒋介石在各地巡视。她在江西的南昌、抚州各地看到很多青少年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精神颓丧，行动无秩序。国民党统治下的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却被宋美龄认为是中国人的生活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根源。于是，她向蒋介石献策，要开展一项“新生活运动”，以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蒋介石大受启发，认为可以用“新生活运动”的形式，向人们灌输奴化思想，从精神上羁缚人心，以便于推行他那一整套的反对统治政策，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即日宣布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扩大纪念周，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党政军界官员都出席大会聆听。他首先强调，“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而是“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而国民道德是通过“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表现出来，其道德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他吹捧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一切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要求中国人一切行动效法洋人；其次，他要求党政军学商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知识界，“首先能够一齐奋发，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协力来做除旧布新的工作，然后一般国民才有所效法”。他先给知识界冠以“各界民众领袖”的桂冠，然后说，“如果看到当地社会腐败，人民野蛮，不好说这是当地全体民众倒霉，实在只能算是当地一般知识分子的倒霉，只能怪一般知识分子”。这是蒋介石拢络、利用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法。他企图用一顶“民众领袖”的高帽，把对国家大事反应最敏感的知识界压得飘飘然，不再与他的执政方针唱反调，同时，又驱使知识界充当他向民众灌输“礼义廉耻”教育的马前卒；最后，他以日本能够强盛为例，说明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他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与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运于现代生存”。而提倡“明礼义，知廉耻”，就是“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这说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用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等封建道德作为奴役人民的精神力量，以便摆脱他政治困境，强化其专制独裁统治。

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七月，蒋介石先后六次发表长篇演说。又手订《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完善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政治目的，确定了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方法、步骤，健全了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机构，先以江西省为试验区，大

张旗鼓地开展了新生活运动。

三月五日，蒋介石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作了《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的演说，他规定，“新生活之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礼’”。他要求人们要“学礼、知礼、行礼”。“礼一定要有节”，“节就是合理的规矩节度。”《新生活运动纲要》则全面表达了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与内容。纲要称，“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为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为改变这种状况，“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之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运动”。纲要规定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而‘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提倡礼义廉耻，最终在达到“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军事化’”。用这些生活规范，来“救此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以求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也”。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为督促国民党军追剿红军，飞到贵阳，作了《消灭赤匪建设贵州》的演说，鼓吹要人人遵守我国固有的封建道德规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要求人们都要做到“尽忠孝，行仁爱，重信义，尚和平”，“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新生活运动由南昌行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各省、市、县亦可设会，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努力实行新生活。七月一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会长，熊式辉为主任干事，邓文仪为副主任干事，阎宝航为书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同年二月十三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宋美龄为指导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改组，正副主任干事为正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阎宝航为副总干事。全国有二十个省、四个直辖市设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县中成立了县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南京沦陷，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宣布“还都”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便又迁回南京。促进总会虽然一直存在，但自抗战开始，新生活运动便已衰败，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反革命内战，新生活运动已毫无内容，在蒋家王朝日益走向崩溃的形势下，新生活运动也就自行瓦解了。

（摘自《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张同新）

史量才被暗杀

背景介绍

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以他所主办的《申报》为武器与阵地，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评南京政府的内外方针。他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主张办报纸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顶住压力，尽量为大众说话。他把报馆设在上海的租界，认为帝国主义的法律会保护他们批评中国的政局。他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对当局采取旁敲侧击、有捧有骂的态度。蒋介石当政后，他收买了上海的《新闻报》，成了上海报界的权威。他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指令，不顶撞，也不完全照办，对南京政府不即不离，与CC的关系也尽力周旋。他幻想把《申报》办成“公正”的报纸，不受政府旨意的左右，因此，对南京政府的各项方针作些小批评。《申报》开辟了“自由谈”专栏，登载过鲁迅、陶行知等人的文章。陶行知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写了《古庙敲钟录》。又开辟了“剿匪评论栏”，对国民党发动的剿共战争不断有所评论，反对围攻红军。一九三二年创办了《申报月刊》，创刊号上登载了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上海“一·二八”抗战时，史量才慷慨解囊，向宋庆龄、杨杏佛捐献巨款，支援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六月，《申报》如实报导了南京中央大学闹学潮，学生殴打教育部派去的校长段锡朋事件。人权保障同盟会的宣言，反对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文电等，《申报》也都一一刊载。这样一来，史量才不仅得罪了南京政府，而且直接触怒了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上海市教育局长CC骨干分子潘公展，二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告《申报》有“危害党国”罪。

史量才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本有警惕，曾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但是，生活在魔鬼横行的社会里，不管史量才有多么精明，只要他被魔鬼选中为取命的目标，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末，史量才为调养胃病赴杭州，戴笠的行动组立即进行了紧张活动。

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从杭州乘自备汽车返回时，特务们埋伏在他的必经之地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沪杭公路。当史的汽车一到，特务们便用强力手枪和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向汽车猛烈射击，当场打死了史量才、司机和同车的邓祖询。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侥幸逃脱。待特务们乘

车溜走后，史咏赓才返回现场，将三具尸体运到杭州。

材料：

· 沪杭公路暗杀行动

材料 沪杭公路暗杀行动

1934 年 11 月 14 日。宽阔的沪杭公路翁家埠地段(属浙江海宁县)，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横放在公路中间，六个黑色短衣打扮的人，有的在装模作样修理汽车，有的站在公路边紧张地注视着从南边开来的汽车。原来他们是国民党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华东行动组的六个特务，奉戴笠的指示，准备在这里狙击刺杀报界大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

暗杀史量才的命令是在 1934 年夏秋间由蒋介石下达给戴笠的。戴笠随即布置华东行动组赵理君等人迅即实施。特务们执行上级下达暗杀任务，只管实施，而不管对象是谁，不问什么原因，这是特务纪律决定的。去年他们在上海亚尔培路杀了杨杏佛，得了奖赏。这次奉命暗杀史量才，曾打算在上海租界动手。他们在《申报》馆与史量才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却迟迟没有找到适合的。戴笠在南京闻讯，亲自赶到上海来检查布置。他担心在租界动手，会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被捕房抓住，惹出许多麻烦，故指示另找地方下手。后来派去秘密监视史量才的特务通过帮会关系结识了史量才的司机，打听到史量才常去杭州，戴笠决定在其赴杭时对史实施暗杀。

1934 年 11 月，史量才携带家眷去杭州小住，调养胃病，住"秋水山庄"。戴笠与赵理君听到报告立即赶到杭州。他们先准备在杭州动手，但怕史被杀死在杭州，浙江省会警察局会为难，因为该局局长赵龙文与许多警官都是复兴社特务处成员，如果被责令破案，就会进退两难，戴笠决定改在沪杭公路上，等史量才乘自备汽车回沪时暗杀。

特务们通过关系获悉史量才将于 11 月 14 日由杭回沪的情报后，先由赵理君去察看选择了动手的地点，确定在海宁县属翁家埠地段。然后又给暗杀时乘坐的汽车仿制了两个假汽车牌照，一是"京字七十二号"，另一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参加暗杀的成员共六人，除华东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外，还有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他们这天早就驾车到预定地点，静候史量才汽车的到来，特务们所用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以便能射穿史量才所乘的保险汽车。

约在下午时光，特务们欣喜地发觉史量才乘坐的汽车在南方公路上出现了。这天车上除史量才外，还有史的次妻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史的儿子史咏赓与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邓祖询坐在最前面司机的座位旁。

特务们见史的汽车驶到近旁后，先以手示意汽车缓行，然后突然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使该车不能再开动。同时，另两名特务向坐在前面的司机与邓祖询射击。特务们误认邓是史的保镖，怕他开枪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因此先杀掉这两人。当枪弹乱飞时，史量才与史咏赓知有人行刺，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史咏赓年轻身体好，一出车门向田野上狂奔，三个特务以为他是史量才，在后面紧追不舍，放了 20 余枪，均未击中，史咏赓得以脱身。而史量才年纪大些，身体又不好，跑得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的一个干涸的小水塘里，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开枪向史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来补上一枪，登时史血流如注，气绝身亡。特务们见目的已达，便长呼一声，乘车迅速逃去。

特务逃去后约半小时，史咏赓才回到汽车旁，见到吓成一团的沈秋水与沈丽娟，又请来一些人，向附近的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上海。

史量才被刺后，社会震惊，舆论哗然，责难纷起，许多社会名人与报纸纷纷谴责这一罪行。蒋介石为遮人耳目，一方面电唁史量才家属，一面责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迅速破案，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当鲁涤平因不明真相，真的想侦破此案，蒋介石很快就将他调离了，使此案永远成了一件悬案。同时社会上开始谣传，史量才被刺是死于私仇：史量才在辛亥革命期间有位朋友叫陶骏保，任镇江军政府参谋长。史量才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合谋设计，诱杀了陶骏保，陶妾沈秋水携巨款逃到史家，史量才人财两得，才有巨资得以盘进《申报》。这次暗杀史，就是陶骏保的儿子贿买凶手下手的。云云。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经盛鸿)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4 年 12 月 10 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五中全会，14 日闭幕，历时 5 天。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戴季陶、丁惟汾、居正为大会主席团，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时红军已开始长征，会议中心问题讨论围剿红军，反对共产党；并决定成立以林森为首的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于 1935 年 11 月召开"五全大会"。全会共开过 5 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106 人，通过《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案》、《刷新政治与民吏始案》等 15 个决议案。并发表宣言称"本党同人受国民托付之重，深知攘外必先安

内，雪耻端在自强，救亡图存之工作，当以充实国力，修明政治为先务”。全会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妥协政策。

材料：

· 开幕词

· 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纲要

材料一 开幕词

各位同志：

自四中全会以来，各地中央委员因剿匪及各种职务上的关系，各在一方，直至今日方才能相聚一堂，开成了五中全会，这是极可纪念的事。全会的最大任务，是在听取上次全会以来关于党务、政治之报告，加以检阅，明了了过去的状况，以确定现在及将来努力之方针。四中全会以来，国难的严重并没有减轻，而且更有增加。同人处于这危急存亡的环境，惟有本着四全大会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方针，坚忍进行，在万难之中维持政局的安定。这安定的意义，不是姑息苟且，不是偏安苟活；而是在利用时间，力求进步。自四中全会以至今日，剿匪确有极大的成绩，江西匪祸已经摧陷廓清，数年以来，在瑞金等处建立伪都，自以为根深蒂固的，也已经犁庭扫穴。现在的急务，是剿灭残匪及如何肃清四川的匪患。关于生产建设，最紧要的工作，是复兴农村；而复兴农村的关键，在于免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增进其生活的力量。五月间中央与各省当局在全国财政会议里同心合力、统筹兼顾的结果，此项希望已经由决议而见之实行。如果没有今年夏天意外的旱灾，则现在各地农民已经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环境。但旱灾是一时的，而免除各种苛捐杂税，则各省已次第实行，垂之永久，所以农村复兴的希望终有实现的日子。其他各种生产建设虽限于经费未能整个的及大量的进行，而一点一滴也在不断的努力积聚起来，其详见于各种报告。

以上所述，是说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最大注意，在于求和平，求统一。而所以忍辱负重，以求和平，求统一，在于维持安定。而所以维持安定，在于求得进步，使国力日以充实，民力日以增益，以解救国难。向来对于会议的人，往往痛心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然而原因在哪里呢？总理垂训我们说是“知难行易”，我们必须知道所以决而不行，并不是行之维艰，而是在会议的时候、议决的时候，并没有顾到可行与否，能行与否，先造成了不行的原因，所以才会有不行的结果。如果不为空论，不唱高调，而专从对症下药着想，则每一次会议，必能想出一种适应需要之方案，以为会议后一切工作之总方针。先看准了要行的方向，制定了可行的条理，而运用之以必行的意力，则我们最终的目的，必能以逐渐的成就，及一贯的进行，而底于完成。今于五中全会开会之日，谨祝我们所负重大之使命得有进步，并且得到成功。

（摘自《民国代表大会资料选辑》第二历史档案馆）

材料二 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

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惟和平而后能得真正之统一，亦惟有真正统一而后乃有永久之和平。吾人当此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国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不足以言救亡而图存。而和平统一之途径，必须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冲突，增进团结，充实国家之力量，乃为今日全国所应共守之惟一方针。不惟中央与地方应彻底树立互信共信之基础，推诚扶掖，同循政治之正轨；即凡国人之有正当政治之主张，而不恃武力与暴动为其背景者，亦应使其依法有言论、结社之自由，而不加防制。夫以党治国，固为吾党不易之主张，然其道当在以主义为准绳。纳全国国民于整个国策之下，为救国建国而努力，决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转以丧失训政保育之精神。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也。

吾人果坚定和平统一之信念，而为分工合作之努力，则挽救国难，复兴民族，当可操券而待。顾数年以来，所以未能收分工合作之实效者，盖因中央与地方之权责划分未清之故为多也。其最显著之弊害，则在地方之责任未明，中央之运用不灵，以致行政效能趋于低落，各项建设艰于发展。故重新厘订中央与地方之权责，力谋政治设施之适宜，实为当前之急务。然欲达此目的，必须中央对于地方免除其掣肘之虑，消释其疑难之端；同时地方对于中央，亦应本休戚与共之真诚，遵国家整个之政策，怀当前严重之国难，守法奉命，一扫往昔割据与形同对立之形势，一致努力，以期蜕变中古时期封建之遗习，而创造三民主义新时代整个之国家。倘中央与地方之负责者，皆同心一德，本此而行，不仅所以救党国，抑亦所以自救也。查总理《建国大纲》所垂示者，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此乃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最高原则。惟于此过渡时期，不能不有斟酌损益，以为应时应地权宜之变通，期臻于统一正轨之大道。兹本上述之要旨，特拟中央与地方之权责划分纲要如下：

一、关于官吏之保荐与任命问题。国家庶政殷繁，需才孔多，用人大权虽操之中央，而保荐人选则不妨属于地方。现行各级官吏之任用法规，已多采取此项之精神。然

举贤与能,因材任使,必须负责者有辟荐之实效,而后能便利指挥。专一责任。谓宜重申此旨,一切文武官吏,应由各地方之主管长官,就有法定资格者自行选择,荐于中央,由中央任命之。务使适应事实,登进材能,于统一中央命令权之中,更充分发挥地方主管长官之权责。此对全国官吏之保荐任命法规,必须本此主旨,重行增订,切实施行者一也。

二、关于官吏之任期与保障问题。凡百庶政,责专始举,若存五日京兆之心,必有苟且因循之弊。各地方文武官吏,宜确实规定其任期,师古人三载考绩之遗意,以三年一任为原则。并须规定保障切实执行,无故不得撤职。其成绩优良者,任满之时,仍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连任,俾得久于其位,假以时日,课以考成,使材智之士,感国家任使之重,无设施不竟之忧,各展怀抱,献替国家。此对全国官吏之任期与保障法必须分别增订,切实施行者二也。

三、关于地方行政及经济问题。欲谋地方事业之发展,须加重地方主必管长官之责任;而欲各地之事业皆在国家整个政策之下进行,得免彼此冲突,或畸形发展之弊,则必须中央有统筹兼顾、指挥监督之权。故各地方行政方针,与夫经济建设,应由各地方斟酌实情,拟定计划,编制预算,呈请中央核定施行。中央既经核定之后,只须按其期程,考其成绩,而不必遇事干涉,辄令纷更。其他各项要政,凡具有地方性质者,亦概可依此原则,责令地方因势利导行之,则事半功倍矣。此对地方事业必须责成地方政府自由发展者三也。

四、关于中央与地方之财政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政,亟应根据现行办法,明确划分。凡属于全国性质之国家财政,应归中央统收统支,例如对外有关之关税等之税例与收支,尤应绝对由中央管理,地方固不得越权干涉。其他国税,亦应遵守中央所颁布之规则及税法办理。但在此过渡时期中,各地方经费确有不足者,自可由中央核准补助,使内外相维,以为调剂。此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之关系应急谋解决者四也。

五、关于国防军及地方兵警之问题。国防军为捍卫国家之武力,故关于国家之正规军,自须由中央统一管辖指挥。但在目前过渡时期,得依平时之统属关系,对于统属官佐之任免,准由其最高主管长官呈报中央任命。至属于地方性质之兵警、各保安队、保卫团、警察队等,除编制数额须由中央核定不得自由增减外,概准由地方行政长官训练调遣。无论国防军或地方兵警,若必须向外国购买武器时,可由中央统一购订,以免品类庞杂,减少效用。此对全国军事必须划清中央与地方之权责者五也。

六、关于法制之制定问题。吾国幅员广大,交通阻滞,各地风俗悬殊,国民程度不齐,经济产业状况均互有差异,不但因自然地理之关系,在行政设施上应有轻重缓急之别,且因文化程度之不同,更应有因时因地与因人制宜之必要。若概由中央颁布整齐划一、详密繁杂之法制,强使一体施行,是无异削足适履,扞格难通。故今日我国之法制,欲使全国推行无阻,必须中央祇定原则大纲,务使富于伸缩力。其一切实施办法与详密条理,应由各省市根据原则大纲,因地制宜,而自订单行法规,呈请中央备案,以期切于实用。此对于全国法规必须因应事实者六也。

以上诸端,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兆铭等认此要项为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最切实际之标准,亦即为增进中央与地方密切关系之良法。准此推行,则中央与地方过去矛盾隔阂之现象,当可一扫而空;全国负责之文武长官皆得安心任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和平统一之途径,复兴民族之基础,皆在于斯。应如何具体规定,以蕲其实施,敬候公决。

(摘自《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溥仪称帝

背景介绍

一九三四年一月,日本外务省公开承认,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伪国官员、著名人士要求恢复帝制,并以溥仪为帝的"请求"。同时,东京各报均披露消息,称伪国宪法将有重大改变,日本政府将对伪国发表重要宣言,溥仪将于三月一日称帝。

一月二十日,溥仪发表宣言,宣布于三月一日改制,称:"国基已臻巩固,因此满洲三千万人民全体盼余践位,此为余之神圣权利"。又称,在典礼时"将颁布宪法。按照宪法规定,'满洲国国旗与首都地点及国策将不变更'"。伪国当局还宣布,改称"帝国"遵行如下原则:(一)溥仪称帝。(二)主权属于皇帝,但许可人民表征、请愿。(三)溥仪称帝并非满清复辟,而是建立"新帝国",溥仪为第一代皇帝。(四)永远尊重王道政治,然又决不是君主专制政治。(五)皇帝统治"满洲国",依立法行皇帝权,国务总理辅佐之,并制定宪法。(六)外本国际亲善,内重顺天安民为基本。(七)"国旗"与"国都"不变更。(八)国号改称"满洲帝国"。(九)宫与府分别明显。(十)即位典礼在长春举行。

溥仪的宣言刚刚发表,日本外相广田立即表示"欣然满意"。外务省发言人称,溥仪即位并非恢复满清,"国疆"也不变更,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华北。又称"溥仪即位一举,将使人注意于'满洲国'之独立,并可消除日本将并吞满洲之无根谣诼。"这番表白倒把日本的阴险用心合盘端出了。

三月一日,溥仪在日人的导演下,身穿满绣金龙兰袍,祭天告地,郑孝胥率众大臣三呼"万岁",宣读受位诏书;同时伪府发布伪帝国组织法,即位诏书及开元诏书,

宣布伪年号为“康德”，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原伪总理改称为“国务院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改称大臣。总理大臣依政府组织法第四条，任辅弼伪帝之责。伪执政府改为宫内府，新设国玺府。被任命的各伪大臣为：宫内大臣，沈瑞麟；国玺尚书，宝熙；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民政部大臣，臧式毅；外交部大臣，谢介石；军政部大臣，丁鉴修；司法部大臣，冯涵清；文教部大臣，郑孝胥（兼）；兴安总署总长，齐默特色木丕勒；监察院长，罗振玉；立法院长，赵欣伯。

当日午后，日本驻“满”全权大使菱刈隆与郑孝胥交换公文。谢介石与郑孝胥还分别发表外交声明。谢介石重弹溥仪称帝绝不是亡清复辟，对于民国国民无敌意的老调；郑孝胥的声明则强调伪国与苏联应相互承认，设立领事馆，尽快解决中东路纠纷，划清两“国”界线等。

材料：

- “儿皇帝”登极大典
- 我第三次做皇帝

材料一 “儿皇帝”登极大典

溥仪就任执政时，在对东北代表的答词中有“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倘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的这一段话，是溥仪为一年以后进一步做皇帝的张本。“执政”这个称号，是陈宝琛、陈曾寿、胡嗣瑗等遗老所反对的。一九三二年三月溥仪就任执政后五天，陈曾寿拂袖而去，回到天津，曾经寄了一封奏折，其中有一段是：“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陈宝琛则是主张溥仪必须坚持“正统系”的，京津各地遗老也持着相同意见；即使与溥仪关系不深的曹汝霖、汪荣宝等人，也认为名义至关重大。至于溥仪本人，无时不沉醉于重登九五的迷梦之中，再加上周围的人不断向他打气，直弄得他神魂颠倒，坐立不安，巴不得一步就登上皇帝宝座而后快。

一日复一日，“暂任执政一年”的期限快要满了。在一般看来，一年的时间是不算长的，可是迫不及待的溥仪却感到这一年比十年还长。远在天津的陈宝琛，近在身旁的胡嗣瑗、陈曾寿、佟清煦、商衍瀛、熙洽等人，纷纷旧话重提，四处奔走，酝酿复辟。溥仪特派亲信工藤忠去东京找日本军政各界重要人物摸情况，探消息。工藤忠从东京带回来的消息说，南次郎和黑龙会的头头，以及军部各方面的当权人士大都同意实行帝制。与此同时，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辞职去华北，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此行还打算去上海，为溥仪将来在全国复辟进行活动。这时正当重阳时节，郑孝胥是每逢重阳必有诗的，人称为“郑重九”。这一年的重阳节，郑孝胥为了发抒自己的抱负写了一首七绝：

“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

溥仪的皇帝之梦终于实现了。一九三三年十月，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这一喜真非同小可，他首先想到的是“龙袍”。他认为唯有穿龙袍才能表现皇帝的威严。于是急急忙忙派人到北京从荣惠太妃那里取来了一件龙袍，这件龙袍是光绪皇帝曾经穿过的，在荣惠太妃手里保存了二十多年，现在又用着了。但是，关东军司令官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不能穿清朝的龙袍，只能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上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和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极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正在溥仪纠缠于龙袍问题时，陈曾寿递了一封奏折，节录如下：

“……今之应争者在赏罚黜陟之大权，不在外面之礼文节目，如时犹未至，宁暂俟之，果以能实权在己，则虽如赵武灵王之胡服，未为不可。……”

登极大典选定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溥仪派宝熙、胡嗣瑗为“前引”，陈曾寿、商衍瀛为“后扈”，并分别指派执事官若干名。为了与溥仪的龙袍相称，前引、后扈与执事官的服装，一律规定为蟒袍翎顶。宝熙、胡嗣瑗、陈曾寿、商衍瀛四人都是当过一、二品大员的，应该戴红顶花翎，穿仙鹤或锦鸡黼黻，自不必说。至于执事官，大都是年龄不满三十岁的宗室亲贵子弟，没有封过官、戴过翎顶，于是溥仪临时赏给某人一、二品顶戴，某人三、四品顶戴。这种服装谁也没有现成的，赶制已来不及，只好四处去借，好不容易拼凑齐了，破旧且不管它，蟒袍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帽子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借不到朝珠怎么办？有一个执事官异想天开，把算盘珠子拆下来，用线穿成一串，套在脖子上，虽然不够圆，但远远看来，也还混得过去。朝靴小了，硬把脚塞进去，走起路来扭扭捏捏，怪像个小脚女人。

三月一日是登极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

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由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卫处长工藤忠陪乘，随行官员一律乘红色汽车，名为"卤簿"，其次为"列外车"（卤簿以外）。一路车水马龙，浩浩荡荡，到达了杏花村。溥仪在前引、后扈簇拥下，先进入八卦红黄幔帐内，洗手洗脸，然后由前引、后扈和陪祀官郑孝胥、张景惠、臧式毅等人陪同到天坛下敬献帛、玉、爵、牲，对天恭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回宫，脱去龙袍，换上陆海空军大元帅装，御勤民殿（勤民楼改称勤民殿），站在装饰着兰花御纹章高背宝座前接受朝贺。以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行三鞠躬礼，溥仪答以半鞠躬；其次是日本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菱刈隆呈递国书；溥仪发布即位诏书，国号满洲帝国，年号"康德"（溥仪任执政时期年号"大同"）。登极大典遂告完成。

此外是接受从京津各地来的旧王公大臣和宗室觉罗子弟的朝贺，溥仪坐在宝座上受三跪九叩礼，不答礼。午时赐宴伪满文武官员，晚间举行家宴。

（摘自《落日残照》丁燕石，档案出版社）

材料二　我第三次做皇帝

"重登大宝"和初次访日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允许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在一次和武藤的例行会见中，出乎我的意料，他先向我提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目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投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指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就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3月2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愤激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地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做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地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是看做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的。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这时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3月1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上，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历史内幕

血染的江河

敢于承认失败的军队，
是不可战胜的军队。

——丘人

历史闪回到半个世纪以前，1934年12月。

湘江，鲜血染红的河，漂泊着无数红军将士的尸首。

大地在哭泣。山岳在摇撼。细雨、寒风在哀号。

这是蒋委员长最辉煌的战绩，也是红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篇章：

八万中央红军折损过半，

红34师等全军覆没……

四道封锁线 “国军”的铁栅栏

1934年10月中旬，由于左倾路线领导者的错误，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留下3万余人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千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突围西征。红军经过艰苦转战，在安远、信丰间；桂东、汝城间；郴县、宜章间；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红1军团由2师担任前卫。这时粤敌的第1师主力在西安。第2师在信丰，第4师在赣州、南康、独2旅在安远。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这一线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敌人发觉突围的红军大部队以后，边打边撤。红军在追击途中，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3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1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古坡，红3军团早从右翼插到了古坡随后也追歼逃敌到安西。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红军冲垮了。

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正式红军，有的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国民党正规军则深处内线。红军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城口。第二道封锁线又被红军突破。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当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也频繁，对敌军调兵非常方便。敌人预先就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在一线山上修了不少碉堡。而且这时敌军已判明红军在突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赶往前面堵击。红军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封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红3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但是，越过九峰山时，红军部队行军非常艰苦。大批的骡子、物资，甚至连印票的机器也带上了。机关、家属，大队人马，可以说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在搬迁。部队冒雨行进在九峰山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这里没有村庄，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然而，比这天气更危险、更可怕的还是前面的敌情。当红军部队进到湖南、广西边境，还没有渡过潇水，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就尾追上来了。

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乘机从两边夹击过来。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他决心利用湘江险要，构成更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调集广西军，湖南军两相夹击，并以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意在全歼红军，灭此朝食。蒋介石在给前线各部队的手谕上都写着："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已经经过几番搏杀的红军将士，一路上又连遭风雨、露寒，加上错误路线领导者的滥施淫威与在敌情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支队伍的险恶情形常人难以想象。在湘江两岸，红军将士全力抗击敌人，以保障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战斗空前激烈。

蒋介石的第一步恶毒计划是先合击红军于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在当时的形势下，从红军右翼部队来说，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先敌抢占道县。道县旧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这一带第一大渡口。

11月20日，红1军团2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他们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11月22日拂晓攻入道县，消灭了守敌，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并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架起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这样，使敌人第一个计划不能得逞。

紧接着，蒋介石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这是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最严密的部分。

敌人麇集20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将其所属的刘建绪的4个师调至桂北全州。第二路粤军薛岳的4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把指挥所移到桂林，将他的5个师和民团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阳等地。并声称，此举的重点在保境"灭共"。而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的4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从红军的背后，象拉网似的直压过来。

横在红军面前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湘江，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间，修了140多座碉堡。远远看去，仿佛是座座相连的锁柱。

本来，当11月16日红军攻占临武，继续向江华、永明（今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军刘建绪部还没有直到全州，灌阳、汀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是红军丧失了宝贵的时机。

白崇禧看到红军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5个师开回灌阳和兴安两点。从11月27日起，红3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红1、3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红军已控制界首到屏山渡之间60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27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160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的时机。他们仍然让红军战士抬着从中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前后磨磨蹭蹭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但这时，前线战士为了执行掩护任务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谁说红军是好惹的

一天战斗又过去了，令人夜间无法入眠。这几天，中央军委与所属部队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11月30日晚上，红1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一份电报。

朱（德）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12月1日1时半，朱德主席给全军下达了紧急的作战命令。其中，命令"1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紧接着，在3时30分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给红1、3军团。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励。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

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　委
总　政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到十二月一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和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啊！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都是熬红了眼在为第二天作战斗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啊！

十二月一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湘军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红军进犯。而总参谋部命令红军在本日十二时前，要保证决不让湘军突破白沙河，使总部和全野战军能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敌众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红军的士气惊天动地而泣鬼神，于是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蒙蒙大雾吞没了湘江，到处荡漾着牛奶泡沫似的乳白色的粘稠的雾团，十几米以外就看不清人脸，这对防守是有利的。

湘军看不清目标，便乱打冷炮，不让红军有片刻喘息时间，炮声在雾中显得沉闷，落点零乱，可是，这种冷炮有时危害人，往往歪打正着，有时恰恰落在指挥部的要害位置上。

连续的突击，疯狂的搏杀，不让对方有喘息之机，这也是湘军将领的绝活。湘军已向蒋委员长吹下牛皮，非全歼红军不可。这点大雾算什么?!

这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神秘与恐怖感同时压在心头。

炮火的气浪使浓雾激荡起来，晃动起来，在撕碎的乳白色的破絮里露出了黑沉沉的山头，西风从越城岭猛扑下来，弥天大雾迅速向湘江东岸淡散，山林、田野、沙丘又呈现出莽莽苍苍的姿影。

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湘军在有飞机、大炮和精良的步兵武器的情况下拼搏，就等于持长矛对红军的菜刀，只有近战，才能发挥红军之长。红军首长命令部队不要过早还击，把湘军放到阵地前沿，而后突然反击。红军将士用湖南话挑逗说："让蛮子们在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红一军团是擅长打运动战的部队。这场阻止战打得这样出色，不能不归功于五次反"围剿"中，与敌人阵地对阵地的拼杀时的锻炼。

飞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战士震昏，耳鼻出血。湘军的确不是孬种，他们的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在后，好象着了"刀枪不入"的魔法，无知无觉地"哇哇"叫着，踏过他们自己兄弟的尸体，向对方阵地冲击。红军面对的的确是湘军老虎。

开始，湘军猛攻红三团阵地，红三团连续打了几次反冲锋。敌转而猛攻红军一、二师的接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并迂回到三团背后，包围了三团两个营。一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一、二团会合。一个营突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了，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

这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部也受到极大的危险。湘军的迂回部队打到了红一军团部指挥所门口，真是情急万分！

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林彪、聂荣臻等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起初将领们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聂荣臻。聂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当时，左权还在那里吃饭，聂荣臻果断地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红军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令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通知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由于红军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摆脱了敌人，减少了损失。

当红军一军团与湘军血战的同时，红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红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追敌激战。同样是惊心动魄，激烈万分。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后，打得最激烈也是最大的一仗。八万红军将士死伤过半，战地沿途到处是尸横遍野，满目狼烟。滚滚的湘江，漂泊着无数红军将士的尸首，还有大量被丢弃的文件和物资。然而，经过红军将士的拼死决斗，终于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突出重围。

数万红军将士活脱脱的生命，殷红殷红流成河的鲜血……

谁说它不是醒世的呐喊，
谁说它不是胜利的召示呢。

（选自《百战图》，作者：沙客）

动魄惊心的梅岭事件

一

在那漫漫的长夜里，陈毅同志翘首凝望西去长征的红军主力，默默祝祷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的伟大胜利，写了这样一首诗：

微石终能填血海，
大军遥祝渡金沙。
长夜无灯凝望眼，
包胥心事发初华。

这首诗，凝结着他对党和红军多么深厚的感情！他是多么惦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么热切地期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及时得到指示呵！

是的，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到一九三六年秋，我们红军游击队已经在深山密林里转战了两个年头。除了突围前收到党中央的两份电报以外，南方各游击区就一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项英、陈毅同志与南方各游击区之间的联系也完全被隔断。

那些日子，陈毅同志与项英同志商量，应当同中央建立联系，听取中央的指示。他们曾对我说："要是能派个人到陕北就好了！可是谁能够去陕北呢？有的同志认为和党中央联系，路上危险太大，不能冒险。你和杨尚奎同志对路途又不熟悉。"

在这以前，我知道陈毅同志曾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千方百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可是，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正在这个时候，赣粤边特委内线交通员黄亚光给我们送来了一封机密信。这封信是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写的。信中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一个大饭店里会面。大家得到这个讯息，自然都十分高兴。

陈海，原名陈宏，是红六军团长征时的掉队人员。由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流落到大余城郊修马路。一九三五年冬湘赣省委便派他和陈桂华一起，到国民党五十师做兵运工作。他们两人工作不慎，被敌人发觉后逃到了赣南，又通过关系找到信康县委。这时正逢叛徒龚楚窜到赣粤边进行破坏活动，信康县委感到他们两人形迹可疑，就加以扣留审查。后经过考察没有发现叛变行为，就把他们两人释放了。接着又给他们一笔经费，派他们到余汉谋部队中继续做兵运工作。不久，他们在余汉谋部第一师和第二师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等秘密组织。

一九三六年间，上海的地下党派张斌，红六军团也派吴俊卿到余汉谋部开展兵运工作。陈海、陈桂华跟张斌、吴俊卿接上了头，并直接受他们的领导，而赣粤边特委发生横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陈桂华被捕，张斌与吴俊卿逃离余汉谋部，陈海未暴露身份，仍留在白军中做兵运工作，并直接受赣粤边特委的领导。陈海曾几次到特委报告过工作，有时带来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刊物。有一次，他说国民党军队生活很苦，怨言很多，有两个连随时可以拉出来。陈毅同志对他说：应该钓大鱼。现在暂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

这天，收到了陈海寄来的机密信件，陈毅同志真是喜出望外。他怕错过和中央以得联系的机会，决定亲自去一趟。第二天，天麻麻亮，陈毅同志由新担任梅山区委书记的黄占龙同志带路，一同下了梅山。

他们两人穿过莲花梁，到了大余城，决定先到陈海家中探时虚实。他们来到陈海的家门前，只见一个妇女正在洗衣服。黄占龙估计她就是陈海的老婆，便问："陈海先生在家吗？"她连头也不抬，神气十足地答："到团部去了。"大余县广启安糖铺，是我们设在大余县城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陈毅同志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和黄占龙一起，直往广启安糖铺走去。当他们转弯走向糖铺时，只见国民党兵正在那里搜查。于是停住脚步，躲进一家茶馆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同志，走近陈毅同志悄悄地说："陈海叛变了！昨天他带着国民党兵把店里的黄亚光也抓走了。你们快走吧！"

这时，大街已经开始戒严，国民党的士兵正在街上盘查行人。陈毅和黄占龙同志沉着地离开茶馆，穿过一家老百姓的小屋，从小路绕出城去。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出城后便分开走，各自取道回梅山。

二

原来，叛徒陈海把信送出后，便在大余城等候我负责同志下山。他没有等到，便又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我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的斋坑包围起来了。

当时，指挥机关的警卫员曾忠山同志正在斋坑的棚子外面执勤放哨。他把注意力放在棚子正面的大道上，没有料到敌人会从后面包抄上来。因此，当他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大吼一声："反动派来了，快走哇！"边喊边举起枪来，一枪撩倒迎面而来的一个敌人，就滚下山逃跑了。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同志告了警，而且也使敌人吓了一跳，使他们不敢贸然前进。

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员丁上淮、宋生发等同志听到枪声，立即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倒很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不巧的是，这时有两个到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在棚子附近被敌人拦住了。这两个交通员，男的姓殷，女的叫彭茶妹(我们习惯叫她彭妹子)。老殷是个挺机灵的同志，当敌人用枪刺对准他时，他急忙举起手中的布伞，在敌人眼前虚晃了一下。敌人摸不准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武器"，被吓得倒退了几步，老殷趁势转身逃跑，冲出了包围圈。

彭妹子不知道敌人的意向，只顾从山下往山顶上跑，正好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捉到一个'土匪婆'啊！"敌人一面嚎叫着，一面对彭妹子拳打脚踢，逼问她："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人？"

我躲在茅草丛里，心里有点急，怕她经不起敌人的恐吓，万一说出什么来，那就糟了。

然而，不管怎样骂她、打她、踢她，她始终坚持说："两个人"。

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问她："'大头子'藏在哪里？"她怒目相向，只字不吐。

敌人恼羞成怒，更加狠命地用拳头揍她，用枪托打她。她朝敌人的脸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说道："我不告诉你。"

后来，她的声音渐渐你微下去……我在草丛里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好象她已昏过去了。

说来有些奇怪，在这方圆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三百个敌人包抄我们，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搜不到我们。敌军官想出一条毒计，命令士兵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呼噜呼噜地燃烧起来。谁料天下真有这种巧事，正当万分危急的时候，忽然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声轰鸣，不一会儿，哗啦哗啦落下了一阵倾盆大雨来，把火苗通通淋灭了。火燃不着，敌人可不甘心，命令士兵继续搜索。直到时近黄昏，这才吹号集合，排队下山。我正要从草丛中往外钻，心里又暗自想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是小心点。拨开草缝朝外一瞧，真危险！原来他们假装退却，却把队伍埋伏在山脚，要不仔细，可就上当了。敌人在山下呆了一会，看看山上毫无动静，眼看天快黑了，这才快快地走了。

三

正当敌人往山下撤走时，陈毅同志刚好从大余县城回到梅山来。他还不知道斋坑已经出事，所以，一个人信步走来，不想正撞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一个敌兵抓住他，恶狠狠地说："老表给我们带路。"他听说叫他带路，心就安了下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支杀气腾腾的队伍就是去捉游击队的，叛徒陈海正领着大队走在后边呢。陈毅同志不慌不忙地推托说："老总，对不起，我是外地人，路不熟。"那个敌兵瞪着眼睛说："你不是本地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陈毅同志笑着说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到这里来买茶叶。"那个敌兵命令他说："教书也好，买茶叶也好，先给我们带路。"陈毅同志没有法子，只好往回带路。陈毅同志的沉着，迷惑了敌人。敌军官一听说是"教书先生"，又见他那严肃的神气，不敢有所怠慢，刚好这一带盛产茶叶，说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并且对刚才的失礼，还表示歉意。敌军官为了显示自己也有点学问，便跟假称"教书先生"的陈毅同志攀谈起来。一路上，陈毅同志边走边想，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那就糟了，还是早想办法摆脱为好。等进了一座村子，他忽然捧着肚子叫起痛来。敌兵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肚子痛得厉害，要解大便。"敌兵叫他到路旁的茅厕里去。过了很久，敌兵不见他出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钻进茅厕里去看，原来，陈毅同志早已跑掉了。

陈毅同志逃离敌军，躲进了树丛。他见一队队国民党兵从山里往大余城的方向撤，便在树丛里观察了好一阵子，见敌人真的远去了，才摸回斋坑那个棚子来。他见棚子已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也被抢劫一空，便走出棚子，在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我们的同志，便自言自语，高声地说道：

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他说了几遍，却没有人答应。

于是，他又一个个地呼喊着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几个警卫员的名字。

他怕敌人折返回来，焦急地说："难道都转移了吗？不可能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也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这时，陈毅同志的警卫员宋生发同志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辨认出来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迎了过去。随后，我们几个人也都从草丛里钻了出来，先后来到陈毅同志的跟前。我们彼此紧紧地握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真比阔别多年的亲人还要亲啊！在那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我们同受风吹雨打、蛰伏草丛之苦，同历生死的严峻考验，遇险之后，幸又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我们内心的喜悦啊！

天黑了。树林里仿佛笼罩上一层层厚厚的绒幕。陈毅同志向我们讲了他进城经过和回来时的遭遇。我们也同他讲了敌人包抄棚子时的情景。接着，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敌人还会回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大家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路，才在斋坑北边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果然，敌人又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猎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他们还乱打枪，乱喊乱叫，为自己壮胆。这一切，我们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虽然相隔三十多里路，但实际上山与山之间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多远。我们听了敌人疯狂的嚎叫都觉得好笑。有的同志说："要不是老刘同志及时回来，催着我们赶快离开斋坑，我们恐怕早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出不来了。"有的说："要不是老天下大雨把火淋灭，我们也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同志风趣地说："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在这天晚上，曾忠山同志也摸到我们隐蔽的地方来了。原来，他在白天打了一枪，撩倒一个敌人，滚下山沟之后，敌人就拚命地追他。敌人为了"捉活的"，没有朝他开枪。可是敌人追了半天，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悻悻地走了。他脱离危险后，摸到附近一个老百姓的家躲了起来。随后，他向那个老百姓买了一把砍柴刀，装作砍柴人出来寻找游击队，终于在山上同我们碰到了块了。

第二天早上，那个突围而出的交通员老殷同志也找到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两人的安全归来而高兴。

但是，彭妹子被敌人打成重伤之后，抬到大余城去

实录三卷3正

了。后来我们打听到，她被关进监狱，备受敌人的拷打和毒刑。这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女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战士，始终没有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屈服。

彭妹子原是南雄的农村妇女，个子高大，机智勇敢，革命警惕性高。她既是交通员，又是炊事员。她常在深更半夜只身穿过深山密林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当时我们红军游击队里有不少象彭妹子这样英勇顽强的女同志，她们经过战火的锻炼，已由一个普通农村妇女逐步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她们是平凡的，然而，在她们身上却洋溢着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彭妹子牺牲了，她的精神不死！

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天一晚，一无米，二无锅，什么也没有吃的。曾忠山同志拿出他在他躲藏过的那个老百姓那里买来的五、六两米，让大家吃。本来他只买了一升米，而他自己已经了一餐，所以只剩下这么一点米了。这五、六两米，真是比珍珠还要贵重啊！我们用一只压扁了的搪瓷口缸当"锅"，大家一边轮流做饭，一边站岗放哨。这时，每个人早已饥饿肠辘辘，饿得发慌。可是，谁也不愿多吃一口。五、六两米，八、九个人吃了一"餐"还没有吃完，最后把剩下的，连同沟边采来的苦菜叶煮成了"稀饭"。那些"稀饭"的饭粒粘在苦菜叶上，被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下子都吃光了。陈毅同志笑着对大家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支人参呢！"

敌人先后调集了四个营的兵力，把梅山团团围了二十多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我们忍饥耐寒，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把草鞋都磨穿了。

就在我们梅山被围、九死一生之际，身带伤病的陈毅同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激励着革命的诗情喷薄而出。他日夜伏在丛莽间，写下了他那豪气入云的"绝笔"：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梅岭三章》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是激励我们为真理而冲锋陷阵的战斗号角。它壮怀激烈，唱出了陈毅同志坚贞不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共产主义情操。"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说，生要持枪跃马，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奋斗不息，即使化为雄鬼，还要高举革命的旌旗，踏平阎王的森罗宝殿！这种视死如归，虽死犹生的精神，多么崇高，何等可贵！"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说，现在个人牺牲了，但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要胜利的。陈毅同志在自料必死、万般危急的景况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决不是偶然的，它根植于坚信共产主义的伟大抱负。

四

红军游击队并没有因"梅岭事件"而受到大的损失。但是，这一事件说明，敌人时时刻刻都在想搞垮我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从而搞垮整个红军游击队。

事后查明，"梅岭事件"与"北山事件"一样，都是叛徒龚楚、何长林等一手阴谋策划的。

原来，有一天，我地下工作人员李品仙到南雄的里栋采购药品和食盐，不巧被叛徒何长林发现，何对他多方进行威胁利诱，要他带人捉拿项英、陈毅同志，如果干成了可以得到重赏。毫无骨气的李品仙叛变了，当场供出了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敌人连夜把陈海抓起来，贪生怕死的陈海也叛变了，供出了我们在大余开"糖铺"做内线交能的黄亚光。随后敌人又诱捕黄亚光。黄亚光把所掌握的我指挥机关的一切情况向敌人告了密。于是大叛徒龚楚、何长林和陈海之流，为敌四十六师师长出谋策划，设下了骗取我领导同志到大余城碰面的阴险圈套；同时，敌人还派密探对梅山斋坑附近的地形作了详细的侦察，作好武装包抄我指挥要关的准备。然后又派了四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周围搜抄，妄图把我们一举消灭。但是，在机警而坚强的战士面前，敌人的卑鄙阴谋又彻底破产了。

"梅山事件"以后，我们的指挥机关就更加注意隐蔽，总是设在最偏僻的地方，设在敌人最不容易找到的深山峻岭中。同时，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也进一步作了改进。

（选自《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作者：陈丕显）

项英陈毅北山遇险

"北山事件"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叛徒龚楚企图活捉项英、陈毅，破坏我游击队指挥机关的一个重大阴谋。

项英、陈毅当时是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留下来领导苏区武装斗争，以配合红军长征的。1935年春，项英、陈毅鉴于苏区形势的日益紧张，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粤边南雄县的北山，领导赣粤边的游击战争。

龚楚原是中央根据地军区参谋长。1935年2月中

旬，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700余人，从于都南部出发，经赣粤边的南康、油山、北山等地，到达粤北的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同年5月，他亲手杀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的七十一团政委，叛变投靠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并告诉敌人："项英、陈毅 在南雄、大余一带，分手时他们告诉我的。"他的卑劣行径得到敌人的赏识，陈济棠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卫队，要他赴北山破坏我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1935年10月中旬，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顺着他原来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一带。他们在那里转悠了几天，不见游击队的踪影，也不晓得我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按预谋，此时余汉谋派仁化地主周文山率领一支100余人的武装队伍，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命令他的卫队开枪"迎击"，与周文山导演了一场"自打自"的丑剧。这样，龚楚就到处吹嘘他们"击溃"了余汉谋手下由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当时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并不知道龚楚已叛变投敌，加上龚楚又演了这场闹剧，就误认为他是"兄弟部队"。驻在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游击小队长刘矮古和游击队领导人贺敏学，以及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大吹大擂他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使人感到龚楚的这支队伍作战勇敢，值得学习。但见他们服装很新且整齐，讲一口的广东话，又产生了疑窦。龚楚知道时间长了会被游击队识破真面目，于是决意先下手为强，"一网打尽"游击队。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出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龙西石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贺敏学一到就问龚楚："警戒布置了没有？"龚楚点了点头，实际上他已派武装包围了会场，四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贺敏学感觉味道不对，转身要走，但4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冲出，身中三弹，滚下山岗，负伤逃离虎口。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画皮，说共产党游击队没出路，要大家投降。同志们知道中了敌人奸计，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火力封锁下，打也打不出去，有30多名游击队员当场牺牲，只有刘矮古等八九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

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被逮住了。他经不起龚楚的威胁利诱，也可耻地跟着龚楚叛变了。

敌人破坏了我后方 机关后，龚楚又叫何长林带路去抓项英、陈毅。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游击队各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何长林也只大体知道项英、陈毅住处的方向，并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马上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丹眉坑买米。只要能在途中截住他们，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陈毅。"龚楚听后非常高兴，马上叫何长林带他们到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须经过的丹眉坑岔路口守候。

这天下午二三点钟，我侦察班的关少华、丁上淮等5位同志从丹眉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你是哪个部分的？"在相距几十步远的地方，吴少华机警地问。

何长林听出是吴少华，假意问："你是吴少华吗？"

"是的。"吴少华回答。

"你们辛苦了，又去买米啦！"

"是啊，何主任辛苦了。"

在这一问一答中，双方慢慢地走近。这时何长林身后忽然闪出两个家伙，上前一把抓住吴少华的衣领，另一个家伙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丁趁势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扁担打掉了那家伙伸出来的手，立即飞身滚下山去。跟在丁上淮后面的3位同志，也滚下山去。

敌人抓住了吴少华，把他佩带的枪下掉。吴气愤地骂道："你们是反动派，是土匪！"

何长林和龚楚知道来硬的不行，也怕吴少华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后不肯带路，急忙表白道："别误会，龚参谋长是从湘南来接老周（项英化名）和老刘（陈毅化名）去湖南领导革命的。这些同志也是跟着龚参谋长一起来的。他们见到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误认为你们是敌人。请你给我们带路。"吴少华见这些部队的衣服很新，早就怀疑他们，但现在自己已落入他们手中，要脱身已很困难。如果反抗，自己牺牲不要紧，龚、何还会去找指挥部，项、陈等首长的危险仍没解除。好在丁上淮等4人已脱离虎口，不如暂时应付一下，再寻脱身 之计，想办法通知项、陈。

于是，吴少华带着敌人往前走。距我指挥机关驻地只有两三里路了，吴少华站着不愿再走。何长林、龚楚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我是侦察员，我的枪已被你们收走了，空着手回去，怎好向首长交代？"

龚楚当即把一支驳壳枪送给吴少华。吴少华接过一看，见是一支新枪，不是自己原来的 ，里面压满了子弹，但撞针却被卸掉了。他不动声色，继续往前走。

越接近我指挥部，龚楚他们心里越是紧张，于是打听起指挥部的虚实来。吴少华心想：山上担任警卫和侦察的同志不过八九个人，首长们都在山上，要是照实说了，岂不是暴露了秘密？不如将计就计，吓唬吓唬他们。于是，吴少华回答："司令部人不多，总共才20多人，但每人都有一支驳壳枪，100余发子弹。不过，前天下午，从河东那边开来了一支游击队，约有300来人，有40几支驳壳枪，3挺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这3挺机枪架在司令部右边的山坳里，其余的人都驻在司令部附近。

敌人听了吓了一跳，有几个马上把子弹推上膛，准备战斗。吴少华借机说："快到家了，怎么还把子弹推上膛？"龚楚吆喝着要他们放下枪。

当他们接近我指挥部岗哨时，吴少华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人去多了，会引起误会。"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规定：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 3 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吴少华回答。

龚楚听了很生气，但又没办法，只好命令停止前进，派了两个心腹跟着吴少华。

我们的哨兵站在较高的山坡上。当接近我哨兵时，吴少华左拐右拐，甩开了跟来的敌人，快步冲到哨兵跟前，指着坡下的匪徒说："快开枪，他们是反革命。"

哨兵朝坡下开了 3 枪，向指挥部报了警。

项英、陈毅、陈丕显、李乐天、杨尚奎以及警卫战士听到枪声，急忙离开指挥部住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起来。

敌人听到枪声后也开了枪。吴少华和哨兵立即滚下山去，朝着与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了。敌人朝岗哨打了一阵枪，却没敢冲上来。这时天近黄昏，龚楚害怕我游击队人多，仓促地撤走了。

敌人的阴谋破产了，我指挥机关完好无损。这就是"北山事件"的始末。

（选自《纵横》91 年 4 期，作者：钟祥胜）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三次等待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影响，到遭受王明教条主义接二连三的打击，毛泽东几经受挫，度过了几次痛苦的等待过程。

1929 年 7 月：毛泽东经历了第一次"等待"。还是在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期，当红军三次攻克龙岩胜利后，红军有了一个安定可靠的立足点。为了总结经验，加快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29 年 6 月下旬，四军前委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由于当时红军在战争中不断补充军队，部队成分异常复杂。有的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接管过来的"解放战士"，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各种职业的群众，加上"中央二月来信"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致使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旧军队意识在红军中蔓延，有的认为党管一切的约束力太大，有的不愿意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有的要求部队要搞极端民主化等等。对于这种种错误思想的出现，毛泽东在会上一条条给予批驳，并认真劝导大家要扎下根来搞好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但是，此时各种错误思想已占上风，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大多数人不愿意听，有的还拿出各种理由与毛泽东直接顶撞起来。在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

这是毛泽东自创建红四军以来头一次挫折。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现在形成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都极为有害，但同志们已不大愿意听自己的，那就只好暂时离开一下，有朱德、陈毅同志在，部队是不会出多大问题的。会后，毛泽东即离开四军，一面养病，一面投入闽西根据地建设的斗争。

3 个月过去了，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不断泛滥，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恰此，中央要求红四军乘粤桂军阀混战之机，将队伍拉到广东、广西去，配合那里的地方武装，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胜利区域。

当毛泽东得知中央的来信和红军的现状后，对红四军的前途十分担忧。四军中大部分人已热衷于攻下几个大城市，过过胜利的好日子，中央的来信又正好让他们去攻打城市。这样，必定会葬送红军和根据地。在这危急之时，毛泽东的疟疾病却越来越重，无情的病魔折磨得他两腿无力，浑身酸痛，但他此时怎么也躺不住，硬是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龙岩城。

到龙岩后，毛泽东立即找到朱德，要他正确分析两广的形势，不能盲从中央的指示。但朱德却以"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来回绝毛泽东的主张。各级军官听说毛泽东是来劝他们不要去打广东的，也都索性躲开。一片苦口婆心毫无效果，毛泽东又只好痛苦地离开龙岩，来到上杭继续养病。

一天，新任四军前委书记陈毅来到上杭。毛泽东一见陈毅到来，立刻从病床上爬起来，还没等陈毅坐下就急忙劝导他说："广东去不得，那里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还比较弱，加上现在四军内部思想比较混乱，那就更不能去了，千万要珍惜我们的队伍和这块根据地呀。"

陈毅本来是想劝毛泽东一起去参加打广东的，听毛泽东这一说，急忙拿出庄重的口气说："毛委员，我刚从上海回来，我这是带了中央的指示请你一起去参加打广东的，其它事待打完这一仗再说，现在，我们不能把敌人的力量看得过高了，我们四军也不算弱了，打下广东，扩大点影响，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危险思想。"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声音越大，越说情绪越激动。陈毅发火了，大声说："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说罢，重重地拍

了几下桌子。

毛泽东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他极力控制自己，慢慢地重新躺在床上。顿了一会，毛泽东冷静而又坚决地说："你们要打，你们去吧，我不去。"

陈毅看着毛泽东坚毅的神情，知道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说："那好吧，我们先去打广东，等取胜回来再与你细谈。"

毛泽东点了点头。陈毅转身走了。

陈毅一走，毛泽东难过极了。在病痛中，他认真地研究着四军进攻广东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耐着性子艰难地等待着各种消息。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陈毅又突然出现在毛泽东面前。陈毅抓住毛泽东的手，内疚地说："毛委员，我们真不该不听你的劝告。"

毛泽东看见战友诚挚的表情，知道事情终于有了结局，忙急切地问："我们的队伍现在在哪里，损失有多少？"

"我们部队到达广东时，粤桂军阀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在东江遇到了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派出三个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红军损失大约有一个团。战斗失利后，四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逃兵现象严重，现在部队正往闽西开来，"陈毅喝了口水接着说，"出击广东前，我先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说到这里，陈毅站起来，以极其诚恳的语调说："朱德和我都希望你早些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我现在是来接你的。"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一番肺腑之言，顿觉大病好了一半。他感激中央对自己的信任，更感激战友对自己的坦诚。

通过这次艰难的等待，换得了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友谊和信任，他们互相依附，互相支持，忠贞不谕，在以后的战斗年月中，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

1930年6月：毛泽东有过一次巧妙的"等待"。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1930年4月3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发出指令。命令红四军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大主力红军，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作好攻打城市的准备。尔后，李立三又接连向四军发出指令，要他们立即放弃闽、粤、赣根据地，向长江流域推进。

在李立三三番五次的指令面前，朱德、陈毅等深感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知道不执行李立三的命令将意味着什么。不过此时，他俩都还能沉住气，不时地注视着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经过深思后劝导朱德、陈毅，不能盲从中央的指令，要坚持下来搞好根据地的建设，思想上不能动摇。

没过几天，李立三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批评毛泽东固守根据地建设的"极端错误的思想"。尔后，又用专信指责毛泽东、朱德等"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完全是一种"农民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他们接到信后，"应当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来信并特别指出："如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李立三这样强硬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指令面前，憨厚的朱德不禁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起来。一天，他提醒毛泽东说："我们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

听朱德这一问，毛泽东心里不觉一惊。看来，红军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受不了压力了。如果朱德的思想一动摇，将会影响整个部队。想罢，便对朱德说："中央要我们打南昌、进九江、攻武汉，凭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据悉，目前我党在武汉还只有两百个党员，赤色工会也只有一百五十个会员，而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就有十个现代化师。南昌、九江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去打那是鸡蛋碰石头。因此，我们要坚定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坚持，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但是，中央这样一再催促我们，如仍我行我素，恐怕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朱德回答说。

看来再行劝导已无济于事，朱德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只好跟着打吧。毛泽东想了想说："也好。不过我们不能直奔南昌、九江，要一路打过去。我们的目的不在攻取南昌，而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扩大政治影响。

朱德微笑地点了点头。

次日，红四军发布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在向南昌推进的途中，红四军一路歼敌，一路发动地方武装，先攻占樟树，后又西渡赣江，攻占高安，然后又折回南昌附近，拉开攻打南昌的架势，实际并没有攻打南昌，而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牛行车站鸣枪示威。耳闻阵阵枪声，毛泽东诙谐地对朱德说："我们此举一为纪念3年前八一南昌起来的勇士们，二为表示我们执行了攻打南昌的命令。"说完，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佯攻南昌之后，红四军又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在向长沙开进途中，毛泽东、朱德等瞅准时机在浏阳文家市歼敌一个旅，尔后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红一方面军组成后，革命力量大大加强了。此时，全军上下攻打长沙的呼声很高。毛泽东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对长沙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当时长沙城内几乎没有我党的组织，"全长沙仅八个失败情绪很深的党员"。这时红一方面军虽然有3万余人，仍然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不宜硬攻这个已有坚固设防的长沙城。但是，毛泽

东的意见还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无奈，他又只好继续跟着大家打。

当攻击长沙的命令发布以后，毛泽东再一次建议进攻长沙之前先扫清长沙附近之敌。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因此，红一方面军首先在枫树河、新桥、龙头铺等地大量歼敌，广大指战员情绪更加高昂，歼灭长沙之敌更加急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防止盲目蛮干情绪的滋长，又劝导大家必须采取把敌人引出长沙城歼灭的办法。红军等了几天，守城之敌无动于衷，一部分人又急于吵着要总攻长沙城，毛泽东耐心说服指战员要有耐性等待。后来，终于引出敌人的一个师，取得了全歼该师的巨大胜利。后来敌军再不敢越雷池一步，全军强攻长沙的请战情绪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签署了《强攻长沙的命令》。

强攻长沙的战斗开始了。红军战士象猛虎一样向敌人冲去，大批的战士撞在敌人的电网上倒下去；有的战士裹着棉被、推着禾桶往前冲，在敌军密集的弹雨下，红军战士倒下一片。看着这些无私无畏的战士们毫不顾惜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消耗敌人的枪弹而倒下，毛泽东的眼角溢出了痛苦的泪水：多好的战士啊，害死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等待不能持续下去，毛泽东坚决主张撤围长沙。

红一军团撤出攻占长沙战斗后没有几天，李立三派来周以栗督战红一军团，要他们再度组织攻占长沙，切断敌人湖南与武汉的联络。当夜，毛泽东与周以栗促膝交谈，力主中央放弃再攻长沙的主张，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陈述不再攻占长沙的理由，要周以栗带回去。然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折回了江西，准备攻打吉安。

此后，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让自己的战士去送死。为了稳定军心，统一思想，毛泽东每一行动计划的提出，总是与攻打大城市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每一次行动之前，就预先准备好转弯子的步骤，把直接攻占城市的任务，转到在城市周围发动群众，歼灭小股敌人，巩固后方根据地建设工作上，同时，通过会议和交谈，劝导大家认清形势，坚决抵制李立三错误的冒险主张，一直到罗坊会议，全军指战员对李立三错误路线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统一的认识，毛泽东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赣南会议后至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经受了一次艰难的"等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垮台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左倾的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1月1日，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会议直接进攻毛泽东，把毛泽东的各项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反富农路线，反毫无理论基础、毫无远大前途的"狭隘经验论"，从而开始在党和军队中排挤毛泽东，以致步步削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来到瑞金。他是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这年，他只有24岁，人长得又黑又瘦，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一到瑞金，就利用他在理论上的优势，将他学到的条条框框抛出来。他认为中国党和军队必须迅速布尔什维克化，而根据地的人民应该迅速无产阶级化，对以前那种"农民习气"的、非正规化的、山沟里的东西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总之，在他看来，毛泽东的那一套消除得越早越彻底，他的这一套才能迅速及时地推广实行。

开始，他们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理由，决定让他到离瑞金城大约二十余里的东华山古庙里去休养一段时间。

毛泽东"顺从"地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山顶小庙。也不知怎么回事，人越闲，心越烦。他对于送上山来的每一份文件，每一张报纸，只字不漏地认真阅读，有时还反复看几遍。一天，当他听到红军攻打赣州不克，伤亡惨重的消息后，眉心紧锁，心情沉重。他常常在古庙前后来回踱步，并时时向山下张望着什么。

一天，项英带着警卫员急匆匆来到东华山。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就急切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周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攻打赣州的战斗。"

听完项英介绍赣州战斗的情形后，毛泽东立即冒雨下山，赶往赣州前线。到了前线，毛泽东力陈自己的主张，说明攻打赣州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攻城部队撤围赣州，转移到外线休整。

毛泽东的这次"越轨行为"，把博古等人搞火了。在事后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对于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如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让他们罢免了。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1933年初，随着临时中央的迁入，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不久，罗明被责令停职反省，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被撤了职，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来往较亲近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打击，以此进一步孤立和打击毛泽东。

1933年7月，毛泽东搬迁到瑞金沙洲坝元太屋。这是一幢地主的旧祠厅，祠厅门前有一棵百年历史的大樟树。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博古等人又把毛泽东和邓毛谢古说成是反党小集团，从路线斗争变成敌我斗争，这使毛泽东更加难以承受。他常常来到那棵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一连好几天不讲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田

野，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烟雾缭绕，思绪万千……

难道说以前的一切真的错了么?难道从实践中，从群众中总结出来的道理真不能适应革命的新形势了么？毛泽东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而根本不相信这些洋学生们所宣传的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速胜论调。可是，他现在连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怎么办呢？

毛泽东并不想就此沉沦畏缩，他决定暂时改变策略，先到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于是，他开始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和群众一道抗旱挖井；骑上马向各县乡进发，了解各级苏维埃政府建设，统计粮食数字，组织农业生产，领导大规模“查田运动”……毛泽东一回到群众之中，情绪马上活跃起来，工作十分顺手，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第一手材料，思路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坚定。

1933 年 9 月，蒋介石组织了十倍于红军的力量，采用堡垒战术，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战争一开始，毛泽东认真地注视着这些洋学生们所采取的对策。听了博古等人毫无根据地喊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的口号；看到一些红军官兵跟着起劲呐喊的激动样子，毛泽东心急如焚。

红军在博古等人的组织下，分成四路还击敌人。他们要求红军官兵英勇进击不怕牺牲，从而把一批批红军指战员推向死亡的深渊，把红军创建的根据地一寸一寸地丢给敌人。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入他们的耳中，可他们仍然高傲地在地图上标明各挺机枪火炮的位置，用电话施发出各种命令，并不时地呐喊：“坚决顶住！”“加紧修复工事！”“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看到这一切，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要把红军和根据地都葬送掉！

不久，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李德的到来，开始也使毛泽东放心了些。以为他是一个有专门军事知识的人，那些洋学生们盲目蛮干的举措将会得到纠正，反“围剿”战争有希望了。可是，当毛泽东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听到李德抛出的一套所谓“新原则”时，方知洋先生比洋学生高明不了多少。他同样主张分兵把口，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李德挂帅上阵，亲自指挥红军作战以后，红军的伤亡却越来越大，一个接一个县城落入敌手。1934 年 4 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的“永久性防线”被国民党飞机夷为平地，红军仅在一天的战斗中就伤亡一千二百余人。

广昌的失守，表明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也标志李德教条主义战术的破产。但是，厚颜无耻的李德依然亮着嗓子高喊“无敌铁军！无敌工事！组成铁壁铜墙！坚决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毛泽东气恼极了。毛泽东再一次恳劝他们必须立即改变战略，许多红军将领也对这种打法提出异议，可是得到的却是一再的压制和嘲笑。

愚蠢加傲慢是最难以对付的。毛泽东只好放弃与这些人直接交锋的努力，而是寻找一切可行之机去说服军委及各军团领导人，要求他们在执行教条主义者的命令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要他们认真学习《两个策略》、《论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籍，以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看清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李德、博古等人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实行战略转移。

看着红军大搬家似的阵容，毛泽东又一次意识到这些教条主义者身上的包袱有多重，他们的心胸是何狭窄。象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沉重的包袱拖垮。

果然不出所料，当红军到达湘江东岸时，国民党部队调动各路大军，借助湘江的天然屏障，企图把红军锁在口袋里一举围歼。面对强敌的围追，眼看着奔腾不息的湘江水，红军原有的搬家阵势立时乱了套，挑夫们挑着重担不能涉水，所有的辎重部队都乱 七八糟地堵在岸上，前面的无法渡江，后头的却源源不断往前涌来，结果人与人相挤，马与马打架，几万人的队伍，延绵几十里的辎重队，陆续堆挤在江边，谁都想赶紧过去，可是谁也无法过去。敌机在上空盘旋，不时投下一片炸弹，顿时浓烟和血肉砂石冲天而起。密集的人群，密集的炮弹，密集的死亡……

眼看这混乱的场面和惨重的死伤，这些洋先生和洋学生们手足无措，那学来的一条一款的“新原则”“新理论”也不管用了。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赶到岸边。毛泽东果断地说：“一定要把那批笨重的设备抛掉！”只见他登上一块大石头，高声下令岸上的人马疏散到林中隐蔽，喝令河里的人把身上的机器扔到河里去……半个小时后，敌机寻找不到红军的目标，一溜烟跑了。

此时，毛泽东意识到再不能继续等待下去了。从江西到广东，从广东到湖南，一路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谈论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谈论着李德鼓吹的“新原则”和“正规战术”；谈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至此，他们三人已经取得了统一的认识，在血的事实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再让这帮人胡作非为了，中国革命的路，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走！

此后，李德、博古的指挥棒不太灵了。毛泽东也毫不客气地站出来，率领红军部队艰难地渡过湘江，然后绕道贵州，进军遵义，甩开国民党部队的追击。毛泽东在危难之际更显得英明果断，全军上下的心立时向着毛泽东，在

大家的一致强烈要求下，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人们立时欢呼起来。

（作者：刘良，选自《风云七十年》）

学者蒋廷黻衔命访苏记

1934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曾去苏联访问了二个多月，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使恢复邦交不太久的中苏两国关系，获得了改善与发展。蒋廷黻作为一个学者这次赴苏不仅仅是进行一般的学术交流和参观游览，还肩负有中国最高当局蒋介石交付的特殊使命。

蒋廷黻是在中国面临联苏抗日的政治背景下访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辽阔、富饶的东北，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的安全。

面对共同敌人，中苏两国捐弃前嫌，于 1932 年末恢复了中断近五年外交关系。同时蒋介石担心改善和加强中苏关系，会妨碍他的“剿共”大业。因此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1933 年初日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热河，并派兵越过长城线，占领了冀东大片土地，直逼平津城下。日本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步步进逼，使国内（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中日战争一开，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那样中国就无法从海上接受外援。而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因此国内要求联苏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报纸明确指出：联苏就是为了抗日！

面对日益深重的国难和愈来愈高的联苏呼声，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与苏联改善关系。可是这时蒋介石不知道苏联政府对他 1927 年以来一系列反苏行动所持的态度，意识到要改善中苏关系，他本人就可能是一个障碍。于是，他授权计划访苏的学者蒋廷黻去完成这一使命。

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家、自由主义学者，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著有《清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和《中国近代史大纲》，1929 年赴北平进清华大学历史系。

“九・一八”后，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并经常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一些内政外交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经《大公报》吴鼎昌引荐，蒋廷黻于 1933 年夏和 1934 年初，两次受到蒋介石召见，当面向蒋提出不少建议。蒋廷黻计划于 1934 年暑假去欧洲访问，搜集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蒋介石得知他的这个出访计划后，7 月 27 日在庐山牯岭再次召见他，让他这次欧洲之行“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以“测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向蒋介石表示，作为一名学者，他很难担此重任。蒋介石对蒋廷黻说：我将使苏联当局明了，你是我所信赖的人。蒋廷黻遂允诺，表示当尽力而为之。

蒋廷黻于 8 月 16 日从北平启程，经山海关进入日本统治下的东北，8 月 20 日从满洲里出境进入苏联远东地区。有关苏联的情形，她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在出访前，蒋廷黻虽听到过不少的议论，可毕竟是道听途说，头脑里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看法。他曾说：“近十几年来，关于苏俄的情形，我读了不少，听了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现在，他可以亲眼目睹、亲身了解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了，从进入苏联国境到抵达莫斯科的漫长旅途中，蒋廷黻领略了苏联的辽阔领土、富饶资源和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那波光粼粼、水天相连的贝加尔湖，连绵不断、松桦相间的茂密森林，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廷黻乘坐的火车经过 6 个昼夜的颠簸，于 8 月 26 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首都工作和游览了半个月。9 月 10 日去十月革命的爆发地列宁格勒。这座位于芬兰湾畔的历史文化名城，使所到的游人流连忘返。金碧辉煌的冬宫，令人陶醉的涅瓦河夜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的高大塑像，使参观者赞叹不已。9 月 16 日，蒋廷黻离开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9 月 24 日，他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看法：“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的电报后，10 月 1 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让孔祥熙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说明蒋廷黻与蒋廷介石有“深密关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鲍格洛莫夫“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洽谈”。

10 月 8 日，鲍格洛莫夫向莫斯科报告，孔祥熙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希望苏联政府对蒋廷黻访苏给予通力协助。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向苏联外交当局交涉，希望苏联政府的外交官员与蒋廷黻会见。

苏联政府视蒋廷黻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10 月 16 日派负责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他会见，围绕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两人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关于这次谈话，苏联档案里保存了一份详细记录，笔者从俄文译成了中文。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并评估它对日后两国关系的影响，现全文引述如下：

蒋：阁下是否已获悉鲍格洛莫夫先生关于我担任蒋介石的代表，并受他委托求见的通知。

斯：我们已得知蒋教授的情况。

蒋：7月27日我动身出国前，曾应蒋介石之召至南昌。蒋嘱转达：蒋介石认为中苏两国由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或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探问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他关于两国关系的那些想法。

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还因苏联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得到平等权力、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大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迥异，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斯：有许多证据可说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或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求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我们同一系列国家包括某些个人专权的地区保持关系，后者与我国制度的差异远远超过苏中制度的差异。尽管我们同这些国家之间并没有我说过的类似我国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友情，但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仍在发展。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援举我国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为例子：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地道的法西斯统治制度，与我国制度是根本相对立的，但十年来我们仍一直与意大利保持着关系，因为意大利政府也愿意这样做，并且没有任何违背与苏联维持和平关系的计划。然而，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如果说目前的关系并不好，那仅仅是因为德国对和平、特别是对苏联的和平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蒋：我们知道苏联和许多非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譬如和土耳其、意大利和近来同法国的关系。在长期密切合作之后，非常遗憾，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关系呢？此外，大家知道，在中国当政的正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我不想回顾过去的苏中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是中国政府肇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的关系。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一点我倒可以拿我们对法国的态度为例：大家知道，不久之前法国在组织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统一战线，在这一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些事件的发生还在苏中关系发生的那些事件之后，虽然如此，目前我们仍和法国保持着最好的深厚友情。

蒋：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作的解释，请相信，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观点，我将马上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意义。

斯：我希望避免因我们今天的谈话而出现误会，请您了解，我们今天的谈话是非正式的、秘密的，事先我不知道您会向我提这些问题，所以，我自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授予的任何全权向您作正式说明，况且您本人也是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

蒋：我明白谈话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我能否认为您说的想法和原则反映了苏联的立场？

斯：我对您说的是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它反映的也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您当然可以如实地向蒋介石报告谈话内容。

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蒙您允许，我想再补充几点意见。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不能代表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族感情，不过，我们应该跨过这一阶段，并且我们大家都坚信它将不会持续太久。在最近两三年里，很多中国活动家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与苏联合作和接近苏联的政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建议没有被我们的政府采纳。但是，至于说蒋介石，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会努力开始同苏联接近。请问，据您看，这种接近在什么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还要做些什么方可使之更有成效？

斯：这是一个很重要和繁难的问题，我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才能回答，因此我暂不答复。

蒋：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也并不坚持要您立即回答。我想补充几点，或许会有利于您的回答。南京政府收到了关于中苏接近政策的建议，比如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以任何形式表明，我们两国友谊的建议带有表面的性质。蒋介石谋求的接近苏联，不是通过形式上的结盟或别的什么公开表示，他希望通过培养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方与苏联作对，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为做到这一点，要按步就班地认真做好准备，比如可以通过外交合作的途径。毫无疑义，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苏联都将是有益的。

斯：我赞同您的意见，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接近和形式上的表态。至于具体的建议，那应该认真地考虑。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我还应该再一次提请您注意我们各自的不同之处，您的谈话是以私人身份；我谈话时虽然也是以私人身份，可我并没有放弃充当我国政府的代表。

蒋：要进行这样的谈话，蒋介石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

方式，只能选择非官方的方式。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属外交部管辖，所有的问题都要与它联系，而我们的外交部有自己的政策，它收到的有悖该部现行政策的报告，往往不转给蒋介石。况且，官方途径是不允许涉及像我们今天谈话中这样提及个人问题的。我个人衷心地希望促进我们两国的接近，如果我能帮助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乐于效力。我相信，假如中苏间能重新开始认真的接触，我们今天的会谈在这当中必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这次会谈，是1932年末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蒋廷黻认为，这次会谈标志着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由此了解到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他对蒋廷黻莫斯科之行的结果甚为满意，遂立即复电"甚表嘉许"，并从1935年起，加快了联苏的步伐。

1934年11月7日，蒋廷黻作为中国驻苏使馆的客人，应邀到红场参观了十月革命节的庆典。11月10日，蒋廷黻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的使命后，乘火车离开苏联首都，途经波兰，前往德国访问。

一年后，即1935年11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又让他接替颜惠庆担任了中国驻苏联大使。

（杜华）

藏本事件与汪精卫的媚日外交

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仕途失意单身出走，日本方面借机寻衅。承担对日交涉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面对来自日方的汹汹抗议和下关江边上蜂涌而至的日本长江舰队，惊恐万状。为支持在江西"督剿"红军的蒋介石，汪精卫调动南京国民党宪警机关，全力以赴，进行持续数日的城内城外大搜寻，闹得首都内外，鸡犬不宁。直至6月13日中午，始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后寻获藏本。本文根据有关档案资料，揭示藏本失踪背景及寻获经过，读者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侵华野心和汪精卫对日交涉中的媚态。

1933年秋至1934年春，南京国民政府以"妨碍统一政令"和"讨逆"名义，先后用武力扑灭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与此同时，蒋介石向江西发起的第五次"剿共"，也因红军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得了主动的地位。急于求胜的蒋介石，为与日本保持暂时"相安"，迎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声明》的要求，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默认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占领。

就在蒋介石在江西"督剿"红军，汪精卫独挡一面，承担对日外交的时候，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因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一事，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1934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坐落在中山北路上的外交部大厦竣工。6月8日晚，外交部举行大厦落成典礼。汪精卫借机宴请各国驻华大使、公使、代办及驻京主要官员暨夫人，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长官奉命作陪。

日本驻沪公使有吉明应邀来宁出席宴会。宴罢，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人员争相陪送有吉去火车站。仕途颇不得意的副领事藏本英明，想利用陪送的机会与有吉套近乎。却因汽车坐不下而被冷落在一边。望着车上先行挤上的同僚，藏本十分沮丧，于是"坐黄包车出中山门，循中山大道来到中山陵处，即转入山径上紫金山去，到达山上，回看南京城内灯炬辉煌"，决定"即与南京告辞矣"。

6月9日上午10时，日本驻京副领事田中来到国民党外交部，口头照会藏本失踪，要求搜查。下午4时，日方向中方递交了备忘录。这就是令汪精卫心惊肉跳的藏本事件。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方面汹汹抗议"，表示"极为重视"。旋即通知"驻京军警当局严密搜查，务期明了真相"。

9日上午，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派督察长陈独真前往日本领事馆访问，力图调查了解藏本平素个性嗜好、身材、服饰及出走原因。日本方面虽未提供藏本出走真实原因，但就其出走时间，外貌特征提供了线索并交出一张藏本近照。当日，南京警厅即将藏本近照翻印多张，分向藏本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车站。在四出查访的同时，军警当局并悬巨额奖赏，以期水落石出。督察长陈独真还亲自向日领馆至阴阳营藏本寓所，及日领馆至下关一带的沿路岗警逐一查问，也未获得蛛丝马迹。

6月10日是星期天，首都军警当局破例不休息。厅长陈焯召来驻京各局队所长官研究扩大访查办法，还派专人赴藏本住所慰问家属，以示当局"竭诚关怀"。经过星期天紧张寻查，仍未发现藏本踪迹。此时，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还传出"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的消息"。

面对这种形势，汪精卫急忙召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朱培德等军事要人计议，这时才知南京城内无作战部队，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主力已全部调往江西"剿共"前线，石头城实际等于空城。汪精卫又获悉，蒋介石将定于6月13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汪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使"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搅动"，在一天中三次致电蒋介石，劝他万万不能回到南京，"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尽无益也"。并再次特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前往日本使馆面达政府重视藏本失踪之意，请求"日方持镇静态度，勿过张皇"，表示政府"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

6 月 11 日，首都警察厅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官会议，决定实行大规模户口总检查及四郊侦察。饬令各下属单位不分昼夜加紧工作，“即日寻出线索查得藏本下落”。

6 月 12 日，汪精卫为安抚日方，又派员赴上海面见日本公使有吉，再次表达对藏本失踪一事的高度重视，详细汇报了南京宪警竭力访查的情况，请求日方“务取镇静态度”。殊不知，此时日使馆已派参赞有野前往南京与日领事馆密谋对南京政府继续施加压力的对策。

这天下午，日领事馆一等秘书须磨、日本使馆参赞有野奉命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以藏本副领事行踪尚无着落，要求严饬彻查”。

自藏本失踪后，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韩文焕、警察厅督察处处长金斌，禀承上级旨意接连几天亲自参加探查工作。查访范围由市区扩展到城郊的京芜道路及沿江管辖区域。南京城里城外，形迹可疑者、面貌奇异者、似有神经病状态者都成了重点探查对象。重赏告示布满了全城要道，但直到 6 月 12 日晚仍无藏本的线索。

6 月 13 日上午 9 时，军警当局接到明孝陵陵园附近居民张某电话，称早晨有人来此要水喝，喝水后即独自缓步往紫金山上去。所叙要水人的年龄、相貌、装饰均与藏本相符。

军警方面当即派人依此线索向明孝陵山后寻觅。上午 11 时左右，在明孝陵后，发现了神情颓唐、蓬头垢面、身着西装的藏本。经查询姓名、核对照片确认是藏本无疑。

起初藏本支吾其词，欲言又止。警方当局派人请其下山登车入城，藏本坚辞不允。经来人再三诉说南京政府在其出走后，寻觅的苦衷细节，藏本才答应下山登车入城。为此警方与藏本一直磨蹭到下午 2 点。

被寻获后的藏本，由警厅人员径直带至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焯与藏本素有交往，一见面，藏本便紧握陈焯的手涕泣不已。经劝解，藏本才揩泪进食。饥不择食的藏本一口气喝下两杯牛奶，一瓶汽水。在叙述出走经过时，藏本说到“本愿送有吉公使，因汽车坐不下，所以没有送”之处，又禁不住伤心落泪。看他那种痛苦万状的神情，似有难言之隐。藏本还说，本想在紫金山紫霞湖明孝陵一带，以绝食求一死，但因饥渴难忍，不得已先后两次下山寻求食物。6 月 11 日上午，到山下一小面馆吃面时，“身上只剩一双银角，后来曾将上衣金扣解下送与面馆作代价，但面馆不受”。藏本便将金扣交与附近工友，请代购鸡蛋等，不想为人发现。

藏本被寻获后，南京国民政府如释重负。外交部、首都警备司令部、行政院、参谋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纷纷派要员到警厅探视藏本，以示关怀。

藏本对于出走原因一再表示：“我不愿说，回领馆后，亦不愿发表。”但他强调：“我一身存亡与贵国均无关系，我今重回，贵国无负于我。”当美联社记者、路透社记者向藏本采访新闻谈话时，藏本言语清楚，记忆力良好。

6 月 13 日下午 5 时左右，藏本经国民党外交部转交日本领事馆。

6 月 14 日，日领馆派须磨等人进见汪精卫诡称：“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见好转。”并掩饰说：“藏本副领事 8 日晚之出走，系一时神经衰弱，毫无其它原因。”汪精卫心领神会连称“欣慰”，并希望藏本早日恢复健康。

6 月 15 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派专人“陪同”藏本赴上海福民医院“疗养”。不准藏本接触任何宾客和来访记者。

6 月 21 日，当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将藏本的两枚金袖扣找回，并派专人送交南京日本领事馆时，藏本及其眷属，已在日警“护送”下于日前被遣往日本国内了。

（朱宝琴）

吉鸿昌被刺

1934 年 11 月 9 日晚 8 时许，天津法租界豪华的国民大饭店里正是最繁忙热闹的时刻。房客、来访者与穿着白制服的侍役们穿梭般地来来往往，乐曲声、打牌声与吆喝声响成一片。

这时，在国民饭店三楼的 45 号房间里，四五位住客正在热烈地推牌九，兴奋地谈论着。为首的那人生得异乎寻常高大、健壮，方正的面庞，炯炯有神的眼睛，宽背阔肩，满脸络腮胡子。因为他的座位靠近暖气管子，身上太热，就脱去了棉袍，只穿一件白小褂，一边漫不经心打牌，一边向伙伴们讲述着什么……

此人就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前西北军将领、察北抗日同盟军总指挥吉鸿昌。此时，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遵照上级指示，坐镇天津租界，秘密联络旧部与全国各反蒋实力派，积聚力量，重新树起抗日反蒋武装斗争大旗。现在，他正以打牌作掩护，带着前西北军将领任应岐等人作助手，与广西反蒋实力派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

吉鸿昌及其伙伴牌打了四圈，告一段落，进行搬庄换门，吉鸿昌改坐到对面的位置上。因离暖气管远了，又穿上了棉衣。广西代表刘少南改坐到吉鸿昌先前的位置上，因热，也脱掉了棉衣。恰巧他也穿的是一件白小褂。

正当吉鸿昌与伙伴们边打牌边谈论兴致最高时，突然，“砰”的一声，房门被人用脚踢开了，门口出现了两个陌生人，对他们大喝一声：“吉总指挥！”吉鸿昌还没有来得及回头，来人开枪了，子弹对准穿白小褂的广西代表刘少南打去，刘少南应声倒地身亡。因子弹发射距离很近，

力量很大，子弹穿过死者的身体，又从水泥地上蹦了回来，擦伤了吉鸿昌的身体，并打伤了任应岐的手。吉鸿昌顾不得伤痛，大吼一声，站起来就扑向门口的刺客。刺客急忙调转枪口打吉鸿昌，但被吉鸿昌先用拳打落了手枪。两个刺客见事不好，扭头就跑。吉鸿昌因身上没有武器，怕追击再遭刺客暗算，因而止步留在屋内。

这时，整个国民饭店已乱成一团。两个刺客持枪逃离45号房间后，狂奔下楼向大门逃去，同时嘴里佯呼："屋内有匪！"至饭店前门，见行人众多，两个刺客折身转由饭店侧门奔出，跑到大街上。值岗巡捕企图上前阻挡，两个刺客连放数枪，冲出包围，逃到电报局门口，扔掉手枪，混进人群，不知去向。

国民饭店的茶房在刺客逃离饭店后，来到45号房间，只见吉鸿昌坐在沙发上，鲜血正顺着膀子直淌。吉笑着对茶房说："这是找我来的！"茶房早与吉鸿昌熟识，感情很好，怕吉鸿昌留在这是非之地再次遭遇麻烦与危险，遂对吉鸿昌说："吉将军，我这儿有钥匙，你们快从太平梯口跑吧！"吉鸿昌怕连累茶房，不愿离开，经茶房再三劝说催促，他才缠好伤口忍着剧痛，与任应岐走向太平门。

但一切都已迟了，外边的警笛响成一片，法租界巡捕像蚂蚁一般布满了街心，包围了国民饭店。街上已经戒严，吉鸿昌感到自己被人监视，要逃出去不可能了。吉鸿昌当机立断，带着任应岐折回原来的房间。

几分钟后，吉鸿昌与任应岐被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

吉鸿昌遇刺并遭逮捕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国。

吉鸿昌是河南扶沟人，1895年10日18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中，6岁丧母，从小跟父亲劳动。1913年8月，吉鸿昌18岁投冯玉祥部当兵，因其身体结实，性格刚强，吃苦耐劳，智勇正直，深受冯玉祥赏识。经过历次战役，吉鸿昌由士兵历任连长、营长、团长、警务处长、旅长等职。他一直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志愿，跟着冯玉祥南征北战。吉部被称为"铁军"，吉鸿昌因在作战中勇敢无比，身先士卒，被全军称为"吉大胆"。北伐以后，吉鸿昌升为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兼任宁夏省主席。他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企图实现"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而生产"的理想。但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把他从宁夏推向了内战前线。吉鸿昌内心痛苦万分。西北军兵败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吉被任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

吉鸿昌不愿执行蒋介石要他进攻苏区红军的命令，反而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在共产党人的指导帮助下，吉鸿昌的认识与觉悟迅速提高，准备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不幸被叛徒告密，吉鸿昌被强行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抱着"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的决心，从国外回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军委，更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8月，他到湖北黄陂、宋埠策动旧部起义投奔红军，事未成，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吉鸿昌来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将领徐海东建议他："你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更大。"吉鸿昌深以为然，在这年秋天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奉中共北方党组织之命，联络冯玉祥，筹组抗日同盟军。他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1933年5月26日，在反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抗战炮火声中，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了，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6月20日，吉鸿昌出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猛攻日本侵略军，收复宝昌、多仑等失地，取得振动全国的抗日大捷。

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抱不抵抗主义，阻挠与破坏同盟军抗战，并派军队配合日军包围、进攻同盟军。10月同盟军兵败，吉鸿昌和方振武在与国民党晋军商震部谈判时，被关押。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令将他们押往北平受审。在去北平途中，方、吉二人先后脱险。吉鸿昌换便服回到天津家中。

吉鸿昌并没有被连续的失败所吓倒。他回到天津之后不久，就与共产党员宣侠父秘密前往上海，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按照组织指示，吉鸿昌回天津，与宣侠父、南汉宸广泛联络全国抗日反蒋力量，联络原西北军的同事与部下，为重建抗日武装而奔走。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把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吉鸿昌担任该组织的党组领导成员兼主任委员，宣侠父、南汉宸等人为委员，南汉宸兼秘书长。同时，吉鸿昌并与宣侠父等人创办了大同盟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杂志。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的住宅中，设立了秘密印刷所，翻印《民族战旗》和一些秘密文件，同时他将此住宅作为中共党组织的联络站，不少中共负责同志都曾到此楼中隐藏过与工作过。

按照中共党组织指示，1934年夏，吉鸿昌与宣侠父、南汉宸、李铁夫等人准备再次策动在江西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兵变返豫，与河南地方武装结合，组成抗日义勇军，尔后转到西北，与杨虎城部队会合，形成大西北抗日局面。

不幸的是，这项战略计划在实行中受到了重大挫折：1934年八九月，吉鸿昌派往江西、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南京政府逮捕，吉鸿昌在天津联络全国反蒋实力派、组织抗日反蒋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吉鸿昌进行的抗日反蒋活动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动与恐慌。蒋介石急令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迅速设法逮捕吉鸿昌等人。因吉鸿昌隐匿于天津外国租界中，国民党军队不便公开进去捉人，蒋、何指示军委会特务处戴笠，迅速派人与天津

法租界当局联络，同时要华北特区的北平站与天津站的特务，对吉鸿昌进行侦察、监视并尽快实施暗杀。

1934年秋天，天津法租界巡捕房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吉鸿昌的监视。

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在华北的特务工作，特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坐镇北平指挥，兼华北特区区长。特区下的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扩大编制，成立行动组。这时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行动组组长白式维；天津站站长原是王天木，王因事被捕，改由王子襄接任，行动组长是王文。在他们下面控制着许多行动员与情报员。南京特务本部下达"制裁吉鸿昌"的命令后，郑介民与陈恭澍专门来到天津，与王子襄、王文等人密商暗杀计划。郑介民回北平后，陈恭澍则留在天津。后来王子襄中毒死亡，整个暗杀工作便由陈恭澍统一指挥。

对特务日益加紧的监视与跟梢，吉鸿昌早就觉察到了。他以非凡的勇敢与机智，与特务们斗法。有一次，吉鸿昌到惠中饭店进行联络工作，出来时发现一个特务跟在后面，就跑过去问那特务："喂！朋友，你干嘛老跟着我呀？你每月挣多少钱呀？"吓得特务扭头就跑。为了吉鸿昌的安全，中共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但吉鸿昌因他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约见会面的广西李宗仁代表尚未到达，因此决定暂留天津不走。但吉鸿昌提高了警觉，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在取得组织同意后，将其住宅中的秘密印刷所转移走；又托其夫人的姐夫林少文出面，在法租界国民饭店二楼开了一个38号房间作为新的秘密活动地点，原来经常去的惠中饭店不去了。

但国民党特务们也更加紧了对吉鸿昌的监视与侦察。特别危险的是，他们设法用高官厚禄收买了两个正与吉鸿昌联络的旧西北军军官。这两人将要被吉鸿昌派往河南、河北一带联络旧部起义，他们不仅向陈恭澍提供了吉鸿昌的内部活动情报，而且报告了1934年11月9日下午吉将在交通旅馆与他们会见谈话的重大机密。

陈恭澍获知这一情报之后，立即决定在那时到交通旅馆对吉鸿昌实施暗杀。他指示由王文与吴萍到现场侦察，王文负责刺杀。

然而，在11月9日下午，王文等人在交通旅馆等到天快黑，也未见吉出现，只得向陈恭澍汇报。陈恭澍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时，被派去与叛徒军官联络的情报员吕一民与杨玉珊来向他报告：情况有变。机警的吉鸿昌把约会地点从交通旅馆改为国民饭店二楼38号房间。

陈恭澍等特务一方面被吉鸿昌的机警气得发抖，一面只得从交通旅馆迅速赶往国民饭店。陈先派杨玉珊与另一名男特务带一名小女孩，充作一家人，到饭店里侦察38号房间里的情况。陈叫人向杨玉珊介绍了吉鸿昌的长相与特征。指出查明此人是否在场是最重要的事。

杨玉珊三人进了国民饭店，设法在二楼30号开到一个房间。但他们很快发现：毗邻的38号房间里已是人去房空。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吉鸿昌为防万一，又临时换到三楼45号房间里去了。吉鸿昌等人一面打牌，一面与刚到达天津不久的广西代表会谈。杨玉珊从二楼侦察到三楼，终于发现45号房间里人多声杂，一打听才知道这房间里人是从二楼38号房间搬来的。杨玉珊为了弄清房间里面的情况，特别是摸准吉鸿昌在牌桌上的座位，就故意带着小女孩到走廊上拍球，然后把球从气窗打进45号房间。杨玉珊不待房间里有否反应，一下推门而进，假装寻球，乘机侦察了房间里的情况，发现吉鸿昌穿着白小褂，坐在暖气管旁。

杨玉珊不动声色的侦察没有引起45号房间里吉鸿昌等人的注意。吉鸿昌等人继续打牌，而杨玉珊却迅速到国民饭店外与陈恭澍联系，报告了侦察情况。王文立即带着手枪进入饭店，由陈国瑞带到三楼45号房间门口。陈国瑞先是轻轻地转动门球，门球纹丝不动，原来门已被里面关上了。陈就后退半步，抬起右脚，用力一踢，把门踢开。王文乘势窜进房间，故意高喊一声："吉总指挥！"只见靠近暖气管旁一位穿白小褂的人猛地抬头，王文立即举枪打去，一连三枪，枪枪击中要害。王文以为吉鸿昌被击中，必死无疑，就迅速与陈国瑞狂奔逃去。

出乎陈恭澍与王文等人的意料，第二天天津各报登载，在国民饭店被王文打死的，是一位叫刘少南的人，而吉鸿昌仅负轻伤，被法租界巡捕房送往天主教堂医院医治。

国民党特务们对吉鸿昌的暗杀失败了。于是，由国民党军政当局下令对吉鸿昌实施公开逮捕。他们与法租界串通勾结，于11月14日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又转押到五十军军部。11月22日由重兵秘密押解北平军分会，受"军法会审"。吉鸿昌态度倔强，骂不绝口。11月24日他被押上刑场，刑场上，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悲壮感人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历史考证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究竟突破国民党军几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突破的国民党军封锁线，目前党史、军史的统一提法是四道。从赣州沿桃江向南经信丰境内的古陂、新田、安西到安远为第一道封锁线；沿湘赣边界的汝城到仁化至曲江为第二首封锁线；沿衡阳、耒阳、郴县、宜章、乐昌至曲江公路碉堡为第三道封锁线；沿湘江经衡阳至桂林为第四道封锁线。

据查有关资料，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的提法，比较早见诸于文字的是红军时期的《红星报》。1934 年 11 月 11 日，该报第 3 期《我们的胜利》一文中提到红军"突破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14 日，该报第 4 期《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一文中又说："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第一条是广东敌人古陂、新田（信丰境）的封锁线。第二条是湖南广东敌人的汝城、城口（仁化境）的封锁线。第三条是湖南敌人的宜章、郴州的封锁线。"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红军占领宜章逼近郴州突破了湖南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的捷报。25 日，该报第 5 期《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提到了要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文中说，红军已"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必须有坚决果敢的战斗动作在运动战中消灭大量的敌人，并突破敌人的最后封锁线，完成在我们肩上的光荣任务。"1935 年，陈云同志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中，他具体地记载了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经过。1936 年，中共中央开始收集红军长征的资料，并编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文中采用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的提法。此后一直沿用下来。

据查当时国民党军碉堡封锁计划和实际构筑的有关情况资料，似乎这四道封锁线的提法不够确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开始就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苏区周围修筑层层碉堡封锁线，把东西方向碉堡封锁线称为横线，把南北方向碉堡封锁线称为纵线。1934 年初，国民党军北路军在主攻方向正面，完成东起福建南平经宜黄、乐安、永丰、吉水西至吉安的横向碉堡封锁线后，蒋介石提出"宁可迫使东窜，不可纵其西窜"之原则，并详定了封锁计划。2 月，蒋介石令西、南两路军"就赣江天险，于其西岸，构筑墙壁式碉堡"，并把这称为第一道封锁线。"就万安、遂川、大汾构筑横线碉堡；大汾、桂东、汝城、仁化、曲江构筑纵线碉堡线"，把这称为第二道封锁线。不久，将介石又令湖南、广西两省政府"就湘漓两江，构筑南北连贯之碉堡封锁线"，这实际上是第三道封锁线。国民党军构筑的这三道封锁线，目的是堵截红军西进。蒋介石的作战命令也是这样记载的。1934 年 10 月 20 日，他给何键的电令中说："我军方针，首先巩固赣、信、安、寻第一纵线，务期聚歼该匪于此线以东地区。至第二、第三各纵线，无非用作补助"。11 月 14 日，中央红军超过郴宜公路后，蒋介石给何键的电令中又说："现在匪已穿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

从上可以看出，关于封锁线的提法，我们与国民党军有两点差异：一是三道与四道之差；二是我们说的第四道封锁线，而是国民党军所称的第三道封锁线。我们说多出来的一条是宜章、郴州公路封锁线。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从国民党军事档案中看，实际有五道封锁线。1934 年 9 月，红六军团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之命，先行突破国民党军的纵横碉堡线，渡过湘江。蒋介石大为恼火，电令何键巩固并增筑碉堡封锁线，"兹特定两项原则如下：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线）；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属于甲项者：1. 由赣江两岸沿线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纵线；2. 由萍乡、莲花、大汾、桂东、汝城、仁化到曲江之第二纵线；3. 由万安、遂川至大汾之第一横线；……。属乙项者：1. 以湘水由衡阳至桂林为第三纵线；2. 由莲花、茶陵、安仁至衡阳为第二横线……。3. 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大庾、南雄之公路线及衡、来、郴、宜、乐昌、曲江之公路线分别筑护路堡以维南北交通，而便利运输。"从这份电令可以看出，除沿赣江至信中、安远的第一道封锁线，由大汾、桂东、汝城、仁化至曲江的第二道封锁线，沿湘水经衡阳至桂林的条约三道封锁线外，又沿遂川、赣县、南雄公路及郴宜公路增修了两条碉堡线，共计为五道封锁线。其中郴宜公路碉堡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道封锁线。这样，就多出沿遂川、赣县、南雄公路碉堡线。敌在赣雄公路碉堡线上驻有粤军第四师的部队，在郴宜公路碉堡线上驻有湖南保安部队两个团。因此，应该说，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五道封锁线。

长期以来，我们为什么说只突破了敌四道封锁线呢？笔者认为，由于赣雄公路封锁线与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县交叉处分开的，并在红军西进的线路上仅相距 100 里左右，在靠近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带，敌碉堡线相对密集是很

显然的。中央红军野战部队在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后，为保障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能顺利通过，前卫部队至少要比中央纵队前出二至三天的路程。这样，中央红军就必然连续突破敌第二道赣雄公路封锁线。加之这两道封锁线都是由粤军防守的，因而很容易把赣雄公路封锁线看成是敌第一道封锁线的纵深防御地带。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是这样记载的："红军分两路渡过信丰河后（一路由信丰北之王母渡，一路击退信丰东南之古陂、新田粤军），即在南康、大庾两县之间渡过章水，突过赣州、南雄之汽车路。在古陂、新田及赣雄汽车路上，粤军本筑有碉堡，并有守军。但寡不敌众，闻风逃逸。由此国民党军年来包围赣省红军之第一道碉堡线，全被冲破。"这里明确说有古陂、新田和赣雄公路两条碉堡线，而赣雄公路碉堡线作为古陂、新田碉堡线的纵深，并和它一起构成包围中央苏区的第一道封锁线。我们从蒋介石给何键的电令中看出，赣雄公路碉堡线并不是对第一纵线的补充，而是增筑的一条新碉堡线。另外，1934年11月，国民党军绘制的《西路军堵剿赣东南主匪西窜经过要图》上，也标明了这五道封锁线和中央红军突破各道封锁线的位置、时间。

综上所述，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五道碉堡封锁线更为准确些。

（选自《军史资料》，作者：金新果）

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为时一年的长征。在那艰苦卓绝的年月里，曾有35名女红军指战员凭着巨大的毅力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踏遍了从江西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的战斗征程。现确知姓名的有30位，她们的简况如下：

李伯钊 （1911—1985）四川重庆人，红军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杂志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总政治部干事等职。

邓颖超 （1904— ）河南光山县人，长征时任中央局委秘书长。

邓六金 （1911— ）福建上杭县人，曾任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战士。

谢　飞 （1913— ）广东海南岛文昌人，长征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担任机要员。

谢小梅 （1913— ）福建友岩人，长征时任红军卫生部直属野战医院连政治干事。

危秀英 （1910— ）江西瑞金人，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

危拱之 （1903—1973）河南信阳人，长征时是中央工作团成员。

吴富莲 （1912—1937）福建上杭人，长征时在卫生工作团野战医院任干事，后来牺牲在河西走廊。

吴仲廉 （1908—1967）长征时任一方面军总部女子义勇军指导员。

刘　英 （1905— ）湖南长沙人，长征时任二纵队巡视员、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等职。

刘群先 （1907—1940）江苏无锡人，曾任工人联合会组织部长。

刘彩霞 （1915—1940）江西赣县人，曾任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

李坚真 （1907— ）广东丰顺人，长征中任第二纵队民运科科长、干部休养连指导员。

李桂英 （1911— ）江西寻乌人，长征时任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

贺子珍 （1910—1984）江西永新县人，毛泽东的秘书。

蔡　畅 （1900—1990）湖南湘乡人，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

康克清 （1912— ）江西万安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

李建华 （1915— ）江西高安县人，长征时任军委第二局报务员。

钱希均 （1905— ）浙江诸暨人，长征时任政治保卫局检察员。

金维映 （1904—1941）浙江岱山人，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兼秘书。

陈慧清 （1909—1983）广东番禺人，中共工作团成员。

廖似光 （1911— ）广东惠阳人，红军供给部党支部书记。

丘一涵 （1907—1956）湖南平江人，长征时在红三军团卫生部任党总支书记。

王泉媛 （1913— ）江西吉安人，长征时在红军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

钟月琳 （1915— ）江西于都人，红军时期曾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

周越华 （1904—1977）湖北广济人，长征时在卫生部工作。

甘世英 （？—1971）四川南溪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

肖月华 （1913—1983）广东大埔县人，当时在干部休养连工作。

曾　玉 （？—1941）湖南宜宾人。

杨厚珍　(1908—1977)江西瑞金人,曾任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

(《党史纵横》92年2期,作者:张艳林)

红军长征中的会师

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在这一年多时间内,红军几经聚散分离,主力红军会师就有七次。

最早的一次会师

广昌战役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内线作战决定性胜利已不可能了。为此,1934年7月7日,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军的七军团共约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的率领下,奉命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自江西瑞金出发,向闽浙赣方面长征。10月21日,红色七军团奉命率主力3000余人冲破敌人的围攻,转移到江西德兴县重溪镇,三天后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新红十军在此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于11月4日奉命整编部队,组建成红十军团,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继续北上抗日宣传活动。但因偏师深入,孤立无援,1935年1月在婺源地区失败了。七军团与红十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会师。

第二次会师

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一方面军西征的先遣队,向湖南方向突围西征,与驻扎在偏僻的黔、湘、桂、川一带的贺龙第二军团会师。8月7日,任弼时等奉命率领六军团主力部队(红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共9758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新江口地区突围,开始长征。红六军团3000余人经过艰苦奋战,跳出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村,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与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三军(时以红二军团番号)会师。这就是历史上的红二·六军团七、八千人在四川酉阳的南腰界举行隆重的会师大会,会师后,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统一二、六军团的指挥,转移到湘西地区,开辟了湘鄂川豫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会师

1934年10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共36个团和两个中央军委纵队)连同中央机关人员共86859人,自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一带突围,开始长征。12月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人员损失过半,锐减到不足4万人。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说服,中央决定放弃继续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前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此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引下,红军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天险,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海拔4000米的夹金山。6月13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夹金山下懋功县达维村胜利会师。14日,一、四方面军约4万人在懋功西河口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宣告: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两大主力会师后,兵力达10万余人,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次会师

1934年11月16日,以程子华为军团长的红二十五军(下辖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共2980余人,奉命高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了鄂豫陕皖根据地,从河南省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创建豫陕鄂根据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消息传到后,红二十五军决定西征北上,与红二十六军配合,争取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4000人从子午镇出发,向甘肃挺进,9月9日抵永宁山。陕甘政府和红军的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前往迎接。9月18日,红二十五军3400多人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建成红十五军团,共7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扫清道路,建立落脚点。

第五次会师

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县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主张北上抗日,力排张国焘阻挠北上阴谋;红一方面军翻越四座终年积雪的雪山,通过400里荒无人烟的草地,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抵达甘泉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热烈欢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到来。

第六次会师

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主力17000余人，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率领下自湖南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在湘中、湘黔边、滇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3月30日，张国焘和朱德联名电令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4月，二、六军团分两路北上：六军团为右路，6月6日，先头部队第十六师与前来接应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先头部队，在川西理化以南六甲洼胜利会师；二军团为左路，6月30日进抵甘孜以西绒坝岔与四方面军三十军第八十八师胜利会师。7月2日，二、六军团同红军总令部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奉命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共14000余人。

三大主力的会师

1936年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举行联席会议，否定张国焘南下退却的错误主张，决定两个方面军分三路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分为：朱德为左纵队、徐向前为中央纵队、董振堂为右纵队，分路向甘南挺进；二方面军分成两个梯队，沿左纵队行进路线前进。9月，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率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举行西征，攻占会宁，以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进，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师抵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次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一方面军的热烈欢迎。10月10日，二方面军进抵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举行盛大的会师联欢大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联名发出贺电，热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选自《党史月刊》92年4期，作者：蓝振露）

张学良怎样转向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一直背着"张不抗"的黑锅。他代蒋介石受过，有苦难言。待山海关、热河相继失陷于日军之手后，张学良虽仍遭舆论谴责，但此时国人已逐渐看出了蒋介石的面目，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了蒋介石。蒋介石为了转移国人视线，仍然抓住张学良不放。

1933年3月8日，处在万般痛苦之中的张学良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辞职，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于是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见面后，蒋介石不等张学良开口，便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甚至于想好了让张学良以出洋养病为名，离开东北军，并为其办好了出洋手续。张学良满以为蒋介石会挽留他，并补充给东北军充足的粮饷、弹械，以便让他领兵夺回山海关，进攻热河，打回东北老家去。岂料蒋介石竟如此无情无义。张学良满肚子委曲对部下说："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在心灰意冷之际，张学良于1933年3月11号通电下野，并于4月11号出洋，5月12号抵意大利。

张学良以意大利为主要旅居点，同时游历了英、法、德、瑞士等国，历时八个月。这期间，蒋介石曾想方设法以阴谋手段瓦解东北军，但因为受到东北军各将领的抵制而未得逞。于是蒋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让东北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便双方相互火并，两败俱伤。这是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一贯采用的办法。所以他命令张学良尽快回国担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在宋子文去英国参加世界经济会议期间，蒋介石让宋子文到意大利，把此决定告知张学良。宋子文与张学良的私交一向甚密，当宋子文向张学良说明来意后，张学良并未即刻答应，只说待考虑后再做定夺，并说目前没有回国的打算。

1934年1月8号，张学良终于由意大利乘康特凡弟号邮轮返国。这天下午，康特凡弟号邮轮停泊在上海和祥码头，张学良一行人登岸则在上海外滩的太古码头。蒋介石特下令热烈欢迎张学良回国。蒋介石的代表蒋伯城，宋子文的代表黄纯道，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亲往迎接。张学良一行于4点45分抵达上海莫利哀路5号寓所休息，5点钟，宋子文便来拜访。1月10号下午，张学良宴请东北军旧僚属。后并派代表米春霖等人慰问东北将士的亲属。

张学良曾对记者谈到旅欧八个月的感想，他说："出国游踪所及意、瑞、德、英、法，……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怨，否则惟有亡国。"在谈到回国原因时，张学良说："至于本人回国原因，一则倦鸟归林，二则料理个人家庭私事，三则急于与政府商量根本之救济东北难民及失业者之办法。至于是否做事，则本人系军人，惟有服从命令。国家如有用我地方，自度力能胜任，决不敢偷闲，不能胜任，则不敢一误再误。维持和平、促进和平乃始终不变之态度。如志不

得行，拟再出国调查研究。"

张学良本人是带着委曲和对蒋介石的成见出洋的。但他回国后，却呼吁拥护领袖，对于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也是拥护的。在他就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之后，召集了在北平的东北救国会的几个重要人物王卓然、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阎宝航、杜超直等与在武昌"剿总"的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和蒋介石方面的丁炳权等组织了"四维学会"，这个学会就是模仿蒋介石的复兴社并与复兴社有联系的组织。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拥护领袖、拥护领袖提出的政策。张学良所以有这种思想，首先是因为受中国封建传统道德思想主要是忠君思想的影响。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就曾针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说张学良中《连环套》的毒太深了。二是因为张学良在旅居西欧期间，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其中包括法西斯思想(对领袖盲目、狂热崇拜等)。所以尽管张学良是带着对蒋介石的成见而出洋的，但回国后却希望各派政治势力"泯除恩怨"，拥护蒋介石的领导。

然而，张学良的思想又有其矛盾的一面。他虽然主张"拥护领袖"，却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不满，所以他在谈旅欧感想时又说，领袖"俾得放手做事，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因此张学良在处理一些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与蒋介石背道而驰了。譬如他起用一些开明进步人士在他手下工作，还保护了一些进步人士免遭蒋介石、国民党的迫害。

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张也有不小的影响。自游历欧洲回国后，他变得比较乐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了。当他手下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人向他阐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时，他觉得言之有理。正因为如此，1934年6月，在与英文汉口《民声报》记者谈话时，张学良呼吁停止内战和统一对日作战，他说："每一个中国人苟对其国家尚有些许之人心与敬爱，苟能看出当前民族危机之严重，均应在郑重放弃一切自私之念头，而为国家鞠尽其天职，凡属中国人民，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拯救中国者，均应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此乃救国唯一途径。"上述主张在张学良的思想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他从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主张"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的抗日政策。

(连若雪)

风云人物

程子华

程子华(1905～)山西解县(今属运城)。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1927年在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底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坚持海丰、陆丰地区革命斗争。1928年9月到国民党第二军南路军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冬在湖北大冶领导发动国民党军第十五旅一部兵暴成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五纵队，任第二支队支队长。1931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三十五军三〇七团团长、红军独立第三师七团团长、独立第三师师长。1931年12月调到红五军团十四军，先后任第四十师政治委员，第四十一师政治委员、师长。1933年6月部队整编，成立红五军团十四师，任师长。同年冬入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春任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9月奉命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传达中革军委指示；11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同吴焕先、徐海东率部长征，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指挥部队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辟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继又率部向陕北进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9月初改任军政治委员、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9月中旬与陕北红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任政治委员。随后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同年11月同中央红军会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和东征、西征战役及在山城堡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中共冀中军区党委书记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并参与指挥塔山阻击战。不久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平津战役，曾任北平警备司令员。1949年夏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参与指挥解放鄂西、湘西和衡(阳)宝(庆)战役。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主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寻淮洲

寻淮洲(1912～1934)湖南浏阳人。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小学毕业后到下湖小学当教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同年秋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上井冈山,任代理排长。1928年5月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连长。参加创建井山革命根据地斗争。1929年春任红四军三纵队支队长,参加转战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成立红一军团,率队编为红十二军一纵队一支队,任支队长。10月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团长。1931年5月任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春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率部参加漳州战役。同年夏所部改称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任师长。10月任红一方面军二十一军军长。1933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率部队插入敌后,箝制国民党军数师兵力,保证主力歼敌,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嘉奖。不久调任红三军团七军军长。6月部队缩编为红三军团五师,任师长。同年10月任红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7月红七军团被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总指挥。与乐少华等率部转战闽浙赣皖,奔袭樟湖板,攻占罗源城,作战数十次,扩大了抗日宣传,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荣获二等红星奖章。是红军年轻的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1月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新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任第十九师师长,继续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同年12月中旬在安徽太平潭家桥战斗中身负重伤。12月14日不幸牺牲。

夏曦

夏曦(1901—1936),字蔓伯(也作蔓白),化名劳侠。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1915年,考入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堂,在校两年。1917年8月,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入第十六班,1922年毕业。1919年5月,在长沙参加五四运动;同年下半年,加入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后又参加了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1920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曦是早期的团员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春,回到湖南后,在一师组织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全校同学加入者至二百人"。同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他和李维汉等担任教员。

夏曦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青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夏曦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团中央驻湘委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从1922年冬到1923年,他还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是由青年团直接主持的团体)干事部主任,并主编学联的机关刊物《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1923年3月,他还作为湖南学联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总会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在上海期间,加入国民党,开始从事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

1924年,夏曦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参加领导湖南的革命运动。1924年1月,他和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等六人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代表,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湖南,参加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在党内,则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书记。1926年1月,夏曦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和毛泽东等一起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仍回湖南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湖南省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夏曦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返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马日事变前夕,他不敢组织力量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击,并离开湖南到了武汉。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8日,中共中央曾决定成立湘南特委,并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夏曦、郭亮等为委员,要他们组织湘南暴动,配合南昌起义。但当时夏曦、郭亮均在南昌起义部队中,无法受命。南昌起义失败后,夏曦到达上海,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不久赴苏联学习。1928年6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大会设立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湖南问题委员会和南昌暴动委员会的工作。

夏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期间,曾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开始时,他还和王明等人作过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31年3月,夏曦被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军长贺龙);此外,还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西分会委员、中共红三军前委委员、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等职。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前段，他对反“围剿”作战，对建设工农政权，对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作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的发展，他推行得更加积极。在军事上，只准打大城市，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在根据地的建设上，实行消灭富农的过左政策；在党内、军内，把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优秀干部，如原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等，给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32 年 10 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再加夏曦的错误领导，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

从 1932 年 7 月到 1934 年 10 月的两年间，在与党中央失去电讯联络的情况下，夏曦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在豫、陕、川、鄂、黔等省进行艰苦的流动游击，独立地坚持革命斗争，红三军虽遭到严重损失，只剩下三、四千人，但却保存了骨干力量。1934 年 6 月，红三军攻占贵州沿河县，建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夏曦、贺龙、关向应等均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使红三军又重新走向新的发展时期。

1934 年 10 月，任弼时、王震、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地区，和夏曦、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他也承认犯了严重错误。但在组织处理上，却撤销了夏曦的全部领导职务，并分配他做地方工作。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 1935 年 3 月 31 日给红军二、六军团的领导发来指示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委员、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主任和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湘鄂川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 1931 年 11 月和 1934 年 1 月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夏曦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 年 11 月，夏曦随红军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 年 2 月，在到达贵州毕节地区时，有几股土匪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向我军投诚，被收编为红军。后来其中一股(席大明部)又叛变投敌。夏曦不顾个人安危，带着两个警卫员准备前去做争取工作。但叛军竟向夏曦开枪射击。他和警卫员在后撤时泅水过河，不幸淹死。红六军团抬着他的遗体走了两天后，把他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处的七星关。

吉 鸿 昌

吉鸿昌(1895—1934)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六岁丧母，当过首饰店和杂货铺的学徒。1913 年 8 月，参加冯玉祥的军队。1924 年，冯玉祥部队改编为国民军，任营长，后升团长、旅长。1926 年 9 月，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于绥远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参加国民革命军，吉任第十九师师长。1927 年 5 月，率部出潼关，27 日攻克洛阳，占领巩县，随即渡过黄河，消灭奉系万福麟部，攻克新乡，战功卓著。不久升任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30 年，冯玉祥反蒋失败，吉鸿昌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同年冬，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二十二路军被调去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托病离开驻地前往上海，与中共中央的同志取得联系。后化装小贩入鄂豫皖根据地考察，耳闻目睹使他深受教育，他曾计划率部起义，但因国民党的监视和破坏，未能实现。不久，蒋介石解除他的军职，并逼他出国“考察实业”。这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他电告蒋介石，要求去东北抗日，遭到拒绝。出国后，从美至欧，到处宣传抗日主张。其间数次要求前往苏联参观，都因国民党的反对未能实现。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海外，他摆脱了特务的监视，乘船回国。1932 年 2 月，回到上海，后去天津，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8 月前往湖北的宋埠，策动旧部起义投奔鄂豫皖根据地，未果。是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 年春，日军侵占了热河全省，并分后侵入冀察。吉组织旧部，于 5 月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6 月，同盟军北上抗击日伪军，收复了康保、宝昌、沽原诸城，7 月收复多伦。他率部在长城内外苦战数月，10 月部队在顺义牛栏山一带，陷入日、伪、蒋军的重围。10 月 16 日，应国民党和北平慈善团体代表的邀请，和方振武到国民党军驻地进行谈判，随即失去自由。后在被押往北平途中脱险，潜回天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统一战线活动，担任“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主任委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广泛联络各界人士进行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

1934 年 11 月 9 日，在天津法租界被捕。24 在北平英勇就义。赴刑场时，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悲壮诗篇。

材料一　我是中国人

一九三一年秋，我父亲吉鸿昌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

指挥的时候，曾被迫出国作了一次考察。出国之前，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为了阻挠父亲的抗日活动，立逼他"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而实际上是夺去了父亲的军权，将他流放国外。

父亲来到美国纽约，一次，他穿着整齐的军装，率领一行从属人员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父亲叫翻译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不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

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送东西，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明知故问地说："你是哪国人? 我父亲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接连受到这样的嘲笑和侮辱，使父亲异常气愤，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当我母亲和属下劝慰他的时候，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来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他坚决地表示："下次外出时，就带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让外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振兴起来的!"

果然，他用草板纸自制了一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书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当他挂着牌子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引起很多人的注目，但父亲总是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骄傲。

(选自《纵横》83年1期，作者：吉瑞芝)

材料二　我为抗日死，死也不倒下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和任应歧被国民党刽子手押上了刑场。

任庆歧被排在吉鸿昌后边受刑，他见吉鸿昌就要就义，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对吉鸿昌哭道："我死了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了，国家正用得着你。"吉鸿昌皱皱眉头，制止任应歧说："你这是干什么? 别让他们小看了咱们!"说罢，抽过身来，骂那几个行刑的特务："你们这不是故意为难他吗? 这样吧，让他先走一步，我送送他。"任应歧随即擦干泪水，昂首挺胸向前走去。罪恶的枪声响了，任庆歧壮烈牺牲。

吉鸿昌送别战友，朝特务招招手，昂然说道："这样死不行!告诉你们，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你说怎么办?"特务们早已战战兢兢了。

"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吉鸿昌命令道。

椅子搬来了。吉鸿昌又说："还不行!"他把那个拿枪的特务叫到面前，对他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那你说怎么办?"刽子手没见过这样的硬汉，有点怕。

"你就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吉鸿昌说罢，望了望刚才在地上写的一首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然后，他抬起头来，瞪着两只大眼，横眉怒视着刽子手，用尽气力，高声呼喊道：

"抗日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凛凛宏音化为利剑响彻长空。

史　量　才

史量才，名家修，1880年1月2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上海青浦县泗泾镇。其父史春帆是个商人。1899年，史量才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以后他放弃了科举致仕的道路，开始研究日文及理化等近代科学。1901年秋，他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上海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即苏州女子蚕桑学校前身)。1907年，他积极参与江、浙两省绅商的拒款保路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史量才在上海与陈其美、章梓等人结识，乘机多方联络，因而于民国初年，被委任主办沪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

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以特殊的机缘盘进《申报》，以后遂将一生主要精力经营报馆。《申报》是在中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原为英人美查(E. Major)所办，后美查返国，由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接办，即逐步变成华商企业，但仍用外人名义发行。到史量才接办后，《申报》才真正成为中国报纸。史接办后，初任席子佩为经理，继又将席挤走，改任张竹平为经理，自任总经理，悉心经营，销路日增，1912年销七千份，1917年销二万份，其后仍逐年上升。其间还先后增出多种专栏、专刊，成为国内著名的大报。

1929年，史量才从美商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手里购进《新闻报》的大部股权，从而，他成了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申报》在史量才的经营下，规模不断扩大，1932年4

月，《申报》销数已达十五万份。同年7月，创办了《申报月刊》，1933年开始编印《申报年鉴》。同时期，还陆续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及申报流通图书馆。1934年，出版了翁文灏等绘制的中国新地图。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史量才凭借他在新闻界的地位，扩展其社会活动。1921年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发起民生纱厂；又曾帮助项松茂扩大五洲药房；协助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特别是中南银行的成立，使史成为金融界有力分子，而《申报》也有了经济后台。

《申报》从史量才接办以来，其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保守的。但为销路着眼，又以"民众喉舌"相标榜，对时政亦偶有批评。袁世凯搞帝制活动时，《申报》等上海报纸持批判态度；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申报》政评甚少；蒋介石统治初期，《申报》采取了拥蒋的立场。

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政治态度逐步地有了变化。当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时，他曾捐巨款支援抗战，因而被推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的会长。同时，《申报》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所批评。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史量才及其《申报》，曾给史各种荣誉职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及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但这并未改变史量才及《申报》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倾向。相反，随着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日益丧失人心，《申报》对它的批评也愈趋激烈。《申报》从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1932年12月，宋庆龄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史量才积极支持了该同盟的活动。他代觅通讯社发表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并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尖锐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登载有关民权保障同盟的代电和报导。这时期，史量才还聘请了一些爱国和进步的人士参加《申报》馆工作，如用李公朴主持业余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以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同时还经常刊登陶行知、胡愈之、茅盾等人的文章和作品。从1933年1月至1934年5月，鲁迅先生用各种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

1932年，《申报》曾连续发表短评，抨击国民党的军事"剿共"政策，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严重不安和仇视。与此同时，《申报》报导关于"中大学潮"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情况，蒋介石遂下令对《申报》禁止邮递。后来，蒋介石得到其特务机关关于史量才的种种"告发"材料，终于下令要戴笠亲自部署暗杀史量才。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携眷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下午乘汽车由杭州返上海，途经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为蒋介石特务狙击遇害。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张君劢

张君劢，原名嘉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省宝山县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是江浙财团首要人物，曾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

张君劢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报，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考取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斥退。自后，在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劢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相勾结，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1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10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张嘉璈等所组织的"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之后，张君劢作为民主党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是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张君劢致函国内报界，极力主张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实行镇压，并号召其党徒（时民主党已合并为进步党）为此"舍身自效"。直到1915年，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活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他这才追随梁启超等人作反袁的表示。是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后即专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投靠段祺瑞，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又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劢又跑到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

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求教。自此，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劢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深入的传播，引起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极端恐惧。张君劢伙同梁启超公开反对科学，反对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2月，张跑到清华学校作所谓“人生观”问题的讲演，大肆贩卖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宣扬“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混战，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张被称为“玄学鬼”。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溜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列举一些革命新气象，为自己播身应变作准备。次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以“世界室主人”为笔名，刊行《苏俄评论》一书。又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撰写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之解剖》等反苏反共文章。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于1929年6月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人说项，很快获释。被释后曾往满洲里、绥芬河一带了解中东路事件，旋返上海。是年10月，再次到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于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劢回国后，表面上在燕京大学任教，暗地里为筹建政党作准备。1932年4月16日，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和一些封建余孽，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军阀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失败，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政治上反动，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他半年后就去职。1935年，张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他在该院的专题演讲与旧作曾合辑为一书出版，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宣扬“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1936年夏，陈济棠反蒋失败，学海书院封闭。是年11月，张跑到红军撤离后的瑞金作“视察”，大作反共演说，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所以赣南弄成一片惨无人道的地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8月，刊行《立国之道》一书，系统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国民党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对于张君劢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谬论，中国共产党对他作了必要的批驳后，仍然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作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劢等人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于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布政纲，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政治。纲领中同时也掺入了反对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主张。1944年9月，为容纳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张均任常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学生以港渝飞机运狗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张君劢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此事的指使者。不久，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被滞留在重庆两年多，民族文化学院亦遭封闭。

1944年底，张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头子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后又往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等国的“国社党”瓦解，而英美等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高涨，便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也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

出什么“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妄想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政府，以所谓“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

政协会后，张君劢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方面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劢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决心卖身投靠，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伪国大代表名单。这种可耻行径当即遭到广大民主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劢分为两派。张君劢“中立”的伪装被彻底戳穿。

1947年4月，张君劢伙同青年党头子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东窜西跑，到处宣讲伪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逃居澳门，未敢就任。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逃往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极力宣扬孔孟哲学和宋明理学，攻击中国共产党“叛离”了中国传统，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南越、新加坡等国各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23日因肺炎死于美国旧金山。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富宁红军游击队始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滇东南的壮家山乡富宁，活跃着一支由红7军播下的种子发展起来的红军游击队，他们以壮、苗、瑶、彝等少数民族居住的七村九弄地区为依托，和敌人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云南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篇章。下面记述的，是这支游击队8年间走过的历程。

一、革命火种

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领导下，在广西西部暴发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了红7军、红8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由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根据斗争的需要，红8军和红7军合并，在左、右江地区和敌人进行斗争。

富宁是两国（中、越）三省（滇桂黔）的交界地，是“三不管”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这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百色起义后，受右江革命斗争影响，群众容易发动，特委决定在这里开辟工作，建立游击根据地。与右江下游根据地形成依角之势，与右江下游根据地相呼应，广泛开展对敌斗争。

1931年10月19日，右江党委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韦拔群惨遭叛徒杀害，不久，右江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陈洪涛被叛徒出卖被捕后，被敌人杀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右江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为了保存力量，开辟新区，右江下游党委派李德惠、黄庆金、谭统南由家在富宁七村的红军战士刘家华带路来到富宁的七村九弄地区开展活动。

七村九弄是个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这里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红7军的人来到后，积极开展民族工作。有的以锯木板为业，走村串寨；有的以刻图章为名深入各家各户；有的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打入护商大队或区、镇公所，他们秘密串联，发动群众，组织“兄弟会”，建立赤卫队，争取改造了一支100多人的绿林武装，初步打开了九弄地区活动的局面，红7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富宁这块土地上，已经开始扎下了根。

二、星火燎原

1934年初，桂滇边区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乡村普遍建立了“劳农会”和赤卫队，人数发展到2600多人。斗争已由富宁发展到靖西、那坡、德保、广南、麻栗坡、西林、隆林、百色等县的大部份地区，建立了以七村九弄

为中心的边区游击根据地。为了巩固边区游击根据地，党组织又决定在村寨集中、人口密集的百油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开始进行土地登记，以便取得经验，在全边区推广。红军游击队的壮大，引起敌人的惊恐和不安。六月上旬，敌广富守备军农志猛一个营，分两路从皈朝出发，袭击驻在江曲、甘美的两支红军游击队。由于我军事先已得到群众送来的情报，甘美游击队负责人韦高振命令部队在后山冲设伏，当进攻甘美的敌人进入寨子后，游击队突然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纷纷朝敌人飞去，顿时，敌军大乱，吓得在寨子里乱窜乱逃，东躲西藏。是役，毙敌连长以下近30人，缴获敌军旗一面，枪10余枝。我红军游击队连长王保成及3名战士牺牲。进攻江曲的敌人听到甘美的枪声后，知道情况不妙，慌忙撤退，连夜逃往富宁。

甘美战斗是红军游击队和敌人进行力量对比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打响了保卫根据地的第一枪，也是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边区根据地军民。

三、举行武装暴动

1934年10月，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的消息传到边区，给边区军民以极大鼓舞。为了响应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周密的策划，决定以七村九弄为中心，举行武装暴动，镇压那些长期以我为敌的土豪地霸。九弄地区大土豪韦英豪，拥有众多的田地和家丁，他占山为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红7军干部到九弄后，他恨之入骨，一年时间里，曾三次给敌人送情报，企图围剿红军游击队，但由于红军事前防备，其阴谋才未能得逞。为了惩罚这个地头蛇，打开斗争局面，何尚之派红军干部蒙运廷带一个精干的战斗小组，经过短兵相接，把逃到山洞躲藏的韦英豪及其走狗抓来，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后将其当众处决。接着红军游击队又镇压了架街伪保长陶炳希、龙迈乡乡长李成华、花甲区区长汤焕文等一些作恶多端、民愤较大的地头蛇，并把他们的财物没收后分给群众。这些活动大大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起来参加革命，为争取翻身解放而斗争。

四、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1934年11月初，活动在七村九弄的地下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何尚之的主持下，在九弄的多立寨召开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何尚之任书记，委员有黄德胜、韦纪、赵敏。这样，就把三省边区的斗争统一起来了。为了更好发动和组织群众，11月20日，在边区临委的主持下，在谷留召开劳农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并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黄庆金任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常委有岑日新、李家棋、刘家华、朱国英、梁振标。劳农会主席何尚之(兼)，委员有岑日新、李家棋。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司令梁振标，政治委员何尚之(兼)，参谋长黄德胜、副参谋长蒙运廷、政治部主任赵敏，宣传部长谭统南、民运主任陈勋(陈尧宝)，财政主任周书模。

会后，为了发展壮大边区根据地武装力量，边区党委决定继续派出人员到下游组织游击队第二联队，到东兰、凤山组织游击第一联队，到黔桂边区组织游击队第四联队，后因黄庆金、韦纪被捕，计划未能实现。

五、建立苏维埃政府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给边区军民极大鼓舞，为了扩大影响，边区党委决定把部队拉出七村九弄，进驻交通方便、人口较多的皈朝镇。

红军游击队从七村九弄出发后，途经百油时，在该地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作短期休整，然后一举进入皈朝，并占领了区公所。接着，建立了皈朝地区“苏维埃政府”和“青年会”。

皈朝大会后，部队决定攻打富宁，部队在向富宁开进途中，经板仑时开展了打土豪，把从两户大土豪家没收来的财物粮食除一部份作为部队军饷外，其余全部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在板仓部队得知驻富宁的敌军已有防备，滇军警备旅17团已开到广南县的八宝、桂军苏新民团(132团)已从百色出发，向云南的剥隘、谷拉推进。根据敌情发生变化，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游击队决定先打敌警备旅17团的回马枪，歼其一部，阻其前进，不料在我部队到达弄迫时，敌人先头部队也同时到达，并抢先占领制高点。游击队变主动为被动，这时只好与敌展开正面交锋。战斗进行了一天，歼敌30余人，我牺牲14人，十余人受伤，这一仗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使滇桂军阀联合围剿根据地的阴谋归于破产。

六、第二次围攻富宁

1935年初，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长征两次入滇，给边区红军游击队以极大鼓舞，边区党委决定集中兵力，第二次攻打富宁，扩大影响。

5月上旬，红军游击队600多人再次包围富宁县城并发动攻击。同时还派出小分队袭击剥隘等交通要道和重要集镇的敌人。敌人纷纷向省城告急，龙云不得不又重新派出一个加强团配合广富独立营驰援富宁，同时，还用重金聘请桂军保安团和靖镇守备独立营等部队，向根据地进行围剿。为了保卫根据地，红军游击队决定放弃攻打富宁，转移到那刀埋伏，伺机伏击从广西方向开来的靖镇

独立营。

第二天，敌人进至那刀，我红军游击队向敌猛烈开火，把敌人全部压在那刀坝子，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是役，共歼灭敌100余人，红军游击队副参谋长蒙运廷光荣牺牲，赤卫队长黄大良负重伤后牺牲。

那刀坝战斗后，红军游击队分两路返顺洞波和七村九弄地区，继续与敌人周旋。

七、芭莱、谷沙战斗

1936年9月15日，红军游击队一部在大队长岑日新的率领下，以长途奔袭的方式，对芭莱之敌实行包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此次战斗，俘获敌区长黄立廷以下83人，歼敌近百人。

12月15日，敌人一个连对阿用的谷沙，进行大肆烧杀抢掠。游击队决定由大队长唐秀山率领二大队打击进犯之敌。二大队到达谷沙对敌人实施包围，敌人听到枪一响，慌忙躲进一老乡家进行抵抗。因这老乡家房屋的土墙较厚，游击队只有长短枪，没有重武器，虽几次组织火力发动攻击，均未能凑效。为了消灭这股敌人，大队长唐秀山决定采取火攻。他们用柴草堵住大门，倒上桐油点火将柴草烧燃，顿时，整座房子燃起熊熊大火，敌人被大火包围在里面，烧得哭爹叫娘，有的敌人被烧死在里面，部份逃出来的全都当了俘虏。这一仗毙俘敌80多人。经过芭莱、谷沙两次战斗，进攻根据地的敌人吓得纷纷撤退。

为了庆祝芭莱、谷沙战斗的胜利，1937年2月中旬(农历正月初二)，边区党委在塘彦召开庆功大会，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群众三千多人参加，他们白天开会，晚上演戏，军民同庆胜利。

八、挫败敌人的“三省会剿”

1937年3月下旬，西进的敌人占领了甘邦，烧毁寨子，接着又开向龙矿对红军游击队实行进剿。龙矿地处甘邦左侧五、六公里处，从甘邦至龙矿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道路两边都是些很深的石洞，行人稍不注意，掉进洞里便有丧生的危险。红军游击队选择了这一有利地形设伏待敌。一天，敌人向龙矿开来，当来犯之敌进入伏击圈时，游击队一齐开火，顿时，敌军被打得仓惶不知所措，等他们弄清是中了游击队伏击的时候，前面数十人已倒在地上，剩下的落荒而逃，有的在逃跑的时候，为了活命互相拥挤，掉进路边的石洞后就再也没命了。游击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是役，歼敌近百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0月，傅少华、汪富兴等率领两个游击大队，攻占敌人据点那耶，枪毙了国民党花甲区长冯忠贤，拔除了这个敌人据点。至此，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归于失败，通过这次反“会剿”胜利，游击队日益壮大，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根据地更加巩固，根据地军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九、接受改编

1937年4月，边区党委派朱国英到广西汇报边区的工作，广西工委听了汇报后，派张凡、欧阳才等与朱国英一起来到边区，他们在边区游击队司令部驻——者兰，传达了“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今后的任务是促进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中共桂西特委书记黄桂南和中共广西工委代表高朗如，主持召开了桂西特委扩大会，会后派黄桂南、高朗如、黎达为代表与国民党百色地区民团指挥部进行谈判。10月，双方签订协议，同意将活动在滇桂边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广西田州(今田阳)接受国民党改编。

在对待“改编”问题上，边区党委内部出现了分歧。何尚刚、赵敏、岑日新、谭统南、傅少华等认为在党中央还没有指示之前，就轻易作出将部队接受国民党改编的决定是错误的，党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红军游击队不能拱手交给国民党，表示反对桂西特委某些人签订的投降协定。但由于黄桂南盗用了上级党组织的名义，采取高压欺骗的手段蒙蔽了一部份干部。12月下旬，命令黄德胜、朱国英、李家棋等将400多红军游击队主力开赴田州，接受国民党改编。根据地人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送别了红军游击队。部队开到田州后，当黄德胜听到说党中央有关于地方、地下党组织不要同国民党单独进行谈判的指示后，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改编，后来，黄德胜就被叛徒韦高振命人把他骗到田州城外的河边开枪打死。接着，红军游击队就被国民党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这样，这支党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红军游击队，就被错误的决策和叛徒的破坏断送了。

红军游击队离开富宁后，留下的领导人何尚刚、岑日新、谭统南、傅少华等转入地下，分散在滇桂边和中越边的广大地区开展发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面对敌人白色恐怖，不顾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富宁的解放。

(选自《党史月刊》92年1期，作者：陆廷荣，有删节)

红军长征途中击落三架敌机

1934年9月7日，红六军团前卫部队进抵广西全县地区(今资源县西)，突然遭到国民党桂系空军一架AVRO637号侦察机的低空扫射，红军立即进行对空射击。敌机被击中后迫降于附近的稻田中，两名飞行员下机

顽抗，被红军击毙。11 月 24 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 2 师在道州(今湖南道县)的战斗中，用步枪击落了第二架敌机，并俘飞行员两名。1935 年 3 月 18 日下午，在贵州茅台上空，第三架敌机被中央军委警卫营防空连用重机枪改装的高射机枪击落。

(作者：马军，选自《军事历史》92 年 2 期)

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的通信兵

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谱写了一部英勇悲壮的革命史诗。在这场举世闻名的人类壮举中，红军通信战士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的通信保障任务主要由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承担。长征开始前夕，为确保长征途中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万无一失，联络局于 1934 年 8 月组建通信团，具体组织、实施长征中的通信联络。通信团上属联络局，团长、政委分别由联络局局长王诤、政委伍云甫兼任，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

长征开始时，红一方面军共携带电台 14 部。其中 5 部配属在军委总部，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各配 1 部。余者为机动台，根据需要可临时配给师或团使用。

后来，由于指挥上的失误，红军损失惨重，人员锐减，中央军委和联络局对通信人员和电台的配置作过多次调整。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 16 个团。通信团及其下辖的无线电营编制随之被取消，各无线电分队直属通信联络局。这次整编对保障即将进行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通信联络起了重要作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为加强红四方面军的通信实力，从一方面军先后调去 30 多名通信工作人员。原随军委行动的无线电第 1、第 6 分队，三局通校，电话队及军委联络局政委伍云甫均在此列。红一方面军的通信人员和电台数量减少了，由于通信人员加倍工作，齐心协力，通信联络依然畅通无阻、保障了红一方面军的北上。1935 年 10 月，这支通信队伍跟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完成了保障长征通信联络的任务。当时，随军委到陕北的共有 5 部电台，23 名报务员，3 名机务员，4 名见习员和 2 名技工。

长征期间，中央军委和联络局采取很多措施，确保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保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交替前进，两端架线。由于敌人四面袭击，红军处于频繁作战状态。随行的电台有时因情况紧急需要转移，出现延误联络和拒收电报的现象，通信联络一度不够畅通。为改变这种情况，通信联络局决定：随军委总部行动的无线电第 1、第 6 分队，采取交替前进的办法，即第 1 分队工作时，第 6 分队行军；第 6 分队工作时，第 1 分队行军，使电台全天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根据情况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有线电大队每到一地，先架好总部的电话线，然后向部队架设。为提高架线速度，他们从两端对架，这些办法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战场通信联络状况。(2)合理运用各种通信手段。在通信器材简陋，通信手段原始的情况下，通信人员十分重视通信手段的合理运用。在军委和军团之间，以使用无线电通信为主，有线电通信为辅；在军团和师、团之间，以使用有线电通信为主，辅以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距离近时，尽量使用有线通信，距离远时则以无线电联络；对执行紧急或特殊任务的师、团，由总部临时派遣电台越级联络。(3)作战、机要、通信三个部门密切配合。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谁抢在前头，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争取时间，作战、机要两部门的驻地总是尽量靠近电台，遇到紧急情况，三个部门一起工作，对来电做到边收、边译，首长明白大意后立即作出决断。

通信兵在长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遵义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此期间，无线电第 1、第 6 分队把一份份电报及时地发往各军团和根据地。

1 月 29 日，中央红军在土城、元厚场一渡赤水河，向川南前进。由于敌军的包围，第 3 团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总部立即派出部队携电台寻找该团。当他们行至一座山的半山腰时，发现山上有部队集结。负责电台的曹丹辉立即打开电台进行联络。发现他们正是第 3 团。曹丹辉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总部，并转达了总部要第 3 团突围的指示。经过一番激战，第 3 团胜利突出敌人重围与总部会合。

二渡赤水后，军委派了一部电台跟随红五军团第 37 团执行佯动任务，以吸引、阻滞敌人。电台工作人员昼夜守候在电台旁，同军委总部电台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络，使第 37 团能随时按照军委的指示，一面抗击敌人，一面将尾追之敌(3 个旅 9 个团的兵力)向远离红军主力的方向吸引。直到第 6 天，敌人才发现红军只有 1 个团，便又调过头来寻找红军主力部队，但为时已晚。就在前 5 天，红军主力部队已连下桐梓、遵义，击溃国民党王家烈部 8 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支 2000 以上，俘虏约 3000 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在四渡赤水期间，电台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共收发电报 300 余份，其中由朱总司令签发的电报就达 200 多份，保障了作战指挥的顺畅。

四渡赤水后，又经过与敌军的一番周旋，于 5 月下旬

来到金沙江边。金沙江谷深流急，地势险峻。中央红军如不能迅速过江，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4月29日。中央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及时引导了部队的前进方向。

为做好抢渡金沙江的通信联络工作，联络2局对担负这一任务的无线电第1、第6两个分队渡过金沙江，宿于江边的中屋山。第1分队立即在山上的石洞里架起电台，负责渡江的通信联络。渡江前，中央军委曾指定：红一军团在龙街渡渡江，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渡江，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皎平渡渡江。渡江第2天，电台先接到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急电，称他们那里因水流太急，难以架桥，且有敌机骚扰，无法过江，情况紧急，请求指示，军委接到电报后，经研究决定：两军团放弃原渡口，速赶到皎平渡渡江，两军团闻电启程，及时赶到皎平渡，安全渡过金沙江。接着，第1分队电台又给红九军团发去中央军委要他们迅速渡江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的指示。这样，尚在滇东北执行牵制敌军任务的红九军团也及时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完成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如果说红军是一个坚强的战斗机体，那么军事通信就是它的传感神经，正是借助于这根灵敏的传感神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才得以及时了解情况，正确制定作战部署，实施不间断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作者：唐春华，选自《军事历史》92年1期）

赣南红军游击队歌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敌，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戴季陶一则贻笑大方的通电

1934年4月11日，正在西北地区考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在西安发表了致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通电，就“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一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加以痛斥：“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他危言耸听道：“何必发墓，然后为学。民德之薄，至今而极。此心不改，灭亡可待”，最后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庶几足以正民心而平民怨。一面苦劝诸君子，改其无益之行，变其无用之心，致力于救国救民之学，以培国本而厚国力”，云云。这则通电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话说西方近代考古学自晚清传入我国后，其田野考古学说很难为我国传统思想所接受，正如蔡元培在答复戴季陶这则通电的函中所言：“以中国历史之悠久，不动土则已，一动土则无论何事均难免遇到遗骸遗物耳。”这种掘墓挖坟之举当然是封建卫道士们所深恶痛绝的，即使在一般民众看来，也往往视为离经叛道之举，所以国人很少有矢志于考古工作的，一些外国学者、商人趁机攫取利权，喧宾夺主。最初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往往是地质工作者的副产品。如1921年秋，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在瑞典顾问安特生的主持下，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著名的彩陶文化就是一例。这种状况到20年代中期以后稍稍有了改观，如1926年，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阳村主持发掘了仰韶文化，这是由我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同时，民间的或半官方的考古学术机构也纷纷成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8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考古学组，这是第一个由政府设置的专门从事考古发掘研究的学术机构。考古组成立伊始，就在李济的主持下，在河南安阳县从事殷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费时经年，出土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堪称民国史上田野考古的最大收获。蔡元培等人遂于1933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考古会，“期以群力搜考先民遗泽，维护前代文化，切磋流通，相亲而善”……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国内考古学的振兴有望。就在戴季陶此次赴西北考察的同时，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同仁们正在陕西宝鸡、凤翔、西安一带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大概是这触怒了这位考试院长戴季陶的神经。在这位一向提倡“将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的党国元老看来，考古发掘无疑是挖了祖宗的根，同私掘古墓毫无二致。于是乎，“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陈独秀狱中作《金粉泪》诗句），有了这么个被学术界贻笑大方的通电。

戴季陶通电发出的第二天，教育部长王世杰不敢怠慢，当即复电称：“发墓取物之事，颇闻各地有古董商或不良分子为之，在考古学术机关实际上尚属罕见”，婉转地表示了不同见解，保证要从严取缔不法分子的行为，并行文考古机关不得侵害有历史意义的古墓。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戴季陶的通电则多嗤之以鼻，笑其缺乏常识。4月14日，蔡元培作一长函答复，也对戴季陶这种做法大不

以为然，象像诚学生一样解说了考古发掘的意义和功用，以及我国考古工作者所取得的成绩，指出“近数年来科学发掘之事虽有而实稀，然其成绩已闻域外，其工作之细密谨严有可佩者。先生向所谓‘向世界赶上去’者，今日实不多有，此转是其一端”，以为“政府保护古迹，禁止私掘，应取更有效之手段，此外之学术事件自当出之以慎重，而不宜泛加之以禁止，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至于民间私掘古墓之风，由来已久，这同地方当局的处置不力有关，与考古发掘并无什么连带关系，决不能因噎废食。就在戴季陶发出通电后的一个月，各报宣传北平通州县光绪帝之父醇亲王的陵墓被盗，百余名盗匪竟身携机关枪击溃保安队，用炸弹炸开陵墓，尽掘珍宝而去，重演了当年孙殿英军队在清东陵盗宝的故伎。……谈到戴季陶何以发出这则昧于事理的通电，蔡元培讳言道，“必是告者颠倒其词耳”，算是为戴挽回了些面子。

戴季陶这则通电并没有石沉大海，行政院惮于戴的地位，也不得不有所表示。5 月初议决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令各省市成立相应主管机关。不久又发出严禁发掘古墓令，除了考古学术团体“为科学工作起见，整理先民遗物，偶及已发见之古墓物件”，可遵照 1930 年 6 月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 8 条，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后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掘执照方可从事外，其他盗掘坟墓私运出口者一律依法严惩。而上述提到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实际上早在 1932 年 5 月国民政府就已颁布过组织条例，该会直隶行政院，成员由内政、教育两部代表和聘请有关学者专家 15 人组成，职责是“计划全国古物古迹之保管研究及发掘事宜”。但由于迟迟没有落实人员编制，久悬虚名，至此才算是有了个结果，到 1934 年 11 月初正式成立办公。这算是戴季陶这则通电发表后的一丝余响吧。

（俞莹）

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的一场诉讼

1934 年初夏，文坛发生了一起文人随笔挥写、妄下雌黄而吃官司的事件。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易君左“闲话扬州”文案。

易君左，本名家钺。其父是湖南汉寿名诗人易顺鼎，别号哭 庵，小时人很聪颖，长大以后才思横溢，文名籍甚，有“龙阳才子”之誉。易君左幼受庭训，秉承家学，也喜好诗文，常舞文弄墨。他在长沙明德中学就读时，凡有所求于父亲时，都以纸笔代喉舌，用书面提出，而且常常往复笔谈，乐此不疲。他也显露出文学方面的才能，曾写过一部名叫《他和她》的白话文小说，还油印出来，分赠同学友好，博得了不少读者的欣赏。

30 年代初期，易君左在镇江江苏教育厅当编审主任，常去扬州，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写成了《闲话扬州》一书。这部散文作品有数万言。内容对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形势、沿革、杂话等等，均有叙述，还刊用小金山、平山幽径、万松岭、徐园一角、绿杨村、梅花岭、瘦西湖等铜版照相，可谓应有尽有。

但书中所写，颇多轻侮扬州人的地方。如说扬州人“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其意是指扬州人懒惰，不事生产，上午孵在茶馆中，下午泡在澡堂里，消磨一天。实则这只是当地少数有闲阶级的生活情况，并不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书中又写到各地澡堂子中擦背的和修脚的，大都是扬州人，暗刺扬州人“低贱”。而作者论及扬州妇女的文字，更多有薄行不检、恶俗无信的偏执。

易君左此书完稿后，交给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书局负责新文学的编辑是钱歌川。他也是湖南人，三个哥哥在中学时曾与易君左结拜兄弟。他对易一直以兄长相待。引为至交，并欣赏其才气。钱歌川认为此稿虽有一些偏激的文笔，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便通过出版了。

《闲话扬州》出版仅两个月，江都妇女协会就向镇江法院（被告所在地）起诉易君左，同时也控告该书发行人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还组织了“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负责追究此事。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登报要求政府封闭中华书局。妇女代表郭坚忍延请韩国华律师，状告易君左及陆费逵。状文中说“此事对整个扬州，类多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而以毁损扬州全体妇女之名誉为尤甚。如硬指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扬州包办全国妓女，……均专对扬州妇女存心毁谤，故特提起控诉”。

这时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长，诉讼一起，他就嘱易君左暂时回避开，由他出面斡旋。而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编辑所长舒新城和编审钱歌川则不得不前往镇江出庭。后来经法院判决，作者登报道歉，书局收回书本销毁。中华书局不仅要全部收回市面上的的书不得再售，而且书版及存书都要加以销毁，永不发行，赔了许多人工和财力。因此，《闲话扬州》现今几乎绝存。至于易君左，不但没有经济损失，名声反而随之扩大。当时有人出了一个上联征对，如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于是有许多下联发表出来，其中有：“林子超主席国府，不愧国府主席，林子超哉。”（其是林森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子超是他的字）一时文坛传为笑谈。

《闲话扬州》并非是易君左初次招惹的笔祸。早在 20 年代初，他就是“呜呼苏梅”风波的主要肇事者之一。1921 年，原中国公学学生谢楚桢写了一本 10 万言的《白话诗研究集》。他自以为是，想请老师胡适撰文介绍。胡适阅后，认为其中收录的“名人所作”和“男女青年的杰作”极为不堪，“差不多无一首算是诗”，拒绝评介。但谢楚桢结

交了易君左等一班文坛新名士，被易等捧为“于新诗界大有贡献”的诗坛新秀。那本胡编乱论的“苦心孤诣之作”，居然也获出版。而且由沈兼士、陈大悲、瞿世英、易君左等10多位文艺界名人在《京报》上联名同启，称其“无美不备”，“诚为新文艺中别开生面之书”，“凡有志研究新诗的人，当无不先睹为快”。

当时北京女高师的学生苏梅看不惯谢楚桢和那些名人的作为，便在《京报·女子周刊》上著文，严厉地批评了《白话诗研究集》。这就触怒了谢楚桢的那班“哥儿们”，纷纷在《京报》上攻击苏梅，易君左也在其中。

5月13日，《京报》又登出一篇《呜呼苏梅》，用污秽的语言大骂苏梅。结果激起了公愤。因文章署名“右”，众人都以为是暗示易君左所作。一时易君左为人所不齿，颇受斥责。他急忙“郑重声明”，否认自己写过《呜呼苏梅》。接着彭一湖、李石曾等8位名人，在《晨报》上发表启事，以“同人对于易君左相知有素”为由，声明《呜呼苏梅》一文非易君左所作。

胡适和高一涵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些名人“不该滥用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签，替无赖少年作辩护。”他们随即也在《晨报》上刊出启事，要求这些名人举出证据。

对于胡、高两人的启事，“诸位先生”迅速作出了反应。有趣的是，这次发表的“郑重声明”却是针对易君左的。声明以致易君左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举出此书并非自己所作证据并登报声明。同时，黎锦熙、戴修瓒等人还申说前次启事实未参与，是他人代拟，过去也不认识易君左。此后，易君左一声不吭，《京报》也毫无答复。于是人们仍然认为《呜呼苏梅》是易君左的作恶。新知书社在《晨报》登出启事，宣布取消易的编辑职务，少年中国学会也声明易君左“现已非本会会员”。易君左当时可谓声名狼藉，为人所鄙弃。

如果说《闲话扬州》和《呜呼苏梅》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易君左人格品行方面的庸俗不端；那么，抗战胜利以后，他率先掀起围攻毛泽东《沁园春》咏雪词的风波，则反映了他反动的政治立场。

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作了著名的《沁园春·雪》。这首气势磅礴的咏雪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当即公开发表。直到1945年11月11日，毛泽东已由重庆飞返延安后，《新华日报》才发表柳亚子的《沁园春》和词。柳词前有小引：“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意也”，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重庆时曾作咏雪的《沁园春》词。与此同时，有人给《新民报》主笔张恨水送来毛泽东的这首词，说是愿意首先在《新民报》发表，希望张也能和一首。张恨水看后，觉得气魄雄伟，非同凡响，难以唱和，但很乐意在《新民报》首刊此词。于是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上，首先披露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编者在词后加了按语说：“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在，乃不可及。”隔一日，《新华日报》也转载了这首名作。接着《大公报》又将毛泽东和柳亚子词作并列刊出。由此，这首豪迈的《沁园春·雪》就广为传诵了。

可是，这时由《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的国民党军统报纸却逆流而动，发表易君左的词，对毛泽东的这首词进行谩骂和诬蔑。易君左还在序言中呼喊同道起来攻击，声称“……因次韵成一阙，发全民心声，并望天下词家，闻风兴起！”随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动下，一些应声虫起来附和，大兴颠倒是非、含血喷人、挑拨离间之能事。

当郭沫若看到这些诬蔑性的评论与和词后，很是气愤，也作词两首予以还击。其中对易君左专门作了抨击：“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这对易君左当时政治本质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陈雪岭）

蔡廷锴考察意大利

“一·二八”淞沪抗战，蔡廷锴成为民族英雄，名闻全球。后由于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蔡廷锴等于福建起事另立政府。失败后不久十九路军解体，残部进粤后被陈济棠缴械，蔡的秘书被戮，蔡亡命香港。

闲居香港时，蔡自思“学识浅陋，缺少政治眼光，性情鲁莽”，决心去国外考察，以“增加见识、陶冶性情”。当时由麦英俊任翻译，同行的还有谭启秀、丘兆琛。

1934年5月15日，蔡应约前往意大利拜会墨索里尼。据蔡氏回忆，墨对其极为尊重与欢迎，“握手达数分钟”。墨索里尼能讲流利英语，蔡则必须通过麦英俊翻译。墨恭维蔡氏是当时中国“唯一能与日军作战之将领”。是时轴心国尚未形成，墨氏登台亦不久。墨索里尼还特地开柜取出其照片一张，亲笔签名以赠之。还要蔡开一单子，列出拟参观之项目以便安排。双方谈约30分钟。告别是墨亲送蔡至大门外。

在墨索里尼安排之下，蔡氏考察了意大利陆军第三师、党卫军、海军兵工厂、航空学校，并参观了开荒筑坝建成的“墨索里尼新村”，蔡氏称之为“社会政策之实验场”。此外还参观了庞培遗址等多处。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意国为战败国，亟待复兴，墨氏乘机率社会党人夺取政权，其政治生涯正当上升期。蔡对所见所闻十分惊叹。后墨索里尼自感时机成熟，因而野心毕露，将社会党改为法西斯党，倒行逆施，助

日侵华，妄图称霸全球，这是蔡氏始料未及的。

（范士林）

吴稚晖逃寿说怪话

《锡报》创刊于辛亥后的1912年，初由地方人士蒋哲卿主办，后由吴观蠡接办，是一张民办报纸。因为办报，吴观蠡与吴稚晖成了本家之交。

1934年3月5日是吴稚晖的花甲寿辰，无锡地方人士荣宗敬、荣德生、裘可桴、丁宝书、刘春圃、吴观蠡等会同旅沪同乡会头面人物30余人，在上海功德林菜馆定下了几桌丰臧寿筵，为吴稚晖庆寿。事前由经办人印发了请柬，并致函吴稚晖本人，届时莅沪，接受众人祝贺，事情办得十分妥当。为此《锡报》还在副刊上发了一条消息。

3月5日上午，上海功德林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悬挂，并装有霓虹灯的大寿字，桌上供着寿面、寿桃、各色礼品、琳琅满目，十分堂皇。午前10时左右，衣冠楚楚的宾客陆续而来，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地方士绅。吴观蠡、荣德生、裘可桴等专程由锡赴沪。各人在礼堂上恭候寿翁驾临。

谁知到了11点钟，还不见吴稚晖的大驾，经办人吴观蠡、刘春圃等好不心焦，当时诸事齐备，只缺寿星。来宾饥肠辘辘，不能就席，情况更见紧张。

时已11点30分，功德林帐房间人员送进来一封信，刘春圃接过来一看，却是吴稚晖从杭州寄来的，忙拆开当众宣读，内容略称："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五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弟敬恒谨启。"

这样一来，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十分尴尬。不过目前寿堂局面如何了结？吴稚晖这个老滑稽和大家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于是几位经办人一再磋商，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张冠李戴，在来宾中推出一位年届80岁的庄仲威老人做寿翁，为他庆八旬大寿，这才大家入席，草草结局，不致再出洋相。

《锡报》吴观蠡回到无锡，报社里已接到吴稚晖寄来的责问信，内容是说："……要祝我的华诞，骇慌了我，赶紧退回帖子。先母去世太早，是外祖母不忍提及我与妹子的生日子，所以终身不曾有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是日固然不敢上功德林，却白白牺牲了一次茶会。不料接着又有人登小报说：那天丁先生等为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接着又有许多看见小报的人前来问我，'三月五日必是你的生日，这秘密被我们打听到了。'哈哈！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我虽然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我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过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祝拜的，这是一个硬凭据。……祸从弄笔头起，请你登个义务广告，免得谣言放开来。敬恒顿首。"

这封信更幽默有趣了，吴稚晖自称年纪白活在狗身上，生平不知有诞。吴观蠡又是弄得啼笑皆非，他和编辑部同仁商议，是否可登？当时笔者亦看到原信，经大家研究，认为如果不刊出，他会再来信骂人，于是吴观蠡决定仍在副刊上原文发表。

报纸发行到南京，此事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军政各部门传开了，有人说："一个党国元老，自称是狗，是绝大的讽刺。"据说后来连蒋介石也知道了。只觉得幽默滑稽，有失体统，心里不是滋味。

（孙云年）

市长强征"牲口税"引起的风波

30年代，北京的一些大寺院，如圆广寺、天严寺、善果寺、广通寺、觉生寺、万寿寺等，在寺庙附近都置有大面积的土地和菜园子。这些寺庙在菜园附近都开设粪厂。按当时的规定，粪厂令粪夫用人力粪车将北京市内各处粪便掏净，运回粪厂，以供菜园施肥，余者售给附近的农民，用棉花、粮食等农作物来换。冻粪论车，干粪论筐，每筐售价折合粗粮一斤。而寺院给粪厂运粪的粪夫每月工资3元，给住户掏粪的粪夫每季1元。1934年，袁良任北平市长，见到当时粪车没有捐税，准备对粪车加征一种捐税，叫"牲口税"。这样不但增加各粪厂的负担，而且对掏粪、运粪工人征收牲口税也是莫大的侮辱，因此激起了粪夫们的愤怒。圆广寺住持慈慧法师通过各寺院，对粪夫说："对拉车的人征收牲口税，这是侮辱人格……"结果所有北京的掏粪运粪工人都起来，扛着粪勺，上街游行示威，向市府请愿，游行后宣布罢工7天，表示坚决抗议。袁良开始置之不理。孰知罢工后，市内各厕所，粪便堆积四溢，满城臭气冲天，一些有钱人家、世家、官员均纷纷不满，袁良目睹众怒难犯，不再坚持原议，遂把要征收的税，改向粪厂加捐，一场"粪税"风波始告平静。然而，"粪勺子舀袁良"的笑柄，轰动了北京城。

（赵斐然）

流行风

电影《渔光曲》

《渔光曲》——联华公司摄制的配音片，周克摄影，王人美、韩兰根主演，它是描写东海渔民穷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影片。

编导蔡楚生从小生长在滨海的潮阳，对沿海渔民生活比较熟悉。当他进入左翼电影运动行列，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认识社会生活时，无疑会有一种新的感受。于是强烈的创作欲望冲击着他，使他很快地写出了剧本《渔光曲》，以实践他"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的诺言。影片于1933年9月开拍，1934年春末完成，6月1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始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创连映84天的纪录，超过了《姊妹花》的上映。

影片《渔光曲》描述了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渔民徐家儿女小猴(韩兰根饰)和小猫(王人美饰)，父死后，又在渔业资本家的盘剥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下，家庭破产，不得不扶母投奔在上海靠卖艺为生的舅舅；这时，渔霸何仁斋之子何子英(罗朋饰)学成回国，进上海华洋渔业公司。一天，何子英在街头听见《渔光曲》歌声，并发现了小猴、小猫，还资助他们100元钱。不料兄妹俩反被诬为盗而抓进监狱，等无罪释放回来，看到母亲与舅父丧生棚户火海中。这时何子英从渔场归来，见状十分同情，带其兄妹二人回到自己家中；没想到，他家也遭到破产，父亲自杀。最后，为生活，子英和小猴、小猫一同受雇于人，在轮船上开始了更为辛苦的捕鱼生涯。而身体瘦弱的小猴在捕鱼时受伤而死，临终前还让妹妹为他再唱一遍《渔光曲》……

影片主题歌《渔光曲》，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它以凄婉、哀怨的曲调，抒发了渔民心底的悲忿，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轻撒网，紧拉绳，
云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天已明，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已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这支歌曲在影片中几次出现，每次都因情景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艺术效果，象影片中，小猫在家里给舅舅、妈妈唱这支歌时，情绪是欢快的，随着歌声，出现了大海、渔帆以及渔民捕捞等画面，声情并茂，场景优美；最后在船上，小猴受伤将死，要妹妹再为他唱这支歌时，歌声伴着表情，无限悲伤和凄凉，小猴听着这支渔民命运之歌，慢慢地死去，十分感人，也从结构上起到了首尾呼应的作用。随着影片的公映，《渔光曲》的歌声也传遍全国，成为当时群众最喜爱的电影歌曲之一。

电影《神女》

《神女》——1934年联华公司摄制，无声片，洪伟烈摄影，阮玲玉、黎铿主演。

《神女》的故事是：一个有小孩的母亲生活在大都市，为了养活儿子，每天华灯初亮时，她便丢下孩子到街头拉客卖淫。有一次在警察追赶下，她误入流氓章老大家中，从此被他霸占、勒索。神女几次搬家也难逃出流氓之手。为了摆脱妓女的生活，她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最后，只有继续做妓女。几年后，儿子(黎铿饰)长大，送进学校读书。孩子聪明可爱，品学兼优，可是却因他的出身而遭到富家子弟的歧视和辱骂，学校也受到家长们的攻击。老校长(李君磐饰)得知真情后，虽同情其母子处境，但终抵不过校董的权势，孩子被开除，他也被解雇。"神女"为儿子不平，严斥了这种社会偏见，撕毁了学校的通知书。为了儿子的未来，她决定带他到没有人认识她母子俩的地方去。这时，发现了藏在墙洞中的血泪钱被章老大偷去，她那饱经沧桑的心，顿时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怒火，立即跑去找老大要钱。于是两人撕打起来，在盛怒之下，"神女"以酒瓶击死了章老大，自己也被关进监牢，判刑12年。最后，老校长前来探监，向她表示愿为其教养孩子，这时，在她愁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她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往日的创伤，在铁窗之中，开始熬度其悠悠岁月……。

小说《猫城记》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

是一部带有梦幻传奇色彩的讽喻小说。写"我"因飞

机失事坠落在“火星”上的猫国的一段见闻，展现了猫城国内一片混乱、黑暗颓败的景象。这里的最高当局，玩弄权术，出尔反尔，投靠洋人，出卖主权；官僚地主，草菅人命，贪婪自私，荒淫无耻；他们在国难当头，还只顾享乐，卖国求荣，最后敌人侵占猫城，屠杀活埋人民，猫国终因不自强而灭亡。作品也揭露依附统治者的学者文人，争名夺利，不学无术，误人子弟，以至教育腐败。作品还着力剖述了猫人妄自尊大、嗜毒成性、麻木自私、愚昧懒散、好逸恶劳、不讲卫生等精神状态，以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作者指出.《猫城记》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和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由于作者对当时革命的前途与共产主义认识不足，以至对革命者作了歪曲的描述，但从总的倾向上看，作品对黑暗腐败的时政揭露得相当有力，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艺术手法上采用梦幻、夸张等讽刺手法，寓庄于谐，笔调风趣，别具一格。

小说《革命前的一幕》

作者陈铨，主要内容：

以北伐前夕杭州和北京为背景，写凌华等人的三角恋爱故事。上海明华大学学生凌华与同学宝林之妹梦顿在西子湖畔相识，别后，彼此吐露爱慕之情，相约订为终身伴侣。寒假时，北大教授许衡山来沪，劝告凌华应以救国救民事业为重，勿沉溺于私情之中。但凌华并未接受他的劝告，即去美国留学。后梦顿在北京上学时与衡山相识，两人产生感情，在“三·一八”惨案中，衡山在游行队伍遭到军队镇压时救出梦顿而自己受伤住院。在住院时两人感情日笃，但双方仍未提出求爱，一直保持微妙关系。凌华回国后，得知衡山所爱的竟是梦顿，痛苦不已。但当衡山到梦顿家向她表示爱情时，却遭到拒绝，方知凌华与梦顿早已相爱，遂毅然离开北京，奔向已掀起大革命的南方。作品虽以学生运动和北伐革命为背景，但着力于写爱情纠葛，未能摆脱“革命加恋爱”的窠臼。

诗《纺纱室里》

永远照不到一线慈和的阳光，
也吹不进一丝凉爽的风儿，
千百只手把住千百辆纺车，
在灰暗的石室里竞速的旋动。

两只眼把定了手里的细线，
一个心粘住了自己的工作，
纺车楞楞地唱着自然的音乐，
棉纤维像柳絮在头上飞绕。

过度的工作弄成了驼背驼腰，
恶浊的空气损伤了呼吸匀和，
惨白的脸一找不出一丝儿欢笑，
青春眼里丧失了晶颖的光波。

心里总惦记着“扣薪革职”，
肺病蚕食了生命的健康，
就这样辗转在生活的轮下，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苦苦地挨着时光。

可喜的是大家的心儿结成一个，
在困苦的斗争里同求解脱，
怕什么？怕什么？人多力量大，
去吧！冲破铁门夺取更好的生活。

（王亚平）

歌曲《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鱼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潮水升，浪花涌，
鱼船儿飘飘各西东，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鱼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东方现出微明，
星儿藏入天空，
早晨渔船儿返回程，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天已明，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也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鱼儿捕得不满筐，
又是东方太阳红，
爷爷留下的破鱼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歌曲《乡愁曲》

大地茫茫哪里是我的故乡？
眼前是酒绿灯红，
悠扬的音乐在耳边响！
心儿沉醉，人儿轻狂，
小姐们巧笑佯嗔，
绅士们浅斟低唱；
看不见国事的沧桑，
听不见大兵的嗟伤，
轻歌妙舞夜未央，
夜未央，好一片太平景象！

大地茫茫哪里是我的故乡？
张望那遥远的北方。
锦绣的山河已沦亡！
遍地哀鸿，满眼创伤，
敌人的枪炮震天响，
同胞们血染荒场；
毁灭了城市和村庄，
离散了儿女和爹娘！
天南地北在流浪，
在流浪，哪里是我们的家乡？

历史档案

嘉勉剿匪讨逆将士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第四届第四次中央全会决议）

四中全会以剿匪讨逆诸将士捍卫党国，劳苦功高，一致决议致电嘉慰，原电如下：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中正同志并转剿匪讨逆全体将士均鉴：一年以来，外患内忧，交相侵迫，我全国武装同志处危若定，动必前驱，舍生赴义，捍卫党国，用能于长城之役，不惜巨万牺牲，以发扬民族精神，昭告正义于世界，更于剿匪诸役，迭奏奇功，残余之匪，肃清可待。最近李陈等逆背叛民国，毁党僭号，我将士义旗所指，逆气荡尽，国本重安，发挥国民革命军之声威，巩固全国同胞拥护统一之信念，是皆我武装同志神勇英励，牺牲卫国所致也。大会审核战报，披览捷书，眷念忠勤，至深欣慰，当经全体一致决议，对我前敌剿匪讨逆诸将士致电嘉勉，尚望继续奋斗，以竟全功，国难方殷，诸希努力。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印。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六期）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在
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演词）

蒋中正

南昌各学校校长暨党政军各界同志：

在上一次纪念周中，本席已经讲过现在我们江西要做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这就是说：我们江西无论在那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全国各省，使全国的民众都能闻风兴起，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来建设我们新的国家，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要完成这种期望，一定要我们江西全省民众，尤其是在江西省会的南昌党政军学商各界同志，即一般民众领袖，首先能够一齐奋发，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协力来做除旧布新的工作，然后一般国民才有所效法，然后才可以风动全国，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要讲难，当然很困难；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程度如此之低，社会环境与一般的教育基础也如此之坏，我们现在要在最短期间使全国国民所有社会上各个分子都能够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时代环境，知道现在国民的地位和责任，并且能够实实在在共同一致的来尽国民的责任，努力救亡建国复兴民族的工作，

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大家要晓得，无论古今中外，一个社会要能改造进步，一个国家或民族要能复兴，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全体国民个个人都有足够的知识，然后才可能。如果一定要这样，那末，不仅是我们中国有如"俟河之情"，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使全体国民的知识充足，可谈复兴；恐怕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能够复兴的了。所以改进社会，复兴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在事实上绝不能希望全体国民都能尽到，完全要靠我们一般有知识的做各界民众之领袖的人，能够将这个重任一肩担负起来。只要我们先负起责任，以身作则来切实去干，才可以推动全国国民，共同觉悟奋发，协力来干。古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根本紧要的事情，还是要教做人的道理，养成学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使他成功一个明礼义知廉耻的人。具体的讲，就是首先要从他们的衣食住行教起，使他们都能过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新生活。如果这个根本的东西忘了，单是教些物理、化学、英文、算学等知识技能，那么，不管你教得怎样好，也没有用；因为知识技能，禽兽也有，禽兽也可以教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所以为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礼义、知廉耻。从关际生活上讲，没有旁的，就是要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如此的生活，才可以叫做新生活。过新生活的人，才配做一个新时代的人。新时代的人绝对不是吸香烟、拍香水、随地吐痰、蓬着头发、拖着鞋子、扣子不扣、帽子戴歪的这一类的人。现在拍香水拍得愈多的就愈臭，愈不清洁；不整齐的人，就是野蛮。现在我们要救国，要复兴民族，并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很粗浅的事情。古人所谓"蔬米布帛"，一般人所谓"家常便饭"，我们现在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就是要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做起，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拿这个东西来复兴民族，比用什么武器什么军队的力量都要大。我们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都要从这一点做起。

因此我们现在新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我们要使南昌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能过整洁简朴，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可以做全国人民的模范。我希望我们各界的领袖，以及一切智识分子，从今天起下定一个决心，来做新生活运动，尤其要能从自己做起，然后更以身作则的教导督促自己的学生、部下、亲戚、朋友，以及一般国民，如此努力干去，我相信三个月以后，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那时，无论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论是要报仇雪耻，复兴我们的民族，都不是什么难事。现在这个复兴民族的新生活运动正在开始，我很希望我们在南昌的党政军学商各界同志，下定决心，共同来推进这个运动，尤其是各界领袖，自己要先能做到，方能以身作则，鼓舞群伦。中正就以此自勉，很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各界领袖，各校校长，人人以此自勉勉人。古云："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希望大家抱此决心与精神，将过去不适于现代的一切野蛮生活，彻底改革，一切新的生活，新的运动，新的事业，统统要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本席今天向大家所贡献的关于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与方法的这几句话。希望大家能依此共同努力，以完成革命的使命。就此谨祝各位成功。

（选自《蒋总统集》下册）

国民政府就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发表通告全国书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

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鉴于其性质之重大，断非寻常国际事故所可比拟，亦断非寻常外交方法所可应付。故在外交方面则以事实真相诉之国联，几经努力，卒获得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之保全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之决议案，及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同年六月七日之不承认伪组织诸议决案。责任所归，于以大明。彼伪组织虽侜张为幻，终于不齿于国际之林。至军事方面，一时虽未足以武力申张公理，收复失地，然苟有来犯，义无反顾。故淞沪之役，古北口之役，我军以血肉之躯，与现代新武器抗，伤亡山积，曾不少馁，此过去外交军事之实在情形，亦即将来历久不变之方针也。比者伪组织改称帝制，群情愤激，环请声讨；惟政府始终认定此等傀儡，初无独立之人格，不成为讨伐之对象。而迹其卖国行为，自应与危害民国同科，其他败类如有附和伪组织，阴谋扰乱等情事，政府必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惩治盗匪条例从严处置，决无宽贷。要之，国势阽危，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我国人，应引匹夫有责之义，懔精诚团结之旨。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生聚教训之准备。庶几挽回国难，维持统一完整之国家，其共勉之。（十一日）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十一期）

国民政府发布严治汉奸令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

为令遵事，查伪组织僭号称帝，甘为傀儡，迹其先后卖国行为，自应与危害国民同科。其有汉奸附和伪组织，阴谋扰乱者，应即厉行制裁，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惩治盗匪条例从严处置，以重国法，而杜奸宄。除分行外，合亟令仰遵照，转饬所属一体严厉执行，毋稍宽贷，是为切要，此令。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十一期）

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会有关棉麦借款的支配决议案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会议中最重要之任务，即为支配棉麦借款用途。按棉麦借款，原为五千万美金，内计棉四千万，麦六百万，面粉四百万，按当时市价计算，折合国币约值二万万元。现经修改合同，将棉花部分，核减为美金一千万，连同麦与面粉，共美金二千万，以现在金价（约三元左右）折合国币，仅五千余万元。按照合同，货到三月以内，当须还本及除去运费，全部借款可作用者祇剩四千万元，而纷纷请求支配棉麦借款者，总计共十万零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三千八百三十元，已超过二十五倍以上，故对各地请求，大多无法应付。惟各常委曾规定原则三项，（一）集中办几桩重要事件，（二）指定几个地方办几桩事情，（三）如非少数经费可办者，则暂不办，根据上项原则，支配借款用途。去年中政会议曾决议以借款百分之四十用于币制改良，及整理金融，以一千四百万元作为整理金融之用，拨交中央银行办理所余二千四百万元，以六百万元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一百八十万为赣省治标经费，至治本经费，则以所需甚大，已先拨一百万元。经委会去年十月成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经委会事业费，已用二十万元，其中最大用途，为筑路费。本年所存仅一千五百万元，犹望美金不再跌价，棉麦市场，不再变化，现决定即以此作为经委会事业费，原有事业费须维持者最大为继续兴筑七省联络公路，拟以六百五十万元，支配该项用途，继续卫生事业五十万元，办理江西建设事业一百九十万元，西北建设事业二百五十万元，棉麦统制一百万元，蚕桑改良七十五万，茶业改良六万四千，燃料研究十万元，（研究汽车飞机燃料）调查研究费，二十万（经济调查及土地调查）此外所余作为预备费。按以上支配，似乎农业及水利未包括在内，但大的水利工程，如黄河水利，即须一千四百万，因不易办，暂不列内。而农业经费，实际已包括于上项用途者，为数甚大，如棉业蚕桑丝业茶业，及西北建设费中，内有四十万办畜牧，四十万办农村合作事业，江西建设费中，亦有五十万元，指定办理农业合作，共约三百十一万数千元，惟因以地域及科目分别无农业之名称而已。以上支配大概情形，已由大会通过为最重要之议案。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十三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9日　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常会，决定解决闽事四项原则：（一）停止军事行动；（二）取消人民政府；（三）李济深、陈铭枢引咎下野；（四）责成蔡光甫、蒋廷锴恢复十九路军番号，整饬军纪，驱逐叛逆。俟执行部通过，即电请南京当局采纳。

1月20日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到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九十六人。

1月26日　西藏驻南京代表接拉萨电称：西藏司伦葛厦益仓及僧俗官民大会举热振呼图克图为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其军权仍由司伦葛厦负责。

2月1日　云南各界在昆明组设“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对付英军入侵班洪等地。并致电国民政府，表示誓作政府后盾。

2月11日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通电，重申反共决心，谓“救亡图存之方策，以为 治标莫急于剿除‘赤匪’，治本莫急于建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同时，呼吁中央、地方开诚相与，来密合作。冀图缓和内部矛盾。

2月21日　国民党中政会第三九六次会议通过地方自治原则三条：（一）确定县与市为地方自治单位；（二）分扶植、开始、完成三期之程序进行；（三）为推行政令起

见，每省至少应设县政建设实验区一处，或分区设实验县若干处，以为研究及实验中心。

2月23日　吴铁城由沪密电汪精卫报告蒋光鼐等在港活动情形，谓由憬然主持《大众日报》为言论机关，拟召集流亡在港之福建人民政府分子分组活动。

3月1日　溥仪在日本导演下僭位称帝，改称“大满洲帝国”，伪年号“康德”。公布伪“组织法”，规定即日改称总理各部职务为大臣，执政府改称宫内府，并新设国玺府。

3月5日　日本外相广田在东京接见苏联驻日大使尤民列夫，密议中东路出售案。此后谈判进入秘密状态。

3月9日　蒋介石制定处理原苏区之土地办法：(一)对前分田之农民概不追究；(二)旧赋旧租免交，新租酌减；(三)旧债展期减成；(四)设农村复兴会清理田地业权；(五)设利用社合伙均耕等。用安抚手段诱骗农民。

3月12日　西南人民外交委员会为英兵侵入滇境事件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立即增强川康边防。并谓：如不及时准备，则此数边省恐为东三省之续。该会同时电请四川各军领袖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御外侮。

4月29日　蒋介石致电黄郛，指示对通车问题按本月11—13日在南昌所议办法，自动向日方作表示。电谓：“日军部对华政策，或采刚柔并用主义，应仍照面谈办法自动的表示，为釜底抽薪之计”。

5月15日　华北农产改进社在天津成立，由金城银行、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联合组成，以周作民任理事会。该社以“改良农村生产，调剂农村金融”为主旨。首从运销及植棉入手，计划五年内植棉一千亩，推及晋、鲁、豫三省。

6月8日　日本制造藏本失踪事件，以为侵华之借口。是日晚，日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昭奉命匿入明孝陵山中。次日，日驻京总领事须磨以藏本“失踪”通知外交部，南京军警机关发动搜查。

6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全国民众运动工作讨论会。孙科在会上提出：“自治、自卫、自足为民运工作三大目标”。连日会议讨论提案九十余件、决议案二十一起，15日闭幕。

6月19日　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交换外交、内政、财政之意见，一致决定对日外交以安定为宗旨；对内不变动党部官吏而维现状；华北通车问题立即实行，委黄郛全权处理。

6月20日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一致拥护《抗日作战基本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8月1日　宋庆龄等以中英文向各方发送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公布之《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同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一些工厂贴出或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传单。

8月26日　奉天日人举行集会，反对撤消治外法权及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反对伪满在附属地内课税。

9月13日　东北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在伪满“中央民政部”通令下，是日举行“秋丁祀孔”典礼。并召开尊孔讲演大会，宣传孔孟之道和日本“王道”。

10月16日　立法院通过《宪法草案》全文，计十二章一百七十八条。

10月23日　行政院驻平政整会决定撤消战区整理委员会，将其改组更名为战区清理委员会，呈行政院鉴核。是日，行政院会议通过，令平政整会予以设立，指定殷同、李择一、朱式勤、陶尚铭、殷汝耕、许同莘、岳开优为委员，王弼候为秘书。

11月1日　全国考铨会议在南京召开，出席者吴稚晖、邓家彦、汪精卫、戴季陶、孙科、居正、钮永键、叶楚伧及罗家伦、胡适等一百六十人。会议议定关于公务员保障等九十五案，决定于各省设铨叙分机关，以考试办法录用各级行政人员，对公务人员实施补习教育。

11月9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维炽为实业部政务次长，免去郭春涛政务次长职务；派叶琢堂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

12月20日　行政院召开第三次庚款机关联席会议。决议：(一)由中美、中英、中法、中比各庚款机关各筹部分经费，作为推动与补助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之用；(二)由上述庚款机关各拨部分经费协助各大学为设研究所之用。

12月22日　国民政府准免居正兼司法行政部长职，任命王用宾为司法行政部长，准免王用宾考选委员会委员长职，任命陈大齐为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准免谢冠生辞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职。

外　交

2月11日　国际邮政第十次大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国政府派驻瑞士公使胡世泽、驻葡萄牙公使张歆海、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黄乃枢为全权代表出席。

3月3日　驻英公使郭泰祺奉外交部训令，就英侵云南班洪事向英国政府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英方答复谓“偶有此事，但言过其实”，不予正视。

4月19日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外交审查会。决定：(一)大会交付研究华北问题向外交当局质询各点，经汪精卫详细说明后不再提出；(二)通邮通车以外交当局最近确未考虑，故无表示意见的必要；(三)目前外交不仅对华北应切实注意，尤应注意国际间相互之趋势及东亚

时局之前途。

4月20日　中国驻英、法公使馆分别在伦敦、巴黎向新闻界发表声明,严词驳斥日本《四·一七》声明,指出:“此次东京对华政策之声明,不外为日本侵占亚陆传统政策之再度申说,益足以暴露其对中国之野心”。

7月13日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衔汪精卫之命,由南京赴莫干山促黄郛早日北返复职,并与黄郛、殷同商谈华北外交问题。

7月16日　日驻华武官柴山、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至北戴河与陶尚铭讨论:(一)建昌营驻屯之日军撤退及非战区特别警察队之设置;(二)山海关、古北口及长城其它各口设置税务分关;(三)通邮问题等等。此次会谈无结果而散。

7月20日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沪与日使馆参赞有野商谈取消《塘沽协定》事。会后,有野宣称:“此次会见仅系友谊性质,关于撤废《塘沽协定》问题,应由关东军负责,日本政府与此无直接关系。”与此同时,殷同到沪与唐有壬商讨华北中日交涉问题,为大连会议进行准备。

7月28日　中英双方修订广九路协约问题经过香港谈判后,是日在广州正式签订新约,计四十八条,附件三条。规定盈利分配,中方占七成二,英方占二成八,以五年为期。9月24日新约公布,10月1日起生效。

8月27日　驻日公使蒋作宾会见日本外相广田,就日本无理大批驱逐秋田县、山形县及广岛县等地华侨问题提出交涉。

9月4日　苏联与伪满在黑河签订《满洲帝国航政局与苏联国立阿木尔船舶局间之航路状态改善协定》十条。规定共同设立技术委员会处理双方共同事业,双方在边界河道共同设置并维护航行标志,双方共同遵守所定航务规定等。

9月23日　驻美公使施肇基就白银问题照会美国政府。指出因美国实施白银购买法,以致银价高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若银价再行高涨,则中国将受极大之损害。希望美国政府不取可使中国白银再有流出之行动,并与中国合作,依照伦敦银协议之原意,阻止银价高涨而维持平衡。

10月13日　外交部于北平设立驻平特派员办事处,以程锡庚为特派员,负责视察华北冀晋热绥四省对日交涉事务。

11月16日　上年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朱鹤龄视察南洋各领事馆后,曾向外交部建议采取总领事中心制,外交部采纳后已令新加坡总领事馆实行。是日,外交部复令驻新加坡总领事于驻印度尼西亚首都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设置总领事馆,指挥及监督荷属南洋各埠领事馆事宜。

军　事

1月1日　蒋军对福建人民革命军发动总攻。第二路军蒋鼎文、第四路军张治中及第五路军卫立煌三部共七个师,由顺昌、建瓯、屏南分别出动,布成品字阵形向延平、水口、古田推进。

1月3日　福建人民政府闽东警备司令邱兆琛率李金波等三独立团增兵连江,进占罗源、宁德,与蒋军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部战于白鹤岭、飞鸾岭之间。同日,陈季良抵福建三都澳部署进攻福州计划。

1月5日　福建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李济深、陈铭枢等改变固守福州方案,决定命蔡廷锴火速率部驰援古田、延平击破蒋军,保全福州。

1月7日　蒋军李延年、汤恩伯两纵队沿闽江而下,分东西两路夹击水口。闽军谭启秀部背水作战,失守天竺山。同日晚,李部占水口,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闽人民革命军两师被歼。

1月8日　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讲话,坚持“厉行党治”、“厉行训政”、“扫除一切障碍”,反对以和平方法解决闽事。并谓对十九路军定非消除不可。

1月11日　海军部长陈绍宽率海宁等五舰由沪驶闽,次日抵三都澳向福州推进。

1月14日　英舰白威克号、美舰杜尔萨号借口护侨,各派水兵数十人在福州登陆,次日撤往马尾。

1月22日　蒋军宋希濂师占莆田,续向泉州推进;王敬玖师与刘戡师相配合进逼泉州。对泉州取包围之势。

1月26日　国民党“剿共”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率罗卓英、樊崧甫等纵队由樟村、横村向建宁推进。

2月1日　蒋介石由京抵杭,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学良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

2月4日　下午3时,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余汉谋等二十余人出席,会议讨论粤军“剿共”军事方针及海空军之实力扩充。

2月7日　朱耀华、彭位仁两部追击湘赣红军萧克、高咏生两部至甘坊。次日,高部转入石门楼附近塘埠一带,摆脱朱、彭两部追击。红军续向南浔路。

2月9日　蒋介石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学良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

2月13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军代表举行军事会议,部署“剿共”军事,继续指挥第五次“围剿”。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2月14日　北平军分会委傅作义任晋绥军总指挥，阎锡山亦派王靖国、赵承绶率部集中临河，袭击孙殿英军后路。同日，陕军井岳秀部进驻安边堡。

2月27日　蒋鼎文偕福州行辕主任林蔚等由厦门乘飞机赴广州，与陈济棠商定东南二路"剿共"军事计划，粤军参加者尚有余汉谋、缪培南、邓龙光、杜益谦等人。

3月7日　蒋介石集中兵力于闽西，以东路军向闽西、闽北两路推进。由蒋鼎文自任闽西指挥，卫立煌为闽北指挥，并调北路军陈诚部三个师向建宁、泰宁推进。是日，蒋部李玉堂师入驻龙岩，李延年师续向漳州跟进。

3月9日　蒋介石电令刘膺古追剿红军应改变以往"布置阵地，明张旗鼓"的堵截办法，而改用"扼要埋伏"的策略，出其不意予以突袭。

3月14日　福建省政府划分防区：福州至仙游，以王敬玖为福州警备司令；惠安至长泰，以宋希濂为泉州警备司令兼闽南区保安处处长。

3月20日　南路"剿共"军执行其第二期军事计划，分两路总攻筠门岭、会昌。

3月23日　张学良命令东北军南下参加"剿共"。王以哲军移驻河南、安徽，司令部设信阳；何柱国军移驻豫鄂境武胜关、麻城地带，司令设麻城；刘多荃师移驻武胜关、信阳地带，司令部设信阳。下旬，张在信阳设行营，以便随时指挥。其后，东北军先后南下参加"剿共"，所部共九个师。

4月1日　南昌行营在南昌再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就东北两路军协同进攻，会师赣南之计划，颁发该两路军推进方法及具体部署规定。

4月5日　刘戡师进攻闽西白沙、邹坑，被红军寻淮洲第七军团刘畴西第二十师和周昆第二十二师、周建屏第二十四师击退。翌日，刘部从正面进攻红军，李玉堂师由石铭策应，又遭失败。

4月6日　黄郛抵南昌面谒蒋介石，报告华北情形，汇报日方侵夺华北所提之各项要求，请示今后华北外交方针，连日与蒋商讨华北问题。

4月16日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命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由南丰双田圩集结里程、凤冈一带，暂归河东纵队樊崧甫指挥，准备向广昌方面进展。

4月25日　陈诚颁布进攻广昌之第三期作战计划，决由高洲瑕、长生桥、伞盖尖之线，沿盱江两岸筑堡诱使红军主力决战，并包围广昌而占之；预定4月27日开始进攻。

4月27日　陈诚执行其进攻广昌之第三期计划，以第五纵队罗卓英、第三纵队樊崧甫、第六纵队周浑元取扇形攻势向广昌进犯。

5月1日　蒋介石为促东路军进攻建宁，于上月26日抽调北路军周浑元纵队暂归东路军第五路军指挥，是日蒋电汤恩伯，令其"在第八纵队未到邱家隘以前，切勿单独急进，总须稳扎稳打"。汤接电后，即命所部赶筑泰宁、挽舟岭之线封锁线，等待周纵队到达后进攻建宁。

5月2日　"剿共"南路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声称以第二纵队为主力，由第一纵队协助，分两路总攻会昌。虚张其声势以应付蒋介石，议而未动。

5月9日　川军第五路军范绍增部第十旅进攻通江，是日占领巴陵寨、元山场，并以第十一、十二两旅各一团向刘坪钳形进犯，连续以车轮战术猛攻。翌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某部以主力反击，至夜将敌击溃，打死打伤五百余人。中旬以后，川军在通江镇龙关、刘坪线，一时再无力进攻。

5月13日　日军杉原旅团二百余人于下午2时由兴隆开抵蓟县，将县城占领。同日，日机二架飞马兰峪上空演习，投弹二枚。翌日，蓟县县长吴明浩与日军数度交涉，日军拒不撤走，城内半数居民外逃。

5月25日　蒋介石在武昌召开豫鄂皖三省边防"剿匪"会议。张学良、何成浚、刘镇华、梁冠英、郝梦麟、何柱国等十余人参加，会议议定对鄂东苏区"清剿"办法及善后，以进一步发动对豫鄂皖等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次日闭幕。

6月21日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何键及薛岳等在广州召开三省军事会议，何键传达蒋介石关于湘粤两省联合反共的旨意。

7月2日　蒋鼎文委派第九师师长李延年为进攻长汀前敌指挥。是日李由龙岩前往连城督战，并电请南昌行营派空军协助。翌日，驻浔空军预备队飞赴漳州归其调遣。

7月29日　蒋介石制定《改善保安团队大纲》，函送中政会、行政院备案。大纲计七章三十一条，要旨为统一名称；训练划一；统一经费等。令苏浙闽豫鄂皖湘赣陕甘等省切实遵行。

8月22日　桂军李宗仁委派陈恩元为入湘"剿匪"总指挥，率第十九师周祖晃和二十四师覃联芳由兴发赶往黄沙河堵截萧克红军长征先遣队。

8月10日　蒋鼎文调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堵击红军抗日先遣队。是日伍师由海路抵琯头登陆，从东面堵截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军围福州数日后总退却，11日撤至连江县汤岭、潘渡一带，分入连江、丹阳。

9月8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为统一全国军事训练，并提高军事教官才干，特在冀、皖、湘、鄂等八省成立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是日，派定第一批军训教官五十二人分赴各地。

10月12日　陈诚由庐山返回部队，判断红军主力潜伏石城、宁都间堵击北路军，一部在长汀方面堵击东路军，即以第十纵队接替广昌至石城封锁线守备，以第三路

军主力移至头陂、新安一带准备进攻宁都，再与东路军配合进袭瑞金。

11月14日　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宣布就任总司令职。蒋介石特派刘文岛至衡阳监督。何健专负军事，湖南省主席由省政府委员曹典球代行，以副参谋长吴家骏为西路军及第四路军总部后方留守主任。

11月26日　白崇禧至平乐指挥，调集桂军主力夏威、廖磊两军于兴安、灌县之线阻击中央红军，以黄镇国师由富川、贺县移至兴安协同民团控制湘江沿岸之咸水、伏华铺、深布坪之线；以王赞斌、韦云崧两师移至灌北新圩、苏江、咸水、界首之线；仍以覃联芳师在道县尾追。

12月1日　湘军追抵咸水后折回湘西防堵，何键遂改编"追剿军"所部为第一、第二及后备兵团，以便指挥。是日，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辖第一路（司令陶广）、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李韫珩）及李觉师（缺两旅）并补充各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吴奇伟为副总指挥，辖第二路（司令吴奇伟兼）、第三路（司令周浑元）；以刘膺古为预备兵团总指挥。

12月2日　白崇禧至兴安编组桂军，以第十五军为第一追击队，由夏威任指挥官，辖四十三师（师长黄镇国）、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入西延尾追；以第七军为第二追击队，由廖磊任指挥官，辖十九师（师长周祖晃）、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于兴全一带尾追，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并防护柳江上游，以湘黔边境为进军方向，共计兵力十四个团。

12月4日　湘军王东原部抵全州，奉何健之命向湘西转进。翌日，王部由全州出发，经新宁、武冈、绥宁、靖州，于18日先后到达广平、会同之线。

经　济

1月9日　财政部统一全国盐税，通令各榷运局自本月起，发售盐斤除用新衡器外，每担一律收税十元。

1月15日　中华国货产销联合公司在上海成立。该公司由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出品协会之各省代表周贯虹等发起，得全国十八省区响应，以"生产救国为宗旨，扶助实业之发展，实行产销合作"相号召，股本二十六万零五百元。

1月27日　财政部与中国、交通、中南、金城等十六家银行合组之银行团签订四千四百万元借款合同，指定以意大利庚款余额为还本基金，海关税余款为付息基金，利率按月八厘，至民国三十七年偿清本息。2月8日，合同公布。

2月14日　中国工程师协会应刘湘之请组成四川实业考察团，以萨福均为团长，团员二十三人，是日由上海启程前往考察钢铁、水利、交通及盐糖、皮革等各项工业，以备投资开发四川工矿业。

2月20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铁道部为实现兴筑新路，整理旧路计划而发行"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案，发行额一千二百万元，4月30日公布条例，5月1日发行。

2月27日　上海国泰商业储蓄银行开业，资本额一百万元，经营储蓄及信托等业务。董事长王伯元，常务董事徐可城、郑秉权。郑兼总经理。

3月12日　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在南京举行首次会议，主任委员褚民谊，委员丁心普、艾沙、唐柯三、张西曼、安石如、孙绳武、刘抡英、陈曾亮等五十三人出席，由刘抡英、陈曾亮起草《新疆建设计划大纲》。

3月20日　交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促进航业讨论会，交通部长朱家骅及各省代表六十余人与会。会议讨论了航政机关、航政法令、人才训练及收回航权、开辟远洋航线、航业统制及减免捐税等提案一百件。为了增进航商的团结，减除过度竞争，议定设立航业合作设计委员会，进行详细调查，计划于9月间完成合作方案。

3月26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到会委员及列席代表共三十余人。宋子文作中美棉麦借款经过及借款支配情况的报告，提出美麦、美棉销售的困难。大会通过宋的棉麦借款用途支配案，决定修改合同，美棉由原订五千万美元减为一千万美元，麦及粉仍为一千万美元，共二千万美元。大会还通过提高粮米价格、火柴统制及修治冀省各河计划等案。

4月4日　财政部盐务署在南京召开整理盐务会议，6日结束。通过：(一)取消引票；(二)筹备两淮借款八百万元；(三)实行新盐法。

4月25日　宋子文由沪抵西安考察西北经济。翌日提出开发西北四项计划：(一)兴修水利，先协助泾惠渠，洛惠渠完成，再进行导渭计划；(二)建筑西(安)兰(州)公路；(三)改良农业，发展棉产，改良兽种；(四)兴办卫生事业。

5月2日　财政部长孔祥熙由赣抵汉。12日，张学良自豫专程返汉与孔会商，决定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设立华中经济讨论处，以张学良顾问端纳主持。其任务为详查华中各地各城市经济实况，对其商业不振和农村破产实况进行研究。

5月18日　宋子文考察西北后返回上海。翌日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对"西北前途乐观"，"希望国内银行界竞往投资"。20日，宋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西北建设计划"，获得通过。

5月21日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到会代表一百十四人，通过确定地方预算、废除邮包税、办理土地陈报纲要草案、举办外侨营业税、改革财税制度、举

办地契过户税以及所谓"整理田赋附加"、"救济乡村"、"废除苛捐杂税"等一百余件提案，27日闭幕。

6月1日　由宋子文、孔祥熙等发起组织之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开创立大会。资本定额一千万元，举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等二十一人为董事，张静江等七人为监察，孔祥熙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宋子文。该公司为欧美国际资本的大买办公司，定7月1日正式营业。

6月8日　财政部修正出口税则，规定杂粮、酒、糖、竹木器等免税；蛋制品、毛类、油脂等减税；烟叶等增税。经财部呈行政院，送请中政会转立法院通过，是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日，财部饬令各海关于6月21日起施行。

6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海关进口税则"，订7月1日起施行。新进口税则规定五金、机械、化学品等增税，棉纱、人造丝等十六项减税，使外货在华倾销得利。各地工商界纷纷表示反对。

7月4日　伪满公布所谓"企业局官制"，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以实现其"经济产业政策大纲"的要求。

7月13日　中国棉纺业巨擘、上海申新纺织公司资金枯竭，各银行不予续贷，茂新、福新、申新公司总经理荣宗敬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救济不应，上月底搁浅。是日，荣宗敬退职，由福新、茂新两面粉公司主持人王禹卿代理。国民政府实业部企图趁机攫取申新厂，提出由该部整理。

7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统一水利行政及事业办法纲要》及《统一水利行政事业进行办法》。17日，决定由经委会组设全国水利委员会，管辖长江、华北及各省水利。

8月1日　伪满实业部召开第一次产业调查局筹备会议，讨论设置产业调查局及人选等具体事项，以期确定所谓"产业政策。"

8月13日　财政部重申禁止外国银币如墨洋、日洋等入口，饬令各海关厉行监督。

8月15日　实业部农商银行复业，资本三百万元，有发行钞票之权。总管理处设上海，以陈公博兼董事长，梅哲之任总经理。同日，上海、汉口分行同时开业。

8月29日　行政院公布《奖励工业审查委员会规程》及《工业奖励审查标准》各十五条。

10月2日　伪满与日本议定邮政条约，内容规定：(一)划一邮费；(二)整顿伪满邮局；(三)废止二重设施(即邮件之转递)；(四)直接邮递包裹、小汇兑、普通汇兑及电信汇兑；(五)废止满铁沿线与日满交换之邮局；(六)邮票通用。

10月11日　上海中国兴业银行总行因经理秦抱元卷款潜逃，资金周转不灵发生倒闭。其附设之中国群益银团及六处分行同时停业。

10月18日　上海各交易所市场发生巨变，标金、纱花均狂涨。其中标金较标准挂牌价抬高二十余元，纱花远期花末盘一跳六角，涨风继续发展。

10月26日　中国实业银行因受上海中国兴业银行倒闭之影响，上海、天津、济南、青岛各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次日，芜湖、厦门两行亦发生挤兑。一、二日后均告平息。

10月28日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代表会议，决议反对增加棉纱统税二成，派代表郭顺等九人赴南京请愿，并发表宣言，请求各界援助。当晚郭等至南京向行政院请愿，行政院允转财政部考虑。

10月31日　伪满"满洲石油公司"成立，资本五百万日元，日资占百分之八十。社长日人桥本圭三郎，总经理佐藤谦三。该公司垄断伪满石油的开采与销售，是日军的石油生产供应部，在大连甘井子地方建设制油工场。

11月14日　伪满公布改订关税征税率，改订入口货一百八十种，出口货二十三种，以便日货自由进入东北市场，使之"日满经济一体化"。定于22日起施行。

11月22日　财政部为防止奸商将现银由内地偷运出口，命令江海关凡国内运输现银须有财部护照方准起运，如无护照，概以私运论，其货物全数照章没收。同时饬关税署令各地海关严缉私运。

11月24日　财政部根据《海关缉私条例》第31条之规定成立海关罚则评议会，设评议员五人。

12月10日　财政部于8日公布粮食运销局暂行组织章程二十一条，是日正式设立粮食运销局。

文　教

1月1日　上海宗教哲学研究所成立。该社由吴铁城、王晓籁、王一亭等发起。宣称"对社会提倡精神治疗，冶儒、释、道、耶、回五教为一炉，培养固有道德。"举李玉阶、章文通、王一亭、王晓籁等九人为理事。

1月10日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推行社会教育应切实注重国语，并附办法四条，以便推行。

1月20日　北平"文化团体联合会"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建议设立"中央文化委员会"，集中人才从事编纂、译述以三民主义为范围的书籍，严格取缔"反动"宣传，以加强对文化领域的统治。

2月11日　"中国文化协进会"在南京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潘公展为秘书长，周佛海、王云五、张竹平、郑正秋、叶秀峰分任教育、出版、新闻事业、电影、广播事业等委员会主任。

4月26日　教育部视察员调查湘粤等省中小学语文教育，鉴于文言文和读经有压倒之趋势，特向教育部报

告。是日，部长王世杰发出训令：全国各级学校务须遵照教育部的法令办理，并责成督学等对文言文和读经之风予以纠正。

5月31日　教育部颁布《研究所规程》。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已设研究所，饬照新章程积极整理外，并由部令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两校筹设研究所。

7月12日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由叶恭绰等十人任委员，傅汝霖任主席，制定《工作纲要》十条。

9月29日　中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在郑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为陇海路总务处副处长黄学周发起，各省出席会议代表七十余人，大会主席黎锦熙。大会宣言主张实行罗马拼音字母，改革汉字，以普及文化教育，普及国语，统一国语。26日闭幕。

11月19日　中国天文学会发起，联合中央天文、气象、物理三所及北平物理研究所、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等共同组织日蚀观测委员会，是日在南京成立，举蔡元培为会长。成立该会系因1936年6月19日、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见于我国。

11月21日　教育部派蒋梦麟、刘湛恩为出席菲律宾东亚高等教育会议代表。

12月7日　教育部在南京举行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议，出席代表五十余人。会议讨论职业教育指导、法令、经费、毕业生出路及各省市应如何实现部定中等学校的设置与经费支配等十案，决议由教育部督促各地实行职教法令，于各厅局设置专员办理职教。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5年

导　言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遵义，十五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分析批判。会议明确指出红军的挫折主要是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这次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遵义会议后，红军展开灵活的战术，四渡赤水，虚虚实实，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六月十二日，在翻越夹金山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李先念的红三十军会合。十四日，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北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同日本关东军达成协定，由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在协定上签字，是为《秦土协定》。这使日本侵略军轻易控制了冀察两省。

七月六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天津驻军梅津美治郎，对日本借河北事件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均予承认，答应撤退中国在河北的军队，这个函件被称为《何梅协定》。

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宣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产生了积极影响。

日本侵入河北和察哈尔后，扶植大批汉奸，宣称华北一旦脱离中国自治，日本愿意帮助。从而煽起华北“自治”运动，使华北局势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此时，日本正加紧侵略中国，而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卖国内战的政策。

十一月三日，国民政府在英国经济顾问的策动下，实行币制改革。通过法币改革，统一了全国币制，缓和了财政困难，一度促进了经济增长。

同月，国民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会议接受了蒋介石的方针，大会的对日政策开始有了变化。

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在中共领导下，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

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决定采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遵义会议
- ●四渡赤水战役
- ●《八一宣言》
- ●懋功会师
- ●张国焘另立"中央"
- ●"一二·九"运动
- ●瓦窑堡会议
- ●何梅协定
- ●秦土协定
- ●华北"自治"运动
-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 ●币制改革
-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遵义会议

背景介绍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抵达遵义，当时国民党军队后追前堵，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总结几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挽救红军和革命事业，成为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适应这种要求，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应采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肯定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明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突围问题上，我们没有较早地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主动转移，保存实力；在突围中又表现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见史料2）。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常务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的责任。接着，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我党在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材料：

- ·遵义会议召开的经过
-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
-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
- ·遵义会议侧记
- ·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材料一　遵义会议召开的经过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随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党中央利用部队休整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于基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自从通道改变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后，建立苏区根据地和如何打破几十万敌军的围攻，已是党中央和军委在阵地大转移的

战略行动中，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如果党不能及时总结红军第五次“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与长征以来在军事问题上的是非问题，红军就不能胜利地继续进行，甚至在征途中随时都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这是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最紧迫的问题。因此，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军团负责人都到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1月15日在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

会议一开始，博古代表党中央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正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质供应工作没做好等客观原因。他对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强词夺理，缺乏应有的认识，并为其错误辨护。

接着，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军事工作报告(即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的战争的失败，确有各种客观原因，但严重的损失总是事实，我作为军事计划的最高领导人，是应该对此负责任的。他在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之后，强调指出：红军正面临着不次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严重敌情，只有调换错误的军事领导，让善于运用运动战的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不管今后的道路还怎样艰难困苦而又遥远，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长时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党内、军内享有很高威望，他的态度震动了会场，使与会同志在敌人正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十分危急中，看到了红军得救而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敌我情况，说明第五次反“围剿”未能打胜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余，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是10比1，这四次反“围剿”斗争，不是都取得了胜利吗？而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却失败得那么惨重呢！这难道不是主观上军事战略指导方面的错误所造成的吗？他还指出：前四次反“围剿”斗争时，各根据地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红军却取得了很大胜利呢?!毛泽东强调指出，根据地的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蓬勃开展，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积极参战支前，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当时扩红运动形成了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而前方红军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能说后方支援不力吗?!毛泽东据理驳斥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辨护的错误观点。他还尖锐地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是瞎指挥。会上“毛泽东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毛泽东有意识地着重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方面所犯的错误，但对政治方面的错误没有批评和清算。这是由于当时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若提出政治方面的问题，一些同志肯定不同意，不接受，势必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而影响大局，影响当时的长征，甚至影响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的解决。因此，毛泽东的发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急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积极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极力主张改变军事指挥人，赞同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遣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而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牺牲了多少优秀的指战员。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坚决拥护毛泽东为我党领袖；他最后表示：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

刘少奇、李富春在会议过程中，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挥，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红军直接领导人，深有感触地在会上对军委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军委在指挥作战时过于集中、具体，常常由于敌情变化，军团的指挥不能独断专行，失去了许多有利于我的战机；还指出军委在指挥上不灵活，要求部队机械地执行分兵把口，搞短促突击，使红军行动失去了机动性，致使在敌人工事的密集火力下造成很大伤亡。特别是聂荣臻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指出，李德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

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要横加干涉。军团指挥员们说，以上有的意见，曾在前线向军委建议过，但都未被采纳；而且很多意见是不敢提的，甚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变动了军委布置打了胜仗，也吓得睡不着觉。怕提了与军委不同的意见，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反革命帽子吓人。军团指挥员们表示，衷心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坚信部队在毛泽东领导下，一定能够摆脱当前的困境。

会议上大多数意见是批评李德、博古，在整个会议进行中，李德常常坐在会议室的过道上，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有时，李德也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辨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别人身上。他看到会上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发言。

博古虽然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和耐心帮助，但仍对自己领导军委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缺乏应有认识。

凯丰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等的意见，还硬说毛泽东过去领导红军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上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接着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非常难堪，凯丰只好提出博古虽然在领导军事工作中犯了错误，但不要撤他的职。

扩大会议最后一次指出：博古"对于华夫（即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又鉴于"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为此，会议决定在组织上作部分调整：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议进行过程中，还讨论研究了当时形势以及会后红军的战略方向，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条件好的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到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够站稳脚根，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在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扩大会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违背了这一系列基本原则，犯了根本性质的错误。

遵义会议是在敌我兵力10与1之比，弱军被包围的极端危急形势中举行的。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摘自85年《遵义文史资料》第6期《遵义会议前后》一文，作者费侃如）

材料二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于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记得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同志就曾对我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有一次军委开会时，张闻天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同敌人死拼的错误方针，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结果引起了博古的不满，指责他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张闻天当然不服，两人就争执起来。李德忙出来当"和事佬"，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自相磨擦。张闻天却不理这一套，对博古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全听李德的，应该自己有主张。由此可见，他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张闻天同志早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准备，所以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1935年1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央决定，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了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过程中，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三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是在1月13日到15日。1月15日有份电报说，彭德怀同志已回前方，会议仍在进行。保存下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很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1月9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象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辨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上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别的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重点批判的是博古，同时批判了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我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短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辨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时，又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撤离遵义以后的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节选自伍修权：《我的历程》）

材料三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

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这样说

“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一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就犹如韩信。”这是陈毅在党的七大期间评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所作的生动比喻。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是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关键会议。会上，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与李德的错误辩解，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方面，对自己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毫无认识；

周恩来关于军事问题副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错误，同时主动承担了责任，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

张闻天作了系统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这个报告实际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

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事实，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这时，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这是个关键时刻。

毛泽东话音一停，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肃地批评博古、李德军事错误思想，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再地拒绝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而只听信少数甚至个别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说到这里，王稼祥有意识地看了李德一眼，恰好李德也正歪着头看王稼祥，眼神中满是怨恨和怒气。

周恩来似乎想缓和一下会场气氛，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你身体不好，坐下说吧！”王稼祥对周恩来说了声“谢谢！”并未坐下，反而上前几步对着李德一一列数起他的错误。

李德，面对这有理有据的严正批评，也只好收回目光，低头抽烟了。

王稼祥接着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一气说完，心胸顿时舒展畅快，苍白的脸上泛出了一层红润，多少要向党陈述的观点今天总算痛快地倾吐出来了。

他走回原位，周恩来忙过去扶他坐下。

聂荣臻因脚伤无法站立，伸过手去支持地同王稼祥紧紧一握。

李富春赞许地点头。

连神情严肃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也向王稼祥投去了亲切的目光和微笑。

政治局里由于王稼祥第一个明确而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接下去的会就热闹了。

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

陈云、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发言，推举毛泽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和指挥者。

遵义会议，事实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全军士气大振，上下欢呼四起，奔走相告——红军得救了！我们的党得救了！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作者邹书春，选自《党史纵横》）

材料四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材料，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博古为自己辩护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言辞尖刻，冷嘲热讽，不留情面，语汇通俗生动。他批驳了博古的论点，点名批评了李德。他谴责了在瑞金推行的扩兵的方针，把所有18岁至40岁的男人都拉进了红军。结果农业受损，粮食匮乏，最后不得不撤退。”毛泽东集中“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他指出：“‘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与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谈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毛泽东指出："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守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 ，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还着重批评了博古、李德长征出发后，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他指出："军队被迫长征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军需供应毫无计划。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没有认真地去实地侦察过地形。部队损失惨重，不仅在军事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被忽视，结果部队士气低落，而士气和觉悟对红军恰恰是生死攸关的。轻率地招募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然后又让这些新兵汇入匆忙而无计划的撤退之中，这是非常愚蠢的……轻率地从根据地'大搬家'，仓仓促促，考虑不周，携带成吨重的重型装备，战士们变成了一队一队的搬运工，他们必须先放下肩上的笨重东西，才能开枪射击。我们保卫了什么?缝纫机，印刷机……人们为保卫这些东西而牺牲了生命。"

毛泽东还尖锐批评了博古，特别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

(选自《大江南北》)

材料五　遵义会议侧记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的第二大城遵义。9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15日至17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有20人。他们是：

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凯丰)、邓发、刘少奇、王稼祥；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检讨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有关的争论，以便统一认识，并在组织上作出相应的决定。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即所谓主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极大帮助、白区和各根据地的配合不够等客观原因，不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即所谓反报告，系统批判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个"毛、张、王提纲"，就是会后张闻天受会议指定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

张闻天作反报告后，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也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自己辩解的错误，并系统地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一书的内容提要。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他们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古、周恩

来三同志，但又指出李德、博古二同志“是要负责主要责任的”。

会上被直接批评的是博古。博古态度尚好，他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没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批评博古，实际上就是批评李德。李德的态度十分顽固。他是列席的，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会议过程中，他曾为自己的瞎指挥及“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辩护，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

凯丰（何克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左”倾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他在遵义会上的态度很不好。聂荣臻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会前和会议中，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我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会议中他不但“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而且也反对周恩来的提出的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倡议。他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最后作出了下列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会后在红军从遵义向云南扎西（今威信）的行军途中，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 月 4 日，中革军委设置前敌司令部，根据张闻天提议，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不久，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周恩来为组长，负责全军的军事活动。而周恩来在军事上总是“接受毛主席的意见”。

张闻天受会议的委托，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和：“毛、张、王提纲”，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2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附近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是根据遵义会议内容和会议决定而写的，所以仍然称为“遵义会议决议”。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遵义会议，不可能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特别指出李德的“极端的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同时，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指挥权，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又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实际情况，实事求事地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因而，遵义会议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选自《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材料六　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1935 年 1 月，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一下了把敌人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南和以东，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红军沿途写下了“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的标语。

1935 年 1 月 15 日，决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在遵义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共 20 人。

在这次会议上，首先通过了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紧接着会议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行动，这也是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首先发言的是博古，只见他站在台上，手里没有稿子，完全是一种即席发言。从他的发言中可以听出，他在莫斯科的 4 年中，并没有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因为他在通篇发言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归咎于客观原因，忽视了主观上的错误，完全是一种推御责任的说辞。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的副发言。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说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指挥作战，但往往都是博古和李德说了算，

根本就不听周恩来的建议，所以，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对李德和博古十分不利。然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也纷纷发言，批驳了博古在他的总结报告所提出的错误说法。在这些人的发言中，尤以张闻天的发言最切中要害，因为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反"左"倾军事路线(通称"反报告")。他在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三个人集体创作的。而毛泽东在发言中又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症结所在。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指挥员长期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而李德却被毛泽东的发言深深地刺痛了，因为这使他的处境非常不利。

随着会议激烈争论的进行，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支持博古和李德的人只剩下了何克全一人，他只承认他们犯了错误，而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次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军委领导方式。"为此，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增补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乃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在遵义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再次召开了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月1日，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一个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及其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束，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在极端危急的时候，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四渡赤水战役

背景介绍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1935年1月19日上午，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此时，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相比，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它已没有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虽然仍号称四个军团。进入贵州以后又扩大一些红军，但总兵力仍然只有35000人。

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向东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三种可能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因此，蒋介石在这三个方面都作了布防，而以主力集中在东西北面，企图堵截中央红军，使之不能与红四方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企图把红军限制在乌江西北，再以川、湘、黔、滇及中央军薛岳兵团，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1月中旬，蒋介石电令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堵截，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鄂豫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今大方县)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企图在云贵川地区将红军团团围住，以达到歼灭的目的。

这时，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多人，而且没有后方根据地的依托，面临着蒋介石150多个团几十万重兵的重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红军当时处在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在敌人重兵的包围之下，形势相当不利。根据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四川境内军阀之间矛盾尖锐，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建立了大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入川，可以得到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利用军阀矛盾，求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决定："渡赤水，过长江，北上四川。随后红军便按部署行动，打响了赫赫有名的回渡赤水之战。

材料：

- 四渡赤水河
- 四渡赤水出奇兵
- 四渡赤水

材料一　四渡赤水河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减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干部团，全军缩编成了16个团：即红一军团的两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3个团，红五、九军团各3个团。

1月19日，全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开进，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迅

速北渡长江。蒋介石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调来了川军的40多个团来封锁长江，到24日至26日红军占领土城、习水等地时，川军的6个旅也先后到达了赤水、习水、土城等地，阻击红军北进。鉴于情况发生的变化，红军便给敌以打击后挥师向西，以凌厉的攻势，冲破了敌人的阻拦，在贵州的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进入了川南，准备北渡长江。

这时蒋介石见红军奔向川南，便急忙调整兵力，再次部署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为了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并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红军部队又一头扎向了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没几天，国民党军队便纷纷向着扎西逼来。见敌人向扎西逼来，红军则来了个出敌意料之外的做法，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突然从扎西调头东进，于2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渡口第二次渡过了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境内)。这样就把敌人远远地抛在长江两岸。

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迅速占领了桐梓。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则把他的部队撤退到遵义附近的娄山关凭险据守，他本人也亲自赶到遵义"督剿"，企图阻止红军夺取遵义，敌吴奇伟纵队也从贵阳驰援遵义王家烈。娄山雄跨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关侧群峰如剑，高耸入云，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把守娄山关的是敌王家烈的一个师，在我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守敌狼狈逃窜，红军则乘胜追击，再次占领遵义。这次战斗，共歼灭王家烈的两个师，王家烈本人从遵义仓惶逃跑时，只带了几个随从。

红军占领遵义后，王家烈和吴奇伟又纠集了一部分部队向遵义发动了进攻，但他们却被红军阻于遵义南面的制高点——红花风、老鸦山、碧云峰一带，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为了全歼进攻之敌，红军部队全线出击，顿时将敌人团团包围。敌人见状，不得不慌忙向南溃退。红军则乘胜猛追，直达乌江边上，歼敌一个多师。残余的敌人渡江南窜，吴奇伟深怕红军继续追击，没等残部过江，就下令破坏了乌江上的浮桥，把1000多人弃在乌江北岸，作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主力在遵义附近进行的这次战斗，在5天内拿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的8个团，消灭了吴奇伟部的两个师，一直将敌人追到乌江边上，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要不是敌人事先将江上的浮桥砍断，就连吴奇伟也会成为红军的俘虏。

红军主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英明地指挥了红军进行了声东击西，大踏步地进退，大范围地迂回和采用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从遵义会议后，红军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迷惑了敌人，调动了敌人，拖垮了敌人，从而为这次战斗胜利创造了条件。他们的行动，正象2月2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的《告全体红军战士书》中所说的："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3月2日，遵义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便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红军的新的围攻。他命令各部修碉堡封锁，步步进逼，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遵义、鸭溪的狭长地带内。而红军则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待敌人纷纷被吸引到遵义地区后，又从遵义向西，在茅台渡过了赤水(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了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见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便急忙调整部署，在四川、贵州、云南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布置包围圈，企图在长江以南围歼红军。但是，蒋介石又中计了。就在他急忙调整部署，以川、黔、滇三省的军阀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红军进逼，以滇敌孙渡纵队主力集结于毕节地区堵击，企图对红军形成包围，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时，红军不仅没有北渡长江，反而于他们到达四川南部、贵州北一带后，突然于3月下旬调头东进，从四川西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再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这就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了后边，并使他们的碉堡群完全置于无用之地。

在这段时间里，红军四渡赤水，忽儿向东，忽儿向西，不仅把国发民党军队的重兵甩在了赤水河以西地区，也把个蒋介石弄得昏头转向，莫明其妙。他哭丧着脸说："现在共军忽然向东回师，但其主力是向东去？还是仍向西去？"被迫无奈之际，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亲自从重庆飞抵贵阳"督战"，他要在这里紧缩包围圈，以期消灭红军。他在他的部下为他选择的一座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之时，毛泽东却正指挥主力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鸭溪、白腊坎地域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直奔乌江而去"他命令第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在此地区，诱使敌人向北出击，以便于红军主力秘密迅速地向南转移。2月29日晚，第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的路上摆上了露天的标语.在路侧放置许多烟火，远远看去好象是主力部队做饭时升起的炊烟。就在国民党军队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时，红军主力除第九军团外，其余全部于3月31日渡 过了乌江，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把几十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甩在了乌江北岸。

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继续采用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令一部队监视息峰以北的敌人，并伪装为红军的主力部队，摆出一种东进湖南，会合二、六军团的姿态。而主力部队则经息峰、扎佐、直逼贵阳。蒋介石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部队统统派到前方去堵截红军去了。

(选自《20世事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二　四渡赤水出奇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左”倾主义领导者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节节抗击，步步退守，始终处于被动，最后在蒋介石大兵压境下，不得不向西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经过两个月的征程，红军突破了蒋介石的封锁线，来到了贵州省遵义，但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也蜂拥而来。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一反“左”倾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死板做法，以其特有的远大战略目光，一切从我情、敌情、民情、地形等实际出发，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扔掉了一些笨重的辎重，精简了各级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干部团，中央红军共缩编为16个团，其中：红1军团编两个师6个团，红3军团编3个团，红5军团和红9军团各编3个团。这时，红军面前仍然是优势的敌人，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阻止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他紧锣密鼓，调兵遣将，企图压缩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会剿而聚歼之”。蒋介石聚集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约150个团，40万人的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组成一个大包围圈。东面是湘军刘建绪4个师的兵力；西面是云南军阀龙云的6个旅2个团，共2万4千人的兵力；南面是薛岳的8个师的兵力，以及黔军、粤军等部队；北面是刘湘的12个旅36个团的兵力，以及上官云相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的重点是防止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在这一方向上，他部署了两道封锁线：第一道是泸州、叙永、毕节一线；第二道是横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

蒋介石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虽然很周密，兵力众多，占有优势，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川黔滇湘四省敌军的作战部署尚未就绪，蒋介石欲完成对红军的合围还需一定的时间。

挥戈北进，一渡赤水

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提出了作战方针：“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向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1月19日，红军除留3军团第4师在遵义阻敌外，其余兵力分三路，分别从原驻地向赤水方向推进，而后准备向四川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相机从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红1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地区出发向西，经温水、良村向赤水前进，任务是向綦江、赤水两个方向侦察警戒；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红9军团为中央纵队，分别从遵义、桐梓出发，经官店直奔赤水；红3军团为左路纵队，从懒板凳出发，经遵义、芝麻坪、大塘口、土城、猿猴，直抵江安。

红军离开遵义后，黔敌6个团即向遵义袭来，红3军团第4师不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最后主动撤离遵义，追赶大部队。1月19日下午，黔敌便占领了遵义，并派出部分兵力尾随红军。

1月27日，中央军委抵达土城，此时各路敌军纷纷向红军靠拢，根据侦察的情报得知，尾追之敌为4个团的兵力，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中央军委当机立断，命令红1军团第2天北上夺取赤水县城，以红3、5军团占领土城以东2至4公里处的有利地形，打击刘湘的先头部队。1月28日晨战斗打响了，红军连续奋战近4个小时，敌人仍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敌刘湘发现红军滞于土城，急令其各部向土城急进，企图合围红军。敌军陆续逼进了土城，毛泽东立即命令红1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当天下午两点，红1军团第2师就跑步返回，到达了白马山阵地，投入了战斗，连续反击敌人，终于打退了敌人。我军阵地巩固后，毛泽东在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决定不与敌人恋战，变被动为主动，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镇渡过赤水。1月29日3时，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关于《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

周恩来同志亲自率领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参谋，选择渡河地点。经过沿河的考查，最后将架桥地点选择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沙滩处，这里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疏开的地形，便于红军展开队形渡河，也便于隐蔽和迅速投入战斗。与此同进，朱德总司令率领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取了敌人的一座浮桥。于是，由1军团、9军团、军委2、3纵队、干部团组成的右纵队，由军委1纵队、红5师组成的中央纵队，以及由5军团、3军团直属队、红4师组成的左纵队，在29日拂晓前全部渡过了赤水。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渡河，红军炸掉了所有渡河器材，并向老乡作出了赔偿。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看到涛涛的河水，只好隔岸兴叹。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调整了部署，分左右两路纵队，进入川南古蔺县境。左路纵队由军委纵队、红3、5、9军团组成，渡过古蔺河，经太平、大村、丫叉、镇龙山、白沙等地，进入古蔺县；右路纵队由红1军团组成，经古蔺店子坝、桂花、大寨等地，向叙永县的三岔河前进。2月1日，红1军团在三岔河鱼塘坳与川军遭遇，当即将其击溃，红军直抵叙永城下。

蒋介石见红军渡过了赤水河继续北上，急令其北路军各部加紧部署，并派兵向叙永增援。鉴于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分析，认为红军若继续北上，正适合蒋介石欲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企图，因此，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红军改变行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省扎西前进。

2月3日，军委要求红军立即脱离当面之敌，向川滇边的扎西集结。5日，要求部队若渡江不可能，"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中央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改取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然后由黔西向东实施有利发展。2月8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了扎西地区，进行短期休整。此时，蒋介石仍以为红军要继续北上，迫不急待地令其主力在北线加紧布防，并命令各机动部队向红军靠拢。

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敌情、我情，指出了红军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最后指出：红军应采取机动灵活的原则，敌变我变，红军的作战线应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现在，蒋介石把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黔北敌人比较空虚，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错误。因此，红军应该集中兵力，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在川、黔、滇边区实行机动作战，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壮大红军，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

回师东进，二渡赤水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消灭红军的迷梦，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对我中央红军实施围追堵截。2月初，蒋介石收到了薛岳送来的一份情况，说我党在遵义召开了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大为吃惊，他在前几次"围剿"中央根据地时，都领教过毛泽东卓越的指挥艺术，毛泽东的威力曾使他四次失败。他本以为我党和红军内部存在分歧，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以利于他各个击破。此时，蒋介石获悉我中央红军进入扎西，他急忙调整部署，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中央军第1、2纵队从扎西东面和南面方向攻击红军，以滇军孙渡部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攻击红军，以川军各旅从扎西东北和西北方向攻击红军，企图以几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包围和压缩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蒋介石深知毛泽东用兵如神，他再三告诫其部下对付毛泽东的红军要"慎之又慎"、"不可轻敌"。于是，蒋介石驱使着大队人马向川滇黔边区蜂拥而来，而此时黔北地区的敌人却十分空虚。

敌人纷纷向扎西逼近，在其尚未形成包围圈时，红军已经在扎西地区得到了休整。为了把中央军委"重返黔北"的战略意图变成全体红军的自觉行动，2月16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是在革命战争的许多胜利中创造与发展起来的。和平地创造苏区，完全是一种幻想。没有流血的战争就没有苏区。"毛泽东同志也反复向指战员讲解中央的战略意图，指出："红军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有利的战机，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拒绝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中央红军统一了思想。

2月21日20时，朱总司令电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中央军委把红军划分3个纵队，左翼队由红3军团及红1军团一部组成，经扎西、双河场向摩泥场前进；中央队由军委纵队及红1军团主力组成，经大河滩、石坎子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右翼队由红5、9军团组成，担任佯攻和迷惑滇敌，以掩护主力转移，然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

经过4天的秘密行军，红军先后到达古蔺营山、摩泥、黑尼哨等地。2月15日，军委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规定"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到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区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太平渡位于赤水河西岸，有四五十户人家，是川黔交界地区的一个小市镇。红军在这里开展过工作，群众基础较好，他们愿意帮助红军渡河。2月18日，红1军团前卫2师奉命先机抵达太平渡，因太平渡无敌军，红2师迅速控制了渡口，并征集渡河器材。红军以每只船二三十块白洋的办法，征集了20多只船，还有一些门板、楼板、木杆等等。工兵连同志连续奋战，很快在太平渡的沙溪渡口、九溪口、凤溪口、老鸦沱和二郎滩等地架好了浮桥。19日1时，红2军渡到东岸，此后，红军在21日前，全部渡过了赤水河。

红军二渡赤水后，立即向黔敌发起了猛烈攻击。红军行动异常迅速，出敌预料。蒋介石发现红军渡过赤水后，急令黔军在娄山关、桐梓一线阻击红军。2月24日，红军迅猛地攻占了桐梓城。中央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并乘胜夺取遵义城。

桐梓被红军攻克，敌人受到了极大震撼。蒋介石急令薛岳驰援遵义。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军委预备队红13团"务必于今日（25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

山。”红13团的前身是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左右江起义形成的红10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团长彭雪枫做了短暂的战斗动员，全团立即奔向娄山关。欲夺娄山关，必先占点金山，因为此山又高又尖又陡，可以俯瞰娄山关，形成火力优势。红13团前哨9连首先与敌遭遇，7、8连相继进入战斗，向敌人猛攻，很快占领了点金山，随即转向攻打娄山关。敌人深知娄山关的重要，拼命抵抗和反扑。彭德怀军长调兵遣将，命令红11团增援娄山关。双方在娄山关展开了激烈的夺争战。红军顽强战斗，终于在下午8时，占领了娄山关，为下一步重占遵义扫清了前进障碍。

毛泽东同志以其宏大的气魄，卓越的才华写下了描写类山关战斗雄伟景象的慷慨激昂的词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27日，彭德怀、杨尚昆同志指挥红1、3军团，遵照中央军委“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薛敌唐、韩两师”的命令，向遵义急驰。彭德怀、杨尚昆命令“3军团于3时前由四渡站下坝一线出发完毕，沿马路向遵义速进，消灭或驱逐沿途溃敌，直逼遵义城而占领之，如敌固守遵义时，则11团、10团、12团由遵义城东北向新老城攻击，13团集结于老城西北，对牛蹄塘、毛石坎方向警戒，并派出侦察，11团应以一部占领老城南端之红花冈、碧云峰高地，并向鸭溪场方向侦察警戒。第1军团以集结主力打击增援之敌为目的，尾3军团后进到遵义城东南水师坝及其东北集结，必要时准备一部由新城东门协同3军团政城，对懒板凳及湄潭方向警戒侦察”。

红军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迅速逼到遵义城下，红3军团主力11、12、13团立即向遵义老城发起了猛攻，敌人伤亡众多，仓皇溃退，红军随即占领了遵义城。

此时，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奉命正向遵义驰援，吴奇伟来到王家烈的指挥部，共同策划：“川黔公路(含)以西，由吴部两个师向红花冈进攻；川黔公路(含)以东一带高地，由黔8团坚守。”28日上10时，吴奇伟的两个师开始行动，他们孤立突出，为我红军打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立即进行了歼灭吴奇伟的部署：红3军团以10团、13团控制老鸦山、红花冈、插旗山、碧云峰一线的山头，构筑防御阵地；以12团在遵义通贵阳的公路以西迂回，向敌侧背攻击；以11团正面迎敌。红1军团配合3军团迎敌、侧击，并断敌退路。

28日上午，吴奇伟的两个师依仗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向红军阵地攻来。红军坚守阵地，敌人虽然火力密集，攻势猛烈，却始终未能从正面突破红军，吴奇伟命令向右侧的红11团攻击，又未能占领红11团的阵地。敌人久攻不克，急得团团转。这时，红1军团已经作好准备，沿遵义城东南的山脚，绕到敌翼侧的一片树林中，隐蔽起来。到了黄昏，红军发起了总攻，在红军主力强大的进攻面前，敌军立即溃散，乱如黄蜂。红军勇猛追歼，锐不可挡，势如破竹，向吴奇伟的指挥所逼近。吴奇伟此时已经控制不了部队，组织不起来有效的抵抗，他急忙调头南窜。红军不顾一天战斗的疲劳，连续作战，直追乌江。吴奇伟见势不妙，只顾自己逃命，他渡过乌江以后，下令斩断浮桥保险索，正在渡江的敌军，统统随着向下游漂移的浮桥落入了水中，留在北岸的1800余人，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在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的胜利。

转向西进，三渡赤水

红军重返遵义，并重创了国民党中央军，使蒋介石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他立即重新组织对红军的围堵。3月2日，蒋介石飞往重庆，命令龙云、刘湘、薛岳各部广修碉堡封锁线，步步进逼红军，并叫嚣要在遵义、鸭溪的狭长地带内歼灭红军。这次，他亲自指挥各部队的行动，企图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消灭红军。蒋介石判断红军二渡赤水，一定会向东前进，与肖克、贺龙2、6军团会合。为此，他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设防，防我红军东进；并命令滇军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在打鼓新场一线，堵我红军西进；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滥泥沟、修文、六厂河、息峰、黄水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我红军南下；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我红军北上。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变化，将计就计，命令红军有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国民党中央军出动，并准备在黔北再歼灭敌中央军一部，粉碎敌人当前的围堵。军委决定，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域阻击黔北方向的敌人，吸引川敌向东并钳制该敌；以红1、3军团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乘吴奇伟纵队新败之际，摧枯拉朽，打击敌周浑元纵队。

于是，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红军的这一行为，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一

方面认为红军在遵义消灭了他两个师，所以红军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有毛泽东灵活战略战术的指导，因此他告诫下属，对红军要不可轻视；另一方面，他认为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大部队行动不仅给养供应困难，就是些草也不易获得，红军在这种地区内徘徊不前，说明红军尚未定下前进的大方向。蒋介石又进一步认为，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红军大部队无法实施有效的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地区打游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绝好时机。3月9日，他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向前推进，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将红军包围在遵义地区。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改组了军事领导，发扬了民主作风，凡属重大作战行动，每天要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才能决定，这样显然与战场多变、紧张的情况不相适应。于是，党中央在遵义之战胜利后，成立了3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保证了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3月13日，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确立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决定红军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的敌人则在紧急和有利的情况下与之作战。

红军于是积极寻找歼敌之机，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敌人虽然向红军进发，但因红军的飘游不定，使敌人大惑不解，不敢采取大的行动。蒋介石也搞不清红军的真正意图，因此他命令各部队必须弄清红军企图之后，方可采取大的攻击行动。

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命令红军主力向鲁班场之敌进攻，坚决消灭该敌，以扭转整个战局。15日15时，红军发起了进攻，由1、3军团主力及干部团组成的右翼队，取道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由5军团和3军团的第10、13团组成的左翼队，在西南协同1军团突击敌人，3军团从鲁班场、三元洞之间突击敌人，并向5军团靠拢；9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因敌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工事，并有空中飞机掩护，红军虽给敌军以重创，但未能攻占鲁班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于晚20时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并命令红军主力转向茅台歼敌。于是，红军以迅猛的动作直奔茅台，至16日晨，红军就攻占了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茅台。这一仗，表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当敌我双方在鲁班场打成对峙状态时，虽然红军仍占主动，但不能速胜，而当红军转至茅台时，鲁班场之敌却依然龟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追击红军。毛泽东指挥的着眼点就在于发扬红军的优长，以迅速的机动歼灭敌人，而不与敌人拼消耗。

毛泽东在鲁班场战斗中，见不能迅速消灭敌人，凭借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战略意识，迅速形成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摆脱敌人，迅速撤出鲁班场战斗，挥军北上，从茅台三渡赤水，将敌人的主力再次吸引到川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彻底甩掉敌人。中央军委迅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红军占领茅台后，照例打土豪，做群众工作，把土豪家里的粮食、财物和茅台酒分给工农群众。广大群众积极支援红军，纷纷送来船只、木板等架桥器材，红军工兵迅速在离茅台不远的珠沙堡和观音寺各架设了一座浮桥，并修好一座被敌人炸坏的浮桥。红军于16日18时开始渡河，17日中午全部渡河完毕，再次进入了川南。尔后，中央红军公开摆出了再次北渡长江的姿态，大队人马经古蔺妙山、金华寺，进入万宝寨、大村、铁厂、皇华、镇龙山等地的山林中隐蔽集结，等待着新的战机。

神兵南进，四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使急于探明红军战略意图的蒋介石，再一次造成了错觉。3月16日至18日，敌人飞机侦察到了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判定红军必然要北渡长江，他急忙把重兵再次向川南调动。红军将计就计，以红1军团的1个团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佯装红军主力，作北渡长江之态，迷惑敌人，当他们行至镇龙山时，该处敌人因戒备不严，很忙溃逃，这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他令各路纵队向川南急驰，妄图将红军消灭在赤水河以西地区。

正当蒋介石指挥几十万大军向川南进发之际，毛泽东棋高一筹，艺高一著，抓住战机，出敌不意，在蒋介石云集大军、遍筑碉堡，尚未形成对红军的包围部署时，毅然决定红军四渡赤水，回师东向，南下贵州，使敌人无用武之地。

20日，朱总司令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1军团留1个团在镇龙山，并逼近古蔺方向之敌，伪装红军主力西进；红军主力部队立即渡过赤水河。于是，红军再次以神奇的速度向赤水河奔去，9军团在二郎滩，军委纵队在九溪口，3军团在太平渡，1军团在林滩，于22日上午前，分别渡过了赤水河。之后，红军迅速南进，与北上川南的敌军相对而行。为了争取南下先机，红军急速前进，并派红9军团佯装红军主力，在马鬃岭西北地区大造声势，迷惑敌人。这一着十分有效，蒋介石又一次上了当，他把红9军团视为红军主力，当红军主力南下之际，他仍以为红军主力在他的封锁线以北地区，他急令孙渡速取直径，在打鼓场方向堵截红军。而此时，红军主力却穿过了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我军先头团的一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了对岸，顺利地攻占了渡口。到31日，除红9军团留乌江北岸阻击、迷惑、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红军的行动非常秘密、迅速、坚决，神不知鬼不

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精心策划，严密部署，尚未完成的包围圈，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

红军南渡乌江以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四渡赤水之战，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在毛泽东正确的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从容不迫，敌变我变，巧妙地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川南、黔北地区周旋，一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那种笨拙、呆板的"正规战"模式，发扬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运动中积极寻找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在四渡赤水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不断调动敌人，使红军冲破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

（选自《百战图》作者：王洪武）

材料三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军事上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争取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组织上，整顿全军，精简了机关和后勤部队，许多工作人员到连队里当战士，充实了连队战斗力，不少干部下放到连队。加强了基层组织领导，丢掉了笨重的机器和不必要带走的辎重物资，轻装前进。整个部队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气象焕然一新。

一月十九日，我军离开了遵义，经桐梓、松坎，向贵州、四川边界的赤水挺进，打算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和第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看到红军要直捣他的老窝，就拚了死命来堵击。我军在遵义时，刘湘已经调集他的最精税的所谓模范师郭勋祺部开入綦江，把五师陈鸣谦也从涪陵调到川南，把二十一军大部队驻守在长江南岸，全力防堵我军入川。当我军向赤水前进时，刘湘就急忙命令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赶赴赤水，竭力堵击。同时，湘军徐源泉部由彭水，王东原部由酉阳、秀山，陈光中部由石阡等方面截过来，黔军犹国材、何知重、柏辉章和湘军章亮基等部从遵义尾追，吴奇伟纵队又绕贵阳，出清镇北上，滇军孙渡亲率二、五、七三个旅从毕节方面拚命赶来。所有这些军阀军队又再一次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把红军压缩在包围圈里消灭掉。

当时敌我双方都要抢先到赤水，我军和敌军郭勋祺部齐头前进，双方只有一山之隔。我们走的是崎岖山路，敌人走的是公路大道，双方都向着一个目标——赤水前进。

当我军向赤水前进时，侯之担在土城集结了三个团拦住去路，我军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垮了。这个在红军手下连吃败仗的军阀，从此就以"剿匪不力，迭失名城，擅离职守，贻误军机"的罪名，被蒋介石以"军法制裁"了。

我军进驻土城时，群众燃放鞭炮，夹道热烈欢迎。土城的茅台酒很多，赤水河从土城流过，河水清彻见底，是做酒的好水源。在土豪家里，满屋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立即分给了群众；部队也留了一些。这时候，会喝酒的同志就畅饮一番，不会喝酒的同志，在急行军后，拿点茅台酒擦擦脚，也很舒服，第二天走起路来，两条腿就轻快得多。

赤水地势险要，扼守在赤水的川军部队，凭着险要的地形顽抗，落在我们后边的郭勋祺部又很快赶到，要和我们拼命。看来硬攻很不利，我们就改变了原定渡过长江的计划，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前进。二月八日到扎西，这天正是阴历除夕。当晚下着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不久就雪深过膝，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觉得到处白色，象个银世界，十分好看。在扎西休整了一天。利用这一天，各军团继续完成整编工作；有的工作人员又下连队参加战斗，进一步充实连队战斗力。在扎西一带，我们又扩大了红军三千多人。这里的群众参加红军的情况也非常热烈，他们不是三个、五个地参加，而是成批成批地几十个几百个地来参加。云南的各个兄弟民族受云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很深，一号召打云南军阀，群众就纷纷响应，踊跃参加红军。

我们到了扎西，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和"中央军"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拼命追，这样一来，敌人的后面就很空虚了。于是，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扭过头来，二渡赤水河，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乘虚迅速地又占领了桐梓。这时王家烈急忙把遵义及其附近地区的部队调往娄山关一线布防，想阻止红军前进，我三军团第十三、十二团和十一、十团就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把敌人消灭掉，乘胜追到遵义，当天夜里就二次占领了遵义。这时王家烈还在遵义城，他以为他的部队凭险据守娄山关，满可以顶一阵子，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快被我们消灭了，更没想到红军已经来到遵义。所以当红军进到遵义时，他只带着几个随从仓皇逃去，极为狼狈。他的兵力没有了，蒋介石也就把他一脚踢开，派了官僚政客吴忠信来代替他，这个烟鬼主席只好下野出游。

这时候薛岳还在贵阳，看见红军二次占领了遵义，就急派吴奇伟纵队来增援。我一、三军团和干部团在滥板凳和才溪（鸭溪）之间，趁他立足未稳，来一个猛打猛冲，在老鸦山附近一下子歼灭了敌人两个师的大部分，剩下的扭头就跑，漫山遍野象茅坑里的蛆一样，蒙头转向，到处乱窜。我军抓住这个战机，猛追下去，先头部队一直向前冲击，把溃散的敌人甩在后边。沿途都是打散了的敌人，有的溃兵迷失了方向，也盲目地跟在我们队伍里跑。他们还问我们的战士："你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的战士回答道："工农红军。"敌人一听，有的吓跑了，有的就跪下来缴枪。到处都是溃兵，我们个个都下手抓俘虏，炊事员、司务

长甚至伤病员都抓俘虏，俘虏实在是太多了，抓也抓不完。我军有的部队一直追到敌人烧水造饭的地方，抓他们的伙夫，这班伙夫还以为开玩笑，把手一撇，说："还开什么玩笑，饭还没有做好呢，你们还吃饭不吃饭！"转过头来，一看是红军，吓得脸如土色，连忙跪下，大叫饶命。我们这样一直把吴奇伟追到乌江边，吴奇伟只带着几个人渡过了乌江。跟吴奇伟突击出去的一千多人正要渡江，吴奇伟看到红军快要追到，就立即砍断了浮桥的保险索，桥被急流冲断，剩下的一千多人也就在江北全部作了俘虏，敌人的武器装备全部被缴获。这一仗打得真痛快，把敌人主力，甩在赤水河西，我们回头以优势兵力，一连歼灭了王家烈八个团和吴奇伟两个师。这是长征以来空前伟大的胜利，是毛主席战略方针的伟大胜利，也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的伟大胜利。

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吴奇伟两个了师以后，部队在乌江以北休整了三天，准备把周浑元的部队吃掉。这个家伙，从江西、湖南起一直紧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追，现在用不着追了，红军等着你。可是周浑元真狡猾，他看到我军歼灭了吴奇伟两个师，就吓得躲在贵阳，不敢出来应战。

蒋介石吃了败仗，极为恼火，怒气冲冲地于三月二十四日从重庆飞到贵阳，要亲自"部署一切，统一指挥"。

毛主席为了再度调动敌人的兵力，又令我军从遵义转向仁怀，三渡赤水河。蒋介石以为我们又要过长江，急调薛岳到川南堵击，令川军在叙永一带固守，并在桐梓以北，由川军郭勋祺、潘佐、魏楷，黔军蒋在珍、侯汉佑，湘军王东原及"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等组成五路纵队，齐头向仁怀一带压过来。又调滇军从毕节尾追，并在桐梓、松坎、鸡鸣关、鸭溪、白腊坎、枫香坝、长干山、谭厂、仁怀之间以及赤水、土城之间，大力修筑碉堡群，企图在遵、桐以西，赤水河以东一带地区，布成一个大包围圈，使我军"自投罗网"，以便"一网打尽"。我军从仁怀三渡赤水河，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川南、黔北一带以后，又突然转回头来，四渡赤水河。蒋介石日夜抢修的碉堡群，毫无作用，只好作为自我欣赏的陈列品；"包围圈"，这个蒋介石的得意杰作，也就全部破产了。

这时，毛主席又令我军摆开了几个阵势，迷惑敌人：一部分队伍佯攻贵阳，一部分又用最快的速度东向瓮安、黄平挺进，摆出要急于和第二方面军会合的样子，又留下第九军团在仁怀一带牵制住敌人。我军佯攻贵阳时，贵阳及其周围很空虚，守敌只有三个团，我军一度占领了离贵阳城二十里的飞机场，把宋美龄吓得丧魂失魄，连忙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毁掉。蒋介石更是恐慌万状，急忙命令云南军阀龙云部队星夜兼程开赴贵阳增援，调湘军李韫珩五十三、五十九两个师到息烽。蒋介石又怕我们和第二方面军会合，除令何建到常德亲督陶广、郭汝栋及李觉等部向我第二方面军进犯外，并急调湘军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川、黔、湘边界的铜仁、秀山、酉阳一带布防堵击，并急派一部分兵力赶赴镇远、施秉、余庆阻拦，令李抱冰部直奔黄平，又令吴奇伟、周浑元、何知重等部向东尾追。这时敌人象捅了马蜂窝一样，慌慌张张，敌作一团。

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料敌如神，使敌军陷于完全被动挨打状态。我们巧妙地把云南军阀部队调到贵阳附近，又把川、黔、湘各省军阀和薛岳部队调到黔北、黔东及湘西以后，乘虚向黔南前进。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渡过乌江，随后连克定番（惠水）、长顺（长寨）、广顺、紫云，渡北盘江，占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再一次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从黔南转入云南了。当蒋介石发现我军由黔南入滇后，又急调薛岳到安顺督师，调滇军到长顺、黔军到紫云、湘军到罗甸、桂军到册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军的背影浩浩荡荡地进入云南，毫无办法。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统一指挥"的结果，正好把兵力"统一"起来，让毛主席统一调动。主席叫敌人到哪里，敌人就到哪里，主席不但指挥了自己的聪明机智、勇敢善战的红军，同时也指挥了蒋介石和他的反动而愚蠢的军队。

我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期间，……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争取了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军战士勇敢机智，生龙活虎，所向无敌。敌军却疲于奔命，蒙头转向，十分被动，到处挨打。我们在贵州的一个小镇子里，看到周浑元部的政训队在墙上写的几个大字："本师奉命，开赴谭厂，掉队士兵，赶快跟上，今日行程三十里。"可见敌人的疲惫和狼狈相。

红军在长征途中，不仅每天要和几十万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部队作战，而且还要和沿途的地主武装作斗争。这班惯于敲诈勒索、吸尽民脂民膏、骑在当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民团，当然不敢正面和我们作战，就躲躲闪闪地埋伏在深山密林里，伺机伏击，干着暗害我们革命同志的反革命勾当。我们分队的副队长（副局长）钱壮飞同志就是在南渡乌江时，在沙土、牛场一带的大森林里，被地主武装伏击杀害的。

中央军委纵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回到遵义。当我们四渡赤水，返回遵、桐一带时，常常看到许多感人肺腑的情景：沿途的干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军留在干人家里的伤病员掩护起来，想尽办法尽快地把他们的伤病治好。老妈妈还亲自带着病伤治愈后的战士来归队。我们把银元送给老妈妈，她们坚决不要，而老妈妈送给我们的包谷巴巴，却非让我们收下不可。沿途参军的干人也不少，各连队每天都要接待新来的阶级兄弟。贵州的干人们和中央苏区的工农群众一样，是和我们心连心的。

我军甩开了敌人的主力，由黔西南向云南前进，当时

的主要任务就是行军。晓行夜宿，十里小休息，三十里大休息。在大休息时，喝开水，吃干粮。在行军途中，大小休息的时候，战士们的歌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宣传队的政治鼓动工作，更是活跃。在鼓动棚里，快板诗歌，伴着有节奏的锣鼓声、口琴声，使伤病员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战士们更加精神抖擞，不知道什么是疲劳。连队干部和部队首长经常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当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枪、背行李，互助友爱，亲如兄弟。

……

（选自《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作者：戴镜元）

《八一宣言》

背景介绍

《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发表，故称《八一宣言》。1935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这个宣言，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国外正式公布。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真诚觉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提出组织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成抗日联军，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材料：

- 《八一宣言》的发表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流”之“源”

材料一　《八一宣言》的发表

对于国民党一次次的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特别是在卖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订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1935年8月1日，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有许多特点。宣言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阅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力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同城市中心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思潮，是带有全党性质的问题。这种极“左”思潮（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还有国际的背景，它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长官意志，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革命的残酷屠杀，同中间阶级叛变革命，反复无常，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要化敌为友，要把昨日的背叛者认做同盟者，联合次要敌人反对主要敌人，这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党是在多次的失败和挫折中，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才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阶级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一工作，是在瓦窑堡会议上完成的。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流”之“源”

在东北危急、华北危急、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曾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是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酝酿讨论，由王明执笔；又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查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它的发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

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同志曾对《八一宣言》作过极高的评价，认为：有了《八一宣言》之“源”，才有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流”。本文试从五个方面对《八一宣言》的历史作用进行分析。　　——作者

一、《宣言》是集体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宣言》是代表团集体智慧的产物。1935 年初夏，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件 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等同志心急如焚，认为在此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对策。于是，便急电在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的王明，速反莫斯科。据吴玉章事后回忆说：“三五年六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士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立即组织代表团成员讨论国内形势。大家一致认为，为了配合共产国际的战略转变，指导国内的抗战，有必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经过代表团的多次讨论，于 7 月 14 日通过了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将宣言译成俄文呈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8 月 7 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作中国问题报告时，首先向世界各国宣读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后来又经代表团修改，才于 1935 年 10 月 1 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因宣言注明日期为 1935 年 8 月 1 日，故史称《八一宣言》。

《宣言》既不同于 1934 年 4 月 20 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 1779 人签名或同意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在我党原有统战口号及其主张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一个以崭新的姿态出现的一个统战文件，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1. 在联合对象上，宣言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个民族的最广泛的联合，提出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2. 在联合组织形式上，宣言已不再只限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援助，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实现更有效、更高形式的联合。3. 宣言虽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但却希望各党派抛弃以往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4. 宣言不再是出于与国民党的斗争需要，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诸实施，希望各抗日力量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具体行动，并愿作为发起人。5. 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措施，以“抗日救国”的口号代替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了与一切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表示同情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主张。

二、《宣言》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

1937 年 11 月，毛泽东在欢迎王明等人回国的谈话中讲到，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有今天，应该“饮水思源”；是党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才促成党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

为了迅速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长征后中断的电讯联系，使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党的《八一宣言》在国内得到落实，中共代表团先后派林育英(化名张浩)、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回国。他们先后于 1935 年 11 月、12 月和 1936 年初回到陕北。林育英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直罗镇指挥作战，直到 12 月才回到驻地。林育英向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后，中央立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研究具体落实问题。

在 1935 年 12 月下旬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党的《八一宣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宣言中的许多观点，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后，毛泽东同志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恢复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一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

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既是贯彻国际七大精神的结果，又是对《八一宣言》具体化、理论化的结果。它解决了《八一宣言》作为公开统战文件而无法解决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基本问题：正确地分析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军阀不同程度的抗日要求，提出了不但要团结 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指出了要实现统一战线的策略，必须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作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在批判关门主义的同时，又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措施；明确了共产党必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党的《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

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它们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系统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胡乔木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这样指出："这个工作(指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下，党的8月1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三、《宣言》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和随后在全国迅猛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动力，是党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内容传到国内后，华北的知识界首先积极拥护和响应，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地用各种方法进行传播。《宣言》在北平学生中开始传阅的时间是1935年8月中旬。据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陈落同志回忆："大约在8月中旬左右，在北平地下党市委工作的同学何凤元同志交给我一份文件，即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要我立即油印散发。我就找了一个姓徐的同志一起来干这个工作。……我们印完《八一宣言》以后，当晚就在学校图书馆、小桥上、布告牌上张贴，还到二院宿舍的洗脸间散发。"党的团结抗日主张，迅速传遍校园，走向社会，使广大学生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许多的人"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的夜不成寐。"北平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于8月间的一天，派徐冰同志邀集北平各大学的部分进步教授，在玉泉山研究如何发动学生和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事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为使宣言精神迅速地扩散出去，产生影响，有必要组织一次学生游行示威，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为此，会议指定了各校联系的负责人：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许德珩负责(后北京大学增加马叙伦、尚仲衣)；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平大法商学院及平大各学院由陈豹隐、程希孟负责；师大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邢西萍、张小梅负责。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八一宣言》激发出来的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很快疑成五股伟大的力量。

党在巴黎办的《救国报》把《八一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后，使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我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并开赴抗日前线，以及中共中央又两次发表宣言的消息在社会传开后，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便燃烧起来了。为了更好地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地下党于1935年11月18日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北平爱国学生在党的《八一宣言》号召下，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准备，便冲上了抗日救国的前线，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很快，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杭州、长沙等十几个城市的学生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和海外侨胞也都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一位华侨以感激与兴奋的心情撰文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在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宣言和主张，而是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心声。"这些文字代表和反映了广大爱国侨胞的共同心愿和意志。12月15日，伦敦华裔中华学生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组织五省自治政府告全国同胞书》，12月28日，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通电斥责国民党政府："媚日卖国，九省沦亡，侨情激愤，请即开放政权，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否则，声罪致讨。"1936年，旅居欧洲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组织及团体在巴黎开会，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对推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宣言》推动了地方实力派中间派别与我党的合作

《宣言》传到国内后，在地方实力派和中间派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他们以新的姿态对待共产党，纷纷表示赞同抗日救国，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地方实力派人物冯玉祥将军，正是在看到《八一宣言》之后，公开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他曾对朋友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他派人前往四川说服地方实力人物，放弃对红军进攻，靠近共产党，并且认定，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坚持抗日；二是与共产党交朋友。他利用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和全会提出了保障人民自由；大赦政治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等九项措施。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正是在获悉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联合抗日的主张之后，才加速了与我党合作步伐的

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时，得知我党发表《八

一宣言》的消息，于是他在会议一闭幕，便托故到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同乡杜重远。在杜重远处他见到了《八一宣言》，并与杜交换了意见，表示愿意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主动提出停止进攻边区，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有机会与共产党直接接触。随后，他又在上海约会了刚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请他帮助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此时，他除了静候李杜的消息外，又想到了两个可能找到共产党线索的途径：一是打电报给东北大学，表示捐1000元现款给学生会，慰抚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受伤学生，希望学生会能派代表去西安见他；二是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并将这个意图告诉了王以哲并让他亲自负责。1936年2月，他与共产党代表李克农谈判，很快达成了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五条协定。4月，经过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张学良终于走上了联合共产党、"逼蒋抗日"的道路。

杨虎城与共产党的联系一直没有断。《八一宣言》发表后，申伯纯同志奉华北党组织之命，前往南京与正在开会的杨虎城取得联系，向他转述宣言的内容，建议他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杨虎城对申的秘密到来表示欢迎，他愉快地对申说："很好，我也正想找他们(指中央)的关系。"会后，他同申伯纯一起乘专车离开南京。在徐州分手时，杨虎城要求申立即去天津找党组织问明联合的具体办法，然后赶紧到西安去找他。12月中旬，申伯纯向杨虎城转述了我方关于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的六条措施。与此同时，党中央派汪锋同志去西安，并带去了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亲笔信，希望他在当前的危急情况下，尽快采取联合措施，进行联共反蒋、抗日救国的行动。到1936年2月，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红军消除了对立状态，他本人也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曾经组织过福建人民政府的国民党著名将领李济琛、蔡廷锴等，也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于1936年1月公开发表《对时局宣言》，揭露蒋介石"卖国无罪、降日有功、抗日者格杀勿论"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共反蒋抗日的主张，认为："中国大众只有团结于反蒋抗日的旗帜下，以无畏的牺牲精神，用鲜血头颅才能换得民族之独立解放。"

与此同时，许多中间派别也都纷纷表示赞同中共主张，实行联合抗日。1935年11月以章伯钧、彭泽民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民主党派中率先响应我党的《八一宣言》，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建立反日阵线，发动反日战争，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五、《宣言》促使国民党改变态度，国共关系开始松动

中国共产党策略的重大转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也震惊了国民党当局，迫使蒋介石实行政策上的改变，变反共内战为联共抗日。

国民党"五大"召开之时，也正是我党《八一宣言》在国内得到广泛响应之际。形势的发展，逼迫国民党当局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采取试探性措施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据陈立夫说，他见《八一宣言》之后，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自己在《苏俄在中国》一文中也这样提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从1935年底开始，蒋介石便从国内国外两个途径与我党接触，以探讨共产党实行《八一宣言》的诚意。

在国外，蒋介石派自己的亲信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了解同中国共产党调整关系的可能性。"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关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以后，决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王明与邓文仪进行过多次交谈，向他了解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和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决心，并指派潘汉年同志与邓文仪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必要时可直接去南京。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多次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向他了解斯大林对《八一宣言》以及国共合作的态度，并且"暗示他准备同中国共产党和解合作抗日，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取得苏联的支持与帮助。

在国内，国民党当局主要是通过五条途径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联系：一是通过吕振羽找到了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二是由谌小岑通过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党组织进行接触；三是由宋子文指派曾养甫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四是通过宋庆龄帮助沟通与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五是由陈立夫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直接接触。

经过双方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于1936年1月开始派出代表在南京进行非正式谈判，谈判主要是围绕《八一宣言》所提内容进行的。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确表示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希望两党之间举行高级会谈，提出周恩来到南京或张冲去陕北都可以。不久，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国民党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共产党也派潘汉年去了南京，双方开始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国防政府、国防军等具体问题进行交涉。

党的《八一宣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决定和主张，代表了全国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心声，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大振声威，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知道在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线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选自《党史纵横》91年4期，作者林雄辉)

懋功会师

背景介绍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的胜利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935年5月3日至9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为实现北上的战略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会理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其先头部队，第一军团二师四团于6月12日翻越夹金山，到达夹金山下懋功县达维镇，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军四方军先头部队会合。6月13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懋功，14日举行联欢会。同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抵达达维镇，当晚一、四方面军举行庆祝会师大会，毛泽东及其它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为开创革命新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材料：

- 迎接懋功会师
- 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忆懋功会师

材料一　迎接懋功会师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红。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正调遣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我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西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我军休养生息。然而，"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要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我军不能在这里久留。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经上来，立即在江油附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各军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会上，张国焘讲了我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他还提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苏维埃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云云。陈昌浩也发了言。大家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指示行动。

西向岷江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成了动员和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五月上旬，部队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进发。从此，红四方面军开始了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艰苦长征。

松、茂、理、汶一带，是蒋邓锡侯的地盘。境内高山连绵，河谷错列，地形险要，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盛产黄金、木材、烟土、药材、牛羊、兽皮等。为防止我军西进，邓锡侯在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北川至茂县和土门险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约三万余人，凭险筑垒，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五月十二日，我先率九军、三十军主力，由北川西进，翻山越岭，直抢土门。沿途多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我军经激烈战斗，连续击溃邓锡侯部十一个团和各地民团的防堵，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先头部队于十五日占领茂县，我和前线指挥部在土门住下，指挥部队消灭附近顽抗的残敌，扼住南面的制高点，接应后方机关转移。从成都、绵竹方向来援之敌，拼命向我进攻，想把红军的通道截断。我掩护部队在土门以南的山上，抢筑工事，顶住敌人。敌人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死伤惨重。我后方机关包括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兵工厂、被服厂、造船厂、医院、妇女组织、地方干部等，相当庞大。男男女女，抬着机器、粮食、担架、物资，走了几天，才转移完毕。伺后，方面军总部进驻茂县。先头部队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一部直逼汶川，占领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则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北进的这一路，本想占领松潘县城，扼控从甘南通往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屏障茂、理。但胡宗南部先我一步，进驻松潘。松潘是座古城堡，城墙厚达三四米，周围皆崇山峻岭，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我们的部队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动，遂退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与胡敌对峙。从镇江关、片口、北川、观音梁子、千佛山至汶川一线，敌我双方不时发生激战。

方面军总部住地茂县，即现今的茂汶自治县。县城内有几百户人家，全县约六七万人口。羌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川西北羌族人民集中的县份。

这个民族勤劳，朴实，好客，喜歌舞，性情开朗。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深山老林里去。红军

来以后，使敌人的宣传不攻自破，彻底破产。

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合，指日可待。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首先是派部队前往接应的问题。确定由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该军八十八师及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要求各部队层层深入动员，以坚持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等实际行动，迎接兄弟部队。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队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长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进入理县内，藏族逐渐多起来。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深入，藏族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我们第一次对藏族社会，有了概略的了解。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会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决、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合进行的。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等。群众工作愈深入，筹集物资愈好办些。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羊毛，捻毛线，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物少情意重。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对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东面和东南面的川军，频频向我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工事固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我最担心的是灌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们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天天打消耗战，够恼火的就是了。北川、松潘、茂县、汶川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在各级苏维埃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冒着敌机轰炸和炮火杀伤的危险，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粮食，帮红军砍柴、烧水、护理伤病员等，给前线指战员们极大鼓 舞和有力支援。

六月八日，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攻占懋功，歼邓锡侯部近千人，继占达维。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六月十二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十三日胜利会师在夹金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仅三十一军，一批就送去了衣服五百件，草鞋一千四百双，毛袜五百双，毛毯一百条，鞋子一百七十双，袜底二百双。翻身的藏族同胞，跳起“锅庄”，表示庆贺。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彻底破产。

（选自《长征回忆录》作者：徐向前）

材料二　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
——忆懋功会师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省会宁，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和外国许多朋友称颂的历史奇迹，成为鼓舞我国各族人民克服艰难险阻去夺取胜利的巨大力量。为纪念长征胜利 50 周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单位，要我写一篇回忆长征过程中懋功会师的文章。这段历史距今半个多世纪了，许多细节已记不清楚，只能把主要经过写出来，以资纪念，并供研究长征史的同志们参考。

1935 年 6 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会师，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两个方面军英勇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两军会师的实现，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1935 年 1、2 月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英勇艰苦转战到了川黔边境，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电示红四方面军派部队去迎接。消息传来，广大指战员都非常高兴。我们早就盼望见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了。过去只听说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可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到过他们的不多。我们对红一方面军非常敬佩。早就知道红一方面军在中央根据地英勇奋斗，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发展壮大到 10 多万人，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知道的情况就

少了。根据我们从鄂豫皖西征到川陕时经历的艰难困苦，心里常想到，红一方面军离开根据地，多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作战好几个月了，各方面的困难一定很大。因此，大家都想尽快地前去策应和会合。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进到嘉陵江和涪江之间地区不久，为了两个方面军的靠拢，又继续西进。这时，蒋介石已调胡宗南部进入甘南，企图从北面堵截和进攻红军，以配合南路、东路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追剿"红一、红四方面军。针对这种敌情，奉军分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我们红30军（我任政治委员）第89师（邵烈坤同志任师长）从剑阁开赴青川、平武一线，抢占摩天岭，堵击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方面军向西行进的右侧安全。摩天岭是甘南进入四川的天然屏障，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很重要，历史上称之为阴平古道。三国时期诸葛亮为防御曹魏从北面进攻，保卫蜀国的安全，曾在此屯兵驻守。我们到青川和平武之间的山梁上还看到诸葛亮庙的旧址。史书记载，魏国进兵蜀国时，邓艾得知这里无兵防守，指挥部队攀越摩天岭，攻取江油，进入成都，灭掉了蜀汉。我们迅速占领了摩天岭，就打乱了胡宗南部企图夹击红军的计划。

5月上旬，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西彝族居住区，准备经冕宁北上。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向岷江地区进发，继续向红一方面军靠拢。我们从摩天岭撤下来，急速向西南前进。与此同时，徐向前同志指挥许世友同志率领的第9军和程世才同志率领的第30军一部，经过多次激战，击溃邓锡侯部陶凯师和当地民团，突破敌人防线，枪占北川河谷，夺取了墩上和土门险关，打开了进入岷江的门户。随后，他们又攻占了茂县、汶川和理番（今理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指日可待了。

5月中旬，即两军将要会合的前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了各军领导同志的会议，研究布置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总部决定由我们率领红30军第88师和红9军第25、第27师各一部，开往小金川地区去迎接党中央。红4军、红31军的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抵御北面的胡宗南部；另一部在北川、片口一线抵御东面的川军，以保障会师的顺利实现。会上，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同志都讲了话，说明了这次会师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动员，奋勇杀敌，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给养和制作慰劳品，以实际行动热烈欢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向前同志特别强调，会师后，一定要搞好团结，一切行动要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会后，他还把我们留下，说：一方面军长期转战，一定非常辛苦和劳累，要动员部队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争取早日会师。

接受任务后，我和李天焕同志（红30军政治部主任）立即同红25师师长韩东山等同志，研究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具体行动计划，动员部队尽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随后，我带少数部队，从茂县赶到理番，又向红88师师长熊厚发和政治委员郑维山等同志传达总部的命令和部署。经过讨论确定熊厚发同志率红263团留在理悉继续同敌人作战，郑维山同志率红265、红268团和我们一起行动。

5月底，部队分两路出发：一路是红9军第27师一部，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击由巴郎山方面西进的敌人；一路是红9军第25师和红30军第88师，分别从汶川、理番出发直取懋功。从理番到懋功有300多里，中间必须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翻越这样终年积雪的大山，还是红军创建以来的第一次。我们有打硬仗、打恶仗的经验，有走险路、强渡江河的经验，还没有爬过雪山。当地人烟稀少，也找不到向导，可是指战员为完成迎接党中央的光荣任务，心急如焚，纷纷表示一定要爬过雪山去。百闻不如一见。从山下向山上爬，先是很大的太阳，后是大雾，快到山顶时，飞起鹅毛大雪，一时好象进入银色的世界里了。大家第一次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色，非常兴奋。由于山路陡峻崎岖，空气稀薄，指战员互相搀扶着，防止倒下去爬不起来。没想到下山后，因为强烈雪光的刺激，部队中有1/3的同志得了雪盲症，还有很多同志高山反应头痛很厉害，部队只好暂时停止行进。记得休整了半天，大家的眼睛才慢慢地恢复正常，部队又继续前进。这次过雪山得到了一条经验，就是群众说的，雪山不能白天过，要在半夜时候过。我们懂得了这一点，后来在其他地方几次过雪山，就再没有人得雪盲症了。

6月初，前锋部队红25师遵照我们的命令和部署，先攻占了两河口，随后又歼灭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攻占了懋功，并乘胜向达维进发，准备南出夹金山，到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6月12日，我们和红88师部队进驻懋功后，接到韩东山两次电话报告，说红9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和红1军团第2师的先头部队，在达维以南、夹金山北麓的木城沟胜利会师了。喜讯传来，群情振奋。我当即发电报向总部作了报告。我们在懋功一方面分析敌情，察看地形，部署警戒；另一方面动员部队和发动当地群众，腾出房子，打扫街道，筹备给养，编排文艺节目，书写欢迎标语，集中慰问品等，准备热烈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有八个兄弟民族居住的懋功空前热闹起来了。

同日，向前同志代表军分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理番写了一份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诸同志的报告，详细报告了敌情、民情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介绍我们率领部队带着电台已经到达懋功，如何行动请中央指挥。他建议两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先休息补充，让红四方面军在前面御敌。报告还说：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千百万工

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百战百胜的西征军。这些话，确确实实表达了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心情，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份报告，是派专人传送的，还附送了两份地图，供中央领导同志更具体地了解四川地区的情况，以便研究确定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6月16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首先向岷、嘉地区发展的行动计划，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征求意见。可是，由于敌人很快占领了茂县、北川一带地区，失去了战机，致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6月18日，我们在懋功迎接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当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毛主席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我们住在小金川河边的新街。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同志和红一方面军的几位领导人，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亲切会见了我。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心情特别激动，也有一点拘谨。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给红四方面军很高评价，并代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全体同志，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地关怀和慰问。毛主席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现在会合了。这样，我们的力量更大了。他打开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再打回去？我说，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居住地区，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而且这时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我还说，来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脚。向西和向北条件更差。总的思想是说明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早在川陕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向前同志同我们就议论过沿嘉陵江两岸作战和向甘南发展的问题。所以，当时心里是真想打回去。广大指战员也是这种心情。毛主席听我汇报情况时连连点头。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大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准备制定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兴致勃勃，一直谈到深夜。在懋功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会见，使我终生难忘。不久，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对红军行动又作出了新的部署，制定了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

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在懋功休整了三天。这期间两支部队互相联欢、慰问、交谈，非常亲切。我们和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举行了一次联欢庆祝大会。会上，红一方面军的代表讲话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打击。过去就耳闻过红四方面军的光荣战绩，相信两军会合后，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更多的部队，创造新的根据地。我们的代表讲话中，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一定虚心向红一方面军学习，团结奋斗，并肩前进，争取新的胜利。在天主教堂里，两军一些团以上干部还集会一次，一起吃过饭。当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非是让大家吃一顿饱饭，而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很难得的。同志们都非常满意。朱德同志还特意到住处看望我们，询问红四方面军部队的休整情况，对广大指战员非常关怀。

6月21日后，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沿抚边河北上，向两河口进发。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红25师继续留在达维镇，防御东面敌人的进攻；又派出一部分部队沿小金川河西进丹巴，再沿大金川河北进，以保障党中央北上的左翼安全。我们和一部分部队又在懋功驻了几天，负责党中央的后卫。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敌人从东、南、北三个方面继续向我军进逼，企图把我军困死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这种形势下，部队保持会师时的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精神、特别重要。为此，在党中央领导下，双方都做了许多工作，对加强部队建设，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懋功会师形成的团结局面，后来虽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最终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全国红军的大团结。历史证明，我们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是符合革命历史发展潮流的，任何人，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

懋功会师，标志着我们党和我们军队团结胜利的一个新开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50年过去了，懋功会师所体现的党和人民军队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

在长征中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选自《军事历史》89年4期 作者：李先念）

张国焘另立“中央”

背景介绍

长征途中，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坚持南下同党中央分道扬镳中央在北上途致电张国焘，命令他改变南下方针。但张国焘坚持错误。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

省委扩大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仍力主南下，并反对在左路军中坚持主张和中央一起北上的朱德和刘伯承。9月下旬，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分（包括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而已编入左路军的红五军）在张国焘的指挥下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他以为党中央率领不大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并宣布“开除”和“通缉”一些中央领导人。12月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和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指战员的工作，与张焘的分裂行径进行斗争。

材料：

- 张国焘另立中央始末
- 叶剑英危难之时挽救党
- 彭德怀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

材料一　张国焘另立中央始末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它诞生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在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后，到1935年3、4月时，已经发展到了5个军11个师33个团，连同地方部队共约10万人左右了。这对于坚持和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南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却不顾红四方面军在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被困难所吓倒，擅自作出了主动放弃根据地的决定，也被迫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张国焘是王明派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中的中央代表，他同博古等人一样，深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认为“只要有了红军，苏区要不要都可以”。就是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六路围攻，他又企图放弃川陕根据地。当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张国焘便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低潮和退却的时候了。于是，他不顾红四方面军其他人的反对，终于放弃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川陕根据地，使红四方面军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不利的局面。

当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解放了茂县，并占领了大片领土后，张国焘一来到茂县，便自以为人多枪多，擅自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内设政治局，俨然如同党中央的组织。到5月底时，他又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并自任主席，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以主席的名义发布主席令。他还把陕南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川南孟光远领导的红23军，都说成是围绕四方面军的行动而行动的。对于他的这种做法，中央曾指示要他取消“西北联邦政府”。

当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后，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尚在杂谷脑（今理县县城）。6月23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抚边出发，于6月24日到达懋功县两河口。为了欢迎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还在这里布置了欢迎会场。第二天，张国焘骑着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来到了两河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同志，冒着滂沱大雨，站在路上欢迎他的到来。但张国焘却傲慢之极，他骑着马一直来到欢迎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身边，他的马溅起的雨水溅了中央领导同志一身。在欢迎大会上，当张国焘讲话时，竟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反的南下主张。他的这个主张的提出，给两军会师的有利形势罩了一层阴影。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许多人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的战略方针。就张国焘的错误，与会者耐心诚恳地批评说：“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一直到川北落脚，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这么大的行动，没有向中央报告，是不允许的。”“在川北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胜利以后，又撤出了川陕苏区，同样没向中央报告，也是擅自撤退的。

”此时的张国焘因在会议上陷入了孤立而被迫同意中央的决定，但他却仍然在心里反对中央的决定。他不仅借王明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进行攻击，而且还在狂妄地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做法。他一回到杂谷脑，就立即在红四方面中召开会议，歪曲会议精神，散布不满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请来了彭德怀和聂荣臻二人，在吃饭的时候张国焘装作很关心的样子对彭、聂二人说道：“你们一路征战，很是辛苦。一方面军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要归功于你们二人。我决定拨两个团的兵力给你们补充部队。”张国焘的这种拉拢行为，引起了彭、聂二人的警惕，当饭后他们离开张国焘处时，聂荣臻问彭德

怀："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当然要了"。实际上，张国焘拨给彭、聂二人的两个团，只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也就1000人左右。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增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对此并不满足，他想要的是全军的最高权力。于是，他便借"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向中央伸手要权。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建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徐向前出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出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出任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张国焘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对中央威胁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中共中央拒绝了他的这种无理要求。

张国焘见目的无法达到，便故意拖延四方面军执行中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致使红军北进迟缓。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认识问题，中共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两次会议。在7月18日的会议上，周恩来主动表示愿意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出，洛甫提议把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毛泽东只同意交红军总政委，不同意交总书记，于是，张国焘便当上了红军的总政委。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自有他的道理的，如果当时让出了总书记的话，那张国焘就会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那他后来成立的伪中央也就成为合法的了。

鉴于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时机已失，军委又于8月重新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并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兵分两路行动。此时问题已经解决，但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又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不得不于8月4日到6日在沙窝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在会上经过一番斗争后，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但他又仗着枪多人多，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要求在原有7个政治局委员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

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央在批评教育基础上也作出了让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只同意增补几人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并于最后作出决议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

毛儿盖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先遣队开始进入茫茫无边、水草纵横的大草地，他们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率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茫茫草地，终于走出了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到达了巴西、班佑一带。

而与此同时，张国焘却出尔反尔，百般刁难中央。他率领左路军到阿坝后，先是按兵不动，继则抗拒中央要他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至此，张国焘与中央之间发展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9月3日，他不顾朱德等人的劝阻，竟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不仅如此，他还于9月8日电令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张国焘见目的没达到，竟一再公然抗拒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发展到了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再返草地，重爬雪山，跟他一起南下的地步。他给陈昌浩发了一封密电，要其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他一起南下，如果不听，就监视这些人的行动，如果坚持北进，就展开党内斗争，彻底解决这些人。幸好这封密电被叶剑英扣下了，并亲自将密电面送给了毛泽东。

事态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毛泽东以其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定下了一个脱身之计。他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他听到徐向前回话后，"你早点休息吧。我还有事，再到别处去一下。"说完就走了。他又回到陈昌浩处，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便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部同周、王开会。"

就在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域，继续北上。会后，经过秘密而迅速的准备工作，于当天夜里12时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到达了拿界，脱离了险境。

就在毛泽东率领临时北上先遣支队一路斩关夺隘，连克强敌，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前不久，张国焘终于走上了一条公然另立伪"中央"道路。9月15日，张国焘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攻击党中央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9月17日，又发布了南下"命令"，提出了"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

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岗卓木碉召开了一个高干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一个由他"钦定"的"中央"名单后，他便恬不知耻地说道："我们红四方面的这一举动，就象是当年列宁在第二国际变修了以后，举起第三国际的红旗一样，我们也要举起中国革命的旗帜，与那些右倾逃跑主义者斗争到底。"

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自封为主席，并设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非法机构，他还狂妄地非法宣布道："我们要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职务，开除他们的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当时随左路军一起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的坚决反对，他们表示说："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

党中央。”朱德和刘伯承的行为使得张国焘怀恨在心，更加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排挤打击。

12月5日，张国焘狂妄地致电中央称：“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上来，以便批准。”

至此，张国焘从伸手要权、分庭抗礼，发展到了另立中央的地步，使其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的这种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中央’的倾向，无异自决于党，自决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经过党内既讲原则，又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斗争，再加上张国焘南下碰壁和1935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的林育英(张浩)的工作，终于使张国焘放弃了他的第二“中央”，率四方面军来到了陕北，并走向了抗日前线。事后不久，张国焘便于1938年不辞而别，投奔到蒋介石门下，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最后死在加拿大。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二　叶剑英危难之时挽救党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发起了著名的包座战役，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如果左路军能迅速北上，必能开展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然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的，他却主张左右两路出洮河以西，越黄河向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开进。中央三令五申，坚持要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勉强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其实，河水虽然上涨，但仍可涉渡。张国焘却于九月三日致电中央，谎称“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还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障碍”，因此，他不仅要左路军返回阿坝，同时还向已出草地的右路军提出“回击松潘”的南下要求。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犹豫不决，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中央九月八日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张国焘不听从中央的耐心说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竟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那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作报告。叶剑英看到电令后，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令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既然已经背着党中央，下达那个命令，要右路军南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党与红军命运的严峻时刻，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很快到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确定了党中央和一、三军团立即北上的方针。

与此同时，叶剑英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副科长吕继熙(吕黎平)，要了当时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以备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时急用。

党中央在离开巴西之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曾经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迅速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博古临走时也对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这里危险！”叶剑英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军委纵队一同行动。”他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想到军委纵队同志的安危，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把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建议以“打粮”准备南下为由，把大家带走。

接着，召开军委纵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肖向荣等。叶剑英在会上说，中央已经走了，凌晨两点我们出发“打粮”。这次行动，意义非常重大，要严守机密，统一行动。他要求大家对表，两点整准时出发。会后，他又和杨尚昆商量了具体行动方案。

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喇嘛庙，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凌晨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军委纵队那么多人的命运系于自己身上，稍有差错就会使党的事业遭到损失，想到四方面军这支英雄部队就要被张国焘引入歧途，怎能不令人痛心！……大约一点三十分

左右，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的小藤箱里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甘肃省地图。他走出喇嘛庙，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甘肃地图交给肖，并交代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你千万要管好！临出发，他发现手枪没有带，立即返回大殿，赶忙拿了左轮手枪，便急促地上路了。

九月十日凌晨两点，军委纵队出发"打粮"了。随后，叶剑英与杨尚昆在约定的水磨房会面，一起前往三军团。当叶剑英赶到军委纵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都非常高兴。有人开玩笑说："首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听了，也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他们着急地说："老叶！你还不快走啊！"叶剑英说："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军委纵队从潘州赶到阿西，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十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该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纵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一、三军团北进以后，陈昌浩立即召集部分干部进行煽动，说什么"中央红军投敌去了"。当时在救济寺的红四军，奉命通知二十八团作好追击中央红军的准备。四军军长许世友没有马上行动，请示总指挥部打不打？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的话，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对维护革命利益起了重要作用。

博古、彭德怀等同志在俄界见到叶剑英，高兴地说：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走后不久，路上有四个人带着驳壳枪到处找你，说要把你打死。叶剑英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了我。"

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十二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及时地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纵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长征中左路军和右路军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了。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并且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朱德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有一次谈到张国焘时说："到阿坝，他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他说："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指宋太宗评吕端)来比喻吗？……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叶剑英在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尚品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选自《叶剑英传略》)

材料三　彭德怀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

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两军会师的欢呼声中，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却在红军内部酝酿着一场严重危机。这场危机对每个党员和红军，特别对高级干部和指挥员，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时任红三军团司令员的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一方面军经大半年浴血转战，只剩下一万多疲惫之师，而四方面军刚离开川陕根据地，兵强马壮，有八万之众。张国焘仗势欺凌中央，说中央红军失败了，遵义会议不合法，进而否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欲将其向川康边境地区退却逃跑的主张强加于中央。另一方面，他又在背地里施展军阀手腕，挖中央的墙脚，在一方面军内部挑拨离间，企图达到为其所用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国焘将如意算盘拨弄到了彭德怀的头上。这不仅因为彭德怀手握重兵，且还因为张国焘认为在彭德怀身上有机可乘。

"机"从何来？这要从会理会议说起。1935 年 1 月，遵

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会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兵逼贵阳昆明，巧渡金沙江。这种为调动敌人而采取的穿插战术，部队多走些路是必须的。但当时任一军团司令员的林彪对此却有些埋怨，认为毛泽东的指挥是走了所谓“弓背”而没走“弓弦”。他在未与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擅自致电中央，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意见。5月，部队到达会理。中央开会，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然后又批评了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是对失去中央苏区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彭德怀当时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心里虽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敌人又追到了金沙江边，他想人总会有误会，林彪的信或许是出于好意，反正事久自然明，便没有声明与林彪的信无关，只是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因为鲁班场和玩水两仗未打好，心里烦闷，同时也批评林彪不该提出改变前敌指挥，尤其提他彭德怀作前敌指挥更不妥当。在这次会上，林彪可能是由于挨了批评，不敢声明彭德怀与他写信无关。

张国焘对会理会议上这一插曲有所风闻，以为可以加以利用，遂派他的秘书黄超作为代表前往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肉干、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黄超一坐下就对彭德怀摆明他的来意：“张主席很知道你!”彭德怀不冷不热地答：“没见过面”。接着，黄超便装着关切地问起会理会议的情形。彭德怀坦然地说：“没打好，我有点右倾情绪，批评两句，也没有什么!”黄超故作义愤，又冒了一句：“实际主事的是毛而不是张闻天(遵义会议确定党内张闻天负总责——作者注)!”彭德怀心生警觉，这话可不是才20多岁的黄超所能说出口的，肯定是张国焘的真言，于是便没作声，想听听黄超的下文。黄超果然又念了一番张国焘的“欲北伐必先南征”的歪经。因为事关红军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再不能沉默，便驳斥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战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是早已定了吗?中央的方针是北上。在两河口，你们的张主席可是同意中央决议的!”黄超见彭德怀不为所动，知道多说无益，便岔开话题，寒暄一阵，讪讪地走了。彭德怀将黄超的前言后语和送东西送钱综合起来作了分析，明白对方来意是游说挑拨，说明张国焘对中央存有异心。自此，他开始警惕张国焘的所作所为。7月中旬，张国焘指使川康省委出面，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的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以便“集中领导”。为了团结张国焘和四方面军，7月18日，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11日，又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九、三十军组成，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部队行进序列为一军团走在最前面，三军团走在最后面，中间则为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和总指挥部所隔断。行动前，军委参谋部还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这样，一、三军团之间以及和军委、中央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有什么情况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联系。彭德怀从这种种迹象更进一步判明，张国焘有野心。为了保护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在部队到达巴西地区时，他天天都假装去前总，实际去探望毛泽东，并把红十一团秘密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万一有什么突然事变发生。当他从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时，他让三军团准备好电台，另编一套密码，派朝鲜同志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路径，将电台和密码送给林彪和聂荣臻，沟通了与一军团的联系。

9月2日下午，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听到陈昌浩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联系到这天下午陈昌浩还在大谈北上，突然改变腔调，他猜测是张国焘来了电报，要改变行动方针，随即赶往毛泽东处作了报告，并建议：鉴于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有可能解散三军团，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扣押人质?彭德怀这一建议虽然没被毛泽东接受，但他的报告为毛泽东和中央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赢得了时间。两小时后，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要开展彻底的党内斗争。彭德怀遂陪同毛泽东往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即按原已想好的脱身计答：“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那里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不知是计，点头同意了。彭德怀即护送毛泽东、张闻天等到三军团部，马上发电报给林彪、聂荣臻，告诉他们行动方针有变，让一军团在原地等着。次日拂晓，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护送中央和毛泽东单独北上，追赶等在俄界的一军团。

陈昌浩得悉三军团已经开拔后，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彭德怀当即请求毛泽东，然后复信陈昌浩，表明自己拥护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坚定立场，批评陈昌浩执行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希望陈昌浩能够迷途知返，并言明“后会有期”。陈昌浩接信后要派部队追击，徐向前说了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道理”，遂才止住。9月4日，三军团到达俄界与一军团胜利会师，党中央终于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几天后，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谴责了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和分裂红军的错误。彭德怀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俄界会议后，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彭德怀先后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东征军司令员、西征军司令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长征、东征、西征的胜利，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正确性，对张

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

彭德怀不为挑拨利诱所动，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关键时刻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为党取得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始终对彭德怀的这一段斗争历史给以高度评价。1965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彭德怀谈话时说，老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

（选自《党史文汇》92年8期作者：鱼朝霞彭瞭）

“一二·九”运动

背景介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以后，于1933年初侵入华北，逼迫国民党签定了《塘沽协定》。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全部承认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就大部丧失了。与此同时，日本还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控制了华北的经济命脉。大敌当前，蒋介石不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而且更加强对内的镇压，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奋斗。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12月6日，北平各校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的投降政策。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6千多人冒着严寒，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拦，涌向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队和武装警察的大刀、水龙、木棍、枪刺的残酷镇压，有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反动派的镇压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1日，北平各校学生发动全市总罢课，酝酿着更大的斗争。16日，一万多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袭击，集会到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比“一二·九”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五百人的“扩大宣传团”，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很快发展成拥有两万余人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大大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再次表明，中国青年学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锋，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来到了。

材料：

- “一二九”请愿游行
- 彭涛与“一二九”运动
- 青运领袖董毓华
-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

材料一　“一二九”请愿游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受尽压迫、沉默无声的北平城怒吼了！城内外参加请愿游行的青年学生们积极运动起来了！

在城内，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学生。当天清晨，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在军警包围了学校的情况下，在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会上，当传达了市学联关于在今天举行请愿的决定后，同学们热泪盈眶，群情激奋，当场推选宋黎为东北大学请愿队伍的总指挥。接着，宋黎向同学们作了简短的动员。他沉痛地指出东北沦亡，华北垂危，在这种形势下，学生已无法安心读书，当务之急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而这次请愿就是我们抗日救国的一次行动。到会的三百多名爱国学生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学联的决定，坚决参加请愿游行。

在新华门前，到上午十点多钟，已经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市立女一中、艺文中学等十多个学校，约一、二千人。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中南海里面的居仁堂办公。全体学生在新华门的前广场上，挥舞着旗帜、标语，不停地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打倒汉奸卖国贼！”

“武装保卫华北！”

…………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经久不息的回荡在新华门上空。

学生们临时推选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刚等十二人，作为前往居仁堂请愿的代表。他们经过商议后，临时草拟了六项请愿要求，由董毓华当场宣布，一致通

过：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由于学生们的坚决斗争，到了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才被迫出来“抚慰”学生。然而，侯成对请愿的“答复”更加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愤慨。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不打倒卖国贼，就不能救中国！”“卖国贼不是人！”等口号，表示抗议。侯成只好灰溜溜地缩了回去。

接着，各校代表做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是：队伍先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京的队伍入城，然后由西单到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示威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由东北大学的宋黎担任。当宋黎宣布“游行开始”后，中国大学的队伍带头向西进发。上千人的抗日救亡的洪流，立刻涌流在西长安街上。

行进中，宣传队不停地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他们的鼓掌和支持，很多人争相抢阅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甚至有些军警也被感动了。领导整个游行队伍的负责人是市临委的彭涛、学联主要负责人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和市立女一中学生郭桂英(郭明秋)等。

在行进中，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浩浩荡荡地由北向南前进。由于沿途又有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弘达中学、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市立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大中学校的同学陆续加入，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三千。但是，当队伍前锋到达了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一场更严重的斗争出现了。这时，站在水龙旁的警察，突然打开水龙向学生队伍喷射起来。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象一把尖刀似地扎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走在队伍最前边的学生领队和纠察队员们，全被水浇透了。身上、地上，冰碴子哗哗作响。接着，军警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立刻有四十多名同学受了伤。东北大学的林铎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鲜血淋漓……。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与军警们展开了英勇的搏斗。有的学生试图冲过去抢夺警察手中的水龙；有的学生被打倒在地上后又立即爬起来加入了队伍；有的学生一边向军警扔宣传品，一边作宣传，……但是，经过二、三十分钟的激烈搏斗，游行队伍还是被打散了。

队伍被冲散时，暮色已经降临。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游行队伍的交通员传达了指挥部的意见。他们呼喊道“同学们，快到北大三院集合！”一时被冲散的游行队伍，很快汇集到北大三院。在这里，宋黎传达了北平市学联关于从十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和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意见。学联的决议在大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通过。这样，爱国学生们才高呼口号，返回了各自学校。

与此同时，城外清华、燕京学校的爱国学生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下午，北平大学农学院的二、三十位同学赶来支援，使清华、燕京等校同学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西直门外的这支一千多人的请愿游行队伍，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最后，按照指挥部的决定，由清华女生陆璀站在凳子上向全体同学讲话：“我们今天请愿不成，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同学们一致呼口号表示同意。大家怀着强烈的愤怒和坚定的决心，在苍茫暮色中步行返校。

十二月九日这一天，还有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同学生在一起，参加了请愿游行。吴承仕不顾年迈，坚持同中国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最早来到新华门前，又一起冲过了军警的大刀、水龙。此外，《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的记者，以及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和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报社的记者，也随同了请愿游行队伍进行了采访。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夫妇，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请愿游行，拍下了不少中国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珍贵照片。斯诺夫人海伦(尼姆·韦尔斯)为救护中国学生，被水龙头喷得一身湿透。

这一天，学生们散发了大量宣传品，庄严宣布他们行动的意义，呼吁共起救国。清华大学救国会在十二月九日当天发的《告全国民众书》，痛陈华北危机，指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说出了学生群众心里的话。

对于这次请愿游行的消息，国民党反动当局严禁报道。因而，第二天北平各报都没有登载。但是爱国的新闻记者们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巧妙地将这个重大的消息透露给广大读者。外国的报纸也有各种各样的登载报道。这样，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选自《一二九运动史略》)

材料二　彭涛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称这场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

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江西籍的彭涛便是组织和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彭涛，原名定乾，江西省波阳县鄱阳镇人。1913年11月出生，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张家口共青团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任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次年1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员、区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历任中共冀西特委书记，武乡地委书记，太行区党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太行纵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皖西区委书记、皖西军区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川南区党委第二书记、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化学工业部部长等职。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彭涛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1年11月14日，彭涛不幸病逝。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中山堂举行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主持，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刘伯承、李先念、薄一波、李雪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高度评价了彭涛光辉的一生，特别是彭涛对一二·九运动的伟大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7月6日，国民党华北当局同日本华北驻屯军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引起了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时任中共北平市工委宣传部长的彭涛，积极组织发动爱国学生向何应饮请愿，并起草了“反对出卖华北”、“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等六项要求的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8月29日，彭涛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意见，为团结更多学生，掩护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市立女一中正式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党组织积极利用联合会广泛开展赈济活动，并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与救灾工作结合起来，以动员更多的人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

10月下旬，彭涛邀集平津十校学生代表协商，通过了《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的宣言》。11月1日，天津《大公报》以各校联名电呈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形式，刊登了这篇宣言，在北平爱国学生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11月初，中共河北省委了解到北平市工委领导层的内部意见分歧：工委主要领导人坚持要在学生中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以彭涛为代表的另一些同志，则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一次学生救国运动提出抗日救国要求。为此，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市工委，成立由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确定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发动广大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利用合法斗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临时工委决定，将“北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改为”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以适应斗争需要。11月8日，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了学联成立大会，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学联实际上是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临时工委决定由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组成学联党组织，彭涛为党团书记。

11月下旬，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傀儡政权，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与此同时，适应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酝酿出笼。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彭涛在西城区辟才胡同自己的住处秘密召开了学联会议。会上他指出：“当前形势更为紧迫，学生需要有个抗日的行动来表示华北人民、也可以说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民意”，“现在的形势就象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广大学生群众是爱国的，是要求抗日的，只要我们一号召，群众就会响应起来的”。他的倡仪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他还具体提出了六项请愿要求：(一)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即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次会上还研究确定了集会游行的时间、路线、口号等具体事项。

12月7日，彭涛又在女一中召开了各校学联代表会议，就这次行动的领导、组织作了详细的安排，决定12月9日先集中到新华门请愿，如不成功就改为游行示威。

12月9日，在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直接组织、指挥下，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学生数千人怀着满腔热血，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涌向新华门请愿，何应钦避而不见。学生随即转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实行残酷镇压，爱国学生与之进行了英勇搏斗，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准备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一二·九”以后，传出汉奸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的消息。经彭涛与学联主要领导人组织筹备，16日组织了北平学生和市民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和声援。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南宁、重庆、开封、太原、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集会游行。

为了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

根据党的指示，平津学生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彭涛任总指挥部党团书记，投入了新的斗争热潮。

（选自《党史文苑》95年1期，作者：王志成）

材料三　青运领袖董毓华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堪回首的两个血雨腥风的日子。由于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董毓华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董毓华由武汉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他进校不久，就创建了该校的第一个党支部和"学联"，并任支部书记和学联主席。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致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这种形势，北平党组织立即决定：迅速组织全市大、中学生前往当局，举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请愿斗争。

12月9日凌晨，作为西城区请愿总指挥的董毓华，高呼爱国口号，领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向新华门方向前进。快到府右街时，他机警地向交通员低声交待："路遇阻拦，可以化整为零，分散行进，不必拘泥队形"。

队伍走到府右街南口，董毓华远远望见前面早已布满警察、拦住去路，他将指挥旗朝下一挥，队伍便立即停下步来。

他领着几位"中大"同学朝警察走去。

董毓华对为首的警官动情地说："警官先生，想你们必定比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如今可是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啊！大家莫非还未受够日军的欺侮？！能甘受欺侮？！华北不光是同学们的华北，而是大家的华北。为救华北于沦丧之缘，为使我们大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儿女不致遭受屠戮与凌辱，我们方冒生命危险前往请愿，请求政府抗日呀……"那警官被说得低下头来，只是默默不语，脸露难色。

见此，董毓华装作发恼的样子，说："算了，解散队伍！"他向大队两手一挥，队伍随即解散。"这下，你们该好交差了吧！"说毕，他就邮步冲过警察防线，一如撒手不管那四散而去的人们一般，径直朝前奔去。走不多远，散开的同学三五成群，纷纷归队。董毓华带领西城各校队伍，按预定时间到达了新华门前。

由于当局关闭城门，清华、燕京等城外学校的请愿队伍以及准备好的请愿书，均被阻于西直门外。

怎么办？董毓华根据大家的提议，接过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片，就地蹲身，很快草成了一份与"一二·九"同载史册的文稿——《北平大、中学生致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主任请愿书》。其主要内容为：一、反对防共自治，反对华北特殊化；二、反对屈辱的秘密外交，公布对日交涉经过；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四、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五、非依法不得逮捕人民；六、释放被捕学生。

董毓华和宋黎等学生领袖，为了代表千千万万华北人民表达抗日救国的愿望，当机立断，改请愿为游行示威。董毓华跃步上前，挥手喊道："同学们！现在举行游行示威！出发——"

他们迎着警察的枪口、刺刀、棍棒，冒着生命的危险，奋勇向前，以唤起民众抗日。

"一二·九"之后，董毓华担任"北平学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进一步扩大"一二·九"的影响，把抗日救亡的宣传引向农村，学联决定成立南下农村扩大宣传团，由董毓华任宣传团总指挥。

1936年元旦刚过，600余名平、津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向广大农村进发。董毓华用他那火一般的激情，领着他的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播种抗日的火种。

元月10日，在固安城外的广场上，董毓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中华民族的子孙们，素有头可断而志不夺的铮铮铁骨，和不畏强暴、拼死反抗异族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又在'五·四'时代为我们做出了勇猛搏击风云的光辉榜样。'一二·九'以来，我们大家所采取一连串的，并且是方兴未艾的斗争行动，已充分表明：我们民族的铁胆犹在！忠魂犹在！我们抵御外强侵略的传统永存！而'五·四'青年勇猛搏击风云的精神，又正由我辈发扬光大——我们民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日寇亡我中华的图谋永远不能得逞！"

冷风吹着他那罩在棉袍上的阴丹士林布长衫，吹着他那黑白条纹相间的长围巾，他全然不知。他讲到动情处，一甩那乱蓬蓬的长发，几乎声泪俱下："同学们！现在，是我们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保卫祖国新长城的时候了！我看我们大家是早已下了这种决心的。在有这样决心的人们面前，天寒地冻算什么！关城设卡又算什么！虽然我们是学生，没有枪、没有炮，但我们有口，有喉咙，有一腔热血！明天，我们将继续南下，到边远乡村去，扩大宣传，唤醒全国人民抗战。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许多同学落泪了，连据守在固安城头的二十九军的一些官兵也掩面而泣。

（选自《纵横》91年1期，作者：陈文学）

材料四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情况。

当时河北省委派了一个联络员来，与我们取得了联

系。联络员是李常青。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宣传部长是李大章。我们组织了一个核心小组（据郭明秋告诉我，彭涛对她说是学联党团），有四个人：彭涛是头，此外有黄敬（他当时未正式恢复组织关系，“一二九”后才正式恢复）、郭明秋和我。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是镜湖中学学生孙敬文（原化工部部长），他联系各学校。当时联系的渠道除极少数党的组织外，一是民族武装自卫会，一是黄河水灾赈济会。

为什么运动确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因为传说这一天是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搞所谓华北特殊化。我们就定在这一天举行示威反对。

“一二九”游行酝酿了很久。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后就开始酝酿了。游行前夜，12月8日晚上，彭涛、郭明秋、黄敬、孙敬文和我五个人，在女一中研究决定第二天搞游行。我们五个人还商定，由黄敬同志在队伍中指挥，我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并约定十一点在新华门请愿后，在王府井汇合集中。这一下，孙敬文就忙着跑交通，搞联系，忙得不得了。而“一二九”用的传单，早在12月6日就付印了，还租了一部出租汽车，事先就运到了女一中。

“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北大还没有拉起队伍。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北大的同学才去敲钟。

“一二九”游行以后，我们又进一步酝酿新的发动工作。“一二九”到“一二一六”之间，各校组织猛烈发展。“一二一六”是有准备的。12月15日夜晚，在长安饭店（王府井拐角处，解放后已拆掉了）开会研究部署。由我和郭明秋去开房间，加上彭涛、黄敬等。我们以打扑克牌作掩护，打了一夜扑克。边打边商量和确定第二天再搞一次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图也是当晚确定的，准备在天桥开大会。第二天一早，我通知北平大学等校，郭明秋、孙敬文分头联系通知其他大学中学。“一二一六”参加的学校多了，队伍有了猛烈发展。

关于南下扩大宣传。

“一二一六”后又如何办？“一二九”未抓人，给水龙头冲散了。“一二一六”被砍伤了几十个人。翁文灏的女儿翁燕娟也受了伤。因此，感到老这样搞下去不是好办法。这时大家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以后，在彭涛家，即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开了一夜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郭明秋、我、高慧如。黄敬首先提出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分三路徒步南下扩大宣传。

提出南下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一二一六”后，因为已快到年底了，国民党宣布提前放寒假。放假前，国民党与我们举行过一次谈判。大约在“一二一六”以后几天，国民党派出的代表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条长杨立奎。他是个很反动的家伙。他正式表示代表蒋介石来与北平学联负责人谈判。我们事先讨论过去不去参加谈判，讨论结果是决定由黄敬、郭明秋和我三人去。谈判方式是由杨立奎出面请客吃饭。杨立奎提出蒋委员长关怀北平学生运动，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政府愿出经费，希望学生能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显然这是想把我们拉过去。他还讲了蒋委员长准备如何抗战。事先我们和彭涛同志商量过，由黄敬出面作答。黄敬说：我们学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国民政府光讲支持不行，要看行动。如果蒋委员长有抗日行动，出兵抗日，我们拥护。否则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国民政府。

斗争是很尖锐的。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宣布放寒假。这时，我们顾虑的是一放寒假大家就回家了，人少了，少数进步分子就显得孤立了，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黄敬主张要想办法把人尽可能集中起来。国民党政府放寒假，我们就把人集中起来，并提出搞一个宣传队出去（后来实际上派出了二千余人，天津派出了几百人），这样他们就难办了。那天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彭涛家里开会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当然，在讨论中也讨论过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问题。至于到工人农民中去、与工农结合，当时尚无明确认识。因此，南下宣传除了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以外，主要是要搞一个以对付国民党政府提前放寒假的对策，不致使各校被各个击破，同时也可以锻炼二千多积极分子。当时我们也考虑过武装暴动，考虑过策应红军东征。但因为力量不够而没有这样做。这些就是决定南下扩大宣传的情况。

南下扩大宣传团，由黄敬当队长，彭涛为政委。我留守北平。出发时间约在12月26日或27日。

（摘自84年《党史通讯》第6期，作者：姚依林）

瓦窑堡会议

背景介绍

1935年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这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曾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在大会后，打扮成商人，越过茫茫沙漠，历尽千难万险，从苏联经蒙古，于1935年11月下旬回到陕北。张浩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委托，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

际七大的精神，初步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联系。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革命的急性病。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决议强调指出：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当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作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会议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关门主义错误观点，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瓦窑堡会议是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转折的关键。

材料：

· 瓦窑堡会议侧记

材料　瓦窑堡会议侧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重新走向新的高潮，这时，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对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分析，以便制定出正确的政策。然而，当时共产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犯有关门主义错误的同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的反革命，不可能与工人农民联合抗日；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营垒是完全统一的，不可分裂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等等。为彻底克服这种关门主义错误，正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12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以及于11月间从莫斯科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等人。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于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瓦窑堡会议决议首先指出当时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东北、控制华北之后，正准备“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个阶级、阶层、政党以及各种武装势力，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也“转入了革命”，他们掀起了“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总之，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革命斗争的道路。

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决议特别强调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党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使全国人民都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决议指出，在这个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对于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军阀，则“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对于地主买办营垒中的矛盾与冲突，也应加以利用，“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应当是利用矛盾，使之有利于反对日本侵略者。

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决议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同时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的反日反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力量。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工农的，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为了适应这一改变，会议决定把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为更加适合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如对待富农的政策，由"加紧反富农"改变为"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也采取比过去更为宽大的政策。决议规定"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等等。

瓦窑堡会议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为了切实保证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决议强调要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贼军队的进攻"等等，决议认为没有这些条件，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不能实现的，抗日反蒋的斗争是不可能胜利的。

瓦窑堡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同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决议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在工人阶级中进行活动，而且还必须深入到一切群众的、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中去；不但要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而且还必须懂得如何在上层人物中进行工作，以争取和团结一切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同时，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还必须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瓦窑堡会议还指出，必须为扩大和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克服在发展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同时必须大量培养干部。应当有数十万和数百万能够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只有这样，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何梅协定

背景介绍

1935 年 5 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亲日分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平使馆武官高桥即密谋借此挑起事端，以达到其不战而控制华北的目的。29 日，酒井、高桥又以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驻滦东"非武装区"等为借口，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提出"责问"和无理要求，并宣称："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事态，日军概不负责。"接着，天津日本驻屯军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6 月 9 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了下列更为苛刻的要求：（一）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二）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班；（四）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10 日，何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示，约见高桥，表示全面承诺。7 月 6 日，何又在日方坚持要求下，经汪精卫批准，复函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谓："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至此，何、梅之间的协议完成，习惯称之为《何梅协定》。

材料：

- 华北主权大拍卖
- 日本的要求
- 何梅协定

材料一　华北主权大拍卖

长城华北抗战之后，国民党中央对华北的控制能力增强了。何应钦、黄郛坐镇北平，一小部分国民党中央军驻扎华北，各级官吏由南京政府直接委派，以及蒋孝先率领宪兵第三团在北平的活动等等，都被日本看作是南京加强对华北控制的表现。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召开的日本核心内阁会议上，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原则，基本上是和日本对华政策相对抗的。"基于这一判断，核心内阁"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政权势力"。所以，一九三五年开始的"中日亲善"与关东军咄咄逼人的叫嚣，都是为了达到日本核心内阁的这一目的。

大滩口约达成后，日本关东军继续借故闹事，挑动事端，伺机削弱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势力。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关东军因战区保安队换防事，无故指责于学忠"违反协定，蓄义挑战"，扬言关东军将有所行动，华北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华北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于五月六日在天津宁园与日本谈判，结果华北当局同意，凡进入战区的河北省保安队，都要经过日本关东军的核准，而换防下来的保安队如何安置，也要得到日方的同意。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从保安队中培植亲日武装，并由这支武装逐步控制河北；而那些专员、与日方谈判的代表，则是日方收买的对象。

五月上旬至中旬，日军借兜剿辽宁"义勇军"王彦、孙

永勤部之机，在长城一带制造事端。五月三日，天津日租界报纸《振报》主笔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被刺身死。白、胡是日本豢养的吹鼓手，本来是死有余辜的，然而，日方却把这件事也作为制造事端的借口，向北平方面发动了新攻势。

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使馆武官高桥，分别访晤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称孙永勤部在遵化滋扰系得到了中国当局的援助，白、胡被刺，与河北省政府有牵连，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中国驻军也要他调，并取缔蓝衣社在天津的活动。如果中方不答应这些要求，日方将自由行动。同时，天津日本驻军到河北省公署、北洋大学等地滋扰、示威，天津形势骤然紧张。

日本外务省、陆军部于五月三十日分别发表声明，诬称中国制造事端。三十一日，日本驻南京武官访晤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日本驻沪武官矶谷访晤黄郛，要求中国采取措施。正在长春的日本陆相林铣十郎，邀集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在关东军司令部谋划压迫中国当局的具体办法，决定由酒井出面，再度与何应钦交涉。南京政府急忙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随后致电何应钦，令其妥善处理。又致电驻日本大使蒋作宾，令其访晤日本外相广田，请从中调停。广田十分狡猾，诡称此事由军部办理，他不过问。六月四日，酒井、高桥访晤何应钦，提出了六项要求：一、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移至保定。二、中央军从河北撤退。三、天津市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应即更换，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及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予以免职。四、河北省市党部及北平军分会训练处停止活动，并解散抗日团体。五、暗杀白、胡的犯人要逮捕严惩，赔偿被害者的损失。六、取缔排日活动。何应钦应允了这些要求，称蒋孝先、曾扩情二人已于六月一日免职，并表示遵行"中日提携"方针不断改善中日关系。

何应钦的妥协未能使日本到此止步。六月七日，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武官矶谷、参谋长酒井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向中国提出要求，让南京政府以具体行动表现不断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如全面解决中日悬案、在全国严厉取缔排日活动、停止保护与援助反日的朝鲜人士、整理旧债等等。须磨总领事在南京向唐有壬正式提出了这些要求。日本为了加强与中国谈判的力量，关东军派土肥原到天津，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专程由东京到中国，与驻华武官会商对中国政府的交涉。

何应钦为了满足日方的要求，特于六月八日发布如下命令：

"国家交邻之道，首重亲睦。平、津两市，为各国人士荟萃之区，应使中外感情融洽无间，以得增进中外之邦交。着即严令平津两市长，平津卫戍司令，北平宪兵司令注意严查，如有有害于邦交之秘密结社及秘密团体，务予严加取缔，勿使存在，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

当天，何应钦对日本大阪新闻记者本乡发表谈话，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处理华北问题遵从"中日两国亲善提携"的原则，"务希得到圆满解决，以增进两国国交之敦睦"。第二，表示他已完全按照日方要求采取了各项有效措施。第三，说明了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对华北问题的态度，"蒋委员长并主张凡于中日两国国交有碍之情事，必须一律加以改善，以谋中日亲善提携之实现"。

六月九日，酒井、高桥、矶谷到中南海居仁堂访晤何应钦，转达日本陆军部的意见，并递交了梅津致何应钦的备忘录，内容为中国方面曾向日方承认实行的诸如撤换一批重要官员、撤退国民党军队、取缔一些国民党的机构等九项，及为实现这九项日方提出的三项无理要求，并要求立即答复。何应钦急忙电告南京，十日得到回训，何应钦向高桥武官转达。南京已承认日方的各项要求。当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对妨害国交的个人与团体，将予严惩。同时，国民党开始从华北退却：六月八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停止办公；六月九日；宪兵三团由北平南调；六月十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河北省党部奉命停止办公；北平军分会下令，驻北平的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调赴陕西协剿红军，驻南苑的第二师黄杰部移驻豫皖边区；河北省政府移保定；五十一、五十二师他调。

日军派飞机至北平，监视国民党军队撤退。驻古北口的日军向密云、怀柔开进，日军两艘驱逐舰亦由旅顺开抵塘沽。

日本要求何应钦对备忘录要作出书面答复，又要求中国以此为转机，在全国铲灭排日活动。六月十三日，何应钦携带梅津的备忘录赴南京汇报，北平军分会暂由鲍文樾主持，北平市的治安由市长袁良负责。

《秦土协定》签字后，梅津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立即先后发表声明，逼迫南京对六月九日的备忘录给予书面答复，要求必须在全国清除"排日"活动，于是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首先进一步调整河北省、天津市机构，以商震为河北省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其次，何应钦于七月六日致函梅津："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这样，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的备忘录，与七月六日何应钦的这封回函，便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南京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换文，人们通常称其为"何梅协定"。

《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是蒋汪政府对察哈尔省、华北地区的主权又一次大拍卖。

（摘自《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张同新）

材料二　日本的要求

六月九日，酒井、高桥到居仁堂访见何代委员长，何代委员长口头答复酒井等谓：

对日方希望之点，截止昨日止，已完全办到：

1. 于学忠、张廷谔之免职。

2. 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三团已他调。

3. 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天津市党部已结束。

4. 日方认为有碍两国国交之团体（如励志社、军事杂志社）已结束，已严令平津地方当局负责取缔一切有害国交之秘密组织。

5. 五十一军已决调防。

蒋委员长对于中、日问题之见解，于其今年二月十四日对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之谈话，可以见之。中日必须亲善提携，方足互维东亚大局之和平。此乃我中央既定之方针，亦即蒋委员长之方针，迄今并未变更。凡此皆有事实可以证明，非仅言语所能掩饰者也等语。

酒井等表示对于我方已办诸事，认为尚未满足，并提出以下四点：

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

二、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

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

四、全国排外、日行为之禁止。

谓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断然之处置；并谓一、二、三项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并请于十二日午前答复。

同时酒井并交来缮写之件一份（计三页），照录如次：

第一，据于迄今的交涉，中国方面受诺之事项：

一、蒋孝先、丁昌、曾扩情等，罢免。

二、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罢免。

三、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解散。

四、天津市党部，解散。

五、宪兵第三团，撤去。

六、军事分会政治训练处解散。

七、蓝衣社类似的机关撤废。

八、励志社北平支部撤废。

（一）撤出的各机关不得再进入，可能对日关系产生不良影响的新的机关不得进入。

（二）关于省市职员人事问题。

（三）约束事项，监视、纠察手段。

第二，未着手事项：

一、河北省内党部的撤退。

二、五十一军的撤退。

三、中央军的撤退。

四、在全中国禁止排外排日的活动。

酒井等谈毕即去。俄顷又复返谓，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军部之决意，万难变更等语。

（摘自《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二十五）3042》）

材料三　何梅协定

（一）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

（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延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切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此笔记送达。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二）何应钦复函

（1935年7月6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何应钦

（摘自《日本侵华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秦土协定

背景介绍

1935年6月5日，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免引起事端，下令释放，是为"张北事件"。11日，日方以日军官被"恐吓"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等三项无理要求。他们还确定了"今后应使宋哲元绝对无法阻碍我在察哈尔省内的行动"的方针。此后，日军即由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负责处理此事。为了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9日发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之职，改任秦德纯代理察省主席。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下，秦德纯与土肥原于27日在北平正式签定了《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行动；(二)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省移民；(四)解散察省排日机构。

秦德纯为协定达成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于张北事件，"余奉中央电令，秉承军分会进行交涉"，已圆满解决。"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尽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土肥原对中日记者发表谈话，得意洋洋地称赞察省当局的合作。其实，秦德纯只不过是卖国外交小经纪人，而蒋介石、汪精卫则是大老板，土肥原的真正合作者是他们。

材料：

- 张北事件始末
- 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材料一　张北事件始末

自五月二十九日以来，平津事件及察省事件相继勃发，中日关系史上突又增最可纪念之一页。平津事件，以我方之力顾大局而解决，已略志前期本栏。兹特将察省事变经过之概要，撮述如左：

先是六月五日，有无照日人四人，旅行至张北，当地驻军照例须查验护照，以四人均无护照，乃向张垣请示，旋奉电覆放行，是殆一极普通事项，日方为此事初由松井向察省当局提出要求。数度谈判后，察方为宁人息事计，已允照办。关东军复于此事，加派土肥原为全权代表到津交涉。松井乃邀秦德纯赴津谈商。秦赴津之第二日，政府更换察主席之命[illegible]下，日方又发布伪丰宁县日伪警员在独石口附近被射击之消息，土肥原遂向秦提出要求，在津商谈无结果。秦德纯因故离察，一度返察，土肥原亦于二十晚由津偕松井来平，察事遂移平交涉。

日方始终认定此事，应作为地方问题，初拟与宋哲元交涉，既见宋氏去职，乃转而与代理察主席秦德纯交涉，六月二十三日晚秦德纯宅之谈判，为察事之正式谈判。我方出席者五人，为秦德纯、萧振瀛、程克、张允荣、陈觉生。日方三人，土肥原、松井、高桥。是晚会议亘二小时半之久，土肥原等态度颇谦和，惟对所提要求，意志则甚坚决。会谈结果，遂由秦德纯据以电中央请示，二十四日中央当局回训到平，着由军分会各委员与秦德纯就近斟酌办理，并略示中央方针之轮廓。

军分会先后开会议三次，秦德纯皆出席。在此数日中，日机每日飞平盘旋。二十四日独石口复发生便衣队百余名前进事件，二十六日古北口南天门日军四千复作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平市谣诼亦多，形势骤呈紧张。土肥原复对秦德纯等表示至二十六晚为止，如察事不获解决，本人将离平返长。于是秦等于军分会会议结果，再度电中央请示，二十六晚十一时，中央最后回训到平，问题急转直下。当日深夜通知日方约定于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双方在日使馆武官室会晤，完成察事交涉之最后手续。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我方之雷寿荣、陈觉生，即首至日使馆，时土肥原、高桥，均已先到候晤。旋即由雷赴军分会迎秦偕来，在日使馆武官室，与土肥原高桥会晤，当即举行最终会议，就张北问题，双方意见完全一致，十一时三十五分互饮香槟，摄影散会，盖察省事件自六月五日发生，至六月二十七日完全解决，先后共历时二十有三日云。

交涉最后手续完成后，秦德纯土肥原皆有谈话发表：秦之谈话：谓关于张北事件，关东军颇坚持其主张，本中央电令，秉承军分会进行交涉，经在平与土肥原间接数度确商，彼此开诚相见，最后决定：(一)处罚事件责任者，撤换一三二师参谋长及军法处长；(二)互相谅解以后不发生此项误会，交涉至此解决。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负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土肥原谈话：则谓张北事件，现已告圆满解决，察省当局之诚意解决至感愉快，今后中日关系可信能有更进一步之提携。且称古北口日军即可撤退，独石口事件不成问题云。

平津事件及察省事件，表面虽属个别，实系首尾连贯，察省事件，既已于六月二十七日完全解决，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于上述两事件，均曾于次日(即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声明，虽不免为彼一方之言，而以其为日方之正式表示，用特附录于下，藉备参阅。

(略——编者)

(选自《时事月报》，第13卷第2期，1935年8月。)

材料二　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要求事项：

（一）撤退地区：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

（三）[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四）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一）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三）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四）[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摘自《日本侵华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北"自治"运动

背景介绍

1935 年 9 月，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公开声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10 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接着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武宜亭等在日人指使下，借口反对加税，召开所谓"国民自救会"，并于 22 日在日宪兵的掩护下，占领县城，实行"自治"，是为"香河事件"。随后，河北安次、庆云、曲阳等数十县，先后发生在日人操纵下的"自治运动"。11 月 24 日，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自治独立"；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自任"政务长官"，统辖冀东二十二个县，"总揽全区军政事宜"。这样，冀东大片国土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不断威胁已调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迫其同意"华北自治"，"使华北五省得到南京政府宗主权的认可，政治、外交、财政脱离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于 11 月 26 日发布命令，撤销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经日方同意，抛出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并于 12 月 11 日任命了宋哲元等十七名委员，宋为委员长。18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强行成立。它虽未公开打出"自治"的旗帜，实际上冀察二省已变相"自治"。至此，华北的危亡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材料：

- 香河汉奸暴动
- 冀东政务委员会

材料一　香河汉奸暴动

香河来客谈香河事变经过详情云：此次事变起因及经过情形，外间传闻不一，余（来客自称）系目击真情实况者之一，故经过情形比较详确。缘本月十八日当地劣绅武宜亭等即在东门外距城一里许安抚寨村胡承武宅集议，有所策动，内中并有某方浪人参加指挥，并印刷请愿传单，准备一切，事经数日，于本月二十日发动。本县劣绅代表陈志儒、曹辅卿、张一斋等三人并有浪人三名，首先至县城内向县长交涉，请即将县城让出，由民众自动组织县府。县长赵钟璞（字抱真山东忻县人）因事出奇突，当即将代表扣留，分别羁押于南大街客栈中，县代表在魁顺馆、浪人在承兴栈由公安局警察及保卫团看守。县长当即拟具电文急电北平方面请示，是时香河通达北平电话电报线已不知何时被人割断不通，县府遂派员驰赴通县转电北平报告，同时并将县城紧闭，以防发生意外，劣绅等更在城外活动，假减税之理由，号召民众。二十一日聚集民众达二三千人，是时城内民众虽较恐惧，但商铺仍照常营业，并无意外，县警保卫团并在城内把守，以免变民冲入，相持至下午五时，劣绅等以冲入城内之计不能实现，遂喝令携带枪械之变民开枪，双方互击，各有死伤。二十二日下午到有日宪兵二十三名，要求进城，结果由西门入，分乘汽车二辆，武装齐整，而变民随日兵入城者甚多，频呼口号，秩序较乱。县长于是时由北门出走，变民追至赶水坝未得。日人旋将羁押之三浪人带去，被押之县代表三人亦乘机逃逸，一时枪声四起，城内住户商店多亦闭门，街无行人，情况混乱，变民等更至公安局将县警缴械，并至民团大队部，由团长姜恩良暂维治安。公安局长白志纯及

队长陈某刘某等三人由城东魁星阁缒城拟逃，被变民瞥见，聚众殴打，伤势甚重，囚于天齐庙内，继移至天德店，由变民看守，禁止任何人接见，待若犯人。现县政由民团姜团长及商会会长王福亭维持，劣绅等更组织自治政府、推举县长，城内商店仍未开始营业，居民亦无人敢参加暴动工作，县城秩序虽尚安谧，已陷于无人负责状态中。河香省保安队一队现进驻距香河五六里之运河西岸，相机而动，变民被胁从，散去者已不少，现仅余三四百人，由首领武宜亭在城内指挥一切，县民痛苦殊深，希当局迅予解决，以救人民于水火云。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25日，第3版）

材料二　冀东政务委员会

日本拼凑华北伪政府的阴谋已在暗中进行多时了。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早已被日本收买。十一月中旬，华北伪组织的方案已最后形成。十一月二十四日，殷逆率领一小批汉奸在通县宣布组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战区二十二县“独立”。二十五日，成立委员会，殷汝耕自任委员长。同时，日军在天津、丰台等车站滋扰。冀东事变突然爆发，宋哲元、商震急电南京请示办法。二十六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开会，作出六项决议：(一)北平军分会应即撤销，其职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五)决议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着即撤销，其职务由冀省府直接处理。(六)电令宋主任、商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当天，南京政府发布命令，通缉殷逆汝耕。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于二十七日会见孔祥熙，指责南京采取惩办殷氏的措施。日本内阁还训令外相广田与中国交涉，压迫南京承认华北伪政权合法，反对何应钦北上。

日军剑拔弩张，部分关东军入关，天津站增派日本宪兵，在天津修筑机场，准备以武力保护冀东傀儡。日本雇用歹徒在天津“请愿”，散发传单，为殷逆叛举造声势。

日本分割华北领土主权的罪恶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北平各界，特别是教育界，连日开会，声讨殷逆组织伪政权，反对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央，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切实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上海商会致电宋哲元、程克，要求他们必以全力维护主权。南京政府除发布通缉令之外，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宋哲元急流勇退，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请南京辞职。南京只电宋留任苦撑而无具体办法。此时肖振瀛倍加活跃，奔走于南京、北平、日本人之间，以谋求一项妥协方案。宋哲元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要自主权。

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谈，要求日方取消华北自治运动，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考虑一项包括日本三原则在内的解决华北问题的措施。有吉是要求南京把承认广田三原则具体化，拒绝取消伪组织，双方未达成协议。十一月二十八日，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两项照会，一项为抗议日本在华军人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一项为抗议日军擅自占领丰台车站。二十九日，又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声明殷汝耕的一切行为无效。同时电达中国各驻外使节，向各驻在国说明政府立场。日本以华北再次催促宋哲元承认冀东伪组织宣布华北自治，并以三十日为最后答复日期。二十九日，宋哲元第二次致电南京，请求辞职。十二月一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也电请辞职。

南京政府对宋哲元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拟削弱他的权力，遂令何应钦北上处理。十一月三十日，何应钦偕同熊式辉北上，与韩复榘会商于济南、与商震会商于保定，十二月二日到达北平。

十二月三日晚十时，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访晤何应钦，宋哲元报告了华北事件与日方交涉的经过之后向何应钦表示：(一)不向他人屈服。(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五日，宋哲元避入西山休息，同时发表一份深含隐情的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且何部长与韩、商两主席均经晤面，对华北实际情形既有真切的了解，当然可以得到整个的解决。本人卫戍平津以来，中央曾有令责成商主席负津市治安之责，本人则仅担任平市方面，而卫戍司令部，近又有令准备撤销，本人责任，从此当可减轻，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也”。可见宋哲元的消极在于对抗南京削弱他的权力。

日本大使有吉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会晤南京新任外交部长张群时明确表示，如何应钦坐镇北平，华北问题难于解决。取消黄郛主持的政整会，换成何应钦掌握华北全权，是中国对日本关系的“倒退”，而不是“进步”。要求由握有华北实权者主持华北，暗示如宋哲元主持华北，问题将容易解决。日本人认为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有矛盾，且其手下还有一批能与他们“合作”的人，便于掌握与利用。

何应钦面临上述三种势力的压力，只好请出秦德纯、肖振瀛出面与日方折冲。十二月六日，肖振瀛赴天津与酒井等会谈。几经磋商，最后产生了华北组织机构方案。何应钦电请中央批准，熊式辉专程返宁报告。十一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云：

“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李廷玉、贾德耀、胡毓坤、高凌尉、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门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时调整华北各机构：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所辖三十二军开往顺德训练。刘峙改任豫皖

绥靖主任。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肖振瀛为天津市长，程克改任冀察政务委员，张自忠为察省主席，秦德纯仍为北平市长。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这样出现了。

何应钦完成了使命，于十二月十二日南返，陈仪、殷同赴天津。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者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妥协产物，它暂时起到缓冲矛盾的作用。在日本看来，已经达到了驱逐南京势力出华北的目的，伪化华北已经有了开端。而在南京看来，冀察政委会仍为自己的属下，日本鼓动的华北全面自治计划未能实现。不过，这只是南京政府聊以自慰的想法。事实上战区二十二县成了伪区，日本要不断扩大伪组织，并派伪军进攻察东沽源六县，造成了华北的空前危机。

（摘自《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张同新）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5年11月1日至6日，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开幕当天，汪精卫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以手枪击伤。会议检讨了四年的党政工作，为"五全大会"作了准备。会议通过了以冯玉祥等二十人联名提出的"救亡大计案"，其主要内容为：①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②大赦政治犯；③精诚团结；④充实军备；⑤注意防灾救灾等7项。还通过自11月4日起，通行法币，停止使用现金一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而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内战政策。汪精卫在开幕词中就称"我们近几年当中剿匪之努力已得到了极大的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感到满意和安慰，我们须更加劳苦，更加努力。"会议检讨了四年的党政工作，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材料：

- 汪精卫致开会词
- 于右任致闭会词

材料一　汪精卫致开会词

各位同志：

自从五中全会闭会以后，因种种关系，至今日才能开六中全会。各位委员由各处来京出席，其人数之多，为历届记录所未有。在这一点，可以充分表出各位同志奋斗之精神，这是极可欣慰的。六中全会闭会以后，紧接着就是五全大会，所以六中全会是四全大会之结束，同时也是五全大会之开始。所以这一次的开会，其意义非常重要。我们记得四全大会开会的时候，正值国难严重，所以四全大会的口号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四全大会之后，自一中全会以至今日，各位同志都是本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意义，努力去做。我们固然不敢说我们的努力已得有完满的结果，但是历次全会都是照着这方针而进行的。如今五全大会开会期近了，国难严重比之四全大会时候有增无减。我们在这几年当中，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了极大之成绩，其他建设也得有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的安慰，就是因国难并未解决，而且更加严重。我们须要更加劳苦，更加努力，照着四全大会所定方针做去，并以之贡献于五全大会。自五中全会以至今日，所有各种工作在此次全会理当有详细报告，恕不先述。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之精神永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我们盼望本此精神及其决心，在此次全会里得到极有价值的讨论，因而得到极有价值的决议，以见之实行。

材料二　于右任致闭会词

这一次全体会议开了五天的会，中央执监各委员除远在海外及少数直接指挥剿匪之官长以外，几乎是全体到会参加，可算是第四届中央第一次的盛会。这种热烈的情况，鼓励着会议的进行，大家都感觉到无限的兴奋，充分表现了本党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经过情形可以说异常圆满。所引为遗憾的，当开幕的一天，竟发生凶徒混入开枪的意外事件，致汪委员中弹受伤，不能出席会议。此种仇害党国的凶徒真是本党全体所共愤。在汪委员以革命家大仁大勇的牺牲精神，担当国家的难局，本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我们回溯本党自总理领导革命以来，本党中重要同志历次遇险与牺牲的经过，更可证明本党革命每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就必然有反动势力欲得本党而甘心。我们要完成我们革命事业，每一个同志均须以总理及先烈遗留之精神来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现在汪委员伤势治疗经过非常良好，我们大家于安慰之余，衷诚盼望其早日康复，仍为党国继续努力。全体会议的使命在检查过去，策动将来。六中全会开幕距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不到十天，实在是第四届最后一次的全体会议。因此我们的工作在结束从前的议案，检查已往的事实，关于党务、政治、教育、经济我们也讨论了若干的议案。但此后党政大计的进行，应留待五次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所以这一次会议，我们除公布会议情形以外，不另发闭幕宣言。

我们检查自五中全会以来十个月间的情形，深深感

觉到国家民族处境的艰危有加无已。在这十个月中间，虽然全国同胞和本党同志在各方面均已做了很大的努力，国家一切建设及社会力量都表现了相当的进步，剿匪军事与绥靖工作也收了不少的成功，但是水旱天灾相接而至，国际环境的紧张和世界经济变迁的影响，使我们处在这个困难严重中的国家，一天天的增加艰难的程度。我们不能否认在此十个月间，全国上下挣扎奋斗的苦辛，但我们必须指出要度过这个艰危万状的时期，实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赤诚和团结，还需要十倍百倍的努力。救亡图存必须要集中国力和充实民力，以自身奋斗的力量来挽救环境的艰难，这是中央几年来所决定的方针，实在也是一定的真理。自从三中全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及起草宪法以来，经过立法院起草、征求、讨论、修正种种手续，五中全会又交付常会审查，核交立法院再修正。最近立法院已将修正本送六中全会，会议中同人均觉得颁布国家百年大计的宪典是一件应十分郑重的事，决定将草案送请五次代表大会指示纲领，并考虑较长时间之集中研究的方法，以期臻于至善。但一方面又觉得我们要提高国民共同奋斗之志趣和愿力，非提早实施宪政不可。所以又决定建议五次代表大会请先将召集国民大会日期加以决定，以一新国民的视听，使我们集中国力和目的得以充分发挥。由最近舆论的趋势看来，国民对于本党革命救国的主张逐渐增高其认识，实施宪政以后，于挽救国难、复兴民族必能收很大的效果。这是本会议同人所深信的第一点。

关于充实国力和培养民力着手之点，当然是千绪万端，我们期待五次代表大会必有极详尽的决定。但其最要关键，还在乎使国民经济臻于健全。这一两年来我们于重重困难之中，还感受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非挽救经济国难，谈不到充实国力，以救亡图存。最近更觉得货币与金融倘不从速设法使其安定，一切工商百业，无论都市乡村，必将日趋崩溃，不可收拾。所以本会议就不期等待五次代表大会，而接纳了政府财政当局的“统一发行，集中准备的货币改革”案。自从此案颁布，各地社会对于这样空前的大改革，都能安然奉行，金融界与政府呼应一气，共同努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民接受国家政策的一种进步。由此种上下一致的精神，更进一步谋国民经济的积极建设，忍劳忍苦来牺牲，中国必能以自力奋斗来复兴。这是本会议同人所深信的第二点。

综合上面所报告的几点，我们国家民族当前的环境诚然是存亡呼吸十分艰危，同时我们敢于断言：全国同胞对于一致奋斗的必要，确实有了深刻的觉悟。希望大家体察当前的情势，增加我们的自信，遵奉总理遗教，矢勤矢勇，往前努力，来完成我们革命救国的使命。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币制改革

背景介绍

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南京政府财政部于是年11月3日正式发布改革币制的布告，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同时，又发表宣言，明确规定，“所有银元持有人，立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①]法币一元折合英镑一先令二又十分之三便士，或美金二角九分五厘。在法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四大家族垄断的金融机构发行钞票、广收白银。至1937年6月，“四行”共发行法币十四亿元。据1936年度的统计，中、中、交三行除原有的一亿三千万盎司白银外，又从其它银行收回二亿盎司，从民间收回一亿七千万盎司，总共集中了五亿盎司左右的白银于自己手中。

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四大家族却乘机将全国的财富不断集中到自己手中，以后更滥发纸币，经营公债，向中国人民进行最直接的掠夺。

材料：

- 孔祥熙关于改革币制宣言
- 财政部安定货币金融办法案
- 孔祥熙与通货膨胀

材料一　孔祥熙关于改革币制的宣言

行政院代院长兼财长孔祥熙对我国货币政策三日发表宣言云：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而失业增加，破产迭出，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七月起，仅三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二万万元以上，苟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政府于同岁十月十五日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借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险得以幸免。顾此种举措有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迩来事实所表现，则现银之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各国之先例，颁

布紧急法令，自本月四日起有效，其内容如左：（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所发之钞票，自公布日起，定为法币，并集中其发行。其他各银行所发钞票仍准流通，但应逐渐收回，而代以中央银行钞票。以后各行不得印发新钞票，所有已印未发之新钞，应交存中央银行。（二）所有各种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债务，应准照面额于到期日以法币清偿之。（三）所有银之持有人，应即将其交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四）为使国币对外汇价按照现行价格稳定起见，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应即对外汇为无限制之购售，现为国有之中央银行，将来该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其主要资本应由各银行及公众供给，俾成为超然机关，而克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之稳定。中央准备银行应保管各银行之准备金，经理国库，并收存一切公共资金，且供给各银行。并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惟于二年后享有发行专权，政府并着手准备进行步骤，使吾国商业银行于健全状况之下，设法增加其活动能力，俾其基金充裕，及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在此种步骤之中，并拟专设机关，办理地产抵押业务。一面修改现行（原件此处缺十几字——编者）更为稳固。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关于财政整理之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再历十八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如有不正当之投机及逾分之物价上涨，当予以严厉之取缔。政府对于上开改善财政经济状况之积极方案拟即施行，以冀早奏成功。深信全国民众对此种种措施必不吝一心一德全力赞助。俾国民经济得以早日恢复，而全国乃克臻于繁荣之状况也。

（原载《新天津晚报》，1935年11月4日，第2版）

材料二　财政部安定货币金融办法案

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所至十一月三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制，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自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保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决议：

追认，交国民政府通令施行。

（摘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

材料三　孔祥熙与通货膨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中滋生的官僚资产阶级骑在人民头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最初还只利用苛捐杂税和摊派公债的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到了后来因财政赤字愈来愈大，便从通货膨胀上打主意。当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宣布所谓“法币政策”，实质上就是没收人民白银的政策，为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它的内容不外以下四点：（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以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作为“法币”在全国各地流通；（二）凡持有现货者应向国家掉换这种法币；（三）法币的发行仍以白银为准备金，但所谓准备金只是一句空话；（四）“法币”的对外汇价，最初是与英镑联系，到抗日战争以后又与美元联系。

这种“法币政策”规定的本位，显然是放弃银本位而改用外汇作本位的一套把戏。在进行所谓币制改革以前，孔祥熙曾与诡计多端的财政部次长徐堪密商多次，由徐堪献计把白银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趁美国收大量白银时送到美国去卖。当时孔因害怕英国与日本出来反对，又同英国大使贾德干商量邀请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Laitz Ross)。李滋罗斯为了征求日本意见，曾绕道日本，然后访问中国。孔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晚十一时发表“金融改革令”以前，还同贾德干和李滋罗斯会晤了一次。法币的对外汇率规定为一先令两便士半，与英镑联系起来，法币对其他国家的汇率都是通过英国电汇汇价套算出来。这就说明法币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是一种英汇本位制。孔在英王加冕时还率领了一批购买军火的随员到伦敦去活动，在英国订购了许多军火。在施行所谓“法币政策”后，他们把中国人民数千年来血汗的结晶品——白银，以每盎斯六角五分的价格输送给美国。因此，法币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金融的一根绳子。

在法币刚刚发行的时候，发行总额还不过十四亿元，因而当时人民对它还有一定的信任。在抗日战争初期，孔

祥熙还用发行救国公债和施行直接税等手段来弥补财政收支。可是从一九三九年以后，财政赤字愈来愈大，新增的直接税既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公债又因民穷财尽，发不出去，孔便利用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发行权，无止境地增加发行纸币，在全国范围内对广大人民进行掠夺。因而从一九四〇年以后物价逐步上涨，造成通货膨胀的局面。到了后来，物价变动的间隙愈来愈缩短，最初半年一次，继而数月一次。物价上涨本来就是币值下降，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工商界都乘机将商品囤积居奇，形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局面。对外汇率也就随着币值低落而急剧变动。最初由一先令二便士半跌至八便士，与法币的法定汇率相差六便士半。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虽与英国订立平准基金协定，企图把黑市价格稳定于八便士又四分之一，但中英双方提出的一千万英镑不到三个月已用完，无法维持。孔一再向英国求救，遭到拒绝后更捉襟见肘，到了六月初财政部不得不宣布暂停出售外汇。孔采用英汇本位制的纸老虎，从此戳穿，黑市汇率也就暴跌到六便士。到了一九四一年，孔的亲英路线改变了，开始依靠美帝。因为那时美帝利用购银政策的这张王牌，在国际市场上压倒了英帝。于是财政部宣布法币的汇率与美金联系，五元换一元美金。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发行了美金券的巨额大钞，同时规定法币对美汇的价格为二十元。这样，法币又显然成为美汇本位制。

可是由于不断增发法币，不管英汇本位制，或者美汇本位制，都阻止不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法币的购买力一天天地降低，与法定汇率的距离愈来愈远。美帝人员在中国使用的美钞都不肯向中央银行照法定汇率兑换，而直接大量流入市场，在国内形成美钞的黑市买卖，成为投机的对象。到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币的发行额增加到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亿元。通货继续膨胀，即促使物价不断高涨。如以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为一〇〇，一九四五年九月即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二十二种基要商品销售物价指数为一二二，六〇〇。可见在通货膨胀的后期，物价上涨比通货膨胀的速度更快。因为通货膨胀结果，游资趋向于商业与投机方面，工业生产反因资金短绌而萎缩，造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形势。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两度展期，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一百零三人，代表四百零五人。阎锡山、冯玉祥经蒋介石亲赴太原、泰山邀请而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谈而派代表参加。在"国难严重"的情况下，这次大会表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作为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这些内容，又反映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以及中日关系的一些新动向。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会议还授权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通过了对政治、军事、党务各报告的决议案。五全大会对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匪共暴行，荼毒生民，重为民族心腹之患者"，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11月23日，大会闭幕，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一百八十人，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八十人，并发布《宣言》，列举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条措施：第一，崇道德以振人心；第二，兴实学以奠国本；第三，弘教育以增民力；第四，裕经济以厚民生；第五，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第六，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第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第八，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疆而成统一；第九，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第十，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

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

材料：

- 林森致开会词
- 蒋介石提案

材料一 林森致开会词

自从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至今整整已有四年，经过好几次因不得已原因的延期，直至今日才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筹备和延期的经过，中央党务报告中当另有说明，不待重述。我们此次延期，固然因为有种种事实的原因，最主要的还在希望大会多得集思广益的机会，使大家在大会中，格外能表现踊跃团结的精神。这次参加大会的代表及中央委员人数，超过了历届的纪录，因内部的团结情形较之四次代表大会时更有增进，这一层全党同志必定觉得很安慰的。我们开会的日期，正是总理的诞日，大家在参谒总理陵墓以后来参加开幕典礼，人人心中必然感觉得有总理伟大的精神照临我们之上。全体同志追念总理的遗训，体察国家当前情势的艰危，人人心中又必然都感觉到有两问题：我们对于总理遗留给我们的革命救国的使命，所已尽力者几何？我们对于今后努力奋斗的途径，又应该怎样？这两点正是代表大会的使命，即所谓检查过去工作，和决定将来方针。本党负有建国的责任。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举国同胞均瞩目于我们大会的进行。我们大家应该如何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发挥总理未竟的绪业，安慰全国同胞的期望，鼓舞起一致救国的热诚，振衰起敝，以挽回艰危的国运。在过去的四年中间，国家所遭遇的国难，重迭相乘，难以尽述。四次代表大会举行于国难发生之始，到今天国难的严重，更十倍于当时。因了外患的加深，加上了水旱天灾、匪祸、以及经济变动的剧烈，使得举国民众备尝屈辱流离和痛苦。在责备我们的，都说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和国家艰危紧迫的环境相应和；在原谅我们的，则以为我们在这几年中并不是没有向上努力，国家人民并不是没有相当的进步，只是世界形势的变迁，外来困难的加甚，证明革命救国的工作正在经过一重极辛苦的实验。不论是责备或是原谅，我们都觉得应自己鞭策我们，站在党内地位的实在是愧对总理，愧对我们革命的天职；站在本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实在也可以说是愧对一般的国民。为完成我们的使命，当然应有更深一层的自省和努力。大会对于过去的工作，在开会中间必有严切的检查，来作成决议。但最重要的任务，尤其在开创今日以后努力途径，使我们的党与全体国民提挈一致，以尽救国复兴的责任。因此对于本党的章制以及党务的推进，我们应考虑有没有应改善的地方，研究如何切实改善的方法，使本党能在革命救国的工作上，切实负起比一般国民还要重大的责任来，实现总理的遗教；对于今后政治上对内对外的设施，以及一切建设，我们应悉心讨论，确立精详切当的方针；对于团结国民，共同奋斗，我们应该讨论如何鼓起全国的热诚，集中全国的心思财力，以共济艰危的方案。我们相信到会代表同志，必然有很完美的议案、很精详的讨论，来作成切实有效的决议，以慰全党全国的期望。我们觉得我们当前的工作应重在将来，因为本党是负有时代使命的党，而时代始终是前进的。由今日来比较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代的形势，有一点显著的变迁，足使我们得到兴奋，这便是国民对于本党的态度。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一般国民对于国家的环境和前途，似乎还没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对于本党只是片面的责难或不满，甚至因对党的不满，而对总理救国的主张及一切遗教也发生怀疑的。到了今天，则大多数知识分子及有觉悟的国民，改其片面的责备，而为加重责任的期望。在党外的舆论只是责备我们没有完全尽到总理交给我们的使命，不断鞭策本党的努力自爱，愿意在一个目的之下，与本党共同尽瘁来努力于国家的建设和复兴。这一个显然的变迁，一方面证明总理遗教和主义的伟大，表示我们时代进步，但同时也使我们身为党员的全体同志，格外感觉得责任的重大，我们若不能一致的努力，切实负起救国的责任，将不仅为总理的罪人。因此更使我们想到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总理所谆谆告诫党员的遗训，总理当时曾说："我们国民党应有一种精神结合，第一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并且还申说了必须个人能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才能得自由，个人能贡献能力，然后全党才能有能力，党有了自由和能力，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来改造国家。"总理谈这一番话，还在十余年以前，但我们观察这十几年以来，许多新兴国家由困苦危亡中奋斗成功的途径，实在不外牺牲自由与贡献能力两句话。可惜总理这样的精识远见，我们过去没有能完全奉行。其实要组织一个健全的革命救国的集团，固然必须全体党员能牺牲自由贡献能力；要造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也不外乎使全体国民人人都为国家而牺牲自由与贡献能力。这个精确不磨的理论，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大道。牺牲自由就是克己，贡献能力就是能效命。我们要以党内牺牲自由的精神，来感动全国国民都为国家来牺牲自由。我们又必须加倍刻苦来贡献能力，才可以团结全国同胞，人人贡献能力，为国家效命。在这个安危兴亡的关头，我们重述总理这一番的遗教，更觉得有深长的意义，希望全体同志，充分表现这两句遗训的精神，来尽我们应有的使命。敬祝大会成功。

（摘自《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二 蒋介石提案

此次大会开幕，一切工作业已过半，连日诸同志开诚讨论各项提案，一种精诚团结之精神，弥漫全会，实为国家前途最可庆幸之事。中正今日更愿借此全国代表聚首一堂之机会，对于年来吾国之对外关系，率直的有所披陈，幸诸同志悉心的加以检讨后，有切实的指示。

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继续不断的上海事

件、华北事件，接踵而来，全国上下，均陷于极度烦闷苦痛之中。中正受全党同志付托之重，担担[当]中央常委，实感觉责任最大，苦痛更深之一人。惟吾人经过长期间国难之结果，深信全国已达到一种深切之体认。体认维何？即吾党三民主义之第一义，所谓民族运动，决非单纯的对外运动。盖民族运动应有内外两面，对外运动仅为民族运动之一部份，决不足以概民族运动之全。换言之，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恭按总理遗教实早已昭示吾人，总理对外固主张为吾民族求自由平等，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同时对内极力主张精神建设、物质建设。吾人每读《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各种遗著，总理向我全民族要求共同奋斗为国求自立自强之道，实随处皆是，而民族主义第五讲所以昭告吾人者，尤为明显。故吾人今日亟宜切实反省十数年来吾全国对一切精神建设、物质建设所谓自立自强之道，究竟努力至何程度；尤应了解民族运动之两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若仅着力于一面之突出，必遭意外之挫折。此必然之势，今日之所欲披陈者一也。

其次国与国间之关系，及个人与个人之关系，完全不同。国家与国家间决无百年不解之仇，征诸欧洲各国相互间百年之外交历史，或合或离，即其明证。盖国与国间之关系，事态复杂，范围广泛，决不若个人相互间之简单。每有就某一事件某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决无可合之理，然更就另一事件另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又决无可离之道。此种情况，各国相互间实例甚多。故国际关系，纯系比较的，而非绝对的；易词言之，决定国际间离合友敌关系，应以整个的国家盛衰及整个的民族利害为对象，不应以一时的感情及局部的利害为对象。其间权衡缓急，比较轻重，以定决策，实为负责之政治家与革命党员应守之规范。吾人每遭横侮之来，惟有反躬自省。尝读民族主义第五章，总理所昭示吾人者，总括其意以可以灭亡我中国者，不止一国，此吾人不能不引为猛自警惕者也。因为此次空前之国难，自有其因果律，决非偶然发生的。孟子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总理亦每引此以告吾人。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友邦，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古人所谓“自助人助”与“自求多福”者皆此理也。吾人丁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于自助与自求而已。此今日所欲披陈者二也。

尤其是吾党“国民革命”之使命尚未完全成功，凡一国在革命过程中一切对内对外之设施，多半与旧有之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或变化。故阻力之来，诽谤之兴，乃必然之势。吾人处此时会，应须注意者约有二点：其一，应完成“国家中心之基础工作”为绝对的坚决的共同信条，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盖非常时期之外交，决非普通国家所用之经常手续可资应付。其二，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机微莫测，每一事变发生，均有当机立断，迅赴事机之必要。试观察欧洲战后，东西诸国，在革命过程中内外两面所发生之困难与阻力，大都与吾国最近十年间之政象相同，然卒因全国上下有坚决的共同信仰，负责当局有立断的应付权能，故均能转危为安，国基大定。此今日所欲披陈者三也。

吾民族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其盛衰兴亡，影响于全世界之和平及全人类之福利者，至深且巨。各友邦之贤明政治家，不能见及于此，而我东邻日本，关于东亚之和平与彼此两国之福利，亦必关心更切也。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岂有他哉。诚能对国内为健全坚实之改进，对友邦为坦白诚挚之周旋，自信必有内外相谅之一日。吾人于此，可下一结论如下：

基于上述三项意见，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敢自逸。换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其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陈述至此，中正谨披肝沥胆，向大会建议，大会如以上述方针为是，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政府誓必竭诚尽能，对全党负完全责任。是否有当，敬请大会公决。主席宣告：

大会如赞成蒋同志建议，请起立表示接受(全场一致起立接受)。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决议案选编》1941年)

历史内幕

遵义会议上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遵义会议的第二天。

博古照例坐在会议室长方桌靠里墙一边的中间，神情似乎有点儿沮丧。

博古宣布开会，由于情绪没有昨天好，不想多说话，因此语言很简洁："同志们，继续昨天的会，请诸位对两个报告继续发表高见。"

大家都不吭气。这一、二十平方米的会议室，真是风云际会，万马齐喑，不比辽阔的战场上的真枪实弹与硝烟炮火轻松！

彭德怀在昨天的会上讲了一点意见，但他深感一年多来的感触太多，并没讲完。憋在胸中的好多话必须在会上说说，出出胸中的郁气。他看见大家都不讲话，感到这样空气太沉闷，憋得难受，决定打个头炮。于是，他对博古说：

"突围西进途中，搬家逃跑，行动迟缓，野战军遭致重大损失，这个责任应由中央来负。"彭德怀又将目光移向坐在过道一侧的李德身上，大声说道：

"华夫同志在反五次'围剿'中实行的'短促突击'战术，也是十分错误的。

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后，叽哩哇啦地立即反驳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短促突击'战术之所以未能取胜，是由于军事干部们在执行这种新战术时发生了偏差。"

彭德怀一听李德为自己辩护，接着说道："在国外正规的阵战战场上，采用'短促突击'，可能行之有效，但用在中国战场上，不一定适用。从这一点来讲，李德同志不了解中国情形，是在那儿瞎指挥！

李德听了翻译后，立刻反唇相讥道：'"过去陈独秀、李立三也说过国际代表不懂中国国情，既然你们说我不明了中国情形，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责任到底是谁呢？"

会议一开始便展开了辩论，大家嗅出了一点火药的味道。

刘少奇一直在搞白区工作，近几年来，苦衷很多，趁此机会，他也想讲讲，于是操着一口湖南宁乡口音说着：

"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吱声，注意听着大家的意见。当听到刘少奇提出要检讨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总路线时，坐不住啦，他用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有点激动地大声说道：

"我不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执行了历次国际的重要指示，在国际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党的危险，保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建立了广大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组织了三十万铁的红军；实行了苏区的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说这些都是'左倾'冒险主义？难道说，因为我们未能粉碎五次'围剿'，便可抹煞全党奋斗的功绩？请问大家，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对苏区红军、对我党的污蔑又是何区别呢？…"

博古真会讲话，能言善辩，侃侃而谈，讲得似乎颇有道理。不愧是一个理论家。

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凯丰接过博古的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不容否认，谁要否定，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论调。"

刘少奇不服，正要辩解，被毛泽东打断了："路线问题，我们可暂搁一边，不去管它，一时扯不清楚，以后再说，还是集中力量检讨一下我们的军事路线，看是否真有问题？"

博古语塞。

凯丰看见毛泽东回避讨论政治路线，目的在于集中精力清算军事路线，这可能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他在心里暗暗说，还是毛泽东厉害。

凯丰是博古的支持者，会前，他曾经三番两次的找聂荣臻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但聂不同意，有他自己对博古的看法，眼看争取不了聂荣臻，于是凯丰对人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在会下找同盟者支持博古无效，于是在会上亲自出马。此刻他心想，你毛泽东不要以为在会上有人支持你的意见，便认为不得了，大言不惭起来。你毛泽东在会上侈谈什么军事路线，你懂得多少？于是他以一种鄙夷不屑的口气冲着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抬头瞅着凯丰："请问凯丰同志，《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

凯丰睁着眼睛，瞠目结舌。

毛泽东从上装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划燃火柴，吸了两口，瞄了一眼凯丰，大声说道：

"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得是个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洋，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啊——啊——"凯丰答不上话来。

红军总司令朱德可以说还没有好好发言，昨天只是听到同志们发言时，讲得气愤的时候，简单冒了两句。他那双慈祥而和善的眼睛望着大家，神情凝重地说道：

"李德顾问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进入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苏区，牺牲了多少人命！最后，我们还是只能撤离江西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畏于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

王稼祥在躺椅上欠起身子，接过朱德的话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博古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白皙的脸庞泛起一阵微红，盯着王稼祥，感到有些吃惊。心想自己与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一起共事，后来虽然产生过一点矛盾，但基本上还是一个营垒里面的同志，今天，为何这么理直气壮地反对起自己来……。

凯丰不以为然地说："博古同志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你们要撤他的职？改换领导，我不同意！"

洛甫有些激动，但他尽量沉住气说："请问，博古同志能再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顾问，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

李卓然操着一口湖南话，有些生气地说："我来迟了，没有听到博古同志的报告和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今天上午，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颇受启发。朱老总讲得好，突围出来的军事策略很成问题，一路畏于接敌，仓皇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掩护，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湘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摊，我们在后面走起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敌人袭击。这哪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撤退呢？简直是夺路逃命，溃不成军……"

聂荣臻马上接过李卓然的话说："提起过湘江，简直是一场恶梦。"

一直没有发言的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讲话了：

"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内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凯丰不以为然地说："要说博古同志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最多只能说在军事上的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大家知道，军委的工作具体是恩来同志与李德同志负责，如将全部过错堆在博古同志一人身上，也不公平……。"

凯丰的话还没最后讲完，博古接过去说："比如前年底至去年初发生的闽变，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应付方针时，我与恩来等同志都主张速派第一、第三军团赴闽，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以抵抗国民党军队，同时可坚定蔡廷锴的斗志，但泽东同志却坚持主张慎重行事，决定先邀十九路军配合红军，消灭闽西刘和鼎部后，才与之援助，以此检验蔡廷锴是否有坚决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本来，这件事事关重大，慎重一点处置是应该的。但是，由于毛泽东不相信十九路军，认为不要轻信人家的欺骗宣传，我们却坐失良机。于是援闽的方案便束之高阁，于我们大大不利。难道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博古也有责任？"

博古讲完后，大家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毛泽东安详地望望大家，不紧不慢地说："看来，博古同志的提问，是有我毛某来回答了。好，让我来说说，讲得不对的地方，请诸位不吝批评指教。"

"闽变发生，中央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方针，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停战协定，来推动蔡廷锴部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但是，博古与恩来等同志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了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这样，就认为是帮助了十九路军。于是，将一、三军团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域敌人的堡垒，使我军遭到重大损失，当然也就无补于援助人家。如果我们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福建人民政府就不会垮台，于我们的五次反'围剿'战争也大大有利。"

停了停，毛泽东继续说道："在援闽问题上，我确实主张慎重行事，但不等于说在政治上军事上不利用这一事变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相反，我认为处理好了，是击败国民党进攻的关键之一。怎么可以说，因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提了须认真研究，慎重行事的意见，就铸成了大错了呢？我看应该在当时中央的领导者所执行的战略方针上去找原因。"

洛甫看见毛泽东与博古针对闽变问题争论不休，各据一方，各持己见，言词激烈，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伤和气，于是从中斡旋说：

"十九路军兵变，是我们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冒出来的重大事件，党中央在处置上有失误的地方。无庸讳

言，责任应在中央。我看，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下去了。对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战略战术诸方面，大家还可谈谈，好好总结总结，以利下步行动。”

经洛甫这么一转圈，毛泽东与博古之间的辩论，暂时停止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摆起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又一个战斗，一次又一次战役来，分析这些战斗战役取胜或失败时所执行的战略方针，因为与会者多数曾经沧海，是前线的指挥员，一个个从血火中钻出来，讲起那些浴血奋战、肝脑涂地的往事，大家都非常熟悉。

由于意见还不统一，认识尚有分歧，预计三天的会，就剩下明天啦，博古与周恩来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晚上继续开会。

听说晚上还要开会，一局的几个小参谋匆匆吃罢饭即登登登地跑上楼去，将吊在会议室正中顶壁的那盏荷叶盖的洋油灯灌满煤油，然后点上。又从管理科领了一箩筐青杠炭抬上楼去，搁在走廊上，顺便添加一些在会议桌下的火盆里边，另外还准备好了一桶开水。

房子虽然不大，但那盏吊洋灯的火焰毕竟不算太强，昏黄的光，照着一张张瘦削的、颧骨突起的脸颊，呈菜青色，这时显得更加难看。但一双双眼睛却很明亮，闪着坚毅、沉静而又倔强的光芒。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站起来，两道浓浓的黑眉几乎纠结在一起，额前的几道纹沟似乎更深了。

周恩来讲话了，他颏下的长髯频频颤动着：“同志们，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和大家的认识一样，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周恩来讲完后，坐下来。

会场又是一阵沉默，大家在心底掂着周恩来讲话的份量，一致的感觉是可不轻呀。特别是对于周恩来严于解剖自己，主动承担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指挥作战的错误责任，引咎辞职的高风亮节十分钦佩和赞赏，于是一个个向他投以敬重的目光。

在一阵沉默之后，洛甫站起来说：“这个时候，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应付这个局面。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洛甫的表态简洁有力。作为党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洛甫，作这样的表态，其份量也不轻呀！看起来这简单的几句话后面，沉淀着洛甫几多个日日夜夜的认真思考！

洛甫发言后，没有人吭气，没有人提出疑义，无形之中表示出一种倾向：赞同周恩来和洛甫的意见。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就这样由一个领导局部——一块根据地的首脑人物，一跃而成为中共军内的领导核心之一。他虽然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自从开了那个秘密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之后，即悄悄离开黄浦江，回到他熟悉的农村，秘密组织武装暴动，长年累月奔走在苦难的山野。在那星火燎原、群雄四起的战乱年代，他为了一个执著的追求——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东拼西闯，南攻北斗，还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内一个个传奇式的人物——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甚至还有井冈山区的王佐、袁文才这样的绿林好汉。于是他在莽莽苍苍的五百里井冈当了两年零四个月的“山大王”，闹得湘、赣两省的军阀不得安宁，几次兴师动众，又是“围剿”，又是“会剿”。毛泽东凭借他的游击本领，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神出鬼没，与朱德一起，让他们领导的这支部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以致在国民党势力统治薄弱的地方，开辟出一块根据地来。毛泽东自然是这块根据地的领袖。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他的不断实践，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开展对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斗争。虽然其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挫折、有失误、有流血、有牺牲、有欢笑、有胜利。如果从革命宏观的发展来认识，他仍然获得不少成功。但他的所作所为，开始并不为第三国际所赏识，特别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王明、博古等人，对于毛泽东更时有指责。其实，毛泽东对这些留过洋的书生，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只尚空谈，缺乏直接领导群众斗争的本领，没有搞过工运，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领导过武装斗争，只会对马列主义生搬硬套。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难道单靠书本上的理论，就可以变成主宰中国命运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在具体领导武装斗争中，往往凭他的聪明才智，大智大勇，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然而又是惨淡经营、荡气回肠的活剧来。他干起来，没有具体的模式，有时依靠他天才的发挥与创造。碰了壁，再总结经验教训，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地抗争。对中共年轻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自有他的看法，他的言行与他们总有些格格不入。特别是当他受到错误的排挤与打击时，压抑折磨着他，苦苦啃噬着他的心。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理想与创造力不能很好发挥。中国革命也为此遭到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事业，将会在教条主义者的空谈里断送，这是使得他特别忧心如焚的地方。他决心要改变这

种情况，于是在突围西征的路上，他不停地找人谈话，不停地与握有党权与军权的领导人物争论，想用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真知灼见去影响他们，说服他们，争取他们转变。工作很有成效。于是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大问题。

（选自《遵义会议纪实》作者：石永言）

张国焘危害红四方面军及川陕根据地见闻

一九三三年，我在红四方面军总政地方工作部工作。曾耳闻目睹了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川陕革命根据地及红四方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

一九三二年春，红军在皖西苏家埠、韩摆渡、七里桥等地取得了东征胜利。张国焘为这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国民党已成为"偏师"，要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武汉。结果使鄂豫皖根据地在四次反"围剿"中，遭受很大损失。此时，张国焘又过高估计敌人，惊慌失措，坚持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军事方针。红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开鄂豫皖，在历时两个月的无目地转移中，外有敌兵围追堵截，内有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脱离了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困难是极其严重的。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危局，使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逐步有所认识，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红四方面军中以徐向前、曾中生、张琴秋为首的革命领导同志，根据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理解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正确性。制定了：开辟巩固新的根据地，消灭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援助中央苏区，依靠根据地向外发展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元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指挥下，由陕南小河口，翻越秦岭，巴山，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州）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建立，使红四方面军重新有了立足之地。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红军越战越强，连连取胜。经过四个月的苦战，粉碎了敌人"三路围攻"，根据地迅速扩大。饱受了四川各派军阀欺压的劳苦大众，得知红军打败了田颂尧（四川达县地区的地方军阀，民愤很大），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群众热情极高。青壮年踊跃参军，妇女会，儿童团，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而张国焘却一直对川陕根据地的开辟表示不满。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到共产党内来的张国焘，犯了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早期"左"的表现上，和王明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军事上，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低估军事斗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根据地的建立，"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犯根据地的危险"。主张"以中心城市的起义来夺取全国的胜利。"对川陕根据地，他抱着随时放弃的思想，不去巩固发展。并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推行一套错误的方针政策，严重削弱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有生力量。

在部队的组织成份上，张国焘盲目怀疑知识分子。他本人也是学生出身，却认为：有文化的人，就不是穷人，政治上不可靠，不是地富，就是国民党特务。他借口部队的"纯洁化"和"无产化"，在招收新兵时，首先问你识不识字，识字的一律不收。回答犹豫些，立刻怀疑你有问题，揪起来严刑拷打和逼供。我有一个同乡，赵登云，在总部特务营当战士。在家乡时，我们的草屋隔山看得见喊得应，经常在一起放牛、割草，彼此都是受苦人。他父母含辛茹苦曾供他读过两年书，参军时，他没有暴露。一次特务营出早操，他在家搞卫生。到秘书房里看见纸和笔，信手写了几个字，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查问，最后查出是他写的。认为他隐瞒历史，政治上有问题。经过严刑拷打，逼他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被处决了。鄂豫皖根据地来的一批学生战士，则被张国焘视为"不可靠份子"，行动和言谈稍不小心，就有被清洗的危险。我参军一个月时，就有三名学生出身的军邮员，因为在家信中谈了一些部队的生活情况而被活埋。说他们不是来革命，是来动摇军心，探听情报的。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直接影响了部队"扩红"，许多当地青年，因为识几个字，不敢报名参加红军。

在组织上，张国焘发展宗派主义，重用亲信，而对有怀疑或不满其错误的同志，实行残酷的打击报复，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造成了党内极不正常的现象。四方面军九军军长何伟，对张国焘很忠诚，年纪轻轻，职务提升却很快。他平素对战士完全是一套军阀作风，还调戏妇女，战士们暗地里叫他"花花太岁"。这种在部队里为所欲为的人，张国焘不但不处理，还提拔了他。平素张国焘对自己亲信的人，见了面满脸堆笑，又拍肩又握手。对普通战士，却完全是别一副模样，他从不到战士中去，偶尔在路上遇到了他，也从不和我们说话。对怀疑或不满的同志，他表面不流露什么，却怀恨在心。以"肃反"为名，暗中处决，草菅人命，甚至一句话不小心得罪了他，却要无辜受害，一度在部队形成了"白色恐怖"。为了监视部队干部战士的行动和言谈，由保卫局曾局长领导，给各部队派遣了一名"特派员"。（大部分是保卫局成员），名为特派员，实为张国焘的耳目。并成立了一个"保卫党，巩固部队"的特别组织，组织是秘密的，成员都由基层战士担任。任务主要是发现部队中有谁说不满的话，有谁的行动可疑，有反党苗头，直接向特派员汇报，每周一次。组织有自己的特殊介绍信，调换单位时，介绍信也同时带走，到他单位后，由新的特派员来领导。我因为没有文化，出身苦，加之性格活泼，部队里四川籍的老乡多，易于接近群众，被发展为组员，组长是党委一个姓方的保卫委员。当时毛

泽东同志因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被撤销了中央苏区代理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在红四军中，占了主要的领导地位，不少人受了蒙蔽，对张国焘盲目崇拜。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在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时说：“毛、朱、周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他们害怕国民党的力量，要逃跑。逃到雪山，草地，没有空气和粮食，许多人死了，要认识张主席是英明的……。”方组长在动员我参加特别小组时，也再三说明：“你的任务很光荣，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张主席，这是一条无形的巩固红军的战线。”我那时只有十五岁，政治上很幼稚，思想十分天真，接受了任务很激动。我认为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党性水平一定很高，也一定是正确的，正确的领导是党的化身，保卫了张主席，就是保卫了党中央，但后来的事实却让我感到失望，也逐步教育了我。红四方面军在放弃了群众基础很好的鄂豫皖根据地后，战士们情绪很低沉。人们在怀疑，不满，思索着红四方面军走过的历程：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使鄂豫皖根据地在四次反“围剿”中，遭受很大损失。张国焘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杀害了许继慎、周维炯等大批苏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红军指战员。张国焘无目的地的转移和逃跑，使红四方面军在两千里的行程中，物资缺乏、部队疲惫不堪，没有过冬的棉衣。如果不是徐向前等同志实施了正确的军事指挥，保存了红四军一万五千人的骨干力量，部队早就在到达川北之前拖垮了。大家清楚看出，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胜利发展。相反，“左”倾的领导，却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因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不断增长。我觉得代表了这种情绪的言谈，是战士们真诚维护红军的心里话，不是反党言论，没有去做汇报。迟迟不作汇报，领导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正在这时，一个姓刘的南通籍战士想逃跑回家，拉我同跑。我对红军的感情很深，觉得穷苦人离开了红军，是耻辱，劝他不要跑，他坚决不听，我向特派员作了汇报。目的是希望组织帮助教育他。他毕竟是穷人，当兵时间短，不习惯部队的艰苦生活，脱离部队的性质和叛变截然不同。谁知，他在被关押后，就“失踪”了。此后，部队里“失踪”的人越来越多。

一个女同志，放了脚，大家开玩笑，叫她“改组派”。消息传到张国焘耳中，立刻逮捕了她，逼她供出参加“改组派”的事实。(“改组派”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反动组织的名称)，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

两个同村入伍的战士，上山去玩。说着知心话，吃着家乡带来的花生。这是张国焘十分忌讳的“小集团”，他认为这种两、三个人悄悄地在一起的小集团，最有“搞阴谋和特务”的嫌疑。两个战士被抓起来审问，拷打，让他们供出同组织的人。两人经不住拷打，胡乱供出一些同乡。这两个人连同供出的人也全部“失踪”了。

我有个叔伯哥哥，周天顺。一次在闲谈时说了句：“吃粮当兵，爹妈没有生。”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土话。意思是吃了当兵粮的人，要做坏事，爹妈就象没生他一样。这种兵，都指的当国民党和土匪。一句无意说出的话，立刻使我这个叔伯哥哥被当作“审查对象”，抓了起来。两个月后，他也“失踪”了。

这些人“失踪”的真相，终于在一天夜里被我搞清了。原来，查出了家庭出身不是贫、雇农，说错了话；有不满言论；行动有可疑的人，都在半夜里被特派员叫醒，以找“谈话”为名，悄悄处决了。第二天早上，宣布此人“开小差逃跑，”他就永远在人们面前消逝了。那天夜里，处决一个查出是富农出身的战士，我们特别小组的成员也被叫起来参加。执行处决的都是保卫局的同志。和我一样，在受骗时期，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一项保卫中央的光荣任务。却不知双手埋葬的正是亲爱的同志，干了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历史的教训是多么惨重啊！尽管这样的处决是秘密的，越来越多人的“失踪”，使干部战士对“肃反”的真相也有所觉察。部队那时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特派员的权力很大，凡是被特派员找去的人，有去无回。仅我所知，在总部范围的机关，部队里，被处决的就不下十人。盲目的“肃反扩大化”，引起部队情绪的波动。干部们小心翼翼，不敢暴露思想。战士悲观失望，逃跑回家的增多，留队的也不敢彼此来往。党中央曾对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扩大化”，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他在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关押了和他进行过坚决斗争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同志时，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电令张国焘，要他保证曾中生同志的安全。谁知张国焘早已用杀人灭口的手段，在川西北卓克基将曾中生同志秘密杀害。我在认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后，坚决不愿再干损害红军利益的事情，退出了“特别小组”。有人担心我这样做，也会遭到张国焘的打击报复。是总政的领导同志，见我活泼，嗓子好，把我调到总政宣传队工作，我才免遭毒手。

张国焘的领导作风十分武断，军阀残余严重。总怕有人暗杀他。他的行踪只有少数随从才知道，一举一动都十分诡秘。也不允许战士们认识他。一个曾给张国焘喂过马的战士，和几个人在路上遇见张国焘，立刻惊喜的喊了声“张主席……。”事后就被枪决了。罪名就是他有意暴露张主席的身份，威胁了首长的安全。张国焘这种毫无民主的军阀作风，在部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个别领导上行不效，一句话就可置人死地。保卫局曾局长，肃反期间处决大权都由他掌握，随意处决了许多无辜的战士。他是江西人，走路一跛一跛的，作战十分英勇，部队到延安后，我还见过他。他没有和张国焘一起逃跑，证明他还是认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当时的后勤部供给部长郑义栽，只因马夫失职，马跑到地里吃了蚕豆，他提着枪就把马夫拉到野

地里“崩”了。个别部队打仗时,如战败了,不是枪决,就是罚去当伙夫、勤务兵。我们到了延安后,四方面军一些干部不服中央的领导,秘密计划在“红大”组织暴动。目的是搞一部分枪,上山打游击,提出:“不听张国焘,也不服毛泽东。”这些人闹独立,也是和张国焘平素目无中央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川陕根据地的建设上,张国焘实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首先在革命策略上,张国焘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会利用敌人矛盾,寻找同盟者。四川各派军阀混战,四川人民饱受压榨,一些小军阀也受过排挤,有接近共产党的倾向,张国焘却一概不接受这些联合要求。刘文辉和国民党的大军阀有私仇,主动要求和红军合作,张国焘不同意,致使他最后倒向国民党,来打红军。西康地区有个藏族喇嘛,是个当地头人,管辖地区很大,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手下有三百名藏兵。我们把他请来,做了许多工作,他投靠了红军,并担任了红军团长的职务,仍带他手下的藏兵。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离开四川时,张国焘说“这种人不可靠,不能带走,”杀了这个头人,藏兵们不见了首领,拔出刀箭,冲到部队里要人,气氛十分紧张。我们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才平息了这场混乱。张国焘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土豪劣绅的错误口号,使我们丧失了许多同盟者,增加了敌对力量,给了国民党以可乘之机。

川陕根据地建立后,首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尤其是消灭了川北的土军阀田颂尧,群众反应热烈,情绪很高,土地革命顺利展开。这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应是,依靠贫雇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积极发展根据地经济。张国焘却认为“有产者”都不是革命的联合对象,“要使小资产者变为无产,强迫他们革命”,企图在民主革命时期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他在根据地组织了工作队,凡是当过国民党的部属,如保长、甲长、保安团长、保丁的人,一律处决。凡是为土豪、地主藏过东西的人,就是“土豪劣绅的狗腿子”,交出东西,还要游斗。当时川北地区有许多地主的佃户,东家逃跑时,留了一些东西叫他们埋藏,因为害怕,不得不藏,完全不是出于本心。张国焘却不正视这些事实,一概列为打倒对象。一些稍有薄产的小地主,中农和手工业者,工作部强迫他们交银子,光洋和粮食,交不出就拷打压杠子。向群众征粮时,给他们红军票子,这种票子离了根据地就用不了,群众不愿要,就强迫他们收下,群众敢怒不敢言。这种“左”的错误政策,侵犯了群众利益,使党脱离了群众,甚至迫使一些受蒙骗的群众与反革命一起反对我们。对中农、富农的限制和对手工业者利益的侵犯,影响了根据地建设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无产化”运动搞的人心惶惶,田地无人耕种,根据地困难更加严重。

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主动向西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并再三说明:要留部分武装力量巩固根据地。张国焘却借口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擅自放弃了已开辟两年的川陕根据地。就要离开生育、哺养和战斗过的地方了,红四军中四川籍战士的心情尤其难受。而张国焘在放弃根据地之前,又借口“不给国民党留下粒米片瓦,造成一个三光地区,让他们冻死饿死”,下令将城镇及沿途房子全部烧掉,粮食带走。其中巴州县城烧的最厉害,大火熊熊,烧了几天,只剩下一堆废墟。失去了祖居的群众头顶煮饭的铁锅,拿着梭标,要找红军算帐,见到被迫执行烧房任务的战士伏在断壁残垣中嚎啕大哭,群众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张国焘又命令根据地的青壮年,妇女会和少先队全部和红军同走,根据地只剩下了老幼妇孺。有的干部曾对张国焘进行劝告,说这样做违背了中央的意图,会造成根据地武装力量及劳动力的缺乏,田地无人耕种,根据地会再落敌手。而部队增加了这么多妇女、儿童臃肿庞大,不利于行军作战。张国焘却根本不接受这些正确意见,下令部队全部撤离。一路上千辛万苦,有的少先队员只有八、九岁,走的满脚血泡,累的直哭,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落泪。到西康地区,儿童们实在走不动了,张国焘让工作队把孩子们集中到一个小镇子上去,说是给他们找饭吃,然后叫部队离开。被抛下的一百多个孩子哭的哭、叫的叫,十分凄惨。部队离开后不久,国民党的骑兵就到了这里,一百多个孩子下落不明。张国焘的错误,给军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每当我回忆在川北战斗过的这两年,每当我想起那些无辜被害的同志,总不会忘记告诫自己:共产党员要学习、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觉悟,再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选自《中华英烈》86年5期,邹俊程口述、熊标整理)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纪实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进华北。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醒全国人民注意,日本关东军部正积极筹组所谓的“蒙古国”“华北国”,因此全国“任何部队只要实行对日作战,(红军)就愿与之紧密携手共同抗日”。时任国民党第七军团司令兼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将军,表示欢迎中共号召。早在1931年,傅作义就与关押在绥远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员王若飞有来往,王若飞经常写信或面谈劝告傅将军抗

日，对其思想影响很大。1933年，傅作义率三十五军进行长城抗战期间，中共也曾派人与傅作义联系，称赞他的抗日壮举，希望他抗日到底。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当“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傅作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并允许共产党的报刊书籍在他的部队中公开发行阅读。他还与中共中央联系，请求派共产党进入他的部队，帮助他做抗日政治工作。这个时期，我党先后派潘纪文、王一然等20余名共产党员，进入傅作义部队担任政治工作职务。

一天，傅作义把潘纪文请来，要他帮助物色一位俄文翻译。潘纪文立刻想到乌兰夫，他问：“傅将军要求什么条件？”

傅作义说：“当然要坚决抗日、精通俄文的人才。”

潘纪文说：“这事好办，明天我就给您领来。”

潘纪文直接去找乌兰夫。这时乌兰夫正在归绥土默特小学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领导中国共产党西蒙工委做民族工作，主要是争取蒙族德王抗日。二人相见之后，潘纪文征求他的意见，乌兰夫当场就答应下来。

次日上午，潘纪文带乌兰夫来见傅作义。傅作义握住乌兰夫的大手，见他长的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怔住了。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面!?”

潘纪文笑笑说：“他就是国民党通辑了几年的蒙古族共产党员陈云章(乌兰夫的化名)。”

“噢，你就是从苏联回来的陈云章呀！原名叫云泽对不对？”

乌兰夫点了点头。

傅作义虽然没见过乌兰夫，但对他的身份、历史以及胆识、才华十分了解，内心庆幸自己又得到了一个好助手。傅作义说：“陈先生能不记前嫌，给我当俄文秘书，实在令傅某敬佩！”

乌兰夫说：“历史上化干戈为玉帛的事例很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携起手来抗日呢！”

傅作义便将乌兰夫担任的工作交待一番，而后命秘书拿出一台高频率的小收音机来。说：“这台收音机既能接收苏俄的广播新闻，又能听听音乐，就算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二

自从当了傅作义的俄文秘书后，乌兰夫每天午夜扒在家里的小炕桌上打开收音机，接收记录苏联电台的新闻广播，翻译成中文后，第二天早晨便送给傅作义阅读。

像乌兰夫这样年轻有为、博学多才、能文能武的蒙古族干部，深受傅作义的钦佩。

1935年夏天，视敌为友的德王访问“满州国”之后，加紧了与日寇勾结，筹划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日伪布重兵于察哈尔地区，矛头指向绥远，形势更加恶化。

有一天，傅作义阅罢刚刚收到的塔斯社新闻，便把乌兰夫留下，想听听他对时局的看法，探讨如何组织绥远的军民对付日伪的进犯。

傅作义提出，绥远大部分属于蒙民居住地区，应当动员蒙古族群众组织一支抗日武装，保卫家乡。试想现在如能有两个蒙古族骑兵师部署在草原上，他德王和日本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从乌兰夫来说，自1931年王若飞来绥远向他提出抓武装抗日斗争之后，他便时刻重视这个问题。在德王招募青年建立学生队，培养军事干部，成立百灵庙蒙族保安队时，乌兰夫就抓住时机，把一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军官秘密派进德王的保安队去，为掌握这支部队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今日傅作义提出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后，两人可谓不谋而合。他对傅作义讲：“德王那里不是有一支现成的蒙古族武装吗，我们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就有了发展蒙族武装的基础。”傅作义说：“根据目前德王情况，这支部队很可能编入伪蒙古军，成为日寇侵华的帮凶。除非搞暴动把队伍拉过来。”乌兰夫说：“当前我们还是尽力争取德王，阻止他降日；如果他顽固到底，死不回头，我们也有办法把保安队从德王那里拉出来抗日！。傅作义知道乌兰夫经常出入百灵庙保安队做抗日工作，在这支武装里仍有影响。现在保安队的两个头面人物云继先和朱实夫，前者是青年团员，乌兰夫的叔伯妹夫；后者是留学苏、蒙的共产党员，乌兰夫出头去做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乌兰夫心里也明白：傅作义和德王因鸦片税和“蒙古高度自治”问题，发生过多次摩擦，成见很深，互相敌视，无法与德王接触；蒋介石也曾派黄绍竑、巴文峻等人到百灵庙做德王的工作，莅临绥远，对德王“软硬兼施”、“恩威并举”，但均无济于事。对付德王的任务只有落在共产党人的肩上了。

三

乌兰夫为了争取德王抗日，多次秘密到百灵庙去，向德王保安队官兵做抗日宣传。重点向他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行，用抗击日寇侵略，保卫家乡，保卫国土，不做亡国奴的思想，启发教育他们。

到1935年冬，日寇与德王的双簧愈演愈烈，你唱我和，狼狈为奸。为此，乌兰夫决定再去百灵庙亲自和德王谈谈，摸清德王的态度，劝他悬崖勒马，如果德王死不回头，就要把广大官兵拉过来。他化名乌云达赉，通过朱实夫介绍，在蒙政会德王办公的蒙古包里会见了德王，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

德王故作谦逊地问：“乌云达赉先生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贵干？望不吝赐教。”

乌兰夫说：“欣闻德王爷首举义旗，要振兴我蒙古民

族，敝人乃至整个蒙古民族，无不钦佩之至，特来拜访致意。”

德王高兴地说：“不敢，不敢，余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代，振兴民族大业，是时代对余等的重托，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但是，当谈到如何振兴蒙古民族，特别是靠什么实现振兴时，两个人当然就谈不到一块了。德王说：“要实现振兴民族大业，就要有钱、有粮、有枪炮和人马……这些靠谁给呢？难道上天会赐予么？”

乌兰夫说：“此乃蒙古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要靠我们自己。”

德王听了大笑说：“靠我们自己？您不是不知道，蒙古民族缺衣少食。瘦羊的肠子里能有多少油呢！”

乌兰夫说：“即使这样，中国如此之大，难道就找不到真正的朋友帮助我们么？”

德王干脆摊牌了，说：“真正的朋友？我就跟您实说了吧！这些年来，余曾亲自找过蒋介石，老夫子也亲自来过归绥，余也派人去广州找过胡汉民、陈继棠。结果如何？他们口头上甜言蜜语，行动上空空如也，至于傅作义更不用说，他呆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天天都想吃掉我们？。乌兰夫解释说：“德王爷对傅作义将军不要误会，他是欢迎您同他合作抗日的。”“算了，我是领教他的好心了！现在只要日本人——”

德王提到日本，自知失言，急忙停住，端起茶碗呷茶。

乌兰夫抓住话头，追问道：“只有日本人支持你，对么？”

德王只好明说了：“对，现在只有日本人支持余等搞‘高度自治’！”

乌兰夫说：“既然德王爷如此坦率，也恕敝人一吐为快。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的吃人’。那日寇占领我东三省后，扶植溥仪当他们的儿皇帝，搞什么‘满洲国’，其真正用心是想吞并全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难道他们会真心实意地帮助蒙古民族么？”

德王连忙申辩说：“余是利用日本人的金钱和武器而已。”

乌兰夫说：“话是这么说，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很难讲了！我这里冒昧地向德王爷进一言，古时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今日的溥仪认贼作父，遭到国人唾弃。德王爷若步他们的后尘，结果会如何呢，请三思而行！”

德王听了乌兰夫的话大为不悦，猛地右手一拍桌子说：“余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余一人承担，勿需别人教训！”他大声吼叫下边人，“送客！”

乌兰夫只好起身告辞了。从德王的蒙古包出来，直奔保安队去找去云继先和朱实夫。云继先和朱实夫、云蔚、赵诚等人，正在等乌兰夫和德王谈话的结果。乌兰夫向他们介绍了方才同德王谈话的情况。

众人商议后异口同声地说：“把保安队拉出去参加抗日！”

乌兰夫根据德王的态度，认为目前也只好搞武装暴动了。但对暴动之后部队的去向，分歧很大。有人主张就地占领百灵庙，控制由国内通住苏、蒙两国的交通咽喉；有人提议把暴动队伍拉到陕北去，加入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也有人提出和傅作义取得联系，把队伍拉到归绥去。

乌兰夫对这个问题本已成竹在胸，但又担心提出把队伍拉到傅作义那里去，众人一时接受不了，便帮助大家对三种去向进行分析：

“占领百灵庙和去陕北这两个方案，固然很理想，但是条件不允许呀，你们想想，日寇的机械化部队和李守信的大批伪蒙古军就在察哈尔一带，几个小时就能开过来，我们千把人马在百灵庙能顶得住，能站住脚么？！至于去陕北也不行，因为我们同党中央没有联系——”

“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只有去找傅作义了？”云蔚截住乌兰夫的话说。

乌兰夫很严肃地肯定地点点头，并解释说：

“傅作义过去是推行过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可现在响应我们党中央‘八一宣言’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打日本，还是长城抗战的将军，我们现在把队伍拉到前山去和傅作义一块抗日，有甚么不对的呢？有人可能担心：傅作义知道这场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会不接受我们。这一点请放心，我现在还给傅作义当俄文秘书呢，他是不会不接纳暴动队伍的。”

乌兰夫为了让保安队的领导直接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增强信心，决定马上由云继先和朱实夫去同傅作义取得联系。

傅作义早有把德王保安队拉过来的打算，今日乌兰夫帮助实现这个夙愿，他高兴地说：“很好！不过此举非同寻常，要做周密的安排，切不可泄露军机，贻误大事。”

接着傅作义打电话，将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曾载厚、三十五军旅长金中和找来，责成他们二人与云继先、朱实夫研究了暴动计划，决定于1936年2月22日晚10时开始行动，由三十五军汽车队前往百灵庙附近地区接应暴动队伍下山。

四

云继先和朱实夫披星戴月，飞马驰骋，急速返回百灵庙，直接来到云蔚家。云蔚告诉他们，德王已经回苏尼特右旗，筹备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百灵庙蒙政后只留下德王的心腹、稽查处处长李凤诚主持日常工作。机不可失，这正是他们暴动的好机会。

他们马上研究部署了暴动的准备工作。具体分析了

蒙政会文职人员以及教导队、新兵队的头目们对暴动可能采取的态度，确定了争取、团结和利用的对象，并预计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与问题。

在云继先他们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工作之际，乌兰夫根据各方面情报获悉，德王决定将保安队全部编入伪蒙古军，使百灵庙的形势突然变得更为紧张，有剑拔弩张之势。蒙政会稽查处长李凤诚带领袍子队全副武装，在商业区大街上日夜巡逻。载着荷枪实弹的日寇的军车，开进了百灵庙，在街上示威。德王还决定调云继先和朱实夫到苏尼特右旗，蒙古军司令部工作。很明显，这是要拿掉他们的兵权，将他们控制起来。这一系列迹象表明，云继先和朱实夫与傅作义会晤的事，已被德王在归绥的特务发密报给德王，所以，德王马上采取了防范措施。

乌兰夫立刻派人连夜赶往百灵庙，与云继先等人联系，决定将暴动时间提前一天，一定要抢在德王之先。

同时，乌兰夫把提前一天举行暴动的决定通报给傅作义，以便傅作义按时派部队接应。

1936年2月21日夜10时整，百灵庙暴动枪声打响了。云继先根据暴动计划，指挥暴动队伍分别开始行动。

新兵大队队长云秉璋和德王十分要好，这个人是拉出新兵大队的主要障碍。因此，云继先首先带领部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新兵大队队部。云继先冲进去用手枪对准云秉璋，喊道："不要动！"云秉璋先是一愣，继而不以为然地说："老云，你这是开什么玩笑？"这时几个士兵上去缴了他的枪，将他捆绑起来。然后晓以大义地说："云大队长，现在德王已经投降日寇，我们不甘心做日寇和德王的走狗，屠杀蒙古同胞，决定暴动，将保安队拉到前山去参加抗日。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待我们举事以后，就放开你，何去何从，悉听尊便。"这时，朱实夫已在新兵队伍中联络好了。云继先一声令下，队伍很快就在大操场上集合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先拉到了河滩待命，待打开军械库后去领武器。所有伙夫都留下，马上生火，为暴动队伍准备明晨早饭。

云蔚指挥一部分人马，秘密接近蒙政会稽查处，把主掌百灵庙大权的德王的狗腿子李凤诚击毙了。

与此同时，巴振玉和赵贵何巧用计谋，打开了军械库大门，云继先带领新兵来取枪支弹药。大家正忙着收拾枪弹之际，一个士兵在摆弄一只冲锋枪时不小心走了火，夜深人静，声音很大，又传得很远。在大庙附近站岗的袍子队哨兵，听到军械库方向响枪，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冒冒失失地照军械库方向放了一枪。在睡梦中惊醒的袍子队，都从蒙古包里跑出来。

先跑出来的几个袍子队员一齐向军械库方向开火。云继先为了防止与袍子队正面冲突，引起麻烦，灵机一动，向袍子队喊话："别开枪！别开枪！没有情况，是哨兵走了火。"

袍子队员睡眼朦胧，骂骂咧咧地回蒙古包去了。

云蔚来到蒙政会文职官员住的福云魁商号，将他们全叫起来，集合在一起，简单扼要地向他们宣布了保安队举行武装暴动的缘由和决定，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随同暴动队伍脱离德王，参加抗日。大部分文职官员对德王勾结日寇早就不满，纷纷表示愿意脱离德王，弃暗投明，参加抗日队伍。云蔚带着几十名文职官员直奔南卡子。

德王的电台设在德王办公的大蒙古包后面的一座小蒙古包里，去砸电台的暴动官兵，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包里，里面却没有一个人。原来报务员早已闻讯逃之夭夭。他们一起动手，将箱箱柜柜砸了个稀巴烂。

各路人马在午夜时分便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动作快速麻利，按事先约定在南卡子集结编队。五更时分，云继先带领暴动队伍离开百灵庙，向归绥方向开去。

五

暴动队伍冒着凛冽寒风，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走到黑沙图，东方就放亮了。这时，忽然听到后面的路上有阵阵汽车声和战马的嘶叫声。原来在暴动时，派去砸电台的人慌忙之中把箱子砸坏了，收发报机却没砸。暴动队伍刚离开百灵庙，报务员又返回机房，紧急地给德王发电，报告了百灵庙发生的事。德王立即下令，命袍子队和保商团跟踪追来。云继先沉着地指挥部队，双方激战了一个小时，德王的追兵在暴动队伍伏兵的两面夹击之下，伤亡惨重，溃不成军。

德王派队伍追击暴动队伍失败了，第二天又派日本人给他的飞机，到暴动队伍驻地上空散发传单。传单煽动对傅作义的仇恨，对共产党的怀疑，劝诱云继先和官兵们撤回百灵庙，重金赏赐。如果执迷不悟，将派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前来追剿。德王这些软硬兼 的手段，引起暴动队伍的思想混乱。

云继先发现这些情况后，命令各部队官兵们把拾到的传单全部收缴上来烧掉。正在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分头到部队去做工作时，二中队派人来报告说："傅作义的部队将我们包围了！"

原来，傅作义接到百灵庙暴动提前一天举行的通报后，他立即将三十五军军长找来，命令他派一个团的兵力，带汽车队立即赶到百灵庙地区，接应暴动下山的保安队官兵，并且指示后勤部安排起义部队一千人的食宿。

三十五军四二一团接受任务后，昼夜兼程开赴百灵庙。当部队到达二份子地区时，正赶上德王派飞机撒传单。据侦察兵报告，保安队起义部队是顺利地拉出来了，由于德王用传单煽动和拉拢起义部队，官兵思想混乱，有哗变的可能。团长立刻将这些情况报告经傅作义。傅作义

立即决定，将起义部队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枪，保证他们安全下山，防止发生意外。并准备派人去和云继先谈判，避免出现对抗局面。

四二一团根据傅作义的命令，当即采取行动，将起义部队包围起来……

再说云、朱二人来到村外一道土梁后面，看到惨淡的月光下，果然摆满了部队、军车，黑压压的枪口对着暴动队伍住的村子。云继先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傅作义真的欺骗了我们？恰在此时，云蔚跑来说："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团二一团派人来，让我们缴枪。缴了枪拉我们下山。"

云继先问："他们的人在哪儿？"

"在总队部！"云蔚气喘吁吁地说。

云继先的脸阴沉沉地说："我去和他们谈谈。"

"谈什么，干脆和他们干！"有些官兵都要和傅作义的部队拼个死活，坚决不缴枪。云继先思忖片刻说："大家不要盲动，傅作义这样做令人不平，但是，我们还要记住老云（这里指乌兰夫）的话，处理一切问题都要讲大局，都要有利于抗日！"他知道在这种众怒难犯、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把乌兰夫抬出来才有说服力。

朱实夫说："你是暴动总指挥，我们听你的，赶快拿主意吧。"

云继先主意已定，就说："我主张先把枪缴给他们，坐他们的汽车下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不信傅作义会出尔反尔，把我们这支队伍吃掉！"

众人头脑也冷静下来，都表示赞成云继先的主意。

云继先还强调告诉大家："光是你们同意了还不行，目前部队官兵的抵触情绪很大，还要向他们讲清道理，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我去和三十五军派来的人交涉，你们都到部队去做工作，要保证不使一个战士对傅作义的部队开枪，以免事态扩大。"

决定之后，大家回到部队去做工作。云继先回到大队部，与三十五军派来的人见了面，云继先直接了当地向对方提出两个条件：第一，部队把枪缴给你们之后，你们必须保证安全地把暴动队伍拉到前山去；第二，只缴长枪，不缴短枪。对方听后，立即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当即派车将暴动队伍拉到前山，驻扎在归绥附近的水涧沟门和三两村。

当云继先向乌兰夫报告暴动队伍被傅作义部队缴械的经过后，乌兰夫对云继先的胆识很佩服，觉得云继先的忍耐克制，深谋远虑，是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是很有远见的。并答应立即找傅作义联系，把枪械要回来……

六

1936年2月25日，云继先等通电全国，声明保安队的全体官兵脱离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加抗日。就在这天早晨，傅作义同乌兰夫作解释说："当时德王派飞机撒传单，煽动拉拢暴动的官兵返回百灵庙，暴动的队伍军心不稳。权衡之下，宜生唯恐生变，才命令部下采取了这项措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先生代傅某向云继先将军解释此事，望能谅解。"

乌兰夫说："既然如此，现在暴动队伍已全部拉到前山，将军就应下令将收缴的武器送还他们才好。"

傅作义慨然应允说："枪的问题好办，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我需要同云继先将军当面交谈，请你通知他近日能来省府一趟。"

乌兰夫离开省府，便到暴动队伍去找云继先，向他说明了傅作义的意思。随后，他把暴动骨干找到一起，临时碰了头，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了几条谈判原则：

第一，我们要诚恳地郑重其事地声明，暴动队伍今后保证在傅作义将军领导下进行抗日。

第二，要求傅作义命令三十五军立刻将缴去的武器如数退还暴动队伍。

第三，要求傅作义按月给这支暴动队伍提供粮饷，补充武器弹药。

第四，改变暴动队伍的番号时，必须保持原部队的建制和蒙古族抗日队伍的性质，不能拆散。

乌兰夫解释说："这些条件的实质，是要保证建立一支蒙古族抗日队伍。"

第二天上午，傅作义便打来电话，召见云继先和朱实夫，让他们立即到省府办公室。傅作义极其热情地同云、朱二人一一握手说："二位辛苦了，宜生祝贺你们的成功！"接着似带歉意地解释了派三十五军解除暴动队伍武装的特殊情况，希望得到谅解。

谈到今后的想法，云继先按事先准备的四项要求，逐条提了出来。

傅作义听了马上表示说："你们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本人完全同意。"

并当场落实，首先宣布绥远省政府的命令，决定将百灵庙暴动部队改编为"绥境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上校副总队长。接着便打电话把参谋长请来，命他马上通知三十五军，速将暴动队伍的武器弹药如数送还，不准少一枪一弹，违者严办。至于今后粮饷、武器、弹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的供给问题，由蒙旗保安总队按月造册呈报，予以拨发。

云继先和朱实夫向乌兰夫汇报了这次谈判情况后，乌兰夫又专门把在部队的一些党员和进步军官找来，布置他们在暴动部队里仍要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一定要团结广大官兵，帮助云继先把这支部队巩固住，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民族抗日武装。

七

百灵庙暴动发生后，德王非常恼火，气得捶胸顿足，大骂云、朱忘恩负义。死不甘心的德王派人秘密与潜伏在蒙旗保安总队的亲信章文锦取得联系，在暴动队伍中散布谣言，挑拨官兵与云继先的关系，更为险恶的是用大洋收买政治上不坚定的份子，秘密杀害了云继先，继而煽动哗变，带领一部分官兵又投奔德王去了。有些土默特旗的士兵也纷纷离队，跑回了老家……。

正在归绥忙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乌兰夫，从流散的士兵中得知这个消息，感到震惊，也很惋惜。待他赶到蒙旗保安总队时，这里只剩下一百多名排以上干部骨干了，他们多是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员。大家的情绪十分低落、沮丧，不知所措，有的竟抱头痛哭。乌兰夫看到这种情景极为难过，他想：德王会甘心失掉这支部队吗？我怎么没考虑到，提醒云继先注意警惕呢？好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拉出来的队伍，一夜之间竟又散了架子。带着痛苦和内疚的乌兰夫，领了几个官兵埋好云继先的尸体，立即给傅作义打电话，报告保安总队发生哗变的情况。傅作义闻讯勃然大怒，立即派三十五军出动一个团的机械化部队去追击哗变部队，并下令能追回的尽量追回，对顽固抵抗者一律就地歼灭。

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在达茂旗的乌拉忽洞敖包追上了哗变队伍，就地全歼。

保安队的哗变事件，无疑是对抗日斗争的损失，乌兰夫和傅作义都决心重建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

乌兰夫深入部队，对留下来的官兵说："你们能在哗变中不动摇，坚决地留下来，说明大家的抗日决心很坚决。现在我们的排、连以上骨干多数都在，就不愁把队伍再拉起来。淘汰了那些不坚定分子，我们可以再建立一支更加纯结、更加坚定的蒙古族抗日队伍。任何人企图阻挡我们抗日，那是办不到的！"

这时，傅作义也在筹划重建这支部队。一天下午，傅作义通知乌兰夫到省府去，说有要事相商。傅作义对乌兰夫说道："我们决定重新组建蒙旗保安总队。并由白海风将军负责；先生对绥远地区和百灵庙下来的部队比较熟悉，我想请你助白将军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

傅作义的主张正中乌兰夫的下怀。他认为，有了傅作义的合作，实现重建蒙古族抗日武装的计划指日可待。况且由白海风来重建蒙旗保安队，也是合适人选。白海风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席过我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从苏联回国后，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在北平被国民党的宪兵逮捕。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师何应钦将他从宪兵手里要了出来，留在何的手下干事。白虽然从此脱党，但由于他从学生时期便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拥护我党的抗日政策，是一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蒙古族爱国军官。所以乌兰夫立即表示："傅将军既然信得过我，我一定赴汤蹈火，鼎力相助。"

傅作义听了，满面悦色，让乌、白共同安排重建保安总队的具体事宜。

乌兰夫从白海风那里商议回来，把傅作义的决定传达给每个党员和在部队待命的官兵，安慰他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安排他们分头去把跑散的官兵找回来。乌兰夫也亲自到土默特旗农村去，宣传当时的国内形势和抗日主张。在大家说服动员下，那些失散回家的原暴动队伍的官兵，基本上都陆续归队。同时，乌兰夫又通过亲属、朋友，先后动员了三百多名有志抗日的蒙古族青年，参加了蒙旗保安总队。

为了保证这支队伍执行团结抗日的政治路线，乌兰夫将一批共产党员和靠近我党的进步青年都安排在营、连以上的领导岗位上。

乌兰夫在部队里建立党组织，自任党委书记。在各连队设政治指导员，负责抗日政治思想工作。蒙旗保安总队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傅作义十分高兴，特意在归绥省府举行一次宴会，为白海风和乌兰夫祝贺。席间，傅作义兴致勃勃地举杯，对乌兰夫和白海风说："希望你们两位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把这支蒙古族部队带好，为抗击日寇出力。"

蒙旗保安总队重建后，在察素齐一带进行一个阶段的军政训练后，便投入了抗日斗争。

1937 年 10 月 12 日午夜，日寇向归绥发动大规模进攻，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受命坚守归绥大黑河北岸的阵地。他们苦战两昼夜，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给日寇以大量杀伤之后，才主动向包头方向转移。10 月 16 日，日寇进犯包头，这支部队又南渡黄河，进入伊克昭盟，凭借黄河天险抗击日伪军。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于 1938 年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驰骋在鄂尔多斯草原上，为巩固伊克昭盟抗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的北大门，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中国共产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毛泽东主席在 1938 年 5 月，亲自召见了这支部队的两位领导人乌兰夫和白海风，教导他们：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你们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供给，设法扩大队伍。又提示他们说：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

《何梅协定》的前奏
——天津两报人被杀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侵占了我国东三省之后，进而觊觎华北。

1934年3月，日本少将梅津美治郎由参谋本部调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在天津就职。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地临抗日前沿的华北，局势非常严峻。

1933年5月签订的《塘沽协定》，南京政府不但默认了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而且又同意划冀东、察北一带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驻守，相反的日本军队却可以随时进入"视察"；也就是说，上述地区纳入了日军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尚未达到其策动"华北自治"的既定目标。因此，还要伺机寻找借口，挑起争端，把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势力从华北彻底地驱逐出去。梅津就是负有这样的使命走马上任的。

日方果然找到了挑起争端的由头。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突然发生了两起暗杀报人的事件。5月2日晚，《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住处被枪杀，凶手2人当即逃逸无踪；接着，5月3日晨4时，《振报》社长白逾桓又在日租界义德里22号私宅被害，凶手也是2人，同样也未抓获。

胡恩溥与白逾桓都属于亲日派，所办报纸均接受日本津贴，并具明显的亲日宣传色彩。胡恩溥还标榜自己是国家主义派，自封国权党总裁；白逾桓在民国初年曾一度追随孙中山，后来与蒋介石不和，旅居日本，1931年来天津办报，同时担任伪满通讯社记者，与日本军方关系密切，死后从他身上发现一封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密信。由于胡、白二人具这样的政治背景，致使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喜出望外，认为向南京政府进行政治讹诈的机会到来了。

5月25日，酒井隆给日本杉山元参谋次长拍发了一个电报，声称："关于在天津租界内发生暗杀白逾桓、胡恩溥事件，经调查结果，终于判明系蒋介石系统的策动"；"白逾桓系我军机关报的社长，属于我军使用的人员，依据条约，应受到保护。"在同一电文中，酒井提出必须"严厉追究中国方面之责任"，准备向北平军分会当局进行交涉，要求"至少中央宪兵第三团等类似机关撤退，并罢免该团团长蒋孝先、团副丁昌及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且禁止国民党部、蓝衣社、军委分会政治训练处等一切排日团体的工作"。酒井的强横态度得到了参谋本部的支持。5月29日，酒井会同日本驻北平武官辅佐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递交了含有上述要求的"通告"。5月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也与军方相呼应，就此事向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提出严重抗议。酒井还狂妄地叫嚣"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与此同时，调关东军主力部队入关，空军在锦州集结待命，海军也从旅顺派出驱逐舰驶抵天津，造成武力威慑的态势。一时剑拔弩张，风云莫测。

胡、白二人究系何人所杀？当时并无确凿说法。何应钦对此表示："以事发生于租界，我政府无从知其详情，但因租界毗连天津市，已严令河北省政府转饬天津市政府协同缉凶。"南京政府通过中央社也申明了同样的立场："天津胡、白暗杀事件系发生在租界，其当日真相如何，当地中国官厅亦不知其详云。"6月5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往见日本广田外相，表示："此次华北事件与国民政府毫无直接关系，因此不能承担责任。但为了中日亲善，决定将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他的谈话，反映出南京政府的基本态度：中国政府对胡、白被杀事件虽不承担政治责任，但又不愿意扩大事态，极力谋求妥协。这就越发助长了梅津与酒井的嚣张气焰。

中日双方经过一个月的紧张交涉，最后以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互致备忘录的方式，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河北省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及宪兵三团；解散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高级官员；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等等。就是说，何应钦答应了酒井隆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在此期间，南京政府还向全国下达了《邦交敦睦令》，以取悦于日本政府。

那么，导致此次争端的胡、白被暗杀一案的下文如何呢？似乎从谈判桌上消失了。奇怪的是，南京政府既然否认与此案有关，为什么不据理驳斥呢？同样令人不解的是，日本驻屯军为什么没有提出究查、严惩凶手之类的进一步的要求呢？这是一个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谜才逐渐被解开，原来策动暗杀胡、白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特务机关自己。日人古屋奎二在《蒋总统秘录》一书中提到，胡、白被杀事件是"日军所设计的谋略，据说其幕后人就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人清水实在《秘密结社青帮工作的跃进》一文中揭露说：此次暗杀原是蓝衣社策划的，由于他们难以进入租界行动，便唆使住在租界里的青帮分子李炉已、沈烛昌进行；而李、沈与青帮头子袁文会一伙，隶属于关东军天津特务机关的恐怖班。清水实认为："李等是青帮，暗中操纵的是关东军天津特务机关，这未必是别人干的，完全是天津军的谋略。"如此说来，杀手是"一仆二主"，同时为国民党蓝衣社与日本特务机关效力；至于究竟谁是这次恐怖行动的主谋，扑朔迷离，其内情绝非局外人所能道其详。这大概就是南京政府与日本驻屯军双方都不再深究此案的原

因。卖身投靠日本人的胡恩溥与白逾桓，到头来成为日本侵华谋略的祭牲，其下场可悲亦复可耻！

一手炮制《何梅协定》的酒井隆，1946 年 9 月在南京经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如此结局，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杨大华）

神秘女郎行动

1935 年春节，“山东王”韩复榘声称要“与民同乐”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便下令济南市地方上组织各种民间文艺活动，放假三天，组织提灯会。一时，高跷、龙灯、狮舞、旱船等各种民间歌舞及杂耍沿着繁华的街道上一路耍来，街两旁都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各种小贩也到处叫卖，好不热闹。

这天是年初二的晚上，韩复榘正在小纬二路的一幢小楼里和几省府委员和高级参谋在叉麻将。他正和了一副筒子“清一色”，拍着一张刚刚摸进的嵌八筒在哈哈大笑。突然，门帘一掀，闯进一个人来。此人瘦长个子穿着一件灰布长袍，上身罩了件青布坎肩，一顶黑色西瓜小帽顶在头上，打扮是个二爷。他神色慌张，快步走到韩复榘身边，结结巴巴地报告道：“主席，不好了！”

韩复榘定睛一看，是自己的亲随张富贵，将手里八筒一甩，忙问：“什么不好了！”

“张委员，他他被人杀了！”张富贵道。

“哪个张委员？”韩复榘将门前的牌一推，“嚯”地站了起来问。

原来，当时山东省政府里，有两个姓张的委员，一个是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一个是张鸿烈。

“是张书记长！”张富贵道。

韩复榘双眉一竖，继续问道：“在哪里？”

“在进德会。”张富贵道。

进德会是当时济南最大的一个游乐场所，又是高官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

韩复榘两眼一瞪：“凶手抓住了吗？”

“没，没有，”张富贵说，“不过，有人看见是两个穿灰布衫的人！”

韩复榘左手托着尖下巴，在房内踱了几步，猛然在桌上击了一拳，命令道：“立即把进德会大门关闭，所有人不得再出入；马上派省府卫队去进行严密搜查；同时把当时的情况弄清楚，及时向我报告！”说完穿上大衣，带了随从副官和卫士们回省府去了。

自然，一场竹战也只好停下，那些委员、高参，怀着种种疑虑各自回府。

再说进德会，这里有电影院、京剧院、地方剧院、杂耍场、花园、茶室，游人如云，热闹非凡。韩复榘一声令下，身背大刀，手持快枪的省府卫队如虎似狼地冲了进来把守了各道关口，整个欢腾的进德会，顿时成了鬼哭狼嚎的活狱。各个戏院停演，杂技焰火收场，几万游人拥在大门口听从卫队的搜查。

先是把一些妇女小孩放出去；再是把穿制服有徽章的公务员放行；再放一般的居民和商人。扰攘到了下半夜，抓了几个穿灰布大褂的倒霉蛋，才算结束了这场搜索。可第二天一审问，这几个人都是有名有姓，有确切职业的店铺伙计，那几家店东也都纷纷来保，又无任何凭据，也只得取保释放。

韩复榘见抓不到凶手，大发雷霆。一个堂堂的省党部书记长，在省府所在地被杀，怎么向南京交待？更何况，他还有自己说不出来的隐痛。

第二天下午，张苇村被杀经过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材料主要是同时被伤但未丧命的张苇村的卫兵提供的。韩复榘看着看着脸上有了笑容，一个破案的方案在他腹中形成了。

原来，这一天，省府公务员的提灯会轮到张苇村带队。集合地点在城内皇亭。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有些应酬，公务员们吃过晚饭，提着灯赶到皇亭比较晚了。张苇村去得较早，见队伍总集合不起来，很是恼火，当场对迟到的人大发脾气，指责他们不守纪律。兴匆匆赶来提灯的人被骂得个个垂头丧气。7 点钟提灯会出发，沿着西大街、普利门大街、筐市大街、二大马路、纬二路走了一圈。因为开始触了霉头，大家情绪不高，走得很快，都想尽早结束这场无趣的把戏，所以 8 点钟就到了进德会。提灯会的队伍在电影院门口就解散了。大家各自去看电影、看戏、看杂耍去了。

张苇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想回家去叉麻将。这时，他突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位身穿豹皮大衣，烫了长波浪秀发，足登高跟皮鞋的妙龄女郎从他身边闪过，还向他回眸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和一副洁白的皓齿，使他浑身都酥了。张苇村是个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遇此良机如何肯轻易放过？豹皮女郎向他一笑之后，就径自向东南方向走去。张苇村就紧紧地跟在她后面，他的卫兵只好自认倒霉跟在他的后面。

那豹皮女郎象条鱼似地在人群中游来游去，张苇村也紧跟不放，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女郎慢慢地离开了人多喧闹的地方，进入了柏墙甬道，上北而南，往东南角的古玩店走去。跟在后面的张苇村这时四顾无人，只有自己的卫兵跟在后面，就没有顾忌了，加快了步伐，想上去和那女郎攀谈。他刚刚靠近女郎身旁，在柏墙东面突然跳出来两个身穿灰布大褂的人，都拿着左轮枪向他逼来。跟在后面的卫兵刚想拔枪，“砰！”一个高个子的长衫客举手一枪就将卫兵打倒了。另一个稍矮一点的人举枪就向张苇村

射击。张苇村见势不妙，纵身想跨过柏树墙向西边人多的地方逃命。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早已命中，张苇村倒在孔雀亭的西南附近的墙脚下。那两人还赶过来又补了一枪，走到他身旁验明张苇村确已死去，然后才从容地向进德会大门方向扬长而去。那位身穿豹皮大衣的女郎也神秘地不知去向了。

当时，鞭炮放得震天响，三声枪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张的卫兵并未被打死，他目睹了这幕活剧，咬咬牙，在上衣上撕下了一块布，包扎了自己的伤口，在地上爬了半个多小时，才爬到了进德会军警分驻所，报告了这场事故的经过。

那么，刺张的凶手究竟是谁呢？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但韩复榘心里有一本帐，他决定亲自来抓这个案件的审理。

他先找了那卫兵详细地审问了一次。又秘密地找省党部行动队副队长和几个队员询问了几次。在张被刺的第3天，突然下令，逮捕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行动队队长谌俊臣。前去逮捕的省府执法队，几乎没有遭到反抗，就把这个中统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当晚，韩复榘就坐堂审问。12个彪形大汉站立两旁，各种刑具都摆在大堂上。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谌俊臣如今蜷缩地跪在地上。

"你们是怎么杀张书记长的？谁主使你干的？"韩复榘瞪大了虎目，威严地问道。

"冤枉呀！主席！"谌俊臣哭丧着脸，大声叫屈，"他是党部书记长，我们怎么会杀他呢！"

"你们为什么杀他，你自己心里明白！"韩复榘冷冷一笑，"我只问你怎样杀的，主使人是谁？"

谌俊臣还是大叫冤枉。

韩复榘用眼向张富贵一瞟，张富贵拿出一个包裹来，扔下堂去，韩复榘大喝一声："你自己看！"

谌俊臣抖抖索索地去解开那包裹，只见里面是一件豹皮大衣。他一见这大衣眼直愣愣地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件豹皮大衣，怎么会到了韩复榘的手里呢？

原来第2天对进德会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在柏墙的西南角发现了这件大衣。可见是引诱张苇村的那个女郎已"金蝉脱壳"弃衣脱身了。传说中，往往把韩复榘说得是个鲁莽的草包，其实，他是很有心计的。他立即派人在全济南的皮货店作了调查，查到这件豹皮大衣是"乾泰恒"卖出来的。他立即密审了"乾泰恒"的老板，那老板起初还不敢说实话，后来，韩复榘恩威并施，桌上放了100块大洋和1支枪，说道："你说实话，拿了100大洋走路，我一定替你保密；你要不说实话，就一枪崩了你！"那老板只得据实报告，那件豹皮大衣是省党部行动队一个兄弟来买的。……

"你还有什么说的！"韩复榘一拍桌子，怒火冲天地问道。

谌俊臣起初是吓呆了，但他毕竟是阅历很深的，心想那个去买豹皮大衣的队员，在当天，就命他到南京去了。更何况天下豹皮大衣何止一件，他就一口咬定"不知道！"

"上刑！"韩复榘怒不可遏地喊。

上老虎凳，灌辣子水，插竹签……谌俊臣实在有点受不住。他想招，但一个严厉的声音在耳边吼叫着："你若说了出来，也是没命！"他又咬住了牙关，幻想着：他的上级知道了一定会来救他的。

3个月过去了，刺张一案还未了结。

确实的，中央党部曾过问过此事，要保谌俊臣出来，但是，韩复榘就是不放，而且他的理由十分堂皇：堂堂一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被刺身亡怎么可以马虎了事；嫌疑犯如何可轻易放出。何况，人在韩的执法队手里，谁敢怎么样?!

有一天，又开审了，照例又是僵局。

韩复榘实在气得忍无可忍了。"唰"的一下，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来，将子弹推上了膛，走下公案，将枪口对准谌俊臣胸口吼叫道："你到底说不说！?"谌俊臣眼里闪过了一丝恐惧的目光，头微微地低了下去。但他很快地清醒过来，如果说了，也难免被"组织"制裁，倒不如硬到底，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他又把头一摇："不知道！"

韩复榘象头暴怒的狮子似的，对着站在两旁的执法队大吼一声："拉下去打！打死他！"

谌俊臣就在执法队的军棍下，被活活地打死了。

不久，刺张内幕披露：张苇村确实是被谌俊臣策划组织人暗杀的。

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行动队长，为什么要去暗杀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呢？

原先张苇村是CC系统的一员干将。1933年，CC系统为了将势力扩充到山东，陈果夫就将张苇村推荐给韩复榘，当上了省党部执行委员。这时韩表面上虽服从中央，但骨子里却事事闹独立，尤其怕中央势力渗入山东。这次张苇村到山东，临行前陈果夫曾找他密谈：要他此行表面上是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监视韩复榘，并要将韩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而韩复榘对CC头子的用心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事先已对张的为人作了一番调查，知道张只是个爱财喜色之徒，并不难对付。

于是，张苇村一到济南，韩复榘就盛宴款待，而且还委任为省府委员的重任。以后，他又按月送上巨额津贴，一昧在"财"与"色"上，逞其所欲。从此，张苇村就投入了韩复榘的怀抱。他非但不将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向CC汇报；反而把CC及蒋介石对韩的种种意图，统统告诉韩。张为韩用，他不但不再是"中央"派往山东的耳目，反而成了山东韩复榘在"中央"的耳目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果夫已得密报，张苇村确已投韩。他把张苇村召回南京，大加痛斥，但又为了韩的面子，不至使山东分裂出去，仍叫张苇村返回山东，但在临行时，他把张叫到小书房，阴沉地对张说："你的事，是叛党行为，中央本来有权随时处置你的！这次给你个'带罪立功'的机会，你回山东后，好自为之吧！"

张苇村战战兢兢地擦着汗，退出小书房。

不久，另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小书房，他就是山东省党部行动队队长谌俊臣。他是受了陈果夫密电召来的。

"今后，你要注意张书记长的行动！"陈果夫吩咐道。

"是！"谌俊臣头点得象鸡啄米，他俩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如今见头子这样吩咐，心里有着一种莫名的快意。

"要将他的一举一动用密电报来！"陈果夫将象牙烟嘴上的三炮台香烟烟灰弹了一弹。

"是！"谌俊臣又忙点头道。

陈果夫抹了一下眼镜镜框，从牙缝里又挤出了一句话："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对他严加处置！到时，你会有好处的！"

"谢谢部长的栽培！"谌俊臣感恩戴德地道。

张苇村一回济南，立即将这次南京之行的情况向韩复榘作了汇报。韩复榘听了，发出了会心的笑，他拍拍张苇村的肩膀，大大咧咧地道："我为你作主，你不要怕他们！"

"谢谢主席！"张苇村恭敬地鞠了个躬。

而这一切，马上被谌俊臣知道了。立即用密电向陈果夫报告。陈指示他"密切观察，及时报告"。

张苇村回济南得到了韩复榘的保证后，更加死心塌地的投靠韩了。对于"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对韩复榘的指示，奉若圣明。谌俊臣一次又一次地密报。他极希望早日除掉这个死对头，以便自己好取而代之。

不久，陈果夫的密电来了，命令谌俊臣除掉张苇村。但电文中又命令：要暗除，不能使韩知道，如果事泄也不能暴露，否则将以"组织制裁"！

谌俊臣通过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一个谋杀张苇村的行动计划策划好了。他抓住了春节提灯会这个良好时机，又选在一个万人浏览的进德会。他又从广东重金聘来了两个枪法高明的刺客，再由南京选派了一位美貌女郎来作诱饵。定名为："神秘女郎的行动"。果然，张苇村这个色鬼入港成了黄泉之鬼；而制定这计划的谌俊臣非但没有得利，而且也成了棍下之鬼。

（李炎韬）

南京刺汪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结束后照相时，平地起风波，发生了一起重大刺杀案。

自从北伐结束以后，国民党内各实力派系连年征战不休，纷扰不已，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并导致了东北沦丧，外祸日亟。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蒋介石提出"举国团结，共赴国难"，还邀请国民党内各派系首领来南京参加四届六中全会。经过多次的说服拉拢，虽然冯玉祥、李宗仁等少数人尚未赶到，但阎锡山、张学良等军政实力人物与绝大多数党国元老、要人都已如期到达南京。国民党内各派首领已多年没有这样聚会了，今天确是个非比寻常的中央全会。

按照会议日程，这天早上7点，出席全会的全体代表由蒋介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率领，去南京东郊的中山陵谒陵。约在9点钟，全体委员回到城内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全会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身着黑色中山装，登台致开幕词。他不无得意又不无伤感地说："我们在这几年当中，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了极大之成绩，其他建设，也得有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的安慰，就是因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负担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决。"

开幕式结束后，照例先由全体代表集体照相，然后再举行预备会议。大约是上午9点30分钟光景，全体代表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准备照相。但等了许久，却不见蒋介石到来。委员们一再催促，汪精卫只得亲自进楼相请。原来蒋介石见楼外照相场地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军政首脑云集，每人均带有马弁，腰佩手枪，不禁心中一动，警觉顿生，心想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没有异动者？万一有一个异动者，首要刺杀目标必定是我蒋介石。于是立即决定不去楼外参加摄影，带着随从副官蒋孝先坐在会议休息室里休息。汪精卫跑来催他去照相，蒋对汪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汪精卫回到摄影场，在前排中的位置上坐下。张继大声招呼说："不要等，就照吧！"于是全体委员摆开照相的姿势，照相机对着代表们来回照了两圈。中外记者们也拿起手里的照相机，纷纷拍下这镜头。

约在9点35分摄影完毕。在这刹那间，突然从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个身着西服、外套夹大衣的年轻人来，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轮手枪，一边高呼"打

倒卖国贼!”一边向站在第一排中间正在转身的汪清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第一枪射进汪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汪的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立即应声倒地,血流满身。

枪声响起后,摄影场上立即秩序大乱。坐在轮椅上、患有足疾的张静江惊吓得滚到地上,别人以为是他中了弹;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只有站在汪精卫旁边的国民党元老、身高力大的张继见状,急奔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那刺客仍然继续打枪,张学良急奔上前猛踢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向刺客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在楼里的蒋介石听到枪声,带着副官蒋孝先与军事参议院院长朱培德,急奔而出,来到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边,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呼:“汪院长!汪院长!汪院长!”连呼三声,汪精卫才无力地答道:“不碍事……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代表们围成了一圈,竟不知如何是好。闻讯从楼里赶来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声泪俱下,怒斥陈公博:“你还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将汪先生送医院!”蒋介石也猛醒过来,急忙指挥人把汪精卫搭上救护车送往中央医院。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刺客。陈璧君等大叫:“快,将凶手也送进医院,不能让他死! 要他的口供!”

当天,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车站、码头与机场等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量的嫌疑犯。蒋介石将特务处处长戴笠等人叫来大发雷霆,说:“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这类祸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脑袋!”

巨大的搜捕网向全国张开了。

南京刺汪案震动了海内外。无疑,这是民国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暗杀案之一。

此案的主使人是谁?

国民党内的汪派与其他反蒋派,开始怀疑是蒋介石指使其特务系统干的。因为蒋汪曾长期交恶,蒋为消灭政敌过去常常采用暗杀的方法;而且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里,在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要没有蒋介石及其亲信的默许,刺客怎能带手枪进入呢? 因此,刺杀案发生后,陈璧君曾对蒋介石大叫:“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你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广西的李宗仁也来电责问:“会场森严,乃来暴徒,亟应严办,以儆凶顽。”蒋介石为洗刷自己,特地将汪派重要人物陈公博、顾孟余、谷正纲、唐有壬找到中央军校谈话,告诉他们:“我看这件事不是自己人干的。”后来经陈公博等人亲自参预审问与调查,证实蒋介石及其特务系统确实与此案无关。

国民党的中央社宣布说:“刺汪的幕后主使者完全是在福建组设人民政府的陈铭枢、李济深”,“意图颠覆民国”,等等。把刺汪案的主使人说成是当时反蒋失败后隐匿在香港的陈铭枢与李济深。

还有人认为,此次刺汪是安徽帮首领、号称民国年间“暗杀大王”的王亚樵指使其门人党徒干的。

又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此事是中国共产党指使与策划的。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1935年11月1日南京刺汪案的真正组织者与行动者,其实是几位不满现实、企图以暗杀来铲除国之大奸、以挽救国家危亡的热血青年。

为首的青年人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毕业于江苏省立一中,后入金陵大学学习。在大革命高潮中,曾担任南京学联的理事,思想进步。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华担任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赞许他的过人才智,称他为“振兴党国的中坚”。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用利禄引诱他进入南京政府,华克之断然拒绝,因而被国民党当局囚禁,经国民党元老保释才得以出狱。此后,他回到苏北企图组织反蒋抗日的游击部队,没有成功,就到上海活动。1933年底他到福建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活动。失败后,再次潜回上海。

与华克之一道来上海活动的,是他的同乡、同学陈惘子。陈惘子曾在安徽大学读书,因参加反蒋活动被学校开除,就流亡到上海,进入法政学院读书。与华克之不同的是,陈惘子在这时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二人秘密地住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新南里二三二号,共同策划反蒋抗日活动。

不久,他们的同乡张玉华放弃金陵大学的学籍,也来到他们这里来寻找革命出路。另一位徐州青年叫孙凤鸣的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此人粗识文字,早年随父母去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家业。不料“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家倾家荡产。孙凤鸣抱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民族仇恨,入关投军,曾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充任十九路军的排长。战后,随十九师踏军退往福建,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时,任十二混成团机关枪连连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孙凤鸣回到上海,十分憎恨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立志铲除国之巨奸。还有一位丹阳青年贺坡光不久也参加到他们的小团体中来。

但不久,这几位青年人在讨论救国行动方案时,发生了分歧与争论。华克之等四人认为当时外侮日亟,日本侵略日益加剧,国势危如累卵,这一切恶果都是因国民党政府的几个军政首领如蒋介石、汪精卫造成的,因此,救国之道在诛杀这几个巨奸元憝,效法张良博浪一击,“拚一死以诛元凶”;只有陈惘子一人系中共党员,根据中共组

织指示，不同意搞暗杀。争论结果，陈惘子不再过问他们的事、华克之等四人遂为实施暗杀蒋介石的工作更紧张地忙碌起来。

要暗杀蒋介石，首先必须在南京城立住脚，并找到一个容易接近蒋介石的工作。经过密商，华克之决定在南京设立一个新闻通讯社——“晨光通讯社”作掩护。没有经费怎么办?华克之通过关系到香港找到李济深与陈铭枢，向他们报告了杀蒋计划，得到李、陈5千元港币（约合5150元银元）的资助。正隐匿在香港的安徽帮首领王亚樵也给予他们以一定支持。华克之回到南京后，立即通过关系向国民党中宣部等机关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晨光通讯社”的立案登记手续。批准立案的时间是1934年11月，在登记表上注册的名单是：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华克之化名），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当月，该通讯社就开始向南京各报社发稿。他们的活动没有引起任何方面的怀疑。

1934年1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暗携手枪前往中央党部会场，由于在看到蒋介石时稍一迟疑，失去了下手机会。1935年8月蒋介石自武汉回到南京，孙凤鸣又携枪前去，准备在途中对蒋狙击，但由于汽车开得太快，也未能下手。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晨光通讯社的经费已告罄尽，恰好这时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华克之与孙凤鸣等人决定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地在这会上实施对蒋介石的暗杀。孙凤鸣把妻子托华克之送往香港，自己抱着必死决心；华克之安排晨光通讯社工作人员撤退。1935年10月28日晚上全体同志设宴为孙凤鸣饯行。华克之亲手将一支六响左轮手枪交给孙凤鸣，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留芳百世。祝四弟成功。”孙凤鸣悲壮地唱起了《易水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5年11月1日上午，孙凤鸣拿着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件，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与会代表们集体照相时，他作好一切准备，等候蒋介石出现。但直到照相结束，蒋介石始终没有露面。眼看着代表们快离开摄影场地，这难得的机会即将失去，孙凤鸣毅然决定刺杀地位与影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于是，他迅速拔出手枪，向汪精卫打去……

孙凤鸣被 卫兵击成重伤倒地后，卫兵在他身上仅搜出毫洋六角与作为自杀用的一枚鸦片烟泡。为追逼口供，国民党当局将孙凤鸣急速送进医院抢救，医生奉命每小时给他注射10余次强心针。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亲临病房，对孙审问。孙凤鸣忍着肉体强烈的痛苦，没有暴露任何团体秘密，只是深沉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只是我的良心。”很快，孙凤鸣就因伤重不治身死。

但国民党当局从孙凤鸣身上搜到一张参加这次全会的新闻记者出入证，号码是“第六十三号”。顺着这个线索，他们找到了晨光通讯社。宪警特务迅速包围了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陆家巷二十三号的晨光通讯社社址，但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只有没有烧尽的纸片与一封“留交来人们”的信函，信上写：“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三君毫无关系，特此声明。”除此而外，一无所获。

后来，国民党特务人员到丹阳贺坡光家布置陷阱，逮捕了贺坡光。又在上海北站抓到了晨光通讯社一位工勤人员谷子丰。谷子丰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线索，导致了孙凤鸣夫人崔正瑶、张玉华及陈惘子等多人被捕。1935年年底戴笠率领大批特务到香港，与港英当局勾结，逮捕了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旧部余立奎、胡大海与周世平。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理，一部分人被公开判刑，一部分人被秘密处决。因此案牵连而被处死者究竟有多少，至今不详。但南京刺汪案的最主要的策划者与领导者华克之，国民党政府却始终没有抓到。

南京刺汪案对当时中国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时四年的蒋汪合作因此瓦解，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被蒋介石接替，汪派上层分子陈公博、褚民谊等人一个个被赐出了行政院。亲日派受到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日趋强硬。

汪精卫先在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了出来。后转到上海医治，由著名外科专家牛惠霖开刀取背脊子弹，未成。1936年2月19日，汪精卫带着枪伤，去欧洲疗养，“西安事变”发生，才匆匆赶回国内。抗战爆发后，他堕落为头号大汉奸。其背脊的子弹一直无法取出，到1943年发展成为致命伤，1944年11月10日结束了其可耻的生命。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历史考证

遵义会议情况是谁向共产国际报告的

1935 年 1 月党中央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份，取消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在共产国际绝对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确是一件大事。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台不仅失掉联系，而且处于紧迫的战争环境。是谁最先把遵义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呢？过去不少文章和回忆录几乎都说是陈云去报告的。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离开长征队伍，到过莫斯科，可是并未担负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的任务。陈云说过："……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的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派我、潘汉年、夏采侠三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我们各走各的，不是一起上海的。……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来，机关被破坏，无法工作了，共产国际把文件和人全弄到莫斯科，我也去莫斯科了。……"

以上情况，陈云也对遵义会议纪念馆访问他的同志谈过，对是否向共产国际报告过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则一点也未提及。那么，遵义会议情况究竟是谁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呢？根据最近查阅的一些有关资料，可以肯定，"关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首先是由王稼祥同志带到远方，向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其主要内容是：我党关于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检查、总结和纠正；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党在新形势面前的新方针、政策和路线的明朗化；依据抗日战争爆发的局势，确定的战略任务和力量的部署，等等。"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腹部受伤，伤口未愈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缺医少药，到达陕京后其伤口更加恶化，党中央即派人护送他经上海去莫斯科治疗。根据当时的交通情况，他到莫斯科也是在 1936 年初了。王稼祥同志向国际执委会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理应在他治疗伤口期间。

（摘自 84 年《教学参考》（青海）第 6 期，作者费侃如）

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红军长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它主要地不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举行长征，而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共产党内主观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理由是：第一，从中国革命的特点看，红军长征顺乎当时国内变化了的形势，合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第二，从中原军阀混战后蒋介石集团对南方根据地和红军的态度看，他们决心剿灭红军，因此红军难以再在南方存在和发展；第三，"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图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民族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党领导的南方红军必须实行战略大转移，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抗日前线；第四，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来看，为了避免在不利时机与敌人决战，红军必须实行战略转移，以免在敌人进攻时使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第五，一、四方面军的历史比较，说明了南方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必然与必要性：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由豫鄂根据地向西转移，部队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约八万人，开辟了包括二十三个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在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最后都丧失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突围转移，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人。因此，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认为，红军长征是继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第一次战略大转移后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南方农村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较弱的北方农村，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红军长征不能光从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方面去寻找原因，而应着重从物质条件方面去进行探讨。具体说来，红军长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苏区地盘缩小，到 1934 年 9 月，中央根据地由原来的三十五个县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由五万多平方公里减至一万左右平方公里，这就使红军没有回旋的余地；二是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王明的"左"倾经济政策，导致根据地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使红军缺乏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的物质条件；三是由于苏区面积缩小和人口锐减，使红军兵员得不到补充，只有突围向外发展。

第三种意见认为，红军长征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果。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有多方面的因素，即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是主要的。不能把敌人重兵"围剿"及其推行的堡垒政策作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破和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更不能把它视为具有"必然性"的中国革

命"发展规律"。理由是：第一，从客观条件来说，从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只相隔半年时间，客观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敌人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兵力，第四次"围剿"中是四十万人，第五次"围剿"中是五十万人，增加百分之二十；而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是六万余人，第五次反"围剿"中是十一万余人，扩大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中央苏区的东线还出现了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的有利形势。如果把客观条件（敌人的强大及其策略的改变）作为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则无法解释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把革命力量由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全国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既有遍布南方各省边区的，也有建立在北方的（如陕北、陕甘根据地）。不能把红军主力由南方转移到北方也看作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否则，则无法解释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也无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大江南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第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左"倾错误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过去只强调军事方面的）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政治上打击中间势力，拒绝与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合作，坐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在党内反"罗明路线"，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革命内部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使党和革命队伍大伤元气；在经济上推行"左"倾的经济政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使根据地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加以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被迫举行战略转移。

（摘自 86 年《历史教学》第 12 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综述》一文，作者夏道汉）

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何时称为长征

史学界对于中央红军 1934 年 10 月的突围转移，现在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把红军刚刚撤离中央苏区称为"长征开始"或"开始长征"。这种提法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容易使一些不熟悉历史的同志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不是被迫的。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长征"的呢？大量文献资料说明，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王明，而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统一地称为"长征"是 1935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逐渐形成的。

1934 年 11 月，也就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一个月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的报告中，谈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时，他曾经把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这是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把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但是王明当时仅只是指红七军团和红六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经中断，因此王明虽然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但是国内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的红军并不知道，并未使用这一概念。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时，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突围战役"。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也只是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西征"。这就说明，直到遵义会议前后都没有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1935 年 9 月 12 日，为了克服和纠正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中共中央在行军途中的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

但是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个决定当时只传达到党中央委员，因此"长征"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也没有广泛使用。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对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作了精辟的总结，对它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长征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连夜行军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我们完成了伟大的远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只有我们红军才有这个气魄，才有这个决心！长征苦是苦，可作用大，它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传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反动派是没有用的。它又是宣传队，向十一个省的广大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它又是播种机，在十一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在毛泽东的这一段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

但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对红军的战略转移也还没有统一称为"长征"。在 1935 年 10 月 29 日的《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途远征"。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诗；12 月 25 日，他在《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又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193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纪念红军艰苦转战的英雄业绩。从此以后，“长征”就成为红军突围转移的专门术语了。后来红军二、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也都统称“长征”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不是在战略转移开始时就称为“长征”了，而是在战略转移到达陕北之后才逐渐统一称为“长征”的。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第10期，作者邬家能）

长征何时确定落脚陕北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过大渡河后，原来曾设想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根据地。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部队集中在懋功、两河口一线。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今四川省小金县境）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北上的战略方针。这时候，还没有提到陕北。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松潘县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要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然后，红军应向东发展，即向陕甘边界发展。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这里最早提到了陕北地区（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方）的战略构想，但是并没有提出以陕北为落脚点。关于陕北是否存在苏区根据地，当时是并不确知的。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12日在俄界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报告说：“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会议经过讨论，毛泽东作结论，肯定了上述构想，并说：“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不过，当时还并没有确定落脚陕北。

之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9月17日突破腊子口。这天，支队政治部发出《坚决北进赤化川陕甘讨论大纲》，内称：“党中央决定坚决北进的战略方针，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陕甘创造苏区”，“陕甘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等军（当时实际上二十九军尚未成立，只有二十七军——作者）和许多游击队，容易创造苏区”。

所以，可以说直至9月17日，中共中央知道陕甘有红军、有游击队，但不知道是否尚存在苏区根据地，也没有考虑到落脚陕北。

9月18日，红军占领哈达铺。在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陕北有苏区存在。

《彭德怀自述》中说：“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据现在所知，当时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关于陕北苏区的，至少有以下的内容：

《大公报》7月29日社论《论陕乱》中称：“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赤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也。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近驻井岳秀部担任，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命运，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形更不可知。”

《大公报》8月1日载：陕北红军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阎锡山7月22日在山西绥靖公署和省纪念周上报告中说：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这些消息，明确地告诉中央领导人，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央决定红军由甘南北上，到陕北苏区落脚，是很自然的。从而考虑了整个部队的战略行动。

《聂荣臻回忆录》中还提到，9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上说，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决定，是红军继续北上的榜罗镇后，在榜罗镇会议上（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才正式作出的。

榜罗镇（属通渭县）会议是在9月28日召开的。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博古的文章《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文章说：

“经过国民党报纸及反动军阀口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零星消息，当然不能给我们对于陕甘苏维埃运动发展之全盘的图画。但是初步的概念与轮廓是可以获得的。从一般的零星消息中，我们的印象是：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二十几县中，都多多少少的吸引

入运动之中，而延长等五六个县城已经几个月保持在红二十六军的手中；陕南二十五军的活跃，陕中及甘东北一带的游击队活动，都说明运动是在很大的范围中发展着。其次，运动已经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的现状，在全党面前提出一个紧急的任务，就是：组织领导集团与加强陕甘的游击运动，将他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之建立。这是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的基本一环。""正是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的支队，应该完全的负担起来，应该把完成这个任务当做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一切我们的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及地方的群众工作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总的战略目标。"

所以，红军长征中确定落脚陕北，是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尚有苏区存在后，中央领导人作出的抉择，而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摘自 86 年《僚望》第 26 期，作者力平）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词及曲的由来

一、产生于鄂豫皖苏区的两支歌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就曾产生过两支词不同、曲也完全不同的歌：

其一，《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就歌词而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可以说是一致的，词句也十分接近。从《红军纪律歌》似乎可以看出：早在 1929 年或 1930 年间，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传到鄂豫皖苏区，并被编成歌流传开来。

其二，《土地革命歌》。歌词开头两句是："土地革命已经开始了，须知工农专政最为高。"歌词长达 32 行。这里仅摘录几段：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
莫叫同志费心又操劳。

第三枪支自己要擦好，
临阵之时击发多灵巧。

第五队内同志团结好，
同吃同饮且莫相争吵。

第六临阵奋勇向前跑，
若是退却纪律不能饶。

第九服从命令为正道，
严守军纪战斗力提高。

这道歌的词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两回事，词作者及产生年月已无从查考；但这支歌的曲却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这个曲子具有一种军歌风格。不少音乐家都曾认定是一支"军歌"，或是在军歌基础上产生的。不少红军老战士认为它可能来源于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唱过的一支军歌。从 1931 年到 1934 年，原属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序列的岳维峻、张印湘、彭振山、梁冠英、马鸿逵、肖子楚、刘镇华、刘茂恩部十多个师（旅），都参加过"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军。红军当时也俘虏过不少西北军官兵。被俘官兵带来他们部队流行的歌曲，被红军加以吸收和改造，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难以查明词曲作者的《土地革命歌》，无论怎么说，它首先是从鄂豫皖苏区唱起来的。

二、程坦把两支歌变成一支歌

程坦，原名程宗寿，河南省新县箭场河乡红显边村人。1928 年入党。1932 年底，担任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在坚持鄂东北艰苦斗争的两年间，那首《红军纪律歌》，使他晓得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4 年 9 月，"程子华同志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他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有了进一步地了解。他渐渐萌发出把它编成歌词的念头。

程子华由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后，跟郑位三以及程坦、刘华清等人住在一起，先后约有四五十天。他们都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把南瓜叶子当饭吃，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却念念不忘严守群众纪律。有一次，程坦在给独立团指战员讲政治课时，就讲到不但不能拿工农的一点吃的，还必须勒紧裤带喝稀的，好节省一把粮食，拿去优待红军家属。他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课题。

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触发了程坦的灵感，他在跟程子华作过几次交谈后，即将"三大纪律八基注意"的内容，仿照《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以九个字排列成句，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他把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就拿到独立团进行教唱。

对此，刘华清上将回忆说：

"他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押韵的歌词，用了苏区流行过的《土地革命成功了》这首歌曲的

曲调，也就是现在所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调。”又说：“1934年11月，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并遵照中央命令开始长征。因此，这首歌在部队还没有传开。”

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0月20日作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工作决议》，决定从11月1日至7日为纪念活动周，开展纪念和宣传十月革命的活动。程坦参加和主持活动周的具体工作，其中，就有他教唱最新编成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最初的歌词内容，刘华清上将还记得开头两句是：“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建制也被打散。因此，从该团唱起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没有能够广泛传唱起来。

三、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了这首歌

长征出发时，程坦因身体虚弱，领导上让他骑着马随军长征。这时他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部队进入陕南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创建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这时，红二十五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2980余人，很快壮大到4000余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2000余人。

当时部队迅速扩大，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政治思想教育与作风纪律教育成为很重要的工作。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除主编《红旗报》外，当时还负责印刷了几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教材，在部队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程坦还将一首题为《红军三大任务》的歌曲，单独印成歌页，发至连队教唱。为配合纪律教育，程坦又将他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那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一次进行了改写，刻印成歌页，发到每个连队教唱。

刘华清是这样回忆的：当时，我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工作，当宣传科长。程坦同志编出歌词后，我即帮助他把歌词填入歌曲。我还刻过蜡板，印过歌片，也教部队唱过。歌词是程坦同志编成的，这是肯定无疑的。根据程坦自己讲，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他又整理过歌词，重新印过。

原军委炮兵政治委员张池明、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徐光友、原军委基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黎光、湖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程启文、民政部原副部长李金德、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原政治委员徐兴华等不少老同志，都曾回忆说：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沣峪口西征北上时，一路上唱的就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部队进入陇东回民地区时，军政治部当时还制订了一个“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内容是：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郭述申回忆说：“这个‘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也是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影响下形成的。”“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也从这一带路过，毛泽东同志还曾称赞过红二十五军留下的良好影响，说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四、这支歌又一次大放光彩

红二十五军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编成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1日、25日，红十五军团先后于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中，取得俘敌3800余名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部队中也补充了一批东北军士兵。因此，如何对部队进行红军纪律教育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日程上。

中央红军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10月底，即派贾拓夫等先遣人员到达红十五军团驻地道佐铺，及时送来中央红军《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这一内容完整、文字准确、条款分明的《布告》，对于程坦来说，真是如获至宝。他最初在鄂东北编写歌词时，就没有这样的“布告”作依据。程子华传达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只是记忆所及。见到《布告》的当天晚上，程坦就激动得睡不着觉，严格按照《布告》的内容，并结合原来所编写的歌词，逐条逐句地斟酌的修改原歌词。第二天早晨，就将修改后的歌词送给了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很快，这支歌就在红军各部队中传唱起来了。

郭述申是这样回忆的：“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同志编写的。……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他为了用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刚补入部队的一批解放士兵，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他们送给我看时，我让他们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予以刊登。最初的歌名叫《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支歌已唱遍各个抗日根据地。随着我军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发展，各地各军对歌词都做过一些相应的修改。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颁布实施。1950年底，解放军

总政治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第一次组织专人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修改，并于1951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中正式公布。是年8月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印发"部队歌曲选集"的通知》中，再次将这首歌词予以公布。1957年，总政治部又一次对歌词作过几处修改，并在《解放军战士》杂志第14期正式公布，《解放军歌曲》1958年第11期二次公布。1978年4月6日总政文化部《关于学唱十六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第三次重行公布。而这多次"公布"，均署名为"红军歌曲"，至于歌词编者程坦，则被埋没了46年之久。

1981年，《解放军歌曲》第3期重新发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才在"红军歌曲"底下，增添了八个字："程坦编词，集体改词"。并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同时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介绍了这首歌曲产生的具体年代和歌词编者的情况，认定："目前广播和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在程坦同志编词的基础上，1957年集体修改后的定稿。"这对歌词编者程坦当然也是一种安慰。遗憾的是，这时程坦已与世长辞三个月了。

五、似可终止的尾声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只知道《三大纪律八注意》歌是一首红军歌曲，但对它的由来及产生经过以至歌词编者的情况，则一无所知，也未加考证。现在，当然"已全部弄清楚了。"

所谓"已全部弄清楚了"，乃是以1935年11月程坦在陕北见到《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后，重新编写为起点，而对此前的情况都仍无人问津。程坦若不是在鄂豫皖苏区编过此歌的词，在长征途中又一次编写，这首红军歌曲恐怕也不会在陕北即刻问世。

1981年重新发表这首歌曲时，署上了程坦的名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1978年4月，总政文化部曾就歌词编者问题，派《解放军文艺》社编辑邵遗逊、雷抒雁访问过程坦，并写有书面调查情况汇报，但当时未能及时作出定论。1979年，程坦的子女联名写信给胡耀邦反映情况，程坦所在单位民政部也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问题才得以解决，这首红军歌曲创作历史的一角空白才得以填补。

1980年4月30日下午，笔者曾在北京医院采访过程坦老人。他的生命之烛，时已燃到最后时刻。听说有人来访，而且是采访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的事迹，老人的兴致很浓，侃侃而谈。话题由吴焕先如何严格治军，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经过。老人没有谈及更深更远的历史背景；只说在长征中所唱的、由他编写歌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内容很不完整。他说："那会，可没有看到过什么文件和布告，没得这个条件嘛！"

问到他为什么不向有关部门讲明这一情况时，老人摇了摇头，回答十分简单：一说他过去不愿讲，二说他后来工作忙也顾不上，三说"文革"开始了，……

值得庆幸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毕竟是诸多革命歌曲中的佼佼者。"文革"时期，它照样在唱。197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重新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两报"评论员还发表了《唱好两首革命歌曲》的评论。程坦当时并没有向"两报一刊"透露这首红军歌曲的产生经过。1972年春天，他在医院养病，填写干部履历表中"有何著作"的栏目时，这才想到他所编写的红军歌曲。为此，他曾致信周恩来总理，就这首红军歌曲的有关情况，如实地作了反映，请求组织予以调查核实。

(选自《党史文汇》91年12期，作者：卢振国)

"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1933年9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实行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遭受到很大损失，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曾派三支红军部队突围远征，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八万多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红军虽经英勇奋战，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西以西地区，但遭到很大损失，到达湖南通道城红军只剩二万八千人。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毛泽东的坚决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通道城后转入贵州，称之为"通道转兵"。红军攻克黎平后，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

如果说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转兵则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通道转兵"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事件，应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它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其理由：一是，通道转兵使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蒋介石集中五倍于我的兵力，在武汉、绥宁一带阻拦，并命令广西

军阀向西延、龙胜一带追击，企图围歼红军。在毛泽东的坚决主张下，决定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扭转了当时的被动局势；二是，通道转兵减少了红军的损失。若当时红军继续去湘西，不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那么将遭到蒋介石的重兵阻拦，红军的损失会更惨重；三是，由于通道转兵甩开了敌人尾追和堵击，减少了红军的损失，使红军有了休整的机会，全力来解决"两个路线"问题，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所以说，在肯定遵义会议在我们党历史上的作用同时，要正确估价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选自《革命春秋》92年4期 作者：张迎吉）

红一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称谓演变

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教材中，常见的提法是"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严格地说，这个提法并不确切。事实是，红一方面军曾两次改称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也曾两次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其称谓改变时，总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其主要领导人和所辖部队也都有所变化。笔者以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来说，什么时候称红一方面军，什么时候称中央红军，应严格地按照历史事实，不要笼统地含糊不清地用"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提法。本文试用历史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组成。

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县的永和市会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二、1931年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奉令撤销，所属各部统称中央红军。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并决定在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红一方面军总部奉命撤销，所属各部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统称中央红军。

三、1932年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8月8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0月上旬，中共苏区局会议（即宁都会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林彪、聂荣臻，令将红一方面军组成三个军：即东方军，由红五、红七军团和赣东北诸独立团及独立第61团组成；中央军，由红九军团及独立第一、第四团组成；西方军由红一、红三军团及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组成。从这个电报可以看出，此时的红一方面军，除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外、还辖红九军团（均于1933年10月28日成立）。

四、1934年12月，红一方面军又改称中央红军。

1933年12月，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前方总部"（即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并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第一方面军改称为中央红军。这一决定到翌年1月中旬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正式实行。

五、1935年8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中央红军又改称红一方面军。

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俄灯）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8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正式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后，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六、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对外公开称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18日，陕甘支队所属三个纵队业已编成，以红一军

团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全支队共七千余人。此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对外公开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七、1935 年 11 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军团：以陕甘支队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继任军团长，程子华继任政治委员。

八、抗日战争爆发，1937 年 8 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为八路军第 115 师。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八路军第 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摘自《党史纵横》90 年 6 期，作者：孙道同）

困境中的智慧之光
——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为了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剿，制定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对策，曾相继召开过一系列由党和军队高级干部参加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均是在艰难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之后的间歇进行的，他们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

通道会议（中央军委会议）

1934 年 11 月底，中央红军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突破了敌人设在湘桂边境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掌权的“左”倾领导人此时仍坚持执行原定的率部队赴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却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在此危急关头，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湖南通道的播阳镇召开了军事会议，以商讨对策。毛泽东在会议上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党和军队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于是中央红军自通道城改变进军方向，转兵图黔，逐步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红军在黔东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军事主张的正确性。1934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在黎平（今贵州黎平境内）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略方针。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肯定了通道转兵的决策，并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不适宜的。”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原定计划，并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

猴场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今贵州松坪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决定还提出：利用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加强政治工作、缩编部队，充实战斗连队以适应新的环境；保持同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密切联络，加强对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

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向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有：邓小平、伍修权、李德（共产国际所派军事顾问）。会议揭发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会议在取消秦邦宪和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同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让其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扎西会议（中央军委会议）

1935 年 2 月 10 日，中央军委在扎西（今云南威信）

召开会议，与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会议作出了关于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的决定，并下达了《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命令规定一、三军团取消师一级组织，各编为四个团；五军团由现有三个团缩编为二个团，九军团分别并入三、五军团(未实行)。

会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一方面军巧渡金沙江后，到达会理(属四川)，党中央于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以及一、三、五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说明了红军机动作战以摆脱敌人重重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讨论了今后行动，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

两河口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6月13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毛泽东在懋功县两河口(今四川省小金县境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的批评，进一步说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还决定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两个方面军。

芦花会议(中共中央会议)

1935年7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芦花(四川黑水境内)召开会议，与张国焘会商组织问题，对张国焘反对北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希望他改正错误共同北上。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毛儿盖集中。

沙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8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毗邻毛儿盖的沙窝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所造成的局势和当前任务，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正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决议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并号召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毛儿盖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今四川松潘境内)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提出了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广大地区的计划。决定还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错误计划，做了具体的分析。

巴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出密电企图危害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在巴西(今四川若尔盖境内)寺院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揭露了张国焘南下逃跑，企图危害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并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决定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纵队近一万人，迅速脱离险境，坚持北上。

俄界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肃迭部境内)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了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被敌人进攻所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动的综合。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党员，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关于北上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会议决定改变原定的川陕甘计划，经陕北、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会议还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吴起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宣告结束。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城内)举行会议。会议再次讨论了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正式作出了保卫

与扩大陕北根据地和在这个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决定。

（选自《党史纵横》91 年 6 期，作者：张艳林）

瞿秋白和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刊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很重视革命报刊的宣传作用，曾主编过《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等党中央机关报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3 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理论宣传工作。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同时主编党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

1923 年 6 月 15 日，瞿秋白主编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亲自题写刊名，设计封面。封面中心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上面写着："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在 15 篇译、著文章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 6 篇及创作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1925 年 4 月《新青年》改为月刊，1926 年 7 月停刊。

1923 年 7 月 1 日，瞿秋白主编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在广州创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统一战线理论。瞿秋白是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中的 7 篇文章中，瞿秋白写了 3 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1924 年 2 月 1 日出第 3 期后停刊。瞿秋白共发表政论文和短评 40 多篇，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问题作了探讨，批判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为党成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作出了贡献，为北伐战争作了舆论的准备。

1925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五卅运动高潮时出版第一张机关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负责主编。6 月 4 日，《热血日报》出版，瞿秋白亲自为前几期报头题字，是主要撰稿人，并担负大量事务工作。《热血日报》出版了 24 期，瞿秋白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包括发刊词、重要社论、专论及大量短篇评论，多的二千字，少的二百字，每期刊出两篇。《热血日报》是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战斗号角。

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每月来编辑部，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编委会会议。到 1928 年 4 月瞿秋白赴莫斯科为止，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 50 余篇。他任主编期间，《布尔塞维克》的每期社论除一期外都是他写的。《布尔塞维克》辟有社论、国内政治、外交问题、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国革命问题、党内问题、理论问题、经济与财政、妇女青年问题、地方通讯和读者之声等 16 个栏目，大多是理论性文章。由于在国统区，刊物封面多以《中央半月刊》、《中国文化史》等书名伪装。《布尔塞维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领导人民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

1934 年 2 月瞿秋白到达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首都瑞金，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教育部长、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长兼主编（前社长沙可夫在 1934 年去苏联疗养）。早在 1933 年 7 月，瞿秋白在上海时，就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目的，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瞿秋白留在江西根据地，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报，为保守转移的秘密，报纸仍以中央机关报出现，一切照旧。瞿秋白搬到报社住，与其他两位同志承担编务工作，带病坚持正常出版，每周二、三期。他随军行动，一到宿营地时，就抓紧时间写稿审稿，以保证正常出版，并鼓励其他人也写稿。直到中央局正式突围转移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瞿秋白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

1935 年 2 月，瞿秋白在福建武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逮捕。6 月 18 日在长汀英勇就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者：申长友、张学泰选自《党史博采》92 年 8 期）

张闻天同志任职述略

1919 年，张闻天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同年 12 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2 年 8 月，赴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1924 年 1 月返回上海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同年 11 月，任重庆女二师英文教员。

1925 年 6 月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8 月，被派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参与苏州党的活动。10 月，赴苏联，12 月抵莫斯科入"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 9 月毕业留校任教。

1928年9月，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分工作。

1931年2月中旬，从莫斯科回到上海，4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5月，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同年夏上海党中央机关遭敌破坏后，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苏区中央局"会合，改称中共中央局，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局宣传部长，兼任中央局党校校长。3月26号，新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部，任委员。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在同年1月24日至2月1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2月3日，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7年5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主编。12月下旬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张闻天任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会议成立了召开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张闻天任委员、秘书处成员。

1938年5月，兼任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并主持《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编译工作。9月，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兼任部长。编辑《共产党人》。

1940年初，中央宣传部同中央教育部合并为中央宣传教育部，任部长，并兼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7月，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43年3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任组织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5月到佳木斯，任中共合江省(今属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合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1948年6月到哈尔滨，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2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5月，到安东任中共辽东省(今分属辽宁省和吉林省)省委书记。

1950年1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因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未能恢复，故未到职)。

1951年4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954年4月至6月和7月，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5年1月，从苏联回国，任外交部常委务副部长。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9月28日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0年11月至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写了许多理论研究文稿和笔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1976年7月1日，因被长期迫害，心脏病猝发，在江苏无锡不幸逝世。

(选自《党史纵横》90年4期，作者：胡光)

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

在民国史上被称为"四大家族"中两个主要成员的宋子文和孔祥熙，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在1947年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照毛泽东所说的100—200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币值，要比现在的币值高出很多，是一笔巨大的财产。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有这么多私人财产吗？据当年国民政府留下的有关档案资料，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时的法币对美元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如以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可见毛泽东所说的"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那么，在国民政府内当过行政

院长，几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究竟有多少财产？虽是个谜，还是可以查一查的。

宋子文有多少财产

宋子文(1894—1971)1894年出生在上海，青年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财经，获博士学位，曾在纽约银行见习。回国后先在汉冶萍公司任英文书记(秘书)，后在上海担任过联华商业银行副经理和神州信托公司副经理。他还经营过五金生意和炒卖过股票，但均失败。1923年宋子文跟随孙中山去广东，先任广东革命政府秘书，又管理过盐务，筹划过财政，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委托他创办中央银行，并担任行长。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凯遇刺身亡，宋子文接替了财政部长一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于1928年和宋美龄结婚，宋子文和蒋介石便成了郎舅关系，宋应蒋的邀请，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底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成为中央银行的"当然"行长。后来又当了中国银行董事长。1933年宋子文曾因和蒋介石某些意见不合而辞职，由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但宋子文官运不衰，后又担任过行政院长、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驻美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1945年联合国大会成立时还担任了中国首席代表。

宋子文1933年初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虚职。他深知当时国民党正在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批建设资金，于是就筹划成立一家新的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公司。这一消息最先是1934年4月由莫斯科传出的，说宋子文正着手建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专办外国人投资，已聘请了国际金融专家拉西曼和马虚为顾问。这年4月15日，上海的《申报》发表文章说，"以一千万元之资本合组银公司问题，更已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氏予以证实。"并说，"盖该公司系专以沟通我国与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也"。6月2日，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九江路111号成立，资本1000万元，其中发起人宋子文、宋子良兄弟等26人，每人认股185股，共5000股，每股100元，合计50万元，其中宋子文兄弟认股370股、资本37000元。其余950万元分别由中央、中国、交通、金城、中南、大陆、上海、浙江兴业等17家银行认购。宋子文初被推举为董事，后来担任了董事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当了总经理，因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实权一直握在宋子文的手中。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通过对一些大的工矿建设项目的投资，势力扩大很快。1936年宋子文以建设杭州至宁波间铁路的名义，向英国的中英银公司和汇丰银行借款，并包揽杭州铁路的建设资金。1937年又为建设广东、江西、四川等地铁路贷得一笔外资，在工业方面，他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陕西的京西电厂、苏州的成金煤矿、四川的建川煤矿、陕西的同官煤矿、湖北的既水电公司、安徽的淮南煤矿、南京的扬子电气公司等进行投资，赚了大钱。据1936年12月31日公布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资产负债表》所列，资产合计为3283万余元，这年纯收益(利润)为191万余元。抗战期间中国建设银公司一度迁往香港，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建设大厦内，名噪国内外。当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称它为"华尔街的买办机构"，因而它受到国内舆论界的众多攻击。蒋介石也对宋子文控制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很不放心。一次蒋对孔说："别人都指谪豪门资本，如中国建设银公司等，你以为如何?"宋子文回答说："我捐出来好了。"在1947年6月国民党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竟然说，"宋子文捐产二千亿元"。于是上海、南京等地各报曾一度盛传宋子文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财产都捐出来了。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1948年上海经济资料社编的《TV宋豪门资本内幕》一书指出："实际上献产并不损害他对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掌握与宏图，其所捐股票为中国建银的35000股，及其在各公司的股票。目前银行股票为75万元，票面百元，升7500倍"。"二千亿元约合抗战前三百万元，在中国建银所占股权不过四十分之一，也不影响他老弟宋子安的总经理。如此建银仍然牢牢掌握在宋家手里，而且可以抗御一切指谪与攻击"。

宋子文在发展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同时，觊觎中国银行的大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把中国银行总行南移上海，但政府资本仅500万元，占1/5。但中国银行信誉好，经营得当，一直保持中国最大的银行地位。1934年中国银行现金比中央银行多50%，存放款各多一倍，钞票发行多二倍半。宋子文和孔祥熙经密谋后，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提出由政府向中国银行增资2500万元的动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1935年初，宋子文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增资扩股的目的。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500万元，其中原有官股500万元，再增官股2500万元后，官股比例增至60%，其性质一下由商办变成为官办，董事会也进行了改组。这年4月，由孔祥熙提名，宋子文当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推荐宋汉章当总经理，宋汉章先推辞，先由宋子文兼任总经理数日，后仍由宋汉章出任总经理。抗战期间由孔祥熙担任董事长，但实权一直在宋子文手中。

抗战前宋子文还收买了广东银行，置于宋家直接控制之下。广东银行原是美国华侨投资，成立于1913年2月，资本200万港元，1926年增资至820万港元。1935年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而亏蚀倒闭。1936年宋子文出面

收买，投资改组。改组后的广东银行资本为870万元，分为第一优先股200万元，第二优先股4678520元，旧股（普通股）1083200元。宋子文兄弟私人投资仅20万元，但他的弟弟宋子安担任了董事长要职。该行在抗战前由于经营侨汇和进出口押汇业务，赚了大钱，到1947年时资产增加到8000万港元。据当时报载，“这个广东银行，在抗战前广州等地吸收存款，抗战爆发后一律停业，而存款则被宋家运用来买外汇，存款人前往取款，以帐册不全拒付，战后则以一偿一”，从中谋取了大量不义之财。

除此，宋子文还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

宋子文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但很分散。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银行的资金用于工矿和铁路的建设投资。除上面说到中国建设银公司对几家铁路和工矿的投资外，宋家还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公司、华丰和记纺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和记面粉厂、中华书局、六河沟煤矿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恒丰纺织新局、中湘煤矿公司等工矿企业握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宋子文和宋子良还当了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如中国毛纺织公司是1940年成立于四川，最初资本400万元，后增资到1200万元，其中宋子良名下投资50万元，为各股东之首。

宋子文家族控制下最大的工业企业要数雍新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40年的抗战期间，由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等18个单位，共投资2000万元，该公司在陕西、甘肃两省拥有纺织、面粉、机械、制药、皮革、印刷、酿酒、采煤、火柴等工厂15个，职工12000人。该公司名为国营，但从总经理到各业务部门要人，均由宋子文安插。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后，又控制了广东实业公司的大权，在穗港间大做纱布生意。1948年5月《工商天地》第3卷第1期发表文章说他“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在商业方面，宋子文家族也干得十分活跃。1936年在宋子文的筹划下建立的中国棉业公司，宋自任董事长。最初资本仅50万元，到次年初发展到200万元。数月之间翻了四番。1937年4月成立的华南米业公司，资本1000万元，另有流动资金2000万元，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还有宋子良出面经营的公司，如国货联营公司，香港的中国物产公司，资本均在1000万元左右。其余宋家直接投资和控制其业务的还有重庆的中国国货公司、四川畜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利用当时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的时机，进行囤积投机倒卖活动，赚了大钱。1947年12月重庆出版的《工商导报》上刊登东方明的文章说：“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据笔者分析，这么多工商金融企业，宋家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资产应当小于这30多个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当政时，由国家银行或财政部投资创办的企业，不应当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财产。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宋氏家族把大部分私人财产转移到泰国。据1948年5月31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第30期上刊登的张长荫的文章说，第一批转移到泰国的资金约3000万港元，折合美金600万元，约合当时法币6万亿元。以后仍有一些财产带出。另在美国银行存有一笔款子，但数量不详。宋子文后去美国定居，就靠这些生活，晚年生活并不宽裕。

孔祥熙及其家族有多少财产

孔祥熙（1880—1967）祖上是拥有6000顷土地的大财主，并从事经商活动。孔家在经商同时也经营票号，名声显赫的“志诚信”票号就是孔家开设的。孔祥熙早年就读于北京协和书院（燕京大学前身），1901年去美国求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在山西创办铭贤学堂。辛亥革命后他在山西督军阎锡山部下当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1914年孔祥熙在日本和宋耀如的大女儿宋蔼龄结婚，和孙中山是“连襟”，和宋子文是郎舅关系。1926年后他担任了广东省革命政府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以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要职。1933年宋子文辞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就由孔祥熙继任，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以后还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解放前上海出版的《经济导报》第96期刊登刘康的文章说：“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是商业资本，他的金融机构只是商业资本的褓姆；工业资本则多是他人依附或部分投资或公私合营”。那么先从他的金融资本说起。

孔祥熙经营银行不象宋子文那样藏头露尾，而是直接公开。孔家经营的主要银行是山西裕华银行。该行于1915年先在天津开业，名义资本200万元，实际没有这么多。据说孔祥熙创办山西裕华银行前，他所办的祥记公司在为美商美孚石油公司推销煤油，要有一家银行担保。而孔家又找不到合适的银行但保，就自己在天津亮出“裕华”的牌子。孔祥熙自说此行来头很大，是由原来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事实上志诚信早已关闭了，只是骗骗美国人的。孔祥熙担任了几年工商部长后，口袋逐渐丰满起来，加上日本强占了华北，形势大变。1937年孔祥熙把裕华银行迁到了重庆，资本增加到2000万元。抗战期间山西裕华银行发展很快，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1939年蒋介石决定把抗战初成立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简称“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成为全国金融垄断机构的总司令部，蒋介石亲自担任该处主席。当时“四联总处”就设在重庆的山西裕华银行内，具体业务由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侃主持，可见山西裕华银行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孔家的势力了。

裕华银行的经营方法是投机，是一家有名的“透支户”，1941 年的透支额就达 3000 万元，他利用透支来的钱去抢购黄金，大发国难财。当时报载文章说：“黄金市场，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 两)”。“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指山西裕华银行。

抗战胜利后，山西裕华银行由重庆迁到上海四川路上，资金增加到一亿元。该行的要员有人给他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家儿女，如孔令侃、孔令仪、孔令杰、孔令伟等兄弟姊妹；第二类是孔家的门生亲友，如总经理武渭清等。第三类是孔祥熙的好友门客。这家银行可说是代表了孔祥熙的面孔。

孔祥熙办工业较晚，最早在抗战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如 1939 年 7 月他和四川财团何北衡等共同创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孔任董事长。该公司主要从事冶金工业，其次是发电和建材生产，下辖 10 个工厂，最初资本 1200 万元，到 1943 年增资到 1.2 亿元，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孔祥熙一度打算逐步将该公司转变为其私有。但不久由于财政部长下台而未实现这一美梦。他还和刘鸿生合资创办了中国火柴公司，在四川、贵州和广西开设有工厂；还以宋子文名义投资于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毛纺织厂，对四川的福华公司也有投资，曾担任过这些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等要职。抗战胜利后，孔家还在大光瓷业公司、益中实业公司、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新华玻璃厂、淮南路矿公司、温溪造纸厂、科祥发药房、屈臣氏汽水公司、阜新面粉厂、祥泰夹板厂、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等工矿企业握有一定数量的股票。

孔祥熙及其家属主要着力经营的还是商业。孔祥熙最早经营的商业是民国初年开设的祥记公司，开在山西，主要是推销美孚公司的煤油，兼做棉纱和棉布生产，后来还开了广茂兴药材铺，主要销售人参、鹿茸等。他在日本向宋蔼龄求婚时曾拿这两家商业机构炫耀过自己。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后方物资紧缺，利用职权，囤积和倒卖物资成为社会风尚，于是孔祥熙就由他的妻子、儿女出面大搞投机买卖。在重庆，除祥记公司外，又新开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和华福——华盛公司等。祥记公司在重庆就拥有 30 余辆汽车；庆记纱号专做棉纱倒卖投机，与公营“福生庄”相配合倒卖。据 1944 年重庆出版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丛刊》所载：1942 年以后重庆政府推行“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办法后，后方棉布年产量为 215 万匹，其中 80%供军用，造成严重供求不平衡，形成花、纱、布价格暴涨。1942 年重庆每担棉花售价达 1666 元，比 1939 年上涨了 19 倍；每件 20 支棉纱售价达 5 万余元，比限价高出 7 倍；白布每匹售价 807 元，1943 年又涨至每匹 2800 元，一年间上涨了 4 倍。如此狂涨风潮中，庆记纱号靠套、购、倒卖纱布一项发了大财是可想而知的。孔家的华强公司是专做运输与贸易的，当时跑一次昆明到重庆，倒卖的物资就可翻几倍钱，被称作“黄金路”。华强公司和宋子良的西南运输公司，宋美龄的中美实业公司等一起从事走私倒卖活动。他所开的大元公司是专做五金电料。当时五金电料奇缺，属于政府一类管制器材，大元公司的利润更可想而知了。

抗战初期，孔祥熙还从事中国政府与德国政府间的军火交易。据其父说：“抗战以前，我(孔祥熙父亲)在欧洲与德国商量易货的事情，当时德国方面不愿意太公开，因此蒋主席嘱托重要的电报由小儿(孔祥熙)转呈。抗战初期，德国方面对我国还有军火卖售，为要避免外间注意，也是由小儿在香港经办”。不知孔祥熙在对德军火交易中拿了多少回扣。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孔祥熙儿女出面在上海和美国纽约开设了一连串的贸易公司，而且由内贸转向外贸。1946 年成立的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外的代理公司是设在纽约的扬子贸易公司。1946 年国民政府发放购粮贷款 10 亿元，这家公司独得 6000 万元。该公司又从浙江贷得 1.5 亿元，从事米粮囤积倒卖活动，挑动上海粮价暴涨，每担米价由 3 万元一下跳到 51000 元。长江公司挂出 55000 元一担牌价，挑动米价再涨，使该公司不到一月，就获得一倍。扬子公司事件后该公司被勒令清财结汇，仅据帐面公开材料，已结清的外汇有 183 万美元，21000 英镑和 45000 瑞士法郎。尚未结清的有 90 万美元，出口结集外汇 95.48 万美元，95000 英镑和 26.6 万瑞士法郎。那么仅扬子建设公司一家起码拥有 250 万美元以上资本。

根据孔祥熙家族已知的有关金融、工矿和公司财产估计，总数要比宋子文多，约在 1000 万至 2000 万美元之间。

孔祥熙早在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就预感到不妙，于 1947 年底带了巨款避居纽约，并定居美国。

（陆仰渊）

韩复榘“山东独立”未遂解密

1935 年冬，社会上有一个传说，说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日本人勾结，要搞“山东独立”。究竟韩有没有这个打算呢？有。为什么没有成为事实呢？因为遇到了阻力。

这是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原任山东省政府顾问的韩

多峰在文章中说的话。

韩复榘在山东早就和日本人有所接触。1935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掠夺胶济线上一处矿藏，曾由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向韩提出一个由日方开采的合同要韩签字，被韩拒绝。

在这以后，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常到省府与韩密谈。原来是要搞什么"山东独立"的阴谋活动。韩和花谷在密谈过程中，对他的部属未征询过任何人的意见，就把"山东独立"的问题决定了下来。可是他又想到，如果不征得自己将领的同意就公开宣布，万一遭到他们的反对，独立不成，原来的地位也有不保的危险，所以最后还是把孙桐萱等五位师长请来了。

五位师长还未与韩见面之前，韩多峰即将日人要韩宣布独立和韩已动摇的情形告诉了他们，请他们竭力劝阻。

后来，韩复榘在会议时提出了他的主张。孙桐萱说："主席如果这样做，恐怕第三路的官兵跟着主席走的就不多了。"因孙在五个师长中资历较高，韩也听他的话。孙首先有了这样的表示，其余的四个师长也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韩的主张，韩遂默然，独立之议就这样被打消了。

原来韩复榘答应了宣布山东独立之后，花谷即去天津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报功。后因韩的独立久无声息。他又于11月间到济南催韩，并说天津如何好玩，企图诱韩前往，以便作进一步的胁迫。韩没有接受邀请。

不久，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设宴招待日本经济考察团来济南考察，邀请韩与考察团见面。韩出席了宴会。花谷就找韩谈话，韩多峰也随其后。花谷所说大意是：黄河决口，河水泛滥，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如通电独立，南京的军队也不易过来。这时韩多峰凑到他们跟前说："天气已冷，就要冻冰了。"

主人西田请大家入座，并说了一些"中日亲善"的话，韩致答辞。接着花谷气忿地站起来说："日中是不会亲善的，如果要想亲善只用一个字就行，那就是'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中国打败了，庚子年中国打败了……"花谷在说话时，表现了极端狂妄的态度。韩的面色也十分难看。

（唐志摘自台湾《传记文学》1990年7月号）

风云人物

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7年，赴北京求学。先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入俄文专修馆学习，开始接触新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1920年3月，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同年10月，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等报馆的聘请，以特派员身份，前往莫斯科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在苏俄期间，写了大量通讯，及时地向祖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2月，经张太雷介绍，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莫斯科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12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1923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正确意见，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历任中共第四届、五届、六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923年夏，经李大钊介绍，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念》和《社会哲学》，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中共早期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主编、编辑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较早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中共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他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2月，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正是第0国际》的小册子，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8月7日，在汉口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党中央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8年4月底，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在苏联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1930年9月，和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工作。

1933年1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共工农红军民主政府教育人民委员，苏维埃大学校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他因肺病留在江西，参加中央分局，继续领导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初，他化装成商人准备经福建到上海养病，2月，在福建武平县水口乡被俘，在监狱里，严词拒绝敌人的威胁诱降，1935年6月18日，从容就义，葬于长汀县罗汉岭盘龙岗。1955年，中共中央将他的遗骨重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

材料一　瞿秋白慷慨就义纪实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接到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第二天中午，宋希濂派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这时，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瞿秋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瞿先生，你在这儿有一个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报，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后事，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为之"。

瞿秋白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早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当天晚上，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6月18日清早，瞿秋白起身换上了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地漱洗之后，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唐诗，他翻着，吟读着，思索着，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正书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按照特务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怡然自得，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又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曲，并不时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时年36岁的瞿秋白壮烈牺牲，中华大地将永远铭刻着她优秀儿女的英雄业绩……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87年2月28日)

材料二　"秋之白华"

一九二三年一月，秋白从苏联回国，就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从事革命斗争和党的领导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这八年间，他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主要的有：一九二三年六月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我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他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作了关于未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要建立革命军队，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有关决议案。瞿秋白当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八年间，是秋白对党的工作贡献较多的时期，也是他政治生命中的"黄金时代"纪念馆对此作了突出介绍。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秋白和杨之华结婚了。秋白赠送给之华一枚金别针，作为结婚留念。他在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之伴侣"，表达了他的心声。这枚金别针，解放后杨之华捐赠给常州市博物馆珍藏，纪念馆展出了复制品。他俩结合后，互相勉励，并肩战斗。正如秋白把他们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刻成的印章"秋之白华"一样，象在寒秋中，绽开的一朵白色菊花，迎风挺立，斗雪傲霜，装点着祖国大地的美好景色。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挤出中央政治局，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初，不给他分配工作。连杨之华的工作也给撤掉了。秋白一不抱怨，二不消沉，而是乐观、愉快地工作、生活，并且劝勉之华要经得起考验，受得住挫折，在逆境中也要积极地为党工作。秋白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年中，居住上海，在白色恐怖，敌特搜查下，多次迁居，艰苦卓绝，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和鲁迅一

起，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这一时期他的文学著译，收集在《瞿秋白文集》中的就有150余万字。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政论文章。纪念馆展出了他大量的手稿，写的是那样的工整、秀气，很少涂改，非常清晰，由此可见秋白工作的认真。

秋白和鲁迅在战斗中建立了深挚真诚的友谊，成为"文人相亲"的楷模，文坛艺苑的佳话。鲁迅书写了清人何瓦琴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送秋白。秋白遇难后，鲁迅哀痛万分，抱病精心编集秋白的遗文——《海上述林》。纪念馆中陈列的那副对联，以及《海上述林》早年版本，还有鲁迅家中让床给秋白睡的房间照片等，都闪现着他们伟大友谊的光辉。

一九三四年一月，秋白奉命赴中央苏区工作，展品向人们介绍了他在瑞金一年，为党的教育事业付出的心血。红军长征时，要他留在苏区，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安心工作。他把自己的战马送给徐特立，把心爱的长袍赠与冯雪峰，让他们带着这些去长征，表现了他对战友深厚的阶级友爱。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长汀被俘，后来被叛徒指认，身份暴露，他立场坚定，忠贞不屈，敌人百般劝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蒋介石无奈只好下令："就地枪决"，当他看到电报时，漠然一笑说："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我们革命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敌人带他赴刑场时，他沿途高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地上，对刽子手微笑说："此地很好！"从容就义。

（选自《中华英烈》86年1期作者：郝赫）

材料三　多余的话（节选）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所写，正如茅盾所说："烈士走向刑场之前，真诚坦率地解剖了自己，他一面高呼口号慷慨就义，一面却向人们毫无保留地暴露了自己弱点和内心痛苦。他不想成为完人，也不想在自己死后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个虚假的伟人像，他却希望后人以他为前车之鉴。"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份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一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果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

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上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剖解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 X 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的那一次，我看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是什么留恋也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 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 Q 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方志敏

方志敏（1900—1935）江西弋阳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人之一。七岁上私塾。1919 年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1921 年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因组织反帝大同盟，被开除。后在上海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向警予、瞿秋白等，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 年 7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长，领导农民运动。曾两次到广东参加广东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向毛泽东、彭湃等学习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回江西后，在省委领导下开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讲习班。1926 年 10 月，北伐进攻江西，他组织农民给予积极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西农村坚持秘密的革命活动。1927 年底，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员联席会议，制定武装起义的纲领，成立了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和起义总指挥。12 月，成功地领导了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1928 年 9 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任主席。1930 年后任赣东北省委书记、省苏维埃主席、红十军政治委员等。创建了包括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人口一百万，红军三万多人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陷入困境时，率部北上抗日，牵制了参加"围剿"的敌军。但在部队分两路向浙皖边的皖南行动中，被敌军合围于怀玉山地区，不幸被捕。

在狱中，顽强斗争，写下了《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等著作。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35 年 8 月 6 日，在南昌市下沙窝，慷慨就义。

材料一　方志敏之死

方志敏蹲在大石头下，四围都是树林，林子里响起敌人的阵阵吆喝声。从他躲藏的地方可以看见山下有个坝子，打散了的红军战士一个个被从林中搜出，押到坝子中央。

撕心裂肺的痛苦在他的胸膛翻卷着，他举起手枪，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1934 年 10 月，他奉中共中央指示，率作为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北上抗日，至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堵截，部队受挫。他决定撤回赣东北苏区，途中又被 7 倍于己之敌围困在怀玉山区。

作战失利本是兵家常事，但他认为责任主要在自己"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从此，"责

任"便千斤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本来,他已和粟裕一起带 800 人冲出了重围。但主力 2000 余人还在敌人包围中,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决定留下来。他说:"我是负责人,你们先走,我留在这!"而留下,就意味着等待死神。

第一天与敌激战,部队没有冲出包围圈,而且还被打散了。第二天,红军被俘去 800 余人。第三天、第四天……,部队越打越少,2000 余人的主力几近全军覆没。

如此惨重的失败,怎不叫他痛不欲生?!

但他没有开枪。他的心底响起一个声音:"方志敏,你这是逃避责任!自杀哪是共产党员的行为?"

他把枪重新插回腰间,竭力抑制住悲痛:"是呵!共产党员,岂能遭了失败就悲观绝望?"

他战胜了自己刹那间的怯弱,也躲过了这次搜捕。他微微一笑:"反动派呀,反动派!这一次,我若能逃出罗网,不打倒你,我是不会罢休的!"

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敌人的魔掌。1935 年 1 月,他在陇首封锁线上被俘。两个国民党兵搜遍他的全身,以为象他这样的大共产党一个头就值 8 万元赏洋,身上一定有许多值钱物件。但他们彻底失失望了,他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身无分文。

一张红纸,写好了 34 人的名字

1899 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湖塘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他曾在一篇遗文里说他的家乡是很好看的:村后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树木葱茏;村子荫掩在深绿的花果林木中,各种鸟儿在绿叶间上下跳跃,鸣叫出啁啾悦耳的声音;村前是几口养鱼池,水平如镜,每天早晚妇女们便来到池塘边洗衣裳;鱼塘前是大田坂,戴斗笠的农民,三三两两散在田坂上,弯腰低头做工……

就是这样美丽的地方,也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一样,充斥着贫困、饥饿和疾病。压迫与剥削笼罩在农民们的头上,日月无光。

方志敏从青年时代起渴望着能为家乡、为可爱的中国找到光明。1924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国共两党合作打北洋军阀。他一身二任,既是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又是共产党的江西省农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中,方志敏回到家乡。他邀集起 34 个贫苦农民,高声问他们:"欠财主佬的债的有几个?请举手!?34 人都同时举起了手。他又问:"自家没田种的有几个?举手!"又是 34 人举臂如林。他点点头,看着 34 双期待的眼睛,说:"我准备搞革命暴动,平债分田,大家干吗?"34 人齐声响应:"干呵!"

一张红纸上,方志敏写好了 34 人的名字。34 人一个个走拢来,郑重地按他的指点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手印。从前这些农民只知在田里埋头做工,现在他们昂起了头要干那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

——第一个农民革命团就这样成立了。

1928 年 1 月,响应着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起义风暴,方志敏振臂一呼:"暴动!"发动了有名的弋阳、横峰起义。五万多农民云集在他的周围,他们烧借据、毁契约、废除债务、劈仓分粮,把个革命搞得热火朝天。

方志敏带领起义队伍,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进行游击战争,波浪似地将苏维埃的版图扩展到了横峰、贵溪、万年、余江等 8 县区域,使苏区纵横 500 余里、人口达 100 万众。在这些斗争中,他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革命经验,被毛泽东盛赞为"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他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他本人也获得了苏维埃中央颁发的银质"红旗勋章"。

抓到了方志敏这个大共产党,敌人欣喜万分,同时又惊恐万状,急忙给他脚上铐了一副 5 公斤重的铁镣,将他关在戒备森严的军法处看守所里。

过些时候,敌人把方志敏移到"优待室",对他玩起了劝降的把戏,劝他放弃共产主义,写一纸脱党声明,再写一点"文字",然后高官任做。

方志敏对他笑笑,表示愿写点"文字"。敌人拿来了纸笔。他伏案疾书,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狱中遗嘱》等文章。这些文章字里行间都闪烁着"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必胜"的思想和他宁死不屈的信念。

敌人恼羞成怒,想用夫妻之情来威逼他,问:"你是不是愿意看见你夫人?你与她的感情不是很好吗?"方志敏知道敌人已逮捕了自己的妻子缪敏。

方志敏与缪敏感情甚笃。他俩在校读书时相恋,在革命低潮时结为夫妻。他们是革命的患难伴侣。但在敌人的威逼面前,他坚定地回答:"我到了这个地步,妻子儿女哪还能顾得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劝降不成,威逼无效。无计可施的敌人便把方志敏五花大绑,戴上重镣,拉去"示众"。面对围观的人群,方志敏昂首挺胸,表现出一副凛然难犯的英雄气概,令人们不得不发出"这个共产党真不了起!""虎死不倒威"的赞叹。

有一次,敌人煞有介事地问方志敏:"方先生,要是上峰下令处决你,你会感觉怎样?"方志敏知道敌人是以死相威胁,他无所畏惧地笑着答:"嘭的一枪,或者啪的一刀,那正是我需要的一死谢党的时刻。"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敌人在筹备一个大规模的"'剿匪'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届时要将方志敏等人绑去杀头,做"追悼大会"的祭品。方志敏听说后,沉思片刻,泰然自若地点点头:"这样死,也很痛快!"

敌人最后决计下毒手了!1935 年 8 月 6,南昌的清晨,细雨栩栩,马路两旁军警林立。敌人将方志敏反铐双手,口中塞满烂棉絮,嘴上又紧紧缚了一块白布,然后押

上刑车，驶往刑场。

刑场上，方志敏神色凛然，向前走几步，然后转过身来，用蔑视的目光打量着刽子手们那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敌人吓得心惊胆颤，立即排枪齐射……

方志敏英勇就义了，按他的话说是一死谢党，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却在肉体的牺牲中得到永生！

（选自《党史月刊》作者：彭明榜　陈清华）

材料二　方志敏被害侧记

1935年8月6日凌晨，细雨蒙蒙中的南昌市。

一辆军用卡车，载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车上解押着一位反铐双手的重犯。马路两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路上不见行人。

车上被铐的人，方脸高颧、身躯魁梧。一路上，他神色凛然，态度从容，挺胸昂首地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国民党士兵们惊慌失措，仓促抓团棉花塞进他的口里，又用一块白布紧紧缚住他的嘴巴。

目的地——沙窝到了，卡车嘎然而止。

重犯被士兵们推下车来。他挺起高大的身躯，神色自若地向前走去。走到行刑处，他双目怒视那一支支正对着他的黑洞洞的枪口，脸上浮现出一抹无畏的、轻蔑的微笑……

枪响了！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屈的民族英雄——方志敏，傲然倒在血泊中。

殷红的血，染红了赣水之滨……

方志敏牺牲时，年仅36岁，他在狱中，用全部心血和感情写成的，嗣后以《可爱的中国》命名出版的书稿，在亿万革命人民中传诵。1940年，当叶剑英同志在重庆看到其中部分手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后，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绩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日，
又照秦淮一叶枫。

（选自《纵横》87年6期作者：王永春、陈芷遐）

材料三　狱中与方志敏交谈

苦战八年的方母文（方志敏的代名）被俘的消息在报纸上用头号字登出来了。政府一方的报纸，全都表示对这次胜利的庆祝。

永一（本文作者的代名）看报纸上这消息深感不快，苦战了八年都没有出甚么岔子，怎样这次却被俘了，报纸上的消息怕不确实吧？

半个月之后，永一极力求得所长同意，并由所长导引到方母文四人囚押的普通号子里，所长向他们介绍永一说："这是永一先生，素来肯在狱中做好事的，他早就想与你们谈话。"

永一仔细看看他们，方母文是一个身躯长大的壮年，穿着袄裤。田寿身躯比较短小，左臂已断。平知身躯较疲，正负着枪伤。还有祝三，身负三枪又患肠炎症，卧在竹床上呻吟着。四人的脸上都因行军作战晒成黑色，但却看不出愁容和怕死的表情。他们微笑地谦和地请永一就坐，永一接过所长的话头说：

"我名叫永一，我很同情你们，听说你们被俘心中很是难受，我从前在'清党'时间曾经设法开脱了不少你们的同志——可爱的青年！"

"谢谢你！我们这次失败被俘真是万分羞愧和懊恼。"母文慨叹地说。

"胜败是兵家常事，失败并不是从你们开始，古往今来，不少有失败的人！"永一只能这样安慰他们。

"不是那么说的，我们的军队，是应胜利的，现在我们被俘，这不能不算我们极大的痛心！咳！"母文深深地叹了口气。

永一寻思了一下，乃用别的话，撇开了这一话题。

"这次你们身边大概都很困难吧！"

"我们身边是一无所有，但这并不要紧，我们向来就过着清淡的生活。永一先生，你如果有什么书籍，请借些来看，在牢里没有书看真是难过啦！"母文说。

"书籍是有的，等下我去检齐交所长送来。"

官厅正在用各种方法诱降方母文，并想让他写些"剿匪"材料的文件，强迫地将他与田寿等三人分开，移到优待号里来，关押在永一的房子对面。这时，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一个好好先生，很容易说话，永一想怎么样，所长都是肯定答应的。新所长允许永一每夜夜深的时候，可以到方母文囚室内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在母文搬房的第五天晚上，永一单独走到母文的囚室内，与母文谈话。母文正在电灯下执笔写"我参加革命斗争经过之略述"一文，看到永一进来，就放下笔来，起身请他坐在书桌前的板凳上。永一先开口说："先生，新来所长答应我每晚来与你谈话，面子上我是来做说客，实际上可以借这题目来和你谈谈天，官厅正想重用你，关于这一点，你的意见以为怎样呢？"

母文不觉大笑一声。

"永一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话，自从我们被俘入狱之后，在这个区域里实际观察之结果，更证明从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不错的。就是我们这次遭到失败，只能归咎于我们领导的错误，绝不是客观环境困难到非失败不

可的。我们都是革命者，既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投降？真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

永一随手翻翻母文所写的稿本问道：“你在写什么文章？”

母文微笑地答道：“狱中无聊得很，不过将自己以前参加革命斗争的经过随便写写罢了。”

“请你仔细写好来，不要随便……”

“仔细写好来有什么用处，简直是拿不出去的。”

“那暂且不管，不见得拿不出去吧？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就可以替你出力。”

“先生愿意替我出力吗？那我将努力地写好来，写多少，算多少，至死而后已，我愿我写的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口直心快，说到就要做到，请放心地写好了。”

“那真感谢先生盛意，请问先生是为什么入狱的？”

“说来话多”，永一接着将自己的身世，所做过的官职，以及因言语莽撞性格粗暴，犯人家的疑忌，被人家控告，自己才跑来投狱的经过概略地说过一遍，最后说：“咳！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跳出这个牢门呢？”

“永一先生，请问你，你为什么自来投狱呢？”母文不禁奇异地问。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情真有点糊里糊涂，好像是着鬼迷似的。”

“先生，我们虽然是初次交谈，请勿怪我直言，你当时自己跑来投狱，并不是着了什么鬼迷，乃是舍不得家资财产吧！”

“也许是的。”永一微感忸怩不安。“不过我记得当时投狱之前是经过一番内心的苦战，我觉得我过去所做的事是很多罪恶的，想入狱来吃吃苦，表示我对罪恶忏悔一下。”

“这也是很错误的，当然我认为你过去的官僚生活，没有一件不是害人民的。只有舍弃自己一切，为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工作，才是正当途径。自己跑到监狱来悔罪，不过表示愚笨罢了。我认为你真的动机，还是上面所说的不舍得家资财产，不敢做违法的行动罢了。我们革命的人说话是很戆直的，请勿见怪。”

“你的话我非但不见怪，而且认为是真理，我还要将我做过的事告诉你，过去我常把这件事夸耀于人，现在觉得同样是无意义的。”永一于是又把他如何将某省的军事领袖拉向中央，以完成那次战争，又叙述了一番津浦线上的胜利的事实，永一尚未说完，母文已听得不耐烦了。

“永一先生，你过去做的那件事，就谈到此地为止吧！那绝不是件足道的事。对于中国军阀，不论是哪一派，都应该破坏它，因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和民众的敌人，他们把一个很好的中国，弄得如此糟，所以凡是帮助军阀做事的，都是罪恶，反之破坏军阀统治的才是道德的行动，你说是不是？”

永一点点头很觉悟地说道：“噢人生！这是人生应做的。”

（选自《纵横》84年1期，作者为被国民党下狱的监狱长胡逸民）

材料四　铮铮铁骨方志敏
——胡逸民自述

要说方志敏的故事，十天半月我也说不完。

1935年，在江西、安徽、福建三省，到处可见这样的悬赏告示：

“凡生擒或献出‘赤匪’方志敏头颅者，赏洋八万……

八万大洋诱惑着国民党的官兵。

方志敏对我说：他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失利，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作短暂休息时，在怀玉山区遭到国民党军十四个团、约七倍的兵力包围。他曾七次率领部队突围均遭失败，被疯狂的敌人团团围住。

天亮，恶毒的敌人到处点火烧山。大火过后，又派重兵搜山。

刘畴西被捕了。

王如痴被捕了。

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被捕了。

疯狂的敌人到处搜捕方志敏，逐山逐沟，逐树逐草都搜了一遍，还是没有搜到。

八万大洋，敌人哪肯罢休呢。

敌人用枪指着被捕战士的胸膛说：“方志敏藏在哪里？”

战士们摇着头。

方志敏后来对我说：“其实呀！胡先生，当时我方志敏就躺在不远处的柴窝里，我正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地被敌人捉去，看着钢枪一支支地被敌人搜走。我心如刀绞，几次想拿起枪向自己的脑壳上放一枪，一死了事，但我想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举起的枪又放下了。。”

那次，敌人搜山整整搜了6个小时，还是没有搜出方志敏，都以为方志敏遁山走了。敌人正准备收兵时，由于叛徒魏长发告密：“方志敏还在山上，没有走。”这样，方志敏终于被两个敌兵发现了。

“1935年1月27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不幸的日子。但是，对那两个找到我的国民党士兵来说，自然是高兴到了极点。”方志敏对我说。

老方被两个国民党兵逮住后，这两个国民党兵认为方志敏是个“金菩萨”，满肚子热望在老方身上能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的，或者搜出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

两个国民党兵一高一矮颇成对比，他俩一左一右兴冲冲地搜开了。从方志敏的上身搜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搜出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失望之余，激怒起来，他俩猜疑方志敏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

两个国民党兵一个用枪对着方志敏的胸膛，另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手榴弹，右手拉出手榴弹中的引线，举在手中，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一炸弹，炸死你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方志敏淡淡地说。

"你骗谁！象你这样的大官会没有钱。"拿手榴弹的高个子国民党兵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见过世面的，骗不得我。"矮个子国民党兵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方志敏的衣角裤裆细细地捏了一遍，总企望能搜出点来。

"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方志敏说。

两个国民党兵还是不相信，在方志敏的身上确实搜不出东西来了，又在方志敏躲藏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两个国民党兵是多么的失望呵！

那个持手榴弹的国民党兵，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手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方志敏的表和笔。

后来，这两个国民党兵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平息了一场"战争"。

两个国民党兵那四只贪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共产党的大官方志敏，他俩认为：凡大官，应该是越落难越满身金银，这个共产党大官，一个铜板也没有，真是怪哉！

最后，这两个国民党兵恶狠狠地同时又是泄气地同声喝一声："走吧！"

方志敏冷笑了一声，被这两个国民党兵押走了。

事后，方志敏就此写下了《清贫》这篇名作：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是不是这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确实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啊！

两天后，方志敏被押解到陇首村国民党四十三旅七二七团部。

敌团长是个胖胖的麻子，副团长瘦伶伶的，都象似魔鬼。

他们在团部摆酒设宴，满脸堆笑，为方志敏接风。

方志敏拒绝赴宴。

这可叫麻子团长下不了台，只得撤宴奉茶！

麻子团长搜肠刮肚找话说，方志敏问东不答，问西不理。

麻子团长尴尬极了，没话找话说："方先生文武全才、久负盛誉，倘能为敝人写点什么，不胜荣幸。"

"要写点什么吗？可以。"方志敏肯定地答。

麻子团长忽得慷慨承诺，反倒有些不相信起来，可偷眼看了看方志敏，对方是坦然自若的神态，不象是开玩笑，便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赶紧吩咐道："快、快给方志敏先生备砚磨墨，拿纸笔来。"

方志敏拿起笔，略加思索，便在铺平的白纸上一口气写下了《方志敏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麻子团长一看自述，心便凉了。立时，下令将方志敏绑了起来。

次日，即派大队人马，把方志敏押解至玉山县大水坑旅部。

再解上饶，辗转押解南昌、方志敏的脚上被加上了10斤重镣……

方志敏被提审了。提审人员是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

钱协民以杀人心狠手辣著称。凡是共产党的案，宁可错杀，决不错放！酷刑拷打，更是他的专长。对方志敏，钱协民却表现了从未有过的"耐心"和"宽厚"。

方志敏拖着脚镣走上刑堂，昂扬地站着。

“为什么不给方先生凳子？”钱协民一走进刑堂就怒目喝着。

吓得在场的钟所长手足失措，赶紧跑下去，端上凳子来。

“方先生，今天提你出来，不是审问，而是告诉你一个消息，对你十分不利，你的夫人组织了军队，大概有一二千人，在铅山方面，拆了我们的一些碉堡……”

方志敏冷笑了一声。

“方先生，我听说你和夫人的感情不坏。你不愿见见她吗？”

“长期同患难，我和小敏感情不坏。不过，我现在已落入你们的手中，一切都可抛开。”

“不必不必。如果你愿意。可以写封信把你夫人找来。”

方志敏又冷笑了一声。

“你写封信，在这里任意你挑一个，替你送信去。”

方志敏紧锁的眉头动了一下。

“好，让你再想想。人嘛，孰能无情呢？我想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固执，到国方来作事好了！”

“哼！到国方，我能做什么事？”

“你能的。”钱协民接着说，“你能作事的，我们都知道，上方也知道；不然，杀了多少你们的人，何必还留着你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重用你啦，收拾残局，就要借重你方先生啦！”

“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共产党员都是有坚定的信仰的。”

“嘻嘻，算了吧！”钱协民笑笑说：“有信仰也不能实现，就说能实现，也是将来的事，你何必作傻子呢？人生在世，‘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人必要的本领……”

“行了，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觉得，我是不能做没有气节的人的！”

“气节，你还讲气节。你晓得你们那方的孔荷宠吗？”

“他是什么东西！”

“孔荷宠在你们那边是军长，一军之长，能有多少薪金，现在也觉悟了，在国方是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薪水。”

“我跟他不一样，我生来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哼！”钱协民突变了脸色。”你须知你所做的事，有许多人是被我判决枪毙了的！我看你是一个人才，才来好意劝你，不然，我做我的官，你做你的囚犯，枪毙你是上面的命令，全不能怪我！千钧一发，是降，还是死？”

“随你们的便吧！”

（选自《胡逸民自述》）

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曾用名稼穑。安徽泾县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13年至1921年，进本村柳溪小学和私塾读书。1922年至1924年，转入教会学校（南陵县乐育学校和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就读，由于受新思潮影响，乃立志投身社会革命。1925年5月，因参与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学潮被开除学籍。9月入上海大学附中，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被选送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和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31年11月，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此后，逐渐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1932年，坚决反对“左”倾错误领导者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带病参加红军长征。

长征途中，由于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很快接受了毛泽东批判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正确意见。从老山界起，多次在会议上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并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召开时，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指挥红军。遵义会议后，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忠实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促使共产国际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核心，对促进中共中央的团结和统一起了很好的作用。1938年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1943年7月，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中，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六十年代初，鉴于国内外形势紧张，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对外政策方面的正确意见。但却

被康生和王力诬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倍遭迫害。1974年1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材料　我所知道的王稼祥同志的一些事迹

一

王稼祥同志一九三一年春到中央苏区后，他的主要职务是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政治工作中，把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决议加以发挥了。他的主张和主要做法，根据我所接触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他大力提倡学文化。干部、战士要掌握文化知识。我们红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很多人没有文化。那时也没有学校，没有纸张和笔墨。王主任要李翔梧同志(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知识分子干部)召集部队的指导员开会，研究怎样教战士识字，从哪里学。没有纸和笔，王主任说，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指导员每天要教战士认两个字或者几个字。例如：武器、步枪、行军、打仗等。行军时，每人背后贴两个字，宿营时，指导员就问那两个字，答不出来，就督促你好好学习。还把有文化的人集中起来，编写对敌军喊话的口号，从实际效果出发，要求口号不要太长。比如：白军士兵们，你们也是受压迫的，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

他反复指示要讲纪律。战士们认了字，有了文化，就有利于讲纪律。总政治部编了一个讲话材料，是个油印本子。其中说工人出身、农民出身当了红军，就去拿工人、农民的东西，对不对？启发战士遵纪爱民。又拿国民党军队作对比，说他们的纪律坏，又抢老百姓的东西，红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纪律好。有了文化，又有了纪律，根本问题是什么？王主任亲自给我们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执行任务。干部、战士对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要反对打骂、反对刑罚处理，反对下死命令。王主任抓训练，就是以训练连队指导员为基础，要求指导员以身作则，为全连作表率。当时红军战士中流行几句开玩笑的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训话。可见，指导员的威信是很高的。

王主任对干部的要求严，要求高。无论什么干部都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王主任自己就以身作则。他看起来沉默寡言，但对干部、战士非常热情。他到连队检查工作，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同大家亲密无间。我在政治保卫局工作中，有的领导同志经常训人，但我从未见到王主任发过脾气、骂人训人。

二

关于长征中的情况。王主任在一九三三年春因敌机轰炸负重伤，把肠子打坏了，负伤后仍坚持工作。在长征路上，保卫局是后卫队，专门收容掉队的。由李克农同志亲自负责，组织了收容队，张燕和、周兴、胡底等同志都在这个队里，他们带了一部分武装，还有十几个便衣(侦察员)。收容队还负责保卫王主任的安全。王主任考虑的是如何把掉队的同志安置好。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时我在五军团保卫局，五军团行军在最后，李克农同志的收容队也在最后。所以，我们保卫局也担负了这一任务。

王主任身负重伤，在长征路上历尽艰苦。那个时候，没有牛奶、面包、最好的是青稞麦子，又没有磨子，这对他的病痛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不行的。过夹金山时，最危险、最困难。那里空气稀薄，你稍一停下来，人就没救了，不少同志就是牺牲在那里的。我们上去，也是一鼓作气跑上去，不能停。王主任是在大部队过去以后，才用担架抬上去的。李克农同志在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要求把王主任的担架既要抬得快，又要抬得稳。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胡底、钱壮飞等同志。

在长征途中，在王主任的指导下，对敌人的宣传传单和喊话起了很大作用。对敌人的宣传，宣传是实际的宣传，特别是对薛岳、刘湘的部队。

三

在延安时期的情况和他对保卫工作的六条意见。王主任经会宁到了瓦窑堡，马海德带了一个医疗队也在瓦窑堡。一九三六年，到了陕北(还没有到延安)，中央决定王稼祥同志去苏联治伤。后来，他是在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由苏联返回延安的。他的主要职务仍然是总政治部主任。那个时候，他身体尚好，能吃饭。虽然没有牛奶，但有羊奶喝，还可以吃面片，吃鸡蛋黄，把青菜练成汁吃。条件比长征时好多了。他是南方人，喜欢吃南方口味的菜。叶季壮同志搞后勤，能搞点香烟、炼乳等，供应给他。

一九四〇年，成立陕甘宁等五省联防军司令部。他兼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傅钟同志兼副主任。我担任保卫部部长。

王主任同我一次谈话中，对保卫工作讲了六条意见。我记得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要打掉中央苏区保卫局工作中的神秘观点，捕风捉影，主观臆断，苏联格别乌那一套。从组织上来说，要打掉每个单位都有个工作网的做法。我们不能这样干。工作网要撤销。保卫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

第二条，保卫部门要有社会常识，或者说社会知识。现在我们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要以抗大作为中心，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认为，知识分子论他家里的生活条件，不是不能生活，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呢？无非是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抗日救国。当然，有极少数人被敌人利用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他对我说，中央党校门口四个字(指"实事求是")，你懂得吗？不

能乱来。这对我是很深的教育。

当时对抗大的审干确实有神秘观点，王主任讲了以后，我们的思想比较实事求是。但康生还很"左"，一再要我们汇报，我们一直拖下来了。

第三条，军队里的保卫工作，主要做什么？不是天天去抓几个特务，应当考虑怎么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怎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结合军事工作去做保卫工作，防止敌人对部队的破坏。

第四条，要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保卫工作。政治工作机构是党委的派出机构。不能搞中央苏区时期司令部、政治部、保卫部的三足鼎立。

第五条，要执行政策。多学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现在还没有什么法律，掌握抗日的政策很重要。凡是同抗日相违背的，保卫部门要过问。有一次，我们在延安邮电局抓了一个坏蛋，把他杀了。我们写了一个布告，说这个坏蛋是汉奸、国民党、特务。王主任说，究竟是汉奸，还是国民党、特务，还是三者都有呢？他说，写汉奸就够了。有些什么罪恶的事实，写了就够了。我们根据王主任的意见改了，这件事对我的教育也很大。

第六条，要注意界限，不要扩大保卫部门的工作范围。王主任说，对抗日前线战士们的思想情绪要有正确的估计，对于一般的讲了些怪话，发了些牢骚的，保卫部门不要去管，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

四

关于他的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风。王主任以身作则的实际事例很多，确实是教育后代的好材料。他在延安，一不打麻将，二不跳舞，三不打扑克。他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学习上。他上厕所，手里也拿本书在看。他看报纸，有时把报纸拿在手上，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了这个消息没有？督促我们好好看书看报。

他对党中央很尊重，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他说得到，也做得到。有一次，有位领导干部对毛主席说了一些吹捧性的恭维话。王主任说，毛主席的功劳大，你究竟是真的拥护，还是假的拥护。他对延安的抢救运动是不同意的。当时发生过七人跳城墙，二人身亡的事件。他一再说，不能那么搞，并且请李富春同志出面，在杨家岭大礼堂作报告，解释党的政策，安定人心。

王主任作报告，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际材料，说理性强。我们都乐意去听。总政治部开会时，王主任从不空发议论，他总是先让大家讲，仔细听了大家讲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然后他加以归纳、分析，抓住几点来讲，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提出来了。

（选自人民出版社《回忆王稼祥》作者：钱益明）

徐海东

徐海东（1900——1970）原名徐元清。湖北黄陂（现属大悟）人。中国共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幼时家贫，九岁读私塾，十三岁到窑厂当学徒。烧窑做工十多年。1925 年 4 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被中共派到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代理排长、排长，参加了攻打汀四桥、武昌等著名战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湖北黄陂组织游击队，任农民自卫军队长。1927 年 11 月，参加黄麻工农武装起义，历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县独立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师长、县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积极为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其全族六十六人，但他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学会抓住枪杆子的道理，并在革命战争中，逐步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 1932 年起任红军团长、七十四师师长。1934 年 6 月任红军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参加和指挥过鄂豫皖、鄂豫陕反"围剿"的多次战斗，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保卫根据地和人民群众作出了卓越贡献。1934 年参加长征，1935 年 9 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同年 11 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西征，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他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在一起，为迎接中共中央、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西安事变发生后，奉命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于 1937 年 8 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战役。1939 年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先后九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1940 年以后，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几次生命濒于重危，仍保持乐观精神，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

在中共党内，他历任黄陂县委书记、鄂豫省委委员、鄂豫陕委委员及代理省委书记、陕北省委委员、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遭受政治迫害，但毫不动摇，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揭露林彪一伙的罪行。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1970 年

3月25日在郑州病逝。

王树声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麻城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青少年时期,在学校接近进步学生和教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6年在麻城县乘马岗小学任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组织农民协会工作。1927年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兼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贯彻八七会精神,他与蔡济璜、刘文蔚等县委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同黄安加强联系,共同行动,实施秋收暴动计划。1927年11月13日,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攻占黄安县城后,宣布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被任命为鄂东军第二路军副司令。

黄麻起义失败,他坚持鄂豫皖游击斗争,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分队长、大队党代表、支队长、红一军三团团长、总预备队指挥、红四军三十团团长。1931年11月,任第四军十一师师长。同月,参加黄安战役,指挥十一师英勇作战,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途中,调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四川军阀调集三十八个团五万余人,对红四方面军发起三路围攻,他指挥该师抗击敌主力左路纵队十八个团的进攻,歼敌五千多。随后配合十师、十二师发起反攻。歼敌七个团。击溃敌六个团,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的三路进攻。1933年6月,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三十一军军长。1935年6月,被任命为岷江掩护队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11月,组成西路军,任西路军副总指挥。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李先念等率八百余人转战到新疆后返回延安。他和李聚奎等九百余人分散绕回陕北。随后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1940年,该部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合并,组成太行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1944年任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西北根据地区委书记、鄂西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衔。他还历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年1月7日,在北京病逝。

聂耳

聂耳(1921—1935),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原籍云南玉溪,生于昆明市。出身贫寒的中医家庭。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成人。6岁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10岁入私立求实小学。从小爱好音乐,是求实小学音乐团的成员,担任演奏和指挥,还主演过话剧《青春的梦》。在校期间,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会长。1924年考入昆明联合中学。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常和同学一起活跃在街头,或唱革命歌曲,或演话剧,或说相声,积极唤醒民众。革命斗争使他感到了艺术的战斗作用。

1927年7月,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外语组。1928年,经他的老师、共产党员李国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参加团组织领导的读书会、音乐戏剧表演,秘密散发革命传单。他是学校戏剧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女店主》中扮演女主角,并学习小提琴和钢琴,音乐素养有了进一步提高。这时,他已开始创作革命歌曲,曾为一师附小谱写校歌。

1928年冬,聂耳为寻找革命出路,瞒着家庭考进云南军阀范石生第十六军的学生军,并随军进入湖南。旧军队的腐败,使他根本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夙志,半年后,便离开军队返回昆明,在一师继续学习。

1930年7月,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其时,昆明的党团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他也被列名通缉,被迫离开昆明赴上海。他曾报考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失败后到云峰申庄当店员,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11月,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的群众抗日示威游行。1931年3月,因商号倒闭而失业。4月,考入明月歌舞社拉小提琴,后升任首席小提琴师。这时因他姓聂,听觉又灵,社里有些人叫他"耳朵先生",遂改名聂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但这时的明月歌舞社里,仍然演奏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一类萎靡颓废的节目,麻醉毒害着人民,这使聂耳非常气愤。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中国歌舞短论》、《黑天使答黎锦晖》等文章,对明月歌舞社领导人黎锦晖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于1932年8月愤而辞职。旋到北京,投考国立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未能如愿。11月返回上海,先生在联华影片公

司一厂、百代公司音乐部工作。

1932年4月，聂耳结识田汉。1933年，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积极从事左翼音乐、戏剧、电影工作。1933年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他和任光、张曙、吕骥等首批加入。这一年，他创作了《饥寒交迫之歌》、《开矿歌》、《小工人》、《雪》、《静夜曲》等歌曲，并写了《影界漫话》、《电影的音乐配音》等评论。还在电影《母性之光》中，扮演过黑人矿工。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丰盛的一年，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一年写成的。如歌曲《伤兵歌》、《卖报歌》、《雪花飞》、《白雪歌》，歌剧、电影、话剧插曲《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毕业歌》、《大路歌》、《小野猫》、《开路先锋》、《牧羊女》、《飞花歌》、《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等；民族器乐曲《金蛇狂舞》、《山国情侣》、《翠湖春晓》、《昭君和番》，评论《看俄国歌剧杂谈》、《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以及短篇小说《一个冒险的摄影故事》等。他与田汉合作创作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还兼饰码头工人老王。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影片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兼联华声乐团指挥。作有电影《新女性》主题歌《新女性》，电影《逃亡》插曲《自卫歌》、《塞外村女》，歌曲《打长江》、《采菱歌》，话剧《水银灯下》插曲《走出摄影场》，电影《风云儿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义通军进行曲》等。1935年4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准备逮捕聂耳。中国共产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学习。4月18日，到达东京。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

聂耳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他的歌曲产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精神，以崭新的形式、澎湃的激情，唱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心声。他的音乐创作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起点，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音乐道路。他创作的《义通军进行曲》，被定为我国的国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材料　谱写《义通军进行曲》的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激动人心的旋律，雄壮的歌声，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儿女，在那民族危亡的时刻，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今天这支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已定为我国的国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当我们高唱起这首歌而感到自豪的时候，怎么不缅怀这支歌的作曲者、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呢？

初受熏陶

五百里滇池烟波浩淼，层峦迭翠的西山如诗如画，被称为“春城”的昆明，山青水秀，四季如春。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春城并没有给苦难的人民带来生机。

一九一二年，聂耳在这个城市的一个贫寒的小药店“成春堂”里降生了。生不逢时，军阀混战使小聂耳家境越来越难过，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疾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含辛茹苦挑起了抚育五个孩子的重担。

聂耳长到六岁，进了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这是一所实行新学制的学校，条件较好，校舍和设备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教员也多是省师毕业的高材生。国文老师不仅讲课文，还给学生讲授古体诗和白话诗，小聂耳听得津津入味，这使他从小就受到祖国诗歌艺术的熏陶。他活泼伶俐，喜欢听民歌，也爱看花鼓戏，在校中成了一个小小的歌手。

初小毕业了，新制学校要每个学生都参加童子军训练，家贫如洗的小聂耳买不起童子服，只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上高小。在这里，他跟音乐老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并成为学校音乐小组一个活跃的成员，当他挥着手指挥小乐队奏出乐曲时，常常赢得一片掌声……。

走上街头

春城终于有了春天到来的预兆。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美丽的春城也沸腾起来了。这时，聂耳已经考进了联合中学，也没有埋头在课桌上，而是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去唤起民众。

昆明上空风云变幻，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七月三日，进步学生捣毁了反动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李宗黄竟下令开枪，打死了成德中学学生梁之斌！声势浩大的驱李运动爆发了，群情激奋。聂耳带着满腔仇恨活跃在街头，他时而带领学生高唱革命歌曲，时而在集会上演话剧、说相声。斗争使他初露艺术才干，也使他感到了艺术的战斗作用。

看到了曙光

如果说聂耳开始参加学生运动是出于义愤，或者被浪潮所裹胁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二八年，他已经开始向自觉的革命者转变了。那时，他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在这里，他认识了共产党员李国柱老师，并在李老师的教育下，开始懂得共产主义道理。不久，就由李国柱介绍加入共青团。他兴奋极了，写印传单、张贴标语、参加读书会……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政治上的抚育，使聂耳觉悟不断提高，更巧的是李国柱也酷爱音乐，他教聂耳学习小提琴，使聂耳的音乐素养又进了一步。在这里，聂耳学会了许多革命歌曲，还学会了演戏。在那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的时代，聂耳就经常充当女主角，无论在《罗密欧与朱立叶》，还是在《女店主》之中，他都演得十分逼真，如不是带有男性音质的话，观众简直以为他就是一位妙龄女郎！

创造新鲜的艺术

在党的哺育下，聂耳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也慢慢熟悉了艺术的武器，但是这里还处在黑暗之中。大革命失败后的昆明，血溅街头，军队进驻学校，许多进步学生和教师被杀害或投入监狱，聂耳的导师李国柱同志也牺牲了。白色恐怖迫使他离开了可爱的故乡……

他想拿起枪杆，一九二八年冬，他投军到范石生部队。旧军队的腐败，士兵的痛苦，使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那里，他根本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

他终于离开军队，一九三〇年，他来到十里洋场——上海，进了著名的明月歌舞团。他想在这里向黎锦晖先生学作曲，现实使他失望了，因为明月歌舞团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健康，用黄色流行歌曲来赢得观众，已成为歌舞团的主要方针，他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他激烈地斥责"香艳肉感，热情流露""麻醉了青年儿童"，呼吁人们"由斗争找到社会的进步"，去"创造新鲜的艺术"。

他也感到欣慰，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田汉同志，两人互吐衷肠，说话投机，很快成了忘年之交，这也为聂耳今后的道路找到了一个指路人。

北平之行

明月歌舞团的状况，已使聂耳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决定到北平投考艺术大学继续深造，同时也想到抗日的前线去体会一下生活。

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兵的喊杀声，敌人轰炸机在头顶盘旋的噪音，再一次点燃了聂耳心头仇恨的火种；国民党当局对敌人的卑怯和对人民的凶残，更激起了他满腔的义愤。而民众的吼声，爱国者的奋斗则时时激励着他的斗志。他虽然没有被艺术大学录取，但在那里感到振奋，他结识了于伶、宋之的、李元庆等同志，他们一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他为进步刊物撰稿，参加剧社活动，排演了高尔基的话剧……，他在实践斗争中增长了艺术才干。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东北学生自治会邀请芭莉巴剧社参加一次演出，地点在清华大学礼堂。节目单上有演奏《国际歌》的安排。幕已经启开，学生自治会主席突然改变主意，表示反对这一节目，台下的右派学生乱叫乱喊，演奏者吓呆了。眼看这个节目就要取消，聂耳不甘罢休，他沉着地走上舞台，搭弓托弦，一曲雄壮的《国际歌》响彻全场，他们胜利了……。

《扬子江的暴风雨》

他带着战斗胜利的激情，于十一月三日回到上海，从此，他又和田汉同志战斗在一起。

一九三三年，在聂耳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经田汉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带着音乐这种特殊的武器更勇敢地参加到解放全人类的战斗行列……

他为田汉的电影剧本谱曲，《开矿歌》、《毕业歌》，一首接一首地问世了。

他没有忘记到人民中去吸取营养，他和田汉来到上海外滩码头，工人们佝偻着身子，驮着沉重的木箱、麻袋，喊着"哼哟，哼哟"的号子，在监工的皮鞭下，步履艰难地行进着，行进着。戏曲家和音乐家的灵感产生了，一部著名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终于完成。

当聂耳亲自导演并担任角色的《扬子江的暴风雨》演出时，场场座无虚席，舞台上下，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全场，震撼人心的怒吼感动得聂耳热泪盈眶。

当一个艺术家看到自己的创作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激励着人们去战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聂耳浑身充满了力量，他看到了音乐武器的威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九三五年二月，田汉同志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还未完成，突然被捕了。聂耳得到消息，悲痛万分，他找到接替田汉工作的夏衍，激动地说："听说田汉先生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谱曲好吗？"未等夏衍回答，他又坚决地说："请交给我，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会满意的！"除了信任，夏衍还能说什么呢？

聂耳读着歌词，满腔热血地沸腾，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听到了战士的怒吼，《国际歌》的悲壮旋律震撼着他的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战鼓隆隆，号角齐鸣，"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祖国的召唤，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炎黄子孙们一往无前……。

《义通军进行曲》谱成了，他谱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谱出了祖国的尊严。

时代的强音

在中华民族的兴亡时刻，聂耳以旺盛的斗志，谱写了《大路歌》、《前进歌》、《自卫歌》……，同时还谱写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乐曲，它唤起了民众，也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

聂耳的歌曲代表了时代的强音，"征服了某种'靡靡之音'和一些封建法西斯的狂吠"。他的歌曲不容歪曲和践踏。

一天，聂耳被一个初到上海的朋友硬拉着去舞场。刚走进舞厅，就听到正在伴舞的乐曲仿佛是自己的音乐，但听起来是那么委靡不振。

他立即走到乐队面前，说："我就是聂耳！"按照音乐界习惯，乐队演奏某作曲家作品时，如果作曲家在场，应请他亲自指挥。乐队指挥立即将指挥棒奉上。

聂耳手拿指挥棒，大声向场内的人说："我是聂耳，刚才演奏的是我的歌曲，我的歌不是给你们伴舞的，他们演奏的也不是我原来的调子，现在我指挥乐队重新来一遍，让你们知道我的歌是什么音乐吧！"

说完，他抖擞精神，有力地挥起了指挥棒，乐队奏出了雄壮的曲调。

含笑在人间

一九三五年三月，党批准聂耳到国外学习，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在异国，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他把带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反复推敲，进行了细致的加工，很快定了稿，寄回祖国。在那里，他还在继续战斗……。

当年七月十七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海浪汹涌，惊涛拍岸。聂耳带着远离故国的痛苦，民族危亡的优虑来到这里，决定痛快地洗个海水澡，以消除心头的优愁。他迎着一个个海浪，象海燕一样在浪尖上扑过去，他感到了同大自然搏斗的愉快。但是，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被海浪吞没了……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同声哀悼。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生死……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监狱的田汉，听到亲密战友的死讯，悲痛已极，挥笔写下了充满感情的悼诗。

这不是田汉同志一个人的感情所在，他同样代表了全国人民对聂耳的怀念。

今天，英魂已化狂涛返，含笑在人间。

（选自《纵横》83 年 1 期，作者：何力）

宋 哲 元

宋哲元，字明轩。一级陆军上将，是冯玉祥的主要将领之一。冯玉祥部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过陕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1937 年"七·七事变"导致中日战争爆发，宋哲元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后辞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职。

1885 年 10 月 30 日，宋哲元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城西赵洪都村一个读书人家庭。其祖父宋堪性善好施，享有佳名。其父宋湘及为清末廪膳生，学识广博且多才，然而不通农事，成婚后便外出谋生了。宋哲元两三岁时，家境早已变"望族"为破落了，他和母亲住在村边一间破烂茅屋里，由于父亲捎回的钱物不多，基本上靠母亲赊购些棉花来纺线织布出售勉强维持生活，有时还得用野菜充饥。

1932 年 10 月，力主抗日的冯玉祥由山东泰安到达张家口，与共产党人合作，积极筹备"抗日同盟会"。此时适逢发表宋哲元担任察哈尔省主席。

此间宋哲元的处境相当尴尬。一方面，他内心里非常不希望冯玉祥在他的地盘中组织军队进行抗日，也明白蒋介石决不会允许冯再掌实际兵权；另一方面，由于宋哲元是冯玉祥所器重、提拔的下属，而原西北军上下级之间的封建关系又根深蒂固，宋哲元不敢公开反对、制止冯玉祥的行动。作为冯玉祥，也正是希望在旧部下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佟麟阁等人的掩护下，积蓄力量，打出抗日的旗帜。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摆脱尴尬处境，便避往北平，并顺着冯玉祥的意思，叫佟麟阁在张家口代理主席。

1933 年 5 月 26 日，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冯不理睬蒋介石汪精卫的多次劝阻威逼和以高官厚禄引诱，招集旧部和各种民众武装共八万多人进行整编训练。五、六月间，占领热河的日军开始进攻察哈尔省，抗日同盟军即行抗敌。此时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的何应钦几次派员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停止抗日行动，说是为了防止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冯玉祥对何作了严词驳斥，并挥师北进，与日伪作战，于六、七月间收复康保、宝冒、多伦等地。其间何应钦曾几度叫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的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搪塞，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他索性托病去西山休养了。见劝阻无效，蒋介石准备用武力解决抗日同盟军，调集了十六个师，八列钢甲车和二队战斗机向张家口逼来。同时，何应钦一面叫宋哲元不要过问抗日同盟军的事，一面命令驻北平附近的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部攻打张家口。何应钦还向庞炳勋许愿，如果打下张家口、赶走冯玉祥，将让其当察

哈尔省主席。正当庞炳勋兴冲冲准备一战而获得察省地盘时，"保持缄默"的宋哲元给其当头一棒。宋哲元派冯治安和秦德纯去见庞炳勋，当面警告庞，如果庞敢打张家口，第二十九军就准备帮助冯玉祥打庞。从当时实力上看，庞炳勋只有几千人，而宋部有四个师二万以上兵力。所以，庞炳勋尽管垂涎察哈尔省主席的位子，但为了身家性命还是不敢动兵。

宋哲元这样做，直接地看是怕丢失了地盘——察哈尔一丢失，第二十九军就等于失去了粮饷来源，但客观上也维护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进入8月，抗日同盟军处境险恶，加之内部动荡不和，无法再维持下去。冯玉祥也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哈尔收拾局面。宋哲元于12日抵张家口，冯玉祥14日离张。宋哲元根据冯的意见，收编部分抗日同盟军部队，使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得以保存。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于7月11日由山东乐陵返回天津。此时，日军因部队尚未调齐，以"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与中国方面谈判并达成双方撤兵、恢复和平状态的协议。宋哲元抵津后，见局势趋向和缓，情绪比较乐观。第二天，接替因病去职的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的香月清司到任，宋哲元即派张自忠去见香月摸摸底，几天后又亲自偕张会晤香月。会晤归来后，宋哲元神情轻松，说是和香月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他还发表谈话："此次芦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19日，回到北平后，宋哲元再次发表书面讲话："此次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同时，他下令将北平城内通衢各要路口所设基本防御工事和路障全部拆除，将关闭的城门全部打开，并对各地汇寄来的大批援助抗战官兵的捐献表示谢绝。事变爆发后，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经宋哲元同意的"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攻势作战"的计划，也因这种"缓和"气氛而未能实行。

宋哲元离开北平后，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各部队和保定部队陆续撤退，30日夜全部撤出，当日北平、天津完全沦陷。此次抗战，尽管二十九军中下层官兵抗日情绪较高，但由于宋哲元等人相当一段时间里抱着"乞和"思想，在国防工事、作战物资、兵力部署等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卒应战，所以宋部二万多兵力竟被当时三千日军所败。

宋哲元到保定后，郁郁寡欢，除了国内的责难舆论外，还非常担心蒋介石乘此机会加害于他。经过反复考虑，他向蒋介石发了一个试探性的电报，表示自己对平津形势负有责任，向中央请罪，同时请求由冯治安代理军长职务，自己暂时卸任稍事休息。不久蒋复电，电中非但避谈处分，相反有不少安慰话语，并希望他早日销假。接报后，宋哲元心境似乎好了一些。时隔不久，他又接到蒋介石要他安排好部队后赴南京会晤的电报，顿时又起疑心。为防不测，他派了亲信秦德纯去见蒋。没想到，蒋介石在与秦交谈中，没有丝毫指责宋的意思，反而慰勉有加，称赞宋这两年忍辱负重，应付得不错，为抗战争取了时间。最后，蒋还出乎意料地将第二十九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此举不仅消除了宋哲元的疑虑，而且使他喜出望外。据宋部将领猜测，其原因可能要追溯到上年"双十二"的"西安事变"。当时，宋哲元曾特地给张学良发过电报，请张保障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又专门派秦德纯去南京对蒋表示慰问。所以，尽管宋哲元和蒋介石有矛盾，但在关键时对蒋还算忠诚。二十九军战败失地，宋哲元不受追究反被晋升，也算是蒋的一次回报。

9月，日军主力矶谷师团又在津浦线方向上行动，南京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北上指挥对日作战。本来，宋哲元等均为冯的部下，对冯应能服从和敬重，但由于受人挑拨，中旬冯到达时，宋竟托病赴泰山休养去了，冯治安等也尽量避而不见，有的将领还故意不予配合，造成冯玉祥的被动。

在泰山，宋哲元一直通过部属的电报，密切注视自己部队的情况，但无法过多干预过问前线的作战。这段期间，宋哲元所部内部矛盾重重，外部遭受打击，节节败退，情势十分不妙。10月下旬，冯玉祥满怀愤懑离开战地，返回南京。宋哲元得到消息后，身体马上"康复"了，立即下山回到总司令部。此时总司令部已退至大名，年底又转移到新乡，宋的直属部队亦在新乡集中。

宋哲元回部队后，曾积极部署对日军出击，企图挽回局面，还很自负地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然而，时间不长，各路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力，加之大名被日军攻陷，出击计划完全落空。此后第一集团军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和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陆续被蒋介石调走，宋哲元的思想也就由"打"变为"走"，以求保存实力。1938年初，在几次与日作战中，宋哲元都是令部队稍微接触一下便撤退。秦德纯曾不理解地问宋哲元："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宋回答道："全军为上。"秦听后笑话他："孙子兵法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宋则说道："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由于他抱着这种思想，所以各部队争先恐后地向后撤。新乡本是打算好好地打打的，结果也无法有效抵抗而被日军轻取。在撤退中，宋哲元一直沉着地在部队的后面，用他的话说"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

果不是我走在后边，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为此，宋哲元几度遇险，有时他与日军竟近到双方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对方的程度。因此其时军中还传着宋哲元在大敌当前镇定自若的赞誉。

1938年二、三月间，宋部溃败，宋哲元渡过黄河，到达郑州。在郑州他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接受其辞职，遂将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宋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宋哲元住郑州不久便染上肝病，随后离职赴衡山休养。

衡山休养期间，宋哲元既无实权又无实力，心境很差。他特别操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他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尤其是韩复渠被蒋介石处决这事，对他震动更为剧烈。在韩被蒋扣押起来时，宋哲元曾到蒋的面前说过情，此时不由得他不从蒋对韩的决绝联想到自己可能的结局，故而焦虑重重。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推卸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

宋哲元先为肝病，后又患脑血栓，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后转到四川灌县，1940年初再移至绵阳，这是他二十四年前与常淑清结婚的地方。这一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逝于此地，并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其享年五十六岁。

宋哲元病故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冯玉祥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冯玉祥在亲往吊唁时，竟扶棺大恸，说：“明轩身后太萧条，他真正做到了岳武穆所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5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故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宋哲元，追赠为陆军上将叙第一级。”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秦德纯

秦德纯字绍文，山东沂水县人，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早年入济南陆军小学。后入保定军校第二期，1914年5月毕业，到驻在济南的陆军第五师见习，不久在该师补充二旅任上尉团副。1918年经人介绍到皖系参战军第一师任上尉参谋。1920年皖系垮台，秦由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派遣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1923年毕业后，经人介绍到豫东镇守使王文蔚处任上校参谋长，王属直系。1924年10月，直系首领吴佩孚于第二次直奉战中失败后辗转退据河南，调王文蔚为二十四师师长，秦德纯任该师参谋长兼骑兵团团长。12月，国民军二军岳维峻部攻入河南，吴佩孚逃走，王的二十四师被岳收编，改为国民军二军第五师，王文蔚任师长，秦德纯任参谋长，仍驻防豫东一带。

1925年11月中旬，岳维峻派兵两路攻山东奉系张宗昌，一路由其将领李纪才部由归德向鲁西进攻，一路由其收编的王文蔚、田维勤、陈文钊等旧直系部队由徐州进攻鲁南。秦德纯随王文蔚进军至泰安。

先是，10月间浙江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乘机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11月，当岳军进至泰安时，吴派其豫东讨贼军第一路司令靳云鹗到豫东，以协助岳指挥直系旧部会攻山东为名；俟靳到徐州，经其联络，王文蔚、田维勤、陈文钊相率脱离国民二军，仍回直系；王文蔚部又恢复了二十四师番号，秦任该师四十七旅旅长。时直奉联合对付国民军之势已成，靳反而与张宗昌联合，率王、田、陈三部于1926年1月突然转攻李纪才部并回军河南，驱逐岳维峻。秦德纯随王文蔚等于1926年3月进占郑州。4月，吴佩孚令二十四师北上，与奉军会攻南口国民军；秦旅驻防琉璃河。5月，吴至保定督师，升秦为二十四师师长。

10月，广东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吴令二十四师回防郑州。11月，秦调任二十七师师长。1927年1月，奉系头目张作霖趁吴佩孚新败之后，派张学良率大军南下，声称愿帮助吴收复武汉，要求进军河南。但秦认定奉军要求是“假虞灭虢”，真正目的在一举而占有河南，吞并直军，所以他力劝靳云鹗坚决拒奉。靳转与吴佩孚商议，吴同意拒奉，并将直军全部交靳指挥。3月，靳在信阳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准备与奉军作战。靳将直军各部拼凑为十几个军，任秦德纯为第四军军长。这时，张学良派人秘密与秦联系，劝秦投奉，在几经磋商后，秦表示：一旦奉军渡河南下，愿率部撤离郑州，撤往京汉路以西，不与奉军作战，俟奉军全部占据河南后，再“有以报命”。张学良对秦的这一表示，认为“这人不简单”，意在“坐观成败，看风驶船”。3月底，奉军打败靳军，占领郑州后南下，时秦部在漯河，他果然对奉军只略事抵抗，即撤至遂平、西平一带。

同年6月，冯玉祥率领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打败奉军，占据河南，时秦部无所归属，乃托人与冯玉祥联系，由冯收编为二十三军，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不久，和冯治安对调，任十四军军长，旋调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28年6月，冯系将领石敬亭、孙良诚先后掌握了山东省政府，秦任省政府委员。

1929年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到10月，宋哲元奉冯玉祥令率西北军出潼关反蒋，秦德纯任国民军副总参谋长，随宋哲元对蒋军作战，11月失败，退回陕西。次年4月，冯、阎联合反蒋，冯玉祥在潼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组织第二方面军，以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秦德纯任参谋长。10月，冯、阎失败，退入山

西的西北军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归张学良改编为二十九军。时孙良诚与宋哲元争着统带二十九军，后宋哲元赖肖振瀛、秦德纯活动之力，张学良同意委任宋为军长，同时秦被任命为二十九军总参议，肖任军法处长。从此秦、肖两人为宋出谋画策，成为宋的"智囊"。"九·一八"事变后，当张学良处境困难时，秦示意宋向张学良表示拥戴到底，因此1932年秋，张以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春，张学良终于被迫下野，蒋介石将北平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亲日派何应钦、黄郛主持，秦德纯兼任军分会委员。1935年6月初，发生所谓"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同日军代表土肥原谈判，于6月25日订立了屈辱投降的所谓"秦土协定"。"协定"订立后，秦恐受到舆论责骂，向外界透露说"这是何应钦同意的，应该叫'何、土协定'。"在这一事件发生期间，何应钦恐事态扩大，密报蒋介石，将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解除，而以秦德纯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准备将二十九军南调，宋被免职后，甚不满，秦遂未就察主席职。

同年7月何应钦于订立了"何梅协定"后，借口回南京"述职"一去不返。政客肖振瀛利用平津空虚的形势，乘机活动，为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谋取冀察地盘。时日本土肥原等正暗中策动"华北自治"，肖振瀛向日方说明，宋哲元愿率二十九军与日本"亲善合作"。他借日军驻华北势力要挟南京政府，公开提出"拥宋驱黄(郛)"，二十九军不能调走。秦对肖的这一活动，出谋划策，积极支持，肖在前台，秦居幕后，通力合作。南京政府为安抚宋哲元，先后任宋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11月，土肥原及日本华北驻屯军促使宋哲元进一步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图谋中国愈急。秦为宋策划，主张取得华北政权，须"名正言顺"，"避免带上汉奸头衔"，最好办法是逼使何应钦荐宋以自代。因为当时北平军分会虽已形同虚设，但何尚担任委员长名义。秦以军分会委员名义电何应钦，故意促其"北来主持大计"。蒋介石被迫派何应钦等于月底北上处理华北问题。何在秦、肖鼓动及日军威胁下，报请蒋介石核准，于12月初宣布成立了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常务委员兼天津市长。当时北平学生为反对冀察政权特殊化和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掀起了有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运动，秦德纯对示威群众采取了驱散、逮捕等镇压措施。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对日本勾搭事项上，多由肖振瀛出面，对南京政府的联系上，多由秦德纯负责，秦与肖互为表里。西安事变后，1937年春，宋哲元派秦密赴南京，摸蒋介石今后对日政策的底。秦向蒋表示，愿照蒋的意旨，"应付华北危局"，蒋当面嘉奖了秦，并嘱秦与宋"忍辱负重"，秦因知蒋介石对日政策未变。因此于返平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对日军的陆续向华北增兵，无所戒备，幻想冀察局面仍可苟安一时，等到芦沟桥炮声响起，秦看到全国人民和二十九军士兵的抗日情绪高涨，虽有主战表示，但实际仍摇摆不定。到7月26日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任秦为北平城防总指挥，秦才作防守部署。在平郊只抵抗了一天，到28日，宋哲元即委张自忠自代，偕秦德纯退往保定。宋哲元深怕蒋介石把放弃平津的罪责，加在他一人身上，派秦德纯到南京见蒋，经秦活动，蒋介石不但未予"追究"，反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宋哲元为总司令，秦为总参议。

1938年3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蒋介石撤销，秦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不久，又改任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1944年，任兵役部政务次长。当时，国统区走私之风盛行，秦派他的兵役上校部附张任之往来香港等地，秘密贩卖药品及日用百货，并与肖振瀛合伙大搞走私活动，牟取暴利。1945年调任军令部次长。1946年改任国防部次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全国青年学生不断掀起反蒋浪潮。1948年，北平爆发了反迫害、反饥饿的"七·五"运动，蒋介石派秦于8月上旬往北平以"调查"为名，策动对进步青年的镇压。从8月22日起，北平、天津两地军警逮捕了大批学生入狱。

是年12月，济南已解放，蒋介石令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1949年2月，秦先在上海圆明园路设立山东省政府临时办公处，3月中旬，到青岛就职。到任仅八天，南京解放，秦飞逃广州，复任国防部次长。8月，逃往台湾。1963年9月病死于台北。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何应钦

何应钦，一级陆军上将，是国民党军、政界的首要人物。在黄埔系当中，有蒋、何并称，"位极人臣"的地位。历任战区司令长官、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省主席和行政院长等要职。在高层决策谋划中尝有"干才"之誉。曾获美国总统罗斯福、英皇乔治六世，以及法国与墨西哥等政府授予的各式勋章。九十八岁谢世时，台湾国民党当局谓之为"英特之才，文韬武略的一生"。

何应钦，字敬之，1889年4月2日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荡村。祖籍江西临川。父其敏，业商，母史氏。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

何应钦七岁入乡塾，十岁就读于本乡初等小学，十三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十七岁那年，他以考选第一名，保送入省会贵阳陆军小学。1909年春，获保送入武昌陆军第

三中学，同期有谷正伦等人。是年秋，陆军部尚书铁良考选留日学生二十人。他与谷正伦一同被录取，东渡日本，进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武昌革命军兴，他与振武同学返国参加辛亥之役，任沪军都督府（都督陈英士）训练科一等科员，旋奉派任江苏陆军第七师第一旅第三团连长，后升营长。第二年，返日本继续学业。先入振武学校，继到日光宇都宫陆军步兵第五十九联队实习。1913年秋，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科。1915年，学成回国，经沪返黔。是时，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成立黔军第一师，广觅军事人才。何应钦一到贵阳，便被王任为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并负责筹办贵阳贵州讲武学校和组织新军训练。1916年4月30日与贵州督军刘显世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化昆仲胞妹文湘婚于贵州。婚后生一女，名丽珠。是年7月，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

11月，王文华率黔军入川讨伐刘存厚，何应钦任黔军第五团团长，率部出黔讨伐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12月，大败吴军于黄角桠，迫使吴光新退出重庆。翌年，他仿照意大利建国英雄马志尼"少年意大利"之组织，创设"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成为国民党在贵州之外围组织，并很快在全省八十一县成立分支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贵州日报》。这一切，为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与刘显世领导之旧派——进步系对立，夺取贵州政权，奠定了良好基础。故深得王的信赖。

讨伐刘存厚战役后，王文华扩编黔军为五个混成旅。何应钦任第五混成旅旅长，率部驻防湘黔边界。同时，他还向王文华推荐自己的士官同学朱绍良为王的参谋长，张春圃、谷正伦分别为第三第四混成旅旅长。因此，在贵州取得相当的地位，露了头角。

1920年，王文华为避免指挥部下推翻自己母舅刘显世的嫌疑，在上海暂住期间被刺客所杀。王死后，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妻兄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谋夺省政，兵发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被迫交出兵权，自率一连前往昆明，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

1921年，何应钦到上海搞复黔运动无成就，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也不够过长期的寓公生活，乃不得不为其前途打算。当时，他想去粤，但眼看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少有希望；想去北平活动，又苦无机缘。1924年，孙中山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正在彷徨歧路间的何应钦，喜逢机缘。他认为自己与蒋虽无深交，但同是士官同学，又曾在上海"沪军都督府"陈英士的部下共过事，总有一面之交。于是，他托士官同学王柏龄介绍至穗谒蒋。同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协助筹建军校，考选下级干部，并予以短期训练，以担负训练学生之责。由于训干成绩出色，6月即被任命为少将总教官、开学典礼阅兵指挥员。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虽是蒋介石倚为心膂股肱，但王成天去广州狂嫖滥赌，抽鸦片，不务正业，每每有事找不着，而何应钦则相反，思想右倾，工作谨慎，且无不良嗜好，无论在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内一找必到。这样，蒋便渐加信任，把付托王柏龄的任务往往交给他。何应钦受了这样的优遇，内心大为感激，带着属下的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干得越来越出色，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于是蒋、何的关系，也就愈来愈密切了。9月，受命筹备成立军校教导团。10月，率黄埔师生参与敉平商团之乱；同月任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主任李济深）。这年底，蒋介石建立黄埔党军，将第一期毕业学生编成两教导团，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

何应钦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得任蒋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北伐。他指挥第一、第十八等七个军，浩浩荡荡地由镇江北渡长江，占领扬州，沿运河向宝应、淮阴压迫孙传芳部。孙部节节后退，何部直趋陇海线，连克涟水、海州、莒县等地，于6月2日攻占徐州。但这时蒋介石为对付汪、唐声言的东征，把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白崇禧代理的第二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全部撤回江南，从而使江北一带，复归孙传芳、张宗昌等部占领。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军、政大权，以军委会名义通令各军："此次蒋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挽留，在蒋总司令未回任以前，一切军政军令即由本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委员会统一指挥，应努力革命工作，胜利终属吾党，此后无论何部调遣，悉听本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移动"；同时，还下达一道防守命令："南侵之敌人，孙传芳所部之先头部队，于津浦路方面已到浦口，于运河方面已逾宝应。西侵之敌为张宗昌之部队，与国民革命军鹿种麟之步兵及郑大章之骑兵在锡山、钜野等处接触。我军为得时间之余裕，以便联合革命军全体势力及西北军、北方军一致出师，大举北伐起见，拟暂利用长江天堑扼要防守。"并调整了第一、二、三路军的防御部署。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担任乌龙山以东长江下游一带之防务，总指挥部驻南京中正街侯府。这时孙传芳趁宁汉内争未息，战备未周之机，集中主力由运河两岸向镇江、南京压迫。何应钦闻讯后，即刻约李宗仁至侯府商定对策。他们都认为，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首都，万万不能放弃，决定共同御敌，誓守南京。

8月26日，孙传芳的部队渡江反攻南京。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留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又恰好当着敌人的正面，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势难支持，溃兵到了麒麟门，何应钦只得自率不满三百人的特务营，亲

临前线。从前方溃败下来的官兵，见何来到，不约而同地说："总指挥来了！怕什么？冲回去！"一声喊，立刻向敌人反攻过去，占领白虎山，夺回东阳镇，居然把已不可收拾的局面挽回过来。这时，到上海筹款的白崇禧回到无锡车站，就地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第十四军，恰巧与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形成腹背夹攻，密切协同，与孙部血战七昼夜，全歼孙军五万余人，缴械四万余支。何、白两人相见时都不胜欢喜，都认为龙潭战役的胜利在军事上、政治上十分重要。胜利了，才能西征消灭唐生智的力量，才能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并威胁奉军，促使阎锡山加入革命军行列。如果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而且友军离叛，革命军能否再回广东重整旗鼓，便是一大问题。所以，他们都说："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龙潭战役胜利后，何应钦获得"捍卫党国"奖旗一面。他以此为荣，每谈到龙潭战役的胜利，自认为是他一生中指挥若干战役中最得意的战役之一；是他与白崇禧在精神上协同的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何应钦接受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以后，更进一步企图吞并华北五省。于是，在1935年5月又发动了新的进攻。何应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始终追随蒋介石对日妥协路线。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刘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6月初，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9日，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限3日内答复。10日，国民党中央批准了何应钦同梅津美治郎达成的秘密协定，即中国现代史上卖国协定之一的《何梅协定》。协定规定：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

何应钦对日寇的无理要求和野蛮行动，不以为耻，反作为签订协定的辩解词。他在签订协定前就对政训处长曾扩情说："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隐忍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还诬蔑共产党，说是"中国招来这样严重的外患，都是由于共产党的武装暴乱，破坏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除了消灭共产党，完成国家统一后，是无法集中一切力量来反对日本的。所以不得不委屈求全，与日本人签订协定，求得暂安。这不是我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得到了委员长（蒋介石）的许可，黄委员长（黄郛）的赞同的。"

《何梅协定》签订后，他为了实现协定的条款，多次催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辞职离开天津。

后见逼于学忠辞职不行，就又想出一招，要于将省府迁往保定。他约于到北平开会。在会上对于说："天津本系一商埠，省府在那儿有诸多不便，最好迁至保定。"就这样，他以中央的命令形式，迫于将省会迁至了保定。不久，命于率五十一军开赴西安，终于免了于的省主席职。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孔祥熙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祖籍山西太谷县程家庄。孔家自祖父起就开设钱庄票号，从事银行商业事务，人称山西首富。孔祥熙青年时，经常出入于上层社会。1901年，作为李鸿章的随员去美国谈判庚子赔款，不同一般的才华和精明干练的作风，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后由清廷派到美国官费留学，先获文学学士学位，继而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返山西创办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任太原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1905年初次见到孙中山，开始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武昌起义后山西独立，孔当上太谷县民政局长兼新军统制，并被新上台的省督阎锡山聘为经济顾问。1913年元配夫人去世后，和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结婚。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孔作为随员陪同前往。孙中山逝世后，他任治丧处主任。丧礼结束后前往美国。

1926年，孔祥熙由欧洲回国，抵达广州，任广东国民政府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升任实业部长。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武汉对立，孔当即东下至南京出任工商部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积极支持蒋复职。1928年4月孔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翌年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在第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连任中执委委员。1930年改任实业部长。1931年底广州非常会议事件结束，在政府改组中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外交委员会委员。翌年"一·二八抗战"后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去欧美活动，洽谈借款，购买军火。回国后一再呼吁筹建中央航空学校，竭力于空军的组建和扩充。1933年4月继宋子文后任中央银行总裁，10月，再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任职期间，联合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内一批实权人物，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操纵军费、增加赋税、包办公债独占利润、充当买办获取佣金、建立银行垄断金融、霸占市场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等手段，进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积累了数目巨大的私财。在财政部长任内，曾主持实施银币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法币制度的

实施。1937年5月，他作为特使赴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

抗日战争开始，孔一度兼任行政院长。1939年10月为统一国家财政，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名誉理事长身分出任"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主席，孔任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孔竟激流勇退辞职退出政坛。

1947年，孔祥熙眼见国民党内战成功无望，远走美国，在旧金山过起寓公生活，并以"中国银行董事"的头衔，继续活动于上层社会。50年代起，又到香港办报、做生意。1956年其妻宋霭龄回访台湾。1962年10月23日，由二女儿令俊陪同自己由美到台为蒋介石祝寿。11月下旬，进荣民总医院治疗白内障。在台湾住了一年多后又去美国治病。孔祥熙年老体衰之际，颇想念已离开多年的大陆和家乡，在病榻上曾多次表示："我是中国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但其夙愿未能实现。1967年8月16日，孔病逝于美国纽约医院，蒋介石写了《庸之先生事略》以示悼念。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珍闻轶事

瞿秋白轶事

剪辫子

瞿秋白从小喜爱读书，五六岁时就能背诵一些唐宋诗词。11岁那年，他考上常州府立中学堂预科。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员，常给学生讲革命的道理。在屠元博的影响下，他开始思索国家的命运，懂得穷人所以受苦是因为清朝的封建统治。有一天，他在学校操场上，指着自己的辫子，一本正经地对同学张太雷说："这尾巴似的东西，非把它剪掉不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他高兴极了，奔到家里，翻出剪刀，"咔嚓"一声，剪下了辫子。接着，他高擎着辫子跳着、喊着："皇帝打倒了！辫子剪了！"妈妈、弟弟、妹妹和四邻惊喜地看着这一小男孩。瞿秋白心中充满了喜悦，以为祖国已经有救了！

白灯笼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也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氏所窃取，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开始了。瞿秋白又失望了。

是年10月10日那天，常州全城正在庆祝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国庆双十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唯独城东南青果巷里瞿氏宗祠门前挂的却是一盏与众不同的白灯笼。仔细一看，灯笼上还有"国丧"二字，真是大煞风景。这是要冒被官府捉拿的风险的，真够大胆！谁干的？瞿秋白。

对于这件事，瞿秋白的大妹轶群曾在《怀念哥哥秋白》一文中这样叙述过："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去挂；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挂在门外，直到天明。"

"少年老成"

瞿秋白的家境越来越困难。母亲支撑着全家八九口人的生活，实在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生的地步，他不得不中断只有半年就毕业的中学学习生活，跑到无锡乡下当小学教员，以给母亲持家增添一点生活费。不料，刚到无锡不久，1916年2月7日，就接到母亲自杀的电报。

那时，家家户户正在准备欢度春节，他母亲眼望自家灶冷甑尘，吃尽卖光，债主逼门，实在没有生路，便吞下火柴自尽了。国事家事，全都是血和泪！又促使他去思考社会问题。一天，他对朋友杨牧之说："母亲自杀后，我悟出了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这一年夏天，他离开故乡，溯扬子江西上武汉，去投奔堂兄瞿纯白，考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来又随纯白一家搬到北京，考入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管辖的俄文专修馆，除正课学习俄语外，还自学英语和法语，积极研究哲学，过着一天工作11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

他的好友郑振铎曾说："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地山在入大学之前，还曾'饱经世故'，到过南洋，做过教师。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这位

“老大哥”到北京碰上两件造就英雄的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瞿秋白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从此，包括他在内的无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报国有门”了。

“东方稚儿”在苏俄

1920年秋天，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聘请瞿秋白以及俞颂华、李宗武3人以记者和特派员的身份去苏俄采访、考察、研究十月革命后这块神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同年10月16日从北京出发，于1921年1月25日辗转到达莫斯科。他高兴极了，欣喜地欢呼：“东方稚儿已到了俄乡了！”“俄乡！俄乡！你还是磨炼的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着罢。”当时他才22岁，身体很坏，不久便证明由于肺病已使半叶肺糜烂。然而，他却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热烈地学习、研究和工作着。

他以记者的身份访问苏共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多种集会，与俄国人交朋友以了解新生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向《晨报》发出一篇又一篇的报道。从是年9月起，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执教俄文，并担任教政治理论课程的俄国教授的翻译。当时中国派去第一批学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他热情认真的讲授和丰富的学识。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瞿秋白来说，莫斯科之行的高潮是见到列宁。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出席会议。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参加会议。7月6日，他记录了和列宁见面的事：“列宁出席会议发言三四次，德法语言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教授的态度，而是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最使他兴奋的是：会议休息时，在长廊中与列宁“相遇略谈几句”，列宁还向这个东方稚儿介绍了要阅读的几篇东方问题的资料。他对这次会见异常激动，他说“在政治生活中，莫斯科这次与列宁会见，才第一次给我以深切的感想”。

1922年2月，瞿秋白经张太雷和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远东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问题，也在会上再次见到了列宁。这次会议有陈独秀等从国内前往参加，瞿秋白还为陈独秀当翻译。会后，陈独秀建议他回国参加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了。

翻译《国际歌》

1923年初，瞿秋白回到了祖国，担任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工作，同时着手翻译《国际歌》。

那时，他住在北京黄化门西妞妞房他叔叔家里，住的是一个跨院，有两间小房。他在外间靠门壁前，放了一台风琴，着手译起《国际歌》来。他拿着歌曲的原文，仔细斟酌，每译好一句，就在风琴上自弹自唱。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弹唱，直到觉得恰当地配上了乐谱，才定下一句。他译着、唱着，译到“国际”一词时，站了起来。这个词，在汉语中只有两个字，而外文却是很长一串音节。如果照译，将成为“国际——，就一定要实现”，那是很难唱的。他在小屋里来回走动，不时在哼着、想着，在莫斯科时，多次高唱《国际歌》的情景，浮现在眼前。那些向往社会主义而来到苏俄的各国无产者激动歌唱的声音，解放了的苏俄人民幸福欢歌的声音，他自己为求真理而慷慨高歌的声音，汇集成气势磅礴、能够战胜一切的旋律，又回荡在他的耳际。他忽然停下脚步，若有所悟地回到琴边，手指按在琴键上，有力地重弹起那一段曲子。随着琴声清晰节奏，他用不很高的、却十分庄严的声音唱出了：“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歌词和曲子是那样和谐地融合成一体！他终于用音译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后来，他告诉朋友曹靖华说：“‘国际’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就这样，瞿秋白终于完善地译好了《国际歌》的全文，情不自禁地高声唱了起来。歌声在召唤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勇批陈独秀

1927年1月，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农村进行实际考察，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神的威风，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赞同。湖南省委先后请毛泽东在省委和干部会上作报告，并在省委刊物《战士》上分三次全部连载。可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却只发表了一部分，其余被陈独秀、彭述之砍掉，不许刊登。瞿秋白对此气愤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当即为《报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号召每一个革命者都要读一读这本书，并让赶快排印出来，由长江书店发行，广为传播，使《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年2月，他又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

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的小册子，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在4月党的“五大”上，他把小册子散发给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恽代英同志拿了这个文件，连连说：“这个标题写的尖锐！”而彭述之则拍拍文件说：“这是见了鬼了！”原来，小册子指名批的正是彭述之，而实际批的却是陈独秀，因为谁都知道，这两个人观点一致，穿着连裆裤。当时，陈独秀在党内大搞家长制，批评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足够的理论准备的。瞿秋白坚定地表示：“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就要抛弃我们了。”

自我解剖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终于解放了上海。可是，没有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世炎等许多同志牺牲了。一天晚饭后，瞿秋白同志沉痛地对人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过分的激动引起了肺部的隐痛，他用手抚摸几下胸膛，又以低沉的声音继续说：“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到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干不好革命。”

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瞿秋白负责中央工作，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之余，还时常责备自己“对一些问题，没有预见性”。这一年11月，党中央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他曾说：“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太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负责党中央工作后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各地纷纷组织暴动。1927年底浙江奉化也举行了农民暴动，结果遭到失败。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同志牺牲了，另一个领导人沙文汉同志1929年到了莫斯科，去看瞿秋白，讲了奉化暴动情况，瞿秋白听后诚恳而痛心地说：“这是典型的盲动主义，是错误的，我要负责。”

“听中央的分配”

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的支持下，硬给瞿秋白同志加上包庇李立三的罪名，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散会时，有的同志问瞿秋白今后怎么办？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听中央的分配。”

这一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7月间，中央决定瞿秋白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当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后，这位曾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名政治家当即表示：“党中央决定我去河北，我坚决服从。只要革命需要，去哪里、干什么，我都诚恳接受。”后来，有的同志考虑到他在平津的熟人较多，不利于他和组织的安全，向组织上请示另派他人，他才未能成行。

1931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上海，和鲁迅先生亲密合作，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1934年1月，他又服从革命的需要，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岗位，告别了他的亲密战友鲁迅，到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为苏区的文教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长征前夕，瞿秋白以为自己也会和大家一样参加长征的，他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但是，组织上却决定他留下来，在后方隐蔽工作。他长期患病，身边又无人照料，留下来的困难是极大的。因伤而留在医院里的陈毅同志看不过去了，亲自将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他，劝他赶紧去追上部队，随红军主力一起走。但他谢绝说：“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几句话，陈毅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

“亲密的人”

1931年，瞿秋白同志到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结识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两人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鲁迅送给他这么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在鲁迅的一封信中则这么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大约在1931年《毁灭》译本出版后的几个月，瞿秋白和鲁迅首次见面，以后两人秘密来往。1932年9月以后，他有好几次面临极危险的境地，不得不暂时避居在鲁迅家里。后来，鲁迅又给他夫妇俩租了一个亭子间，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由于两家住所只隔一条马路，使得他们的交往比较方便，常常推心置腹地作竟夜长谈。

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先后写了《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等许多杂文，用的是鲁迅的笔名，由许广平抄写后投给《申报》“自由谈”发表。鲁迅先生后来把这些杂文编进了自己的杂文集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真正的作者，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的写作谁也不是为了个人，只是为了同敌人斗争。

1933年4月间，瞿秋白编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序言。写序言时，他为了避免房东的注意，一连三

天，熬着汤药，假装生病，躺在床上看完了鲁迅的杂文，到第四天晚上才起来动笔写。鲁迅看了序言十分高兴，对瞿秋白对他的评价和批评表示由衷的感激。

1933年12月底，瞿秋白要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在动身的前两天，他去和鲁迅告别，两人一直谈到深夜。鲁迅夫妇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把床让给瞿秋白。

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后，曾给鲁迅写信。鲁迅积极准备营救，可惜时间太短，瞿秋白被敌人杀害了。他牺牲后，鲁迅极其沉痛地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为纪念他，鲁迅拖着重病的身子，把瞿秋白的遗文编辑成两大本，题为《海上述林》，亲自抄稿子，亲自校对，亲自联系出版和发行。为了对付白色恐怖，《海上述林》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寄托了鲁迅的全部哀思。书印得十分讲究，是用重磅道林纸精印，精装本是麻面皮背，平装本是用天鹅绒做的书面。鲁迅曾欣慰地说："中国书没有象这样讲究的出过。"鲁迅在逝世前两天，还把《海上述林》分寄给有关的朋友。

两个包袱

1932年农历11月的一个深秋，陈云同志奉党组织的派遣，去鲁迅先生家中接瞿秋白转移住地。当时，瞿秋白一切已经准备好了，共有两个小包袱，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他夫人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夫妇俩换洗的衣服。陈云问："还有别的东西吗？"瞿秋白答道："没有了。"陈云又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瞿秋白回答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犬耕"的署名

1933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一次他给鲁迅和茅盾写的信中署名"犬耕"。鲁迅和茅盾不解其意，他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他进而还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后来，茅盾回忆说："他这番自知之明、自我解剖的话，使我肃然起敬。"

（选自《党史文汇》91年10期，作者：马一夫）

彝海结盟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放弃对会理之敌的围攻，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17日攻占德昌。19日，主力进抵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

这时，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不但有天险大渡河，而且要经过冕宁以北在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成见。蒋介石则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围歼我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声称要使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为粉碎蒋介石的图谋，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要求各军团以极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部；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面。

我军进入彝民聚居区后，为取得彝族人民的支持，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并争取了老伍家族中立，对受敌人利用同我对立的罗洪家族耐心说明我党的政策，使彝族群众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我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并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选自《党史博采》）

《八一宣言》的印刷、发行人

我党印刷界前辈林德光先生，早年在法国参加过国际工运斗争，参与筹办过《救国报》、《救国时报》当年在巴黎曾亲手排版、印制、发行过《八一宣言》。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社、延安中共中央秘书处印刷所、东北日报社等部门从事新闻、出版、印刷工作。

林德光生于1907年1月，浙江青田县人。1927年底，他离家到意大利谋生。1930年辗转来到法国，先后在巴黎、郎丁、地雄果等地做工。在法国，他认识了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何以端。何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水泥厂担任中国工人的翻译兼记工员。何经常给林德光讲革命道理，并给林一些进步书刊阅读，使林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何以端介绍林先后参加了党的外国组织——抗日救国会、红色救济会、反帝大同盟。林德光在对华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经受了一次次斗争的考验。1933年3月，经何以端、周竹安的介绍，林德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党的小组长、支部委

员。

1933年底，法国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林德光时任亚德驿人造丝厂外国（有七八个国家）工人罢工领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组织领导这个厂的中国工人（占全厂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参加大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月，取得了胜利。

《救国时报》是1935年底《救国报》被封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刊的旨在国内外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的机关报。

1935年7月，吴玉章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去巴黎扩大《救国报》的印刷、发行工作，以加强反法西斯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吴玉章11月份到达巴黎，经何以端介绍，林德光见到了吴玉章。吴说，我党决定在法国办报纸，他是来搞印刷厂的，办报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出版抗日救国报，寄回国内给爱国人士，国民党内进步人士与爱国军官，以及其他国家华侨阅读。吴玉章要林德光到印刷厂工作，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受吴玉章委托，林德光开始筹建印刷厂，买了一套房子、铜模、铸字机，以及5号、4号等4种字，又找木匠做了字架子，组织了排版组。林德光负责排版、制版、铸字、印刷、发行等业务工作。《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先后参加编辑部领导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他们先在莫斯科组稿、编辑、航寄巴黎后印刷。林德光等只负责排版，版排好后，送到附近不远的一家法国印刷厂去印，印好后，取回发行。

林德光等大部分同志都没有搞过拣字、排版工作，开始时，由莫斯科来的两个中国同志教他们。大家起早贪黑地练，很快就掌握了拣字，排版等技术。大部分同志不仅要拣字、排版、改样，还要做包装发行工作。发行方式采取隐蔽方法，外面是法国报纸或杂志，里边是《救国报》，以避免海关检查。《救国报》最先登载了由林德光等亲手排版、印刷、发行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报纸强调抗日救国运动“应不问平昔的政见、不问阶级”，“只问抗日与否”，“反日者便是我们的朋友”；要“使学生和工人、商人、农人及一切文化人大家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宣传我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八一宣言》的发表，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救国报》在巴黎出版了两个多月，影响逐渐扩大，法国政府出于政治和外交上原因，在南京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底封闭了《救国报》。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几经交涉，把《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经请示上级同意，使这家报纸一期未停地继续出版了。该报初期每周出一期，自第五期起，改为五天出一期，两开四版，辟有“社论”、“要讯”、“祖国消息”、“侨胞生活”、“国际消息”、“读者通讯”等栏目，遇大事、重大纪念日还出《特刊》或《专号》。《救国时报》一创刊就登载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的宣言》（阐述了《八一宣言》），发表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评论和《怎样建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读“八一宣言”之后》，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极力促成国共合作的形成，共同抗战。

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救国时报》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在国内外的读者越来越多。当时，党的许多负责人非常关心和支持该报，亲自撰写稿件。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邓小平、吴玉章、邓颖超等都给报纸写文章，张闻天、任弼时两人的文章登得最多。很多党外民主人士热烈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陶行知、杨虎城曾经到《救国时报》参观过，还给全体工作人员作了国内抗日运动政治形势的报告。

《救国时报》的发行工作进展得相当迅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销行量超过2万份，在欧洲、美洲、亚洲等43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订户。在国内、沪、宁、平、津、太原、西安、两广、东北、新疆各地拥有万余读者。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纸，常常要传给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看，直到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的发行人兼主编先后有3人，吴玉章领导办报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由吴克坚协助吴玉章领导印刷厂。1936年底，吴玉章奉调去莫斯科，《救国时报》由吴克坚领导，1938年初，又由饶漱石领导。《救国时报》有个特别领导小组，林德光是小组长，金映光是行政小组长，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张吾真、朱世伦、郝启文、陈达帮、曹若铭等，搞印刷出版的共有13人，都用法国名，还有两个法国人。

当年，由于党的经费困难，《救国时报》的经费也很紧张，全靠全体工作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海内外读者募捐支持，该报才得以继续出版。经费最困难时，大家就把平时留下晾干的锅巴拿出来吃。有时有了买米的钱，就没有买菜的钱，只好买点酱油做汤喝。生活虽苦，但大家还是很愉快，没有怨言，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吃苦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

1938年2月，《救国时报》终因收入菲薄，债台高筑，被迫停刊。饶漱石动员大家到美国去，继续办《救国时报》，后由于美国领事馆不同意，《救国时报》的全体工作人员怀着抗日的热情，返回了祖国。

（选自《纵横》94年4期，作者：杨乃坤）

一个跟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

如果有人问，第一个向国外客观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是谁，谁都知道是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然而，几乎不为人知的是，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曾跟随红军长征的一位外国传教士从另一侧面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生活，这就是本文的主人翁——薄复礼。

传教生涯

1897年，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婴，这就是薄复礼。

基督教在当时的英国影响很大，薄复礼从小便受到基督教义的熏陶，他十几岁起便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1919年，22岁的薄复礼向一个教会组织"中国内地会"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去工作。他首先在伦敦进行了两年整的传教工作培训，然后到中国的传教士专门培训学校学习了几个月，1923年春，薄复礼被教会派往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第2大城遵义的教堂任教士，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贵州是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在遵义，薄复礼和其他传教士们一起，虔诚地向人们灌输基督教义。1925年，贵州发生了大饥荒，传教士们全身心地投入了救护灾民的工作，饥荒之后是伤寒病流行，薄复礼本人不幸也染上了伤寒，50多天后，他幸而脱离危险。经过这一次救济灾民的活动，薄复礼深深地体验到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这也增添了他为基督教义献身，普救苦难人们的信念。

到贵州后，薄复礼认识了同是瑞士籍的姑娘露茜·比吉亚特小姐。这位比他大3岁的姑娘在贵州黔东南的镇远教会工作，他向露茜求婚，露茜经过两个星期的考虑后，表示要先征得自己家人的同意。于是，薄复礼孤身一人，前往瑞士，亲自征得露茜父母的同意。1931年，他俩在贵阳的一座教堂中举行了中西合璧的隆重婚礼，中外基督徒共庆一堂，并用中国的花轿抬送露茜。婚后，薄复礼从遵义教会调到镇远教会工作。共同的信仰和爱好，使得他们心心相印，夫妻二人更加起劲地宣传教义。他们帮助当地居民戒掉鸦片烟瘾，教导人们不说谎话，谦恭、虔诚待人。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夫妇到贵州黔西参加完一个宗教活动反返回镇远的途中，在黄平县旧州镇城外，与一支长途转战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不期而遇，成为红军的俘虏，开始了他在红军中18个月的生活，也开始了一个延续至今天的传奇故事。

初遇红军

1934年8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实行大转移。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8军和红16军组成6军团，以任弼时为中央代表，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全军团共12000余人，举行西征，力图与贺龙的红3军会合。进军旧州途中，红6军团发现了薄复礼一行人，因情况不明，遂将其扣留。第2天，红6军团攻入旧州，又扣留了海曼牧师一家。因查明了身份，红军便释放了其他人，仍扣留了薄复礼和海曼牧师两人。

红军之所以扣留薄复礼和海曼，主要原因是将其作为人质，期望获得药品和经费。肖克将军50余年后回忆道："我们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员日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于是，薄复礼和海曼便跟随红6军团，开始了艰苦的转战生活。

红6军团攻占旧州后，在教堂中发现了一张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地图，肖克将军如获至宝。在这之前，红6军团在贵州征战，仅靠中学课本上的贵州地图指挥作战，极为不便。肖克将军忙叫人把薄复礼请来，让他将地图上的法文地名译为中文。薄复礼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肖克将军派人来叫我去他那里。一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尔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件事，肖克将军在1980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撰文专门回忆，并表明这件事对红6军团行军作战十分重要。

难忘生活

薄复礼和海曼一直跟随红军作战行军，与红军朝夕相处，使薄复礼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红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夜行军，给薄复礼留下了深刻印象。"行军中唯一的乐事就是观看红军的旗子。旗子是红底中间镶有一颗星星，还有代表劳动阶级的锤子和镰刀。军旗只在特殊场合展开，迎风飘扬一阵、平时都是收卷着的，并且装成一个用油画布改制的袋子中。油画布上残留着宗教画面。牧羊人、羊群还有耶路撒冷的伯利恒的星星，依稀可见。"

薄复礼记录了大量红军的生活，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第一手的宝贵史料。红军的作战、红军的会议、攻城夺地、

打土豪等，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都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来向薄复礼借他戴的一顶旧毡帽，化装成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和另一位扮演蒋介石的战士同台演出，一位刚入伍的新战士忘记了是在演戏，竟拿起枪向台上瞄准，旁边的红军战士连忙将他拉开，把枪口推向空中，薄复礼感叹不已。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红军、对共产主义并不持理解、支持态度，但红军战士那种清苦的生活、严格的纪律，又给他带来了一种与基督教义有几分近似的敬慕。他发现，红军中所有的游戏及活动都没有赌博现象，红军不允许抽鸦片烟，新入伍的有鸦片烟瘾的新战士被集中起来戒烟，效果良好。参加红军的新战士都是因为没饭吃而志愿入伍的，红军中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活动极为重要，这使他对红军产生了好感。

1935 年 11 月，红、6 军团 20000 余人在贺龙、任弼时和肖克率领下，由湖南桑植出发，经湖南中部折转进入贵州，开始长征。长征中，薄复礼与红军的关系已有了改善，他参加红军的娱乐，与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师长张振汉将军交谈，这些都被他收回忆录中，成为珍贵的史料。他不知的是，张振汉将军后来一直跟随红 2、6 军团长征至陕北，抗战爆发后又被我方释放。

薄复礼被扣后，贵州、湖南军地的教会组织多方与红军联系，要求释放薄复礼和海曼。但是，红军作战行军过于频繁，加上双方的条件一时难以统一，以至于薄复礼长期被迫跟随红军转战。不久，海曼被红军释放，而薄复礼则继续跟随红军长征。

长期的接触，使薄复礼与红军两者之间的互相了解不断加深。红军从开始把薄复礼一类传教士当作帝国主义分子，到中国来无非是搞文化侵略的，因而将其当作人质对待。后来，由于政策水平的提高，对统一战线认识亦进一步提高，红军对薄复礼的态度随之改变，双方一起聚餐、娱乐、交谈，肖克将军亦常与之谈话。

1936 年 2 月，红 2、6 军团攻占贵州西部重镇毕节，转进云南，这时，红军决定释放薄复礼。临行前，肖克将军专门宴请了薄复礼，并请周素园先生和张振汉将军作陪，宴毕，红军赠送薄复礼 10 块大洋作为路资。

薄复礼获释后即返回英国，再至瑞士、美国、日本等国，他到处宣传红军，在各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在红军中的回忆录也得以出版。随着这位瑞士籍传教士在红军中 18 个月动荡生活的结束，一切又恢复了往日面目。

老年异彩

薄复礼又回复到他往日的那种平淡而宁静的生活中，1940 年，他和夫人露茜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贵州。薄复礼被任命为贵州省盘县教会的负责人，直至 1951 年，才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一同离开中国。

薄复礼夫妇离开中国后，来到了老挝巴色小镇，又开始了传教生涯。巴色众多的华侨在精神上给了他们无限的宽慰，但他的心仍在中国。1956 年，在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们收到了贵阳教堂里的中国基督徒寄来的礼品，这使薄复礼夫妇老泪纵横。

1965 年，露茜因病去世，薄复礼将老伴葬在巴色，这时，他已经 68 岁了。第 2 年，退休回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

一个普遍的传教士生活已经结束。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位普通的外国传教士，竟会在许多年之后，会重新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中外友谊的旋律。

1984 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先生来华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他写信给肖克将军，询问有关一位当年为红军翻译地图的外国传教士的情况，肖克将军立即想到是薄复礼。他马信告索尔兹伯里先生，向他介绍了有关薄复礼当年的情况，并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设法打听薄复礼是否还在人世。索尔兹伯里回国后，找到并给肖克将军寄来了薄复礼的回忆录。随后他又追踪到英国，此时，薄复礼已是 87 岁的老人了。薄复礼听闻肖克将军的情况，激动万分，他请索尔兹伯里转答他给肖克将军的问候。

在分离近半个世纪后，两位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老人又沟通了联系，薄复礼后来托人给肖克将军带来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像带和他出版的两本详细记录有他在红军中度过的难忘生活的回忆录，肖克将军也托人给他带去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的画册，肖克将军请他看看当年他曾生活过 18 个月的那支军队今天的风采。

1988 年，薄复礼的回忆录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发行，他为之作了自序。肖克将军为此写了一篇长文，以表友情。80 来岁的老将军和 91 岁的传教士已不可能再见面了，然而，他们的友情，已成为历史永恒的话题。

文章写到这里应当结束了，让我摘引薄复礼为其中文版回忆录作序中最后一段作为结尾吧："亲爱的中国读者，这是我一生中的简历，我把这些推荐给你，我相信你可以从中得到益处，帮助你成为你们伟大国家的一个更好的、更有用的公民。我看到过有关你们国家的许多报道，我为你们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受许多磨难之后，终于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相信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忘记自己的私下的高兴而从帮助和热爱其他人中得到自己的满足。"

（作者：彭苏、选自《传记文学》95 年 2 期）

参加过长征的国民党纵队司令

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那场举世震惊的红军长征中，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列里，有一位身着国民党军服骑着淡色大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国民党军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

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前身）长征前夕，张振汉领到了这匹淡红色大骡子。那时只有军团级红军干部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当他骑在骡子背上目睹一队队英姿勃勃徒步行军的红军官兵时，他的心灵又一次被震撼了。他那略显消瘦的国字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来。

可就在几个月前，也是这张脸，却充满了十足的傲气。6 月中旬，在湖北省咸丰县忠堡镇的一仗中，张振汉做了红军的俘虏。当六军团政委王震押他去见贺龙时，当贺龙请他喝咸菜汤时，张振汉一脸不可一世。他从心底里瞧不起眼前这些俘虏了他的“土包子”军队，他仍把自己当作“失蹄”的“好马”。

在宣恩县李家河的红军祝捷大会上，张振汉被推上台亮相。老百姓一见这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灰狗儿”（群众对国民党军的蔑称）司令，群情激愤，拿着锄头柴刀，朝张振汉涌过来，向他索命。贺龙笑吟吟地拦住愤怒的群众：“乡亲们息息怒。张振汉是有罪恶。可咱红军有规矩，要宽待俘虏呀！”群众被劝住了，可张振汉却颓然瘫在了地上。他不明白，老百姓对他这位堂堂的“国军司令”为啥如此刻骨仇恨？

他得到了红军的种种优待：每到宿营地，总给他单独号一间房，让他原来的马夫做他的勤务员；打土豪杀猪打“牙祭”，每次都给他多盛一碗；还允许他同家人通信，准许其家人到红军驻地探望他。他那做商人的哥哥几次到苏区，见兄弟受到了优待，也被感动了，回去后，还给红军弄些紧俏药品，以示感激。

红军政策的感召，无情事实的教育，使张振汉对自己对红军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为了发挥他的长处，红军还安排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官，讲授一些基础军事知识。

长征前，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几次找他，了解敌军北方兵力部署情况。红军参考了他提供的情况，作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澧沅防线的战略决策。

红二、六军团直插湘中，国民党军望风披靡，老百姓欢天喜地地迎接红军。不几天，就有几千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张振汉思索着，国民党扩军靠抓丁，而红军扩军却是一呼百应。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正好说明了人心的向背？

红军长征到了奔腾咆哮的金沙江畔，总指挥贺龙向张振汉征询大兵团渡江的意见。他提出的伐竹扎排渡江的方案被贺龙采纳了。红军大队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部队进至玉龙大雪山山麓。天气奇热，太阳火一般地炙烤着大地。人们感觉是背着火炉在前进，喉咙、鼻孔都干得冒烟。张振汉在马上紧锁双眉，默不作声地跟着部队，沿着“之”字路向雪山顶上爬去去。山路陡峭难行，行至山腰，突然马失前蹄，张振汉摔下马来，象只麻袋滚下山去。附近的红军战士惊呼着：“张振汉——”“张司令——”掉头朝山下扑去，在谷底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他双腿骨折，脸上擦破了皮，鲜血直淌。红军战士找来急救包给他包扎，然后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越往上坡越陡，加上冰雪覆盖，空气稀薄。战士们穿草鞋的脚被冻得发麻，胸口象压了一块石头。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单人爬行都十分艰难。抬张振汉的几个战士，前拉后推，走几步就要停下喘几口气，硬是咬着牙关把张振汉抬过了大雪山。张振汉这位铁石心肠的军人眼角滚下了激动的热泪。

进入草地后，这位一向养尊处优的“国军司令”又要经受一次饥饿的考验。在草地，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看护张振汉的几名红军战士，宁肯自己勒紧裤带挨饿，也要把为数很少的一点干粮和费很大劲儿才挖到的野菜省给张振汉吃。大碗大碗的野菜，无油无盐，无滋无味，但此时此刻，张振汉却吃得津津有味，觉得比任何美味佳肴还好吃。

在长征这座大熔炉里，这位国民党纵队司令的灵魂得到了陶冶，他看到了红军和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到延安后，中共方面又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张振汉把妻子也接到了延安，打算同共产党合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决定释放张振汉，毛泽东亲自找他谈了话，但他不愿走。经过反复做工作，他才依依惜别了延安，到了西安。

解放战争中，张振汉为和平解放长沙作了有利的工作。解放后，张振汉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文化革命”中，张振汉夫妇因“莫须有”的“特嫌”罪名被迫害致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给他平反昭雪，并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

张闻天的“读报笔记”与长征落脚陕北

1935 年 9 月 22 日，张闻天曾撰写《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篇“读报笔记”，是他从敌人报纸上摘录有关各地苏区发展情况及红军活动消息，整理而成的。此文对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曾产生过重大历史作用。

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6 月 27 日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北向，向川陕甘广大

地区转移，发展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张国焘却主张红军主力应该停止北上，避开强敌，掉头向西或向南部边陲退却。在这关键时刻，为了使全党全军能够认真执行"两河口会议"精神，党中央于 1935 年 9 月 10 日又发布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针对张国焘的避战逃跑主义，明确指出："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因为"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同时强调指出："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就在中央发布"告同志书"的十多天后，张闻天根据自己从敌人报纸上摘录到的有关红军在各地的活动消息，以及陕甘地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于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写成了这篇"读报笔记"，以此证明：中央提出的"继续北上"、"夺取松潘"、"向甘南前进"行动方针的正确性。

实际上，在中央"两河口会议"之前两天，即 1935 年 6 月 24 日，张闻天曾写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明确提出红军继续北上，迅速进入川陕甘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后来，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张闻天的这一战略思想。"读报笔记"一文则是对这种战略思想的进一步补充。

从当时的形势看，张闻天的这篇"读报笔记"，最低限度起到了这样一些方面的作用：①综合了敌方报道的大量有关红军活动的资料，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②通过敌人对红军无可奈何的自白，进一步鼓励与坚定了红军指战员革命信心；③从敌人的哀叹中，证明红军主力北上，"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已经具备相当可观的客观基础；④有力地证明和批判了张国焘对抗中央、采取逃跑主义的错误。

几周之后，即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在甘肃通渭的班罗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最后作出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然与张闻天的"读报笔记"一文所提供的情况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分不开的。

（摘自《党史纵横》90 年 6 期作者：李之彦）

腊子口战斗英雄话当年

发生在 1935 年 9 月红军长征路上的腊子口战斗，距今已 50 多年了。我们生之也晚，只是在历史书籍和老同志的口头传说中，得知一些当年战斗的惊险和红军的神勇，常神往感奋。没想到，1992 年我们竟有幸见到了腊子口战斗英雄胡炳云。

7 月 20 日，我们在南京中山陵附近一座小楼里，拜访了 81 岁的胡炳云老将军。他额阔颧高，浓眉大眼，紧紧抿着的嘴角上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刚毅；他身着白衬衫、黄军裤，坐在那儿腰板笔直，仍不失军人的风采。他口齿清楚，对往事记忆犹新。

（一）

1935 年 9 月，红一、三军团主力，历尽艰难困苦，终于穿越过茫茫草地，向腊子口方向挺进。

9 月 20 日清晨，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已到达腊子口西南 50 里的地方。突然先头部队报告：前方山头有敌人一个营，正在修筑工事。团长王开祥和政委杨成武立即命令二营攻击敌人。营长张仁初率二营扑向敌人。敌人被打个措手不及，往腊子口方向逃窜。张营长令六连咬住敌人，穷追不舍。

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带领全连边打边走，一直将敌人追至腊子口。

在树林中，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对全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左边有杨土司的两万骑兵，右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我们北上的道路只有腊子口这一条；通不过腊子口，我们就不能如期与陕北红军会合。腊子口就是我们的生死关口，一定要誓死拿下腊子口！"

团首长将主攻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六连。

腊子口是一处天险，历来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河流湍急，两岸陡壁悬崖，一座木桥横空而架。崖峰上，敌人的工事密布。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三个团的精锐部队。

胡炳云同杨信芳连长回到连队时，战士们已将手榴弹挂满全身，大刀擦得闪闪发光，待命出击。夜幕笼罩了山谷，周围一切都显得那样寂静。突然，枪响了，六连用密集的火力向敌人阵地射击。一排长王良泰带 30 余名战士，在火力的掩护下，迅速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机出击。狡猾的敌人这时却隐蔽在工事里不还手，但等我军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居高临下，把手榴弹像冰雹般打了下来。几次攻击，均未奏效。在通往桥头 50 米的崖路上，弹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弹铺了厚厚的一层。六连伤亡不少。凌晨二时，上级命令六连暂时撤下，准备重新组织进攻。

部队撤离腊子口后，胡炳云听到几个战士在悄悄议论：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封锁得又严，单从正面猛冲怕不行！战士们的议论启发了他。他立即与在连队一起参战的团总支书记罗华生一起召开了连队党团员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会后，根据大家的建议，作了两个决定：第一，组成敢死队，以少数兵力轮番攻击，疲劳和消耗敌人，伺机夺取敌桥头堡。他们选出 15 名党团员组成了敢死队，分成三个突击组。每个敢死队员都配备短枪一支，子弹百余发；身挂集束手榴弹，背插大刀。第二，兵分两路接敌。

一路顺河崖壁，运动到桥底下，再攀着桥梁下的横木摸到对岸；另一路运动到桥头附近，等河对岸的一组打响后，便两面夹击、强攻桥头堡。

就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在肖华、陈光、杨成武等陪同下，亲临前沿看望敢死队。他简要地讲述了形势，要求敢死队员们一定要拿下腊子口。敢死队员热血沸腾！

这时，又传来一个震奋人心的消息：一、二连的爬山队已从腊子口左侧攀登上陡峭的崖峰，摸到敌人后面了。

敢死队员们在胡炳云的指挥下，立即出发了。当第一组突击队员顺着河边攀着崖壁摸到桥下时，第二组也已悄悄靠近了桥头。这时，敌人与红军打了大半夜，也疲惫不堪，都缩进工事里打盹了。

桥下第一组的突击队员们开始攀着横木悬空朝对岸运动，突然"扑通"一声，一名队员失手落入河中。这一声巨响，惊醒了敌人，他们忙乱地朝河面开火。胡炳云乘此机会，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便带领10名突击队员一下子冲到桥头，向敌人扔出一排集束手榴弹。这时，桥下的突击队员也攀上桥面，跟随胡炳云向敌人猛攻猛打。突击队员抽出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桥窄人多，正适合大刀发挥作用。十几把大刀寒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残余的敌人支持不住，只得舍桥逃窜。

这时，一发白色信号弹从山巅升起，这是一、二连已经迂回到指定位置的信号。接着，我军阵地上连升三颗红色信号弹，总攻开始了。刹那间，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声和战士们激昂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了起来。红军两面夹击敌人，势如破竹，一举攻上山巅。天险腊子口被砸开，红旗漫卷西风。

在这次战斗中，胡炳云身负重伤。由于作战英勇顽强，他被上级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二）

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又乘胜一举占领了岷洲附近的哈达铺。

部队在哈达铺稍作休整，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部队尽量避开敌人封锁线，日夜兼程地往陕北挺进。兵贵神速，10月，这支部队令人难以置信地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随即，中央红军与和徐海东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合。

在哈达铺改编时，二师四团改为四大队，取消营的编制，下辖四个连，胡炳云任钢铁红二连副连长。

11月里，山丹丹花儿已经凋谢、枯萎，黄土高原上的寒风卷起的沙土铺天盖地。这时，胡炳云的连队突然奉命随大队急速开拔。他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断定部队要打大仗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着实令国民党反动派惊慌，蒋介石急令五个师，兵分二路，向陕北苏区围攻。东路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路四个师则从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鄜县进击。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就已经开始设想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了。经过调查研究，沉思熟虑，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方案形成了。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有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等一军团、三军团和十五军团主要将领。会议很快决定了这一战役部署。在会议接近尾声时，毛泽东打着手势，坚定有力地说："战场就选定在直罗镇一线，要打的是歼灭战！"

敌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率一师人马，在六架飞机配合下，边打边进，浩浩荡荡开进了葫芦河畔的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急速前进；中央红军由北向南挺进。拂晓，两路大军已完成对直罗镇的包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临前线总指挥部。毛泽东发出了攻击令。刹那间，山谷中炮火齐鸣，大地在颤抖，砂石、土块腾空而起，浓重的硝烟在山谷中弥散着呛人的苦味。

胡炳云率领全连战士出击了，他们高声呐喊着向敌人阵地冲击。一场大搏杀激烈地进行着。胡炳云顺手抄起一支敌人的带刺刀的步枪，连连突刺，几个敌人在惨叫声中倒下……

正在浴血拼杀的时候，胡炳云突然觉得腹部被一件灼热的物件猛地一撞，他向前踉跄了两步，然后又带队向敌人杀去。这是一块弹片将他腹部打破，肠子已经流出半尺多长。他全然不顾，在敌群中左冲右突，终于把敌人压下山沟里。直到这时，战友们才发现他的肠子已被打了出来，赶紧抢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攻占直罗镇。一〇九师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带一小部分敢死队员窜进一个小寨的残址内，困守待援。周恩来观察到寨子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为避免较大伤亡，下令晚上进攻。

当夜幕降临时，十五军团组织部队突然向小寨发起攻击。牛元峰慌忙率队逃跑，途中被我军击毙。半夜战斗结束，敌一〇九师被全歼。前来增援的一〇六师被我军消灭一个整团。

11月30日上午在东村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直罗镇战斗。他说，红军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会合与并肩战斗，使直罗镇战役获得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选自《大江南北》作者：高胜章、熊克州）

激战劳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进行的劳山战役，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前奏；是红十五军团组建成立后的第一仗，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的重要战役之一，并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我在红十五军团任徐海东军团长的特务员（相当现在的保卫干事），亲自参加了劳山、榆林桥战斗，目睹了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卓越的指挥艺术。五十年过去了，每忆及起来，犹如昨日——

巧设口袋阵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由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获知中央红军北上动向后，决定西进甘肃，破坏敌后方，牵制敌军，迎接党中央，北上会合陕甘红军。我军在挥师猛进中，占双石铺，活捉胡宗南的少将参议，克两当县城，攻天水，连下秦安、隆德，直逼平凉城，截断西兰公路十八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八月二十一日，红十五军政委、鄂豫陕省委书记吴焕先同志、不幸于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迅速经合水县进入陕甘苏区。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将北上会合陕甘红军的意图后，便增派大军加强早已开始的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其主力有东北军的四个军，陕北军阀两个师，入陕晋军五个旅。他们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压缩的战法，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九月中旬，南线的六十七军在军长王以哲率领下，一一〇师，一二九师沿洛川——甘泉公路北上，抢占延安这个战略要地。六八五团一个营驻守甘泉，负责保护这条由南至北的交通线。一〇七师留在洛川、富县一带，加修公路和碉堡。延安是陕甘苏区的中心，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占领延安后，就可以向四面八方伸延，达到分割摧毁革命根据地、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

九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永平镇胜利会师了，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刘志丹和徐海东等同志先后讲了话，号召大家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而战。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鄂豫陕省委主持下，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代表团和两个省委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有的同志主张从北路开刀，先吃掉两个杂牌师；有的同志认为，大军压境，吃掉一路杂牌军，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主张先打主力东北军。最后，徐海东同志果断决定先打东北军。

会后，程子华同志留永坪动手术治伤。徐海东、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周围察看了地形。

当时，延安有东北军两个主力师，外加地方武装，有一定的实力。根据我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强攻延安不行。于是决定把敌人调出来打。延安这么多部队，不能没有补给，如果采用一支部队包围佯攻甘泉，切断敌人南北交通线，必然引敌增援，而且从延安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这样，一个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就定下来了。

在什么地方歼灭敌人呢？刘志丹副军团长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伏击地区。劳山是延安至甘泉的必经之地，这里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军团果断决定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九沿山。那么口袋底设在何处好呢?这既要考虑地形，更要考虑敌行军纵队的长度，接受以往伏击战的教训，不让敌后卫部队逃脱。行军纵队长度决定于其兵力大小和行军纵队多寡。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空间，决定将口袋底选在甘泉城北侧的一七〇高地上（当地群众叫清凉山）。从袋口到袋底约四十华里。我们还担心敌行军纵队装不完，又规定负责扎口袋口的七十五师，在敌后卫未通过九沿山时不准打，只有等敌人全部通过九沿山之后，扎死袋口，并向北派出有力的警戒部队，迂回部队在敌人后面跟进。以口袋底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里。巧设口袋阵的决心和部队的具体部署，是徐海东和刘志丹等同志共同商定的。

九月二十八日，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县城。第二天清晨，我伏击部队进入阵地。军团部规定：每人带三天干粮进入埋伏地区，不准生火，不准暴露目标，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徐海东同志的指挥位置设在口袋底——一七〇高地上，南距甘泉县城直线约一千多米。站在这儿向南可以俯视甘泉县城，向北可以观察整个战场，便于指挥全局。我们埋伏了两天两夜，徐军团长白天观察敌情，晚上查看部队，一双眼睛都熬红了。

在焦急和不安中，我们等到第三天，敌一一〇师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终于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增援。途中留一个团于三十里铺作为接应，命令两个团沿公路向南搜索前进。他以为我军会在地势险要的九沿山打埋伏，其实我少数部队只在九沿山上放了几枪就跑了。敌人在周围搜索了一下，认为我军被赶跑了，才放心前进。过了九沿山，何立中认为龙潭虎穴已过，把两路纵队变成四路纵队，行军纵队缩短了，公路上黑压压挤满了敌人，来势凶猛。

为解甘泉之围，敌前卫距甘泉县城两公里处，令其尖兵抢占右侧高地。当敌尖兵离我们指挥部埋伏的山头约二十米的时候，徐海东同志才下令："开火！"我军一排手榴弹把敌人打了下去。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英勇果断，有手枪不用，端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入敌群，追得敌人直往山下跑。我军堵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二二五团、七十八师和骑兵团埋伏在公路两侧山上，奋勇向敌群发起冲击。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我军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刘志丹同志的指挥所和七十八师在一起，当战斗进行最激烈的时候，他命令一个外号叫"冲锋老爷"的大个子特务员，骑马传达作战命令，不幸在途中壮烈牺牲。当时刘志丹同志有三个特务员，另外两个：一个中等个，叫满娃，真名魏成功；一个小个子，叫魏德。

战斗从十月一日下午约两点打响，晚八点以前结束，全歼敌两个团及师直属队，缴获各种火炮十二门，轻重机枪一百八十多挺，长短枪三千多支。打扫战场时，我们请当地群众把敌伤兵运到甘泉县城。这一手很高明，一来让敌人背上包袱，使甘泉县城增加了负担；二来也具体体现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东北军官兵影响很大。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后，化装成马夫，雇人抬到甘泉县城，不久也死了。甘泉守军见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军心动摇，斗志涣散。

劳山伏击战是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一仗，它成功地运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由于准确地分析了敌情，巧妙地选择了阵地，周密地部署了兵力，适时地予敌勇猛打击，因而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它对陕甘根据地的人民是一个振奋，对我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

强攻榆林桥

劳山大捷，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红十五军团领导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冷静思考着一个问题：敌军部还在延安，大量部队需要补给，南北交通定要打通，增援甘泉势在必行。我军劳山伏击成功后，敌人从北面不可能来了，必然改由南边增援，由于群众条件、地形条件，在南边不好打埋伏，我军只有出其不意，抓敌立足未稳，再打一个歼灭战。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经过精心挑选，周密策划，充分准备，派高福源率领四个营北上增援。

高福源是敌六一九团团长，该团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主力团之一，另加强六二〇团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共有三千余人，并任命高福源为前卫司令。出发前，高满怀信心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这次增援解围任务。他十分慎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北推进。高率部到达榆林桥，很早就宿营，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放好警戒，把一个加强连放在镇后山头上，控制制高点。同时，在洛河南岸驻一个营，并控制南边的制高点。

陕北的冬天来得比较早，一跨进十月就充满寒意。十月下旬，徐军团长和郭副主任率领红十五军团乘胜南下，迅速隐蔽地运动到道佐铺附近。徐军团长亲自率领营以上干部多次勘察了公路两侧的地形。

榆林桥原是富县通往甘泉、延安的一座小石桥，桥南是个小镇，有居民七十多户，靠山坡还有一排排窑洞。镇南的洛河，冬天可以徒涉，南北两山之间是一条百余米宽的大川。

我军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战斗于十月二十五日打响。我随徐军团长紧跟二二三团突击营，在拂晓前，沿着山沟向敌接近，不到十分钟，就歼灭了敌加强连，抢占了镇北制高点。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攻占了榆林桥周围所有高地。河南一个营被七十八师韩先楚同志率部消灭了。敌外围据点被我夺取后，高福源亲自组织反扑，妄图夺回阵地。敌人多次反扑被打垮，我军顽强抗击，浴血奋战。上午八点左右，大雾开始消散。在前沿阵地上，徐军团长仔细地听了部队汇报，察看了敌情和周围地形，指示部队从山上往山下打，对山坡上和山脚下敌占据的窑洞发动进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夺战。我军在火力掩护下，一个一个窑洞地消灭敌人。守敌大部被歼，唯有镇北敌团部和西头的敌军，依托坚固的窑洞进行顽抗。

这时，程政委从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派骑兵通信员送信，说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已到吴起镇。徐军团长在镇北山上的战壕里，利用战斗空隙，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与郭副主任一起传达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号召大家迅速全歼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徐军团长亲自组织二二五团向敌团部进攻。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把驳壳枪一举，高呼："突击队，跟我上！"他们以勇猛的动作，迅速接近敌人。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一样向他们打来，扫起一溜溜尘烟，不少干部战士倒下了，郎团长也负了重伤，后光荣牺牲在医院里。敌人利用坚固的窑洞拼命顽抗，我军搭人梯爬上窑顶，从烟囱口往下扔手榴弹，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残敌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枪投降。这一仗，我军全歼敌四个营，无一漏网，缴获八二迫击炮八门，机枪一百多挺，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支。

这次强攻榆林桥，由于敌人是经过周密准备，挑兵选将而来，所以较有战斗力，打得十分顽强，加上我军怕敌情发生变化，有些急于求成，伤亡比较大。如果我们等到天黑，或组织好火力，一个窑洞，一个窑洞进攻，可能会减少一些伤亡。

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统称劳山战役。其共同特点，都是围城打援。一连打了两个较大胜仗，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缴获了这么多武器，抓了这么多俘虏，对军民鼓舞是很大的。榆林桥战斗结束五天之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

彭德怀司令员到军团部看望大家。我们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心情十分激动。

战后，徐军团长领着我们，在俘虏群中查获了敌团长高福源。高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深得上司的信任，在东北军中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被俘时已三处负伤。程子华同他谈话，问他："你打算怎么办？"高答："杀了我。"程又问："不杀你，你说说第二个办法。"高答："放了我。"程说："不放你，我们有个军事学校，你去当教员。"高说："我一定教好。"就这样，把他送后方了。以后中央首长周恩来、彭德怀、李克农等同志对他进行谈话教育和争取工作，他向我们反映了不少有关东北军内部的情况。高福源被释放回去后，也积极做张学良的工作。后来，亲自带领东北军查抄了国民党省党部档案馆，搜出了特务机关上报的黑材料，其中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在内的《东北军、西北军抗日分子名单》的底稿，这也是引发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自《纵横》86年6期，作者：詹大南）

红二方面军出的独臂将军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革命者受伤致残，但他们身残志不减，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其中，出自红二方面军的独臂将军有：

彭绍辉(1906—1978)，湖南省湘潭县人。1926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33年，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中，率部参加草台冈霹雳山战斗，左臂连中两弹，后截去左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人民解放军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1913—1960)，湖北省松滋县人。1929年春参加红军。1935年随红二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第6次负伤后截去右臂。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余秋里，生于1914年，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参加赤卫大队。长征中，率部担任红二军团前卫，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因伤势恶化，截去左臂。全国解放后，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毅与"偷金者"

1935年6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战斗在赣粤边深山老林里的红军游击队领导机关中发生了一起震惊人心的事——陈毅的特务员（即警卫员）宋生发，携带几十根金条逃走了！

那是一笔巨额革命经费啊！陈毅又惊又气，他立即命令通信班长胡大炳带领3个战士，连夜抄近路赶到章水渡口潜伏，严防宋生发渡河逃进大余县城。

千叮咛，万嘱咐，陈毅把金条交给了宋生发

这几十根金条，是陈毅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千辛万苦从中央苏区瑞金带到赣粤边游击区来的。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时，给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留下一大笔款子，分局和办事处将这笔款子除了分给各路突围的部队外，剩下来的一些金条委托分局书记项英、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人保管。

突围到赣粤边后，陈毅的右大腿伤口经常发炎，加上腰间绑着几十根金条，行动很不方便。杨尚奎、陈丕显等人曾建议他将金条分给大家背，减轻行动的负担。陈毅不同意，他说："在内部还不很巩固的情况下，把钱分给大家背是很危险的，万一落到品质不好的人手里，等于给他发了旅费，使革命受到影响。"

5月初，蒋介石调动一个军、一个师又一个旅，对赣粤边5个游击区进行"清剿"，兵力是游击队的50倍。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陈毅带领指挥机关的部分人员，转战于方圆千里的竹山林海之中，指挥油山、北山、信康赣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打击敌人。由于操劳过度，6月初，陈毅右大腿上的伤痛加剧。当时，陈毅身上唯一的药品就是几盒万金油。然而，几盒万金油差不多抹光了，大腿仍然红肿得象个大冬瓜，创伤面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躺下来。

一天下午，陈毅带领指挥机关转移到油山游击大队驻地仙人岭。住下后，陈毅对宋生发和潘聋牯两个特务员说："看来我不轻装是不行的了。"说着，他从腰间解下用白布缝制的一条3尺多长的宽袋子，上面有一个个格子，沉甸甸的，很小心地放到面前的一块石头上说："这是党中央发给的革命经费。我们要坚持下去，在经济上要靠这笔钱，将来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没有钱，我们要办什么事情都很困难。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象国民党军队那样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需要什么，都得花钱向老百姓买。因此，过去我曾对你们说过：万一我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但革命经费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人民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给革命带来损失。"陈毅提起沉甸甸的布袋接着说："虽然我跟大家一样，每月12元法币，扣去伙食，剩下的连吸烟也不大够，但我以党性保证，钱在我身上，我没敢动过一丝一毫。现在交给你们俩背，希望千万要小心。"陈毅把布袋交给宋生发："你先背

吧，如果单独外出执行任务，就交给聋牯背。将来我腿伤好了，还是我背。”

紧锁眉，泪水涌，宋生发帮陈毅第二次动“手术”

陈毅洗净了伤口，就拄着拐杖，艰难地一步一步移动到密林深处，找到两棵靠近的树坐下来，把右脚架在树叉上，身子靠着另一棵树，慢慢卷起伤腿上的裤管，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伤口。突然，他两手用力挤压，脓水顺着伤口流出，由于剧烈疼痛，他的脚下意识地从树叉上缩了回来。于是，他解下腰带，将右脚绑在树叉上，再次挤压伤口。也许为了镇痛和帮助双手用力，他发出了“嗨吱、嗨吱”的喊声。

从树林里传出的“嗨吱、嗨吱”的声音，惊动了正在寻找陈毅的宋生发和潘聋牯，他俩顺着声音找过来。陈毅见宋生发和潘聋牯来了，抬起汗流如雨的头，说：“咦！我没叫你们，你们怎么来了？好吧，来了就不能闲着，过来帮帮我挤挤脓水。伤口‘反攻了’，我给它第二次动‘手术’！”

陈毅是1934年8月28日在兴国前线指挥红军反第五次“围剿”中负伤的。中央机关长征的前一天（10月9日），医生为陈毅开刀治伤。由于时间紧迫，被打碎的骨头没有完全取出，所以伤口愈合不了，经常发炎。

“哈哈！”陈毅看着两个特务员惊愕难过的小脸笑道，“肉烂骨不伤，怕什么？快帮我挤脓水。”

陈毅看着他们泪眼相视，不忍动手，就疼爱地拉着他们的手说：“男子汉流血不流泪，还傻愣干啥！动手！”看他们还是愣着不动，特别是潘聋牯，吓得浑身都抖起来。陈毅故作严肃地说：“看你们多大的胆子！和敌人拚刺刀，你们个个象小老虎，今天叫你们挤挤伤口，就吓成了呆子。唉！我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看到我这样第二次、第三次挤脓？”宋生发、潘聋牯同时摇了摇头。陈毅高兴地笑道：“这就对了，那现在就把这脓包彻底挤干净吧。这也和消灭敌人一样，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嘛。”

陈毅让宋生发把他的右脚绑在树叉上，让潘聋牯从背后把陈毅和树杆一起紧紧抱住，然后让宋生发用力挤压伤口。宋生发眉头紧锁，低头用力，滴滴泪水不停地从宋生发与潘聋牯眼中涌出来，涌出来……。宋生发不但把陈毅伤口里的脓水挤净，还挤出了一小块碎骨，清除了后患。陈毅用树枝钳起碎骨看了看，笑道：“好，这下除掉祸根了。”

心颤抖，难入睡，宋生发终于割开布袋挤出一根金条

宋生发把陈毅背回到铺上，扶他躺下休息。天黑了，宋生发挨着陈毅的身边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陈毅那红肿的大腿和溃烂很大很深的伤口不时在他眼前呈现。他脑海里老是在翻腾：伤口复发这么严重，光靠万金油能治好吗？不行！得想法买点好药，补品，才能使他快些康复。可是拿什么买呢？每月的津贴费仅仅够饭钱！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间的金条，“对，就用它来买！”他在心里暗暗地说了一句。但转瞬间他又把手从腰间移开了。久久地，宋生发不能入睡。他见陈毅睡得很香，就打亮电筒照照陈的伤腿，啊！大腿上的裤管全被血水浸湿了，铺在身下的破夹被也浸湿了一大片。宋生发的心颤抖了，陈毅那又深又大的伤口又一次呈现在他的眼前。“不！就是给我处分，开除我，枪毙我，我也要用金条去给他买药，革命不能没有他，红军游击队不能没有他！”宋生发从腰间解下布袋，用小刀割开一个小口，从里面挤出一根黄灿灿的金条……

诉真情，动人心，但陈毅还是把宋生发关了禁闭

胡大炳带领3个战士赶到章水渡口时，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胡大炳指挥战士分头潜伏在渡口两边的灌木杂草丛里，等着捕捉偷金人。

这时，胡大炳发现一个人游过江来，这人正是宋生发。胡大炳大叫一声：“宋生发！”宋生发回头见是胡班长，高兴地问：“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胡大炳冷笑着说，“这要问你呀？”“问我？！”宋生发还没有明白过来，胡大炳就下令把他绑起来。

宋生发被带到游击队驻地，绑在一棵树干上，指挥机关的干部战士站在两边，无不用鄙夷、愤怒的眼光看着他。陈毅拄着拐杖，在潘聋牯的搀扶下走过来。胡大炳搬来一个木墩，陈毅侧身坐下。

胡大炳走到宋生发面前，大声地问：“宋生发，你不经请示，一个人偷偷下山，想干什么？”

没等宋生发张口，几个手持木棍、大刀的游击队员围上来，齐声喝斥：“说！快说，不说……”有几个游击队员举起木棍要打。

“住手！”陈毅上前取下一个游击队员手中的木棍，转向宋生发问：“老宋，你身上的革命经费还在吗？”

宋生发生气地说：“我又不是偷金逃跑，干吗不问青红皂白就绑人？”

“松绑。”陈毅向胡大炳示意后转身说，“我想你也不是那种人。”

松了绑，宋生发又喝了潘聋牯送来的大半缸子水才说：“我下山的时候，把革命经费放到聋牯饭包里了。”潘聋牯立即解开饭包，里面果然有条粗面袋，这时他才感觉到饭包比过去重得多了。他提起沉甸甸的布袋，交给了陈毅。

“不过……”宋生发嗫嚅着说。

“不过什么？”陈毅立即警觉起来。

“我拿了一条。”宋生发低下头说。

“啊！你拿了一条！”陈毅顿时火冒三丈，满脸胀红：

"你、你、你好大的胆子，你拿这根金条干什么去了？"

宋生发从来没见过陈毅发那么大的火，一时有些慌乱。镇静之后，宋生发才理直气壮地说："为了你，也为了大家，为了革命！"他解开衣扣，脱掉外衣，露出了绑在肚子上的一包东西。他取下这包东西，放到一块石头上，一层又一层地剥开包着的油纸，一堆各种各样的药品和补品显露出来。他冷不防拉起陈毅右腿裤管，激动地说："大家看，这裤子上是什么？是血！是脓！同志们，你们不知道，老刘（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代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右大腿受了重伤，他是拄着棍子从中央苏区走到这里来打游击的。昨天下午，他在树林里挤伤口，我才晓得他右大腿肿得象大冬瓜，伤口烂到了骨头，挤出的脓血，有一大钵子。可是，他身边只有几盒万金油！大家说，这万金油，能治好这么重的伤吗？"宋生发说得情真意切，泪流满面。游击队员们过去都不知道内情，听他这么一说，都十分惊讶，受到感动。有的问："你拿金条，去给老刘买药啦？"宋生发说："是的，昨天下午老刘把金条给我背，晚上我趁老刘和龚牯睡熟时，拿了一根下山过江到大余城，找了交通站老黄，买了这些药品，只花了半根，还有半根……"宋生发弯腰从鞋底夹层里取出半根金条。

游击队员们个个转怒为喜，纷纷向宋生发报以敬佩的目光。胡大炳满脸歉意地给宋生发敬礼："老宋，对不起，误会了！你是我们游击队的好汉。"

"胡大炳！"陈毅回到木墩前坐下说："把宋生发带下去，关禁闭。"

"老刘，这……"胡大炳和战士们都有些愕然。

"执行命令！"陈毅严厉地说。

"老刘，你……"宋生发感到意外，赌气地蹲下不走。

"你，你怎么啦？受委屈了？你简直是乱弹琴！"陈毅恼怒地起身来到宋生发面前说，"你很勇敢，很有胆量，但你无组织无纪律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胡大炳，把他带下去关禁闭。"

胡大炳只得碰了碰宋生发，在大家一片惊愕、静默中把宋生发带到游击队一间空草棚里关起来。

（选自《党史文汇》92年3期，作者：胡居成）

贺龙两救警卫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三军路经湖北兴山时，带走了一个年仅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他，就是后来的警卫员张昌华。

张昌华出生在书香门第，知书达理，聪慧过人，颇为贺龙喜爱。红三军回到洪湖后，张昌华便成了贺龙的得意警卫。

一九三二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贺龙被迫率红军撤离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转战川、黔边境。一九三四年十月，任弼时率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为了摆脱敌人的重兵追剿，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后，并未取道川陕北上，而是直下湘中，绕道长江天险。部队夜以继日地急行军，鞋子烂了，光着赤脚走；肚子饿了，勒勒腰带；不少战士脚底板磨起了大泡小泡。为了使部队得到短暂休息，部队到达芷江的竹平铺后，贺龙命令部队就地驻扎，欢度春节。

除夕之夜，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当地的群众纷纷送来猪肉、鸭子、鸡蛋等土特产慰问红军。饥饿而又疲劳的红军战士们如鱼得水，饱餐了一顿。入夜，战士们分散到老百姓家宿营，贺龙和警卫连住进了刚攻下的一座地主庄园。警卫员张昌华忙个不停，收拾房间、生火烧水、整理床铺……一切都忙停当后，贺龙才查哨归来。

"老总，您该洗个澡了吧？"张昌华说着，将一盆热水端到了贺龙的床前，贺龙看着这盆热气直冒的洗澡水，满意地笑了。

"小鬼，今天你也该好好睡一觉了，快去吧！贺老总再三督促，张昌华才勉强离去。

贺老总洗罢澡，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实在太困了，才熄灯睡觉。

"呼呼"，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枪声把贺龙从梦中惊醒。贺龙一骨碌从床上下来，提起双枪直奔楼下。这时，警卫员已与敌交火，敌人的火力直压楼口，贺龙当即判断出这是敌人的先遣部队与地方反动势力进行勾结围攻。

"一班压住敌人火力，其余跟我撤！"贺龙边还击，边指挥撤退，很快就摆脱了敌人猛烈的火力封锁。当撤至后院后，贺龙听见前院枪声仍然密集，这才想起睡在楼上的张昌华还没撤出。

"二排，跟我返回前院迎救张昌华，快！"贺龙说完，带头冲向前院，背着墙角一看，张昌华被敌人火力死死压在楼门口不能动弹。

"快，引开敌人火力。"贺龙一声令下，警卫二排立即向左运动，敌人火力很快跟踪过去。趁此机会，贺龙冲进楼门，一把挟住了张昌华，刚一离开，"嗖嗖"。一梭子子弹在贺龙身后直窜。

在贺龙的沉着指挥下，警卫连终于从后院冲出了包围，会合主力连夜撤出竹平铺，甩脱了敌人的追击。

途中，张昌华一直耷拉着脑袋，他知道自己严重失职，差点连累了贺老总，心里十分难过。部队休息时，张昌华怏怏地走到贺龙身旁说："老总，昨晚都怪我睡得太死，险些让您……"张昌华说着说着哭起来了。贺老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笑说："小鬼，红军可是不兴哭鼻子哟！你上

次救我，我可是没有哭哦！"一席话，说得张昌华破涕为笑。

一九三六年九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进入了草原。初秋的草原，冷风阵阵，烟雾沉沉。广漠无垠的原野，野草杂生，望不见山，也望不见树，大地一片凄凉。

开进草地不久，红军携带的粮食吃完了、皮带吃光了，就连树皮野草有时也难以吃上。部队战斗力大大减弱，行军速度明显慢了。有的战士渴了，见水就喝。草原上的水大都有毒，喝了就得痢疾，有的还全身浮肿，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躺下了。贺龙和战士们一样，几天没吃东西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警卫员张昌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天晚上，张昌华趁贺龙入睡后，悄悄牵着那匹枣红马消失在夜幕中。他想去打几只野羊给老总补补身子。然而，他骑着马在草地上找啊找，直到后半夜，也没有见到野羊的影子。走着，走着，张昌华那握着缰绳的手松了，一头栽下马背，昏倒在地上。

清晨，贺龙起床后，不见了张昌华，正在猜疑，突然听到了马叫声。贺龙赶快走出帐篷，只见与张昌华朝夕相处的枣红马从远处奔驰而来，立即意识到张昌华出事了。贺龙迅速提枪，翻身上马。不一会儿，枣红马驮着贺龙来到了张昌华昏倒的地方。贺老总跳下马一摸，张昌华还有微弱的呼吸，遂立即将张昌华抱上马鞍，策鞭返回营地。经过卫生员及时抢救，张昌华终于脱离了危险。

红军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进着，部队的粮食缺乏已成了致命的问题。为了使部队胜利越过草地，一天夜晚，贺龙命令炊事班杀掉了自己心爱的枣红马，给每人分了一斤烧马肉。张昌华吃着香喷喷的烧马肉时，心里觉得很奇怪。第二天，张昌华找不见那匹枣红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贺龙走到张昌华身旁安慰说："小鬼，别难过！到了陕北，再弄一匹更好的马。"张昌华擦了擦眼泪，默默地点了点头，跟着贺老总又开始了这一天的新征程。

（选自《纵横》87年2期，作者：田云兵）

毛主席欢送朱总司令上火线

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日左右，红军离开遵义，挥师北上。我们中央纵队往土城方向走，来到良村附近。队伍刚挨近一座山头，突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子弹象下雨一样地泼过来，在耳旁、身边"啾""啾"地飞过去。我们都卧倒地上，动弹不得。警卫部队的一个连迎头扑了上去。但是，仍压不住敌人。正在危急关头，指挥部马上调来五军团一个团，只见这个团的同志们握着上好刺刀的枪，朝着枪声最稠密的地方，象一股风似的卷了过去，占领了两边的山头。我们立即爬起来，朝东北方向，跑步冲出了危险的地方。

我们虽然到了赤水河的土城，形势却依然很险恶。我一军团在土城前边的复光场与川军遭遇后，总部首长本想集中兵力打击川军主力，准备消灭它三、二个团，再卷击其他敌人，然后渡赤水河。战斗打响后，才知道敌人不只四、五个团，而是九个团。敌情发生了大变化，尾追的川军一部又咬上了。敌变我变，总部首长考虑到红军不能前后作战，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为消灭、重创敌人的一部分，赢得时间，粉碎敌人企图将我聚歼于赤水河畔的阴谋，于是便果断决策：一、三军团迅速回师土城，再加上军委纵队干部团，会同五军团进行战斗，首先解决"后顾之忧"。这一仗打好了，可以吓破敌人的胆、打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保证红军渡过赤水河，走活一盘险棋。

紧要关头，老帅一马当先，朱德总司令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朱老总要披甲亲征，震动了全体红军，毛泽东同志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老总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说得毛泽东同志点头了。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久雨初晴。毛主席和总部其他首长决定为朱德同志到作战第一线而举行欢送仪式。那天，我们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吃过早饭，便来到了土城街的集合场地。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已站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中央领导和我们一样，手中都拿着一面用小竹棍作旗杆的三角彩旗。我们二百多人在街道两旁刚排好队，便见朱总司令身着灰棉军衣，头带红军帽，腰束朱皮腰带，别一支小橹子，身上背着一顶斗笠，上上下下干净利索，满身豪气。他有力地挥动着手臂，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近来。毛主席立即从欢送队伍的排头走向排尾，迎着朱总司令走过去，一边走一边举着旗子领我们高呼："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消灭川军，北上抗日！""打倒蒋介石！""英勇红军，战无不胜！""打胜仗，创造新苏区！"等口号。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的各色小旗，增添了雄壮、热烈的气氛。

朱德同志快走近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也赶忙紧走几步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朱总司令很激动："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主席当即说道："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说话之间，这两位首长手拉着手，走到夹路相送的队伍尽头。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同志也离开队伍，满脸笑容迎上前，和朱总司令一边握手还礼，一边高兴地说："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总坚毅的脸上，露出庄重而又欢快的笑容。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双手再次紧紧地握着，很有力

地摇了几摇。此刻，两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多少深情的嘱咐，多少无限的期望，都集中在这无声胜有声的握手之中了。

"请多加保重。"毛主席对朱总司令说。

"请放心，您也要注意保重！"朱总司令说完，猛然把手抽回来，车转身，朝前走了。

朱总司令上火线后，亲自率领着干部团及一、三、五军团分路向敌人发起了英勇的反击，歼灭了许多敌人，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止了敌人的追击阻截，为红军渡赤水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毛主席在军情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不顾可能的危险，带领着几个同志，亲身迎接朱总回来。毛主席还亲手给朱德同志敬上一碗茶哩。

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之间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永令后人景仰。

（选自《纵横》84年4期，作者：许长庚）

第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

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对西北地区进行了考察，写出了《中国的西北角》。该书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向全国读者报道了红军胜利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消息，揭露了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经济的凋敝，以及日益严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数月之中，连印七版，风靡全国。范长江也因此蜚声报坛。

西安事变之后，范长江于1937年2月2日只身冒险进入西安，对事变作实地采访。在西安，周恩来同范长江作了竟日长谈。范长江还由周恩来介绍，会见了叶剑英。2月6日，范长江同博古、罗瑞卿一道，前往延安。2月9日，范长江进入延安城。在那里，他参观了红军大学，先后会见了我党各方面的负责人。晚宴之后，范长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作竟夜长谈。毛泽东回顾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同时深刻阐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月10日晨，范长江告别延安，登程南返。不久，他把在延安的见闻写成通讯，以《陕北之行》在《大公报》上发表。《陕北之行》的发表，促进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刘泽洪）

陈毅化名"大老刘"的由来

1935年3月中旬的一天，项英化名周松山，陈毅化名老刘，两人装扮成富商，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在化装成"仆人"的原信丰县委书记曾纪财和两个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赣粤游击根据地。但为何已化名"老刘"的陈毅，又叫"大老刘"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当时，在赣粤边地区打游击的红军游击队只有几百人，国民党反动派却出动了1个正规军、2个保安团和10个县的铲共团常务队及铲共义勇队共4万多兵力进行层层包围，反复"清剿"。在项英、陈毅的指挥下，游击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1935年夏，国民党军队在赣粤边游击区，大搞移民并村，实行联保联坐，限制群众购买粮油和日用品，利用叛徒带路，加紧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越来越艰难，他们长年累月钻山沟、住茅棚和山洞，经常转换地方，没有固定的住地。这年10月，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人转移到信丰县潭塘坑滴水垅。一天，信丰游击队得到敌人一个重要情报，要交通员郭洪传迅速送给陈毅。正巧，项英、陈毅和特委、县委领导在棚子里开会。当时，红军游击队的纪律是很严的，不是出席会议的人，是不能进入开会地点的，郭洪传站在外面，不好进去，只好请警卫员去通报，请"老刘"出来一下 。一听要"老刘"出来一下，参加会议的陈毅和信丰县委书记刘符吉、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都一起走了出来，问郭洪传有什么事。郭洪传一看，三个老刘都出来了，于是他就指着陈毅说："我找这个老刘。"事隔不久，新城交通站又送来情报，要郭洪传交给在上乐指挥工作的刘新潮。此时，刘新潮已到滴水垅向特委汇报工作去了，郭洪传立即赶往滴水垅。恰巧，3个老刘又都在那里。郭洪传叫老刘出来，但3个老刘面面相觑，仍旧坐着，没有出来。无奈，郭洪传只好央告项英：3个老刘要分大小命名，不然我送情报给他们当中的一人，遇到他们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叫老刘，又会出现不是全部答应，就是全部不应声。"项英想了一想，说："好："好，3个老刘都定个名字。"郭洪传以试探的口吻说："这个老刘个子高，身材魁梧（指陈毅），就叫大老刘；他（指刘符吉）个子中等就中老刘；那个老刘（指刘新潮）个子矮小，年令也小，就叫小老刘这样区别可以吗？"陈毅听后哈哈大笑："给我取大老刘的名字取得好，我不仅个子比这两个老刘高，年龄也比他们大。"从此，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都叫陈毅"大老刘"。

（选自《党史文汇》91年11期，作者：邹鸣光）

离开中国后的李德

德国人李德(1900—1974),即奥托·布劳恩,30年代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的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斗争,由于他支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严厉批评,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1935年底,李德辞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的工作,离开延安去苏联。

李德到莫斯科以后,就他在中国历时七年的活动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此后,共产国际严厉批评了李德,并不许他再过问中国的事务。此后,他不再从事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被安排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他精通德、俄文,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文艺书籍翻译家,主要进行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尼古拉耶娃的《收获》,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的译著文笔流畅,译意准确,在德、苏等国都很有影响。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参加了苏联红军,投身到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之中。这期间,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担任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苏联反法西斯中心学校的政治教员,做战俘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富有说服力的讲授感化和影响了德国官兵,受到一致称赞。

鉴于李德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功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授予他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战争结束后,李德回到外国文学出版社继续做翻译工作。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诞生。李德对于这个德意志土地上第一个工农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十分振奋,为维护和帮助共和国积极活动,李德回到了阔别20年的祖国,进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普及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事业。

50年代,李德作为德文版列宁著作的主编,系统翻译和出版了《列宁全集》,并结合翻译理论与实际工作的需要,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如《关于出版德文版列宁著作的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列宁的著作〈战争与革命〉的序言和注释》、《军事学者弗·恩格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等。他还针对国际形势写了《自由与社会主义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裁军和危机》,就众人关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60年代初,李德担任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领导和组织全国的文学理论创作工作。同时,他继续翻译苏联作品,撰写书评和关于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问题的理论文章,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翻译问题》、《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等。

1964年中德两国关系恶化,李德于这年5月27日在德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一文,对我党的现行政策和国际立场进行曲解和指责。此后,他又陆续在报刊上撰写了一系列反华文章,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

1969年,李德在《地平线》周刊上刊登了他的系列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出版了《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在这两部回忆录中回顾了他在中国七年的活动经历,再现了中国当年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生动场面,书中涉及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运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作者为开脱他所犯错误的责任,在书中也多有歪曲和失实之处。

为表彰李德在国家建设事业中所付出的巨大劳动,东德政府授予他卡尔·马克思勋章和其它最高奖以及国家奖金。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首都柏林去世,终年74岁。

(选自《党史纵横》92年3期,作者:欧阳波)

国歌的来历

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蒋介石国民党在对革命根据地红军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反革命的"围剿"。国民党政府不但公开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查禁革命刊物和进步书籍,还大肆逮捕、残杀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进步人士。1935年2月,也就是聂耳逝世前5个月,我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田汉同志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还没有完成,就突然被敌人逮捕了。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对内积极反共,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田汉身在监狱,眼望牢房的铁窗,日寇铁蹄践踏我国土的惨象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搏斗的情景,不时在他脑中闪过,怒火在他心里燃烧。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那火一般的诗句,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奔腾起来,歌词在他心中很快就酝酿成熟。

可是,往哪儿写呢?手上?衣服上?都不行。写下来也无法传递出去,无法交给党组织。正当他心急如焚的时候,突然在牢房的一个墙角捡到一个香烟盒。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被写在那张巴掌大的烟盒纸上,又经过一双双忠实可靠的手传到党组织负责人夏衍同志那里。

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对敌人的无耻行径无比

愤慨！他很快找到接替田汉工作的夏衍，激动地说："听说田汉先生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谱曲好吗？"没等夏衍回答，他又坚决地说："请交给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满意的！"夏衍同志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聂耳。聂耳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是田汉发展入党的。于是，夏衍就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交给了他。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聂耳细读着歌词，满腔的热血在沸腾！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战士的怒吼，他好象看到了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战斗。激情在聂耳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他心底产生，一串串音符从他的笔端流泻到纸上。

《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创作出来了。它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显示了祖国的尊严，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从此，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歌立刻插上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扬。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军事资料》89 年 5 期作者：林以章）

李立三苏联蒙难记

1930 年 11 月，曾犯有"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奉命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尽管他相当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赢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但他还是被定为"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而被指令留下来，安排进列宁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隶属王明负责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羁旅生活。王明原来就对李立三怀有私愤。早在 1930 年 3 月，王明在上海被捕时，为了自己能早日取保释放，他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竟主动供出中央宣传部地址，给党的地下机关造成了很大危险，因而曾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并给以严重警告处分。再者，王明一伙机会主义者是靠米夫等人的极力扶持，高举着国际路线，大反特反"立三路线"而上台的，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更加卖力地对李立三进行过火的批判和打击。一连四年之久，批判"立三路线"的会议不计其数。每每是作为会议主持人的王明先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番自我检查，回答大会的提问，接着许多人又发言，说李立三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必须彻底改变反共产国际立场、真诚地拥护王明同志英明的路线。即使是其它会议，前面也要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引子。正如李立三后来所讲，"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象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

1935 年，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阴谋唆使一些人发起倡议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通过这次非法的大会选举王明作党的总书记。李立三认为当时在莫斯科的党员并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感到其中很有问题，因而拒绝了倡议签名，并向代表团其它成员汇报，提出了"临大"的非法性和严重性，引起大多数同志的抵制，致使王明夺权的阴谋彻底破产。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忌恨"。不久，李立三在上班路上丢了一个日常使用的皮包，第二天就由车站人员送还。但是，王明抓住此事不放，他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予以严厉的批评。因为当时苏联正处于肃反扩大化的非常时期，王明颠倒黑白上纲上线批判李立三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苏内务部的警觉，从此开始指派专人监视李立三的行动。抗战爆发，李立三被允许回国参战，但启程之际，王明突然改口，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继续改造。两个月后，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38 年 2 月 23 日，苏联内务部在突然逮捕日共领导人野板参之等人的同时，无端地也将李立三逮捕入狱。第二天提审时，他坚定地大声回答："我叫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内务部人员十分吃惊，马上将他关进了单人牢房。不久又被传讯，无端污蔑他是日本特务，阴谋刺杀斯大林，等等。并对其施以肉刑。李立三毫不屈服，他严厉驳斥了内务部的种种无稽之谈，并写信给斯大林揭露苏联监狱的不法行为。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尔后，他被转移了几个监狱，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加之连续不断的审问以至刑讯，使李立三的肉体和精神遭到严重的摧残和打击。但是他对前途没有悲观失望，对党的信念也从未动摇。他的夫人李莎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给他以生活上的关照、精神上的安慰，使他维持着孱弱的生命，艰难地与命运搏斗着。

1939 年 7 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受审。他在军事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对他的种种指控，并致书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又把李送回了内务部。这样，又经过三个月左右时间的复杂斗争，11 月 4 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从此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涯。但问题还没有完结，直至 1940 年 3 月，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才作出结论说，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搞清了，但是，他在中国党内的问题要由中国党去作结论。因此，决定停止李立三党籍一年。这种无理的处分使得他连参加政治学习甚至参加节日游行的权利都得不到。而且，出狱后他的工作、户口均无着落，不得不靠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金维持生活。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的窘迫，并没有消磨掉他的革命斗志。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李立三在过了 15 个春秋的羁旅国外、忍辱含冤的生活后，1946 年初，终于回到

了祖国的怀抱。

(《党史纵览》作者:孔德生)

三十年代上海发生的一桩外国艺人强奸案

1935年4月底,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英国伊索古马戏班团员诱拐强奸一名13岁中国幼女的恶性暴力事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案发后,社会各界纷纷出面,谴责肇事者,积极声援、救济受害者及其家属。此案前后持续近一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

伊索古马戏班是由英国商人开办的艺术团体,当时颇负盛名,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35年4月首次来华,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对面的大华公司附近空地上设场表演,前往观看之人络绎不绝,生意空前兴隆。

4月30日晚,在上海天蟾舞台从事编剧兼演员工作的扬州人尹声涛,让13岁的养女尹阿佩出去买日用杂物。当阿佩路过伊索古马戏班剧场时,场内一个中年外国人以带她入场观看马戏为由,将其诱骗至团内,非法羁留。到5月2日,在该团所雇华人苦力王根本的帮助下,该外国人将阿佩强行奸污。

尹声涛自女儿失踪后,心急如焚,苦于无处寻找,报告法租界巡捕房求助。而阿佩在被污后,当日就由王根本带到圣母路大千世界游乐场内游玩,企图在人丛中甩掉了事,不料被在该游乐场工作的阿佩的舅父章皓月的一位同事撞见,章得知后立刻赶至寻找。王根本发现事已败露,情急之下,匆匆带阿佩逃离大千世界。章皓月紧追不舍,终于在福熙路九星大戏院门前将二人截住,报警后由巡捕带到芦家湾法捕房审问。尹声涛闻讯赶往,向女儿讯问了被污经过,捕房当即派探员与被害人一起来到马戏场内,找到了作案者及作案现场,搜出了污纸等物证,被告荷兰籍团员(捕房一直未予公布姓名)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被带到捕房拘留。捕房风化科主任通知尹声涛三日上午再来捕房,分别向荷兰领事馆及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办理起诉手续。

5月3日,尹声涛如约前往,法捕房却忽然改变态度,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而不予受理,并将在押的要犯王根本当场释放。尹声涛万分愤慨,分别致函扬州旅沪同乡会和伶界联合会,请求援助,以伸雪耻辱。

5月6日晚,伶界联合会召集会议,一致表决予以援助,并分别上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市党部等机关,请求据理交涉。

旅沪扬州同乡会也于当晚在可可食品公司召集紧急会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1)推派二人根据尹声涛来函所述进行进一步调查。(2)将被害人送医院进行检查。(3)以同乡会名义致函法捕房,交出案犯。(4)致函荷领事馆。

经过细致调查核实后,同乡会于9日致函法租界芦家湾巡捕房,要求将罪犯的姓名抄示,以便依法进行究办,同时致函上海第二特区市民联合会、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等各公团,请予一致援助,并推定鄂森、宋士骧二人为义务律师,依法提起诉讼。

5月15日,鄂、宋两位律师赴法捕房交涉,要求对罪犯依法根究,捕房方面声称此案已由法领事馆移送荷兰领事馆核办而不予帮助。

案情传出后,群情激愤,各界人士对法捕房玩忽职守,肆意庇护,私放该案要犯,无视华人人身安全等表示强烈抗议,纷纷谴责洋人之不法行为。受此恶性事件影响,伊索古马戏班的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11日晚,场内连续发生两起火警,观众四散奔逃,生意难以为继。

5月16日,尹声涛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偕其女延请鄂森律师代理,具状第二特区法院刑事法庭,对帮助洋人作案的王根本提起刑事、妨害风化的自诉,请求法庭严办。特二法院根据起诉,派孙彭衔推事承办此案。孙当即签发传票,于17日派人传送双方当事人,并通知代理律师,于20日下午1时在第二法庭审理。其时被告人王根本自经法捕房释放后早已潜逃,根本无法到案。但奇怪的是,20日下午的庭审中,自诉人父女与代理律师也均未到庭,法官只得宣布改日再审。旁听者莫不感到万分惊讶。后有传闻说,该案件已经有人出面向双方调解,被害人已有息事宁人之意,故未出庭。对此,此案代理人鄂森律师声明:"自承办此案后,一再向法捕房交涉,经法总监允许,转荷兰领事馆究办。20日庭讯,只是因为其他案件审理时间相冲突,故没有出庭。至于和解之说,本人并未参与,当事人亦未声明。"

5月26日,第二特区法院裁定,此案已经和解,不再予以受理。个中原委,当然无人得知。此案轰动一时,但就此不了了之,成为30年代上海滩的一桩谜案。

(王存奎)

抗战前华北武装走私奇闻

走私有“理”，缉私有“罪”

1935年5月17日，秦皇岛海关派驻山海关的关员率领巡缉队员数人，身佩短枪，正在山海关西长城段巡逻。当他们走至角楼湾附近，突然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向长城外面掷下一个装得鼓鼓的麻袋。与此同时，从长城下面隐蔽处冒出了两个人影，仓皇地将麻袋扛起向远方逃逸。巡缉员见状立即疾步赶上大声喝道：“站住！”城墙上二人见势不妙，慌了手脚，其中一人不顾一切，纵身跳下长城，一瘸一拐地尾追那二人逃去，另一人未及跳下，即被巡缉员逮住，押回海关，他招认麻袋里装的都是银元。

10天以后，秦皇岛海关得到举报，称有二个状似日本人的人，向长城东北隅的罗城抛下了一包银元，要赶快派人前去检查。海关当即派员奔向所报地点察看，果见有两个包裹抛在城外墙脚。又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城墙上跳下，跌入城墙外田氏中学院内，致遭重伤。关员当即将墙外两个包裹用铁钩钩起，果是两包银元。

这是当年华北白银走私的两个小插曲。象这样的走私活动，已非一日。开始时，只是个随身携带几十、几百元，偷运到关外。后来愈演愈烈，有从汽车上偷运出境的，有从火车上装入行李包内夹带偷运的。缉私人员从开往山海关的火车上，有时一天可以截住200多人，没收银元可达数万元。但尽管如此，银元走私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加猖獗，估计每天走私出境可达40万元。银元先是由各种渠道私运到山海关集中，然后由乔妆成伪满警察的日本人将银元包运至东罗城上火车，再转运至沈阳、大连发往美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又于1933年和1935年先后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非武装区”，遂趁美国政府1934年实行大量收购白银之机，由日本人出面，在关东军支持下，在华北勾结大批日本、朝鲜浪人，汉奸走私商贩，无视中国海关主权，在海上、陆上，大搞进出口武装走私，在国际上造成“华北已经独立”，不再属中国管辖的形象。

为此，日本对我海关缉私，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年五月份两次缉私事件发生后，他们由军方出面，气势汹汹地向秦皇岛中国海关提出了蛮横的要求，声称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已将长城割让给“满洲国”，中国海关不得再在长城执行巡缉，如中国方面不予承认，日方将把海关人员全部逐出山海关，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受伤人员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息事宁人，除对日方要求一一照办外，并立即指令缉私人员，从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一线撤回，并为“防止发生误会肇事”，命令缉私人员此后一律不再佩带武器，收回所有枪支。从此，华北大门完全向日本敞开了。

运输队怪哉，缉私员屈煞

白银象潮水一样流向关外，关外的走私货，则象汹涌的海浪一样涌进了关内。

1935年9月，山海关车站外的大马路上，一支谁也未见识过的“运输队”，耀武扬威地开了过来。这是一支武装走私运输大队，它由上百辆马车，200多人组成，车上满载货物，前后各有武装马队20人开道、护卫。一个日本浪人，手把盒子枪，昂首阔步，怒目而视，率领着这支队伍在中国山海关查验所大门前喧嚣而过。中国缉私人员，个个憋着一腔怒火，却谁也无法过问。

1935年9月7日，山海关车站内。一列西行入关的火车，正在站内待发。徒手的中国缉私人员进入站内，见有朝鲜浪人多人，守护在待发的私货列车房。他们正准备上车查验时，一言未了，突然有50多个朝鲜浪人，个个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棍、石块等物，蜂涌而出，将中国海关人员团团围住，棍石交加，赤手空拳的海关人员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结果多人受伤，而私货列车却长鸣一声疾驶而去。

山海关车站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国缉私人员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秦皇岛缉私队长，因扣留了私货火酒，遭到日人殴打致伤。日本浪人甚至闯入山海关海关的监察长院内，野蛮殴打守护私货人员，而将被没收的私货劫走。天津小西门卡所的关员和警长，甚至遭到了日本浪人的绑架，卡所办公室被占据，枪支被劫走，已被没收的私货全部被夺回。

海盗成“主人” 主人成“海盗”

走私规模更大的是在海上。

1935年春，在冀东留守营的海滩。距离岸边十几米处的海水里，停泊着几艘满载货物的渔船，几十辆马车，正在忙碌地运送着从渔船上卸下的货物。这批货物，又是从停泊在几百米外的海中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品种繁多，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纸、煤油、润滑油、颜料、车胎、罐头食物……等等。因为全是走私货，机帆船不敢公然停靠码头，只得远远地停泊在吃水较浅的海滩外，搞起“马车、渔船、机帆船”这样的接力运输来，然后再偷偷地发往天津等地转运内地。

到1936年春，走私的规模大大升级了。

在北戴河海湾里，大小船只密密麻麻，往来频繁，全都是走私船只。这些船只，载重有数吨数十吨的，更有数百上千吨的；船主有日本人、朝鲜人、汉奸商人的，更有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系统的；走私货物，应有尽有。可谓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所有船只，都有朝鲜浪人或日本浪人武装护卫着，就是看不到中国缉私船只和人员。

这些船只，大都是从大连开来的。除了北戴河，在秦皇岛、南大寺、留安营、昌黎等北、东沿海各口岸，无不都是这样。最多时，各地口岸停靠的走私船，曾达12000艘之多，各个码头上，走私货物堆积如山。

日本方面诡称，根据日本法律，向中国走私是正常的"特殊贸易"。为了使这种"特殊贸易"通行无阻，他们自1935年起，即操纵冀东伪政权在唐山设立了"检查所"，在秦皇岛、北戴河等地，设置了"检查分所"，从而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华北的海关行政权。同时叫嚷如果中国海关对走私船只进行检查，日本将视作"海盗"行为。因而中国缉私船只，不但不能执行缉私，反经常遭到日军炮击，被日军堵截，任日军上船检查，被迫将船上武器卸掉……受尽日军的侮辱。

"走私"不但合法，而且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公开成立了一个石河转运公司，雇有中国搬运工千余人，专事搬运走私物品。在山海关和秦皇岛等地，也有走私的专业组织。在天津成立的专营或兼营走私的"公司"或"洋行"，更是多如牛毛，足有二、三百家之多。日本还成立了海上运输保险公司，收取高额保险费用，使走私者更有恃无恐。

华北走私活动至1937年抗战爆发，历时长达3年有余，给中国财贸海关、金融工商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白银走私数额，最高时曾以每月1500万元的速度被偷运出境，致使不少银行、钱庄倒闭、停业，加深了金融危机。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走私期间累计减少2亿元。致使中国主要民族工商业如纺织、缫丝、火柴、卷烟、面粉、食糖等都先后因抵挡不住走私突袭而陷入绝境，倒闭者不胜枚举。

走私的恶果，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愈益高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1935年底，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武装走私"就是当时斗争口号之一。继而天津、上海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群起响应，反对华北武装走私的斗争，一直延续至抗战爆发。

（刘大明）

黎锦晖婚变以后

1935年，音乐家黎锦晖与影星徐来离婚。爱女也在前一年去世。他孤独一人，住进淮海路康福公寓，精神上支持不住，病倒在床，时常昏迷不醒。

在这贫病交困之时，突然出现一个17岁妙龄女郎，日夜守护在他身边，并为他请来医生治病。

这青春少女叫梁惠芳，出身上海书香世家，名门闺秀。她听到黎先生遭遇不幸，主动前来护理。他们从未见过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相识了。

梁小姐对黎先生说：

"你写的《麻雀与小孩》、《可怜秋香》、《三蝴蝶》、《月明之夜》等，童年时我都唱过，我也很喜爱，给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些优美动听的儿童歌曲，引起我丰富的想象。歌词浅明、易懂，完全口语化，主题更加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加上曲调美，流畅，易记，上口，因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自幼就爱黎先生的儿童歌曲，也很崇拜黎先生。"

黎锦晖听了姑娘的话，感到困惑、不安。

梁小姐后来回忆说："当我见到黎先生的时候，他正挣扎在极端苦痛中，使我产生同情。这样一位优秀儿童音乐家，多么需要一个真心诚意的伴侣，使 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基于这样一种心情，我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向黎先生表达我的心迹……。"

黎先生听到梁小姐的表白，反复摇头，恳切地对梁小姐说：

"我比你要大30岁，年龄太悬殊了；我现在事业无成，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两袖清风，你跟我要受一辈子苦，还有，我对以前所做的工作、过的生活，感到厌倦。路在哪？怎么走？都很渺茫。……"

梁小姐听了黎先生一席话，更感到黎先生为人忠厚、诚实而又善良。她不但没有被黎说服，反而坚定了信心。

梁小姐说："我的心比金石还坚，天涯海角永不变！"

黎先生被感动了，紧紧抓住梁小姐的手说：

"是你用纯洁的爱，愈合了我心灵的创伤，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愿为祖国尽力，也愿为爱我的人尽爱。"

他们终于结合了。只请了"明月歌舞社"的新老同事。为了节约开支，住进了"明月歌舞社"。

（赖康宁）

于右任醉后写字的笑话

1935年秋季的一天，南京于右任院长公馆内灯火辉煌，大开宴筵。宾主双方频频进酒，大家都带了几分醉意。

忽然一客建议："是否请于先生带醉现场挥毫，以现绝技。"众人拍手赞同。于先生微微一笑，点头同意，呼一声："祥麟，准备笔、砚。"随侍在侧的副官李祥麟，立即取来文房四宝。只见于先生脱去了身上的马褂，把长袍袖子卷了卷，又把长及腹部的美髯挽成一结，然后握笔，开始作书。客人们则排成一行，鱼贯趋前求字。右任先生开笔写一幅"为万世开太平"，接着再写第二幅，第三幅……内有一客已求得一幅，后又乘机再求一幅。于先生感到此人贪得无厌，乘着酒兴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信笔而书，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求书者得此大窘，手足失措。当时在场的监察院秘书长王陆一见此情景，立即俯耳对客低声出了个主意，客笑容满面，拿了字幅就走。原来，王陆一关照他把六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剪开来，装裱成"小处不可随便"。客人拍手叫绝。

翌日，于先生酒醒后，记起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乃问李祥麟副官，李笑答：确有此事，但后为王秘书长变成了"小处不可随便"。先生听罢，拈须大笑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张晴）

梅兰芳访苏演出记

苏联人民欢迎梅博士的到来

1934年3月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因筹备中国绘画展一事，特约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艺术部主任乞尔略夫斯基等人至大使馆茶叙。在言谈中，吴代办提及梅兰芳将赴欧洲各国游历并考察戏剧，在道经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将如何接待呢？乞尔略夫斯基等人表示，梅氏的艺术是举世闻名的，若能献艺于苏联舞台，则必然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就成为苏联邀请梅兰芳访苏演出的缘起。不久，苏联方面在招待杨杰军事考察团的席上，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帮办鲍乐卫对在苏联考察的中国记者戈公振说："梅兰芳如能在赴欧之前先来苏联表演，则我方将毫不迟疑，立缮请书，并可保证其表演必获成功。"戈公振是中国知名的记者，并同梅兰芳有私交，于是他便热心为梅兰芳访苏演出牵线。他先以私人资格发电给梅兰芳征求意见，不久得到梅兰芳回电"苏联之文化艺术，久所佩羡。欧洲之游，如能成行，定必前往。请先代谢文化协会之厚意，并盼赐教。"接着，戈公振与苏联国家乐剧协会的丹克曼就梅兰芳访苏演出事作具体洽谈，诸如剧团人数、演出日期、场次、地点、食宿安排、行李运输费用等等。当时苏联方面希望梅兰芳能于9月份苏联举行一年一度的戏剧节时抵达苏联，认为这将使戏剧节增辉添色。而梅兰芳因需同欧洲之行衔接，不能如期于9月份到达。在经过多次磋商后，由戈公振代表梅兰芳同苏联国家乐剧协会就访问演出的具体事宜达成了协议。

当时正值中东路事件发生不久，因为中苏利害各不相谋，两国关系比较疏远。这次梅兰芳应邀访苏演出，无疑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成为恢复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一个重要媒介。苏联方面专门组织了一个招待梅兰芳的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委员有苏联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青科剧院院长丹青科、梅耶荷尔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尔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罗夫、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国家乐剧协会会长韩赖支基、艺人联合会会长鲍雅尔斯基、名剧作家特烈杰亚考夫、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帮办鲍乐卫以及中国方面的吴南如和戈公振。12月28日，因苏联对外文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出访，代理会长库里雅科发出一封正式邀请书：

"梅兰芳先生：阁下优美之艺术超越国界，遐迩知名，而为苏联人士所钦仰。兹特敦请阁下莅临莫斯科表演，以求广为介绍于苏联民众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开示各节，遵当接受，惟盼阁下能于明年3月15日前莅临，敝会自当竭诚招待，以谋阁下旅途之安适，并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专此即颂时绥。"

邀请书由苏联驻华大使馆特派汉文参赞鄂山荫送交梅兰芳。一月后，梅兰芳复函表达感激之情："大函拜悉，殊感盛情。苏联戏剧之优越，久为予所歆羡，倘因予个人之亲近，而能增进两国之文化关系，有如阁下所言者，则未免过誉。予乐于接受阁下之美意，并预谢贵国所与之种种便利。"就这样梅兰芳访苏演出事宜谈妥了。

苏联方面盛情款待梅博士

1935年2月，苏联派"北方号"专轮抵沪迎接梅兰芳。梅兰芳演剧团以梅兰芳为团长，张彭春为正指导，余上沅为副指导，此外还有配角、乐师及管理服装道具及庶等共24人。行前，苏联驻沪大使鲍维洛夫在使馆中为他们饯行。21日下午，"北方号"启航离沪，同船的还有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胡蝶女士和周剑云夫妇。27日，"北方号"抵达太平洋海岸的重要商港海参崴，苏联国家乐剧协会特派专员罗加支基与海参崴地方当局及中国领事馆所派人员到码头迎接。梅兰芳一行下榻于砌留斯金旅馆，该旅馆规模宏伟，有着华丽的吊灯以及大理石圆柱的古典建筑，为海参崴一流旅馆。当晚，苏联远东州州长在交涉署中设宴欢迎梅兰芳一行。翌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权世恩又设宴为梅兰芳等洗尘。3月2日，梅兰芳一行乘西伯利亚快车驶向莫斯科。车行10天，沿途白雪皑皑，装缀着

一个灿烂的银光世界。北国雪景给梅兰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梅兰芳抵达莫斯科后，到车站迎接的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副司长鲍乐卫，对外文协艺术部主任契尔年斯基，东方部主任林迪夫人，作家特尔塔柯夫及中国驻苏大使代办吴南如、苏联驻华大使代表奥山荫。梅兰芳刚下火车就被众多的记者所簇拥、拍照。之后，梅兰芳、张彭春及余上沅3人下榻于都会大饭店，其他团员住新莫斯科旅馆。由于旅途疲劳，梅兰芳在苏联演出期间，谢绝各方面的宴请，仅出席3次宴请。3月14日，梅兰芳出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的午餐，会长阿罗舍夫致欢迎词，他热情称颂梅的技艺是最高艺术，又追述上一年徐悲鸿教授在苏联举办中国绘画展，以及苏联的绘画在南京展出的情况，对两国文化上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梅兰芳也报以热情洋溢的答词。

泰伊罗夫、特烈杰亚考夫等亦相继致词，除赞誉梅氏的艺术外，更希望彼此为戏剧的质量而奋斗。餐后，梅兰芳等观看了苏联当时最成功的电影《恰巴也夫》。

3月19日，梅兰芳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茶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夫妇、副委员长克列斯丁斯基、苏联政府各部要人、各国大使、公使及代表、苏联知名的作家、美术家、戏剧家、电影表演艺术家以及旅俄华侨和中外记者等应邀出席。茶点后。即在使馆的大厅中搭一座戏台，梅兰芳与刘连荣合演《刺虎》一剧，表演真挚动人，使苏联各界代表得以先睹为快，并且大饱眼福，掌声数分钟不断。演剧结束后，又有音乐、跳舞等为余光，其盛况为各宴会所未有。

3月21日，梅兰芳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鲍果莫禄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迎宾楼主办的晚餐，参加的有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苏联各大剧院院长、欢迎梅兰芳委员会的各委员、苏联对外文协、外交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大使馆的高级职员以及胡蝶女士等。鲍大使在致词中说：这次梅博士能到苏联来表演，这可以说是中苏两国文化合作的先声，若能由此而推进各项合作，则必有益于世界的和平。餐后，胡蝶女士应众客之要求，清唱一曲《夜来香》以助兴。

梅兰芳的演出轰动莫斯科

这次梅兰芳到苏联演出，在苏联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当梅兰芳从上海出发时，莫斯科的街头巷口就有许多印有“梅兰芳”3个中国字的招贴，色彩艳丽，引人注目。在一些主要街道的大商店玻璃橱窗内，也陈列着大幅的梅兰芳生活照和戏剧照。梅氏到莫斯科后，《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等报不断登载关于梅兰芳的新闻和照片，并介绍中国戏剧。梅氏演出的戏票从3月5日开始出售，不到一个星期即销售一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专门编印三种俄文说明书在剧院中出售，它们分别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大剧院所演三种戏之对白》。此时，中国的中央社、苏联的塔斯社都发出消息，苏联的新闻电影制片厂则将梅氏演剧的情形摄成影片，莫斯科电台也请梅兰芳播音。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街谈巷议，言必提梅兰芳。

梅兰芳在苏联主演的六部戏分别为《汾河湾》、《刺虎》、《打渔杀家》、《宇宙锋》、《虹霓关》、《贵妃醉酒》；六种舞为《红线盗盒》、《西施》、《麻姑献寿》、《木兰从军》、《思凡》、《抗金兵》，其他演员所演的有《青石山》、《盗仙草》、《嫁妹》等剧。

3月23日，在莫斯科高尔基街的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高尔基音乐厅是以享誉世界的苏联文豪高尔基命名的，音乐厅的中央是正厅，三面为包厢，旁边两个包厢中分别装有中国和苏联的国徽。舞台幕启后，即有一幅黄缎幕，上面绣着一株梅花和几枝兰花，并绣有“梅兰芳”三个大黑绒字。开演前，阿罗舍夫至幕前演说，介绍梅兰芳的艺术。中国大使颜惠庆向观众解释了忠孝节义，他说中国戏剧的剧情特色就在提倡忠孝节义，了解此要义即可理解中国戏剧的剧情。张彭春代表梅兰芳向观众致谢词。启幕后，第一出戏是梅兰芳与王少亭合演的《汾河湾》，演前均由专人将剧情用俄文向观众作一大概介绍。第二出戏是刘连荣、杨盛春合演的《嫁妹》，第三出是梅兰芳的《舞剑》，第四出是朱桂芳、吴玉玲、王少亭合演的《青石山》，最后一出是梅兰芳与刘连荣合演的《刺虎》。演出结束后，掌声热烈，经久不息，观众如醉如痴，梅兰芳谢幕达10次之多。

梅兰芳原定在莫斯科表演5天，在列宁格勒表演3天，后因无法满足观众的要求，随由苏联对外文协请求在莫斯科加演1天，在列宁格勒加演3天。梅兰芳在列宁格勒演出结束返回莫斯科后，对外文协又续请梅兰芳在莫斯科大剧院作告别演出。在梅兰芳演出期间，一向深居简出的斯大林亲临观看，此外苏联政府要人如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伏洛希罗夫、教育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布李洛夫以及大文学家高尔基、阿·托尔泰等均前往观看，李维诺夫夫人则每天必到，并掷花束以示敬慕。梅兰芳演出期间还收到从各方面发来的信函和纪念品。在此期间，苏联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许多太太、小姐都穿起中国古装绣花衣服，并以此为自豪。有许多戏迷买不到票，只好等在剧院门口，想一睹梅兰芳风采，苏联警察为维护秩序，不得不骑着马驱赶，始能辟开一条路。有许多女子大声高喊“梅兰芳，我爱你”，最有趣的是马路上的小孩，一看到中国人就喊“梅兰芳”，真是轰动一时。

梅兰芳在苏联期间，除演出外，还观看了大量的苏联知名歌剧、舞剧、话剧、芭蕾等。每次戏剧开幕时，即由剧

院院长介绍梅兰芳于观众之前，然后一束电光射向梅兰芳，全场掌声四起。梅兰芳还参观了苏联戏剧学校、电影学校以及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苏联 17 年戏剧艺术展览，并且应邀到艺人俱乐部演讲中国戏剧艺术，各剧院的高级艺员在听讲后赞誉梅兰芳为“戏剧大师中的大师”。在访问期间，梅兰芳专门拜会了大文豪高尔基，并把自己的戏剧照赠送给高尔基，以表示对这位文豪的敬意，这张照片至今仍保存在莫斯科高尔基博物馆。另外梅兰芳还拜会了苏联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尔德及刚好到苏联考察的英国著名剧作家戈登·克莱格等人，并分别同他们进行了戏剧艺术交流。

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虽短，却给梅兰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4 月 4 日，梅兰芳借都会大饭店宴请苏联各界人士，答谢此次苏联招待之盛意，参加的有颜惠庆大使、李维诺夫夫人、剧院院长梅耶荷尔德·泰伊罗夫、电影导演家爱森斯坦、名作家特莱杰亚考夫、名记者拉狄克以及柴霍甫夫人、柯兰女士、静娜黛·赖赫女士等，此外尚有外交人民委员会、对外文协、国家乐剧协会及艺人俱乐部有关人士和中国大使馆全体馆员。梅兰芳在致词中表示十分感谢苏联各界对他演出给予的支持以及盛情的招待，并为演出获得的成功以及苏联观众对中国戏剧的理解感到莫大的欣慰。

4 月 15 日，梅兰芳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演出活动，从莫斯科取道波兰然后抵达柏林，开始他对欧洲的游历考察，在苏联边境的涅戈列洛耶车站，梅兰芳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致电阿罗舍夫会长：“今天离开了贵国的边境，回想起我个人和剧团在旅居上所感到的快乐，环绕着我们的热情和殷勤的款待，以及能和如此聪慧的观众（他们能明了和欣赏这似乎是相去很远的戏剧艺术）相接触，自引以为非常荣幸。我在此特对贵国政府、贵会、国家乐剧协会以及所有苏联社会人士的爱护，掬忱敬致谢意。”

（刘小清、滕晓梅）

流行风

电影《大路》

《大路》——联华公司摄制，1934 年 7 月开拍，1935 年初上映，裘逸苇摄影，金焰等主演。它通过对筑路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的愿望，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舆论界好评。近来年《大路》在国内外展映仍受到好评，显示了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大路》的故事是：金哥（金焰饰）是一个由农村逃荒到城市的筑路工人。他和年轻的小罗（罗明饰）、魁梧的老张（张翼饰）、东北流亡大学生郑君（郑君里饰）、码头莽汉章大（章志直饰）和小扒手韩小六子（韩兰根饰）六个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处。由于反对工头无理开除工人，他们便遭到失业，不得不由城市转到内地乡间去修路。在湖滨工程劳动时，结识了包饭小饭铺的两个姑娘丁香（陈燕燕饰）和茉莉（黎莉莉饰），后丁香与小罗相爱，茉莉与金哥、老张结为好友。不久，日军逼近湖滨，先遣特务贿赂地主胡天，由他用金钱诱劝金哥等工人，停止对这条重要军用线的修筑。但此举当场遭到金哥的拒绝和嘲笑。胡天恼羞成怒，下令将金哥、老张等囚禁于土牢，并以死相逼。后经丁香、茉莉的探察和奔走，救援工人高举火炬，象怒潮般涌到胡家，抓住了胡天，搜查到他的卖国罪证，救出了金哥等人，但老张在与敌人搏斗中牺牲。接着，金哥等筑路工人和抗日军士共同努力，抢修公路；三天三夜后，这条军用公路终于完成。这时日寇飞机竟来空袭扫射，金哥等和前来送饭的茉莉，都壮烈牺牲。而抗日军车却一辆辆通过公路，开赴前线。

影片《大路》表现了鲜明的抗日反帝主题，而且进一步把抗日斗争与中国工人阶级联系起来，将工人阶级作为抗日救国的中心力量来描写，更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性。对工人形象的刻划，虽杂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从当时水平来看还是成功的。他们不但各有其性格特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团结友爱和坚定乐观的思想品质。《大路》在电影史上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曲工人阶级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

电影《自由神》

《自由神》——1935 年 8 月完成上映，由杨霁明摄影、王莹主演，是电通公司第三部出品。

影片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的斗争经历，再现了从“五·四运动”到“一·二八战争”的历史风云，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和时代感。故事开始于 1919 年的夏天，出身于封建家庭的女学生陈行素（王莹饰），受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为追求婚姻自主，和其所爱的同学林之彬（施超饰）由杭州私奔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之彬在报馆工作，行素从事写作，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

后因报馆被查封，他们一起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之彬投身紧张的革命工作，行素也参加了妇女运动。1925年发生了反帝斗争的沙基惨案，之彬在游行斗争中负伤牺牲。行素在医院里巧遇旧时朋友杨棣华（周伯勋饰），杨早就爱着行素，这时更是热情相助，将行素母子接住自己家中，并请护士汤秀云（吴湄饰）为其照护小孩。1926年北伐开始，行素继承丈夫遗志参军北上，并在军旅生活中，与青年军官周范（顾梦鹤饰）相爱。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危难之中，行素与周范逃往上海。这时，杨棣华携行素儿子和秀云，由广州来上海，满怀希望与行素成为眷属，可是却遭到行素的明白拒绝。杨在痛苦中，最后与表妹秀云结婚。而陈行素却发觉周范是有妇之夫，心中深为痛苦，并毅然离开了他，靠自己教书为生。"一·二八"战争爆发，在炮火轰击、一片混乱中，她又与儿子失散。最后，她极力克制自己的痛苦感情，自告奋勇来到儿童收容所，积极投入教养战争孤儿的工作。她教孩子们唱《自由神之歌》，讲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堂堂的人"。

影片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怎样由反对封建婚姻到投入时代洪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的过程。表现了妇女为争取独立自主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相一致的鲜明主题。而陈行素这个"前进中的女性"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为妇女解放指明了道路。方岩在评论文章中说："……现在舞台娜拉演过，我们再来看一看银幕上的娜拉——《自由神》。这两个剧本的意义，也截然地分做两个时期。中国需要实践生活的成群的娜拉，更需要指示'出走后的娜拉'该向哪儿去。"

电影《人之初》

《人之初》（原名《老人》）——摄于1935年6月，周克摄影，是这时期史东山电影创作的代表作。它写民国初年苏州船夫张荣根（魏鹤龄饰），与妻子素珍（胡萍饰）因无力扶养，将所生之子送与富绅黄子敬（王乃东饰），张氏夫妇因此得入上海黄家纱厂做工。留在苏州的大儿子小根（王引饰），长大后与铁匠女儿金娣（袁美云饰）结婚，后也来上海纱厂做工。这时，送黄家的儿子名家驹，留学归来当了纱厂协理。母亲素珍思儿心切，弄得神经失常。张荣根为安慰妻子，窃取家驹一张照片，却遭诬为盗而被捕，待审判时，张荣根道出真情，黄家驹贪恋财势，却不认生父，致使张荣根判刑入狱。"一·二八"战争爆发，素珍被炮火惊吓而死，张荣根受难友启发，出狱后和儿子小根参加义勇军，投入抗战行列。

这部影片通过工人张荣根与资本家黄子敬两个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衰。也表现了资本家怎样将帝国主义的压迫转嫁工人阶级，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历史真实。透过黄家驹这个形象的塑造，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剥削的本性，而且说明了阶级地位、社会生活，对人们思想性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有力地批判了抽象的人性观。与黄家驹相对照，张荣根父子所代表的工人形象，也有着时代的特点。从这部影片可以看出，这时的史东山已开始接受并运用阶级论观点，反映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显示了他创作思想的进步。

小说《长河》

作者沈从文，主要内容：

以北伐时代湘西沅上流域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未完成长篇。主人公滕长顺是由短路水手开始发家兴业的桔园主人，而他的知交老水手是十几年来穷愁潦倒，在长顺的关照下看管祠堂。当老水手传来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消息，村中人心惶惶。长顺家的桔园虽又获丰收，但却遭到保安队的敲诈勒索，而他的爱女夭夭又被那个保安队长盯上，他多方设法要娶夭夭，引起夭夭哥哥的愤愤不平。作品揭示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渗入沅上水乡后地方军政当局相互勾结对镇上商人和农民的欺压盘剥，反映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在隽永的笔调中蕴含着浓烈醉人的乡情，是作者创作中较有社会意义的长篇。但作品对农村中的阶级矛盾挖掘不深，对黑暗现实鞭挞不力，并用牧歌情调冲淡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不幸，这些都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小说《死水微澜》

作者李劼人，主要内容：

作品以甲午战争后到义和团失败为背景，描写四川成都附近天回镇一户小商兴顺号的悲剧，反映当时教民与袍哥两股社会势力的冲突和消长，揭示了革命风暴来临之前那死水一般的社会风貌。小说着重描写袍哥头子罗歪嘴，串通封建霸头，吞食了粮户财主顾天成。顾为报私仇投靠教会势力，随着北京义和团失败消息传来，他勾结屈从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官府，诬告罗要打教堂。结果官府到兴顺号来抓罗歪嘴，而受害的都是老实的商民蔡兴顺。他被非法逮捕，投入牢狱，重刑拷打，妻子又被霸占。蔡兴顺一家的悲剧是死水般黑暗社会里广大下层人民生活的生动写照。作品在刻画众多人物中，有貌似豪侠仗义、实为地痞流氓的罗歪嘴；有仗恃洋人势力发迹后无恶不作的顾天成；有向往都市文明，机敏善良又泼辣脆弱的蔡大嫂；有既不满洋人，又爱洋货的半商半官郝达三；

他们性格写得甚为鲜明突出。由于作者社会经历和历史知识丰富，书中描绘城乡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地方特产，纤细入微，生动逼真。作品大量运用地方语言和袍哥语言，无论形声状物、写人叙事，都亲切自然，更增添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诗《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
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
失掉自由也失掉了饭碗，
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
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啊！卑污的投降！
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

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愤怒，
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

（副歌）
震天的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

（光未然）

歌曲《铁蹄下的歌女》

我们到处卖唱，
我们到处献舞，
谁不知道国家将亡，
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
为了饥寒交迫，
我们到处哀歌，
尝尽了人生的滋味，
舞女是永远的飘流。
谁甘心做人的奴隶？
谁愿意让乡土沦丧？
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
被鞭挞得遍体鳞伤！

歌曲《自卫歌》

拿起一切拿得到的枪，上前！
我们没有了豆米；
拿起一切拿得到的子弹，上前！
我们没有了土地。
誓为民族牺牲，
齐向强权奋斗，
我们要决心救自己！
不要害怕，
拿定坚决的主意，
对准敌人，
举起所有的武器。
我们要自卫！
我们要救自己！
上前线去！大伙儿在一起，
驱逐我们的敌人出中国去！
今天是被压迫的民族，
明天一切属于我们自己。

历 史 档 案

中央红军长征时的人员装备表

类别		数量
人员	一军团	19880 人
	三军团	17805 人
	五军团	12168 人
	八军团	10922 人
	九军团	11538 人
	军委一纵队	4693 人
	军委二纵队	9853 人
	合计	86859 人
步枪		29153 支
轻重机枪		651 挺
迫击炮		38 门
刺刀		17552 把
梭镖		6101 支
马		338 匹
马刀		882 把
各种枪弹		173 万余发
手榴弹		76000 多个
迫击炮弹		2473 发
冬衣		83000 件
盐		34000 多斤
钱		202 万元

(选自《中共党史导续》)

红军长征情况统计表

类别	数量
时间：1934. 10. 12 — 1936. 10. 22	路上 368 天
地点：江西瑞金—甘肃会宁	25000 里
纵横省	11 个
粉碎敌军围追堵截	国民党中央军及 10 个地方军阀
翻越山脉	18 座(其中 5 座终年积雪)
渡过河流	24 条
攻占过大小城市	63 座
通过少数民族地区	6 个
整天打大决战	15 整天
夜行军	18 天
休息	44 天
平均每天行程	71 里
平均休整一次需走里程	365 里

(选自《中共党史导续》)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　(洛　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　(博　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　(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

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　《红星报》主编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译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一）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到达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从各方面抵御进攻，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人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苏区。决战防御的理由，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况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在适当距离，转移到敌人的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以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分散，使五次战役中失去了许多胜利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的胜利的理论，这等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或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我们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以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连续战斗必须给红军以休息补充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成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是战略方针不能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不变，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的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现象，指出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在紧急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与战争的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

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九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域，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维埃革命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展与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瓦解白军，继续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要胜利的。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936年5月5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从工农民主政府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沉思熟虑之。

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1936年5月5日

（《红色中华报》1936年5月16日出版）。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5年8月1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

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咪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

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分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679页)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瓦窑堡会议)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与战争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

……

二、党的策略路线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

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路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相互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团集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由于不同意苏维埃制度与土地革命而同意于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的存在，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而产生的地方割据状态，由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现在还只在中国一部分领土上胜利，此外还由于汉奸卖国贼等民族反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严重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反日反卖国贼的方式，是多样的，参加斗争的分子的觉悟程度，也是不一致的。……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

……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他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这纲领如下：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业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求得这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

四、苏维埃人民和共和国

……

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

……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

一切政策，一切努力，为着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一切与此目标相违背者，均在排弃之列。这就是共产党与苏维埃的策略路线。

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能够的，必须使它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虽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

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

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的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734页）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于俄界）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并指出：

（一）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

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三）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汪精卫元旦讲话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二十四年元旦，同时是总理就第一任大总统职于南京的纪念日。本来元旦已含有除旧布新的意义，而我们的元旦却更是推倒了四千余年的专制制度，洗涤了二百余年被异民族征服的耻辱，以创立三民主义的国家，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第一日的纪念日。这除旧布新的意义，更为深切著明了。我们想起元年元旦时那一番兴国的气象，再想着当前的国难，使我们于兴奋之中更加兴奋，努力更加努力。古人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虽然是农业时代的话，但是应用起来，可以说是我们二十四年这一年的工作，现在应该安排停妥，按时按日按月的去做。兄弟今日不愿多说，只愿对各同志把总统元年元旦就职大总统的宣言细读一过。宣言里头有几句是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者清庭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日内治之统一。我们看了这几句说话，可以知道总理对于国内的统一是有一个坚确的主张，在元年元旦宣言里说过。其后十三年颁布建国大纲的时候，重新郑重的说过所谓均权制度。总理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可惜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努力的完全实现。如今国内所需要的是和平统一，欲达到和平统一的希望，除了实行总理这种均权制度的主张，实在没有第二条路。我们亦可以说和平统一在二十三年是一种酝酿，一种运动，二十四年却是实现，而且要有条理的实现。宣言里头又有几句是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这几句话是总理外交方针，无论国难已否解除，或者更加严重，我们都要本此方针，加倍努力。所谓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是求得中国自由平等之不二法门。我们义务是当尽的，权利也是当享的。我们中国有与世界各国共存的权利，如要共存，便要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我们一面尽其在我，一面责望于人，所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是平和，不是排外。至于努力解除国难，更是中国对于世界所应有的责任。二十四年这一年承去年之后，继续做清剿共匪生产建设的工作，是无疑义的。同时二十四年这一年世界风云极其变幻，国际形势极其严重，我们在国内努力于修明政治，在国际努力于求自拔于危难，并求自立，且自进于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们只有无疑的依总理主张做去。我们有四千年的文化，有四万万民众，我们绝不自骄，也绝不自馁。我们相信总理的光明时常照耀于我们前路，我们于今年元旦朗读总理元年元旦的就职宣言，增加我们无数的决心与勇气。兄弟借这机会恭祝各位同志的健康，及今年的奋斗努力与成功。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期）

蒋介石在南昌纪念生活运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

【中央社南昌十九日电】蒋委员长十九日在南昌新运纪念会中告全江西民众，致词原文如下。

今日为新生活运动一周年，在新生活运动发源地南昌开此纪念大会，中正感想所及，特为江西的同志同胞敬进一言，赤匪盘据东南，蹂躏赣闽各省，于兹六年，而我江西父老兄弟姊妹无论男女老幼，或其亲戚朋友，直接间接被赤匪摧残逼迫杀害奸污者，其数何止百万，不但匪区民众毫无人生之幸福，而且全国鼎沸，社会动荡，凡我民族之文化美德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之四维八德均被赤匪之兽行摧毁无遗，我国民之不沦为禽兽世界者几希，回顾当时赤焰滔天，阴霾四塞，为祸之惨，甚于洪水烈火，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灿烂庄严之文物历史，几乎扫地殆尽，我江西同胞痛定思痛，回忆此种惨苦危迫与颠沛流离之情景，自不能一日忘怀，应刻骨铭心，垂为我世世子孙永远毋忘之痛史矣，今赤匪消灭，我同胞得重见光天化日，行动思想，远我本初，生命始得保障，人生方获幸福，乃有今次欢欣鼓舞庆祝新运纪念之日，我同胞须知此种精神愉快之纪念日，实为我江西同胞六年忍痛耐苦，不辞艰难，不避危险，上下一心，军民合作，积无量生命财产之牺牲所造成，简言之，即江西全体同胞本身奋斗之力量，与全国同胞努力协助所得之代价也，此种力量与此种代价是何自而产生，实由我江西军民同胞及党政各界之同志一致履行今日新生活运动之信心而来也，我国民自有此新生活运动，我国家乃得创立新生命之基础，亦唯其以此新生命为基础，乃克与禽兽行动及汉奸思想之赤匪恶战苦斗，不到一年，竟将其根深蒂固之老巢即赣南赤匪之根据地次第捣破，完全克复，因此可知新生活运动之可贵，尤可见新生活运动之精神，由礼义廉耻所发之力量，不但可以歼灭禽兽，扫荡奸孽，而且任何危险与困难之环境，皆可由此礼义廉耻四维之力量将其彻底打破，以达于康庄光明之大道，亦由此可证明此四维者，实为我国民创造国家建立社会，复兴民族，发展民生之唯一实筏也，总之，此次赤匪根本歼灭之后，往者共党之斗争，其掠夺暴虐残忍的唯物史观，实不敌于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基础的三民主义之精神，而礼义廉耻之新生活运动，尤足以消灭一切禽兽之恶行与打破一切危难之环境，要皆可不待繁言而明，是知此次剿匪之结果，实为战胜共产主义最后之决战与惟一之佐证也，南昌为新生活运动之发源地，不但应为新生活之模范区，凡我南昌同胞皆应为新生活运动之基干，依照今日所提倡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之精神与意义，加实力行，须知人生只有以劳动为本分，以服务为目的，亦必劳动基于为社会服务之观念方不致为往昔自私自利之个人主义所支配，乃能为我国家社会与痛苦同胞而努力振奋，以一扫我民族已往懒慢之恶习，与挽救我国家今日之危难，进而获得人生真正之意义，所冀江西各界同志同胞一致本此目的，无论本人与其亲友，无论学校与各机关，皆应以一人为体，数人为团，彼此相约，共同劝勉互助合作，精诚团结，时时为新生活运动而劳动，处处为新生活运动而服务，以身作则，努力推进，则新生活运动乃能彻底奏效，而禽兽成性之赤匪共逆方能根本铲除，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亦均系于是矣，中正行将离赣西征，对吾江西同胞依依眷念之怀，莫可名状，惟有以此为临别六赠言，相期共同努力，保持此剿赤平乱难能可贵而最易失堕之劳绩，继续奋斗，勿懈勿替，以奠定此复兴民族，完成革命之基础，有厚望焉，并高呼曰江西同胞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

（选自《国联周报》第十二卷，第七期）

财政部颁布紧急法令布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

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我国以银为币，遂至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凋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计自上年七月至十月中旬三个半月之间，白银流出凡达二万万以上，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本部特于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藉以遏止资源公开外溢，保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著于一时，而究非根本办法。一年以来，迭据各办纷纷条陈政府，设法挽救。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血脉所系之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近今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

（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守粮纲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经收回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

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本位币或其他金币生金等金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银行兑提法币，除金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提法币，其余金类，各依其实含纯金兑换。

（五）苟有金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以上办法，实为复兴经济之要图，并非以运用财政为目的。即中央银行之组织，亦将力求改善，以尽银行之职务。其一般银行制度，更须改革健全，于稳妥条件之下，设法增加其流动，必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并将增设不动产抵押放款银行，修正不动产抵押法令，以谋地方之活泼。均经本部切实筹划，不日呈准次第施行。国家财政之整理措施，亦已准备就绪，务求收支之适合，且自此发行统一法币之准备确实，监督严密，信用益臻巩固。所望全国人民，咸体斯旨，一致遵行，共跻国家于繁荣。事关救国要政，如有故意阻挠，造谣生事，或希图投机，高抬物价者，定以执法严绳，不稍宽贷。除分行外，合亟布告周知。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

（选自《国闻周报》第二十卷，第四十四期）

宋哲元告学生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近来各大学学生，四出请愿，其意义如为单纯的爱国运动，自为社会所同情，更为哲元所敬佩，但据确实报告，学生团体中颇不少共党分子，大多数纯洁学生，皆受共党分子所欺骗煽动，供其利用驱使，荒废学业，至可痛惜。哲元之彻底的反共态度，久为共党所仇视，乘机活动乃属意中之事，不过大多数学生应认清共党的阴谋与救国的正当途径，而加以理智的辨别，避免浅薄的盲从。冀察政务委员会与西南之政务委员会并无二致，既系中央之命，当然有其应设之必要。哲元本一军人，对政治固非所长，然为国为民，不甘落后，一切措施悉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基准，决不能为少数共党分子之宣传而受影响。最后盼望凡属明大体识大义之学生，应立即觉悟，安心求学，勿再为无益之奔走，其少数共党分子，如仍有轨外行动，哲元为维持秩序安定人心计，决予以适当之制止。

宋哲元（十二月十七日）

（选自《北平晨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2月20日　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外交方针，宣称："中国愿意与任何友邦保持友谊与和平，中日两国所发生的纠纷，可用诚意来解决。广田外相的演说，与我们素来主张大致吻合。"

2月27日　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中政会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

4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并规定《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均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

6月7日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奉中央电令即日自北平迁保定。同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结束。

6月14日　蒋介石发表《劝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剿赤匪'书》，提出办法六项：（一）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联保切结，以清"潜匪"；（二）整理地方保卫团队，编组壮丁队，成立"剿共"义勇队；（三）组织侦察网、盘查哨、守望队等；（四）建筑碉堡，兴修公路，厉行封锁，必要时坚壁清野；（五）民众间互相宣传；（六）厉行"新生活运动"。

6月25日　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原天津市长王克敏免职。

6月27日　秦德纯、土肥原在北平签订《秦土协定》。

7月29日　山西"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省纪念周上宣布防共政策，宣称山西防共应有两途径：（一）将全省"做共党目标"者共一百二十万户人民自行武装起来，在"大空隙"中大奋斗，拚命自卫；（二）实行"耕者有其田"，使佃农雇农安定化，以消灭其"大空隙"，并使基干农民武装化，以保卫社会安宁。

8月29日　国民政府明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

理委员会；今后各省市政务、治安及地方外交事件，均归各省市政府办理；其非地方性质之外交事件，则由中央处理。

9月8日　阎锡山在太原对政治工作员谈防共办法，略称：现在防共要"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准出租或私下买卖授受，地主、富农多余土地由地方政府发行无利公债收买，以"和平方法"达到"平均土地"目的。

9月16日　全国司法会议在南京举行，至20日闭幕。讨论议案四百四十六件，较重要者为：(一)各省司法经费拟改由国库负担，以所得税、遗产税及其他确定税收为底款，细则由司法院与财政部商定。在未实行以前仍由各省负担。(二)整顿县长兼理司法，逐步做到司法权完全独立。(三)试行巡回审判制度。

10月17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宪法草案原则五项。立法院长孙科派吴经熊、马寅初等七人遵照中央所颁原则审查修正。

11月1日　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到会中委百余人，各机关代表及党部职员共千余人。

11月2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决议组织"宪草"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电促两广中委到京出席。

11月5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一)追认《改革货币办法》，交国民政府通令施行；(二)《宪法》(草案)提交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三)通过冯玉祥等所提救亡大计案。

11月6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到中委八十五人。于右任致闭幕辞称：这次全会充分表现"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经过情形"异常圆满"；要求"赤诚团结"，"集中国力，充实民力，以自身奋斗的力量"度过危难。

11月8日　国民政府任命萧振瀛、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萧兼主席，未到任前由张暂代；任命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

11月12日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林森任主席，到会中委一百零三人，代表四百零五人。林森致开幕词称："今天国难的严重，更十倍于四次代表大会时"，要求大家"充分表现孙中山'第一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这两句遗训的精神，尽应有的使命"。

12月1日　汪精卫电国民政府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相继呈辞。

12月2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执、监委一百七十四人。推蒋介石、孙科、戴季陶、冯玉祥、于右任、居正、邹鲁、顾孟余、丁惟汾、陈果夫为全会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

12月4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明年5月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12月6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中执会除原设财务、抚恤、党史史料编纂各委员会外，增设海外党务、地方自治、国民经济、文化事业四计划委员会。组织、宣传、民训三委员会仍恢复为部。

12月9日　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2月11日　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李廷玉、贾德耀、胡毓坤、高凌尉、王克敏、萧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周作民、门致中、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

12月16日　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举行"一二·一六"大示威游行，四十四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参加，共组四个大队。

12月19日　教育部长王世杰对记者发表谈话，禁止学生游行、请愿、罢课，并督促各地教育行政机关执行。同日，宋哲元再致北平各校校长书，望对学生运动"取有效方法，作严厉制裁"。秦德纯再邀北平各大学校长交换制止学生集会、游行意见。

外　交

1月15日　中国驻意首任大使刘文岛向意国王爱麦纽尔呈递国书。25日，意大使罗亚谷诺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2月12日　外交部为明了各省交涉署裁撤后地方接收办理涉外情形，特设视察员视察一切。是日，行政院通过《外交部视察专员办事处规程》，全国共分十一个视察区，各设视察专员一人。

2月24日　王宠惠访日牧野内府，恳谈中日"提携"。午后，王出席日众议院各派议员菅原传等七十五人招待会，交换意见。王表示"中日亲善应以道义为中心"。

2月27日　日外相广田在日众议院预算总会席上答复议员关于中日问题的质询，谓王宠惠在日谈话内容有三：(一)中日关系应以和平方法使其密切；(二)中日外交为和平对等外交；(三)两国国民亦应互相融和。

3月11日　外交部对日苏中东路买卖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出售该路，声明中国保留对中东路之一切权利。

4月15日　驻华日使有吉回国述职，是日向汪精卫辞行，对中国政府禁止排日运动表示满意。汪设宴饯行。

4月24日　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蒋作宾与驻日暹使交涉中暹建交，并订中暹商约。

5月4日　《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正约于1930年5月16日由前外长王正廷与前驻华法公使玛德签字，其附件由于征收洋米税等问题未决，致久悬未定，后迭经洽商，是日始由兼外长汪精卫和驻华法使韦礼敦在南京正式签字。其它附件同时换文。

5月8日　日驻京总领事须磨向外交部转达日政府决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同日，日外务省将驻华使节升格事分别通知英、意、法、美、德各国驻日使馆。

5月17日　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中日互换大使，双方分别以现任公使蒋作宾、有吉升任。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日两国国交的增进，以互相尊重为原则，此次升格，亦即互相尊重的最明确的表示。"

5月22日　国民政府公布以现任驻英公使郭泰祺升任中国驻英首任大使。英国政府同时公布以现任驻华公使贾德干升任驻华大使。

5月31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奉令访日外相广田交涉河北问题，表示平、津不能划作停战区域，于学忠更调系中国内政，河北省府早已决定迁保定，即付实施，愿竭诚相商解决办法，力避事态扩大。

6月28日　国民政府任命施肇基为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派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为出席国联第十六届大会代表。

7月4日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招待驻华苏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谈话会，由鲍格莫洛夫详述苏联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并对中苏各问题详加探讨。

7月15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签订《关于设置日满经济联合委员会的协定》。该委员会设伪满新京(长春)，得对日"满"经济联系的重大事项向日、"满"政府提出建议并备咨询。

8月7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自成都返京，携回蒋介石对日交涉提案：(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二)中日关系应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在经济提携之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8月18日　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就外交部抗议日机近来不通知中国政府，在平津一带飞行、降落一事在平宣称，此种飞行"系塘沽协定所许可"，中国政府所提抗议"实无根据"。

9月10日　李滋·罗斯抵东京，偕英驻日大使克莱武访日外相广田及外次重光，商讨有关中国币制与经济问题，并声明此次赴华仅在调查，英政府并未授予对华经济援助任何谈判之权，对复兴中国经济事宜，甚愿与日政府发生密切关系。广田答谓此次调查如能制成具体方案，商诸日本，当竭力合作。

9月14日　德首任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德使馆由平迁京。

9月21日　李滋·罗斯及随员巴琦、罗杰斯抵沪，汪精卫代表余铭、孔祥熙代表徐堪及全国经委会代表唐海安等往迎。翌日接见各报记者，谈来华目的在于"调查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希望中英两国能共同合作，使贸易能有更多发展"。

10月7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访广田外相，广田根据日内阁通过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提出三原则：(一)中国应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依赖英美牵制日本，所有排斥日货及排日教育，均须一律停止；(二)中国应尊重"满洲国"之存在，并设法促进华北与"满洲"之文化、经济联络；(三)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

10月23日　河北省政府派参事郑文轩访日武官高桥，表示香河事件将以和平方法解决，并派参议刘耀东代理香河县长。同日，刘会同特警第一总队总务处长孟昭兴赴香河。

10月26日　商震与多田连日在津会商香河事件，尚无具体结果。是日武宜亭向刘耀东提解决条件三项：(一)容纳"民众"要求；(二)对事变责任者不加处分；(三)死伤者给抚恤费。刘向商震请示后，允酌予接受。

11月22日　蒋介石会见驻华日使有吉，提议以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中止自治宣言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对华三原则；并称最近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

11月29日　外交部分别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声明殷汝耕一切行为，均应视为无效；同时电令驻外各使节分别通知所在国政府知照。

12月27日　驻日大使馆代办丁绍伋衔命向日外务省提议在南京举行中日会议，调整中日关系，日方表示同意，并主张以广田三原则为重要议题。

军　事

1月4日　日本关东军在大连星浦旅馆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华侵略方针，要求中国充分履行《塘沽协定》，调整华北中日关系。实行"中日提携"。

1月10日　蒋介石企图在川黔边境消灭中央红军，是日电令各军作如下部署：四川刘湘推进川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南何键向黔东"追剿"；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向黔、桂边境推进；薛岳及王家烈向北"追剿"。

1月23日　晨10时，日机在察东东栅子投弹七枚。11时，日关东军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又在该处发四十余炮，保卫团团员及居民死伤四十余人，全镇成为瓦砾。12时，日步兵向独石口东北方之长城线进犯。

2月2日　上午11时，中日代表在热河省丰宁县大滩(今属河北省)举行察东事件"和平"解决会议。察省府代表为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长郭堉

恺；日方关东军代表为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寿夫、第二十五联队长永见、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伪满丰宁县长亦与会。会谈半小时即结束，订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兵。

2月15日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暨豫、鄂、皖边区各总指挥、军长、师长，限本年4月前将该边区红军肃清，红军重要首领全部捕获或斩杀，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

2月23日　王宠惠访晤日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及海军省军令部次长加藤隆义，恳谈中日“亲善”。

3月3日　蒋介石为夺回遵义，电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并指挥桐梓黔军于6日集中大渡里、排居场附近，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周浑元部6日集中枫香坝、鸭溪口一带，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主力集结茶山渡附近，在茶山渡至乌江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与周浑元部联络“堵剿”红军。

3月9日　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饬部协同湘军向湘西贺龙部红军进攻。红军开始撤离大庸，向桑植、永顺、塔卧转移。10日，十九师李觉部占大庸。

3月10日　上午，日军以纪念日俄战争三十周年为名，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榆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塘沽等地先后演习巷战、野战。

3月19日　何应钦为统一陕北“剿匪”军事指挥，特设北平军分会驻陕参谋团，委前保定行营参谋处长毛佩为主任。是日，毛率随员二十余人离平赴陕北绥德。

3月29日　蒋介石令周浑元部第九十九师由贵阳以北驰赴息烽“堵剿”红军；令周率所部由黄沙渡(金沙县东南)渡乌江截击。

4月6日　蒋介石乘调大军入黔追堵红军之机，压迫贵州省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交出军政权力。是日，王以“身兼纵队司令，不能兼顾省政”为由电蒋介石请辞省主席职。继又被迫辞去军职，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督战”，获悉红军大部已渡金沙江，急电薛岳亲率一、二纵队与五十三师渡江，兼程向会理急进。

5月15日　蒋介石为阻红军徐向前部西进，解江油之围，电令孙震、邓锡侯等部向红军总攻。邓锡侯部杨晒轩旅被困江油，21日围始解。

6月1日　武昌行营召开赣、闽、皖、豫、鄂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行营主任张学良代蒋介石致词，强调利用中山民校，采取“管、教、养、卫兼施”方法向所占红军根据地民众强迫进行反共教育。

6月6日　国民政府调于学忠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河北省府主席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

6月23日　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决议：察事由察省府与日方商议解决，惟须秉承平军分会与中央意旨；划定不驻兵区域问题，先交军委会详加研究后再行核办。

8月2日　蒋介石为使胡宗南纵队集中全力防守松潘，令薛岳第一纵队接替胡部自平武至高庄坝一线及水晶堡、施家堡一带防务。

8月3日　蒋介石为防堵红二十五军南进，令在成都附近之十三师万耀煌部开赴宁羌、广元、昭化一带，筑碉防守。该师是日出发，7、8两日先后到达昭化、广元。三十八旅同时向宁羌推进。

8月10日　蒋介石为控制川军，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定本日到达点验地点。15日开始，分九组进行。嗣后每三个月点验一次。

8月13日　蒋介石委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四省边区部队统归指挥节制。

8月28日　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调原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0月2日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副司令；以朱绍良、于学忠、杨虎城分任一、二、三路军司令。

10月10日　蒋介石为消灭湘鄂川黔边区红军，在宜昌设行辕。是日行辕成立，以陈诚为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务。下辖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二十六路军等。

12月31日　蒋介石为防阻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令薛岳第二路军即日攻取天全、芦山，并令刘湘饬部协攻。是日，薛岳策定先进攻红九军团在荥经西北之懒板凳、王家山、小河场一带阵地，然后歼灭红四方面军主力于天全、芦山地区。

经　济

1月2日　财政部以久大等精盐公司销量骤减，请求救济，特重订《精盐行销暂行办法》八条。

1月4日　美国提高银价收购白银，上年上海流出白银两亿元以上。沪市银根奇紧，上海外汇平市委员会抛出纯金二万零八百余条，向港购现洋两千万元济急，首批金条是日出口。香港银价高于上海，依汇率计算，损失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

1月28日　财政部赋税司长高秉坊在该部纪念周上报告，废除苛捐杂税已达二千 六百余种二千八百余万元。

1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三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经常、临时两门共计九亿一千八百一十一万一千零三十四元。岁入以关税为主，约三亿八千万

元;岁出以军费为主,约二亿九千万元。

2月2日　上海各业因年关结账,银根紧张,荣康、益康、德昶、顺记及宝大裕等钱庄相继停业。其它各业也停闭甚多。是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开紧急会议,决拆放一千五百万元,以资救济。

2月8日　自美国实施"白银政策",提高银价,收购白银后,我国现银陆续大量外流,沪市存银骤减,虽经港银运沪补充,现银仍极短缺。是日,华商银行存银二亿九千九百八十一万二千元,洋商银行存银三千五百一十万一千元,共三亿三千四百九十一万三千元。与去年同日相较,计短银二亿零六百余万元,均系去年流出。

2月16日　财政部金融顾问委员会在沪成立,委员二十一人,以孔祥熙为主席,张公权为副主席。该会为政府之财政顾问机关,亦为金融之辅助机关,其任务为听取银行界、商界建议,研究改进通货、安定汇兑行市、改善国际收付、调剂内地金融等问题。是日第一次会议,讨论奖励白银进口办法,通过复出口白银免纳出口税案。

2月19日　财政部公布《奖励外银进口办法》,规定:凡由外国输入现银(每次至少不得在五十万盎斯以下),得向海关登记,将来复出口时,准免正附各税。

2月26日　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应申新纱厂七厂第二债权人中国、上海两银行之请,将该厂假扣押。英商鲁意斯摩洋行置法院判决于不顾,于是日下午以二百二十五万元之最低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

3月4日　上海工商业因国民经济枯竭及外货倾销,日趋危殆,工商界为谋自救,特成立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是日,该协会等一百六十余同业公会及各产业职工会联名电请蒋介石、汪精卫给予救济。该会议定救济办法两项:一为信用小借款,总额五百万元,由中国银行负责组织银团办理;一为物产公估抵押借款,总额一万万元。并致函市商会、地方协会及中国银行商具体办法。

3月5日　驻华英使贾德干对合众社记者谈称:对华借款无碍中日谅解,关系各国均应参加。

3月6日　国民党中政会为解救财政困难,决议成立审查二十四年度预算计划委员会,以蒋介石、汪精卫等十八人为委员,决定审查原则为"从困难中求生",实行"苦干"方针,各就最低政务费之标准尽量节减。

3月13日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实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到会员陈果夫、彭学沛等百余人。汪精卫致开会词。会议讨论合作事业制度与法规、合作业务、合作资金及合作教育等问题。

3月15日　财政部公布《省地方银行发行暂行办法》,规定各省银行或地方银行领用中央银行兑换券,其数额须与中央银行商定报财政部备案,并应照领用数额缴存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于中央银行。

3月1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湖南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一千万元,十年偿清,以三分之一用于清偿银行旧欠,三分之二作修筑公路等费用。

3月20日　国民党中政会根据孔祥熙提议,通过发行金融公债一万万元。

3月27日　英沙逊银行董事长沙逊爵士在上海发表《救济上海金融计划》,主张国民政府"觅取英镑借款,作为抵押,发行'上海镑券'与银币共同流通"。沪银行界及宋子文均认为沙逊主张"必使中国金融益趋紊乱",表示反对。

4月1日　财政部批准中国银行股东会议关于扩充资本总额为四千万元的决议,并派宋子文等九人为官股董事。是日,该行常务董事会推选官股董事宋子文、杜月笙、王宝仑、钱新之四人为常务董事,宋子文并由财政部指派为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原董事长李馥荪、总经理张公权均辞职。

4月10日　美国政府宣布提高新产白银收买价格,由每盎斯六角四分半升至七角一分。国民政府为防白银继续大量外流,除令驻美公使施肇基提出抗议外,由孔祥熙与京沪当局及金融界商对付办法,并由宋子文迭与外商银行商合作办法。

4月13日　上海市商会因我国茶叶国外市场为日本所夺,国内市场又受军事影响,茶业资金减少,周转失灵,特电请财政部豁免毛茶转口税。

4月17日　财政部拟定救济工商业放款原则十项,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及上海银行业公会遵办。规定抵押放款一千五百万元,信用放款五百万元,月息八厘,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并规定"银行应随时监督稽查其用途","对于工厂的技术改良及商号之营业方针,银行得随时派专家指导或矫正"。

4月18日　立法院通过裁撤转口税,自本年6月1日起实行;因裁撤此项税收而短少一千六、七百万元岁收,由增加关税抵补。

4月20日　交通银行增资改组。股东会议追认政府拨付金融公债一千万元作为"官股",资本增为二千万元,分二十万股,官股占十分之六,商股占十分之四;设常务董事七人,由财政部指派一人为董事长。22日,董事会增选"官股"董事宋子良、杨敦甫为常务董事。财政部指定胡笔江为董事长,唐寿民连任总经理。

4月26日　二十四年度国家总概算,由主计处按中政会所定紧缩原则编成,计岁入七亿四千二百六十四万三千三百四十元,岁出八亿九千八百四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二元,不敷一亿五千五百七十八万零一百十二元,另筹抵补办法。

5月23日　青岛明华银行因经营地产,损失甚巨,被迫停业。平、津明华银行因受青行影响同时停业。

5月24日　上海美商美丰银行以经营地产及外汇

投机失败宣告停业清理；与其共资经营之普益地产公司、普益信托公司、美东银公司同时改组。天津美丰分行同日停业。美丰资产总额一千九百余万元，各项存款一千万元以上，发行钞票二十三万七千余元。

6月1日　中国银行储蓄部在沪成立，资本五百万元，广泛吸收储蓄存款。中、小私营银行因存户纷纷提取存款转存，储蓄业务大受打击。

6月5日　财政部以沪市近来银行、钱庄时有倒闭，停业后又复延不清理，影响市面，特训令沪银、钱业两公会，规定监督清理办法，以三个月为限；如有违法舞弊情事，予以看管惩办，逃亡者通缉。

6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资本总额一千万元，分十万股，财政部认二万五千股，余由各省、市政府认股，少量由个人承购。总行设汉口。该行为政府特许农业银行，有发行兑换券及农业债券特权。

6月21日　立法院通过民国二十四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岁入岁出各为九亿五千七百十五万四千零六元。岁出中军务费为三亿二千一百万元，占支出总数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6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海关出口税则》，果类、火柴、棉织物、海产等八十八种免税，蛋类、油类等五十种减税，共减免出口税年达三百万元左右。财政部长孔祥熙谈，因抵补办法未筹妥，减免出口税尚难实行。

6月29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公债条例》，债额一万万元，本月30日开始发行，用于弥补二十三年度总预算收支不敷之数，至三十四年6月本息全部偿清。

6月30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债额七千万元，定7月1日发行，用于"剿匪"、"善后建设"、"整理债务"，限九年还清本息。

7月4日　中法储蓄会结束，移交中央银行信托局接办，所有有奖储蓄储户，多数改为零存整取。各地分会同时停止收付。

7月15日　国民政府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规定意图营利，销毁银币或中央造币厂厂条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课一千元以下罚金；意图营利，私运银币、中央造币厂厂条或银类出口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课币额或价额五倍以下罚金。

7月26日　日本中日实业会社副总裁高木在天津召开中日实业经济专家会议，商讨中日"经济提携"及日方投资开发华北资源等问题。中日实业会社、三菱银行、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仓洋行等负责人及驻华使馆、天津驻屯军人员均出席。天津盐业、大陆、中南、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经理或行长及市府代表亦被邀参加。

8月23日　财政部在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及四明银行各增"官股"五百万元，并规定增股后，四明与中央、通商与中国、实业与交通各银行分别相联，成为"姊妹"银行。

9月1日　财政部公布，自本日起减征洋米进口税，由每百公斤一・六五关金元减至一・三五关金元；附加税由〇・一六五关金元，改征〇・一三五关金元。

9月5日　实业部为救济矿业，特成立矿业金融调剂委员会，以王正廷为主任委员。实业部长陈公博在该委员会成立会上称，决先着重救济煤业，向银界借款一千万元分贷各煤矿公司。

9月7日　国民政府公布《全国县市预算执行办法》，规定县市地方预算核定后，应公布城乡，并在当地发行或销售之报纸上披露全文；地方所有收支，应绝对遵守预算范围，否则惩处；人民对预算或法案以外征收，不负输纳义务；预算公布后，非重大特殊情形不得呈请修改。

9月16日　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因受广东银行停业影响发生挤提，周转不灵，宣告停业。沪、津、汉各分行同时清理。该行创立于民国十年，资本五百万元，由侨绅马应彪等所组织。

9月29日　"满铁"为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日前在津设立"天津事务所"，并决定在察、绥两省各设一调查机关，专司搜集产业情报及经济资料。察省调查机关设张家口，在多伦设分机关。是日渡边奉"满铁"命到达多伦。

10月1日　中美成立白银买卖秘密协定，美以白银一盎斯兑换美金六角五分之比值，向中国购进白银六千五百万盎斯。

11月3日　财政部颁布币制改革紧急令，自4日起实行新货币政策。规定办法六条：(一)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钞票为法币，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二)其他银行钞票限期兑换法币；(三)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法币发行收换及保管准备金等事宜；(四)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类者，交发行准备管委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五)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到期以法币结算；(六)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11月14日　北平市府议决平抑钱价、物价办法三项：(一)铜元价格规定每元折合五百枚，不得任意高下；钱市出入补水，差数每元不得过三大枚。(二)为防铜元流出，限定出境携带铜元，每人不得过一千大枚，逾限没收。铜元票不在此限。(三)物价平抑，依米粮各公会所定办法，米面价格以上海市价作标准，增价至多五分至一毛，逾一毛者惩罚。杂粮价格劝令粮商尽量平抑。

11月15日　财政部公布《兑换法币办法》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办法规定：银币银类自11月4日起限三个月内换成法币；古币、装饰品、工业原料等不在此限。通用银币兑换法币不得有丝毫差价，违者没收。高价收换银币、银类意图偷漏者，依法惩治。

11 月 17 日　财政部函知中央银行，准各银钱业行庄按照原有领券办法，以现金六成，搭配政府债券四成，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换取法币，或照章领用法币。

文　教

1 月 14 日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以《新生活运动纲要》为各大、中、小学补充教材。

1 月 26 日　教育部开会商讨编制简体字谱及注音符号推行问题，决定编简体字以力求易写、易识、笔简为原则；至开铸注音字模事，由汪怡、黎锦熙赴沪调查研究后再定。

2 月 10 日　《文化建设》第一卷第五期刊载郑振铎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意见，称："文化问题固然重要，但中国民族本身如何能生存，却是更大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如何使民众都有自觉的为生存的斗争心，是今日的急务，而恢复旧文化却是死路一条。"

3 月 30 日　上海市教育局会同公安局派人搜查新中国书局及现代书局，销毁《羊棚外之奇想》及《新写实主义之论文集》两书，理由是两书鼓吹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普罗文艺。

4 月 11 日　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丁文江任主席。该会准备三年内完成自山东半岛以南至长江口一段测量工作，并决定在青岛、定海、厦门、威海或烟台四处设海滨生物研究所。

4 月 19 日　据教育部发表，自 1929 年至 1933 年五年内，派至各国留学生人数为四百零九人，其中文、史、政、经各科为二百零六人，理、工、农、医各科为二百零三人。

4 月 22 日　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予法》，分博士、硕士及学士三级。

5 月 6 日　广东明德社开办"学术研究班"，轮训第一集团军政训人员。研究科目为《孝经》、《四书》、群经大义、宋明理学。6 月 8 日，陈济棠在该班讲《明德要义》，提倡读经、祀孔。

5 月 15 日　《世界文库》第一册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刊由郑振铎主编，鲁迅、茅盾、蔡元培、巴金、冰心、胡适、丰子恺等一百数十人负责注释、撰述。

5 月 27 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规定由国民政府聘专门学者三十人为评议员，院长及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以院长为议长。

该会主要任务为决定该院研究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

5 月 28 日　行政院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规定于十年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年制达到四年制之义务教育。分三期进行：1935 年 8 月至 1940 年 7 月推行一年义务教育；1940 年 8 月到 1944 年 7 月推行两年义务教育；1944 年 8 月起推行四年义务教育。违者强迫入学。

7 月 12 日　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规定一切出版物须先经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能出版，出版物审核权力在内政部。地方政府有监督、取缔新闻纸和杂志发行之权。全文七章四十九条，其中"登载事项之限制"、"行政处分"及"罚则"占二十八条。

7 月 24 日　中苏文化协会发起人在南京举行首次会议，到苏大使馆秘书沙拉托夫策夫及张西曼、徐悲鸿、王陆一等五十余人。徐悲鸿任主席。由张西曼报告发起经过。选张西曼、张冲西、门宗华、徐悲鸿、沙拉托夫策夫等九人为筹委，张西曼为召集人。

7 月 31 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考试法》，规定公职候选人、任命人员及依法应领证书之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均应经考试定其资格。考试分普通考试、高等考试两种。同日，公布《典试法》、《特种考试边区行政人员考试条例》。

8 月 5 日　考试院公布修正高等考试普通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警察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外交官领事官、司法官、监狱官、建设人员、会计审计人员、统计人员十一人考试条例。

10 月 26 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沪开常会。蔡元培、李石曾、周诒春、胡适、司徒雷登等出席，美大使詹森等列席。会议通过拨款 三十万元补助义务教经费等案。

10 月 28 日　伦敦中国艺展会开幕。展品共三千余件，其中除由中国运往约一千余件外，余均自英、美、日及欧洲各国征集而来。展览会由英皇、英后及林森任名誉会长，汪精卫、包尔温、蒋介石、麦克唐纳任会长。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6年

导　言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青年组织。

2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封锁，直接对日作战，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东进山西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歼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了山西的抗日运动。

红一方面军在5月18日组成西方野战军，为扩大苏区，在甘宁一带发动了进攻性战役。7月，在打退国民党数次进攻后，西征战役结束，历时2个多月，开辟新根据地200多平方公里。

广东、广西的地方实力派在其领袖人物胡汉民去世后，为防止蒋介石分化，打出了反对日本增兵，要求蒋介石抗日旗号，是为“六一事变”。由于蒋介石收买广东空军，粤军倒戈，桂系严阵以待，为全国要求抗日团结所追，蒋介石放弃武力解决广西计划。

7月1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成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会师。随即举行了甘孜会议，坚决抵制了张国焘分烈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会议决定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七月十日在南京举行。期间共举行过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蒋介石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仍然在抗日与妥协中动摇。

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的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保存了红军力量，标志着长征的胜利完成。

10月19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

11月13日开始，傅作义指挥绥远军民击败来犯的日伪军，绥远抗战开始。伪蒙古军在日本策动下近万人分三路大举进犯绥东，傅作义部英勇作战，在红格尔图，百灵庙击败敌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信心。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国民党政府视之如刺。11月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救国会领袖七人，是为“七君子事件”。在全国人民压力和七君子斗争下，抗战爆发后被释放。

12月12日，东北军领导人人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经过斡旋，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 ●红军东征
- ●甘孜会师
- ●会宁会师
- ●西征
-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 ●两广事变
-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 ●鲁迅病逝
- ●绥远抗战
- ●七君子事件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在北平（今北京）成立。总队长兼党团书记李昌，其他主要领导人有敖白枫、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孙传文、顾得欣、李哲人等。成立不久迅速发展到全国和海外一些地区。193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合并入青年救国会。

材料：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始末

材料一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

北平学生在扩大宣传中间发起的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这一天，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代表会议，议决凡宣传团员自愿加入者皆为民先队第一批队员。会上产生了领导机关——总队部，队长敖白枫（高锦明），秘书刘文卓（刘导生），组织部长肖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黄敬任党团书记。最早加入的队员约有三百人左右，下设二十六个分队。分队按学校成立，全市设四个区队部。

会上讨论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规约》等，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宣告成立民先队的意图："……我们明白救亡工作是繁难的，我们只有在反汉奸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作长期的抗争，才能争取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工作纲要中说明了民先队的性质：要求队员"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工作。……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还要学习理论，学习军事，"准备参加就要到来的战争。"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所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民先队的章程并没有标明是党所领导的。当然不少的民先队员后来也慢慢知道了这是党领导的组织，他们把加入民先作为接受党的领导的一种行动。

民先本来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但由于各学校及各地政治环境不一样，有的地方民先分队只能采取半公开或秘密方式。但是，在环境较好的学校则尽量公开，例如清华和燕京两校，便经常召开公开的民先队全体队员大会，并以民先的名义组织讲座，举行演剧唱歌、篮排球比赛、田径对抗赛等活动。

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向全国、向海外发展。在抗日爆发前，这是党在白区的一支有力的青年骨干队伍。特别是在北平、天津的大、中学校中，从贯彻方针政策，从搞好各校学生会，到读书研究、军事演习、文艺活动……都有民先队员在起着积极的骨干作用。由于有了这样一支骨干队伍，党的号召就便于在学生中得到贯彻，学联会所发动的各次行动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民先队的建立，把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北平的民先队之外，各地还陆续建立了类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　如上海的抗日救国青年团及南京的秘密学联、武汉的秘密学联（原公开学联被解散后转为秘密）等等。这些组织都在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的作用。

除了在青年学生中建立了上述那些群众性组织以外，北平文化界、妇女界的先进人士也组织起来了。几乎在民先队成立的同时，一月二十七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发起人为马叙伦、白鹏飞等，签名者一百一十九人，大部分是左派和中间的教授、讲师及记者们（其中骨干是一些地下党员，如刑西萍、张友渔、杨秀峰等）。他们发表宣言，表示同意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八项主张，要求坚决抗战，反对亡国外交，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北平妇女界救国会也随后成立，由刘清扬、张晓梅、孙文

淑等发起，参加者有一些左派的职业妇女，多半是各校的女学生。这个团体曾组织女学生去门头沟下矿井参观，并创办刊物《北平妇女》。

（选自《一二九运动史要》）

材料二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始末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

"一二·九"运动是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造成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发生的。它一发生，就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把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但却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慌。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各种手段妄图将运动镇压下去。蒋介石和北平反动当局，眼看单纯以武力镇压不成，便施展其政治阴谋，一方面由蒋介石亲自出马，要各学校当局和学生代表进南京"聆训"，表示"愿意听取学生意见"，在青年学生中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另方面国民党教育部又宣布提前放寒假，限令各校学生于1935年12月25日前一律离校，并命令学校当局，假期不得留学生住宿。企图使学生运动陷于瘫痪，达到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目的。

为了粉碎反动派的阴谋，共青团中央根据党的指示，于12月20日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

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一方面根据广大学生的意志发表了《为反对派代表进京聆训告民众书》，揭穿蒋介石的政治欺骗，使其"聆训"命令破产；另一方面，把党的"到农村去"的号召变成行动，于1936年初与天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扩大成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约500人左右。

宣传团的总指挥是董毓华（中国大学）、宋黎（东北大学）和江明（北平师范大学）。宣传团的党团书记是彭涛，党团领导成员黄敬。另有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党团的领导成员则留守北平。宣传团下分四个团：由韩天石（北京大学）指挥的第一团和由江明指挥的第二团是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镜湖中学等校学生；由蒋南翔（清华大学）和黄华（燕京大学）指挥的第三团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校学生；第四团由天津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

宣传团的行动计划是沿平汉路南下，先到固安会合，然后分头至保定集中。一、二团于1月3日晚，三团于1月4日凌晨出发，四团也陆续向目的地开拔。各团均化整为零，躲开军警特务的监视，1月8日先后到达永定河南岸的固安县域。但伪县长却把城门关了，诬蔑学生是"土匪"，还派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在城墙上。学生们义愤填膺，质问伪县长："你是不是中国人？"同时对守城士兵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攻势，东北学生以家乡父老同胞受到的亡国之痛，挥泪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野蛮罪行，使城墙上的士兵和围观的群众都深受感动。县城进不去，就在城外开展工作，在城内外民众的支持下，一连数日坚持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大大锻炼了这批青年爱国学生。

在固安住了四天，总结了工作，调整了队伍。由于第四团人少，将其与第一团的第三、四小队合并，原第三团不变。这样，就将原来的四个团改组为三个团。同时，重新划分各团的行动路线，1月12日又继续前进了。

队伍前进中，一路遭到便衣警察的阻挠。第二团在辛立庄被军警包围，多数团员深夜逃出，与第一团在孔家码头汇合成为一路，其他40多人，被军警武力押回北平。第三团1月14日，在高碑店也遭重重包围，团员们在暴力袭击下抗争，大家拉紧了手，一致喊出："我们死也不能分开！""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奋斗到底！"终于因手无寸铁被武力押解回北平。他们在最后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组织一个永久性的抗日团体，向日寇、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的斗争，蒋南翔等在会上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与会的热烈拥护。回北平后，1月16日第三团在燕京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第一、二两团经过艰苦工作，最后于1月21日到达保定，马上遭到大批军警的围困。虽然大家奋力反抗，终以众寡不敌，不得不在枪杆压力下结束此次影响甚大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最后一天，在保定军警严密监视下，一、二两团开了全体大会，全场异口同声喊着："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组织要永远存在下去！"全场一致通过，将"扩大宣传团"变为一个永远的强固组织，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选出九个筹备委员，负责从速组织。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北平后，中共北平市委便着手研究如何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共青团组织，一则圈子太狭小，二则太红，已不能适应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于是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和学联负责人彭涛、黄敬、姚依林等便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商量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会后，党采取具体步骤，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

锋团”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于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等。有正式队员300百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

1936年2月16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成立宣言》，充分肯定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成绩：“下乡宣传，使民众知道当前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和救亡策略”。这次伟大行动是胜利了：“徒步700里，历时3星期，博得了民众的同情，撒下了抗日的种子。”进而指出了在南下扩大宣传团基础上成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首要任务是：“一、揭露汉奸及其走狗的阴谋，并打击其种种阴谋的破坏手段；二、联合一切抗日反帝力量，不分党派，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致团结起来。”并提出具体斗争纲领：“(一)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二)成立各地民众自卫组织；(三)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四)铲除汉奸卖国贼；(五)打倒傀儡政府；(六)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产业，充作抗日经费；(七)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八)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众共谋解放！”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成立的那立起，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先进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成为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据1936年10月间的统计，全国共有31个城市先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而且也在工农中发展成员。1937年春，在北平成立了总队部，总队长李昌，总队部成员先后有：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关山复、孙传文、顾德欢等。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1936年2月1日成立起，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之日止，历时两年9个月，为抗击日寇的侵略和挽救民族的危亡，做了大量的工作，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不愧是抗战前后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支青年先锋队。

（作者黄义祥，选自《历史大观园》89年12期）

红军东征

背景介绍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亡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向山西发展并且进一步“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向山西发展还“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但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南面有东北军、西北军和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的三个军；向南发展，就会同这些军队作战，就会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西北。因此，向山西发展，“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南发展比较理想。”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决定东征，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支部队：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全军约1.3余人。1936年1月15日下达《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说明红军渡河东征是为实现抗日。20日夜在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100华里的地段，分两路强渡黄河，揭开了东征的序幕。

材料：

- 东渡黄河、进军山西
- 东征
- 红军在1936年的东征战役
- 渡河东征

材料一　东渡黄河　进军山西

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以后，部队的给养等物资问题仍然很困难。这些实际问题，也就经常使人考虑着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这些，对于当时的发展和总的局势都不利。东渡黄河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但是，东征必须保证部队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点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强渡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岸，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主席随十五军团到石楼，我随一军团到留誉镇。

东渡黄河后，我军胜利占领吕梁山之隰县、石楼、吉县，引退了敌军进占绥德、米脂的两个师。这对于陕北根据地可以减少威胁，有利于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元修建的沿黄河的堡垒，一点也没有起到阻挡红军东渡的作用。

敌人迅速集结十二个团于兑九峪，准备向大麦郊推进。如乘敌前进时，首先消灭其先头两个团（一个旅）是可能的。当时没有这样打，而采取对兑九峪三面包围攻击。此役口张得太宽，战斗一天成了相持。毛主席又即改变了计划，乘晋军后方空虚，以十五军团向北挺进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后又挺进到静乐县，宣传北进抗日；一军团进占孝义，向灵石、介休北扩张，威胁平遥、榆次、太谷、太原。这就调退了兑九峪晋军退守太原，阎锡山原进入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星夜东调回晋，使无定河两岸苏区联成一片；迫使陈诚三个军不敢从潼关北渡黄河入晋，而绕道郑州、石家庄乘火车集结榆次、太谷地区，然后逐步南压。待阎、陈主力集结向我进攻时，我军争取了一个多月时间休整，做群众工作。一军团在灵石、介休、临汾之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得现金数十万元，扩兵数千人（河南、山东人多），收缴民团武装、弹药不少。十五军团因行动时间多，扩兵筹款成绩少些，但他们回师时经岚县、柳林，在柳林以南歼敌军一个整团。当敌军进迫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

当阎、陈集中兵力向吕梁山进攻时，我们以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发表了宣言，通电国民党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各公法团体学校，并写专函给阎锡山，说明抗日主张，不愿同室操戈（从这时起对蒋介石、阎锡山等均称阎氏、蒋氏）；说明我们北进抗日，你们既不能原谅，奉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抗日先锋军暂时撤回陕北，请你们派代表前来共商救国大计等等。

东征意义甚大：消灭敌军约三个团，共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竟达数千人，还有俘虏参加红军，共约七千人；筹了四十万元左右的现金；扩大了陕北苏区。这次行动宣传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的抗日主张，对平津、太原学生救亡运动起了积极支援的作用。全军指战员都看出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政治、军事由被动转入主动，向敌人开展了战略上的进攻。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我是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具体工作。

（选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二 东征

直罗镇战斗以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粉碎了。同时，这时候陕北党组织的错误路线由于中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向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已

得到初步纠正。刘志丹同志等已从冤狱中释放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呈现了稳定的局面。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制定了东征的决定。在延长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寇正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经毛泽东同志说明，大家原则上都同意东征，但有些同志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于是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补充，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参加会议的同志最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闾甲制度。这都会给我们红军东渡造成很大困难。

当然，既然决定东征，我们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一军团先遣军在陕北延长县临镇一带休整待命，并不断地开展练兵。移防到那里，练兵练到那里。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直到组织编制，都在进行整顿。

一月二十八日，一军团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这时的一军团，已恢复了三个师的建制。即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此外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一师由陈赓同志任师长，杨成武同志任政委。战斗力显然又加强了。

整个东征军命名为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野战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协助。开始，兵分两路。彭德怀率一军团为左路军。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的第二十八军为右路军。两路军都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黄河去。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延长县古峪村——一方面军司令部即抗日先锋军司令部所在地，召集团以上干部进一步作动员，讲东征形势与任务。明确了东征的任务有三条：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先锋军司令部对渡河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此之前，林彪曾经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到黄河西岸各地进行侦察，开始想由冰上渡河，因为这一年天气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决定改由船渡。渡河工作，接受了长征的经验，组织得很严密。一军团的两个渡河点都选在绥德以东，沟口附近。强调渡河要有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

渡河前夕，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秘密而紧张地做好了渡河前的准备工作。所有集结和开进地域都封锁消息，部队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对大的居民点，都是绕道通过。二十日晚二十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

二师五团是这次渡黄河左翼的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小川里悄悄地滑出来，滑到了水深处，然后人乘上去直奔黄河中流。当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见人影绰绰，大家都压低嗓音说话，显得很肃静。只听见黄河咆哮和河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木船渐渐划向对岸，划着划着，突然对岸发出了一阵猛烈的枪声。战斗打响了，偷渡变成强渡，木船也加快了速度，很快靠岸了。我们冲上去，手榴弹加拼刺刀，敌人的河防被突破了。

渡河成功后，我们立即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通电全国。

渡河部队于二十一日拂晓占领三交镇，全歼敌人一个营。二十二日一军团的部队已全部渡过了河并乘胜占领了留誉镇。开始我们奉命在留誉镇地区开辟作战根据地。到二十六日，阎锡山组织一部分兵力向留誉到石楼一线我军占领地区进行反击，企图防堵我东进和把我赶回河西去。我们一军团主动东进迎敌，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这个旅共两个团，我们先截断了旅部、第三团与已进关上村的第四团的联系，然后当天下午，我带四师、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带二师由南向北包抄。敌人的旅部和第三团被击溃，向汾阳逃跑。第四团被包围在关上村，我们黄昏发起攻击，经过大半夜的激战，在雪后朦胧的夜色中，全歼了这个团的敌人。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步枪二百多支，山炮三门，打了东渡以后第一个胜仗。

…… ……

红军由陕北进入山西，算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带离北平、天津比较近，从平津沪流入的抗日救亡报刊杂志不少，红军收集了很多。我们从中进一步看到，中国民气很盛，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的抗日高潮是一定会到来的。

我们本来还想进一步向太行山长治一带前进。北方

的学生运动是很活跃的，想配合一下，向北发展，开拓一块根据地。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部队，配合阎锡山，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来了。

四月中旬，蒋介石派了十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另一路五个师沿正太路西进。阎锡山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共编成七路纵队，向我军压过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也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企图消灭我于隰县、石楼地区。

我们奉毛泽东同志命令，决定撤回陕北。撤退以前，在蒲县附近抓住给国民党当先遣队的关麟征的骑兵，趁他们正在睡觉之时，我们一个袭击，就消灭了它一个骑兵连，给了他一点教训，他就往后退了。随后，我一师向稷山、新绛经吉县后撤，四月十五日顺便把吉县打开了，俘敌保卫团稽查队等三百余人，又抓住了敌人一个县长，缴获了不少鸦片烟。与关麟征作战，我军也受过一些损失，苏家坪战斗，我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

五月三日和四日，一军团在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西渡黄河，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坚持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恩来同志特地从瓦窑堡赶来迎接远道归来的红军。战绩是令人鼓舞的。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七十五天的成绩统计是：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筹款四十万元，扩充新兵七千人左右。更重要的是，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政治上的收获，中国工农红军把抗日的大旗插到了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为以后八路军从山西继续北上抗日造成有利条件。总结起来，教训也有：在东渡之后，战线拖得太长，部队撒得太宽，没有突出重点。否则战绩还会更大一些。

我至今还记得东征时唱的一首歌："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即使我如今到了垂暮之年，每当哼这首歌时，仍使我豪情激荡，不能抑止。

（选自《聂荣臻回忆录》）

材料三　红军在1936年的东征战役

1936年2月，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军部队，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驰骋二十余县，所向皆捷，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为山西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的东征，是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决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一次重要战役。东征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在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指引下首次胜利地执行这一路线的军事行动。通过东征，扩大了我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巩固、扩大了陕北根据地。东征为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开创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因此，从当时和现在来看，东征在我国革命史和红军武装斗争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到山西，当时采取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有这么几条：第一，在政治上是要以这一行动宣传我党抗日救亡主张，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在军事上，红军进攻阎锡山的老巢，以调动阎锡山在陕北的两个师回山西去，借以扩大陕北根据地。第三，在经济上，在物资、财力这些方面可以得到补充。可以从战斗中获得武器和弹药，可以打土豪，可以筹款，得到物资。第四，在陕北兵力补充也有困难。到山西可以动员群众参军，从俘虏兵中也可以补充兵员，扩大红军。同时，我们还计划在靠黄河边的一些县，建立吕梁山根据地。

红军抗日先锋军进行东征的部队，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以后十五军团到了晋西北兴县一带，红二十八军就从黑峪口渡过黄河，也来参加东征了。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军东征。叶剑英同志是东征部队的参谋长，杨尚昆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同志。十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徐海东，我是政治委员。当时黄河仍结着一层冰，我们开始计划从冰上跑过去。在过河的头一天晚上，黄河一下子解冻了，无法履冰过河。好在毛泽东同志从来有两手准备，已制造了许多船，于是就乘船渡河。十五军团在南边这一路，过了黄河，就直趋石楼县城。一军团在北面这一路，过河后直指中阳县城。阎锡山沿黄河东岸苦心修筑的堡垒线，被红军一举攻破了，部队顺利地过了黄河。十五军团一部包围石楼以后继续前进。一军团向中阳一带前进。果然，阎锡山看到红军东渡黄河，就把在陕北的两个师星夜调回山西，保护他的老巢了。这时敌人从孝义这方面阻击红军，在兑九峪打起来了。兑九峪这一次作战，我们的口张得太大了，想多吃一些敌人，但口张得大了就消化不了，结果打成了对峙战，没有打成歼灭战。那时如果口张得小一些的话，完全可以消灭敌人一部。这一仗打成对峙战后，我们就分兵活动了。十五军团包围灵石县城，掩护一军团向灵石以南、汾河这一带摆起来。灵石以南，霍县、洪洞、赵城、临汾、侯马这一带，是山西很富的地方。一军团就在这一带消灭敌人，扩兵，打土豪，筹款，筹集物资。十五军团掩护一军团到灵石以南之后就北上了，就从孝义和介休中间、汾阳和平遥中间往北面去，经过文水、交城到了古交。到古交后，我们就派骑兵到太原附近袭击飞机场，向飞机场打机关枪。目的是要阎锡山把他的军队调集来保太原，以便利红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我们此后到了静乐、兴县、岢岚、岚县这一带。这时红

二十八军从黑峪口、罗峪口也渡黄河过来了。当时阎锡山的李生达师一直尾追我们。我们也想消灭李生达的这个部队,但有利条件不够,这一仗没有打成。十五军团到晋西北这一带活动,曾经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由于敌情变化,不可能建立根据地了,又沿着兴县南下,经过白文镇、方山、离石,往南转回朱家峪附近,同总部会合了。我们晚上通过离石城后,第二天拂晓到了离石城以南,阎锡山的一个团阻击我们,我们就消灭了这个团,把团长郭登瀛活捉了。以后毛泽东同志给晋军的一个纵队司令官、师长杨效欧写了一封信,我们就给了郭登瀛一、二百块钱,放他回去,让他把这封信带给杨效欧。毛主席在这封信里说:红军西渡回师,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决心。当前大事是抗日讨逆,日本为我世仇,民族叛逆则为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望晋军领袖商之阎锡山,派遣代表,共商大计。

阎锡山阻挡不住红军,就求蒋介石增援。陈诚就带十个师进了山西,再加上晋军,敌人力量太强。红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了,派一部分部队去河北抗日也不可能了。我们如果在山西停留,就会有被隔断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的危险。在这种敌情变化的情况下,中央决定红军返回陕北。十五军团东渡以来,一直不停地打仗,就先行西渡,接着总部、一军团也相继渡过。红军全部安全地回到了陕北。

红军东征直接对山西产生了政治影响,把国民党讲的共产党人杀人放火那些欺骗宣传都打破了。尤其重要的是,红军开上抗日前线,而阎锡山阻挡红军抗日,蒋介石也派军队来阻挡红军抗日,从红军的抗日行动与蒋介石、阎锡山反对红军抗日的事实,使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东征对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也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也达到了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的目的。同时,由于我们的这些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我党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建立统一战线的进程。总之,这次行动的收获是很大的。

(摘自83年《党史通讯》第6期,作者程子华)

材料四 渡河东征

一九三六年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灭亡的威胁之下,全中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这个运动的开路先锋的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全国的救亡运动,于二月开始渡黄河东征。

一

国民党反动派,对领导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是极端仇视的。统治着山西的老军阀阎锡山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沿着黄河东岸二十余县,构筑高碉暗堡,妄想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堵挡在黄河以西,不让我们开赴抗日前线。

阎锡山太不自量力了。蒋介石上百万的"中央军",尚且不能在天险的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挡住红军,难道你阎锡山就能在黄河边上顶得住吗?

二月中旬,虽然是初春了,西北高原上依然冰雪未化。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极其荫蔽地来到黄河西岸,在沟口至沙口一线,紧张而秘密地进行渡河准备。各级指挥员都仔细地研究了渡河口和登陆点。我们站在白雪皑皑的河岸上,望着滔滔的黄河水,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过去。

二月二十日夜里,渡河的命令下达了。先遣队的小船从通向黄河的小川里,静悄悄地滑向黄河。我们红二师的第五团,由二十四名同志组成的突击队,开始了敌前强渡。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夜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河水的咆哮声、冰块与木船的撞击声。突然,对岸发出一阵猛烈的枪声,冲破了寂静的黑夜。敌人发觉了。突击船上的战士们,加快了划速,互相鼓舞着:"加油!加油!登上岸就是胜利!"

小木船的速度加快了,穿过弹雨,越过惊涛,不管敌人火力多猛,一直向前。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人畏惧,受了重伤的,咬紧牙关坚持;受了轻伤的,继续坚持战斗。……

第二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路突击部队都上了岸。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河防,被撕裂开几道大口子。红军的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地渡向河东。黄河岸上到处是胜利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磨拳擦掌杀气高
是我们铁的红军……

我军突破了阎军的堡垒封锁线后,红一军团于当日拂晓便占领了中阳的三交镇,全歼敌一个营;接着乘胜前进,占领留誉镇。河东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阎锡山压不住阵脚了,他的河防军象一群丧家狗,拚命向后逃跑。我军奋勇追击。二月二十五日,红一军团在关上村截住了逃敌独立二旅旅部、第四团的全部和一个炮兵连。

关上村是在一条大川里。头一天刚下过雪。敌人被堵

在这里，变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爬不出、飞不起。红一师由西北向东南，我们红二师由南向北，把敌人包围起来后，天一黑便发起了攻击。我们二师阵地东南角的山洼里，打得特别激烈。阎锡山自己在太原有兵工厂，他的部队子弹多，打起来拚命放枪。并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多次企图突围。这是我军过河后遇到的头一次大仗，战士们劲头十足，又善于夜战、近战，因此卡住“布袋”口以后，就用手榴弹狠敲敌人。打到半夜光景，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了。

阎锡山的独二旅，战斗力满不赖，号称“满天飞”，过去哪里吃紧，就“飞”到哪里去救急。这一回却没能“飞”出红军的手。同志们说：我们把“满天飞”打成“满地滚”了。直到第二天拂晓，还满山遍野捉俘虏呢！

二

为了保证东征的胜利，关上村战斗结束后，红一军团在关上村一带略事休整。根据军团政治部的指示，部队中展开了强有力的行军作战的政治工作。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分头下连队，不断地把东征的战略意义和当前形势讲给战士们听，使人人了解行动目的。行军时，干部都深入连队，同战士边走边谈形势。那些日子里，特别忙坏了给养员，他们不仅要筹办粮草，还得学习做饭。因为部队刚从南方来，对吃小米、面食还不习惯。饭做不熟，吃了拉肚子。天气寒冷，衣服单薄，预防冻伤也是比较棘手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骨干作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依靠着党的坚强政治工作，战胜了各种困难。

敌人阻止我军于吕梁山以西的企图，经关上村一战破产了。三月初，我军继续东进至孝义兑九峪一带后，逼近了同蒲路。阎锡山看到红军全部渡过了黄河，自知难以抵挡，一面加强太原的防守，发急电要求蒋介石支援；一面调动驻守介休、孝义的部队向兑九峪兼程前进。我们估计敌人不过四、五个团，便决定把它诱进来聚而歼灭。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摆好阵势，把敌人放进了兑九峪。

三月十日清晨七点钟，我军发起了攻击。开始打得比较顺利，但突破敌人的第一线后，却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敌人利用山边的窑洞固守，集中炮火向我军轰击，炮火之猛。是五次反“围剿”以后少见的。我们占领的山头，黄土全被翻了过来。我当时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刚跳下一个土坎子，突然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觉得裤脚里湿漉漉的，低头一看，血已流到脚面上。这才发觉左腿受了伤。警卫员把我背到一个洼地里，这时看到四师的部队正继二师之后向前挺进。

从日出到日落，两军一直处在对峙状态。在战斗过程中才查明，原来敌人投进来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我军刚刚过河，没有根据地，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地形又不利，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是很困难的。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毙伤俘敌约两个团，给了阎锡山精锐部队一个严重打击。

阎锡山吃了几次苦头，不敢贸然进攻了，为了保住他的地盘，组织“防共保卫团”、“公道团”配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路严密设防，阻止我军继续东进；与此同时，又再三催促蒋介石火速发兵山西。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一军团与十五军团分头南下北上，使敌人首尾难顾，以利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于三月中旬逼近了太原附近。先头骑兵连并一度占领了距太原几十里路的晋祠。阎锡山一看红军到了他的老窝，极度恐慌。急调其主力十多个团，尾随红十五军团追赶。红十五军团带着他们，从晋中一直跑到晋西北。路经岚县、兴县等地，并在白文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渡过河的红二十八军会师。达到调动敌人目的后，又挥师南下。并在运动中歼灭了敌人近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

敌人对于红军既打不上，又放不下，只有疲于奔命，跟着转圈。这时晋南便空虚了，敌人留下的少数部队，只能固守一些城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一军团乘虚突破敌之汾河堡垒线，沿同蒲路东侧南下，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克了襄陵（今襄汾）和侯马镇。

山西人民在阎锡山长期盘剥下，生活极为困苦，农民迫切要求实现土地革命，当时党的工作方针，是把发动人民抗日和土地革命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晋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一方面普遍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做宣传员，挨家挨户去宣传，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各级政治机关还组织了一些说书的、唱戏的、搞音乐的、办小报的人，发给他们宣传提纲，要这些人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奋起抗日，反对卖国，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揭露阎钢山勾结日寇进攻红军的罪行。

为扩大抗日力量，我军大力展开了“扩红”运动。经过宣传教育后，汾河平原上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青年人络绎不绝地跑到“报名处”报名。已经来了的，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更加热爱红军，有的便又回去宣传，一串十、十串百，亲戚朋友相约而来。许多青年学生，也毅然离开学校报名当红军。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军扩大了七千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长征到陕北后，红军减员的数目很大，有些部队只剩下空架子了，有些连长下放当班长，打仗缴来的枪都请人扛。现在七千名新战士涌进部队，队伍一下扩大起来。

东征的胜利，完全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的正确。

三

阎锡山在山西几十年闭关自守，连铁路也是窄轨，不论蒋介石和其他军阀，谁也进不来。现在他的统治摇摇欲坠，只得再次请蒋介石派兵。蒋介石得此良机，四月中旬，派了十个师分两路来了。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阎锡山有了蒋介石壮胆，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压下来。这时，驻守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也企图沿黄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敌人的企图，要迫使我军背水应战，进而聚歼我军于晋西的隰县、石楼地区。

红军既然在东征中壮大了自己，又达到了调动陕北阎军回山西的目的，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的敌人决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红军回师西渡。

红二师由临汾附近向西转移，撤到清水关附近，负责掩护军团部和一、四师渡黄河。一、四师西渡前，在吉县又打了一仗，歼敌八百余名。

四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在清水关以东二十里的一座山上的小庙里，见到了毛主席。这时红军主力大部分已渡过了黄河，而主席还带着电台和一支小部队留在河东。情况异常严重，敌人二十万大军，正从东、南、北三面压过来。隆隆的炮声越响越近了。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快些过河去。主席却沉静地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说着又继续工作。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紧要的关头，那种坚毅、沉着、当机立断的气质，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急，他时常出现在那里。记得长征途中打腊子口的时候，毛主席就在离腊子口很近的地方指挥我们；夺下腊子口后，我们追歼逃敌，一口气夜行军七十多里，部队有些伤亡，也十分疲劳，有人想就地休息一下，这时毛主席来了，鼓励大家再鼓一把劲，赶到岷县去包围敌人，掩护后续部队前进。战士们看到主席，忘记了疲劳，一跃而起，连跑带跳地向前奔去。直罗镇战役时，大清早部队正要发起攻击，毛主席到了我们师的进攻出发地。那正是十一月的寒天，敌军都穿上了老羊皮袄，我们还穿着单衣呢！毛主席亲自察看了战士们的战斗准备，鼓舞战士们说："同志们，天气冷了，我们还没有棉衣，今天要找敌人'借'点衣服穿！"同志们受到主席的鼓励，把寒冷都忘了。有主席在身旁，我们就象紧挨着一团火，感到温暖，感到全身充满着力量。现在，主席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正在渡河的战士，慌乱的也沉着了，勇敢的更加勇敢起来。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渡口虽然只有几只木船，部队的秩序依然有条不紊。当毛主席随同最后一批掩护部队渡过河后，敌人的炮弹便从东岸飞了过来。同志们笑着说："听，敌人给咱们送行来了！"这时候，敌人二十万大军压在河岸上，他们望着滔滔的黄河只好隔河兴叹了！

胜利的东征结束了。在七十五天中，我军歼敌万余人，大大地壮大了自己。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被打乱了，红军在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种子，抗日的烽火在阎锡山的脚下燃烧起来。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四，作者：肖华）

甘孜会师

背景介绍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的胜利会师。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抵达陕西省吴起镇（今吴旗县）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从而胜利结束了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此同时，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到达四川省的天全、芦山、保兴地区。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中央"，放弃一切反党行为。张国焘在国民党军的大力攻击下，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3月下旬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早在1935年11月，红军二、六军团突破敌军重围，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抵达黔滇边地区。朱德、刘伯承得悉后，主张让二、六军团前来会合，遂于3月23日，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建议他们渡过金沙江北上。29日又复电，令他们到西康（今四川省）会合。5月11日，六军团抵达乡城县（今四川省），6月22日，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在甘孜县普玉隆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见了红六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并召开两军会师大会。6月30日，红二军团抵达甘孜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7月1日，在甘孜召开了庆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会，任弼时在会师大会上指出，中央已经到达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唯一的方向是北上与中央会合。7月2日，红军二、六军团与红军第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7月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的胜利会师，是红军长征得以最终完成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加强红军团结、北上抗日，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

· 会师甘孜

材料　会师甘孜

红六军团进到稻城，已经是五月下旬了。

近二百天来，我们且战且走，穿越了湘、鄂、黔以及滇、康等五个省份，不知道翻越了多少高山峻岭，渡过了多少河川，磨破了多少草鞋，吃了多少生包谷和酸涩的野果子。终日雨淋日晒、风餐露宿，人们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疲惫不堪。衣服露肉了，没有时间补，头发长了，没有机会理。敌人前堵后追，但是我们在党和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首长的领导下，终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堵截，用鲜血为胜利铺平了道路。

从湘鄂川黔边区出发以来，部队面临的困难真是难以描述。但是，大家的战斗情绪一直很高涨。在连续的长途行军中，也常听到同志们暗自嘀咕："只要有一天休息，我们便可以打两双草鞋。"可是，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

一天早晨，我们队伍集合在稻城西北面的一个地方，正准备着出发，王震政委突然走到队伍面前讲话。那天他显得格外兴奋，迎着朝阳站在部队前面的土坎上，用那很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人们霎时静寂下来。王政委又继续说："四方面军就在甘孜，他们已派三十二军到理化（今理塘）接我们来了。同志们加把劲，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去！"

"到甘孜会师！"战士们都惊喜地叨念着这句话，有的人甚至高兴地跳起来。这太意外了，刚才还发愁没有一个休整的地方，无法补充草鞋与粮食，然而一瞬间，一切都有希望了。

充满信心的长长行列，迎着东升的旭日朝理化方向前进。这里是一片绿油油的平川，在水草肥美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藏族人民牧放着的牛群和羊群。牧民们悠扬的歌声是那样动听，喇嘛寺的金色屋顶与远处山上的皑皑白雪相映，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从稻城到理化的路上，常常看到许多藏民骑着马，有的手里捧着糌粑、酥油，分站在道路的两旁欢迎我们。看见我军一到，便手举鸡子扣马赠送。因为言语不通，我们只有通过通司代为答谢。他们竖起大拇指，口里不停地念着："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

我们的病员走不动，他们用马送到宿营地。藏族人民待我们真是亲如兄弟。这一天大家的脚板也变得特别有劲，原定一天的路程，到中午十二点左右便到达了。我们在理化以南的甲洼与三十二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部队在理化休息了半天，整顿了个人卫生，进行了有关民族政策以及两支兄弟部队会合后应注意的事项的教育，便向甘孜开进了。

我们红十七师进到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宿营时，一进门便见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厚厚的麦秸。这里原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住的，他们今天上午专门把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炊事员老杨说："四方面军的同志还准备了许多柴禾，两只水缸也盛的满满的；还为我们烧好了一锅开水呢。"

刚到这里，就听说要开会师大会。

过了不久，开会的通知下来了。这天集会的动作非常迅速，没有等值星员发口令，队伍早就站整齐了。根据司令部的通知，队伍必须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

很远就看到在喇嘛寺红色的墙上高悬着："向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致敬"的大幅标语。广场上集合着许多队伍，歌声阵阵传来，里面还夹杂着女声。记得有这么两句歌词："来，会合二、六军团"，高举红旗向前进！"

当我们的部队进入会场时，从四面八方，千万只眼睛凝视着这条'巨龙"，千万只手臂在挥舞，人群在欢呼。"欢迎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藏族人民也簇拥在路旁，捧着酥油、糌粑来欢迎我们。看四方面军战友们亲切的脸孔，听了战友们鼓励的话语，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几个月来的疲劳。

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有满肚的话，就是不知从哪里说起。

"同志们静一静，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会场上马上静下来了。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了。他个了不高，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

"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接着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甘孜地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晚饭后，四方面军政治部的剧团为我们演出了《迎亲人》的歌曲和《红军舞》等精彩节目，这是七、八个月以来第一次坐下来安安稳稳地观看演出，大家都是异乎寻常地激动。

吃过晚饭后，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子。这些东西对我们南方人来说都有点稀罕。有些人过去在乡下就根本没有见过这样厚的毛衣毛袜子。有人问指导员："这是哪里来的？"指导员说："是四方面军慰劳我们的。人家怕我们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晚没有休息，剪羊毛、洗净、捻成细细的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

在稻城，我们还为衣服发愁，现在从吃的、住的到穿的都有了。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上脱下，脱下又穿上。有人提议：把毛衣好好保存起来，带到陕北去送给一方面军的同志。议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包起来了。

我分到一双毛袜子。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象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汗水和深情。他们到这里不久，装备并不比我们好，除了每人一个竹斗笠之外并不比我们多什么，象我们一样迫切需要御寒的东西。可是，他们先人后己，起早贪黑织出这样漂亮的毛织品送给我们。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晚上各连召开了干部会和党的小组会，讨论如何搞好团结，克服困难，继续完成北上抗日的光荣任务。战士们个个都表示决心，要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征服大自然的障碍，坚决北上抗日。

在这里，红二、六军团奉中央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

（作者谭尚维，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会宁会师

背景介绍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的会宁胜利会师，标志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17日发表了《东征宣言》，2月20日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到山西作战。在东征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这时，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进入山西，为避免内战，保存实力，顾全大局，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撤回黄河西岸，返回陕北。5月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与东北军、17路军发展西北地区团结抗战的局面，以及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到7月底，历时两个月的西征胜利结束，解放城镇十余座，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劝说和抵制，1936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被迫宣布取消"中央"。甘孜会师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对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斗争和抵制。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的实际工作和共同努力下，促进了张国焘的北上进军。7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8月5日，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穿过草地，抵达四川北部和甘肃南部。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去甘肃西北部的主张，朱德、陈昌浩等部分领导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提出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正确主张，得到会议的肯定。9月21日，林育英（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提出为了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本来，在三十里铺会议上已经肯定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正确主张，但张国焘仍坚持其四方面军西进。9月23日在甘肃漳县三岔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会上否定了北上的主张，决定四方面军西进。中共中央得悉张国焘西进打算后，三次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仍按9月18日部署执行，继续北上。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了北上的命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10月7日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会合。10月10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界石铺会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及全军指战员，热烈祝贺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的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史无前例的长征胜利结束。

材料：

-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 长征胜利万岁
- 钢铁战士汇巨流
- 到了家
- 毛泽东：七律、长征

材料一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4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

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剿包围。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机立断，放弃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红军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出发，分3路向川南开进。1月26日进抵土城附近，与入黔的川军郭勋祺等部遭遇，击溃川军一部。29日，中央红军从土城、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石蔺、叙永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这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得以集中全力封锁长江，各路敌军也向川南奔集。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摆脱敌人，毛泽东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中央红军乃由川南折向滇东北扎西(今威信)集结。滇军和川军又忙向扎西地区逼近。中央红军乘黔北兵力空虚之机，即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于2月18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向遵义方向前进，一路攻占桐梓、娄山关等地，于28日晨再次占领遵义城。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部2个师激战，敌军大部被歼。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的战斗中，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从重庆飞到贵阳，调整部署，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中央红军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于3月16日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当敌军新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中央红军于3月22日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并南下于3月31日渡过乌江。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部分兵力向黔东佯动，摆出东返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则直趋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主力增援贵阳，又令中央军薛岳兵团和湘军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截。中央红军趁各路敌军东调之机，即向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敌军发觉后，急沿黔滇公路追击。4月下旬，中央红军乃以一部兵力佯攻昆明，主力即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岸挺进。中央红军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下，已先于5月3日晚在绞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敌，并击溃了川军2个团的增援，俘敌600余人，控制了渡口。接着，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自5月3日至9日，依靠7只小木船，全部由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北路的红九军团，也在会泽西北的巧家附近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然后中央红军从会理北上，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了四川凉山彝族地区。5月下旬，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长征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支红军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革命力量大大增强。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继续发展。但是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退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地区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7月10日，先头部队到达松潘县城附近的毛儿盖地区。张国焘借口"目前给养困难"，仍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一再要挟党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妄想担任军委主席，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争取张国焘早日改正错误，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经过中央说服，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下，由毛儿盖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抵达巴西；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以后，张国焘即停止前进，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并擅自命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分裂党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于9月12日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共产党员，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14日致电张国焘，再次希望他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南下，向川康边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并于10月间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公然打出分裂党的旗帜。

俄界会议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下继续北上，走过残缺艰险的栈道，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到达甘南的哈达铺。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随后，渡过渭水敌人的封锁线，翻过六盘山高峰，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地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

被错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和红军。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为了打通去天全、芦山的道路，于1935年10月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10月下旬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接着又在邛崃、大邑与四川军阀刘湘主力决战。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红军虽然英勇作战，但伤亡重大。1936年2月中旬，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到达四川甘孜。此时，部队只剩下4万余人，与南下时相比减员过半。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失败，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日益不满。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二、六军团2万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1936年6月抵达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5日，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时，张国焘虽然被迫取消伪中央，但仍继续坚持其分裂主义错误，妄图煽动红二方面军进行反党活动。但是，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自甘孜出发，8月到达甘南。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带领部队挺进到西（安）兰（州）公路以北，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选自《七十年史话》）

材料二　长征胜利万岁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我们长征到达洪德城，十七日到达陕甘交界的老爷山。过了老爷山，我们继续东进，不多久便踏上了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这里往东，地势显然渐渐低落。我们快马加鞭经过铁边城附近，来到了一个叫作元城的地方，便就地宿营。

夜晚，战士们睡得很迟，熄灯号吹响了，尚有人在叽叽咕咕，要在以往，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是不是老人介绍村史带来的激动？是，但又不全是。因为大队长提醒我，还有几十里就要到吴起镇了。是啊，快到陕北抗日根据地了，这怎能不让我们的战士激动！

十月十八日这一天，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时，队伍中顿时沸腾起来了！“吴起镇到了！”同志们欢叫着冲着跑了下去，看到这个欢乐、热烈的场面，我们都很高兴。

是的，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和整个红军一样，经过万水千山，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不少同志流了血，许多战友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早就听说，吴起镇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名将吴起的功绩而命名的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一看，除了一条小河，一排古老的窑洞之外，却看不出有什么纪念吴起的古迹，倒是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们。

啊，原来这里挂的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

苏维埃！多么亲切的名字啊，见了她，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可不是，自从去年离开瑞金、于都河，无论在巍巍的雪山上，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不管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都惦念苏维埃。如今，在陕北吴起镇的窑洞门口，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名字！

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同志来了，我们互相祝贺、互诉衷肠。

没隔多久，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也来到了吴起镇。我们红军刚想在吴起镇安营休息，怎知敌人又追上来了。

自从过了哈达铺，我们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迅速北上抗日，一般不和敌人硬打，尤其进入陕北后，更是如此。除非敌人穷追、拦阻，惹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给予还击，搬去前进路上的障碍。

然而，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十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八时整，我们埋伏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王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刹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脚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

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在打扫战场，清理缴获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的密电，电报称：

"……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红军长途行军""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这话都不假，但却是我们"相机包围"了蒋介石的骑兵，并把他们给歼灭了。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就在我们回击二马骑兵的同时，军委警卫连、工兵连在左权参谋长的率领下，也拔掉了陕北最反动的地主豪绅安在千佛山的一根钉子。原来那里有一股反动民团，经常下山来作恶，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这次把他们消灭了之后，附近各县的乡邻全都拍手称快，他们欢天喜地，抬着猪、羊来慰问红军，红军的威信更加高了。

打完二马骑兵，我们在吴起镇边休整了一个星期，十月三十日，在陕甘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送下，我们又向陕北甘泉前进。经过几天的行军，于十月革命节前夕，即十一月六日，在甘泉县附近的区域里，我们中央红军与刘志丹、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二十七军会师了。虽然那天天降大雪，我们仍穿着单衣，但情绪很高，心里始终觉得是热乎乎的。

吴起镇战斗之后，有一天，我和王开湘同志由于事先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而这个会为了防止敌机骚扰，确定天一亮，就在吴起镇附近开。于是便从驻地骑着马直奔会场。

天刚蒙蒙亮，会议开始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等同志先后走进会场，会场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同志首先讲话，他说："同志们，辛苦了！"话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刹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时太阳在天空露出了笑脸，阳光灿烂，只觉得周身的热血直往上涌。

毛主席这会儿打着手势，说道："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会后，部队进行了休整，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红二、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国民党军的追剿堵截后，于八月底进到甘肃南部的渭源陇西地区。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原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地区。十月八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全国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选自《伟大的长征》作者：杨成武）

材料三　钢铁战士汇巨流

1936年9月11日，二方面军按照计划分为三个纵队向陕甘交界处出动，迅速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同时，一方面军亦于9月13日从同心城南下，经海原、固原地区，进至西兰大道，占界石铺，将敌许克祥部包围。正当计划即将实现的时候，张国焘却拒绝协同一、二方面军聚歼敌人，他以组织岷洮西战役为名，擅自率领四方面军向西撤走，往青海西宁方向退却，破坏了三个方面红军互相配合的形势，丧失了歼敌的有利时机。

接着，西北局（1936年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便在岷县的三十里铺开会。会议开了整整一夜，斗争十分激烈。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力主北上，同中央会合。张国焘最终表示放弃自己意见。9月19日，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可是，张国焘却于20日晨，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跑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他一到就召开干部会议，利用大家还不了解已经开过岷州会议的机会，欺骗前方部队干部，煽动继续西进。9月22日，张国焘打电报给中央，说什么"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叫嚷："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了向中央封锁消息，他还命令机要部门，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朱德在带领司令部北上途中，收到张国焘要部队停止北上、改向西进的电报。他一面马上向前方部队发了急电，要部队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一面排除阻拦和封锁，向党中央发出反映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的电报。于是，在漳县再开西北局会议，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的行为，进行斗争。27日，党中央命令停止西进，并要原在通渭的部队立即回占通渭，其余随即北上。

当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逃跑错误，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徐向前警告张国焘："再要翻雪山、过草地，是没有人跟你去的！"张国焘随身带的一支

"传令队"(即警卫队),听说又要西进,集体离开张国焘以示抗议。临走时,他们留下一个字条,大意是:"张主席,我们跟随你多年了,我们听说你要带我们去青海,再过草地,我们不去了。我们不愿无辜地死在草地。请你相信我们,我们决不会投降敌人,我们要继续革命……"在多方面力量的作用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再一次放弃西进。9 月 29 日,四方面军指挥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但由于张国焘破坏协同行动,放弃了掩护二方面军北上的任务,使二方面军遭到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严重损失,并延迟了与一方面军的会师时间。

从 9 月 30 日起,四方面军分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一方面军于 10 月 2 日攻占会宁城。

10 月 8 日,四方面军四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9 日,朱德、徐向前等到达会宁,受到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与一方面军会师,回到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是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渴望已久的心愿。会师前,四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讲话大纲,这样写道: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眼睛望穿了……听到了党和军委决定要四方面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消息,我们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不放松一秒一分的准备,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准备铲除任何企图阻拦我们的敌人,来会合你们……就这样,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的会合。当会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在行军中,在宿营地,在火线上……没有一个人不在欢喜地庆祝这件事……"这份热情洋溢的文件,充分表达了当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克服张国焘的种种阴谋阻挠后,对于三大主力会师的狂欢心情。

10 月 10 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城举行盛大的会师联欢大会。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全场欢跃,士气高涨。一方面军把久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纷纷送来。

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四方面军同志们手捧中央的贺电,个个喜笑颜开,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花。

10 月 22 日,二方面军也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12 月 7 日,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红军三大主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而英勇奋斗。

(节选自璞玉霍、徐爽迷:《铁流两万五千里》)

材料四　到了家

经过了千万里艰苦转战的二方面军,终于来到了陕北。

连续几天没有打仗,我们都猜想着:是不是已经到了根据地?可是又不象,因为部队仍旧日夜不停地往前赶。

一天半夜里,部队正在快速前进,前面突然传下话来:"跟上,不要掉队,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消息象一股旋风飞掠过来,队伍里马上掀起一阵欢腾的风暴:"到家了!到家了!""就要见到毛主席了!""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合了!"这是一年来日日想夜夜盼的事啊,现在可盼到了,谁不高兴呢!同志们象脱弓的箭似的甩开大步,唰唰地赶上去了。

我带着总务处的一个挑夫班和一些勤杂人员走在后面。听到会合的消息后,我们也鼓足劲头向前猛赶。可是,经过长期行军作战,人员减少了,大家早把两担并作一挑,每挑都有七、八十斤重,赶着赶着,渐渐地掉队了!大家都为不能早一些见到毛主席,不能跟部队一起去和中央红军会合而扫兴。

拂晓以前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只见前面黑暗中有火光在闪烁。

"喂!看见亮了!"大家一齐欢呼起来。

挑夫班的徐班长,举起手指着前面,兴奋地说:"革命的道路真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堂啊!前面的部队怕已经和中央红军会合了,同志们!加劲赶吧!"徐班长的话更加鼓舞了同志们,大家都加快脚步,朝着火光奔去。

"哎呀咧!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拖得敌人叫爹娘,哎呀咧!……"前面又传来了一阵歌声。

"兴国山歌!兴国山歌!"同志们一阵欢呼。这是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流行极广的民歌,已经一两年没有听到了,如今,忽然听到它,感到十分亲切。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呼:"哎!同志——"

前面有六个同志围着一堆火唱着,有的低着头在火里拨着什么。听见喊声,他们一起站起来,迎着我们边跑边喊:"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二方面军的吧?"

"是啊,你们是中央红军吧?"

"是啊!是啊!"两边同时回答,两边同时靠拢。我们有的同志撂下挑子,就扑了上去……。阶级弟兄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革命同志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激情的拥抱,表达了长久的思念;跳动的心声,倾诉着漫长的、艰难的历程。

他们拉着我们围拢在火边,把一个个热呼呼的洋芋硬塞在我们手里,还很不过意地说:"前面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是在这里等你们的,没什么好的,先将就吃点吧!"熊熊的篝火,向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接待。这一切是多

么温暖啊！虽然是在旷野里，我们的心里却连连地默念着："到家了！到家了！"告别了他们，我们又继续赶部队。太阳出来的时候，远远望见山麓下升起一缕缕的炊烟。走近了，才看出是窑洞。村口有个人向外了望，看到我们，急忙回头又叫来两个人，一同在路边站着。

"同志！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走近时，其中一个扎着围裙、带着福建口音的同志问道。

徐班长回答说："我们是二方面军六军团政治部的……。"

"啊！你们真辛苦了，辛苦了！快进去休息休息吧！"他们三人连说带拉地把我们让进一孔窑洞。

坑桌上整齐地放着十几副碗筷。他们先拿来一罐开水，接着又端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和羊肉炖山药蛋，连声地让着"快吃点，快吃点。"饭菜的香味很诱人，可是谁都不动手。大家好象都是一个想法：一来怕掉队掉远了，二来也觉得不好接受这么丰盛的招待。有个同志起身对我说："处长！咱们走吧！"

照顾我们的一位同志听了不知所措，急得叫起来："班长，班长！二方面军的同志要走。"

那位福建同志赶忙堵在门口，埋怨道："到了家了，还急什么！你们走这么远，挑这么重，还能空着肚皮赶路？你们不吃，教导员回来还要批评我们哩！"我只好叫大家都坐下来。

原来，这是中央红军一个营部的炊事班。班长见我们十几个人都接受了他的招待，不客气地吃起来，就眉飞色舞地打开话匣子："今早，天没亮，过去许多二方面军的同志。我们等你们好久啦！袜子、毛巾、牙膏、牙刷都送到前面去了。这饭也是为你们准备的。"他指着满桌子饭菜说："都得吃光，一点也不准剩。"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正笑着，他忽然往我身上看了两眼，转身从背包里翻出一块蓝布，里里面面看了看，又偷眼望着我，拿着布踌躇起来。我心里纳闷：他要干什么呀？

另一个炊事员好象领会了他的心思，说："班长！我有，我有。"他急忙拿出了一个布包，把包着的干粮倒在班长那蓝布上，然后把这块黑布递给班长，笑嘻嘻地说："这还是东渡黄河的时候，司务长分给我的呢！"

班长抖着那块布，直朝我走来。唔！他多细心呀，原来他见我衣服破了，要给我补衣服啊！我刚想推辞，班长已拿着那块黑布走到我面前，关切地望着我说："同志啊！补补你的衣服吧，整整齐齐地去见毛主席！"

这件黑单衣，还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从湖南桃源穿出来的。整整两年了，已经烂得很难再补了。可我还是接受了他的关怀。我要把衣服补好，用这标志着阶级兄弟的团结友爱来纪念长征的胜利，纪念伟大的会合，纪念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材料五　毛泽东七律长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西征

背景介绍

1936年，蒋介石调集16个师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这次"进剿"，蒋介石以嫡系汤恩伯的一个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一个旅以上的兵力，渡黄河入陕，协同陕北井岳秀、高桂滋的两个师，采取堡垒主义政策，向陕甘根据地的东北部进攻。同时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

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首先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蒋、阎军和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二十八军、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路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攻占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等地，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

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作积极准备。

材料：

- 李卓然回忆西路军
- 西路军悲歌行——史沫特莱访李先念记
- 喋血西征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始末
- 西路军失败后领导人的去向
- 西路军被俘人员蒙难纪实
- 补连壮歌——记曾日三烈士

材料一　李卓然回忆西路军(部分)

1936年10月，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二、四方面军终于与一方面军在会宁汇合了。我同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带四方面军之主力三十军、九军，与任弼时同志所率二方面军在会宁集结，准备北上赴陕北。这时，我听说中央有一个岷州会议(或洮州会议？记不清了，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打算让四方面军的主力过黄河，配合中央红军打宁夏。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部署。宁夏的驻敌是马家军的骑兵，虽然不易打，但两边配合起来，还是可以的。我相信中央曾有过这样的计划，为此才成立了西路军。后来中央是否又撤销了攻打宁夏的计划，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电报和命令，不得而知。当时我所听到的只是陈昌浩同志传达的中央及中央军委的电令，命令：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四军、五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编)组成西路军过黄河，剩下的二方面军和部分一方面军的队伍经会宁去陕北。西路军过黄河的宗旨在于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那边得到援助，得到新式武器。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计划，我们那时正是缺乏武器，自然很高兴，士气很高。

由三十军、九军、五军的主力及一些零散部队组成的西路军按照中央的电令，迅速过了黄河。我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但对中央攻打宁夏计划的内情一无所知，何况在当时那样风云变幻的、残酷的战争年代，根本无从估计也无法预料这次行动将会在我军历史上产生怎样的结局。

我当时跟着三十军，与李先念同志在一起。这是一支很能战斗的军队，军长是程世才，李天焕的政治部主任。九军的政治委员陈海松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在中央军委任职的洪学智，当年是四军的军级或师级干部。但他们也都跟我一样，根本无法了解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情况，不知道中央内部的矛盾斗争，因此也就根本无法预料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

我们按照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准时渡过黄河后，开始还打了几个胜仗。因为那时大家不怎么疲劳，给养、弹药也充足，士气又高。马步芳的骑兵还是很怕红军的，我们这些土地革命时期出来的战士，作战很勇敢。但到了后来，黄河的通路阻断了，增援部队上不来，撤又撤不回去，西路军等于是孤军深入，弹药、粮草、人员都无从补充，情况就不好了。马家军地上跑的是骑兵，天上追的是飞机，因此我们只能改在晚上行军，白天打仗。晚上走路，天气很冷，我的大胡子上都结了冰，冻成冰条了。更糟糕的是冰天雪地，夜路难行，我们走几天的路程，敌人骑兵几小时就追上了，搞得我们不能休息也不能做群众工作，有时甚至连做饭都来不及。敌人是吃好睡好，骑着马追我们、打我们，而我们则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汉朝李陵答苏武书有这样一句："步马之势，势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打胜仗可言呢？加之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与我们有隔阂，我们得不到任何给养，再勇敢，再是铁的队伍也不行，都会被拖垮的。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经常是我们行军后刚停下来休息，筑工事，敌人就追上来了。马步芳的骑兵多，打起仗来是很野蛮的。我们的队伍里牺牲最大的是连长和指导员。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光靠精神、靠勇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人，疲劳了，受伤了，总不能再战斗了，孤军深入的一支部队，怎么能与马家军的骑兵相持很久呢？不到了那个具体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到当时的困难和艰险的。但我们的战士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有时候打仗不但靠勇敢，还要有智谋。记得我们过黄河不久，快到永昌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地主的土围子里(象我们汉族的小村落)，总部200多人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当时大部队已经走到前边去了，只有两个特务连的兵力留在总部。我们刚要起火做饭，马家军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敌人是骑兵，且兵力又远远超过我们，而我们总部里还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硬夺。于是我命令两个特务连守住围子口，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巧打。敌人虽然多但都是骑兵，使用的也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他们只能把手榴弹扔出来，我们就很快地再给他扔回去，让那些手榴弹在外边爆炸。

这样直打到天黑。趁着黑夜我们在围子边上挖了一个洞准备突围，但被马家军发现了，他们在外边死死守住洞口，我们冲不出去，又是一阵激战，如果再拖下去，我们弹药没了，就危险了。于是我就把两个特务连调到别处去另挖洞，只让我的两个警卫员邱正基和黄坤(现名胡子昆)用绳子打个套悄悄地守在洞口。马家军在外边听见枪声停了，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于是很嚣张，大喊大叫着一个跟一个地从洞外冲进来，那两个警卫员就进来一个套

住一个，拖到后边铡死。后来敌人发现不对劲，但这时我们的洞也挖好了，又得了许多武器，一个特务排冲出去，掩护大家突围了。

1936年底，部队打到河西走廊一带时，情况就更糟了。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不利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再与敌交战。河西走廊北面是沙漠，南边是冰雪覆盖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当地居民回、汉杂居，长期受国民党部队欺压，马家军欺骗，不了解红军。这时马步芳和马步青又纠集了青海与河西的民团几万人，用几倍于我的兵力，想一口吃掉西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没有得到中央任何阻止西路军西进的命令。广大指战员尽管衣衫褴褛，弹尽粮绝，仍然斗志昂扬，他们的意志来自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但是，我们这支几番出入草地，连续作战，从未得到休整的部队，那些坚强的士兵们又怎么会想到我们即将面临的失败和考验是那么惨重与严酷。现在想来我们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将十倍、百倍于敌人的攻击。

进入河西走廊不久，西路军便连续失利，先是九军折兵古浪，原6000多人的队伍已不足3000；然后又是五军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总部当时和五军相距几天的路程，无法接应，后来听一位逃出来的女战士讲，董振堂同志最后被火焚于一座破庙，他殉难时才42岁。我和董振堂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他那时是红五军团军团长，我给他搭档政治委员。他为人正直，作战身先士卒，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们退进祁连山前和马家军的最后一仗是在梨园口一带打起来的。梨园口是一个靠近祁连山的山道口，刚进去还能遇见喇嘛庙，还有商店和人，走一两天的路程后才真正进入了荒无人烟的祁连山。部队退至梨园口，后边是冰雪覆盖草木不生的祁连山脉，前面是凶残追击的马家军骑兵，我们只有在这里甩掉敌人，退入祁连山，才有生路。因此这是决一死战的一仗。我们的战士用机枪封住狭窄的山口，敌人来了就干，就连炊事员也拿起扁担和敌人拼。梨园口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经过激战，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附近转移到一座小山上，我记得这座山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在这里我们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后来人们称这为“石窝会议”。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2万多人的队伍，打得不足千人。面对这样的惨败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在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陈昌浩同志讲了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存力量要把干部分批化装护送过黄河，去找援西军。他和徐向前同志在部队里目标太大，因此他们第一批离队过黄河去找刘伯承的援西军，然后去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徐向前同志很沉闷，一直没讲话，似乎是不想走，但会议已经决定了，也没有办法。徐、陈二人化装后由战士护送过黄河。我们剩下的几个主要干部带领西路军残部转入祁连山。

（选自《悲壮的征程》，口述李卓然，李延风整理）

材料二　西路军悲歌行
——史沫特莱访李先念记

史沫特莱小心翼翼试探性地问道：“李将军，你可以告诉我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的一些情况吗？”

“可以。”李先念略加思忖后答道：“你想知道什么？”

“请随便谈。”

李先念理了理思路，虽然心潮澎湃，但仍然十分平静地叙说着。

“1936年10月下旬，西路军西渡黄河，在既无后方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数倍于我的马家军艰苦作战达五个月，我军虽然毙伤敌军总指挥马廷祥、马元海以下25000多人，但我们自己也由2万多人减员到不足3000人，可以说损失惨重。1937年3月14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紧急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保存基干力量，会议决定将这3000人编成三个支队，分散行动：以红三十军剩下的约千把人组成左支队，由我和程世才带领，向南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以红九军剩下的500多人和百余骑兵组成右支队，由王树声带领向北，依托祁连山北麓展开游击战；总直特务团两个连和伤病员组成中支队，由毕占云带领就地坚持游击。会议还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由我和李卓然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我统一军事指挥。各支队如何突出重围？到何处去？如何生存？会上没作研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所以统一指挥是无法做到的，只好各奔东西了。”

“李将军，你能否告诉我石窝分兵后，你率领的左支队的一些具体情况？”史沫特莱插话问道。

“行。”李先念爽快地回答：“石窝分兵后，我带领左支队千把人，向祁连山进军，当时最大的困难，除了敌人围追堵截外，就是饥饿和寒冷。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战士们的米袋子早已空了，岂止是一顿，有好些顿了。祁连山区荒无人烟，部队无法补给，饿肚子是走不出祁连山的。”

“那你们是怎样渡过这个难关的？”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我正为部队饿肚子犯愁。忽然，我看到我的警卫班长巴方庭扛着一头黄羊朝我跑过来，嚷嚷道：‘首长，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我心里一亮，祁连山有黄羊，说不定还有野牛、野马。我即刻命令部队组织打猎队，捕捉黄羊等野物。战士们忘记了饥饿，忘掉了

疲劳，为了生存，他们拚命追赶捕捉黄羊、野牛……这一着还真灵，是黄羊、野牛救了我们。战士们围在篝火旁烤黄羊，炖牛肉，虽无油盐，但吃得很香。至今想起来，还口留余香呐。"说到这里，李先念笑了。

史沫特莱也跟着笑了："你真风趣。这么说，你们战胜了饥饿。那么，你们如何抵御寒冷呢？"

"寒冷与饥饿同样可怕。"李先念颇有感触地说："要说寒冷，真有点叫人毛骨悚然，直打哆嗦。那时，也和今天一样，冰天雪地，但祁连山区的冬天比我们湖北可要冷得多，气温零下30多度，冷得鸟儿也从天上栽下来，真可谓天寒地冻。而我们的战士还穿着破烂的单军装，没有棉衣，有的只裹着一条破毯子。白天行军打仗还好一点，一到夜晚，呼啸的北风，象刀子一样刺骨寒。好好的战士，夜里睡觉前，还有说有笑，可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但我发现，睡在篝火旁的战士都没事。于是，我命令部队晚上宿营必须生火。就这样，部队夜夜生篝火，驱走寒冷，驱走黑夜，我们终于挺过来了。但是饥饿、寒冷、还有伤病，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可爱的战士和亲密的战友，我很想念他们。"

停了停，李先念心情沉痛地说："我有个好战友叫熊厚发，他是八十八师师长，后来当了副军长仍兼师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年轻的指挥员，智勇双全。1937年初，他左臂负伤，由于缺少药品，伤口化脓，血管断裂，部队进入祁连山后，无力随部队前进，他请求我将他留下。我对他说，不行，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过祁连山。他坚定地对我说，政委，你要指挥部队，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你给我写一封党员介绍信，我养好伤后，就在这里打游击。卫生部长苏井观悄悄跟我说，厚发同志流血过多，很难翻过祁连山。我紧紧握着厚发的手说，你一定要坚持住。我给他开了党员介绍信，留下一小包盐和一些银元，还抽了一个排保护他。我对战士们说，等熊副军长养好伤后，你们就在这里打游击，如果祁连山站不住脚，就回保安去找党中央。不幸的是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厚发同志壮烈牺牲，那时他才24岁，多年轻啊！"

大家都沉浸在李司令员的回忆中，屋子里显得格外静谧，彼此的呼吸声和火盆里板炭燃烧的细微响声清晰可闻。

还是史女士打破沉寂，继续发问："此后你是怎样率部穿过浩瀚的沙漠到达新疆的？"

"大约是4月份。"李先念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从白墩子、红柳园敌人的包围中突出来后，向西北方的沙漠急进，甩掉了马家军的追击，因为茫茫戈壁，无水无粮，人迹罕至，马家军只好望漠而叹。我们在沙漠里走了好几天，带的水全部喝完。沙漠里的气候特别怪，白天热死人，晚上冷死人。人不喝水是活不下去的，由于缺水，有的伤员和体弱的战士活活渴死。如果继续找不到水，部队是无法走出沙漠的。这时，有人向我建议喝人尿，人没有水喝，哪来的尿。有人提出杀马喝血，我坚决不同意。马是我们的无言战友，再说它给我们负重，杀不得。说也奇怪，这时，我身边的白马突然卧下来用前蹄死劲的刨沙，一会刨了一个坑，它便低头舔沙，然后继续刨沙，竟刨出水来，白马贪婪地喝着。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叫吉人自有天相，我命不该绝。我即刻命令部队刨沙取水。这下可好啦，部队有救了，大家喝饱了水，又把所有能盛水的器具统统灌满，精神抖擞地前进了。我们经历了47个日日夜夜，4月底终于到达新疆的星星峡，见到了陈云和滕代远同志。这时，我的部队只剩下420多人了，多少好同志没有走出困境。"

李先念无限感慨，深深怀念他的战士……

史沫特莱也陷于沉思之中……

（作者：雷河清）

材料三　喋血西征路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始末

有谁曾记得在中国大西北严寒的河西走廊，有一支从南方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在外无援军、内无粮弹的情况下，血战历时近5个月，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那就是西路军悲壮惨烈的西征史

一

1936年10月，甘肃省会宁县，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此实现了胜利大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早在红军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时，党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拟就了宁夏战役计划。会师后，党中央和军委参考各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战役计划，四方面军的任务：一是南向西（宁）兰（州）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一是迅速造船，以红三十军渡河进攻宁夏，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枢纽地带，袭取宁夏战略要地定远营，为全军渡河打开局面。于是，渡河先遣部队红三十军全体将士，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迅速秘密集结于靖远城附近，进行紧张的战前渡河演练和各项准备。10月下旬，南线之敌攻势凌厉，推进迅猛，战局趋于紧张，红军总部遂令红三十军渡河。10月25日深夜，西征的序幕终于在甘肃靖远县虎豹口拉开了。

虎豹口两岸峭壁雄踞，巨石参差，黄河对岸又有西北马家军阀重兵布防。为了战胜重兵把守的马匪，渡河突击任务，由四方面军的"铁拳头"之一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担

任。二六三团是渡河前卫团。为了保证渡河成功，从全团九个连队和团部特务连里各抽调一个班，由一百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打仗勇敢的英雄、模范组成了"渡河先锋连"。10月25日夜，缀着稀疏星光的深蓝色的天幕，沉重地垂在靖远河谷，出击的二六三团全体指战员隐蔽集结在岸边的一片梨树林里，代军长程世才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亲临虎豹口指挥。时针终于指到十一点，出击的时刻到了。先锋连飞身上船。霎时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突然，对岸火光闪烁，枪声大作；先锋连勇猛突击，攻占了登陆点。随后二六三团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打散了马步青的河防团，占领滩头阵地，掩护方面军主力陆续过河。渡河部队，猛打猛冲，势如破竹，摧毁了马家军防线，红三十军渡河成功。次日，中央军委电令红九军接三十军后渡河。28日拂晓，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总部和九军渡河完毕。10月30日，红五军奉命渡河，布置于西岸三角城地带，担任守船及控制渡口任务。但由于敌情变化，南线之敌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部北进很快，中央遂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停渡河。10月31日，胡宗南部推进到郭城驿、大芦子地区，并进占靖远一带黄河渡口。至此，河西部队与河东红军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敌切断。东岸红军诱敌深入，向东转移，待机歼敌。西岸红军北进一条山，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西渡黄河的红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在渡河后的十多天内，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统率下英勇进击，全力抗击马步芳、马步青的新编第二军和骑兵第五师的反扑，仗打得异常激烈，共毙俘敌两千余人，并击毙敌骑五师参谋长、前线作战指挥官马廷祥，先后占领了一条山、五佛寺、寺儿滩等战役枢纽地带，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条件。

二

红军西渡黄河后，就进入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武威)地区。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接星星峡，南依千里祁连，北枕龙首、合黎、马鬃等山，是东西长达一千公里，南北宽仅四十至一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河西"四郡"被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占领。马步芳占据着肃州(酒泉)、甘州(张掖)、敦煌，马步青占据着凉州(武威)。"二马"在河西一直实行着武力割据和封建世袭的"家天下"。他们既怕红军在河西建立永久的根据地，推翻其家族统治；同时又唯恐蒋介石嫡系部队借追击红军之名，进入甘、青地界，侵占他们的老巢。所以当他们听到红军突破黄河防线后，青海马步芳立即调集一万六千多人，在马元海率领下，驰援一条山一线马步青所部。

可是形势时刻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坐镇西安，决心消灭陕甘红军。一面部署河东部队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一面电令西北马家军阀倾巢堵截红军。红军三十军、九军和五军渡河后，河东主力部队因没有找到战机粉碎敌人的进攻，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3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进占永登、古浪一线。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可留一部兵力扼守，便于机动。11月5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电告徐向前、陈昌浩：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青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并应乘敌尚未注意时，首先占领大靖、古浪、平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陈昌浩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敌人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足点。但是局势变化很快，党中央和军委终于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0日，军委电令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并指出要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西路军正式组建后，全军共计两万一千八百余人，而河西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及反动民团总数有十二万五千余人，其中正规军两万五千多人。

西路军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分三路纵队向河西走廊挺进。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右路一条山地区向大靖进击；红九军为第二纵队，由左路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挺进，总部直属队随九军行动；红五军和总部机关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地区在三十军右侧跟进。从此，红西路军开始踏上了艰苦卓绝、血火交炽的漫漫西征路。

三

11月10日，作为西路军的左翼纵队红九军进驻干柴洼。不久尾追而来的马元海部敌骑兵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干柴洼。敌人调整布置后，即以步、骑配合，空中利用飞机掩护，向九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九军顽强抗击；不久九军前沿阵地被敌突破，敌人大队人马向军部驻地扑来，全军指战员在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率领下，英勇反击，多次打退敌人的步骑轮番疯狂反扑，敌人横尸遍野。但敌人多是骑兵，机动力很强，我未能给以歼灭性打击。是夜，九军放弃干柴洼，按原计划进军横梁山，向古浪方向挺进。15日，一举攻占古浪城。古浪乃凉州之门户，又是凉州和西宁、兰州间一个重镇，地当要冲，势在必争。盘距在凉州的敌马步青部，听说古浪城被我军占领，十分惊慌。一面电令马元海迅速夺回古浪城，一面又增调援军，企图夹击我军。

九军进驻古浪城后即抢修工事，并迅速部署防卫。二十七师部署在东北方向，警戒凉州方向之敌；二十五师部

署在西南方向，师部驻南门外村庄，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配置两翼，七十四团及军交通队一部控制南山制高点。翌日拂晓，敌人集中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和四个反动民团在大炮的掩护下，以步骑配合，向古浪外围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守军猛烈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使之遭到惨重的伤亡。敌人强攻未能得逞，便改变战术，从侧翼迂回，配合正面强攻，另有空中飞机轰炸扫射作掩护，并以骑兵作穿插，切断我军师、团之间的联系。由于敌人穿插分割，九军阵地被分割开来，致使各部队都各自为战。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九军指战员仍沉着应战，每个人心中都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英勇地与强敌拚杀。18日，战斗更为惨烈。尽管九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古浪已危如累卵。增援部队因被敌切断上不来，城南制高点南山失守。守卫南山的七十四团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南山制高点失守以后，敌人不顾一切，突进城中，向军部压来。军部首长、参谋人员均拿起武器，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形势如此严重，跟随九军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也亲抵前沿指挥战斗，甚至抓过机枪向敌人扫射。危急时分，二十七师在东北方向击溃敌人的分割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入城接应，对冲进城内的敌人形成内外夹攻之势。敌人见势不妙，逃出城外，战斗遂趋平静。

古浪一仗，打得十分残酷。九军损失很大，伤亡超过三分之一，四方面军"铁拳头"之一的二十五师损失尤重，排以上干部也伤亡很多。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壮烈牺牲。九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突围，继续西进，向永昌红三十军靠拢。

四

就在九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的同时，右纵队三十军和五军乘虚向西疾进，深入河西腹地，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从永昌到山丹绵延达一百多公里。这一带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中间是一条宽仅四十多公里的"弄堂"，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邻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地形对我步兵活动很不利，既不便大部队回旋，也不便小部队游击。11月中旬，中央来电，为了在军事上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行动和策应建立陕甘宁根据地，使河东、河西从战略配合上连起来，指示西路军在甘西北永凉地区和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为此，西路军暂停西进，在永凉一线摆开，试图站稳脚跟，策应河东部队。但不久，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数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

当九军在三十军八十八师接应下到达永昌后不久，马步芳、马步青就调集了近十个旅的人马，另有胡宗南部一个旅，向永昌扑来。11月22日，敌五个团向三十军四十里铺阵地进攻。我八十八师奋战三日，和敌数度肉搏，毙伤敌两千四百多人，其中用大刀砍死的即在七百人以上。就在八十八师鏖战四十里铺的期间，八十九师将山丹城交五军接防后，也返抵四十里铺。在李先念、程世才指挥下，三十军大战四十里铺，旋再战八坝、水磨关，打退敌人数次反扑，毙敌甚众。但敌不久就集中了五个旅的兵力猛攻永昌城，三十军遂进抵永昌，与九军并肩鏖战，守卫永昌。英勇的红军将士顽强迎击，与敌血战数日，击退了敌数次多路攻势，并杀伤敌两千余人，始迫敌后退。痛心的是，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壮烈牺牲。

在山丹，敌人以两个旅又两个团兵力向红五军发起进攻。五军在山丹城周围的大佛寺、野猫山、红沟、西二十里堡、西十里堡、暗门滩等地与敌激战，多有伤亡。后全部收缩进城，据城固守，予敌以严重打击。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在率部冲杀中壮烈牺牲。

12月12日，就在西路军在永凉一带艰苦鏖战之时，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敌人大的进攻战减少了，但仍时打时停，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至此，西路军鏖战永凉时近两月，冒白刃，餐风雪，疲兵屡战，虽歼敌六千多人，但自身也元气大伤。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人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血战，根本得不到补充，而敌人却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全军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迅速降至一万五千多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命继续执行西进任务。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冒着西北高原凛冽的风雪向甘、肃二州挺进。12月30日，红五军攻占临泽县城。1937年元旦，五军一部又一举攻占高台，生擒伪县长马鹤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兆德；守军一千四百余人全部投降。1月上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张掖）未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总部直属队、总供给部及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不久，敌两万多人在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追来。1月12日，敌以一部牵制驻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的红三十军、九军；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开始全力围攻高台。五军依托城外工事予以抗击，激战数日后，在敌优势兵力压迫下，全部退入城内坚守。面对敌人的重围，五军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堵死城门，准备死守高台。1月20日，敌人攻势更猛烈，但五军全体指战员前赴后继，以一当十，浴血苦战，敌人每次冲上城头，都被红军用大刀刺刀砍戮下去，不少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与敌同归于尽。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将城门打开，敌人大队人马涌入城内。董军长当即组织部队与

敌展开逐屋逐街的争夺，战斗异常惨烈，但终因敌众我寡，力竭援绝，五军血战九昼夜后，高台被敌攻破。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委朱金畅等以下三千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同时总部骑兵师因增援五军，在沙河堡一带遭敌阻击失利，损失很大，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壮烈牺牲。高台失利后，西路军总部任命孙玉清为五军军长、重整五军。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立即折头向东，气势汹汹地将临泽包围。其一部兵力围攻城外的五军部队，主力五个多团兵力则向城垣攻击。临泽城内驻着西路军的总供给部、妇女团以及机关干部等勤杂人员。在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四局科长秦基伟的指挥下，城内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战斗十分残酷激烈，城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城墙上也洒满了战士们的鲜血，马家军数次猛攻均被击退。1月23日，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利，再守下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遂奉命突围，在外围大部队接应下向倪家营子靠拢，但却遭敌截击，队伍边打边走，妇女团和机关干部伤亡严重，不少人被俘。五军的两个团抵倪家营子时都只剩下二百多人，被编入三十军。

六

高台、临泽血战后，西路军只剩一万余人。为了保存实力，总部决定收缩阵地，全部集结于临泽县南的倪家营子一带，并重新调整了部队体制和建制，精减机关，充实部队。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椭圆形防御阵地。

西路军收缩于倪家营子后，敌人立即调集了六个步、骑兵旅及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三千余人蜂拥而至，将红军团团围住，与我决战。1月23日，黑压压的敌人覆盖了倪家营子四周的地面，并接二连三地以团、营为单位集团冲锋。西路军以无比英勇的斗志，顽强反击，寸土不让，战士们没有子弹，就用刺马和马刀对付敌人，没有手榴弹，就用石头砸，轻重伤员至死不下火线，与敌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整个战场，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就这样从1月23日到2月21日浴血苦战一个多月，总计毙伤敌万余人，我军也伤亡惨重，全军兵力已不足万人，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西路军总部决定东返自救。2月21日，西路军主力在夜幕的掩护下，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24日，进至甘州(张掖)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并将追敌一个骑兵旅及宪兵团击溃，毙伤其四百余人。次日，又将马步芳新式装备的青海宪兵团全部歼灭。这时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原地固守五十天，将设法援助。于是，26日西路军又回师倪家营子。二返倪家营子，战斗比前次更加激烈和艰苦。敌人继续调集兵力，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叠，步步推进，就这样又血战七个昼夜几乎弹尽粮绝，不添油的灯是会灭的，再顽强的生命力得不到一点养息也无法永远支持。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到了非突围不可的时候了。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兵进祁连山。3月5日，西路军被迫向西北转移，进驻南流沟。不久敌人就蜂拥而至，西路军再次与敌展开血战。10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军委：“现已无粮，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300米以内亦用电台联系。”西路军遂乘夜色再次杀出重围，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兵力已不足三千人。12日，在梨园口与敌遭遇，战斗异常激烈，红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壮烈牺牲。

就在西路军血战倪家营子地区之际，中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一军，同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及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任政委，李达为参谋长，援助西路军。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当行至甘肃东部镇原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经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败局已定，援西军遂停止待命。

七

3月14日，西路军兵退石窝，处境更加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余部编为左右支队：把三十军剩下的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九军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剩下的干部随三十军一起行动。至此，西路军经与十多万敌人殊死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五千余人，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

会后，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领下，怀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顶着戈壁滩的风沙，忍饥受渴，在冰天雪地里历尽艰险，终于在1937年4月下旬，按着党中央的指示，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部队只剩七、八百人。1937年“五一”节，党中央派陈云、滕代远带着几十辆汽车，载着衣服和生活急需用品，从迪化(乌鲁木齐)赶来迎接左支队将士。左支队在迪化进行一段休整和训练后，先后奔向延安，奔向抗日战场，奔向全国解放战场。

右支队在王树声、李聚奎率领下，夜行日伏，躲过马家军的次次搜山，艰难地东进。但不久即被打散，可是大家心向延安，坚持一直向东走。经过三个多月的辗转，一路乞讨，陆续回到陕北，走上新的革命征程。在这过程中，原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惨遭敌人杀害；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壮烈牺牲。总指挥徐向前克服重重困难，也

于1937年7月返回延安。毛主席见到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不久即率师奔赴抗日战场，为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总政委陈昌浩在抗战开始后，也辗转回到延安。其余的被俘将士，除一部分被敌杀害外，在党的积极营救下也陆续返回陕北。

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冲破重重困难，赢得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新的历史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选自《党史纵横》95年5期，作者：孙堂厚，何淑梅）

材料四　西路军失败后领导人的去向

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由21800余名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先后在古浪、永昌、山丹、高山、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步芳、马步青等部浴血奋战五个月之久，歼灭敌2.5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1万余名红军壮烈牺牲，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遭到敌人各种非刑杀害。幸存者700余人到达新疆，也有的失散后个别返回延安。在西路军失败后，其领导人下落大体可分为以下四部分：

一、阵亡和在战斗中被俘后壮烈牺牲的有：郑义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供给部长）、董振堂（第五军军长）、杨克明（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孙玉清（第九军军长）、陈海松（第九军政委）；牺牲的师级干部有熊厚发、王清海、杨朝礼、易汉文、叶崇本、董俊彦、秦贤道等。

二、被俘后逃返延安的有朱良才、方强、秦基伟、徐立清、卜盛光、徐太先、黄鹄显等。也有的是在被俘后受尽了折磨，在抗战爆发后，经多方交涉才回到延安的，如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等。

三、个别返回延安的有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李聚奎、杜义德等，他们都是只身一人，风餐露宿，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沿途乞讨，化装潜行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与徐向前返回延安的途中因病先回湖北老家，抗战开始后回到延安。

四、由李先念（第三十军政委）等率领的700余人，退出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于1937年4月底到达新疆，受到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的欢迎。同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郭天民、李天焕、曾传六等在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鼓励这些英勇的西路军战士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了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

（选自《党史纵横》90年6期，作者：蒲德生）

材料五　西路军被俘人员蒙难纪实

西路军挺进河西，遇到了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堵截。红军一路英勇血战，最后弹尽援绝而失败。"二马"伙同当地地主武装，对被俘、伤病、失散红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这里重点记述的是对红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的残害史实。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西路军在河西与敌血战70余次，沿途留下了数千名重伤员和掉队、失散人员。马步芳、马步青对他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地反动民团、保甲组织以及地痞流氓也伙同马家军疯狂地残害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

红九军血战古浪突围时，一些无法行动的重伤员被安置在当地可靠群众家里。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以西路军名义给马家军留下一封信，希望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杀害伤病员。

红军撤走后的第二天，马家军进城，将数百名伤病员全部搜查杀害。仅金得鸿院、张守信院两处，被马家军用刀砍死的就达100余人。在古浪之前的景泰一条山，马家军杀害了留在盐仓库里养伤的30余名红军伤员。干柴洼战斗，躲在群众党应选家夹墙内的40余名伤员，连同他处养伤的红军伤员共百余人全被残杀。横梁山一战，红军数十名伤员也被杀害。

高台失守后，敌人烧杀达3天之久。据幸存者西路军老战士罗光华回忆，高台失守后，惨无人道的敌人对被俘红军战士大肆枪杀，把我数百名战士排成队，拿马刀砍杀。敌马彪旅参谋长常征说，攻开高台城后，马忠义等部搜捕了五六百红军。他亲眼看见马家军用机枪，将这些红军全部打死了。梨园口战斗后，不少红军身负重伤。原九军二十七师战士朱友德亲眼看到马家军用大刀乱砍乱杀，负伤的同志几乎全被砍死。原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乔元玉讲："我是在倪家营子被俘的，亲眼看到敌人迫害被俘干部战士的情景。最为残忍的是他们把一位连长（忘掉名字），吊在山庙前的一棵树上，脱去衣裤，用刀剥皮致死。敌人以此来恐吓我们顺从押往新城（在武威）。"

更为残暴的是临泽的一个屯庄的大屠杀。原三十军政治部警卫排二班班长岳仲连回忆说，1937年1月，部队撤往倪家营子时，将我们200多重伤员安置在临泽的一个村里的几间相通的大屋子里。部队走后的第三天，敌马彪旅进了屯庄，见到我们后，马彪凶狠地说，"能带走的

带走，不能带走的一刮(全部)打掉。”此时伤员们没有一人向敌人乞求，都静静地闭上眼睛，以沉默表示反抗。马彪见我们无一人投降，气极败坏，一声令下，几挺机关枪对准伤员们一阵扫射。这时一位不知姓名的小战士猛扑在我身上，子弹从他的头颅穿过打在我的肩上，敌人验尸时又砍了我3刀，我是这次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

马家军杀了红军，当地民团又来剥死人身上的衣服。西路军东返时留在倪家营子的百余名伤员，被马家军和民团全部杀害后，当地地主恶棍又把死人身上的衣服扒个精光，暴尸荒野。老红军赵天然在犁园口就看到6具女红军尸体被剥得一丝不挂，真是惨不忍睹。

再如，永昌战斗后，安置在水磨关、赵定庄、唐家坡等处的2000余名红军伤病员，马家军和民团搜身翻铺，抢走了他们身上带的钱物，并把他们从原安置的房间、居民家中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当时，连冻带饿，折腾死的就有百人。

战斗后，西路军无法转移的重伤员遭到敌人如此的杀戮，被俘红军在押解途中所遭受的迫害和折磨同样是血泪斑斑。当时，被俘红军指战员大部被解到张掖韩起功部，再由张掖解往青海西宁。当时从张掖到西宁有两条路，被俘红军大部走的是经民乐扁都口、俄博、大梁、祁连、门源、大通到西宁这条道。少数从武威经永登、民和、乐都到西宁。从张掖到西宁338公里，步行十一二天。押解时，正值严冬季节，从民乐炒面庄到俄博经扁都口，两旁是四五千米的高山，70里路无人烟。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被俘红军大多又是伤病员，他们身着破烂单衣，脚上裹着破皮烂布。白天吃一顿能照见人影的面糊糊，晚上露宿在荒野、庭院。押解的马家军骑兵荷枪实弹，腰挎大刀，对伤残冻饿走不动的，或不满虐待稍事反抗的红军战士，一刀一枪，肆意杀害，尸横路旁。据幸存者回忆，妇女独立团一营营长胡延秀，因反抗虐待，在众目睽睽下，被惨杀于大坂山下。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战士邓秀英说，在押往青海途中，她亲眼看到一男一女两个红军战士被马家军捆住手脚，全身用棉花包上，浇上油，活活烧死。老红军马成海说，他在俄博看到一名被俘红军战士，被刺了一刀，匪徒们将他的肠子抽出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拉死。原西路军九军保卫营二连连长王大英说，在门源流水沟，和她一起押送的八名红军理发员，有7人因民团3个营争着叫他们理发，你争我夺，相持不下，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途中又一个冻坏了脚走不动的，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

押解途中被集体杀害的被俘红军也屡见不鲜。原五军骑兵团长吕仁礼回忆，路宿洪水时，一个晚上马家军就偷着杀了我们20多名战友。原西路军战士贺彦太说，他们被押到门源后，敌人在夜间把伤员捆绑起来，扔到几辆(每辆装5至10人)木轮大车上，拉到东门外窑沟一带杀害。因他被一警察救下才免于一死。经查证，在门源东门外窑沟槽和北门外麻尼旗杆等处，活埋的就有100余人。据原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参谋长李惠民交待，1937年元月，被俘红军由武威经永登押往西宁前，马步芳曾密令所属各部将被俘人员中老弱伤病走不动的人就地杀害，他在永登亲自于夜间参与活埋的就有3次，每次10余人，共40余人。据国民党《青海日报》1937年元月25日报道，从张掖押至西宁的290名战俘中、沿途冻饿而死的有27人。类似这样残害被俘红军的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从甘肃河西押往青海西宁的被俘红军总数为5600余人，其中沿途被害的就有300余人。

被俘红军押到张掖和西宁后，即遭到马步芳更为残暴的血腥屠杀。

在张掖，马步芳一百师三百旅韩起功部伙同当地反动民团，在东教场、王母宫、牛王宫、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墙下、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多次残杀和活埋我被俘红军。据张掖地委五人小组1958年社会肃反时统计。仅张掖一县就残害被俘红军2093人，其中活埋的1633人，枪杀刀砍的380人，用火烧死的53人，扒心、挑喉、割舌、断劲残害致死的27人。

经查证，韩起功随从副官马兆祥曾两次指挥部下活埋被俘红军139人。张掖民团团副韩绍华亲自参与活埋红军370人。民团团长罗兴章亲自带领民团清乡数次，先后将俘获的180余名红军全部交韩起功活埋。

据幸存者回忆，在康隆寺俘获的一部分西路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韩起功以“解往青海”为名，在一天深夜全部活埋在南门外的义园广场。

当地农民李成文回忆，东关外的飞机场有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尺的大坑。193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深夜，全城戒严，韩起功部下押着装有被俘红军的一辆辆大车，向飞机场方向驰来。第二天拂晓，他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象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两个大坑被尸体填得满满的。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浑身血淋淋地从死人坑里爬出，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又被拉去埋掉了。

据马步芳的军官马三顺，赵述讲，在张掖所有战俘中的老弱病残及重伤员，奉马步芳的命令，悉数残杀，掩埋在张掖东城外飞机场。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解往青海西宁的被俘红军，便进了马步芳的杀人魔窟。

在西宁马步芳究竟杀了多少被俘红军？据当时《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讲：1937年7月，马步芳在西宁南郊的杨家滩、东塔院、苦水沟等处的荒沟里，大规模地活埋了3次人，第一次约400余人，第二次约600余人，第三次约200余人，共约1300人。这里只是一个月杀害的，其他的小规模或零星杀害还不在内。

1952年马子父(1958年前任西宁市副市长)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他回忆:"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3个坑,挖出人头骨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那里也有3个坑,挖出人头骨700左右。总数1700余人头骨。

马步芳屠杀被俘红军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被俘红军解到西宁,马步芳将年轻体壮的编入"补充团",对年纪稍大或伤残病弱的分别关押起来,每天仅供应粗糙的饭食一次,几天时间,就有许多人被折磨死去。尽管这样,面对敌人的屠刀、红军战士仍大骂马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视死如归。

据陈秉渊先生回忆:"第一次惨杀战俘的一个黄昏时分、我亲见马步芳在大南门外土地局的台阶上,令卫士按编定的队序,押解被俘战士抵该局大院中,他对战俘说:'把你们送到兰州去,即日出发。'遂由派定的匪军驱往南郊一带的沟壑中惨害。听说,起初用大刀顺头乱砍、使其倒入壑中,其后不用刀砍,在预先挖的坑中活埋。有些战士激愤之余,自行跳入,视死如归,即被铲起的崖边土块横行掩盖。其后两次也用了同样的残酷手段。第二年夏季,我们道红东滩东塔院时,在沟壑中犹见血渍与土块交积一起,血腥气仍在上空升腾。上一层被掩埋的尸骨露出土面,惨不忍睹。"

马步芳做贼心虚,屠杀被俘红军多半是在夜间秘密进行。他指示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在夜间杀害时,一不准掌灯、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马步芳的传令队长、曾屠杀被俘红军的刽子手马英交待说,一天晚上,马步芳把他叫去对他说:"你去看看,尕娃们(指传令队队员)怕出事哩!去了血,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要打枪"。马英奉命后一次即砍杀活埋130多人。

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人,每谈及当时的凄惨的场面,就声泪俱下。原红九军交通连指导员黄科林(原名戴登高)就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马家军把他同战友一起活埋,前面的人每人一刀,砍死砍不死的都是一脚蹬下坑内。后面砍下去的就把前面下去的压上了。黄科林在后面没有被砍上就跳下去了,刽子手们在上面盖了些土,但不多,天又黑,黄科林就偷着爬上来,爬到一个老乡家里才得以活命。被活埋过的女红军李桂珍,被铁锹砍了一下就被推进坑里。她脑子很清楚,就爬在坑边,马匪在上面压土,也没有压在她身上,她等刽子手走后,留下看万人坑的匪兵也睡着了,就爬了上来。到处是吃人的狗,很凶。她又怕被狗吃掉,就藏在一个山洞里才脱险。象黄科林、李桂珍这样从万人坑里侥幸逃生的人还有原红五军战士姚芝珍和妇女独立团一营副营长胡秀英,他们都是马步芳血腥屠杀被俘红军的见证人。

受尽凌辱的被俘女红军

落入敌手的西路军男战士尚且遭到如此地残害,落入敌手的女战士比起男战士来命运更为悲惨。

西路军总部文工团、妇女独立团、总医院、被服厂、兵工厂等单位的女战士约1800人。这些女战士除战场上牺牲的外,大部被俘。而被俘女战士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屠杀。如1937年旧历十一月初四,张掖的韩起功就将分散到各连的女红军和孩子活埋了一批。原妇女独立团二营一连指导员马玉莲是在张掖被活埋时逃生的幸存者,据她回忆,和她一起活埋的有30人,时间约在1937年正月。侥幸活着的,所受的折磨和凌辱也是难以想象的。

红军女战士落到马家军野兽般的官兵手里,被糟踏、被轮奸,真是受尽了凌辱。原妇女独立团的一女战士回忆被俘后的遭遇:梨园口失败后,马家军将俘虏的100多名女红军战士押到一个土圈子里,扒光了身上的衣服和鞋袜。夜晚,马步芳的胡子兵兽性大发,对这些被俘女战士进行了野兽般的奸污,就连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也未能幸免。另一位幸存的女战士回忆:"1937年3月,我们在康隆寺被俘,我们280余名女的,在武威关押5个月。马匪有两个营盘。把我们给马匪兵轮班奸污,每天夜里一班一个。有的人被折磨致死,有的不愿意受辱而自杀。"

被俘女红军被马家军糟踏后,稍微有些姿色的,即被马步芳、马步青、马步銮和马元海等高级军官霸占。一般的则被迫给马家军下级官兵做妻妾、使女,有的还被当作物品随意赏赐,转送。被俘女红军象牲口一样地被赶到一起,马家官兵或用手巾扪住眼,逐个去摸,摸到谁就是谁;或用抓"阄"的办法,抓上谁就是谁;或把被俘的红军女战士和受赏赐的下级官兵排成相对两行,排在对面的就"对"为夫妇,就这样,马步青将200余名红军赏给了他的部下。这些当妻妾使女的女红军战士的命运又是怎样呢?有的不堪忍受,一次一次地逃跑,又一次次地被抓回,打得遍体伤痕;有的被作贱后又转送他人;还有的被折磨致死。原妇女独立团排长何思玉,被分给一马家军团长当使唤丫头,因不堪毒打逃了出来,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嫁了比她大20岁的男人,过着凄惨的生活。红军女连长何翠花被马步青送给了一青海卖买人为妾,后又被转送给当时青海教育厅长马乐天的弟弟马玉成。马玉成根本不把她当人待,轻则唾骂不已,重则毒打成伤。她遭百般虐待,终于跳出火坑,与当地的马福光结婚,生活至今。被迫给马步青当小老婆的苟兴才、何德珍,和给马步青秘书孟练百作使女的三名女战士也都被折磨死去。

被分配到马步芳义源工厂、羊毛厂以及医院作苦工的女红军,也是在马家军谩骂、鞭笞、凌辱下生活着。一位曾在羊毛厂做苦工的女战士讲,她们白天干着最脏最累

的活，晚上一个排分一个又被拉去奸污。编到马步芳新剧团的女战士，尽管生活上稍好一些，但仍摆脱不了被霸占、被残害的命运。原西路军文工团的孙桂英，因不顺从马步芳的欺辱，被残杀在离张掖 20 里地的沙滩上。文工团员党文秀也同样被毒打后枪杀了。

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的命运如此悲惨，她们的反抗斗争精神便也十分英勇顽强。有的在押解途中因不堪污辱而自杀；有的被逼与马家军官成亲时，拉响手榴弹与军官同归于尽；有的经历种种磨难回到党的怀抱；还有许多为躲避残害流落当地成家。这些女红军尽管受尽了污辱、折磨，生活艰辛，但她们相信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成功。她们终于盼来了解放的这一天，然而绝大部分女红军战士却长眠于甘、青的土地上。

（选自《悲壮的征程》，作者：牟慧芬　安永香）

材料六　祁连壮歌——记曾日三烈士

长征结束时，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继续远征。红九军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血战河西走廊，用最后的生命，谱写了祁连山下一曲雄壮的悲歌。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五军团从瑞金出发长征。党中央决定留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调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接替他的职务。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曾日三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一起，指挥部队边打边撤。

部队进入湖南境内后，蒋介石调集四十万重兵围追堵截，形势更加严重。敌人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红五军团打得异常艰苦。曾日三与战友们扼守东岸的第一个山头，挡住如潮的追兵，激战三昼夜，才掩护庞大的中央机关和辎重队伍渡过湘江。此时，八万红军已减员过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也因来不及过江，全部损失。面对严重挫折，曾日三痛心疾首，对“左”倾机会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筹莫展，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去湘鄂川黔苏区的计划，部队于黎平转兵入黔。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下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遵义城头的霞光，使曾日三脸上的愁云为之一扫，他和李卓然陪同中央代表陈云，连日向红五军团所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指战员精神振奋，坚决拥护毛泽东倡导的运动战方针，高度机动灵活地活动在云贵高原上。

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接着又突破乌江天险，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兵临贵阳逼昆明，调动敌人保守中心城市。然后，红军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直趋金沙江畔。红五军团是全军后卫，在绞平渡以南的石板河布防，掩护主力北渡。追敌受到节节抵抗，每天只能移动七、八里。但是，红军人多船少，需九个昼夜才能渡完。曾日三与战友们在南岸坚持了五天。敌人兵力猛增，形势更加严重。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到红五军团，偕同李卓然、曾日三等到前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士气陡增。红五军团完成了阻击任务，总部首长表彰他们甘愿承担牺牲，保证了渡江北上战略意图的实现。

入夏以后，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曾日三反复向全军团指战员宣传民族政策。接着，部队横渡金沙江，跨越泸定桥、翻过夹金山（大雪山）于六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作好过草地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曾日三带领政治工作人员和“通司”（藏语，即翻译）访问藏族群众，购买粮食。

八月六日举行的沙窝会议，中央决定组织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编作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前锋。因李卓然重伤，曾日三代理政委职务。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克服困难，坚决北上，然后率部队踏上了茫茫草地。可是，进至噶曲河边时，眼看只有三天路程就要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会合了，曾日三突然接到张国焘的电报，调红五军南返阿坝地区。曾日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率部从草地退回。粮食早已吃完，许多战士饿死在草地上，原因却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率军南下，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曾日三对此极为气愤，在张国焘召集红五军营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当场与军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抵制张国焘的命令。

张国焘恼羞成怒，竟挑动红四方面军少数受蒙蔽的人寻衅闹事，曾日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他一方面要求部下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另一方面与董振堂、欧阳毅联名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写报告，反映情况。当时，红五军的电台仍与进抵陕甘的党中央保持着联系，能够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告诉广大指战员。张国焘察觉此事，更加[illegible]。指责曾日三“造谣生事，扰乱军心”，没收了电报[illegible]从此，红五军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随后，张国[illegible]采取组织措施，将曾日三调出红五军，派往红四方面军所辖的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想陷他于孤立的境地。由于曾日三老成慎重、一身正气，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九军后，很快得到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长征期间，曾日三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原则性，先后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无愧是红军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继续对抗中央北上的指示，率部向川康边界退却，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由于屡受挫折，部队损失严重，不得不向西康东北部转移。一九三六年七月与红二、六军团（后改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坚决斗争和红四方面军

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曾日三和战友们第三次涉过泥泞的草地，九月初到达甘南。即将与红一方面军的战友重逢，他心情格外激动，可是，张国焘却利用组织宁夏战役的机会，以“打通国际路线”为名，将红四方面军所辖的第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调往黄河以西。

十月底，西路军二万余人从靖远包河口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总指挥部随红九军在左翼行动，经五佛寺时，歼灭前来阻挡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骑五师，直奔古浪。古浪为河西走廊门户，历来为兵家争战之地，敌马元海部闻讯大惊，从后路包抄上来。曾日三留一支部队阻击，率主力进至城下。首先，他派了四个小红军入城送信，大意是：西路军要打通国际路线，请允许借路通过。但守敌残忍地杀害了送信的小红军，不肯让路。曾日三义愤填膺，下令攻城，守敌仅一个团，抵挡不住，弃城逃路。古浪两面临山，地势低洼，加上地震使城墙坍塌，易攻难守。军部将红二十五师配置西南制高点，红二十七师扼守东北山头，形成口袋形阵地。盘踞凉州的马步青，率部争夺古浪，双方激战三昼夜。敌人以山炮击毁城防阵地，骑兵挥动明晃晃的马刀突入城内，军部机关许多女同志手无寸铁，被敌人马队劈砍践踏，血浆满地。曾日三与政委陈海松组织军部警卫连和交通队与敌人展开巷战，且战且走，幸得守城的红二十六师接应，方得脱险。总指挥部决定当晚组织突围，据红九军保卫局长陈宜贵回忆这次战斗，退出古浪时，“我们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能带走的伤员尽量带走，一些实在无法带的重伤员，每人发给三块大洋，集中在九间大屋子里。陈海松政委还特意让曾日三主任给敌人写一封信留下，希望他们以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要杀害我们的伤员。事后我们得知，惨无人道的敌人，竟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古浪激战，红九军阵亡两千将士，退据永昌城。西路军也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即从永昌至山丹绵延一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十一月下旬，马步芳、马步青利用红军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等弱点，集结十个旅的人马，连续发动进攻，还轮番不断地用飞机和大炮轰炸红军阵地。红九军挫败敌军数十次攻击，坚守永昌达半月之久。战斗正酣，红九军的电台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曾日三立即带领敌工干部，爬到前沿阵地上，向敌军喊话：“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活捉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打内战了。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可是，地方军阀部队麻木不仁，丝毫不理会红军的政治攻势，依然凶悍地进攻。因孙玉清重伤，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红九军军长，他与陈海松，曾日三交换意见后，下令撤出永昌，靠拢主力部队。

一九三七年一月，红五军攻占高台，但被敌马元海部两万余众围困，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人全部捐躯，红九军攻甘州（今张掖）未克，与红三十军到达临泽，屯驻倪家营子。倪家营子地处平川沙滩，居民稀散，分布方圆数里内。敌以六个步骑旅及民团武装七万人三面包围，纵横分割成数十块。红军伤亡十分惨重，被迫退入祁连山区，与敌斡旋。曾日三率红九军三百余人断后，掩护主力部队继续西进。

巍巍祁连山，白雪朔风肃杀。西路军仅存三千人的队伍，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搀扶着伤病员，出入荒山野漠，一连五十多天没有见到老百姓。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很难找到。生活比过雪山、草地时更艰难。曾日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下山找粮，都遇敌人马队忍痛而还。长征出发时，吴仲廉因生育一男孩（取名曾吴，一九七九年逝世），编入红军总部干部休养连行动，后随曾日三调入红九军（任军敌工部副部长）。孩子嗷嗷待哺，剩下的几匹战马驮了伤病员，吴仲廉搂着孩子从遥远的南方走到甘肃。虽然同在一个部队，曾日三无暇照料产后虚弱的妻子，也无精力顾及只有两岁的孩子。部队行至肃州（今酒泉）附近的梨园口，突然与敌骑兵遭遇，陈海松不幸阵亡，总指挥部任命曾日三代理红九军政委，他临危受命，领导余部继续战斗。

走出嘉峪关，三月十四日，总指挥部在祁连山口的石窝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去陕北。剩下的人员编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李先念（红三十军军长）各率一个支队，分左、右两翼西进，直属机关和伤病员、妇女（如张琴秋、吴仲廉等）编在第三支队，由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政委、钟立彬任政治部主任，带领二百余人随后而行，困难时刻，曾日三以坚定的信念鼓舞大家，据红八十八师参谋长饶子健（此时编在第三支队）回忆：“一天黄昏，部队在一个背风的山破上休息，曾日三政委见大家心情低沉，就叫钟立彬主任把几个连队的支部书记叫来开会，布置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不一会儿，大家都到了，曾政委总结了前一段行军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还在陕北，革命无疑是要成功的！’他还要求在战胜严寒、战胜马军的战斗中，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个革命干部、战士都要做钢铁战士。”一天早晨，曾日三从总指挥部赶回，兴奋地对大家呼喊起来：“好消息！我们的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到新疆去，还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接应我们哩！”部队的情绪立即活跃起来，有些人哼起了江西民歌。一个战士问他：“曾政委，到新疆还有多远？”曾日三自己也说不清，仍乐哈哈地说：“不远了，我们脚板底下要加油呀！”那个战士拍拍干瘪的肚子说：“就是有点唱空城计。”曾日三幽默地笑道：“空城计可以吓退敌人，我们扎紧皮带还唱几天，到新疆再休息吧！”但是，他眺望前方：山高路险，敌情不明，有些忧虑，便走到钟立彬前面低声说：“我们的担子是更重了啊。”

四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西，决定打下县城补充给养。敌军防守甚严，攻城未克，部队撤到红柳园子。敌人策马包抄上来，曾日三立即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走。情况紧急，不容多说，他简单地交待了几句："你们顺着电线杆子的方向，往西北突围，再过两天就到新疆边境的星星峡了，那里有人接应！"说毕，转身带领一部分战士，利用残墙断垣作掩护，向敌人马队射击。突围的同志，后来会合左、右支队的八百余人，安全抵达新疆。可是，曾日三始终没有归队。据最后冲出来的战士说：曾日三被敌人包围，子弹耗尽，以恐被俘受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几个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一说被俘，押至青海遭惨杀）。时年，他三十三岁。他用自己的鲜血，为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写下了最后殷红的一笔，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选自《革命春秋》92年4期，作者：曾长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背景介绍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到陕甘一带攻打中国工农红军。张、杨受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但拒绝张、杨"苦谏"，而且调嫡系部队进驻豫陕，监视张、杨。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逼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12月7日，张学良见蒋介石时，痛切陈述民族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又遭蒋拒绝。于是，12月12日，张、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扣押蒋介石，西北军在西安城内西京招待所扣押陈诚等重要将领十余人，逼蒋联共抗日。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炸平西安，扩大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艰苦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条件。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材料：

- 抓获蒋介石
- 结束内战的枪声
-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段经历
- 西安事变那几天
- 王炳南回忆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同志
-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材料一　抓获蒋介石

华清池外第一声枪响，蒋介石就一骨碌翻起来了，他胡乱爬下床，吩咐门外的侍卫官竺培基迅速布防阵地，构成火网封锁二道门，并连声呼叫："钱主任呢？钱大钧！"钱大钧的卧室正对二道门，他一出来，便被黑地里一排枪弹击倒在地，子弹直透肩胸上部，他挣扎着一侧身，贴住过道墙壁，一动也不敢动。子弹穿梭般射来，他听见委员长唤他，却疼得无法应声。初始，华清池外墙四周没有动静，蒋介石以为是局部兵变，指挥叫喊了一会，发现正门一线枪声很密集，他便乘机逾窗而出，黑暗中摸摸爬爬，溜到了东侧围墙边。竺培基爬在墙头上打枪掩护，贴身侍卫、蒋介石的族侄蒋孝镇挺起瘦小身躯，战兢兢把蒋介石托上了墙头。土墙也还结实，秋夏大雨天从骊山冲刷而下的水流，正好贴墙泄去，墙根下形成了深沟，从里边看去不甚高，蒋介石跳下去，却禁不住"哎哟"一声，仰面朝天摔倒在冻得铁硬的壕沟里。蒋孝镇翻过墙扶他起来，蒋介石抖索着迈不开步。蒋孝镇顺着委员长身子摸下去，委员长赤着双脚，满地上是冰凉的砖头瓦块，摸不着皮鞋在那儿，蒋孝镇只好坐在沟沿，胡乱扒下自己的皮鞋，硬给委座往脚上套。套上鞋，蒋介石仍是"哎哟"着走不动。蒋孝镇便蹲下去，背起他往山上爬。瘦小个儿背个瘦长个儿，山又陡，背后子弹"吱吱"横飞，遍地荆棘丛中什么也不顾了，跌跌撞撞，蒋介石不知被摔下过多少次，每次跌地，他都尽量抓住黑乌乌的柏树杆枝，不使自己滚进边上的悬崖里。东边暗处的蓝天衬托出齐崭崭一堵石崖，当地老乡称曰"鸡上架"，蒋介石无论如何是翻不上去了，就势躲进了大石侧畔的一缝山垭里，蒋孝镇精疲力竭，跌倒在二三丈远的右下方，他只听见委员长窸窸窣窣往里爬，却怎么也瞄不见那颀长干瘦的身影儿……

山是阴坡，冬日之晨又那么冷，巨石上、树叶上、荆棘上，全是白花花的残雪和霜花。空中笼一层薄薄的云雾，晨光蒙蒙，蔓草荒山的苍色石壁冷峻突兀，益发显得寒如冰窖。孙铭九带着十多个兵持枪而进，一步步搜索过来，一丛荆棘、一块岩石也不放过。"鸡上架"下边，他们发现了就地半躺着的蒋孝镇，荆棘划破了衣衫、手脸，面色苍白，活象一条失魂落魄的被抽了筋的小鬼。孙铭九问："委员长在哪里？"

蒋孝镇半吴半吐乱支吾，孙铭九用枪指住他的脑袋："不说，我马上毙你！"周围的枪都指向了蒋孝镇。蒋孝镇

抖着嘴唇，眼睛却往东侧的山垭里瞄去。孙铭九一挥手，队伍忽啦一下围定了山垭，一步步裹了上去。忽然有人大喊：

“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随着一声划破晨空的清亮的叫喊，众人逆着曙色，分明看见石垭间很快溜下来一条瘦长的身影，双脚在平处一落稳，便伸手扶住一尊鱼脊样的巨石，缓缓直起了身子，四周围同时发出了“哗啦啦”拉动枪栓的金属音响，那瘦长的身影突然缩了缩，抖抖索索喊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那头颅随着惊恐的喊声一抖、又一抖。众人这才看清楚：这就是蒋介石！秃头，短发有些灰白，嘴里没牙，满身是土，身着古铜色长袍，白色布裤的裤管一长一短，赤脚板胡乱套一双小皮鞋，鞋带断了，手和腿腕划出了一条条血痕。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他望着一眼眼黑乌乌的枪口，两颊抖得很厉害，几乎是站也站不稳，随时有可能一下子跌倒在地。

“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

周围十几个人同声发喊：“委员长要领导我们抗日！领导我们打回东北去！”有的人双手举着枪向山下大喊：“委员长找到了，在这儿哪！”

一听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屁股坐在地上，低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浑身似乎抖得不那么厉害了。忽然又一抬头，对着对面而立的孙铭九说：“你是孙营长——孙铭九！”说罢就直直地盯住他。

“啊！你怎么知道我呢？”

“嗯，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有人报告我的。”周围的枪口垂下来了，蒋介石看出众人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又对孙铭九说：“你是个好青年……好青年……把我打死好啦，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快快下山吧。”孙铭九催促。

“你们副司令怎么没有来？”蒋介石半眯住右眼发问。

“他在城里等你哩，专门等你哩！”

蒋介石一下子显得很不高兴：“你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他一面说一面坐在地上摇头。

“你腰疼，我背你下山”。

“山这么陡，怎么背？！这里有没有马？骑马也行，我会骑马。”蒋介石又仰起了脸。

“马在下边哩！”四处的枪声还在不住地响，这是个危险地域，孙铭九简直有些发急了，“委员长，这地方不能久待，你再不走，我就要给你下跪了。请你快下山吧！”孙铭九说着跺了一下脚，向众人示了个眼色，左右一拥而上，挟架起蒋介石，簇拥着朝山下走去。

（选自杨闻宇、王光亚《丙子双十》）

材料二　结束内战的枪声

1936年12月12日拂晓，枪声惊破了蒋介石的好梦，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在华清池后的骊山上的一个山坳里捉到了还穿着睡衣企图逃跑的蒋介石，随即移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也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囚禁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于当日发表对时局宣言，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从事变的兴奋中稍稍冷静后，就感到了事情的棘手，于是寄希望于中共。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邀请中共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突然的，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极大震动，一时之间，国内、国际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紧张而又微妙的局势。

南京国民政府因蒋被捉而出现一片混乱的局面。确如宋美龄去西安见蒋时的第一句话：“戏中有戏”。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上，决定由孔祥熙为行政院代院长（原院长为蒋介石），并决定由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讨伐”张、杨，宣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政会立即电请旅居德国的中政会主席汪精卫（蒋是中政会副主席）回国主持工作。汪派的用心是想置蒋于死地，由汪取蒋而代之。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买办集团，竭力反对立即“讨伐”张杨的主张。宋美龄、孔祥熙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孔祥熙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之前，先着手营救蒋介石。并请曾任张学良顾问、现为蒋介石上宾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从南京飞西安，探明实情，居间调停。

国民党内各派别态度也不一。国际上英、美、日等列强与苏联，从他们的在华利益出发，态度各异。但中国的事情最后决定于中国自己。

对于西安事变，中共方面事前亦毫无所闻。消息传来，实出意外，惊喜交并，上下大快。一面由中央军委将蒋被扣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一面

由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建议张、杨整兵备战，迎击中央军的进攻，并表示若胡宗南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还决定中共中央暂时不就西安事变事发表宣言。决定派周恩来到张学良处协商大计，电请张派飞机到肤施（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力争和平解决，促进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主张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这与张、杨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但对于蒋介石，中共开始的考虑是主张罢免他，交人民公审。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要“推动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当然，也有极个别人提出过“左”的主张，如张国焘就一再反对和平解决的主张，几次深夜扣门求见毛泽东，要求杀掉蒋介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中共关于要罢免蒋介石、公审蒋介石的要求，与张学良的初衷产生了矛盾。中共一方面鉴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一方面也考虑到张学良的主张，所以在对蒋的问题上也迅速改变了意见。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18人，冒着风雪骑马由保安赴延安，17日下午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途中听取专程到延安迎接的刘鼎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的汇报，对刘鼎说：这次是军事的突然行动，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的这段话，表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已有改变。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局势，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或内战爆发，或结束“剿共”内战。为争取和平前途，会后发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同时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通电提出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方面召开和平会议，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等建议。《指示》向党内指出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准备打击南京“讨伐军”的进攻，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要争取与蒋介石、陈诚等开诚谈判，在他们答应初步改组南京政府，取消何应钦的权力，讨伐军退出陕甘，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下，可以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中共在对蒋介石个人处置问题上的意见，经历了从“罢免蒋氏”到“保蒋安全”，进而到释放蒋氏，始终把这一问题服从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基本方针，而从不把对蒋个人的处置作为处理事变的主旨。中共这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和宽容大度的胸怀，是蒋介石之辈所未可始料的。

周恩来到西安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张学良、杨虎城具体商讨了与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等有关的问题和办法。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杨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会后并会见了蒋介石。

由于中共对张、杨的支持，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强烈呼吁和平，迫使蒋、宋口头允诺下列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张学良事先未同周恩来、杨虎城具体商谈何时释放以及如何释放蒋介石，便独自下令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去南京。张学良到南京后，立即被蒋介石扣留，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叛徒刑10年；次年1月4日，虽由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被“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并幽禁至今。

张学良被扣，严重的内战危险因而重新出现。但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热情地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的团结，对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终于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枪声，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这就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选自《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材料三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段经历

1936年7月，我从东北大学（简称东大）毕业后，党组织派我到甘肃兰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公开身份是办报。后因经费筹措困难，我就给东大先派到西安做救亡工作的同学宋黎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宋回信说，现在西安形势很好，让我马上去西安。这样，我于10月下旬来到西安。

西安是西北重镇。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多次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做了大量争取张、杨抗日的工作，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西安群众抗日运动，在张、杨的支持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我来到西安后，宋黎即指派我在刚刚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公开身份是《西京民报》的记者。

不久，宋黎又派我以"东救"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并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西救"是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于1936年6月成立起来的。"西北特支"的前身是西北军宪兵营地下党支部。"西北特支"成员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均在"西救"担任职务。在西北地区威望颇高的民主人士杨明轩担任"西救"的主要领导。这一时期，"东救"、"西救"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影响，形成当时西北地区群众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剿共"。他调了260个团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扬言在两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适值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西安的"西救"、"东救"和"西安学联"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起草、讨论了给蒋介石的请愿书，要求蒋介石立即撤销"剿共"计划，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秘密决定于12月9日举行学生、群众参加的纪念"一二·九"周年游行示威。

8日晚，"西北特支"成员宋黎通知我参加明天的游行示威，并担任总指挥。他说："这是组织上考虑你原是东北大学驻北平学联的代表，亲身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有斗争经验。"

12月9日上午7时许，西安的大中学队伍及群众团体，从四面八方向南院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广场集合，约10点左右，基本到齐。由于沿途有不少市民加入行列，广场上聚集了近两万人，将南院门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拥护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

迁到西安的东北大学工学院，是西安仅有的一所大学。考虑到"东大"学生曾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有一些斗争经验，个头也比较大，所以将他们排到了这次游行队伍的前列，其后有进步力量较强的西安师范、西安高中及其它几个中学，还有东北人办的竞存中学和东望小学等。

那天是阴天，刮着西北风，学生们的情绪却非常高，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歌声在广场上空震荡。门前东北军的许多军官和士兵以同情的眼光看着学生们，有的甚至难受得将头扭过去暗暗地落泪。整个广场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

不一会儿，张学良的秘书出面接见。秘书站到门口的桌子上，高声对游行请愿的学生、群众说："同学们，同胞们，大家的请愿行动是正当的，只是张副司令不在机关，下部队去了。等他回来时，我一定向他汇报。"学生们未见到张学良，很不满意，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

没见到张学良，游行请愿队伍又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向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游行队伍来到了北院门，省政府让派代表进去。我为总代表，还有师范和高中的几名代表，进入省政府后，邵力子接见了我们。我代表大家提出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绥远抗战，释放政治犯……。邵力子看看我说：你不是学生吧？我说：是学生。又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答：是东北大学的。邵力子对我点了点头。然后，他对我们全体代表说："你们的要求有道理，但你们学生主要是读书救国，国家大事，自有政府考虑，你们应该好好安心读书。"我非常气愤地说："日寇占领东北，并已伸入华北、绥东，整个西北也危在旦夕。全国人民都将沦为奴隶，学生们就是读好书，又有什么用？"随后，我们要求他给学生讲话，邵推说："国家大事，我也作不了主。有的要请示上面，有的需要研究，你们跟同学们讲讲就行了！"我们代表不满意邵的答复，当下出来向同学们做了传达，大家情绪更加激烈，遂向新城陕西绥靖主任公署进发。

因蒋介石住在临潼行辕，杨虎城将军好象也不便直接接见我们，出来的是杨将军的代表，绥署参谋长李兴中。他说："杨主任不在家，到临潼开会去了。同学们的请愿书我已看了，我都同意。但我个人作不了主，等杨主任回来，我一定向他汇报。"

广大学生群众未见到张学良，又未见到杨虎城，对李兴中的答复也很不满，群情鼎沸。队伍中猛然有人高喊："他们都作不了主，咱们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去！"霎时，一呼百应，"对，向蒋介石请愿去！"这样的大事，开始我们并没有计划，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便马上跑到队伍外面询问宋黎。宋说："去也去不了，城门都关闭了，群众要求去，就顺其自然吧！"于是，我就带着队伍向东城门进发，到了城门下，西北军已把城门打开了，请愿队伍便一拥而出，浩浩荡荡地向临潼涌去。

这时已是午后3点多钟，同学们一天没有吃饭、喝水，已非常疲惫。但是，队伍里听不到对于饥饿疲乏的叹息，只有壮烈的救亡歌声和口号声。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一致抗日，同学们的血在沸腾着，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汹涌向前。

离开西安东门三四里地，东北军的一个骑兵迎头赶来，跑到队伍前面跟我讲：你们不要去临潼了。中央军已经在霸桥架起了机关枪，前面已经戒严了，蒋介石下命

令，对敢于前去请愿的学生"格杀勿论。"我想，请愿的目的还没达到，岂能因为前面架了机枪就不去了！便义无反顾，带领队伍继续向前。

这时候，《西京民报》一个小个子记者骑着自行车赶到我跟前对我说："胡焜同学（我1937年4月以前的名字），你把队伍继续往前带，必是凶多吉少，你有什么遗嘱没有？"我当时心里十分焦急，一直在考虑着如何带好队伍，没有心思跟他多说话，只说："身为总指挥，现在哪顾得上想遗嘱。等我牺牲之后，你就自己编吧！"

请愿队伍继续前进着。我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让队伍暂时休息，进行一下调整，把东大工学院调到最前头，其它各校也都把大个子调到前面，女同学和小同学排在后面。准备到前边遇到中央军，先向他们宣传，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惜一切地冲过去。

当学生请愿队伍走至十里铺时，后面一辆小汽车飞驰而来，拦住了前进道路。只见张学良将军从车里出来，对我说："我是张学良，我想跟你们学生说几句行不行？"我回答说："校长讲话，我们当然欢迎！"

路南是一片开阔的坟地，挨着路边有一座约一丈高的大坟堆。于是我即让前面的队伍就地集合，并指挥后面的队伍向前集结。张将军手拉着与他同来的一个配带上校军衔的"侍从"，走上了大坟堆。

那天，张学良将军没有穿军装，显得很和气，可他的讲话却慷慨激昂。他说："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你们的要求一点不高，我完全赞成。不过你们不能去临潼，我想代表你们前去请愿。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将三天内答复你们，若逾期不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他右手仍然拉着那个侍从，左手在自己脖子上比划狠砍自己的脑袋。

此时，我带头高呼："相信张副司令！""拥护东北军北上抗日！"……随即掌声、口号声震撼着天空。听到张学良将军如此坦诚的表示，很多同学竟感动得哭泣起来。至此我觉得请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征得大家的同意后，便宣布游行队伍返回西安。

游行队伍往回走时，已是下午5时许。学生们自晨至此步行四五十里，颗粒未进，又冷又饿，虽然情绪依然甚高，但是不少女同学、小同学已累得走不动了。在返回的路上，沿途群众给我们送水、送烧饼。饥肠辘辘的同学们，在寒风中吃着大饼、馒头，浑身涌出一股股暖流。

夜幕降临时队伍入城，秩序井然。队伍中不时传出用嘶哑的喉咙高唱的救亡歌曲。很多同学脸颊上的热泪未干，在街道路灯的掩映下，莹莹发光。马路两旁挤满了欢迎的市民们，他们无不为之感奋！

12月12日，即张学良将军向学生许诺的第3天后半夜，骤然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那晚，我住东大校友会，起来一看，大街上已经戒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次日见到大张的号外，头版大字刊登："张杨对蒋实行兵谏"，副标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运动；遵行总理遗嘱，召开救国会议"。并刊登张副司令、杨主任大幅照片。

13日晚，"西救"在西安高中礼堂召开紧急会议，议题是研究筹备举行市民大会，在拟出的一大批标语口号中，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此外还有"组织救护队、担架"等。在讨论时，我认为后一条不合适，应取消，因为这样提就表示我们准备打仗了。同时，我还建议增加一条，即"拥护张杨抗日救亡八大主张"，而且把它放在第一条，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12月16日上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到会者近10万人。我任大会执行主席。"西救"主席杨明轩致开幕词。接着，张学良将军讲话，他说："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想诸位还记得'12·9'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随后杨虎城将军也讲了话。张杨讲话，真切至极，赢得了民众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讲到痛切处，场下一片欢呼口号。群众手持的彩色标语口号小旗，伴着口号欢呼声，不停地挥动。可以讲这是西安市空前未有的救亡盛会！

"双十二"之后，西安地区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在"西救"的带动下，很快地融汇在一起，形成波澜壮阔的斗争局面。为了适应新的救亡高潮，"西救"决定成立"西京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市救"），把市内的诸救亡团体统管起来。1937年1月30日，在西救会大礼堂，举行了"市救"成立大会，我被推举为主席。在2月7日由"西救"召开的各救国团体座谈会议上，我作报告说："'市救'的产生，系分担'西救'工作之一部。'西救'代表大会一时恐难召集，又以新局面之开展，故须产生此新的组织，肩此重任。"此后，我虽仍兼着"西救"、"东救"职务，但却以"市救"工作为主了。

1937年2月上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使社会各界认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象，争取群众救亡团体的合法地位，"西救""市救"负责人杨明轩、我和学联主席李连壁联名，对各界发表"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声明"。2月10日《解放日报》（西安版）见报时改为对各界发表谈话了。

时隔不久，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限制民众救亡运动，解散、镇压救亡团体。西安形势趋向恶化。

一天凌晨，突然四五个宪兵闯进"市救"办公室，质问我是干什么的。由于事先得到西北元老、"西救"主席杨明轩的提醒，我从容应对，躲过了宪兵的抓捕，跑到东北军后方机关驻地邠县暂住。后来听说西安局面有所缓和，便

返回西安工作，住在一家叫"马迭尔"的小公寓。其实这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更加厉害，群众团体都已停止活动，就连秘密活动也很困难了。到了3月下旬，宋黎通知我撤离西安，去延安学习。

3月底，我到达延安后，进了抗大四大队(白区学生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开始了新的革命旅程。

（选自《党史博采》90年12期，作者：胡开明）

材料四　西安事变那几天

1936年12月11日晚，同往常一样，我闲着无事，就和公馆内的一些同事闲聊。

忽然，少帅的轿车开回来了，速度很快，进门后没有停，在院内转了一圈，又开到大门口才停下来。可少帅没有下车，副官长谭海马上迎上去，少帅坐在车内问："杨主任来了没有？"谭海回答说："没有。"少帅回头对司机说："走！"小轿车便冲出大门，朝杨虎城公馆的方向疾驶而去。

过了不久，又看见张公馆的手枪营紧急集合，全副武装，乘上汽车出发了。张公馆的警卫任务移交给司令部卫队团一营。

一营一到张公馆就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四周的院墙上架上了高射机枪，贴院墙的里侧又搭上了跳板，人站在跳板上刚好能看到院墙外的情况。看得出，必要时他们是要以院墙做掩体进行射击的。同时，在院子的外边又加派了巡逻哨，真是戒备森严。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都注意观察动静，感到要发生大事了。

夜里，西安城内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远处也传来了枪响，枪声越响越密。这时，使我不禁想起了前些天，让我调查西安城内各部队驻防及武器装备情况的事。看样子是与中央军以及几个警察大队接上火了。

枪声估计响了一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稀下来。突然，副官长谭海屋内的电话铃响了，这响声好像比平时任何时候的声音都大，连我们在外面的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谭海抓起话筒，仔细地听着。我们在外面也想知道个究竟，因此，也仔细地听着。开始，只听他"嗯，嗯"的应答着，后来，听他大声地喊起来："啊！什么？"接着一拍大腿喊道："糟了，老鳖子跑了！"一听这话，大伙猜着了七八成，因为当时的东北军，对蒋介石恨得牙根直痒，所以副官长一说"老鳖子"就知道指的是蒋介石。可是，听说跑了，大伙也很担心。这时只见谭海扔下电话，转身出屋，登上汽车就走了，估计他是到前线去了。

第二天上午，才知道在华清池骊山石头缝里终于把蒋介石抓到了，送到西北军一个军长高桂滋的公馆里。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之夜我在张公馆内看到的情况。

12月12日，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全部进入战备，气氛非常紧张。天上，20几架飞机低空盘旋，看样子随时都要轰炸；地上，我们也架起了高射机枪、高射炮，时刻注视着天空的动静。但不知为什么飞机没有轰炸，地面也就没有打它们。公馆内也没有发生什么意见外情况。

事变之后，西安开了一个国民大会，我也参加了。

会上，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讲得十分感人。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次兵谏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弟兄们都知道，东北已经沦亡了，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自从旅欧回国以后我就发誓：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可是，蒋委员长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让我们去打红军……讲到这儿，他稍微停了停，接着说：红军是没有家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家的人，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停止一切内战！谁要打内战，谁就是我张学良的敌人；谁要打内战，谁就是东北军的敌人……张将军的一席话引起了到会者的共鸣，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杨虎城也发表了讲话。他愤怒地谴责了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并强调这次兵谏，他与张副司令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记得杨主任发言以后，事变前住在张公馆的那位刘先生也发表了讲话。据刘海山说，他叫刘鼎。这位刘先生穿着青上衣，蓝色的毕几裤子，屁股上还补了一块青补丁。开始大伙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是共产党。

他说：同胞们，我们坚决支持张将军和杨将军的行动。他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为了使蒋介石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这和我们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大敌当前，中国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有志气有抱负的爱国军人应该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不能看着大片的领土被侵略者任意宰割，全国各党各派要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同心协力，驱逐日寇。

到会的人，都感到他的话很对，特别是我们东北军的将士们，深知流落他乡之苦，更希望早日消灭日寇，重返故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公馆已成了总指挥部，来这里见张将军的要人接连不断。承启处也跟着忙了起来。

有一天(记不得是哪一天)，一些高级将领刚刚离去，传达处又给我们送来一位陌生的客人。传达处的副官与承启处的刘世斌副官小声说了几句，刘副官就去向张将军报告了。

这位客人头戴灰布棉帽，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大衣，个头不高不矮，步伐稳健，两道浓眉下，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进屋后，我马上迎了上去，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微笑着点点头。随后，顺手解开了大衣扣，露出了一身灰色制服布装。看了这身服装便知道他是一位红军。他的衣着虽

不豪华，但却十分整洁。我赶紧过去帮助他脱大衣，这对于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这位客人却不一样，他向我摆摆手，意思是不用我帮他脱。他自己把大衣脱下来顺手挂在衣帽挂上，接着随手把帽子摘下来，也挂到了上面，又用手轻轻地理一理头发，转身坐在沙发上。之后，他微笑着问我："张将军在家吗？"我说："在！"并随手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又摆了摆手说："谢谢，我不吸烟。"这个人举止非凡、精明强干，可又不是盛气凌人，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想问一问他是谁，但又不便开口。正在这时，刘世斌副官回来了，说："副司令请周先生去！"听了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他就是周先生！记得有一次夏宝珠跟随少帅去陕北前线，那时候东北军在陕北洛川一带，司令部的人管陕北叫前线，因为接近红区。几天后少帅领着夏宝珠等人回到西安。我见夏宝珠很高兴，不知为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他悄声地告诉我："赵大哥，我这回跟少帅去陕北前线见到周先生了。"我问："谁？""周先生，就是共产党那边的周恩来。这个人可好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了不起。"接着他又讲起在陕北张学良将军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形，他说："这回可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张、周会谈，不久咱们就可以打回东北老家去。"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先生。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敬意。

张将军这时已从客厅走出来了，周先生迎上去，二人相见，好像故友重逢，十分亲切。他们在会客厅里谈了片刻，一同出来，就乘车走了。约莫有两个钟头左右，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同周恩来又一齐回到了张公馆，谈了很长时间才离开。

过了一两天，周先生又一次来到张公馆。这次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到承启处以后，他边脱大衣摘帽子，边说："还认识吗？"我赶忙起身，回答说："认识，认识。周先生请坐。"当时，承启主任夏宝珠和承启副官都不在，只有我在屋，我马上到少帅的会客厅，告诉了那里的副官，他请示少帅以后，对我说："副司令屋里有客人，请周先生稍候。"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先生，他微笑着点点头，并打了一个手势，说："你也坐吧。"并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叫赵新华，是辽宁人。"周先生说："是沈阳市内的吗？"我说："不是，我是新民县人。在沈阳西，离沈阳100多里路。"又问我是什么时候到西安来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说到这儿，我心中不由得酸楚起来。周先生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痛苦，安慰我说："别难过，这回好了，你与亲人不久就能团聚了，蒋先生已经答应抗日了，你们可以打回老家去了。"我说："真的吗？"周先生轻轻地点点头，说："是真的。"

正在这时，少帅出来送客，又把周先生迎进了他的会客厅。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先生的时间虽然还不到10分钟，但他那和蔼可亲的言谈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三次见到周恩来先生是在西安城里的长安县政府。当时，少帅已送蒋介石回南京，离开了西安。

大概是在12月26日早晨5点钟左右，接到一个通知，让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东北军司令部各处和张公馆各处的代表，以及卫队的一些军官代表，共有300多人。

在会上，周恩来先生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在洛阳黄埔分校蒋发表了声明，看那个声明他是要撕毁自己的诺言。这样，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一个时期。"讲到这里，他环视一下会场。接着，提高了声音继续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他的声音洪亮有力，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话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

（选自《纵横》90年5期，作者：赵新华）

材料五　王炳南回忆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同志

王炳南回忆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没有抗战胜利的基础，西安事变的意义就在于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整个事件中，周恩来起了关键性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西安事变之前，为了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来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这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同他一一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还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会谈一直到深夜。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形势极其复杂，亲日派何应钦指挥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当天晚上就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用透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抓住两位将军的心，使他们看清了事变的前途。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心血。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

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周恩来十分关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事变后成立了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向我指示说：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事变后西安的《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是由宋黎、郭维城等负责的，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搞国际宣传。当时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12月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同宋氏兄妹的谈判，并在会上首先提出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在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那天，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很严肃，也很认真，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蒋介石面容憔悴，无精打采，但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却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当周恩来谈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条件时，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了同意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王炳南说："12月25日下午三点多，张学良没同杨虎城商量，就轻率地把蒋介石送回了南京。事后，周恩来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在南京软禁了张学良后，西安古城风云突变。中央军再次向西安推进，汉奸特务兴风作浪，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分裂。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久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首领杀害了王以哲将军。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来搞所谓'兵谏'的。他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是在犯罪！周恩来这番严厉的训斥，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随后，孙铭久也到周恩来住处，跪地请罪。王以哲被害后，西安城内顿时增加了一层恐怖气氛。周恩来面对危局沉着冷静，亲率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周恩来迅速果断的行动，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稳定了人心。

周恩来这种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使杨虎城和所有在西安的朋友们、同志们都深深感受到：没有周恩来在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为中华民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摘自85年《经济日报》8月23日《力挽狂澜 际会风云——王炳南回忆抗战中的周恩来同志》一文，作者孙燕君）

材料六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不仅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共中央。

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十分秘密，直到行动前才通知中共西安代表刘鼎，刘鼎于12日下午2时许电告党中央。得到信息后，中央于13日在张闻天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党中央对兵谏性质的认识是明确的：逼蒋抗日。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响激烈，蒋介石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以至拥蒋反蒋派系均谴责张、杨，亲日派何应钦甚至主张武力解决事变，中国局势一时出现复杂的局面。加之事发突然，情况不明，在事变刚发生时，中央还很难公开表明态度，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在13日的会议上，张闻天比较冷静、准确地表达了我党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闻天与周恩来的看法颇为接近，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之时，"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复杂情势下的这种清醒、冷静的认识，成为我党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经过6天的观察，12月19日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通电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赴西安参加谈判，张闻天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做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同时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确定我方对策。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闻天和刘英都曾前往西安做工作。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使一度和缓的局势再度紧张。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到西安做青年工作，住在李克农管的内部招待所"六国饭店"。说是六国饭店，其实不过是几间平房，不过，在这里刘英吃的美味佳肴是"猪油熬白菜"。因情况复杂，刘英在西安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通过贾拓夫派另一位女同志将当地学生领袖带来接头。

一天，李克农的副官王立突然悄悄告诉刘英："洛甫同志来了。"并将刘英带到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张闻天笑眯眯地跟刘英打着招呼。

刘英只知道张闻天已经与恩来、博古谈过工作，但却不了解他此行的目的。

张闻天1月25日从延安出发，27日抵达西安。他是在张学良被扣之后，西北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到达西安的。为谋求全局和平，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对南京政府做某些让步，使西安事变得到彻底的和平解决，东北军上层也预备做些让步。但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激于义愤，坚决抵触，西北形势若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就在张闻天抵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发生了东北军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事件；深夜，周恩来、博古又获悉有人拟了包括东北军主和派和中共代表在内的暗杀名单。

第二天上午，博古急匆匆赶到张闻天住处，讲明情况紧急，当天就把刘英、张闻天送到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博古也相继赶来，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开了一夜会，并将决策意见当夜电告毛泽东、朱德，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三位一体（即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张闻天亲赴西安与周恩来等现场商议决策，并在到达的第二天向延安连发两封电报，体现了我党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心和所作的努力。但是，2月2日主和派王以哲将军的被害，使得西北联合局面解体，张学良回陕的希望也成泡影。张闻天感叹不已，觉得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没有做好激烈派的工作。

（选自《纵横》90年2期，作者：孙晓阳）

两广事变

背景介绍

1936年5月27日，西南执行部发表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是发起“六一运动”的先声。六月一日，两广决定揭起抗日旗帜，出兵北上。六月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南京中央、全国各界及海外华侨发表通电，首述日本侵华日甚一日，中国已届生死关头的紧迫形势；次论南京政府一贯纵容日寇，采取妥协投降的外交方针，给国家造成了无穷危害，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据此，通电督促南京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六月四日，第一、四集团军全体将士联名通电响应，要求迅速改颁军号，明令北上抗日，雪洗频年屈辱之耻，为国家民族争一生机。

两广方面事前作了军事部署。陈济棠原有兵力三个军九个师，发动前又扩编了两个军，总兵力达七十个团共二十万人；桂系原有两个军，运动发起时又扩编两个军。广西民团已久经训练，可动员九十九个团用于作战，总兵力约十多万人。广东有六个中队空军，黄光锐为司令，有数十只江防舰艇；广西有三个中队的空军，林伟成任司令。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两军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并颁发印信，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的番号。随即两广军队开始行动：对福建、贵州取守势，对江西、湖南取攻势；桂系集中主力于全州、桂林，以四个师置于祁阳，先锋部队进至湖南永州；粤军主力部署于大庾、韶关地区，准备北攻江西。两广均在邻省边界地区修筑防御工事，以防中央军进攻。

陈济棠派人与何健联络，两广军队经过湖南北上抗日。何虽面允，却立即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两广方面组织数万人参加的群众抗日救国示威，给军事行动助威。两广的地方国民党党部、群众团体，纷纷电请中央、要求顺应舆情，调兵北上，出师抗日。两广当局组织了“扩大民族主义宣传设计委员会”，宣传“收复一切失地，还我完整河山”，“宁可死而为爱国鬼，不愿生而为亡国奴”。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压制民众抗日运动的行为。广西报纸每天都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抗日标语、报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其中的口号有：“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出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不参加抗日运动的不配做中国人”，“反对抗日运动的就是汉奸”，“摧残抗日运动的就是卖国贼”，“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等。第四集团军遍贴抗日布告称：军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取消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全力抗日。

两广运动得到国内舆论深切同情与广泛支持，全国各爱国团体纷纷派人到广州联络，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的爱国斗争。

材料：

- 桂粤两军入湘
- 李宗仁忆“六一”运动

材料一　桂粤两军入湘

粤桂联合揭櫫“抗日反蒋”，是从1936年6月1日正式开始的。

6月1日那天，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具呈南京国民政府，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呈文说：“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有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则无出路。”文中申明“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2日，以同样的内容，通电全国。4日，两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数十人通电，表示愿意率领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国家民族争一线之生机”。并请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改颁军号，准其北上抗日。西南两机构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军

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两广当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抗日的行为，在全国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6月5日，陈济棠单衔电蒋，吁请出兵抗日。两日后，蒋复陈一电，重弹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旧调，并说"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必有损于"国家尊严"。6月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构，令其转饬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不得自由行动。6月10日，蒋介石再电陈济棠，谓南京已有电令，严禁两广部队擅自行动，全国军人必须"听命党国"，倘两广继续行动，即为"地方将吏抗命"。6月11日，西南执行部发出通电，对蒋介石所谓"统一方能御侮"加以驳斥，揭露蒋介石无御侮之心，日本在华北增兵，未见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而调集兵力向粤、桂压迫，奉劝国民党中央放弃贻误全国抗战的内战政策。蒋介石对两广的劝告不予理采，他早已下令集结军队于两广边境，南京政府此时还与两广通电往返，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正当蒋介石企图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马电，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宋、韩这一电报，目的在于试探蒋介石下一步对两广采取什么行动。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韩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仍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假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意在骗取宋、韩的支持，使他俩不致为两广所利用。

桂粤部队已向湖南出动。当时两广方面军队共约30万，飞机100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粤军番号仍称第一集团军，桂军为第四集团军。6月6日，广西部队进驻湖南永州，作出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之姿态。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所到之处，他们散发的抗日传单口号有："开放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

两广军队假道湖南，需要争取何键的同情。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何键玩弄两面手法，一面与两广相通，坐观桂粤与蒋战局的变化，一面向蒋暗送秋波，将两广动态向蒋告密，换得蒋的40万元奖赏。李品仙一再敦促何键明确表态，何键说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李品仙怏怏而返，联湘计划竟无结果。这时蒋介石派陈诚至长沙坐镇，10月，蒋军两个军抢先控制了衡阳。桂军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到达祁阳大营市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桂军虽张贴布告说："本军师行所至，不反对或攻击任何人，不反对或攻击任何军队"，但何键看到形势对两广不利，就不敢应允桂军假道湖南了。

与时同时，蒋介石加紧以官职，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部战斗力最强的是驻防赣南的第一军，蒋允诺该军军长余汉谋在去陈之后主持广东军事，余便叛陈投蒋。广东空军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下，有48架飞机于7月4日飞离粤境。7月6日，投蒋空军人员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同日，陈济棠部队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离开汕头赴港，通电弃职投蒋。7月8日，粤空军又有9架飞机飞往南京。余汉谋由大庾去南京见蒋，表示愿依蒋命去收拾粤局。

白崇禧见粤局危急，忙于7月10日派黄旭初、刘斐飞抵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商讨两天，决定在军事上组织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两军作战，粤军改为内线作战部署。同时，广西财政厅厅长黄蓟抵粤与广东财政厅厅长区芳浦商定：两省银行发行的钞票互相收受和兑换。13日，黄旭初、刘斐、黄蓟离粤回邕。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离间桂粤的关系，表示不改变广西的现状，以此来安抚李、白，进而孤立陈济棠。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主任、副主任；任命陈济棠为最高国防会议成员。

广东局势恶化，必将危及广西，李、白自然尽力扶持陈济棠。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运存西江，并问是否需要桂军东下援助。由于广东局势逆转太快，白崇禧的建议无一可以实施。同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广东省绥靖主会和第四路军总司令职，指斥陈济棠称兵背叛中央，破坏"统一"，限令陈于24小时内离开广东。7月15日，余汉谋挥师指向韶关、翁源等地，陈部第二军不战而退，第二军军长陈达声明"服从中央"，准备迎余来穗代陈。此时，陈济棠还存侥幸之心，7月15日致电蒋介石说：如蒋宣布抗日，他当即日晋京，共赴国难。蒋介石正踌躇满志，根本不理睬陈的来电。白崇禧为挽救粤局，7月17日致电陈济棠："粤局危急，间不容发，应以官以钱或其他可行措施进行挽救，否则，转瞬将为他人所有，何所爱惜耶？"陈济棠已准备下野，不会考虑白的建议了。当天蒋介石派机飞南昌，接陈济棠的私人代表——师长陈汉光到南京。陈汉光带去陈济棠致蒋介石的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仅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这当然不会被蒋介石所接受。

蒋介石于7月18日以巧电复陈，并另有一函由陈汉光带回广州；逼陈济棠迎余汉谋就任。同日，被陈济棠视为王牌的广东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离粤

投蒋。陈济棠见大势已去，遂以军事交由李扬敬、政治交由林翼中负责向余汉谋交代。陈济棠离去时，发给余汉谋一个电报说："棠诚信未孚，现诚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即日，陈济棠乘英舰"蛾"号去香港，悄然下台。

（摘自《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李宗仁忆"六一"运动

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呈文的内容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时。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乃根据这呈文的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两日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我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是为有名的"六一运动"。

在当时不明内幕的人看来，以为两广又假抗日之名，对中央用兵。其实，一看"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的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当时中央如置若罔闻，或与西南电战一番，此事也便消灭于无形，而我们也算慎重地应付了陈济棠这次的妄动。

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运动"的发动，正予蒋氏以打击陈济棠的机会。先是，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款项多至数百万元。果然"银弹"效力甚大，七月四日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中央。七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离职，赴港休养。七月十三日南京军委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余在粤北防地立即通电就职，并声明率部回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乃于十七日晚间十一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民国十九年阎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罢。

陈济棠于七月十八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迳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果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果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愿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主席、政学系巨擘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七月十八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沛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

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发表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拼。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逐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进言，劝毋断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九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已甚，战争不可轻启，都是同意广西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愤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权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患，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拚不可。

当时，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竟抗不从命。九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附和。白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敝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九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7月14日闭幕。

五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国民党五大以来的内政与外交，强调按五大决议精神，建立力量统一纪律之严明的"近代国家"，实则如何解决两广事变是全会的中心议题。七月十三日，全会通过决议，"明令撤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时通过《国防会议条例案》，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设义长一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议长一人，由行政院院长担任。按此项规定，国防会议正、副议长只能由蒋介石一人担任。决议组织的国防会议委员除按条例规定应为委员者外，特对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列举了十八名为委员，即：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何成浚、顾祝同、刘湘、龙云、何键、蒋鼎文，杨虎城、朱绍良，徐永昌、傅作义、余汉谋。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全会上讲话说，因为西南方面与中央太隔膜了才有这项提案。他为表示主张抗日，特对五大决议的重要一段话作了明确的解释，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割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

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蒋介石举起了"统一抗日"的旗帜以涣散西南的斗志，拢络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

蒋介石的讲话在国民党中受到好评，局势趋向稳定，于是对两广采取进一步措施。七月十三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军委会连续公布二十八项命令。其中任命余汉谋任广东绥靖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四路军第一军军长，张达为第二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长兼第四路军副总司令，黄光锐为空军驻粤指挥官，张之英为广东省江防司令。重新任命了各军副军长及各师长。

七月十四日，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发表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着重强调"一致团结，保障统一，巩固中枢"，特别提到"西南两机关之撤销"，"尤足以扫除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睽离隔阂之形迹，表示党国集中统一之实际，以根绝中伤分化之阴谋。"五届二中全会成了蒋介石统一两广的工具。

材料：

- 会议宣言
- 冯玉祥致闭幕词

材料一　会议宣言

本会议之举行，距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体会议之期已逾半年。回溯此时期中，内外环境，弥感艰危，举国同胞在极度烦闷苦痛之中，共赴国难之精诚，日益深著。国人所殷切期望于本党者，为如何统一人民救国之意志与力量，以御当前之外侮，而保民族之生存；而本党之所为坚忍负责，致其最大之努力者，亦以是为鹄的。此次全会中央各同志赴会之盛，为历届所未有，多数同志或躬负重责，或久未来京，无不专涖首都，共商大计。而西南两机关之撤销，出于两粤多数同志之提议，尤足以扫除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睽离隔阂之形迹，表示党国集中统一之实际，以根绝中伤分化之阴谋。可见精诚团结，早具同感，艰危共济，弥见决心。而外察环境，内审国情，必如何方能确实统一救国之意志，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则此次全会所欲照示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者也。

五全大会于救亡图存既已明示吾人以正确不易之方针，其基本要点，则以为在中国今日非以自身刻苦之奋斗，彻底更始之觉悟，以建立一人力、物力并皆发展充实之"近代国家"，决无以克环境之艰危，奠国家于巩固。而对于当前御侮之要略，亦明示抉择国策之限度，济之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凡所决议，不仅本党同志共信为救亡图存之真理，即一般爱国明义之国民，亦无不认此为共同努力之基点。全会检阅半年来中央党政措施，认为确能秉承五全大会所交付之方针，艰苦奋斗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环境中，幸获相当之进步。就外交言，国难之程度虽日益深刻而严重，然以中央政府严正应付，坦直周旋，务纳外交于正轨，与冀察及全国将士为维护国权而努力，已使国际对我之观感显有转变，而和平折冲之望，因之亦尚未全绝。就内政言，则如币制之改革，金融之稳定，建设之进展，以及剿除匪患，防遏天灾，无不于艰苦备尝之余，收迅速显著之效；而宪法草案之如期颁布，国民大会之定期召集，循序进行，既以昭信于国人，亦将厚集全国之心思才力以共图救国之大计。至若完成"近代国家"之组织，原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义。有此组织，方足以建立完固之国防，保障民族之独立。半载以来，中央不特在物质方面力谋国民经济之建设，及自卫能力之充实，而对于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唤起民族意识，尤努力培养，各地之民众训练与学生训练，凡足以统一救国意志，振起卫国精神者，无不积极进行。同时对国民教育求普遍之发展，为失业青年谋服务之机会，其主旨亦莫不在于民德民力之增进，无形中为国防增厚其基础，亦即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致其不绝之努力，果能共同一致，循此迈进，必能确立民族复兴之始基。此固全国贤智之士所共与其役而深信不疑者也。

抑所谓"近代国家"之组织，其精神尤在于力量之统一与纪律之严明。世未有力量涣散而可以御侮者，亦未有纪律废驰而可以建国者。今日全国上下诚欲攘外御侮，均须爱护此十载艰辛牺牲换来之统一局面，尤须绝对恪守民族生命所系之公共纪律。在教育上、组织上能训练纪律，则国民可以团结而不散漫，国家自能增加其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尊重纪律，则中央与地方乃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割据封建之残余形态，可以一扫而空，国力乃有积累之增加与真正之统一，而国家对外奋斗所需坚固不拔之基础，亦于是乎确立。质言之，救亡图存之道，固莫要于御侮，而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此为言国防者所不可不知，亦为今日全体同胞所不可不察者也。

最近两粤异动，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一方面足以反映中国今日所处环境之艰难复杂，同时更足证明国家各部分间如不能维持严整之纪律与统一，决不足以立对外抗争之基础，而适足以加重国难。中央自此事发生，感于国事之艰危，爱护国家之实力，始终以和平方法，苦心善处，期挽危局于无形，而促一致之觉悟。所幸全国舆论咸能明辨是非，正言规戒，而我革命策源地之粤中民众，久受革命主义之熏陶，不为诡词妄行所摇惑，粤中陆海空军

将士多能昭揭大义，葆爱革命光荣之历史，尽力于国家统一之维护。此实全国爱国同胞所一致欢慰，亦我国难严重期中真正意志与力量之表现。而方东军事当局既已首唱异议，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动摇革命根基，虽经中央苦心之容忍，仍无悔悟之表示，律以国家之纪纲，宜为国民所不恕。全会对两粤异动，固切痛心，而一念国事艰危，断不忍以仅有之实力，轻用于对内之制裁。故仍本于总理宽大为怀之精神，务以政治方法消弭异动，纳入正当轨道，只求国家政令、军令自兹得以确实贯彻，是非顺逆之辨，昭然大白，纲纪法令，两无毁损，不仅不欲对此事变加以苛求，且追溯睽离乘误之原因，进谋消弭离间利用之凭藉，对于共同革命具有历史之军事同志，仍愿寄以国防之事权，谋更进一步之团结。同时又感于各地负责同志咸具救国之精诚，而鲜共同研讨之机会，值兹存亡兴废关头，益宜集中心力，共负艰巨，爰成立国防会议，期于荟萃全国之心思才力，发抒关于救国之良谟，为整个国防策安全充实之图，以树救亡图存之根本。全会深信此种措置，必与全国热望救国之要求相符合，而益以造成协同团结之力量也。

尤有为吾全国同胞告者，国家之处境愈艰危，国民之意志与行动宜愈趋于整齐与严肃，而以救国自任之国民，与负责之中枢，必更有需于彻底之信任与坚强之毅力。能如是者复兴、反是者灭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盖必具有牺牲奋斗之决心，方足以任宏远艰巨之事业。以中国近百年来之内多病根，外受束缚，而又处此国际冲突之漩涡，言乎建国，其难可知。本党秉总理之遗教，负革命之大任，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亦惟熟审于民族百年之利害，决不容掉以轻心，诚以一人一党之牺牲事小，而国家民族之牺牲事大，吾国家既已临此历史未有之非常时期，此时决策之当否，实系数千年历史之绝续，与民族千秋万世之安危。故不仅负责建国之本党所宜坚忍沉着，以赴事机，即吾全国同胞于此存亡危急之际，亦宜对于过去之历史与民族之将来负起一切之职责，认清时代责任，而以绝对严肃慎重之态度临之。

总之，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故此时全国国民唯有本于救国之诚心，予中央以彻底之信任，诚能一致团结，保持统一，巩固中枢，俾能负起责任，运用举国协同之力量，以救护国家，保全民族，则环境纵极困难，必可转换危机，造成复兴之大业。否则意志不一，步骤不齐，筑室道谋，自坏纪律，根本既伤，虽无敌国外患，亦必崩溃而不可救。本党受全国同胞付托之重，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即或形势更趋险恶，亦必于层围夹攻之中，百折不回，为我中国确立国家健全组织之基础，为我民族求得永远生存之保障。所敢郑重宣告于国人者，国家既处此非常之形势，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此则五全大会所决定之方针，兹更诠释揭示，以期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共喻者也。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历次宣言案重要决议案选编》）

材料二　冯玉祥致闭幕词

这次二中全会会期虽然不长，但是精神很好。在这样热的天气，大家平心静气聚在一起，讨论一切救亡大计，这样好的光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实在是很好的现象。

这回大会中最紧要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救国会议，实在非常重要的。全会闭幕宣言中曾说过，希望我们一般有决心的同志参加到这个会议，把意见贡献到中央来，大家一致共同努力。尤其是要紧的，恐怕有一部分不十分清楚中央意旨的同志，应当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都能够清楚，我们要真正赤坦地为国家民族去说话，使他们了解中央意旨，幡然来和中央站在一条战线上。唯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才有生路。在前昨两天会议中，有两位先生报告关于国防的问题，这就是恐怕我们一部分同志不清楚，所以特地详细报告出来，使大家明了中央的准备情形。

今天我们会议完毕了，在散会之后，希望各同志都要本着在会场的精神，奋发努力；尤要本着总理的教训，努力向前，救我们的国家，复兴我们的民族。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第二历史档案馆》）

鲁迅病逝

背景介绍

1936 年 10 月 19 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九号寓所。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1902 年留学日本，初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谋以此改变国民精神。1906 年发表《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抨击康、梁改良派。1909 年 8 月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 年 1 月，参加《新青年》编务工作。同年 5 月第一次以鲁迅的笔

名，发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此后，陆续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出版了《呐喊》、《热风》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26年8月，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北洋军阀政府迫害，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转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愤然辞职，彻底放弃进化论思想。同年10月移居上海，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一直用笔坚持战斗，创作了大量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深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作品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顽强的战斗精神。1930年以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为粉碎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做出了贡献。1936年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生前著作、著译甚丰，已编为《鲁迅全集》共16卷出版。

材料：

· 鲁迅的逝世

材料　鲁迅的逝世

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故。这消息立刻传到国内外，追求光明进步的人们一致表示深切的哀悼。苏联人民、日本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东方被压迫民族各国的许多人都把鲁迅的逝世看做世界文坛上的巨大损失。

鲁迅的去世，在要求抗日 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中，更引起无比的哀痛。四面八方的唁电纷纷飞向上海，全国各大城市的革命群众都发起追悼。单上海一地，就有工人、学生、作家、店员等男女老幼近三万人，不顾租界及国民党的警察特务的监视，纷纷前往吊丧。送殡的群众，唱着挽歌，喊着口号前进，成了对反动派的示威。中国共产党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致鲁迅家属的唁电中说："本党与苏联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鲁迅战斗的一生，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建立了不朽的革命功绩，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思想遗产。

鲁迅从1918年起，开始驰骋于文化战场，以文学作武器对各种旧思想旧势力宣战。他的大声呐喊，不仅震动着官僚地主永久统治的迷梦，也在广大青年中激起了反抗的火焰，并给中国新文学奠下了基础。

早期的鲁迅是一个相信进化论的爱国主义者。他反对复古，反对麻木，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家。他又是一个清醒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者，忠实于现实，紧紧地追随实现的发展前进，爱憎分明，斗争到底；因而他在政治上就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求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虽然五四时期的鲁迅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作家，但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十月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由于他在思想上已多少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因而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就不仅能对旧社会、旧制度作无情的揭露，而且还经常透露出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从而鼓舞了青年一代为未来而战斗的勇气。这种情况表明鲁迅的创作已和一般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预示了他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前途。

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急剧的斗争使鲁迅不能从容地将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具体的形象里去，从事小说的创作，于是他便发展了他的独具一格的杂文形式，来及时地进行战斗。他用这种锋利的杂文向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奴仆们冲锋陷阵，有力地打中敌人的要害。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鲁迅对现实的认识虽然逐步加深，但这时期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没有投入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他较多地看到工农群众由于反动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的一面，而不容易看到他们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因而感到自己是在"孤军作战"，思想上蒙上一层苦闷、彷徨的暗影。这种情况促使他一面战斗，一面探索；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时，也无情地解剖着自己。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阶级斗争的残酷事实，引起了鲁迅思想上深刻的变化。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的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从此，他毅然斩断过去的葛藤，不再犹豫彷徨，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背叛了旧社会，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列，并且宣称："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又给鲁迅以有力的帮助，使他终于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更进为国际主义者，由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路人。

从此，鲁迅的工作更勤奋，斗争也更勇猛了。他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介绍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作品，并创办了"奔流"杂志。在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创立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和其他革命作家一起，勇猛地向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幽默小品派等各种反动文学流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还严厉批判了革命文学内部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这些斗争保卫了革命文学的成长，从而使中国革命首先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鲁迅冒着生命的危险，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攻，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各项反动政策，并参加了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群众组织，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主力——红军所进行的反围剿斗争。

鲁迅的才能，到晚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他写下了更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杂文。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后期的战斗思想，鞭笞了各色各样的奴才，记录了国民党反动派媚外独裁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历史。

鲁迅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除了从事革命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外，还进行了很多的翻译工作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他是外国进步文化的辛勤介绍者和有力鼓吹者，也是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优秀继承者和杰出发扬者；他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家，也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中外进步文化的结晶。

总结鲁迅的一生，毛泽东给予了最崇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勇敢、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

绥远抗战

背景介绍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会议由日本关东军派遣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主持，参加人员有：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奸李守信，匪首王英以及卓古海、张海鹏等。共开三日，于十一月七日闭幕。会议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王部由商都进犯陶林红格尔图，兵站及后援部队设商都及嘉卜寺；李部由张北以西之南壕堑、大青沟，直犯兴和，兵站及后援部队设张北。得手后，再以李守信率伪蒙古军第一军由兴和出动，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伪蒙第二军，由绥北土木尔台出动，以穆克登宝伪蒙古骑兵第七师由百灵庙出动，分路进犯归绥。会后关东军派出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天飞到我绥东及武川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敌伪总兵力号称四万。

傅作义侦得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大意如下：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匪首王英等，既已决心背叛祖国，甘心出卖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我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我们一定要坚毅、沉着地积极作好一切准备，为完成抗战救国的艰巨伟大任务而奋斗。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讨抗战对策。确定绥东红格尔图方面的作战，由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负责，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负责。傅作义说：绥远为西北数省的门户，保卫绥远，就是保卫西北，关系非常重大。大家的精神很好，但只凭血气之勇，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讲求策略和很好地运用战术，才能克敌制胜。要出奇兵，必须行动迅速，严守秘密。战士们要配备开道用的工具，扫除路上的积雪，要携带防空用的白布，利用雪地伪装，使敌机不能发现我军。傅作义最后要求大家激励全体官兵，全力以赴，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伪蒙古军近万人在日军策动下分三路大举进攻绥东。傅作义部英勇作战，在红格尔图击溃来犯之敌，随即又乘胜进攻百灵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百灵庙，又于十二月初攻台大庙等绥西镇。伪蒙古军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绥远军击退。

材料：

- 红格尔图保卫战
- 血战百灵庙

材料一　红格尔图保卫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加紧了对内蒙古的侵略。一九三六年一月，日伪组织“蒙政会”所属的守备队官兵二千余人，在共产党人乌兰夫领导下于百灵庙举行武装起义，振奋了内蒙古广大人民抗日精神，打击了内蒙古上层阶级中的卖国分子，迫使德王集团把其驻地迁往了察北的嘉卜寺。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拼凑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积极准备进攻绥远。

八月初，伪军司令王道一率部三千余人第一次进攻绥远红格尔图。当时红格尔图守军——晋绥骑兵第三团，在群众支援下奋起抵抗，伪军败退红格尔图以东约四十余里的头股地驻扎，准备再次进犯。

这时，我在赵承绥部下任骑兵六团团长，驻防集宁。一天，师长彭毓斌令我连夜率领所部向红山集中（红山是傅作义部绥东司令部所在地）。我正在行军途中，彭师长乘车赶来，让我与他一起共乘车先行到达红山，与该地驻军共同研究袭击头股地伪军的计划。之后，彭师长当面把前往头股地袭击敌人（王道一）的任务交给我，并说："你先从小路挺进，我从大路支援，但必须在三点以前到达"。我随即挑选精干弟兄八十名由蒙古旅战士做向导，轻装出发，全速挺进，连翻十三个山头，于夜二时许，提前赶到。经侦察伪军毫无防备，为了出敌不意给予痛击，决定不等彭师长到达就先进攻。部队从暗水道钻进围墙，立即冲进伪军驻院，用手榴弹向敌猛烈轰击。伪军仍在梦中，又摸不清进来多少人，有的仓促爬起应战，有的赤身四处逃窜，乱成一团，唯有一碉堡内伪军用较重火力向我射击，被我集中火力予以消灭。全部战斗三小时许，当彭师长率主力到达时，战斗已胜利结束。敌人伤亡惨重，大部逃散，枪枝弹药遗弃满地。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继续招兵买马，扩充伪军，企图卷土重来。

十一月上旬，日本侵略军认为已准备就绪，便指使伪司令王英带领一万余众，在日军官指挥下，再次向红格尔图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时，我团一半由中校团副张少良率领在红格尔图驻守，另一半由我率领在距红格尔图二十里外的高家地驻防。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敌人开始向红格尔图四面进攻，我一面电话命令其团副死守待援，一面准备亲带所部的夜间冲入红格尔图，加强防御力量。同时，师部也命令我团死守三天。当日黄昏，我集合部队向红格尔图增援。走到距红格尔图六七里的地方，天色已全黑了，枪炮声也稀疏下来。我命令部队不准说话，不准开灯，没有命令不准开枪，继续快速前进。就这样从敌人的缝隙间穿插而过。敌人虽发现了我们，但是既未呼询口令，又未射击，大概是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人的缘故吧！

全团会合后，我和团副研究了情况。第二天一早，我向部队讲话，说明东四省沦陷后，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亡国奴境地，我们必须誓死保卫红格尔图，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持，为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全团官兵士气很高，一致表示愿为国尽忠。由于预料敌人会很快进攻，所以部队饱餐之后，立即进入阵地。不一会儿，敌人就开始了更猛烈的进攻。他们上用六架飞机沿着阵地轮番轰炸，用机关炮连续扫射，下用十门大炮不停地轰击，其万余步兵波浪式地向我进攻。但是我团在群众全力支援和鼓舞下，坚决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用轻机枪击伤敌机一架。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敌人兵力虽占绝对优势，但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红格尔图仍为我军所控制。

红格尔图的胜利和随后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出，全国振奋。各地各界赴绥慰劳人员络绎不绝，形成了一九三六年冬季的援绥热潮。青年学生为抗日部队大演救亡歌曲和戏剧，尤其是有关东北的流亡歌曲，唱者泪零，闻者欲泣，学生和士兵沸腾的抗日情绪交织在一起，极其高涨，令人感奋。

（摘自《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血战百灵庙

百灵庙位于绥远省北面草地，距归绥市约三百余华里，建筑宏伟，四周群山环绕，东南、东北、正北、西北、西南有五道沟可以通行。山外地势平坦开阔，百里内无村庄，由外向内，逐渐升高，以百灵庙为中心，对四周形成瞰制之势。山内之幅员三四华里的小盆地，有一小河，由东偏南流向西北，分河东河西两部，河东多为汉人行商，河西地区较大，为喇嘛集居之所。庙内大殿林立，房屋亦多，日军在这里驻有特务机关长胜岛领导下的军事人员。他们把百灵庙这个地方作为进攻绥远的基地，运来大批粮秣械弹。伪蒙军李守信部骑兵约三千人，在周围山上筑有工事。

当时驻绥远的傅作义第三十五军辖三个步兵旅，六个步兵团，大部在绥东、绥北各要点构筑国防工事。第二一一旅第四二一团驻武川县境，我任该团第一营营长，率部在归绥以北四十余华里的大青山上老爷庙附近构筑据点工事。老爷庙是归绥市经武川县到达百灵庙的必经要点。我们亲眼看到日军运输粮秣械弹的汽车横冲直撞，路上行人躲闪不及，日军司机助手即以铁棍击头，遇有庙会的时候，他们开着汽车故意往人多的地方乱闯，逞威风取乐，我广大官兵个个义愤填膺，忍无可忍。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军指挥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以及安华亭、石玉山、金宪章等伪蒙军，进攻察西商都县属的土木尔台、红格尔图和南壕堑（即尚义县）等地，并以一部兵力协同盘踞在百灵庙的伪蒙军从绥北的大庙直向大青山以北威胁，企图逐步侵占绥远全省。

傅作义将军看到日伪军越逼越紧，形势岌岌可危，就在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下和绥远人民的直接支持下，掀起了保卫绥远的抗日战争。他把第三十五军和在绥东驻防的赵承绥骑兵都动员起来，对日军所指挥的伪蒙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取得了红格尔图等地战役的胜利，并且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准备进一步收复百灵庙。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傅作义在百灵庙正南近一百华里的二分子、公胡同等地区集结了骑兵一师，步兵一

旅，各辖两个团，附山炮、苏鲁通高射炮各一营，装甲汽车一队和汽车数十辆，约五千余人，以骑兵师师长孙长胜为总指挥，步兵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当时的作战部署是：步兵旅附山炮、苏鲁通炮为主攻部队，由正面攻击，分为左右两上梯队，左梯队为第四一九团，由团长张成义指挥，从西南口攻入，右梯队为第四二一团，又以第二营从东南口攻入，第三营掩护旅之右侧，并打敌增援，第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指挥部沿东南大道右侧跟进。骑兵师进出敌之背后，与步兵协同，由北山围攻，并追击溃退之敌。

部署既定，各部队于当日（具体日期忘记）黄昏前即由集结地出发。因收复百灵庙是近于急袭性质的战斗，为避免敌机侦察和轰炸，须在夜间行军，以便于翌日拂晓前接近敌阵，发起突然攻击，消灭敌人。并为保持部队战斗力，约三分之二以上的行程，是在黄昏前和皓月以下汽车运送的。

午夜过后，左梯队第四一九团即开始向敌攻击，继之，右梯队第四二一团第二营也开始了进攻。因官兵对日本侵略者蓄恨已深，战斗一开始，就奋不顾身地勇猛冲杀。激战数小时，敌不支后撤。将至拂晓，敌凭借最后高山和工事，负隅顽抗，致使我军前进困难，第四一九团伤亡较大。孙兰峰旅长为在拂晓前攻击成功，乃决心用第四二一团第一营投入战斗，并指定第三连由连长张振基率领，乘装甲汽车六辆，由东南山口（沟内可通汽车）直冲敌后，围歼高山之敌。敌人以炽盛火力阻击我装甲车，该连仍奋勇前进，在重机枪掩护下冲至沟中。敌以集束手掷弹将我先头装甲车击毁一辆，致后续各车不易前进。第三连官兵当即迅速下车，勇敢地向山上之敌猛攻，战半十分激烈。由于我第三连吸引了敌的注意力，第一、二两连便乘机沿沟的东西两侧山梁登到山腹，借我山炮威力的掩护，一举而把第三连当面之敌消灭，其他山头之敌即向庙内溃退。当我第一、二两连跟踪追进山内时，见有小汽车两辆由庙内驶向东北（后据悉是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及其指挥部人员）。残敌向东北方向沿通滂江大道逃窜。战斗于上午八时许结束，第四一九团与第四二一团共俘敌二百余人（多系伪蒙军）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一百余枝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在收复百灵庙的当天，从正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日军飞机数架不断飞至百灵庙上空，侦察庙内我军情况并轮番投弹，傅作义将军为避免部队受无谓损失及防御敌人反攻，电令除留第四二一团担任百灵庙守卫任务外，其他步、骑、炮各部队一律于当日撤回百华里以外各村庄隐蔽，以便于日军反攻时及时支援留庙的守军。各部队奉令后，即星夜撤到指定地点。

第四二一团团长刘景新分配第一营在东北山，第三营在东山，第二营在东南山，冒着严寒加速构筑防御工事。

日军不仅派机在百灵庙上空不断侦察，且指挥伪蒙军步、骑兵各两师从大庙方向出发，逐渐迫近百灵庙，企图进行大规模反攻。傅作义据报后，仍令孙兰峰率原山炮、小炮等各部队即从武川开回百灵庙，坐镇指挥，嗣又令王靖国部驻包头的步兵补充第一团，由团长刘效曾率领，开到百灵庙参加防御战斗。

刘效曾团到达之日下午，指挥部即令该团接替第四二一团第一营担任的东北山上的防御阵地（因东北口系通德王府、滂江和大庙的大道，判断日军可能从此方面为攻击重点，故控制较大兵力），并令第四二一团第一营于当日将防务交给刘团后，即刻到庙南的康熙佛爷山构筑防御工事（因该山大而险峻且背向南方，我增援亦易，在补充第一团未来以前，因兵力所限，未能设防）。

经四二一团第一营交防后，天色已晚。我率领各连长到南山侦察地形时，因天色大黑，不便作周密部署。并料定日军不敢于当晚来攻，当即大山北腹，选择要点，着第三连布置连哨，严行戒备，令其余各连，暂在山下及庙南空地搭蒙古包休息，准备次日拂晓，再在山上周密布防。

不料日军飞机前几日侦知我方在南山未布置兵力，是个空隙，乃于当晚午夜后选拔奋勇队六百余名，利于雪夜，反穿白茬羊皮大衣，从南面偷袭我军，企图占领南山，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庙内反攻，重行侵占百灵庙。

从南面向康熙佛爷山攀登的敌人快至山顶时，天将破晓，被我第三连第二排哨长韩镇中发现，突然给以射击。敌人不知弹从何来，慌忙伏地作无目标的还击。我第三连官兵立即进入阵地，向敌射击，第二连则迅速从东边登山，向敌人右翼包围。我也指挥第一连和重机枪连从右方登上康熙佛爷山西端的最高顶。当时天已发亮，我见东方枪声激烈处似有羊群活动，初还以为是敌人用来踏地雷的，及用望远镜详细观察，才发现是一支反穿皮袄的敌人，正在南山正面雪地上匍匐前进，与我第三连激战中，我乃急令重机枪连占领阵地，居高临下，向敌侧面猛烈狙击，着第一连配合东面第二连，向敌左右两翼包围。激战至上午十时，敌以死伤枕藉又孤立无援，正欲弃阵脱逃。第二连排长齐振海率士兵十余名冲至敌人右侧后，以轻机枪、手榴弹阻断敌人去路。第一、二两连乘敌混乱之际，以炽盛火力合击围歼。计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生俘敌官兵百余名，获冲锋枪、手枪、步枪共一百二十余枝，残敌狼狈向东逃窜。敌奋勇队被歼后，主力亦向东北方向逃窜，未敢再来进犯。

一九三七年春季，绥远军民在归绥市举行了庆祝绥东抗日和收复百灵庙胜利盛大典礼和阅兵仪式。蒙汉群众个个扬眉吐气，欢呼雀跃，团结爱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文史出版社）

七君子事件

背景介绍

1936 年 11 月，沈钧儒、邹韬奋等 7 人因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而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号召下，1936 年 5 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占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7 月 15 日，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文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11 月 23 日凌晨，责以"危害民国"罪，将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 7 人逮捕入狱。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人士。1937 年春，国民党政府准备对沈钧儒等 7 人起诉公审。中共中央 4 月 12 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国民党放弃错误政策，释放政治犯。7 月初，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 年 7 月 13 日，沈钧儒等 7 人被释放出狱。

材料：

- 第一次被捕
- 沈钧儒等答辩状

材料一　第一次被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通过各种活动，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抗日救国运动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惊恐，万分恼恨，采取恐吓威胁，拉拢收买，分化瓦解，诬陷打击，绑架谋害等等卑鄙手段对救国会进行迫害，企图搞垮救国会，推毁抗日救国运动。但是，我们抗日救国的立场毫不动摇，抗日救国活动分秒不停，救国运动不断发展。

国民党反动派看到他们的这些反革命手段都没有得逞，于是赤裸裸地采取血腥镇压手段，以我们援助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这件事为借口，对救国会领导人实行逮捕，妄图以此扑灭抗日救国的烈火。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二时半，我正睡梦中，突然母亲把我叫醒，说是门外有朋友找我，请我起来看看是谁，有什么急事。我走到母亲的房间去，从窗口向外一看，只见几个面目狰狞的家伙。他们在外面大叫："我们行里来的！开门！开门！"所谓行里，就是上海租界的巡捕房。我一听就完全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为了抗日救国，我早有被捕入狱的准备，于是，我一方面叫母亲去开门，一面回到自己的房间穿衣。

开了门，五六个上海市公安局的穿黑衣的彪形大汉和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探，一拥而进了我的房间，其势汹汹，形如虎狼！进门后二话不说，有的拿手电四面照射，有的翻查我的房间。那个西探走到我面前，一面问我的姓名。我也一再反问他："为了什么事？我犯了什么罪？"他置我的问话于不理，只是极力催促我穿好衣服，跟他们走。我心里十分清楚，除了救国会的事之外，是没有其它缘由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对于非现行犯实行拘捕，必须将拘捕票出示被告，否则是不能随便捕人的，被捕者可以拒捕。因此，我再三要他们拿出拘票来看，那些黑衣大汉茫然不知所答，可是那个西探却狡猾地推说："到捕房里去给你看。"我被迫跟他们走。我告诉母亲和爱人桂灵，我没有犯什么罪，最大的原因只是与救国会的关系。母亲在万分惊慌中，还保持着相当的镇定，命我穿暖衣服，嘱咐我安心，说在外面她会替我想办法。我从容地走出门。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法律手续，他们准备象惯常抓捕他们认为要抓的人一样，一抓就走，从此不知下落去向了。

我被带到爱文义路租界捕房。到了捕房，我先经过"写字间"，问明了我的姓名，便被带到"西人包探间"。在这里，我借机会向逮捕我的国民党特务宣传：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共同救国，不应自相残杀的理论。我还对他们讲，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爱国之心的，对于拘捕爱国分子也不是愿意的。你们是执行命令，还可以原谅。我讲完以后，有两个人被我话打动了，立即表示："我们也没有法子"。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参加捕我的人员走了。捕房的西探要了我的口供：我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等等。他一一作了记录，最后加了一句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形成"犯人的供单"。随后，我被送回"写字间"，一个值班的华探让我打了十个手指的指印，搜查了我的全身，拿走我身上所有的物品，包括装在衣袋里的眼镜，还把我皮鞋的带子取下，接着把我关进面积不过三尺光景的象鸟笼一样的六角铁笼，关上铁门，还加上铁锁。早上七点钟，值班的华捕给我带上手铐。将近九点钟的时候，我被一个西捕、一个华捕、一个华探押上汽车送到法院去。送我去的法院是位于浙江路俗称新衙门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分二院"。

在法院，遇见沈钧儒、李公朴和王造时三位先生，他们也是被捕探押解来的。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三位与我同时被捕，而且在法租界的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位先生也同时被捕，一共七人。后三位被送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简称"高三分院"去了。

"高二法院"第一庭对我和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进

行了审讯。当我们走进法庭的时候，法庭上已经挤满了旁听的人们，救国会和我们的亲友为我们请的辩护人也已在"律师座"就席。法警捕探重重叠叠地站在法庭上，戒备森严，空气很为紧张。审判长入座之后，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旁听席上的人被迫退出，随后，法庭大门紧闭，气氛更加紧张。

法院开庭，首先审问沈、李、王三位。原告席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代表，是一个穿西装的青年，意态骄傲，好象以拘捕救国分子为荣的样子。他代表公安局控告，一会儿说三位有反动嫌疑，一会儿又说是鼓动工潮；说了半天也没有确定地说出他们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却要求引渡到内地法院去。沈、李、王三位立即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公安局非法移提。接着，由他们三个人的九位律师，轮流进行辩论，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公安局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担保外，改期再讯。于是沈老和李、王三位退庭走出门外，候在门外的群众热烈地向他们鼓掌和欢呼。

我走到被告席上以后，上海市公安局的另一个代表，到我家里逮捕我的一个家伙，也用如同前一个公安局的代表诬蔑沈老等三位的那一套内容，对我进行指责。我随即予以反驳，指出公局代表的陈述，全属虚罔，毫无根据。此时，我的三位辩护律师起立，指出捕房拿不出犯罪的事实，并提不出证据，没有拘票，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是违法的，法庭不应违法移送。最后，法院也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并宣布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再讯。

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位在高三法院经过斗争，也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这样就使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我们的阴谋遭到挫折。

（摘自《漫话救国会》沙千里）

材料二　沈钧儒等答辩状

被告　沈钧儒（年六十四岁，浙江嘉兴籍，在押）

辩护人　张耀曾（律师）秦联奎（律师）李肇甫（律师）

被告　王造时（年三十五岁，江西安福籍，在押）

辩护人　江庸（律师）李国珍（律师）刘世芳（律师）

被告　李公朴（年三十六岁，江苏武进籍，在押）

辩护人　汪有龄（律师）鄂森（律师）陈志皋（律师）

被告　沙千里（年三十五岁，江苏上海籍，在押）

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徐佐良（律师）江葆椙（律师）

被告　章乃器（年四十一岁，浙江青田籍，在押）

辩护人　陆鸿仪（律师）吴曾善（律师）张志让（律师）

被告　邹韬奋（年四十二岁，江苏上海籍，在押）

辩护人　刘崇佑（律师）陈霆锐（律师）孙祖基（律师）

被告　史良（三十三岁，江苏武进籍，在押）

辩护人　俞钟骆（律师）俞承修（律师）刘祖望（律师）

为被告危害民国一案，具状答辩，并声请停止羁押事。

事实

缘东令入寇，得寸进尺，侵扰三连，囊括四省。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长城以北察哈尔又丧失过半，榆关以内，冀东伪组织亦宣告成立，驻兵日增，特务林立，走私猖獗，浪人横行，封豕长蛇，气吞宇内。而河北奸民方假请愿自之名，以行为虎作伥之实。形势岌岌，不可终日。于是平津教授呼号于前，学生市民奔走于后，风声所至，举国奋兴，沪上人士乃有救国会之组织。查二十五年一月一日《申报周刊》记载此事之宣言曰："此一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愤慨异常，上海文化界马相伯等三百余人鉴于中华民族之危机日迫，整个华北又将成为第二个伪满，特发起救国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主张七点：（一）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二）坚决反对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四）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五）从略（原文从略谅系恐启对外纠纷之故）；（六）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七）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救亡运动遍于全国，情绪激昂，为近年来所罕见"等语，此当时之实录也。被告等目击河山破碎，痛念国亡无日，奋起赴难，未敢后人。当时救国会及被告等均认为救亡唯一要道，端在全民族团结一致，御侮抗敌之故言论行动莫不以此为依归。至和平统一，集中力量各点，则均不过为求达此项目的之方法。凡此各情，均有后列答辩理由内所引救国会及被告等个人之文件足以证明。尔后全国抗敌人情绪日趋高涨，实足为政府外交强有力之后盾。奸民之谋既败，华北之局势暂安。对日外交强化，敌人之气焰稍杀。被告等方自惭个人能力之薄弱，报国之心未尽万一，不图于去年十一月廿三日午夜，忽同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分别被捕，卒由上海市公安局函送钧院检察处侦查，中经延长羁押期间两月，期满之日，竟以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提起诉公。

答辩理由

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所定之罪，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起诉书认为被告等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嫌疑。然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救国会与被告等耿耿之诚，具见各项文件，试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第一面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一致，以全力抗敌"第二面载："在这敌寇日深，而内部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为了这种要求，全国各地各界的救国团体代表们在上海开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第六面所载口号为："中华民族团结万岁！反日战争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第八面《页数系连前载宣言计算》载："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工作检讨》第十五面载："联合战线的意义是，在横的方面，团结各党各派，在纵的方面，团结社会上的各阶层，去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的扩大的团结，是需要极端的诚意和极端的宽大容忍的态度的。"第廿一面载："联合战线的意义可以用'同舟同济'四个字来解释。一只船遇了险，船里面的人自然会忘记了平时的一切党派的歧异和意见的冲突，而共同协力，使这只船出险。那时候如果真有少数不顾大局的人，依然为了自己的行李而不顾大众的生命，那才是大众的公敌——汉奸，此外是不应该有另外的纠纷的。一切党派歧异和意见冲突，都只好在出险以后再来算帐。然而一度共过患难之后，也许就不必再算帐了。"

钧儒、乃器、韬奋及陶行知等四人用个人名义所发表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第十二面载："随后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各等语。究竟救国会之目的系救国抑系害国；其主张为违反三民主义，抑正为三民主义之所规示，实可不待颖言而解。起诉书虽胪列犯罪证据至十款之多，然无非将救国会之各项文件，断章取文，穿凿附会；曲解对外敌忾之旨，为对内攘夺之意；并未就本案之事实与证据，为整个之观察，终至支离破碎，真相不明，而于国际情势与国策内容之如何，尤多未晓。兹为抉剔谬误起见，仅就所列十款，逐一答辩如次：(略)

(摘自《申报》1937年6月)

历 史 内 幕

争取东北军的秘密战线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告诉刘鼎，有位朋友约他在一个旅馆见面。刘鼎前去赴约，由此接受了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开始了他与张学良在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交往。

约刘鼎前去见面的是长期为中共工作的董健吾牧师。不久前，他受宋庆龄之托曾去了趟陕北，来往传递了国共两党谋求接触谈判的信件。董在宋处说起，去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当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送一位"周先生"(当时他们称刘鼎为周先生)为躲避警探搜查而到她家住了几天。"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阅历不凡的共产党员，挺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就让董健吾约"周先生"见面谈谈。

董健吾一见"周先生"，就认出是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阚尊民。两人早就认识，谈话开门见山。董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联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前去张处代表共产党方面工作。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到西安后还可以去陕北，这算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送到瓦窑堡的。"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刘鼎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仍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

刘鼎对张学良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认真回想和分析，认为张学良为大势所趋，有联共抗日的想法是可能的，可信的。既然张学良主动来寻找中共的关系，作为共产党

员，义不容辞，应该去和他见面谈谈，去做做工作，再把情况汇报给陕北党中央；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去，要冒点风险，但只有去才能把真相搞清，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经过这番思索，刘鼎决定应张学良之邀去西安，并化名"刘鼎"。从此，阚尊民就叫刘鼎了。

李杜即电告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红军代表李克农，已取得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但对李杜介绍的关系仍很重视，立即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前往上海迎接。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到了西安，找到董牧师介绍的陕西省禁烟局局长家里住下，并把史沫特莱托他带的麻药等寄放在那里。第二天，赵毅接他去金家巷张公馆会见张学良。

见面时，刘鼎先说明：感谢张将军派人专程迎接。我还要去陕北，张将军有什么意见，我将如实向党中央报告；有什么要了解的问题，我也可以谈谈个人的见解。

张学良开门见山地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

刘鼎一听这些问题很冲，带着几分火气，心想不可贸然回答，就说："让我考虑考虑，下次我们再谈。"

次日，刘再见张，逐个回答了昨天的问题。言辞侃侃，剖析精确，最后进一步指出：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这是东北军不负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殷切期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功垂史册，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占一页。

张学良静静地听着，心里暗暗佩服面前这位中共党员的胆识和见地，这正是他要找来与之对话、切磋的人。于是，他一改严肃端庄为诚恳亲切，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我们还要多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请就住在我这里。"刘鼎表示要去陕北，请张将军帮助。张学良即把他不久前曾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过，并约定将要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见面的事告诉刘鼎，说："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去住几天。"

洛川当时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张学良偕刘鼎到洛川，对外以"督师剿共"作掩护，实为摆脱西安"耳目"与琐事，要和刘鼎好好谈谈，以为同周恩来肤施会谈作准备。他们住在军部西侧一个两套的四合院里，张学良住里面的一套，刘鼎和张的随从军官住外面的一套。

刘鼎和张学良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天天谈话。张把他待为上宾，每日同桌共餐，边吃边谈，谈起没个完，有时两餐、三餐之间都不离席。

多次长谈，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出之有据，靠得住，因此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做好了与周恩来会谈的思想准备。

1936年4月9日下午，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抵肤施，同机前往的还有王以哲将军和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张学良此行绝对机密，除了同行的人，谁也不知他肤施之行的目的——将与周恩来举行历史性的会谈。

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静静等候着。延安宝塔的雄姿终于被夜幕掩没了。随着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双方主要人物见面寒暄时，张学良幽默地说："我这里还有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一看，这不是阚尊民么！（还不知道他化名刘鼎）紧紧握着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首长好！"刘鼎强抑着激动，从内心深处迸出这三个字来。就象走失了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他多么想紧紧地拥抱他最敬爱的首长啊！

会谈的议题，早在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张学良、王以哲电，通知周、李行期和联络地点时就已提出：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二、红军抗日立脚点问题；三、抗日救国施政纲领与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问题；四、联苏问题；五、双方合作、通商等问题。这次会谈双方不仅就这些问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还进一步涉及到联蒋抗日问题和协助东北军培训干部问题。

会谈于翌日清晨4时结束。夜餐后，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申报》六十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册赠送给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

刘鼎与张学良道别，随周恩来一行，迎着东方的曙色奔赴陕北苏区。路上，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啊，出乎意料！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原来曾估计会谈在抗日救国十大施政纲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议，设想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对最初方案就原则上全部同意，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都"出乎意料"。

10日这天行抵十里铺，遇上大雨，只好住下。周恩来亲自起草给中央《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写到会谈前刘鼎到张学良处工作，"谈得很投机。"

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了他在张学良处了解到的情况，并见到了经过长征的战友们，无限喜悦。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行前，周恩来向他交待：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是第一次出马，中央寄托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随后，李克农和刘鼎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以备交替使用，还一起试用了几个来回，做到准确无误。

准备完毕，刘鼎和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在一个清晨从瓦窑堡起程，牵了一头毛驴，驮着一藤箱山西票。当天下午到达肤施。驻扎在这里的东北军赵团长见过刘鼎和张学良在一起，以为刘是东北军的人，第二天用汽车把刘鼎送到洛川王以哲的军部。

张学良见到载命归来的刘鼎，如旧友重逢："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来了。好哇，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这要谢谢周先生！"

几天后，张学良和刘鼎乘飞机去西安。张亲自驾驶飞机，他知道刘鼎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工作过，让刘坐在副驾驶座上。张驾着飞机饶有兴致地在黄河上空绕飞了一段，直到快降落时，才把驾驶盘交给了驾驶员巴尔。

到西安，张学良把刘鼎安排住在他公馆内的东楼，对刘说："你在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多多帮助我。"

刘鼎考虑，要帮助张学良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首先要培养抗日的干部，形成全军的核心力量。他围绕开办军官训练团，建立抗日同志会，扩大卫队营，增加随从军官和创办学兵队等问题，先后多次向张学良提出建议和实施办法，并按张的需要参加一些具体工作。

7月初，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行前忽然派人把刘鼎找到他在王曲的住处，讲了一个重要问题，并断然说："请你立即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刘鼎立即回到西安城里，从地图上查到离肤施最近的城镇是安塞，立刻电告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

第二天，刘鼎乘飞机到肤施，然后步行去安塞。途中遇到一场大冰雹，他顾不上躲避，头竟被打出了许多包。

安塞当时是个没有几座象样房屋的小镇。刘鼎到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童小鹏等已等候在那里。周恩来问："只是你一个人？原以为张学良或者王以哲一齐来。"原来，中央接到电报后，知张学良有大事要谈，几位主要负责人都赶来了。

晚饭后，刘鼎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以及东北军内部情况，军官训练团开办情况，张学良和晋、平、鲁、川、桂、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等等。会开了一夜，最后，毛泽东主席做了重要发言，部分大意是：

东北军正处在亡省亡家流离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匪"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商谈，回去又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其中有些高级军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弄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回到西安，刘鼎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向张学良做了报告，张听了，沉思良久，说："过去有些人担心共产党讲联合是要以此吃掉对方，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间互相拆台、吞并是司空见惯，而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以后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又说到改造东北军问题，张说："东北军骄、娇二气很浓，要克服。高级军官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还要增加领导力量，提一批青年军官。"讲到推动全国抗日局面时，他说："以后，我要尽一切办法劝说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此后，张学良一方面抓紧东北军的部队改造，通过个别谈话争取高级将领，一方面注意蒋介石的行踪，找一切机会向蒋进言，劝他抗日。

刘鼎在帮助张学良工作的同时，还负责党在西安的通讯、联络和交通工作。他在七贤庄一号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的牙科诊所。刘鼎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牙科医学博士，叫赫伯特·温奇，犹太人，为反抗法西斯的迫害而来到中国，由他来挂牌办诊所以掩护秘密交通站。党组织还派了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共产党员夏明以诊所护士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

有了诊所的名义，秘密交通站可以公开从车站、邮局接收史沫特莱、艾黎等人为红军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其他货物，再由这里转送苏区。刘鼎还在诊所的地下室安装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把曾在中央特科搞过电台工作的涂作潮从上海找来负责。这部电台可将中共中央在保安的"红中社"广播接收来再转播出去，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苏联、日本、新加坡都能收听到。国民党西北总部的交通处长曾向张学良反映：陕北那边电台很强，收听时就象在西安一样清晰。他哪里知道，这声音正是从西安七贤庄发出的。

刘鼎还利用他在东北军中的特殊地位（张学良身边工作），或以张学良的名义，关照西安至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是党中央当时对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叶剑英、潘汉年、邓发等党的重要干部都需经这条交通线出入苏区，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国际友人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入苏区，每次刘鼎都做出安排，保证安全。为了方便交通，他还购置了一辆大轿车。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回来，在西安见到刘鼎，刘鼎鼓励他把见到的中国红

军情况公正地向世界报道出去，并嘱咐斯诺："你可以写其他人，但是一定不要写我，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刘鼎的活动曾引起西安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艳晚"事件（即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直接逮捕东北军抗日干部的事件）后，张学良更担心刘鼎的安全，要派卫兵保护他。刘鼎说：不需要，那样工作反倒不方便。张要他带上手枪，"遇到情况，你先开枪，只要不被他们抓去，我就可以保护你。"刘鼎有在敌探环伺的环境中秘密工作的经验，虽然古城西安空气骤然紧张，他仍从容自若。

（选自《刘鼎和西安事变》作者：吴天遥）

西安事变前夕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日，正是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时。

对如何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毛泽东作出了带战略性的决策：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以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是"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要尽一切可能争取与张、杨搞好关系，以实现"西北大联合"，力争全国抗日局面的早日到来。

李克农将军受命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除了党的活动分子训练班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训练班，就是将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集中起来，举办"解放军官学习班"。当地老百姓则把他们称作"白军军官连"。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东北军出路是抗日，打回老家去！"当东北军军官一进入训练班的礼堂时，120双眼睛几乎同时凝聚在这异常醒目而又牵动情愫的标语上，一下子把这些东北军官与红军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由十几名红军男女战士演唱的《打回老家去》的歌声突然响彻在礼堂。歌声把他们带到了正在遭受日寇蹂躏的松花江畔，歌声刺痛了这些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三省的东北军军官们那颗倍感屈辱的心。他们被唱得垂下了头，被唱得泪水满面……

这都出自李克农的精心布置。

在这些东北军官中有一位特殊人物，就是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的团长。被俘后经李克农多次做工作，使他的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由原来沮丧、不言语，甚至有抵触情绪，转变到悔恨自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他向李克农坦率直言："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他人的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对高福源的处理意见李克农当然是清楚的，但此时李克农并没有立即答复。

高福源见李克农未作声，便进一步问道："是不是怕我回去就跑了。"

李克农摇摇头解释说："高团长，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我有些担心。"

高福源不加思考地回答说："你放心，我有把握，再说为了抗日救国，就是死了也值得。"并进一步说："我回去时，你们可以派一人与我一起回去。"

临行前，李克农又向高作了交代："你不要说共产党派你回去的，先用个人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再深说。如果他有意，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福源回去见了军长王以哲，王以哲将高回来之事及时报告了张学良，然后由王以哲带高福源去见张学良。张学良对高福源先来了个下马威，拍案怒斥：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还敢让我"通匪"。声称要将高拉出去枪毙。

高福源毫不畏惧，冲着张学良嚷道："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还有脸去打抗日的红军，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寇，却在这里打内战！"

张学良闻声大喜，忙上前握住高福源的手说："你果然有胆量，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

迫切想与共产党接上关系的张学良和高福源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重返瓦窑堡，立即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

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1日从瓦窑堡出发，冒着大雪，向洛川行进。

出发前，周恩来曾嘱咐李克农："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东北军内混有不少蒋氏奸细，为防止泄露，李克农等人是在午夜入城，并被秘密安排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十分僻静的院内，而且有王以哲的贴身警卫把守。李克农到达洛川的当晚就电告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

王以哲也于当晚电告张学良，禀报李克农一行抵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在回电中称，因有事去南京，要王先同李克农商谈六十七军（即王以哲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会谈于2月26日开始，李克农首先陈述了我党提出的大敌当前，应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主张。接着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会谈比较顺利，经过李克农与王以哲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如下口头协定：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地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五、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去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谈判初战告捷，但真正的对手还在后面。

3月3日，张学良乘飞机从南京回到西安，次日，未等恢复疲劳他便自己驾机秘密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张学良抵洛川时，全城实行昼夜警卫。

李克农与这位少帅是初次相见。一见面，张学良开口道："李先生辛苦了。"

李克农见张学良穿一套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架一副墨镜，手持文明棍，酷似富商，便风趣又不失礼地问道："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被问得先是一愣，又很快反应过来，边笑边回答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言下之意他与王以哲所谈六十七军之事不同。

头脑敏捷的政治家李克农是不难理解此话的含意的，随即也会心地发出一阵豪放的笑声。

张学良不愧是军人，快人快语："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克农亮出此时的公开身份。

张学良又问："组织部长是对敌人的吗？"

"不是。"张学良话音未落，李克农已简练地作了回答。

"你到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张学良站起离开座椅，边踱着方步边说道："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一、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你们说的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二、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三、你们说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坦然地说道："红军当然是抗日，要不为了抗日，何必走二万五千里到陕北？"

"你们到了宁夏还准备开到前方去抗日，是否？"

"是的。"稍顷，李克农又继续答道："张先生，你是一个军事家，抗日这件事，要有后方，不要说要有总部后方，至少有运输后方。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这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张先生你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到。"

张学良点点头，表示赞同。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李克农解释得天衣无缝，张学良无话可言。

一直谈到中午，李克农看看表说："张先生，你休息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谈。"

王以哲忙摆摆手："等一等，少帅请你吃饭。"

张学良也接着说："李先生请吃饭，抗日时期，我这里饭菜不好。"

午饭果然很简单，一个炒肉片，一个鸡蛋汤。

饭筷刚落，张学良又先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李克农回答很果断。

张学良又用试探性的口气问道："那么，我要问一句：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

李克农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

说毕他起身就要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说："不，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

表情严肃的李克农缓缓转身坐下，竭力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以平和的语气讲道："张先生也许还没有吃过亏的，请你回想一下，你的部队东进时，一共是多少？现在是多少？一部分叫蒋介石缴过去了，又有一部分跟我们抗日的部分互相抵销了……"

"好了，不谈这些了，再说另外一件事。"张学良故意把话题引开，他指了一下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岂不更好吗。"

在后来达成的协议中就有了此内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央机关撤迁到延安。

我们做出一点让步，是为了帮张学良个忙，他可以用所谓剿共的"战果"去堵蒋介石的嘴，减轻蒋介石对张学良施加的压力。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张学良提出说，经过考虑，他要自己驾飞机到延安与周副主席见面。此话说出，他又耽心会引起李克农的误解，便忙解释说："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李先生，我早听说还有一位周先生，而且很有学问，我是很钦佩他的，是不是可以见见面？"

"怎么见面？"李克农问他。

张学良说："在延安见面，我还带了一个你们愿意见面的朋友，你们一见面就知道了。"

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就将这次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内容立即起草电文报告了党中央。

3 月 6 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奖，对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议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李克农到山西石楼汇报。

3 月 7 日，李克农一行悄悄离开洛川，经过几天昼夜兼行，3 月 16 日到达石楼。石楼是坐落在山西西部边陲的古县城，红军抗日东征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于 1936 年 3 月驻扎此地。

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议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提出的条件。毛泽东听完汇报，颇为满意，当即评价说："李克农单枪匹马，干得很好。"

经中央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进行会谈。

4 月 6 日，毛泽东、彭德怀给张学良发出电报：

"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延安），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抗日救国大计。七日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来引导入城，并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入城后之安全。"

关于双方会商之问题，我方拟定为：

1. 全国军队不分红白，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

2. 为抵抗日帝侵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

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约问题；

4.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5.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

双方需要商谈的其他问题。

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

从这封密电中，张学良摸清了李克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及与中共首脑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以致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十分感慨地说："使我惊讶的是，李回去后不久，中共即通知周将来谈"。在他看来，李克农是中共方面一位有权威性的使者，只要有他的穿针引线，事情就有成功的把握。自此，李克农在张学良心目中的份量愈加举足轻重了。

4 月 7 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警卫班从瓦窑堡出发，奔赴延安。

4 月 9 日下午 4 时，张学良乘飞机到了延安。随张学良一起下飞机的除王以哲外，还有刘鼎，他就是张学良所提及的"我还要带一个你们愿意见面的朋友。"刘鼎是从上海到西安的，张学良知道他是共产党人，原先张学良一度认为中共首脑机关还在上海，因此，视刘鼎为上宾，目的是想与中共接上关系。现在他已知中共首脑抵陕甘，便请刘随他一并前往延安。这次会谈结束后，刘鼎就作为红军方面的联络代表常住西安。

这次张学良一改便装打扮，穿一身整洁的东北军军服，头戴东北军军帽，脚蹬马靴，军容肃整。

会谈是在延安一座教堂内秘密举行的，教堂周围有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兵守卫。

9 日晚 8 时会谈正式开始。

与延安会谈相隔八个月之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奔波于南京和瓦窑堡之间

"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推动下，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合作的酝酿时期，曾有一位共产党员深入虎穴，与国民党要员接洽，不辞艰险地奔波于南京和瓦窑堡之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

他，就是曾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络局秘书的张子华同志。

张子华，1914 年出生于宁夏中宁县一个地主家庭，取名王绪祥。他在兰州和北平求学时，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并于 1930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改名张子华，表明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他先后担任全总华北办事处秘书及代理党团书记，1934 年被捕入狱。出狱后，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5 年任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络局秘书，1936 年任中央联络局副局长。1938 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政治教员。1942 年病故于延安。

沟通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贪婪地将其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郑重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这一坦诚的呼吁，不仅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发展，而且对国民党当局也有很大震动。

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内部开始酝酿改变其对日屈服的政策。而集中国力共同抗日，则是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1935 年底，国民党着手通过各种途径寻

找共产党的关系，企图在军事上压迫共产党的同时，通过谈判"溶共"，尔后实现共同抗日。这项工作初期由宋子文主持，1936 年 4 月以后由陈立夫负责。

1935 年初，21 岁的张子华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络局担任秘书工作。不久，调任鄂豫陕边特派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参谋。当时，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敌特的破坏，张子华于年底回上海汇报工作时未找到联络局，便按该局以前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上海特科。此时，特科刚刚获悉南京方面急欲寻找共产党关系的信息，于是即派张子华前去接谈。

南京方面出面接待张子华的是在国民党内研究劳工问题的湛小岑。湛早年曾加入《觉悟社》，结识一批左派朋友。"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宣传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主张。宋子文委托国民党中央委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曾养甫很自然地想起了他这位北洋大学时的同学湛小岑。湛接受任务后，曾与他的好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此事。左恭系中共地下党员，他立即到上海向党组织报告了国民党这一新动向。

张子华与湛小岑的第一次会面是于 1936 年元旦在上海进行的。张子华假称自己姓黄，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这次会面，主要由湛小岑向张子华介绍国民党方面准备抗日的意图，说明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以及土地改革等政策问题。张子华向党组织汇报这次会面的情况后，向湛小岑表示：愿尽力为国共联合抗日而奔走。他向湛建议国方派一代表与他一起前往陕北苏区同中共中央直接面谈。然而，国民党方面却选了个叛徒。张子华代表共产党理所当然地予以回绝。

这时，宋庆龄、宋子文姐弟选派了一位使者到陕北苏区。鉴于张子华曾于 1934 年 9 月被中共北方局派往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熟悉陕北一带地形，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陪同这位使者一起到陕北。张子华于 1936 年 1 月下旬离开上海。临行前，他通知湛小岑，告之中共方面派他到陕北，以向中共中央报告两党联络情况。

由于冰雪封地，交通不便，张子华一行在西安停滞近一个月，2 月 27 日才抵达瓦窑堡。当天，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就接见了他。党中央十分重视他传递过来的信息。此时正值红军渡河东征，多数政治局委员正在山西抗日前线。张子华应党中央之嘱随秦邦宪等领导同志一起到山西交口。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3 月上旬在山西交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与国民党继续保持联络。张子华随即被派回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意向。

张子华于 4 月 16 日离开瓦窑堡。途经西安时，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他向张学良通报了国共两党联系的情况。4 月底回到南京，曾养甫在家里接见了他。张子华向曾养甫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了解南京方面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希望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面谈。对于第一个要求，陈立夫于 5 月份在曾养甫家里口授了四项办法：①国方欢迎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②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享受与中央军同等的待遇；③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④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对于第二个要求，即国方派人到陕北苏区之事，曾养甫答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可由中共方面派人往返联络。于是，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张子华承担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络任务。

曾养甫还要张子华给中共中央捎个口信——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南京会谈。这样，张子华便又返回陕北。从此，张子华便以国共双方使者的身份，在南京和瓦窑堡之间往返奔波。这项任务既劳累又担风险。例如，到陕西后，要靠搭乘东北军的军车进入苏区。这中间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进入苏区后，安全是不成问题，但得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步行 3 天以上，风餐露宿，忍饥受寒。

张子华的使命国民党方面是知道的。但以上四项联共抗日的办法，只是曾养甫代转陈立夫的口头许诺。张子华心里很明白，万一发生什么变故，或稍不合意，国民党方面完全有可能翻脸不认账，所以需要十分谨慎机智地从事。

传递信件

张子华于 5 月中旬赶到陕北。此时，红军已东征归来，正在延安带休整。党中央则在大相寺开会。周恩来利用会议间隙听取了张子华的汇报。5 月 15 日，他给湛小岑写信，希望湛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同时，约请曾养甫、湛小岑来陕北会面。信中说："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共商大计，至所欢迎……"周恩来还给张伯岑、时子周等写信，陈述我党主张。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于 6 月回到南京。他要求湛小岑在南京找一个住处，以便他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活动。然而，国民党当局终于翻脸了。他们生怕国共两党的接触被泄露出去，影响"围剿"红军。曾养甫不仅禁止张子华公开活动，而且没收了他带来的一批周恩来的亲笔信，不允许他直接送给收信人。更卑鄙的是，曾养甫将张子华关进一个由中统管辖的监牢里，使他失去了自由。张子华的信息突然中断，使上海党组织感到蹊跷，于是通过左恭向南京方面要人。湛小岑也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这样，曾养甫才同意释放张子华，由湛陪同回上

海。二人到上海后，湛为了缓和气氛，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约请张子华到他的住所上海新新酒家会面。张子华顾全大局，亦不再提被关押之事。后来。他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与湛小岑交换了电台呼号和密电码。张子华还给湛一个上海邮政局的信箱号码，告之有事可通过邮政信箱找到自己。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首次明确表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7月19日，曾养甫奉命给周恩来写信，提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弃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矣。"信虽简短，却是国民党方面首次书面表示国共双方负责人商谈。曾养甫请张子华将这封信面呈周恩来，并请他捎口信给周：必要时自己也可去陕北苏区。7月下旬，张子华离开南京。这已是他第三次往返陕北苏区了。

张子华在西安停留了一个时期，于8月27日到达瓦窑堡。这时中共中央刚开过政治局会议。鉴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有变化，我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开始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25日，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要求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重新建立国共合作关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很重视张子华带回的书信和口信，于8月31日即复信曾养甫，首先表明"黄兄（即张子华）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信中接着邀请曾养甫、陈立夫来陕西谈判，并说明："弟等出外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写信，赞扬他们主持这项工作："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贤者所主持。"信中还邀请两陈兄弟亲自参加两党负责人的面谈。周恩来还具体筹划了这次会晤，并嘱张子华将这两封信面交陈立夫、曾养甫，再带去妥靠的密码和呼号波长，陈、曾看信后，便可通过密电商定会晤日期。

9月初，张子华带着中央领导的嘱托和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又离开瓦窑堡，风尘仆仆地赶回南方。但此时曾养甫已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已成泡影。张子华在上海与冯雪峰商量后，决定直接去广州。因为曾养甫和陈立夫当时都在广州，湛小岑也调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9月20日，张子华抵穗。第二天，便找到湛小岑，要求面见陈、曾二人。不料，陈立夫到外县视察去了。湛小岑答应转告，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他也答应代为转交。张子华原以为陈、曾看信后事情可能办得快些。不料陈立夫看信后并未约见他，于9月23日返回南京去了，只交待此事由曾养甫办理。

曾养甫于9月27日才见张子华。他表示国民党方面负责人的行动引人注目，还是请周恩来去广州或香港利于保密，况且蒋介石、陈诚和陈立夫等党政要人都要到广州。张子华答应打电报请示周恩来，如他有不同意见，再另商定地点。次日，张子华便向党中央发了电报。由于辗转传递，党中央于10月9日才收到这份电报。然而，国民党在邀请周恩来去谈判的同时，却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这当然是我党所不能接受的。党中央复电国民党当局：需停战方能言谈判。但是国民党仍不放松对红军的进攻。为此，党中央再一次严正指出：停止内战后，周恩来才能去广州谈判。

1936年10月15日，张子华回到了西安。随后，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汇报。当年11月，张子华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联络局副局长，又接受了党组织的新任务。

（选自《纵横》88年5期，作者：李坤）

周恩来斡旋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上午，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忽然收到从西安发来的密电：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扣起来了……

周恩来看了西安发来的捉蒋电报后，异常激动，立即走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也万分兴奋，他也刚刚看过同一内容的电报。

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说："临潼兵谏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动的。这是它的进步性质。但是，事实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等人，使南京与西安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

应张、杨要求，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12月15日凌晨，风寒雪舞。

周恩来一行顶着大风，踏着积雪，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向延安进发。12月17日下午2时，周恩来一行在延安转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向南翱翔。周恩来把张学良派来的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刘鼎拉到身边的座位上，向他详细了解事变爆发后国内外的反应。刘鼎就所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

黄昏，霞落云飞，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

当周恩来来到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迎候多时了，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宴后，周恩来即和张学良到公馆西楼秘密单独会谈。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诚恳地说："有何指教，请毫无保留。"

周恩来对张、杨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行动作了肯定，并坦率指出："你们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手段把他捉了起来。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因而将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军事阴谋"这个字眼使张学良感到刺耳。他双眉紧蹙，问道："我为公不为私，抓蒋介石还算阴谋？"

"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张将军出以公心，发动西安事变，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周恩来一看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便放缓语调，耐心解释，"只是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一世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捉住的。但蒋介石这次被捉住，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上述二例不能相比。目前，在全国救亡运动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大。从大局着想，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张学良愠怒之色已消，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周恩来继续说："目前西安事变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会使中国变好，一种会使中国变坏！"

"什么？会使中国变坏?!"张学良惊愕地插问。

"是的。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而如果要是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寇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岂不是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吗？"

"那你看，该怎么办？"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张学良听到这里，眼睛为之一亮，他尤其十分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自己虽然也主张释蒋，但没有象周恩来考虑得如此周密，高屋建瓴。他在彷徨、朦胧、担忧之中，感到有了主心骨，天塌不下来了、地也陷不进去了！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他兴奋地走过去，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由衷表示："共产党人胸怀博大，确是一心为国家，为了民族的未来。"难怪几十年后，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时，还承认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谋主"。

"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已成赤色恐怖世界"，"红军要把蒋介石押送陕北"，各种谣言传到南京，使宋美龄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尽管端纳已回南京报告西安无险情，尽管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后已暂停"讨伐"行动。

为探明真相，12月20日，宋子文冲破何应钦阻碍，急匆匆抵达西安。一下飞机，立即要求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并未参预。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善后。"周恩来还请宋子文认清国内外形势和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宋子文还会晤了张、杨，探望了蒋介石。

第二天，他即飞回南京。到处宣传蒋介石在西安情况，称赞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了不起的人，恐怕南京没有这样的人。"并带讥讽的意味斥责何应钦："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去挽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宋子文的宣传使何应钦的猖狂气焰顿时收敛。

12月22日，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等人飞抵西安。

23日，周恩来和张、杨二将军开始与全权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谈判。周恩来先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即："子、停战，撤兵至潼关以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有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借口中日武力相差太悬殊，不能马上抗日，只能作抗日准备工作，并且提出红军必须改编为国军，必须听从国民党指挥，方可停止内战，停止"剿共"。周恩来既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从大局出发，作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诚感人的让步，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表示，如果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提出的6条，那么"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宋氏兄妹救蒋心切，蒋介石本人更是归心似箭，况且英美老板一味督促和解，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终于以周恩来提出的6项主张为基础，达成6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五）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六）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

24日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10年冤家今天重逢，这确是历史注目的一刻。蒋介石

被捉后最害怕共产党插手，心想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必死无疑。周恩来到西安后，色厉内荏的蒋介石整天提心吊胆。直到他知道共产党并非想置自己于死地时，情绪才稍安定下来，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大义凛然出现在面前时，还是显得很不安的样子，显出一副窘态。他努力控制自己的神经，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一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走时摔伤的腰，一手招呼周恩来入座。

周恩来神态从容地与蒋介石握手，望着老对手那衰老憔悴的脸容，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蒋先生，我们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听后点头叹气，但他见周恩来态度温和，就装腔作势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心想对方又故作姿态了，立即面容庄严，说话的语调也显得威严有力："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十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脑袋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他有意停顿一下，见"委员长"的架子没有了，就放缓语气，给对方留点面子，接着又说，"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一见周恩来不咎既往，又松了口气，他瞟了周恩来一眼后，装出几乎要落泪的样子，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周恩来见蒋介石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连声说："好！好！"

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蒋介石显得那么渺小和虚弱。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可是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将士都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人的事。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在协议上签字，干脆就干掉他。"25日就是圣诞节了，这天早上，宋子文收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一封联名信，提出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宋氏兄妹和蒋介石惊慌不已，立即要张学良想办法。

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深怕夜长梦多，便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并准备亲自陪同前往南京"赔罪"。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杨到后，张学良说："现在不走不行啦！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他们离开公馆10多分钟后，孙铭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连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在疾驰的汽车上，他心情沉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张学良个人前途，而且还会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带来困难。等周恩来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27日，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训词》，掩盖他接受西安方面6项条件的真相，并把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接着他背信弃义扣押、软禁善意陪送他的张学良。新年元旦，蒋介石还调兵西进，筑垒布阵，威胁西安。

1月11日，周恩来写了亲笔信托王化一、吴瀚涛带给蒋介石，请他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再次表明中共和红军的一贯态度和和谈诚意。

蒋介石在溪口与其幕僚精心研讨从西安带来的信息后，1月13日，蒋介石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水以西的西兰路上；西北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驻12个团。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西北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便是在1月中旬和下旬，几次派李志刚、米春霖、鲍文樾赴南京、奉化同蒋介石等人谈判，要求释放张学良并了解他经过这次事变是否从"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变过来了。1月24日，李志刚在南京电告杨虎城，说：蒋介石虽然拒绝释放张学良，但内战他是没有脸面打下去了。接着，西安方面直接与驻潼关的顾祝同就军事问题直接谈判，一致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军事问题。西安方面同意接受甲案，因为按照甲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是连接的，可以互相支持。

不料，大好的形势竟然发生了不可收拾的逆转。

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在战与和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少壮派军人不顾周恩来的反复说服和再三解释。2月1日晚，少壮派军官在孙铭久家秘密聚会，决定杀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堵塞和谈之路。2月2日早晨，孙铭久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闯进王宅，将病中卧床的王以哲击毙。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得免于难。

少壮派军人的鲁莽行动，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机对西安施加压力，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2月7日，"中央军"进驻西安，9日，顾祝同成立"西安行营"。……

蒋介石虽然报复了张学良，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

局面，并苦思冥想消灭红军。但是险些使他丧命的西安事变如同劈头一棒，给他一顿严厉的教训，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的政策已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如再打内战，他的统治就要垮台了。因此，他不敢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

（选自《风云七十年》，作者：史恒）

陕北高原上的红色交通线
——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友好往来

“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鄜(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进入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这是1936年2月红军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达成的四项口头协定之一，也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突破蒋介石的层层封锁，通过东北军，建立起来的一条极其重要的交通线。

1936年4月8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于延安会谈，再次肯定这一口头协定的效力。

这是以双方互利为原则的，六十七军当时虽占有肤施(延安)、洛川等城市，但广大农村却在红军控制之下，采办粮草相当困难，尤其是一些孤立据点，如甘泉，被红军围困数月，军粮匮乏，疲惫不堪。与红军达成协议，甘泉之围可解，军需之急得济，这是符合东北军的利益的。至于红军，长期处于国民党封锁之下，物资奇缺，急需采买布匹、医药、通讯器材。更重要的是可以与国内各大城市勾通关系，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摆脱长期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

由于“联共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觉悟的提高，这条交通线也随之扩大、发展了，不仅仅局限于洛川、鄜(富)县，而是扩大到西安，甚至北平、天津、南京、上海；不仅仅是穿便衣往来于白区、苏区之间，而是穿上东北军服装，佩带符号，手持护照，坐着东北军的大卡车，大摇大摆地来往于六十七军军部与西北“剿”总驻地之间。

根据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精心安排了这条交通线，北设据点于洛川六十七军部驻地；南设据点于西安，一在六十七军西安留守处，一在王政副官家中，即西安安居巷乙17号。

在延安会谈时，王以哲就派人掩护红军采购员前往西安采购西药、布匹等物资，还帮助搜集了一批京、沪、平、津出版的报刊、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一并赠送红军。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36年3月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贸易局局长钱之光前往西安，采购物资，换上东北军军装，打扮成东北军军官，骑上军马，还派一名副官随行保护，到西安后，住在王副官家中，让钱不要轻意上街，以免暴露；须采购物品，开出单子，由副官办理。如西安无货，则派人到上海、天津、北平订货；所需款项不足，由西安留守处处长宋学礼垫付。钱之光在西安住了两个月，平安无事。从上海买来印钞票的石印机、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等，都由六十七军的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驮骡，派人护送钱之光及其全部物资到苏区交界处。

内战10年，国共两党联系中断，最早搭桥的是上海党派张子华到南京去与曾养甫接触。张子华到陕北汇报，董牧师到陕北传送信息，都经过张学良的安排，由六十七军的交通线前往陕北，再返回上海。

各地经西安前往苏区的还有上海的周建屏、梁明德、芦伟良、金敏英、施月琴、丁玲等人。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等也是走的这条交通线。

从苏区来西安的，如吴自立、吴德峰、王立人等也走这条交通线，住在六十七军留守处，或住在王副官家中。

叶剑英到西安也是走的这条交通线，住在王副官家中。根据张学良的指示，由六十七军拨给一台35瓦电台，供叶剑英与中共中央通讯联络之用。

常驻东北军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曾在一次座谈中谈到这条交通线的情况：来往交通很简单，六十七军兵站里有一个王副官管这件事，他指定一个士兵就能把你带走，平安到达。他又说：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讲他经过边界时遇到土匪，东西丢了，这都是假的，他故意这样写是为了掩护关系；实际上，东北军保护得很好，很安全。

这条交通线曾为国民党特务所怀疑，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就有国民党特务在搜集情报。南京就给王以哲发过电报：“不得在军部窝藏共党分子。”但从没抓住真凭实据。其实，当时，六十七军军部就有红军常驻代表刘向三，王以哲军长给他穿上军装，不准外人接触，晚饭后散步，王以哲亲自陪同，始终未暴露；还有上海派来的地下党员孙达生，王以哲怕暴露，秘密把他转移到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的公馆内。

1936年8月9日，红二、四方面军翻过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境界，在此之前，红一方面军组成西征军，挺进至固原、海原一带，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蒋介石慌了手脚，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久等部10万余人，组成左路军，又调东北军7个师，由王以哲指挥，组成右路军，对红二、四方面军尾追堵截。迫于蒋介石军令，六十七军主力西移，军部驻平凉。

也是8月9日，毛主席写信给张学良：“六十七军调防之后，要保证双方交通不受阻碍，最好保持肤洛一线于一〇五师之手，羊泉、张村驿之一一二师请面谕解(邹)团

长与后方发生关系，目下该部关系是很差的，庆阳部队亦请令其改善关系。”

一〇五师趋向联共，在东北军内，仅次于六十七军，担负这条交通线，不失为一合适对象。但，一〇五师也被蒋介石调往西线了。

一一二师为西北“剿”总的直属部队，它的驻地在洛川西北的张村驿一带。与苏区邻接，六十七军西移，一一二师政治态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交通线的安全。庆阳部队（五十七军）位置偏西，影响不大。

多年来，只知这条交通线未断，红、白区之间来往频繁不已，但，这条交通线由哪个部队负责，却说不清楚。最近，笔者发现原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的遗稿，它揭示了这一并未中断的交通线之迷。

霍守义的遗作中讲：1936 年霍参加西安军训团卒业时，张学良特别召见霍守义，说：“我们要实现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必须先联合共产党。”霍当即表示同意，张学良就交代霍，秘密担负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络工作，凡往来苏区至金家巷（张学良官邸）的中共人员，沿途的安全和生活照顾，统由霍负责，“必须极端保密，倘有走漏消息，影响之大，何堪设想！”这事，除张学良的副官谭海知道外，其他人员并不知情。

西安军训团，即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从 1936 年 6 月 15 日至 10 月末，共办 4 期，每期一个月，对外仿效蒋介石的庐山训练团，实质上是为联共抗日作准备，霍卒业时间，在 7、8 月间。

霍守义卒业返防，就由张学良介绍一位不知名的中共高级干部与霍同车返回洛川，再换马返回苏区。如六十七军不移防，那会由王以哲掩护，交给霍守义办理，就是 8 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耀县以南有国民党检查站 4 个，一律由宪兵检查。耀县至洛川，沿途驻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针对这一情况，霍设立 3 个隐蔽点，掩护中共来往人员，并解决食宿问题：一设西安一一二师留守处；一设洛川一一二师粮秣库；最后一个设在一一二师张文烈营长处上柳池村，其位置在一一二师师部驻地张村驿北 10 余里，属鄜（富）县。所有接待事宜，统由师迫击炮连长韩福山办理，遇有过往人员，韩福山都详细地向霍守义报告。

接待人员除上述霍返防掩护的中共高级干部外，还有这样一些人：

张纲等 4 人由苏区去西安。

中共要员 2 人由苏区去西安金家巷。

上海各界访问团 10 余人，往返于西安、苏区间。

中共高级干部眷属 6 人，由上海经西安去苏区（据说，内有林彪眷属）。

中共要员杨雨苍购买无线电器材、医药一批，由西安到洛川，下汽车后以 8 个驮骡载运苏区。

美国驻华通讯社记者斯诺返回西安。

中共在南京行政院内做秘密工作的郑某经西安去苏区汇报。

以孙、王为首的 12 名青年，内有东北大学学生多人，由西安前往苏区。

西安事变前 5 天，装满法币的煤油桶两个，运往苏区。

上述行动中，中共派出的联络员是边参谋和项同志。

这条交通线延续至西安事变爆发，从 1936 年 8 月至 12 月，先后约 4 个月。

12 月 13 日霍守义接到十万火急的亲译电报，命令一一二师飞进西安，指出红军是友军，十七路军注意联络，对国民党部队严加戒备。13 日下午，一一二师整装出发，行动前留一副官持公函见红军负责人，请他们接防。部队到达耀县，西安转来长途电话，说国民党部队已进至华县，命令一一二师速赴渭南，百多里路，连夜赶到，当即接下一〇五师铁路正面防务，配合友军，击退桂永清教导总队的数次进攻，西安局势转危为安。

从《叶剑英传略》中，大体看出这条交通线的轮廓。1936 年 9 月，叶剑英一行，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传略》上讲，“他们先到富县（鄜县）张村驿，然后骑马到东北军的驻地，换乘汽车到西安。”而张村驿，正是一一二师驻地，他们走的正是这条交通线。叶剑英于同年 11 月返回苏区，与中央汇报时就发生西安事变，中央即令叶剑英返回西安，《传略》上讲：“到了富县，都找不到接头人。”这时，一一二师已奉命疾驰西安。

毛主席给张学良的信中，建议他面谕一一二师的解（邹）团长与我方发生关系，这是费解的，在旧军队中，不经过师长，直接给团长面谕，一般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也不是面谕团长。据查证，一一二师当时并无解团长。霍守义字师邹，很可能是“面谕邹师师长”的笔误。

正象霍守义遗稿中讲的，他是“张先生亲手培植的相知干部。”他参加抗日战争，江阴保卫战负伤。两次反共高潮，他基本保持中立，1943 年升任十二军军长，解放战争中，1948 年 6 月兖州战役城陷突围，率余部投诚，1948 年 9 月参加我军，先后任华东军大教员，南京军事学院研究员，江苏省、南京市政协委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80 年平反昭雪。

韩福山在解放战争中任一一二师三三五团团长，淮海战役时，经霍守义派人争取，率所部数百人于战场起义，现已病逝。

（选自《党史纵横》92 年 6 期，作者：刘祖荫、霍正实）

潘汉年与1936年的国共秘密谈判

潘汉年是中共秘密工作战线上一位传奇式人物。1931年,他由中宣部文委书记的岗位调入中央保卫部门——特科,成为其领导人,开始了长期的地下情报工作。

1936年,潘汉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共中央派出的正式代表,在莫斯科、南京、上海等地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

莫斯科 王明点名
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

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

潘汉年是1935年8月为接通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被派到莫斯科的。

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多次秘密交涉,但没有结果。

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在向蒋介石汇报情况时,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交给了他。这个讲话公开宣布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

蒋介石仔细看了这个报告,从文中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中共正在调整自己政策的信息。他决定马上派邓文仪回莫斯科找王明联系,以便了解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可能性的大小。

邓文仪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授意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春被派去担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立即致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告王明。在信中他提出了和王明见面的请求,但没有得到回音。情急之中,邓文仪找到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在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他从中斡旋,与王明联系。

王明从胡秋原口中知道邓文仪的意图后,便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还是与其接触为好。但在未清楚其具体背景和条件之前,王明不宜出面。因此便推出了在此方面有比较丰富经验的潘汉年。

于是,便有了潘汉年的这次谈判。

1936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胡秋原在莫斯科的寓所。邓文仪正在等候他,见潘汉年来到,立即上前与其握手。双方寒暄一番后,便进入了正题。

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邓先生,王明同志听说你要见他,商谈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因他事忙,一时抽不开身,委托我先来见你。你这次找我们,是私人身份,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呢?"

邓文仪说:"我这次来,完全是秉承蒋先生之意。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当然,如果详细谈判,一些具体细节还需要请示。"

"那么,你们党内对国共合作的基本意见如何呢?"潘汉年问道。

邓文仪道:"来莫斯科之前,我们党曾在南京召开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在会上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后,大家基本上同意。我们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共产党关系,没有找到。后想赴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恐事先无接洽,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大的讲话,马上派我来找你们洽谈。"

摸清楚邓文仪的底细后,潘汉年进一步说:"在全国同胞要求一致抗日的今天,你们到底有何表示呢?"

邓文仪说:"蒋先生认为,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抗日,必须集中80个师的军队,而现在这些军事力量却被红军牵制住了。假如能像1925年那样的合作,一定有办法。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由于邓文仪的主要目的是与王明谈判,所以没有进一步与潘汉年谈合作条件。而潘汉年的任务也只是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也就没有再更深入地问下去。

几天后,王明约见了邓文仪,邓文仪列出了合作条件:取消苏维埃,其政府人员可参加南京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必须开到外蒙。王明拒绝了他的要求,要邓回国直接找中共中央谈判。

在会谈后,邓文仪请王明回国继续谈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研究后,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谈判。

陕北 毛泽东任命潘汉年为
"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6年4月,潘汉年经巴黎回国。他先在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交通部次长曾养甫进行了会谈。7月24日潘汉年到达西安,8月8日到达了保安。

8月10日,潘汉年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汇报了在苏联同邓文仪会谈的情况,及在南京同曾养甫会谈的情况,受到大家称赞。

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也

由过去的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为此，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任命潘汉年为主任，负责同国民党的联络和谈判。

8月26日，毛泽东由肤施（延安）给在保安的潘汉年去了一封电报，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他要潘汉年去南京时取道延安，因为"谈判方针亦须面告"。

9月，潘汉年和中共派驻西安东北军的代表叶剑英及彭雪枫、边章伍等人，装扮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到达西安。在西安，他协助叶剑英同张学良进行了几次会谈，因此住了一些日子。

国民党在派邓文仪去莫斯科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同时，也从其他渠道同中共中央接通了关系，表示希望周恩来亲自去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9日，中央收到此电后，认为双方在没有停战前，周恩来不宜出面，决定让潘汉年出面。

10月1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西安的叶剑英。……在进攻未停止前、周恩来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他要求潘汉年赶快赴上海。10月24日，潘汉年抵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

上海　陈立夫对潘汉年说，必须请周恩来出山

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对待中共态度上很矛盾，一方面，迫于日本侵华的压力不得不与中共谈判；另一方面，他始终都想消灭红军这支武装力量。

1936年10月，他在和冯玉祥的一次谈话中说：人的问题好解决，党的问题也好办，而军队问题"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因此，当外部压力稍微轻松，他就把注意力转到对红军的进攻上了。他想以军事优势迫使中共就范。10月22日，蒋介石亲飞西安，调集30个师军队围攻红军，他决心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去。如不成功，就让红军在宁夏绥远边境自趋灭亡。他对心腹陈诚说：到那时，看共产党还有什么条件可讲。

11月7日，在上海的潘汉年接到毛泽东的来电。毛泽东要他以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委张冲来找潘汉年，并带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电报。电报中要潘与陈立夫谈判，张冲邀潘汉年和他同去南京见陈立夫。但潘汉年没有同意。张冲于当天返回了南京。

11月9日，潘汉年抵达南京。晚上见到张冲后，才得知陈立夫已到上海等他。于是，他马上和张冲连夜返回了上海。

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坐到了上海沧州饭店的谈判桌前。

离开陕北时，潘汉年曾随身带了周恩来8月22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及蒋介石的信和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文件。一见面，他就把周恩来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问潘汉年："潘先生是代表周恩来还是代表毛泽东呢？"

潘汉年回答道："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

陈立夫说："那么贵方愿意合作之条件是什么呢？"

潘汉年于是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申述了中共的条件："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在不变更红军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编制；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国大会；建立统一的指挥机关，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可派人参与其工作。

"陈先生对我们的条件有何意见"？说完后潘汉年问陈立夫。

"我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和邓文仪一样，陈立夫也称他只代表蒋委员长，而不代表南京政府。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党内干部可到相应的政府机构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各点都好办。"

陈立夫说完后，接着笑着对潘汉年说：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

看来，蒋介石还是想通过谈判解决红军。潘汉年心里这样想，于是，也笑着回答说：

"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而不是什么合作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现在有些想法，大概是误会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了吧！南京向来标榜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听了潘汉年这番话，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想，声音很轻地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和蒋委员长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的，如由3000扩大为一万之数。蒋先生的意旨，中心是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呢？如果他出来，蒋委员长答应亲自和他面谈，那时，或许蒋委员长的条件不会那么苛刻。"

潘汉年很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国民

党的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周恩来更不会出来。因此，他带着滑稽的笑声问："陈先生，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打电报给周恩来呢？"

陈立夫思索一番，说："这样的话恐怕周恩来不会出来，暂时不提也好，看周恩来愿意不愿意与蒋谈。"

潘汉年说："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先生愿意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现在双方交战激烈，如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

陈立夫说："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潘汉年看陈立夫始终坚持军事问题的解决，就针锋相对地说："军事问题的解决，也要求先停战，而且是无条件的，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的会面，我们应讨论如何使各方暂守原防休战。"

陈立夫拒绝了这个提议，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沉默好久后，潘汉年又向陈立夫提出了一个建议："陈先生，看来，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我们可否就陈先生直接所负责的政治的、群众的等部门进行统一谈判，以造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呢？"

陈立夫显然没有料到潘汉年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和在一旁的张冲面面相觑。好久，他才说："这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

潘汉年考虑了一下，觉得拒绝他的提议，使谈判陷于僵局不太好，最后同意了。

张冲送潘汉年出沧州饭店时，对潘汉年说："陈先生对蒋委员长所提办法也很失望，但我们一定想办法促成此事。"

潘汉年也表示，正式谈判时间恐还未到，如南京方面什么时候需要谈，可随时找他。

11日，潘汉年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未谈及国民党的条件。第二天，他又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派交通送给了中央。

南京　国民党只给红军三千人的番号

就在10月底，红军进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失利，中共中央接联苏联援助的战略计划再无实现可能，蒋介石也加紧了对红军的进攻。因此，在对国民党谈判条件上也有了较多的让步。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潘汉年的谈判结果。

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毛泽东马上给潘汉年回了一份电报，询问："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

在电报中，毛泽东还告诉潘汉年曾养甫通过间接渠道转中共中央的国民党曾提出的四项条件：党可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接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他要求潘汉年按照这个原则谈判。

国民党截获了毛泽东的这份电报。陈立夫马上电邀潘汉年赴南京再次谈判。

在南京，潘汉年首先见到了张冲。张冲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其余则归南京军队编制。

潘汉年一听很惊异，马上问道："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3000！"

张冲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蒋介石因为进攻红军的初步得手而提高了谈判条件。

潘汉年要求马上与陈立夫会谈，但陈立夫带着毛泽东的电文去洛阳请示蒋介石了。

11月19日，潘汉年见到了陈立夫，但陈立夫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

陈立夫说："蒋先生坚持原来提出的方案，绝不让步。你可以把收编办法报告你们中央。"

潘汉年再次拒绝："上份电报未提及条件，中央已不同意周恩来出来，如这样报告，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法进行。"

他又一次提议，双方可先停战，以便双方军事长官面商一切。陈立夫则坚持军队问题不解决，无从停战，并威胁说，如红军过事要挟，可能中苏关系更加恶劣，因为日德正在拉拢蒋加入反苏阵线。

针对这种威胁，潘汉年坚定地说："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讨论的是一致抗日。"

他把所带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递给陈立夫。说，"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如双方能按草案原则精神协商，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顺从民情坚决抗战，恐将成泡影。"

潘汉年进一步指出："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呢？"

陈立失争辩道："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过谈判条件。"

既然陈立夫否定了曾养甫所提四点，便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因此，潘汉年不再说话。最后声明当晚将回上海，第二次谈判草草结束。

潘汉年把这次谈判结果电告了毛泽东。

11月22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明确指出："中共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对国民党再次邀请周恩来出去谈判一事，表示

"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12 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1937 年 2 月，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开始谈判。而这时的形势，已与两个多月前大不一样了。

潘汉年的谈判为周恩来的出山奠定了基础。

一个拆人间地狱的牧师

参与创造新世界

牧师的所谓"天职"，是引导人们的灵魂进入"天堂"，可有一位牧师却愿帮助无产者拆毁人间地狱，创造新世界，他的名字叫董健吾。在上海，他曾主持英租界成都路圣彼得堂，管一个教区。

20 年代末，董牧师带着子女，穿着红色衣服，参加"左"倾盲动人物所组织的飞行集会，在马路上游行。革命者觉得董牧师这样做太危险了，决定由特科和他联系，让他做一些有益革命的工作，避免无谓的牺牲。从此董牧师和女儿董杰芳给特科传递情报。圣彼得堂也成了共产党人的秘密机关和集会的地方。那里很安全，包探和特务都不会把上帝随便与共产党相联系的。

顾顺章叛变了共产党，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顾出卖后也叛变了。由于工作上的联系，董牧师和周恩来、邓发、向忠发、陈赓、冯雪峰、刘子华、浦化人等人都认识。当时，潘汉年在特科领导董牧师，潘让董拜杨度为师，在杨家行韬晦之计。杨度是学者，是闻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实，这时杨度已由潘汉年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一般人仍把他看作是名人、学者。1931 年 9 月，杨度病故，董牧师领着周恩来、陈赓和潘汉年去杨的墓地悼念，每人种了一棵树。

向忠发被捕后，董牧师辞去了教堂神职，专心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秘密信使

1936 年 1 月 2 日，宋庆龄要董牧师送一封信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宋没有说信的内容，只是告诉董："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董牧师见孙夫人说得如此郑重，欣然受命。

董牧师与宋庆龄既有革命的友谊，与基督家庭的宋府又有很深的私谊。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同学，深受宋太夫人的崇敬，宋太太要作祈祷等宗教活动，非董牧师主持不可。董牧师可说是宋府的家庭牧师，是上宾。

1 月 6 日，董牧师偕张之华到西安，住在禁烟督办钟可托的家里。张之华是中共党员，在陈立夫、曾养甫与中共北方局谈判国共合作抗日时，他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参加了谈判，化名黄君。陈、曾要张之华为代表，与中共中央商谈谈判条件。特科托董牧师把张之华带到陕北，说张是甘肃共青团书记，向中央汇报工作，自带川资。

40 多天以后，董牧师在西安见到了张学良。张问董找他有什么事？董说："请你派飞机送我去陕北，再入苏区。"张说："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枪毙你。"董说："我是奉命而来。"张问："奉谁之命？"董不慌不忙，掏出一封公文。张学良一看，是财政部的公函，写明是派专员董健吾去陕北苏区公干。张大喜过望，说："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原来，张学良已决心联共抗日，但"剿匪"副司令"通匪"是弥天大罪，现在国民政府也有人"通匪"，他抓到把柄，也有所恃。以后，张学良曾对刘鼎说："董牧师要去陕北，我就要让他说出原委才送，否则不送。"同时，张学良故意张扬：这两个客人是南京来的。不久，南京已传开有个姓董的去了西北，是南京某要人让他去唆使红军攻打山西的。转移了人们视线，利于张学良与中共秘密联络。

2 月下旬，董健吾、张之华坐飞机到肤施（延安），由东北军骑兵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红军已东征山西，由留守的秦邦宪、林伯渠和张云逸三人出城迎接，把董牧师引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大厅。董牧师递交了孙夫人给他的那封秘密信，然后被安置在全城最漂亮的、有取暖设备的外交大楼住下。张之华由秦邦宪引去。第二天，董牧师去罗迈（李维汉）家作客，又见到在养病的王稼祥，王当时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3 月 4 日，瓦窑堡接到毛泽东自山西来的复电，列具了国共和谈的条件，是：一、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犯；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但是，董牧师拿到了中共中央密封的复信，还是不知道它的内容，一个人由随去的东北军骑兵陪回肤施，再乘军用飞机去西安。他在瓦窑堡共住了 9 天。

和副司令交上了朋友

再回西安，董牧师住在西京招待所，那里有张学良长期租的房间。董牧师向张谈了在苏区情况，虽然董不知道复信内容，但张学良不难窥测其中奥秘，因之十分高兴，设盛筵款待董牧师，对董说，他们已交了朋友，欢迎他随时来，并问董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朋友之道，帮助他。董先谦辞，以后张又提这事，董看不是一般客套，对张学良说："有几个朋友，不见容于当局，出走在外，他们有几个

子弟流落在上海，久想送他们去欧洲，但缺乏盘川，张将军可否资助一些。"张说："完全可以，只是要在上海取款。"董说："那不成问题。"随后，张差人送去一张10万法郎的巨额支票。

董牧师所说的是一些流落在上海的革命者子弟。由于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散了，连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也曾流落街头，丢了一个，老二毛岸青受到摧残，留下精神不正常的后遗症。董牧师就用这笔钱，把困在上海的一些革命者的后代，取道法国送往莫斯科。张学良没有问过董送的什么人，当然不会知道他的捐赠泽及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是慈悲的牧师遇上慷慨的将军，他的子弟们才摆脱困境。

董牧师动身赶回上海复命。他到宋庆龄家里，可热闹了。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都聚在那里。董牧师交上那密封的信，谈了此行情况，拿出苏区赠送的纪念品：布币。这不是古布币，而是用布印制的苏区钞票。苏区穷得连普通纸张也十分缺乏，更没有印刷钞票的纸，只得以布代纸。苏区也没有名贵土特产，只好送点布币作纪念。孔祥熙是位财神爷，也是第一次开眼，还赞许董牧师此行，说："益国匪浅！"

从这个场面看来，董牧师的陕北之行是孔、宋两家通力合作的，而它的背后则是蒋介石。没有他的示意，孔敢委任董牧师为财政部专员，并开出要董去苏区公干的公函?! 这也正是蒋的狡黠。

原来，蒋介石要保自己宝座与英美在华利益，想联苏以抵制日军贪得无厌的侵略。因此，试探与中共和谈，寻求既能联苏又抑制中共的方案。试探和谈是秘密进行的。这样不致涣散"剿共"军心，万一不成，蒋介石可以赖帐，舍车保帅。其中一条线是宋子文，他知道宋子文倾向联共抗日，郎舅至亲，孔祥熙是连襟，都信得过。

宋庆龄又单独告诉董牧师说："张学良不是要找共产党的代表吗？艾黎家里就住着一个共产党员。"董牧师一听，就知道是史沫特莱的关系，他对进步人士的情况很熟悉。

再逢刘鼎

董牧师带信约住在艾黎家的"周教授"在一个偏僻的旅馆见面。"周教授"如约而去，走进旅馆，看到一个身材高大胖硕的背影，十分熟悉。那人蓦地回头，啊了一声，说："原来是你！"刘鼎在特科的时候，用阚尊民的原名，董牧师经常给他传递情报。刘十分机警，对董说："我现在叫刘鼎。"因为他第一次被捕越狱后，国民党一直通缉阚尊民。

自刘鼎1930年被捕后，董牧师再没见过他，算来已五六年了，久别重逢，喜出望外。董牧师把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的张学良决心退出内战，要求联红抗日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刘鼎，要他去张学良那里继续做张的工作。同时，他又告诉刘鼎，到了西安，还可以让张学良送他去陕北，最近他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去的。刘鼎没有接上党组织的关系，对外面情况也不了解，不知道张学良是真想联共抗日还是圈套，对董说："事关重大，两天后答复你。"革命本身就是极大的风险，能去陕北党中央的前景也十分诱人。经过慎重考虑，刘鼎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告诉董牧师，决定去张学良那里。

5月间，宋庆龄请董牧师再去西安，想法送斯诺和马海德进陕北。董牧师先一天到达，住在西京招待所。斯诺等二人到达后，相互验看了证件，无误。三个人谈开了。斯诺和马海德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因而他们敬仰毛主席。马海德带了十几只大木箱，都是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斯诺是记者，渴望见到毛泽东主席，向他请教，准备以宣传中国革命为他毕生的事业，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入苏区。董牧师去见张学良，张答应送他们去，吩咐马副官招待。

董牧师从马副官口中知道他还招待着一位刚从陕北来的要员，董牧师让马副官递个便条求见，署名是上海董健吾牧师。不久，那个要员来了，董牧师一看是多年不见的邓发，真是他乡遇故知。邓发是准备取道新疆去苏联，执行肤施会谈中联苏的协议的。董牧师说明此行目的。邓发说："欢迎、欢迎，好办、好办。"又说："等会儿我去找个朋友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交给他送到那边去。"董牧师引邓发到斯诺等人房间去，给他们介绍，邓发用英语和他们寒暄，欢迎他们去苏区。

邓去不久，所说朋友来了，是刘鼎。刘对董牧师说："马上就去西郊开个会，商量走的办法。马医生的药箱交给我。"随即，一辆大汽车来了。邓发在车上，连副官、司机一行7人，驰向未央宫。

在废墟的一个石堆旁，邓等五个人围团而坐。邓发首先致欢迎词，说："毛泽东主席十分欢迎同情并热心支持我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只是苏区贫穷，交通不便，招待可能不周，请原谅。你们所带行李及贵重物品都交给刘鼎同志，他负责送你们进去。路上你们要辛苦点，我要出国，不能奉陪了。"邓还关照斯诺，去苏区路上，请不要摄影，以免引起群众误会，请他谅解。摄影机交刘鼎转送去。刘鼎也说了欢迎的话，保证托运的东西不会遗失。此外，与斯诺约法一章，即报道时注意保密，例如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还有本人或家属在国民党管辖区域的，也要注意他们的安全。斯诺信守诺言，在《西行漫记》中，对刘鼎一字未提，董牧师成了王牧师。尽管这是一条极为安全的秘密交通线，为遮人耳目，他还编造中途遇到土匪的一类"山海经"。这是《西行漫记》的起点，这本书使国内外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区。商量妥当后，邓发环顾四野，说："这是中国古代皇帝居住的地方。沧海桑田，变化

很快，在一片废墟中已掀起全中国革命的浪潮。"在这汉宫废墟上举行了一次用英语的聚会。他们回城已是中午。

马海德进入苏区投身于中国革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董牧师回上海复命。

董牧师辞掉了神职，生活很困难，一度靠典当度日。地下党经费也很困难，潘汉年帮助他，让董在简又文主办的《逸经》半月刊上卖文为生。最初，董只写些李白的国籍、宗教等考据文章。以后，潘汉年给他提供一捆长征的万人笔记，董写成《中国共产党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描画出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智勇兼备地突破重围的伟大胜利，动人心魄。因为他是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写的，得以顺利地发表。这是比《西行漫记》中译本更早的描写长征的文章，发表在"七·七"事变前。

抗战爆发后，董牧师仍在潘汉年领导下艰苦地做情报工作。董杰芳曾经做宋庆龄的联络员，此时，她也被调到香港，她已是职业革命者。解放后，董牧师被安排为上海参事室参事，也许长期受潘汉年领导给他带来不幸，他没有逃过十年浩劫。按说，他参与了新世界的创造，无产者理当欢迎他。他志在拯救人类，但是，他像许多毕生为革命呕心沥血的革命者一样，既没有洒热血于战场，也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而是在史无前例的人类最大的悲剧中，以功为罪，含冤辞世。

（选自《纵横》90年1期，作者：张魁堂）

杨献珍参与营救王若飞出狱纪实

1931年7月，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化名黄敬斋在内蒙古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于这年10月在包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入归绥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7月，阎锡山接受叛徒、托派张慕陶的献计，想把王若飞"争取"过来，为自己服务，于是下令将王若飞从归绥押解太原，关入陆军监狱。

由于王若飞是我党重要的、具有卓绝才能的领导人，中共中央对他的被捕十分关心，采取多种措施营救，但都未成功。现在阎锡山把王若飞押解到太原，中央抓住这个时机，把营救王若飞出狱的任务交给了中共北方局。

在王若飞被捕的那一年，即1931年前后，顺直（即河北）省委连续遭受破坏，省委负责人陈原道、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和刚到北方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的杨献珍等同志相继被捕，关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在狱中，殷鉴等同志在讲述北方地下党活动情况时，曾说到王若飞在绥远工作和被捕坐牢的情形，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6年秋，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等同志在北平坐了五年多牢狱，经中央批准，由北方局营救出狱，并被派到山西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北方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把营救王若飞同志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北方局领导同志找薄一波谈话，要他们到太原后，打听王若飞的确实下落，千方百计想法把他救出来。

到太原后，薄一波等同志即开始打听王若飞的下落。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那里了解到，王若飞确实于1936年夏由绥远递解到太原，化名黄敬斋。但关在什么地方，却不知道。薄一波只好利用他是阎锡山请来的贵宾和高干的身份，到太原各监狱察访、查看名单。在第一监狱、训导院、自新院都没有查到。但最终在陆军监狱的一本发黄的犯人登记簿上，查到了"黄敬斋"的名字。并且翻阅了有关王若飞的审讯记录，其中记载王若飞在包头被捕时，"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竟无悔改之心，经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不与当局合作……"等等。

有了这个线索，薄一波和杨献珍等同志商量，需要去监狱见到王若飞本人，证实一下"黄敬斋"就是王若飞，然后才能向阎锡山提出要求释放的问题，以防他否认王若飞被关在太原监狱里，使事情复杂化。还商定由杨献珍先去陆军监狱会见王若飞，因为在去太原的五个同志中，杨献珍的年龄最大，老成持重，和王若飞年龄相近，易于取得对方信任。

为了顺利达到会见王若飞的目的，杨献珍去陆军监狱时，是以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的。他穿着军政训练委员会发的军服，带着军训会的徽章和介绍信。杨献珍到监狱后，找到监狱长，监狱长见他穿着军服，戴的徽章，又看了介绍信，信上写明要见黄敬斋。监狱长明白，军训会的会长是阎锡山，军训会来人，必是有重要公事，不便多问，就很客气地让杨献珍坐下等待。不一会儿，他就把王若飞带进来介绍说："他就是黄敬斋"。随后，监狱长叫留下一名看守，其他人都离去，让他们二人谈话。

杨献珍和王若飞从未见过面，互相打量了一番。只见王若飞穿着破旧的衣服，中等个子，虽然坐了几年牢，仍显得健康和精神。王若飞也打量着对方。首先是杨献珍开口，作了自我介绍，说了自己的名字，现在在军政训练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为训练抗日救亡干部而设的，今天受朋友的委托，来看看黄先生，彼此认识一下。王若飞说："好嘛！接着机献珍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界和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已深入人心，推动了全国和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旦日寇进一步侵略，将会奋起反抗，燃起抗日战争的烽火。

对于这突出其来的事变，王若飞一时弄不清楚是怎么一会事。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时刻提高着警惕。但听到关于当前形势和党的活动的讲述，又感到兴奋，对

对方诚恳的谈话，又不能不信服。所以在谈话中，王若飞虽很少答话，却是注意地听着。最后，杨献珍告诉他，是受朋友之托，设法救他出狱。因为旁边还有看守，不能明说自己是党派来的，只能暗示他，要他配合。杨献珍还说，以后他和别的同志还会来看他。

杨献珍回来后和薄一波等同志研究了情况，认为从接触中虽然黄敬斋说话不多，但从言谈中可以肯定就是王若飞同志。

薄一波立即去见阎锡山，向他提出要求释放一切被关押在山西的政治犯，特别提出要求立即释放王若飞。果然，阎锡山装着不知道的样子，吱吱唔唔地反问道："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薄一波说："黄敬斋就是王若飞，关在陆军监狱。"阎锡山见搪塞不过，才答应先让梁化之陪薄一波一起去看看。

王若飞这次见到薄一波，因有梁化之陪同，有些怀疑，态度很谨慎。杨献珍第二次去见他时，带去了从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那里借来的党内文件，是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王若飞看了文件，才相信杨献珍是党派来与他联系，设法营救他出狱的。这时两人谈话就比较深入了，谈到当前时局的变化，个人的简单经历。王若飞还谈了狱中政治犯的斗争和学习、生活情况。杨献珍还告诉了他，薄一波和自己都是北方局派来山西做统战工作的。薄一波第二次去看王若飞时，也带了党内文件，以证实自己的身份。

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释放王若飞和其他被关押的同志时，阎推辞说，蒋介石的监狱里还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没放，山西不能先放。经薄一波反驳，并要山西带个头释放政治犯，以实际行动表示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并先把王若飞放出来。经过几次交涉、谈判，阎锡山终于同意释放王若飞和其他政治犯了。但他又提出必须从监狱转到训导院过渡一下，为时约一个月，再从训导院出去。薄一波坚持说，释放政治犯必须是无条件的，经过训导院后，也应是无条件释放。阎锡山也同意了。

薄一波和杨献珍等同志研究，估计阎锡山所以要提出经过训导院，是因为阎锡山早已宣布受国民党南京政府领导，像要处理"共产党要犯"这样重大的事，都得事先报南京政府批准。

如果向南京政府报告无条件释放王若飞这样的人，蒋介石肯定不会答应。而且阎锡山有意把王若飞放出去后，留在山西为他工作。他想出的办法，就是经过训导院，这个机构是山西地方的，放人不必经过南京政府批准就可以了。当时还了解到，训导院的实际负责人是教导主任时逸之和教导员郭实甫，此二人都是秘密共产党员。经过这样的研究和分析，认为经过训导院不会出什么问题。薄一波等将情况报告北方局。北方局同意后，薄又向阎锡山表示同意这一安排。同时，也把情况告诉了王若飞。王若飞表示同意组织的安排。

薄一波和杨献珍等还研究了王若飞出狱后的居住和工作问题。

杨献珍到太原后不久，考虑到要把家眷接来居住，廖鲁言要和陶桓馥结婚，两人商量在小北门里东二道巷永济路二号租了一座四合院。

杨献珍一家3口住东房两间，廖鲁言一家两口住北房一间，杨尚昆到太原工作时，也住北房一间，还有一间作客厅，南房住着董天知的姐姐一家人。西屋两间尚空闲，王若飞出狱后，就住这里。

王若飞于3月底转到训导院。在训导院期间，薄一波和杨献珍又去看他，并告诉他出狱后的住处等问题。至于他出狱后的工作安排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4月底，杨献珍去训导院，把王若飞接出来，陪他一起回到永济路2号院里住下。不久，他的夫人李培之从上海来到太原和他团聚。在太原的一些党内负责同志，也都来看他，表示慰问。不久在山西监狱的一些同志，也相继出狱。

（选自《人物》，作者：安阳）

1935—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

华北事变以后，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和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国共两党都开始调整了各自的政策。从1935年底开始，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持续一年的秘密、曲折的接触和谈判。

一、邓文仪和王明、潘汉年之间在莫斯科的初步谈判

日本入侵华北后，蒋介石出于利用苏联牵制日军侵华力量的目的，于1935年初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以示中苏友好。还派侍从秘书、复兴社骨干分子邓文仪为驻苏大使馆武官，具体了解苏联在军事上的意向。1935年秋邓文仪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政府曾向其表示愿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这更促使蒋介石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与此相配合，蒋介石授意邓文仪，设法与中共在莫斯科的人员接触，向苏联作出和解的姿态，以实现中苏联盟对抗日本的侵略。邓文仪奉命于11月返回莫斯科，遵照蒋介石改善中苏两国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意旨，积极开展活动。1936年初，经《救国报》撰稿人胡秋原的介绍，开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

员、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接触。

1936 年 1 月 13 日，邓文仪与潘汉年在莫斯科举行初次会谈。会谈中，潘汉年先向邓文仪重申了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表示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军队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共同挽救民族危亡。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目前国民政府正谋求联苏，欲从苏联得到军需物资。为抗日作准备；并主张国共合作后，抗日军队应由政府统一指挥。此次会谈，双方都表明了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各自的主张，但是双方对两党合作后统一指挥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分配苏联援助物资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又同邓文仪举行举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是在看到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才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的。邓还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双方讨论：1. 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 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3. 国共两党间恢复 1924 年至 1927 年间存在过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以继续独立存在。邓还提议改编后的红军可开到内蒙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地区作为红军的基地。对此，王明未予同意。王明认为邓文仪所提出的政权、军队、抗日区域等问题事关重大，是中共代表团所无法决定的，最好由国民党派人在国内同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渠道。出于这样的考虑，王明于 1 月 23 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苏区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触，就抗日救国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同日，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安全和自由。

邓文仪将他同王明、潘汉年等人的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副官专程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同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谈判。1936 年 4 月，潘汉年和原在上海工作的中共特别党员胡愈之一道，由莫斯科经法国乘船到香港。

二、宋庆龄派董健吾沟通两党中央的联系

当国共两党代表在莫斯科接触的同时，蒋介石还指令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在国内打通与中共的联系。1935 年底，宋子文和宋庆龄商议后，决定请与宋家素有交往、当时以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即斯诺《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1936 年初，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邀见了董健吾，要他携一封重要信件去陕北，面呈毛泽东、周恩来，并一再叮嘱：信件要妥为保存，成功了益国匪浅。宋庆龄还委托董健吾带云南白药一大包交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医治红军伤员，表示她对红军的关怀。为了董沿途行动方便，经宋子文出面，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给董开具"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证件。这样，董健吾就以国民政府官员的公开身份去陕北。1 月底，董抵西安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去苏区，便设法面见张学良，要求张派人护送他们进入苏区，张学良初表诧异，但在电询南京核实此事后，便派飞机送董健吾等到肤施（延安），再派一骑兵连护送去苏区。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了董健吾一行，并派人送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2 月 27 日，董在瓦窑堡受到博古、林伯渠等人的热情接见。董向博古递交了宋庆龄的信函，介绍了国民党方面的意向，董称他"走时曾见蒋，据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博古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毛、张、彭等人研究后，于 3 月 4 日联名复电博古转董健吾，电文称："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五项谈判条件：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 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 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 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 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3 月 5 日，董健吾立即携此条件离开瓦窑堡。临行前，林伯渠特意拿出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三块在江西苏区印制的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布币，请董转交宋庆龄以资纪念，作为对她赠送红军云南白药的答谢。董健吾返回南京后，向国民党当局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这样，由于宋庆龄的牵线搭桥，终于使干戈对峙中的国共两党中央相互得知了欲求再次合作的信息。然而，董健吾的陕北之行，很快被阎锡山知悉，阎怀疑南京当局欲趁红军东征之机，秘密联络红军，共同消灭晋军。因此大为恼火，立即发电责问蒋介石：为什么派人去瓦窑堡？宋子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收回了财政部给董健吾的委任状。

三、国民党通过谌小岑打通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系

为了从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的联系，陈立夫、宋子文

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指派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养甫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1935年11月，曾养甫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时任铁道部劳工科长的谌小岑执行。谌接受任务后，即找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商议。根据翦的建议，谌小岑写信给其旧友、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请其来南京面商国共接触的有关问题。吕接信后，立即交给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市委研究决定：吕辞去教职，立即赴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与主持。北平市委并将此事报告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再向他向中共中央汇报。

1935年11月底，吕振羽抵南京。谌小岑立即陪他去见曾养甫。在谈话中，曾表示了国民党方面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要求国共再度合作的意愿，并称他是奉宋子文的意见办事的。问吕能否找到共产党方面的线索？吕回答：可以从北平的教授和学生中找到这种线索，随后，吕将探知的情况报告了中共北平市委。

1936年1月初，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转达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1. 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2.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吕振羽当即告知谌小岑：与中共联系的线索已经找到，并介绍周小舟与谌小岑会面。随后，周小舟返回北平，吕振羽则被留在南京，作为国共谈判的“中间人”，继续与国民党接触。吕振羽随即向曾养甫正式提出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曾养甫则代表国民党方面向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维埃运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活动等四点要求。吕振羽当即书面报告周小舟。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两党合作抗日的六项要求：1. 开放抗日的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2. 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 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4. 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5.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6. 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针对曾养甫提出的四点要求，周小舟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的意见：1. 阶级斗争问题，国共合作后，只要国民党改善工农生活，中共为加强国内团结，可实行战时阶级休战；2. 国民党实行“二五减租”政策，中共暂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 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4. 组织国防政府后，武装推翻国民政府问题将不存在。此外，周小舟还分别向国民党方面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给孙科、宋子文、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

5月，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出面向共产党提出双方合作的四项条件，作为对中共方面提出联合抗日主张的回答。四项条件是：1. 国民党欢迎中共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 共产党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 共产党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4. 共产党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上述四条由陈立夫口授，谌小岑笔录，然后由谌小岑转告吕振羽，再由吕报中共北方局转中共中央。

到1936年7月，周小舟第三次到南京，以共产党代表身份正式和曾养甫会谈。双方就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红军改编、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谈，除对上述问题阐明各自的主张外，未能就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此次会谈后，曾养甫调任广州市长，南京国民党中央与陕北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络也已沟通，因而不再重视同中共北方局这条线的联系。同时，中共中央也于10月间正式通知北方局不必与南京方面接触，与国民党中央的接触和谈判统一于中共中央。

四、国民党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与中共中央联系

1935年11月，谌小岑在通过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的同时，还与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的左恭商议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在恭得讯后，立即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并介绍谌小岑同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代表张子华接触。谌小岑在1935年11月至12月间，曾先后到上海的惠中旅社、新亚饭店等处，同张子华会见。1936年1月，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后，派张子华以国民党代表身份随董健吾一起去陕北。在瓦窑堡，博古单独接见了张子华，张向博古详细汇报了他与南京方面谌小岑接洽的情况，并传递了陈立夫等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此后，张子华又单独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详细汇报。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谈判等问题。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张子华在得知中共中央的意图后，于4月中旬和奉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冯雪峰一起由陕北赴上海。然后到南京与谌小岑会面。并由谌陪同向曾养甫略述陕北之行的经过，及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态度与主张，并提出要了解国民党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于是，谌小岑将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由他笔录的四项条件抄了一份交张子华，并要张再去陕去邀中共负责人会面。5

月中旬，张子华携带国民党的谈判条件第二次去陕北，于6月初带了一封周恩来给谌小岑的亲笔信返回南京。张子华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找一住处，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开展活动。曾养甫不仅拒绝张子华的这一合理要求，反而以"两党谈判要绝对保密"为由，指令中统特务将张关进监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获悉此情况后，通过左恭向国民党当局要人，谌小岑也对曾养甫进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只好同意放张子华出狱，同时叮嘱谌小岑："谈判之事，要绝对保密。"说他有一次向蒋介石报告与中共联络的情况时，陈布雷突然进来，蒋介石立刻"顾左右而言他"，待陈布雷退出后，蒋介石告诫曾联共之事要特别谨慎。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一事，系蒋介石亲自指挥，并且是在极小范围内、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张子华出狱后，由谌小岑护送至上海。分手时，张给谌一份电报密码和上海的信箱号码，作为今后联络之用。谌交给张一个国民党汉口电台的呼号。因此，后来建立了陕北中共中央与汉口国民党的直接通讯联络。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了稳住西北的阵脚，对国共谈判表示了一定的主动。7月19日，曾养甫奉命给周恩来写信，提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并请张子华将此信面交周恩来。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于8月27日第三次到达陕北。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国民党的策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并准备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周恩来在8月31日给曾养甫的复信中表示："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希望曾养甫与陈立夫能"惠临敝土，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指出："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张子华于9月20日抵广州，向当时已调任广州市长的曾养甫和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的谌小岑转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并向他们说明，中共中央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陕北谈判。陈立夫接到周恩来的信经蒋介石阅示后，当即指示由曾养甫出面负责给予答复。9月27日，曾养甫与张子华商谈时指出：国民党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9月28日，张子华将曾养甫的上述意见电告周恩来，并于10月14日携带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四项谈判条件抵西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这项条件的内容是：1. 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 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 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 即派人具体谈判。中共中央据此认为国民党有谈判的意愿，同时又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16日到西安，于是立即令张子华出面交涉，要求蒋方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赴西安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但此项要求未能实现。

张子华在10个多月里往返陕北、南京、广州达四次之多，在国共两党之间做了许多联络的工作。

五、陈立夫和潘汉年的秘密谈判

1936年8月，中共中央电告正在西安的潘汉年，任命他为中共谈判代表，并召他迅速返回陕北。潘汉年在陕听取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原则的指示后，于9月24日携带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蒋介石的信以及毛泽东给宋庆龄和救国会领导人的信、《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起草的供国共谈判时讨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离开陕北经西安赴沪。

11月10日，通过张冲的安排，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仓州饭店举行第一次谈判。潘先向陈转交了周恩来给二陈及蒋介石的亲笔信，然后根据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精神，向陈立夫陈述了中共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目标：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为此，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抗日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军需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国共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等。陈立夫则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作为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党内与政府的干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中共所提政治各点，都好商量。潘汉年当即予以严正驳斥：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误认为红军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陈立夫再次强调蒋介石的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才好办，并提出请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明确回答："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

会谈结束后，潘汉年立即将详情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于11月12日复电潘汉年："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

无益”。同时向潘转达了曾养甫10月14日让张子华带回陕北的四项谈判条件：1. 党公开活动；2. 苏区政府继续存在；3. 参加国会；4. 红军改名受蒋指挥。并叮嘱潘“为一致抗日，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电示精神，由沪至宁，于11月19日再次与陈立夫会谈。会谈中，潘汉年提出可以曾养甫自广州转达中共的四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陈立夫则说：蒋介石坚持原提各点，决无让步可能。至于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四项条件，陈立夫矢口否认。陈还说：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当即驳斥：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就没有必要了。陈立夫表示：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最后，潘汉年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陈立夫，并说明：这是我党及红军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最尽职的意见，供两党合作之参考。11月21日，潘汉年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于11月22日复电潘汉年，鉴于国民党无合和抗日的诚意，便以“恩来事忙，暂难出去”为由，拒绝派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同时说明：“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至此，谈判已陷入僵局。

通过这次谈判，中共中央进一步弄清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想在谈判桌上压服中央，收编红军；若不能，则将全力“进剿”，“一举荡平”。因此决定在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的同时，在军事上给蒋反击，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11月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这是两党10年内战中的最后一仗。

193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提出：红军在抗日的前提下，可以改换部队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兵员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还应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陈立夫亦派张冲到上海会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李淮成）

陈诚西安被拘

一

1936年12月7日，古城西安寒风凛冽。一列南下的列车，把委员长行辕参谋长兼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送到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他往华清池向坐镇这里“进剿”的蒋介石汇报了晋陕军情后，便驱车驶往西安城里，下榻于西京招待所。

东道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赶往西京招待所，看望陈诚。

“辞修兄，我看中央对绥远日伪军的动作，主要仍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时，应即联俄容共。”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对政局的看法。

“汉卿兄差矣，中央对于绥东战事已有明确的作战方针，即对整个国防也有了确实的准备，一至适当时机，即可决然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陈诚对于蒋介石的抗日确信不疑，接着说，“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

张学良带有几分挖苦的意思连说：

“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次日，张学良再次来访陈诚，言辞比昨日更为激烈。也许，这位年轻的将军，是故意说给陈诚听的。他以严肃而怨忿的口气说：

“我的抗日之志决不动摇，若中央能够容共我亦有把握，可惜委员长不能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突然激动得站了起来。他说：“委员长近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

陈诚已觉察出张学良的苗头不对，但也没有与他正面顶撞，只是好言加以劝慰。

随着西安政治温度的不断升高，蒋介石决定对蒋鼎文、卫立煌和陈诚三人委以新的重要军职，以指挥西北军事，控制局面。

9月，就在西安1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的这道秘密手谕，显然是为了制造一种神秘而朦胧的舆论，暗示张学良、杨虎城如不从命“进剿”红军，则将由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来接替他们指挥战事。

11日，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次长的陈诚，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将有动作的情报，随即赶到华清池面

见蒋介石。

“委座，据可靠消息，张、杨似有不轨之谋，为安全起见，敬请委座即乘今天陇海路特快车，离开临潼。”陈诚讲这番话的时候，诚恳而又有些紧张。

“辞修，不要这么紧张，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也暂时不要离开西安。”蒋介石比陈诚要镇静得多。

陈诚的情报是准确的。张、杨已经决定，在今夜实行兵谏。

当晚，在西安通往临潼的公路上，军车奔驰，摩托穿梭，准备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已经集结在华清池和西京招待所附近待命。

与此同时，两个高级的宴会分别在华清池和张学良公馆举行。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张学良，作陪的有陈诚、陈继承、陈调元、卫立煌等中央军高级将领。杨虎城、邵力子则在张学良公馆邀宴到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宴会灯红酒绿，笑语欢声。这时距离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事变，已经只剩下了最后几个小时。

二

12日拂晓，天刚蒙蒙亮，大地一片寂静，古老的西安城还在沉睡。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由东北军派兵包围华清池，将蒋介石扣留；第十七路军则将往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一概予以拘捕。

对于陈诚被捕的经过，说法不一。

他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清晨五时许，正在准备起床之际，忽闻外面有嘈杂声，即出卧室，拟察其究竟。当询问茶房，谓有军队开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将机密文件，稍行收检，即复出外，由一茶房引导至彼等之卧室暂避”。

但其他资料却说：陈诚在知有异动后，首先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撕碎，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于慌乱中，闪进大餐厅后面的一间烧火室，钻进一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中暂避。

其实这个细节，与西安事变的历史，并无多大关系。也可能是陈诚自己为了叙述更加得体，将情况作了一定的修饰；也可能是别人为了渲染其事，编造了一些细节。

由于陈诚的躲避，他被寻获的时间比别人都要晚。

早晨7时左右，当他被第十七路军特务营长汪国鑫押至大厅时，其他的军政大员都已齐集。同时被拘押者有：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议长陈调元、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驻甘绥靖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刚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身份由欧洲各国访问归来的蒋百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陈继承、第二十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等。此时的陈诚，满身尘土，面色苍白，形容尴尬，俯首呆坐。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领教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9点多种，张学良带着拟好的“八项主张”通电稿，来到西京招待所。他向中央各大员说：

“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接着，他便念了通电稿的全文。念完，他再次动员说：

“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

中央各大员，虽并不同意这个通电，但在身不由主、生死莫明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拒绝在通电上签名。他们还是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诚当然也不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杨在这篇通电中，指责蒋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并宣告对蒋介石实行“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蒋介石的这批文臣武将，都在这样的通电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午后，陈诚等人由大厅回到各原住室。陈诚入室后发现，家具及杂物零乱，个人衣物亦多不见，显已被搜查过，正疑惑间，突然一军官入内，态度友善，问道：“老师，可认识学生否？”

“噢，想不起来了，请问阁下尊性大名。”陈诚客气的回答。

“学生曾在庐山受训，现在东北军供职。说着递一张印有“何镜华”名字的名片。

“请告诉我委座现在何处？平安否？”陈诚急不可耐地问。

“委座已在骊山寻到，身体平安，现住新城大楼。”何镜华爽快地回答。

陈诚还想再打听些情况，但在一旁负责监视的杨虎城部军人似有干涉之意，遂不便再问。

何镜华走后不久，张学良来到陈诚房间。他一进门便拱手对陈诚说：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

陈诚即向张表白说：

“我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惟委员长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

“委座安全，绝无问题，无论如何，我要负责保护，现已接到新城大楼居住。不过他的脾气太坏，完全不准人家说话。”张学良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回答。

正当张学良匆匆准备告辞的时候，陈诚突然脱下手表，取出钢笔、小日记本等物，凄惨地对张说：

“如果委员长遇害，你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这是我随身的一点用品，请交内子谭祥，给他留作纪念。”

张学良摇头不接，并报以微笑，似乎在说：“不需要如此。”陈诚估计，自己暂时还不致遇害。

晚餐各人在住室用餐，每人白饭一碗、菜一盘。夜间亦无暖气，每人仅一床毛毯，且房门不许关闭，室外有卫兵巡视。

13日，这是陈诚等人当囚徒的第二日。

张学良又来遍访各室，并与陈诚再次唇枪舌战。

“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无论如何，我们的八项主张需要贯彻，蒋先生如能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仍旧拥护他。”张学良的态度恳切而又委屈。

“如此说来，究竟是你服从委员长呢？还是委员长服从你呢？”陈诚反问。

“并不是谁报从谁，大家要服从民意。现在民意要抗日，任何人不能阻止；民意不赞成内战，任何人不能反对。”

“你以为这种做法，能得到民众的同情吗？我看你还是应当早日送委座回京。”

“你所谓早日送委座回京，那也没有这样简单！”张学良不甘示弱。

14日陈诚见到张学良时，说：“在我的皮夹中有两份函稿，请代为寄回武昌留为日后纪念。”

张学良笑答：

“那不能寄回去，恐怕你的夫人认为是你的遗物，我已致电尊夫人，告兄在此平安。”

15日晚，陈诚等被命搬至仁寿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宅，陈诚与朱绍良及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共住5号院。进入这个新的住处以后，陈诚环视四周，只见室内有木床、沙发、桌椅、火炉，桌上放有毛笔、墨盒，厅中有衣柜、大沙发、方桌、火炉，家具一应俱全。但是，令他十分不快的是，每室有便衣3人监视，整个院内有10名武装士兵守卫，墙高数仞，后院的水井亦被封闭。这些又显示了他的囚徒身份。

后来，张学良又派副官送来两件东西：一件是每人分送《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各一册，另一件是每院送麻将一副、每室给银洋200元，以资消遣。陈诚对马列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又不会摆四方阵，因此对于此二件赠物，只能是哭笑不得。

21日，张学良又出现在仁寿里5号院，一见陈诚便说：

“辞修，今后两三日内，我不能来看你们了。”

“汉卿，什么原因？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陈诚焦急地问。

“我要到前方去指挥部队。中央军开过来了，而且进攻甚急，已经将驻华阴的一O五师部分官兵俘虏过去了。”张学良并不忌讳把这些军情告诉对方。

“我早就说过，你这样做，要分散抗日的力量，成为爆发内战的祸首。”陈诚提醒张学良。

张学良愤愤地说：

“中央军要打我们，那我们没法子不打”。

三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不懈努力，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和支持，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飞回南京。

26日晨，在飞机由洛阳起飞前，蒋介石试探着对张学良说：

“汉卿，是否给西安发个电报，让陈诚、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四个先离陕”。

“可以，现在事变既已和平解决，当立即将全部要员送返。”张学良的回答非常爽快，超过了蒋介石的要求。

他立刻发急电给杨虎城：

“请将留陕中央要员，一律送返南京”

中午，杨虎城来到仁寿里1号万耀煌夫妇居住的客厅，陈诚及其他各大员亦均来此，杨虎城坐下后，连声说：

“实在对不起各位，许久不来，实在不好意思”。

被监禁者，面面相觑，不知杨虎城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杨虎城接着说：

“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所以张副司令亲送委员长回洛，今天早上8时由洛飞京。”

在场的中央大员们听到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个人脸上都出现了兴奋的神情。

这时，杨虎城又从口袋里取出张学良的电报，说：

“张副司令电嘱送各位飞京”。

大厅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杨虎城通知说：

“今晚兄弟在新城大楼设宴，为诸位压惊，务请赏光。明日派飞机送诸位返京。”

自杨虎城前来宣布张学良电报后，仁寿里各院内的监视者一律撤走；卫兵的任务也已改变，不再是看守和限制中央大员的自由，而是真正保护他们，使之不在离陕前夕发生任何意外。

陈诚忙着和自己的同院难友朱绍良、晏道刚在5号院内合影留念。他们三人穿一式中式棉袍，头戴齐眉的无舌绒帽。陈诚站在左边，基本为立正姿式，左足稍向左前方伸开，虽为百姓装束，但仍可见其军人的风度。

当晚，陈诚等人在被拘押10余日后，第一次复为上宾，由东北军高级将领陪同，驱车开出戒备森严的仁寿里，往新城大楼赴宴。他们从车中见到街口巷尾，到处是

沙包、工事和铁丝网，哨兵密布，满街张贴着标语口号，充满紧张、动荡的气氛。

席间，蒋百里感叹地说：

“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正为我们写照”。

满座大笑。杨虎城则稍显不自然。

27日晨，陈诚由杨虎城亲自陪同，乘车驰往机场，杨与司机并坐前排，陈诚被礼让后排；其他南京要员，亦分由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陪乘。

机场的欢送场面极为隆重。军乐大作，仪仗队一团列队致敬，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军师长、总部处长以上将领以及杨虎城夫人谢葆贞等，均到机场欢送。

陈诚与诸大员同乘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巨型机，于9时45分起飞。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三周后，往东飞去。他们的侍从人员，则另乘一架福特巨型机，于稍后升空飞京。

身着戎装的陈诚，从舱口府视机身下面的云彩与山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富于戏剧性的事变结束了。回首刚刚过去的日子，却犹如梦境一般。

（孙宅巍）

历史考证

红军长征中一支部队曾误入缅甸

1936年3月、4月间，红二、六军团在云南石鼓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甩掉尾追之敌，翻过雪山到达中甸。在中甸红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路，继续向西康前进，准备与在甘孜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六军团为右翼纵队，经定乡、稻城等藏民地区，在甲洼寺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红二军团为左翼纵队，5月上旬，经巴安（今巴塘）等地向甘孜进发。敌人企图在巴安一带堵截红军北上，为了避免与敌军发生交战，红二军团原打算绕道过巴安，结果后卫部队还是被敌军截住。为此，红二军团又回过头来打巴安。这一仗打得不好，没有拿下巴安县城，撤退时，由于人生地不熟，部队很乱，有的部队又折向西南方向，走到了中缅边境地区。有时就沿着中缅边境线行军。和缅甸仅隔一条河，可以清楚地看到缅甸的哨卡。当时，有一个团的前卫分队，因迷失方向，一直朝南渡过独龙江，进入缅甸克钦邦边寨的一个山村。在缅甸住了一、两天，受到缅方的接待，并给了他们粮食，将他们送回中国。这个分队后来在西康省白玉县赶上了大部队。他们还带着缅方用英文写的字条（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并把这个字条交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泗淇懂英文）。这件事那时有很多人知道。因这支小部队是误入缅甸，对整个红军（指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发生影响，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摘自《湖南党史月刊》1987年，第7期，作者：王雅雄、袁胜）

张学良“兵谏”方案的最早提出——世所鲜知的“平凉会议”

1936年，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日趋加深，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以及胡宗南精锐部队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剿共”惨败的影响下，进一步认识到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有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这年11月下旬，张学良将军乘飞机抵达兰州又转平凉，召开了一次会议，密筹谏蒋步骤。其所以在平凉开会，是因为王以哲部正驻在平凉，张学良去“督剿”红军，理所当然要到平凉，这样可以掩饰此行的目的。如果在西安或在兰州开会，蒋系特务就会侦知会议内容，又不能把胡宗南嫡系晏道刚等人拒于会议之外。

参加平凉会议的只有张学良将军以及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主要心腹。西北军只有杨虎城将军一人参加。为了防止走漏会议消息，连张学良和王以哲的随从副官都没让参加。会议的守卫工作由“替死鬼”王政负责（王政，十几岁就参加东北军，他的外貌酷似张学良，所以，经常装扮成张学良外出，使一般人难辨真假，故王政被戏称为“替死鬼”）。在这次会上，张学良谈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后说，他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毫无效果，还说他一个多月没到班，实在是由于内心不愿意做“剿共”工作，并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在三个办法中选一个：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够改变他的主张；第三，蒋委员长若还拒绝，不得已将他武装扣留，实行兵谏。采取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

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已采取的行动，在实行过程中，我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听不进去，况且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

（选自《党史纵横》91年4期，作者：丛丹）

说中共事前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不可信

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有人认为，中共是事前得知，并言之凿凿：“在1936年12月12日〇时30分”，即事变爆发前的5个小时，红军战士当夜举行灯火游行庆贺，蒋文祥在《学术研究》1992年第6期著文指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据在西安事变前后一直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回忆、张学良本人的回忆以及当时英国记者贝特兰经过43天实地考察、调查得出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并未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也绝不可能事先向红军战士发布事变预告。因此可以肯定，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根本不会发生红军战士举着灯火游行庆贺的事。事实上，那是事实发生之后的事。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正确方针的确定，绝不是因为事先得知了事变将要发生的消息，而是因为已经从一个幼年的党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它也充分说明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摘自《中共党史通讯》）

第二次国共合作“搭桥”第一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鉴于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和英美在华利益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面临严重挑战，蒋介石在加紧“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机会与中共接触，探讨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于是，蒋介石在1935年底派出大员在国内外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共产党人，以打通国共关系。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这时约见宋庆龄，向她透露了国民党最高方面愿与中共谈判，商讨国共联合抗日的信息。宋庆龄认为蒋介石的这一意愿是符合历史潮流和国家利益的，与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的主张也是相一致的，便欣然同意出面斡旋。

次年1月，宋庆龄请以牧师身份在沪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带着她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赴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中共中央收到宋庆龄的信后，经慎密研究，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和国民党谈判的5条原则：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 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 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侵略；4. 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5. 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这些原则，把中共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化了。3月，董健吾携此密件返沪后亲自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又通过宋子文把上述意见转告国民党中央。这样，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从此恢复了两党高层的政治接触，为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条件。宋庆龄是近10年内战后在国共之间搭起桥梁的第一人。

（摘自《党史纵横》93年第1期　金英豪文）

张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1936年，南京一位行踪神秘的人物数度往返于南京与陕北之间，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在陕北，毛泽东和周恩来与他作为几次竟夜长谈，使他受到深刻的启发教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人民的殷殷诚意。返南京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亲自领略到的。”他，名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晚，张冲属下的特务电台收听到这个《宣言》，随即抄送蒋介石。迫于形势和舆论，蒋介石派张冲前往陕北探听虚实。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便由此开始。

张冲回到南京，亲自布置电台与陕北定时联络，凡有陕北来电，他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面交蒋介石。蒋有什么答复，他随即拟成电文，蒋点头后译成密码发出。

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国民党内“讨伐”与“主和”两派相持不下。这时，张冲建议约请中共在南京的秘密谈判代表潘汉年商量，请求中共出面调停，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1937年3月，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到达杭州，在西子湖畔、莫干山等处与蒋介石等进行正式谈判，初步达成了具体的合作协议。张冲始终参与了这次谈判，并在杭州与周恩来单独合影留念。从此，张冲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周恩来相处五年，为国共合作，联共联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摘自85年《浙江日报》9月12日《安危与共　风雨同舟》一文，作者：仲向平）

西安事变一个使人难忘的结尾

张学良陪蒋飞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回，被蒋介石终身监禁。曾经把蒋介石当作人质的张学良转眼间变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剧，而且这个悲剧在于主人公是"自投罗网"。很多同情张学良的人无不为此深感遗憾，认为张学良为了抗日救国，舍身忘己，精神固然可佳，但陪蒋回宁，乃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我认为，评价张学良陪蒋回宁这一行动是否正确，最重要的应看它是否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因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整个民族的当务之急是结成最广泛的联盟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任何个人的进退得失、生死存亡，都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衡量其意义。凡是促进了抗日民蒋统一战线形成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从这一点看，张学良陪蒋回宁是值得肯定的。

从社会舆论看，张学良陪蒋回宁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事变的种种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张、杨发动事变是为了阻止蒋介石继续内战，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然而张、杨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心存芥蒂，张、杨拘蒋，容易使人误为僭位夺权的兵变。特别是，在事变前不久的1936年6月间，两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也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出兵湖南与蒋介石混战一场。西安事变是紧接"两广事件"之后的第二起反蒋事件，人们自然地会产生一连串疑问。加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不作抵抗，使东北三省轻易沦陷，这种懦弱无能丧权辱国的表现与其抗日主张格格不入。当时张学良不作抵抗是奉蒋介石密令行事的，但这段枉情有谁得知呢?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学良成了一个不抗日的民族败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猜疑：由张学良这样的将领发动事变，能是诚心诚意地为了抗日吗?

有这种疑虑的，在全国是相当普遍的，这可从社会舆论反映出来。在中共及张、杨控制的地区，支持事变的舆论是占优势的。但在全国其他地区，除少数实力派外，各种谴责之声频频飞到西安。舆论界的这种形势表明，由于张、杨采取的是异乎寻常的兵谏手段，他们发动事变的良苦用心并不为全国各阶层人士普遍理解。

在国际上，各国的微妙反应也是对张、杨不利的。起初日本极力反对事变，担心蒋介石失势会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后来日本看到这是制造中国内战，削弱英美势力的一个机会，便改变态度。它一方面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蓄意制造内战空气；另一方面支持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便与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企图以亲日派取代亲英美派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日本的这一阴谋举动更加深了人们对张、杨的怀疑，甚致连一贯支持中国抗日的苏联官方舆论也指出：张、杨的举动是"投机"，"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怀疑事变的发生有日本人参与策动。所以，表白发动事变的抗日诚意，取得广大爱国军民的信任，以形成一股逼蒋抗日的强大压力，这在政治上是极为必要的。

张学良陪蒋回宁正是出于这种动机。他对部下说，这不仅是给蒋介石一个面子，"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及社会效果看，陪蒋回宁有利于缓和南京与西安的矛盾，是明智的做法。诚然，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如释重负，感情相当冲动，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蒋介石所谓的人格保证，对与蒋介石重修旧好存在一定的幻想。所以陪蒋回宁的确带有一点"负荆请罪"的味道。但深入权衡事态得失，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始，就坚持一条信念：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然拥护他当国家领袖，张学良这一出发点是求实的，也是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所赞同的。因此，事变后的当务之急应是趁热打铁转变策略，以缓和矛盾，消弭内乱。基于这一点，张学良主动陪蒋回宁，给蒋介石一个面子，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抛弃前嫌维护团结的诚意，是显得明智的。

从客观的政治效果看，陪蒋回宁对维护统一战线也做出了贡献。最典型的事件是张学良在他受审的军事法庭上，当众宣读了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密电，以事实震醒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爱国人士，这对蒋介石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力，使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上不敢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张学良这一行动，对促进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是有益的。

从张、蒋两人的本质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张学良个人的悲剧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瓦解是必然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为统一战线的成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从当时的各种因素看，张学良迟早总是要到南京去的，不去有些问题无法交代清楚。而且即使他不愿意去，蒋介石出于报复欲望随后也会下令他去的。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张学良巧妙地防止内战危机的政治手腕。这种政治手腕实际上就是自愿地把自己当作人质来表明抗日的诚意。这种人质作用不可忽视。正如蒋介石被当作人质的时候，人们普遍考虑的是用政治手段来和平解决一样；张学良一旦成为人质，就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政治解决的问题上去了，防止了蒋介石利用人们的疑虑和感情冲动来立即发动一次讨伐"叛逆"的武装进攻，为统一战线的我方争取了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毕竟是国民

党军队，名义上仍然是蒋介石的部属，蒋介石可以用合法手段命令其调防改编，即使张学良留在西安也不可能拒绝调防改编的命令。就是杨虎城将军，一向对蒋介石充满戒心，但在接到蒋要他出国考察的命令之后，也不敢断然拒绝，只好含悲而去。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东北军、十七路军要排除被吞并的危险，实际上只有联合红军以武力对抗这一条路了。但这样一来国共间的战争就势在难免了，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将延缓。从张、杨两将军的世界观看，他们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所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瓦解并不是张学良陪蒋回宁造成的后果。尽管张学良这一行动曾经引起东北军内部的误会和分裂，但其命运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所决定的。

张学良陪蒋回宁后身受厄运，从我们的感情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倘若个人的牺牲能换取历史的进步，那该是多么值得，而牺牲者又该是多么崇高！张学良将军的无私贡献，应引起后人深思而不是遗憾。

（摘自86年《党史资料与研究》第3期，作者"郭溪土）

蒋介石从未打算释放张学良

有的报纸刊登文章说，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我们反复查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历次发表的有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来往电报和其它资料，均未找到能够说明蒋介石有这种"打算"的档案资料。

张学良陪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6日下午到南京，第二天蒋介石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决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并推定李烈钧为审判长，12月31日即开庭会审。可以看出，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急于会审张学良。会审之前的短短的四天中不可能产生释张的念头，而且释张之后又怎么审判他呢?即便当时有释张之说，蒋也根本不会真正实施。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12月25日夜，张学良又给杨虎城打电报让其放大员，这些情况蒋介石都知道。杨虎城于27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这封电报说明军委会于25日（有）和27日（感）来电让杨放大员，杨虎城是在接到南京27日电报后复电放大员的。28日杨虎城又给蒋介石发报，告知西安大员已于28日9时和11时分两批飞南京。这个史实说明蒋介石27日决定审判张学良，同时又给杨虎城发报让放大员，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另外，决定审张在前，实际上放大员在后，释放飞机是在1937年1月3日，那就更晚了，所以释张和放大员并无因果关系。因此，由于西安方面放了大员和飞机，蒋介石才不释张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有一种说法，在拥护张学良的少壮派枪杀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之后，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因此，决定立即释放张学良；后因获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决，于是蒋介石再次取消释放张学良的计划。而据我们查阅档案的结果，恰恰是因为"二·二事件"发生，蒋介石才为他不释张找到新的借口。根据《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公布的38封函电看，自从扣张后，西安方面不管是派代表到南京、溪口谈判，还是电报往返，都提出要求释放张学良的问题。在舆论压力下，1937年1月27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即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同时张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也给东北军将领去电，让他们立即撤兵。蒋、张电报之后，潼关谈判立即达成协议，决定执行甲案，西安方面答应从1月28日起撤兵，7天撤完，并提出退兵后"即恢复张之公权，并要求张至部队上说话"。顾祝同答复："俟撤至渭北后当请中央恢复张之公权，俟顾到西安后当请允张至其部队上说话。"至此，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这无疑使蒋介石找到了拒绝释张的口实。正是因为"二·二事件"发生，主和将领王以哲被杀，蒋介石才得以此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事件"，东北军元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张将军的力量被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的长期囚禁张学良。由此可见，"二·二事件"不仅没有带来蒋打算释放张的结果，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蒋扣张的顾虑。

"二·二事件"之前，王以哲的主和立场，符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与中共态度是一致的。从这点看，杀害王以哲绝不会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因此，更谈不上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的问题。事实上，中共与少壮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前者说服教育后者的方面。西安事变前，肇事的少壮派与中共并无电报的往来；西安事变后，肇事的少壮派坚决反对中共放蒋主张；张学良被扣，肇事的少壮派又极力反对中共和平谈判以解决问题的意见，以致发生"二·二事件"。可以看出少壮派与中共中央往往不能采取一致立场，其中有些人甚至对中共不满。（见《朱理治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

甚多，对东北军与中共关系情况是了解的，所以他本人也不会担忧因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蒋介石扣张的目的之一是破坏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破坏三位一体，“二·二事件”使蒋有可能达到目的。在此情况之下，他怎会产生释张的念头呢？

有根据证明，蒋介石不是以释张去平息不撤兵者，而是决心以武力解决东北军。《民国档案》刊登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给各方函电17件，其中8件是关于要打仗的。最初他下令：“开战后十日克服西安”。后来慑于各方压力，他不敢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遂重点采用政治解决，但并未放弃武力威胁。1937年1月26日蒋致何应钦电：“如东北军作梗”，“反抗命令，阻碍和平，破坏统一”，“明日午后起即为和平破裂，先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前方司令部开始轰炸”。同年1月29日，蒋又下令：“我东路军决于下月1日向逆开始轰炸。”白纸黑字，这是有档案可查的。很明显，蒋介石对阻挠撤军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如果少壮派蛮干下去，必象毛泽东所说：“……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综上所述，“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的说法，是无事实根据的。

（白竟凡　鱼汲胜）

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中苏交涉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曾经通过驻苏大使蒋廷黻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请求苏联出面斡旋。现据从未公布过的历史档案，向读者介绍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和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列强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反应不一。日本政府内阁连星期日（12月13日）都顾不得休息，接连举行会议，商讨对华政策。日本外务、海军、陆军三省开会决议，“要监视事变之进行”。东京的《朝日新闻》得意洋洋地发表社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实在是可喜的现象”，声称“苏联政府与此事有关”。日本外相表示，如果蒋介石与张、杨妥协，“日本不能再作静观”，并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武力占领京沪”，积极支持亲日派何应钦进攻西安的主张，企图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火打劫。德意报刊甚至公开断言，西安事变是苏俄及第三国际插手策划的，阴谋混淆视听，挑拨离间。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将导致亲日派上台，使其在华权益受到损害，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讨伐张、杨。《华盛顿星报》12月14日发表社论说：由于日本和南京亲日派的积极活动，美国各方正“注视日本之秘密行动”。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抛出大量外汇，维护“法币”币值，从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苏联在事变一开始就表明了态度。《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社评，表示：“切盼早日迅速和平解决。”但又说，张、杨的举动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甚至怀疑有日本人的策动。

由于事变的突发性，南京当局一度乱成一团，许多人怀疑此事与苏联有关。1936年12月13日，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与政务处长何淬廉电告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张学良等将院长扣留西安，极盼兄在苏俄酌量速妥接洽”。但是，外交部并未令蒋廷黻向苏联政府有所举动。16日，孔祥熙等来电嘱咐蒋廷黻努力，但亦未指示具体办法。蒋廷黻原来只是位学者，全仰仗蒋介石的赏识才得以步入政界，深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闻知恩公遭困，心急如焚。在不明事变真相和没有接到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蒋廷黻断定此事可能与苏联有关，因而匆忙地采取了行动。

12月14日，蒋廷黻会晤了回国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其后，他又两次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希望苏联能够出面斡旋。蒋廷黻对他们说：“苏俄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不少人士对苏俄怀好感。至于用何种方法促进圆满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李、鲍都摇摇头表示无从帮助。17日，即蒋廷黻接到孔祥熙电报的第二天，他把自己对苏联的怀疑态度电告孔祥熙。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及中苏交涉的顺利进行，蒋廷黻建议对张、杨“讨伐宜明急而暗缓”，并请孔祥熙在回电中讲明张学良等人提出的条件和中国在与苏方交涉中愿意出的代价，以及足以证明苏联与事变有关的可靠证据，以便他在与苏方的交涉中进退有据。

当时，苏联针对日、德、意等国的诽谤曾利用报纸、电台发表声明，申述苏联政府的立场和态度，驳斥日本等国的谣言。但何应钦等人却借口该声明涉及汪精卫的部分措词失当禁止登载。

17日下午，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召见蒋廷黻，提出了抗议：“此举表示中国政府怀疑苏联与西安事变有牵连，这种猜疑实不友谊。”李维诺夫接着说，他前一次与蒋大使谈话时就已经说明，自从张学良离开东北以后，苏联就与他没有关系了。蒋廷黻辩解说，他不知道政府禁止登载苏联声明的事，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事实。李维诺夫对此并不否认，但声明苏联政府与第三国际无关系，苏联唯一能帮助中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却禁止登载表明苏方态度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无他法”。蒋廷黻觉得李维诺夫的话不无道理，但仍然认为，苏联不能完全脱避责任。后来，蒋廷黻和李维诺夫谈到西安事变的幕后支持者问题。李维诺夫提出，张学良背后可能有日本支持。蒋廷黻却意味深长

地说："日本绝不是西安事变的背景，也不会是英美法"，希望苏联"努力于善后"。李维诺夫闻之大怒，气愤地表示："不愿听任何方法，此事与我们无关"；"如贵大使再提方法，我即向贵大使提出严重抗议"。谈话不欢而散，蒋廷黻的交涉毫无结果。

当晚 11 点半，蒋廷黻把他与李维诺夫的谈话情况电告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请他们转告孔祥熙和翁文灏："目前此间无进展可能。"

19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斯皮里瓦尼奉命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声明，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事，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

西安事变由于各方的努力，后来终于得以和平解决，蒋廷黻等人怀疑苏联"幕后操纵"张、杨，被证明毫无根据。蒋廷黻到任不久，便遇上这种麻烦的事情，交涉又如此不顺利，这对他以后在苏联的大使生涯不无影响。西安事变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对苏不信任情绪显然刺激了苏联政府，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到 1937 年 3 月中旬才返回中国。同年 4 月，蒋廷黻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表示："此次事变不幸牵动中苏关系，其责全在职一人"，"事近越权，应请处分。"

（壬之）

风云人物

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 名景桂，字子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幼年进永宁山县立高等小学堂。1922 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的影响波及陕北，特别是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对刘的教育，使他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1924 年榆林中学组织学生自治会，被选为主席。同年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选派他去黄埔军校学习。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1926 年秋毕业，参加北伐。这时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他奉命去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曾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代表的身份，到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实行"清党"，刘志丹等几十名同志被捕，在被押送武汉的途中逃脱，辗转一个多月到达上海。不久回到陕西。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决议案。奉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1928 年 5 月和谢子长一起领导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为军事委员会主席。1929 年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同年冬和谢子长等到陕甘宁边界一带进行军事活动。曾在甘肃军阀的部队中担任团长、旅长等职务，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后被捕，囚于彬县，在狱中坚持斗争，被营救出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和谢子长等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932 年 2 月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参谋长等职。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创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一度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迫害，被剥夺了指挥权。1933 年 8 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10 月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 月上旬红二十六军建制恢复，任四十二师参谋长。次年 1 月任师长。1934 年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挺进陕北，与谢子长领导的陕北地方游击队配合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使陕甘边区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接起来。其时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学校校长。1935 年 2 月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军委副主席。是年秋，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调集十万军队对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他和徐海东一道指挥红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此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中实行肃反，以"右派反革命的首领"的莫须有罪名将其逮捕。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党中央立即释放刘志丹等人，任命他为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 年初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他和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向黄河挺进，连战皆捷。4 月 14 日在攻占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中弹牺牲。党中央赞

誉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为了纪念他，中共中央1936年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赵一曼

赵一曼(女)(1905—1936) 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字淑宁。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家乡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后考入宜宾女子中学，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委员、宜宾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共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宜宾地区学生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同年冬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代理部长。1927年1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到上海。后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1929年秋到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工作。1930年4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被派到沈阳做女工工作。同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1933年10月兼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秋被派到珠河抗日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任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同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率部在滨绥路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军主力远征后，奉命率第二团留根据地坚持斗争。同年11月率抗日游击队与日伪军作战，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后被关押于哈尔滨伪警备厅看守所。教育争取看守、看护警察和护士，于1936年6月28日越狱潜逃，三日后被追回。同年8月2日于黑龙江珠河壮烈牺牲。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女英雄。

材料一　血洒关东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是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委书记和第3军第2团政委的重担。

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突围的机会。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而赵一曼等则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3名同志在珠河县第3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后没几天，敌人便得到了消息，并由第3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了。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后，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里。远间重太郎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了在押的20多个人。当知道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后，感到不能让她死了，并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10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上的枪伤化脓后，才被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在既然进了医院，身体就有好起来的可能，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伪警察在看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把突破口就选在了看她的伪警察董宪勋的身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看管对象了。应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说体写了出来。她写得非常感人，以致每一个读者都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勋最先受到了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这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

不久，赵一曼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争取了过来。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赵一曼制定了一个周密的逃走计划。她把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照赵一曼的安排，董宪勋负责筹集物

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

到6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加快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60元钱（韩勇义卖掉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6月24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行动时间定在6月28日晚上。

6月28日晚9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3病室，董宪勋则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了小轿，然后又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击区而去。

6月29日上午7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进行追捕。经过调查前一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地方，很快判断出了赵一曼等的去向。

6月30日早5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了赵一曼。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8月1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这位从天府之国走来的奇女子，在珠河县小北门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那片黑土地上。

（选自全勇《黑白关东》）

材料二　赵一曼被杀害经过

一九三六年春，我在哈尔滨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当时哈尔滨的日本情报机关为了寻找所谓苏联通过中国共产党“搅乱”伪满洲国的事实，加强了北满洲国的情报网。

同年二月，召开了省公署所属二十七县的警务指导官会议，讨论有关情报问题。我提议“对捕获的抗日干部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珠河县的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当时说：“珠河县正押着二十多名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因为警务人员正忙着进行焚烧民房的事务，没有功夫去审讯。要是警务厅能派人去审讯就好了。”一周后，特务科长命令我去审讯，我就带着翻译（朝鲜人）出发了。

为了阻止抗日军的活动，日军企图把珠河县城周围几公里的地方变成无人区。当时驻珠河县的一个日军中队加上县警察队的八十多人，除每天进攻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部队外，另一任务就是焚烧和平居民的住宅。远间同参谋官天野义光隔日轮流指挥警察队执行这个任务。

我到珠河县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约五时左右，远间率领警察队回县公署，我出门迎接他们时，看见他们押着一辆牛车，车上有两个妇女。远间指着躺在车上的那个妇女，向我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跑出来的，被我们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我们把她连同俘虏一同解来了。请快些审问吧，免得她死了。”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军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

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象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我就说：“好啦，别扯这些闲话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阻止她再往下谈。从她的谈话内容和态度上看，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到远间的宿舍里去，远间正地洗战斗的尘污。我对他说：“喂，可捉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远间说：“是嘛！是怎样一个人啊？”我说：“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教育程度上看，从讲话的态度上看，我认为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远间问：“那么，她的生命怎样呢？”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对这样强硬的女人进行审讯可不那么简单，若是听凭她死掉，我们就立不了功啦。总之，最好找一个高明的大夫来。”远间吩咐仆役唤来一个警察队员，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赵一曼那里去审讯。还没等我张口，赵一曼就指着照料她的那个姑娘对我说：“这个姑娘是我临时藏身的那户农民的孩子，当时因为吓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没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里来，而且她的家里肯定在惦念她。请你们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着说：“要是把这个姑娘放回去，谁来照顾你呢？你好好地回答问题，回答完了，我打算让你们一道回去。”但赵一曼仍固执地要求把这个姑娘释放。我本想把这个姑娘关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虑到在得到情报前，不能让赵一曼死掉，还需要让这个姑娘看护她。“这件事要由我们来决定。”说着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伤口，“这是干什么？”赵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扎着绷带的手慢慢地伸出来。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的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分，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大夫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我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大夫给她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伤口后，对我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持她的性命。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到明天早晨，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我的强迫命令，他脸上露有难色，但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赵一曼那里去进行审讯，警士告诉我，夜里给她打了三针。

在审讯中，我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赵一曼在痛楚中也没有缄默，她对我说：“与其喊叫，要我别隐瞒自己的行动，倒不如用这里的事实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比如，不管你们抱着什么目的，给负伤的人治疗，总是正当的，可是对一个重伤的俘虏用刑不能说是正当的吧。日本人这样杀害我们的同胞，恐怕是难于计数的！”我叫喊道：“别说了，你说在战争里杀人是坏事情吗，你这是胡说。”同时我心里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周围的多数人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二十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赵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译，我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我对翻译说：“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于是把一个三十多岁的矮汉子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赵的一些情况：“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查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来独往，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我又问：“在押犯里还有谁了解她？”经过再用重刑，他指出一个人来。我说“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吗？”又给他上刑，他略微寻思了一会说：“不知道。”其他的话再也问不出来了。

我把他指出来的那个人提出来用重刑，经过几次拷问，他供出：“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部会议，我出来进去端开水，照料会场内外，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的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总是听从她的。”我听他说完了这句话，又给他上刑，我说：“你以为把她说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过去了么？你这个东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给他灌凉水。”他说：“别灌了，我说。我没有说

谎，她是县委，握有领导的权力。"听到这儿，我心里想，"会慢慢地说出来的"，于是又给他用刑，可是他说了上述那几句话后，又想了一会儿，只说："我不知道了。"

我从这二十个人的刑讯中，还不能肯定他们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我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俘获赵一曼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我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俩带到赵一曼那里去了。宪兵用笨掘的中国话问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又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

从这里我觉得，我那样的审问方式对她是无效的。我以为既然逮到了，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我怀着这样的野心，决定把她解到哈尔滨。我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赵一曼回答："就是到哈尔滨，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寻思了一会儿，说道："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对她的顽强态度我简直无法应付，只好把那个姑娘释放了。珠河县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赵一曼一道坐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们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连同我一共四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我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大黑反对，说："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大黑所以反对我的意见，是因为担心我负的责任太大。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我又说："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呢！"山浦科长耐心地听罢我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决定，说："治疗所需的必要费用和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来负，就这样，把她先看押起来吧。"

我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委托给当时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由于伤势太重，他感到为难。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他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赵一曼顽强地拒绝，她说，与其锯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杀掉好。我十分为难，又同上述的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由哈尔滨警务厅派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

我因为担负着监视的责任，几乎每天或隔一天派外事股的翻译黄嘉时到病房去看看。

市立医院给她照了爱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乱在肉里。我当时曾在片子上数过，还记得，散乱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二十四块。大夫诊断："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渡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之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由于赵本人坚决反对锯腿，就决定这样治疗了。我也想到，她拒绝锯腿，是不是企图逃走呢？就极力劝她锯掉，无奈她断然反对。

我负责执行监视的期间，大约有两周。当然我一直考虑继续审问她，把她当反间来利用。

有一天，我问她："伤治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赵一曼说："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我嘲笑她说："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并恐吓她："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

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首诗，交给我，我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锋利。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终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

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以后我见到大黑，他对我说："你让一个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结果呢，她同警士和看护妇结成一伙，逃跑了。"我说："我到阿城去的时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须改变监视的方式。怎能这样说我呢?对一个能组织起三万多群众的人，就应该考虑到她会把警士和看护妇拉过去，失败的原因是把同一个警士和看护妇留在她身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调换。"大黑说："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让她逃回原来的地方，不知道将有多少我们的人被杀掉呢，我们是受了一次骗，凡是叫共产党的人，我认为杀了是没有错的。"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赵一曼这个人的侧影了。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黑的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同乡、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的森口作沼对我说："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

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他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他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选自《纵横》83 年 1 期，
作者为日本战犯：大野泰治）

潘汉年

潘汉年（1906——1977） 江苏宜兴人。1923 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 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领导的创造社，主编进步刊物《洪水》。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去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1928 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1929 年、1930 年前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1931 年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在上海的党中央受到了破坏。为了保卫驻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的隐蔽斗争，是党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1933 年夏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 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1934 年底参加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在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陕北。"西安事变"后，他再次任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1937 年 9 月，任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后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由于他在 1939 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运输。1948 年护送了大批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到解放区。1949 年夏到 1955 年春，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任职期间，他协助陈毅同志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从接管上海，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到恢复、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日夜操劳，兢兢业业地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绩。1955 年 4 月，因以所谓"内奸"的罪名被错误地判刑。1982 年 9 月 1 日党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7 年在湖南郴水病逝。

杨虎城

杨虎城，原名虎冬、虎臣，陕西省蒲城县人，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生在一个农民家里。幼年时，由于家庭贫困，他只念过两年村塾，便到一家小饭铺替人烧火。1908 年，他的父亲遭仇家诬陷，被官府处死。这时，他才十五岁，得村民帮助勉强安葬了父尸。之后，他走投无路，和当地一帮少年成立了一个"中秋会"，以"打富济贫"相号召，后来发展到百余人，他是领袖。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杨率领中秋会员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兵作战。1913 年退伍回乡，他仍然以中秋会员为基本群众，参加当地农民的抗捐抗暴斗争。1914 年，他纠合一批人打死了县东南乡一个向农民逼债的大恶霸李桢。此人包揽词讼，强占民女，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李桢被打死的事件，轰动了当地，县官派差役缉捕杨虎城等人，他们被迫流亡到同州（今大荔）、郃阳（今合阳）一带去活动，杨成了当地"刀客"集团的首领。1915 年冬，杨已有众数百人。袁世凯窃国称帝，民党井勿幕等发动反袁护国，杨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转战于朝邑、华阴一带。1916 年反袁军事结束，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

1917 年底，中华革命党人在三原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不久靖国军在三原、渭南宣布独立，杨虎城任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次年 2 月，杨率部参与临潼关山镇防卫战役，使陈树藩压境之敌不能前进一步。6 月间中华革命党人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入陕，为各军共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杨虎城任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19 年 1 月，杨率部与陈树藩军及北洋政府八省援陕军相对抗。1920

年杨攻占武功城，及于扶风、麟游等县。不久，直系曹、吴取代了皖系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派阎相文督陕。直系对靖国军采取分化政策，胡景翼一师首先接受了直系收编。其后各路靖国军多被改编，独杨不为所动。1922年春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到武功。于右任任杨为第三路司令。杨率军一旅迎击十倍之直军于大王店，奋战半月后，以孤军难持久，退往凤翔。在此决定：于右任南下向孙中山请示，部队由杨率领再转移到陕北。千里行军，冲破沿途堵截，最后，到达延安，依托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井勿幕之兄）处。杨到陕北后，一面集训旧部，一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告诉他，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驱逐曹、吴的北京政府，与胡景翼、孙岳共组国民军，委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5年7月，杨率师自陕北南下，击败直系军阀吴新田，把他赶到秦岭以南，杨升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这时，杨虎城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由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学校政治部主任，请一些共产党员教授政治课，还吸收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在部队中任下级军官。这对杨及其部下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不少影响。

1926年1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对国民军开战。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率镇嵩军七万人进攻陕西。镇嵩军是土匪集团，陕人过去深受其害。但当时陕西督办李云龙（属国民二军）新自豫西败回，潼关门户洞开。刘镇华得以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陕西人民要求抗刘。这时杨虎城带领部队自三原迅速开入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守省城。两部兵力不过万人，又当国民军各军新败；当时西安城内又有一批反动绅士，政客，见刘势大，与刘勾结，形势十分险恶。但西安城内，当时也有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学生、妇女等各种进步团体。这些团体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打倒军阀，帮助守军，给守城国民军以极大鼓舞和支持。杨在群众支持下，枪毙了"和平迎刘"的劣绅头目，镇压了投降活动。守城战自4月中旬开始，至9月冯玉祥派国民一军援陕，到11月底西安解围，历时将近八个月。其间城内粮食吃光，代之以树皮、草根，可食之物，罗掘殆尽。杨与李云龙部团结一致，坚守待援，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这一战役有力地支援了当时已开始的北伐战争，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守城战例之一。

1927年初，冯玉祥入西安，6月杨虎城归冯统率，任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旋改第十军），随后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同奉系直鲁联军在陇海线归德一带作战半年之久。后因失利而退入皖北太和休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冯玉祥接着与蒋合作反共，形势大变。当时在杨身边的中共干部劝杨起义，他不赞成。1928年春，以魏野畴为首的皖北特委发动刘集暴动失败（魏牺牲），引起南京政府注意，杨从"朋友道义"的关系上，礼送其身边中共党员（有南汉宸等人）出境。在时局重大转变关头，杨表现迟疑不决。蒋介石发动的二次"北伐"，他不愿参加；与冯的关系也渐疏远并有所不满，但也不愿追随中共。他终以处境困难，决定出国"休养"，于4月底到日本。同年冬，蒋、冯之间出现裂痕，双方都电促杨回国，他于11月回到国内。当时，他的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奉冯命开往鲁南。他到鲁南就任二十一师师长新职，暂时仍隶冯部。1929年4月，蒋、冯矛盾濒于破裂，冯为备战，令其驻鲁部队西撤。杨权衡利害，不听冯命，继经蒋的拉笼，他率部投归了蒋介石，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从此，他参加进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行列，9月奉蒋令调守河南南阳一带，阻击冯军。12月，助蒋击溃了反蒋的唐生智部。

从1930年4月起，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在中原大战。杨虎城受蒋方何成浚指挥对阎、冯作战。7月间蒋升任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率部自豫西转战入陕，11月占西安。大战结束，蒋为收拾西北局面对杨极力拉拢，并临时授杨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但从杨主陕之日起，蒋与杨的矛盾就开始了。杨一入陕，蒋立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兵扼制陕东咽喉。1932年2月蒋任杨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企图把杨的职权范围限制在陕西境内。其后，蒋曾策动杨部一个师长叛杨；派马鸿逵率部回宁夏作主席，以控制杨向西北发展；派邵力子主甘肃，拉笼马家回军反杨；还令胡宗南驻天水，以监视杨部。在杨虎城方面，则镇压了一批由蒋暗中扶持反杨的地方武装；一度派其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驱逐吴佩孚的余孽及四川军而进入兰州（1931）；并帮助回民马仲英部进兵新疆（1932），准备从西北打通国际线。同时，杨与国内各方面反蒋势力，也有所联系。1933年5月，蒋介石突然免去了杨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保留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另委邵力子为陕西省主席。1934年10月蒋又调走了杨的一旅人，开往河南。这些都显示了蒋、杨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

杨在主陕期间，南汉宸又回到陕西，任杨的省府秘书长，援引了一些进步人士在杨处工作。杨的内部有进步、中间、反动三种力量，互相消长，左右着杨的政治倾向。"九一八"事变后，在应否抗日问题上，三种力量进行着斗争。1933年，当红军一部分到达川北陕南时，进步力量推动杨与红军取得默契，迂回避战。但后来破裂，终于发生冲突。1935年，杨奉令阻击红军北上。当年1月，杨调其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进入陕南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被歼灭六个营。2月，杨又将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红二十五军作战，并亲到蓝田指挥。3月，警三旅两个团在佛平、

华阳地区被歼灭，旅长张鸿远负伤。4月，警三旅五个营在柞水九间房地区被歼。7月，警一旅在秦岭山区袁家沟口又被全歼，旅长唐嗣桐被俘。在军事上不断受到打击的情况下，经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全国人民抗日潮流的推动，他渐觉悟到此路不通。同时，1935年夏张学良的东北军奉令入陕"剿共"，9月到11月，东北军也连续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因而张学良发生了与杨同样的感想。当东北军入陕之初，蒋介石在张、杨两部之间施行挑拨，使其互相牵制而后加以操纵利用，因此，两部之间曾一度深有隔阂。后通过中共地下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作，双方意见沟通，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下，决定共同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到1936年春，他们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进而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当时蒋不但拒绝其建议，反调集大量嫡系部队入陕，准备对工农红军大举"围剿"，蒋于12月4日亲至西安向杨与张施加压力，说他们如不愿"剿共"，则将他们的军队调开，让出陕省，由"中央军""进剿"。到此，张、杨与蒋的矛盾已无可调和，于是张、杨密商，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两部密切合作，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开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致电陕北，请中共和红军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16日毛主席、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为代表到西安。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士兵及西安群众，普遍要求公审蒋介石，把他明正典刑；汉奸亲日派分子则企图利用群众情绪，杀死蒋介石，挑起内战。末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由内战到抗战转变的关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竟背信弃义，于1937年4月迫杨辞职，6月又迫杨"出洋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在欧洲想返国参加抗战，曾两电蒋介石，均遭拒绝。后电宋子文，才得到同意。11月他由法国马赛乘船经香港回国。这时蒋介石电杨，要他至南昌相见。杨到南昌后即被戴笠囚禁。对此，杨虎城曾对其友好坦然表示："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1938年他被解往湖南长沙、益阳监禁。次年起又先后被囚于贵州息烽玄天洞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以及贵阳麒麟洞等特务机关，前后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指使其特务用利刃将杨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内。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同他一起坐牢，死于狱中。杨虎城的幼子拯中和在狱中出生、年仅九岁的幼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年亦八、九岁的幼女，还有杨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七人，都与杨同时被杀害。这是蒋介石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之一。同年11月重庆解放，中共党政军人员找到了杨虎城及其家属、随员的遗骸，将他们的遗骸迎葬于西安韦曲少陵原，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于学忠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人 1890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日）生于旅顺。其父于文孚曾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

于学忠幼年随父在军营中，1904年肄业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于学忠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提拔为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曾任职毅军，原隶于文孚部下，因此关系电召于学忠至襄阳，任为炮营营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于随赵旅参加对皖系吴光新作战，将吴部包围缴械。1921年秋，川鄂战起，熊克武、刘湘进攻湖北。赵荣华旅防守宜昌。战事失利，准备放弃。适逢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至宜昌督战，于往见吴，面陈反攻计划，吴即采纳。后激战五昼夜，击退川军。于因此被吴佩孚赏识，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的战争，年底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杨森、刘湘，攻击熊克武，不久赵荣华因抗拒军令被撤职，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

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成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坐镇北平。7月，石友三反蒋。张奉蒋命，把在关外看家的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讨石，并任命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平汉线作战之责。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拿办石友三。于率所部与王树常所率第二集团军及南路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合力夹击石军。不到半月，在滹沱河畔深泽地区击败了石友三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图谋控制华北，平津时局紧张。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将于学忠的平津卫戍司令与王树常的河北省主席对调，于赴天津就任河北省主席。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将东北军大部分交于学忠指挥。日本侵略者曾用种种手段对于学忠进行利诱和威胁，于皆未为所动。1935年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会长何应

钦屈服于日本军阀的要求，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次郎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方所提出的“觉书”第一条即为罢免于学忠，要求将于部五十一军撤出河北。为了迁就日本侵略者，何应钦几次亲自打电话逼于辞职，均遭于拒绝。5月31日南京政府乃命于将河北省府由天津迁往保定；6月6日又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任命于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令其率部开赴西安（后驻天水），参加尾追徐海东率领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11月1日，于被任为甘肃省主席。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由兰州到西安，12月11日晚参加了张学良为发动西安事变召集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虽力主慎重，但同意张采取“兵谏”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12月12日晚7时，驻兰州的于学忠部奉张学良命令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开会）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的高级官员，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12月16日，于学忠飞返兰州，以后不断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安西各种会议。

西安事变后，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押。于学忠奉张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于曾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在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蒋介石在无理判处张学良后，又派五个军进逼西安，并在1937年1月4日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1月5日，于学忠同杨虎城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1月中旬南京政府提出改编东北军、西北军的甲、乙两案，为此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扣押张学良并对西安步步进逼形势下，东北军内部发生“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情况下，1月30日晚，于学忠、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于学忠与杨虎城及两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2月8日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接受乙案，准备东调。蒋介石、何应钦等便以处理善后为名，加紧分化、瓦解东北军的活动。1937年4月，蒋调于部五十一军往蚌埠、淮阴、宿县，任命于为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阴。

1937年7月抗战开始，蒋介石调五十一军到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于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25日退出青岛。次年1月山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济南和山东大片土地。此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山东军队统交于学忠指挥，任于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于率部先后参加了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于军和其他东北军一样，由于蒋介石对“杂牌”部队的歧视，在战争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得不到补充，实力不断削弱。

1939年，于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

1941年底，于任山东省主席。1944年，卸去苏鲁战区总司令职务，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解放战争时期，于任南京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胁迫于去台湾，于藏在四川乡间未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和信任。1952年12月，担任河北河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傅作义

傅作义，字宜生，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军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察哈尔省主席及华北“剿总”总司令等高级职务。

1949年1月，他毅然决然举行了北平和平起义，并推动了尔后的绥远起义。北平的和平解决，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完好地归回人民，二百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毛泽东主席高度称赞傅作义的这一义举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

傅作义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祖上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人过黄河（从河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铜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独家经营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逃往西安，傅庆泰运煤售给皇家，得利甚厚，旋设立了若干商号，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傅庆泰因出身贫微，不为邻里所重视，乃决心让作仁、作义二子投身军界，以提高社会地位。

191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分配回山西，在阎锡山部

第十团当见习军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营附，第三年升任第十团少校团附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体操、射击、劈刺、投弹）。每天拂晓，他总是亲自带领部队急行军三四十里；训练场上，他身着士兵服装，每项课目自己先做示范动作；他尽量设置难度大、近似实战的场地和障碍，从难从严要求部队。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该团获得第一名。傅作义因此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并为同僚所称赞。

1922年，傅作义任第四团一营营长。他能叫出全营八百士兵的名字，熟悉每个军官的性格和优缺点。他关心全营官兵，逢年过节要赏给士兵猪肉、粽子、月饼等；知道某人有困难，就解囊相助。因此，全营官兵乐于服从他的严格要求。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派出四个旅由张培梅任总指挥出兵娘子关，进占石家庄，阻击直系援军北上。当时傅作义营负责警戒石家庄的任务。傅将兵力集中市内要隘，派得力班长同士兵一二名，携电话机分布于各要口。适张培梅夜间巡防，发现哨位兵少，责问傅作义。傅说，将兵分布各路口，如有情况无法应付，不如集中兵力，接到哨位电话，可以应付紧急情况。张对此甚为嘉许，后荐傅为第四旅第八团团长。

1926年，晋、奉、直联合反对国民军冯玉祥，傅作义固守天镇城有功，擢升为第四旅旅长。旋又升任为第四师中将师长，时年三十一岁。

1927年6月，阎锡山依附蒋介石，反对奉系张作霖。9月，阎部分兵三路出京汉、京绥线攻打奉军，傅作义师作为别动队，担负横断京汉、京绥西铁路间奉军之联络的任务，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相机进据京津。

傅作义原计划率部先进至蔚县东北之桃花堡，然后指向北京城南铁路沿线的涿州城。当所部在蔚县集结之后，傅觉得进出桃花堡，行动易被奉军发觉，于是决定改变计划，从蔚县东之九宫口入山，转至拒马河上游的大河南，再沿拒马河而下。这条线路固然路途艰险，但人烟稀少，出敌不意。10月11日，傅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占了涿州。

涿州城为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带之要冲，紧扼北京之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坐镇北京，前敌指挥中枢设在保定，由其儿子、奉军军团长张学良统驭。张作霖对傅作义奇袭涿州异常惊恐，即令张学良集中三万精锐部队，猛烈攻城，重夺涿州。

傅作义于14日凌晨进涿州，立即绕城墙巡察，接着召开全师官长会议，研究部署守城方略。他把守城分成两个战线：一是卫戍，由旅长白濡青任司令；一是城防，由团长袁庆曾任司令。他还提出，兵民相处最难，客兵初至尤其难，对部队必须实行严格的法纪约束。会议结束，他命令卫戍、城防分兵各司其职，马上建筑工事及布置炮兵阵地。师司令部布告涿州民众，严申纪律："凡我民众，各安生业，勿相惊疑。公平交易，勿抬市价。倘官兵或有不法行为，准予来部控告，定尽行惩治，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未几，奉军飞机便飞临涿州。傅要求部队一面防空，一面构筑工事；战情越紧急，越要筑好工事。还亲自教授士兵守城侧射之法。这天深夜，张学良的卫队旅长王以哲指挥第三团韩麟征部从东北角爬城偷袭，被傅师挫败。他抓住战机，指挥部队乘胜冲出东门，袭击奉军后方，迫使敌撤退至城东北五六里远的普寿寺（即清凉寺）。

1928年1月5日凌晨，傅作义出涿州城赴保定议和。下火车后，他即拜见了张学良，说："作义此来，有个要求向总指挥提出，涿州城中的人，已经有两天没有一点吃的了。"张不等傅说完，便让师长万福麟传令前方，马上拨涿州城内军民三天的食物。嗣后，傅两次发表和议通电，昭告中外。一周前，傅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

12日，傅作义师七千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奉军万福麟师进驻城内，历时三个多月的涿州攻防战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大元帅府设宴招待傅作义，并许以指挥方面军一职，被傅拒绝。张作霖大怒，要枪毙傅，后经张学良说情，张作霖才允许将傅软禁于保定指挥部。傅作义到保定，住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家中。鲍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与傅有同学之谊。他同鲍及张学良的副官长单益三（山西临汾人）等人竭力周旋，并且金钱拉拢监视自己的宪兵们，同时逛公园、打麻将、品茗、奕棋，以示玩物丧志，使监视日益松懈。是年5月初，在同乡崔笑如和大学生段伯宇的掩护下，骑自行车逃出保定，到了天津。

傅作义坚守涿州，对于晋军在整个战场上的转败为胜，以及奉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造成在冯玉祥的配合下，晋军在进击京津方面取得节节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傅由此声名大噪，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喝彩。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开序幕。阎锡山集中十一个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入山东境内，由于阎热衷于攫取最高权力，回石家庄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即以傅作义代理行营主任兼第二路军指挥官，另一方面，又以第四路军指挥官张荫梧为前敌总指挥，指挥二、四两路军，傅作义为前敌副总指挥。6月25日，晋军占领济南后，傅主张迅速南下，直捣徐州；而张则主张先肃清沿胶济线东撤之韩复榘、刘珍年部，巩固后方，再行南下。阎锡山为此到济南进行调解，并错误决定，让傅作义率部继续南下，张荫梧率部追击韩复榘。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延误了战机，招致了津浦线晋军的全面失败。傅作义率部进至兖州、曲阜一线，遇上大雨，行军迟缓，突遭蒋介石之增援主力为陈诚、蒋光鼐两部的反击，即全线溃退；胶济线方

面的韩复榘亦乘势反扑，张荫梧率部狼狈逃窜。8月15日，济南失守，津浦线之战，历时五十天，晋军伤亡四五万人。

1938年初，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北路军总部驻离石县柳林镇。

此时，毛泽东主席特派程子华、曾三二人会见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事宜。之后，傅也派周北峰(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到延安拜见毛主席和有关领导同志，并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来帮助开展抗日工作。3月，傅派代表到岢岚县参加晋西北地区动员新战士会议，该会为傅部动员了三千名新战士。会后，傅作义应约在兴县、临县之间的白文镇与关向应、续范亭、肖克等会谈协商抗日问题。

4月，为策应徐州会战，打击日本侵略军，傅作义又发动了绥南战役，先后收复清水河、和林县城、一直攻到绥南之一间房。在和林县的察圪洞，傅部全歼了日军岩田骑兵联队，缴获战马三百匹。是年初秋，傅率部从绥南经偏关、三岔口等地，撤退到河曲县整顿，总部驻县城西关。

傅部转入河曲之后，为了更好地统一抗战，遂与驻在晋西北岢岚、五寨一带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部进行联防。其间，两军书信不断，交换情报，人员往来频繁。傅作义还邀请八路军负责同志程子华、南汉宸、罗贵波、续范亭等到其河曲总部联欢，共同交流抗战的经验、教训。傅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政治干部来加强所部的政治工作，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赠送的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

1949年1月，傅作义毅然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率领五十余万官兵走到人民阵营来。

辽沈战役结束后，傅作义马上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言和。傅将电文口授其长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转由《平明日报》社王汉斌(中共地下党员)于11月17日发出。该电的内容是表明自己不愿打内战，请求派南汉宸来谈判，并报告了在北平他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中共中央对这个电报未予答复。

12月13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使傅部与蒋介石嫡系建制的部队分割于平津两地。第二天，傅作义即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平明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为代表，配备一部电台连同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出城驰往平山，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

12月15日，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师长以上军官，秘密研商和平问题。傅在会上说：北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和平，用军事已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我决心走和平这条路，你们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大家都应声道，愿跟总司令走和平道路。

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天，傅作义又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周北峰为代表至通县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进行第三次和谈，签订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15日，解放军解放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次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谍，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预"。傅立即表示，愿意完全接受和平改编。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新篇章。"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等就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发动"西安事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这次会谈对于贯彻我党逼蒋抗日方针和推动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任张学良为"剿匪"副总司令，命令他的东北军开往陕西，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机一举"剿灭"红军。然而张学良的"剿匪"多次遭到失败，大批东北军官兵被红军俘虏。同时东北军中的思乡和抗日情绪越来越强烈。1936年元旦，红军在瓦窑堡为被俘的东北军官兵举行了盛大宴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部分领导人出席了庆祝大会。这一事件，对东北军和张学良本人震动很大。庆祝大会后，红军通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同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中有抗日倾向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建立了联系。接着，张学良在西安召见了高福源，向他询问了陕北苏区共产党和红军的若干政策措施，高福源就所知如实作了回答，并向张学良转达了红军希望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愿望。张学良听了之后，便让高福

源回瓦窑堡告诉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正式商谈一下。高福源随即返回瓦窑堡，向红军转达了张学良的要求。2月25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钱之光等同志与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会晤，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之后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抵西安后，第二天就去洛川再次会见了李克农，双方就停战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讨，经过几个小时坦诚而友好的会谈，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张学良诚恳表示，希望能同我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见，会谈地点定在东北军一二九师防区肤施城(即延安)内，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3月16日，李克农带着张学良将军的抗日决心和要求，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会晤张学良，李克农随行。会谈时间原定在3月底，但由于张学良患了喉病，遂推迟到4月8日进行。在周恩来和李克农临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4月6日致电张学良、王以哲，通知周恩来等同志行期和联络地点，并提出这次会谈的几个问题。电文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赶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问题；

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望预告为盼。

4月7日，当周恩来和李克农顶着寒风于约定时间赶到肤施城东川口时，老天突然下起雪来。因气候恶劣，电台联络失时，直到4月8日上午，张学良才冒着风雪亲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等赶到肤施。几经周折，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于当天下午8点进入肤施城。晚上，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教堂里，周恩来和张学良见了面，会商救国大计。参加会谈的还有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3人。

会谈是在开诚布公、恳切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把自己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倾诉出来，向周恩来请教。张学良认为：现在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考察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为唯一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现在这条路能否走得通，他已开始有些怀疑。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坦率，便直接了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最凶残的政治主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张学良流露出对人民群众抗战的作用和力量估计不足。针对张学良的这种认识，周恩来诚恳地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只有靠这种无比伟大的群众力量，中国的抗日才有胜利的希望。若仿效德国和意大利，走法西斯道路，个人专断独裁，抗日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张学良真挚而坦率地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但同时，张学良又为东北军中缺乏抗日干部而感到苦闷。周恩来向他指出，干部要在培训中选拔。这个建议对张学良启发很大，后来他果然在中共帮助下，为抗日需要而与杨虎城共同办起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了一批较有才干的军官。当谈到联合抗日如何对待蒋介石时，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周恩来还向张学良解释说，红军的大部分将领，都曾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只要蒋介石以诚相待，真心抗日，他们愿意再度服从他的指挥。对于逼蒋抗日的策略，张学良设想了种种办法，希望东北军和共产党共同努力，周恩来表示赞同。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一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这就为后来张学良逼蒋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就这样，周恩来和张学良经过通宵达旦的长谈，顺利地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

(三)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从新疆前方。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并认为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学良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命令进攻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

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红军所需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学良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学良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尽力提供方便。

张学良还表示拿出一部分私人财产来帮助红军解决物资的困难。会谈后，张学良即送二万元现款给红军，之后又赠送红军二十万法币。

4月10日凌晨四时，肤施会谈结束，张学良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周恩来随即返回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会谈情况。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对于共产党和东北军双方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会谈会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发布"五·五通电"，指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改反蒋抗日口号为联蒋抗日口号，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对张学良来说，这次会谈使他基本了解共产党主张抗日及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从而坚定了与共产党的合作，走向逼蒋抗日，开始了他政治生命中的伟大转变。

肤施会谈后不到九个月，扭转中华民族抗日局面的"西安事变"终于爆发了。

（《党史博采》杨盛云）

身在禁中　心忧国事
——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发动西安事变、威震中外的张学良将军，在特务头子戴笠等人的"陪同"下，由南京移到了浙江奉化，住进了溪口的武岭学校。当天夜里，张学良将军遥念秦川，挥毫疾书：

虎城、孝侯、鼎方、仲贤、乃赓、秀方、蔚如、宪章、世甫、开源、柱国、志一、公侠、芳波、伯纯、炳南、菊人诸兄鉴：

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illegible]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illegible]。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专此，并颂

戎安

弟良顿首

十三日夜

这封信是写给东北军、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和幕僚的。信中商量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提出要杨虎城等在蒋介石提的"办法二则"，即所谓甲、乙两案中选择一项。

张学良来到奉化的当夜，为何要匆忙写出此信？甲、乙两案又究竟是怎么回事？

话要从头说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救亡汹涌澎湃的浪潮下，被迫接受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六项条件：(1)中央军入关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2)停止内战，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改变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6)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六项条件，并信誓旦旦地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然而，在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蒋介石便大要阴谋诡计，先将张学良交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十年徒刑，褫夺公权五年；紧接着蒋介石又呈请国民政府给以特赦；国民政府决议表面同意特赦，但是又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则软禁终身。

蒋介石以扣押张学良，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政治压力，进行种种讹诈，破坏东北军、十七路军同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他组织了五个集团军，共三十七个师的兵力，从东、西两路威胁西安。又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等。

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食言而肥，西安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月五日由杨虎城领衔，发出著名的"歌"电，揭露蒋介石撕毁协议，妄图重新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表示如战事重起，西安方面决心"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同时，作好军事防御准备，备战言和。蒋介石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开内战，因此，他提出所谓解决问题的甲、乙两案，进行新的讹诈。

甲、乙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

(1)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

(2)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咸阳一线中央军长驻十二个团；

(3)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

地区；

(4)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以西地区；

(5)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乙案：

(1)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2)十七路军调驻甘肃；

(3)东北军调驻安徽和淮河流域；

(4)红军仍回陕北。

十三日当夜，张学良将军给杨虎城等人的信，正是在两案提出后，疾笔而写的。这时，蒋介石虽已撕毁部分协议，张学良本人也失去了自由，但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对于抗日和改组政府两个首要问题还没有抛弃，要提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仍有可能实现。再则，为了一致对外，避免可能再次爆发的大规模内战，宁可再委屈求全。因此，张学良迫切希望杨虎城等在甲、乙两案中选择一项。至于他自己，张学良在信中写道："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他并要杨虎城等"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一月十九日，张学良再次写信给杨虎城，催杨接受甲案，"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他说："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说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张学良决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风亮节，矢忠不渝！

不久，西安方面派出鲍文樾、李志刚到奉化与蒋介石谈判，要求释放张学良，再谈其它问题。一月下旬，蒋介石拒绝了西安要求，只允许他们在甲、乙两案中选择，并指定顾祝同与他们谈判。一月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行甲案，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放宽。

就在事情可告一段落之际，一九三七年二月，西安方面突然又爆发了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的爆发是东北军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争斗激化的结果。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主张先释放张学良，再谈其它，为释张不惜一战；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则同意和平解决事变，不以释张为先决条件。和、战之争十分激烈，致使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枪杀，东北军内部分化加剧，有实权的将领转而同意实行乙案，决心谋个人出路。

按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还可集中在甘、陕，连成一片；而乙案则三军分开，势必"三位一体"解体，使得蒋介石达到分化和消弱进步力量的目的。

二二事件初步解决之后，东北军内部矛盾未息，对部队东开与西开仍还有激烈争论。何柱国便在顾祝同的指派下，前往奉化，面见张学良。张见何后，又于二月十七日再函杨虎城，原信如下：

虎城仁兄大鉴：

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持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亟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弟良启

二月十七日

此时，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抑郁，信尾"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足以可见。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然而，二二事件之后，"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同一天，张学良给于学忠的信中写道："犹以鼎方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流"，感情更为强烈。他既伤感王以哲死于非命，也悲惜东北军和个人前途。

仅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

(选自《纵横》83年1期，作者：张魁堂)

张学良遭终生软禁之谜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关于记述这个事件的史料及文章，发表的虽然不少，但对张学良将军为何敢承担巨大风险，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事隔半月，张又亲自护送蒋飞返南京？同时，蒋本人和其集团中的军政要员20余人，大都对张此举恨之入骨，均欲置张于死地而后快，可是为何蒋介石不杀张学良，而又不放他？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

笔者有幸在1943年的重庆和在1946年的南京，先后两次见过张将军智囊团中的亲信人士：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先生，原沈阳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先生和张的随从秘书、我的同窗张荣春。由于我们都是东北人，抗战时期深感"国民党中央"对东北人的歧视，尤其谈到对张学良将军的遭遇深感不平，王、阎二先生等遂将他们亲历的"双十二事变"一些内幕事实告诉了我。今将我亲听这个事变参予者当时的谈话和我在南京国防部任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科长时，亲见蒋给陈诚等确保张学良人身安

全的手令等情况，笔之于书，以供研究民国史的同志和读者们参考。

1931年8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张当即密电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而蒋却回电说：日寇正到处寻衅，找个借口好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希你顾全大局，忍让一时，并严饬东北军官兵，如遇日寇挑衅时，不要抵抗，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竟悍然出兵，侵犯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在北平得到电报，马上再次急电请示蒋。张首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旋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一)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范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二)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有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英苏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等，云云。张将军误信蒋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致将东北大好河山，束手让给日本侵略军占领！又据王先生告称："从这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压迫，不得不辞职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张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十余份之多。我们(指张学良的智囊团人士)建议张将军将这些电令原件妥为保存起来，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将这些函电让张将军去西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不料这些文件竟救了张将军的性命。"此中的秘密，还有下面一段故事。

当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承认张、杨二将军提出八项救国建议，同意停止内战，团结国内各派系共同抗日时，张将军为了团结抗日，报仇雪耻，监督国民党中央执行蒋在离西安前的六项诺言，遂亲自护送蒋介石飞返南京。但当蒋、张安抵南京后，国民党中央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及与张有宿怨的国民党党政大员，如陈果夫、陈立夫、唐生智、张继等人，均主张将张学良交军法审判，处以极刑！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得悉此噩耗，立即分电蒋介石及西安谈判保证人宋子文，电文首先说明："九·一八"东北军不抵抗，乃遵照委员长电令行事，汉卿并无罪责；"西安事变"系汉卿为维护"领袖"名垂青史，激于抗战之热诚，才进行诤谏的。进而说明，张唯恐蒋拟12月12日亲莅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偏激分子暗算，才于12日凌晨发动名曰兵谏，实为保护委座安全之策；最后为维护"领袖"之威信，故又亲自护送钧座安返首都云云。电文最后着重说明：假如中央为某些当权者所操纵，致使汉卿有不测之时，风至即将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以来，中央及钧座给汉卿和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诸于世，诉诸国联，对日不抵抗之罪责，究应谁负？敬乞钧座明察而制之。翌晨张夫人即收到宋美龄的复电："……汉卿兄事，请仁姊放心；委员长绝对履行诺言，保证汉卿兄之安全"云云。我们事后推测：这两个电报起了先判刑后特赦的作用。张学良一直没有遭暗害，不能不说是与伦敦保存的函电有关。即在1946年至1948年间，当我任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科长时，我就亲眼看见过两次蒋介石给陈诚和毛人凤的手令，指示确保张学良人身安全之重要。蒋介石害怕他手下的一些妒贤嫉仇的军特人员将张暗杀，而导致他们见不得人的密电手令一旦公诸于世，使蒋失信于天下，动摇他在中国之统治地位。但蒋又不敢放张，一怕放虎归山，终成后患；二怕张投奔中共而竟成劲敌；三怕张获得自由后，其夫人于凤至公布其密电，让世人知晓蒋不抵抗日军之内幕。为此，蒋以"张"作"人质"，而迫使于不敢泄密；个中内情，至今尚为世人所不知。

此段亲闻亲见的史实证明：一封密电救了张将军的一条命；但它也造成张被终身软禁的悲剧。

(选自《纵横》88年4期，作者：徐世江)

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被杀害的经过

(一)在南昌被蒋介石扣押的经过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迫前往欧洲，其在西北的部队，均被胡宗南予以分化宰割。

"七七事变"一发生，杨虎城将军即兼程返国，共赴国难。蒋介石得悉后，即派戴笠由庐山赶往上海，布置秘密监视，并伺机诱捕。戴笠抵沪后，即召集军统上海特区区长王新衡、行动组长赵理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兆槐等密商监视办法，决定由王兆槐主持监视工作。

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7月中旬，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乘意大利邮船"康悌罗梭"号到达上海。赵理君、沈醉、许鹏飞、杨凤岐、王开明、朱又新等二十余名特务，跟踪到

杨将军临时下榻的"国际饭店"后,即进行严密监视。

当晚,戴笠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做下一步处置:一、派赵理君率特务二十余人,严密监视,防止杨将军返回西北;二、派杨凤歧、许鹏飞与英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以警备司令部派员"保护"杨将军为名,协助赵理君做公开监视;三、派王新衡负责与新闻界联系,要报纸尽量少刊登或不刊登有关杨将军的一切消息;四、由公开进行监视的特务登记前往拜访杨将军的客人,并以种种办法阻挠和减少客人接近杨将军;五、查扣杨将军发给其在西北等地旧部的函电,并窃听杨将军住所的电话。同时,戴笠急电蒋介石,请示报告。

杨虎城将军在沪停留了十余日,蒋介石即以"召见"为名,派专机将杨虎城夫妇及儿子骗往南昌。一下飞机,杨虎城夫妇及儿子就被接往百花洲熊式辉的别墅内软禁起来。

当时看守杨将军的,是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和他所率领的三十余名特务。这个特务队有三个小队,队员都是由杭州特训班的毕业生与首都警察厅特警课的特务中挑选的,都受过专门的训练。任务是严禁杨将军与外界往来。另外还配备了一个宪兵连,担任外围警卫。

(二)在集中营遭受迫害与虐待的情形

"八·一三"战起,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军事情况混乱。杨虎城将军在南昌被禁两月有余,即被移送到湖南,先在长沙郊外朱家花园小住月余,后又被移禁到益阳桃花坪集中营。

1938年冬,武汉告急,蒋介石准备逃往西南。杨将军在桃花坪约住了十个月,即随同益阳集中营被移往贵州息烽,囚禁于离息烽南郊十余华里之丛山中的玄天洞内。仍由李家杰率领的特务队负责看守。外围除宪兵一个连外,又加派了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张止戈部担任警戒。

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均被监禁在玄天洞的一个小庙内。小庙共有平房四间,周围约百余步。洞内潮湿异常,早晚有浓雾,且极寒冷。杨将军终日被禁洞中,故精神更感苦痛。1939年春,杨将军出美金数百元,自建了一小住宅。杨将军建小住宅之时,李家杰乘机大揩其油。杨将军对其行为略表不满,李家杰便恼羞成怒,对杨将军更加虐待,处处留难,凶横备至。

杨夫人对蒋介石、戴笠及看守特务,素极仇视,虽在此种高压之下,对蒋介石等仍终日痛骂,不肯屈服,甚至以巨碗痛击李家杰的头部。李家杰更加恼怒,他在监守期间,不断向戴笠反映杨将军如何对蒋介石不满,杨夫人又如何痛骂蒋介石、戴笠等,并挑拨杨将军夫妇之间的关系,借口杨将军夫妇不和,影响杨将军的情绪,强迫杨将军夫妇分居。杨夫人经不住一再刺激,身体日益衰弱。杨将军对夫人的健康恶化尤感不安。

1940年春,戴笠以李家杰看守杨将军有功,将其调升为重庆中训团警卫组少将副组长,遗缺另派龚国彦接充。龚国彦继任期间,表面上虽较温和,但军统一向因杨将军在"西安事变"中曾主张杀蒋介石以谢国人,故对杨将军素极怀恨,所以并未因看守人员之更换有所改善,而虐待依然如故。

1946年8月,军统息烽集中营迁并重庆白公馆,杨将军亦被移禁于重庆磁器口中美所杨家山后面的小屋内。其外围警卫除中美所之交警大队外,还配有宪兵二十四团一个连。在囚禁杨将军之区域内,即特务亦不准往来,仅朱绍良及特务头子侯桢祥、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间或前往视察。

杨将军迁渝不久,所患之胆石病发作,病势极其严重。后由中央医院童家桥分院割去胆囊,才幸获痊愈。未几,杨夫人因受长期迫害,以致神经失常加深,终日狂呼、痛骂蒋介石及看守特务。军统偶尔发给一点医药费与药品,又被特务队副队长张静甫克扣盗卖,加之营养不良,致使杨夫人病势日趋严重,于1947年春含愤去世。

(三)在重庆中美所被杀害的经过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一再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但蒋介石不允释放。1949年2月,蒋介石集团面临崩溃的前夕,蒋介石退入幕后,希冀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与释放全国政治犯及张、杨两将军的和谈条件,受到了全国人民及进步舆论的热烈拥护。李宗仁做了释放政治犯之表示,重庆人民亦纷纷要求释放囚禁于中美所集中营之杨将军。毛人凤即赴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不但坚决表示不准释放,还命毛人凤将杨将军由重庆中美所秘密移禁贵阳。

西南特区接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即由徐远举、周养浩、侯桢祥前往杨家山,请杨将军作离渝准备。杨将军对此极表愤怒,坚决不允迁移。并说:"要死便死在这里,我又不是小孩,任你们迁来迁去。"后经再三胁迫,杨将军才要求将监禁于白公馆之秘书宋绮云夫妇与副官阎继明、勤务张醒民,一同偕行。越日,徐远举洽妥专机,由周养浩、龚国彦等押解,秘密飞往贵阳,囚禁于黔灵山戴笠的住宅。由八十九军刘伯龙及驻贵阳的宪兵分别派兵担任外围警卫,对杨将军的监守更为严密。4月间,毛人凤又选派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鹄前往接替龚国彦,加强看管。

1949年8月下旬,毛人凤来渝,在枣子岚垭漱庐何龙庆住宅,召集徐远举、周养浩会谈,传达蒋介石杀害杨将军及其家属、随从的命令。并商讨杀害办法,决定将杨

将军及其家属、随从由贵阳提回中美所执行。毛人凤当场委托周养浩负责，由周前往提解。这次会谈进行了约半小时。徐远举离去后，毛人凤即嘱周养浩先从看守白公馆的特务中挑选有经验之行动员，准备屠杀。并询问："除用枪外，还有什么办法？"周养浩返家后，转知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约行动员三人来晤。杨进兴表示除用枪外，还可以用刀，其余两人感到用刀无把握。杨进兴于第二日上午，又约同西南特区行动组副组长熊祥再度来晤，熊表示用刀屠杀没问题。并说："这件事我和杨进兴可以负责。"当日下午，周养浩即向毛人凤报告了与杨进兴、熊祥两人洽谈的经过及赴贵阳的日期。毛人凤当即指示周养浩："回来时，须早一天电告，最好在晚上到重庆，我派人过江来接你。此事可密告张鹄，由其挑选可靠队员五六人护送。"

9月1日，周养浩偕同郑文松乘吉甫车一辆，并带卡车两辆，由重庆赴贵阳。

9月2日中午，毛人凤命徐远举带同熊祥等六人到中美所开会，在抵达中美所大礼堂时，毛人凤与杨进兴及白公馆两名看守已在等候。徐等到后即举行会议。会上对布置杀害杨将军等做出了具体的决定。

毛人凤首先指出："屠杀杨虎城等，最好不要用枪，以免有声音。"熊祥表示，他已与杨进兴商量过用利刃，另外还准备了斧头，并当场拿出了带来的匕首。毛人凤问："这行吗？"熊答："有把握。"毛人凤便指示在松林坡戴笠的住宅执行，汽车一到即动手，杀后要毁尸灭迹，把残骸甩到防空洞里。熊等表示，只要汽车到达松林坡停车场，即可由两个人扶架杨将军上山，进入房内，一刀插入胸膛即可毙命。

接着便商量汽车夜间过江的问题，决定由徐远举派人至五区找公路局警稽组长陈粟冬拿"夜间汽车通行证，以便随时用轮渡过江。

会议至此，参加杀害杨将军的行动员当场进行宣誓。誓词大意是："保证完成任务，绝对遵守秘密，如有违反，甘受严重处分。"会议完毕后，熊祥、杨进兴等行动员先行离去。徐远举又向毛人凤提出外围警戒问题，毛说："由我告诉谢旭东（驻中美所交警大队长），叫他这几天对警卫特别留心一点。"接着徐又说："据龚国彦讲，杨虎城的小箱子里存有一些英镑、美钞，这批财产如何处理？"毛答："可以没收，拿来分奖金好了。"

9月6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率领张鹄、郑文松及原在贵阳看守杨将军的六名特务，将杨将军及男（十八岁）女（九岁）两公子、宋绮云夫妇与十二岁的男孩等一行八人，由贵阳押解到距重庆一百三十八公里之东溪。周养浩以天气尚早，便嘱杨将军在该处小憩。自己则偕郑先行，约晚间7时左右抵南岸八公里处。见杨进兴持毛人凤的手令已在该处等候，周乃先行回中美所家中，将郑文松留下，嘱其密告张鹄派一年老可靠的队员，接阎继明、张醒民分开软禁于重庆城内，另候处理，以免妨碍。并嘱，如杨将军对此有怀疑，即一并带往中美所杀害。

杨将军等所乘卡车于夜间到达海棠溪，张鹄即派特务队队员李谦祥，以先往见毛人凤为名，将阎、张两人分开。

杨将军等六人于深夜11时半始行到达。车抵中美所松林坡后，熊祥、王少山等凶手，即紧随杨将军及杨公子至戴笠住宅右上首之一小屋内。杨将军被凶手对准胸膛猛刺一刀，他惨叫一声："啊唷！天啊！！"又被凶手向要害处连连刺入数刀，倒于地上。同时，杨公子将所携行李刚放置于左边房内，也被预伏之凶手将利刃插入腰部。他仅大叫一声"爸爸"，倒地气绝。

宋绮云夫妇及一男孩，与杨将军九岁之女公子，则被安置在戴笠原住宅下方之警卫室内。凶手以同样的方法先杀了宋夫妇，两小孩见状大骇，惊极狂呼，旋亦同遭惨杀。将杨将军等人杀害后，张鹄即帮同特务队队员江利田等掘坑，将尸体匆匆掩埋，前后约一小时半即告竣事。事后由郑文松用电话向周养浩报告："事已完成。"

杨将军的遗物，当夜由张鹄、郑文松会同清点查封。清点结果，仅得美金十余元，小英镑二十余枚，金牌、金戒指各一，由张鹄于9日上午送交周养浩。周即将连同所没收之财物拿去，于下午向毛人凤复命。

9月10日，毛人凤向屠杀杨将军等之"有功"人员，颁发奖金一批，周养浩与熊祥、王少山、杨进兴等凶手各得银元二百元，张鹄一百五十元，江利田、李谦祥等特务队队员各五十元，司机、助手等五人共一百元。

由李谦祥骗往重庆之阎继明、张醒民两人，9月8日移禁于渣滓洞看守所，"一一·二七"惨案中，同被屠杀。

（选自《血手染红岩》作者：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徐远举）

西安事变前后的王以哲将军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可谓妇孺皆知，而曾在西安事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王以哲将军，有些读者也许还不甚知之。

王以哲（1896—1937），字鼎芳，生于吉林省宾县（今属黑龙江省）。1913年入吉林旧制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1921年夏投入奉军。后由排长逐级升至军长。

1934年初，张学良应蒋介石召唤回国就任"剿匪"副总司令。王以哲时任东北军第67军军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该军被调往豫皖鄂"剿匪"。王以哲不愿打内战，力图保存实力以便收复东北失地。是年底，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王以哲所部奉命入陕追堵。次年10月间，第67军

在陕北连续遭到红军歼灭性打击，先后损失第 110 师及第 107 师之第 619 团。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还下令取消第 110 师番号。王以哲受到严重打击后，决心脱离内战，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1936 年 1 月中旬，红军放回东北军第 619 团团长高福源，并让其带回中共中央争取东北军抗战、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息。王以哲立即接见高福源，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密电因"剿共"失利而苦于无计可施，到处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张学良，称："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58 页)张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亲自驾飞机飞抵洛川。

张学良、王以哲与高福源经过畅谈，张学良一方面令高速回陕北，另一方面指定由王以哲负责与红军方面联系，协商双方谈判的时间、地点等。1936 年 2 月 25 日，王以哲代表张学良与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李克农，进行东北军和红军间的首次谈判。王以哲和李克农就第 67 军与红军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经过几天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战、互助的口头协议。

随后，王以哲积极筹划安排张学良与中共方面的会谈。3 月 3 日，张学良在第 67 军军部与李克农进行会谈。4 月 9 日，又在延安与周恩来进行会谈。这些会谈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期间，王以哲曾令第 67 军军械处长范长庚由洛川拨给红军"七九"步枪 2500 支，后又由西安拨给红军"七九"子弹 6 万发及子弹带若干个。

同年 11 月，红军主力发起山城堡战役，王以哲为"配合红军行动"，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与彭德怀天天函电交驰。把其所部及胡宗南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通报给彭，并按彭的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帮助红军赢得时间。当胡部被围于山城堡时，胡曾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电，然而任凭怎么呼叫，第 67 军电台均不予回答。

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在做好"围剿"陕北红军的部署后，携卫队由洛阳抵西安，设行营于临潼华清池，坐镇"督剿"，胁迫东北军和西北军进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共抗日决心已定，在蒋到达西安后，向他诤谏，要求停止内战，率领全国军民抗战。

12 月 9 日是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和学联的领导下，举行游行请愿大会，蒋介石闻讯，竟然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说服学生回去，并保证："三、五日内有事实表现答复你们"。晚上张学良即找来王以哲商议扣蒋事宜，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10 日上午，王以哲参加讨论扣蒋行动计划的会议。11 日晚又参加张学良给东北军捉蒋部队下达命令的会议。12 月 12 日早晨，蒋介石及其随从在西安被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爆发后，王以哲积极协助张学良和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防止新的内战发生，推动全国联合抗日。12 月 14 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王以哲是参谋团主要成员。12 月 17 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要员会组织援绥军第一军团，王以哲出任副军团长，准备北上援绥抗战。

12 月 25 日，经过多方面的谈判协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在被扣 14 天后安全返抵南京。就在西安事变沿着和平的前途发展的时候，张学良送蒋至南京被扣，使事变以悲剧告终。

张学良被扣，王以哲成了西安东北军的实际代言人。王以哲等根据张学良的电文，26 日首先撤销对陈诚等的监视，恢复了他们的自由。27 日早晨就把被扣的南京政府军政领导人员先放回南京。31 日又放回了 70 多架战斗机及 500 名空勤人员。然而，蒋在达到南京后，又使出其惯用伎俩，一面调集 30 多个师进入潼关，摆出要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火并的架势；一面又指使早已失势的国民党老军官李烈钧为审判长，判处张学良 10 年徒刑，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回西安，蒋非但坚持不放，反而令中央军步步西进，企图以武力迫使东北军就范。在此危急时刻，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一派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避免与中央军相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而后要求释放张将军。另一派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则主张要蒋介石先放人回来，然后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少壮派做了大量耐心的说服工作，但两种意见仍相持不下，始终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矛盾日益激化。

1937 年 1 月 29 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 40 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尽管两派意见分歧很大，但会议最终形成"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坚持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当时王以哲的全权代表也在决议案上签字。但是，王以哲等高级将领实际上是主和的，而少壮派则不断鼓动，主张要坚决贯彻"决议"。在这种情况下，王以哲提出接于学忠来西安做主，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前手谕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少壮派也同意这种办法，并认为他对张是忠诚的。

1 月 31 日晚，由杨虎诚召集东北军、第 17 路军、红军"三位一体"高级会议在王以哲家中进行。三方五位代表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会议作出"和平撤退"的决议。2 月 1 日上午，由于学忠在新城大楼

主持会议，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会议关于撤兵的决定。结果会上众人痛哭流涕坚持要求请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无言以对。同时，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起草撤退命令。

当时，东北军中有一些人以为于、王、何等人不愿执行“渭南决议”，不要求副司令回来而先撤兵，副司令回来的希望就渺茫了。尤其是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于是，少壮派在2月2日上午让警卫营长孙铭九派连长于文俊，去执行杀王　何任务。随即于文俊带领20多名荷枪实弹士兵，直奔王以哲家，王以哲被枪杀于病床上。这就是东北军历史上有名的“双二事件”或称“杀王事件”。王以哲遇难时，年仅41岁。

噩耗传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率领红军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王宅吊唁。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给关克仁及第67军各级军官发出唁电，云：“王鼎芳军长兄遇难，不胜惊悼。王军长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职，苏区军民同声悼惜。”(《西安事变纪实》第201页)。另外，中共中央还特送丧仪费2000元。

王以哲将军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永垂史册。

(选自《军事历史》92年1期，作者：何仁学)

令蒋介石惊惧的“双十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丢尽了领袖体面，而且在从临潼华清池翻墙出逃中跌伤腰骨，事后回家乡浙江奉化溪口治疗休养三个多月。因此，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来说，是个灰暗的日子。一提到这个日子，他就怒形于色。

西安事变后，在蒋的历史上又有两件断肠落魄的事，也发生在12月12日。

1939年12月12日，6架侵华日机轰炸奉化溪口，目标对准蒋介石的祖居“丰镐房”和别墅“文昌阁”。在这次轰炸事件中，蒋的发妻毛福梅身亡，其心爱的住处“文昌阁”也被夷为平地。当蒋得悉毛福梅罹难时，黯然神伤，掷笔于地，停止办公。作为毛氏亲生的蒋经国，从江西赣州星夜驰归奔丧，手书“以血洗血”，以表示愤慨。

1949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的日子。这天下午2时，蒋介石从成都中央军校黄埔楼驰车到凤凰山机场，仓皇登上“美龄号”专机，黯然垂泪而去。从此他一直没有再踏上大陆的土地。这个日子，在蒋的记忆里恐是最痛苦的了。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抗日的歌手——《五月的鲜花》作曲者阎述诗

“卅年辛苦育英才堪为师表、《五月》歌声鼓斗志永留人间”。这是镌刻在阎述诗先生墓碑上的联句，它是阎先生爱祖国、爱人民的一生写照。

阎述诗，原名阎绍璩，1905年3月28日生于沈阳市小河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兄姊妹都是当时著名的教师和音乐爱好者。由于家庭的熏陶，阎青年时代即表现出卓越的音乐天赋与艺术才能。23岁时，亲自作曲，编剧，主演，指挥，成为奉天业余谐和音乐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闻名遐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述诗被迫离开沈阳去北平，到当时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法学院任职。著名的《五月的鲜花》歌曲，就是在这个时期谱写出来的。

《五月的鲜花》谱于1935年“12·9”运动之后。12月12日傍晚，学生的游行队伍在宣武门外被解散，学生许多人负伤，伤势较重的有13人。当时阎是东大的训育导师，目睹此情此景，脑海中留下了血的痕迹。这时一位同学拿了光未然写的《五月的鲜花》一词求阎谱曲，词的内容激发了阎的感情并引起共鸣，遂即兴创作，谱和词的情感很协调。《五月的鲜花》一经问世，便冲出东北大学校门，迅速地传遍了祖国大地，广为传唱。直至今天，仍不失其光辉。

阎述诗博学多才，但他不追求功名利禄，毅然选择了教师这平凡的职业，表现了他坚持清白气节的志向。他的岳父母曾在张家口对外交涉署为他联系好工作，指望他从此步入政界，飞黄腾达。但他只干了几个月，因看不惯那种官场，便弃官而归。“九·一八”事变后，他针对少数反动文人、作曲家，美化日本侵略者，麻痹民族意识的“靡靡之音”而创作许多爱憎分明的进步歌曲和歌剧，有力地抨击了日本侵略者，激发了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阎述诗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音乐家，而且也是独具匠心的教育家，是北京市首批特级教师，1960年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

阎述诗先生跨越了黑暗与光明两个时代，不仅以其学识和才华在艺术和科学两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更以其谦逊质朴、高尚的人格感染和激励着人们。

(选自《党史纵横》90年4期，作者：卢素芳、马文忠)

七人之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许，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伙同法租界捕房把我从家中逮捕。我到法院以后，知道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我同时被捕。随后，我们七人被移解到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我们当时把这次事件叫“七人之狱”。我曾写了一本书叫《七人之狱》，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社会上的各界人士称我们为“七君子”，历史上这个事件也就被称作“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为什么逮捕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救国会的领导人，积极倡导抗日救国，批评国民党的投降内战政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企图独霸全中国。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一再屈膝退让，对内加紧“围剿”红军和镇压工农运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二月，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出现高潮。此时，我们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和民众，建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界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在此基础上，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先后建立了各种救亡团体。是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一日，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七十多位代表会聚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我们七人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十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全救”发表了成立大会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出版《救亡情报》。我们在宣言和政治纲领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在于灭亡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几年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证明，“中华民族有力量反抗一切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我们呼吁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不咎既往，派代表举行谈判，制定正式的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我们指出，全国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当局。其“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

“全救”成立以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七月十五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我们派出代表与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各地实力派联系，推动他们抗日。我们利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鲁迅先生逝世等日子，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和集会。绥远抗战时，我们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全力援助绥远抗敌部队，并组织募捐活动。在上海，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这一天，有三百多个宣传队两千多人上街进行募捐。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时，我们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支持工人的反日斗争，等等。

正是由于“全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救国运动，因此，国民党对我们十分恼恨。最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将我们七人逮捕，妄图置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死地，扑灭抗日救国运动的烈火。

然而事与愿违。

国民党逮捕我们时，打的是秘密逮捕，解往南京，军法关押的如意算盘。但是，“全救”立即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将此事公诸于世。消息公布以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营救运动。国内外各界人士和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声明、举行集会、或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北平文化界李达、许德珩、齐燕铭等一百多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对此事件表示惊异，要求即日完全开释。宋庆龄以“全救”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也致电蒋介石，表示营救。张学良在洛阳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我们。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杨虎城发表的八大主张之一，便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兰也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迅速恢复我们的自由。

我们被移解到江苏高等法院以后，法院对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侦查，以确定我们的“罪行”。这期间提审了我们五次。对于司法当局强加给我们的罪状，我们却都给予有力的驳斥。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曾准备杀害我们，由于畏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国民党内冯玉祥等人的坚决反对，我们才免遭毒手。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侦查期满。四月四日，检查官给我们送来《起诉书》，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的罪名，对我们提起公诉。我们宣传抗日救国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一致的。孙中山曾说：三民主义即爱国主义。如果说我们宣传与卖国投降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倒是事实。

接到《公诉书》以后，我们每人聘请了三位知名律师，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大辩护团，这在中国政法史上是空前的；起草了长达两万言的《答辩状》，逐条驳斥了《公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我们严正指出："以被告等之爱国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我们坚决要求法院判决无罪，以雪冤狱。

与提起公诉相配合，国民党对我们进行诱降。蒋介石从庐山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出面进行"调停"。说什么只要我们发表声明，并到反省院办理手续，即可免于起诉，获得自由。我们郑重指出："钧等对本案态度，始终坚守不妨碍救国运动及不侮辱个人人格之原则，为救国无罪而努力，诚以个人受屈事小，国家前途及民族气节事大也。"揭露和拒绝了国民党的诱降阴谋。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和二十五日，法院两次开庭对我们进行审判。这两天都是阴雨连绵，间有骤雨。苍天好像也在为我们救国受罪而表示悲愤。那两天，法院内外，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感到十分可笑。本来法院宣布是公审。但是，临时又改为停止公开，不许旁听。全国各地及当地前来旁听的人被拒之门外，甚至家属也不许进入法庭。这种作法引起人们的公愤。我们表示抗议："不许旁听这叫什么公审？必须坚持公审，如不公审，我们即不发言"。法院被迫允许家属和新闻记者旁听。

我们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救国，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我们的诬蔑，把法庭变成讲台，把司法当局对我们的审判变成我们对司法当局的审判。

审判长问："你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

李公朴答："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过的话，别人都不能说；共产党说抗日，别人就不能说抗日。国难如此危急，共产党既然愿意抗日，我们当然欢迎。"

审判长问："你知道你被共产党利用吗？"

沈钧儒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章乃器答："四万万人都要抗日，我相信审判长也主张抗日吧，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吗？"

审判长问："你是不是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

章乃器答："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本领！我要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好了。"

审判长问："你为什么要援助罢工？"

王造时答："因为工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们才援助他们。我们不但自己援助，而且希望当局对在日本压迫下的工人也应该加以援助。他们虽是日本工厂的工人，但到底是国家的公民，是我们的同胞。"

审判长问："西安事变你知道吗？"

章乃器答："审判长可以凭常识判断，那时我们正被押在看守所里，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呢？"

审判长以我们打电报给张学良为依据，胡说我们勾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我指出："我们不但打电报给张学良，同时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请他们出兵援绥抗日。因为张学良是东北人，他应该去收复失地。"

邹韬奋说："这个电报的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同样性质的电报打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

检查官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的电报未引起事变。"

史良反问："比方一个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查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吗？"

我们的律师也都据理为我们辩护，驳斥司法当局对我们的诬蔑，一致要求法庭拿出确凿的罪证来。

审判长和检查官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审判没法进行下去。第二审以后，法庭只好宣布暂停审判。审判以我们的胜利，审判者的失败而结束。

国民党对我们提起公诉并开庭审判以后，营救运动更为广泛深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沈、章诸氏起诉宣言》，抗议国民党制造"此爱国有罪的冤狱"。宋庆龄、何香凝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表示如果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等十二人还携带行装前往苏州，要求法院将她们收押，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上海市签名要求入狱的达万余人。全国各地的救国会、进步团体和各界人士也纷纷举行集会、示威、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国民党撤回起诉，停止审判，无罪释放。

在我们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声援下，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宣布：停止羁押，具保释放。我们在非法拘押七个多月以后，胜利出狱，重新投入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中。

我们出狱，在当时还只是停止羁押，交保释放的性质。爱国是否有罪一案，并没有了结。国民党这样做，一方面是遮面子，更重要的是故意留下一个尾巴，待机继续对我们进行迫害。直到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蒋介石上了峨

嵋山后，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出面宣布撤回起诉。这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事。至此，七人之狱一案才作了司法上的了结。

爱国无罪已由历史作出了结论，爱国无罪获得彻底胜利。

（选自《纵横》83年1期，作者：沙千里）

苏州狱中探望七君子

1936年10月22日，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与蔡元培先生共同主持了鲁迅葬仪。20天后，11月12日，上海各界举行孙中山先生七十诞辰纪念会。正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斗争的上海日本商纱厂的罢工工人到会呼吁支援，沈钧儒当场带头响应，发起组织"罢工后援会"，募款救济慰问。不料纪念会后第十天，沈先生和全国救国会的另六位领导者邹韬奋等，突然全被反动当局逮捕。这便是震惊全国以至国际的"七君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宋庆龄同志随即对这一暴行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世界著名学者爱因斯坦和杜威等也相继发电要求释放"七君子"。事件后二十天，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事变在宣言中强硬要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引起全国响应。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夜。

当时，沈先生原是上海法学院的教导长，我正在这里读政治经济系。几年来，本校好多师生常随同沈先生从事抗日救亡和社会正义事业。沈先生被捕后，本校师生即配合各界爱国人士及进步团体进行营救和慰问。"七君子"于12月初被反动政府从上海移押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四个月过去了，法院还没有正式开审，并且还宣告停止接见。

第二年3月29日（农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正是群众春游时节，我们法学院院长、辛亥革命老人褚辅成（慧僧）先生和著名学者、本院教授潘震亚、潘大逵、孙怀仁，张耀曾、周新民等，以及学生代表共约三十人，以集体春游名义往苏州狱中探望"七君子"。通过私人关系和事先接洽，我们一到苏州，午饭后即由法院两个官员陪同进入了看守所。

"七君子"中除史良一人独住女房外，沈先生等六人统受"优待"住进刚刚建成而还未启用的一座独立院子"病房"。沈老等早候在院子门口欢迎我们。四个月未见，真如久别重逢，大家立即紧紧握手，亲切慰问，说不尽的想念，院内有一个小天井，一排朝南的三间卧房和一间活动室（会客室），环境宽敞整洁，空气清新。对我们的到来，沈老特别兴奋，他先带领我们细看一间间卧房，每一个人的床铺；随后又邀我们到活动室去饮茶座谈。后来，大家又聚在天井里漫谈。

这里的生活有组织、有规律。王造时介绍说，沈老是这里的"家长"，章乃器是"事务部长"，李公朴是"体育部长"，沙千里是"卫生部长"，邹韬奋是"监督部长"。他还幽默地说："这里人口不多，人人有职业，而且都是达官。"沙千里说："我们是这里的第一批病号。"李公朴插说："不，我们都是寓公。"众人听了都不禁大笑。他们六人各有所喜和所长，或写作，或读书，或学字，或练拳，或打球。邹韬奋潜心写作，积稿已十多万字。沈老擅长书法和作诗，远近识与不识者都向他求字，应接不暇。他入狱前的抗日诗歌，早已被人传诵，入狱后写作更多。墙上正挂着昨天写成的条幅，录的是挽辛亥革命前至北伐战争的老同事、金华王廷扬的七律诗两首。我最爱他的《自由》一首，呼号强烈，撼人心魄："天地一桎梏，万物皆戈矛。……吾欲披发请缨复大仇，不饮黄龙誓不休！呜呼，此境只向梦中求，唯有梦魂能自由！"我随手抄录了好几首，归来后都给报纸发表了。沈老还拿给我们看他前一天写成的文稿，两千余字，是记述来苏州后的生活的。文后有邹韬奋的两段附记，说："一人的安危就是七人的安危，……同患难，共安危，这种同舟共济的意义，推之国家民族与全国，便是团结御侮的精神。"我急忙又把这些话摘录下来。

我们带了照相机来，沈老也叫沙千里拿出自备的照相机，拍了好几张合照，他们六人又各拍了单人照，要我们带出去分赠亲友。六人那天都穿着新鞋子，说是为了迎接客人。李公朴身穿麂皮运动衫，跳来跳去，一派运动员的神气。他留着长胡子，相貌很象南京政府搞国术运动的褚民谊。沙千里穿着不显眼的长袍，相貌清秀，象个拘谨的旧式书生。邹韬奋穿灰色羊毛衫，戴眼镜，貌似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章乃器身材魁梧，前额特大而半秃，有些象墨索里尼。沈老的样子，我感觉有些象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的莱奋生。两人在自己的同伴中身材都较短小，都留着三角胡子；论地位与处境也相似，一个是敌人围困中的游击队长，一个是囚禁中的救国会首脑，两人都受同伴的尊敬。

到了两点多钟，我们告辞了，沈老等送出院门，李公朴拿出口琴吹着《毕业歌》相送。我们边走边回头挥手，沈老他们还依依地站在门口。一路出来，我脑子里久久回响着《毕业歌》的歌词："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史良另外住在女看守人员的宿舍里，一个老年女看守陪她同住一间。房间宽敞，有简单的家具。褚辅成、潘震亚、潘大逵等老师带领我们进去亲切地慰问她。我们细听她的谈话。她在这里不象沈老那边热闹，但不少看守人员看重她，同情她。她可以给一些女犯作法理上的解答和文字上的帮助。桌上有一叠新写的文稿，她说正在作犯罪统计，调查研究犯罪原因，对犯罪学有新的心得。书架上有

很多社会科学书籍。史良原是上海的红律师，二十年代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她对褚先生等老师一直很尊敬；在监狱里，她也能经常同沈老那边取得联系。

"七君子"甘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虽被囚禁，抗争不息，绝无畏惧。他们还借机会向访问者和外界发表谈话和文字。我们刚跨出看守所大门，即有人赶送来几十本小册子，印的是原载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的王造时特约稿《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重视。反动当局只能囚禁抗日救国运动领袖的身体，却不能关锁住他们的正义呼声，割不断他们同爱国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也一直密切关注"七君子"的情况。我探望回来后，即连夜赶写了详细的报道，4月初全文在上海《大晚报》以第一版和第三版的显著地位发表了，读者争相购阅；此文还很快地被开明书店的大型杂志《月报》所摘录。

（选自《纵横》87年3期，作者：胡今虚）

宋庆龄曾安排护送陈云赴苏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她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由于当时许多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没有文字记录，因而一些重要史实一直未被人们所了解。以下这件事就是其中一例。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为了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同时为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在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即1935年五、六月间，派遣陈云等人赴苏。陈云途经上海时，曾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帮助和掩护。

当时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常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有：王明、吴玉章、康生、蔡和森、滕代远等人。另有一部分是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陈潭秋、杨之华等。另外就是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后两批人员都是途经上海再赴苏联的。据马海德回忆："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两位客人到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宋庆龄当时没有把两人的身份告诉马海德，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位重要人物中的一名就是陈云同志。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泊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到：陈云"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便动身。他在上海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安排他坐船去海参崴。1935年8月5日，陈云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参崴。"

（摘自《上海党史》1991年3期，刘复昌文章）

舍身忘死救红军

董道泉又名董源彰，东北军将领。本文所讲的就是这位年轻的爱国将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抗日救国大业，掩护红二方面军突围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事迹。

董道泉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始于1932年。那时，董道泉任东北军骑兵第2师参谋长。在师内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澜波对他影响很大。1935年东北军开入西北地区后，董道泉率骑兵第16团驻甘肃省固原县七营（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隔河对峙。在刘澜波的帮助下，具有满腔爱国热情的董道泉非常赞同中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与对岸的红军关系很好，曾在购买军需物资和军事情报方面为红军提供了一些帮助。后来，董道泉还主动要求刘澜波派共产党员到他所在的团工作。不久，中共党员宋任远前往第16团。宋任远的到来对于促进骑兵第16团广大官兵理解和接受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起了积极的作用。董道泉非常尊重宋任远，一直按中共的意图指挥部队。

1936年9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率军围歼长征到达陇东不久的红二方面军。胡宗南立即部署所部迅速行动。董道泉在接到要骑兵第16团向南调动"剿共"的命令后，十分焦急。他一面派人将"剿共"计划秘密送给河对岸的红一方面军，一面在部队出发前派人找到刘澜波，询问骑兵第16团如在战场上与红军相遇怎么办？刘澜波当即回答说：不打，把队伍拉到红军那边去。后来董道泉忠实地执行了刘澜波的这一指示。

在骑兵第16团奉命进入阵地、对红军发起进攻的头一天晚上，董道泉与宋任远一起研究对策，决定由宋任远立即去红二方面军报告国民党军此次围歼红二方面军的作战部署，以商定突围办法，董道泉则率全团人马等候宋任远回来后视情况行动。

宋任远乘马连夜找到红二方面军指挥部，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等，他说明来意并交出胡宗南部围歼红军计划的机密资料。任弼时果断作出了红二方面军从骑兵第16团阵地突围的决定。在确定了红二方面军与骑兵第16团进行接触时的联络暗号后，宋任远连夜返回骑兵第16团的驻地。

次日晨，红二方面军顺利地通过骑兵第16团的阵地，冲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董道泉的积极参与和帮助之下，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计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同时，为掩人耳目、制造努力参与围歼红军的假象，董道泉率骑兵第16团向预定阵地出发，接着又向三岔方向前进。不料与前来接应红二方面军突围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遭遇。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立即向骑兵第16团开火并包围过来。在这紧急时刻，经董道泉与宋任远及部下几个军官商量后，决定全团官兵一枪不发，缴出枪马，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官兵不知实情，遂押送董道泉部全团人马进入苏区。直到见到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方弄明白是发生了一场误会。

为团结张学良将军一道抗日救国，做好对东北军广大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董道泉遵中共方面的意图，置个人安全于不顾，在红军的秘密护送下，率骑兵第16团全团原有人马枪械返回东北军。

时因围歼红二方面军计划的破产，令胡宗南十分气恼。为推卸责任，他向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匪"总部任参谋长的晏道刚密报，称东北军骑兵第16团参与"围剿"红军时，不战即向红军投降，现又整装返回，足见通敌证据确凿。他请求对骑兵第16团团长董道泉严厉查办。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电令张学良严办此案。张学良为保董道泉，遂回电蒋介石，称董团是被红军所击溃，并无投红军之事。但蒋介石从国民党空军那里得到航空侦察拍摄的有关照片，认为董团人马齐全，队形整齐，决非战败的样子。于是电令重审严办，并要张学良将董道泉押赴南京审判。

张学良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逮捕了董道泉，并忍痛下令将他处决。董道泉牺牲之前，曾托人转告刘澜波等，说他死得值，死而无憾。

（作者：赵东阜，选自《军事历史》94年5期）

传奇式反蒋人物——王亚樵

王亚樵是20年代、30年代政治风云的产物。跟蒋介石对立的各派政治力量，或采取逼宫方式，或兵戎相见，逼蒋下台。王亚樵则致力于采取暗杀的手段对待蒋介石，这在他看来，是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最干脆最有效的方式。他收徒弟，扩充实力，自成系统，自立帮派，从反蒋派那里接受经济后援，支持革命活动和抗日救国斗争，一切的活动都旨在推翻蒋介石政权。他曾自信地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殊途同归，我们只是手段不同，但目的一致"。他的路没有走通。

他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复杂多变令人惊心动魄的49个年头。

上海滩上的流浪汉

王亚樵出生于晚清，饱经忧患，养成一种发奋图强的刚烈性格。自幼崇拜文天祥，为《正气歌》所倾倒。年过弱冠，就发起组织正气学社，和柏烈武结识。

英雄起于草莽。辛亥革命义旗一举，王亚樵揭竿而起响应武昌首义，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告独立。但是没有多久，他们这一伙革命志士，就被争夺权势另立门户的一群政客打下去了。王亚樵的战友被枪杀，王亚樵本人因工作在外，得以亡命南京。

王亚樵被一脚踢出革命队伍后，正好被正在招兵买马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看中，一手拉过去。王亚樵成为安徽社会党的组织者，他相信这个党的吹得好听的纲领，从不怀疑它的党魁却是一个大骗子。他到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在全椒、巢县、安庆、芜湖等地组织支部。听了他的鼓动后加入社会党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的卧稻草、吃残饭的艰苦生活，也获得人们的赞赏。王亚樵把总支部设在合肥，大张旗鼓地搞起来，这座城市自从王亚樵卷土重来后，闹得天翻地覆。继柏烈武而后任安徽都督的倪嗣冲，当然不会容忍，随即下令通缉，王亚樵又亡命上海。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流亡在上海的王亚樵，白天出卖苦力，晚上露宿在马路上，覆盖几张报纸就过夜了。他感到迷惘，但他继续在寻找出路。他结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钻研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奠定他一生事业的思想基础的，正是流浪在上海滩的这一时期。

四年后，他以国民党员身份，向孙中山先生上书，建议用非常手段杀死段祺瑞。可以看出，他渴望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但是，高瞻远瞩的孙中山，却给他当头泼一盆冷水，批驳道：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

首战告捷

王亚樵是从自己的亲身经验出发来理解、探索政治斗争的方式的。他跟随老国民党员韩恢反对霸占江苏的军阀李纯，在苏、皖组织军事行动。还未及出手，李纯先发制人，颁布通缉令，韩恢被捕死难，王亚樵逃回安徽老家。安徽都督张文生，是一个鱼肉人民的省长，对安徽人民实行军阀专政，搜刮钱财。正在避难的王亚樵又一跃而起，鼓动老百姓反对张文生。他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提倡

民权革命，以民权促进会的名义，登高一呼，提出军政分治的主张。张文生心怀鬼胎，害怕明枪交战，密令副官暗中捕杀，谁知这个副官却把张文生的密谋告诉王亚樵，王亚樵只能离皖，再奔上海。王亚樵认为九九归原，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回敬政敌，铲除害人的军阀、官僚。

曹锟、吴佩孚贿选当政后，反对曹锟、吴佩孚成为国民党战略的中心课题。王亚樵遵照国民党的总体战略，向浙江都督卢永祥说项出兵讨伐曹、吴。卢永祥打的主意是首先要击溃江苏都督齐燮元，而攻打齐燮元的前提，是把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除掉。

徐国梁手里有7000名警察，在齐燮元系统里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亚樵对徐国梁的生活规律摸得一清二楚，徐国梁每天下午要到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王亚樵把枪手布置在浴室门口附近。一辆豪华汽车果然送徐国梁来到。徐缓步走进浴室，把繁杂事务都抛诸脑后，舒舒服服地泡在单人浴盆里。他暄赫一时，不知道死神已经降临，因此他没有任何防御的准备。他轻松地跑出浴室大门，整一整衣服的领子，举步登车。王亚樵的两名枪手，突然拔枪袭击，徐国梁倒地，只拖延了几个时辰，就一命呜呼。

这是王亚樵从事暗杀活动的首次行动，旗开得胜。卢永祥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在湖州盘马练兵。戴笠当时在王亚樵麾下任中队长，戴以王为师，对王执礼甚恭。

齐、卢交战，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卢永祥战败，王亚樵、戴笠去广东。适黄埔军校招收六期生，王亚樵把戴引进黄埔军校学习。

“四·一二”成为分界线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亚樵被委为安徽副宣慰使，并跟随革命势力的推进进入上海市，在工人中间培植他个人的力量。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到南京组府，“四·一二”前，蒋介石蓄谋进行大屠杀，镇肃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而王亚樵，却是蒋介石所拉拢的对象，蒋介石已经得到情报，王亚樵在工人中的势力已不可小看，他振臂一呼，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跟着跑的。

蒋介石的第一个安排，是请他到南京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不愿干，是因为他志在四方。蒋介石第二个安排，是请他到南京组织劳工总会。搞一个劳工的领导机构，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被骗到南京来了。

王亚樵当然不知道蒋介石的用心，正好在南京安徽会馆碰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华克之，他向王亚樵点明：蒋介石请你来组织劳工总会，是“对于共产党和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大开杀戒，大势已定，无可挽回，你准备和他遗臭万年吗？”王亚樵弄明白后，掉头就走，从此不和蒋介石见面。

“不为我用，则为仇敌。”蒋介石密令南京警察机关逮捕王亚樵。王亚樵脱逃，奔走于各反蒋实力派之间。1929年，他鼓动方振武、石友三联兵倒蒋，事泄，致方振武被扣，余立奎被俘，王亚樵因未抛头露面没有引起注意。1930年前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同时还需对付西南反蒋派，为扩军备战，在全国试行“米照捐”，增补财政收入。由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串连组成的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并派出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等地请愿，发动安庆和长江沿岸米商罢市，粮运停止。蒋介石被迫由行政院下令撤销“米照捐”。后来查明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后，即下令查封，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北站刺宋

宋子文在他当财政部长期间，通过发行债券把上海银行界和蒋介石政权绑在一辆战车上，巩固了蒋政权的统治。同时，致力于排挤太子孙科掌握实权。适时反蒋派意在除宋，以去掉蒋之左右手。王亚樵又被推上前线。

1931年7月23日，布置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侦察到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洽谈借款，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

王亚樵派出8名行动队员前往北火车站，派出10多人把守站外，接应撤退。

24日上午，宋子文的专车到站，随员、卫士簇拥下车，走进北站大楼。宋子文和他的秘书唐腴庐都穿白哔叽西装，头戴白拿破伦帽，一前一后，面貌高矮乍看区别不大。等候在南首第二、第三柱旁的狙击手，开枪射击，唐腴庐被击毙，宋子文臀部中一弹，卫士还击，但接应人员几枚烟幕弹一打，一时烟雾弥漫，全部人员安全撤退。

由于手枪的火力不足，宋子文屁股上一颗子弹拿出来就没事了。

尽管除宋之举没有成功，但此举使王亚樵的名声大震。所有参与的人都受到反蒋派的犒赏。

参与策划暗杀宋子文的余立奎，为躲避戴笠的追缉，化装潜往福州，投奔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不久，被戴笠侦知，蒋介石急电蒋光鼐把余立奎押解南京。蒋光鼐让余立奎离开福州去香港。

王亚樵在上海、香港都有他的潜势力，上海有几万徒众，他的行踪倏忽，神出鬼没，前门进，后门出，连他的汽车司机都不知道。军统特务不易掌握他的动向，刚刚得到的线索马上就会中断，他们碰到一个厉害的对手。

把印刷厂送给共产党

王亚樵看过马列主义的书，看过无政府主义的书，但更多的倾向无政府主义，他不相信神与国家，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认为和共产党同一目的，因而把共产党人看成朋友。有些共产党人被关着，需请律师辩护，王亚樵也乐意拿出钱来。

1931年底，共产党的《红旗日报》被查封，连英租界的印刷厂都不敢承印《红旗日报》。国民党当局扬言，哪个工厂印《红旗日报》，所有工人都带走扣押。华克之掌握王亚樵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向他说项："九哥（指亚樵，字九光），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亚樵真慷慨，二话不说，就表示愿意拿出一万元钱，不出三天就如数交出。共产党人就利用这笔钱把圣母院路清顺里招顶的印刷厂买下来，照常使被查封的《红旗日报》按期出版。一年后，这个印刷厂又被查封，华克之向王亚樵报信："印刷厂垮了，一二十个工人兄弟被关着。"王亚樵并没有计较这笔损失，他说："革命嘛！就是这样。现在再拿些钱去，把工人兄弟赎出来，并安置好他们的生活。"

王亚樵在上海的潜势力愈来愈大，蒋介石在上海的支柱——杜月笙，告诫他的党羽，碰到王亚樵那伙人，让他三分为上策。因此，有人说王亚樵也是一个有潜势力的流氓。可是，王亚樵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就会生气，他认为自己称得上是革命者，反蒋除暴就是革命。有的朋友编造了一个消息逗他，"毛泽东问起你，向你致敬。"王亚樵听的可乐啦，他碰到至交就拉开话匣子："毛泽东讲致敬我呢！"其实并没有这回事。

"一·二八"中的义举

1932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起而抗战。王亚樵召集部众，宣布全力以赴，支持抗战。

很快，市民、工人、学生被发动起来，组成淞沪抗日义勇军，成立20个大队，3000人马开赴战场。

蒋介石得悉王亚樵担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后，非常恼火，下令解散。王亚樵不得已退居幕后，把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担任司令。

决死军选出一批精干人员，配合十九路军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日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余部奔"出云号"兵舰。"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派出七名水手，把水雷秘密送到"出云号"舰底，一声爆炸，"出云号"中雷受伤。

跟随王亚樵多年的汽车司机王阿毛，一天驾驶云飞汽车行的卡车经过北四川路时，被日军截住，强令装载枪支弹药及作战人员开赴前线。阿毛听从亚樵嘱咐，俟机狙击敌人、汉奸。于是，阿毛在黄浦江边加足马力，把卡车开进黄浦江，让滔滔江水一起吞没，留下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名。

王亚樵平时和朝鲜革命党人常有来往，经常在经济上支援朝鲜革命党人。淞沪战役结束后，日本竟借庆祝天长节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引起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公愤，王亚樵和朝鲜革命党人合谋在虹口公园司令台引爆。捣毁祝捷大会。这次的中心突破很成功，侵华的白川大将见上帝去了。

保蒋和反蒋的生死搏斗

戴笠于1932年4月1日受命成立特务处，隶属军事委员会。戴笠感蒋知遇之恩，向蒋介石表示了牺牲奋斗的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戴笠华恭毕敬对蒋介石说："报告委员长，学生从今天接到命令之日起，这个头就拿下来了。"蒋介石一时摸不着头脑，问戴笠这句话怎么讲？戴笠答道："这个工作做得好，头一定要给敌人杀掉；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戴笠从此卖力为蒋剪除异已，爱国人士被其虐杀者不可胜数。

王要反蒋，戴要保蒋，过去的师生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从此成为死敌。戴笠庆寿，王亚樵从香港捎去一副对联，上联为"湖城盘马称师座"，下联为"白下腾龙叫九哥"。王亚樵提起往事，当然并非仅仅是讥讽戴笠，而是通过这副对联，表明他和戴笠已无任何瓜葛和任何共同的语言。

蒋介石需索王亚樵甚急，戴笠已多次受蒋训斥，志在必得。王亚樵也抱"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想法，除蒋心切。蒋介石上庐山，王亚樵一批人也上庐山。因为戒备森严，过往行人一律要受到搜身，身上不能带枪，因此，把手枪拆成零件，放在金华火腿里面，外用盐泥封口，由王亚樵妻子王亚瑛带上山。后因不得近身，刺蒋行动，未能实现。

戴笠深感不抓到王亚樵，老蒋和中央首脑的安全很受威胁，因此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不惜重金缉拿。

神出鬼没　屡次扑空

王亚樵的头，价值百万，重赏之下，见财起意的知情者告密，王亚樵藏匿于姚主教路刘军长新建公馆内。军统特务会同军警和法捕房共100多人，分乘四辆红卡车开往姚主教路，把刘公馆团团围住，冲进楼上王亚樵的卧室，不见有人，发现被筒里尚有暖气，床上还有一件黑紫羊皮袍。明知王亚樵潜离不久，上上下下到处搜索，都不

见人影。

翌日的报纸大加渲染，王亚樵有非凡的轻功，飞墙走壁，如履平地，军警巡捕，望尘莫及。王亚樵见报，哑然失笑，当时他闻警知变，急奔四楼晒台，正好隔壁新造房有根千斤坠绳索，他抓住绳索乘势滑下去，溜之大吉。

阳春三月，军统侦知王亚樵夫妻俩潜居赫法路赫法里楼上，一辆红卡车急驶赫法里弄口停下，正好王亚樵的妻子亚亚瑛从菜场卖菜回来，见状后不动声色，稳步跨进大楼，告诉王亚樵，前后弄口都有特务把守，眼看就要上楼搜查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王亚樵一点也不慌张，他叫亚瑛穿上他的衣服倚窗眺望，以吸引特务的注意，他自己穿上亚瑛的衣服，扎上头巾，手提菜篮子，他装成娘姨出门，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滑过去了。

负责监视王亚樵的特务，看到王亚樵并未离开窗口，以为逮住他十拿九稳，当他们上楼破门而入时，连人影儿都未发现，卧室内空无一人。

在军统特务的眼里，王亚樵这个人神出鬼没，行踪诡秘，好容易侦知他藏匿的秘密点，等到兴师动众赶去时，王亚樵却先一步跑了，好象他事无就知道军统的追捕行动，从容应付。

其实，王亚樵全靠自己的机智，步步设防，善于金蝉脱壳，才使军警特务屡次扑空，百万赏金，可望而不可即。王亚樵有次暂避到老朋友家，偏偏碰到两个多年不见的熟人，他随即拔出手枪，要大家暂不走动，以免祸起仓卒，待接应的人到达，方可自由行动。少顷，他的胞弟王述樵赶到，把他接引到秘密地点。深夜，再一次转移，王亚樵一身消防员装束，钢盔戴到头上，由一辆救火车送到另一个秘密点。

谈判破裂　招安失败

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在上海挂牌当律师。戴笠捕王亚樵不到，就命令上海军统特务捕王述樵，一个公开挂牌执行公务的律师，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手到擒来。于是，王述樵被押送到市公安局关起来。

上海律师公会为此呈文司法行政部并分函市政府第一特区人民法院，以市公安局蔑视法治、破坏法权提出抗议，要求市公安局把王述樵律师移送法院。

沈钧儒为其学生王述樵的被非法逮捕，登报抗议，指出即使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沈老去看守所探望囚禁中的王述樵，赠以近照，并有亲笔题字："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戴笠捕王述樵，是想通过王述樵把王亚樵拖出来，表面说是双方和解，其实是招降纳叛。然而王述樵回答得很干脆，现在处在囚禁之中，无法和胞兄联系上，如果真想和解，可以找原先在北伐期间做安徽宣慰使的常恒芳，王亚樵当时是副宣慰使，两人交情颇笃。

常恒芳不得不从命把王亚樵找到，谈起戴笠赋于他的使命，是要双方和解，并敦促王亚樵共同保蒋。王亚樵提出两点要求：一、所有我系统被捕的人，一律释放。二、把我的部属解散，遣散费需100万元。如能做到以上两点，则将只身到南京，用则用之，诛则诛之，一切听便。

常恒芳把王亚樵的表态转达给戴笠，戴笠表示对王亚樵所提两点均可同意，但王亚樵必须向西南放一枪，不管是对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等其中任何一个人，一枪就可复命。

谁知王亚樵听后，马上就在常恒芳老友前大发脾气："雨农不是来和解，不是来为党国团结，而是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王亚樵一气之下，拂袖而走。

戴笠无计可施，只是策动王亚樵的老朋友胡抱一出面，在《新闻报》、《申报》上登张招安启事。这张启事扑朔迷离的内容，非局外人所能理解。

胡二问鼎

你究怎办？何去何从，早日决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与你同受罪，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为你关心。

按胡二即胡抱一，鼎即王鼎，亚樵之别名也。对于此招安启事，王亚樵一笑置之，不予理睬。

瞒天过海　留书明志

戴笠捕风捉影，十面埋伏，必欲得而甘心。

王亚樵决定潜离上海，和西南反蒋派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

初拟方案，是乘日本轮船去香港，化名王维新。日本领事馆发动密探，查询王维新其人，名不见经传，因而怀疑到王亚樵，此人和天长节的爆炸案有关，不能放过。日本领事馆告诉替王维新办理保险手续的国民党中委陈中孚，如果真是王亚樵，登上海轮，自投罗网，乃天赐良机，将给陈以重谢。陈中孚对日本人虚与周旋，回过头来嘱王亚樵千万不要乘日本海轮。

王亚樵转而乘英国海轮。军统特务人手一张王亚樵照片，遍布码头，并登轮检查房舱。可是王亚樵一化装，又变成一名码头工人，扛货进入货舱，就潜藏在货舱内了，舱门一上锁，比任何地方都保险。

王亚樵平安抵香港。

上海这边，戴笠收到王亚樵特意在上海留下的一封书信，徒呼奈何，一筹莫展。

书信内容如下：

雨农老弟惠鉴：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杨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捷。一·二八淞沪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书

闽海起事搞肃反

李济深本来就希望王亚樵到香港，共商反蒋抗日大计，看到王亚樵来临，非常高兴。经和各路反蒋人士联络，决定在闽海举事，筹组福建人民政府，打出中华共和国的旗号。

两个巨头，迟疑不前，作壁上观，蒋介石则调集大军，分路进剿起义军。在起义军的最高军事会议上，王亚樵主张采取战略进攻，和蒋光鼐取得一致意见，蔡廷锴却主张防守，彼此争执不决，不欢而散。

王亚樵对已经造就的反蒋局面前途非常忧虑，他对老同盟会员李怀成说："此间是鱼龙混杂，来投奔的有一大批落魄的文人、市侩，其中有共产党的叛徒，有国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从前反共现在转而亲共的，也有潜入的军统、中统分子，因此一召集会议，就冲突无已。此间拼命高喊反蒋抗日的口号，但并不把反蒋抗日的大业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让大众了解，反蒋抗日，原是大众的事情，似乎他们包办得了的。"

王亚樵被请去参加最高会议，这次会议并非讨论战略决策，而是讨论如何处理日本领事馆的严重抗议。连福州城内贴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都受到干涉，甚至用炮舰进行威胁。偏偏总司令部会接受这种抗议，准备查究，并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这对王亚樵来说，一个革命政权如此软弱，是不能想象的。他回到寓所，牢骚满腹，象老夫子吟诗一样连声说："抗日云乎哉！"

即使这样，王亚樵仍然在切切实实地工作，清查潜入福州的军统、中统特务，他在部下已把这些歹徒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李济深打算发枪给王亚樵的部下，叫副官拿他的亲笔批示去总司令部领取手枪，但总部居然不发，李济深下令解下卫队手枪两枝，交给王亚樵使用。当夜，王亚樵的部下，会同公安局逮捕12名南京特务。

蒋介石命令空军轰炸福州城，总司令部及主席府均被击中。闽北卢兴邦、刘和鼎两个师反叛归顺蒋介石。讨伐军长驱直入，三面包围福州城。福州城内，人心浮动。王亚樵知事不可为，只得乘海轮撤离危城。

博浪一击出大力

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政府昙花一现，为期50多天即告失败。起事巨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飞香港。对李、陈、蒋、蔡来讲，反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依然是他们的主题。蒋介石不倒，要东山再起，永无希望。

正好华克之来到香港，和王亚樵谈起一条妙计：充当新闻记者进入中央党部，可以凑近独夫民贼，搞五步流血，蒋的生死就在掌握之中。王亚樵很欣赏华克之的方案，并认为李济深在目前的处境下，五步流血是可以谈的。

王亚樵安排了李济深和华克之的会见，谈妥由李济深从经济上支持这一神圣的事业。对于刺蒋机构晨光通讯社的建立，李济深拿出5000元开办费，由王亚樵转交给华克之。以后总共支持3万多元经费。

当刺蒋之举迟迟未及实现而李济深啧有烦言时，王亚樵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晨光通讯社的支出。华克之的妻子尹彭杰到香港筹款，也只有王亚樵拿出了一笔钱。

1935年11月1日，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他的英雄使命。由于蒋介石没有出场，向汪精卫射击三枪，枪枪命中。翌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特大字体标题：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

孤胆英雄孙凤鸣牺牲了，他的妻子崔正瑶，却愿意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她回到危险之地的上海，给孙凤鸣的战友及其家安排生活。又是王亚樵张罗了1000元交给崔正瑶，并派王仁山护送崔正瑶到上海。

当崔正瑶在新亚酒店被捕后，军统特务刑讯逼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追问王亚樵在哪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便英勇地死去了。

梧州死难

戴笠被蒋介石训斥，如果不把谋刺要犯抓到，就要戴笠提自己的脑袋相见。蒋介石为了汪精卫被刺这件事，也蒙受"不白之冤"，被陈璧君说成是幕后主使者。

戴笠派出干员在海内外缉拿刺汪案要犯，上上下下

抓了近百人，但就是支持刺蒋、汪的王亚樵和指挥博浪一击的华克之没有抓到。

王亚樵在蒋介石的腥风血雨中，仍然是斗志昂杨，参加1936年的两广"六一"反蒋行动，负责锄奸和情报工作。余汉谋倒戈，陈济棠下台，反蒋又告失败，王亚樵仍回香港。

军统特务通过香港当局，会同香港警务人员，撒下天罗地网，并派陈亦川打进王亚樵的团体内部，但仍未得逞。有次，王亚樵及其部下开会。特务跟踪而至，因叩门声音并非暗号，王亚樵等越屋脱险。

"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王亚樵率领随从，出奔对蒋政权保持半独立的广西，居住梧州西江岸一幢房子里，由广西省政府按月支付生活费。王亚樵当时陷于绝境，派余亚农、张献廷前往陕北接头。他困居梧州时曾作诗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

陈亦川奉戴笠命，放一汽油船跟踪到梧州。王亚樵的战友余立奎被捕入狱后，陈亦川利用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救丈夫心切，从余婉君那里骗得有关王亚樵的情况，并要余婉君引路。

1936年12月30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王亚樵21日在梧州大东中街某号后座被刺身死的消息。并称王亚樵身中三枪，被剑剁二刀，这把剑还留在身上。宅主系妇人，由港来梧不久，事发后，留下子女三人及港币银物等，不知去向。据说，这个妇女即余婉君，也被特务杀死在途中。

王亚樵死得很惨，但他一贯反蒋，义无反顾，不失为好汉，只是他在认识上有局限性，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力量对抗蒋介石为首的庞大的统治集团，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失败。

（强剑衷）

一袭裘衣换得十万元

1935年南京政府将青海土著部队编为第一〇〇师，委任马步芳为师长。马想借此机会靠拢南京，与蒋介石拉上关系，他精心组织了一个"献马祝寿代表团"。代表团由五人组成；团长是班禅大师驻南京代表罗堪布，团员有民政厅长谭克敏，第一〇〇师少将顾问（原财政厅长）魏敷滋，青海省各界代表韩海容，以及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委员郭学礼。

1936年的正月，代表团随带几十匹挑选的良马（青海以产良马闻名全国）浩浩荡荡来到南京。先代表马步芳向蒋祝寿，由蒋介石在中山陵的凯歌堂（即现在的美龄宫）接见。寒暄以后，当提到请委员长拨给第一〇〇师军饷时，蒋连说两次"斟酌再看"便起立送客。这个名为献马实为要钱的代表团又去见军政部长何应钦，何的答复冷淡而尖刻。他说中央的钱是用作抗日的，养许多不可靠的军队例如四川的军队有什么用？代表团随后去见财政部长孔祥熙，是由七大护国禅师驻京联合办事处敏珠活佛介绍的。据敏珠说，他的这条门路是用很多狐皮及麝香才打通的。先由秘书长翁文灏代见，翁问青海省一年倒是有多少收入？行政、教育、卫生、军费总共支出多少？刚刚卸任的财政厅长魏敷滋是一清二楚的，但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他明明知道大部分收入都被马步芳侵吞，但他怎能说出口呢！孔祥熙又亲自接见一次，也只说几个"好，好；好，想办法"，便无下文。

这一系列的活动，开汽车的司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看代表团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便主动向代表团献策，去走夫人（指宋美龄）的门路。司机自我介绍说，他本是给夫人开车的，后因故调给班禅大师开车，班禅离开南京，他留在办事处开车，此次临时专给代表团开车。据他介绍凡是馈赠夫人的礼品，都是由夫人的贴身赵副官经手，他和这个侍卫副官赵某人很熟。代表团听到这里，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先备下黑藏羔皮筒数件，以及麝香红花等特产，重重的一份厚礼送给赵副官。然后将一件非常名贵的海龙裘皮大衣由赵副官送给夫人。据司机说夫人很满意，并由赵副官侍候穿在身上，远远的看见夫人（仍在美龄宫的廊下）一面用手抚摸，一面左右侧身自顾，并微笑点头。只隔两天便接到通知："奉委座谕：明日上午10时青海代表韩海容、郭学礼由朱厅长培德代见。"接见时朱的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朱说委座十分关心边疆，只是现在本年度预算已过，只能提交下年度军费预算，因此，一〇〇师的军饷今年仍由地方负担。目前由临时费内先拔10万元，已于昨日电达班禅大师及马步芳师长。这一袭裘衣不但要来10万元巨款，而且为日后马步芳进一步投靠蒋介石大开方便大门。

10万元当时可买8万多担大米。

（赵芸）

马鸿认子案

1936年，天津发生了一桩马鸿认子案，牵涉到抗日将领马占山，一时轰动全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他不顾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率领部队在黑龙江嫩江桥，把日本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之后，他又组织东北救国抗日军。失败后，便定居天津英租界37号路。就在这个时候，马占山的儿子马奎（又名子之）有一天去日租界中原公司参加舞会，在舞场上狂欢之际，突然被人绑架了。第二天，通知马占山付100万元赎票。马占山得到消息后，立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他说只当儿子在

战场上牺牲了，就连一滴眼泪都不会掉，更甭说出钱了。这次绑架，原来是日本特务所为。

日本关东军为报复嫩江桥战役一箭之仇，必欲除去马占山。一天马占山正在室内看书，突然从后楼外飞进一枚炸弹，不难猜知是日本人在捣鬼。这就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又有一天，马宅门外有位年迈的老人自称名叫马鸿，说"马占山是我丢失了几十年的儿子。我是从河北丰润县投奔马占山的。他遗弃 我多年不赡养我……"说完声泪俱下。门卫一听，是"老太爷"来了，忙去禀报马将军，马占山一听，说"俺爹早已入土了，怎么又出来一个老子?简直是活见鬼，虽然我家早年从丰润迁到东北，但我从未去过河北老家。我父母的坟墓，现今还在东北怀德县。"马将军心地善良，对秘书杜荀若说："送那老头100块钱，告诉他说，我的老子早已去世了。"可马鸿在门外还是哭着不走。如此纠缠了两三天。

马鸿在幕后地支持下，跟马占山打起了官司。天津检察院按刑法遗弃尊亲罪，对马占山提起公诉。天津律师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案子，故向马占山要两万元公费，马占山好友对马说："有位从东北去北平的女律师名叫纪清漪，号称'女侠客'，何不请她来?"马占山说："听说过东北北齐齐哈尔有个抗日巾帼英雄，是不是她? 那就把她请来!"

马占山的秘书奉命乘坐一辆防弹车，两个小时的工夫，就到了北平小沙果胡同纪清漪律师事务所。杜秘书说明来意，纪清漪说："我有保护抗日英雄的责任，责无旁贷，愿意为马将军义务辩护。"纪清漪当机立断，随同杜秘书乘上汽车直奔津门而去。

纪清漪与马占山相见，各道仰慕之情，嗣后每当纪清漪出庭，都是由杜秘书陪同乘防弹车，而车子不经过日租界，绕道去法院。纪向法院提出：如果叫马占山出庭，法院能否保证马占山的人身安全?如果能保证，则马占山当准时出庭! 且原告须指出马占山是马鸿的儿子，有何根据，马占山的生理上有何特征?

后来，那马鸿不知是自己编造的，还是听幕后操纵人信口开河，说马占山耳后有个"拴马桩"。他如此这般地对法院说了。

纪清漪在开庭时强调马占山不能出庭时的理由说："马占山来天津后，曾两次遭到袭击，险遭不测，他的处境，请法庭考虑。"然后，她补充说："我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一颗鲜红的爱国之心。"

审判长对这一案破例审理，一周后，法院通知被告马占山，就到马宅开庭审理——对马占山予以检验，并通知纪清漪律师，但未通知马鸿和他的律师。出庭有法院刑庭庭长、书记官、检察院长、法医、天津医院大夫、新闻记者等。当检验马占山的耳后时，并未发现有什么"栓马桩"?

再次开庭时，宣判马鸿败诉。大家离开法院向外边走的时候，马鸿垂头丧气的自言自语说，我上当了，真倒楣，谁说马占山耳后有"拴马桩"。

（颜仪民）

"赛金花热"

近代名妓赛金花，被称作"清末民初名满京津的一个奇女子"。其所以"奇"，不仅是因为她风尘落拓、坎坷曲折的一生，而且还由于在庚子乱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她曾与联军司令斡旋，舌战德公使夫人，并因此而名噪一时，蒙西太后亲自召见。以致在1936年她去世前后，文化界又以她作为国难危境中振奋民心、共济艰危的精神药剂，激起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冲击波。

赛金花本是姑苏城外七里三塘的一名青楼女子，略知文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回籍奔丧的苏州状元、兵部左侍郎、时任江西学政的洪钧结识成婚，成为"状元夫人"。同年洪被简派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赛金花即随洪出访。在欧洲，她出没于各种交际和外务活动场所，活跃开朗，艳惊四座，尤为一些青年军官所注目。其间，她稍习德语，曾结识了德国军官瓦德西。四年后，洪钧回国，不久暴卒。赛氏受不了清苦生活，乃脱离洪家，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挂牌接客，重堕红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天，几名洋兵来赛寓劫掠，赛听到他们嚷着德国话，便以不甚流利的德语与之对话。德军甚觉疑惑，问及身世，她便把曾经出访德国、结识俾斯麦宰相和瓦德西中将、以及与德国皇后合影等事一一讲出，并出示当年的合照。几名士兵闻后颇感吃惊，向她立正行礼，乞求宽恕。又谓瓦德西就是八国联军元帅，将回去报告云云。翌晨，果有两名德兵赶着马车来赛寓，邀她去德军兵营见瓦德西。俩人相见，重叙旧情，谈吐投机。赛倾诉着颠沛流离之苦，瓦德西送给她许多掠来的衣物和现洋，之后，俩人每天聚首，交往甚密。赛金花便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及瓦德西在联军中的权威，维护京人利益。德国兵以德公使克林德被杀，进城后烧杀最凶，还传说要把西太后剁成肉馅。赛金花常常规劝瓦德西，瓦德西允之。在李鸿章受西太后命与联军和议时，德使克林德夫人提出必以西太后偿命为和谈条件。赛氏又屡访当年在德时有一面之交的克林德夫人，最后说服了她。作为报答，西太后回京后在颐和园召见了赛金花。联军撤后，赛氏重操旧业，屡经变故，至1936年12月初在穷困潦倒中凄凉死去。

赛氏之死本是桩不起眼的小事，却在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30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日深的岁月。至1935年底，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五省，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

成为日本铁蹄下的殖民地。南京国民政府却致力于“剿共”战争，内战连绵，民怨沸腾。文化界的人们触景生情，纷纷从历史的追忆中寻找材料，批评政府消极御外国策，唤起民众自救之心。赛金花30多年前的奇异经历遂为各书报杂志作者以及编剧们所瞩目。

赛金花谢世的第二天，南北各报便争相刊出有关消息，北京有影响的《晨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大晚报》、天津《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申报》等先后刊出大量纪念文章，介绍赛氏身世及离奇生涯。

据当时报载，早在赛氏去世前的1934年，著名学者刘半农等连日访问赛金花，其学生商鸿逵依据这些材料写成的《赛金花本事》面世，一时成为俏货。山西易俗社在北平吉祥戏院上演《赛金花》一剧，由王天民饰赛金花，赛本人也应邀观剧，盛况空前。1936年4月，著名剧作家夏衍手作《赛金花》剧本发表于《文学》月刊。同年11月，“眼看着第二次庚子事变要重演于北平，熊佛西也着手草《赛金花》剧本，企图借以唤起国人，共御外侮。”之后，《孽海花续集》、《赛金花外传》、《赛金花传》等传记作品相继刊印出版。尤其是赛死后夏衍《赛金花》剧本由上海四十年代剧社公演更是轰动一时，著名演员王莹、赵丹、崔嵬等领衔主演。当时众多报纸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有的说：“际此绥东炮火声中，此历史悲壮哀艳之名剧，益令观众感到无穷之兴奋与感叹。当距今三十七年前，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清帝蒙尘西奔，城中乃处异族铁蹄下，三千壮士齐下拜，竟无一个是男儿。独名妓赛金花以一弱女子，往见统帅瓦德西，……”又谓中华民族于目前之苦难时代，“对于赛金花的出现，有一种深刻的联想”。有的则言，闻悉赛金花在北国危城的救民之举，“联想到当前状况，于是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将那些在这危城里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有的评论认为，“在国家飘摇之秋，兵荒马乱之际，一个妓女身上还闪动着爱国热情，尤其同那些鼠窃狗盗者比较起来，更显得她的人格神圣伟大！”有的提出质疑：“现在赛金花死了，赛金花的时代是否也随着赛金花的死而死了呢？”

《赛》剧在上海连演十数日后即去各地巡回演出。1937年1月在南京民国大戏院上演，竟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演。

赛金花晚年家境窘迫，死后连棺木也没有。北平文化界众多名流如沈均、杜润芝、孙晋卿、李青山、刘耀庭、李苦禅、郑颖孙等先后发起募捐，并建立丧葬筹办处。一些社会团体及上演赛剧的剧社也纷纷捐赠。是后，赛金花被安葬于北平城南的陶然亭——一个多少年来为诗人墨客所咏叹的地方。

（朱坤泉）

张学良向蒋介石送表真相

30年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过去已经57年，但是围绕这场事变和主要人物，至今还有许多谜尚未揭开，张学良向蒋介石送表就是其中的一个。最近笔者访晤40年代曾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工作过的奉化人周坤和先生，才了解了此事真相。

周坤和于1941年12月进入国民党军委会机要室。开始任档案组档案员，以后改任蒋介石的监印官，直至1945年4月。周坤和说：在重庆军委会机要室的第二地下室里，放着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党要员的专档。一次，我在整理蒋介石的档案时，看到从蒋介石已用过的工作笔记中摘录下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收汉卿弟表一只”。以后，又在张学良的档案里看到一张卡片，上记“张副呈送表一只”。汉卿即张学良，他曾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当时这块表也放在档案组的实物档案柜里，我亲眼见过。那是一块瑞士产的英纳格怀表，比银元略大，系德国飞行人员用的航空表，是张学良在德国学习航空驾驶用过带回来的。表面上可以看到在同一时间里世界几个大城市的钟点，还可以显示此表所在位置的经纬度。表上所指的日期是1939年12月25日，正好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失去自由的三周年。张学良把表拨到这个日子，其用意显然是要蒋介石恪守信用，还他自由。过去对张学良送表时间、表的来历、样式等说法颇多，前些日子港澳报刊还说事情发生在张学良被移送到台湾之后的50年代，周坤和先生依据亲见的档案资料的实物，揭露了事实真相，足以澄清以往种种误传。

至于蒋介石给张学良送了什么，周坤和曾听其堂兄周启勋说过具体情况。周启勋在西安事变前后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秘书，他曾作为随员，亲历过西安事变。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回奉化溪口养伤，周也跟到溪口随侍。后来，周启勋在重庆告诉周坤和：1937年张学良软禁溪口雪窦山期间，蒋介石派陈布雷上山送给张学良4箱物品，其中有书籍、文房四宝、猎枪、钓鱼竿，还有一张蒋、张结拜兄弟时交换的“金兰谱”。张学良收到后十分生气，当场把钓鱼竿折成两半，掷于地上。

1939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怀表，蒋介石有没有回赠什么？档案里没有记载，档案柜上也无实物。从录自蒋介石工作笔记的卡片看，似乎没有。因为如果有，蒋定会在笔记本上顺手记下“回赠汉卿弟……”有人说，回赠了一根钓鱼竿，那恐怕是把时间顺序搞颠倒了。

（王舜祁）

流 行 风

出了一曲绵绵无尽的“长恨歌”。

电影《迷途的羔羊》

《迷途的羔羊》——联华公司摄制的配音片，蔡楚生编导，周达明摄影，葛佐治、陈娟娟主演，完成于1936年8月，是我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

影片描写了小三子(葛佐治饰)和小翠(陈娟娟饰)等儿童在农村破产中家破人亡，沦为孤儿，流浪街头，受尽上层社会人们的歧视与凌辱。流落上海的小三子做过乞丐，替算命瞎子引路，帮黄包车夫推车过桥……夜晚露宿街头，任狂风暴雨吹打。一个偶然的机会，小三子做了富翁沈慈航(沈浮饰)的嗣子，还被送到贵族学校去读书。后小三子因无意中发现沈太太(黎灼灼饰)与其姘夫偷情，便被诬陷偷了她的钻戒而被沈慈航赶出家门，老仆人(郑君里饰)为之辩护也被赶出沈家。这样老仆人租得一间屋子与小三子同住，还收容了那些流浪的儿童。最后，老仆人冻饿而死，孩子们也被房东赶出来，又流浪街头。他们因饥饿偷了几个面包，被警察追捕，逃至一座未完成的摩天楼上，面对茫茫上海，进退无路。孩子们惊恐含泪的脸展示在银幕上。接着推出这样字幕：“各位，假如这些‘迷途的羔羊’——无辜的孩子们，是你亲爱的弟妹，或者是儿女，你应该有什么感想？”

电影《长恨歌》

《长恨歌》——原名为《人情》，薛伯青摄影。1936年新华公司摄制，梅熹、王人美主演。影片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爬的悲剧。主人公朱冬心(梅熹饰)和马妮娜(王人美饰)，是一对为追求婚姻自主而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的青年。到上海后，朱冬心在马妮娜的舅父开办的橡胶公司谋得一个工作，两人结婚安家，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朱冬心由推销员爬上了经理地位，从此得意忘形，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久，妻子发现了他的堕落，便离他而去，到电台唱歌谋生。继之，又遇营业上的失败，朱冬心将橡胶厂作了抵押，使公司破产。最后，在苦闷中去找妻子，两人又争吵起来。这时，电台老板(金山饰)突然进来，两人便撕打起来；朱冬心夺过对方手枪，当场打死了电台老板，在逃跑中又打死了侦探。事后老板妻子起诉，朱氏夫妇被捕，朱冬心判处死刑，马妮娜判两年徒刑，演

电影《壮志凌云》

《壮志凌云》——1936年新华公司摄制，吴永刚编导，余省三、薛伯青摄影，金焰、王人美、田方主演。影片描写了太平村村民在他们的平静生活遭到“匪贼”侵扰时如何团结起来，奋起抵抗的故事。太平村的群众推举了顺儿(金焰饰)作领袖，率领大家拿起武器，进行抵抗。在与敌人的流血战斗中，原先主张不抵抗的华老汉也拿起了武器；与顺儿有个人成见的田德厚(田方饰)也识破了奸细的阴谋，消除了芥蒂，投身于战斗，并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向邻村求援。邻村农民也消除了以往两村之间的隔阂，发兵相救。这样，两村乡民联合起来，凭了满腔热血，向敌人冲去。影片表现了壮烈的战斗场面和守土抗敌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团结抗日的时代精神。影片公映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有的评论写道：在《壮志凌云》中，没有悲叹，没有嗟怨，太平村的人民“虽然没有精良的枪械”，但“他们所相信的，只有大众的力量才是力量。因此，全片自始至终，都充满着青春的健壮的活力，令人感到兴奋！”这部影片比起第一部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的寓言体来，更为直诉和现实，因而更易为广大观众所接受，更好地起到了动员全民抗战的积极作用。

电影《新旧上海》

《新旧上海》以讽刺、幽默的喜剧形式，通过对住在一座鸽子笼似的两层楼房的六户人家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小市民层在社会不景气和生活重压下的不安与抗争。楼里住着丝厂停职的袁瑞三夫妇(王献斋、舒绣文饰)，无人光顾的两个舞女(袁绍梅、顾梅君饰)，慷他人之慨的汽车司机夫妇(尤光照、朱秋痕饰)，靠卖文为业的教书匠(李清饰)，摩登木器店的推销员及其多产的妻子(谢云卿、黄耐霜饰)以及二房东吕太太及其好赌的儿子。影片从他们的停职、失业、贫困、苦闷中，反映了当时经济的不景气、人间的世态炎凉，而这些又是通过日常生活、相互间关系展示的。同时也讽刺了小市民层贪生怕死、虚荣心要面子以及企图不劳而获、患得患失等落后的思想性格。《新旧上海》不仅是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是洪深对电影样

式的一种新探索。洪深在谈到此片剧本的编写时曾说："过去写'穷'的戏多数是悲剧，而结果也多数是非常凄惨；若要推陈出新，除非用喜剧的方式；但回过头来一想，若走喜剧这条路，也不十分妥切的；思之再三，方才决定了用悲剧的题材，而以喜剧的形式演出，目的是要使观众感到可笑，同时又使观众感到可悲。"

电影《桃李劫》

《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兼主演，吴蔚云摄影，由电通影片公司摄制，是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全部有声片，并获得较好的成绩。

《桃李劫》描写了建筑工艺学校毕业的陶建平（袁牧之饰）和黎丽琳（陈波儿饰）结婚之后，几经失业，工作无着，生活困窘。眼看妻子快要生产，陶建平只好到造船厂当了苦力工人。妻子产后体虚无力，在拎水时摔下楼梯；陶建平为给妻子求医治病，向工头借钱未得，在万般无奈下，他从其未锁的抽屉里偷出些钱；当他急忙请来医生时，妻子已经死去。在巨大悲痛中，他将嗷嗷待哺的婴儿送进了育婴堂。待他回来时，正有巡捕与工头等在家里。虽经反抗、挣扎、终于被捕入狱，并误判他死刑。这个故事是以老校长探监、学生向他叙述何以至此的倒叙手法展开的。当陶建平的故事结时，狱卒前来叫号，带赴刑场。而老校长看着自己学生离去不知所措。一声枪响，使他全身心震动了一下，手中的陶建平毕业照滑落地下。他踽踽独行，脚从照片上踏过，耳边响起《毕业歌》的声音。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是社会把这个有为青年葬送了；而老校长的热心教育，关注青年，都是无济于事的，影片对于黑暗、腐败的旧社会，给了有力的揭露与批判。

电影《狼山喋血记》

《狼山喋血记》（原名《冷月狼烟录》）——1936年11月联华公司出品，根据沈浮、费穆合写的电影故事，由费穆导演、周达明摄影。这是一部寓言体样式的影片。它描写了一个山村的村民打狼群保家园的故事。这村常年发生狼患，后来狼群得寸进尺，竟结队出山，将只身外出的李老爹（尚冠武饰）咬死，夜里又闯进村来，将刘三（刘琼饰）的小孩咬死。这时，猎手老张（张翼饰）主张坚决打狼，赵二（洪警铃饰）则主张求神许愿。最后，狼群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上街横行起来。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由村姑小玉（黎莉莉饰）、老张和刘三带头，全村人一致奋起，举着火把，拿着武器，高唱着打狼歌："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投入了打狼的战斗。影片通过一个寓言式故事，曲折隐晦地表达了抗日救国的主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了只有团结起来，坚决抗战才有出路。正如当时有的评论文章所说的："费穆先生创作出了这个如何去采取联合阵线来抵抗狼患的故事，而获得了只有结成抗敌的统一战线，才能有最后的胜利的结论。"

小说《春花》

作者　王统照

主要内容：以"五四"运动后济南为背景，写"黎民学会"中一群青年学生的斗争生活。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济南学生演新剧、查日货、办刊物，组织了"黎民学会"，但这一组织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而告终，青年们由于政治思想信仰不同走向不同的道路。作者着力刻画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形象，坚石由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而走向消沉、苦闷，甚至皈依佛教，是时代的彷徨者；背叛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身木，坚毅、干练，由信奉科学救国而投入革命，是进步青年的代表；以追求理想爱情而参加学生运动的义修，在时代的激流下逐步隐退成为一个颓唐的虚无主义者。作品通过这些青年的奋斗、挣扎、沉溺，反映"五四"到大革命前夕青年知识分子行程中的不同侧面，人物性格相当鲜明，但未能深刻反映社会发展的主流。

小说《牛天赐传》

作者：老舍

主要内容：牛天赐一出身就被父母抛弃，把他丢在商人牛老者的店铺门口。牛老者夫妇年迈无子；发现门口丢弃的男孩时，高兴地抱回家去，认为是天赐给的，取名为牛天赐。作品写了牛天赐出生以来二十年的经历。作者说："这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的传记。"目的是想从家庭教育角度探索市民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牛天赐在家中接受三种教育。养父牛老者是个老实本份的商人，牛天赐从他身上理解了金钱的作用和意义。养母牛太太望子成龙心切，以"天官赐福"为儿子命名，从小给他灌输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教育。男仆四虎为人机灵、善良，深明世事，又有在艰难中挣扎生活的能力。而天赐则是娇娇公子，在牛老者死后，天赐对经商一窍不通，只会跟着四虎上街去卖梨。作者通过四虎与天赐的对比，对牛老者夫妇的市民家庭教育作了否定与批判。作品还写牛老者的破产过程。牛老者所采用的旧式商业经营方法在与新式商人竞争中不断失败，加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最后终于破产，从

中反映了商业竞争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批判了旧中国腐败政治，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商业破产的同情。

小说《暴风雨前》

作者：李劼人

主要内容：以四川成都为背景，写辛丑条约至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变化。作品通过成都一个半官半商家庭内外的矛盾纠葛，着重写一群知识分子在维新浪潮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成都闹起了红灯教的反清活动，不久被清政府镇压。在官府任职的郝达三的儿子郝又三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鼓吹维新思想的文明合作社。在这个社里，苏星煜对清政府镇压红灯教首领深为不满，积极提倡办新学。在他的影响下，郝达三办起了广智小学。这时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的尤铁民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国积极向郝宣传革命思想，但郝对革命顾虑重重。不久，革命党准备暴动的消息走漏，官府要在全城大逮捕，搞得人心惶惶，终因军界、学界多方活动而未能动手。作品着力刻画三个不同知识分子的典型：郝又三是维新组织中的保守派，他奉行既不革命也不反动的中庸哲学。苏星煜是改良派，他怀着救国抱负，在日本接受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一心想到北京做议员，当官享福。尤铁民是激进派，他高叫流血、革命，但对革命以后建立怎样的社会毫无所知。作品通过在维新运动和反清浪潮中这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同态度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

作者：谢冰莹

主要内容：以自叙的形式描写北伐军一个普通女兵在成长中的坎坷历程。主人公出身于湖南农村书香门第，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终于反抗家庭，考入湖南益阳女校，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转入长沙省立第一女师，与徐特立校长相识，并开始写小说。在“六·一”惨案爆发后，她瞒着家庭考进中央军校，冒名入伍，于1927年参加北伐，在报上发表《从军日记》。北伐战争失败后，历尽艰难，回到家乡。经过四次逃跑，终于摆脱封建包办婚姻，重新走上社会。不久，被当作嫌疑犯被捕入狱。经大哥相救，出狱后当了小学教员，开始尝到了人世间的冷酷、虚伪、终于离开学校，奔向上海当了一名工人。作品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反封建精神，它记录了历史的风云，又揭示了旧社会妇女的痛苦遭遇。由于题材的独特和生活实感较强，作品发表后曾受广大读者欢迎。

诗《青纱帐》

青纱帐，
咱们的城墙！
咱们握着刀，握着枪，
在雪底下来来往往，
在黄沙底下来来往往，
叶缝里，梗缝里，
咱们看准敌人就放，
一个个弹子，
打进敌人的胸膛；
叶缝里，梗缝里，
咱们的刀闪着光，
咱们的枪闪着光

青纱帐，
咱们的城墙！
它保护着咱们，
它养活咱们，
敌人可用刺刀
迫着咱们老乡，
迫他们把高粱斩光。
弄倒了青纱帐，
抢去了田地米粮，
可教聪明了咱们老乡，
丢了锄头，握起个枪，
伴着咱们守望，
守望咱们的田地家乡！

青纱帐，
咱们的城墙！
咱们东奔西走，
咱们在炮火里死亡，
咱们在炮火里生长，
咱们给炮火炼成了钢。
五年了，五年了，
仇恨刻在咱们心上，
咱们喊：“抗日到底！
不卖国，不投降！”
咱们联合起来了，
十万枝枪，廿万枝枪，
筑成咱们新的青纱帐！
青纱帐，

新的青纱帐！
咱们钢的城墙！
守住咱们的田地
守住咱们的家乡；
咱们要用血，用肉，
让它长得坚固，久长；
它，新的青纱帐。
永久不会倒下，
永久伴着咱们冲锋，打仗！
一直到咱们把敌人赶个精光！

（温流）

诗《赠爱人》

看后面，
后面是我们血染成的大道；
看前面，
前面是我们要开辟的峦野荒郊；
想什么空头心事呀？
走，走，走，
机警地走！
壮勇地走！
按着一定路线走！

赠爱人，
年年有红花绿草；
辟道路，
手里是斧头镰刀；
想什么空头心事呀？
走，走，走，
机警地走！
壮勇地走！
按着一定路线走！

（柯仲平）

歌曲《新中华进行曲》

我中华英勇的青年快快起来起来！
一齐上前线！
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已不能再忍受这横暴的摧残？
满腔的热血已沸腾，
满眼的热泪总不干，
不将暴敌扫荡誓不生，
不将国土恢复誓不还！
难道黑暗世界长存在，
永远不能到明天？
赶快上前，前面有无数的同志们
赶快上前，无数的同志们正在抗战！
看胜利就在眼前，
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最后瞬间！
侵略者已经到了最后瞬间！
新中国正在等待我们建！

歌曲《拉犁歌》

嘿哟拉哟！
嘿哟拉哟！
莫回头，莫回头，
老家只有穷和愁，
水旱成灾三千里，
县官催租如火急，
弃家离乡天下走，
边省荒地堪存留。
没有牲口，
且将绳儿背在肩头，
开荒嘿哟，靠双手。
流着血汗向前走，
莫回头，莫回头，
老家只有穷和愁。

历史档案

张学良、杨虎城通电

（1936年12月13日）

……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之一线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依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戴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藉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覆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决，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

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二)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也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方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三)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792页）

外交部重要声明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二日晨须磨抵京，下午四时至外交部访张群，就外务省之意见，恳谈约一小时，始辞出。晚九时外交部发一声明否认承认广田所提三项原则事。原电云：中央社南京二十二日电，路透电讯载，日外务大臣广田在日本贵族院演说外交方针，叙及对华三原则，谓中国业已表示赞同云。其中一点且有包括承认伪满之意，记者以所称之点，各报所传，出入颇大，当访外部发言人，询明真相。据称：广田所谓对华三原则，当系指去年九月中广田外相对我蒋大使所提出之三点而言，缘我方鉴于中日关系虽经双方之竭诚努力，而年来仍迭次发生纠纷，殊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概。故我政府于去年秋间向日政府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之基本办法。旋广田外相对蒋前大使表示中国所提办法，原则上非不可行，惟须请中国先同意三点，第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第二，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第三，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我方以该二点措词过涉空泛，无从商讨，当要求日方提示其具体内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而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最近张部长接任后，即提议中日两国必须依正常办法，经由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以期两国关系可得根本调整，现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演词中，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并重申对邻邦不威胁不侵略之根本政策，努力冀求两国国交之常态化，进行两国利害之调整，此则与我方主张并无二致，此后循此途径，进行交涉，两国关系自可改善云。外长张群并于二十三日午特谒蒋报告发表声明之经过及须磨所陈述之意见。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期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组织章程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之组织，原根据冀察政委会组织章程，纯系外交研讨之机关。该会主席委员陈中孚，以该会职权范围过于狭小，对于外交之处理，颇难进行。于十四日冀察政委会举行第四次例会时，由陈氏提出修正案，业已通过，修正后之组织规程。十八日由政会公布，规程原文如下：（第一条）冀察政务委员会，为研讨及办理冀察平津各项外交问题起见，设立外交委员会，（第二条）本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聘任之，（第三条）本会设主席委员一人，由冀察政务委员会就本会委员中指定之，主席委员综理本会一切事务，（第四条）本会设左列各组，第一组、掌理本会文书会计庶务印信编译出版交际等事宜。第二组、掌管研讨及办理外交事项及国际情报等事宜，（第五条）前条各组每组设主任一人，分设三科，每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五人，办事员四人，办理各该组主管事宜，（第六条）本会设秘书四人，分掌本会中英法日机要事务，（第七条）本会得设专门委员五人至七人，（第八条）本会得酌设顾问参议谘议若干人，（第九条）本会为缮写文件得用雇员，（第十条）本会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次，（第十一条）本会遇必要时或委员五人以上之提议，得由主席委员召集临时会议，（第十二条）本会开会时以主席委员为当然主席，主席委员缺席时，得由出席委员公推临时主席，（第十三条）本会议事细则及办事细则另定之，（第十四条）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由冀察政务委员会修正之，（第十五条）本规程自冀察政务委员会公布之日施行。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七期）

西南政委会之支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钧鉴，奉读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冬电，忠肝义胆，炳若日星。凡有血气，莫不感奋。自九一八以来，日人挟其暴力，蔑视一切国际信义与条约，掠夺我土地，虐刘我国民，侵略我主权，危害我国家，侮辱我民族，亦既五年矣。我政府隐忍委

曲，冀欲蒙亘古未有之耻辱，求万一或得之和平；讵知愈忍辱敌愈凶狂；我愈和平，敌愈侵逼，驯至受威胁而成之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俱不足以餍敌人之苛求，今则辽吉黑热四省，与冀东之失地未复，而敌又以进兵平津走私华北闻矣！呜呼，寇氛既陷于腹心，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济棠宗仁等暨全体将士，分属军人，天职所在，厥为捍卫国土，保障生民。今敌人得寸进尺，实逼处此，唯有依从钧部会之主张，为国家雪濒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用特电恳钧部钧会，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赴汤蹈火，所不敢辞，众志成城，定操胜算，临电无任悲愤待命之至。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总参谋长李品仙，参谋长张任民，军长余汉谋，张达、李扬敬，廖磊，夏威，副军长李振球，李汉魏，黄延桢，韦云淞，周祖晃，师长缪培南，黄任寰，莫希德，叶肇，张瑞贵，巫剑雄，李振良，黄赞文，王质斌，空军司令黄光锐，海军司令张之英，要塞司令李洁芝，绥靖委员陈章甫，范德星，李汉魂等同叩支印。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三期）

冯玉祥辟谣谈话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冯玉祥五日关于日来外电谣传及华北问题与走私问题，发表谈话如下：近日外报所载同盟社中央与西南将发生战事之消息，纯系别有用意的挑拨造谣。我在中央熟知中央决无向西南提出所谓五条件之事。两广周围各省的中央军队，早已陆续他调，所谓以三十五万军队进攻两广云云，实为可笑的无稽之谈。同时两广当局与中央关系，日在亲密进步之中，即使对于救亡图存之步骤，容有轻重缓急之差异，然均能以有利于国家民族之观点，开诚商讨，所以在目前国难日趋严重的情势下，无论中央或西南，均不能亦不愿发生自相残杀的内战。那些外来的谣言，本其一贯政策，要有计划地制造中央与各省之对立，各省与各省之对立，以至每一省内每一个人之互相对立，使我国变成分崩离析不断内战的局面，从而转移国内外之反对侵略者的注意，同时又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以逞其野心，把这种谣言和华北近日的事情，对照的研究一下，对于这谣言的发生，就可以洞悉其用意之所在了，而其企图破坏我国国难中新生之力量，尤不难明湜，我绝对相信，只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得如同一家人一样，集中力量，作艰苦的奋斗，才可以得到救亡图存的最后胜利，说到华北，因为侵略者一步步的进攻，其危险程度，自然也一天天的严重，这是不必讳言的事，然而我们决不可有华北已经灭亡的错误认识，事实上自去年十一月以来，华北还是在艰苦中保持着，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策，只有官民团结一致，我们能团结一分，就是增一分救亡的力量，如果全国上下由此更进而坚持团结救亡的信仰，从精神上物质上一步步的严紧我们民族壁垒，整齐我们奋斗步调，都有最伟大的最光明的胜利的前途，关于大规模的走私问题，实在已不属于一般的所谓走私的范围与意义，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切盼各级机关严厉执行，偷漏关税及各种走私的惩治条例，另一方面，更希望全国人民自觉的起来，查缉私货，抵制私货，努力巩固我国经济壁垒，务使私货根本绝亦于国内，并应以最大的实力，以保护国营产业，勿令我们的国民经济受到丝毫的损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命线，大家应联合起来，保护这生命线，强固这生命线。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三期）

张、杨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

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锵流等叩文。

(选自西安《解放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关于西安事变处置办法之决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当晚十一时半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出席有丁惟汾、陈果夫、冯玉祥、叶楚伧、戴传贤、居正、于右任、张继、孙科、方治、陈立夫、张群、吴鼎昌、朱家骅、张嘉璈、陈璧君、张道藩、张厉生、李烈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邓家彦、陈绍宽、曾养甫、梁寒操、陈布雷、王陆一、陈公博、马超俊等。主席丁惟汾,通过决议如下:

"(一)决议: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二)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选自《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2日　平津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平津两地共组织九个团先后出发,一、二、三团属北平,第四团属天津,相约在固安会师,到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同日　福建省府出卖安溪矿产与日本人。

同日　伪军李守信部占据察北已有五县。

1月5日　蒋介石手令平津各学校放假,强迫学生离校。

1月7日　红六军团进抵贵州玉屏。八日,红二军团亦进入该地。

1月10日　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发布关于建立革命政府和革命根据地问题的指示。

1月11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十二项。

1月12日　日本在绥远增设特务机关。13日日本驻津参谋中井偕新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飞太原会见阎锡山。

1月13日　日本将《日本陆军华北处理要纲》传达到在华日军。

1月21日　日本广田外相在贵族院发表外交方针,对华关系仍本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22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谈话,未同意"三原则"。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在党内公布中共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

1月25日　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谓"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

1月26日　乌兰夫率领德王警卫队二千余人起义,捣毁"蒙疆政务委员会"。

1月28日　东北民众反日联合会军政扩大会议于黑龙江汤原召开,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冯治纲、谢文东、李华堂等人参加。

同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2月1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

同日　伪冀东军开入昌平。

同日　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反抗保安队深夜包围学校逮捕学生领袖。

2月2日　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渡过乌江,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2月4日　国民党政府发行"统一"、"复兴"两公债共十四万六千万元。

2月6日　旅顺日军司令和田在津与日驻军议决,旅顺海军扩充华北港口,并与津驻屯军联络侵华办法。

2月7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定成立,贺龙为主席。

同日　上海、天津日人各纱厂中国工人纷纷罢工。

同日　兰州发生地震,旧房多倒塌。

2月9日　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

同日　日满铁调查察绥晋等省实业，半月中派员达二百余名。

2月10日　南京中央银行发行新辅币。

2月11日　日唆使卓什海在张北组织察盟政府，卓掌盟事，李守信掌军事。

2月12日　日关东军在通州设立特务机关。

2月17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2月20日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

同日　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黄河东征。

2月21日　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电平津当局，谓学生运动为"共党暗中操纵"，令饬镇压。至24日，平津当局逮捕学生已有107名。

2月23日　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成立。

2月25日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关上村歼阎军独二旅第四团。

同日　李克农由瓦窑堡抵洛川，会见王以哲，就红军与国民党六十七军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定：政治上，同意《八一宣言》提出之抗日要求；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经济上，王答应开放几个口子以运输物资。

同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军警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之"合法"行为。

2月27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全部撤出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开始在滇黔川边乌蒙山一带迂回。

3月3日　日本操纵汉奸在厦门成立"福建自治委员会"。

3月8日　冀察政委会外委陈中孚与多田商议"防共"问题，决定派二十九军得力部队在冀察晋交界地方，防堵红军东进抗日。

3月11日　刘志丹率二十八军从神府罗峪口东渡黄河，由兴县向南推进。

3月16日　日本大批漏税私货运抵天津。

3月22日　日本唆使德王成立蒙古自治军政府。

31日　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撤离盘县，西进入滇中地区。

同日　北平学生以十七中学生郭清参加爱国运动被宋哲元杀害于狱中，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举行追悼郭清的"抬棺游行"，遭到镇压。

4月1日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被强令解散。八日，鄂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也被解散。

4月7日　冀省府"厉行防共"，令冀南、大名等四十余县县属小学教员，寻觅铺保。

4月9日　周恩来、李克农到延安和张学良举行秘密谈判，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

4月10日　刘少奇于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署名K.V.，批判"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阐明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

4月14日　刘志丹在山西中阳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4月18日　北平《晨报》载，"上海全市六十家糖行濒危，华糖存货山积，时有停闭之虞。"

4月21日　甘肃凉州、安西、玉门等县瘟疫大作，每县每日死千余人左右。

4月23日　粤西南数村发生剧烈地震。

4月24日　天津各校学生停课示威，宣言反对防共协定。

4月27日　红军第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

5月1日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铁罗关开始撤回黄河西岸，返回陕北，三日完成。

5月5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同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从中甸出发，十日占领得荣县城。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

5月6日　冀察政委会与日订立《华北防共协定》，规定国民党军不得开入冀察。

5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十一日到达乡城县。

5月14日　东征红军在延川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山西经验。

5月22日　《申报》天津电："津国营糖商闽、潮、汕三帮，因受走私影响……顷有七十家倒闭，仅余三十家亦纷电本庄停止来货"。

5月23日　开滦唐山矿工怠工。

5月28日　天津学生、工人、市民万余人举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31日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于上海，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策》。

月底　中国工农红军分两路从陕北出发，西征甘、宁，徐海东率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左权率一军团为左路军。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

同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军克曲子，21日占盐池，二十七日克豫旺。

6月2日　两广军阀以抗日反蒋为名，组成"抗日救

国军西南联军"。九日，粤桂军下动员令，出兵湖南。十日，进逼衡州，与蒋介石军队发生战争。

6月4日　广东各界民众两万余召开大会，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6月7日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8月1日又停刊。

同日　茅盾、傅东华、夏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入会者百余人。

6月14日　章太炎去世。

同日　日韩浪人组织特殊贸易协会，强占津浦线火车，运大批私货南下。

6月15日　北平、广州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6月21日　上海三千余人在救国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对日宣战"。

6月22日　红军第四方面军与第二、六军团在西康甘孜会合。

同日　两广组织独立军委会，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

本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抗联第一、二军组成，扬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活动于辽宁省东部山区。

7月1日　在汉奸操纵下保定五百余人请愿"自治"。

7月2日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第二、第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第二方面军。

月初　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在甘孜开会。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朱德、刘伯承一起揭露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持北上抗日方针。

7月10日　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14日结束，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同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

7月13日　蒋介石下令免陈济棠职，派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14日，余在大庾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二十四时内离粤。15日，陈部主力集英德、军田与余部对峙。17日陈部军长张达为蒋收买，陈济棠失败。

7月15日　刘少奇于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八期发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同日　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

7月16日　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7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

同日　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到达中阿坝。

7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由二、四方面领导人组成党的西北局委员会，统一指挥二、四方面军。

8月2日　红二方面军六军到达葛曲河，六日，二军和三十二军亦到达。

8月7日　伪蒙边防军李守信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十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十五日，伪军进犯集宁，与傅作义部冲突。

8月9日　红军四方面军攻克腊子口，十日到哈达铺。

8月19日　广西组织"中华民国人民抗日救国政府"，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分任正副主席。

8月22日　台湾恒春北发生七点三级地震。

8月25日　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出国共进行谈判，以实现合作。

同日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经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8月24日　成都民众反对日本在蓉设日领事馆，捣毁大川饭店及交通公司，益晋、恒宝等商号，殴毙日人两名。

8月27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力争夺取宁夏。

9月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中共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同日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到达哈达铺。

8月2日　居正、程潜、朱培德等携蒋介石亲笔信飞南宁，调解宁、桂冲突。6日，南京任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委会常委。

8月3日　广东北海日侨中野被杀。19日，日警被击殒命。

8月7日　四方面军占领通渭。

8月13日　天津南开学生二十余人遭日军逮捕。

同日　日使川樾到南京与张群谈判，提出四项要求：一、中日经济合作；二、冀察绥晋鲁实行自治；三、日本有权在长江沿岸各地及海南岛驻军以保护日本利益；四、修改中国学校所用教科书，务将其中反日宣传删除净尽。谈判没有结果。

9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

同日　红二方面军于本日及19日取得成徽两康战役胜利。

9月18日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戎伍胜、宋劭文等担任委员。

同日　日军在丰台挑衅，包围二十九军兵营。

9月20日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者有：英、法、德、荷、瑞士等国华侨代表四百余人。

10月1日　宋哲元与日本华北侵略军司令田代订立"华北经济开放协定"，规定日本取得修筑天津至石家庄铁路、塘沽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等权力。

10月2日　红军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攻克会宁城。

10月8日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会宁之清江驿和静宁之介石铺会师。

10月10日　红二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介石铺会师。同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同日　西安各界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0月17日　宋哲元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崛内签订《华北航空协定》。二十三日，成立所谓中日合办的惠通航空公司。

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病逝，全国许多地方均举行追悼活动。

10月22日　蒋介石由京飞峡"剿共"。二十九日，蒋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若何，政府坚决贯彻勘乱方针"。

10月26日　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将领："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望蒋"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

同日　华北日本驻屯军以北平为进攻目标，开始大演习。

11月5日　日军和德王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傅作义率部抵抗。

11月7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贺龙、任弼时组成军委主席团。

11月8日　中共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1月9日　上海日本七大纱厂全体工人联合罢工。

同日　绥远旅居北平同胞绝食一日，积资慰问绥远前线将士。

同日　29军举行演习，以对抗日军10月26日以北平为目标的模拟演习。

同日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反日罢工，至二十日，罢工人数达两万余。

11月13日　察北伪蒙军窥伺平地泉、大同。

11月14日　各地援绥运动纷起，北平学生绝食慰劳前线将士。

11月15日　西安学生联合会组成。

11月18日　晋绥军傅作义部败伪军王英于红格尔图。

11月20日　刘少奇于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六十七期发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署名K.V.。

11月21日　中国工农红军在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师。

11月22日　上海各界人士，包括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召开援绥会议。

11月23日　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仆、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十二月四日被移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

同日　伪满财政部决定火柴专卖制度。

11月26日　宋庆龄发表宣布，痛斥国民党对救国会散布谣言。

同日　沪日华纱厂工人罢工。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致书蒋介石谓："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同日　青岛银月纱厂全体工人罢工。

12月2日　青岛日厂工人响应上海日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日海军登陆镇压。三日，日军占领国民党市党部，赴各厂殴捕工人，日纺织厂九家工人均被迫离厂，失业者二万七千人。

12月4日　蒋介石由洛阳赴西安，布置剿共和镇压东北军，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

12月7日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同日　张学良到华清池向蒋哭谏，痛陈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红军的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蒋骂张是年青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

12月9日　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同日　蒋介石召集全部参谋人员会议，决定在十二日颁布第六次总攻红军命令。如张、杨两部不听命令，就解除张、杨武装。

12月10日　绥境中国军队克大庙。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捕蒋介石，囚禁国民党中央在西安的军政大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继承等十余人。

同日　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将西安事变消

息电告中共中央。张、杨亦电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后的善后事宜。中共中央即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驻防渭河以北，彭德怀、贺龙部进驻三原、咸阳，徐海东进驻西安四周。并复电张、杨，中共代表四日后可达。

12月13日　中共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

同日　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合发出通电，谓："对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　张学良、杨虎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任正副主任。

12月15日　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盼"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之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

12月16日　应张学良之请，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以及罗瑞卿、李克农、童小鹏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张学良会谈，张对周所谈中共对事变前途的分析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表示赞同。次日，周会见杨虎城，阐述逼蒋抗日的可能性。

12月18日　蒋鼎文飞回南京，持蒋介石致何应钦亲笔函，命停止对渭南轰炸。

12月19日　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指示》，并发表通电，提议召集和平会议，向南京和西安方面提出和平条件四项。

同日　于右任策划西北军冯钦哉部投靠南京。

12月20日　南京董钊部占领华县，冯钦哉部沿渭河北岸西进。

12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指出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12月22日　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及随员二人到西安，准备谈判。

12月23日　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开始谈判。周恩来提出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谈判基础。周恩来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

12月24日　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撤兵手谕，交蒋鼎文、蒋坚忍分别向南京和前线传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5日　周恩来、博古联署向中共中央电告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劳动契约法。

同日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离陕飞洛。26日到达南京。张学良即被扣留。

12月26日　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邮政协议。

12月29日　周恩来、博古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12月31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判十年徒刑，次年1月4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本月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制定出一套研究革命和指导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

外　交

1月1日　苏联外交部否认与外蒙古秘密缔结"军事协定"。

1月2日　盛世才与苏联订立协定，苏联以军事、经济、政治援助新疆。

1月22日　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未同意广田三原则。

1月29日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离职，于2月8日返国，国民政府颁发给其勋章。

2月14日　苏联政府封闭沈阳总领事馆，18日又封闭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3月4日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抵南京。

3月12日　苏联与外蒙订立军事协定。

3月29日　苏联宣布与外蒙古订立"互助条约"。

4月1日　国民政府外交交部发言人否认中苏订有密约。

4月7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抗议苏联与外蒙签订议定书。

4月8日　苏联政府公布"苏蒙军事互助协定"。

4月9日　苏联政府复国民党政府外部抗议：苏蒙互助条约未违背1924年5月31日之中苏协定。

4月17日　日本以驻天津领事川越茂升大使，征求意见。

5月1日　国民政府同意日本派川越茂任驻华大使。

5月14日　国民政府派陈兴甫去美国，*18日*与美签

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美向中国购买白银五千万盎斯，每盎斯以美金五角作价，以卖价所得，稳定中国法币在汇兑市场上的价格。

6 月 22 日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抵沪。

8 月 19 日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访宋哲元，商谈“防共及经济提携”。

8 月 22 日　太平洋学会上，苏联代表承认我在外蒙主权。

8 月 29 日　国民政府重申睦邻令。

9 月 25 日　日本内阁决定支持强硬政策，训令川越茂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继续谈判。

9 月 28 日　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宣言，谓请中国速决定与日本“携手合作”。

10 月 2 日　日本政府决定派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驰赴南京，对川越茂传达新决议案。

10 月 8 日　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明：中日一切问题，应本着平等原则，并须尊重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而协商解决。

10 月 19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与日使谈判，日方再提所谓“中日防共”。

10 月 23 日　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本外相有田，建议中日悬案部分解决，有田拒绝。

11 月 6 日　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中希（腊）友好条约》。

11 月 13 日　中英订立十万镑信用借款。

11 月 28 日　意大利与日本成立协定，承认伪满洲国。

12 月 17 日　日本外相接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南京政府若与张、杨妥协，则日本不能坐视。

12 月 19 日　苏联驻华大使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西安事变与苏无关。

12 月 21 日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见张群，声明张、杨所提条件，与日本根本方针不合。

军　事

1 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成立，军长夏云杰。

同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军长周保中。

2 月 17 日　华北日本驻屯军扩增至两倍半，兵员 5000 余人。

2 月 23 日　蒋介石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共三十万人入晋堵截红军东进抗日，同时下令东北军、十七路军进扰红军后方。

3 月 7 日　蒋介石为防堵红军东进抗日，急调商震部等中央军六个师进入山西。

3 月 10 日　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孝义一带与阎军激战。

3 月 20 日　蒋介石电阎锡山，加紧进攻红军。

3 月 21 日　晋省国民党军分七路进攻红军。

4 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成立，军长杨靖宇。

同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立，军长王德泰。

5 月 14 日　日本向华北大量增兵，合按战时编制，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线驻重兵。是日，通州日军已达千余。

5 月 28 日　国民党政府派陈诚为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仍加紧进攻红军。

6 月 21 日　日本军队分批开进丰台。

7 月 10 日　日军进攻驻防大沽之国民党二十九军。

7 月 17 日　陈济棠部军长张达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失败。

8 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军长赵尚志。

9 月 23 日　沪日水兵被枪击，一死二伤，日海军陆战队立即戒严，并越界布防。

10 月 10 日　东北抗日联军 200 人在敦化东清沟与日军激战。

10 月 17 日　绥东国民党驻军与日伪军发生遭遇战。

11 月 3 日　华北日军开始以北平为目标进行大演习，迳入北平市。

11 月 24 日　傅作义部克复百灵庙，歼敌千余名。

11 月 29 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军长陈荣久。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成立，军长汪雅臣。

12 月 6 日　蒋介石连日召见陕西、甘肃“剿共”的国民党将领，要其协力完成围剿红军的任务。

12 月 16 日　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时国民党军在华县与杨虎城军对峙。

12 月 30 日　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六军联合收复佛山县城。

本年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成立，军长李华堂。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成立，军长谢文东。

经　济

1 月 4 日　上海银行公会停止公布汇兑行市，国外汇兑集中中央、中国、交通三行。

3 月 13 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准长芦盐销日本，年约输出百五吨。

4 月 30 日　中国海关报告，因华北走私致税收损失，从 1935 年 8 月 1 日至本年 4 月 30 日止，共计二千五

百万十万六千九百四十六元。4月份一个月内海关收入之损失达八百万元。

6月17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增设所得税。

8月　沿海地区中国企业家为免遭日本的掠夺和战争的破坏，纷纷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形成工厂内迁运动。

9月　国民政府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委员会。各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统制农副产品、工矿业和对外贸易的机构。

11月19日　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各地方建仓积谷办法大纲》。

12月1日　日本产业股份公司迁至东北，改称"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资金总额4.5亿元。经营钢铁、轻金属、汽车、飞机、煤炭及其他矿产，形成一个以军火工业为核心的大托拉斯。

本年　国民政府实业部设农本局，通过举办农贷，控制粮、棉产销。

文　教

4月1日　夏衍在《文学》月刊上发表历史剧本《赛金花》引起反响；6月，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报告文学《包身工》，为30年代报告文学代表作品，年底，又发表历史剧本《自由魂》(后改名《秋瑾传》)。

4月15日　《作家》月刊在上海创刊，孟十还编辑；至11月停刊。

5月　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月，周扬在《文学界》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此前已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此后至10月，文艺界开展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当时在上海及全国300多种报刊上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章有480多篇。

6月1日　《文季月刊》以北京《文学季刊》复刊的名义在上海创刊，巴金、靳以主编；至12月被查禁(共出7期)。

6月7日　"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署名者有王统照、朱自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洪深、郑伯奇、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111人(各杂志发表时署名人数略有不同)，并创办《文学界》月刊。

6月10日　《光明》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洪深、沈起予主编；至次年10月停刊(共出35期，末6期为《光明战时号外》)。

6月14日　章炳麟在苏州去世。章炳麟(1869～1936)，近代思想家、学者、散文家，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晚年寓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研究所。有《章氏丛书》。

6月15日　巴金、曹靖华、曹禺、鲁彦、鲁迅、茅盾、胡风、张天翼等77人在上海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各杂志发表时署名人数略有不同)。

9月5日　《中流》半月刊在上海创刊，黎烈文主编；至次年8月停刊(共出22期)。

9月　丁玲经营救自南京潜回上海，转赴延安；11月，延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丁玲任主席。

9月　茅盾主编并作序的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出版，收征文作品近500篇(限写本年5月21日一天之事)。

9月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连载，至次年10月载毕。

10月1日　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丐尊、张天翼、傅东华、叶绍钧(圣陶)、郑振铎、郑伯奇、赵家璧、黎烈文、鲁迅、冰心、丰子恺21人在上海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去世。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姓周，幼名樟寿，字豫山，改名树人，字豫才，笔名有唐俟、何家干等130多个，浙江绍兴人。一生著有小说集3部、杂文集17部、散文集1部、散文诗集1部、学术著作2部以及大量日记、书信等，共约400万字；译著33部，共约250多万字；辑校古籍18种，共约100多万字。有《鲁迅全集》。

本年　王树楠去世。王树楠(1851～1936)近代散文家、学者，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晚年致力于编纂《新城县志》。有《陶庐众刻》。

本年　王统照的长篇小说《春花》(又名《春华秋实》)，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花边文学》，艾青的诗集《大堰河》，田间的诗集《中国牧歌》，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宋之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谢冰莹的传记文学《女兵自传》，曹禺的剧本《日出》，张天翼的长篇童话《秃秃大王》，高士其的科学文艺作品《细菌与人》，朱光潜的文艺理论著作《文艺心理学》等发表或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7年

导　言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其间共开过六次会议。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础之上，会议以确定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驻丰台日军炮轰宛平城，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揭开了全面爆发的序幕。

七月底，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不断向华北增兵，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抵抗，但未能抵挡住日军攻势，29 日、30 日，北平、天津先后陷落。

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谈判。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发布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日军侵占平津后，蓄意在上海挑起事端，找寻扩大战争的借口。八月十三日，日军突然袭击驻守上海守军，中国守军在张治中指挥下"奋起还，抗击日军 3 个月之久，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八·一三"之后，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这次会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行动纲领。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十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后，立刻奔赴抗日前线。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九月二十五日于平型关设伏，歼敌 1000 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国民党为防御日本军通过忻口直扑太原，在忻口一带组织了忻口会战。双方激战半月之久，同时八路军在朱德指挥下，在日军侧翼活动，配合忻口守军作战，使日军在忻口受挫。但由于娘子关失陷，忻口守军撤出阵地，战役结束。

十月十九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以该师七六九团三营秘密进至代县西南阳明堡机场，突然发起猛攻，毁敌机二十四架，创造步兵伏击敌机的奇迹。

为保卫太原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组织了太原战役。十一月八日，日军从东、北两路猛攻太原，中国守军誓死不退，伤亡惨重。9 日，傅作义见势已无法挽回，遂下令向西突围，太原陷落。

十一月下旬，为保卫南京，国民党军发动了南京战役。十二月一日，日军进攻南京，中国守军殊死抵抗，但各要点先后失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制造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实践论》、《矛盾论》发表
- ●抗日战争爆发
- ●国共合作谈判
- ●洛川会议
- ●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抗日
- ●平型关大捷
- ●夜袭阳明堡
- ●雁门关游击战
- ●东北抗日联军
- ●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 ●平津陷落
- ●"八·一三"淞沪会战
- ●忻口会战
- ●太原失陷
- ●南京保卫战

《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背景介绍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以便在国共合作的复杂情况下，领导抗战走向胜利，毛泽东着力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于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中，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全面、深刻、通俗地论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彻底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实践论》阐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实践论》科学地概括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指出：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由此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回到感性认识，即回到实践。人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发展过程。《实践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批判了党内曾经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思想则超过客观事物的一定发展阶段，不是把幻想当成真理，就是把将来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勉强放在当前来做。《实践论》还进一步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矛盾论》全面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立统一法则。《矛盾论》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主要的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矛盾论》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教条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抽象的公式到处搬用，他们拒绝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对客观情况不调查研究，不进行具体分析。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片面的，都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不能掌握矛盾发展规律，因而都必然要犯错误。

《实践论》和《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杰出的贡献，同时，也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哲学体系的形成。

材料：

·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实践论》与《矛盾论》

材料　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实践论》与《矛盾论》

毛泽东继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后，把政治路线问题提高到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发表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总

结。

《实践论》着重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并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揭露和批判了“左”的右的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实践（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科学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由此得出结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还透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运动的唯物的辩证的基本观点，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观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论认识，又从理论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对“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在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毛泽东还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他指出，“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时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他论述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最后，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继《实践论》后，又发表了《矛盾论》，其研究的目的，针对性现实性十分明确。在《矛盾论》的开宗明义就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在结束语中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矛盾法则的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根本法则。他说：弄清了对立统一法则就从根本上懂得唯物辩证法。为此，首先指明两种宇宙观。然后着重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

毛泽东在论述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时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事物矛盾法则关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的论述后，明确得出结论说：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时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过程中，并发源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承认或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区别。大革命时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无视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的矛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其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他指出，矛盾特殊性是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又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各阶段也各有其特殊性。每个事物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解决不同矛盾必须用不同方法。在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他着重指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作为特殊矛盾的形态而存在，普遍矛盾寓于特殊矛盾之中。没有离开特殊性而孤立存在着的普遍性，也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因此他说，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

魂。"左"倾教条主义则违反这一原则，否认矛盾的特殊性，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也不了解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生搬硬套，结果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阐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指出，在复杂的事物中存在着多种矛盾，但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在一种矛盾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随着外敌入侵情况影响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两种矛盾互为消长。党内教条主义者无视各历史阶段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竟把中间势力当做"最危险的敌人"，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结果孤立了自己，丧失了有利时机。

毛泽东分析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依据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又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运动和变化。党内教条主义者否认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在对待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只讲斗争，不讲联合。

总之，《实践论》、《矛盾论》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意在告诫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了解中国这个特殊国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从而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并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选自《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

背景介绍

1937年7月7日，驻扎在北平城外的日军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当局，便荷枪实弹开往北平西南郊，靠近芦沟桥中国兵营的龙王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当晚，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突然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交涉，称日军在"演习"中失落一名士兵，日军要进城搜索。当即遭到北平当局拒绝，发生争执。就在双方代表在宛平城中会商调查办法之际，日军已将宛平城包围，并多次向城内开枪射击，还以迫击炮攻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第29军37师111旅第219团奋起反击。第29军司令部发出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芦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枪声，在芦沟桥畔打响了。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抵抗，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同时，红军迅速集中，准备奔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爱国军民纷纷行动起来，支援第29军，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7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增调陆军10万来华。17日，又召集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日军扩大侵华战争。大批日军及飞机、大炮、坦克源源不断地运往平律一带。与此同时，日本继续放出"和谈"烟幕，佯称"华北事变可以局部解决"，以欺骗舆论，诱使蒋介石放弃平津乃至华北，并为军事增援争取时间。

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状态。一方面幻想以双方同时撤军为条件，准备妥协；另一方面在全国坚决要求抗战的汹涌怒潮面前，又不敢作出对日投降的决策。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日，但他又反复强调"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就在国民党企图利用谈判解决事变之际，日本军队又开始了进攻。7月26日，廊坊失守，平津铁路完全被敌控制。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二十九军在24小时以内不全部撤离北平，日军"当即采取独自之行动"。28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南苑阵地，激战至下午，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守军伤亡惨重。7月30日，芦沟桥、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芦沟桥的炮声，唤醒了全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决心。

日本军队占领天津后，又开始大举进攻上海。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等，携带武器，驾驶军用汽车，冲击上海虹桥军用机场，打死中国守卫士兵1名，蓄意制造事端。中国士兵还击，击毙大山勇夫等2人。日军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向上海的进攻。8月13日，日军战舰突以重炮轰击上海闸北，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以闸北为阵地，奋起反击。

由于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大举进攻，直接侵害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财产的集中地，致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江浙的统治地位无法维持。同时，也由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容许国民党当局继续维持对日妥协的方针。迫于形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比较积极的抗日行动。中日双方的战争持续了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死伤达4万人以上。中国守军

十八路军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率领下，孤军坚守在上海四行仓库，阻止敌人进攻多日，但因日军武装精良和难以得到充足的支援而于11月5日撤退。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中国已经进入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材料：

-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 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
- 七七事变

材料一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芦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芦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材料二　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

（1937年7月17日）

蒋介石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得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

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幸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7月份，第31页，美商华美出版公司1938年版。）

材料三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宛平城中国守军对此严辞拒绝。我驻守芦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奉命严密监视敌人，随时准备迎击日军的来犯。就在7月6日这天午后，营长金振中化装前去侦察，他来到距铁路桥五百米左右的日军阵地前，用庄稼作掩护，亲眼看到陈地内的日军，以芦沟桥为假想敌阵地，在做各种攻击演习，位于后边的是日军炮兵，他们如临大敌，紧张地在那里构筑工事。再后，就是正在行进的战车，车轮声震耳欲聋。金振中营长见此情景，立即返回，在营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要求各连队做好战斗准备，还向大家提出：一定在敌人进入我阵地百米以内才准射击，以确保杀伤效果，决不让敌人逃出我方的射击火网！

金振中，保卫芦沟桥战斗的直接指挥者。生于1902年，河南固始县人。早在1924年就跟随冯玉祥，以后编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参加过喜峰口战役，作战勇敢，受过师部嘉奖。1936年任营长奉命驻防芦沟桥，亲临战斗第一线与战士一起冲锋陷阵。为保卫芦沟桥提出："宁为战时鬼，不作亡国奴"的号召。

1937年7月7日，夜幕降临，细雨蒙蒙，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就发生在这漆黑的夜晚。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芦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的枪声而致使一名日本士兵失踪为由，要闯入县城搜查。驻城的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吉星文团长，"以值深夜，日军进城足以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经拒绝。"消息传到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处，他急忙派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方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但日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制造战端。他们一面诡称"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一面又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翌日晨5时，当谈判代表刚步入县城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猛烈的炮火袭击宛平城，并攻占了宛平城东北方的沙岗。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下令还击。从而举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所谓"士兵失踪"只是日本的故伎重演而已。"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就借口一名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失踪而挑起事端，占我沈阳，陷我东三省。其实呢?这位中村上尉并未失踪，只是背着他的上司去搞罪恶的勾当罢了。后来日本当局怕露了马脚，不得不偷偷把他遣返回国。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又是借口在军事演习中一个日本士兵失踪了，从而无理闯入我吉星文团防区，狂妄要

求搜查宛平，并且炮轰宛平城。正如冯玉祥将军在这次事变发生两周后对记者说的："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九一八的故伎重演于华北了。"

7月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犯，连续进攻三次，中国驻军冒着猛烈的炮火英勇奋战，打退了敌军多次猖狂进攻。战前，何基沣旅长动员战士英勇奋战。他说："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何基沣，河北藁城县人，出生于1898年10月，他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他作战勇敢，机智多谋，深受战士们的爱戴。他所统率的一一〇旅，共辖两个团，其一是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这团正在前方与日军交火，其二是二二〇团，与旅部驻在西苑，团长是谢世全。何基沣命令谢团长说："谢团长，今天你拿不下铁路桥，就别想来见我！"谢世全，三十岁出头，身高体壮，是一个疾恶如仇的威武军人。他大刀一挥，如同猛虎下山，带着战士就出发了。每人身带三大件：大刀、枪、手榴弹，向敌阵冲去。整个战场喊杀声震天动地，中日双方杀得难分难解。最先冲上去的孙连长，一气砍死六个鬼子，自己身上七处负伤。谢世全团在观音庙附近歼灭敌人一个连，并在芦沟桥地区的反复拼杀中，我军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上将。芦沟桥上的战果，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战士们豪迈地提出："誓与桥共存亡，决不后退！"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7月8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日军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们深刻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日本侵略者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愈益加强了他们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军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奋勇杀敌，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某天夜间，敌人以坦克向我阵地冲来，我以一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前进，将敌人的九辆坦克全部打退。

附近军民看到了自己的军队英勇杀敌。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的发动下，人们纷纷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进医院，送水送饭、搬运弹药的群众更是往来不绝。有的群众看到我军伤员，感动得落下泪来。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就在城墙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所有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愈加鼓舞了前线战士保家卫国的壮志。

芦沟桥的炮声对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是一次空前深入广泛的动员。此时，北平西山的大觉寺正在进行学生的军事夏令营，内容是学习关于游击战的知识。前方的消息传来，学生们立即返校，投入到广大军民的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中。正在西苑接受军事训练的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要求立即上前线，投入战斗。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应届毕业生，退回了本省寄到学校的聘书，留在北平投入抗战。"

当时，北平城区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宣传队、劳军队、募捐队。7月9日，民先队、北平学联、华北各界救国会、北平作家协会、北平妇女抗日救国会等二十九个团体组成了"北平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其常设机构由民先队总队长李昌负责。北平学联7月13日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当时还组织过捐献十万件背心、一万包茶叶等活动。儿童们省下家长给的零用钱，为抗日发起捐献"一大枚铜板"运动。这些，都有力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杀敌勇气。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共中央的号召，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开战以来，二十九军将士，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的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的经费。有不少国民党的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芦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进攻中，仍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而夺取平津以至囊括华北的阴谋；它宣称华北事

件可以"局部解决"，对宋哲元采取威逼和诱降兼施的办法。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在其主子的号令下大肆活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为他们的主子日寇效忠的大好时机。汉奸齐燮元，过去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现在又亲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还乘此机会秘密进行逼走宋哲元而使冀察进一步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而就在这威逼和诱降兼施的烟幕下，日寇却更积极地策划大规模的侵华战争。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即调动十万陆军来华；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议决动员侵华日军四十万，侵华规模进一步升级。

在日本帝国主义燃起战火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紧急形势下，直接肩负着冀察军政重责的宋哲元，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长期影响下，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他把日军的大举进犯仍看作"局部的冲突，能随时解决"。这种苟安的心理，和蒋介石仍想寻求"外交解决"的侥幸心理一样。因此，在华北军民坚决抵抗日军的同时，宋哲元仍在日本的欺骗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谈判。

就在谈判过程中，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捷足先登，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从海道送来的大批日军也由塘沽口紧急登陆，热河省的日军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在空军方面，日本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当日本援军调齐后，便又开始向我大举进攻。

7月21日，日军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7月25日，炮击我廊坊驻军；26日，日机十余架猛烈轰炸廊坊。同日，北平广安门外有三十多辆汽车满载日军，企图冲进城内。27日，日军一面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于28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尽；一面就于当晚猛攻南苑和北苑。28日，日军继续猛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守军死伤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城内转移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宋哲元于28日晚自北平逃往保定。7月30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天津也在日军的猛攻下，同日弃守。沦陷后的平津，又成为日军进一步进攻华北和全中国的重要基地。

芦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全面抗日战争便从此开始了。

（选自《抗日战争实录》，作者：解力夫）

国共合作谈判

背景介绍

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做出过巨大努力，仅1937年就与国民党进行了三次谈判。

第一次国共谈判是在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谈判中心是红国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国民党基本接受我军提出的编制、人数方案，即将红军编为3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但反对我方设总指挥部，坚持改编后的红军的管理教育必须属国民党行营。并要求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领导。取消民选制。谈判未有结果。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进行第二次国共谈判。周恩来重申我党的立场，表示如果国民党能够彻底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共产党可以拥蒋抗日。蒋介石表示原则上接受我党在红军和边区问题上所提的条件，但却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个人合作。并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了，具体问题容易解决。周恩来未正面回答，而表示为保证两党合作到底，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和适当的组织形式。蒋介石要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再作商谈。

第三次国共谈判在是年6月间，由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在庐山举行。我方草拟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但蒋介石却抛出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方案，他自己为主席，委员由国共两党推同等人数组成，凡事由他最后裁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指出，共同纲领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政治基础，只有先确定了纲领，才能进一步商谈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

七七事变后，我党又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并于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但蒋介石迟迟不肯公布这个宣言。日本进攻上海后，蒋介石受到严重威胁，急于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表示同意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就职通电。9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按照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搁置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将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团结救国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此为标志，

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新的历史篇章。

国共合作的再次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表明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民心不可违背，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坚强意志必将战胜一切倒行逆施，并将赢得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

材料：

-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材料一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937年2月10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新中华报》1937年2月13日出版。)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解放报记者以共产党中央最近由南京中央社广播发表之宣言，影响中国时局甚为广大，特请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发表意见如下：

“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9月22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9月23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氏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

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蒋氏谈话中尚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尚没有能坦白的承认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不免遗憾！共产党的宣言及蒋氏的谈话，宣布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启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用以极大的增强抗日战争的力量。这个宣言是一个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本应早日发表，还是在7月4日起草，7月15日就交付国民党了的，可是推迟了两个多月才发表，然而宣言的基本精神是没有损失的，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其基础。”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实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

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然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诚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受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民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势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呀！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材料三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1937年9月23日)

蒋介石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世界明达之士，必能深切了解之也。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66页。)

材料四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潘汉年舌战陈立夫

国共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溶共”。因此，在谈判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电给正在西安的潘汉年，任潘为中央谈判代表。10月初，潘汉年携带我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来到上海，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晤谈，张冲也在座。潘汉年将周恩来致陈氏兄弟、致蒋介石的信，当面交给陈立夫。潘根据我党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的内容，阐述了中共的意见。陈立夫转达蒋介石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其他都好办。

潘汉年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谈判条件。陈立夫再次强调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还表示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潘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

中共中央从这次谈判中，进一步弄清蒋介石的企图，是用谈判方法收编红军。决定一方面在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内部推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活动，一方面军事打击蒋军，迫蒋妥协。

蒋介石在布置军事“剿共”的同时，仍企图在谈判桌上压我就范。11月16日，陈立夫第二次邀请潘汉年去南京会谈。17日，潘汉年到南京。19日，陈立夫即与潘汉年会谈。陈立夫说：蒋介石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陈传达蒋介石的意见，打电报给我党中央。接着，陈立夫竟说：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据理反驳，指出：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陈立夫又表示：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弃除成见。潘汉年将预先抄好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交给陈，并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国共两党合作之参考。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四个条件时，陈立夫竟抵赖说：“纯属子虚。”

这次会谈没有进展，蒋方将曾养甫所提四个条件也推翻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围绕着如何处置蒋介石，各方力量积极活动。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局势，认为在众多的矛盾中，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仍需坚持逼蒋抗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提出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旧仇，拥护蒋介石作全国抗日领袖。张学良、杨虎城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西安城两党开谈判

1937年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谈判。

中共代表团拟定的谈判方针的基本精神是：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时，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军队中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但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2月12日下午，周恩来与顾祝同正式面谈。

16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红军人数“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关于干部“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应由中央派充也”。“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顾祝同、贺衷寒等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谈判中坚持红军编制两个师。经过激烈的争执，双方商议红军编制三个师。

3月8日，谈判双方都认为意见已大体一致，决定由周恩来将1月来的谈判写成一总结性条文，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

3月11日，贺衷寒竟提出红军缩小至二万余人，红军改编后，副职干部由国民党方面派遣；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方面的一切命令等。这实际上是“收编”性提案，实质是企图使中共放弃独立性，变成国民党的附属品。周恩来阅毕很愤慨，当即报告中共中央。

3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回延安开会，行前，顾祝同、张冲向周恩来口头表示他们两人也不同意贺衷寒写的条文，赞同周恩来直接面见蒋介石。

西安谈判只解决了红军改编成三个师，和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

国民党对红军的军饷接济从3月份开始。

周恩来两上庐山

6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举行第一次庐山谈判。

6月4日，周恩来携带我党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十三个问题来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多日。周恩来向蒋介石询问和讨论了保卫绥远、反对走私和全国性的国防军事财政的准备，以及太平洋集体安全等问题。

在谈到红军编制和人事问题时，周恩来坚持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蒋介石却主张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朱德、毛泽东出洋。周恩来严词拒绝，跟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从中往返磋商，蒋仍坚持设政训处指挥军

队。

蒋介石这些意见的实质是妄图控制中共、红军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限制束缚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谈判未获结果。

7月中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举行第二次庐山谈判。

7月初，蒋介石、汪精卫函请各方人士去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人士对国事的意见。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邀周恩来去庐山。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赴庐山，但没有参加庐山谈话会。

庐山谈话会期间，爆发七七事变。中共竭力促进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向各方表示诚意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7月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天中共中央派南汉宸以毛泽东和红军代表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7月9日党中央要叶剑英答复救国会及各方领袖，请他们努力同政府、国民党党部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此时，中共中央与上海、太原、广西、四川、贵州等地都有电讯，申明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谈判。谈判会上，蒋介石表示：中日开战后，宣言即可发表，但仍坚持三个师以上不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或指挥部，设立政治部指挥军队。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方面派。蒋介石还在政治主任的人选上要花招。周恩来严肃表示，蒋介石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这次谈判仍无结果。

重合作两党发宣言

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蒋介石、康泽举行第一次南京谈判。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

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南京政府认为对日全面战争开始，指令中央军奋起抗战。蒋介石早就许诺一旦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就发表中共宣言，在全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康泽提出要修改中共宣言，蒋介石同意康泽意见，交康泽修改。中共不接受康泽提案。蒋介石为了调遣红军上抗日前线作战，接受了中共有关军事方面的条件。8月19日双方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率三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及至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行派配，南京政府对三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一名联络参谋。达成协议后，周恩来、朱德即在当天离宁返洛川，叶剑英留南京继续交涉。

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于9月中、下旬进行第二次南京谈判。

原决定周恩来、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参加谈判。9月18日，中央令周恩来、彭德怀速返太原，和阎锡山交涉八路军进驻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等项问题。因此，周、彭没有参加第二次南京谈判。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和康泽当面商议宣言稿的修改问题，经过激烈争执，最后在宣言稿中写进了中共提出的三项政治主张。

双方通过宣言基本内容后，博古代表共产党，康泽代表国民党在宣言稿上签字。

9月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的公馆里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宣言。

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郑重申明发布这个宣言是"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国共双方"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

（节选自《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洛川会议

背景介绍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明确指出：7月7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现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坚持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会议提醒全党同志，由于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政策，抗战

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折、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以及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洛川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下，实行全国军事的和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等。这是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动员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纲领，也是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思想武器。

洛川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在敌人后方，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担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广大农村，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

洛川会议是抗战初期党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项决定，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为红军实行战略转变、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做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准备，并对迎接抗战的新高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材料一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

（一）卢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一切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

（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五）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

（六）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和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八）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858页）

材料二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8月25日）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文如下：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

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除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相协定。

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战线。

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429页。）

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抗日

背景介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经过我党的努力和斗争，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称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等三个师，共约三万多人。同年十月二日，原留在长江南北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共一万零三百人。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前线，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秋，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相继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抗日游击队，进行抗日战争。

材料：

- 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
- 红军主力改编与出师
-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与挺进敌后
- 云阳誓师救中华
- 关于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的指

示

· 刘伯承三原誓师

· 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

材料一　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等部，改编为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副主任。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材料二　红军主力改编与出师

根据国共两党会谈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南京政府颁发了红军编为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番号。同日，红军总指挥部命令红军分别由宁县、孟坝、合水、镇原、宁阳等地集中三原，进行统战政策、改编意义教育，进行整编。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下达改编命令。任命朱彭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月二十九日，中央书记处指示，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分会，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

改编前，驻陕甘宁地区红军分为五个系统，统归军委指挥，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第一方面军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共两万四千人。第二方面军，辖第二、第六军团，三十二军，方面军直属队，共一万一千五百人。第四方面军，主力去河西，留陕甘者，有第四军，三十一军，援西直属队，共一万四千八百人。陕甘宁地区主力部队，八千七百人，地方部队五千三百余人。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共五千人。总计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前实有兵力七万四千四百余人。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七十四师，编为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下辖第三四三旅，第三四四旅，及炮兵辎重，骑兵教导大队四个直属营。第三四三旅，由第一军团编成，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辖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德志、副团长邓华）、第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三四四旅由第十五军团编成，旅长徐海东，辖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第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全师共一万五千五百人。出师后不久又组建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

第二方面军及陕北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个营，骑兵团，编为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教导团，及特务、工兵、炮兵、辎重、骑兵五个直属营。第三五八旅，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二十八军编成，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第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第三五九旅由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三十二军等部编成。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旅辖第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福）。教导团团长彭绍辉。全师共一万四千人。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队编成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及教导团和特务、炮兵、辎重、工兵、骑兵五个直属营（由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等部编成）。第三八五旅，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编成，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彪。辖第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第三

八六旅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编成，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旅辖第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

红军改编后，于八月下旬陆续开往山西前线。第一一五师于八月二十五日举行誓师大会，由陕西三原出发，三十一日经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由侯马乘火车北上，于九月十四日到达晋东北原平，在大营集结。第一二〇师于九月二日在陕西富平、庄里镇举行誓师大会，三日出发。师部率第三五八旅，于九月二十八日集结于晋西北管涔山脉的神池、八角堡地区。第三五九旅旅部率第七一七团，随八路军总部开赴五台、平山地区。第一二九师于九月六日开誓师大会，九月三十日师部率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及第三八六旅，分别由富平县庄里镇和三原县南桥头出发，沿一一五师行军路线，经榆次，转正太路，十月十八日进抵平定以东地区。

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将三个主力师直属营（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一二九师的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该旅的第七七〇团，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的第七一八团，共九千余人，留守陕甘宁。实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一一五师约一万四千五百人，一二〇师为八千二百人，一二九师为九千一百六十余人，总共约三万二千人。

在红军改编时，为适应国民党编制要求，根据一九三七年五月党的苏区代表议会关于组织问题决定的精神，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经过一段实践证明这一改变，不利于部队建设。为加强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经朱德、彭德怀提议，中央军委批准，我军于十月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军委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后由罗荣桓接任），关向应为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接任）。军委还任命，肖华为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为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谢富治为一二九师新三八五旅政治委员，王新亭为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

（选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

材料三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与挺进敌后

继红军主力改编后，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陈毅与项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四十六师代表谈判。八月底，项英到南昌，同江西省府代表达成协议，议定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项返回游击区后，即令各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准备集中。

各部队在谈判改编过程，绝大多数坚持了原则，但也有少数游击队，对国民党的阴谋缺乏警惕，受了损失。活动在闽粤边的游击队，由于特委代理书记、红军三团团长何鸣在与国民党第一五七师谈判时，答应将游击队改编为保安队，归一五七师指挥，将部队一千余人撤离根据地，开到漳浦县城集中，结果被国民党军队于七月十六日包围缴械。以后虽经中央交涉，武器送还，但人员失散。活动在闽中的一支游击队约百余人，也由于同样原因，被国民党骗到莆田城内缴械扣押，后经交涉获释，但大队长遭杀害。湘鄂赣游击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后经中央指出，才“礼送”出境。此外，还有的游击队，坚持“左”倾关门主义。如活动在赣东北弋阳磨盘山地区由杨文翰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一直拒不下山，还杀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活动在赣东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杀害了前去做工作的红军第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这两支游击队后来都被国民党消灭了。

鉴于上述情况，党中央又连续发出指示，具体指导了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毛泽东电林伯渠转告董必武，指示湘鄂赣区，与国民党谈判时，记取何鸣部教训，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我军任职。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电周恩来等，指示各区，谈判时须坚持以下原则，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要依靠山地，不得重蹈湘鄂赣、闽粤边覆辙。十月一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张云逸等，令其通知各游击队，部队集中时，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须经中央派人传达方针；二、驻地二百里内对方驻军调离。中央还批评了项英在南昌答应红军无条件集中的做法。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根据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当局宣布，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中央决定，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为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开始在南昌办公，全军共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和赣东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支队辖第一团，团长傅秋涛兼任，副团长江渭清；第二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

第二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和浙南等地的红军

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承，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支队辖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星；第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

第三支队，由闽北和闽东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支队辖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

第四支队，由鄂豫皖边和豫南桐柏山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支队辖第七团，团长杨克志；第八团，团长周骏鸣；第九团，团长顾士多；手枪团，团长詹化雨。

此外，将湘南、闽中等地游击队，编为军部警卫营。全军共计一万零三百余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新四军限期集中安徽南部歙县岩寺地区。三月起，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及军部陆续向皖南岩寺集中，军部于四月四日由南昌移驻岩寺，后进驻泾县云岭。第四支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由支队部率第七、第九团，在湖北黄安（现名红安）七里坪集中，第八团在河南确山竹沟集中，二月出发，三月中旬全支队会合于安徽霍山西的流波疃。部队集中后，陆续向江北敌后挺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选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

材料四　云阳誓师救中华

八月的一天上午，独立团到达会场。会场设置在镇外一片稍稍倾斜的山坡上，西边是主席台，台子是临时用桌子拼起来的，主席台上方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红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左侧竖一块门板，上面贴着《红军抗日出征誓师词》，字字硕壮有力。

云阳是个弹丸小镇，人口不多，今天忽然聚满各路红军，小镇也变得大为壮观。会场四周，竖满标语和旗帜，镇里的乡亲全惊动了，连多年不出门的老大爷也骑着牲口来观看，孩子们则爬到屋顶和树杈上，挥舞着小彩旗。每支队伍入场，四周都轰响一阵响亮的口号声：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改编命令！”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兄弟姐妹齐奋起！”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

口号声中，战士们举起枪，乡亲们挥舞着小彩旗。真是：其声壮如天鼓，其势如汹涌海浪。

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同志骑马从镇上赶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换上了国民革命军军装，腰扎牛皮带，打着绑腿。他们后面，跟随着几位政府人员和一些爱国人士。走上主席台后，他们时而环视会场，时而向熟识的同志招下手，交换一下笑容。

我挺身朝四周一望：嗬！指战员们多神气啊！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多年没见过这么多部队和战友了，今天聚集在一起真是难得。这是出征前的欢聚，是胜利的前奏！我非常兴奋，为我们的力量而自豪。

大会开始，先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

依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结果，中国工农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前敌指挥部将改为八路军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左权同志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同志为主任、邓小平同志为副主任……

周围的人都在屏息静听，眼内闪耀着严肃的神色。天气很热，地面暑气蒸腾，人群内密不透风，身上的军装早已被汗水湿透，耳旁有粗重的喘息声。为了听清每一句话，人们不知不觉地朝前拥挤了。

讲话完毕，罗荣桓同志亮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说：

“同志们，父老乡亲们，东三省已沦入敌手，现在华北危在旦夕。日军正想越过黄河，侵占全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为了不亡国灭种，每个中国人都要奋起抗战！红军就是抗战的先锋……”

最后，罗荣桓同志高高擎起拳头，在烈日下率领我们全体战士，发出了整齐的誓言，也就是《红军抗日出征誓师词》：

“……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誓做抗战先锋……”

（杨成武《敌后抗战》）

材料五　关于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致林彪等）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

1. 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一一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2.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3. 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4. 一一五师现到何处？

材料六　刘伯承三原誓师

一、大雨滂沱

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又于1937年7月7日突然向北平(今北京)西南郊芦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实行它以武力吞并中国的计划，史称"芦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抗击，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了又一个高潮。事已至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外爱国人士久已提出的要求，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停止内战，开始抗战。

中国共产党履行自己的许诺，取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根据两党的协议，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这改编又是缩编，八路军只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其他两个师是：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后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聂为政委)。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

一二九师集结于陕西省三原县境内。举行誓师大会那天，忽然乌云密集，下起雨来，看样子雨越下越大，负责指挥誓师大会的陈赓旅长和参谋处长李达请示刘伯承，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刘伯承一口回绝了：

"不行!军人就是要风雨无阻，定了就不能随便改，今天誓师抗日更不能改。"

李达将军后来一直担任刘邓大军的参谋长，他在他的《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书中写道："刘伯承"平时总是讲，作为一个军人，就要风雨无阻，要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气概。尽管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这一回我的体会更为深刻了。"(所引书第4页。)

雨果然越下越大。刘伯承在大雨滂沱中向部队讲话。一个警卫员走上去给他披雨衣，他推开了，回头对那位警卫员说："大家都在雨里，我怎么能一个人穿上雨衣呢?"会后他向司令部的人员说："指挥员要跟战士们同艰共苦。诸葛亮就说过：'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副司令的杨国宇将军对我们说："当时我在场。那时我是司令部的译电员，亲耳听到了这句话，至今记得。"又说："刘帅就是这样随时随地教育部属，教军事，教政治，也教文化。他不仅是一位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教育家。办军事学校是教，日常也在教。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后来我们长期叫他'师长'。"

这话说得很对。他确实不放过一切机会言传身教。他勤于读书，就影响了他左右的人。他熟悉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与众同也"这句话见于诸葛亮《将苑》中的《将情》篇。全篇文字不长，不妨抄在这里："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张，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刘伯承一生带兵，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岁月，尽管他年近半百，比他的部下年纪大得多，又曾多次身负重伤，依然坚持跟大家一样吃"砖头"——那是一种用红高粱或黑豆面加野菜、树叶蒸成的菜馍馍，又黑又硬，大家称之为"砖头"。

誓师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换帽子。红军的帽子上缀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现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帽徽是圆形的青天白日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有些红军老战士气得直流泪。跟国民党打了十年仗，现在却要换上国民党的军帽。甚至解放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战士也憋气，纷纷议论，说我们戴红军帽还没戴暖，又要戴上原来的帽子了。(参看陈锡联文，《刘伯承回忆录》第三集，165页。《陈赓日记》，10页。)

刘伯承在大雨中的讲话，就针对这一点，讲了团结全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而改编的道理。他说部队改编只是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又说：现在要改穿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服装。要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继承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他取出黄色帽子来自己先换上，然后大声命令道："现在换帽子!"(见：宋任穷《刘伯承同志永生》；及上引李达书与《陈赓日记》。)

当红军还在改编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展开了全面进攻。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单纯从正面防御，抵挡不住，纷纷败退。中共中央早已估计到未来华北抗战的坚持，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等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便命令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先行出师。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奉命最后出动，于1937年10月初到达陕西省韩城的芝川镇。这时，一一五师已经在山西省东北正太铁路附近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稍后，一二〇师也在雁门关一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一二九师全师13000人。一部分主力被留下来编成陕甘宁边区的留守兵团。刘伯承带上前线的是一个旅和另一个团，9000多人，实际上是一个旅的兵力。

刘伯承率先遣团行动，来到黄河渡口。参谋人员在河边跑遍了，没看到一条船。刘伯承叫人把国民党的地方官找来。来了两个人。刘伯承问为什么西岸没有船?来人答道："我们不知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刘伯承啪的一声拍着桌子，厉声问道："你们认识我吗?"一位参谋介绍了他的官衔和姓名，两人忙说："刘将军的大名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

"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大怒道："什么

荣幸不荣幸。我们奉命渡过黄河上前线抗日，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个小时内把船调齐，不然我们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

红军人员没见过这种事，更没见过刘伯承这种架势，问道：“师长，我们可从没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啊！”

刘伯承笑着答道：“我在旧军队干过几年，知道国民党这些官儿们的脾气。他们欺软怕硬，看势头办事。我吓唬他们一下，叫他们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何况，这次很可能是国民党和阎老西那班人捣鬼，故意刁难我们。”他说的阎老西是山西省的土皇帝阎锡山，那时他是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由于没有船，口粮不够吃，有些战士发牢骚说：“老子饿着肚皮怎么抗日！”团干部们请刘伯承讲讲话，做做思想工作。晚饭前，他来到集合好的队伍面前，大声说道：“同志们，我先宣布一件事，我已经叫国民党的‘父母官’去找船了，明天拂晓一定全部渡过黄河。”战士们热烈鼓掌，打断了他的话。“哈哈，你们饿着肚皮，还有这么大的劲鼓掌哪！”

他接着说：“我们当红军是饿惯了的。现在当八路军，也不能指望国民党能给我们多少东西，还得准备饿肚皮。我们一起宣过誓，不赶走日本强盗不回家。日本鬼子可不会因为你饿肚皮不打你，等你吃饱了再拚刺刀。同志们要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精神，坚持坚持。过了黄河，就有办法。可能有同志要说，你倒说得轻巧，你有啥子办法解决肚子问题哟？我们四川人的办法叫做饭不够，米汤凑。”这话说得全场大笑，大家顿时振作起来。

刘伯承派了两个参谋跟着那两个“父母官”去找船，当晚就把船找齐了，部队第二天拂晓过了河。

二、牛皮不是吹的

果然是阎锡山那班人捣鬼。部队过河以后到了同蒲铁路上的侯马。阎锡山拨来一列火车，还派人送来一批棉衣、棉鞋、大衣、米面，装了好几节车皮。但是，火车开出一个多小时，越走越慢，干脆停下来不动了。司机检查了一阵子，说是水箱漏了。有人说：“咱们下车走吧。阎老西这几车东西，咱们不要了，给他留下。”

刘伯承想了一想，说：“不。他巴不得你不要。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偏要来推推火车。”停车的地方离汾河不远。他命令把火车推到汾河边上灌上水，派人押着火车头往前开，看哪个站上有车头，换一个开回来。部队在原地休息，等换了火车头来再走。刘伯承平日手不释卷，却不是个书呆子，阎老西那班人这回又没有难倒他。人们把这台得了胃穿孔的机车灌满了水，押着开了二百多里，终于在霍县车站找到了一台完好的机车。

刘伯承带兵通常总是走在最前面。他坐在第一辆车厢里，一路上给团干部们上课。这回担任先遣的是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那年还是个24岁的小伙子，原任红十师师长，这次缩编，当团长，全国解放后授衔为上将。他在《刘师长带领我们出师抗日》一文中，讲了当时的情形。

包括陈锡联在内，这些红军指战员都没坐过火车。刘伯承历来十分重视通讯联络，他常说：“没有通讯联络就没有指挥。”在火车上怎么办呢？他叫他们从列车车头到车尾拉上电话线，而且要复线。他说，车上不搞好前后的联系，后面车厢掉了还不知道。现在虽然国共合作了，还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汉奸特务的破坏。他自己还不时去摇一摇，听一听通不通。

然而，这不是刘伯承讲的主题，一路上他讲的主题是游击战。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完成从内战时期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今后的作战对象与过去不同，因此作战方式也不同。在敌强我弱，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形势下，我们主要靠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他说：红四方面军有好传统，作战英勇果敢，坚决执行命令，但是在战术上习惯于正规战，特别是阵地战，现在就要努力学习游击战。他引用《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句话，说：知己，就是要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知彼，现在就要抓紧把敌人的装备、编制、训练、战术都了解清楚。日本侵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军队，装备精良，除了有飞机大炮，还可能施放毒剂。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关于战前的准备工作，这支部队过去不重视沙盘作业。一路上，刘伯承多次给以指导。有时在村边道旁，摆上几堆沙子，蹲在地上讲解。在车上，他就用眼镜盒和茶缸当“部队”。他一边摆一边说。他叫他们注意八路军将以山西为根据地，而山西主要是山地。山地固然便于荫蔽，便于打游击，但是地形复杂，要好好去调查地形，熟悉地形，不然，行军作战都可能摸不清东南西北（见上引陈锡联文）。

三、五十五把刺刀

车到太原，刘伯承进城去见了阎锡山。

太原的气氛已经很紧张。日军飞机不时来轰炸、扫射，还听得到远处传来炮弹的爆炸声。战局正在急剧变化。占领了平津（北平和天津）的日本侵略军继续南犯。太原已处于敌军两路钳击之中。北面，经雁门关南犯之敌已陷代县、原平，正向忻口进犯。东面，经保定南下之敌在攻占石家庄之后，正进逼娘子关。

刘伯承见了阎锡山回来，在车上对陈锡联说：

“虽然国民党提出了保卫太原的口号，但是看形势，太原是一定要丢的了。阎锡山已经准备向河西搬家。大批

国民党军队没怎么打就溃退下来。现在要保卫太原，必须用'扼咽拊背'的办法。所谓扼咽，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忻口方面，阎锡山的部队在正面进行防御作战，要求我们配合。我们拊击敌人的侧背，就可以起到牵制作用。"他叮嘱陈锡联："第一仗要特别慎重，而且一定要打好。"

"我们团的具体任务呢？"陈锡联问道。

"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我下车以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不了解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

这段铁路，从太原往东，修到东冶为止。东冶有个河边村，是阎锡山的老家。刘伯承在东冶下车以后，给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作了动员报告。他先讲了华北战局，然后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敌后，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寻找战机，牵制和打击敌人，支援忻口友军。"

他的主旨还是讲游击战。他说他这次在太原拜访了阎锡山，很客气地称呼他"阎长官"。"我说，我们现在在阎长官领导下抗日，感到很荣幸。他说：我们的部队在忻口方面受日军的压力很大，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我说，我们一二九师开到前线，就是要配合友军作战的。只是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十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些枪械弹药。可是阎锡山说，我们的武器弹药都发完了，抽不出来。我说，阎长官不拨点儿补给，对敝师作战很不利呀。他说，兄弟眼下也很吃紧哪，希望刘师长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在忻口北面的军械库被日本人给端了。我们对贵师也是尽了力的。比如七六九团只有三千人，我们就拨了五千套棉衣。同志们，阎锡山的特务工作倒是搞得满好的。原来我们在侯马上火车的时候，他早就派人给我们过了数的。"

刘伯承接着说道："今后，我们的武器弹药，要靠从敌人手里去夺。我们现在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差，又不能依靠国民党，打仗也不能硬拚。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后要进行的，就是毛主席说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现在日本鬼子不是左右两翼钳击太原吗？我们把部队开到鬼子的侧背，瞅准机会，在鬼子的这把'钳子'上狠狠打它一下子。"

这里，让我们介绍一下一二九师的武器装备。李达将军写的《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那本书中有详细的数字，这里略引几个。人员：9367，步枪：3412 支，马枪 724 支。除了还有少量轻重机枪和其他枪支，步马枪合计，两个人摊不到一支枪。李达写道："从上面列举的这些数字，特别是刺刀和手榴弹的数字，可见我们当年开赴抗日前线时是何等艰难。"刺刀多少呢？55 把。手榴弹呢？203 枚。

四、二十四架飞机

凭着这样的装备，八天之后，陈锡联就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夜袭阳明堡，炸毁日军飞机 24 架，使急欲攻下忻口的日军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从而支援了阎锡山所部的作战，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是一二九师出师抗日的第一仗。我们再来讲讲这一仗。

刘伯承在东冶下车，前往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陈锡联率七六九团北进，前往忻口、原平北面的代县境内，寻机歼敌。他们在忻口北面约一百华里之处，看到日军飞机不断从头上掠过，向南飞去，显然是轮番到忻口、太原方向去轰炸的。他们判断，飞机场很可能就在附近。

当时，代县、阳明堡、崞县等处都驻有日军。正好有一位国民党晋绥军的团长，带着队伍刚从大同方向退下来。陈锡联便去拜访，想打听一点情况。不料那位团长只说了一句："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我们没有打就完了。"说罢，不住地摇头叹气。陈锡联只好再去找当地居民询问，得知在代县城南二十多里的阳明堡，确有敌人的一个飞机场，有 24 架飞机，其中有 8 架还是大家伙。陈锡联便同三位营长化装成老百姓，带上电台，尽量抵近机场实地侦察。机场在阳明堡西南两个小村庄之间。他们悄悄爬上一座小山，用望远镜观察，看见敌机每次三架一组起飞。机场警卫部队约 200 人，防卫工事只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总的说，防卫不严密。

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几乎可以说所向披靡。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让它吃了个大亏，它也还没警惕，根本没想到八路军会绕到背后来揍它，因此对后方的警戒确实不大在意。

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等人弄清了地形，分析了敌情，决定在夜间秘密行动，突然袭击。部署是：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击毁飞机；并以一部破坏阳明堡西南的公路和桥梁，阻止敌人出援。一营袭扰南面的崞县，牵制驻扎该县的敌军。二营为预备队。

夜晚漆黑。三营赵崇德营长率领两个连爬过铁丝网，摸进飞机场。十连有个战士摸到了飞机，悄声说道："好大的家伙！这回该我炸你了！"

十一连接近守敌的时候，敌人的哨兵发觉了，立即放起枪来。

赵营长命令："快打！"又喊道："快往飞机肚子里甩手榴弹！"有几架飞机顿时起火燃烧。

正在机场巡逻的敌军哨兵首先跑了过来。接着，又有一部敌军守卫部队冲过来。双方在并列的飞机中间展开格斗。如前所述，一二九师的步枪没有刺刀，这次又没带刺杀武器，只能用枪托同鬼子拚命。

不到一个小时，24 架敌机全部炸毁，并消灭敌军守

卫部队100多人。驻扎在阳明堡的敌军香月师团的装甲车赶来增援的时候，三营已经从机场撤走了。

但是，赵营长和十几位战士牺牲了！赵崇德年仅23岁，改编前担任团长，是一员虎将。李达在他的书中写道："此后多年，刘伯承同志还经常同我谈起赵崇德同志，为这位很有指挥才能的英雄的牺牲，感到十分惋惜。"

这一仗是1937年10月19日凌晨一点钟的事。九天前刘伯承曾指示陈锡联：不必先请示，可以边打边报，也可以打了再报。这次是先打后报。当天陈锡联的电报报告"计毁敌机20架"，又说："今早敌以两架飞机侦察我团驻地及向附近投弹。其余的飞机已损坏，未见起飞。"后查明，这个机场的24架敌机全部报销；电文所说的两架飞机，是由别的机场来的。

这里，请让我们讲一段并非闲话的闲话：

这个胜利，那些见了日本鬼子就向后跑的国民党将领根本不相信："就凭八路军那些破烂家伙，还能打日本的飞机？"

然而，从那天起，一连数日，忻口、太原上空没有敌机轰炸。国民党当局也怀疑起来，从太原派飞机到阳明堡机场侦察，看到了敌机残骸，这才相信是真的。然后，蒋介石颁发了嘉奖令，还发了奖金。但是，蒋介石政府不愿意发表新闻。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党的大部队望风披靡，共产党的部队却一再得胜，这个对照太刺眼了。可是阳明堡的喜讯已经不胫而走，整整一个月之后，国民党报纸上才不得不登了一条小小的没头没脑的消息：

"南京20日电：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敌空军侵略临时根据地，并炸毁敌机24架之消息，此间关系方面亦接得报告，业经证实云。"电头用南京是不错的。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还在南京，南京至12月13日才陷落。这"20日"是11月20日，离作战那天整整一个月。

五、"草船借箭"和"空城计"

夜袭阳明堡，打的是进犯太原北面忻口的敌军。这时，太原东面的形势紧张起来。东面沿正太路进犯的敌军两个师团（大体上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两个师），一部分兵力从正面猛攻娘子关，一部分兵力由河北、山西边境的侧鱼镇沿正太路南侧大道西犯，向娘子关实行迂回进攻。国民党几万军队阻挡不住，纷纷败退。娘子关告急！

一二九师决定绕到进攻娘子关敌军的侧后，寻机歼敌。

娘子关东南，由侧鱼镇通向平定城的公路上，有个七亘村。10月22日，七七一团奉命赶到七亘村附近的营庄布置阵地。正当他们赶修隐蔽工事的时候，被敌机发现，敌人当夜就来偷袭。七七一团警戒不严，仓促应战，受到了损失，一时与师部失去了联络。

七七一团已经七八个小时没有音讯了。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们到七亘村那边去一趟。找找失去联络的部队，再看看地形。"

下午，他带着李达等一行三十几个人，来到七亘村附近的山岗上。他选好一处高地，警卫员架好了望远镜，他仔细观察四周地形。这时对面山后忽然传来枪声。枪声越来越近，看样子他们已被敌人发觉。刘伯承叫大家分几个方向撤走。话音未落，鬼子已向他们射击。这是一小股敌人。李达指挥警卫班把敌人压了下去。转移途中，刘伯承、李达等人沿山沟走，刚过了两道山脊，又发现几个鬼子端着枪向他们冲来。李达和警卫班一齐开火，把那几个鬼子击毙了。几小时后，总算摆脱了敌人，他们全体三十几人重新在预定地点集合了。后来成了日本问题专家、曾经留学日本的作家张香山，那时刚来到一二九师当敌工干事。刘伯承看了看他，笑着说："看你的样子，这是第一课吧？"

张香山打量了一下自己，笑了，回答道："是。好难的ABC！"

刘伯承依然笑着说道："不但是难，也很危险哪。我们和鬼子差不多打了个照面，连他们的胡须茬子都看清楚了。"

这时，一架敌机飞来，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大家劝刘伯承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别忙，我们再看看地形。"刘伯承通过望远镜观察了一阵，对李达说："你来看。我们在跟敌人演戏呢。"

李达用望远镜一看，原来在七七一团的阵地上，还有战士不时从防空工事里向外张望。鬼子的炮兵就在那架侦察机指挥下不断打炮。李达禁不住高兴，说道："我们的阵地还在那儿，看鬼子有多少炮弹吧。"

刘伯承正等着这句话，接着说："那些战士在演《草船借箭》，我们几个在演《空城计》啊！"

确实是演《空城计》，他们才三十几个人。

在联络中断了十四个小时之后，七七一团的线路恢复了。他们在电话中报告，由于警戒疏忽，等到敌人开了火，才仓促应战。包围过来的敌人是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和骑兵二百多人。我们的战士很顽强。有一名通信员冒着炮火三次冲进团部，把重要文件抢了出来。三连五班八名战士伤亡了七个，也没有退出阵地。全团一共伤亡三十多人。

刘伯承对李达说："告诉他们，受了损失不要泄气。部队打得很顽强，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五班的战士要表扬。部队迅速撤下来，到营庄、马山一带担任侧击敌人的任务，配合七七二团进攻七亘村，叫他们赶快与陈赓同志联系。"

安顿好七七一团之后，刘伯承对李达说："部队遭到袭击，这是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向周副主席写检讨。"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

委副主席，那时正在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同阎锡山交涉，并直接负责八路军的一切事宜。

刘伯承很快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于12月25日作了批示，电告集总和各师。集总即十八集团军总部，也叫八路军总部。

以上这段故事，引自前述李达将军那本书。书中记载了毛泽东这个批示的全文，照抄如下：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结合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的机械主义。"

毛泽东这个电报不仅一般地告诫全军不要骄傲，并且指出抗日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不过有些用语如"自称天下第一"、"目无余子"之类，好像是有所指的，而且必是高级干部。可能是谁呢？我们不由得想起二十年以后的一件事。1958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刘伯承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内容之一是批评刘伯承"迷信自己"。事隔二十年，两相对照，岂不是有某种蛛丝马迹可寻呢？

李达的书中，在引用了毛泽东这个电报的全文之后写道："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下级有了疏忽，没有责备他们，而是主动向上级写检讨。刘师长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崇高精神，我一直铭记在心。"李达说到这里便戛然而止。我感到似乎还有点儿余音袅袅，这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六、中学生的地图

现在说七亘村，那是日军从河北进攻山西平定城的必经之处。刘伯承经过实地勘查，看到那一带地形复杂，南北都有高山，通向平定的大道两侧，大部分是高十米左右的土坎，杂草、灌木丛生，便于埋伏，而敌人的队伍在公路上却不易展开。他决定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战。

陈赓旅长已经奉命率七七二团到达七亘村附近地区。刘伯承在电话上把七亘村的情况和他的意图告诉陈赓，指示他再仔细侦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陈赓经过进一步的实地侦察，把七七二团三营埋伏在七亘村东面和南面的公路两侧，最近处离公路只有十几米，最远也不过四五十米，手榴弹可以直接投向公路上的敌群。

不出所料，敌人来了。侧鱼镇敌人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上午九点钟左右，大部进入伏击区。三营发起猛烈冲击，机关枪和手榴弹从土坎上倾泻下来，敌人乱成一团。激战两小时后，小部分敌人和骡马逃回侧鱼镇，大部分被消灭，我军仅伤亡十多人。

得胜的部队从七亘村出来，许多干部和战士骑着东洋的高头大马，穿戴上了缴获的皮靴和钢盔，还有不少人穿上了黄呢大衣。解放后授衔为大将的陈赓在当天（10月26日）的日记中记道："伏击成功，计缴获骡马三百余匹，满载军用品。炮弹、子弹、无线电器材、干粮，堆积如山。一时群众欢呼，抗敌情绪突然高涨。但未得到俘虏兵，敌人死不缴枪，全部击毙，约三百人。日本武士道的作风，忠君爱国的欺骗，是有它的效果。"第二天记道："今日终日搬运胜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孔氏村、泉口及另一村公推代表携猪一只求见，说为庆祝第八路军的胜利。"（《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第26页。李达书注：日记中泉口应为川口。）

这是七亘村第一次伏击战。

刘伯承决定在七亘村再打一仗。他根据各方报来的情况，分析了敌军的意图和特点：日军侵略华北以来，一直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他们骄横得很，目空一切，更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敌二十师团急于侵占平定，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必然还要走七亘村。因此，他当机立断，指示陈赓在七亘村再打一次伏击战。陈赓依令而行，仍由七七二团三营主攻。跟上次不同的只是，上次埋伏在七亘村东面，这次埋伏在西面，让敌人过了七亘村再打。

果然，敌人又来了。这一仗，毙敌百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我伤亡20多人。

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两次伏击，这在军事史上是很少见的。

这一仗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两份军用地图，正是八路军渴望已久的宝贝。一份是华北地区军用地图，一份是山西省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明是中国印刷，显然是日军从阎锡山的军用仓库里抢去的。

刘伯承喜出望外，高兴极了。他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去了。他对八路军这么小气。对日本人却这么大方。"

这里请让我们声明，本书这一章，大量引用了前述李达上将书中的史料；有些叙述大大简化了，有些对话基本上照引全文。李达将军在记述了刘帅这几句话之后，还有一段说明：

"原来，当我师途经太原时，曾经找阎锡山要几份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他回答说没有。而我们以前用的作战地图，竟是袖珍本的中学生用图。了解了这个原委，就不难理解我们缴获军用地图后的欢快心情了。"

七、"重叠的待伏"

按照刘帅制定的军事用语，"埋伏战"应当叫"伏击战"或"待伏战"。继三天内在七亘村两次伏击之后，八路军又在一个星期之内，在敌军经昔阳向榆次进犯的路上，打了第三次伏击，刘伯承把这种打法叫做"重叠的待伏"。

1937年10月底，李达向刘伯承报告：经过侦察获悉，敌军一三五联队将由九龙关向昔阳进犯。刘伯承查看着刚刚缴到的军用地图，对李达说："一三五联队要到昔阳，必然要经过昔阳南边的南、北界和黄崖底。黄崖底是个河谷，正好埋伏部队。"他立刻下决心打，对李达说："这一仗让七七一团打吧。"

刘伯承直接指挥了这一仗。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从山顶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河谷。

那是11月2日。日军的一三五联队果然耀武扬威开过来了。等鬼子大部分进到河谷，从天而降的突然袭击，把鬼子们打得蒙头转向。这一仗毙伤日军三百多人，战马两百多匹。

在以后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八路军又在这一带打了两仗；在同一地区连续三次伏击成功。两年后刘伯承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本师（一二九师）部队在昔阳以东的黄崖底，伏击它一个联队的尾巴一次，在昔阳以西的土封口，伏击它一个联队的腰干一次，第一一五师又在土封口以西的广阳，伏击它一个联队的尾巴一次。这几次连接起来看，就是'重叠的伏击'。"他说：其所以都能成功，是因为"日本强盗的大部队，通常发一股牛劲，向其预定的目标执拗地突进"。这就是说，日军为了完成某一作战任务，往往不惜牺牲，如刘伯承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记吃不记打"。（引文见《对目前战术的考察》，《刘伯承军事文选》，150—151页。）

这重叠三仗的第一仗，刘伯承指定让七七一团打，其中寓有深意。部队埋伏在高地，只有几条羊肠小路通向河谷，因此不能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当时有人觉得不过瘾，说："就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要不就把鬼子全部消灭了，那才痛快哩！"刘伯承笑道："我们用火力杀伤了敌人这么多有生力量，也是个大胜仗啊！"刘伯承老于带兵，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如前所述，七七一团刚出马就遭到包围，吃了亏，所以这次让他们打个便宜仗。虽然胜利不很大，也可以缓缓气，振奋精神。打仗也如同排球队或乒乓球运动员进入比赛那样，第一局的胜败，对往后的作战至关重要。

当初，七七一团遭到包围，国民党第二军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将军也知道了。他给刘伯承打电话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了。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怎么行，还是撤吧！"刘伯承对李达说："游击战行不行，过后打给他们看看。"

正当一二九师第一次在七亘村痛击日军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却放弃了娘子关。汤恩伯又给刘伯承打电话，通报了这个消息，又说："你们也赶快撤吧。"刘伯承回答道："我们刚刚在七亘村报复了鬼子一下，打死了他们三百多人，抓了三百匹牲口。"

"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汤恩伯说。

"我们还准备在七亘村一带再打一仗。"

"好，好，我们等着贵军的捷报。"汤恩伯就这样仓皇撤走了。

八路军在晋东这几次胜仗，阻滞了敌军沿正太线西进的势头。可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太原终于在11月8日被日军占领。

这时，汤恩伯又奉蒋介石之命，到太原南面的榆次布置阵地，企图阻止日军继续南下。他刚到榆次东南一百多华里的榆社，就遇到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他自己也不敢前进了，又给刘伯承打电话。寒暄几句之后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今沁县）方向、西河底（今左权县城近郊）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汤将军，"刘伯承说："敝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敌情。"

"兄弟非常感激。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

"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说得很诚恳。

"唉呀，刘师长，你们一师人摆得这么宽，危险哪！"

"我们这是游击战哪！"

汤恩伯似乎得到了安慰，心情舒坦起来，说他久仰刘将军，很想跟刘将军见一见。

刘伯承应邀到榆社。两人一见面，汤恩伯就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

（选自李普《记刘帅》）

材料七　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遐迩闻名的北伐名将叶挺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领南方八省游击健儿奔赴抗日前线。叶挺是怎样就任新四军军长的呢？这话还得从1931年叶挺由国外回到澳门谈起。

叶挺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回到澳门居住的。在澳门，叶挺的生活很困难，常常靠借债和典当过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引诱叶挺，说只要他肯反共，就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他过去的一些同事，也怂恿他回到军队去做官。但是，叶挺宁愿过清贫生活，也不肯为国民党做事。他后来对别人说，"由于政府和国民党还在继续进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我既不同意他们这

样做，也不为他们工作。”同时，他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做事。

叶挺还时刻关注着国内的风云变幻，他十分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盼望早日回到内地，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党组织也一直惦记着他。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作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

这一天终于到来。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头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叶挺毅然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大陆迎接新的战斗。

7月间，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之后前往上海，与正在上海的叶挺见了面。久别重逢，两位战友都很激动。周恩来告诉叶挺，西北主力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很快也要下山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还以个人名义向叶挺提议，要他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他还提议，改编后的抗日武装番号就叫新四军，意在使这支队伍能够保持北伐时期第四军的“铁军”声誉，保持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红四军的光荣传统，这是新四军番号的由来。

一个月以后，叶挺的愿望得以实现。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但是，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另有企图的。这是因为在叶挺提出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建议时，国共两党也在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谈判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改编后的这支抗日武装由谁指挥。国民党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我党不同意，我党推荐的人选，国民党也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单方面委任了叶挺。

蒋介石以为，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这次回国，恐怕不会再替共产党办事了。因此，他想乘此机会把叶挺拉拢过来，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

对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看得很清楚。在叶挺被委任的第四天，10月1日，中央书记处在致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磨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对叶挺是否任新四军军长，电报强调，“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10月19日，洛甫、毛泽东又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来一趟。如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是可以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是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不太清楚，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

叶挺获知党中央的上述意见后，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向党中央当面汇报。

在此期间，叶挺已领回了新四军关防和五万元开办费，但没有呈报就职，他要等去了延安，得到党中央正式同意后再呈报。

在赴延安前，叶挺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地为筹建新四军奔走。

10月21日，叶挺为解决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有关事宜，同叶剑英一起去找蒋介石商谈。蒋介石态度蛮横，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叶挺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为此展开了一场舌战。

蒋介石气势凶凶地说：“各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还说，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叶挺反驳：“将他们开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这不行”。蒋介石粗暴地嚷着，“我估计他们不能调开的。”叶挺进一步晓以大义：“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蒋介石见叶挺不买他的帐，恶狠狠地说，“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江南。”他还当着叶剑英的面向叶挺挑拨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叶挺不为所动，他对蒋介石一味胡搅蛮缠，毫无诚意的态度非常反感，愤然提出辞职。蒋介石见叶挺态度坚决，也就软了下来，说具体问题可以找陈诚商量解决。

经过这次舌战，叶挺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抗日救国的，从而更加坚定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7年11月3日，叶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第二天晚上，延安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同志亲自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被深深感动了，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激动地

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在延安期间，叶挺还被毛泽东请去吃了饭，在毛泽东陪同下参观了抗大和党校。毛泽东还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询问他是否愿意重新加入党的组织，叶挺表示，暂时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通过这些天的考察了解，党中央对让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是满意的。叶挺经过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导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也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7年11月9日，叶挺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启程前往武汉，开始了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

（选自《历史大观园》88年1期，作者：东方沐）

平型关大捷

背景介绍

1937年7月底，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沿津浦、平汉、平绥铁路线分三路向我进犯。沿平绥线的进犯之敌是日军精锐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的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混成旅团。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8月25日，该敌攻陷南口，27日侵占张家口，并继续大举推进。山西战场形势危急。

按照中共中央部署，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于8月25日从陕西三源以北地区出发，经韩城东渡黄河，9月中旬开赴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这时，日军已进至涞源、灵丘一线，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晋北要地，将沿平绥线后撤之国民党军在平型关、雁门关等一线沿内长城布防，并要求八路军配合其正面防御。

9月下旬，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在重创国民党第三十三军之独立旅后，于23日占领灵丘；21日敌第五师团第9旅团占领涞源，向平型关推进，准备与大同南下的日军会合，进攻太原。我军为打击日寇凶焰，决定利用平型关天险隐蔽集结，从侧面伏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

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为晋东北交通要冲、长城隘口之一，地势险要。我军当时具体的战略部署为：以343旅两个团布置在小寨村至老爷庙，担任主要歼敌任务；以344旅的68团作为师预备队，并将师属的独立团、骑兵营配置在灵丘至广灵和灵丘至涞源之间箝制敌人，以保护全师侧翼安全。

9月24日夜，一一五师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9月25日晨，敌第五师团21旅团约四千人，以一百余辆汽车为前导，二百多辆大车居中，少数骑兵断后，沿公路向平型关推进。6时许，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区。当攻击命令发出后，埋伏在公路两侧山上的我军猛扑下来，向敌军发起突然攻击，日军顿时乱作一团，被击毁的汽车、马车堵塞了道路，敌人在我手榴弹、机枪、步枪和猛烈袭击下纷纷倒毙。随后，我军冲上公路，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敌人企图凭借汽车、水沟和老爷庙等地形顽抗。我军各团预备队迅速越过公路夺占老爷庙，将敌分割包围。在激战中，敌出动飞机助战，又以炮兵向我开火。但由于我军冲入敌阵，短兵相接，使飞机大炮失去作用。激战至午后，辛庄、老爷庙、小寨村一线山谷中敌军被歼，与此同时，由灵丘来援之敌也被我预伏部队阻歼。接着，我军又集中主力向敌军前沿阵地东跑池高地发起进攻，到晚间，又占领东跑池高地一部。由于国民党军八个团未按协同作战计划参战，次日，敌第五师团21旅团在蔚县之部进入平型关，由大同南下的关东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一部也经浑源增援，我军在此情况下乃撤出战斗。

平型关战斗经一天激战，共歼敌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约八十辆，大车二百余辆，缴获战马一百余匹，九二式步兵炮一门，步枪三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炮弹三千余发以及大批军用品；而我军伤亡六百余人。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给了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并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梅建华）

材料：

- 振奋人心的平型关之战
- 首战告捷平型关
- 大捷平型关中国欢呼八路军
- 血染英雄关
- 蒋介石对平型关战斗胜利发来的贺电

材料一　振奋人心的平型关之战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第一一五师便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经韩城东渡黄河，9月下旬抵达恒山山脉南段地区展开，准备迎击西进山西的日军。

当时，部署在平型关、长城口、茹越口、雁门关等地的国民党晋军达数万之众，统归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指挥；另外，还有高桂滋部和刘茂恩部约3万人，驻守平型

关、长城口至雁门关一线，协同晋军担任正面防守抗击任务。高桂滋部曾在长城口一带抵抗侵犯之敌，但因部队伤亡大，晋军又未及时支援，致使日军突破防线。嗣后，正面各防守要地的国民党部队纷纷向崞县、原平撤退。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气势汹汹，迅速推进到广灵、灵丘、涞源一线后，企图夺取平型关要隘，尔后与自大同南下之日军会合，攻占太原。

我八路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决心配合国民党部队，重创西进之敌。国民党军几个师、旅在平型关以北担任正面防守，我一一五师则隐蔽集结于平型关以东地区，从侧面伏击日军。

我军决定以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六八六团担任主要歼敌任务。六八六团部署在老爷庙至小寨（含）一线；六八五团部署在老爷庙东南一线。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在小寨（不含）蔡家峪至东河南一线打援；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师独立团、骑兵营分别在灵丘至涞源和倒马关、走马驿至涞源间活动，以保障全师翼侧安全。

9月23日，一一五师在上寨召开全师干部会议。会上，师首长作了战斗动员，指出：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国民党数十万部队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恐日情绪正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充分发挥我军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打出国威！会后，师主力立即赶往平型关以东约30华里的冉庄地区待命。

次日午夜，部队由冉庄出发，向预伏阵地开进。恰值天降大雨，部队既无雨具，又缺御寒服装，在崎岖的山梁、沟壑间摸黑冒雨急进。天放亮时，雨停了，部队也赶到了目的地。

当时，我任六八五团副团长。团长杨得志，参谋长彭明治，政训处主任邓华。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迅速按指定地点，以连、营为单位隐蔽集结，抓紧短促的待命时间，分别进行战前动员。彭明治照管部队，我与邓华去师指挥所受领任务（杨得志已先行一步）。

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是一长约15公里的峡谷古道，道沟宽不过三五米，仅容一辆卡车单行。道两侧部分地段是已收割过的庄稼地，再往外是一层高过一层的山峦峭壁。我们的部队就埋伏在古道两侧。干部战士身着湿漉漉的衣服，忍着饥饿，趴在冰冷的泥土、山石上，严阵以待。

我和邓华一路小跑来到了老爷庙东南的一个小山头上，师指挥所和三四三旅指挥所都设在这里。我们赶到时，师、旅首长正举着望远镜向预伏战场及两侧观察，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和副团长杨勇刚刚受领了任务赶往阵地。

师首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敌前梯队有几十辆卡车载着敌兵已于拂晓前通过老爷庙、关沟，估计已抵平型关晋军防守的山下；敌由灵丘开进的第二梯队现正经蔡家峪、小寨，向老爷庙开进中。师长林彪用手指向老爷庙西面的干河滩说，那里停有敌人十几辆卡车，你们马上回去，让担任第一梯队的突击营作好出击准备，待六八六团打响后，立即向那个停车场攻击，力求速歼该敌。随后，你团即向关沟、兴庄推进，扩大战果，以阻止平型关敌之第一梯队东援，掩护六八六团、六八七团围歼伏击地段之敌。同时，又可配合晋军对敌前梯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副师长聂荣臻进一步讲了这一仗的重要意义，要求必须打好。

我们迅速返回团指挥所（在师指挥所左前方），按照师首长的决心，组织部署兵力：营长刘德元、副营长胡炳云率一营为先头突击营，攻击敌停车场；营长曾国华、副营长王麓水率二营为第二梯队，视情况从一营左侧向关沟、兴庄方向攻击前进；营长梁兴初、周副营长率三营在师指挥所东南的山梁后隐蔽，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8时许，敌汽车、马车及掩护部队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战斗打响了。

我军似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拥挤在沟里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雪耻的手榴弹甩向敌群。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

战斗一打响，杨得志团长即令一营迅猛出击。一连是该营的突击连，连长曾贤生一跃而起，率队向干河滩上的停车场冲击。汽车上的敌人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死伤甚多，其余的纷纷跳下车来，或钻到车下，或躲到侧后，进行顽抗。

一连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用机枪和手榴弹向敌猛烈攻击，并乘机扑向以汽车为依托的残敌。经过一番白刃格斗，全歼残敌。一连也付出了血的代价，连长曾贤生英勇牺牲。三连为配合一连攻击，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就在一营围歼停车场之敌时，我从望远镜里观察到白崖台以东和停车场西南有两股日军，妄图抢占1363高地。如敌抢占了该高地，则可以火力控制老爷庙、关沟地域，还可居高临下，瞰射我师指挥所。六八六团之西段部队亦在其火力射程之内。情况紧急，我们当即令曾国华速派两个连，不惜任何代价，从东面先敌抢占该高地。

担任该任务的是五连和六连。我和二营副营长王麓水带着这两个连（还有营重机排）冲向高地。当五连指导员杨俊生率领突击排快接近山顶时，发现敌人从对面刚刚爬上山顶。五连连长曾宪生即令另外两个排从突击排的两侧包抄上去。突击排乘敌立足未稳，向山顶猛甩手榴弹。随后，突击排的勇士们端起刺刀，呐喊着冲了上去。刚刚爬上山顶的敌人，喘息未定便挨了炸，又见我军战士端着刺刀扑了上来，勇不可当，遂仓皇向下溃退。

我右侧之敌继续向山顶爬，正面溃退之敌也在其指

挥官的督战下向我五连反扑，遭到顽强抗击。这时，六连在连长周志辉、指导员曾广杰率领下也上来了。经激烈争夺，敌伤亡惨重，连滚带爬地向关沟方向溃逃。二营营长曾国华率七连和八连迅猛追击，将逃敌大部歼灭。

此刻，从关沟至蔡家峪的山沟里，枪声大作，人喊马嘶，响成一片。沟底、沟坡，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尸和马尸。被我击毁的敌汽车，东倒西歪，有的油箱被打着起火，整个车身正被熊熊烈火吞噬着。

经4个多小时激战，蔡家峪至关沟的1000余敌人全部被歼，敌100多辆汽车被击毁。师独立团第一营在腰站阻击由涞源增援的板垣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敌400余人，迫敌退回涞源，有力地配合了师主力作战。

我军稍事休整，即按预定方案，开始第二步推进，即六八六团攻击东跑池之敌，六八五团继续控制关沟、兴庄以及西山头阵地，以阻击敌先头梯队掉头东援。

东跑池，位于平型关以北，老爷庙以西。其西北1674主峰一线是国民党晋军防守阵地。当时，山峰四周云雾缭绕，能见度很低，用望远镜都看不清楚。据侦察人员报告，晋军已放弃东跑池一线，高山阵地被日军占领。又据报告，长城口也被日军轻而易举突破，敌似有向老爷庙迂回进击我军的可能。

此时已近14时。师首长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晋军一直按兵不动，我军若继续前进并仰攻敌人，势必付出极大代价，如长城口之敌向我迂回，我军则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于是，决定各部队立即停止前进，除负责掩护的部队外，主力撤离战场，分途向老爷庙、蔡家峪、东河南以南地区转移。

（陈正湘：《平型关之战纪事》）

材料二　首战告捷平型关

1937年8月26日早晨，连续五天的暴雨终于止住了。阵阵黑云渐渐散去，从黑云的隙缝中露出一道蓝色的天幕。渐渐地，云层的裂口越来越大，明净碧蓝的天空露出了一片灿烂。此时，从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上，马蹄声声，一支马队飞奔而过。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行色匆匆？

原来，马背上坐的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最高首领——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就在他俩参加洛川会议时，一一五师已奉命从韩城、芝川镇出发，渡过黄河，往山西前线去了。因此，洛川会议刚刚拉下帷幕，他俩便快马加鞭，追赶队伍。一出洛川城，他们一口气追出了60多里，这才放慢了速度。一马当先的林彪坐在他心爱的大白马上，不时地回头看看落在不远处的聂荣臻，放松了缰绳；聂荣臻则一抖缰绳，他的枣红马心领神会，快步赶上了大白马，两人并肩而行。

夜幕降临，上灯时候，他们赶到一一五师师部所在地——上寨村。在这里隐约传来灵丘方向的枪炮声、飞机的轰鸣声。晚饭后，团以上干部们丢下饭碗，便纷纷集中到师部会议室内，他们三五成群，都在议论如何打击日寇。林彪轻咳一声，大家顿时鸦雀无声，目光全部集中在林师长身上。会议开始，林彪走到地图前，神情严肃地说："据第二战区司令部电报说，日军蒙疆兵团于9月13日攻占大同后，正向怀仁、山阴进犯；日军第五师团9月11日占领蔚县、广灵，21日占领灵丘，正由灵丘经平型关向大营镇进攻。敌人如此猖狂，我们必须狠狠杀杀他们的傲气，给他们迎头痛击。让国民党军看看，鬼子不是钢铁，中国人不是豆腐，可以增强民众抗日的信心和力量，树立我八路军的威望。"林彪的一番话，正说到大家的心坎上，纷纷交头接耳，摩拳擦掌。林彪打了一下手势，大家安静下来后，他继续说："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将八路军成立后的第一仗任务交给我们师。我和聂副师长已立下军令状，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师部研究决定，战场选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

"太好了！"

第二天一早，林彪将团以上干部带到了关沟，隐蔽在几棵大树下。林彪介绍说："平型关是山西内长城的重要关口，关内关外，重山叠嶂，地形险要。关前有一条公路一直通向灵丘、涞源，此路是板垣师团侵占平型关的必经之道。关沟的前面有一条深谷约十里路长，我们就称它十里沟吧。公路必经十里沟，我们就在那里埋伏下来，等鬼子一到，打它个措手不及。"林彪介绍完毕，带领干部们到十里沟实地察看。

察看完毕，他们找一隐蔽处，将地图摊在地上，林彪对旅长陈光说："三四三旅两个团打主攻，杨得志的六八五团埋伏在关沟，重点在公路拐弯处高坡的缺口上，向西阻击东跑池日军回援，向东堵住公路内日军的去路，配合六八六团关门打狗；李天佑的六八六团隐蔽在六八五团东面的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战斗打响后，立即歼灭沟内敌人。"三四三旅各团干部默默记下了自己的任务，心里盘算着如何圆满完成任务。林彪又对徐海东说："你们三四四旅的张绍东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灵丘、涞源方向援敌。陈锦秀的六八八团作为预备队。"说罢，林彪的目光在寻找，口中低声叫道："杨成武！"

"到！"杨成武一边低声应到，一边从后面挤到林彪面前，立正站着。林彪招招手，叫他一同蹲在地上，然后指着地图说："你们独立团插到腰站地区，切断敌人从涞源至灵丘公路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援敌，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的日军。"布置完毕，他又叮嘱说："平型关战斗的胜负关键，就在于你团能否将敌援兵挡住。你一定要全力以赴，死死挡住敌援兵，决不能放过一兵一卒，如有闪失，我拿你是问。"

"首长放心!"杨成武目光炯炯,坚毅地回答。

"你们路远,午饭后出发。"

"是!"

一切布置完毕,林彪问众干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每个干部都信心百倍。

手表已指到七时。林彪举起望远镜,远处出现一个小红点,这红点渐渐向前移动,红点的后面是黄乎乎的一片,隐约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林彪目不转睛,紧紧地盯住前方。红点渐渐清晰,那是鬼子举着的太阳旗。100 多辆卡车在前面开道,有的车上坐满了日军,有的则拖着大炮,有的装着物资。长长的汽车队后面,则是长长的骑兵队伍。

林彪一面密切注视鬼子,一面拨通电话,他告诉几个团长:"鬼子来了,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他又安慰大家:"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两条腿,没有三头六臂。"林彪的话在战士中间传开后,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勇士们将手榴弹盖拧开,拉出了弦,子弹上了膛,静静地等待着攻击命令。

十分钟后,第一辆汽车爬到了公路拐弯的缺口处,抬起了汽车头,加大了油门。林彪一手持望远镜,一只手臂有力地一举,说:"打信号弹!"

随着林彪的话音,"叭叭"两颗绿色的信号弹冲向天空。顿时,隐蔽在十里沟两侧的六八五、六八六和六八七团同时开火,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吼叫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混成一片,震撼着山谷。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十里沟成了一条火沟。第一辆汽车的前轮飞上了天,后轮挂在枣树上。后面的汽车一辆撞一辆,前进不了,后退不能,窄窄的十里沟被堵得严严实实。骑兵队更是乱成一锅粥,受惊的战马扬起四蹄,乱蹦乱跳。鬼子死的死,伤的伤。

林彪看到这情景,高兴地直喊:"打得好,打得好!"

突然,敌人的机枪响了。林彪一看,小鬼子遭突然袭击,一阵混乱之后,很快恢复了战斗队形,正组织反击;有的则寻找隐蔽点,各自为战,顽强抵抗。林彪一甩帽子,自语道:"板垣师团不是泥捏的,也是只铁老虎,战斗力还满强的呢!我就是要啃啃这块硬骨头。"他瞪起双眼,大声喊道:"吹前进号,吹冲锋号!"

嘹亮的号声响彻高空。战士们叫喊着冲下山沟,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战。六八五团二连战士范应兴,一连刺倒两个鬼子,自己左臂被鬼子的刺刀穿透;他还来不及拔出刺进鬼子胸膛的刺刀,右侧又上来一个鬼子,他猛地一转身,拔出刺刀又刺了过去。一个战士见汽车旁躺着一个鬼子,便大声喊道:"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话音未落,却被那个鬼子一刀刺进胸膛。另一个战士正在给一个鬼子包扎伤口,却被那个鬼子暗算,英勇牺牲了。连长曾贤生,外号"猛子",在白刃战中,一人刺死十个鬼子,自己也体无完肤,在一群鬼子的包围下,他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突然,林彪在望远镜里,看见 100 多鬼子冲过公路缺口,正向关帝庙冲去。林彪一急,大声吼道:"司号员,快吹号,调六八六团三营火速增援口子。"其实,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已在十分钟前发现了日军动向,率八连、九连抢占了关帝庙高地,控制了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冲上来的日军一阵猛烈扫射。鬼子倒下一批,后面的鬼子象疯了似的往上冲。就在这紧急关头,机枪不响了。杨勇焦急地吼道:"怎么回事?"机枪手陈小虎急得要哭了。杨勇一检查,原来这些子弹生锈了。他气得骂道:"奶奶的,阎锡山拨来的废子弹,害死人了!"然后,他睁着红红的眼睛,命令战士们和鬼子拼刺刀。战士们跳出阵地。大个子李二根端着刺刀朝一个鬼子军官猛刺过去,不料那鬼子臂力过人,指挥刀一挥,李二根的步枪被打落在地。李二根面无惧色,猛地一扑,抱住对方,两人在山坡上扭打,一起滚下了山崖。班长张云山奋力刺倒一个鬼子,自己同时被另一个鬼子刺倒身亡。连长周志辉赶来,一刀结果了这个鬼子。

下午一时,枪声渐稀,战斗基本结束。打扫战场时,蔡家峪至关沟内,1000 多残暴、凶恶的鬼子被歼,100 多辆汽车被毁。沟滩上,石缝里,以及被炸毁的卡车下,鬼子的尸体到处可见。战场上还到处是车辆、器械及骡马。缴获的呢大衣全师每人发一件后,还多出几十件。杨成武独立团在腰站毙伤敌人 400 有余。此时,一一五师的官兵们喜笑颜开。

肖华乘兴赋诗一首:

> 九月长城秋风寒,
> 平型关下开战端。
> 枪炮声烈震山谷,
> 痛歼板垣美名传。

(选自《八路军演义》胡兆才)

材料三　大捷平型关中国欢呼八路军

平绥线日军开始沿同蒲线南下,展开了攻占山西的进攻。山西地区为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乃山西军阀阎锡山。阎锡山见日军要端他的老窝,急调其第 6 集团军、第 7 集团军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带设防,并要求八路军配合其部迎击日军。开赴平型关一带的是八路军第 115 师。

平型关乃山西和河北两省的结合部。日军坂垣第 5 师团的进攻矛头,恰恰就指向了这一薄弱点。此刻,平型关东面的灵丘正打得热火朝天。第 6 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要林彪立即率其第 115 师,火速前往灵丘增援正面作战。

林彪乃毛泽东手下的一员著名战将,历来以善打巧仗著称,人赠外号"韩信"。此刻,他并没有草率进军,而是

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则带上几个警卫员、作战参谋和电台，坐上辆卡车直奔灵丘。

车到灵丘，林彪等人下车，眼见得日军已进逼到距灵丘县城10公里的地方了，炮弹早已不断地射入城内炸响。他预计灵丘必是守不住的，而日军一旦占领该城，则下一个目标必会是平型关。于是，林彪急电部队，立即赶往平型关一带集结待命。自己也驱车驰向平型关。

在平型关的山顶上，林彪一面等待部队的到来，一面通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地形。平型关乃晋北长城一重要关口，其地势之险峻可想而知。他决定利用平型关附近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采取侧面伏击战术，给进犯之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等到部队到达时，对于大致的战场确定、兵力使用等问题，林彪已然成竹在胸。

9月23日，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马上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进行战前动员。他在动员令中说："眼下日军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带打个大胜仗，给日军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部队一个兴奋！"林彪遂令师骑兵部队和一部分步兵向灵丘方向前进，以牵制迷惑敌人；而令该师主力陈光的第343旅和徐海东的第344旅，开进到位于平型关前面15公里的冉庄集结。

24日，部队以营为单位进行了战斗动员。115师全体官兵，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决心好好教训一下小鬼子，给中国人长脸，为八路军扬威。当日下午，派出的侦察人员先后归队。林彪根据汇总的侦察结果，掌握了日军翌日行动的目标和路线。当日黄昏时分，第6集团军总司令部送来了翌日作战的计划：除正面防御外，另以8个团的兵力由平型关以北出击；第115师则由平型关东南出击，共挫敌军。

24日午夜，部队冒雨向预定设伏地白岩台开进。9月下旬，已是塞外的深秋时刻。身着单衣的八路军战士们既无雨具，又无御寒的服装，只有任凭雨水浇身、寒风吹打。全体官兵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疾行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并终于在25日拂晓前按时到达了设伏地点。此时，日军在旅团长三浦敏事率领下，已沿山间公路向115师预伏地开来。经过一夜疾行军的八路军官兵，来不及稍事休息，立刻就按照命令散开在距公路1公里左右，长至几公里的伏击地带。

曙光降临时，大雨终于停了，可寒风仍然无情地吹在衣衫湿透的八路军战士身上，寒冷难熬。但为给予敌人以突然的打击，俯伏在湿地上的战士们坚决地执行着不得一动，不得暴露目标的命令。官兵们仿佛已与周围的土地化为了一体，即使用望远镜也难以看出伏兵的迹象。

日军终于出现了。这是素称精锐的坂垣师团第21旅团的一部分，约有1000余众。自对华作战以来还从未吃败仗的日军，此时真是骄横已极。部队通过如此险峻的地形时，居然敢在未向两侧山上派出任何警戒的情况下，以一路纵队队形，就大摇大摆地开进了谷底夹道。走在最前面的是100余辆汽车，紧接着是200多辆大车及一些骑兵。雨后的山间公路泥泞难行，日军的车队缓慢艰难地向平型关推进着。如同一字长蛇般的日军队伍，渐渐地全部进入了第115师的伏击圈。

林彪看了一眼表，时间整5点，遂向身边的参谋点了一下头。参谋随即打响了发起攻击的第一枪。

顿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八路军的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弹如同狂风般地扫向谷底日军队伍。担任截断日军退路的某团5连官兵猛然跳起，在外号叫"猛子"的连长曾贤生的率领下，向山下冲了下去。随着5连一阵手榴弹投掷与爆炸，日军队伍最后面的一辆汽车被炸毁，立时堵住了全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全线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下山去。顿时，嘹高的冲锋号声、喊杀声响彻山谷。

该敌不愧是日军之精锐，虽遭此突然打击却未完全乱了阵脚。谷底日军首先凭借汽车、水沟进行顽强抵抗，接着又多次发起反冲击，试图占领夹道两傍的高坡，并进一步扩大防守阵地。同时派出一部攻向山顶，企图抢占老爷庙一带有利地形以扭转被动。但115师各团第二梯队迅速越过公路，先敌夺占了老爷庙有利地形，并将派出攻占老爷庙的日军团团围住。山下部队则以雨点般的手榴弹，投向日军的汽车及其周围的密集敌群。顿时炸得敌军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八路军随即将公路之敌断为几截，展开了最后的围歼。立时间，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刺刀的铿锵撞击声以及日军伤兵的呻吟声，响成一片。

坂垣征四朗师团长接到三浦旅团被包围的报告后，即令在蔚县的第42联队急速前往增援。同时派出空军参战，以支持其地面部队作战。但由于我军此刻已与敌展开近战及白刃搏斗，使得飞临战地上空的敌机也只能在空中乱转而无从下手。眼见的日军伤亡不断，敌机也只得"凭吊"一阵过后，悄然离去。

自蔚县增援的第42联队，沿途中即遭到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后营的有力阻击，直到持续了一天一夜的战斗结束后，才得以与逃脱出的部分敌军汇合。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自抗战以来同日军的第一次交战。被伏击的千余日军，除个别逃脱外全部被歼。这次歼灭战共缴获日军野炮一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千多支，掷弹筒20余具，军马53匹，弹药无数。服装则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仅军大衣即够115师全体指战员每人一件。缴获的其他物资，由部队和民众搬了两天都未能全部运完。最后只好将剩余的物资和被击坏的汽车一起，全部焚毁。

在打扫战场时，还从被打死的第5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身上，缴获到了第5师团的作战计划图，其中还涉及到关东军"蒙疆兵团"及华北日军第1军、第2军的作战计划图，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随即将

该文件上交，又专门给蒋介石致电报捷并通报日军企图。从而使我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及华北抗日部队，得以掌握敌方之侵略计划。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胜仗。消息传出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抗战情绪及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英勇抗日的良好形象。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四　血染英雄关

天亮后，风停了，雨住了。除了平型关方向传来稀疏的炮声外，公路上仍不见鬼子的踪影。怎么搞的？情况有变化吗？一营长从山头左侧跑过来，有点着急地问我：

"团长，鬼子怎么还不来？"

我说："打伏击嘛，就要沉得住气，有点耐性。怎么？你认为鬼子不会来吗？"

一营长摇摇头，说："拿不准。"

"没有什么拿不准的。"我说，"你赶快回到自己指挥位置上去！"因为他那里集中了全团十多挺机枪，我特别嘱咐他说，"要注意你那些机关枪噢！"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大约上午八点多钟吧，先是听见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接着隐隐约约出现了汽车的影子。汽车越来越近，这才发现后面还有大车、马车一大溜。只见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太阳旗"，坐着几十个鬼子，头戴闪光发亮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上着刺刀的步枪揽在胸前。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地域。这些家伙装备精良，侵华以来还未遇到过什么真正有力的抗击哩！他们在车上指手划脚，叽哩哇啦地不知讲些什么。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旁若无人似的，真有些不可一世的味道。

战士们上好刺刀的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机枪射手们已经在瞄准了；他们都不时地望着我。我好象感到了大家的心在剧烈跳动。而我的双眼却只盯着公路的拐弯处。当鬼子的头几辆汽车开到我们阵地的山脚下时，我立刻命令：

"全体冲锋，打！"

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指战员们暴风骤雨般地向敌人冲去。鬼子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马匹等互相撞击，走不动了。鬼子们嗷嗷地叫着跳下车来四处散开。我想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遇上这样突然的勇猛的打击。"大皇军"的精锐旅团惊惶失措了。

应当说坂垣二十一旅团还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懵懵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站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我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营长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了几段。他接到我的命令后，马上指挥一、三连，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一、三连紧接着又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报销了。这个营的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鬼子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冲锋中负了伤，一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他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鬼子逼回沟底全部消灭。

正当部队同敌人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战士们看到这情景，一股劲地靠近鬼子，同敌人混在一起拼杀起来。敌机大概看到双方交织在一起，无法扫射，也无法投弹，只好飞走了。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了。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二十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二十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十几个鬼子。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鬼子在向他逼近，他——我们的英雄连长曾贤生同志拉响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壮烈行为鼓舞着我们，更鼓舞着他身边的战友。他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三十多位同志，却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三营的九连和十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拣起石块将鬼子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这是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日军士兵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所谓"武士道"的影响，成了一帮亡命之徒。他们负了伤仍然顽抗。战士们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知他们是听不懂，还是根本听不进去，毫无反应。一九三七年的日军，战斗力还是满强的。也许，"皇军"几个月要灭亡全中国的神话在他们的头脑里还起着作用。但神话毕竟不是现实。战斗进行到下午，以我们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据后来的统计，此次战斗共歼敌一千余人，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在中国人民的铁拳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砸烂了！

平型关一战打击了敌人，大大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也大大的锻炼和考验了我们自己。

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她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

平型关是难忘的关，因为她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平型关已经载入了光荣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

（选自《横戈马上》，作者：杨得志）

材料五　蒋介石对平型关战斗胜利发来的贺电

电文如下

朱总司令玉阶兄：

江午电悉，捷报传来、无限欣慰、袭敌背侧、断其联络，收效甚大。希更加发动群众，扩大行动，使敌有后顾之忧、则与我战局更有裨益也。

蒋中正

国民二十六年十月

（选自《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校刊，1985年8月15日）

夜袭阳明堡

背景介绍

1937年10月，日军发起了对山西的围攻。国民党组织忻口会战，以保太原。根据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八路军司令员朱德订立的军事协议，八路军三个师向敌侧翼袭击，以配合友军的正面防守。

9月30日，一二九师自陕西富平庄里镇地区出师，10月10日进抵太原，其先头部队769团奉命向原平东北山地挺进。该团发现代县、崞县等地均驻有日军，代县的阳明堡机场集中了大批飞机、轮番出动，对忻口狂轰滥炸，对我造成严重威胁。于是该团决定袭击阳明堡敌机场。为了顺利进行战斗，团长陈锡联和三位营长亲自化装侦察。经过侦察，了解敌人机场的情况后，陈锡联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赵宗德营长带领的三营进行袭击，第一营担任箝制崞县之敌，第二营第七连为预备队，并以第八连破坏王董堡之桥梁，保障第三营后方的安全。

10月19日夜，赵宗德带领了3营10、11两个连战士，由向导带路，偷渡滹沱河，越过了敌人的岗哨，悄悄进入飞机场。驻守机场的是敌香月师团的部队。赵营长亲自带领10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以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11连的战士则分成三排直扑停在机场上的机群。当11连的战士们要接近飞机时，西北方响起了枪声，10连与敌人遭遇了。这样，11连发起了攻击。战士们勇猛地冲杀上去，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朝我军开枪、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在慌乱中也急忙向我射击。战士们靠着机身的隐蔽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一会儿，机场上的飞机全部燃烧了起来。当敌人增援的装甲车队快接近机场时，我军趁胜撤离机场，返回了部队。

在夜袭阳明堡的战斗中，我军共击毁敌机24架，毙敌百余人，创造了步兵击毁敌机的奇迹。但是，我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以赵宗德营长为首的三十余名战士英勇牺牲。

材料：

- 夜袭阳明堡
- 神兵天降袭机场

材料一　夜袭阳明堡

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变更了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直下太原。

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在城市、在乡村，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大兵，三五成群，倒背着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南逃。

就在这时，我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师的先遣团）奉命插向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十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来到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一带。

苏郎口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顺河南下便是忻口。战事正在那里进行，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敌人的飞机一会两架，一会三架，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疯狂到了极点。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这儿不远。问老乡，才知道隔河十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果然有个机场。各营的干部纷纷要求："下命令吧，干掉它！"

打，还是不打？在北上途中，刘伯承师长曾专门向我们传达了平型关战斗总结的经验，刘师长再三嘱咐：到晋北后，每战都应加倍谨慎。这些话使我立刻感到，必须很好了解敌情，然后才能下定决心。

最初，我们打听到附近驻着一个国民党晋绥军的团长，据说他和日军打过仗，是前两天才带着少数部队从大同方面退下来的。我决定去访问访问他，一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

寻遍了附近的大小山沟，好容易才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找到了这位团长。不料我刚说明来意，他便谈虎色变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象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

我强制住心头的憎恶，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

打敌人的呢?”这位堂堂的国民党中级军官竟毫不知耻地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了……”

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我便起身告辞。刚转身要走,他又嘻皮笑脸地轻声对我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们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

真是十足的怕死鬼!亡国奴!无怪乎他们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几个月内就把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

为了设法弄清敌人机场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决定到现地侦察一下。一路上,几个营长听我谈起昨天访问那位团长的事,心里直冒火。三营长赵崇德同志唾口骂道:

“孬种,简直不是中国人!”

“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一营长不胜感慨地插上一句。

是的,抗战决不能指望那些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无能的国民党军队,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只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来挑!我想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

我们顺着一条山沟边走边谈,很快来到了滹沱河边。登上山峰,大家立时为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极目西眺,管岑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突然,二营长叫道:“飞机!”

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照下,发出闪闪刺眼的光芒。

我们正仔细观察着那机场内外的每一个目标,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来。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打着赤脚;看样子是个农民,但神情很紧张。

等他走近一些,我们忙迎上去喊:“老乡,从哪里来?”

那人听到喊声,身子一怔,马上停住了脚步,两眼不住地四下观望。及至见到我们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慌不安,两眼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们,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了两个字:“老……总……”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打鬼子的。”

他听到“八路军”三个字,马上“啊!”了一声,一下扑上来抓住我们的手,激愤地向我们诉说起他的遭遇。

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自从日军侵入山西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抢劫、日本兵的烧杀,弄得他家破人亡,一家三口,只剩下他孤苦零仃一个。后来,日本兵又把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每天从早累到晚,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还得挨打受气。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才由机场偷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机场狠狠地说:

“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

听了这位老乡的控诉,大家更加气愤。赵崇德同志握着老乡的手,恳切地说:

“老乡,我们一定给你报仇,给所有受难的老乡报仇!”

接着,这位老乡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敌人机场内外的情况。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的和老乡介绍的大体一致。机场里共有二十四架敌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都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给它以突然袭击,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当即决定马上下手。

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三营,并以一、二营各一部破坏崞县(今原平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可能来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准备随时支援三营。

十九日下午,整个苏郎口村都沸腾起来了。各营、连纷纷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干部、战士们个个意志高昂,决心如钢。老乡们听说八路军要去打鬼子,几个钟头之内就扎起了几十副担架。

傍晚,我和几个团的干部一起来到了三营十一连。战士们见到我们都围了上来,争着表示决心。

“准备得怎么样啦?”我问大家。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们纷纷回答。

我指着面前的一个小战士又问:“飞机全身包着铝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

这个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空中摇几摇,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揍它!”

这时,赵崇德同志向战士们说:“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人丛中走出来一个粗壮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机枪,气呼呼地用大嗓门说:“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有脸耻笑人!我定要缴架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我一看,正是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

有人笑着问:“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

他辩解道:“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战士们被他逗得哄然大笑。这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虽然是第一次与侵华日军作战,而且又是去打从来也

没打过的飞机，但谁也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

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三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曾得过“以一胜百”的奖旗。今天他们继承着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投入了新的战斗。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具，也都绑得紧紧的。长长的队伍，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神速而又肃穆。

向导就是先前我们遇到的那位老乡。他对这一带的道路，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死一样沉寂。大概这时敌人睡得正酣吧？部队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赵崇德同志带着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十一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它们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那里。多少天来大家日夜盼望着打鬼子，现在猛然看到飞机就摆在眼前，真是又惊喜又愤恨。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说着就要接近飞机。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呼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声。原来十连与敌哨兵遭遇了。就在这一瞬间，十连和十一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

战士们越打劲头越大，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也有人七手八脚地往机身上爬。机枪班长老李早爬上了一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向机身猛扫。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嚎叫着向我扑来。就在二十多架飞机中间，敌我混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

赵崇德同志跑前跑后地指挥部队。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抱住了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赵崇德同志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原来他正举着铁锹猛砸，嗬！他倒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赵崇德忙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他又抱起机枪扫了起来。

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杀退了。赵崇德同志正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几个战士跑上去把他扶起，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话没说完，这位“打仗如虎，爱兵如母”的优秀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他的牺牲使同志们感到万分悲痛，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抓起手榴弹，冒着密集的枪弹向敌机冲去……

几十分钟后，守卫队大部就歼。二十多架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可是，等它们爬到机场时，我们已经撤出了战斗。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消息，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遍了全国。那些国民党官儿们，开始根本不相信，他们仍说：“就凭八路军那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可是自从十月二十日起，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那些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的官儿们方才张口结舌了。”

（陈锡联，《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二　神兵天降袭机场

夜里，部队按既定部署悄悄地出发了。

3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曾获得过“以一胜百”的奖旗。今天，他们投入新的战斗一定能得胜而归。陈锡联对3营充满信任。

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脱下了，背包也摘了下来，刺刀、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声响的装具都绑得紧紧的。战士们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快速而肃静。

在先前遇到的那位老乡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十分沉寂，此时敌人可能睡得正酣。3营的战士们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3营长赵崇德带着10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部队的掩蔽部。11连直接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12连2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只见飞机整齐地分3排停在那里。多少天来，战士们日夜盼望着打鬼子，现在猛然看到敌机就摆在眼前，真是又惊喜又愤恨，不知是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说着就要接近飞机。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呼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声。原来是10连与敌哨兵遭遇了，就在这一瞬间，10连和11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机枪、手榴弹一起倾泻，团团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后，慌乱之中盲目开枪，后边的飞机上射出的子弹接连打到前面的机身上。

战士们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也有的人往机身上爬，机枪班长老李早已爬上了一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向机身猛扫。

就在这时，敌人的守卫队嚎叫着向我军战士扑来。在

20多架飞机中间，双方混战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

赵崇德营长跑前跑后地指挥战斗，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抱住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刀，结果了那个敌人的性命。赵营长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爆炸起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顷刻间，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机枪班长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只见他正举着铁锹猛砸，他倒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赵营长赶忙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听到营长的命令，老李又抱起机枪扫了起来。

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打退了。赵营长正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前胸，几个战士赶忙奔上去，把他扶起。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话没说完，这位"打仗如虎、爱兵如母"年仅23岁的优秀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赵崇德营长的牺牲使战士们万分悲痛，他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抓起手榴弹冒着密集的弹雨向敌机冲去……

几十分钟后，敌守卫队大部被歼灭，24架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等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爬到机场时，3营已撤出战斗。

第二天，忻口阵地上没有看见日军飞机活动，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看见日军飞机。国民党忻口会战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听说八路军炸毁敌人24架飞机，异常高兴，他对周恩来说"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那些见了日本鬼子就望风而逃的国民党将领，怎么也难以相信八路军会一下子炸毁日寇24架飞机，他们轻蔑地说："就凭八路军那些破烂家伙，还能打日本的飞机？"国民党的飞机从太原飞到阳明堡机场上空侦察，看到了飞机的残骸，他们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

（选自《中共虎将与名战》）

雁门关游击战

背景介绍

1937年9月3日，贺龙率一二〇师由富平庄里镇地区出师，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以管涔山脉为依托，在雁门关内外的神池、宁武、朔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0月初，日军分兵三路直扑太原，企图侵占整个华北。国民党军乃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组织左、中、右三个兵团进行忻口会战，以保太原。为配合友军作战，一二〇师部决定派遣雁北支队袭击怀仁至朔县和雁门关的敌后交通；以一部兵力游击骚扰宁武之敌；师主力向崞县方面进攻。10月10日，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在怀仁、岱岳间的辛庄伏击敌汽车大队，歼敌二百余人，击毁汽车18辆，炸毁道路桥梁，截断了怀仁至朔县间的交通；并袭击井坪、平鲁，威胁大同。我在宁武地区活动的游击部队也不断袭扰敌人，迫使日军于10月13日派兵增援宁武，中途又遭我军伏击，退回朔县。宁武之敌待援无望，只得当夜突围逃走，我军收复宁武。

与此同时，一二〇师主力于10月10日逼近崞县，12日攻占崞县以北的十里镇。13日，敌军主力进至忻口东西高地，其右翼向阎庄地区的国民党军进攻。我师遂以715团于14日袭占南北大常村，并攻入永兴村。敌军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我反扑。我击毁敌坦克、装甲车各一辆，毙伤敌百余人，支援了国民党军在阎庄地区的防御。16日，我师部令385旅向忻口西北大牛店方向出击。这时，359旅正由五台地区到达忻口以西，并归还一二〇师的建制。我师部乃令该两个旅合力夹击大牛店之敌，箝制日军对忻口阵地的进攻。随后，一二〇师主力挺进至雁门关。

10月18日，我师得悉自广武南开和自阳明堡北开的敌汽车共约五百辆，716团乃在雁门关以南之黑石头伏击该敌，激战三小时，火烧雁门关，焚车数十辆，歼敌五百余。随即，我师攻占雁门关、太和岭等地，完成了截断敌后交通的任务。23日，717团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敌运输汽车35辆，歼敌二十余人。24日，715团在忻口以西北岗上村歼敌骑兵一个小队。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于10月中、下旬在雁门关进行游击战，先后击毁汽车、装甲车、坦克五十余辆，歼敌八百余人，截断敌后的主要交通线，阻击敌后续部队，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友军进行了忻口会战。

材料：

- 雁门关伏击
- 弯弓雁门射敌枭

材料一　雁门关伏击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八路军一二〇师，挺进到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残暴的日寇，在这一带施行了极其野蛮的屠杀。复仇的火焰在部队里炽烈地燃烧着。一天，我正在翻着各连的求战书，忽然接到师部通知，要我们七一六团的领导干部去受领任务。我和廖汉生政委急忙驱马，奔向师部驻地。

师部在神池以西的一个村子里。当我们走进师首长

的房子时，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正围着地图研究情况，一见我们来到，关政委便关切地问："到达这一带，部队情绪怎么样?"我们说："看到敌人的暴行，同志们都非常气愤，总盼着有机会狠狠收拾他们一下!"

贺总一听放声大笑起来，连连说："很好很好。要收拾敌人，机会有的是!"他叫我们靠近地图，指着一块密密层层的山区说："准备把你们调到这里去。"我俯身一看："一个长长的红箭头，正指向历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贺总分析当前情况时谈到：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地给前线输送弹药；这是敌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但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是后方，警戒相当疏忽；我们要利用敌人的弱点，到那一带发动群众，寻找机会，给敌人一个打击!接着，关政委也给了我们许多指示。最后，贺总又再三叮咛我们：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了，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领受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和廖汉生政委怀着兴奋的心情，扬鞭策马，很快返回到团部驻地。

听说去打仗，谁不高兴？部队立即向雁门关方向疾进。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敌军的残暴景象：许多村镇被夷成了瓦砾，无数同胞遭到了屠杀。仅宁武一个县城，就被杀害了不知多少；差不多家家的菜窖都成了活埋人的土坑；所有的水井，都堆塞着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小孩和被奸淫后复遭杀害的妇女们的尸体……血债要用血来还!战士们眼睛都红了，行军不愿休息，驻下不想吃饭。队伍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地向雁门关方向赶去。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驻下以后，果然发现敌人的汽车不时从雁门关上滚过。南面还时而传来隆隆的炮声。我们立即派出人员沿公路进行侦察。

老窝村四面环山，十分荫蔽。但村里的人为了逃避日寇几乎都跑光了。按师首长的指示，我们立即组织了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进行宣传；同时，派出部队帮助群众秋收。第二天，我带着一个连正在一片莜麦地里收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颤颤巍巍地朝我们走来，边走边揉着眼睛。我走过去，问："老乡，你有什么心事?"老人家长吁了一口气，揉着泪湿的眼睛说："你们哪知道啊!国民党的兵只知道抢老百姓的东西，见了鬼子，就象老鼠看见了猫一样，跑得比谁都快。鬼子来到这儿又烧又杀，你们要不来，老百姓可真没有活路啦!"

八路军的名声，风似的传开了。不到两天，逃到各地的群众陆续回来，和我们相处得水乳交融。他们自动给侦察员带路，帮助我们搜集情报；公路上有一点汽车动静，他们也跑来向我们报告。短短几天，我们不但摸清了雁门关一带的地形，连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也掌握了。

十月十六日，群众送来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三百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南开忻口的模样。这些日子，每隔四五天就有敌人的车队通过，看来情报可靠。我们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会上，廖政委问大家："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廖政委刚刚说完，三营营长王祥发霍地站起来说："我发表意见。我永远也忘不了敌人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十一连连部驻的那个院，一家八口人，被杀了七口，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孩，也被刺刀活活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眼泪都哭干了，拉着我们，要我们报仇。这是她一家的仇，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他愈说愈气愤，脸色铁青。接着，他又百倍激昂地说："要叫敌人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们全营同志的决心!"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同志也站起来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会场上严肃紧张，干部们纷纷表达决心，争着要当突击队。最后，廖政委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在全团掀起复仇的怒潮。"

第二天拂晓，我和廖政委带着干部去看地形。到了黑石头沟，爬上山顶一看：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从雁门关盘旋而下，在石头沟这里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公路西面是悬崖绝壁，北面是一段陡坡；顺公路向南不远有一座石拱桥。这真是一个很理想的设伏地形!政委和我商量了一阵，决定把一、三营分别埋伏在陡坡南北，由三营担任主攻，再由一营派出一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戒，三营十一连伏在桥西，断敌逃路。我们总的计划是：全团一起，突然动作，力求把敌人全部消灭在黑石头沟内。任务布置下去，大家都满意地回去了。

十八日鸡叫头遍时，部队沿着崎岖小道，插入了黑石头沟。黎明前的黑夜分外沉寂，只有南面偶尔传来几声炮响。进入阵地之后，一切准备停当，单等着敌人的大队汽车越山而来。

我虽然经过了多少次战斗，但是象这样严阵以待地等候日本法西斯军队还是第一次。"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了"。贺老总的指示又在耳边响了起来。我心里有些紧张。为了防止出现差错，我决定再到阵地上检查一下。

战士们看见我，都显出几分神秘的笑容。这时我发现有几个文书、炊事员也上来了，便惊奇地向他们问道："怎么，你们也上来了?"他们调皮地回答我："打鬼子人人有责，团长，这是第一次和日寇交手，不参加，心里不好受!"有的说："老大哥在平型关给鬼子吃了个大苦头，这回也叫他尝尝咱们的厉害!"我想听听他们的决心，故意说："别想得太容易了，要知道这是三百辆汽车啊!"战士们一

听，纷纷抢着说："甭说三百辆，三千辆也别想漏过去！不信打起来看！"见部队情绪这样高昂，准备也很周到，我放心地返回了指挥所。

太阳高高升起，雁门关巍然可见。我站在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公路上冷冷清清，毫无动静。有的战士不耐烦了，不时抬头张望。我立即通知各营：耐心等待，绝对防止暴露自己。

十时左右，北面公路上突然腾起一股尘土，接着，隐隐约约传来呜呜的马达声。战士们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悄悄地说："来了，来了！"每一个人都揭开手榴弹盖，望眼欲穿地瞅着北面的公路。

眼看着长长一列汽车就要进入伏击圈，突然三营送来报告说："南面阳明堡又开来一百多辆！"

啊？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前曾听说：为了互相警戒，免除后顾之忧，敌人常在这一带南北会车；不料今天叫我们遇上了！敌人数量增多，我们战斗增加了困难。但又一想，越是这样，敌人越是有恃无恐，只要我们荫蔽得好，部队动作快，这些敌人仍然可以消灭！

我向廖政委说："既然送上门来了，就一起吃掉它！"

"对！"他果断地说："赶快告诉一、三营，听统一号令，一块消灭！"

两路汽车无忧无虑地开过来了。南来的车队，前面一辆上面坐着十几个鬼子，后面除少数几辆装有伤兵和死尸外，其它全部是空车。北来的车队，引头车上坐着掩护部队，一个腰挂大刀的敌军官，还不时用望远镜四面了望。两个车队愈走愈近，车上的敌人都活跃起来，一个个趾高气扬，"哇里哇啦"地打着招呼。北面车上的敌军官见南面车上拉着死尸，急忙指挥士兵脱帽致哀，然后还扯开喉咙唱起挽歌来。好骄横的家伙！竟敢把这里当做他们的"王道乐土！"我抑制着满腔怒火，待两队汽车全部开入狭窄的黑石头沟，正在并排交错时，立即发出命令："打！"王祥发同志把驳壳枪向前一挥，带着全营的同志向敌人扑去。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狂叫，只见两路汽车互相冲撞起来，弹药车被打着了，响成一片，顿时黑石头沟被闹得天翻地覆！

敌人遭到这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一个个从车上往下跳，但有的还没跳下来就送了性命。一刹那的混乱之后，敌人整顿了一下，端着枪企图反扑。但没等他们散开，十一连的勇士们便冲上了公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我军战士勇猛地和敌人对刺，有的索性用长征时使过的"鬼头刀"和敌人拼杀。胡觉三同志带领三排刚冲过来，突然看见一个战士被三个敌兵包围，他挥起大刀冲去，一连砍死两个，剩下的一个被那个战士刺死。他继续向前冲去，见鬼子兵大部已被消灭，只有少数还在顽抗，忽然发现车下趴着一个，胡觉三同志想抓活的，不料刚一迈步，被那家伙打中前胸。胡觉三同志[illegible]全身力量最后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地打，为宁武的老乡们报仇！……"说罢，就光荣地牺牲了。

新仇旧恨，在战士们心头燃烧。他们高喊着"为指导员报仇！"猛扫残敌。

枪声渐渐稀落下来。公路上的火药味浓烈扑鼻，敌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有的被车上的弹药崩得五体分家。哼！这就是野蛮、残暴的侵略者的下场！

黑石头沟里，一片欢呼。战士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打扫战场，附近的老乡们也乐呵呵地赶来，帮助我们搬运战利品。我巡视着，见一个战士正用铁锹狠狠地砸着汽车，一面砸，一面气呼呼地说："我叫你再跑！我叫你再跑！"我笑着对他说："这样多的汽车，哪砸得完？"廖政委也说："不要砸了，应该炸掉！"

响声四起，烟火弥漫，不一会儿敌人的汽车便在雁门关下焚烧起来。

正在这时，一营警戒部队报告：阳明堡的敌人增援来了。我们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撤离战场。

当我们到达山顶时，远远望见雁门关附近又开来几十辆汽车，一队敌兵正沿着公路搜索；天空出现两架敌机，在黑石头沟上空盘旋，为被燃烧的汽车和"皇军"的尸体"吊丧"。想来，敌机上的驾驶员，一定能看到他们的"武运"是个什么样子了！

我军的游击战，到处为敌人安排了坟墓！

（贺炳炎，《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二　弯弓雁门射敌枭

第二天拂晓，贺炳炎、廖汉生亲自带着干部去察看地形。他们爬上黑石头沟山顶，往下一看，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从雁门关盘旋而下，在石头沟这里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公路西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段陡坡，顺公路向南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这真是一个很理想的设伏地形"，贺炳炎心里想。

回到团部，贺炳炎同廖汉生研究后作出决定：1、3营分别埋伏在陡坡南北，由3营担任主攻。1营派出一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戒，3营11连埋伏在桥西，断敌逃路。贺炳炎对干部说："我们总的计划是全团一起突然行动，力求把敌人全部消灭在黑石头沟内。"

18日鸡叫头遍时，部队沿着崎岖小道，插入了黑石头沟。

黎明前的黑夜格外沉寂，只有南面偶尔传来几声枪响。进入阵地后，战士们将一切准备停当，单等日本鬼子进入"口袋"。

像这样严阵以待地静候敌人，对贺炳炎来说还是第一次。"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了"。贺龙师长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回响了起来，他心里不

免有些紧张，他站起身又一次向阵地走去。

贺炳炎发现有几个文书、炊事员也上了阵地，便惊奇地问："怎么，你们也上来了？"

"打鬼子人人有责，团长，这是第一次和日寇交手，不参加，心里不好受！"有的说："老大哥在平型关给鬼子吃了个大苦头，这回也叫敌人尝尝咱们的厉害！"

贺炳炎想试探他们一下，故意说："别想得太容易了，要知道这是300辆汽车啊！"

战士们一听，纷纷抢着说："甭说300辆，3000辆也别想溜过去！不信打起来看！"

见部队情绪高涨，准备充分，贺炳炎才放心地返回了指挥所。

太阳已升得老高，雁门关也已巍然可见。贺炳炎站在山顶上，他举起望远镜，只见公路上毫无动静。

有的战士有些不耐烦了，不时抬头张望。

贺炳炎下令："通知各营，耐心等待，绝对防止暴露自己。"

10时左右，北面公路上突然腾起一股尘土，隐约可以听见呜呜的马达声。有的战士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悄悄地说："来了，来了！"战士们揭开手榴弹盖，一动不动地盯着北面的公路。

长长一列汽车队就要进入伏击圈了，就在这时，贺炳炎接到3营送来的报告："南面阳明堡又开来100多辆！"

以前曾听说：为了互相警戒，敌人常在这一带南北会车，没想到今天叫我们遇上了！敌人数量多，这给战斗增加了困难，但越是这样，敌人越是有恃无恐，麻痹大意，只要我们隐蔽得好，动作快，这些敌人仍然可以消灭。想到这里，贺炳炎对廖汉生说："既然送上门来了，就一起吃掉它！"

"对！赶快通知1、3营，听统一号令，一块消灭！"

两路汽车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南来的车队前面一辆车上坐着十几个鬼子，后面少数几辆车装的伤兵和死尸，其他大部分车都是空车。北来的车队引头车上坐着掩护部队，一个敌军官腰挂大刀，还不时地用望远镜四面徬望。

两个车队靠近了，车上的敌人"哇里哇啦"地打着招呼，一个个趾高气扬。

北面车上的那个敌军官一眼看见南面车上拉着的死尸，他急忙命令手下士兵脱帽致哀，还扯开喉咙唱起了挽歌。

贺炳炎强压怒火，两眼紧紧盯着行进的汽车。

两队汽车全部进入了狭窄的黑石头沟，开始并排交错。

"打！"贺炳炎发出了命令。

王祥发把驳壳枪向前一挥，带着全营的战士向敌人扑去。

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怒吼。两路汽车互相撞了起来。弹药车起火了，爆炸声响成一片。

敌人猝不及防，惊惶失措，一个个从车上往下跳，有的还没跳下来，就送了命。

敌人整顿了一下，端着枪要反扑。没等敌人散开，11连的勇士们便冲上了公路，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勇猛地与敌人对刺，有的战士索性用长征时使用过的"鬼头刀"同敌人拼杀。

胡觉三带领3排冲了过来，突然看见一个战士正在被三个敌兵包围在当中，胡觉三挥起大刀，一连砍死两个，剩下的一个被那个战士刺死。

胡觉三继续向前冲，忽然他发现车下趴着一个鬼子，胡觉三想抓活的，他刚一迈步，那个鬼子向他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前胸，胡觉三鼓起全身力气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地打，为宁武的老乡们报仇……"说罢，光荣地牺牲了。

战士们高喊着："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猛扫残敌。

枪声渐渐地稀落下来，公路上的火药味浓烈扑鼻，敌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黑石头沟里，一片欢腾，战士们打扫着战场，心情格外激动。附近的老乡也乐呵呵地赶来，帮助战士们搬运战利品。

贺炳炎在巡视着，他看见一个战士正用铁锹狠狠地砸着一辆汽车，一面砸，一面说："我叫你再跑！我叫你再跑！"贺炳炎走过去，笑着说："这样多的汽车，哪砸得完？"

廖汉生说："不要砸了，应该炸掉！"

响声四起，烟火弥漫，敌人的汽车在雁门关下焚烧了起来。

等阳明堡的敌人赶来增援时，716团已撤离了战场。

雁门关伏击战，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的国民党军队，贺炳炎因此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

巍巍雁门关会永远铭记贺炳炎这位独臂将军的勇武风采！

(选自《中共虎将与名战》)

东北抗日联军

背景介绍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它始建于1936年1月28日，发展壮大则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

东北人民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的第一天起，就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抗日斗争。1931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

严重的打击”的号召；其后，东北各地人民纷纷建立抗日游击队。1932年，先后建立了由我党直接领导的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和龙、饶河等抗日红军游击队。1933年后，又陆续建立了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抗日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有杨靖宇、童长荣、赵尚志、夏云杰等人。此外，还有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分别率领的吉林救国军余部。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在东北地区已经完全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应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而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从1933年7月至1935年底，东北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各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五个军，后来又把汤原抗日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军，编为第六军，总人数达六千余人，游击区扩大到四十多个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建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在《八一宣言》的指导下，东北党的组织开展了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1936年1月18日，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境内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抗日部队代表百余人，群众团体代表七十余人。会议决定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便统一指挥对日作战；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为副司令，李红光为参谋长。2月20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根据《宣言》的精神，1936年春，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3月，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陈龙（刘汉兴）。8月1日，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9月，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政治委员吴平。11月，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同年秋，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阶，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参谋长冯志刚。11月15日，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

1936年至1937年，抗日联军在与敌人的不断战斗中发展壮大。在此期间，东北抗日联军除原来的七个军普遍进行扩编外，又先后增编了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等四个军。第八军主要由依兰县土龙山附近的农民所组成，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委员刘曙华。第九军是由旧吉林自卫军残部改编的，军长李华堂（后叛变），政治委员李熙山。第十军是由原活动于舒兰一带的义勇军组成的，军长汪雅臣。第十一军是由祁宝堂组织起的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而成的，军长祁致中（即祁宝堂），政治委员金正国。“七七”事变前后，东北抗日联军各军人数发展为：第一军6500人，第二军5500人，第三军5500人，第四军3500人，第五军5000人，第六军4500人，第七军5000人，第八军2500人，第九军2500人，第十军1000人，第十一军2500人。这样，东北抗日联军成为拥有十一个军四万余人（最多曾达四万五千人）的强大武装力量；游击区域也扩大了，从长白山下到松花江畔，从绵延的兴安岭山区到松嫩平原，到处都有抗联健儿纵横驰骋。仅1936年至1937年，抗日联军与敌交战便达3976次，其中与日军交战1891次，与伪军交战2085次。

1937年初，为了适应全国抗日高潮和东北游击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后成立了三个省委的实际情况，东北抗日联军又进行整编，首先将第一、二两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指挥，在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转战辽东和辽南。同年夏，又将四、五、七、八、十各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在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主要活动于西起哈长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将第三、六、九、十一各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赵尚志任总指挥（后又改为由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在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下，主要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等广阔区域。各路军协同作战，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东北这一侵华后方基地，从1937年冬开始，动用日、伪军五、六万人对抗联部队集中的伪三江省地区进行重点“讨伐”，此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转入了极为艰苦的阶段。

针对敌人大规模围攻，中共北满和吉东省委共同议定，抗联各军除留部分部队坚持下江地区斗争外，主力部队分别脱离险区，到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聚歼计划。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以所属第四、五军为主，向五常、舒兰旧游击区西征，以便牵制敌军，并打通与南满和热河的联络。西征部队于1938年7月翻越老爷岭，突入五常境内，但因敌人调集3000日伪军追堵，使前来接应西征部队的抗联第十军无法靠拢。在敌人重重围攻下，第四军坚持战斗至11月末，军长李延禄等牺牲，仅第五军余部百余人突围，返回刁翎地区。

留在方正、依兰、勃利、宝清等地的抗联第二路军，与围攻之敌周旋苦斗后，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便以小股部队分别活动在乌苏里江左岸和穆棱、东宁一带。第七军于1940年春改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坚持饶河地区的游

击战争。同时，远在五常地区的第十军，于1941年初突围时，军长汪雅臣重伤后牺牲，部队散失。

1938年6月，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部队主力共七百余人，分三批向黑嫩平原远征，经过艰苦的斗争，于同年底先后到达海伦境内，与活动在当地的第三军一部会师。1940年春，第三路军部队重新整编为第三、六、九、十二等四个支队。这一年，各支队战斗频繁，获得许多胜利。

这一时期，南满抗联第一路军，在敌人疯狂进攻下，游击区迅速缩小。第一军放弃本溪、宽甸、桓仁一带，向辑安、通化方面转移。1938年夏，将部队改编为三个方面军，实行分区作战。部队在杨靖宇指挥下，经临江于1939年6月攻入辉南县。第二方面军与第三方面军则转战于长白、抚松、和龙和安图境内。

1939年9月，日寇关东军为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专门拟定了自1939年秋至1941年春"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抽调日伪军七万余人实行"大讨伐"，第一路军部队即行分编小部队活动，以缩小目标保存实力。1940年初，敌人在蒙江发现杨靖宇和第一路军指挥部的行踪后，即用大批兵力跟踪"搜剿"。杨靖宇识破敌人意图后，陆续派遣部队突围。2月23日，杨靖宇只身一人在三道崴子陷入敌军重围，经激战后壮烈牺牲。形势由此更加恶化，部队损失严重。1941年3月，魏拯民因病逝世。第一路军余部改编为抗联第一支队。

由于作战严重失利，东北抗联部队被迫越境入苏。到1942年上半年，抗联三个路军的主力，在苏联的帮助下，先后在中苏边境设立野营，集结休整。同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将中国东北抗联部队整编为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旅），由周保中任旅长，内设中共东北党委会。此时，东北抗联部队下降到800人。

东北抗联部队在集训期间，仍不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战场打击日寇。东北抗联小部队活动一直坚持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1945年8月，东北抗联部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一起，积极配合苏军，为迅速解放东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材料：

- 李延禄军长会见记
- 民族自救的旗帜——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纪略
- 遍地烽火战敌寇——记东北抗日义勇军

材料一　李延禄军长会见记

七年来，可爱的白山黑水，无时不为我们心向神往，而在白山黑水间，天天和日寇进行浴血斗争的英雄们，更无时不为我们景仰关怀。我们无时不在期待着英雄们的消息！期待着，期待着，今天，东北抗日联军中英雄之一的李延禄军长来××的消息，有如从天降临，如何能不使人兴奋雀跃呢！

于是，我怀着一颗热烈的心，会见了李军长。

在他的寓所里，同时有三位穿灰布军衣的军人，可是不用介绍，我首先认出来，那位身材高大体魄魁伟的就是我所要会见的主人，因为在照片上，他是早已为我熟悉了。不错，他就是为国人所崇敬的民族英雄。长方的脸，浓黑的眉，两只眼睛闪烁着坚毅果敢的光芒。他大约四十岁光景。

我们好象久识的老友，不客套，亲切地谈了起来。首先他说他是在重庆会过蒋委员长的，现在来此，和八路军的领导者们，交换一些抗日斗争的经验。

"根据我们的经验，日本鬼子并不是怎么可怕的东西！"当我们把话头引入正题之后，他劈头就是这么一句，坚定坦直，使听的人大大感动。是的，他有这种坚定的意志和信心，不然的话，他如何能在冰天雪地，餐风宿露的艰苦环境下，和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强盗进行了七年的奋斗呢！

"七年的光景，天天在日寇的'围剿'中，然而，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相反的，我们的队伍在血的斗争里，壮大起来了，并且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杀伤。现在，抗日联军已经扩大到十一个军了。"李军长讲到这里，脸上浮出一层轻快的笑。他是吉林人，语句里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以下他简单讲述了一遍四军发展的经过：

四军的前身是"救国游击军"。因为自"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三千五百万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亡国惨痛，在同一命运下的各界同胞，因愤慨日寇的残暴，一时各地高举义旗，进行反日斗争，风起云涌地产生了救国军、自卫军以及山林队等许多名目的抗日武装。但自一九三三年春，日寇用各个击破的诡计，先击溃马占山、苏炳文等将军，再压迫李杜、王德林将军退出国境，抗日力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应这危机的关头，他——李延禄军长（当时为王德林的参谋长兼卫军第二团团长）率所部坚决留在宁安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即名为"救国游击军"，并与南满、东满、哈东、吉东等地之人民革命军、救国军、义勇军等抗日武装发生联系，互相应援，以避免日寇的各个击破。

"这样，我们建立了初步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补充这样一句。

到一九三四年秋，李军长自关内回队后，对统一战线更为注意，并具体地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籍贯，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联合起来的口号，因此，散布在密山、勃利、饶河、依兰一带的抗日武装，顺利地联合了起来，组织成了有名的"东北抗日联

军”，于一九三六年“一二八”纪念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当时有南满第一军、东满第二军、哈东第三军，李延禄将军所统率之救国游击军，即第四军。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人民的热烈拥护，尤其由于“七·七”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给东北同胞以极大的刺激与鼓励，抗日力量更得以澎湃地迅速发展起来了，现在已经组成十一个军，共约×十万人，分布在白山黑水间，随时随处打击敌人，钳制了敌人数十万兵力，而且正努力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虽然是一个艰苦而困难的工作，但是他们是有办法克服的。他坚决的说：“将来是可能的，八路军在华北还不是我们的榜样吗？”

四军的领导者对于政治工作也非常注意，军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委员，连有政治指导员，对战士经常进行政治教育，每个战斗之前，要进行政治动员与鼓动工作，实施着“用政治来保证军事胜利”的方针。

接着我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问题。

“那还用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抗日胜利的保证，这你们是了解得更深切！”李军长略停一下，继续说：“在王德林成立救国军的时候，他提出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抗日的口号。号钟一响，马上象潮涌一般，队伍澎澎湃湃强大起来。可惜的是，后来运用不好，没有很好地发展下去。”

“一九三五年”，这时他挺了挺身，把一只手撑在腰间，“我们看到了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之后，感觉到那上边说得对，对统一战线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一九三六年抗日联军正式成立以后，统一战线才得以正确而顺利地发展下去。”

他又告诉我，他们的队伍不但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信仰，而且不分国籍。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有无党派群众；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地主，而且有蒙古人，有朝鲜人。“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之独立解放！”

他突然站起来，嘻嘻地笑着：“还有人造谣说我们排外哩！”随即他的笑容收敛了，镇定地说：“我们的参谋长胡坚是湖南人，秘书长彭青山是河南人，副官长朱鸿恩是河北人，军需长金龙国是朝鲜人。我们只有用事实来揭破那些汉奸托派的无耻造播！”

我又问到四军与居民的关系，他不加思索地说：“鱼离开水，当然一会儿也不能活下去的！”

“我们无论驻军行军，都有民众作掩护！”他的语气是那样亲切。“尤其我们在物质的补充上，除了一部分是从敌人那里打来的以外，而大部分还是老百姓帮助呵！”

他们把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等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足迹所至，将民众组织为武装自卫军。他们虽然住在老百姓家里，但有严明的纪律，战士们不得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保护群众的利益，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他们到处受到群众的热诚欢迎与拥护，老百姓还自动地担任着许多艰巨的工作，如传信、谍报、侦探、除奸……等。

“群众的力量太伟大了，”他有些兴奋了。“有一次，我和赵尚志会师方正的时候，突然被日寇三万大军包围，前、左、右三面布满敌军，而背后三十里便是大江，处此困境，我们若硬打，用武力冲出，定要受极大的损失。恰当这时，老百姓送信来了，说江面昨夜封了冻，人马都可通过，而且他在冰上来回走了两遍。于是我们便用一小部钳制迷惑敌人，主力遂偷渡松花江，安然冲出重围，并连克江北通河、凤山、汤原等数城。”

“还有一次”李军长又讲了下面一段故事。“天气冷了，下了雪，然而我们的棉衣问题不得解决，遂和××的农商会伪组织秘商，让他们接济我们军装五千套，约定即送至某某地方，我们响一阵枪，他们抛下军装跑回去，并假意报告伪政府，说军装被‘胡子’截去了。”

最后，他加重了语气，补充一句：“许多许多的困难问题，都是通过群众这么解决的！”

李军长仪表堂堂，表情严肃，讲述战斗经历，象讲故事一样，娓娓动听，扣人心弦。

（原载 1939 年 4 月 21 日《新华日报》，作者：田野）

材料二　民族自救的旗帜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纪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和坚持东北的抗日斗争，经过艰难的过程，建成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高举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抗日救国的旗帜，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于敌后沦陷区坚持反满抗日斗争。大体经历 6 个阶段：

1. 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游击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从 1931 年冬开始，陆续派出干部到各地组织群众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游击区。其中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到汤原，以及共产党员金日成、崔石泉（崔庸健）、金策、夏云杰、王德泰等数十人，先后创建了巴彦、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汤原、饶河、珠河、密山、宁安等反日游击队。同时，中共满洲省委还派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和共产党员李延禄到中国国民救国军中进行团结改造工作，建成绥宁反日同盟军、抗日救国游击军。这些抗日武装共 3000 余人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 30 余个县境，开辟了磐石红砬子、延吉王隅沟、汤原太平川、饶河暴马顶子等数十个小块抗日游击区。各反日游击队，在游击区内独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战斗千

余次，唤起民众，壮大队伍，打击日伪的殖民统治，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拓了新的前景。

2. 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共同作战。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示满洲省委要加强党的领导，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据此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初，相继成立7个军。各军认真贯彻政治建军的原则，加强党的领导，连以上单位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建设，使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人民革命军大力开展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至1935年末，东北抗日游击区已建成磐石、河里、延边、珠河、密山、勃利、绥宁、汤原、虎林、饶河、五常等八大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游击根据地内有的建立反日会、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有的建立抗日的地方政权。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后，积极开展反日武装统一战线工作，多方团结争取东北抗日义勇军共同作战。主要采取战前约定配合行动、统一计划协同作战和建立联合指挥部等多种形式。东北人民革命军依托抗日游击根据地，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共同战斗数千次，打破日伪军多次“讨伐”，攻克日伪军占领的数十个城镇，歼日伪军万余人。部队发展到万余人，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抗日游击区扩及50余县。

3. 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扩大游击区，支援和配合关内抗战。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领导人，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至6军依次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6军，第8军改称第10军，另以第4军第2师为基础编成第7军。同时，又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改编成第8、第9、第11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最盛时期总人数达3万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及其逐步发展壮大，严重打击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其向全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扩张。日本关东军于1936年4月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调集重兵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讨伐”。抗联各军采取留少数兵力在游击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以大部兵力跳出日伪军“讨伐”包围，扩大游击区的方针，以打破日伪军“讨伐”。第1军主力从辑安（今集安）北部山区向桓仁、宽甸、兴京（今新宾）、本溪转移后，为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于6月、11月先后组织两次西征，曾越过南满铁路，进至辽河岸边。第2军主力与第1军一部在长白山区配合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北部东边道九县大讨伐”，巩固和扩大了长白山游击根据地。第3军主力及第4军一部由汤原地区出发，西征至海伦、龙门地区，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游击区；第4军另一部东进，开辟了宝清、富锦游击区。第5军转战至牡丹江下游地区，扩展了游击区。第6军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建立了较稳固的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下江地区人民政权。第7军开辟了同江、富锦游击区。其他各军也都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战。抗联各军从1936年4月至1937年上半年，经数千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数万人，取得了反“讨伐”作战的胜利，游击区扩展到70余个县境，建立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抗联各军紧密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第1、第2军在东南满地区主动出击，进行较大战斗30余次，歼日伪军1500余人。翌年春夏转战辑安山区，在通化至辑安铁路沿线开展破袭战，歼日伪军千余人。战斗在吉东地区的抗联各军向日伪军展开积极进攻，战斗数百次，歼日伪军数千人。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的各军到处打击日伪军，作战42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7600余人。抗联各军广泛出击，打击与牵制几十万日伪军，积极配合全国的抗战，给关内抗战以有力的支援。

4. 编成路军，进行艰苦的转战和远征，挫败日军的“聚歼”计划。

1936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先后成立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东北抗联亦随之编成3个路军，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第1路军辖第1、第2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第2路军辖第4、第5、第7、第8、第10军以及救世军、义勇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参谋长崔石泉。第3路军辖第3、第6、第9、第11军，总指挥张寿篯，政委冯仲云，总参谋长许亨植（李熙山）。

1938年下半年，日军为巩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基地，一方面强化殖民统治，采取保甲连座法和增建集团部落等手段，隔离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加紧军事讨伐、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此时，日伪军警已增至60万人，连续进行“三江大讨伐”，“东南满大讨伐”，“吉林、间岛、通化三省联合大讨伐”，企图彻底“歼除”东北抗联。为打破“讨伐”，东北抗联采取积极措施顽强斗争，以转战、远征的战略行动跳出包围圈。7月，抗联第2路军主力即从宝清、牡丹江地区，向五常、舒兰地区西征。西征中曾涌现出“八女投江”等英雄群体。8月，北满抗联各军主力从汤原、萝北、绥滨地区陆续远征，年底先后到达海伦、德都地区，并在德都县朝阳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第1路军从老岭地区向桦甸、蒙江山区转移，挫败了日伪军在东满地区的“讨伐”。1939年，第2路军在吉东地区反“讨伐”作战20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打破了日军

的“聚歼”计划。第 3 路军在松嫩平原 20 余县战斗数百次，歼日伪军数千人，牵制日军数万人，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和外蒙军队挫败日军挑起的“诺门汗事件”的作战。东北抗联在转战、远征中，虽遭到很大损失，但部队英勇奋战，取得攻击一些城镇据点，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的胜利。

5. 缩编为支队，实行分区作战，坚持小群分散游击战。

1939 年秋冬，日伪军继续进行疯狂“讨伐”。由于斗争形势恶化，部队减员较多。1940 年 1 月，中共吉东、北满省委决定将各军缩编为支队，继续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实行分区作战，开展小群分散游击战。第 1 路军为打破日伪军 7.5 万人全面大“讨伐”，实行分散游击的方针，在长白山区展开艰苦的反“讨伐”作战。杨靖宇率警卫旅转战蒙江(今靖宇县)一带，遭日军重兵围困，历时 50 多天，作战 40 余次，未能全部冲出重围。最后杨靖宇只身与敌周旋 5 昼夜，于 2 月 23 日在蒙江县城南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此后，魏拯民率领第 1 路军在东南满地区坚持斗争一年多，于 1941 年 3 月 8 日在战斗中牺牲。随后第 1 路军编为第 1 支队，继续在绥芬河、东宁地区进行分散游击战。第 2 路军于 1940 年 4 月将第 7 军和第 5 军一部编为第 2 支队。尔后第 2 支队和第 5 军另一部及第 10 军继续在完达山区进行分散游击活动。第 3 路军于 1940 年 1 月 28 日将原有的第 1 至 4 支队，依次改为第 3、第 6、第 9、第 12 支队，继续在松嫩平原坚持游击战，不断打击日伪军。

6. 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进行军政整训，配合苏军解放全东北。

1941 年，日军增至 16 个师团，兵力达 90 万余人。由于敌我力量极度悬殊，日伪军又继续进行更加残酷的“讨伐”，东北抗联的后方密营遭到破坏，大片游击根据地丢失，游击区缩小到不足 10 县，加之自然条件恶劣，部队减少到不足 2000 人。据此，中共吉东、北满、南满省委确定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坚持斗争的方针。此时，东北抗联已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援助关系。冬季抗联部队绕至苏联境内组成南、北野营，夏季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活动。1942 年 8 月，南北野营合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野营和教导旅时期进行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同时还派遣十几个小分队返回东北战场，在北满、吉东、东满和辽吉边区进行游击活动，侦察情况，开展群众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5 年 5 月，德国战败。抗联教导旅为协同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进军，加强临战训练并制定配合苏军作战的行动计划。7 月，派出数百名指战员到苏军中进行训练，月底空降到牡丹江、磐石、海拉尔、赤峰、长春、满洲里等 18 个地区，执行侦察、袭击和为苏军担任向导等任务。8 月，抗联部队配合苏军迅速收复了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等 57 个战略要地，并与从关内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歼灭日伪残余，解放全东北。同时，和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在各地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充军队。9 月中旬建立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委周保中，到 10 月中旬部队发展到 4.8 万人。10 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长期独立奋战，历尽艰辛，战斗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5 万余人，牵制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及警察，堪称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选自《党史文汇》，作者：战军)

材料三　遍地烽火战敌寇
——记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出于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进行武装抗日，被人们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风起云涌，遍及东北各地。参加人员的成份相当广泛，主要是广大农民，其次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和退役的军政人员，还有工人、知识分子和商人。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绿林武装也调转枪口参加抗日斗争。也有毁家纾难的开明士绅和地主。其人数最盛时有 56 万，如果加上利用各种方式先后参加抗日活动的可达百万人。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情况来看主要包括三部分武装。一是以农民为主的民众抗日武装，其中包括大刀会、红枪会等武装，共约 28 万人。二是绿林抗日武装，据不完全统计，绿林队伍参加抗日者近千股约 20 万人。三是东北军警部分爱国官兵组成的抗日武装，共约 8 万人。从义勇军的发展过程看，她是以民众抗日武装为主体，以绿林抗日武装为先锋，以东北军警的长官为主要领导，以东北军警部队为骨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民众揭竿而起，绿林抗日武装遍地烽火，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群众性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东北军、警察部队的少数长官陆续率部举旗抗日，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军事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所以大多数民众抗日武装和绿林抗日武装都自动投其所辖或被其收编，逐步形成以东北军、警长官为领导的，以群众和绿林武装为主要成员的十几支较大的队伍。东北抗日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沦陷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她的抗日斗争，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 义勇军遍地烽火，顽强抗击日军进犯(1931・9—

1932·2)。“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尔后退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此时，辽南、辽西民众抗日武装迅速兴起。老中医金子明在阜新建立抗日武装，成为辽西抗日主力之一。黑山县老举人孙鸿猷变卖家产，率家族子孙成立义勇军。绿林人士高鹏振、张海天、项青山迅即拉起数千人的抗日队伍。11月，设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热北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主要是民众和绿林武装。吉林省义勇军以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为骨干，以民众和绿林武装为主体组成。首先是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吸收绿林人士宫长海、姚秉乾等武装，开展抗日斗争。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省)和榆树等地阻击日军。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省)成立吉林自卫军，进行了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保卫战。尔后吸收哈东各县民众和绿林抗日武装，达5万余人。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本营官兵为骨干，以农民为主体，吸收姚振山等大刀会和绿林武装，迅即发展到近2万人，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始于江桥抗战。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南嫩江桥一带英勇奋战月余，毙伤俘日伪军近万人。尔后撤至海伦地区，组织各县民团，吸收绿林人士李海青、张锡武等部，组成义勇军，编成10个总队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毙伤俘日伪军2万余人，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2. 义勇军迅猛发展，积极向日伪军进攻(1932·3——1932·10)。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为打击日本的殖民统治，向日伪军展开声势浩大的攻势作战，在战斗中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辽宁省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27万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其编为58路和几十个支队，并按活动区域划分为五个军区，在辽宁、热东和蒙边60余县开展反满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义勇军发展到16万人。3月，吉林自卫军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属黑龙江省)等地节节阻击日军进犯，毙伤俘日伪军3000余人。4月初，该部吸收哈东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武装，共达5万余人，尔后从依兰(今属黑龙江省)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毙伤俘日伪军数千人。6月，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吉林省中部地区的民众和绿林武装均投所辖，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9月进行了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王德林的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继续组织4次伏击战，毙伤俘日伪军2500余人，并取得安图、敦化等战斗胜利，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各类抗日武装和吉林省西部地区的一些抗日武装，尽附其指挥，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全省义勇军与日伪军战斗千余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的广大地区。

黑龙江省义勇军在马占山一度附逆时受到很大损失。马占山再度抗日时，于5月在海伦成立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任总司令。马占山收拢旧部，号召伪军反正，吸收民众和绿林武装，使部队不断发展，最多时达10万余众。该部于呼海路(呼兰至海伦)、齐克路(齐齐哈尔至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与日军激战月余。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毙伤俘日伪军数千人，使日伪军惊恐不安。

1932年夏秋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的鼎盛时期，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5000余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8万余人，给日伪当局以沉重打击。

3. 义勇军大部败退，余部坚持分散的抗日斗争(1932·11—1940)。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它的威胁，于1932年冬集中20余万日伪军进行大“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顽强作战，虽在局部地区获得一些战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军政素质较差，战斗力弱，又孤立无援，没有后方保障，大部败散。日军大讨伐后，东北抗日义勇军除死、伤、俘、降外，有11万人退到热河和苏联境内，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继续战斗，有些仍保持原来的组织系统，有些则成为分散在各地的山林队。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分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的序列，或与抗联组成联合司令部共同战斗，一部分继续独立战斗，至“七·七”事变时仍是东北抗日战场的生力军。1937年还有2万余人，1940年剩千余人。辽宁省义勇军5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大部分坚持到1936年，少数人战斗至1937年冬。吉林义勇军6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先后攻克东宁、虎林、方正等10余座县城。救国军余部数千人战斗到1940年。黑龙江省义勇军2万余人坚持斗争多年，少部分战至1940年。热河省义勇军1.5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坚持长时间战斗，先后攻克阜新、北栗、奈曼等县城。孙永勤部战斗到1935年春。刘振东、周荣久、兰天林等部数千人战斗到1937年前

后。李天德部千余人坚持斗争至1944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反满抗日斗争10余年，主要战斗万余次，毙伤俘日军7万余人、伪军8万余人。

（选自《党史纵横》，作者：凌勃）

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

背景介绍

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由牺盟会组织的一支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又称"新军"，以区别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队。

1936年9月，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下，经一些进步人士和在阎锡山部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努力，山西发起组织了地方性的抗日群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阎锡山任会长，其他领导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彭雪枫，南汉宸为正式代表，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与阎谈判。阎锡山同意联合抗日，并同意共产党在太原设办事处，派驻正式代表，我党决定彭雪枫为驻太原办事处主任。

与此同时，我党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也正在做山西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刚出狱，阎锡山派人拿着他的电报，邀薄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北方局决定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到山西太原，进行统战工作，以后又派张友清到山西组织"工委"，以秘密工作来配合。薄一波到山西后，和阎锡山进行了谈判。阎任命薄一波为"牺盟会"秘书长，把"牺盟会"交给了薄一波等共产党员重新组织，阎锡山名义上还是会长，但实际领导权已转到共产党手中，成为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组织。1937年上半年，"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六十万人。为了培养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以吸收山西当地和平、津、沪、冀、鲁、豫等24个省市的广大爱国青年，把他们培养训练成为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37年秋，雁北失守，日军沿着同浦路大举进攻山西，十几万晋绥军，一触即溃，高级将领争先抢渡黄河，纷纷向陕西、四川逃窜。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军长李明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阎锡山对旧军逐渐失去信心，便同意薄一波的建议，决定另组新军。这时"牺盟会"在党的领导下，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动员与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方面。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决死队最初是在原"军政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建立的，有一千五百多人，编为第一总队，薄一波任政委。同年11月，决死队改称新军。1938年春，新军扩编为四个纵队。一纵队队长鲁应麟、政委薄一波，主要活动于太岳区；二纵队队长陈庆华、政委张文昂，政治部主任韩钧，主要活动于晋西南；三纵队队长陈光斗、政委戎子和，主要活动于上党地区；四纵队队长梁浩、政委雷任民，主要活动于临汾、大宁、临县一带，后转入晋西北。根据我党同阎锡山达成的协议，新军的各级军事指挥员由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则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新军中实行政委一长制，政治委员具有特殊的权力。总队（团）设政治委员，大队（营）设政治指导员，队（连）设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工作员，连队有秘密的党支部，领导全连工作。由于在新军中建立了进步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制度，加强了部队的阶级教育和民主教育，组织进步力量反对旧军官和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从而使党在新军中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1938年底开始，新军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泌县的西林办了三期"军政训练班"，每期三个月，新军排、连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参加了训练。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给训练班讲课。训练结束后，新军又换掉了一批排、连、营的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部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1939年上半年，新军发展到50个团，约四、五万人，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共政策，"东方慕尼黑"也正在密谋策划。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宜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能兼任军官，要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纵队政委的职务，提出取消新军纵队的编制，改为旅团，和旧军一样，取消政委制。由于受到我党和新军的坚决抵制，阎的夺权阴谋未能得逞。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了反共急先锋，发动"十二月事变"，提出"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集中六个军的兵力，武装进攻新军。新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了自卫原则，进行了有力的反击，粉碎了阎锡山反动部队的进攻，继续坚持了抗日斗争。

1940年2、3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一、三纵队编入一二九师，二、四纵队和工人自卫旅编入一二〇师，从此新军便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

材料：

· 薄一波谈山西新军问题

材料 薄一波谈山西新军问题

新军九个师、旅共约五十个团。1937年8月1日，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的基础上首先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个团的建制），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为了确掌这个部队建立的政治委员制度吧。决死队建立后，于1937年9月间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在那里，我见到了朱德，向他介绍了山西新军的组建情况和到晋东北的意图，即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朱总司令说：八路军要在这里坚持抗战，现在晋东南是个空子，你们去那里创建根据地为好。接着我到太和岭口（那时阎的司令部设在这里）向阎锡山报告，决死队在五台山地区活动得很好，有战斗精神，很有朝气，与这次旧军雁北失利，不战而溃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建议“青年抗敌决死队”到上党地区活动，并乘机提出以八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再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以坚持山西抗战。这时雁北失守，晋军溃退，山西形势十分危急。阎锡山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并把组建新军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在11月8日太原失守前组建成四个决死纵队（开始各辖两个团）和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晋西、晋西北组织起十多支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暂编第一师。1938年，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又组织起政治保卫队本队及一、二、三、四支队等，后扩编为二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等三个旅。这支拥有近七万人的新军，在抗战中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新军和牺盟会一样虽然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建制上属于阎军系统，但实际上是党领导的，戴着“山西帽子”，发展我党我军力量。对这一点，当时有些人甚至我们有些同志也并不了解，我今天向与会的同志说明一下，也许是必要的。1938年，曾经有同志提出过，“山西形式”现在不需要了，应该取消。当时，我曾向北方局作过汇报。北方局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对决死队和牺盟会的片面看法。指出，不能摘掉这顶帽子。这一形式是我党在山西统一战线成功的一着，是促进阎锡山抗日的好办法。北方局领导同志的这一指示，对新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拉着阎锡山抗战方面也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指示，不管情况多么困难，我们仍然要争取阎锡山抗日。1940年1月27日党中央、毛主席致电朱、彭、杨、贺、关、聂、彭转告我和张文昂、戎子和、续范亭等“应继续不断地打电报给阎、梁（化之）、杨（爱源），痛陈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残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绝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就是说还要继续戴着“山西”这顶帽子。争取阎锡山抗日，做到仁至义尽。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基本上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抗战胜利后，由于阎锡山积极反共，配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破坏了山西统一战线的局面，这才使山西新军正式列入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奋起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摘自《党史通讯》1985年第3期《薄一波同志关于山西新军问题的一封信》一文）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提交大会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案草案，遭到多数人的反对。18日，宋庆龄在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的讲演中，尖锐指出：“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她强调，“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21日，会议通过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国民党在这些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坚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自己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并对中国共产党有许多诬蔑之词，但不可否认，其政策已开始转变。《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并将依据此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关于对日问题，表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只有“出于抗战”。《决议案》中，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

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又于2月24日就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三个问题，发表谈话，部分地答复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材料：

- 会议经过
- 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报告
- 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

材料一　会议经过

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定于本年二月十五日召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盖距上次全体会议之举行，为时已七个月。半年来之工作设施，应待检讨，而承西安事变之后，党政大计亦亟待策划也。全会于十五日如期开幕，二十二日闭会，中经八日，共开预备会议一次，正式会议六次。出席中央执行委员：（略）。凡所决议，于外交、内政以及经济、建设诸端，均有详密郑重之讨论。会议经过，约如下述：

开幕典礼

二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在总理陵前举行开幕典礼及纪念周，由汪委员兆铭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并献花圈。由汪主席致开会词，词曰：（略）。词毕，复领导全体入墓门恭谒灵寝。谒毕复位，摄影，礼成。相率回抵中央党部第一会议厅开预备会议，时上午十一时也。

预备会议

居委员正为临时主席。当经决议：（一）推蒋中正、汪兆铭、戴传贤、王法勤、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九委员为主席团；（二）叶委员楚伧为秘书长；（三）会期定为三日至五日；（四）提案审查委员会分党务、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五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报告大会；（五）所有提案均先交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送由主席团商定提会，十七日下午十二时截止收受提案；（六）所有提案非经秘书长核定，不得发表。

第一次会议

十六日上午九时开第一次会议，于委员右任主席。开会如仪。并对绥远阵亡将士及西安殉难同志默哀致敬。主席团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各组委员人选：

一、党务组：陈立夫、周启刚、陈公博、丁超五、洪陆东、余俊贤、李嗣璁、姚大海、陈耀垣、余井塘、苗培成、萧吉珊、谢作民、崔广秀、戴愧生、谷正纲、王陆一、胡文灿、方觉慧、林叠、洪兰友、方治、张厉生、陈肇英、田瞭山、吴开先、时子周、张强、陈泮岭、陈访先、王子壮、王秉钧、萧忠贞、王瞭嵛、杨熙绩、詹菊似、秦 德纯、刘健群。召集人：陈立夫、陈公博。

二、政治组：吴铁城、王宠惠、张群、商震、柏文蔚、覃振、甘乃光、刘守中、马超俊、邓家彦、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陈璧君、邵力子、蒋作宾、郑亦同、李宗黄、赖琏、邵华、张冲、叶秀峰、谷正鼎、陈树人、赵丕廉、焦易堂、李任仁、陈肇英、吴忠信、萧同兹、麦斯武德、陈仪、梅公任、傅秉常、乐景涛、罗桑坚赞、贡觉仲尼、王用宾、吴经熊、张继、恩克巴图、黄绍竑、麦焕章、狄膺、溥侗、沈鸿烈、何键、黄旭初。召集人：邵力子、恩克巴图。

三、经济组：宋子文、贺耀组、曾养甫、孔祥熙、王正廷、刘纪文、梁寒操、萧铮、薛笃弼、郑占南、王懋功、潘云超、朱霁青、彭学沛、徐堪、俞飞鹏、曾仲鸣、吴保丰、赵棣华、闻亦有、邓青阳、李绮庵、李文范、张道藩、王漱芳、刘维炽、石瑛、程天固、徐恩曾、林云陔、熊式辉。召集人：孔祥熙、李文范。

四、教育组：朱家骅、王伯群、经亨颐、吴敬恒、李煜瀛、褚民谊、陈布雷、陈果夫、雷震、周伯敏、彭国钧、鲁荡平、段锡朋、罗家伦、李敬斋、何世桢、孙镜亚、周佛海、潘公展、王世杰、张默君 、陆幼刚、王泉笙、何思源、吴挹峰、柳亚子。召集人：吴敬恒、王世杰

五、军事组：朱培德、何成浚、王柏龄、李烈钧、程潜、张贞、何应钦、杨杰、陈策、杨虎、张发奎、蒋伯诚、钱大钧、陈庆云、李福林、陈绍宽、鹿钟麟、陈调元、刘建绪、罗翼群、张钫、石敬亭、许崇智、欧阳格、谭道源、余汉谋、谷正伦、孙连仲、庞炳勋、黄实、朱绍良、徐源泉、陈诚、刘峙、蒋鼎文、徐永昌。召集人：何应钦、朱培德。

次党务报告，关于常务委员会部分，居委员正说明，次政治报告，中央政治委员会及行政院由孔委员祥熙说明；考试院由戴委员传贤说明。旋决议：党务报告交党务组审查，政治报告交政治组审查。

第二次会议

十七日上午九时开第二次会议，孙委员科主席。何委

员应钦作军事报告，张委员群作外交报告。当经决议：军事报告交军事组审查，外交报告交政治组审查；并通过推汪兆铭、戴传贤、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五委员为宣言起草委员。

第三次会议

十八日上午九时开第三次会议，戴委员传贤主席。汪委员兆铭报告朱委员益之于十七晚因病逝世。主席宣告请全体起立为朱委员默哀，并推派何应钦、马超俊、谷正伦三委员代表全体前往吊唁。次孔委员祥熙作财政报告，决议交经济组审查。次讨论提案审查委员会各组提出之案，计通过：推进各省边区党务办法，党务工作人员训练办法，及广东省公务员铨叙补救办法等案。

第四次会议

十九日下午三时开第四次会议，冯委员玉祥主席。蒋委员中正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大会于蒋委员为党为国夷险不渝之风谊，深致佩慰；对于事变殉难之文武人员，尤致景仰悼惜之意；至倡乱者所谓八项主张云云，以其出于叛逆行为，断然不予置理；而对于悔过者则冀其革面洗心，彻底觉悟，以报党国。次讨论提案审查委员会各组提出之案，计通过：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改进海外党务，确定以举办社会服务事业为今后地方党部之中心工作，及中央委员列席中央常会及政治委员会等案。最后主席团提出：蒋委员中正呈请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本兼各职。大会对于蒋委员十余年来之精诚坚苦及伟大人格之表现，认为得未曾有，际兹国难方殷，万端待理，甚盼领导群伦，努力迈进，所请辞去本兼各职之处，应即无庸置议云。

第五次会议

二十日上午九时开第五次会议，汪委员兆铭主席。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大会宣言及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案。复以此次全会会期已满，尚有议案未及讨论，决议：大会延期一日。

第六次会议

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开第六次会议，邹委员鲁主席。通过：(一)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二)中央党务委员会取消主席制，仍复常务委员制；(三)推邵委员力子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推陈委员公博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闭会式

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闭会式及纪念周，王委员法勤主席。行礼如仪。于委员右任宣读大会宣言。旋即奏乐，礼成散会。

（摘自《上海民国日报》1937年2月）

材料二　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报告

谨报告者：

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搆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遭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述始末。唯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职守亏损，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借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

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后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唯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值兹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借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此致第五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附送《西安半月记》。蒋中正，二月十八日。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三　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党以历史之使命，奉总理遗教，致力国民革命，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本春秋无外之旨、对于世界殷殷焉蕲至于大同之治，对于国内更断无町畦畛域之见；惟求集中国力，奠定统一之基，以谋中国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愿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此为总理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迄中国国民党一贯之精神。是以兴中、同盟时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识之志士；十三年改组时，则容纳共产党员个人加入本党；史实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断则对本党多方分化，当时本党犹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国民革命军出衡湘，克武汉，乃复遮断本党与民众之联系，播植赤化之祸种，以谋颠覆本党革命建国之基础；阻挠东下沪宁之师，牵掣北定郑汴之役，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昌言 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本党为巩固党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计，乃不得不当机立断，以有清党之役。此共产党人以自绝于国民者，自绝于本党，往事历历，为当世所共见共闻者也。嗣复一面鼓其邪说，荧惑青年，一面结集成队，四出骚扰，为患十年余，荼毒十数省。远之如武汉、南昌、广州、长沙之变乱，以及粤之陆海丰，闽之龙岩、永定，赣之吉安、上饶、永新、铜鼓、弋阳，湘之平江、浏阳、华容，鄂之沔阳、黄安、监利，豫之商城、黄川等县，匪踪所至，田畴为墟。又复伪立政府，致赣、粤、闽、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躏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责，对于毒害人民之匪类，自不得不予以荡除。数年以来，节节清剿，赖我将士智勇忠诚，秉持三民主义，牺牲奋斗，卒能抉其根株。凡经匪众盘踞而为国军克复之地，立即为之区处条理，招辑流亡，不数月而渐复旧观，民获安居，咸庆得所。以我宽仁，易彼残暴，相形之下，妇孺皆知。彼等自江西总崩溃后，由湘、黔、滇边境而四川而甘、陕、宁、晋、青等省。于人民则裹胁之后，继以残杀；于庐舍则摧毁焚烧，惟恐不尽。城市农村之经济，莫不尽力破坏，鲜有孑遗。是皆陈事昭彰，无待缕举。其尤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来，国难严重，全国国民在统一政府之下，实行集中国力，精诚团结，悉心建设，充实国防，以御外侮，犹恐不及。而共产党人乃乘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肆意扰乱。于淞沪之役，则猛攻赣州；长城各口之役，则猛攻抚州，危及南昌；使抗战之师，为之牵制。其他破坏国防，摧残民力之事，更变本加厉。言念及此，举国共愤。今者共产党人于究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亿万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殷忧。就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要之，凡独立自主之国，断不能容许有反国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团体，亦决不能容忍任何残害民生毁弃道德之行为。本党负建国立人之责，共产党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国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国同胞昭告者。

（摘自《救国日报》1937 年 4 月 15 日）

平、津陷落

背景介绍

1937 年 7 月 28 日晨五时许，日军对北平近郊实施总攻击，以第二十师团主力，配以火炮约四十门，向南苑大举进犯；另以混成第四旅团所部切断了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

团，则从北平北侧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以飞机四十架，对黄寺、北苑、西苑、南苑轮番轰炸，战事异常激烈。

当时，二十九军仓卒应战。“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二十九军官兵，苦战终日，损失甚众，南苑遂告失守。副军长佟麟阁不幸阵亡。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向北平城内撤退时，受到敌第四旅团的截击，亦为国捐躯。

南苑的战事既失利，而敌人在北苑、西苑方面进攻激烈。二十九军所部节节抵抗，迄晚亦撤退。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虽曾分别克复丰台、廊房，但在敌人增援反攻下，再次失守。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于是晚十一时，偕北平市市长秦 德纯等离平去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平郊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张自忠虽然代理冀察军政事务，滞留北平，实际上北平于29日已沦入日手。

在北平战事激烈时，驻守天津的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率领下，协同津市保安队，于29日向日军控制的海光寺营房、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展开攻击，给敌人以杀伤。旋敌人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向我反扑。总车站、南开大学等处，几全被炸毁。天津市区遭受严重损失。30日，二十九军所部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

日军经小战而轻取平津，是国民党长期对日本帝国主义委曲求和的必然结果。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虽调兵北上，但进展迟缓，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应战决心不大，从而导致平津迅速失守。之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一方面分三路沿平绥、平汉和津浦路向西、向南进犯；另一方面于8月17日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再次在上海挑起战争。

材料：

- 廊坊事件
- 平津沦陷

材料一　廊坊事件

宋哲元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的蛮横霸道，乃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动身回北平积极筹划抗战。国民政府也答允战时为宋部补充军械弹药，调动兵力支援。

七月二十五日，“廊坊事件”爆发。当日军在平津附近部署优势兵力后，伺机重新开战。廊坊位于平、津之间，扼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时由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驻守。二十五日下午，日铁甲车载兵士百余人，以修理平津之间军用电话线为借口从天津抵达廊坊，强行侵占车站，有意挑衅，与当地驻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日军增派援兵千余人在十四架飞机和数辆装甲车掩护下，向廊坊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炮火。中国守军虽拼死反抗，但在优势敌兵的冲锋下，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忍痛退出廊坊，转至黄村。日军随后又乘胜进占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切断了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交通。宋哲元得报后，立即召见外交特派员，告以“战争恐不能免”，急令第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迅速返察，做好作战准备。

日军占廊坊后，当日下午又派出一个大队约五百人自丰台乘卡车数十辆，想从广安门强行进入北平城。守城部队第二十五独立旅第六十九团刘汝珍部，上前拦截制止，日军开枪射击，中国军队即把城门紧闭，将日军分别包围在城内外。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损失惨重，敌首樱井德太郎负伤而逃。当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二十七日正午以前将卢沟桥和八宝山附近第三十七师撤至长辛店，并把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所部全部撤出城外，然后陆续退往保定，“如果不实行，则认为贵军未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行动以谋应付。”按照日军要求，简直是要中国军队拱手让出北平。

日军不待中方答复，便于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向通县发动总攻。双方激战至午，中国军队突围撤退。同日晨五时，日军也向团河围攻，并出动飞机十八架配合作战，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至此，蒋介石和宋哲元都感到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已毫无希望。蒋电令宋部，“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宋哲元当日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会后通电全国，决心誓死守土。同时又通令二十九军各部奋勇抵抗，指示北上的第四十军向静海、独流镇集结，策应天津，第二十六路军进驻长辛店、良乡，以支援北平。

可是，宋哲元对日态度的摇摆，使抗日作战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日军绝不允许第二十九军有喘息的机会。二十八日黎明，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以第二十师团为主力，配以重炮四十门，向南苑大举进犯，另以混成第四旅团所部切断了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从北平北侧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出动飞机四十架对中国守军的工事轮番轰炸，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二十九军在敌重兵围攻下仓促应战，“因驻地分散，且中其缓兵之计，未能将兵力集中”，很快被日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加之防御工事简陋，尤其是南苑方面，仅以营防周围障碍物作为掩体，在敌人优势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很快各部队之

间的通讯失去联络，造成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情况极其险恶。不久，南苑失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壮烈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撤向北平时，受到日军袭击，中弹身亡。

二十八日，昌平、高丽营的日军在飞机的配合支援下，分向沙河、小汤山、北苑一带猛扑。二十九军所部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仍浴血奋战，节节抵抗，临近傍晚向北城圈退却。为扭转被动局面，武清方面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向廊坊展开攻势，切断敌人后路，威胁其侧背，但很快被敌军回援部队击退，于当晚向安次撤退，同时丰台亦得而复失。入夜以后，战况更加不利，北平南、北郊的日军俱已迫近城垣。宋哲元见颓势无法挽回，乃命令北平郊外作战部队向永定河右岸退却。晚十一时，宋哲元偕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等离平赴保定，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之职，收拾残局。七月底，文化古城北平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当北平激战之际，驻守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偕同天津保安警察部队，于二十九日向日本驻津各机关及租界发动进攻。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翀联名通电："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中国军队一度攻占了北仓飞机场及日军驻守的车站，逼近日租界中的海光寺营房，给敌人以杀伤。旋敌援军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昼夜，三十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

（摘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平津沦陷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从东北方面调来的日军约一百人，由天津乘装甲列车到达天津与北平之间的廊坊车站，借口修理电话，将该站占据。当时，驻守廊坊的中国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要求日军撤走，日军不理，双方僵持，至于午夜。

二十六日午前零时，日军突然向中国军开火，进入战斗状态。及至黎明，有日军飞机十四架来袭，这是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最初的轰炸。继之，在上午七时，由天津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并有战车助战，发动猛烈攻击，中国的营房及车站一带都被完全摧毁；上午十时，中国军不得不终于放弃阵地。

廊坊的冲突，决定了事变的扩大。

虽然在此之前，当地已曾不断有小规模的接触情况，但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等"不扩大派"正在军方内部从事疏解，并抑制日本内地动员；但当廊坊冲突之后，"不扩大派"的态度也为之改变，石原即于二十六日午前一时打电话给留宿在陆军省军事课长室的该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告知："现在只有动员内地师团，如果有所迟延，则一切完蛋，希望火速处置。"此后，便趋向于扩大途径。而石原本人则于九月间军部决定对上海增兵之同时离职。

七月二十六日，攻夺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据了平津之间之北仓、落垡各站，将铁路交通切断。同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遂即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军长）提出内容有："（一）芦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三十七师须于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二）北平城内之第三十二师、西宛（北平郊外）之第三十七师部队亦须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之要求；并于文末言明："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实则就是一件最后通牒。

这一天（二十六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示：

"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介石）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

就是同一天傍晚，在北平又发生了新的冲突。

当时，有分乘军车数十辆的日军，驶达北平城的广安门，伪称"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总领事馆卫兵"，企图闯入北平；实则乃是驻屯丰台的战斗部队，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第二十九军独立二十五旅六七九团（团长刘汝珍）识破诡计，乃打开城门诱引日军入城之后，一齐开枪射击，日军陷入混乱，死伤十多人。这就是所谓"广安门事件"。

"廊坊、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 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蒋介石七月二十六日日记）

翌日（二十七日），日军已不再等待他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发动了攻击——午前三时，突袭驻扎于北平东方二十公里之通州的中国军，继之于五时又有在十八架飞机掩护之下的骑兵进袭北平南方的团河，该地中国守军牺牲千人以上。

及至午后，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各地都陆续受到攻击。

芦沟桥边所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二十八日拂晓，第二十九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平城外南苑，受到约四十架日军飞机的反复轰炸，以及约三千机械化部队的猛烈攻击，阵地都被摧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多数官兵壮烈成仁。

同时，西苑、北苑也在日军激烈攻击之下。

当天午后，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长秦德纯、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举行紧急会议。面临的道路是死守北平呢？还是放弃？本来中央和全国民众都希望他们死守北平；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忍使文化古城因战火而化为灰烬。于是，紧急会议乃终于决定退守保定，而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在当地；宋哲元与秦德纯则于下午九时离平出发，前往保定。

继之，第二十九军官兵也在夜半怀着痛惜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古城北平。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七月二十九日日记）

此时，在天津方面的中国军，则谋作最后之抵抗——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所率领的部队，于二十九日午前二时，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一度夺回为日军所占据的飞机场及火车东站、西站，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之下，不得不于三十日放弃了天津。

（摘自《蒋介石秘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八·一三”淞沪会战

背景介绍

1937年8月9日，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水兵一名，乘汽车闯入上海虹桥军用机场，不服劝阻，致起冲突，二人均被中国守军击毙。中国保安队亦死亡一名。上海市长俞鸿钧闻讯，谋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方乘机扩大事态。11日，无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战争实已无法避免。13日晨9时，日军以租界为依据，突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和持志大学，并以海军舰艇猛烈轰击上海市区。淞沪战役正式爆发。

时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所部驻守京沪铁路沿线；苏浙边区主任张发奎指挥所属部队驻守沪杭铁路一带；上海守备任务由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的保安总队等担任。战争开始后，中国方面密令部队向上海集中。军委会制订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要领是：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能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国方面决定采取攻势作战，以张治中所部攻击虹口和杨树浦；以张发奎所属强袭浦东，警备杭州湾北岸，防止日军由海上登陆。

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当日，中国部队在上海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据点。中国空军亦投入战斗，猛烈轰击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汇山码头等日军阵地，炸伤敌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击落敌机多架。双方连日在闸北、虹口和杨树浦一线，激烈战斗，反复争夺，中国部队曾一度攻入敌军俱乐部。敌我均伤亡严重。

日本放弃了对华战争的“不扩大方针”，8月15日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于22日深夜起，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中国增援部队第十五集团军陈诚所部进行阻击，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一线，发生激烈战斗。守备宝山的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第三营，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与敌搏斗两天，均为国捐躯。9月17日，中国部队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带。日军不断增兵淞沪战场，中国守军迅速丧失战役初期的主动权，被迫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以张发奎率第八、第十两集团军组成右翼作战军；以朱绍良率第九、第二十一两集团军组成中央作战军；以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还组织了江防军，防守长江下游各要塞。

9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再次派遣第九、第十三、第一O一师团以及野战重炮旅团等到达上海，投入作战。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22日起，在战车、火炮的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左翼作战军续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日军为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企图南渡蕴藻滨控制大场、南翔。10月11日以后，敌我双方在蕴藻滨沿岸展开激战。25日，中国守军退至走马塘、大场、新泾桥一带，日军猛犯大场。26日，中央作战军主力撤到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地区。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一营官兵在团副谢晋元率领下孤守北岸四行仓库，掩护友军撤退，其英勇奋战精神，震动全国。之后，日军多次强渡苏州河，均进展不大。

日军长期胶着上海，不利其迅速扩大战果。10日12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以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11月7日又组建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以松井石根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日军在华中地区作战。这一决定极大地影响了淞沪战局的发展。

杭州湾北岸本由第八集团军守备，后来随着正面战斗吃紧，部队多被抽走，只剩下第六十三师之两营又一连，警备着这漫长的海岸，兵力极为单薄。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辖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及国琦支队）在强大火炮的配合下，于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顺利登陆。第三战区虽由奉贤、闵行等处急调部队阻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

实行迂回包抄，谋切断我沪杭线退路。与此同时，苏州河方面之敌，加紧向右岸攻击，以相呼应。到此，淞沪守军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

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由于松江已于9日陷入敌手，淞沪守军分两路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浦东和南市守军继续坚持两日以后才撤退。11月11日夜，上海沦陷。

材料：

- 先发制人
- 寸地必争

材料一　先发制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军官大山勇夫在虹桥飞机场与我守军冲突被杀，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十一日，敌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有即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事的企图。

这时，我京沪区在苏州、常熟、无锡一带的驻军，仅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炮兵第八团、炮兵第十团、警察总队一总队、独立第二十旅的一个团。我立即命令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做输送前进的准备。

十一日下午九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

我当即作了下列几个重要决定：

1. 第八十七师的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前进至市中心区；
2. 第八十八师前进至北站与江湾间；
3. 炮兵第十团第一营及炮兵第八团进至真如、大场；
4. 独立第二十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
5. 令炮兵第三团第二营及第五十六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
6. 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五十六师及江苏保安第二、第四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我是八月十一日夜半离开苏州，统率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向上海挺进，十二日晨，进驻上海。清早，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抗日将士，惊喜交集，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这是由于我们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能够于一夜功夫，便进入了上海预定阵地。

这时，我决定攻击部队于八月十三日拂晓以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攻击准备。此时，我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我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

因此，原定十三日拂晓的攻击，不得不停止。我预定十三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是：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十一日发出，十二日到达外交部，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是否如此，无从确断。

我们的进攻，因此延到十四日午后三时才开始。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抗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八月十三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在八月十四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大战的血幕既已正式揭开，我外交部在这天曾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同日，我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主要显示我军坚决抗日的态度，其中一段是：

> 昨（十三日）下午四时，日方军舰突以重炮向我闸北轰击，彻夜炮声不绝，我居民损失奇重。同时复以步兵冲出界外，进攻我保安队防地，我方仍以镇静态度应付，从未还击一炮。现日方又大举以海陆进攻，我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返顾。兹应郑重声明者，上海和平既为日方炮火所震毁，而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骑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天。五年以来，无日不申儆军中，以湔雪国耻、收复失地为己任。我十万健儿之血肉，即为保卫国土之长城！决以当年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

上面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我对敌行动的正式宣言。

从八月十四日起到二十二日止，是我军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猛烈攻击的时期。

敌自我军开始行动后，就在虹口、杨树浦两大根据地，利用其炮舰火力的掩护固守，等候他们国内的援军到来。八月十四日上午，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三时下达总攻击命令。下午四时，我们的炮兵就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没时止，多有进展。突然又接到上级命令：

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侍参京电）

于是攻击实施，又因此停止。

十五、十六两日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其中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八连与第七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

十五日，我发出一个通电，原文如次：

> 各报馆转各部队、各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公鉴：元日

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应援，保卫我先祖列宗革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天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大光荣之胜利。擐甲陈词，不胜激越！

在日援军登陆以前，我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尤为必要。十七日拂晓，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这次总攻击，其经过及成果的概要，可见我给南京军委会的一个电报：

密。本军于今(筱)晨五时半，按预定部署，全线开始总攻击。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谨将各部激战实况分陈如次：(1)八十八师以主力由北分向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攻击，往返争夺，伤亡甚重，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一营之众。而攻日本坟山之部，于上午十一时攻入后，因受敌侧方机枪射击，未能返出，死伤尤多。日没前，北正面受敌反攻，已被我击退。(2)八十七师先对日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迄九时许，得王师长(敬久)电话报告，已占领日俱乐部及海军操场。惟经派员确查，据称日俱乐部旁之四层楼油漆公司，尚为敌死守，我军正向其包围。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及引翔港镇方面，则激战终日，尚未得手。下午五时许，敌由海军操场南两次激烈反攻，均被我击退。(3)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我在这天上午八时许到前线视察，经第八十八师炮兵阵地到第八十七师，所见官兵士气高涨，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极可嘉。从正午十二时到下午四时，我在万国体育场附近督战，枪炮声密集，战斗激烈。我又看见我国空军也很敏捷勇敢。敌人高射炮声如连珠，弹发如雨，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十八日，我又接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开战以来，第三次的停攻命令。

但是，敌人在这时却整天在其飞机掩护下，到处以小部队向我反攻。我们司令部到前方的电话，也常被敌谍破坏。

十九日，我军又开始攻击。到下午五时，接到第八十七师王师长电话，说他的左翼最前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我决心即刻扩张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当即我率同重要幕僚，进驻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司令部，部署一切。

1. 令第三十六师即夜加入沙泾港至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

2. 在日俱乐部正面的第九十八师之一旅，受第三十六师指挥。

3. 令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归第八十七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 、公大纱厂攻击

二十日拂晓前，我之突破，西进展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敌从昆明路方面向我多次反攻，都被我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有一件事，使我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就是突破杨树浦租界时，我们只凭几辆破坦克(是在厂内修理的，临时拉出，好的坦克早调北方去了)冲击。带领坦克车的连长，也是军校的学生。我命令他冲杨树浦。他说："车子太坏，而敌人的火力过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我说："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结果他冲到汇山码头，连人和车子一起牺牲了！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但未能确实占领，因敌人利用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弹，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步兵虽极勇猛地跟上，但挡不住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也不容易冲破敌方在街市上的坚固据点。所以这天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

二十日晚上，我乘月夜亲赴江湾前线督战，指挥各部队继续猛攻，并以第九十八师全师加入，准备以全力先攻略杨树浦。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的第一线部队推进到百老汇路、唐山路、华德路之线，以新到的第十一师及教导总队第二团控置于江湾市中心市区为总预备队。二十一日，各部队继续攻击。第三十六师最前线部队，在新调来的战车掩护下，又攻抵汇山码头，到拂晓后，因受敌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迫不得已，才退回百老汇路北侧。我战车第一、二两连，全被击毁。第八十七、八十八、九十八各师攻击，也都没有多大进展。二十二日，我军各部继续进攻，但因敌增援已到，攻击已不得手，仅第八十七师在午后将精版印刷厂及康泰厂两据点占领。入夜，敌分途反攻，都被击退。

这是从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攻击虹口、杨树浦根据地的战斗经过概要。

(摘自《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

材料二　寸地必争

卢沟桥事变时，我是桂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六

团团长。淞沪战役前夕，白崇禧飞赴南京，决定广西部队照中央编制改换番号，将原来一师三团改为一师两旅四团，第七军第十九师改称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下辖第五〇八、五一一两旅。调罗活为第五〇八旅旅长，旅辖两团，原第五十五团改称为第一〇一五团，团长黎式谷，原第五十六团改称第一〇一六团，我任团长。当时桂军的装备相当完善，每团约一千五百人，大多数是老兵，班长以上都久经训练并参加多次战役，乃广西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

我所在的第一〇一六团原驻广西宜山，奉命北上抗敌，由宜山步行到全县，沿途都由各县征调民伕，搬运行李辎重。过了全县，辎重由船运至衡阳，部队仍徒步前进，到衡阳后，乘粤汉铁路火车继续北上。沿途所经各地，群众都组织了慰问团，男女青年学生到车上热烈慰问，与各官兵亲切握手，赠送鲜花、罐头、水果、饼干、香烟等慰劳品，官兵颇受感动。有些士兵说："我当兵十多年，内战打了几十仗，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实在没有意思。现在打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打，把敌人赶出去！"从这些事情来说，当时的民气士气都很激昂，因此沿途虽受敌机轰炸骚扰，士兵中无一贪生怕死的。

部队经徐州到海州，在连云港构筑工事，约半个多月，即奉调到上海参战。我团是先头部队，于十月十一日到达上海，归胡宗南指挥。我见了胡宗南，他说："桂军打仗，冲锋很勇猛，但无持久力。现在对日作战，敌人火力占优势，我们不能单凭勇气，必须在白天少活动，利用夜间修补、加强工事，才能减少损伤，持久与敌周旋。"并告诉我，守张华浜的部队打得很好，两个月来阵地很少失守，他们的作战方法是在阵地前面派遣战斗群，用少数兵力固守据点，待敌人突破据点向我阵地攻击时，就容易将敌击退。他鼓励了我几句，即将我团拨归第一师李铁军指挥。当我团到达前线时，我军阵地和敌阵地接近，中间地带狭窄，已不能派出战斗群作据点固守，只好按阵地作出部署。

我由胡宗南指挥所回团后，即召集全团官长进话，要求各部特别注意做工事。当晚由军部派人带我们向洛阳桥前线出发，夜间二时到达洛桥前第一师指挥所，见了师长李铁军。李对我说明前线一般情况，并告诉我，敌人开始攻击必先用炮火和飞机轰炸，然后步兵攻击。我们必须在敌人用火力攻击时，尽力隐蔽，减少损伤，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敌步兵攻击时，即以火力加以歼灭，万一阵地被敌占领，必须乘敌立脚未稳，即时反攻，夺回阵地。还说，你们刚来参战，准备暂不使用你们，让你们见习几天，随即由师部派人带我团到达前线。

当时上海市郊所有村庄都被敌机炸毁，断墙颓垣，无一间完整房屋。我团到达指定位置（距洛阳桥约五六里，小地名已记不起），即分班利用崩倒房屋的木梁木柱架设掩体，上覆泥土，星夜工作，天明前全团进入掩蔽部休息。

敌机整天在上空盘旋，每天从上午五时左右，直至下午八时。晚九时以后才是我军活动时间，调动部队、煮饭、烧茶都在夜间进行。

第二天，我在村外视察敌人活动情况，敌机一发现我后方部队目标，即轮回俯冲投弹。我炮兵威力微弱，射击时被敌军发现，即在上空投下黑布带，敌人炮火集中向这回击，我炮兵遂被压制。我在上海作战前后十天，只在第二天中午见我军飞机五架飞到前线上空，当时所有敌机均升空迎击，我机在高空周旋了几转，就飞走了，此外只于夜间听闻我机飞到黄浦江面攻击敌舰。上海战场的制空权完全操在敌手，炮兵也完全受制于敌。

我到前线的第二天（约是十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接李师长电话，说湘军某处（忘其名，作战地图上有记载）阵地被敌人突破，命我派兵两连即刻增援，夺回原阵地。我接电话后，即派第三营第八、九两连，由营附率领，向该阵地攻击前进。中午后，据该连派人回报，与敌激战约一小时，已将敌人击退，夺回阵地，九连连长负伤，士兵伤亡十余人。下午四时，湘军部队仍派人接防，我团官兵撤回待命。

次日下午，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第七军到达上海，我与军部通话，将上述经过报告廖磊，廖很高兴，在电话中说："我军第一次与敌接触，即夺取阵地，很好！很好！第九连连长即升少校，传令各部，以示鼓励。"

第三天（十月十四日）下午一时左右，接李师长电话，谓该师正面情况不明，电话线被炸断，阵地恐已守不住，要我派兵一营增援。我接令后，即派第一营前往，以疏开队形，一连接一连前进，敌机轮流向我部投弹扫射，我部士兵不怕危险，继续前进。该营到达前线后，了解阵地并无变化，于黄昏后仍归还待命。

十月十五日，桂军开始接受战斗任务。是日上午，廖磊派人来找我到前敌指挥所（在上海作战时，廖磊被任为前敌指挥官）。他在地图上指示了一般形势和第一〇一六团的作战地境，接着对我说："我们现已奉命参加作战，今晚接守胡宗南军防地。你这一团就守这一线阵地，左边与黎团（黎式谷团，即第一〇一五团），右边与颜团（颜僧武团，即第一〇二二团）衔接，必须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你们生在这个范围里，死也在这个范围里，若无命令，有敢擅自脱离阵地的，无论任何官兵，只有拿头来见我。"

是夜我团进入洛阳桥前面约五六里胡宗南部的原阵地，敌人并未发觉，胡宗南部撤出和我部换防，只有敌人的泄光弹，不时一连串地发射，前线枪声沉寂。

自十月十六日到十月二十日这几天，敌人每天发动数次攻击，都是先以炮火炸弹向阵地猛攻，然后步兵前进。每次攻击兵力并不大，只是一个排，最多不过一个连，

都被我守兵击退。二十日，敌人连续发动五次攻击，最后一次，敌军已接近我第二营阵地前，我营士兵顽强固守，以炽盛火力向敌射击，敌不敢前进，相持至黄昏。入夜后，第二营派队出击，敌已于黄昏后撤走，仅有少数兵力在第二营阵地前活动，被我驱逐。

二十一日拂晓，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我第二营阵地攻击，飞机轮回投弹，阵地被摧毁很多，掩蔽部也有被炸塌的。天亮前至上午九时，敌军炮火从未间断，接着敌人步兵出击，我第二营守兵仍沉着应战。该营营长王有清是跟白崇禧当卫兵出身，过去作战一向勇猛，所以我派第二营固守阵地。

约一小时后，接王有清电话说，敌坦克五辆向第二营阵地突击，掩护大队步兵前进。王营长亲到前线指挥，当时我团步兵平射炮已被军部调到别处使用，我以电话报告旅长，请求将平射炮排调还我团，然一时无法调回。过了约四五十分钟，前线枪声沉寂。敌炮火延伸射击，敌机亦向我后方投弹轰炸。我团通讯排掩体被敌机炸崩，电话中断，特务排部分掩体也被炸崩。我除派传令兵到前线联络外，到村外用望远镜观察前线情况。不一会，第二营司号中士由前线跑来报告，敌人坦克冲至我阵地前，我军与敌战车混战，打成一团，阵地全被炸毁，第二营营长阵亡。正说话间，又有数名士兵由前线跑来，询问情况，知第二营阵地已陷敌手，我遂令第三营李营长率步兵两连、重机枪一连，驰赴前线反击，第九连作团预备队，随我跟进。第三营即以疏散队形，一连接一连前进。这时敌机向我出击部队轰炸，我部置之不顾，跑步前进。敌人炮弹连续在村边和树林上空爆炸，树枝树叶被榴弹打断，纷纷飞落。

第三营出动后，我率特务排赴前线督战，第九连暂留原地待命 。在前进途中，团附徐图被流弹所伤，激战中团附李寿民阵亡。第三营几次冲击，战斗极为激烈，终将第二营阵地夺回。阵地前躺着敌战车三辆，第二营司号中士指着对我说，他随营长到前线指挥，当敌战车冲入我阵地时，某连副、连长率领士兵向敌战车冲击，用手榴弹轰炸战车履带，向战车展望孔投掷，我官兵用肉体与敌战车搏斗，全部牺牲。

第二营阵地夺回后，阵地一时寂静，我即转移到第一营与第三营后方，以便指挥。这时已到正午，我一面派人报告旅长，一面收集第二营失散官兵，只剩士兵二三十人。

下午二时左右，敌人发动第三次攻击，坦克四辆向我阵地冲来，战斗又复猛烈。右翼第一营阵地动摇，谢营长退下火线，我命他仍回原地固守，不得后退。不久，第三营营长又由火线退下来，班长也有退下的。我见情况危急，亲往督战，激战中我两足负伤，第三营阵地被敌占领，第一营阵地后移。当时的情况，若我因伤脱离阵地，则第一、三两营阵地恐不能守。敌人坦克一辆距我不过三百米左右，我如要人背负，目标显著，亦难脱离敌人火网。遂决定暂时不下火线，一面包扎伤口，一面交代第九连归还第三营建制，以特务排监督前线官兵，一律不准后退。就这样支持到天黑后，我才由特务排黎排长背下火线。

那天敌人发动总攻击，战况剧烈，洛阳桥附近公路两侧，满地都是伤兵，竟至上海开来的救护车也无法开动。我负伤后，师部曾两次派车要送我到上海，因我不下火线。所派汽车改由其他负伤高级人员乘去。后我到旅部报告战况，即用担架抬我去上海，途中又遇到空袭，直至第二天黎明始到上海 。先在野战医院施行手术，后迁入法租界广慈医院医疗，经过四次手术 ，卧床两个多月，才能勉强行动。后回柳州军医院医治，虽已痊愈，但行动不甚方便。

我离开阵地后，是晚我军反攻，所失阵地完全夺回，仍由我团第一、三两营固守，团长职务由第一营谢营长代理。上海撤退时，谢代团长担任掩护队，与敌作战阵亡，第三营李营长于撤退时被敌机炸死。部队退至孝感后整编。

在上海抗战时，桂军的伤亡是重大的，壮烈阵亡的军官计有旅长庞汉祯、夏国璋、秦霖等六七人，团长廖雄、谢鼎新、褚兆月等十多人。部队经过这次损伤，影响作战能力，此后对敌作战，都没有打过一次好仗。

（摘自《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忻口会战

背景介绍

忻口位于同蒲路要点忻县之北，是太原的北大门。此地不守，日军可直抵太原城下。原平失陷后，阎锡山急忙调整军事部署，以刘茂恩指挥第十五、第十七、第三十三军等组成右翼兵团；以郝梦龄指挥第九、第十九、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等组成中央兵团；以李默庵指挥第十四军及第六十六、第七十一、第八十五师等组成左翼兵团；而以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三路兵团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一线布置防务。

一九三七年10月13日，敌主力在大量战车、火炮和飞机的密切配合下，向我军中央兵团阵地南怀化发起猛攻。南怀化被敌突破。敌又以一部突入我左翼兵团阵地阎庄和大白水。14日，右翼之敌，连续突袭灵山。以后数日，敌我双方在南怀化、永兴村等地展开反复争夺，猛烈冲杀。守军不畏强暴，阵地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歼敌甚众。15日，我国守军向南怀化正面及永兴村等地区反复突击，激战一昼夜，双方伤亡惨重。我中央兵团指挥官、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均在战斗中以身殉国。之后，双方战斗陷入

胶着状态。

第十八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奉命配合友军“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在敌侧翼和后方钳制打击敌人。13日，第一一五师占领平型关，次日又在平型关东面之小寨村截获敌援军汽车数十辆，歼灭二百余人。16日再占团城口，乘胜收复广灵、涞源、蔚县等县城，在察南、冀西威胁敌后方。

15日，第一二〇师在永兴村地区配合友军，打击敌人。20日攻克雁门关，接着，又在同蒲路岱岳和崞县附近分别设伏，给敌以重大杀伤，切断了忻口方面敌人通往大同的后方交通线。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在友军协同下，19日夜袭击代县阳明堡泊水村敌机场，毁飞机二十架。

20日，敌再次以三路猛攻官村、灵山、大白水，并使用催泪瓦斯弹，战斗剧烈。我伤亡团长多人，敌人仍进展缓慢。

材料：

- 壮哉！中华健儿
- 被迫后撤

材料一　壮哉！中华健儿

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陆续到达太原后，向太原北郊的忻县集结待命。他们是在北平郊外与日军几经鏖战后进入山西的，沿途受到抗日爱国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支军队有他的许多特色：一是官兵一致，全都身穿深灰色军服；二是使用的枪全是七点九口径步枪以及一些用来打日军坦克的德制山炮；三是轻机枪比较多；四是说广东话与安徽话的人占多数；五是士兵们坐下休息时，也荷枪实弹，不多说话。而行军大步前进时，又总是唱那首由进步音乐家丁玿谱曲，卫立煌自己填词的《第十四集团军军歌》。歌词是：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是第十四集团军，
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这是中央军精锐部队第一次进入山西。群众听说是来抗日的，便从四面八方前来给部队送茶送水，深深表达了群众要求抗日的热情。

大同失守，日军以板垣第五师团为主力，另附两个师团继续南下。山西局势更加紧张，群情更为激奋。

10月上旬，南京军委会发表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任务是要在忻口阻住日军。这就酝酿着国民党军在华北抗日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烈的忻口战役。要挡住日寇主力由北入侵太原，忻口是战略要地。阎锡山为此又调集几个师增援，朱总司令也命令八路军随时支援配合。

第十四集团军日夜兼程，赶赴忻口地区集结。在黄沙漫漫的山西土道上，身穿深灰色军服的中华健儿，源源向忻口奔去。在全国抗日热潮的影响下，晋绥军也开往忻口。都以整齐的步代，饱满的精神和雄壮的歌声奔赴前线，与日军作殊死战斗。

卫立煌在太原与阎锡山研究了必要的作战计划，又去和朱总司令作了商讨。最后决定由卫立煌负责组织忻口阻击战。卫乃迅速由太原赶到忻县，设立了指挥所。

卫考虑到忻口阻击战，是我军抗日以来，第一次与日军打的大规模的阵地战，无论在战略上或政略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当他赶到忻口镇，就立刻召集各有关将领和参谋长等，计议作战方案。据参谋处掌握的情报，正面来的日军，除板垣师团外，还有日军第一旅、步兵第十一联队和伪蒙军约两个师，总兵力约五万余人。据卫立煌指挥所从各种渠道来的情报得知，日军这次出现了众多的炮队：有山炮二十余门，野炮四、五十门，轻榴弹炮二十余门，十五生的榴弹大炮十门，十五生的加农炮二门，计约百余门。据称板垣师团这次要攻占太原，是接受了日本天皇的“敕令”。

卫部所能投入的作战部队，为第十四集团军全部，河南地方军刘茂恩第十五军，晋军陈长捷的三个师，晋军骑兵五个团，炮兵六个团，总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经过研究，防御线以第十四集团军为主。

忻口大战我军部署概况如下：

最高指挥官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指挥部设在忻县。第十四集团军展开在龙王堂、介河铺、大白水、南峪一线，而以忻口为轴心，必要时可支援两翼。

左翼兵团：李默庵第十四军（卫立煌已不兼军长）辖三个师。后因日寇猛攻忻口左翼大白水及盟村，情况紧急，阎锡山又逐次增派三个师及晋绥军的三个炮兵团。

中央兵团：郝梦龄第九军，再后又增加陈长捷第六十一军第七十师。

右翼兵团：刘茂恩第十五军。刘军原由阎锡山直接指挥，从这时起归卫立煌所辖。卫调往第一战区后，刘要求随卫同去，两人关系融洽。在忻口战役前，刘曾在忻口东北的东社附近阻过南下的日军。

日寇自从在平型关吃了苦头后，已不敢轻举冒进，乃增调大量空军，对我军动态先作详细侦察，再派骑兵严密搜索，最后主力才向前进攻。约在10月上旬，日军抵忻口

以北，准备攻击。

为了使忻口战役的部署有较充足的时间，阎锡山曾严令晋军王靖国部坚守崞县十天。王没有完成任务，擅自撤退，造成日军混成第二旅团占领了崞县，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占领了原平镇。

10月上旬，日军前哨部队在忻口前沿阵地出现。卫立煌在指挥所听取前线各指挥官的情况报告，并鼓励三军奋勇作战。

忻口战役打响之后，战斗一直非常激烈。我军不时与日军白刃相见，几经激战，敌攻占我南怀化要地。卫立煌闻讯，立即去前线，察看地形。严令李仙洲师上前收复失地。李率部反攻，重伤而归。14日拂晓，敌寇再攻忻口西侧要地，一时枪炮齐鸣，硝烟迷漫。我抗日战士舍命相拚，手榴弹铺天盖地投向日军。紧接着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直到收复了缺破口，忻口防线始得恢复原状，实在惊险得很。

南怀化战斗空前激烈。我军在阵地上与日军打拉锯战。日军出动轰炸机、大炮，猛攻我军阵地，目的是想从南怀化要地突破忻口防线。

卫立煌指挥所内十分忙碌，电话响个不停，木板桌上的地图，满是被炮火震落下的灰尘。他用电话命令我炮兵回击。郭参谋长和文副参谋长都全神贯注核对敌我两军的位置，参谋 们也都在紧张地工作着。卫不时走出指挥所，立于高处，用望远镜观察。他的警卫们都枪机上把，或卧或立地警卫着指挥所，硝烟弥漫着整个战场。

10月中旬，李默庵军长向卫立煌报告，第十四军战斗激烈。卫命令第十师郝家骏旅增援。在指挥所，卫一边拂着地图上的灰尘，一边和参谋长们商量。他认为板垣师团现在伤亡很大，兵力又过于集中，无力后继，我军可使用口袋战术，把板垣师团一举消灭于云中河盆地。他计算自己的兵力，还有六个师的步兵和两个骑兵旅可作机动。这时他想起了常来晋军视察的傅作义总司令，立刻接通电话。请傅来红沟指挥所，二人共同研究了敌情，都认为可以夺回南怀化要地。于是作了决定：夺回南怀化要地后，部队发赏十万元，对有功的指挥官，请颁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反攻战役的重任，由第十四集团军郝梦龄第九军担任。总方针定下后，卫又与郝梦龄军长和晋军陈长捷军长，共同再作研究，作出最后部署。这一仗如能成功，板垣师团必被围歼。当夜各部都进入预定位置，陈长捷在百了河与郝梦龄电话相约，同上前线督战，并在南怀化高地相会。

战斗开始时，卫在指挥所通宵达旦注视着全线动态。郝梦龄军主力在午夜前报告准备完毕。夜间枪炮轰鸣，第九军奋起反击，战斗非常激烈。由于战场上出现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变化，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很大。

据亲身参加这一战役的陈长捷军长叙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郝梦龄登上官村南高地时，在炮兵前进观测所里，观察敌方情况，发现南怀化日寇大部在蠕蠕东进，即命孔旅（属第五十四师）下山，乘敌不备发动攻击。并调郝家骏旅在孔旅之后，为攻击主力，准备袭击敌人侧 背。没想到陕军孔旅原是陕西地方新收编的杂部，他以匪盗夜袭方式乱喊乱叫，蜂拥前进，被敌方发现，用炮火猛轰后，又纷纷后溃。郝旅正离阵地下山，受到孔旅影响，同样惊骇怯畏。敌乘势扑上官村南高地，在敌我双方混战与搏斗中，郝梦龄军长、第五十四师刘家麒师长、独立旅旅长郑廷祯同时殉国，官兵伤亡达数千人。

卫立煌闻悉郝军长等殉国后，悲痛不已，立刻向军委会为他们请功，要求抚恤他们的家属。

夺回南怀化高地的战役虽未能成功，但我军官兵更加同仇敌忾。日军伤亡也极大，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卫决定暂取守势，待机再由左翼发动攻势。双方激烈的战斗，又在红沟瀑发。

日军攻忻口久而不能取胜，兽性大发，从已打开的南怀化缺口，又增加兵力向红沟阵地扑来。这次日军先用飞机从早到晚轰炸，再由炮兵猛轰。红沟总指挥部的石室被炸塌，电话总机值班人员被炸死、炸伤。但我中华健儿坚守阵地，日军多次扑来，都被我军用密集手榴弹击退。日军攻占红沟未逞，转而进攻官村南高地。我军迎之以白刃战，日军亦不能得逞。

忻口战役激战一周，我方阵地稳固，且我军迭次出击，累计歼敌约三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日以来最有利的战局。我军鏖战至10月下旬，日军仍然不能突破我军防线。日军97型飞机轮番轰炸，但是，只要日军步兵一上来，立即被我军击溃。我军从战俘的证件及其供述中证实，日军攻南怀化与红沟，已三易其联队。眼下的兵力是由天津抽调来的。忻口的激战眼看有了转机，卫立煌与他的参谋人员都看出日军的兵力穷乏，如再抽调兵力来此，则日军其他战区的兵力就得缩减。这对全国战局来说都很重要。

卫与前沿阵地指挥官联系，根据参谋处计算敌军的尸体和缴获的文件证实，敌人已无多大余力了。这对我军是有利时机。而这种时机稍纵即逝，必须紧紧把握，迅疾行动。于是，卫立煌与郭寄峤参谋长和文朝籍副参谋 长商量，计划作一次延翼包抄，一举将正面日军歼灭于云中河谷。两位参谋长都极表赞同。

卫给阎锡山打电话，说明这一打算。阎问卫："晋东大门娘子关被日军冲破，刘峙又失去联系，眼看日军要向太原冲来，该咋办？"卫提议："要用现有兵力，全力挡住日军。川军邓锡侯部、西北军孙连仲部，都是能打仗的，鼓励他们打。发子弹、发手榴弹，仓库里的东西都发出去，让弹药上火线去 发挥威力。"阎同意，连说："好，好，好，咱们马上发，马上发，把咱的老底全花出去，花光算啦！"

这时，南怀化红沟阵地被日军突破一较大缺口，卫立

煌立即命令陈长捷组织兵力把缺口堵住。并告诉他，凡是退逃的，先问指挥官的罪，必要时可就地正法；现在是打民族的敌人，不是打内战，在日本兵面前逃跑就是汉奸，可以枪毙。

面对日军重兵，我军健儿冲锋陷阵，碧血黄沙，终于把缺口封住。在缺口前后，双方尸体遍地。壮哉，中华儿女！

（摘自《卫立煌将军》卫道然）

材料二　被迫后撤

崞县、原平相继失守，使忻口处于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忻口位于同蒲铁路要点忻县之北，右靠五台山脉，左依宁武山脉，是太原的北大门。此处倘若不守，日军就可长驱南下，直抵太原城。十二日，中国左、中、右三路集团军已到达忻口附近占领阵地。阎锡山又命令傅作义率预备集团军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独立第二、第三旅等部开赴忻口，加入中央集团军作战。并调整军事部署，将中央集团军分为三个兵团，以刘茂恩指挥第十五、第十七、第三十三军等部，组成右翼兵团；以郝梦龄指挥第九、第十九、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等部，组成中央兵团；以李默庵指挥第十四军及第六十六、第七十一、第八十五等师，组成左翼兵团；以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三个兵团在忻口一线作战。

十三日晨，日军以飞机三十余架和大批战车、火炮掩护步兵五千余人，对中国军队忻口防线实行中央突破，猛攻南怀化阵地。中午，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工事被轰毁，守军伤亡殆尽，阵地被突破。卫立煌急令第二十一、第十、第七十二师各一部协同夹击敌人。激战至夜，终于将突入南怀化之敌包围歼灭。决定次日以第十四集团军由大白水附近，第七集团军由忻口附近出击。十四日日军增兵三千，再攻南怀化，并同时向中方阵线左右两翼攻击。南怀化阵地又被攻陷。右翼第十五军与敌激战至暮，将日军二千余人压迫于灵山脚下；左翼第十师克复旧练庄，日军亦攻占侧翼大白水阵地，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十五日，中国军队因南怀化为全线关键，令第二十一师及独立第五旅协同独立第二旅再次向该处之敌攻击，力求将其歼灭。并以一旅由弓家庄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第五十四师也以一部协助攻击南怀化。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关键时刻，中央兵团指挥官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相继阵亡，指挥中断，攻势受挫。右翼日军增兵至三四千人，向灵山主峰攻击，激战至傍晚，终为中国军队击退。左翼方面亦激战终日，双方均无进展。

连日以来，中国左右两翼集团军在五台山及宁武山区对日军后方进行不断袭扰。第十八集团军奉命“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一部进出于繁峙、代县，另一部与骑兵出没于崞县、朔县一带。十四日，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〇师与独立第七旅配合，收复宁武县城。十五日该集团军一部又在广灵、灵丘间击溃敌步骑兵二百余，击毁汽车三十余辆，并收复广灵。第十八集团军的敌后游击活动配合了忻口正面中国军队的主力作战，对日军造成很大威胁。但因兵力有限，“敌仍源源增加不已”；而中央兵团因连日血战，损失惨重，已感兵力不足，遂自十七日转攻为守。卫立煌请求增援，蒋介石令在潼关之第二十二集团军驰援晋北，阎锡山亦命在龙泉关之第九十四师五二九旅归卫立煌指挥。

十九日，日军将攻击重点转移至中国军队防线之左翼，中央兵团各部与敌争夺官村以南高地，战事极为激烈，“敌伤亡奇重，我伤亡亦伙。”同日，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〇师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毁敌飞机二十架，使日军数日内无法对忻口中国军队阵地进行轰炸。二十及二十一两日，敌继续向官村一带进攻，将阵地全部轰毁，敌兵突入，形势严重。中国方面急增兵逆袭，虽死伤惨重，仍奋勇搏战，至十一日午后始将敌击退，呈对峙状态。二十二日，中国方面在官村对敌进行局部反攻，但进展不大。同日阎锡山命左翼集团军司令杨爱源返回太原，筹划晋南防务，左翼军归卫立煌指挥。敌后除第十八集团军及骑兵部队担任游击以外，已别无部队。

二十四日拂晓，中国军队忻口防线右、中、左阵地各以一部出击，此时日军得到一个支队增援，亦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故双方激战后均无进展。二十六日，敌又向华军左翼猛攻，午后将第八十三师阵地突破。在右翼，攻灵山、南郭下之日军增兵后将东西荣华夺去。次日，中央正面之敌增兵一二千，采用坑道攻击法向中国军阵地迫近，中国军队各部队亦以对壕前进及小部队侧击的方法对付日军。二十八日晨，敌向中央第二一五旅阵地强袭，“各种利器兼施并用，一部利用坑道秘密逼近，中国方面守兵单薄，增援不及，情势甚危。当悬赏六千元，士气大振，毙敌二百余”。二十九日，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第八十三师与敌剧烈拚搏，歼敌二千人，该师连日牺牲重大，全部战斗员已不足一团。三十、三十一日，两军继续对峙，阵线无变化。十一月一日，因晋东方面战局不利，晋北中国军队侧后受到威胁，第二战区对忻口部队下达撤退命令。

（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失陷

背景介绍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于在晋北忻口受阻，日军决定加强晋东攻势。沿平汉路南下敌人，在占领石家庄以后，以第二十师团为主力，在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各一部的配合下，由川岸文三郎为最高指挥官，分左右纵队，沿正太路西犯，威胁太原。

第一战区弃守石家庄以后，晋东防务空虚，遂调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路军和第三军等，在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和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一部的协同下，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沿正太路两侧布防，进占娘子关一带山地，确保晋东门户。12日，敌开始猛攻井陉、旧关，守军血战多日。26日，娘子关失守。敌继续西犯，连陷阳泉、寿阳，迫近榆次。

在晋北、晋东战事极端不利形势下，阎锡山命令傅作义布置太原城防，"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但是，由于晋东战斗失利，敌军直扑太原，忻口守军在战略上已处被动地位。11月1日，卫立煌奉命率部向太原北部莱水堨、青龙镇、天门关一线转移，协助固守太原，并以第十八集团军主力牵制晋东之敌，破坏铁路，迟滞敌军西进。6日，东、北两路敌军均迫近太原城下，由东、北、西三面猛攻城垣，飞机轮番轰炸，城内一片火海。敌人突破城东北角阵地，守军奋勇堵击。8日，敌军向城内空降，城内出现混乱。是晚，傅作义下令由南门突围。9日，太原失陷。

材料：

- 娘子关失守
- 阎锡山被迫挪窝

材料一　娘子关失守

中国军队自放弃石家庄后，晋东防务空虚，第二战区因专力于晋北作战，一时无兵可派。蒋介石遂由第一战区调冯钦哉第二十七路军、曾万钟第三军入晋，沿正太路井陉至娘子关一线布防，扼守晋东门户，统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东正面作战。

十一日，日军已到达井陉以东地区。次日，二千余名日军即乘中国军队立足未稳之机，向井陉及其以北贾庄进攻。另一部约八九百人向第十七师正面进攻。傍晚相继攻占长生口、大小龙窝，直指旧关。井陉亦被攻陷。同日，阎锡山命原定增援晋北之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回援娘子关。十三日晨，大小龙窝日军已抵核桃园。日军千余人向旧关第二十七路军工兵营猛攻，午后旧关失守。黄绍竑急令第十七师固守娘子关以东要点雪花山，并以一部向长生口出击迟滞敌人。最初较为得手，克复刘家沟、长生口等处，后遭敌反攻，雪花山守军指挥官疏忽，致使阵地丢失。第十七师反攻，伤亡千余人仍未恢复阵地，不得已退守乏驴岭。负责防守雪花山的团、营长因贻误战机，按战时军律被枪决。

十四日，孙连仲所部到达娘子关附近，立即开始向旧关之敌进行反击。第二十七师一部由苇泽关向核桃园，另一部由新关向旧关进攻，将敌一股四百余人歼灭。当晚日军六百余人由小枣庄向关沟第三十师阵地猛攻，经中方两个团出击，激战三小时，毙敌二百余名，残敌仓惶脱逃。同日，阎锡山下令"着一百二十九师（欠一团）速开阳泉归黄副司令长官指挥。"配合娘子关作战。

十五日，阎锡山下令"娘子关方面战事以孙副总司令连仲负责指挥"，"旧关附近之敌兹限十六日完全解决，……希严督进攻部队拚命杀敌，该总司令、军长应亲自督战，有畏缩不前者，就地枪决"。当晚，第二十七师、第三军之敢死队将由旧关侵入关沟之敌一千五百人包围痛击，大部消灭。入夜，敌步炮联合之一部约五六百人，经大小龙窝向旧关日军增援，又被击毙三百余名。华军指挥官决定于翌日拂晓，对敌发起全线进攻。以第三军为主攻部队，第二十七师主力由大小龙窝切断日军归路，以一部肃清关沟之敌，协同第三军旧关方面攻击。十六日拂晓攻击开始，但恰遇日军反击，中国军队虽将关沟残敌肃清，但旧关被包围的日军利用东南及西北高地顽抗，且得到敌飞机大力支援，因此，在该方面攻势未取得成果。傍晚起，日军向第二十七路军工兵营所在之旧关西南高地反攻，将阵地突破。前往增援之第二十七路军教导团伤亡奇重，几至全部牺牲。十七日中国军队继续攻击，拟先切断旧关之敌后路，然后将其歼灭，而敌又大举反攻，双方激战，肉搏十余次，伤亡均重。中国军队将核桃园至旧关通路截断。

十九日，日军增加一个联队向乏驴岭中方第十七师阵地攻击甚烈，师指挥员受伤，阵地失守。旧关至核桃园一带之日军遭连日猛击，山沟中积尸累累，伤亡甚众。残敌千余退守旧关附近高地。同日，日军第二十师团长接到"攻占阳泉平原"的命令，决定分兵两路，右纵队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前进；左纵队（步兵四个大队、山炮兵一个大队）沿测鱼镇——石门口大道前进，即迂回攻击娘子关中国守军的右侧背。当日奉命增援晋东的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九师到达阳泉，奉命进驻马山村、七亘村一带，掩护娘子关守军右侧背。

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娘子关正面日军得到增援，用

飞机、火炮协同步兵猛攻中国军队阵地，防线多处被其突破。阎锡山致电孙连仲："希仍督令努力固守阵地。"但此时第二十六路军已在娘子关血战八昼夜，实力不满六千人，应付娘子关正面长达五十余里的防线，实感困难。孙连仲请求增援，阎锡山命令川军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师沿正太线前往增援。此后直至二十六日，娘子关正面中日双方军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日军左纵队由横口车站渡河西进，二十三日到达南障城。大部南下测鱼镇方面，一部约二三百人到达刘家栅、固栏村附近。二十四日，测鱼镇方面步骑联合之敌三千余人在七亘村遭到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一部阻击，因众寡悬殊，该旅颇受损失。日军向马山村进攻，刚到该处之川军一部被击退。为缩短阵线，中国军队当日令第三军由固栏村后撤，日军一股约三百人遂乘机由中国军队阵地空隙窜入十家路、乱安村，向固驿镇中国军队右侧背进攻。指挥官急令第一二二师一部与第三军向敌夹击，但至二十五日敌左纵队已全部到达固驿镇附近，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二十六日，日军越过马山村，直指平定，而在该处除第一二二师之外，已无兵可派。指挥官为防止敌军断我后路，"抱最大决心，以二十六路留一小部守娘子关，主力移至巨城镇、移穰镇，进出柏井驿、桥头村。"并以第一二二师一部推进至石门口，准备对敌反击。娘子关遂于是日被敌攻陷。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阎锡山被迫挪窝

卫的参谋处证实，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兵力因损伤过大，面前日军中有原在平津担任警备任务的第一〇九师团的一个大队，随后又发现第一百三十六联队的另一个大队由天津赶来参战。两天后，又证实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机械化部队加入第五师团作战。当此之际，又有消息从山西东面传了过来，日本华北方面军，见到我忻口战线部队众志成城，坚不可摧，乃改变战略，向娘子关方面增派兵力，企图由东面攻占太原。

红沟激战到10月31日，历时已近二十天，日寇不仅始终未能得手，反被我军压缩在南怀化阵地以北，不能越雷池一步。在红沟和南怀化的山谷里，日军又遗下万具尸体。我军战士的鲜血也把山谷染红。

在太原东面战线呈现危急之时，日军乘势突破我军防线，把矛头遥指太原。阎锡山急令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作为防守太原的主力。太原危在旦夕，只要日军从东面进入太原，或置兵于忻口与太原之间，太原和忻口都会成为孤棋，最后终将被日军各个击破。太原方面的危急，促使卫迅速对新情况加以分析。在忻口战役这二十天来，日军寸步难进，初步估计伤亡已达四万余人，其侵华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我军虽伤亡亦大，但士气高涨。现在东面危险，我军必须认真对待。已争取了二十天，为我国后方开展总动员，调遣兵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阎锡山的电话又打到忻口指挥部，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答："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把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动用你的后备兵力，行动千万要快。我们目前正与日军胶织，不能再抽兵去顾背后了。"

10月30日，日军由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忻口我军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犹豫不决，就会腹背受敌。阎锡山要卫立煌暂离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此时，卫正在与参谋长等研究脱离日军的方法。要是先采取佯攻或炮击一阵的办法，这是很容易被日军识破的。最好的办法是：行动前要静，一点不动声色；行动时要疾如旋风，速发速成。他让参谋长先电话通知各军作准备，然后研究撤退路线，下达命令作详图，要求全军撤至太原城北集结待命。并命参谋处派人在各要道口联络。

中央兵团于11月1日脱离日军，左翼李默庵第十四军当晚十时脱离成功，右翼刘茂恩部于2日凌晨四时脱离。卫等到各军全部脱离后，才命令通讯连撤了电话线，率总部与警卫营向太原以北集结地点转移。整个撤退行动，秩序井然。第十四集团军官兵，浑身尘土，但在行军时仍然精神抖擞。

11月4日，阎锡山召集在山西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太原守城问题。黄绍竑主张坚守太原城，放弃外围工事，被阎指责为没有发言权，并借此对黄发了一通责备之词。

阎锡山告诉卫立煌说："咱就在太原不走了。咱的兵工厂、咱的造币厂、银行都在太原……"

由娘子关进入的日军，高速向太原奔袭，离太原已经很近了，卫指挥他的各部，坚守太原城北。

11月5日深夜，阎锡山再次找卫立煌与傅作义，在阎锡山的办公室，研究紧急情况。

傅作义认为卫部可到太原以南，保护太原与晋南的通道，要形成犄角之势。

卫说："北面与东面的日军共有五万余人，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宜生（傅作义）的意见是对的。"

直到这时，阎锡山还在为自己打算，哀叹说："唉！咱的兵工厂也完啦！它是咱从德国买的机器，奶奶的，花了上百万的大光洋呀！我老早对南京说过，要注意，要注意，他奶奶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话！现在没人管啦，把咱的一点家底全弄光啦！"

卫立煌说："你在我处的几个师，到赵城后，我叫他们归回建制"。

阎锡山说："不说这些了，散会，快行动。俊如，听说你

在忻口经常冒险上前线。咱可赔不起你的命。多通电话，再见！”

他们商谈到翌日晨，这时，太原断电，全城一片漆黑。老百姓要冲出城，街上很乱，到处是喊声。卫先到总部，立刻电话通知第十四军李默庵、第九军代军长郭寄峤和其他各军，都由太原以北绕城而过，不必慌乱，到赵城集结待命。他本人带领总部直属机关和警卫营，一小时后也开始行动。行动之前，他命令骑兵在各路口担任警戒。通知各军部队行军要用常规速度，关心友军，防止走错路。

按预计时间卫的各部退到赵城，总部随后抵达。日军在攻占太原有了把握后，又分出一个师团迂回向太原以南的介休等地进军。卫与日军争抢时间，又命令全部军队迅速赶往介休，挖战壕，准备防御工事。

11月6日，东面之敌第二师团向南切断太原与晋南的通路。8日，敌第五师团进攻太原，我守军奋起抵抗。日空军猛烈轰炸市区。9日，太原巷战。阎锡山下令死守，但南路被切断后，太原完全孤立，终于失守。傅作义率余部冲向晋西。10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占领平遥，其第一〇九师团于9日到达昔阳后，16日进入我榆次近郊。

我军在介休、孝义一带继续构造工事，准备与敌对峙。日军亦战至精疲力尽，不得不重整部队和补充粮食弹药及各种军需用品。

（摘自《卫立煌将军》卫道然）

南京保卫战

背景介绍

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向南京方向进迫，企图从东、西两面包围南京，占领中国首都。一路以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沿京沪路两侧向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句容进攻；一路以第三、第九师团，经苏州、无锡、转金坛，直扑南京；一路以第十军所部，经嘉兴、吴兴，绕过太湖南岸，然后以第一一四师团经宜兴、溧阳、溧水，攻取南京，以第六、第十八师团进占广德，分别进攻南京和芜湖，截断南京守军沿江西去的退路。在敌人的猛烈攻势面前，上述苏南、皖东南各地相继失守。日军于12月5日迫近南京市郊。

早在10月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船抵达重庆。部分军政机关，留武汉、长沙等地办公。

由于北战场和东战场形势日趋紧张，11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第七战区。以原四川省主席刘湘为司令长官，陈诚副之，指挥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集团军在长江下游沿岸布防。前一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副之，率第二军团，第六十六、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四、第七十八、第八十三军以及其他部队，共约十余万人，部署南京保卫战。顾祝同指挥第三战区所部在皖南地区予以策应。唐生智在就职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他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但是，从12月5日至8日，敌人未经激烈战斗，即先后占领南京东郊汤山、半边山，以及汤山到龙王山一带的山地；在南郊，占领了湖熟、淳化和秣陵关；在西南郊、攻占板桥、大胜关。9日，日本向我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开始总攻南京。敌人一部突进至光华门外，占领大校场及通光营房，小部敌人攻入光华门后，被歼灭。10日，敌步、炮、空协同作战，对南京复廓阵地展开猛烈攻击，双方在雨花台、上新河和紫金山展开激战，城垣多处被敌炮摧毁。战斗至12日，日军占领雨花台，又以重炮猛轰中华门，并乘机向城内冲击。中华门守军第八十八师余部在师长孙元良率领下，向下关方向避退。是日，敌向水西门、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攻击甚烈。城内到处起火，黑烟冲天，战斗相持至暮，秩序已经紊乱。当日夜，唐生智奉蒋介石电令：“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当即仓促下令突围。由于事先缺乏周密的撤退安排，各部队争先恐后地拥向长江岸边，城内自中山东路至下关江边的道路上，拥挤不堪。江面上船只甚少，士兵争渡，互相开枪。13日，南京失守。是役，除一部分部队突出重围向浙皖边境转移外，伤亡达五万余人。日军为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12月10日又攻占芜湖。14日占领长江北岸的扬州。20日攻陷滁县。24日，又以两师团兵力，沿太湖南岸攻占了杭州。至此，长江下游三角地带全部沦入敌手。

材料：

- 卫戍南京之经过
- 李宗仁谈南京失守
- 南京激战记

材料一　卫戍南京之经过

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我当时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

是中国的。"平常，我对蒋百里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也谈过，他提了些意见。执行部起草后，由蒋（介石）核定：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宁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当时，执行部是按照我的意见构筑各线工事的。蒋介石对我的意见，口头上表示同意。结果，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直接与各部队通电话下达命令，很快将各线的部队调走了。以致执行部修筑的工事和军事计划，都没有付诸实行。

我在军委会执行部时，蒋介石要我让德国顾问法根浩森上将多参加执行部的工作。我对蒋说："法根浩森在日本当过武官，而德、意、日三国是一起的，这样搞恐怕不好吧？"蒋说："法根浩森是个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信任他。"但我始终对法根浩森抱着怀疑的态度。以后，他好象是从日本转道回国去了，还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德国某部队的总司令，好象是驻在挪威。

执行部拟定作战区域时，从海州至舟山群岛为第三作战区，当时蒋介石内定我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我患重病，上海战事刚开始时，蒋有一次问我身体怎样。我说精神还是不好。他说第三战区的事要冯玉祥搞，实际的责任由顾墨三去担负。我说："好吧，我没意见。"他说："关于军队调动有许多事，还是请你照料一下。"以后，我有一次在军委会碰到冯玉祥，他正准备到无锡去。他对我说："这个事不好办。"我说："这个事是费劲的。"不久，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代理。可是，凡属一些军政实权，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亲自掌握，不是他所谓亲信的人，是没有实权的，只是挂名而已。

上海战事非常紧张时，部队接连失败。我在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办公室，时常看见蒋介石打电话到上海骂人。那时，如顾祝同、陈诚、薛岳、白崇禧、张治中等所有在上海守卫失利的人，都被骂过。蒋介石稍有不如意的事，总是爱发火，喜怒无常。

上海战事开始后不久，刘湘到南京，曾见过蒋介石等许多人，也来看过我，我也回看了他。刘问过我关于上海、南京战事的看法。我说："上海的战事是不能长久打下去的，只有拖住敌人一个时候，并利用这个时机，在后方休整部队和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大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他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刘在临走时，对我说："我这次所见到的人，只有你对我讲了真心话。"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宣城、广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以后关于南京战役的经过，有些详

细情节，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十二月十日中午，我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他转来蒋介石关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军队相机突围。接到电话时是中午十二时，顾祝同对我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说："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顾说："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我说："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待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他说："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快过江吧！"我说："那不行，至迟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他说："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我仍说："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于是，就在当晚研究撤退部署。次日一早，就召集总司令、军、师长开会，我先将蒋的命令宣读一遍，再将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除了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突围，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

我回到汉口，见到了蒋介石，送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但以后，蒋也没有置议。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去他家里吃饭，还有张发奎在座。汪当时的调子很低，他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我说："已经死了这许多人，这些人都是为抗日而死的。我们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汪即说："在上海、南京牺牲的人不少了。"我说："但他们都是为不愿做亡国奴而牺牲的。中国是不会亡的，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除了抗战到底以外，别无出路。"这样，话也谈不下去了，终于不欢而散。从这次谈话中，我更认识到汪的为人：有点小聪明，但骨头太软了，什么气节都不讲。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材料二　李宗仁谈南京失守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藉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拚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 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翘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此时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然早已迁往重庆，但中央各部会仍多在武汉办公。唐生智于城防司令职务发表后，公开宣称与南京城共存亡，并督率军民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敌人厮杀。到十二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 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传来，南京失守了，大军十余万人，激战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军溃败。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

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

我军在南京损失部队十余万，器械弹药无算。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歔。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孤注一掷的。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拚，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见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剿共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作简单的论列，中共今日的囊括大陆，实非偶然。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

材料三　南京激战记

十二月九日，南京复廓战事开始了。从早晨七时起，敌为掩护地面部队攻城，以飞机六七十架在南京城内外反复轰炸，投弹数百枚。敌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在当天由敌机掷下致唐生智的所谓最后通牒，劝导投降。其全文如下：

投降劝告书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都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蔚蠌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交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十二月十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亦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在上述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城的进攻。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　松井石根

对此，唐生智置之不理，他下令各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擅自撤退者即按军法严惩。并派宋希濂部负责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又令各部队将自己控制的渡江船只统交宋希濂接受，不得扣留。命令下达后，实际上有不少部队的船只并未交出，其中以徐源泉部扣留的为多。

这天淳化镇的日军乘我第五十一师撤退，接防的第八十七师两团阵地尚未稳定之际，即跟踪冲至高桥门，而七桥瓮及中和桥的两座桥梁我们都不及破坏，所以日军步兵二千，坦克车十余辆，得于拂晓进至光华门外，占领了大校场通光营房。这时，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少数官兵，他们看到情势紧急，就将城门紧闭，并将沙袋垒起堆积至半城那么高，以堵截敌人的猛冲，而日军就将野山炮推进高桥门附近，向城门轰射，城门被掀了下来，泥沙顿时向外倾写，当时即有日军百余人在砂泥间爬入，但立

即为我全数歼灭。城门是随堵随破，随破随堵，我第五十一师下令反攻，仍然不能击退敌人。那天，城中是极度的紧张，参谋处廖肯处长向我说："我亲携电话机到光华门去看看，每十分钟和你通电话一次，要是摇不通了，那大势也就完了，你们即可作其他的准备。"说毕，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们。不久，他的电话来了。他说，进城的日军，已被全部歼灭，原来日军的坦克车列队在大校场上，时常来冲击我们，我们当即在城内调去四门小钢炮，轰击敌坦克车。上午，敌坦克被我们击毁了一辆，余下十数辆坦克车退回过桥去了。这样，才设法堵住了那扇城门。后来第八十七师的后继部队赶到，直属特务队也来增援，彼此配合后举行一个猛烈的反攻，才将大校场的日军击退。到晚上，我们重新把城门堵好，可是在城门洞的高处，总有一个不能堵满的缺孔。这是光华门一线上的激战情形。

同日，牛首山方面的第五十八师，与敌军激战了一个整天，后因第八十八师派出的右侧一个支队过早撤退，因此日军就乘机向西北追进，一部分竟攻占了大胜关，并且有沿江北犯模样。这时，我第五十八师阵地形成孤立。晚上，我军不得已奉命撤退，与第五十一师联合担任双涧镇(双闸镇)至宋家凹的守备。那是在第八十八师右翼延伸线上的作战情形。

十二月十日，日军大批集结，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一线同时猛攻。在光华门附近，日军一支小的敢死队，为教导总队的工兵排所阻挡，展开了白刃的肉搏。

战争愈演愈烈。光华门又复被日军突破两次，冲入城内的百余人，悉数被守军歼灭。长官部更以第一五六师增援通济门，并抢堵光华门。光华门的日军是被击退了，可是还有少数敌军已潜入城门的洞圈里，我们的火力不能扫射到他们，而天又黑将下来，于是第一五六师挑选出敢死队员数十名，由城墙上缒悬下去，将潜伏在城门洞圈里的少数敌军，用手榴弹、汽油把他们全部焚毙，并猛袭通光营房，将那里的日军全部驱逐，而他们在追击中间，也没有一个生还。这数十位英雄的高贵牺牲，使光华门和通济门方面，转危为安。在光华门，我军是由副长官刘兴将军亲自指挥，这一次的激战，使敌人也为之叹服。不过，就在这一天，雨花台的第八十八师右翼，由于日军冲击的猛烈，致失去阵地前要点三数处，稍形动摇；第二军团的第四十一师在南京东面以攻击孟塘方面的日军，遭受挫折，开始撤退收容，至是，南京的防卫战达到了更艰苦、更险恶的阶段。

日军鉴于进攻光华门、通济门的失败，十一日就以精锐部队猛攻中华门。中华门外驻有守军第八十八师，日机三五成群地来更番轰炸，使第八十八师无法站稳，他们被迫退入城内。日军紧接着追踪冲来，以致我军部队陷入混乱状态，云梯和城门撤闭不及，竟为敌军抢入约三百余人。副长官罗卓英将军亲至第一线指挥，在中华门一带我军和敌人展开了壮烈的巷战，把攻入的敌军全部击毙，始得喘息机会。那天，东线敌人猛攻紫金山；另以一支部队迂回偷袭大胜关至江心洲之地区，向第七十四军右侧背射击，企图围攻我后方，使我通浦口之江面受到威胁。下午二时，第八十八师雨花台左翼阵地为敌全部炸毁，敌军乘隙突破我阵地；同时，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联络隔断，战至午后，情况即告 不明。那天晚上，第八十八师为缩短阵线计，只得在城外固守主要阵地，城垣防务由第一五六师、第七十四军分别担任。本来还打算策动一次反攻，但经考虑后，认为各部队疲劳已极，丧失了攻击力量，而第一一二师，第一〇三师新自镇江撤回，更感到疲劳不堪，只得作罢。

自四日以来的八天中，日军飞机整天在轰炸，整个南京城内充满了硫磺、炭酸、火药气味。大家希望着部队来救援，但看不到一机一炮。我天天在经手办理调动部队移上前线去作战的工作，在字面上明明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开上去，可实际上兵员只不过一个师或团模样。同时，没有大炮，步枪也不整齐。我们只能在将领们的命令下计划并调动他们走上前线。

这时，蒋介石在庐山，虽然有线电早就断了，而无线电到十一日为止，还保持着联络，每天都有电报来指示我们。

十二月十二日，从拂晓起，敌人的飞机、大炮，即密集地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石块乱飞，四周的房屋倒塌着，城墙洞开，城里的士兵可以看到城外的敌人。三十余架敌机盘旋天空，炸弹和宣传品同时下来，他们劝告守城将领们投降。至正午十二时，第八十八师雨花台的主要阵地全被敌军占领；紫金山的第二峰也失陷；第二军团被压迫到乌龙山至吉祥庵的背水阵地。长官部就调动第一五四师去增援阻击中华门进入之敌，同时，雨花门及中山门城垣有好些地方给敌人炮毁，敌军乘隙钻进，万千无秩序的士兵，自发地迎了上去，用自己的身躯阻遏敌人的长驱直入。我想，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献身，南京的这次军事撤退是万万来不及的。

危城已成破城了。第三十六师奉调进城，准备巷战。到午后三时，第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的一部分部队，经由中山路北走，要想出挹江门，可是走到铁道部附近，却为第三十六师及长官部特务队所阻，不听指挥，秩序因此更为紊乱了。

十二日凌晨二时，廖肯参谋处长急急地来喊我：

"我们赶快到唐公馆里去吧！"

"什么事？"我问。

"不要问，到那里你自会知道的！"

我随廖参谋处长到唐公馆时，天尚未明。副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都在那里，唐生智看到我们进来，严

肃地说："

现在城已被击破，无法守卫了，委员长已有命令，叫我们撤退，你们赶快去准备撤退命令吧！"

我即随廖处长起草撤退令。一同参加的还有随罗卓英来的林维周副 处长。撤退命令如下：（略）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首先宣布说："……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以为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颤，至是，他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的两真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突围 计划以及集结地点，分别作了指示。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

在这样的气氛下，唐生智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结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十二月十二日夜，城东南隅，已发生激烈巷战。我和李仲辛还在唐公馆迅速搜集文件，等我们赶出来时，卫士们正将汽油向这所屋子浇洒。原来唐生智在上车时，以五百元和二十瓶汽油交给卫士，要他们把这所屋子焚毁。我们离开唐公馆，立刻赶到铁道部办公室，那里除了向几个散兵在无聊地来去走动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一元一张的钞票，零乱地散在地上，一个死尸倒卧在那里。我和李仲辛把遗留的文件烧掉后，急急地离开铁道部。

我们想从挹江门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门，看见两边却布满着铁丝网，中间仅留有一条小径。第三十六师的士兵们举着步枪，作着瞄准的姿态，禁阻任何人的进出。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其他部队退下来的官兵正向他们吵闹着，中间还夹杂一片老百姓哭叫的声音，四处断断续续的零乱的枪声。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后面难民们扶老携幼还在络绎地过来，我们也只得在工事前面停住。我忽然想到第三十六师的这一团是奉命开来城中准备巷战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对那守卫的士兵说：

"团长在什么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给他！"

"你是谁？"他问。

"卫戍长官部科长，我有符号在这里。"

他检查了我们之后，准许我和李仲辛通过铁丝网。我们到了挹江门口，见到了第三十六师的一位连长，我便把他们应担当的任务告诉了他。

我们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门，看见沿江码头上，秩序异常纷乱，枪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了起来，人是成千成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近了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的坠入江里，也没有人来理会，几百只手紧拖住渡船的船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上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跌在水里随着江水流向东方。在这个俄顷里，人与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战争的过失，黩武者的罪恶，让万代子孙永远诅咒吧！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则也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当时，日军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伏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部特务连驻守，停留着一只船。我们登船后，见船里已有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生智、罗卓英和佘念慈。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生智他们来后再开。等待了一小时以后，果然唐生智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陪同着来了，一会儿罗卓英和刘兴也来了，佘念慈和廖肯却还没有来。唐生智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恐误了渡船的计划，所以只得下令开船。

现在再来谈谈这艘船的来历。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唐生智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第三十六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十二月七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分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斓参谋长坚持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由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

十点钟到达浦口，沿铁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远，在花旗营遭到伏击，据报江浦日军正向我们进行包围。因此，就改奔扬州向顾祝同部靠拢。唐生智因身体没有复原，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想了许多办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走不了几里路，唐生智委实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副官报告说，还是那辆板车。唐生智叹道："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无奈，只好上车向前行进，不时停车向左右："长官部人员都过江没有？""佘参谋长和廖处长来了没有？"态度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途中有一座大木桥正着大

火，我们一行共四五百人，在燃烧中的桥上艰难地通过。回望南京，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日机数架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十三日晨七时抵达扬州，顾祝同部已移驻临淮关，他留下卡车六辆，供我们输送。因此，我们便顺利地到达滁州，晚上坐车至临淮关。

十二月十四日奉蒋介石命令，首都卫戍长官部人员调赶武汉待命。

（摘自《南京卫戍战史话》一书）

历史内幕

枪毙黄克功

1937年10月10日，毛主席就红军老战士黄克功犯罪的问题给雷经天写过一封信。当时我在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当战士，对这一事件的经过有所了解。感受很深。

当时，黄克功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在五次反"围剿"中，带领部队打了许多仗，立过功，后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担任了队的领导工作。

黄克功调到抗大后，认识了当时正在陕西公学学习的女学生刘茜。刘茜是山西姑娘，长得很秀气，黄克功想和她建立恋爱关系。但是刘茜在来延安前，已经有了对象，便拒绝了黄的要求。黄仍继续追求。在中秋的一个黄昏，黄克功邀刘茜到延河边散步交谈，并逼她表态。姑娘表示已经有了对象，不能同黄谈恋爱，更不能结婚。黄克功威胁说："不谈，我就枪毙了你！"姑娘坚决地表示："枪毙也不能同意。"黄克功恼羞成怒，便从腰间拔出手枪，当场将刘茜打死。

黄克功作案后，仓皇跑回宿舍，将染有血迹的军衣脱下来，企图逃脱罪责。

次日，我们特务队出操跑步，在延河边上发现了血迹斑斑的女尸，当即向领导报告。抗大的领导和保卫局迅速组织侦破。很快从女尸身上查获了黄克功的照片以及作案的基本线索。

我随有关领导找到黄克功，他已换上一套洗过的军装，面色苍白，精神紧张，但还是装出镇定的样子。经查问，黄克功见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刘茜是自己打死的。

黄克功被捕后，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要求到前线去拚死在疆场上，将功赎罪。

毛主席听说后非常气愤，同时也非常惋惜，便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们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是的，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史是光荣的，他曾经带领1个营歼灭敌人1个团，为人民立过功。但鉴于黄克功因逼婚杀死女学生，造成恶劣影响，特别是当抗日战争处于高潮，全国青年知识分子大批奔向延安的时刻，发生了这种事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毛主席在信中指示："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1937年10月间的一天，在延安大操场召开了公判大会。会上，雷经天宣读了判处黄克功死刑的判决书，并宣读了毛主席致雷经天的信。

枪毙黄克功，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对红军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毛主席在信的最后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严格遵守党纪、军纪和政府颁布的各项法律、法令。

（选自《党史纵横》，作者：翟作军）

许世友蒙难记

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在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上，许世友听到许多"乱言乱语"。由此引出了血染会场、密谋出走、身陷囹圄等离奇情节。

1937年1月中旬，红大随中央直属机关从保安迁至延安。许世友所在的红大一队驻在城内的原师范学校。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红大改为抗大，红大二期改为抗大二期，并从红军部队和全国各地扩大招收学员。

3月中旬的一天，传来了西路军失败的消息，许多在

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失声痛哭，许世友"心疼得两顿没有吃饭"。

西路军的失败，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点燃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线。抗大开始有组织地揭批张国焘。

在那些蒙受屈辱的日子里，红四方面军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抬不起头来。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依然抱着"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的超然态度。

一天，抗大师生坐在城隍庙前的广场上，开会斗争张国焘。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坐在队前一排桌子后面。

会议开到一半，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发言。

"我们军部有一个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和她乱搞，我在军部当科长，事情叫我处理，我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我了，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钱钧的话还没说完，张国焘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同志们啊，我是搞马列主义的，怎么能搞这个呢？这是对我的污蔑！"

"妈那个×，你还赖帐！"钱钧冲上去，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脸上打了一记，把张的眼镜从中间打断了。

"毛泽东，他竟敢打人，我抗议！"张国焘捂着脸大喊。

毛泽东这才注意到张国焘挨了打。这时，钱钧已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

"谁打的？"毛泽东在台上高声询问。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钱钧嚯地立正，朗声回答。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斗争会又继续进行了。然而，许世友的心情却难以平静，他了解钱钧，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有想到张国焘的私生活如此糜烂，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也想到张国焘在"肃反"中的严重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多无故被害的同志。但是，他不同意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

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判会上，有些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许世友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许世友呼地站了起来，红着脸大声嚷道。

"世友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陈赓队长含而不露地劝道。他在鄂豫皖苏区当过许的师长，熟知许的秉性。

大大列列的许世友未能理解陈赓好意，他径直走到队前，放了一通"横炮"：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中央就没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讲话，上万人都能听见，何况在这间不大的教室里！他这些胆大包天的言论，象一颗颗重磅炸弹，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让人想不通……"

许世友滔滔不绝，把埋藏在心底里的疑虑和不满，一古脑儿地往外倾泻。

"许世友，你这是反对中央！"

"不准你胡说八道！"

"你是托洛茨基！"

"土匪！"

有人终于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坐在队列里高呼。

喊声打断了许世友的发言，气得他暴跳如雷。

"我反对中央？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许世友忽然说不下去了，双手紧捂胸膛，口中喷出一道殷红的鲜血……

许世友住院期间，抗大的"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他说："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来看我的病，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3天，尤其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都感觉没有出路。"

面对这些痛哭流涕的战友，许世友内疚得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当初，是他力排众议，坚决把红大和党校学员带到了保安，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现在大家虽然没有埋怨他，但他却受到了强烈的内心谴责。

在这泪雨纷飞的3天中，许世友度过了3个不眠之夜，他想起了当初对大家的许诺："到中央去看看，不好再说嘛！"现在该怎样兑现自己的诺言呢？大家"都感觉没有出路。"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他左思右想，终于作出一个符合其性格的选择。

一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来看望许世友，又是泪流满面。

"你们就知道淌眼尿，哭有什么屁用？！"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咋办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儿？"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又激昂起

来了。"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大家举手赞成,笑容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犹如绝处逢生。

计划在秘密中顺利进行。愿走者越来越多。许世友说:"到第3天时,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准备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许世友还真会选择时机。4月4日是星期天,夜间10点正是人们熟睡之时,他不想伤害那些把守城门口的哨兵,决定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出城。

转眼就到了4月4日,准备出走的学员悄然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许世友也不动声色地从医院回到抗大。他选派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是,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

下午3时左右,王建安报告了抗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又找到了校长林彪。林彪指示:"这事任何人都不能讲,不许声张!"林彪立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泽东下令:"全部抓起来!"

下午4时,抗大一、二队驻地响起了刺耳的哨音。值班员站院子中间喊:"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许世友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喊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相信计划决不会泄露。于是,他十分沉着地和一队学员一起,走进了一间教室。他注意到,二队学员也走进了另一间教室。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团的一队官兵荷枪实弹地冲进校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该连原是红四方面军红大的警卫连,接着又迅速包围了一、二队教室。

一支支黑洞洞的枪管,从每一扇窗口直指室内,两名彪形大汉抱着一捆麻绳走进一队教室,又随手关上了大门。许世友见状,知道大祸临头了。

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开始宣读被捕名单,喊一个,绑一个。王建安也被绑起来了。

傅钟接着念道:"许世友,出列!"

许世友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头,在离绑人者几步远的地方站定。

"你们来啊!上来啊!"许世友冷笑着说。

两名彪形大汉操着一根麻绳,雄纠纠地走到许世友身边,一边一个,熟练地抓住他的双手,欲往后拧。霎时,许世友双手一搅,将两个大汉撞了个头碰头;继而双手一压,将其摁倒在地。

学员大哗。

"你们来捆吧!"许世友以胜利者的姿态,傲慢地把双手背到身后……

可他是什么胜利者呢?他精心策划的密谋被彻底挫败了:詹才芳、王建安、洪学智、吴世安等30多名同伙无一漏网!

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爱人的离异,使许世友大骂中央,只求快死,但他却被毛泽东的几句话感动得热泪纵横。

傍晚,一缕昏黄阳光透过门缝,窥视着牢房里的一切:一只臭气四溢的便桶,一盘肮脏破旧的土炕和躺在炕上的一个神色黯然的囚犯。

这是许世友一生中第3次被捕入狱:第1次是在吴佩孚部队,他一脚踢死了1个为非作歹的老兵痞,被关进了北洋军阀的监狱;第2次是在国民革命军,连里的两名班长抢劫民财,他因受株连而被关进了国民政府的监狱;这一次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而且囚禁的时间比前两次都长,关押1个多月了,只审讯了1次。

那是被捕的当天下午,他被带进一间审讯室,在平静的气氛中接受了审问。

"你们为什么要密谋出走?"

"他们说我们是军阀、土匪,还要枪毙。我们要到四川去再打一块根据地给他们看看。"

"谁指使你们的?"

"我不是3岁伢子。"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我没告诉,他怎么知道?何畏、周纯全都不知道!"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想走?"

"谁告诉你们,你就问他。"

"这次行动是不是你策划的?"

"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许世友对着上衣口袋努努嘴巴:"喏,给毛泽东的信也在我身上,你们拿去看吧!"

……

许世友有问必答,"从头到尾有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地陈述了他对党中央的意见,对张国焘的看法,对红四方面军的评价,对抗大部分学员的不满。

那天晚上,陈赓派许世友的一位同班学友,给他送来了行李。

"你要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很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走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这位同学悄悄地告诉他。

“妈的×，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你带个口信给我老婆，叫她赶快来见我一面。”

自从到延安后，许世友和雷明珍的爱情与日俱增。那时，抗大尚未开学，雷明珍住在延安等待中组部分工作，这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周末总要举行一次“爱的会餐”，直到雷明珍出任延长县妇女部长，他俩才依依惜别。

在这度日如年的30多天里，许世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自从那位同学透露外面消息以后，我知道事情不好，以前我想这是小事，这时知道不小了，就等着死，没有想活的余地。”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临死前最后见妻子一面，他要向她说明事实真相，他要为不能陪她白头偕老而向她道歉，他要劝她早日改嫁……

门外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陈队长派我来给你送烟。”那位同学一进门就说。

许世友接过一条香烟，压低嗓门问：“找到我老婆了？”

“我托人带信给她，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

那位同志掏出一张没有信皮的“公开信”，许世友迫不急待地看了起来，只见信纸上赫然写着几行大字：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我坚决要求离婚！

许世友默默地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忽然，他掏出钢笔，在来信上“刷刷”地写道：“同意坚决离婚！许世友”。当写完“友”字的最后一捺时，“格崩”一声，笔尖断了！

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爱人的离异，人世间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吗？许世友挥手送别那位同学后，对这个世界已毫无留恋之处了。以前他是在等死，现在他只求快死。

在这以后的一个月中，他经常在“思想上大骂中央”，并且“亲口骂了两次”。他认为“这样骂了，一定有人报告党中央，我就能快死”。然而，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既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探监。

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许世友、詹才芳、王建安、洪学智等人被押到抗大，参加公审大会。许世友以为死到临头了，表情特别轻松，大有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慨。

中央为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任庭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任检察长。当许世友被押上被告席时，他看到董、傅俩人已神色庄重地各坐各位。

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董老宣布开庭，检察长傅钟作为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最初，许世友抱着无所谓的冷漠心情，可是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愠色。当傅钟读到“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罪名时，他已气得象个红脸关公，瞪着两只公牛似的眼睛仇视着傅钟。

“许世友，你对检察长的起诉有什么意见吗？”董老问”

“要杀就杀，没有话说！”许世友吼道。

董老接着宣读了判决书，其他人只判了几个月刑期，给许世友的处罚是：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他原以为必死无疑，未想到结果竟是这样。

不息的生命之火，在许世友内心燃烧起新的希望，也带来新的苦恼。

人活在世上，难道就为的保全生命、吃喝玩乐，一年一年地增加岁数？如果是那样，他就不会放弃国民党军的连长职务，回到家乡“提着脑袋干革命”了。

从1927年入党算起，他为实现共产党的宗旨整整奋斗了10年，没想到却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这种政治上的处罚，简直比肉体上的折磨更使他难以忍受。

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有几名战士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政治觉悟不高的极端表现，遂对那些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

此事传到善于举一反三的毛泽东耳中，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毛泽东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于是，他立即着手纠正反对“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公审大会后不久，毛泽东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达门香烟。徐向前刚到延安，他就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作了这些铺垫之后，他又亲自找许世友谈话。

那是7月上旬的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毛泽东微笑着走进关押许世友的牢房。

“世友同志，你们写给我的信我看过了，我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毛泽东站在炕前，和蔼可亲地说明来意。

许世友坐在炕上，一声不吭，埋着头抽烟。

“哈哈哈，看来你的气不小啊！”毛泽东脱了布鞋，像许世友一样盘腿坐在炕上。“看到你抽烟，我的烟瘾也来了。世友同志，能不能给我一支？”

“烟本来就是你的，你要抽就抽！”

毛泽东拿起炕上的那盒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对个火行吗？”

许世友狠劲吸了两口，将一只烟屁股送了过去。

在吞云吐雾中，毛泽东讲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侧耳倾听。谈到草地分兵这一段，他却突然开口，甚至和毛泽东争起来了。

“那是你们自己要走的嘛，当时要是徐总下命令，我就会带部队把你们挡回来！”许世友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中央首先要感谢向前同志，当然也要感谢你这位军长，是你们按兵不动，给我们放了一条生路。但是我们单独北上，也是迫不得已的嘛。如果跟张国焘南下，那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哪会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呢！”

毛泽东接着从战略上分析了张国焘分兵南下的错误……

许世友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认为“要不是中央把我们甩了，我们损失也不会这么惨。”

毛泽东见他固执己见，一时难以说服，就婉转结束了这次谈话。

“世友同志，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哟，我还会来找你争论的！”毛泽东说罢，笑容可掬地走了出去。

自从毛泽东来访后，许世友的待遇有了较大改善，实际上已由囚禁变成了软禁，行动也比较自由了。

一天傍晚，许世友在看守人员的监视下，在监狱附近溜达，正巧遇到了朱德。朱老总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肩并肩陪着他散步。

“听说你跟主席吵嘴，这可不行哎！我和主席是多年共事，情况了解得比你多得多……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展。张国焘对鄂豫皖有贡献，但他搞分裂也是事实……长征路上，那段时间我们常见面，情况你也知道，我的处境难啦！”

“总司令，我已经想通了，张国焘是有闹分裂的错误。我不该跟主席吵嘴，我准备向主席道歉。”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再次来到牢房。坐在土炕上与许世友促膝而谈。

许世友诚恳地向毛泽东道歉，并就事论事地谈了他对张国焘错误的初步认识。

毛泽东见他有所进步，就把话题集中在抗大的批判张国焘上：“……批判国焘路线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该伤害你们这些同志。”

“他们说我是土匪，还说要枪毙我，我觉得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许多彩，没有功还有罪吗？所以我就想到四川去打游击了。”许世友不无悲伤地说。

“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我对你表示敬意！”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许世友差点儿掉下泪来。他还有什么苛求呢？他不惜以出走延安来表示抗争，不正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信念，以另一种方式来求得别人的理解吗？

毛泽东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听到这儿，许世友再也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了，成串的泪珠夺眶而出，在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恣意流淌。

谁能想到这位宁死不屈的硬汉，也会有如此丰富的感情神经，竟然被几句知心话感动得热泪滚滚呢！毛泽东也深感意外。于是他对许世友有了深层的了解。

大概是为了调节这令人伤感的气氛，毛泽东问道：“世友同志，你这个世友的世，是哪个世啊？”

“单人傍的仕。有时候，也有人写成战士的士，世界的世。”

“仕途多风险呀，还是不要和仕交朋友。我们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中国，要实现世界大同，要和世界人民交朋友，还是改为世界的世好啊！”

许世友点头同意，从此，他有了一个含义不俗的名字。

7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撤销了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分，叫他们仍回抗大继续学习。

1938年1月，中央撤销了对许世友的党内处分，给他恢复了党籍。这使他激动不已，他掏光了口袋，拿出全部津贴，买来高粱酒和熟驴肉，请全班同志一起分享他的幸福……

当年12月，许世友跟随朱德来到太行山，随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而他的一些老部下都已是“旅长、司令的干活”了。

许世友有了一种“放虎归山”、“游龙入海”般的愉悦心境。他尽心尽力，协助陈赓旅长指挥了多次战斗，还创造了被誉为“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范例”的香城固战斗的奇迹。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他的固有印象。

“傻子连长“汪乃贵此时已是著名的“汪乃贵支队”的司令官了，成为正旅级干部。他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份中央的电报，说对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能重用。我非常生气，就逐级向上反映，后来说是译电员译错了，不了了之。”

对汪乃贵等尚且如此，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许世友受不了这份窝囊气。终于有一次，他与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发生了激烈争吵，并且动了拳脚。此后，他当面向朱德提出了到山东去的请求。

朱德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之后，同意了许世友的请求，于是，这位硬汉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千里迢迢地到山东去打天下了……

关于这桩发生在“革命熔炉”中的“反革命案件”，许世友从不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不知情者提及，以至许多跟他多年的亲密战友都不知其详，直到他行将就木之际，为了给他撰写生平和悼词，有关部门才从中央组织部调来了他的档案，极个别的人才有机会从那些发黄的纸张中看到了这个案件的内幕。

（载《追求》1992年第2期，作者：衡学明）

陈毅在武功山险被误杀

1945 年 4 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党代表谭余保见到陈毅，特以致歉的口吻说："陈毅同志，那次你到武功山来，我这样对待你，实在是个大误会，真对不起你啊！"陈毅嘀嘀大笑地说："你这个谭余保，还在提那个事，这有什么，都是为了党嘛，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你们怀疑我，那也是很自然的。"

一

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下，促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粤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项英、陈毅等同志得到这个消息，果断地转变斗争策略，及时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0 月上旬，项英、陈毅从赣南来到吉安，与国民党吉安专署专员刘振群交涉执行协议的具体事宜，建立新四军吉安办事处。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时期，他们进行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深入到各个游击山头，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在各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下山改编。但是，有些游击队的工作就比较难做，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共产党能与自己的敌人去"合作"。谭余保领导的湘赣游击队，坚持在武功山区，至今还打得很凶，吉安及其附近数县的国民党当局，借机指责共产党谈判没有诚意，扬言还要派重兵进武功山"清剿"。

当时，项英去了赣南，陈毅留在吉安，他对武功山湘赣游击队至今仍未沟通十分着急，便派出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进山联系。曹此一去十多天都没有音讯，后来听说已被误杀了。然而，国民党当局一天天施加压力，调兵遣将，确有进山迹象，眼看这支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游击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在这万分紧迫的关键时刻，陈毅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定亲自进武功山去找游击队和谭余保。

二

1937 年 11 月，陈毅从吉安出发，经安福来到该县武功山下的洋溪镇。这里设有国民党的一个区公所，区长彭侠民曾是个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有过某些作为。第五次"围剿"失败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区长。胆略过人的陈毅直闯区公所，指名要找区长彭侠民。陈毅一面向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叫他提供上山条件，说若在"白区"地域发生麻烦就拿他是问。彭侠民面对这位共产党的大人物不敢怠慢，热情接待了他，还给他提供了山上山下不少"情况"。第二天，他还给陈毅备了一乘竹篷轿子，派了两个卫兵，办了关卡印信，发足路费，把陈毅送上山去。

武功山下的石级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一路上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来到了九垄山口。

"站住！"冷不防丛林中钻出几个游击队的哨兵来，横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轿子停住了，轿里从容地钻出一个人来。只见他头戴一顶法国博士帽，身着一件浅蓝竹布长袍，脚蹬一双尖头黑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色太阳镜，仪表堂堂，举止潇洒。

"你从什么地方来？干什么的？"哨兵警惕地拉动枪栓，厉声喝问。

"我从吉安来。"陈毅平静地回答。

"到哪里去？"

陈毅摘下眼镜，把游击队员打量一番，然后笑笑说："我是来找谭余保同志的。"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哨兵。名片正中印着"陈毅"二字，旁边还有五个小字："四川乐至县"。

游击队员不知道陈毅是个什么人，赶忙把他带进村里一户农民家里，主人是一位 50 来岁的老表嫂。她凭着多年来的机警，从后门溜出去报告特派员黄炳光。她说："哨兵押来了一位绅士模样的人，戴礼帽，穿长衫，着靴子，黑眼镜，是用轿子抬来的，还有两个国民党的勤务兵保镖。"

黄炳光立即警觉起来。他分析：是共产党的干部？那模样又不像；是国民党的官员？他没那个胆量敢进山来；是做生意的大老板？这年头也不可能。黄炳光遂带着几名战士冲进屋里，对来人进行了严肃审问。黄炳光见那人坐在屋里，镇定自若，谈笑坦然，回答问话之后，大大咧咧和黄炳光等人谈起了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西安事变的事来。黄炳光听罢他那滔滔不绝、有理论、有事实、有风度的言谈，断定：来人非等闲之辈。

"你说你是陈毅，除了名片，还有什么证据能说明你的身份？"黄炳光发问。

"不见到你们的负责人我是不会交的。不过，这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可以发几张给你们看看。"陈毅一边打开一卷印刷品，一边要求黄炳光，他要尽快见到游击队的领导人。黄炳光灵机一动答应道："你们在这里等候，我去向游击队的领导汇报。"暗中却安排游击队战士对他严加看管。

三

湘赣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听了汇报，觉得事关重大，经商量，决定把来人带进山来。陈毅被带到了游击队团部，在场的人却没有一个认识陈毅的。陈毅自我介绍说："我是党代表陈毅，是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代表中共中央下山来跟国民党谈判的。今天到

这里来，是向你们传达中央指示的。”说罢，他拿出一封介绍信来，上写：

特派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项英

段焕竞和刘培善看过介绍信后仍然狐疑，这项英的签名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东西也容易伪造，说是介绍信，又没有盖公章，真要小心上当受骗。就在两个月前，一个持有“湘鄂赣边区党委联络员”介绍信的人来到武功山“联络”，这家伙走后不久，就引来了大批“国军”进山“清剿”，弄得很被动，多么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啊！而眼前这个叫“陈毅”的，这种装束，这副派头，这些从未听过的宣传，不能不使他们特别地警惕。当晚，他们加强了戒备，并秘密把陈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

陈毅就是这种脾气，不管把他转到哪里，他都要抓住每一个机会，用他那浓重而又洪亮的四川口音，向游击队宣传国内外形势。到了这个新地方，他又在向段焕竞等干部战士解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条文。他说：“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坚持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都要全部下山去接受改编。”

他们听罢陈毅的宣讲，既觉得很有道理，又认为这很不可能。段焕竞、刘培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陈毅问题”。大家认为：事关重大，只有把陈毅尽快送到湘赣省委去，请谭余保同志决断。

四

武功山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溪涧纵横，森林茂密。一千多年前，陈霸先利用其险要地势挫败过侯景之乱；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也在此打败过吉安代理知府曾国荃的官兵；如今，红军湘赣游击队在此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的“清剿”。

陈毅的眼睛用一块黑布紧紧地蒙着，由黄炳光、傅浓喜等十多名游击队押送进山。也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陈毅被押送到了临时湘赣省委的驻地。

说是省委驻地，实际上是在武功山腹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用毛竹、杉树皮盖起来的几幢棚子。

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和省委肃反委员颜福华正在棚内谈论着什么。忽见黄炳光到来，谭余保问道：“你来干什么？”

“带个人来了，他说一定要见你。”

“什么人？”

“陈毅……”

话还没说完，谭余保在树桩桌子上猛击一拳：“叛徒！叛徒！大叛徒！你去叫警卫班，把他捆起来，我不见他。”说罢，气咻咻的走了。

到了临时省委驻地，陈毅的黑布解去了。他揉了揉眼睛，四周打量了一番，风趣地说：“哎呀呀，你们这里不错嘛，可惜我此时无闲观山景。喏，还能搭这么大的棚子，蛮阔气嘛，我们在油山搭的棚子就像守野猪的寮棚，又小又矮，人也只能钻出钻进。”

陈毅就这样被无端地捆了三天三夜，无人理睬。到了第四天，肃反委员颜福华来了。陈毅一见，大声质问：“你们捆我，搞什么鬼嘛！”

“你是个大叛徒，怎么不捆呢。”颜福华说。

“我不是叛徒，你们乱弹琴。我是代表江西中共根据地去和国民党谈判的陈毅。”

“哼！你不是叛徒？报纸上都登了，‘江西省共产党首领陈毅投诚’。”

“反动派的报纸你们也都相信吗？离间，策反，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呀！”

“你没有叛变，为什么近来敌人接二连三向我们进攻呢？”

“是你们进攻了人家，不是人家进攻我们，最近他们又准备要大规模进攻你们这里，是我把他们反掉的。我的意见，最好不要打内战，我们今天也没有权利打内战。北方的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搞合作，我们再打，步调就不一致了。”陈毅说了很多，而颜福华等人就不愿听。陈毅觉得这样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声言坚持要见谭余保。

“要见谭余保，要见省委都可以。”颜福华说，“但是，你得要把叛变的经过老老实实都讲出来，你要把怎样勾结敌人，怎样来进攻我们都讲出来，才能宽大处理。”颜福华边说边把陈毅全身又搜了个遍。

这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正在隔壁小房间里开会，只隔着一道竹篱巴墙，那边说话，这边也隐隐约约听得到一些。当时有人发言：干脆把他处决算了。陈毅听到这话，大叫起来：“老谭，你们开会决定要杀我吗？你们不能杀呀，绝对不能杀的，杀了我陈毅，你们要犯大错误的！”

五

第二天上午，棚子外面的空地上坐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好像就要开公审大会一样。谭余保从棚子里出来，他神情严肃，大家正在等待看他怎样对付这个“叛徒”。

陈毅转过脸来，只见此人身挎驳壳枪，头戴红军帽，手里拿着一根粗长的竹管烟筒，开口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同志吧？”

“谁是你的同志，你早就叛变了！”谭余保显得怒不可遏。

“我是代表党来的呀！”

“你代表哪个党？你代表国民党！”

“我是陈毅。”

“我早就知道你是陈毅，你在井冈山那个时候，我还听过你的报告，你神气十足，从猴子讲到人，从天上讲到

地下，从井冈山讲到全世界，头头是道，一讲几个时辰。你过去讲的话，你自己如今还记得吗？讲革命，讲革命就要真革命！就要言行一致，就要不怕死！不要投机嘛！你现在怎么样？你只有老老实实供出是怎样投降蒋介石的，如果不老实交代就杀头！”

陈毅听完谭余保那一大串怒气冲冲的问话，不给他正面回答，反问谭余保：“老谭，我问你，你抗不抗日？”

“我抗日，我马上可以抗日的。”

“那就好了。”陈毅觉得这一问倒还有些共同语言。谭余保接着插话：“不过，要我抗日可以，得有个条件，首先要恢复井冈山八个县的根据地。”

“同志哥啊！你何见之浅也！”陈毅泰然自若，以上级领导的口吻说道：“你只盯着井冈山那八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还要争取领导权呢？将来抗战胜利了，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哪能就只看到八个县。”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口号我觉得很奇怪。”谭余保说：“我只知道有阶级斗争，哪有阶级合作？”

“同志，你要知道，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战高于一切。现在，我们要用抗日救国这个口号来代替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

“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讲阶级合作，你是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就是叛徒！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你却要把工农的军队拉出去，交给蒋介石去改编，你这个叛徒！”谭余保越说火气越大，抽出烟筒就要敲陈毅的脑袋。

陈毅瞪大着眼睛对他说：“老谭，脑壳敲不得的。我给你说哟，改编红军，取得了给养，红军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嘛，这对我们有利。革命的阶段不同了，就要有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形势，退一步就是为了进两步嘛！”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起理论来一套又一套，可敌人一来，你们就逃跑了。你平时东一个指示，西一个指示，如今成了机会主义。”

陈毅继续解释说：“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我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后来转到了赣粤边打游击。我陈毅并没有逃跑，同样坚持了三年嘛！我上面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你有意见，可以向党中央讲，叶剑英在武汉，项英如今还在南昌嘛！”

“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今日也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越说越激动。

陈毅抓住谭余保说漏了嘴的机会，主动进攻，侃侃而谈：“你们在这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那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佩服。你骂我‘叛徒’，我也不见怪，一下子难以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不难理解。但是，我讲项英、叶剑英派来的你不管，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也要抓起来。谭余保同志，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这时，陈毅反客为主，显得很为气愤的说道：“谭余保，你若是共产党员，你就不能这样对付我，你若是土匪，那就马上把我枪毙吧！”

“好家伙，你这个叛徒倒蛮厉害呐！”谭余保命令警卫班：“把他押走，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

六

陈毅那雄辩的口才，遇事不惊的胆略，使在场的人无不佩服。至于陈毅是不是“叛徒”，大家议论不止，各有各的看法。对谭余保来说，他的心里更加难以平静。曾几何时，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军区司令员周杰的叛变，使所有苏区党、政、军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整个湘赣省委和游击队几乎垮掉。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生入死才搞到现在这几百号人枪，支持到了今天。堡垒就怕从内部攻破，惨重的教训，日似一日地绷紧了谭余保那警觉的神经。

夜已经很深了。谭余保在床上转辗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这陈毅到底是不是叛徒？要是错杀了，那将成为千古罪人；要是错放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怎么办？怎么办？谭余保一骨碌爬了起来，提盏马灯，来到“禁闭”室找陈毅单独做“工作”。

陈毅知道，谭余保此时也正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对于这位革命斗争坚决的农民领袖，其本质是好的，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正面再教训他几句，也许会开窍的。陈毅说：“谭余保，我在这里已经五六天了，给你讲道理，讲政策，你总是听不进，而且还把你的臆断来作结论，那是十分错误的；你开口‘叛徒’，闭口‘叛徒’，我看你已经离开党的立场很远了，没有组织观念，不讲道理，我看你才是叛徒。”

半晌，谭余保一直没有做声，思想斗争很为激烈，面对他认为如此复杂、尖锐的问题，他感到束手无策。陈毅看透了他那矛盾的心理，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老谭，这样吧，再给你说道理也是白费劲，为了使你能相信我，拿我的名片到吉安或南昌去，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仍然留在这里，待你们搞清情况之后再来杀我总可以吧！”

谭余保无话可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陈毅。他暗中派了两位同志火速赶到吉安，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副主任韦瑞珍接待了他们。当谈到陈毅的问题时，韦瑞珍惊叫道：“他是党派去同你们联络的呀，你们怎么把他当叛徒呢？请转告谭余保，要绝对保护陈毅同志的安全！”两位同志一听慌了，立即背起半个麻袋的文件和宣传品，晓行夜宿，水旱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到了武功山。

谭余保听后大惊：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选自《纵横》94年4期，作者：周英才）

红星熠熠照太行
——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建中的一场智斗

1938年1月的一天，躲在峨嵋山饱览抗日景观的蒋介石突然雷霆大发，破口大骂阎锡山："狗胆包天，胆敢叫八路军胡闹！"并声称要发兵捉拿叛逆聂荣臻、宋劭文、胡锡奎。是何事如此触怒了蒋委员长呢？原来是太行山北段升起了一颗熠熠生辉的红星——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在抗日的隆隆炮火中成立了。这怎不叫消极抗日，积极溶共的蒋介石如芒在背呢！

那末，成立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蒋介石何故要大骂阎锡山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之后，聂荣臻奉命率八路军主力3000人进军太行山北段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恢复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转眼已是深秋季节，在山西地下党的积极配合下，聂荣臻为筹集武器装备，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经与山西地下党负责同志研究，决定以国共携手共同抗日为由，一是向阎锡山要些武器；二是尽快把边区人民政府筹建起来。经过多方努力，地下党的同志终于把工作做到了阎锡山的客厅里。这天，阎锡山和他的私人秘书，即名为堂妹实为爱妾的五妹子正在客厅中谈天取乐，我地下党的特派员出现在他的客厅里。素有阎"高参"之称的五妹子便一边跑前跑后招待来客，一边又扯东拉西地讲些抗日的官话，话题自然也讲到八路军进驻山西的事。这时，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大员（与我党有联系）道："会长（阎锡山的同志会），八路军初到山西与我们合作，是否给点见面礼？"

一生爱算计的阎锡山，忽听此言便哈哈大笑。本来就想把八路军推到抗日第一线，与日本人拚个你死我活，既能削弱共军的力量，自己又能稳坐山西。对于确保自己实力的阎锡山，对此等事何乐不为。于是抓了抓头皮道："好，那就送500块现大洋吧。"

不料，话一出口，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叫花子上门，会长也不能只给半块山药蛋吧？"

众人的笑，使阎锡山的脸有点挂不住，他霍地从沙发上立起来，喊道："我阎卜川（阎锡山的号）不是个小气鬼！把五号兵器库打开，叫友军也换一换装备。"

五妹子听言，抿嘴一笑，便进内室去了。

五号兵器库是个独特的库，它座落在五台城东的山坡上，有三间房屋面积大的一个窑洞，铁门上有"五号兵器库"五个大字。阎锡山为了确保这个重地的安全，还特意叫来他的一个远门当家子住守，并把库跟前5亩水浇地白送给他，让其边看库边种地，收入就算顶了薪水。

原来五号兵器库存放的仅是一些古老的火药枪。据说是阎锡山当上山西总督后，找来了这些古老的玩意儿存起来，以备有朝一日进北平登基时建筑个军事博物馆当陈列品，以表示他阎某起家不易。

如今，太原失守，还进啥北平，何不把五号兵器库里的破烂东西拿出来哄哄八路军，也叫外人看看我老阎的大方。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我八路军聂荣臻部来到五号兵器库，打开库门的大铁锁一看，不料库内满满当当的木箱子，撬开一看，大都是长把手榴弹和大机头的20响短枪以及子弹，也有阎锡山专门保存的那几支古老的火药枪。聂司令员面对这些武器粲然一笑，道："阎锡山耍了个鬼把戏，反而'弄巧成拙'，给他个公开感谢信吧。"于是《晋阳日报》1937年10月27日以显著位置刊登出如下致阎锡山的信：

> 致上阎长官：
>
> 特谢支援我部手榴弹和二十响短枪。阎长官此举，表明抗战之决心。全国军民敬佩！山西军民敬佩！
>
> 致意
>
> 聂荣臻
>
> 1937年10月25日

阎锡山看了聂荣臻的感谢信，顿时发疯似的抱着脑袋要撞墙，嘴里不住地念叨："我的'蛋蛋'、大"鸡"头，丢了！丢了！"五妹子急忙跑过来搂住他，用力往沙发上一按，道："咱有兵工厂，还怕没有弹弹、没有大机头短枪！"五妹子的话还果真提醒了阎锡山，他冷静下来说："事就坏在兵工厂。"随即下一道秘令，捉拿兵工厂厂长阎边问罪。

阎边是阎锡山的"亲侄"，其实他不姓阎，也不叫边。他姓张，名牛，是五台城里人。这张牛善于阿谀奉承，得到阎锡山手下一个头目的信任，保举他当上兵工厂的厂长。张牛为再登高枝，特将牛字改成"边"字，表明他也是河边人；又把张姓改成"阎"姓，证明他是忠于阎锡山。这个"阎边"到兵工厂上任以后，逢人就说："阎锡山是俺亲叔父。"

娘子关失守后，上司叫兵工厂把武器疏散开。阎边想：五号兵器库，是"叔父"的地下库，得把杀伤力好的手榴弹、称手的二十响短枪运往五号库，待到关键时刻，拿出来保"叔父"的驾，也显显"侄儿"我的预见性，说不定还能立个头功。

阎边得知头天刚把武器运到五号库，翌日八路军便奉"叔父"之命将武器取走，知道自己已闯下滔天大祸，便匆匆逃到娘子关当了汉奸。从此，阎锡山满口的苦水只好往自己的肚里咽。

然而，事情并不算完，筹建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工作还得要和阎锡山打交道，这可是华北人民早已盼望升[illegible]一颗红星，是抗日救国的一件更大的事情啊！

一天晚饭后，聂荣臻司令员、左权副总参谋长，邓小平总政治部副主任散步在南茹村外。聂荣臻为下步的工作正在苦心思索着。邓小平早已看出聂司令员的心思，于是幽默地说："你取了阎锡山的手榴弹，还写感谢信，这叫做牵着毛驴上山嘛！"左权也接过话茬："毛主席说：'陕北的毛驴不上山，前头牵，后头赶，它才上山。'聂兄还欠缺赶驴的人哟！"聂荣臻深沉地道："我正为此事做难呢。邓小平稍加思索后说："宋劭文、胡仁奎都当过阎锡山的县长，他们都深谙阎锡山脾性，又善长社会治理，二人现在"牺盟会"工作，归薄一波管，我和一波说说，把他俩给你如何？"左权畅快地说："把总参的副官长唐延杰也给你，当你的参谋长。"聂荣臻霎时高兴起来，说："有你俩搭台子，就好开戏了！"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唐延杰参谋长传达聂司令员的命令，3000人的队伍腰系手榴弹、背插大片刀、肩扛钢枪，高举鲜艳的红旗雄纠纠地向着五台山地区进发了。

1937年10月末的一天，宋劭文和胡仁奎来到五台石嘴村，在普济寺和聂荣臻共同研究了建立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大事。聂荣臻要组建的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是在阎锡山所辖的第二战区内，为了尽力减少磨擦，团结抗日，须经阎锡山批准，这也是当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宋劭文、胡仁奎是山西"牺盟会"的会员，于是商定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向阎锡山打报告，力争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宋劭文把报告写好后上递阎锡山，可许久不见回音，心中十分着急。胡仁奎要出报告底稿细看，白纸黑字写着：

上报阎长官：

为了祖国的安全，确保华北的抗战胜利，本人建议和胡仁奎二人到八路军聂荣臻辖区组织临时政权机构，以保聂部前线供给；促进抗战的胜利……

宋劭文××日

胡仁奎面对报告底稿细细琢磨，随之微微一笑，提笔把"祖国"二字改成"山西"二字；把"华北"二字改成"山西外围"四字。改好后，遂又报阎锡山批准。事隔几天，阎锡山果然批准了。宋、胡二人带着阎锡山的批示高兴地来到河北省阜平县会见聂荣臻。

1937年12月5日这个不平常的日子，河北省阜平县的城里高高挂起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街道上挂起横标条幅，石头墙壁贴满了红绿标语，顿时变得格外热闹起来。各地按照"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员占三分之一；无党派上层人士占三分之一）的原则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自深山、平原、敌占区、游击区跋山涉水远道而来。

1938年1月5日至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隆重召开。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他们是：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聂荣臻。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等，共140余人，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这是敌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各方面的政策法令，结束了原国民党政权在日军进攻面前土崩瓦解而出现的混乱局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晋察冀边区抗战的力量迅速增长。

晋察冀边区各级政府的成立，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老百姓连天敲锣打鼓，扭秧歌闹庆祝。太行山里的热闹场面传到了大后方，也传上了峨嵋山，蒋"委员长"闻讯，屁股便如坐针毡，腾地跳起来大发雷霆骂道："阎老西狗胆包天，胆敢叫八路军胡闹！我要发兵，捉拿叛逆者！"宋美龄已早知此事，也正心神不安。但她还是冷静下来把老蒋摁坐在"帅"位上，悄悄地说："还是先给阎老西发个电报，叫他们狗咬狗，不是比咱发兵更好嘛！"蒋介石面对粉脸靓女的宋美龄火气消了一半，不住地点头道："夫人高见，发电！"

阎锡山接电后，急忙召开紧急会议。今天的小会议厅，没有了往常的平静，连同阎锡山在内，13员同志会的高干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桌椅乱转。有的主张按蒋委员长的指令办，发兵捉拿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交委员长处置；也有的主张用调虎离山计，先把宋劭文、胡仁奎二人诱回山西软禁起来，叫他公开发表会长没有批示的声明，而后再强令聂荣臻解散边区政府。如若不然，就发兵捉拿归案。这时，靠近"牺盟会"的两人却忧心忡忡地说："要是这么一来，咱们和共产党的关系就掰了，日寇如乘机把山西拿去怎么办？"

还是阎锡山老谋深算，他头头是道地说："对待'草字头'要'尊'，但不要发兵对待'红'字辈，要名联实挤；对待日本人要假抗真拉，让'日'吃'红'。具体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呐喊'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是非法的，必需解散，不然我要用武力解决！但按兵不动，看看再说。"

顷刻间晋报、电台高叫"解散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声浪充斥报刊和电台播音室。

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举动，可把王明吓破了胆，他破门而出向聂荣臻提"意见"，说什么"这样搞对国民党刺激太大，破坏了统一战线，应当是一切事项要通过蒋介石再办。"聂荣臻不吃王明那一套。王明气愤至急，又以长江局的名义，发报给党中央，要求解决聂荣臻的问题。

党中央接到电报后指出：晋察冀组建边区人民政府的办法是个伟大的创举，各抗日根据地应照情推广。党中

央支持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开展。延安《解放日报》和电台还详细报导了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成立前后的经过，把阎锡山"出尔反尔"的丑剧公布于众，用事实有理有据地驳回了蒋、阎对我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诽谤。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犹如太行山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着巍巍太行山区，照亮了广大人民的心，他们高举抗日的旗帜，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选自《党史博采》94年11期，作者：王志军）

高敬亭和岳西国共谈判

岳西谈判，是边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折点，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中最早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的一次成功的谈判。

领导这次谈判的我方决策人，就是化名"政治部主任李守义"。出席九河签字仪式的威震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

高敬亭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先后担任过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在1932年和1934年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他奉命留在鄂豫皖边区，担任重建后的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无军长），领导了大别山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早在1937年"三个月秘密清剿"发动之前，高敬亭就已经从白区报纸上看到有关西安事变和国共酝酿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但知之不详。1937年春夏，党中央先后三次派人进入大别山区寻找红二十八军，因敌人进行"清剿"，封锁严密，一直没有联系上，这时，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派姜术堂辗转找到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几天后，红军联络处委托姜术堂携带《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等文件，返回鄂豫皖边区，在岳西县鹞落坪，通过便衣队在沙僧河首先找到了何耀榜，汇报了西安之行。

7月13日，高敬亭率小股武装从鄂东北突围回到皖西，在岳西南田村与何耀榜会合，看到了姜术堂带来的文件。高敬亭在远离上级领导三年之久第一次见到中央指示，欣喜异常，他独自关在屋内，反复学习研究了一整天。于是立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讨论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方案。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主动试探，以红二十八军名义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发出停战谈判的倡议。

当时，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卫立煌的部队也无意内战，加上卫立煌也已内定新职，即将率部赴防，因此，当天下午卫立煌就复信表示接受谈判，并就近先派出岳西办事处的联络参谋到蛇形岗与我方接触。

次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奉南京政府之命，派出皖西保安司令部办事处郭副官到达岳西协助进行谈判。18日，卫立煌的全权代表、高级参谋刘纲夫也到达岳西县城。红军以何耀榜为正式谈判代表。19日，在我方严正要求下，国民党三十二师撤除了对红军的包围。

从7月22日起，双方正式开始举行谈判，谈判的主要焦点是我方部队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由于我方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国民党方面也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在双方努力下，于27日达成了有利于国共双方在大别山地区合作抗日的协议。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高敬亭当天就从九河赶到鹞落坪召开干部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警惕和提防国民党背信弃义，对我搞突然袭击的问题，同时制定了我军安全进驻七里坪的行动路线。高敬亭向分散在各地的红二十八军部队发出他自己签署的命令："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至黄安县七里坪集中"。并在各地张贴通告，敦促流散人员归队。

9月上旬，红二十八军所属各部及地方武装、便衣队一千八百余人，陆续从鄂豫皖边区各地开赴七里坪，番号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同时，还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豫南红军游击队联系。9月9日，高敬亭给党中央写书面报告，汇报三年来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艰难经过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同时也表达了要求得到党中央领导的急切心情。

1937年7月中旬，毛泽东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荣维轩五人从延安赴鄂豫皖，不久，又派了第二批三十多名政治、军事干部赴鄂豫皖。红二十八军部队进行了全面整训。接着，聂鹤亭、郭述申、戴季英、方毅、彭康等也先后到达七里坪。

10月2日，国共两党协议，改编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1938年1月中旬，叶剑英从汉口到七里坪检查部队整训情况，部署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38年3月8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等率七、九团从七里坪出发，14日在皖西流波疃同周骏鸣率领的八团会合，接着部队向皖中敌后挺进，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一支劲旅。

（摘自《大江南北》1986年第3期《高敬亭

和岳西国共谈判——记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新四军》作者：童志强）

“何鸣危险”及其教训

毛泽东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国共合作中必须警戒“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何鸣是何许人？什么是“何鸣危险”？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何鸣，原名何君熙，广东海南岛万宁县人，生于1910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在万宁县龙滚中学求学。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何鸣辍学，参加了党领导的海南岛农民暴动，同年12月入党。次年冬，国民党十九路军进攻万宁县苏区，实行白色恐怖，何鸣经党组织的帮助出走南洋，在新加坡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闽南革命形势发展，党派何鸣到闽南参加地方革命工作。翌年5月，他转入部队，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四连政委，奉命带领连队到漳州南乡开展工作。1933年初，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同年5月，红三团政委王占春牺牲，何兼任红三团政委。1934年8月，闽粤边特委成立，何为特委委员。1936年6月，红三团团长张长水牺牲，何鸣任团长兼政委。10月，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病故于上海），由何鸣代理特委书记。1937年7月16日，由于何鸣严重右倾，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我军的阴谋毫无警觉，致使红三团指战员近千人被国民党包围缴械。1939年6月，他被新四军军法处枪决。

西安事变后，闽粤边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向漳州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要求和保证，准备与之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当局却在谈判前向我军发动进攻，妄图歼灭我军，当即被我击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才接受谈判。1937年4月，我方代表王祥（即卢叨同志）与国民党当局一五七师的代表进行首次谈判。结果谈判未达成协议，一五七师又继续向红三团进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5月下旬，闽粤边特委决定设在山内的特委机关分三路后撤三、四十里，往据点内靠。何鸣率特委机关人员十多人为一路，在转移中丧失警惕，在平和白沙宿营时被敌人突然包围，何鸣等被捕，并被押往漳州。在我党据理力争和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下，一五七师被迫释放了被捕人员。6月初，何鸣获释后，作为我方代表，与一五七师谈判，并于6月26日订立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协定中规定闽南游击队整编后，受一五七师指挥，师部有派员巡视、检查、帮助之权。他不经过特委讨论决定，也没有得到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许可，竟擅自接受了一五七师阴谋消灭我军的条件，同意将红三团改编为保安队，离开革命根据地，下山到漳浦县集中。

针对何鸣的这些右倾错误，闽粤边特委在平和县高坑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何鸣的特委代理书记，但仍保留其红三团团长的职务。会上讨论部队要不要在漳浦县集中的问题时，多数同志坚决反对部队撤离根据地。何鸣竟丧失革命立场，说什么如不接受一五七师的条件，就会破坏国共两党合作，破坏统一战线。他态度横蛮，一意孤行，竭力主张接受一五七师的无理要求。当时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也未能坚持原则，不顾多数同志的反对，竟作出将红三团撤离根据地，开到漳浦县城集中的错误决定。七七事变后，一五七师借口漳浦是海防前线，要红三团赶快集中训练。何鸣便把队伍撤离革命根据地向漳浦县城集中。部队在开进途中，接到南方工作委员会指示：部队番号可以改，但政治上应保持独立，提高警惕，要住在据点内，不应到平原去。但是，何鸣竟以南委不了解闽南实际情况为借口，拒不执行，仍率部继续开往漳浦县。

7月14日，红三团开进漳浦县城文庙集中。16日拂晓，红三团全体指战员集中到体育场。一五七师旅长，妄图诱骗我军缴械。同时，该旅长还以武力相威胁，指着早已布置在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说，你们如果不把枪支交出，他们也要来收枪的。何鸣虽然口头上也表示抗议，但却在国民党的武力威胁下吓破了胆，他要红三团指战员服从命令，等候我党中央来处理，不同意进行自卫反击。他率先把枪交出去。就是这样，由于何鸣的严重右倾错误，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竟被国民党不费一枪一弹缴械了。这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即“何鸣危险”发生的经过。

漳浦事件发生后，党中央采取有力的措施和对策，对国民党当局开展了坚决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何鸣在漳浦事件后，到厦门担任国民党一五七师侦缉队中尉副员。1939年初，我方谈判代表、闽西红九团政委谢育才代表党组织通知何鸣：卢胜等已重建部队，并开赴皖南抗日，动员何归队。这时何鸣才离开一五七师侦缉队，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联系。由军政委员会介绍，他被分配到皖南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任参谋。后来新四军军部根据南委提供的材料，认为何鸣对漳浦事件负有全责，并擅自在一五七师侦缉队任职，严重违犯军纪。同时，还怀疑他有不轨行为。新四军军法处于1939年6月在皖南泾县云岭将何鸣处决。以后，“何鸣危险”便成了右倾投降的代名词。

我们应从“何鸣危险”中吸取哪些教训呢？首先，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开展既要反“左”又要防右的斗争。第二，必须实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第三，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一致性。第四，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

（摘自《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作者：叶心瑜）

民国史上最大间谍案真相

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发生。中日战争越打越激烈。在南京的蒋介石几次准备亲自到上海前线视察与指挥。但因日军飞机对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公路都作了严密的封锁，狂轰滥炸，蒋介石无论乘火车与汽车都极不安全。约在8月25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向蒋介石进言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明天从南京去上海接见英侨领袖并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你可以搭乘他的轿车去。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是中立国，其座车又插有英国国旗，有明显的英国标志，可免日军飞机轰炸。"蒋介石在会上对白的建议表示首肯。

然而，到了第二天，即8月26日，蒋介石因急事缠身，临时中止乘许阁森汽车去上海。结果，许阁森轿车遭到日机有目的的拦截与扫射。很显然，日机之所以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并开罪英国，是为了达到特别重要的战略目标——袭击与炸毙蒋介石。他们显然预先得到情报，知道蒋介石要乘许阁森的轿车赴沪。他们是冲着蒋介石来的。若蒋介石那天乘上该车，定难逃此劫。

但是，决定蒋介石乘许阁森专车去沪的最高军事会议，只有最高层的几位军政大员与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参加，其他人一概不得与闻。那么，是谁将这极重要机密的情报如此快速准确地提供给日方军事指挥机关的呢？

其实，在英国许阁森大使专车遇炸案发生的前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最上层核心四周，已经发生了多起极其重大、怵目惊心的日谍案。

首先是封锁江阴长江要塞泄密案。

还是在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约在8月5日，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几位高级将领召开了一次小型机密军事会议，商讨对日战争战略。他们鉴于华北抗战吃紧，决定实施"以快制快"与"制胜机先"的军事战略。趁日军主力集中华北之时，在8月中旬率先歼灭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艇，将战争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会上决定：在发动淞沪战役之前，在8月上旬，以海军突然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一方面防止日舰从上海沿江西上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与猎获当时正驶行或停泊在长江中上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与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获得战略成果，并收先声夺人之效。

这是当时最重大的国防军事机密，除与会的蒋介石、汪精卫与几名高级军事将领以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任何人都不知情。这次会议时间在8月5日。当夜，命令就以特级军事机密下达有关部队，其主要内容是：海军舰艇开赴江阴江面，同时加强江阴要塞炮台的火力，共同封锁江阴江面，并破坏这一带江面的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自行沉没我方船只，并布设水雷等。以拦截住日方一切船只。

然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到各有关部队、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江面即将实施之前，突然，在8月6日到7日，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直至重庆行驶与停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共约20多艘，如大福、襄阳、瑞阳、大利、凤阳、吉和、大贞、南阳、宜阳、大昌、兵阳、信阳、大亨、当阳、湘江、沅江、武陵、大吉、长汤、嘉陵、涪陵、云阳等轮，于短时间内，全都升火飞速下驶，奋力冲过江阴江面，撤往长江下游。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事后人们发现，日侨在匆忙撤离时连许多贵重物品都丢弃不顾，甚至有的地方茶饭都已摆到桌上而来不及动筷就匆匆上船逃走。等到中国海军舰艇奉命赶到江阴江面拦截时，仅阻截与捕获到"岳阳号"(3298吨)与"大贞号"(1369吨)两艘日本商船。后来中国海军将船上的水手与日本侨民及外交人员等一起押抵南京，再从浦口搭乘火车，经济南转青岛，释放回日本。

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江面的军事计划未及实施便宣告破产了。很明显，日本方面在中国最高当局作出这一决策后数小时内就迅速获得了这一重大军事情报，并立即作出反映。日本情报机关的魔爪无疑已伸进了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核心内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前述事件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中央军校逃车案。日本间谍再次将暗杀矛头指向蒋介石。

南京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所辖的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学校，坐落在南京城东黄埔路。蒋介石对该校特别重视，自兼该校校长。他在南京时，十有八九是住在军校内的"校长官邸"中。中央军校每次举行"总理纪念周"时，蒋介石多要参加并亲自主持，还要对师生发表精神训话。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因军政事务繁忙，才不经常参加军校的"总理纪念周"。

约在1937年9月初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不仅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要参加，而且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长官都要参加，蒋介石决定届时亲自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扩大总理纪念周"的那天到来了。中央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师生首先来到会场，把队列站得整整齐齐。中央军校学生总队的队长惠济担任大会总值日官。不久，中央党、政、军各部的大员也先后乘车来到中央军校。进出军校大门的小轿车排成了一长串。

由于这天蒋介石与许多军政大员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南京军警宪特机关加强了对中央军校的警卫工作。在从中山东路折进黄埔路的一路上，直到军校大门，

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校内部则有大量便衣特工人员巡查。进校的轿车都由在校门口值勤的宪兵登记车号与人员。

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莅会时，忽然总值日官惠济向大家宣布：发觉有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便安静下来。不一会有人报告，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一辆轿车逃跑了。

事后，军警经过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员很可能是日本特务，他们潜入军校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其目的无疑是企图刺探情报并图谋刺杀蒋介石与其他军政大员。因他们潜入军校不久就被军警察觉，故又乘车仓惶逃走。然而，这两个日本特务是如何事先获知蒋介石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又是如何得以混入戒备森严的中央军校的呢？

军警清查了那天校门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小轿车车号与人员，最后发现，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逃走的轿车，竟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座车。

南京在抗战初期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影响极大的间谍案件，引起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极大的恐惧与震怒。蒋介石又气又恨，暴跳如雷，连夜召来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臭骂一顿后，下达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严令他们在一个月内务要把窃取与出卖最高军政机密的间谍汉奸统统侦查出来，严加惩办，否则，将唯他们是问。

军警宪特各路人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关于他们怎样曲折惊险地侦查破案的经过暂且不表。我们先行介绍一下日本间谍的魔爪是如何伸进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核心内部，以及他们是如何猖狂地活动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灭亡与侵占中国的国策，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了范围广泛、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剧，这种间谍活动更加疯狂与露骨。形形色色的日本间谍，披着各种外衣，潜入中国各地，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方法，刺探与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情报，特别是国防军事机密。南京是中国政府的首都与政治、军事的中枢，自然成为日本间谍注目与活动的头号目标。

南京地区日本间谍的大本营与指挥部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因日本驻华大使馆与其合署办公，故简称日本使领馆。使领馆是一座现代化的花园洋房建筑，楼房是日式结构，坐落在南京市中心著名的鼓楼之西南侧的小山坡上，紧紧与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毗邻。总领事须磨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有名的中国通，是个挂着高级外交官头衔的日本老牌间谍。他到南京就任后，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指挥日本特务与浪人，收买中国汉奸与流氓，不择手段地搜集中国政府最高当局的核心机密，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制造了一起起震惊中外的事件。其中最为成功与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收买豢养与操纵指挥了以中国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为首的汉奸间谍集团。

黄浚，字秋岳，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曾与须磨为同班同学。黄浚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中任职，与北洋各要人及清朝遗老多有来往，十分熟悉清末民初的政坛史事与掌故。黄浚还能诗善文，是民国初年文坛上十分活跃的旧式诗人。他曾撰写了一部约数十万字的近代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述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人物史事与掌故，引用的资料杂采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以及有关的一些外国人著作，内容丰富，令读者目不暇给，且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流畅，颇受读者欢迎。黄浚因此赢得了很大声誉。北洋政府垮台后，黄浚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工作，以其文才与纵横捭阖、溜须拍马的手段，很快就获得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党国要人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最后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行政院机要秘书，为简任级，其地位仅次于秘书长，得以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经常掌握国家各种最核心的机密。黄浚的儿子黄晟时年方 20 多岁，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就被送进外交部任职。

但是，黄浚虽有才能，却无人格。其父子生活豪奢，挥霍无度，在南京与上海各有公馆，经常往来两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每月仅日常开支就近千元，工薪收入根本不敷所用。黄浚父子又是崇日亲日派，当中国人民因日本加剧侵华而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时，黄浚十分反感与抵触，反而与日本来华的一些重要人物打得火热。特别是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须磨往来更加亲密。老奸巨猾、包藏祸心的须磨自然对黄浚的人品与爱好十分了解，对黄浚的极重要的职位更是万分重视，因而在与黄浚的交往中，有目的地引诱，下大力气，花巨额金钱进行收买，果然，在重金收买下，黄浚很快出卖人格与国格，堕落为可耻的汉奸与间谍。

黄浚成为汉奸与间谍后，不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大量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谍机关，而且还将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水，又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如参谋总部的高参曹某、海军部的部员李某、军政部的秘书王某等，参与其卖国活动，充当其向各方面搜集情报的魔爪，共同组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头子的间谍团伙，由于该团伙成员都身居国民政府上层军政要职，隐藏极深，窃取与出卖的都是最重要最机密的情报，因此使须磨与日本大本营欣喜若狂，却给中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危害。

黄浚日谍团伙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联系和提供情报的方法，是十分诡秘的。

方法之一，黄浚在将各爪牙收集来的情报汇齐后，亲

自出马，在休息时间独自驱车来到南京风景秀美的玄武湖公园散步。他爱吃巧克力糖，因此他总带着一包巧克力糖来到玄武湖公园，边散步边吃糖。吃完糖他不将包糖纸乱扔，而是将包糖纸夹着一张预先写好的情报，放到公园一株地处偏僻的大树树洞里，然后走开。时隔不久，就有日本特务来将情报取走。因黄浚不可能经常到玄武湖散步，故这种提供情报的方法不常用。

方法之二，黄浚定期到南京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深灰色呢帽挂到一根圆柱子上的衣帽钩上，其呢帽夹层中密藏着情报。在这时，必定有一个日本特务约在同时间也进入咖啡馆喝咖啡，也将一顶同样式样的深灰色呢帽挂到衣帽钩上，其呢帽夹层中密藏着须磨的指示。黄浚的呢帽与日本特务的呢帽紧紧并挂在一起。但二人并不在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也互不答理。然后，那日本特务先喝完咖啡，人不知鬼不觉地将黄浚的呢帽戴到头上扬长而去；而黄浚则与任何人也不接触，慢慢喝完咖啡，然后戴上日本特务留下的那顶呢帽，不声不响地走了。双方的情报交换工作就这样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黄浚拿到了日本总领事馆的指示，而日本总领事馆则得到了黄浚提供的各种情报。后来，为避免人怀疑，黄浚不再亲自到国际咖啡馆，而是收买与指使他的汽车司机小王代替他，仍戴着那顶深灰色呢帽夹带情报到咖啡馆喝咖啡，而日本总领事馆也经常更换联络人，派遣不同的特务人员到咖啡馆交换情报。

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顺利地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未出现差错。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们的情报搜集与交换活动也加剧进行。本文前述的英国大使许阁森专车遇炸案、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江面泄密案、中央军校逃车案等严重事件，都是黄浚汉奸间谍集团窃取了机密情报，迅速传递给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再由日本领事馆用电报报告日本大本营，然后日本军政当局迅即作出反映而造成的。

（戴怡康）

蒋介石"资遣"杨虎城出洋考察始末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回到南京，他一面布置扣留张学良，一面派了40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进逼，威胁杨虎城与东北军，顾祝同率第一集团军12个师从潼关、华阴、华县正面向西安推进；陈诚率第四集团军9个师从渭北向西安压迫，蒋鼎文、朱绍良率第二、三集团军15个师，分别从甘肃、宁夏向关中压迫；卫立煌率第五集团军4个师从商县、雒南向西安推进。逼迫东北军、十七路军撤出西安。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任免令；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形势严峻，杨虎城一面和周恩来联系，组织联军，准备应战。一面领衔于当日向南京发出通电，严正指出："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面对这种强硬态度，加之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敢妄动，于是便采取了军事威胁、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相结合的策略。1月9日，南京方面派吴瀚焘、王化一两人（均为东北人）持蒋介石、张学良致杨虎城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高级将领的亲笔信，到西安劝说杨虎城等人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同时顾祝同、刘峙等又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以交通联络为名，向杨虎城等人提出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解决陕西军事的甲、乙两案。

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陕，于是决定派十七路军原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和东北军的代表鲍文樾前往南京进行谈判。杨虎城于1月14日致电蒋介石，以恳切的言词陈述了坚持中央军东撤和释放张学良这两项基本要求。

1月17日，李、鲍二人到达奉化，蒋介石当即接见说："张汉卿来京以后，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强调西安方面必须在政府提出的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之后，蒋又单独召见李志刚，许愿说："虎城和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令将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第二天，蒋又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李转杨。

杨虎城接信后，立即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开会，并邀周恩来等参加，研究对策，决定派李志刚再次去南京、奉化。

1月23日，李志刚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奉化见蒋，重申西安方面放张、撤兵的要求。蒋对扣张一事改变了说法：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让他来。他来时，由他也由我，但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对撤兵一事，蒋说："中央军西进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恢复秩序。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关于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可派人同顾祝同直接接洽。对抗日一事，蒋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他什么也不懂，他不了解庐山军训的精神，他没有看过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他还在问什么？！你告诉他，

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一定对得起他们。"

1月31日晚，杨虎城、周恩来与东北军的三位军长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召开三位一体的最高会议，决定和战问题。会议最后决定主和，派李志刚于次日前往潼关，与顾祝同就接受甲案签字。会议的决定完全出乎东北军中应德田、孙铭久等主战派的意外，2月2日，孙铭久派人枪杀了王以哲。随后，主和派将领又枪杀了高福源作为报复。东北军的分裂极大地损害了三位一体的力量，十七路军也有部分将领背离了杨虎城而投向了蒋介石。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接替西安城防；2月9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身份进驻西安。随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源源开进潼关。

杨虎城被迫于2月6日离开西安，移住三原县东里堡。

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要求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8日，杨虎城到杭州和蒋介石见面，蒋指桑骂槐，表面咒骂张学良，实则是在指责杨虎城背叛"领袖"。当时在座的有宋子文、宋美龄、邓宝珊、于学忠等人。

第二天，蒋介石约杨虎城单独谈话，问杨对十七路军的安置有什么意见？又问杨经过此次事变，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不等杨回答，蒋便接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启程的时间暂且不定，可以从容准备。"杨虎城对蒋介石的这一手早有预料，只好当面答应。

就在杨虎城于3月前往杭州晋见蒋介石的前后，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先后找到当年被杨虎城枪杀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和陕西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策动他们暗杀杨虎城以报杀父之仇。由于褚、甄二人颇有正义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拒绝了特务的策动，致使蒋介石暗杀杨虎城的阴谋未能得逞。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处境越来越困难。蒋介石视他为眼中钉，继续加紧对他的逼迫。4月16日，蒋在致顾祝同的电报中说"……总之虎城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在本月内来沪，中正当派员为之筹划一切也。"4月27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呈请辞职。

蒋介石在威逼杨虎城辞职之后，便立即促其启程出国。4月30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所请辞职一节，业已另电知照。尚希即日摒挡，以赴事功为盼。"5月初，宋子文几次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催促杨虎城动身。这时，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军大学学生杨觉天等人以黄埔学生的身份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请求准予杨虎城缓行；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陕西地方人士到上海会见宋子文；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人致电蒋介石，分别提出同样请求，然而均遭拒绝。迫于这种形势，杨虎城只好准备启程。

杨虎城离开西安之前，在家中接见了十七路军的军官，许多人都劝杨虎城不要离开部队，更不要出国。旅长许权中更自告奋勇要率他的部队担任杨虎城的警卫，如蒋介石来硬的就与他硬干。杨虎城面对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深情地对他们说："我们这次举行兵谏，是为了改变国策，统一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只要能实现全国一致的抗日，就是把我个人牺牲了，把十七路军牺牲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杨虎城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使许多军官，包括一些在十七路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当场都流下了热泪。

5月27日11点多钟，杨虎城一行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驻在西安城郊的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界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市民，纷纷赶到机场送行。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也亲自为杨虎城送行，并同机前往上海。机场上盛大的送别仪式，充分表现出陕西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以及对杨虎城的拥戴，一些进步人士说："这既是对抗日将军的欢送，也是对蒋介石的示威。"

5月28日，《西京日报》等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杨虎城的《出国启事》：

虎城此以恳辞本职出洋考察。幸蒙中央体念悬诚，赐于照准。当于本月二十七日乘欧亚航机飞沪。湿荷我乡邦耆旧，各方友好，军政机关同仁，各校同学以及工农大众，辱赴机场欢送，感怀厚谊，弥觉依恋。伏念虎城救国心长，应时才短，半生虚度，殊有愧夫初衷，廿载治军，究无裨于建树。此际辞公祖道，感故人之多情；他日孤篷归来，知山河之无恙。特此奉启，并申谢悃，敬希公鉴！杨虎城拜启。

杨虎城于5月27日到达上海，为等待办理出国手续住了一段时间。这阶段，除了宋子文、杨虎、戴笠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以外，其他一些相熟的国民党要员都避而不见。为了杨虎城在上海的安全，周恩来想方设法通过与帮会有联系的朋友请帮会派来保卫人员，就连请博士给杨虎城介绍英、美、法等国情况，请舞师教杨虎城跳交际舞，以及送来晕船药物及南京织锦、西湖织画等交际礼品，全都出自周恩来的安排。这些都使杨虎城深为感动。

6月间，杨虎城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6月16日，军委会下达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同时，蒋介石批给

杨虎城15万元参观考察费，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镑。

初到上海时，杨虎城和随员一起住在新亚酒店，后偕夫人移住西爱威思路宋子文公馆附近的一所西式寓所里。杨整天忙于会见前来送行的亲朋故旧，与他们一起回顾十七路军的曲折经历。

他曾对专程从陕西赶到上海为他送行的孔从洲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这一点，大体上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还很难说，主要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舍此，就有被蒋介石肢解、消灭的危险。同时，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应该言行一致，积极同日寇作战。我们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在国外也会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所以，你们一定要力争部队参加对日作战，共赴国难，多打胜仗，取得好的成绩。"

杨虎城的这番话竟成了他对十七路军将士的最后赠言。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和夫人谢葆贞一行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亲友、部属、各界人士近千人，登上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从此，杨虎城再也没有能回到十七路军中去。

（李淮成）

日军南京强奸事件与慰安所的出现

南京强奸事件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南京后，在疯狂屠杀、抢劫、放火、破坏的同时，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强奸暴行。据史料记载，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一个月中，发生了2万次左右的强奸事件，无论是幼年妇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都被奸污了。而且，被害人只要稍有一点抗拒，就会遭致枪杀。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人把它称之为"南京强奸事件"。

在南京强奸事件中，日军闯入难民收容所和中国人乃至外侨的住宅，绑架妇女强奸的事例极多。仅据当时中立外国人组织的南京国际委员会向日军当局提出的部分抗议，就有以下事例：1937年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某宅，强奸一个少妇，并绑去3个女人。12月15日夜，7个日本兵闯入美国人办的金陵大学图书馆，绑去妇女7人，其中3人当场被污。12月16日，日本兵架去原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内的7个姑娘，据18日所接报告，她们每人每天被奸污六、七次之多。12月17日，日本兵从五台山一个小学校内拖去许多妇女，彻夜加以奸污。同日，日本兵从原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又架去3个姑娘，把他她绑到国府路（今长江路），加以奸污。12月17日夜，日本兵闯入美国人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绑去妇女11人。12月18日，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农场（有难民百余人），绑去妇女4人，奸污终宵。19日，又绑去妇女2人。12月13日至17日，日本兵每晚用卡车架走广州路83、85号难民收容所的年轻姑娘，被奸污妇女已在30人以上。等等。

这些妇女，命运极为悲惨。如日本兵架去铜银巷6号内的妇女6人，名义上是给军官去洗衣服的，其中一人于1938年1月3日入鼓楼医院。据她报告，日本兵把她们带到城中某处，那里好象是伤兵医院。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10到20次，年纪较轻和面貌漂亮的每夜被轮奸40次。1月2日，两个日本兵又把她绑到一所荒凉冷落的学校内。戳伤10处，计后颈4刀，臂腕1刀，面部1刀，背上4刀。日本兵以为她已伤重毙命，舍之而去，后经旁人发现，再送入医院，也许可望恢复，但颈项恐难灵活旋转。

慰安所的出现

据一位从南京逃出来的中国士兵痛诉，他于1937年12月13日因为没有走得及而在南京被俘。他被敌人押去做挑水夫，12月26日以前一直留在南京，并有10多天被扣留在日本军营里，到1938年初才从滁县附近逃出来。他说："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挑了半天水。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去担洗脸水，一名敌兵让我担水到后院里，又让我往屋里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我只好往屋里送。我刚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两位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日军官佐，一人穿了件女衣在狞笑。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哪能穿衣服！又有一天，一批女人被赶了进去，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总是听到哀号和嘻笑。16日，我搬米走到街上，黑烟红焰仍然没有断，同胞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特别是增添了许多裸体女尸。有的可以看出是因为反抗暴行被敌人顺势剖腹的，她们手臂上都留下了伤痕。七个总有八个是肚子破裂，肠子流到外边来。还有几个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她们所以裸体，原因很简单，她们活着的时候，日军不让她们穿衣服，死了不给她们开膛破肚就是好的。这些女尸的乳部，不是被割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这明明是日军对已经

死了的女人，还要再来一番侮辱！”

以上提到的侵华日军集中蹂躏中国妇女的场所，实际上就是最初的慰安所。许多妇女被糟踏致死，得了性病被认为没有用的妇女，也往往被杀掉。

到 1938 年初，就发展成为正式的慰安所。据一位 5 月 20 日逃出南京的覃姓难民说：当时“在（南京）城中设立了十七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的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攻占南京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许传音博士在作证时，也提到“首先设立日本士兵的游乐场，即慰安所”，以便满足日军的兽欲，日军当局又可以借此得到一笔血腥的收入。据 1938 年汪伪行政院宣传局编的资料记载，当时南京城内附有明确地址的慰安所，就有 9 处，即大华楼慰安所（白下路 213 号），东云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青南楼慰安所（太平路白莱园），浪花楼慰安所（中山东路），其乐馆慰安所（桃源村 3 号），菊水馆慰安所（湖北路楼子巷 25 号——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满月慰安所（相府营），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鼓楼饭店），人民慰安所（贡院东街 2 号——原文如此，本文作者）。另外，据韩国《新东亚》杂志第 3 期文章《挺身队实录》，南京还有故乡楼慰安所，浪速楼慰安所。这两个慰安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2 年 5 月，根据日本“南方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要求”，由“（南京）中国派遣军介绍”，被派往南洋，后分配至缅甸。

日本理应妥善处理

日本军国主义者绑架中国妇女，设立慰安所，迫使她们充当军妓，致使许多妇女陷入悲惨境地，大部分被蹂躏致死。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又一可耻罪行。不久前，在日本发现的 70 份内部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原日本当局曾强迫朝鲜、韩国、中国、菲律宾和日本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事实，只有极少数妇女幸存下来。对于这些被残害的妇女，日本理应给予赔偿，作为战后处理的一个方面。而日本至今未作妥善处理。

（高兴祖）

历　史　考　证

中共“延安时期”始于何日？
——忆迎接毛主席、党中央进延安

红军长征结束时，党中央驻在保安（今志丹县）。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东北军让出延安，我军一部和“红大”随即开进了这座城市。

“红大”的前身是“中央工农红军学校”。按原来的顺序，我们是第二期，编为三个大队，学员都是经过长征的干部，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我刚从红一军团调到陕北红军八十一师三团团部任政治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也被抽到“红大”三大队学习，住在延安城内东门的旧衙门里。

1937 年元旦过后学员陆续报到了，但还没有正式开课。1 月 6 日晚上点名时，队长宣布：明天不出早操，全校到城外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延安！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点名结束后，同学们马上三五成群地议论开了。我对几个江西老表说：“咱们几个参加红军五、六年了，还没见过毛主席呢！明天能亲眼看到毛主席，我就是以后牺牲了也心甘情愿！”从瑞金参军的许财贵说：“过大渡河的时候我见过毛主席，可是离得太远，没有看清，只知道他的个子高高的……”夜深了，我们躺在炕上翻来复去，谁也睡不着，还在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总觉得这一夜太长了，恨不能一下子到天亮。

第二天，没等太阳出山，我们就早早起来了。大家先把室内和院里收拾利索，又把延安城里的几条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列队来到城北门外。

说来也巧，前几天还是寒风刺骨的黄土高原，今天却是一丝风也没有，金灿灿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给隆冬时节的延安带来了几分春意。远处的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紧紧地环峙着城区周围，星星点点的积雪在山坡上清晰可见。蜿蜒的延河已经封冻，犹如一条巨大的银蛇在那里静卧着。城门两侧，新贴着几幅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热烈欢迎朱总司令！拥护张（指张国焘——编者）总政委团结抗战！支持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败日本侵略者！

欢迎的队伍到齐了，我们 500 多人的“红大”学员在道路两侧各站成两列横排，然后各队开始拉起歌来。嘹亮的歌声在旷野上空回荡着，可大家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向大路尽头张望，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我悄悄地拉了拉站在前排的一个大个子学员说：“老表，帮个忙，咱们换个位置行不行？”他赶紧摇了摇头：“什么都好说，就这件事不行！”“我明天给你买盒纸烟”，“那也不行……”

"来了！毛主席来了！"不知谁高声喊了起来。我赶紧踮起脚尖向远处路口望去，只见五六个人骑着马，后面跟着100多人，正朝着延安城奔来。刚才还整整齐齐的欢迎队伍立即活跃蠕动起来，这个说："快看，前头骑大青马的就是毛主席！"那个喊："别挤别挤！都能看见！"不一会儿，党中央的队伍来到离欢迎队伍50多米的地方。这时，毛主席已经跳下马来，大步流星地向夹道欢迎的队伍走来，"红大"的领导和中共延安工委的负责同志赶忙迎上前去。顿时，人群一下子沸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这些红军干部象小孩子似的欢呼着、雀跃着，那个兴奋啊！

"红大"三大队在欢迎队伍的中段，尽管我抬起脚跟，可视线总是被前排的几个同志挡住，我索性来个"见缝插针"，一使劲挤进了前排。正好，毛主席刚刚走到我们面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主席戴着一顶八角帽，身穿灰布皮大衣，个子很高，脸庞有些消瘦，但精神很好。他一边微笑着向我们挥手，一边用湖南口音喊道："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我只觉得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激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毛主席缓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后面紧跟着朱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等中央首长，还有几位女同志。周恩来副主席当时还在处理"西安事变"，所以那天没看到他。

迎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进驻延安的活动，是我们"红大"二期学员入校后的第一件大事，也是这次开学最好的动员。不久，"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由毛主席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开始进入了伟大的"延安时期"，1937年1月7日是这个历史阶段的第一天。

（选自《党史纵横》91年6期，作者：陈绍林）

新四军诞生史实新考

新四军是怎样诞生的，史学界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937年10月达成协议，成立了新四军。有的说得更具体，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还有一种说法，10月2日谈判达成协议，12日正式公布命令。关于新四军军长人选，有人认为，开始共产党提名叶剑英，国民党不同意；国民党提出陈诚或张发奎，共产党也不同意；最后双方商定，由无党派的叶挺任军长。最近，陈兴撰文认为，上述说法均不正确。

他经考证，提出以下观点：

(1)西安事变后至1937年9月，国共两党中央级的五次谈判，只谈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而未谈及成立新四军问题。

(2)蒋介石于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事先未同共产党商谈。新四军番号的取得，不是国共两党直接谈判的结果，而是周恩来委托叶挺出面活动，再由叶挺通过陈诚向蒋疏通的结果。

(3)在叶挺赴延安之前，中共中央尚未正式承认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直到同年11月3日，叶抵达延安直接向毛泽东等人表示完全接受中共领导，中共中央才同意由叶挺着手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4)叶挺赴延安后，国共两党才开始就成立新四军的各种具体问题同国民党正式进行谈判。

(5)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时间。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军长是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当局发出"收编"南方游击队为新四军的电令是10月6日。将10月2日或12日视为新四军成立日，目前尚缺乏史实根据。不过，沿用习惯做法，将10月2日或12日作为诞生纪念日也未尝不可。

（摘自《大江南北》1992年第6期）

蒋介石在南京保卫战中何时离宁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之前的一天，蒋介石在对城防作了一些部署之后，偕夫人宋美龄悄然撤离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也许因为蒋行踪保密，加上事隔多年，故海内外业已问世的有关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及历史文学作品，在叙及此事时，或朦朦胧胧，或各执一端。

在南京保卫战中曾被蒋介石委任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按理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唐在《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1931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文中谈及当年守卫南京的情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唐对一些事情的具体时间及详细情节已不复记忆。关于蒋离开南京一事，唐文只笼统地说："蒋介石在撤走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至于蒋是何时从南京撤走的，则不得而知。（附带说明一下，周而复的新作《南京的陷落》也没有写明蒋介石离开南京的时间，只是说："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部训话以后，第二天黄昏时分，便和宋美龄一同带着侍从室钱大钧等人乘飞机离开了南京。""训话"的日期是个未知数，"训话"的"第二天"也就无从推测了。）不过，唐生智文中又补了一句："当时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

那好，我们就听听当年的"军、师长"们的叙说吧。时任第七十八军军长兼三十六师师长、参加过守卫南京作战的宋希濂，写过一篇《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文中谈到12月4日晚蒋介石到铁道部南京卫戍长官部所在地，召集师以上高级干部讲话，

要大家克尽军人职责，守住南京。之后，“蒋介石于12月5日（或6日）晨乘飞机离开了南京。”看来，这位最有发言权的当事人之一，也记忆模糊了。

幸而我们又在《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抗战纪事》上找到了一篇王正元的文章，王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侍从室电话监听员，与闻军事机密。他在《我所经历的抗战中的电话军事通讯》一文中说：大约在十二月四五日，唐生智电话钱大钧，问蒋何时离开南京；钱说蒋不愿离京。“后来听蒋孝镇副官说：当时委员长是不愿离开南京的，经唐生智、钱大钧劝后，才于6日晨率同钱大钧及侍从室部分人员晋谒孙中山先生陵墓后，即离京赴汉。”“6日晨”，这是王正元给我们提供的蒋离宁的日期。

但王正元的说法没有为人所接受。新近出版的宋平所著《蒋介石生平》云：“12月5日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该书后所附丁秋洁编著的《蒋介石年谱简编》也持相同说法。只是宋平没有告诉我们所说何据。

也有提供蒋离宁日期晚于12月6日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载有谭道平的文章《回忆1937年唐生智卫戍南京之战》。谭时任卫戍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文说：12月7日晚上，蒋介石偕宋美龄来到南京百子亭唐生智寓内，召集守城的师长以上部队长举行会议，意在振奋士气。“当天晚上，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

而程奎朗在所著《回忆南京防卫作战》一文（见《抗战纪事》）中，有这样一段回忆：“8日……傍晚，看到由城外大校场有飞机二三十架起飞，大家估计是掩护蒋介石飞离南京”。

以上介绍了“5日晨”说、“6日晨”说、“7日晚说、“8日晚”说，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除了上述说法外，另有一说，即“12月7日晨”说。持此种说法的是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民国大事日志》及《蒋总统年表》。

《蒋总统秘录》由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台湾《中央日报》社译印、出版。书中这样记载：“12月7日清晨，日军由东、南两面迫近南京城，对城外中国军阵地展开总攻击。当天，凌晨5时45分，蒋总统依依难舍地离开了南京，乘飞机飞往江西。”书中还引用了蒋介石本人12月7日的日记，云：“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若早10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

刘绍唐主编的《民国大事日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在民国26年（1937年）12月7日条下有如下之记载：“蒋委员长于上午5时45分离京飞赣。”

台湾世界书局1982年增订再版的王德胜所编之《蒋总统年表》对此则有更详细、生动之记述：“12月7日上午5时45分，（蒋）由南京乘飞机赴赣，8时，到星子，即往观桥别墅暂住，触景生情，不禁忧然叹曰：‘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14日，总统由星子乘机至武昌。”

以上持“7日晨”说的三部著作，参考、引用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尤其是《蒋总统秘录》一书，编著者古屋奎二在编纂该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台湾当局的全力支持与协助，台湾有关部门为编著者提供了约4千万字的中文资料，其中有“（国民）党的官方纪录、总统府公文书、外交文书、战史资料、蒋总统讲词、日记、回忆录等过去从未公开过的重要文献”。在述及蒋介石离开南京之事时，该书摘引了蒋介石本人12月7日的日记，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蒋总统秘录》主要是依据国民党及台湾当局各有关机关“现存的公文书等官方资料”所编撰的话，那么，刘绍唐主编的《民国大事日志》则多参考了一些非官方的材料，举凡公报年鉴、报纸期刊、年谱年表、日记、自述、回忆录以及传记等，都是该书参引的对象。该书在民国史学界有一定影响，为民国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视。

需补充说明的是，从有关资料记载看，12月5日，蒋介石与前来南京“调解”中日关系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谈结束，“德大使调解未获要领，即返汉”。6日，“日寇兵分四路进攻我首都，其先头部队已迫近南京，离城只5公里，蒋委员长与夫人仍留京未去。”由此看来，蒋介石在5日或6日离开南京是不可能的。12月7—8日，日军分几路陆续攻占了南京城郊，紧逼南京城。9日，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开始总攻南京。说蒋介石7日晚或8日傍晚才离开南京，似乎为时过晚。且《蒋总统年表》中还有蒋介石“8日清晨，登三峡涧南亭，静听泉音”之记载。因此，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蒋介石于1937年12月7日晨5时45分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江西（而不是飞往武汉）。

（陆钟琦）

风云人物

贺炳炎

贺炳炎(1913—1960),湖北省松滋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排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3军手枪大队大队长、营长,湖北独立团团长,湘鄂川黔独立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5师、第6师师长,红2军团新编第5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团长,冀中军区第3支队司令员,第358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5旅旅长,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兵团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锡联

陈锡联(191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第10师30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30军第88师263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4军第11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10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3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3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郝梦龄

郝梦龄,字锡九,河北藁城人,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八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郝家世代务农。梦龄少时仅读三年私塾,就随父从耕。十四岁时,父郝瑞枫送他到正定县一家广货店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遂投奔于东北军魏益三部下当兵。魏是郝家亲戚,时任奉军第三十军军长,看梦龄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任营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通电倒戈。魏益三也随之响应,占据山海关。郝梦龄时任魏部团长,率部阻击奉军与日军入关。十一月三十日,奉军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郭松龄遂与奉军决战于巨流河,郭军败,郭松龄夫妇被张作霖杀害。之后,冯玉祥派代表到山海关与魏益三联络反奉,郝梦龄作为魏益三方面的代表,同冯玉祥的代表进行了谈判。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魏益三在山海关就任冯部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职、郝梦龄为第四军旅长。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后,五月一日,冯玉祥于西安就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职,分兵六路进军,协同北代。郝梦龄于北伐战争中,擢升为国民革命联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六月一日,武汉政府北伐军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郑州后,郝队在郑州改编,郝梦龄为陆军五十四师师长,后兼郑州警备司令。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时,郝梦龄曾率部与红军交战,并败于莲塘。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工农红军彻底粉碎后,郝梦龄深为同室操戈而悔恨。到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郝梦龄请求解甲归田,未获批准。次年被调往贵阳,负责指挥修筑川黔、川滇公路。一九三七年五月,郝再度请求解甲归田,但当局决定调他到四川陆大将官班学习。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郝梦龄正在四川陆大途中,得悉芦沟桥事变发生,他毅然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

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此后又上书请缨，决心率部北上，终获批准。其时，郝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过一年九月，郝梦龄自贵阳率部北上抗日，出发前，他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在途经武汉，趁隙与家人告别时，他抚着儿女们语重心长地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并写下一书，封好后交给大女儿慧英，嘱咐三天以后再拆开看。十五岁的慧英不理解父亲的心情，硬要拆开来看，郝不允，父女在对抢中把信撕成碎片，丢进了痰盂里，郝即同家人辞别。事后女儿把信从痰盂中捞出，拼凑起来，一看，原来是将军留下的遗嘱，尚可辨认的词句是：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方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荫楠、荫森五儿，

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郝梦龄率第九军自武汉到达石家庄后，编入了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序列。其时山西雁门关已失守，晋北的忻口成了山西抵御日寇侵略的第一道防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保卫太原，决定在忻口组织会战，一再向蒋介石请求派中央军入晋作战。蒋介石应允派第十四集团军入晋，阎锡山即委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忻口会战。

十月初旬，郝将军率部先期到达忻口布防，积极派兵增援被日寇围困中的原平镇晋军作战。他在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和嚣张气焰后，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十月十日，忻口会战即将正式展开，郝梦龄给妻子剧纫秋写下最后的遗嘱：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于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这些慷慨悲壮的话语，表现了郝将军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

十月十一日，忻口战役正式展开。指挥进攻忻口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平型关地区被我八路军一一五师重创以后，报复之心十分强烈，他集中其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倾全力向我忻口阵地猛攻。当时，首当其冲的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九军。郝梦龄任中央地区的总指挥。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十二日，敌攻陷中央地区的锁钥部南怀化。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二〇四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十三次之多。敌我双方死伤惨重。我军在敌优势火力轰击下，平均每日伤亡一千多人。第九军在夺回被敌攻占的高地后，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将军仍鼓舞官兵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我死国活，国活我死之决心。军人的天职是保国为民。现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责任。欲置国家于磐石之上，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官兵用命，奋勇拼杀。”当第三二二团战斗到只剩下一百多人的时候，郝将军又亲到该团阵地前对百余名官兵讲话：“……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你们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官兵们以雷鸣般的声音回答：“誓死坚守阵地！”

十月十二日以后，敌以飞机、大炮、坦克向忻口中央地区猛攻数十次，郝率部御敌，屹然不动。迨十五日夜，郝奉命指挥七个旅，由正面向敌夜袭，左右翼同时出击策应，期收夹击之效。夜三时，郝亲临前线，挥兵奋进，连克数座山头。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也随郝督队前进。到五时余，天已微明。郝担心天明后新夺的阵地受敌空、炮火力威胁，决定乘胜直追，以即刻将残敌歼灭，遂更奋勇挥兵。在我军追袭下，敌阵纷乱，不得不以机枪、榴弹炮掩护退却。这时，郝梦龄、刘家麒已临散兵线之前，距敌仅二百多米。突然，郝、刘中弹倒下，二将在弥留之际，仍力呼所部杀敌报国，而后壮烈牺牲。同时殉国的，还有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

（摘自《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

佟麟阁

佟麟阁，原名凌阁，字捷三，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村人，一八九二年农历九月九日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二人，他是长子，从小跟着舅父胡老先生在乡间读书。十九世纪末期，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列强的八国联军肆意践踏我国领土，佟麟阁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年代里度过的。内忧外患，焚烧的战火，难言的凌辱，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的谆谆教诲，使有着强

烈求知欲的佟麟阁受到很大启发，他的眼界超越了本身环境的局限，内心怀有远大的志向和报负。

一九〇八年，十六岁的佟麟阁在高阳县公署当缮写，耳闻目睹的是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佟麟阁怀着对我国古代历史上班超、岳飞等爱国志士的深深敬仰，渴望有朝一日为国为民投身于疆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爆发，同年十一月，冯玉祥等响应武昌革命，在滦洲举行了起义。一九一二年二月，清政府最后一代皇帝被赶下台，从而宣告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制度的结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随之建立。此时，早有报国之心的佟麟阁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到冯玉祥将军统领的部队之中。在这以后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佟麟阁驰骋南北，身经百战。

一九三〇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其残部被国民党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为军长，佟麟阁任副军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佟麟阁、宋哲元等二十九军将领，共同喊出了"枪口不对内"的响亮口号，这反映了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心愿。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攻占了我战略要塞山海关，接着进逼热河，卫护平津的大门为之洞开，一时间朝野震动。二十九军被当时的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火速调遣到北平以东，在三河、蓟县、玉田一带设防。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同心同德，刻苦训练，准备迎击进犯之敌。不久，承德继山海关之后失守。二十九军又被急调到长城一带迎敌。

喜峰口，是长城的要塞。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在日寇的猖狂进攻下，东北军将领汤玉麟部作战不利，丢失了这个关隘。宋、佟二位将军调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兼程赶到，立刻与敌人展开了争夺战。当晚，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三十七师乘机夺回了喜峰口两侧的制高点，压住了敌人，保护了自己的侧翼。次日清晨，赵登禹、王治邦两个旅向两侧增加兵力，旨在巩固阵地，他们用大刀、手榴弹，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十一日拂晓，日军调来援兵，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发起了新的更猛烈的进攻，我军官兵英勇回击，并发动了反冲锋。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亲临火线的赵登禹将军也受了伤。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总结了经验，改变了战术，决定采取夜战、近战，以期出奇致胜。入夜，风雪交加，朔风呼啸，赵登禹旅长带伤领兵悄悄地从潘家口出发，迂回到敌后。当拂晓前的晨曦出现在天边的时候，这支"天兵"已接近了日军特种兵营地。随着赵将军一声令下，将士们呐喊着冲入敌阵，手举大力砍杀，日军纷纷毙命，余下的举手投降，炮兵大佐在睡梦之中，脑袋就被搬了家。这场战斗的胜利，使我军居于主动，一举夺回了喜峰口。惊人的战绩给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朝野惊呼：这是自明治以来的"奇耻大辱"。二十九军扬眉吐气，从此威名远扬，成为华北大地交口称赞的"抗日英雄部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宛平县演习时失踪，突然向二十九军在卢沟桥的守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攻击。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接受佟麟阁将军坚决迎战的命令，立刻指挥所部吉星文团，金振中营奋勇还击。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变，它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七七事变以前，北平四周均有日伪军盘踞，而国民党军队仅在西南宛平县一带有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驻防。卢沟桥是北平南面的一条唯一道路，当然成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变的第二天即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之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这个宣言声援了二十九军将士们，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

面对日军的进攻，佟麟阁痛斥了军中犹豫不决的畏战者，他在南苑召开的全军将校会议上，严正指出，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该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不得后退一步。"冯治安、赵登禹等将军纷纷请战，全军将士群情激愤。

全国各方面人士对二十九军卢沟桥的英勇抗战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打来电报，表示热烈拥护。二十九军在回电中，表达了他们"保卫国土，义不容辞，慷慨就义，理所当然"的坚定信念和豪迈气概。

"宁为战鬼死，不作亡国奴。"这是坚守在卢沟桥回龙庙阵地上的二十九军金振中营喊出的口号。这里满目焦土，战况异常激烈。阵地虽然仍在我军手中，但已是三失三得。双方展开拉锯战，不容半点松懈。战斗中，日军大队长一木清被我仇恨的子弹击毙，而我方金振中营长也身负重伤，营中将士伤亡十分严重。

由于平时佟麟阁领兵有方，二十九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时正值酷暑夏季，气候十分炎热，老百姓给守卫北平的官兵们送来西瓜解渴，都被官兵很有礼貌地谢绝

了。

七月十八日，日军又炮轰宛平城，时局更加紧张。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已麇集十万兵力，丧心病狂的日本内阁继续大量增调兵员。受东京密令，从二十日午夜开始，日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卢沟桥和宛平县城遭到卷土重来的日军的疯狂进攻。日军的步兵、骑兵，在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我阵地扑来。同时，日军的炮口还指向长辛店，并派飞机轰炸了廊坊，不久廊坊失陷。丰台、南苑也在继续发生战斗。七月二十七日，日军调动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机械化旅团，飞机三十多架进攻我南苑、北苑、黄寺、沙河、团河等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苑至北平间的公路被敌人切断。宋哲元在佟麟阁等人的坚决请求下，坚定了抗战决心，紧急调赵登禹部来北平增援。七月二十五日宋哲元亲临南苑军部，为鼓舞士气，邀请各界人士参加阅兵仪式。当时驻守在南苑的二十九军官兵有二千余人，包括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处，军官教导团，平津大学生军训团等。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调集陆军、空军协同作战，向我南苑发动了新的进攻。佟麟阁将军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在劣势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日寇凭借新式武器，向我阵地猛烈轰击，飞机也在尖厉的鸣叫声中不停地俯冲、投弹，战况异常激烈。二十九军装备落后，但士气高昂，誓与阵地共存亡。战斗中，击落敌机一架，缴获两辆坦克，敌我双方损失都十分严重。狡猾的敌人企图乘我不备，从大红门悄悄地接近我腹地。见此情况，佟麟阁亲自领兵阻击。但是寡不敌众，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战场上硝烟滚滚，枪炮声，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佟将军正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阵突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顿时鲜血染红了裤腿和鞋袜。部下劝他退下急治，他却不肯后退一步，依然奋勇向前，带领士兵们拼死搏杀。他大义凛然地喊道："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他的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在战场上的每一位将士。不久，敌机嚎叫着又飞来疯狂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轰隆一声巨响，佟将军头部受了重伤。就这样，一代抗日名将为了祖国壮烈地献出了生命，时年四十六岁。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官兵伤亡一千多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日，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也在大红门战役中遭敌军伏击，壮烈牺牲。

（摘自《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

刘　峙

刘峙，字经扶，号天岳，江西吉安人。1905年14岁时赴日本留学，但不到一星期，就和大批中国留学生一道，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1907年考上湖南陆军小学第3期。武昌起义后回到家乡。1911年年底再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后到奉天新民县陆军20师39旅当兵。旋又考入保定陆军官学校第2期，1916年毕业后到滇军第2军第7旅旅长朱培德手下任职，为第38团2营6连连长。不久转入粤军第2军任职，并加入国民党。1921年6月任军部中校副官。当时第2军军长是许崇智，参谋长是蒋介石，刘峙和蒋介石的交往从此开始。1924年初，孙中山任命蒋介石筹组黄埔军校，刘随蒋赴职，被任命为军校教授部少校教官。1924年9月改任军校教导第1团2营长。1925年4月国民党党军第1旅成立时升任上校代理团副。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2师被定为全军总预备队，刘峙任第2师师长。南昌战役时升为总预备队指挥官。1927年3月26日率部进驻上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驻防在闸北地区的刘峙所部第2师是主要行动部队，刘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鲜血。1927年8月，蒋介石在内哄中下台，南京方面内争四起。25日，江北的北洋军阀孙传芳残部过江反扑，占领南京东面的栖霞山、龙潭一带，南京告急。刘峙受命为南京方面前敌指挥官，负责指挥龙潭以东部队收复龙潭。是役国民党第1军和第7军联合作战，经过激烈争夺，使孙传芳过江的七万之众几乎全军覆没。龙潭一役，刘峙乘座的列车被撞，不战先伤，第1军第2师的损失亦高达三分之一。打完这一仗后，刘峙升任第1军军长。1928年1月9日蒋介石正式复任总司令职，重新调整作战序列。刘峙又升任第1集团军第1军团总指挥。同年6月以后，南京政府的北伐大军兵临北京，盘踞京、津、冀一带的奉军退到关外，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同意"易帜"。随即，国民党开始进行军队编遣。编遣中，由于规定以师为最大军队单位，于是第1军团改称为3个师，刘峙为第1师师长兼徐（州）海（州）地区"剿匪"司令，下属3个旅9个团2万余人，在当时各师中实力最大。随后，各地方实力派因不满蒋介石趁编遣军队之机裁撤异己势力的做法，纷纷起兵反蒋，李宗仁率先发难。刘峙旋即受命为追剿桂系的讨逆军第1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进至鄂境武穴后又升任讨逆军第2路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不久，桂系战败，刘率部驻守武汉。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峙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后一直连任第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5月，改任编遣委员会第2编遣分区的主任。同月，冯玉祥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分兵九路向中原进攻，蒋介石调兵从豫西、鄂西两面反击，刘峙的第2路军奉命进攻鄂西的刘汝明、李金田等部。年底，石友三在浦口反蒋，唐生智在河南起兵响应，刘峙率部在9天内将唐生智打散。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时，刘峙部驻扎在徐州、蚌埠一线。第2

路军改编为第2军团，刘任总指挥，下辖顾祝同、王均、叶开鑫3个军12个师和骑兵、炮兵、航空兵、装甲兵若干，负责陇海线方向的作战，后又转至津浦线。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助蒋，蒋张合作南北夹击，打败冯阎，中原混战结束。10月7日，刘峙改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年39岁。他从营长升到省主席，仅用了6年时间，故在国民党上层有"福将"之称。1931年7月18日，刘峙与张学良分别任剿赤军南、北路集团军总司令官，讨伐再度起兵反蒋的石友三。1932年5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刘峙受命率领马鸿逵、卫立煌、钱大钧、万耀煌、上官云相等11个纵队"围剿"鄂豫皖苏区。其时，蒋为酬谢刘峙的鞍马功劳，特意在河南设立了"经扶县"。1933年4月，刘峙到江西任抚河"剿共"督办，节制陈诚、周浑元等部。后又升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北路军总司令。不久，移职于顾祝同后回河南。1935年，成为南京政府任命的第一批陆军二级上将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率部兵临潼关，威胁西安。1937年1月又任讨逆军前敌总司令，指挥5个集团军和5个预备队压迫西北军第17路军和东北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峙负责平汉路北端防务。1937年8月20日升任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副之，但没有到任)。随后，因指挥失误，加之友军行动迟缓，被日寇从固安处渡过永定河偷袭成功，第2集团军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北平郊区退至保定。旋又组织保定会战，再度决策失当，参战部队大都未能赶到。9月27日，平汉路北端正面作战失败，刘峙从保定、石家庄直逃河南，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10月兼任第1战区陆军督练主任，由开封赴南阳。1938年2月，豫皖绥署撤销，改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7月又改任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预备军司令长官，奉命守宜昌。1939年1月，改任重庆卫戍司令、重庆疏建委员会主任、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主任、重庆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2月，改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4月8日，因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被日寇12军占领，五战区迁扬村铺的王家营。9月20日中秋节，刘峙在漯河接受日寇12军团、25师团的投降。

1946年1月，五战区改为郑州绥靖公署，辖管河南、陕西两省。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刘峙部连战不胜，9月14日被降调为战略顾问。1948年6月14日又升任徐州"剿共"总部司令长官，但接到的是一副烂摊子。当时，中原地带的国民党军队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徐州"剿总"四处救火，救不胜救。10月，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放弃撤守淮河的计划，进行徐州决战。随即，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战役一开始，刘峙就陷于不利地位。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围歼，增援黄部的军队被阻，国民党败局已定。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到徐州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徐州。27日，南京方面电令"剿总刘总司令飞蚌埠指挥"，使他逃脱。1949年1月20日徐州剿总撤销，刘峙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职。3月，特意赶回吉安老家探望。7月23日，由广州到九龙。1950年3月接到台湾当局的通知：滞港久未归队，被取消战略顾问资格。随后，刘峙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教书为生。1953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给刘峙寄去入台证。11月29日，刘峙回到台湾。1954年1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2月，"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时当上主席团主席。10月，任"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刘峙平时居住台中，深居简出，很少露面，1971年1月15日病故。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　治　中

张治中，原名本尧，曾字警魄，后改文白，安徽巢县人，生于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他六岁入塾，读了十年书，应过童子试，没有考中。1906年离家外出，先后到安庆、扬州等地，当过杂货店学徒、缉私营候补兵、警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随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北洋军阀的腐败，使年青的张治中不堪忍受，他决心另谋出路。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离开"安武军"，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在驻粤滇军中担任过连长、营长，还在驻粤桂军总部中担任过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大队长等职。并一度到四川任川军独立旅参谋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治中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决定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参加了建校工作。6月黄埔军校开学，他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嗣后在第三期任学生总队代总队长，第四期任步兵一团(即入伍生团)团长，后调任军官团团长。在此期间，他与在军校工作的周恩来、邓演达、恽代英等往来密切。当时，军校学生中有两个组织，一为"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为"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两派斗争很激烈。张治中"站在中间偏左"。1925年夏，他的言论和态度逐渐左倾，右派看不惯，称之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他诬为"黄埔四凶"。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张治中由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蒋介石反共的做法，几乎遭到逮捕。后来他渐渐得到蒋的信任。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派张

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伐。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又派为学兵团团长。不久黄埔军校改组为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在武汉成立分校，张治中被派兼任分校教育长。这时，蒋介石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党人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极力争取张治中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张说："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蒋也竭力争取张。"四一二"前夕，蒋曾命张率武汉分校学兵团赴江西。张感到进退两难：既不愿反对共产党，又不愿反对蒋介石。他决定辞职不干。"四一二"后他到上海，向蒋介石要求到国外学习，蒋不同意，要他到南京去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的训练处。张把训练处组成后，已到 8 月，蒋介石正宣布下野。张乘机出国到欧美进行考察。行前，到浙江奉化溪口去见蒋，建议保持国共两党的合作，不要分裂。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之役，曾予日军以痛击。11 月调任湖南省主席。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代表是徐特立、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到长沙去，张与他们的关系都很融洽。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张治中担心长沙不保，一度打算长沙失守即进行敌后游击战，并请叶剑英任省府高级顾问，以指导游击战。后来他离开湖南，这些打算也随之作罢。当时江渭清在湖南组织抗日游击队，曾得到过他的资助。11 月，张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引起 13 日长沙大火，延烧三天三夜，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蒋为推卸罪责，给张以革职留任处分。

次年 2 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对内联系各部、会，对外联络各战区，参与机要。1940 年 9 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他在政治部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安置了一批左派文化人。当时四川綦江有一所国民党特务建立的集中营，关押杀害了不少爱国青年，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蒋介石派张治中去处理。张释放了一批无辜青年，撤销了这个集中营。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前后，张治中对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心情十分沉重。4 月 3 日他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力陈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失策，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产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于 1942 年和 1944 年两次派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都参与其事。他和当时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经常保持接触，极力从中斡旋，终因双方观点相去太远，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张治中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和平磋商。在各方面的促进下，蒋介石电请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一起到延安迎接毛泽东。8 月 28 日毛泽东到重庆后，张将自己的住宅腾出来供使用，并为毛泽东举办欢迎会，邀请各方面的代表和毛晤面。经过反复谈判后，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张治中又亲自送毛泽东返回延安。但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协定的诚意，10 月 13 日又密颁"剿匪手本"，并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12 月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停，张治中和周恩来、马歇尔进行了商谈。1946 年 2 月，他们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25 日就《整军方案》达成协议。为了贯彻《整军方案》，月底，张治中和周恩来、马歇尔一起到各地进行了一次检查。到延安时，共产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张在晚会上发表讲演，末后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3 月 27 日，双方又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

这时，张治中被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改称行辕主任，再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4 月赴任时，周恩来嘱托他把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人员全部释放。他到新疆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6 月 10 日派八辆大汽车，由专人护送全体一百三十一人回到延安。

1948 年 6 月，在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的形势下，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约张治中谈话。张再一次劝蒋改变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苏外交要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对共产党要主动放弃"戡乱"，停止战争。12 月平津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约张治中谈话，问他对局势的看法，有什么意见。张说："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 6 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蒋问张是否愿意担任行政院长？张表示，如果"戡乱"政策不变，绝对没法担任。蒋又问张是否愿意担任国防部长？张说，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但表示，如果蒋希望和平，他愿为和平奔走。谈话无结果而终。几天后蒋在一次讲演中斥责主和者，说要将"戡乱剿匪"方针全力贯彻到底。张更感失望。

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遭到惨败，1948 年底，白崇禧忽然发出主和的电报，并宣称非蒋介石下野才能谈和。电报是通过张治中、张群转给蒋介石的。两张约同吴忠信研究后，认为蒋介石非下野不可。三人拿了白的电报见蒋，委婉陈词，一连谈了多次，最后蒋同意"引退"。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表面上下野离开了南京，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张治中见此情况，便想劝蒋出国，放手让李宗仁去促进和平，认为这样对蒋个人也有利。他于 3 月 3 日到溪口，住了八天，对蒋把"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关于蒋出国的问题，"第一天见蒋便被他发了一顿脾气"，以后转弯抹角地

说，也未说通。后来张到北平参加和谈，又写信劝蒋，说出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4月1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行前于3月29日到溪口去看蒋，想听取他对于和谈的意见。到北平后，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4月15日，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对方，20日被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李宗仁、何应钦电促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返回，周恩来劝代表团留下。张治中一度“心情处于极度苦闷与矛盾中”。周恩来劝他说：“将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仍有签订和平协定的可能。”还说，西安事变后，未能阻止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致使其遭幽禁，至今引为憾事，倘张治中此时回去，恐要遭到与张学良同样待遇。“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毛泽东也亲往张的住处慰问，多方劝导。至此，他的“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6月15日、20日、22日，国民党中央社连发三个电讯，对张治中进行攻击和诽谤。26日，张发表对时局声明，表示为中国的解放感到欣喜安慰，号召国民党军政官员“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9月8日，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张治中参加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张治中偕同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张治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谢晋元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镇平（今蕉岭）人，生于1905年4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世居镇平同福乡尖坑村。父亲谢发香是个小贩，母亲李氏是渔民的女儿。谢晋元兄弟姐妹共十一人，一个哥哥，九个姐妹，谢晋元排行第五。由于家境贫困，姐妹大多从小送给别人，哥哥独自去南洋谋生，后来贫病早死。谢晋元幼年在家乡育民学校和三圳公学读书，继入梅县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预科肄业。1925年12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肄业，次年10月毕业参加北伐。历任排、连、营长、参谋主任及团附等职。

1936年日本侵华形势日紧，谢晋元将眷属送回广东原籍，临别时对其妻凌维诚说：“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遗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并说“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嘱咐其妻奉养双亲及儿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时，谢晋元适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二旅旅部参谋主任。是年8月11日该部奉调由无锡开赴上海增防。8月13日沪战爆发，谢晋元所在之旅参加上海闸北八字桥之役，与敌血战。9月间该旅第五二四团副负重伤出缺，谢晋元遂补任该团团副，率部防守北火车站，坚守阵地达两月之久。

10月26日，大场失守，闸北、江湾守军奉令撤退。五二四团担任断后工作，掩护大军退却。谢晋元奉令率领第一营（营长杨瑞符）扼守要点。27日晨4时许，中国军队全部撤竣，谢晋元遂率所部将士据守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四行仓库内，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天明以后，日军大队开到，发动猛烈进攻。谢晋元率部雄踞仓库大楼沉着应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敌伤亡惨重，不敢率尔轻进，只得改采包围形势，伺机进袭，均遭挫败。

租界上的英国驻军目睹谢晋元团孤军困守四行仓库，地处绝境，曾多次劝说孤军卸去武装，准予退入租界，愿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但谢晋元毅然谢绝，他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谢团孤军死守四行仓库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传开后，上海市民莫不敬佩感泣，称他们为“八百壮士”（实际人数为四百余人）。连日来从早到晚有数万群众麇集苏州河南岸遥望，群情激昂振奋，对孤军赞叹不已，纷纷隔河挥帽致敬，连租界上的外籍人士也对孤军深表敬佩。中外人士携食物用品支援孤军者络绎不绝，但苦于交通阻绝，无法输入。10月28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子军杨惠敏潜往四行仓库，向孤军致敬，并献国旗。孤军将士即将国旗升上仓库大楼屋顶，周围观看的群众欢声雷动，外籍人士也深受感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怀进一步鼓舞了孤军的抗敌斗志，他们精神抖擞，严阵待敌。是日晨，谢晋元亲手击毙二名潜踵攀楼的日本兵，租界上环观之民众，皆拍手欢呼。29日，某团体接到谢晋元从四行仓库写出的信函，信中表示“洒最后一滴血，必向侵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激昂慷慨，令人起敬。四行孤军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敬仰，而且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赞扬。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害怕战争危及租界安全，乃电请国民政府下令孤军撤退。31日凌晨，孤军奉令撤离四行仓库，由新垃圾桥退入租界。谢团孤军坚守四行

仓库计四昼夜，毙敌百余人，伤者无数，孤军仅牺牲十余人。

谢晋元本打算撤退后通过租界向沪西方向归队，重新投入战斗。不料退入租界后枪械被租界当局收缴，人员也被羁留起来，"始知已陷入黑黯底深渊"。全体孤军被羁禁在胶州路兵房，称"孤军营"，由租界万国商团派武装看守。在这艰苦的环境中，谢晋元身为孤军领袖(后晋升为团长)，督管孤军营的内务励精图治，制定了教育、体育、生产各项计划，勖勉部下"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孤军自办伙食，学习技能，开办肥皂、线袜等生产工场，并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锻炼体格。为了不忘抗日爱国，谢晋元督率孤军坚持出操上课，并举行精神升旗典礼。除训练部属外，谢晋元勤学不辍，自修外文，并不时为文告激励孤岛同胞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曾勖勉部属说："在上海租界上，我们的言行，必须使友邦从我们身上看出中国军人之气概，从此认识中国的真精神。"上海人民对孤军十分敬仰和关心，许多群众团体向租界当局交涉，组织人员到孤军营参观访问，并捐款慰劳孤军。但孤军营的羁禁生活对谢晋元刺激很大，他内心十分苦闷，以致长期失眠。谢曾作诗述怀："勇敢杀敌八百兵，千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1938 年 8 月，谢晋元为"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重纪念周年，向租界工部局交涉要在营内挂国旗，工部局阻挠不允。8 月 11 日晨孤军在营内升起国旗，万国商团派白俄队冲入孤军营抢旗逞凶，手无寸铁的孤军为护旗与之肉搏战斗，有三位战士为保卫国旗而牺牲，负伤百余人，孤军当即绝食抗议。第二天，工部局又将谢晋元等官佐十余人移至外滩白俄队司令部幽禁，全体孤军继续坚持绝食斗争。孤军的斗争得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和声援。8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撰文"向羁留在沪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诚挚慰问之意"。上海纳税华人会、市商会及各群众团体也纷纷向工部局抗议和交涉。租界当局被迫让步，郑重送还国旗，抚恤死难人员，谢晋元等人于 10 月 7 日回至孤军营，孤军终于获得斗争的胜利。租界当局的无理限制和虐待，使谢晋元非常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弱国国民处处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处于极弱的地位，工业大部操于帝国主义者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必须奋斗才能维护民族独立。

谢晋元身羁租界期间，日伪曾向他多方威胁利诱，均遭拒绝。1939 年 9 月谢晋元鉴于上海形势恶化，作书寄其父母，表示准备以身殉国，决不向敌人屈节投降。信中说："上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后汪伪上台，曾派人诱谢变节，也遭其严拒。汪伪诱降不成，遂策划阴谋，派人收买孤军营内部不肖士兵暗杀谢晋元。

1941 年 4 月 24 日晨，谢晋元督率全体孤军举行精神升旗礼后列队跑步，突有郝鼎诚等四名叛兵，取出匕首向谢晋元猛刺，谢身负重伤殒命，死时年仅三十七岁。谢晋元死后，上海各界人民深为震悼，前往吊唁者达三十万人。5 月 8 日，重庆国民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曾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并抚恤其遗属。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毛泽东撰祭文，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

1937 年的清明节，正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双方都派员去黄陵桥山，共祭黄帝陵。

黄帝陵位西安市北 190 公里的黄陵县。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姓姬，号有熊氏，又号轩辕，生于山东寿丘，逝世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桥山。相传轩辕有土德之瑞。黄字是农业的象征，所以后世尊称他为黄帝。因炎帝侵凌各部落，黄帝在阪泉与炎帝打了三次大战，炎帝败。后黄帝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击杀蚩尤。黄帝当了中原各族部落的大首领。后人把黄帝视为祖先，是华夏同胞崇拜的偶像。

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由林伯渠宣读。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

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度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琉石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为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认其沧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以扬此志，永久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临，皇天后土。尚飨。

全文290个字，前几段歌颂黄帝的丰功伟绩，后面转到日寇入侵后的形势，把挽救民族危机摆到中华民族突出的位置，然后又讲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强决心，并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特派委员张继和顾祝同，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参加祭奠，他们分别宣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祭文。

不忘祖先炎黄帝，国共同祭黄帝陵，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谱出了前奏曲，被人们传为佳话。

（选自《毛泽东的幽默》，
作者：陈祥明、夏天然、邵华礼）

贺龙与一个女"洋鬼子"的交往

1988年5月20日，一位外国人的骨灰被隆重安放进河北省唐县军城的晋察冀烈士陵园。这位外国人就是曾被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戏称为"洋鬼子"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女士。她在抗日战争中曾为八路军120师的医疗工作作过贡献，并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琼·尤恩1911年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幼年随家移居加拿大。父亲汤姆·尤恩曾是加共领导人之一。1933年初，她在护士学校毕业后，以教士的名义来华，在山东省的加拿大天主教会开办的诊所工作了4年多，并学会了中国语言。1937年6月回国。同年底加入"加美援华医疗队"。次年一月初，随白求恩大夫再次来华，支援中国抗战。4月间，与白救恩在延安分手，先到陕西清涧的八路军120师后方医院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6月底来到八路军120师师部驻地山西省岚县。

尤恩一到岚县就首先拜见了120师师长贺龙。贺龙与政委肖克商议了尤恩的安排，决定让她在附近的一个医疗站工作。当医疗站来领人时，贺龙对来人说："这洋鬼子是来看护我们的伤员的。你把他带走，她需要什么就给她什么。"尤恩对"洋鬼子"的称呼毫不介意，她知道贺龙是一个讲话幽默风趣的人。因此，岚县来了个"洋鬼子"的消息也就迅速传开了。

尤恩所在的医疗站，只有一个小小的门诊所，设在农房里；所有伤病员在门诊部动手术或治疗后，被送往附近的老百姓家中休养；站上的医疗设备极为简陋，西药奇缺，大都以中药、土药替代。尤恩不在乎工作条件的好坏，全力投入了医疗站，要医治许多伤病员，拖得很迟才返回驻地。她和其他医生一起拟订了有关操作规程；她教会了司药工作人员配制溶剂，制作蒸馏水，割取生鸦片制作皮下注射溶液以代麻醉药物；她和另3名医生将病员按住地划分为4个片，各管一片，巡回诊疗；在日常工作之余，尤恩还为在医疗站受训的20多名卫生员讲课，传授知识……

尤恩到医疗站之初，无论八路军伤病员还是老百姓都喜欢拿"洋鬼子"跟她开玩笑。但人们在领略了她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后，都尊称她为"尤恩大夫"。尤恩却一本正经地对人们说："还是叫我洋鬼子好，只要你们不当我是外人就行。"

尤恩在医疗站工作期间，贺龙对她十分关心。尤恩每天早晚在司令部食堂和大家一同用餐，贺龙指示食堂工作人员予尤恩以适当的照顾，并亲自从战利品中挑了许多咖啡、饼干、巧克力等食品，派人送给尤恩；尤恩每天步行前往离司令部驻地2公里远的医疗站，十分费力。贺龙特将自己的马牵到运动场，教尤恩学骑马。当尤恩稳稳当当学会骑马奔驰后，贺龙十分满意，并告诉尤恩说："你是第一个骑我这匹马的女人。"对尤恩出色的工作成绩，贺龙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曾指示师战斗剧社根据尤恩的事迹编排出一场活报剧。演出时，尤恩前往观看。当见到那位扮演自己的男演员为装扮成白种女人的模样，在脸上涂了白粉，在身体凡应隆起的部位都垫上了东西，但垫着的东西又不时下滑，演员不得不在台上当众调整，尤恩忍不住大笑起来。

8月的一个下午，尤恩正在医疗站忙着，贺龙赶到医疗站，说东北方正发生激烈的战争，不少指战员负伤，滞留在前方，希望尤恩能带些人赶往救护。尤恩为能有这个机会而感到欣慰。当即收拾好急救包，骑上马就出发。数日后，当尤恩等完成任务返回岚县时，师司令部为尤恩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并为尤恩庆功。贺龙在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赞扬了尤恩工作成绩，感谢她为120师所做的一切。当天晚上，贺龙设宴招待了尤恩。席间，尤恩向贺龙汇报了去前方的情况。并告诉贺龙，她这次去前方，在一个叫见马坡的镇上的小教堂里，她亲眼看到了日军暴行的事实：教堂的窗户、用具、书籍、祭服全被打烂或撕破；圣特里萨神像的脖子上吊着那盏装满人的粪便的长明灯；教堂里没有一个活人的影，只是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

许多尸臭很重已发黑的尸体……她十分愤慨，说：没想到日本兵对在华外国人也如此心毒手狠。听着尤恩的话，贺龙说："好啊，洋鬼子，当日本皇军侵略你们的国家时，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尤恩说："这个问题真值得人们，特别值得那些住在中国大城市租界里的白种人想一想，难道他们还认为由于自己的肤色是白的，日本兵就会对他们发慈悲吗？"

在根据地很差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艰苦的工作中，尤恩消瘦了，以至穿起八路军的制服就象挂在秸杆上似的；维生素的匮乏，又使她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医治无物。尤恩为解脱病痛的折磨，不得不向贺龙提出："可不可以发给我一张回延安去的通行证？"贺龙笑首说："当然可以！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处吗？老是想要这要那的，可是我们又拿不出来。"从他的语气中似乎可听出尤恩在这里简直成了个负担，但尤恩从与贺龙几个月的交往中，已习惯地把握了贺龙所说的话中的深刻含意。

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尤恩打点好行李，向前来看望她的人一一告别后，正要前往贺龙那里辞行，没想到贺龙已来到她的住处。贺龙郑重地告诉尤恩：她来八路军120师使他十分高兴。对她的工作，120师官兵的评价都很高。尤恩不知所措地说："我看不出自己做了多少事，倒是学得了不少东西，并且认识了你。你是我最敬爱的红军司令员之一……"贺龙骑着马陪着尤恩走出岚县的城门。最后对骑着日本大洋马的尤恩说了句"希望你不要跌下马再返回来"的话后，掉转马头回返而去。尤恩也策马向前，开始了她新的征程。

（尤恩于1938年9月离开晋绥抗日根据地后，经延安、西安、汉口、长沙、上海等地，于1939年初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年底返回国内，从此没有再来中国。1987年10月31日，尤恩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病逝。根据她的遗嘱，她的子女将她的骨灰送到中国安葬。）

（选自《党史文汇》91年3期，作者：王庭岳）

史沫特莱在延安

1937年1月初，经过中共方面的安排，史沫特莱搭乘一辆红军的卡车前往三原红军驻地。

在三原停留期间，史沫特莱受到了红一军团长左权的接待，还见到了贺龙、肖克和彭德怀等其他红军将领。他们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左权是一个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贺龙具有"活龙活现的太平军造反战士的神气"，"有几分象版画故事里古代中亚一带的蒙古黑大胡子"；而"清教徒式"的彭德怀"严以律己，行事慎重，是一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正直人。"

初到延安，史沫特莱就在马海德医生的带领下采访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初见朱德，她看到"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钉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他有50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来确象红军之父。"史沫特莱经过当晚和此后一段时间与朱德的多次谈话，萌发了为这位由旧军人成长起来的"红军之父"写传记的念头，因而使得倾其全部心血的《伟大的道路》一书后来得以问世，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史诗般的著作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饮誉世界。当晚，朱德还送一匹小马供她乘骑。后来她为这匹马取名为"云南"，一直极为喜爱。

在同一个晚上，史沫特莱还到毛泽东的窑洞拜访了夜间工作的他。毛泽东给她留下了独特的印象，"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的阴暗景象"使她"不知所措"。"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此后在延安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常常和毛泽东畅谈。有时候她给毛写一个"请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有时候还提着一袋花生米来。他们谈印度、谈文艺，有时谈毛泽东的诗作，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毛泽东还向她学英语，向翻译学习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在延安的另一个令史沫特莱难以忘怀的人物是周恩来。他给史沫特莱的印象是"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

2月间，应中共领导人的请求，史沫特莱教他们跳西方的交谊舞。朱德破除迷信，首先与她揭开了交谊舞的场面。周恩来、贺龙也加入其中。而毛泽东"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也没有节奏感。"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史沫特莱认为周恩来跳舞"象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只有贺龙"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者"。由史沫特莱发起的这项活动日益扩大，大量从城市来的青年大学生也加入其中。由于她教这些干部跳舞，在延安那些传统的妇女中间引起非议，她们认为史沫特莱在"败坏军风"，这使她有所顾忌。但是在朱德的支持下，她仍将这项活动继续下去。

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目睹了这里物资缺乏和医疗条件落后的状况，便利用其影响向世界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吁。加拿大共产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后来来华就是部分地受到她的影响。为了打破国民党对红军消息的封锁，史沫特莱被中共授权向上海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了邀请信。结果英国《联合新闻报》记者伊尔·黎夫、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尼姆·威尔

斯）和纽约《呼声论坛报》记者维克托·盖因相继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还抽时间为新建的鲁迅图书馆整理外文书籍，方便延安的干部和学生。

史沫特莱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是她在华期间最有意义的时期。她感到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处处充满希望，这里正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此间她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毛泽东等人考虑到她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在党外活动更为方便和有利。因此没有同意她的入党请求。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十分伤心，但她想的仍然是为中国革命而战斗。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作为总司令率军开赴前线，为了报道这场伟大的战争和续写朱德传记，史沫特莱决定赶赴前线。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但由于她在一次骑马时摔伤了背部，直到9月中旬她才乘毛泽东送她的藤轿从延安启程。

（选自《党史博采》93年3期，作者：刘学侠）

把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第一人

1937年抗战开始后，著名的翻译家许孟雄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找到长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徐特立作了自我介绍，说："徐老先生，请您给我工作，我也要参加统一战线，参加抗日斗争。"

徐特立介绍他去武汉找董必武。董老又把他介绍给王炳南。当时我党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任务是向国外翻译毛泽东著作、八路军战报以及抗日文章。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孟雄和同志们努力工作，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对许说："斯诺先生看了你翻译的《论持久战》，大加赞扬，说你翻译的非常好"。此外，许孟雄还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战的通讯报道。刊登在美国《亚细亚月刊》上，对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1943年至1944年，他翻译了30多份日军侵华罪行材料和控诉书共百万字，为后来国际法庭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提供了确凿证据。

（《党史文汇》91年5期，作者：刘泽洪）

刘伯承巧布"重叠阵"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中华儿女不甘欺辱，奋起抗战，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创建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年10月下旬，刘帅率部开至正太线路南，宿营于山西省平定县七亘村，10月26、28日，于七亘反常用兵，"重叠待伏"，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抗战初期我军继平型关大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七亘地处太行山脉中段，晋冀两省接壤地，位于平定、昔阳、井陉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峡谷陡峭，是河北进入山西的南大门，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以二十、一〇九两个师团的兵力，沿正太线向西疯狂进犯，企图夺取娘子关，以解晋北日寇被困之危。一〇九师团向娘子关正面进攻，二十师团取道九龙关由井陉测鱼镇向平定迂回，意在使娘子关国民党守军腹背受敌。

25日，我侦察兵获悉，日军二十师团先遣队已向平定急进，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七亘系测鱼通往平定的咽喉要道。刘师长根据敌情和地形分析后判断，敌人次日必经七亘向平定输送军需物资，于是，借其有利地形，令七七二团第三营，布于七亘两旁大山，待伏来敌。

26日黎明，侦察连报告，川岸兵团的一个步兵中队以掩护着两个辎重中队正向七亘移动。我军机枪瞄准着、炮位修正着，手榴弹揭开了盖子……，一分一秒地等待着。9时许，敌先头部队象黄色浊流从沟边小路涌来，进入我军伏击区。草丛中，石岩后，我军战士一双双仇恨的眼睛怒视着步步靠近的敌人。前面的敌人在"猪血膏药"旗下神气活现、洋洋自得，后面的辎重部队带着武器弹药，艰难地行进，当敌人全部进入我军埋伏阵地时，一声清脆的信号枪声撕破了沉寂的静穆，顿时，伏兵居高临下，机枪、手榴弹以密集的火力，猛击敌人，枪炮声似怒涛一般，震撼着整个山谷。我军采取拦头、斩腰、堵尾的战术把敌军分成三段，前面的辎重部队因遭袭击，向后急转逃命，后面的掩护之敌疾进增援，却被击毙的匹匹骡马和骆驼堵塞在狭窄小道上，山沟尘土里，敌军马撞马、人撞人、人马践踏，进退维谷，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时，我军抓住时机，踏着冲锋号的旋律，冲入敌阵，一阵肉搏战之后，300多敌人便成为异国野鬼，并有大批军用物资和300余匹战马被我方缴获，我军仅2人牺牲、8人受伤。

战后，刘伯承师长分析了日军的作战心理和当地的交通条件，英明地预见：日军前方军械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而输送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日军不可能绕道而行，定会继续经七亘向前方输送。

敌人迷信于我国古代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认为我军已经取胜，必定撤离，不会以原样章法，在原地再次设伏，便于28日重新组织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由测鱼镇出发沿原路向平定进犯。

而刘师长抓住敌人迷信教条的心里，出敌意料，反常用兵，再次于七亘村巧布奇阵。11时许敌先头部队，进入

我军伏击圈，看到山上、山下一片寂静，便得意地吹起口哨，通知后面部队大胆前进，当敌辎重部队进入我军埋伏圈时，战士们从地上一跃而起，枪声、手榴弹一起呼啸，敌人呼天唤地，敌作一团。战至黄昏，敌弃尸 100 余具，满载物资的骡马 100 余匹，溃败逃窜。

连续两次伏击，我军伤亡 30 余名，歼敌 400 多人，缴获骡马 400 余匹，骆驼数十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七亘大捷在刘帅指挥下，用同一部队，在同一地点，伏击同一敌人，实为史无前例兵家用兵，是“重叠待伏”战术的光辉战例。从此揭开了太行山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打乱了日寇西进的战略部署，再次打破“皇军无敌”的神话，为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显示出刘伯承同志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卓越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党史文苑》梁岗平）

抗战初期的“四大名团”

抗日战争初期，中外报章曾盛赞英勇杀敌的中国“四大名团”。它们是：(一)1937 年 7 月在卢沟桥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顽强与敌血战到底的第 29 军第 37 师吉星文团；(二)1937 年 8 月防守南口要隘，以一团之众与数倍之敌血战旬日，最终全团殉国的第 13 军第 89 师罗芳沪团；(三)同年 10 月在山西代县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日机 20 余架的八路军第 129 师陈锡联团；(四)同年 10 月下旬在上海与日军血战，以 800 壮士孤军苦守四行仓库的第 72 军第 88 师谢晋元团。

（摘自《机关建设报》1993 年 4 月 7 日）

血染马鞍

1937 年 2 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向祁连山转战的途中，遭敌马步芳部队伏击，西路军总部直属队被敌人冲散。此时，担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张琴秋已临近分娩。她以顽强的毅力，由总部军医黄志亭搀扶着，坚持指挥被冲散的队伍轻装突围。在寒风刺骨的夜晚，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张琴秋强忍着腹内疼痛，刚刚艰难地冲出第一道伏击圈，孩子就出世了。卫生员急忙脱下一件衣服接过呱呱哭叫的婴儿，从摔破的药箱内抓出全部棉花把婴儿包了起来。此刻，敌人的枪炮响声震天，子弹象雨点似地拍打着地面，情况万分危急。张琴秋顾不上自己的亲生骨肉，只好丢下孩子紧跟部队继续突围。第二道封锁线冲过去了，当接近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部队遇到了敌人更加猛烈的射击。这时张琴秋的下身流血不止，已精疲力尽。为了赢得分秒的时间，黄军医请求张琴秋骑马向外冲，没多久鲜血就染红了马鞍。就在这危及生命之时，她却毅然命令警卫员把马让给了重伤员，并让黄志亭去抢救伤员。黄军医回答说：“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负责到底！”张琴秋坚定地说：“情况紧急，不容争论，你就照我说的办吧！”黄志亭含着眼泪只好从命去抢救伤员。拂晓时分，部队终于冲出了敌人封锁线，但张琴秋因产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经过急救，才慢慢苏醒过来。张琴秋以血的代价，谱写了一曲红军女英雄“血染马鞍”的悲壮战歌。

（选自《纵横》88 年 1 期，作者：李培基）

“张大胡子”遇险记

画家张大千，青年时代即留起大胡子，与当时的“美须公”于右任容貌神情相似。抗战前于右任是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长。就因为这两条大胡子一下分不清楚，张大胡子几乎身遭大难。

那是 1937 年的初秋，日军已经占领北平，张大千一家未能及时逃出，原想潜往上海四哥文修家。但这时日军又侵占上海，弄得他走投无路，心里烦躁不安。

一天，夫人杨宛君劝张大千同登景山散散心，大千就带上画夹顺便作点写生，夫妇俩玩得也高兴。当回家的路上却碰上了日本宪兵检查，宪兵一看到这个大胡子老人（其实当年才 39 岁），刺刀就对准了他，连说：“你的是于右任，嘿！大大的官于右任！”要把他抓进宪兵队。张大千急忙对宪兵说：“我不是于右任，我是老百姓呀！”宪兵总是不相信，拽着他的大胡子说：“于右任，大胡子。”张大千急中生智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他不会画画，我叫张大千，是画画的。你看！这是我的画夹，不信的话，我当场画给你看！”那个宪兵也许读过几年书吧，对画画倒有点兴趣，点了点头。张大千就打开画夹，蹲在红墙脚下画起来。他几笔勾出一只大螃蟹，瞪眼舞抓，口吐白泡泡，一副凶相。那宪兵也不懂画中之意，只是点头傻笑，觉得很好，还要了这张画，最后要张大千留下地址才放他走了。宪兵下班后，把遇到张大千的事向日军北平司令官香月作了报告。香月具有中学文化知识吧，一听到张大千的名字，哗地大叫起来，把那个宪兵吓了一跳，以为出什么事了。香月说：“张大千，留学日本的，是中国大大的画家，大大的收藏家。”那宪兵才恍然大悟。第二天，香月就派一个姓金的说客去张家登门道歉，又要张出任日华艺术院院长，并商借张的名家书画开个“中国历代名画展览”。张大千深知香月的诡计，一想利用他为虎作伥；二想骗取他的名家藏品。这时，张大千故作镇定地说：“金先生，我张某是个画匠，画匠当官，岂不使人笑话！不过，开个名画展是非常

好的。不过，我的名画都在上海的一个德国朋友家里，可去上海把它运回来。”那个姓金的一听到要去上海，连说慢点慢点，等我问了香月再说吧！等那说客走后，张大千忙对家人说：“我这条大胡子要引出风险来了，如果得罪香月，那就大难临头了。”于是，他先疏散家中人员，自己暂时留下来。过了几天，那个说客又来了，声称奉香月之命，请张先生赴宴。张大千知道香月又要出一个新花招，怎么办？香月是个凶恶的鬼子，这次如不去必遭大祸。于是，他将计就计，决定前往智斗香月。那天，香月见张大千前来赴宴，十分高兴，亲自招呼上座，恭维一番。席间，香月再次提出要借重先生主持艺术院和举办名画展事。张大千听了装着很高兴，连连点头，并说：“在日华艺术院开个名家书画展，很有意义，不过我的历代书画都在上海，原是在上海开的，现放在北平开也好嘛！可是最近有一个坏消息，上海方面说我……”香月接下话说：“说张先生被皇军杀害了，这是大大的造谣。”大千紧接着说：“我先在上海开个书画展，然后再搬到北平，如何？上海方面一看到我，这个谣言也不攻自破了，这对贵国声誉也有关呀！”香月听了觉得这样的意见有道理，又见张大千的态度挺“诚恳”，就表示同意了。

张大千是由天津乘海船去上海的。临行时，朋友们劝大千把大胡子剪掉算了，免得再出乱子。大千却诙谐地说：“这条大胡子原无靠山，现在就靠这条大胡子作通行证，路上谁也不能阻拦我了。哈哈！”张大千一到上海，即托人把24箱历代名家书画，装上去香港的海船。自己带着家人连夜上船经香港转到了桂林。第一天在街上就碰上了徐悲鸿，他把这次的“大胡子事件”详细告诉了悲鸿，悲鸿拍拍大千肩膀说：“这件事也传到重庆了。现在，你这个张大胡子比于大胡子还出名了。”张大千摸着自己的大胡子说：“那可编一出小戏了。”

（江东）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顺口溜

50年前，儿童习字都是先从“描红”开始。当时的文具店都有“描红纸”出售，价钱很便宜。就是在16开的“八都”纸上印刷一些顺口溜，字有核桃般大，红色的。儿童用毛笔在红字上一笔一笔地描，就叫“描红”。这些顺口溜，都是千篇一律的，其中有一首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民虽英勇抵抗，浴血奋战，终因敌人早蓄阴谋、武器精良，大片国土，暂时沦陷于敌手。在苏浙皖地区，先后出现了以大汉奸梁鸿志为头子的“维新政府”和以大汉奸汪精卫为头子的“国民政府”。

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日伪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进出城门都要向日军鞠躬，否则就遭拳打脚踢，甚至送了性命。日军为了“以战养战”，滥发“军用手票”和伪“中储券”，大肆搜括物资，以致物价飞涨，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

为了严加控制，日伪加紧推行保甲制度，十户为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保，保有保长。保甲长为虎作伥，拉夫派捐，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最为老百姓所痛恨。他们张口是捐，闭口是税，不时上门骚扰，才收清洁捐，又要扫街费，刚派查夜捐，又来皇军慰劳费，如此等等，一月总有好几次。有人把描红纸的顺口溜改了一下，道是：

“一来两三人，恐吓四五下，

敲去六七千，八九十人骂。”

由于民穷财尽，交通工具十分缺乏，一般城市根本没有公共汽车，长途汽车不仅路线少，而且车辆破旧，路上常常出毛病，弄得旅客进退不得。因此又有人道：

“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

补胎六七块，八九十人推。”

为了打击抗战力量，日伪实行“清乡”政策，封锁城乡交通，农产品不能随便进城，城里粮价猛涨，一般老百姓只能靠“配给米”度日。“配给米”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有一时期，“配给米”竟然是五颜六色的，原来是发了霉的扫仓米。老百姓又编了一首顺口溜，道是：

“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

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

这些顺口溜说不上什么艺术性，却反映了沦陷区城市贫民的困苦生活。

（野人）

中华民国国歌小史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古老的“卿云歌”，赞颂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泱泱的风范和光辉的远景，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第一首国歌。

中国之有国歌，是向西方学来的。清末，中国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西方各国在外交场合，常常演奏国歌，作为国家精神的象征。出于外交上的需要，清政府决定制定国歌。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宣统帝下谕以典礼院所制“巩金瓯”歌为国歌，歌词如下：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

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熙。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但在这时，清王朝已面临崩溃。6 天以后的农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 10 月 10 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刚刚产生的清国歌竟成了清室覆灭的挽歌。

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即着手制订新的国歌。1912 年 2 月 8 日，教育部刊布征集国歌的广告。同月 25 日的《临时政府公报》上，又刊载了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稿。教育部在"附注"中说："本部前登广告，征集国歌，蒙海内音乐家陆续投稿，兹特择登公报，以待知音者之评论。"歌词如下：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

喜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歌词表达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学习欧美的政治意愿，将旧中国改造为新的民国。五色旗是武昌起义后苏浙民军攻取南京时使用的旗帜，后来被临时参议院采用为中华民国国旗。

但各方对这首国歌稿反应冷淡。于是教育部又向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王闿运、汪荣宝等直接约稿。经过比较，汪荣宝提出的国歌稿入选。汪荣宝的国歌歌词，是将《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稍加增添而成。相传"卿云歌"是虞舜所作。歌词是：

"卿云烂兮，糺漫漫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最后一句是汪荣宝加上的，以体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与封建政治制度的区别。

歌词虽已产生，曲谱却还阙如。1913 年 4 月 8 日，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按西方各国惯例，国会开幕大典必须演奏国歌。眼看大典即将临近，负责国会筹备事务的内务部十分焦急。教育部急忙邀请了比利时音乐家哈士东为"卿云歌"谱曲。终于，在国会开幕式上，响起了中华民国第一首国歌恢宏的乐声，使得一些真诚的民主革命家为之泪下……。

但是，一心篡夺资产阶级革命果实、企图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对国歌中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一句如芒刺在背。他的侍从武官长、原清王朝陆军部尚书荫昌（旗人），觉察袁世凯的心计，就献上一首新的国歌歌词，全文是：

"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

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

共和五旗开尧天，亿万年！"

这首歌词立即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有的国会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歌词中透出了浓烈的帝王气味，但袁世凯不予理睬，于 1915 年 5 月 23 日下令颁行。不久，袁世凯公然实行复辟帝制，便将歌词中"共和五旗"4 字改作"勋华揖让"，取尧与舜"揖让为帝"的典故。可惜好景不长，次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碎，这首国歌也随之消失。

在这以后，中国征战纷纷，政潮滔滔，政局极度动荡，因而在几年间竟没有一首正式的国歌，各地学校以一些爱国歌曲权充国歌，如赵元任作词作曲的《爱我中华民国歌》，吴研因作词、借用美国民歌曲调的《自由的旗帜》，以及《美哉中华》等。直到 1919 年 12 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才重新着手制作国歌，成立了由教育部参议、司长、厅长、秘书等 15 人组成的"国歌研究会"，并指派当时任教育部佥事（即科长）的周树人（鲁迅）等 5 人为干事。1920 年，根据章太炎提议，国歌研究会决定以"卿云歌"为国歌，而删去在民国第一首国歌末尾由汪荣宝所加的"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一句，使歌词风格首尾统一。这时音乐家萧友梅刚从德国归来，被邀请为国歌谱曲。大总统徐世昌于 1921 年 3 月 31 日发布命令，宣布从当年 7 月 1 日起，全国采用新国歌。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三首国歌，它被采用的时日比较长，一直延续到北伐战争。

当时的中国，是"南北分治"的局面。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这个政府所管辖的地区，曾用过由徐谦作词的一首国歌。但由于护法运动时起时落，广州局面被称为"巴比伦迷宫"，因而这首国歌影响不大。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并决定发起北伐后，迫切需要有一首能团结与激励人民的国歌。1926 年 7 月 1 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作出了制定国歌的决议，并决定在国歌未产生前，暂以"国民革命歌"代国歌。

"国民革命歌"是一首慷慨激越的革命歌曲，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政工人员作词，曲调采用一首法国民歌，当时已流行在南方各省。歌词是：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这首代国歌也从南海之滨播扬长江流域，动员和鼓舞着工农学群众和各阶层人民投入打倒军阀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争夺"党统"进行剧烈搏斗。出于平息内部政争的需要，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于 1929 年 1 月提议，以孙中山的一篇训词作为国民党党歌。这篇训词系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的当天所作，全文是：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30 年 3 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以上面这首党歌为代国歌。1937 年 6 月，又决定为正式国歌，音乐家黄自、

赵元任曾分别为它谱过和声。但是,背叛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南京当局,既不能"为民前锋",又不愿真正"主义是从"。

一部国歌史,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中华民国史的缩影,是值得关心民国史的人们关注的。

(齐牧)

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图书的劫掠

日本侵略者自踏上中国领土起,就开始了其掠夺中国图书的罪恶勾当。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29日攻占北平,并立即着手从学校、公共图书馆以及私人手中掠夺图书。据战后统计,自1937年7月日本侵入北平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8年间北平被劫夺、遭焚毁的图书共586,428册(其中属于个人的书籍137,471册)。日军攻陷天津时,中国军民在天津南开大学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先是炮轰,继而用汽油烧,南开大学图书馆许多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还有许多资料被劫走。战后日方返还南开大学图书15,566册。在上海,日军共劫走并烧毁图书共290,441册(其中个人所有图书25,726册)。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图书损失更为严重。共计公共图书被劫406,461册,个人图书被劫53,118册,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自1938年3月至4月,对南京地区70多个学校、博物馆、政府文化机关等单位进行了图书情况调查,并从国民政府、外交部、军政部、教育部、中央党部、中央研究院等25个单位搜集了646,900册图书进行鉴别整理。从中劫得了极其珍贵的手抄本《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共6,778册。其中还有哪些珍本书被劫,就不得而知了。在杭州,日本人花了3天时间搜遍了文澜阁,想找到四库全书,幸而未果,四库全书可能早在战前就被转移走了。在武汉,日军仅从国立武汉大学就掠走42,080册书与杂志,日军又将武昌华中大学图书馆几万册图书视作"敌产"悉数没收,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日本侵占中国之初,人们都以为香港比较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亦在其中。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书,岭南大学20箱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5箱书,抗战之初均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但日本占领香港后,这些书均被日军劫走。

日军劫书的对象主要是图书馆、各大学以及政府文化机关,私人藏书亦在劫难逃。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的3000册元、明版书,就在香港被日军掳掠;日军攻占北京后,一些藏书家也遭到洗劫,象李鸿文就被枪走38,000册,李维琈被夺走7,000册。由于日军疯狂掳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使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援助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日军不仅抢夺图书,连植物标本、考古学资料、昆虫标本、各种贝类标本、地球仪、科学仪器等也都在掠夺之列。日军侵占南京后,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也因战乱下落不明。

上述图书都是有案可稽的统计,至于毁于战火的图书和其他文献资料,就难以计数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国的文化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创伤,尽管战后日军已将其掠夺走的图书部分归还给中国。

为了有效地对中国图书进行掠夺,日军曾组织了很多专门机构。

"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日军的特务部等单位为骨干组成,主要活动于上海、南京、杭州一带,并专门从日本东京帝大等大学延聘了22位专家来华帮助掠夺图书。仅这个组织就劫夺了中国图书88万册,后来将其中一些无什么价值的书移交给了汪伪政府。

"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以A级战犯里见甫为首,至日本投降为止,这个组织共"购买"、劫夺250,000册有关共产党及其活动的图书。"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则主要活动于东北,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旧书。1937年12月24日成立的"新民会",主要活动在华北一带。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实际受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专门搜集有关抗日文献。

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掠中国图书组织。

日军大肆掠夺中国图书,首要目的是使中国书源枯竭,使中国人文盲化而甘心沦为其奴才,以便炫耀天皇的"权威"("国光")。其次是为了解中国,以利其侵略与占领,并为其学者、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有些从中国劫到日本的图书,仅向极少数专家开放,如帝国图书馆将从中国掠来的书只向30名学者开放。另一个目的是阻止中国将图书西迁。抗战爆发后,很多北方与东部大学西迁,需要大量图书随行,日本人抢夺图书,意欲迫使中国人无书可教、可读,其用心可谓阴险。

历史地看,日本早就开始从中国掠夺图书了。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更好的文献与文物,还曾亲自制订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日军参加八国联军,不仅烧杀奸淫,还抢劫书库、书店。

(胡发贵)

程砚秋拒为日军"献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平、津。京剧大师梅兰芳暂时息影舞台,蓄须明志。程砚秋这时从西南回到北平不久,北平梨园公益会迫于日伪压力,请程砚秋等名角联合演出所谓"献机"义务戏,程砚秋义正辞严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谁就去唱我管不了。"公益会来人有点为难,说大家很怕日本人,如果程砚秋不唱,恐怕对北平京剧界不利。程砚秋非常气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行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

日伪当局见程砚秋不买帐,便存心报复。有一天程砚秋从沪回平在前门车站下车时,一出车厢迎面就过来几个便衣和警察,一个特务边打量他边问:"你就是程砚秋吗?跟我们走一趟有话问你。"刚走进站内北侧一间小屋,特务不问青红皂白,便动手打人,程砚秋大喝:"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他后退到一根柱子前,凭着少年时的武功根底,挥拳还击,把特务打得东倒西歪,狼狈不堪。这件事在梨园界传开,名净侯喜瑞听后连连称赞:"还是我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出了口鸟气。"

为防日伪特务再来纠缠,1942年秋天,程砚秋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查"病",主任大夫、德国人义克德和内科主治大夫杨学涛接待了他。

程砚秋衣着朴素,见面时极有礼貌地称杨学涛"杨老伯",然后十分平静地说:"请杨大夫、义克德大夫详细检查检查我的身体,我现在这样发胖,哪还能上舞台表演呢?"程砚秋一席话,使杨学涛顿时领悟到他是不愿为日本人演出,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杨遂用德语向义克德转述了程砚秋的话。检查之后,杨学涛在诊断书上用中文写出:"程砚秋经本院内科检查,体胖动作不便,不宜去舞台献艺,应休息。"

几天后,程砚秋到医院向杨学涛致谢,并赠杨学涛一幅扇面,上边有程亲笔题诗,以为留念。诗曰:

紫薇花对紫薇翁,名目虽同貌不同。
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浔阳宫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
何以苏州安置处,花堂阑下月明中。

程砚秋不愿为日本人演戏,决定隐居务农。他迁居京郊青龙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每天还拿出时间坚持练功,有时学画读史。

过了一段时间,日伪特务借查户口,问程砚秋的下落。程夫人来到青龙桥劝丈夫小心。程砚秋长叹一声说:"读完《汉书》、《宣和遗事》,徽、钦二帝经过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亡国之惨,真令人不忍睹。现在却该轮到我们来作亡国奴了!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我没作什么亏心事,不怕!一切听其自便,我就在青龙桥等着了,哪里也不去,他们爱把我怎样就怎样,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得什么!让他们来罢!"

敌人寻程砚秋不着,竟于1944年2月15日搜查程宅,逼问程砚秋去向。程砚秋宁折不弯,坚持不为日伪演出。

(李仲明)

孔祥熙率团庆贺英皇加冕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以"中国庆祝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由上海搭乘意大利"维多利亚"号首途,5月3日始抵达英国。5月12日上午举行加冕大典,孔氏率领我代表团人员陈绍宽、翁文灏、桂永清以及驻英大使郭泰祺等,在场参加盛典。

孔氏在英国任务完毕,即行防问欧洲各国,此行访问以在德国和捷克耽搁的日子较久,在军备器材方面,购自这两国的也较多。这次在欧洲订购的大批军火,随即分批装箱付运,在孔氏还没有从欧洲回国之前,"七.七"事变已经发生。

6月16日,孔氏告别欧洲,6月27日抵达华盛顿。29日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抗战期间,尤其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以金钱、军火、军用物资、空军人员等援助中国,都跟这次坦诚交换意见有关系。

也就是这一次,罗斯福特别示意美工商部长兼建设银行董事长琼斯,贷予中国政府美金1000万元,这项借款手续当时即行签字。后来并由中美两国政府,共同组织了一间"环顿公司"专门替中国政府办理军用物资之购运事宜。

(唐志摘自香港《春秋》杂志1990年10月号)

流行风

电影《夜半歌声》

《夜半歌声》——剧本曾经田汉阅改，片中几支著名插曲和主题歌的歌词，也由田汉所作，薛伯青摄影，1937年2月完成。

《夜半歌声》以反封建、争自由为主题，描写了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宋丹萍（金山饰），在革命失败后，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成为剧团的名伶。但因爱上一个大地主女儿李晓霞（胡萍饰），遭到恶少汤俊（顾梦鹤饰）的陷害，被硝酸毁容，变得丑陋可怖。这时，他得戏院看门人（王为一饰）帮助，从此隐居戏院顶楼。十年以后，另一剧团来此剧院演出，青年演员孙小鸥（施超饰）在排练中听到有意教他唱的歌声，于是寻声而找，认识了匿居顶楼的宋丹萍，宋丹萍向他讲述了个人身世，希望他继承其未竟事业，同封建恶势力斗争，并代他去安慰李晓霞。而汤俊又企图污辱女演员（孙小鸥的恋人）时，适被宋丹萍发现解救。仇敌相见，格外眼红，于是在剧院后台展开了一场搏斗，宋丹萍杀了汤俊，终于报了十年深仇，可自己也被葬身火窟。

影片暴露了封建势力的专横与残忍，表现了宋丹萍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过于渲染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与李晓霞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影片在艺术表现上，虽抄袭了《歌场魅影》一类好莱坞恐怖片的手法，但仍不失为一部很有特色的影片。它将视觉形象风格化，利用光影、布景与化装等技巧制造恐怖气氛，剧院顶楼传出忧怨感伤的夜半歌声，也令人迷离可怖。影片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是30年代中国恐怖电影样式的成功探索。

电影《十字街头》

《十字街头》——明星公司二厂摄制，王玉如摄影，赵丹、白杨主演。剧本是沈西苓从一群失业、失学的青年朋友们闲谈中得到启发，并以自身生活体验与社会观察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影片描写了四个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刘大哥（沙蒙饰）性格刚强，思想进步，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回到北方老家，投入抗敌斗争；小徐（伊明饰）性格软弱，在找不到工作和出路时，终于在回家的路上自杀；阿唐（吕班饰）是个乐天派，靠布置橱窗为生；老赵（赵丹饰）活泼热情，对生活充满信心，找到一个报馆校对工作，努力尽职，甚至还担任采访工作，住老赵隔壁的女房客杨芝英（白杨饰），在纱厂当教练员，她上日班，老赵上夜班，每天早晨在十安街头上下电车时相遇，但并不相识，甚至为弄脏房间互相写条讥骂。有一天，老赵去纱厂采访，正巧碰上杨芝英被流氓欺侮，他和阿唐便挺身相助，从此他们相识。赵、杨之间产生了爱情。然而，生活是残酷的。不久，他们先后遭到失业，都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老赵、阿唐沮丧地走向街头，碰巧，杨芝英和姚大姐也迎面走来，四人相遇于十字街头，这时，看到小徐自杀的消息，阿唐发生感慨，提出我们要学刘大哥，于是四人坚定地向前走去……这个结尾暗示出他们结束了徬徨苦闷而走向抗战的道路，同时说明了青年的出路是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密切相关的。影片的主题是含蓄的，而思想又是积极的。如果说《乡愁》和《船家女》是以低沉的调子反映了沈西苓在白色恐怖下看不清出路时的苦闷情绪，那末《十字街头》则表明了他已在探求反抗与斗争的正确道路。

电影《马路天使》

《马路天使》——"明星"二厂摄制，1937年7月与观众见面。是袁牧之编导的第二部影片，也是30年代左翼电影创作的最后一部影片。吴印咸摄影，赵丹、周璇等主演。

影片《马路天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刻划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歌女、吹鼓手、报贩、剃头司务、小摊贩等一群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表现了他们贫困、失业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妓女小云（赵慧琛饰）原是由东北流亡上海的姑娘，为生活所迫落入魔掌，在鸨母逼打下，做了"马路天使"——暗娼，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竟被恶势力杀害。歌女小红（周璇饰），还是个纯情少女就被老板带着四处卖唱，任人调戏，甚至被卖于流氓古成龙。小陈（赵丹饰）、老王（魏鹤龄饰），剃头司务（钱千里饰）等五个"把兄弟"，也属"下九流"人物，过着浪迹街头的生活。影片正是通过对这群人真实生活的展现，深刻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从而表现了作者的进步倾向。影片还热情讴歌了这群小人物自身的纯真、善良、团结互助和勇于牺牲的高尚品格，表现了只有劳动人民之间才会有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可贵感情。小云很爱小陈，而小陈爱的却是她

妹妹小红，但当小云听到老板要卖掉小红时，竟主动帮助妹妹逃出魔掌，最后为救小红脱险，竟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聪明深思的老王，对小云极为同情与爱怜，意识到"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终于走在一起，相依为命。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下，他们这些"苦命的人"，尽管各自性格不同、强弱有别，但表现出的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精神，却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人性的闪光、爱情的火花，才使他们在黑暗王国里看到一线光明，在冷酷的社会中感受到人世间一丝温暖。编导虽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劳动人民立场来描写这群小人物，表现他们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但整个影片却渗透着对当时人吃人的社会的憎恨与反抗，从而给影片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小说《大波》

作者李劼人，主要内容：以1911年四川争路事件为中心，从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发展以及各地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和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一直写到清王朝的覆灭，真实生动地反映辛亥革命这一规模巨大的民众运动。第一部写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消息传来，成都铁路公司里群情激奋，成立以立宪派罗纶为首的四川省保路同志会，运动迅速由成都扩展到全省各地，掀起了罢市罢课、罢捐罢税的热潮。总督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数万民众赴总督衙门请愿时遭到血腥镇压。第二部写赵尔丰的倒行逆施激起四川民众的更大愤怒，同盟会联络哥老会组织同志军、学生军，与清军展开武装斗争。这时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衙门里一片慌乱，成都城内草木皆兵，幕僚政客纷纷避难。第三部写督办大臣端方奉旨率领湖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同盟会夏之时等在全国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带领义军起义，龙泉、重庆相继宣布独立。赵尔丰利用立宪派弱点，表面上交权，成都虽告独立，而清朝官吏依然执政。同时，同盟会发动新军倒戈，使端方遭到应有的惩罚。作品广阔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政治事件，描绘了新旧势力冲突中各派人物的不同面貌，既具有历史的时代特点，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大波》与前两部长篇，形象地展现了历史，被郭沫若誉为"小说的近代史"。

小说《烟苗季》

作者周文，主要内容：写川康边区军阀队伍内部为争夺禁烟委员肥缺而展开一场曲折的斗争。烟苗季节将到，司令官将任命禁烟委员的消息传出后，接着以旅长为一方和以参谋长为另一方立即展开一场角逐。参谋长先发制人，派人大肆宣扬旅长扣发军饷置田放债的劣迹，致使旅长将对方孙连长和教民宋保罗扣押；接着围绕着扣人事件由宋保罗的后台柯牧师出面要挟司令员制裁旅长。结果双方由明争暗斗到相互暗杀，导致一场血战，而遭殃的却是四周的百姓和无辜的士兵。作品生动地揭露了四川旧军阀中上层内部勾心斗角的丑恶内幕，充分暴露旧军阀的腐败和反动。其中写旅长勇而无谋，迷于权势而昏庸无能，与擅长权术，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取材于川藏边陲，并侧重于暴露旧军阀的罪行，在开拓新题材上曾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

小说《第三代》

作者萧军，主要内容：小说以辽宁西部偏僻山区凌河村为背景，描写了辛亥革命前日俄战争时代到"九.一八"事变之间东北的农村生活，展示了交织着血泪与苦难、仇恨与挣扎的广阔生活图景，揭示了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无法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悲惨命运。作品着力描写乡绅地主勾结官吏压迫农民，广大农民铤而走险，纷纷去当"胡子"。他们展开了反对为地主老财卖命，反对苛捐杂税的反抗斗争，并且相信"总有一天，把这些祸害者的窠巢烧成一片平地。"作品通过农民与地主官绅、"胡子"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成功地刻画了数十个人物形象，其中有老一代农民：倔强的老英雄井泉龙，乐天知命的林青，草莽英雄海交；有第二代农民：刚正不屈的刘元，围猎好手杨三，泼辣美丽的翠屏，懦怯自私的杨大辫子。另外如恶霸地主杨洛中，日本浪人天野太郎，沙俄贵族赫列斯达可夫等也都写得个性鲜明。全书结构宏大，情节繁而多变，富有乡土色彩和生活气息，倾注了作者对劳动人民深挚的同情。

诗《风暴》

从亚细亚的高原
——我们先民
所游牧的草野，
风暴起来了。

它呼啸在森林，
呼啸在山谷，
呼啸在万里的长流
与荒冷的大漠。

奴隶们，在风暴里

勇敢地扭断锁链，
驰向亚细亚的海岸，
迎击着夜袭的匪盗。

而且，将举起
浴血的巨臂，
仰向东方的黎明，
呼唤着新生的太阳。

（力扬）

歌曲《热血》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的代价，
甚至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热血，
地泊尔河似的奔流!
任敌人的毒焰胜过克里色姆当年的猛兽，
但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毫无怨尤。
睢吧!
黑暗快要收了，
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

歌曲《思故乡》

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
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
我要唱雄壮的歌曲，
我要写悲愤的词句。
不怕强权，
不怕暴力，
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
要用武器打倒仇敌。
我要回去，
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
我要回去，
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故乡!故乡!故乡!
我要回去，
我的故乡。

历史档案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表

（1937年10月）

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　权
总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总政治部副主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代理师长　陈　光(1938.3)
　政　　委　聂荣臻　(后)罗荣桓(1938.3)
　参 谋 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政治部副主任　肖　华
　第343旅旅长　陈　光　政委　周建平　(后)肖　华
　副 旅 长　李天佑　参谋长　陈士渠　政治部主任　邓　华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　政委　黄克诚
　副 旅 长　杨得志　参谋长　卢绍武　政治部主任　崔田民
第120师师长　贺　龙　政委　关向应
副 师 长　肖　克　参谋长　周士弟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　政委　李井泉　(后)晏福生
参 谋 长　姚　喆　政治部主任　张平化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　(后)王　震
政　　委　王震　参谋长　郭　鹏　政治部主任　袁任远
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　政委　张　浩　(后)邓小平(1938.1)
副 师 长　徐向前　参谋长　倪志亮　(后)李　达
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　政治部副主任　蔡树藩
第385旅(1938年6月组成新的旅部)
旅　　长　王宏坤　(后)陈锡联(1938.6)
政　　委　王维舟　(后)谢富治(1938.6)
参 谋 长　耿　飚　(后)卜盛光(1938.6)

政治部主任　苏精诚(1938.6)
第386旅旅长　陈　赓　政委　陈再道　(后)王新亭
参　谋　长　李聚奎　(后)周希江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独立旅(1938年7月成立)
旅　　　长　陈再道　政委　宋任穷
参　谋　长　卜盛光
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
驻西安办事处代表　林伯渠　(后)董必武　主任　伍云甫
驻晋办事处主任　彭雪枫(兼)
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　朱　瑞(兼)
驻第二战区联络处主任　王世英
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李克农
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李　涛　(后)李克农
驻武汉办事处代表　林伯渠(兼)
驻重庆办事处代表　董必武(兼)　处长　周怡　(后)钱之光
驻成都办事处主任　罗民文(兼)
驻广州办事处代表　张云逸　主任　云广英
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廖承志
驻桂林办事处主任　李克农
驻湘办事处代表兼主任　徐特立
驻湘通讯处主任　王凌波
驻兰州办事处代表　谢觉哉　处长　彭加伦　(后)伍修权
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袁晓轩(后叛变)
驻乌鲁木齐办事处主任　邓发(兼)　(后)陈潭秋(兼)

八路军各部队出师抗日的时间与路线表

部别		出发时间	途经路线及目的地
115师	343旅	1937.8.19	陕西三原→韩城县芝川镇→侯马→原平→繁峙、大营→抵上寨、下关
	师直、344旅	1937.8.25	三原桥底镇→侯马→原平→五台、龙泉关→丁家庄→上寨→晋东北地区
120师		1937.9.3	富平庄里镇→韩城芝川镇→侯马→晋中榆次地区→神池八角堡地区
八路军总部		1937.9.6	泾阳县云阳镇→瓦窑堡→陶池→澄城→郃阳→芝川镇→荣河县(今万荣县)侯马→太原→五台
129师	师前方指挥所769团	1937.9.24	富平县庄里镇→芝川镇→太原
	师主力	1937.9.30	富平县庄里镇→芝川镇→正太路以南平定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序列表

(1936—1939年)

第一路军(1936年7月成立)
总司令兼政委　杨靖宇　副总司令　王德泰
一军　军长兼政委　杨靖宇　政治部主任　宋铁岩
二军　军长　王德泰　政委　魏拯民
第二路军(1937年11月成立)
总指挥兼政委　周保中　副总指挥　赵尚志
参谋长　张建东　副参谋长　王效明
四军　军长　李延平　副军长　王光宁
五军　军长　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　宋一夫
七军　军长　景乐亭　政治部主任　王效明

八军　军长　谢文东　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十军　军长　汪雅臣
救世军　司令员　王荫武
义勇军　司令员　姚振山　副司令员　闵宏仁
第三路军(1939.5月成立)　总指挥　李兆麟　政委　冯仲云
三军　军长　许亨植　政治部主任　张兰生
六军　军长　李兆麟　政治部主任　冯仲云

汪精卫演讲
——先安内后攘外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

汪精卫于一日在国府纪念周演讲"先安内后攘外",此颇可见将来政治之动向.兹录原文如下:"上月十八日,兄弟回到首都参加国民政府纪念周的时候,主席曾命兄弟说几句话.当时因为去国已将一年,深恐所说的话无甚切要,所以格格不入,今天复承主席的命,仍恐所说的话或有不当,或已为诸同志所已知,并且已行,惟有借这机会,请诸同志加以指正。去年四月间,兄弟初到欧洲疗治伤病的时候,耳闻目见的,大半是对于集体安全的失望,大意以为集体安全的弱点已暴露无遗。此后惟有各个决定自己的命运,大战后胜利的国家则尽力于怎样保守既得的权利,失败的国家则尽力于怎样恢复已失的权利,尽其为之所至,从事战备,不但将预备用于增进福利的社会事业经费大部分移于战略之用,甚至每个人民都节衣缩食,预备将一点一滴的血汗都用于国防。再过数月之后,耳闻目见的又稍稍的不同了,各国政府及人民努力于从事战备,并没放松,而且祇有加紧,然而对于集体安全的失望,欲稍稍变了观念。他们诚然承认集体安全的弱点,但是却不以之归咎于集体安全的制度,而以之归咎于自己,以为集体安全的制度所以有如此弱点,无非由于各会员国不肯努力于增进集体安全的关系和加强集体安全的力量,此后不应祇对集体安全失望,而应使集体安全的制度更能在世界上树立起来,获有长足的进步,固然战胜的国家对于既得权利依然不舍得放弃,然而对于战败的国家恢复已失权利的迫切要求,却不敢过分的轻藐和漠视了.这种加紧战备的工作,和维持集体安全制度的工作同时并行,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一贯的.因为厌恶战争,希望和平,固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没有战争的准备和决心,是万万不能维持和平的,维持和平的责任,决不能属之那些偷安苟活得过且过的人们,而当属之那些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摩拳擦掌去预备战争的人们。换句话说,越是预备战争,和平越不易决裂,必须大家知道战事之不易,战胜之没有绝对把握,方才肯向着维持和平那条路走,万一不幸,和平不能维持,战争终于实现.也必须大家知道那破坏和平的戎首是谁,不但国外的人个个知道,便连他自己国内的人也个个知道.穷兵黩武的狰狞面孔,绝不能以自卫的面具来掩饰的.如此,则穷兵黩武者虽然或可以飞扬跋扈于一时,而终必为全世界及他自己国内的人所共弃。集体安全的制度,虽然或不免受一时的挫折,而跟着的进步是必然的,最近数月,欧洲各国对于集体安全的观念,似乎是这样演进,这自然说不得是我们最高的理想.但目前的趋势,似乎只有这样的,在这趋势中,中国的情形是怎样呢?论起我们原来的志愿,是想在国际和平的环境里,努力的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国家,无如数年以来的现象,与我们的志愿实在相违,不但无和平之可言,而灭亡之祸且迫于眉睫.我们的政府及人民只有咬紧了牙齿,立定了脚根,去做救亡图存的工作,其对外方针,数年以来已经中央再三说明了,不惟说明,且已逐渐见之事实了,以交涉论,努力于恢复外交常轨,以抵抗论,努力于不使领土主权稍有丧失。这种方针,是救亡图存所必由的途径,以前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兄弟如今所要说的,不是将这种方针加以讨论,而是这种方针怎样才能排除困难,以获得不断的进步.兄弟以为若要对外方针能着着进行,必须国内统一与安定.举个譬喻,若要一支军队,能够对外作战,则必须这支军队内部组织能够健全,军队如此,国家何独不然,断没有一个国家之内不能维持统一与安定,而可以言对外的.因为对外抗战目的有三,其一是求胜利,其二是求持久,其三是求自尽.所谓自尽,不是自杀,是将所有的力用尽之后,牺牲生命,以保全人格。这种求自尽的心,不但每个兵士应该有的,每个国民都应该有的,不但战时应该有的,平时也应该有的.有了求自尽的心,然后救亡图存方才有了根本,有了这根本之后,便要求持久了.将全国人民的心力,

都用在救亡图存的工作上，积累得一分是一分，人民的心力多一分的积累，则国力多一分的充实，而对外力量亦多一分的增进。这些积累，不是容易的，没有国内的统一与安定，决不能积累起来，我们必须知道，开火是抗战，积累也是抗战，而且抗战之能否持久，取决于此。在今日之文化产业样样落后的情形之下，我们不要高谈胜利，只要能持久，则胜利的希望，不至于茫无把握了，这几年来，国内的统一与安定，不能说没有进步，军事统一，政治统一，已渐渐做到了。经济统一，亦将随之开展。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国家做得到经济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即是着眼于此的，这是救亡图存的必要工作，然而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国内的统一与安定生了摇动，这即是说救亡图存的工作动摇了基础，幸而蒋委员长出险了，幸而善后事件渐渐的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了，但是细心默察，似乎还有种种隐忧，便是有些人躲在暗里仍旧做那破坏救亡图存工作的企图，他们的企图明明是破坏救亡图存，而他们却偏要提高口号，说目前的救亡图存的工作不适于用，例如他们有一句口号是"非攘外无以安内"，这句话表面上似侧重攘外，而实则将攘外的基本工作加以破坏，因为攘外之能否有效，全视安内的工作如何，必须全国有精诚团结之实，方才能在整个的计划一定的步骤之下，积累力量，以求持久。我们并不是说必须积累到某种程度，然后可言牺牲，倘环境到了要求牺牲的时候，自然要将所有积累供于一掷，然而在最后一息以前，积累的工作，仍是不容稍懈的。我们知道，西安事变以来，不但剿匪工作受了顿挫，即国防设备亦受了损失，种种痛心，不能毕述，但愿国人经此事变，明白了救亡图存的工作，时时有人想加以破坏，国内的统一与安定时时有人要加以动摇，我们不可不用尽全力来维持拥护。一枝军队，当枪口向外的时候，如果有些不法士兵犯了纪律，做长官的不能不立刻去惩治他，这种惩治，不能说他汲汲对内，减少了对外的力量，宁可说这正为维持及加强对外的力量起见，不得不然。军队如此，国家亦如此，果有人立心破坏国内的统一与安定，则中央用力量加以惩治，决不能藉口停止内战而加以阻挠的。这不止是为安内计，应该如此，正是为攘外计，应该如此。以上的话，是说明我们现在应有一致的决心，本着救亡图存之整个的计划与一定的步骤，猛向前进。我们当猛向前进的时候，不惜排除一切困难。我们深信我们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将得到人道正义的同情与援助，彼怀有侵略野心，不惜穷兵黩武，以求一逞者，若不觉悟，难免归于破灭。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七期）

实行孙中山的遗嘱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

宋　庆　龄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日本的挑衅已使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继续发展中。日本企图占领华北的种种努力是显然失败了。日寇进攻绥远的企图也已经失败，它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它的条件也没有成功。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沦为赤贫的黩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

如果认为在远东的一般情势如此不利于日本的时候，日本仍能派遣十五至二十师兵力到中国来作战，那就未免荒谬了。日本以这样区区的兵力，永远没有希望达到它的目的，而事实上日本的工业与后备兵力都不容许它派遣更多的兵力。这小量的兵力分散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不难被数量上占优势、并为自己的生命与国家而作战的中国士兵粉碎。中国的士兵已经从侵略者手中拯救了绥远，他们一定也会拯救全中国。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几年来，铁道和公路建设虽然有一些进展，但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进。

乡村中是一片贫困、疾苦和灾难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仍受尚未废除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搜括，以及苛捐杂税的

痛苦。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正影响着劳苦大众。不仅工人的处境十分凄惨，青年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我们中国的青年虽然受了中等或大学教育，仍不免踯躅街头，得不到运用他们的知识的出路。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为要进行这项工作，必须遵循先总理遗教。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只有这样，民生主义才能实现。我们决不能忘记，先总理常常教训我们，发动群众运动是一切工作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只有依照孙中山的遗嘱与遗训，国家建设和农村改进工作才能以高速度向前迈进。

实际上，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国民会议能否完成它的任务，全靠一种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

为了便利选举，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

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虽然救中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但是先总理曾指示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全世界都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政府的任务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利用这种同情。

我在这里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已经去世的总理给我们的指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选自《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

国防委员会条例

第一条　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

国防委员会之决议及其行动应绝对秘密，凡参与会议及工作人员不得将任何决定事项向外发表。

第二条　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

第三条　国防委员会以左列各员组织之：（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五院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办公厅主任，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四条　其他各机关人员遇有必要时，由主席通知列席。

第五条　国防委员会之职权如左：（一）国防、外交政策之决定。（二）国防作战方针之决定。（三）国防费用之编制与筹备。（四）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五）国防紧急事变之审议。（六）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之决定。

第六条　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

第七条　国防委员会设秘书长，处理会议一切事务，秘书长由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之。

第八条　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之组织及办事规程另订之。

第九条　本条例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施行。

（选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一期）

东北军全体致西北同胞告别词

（一九三七年三月）

亲爱的西北同胞：

我们近奉政府命令，移防豫皖，从此便与西北的父老兄弟别离。民国二十四年夏，我们奉命来此，执行政府给予我们的任务。今日奉命离去，回想在此的相信相爱，真不胜临别依依之感。

在这短短的期间里，西北的父老兄弟一定对我们有

了透澈的了解。东北军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国家军队而冠以"东北"二字的理由，只是由于历史上的沿袭与称呼上的便利；这里面绝没有丝毫的封建意味。拥护中央，服从领袖，是我们统帅张副司令铁一般的信念，也是我们全体官兵一致的心理。他——张副司令——曾不畏强邻干涉，以易帜促成了国家初步的统一；他曾振旅入关，因此而结束了民国十九年的战事；他曾在热河抗战之后，毅然解除兵柄以所部完全奉之中央，树全国军人不以军队自私的模楷；比及回国，他的这种信念更因外侮之日趋严重而愈固，直至现在，丝毫没有变更。这都是显著的事实。我们相信：山河易改，但他的这种信念决不会改，客观的环境告诉我们，主观的良知告诉我们，他的这种信念，是我们应该绝对赞同而一致拥护的。西北的父老兄弟，过去对我们十分爱护，并给我们许多地指导与赞助，这正可证明对我们的历史记忆得如何清楚，对我们的内心认识的如何透澈。所以我们，应该以十二万分的感激与钦佩，致其敬意。

同时，我们也深深了解，西北的父老兄弟对我们是怎样地期许。对我们的盛意，我们不敢以空言图报，也不忍以空言图报，我们今后，决将以埋头苦干的精神，训练自己，充实自己，期望在最短期间成为国家劲旅，以备将来在政府整个国策之下，效命于国际战场之最前线，用以报答你们前此的隆情高谊。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正是我们的内心要求。但是你们无形的鼓励，更使我们不能不加倍努力。我们确信：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现已更加巩固。我不自亡，绝无人可以亡我。我们希望，与亲爱的西北同胞，都要打叠起一切悲观，消除了一切苦闷，大家一致地，努力为国家民族的光明而奋斗。

华岳峨峨！渭水汤汤！我们今与相聚年余相亲相爱的西北同胞分手了。兹谨以十二万分的诚意祝你们的幸福无量！

（选自《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十二期）

蒋介石庐山谈话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论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件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的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

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转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近年以来，中国政府及人民一致所努力者，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以期获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对内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复兴，对外则尊重和平与正义，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中国曾参加签订者，莫不忠实履行其义务。盖认为"独立"与"共存"，二者实相待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淞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镇，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以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以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英，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不可胜数。受一于此，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此迄于今，吾人敢言中国之所以出此，期以尽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后之觉悟而已。及至芦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

芦沟桥事件之起因，由于日本大举扩张天津驻屯军，且屡于辛丑条约未经允许之地点施行演习。日本此种行动，已足随时随地引起事变而有余；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军队竟于邻近北平之芦沟桥，施行不法之演习，继之以突然攻击宛平县城。我守土有责之驻军，迫而为正当防卫；我无辜之人民，于不意之中，生命财产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此事实，已为天下所共见。

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之行动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头常用就地解决及不欲扩大事态之语调；而其实际，则大批军队及飞机、坦克车、以暨种种新战争利器，由其本国及朝鲜与我东北，源源输送至河北境内。其实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节节进攻之事实，绝不能为其所用之语调，所可掩蔽于万一。

中国政府于芦沟桥事件发生后，犹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与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同时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解决办法，未予反对。乃日本军队于无可借口之中，突然在芦沟桥、廊坊等处，再行攻击中国军队，并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书，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此则于双方约定解决办法以外，横生枝节，且为吾人所万万不能接受者。日本军队更不待答复，于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进扑中国文化中心之北平，与中外商业要枢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驻军为日本轰炸机及坦克车所围攻，死亡之极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横遭屠戮，公共建筑，文化机关以及商店、住宅，悉仍一炬。自此以后，进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并进攻南口，使战祸及于察省。凡此种种，其横生衅端，扩大战域，均于就地解决及不扩大事件语调之下，掩护其进行。

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

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详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则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日本今犹欲以淞沪停战协定为借口，将使中国于危急存亡之际，尚不能采用正当防卫之手段。须知此等停战协定，其精神目的，即欲于某地点内双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冲突，不妨碍和平解决之进行。若一方自由进兵，而同时复拘束地方，使之坐而听受侵略，此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转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5日　周恩来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通电南京，抗议扣押张学良及重新挑起内战，谓："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事，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同时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组成联军，拟定共同作战计划。

1月7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同日　青海都兰西南发生七点五级地震。

1月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

1月9日　西安十万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同日　国民党政府要求西安方面在二者之中作出选择：一、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到陕西西部和甘肃；二、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调安徽，十七路军仍留陕西西部。

1月11日　杨虎城离西安，移驻临潼。冯钦哉部与东北军发生冲突。

同日　东北军通电反对扣留张学良。

1月12日　杨虎城代表李志刚抵南京，负责交涉事宜，后不断往返陕西、南京间。13日，宋子文"陪同"张学良飞奉化见蒋介石，李志刚亦飞奉化。蒋介石要东北军移驻甘肃；杨虎城部移驻渭北；陇海路及沿路之一线由中央军填驻，中央军并在西安设防；红军移驻陕北；杨虎城绥靖署设于西安，新任陕主席孙蔚如即日就职，由杨指挥；西安事变所提出之各问题由国民党三中全会彻底解决。

1月14日　广西省绥靖主任李宗仁、四川省主席刘湘电蒋及国民党政府，主张和平解决陕事。

1月15日　伪满民政部在奉天、安东、吉林、间岛、三江、滨江、锦州、龙江、热河、黑河等地，设立八百六十四个"集团部落"。

1月18日　德王自称伪蒙政府主席，令各旗限期抽调壮丁入伍。

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1月23日　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十七路军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并说关于潼关以西之军事问题应与顾祝同直接谈判。

1月27日　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等，反对王以哲等主和派的和谈方针，表示"誓与西北同存亡，坚决不撤退。"

1月28日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自瓦窑堡迁至延安。

1月29日　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

1月30日　杨虎城部队开始从西安撤往渭北三原一带。

冀东人民反对伪化运动，抚宁农民三百余人武装抗捐。

1月31日　周恩来、叶剑英同东北军主和主战两派及十七路军召开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经周、叶协调，决定对南京采取和平方针，派李志刚赴潼关与顾祝同签字。

同日　周恩来和顾祝同就中共部队归国民党政府指挥及国民政府发给中共军队军费进行谈判。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国民党以此为国策，中共愿提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二、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二十二日结束。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并散发其《西安半月记》，对张、杨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以绝效尤。"汪精卫发表继续"剿共"演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案。"会议决议"今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 法"；取消中央常务会议主席制，改为常务委员制，任邵力子为中央宣传部长，陈公博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还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案》，将武装"剿共"方针改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

2月18日　沪公益纱厂工人罢工。

同日　日驻华北军部在丰台购地屯军。

2月20日　沪日商丰田纱厂工人罢工。

2月21日　津日韩浪 人抢劫海关仓库。

2月22日　蒋介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开放言论，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三点。但又云："不能不禁止宣传赤化与危害国家扰乱地方治安之言论"，"反对国家破坏社会之共产党及反动分子……如不同有无悔过诚意，而普遍的一概赦免，则中央为重视国家之法纪，保证社会之安宁，决不能随便出此。"

2月27日　殷汝耕于天津组织天津各界防共委员会。

3月1日　陇海铁路通车宝鸡。

3月3日　驻陕甘的东北军开始被调往豫南、皖北和江苏等地。

同日　张群辞外交部长职，王宠惠继任。八日，王发表外交方针之演说，谓对日"循和平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

3月11日　南京政府下令禁止发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十三种刊物，并限两日内将所有存书焚毁。

3月16日　芜湖全埠罢 市。

3月19日　东北抗日联军攻入依兰城。

同日　长城煤矿为日本吞并。

3月20日　沪浪人私运大批铜元出口，中国海关关员七人被殴伤。

3月24日　日舰七十艘来华，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

3月30日　沪丝织工人罢工。

3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系统地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和根源。

4月1日　日海军省野村勘察塘沽港口形势。二日日海军武官集津会商，议决兴筑塘沽港口。

4月4日　沈钧儒等救国会七领袖，被苏州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谓其"危害民国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

4月14日　国民党政府派贺国光到成都与刘湘会谈，要求川军让出重庆，停筑防御工事，撤退某几处之川军。十六日，刘湘表示接受。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对日抗战而奋斗。

同日　日伪军警开始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到十月末，共逮捕四百八十余人，处死八十余人。

4月16日　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举行会议，决定《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策》，提出"内面指导"华北傀儡政权，要南京确保华北的"特殊地位。"

4月17日　四川刘湘被迫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率部撤离重庆，移驻川南永川，随后南京军队进驻重庆。

4月22日　国民党中常会公布修改国大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第一条改为"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第三条规定扩大当然代表之范围，缩小列席人员之范围，代表选举法第三条经修改后，增加了当然代表，新添了指定代表，第六条规定"除特种选举外，所有第六条以下由国民政府指定候选人之规定，一律取消。"

4月24日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

同日　沪市民会电请取消食盐加税。

4月25日　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到达新疆的星星峡。

同日　华北日驻屯军开始在津郊、平郊及通县附近演习。

4月26日　上海棚户数千人请愿。

4月27日　天津学联会发表宣言，主张督促武装缉私。

4月30日　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后被迫出国考察军事。

本月　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成立，向仲华任社长，开始向国内发布国际、国内新闻。

本月　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军阀主义和叛党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5月1日　周恩来在《解放》月刊第二期发表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代表选举法的原则与意见，主张"应该立即开放党禁，释放全国政治犯（自然汉奸卖国贼除外），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确认男女平等，废止一切剥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检查新闻条例'等）"，以保障人民及各政党团体真能获得"选举之自由及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同日　陈云到星星峡，代表中共中央迎接西路军

5月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十四日结束。到会正式代表二百三十六人，列席代表七十四人。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论，刘少奇作《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会议批判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状况，制定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

5月中旬　张申府等在北平成立启蒙学会，推动新启蒙运动。

5月18日　北平东北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

5月22日　汕头日领事馆巡查青山，不依警律报领迁入证，强行搬入神州洋行居住，经员警劝阻无效，反殴伤员警。日军并调舰赴汕威吓，制造汕头事件。

5月28日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由涂思宗、肖致平率领赴陕北。

本月　白区党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

6月1日　国民党政府禁止满洲航空公司系统惠通公司飞机在华北飞行。

6月4日　国民党政府要求日本撤除天津日军用无线电台。

6月10日　上海市民四千八百余人上请愿书，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

7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本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7月2日　沪十四家丝厂万余女工罢工。

7月4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7日　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致电宋哲元等，要求他们坚决抗战，表示红军"愿为后盾"。

7月9日　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肖克、左权、徐海东等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同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等二十多个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到前线慰劳，并组织宣传队、募捐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等，支援抗战，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著名教授和社会名人商讨国事、表示要"准备抵抗"。张群等大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

同日　国民党冀察当局与日军议定停 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部队撤回原防；（三）芦沟桥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驻守。十月，中国遵约撤军，但日军却大批调兵并向中国军队进攻。

7月10日　沪钱总业宣誓拒绝伪钞私货。

7月11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同日　日本宣布香月清司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

7月13日　延安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召开紧急会议，毛泽 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14日　上海各团体组织援助抗敌将士委员会。

7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为主旨，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赴庐山与国民党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合作事业。

同日　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地方上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救亡运动 。

7月15日　宋哲元指派张自忠、张允荣、邓哲熙三人负责与日本代表商谈解决时局的条件。

同日　全国商联会致电各地商会，要求速将募捐慰劳金汇寄前线。

7月18日　宋哲元往天津日军司令部访香月，并发表"平则和，不平则不和"的谈话。19日，宋回北平，拆除市内防御设施，并接受香月所提(一)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二)二十九军从平津、芦沟桥、永定门以东撤退；(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等"休战"条件。2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说：宋哲元的决定与国民政府"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

7月19日　蒋介石在庐山对芦沟桥事件发表谈话，谓：临到最后关头，惟有坚决牺牲，吾人只准备应战，而并非求战。

7月2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对付日本进攻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种前途。

同日　朱德到三原云阳镇着手改编部队。

7月28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

同日　冀东伪自治政府在通县的保安团千余人反正，杀死日本侵略者二百六十多人。

7月31日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获释出狱。

8月1日　南京和山东荷泽发生地震。

8月6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8月11日　日本将察哈尔、绥远、山西三省组成一个地方区域，并隶属于伪"蒙疆自治联盟"之下。

8月13日　朱德偕邓小平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8月19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解散，日本任江朝宗为北平伪市长。

8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主力三万多人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

同日　日本近卫首相宣言以武力解决中日争端。

8月21日　国共两党在南京正式进行合作谈判。

8月22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沟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结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凯丰、博古、关向应、张浩、聂荣臻、罗瑞卿、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等二十二人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同时，会议改组了中央军委，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张闻天、徐向前、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十一人组成，军委书记毛泽东，副书记朱德、周恩来。

8月23日　日军在吴淞等地登陆。

8月25日　日本宣布封锁中国东南海岸。

8月26日　上海战争重心移至吴淞罗店一带。

同日　张家口失守。

8月30日　八路军先遣部队渡河东进。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由延安到达太原。

国民党政府明令征兵。

8月31日　日军全力猛攻吴淞，继以步兵登陆。

9月1日　章乃器在上海《申报》发表题为《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表示"拥蒋抗日"，"完全信赖政府"、一切听从蒋介石，反对中共独立自主原则。

9月4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9月5日　美国和平团体要求政府保卫中国。东方弱小民族联盟发表告日本兵士书。

9月6日　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二十三个县，首府延安。

9月7日　华南日军侵占伶仃、东沙两岛。

9月8日　台湾革命党宣言与祖国协力抗日。

同日　晋北日军攻陷天镇。

9月17日　全国基督教请"国联"履行条约义务，制裁日寇。

9月18日　东北义勇军攻打木兰城。

9月20日　中华台湾革命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9月21日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我军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的方针，要以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二十五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电报，指出："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游击战争。""要设想在敌占整个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同日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

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和“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

9月27日　莫斯科、纽约、伦敦、澳洲各地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暴力侵华。

同日　日本在沪虹口设关收税。

9月28日　《国际新闻供应社》在上海成立。

9月29日　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是把民众加进去，发展充实统一战线，实行一切必要改革。

9月30日　东三省发生反日运动，日派大军镇压。

10月2日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湘、鄂、赣、闽、粤、豫、浙、皖等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万二千余人，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辖四个支队，共一万零三百人。

10月9日　日军侵占大同煤矿，委托满铁开采。

10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表《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封公开的信》，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改变对民众运动的种种错误政策，立刻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以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

10月16日　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到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日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独裁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反对国民党对救亡运动的“统制”与“包办”政策，指出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组织救亡团体和救亡运动。

10月20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关于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指示立即筹备成立边区政府，以宋邵文为主席，并准备公开军区司令部；另外，一面向蒋、阎提出，力求其同意，然后，推广到其它地区，在未得承认前，边区可先行办理。

10月25日　国民党政府在国防会议上密议“停战问题”，谓：综观利害比较，停战或短期停战于我物质上均较有利，故在有利之条件下，自可接受停战。

同日　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

10月27日　旧金山群众举行反日示威。

10月28日　在日本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称蒙古“自治”。

10月29日　八路军挺进队袭占定县城，切断平汉路。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灵邱间之孤树脣袭击日军。

11月12日　中共中央召开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1月13日　周恩来于临汾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主张目前应注意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三个月内扩大十万八路军的建议。

11月15日　十八集团军总部抵沁县。

11月16日　周恩来在山西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演说，论述了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争取和影响友军，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等思想。

11月18日　八路军杨成武支队攻克易县、阳原。

11月20日　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财政、外交两部及卫生署迁驻武汉。

11月21日　常熟、吴县失守，国民党军退守江阴、无锡。

国民党政府发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改任内政部长，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实业部长吴鼎昌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长蒋作宾调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11月22日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于归绥。

11月24日　日军首次“扫荡”晋察冀边区。

同日　八路军三五九旅收复原平。

11月26日　周恩来、彭德怀抵达延安。

11月27日　王明、康生由苏联经新疆到延安。

11月30日　常州沦陷。

12月2日　丹阳失守。

12月5日　日军侵占句容。

同日　伪上海“大道市政府”成立。

12月6日　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讨论投降问题，决定接受日本所提条件。

台湾台东发生七级地震。

12月7日　冀南伪治安维持联合会成立。

12月9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十四日结束。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的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会后，王明到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的工作。

12月10日　日军攻占芜湖。

12月11日　邓拓创办《抗敌报》。

同日　日本内阁批准五相会议对华政策之决定，其主要内容为：(一)除非中国改变对日态度，日本决不放弃

其十字军的"征讨"政策；(二)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帮助新中国之建立。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同日　日军侵占南京，展开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大竞赛"。据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法庭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烧及活埋者十九万人，被零星屠杀者十五万人，合计三十四万人。

12月14日　日本指使王克敏，并纠集平津和华北各省的汉奸"维持会"，在北平成立以王为头子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辖冀(察、绥)、晋、豫、鲁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同时成立了伪"新民会"，王克敏任会长，缪斌任中央指导部长。它标榜"新民主义"。其宗旨是："维持新政权"，"参加反共战线"等。

12月15日　扬州沦陷。

12月17日　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总部设汉口。

12月25日　王明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

同日　日本在上海成立新闻检查所，强迫各报接受检查。

12月31日　周恩来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讲话，指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是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完成救国的重大任务，为此青年应当到军队中去，到乡村去，到战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同日　泰安失陷。

同日　中共山东省委在省委书记黎玉领导下，组织平津流亡学生、泰安人民和鲁中徂徕山抗日武装在徂徕山举行起义，并与莱芜、泗水、新泰三支游击队会合，组编成山东人民抗日自卫队第四支队，在鲁中开展游击战争。

外　交

3月14日　日本经济考察团由日中贸易协会长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率领抵达上海，16日，受蒋介石招待。蒋谓："礼义"为"东方文化的特点"，希望两国"为发扬东方文化来努力"。又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月3日　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翁文灏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想借此机会，游说英、美、法、德、比等国帮助中国，以吓退日本的侵略。

7月12日　中美签定稳定货币协定。

8月4日　中英成立借款协定。

8月9日　国民党政府与法国银行团成立四万万法郎借款协定。

8月13日　孔祥熙与瑞士、荷兰银行团签订货款协定。

8月21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

9月9日　国民党政府代表顾维钧赴日内瓦，向"国联"申诉日本侵略中国。

10月22日　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中国代表。

11月2日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向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所谓对华和平条件。

11月3日　九国公约参加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日本拒绝参加。中国代表吁请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抗战予以援助。但会议在英美操纵下，否决了苏联关于集体制裁日本侵华罪行、实行集体安全原则的主张。

11月5日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的七项和谈条件。蒋对德表示衷心感谢，并望日本能"恢复战前状态"。

12月2日　蒋介石再次会见德大使陶德曼，表示：(一)愿意接受日本的七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二)同意派亲日分子为华北行政首脑；(三)同意与日共同防共。

12月17日　英政府任命卡尔为驻华大使。

军　事

1月1日　东北抗日联军一百五十人在鸡冠山附近与日军中化、上野两部激战。

同日　国民党亲日派挑拨内战，何应钦下令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

1月3日　察北伪军集中商都，图再犯绥远。

1月19日　南京军队与杨虎成军队在赤水发生前哨战。

1月20日　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高台与国民党军队血战九昼夜，董振堂、杨克明等三千余人牺牲。

1月31日　张学良部坚决主张张学良先回陕西，骑兵团围攻南京军驻地白水县城。

2月2日　东北军特务团长孙铭九等杀害坚决主张抗日的王以哲将军。渭北张、杨部队撤出渭南前线，南京部队趁机向前推进。

2月6日　杨虎城率部撤往三原。同日，东北军一〇六师沈克、骑兵师檀自新等致电国民党，向蒋介石投降。

2月8日　南京军进驻西安，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月21日　红军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出重围东返。二十六日又重返倪家营子地区。

2月28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四个军组成增援军，委刘伯承、张浩率领，由淳化出发前去援助西路军。

3月12日　红军西路军在梨园口失败，全部兵力已不满三千人。

3月13日　红军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开会，决定分散深入祁连山打游击，三十军所余人员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领导。九军所余人员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领导。

5月4日　日关东军司令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八日，日增军热河一旅团。

5月7日　陈云、李先念、李卓然等率西路军四百余名到达乌鲁木齐。

6月21日　华北日驻军部成立临时作战课。

6月24日　察北各路民军分头实行游击战。

6月25日　日军在芦沟桥一带不断举行夜间演习。

6月30日　东北抗日联军于长白山击溃日军讨伐队。

7月7日　芦沟桥事变。日军在芦沟桥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炮轰宛平城。驻守在该地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16日　日本政府增调陆军十万人来华。翌日，五相会议决定动员四十万军队，扩大侵华战争。

7月26日　日军第二十师团五之井中队侵占廊坊。同时，北平日军向宋哲元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宋部撤出北平，退至冀南，被宋拒绝。

7月27日　日军在二十架飞机配合下猛攻南苑，当地驻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被迫退出阵地。二十八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

同日　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依照既定方针扩大战争。日本首相近卫在议会(即七月二十五日开幕的特别会议)声明，称其内阁决心建设亚洲"新秩序"。

7月29日　北平失陷，宋哲元逃往保定。日本在北平组织了以江朝宗为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

7月30日　天津沦陷。日军侵占大沽。

8月13日　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日方进攻部队有：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计三十多万人；日军统帅永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负责指挥。中国抵抗的军队分三路：右路军辖第八、十集团军；中路军辖第九、二十一集团军；左路军辖第十九、二十一集团军；左路军辖第十九、十五集团军，另直辖部队九个师，总计参战军约五十个师，七十万人左右。冯玉祥(九月十八日后为蒋介石)、顾祝同、张治中等均负指挥责任。

8月23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二十日起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命令。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委)罗荣桓，副主任肖华；第一二〇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同日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通电就职，随即举行誓师大会，率军东渡黄河，向山西抗日前线进发。

同日　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刘汝明部和第十三军汤恩伯部与日军在南口激战失利，南口沦陷。

本月　共产党员杨植霖、高风英等在归绥(呼和浩特)城东藤家营子一带组织蒙汉抗日游击队。

同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成立，军长祁致中。

9月4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由关中东开，一一五师先遣队抵晋南侯马。

9月9日　淞沪战场国民党军营长姚子青率部五百，死守宝山，经激烈巷战，该营将士全部牺牲。

9月13日　大同失陷。

同日　上海国民党守军撤至第一道防线，战争中心移到罗店、浏河、大场一带。

9月24日　日军攻陷保定，国民党军刘峙部南逃。

9月25日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等领导下，在平型关歼灭日军精锐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一千多人，取得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

9月29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由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组成，总指挥周保中，活动于吉林省东部各地。

同日　淞沪战场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战争重心移向大场、闸北、江湾一带。

同日　津浦线上之新乐失陷。日军占泊头镇、东光、连镇等城镇。

10月1日　晋北八路军克朔县。五日收复平鲁县。

10月3日　国民党阎锡山部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因抗拒命令和不战而逃被判处死刑。

10月5日　日军攻占德州。

10月6日　杨成武支队收复广灵。

10月8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袭击沈阳。

10月10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宋

时轮支队在怀仁、岱岳间的辛庄伏击日军汽车队，击毁汽车十八辆，炸毁公路桥梁。

同日　日军侵占石家庄。

10月11日　八路军克复涞源。

同日　日军集中主力强渡蕴藻浜，进攻大场，国民党军进行抵抗，大场战幕正式揭开。

10月12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在崞县以北十里铺袭击日军汽车二十辆，并袭击岱岳以南之新庄，焚毁汽车十八辆。

10月13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五团收复宁武。

同日　日军坂垣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第一、十二师团等部约五万人猛攻忻口。国民党军约八万人在卫立煌指挥下，与日军相持二十余天。

同日　集宁陷落。

10月14日　吕正操领导的"河北人民自卫军"与中共保属省委领导的游击军汇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战斗在冀中平原。

同日　八路军一部在平型关、灵邱线北小寨村截击日军汽车一百三十多辆。

同日　国民党弃守柏乡、内邱，十五日，邢台失陷。十七日，邯郸失守。

同日　淞沪战场国民党军全线反攻。日军向葛家牌楼猛扑。双方在此线上相持五昼夜。

日军板垣部队进占归绥。

10月15日　八路军晋东北挺进队在灵邱、广灵间之马家湾伏击日军运输队。

10月16日　八路军晋西北挺进队克复广灵县。

同日　包头陷落。

10月17日　八路军挺进队一部，克复平山城。

同日　淞沪战场，战争在蕴藻浜一带进行，国民党军秦庆武团一千四百余人全部牺牲。

10月18日　八路军挺进队一部克复曲阳、繁峙。

10月19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第三营夜袭山西代县西南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炸毁日机二十四架。

同日　淞沪战场，国民党军进击泗泾球场，空军夜袭蕴藻浜日军阵地。

10月21日　八路军与日军在广灵城激战，翌日，日军被击退。

10月22日　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南茹村南移至盂县柏兰村。

10月23日　沪蕴藻浜南激战，国民党军撤离陈家巷、马桥宅阵地。

同日　日军犯娘子关。

10月24日　八路军晋东北挺进队克复蔚县城。

10月25日　八路军挺进队一部克复唐县，次日攻占平汉线之清风店车站。

10月26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与日军激战于娘子关东南的平定县七亘村，歼灭日军二十四师团之辎重部队。二十九日，继在七亘村与营村之间与敌激战，缴步枪五十余支，机枪四挺，骡马、骆驼约百匹。

同日　国民党军弃守娘子关。

同日　淞沪战场，大场南翔公路、陈家宅、梅园宅各点先后失守，国民党军撤离大场。江湾、庙行、闸北国民党军退出第二道防线。

同日　日海军陆战队占领金门。

10月27日　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八百勇士退守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与日军作战，时称"四行孤军"。11月31日，"四行孤军"退入公共租界。

10月30日　松井石根被任命为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10月31日　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一部由五台南下至寿阳。

11月1日　蒋介石在南翔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各军凡已撤退者，必须返回原阵地，未撤者不得移动。

11月2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昔阳县黄崖底伏击日军。

11月4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一一五师主力设伏侧击日军于广阳（昔阳西三十公里）和沾尚二镇之间。

同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收复朔县。

11月5日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正式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初辖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之间晋东北、冀西、察南地区，分设五个军分区。

同日　日军侵占安阳。

同日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

6日　德意日反共公约在罗马签字。

7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于平定南沾尚镇与广阳之间截击日军三、四千人，激战至次日午时，毙敌三百余，缴获马百余匹，枪数十支，弹药军用品粮食甚多。

8日　日军攻陷太原。

同日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

9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在广阳土封村一带设伏，歼日军二十师团先头部队数百。

同日　淞江陷落。

10日　八路军挺进部队攻克满城。

同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某部攻克赞皇城。

11日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决定：除一一五师一部二千人在聂荣臻带领下留守五台山地区、继续发展晋察冀根据地外，主力转至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游击战争，阻日军南侵；一二〇师留太原附近，肩负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同日 山东惠民陷落。

12日 日军占领上海。

12月23日 日军进陷余杭。

24日 中共山东胶东特委书记李琪领导胶东人民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开展游击战争。

同日 日军侵占杭州。

12月25日 日军侵占济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逃到鲁西南。

经济

6月20日 宋子文以财政部名义，发表改革粤币制令，以一四四为毫券与法币之法定比率。

7月23日 南京财政部令沪关禁止面粉出口。

8月16日 国民党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五万万元。

同日 孔祥熙与捷克签订一千万镑长期借款。

9月8日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或"四行总处"）成立。国民党政府明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并规定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9月 国民党政府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垄断主要农副产品和工矿业及对外贸易。

10月1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正式成立，曹菊如任行长。

10月11日 日军制定《华北各铁路运营纲要》，指令满铁华北事务局经营华北各铁路。

12月20日 "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成立。这个股份公司，集中了伪"满洲国"内各种产业的管理权，受以星野为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的支配。

12月2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统一财政的通令，规定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必须遵照统一财政的原则，建立财政系统，禁止自收自用。

本年 中国茶叶公司在南京成立，经营茶叶内外销售业务。

本年 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改为官商合办银行。

文教

1月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成立。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1所分校和少量专业学校。

3月10日 《希望》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周扬撰文《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

4月29日 《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

5月20日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华讲学访问。

5月 朱兴潜主编《文学杂志》在北平创刊。

7月28日 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

7月 南京大学图书馆毁于战火。

8月19日 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抗战》三日刊。该刊自第七号起被迫改名《抵抗》。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号迁汉口出版。

8月24日 《救亡日报》在上海出版，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笔，阿英任主编。

8月25日 《文学》、《文季》、《中流》、《译文》等四杂志联合编辑的《呐喊》在上海创刊，第二期后改名《烽火》。

9月1日 《文化战线》、《战时联合旬刊》、《光明》杂志战时号外版在上海创刊。

9月5日 《战时妇女》在上海创刊。

同日 《全民通讯社》在太原成立，李公朴任社长。

9月13日 《战线》五日刊在上海创刊，编委为章汉夫等六人。

9月20日 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漫画界救亡协会出版《救亡漫画》创刊号。

9月24日《非常情报》在上海创刊。

9月25日 《战时教育》旬刊在上海创刊。

10月1日 《民族呼声周刊》在上海创刊。

10月29日 西安《解放》周刊分销处被国民党查封。

10月30日 《战时大学》周刊在上海创刊。

11月22日 《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共出版八十五号

12月11日 《群众》杂志在汉口创刊，次年十二月起移重庆出版。

同日 沈钧儒创办《全民周刊》。

本年，抗战文艺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集体创作，最初演出在1931年，剧本于1938年出版）等被广泛演出。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8年

导 言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在山东台儿庄取得抗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这是抗战初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大会坚持"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立场，继续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四月六日到八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举行，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以总裁、副总裁身份主持会议。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条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全会将临时代表大会一系列重大决策付诸实施，标志国民党中央体制纳入了战时轨道。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军在整个战场上的被动态势。日本大本营决定集中30万人夹击徐州。李宗仁为防止日军长驱直入武汉，决定在徐州会战，由于兵力分散，陷入被动，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但赢得部署武汉会战的时间。

五月，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这是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全面考察了抗日战争的发生和发展，精确地预见了战争进程，有力回击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七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并致开幕词。大会发布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号召各党派求同存异，共同救国，但决议大多数并未付诸实施。

七月二十四日，武汉会战开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进攻武汉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武汉会战中，大小战斗数百次，打死打伤日军20万人，极大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至此，日军的战略进攻达到顶点，中国抗战在武汉陷落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由张闻天致开幕词，全会决定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这次全会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针，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十月十二日，长沙发生大火，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种消极的"焦土抗敌"策略的体现。大火给长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被革职留任。

同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大亚湾登陆，华南战争爆发。广东守军一触即溃，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日军仅用十天时间，就占领了广州、虎门等要地，充分暴露国民党军战略失误和防守无能。

年底，汪精卫集团正式叛国投敌。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一直在组织"低调俱乐部"，宣扬"亡国论"。在其亲信高宗武与日本今井武夫等举行重光堂会谈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一行逃离重庆，29日在河内发表艳电，成为可耻的卖国贼和汉奸。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
- ●《论持久战》的发表
-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 ●游击战争
- ●神头岭伏击战
- ●长乐村战斗
- ●台儿庄战役
-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 ●国民参政会召开
- ●徐州失守
- ●武汉会战
- ●长沙大火案
- ●广州失陷
- ●汪精卫投敌

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

背景介绍

抗战初期，共产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情绪不断增长，无论是在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南方各游击区，或是国统区，都出现了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的事件，投降主义倾向已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种倾向作了坚决的批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收效显著，但有部分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再犯错误，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这为王明投降主义的滋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1931年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抗战开始后，他的思想从"左"转向右。1937年11月底与康生等从苏联乘飞机回到延安，王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拼命反对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抗战路线，企图用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一套右倾主张来指挥中国的抗战。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要求下，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并两次发言，在党内抛出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推翻了原来中央的正确路线。"十二月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形成。会议决定成立长江局，由王明任书记。12月25日，王明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继而又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1938年初，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做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这一系列的文章和报告，充分表达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

王明新投降主义的主要错误是：否认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抹杀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主张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用民族斗争压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主张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提出的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胜利的前途，醉心于所谓国共两党共同胜利、共同建国；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和建议(见史料1)。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扫除这种极端有害的投降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报告，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了中央的正确主张。由于毛泽东等对王明错误的抵制，会议未就王明的报告作出正式决议，只是写了一个传达大纲，在延安、华北和边区政府分头进行传达，但受到各地抵制。

1938年4、5月间，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关于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直接纠正了王明错误对各地的影响。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名著，驳斥了王明等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重大战略作用，并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武装全党。在华中，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积极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和抗战的正确路线，与王明进行了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党在华中地区的工作。但总的看来，由于王明投降主义的干扰，华中地区的人民抗战局面未能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开展起来。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国民党的抗战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是非已经基本分明，抗战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上，毛泽

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了抗战十几个月以来的经验。

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王明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斗争。通过十几个月的抗战实践，大多数同志已经基本分清是非，认识到王明投降主义的错误，自觉与王明的右倾错误划清界限。毛泽东在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观点和在战争战略问题上的错误政策。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否定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见史料2)。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错误，它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成熟起来。为党领导人民力量，克服相持阶段的严重困难，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问题只作为局部的个别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没有做组织处理，在撤销长江局以后，仍把他留在延安担任统战部长等职。王明在会上没有检讨，继续坚持、宣扬、辩护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因此，他的缺点和错误在某些地区和部门仍有影响，并导致了"皖南事变"的重大损失。直到党的七大，才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

材料：

· 抗战时期：党中央与王明的三次较量

材料　抗战时期：党中央与王明的三次较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与王明进行了三次较量。正是通过这些较量，才纠正了王明的错误并肃清其错误影响。

第一次较量：是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一切听命于国民党、蒋介石？从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就存在着不同的主张。

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此前后的一些文章和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必须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党内则必须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可是，这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立即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反对洛川会议制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当时，苏联为避免在东西两面对德、日法西斯同时作战，想依靠蒋介石在东方拖住日本，因而主张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尽量服从、迁就蒋介石，与国民党搞好关系。按照苏联的这种意图，王明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在《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中，极力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因而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对于王明的这些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党中央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毛泽东等同志针对王明的右倾主张，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就会使共产党无异于国民党。八路军和游击队应该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在政治上要有区别。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能够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为了抵制和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党中央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其一是继续在全党贯彻自洛川会议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其二是及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6月11日，新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以及到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汇报了中国党的情况。共产国际主席团听取汇报后，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第二次较量：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坚持教条主义？

王明留在延安后，主要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他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讨好毛泽东，但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例如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不会再反人民反共产党了"；继续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1940年春，他还在延安再版他"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3月19日，他在为此书写的"三版序言"中，说什么"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

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为昨日之是"，并说"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学习党的建设和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说明，他不但仍然坚持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还在坚持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企图以他的错误观点影响更多的人。

为了清除王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影响，使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教条主义即主观主义的错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又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整风运动正式展开。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

1943年3月，党中央对中央机构作了调整，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这年5月，共产国际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决定解散。这样，就对进一步清算王明的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次较量：到底应该谁向谁承认错误？

从1943年10月起，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及路线是非问题。在这年9月上旬到10月上旬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认为错误的实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概括了错误的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从此，党中央与王明的斗争和较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43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及右的错误和传达、讨论的步骤、方法。这个指示明确指出，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到六届五中全会达到顶点，遵义会议开始被克服；自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王明又利用长江局进行活动，并且长期坚持错误，但他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错误是：1. 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 迷信国民党，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3. 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 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为肃清其错误的影响，可以在中央局及区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周围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讨论王明在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从此，便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直接批判王明所犯的上述两次错误。

在批判王明错误的同时，党中央还派李富春与王明谈话。11月29日，李富春在同王明谈话时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政治局和七大代表及高级干部正在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希望王明认真作出检讨。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看到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七大即将召开，于是不得不作出检讨错误的表示。12月1日，他让妻子孟庆树代笔并经他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说"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我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然后，他对1941年9月底10月初所谈的意见作了说明，申明他"完全放弃"他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对于1941年夏秋间毛泽东等找他谈话，指出他1937年12月会议及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以前指出的他在妇委和女大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他表示"感谢"。在信的最后，他说："我请求毛主席将此项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这封信看起来挺诚恳的，可是仅仅是一个表示而已，王明并不想真正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仅仅几个月之后，当周恩来于1944年春从重庆回到延安，于2月26日找王明谈话，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错误时，王明却于第二天立即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一系列问题要周下次找他谈话时给他以"指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错误，他指出"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即使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关于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的工作，他说"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观点，但决无大过"。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的工作，他说应"弄清是非"，使他"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所在"。信的最后说，他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

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是非真相的。这哪里有一点检讨错误的样子?其意思很明确:错的并不是他,该检讨的也不是他!

1945年春,延安正在准备召开党的七大。可是王明在五绝《延安春兴》的诗中说:"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明显地表示他有与众不同的心情。

但是,在这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王明还是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

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前,毛泽东把决议的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了,并连续派人做他的工作,劝他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看到七大即将召开,决议即将通过,于是不得已在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那一天,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表示赞成这一决议,并比较系统地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

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他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但不管是不是真心,王明总是对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并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作了比较系统的检查。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结合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点名地批判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所犯的两次错误。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形象地、幽默地说是"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你(国民党)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你不上,至少和你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这是个标准口号,就是这样的东西搞错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党中央与王明的斗争和较量也告一段落。当然,这种斗争和较量并没有到此为止,以后,王明拒绝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苏联公开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结果只能被中国人民所抛弃。

(郭德宏,《党史文汇》91年6期)

《论持久战》的发表

背景介绍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为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揭示抗日战争发展规律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正面战场接连溃败,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在徐州、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武汉又告危急,致使全国形势紧张,人心惶惶。抗战开始前曾流行过的"亡国论"又开始抬头。为了推卸丧师失地的责任,国民党竭力散布"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和则存、战则亡"等失败主义论调,为妥协投降作舆论准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更公开叫嚷"中国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再战必亡",为其投降日本制造借口。身受战争灾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渴望抗日战争胜利,但对战争能否胜利和怎样争取胜利等问题,大多数人也并没有解决。

"速胜论"则是幻想依赖外援迅速取胜的一种论调。1938年4月台儿庄会战胜利后,"速胜论"的鼓吹一时热闹起来。在我们党内,有人看到打了一、二次胜仗也冲昏了头脑,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和轻敌思想。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更是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为了澄清党内外关于抗日战争的混乱思想,指出抗战胜利的道路以及争取胜利的方法,坚定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

《论持久战》共讲了二十一个问题,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九个问题为第一部分,主要阐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客观规律,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中日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指出中日战争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客观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四个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然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和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毛泽东特别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因此,"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就有力地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只见武器不见人的错误。

后十二个问题为第二部分,主要指明中国抗战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应采取的战略战术,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

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必须进行"抗日的政治动员"。同时，还必须武装群众，使战争与人民群众结合，使抗日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为战胜强大的敌人提供根本的保证。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具体条件出发，规定了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为了在战争中达到保存发展自己、削弱和消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还在"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等章节中，借鉴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尽可能的歼灭战"，"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等战术原则。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路线的论述，既有力地反对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又批判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思想。在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具体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终于担负起战略反攻的伟大历史任务，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总结了抗战十个多月的经验，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属于中国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有力地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从而在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争取抗战胜利起了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论持久战》也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唯物辨证法的重要著作，不仅对进行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也是我们学习毛泽东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极好教材。

材料：

- 毛泽东如何论证敌必败我必胜
- 《论持久战》的著者

材料一　毛泽东如何论证敌必败我必胜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第一，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

第二，敌退步我进步。"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中国近百年来，虽然各种内外反动力量给了人民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但"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第三，敌小我大。"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而中国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第四，敌寡助我多助。"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而在中国方面，由于"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毛泽东指出："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

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基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敌弱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在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将继续改变着敌强我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但是，"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能勉强利用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我之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进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便"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选自《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

材料二 《论持久战》的著者

卞之琳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运用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十一月二十日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卞之琳）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为了总结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党的工作，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方针任务，听取和讨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参加这次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项英、博古、王稼祥、康生、彭德怀等12人；中央委员有：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罗迈等5人。此外，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邓小平、贺龙、罗荣桓、谭政、彭真、高岗、罗瑞卿等38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党的"六大"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为了开好这次全会，中央政治局先在9月14日和9月26日两次举行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全会的有关问题，为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全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一致通过了由12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大会主席团。

会上，首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共产国际指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全面总结了十五个月以来抗战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抗战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神圣职责，号召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此外，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会议结束时还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此外，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同志作了地方工作报告。王明在会上也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的

发言，表面上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实际上继续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顽固地对抗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

会议围绕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工作重点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批评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否定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全会批准了党中央的政治报告，并一致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以刘少奇为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的南方局，负责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继续领导新四军和长江以南党的工作，仍以项英为书记。全会还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杨尚昆、彭德怀组成北方局常委，杨尚昆为书记，并成立以郭洪涛为书记的山东分局和以彭真为书记的晋察冀分局。

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并通过了三个文件：《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纪律的决定》，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对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工作规律与组织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此外，还通过了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

会议最后由王稼祥同志致闭幕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对党的全国工作进行了正确的部署。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材料：

·告同志

材料　告同志

——庆祝党的六中全会

柯仲平

啊同志们！战呵战！
战到黄昏后，
夜鸣夜深沉，
西不见长庚，
东不见启明，
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
在那夜深沉的时候，
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

啊同志们！战呵战！
你好好掌舵，
我好好摇桨；
不怕暴风暴，
不怕狂浪狂；
我们中国共产党，
越在危急的关头上，
越有坚定的方向。

啊同志们！我们有
一致的方向，
一致的主张，
我们的团结，
象五个指头
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
每一个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个个同志的岗位都朝中央。

啊同志们！中央说：
持久战线上，
有不少困难；
靠党的领导，
去克服困难。
群众如水党如龙，
能号召起广大的群众，
党的主张就一定能成功。

啊同志们！中央说：
我们要巩固
统一战线的桥，
我们要开辟
民主共和国的道；
再走再走嘛，
就到"自由的王国"了。
我们响应党伟大的号召！

啊同志们！战啊战！
从黄昏战起，
战到夜深沉，
再从夜战起，
战到大天明；
战场上有退有进，
我们共产党的主张不胜利，
我们永远都不收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
作者：柯仲平）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红大。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直属抗日红军中央军事委员会。1937年1月，红大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即改名为抗大。抗大除总校外，还陆续成立了12个分校。抗大前后举办了八期，培养了十几万军政干部，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了伟大贡献。

第一期，1936年6月—1936年12月。1936年6月1日，红大在瓦窑堡中梁山上阎家大院创立。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学生共1038人，分为三科，都是红军干部。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红大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办红大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为革命储蓄干部。1936年7月，红大一、二科移驻保安（今志丹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第一期红大学生于1936年12月底结业，奔赴新的岗位。

第二期，1937年1月—1937年8月。1937年1月，红大进驻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原在甘肃环县的红大三科迁到甘肃庆阳，同二、四方面军的两个步兵学校合并成红大第二校，后改称"抗大步兵学校"。1月20日，二期正式开学。《抗大招生广告》宣布："本校直属于抗日红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和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报考"。学生年龄在18—28岁。这期学生中工农干部占多数，知识青年占少数。学生共2,762人，编为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主要是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第四大队主要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学生，聂荣臻、董必武分别兼任四大队的队长和政委。这期开始，抗大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和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担任副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除总校外，抗大步校共编四个营、13个队，学员都是红军班排干部，由刘伯承兼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抗大的同学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于8月毕业出校，奔赴抗日前线。在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也同时毕业，并结束了抗大步校。

第三期，1937年8月—1938年3月。1937年8月1日，三期在延安开学。共有学员1372人，编为三个大队。学员大多是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这期开学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被任命为一一五师师长，离校赴山西前线，学校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主持。1938年2月，罗瑞卿任副校长，许光达任教育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学校颁布的《组织条令》写入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从这期起，抗大还设立了军事队，结合当时作战的特点进行军事训练。1938年3月和5月，第三期学生分别毕业，奔赴抗日战场。

第四期，1938年4月—1938年12月。党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后，抗大的门打开了。1938年4月16日，四期在延安开学。这是抗大空前大发展的一期，共收学员5562人，编为八个大队。其中女生654人，编为第八大队，张琴秋任大队长。由于学员空前增多，延安原来的校舍容纳不下，因此除延安四个大队外，其余分驻在瓦窑堡、蟠龙和庆阳等地。学校颁布的《组织条令》总则中规定了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随着抗大声誉的迅速提高，来抗大参观访问的人越来越多。1938年夏，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雷克兰、付路德等人来延安参观，他们对抗大的教学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抗大接收他们为名誉学员。1938年12月，毛泽东为第四期毕业同学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励，光明就在前面"。

第五期，1939年1月—1939年12月。这一期举办时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培养大批干部，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决定在敌后建立抗大分校。第一分校：由抗大五、六大队与三、四大队各一部分，以及陕北公学一部分、原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分合并组成。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黄欧东，训练部长韦国清。1939年2月初，一分校在晋东南潞城县故县一带举行了开学典礼，也称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后来，一分校在通化并入总校，编为三大队。第二分校：由抗大七大队和一大队四支队为基础，加上二、三、四大队的一部分以及陕北公学分校、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各一部分等组成。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袁子钦，训练部长张平凯。1939年3月，二分校在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开学，9月移驻神南镇。1943年初，二分校一部分调回陕北，归入总校，其余则陆续分配到其他单位，二分校即行结束。抗大总校第五期于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开学。学生4962人，编为五个大队，并增设了参谋训练队、敌军工作训练队、工人大队等以培养专业干部。由于日寇企图进攻边区，加之边区贫穷、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总校移驻晋东南。1939年7月10日，总校出发东征，由于敌人大举"扫荡"晋东南根据地，遂改向晋察冀边区进发。9月下旬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1940年元旦，总校和二分校在陈庄联合举行毕业欢送会，欢送五期学员到八路军去工作。1939年7月总校东迁时，留在延安的一部分组成了抗大第三分校，以保证培养陕甘宁边区和留守兵团的干部以及附近省区来就学的青年。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副校长陈奇涵(后任校长)，教育长张振风，政治部主任李逸民。1941年12月，三分校改组为军事学院，1943年3月与抗大总校合编。

第六期，1940年4月—1940年12月。1940年2月10日，总校离开陈庄，26日到达山西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一带。4月15日，在蟠龙镇举行了第六期开学典礼。这一期共收学员四千九百余人。他们主要是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及山西抗日决死队的工农干部。1940年6月，罗瑞卿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由滕代远调任抗大副校长。第六期学员于1940年12月毕业，分赴各抗日根据地。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需要更多的干部，因此，这一期又成立了抗大第四、五、六分校。第四分校：1940年3月18日成立于安徽涡阳县北麻冢集。校长彭雪枫，副校长吴芝圃、张震，教育长方中铎。1944年，彭雪枫牺牲后，四分校改名为"雪枫军政大学"。抗战胜利后，四分校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苏北公学合并，改名为"华中雪枫大学"，接受新的任务。第五分校：1940年9月在江苏盐城成立，陈毅任校长兼政委，赖传珠、冯定、洪学智、韩振纪等先后任副校长。1941年后，五分校的主要部分改为抗大华中总分校，设在苏北阜宁，1943年春，五分校在淮南牛沛湾结束。第六分校：1940年11月成立于太行区武乡。校长刘忠、政委黄欧东。1942年4月，六分校合并入总校。

第七期，1941年1月—1941年12月。抗大第七期于1941年1月7日在河北省刑台县浆水镇正式开学，共收学员928人。总校还设立了附属陆军中学，接收部队中的青年基层干部，进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训练。这一期编印出版了军事、政治、文化、卫生教材41种，印数18036册。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七期毕业学员，分批返回抗日的战斗岗位。在总校开办第七期的期间，又先后成立了第七、八分校。第七分校：1941年7月26日成立于晋西兴县李家湾。校长周士第，副校长俞楚杰，政委徐文烈。1943年3月七分校迁到绥德合并于总校。第八分校：1941年5月4日成立于安徽天长县。校长张云逸，副校长罗炳辉，教育长冯文华。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八分校学员提前毕业参加大反攻，八分校正式结束。

第八期，1942年5月—1945年8月。1942年5月抗大第八期在河北刑台浆水镇开学，共收学员2156人。1943年3月，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县。滕代远调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后，党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何长工为副校长，李井泉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于部队精简和需要保存、培养、提高干部，这期的学员学习时间最长。八期学员参加了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于1945年8月胜利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大反攻。在这期期间，抗大九、十分校和太岳、太行分校相继成立。第九分校：1942年5月成立于江苏南通的海夏镇。校长粟裕，教育长杜平，政治部主任张崇文。1944年后合并于华中雪枫大学。第十分校：成立于1942年春，李先念兼任校长和政委。1945年2月奉命结束。1945年春，太岳、太行分校分别在山西沁水、河北涉县成立。1945年冬，这两个分校与总校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了晋冀鲁豫军政大学。

抗大是伟大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救国声中诞生，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成长壮大，最后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1945年10月，抗大迁至黑龙江省北安，不久转到齐齐哈尔市，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材料：

- 毛主席给我们讲课
- 清凉山下的故事
- 刘伯承谈"抗大"

材料一　毛主席给我们讲课
——回忆延安"抗大"

1937年冬，我回到了昼思夜盼的革命圣地、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组织上决定要我参加"抗大"学习。我作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的插班生，被编入第二大队六队。学习期间，我有幸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和蔼可亲的面容，以及充满智慧哲理的妙趣横生的马列主义演讲，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成为鼓舞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上"坚贞不渝跟党走"的巨大动力。

一

1938年刚开春(日期记不清了)在批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开会的地点，是在我们六队住地不远的一个大窑洞里。这是原来的一座旧窑洞，圆不圆，方不方，中间有几根粗柱子顶着。参加会议的大约有100多人，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当时，张国焘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四天，上午和下午全天都开，每天八个小时。毛主席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不少同志发言，其中有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发言的内容，既有批判，也有自我检讨，主要是检查个人在张国焘右倾错误的影响下犯了错误的教训。

我原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的基层干部，作为学员队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我不了解情况，只是受教育，没有发言。但我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直接受害者，三次过草地，又经历了西路军失败的悲惨遭遇，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而我过去一直并不清楚所以遭那么多罪，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恶果！

毛主席坐在我斜对面不远的地方，我出于崇敬和好奇，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在会上，毛主席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一边仔细地听，一边不停地记。有时，一边抽烟，一边凝神思索，随着会场气氛的起伏变化。毛主席也时常抬起头来，察看发言人和听会者的面部表情。

我们以为，毛主席在这么严肃、重要的会议上是一定要讲话的。可毛主席始终没有讲什么，只是静听，而且从不打断任何人的发言。发言的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讲多少，算多少；是自我检查，自我认识，没有批斗。

通过这次会，我知道了张国焘的一些情况，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些受他骗的人，跟着他做了一些错事。我感到，党中央、毛主席真是宽宏大量，确实是搞"五湖四海"，对这些人，包括对张国焘本人，都是耐心教育、全力挽救，只要决心改正错误，都给他们以信任和重用。

二

毛主席经常给"抗大"学员讲话和讲课，主要是作政治报告，讲革命斗争形势，进行思想教育。我听他的演讲，算起来不下六、七次。

毛主席每次给我们学员讲话，都比较随便，从不拿稿子，不是照着稿子念。有时，他也在小本本上，或小纸片上，写几个字或几句话，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毛主席的思想博大精深，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讲话的声调很平和，十分诙谐、风趣，使人听了上句，还想听下句，越听越爱听。时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两个小时，甚至半天。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周昆事件"之后的那次讲话。时间，是1938年2月，在毛主席住的窑洞前面，那块狭长的向阳坡的草坪上。我们两个大队的学员，集合后排着横队席地而坐。在队伍正面的半坡上，放了一张长条桌，一个小木凳。毛主席就坐在对面的小木凳上，给我们讲话。

这天，天气虽然晴朗，却刮着飕飕的西北风。大家身上穿着棉衣，还觉得有点冷！毛主席却很精神，刚开始讲话就摘下了红五星的八角帽，放在桌子上。北风从背后一吹，他那往后梳的长发，被吹得一缕缕地跑到前面，遮在脸上和眼上。因此，他讲话中，总爱用手不断向后拢自己的头发。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讲到了当时的抗日战场，平型关一战，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毛主席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论调，提出了"打持久战"的光辉思想。

在讲到"抗大"学员的任务时，毛主席说："你们中绝大多数同志是红军，是经过长征的，过过草地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是用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等你们毕业了，都要到敌后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你们大家有的从前线来，有的从红军来，不论来自哪个'山头'，都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因为我们的革命目标一致，就是要干共产主义，要革命到底"。毛主席讲到这里，突然把话锋一转，郑重的说："我们有的人立场不坚定，革命革到半道上，就动摇了，变坏了，溜掉了，周昆，就是这样的人！"他大声向大家提问："周昆——，他不革命了！我们怎么办?!"

这一问，大家全楞神了！有的，不知道周昆是谁?有的知道周昆这个人，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毛主席简要地向大家讲了"周昆事件"的始末。

周昆，是115师的参谋长（师长是林彪），组织上派他去武汉领军饷，到了那里就被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被“金钱美女”迷住了，背叛了革命，不回来了！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坐的，今天来听我讲话的，都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生活的考验和锻炼的。对你们的要求应该更高。周昆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学！长征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都战胜了，还惧怕艰苦困难吗？大家只要不忘自己是红军，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就不能半截子革命，中途逃跑！

最后，毛主席向大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要求，而且讲得很诙谐，风趣，几乎是一字一顿，把声调拖得很长：“我——希望——我们——男同志，要——革命——第一，老婆——第二！”停顿稍许，他凝视着在前排的十几位女同志，接着说：“我们的——女同胞——你们——要革命第一，老公（指男人）——第二—”。这时，全场“哗——”地大笑起来。特别是女同志，被大伙笑得很不好意思。可大家都觉得，毛主席讲的，话语通俗，道理深刻，句句千斤重，一辈子都忘不掉。

三

大约是1938年4月的中下旬，记得当时大家都身穿夹衣，“抗大”第三期学员的紧张学习生活胜利结束了。我们全体毕业学员，集合在天主教堂，这是延安城唯一的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毛主席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向毕业学员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座教堂，能容纳五、六百人。我坐的是第一排长凳，靠近右边台口的第一个位子。我们刚坐下不大功夫，毛主席便从外面走了进来。这时，全体起立、鼓掌，欢迎首长的到来。毛主席进来后，没有马上到台上去，而是在最前排的第一条长凳上，紧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主持会议的首长请他到台上就坐，他摆了摆手，示意：“还是坐在台下好！”我一看毛主席在自己身旁坐下了，感到十分局促，心里不知是高兴，还是紧张。总之，非常激动，简直连大气也不敢喘了。我挺直腰板，目视前方，一动不动地坐着，生怕打扰了主席。我没敢主动同毛主席答话，而我的目光，却像会拐弯似的，一刻也没有从毛主席的身上移开。

毛主席举止文雅，容光焕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考问题，直到会议开始以后，主持会议的首长请毛主席上台讲话，他才慢慢走上台去。

毛主席走到台上，往讲桌后面一坐，便给我们讲起话来。到这时，我才稍稍松弛了一下，动了动身子，专心一意地听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在讲了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的形势后，着重讲了“抗大”毕业学员的任务。

毛主席说，你们在延安这个地方，在“抗大”这座“大熔炉”里，学习了半年多马列主义，经历了艰苦生活的锻炼，都成为抗日的骨干了。毕业后，你们就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到华北去，到华东去，充实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去打鬼子，去开辟的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有的口头上喊“抗日”，暗中却在不断同我们搞“磨擦”，阻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打鬼子，你们到了敌后，要分辨敌、伪、顽军，情况很复杂。他说，我们同国民党的“合作”实际是“有分有合”，他不抗日就“分”，他抗日就“合”。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怎么样坚持呢？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下中农、依靠广大的劳苦群众，人民群众是坚决主张抗日。我们要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各种各样愿意同我们一道抗日的人，尤其要注意团结各界积极参加抗战的民主人士，共同打鬼子，打败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

毛主席说，我们国土大、人口多，坚持抗战的有利条件很多，你们到了敌后，扎根于人民群众中间，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回旋的余地大得很，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的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威名远震！形势是很好的。同时，我们面前的困难也很大。在力量的对比上，是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更是敌人占优势，我们处于劣势。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发扬过去“艰苦奋斗、英雄顽强”的革命精神，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取武器，装备我们自己。正象一首歌曲里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要以自己的“劣势”，去战胜敌人的“优势”！

毛主席接着指出：当然，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他打了个比方，对我们大家说：“你们二大队住在北门外，到这里来开会，怎么走呢？不是一直走来的，得拐好几个弯，才能走进这个门。”毛主席用手指着教堂的门说：“这个门是朝南开的，你们要回去，出门要先往南走，再向西拐，上了大街、再往北拐，出了北门，还要往右再拐个大弯子，才能回到住地。革命更复杂，道路更不是笔直的，要准备克服困难，走曲折的路。”

毛主席的讲话，不时被一阵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这次毕业典礼，会场气氛异常热烈而隆重。会后，每人发了个毕业证章。证章是圆形的，黄铜做的，看上去金灿灿的，很招人喜爱！

（选自《党史纵览》，作者：唐青山）

材料二 清凉山下的故事
——延安抗大见闻

毛主席给我们讲课

1938年，毛泽东同志多次给我们抗大第四期的学员上课，以极大的热情关怀和培育我们成长，希望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转变思想，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奔赴抗日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时候的课堂，就在操场上或大院子里，既没有讲台，又没有扩音器，只有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当讲桌。不管夏天日晒，冬天风吹，毛泽东同志都是站在小桌的后面讲课，一讲就是二、三个小时。我们全大队的几百名学员，有时是几个大队的一、二千名学员共同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敬听。

毛主席在讲正课之前或讲课中，有时加上几句风趣感人的话，当场引起我们哈哈大笑，课后回味，言短意深，语重心长。

——共产党人要选重担子挑

毛主席说：你们不辞辛劳，不怕危险，越过国民党的封锁，不远千里，来到延安，就是慕共产党之名而来的。在白区传说共产党人很神秘，其实并不神秘。现在我用个最简单的比喻，说明共产党员是什么人。他用手指着桌面说，这里有三副担子：这一副八十斤，这一副一百斤，这一副一百二十斤。谁选一百二十斤的这副担子挑，谁就是共产党人。

——卸下肩上的×，吃饭就香了

毛主席对学员们说，听说你们进入抗大之后，吃小米、土豆，吃得很香，身体也较强壮了。过去你们在白区时，大米白面吃得不香，有时甚至吃不下去，原因何在呢？就是你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一个×，这个×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来。你们回想一下，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令在中国的报刊上，不得出现"抗日"等字样。所以报刊上把"抗日"都印成"抗×"，你们来到延安之后，可以"抗日"，而不"抗×"了，所以吃饭就香了。

——干革命就要敢吃辣椒

毛主席说，听说你们有些人不吃辣椒，我看吃辣椒也表现出一种革命精神：你辣，我不怕你，而且我敢吃掉你。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你凶狠，我不怕你，而且我敢打倒你，吃掉你。

——免费旅行

毛主席对学员们说，你们毕业之后，就要分配到敌后各抗日战场上去了，就要上前线了。到了那里，就要准备吃更大的苦，耐更大的劳，还要准备牺牲，那么，当一名革命战士，对自己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呢？不是，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旅行，不但不收路费，还有武装护送。

1938年12月12日，我辞别了游泳过的延河和多次攀登过的宝塔山，在毛泽东同志教言的鼓舞下，肩负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重担，离开革命圣地延安，渡过波涛滚滚的黄河，翻过积雪深厚的绵山，向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前进，年底到达师部，成为师部的一名见习参谋。接着，向山东敌人后方进军，开始了"武装旅行"。在艰险的征途中，有些同学挑着重担，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不论何时每每忆及毛泽东同志这些风趣、幽默的教言，就感到浑身都是力量。

朱老总的艰苦朴素本色

一个上午，天高气爽。我们抗大第四期的学生，坐在延安清凉山下，远远地看着朱总司令，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给我们讲抗日游击战问题，并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除了学习军事政治之外，还要学习红军时期养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他和祥的面孔、庄重亲切的语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抗大毕业后，我受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见习参谋，便知道一一五师的前身，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亲自组建和培育出来的。在井冈山时，朱总司令在山上种南瓜，到山下担米担柴，在他用的扁担上，还刻着"朱德记"三个字。

老同志们都很怀念、尊重朱总司令。我还记得当时为朱总司令祝寿的一支歌："号儿吹，嘀哒哒，朱总司令顶呱呱，困难他不怕；担担子，吃南瓜，井冈山上人人夸，谁人不说他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家。"

以后，朱老总留给我的艰苦朴素的印象就更加强烈了。

贺龙同志勉励女生大队

1938年秋，抗大组建了女生大队，称第八大队。一天下午，我们四大队奉命去参加女生大队成立大会，会场就在延安清凉山下抗大的校院内。在会场前面，放置了一个方桌和几条长凳，当作主席台。

这一天风和日暖，气温宜人，我排列在四大队的前排，距"主席台"大约十多米。我们席地而坐，唱了几支歌，就看到毛泽东、贺龙、肖克等同志进入会场就座。毛泽东同志，面色红润，神采奕奕，在开会之前，还和当时的青年将领肖克同志开玩笑，显示出格外高兴的样子。

大会开始之后，毛泽东同志请贺龙同志讲话。贺龙同

志面带笑容，心情振奋，他讲了一段祝词之后，很高兴地说："我们的中华女儿一向是具有爱国和习武的光荣传统，不但古代出了不少象花木兰、穆桂英一样的巾帼英雄，就是现代也有一些领导农民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英雄。其中一个是南大脚板，这个人姓南，因为不缠足，所以当地人都用这个称呼，代替了她的真名。她带领一部分起义农民，占据有利地形，曾几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她的进攻。一个是贺英。贺英是我的姐姐，她眼光远大，比我高明，她曾两次帮助我重建革命武装。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我奉命到了香港。这年11月，我由香港到了上海，向中央提出我要回湖南老家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西苏区的建议。经中央同意之后，我于1928年2月，回到桑植县境，当时贺英领导游击队，已在那里创建一块苏区。3月，她把游击队的主要兵力交给我，和王炳南同志带来的参加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组成工农革命军，我任军长；她带领留下的那一部分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第二次是这年8月，我奉命率工农革命军东进，当时我想为了壮大这个军的力量，更有力地执行东进任务，便和她商量，希望把她的游击队都充实到这个军里来，她说，不能连根拔，必须留下一些老底子在这里坚持斗争，保存这一块苏区，牵制敌人的兵力。万一将来你再失败了，回来还有一个立足之点。

"正象她预料的一样，这年9月，我在东进途中，遭受敌人袭击，军参谋长和一个师长牺牲，部队大部失散，转回桑植苏区之后，人枪皆不满一百，那时贺英给我很大安慰和鼓励，并帮助我扩大部队，提供军用物资。1929年3月，我率部队攻克鹤峰县城，部队发展到一千余人，成立了第一路指挥部，在这个基础上，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来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希望你们继承和发扬中华女儿的光荣传统，向巾帼英雄和革命先烈学习，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后，具有远见卓识的帼国英雄贺英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学员们的心里。女生大队的姑娘们，没有辜负贺龙同志的教言，毕业之后，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战不息，在中国妇女史上，谱写了无数光辉的篇章。

（选自《党史纵横》91年1期，作者：周示亭）

材料三　刘伯承谈"抗大"

记得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同志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作'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唻！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唻——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唻——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唻！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就是嘛！他们是老教授了。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能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答刘伯承同志。

"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刘伯承同志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选自《横戈马上》，作者：杨得志）

游击战争

背景介绍

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抗日作战方针"基本是游击战"的指示精神，在华北和江南战场上，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军官兵深入群众，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起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立和发展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我全体军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中，最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

材料：

- 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 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 打游击战
- 斩断华北日军的动脉
- 江南抗战之春
- 江南游击区横断面
- 活跃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队
- 铁道游击队"飞车夺枪"
-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 冀南战事

材料一　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致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

（一）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的方式。

（三）根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发动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拨给养等。

（五）在范专员丁专员的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六）吸收民间的枪枝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来当游击队。筹粮筹款以自愿及公平摊派为原则，并注意逮捕城市及车站的大批汉奸筹款。

（七）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可能时，再组织农会及青年团体。

（八）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

（九）发展党的组织一般要保守秘密。

材料二　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致项英）

项英同志：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下略）

毛泽东

材料三　打游击战

萧向荣

一

日本鬼，真猖狂，
要把中国来灭亡，
占了我们东四省，
又向全国动刀枪。
亡国灭种遭大祸，
图存唯有来抵抗。
敌军采用阵地战，
游击战争在我方。

二

游击战，好主张：
专打敌人侧后方，
敌军占领我城市，
我把山地作战场，

集中分散无一定，
东南西北走四方，
打得赢时我就打，
打不赢时走个光。

三

游击战，好主张：
游击战术要擅长，
秘密迅速并坚决，
胆大心细去思量，
敌军前进我袭击，
敌驻我扰使敌慌，
当敌疲劳我就打，
敌退我追好缴枪，

四

游击战，好主张：
游击任务要端详，
创造抗日根据地，
肃清汉奸保家乡。

动员民众来参战，
组织民众搞武装，
积极坚持持久战，
反对妥协搞投降。

五

游击战，好主张：
积极行动向敌方，
切断敌军联络线，
破坏敌军的桥梁，
剪断敌军电话线，
袭击敌军的车辆，
迫敌兵力都分散，
不好攻来不好防。

六

游击战，好主张：

配合主力来抵抗。
你打门面我拖脚，
你杀敌人我缴枪。
全国同胞都努力，
发展游击敌后方，
千万人民来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方。

一九三九年三月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
作者：萧向荣）

材料四　斩断华北日军的动脉

二月的晋中平原，深夜还是刺骨地寒冷，繁忙了一天的平社小站静下来了，站台上几盏昏暗的气灯在寒风中摇摇摆摆。站里的日本兵，打完牌、喝点酒，刚睡下，灯还没熄。只有两个日本兵在站台上来回巡逻。那个高个的大约听到什么动静，探头探脑地向前张望，忽地，一双铁钳似的大手从背后紧紧卡住了他的脖子，还没醒过来，已经断了气。另一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什么的干活？"话音未落，只见寒光一闪，一个结实的身影一跃而起，一刀结果了他。这正是八路军夜袭平社站。

2月下旬，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亲自坐镇大盂镇，率3个团及1个营的兵力开赴同蒲路北段，对太原、忻县间的铁路、公路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击战。

2月18日，一列满载日军增援部队的火车，由高村方向开来。120师715团在团长王尚荣率领下，埋伏在平社以南黄岭村。当列车完全开进埋伏圈，猛烈的炮火打得鬼子晕头转向，伤亡100多人，分别向青龙，平社方向撤退。战士们轰炸了火车，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这一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兄弟团的士气。

359旅717团是120师野战的主力，团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经过分析敌情和地理环境，一整套破袭计划酝酿成熟了。通过化装侦察查明，同蒲路上重要车站——平社站只住着鬼子中野九吉的小队70多人，正适合采取奔袭手段，攻其不备歼灭该敌。

2月22日晚，717团急行军一百多里地，深夜接近了平社站。该团3营奉命切断站上有线电话、剪破站台外的铁丝网，为10营、2营的突袭开路。战士们越过铁丝网，冲进鬼子的老窝，抢先缴了立在墙边的三挺歪把子枪。战士们个个不含糊，枪上膛怒目而视："不许动，举起手来！"

守站的鬼子还没醒过味来，就乖乖地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共歼敌5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步枪、机关枪10多支。还完全破坏了附近的通讯和铁道。

平社镇是鬼子的据点，驻着日军200余人，岗楼上耀武扬威地排着两门东洋造迫击炮。战士们埋伏在镇外，磨拳察掌。冲锋号一响，如下山的猛虎，勇敢地向镇上冲去。敌人仗着有利地形企图顽抗，激战2个小时，鬼子到底招架不住，第二天在援兵接应下弃城向东北方向逃窜，一路上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而717团的战士愈战愈勇，乘胜追击，连克豆罗村，麻会镇据点。

豆罗村的老百姓一听说战士们3天3夜没好好吃顿饭、睡个觉，还要连夜开拔，心疼地拉着子弟兵，千叮咛万嘱咐，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塞给战士们。群众的支持鼓舞了士气，战士们都暗下决心，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

24日，717团由豆罗村南下，攻克同蒲路东侧关城镇、石岭关两据点，守敌狼狈向南逃去。

第2天拂晓，717团派2个连的兵力在关城镇西北设伏，准备伏击日寇1个汽车队，团主力转到平社镇以西等待时机。上午八时，二十四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粮食，由北向南行驶。待车队行驶到上佐村，设伏部队当即向敌出击。敌人慌忙下车，依据有利地势和武器，拚命顽抗，双方形成对峙状态。717团又派出2个连快速绕到上佐村西侧，向敌人右翼侧击，击毁敌人汽车2辆。鬼子见势，忙收缩兵力，退到路边固守待援。不久敌人增派300多人的援兵，还出动8架飞机向我方阵地连续投了数十枚炸弹。一时间硝烟弥漫，烈火腾空，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战士们浴血奋战，终于打退敌人进攻，并炸毁5辆汽车。

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第4大队1营派3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同蒲路以西原平镇，占领了原平车站。站上鬼子退到民房里，负隅顽抗，手榴弹、机关枪发了疯似地向3连扫过来。敌人如此猖狂，不仅没有吓倒3连，战士们反而愈战愈勇。一部分人绕到房后小山包上，

从背后夹击，一举攻入房屋，鬼子没命向南撤退。没出几里地，迎头碰到早已埋伏在班村营的1连，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俘虏鬼子少佐1个，日伪2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在1连掩护下，一千多群众组织起来，放火烧了原平站房，破坏了鬼子留在站里大部分设备，割电线几千斤，切断了它同其它镇子的通讯联络，还截断了平社、原平间铁路。

忻口位于原平以南，不仅是自古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而且是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敌人派200人把守，城门口设双岗，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原平一战之后，敌人更加恐慌，为了壮胆，整夜枪炮齐鸣，如临大敌。

4大队为攻克忻口，歼灭守镇之路，根据上级部署，大队长李和辉、政委肖文玖作了周密安排：1营袭击忻口镇；2营、3营掩护、警戒。22日下午，各分队提前开饭，炊事员老吴头给每人盛了冒尖一碗小米饭，黄澄澄香喷喷的，乐哈哈地说："多吃点，吃饱了好打小鬼子。"黄昏时分，部队从龙王堂出发，急行军于21点到达冲击位置。1连埋伏在距忻口镇北250米小丘上；3连绕到镇西高地附近；2连分两路，一路沿同蒲路南下警戒忻州之敌，一路绕到西南向镇内进攻。22点，冲锋号嘹亮，划破寒夜的寂静，上了刺刀，各连都从埋伏地点冲出，跑着、跳着、呐喊着，掷出手榴弹，一时间忻口镇枪声、炮声震天。我军借助土墙、麻包和石碾子，同守城敌人展开了巷战，火光把小镇映得通红。我军采取分割包围的方法歼敌一部。守城敌人生怕固守村落有被全歼的危险，急忙拼全力，连滚带爬地向村西突围，靠手榴弹、机关枪密集火力抢占了镇西高地，坚守顽抗，等待援兵。我军乘胜组织火力围攻该敌。

战斗持续了一夜，东方破晓，初春的阳光斜照在晋北平原上，激战一宿的战士毫无倦意。这次战斗共歼敌60多人，缴获手枪15支。

从2月18日到27日，八路军经过几昼夜的顽强战斗，相继占领了同蒲路平社、原平、田庄等车站7处，及邻近的村镇；在广大群众大力支援下，炸毁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铁路10余公里，搬掉铁轨，使同蒲路陷于瘫痪，敌人运输一度停滞，截断了北面敌人增援太原，策应了正面部队。

（选自《百战图》，作者：郭颖）

材料五　江南抗战之春

慰劳新四军

我到某部队检查工作要经过七十里程，走了约莫五十里之后，途中看见二、三十人成群的一队，吹着萧笛，打着锣鼓，往前悠扬行进，后面抬着鞋子、毛巾、衣服，也有一部分鸡、鸭、鱼、肉和喜炮之类的东西，一共有十几担。我猜是结婚？但当中缺少一顶花轿。又猜是迎神？但找不出任何宗教仪式的标志。猜是祝寿？但寿礼不会送这多衣鞋。我正要问，我的马已冲到他们跟前。他们停止吹打，让在一边，大家喊：

"官长骑马来了！"

这句话使我想起官与民的界线，是这么深，是谁筑起的这一道墙，我们应把它完全拆毁！我随口问：

"你们到哪儿去？做什么的？"

"我们是慰劳军队的。"

"慰劳哪个军队？"

"慰劳新四军。"

哦！他们原来是我们部队的客人，我于是跳下马和他们谈谈，我提议：

"大家坐一下吧！"

"好，你坐，官长！"

我仔细一瞄，中间有一个老头子打鼓，三个青年：两个吹萧笛，一个拉胡琴。五个农民打大锣小锣和边鼓，其余的人挑着慰劳品，还有七、八个儿童跟着，我很感兴趣。

我问："你们为什么慰劳他们？"

"他们的纪律好，打日本！"老头子说。

"我们常常看见他们活捉日本兵！"另一个老头子又补充一句。

"我的大哥在那里当兵！"一个青年说。

"他们在我们村上住过很久，常教我们唱歌，他们很喜欢我们。"儿童中的一个抢着回答。

"为什么不多送些猪肉鸡鸭呢？"我又问。

老头子说："官长，你不知道，他们军队最缺乏鞋、袜、手巾、衣服，每人每月配不着一双鞋，几个月配不着一双袜，去年冬天只发一套棉衣，还是在快要下雪了才发下来。眼前衣服早穿烂了；我们慰劳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实际需要。"

"这是谁的主意？"我又问。

青年抢着说："这是我们青抗会讨论过的，也是他们军队服务团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我们去年夏天看见邻乡慰劳吃的东西太多，反叫他们吃得生病了。所以我们就换一个办法。"

"他说得还不全对！"另一个农民抢着把话头接过去："我们村上王先生，他是本县的首富大先生，办了几十桌酒席招待新四军的弟兄们，还请许多老百姓作陪客。王先生以前听见人说新四军如何如何对有钱人不好，现在看见，才证明是相反的，所以办酒席来招待。在酒席上那个营长道谢，还说国难时期，象这样太花费了，先生这样热心帮助军队，还不如换一个办法，用办酒席的钱，办鞋袜，那就更合军队的需要了。"

"这回慰劳是不是新四军要保甲长派下来的呢？"我又问。

"不是的。他们常常找保甲长办事，也常常跟保甲长商量许多问题。保甲长派差事，他们总觉得不好，总说应该先与老百姓商量，讲清道理，不强迫！"老头子第二次发言。

我又加上几句：

"你们老百姓受日本鬼子烧杀，已经很苦，哪里还有钱慰劳军队，太不应该了，军队受你们慰劳是很惭愧的！"

我这话使他们转移到新的问题：

"请问官长，你是新四军吗？"

我说："是的。"

"你是官长吗？"

"是的"。

"好大的官？"

"请你猜。"

"排长，啊，连长吧！"

"连长无马骑吧？"

"恐怕是营长。"

"恐怕是团长或司令？"

"对了，差不多我就是一个司令吧！"

"哈哈，怪和气的新四军司令。说起司令，日本鬼子来了后，江南司令真正多，大小游击司令差不多天天屙尿都碰得到，新四军来了后，部队扩大和整编，有些被日本人打散了，有些参加了新四军，现在抗战有进步，江南的司令也少了，司令的威风也看不见了。你这个司令怪和气，反而不象一个司令样子！哈哈！"一个老人很感慨地絮絮叨叨地说。

"你的话完全对，我是新四军的司令，你来慰劳的那个部队，我也要去那里，我替你们引路。"我提议继续前进，我一马当先引路向前。

"好呀！司令替我们带路哟！"行列中有几个人这样同声喊叫着。

在乐声洋溢的行进中，我们很快到了那个部队的驻地。

晚间，部队举行了一个晚会。欢迎来慰劳的人们。政治部送来这一天各地民众慰问品的清单一张，计开：

布鞋七百双，衬衣一百件、毛巾五百条、鸡八个、鸭四个、鱼二十条、糖果半篮、面七斤。

菜冈设埋伏，麦林抓俘虏

北方的青纱帐遮盖田野的时候，是最好的围困敌人的季候，在江南也有与这类似的一种可爱的春景：麦林和菜花林，虽不及青纱帐那样高，但也很长，人站在里面只露出上半身，坐在里面，过路人走在近旁也看不见。

聪明的日本鬼子就上过这样一次当。

丹阳日本兵二百多人，下乡追捕抗日分子，强迫组织反共青年团，绑架绅士到城内写降表再放回来，这样加紧制造汉奸分子，同时放出空气，不归顺的就全村全乡以通新四军论罪。日寇更利用中国旧时代的传说，加以曲解来进行欺骗。例如说他们是秦始皇时代的徐福的子孙，为了求仙飘流海外的，现在到中国来，是亡子归宗，中国人务要收留，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鬼话。借此达到消除中国人民抗日意识的目的，这就是日寇在今年春天的新政策。若说这个政策完全无效，那是假的，它显然在某些地方起了欺骗作用，我们已经听到有人发表"日本军变好了"的谬论。

这一次，我们一个主力连带二个地方部队，在鬼子下乡的归途上布下埋伏。指战员们隐藏在一线起伏小高地的菜田麦陇里，耐心等着，弯着腰等上几个钟头。有人不耐烦了，嘀咕着："鬼子不会来了吧！""怕走另一条路回去了哩！""早点撤回吧！久等无用。""争取另一个时机吧！"但是指挥员的决心绝不动摇，时时低声发出警告："不要分心，肃静！""不要打瞌睡！""不要伸头望外！""埋伏的原则就是肃静耐心。如果暴露目标，就会被人发觉而使伏击无效。"

及时的政治鼓动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记得有个中央社的新闻记者对我说过："我看你们部队很活泼，恐怕是难得做到几分钟不唱歌、不讲话、不谈笑的。"这话指出了我们部队的优点，也说着了我们部队比较散漫的毛病。在伏击场合，就要特别注意纠正这一点。

耐心等待着，看看太阳要落山了，忽然低声传来："发现敌人！"全体兴奋极了，但更不敢轻动，大地上显得比死灭还肃静，这是过渡时间的静寂，也是过渡时间的紧张。大家知道敌人愈逼愈近，但不敢抬头看一看，这个时候，只有指挥员先饱眼福。大家静待命令下来，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心中想："这回该痛快干一下啦！"

"第八连沿麦田匍匐前进，抢先控制住敌人的前进道路，堵击敌人，要等敌人接近我时才开火。"大家看着八连迅速出动了。

"金坛游击队等敌人过了桥，立即跑步占领桥头，阻敌退路，用火力封锁，压迫敌人投向第八连的火网。"我们又看着金坛游击队的同志们，弯着腰悄悄地跑步前进。

"丹阳游击队跟我来，协助第八连解决当面之敌，并作预备队。"

"呼"的一声枪响，同时响起手榴弹的爆炸声、轻重机关枪的哒哒声，金坛游击队与敌人开火了。丹阳队如得赦令似的，挺起腰，伸起头，向敌人行军纵队跃进，并用火力射杀敌人。

金坛游击队顺利地占领了桥头，敌人朝第八连那边跑去，第八连的轻机关枪和排枪从麦陇菜地中突起射击，敌人吃了一个冷不防，陷入混乱，折身往南就跑，又恰恰落进我们丹阳队的火力射击中。敌人豕突狼奔似的逃窜，

我们乘胜追击。等丹阳城内鬼子兵慌忙出来增援时，我们就胜利结束了战斗。俘获日本军负伤军官、士兵各一名，译员一个。这回敌人逃得慌忙，丢了十七具死尸。我们仅一人阵亡，三人负伤。缴获敌人步枪十二枝。这是一个很大的伏击胜利。

我们作战部队全部集合起来，指挥员做了简单的战斗小结："在八连还未到达指定地区，敌人还未深入到八连火网时，金坛游击队就开枪，失之过早，以致敌人能向南引退。这个时候，丹阳队动作又慢了一点，只顾火力杀伤，没有坚决投入白刃搏斗，让敌人逃跑了，这是个大缺点。但是，这一次是进行埋伏袭击和季候战斗的模范，告诉你们，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我敢说，日本鬼子今后看着麦田就要害怕，我们自己也要注意搜索，警惕敌人的反埋伏，大家听到没有？""听到了！"如雷吼似地回答。

我们扛着缴获的步枪、大衣、旗帜，押着俘虏，胜利归来。沿途老百姓围观庆祝胜利，有一个老先生说："地方武装打这样的胜仗，真不容易，只有配合主力部队才行啊！"

到了宿营地，看见几十个老百姓也押着一个日本鬼子过来，那是他们捉到的一个溃兵。他们高兴地叙说着："这个鬼子躲在麦田里不敢出来，起先我们还怕他开枪，不料走近去一看，他向我们叩头呢。把他捉住送给你们军队办！"

指挥员问鬼子的枪呢？敌军科长向他讲日本话，那俘虏战兢兢答复，科长翻译出来，就是："枪丢在池塘里，可以去找回来。"

（陈毅，《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六　江南游击区横断面

由于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二七"这一天开幕，新四军各支队政工人员代表纷纷聚集军部，记者获得很好的机会与深入敌后艰苦作战的同志们，详谈江南沦陷区的现况。现在特将所谈情形，写出以告本报读者。

（一）"梅花桩"赶不走我们的游击战士

挺进溧武路以北包括句容、镇江、丹阳、金坛、江宁一带地区之新四军团结支队，自不断打击敌伪军后，乡村之间的维持会以及其它汉奸组织，便如热汤浇雪，很快便销声匿迹。敌人为了巩固他江南占领区域的统治，对这现象当然是感到最头痛的，于是从去年九月十日起，开始了他大的扫荡计划，开始运用"梅花桩"这一武器。什么是"梅花桩"呢？便是敌人利用过去中国内战时期碉堡政策的经验，在江南平原河流湖沼地带，到处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据点，公路河流铁路以及桥梁交通要道旁边都普遍构筑工事以外，其它城镇所在地区，也普遍设防。这种防御工事，多得象梅花瓣一样，企图将我们的游击队包围在里面。同时各个据点内，都增加重兵据守，由五六十人到二三百人。在战略上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攻击一个目标往往五路八路同时出动，四面包抄，另外并控制千余人为机动部队，而且多半采取夜间射击，企图一鼓作气把我游击部队完全歼灭。

敌人这一种作战战术，虽然给我破坏交通增加了相当的困难，但是同样也牵制了更多的敌军。敌军对我军进攻时，我军靠着军民关系的密切，和部队有长期游击战的经验，只要敌军一出动，便得到翔实的情报，所以不等待敌人到达，早已从几路围攻的敌军间隙散开了。一次二次乃至许多次，敌人总是扑个空，我们的游击战士始终坚持在敌人的"梅花桩"里活跃着。

针对着日寇这种新的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努力学习新战术，已经得到很大的成绩，最近二月七日，团结支队又在东湾攻破了敌人据点并且击溃了由天王寺来增援的敌军数百人，击毙了敌军四五十名，缴获甚多。这一胜利的捷报，证明"梅花桩"赶不走新四军，而且反要成为日寇的坟墓了。

（二）争取"两面派"获得大成功

新四军的项副军长曾经说过："江南有七多：麻将多，茶馆多，澡堂多，大刀会多，土匪多，青帮多，两面派多"。什么是"两面派"呢？就是在江南沦陷区里，有一部分人，对日军来，也表示欢迎，对我们部队也表示欢迎，往往我军去了，他便将敌军情形告诉我们，等到我们开走敌军来了，同样的欢迎，同样的把我军的消息告诉敌人。可是又派人到我方来申诉不得已的苦衷。

这种"两面派"在江南游击区里特别多的缘故，主要由于江南地方物产丰富，有钱的士绅过惯了安闲生活，他们并不是没有民族意识，主要是处在那样敌我尖锐博斗的环境中，他们舍不得田园财产，而且为了保护他那财产，便形成了两面接近的"两面派"。

对于这许多的"两面派"，新四军的同志们，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方面一再地用文字和口头宣传说明，这种"两面派"的态度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是不允许的，假使全中国的人统统变成"两面派"那就无法抗战了，很明显地表示新四军对这些人的态度，同时一点不放松地直接间接派人去与"两面派"的地方士绅解释，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把他们争取到抗战的阵营中来。

在正确地执行统一路线政策争取"两面派"的过程中间，遭遇到许多的困难，过左的地方民众，会愤愤不平，说："这一类大汉奸，不抓来枪毙，反而要同他们和平商谈，这是要不得的"。可是新四军的战士排除了一切的阻

碍，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结果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日寇"以华制华"的毒策，受到惨重的打击，下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金坛附近的茅山，有一规模宏大的茅农公司，经理叫做纪振纲，他在南京失守国军西撤时，招集了百余从南京附近退下来的广东战士，连同他本来所有的守备力量，共计有二三百人和枪，来保护他的事业，他便成为当地一个最著名的"两面派"。新四军挺进到那边的部队曾一再派人去规劝他，指示他："在这抗日战争中，应做民族英雄，为民族国家努力，两面应付是不好的。"纪振纲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人，当他听到来人谆谆的劝告，光明黑暗的激烈战斗在他的胸中起伏，心灵中重压着的苦痛流露出他的真情："唉！我这二十年的经营呀！我这四十万的投资啊！总要保存才好！"

然而新四军的争取是对的，最近以前，敌人为了要巩固他的占领区，他也强迫着这些"两面派"要表明态度，也不允许他们骑墙观望了。十二月的初旬，大名鼎鼎的纪振纲，便被日寇武装捕到金坛去，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向他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表明态度。第一是脱离与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第二委他做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溧水等七县的剿匪司令。第三要他组织伪军，每月可以由日军送他五万块钱。纪振纲氏在这时候，想起了新四军同志一再劝告的话，终于敷衍一番，由大批武装敌军监送回茅农公司，在敌军严重监视下。他决意逃脱这一牢笼。他伪称儿子病重，急须送上海治疗，全家逃往上海。在他举家离开茅农公司前，写了一封信给新四军，说明他决不作汉奸和这一次不得不出走的苦衷，并且让百多个广东战士携武器全部开到新四军中，托新四军转送他们回原队伍继续抗战，最后并且祝望努力杀敌。他自己到上海后就回抗战后方为国家服务，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亲友，鼓励他们只有牺牲一切参加抗战。

纪振纲是新生了，新四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胜利了，敌人孤立了。这一事实告诉全国的同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没有民族，没有国家，个人的事业财产是无法保障的，并且更证明了，在这民族存亡的搏斗中，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出路——坚决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

（三）在最困难地形下奋斗的一支铁军

我们翻开地图来一看，在南京西南沿长江至当涂石四湖，溧水江宁这一三角洲，四面八方都是大江大湖铁路公路包围着，里面又是河滨交错，我们能够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却破坏不了他天然的公路河流，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地区，新四军的一部坚持着与敌人奋斗。

敌人最近在这一狭小的三角洲内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因此新四军的四周相距四五里十几里都是敌人。为了应付这一困难的环境，新四军的驻扎地区经常在流动，最多的时候，一个司令部每天要移动一二十次，而且为了避免敌人注意，部队经常是在晚间移动。在晚上，部队又要移动，又要出动攻击敌人，是没有睡眠时间的，白天睡眠也无定期，晚间借民房住，煮饭都不能点火。天没有亮以前，便要在黑暗中将房子扫干净，借物一一奉还然后部队开动，在天亮以前到达另一个驻扎地。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不仅指挥员战斗员辛苦万分，勤务炊事同志也辛苦万分。可是他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坚持着，并且不断地获得胜利。

在那一带的敌人，不仅从军事上加紧来压迫新四军，并且用最大的力量企图从政治上来破坏我军民的团结，使我们的战士不能在当地立脚。敌人这一政治上的阴谋主要的可以分成二方面。一方面向民众故意表示好感，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怀柔政策。例如在敌军决定向某一地前进之先，派出大批汉奸去向民众宣传不烧不杀，老百姓不要跑，"皇军"专打新四军，买卖也公平。当敌军到达时，的确也相当地改变一些过去滥烧滥杀的现象，买东西也给钱了。敌人这一阴谋结果并没有得到胜利，因为新四军有很好的政治工作，早已把中国持久抗战最后必胜的道理告诉给老百姓了，而且坚定地表示新四军誓与江南民众共存亡同生死，决不离开江南民众，使民众坚定对抗战的信心，同时更指出敌人这一种阴谋的毒辣，所以民众大部分没有被敌人的欺骗所蒙蔽。敌人虽然军纪比较从前稍好一些，而打鸡子，要花姑娘仍然是家常便饭，这一种事实，也使得老百姓心里明白敌人究竟还是敌人，再加上新四军铁一般的军纪和不断胜利的鼓动，老百姓不仅没有被敌人所欺骗，反而增加了抗敌的勇气。往往某一地方发生战事时，民众一齐将财物整理携往山上，然后各执刀枪前来参加作战，异口同声地表示"来！干鬼子！妈的，我的家也不要了。"

另一方面，敌人企图利用当地普遍发展的"大刀会"，派汉奸向大刀会首领表示："只要不帮助新四军，拥护'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枝"。又说："你们相信菩萨，'皇军'也相信菩萨，我们都是一家人"。还有个别的敌人，故意与地方"大刀会"人员结拜兄弟之类，可是敌人这一阴谋诡计也同样失败了。这失败的原因又得归功于新四军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

"大刀会"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新四军是一支由具有最进步科学头脑的战士所组成的军队，当然他们是不迷信菩萨的。可是为了争取一些民族力量到抗战阵营中来，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办法，要求他们多多训练，保卫家乡，联合起来打鬼子，同时积极地帮助地方政府组织农抗会工抗会等民众组织，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敌人的利用

失败了。

有一次在江宁第三区有一个"大刀会"的首领熊大麻子，勾结敌人，秘密准备聚集二千人，响应敌军。"大刀会"中有很积极的农民抗敌会的分子，得到这一消息，马上告诉新四军，新四军负责人马上通知区长，说民众开会是可以的，但在战区内，大的集会要得到政府和驻军的允许，否则发生变故保甲长是要负责的。保甲长接到区长的通知，马上挨户传送这消息。因此父亲阻止儿子参加，妻子规劝丈夫，这样一来，熊大麻子所预计可以召集二千人，结果只召集了五六十人，而且这五六十人，大半都是受熊大麻子的骗，说集会是新四军允许的，等到他们知道了熊大麻子的阴谋骗局，也很快各自回去了，一路说："新四军不是朱永祥汉奸游击队，我们怎么可以去打他呢?"后来，熊大麻子发动响应敌军计划失败，便派了他的弟弟熊三麻子来谢罪，一场事变，就此终了。

这一支在最困难的情形下奋斗着的铁军。成为敌人军事政治各方面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什么缘故呢?唯一的就是他们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保障了军事。当地的民众以"岳家军""薛仁贵"来天真纯挚地赞美着他们，而且也鼓励着他们。

(四)战胜日寇的政治进攻

在今天的江南游击区里，敌军不仅以军事力量来企图一鼓将我游击队驱逐出境，主要的还着重于政治上的分化和宣传欺骗。在这一方面，敌人是相当巧妙的。

记者最近获得许多敌人宣传品，图书文字都非常悦目通顺，显然已与过去敌人日本化的中文完全不同了。最利害的是宣传抓住中心，文字浅明短简。譬如象长沙大火，敌人在一张小小的传单上，上面画好长沙大火的情景，并引用汪逆精卫攻击抗战的文字。此外，象武汉、广州失守时，便以大量宣传品来散布，不是说中国军队完全打溃了，就是说我军事当局逃亡了。诸如此等不一而足。对江南民众，更提出要和平，说什么破坏和平和安居乐业的是游击队，把游击队画成一个抢劫民财的土匪，穿着草鞋背负大刀。除了这种宣传之外，在敌军队中相当地约束烧杀行为。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不是完全没有发生作用，象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民众们说，现在好了，正规军不烧不杀，日本军也不烧不杀，今后可以太平了。"也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民众在日寇不烧不杀的宣传下开始动摇，但不敢相信，因此等敌军快要到来，便将家财细软包好，放在田塍里，自己跑到僻静处看，究竟日寇是否如宣传所说的不骚扰了。

上述的现象，在今天新四军所在的游击区里，固然发现的是极少数，但是在我游击队兵力不及的地方，难免一般豪绅受敌宣传开始动摇。以下记者再说一些新四军怎样来战胜敌人的这种阴谋。

新四军当去年夏季初次挺进江南的时候，正值我南京保卫战之后，大批国军向西撤退，半年没有正规国军在江南作战，民众对抗敌胜利信心是相当薄弱的。新四军一去，民众一般的心理是这样："新四军的军纪固然是好，但是枪械并不精良，人数也不多，象过去那样多的正规军，有那样好的武器，都要退却，新四军怎样能战胜敌人呢?"

江南民众的这种心理，在去年几个月的战斗中，克服了。新四军不断地袭击敌人获得胜利，使民众对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心提高了，抗战情绪也提高了，民众的抗敌组织也很快地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阴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民众心理又起了另一种变化，一部分人在那里害怕："现在组织抗敌团体，帮助军队赶鬼子，这当然是好的，可是将来要是新四军又开走了，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新四军针对着这种动摇心理，就是广泛地宣传，在任何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不妥协不动摇抗战到底，愿与江南民众同生死共患难。由于这一坚持江南作战的鲜明态度，民众的恐惧消失了。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悲观，他们在想着，游击战固然能打胜仗，但打不退鬼子，收不回南京镇江这种大都市，因此又使他们感到抗战前途的暗淡了。对于这种错误心理，新四军更以最大的努力向民众广泛宣传解释："中国的抗战要经过三个阶段，才能达到最后反攻，驱逐敌人出中国，我们是持久战，持久战最后是必胜的"。江南的民众，自政府军队相继西移后，久已陷入对抗战国策糊涂不清的状态，经过这种持久战的宣传教育，大部分的民众已经了解持久战的意义和抗战胜利必经的阶段了。

不断地宣传教育，不断的帮助组织民众，使敌人的政治进攻和宣传伎俩，惨败了，民众还是我们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新四军的这种胜利是靠着他部队的高度政治认识和铁的纪律，才能取得江南千万民众的爱戴，没有这，宣传只是一句空话。

(五)在铁蹄下的江南同胞

"泥脚"的敌人榨干了日本国内劳苦大众的鲜血，还不能使中国屈服。长期的战争，使它转向到我们的同胞身上来榨取，以支持他残暴的侵略。

大家都知道江南是米丝棉出产最多的沃野，敌人近来一方面指使伪政权"维新政府"，严令农民大量种棉和养蚕，另一方面大量收买粮食。为了破坏我金融，伪"维新政府"最近散布许多流通券，强迫使用日寇的军用票，更以大量毒物运入内地，麻醉民众。

以上仅是农产和货币方面的，此外苛捐杂税，名目更是繁多。象田赋在伪政权已开始征收，"良民证""通行证""安居证"每种二角三角钱一张，汉奸利用这个机会，

更大事渔利，往往一张良发征，敌人要二角钱，一经过汉奸之手，便要向民众要四角五角钱了。

敌人为了巩固他在占领区域的统治，利用大批的土匪，整个江南因此土匪如毛，民众被骚扰得无以活命，同时敌人更唆使伪政权普遍滥招土匪组织所谓绥靖队，这一种变相的土匪，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只要是他们驻扎的地方，滥收捐税，挑一担子便要一角，摆一小摊，便要五角，开一小铺，便是一元，而且收捐无定期，无次数。

最使江南民众恐惧的便是敌人的抽壮丁了。为了实行"以华制华"的毒计，敌人最近在他兵力所及的游击区里，利用我国原有保甲组织，按保分配，每保必须选壮丁三人挑夫一名，若不照办，全保男女老幼，都要杀尽。因此，在江南的新四军时常有人自愿请求入伍的。一次一个老太婆怕儿子被敌人抽到南京去训练，亲自送到新四军的某团部来，坚决要求让他儿子入伍。老太婆说："新四军规矩好，当兵象进学校，我是很放心的"。由此可见民众对敌人抽丁的恐惧了。

江南千百万民众便在这样血腥的魔手下挣扎着，奋斗着，期待着胜利的一天。

（六）从敌人信件日记中所看见的江南敌情

据新四军敌军工作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前方搜集到的三百二十封信和一百六十封明信片中，证明了：第一、游击战已给予敌人很大的打击。在敌人信件中，前方写到后方去的部分，有四十封以上说到我游击战厉害的，说到游击队对公路铁道交通的破坏和袭击，居住行军都遭受打击，在信中流露出在困难危险面前的悲观绝望。在敌人的日记中也提到了对游击队感到可怕。不仅如此，敌人的后方也传染到这种恐惧心理了。日本女人写给丈夫的信中，都流露出因为游击队厉害而关心丈夫的安宁。

第二、敌军充分表现出厌战思归怕死和不平不满的心理。在敌军信件中，这一类记载特别多，有两本敌军日记，一本天天记着梦里回到了家乡，另一本天天记着想回家，又怕回国后会失业。俘虏后藤也说，他那一排人连排长都常常说要想回国，正由于这种厌战思归现象，所以后藤和王谷两个俘虏都是被我喊口号感动而缴械的。信件的检查甚严，每封都有"检查讫"字样，打骂很多。

第三、是敌军伤亡疾病极众。有一封信中说：他们那一连第一次补充的共有两百多人，到他写信时，只剩有三十二人。说到疾病更普遍，有的一连病倒一半，更有全连都病倒的，所病大都是痢疾，因而竟怀疑我在水中放毒。

第四、是敌人后方困难万状。据后方（本国）来信，有的说物价贵到三四倍以上，木材煤炭金属汽油之类既贵也不容易买到。汽车也缺乏，乡下稍为新一点的汽车都被征调作军用了。在这样困难情形下，还要为他"出征"的儿子或丈夫寄钱去，在缴获的信件中，内附五块钱一张老头票的有好几封。

第五、敌人已经知道新四军，并且知道新四军的历史，也知道新四军优待俘虏，只是日记中不敢十分相信而已。

从上面敌人的信件日记中告诉了我们，扩大游击战争，扩大对敌军工作，是何等的紧迫而重要啊！

二月十二日于皖南前方

（原载1939年3月3日《新华日报》，作者：石西民）

材料七　活跃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平原铁路沿线地区活跃着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甄风山同志当时就是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虽然他后来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不幸牺牲，但他的事迹至今仍在冀中平原广为流传。

建立武装初战告捷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日军在当年9月22日，一弹未发侵占了定县县城。这时，甄风山和东朱谷村里的几个人自发组织起了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起初队伍只有两支手枪，大家靠缴日本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或者搞日本人的汽油去换钱买枪。后来，他们发现二十九军退却时埋在城北树林下的武器，又挖出了30支枪。看到自卫队有枪了，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纷纷参加了甄风山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这支武装从此便活跃在冀中平原上。

1937年12月，甄风山带领游击队驻在双屯村，得知20余名日军乘坐一辆汽车去水磨屯村宣传所谓"中日亲善"、"东亚和平"和"爱护村"的好处，妄图以此来达到进一步奴役中国老百姓的目的。甄风山遂带着19名战士，到达水磨屯村河西的小庙打埋伏。中午，日军的汽车行到小庙前，甄风山一声令下，率领战士猛烈袭击。日军如同丧家之犬，向定县城内逃窜。甄风山带领战士猛追狠打，终于在石板村和马家寨村之间打着了敌人汽车，打死打伤日军20余名，缴获长短枪12支。

战斗结束后，甄风山和战士们回到双屯村，老百姓一听打了胜仗，便都来慰问游击队，高兴地说："国民党军跑了，八路军来了，打死这么多日本鬼子，真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初战告捷，战士们士气更旺，抗日救国信心更足了。

同年，甄风山听说北上抗日的八路军住在阜平县，司令员是聂荣臻，便亲自去聂司令员那里汇报游击队成立的经过。聂司令员和甄风山亲切握手，并发给葫芦形八字臂章和宣传品，指示甄风山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团

结老百姓，齐心协力，打击和消灭日军。

空手夺枪　大闹城门

1938年11月，甄风山由定县县委书记李济寰推荐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并奉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朱良才命令，组织第三军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由甄风山任大队长。最初，部队只有20几个人和两支手枪。甄风山向战士们说："我们没有枪没有炮，要从鬼子手中去夺，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夺到。今天我打头阵，去定县城里走一趟，如果借回来，明天你们再去。"说完骑着一辆自行车，从韩家洼出发直奔城里。走到城西门，他看见门洞里有个日本哨兵站岗，背着一支三八枪，走来走去，便打定了夺枪的主意。哨兵看见甄风山，大喊："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良民证的有？"甄风山趁机故意把车链摘掉。日本哨兵一边走近一边指着车子说："坏了的有？"这时甄风山将自行车靠在西门城墙下，假装修自行车窥视敌人。当他环视周围再也没有发现其他敌人，便猛地从车兜里掏出手枪，对准那个日军哨兵说："枪的拿来！"这一突然袭击吓得日军哨兵浑身发抖，将枪双手交给甄风山后转身就跑，甄风山用手枪对着日军哨兵喝道："站住！子弹的有？"日军哨兵便立刻站住，乖乖地将子弹交出。甄风山接过子弹装在车兜里，将枪背在肩上，骑上自行车就走。哨兵被吓呆了，当甄风山走出几百米后，才跑回去报告，等到日军集合队伍追出来时，甄风山早已回到韩家洼。战士们见队长得枪回来，拍手称快说："明天看我们的吧，一定和队长比一比高低。"第二天，又有一个叫甄合顺的同志化装成挑担子的进定县城卖棉花，恰好日本哨兵正在开城门，把枪放在一边。还没等他把另一扇门打开，甄合顺背起日军哨兵的枪就跑。当日军哨兵发现丢枪时，再追也来不及了。

1938年10月，甄风山带领战士们先后夺取了定县北门和南门日本哨兵的6支三八枪。后来又夺取了定县东门日军的枪。那一次，甄风山带着30名战士，化装成农民进城。他们从石板村借了一辆马车，车下装着豆柴叶，上面放着棉花，有的赶车，有的挑担，有的装着进城办事在后面做掩护，前前后后朝东门而来。当时，城门还没有开，人们到城门下，便大声喊："快开门，有人在后面追我们。"日军听到喊声，慌慌忙忙从城门楼上下来4个日军开门，战士们趁机一涌而进。甄风山使了个眼色，战士们一齐动手，用绳子套住日军的脖子，拉出城门外。另一部分战士冲上城楼，将城楼里正在睡觉的日军全都缴了械。战斗一结束，战士们便赶着车，挑着担，扛着夺来的17支三八枪，快速离开东门，回到了驻地。

游击队空手夺枪，大闹城门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兴高采烈，而敌人却胆战心惊，加强了警戒，并在城内张贴告示，用300万元悬赏游击队长甄风山的人头。

识破诡计　敌人落空

日军多次遭到游击队的打击后，悬赏买甄风山的人头没有得逞，伪县长高砚然不死心，就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派人找到甄风山说和，说什么只要老甄投降，给日本人干事，要什么条件都行。甄风山听后说："好吧，我要大枪五百支，子弹十万发，日币十万元，用汽车送出城外。"让来人回去向日军回报，结果日军听后骂他们："你们坏了、坏了的，办事的不会。"

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选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我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风山识破。"美人计"遭失败后，敌人又收买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谋害甄风山。杜长春叛变后，千方百计离间我内部团结，寻机谋害甄风山。一次，甄风山外出开会回来晚了，杜长春假装殷勤，在给甄风山做饭时，乘机在饭里放上毒药。可巧这时来了客人，甄风山和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儿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得逞，但此事引起了甄风山的注意，并暗自进行调查了解。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会，杜长春又自讨勤务端饭，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使警卫连部分同志中毒，经急救才没发生意外。甄风山马上追查撒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去搜，最后在杜长春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长春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恶行为，后被我枪决。

敌计连遭挫败之后，日军又派汉奸特务去东朱谷把甄风山的妻子王均抓到城里，刑讯逼供，对其使用了九种惨刑。共产党员王均宁死不屈，敌人只好把她关进木囚中（这个木囚有四尺来高，二尺半宽，三面都有大钉子）。王均在木囚中通过内线给甄风山写信，鼓励他坚决抗日，赶走日本侵略者，信中写道："风山同志，我祝你在城外带领队伍多捉鬼子和特务，给人民报仇雪恨，我王均死在囚中也是光荣的……"

鬼子的种种手段和诡计，都动摇不了甄风山同志抗日的决心，只能增添甄风山同志打鬼子、除汉奸的烈火！战士们伸出大拇指说："俺们大队长是敌人治不倒的一座山。"

得知甄风山的妻子被抓走，第五大队干部战士非常气愤，当天晚上便进城把伪公安局长的老婆李秀玲等十几人掏出城来，送到军区进行教育。一年半后，上级决定将李秀玲送回城时，敌我双方定在东门外换人。那一天，东汶村徐东志、东朱谷甄如意当中间人，把李秀玲用马车送到东门，甄风山对她说："你回去吧，你在解放区呆了一年半，看你的思想吧，换不换人在你了。"李秀玲连连道谢就回去了。等了五六个小时，敌人才把王均送出来，由甄

风山带领部队保护回到四家庄。

虎穴擒敌　智除韩希梦

抗日战争时期，甄风山经常只身进入敌人严密封锁的据点和保定、望都、唐县、曲阳、新乐、定县等县城除汉奸，捉敌特，摧毁警察所。

1939 年 5 月 25 日，甄风山经过几次侦察，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和住址后，派出三个侦察班化装混进定县县城。下午 5 点，大部队由叮咛村出发到东朱谷村，做好入城准备。当夜 10 点钟，战士们潜到城东南角搭人梯爬上城墙，进入城内，活捉汉奸特务 34 名，平安撤出城外。日军发觉后，集合兵力向我追击。甄风山指挥部队边打边退，将敌引到叮咛店。我五大队见时机已到马上组织反冲击，从东、西、南三面进攻，致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扭头就往城里逃跑。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为庆祝这次战斗的胜利，还编了一首歌，歌词唱道：

> 第五大队下命令，五月二十去进城，锄汉奸抓特务，咦呀呀得外得外，
> 任务要完成。
> 南街有个张保华，我们进城把他抓，
> 一抓父子仨，咦呀呀得外得外，
> 一抓父子仨。
> 张保华媳妇报告，日本不听那一套，
> 活该他死了，咦呀呀得外得外，
> 活该他死了。
> 连夜报告韩希梦，希梦一听心胆惊，
> 赶快集合兵，咦呀呀得外得外，
> 赶快集合兵。

定县警备队队长韩希梦是日军的忠实走狗，敌人每次出发，他都充当先锋，坏事干尽。由于他屡次败在甄风山手下，因而一听说甄风山在城外，他就不敢出城。但甄风山一走，他便出城扰乱百姓，因此冀中军区决定除掉他。甄风山巧设离间计，首先利用关系，收买了日军的翻译官白云山，在定县东关将一封离间信交给了他，请白转交给日军指挥官龟尾，并安排我敌工人员进城送信，故意将信丢在日军驻地门口，让日本人拿去看，内容是："韩希梦同志，你在敌方假装诚心诚意，好好在鬼子面前献媚，按计划消灭敌人，行动秘密，见机而行，看后烧掉，以免后患。"时间不久，又去送第二封："希梦同志，你身在曹营心在汉，请你多加注意，不要让日本人看出破绽，多加隐蔽，稳稳下手，不要让日本人起了疑心，带部队出城，我在城外接你，把你所有宣传材料尽力在城内散发。"

经过多方的工作，日军没多久即开始怀疑韩是我方派来的，再加上甄风山不断给韩希梦写"密信"往城里送，翻译官也在向日军报告中添油加醋，龟尾听后暴跳如雷，马上传韩希梦到日军本部，将其捆绑起来，拉出北门枪毙了。

后来，日本人经过调查，才知道中了离间计，翻译官白云山为此也躲到山西去了。

巧布地雷　严惩日军

1939 年 12 月初，甄风山奉三分区参谋长唐子安的命令，带五大队在定县东关八里店村北口马路上布雷，阻击定县救援之敌(当时冀中三分区正围攻高阳)。五大队战士和各村民兵连夜在马路上挖陷坑，埋地雷，并在马路两旁小沟内，放上老鼠夹子，在上面绑上手榴弹弦。头天挖好陷坑后，正好第二天降大雪，时间不长，地上的雪有两寸厚，所有的痕迹都被大雪覆盖了。当时人们都这样说："天助我军得胜！"五大队全体指战员埋伏在八里店村口以北严阵以待。大雪还在纷纷下着，日军接到高阳被我军围困、情况紧急的消息后，便从定县出动两辆坦克、30 多辆汽车，载着兵员、弹药、给养往高阳进发。敌军行至八里店村北马路上时，扑通一声，第一辆坦克掉入陷坑被炸，第二辆也掉在坑内，后面的汽车拥挤在一起。这时，甄风山下令拉响了马路上的 50 个地雷。爆炸声中，一部分日军被炸死，一辆汽车被摧毁。活着的日军急忙下车往马路旁小沟内跳，又踩上了鼠夹子，引发手榴弹爆炸，敌人又伤亡许多。此时，我五大队全体指战员冲杀出来，打得敌人落花流水。这次战斗打死日军 60 名，摧毁坦克一辆，汽车一部，迫使敌人退回城里，胜利地完成阻击任务。

化险为夷　受命炸桥

1942 年甄风山调任定唐支队任副支队长，率部驻唐县马庄、蔡庄一带。当时日军十分猖狂，炮楼众多，挖沟成网，想以此来封锁、蚕食解放区，分割我武装力量。山里的八路军粮食供应遇到严重困难，上级命令甄风山下山催公粮。他带 6 名侦察员，去西北街谈公粮之事，并召开群众会议，可没有防备北村有一名便衣特务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日军。敌人很快赶来，将该村团团包围，甄风山见情况不好，秘密转移到何家胡同油房地洞内。日军在街上抓了个 15 岁的小孩，逼问地洞在哪里。小孩不说，敌人就用枪托打，小孩领着日军和特务到油房门外，指着一个洞口说："这就是洞口，别的我不知道。"特务一看洞口内有蜘蛛网，说这个是旧的，便又逼着小孩去别处寻找。甄风山他们乘机由山药井内上来，跳入街口坯垛底下洞内，而后借夜幕掩护安全撤回到山里。

1943 年，五大队改为铁道支队，甄风山任支队长。机构精干，参谋、干事和供勤人员也很少，外加几个分队，活动非常机动灵活。铁道五支队的任务是破坏敌人交通线，

炸火车、割电线，并开展地雷战，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

1945年6月，军区司令部命令将唐河大桥彻底炸掉。甄风山接到命令，与五区区委书记邵初同志研究商量，决定从各村民兵中挑选会水的百余人扛送炸药，主力部队在唐河两岸柳拔子树地里担任掩护，工兵配合安放炸药、接电线。到了晚上，甄风山带着战士和民兵往桥下前进，而主力部队用强有力的火力，猛向敌人岗楼射击，把敌人火力吸引住。敌人只顾向两岸开火，没注意到甄风山带领战士、民兵从水中往桥下运动。他们在深水中立着身走，浅水中蹲着走，水面上只露着脑袋和弹药箱，并快速移到桥下，迅速安放好炸药，很快接上电源线。当甄风山带领工兵、民兵等退回后，工兵一按电钮，一声巨响，彻底将唐河大桥炸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抗日战争中，铁道支队在党的领导和上级的正确指挥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活跃在冀中地区。他们神出鬼没，英勇作战，搞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120余次，歼敌278名，俘虏日伪军333名，缴获长短枪426支，轻重机枪9挺，炸毁汽车17辆，坦克5辆，缴获战马13匹，摧毁敌炮楼31个，炸唐河、新乐大桥各一座，炸火车头4个，并缴获大批弹药和物资。

1945年，铁道支队整编为六团，甄风山为副团长。1947年，他们又投入了解放定县县城的战斗。

(选自《纵横》88年1期，作者：黄文明)

材料八　铁道游击队"飞车夺枪"

"吃两条线"起家的队伍，总离不开在铁路上打算盘。有人说，搞火车碰头，有人说扒铁路，有人说打兵车，献计出谋的人很多。我们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认为搞火车碰头，热闹倒热闹，只是敌人有的是火车，碰掉两个车头，他们还有车头，敌人向山里发兵，也不靠火车头拉；打兵车那是过瘾，可我们力量小，兵车行车规律不易摸；至于扒铁路，也不是妙算，扒掉一段，敌人会很快修复。比较合算的，还是搞敌人的混合列车。搞混合列车，有三大好处：第一，这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车上有押车的敌兵，票车后拖着货车，可以搞到枪和物资；第三，我们自己付出代价小，比较容易成功。算过这几笔帐，同志们都说："这着棋妙，截混合列车，截混合列车！"

截哪一班，在什么地方合适，这不要多讨论。常"吃两条线"的人，对每一次车的行车时间，都了如指掌。有的队员，只要看看表，就算出某一次车到了哪里。铁路沿线，哪个地方上下便利，大家心中更有数。具体的战斗部署是这样确定的：在王沟车站四五里的四孔桥，截击由陇海路上的赵墩经枣庄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一些爬车不熟练的队员，扮成工人、农民、商人各种人物，分段从峄县、枣庄等站上车，对付各车厢押车的敌人；会登车的队员，在四孔桥以东，临时登车；余下一部分同志埋伏在四孔桥附近；洪队长和老曹负责控制火车头。一切安排停当，队员分头出发。

预定的这一天，由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象往常一样，突突地冒着黑烟，按时开到了王沟以西。还没到四孔桥，两条黑影嗖的一下，从路旁跳上了车头脚踏板。开车的日本人根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便一命呜呼了；两个中国司炉明白过后，已经被上了绑。火车头，被洪队长和老曹控制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发生的。这一切，坐在客车里的人和押车的敌人，更无从知道，列车照常向前开进。

列车快到四孔桥时，速度慢了，路两旁突然跳动起几个黑点，我们的人又上去了。车头上猛然放出一声汽笛，所有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亮出武器，向敌人猛扑过去。在车厢里耀武扬威的敌人，一霎时有的躺倒不动，有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哭叫着。

隆隆滚动的列车，失去了它的威风，在四孔桥附近停下来。我们冲上铁路，各车厢里的短兵战已经结束。洪队长挥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向跳车的旅客大声呼叫：

"老乡们，同胞们，不要惊慌，我们是八路军！……"

惊慌的人群，渐渐安定下来。他们纷纷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下列车，集结在桥洞下的干沟里或田埂上。我们安定了旅客的情绪，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劝人们快快离开这里。为了迷惑敌人，我向旅客讲话中，特别提高嗓门说，"我们是从山区出来的八路军。"人群中发出一阵"八路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两个钟头后，敌人的铁甲列车开来，旅客已经四散一空，我们也带着大批的军用物资，远远地离开了四孔桥。

八路军截击列车的消息，很快传遍临枣线各站，传向津浦线的徐州、济南，枣庄的敌人戒严，并向进兵山里的敌人呼救。果然，两天以后，进到我山区的一部分敌人，慌慌张张窜回来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们这支队伍，活动到了临城附近，会合了临城南北的另两支铁道游击队。这两支铁道游击队，是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先后从"吃两条线"起家的。有一个队，开始只有五个人，他们赤手空拳飞登列车，翻下四十八包芝麻，才换得了第一支手枪。

三支"吃两条线"的队伍会合起来，正式成立了铁道游击大队。它象一把利剑，深深插进敌人的心脏里，艰苦斗争了六年。尽管敌人对它施行了极其残酷的"围剿"、"扫荡"，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的爱护支持，它便能在艰苦的斗争道路上日益壮大。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铁道游击队的名声传遍临城一

带。神奇的故事越传越多。

有这样的故事：铁道游击队员摸进临城，登上一列军用火车，轰轰隆隆开出车站。

有这样的故事：铁道游击队全部化装成日本兵，大白天走进临城，收缴了敌人三十多支枪。

有这样的故事：敌人封锁了鲁南根据地，八路军的主力供给困难，铁道游击队飞登列车翻下一千二百匹布、六百套军衣和大批的西药，送往根据地。

有这样的故事：一个死心踏地的汉奸，扬言铁道游击队拔不掉他的汗毛，话刚说出不久，这个汉奸便在临城大街上躺倒了，他身上还用砖头压着铁道游击队的布告。

惊险、曲折、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是说不完写不尽的……

（杜季伟，《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九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队伍刚整编完，忽然得到情报：津浦路上的界首镇只驻着七八个日本鬼子，门前放着摩托车、小汽车，看来是个什么官儿；附近的界首车站虽驻有三十多个鬼子，但相距一里多路，也不象是一伙的。于是，我们便抽出六十名队员，由我和崔子明、程重远、陈惠民率领着，开始了第二次作战行动——奔袭界首。

队伍冒着霏霏雨雪，在山间小路上疾进。三点钟左右，翻过香水寺附近的高山，抄小路接近了界首车站。

队伍停下来，进行布置：程重远带一小队到车站以南，负责割断通往泰安的电线，然后控制附近的铁路桥涧，防止泰安敌人增援；陈惠民带一个中队包围车站，不叫车站敌人增援街里；崔子明率一小队进街消灭那七八个鬼子。

各队进入岗位，单等崔子明小队的动静。但等了很久，街里仍然静寂无气。这次战斗的目的就是消灭街里那七八个鬼子，崔子明小队搞不好，就不能顺利地解决战斗。大家为此十分焦急。

我决意到街里去看看，便在陈惠民中队找了一个队员，提上把大砍刀，穿过桥洞，顺公路直奔界首镇。走近街南头，听街里肃静无声，便沿着墙根轻手轻脚地向里摸。我们一边前进一边谨慎小心地搜索着周围。快到街中心的时候，看见一个朝西开的门上挂着日本旗，门前停着摩托车、小汽车，这便是我们的袭击目标了。

我们一边寻觅小队，一边侦察情况，继续向北搜索前进。这时，来到了一家车马旅店的门口。我们正在大门旁向里观察，忽见一个日本鬼子提着枪往外走来。我二人一个箭步窜过门口，向北猛跑。跑不远见一条东西小胡同，便迅速拐进去，躲在墙角上，举起了大砍刀，准备战斗。但是鬼子并未追来。静下来再听，里边一家院内有人说话，我们便进去找人了解情况。找出来的人是个矮小的老头，正是店里掌柜的——这个小门原来就是旅店的后门。老头一听我们问鬼子的情况，惊恐地说："呀！鬼子可多啦，足有三百！是晚上八点钟开过来的，说是从这里路过，街南街北，前街后街都驻满了！"

听他这一说，敌情起了很大变化，我的心不禁凉了半截。我们原是奔袭那七八个鬼子来的，偏偏碰上大队鬼子在这里宿营，这怎么办呢？看来只好撤退了。但跑了一夜路，已经深入敌人据点，难道就这样白白罢手了？我的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着。

我们沿着大街转回来，又走到挂日本旗的大门前，仍然不见崔子明小队的踪影。真的就这样撤回去吗？心里实在不甘心。鬼子的驻地连个哨兵也没有，这可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踌躇一阵，我把心一横，对那个队员说："走！咱们进去看看！"

我们两个人就地趴下向院里爬，爬过漆黑的门洞来到二门，再爬进二门沿东墙根爬，听到东房里有马吃草声。抬头向西房看，里面透出暗淡的灯光。再爬到西墙根，两手扶墙轻轻站起来，听到屋里传出呼噜呼噜的鼾声。我用唾沫点破窗纸向里一看，嗬！炕上、地下，横七竖八睡着二十多个死狗一般的鬼子。地当中燃着一支蜡烛，摆着一堆日文书；武器则全挂在墙上。我看着那些剃着和尚头、盖着黄军毯、哼哈死睡的日本强盗，仇恨的火焰顿时燃遍全身，提着大砍刀的手也痒痒起来。我们摸到门旁，揭开挂在门上的油布，两手轻轻推门。门"吱呀"一响，便缩回手来，静听反映。然后再推，推开豁口后，便钻进去摘鬼子的枪。摘了一些枪，那队员说："我们砍他几个吧！"我说："不忙，先把枪送出街去，再回来干！"说着，两个人奔出大门，来到街南头。这时，见一伙人朝我们走来，一打暗号，正是崔子明小队。原来他们是走小路来的，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我立刻举起枪说："你们看，这是日本鬼子的大盖枪，从里边摘出来的；鬼子睡得象死狗一样，谁有种随我回去用刀砍他！"崔子明和刘西岐争着说："我去！我去！"我说："好，随我走！"随即布置其他队员沿街布岗，我和那个队员带着崔、刘二人又折回鬼子的院子。

我们径直来到西房，把那个队员留在门口放哨，我和崔、刘三个便进了屋子，各人迅速找好了攻击目标。我两脚叉开，举起了大刀；崔子明举起了日本指挥刀；刘西岐手里的刺刀也对准了鬼子的秃脑壳。我看大家都已准备好，双臂一抡，"喀嚓"一声砍了下去；崔子明的指挥刀应声也落下去；刘西岐的刺刀也刺进了鬼子的秃脑壳。我那把大刀象切西瓜一样，接连砍了三个；崔子明也连着劈了几个鬼子；刘西岐端着刺刀也在不停地捅。大家正在干得解恨、眼红，忽然崔子明刀下的一个鬼子没有被砍死，"哽噢"地叫唤起来。这一叫，全屋的鬼子都惊醒了，鬼哭狼嚎地哇嚷起来。这时，崔、刘二人敏捷地退出房子去了。鬼子

抓起军毯向我扑打，我以大刀对砍。三打两打把蜡烛扑灭，满屋墨黑。忽然军毯把我的砍刀缠住，猛力才抽出来，自觉不妙：倘若军毯把我的头蒙住，岂不危险！于是急忙退出门外，鬼子几次向外冲，都被我砍了回去，只管在屋里叫，不敢出来。趁这工夫，我招呼了站岗的队员，一同退出了院子。这时，车站、街里的机枪、大炮响成了一个点。

南街枪响得紧，不能再沿原路走了，我们便向北走。正走着，迎面来了个提枪的人，一问口令，那家伙"嗷嗷"地不知说什么；我一听是个鬼子，急忙一个箭步窜上去，照他脖子猛砍一刀，他象一块木板，扑通一声栽倒了。

我们继续向北跑，背后响着急促的皮鞋声，子弹也在身旁哧哧地追逐我们。又跑出一段路，来到街中心的小桥。这里还有一个队员在站岗，我们招呼他一起走。三个人急忙跳下河堤，顺着干河道向西，跑过铁路，甩掉了敌人。

在街里响起枪声的时候，包围车站的陈惠民中队听崔子明说我还未退出来，便按预先的计划动作起来。陈惠民爬上路基，用步枪打倒了鬼子的哨兵。枪一响，正在睡觉的鬼子紧急集合往外跑，陈惠民中队对准房门，得心应手地猛打起来。向外跑的鬼子被打倒几个，躺在门口，后边的再不敢出来，就依在门窗旁抵抗，双方展开了猛烈的对射。

我们退到铁路西边的山头上，远远看见东边的泰山边上，炮弹东一个西一个地爆炸；界首街上的重机枪也在向泰山扫射。显然鬼子以为夜摸界首的游击队，是从泰山下来的了。

这时，东方泛起鱼肚白色，天快亮了。车站上打得正热火，我叫队员按规定的联络信号朝天连放三枪，通知陈惠民中队赶快撤出战斗。信号发出后，车站上传来一阵更猛烈的射击，原来这是陈惠民中队向日本战马发动的最后攻击，一阵乱枪打死了十几匹战马后，队伍便悄悄地撤离了车站。

天明以后，队员们三三两两来到会合地点夏张镇。集合点名时，知道队员管苇同志牺牲了，还有另一名队员挂了花。我们则打死鬼子二十余人，战马十多匹，顺利地实现了游击队第二次战斗的计划。时逢旧历年关，夏张镇群众送来肉、面、酒、菜慰问我们，全体游击队员在胜利的欢乐中度过了一九三八年的春节。这一仗轰动了整个泰西地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大旗迎风招展，群众纷纷奔向这杆大旗，成群结队地参加我们的队伍。

泰西游击队在界首战斗后，进一步扩大了队伍，旋即投入配合台儿庄战斗的大破津浦路的斗争，炸山洞，毁桥梁，袭击敌人的列车和据点，连战连捷，歼灭了大量敌人。队伍在胜利的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并在东平、肥城、泰安等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已拥有四千余人，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成为鲁西敌后的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武装。

（张北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选自《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十　冀南战事

阵前受命　重任在肩

1937年12月初的一天，我从山西省榆次县的下黄彩出发，去辽县（今左权县）城西约5里的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接受新的任务。命令虽还未下达，但内容已略知一二，因为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曾给我吹过风：要我组织新部队，去开辟新地区。

入晋以来，枕戈待旦，我军数次苦战，以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劣势装备，抗击日军，保卫国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我去师部的途中，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对此感受颇深。

我到达师部时，刘伯承师长和张浩政委正和一位身着军装、个头高大的人在谈话，见我来了，忙叫我坐下。张政委指着那位同志说："这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不认识吧？今后你们就要搭伙计，在一起战斗了。"我心想，准是陈赓旅长给我说的那个任务了。刘师长接着说："是这样子，我们决定抽调五个连组织一个东进纵队，由再道同志担任司令员，菁玉同志当政委，去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菁玉同志是原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刘师长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幅军用地图在我面前展开，并在地图上不时指指点点。从地图上看，冀南的地理位置，大体上是在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漳河两岸这个地域内。尤其是平汉、津浦两大南北平行的铁路干线，纵贯河北境内，径直南下，立刻使我感觉到，这是日军向中国腹地侵略，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线。刘师长敲着地图对我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我立即回答："看清了，是一片大平原。"刘师长点点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刘师长的幽默语言使我们都笑了。接着，刘师长又充满信心地说："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地困难得多，但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约40万至50万分布在整个华北，但这是不够的，是敌人致命的弱点。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那里又有众多的抗日民众，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应该说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我一边

听，一边从心里暗暗佩服刘师长的雄才大略。最后，张浩政委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菁玉同志熟悉那里的情况，你们去谈吧。”我怀着惜别的心情与首长告别，刘师长紧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我等着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有机会我也准备到冀南去看看。”

在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回旅部的路上，我的肩上好像挑了一副重担。我虽然做过军、师的领导，指挥过不少的战斗，但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深感责任重大。

回到旅部，我把师首长关于组建东进纵队的指示向陈赓旅长作了汇报，建议组建部队主要由七六九团抽调，并提议从全旅抽调些骑兵，组成一个骑兵连，因为骑兵在平原可以充分显示威力。陈赓旅长立即表示赞同。李聚奎同志稍微想了一下说：“我们旅现有的骑兵不够一个连，建议报请师部从三八五旅也调一些。”李聚奎同志立即给师部打电话，师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最后，从七六九团抽调第一、第五、第十等3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从七六九团、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各抽调一个骑兵排组成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纵）。

东纵组建后，进行了十多天的动员教育，我和李菁玉同志便率领着这500多个健儿（其中大多数是红军战士），下了太行山，开赴冀南。

这时，日军的铁蹄已踏进冀南，该地区局面极为混乱、复杂。沿平汉路南进之敌已于10月15日占领邢台，17日占领邯郸，11月14日占领安阳；沿津浦线南侵的日军亦于10月3日占领了德州。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曾一度被日军占领，后因日军进攻武汉，大部南下，仅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城留有日军驻守，但在其余县城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驻有大量伪军，有些县的保安团也被收编为伪军。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的专员、县长携带财物闻风而逃，以致整个冀南地区陷于混乱状态。土匪、游杂武装、会道门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各种会道门，如六离会、白极会、二坎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这些土匪、游杂武装、会道门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火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广大民众天无宁日，鸡犬不安。冀南人民如久旱之望云一样渴望我军早日到来，以解倒悬之危。

“巨鹿事件”锋芒初露

1938年1月15日，正值严寒隆冬，北风刺骨，寒气逼人。遇到这种天气，加之兵荒马乱，老百姓大都呆在家里，闭门不出。而隆平县（今隆尧县）的魏家庄这天却热闹异常，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热烈欢迎八路军。我们东进纵队是经过一天的行军到达这里的。

魏家庄有百余户人家，部队刚进村时，群众有些惊慌，以为又是保安团抓人、抢粮来了。那时，我们穿的军装、戴的帽子和国民党军队一个样，从外表上一时还难以识别。但一经说明我们是过去的红军改编的八路军，看到我军说话和气，举止端正，臂上又带着写有“八路”二字的臂章，老乡们顿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共产党来了！八路军来了！”并忙着给部队筹粮、烧水、腾房子；部队给群众挑水、扫街、扫院子，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军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部队住下后，我冒着严寒走到村外的高坡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但见漠漠原野，茫茫苍穹，阡陌纵横，村镇棋布，不要说看不到崇山峻岭，峭壁深沟，连个丘陵也没看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我立刻意识到：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

在太行山时，我们计划在魏家庄休息一两天，然后经巨鹿县到冀南的中心——南宫县城。据菁玉同志介绍，南宫一带群众基础较好，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我党组织，曾领导了一些地区的工人、农民、盐民、学生活动，李菁玉同志就是1935年冬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多次暴动均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的残酷镇压，有些党员被杀害或陷入囹圄，有些背井离乡，隐名匿姓奔走他乡，党的组织几乎全被摧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方局派马国瑞同志，回到冀南，成立了直南临时特委（不久改为冀南特委），被捕和外逃的共产党员也陆续回到冀南。王从吾、王维纲、马国瑞等同志团结各界抗日民众，在大名、内黄、磁县、威县等地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同时，南宫县距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较远，东西均有200里。离南宫只有八九十里的威县虽驻有日伪军，但他们主要是维护邢台至临清的交通线，并不敢轻易外出。因此，我们准备以南宫为立脚点，逐步向西周发展，开辟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

我们到魏家庄的第二天下午，即与先期到这里的挺进支队汇合了。挺进支队是1937年11月初，从一二九师教导团抽调30余人，由孙继先同志任司令员，胥光义同志任政委组成的，他们在这里做了不少工作，我和李菁玉政委听了他们的汇报。翌日上午，侦察参谋领着一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老乡来见我们。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你们了，可把你们盼来了！”说着急忙撕开衣襟，从里面取出一封信交给我们。李菁玉一眼认出这个“老乡”，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这个“老乡”是地方党派来的联络员，姓张名子衡，巨鹿县人，1935年曾和李菁玉一起领导过冀南农民暴动。他告诉我们，在巨鹿和任县的交界，以巨鹿县保安团为一方，

土匪刘磨头、邱庆福等为另一方，拉了一条20多里长的战线，正在火并，已经打了十几天了。刘磨头等是惯匪，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近来他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三四千人，是冀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股；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巨鹿县封建势力的代表，1935年曾残酷地镇压过我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七·七"事变后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所属保安团近千人，人数虽然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是南宫一带保安团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据张子衡介绍，双方火并的主要原因是：巨鹿县保安团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应任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打过刘磨头。刘磨头现在人多势众，要报"一箭之仇"，并乘机扩展地盘，壮大势力，扬言要"打进巨鹿城过年"。

听了张子衡的汇报，我和李政委等都认为：巨鹿县是我军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保安团和土匪火并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不仅会阻挡我们的去路，影响我们预定计划的实现，而且会给我们今后的工作造成困难。据了解，冀南各县的保安团，除少数投敌外，大都原封未动；土匪问题更是严重，不下120余股。因此，解决好巨鹿火并的问题，对争取保安团和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而决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因为一方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部队，另一方是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封建势力，支持任何一方都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从情况分析看，保安团既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统治，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我们只要说明我党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其顾虑是可以解除的；同时，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我军威震华北，并已来到他们面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敢公开投敌，有可能接受调停。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此外，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旗号，如果一味打中国人，就会更加遭到群众反对，陷于孤立。因此，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可能的。

根据上述分析和确定的方针，我们一面派人去刘磨头指挥部、巨鹿城保安团劝说他们停火；一面为了扩大我军的影响，便于对双方进行工作，将部队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

邢家湾是滏阳河上的一个重镇。滏阳河，是冀南一条南北向的重要水路交通线。我们驻在紧靠河岸的一座房子里听候消息，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枪炮声。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刘磨头在我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答应停火。巨鹿县王文珍第二天也复信，欢迎我军派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张子衡同志对巨鹿的情况较熟悉，自报奋勇进到巨鹿城，向王文珍等晓以大义，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战斗。王文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我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嘴称只要刘磨头停火，保安团就撤回巨鹿城，内心里却又在想借口阻止我军开进巨鹿城。谈判拖了两天，最后在张子衡义正词严地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行径后，才勉强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

1月25日，我们率部迎着朝霞由驻地出发，中午到达巨鹿城西关。城门口站着一堆人，有的穿着长袍短褂，有的穿着西服革履，还有几个戎装整齐的军人。见我们下了马，他们急忙走来，哈腰鞠躬，拱手作揖，连声说："欢迎贵军，欢迎贵军！"寒暄后，我朝城门一望，只见刀枪交错，寒光闪闪，城门内侧站着一二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个如临大敌。我向李菁玉递了一个眼色，并用手捅了他一下，李菁玉会意地点了点头。我们正要入城，却见刘建三急忙走上前来向我深深鞠了一躬，皮笑肉不笑地说："有一件事想与司令相商。"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他又接着说："敝县城里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曲。吾辈同仁商议，想请贵军暂住城西一带，务期察谅民困。贵军所需粮草，概由我等筹办。"很显然，他们这是拒绝我们入城。我心里想："这些家伙真是本性难改，太不讲信义！走，进城去，看他能怎么样！"但转念间又想，如果强行入城有可能发生极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发生武装冲突。我军初到冀南，群众对我军还不甚了解，一但冲突起来会给敌人以造谣的口实，不利于分化和争取各地的保安部队，也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因此，我表示："既然你们有困难，我们就暂且在城附近村庄住下吧。"并建议李菁玉和张子衡一同进城，继续进行谈判。说完，部队即开到城西的张家庄一带住下。

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饭后，我派骑兵连经城西门外去警戒威县、平乡之敌。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时值冬天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骏马奔腾，很多群众跑到城墙上目睹我军的雄威，甚为惊奇、赞叹。

王文珍等得知这一情况后，疑神疑鬼，认为我们是在包围巨鹿城，恐慌万状，急忙以巨鹿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绅士等名义邀请我进城去赴宴，说是要为我洗尘，表示对我军的欢迎。我考虑对这些人不给他点政治压力，是不会老实的，因此以研究敌情为由谢绝了。这一来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惧，不多时又派人来请，我以同样理由不去。他们慌了手脚，急忙恳求李菁玉来请我。李菁玉了解我的用意，见到我说："这次该去了，不然他们连觉都不敢睡，要吓瘫了。"我想"事不过三"，王文珍等已经请了三

次了，更何况其正在恐慌之际，是个做工作的好时机，于是便带了 3 个骑兵警卫员同李菁玉政委一起进了巨鹿城。

宴会设在县政府议事厅里，3 张八仙桌坐满了人。宴会一开始，刘建三站起来祝酒，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未让我军进城的“理由”，请我“万勿发生误解，多多见谅”。王文珍和甄福喜等低着头灰溜溜地坐在我的对面，一声不吭。有几位开明士绅对我们和平解决巨鹿事件倍加赞赏，连称“贵军劝说双方停火，使敝县百姓生灵免遭涂炭，真乃仁义之师也”，并再三表示感谢。酒过三巡，我站起来首先谈了我党的政策，接着我又提高嗓门严肃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的命令，破击津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到这里来的，并且要在冀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席间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小心仔细地听着。随后，我看着几位士绅和缓地说：“诸位当中不少是不愿做亡国奴、主张抗日的，凡是抗日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团结起来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只见刘建三、王文珍、甄福喜等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一再连声说：“共产党宽大为怀，兄弟十分敬佩，我等一定以抗日为重。”最后，我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二、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三、保安团听候改编。我的话音刚落，几位士绅连忙举杯向我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急忙向刘建三递眼色，刘建三亦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称接受我提出的条件，欢迎我军进城。

27 日上午，我军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巨鹿城虽不大，但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点名气，公元前 207 年项羽率领楚兵救赵，曾在这里大败秦军，东汉末巨鹿人张角亦曾以太平道发动黄巾军起义，想不到今天我们也开进了这座古老的名城。这是我军到冀南后，解放的第一个县城。

进城后，我们和地下党的同志举行了联欢会。他们见到了自己的军队，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高采烈，热泪盈眶。我和李菁玉等同志与地方同志研究，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以该县开明士绅王淼为战委会主任，张子衡同志为副主任。随后，我们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和巨鹿县保安团进行抗日教育和整编工作。

保安团和土匪火并的“巨鹿事件”和平解决，是我军到冀南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打开了我军进入冀南的大门，而且在冀南特别是在巨鹿附近的几个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大群众在黑暗的彷徨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光明磊落的态度，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赞扬和拥护。因而“巨鹿事件”解决后，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军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

进驻南宫　扩大武装

我们在巨鹿城住了几天，即向南宫县境开进。部队在南宫城西之苏村驻扎了几天，并在这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后，于 2 月 8 日进驻南宫城。南宫，位于冀南地区的中心，是平（北平）太（名）公路上一个重要县城，交通方便，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但由于不久前 10 余股土匪的围攻和敲诈勒索，该城商业多已凋敝零落，我东纵司令部即驻在城内一家已关闭的“华兴公烟草公司”。

这时，日军正向南侵，从华北抽调第十六师团及第十四、第一〇八师团各一部参加南下作战，华北的兵力已相对减少。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首先派出部队在地方党的大力协助下，积极在南宫县及其附近的新河、清河、冀县等地宣传我党的政策，建立抗日政府或“战委会”，改编地方团队，组织抗日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我们从东纵抽出一部兵力组成两支挺进队，分赴平汉路东侧的隆平、尧山、任县一带，以及津浦路西侧的临清、夏津、高唐一带，积极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我东纵以南宫为中心而迅速展开，不仅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在伪军和土匪及游杂武装中，也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有人主动要求我军予以改编。驻在冀县码头李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队伍很快扩展到 3 千余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自封为司令。金庆江想找八路军做靠山，派人到南宫来找我，我当然表示欢迎。但他非要朱总司令下委任状，我没有同意。正在谈判时，我党派往金部工作的同志和一些进步官兵认为金庆江对改编为八路军没有诚意，于是将金庆江扣押起来。闻讯后，我即率部赶到码头李，受到群众和金庆江部爱国官兵的夹道欢迎。在地方党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将金庆江部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二支队”，同时还收编了盘踞在丘县马头镇的土匪李景隆部 3000 余人，将该部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游击第一师”。

占据威县的日伪军，是对我冀南八路军最大的威胁，而要消灭该敌，拔掉这个据点，当时我东纵的力量又一时难以做到。因此，加紧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就成为我们的侧重点。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原为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高士举于日军攻占威县后，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并当上伪旅长。该旅下辖 4 个团和 1 个警备营，共 2000 余人。早在 1937 年 11 月间，我地方党即派人打入该部，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后，又曾派人去做高的工作。在我军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 月初，该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

击独立第二师”，以高士举之子高希伯为师长，由此扫清了一大障碍。

我军的节节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青壮年纷纷踊跃参加我军。东进纵队除收编了一些游杂土匪武装和争取伪军反正外，以两个老连为骨干组成了东纵第一团(团长程启光，政委桂承志)，另以一个老连为基础扩大组成为津浦支队，骑兵连也扩大为骑兵大队。

冀南地区抗战大好形势的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干部严重缺乏。各县纷纷来人要求我们派干部去领导他们抗日，可是地方党和部队的干部能派出的却很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与李菁玉政委等研究，决定立即开办一个“抗日军政学校”，校长由我兼任，具体工作由纵队司令部训练科长王蕴瑞同志负责。学员大都是由地方党介绍来的进步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共产党员，校址设在南宫县原国民党县政府内。学校没有专职教员，都由省委和纵队领导同志兼任，我和李政委也多次去讲课。教学内容主要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学习一些游击战术等军事知识。学员完全按军队组织编成，过军事生活。每期学习一个月，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有两个学员队，每队百人左右；第二期有四个学员队，每队也是百人左右。两期共培训了 600 多人。

学员毕业后，在各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建立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在开创冀南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晓以大义 折服赵段

我军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西向平汉路的发展都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向北发展却遇到了困难。当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县，盘踞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和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赵云祥原在国民党二十九军当过手枪队长和团长，“七·七”事变后，从保定逃到冀县、武邑一带。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利用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组成了两个旅，并以武力威胁，收编了盘踞在景县一带的葛桂斋(外号葛二秃子)，及衡水县的“自卫团长”邵伯武等部，一时竟发展到近四五千人。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一心想吃掉段海洲。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北平上过大学，“七·七”事变后回到老家，在武强、安平、交河一带，打起“抗日”旗帜，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收容了一批抗日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竟扩大到 3000 余人。

赵、段两部是当时冀南各种武装中最大的两股，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或暂时争取其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根据地的建设。我军进驻南宫后，曾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但遭到赵云祥的拒绝而未能实现。当我军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一带展开时，赵云祥为了与我军抗衡，迫不急待地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不时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段为了保存实力，想依靠我军与赵云祥作对，特派其部下陈元龙到南宫同我军联系，表示愿与我军联合抗战。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我和李菁玉政委等同志研究，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并以我的名义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城举行三方会谈。段海洲立即表示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反对，但又惧怕我军与段海洲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出席。

3 月初，会议在南宫城我军驻地举行。

开会前一天，段海洲就来了。我举行晚宴欢迎他，席间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并就联合抗日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赵云祥来开会时带着一个骑兵连，驻在城北一个村子里，第二天快到开会时才进城，很显然对我军存有戒心。

会议开始，我首先说明了我们三方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的话音刚落，赵云祥就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地争先发言，说什么联合抗日他“赞成”，但是如何联合起来，还有待研究。接着，他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竭力解释过去与段海洲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等，意在拉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们，以取得领导地位。但是，他的阴谋并未得逞。段海洲在会上历数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并请赵云祥答复。赵云祥一时神色有些紧张，竭力为自己辩护，把挑起冲突的责任推给部下，而自己只是“管教不严”。我怕他们争吵起来，影响会议的进程，弄个不欢而散，于是急忙从中调解，要求双方协商解决。我严肃地对赵云祥说：“希望赵先生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不能对着自己人，不能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赵云祥自知理亏，虽然极力再想辩护，但怕自己陷于孤立，便顺水推舟地说：“过去的事情咱们不提了，还是研究今后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吧！”我便趁机提出由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意见，以及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等要求。段海洲对我的提议，表示同意，并建议要划定驻区，各部队不得越界行动和由我做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做副主任。段海洲的提议我表示同意。但赵云祥则找出种种“理由”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和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对其他各项虽不同意，但却不敢公开反对。段再度陈述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必要性，不同意赵的意见，并说：“如果赵先生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我和陈司令两方组成。”赵云祥见此情势，怕我们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只好勉强表示同意。会议终于达到预期目的。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我们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它加强了我军在冀南各类武装中的领导作用，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更加处于主动地位，对进一步稳定冀南局势，打开整个冀南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加强冀南工作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1938 年 3 月 19 日，一二九师首长派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来到冀南。我和宋任穷同志在援西军时就认识了，尔后又在晋东北抗日前线一起进行过战斗。从他到冀南时起，我们共同在一起战斗了将近 10 年。这期间，任穷同志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到冀南后，我们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发展根据地的问题。这时，邢台至临清公路上的一些县城仍被日伪军盘踞着；武强、衡水、枣强、景县等地仍被赵云祥和段海洲的部队所控制。因此，向北向南发展均有困难，只有向东、向西发展阻力较小。冀南西部与太行山相连，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必须以太行山为依托，同时也便于及时接受刘邓徐首长的直接领导和指示；而太行山的巩固与发展没有冀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也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决定以东纵一团和骑兵团等部队迅速向西发展，以扩大与太行山的联系。稍后，又组成津浦支队向东发展。我率东纵一团进至滏阳河南北地区，连克宁晋、赵县、藁城、束鹿、新河等县；骑兵团在王振祥团长、邓永耀政委等率领下，连克广宗、平乡、南和、曲周等县城；津浦支队在孙继先司令员、王育民政委率领下，进至高唐、夏津、恩县一带。

我军每到一地，即在地方党的协助下，解散伪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改编保安团队，宣传和组织群众，冀南根据地的局面逐步打开了。

巧擒匪首　计捣匪巢

在我冀南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原来被我收编的一些股匪头子，如邱庆福、刘磨头之流本性不改，不仅不执行我们提出的要求，而且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继续危害人民，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群众的抗日情绪。在群众的要求下，我们决心以武力铲除之。

邱庆福，是原来盘踞在隆平一带的土匪头子，被我收编后，仍贼心不死，依仗其人多武器好，积极扩大地盘，竟带着部队窜到南宫城附近，烧杀抢掠，群众恨之入骨。此间，我多次令他归返原驻地，不得扰害百姓，他却置之不理。那时，随我在南宫的只有东纵两个连，如不解决邱庆福，不仅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而且还会严重威胁着我东纵司令部的安全。于是，我召集东纵一团团长程启光及两个连的干部一同制定了一个比较巧妙的解决办法。

一天上午，我以检阅部队为名，令邱部在南宫城北之樊家庄村北一个大场子里集合。这个场子旁边有条干壕沟，是很好的天然战壕，东纵的两个连站在壕沟的前边。邱庆福的部队站在场子的另一边，其身后也有一条壕沟，但水深及颈，难以徒涉。樊家庄村北有一栋高房子，我们在房子上隐蔽地架起了几挺机枪。当程启光团长站在场子中间一个方桌上给邱部讲话时，我令邱庆福来司令部开会。司令部驻在一座三进的院子里。邱庆福带着十多个护兵一进司令部大门，我们的同志就告诉他，里面屋子小，不能进这么多人，留下了他几个护兵。他们进入第二道门时，我们的人又对护兵们说，今天陈司令要同邱司令商谈军机要事，只请邱司令一人进去，其他任何人不能进。邱庆福无可奈何，当其只身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我一声令下，预伏在这里的几名战士一跃而出，将邱捆俘。接着，我又令邱部中队长以上干部来司令部“开会”，缴了他们的枪。这时，邱部中的汉奸特务和个别死硬分子，见状感到事情不妙，就高声喊“打”。我部队迅即退到后边的壕沟里，不等对方动手，便抢先开枪射击，房上的机枪也同时开火。邱部后退无路，加之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有的跳进水里，有的被打死或打伤，有几个匪徒慌乱中竟跑到我们司令部跟前，作了我们警卫员和炊事员的俘虏。邱庆福和他的部队就这样全部被我军解决。

解决了邱庆福，南宫地区的群众欢欣鼓舞，杀猪宰羊，慰劳我军。这时，宋任穷同志和我又决定 4 月初进剿刘磨头。

在我东纵进驻巨鹿时，刘磨头表面上接受了改编，但暗中却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他率领的土匪盘踞在任县地区，县城东北 10 余里的环水村，是刘磨头的老巢。该村有百余户人家，四周被水环绕，西面与滏阳河相连，东南北三面水深三四尺，水面宽阔，不易徒涉，犹如一个小小的“梁山泊”，易守难攻。刘磨头在这里已盘踞了 20 多年，抗战前任县保安团曾联合巨鹿保安团数次进剿，国民党二十九军派部围攻均曾被刘击退。我军要彻底消灭该匪，必须首先捣毁刘磨头的巢穴——环水村。

我们决定由骑兵团、东纵一部和当地地方武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我召集参加作战的领导干部分析情况，研究作战方案，大家认为，最好智取，不要强攻。

我参战部队到达隆平、任县地区后，地方党的同志一听说要打环水村，端刘磨头的老窝，高兴极了。地方党的负责同志说：刘磨头手下的一个头头在这里，我们可以让他帮忙。这个头头名叫刘富子，我东进纵队到达冀南后，他即以探听虚实为由自环水村出来，想与我地方党建立联系。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可利用人物，打算由他乘船带路，直捣环水村。刘富子开始有些犹豫，怕我们消灭不了刘磨头，自己反而遭到杀害，后经说服才接受了这一任务。

4 月 4 日拂晓，大雾弥漫。我东纵首先以骑兵大队一

部用几挺机枪封锁了环水村通滏阳河的水面，防止土匪乘船逃跑，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队，乘船在刘富子引导下向环水村西岸疾进。突击队距村西100米时，村口的哨兵高声问话，刘富子回答："我是刘富子，外出回来了！"哨兵一听是刘富子的声音，再没吭气，我部队乘机催舟急进，一举登岸，捉住了哨兵，后续部队亦随即赶到，立即发起攻击，将土匪围在一个四合院内。经过激战和政治瓦解，土匪全部被歼，毙伤匪徒百余人，俘200多人。与此同时，我骑兵团亦将驻在永福庄、郑家庄一带的刘磨头匪部消灭，歼匪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长短枪400余支。但是，我们在俘虏和击毙的匪徒中却没见刘磨头，经多次搜查仍未找到其踪影。被审讯的匪徒有的说："刘磨头早在三天前，带着他的姘头不知到那里去了。"有的说："他向邢台跑了。"

在消灭邱庆福、刘磨头两股土匪部队的同时，我们对冀南其他地区一些坚决与我为敌的土匪、伪军也进行了打击。在威县南里村，我们消灭了赵山峰部；在曲周消灭了肖耀成部；在临清之唐园消灭了张义等部。还有不少小股土匪，慑于我军的强大威力，有的向我投降，有的消声匿迹。自此之后，社会秩序大为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高了。

短短几个月里，我军协助冀南党组织建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部队本身也由500多人发展到1万余人。东进纵队由原来的5个连，逐步发展到3个团，东纵政治委员改由宋任穷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是胥光义（后邓永耀），参谋长是卜盛光。

为统一领导冀南各方面的工作，1938年4月15日我们在南宫县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和友军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巨鹿名绅乔铭阁被选为主任委员。军政委员会制定了敌后抗战的施政纲领，县级政权的组织和改造，以及游击队、自卫队的组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重要政策和规定。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标志着我党我军已在冀南站稳了脚跟，冀南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选自《纵横》88年5期，作者：陈再道）

神头岭伏击战

背景介绍

1938年2月，蒋介石组织反攻太原。朱德、彭德怀负责指挥东路军，确定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人后方交通，以配合友军。朱德、彭德怀命令一二〇师切断同蒲路，一二九师切断正太路，八路军指战员根据命令，开始积极行动。

2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津浦线作战，并相机西进，乃集中三万余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西、晋南发动进攻。但是，国民党军不仅没有"反攻太原"，而且不战而溃，第二战区正副司令长官先自逃过黄河西岸。因此，至3月上旬，日军已接连侵陷临汾、汾阳、风陵渡、长治等重要城镇，并向晋东南和晋西进犯，直接威胁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为箝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第一二九师集中兵力，于2、3月间先后进行了有名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其中以神头岭伏击战战果最大。

3月上旬，一二九师在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集结完毕，寻机歼敌。邯长大道是敌人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黎城是敌人在这条运输线上的重要兵站。据此情况，师部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袭击黎城，吸引来援之敌，设伏围而歼之。3月16日拂晓前，385旅的769团一部攻入黎城，与守敌进行激烈巷战，旋即撤出城外与敌继续战斗。黎明，涉县之敌赶来增援，在黎城东北之东西黄须，遭我769团主力阻击，只得退回驻地。上午9时许，潞城之敌第十六师团的林清部队、一〇八师团的笆尾部队，共步骑兵一千五百余人倾巢出援。敌军进至黎城、潞城间的神头岭时，即遭到我预伏该地的386旅突然攻击。在陈赓旅长指挥下，386旅指战员奋勇杀敌，经两小时激战，敌除百余人脱逃外，全部被歼。下午，潞城、黎城的敌人连续增援，均被我军一一击退。16时，战斗胜利结束，我共毙伤俘日军一千五百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毙获骡马六百余匹。我伤亡二百四十余人。敌人惊称神头岭伏击战为"典型"的游击战。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共歼日军二千余人，毁汽车一百八十辆，有力地迟滞了敌人向晋南的进攻。

材料：

- 陈赓神头岭巧设奇兵
- 神头设伏

材料一　陈赓神头岭巧设奇兵

一、心细如发，精选战场

从地图上看，神头岭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看来，整个邯长线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伏击战场地了。大家议论了一阵，最后都望着陈赓，等着他作结论。但是，陈旅长没有马上作结论，却反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

一片沉默，大家都还没有顾上去看。

陈旅长笑了："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做为一名指挥员，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靠国民党的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

翻过一座山，神头岭在望了。眼前的景象使大家吃了一惊：

公路不在山沟里，而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紧贴着路边，残留着国民党部队以前挖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那就是神头村，再往西，便是微子镇、潞城了。

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大适合于埋伏的，因为部队在这里既不好隐蔽，也难于展开；北面是深沟，不便于预备队运动，搞不好，还可能使自己陷于困境。

十几个人一时都愣住了。陈旅长用鞭梢朝公路指了指说："怎么样，这一趟算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

原来的希望落空了，现在，眼看这20多公里的地段上再也没有什么理想地方了。怎么办呢?同志们有的在议论着，有的忍不住骂起国民党那张地图来。772团政委肖永智说："差点没上国民党那张地图的当!"771团政委吴富善说："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哩!"

陈赓却仍在继续细心观察着，好象要把那些废弃了的工事全部都数遍。过了好久，才转身一挥手，呵呵笑着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杀猪的地方?"

回到旅部时，天色渐黑。吃过饭，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了很久，仍难以得出在哪儿打的结论，最后陈赓发言了："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

"神头岭"?大伙儿惊异地问。

陈赓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对，神头岭。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确实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点。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来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如果我们切实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敌人是很难发现的。山梁狭窄，不便于我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请问：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徐深吉团长笑道："我看谁先下手谁占便宜"。

"对哇，只要我们打得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是敌人的了。"陈旅长大手往下一挥说道。

接着他又问叶成焕团长："你们2营放在申家山，40分钟内能否冲上公路?"叶团长满有把握地说："半小时保证冲到!"

看来预备队运动问题解决了，2营一向以快速著称。

听了这些分析，大家心里豁然亮堂了。认识也终于统一了：仗，就在神头岭打。具体部署是：771团在左，772团在右，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伏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772团3营担任潞城方向警戒，断敌归路。最后，陈旅长又问："潞城敌人有什么变化?"作战股长周希汉答到："还是3千多人，没有大变化。"

"3千多，……我们的兵力是有点不足。"陈赓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个连出来，撤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

叶团长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高兴地连连点头，笑了起来。

临晨4点半，一切都已就绪了。陈赓指示各团：每个营只许留一个团、营干部值班，在外边观察，别的人谁也不许露面。

部队静静地伏在工事里，等待着东方慢慢发白。除了远处的枪炮声，四周很静，看不到一丝人迹。神头村离伏击阵地只有一两里路，没有鸡叫也没有炊烟。公路横躺在前面，由于长时间没有下雨，加上敌人运输部队往来频繁，路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很厚的灰土。

一会儿，补充团第2营响起电话声，是陈赓由旅指挥所打来的："补充团一定要沉住气，敌人来的时候，一定要等772团先打响，你们再下手"。

黎城方面，枪炮声仍在不断传来，时紧时慢，时疏时密。386旅的指战员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可心里面都在划着问号：潞城的鬼子会向黎城派出援兵吗?

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敌人来了！从潞城来的敌援兵1500多人，已经到达微子镇。"敌情通报通过电话于上午8点左右传达到了各团。同志们听说敌人真的按照我军的预定计划出援，而且只有1500多人，心里都十分高兴。大家知道，虽然我军在神头岭部署了一个旅的重兵，但潞城之敌3000多人倾巢出援，那么我一个旅的兵力全歼该敌仍将比较困难。正是由于陈赓派出的叶成焕部一个连对潞城之敌进行了袭扰活动，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所以敌援兵只有1500多人，使我军在兵力对比上形成了较大的优势。

8点半，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微子镇方向露头了，这是日军第16师团的林清部队和第108师团尾部队。敌大队人马到神头村后，突然停了下来，过了很久，才出来了20余人的骑兵搜索分队。敌人好象是发现了什么，搜索队沿一条放羊小道，径直朝772团1营的阵地走去。眼看敌人的马蹄就要踩到战士们的头上了，此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大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要是被敌发现，到手的鬼子就有可能逃掉。

看来，担心是多余的。正如陈赓同志所料，敌人只注

意了远处,注意了对面的申家山,对脚下那些见惯了的工事,却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看到申家山没有动静,即指示其部队继续前进。骄横的日本鬼子满以为这样大的部队行动,我军根本不敢惹,大摇大摆,竟唱着军歌进入我包围圈。

9点半,当敌后卫踏入772团伏击圈后,陈赓司令员发出了攻击的命令。弹指间,这平静的山梁,好象成了一座火山,386旅3个团从三面向敌猛击,成百成千的手榴弹蓦地在鬼子堆里齐声炸裂。横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连同那弥漫的硝烟与黄土,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一下把日本鬼子队伍和公路都吞没了。

敌人这时方知中计,但为时已晚,只有作绝望的挣扎。敌人的一个中尉指挥官根本来不及部署他的喽罗,只喊了一句:"就在这块地方!大家一起死吧!"话音未落,一颗迫击炮弹恰巧落在他的头上。随后,小山正美和成田利秋少慰也先后中弹,声嘶力竭地呼着:"陛下万岁"倒了下去。

但是,这些终究是以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兽兵,加之在长驱突击中,国民党军队未作过强劲的抵抗,更助长了鬼子的猖狂气焰,因此,虽然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还是要作垂死挣扎。鬼子有的滚进了水沟,有的趴在死马、死人后边向我军射击,也有的端起刺刀和我指战员们肉搏。386旅的勇士们用步机枪和手榴弹杀伤敌人,用刺刀、石头与敌展开激烈的搏斗。

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烈在神头战场上演出了他们人生最壮丽的一幕:

镜头之一:

772团8连连长邓世松,在夺取一段公路中,头部和胸部负了重伤,不能说话,仍英勇战斗,在倒下前仍投出最后一枚手榴弹,指挥连队向敌人冲击,完成任务。

镜头之二:

一个至今没留下姓名的战士,负伤四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又一口气刺死三个敌人,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手中的刺刀还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肚子上。

镜头之三:

司号员杜旺保,抱着大石头冲上公路,把一个敌人砸得脑浆迸裂,夺回一支三八枪。

在这"独木桥"上短兵相接的战斗中,由于我军迅猛顽强的冲杀,中段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除少数窜向东面的张庄和西面的神头村方向外,绝大部分敌人都成了386旅的刀下之鬼。

三、神头奏凯,毙敌千余

神头之战眼看要结束时,出现一个意外的情况:残敌3百余人钻到神头村,妄图凭借民房、窑洞顽抗,固守待援。如果让敌人在村里一站稳脚,就等于让敌人占领"桥头堡",形势对我军将极为不利。现在,战斗能否取得全胜,关键完全系在对这个不满十户人家的神头村的争夺战上了。大家都很着急。

正在这个时候,陈赓旅长刚好由申家山下来,到了772团指挥所。陈旅长问:"村边是哪个排?"叶成焕团长说:"7连1排"。旅长又问:"是蒲达义那个排吗?"团长又回答:"是"。蒲达义排一贯勇猛顽强,能打硬仗,曾多次受到旅长的表扬。这时陈旅长把手杖一挥,斩钉截铁地说:"命令1排,不惜一切,把村子给我拿回来!"

1排没有辜负旅长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二十几个人在蒲达义带领下,用机枪火力和一个班在正面掩护,以两个步兵班从侧面攻击敌人,一个猛冲,连续攻占两幢房屋,仅以伤亡5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了几十个敌人,把敌人逐出村外。可是,敌我力量众寡悬殊,敌人一出村,马上进行反扑,蜂涌冲来,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叶成焕团长亲自率领第8连及时赶到村里,巩固住阵地。敌人还不甘休,又连续组织反扑,机枪、步枪、小炮、集中向村里扫射、轰击。村中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拉锯战。

正在激战的时候,陈赓旅长拄着拐杖到了神头村里,一边观察村外的情况,一边挥着手杖向冲过身边的战士们喊:"快上!把敌人给我赶到山梁上去!"这时一颗炮弹在附近轰炸,一间小草屋燃起熊熊烈火。旅长的手杖也被爆炸的气浪震落,飞出很远。警卫员急得直喊:"旅长,这里危险!陈赓却只抖了身上的泥土,取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快上去告诉大家,决不能再让敌人占一个窑洞、一间房子!"

陈赓旅长来到村里的消息,立即在部队中传开。正在前沿的叶成焕团长担心他的安全,急得满头大汗。但他知道此刻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彻底歼灭敌人!叶团长二话不说把盒子枪一举,大喊一声:"消灭敌人,冲啊!"战士们跟着团长,不顾一切地扑向敌人。补充团的战士也勇气百倍地冲上去。残余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很快就被全部消灭。

战到11点半,日本鬼子除百余人逃回潞城外,全部被歼。

13点,潞城之敌一部乘两辆汽车来援,被我772团7连消灭于神头村西南。14点,又有汽车七辆载敌来援,被772团炮兵连击毁三辆,其余窜回潞城。至16点,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

黄昏,386旅的英雄们开始撤离了。扛着梭标的战士们,战斗之前每个人都写了一个"矛子枪换鬼子们的三八式"的小条子挂在梭标上。待他们从神头岭下来时,果然都换上了三八式。走在队伍前面的陈庚旅长,骑着缴获的东洋马,手里拿着日本指挥刀,喜形于色。他望着屋里、沟里、地里到处都有的日寇遗尸、战利品和被风吹散的敌军

文件，对同志们说："你们看，这纸张好象画随风临空飞舞，有如天女散花，庆祝我们的胜利呢！"

的确，这次神头岭伏击战，战果辉煌，令人欢欣鼓舞。日本鬼子对此次神头岭被歼，异常震惊。惊恐之余，又称我这次战斗是"典型的游击战"。侥幸漏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酒沼，逃回之后，写了一篇题为《脱险记》的通讯，登在《东亚日报》上。他写道：

"神头村的战斗，是他的典型战术。……

正当先头部队要开始行进的时候，呼呼地飞来的子弹，轰轰隆隆地炸裂的迫击炮弹，沉重的、使人心里不愉快的连续的重机关枪响声盖过来了。

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敌人兵力约有一二千，在前面高地的棱线上露出了脸，……连他们被憎恶的火焰燃烧着的神色，都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尾队长抽出指挥刀喊着：'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地干吧！'他刚喊毕，……敌人的迫击炮弹就在队长的头上爆炸了，当场完成了壮烈的终结，队长完蛋了！

……除了死以外，再没有旁的什么。"

骄横的日本"皇军"，在我 386 旅的沉重打击之下，再次领教了共产党军队的厉害。所以，以后在华北平原的日寇只要提起 386 旅都会引起阵阵恐慌和不安。

（选自《百战图》，作者：王厚卿）

材料二　神头设伏

经过了半小时的休息，部队悄悄的布置好了。第××× 团集中主力在续村岭，向黎城方面警戒，并遥为正面接应；×× 团一部分埋伏在神头村东南地区；第七七二团留第二营作后备，以第三营潜伏微子镇附近，向潞城方面警戒，把第一营安插在神头村后边的高地和高地背后。紧张而秘密的夜间动作一完，一切复归平静，山村的鸡啼犬吠特别响亮起来，这时候天色已渐渐发白。

消息是严密的封锁了。神头村一个早起的老百姓，不知有什么事，走到山背后来，一见满坡坐了八路军，十分惊讶，经战士们挥手示意后，很懂事的不再回村子，下山躲去了。

风很冷。一夜月明以后接上来了一个阴天。

埋伏处排长以上的指挥员亲自放哨了望，其余都掩蔽得一动也不动。

早八时许，忽听得一阵轰轰轰的声音，从西南方动地而至。伏在壕沟里的战士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抓住了武器，可是不准探头！轰轰轰的声音近了，近了，大家想动了，可是没有命令。轰轰轰的声音简直就从他们头上擦过去了。汽车——大家心里明白；了望的则看得清清楚楚——三辆。

这三辆是敌人的探路的汽车，显然的，可是对于埋伏的部队却带了报信的意思：仿佛说敌人的大队人马就要来了。不错，隔不了多久，敌人的四十多个骑兵来了，其次是一些步兵，再后就是近千人的辎重队，带了百多辆牛拉车、马拉车，好大胆呵，他们进了村子，竟那么贴近了埋伏的部队而休息了。

他们只休息了一会儿，十五分钟光景，先头部队就在村北口动起来，而第七七二团也就把命令传达遍了，正好动手。

战士们向狼狈的敌人一连串又一连串的实行刘师长所说的三部动作：用枪打头，用刀矛刺胸，用手榴弹炸屁股。

可是战斗没有立时解决，一直延长到了午后。

西南方公路上又来了几辆敌人的汽车，可是无能为力，无非来多送些命，而第七七二团的第二营第七连和第八连由政治委员和政治副主任率领了增加上来，于十几分钟内翻过了两个山头，一个都没有掉队。政治工作人员也自动跑上战场。

神头村西边山坡上，在打倒的敌人、骡马、辎重之间，抬伤员的、搬胜利品的来去奔忙，热闹得象赶集。

四时许结束战斗，部队渐次撤退。

战斗中随第一营作战的第七连、第八连的新战士特别多英勇的例子。他们有的用矛子，有的甚至于用石头换了枪，有的还履行了对因病不能参加作战的新战友所许下的诺言：给捎来了一枝枪。

战斗中有六个战士受伤了两次不下火线。

第二连打得最剧烈，干部伤亡殆尽，只剩了政治指导员。直接参加战斗的六个连中一共伤了一百多人，牺牲了五十四人，可是一千四百多敌人却遭受全歼，只逃走小部。

第七七二团的敌军工作是进步了。战斗中不管说得正确不正确，不管敌人听懂听不懂，部队实行了叫话，虽然间或还有些战士在打得起劲的时候忘记了"缴枪不杀"的日本话而喊出了本国话的"杀！"

俘虏记录飞进的突破了：这一次抓到了八十多个。

敌人逃走了至多一百个。这一百个当中有几个到战斗差不多完全解决的时候还躲在一个顶厚七尺的窑洞里，从正面打进那里去是很费事的，于是竟有一个小鬼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把铁锹，从旁边爬上窑洞顶，预备挖下去，想挖穿七尺厚的坚泥层！这要花多长的时间啊！真是异想天开。大家笑了。政治委员恰好在那里，招下了小鬼，一边说："我们要走了，饶了他们罢。"

（选自《中国报告文学丛书》，作者：卞之琳）

少录三卷 3 正

长乐村战斗

背景介绍

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开展，特别是八路军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取得重大胜利，使敌人受到很大的震惊。为了消灭和驱逐我在晋东南的部队，解除后方威胁，日寇于1938年4月初，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力，并集中十六、二十、一〇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共十余个联队三万人以上的兵力，由博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泌县、长治，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妄想将我军合击歼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针对敌之企图，我八路军总部决心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消耗疲惫各路进犯之敌；主力则跳出敌人合围圈，转至外线，待机歼敌。朱德、彭德怀亲自指挥了这次反围攻战役。当各路敌人开始出动时，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689团即由辽县以南转移到敌人合击线外的涉县以北地区。而三四四旅主力、山西决死一纵队、各地区基干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则留在内线坚持游击战。

4月10日前后，各路敌军相继侵入我抗日根据地，经我内线军民英勇战斗，除三路敌军深入根据地外，其余各路均被阻滞。深入根据地之敌一〇八师团步骑兵六千余人分为两路，一路以一〇五联队为主侵入辽县，一路以一一七联队为主窜入武乡。这两路敌人沿途均遭到了我游击队和自卫队的袭扰，加上广大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因而陷入饥饿疲惫和恐慌不安的困境。我一二九师师部根据这一情况，即于14日指挥本师主力和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5日，进到武乡附近，准备打击敌一一七联队。是日傍晚，敌一一七联队弃武乡沿浊漳河东逃。我师即以772团、689团为左纵队，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以769团为第二梯队，沿大道跟进。4月16日清晨，我左右横队将敌夹击于长乐村地区。在我猛烈击下，敌人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被动挨打。已过长乐村之敌，为解救被围部队，便集中千余人，向我左翼发动猛攻。14时，敌一〇五联队由辽县方向又赶来增援。我689团、772团与援敌进行了激烈战斗。17时后，从辽县方向再增来援敌千余人。师部根据敌情变化，考虑我已不能全歼敌人，便在黄昏时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我共毙伤日军二千二百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我伤亡八百余人，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给了敌主力以严重打击，迫使其他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是我粉碎日寇九路围攻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我军乘胜追击，27日自长治撤退之敌在高平以北的张店、张度岭和高平以西的町店，又连续遭到我三四四旅和决死一纵队的截击，伤亡千余人。至此，日军的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被我彻底粉碎。

长乐村战斗，我军打破了敌人的围攻，消灭日军四千余人，而且收复县城18座，最后将敌全部赶出晋东南，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完全巩固。同月，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倪志亮任军区司令员；同时，李雪峰任晋冀豫省委书记。不久，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由晋西迁往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指挥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军民对日抗战。

材料：

- 长乐村大战

材料　长乐村大战

战斗开始后，派在极左翼打敌人先头的第三营就从山上冲下去，由第三营营长雷绍康率领第九连，副营长王仕友率领第十连。不巧，前面连续的竖着五六个七八尺高的峭壁，怎么办呢？营长首先滚下去了，一连人都象被一条绳子牵着似的滚下去了；雷营长也首先滚下去了，又一连人也象被一条绳子牵着似的滚下去了。敌人象一阵海潮一样的向河滩上的乱石间退去，大部分都不动了，贴在地上，象水竭于沙。

这时候中部的敌人忽然集中主力拚命向第七七二团的中间阵线冲上来，企图占领几个高一点的据点，遮断第七七二团下到河坝的各部分的后路，特务连就奉命反冲锋下去。可是不巧，前面也连续的竖着四五个七八尺高的峭壁。不等说"怎么办呢"，简国湘连长就首先滚下去了，一连人都象被一条绳子牵着似的滚下去了。敌人象秋天山坡上的落叶，不知被哪来的一阵风直扫了下去。

敌人又集中火力攻击第七七二团的左翼，企图抢上山来，从那里插到第七七二团的侧后方，以挽救全部的危局。第三营下到河坝上的两个连已转上了山头的原阵地，与另外两个连协同了沉着抗拒，使敌人几次三番都白用了气力。

这时候后尾和中段的敌人则局促在山沟里，一任第七七二团第二营和第一营，以及从武乡南边绕到长乐村附近南山上的第×××团的一部分大刀阔斧的聚歼。

第一营的重机关枪打得很得力，有一次见有三个敌兵抢上了山沟对面的一个小山坡，企图占一个高处的据点，当首先把第一个在高头的扫倒了，接着又把还向上爬的第二个扫倒了，然后又把掉头下逃的第三个又扫倒了。

迫击炮兵连先向山沟里的敌人开了十二炮，都打中了，把敌人从这边赶到那边，又从那边赶到这边，碰来碰

去，总碰上炮弹，可是却没有爆炸。于是连长刘明一生气，把炮位移动了一下，然后，说来奇怪，发出去每一弹都开了花。事情也有巧到这样的：一个被敌人拉去的自卫队员从敌人方面逃出来了，很得意的讲着一个炮弹来的时候，把他身边三个敌兵都炸死了，却留下了他，给了他一个逃脱的机会。

仿佛幸运跟着娴熟走，也跟着勇敢走，特务连战士童圣贤，曾经当过骑兵的，见了底下山沟里尽是洋马，心动了，竟独自一人直奔下去，跳上了一匹，拉转马头来就跑，居然安全回阵，而且，另外还带回了一头骡子，那头骡子，大概因为在枪炮声与混乱中吓昏了，看见那匹马被骑着急驰，也就拚命的跟了上来。

满山沟的辎重、枪械看来可以唾手可得了；局促在山沟里的残敌看来可以全部解决了。战斗已继续了四小时。可是他们从辽县方面，没有经过就在大道旁高地上的第×军阻挡，而一直增来了大队的援军。

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左翼的第三营。他们又撑住了许久，直等到第×××师的第×××团赶上来接替了。以后就是第×××团展开了与竭力想抄袭后路的这一批援敌在山坡前的反复冲锋，从山上望去，只见一道灰色线与一道黄色线的忽进忽退，一似海滩上的潮起潮落。

因为敌已大举增援，要全部消灭他们已不可能，而估计四五千敌人已至少伤亡了千五百以上，已给了他们以不小的打击，师指挥所下令收军了。部队乃渐次移动。敌人见了，以为有机会可以报复一下，用足最后的余力，活跃起来了，可是却被挡了回去。

第七七二团最后的一个排用十二把刺刀轻轻的拨退了二百多个向上三次冲锋的敌人。

这最后一个连——带两挺轻机关枪殿后的一个连——里就有叶成焕团长在。他看着满山沟的辎重、枪械不曾作为胜利品而搬上来，很不惬意。虽然知道得服从上级的命令，他怎样也舍不得就此离开战场，迟迟复迟迟，终于落到跟最后一个连一起走。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向山下用望远镜望一下；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向山下用望远镜望一下。终于一颗子弹飞来了打中了他的头部。

他只是受伤。可是抬回去了一昼夜又半夜，于十八日早一时二十五分，他终于结束了差不多全部从艰苦奋斗中过了的二十四年的一生。

哀悼英勇的领导者之余，第七七二团的战士们也非常不惬意：敌人还没有全部消灭自己就先退了！四百人流了血（各团合共伤亡八百人）而得来的主要的胜利品就是二十几枝步枪和一挺轻机关枪！在他们向来认为没有夺到枪的战斗不能算胜利。

可是到十九日下午朱总司令来一讲话，大家又高兴了。朱总司令解释了这一次战斗的意义与价值：长乐村战斗是这次反敌人围攻的大战役的决定的战斗。在这一个战斗里虽然作为进攻的主力的敌人没有被全部消灭，他们的战斗力被完全摧毁了。第七七二团虽然没有得到更多的敌人的枪枝，全晋东南抗战大局上却获得了与几千枝枪价值不可同日而语的大战果：决定了敌人九路围攻的粉碎。

原来长乐村战斗以后的情形是这样的：各路进攻的敌人丧了胆，全部动摇。榆社、武乡确实收复了以后，八路军的特务团配合游击队扰得沁县的敌人昼夜不安，弃城南退，再加以截击和追击，遂焦头烂额，溃退长治，与从长乐村一带退下来的残敌会合。侵占沁源的敌人七八百名也退了，在路上又遭第×××师和第×××师各一部夹击，全部消灭。在东西团城铺和盘陀一带的敌人阵亡了一个联队长，伤亡了四五百人，退出了子洪口。同时和顺、昔阳之间的汽车道已被曾、汪两支队破坏，辽县敌人遭他们不断围攻，乃向北溃退。邢台、榆次、涉县三路的敌人亦先后退去。接着长治周围各县城都次第收复，到五月初第一〇八师团连司令部所在地的长治也放弃了。于是在平汉、道清、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的晋东南以及冀西、豫北的一部，这一大片地方全部光复，很少变化的一直成了华北最大的一块抗战根据地。

（选自《中国报告文学丛书》，作者：卞之琳）

台儿庄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敌千余人开始进攻台儿庄，被第三十一师和黄樵松第二十七师一部歼灭过半。翌日，敌再进攻。27日晨，敌破北门，占领庄东北角。至28日，围攻台儿庄之敌已达四千余人，炮二十余门，战车二十余辆。受敌炮击，台儿庄车站、煤厂，几乎被炸成废墟。我守军与敌实行近战、肉搏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突进庄西北角。我方以汤恩伯军团之第五十二、第八十五军在外线向枣、峄日军猛攻，并把主力移至台儿庄东北，攻敌侧背，策应台儿庄守军。

29日后，敌我双方在庄内反复争夺，敌受重创。濑谷再以兵力支援，并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31日下午，我第五十二军与第七十五军一部抵达台儿庄附近，对敌实行侧击，并切断敌后方交通。濑谷旅团腹背受敌，被我包围。是时，坂本旅团由临沂转来，进入兰陵，攻我五十二军侧背，使我围歼濑谷旅团未能实现。4月2日夜，池师再以奋勇队夜袭，毙敌甚多，夺回庄西北角。第二十七师亦夺回东北角。当日，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总攻。3日起，第五十二、第八十五、第七十五军等，在台儿庄附近向敌展开猛烈攻势，给敌以严重杀伤。庄内，第三十一师与敌

展开巷战，逐段肃清敌人。6日，第三十师攻下南洛，断了台儿庄敌人后路；第二十七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出击，敌仓惶应战，伤亡惨重，向西北退却。第三十一师也向庄内敌人反击，濑谷部队力战不支，向峄县溃逃。7日，坂本支队仍在庄内顽抗，但在我汤、孙两部夹击下，伤亡极大，当晚向北溃逃。由于孙桐萱第三集团军所部第五十五军已到达临枣北侧，切断了敌津浦线归路，日军乃凭借峄枣附近有利地形，固守待援。

材料：

- 血战台儿庄
- 敢死队夜袭敌军记

材料一　血战台儿庄

二月上旬，临沂告急，该地为鲁南军事上所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此处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驻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庞部防地则由驻苏北的缪镕流军接替。）

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崇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则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庞君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于抗日以前的内战时期，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

庞氏有其特长，能与士兵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

当庞部奉令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之初，庞氏即来徐州谒见，执礼甚恭。我因久闻其名，且因其年长资深，遂也破格优礼以待。我虽久闻此公不易驾驭，但百闻不如一见，于谈吐中察言观色，觉他尚不失为一爱国诚实的军人。在初次见面时，我便推心置腹，诚恳地告诉他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位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接着，我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这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个军人，以终其生。

庞听了很为感动，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替你解决呢？庞叹息说："我原有五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四个团。长官，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呢？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似乎也不是统帅部的本意吧！"

我说："可能上级不知道你部队的实况！"

庞说："报告长官，我如不遵令归并，中央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

我说，中央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我当为你力争此事。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还缺少些什么呢？庞说，子弹甚少，枪枝也都陈旧，不堪作战。我也答应在我权力所能及，尽量予以补充。在庞部去海州之前，我便认真地向中央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旋奉军政部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况。"我将此消息告诉庞，全军大喜过望，庞氏自更感激涕零，认为本战区主帅十分体恤部属，非往昔所可比拟。我更命令本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三军团的弹药和装备，然后调其赴海州接防。全军东行之日，我亲临训话，只见士卒欢腾，军容殊盛，俨然是一支劲旅。

此次临沂吃紧，我无军队可资派遣，只有调出这支中央久已蓄意遣散的"杂牌部队"来对抗数目上且占优势的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

二月下旬，敌我两军遂在临沂县城发生攻防激烈的战斗。敌军以一个师团优势的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我庞部猛扑。我庞军团长遂率其五团子弟兵据城死守。敌军穷数日夜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以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名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板垣征四郎显然因颜面有关，督战尤急。我临沂守军渐感不支，连电告急。

所幸此时我方援军张自忠五十九军，及时自豫东奉调赶至津浦线增援。张部按原命令系南向开往淮河北岸，增援于学忠部，适淮南敌军主力为我李品仙二十一集团军的三十一军和廖磊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所纠缠而南撤。我遂临时急调张自忠全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张部以急行军出发，于三月十日黄昏后赶到临沂郊外。翌晨，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五十九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临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始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庞、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

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九十余里，缩入莒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造成台儿庄大战前，一出辉煌的序幕战。

敌军退入莒县后，我军围攻数日，终因缺乏重武器，未能奏效。

临沂一战，津浦北段敌军，左臂遂为我军砍断，敌两路会攻台儿庄计划，遂为我所破，唯敌军沿津浦线而下的正面矶谷师团，则因韩复榘不抵抗的影响，日益向南推进。值此紧要关头，我方另一部援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邓锡侯部(辖第四十一军及第四十五两军)，适自郑州赶来增援。我遂急调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及一二四两师)前往鲁南的邹县堵截，四十五军跟进为预备队。军次滕县，知邹县已失，四十一军乃以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守滕县城，一二四师在城外策应。敌军以快速部队南侵，将滕县包围，并以重炮及坦克猛攻县城。王师长亲自督战死守，血战三昼夜，终以力有不逮，为敌攻破。王师长以下，全师殉城，至为惨烈。然卒将敌军南侵日期延缓，使我增援部队汤恩伯、孙连仲等部能及时赶到参战。

邓锡侯部川军来五战区作战，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邓部原驻于川西成都，因其防区通向外界之水路为川军刘湘所部封锁，无法购买弹药补充，故士兵所用的枪械半为土造，极其窳劣。此次激于大义，请缨出川参加抗战，奉统帅部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以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由二人亲自率领，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然仓促出师，远道跋涉，沿途又无补给兵站的组织，势须就地购买粮草，对军纪不无影响。

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敌人用机动性快速部队向我军左冲右突。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事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悉，大为震怒，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统帅部接此难题，乃在每日会报中提出。委员长闻报也很为生气，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程长官要不要？"

军委会乃打电话去郑州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告知此一命令，并老实说出其原委。孰知程潜对川军作风早有所闻，在电话里竟一口回绝。据说，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将此消息报告委员长，并请示办法时，委员长正因南京初失，心绪不好，闻报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吧！"

白崇禧在一旁听着，便劝解道："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白氏随即自武汉用长途电话问我，并娓娓陈述此一事件的经过。此时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我无援兵可调之时。我便立刻告诉白崇禧："好得很啊！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

白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点。"

我说："诸葛亮扎草人作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

白崇禧闻言一笑。川军就这样地调到徐州来了。

当临沂和滕县于三月中旬同时告急时，蒋委员长也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防御兵力的必要，乃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星夜增援。首先抵达徐州的为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辖两个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和第八十一军王仲廉)共计五个师(第二师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张耀明、第四师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张雪中和第一一〇师张轸)。该军团装备齐全，并配属十五升的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

汤部第八十一军先抵徐州，即乘火车北上支援二十二集团军的作战，不幸滕县已先一日陷敌，迨汤军团全部到达，已不及挽回颓势，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

随汤部之后到徐州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集团军名义上虽辖两军(第三十军田镇南、第四十二军冯安邦)惟该部因曾参加山西娘子关之保卫战，损失颇大。四十二军所剩只一空番号而已，孙连仲曾屡次请求补充，均未获准。其后不久，四十二军番号且为中央新成立的部队取而代之。故该集团军实际可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三师(第二十七师黄樵松、第三十师张金照、第三十一师池峰城)。孙总司令到徐州来见我时，匆匆一晤，我就叫他快去台儿庄部署防务建筑工事。因孙部原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最善于防守。我当时的作战腹案，是相机着汤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我判断以敌军之骄狂，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我正要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君入瓮。待我方守军在台儿庄发挥防御战之最高效能之时，即命汤集团潜进南下，拊敌之背，包围而歼灭之。

部署既定，敌人果自滕县大举南下。汤集团在津浦线上与敌作间断而微弱的抵抗后，即奉命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崮东南的山区。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运河南岸，归长官部指挥。敌军果不出我所料，舍汤军团而不顾，尽其所有，循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四万，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共百余尊，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徐州城和铁路沿线桥梁车站，被敌机炸得一片稀烂。

三月二十三日，敌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闻炮声。

二十四日敌人开始猛烈炮轰我防御工事，战斗激烈期间，我第二集团军阵地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炮轰之后，敌军乃以坦克车为前导，向我猛冲，将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摧毁后，敌步兵乃跃入据守，步步向前推

进。台儿庄一带，耕地之下盛产石块，居民多垒石为墙；以故每一住宅皆系一堡垒。此种石墙敌人冲入占据之后，我军因无平射炮，又无坦克车，即无法反攻。然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与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敌人猛攻三昼夜，才冲入台儿庄城内，与我军发生激烈巷战。第二集团军至此已伤亡过半，渐有不支之势，我严令孙总司令死守待援。自二十七日始，敌我遂在台儿庄寨内作拉锯战，情况非常惨烈。

在此期间，我也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嫂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命令，致误战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到四月三日，全庄三分之二已为敌有。我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敌方更调集重炮、坦克猛冲，志在必克。其电台且宣称已将台儿庄全部占领。我方守庄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深觉如此死守下去，必至全军覆没而后已。乃向孙总司令请示，可否转移阵地，暂时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乃与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贻和参谋处长黎行恕通电话请示。

参谋处来报告，我因汤部援军快到，严令死守，决不许后撤。最后，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和我，仅在他奉调来五战区增援时，在徐州有一面之缘。此时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但是我深知不这样，便不能转败为胜。

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在电话中，我还指示他说，你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于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连仲说，他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夜袭甚为不易。我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一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举！"

连仲说："服从长官命令，绝对照办！"

我所以要他组织敢死队的原因，便是根据我的判断。第二集团军的伤亡虽已逾全军十分之七，但是从火线上因抬运负伤官兵而退下的士兵一定不少。他们因为战火太猛没有回到火线上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一点最后的力量，作孤注的一掷。

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连仲命令他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池师长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所幸战到黄昏，敌人即停止进攻。及至午夜，我军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敌砍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筋疲力竭，初不意战至此最后五分钟，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敌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数，敌军退守北门，与我军激战通宵。

长官部夜半得报，我汤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迫近，天明可到。午夜以后，我乃率随员若干人，搭车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炮声渐密，汤军团已在敌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遂陷入重围。我亲自指挥台儿庄一带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数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骤获全胜，士气极旺，全军向敌猛追，如疾风之扫落叶，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被击毁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了。台儿庄之战至此乃完成我军全胜之局。

战后检点战场，掩埋敌尸达数千具之多。敌军总死伤当在二万人以上。坦克被毁三十余辆，掳获大炮机枪等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的主力已被彻底歼灭。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的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的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参观战绩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涌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壁颓垣之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的第一快事。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

材料二　敢死队夜袭日军记

一九三八年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师奉命在台儿庄一带沿运河布防，阻击日军进攻，并负责守卫台儿庄。我当时是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第一五八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那时，第一五八团作为第二十七师的机动部队，驻守在台儿庄外东南地区的黄林村。三月二十七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第三十一师守备部队与日军展开了反复拉锯战，形势十分危急。根据命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令我团三营副营长时尚彬率七、八两个连，急援台儿庄第三十一师。

我接到命令后，即由台儿庄东南地区，以疏散队形，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跑步向南迂回，经南门进入台儿庄，投入了反击战。由于庄内地形复杂，未经详查，八连进庄后遭到日军机枪火力的伏击，不到半个时辰，全连官兵牺牲殆尽。副营长时尚彬见着我的时候，声泪俱下地哭道："王连长，完了！完了！八连全完了！"此时，天已黄昏，我七连被令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应急。二十八日黎明，日军由西北角侵入，向西南地区猛攻，妄图切断庄内守备指挥部和驻守在运河的第三十一师师部的联络，其攻势十分凌厉。我七连奉命在前沿阵地进行阻击，友邻部队用重机枪从两侧组织火力交叉网，再配备我连轻机枪，加强阵地前火力封锁，步枪上刺刀，随时准备肉搏战。在友邻部队的大力配合下，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我们打退了日军一次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是时，我连进庄时的一百三十多名官兵，尚存五十七名。

二十九日拂晓，前沿阵地一片寂静。我们突然发现，在我连阵地前百米多的开阔地带，出现好多纵横交错的壕沟，偶或可见日军太阳旗晃动。原来是日军经过连日昼夜强攻，由于地面火力封锁太强，很难奏效，于是他们采用对壕战进攻，避开我军地面火力网，通过挖筑的坑道，向我军前沿逼近，情况十分紧迫。我当即向守备指挥官王冠五团长反映了上述情况，并建议尽快集中庄内迫击炮，每炮连续打三十发炮弹，强轰敌阵，摧毁敌人坑道，再组织轻重机枪，进行有目标的扫射，歼敌于坑道之内。王冠五听到反映后，亲自来到前沿阵地观看，立即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我军大炮机枪的轰击下，隐约看见敌人持太阳旗乱窜，迫敌部分撤离了坑道。

为了彻底击退由西北角侵入的日军，我又建议率领我连尚存的五十七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绕道敌侧，前后夹击，以求全歼窜入之敌。守备总指挥王冠五接受了我的请求，并拟定黄昏前，再次集中迫击炮火力轰击敌阵，继以轻重机枪扫射。我连在炮击开始时出庄西门，在墙外集结。待炮火停止后，沿墙向北跑步进入预定位置，待机枪停止扫射时，分数路由庄外越墙插入敌侧。

二十九日黄昏，在我军密集炮火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我连五十七名敢死队员，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尊严，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血肉横飞的搏斗中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敌人一部被歼，一部向北逃窜，我连敢死队员，仅十三人生还，其中干部只剩下我和下士班长杨长炳。战斗胜利结束后，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接见了我们并奖给我们三百元，以资鼓励。当记者采访时，他还介绍了五十七名敢死队的事迹，报纸也进行了报道宣传。

恍惚之间，四十五年已经过去，当年战场上那弥漫的硝烟，呼啸的枪弹，横飞的血肉……，还历历在目，特别是那些为保卫台儿庄而英勇捐躯的阵亡将士，他们的英灵一直激励着我走过了以后几十年的坎坷道路，最后终于促使我选择了光明大道。今天中国人民已不再蒙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的苦难，如果那些为抗日而阵亡的将士英灵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死而瞑目的。特写片断回忆，以慰忠魂。

（摘自《徐州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国民党为了检查其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在 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式于 29 日上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为便于前方将领参加会议，当日晚移会场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出席人员除代表外，还有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等。

在开幕式上，丁惟汾代表蒋介石宣读了开会词。蒋介石在开会词中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最显著的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因此，蒋介石认为大会"根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本党自身的改进"。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共举行了四次会议，听取了叶楚伧的党务报告、汪精卫的政治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何应钦的军事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等。

中共中央先后于 3 月 1 日、25 日两次致电大会，陈述了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抗日救国的团结，健全民意机关，动员和组织民众，以便争取抗战胜利的意见。

大会通过了有关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决议案。如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统一革命

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改善保甲制度确定本党以保甲组训民众之政策促进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而利抗战案、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行政效率以增抗战力量案、在抗倭战中必须举国一致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以期完成国军建设案、为达成长期抗战之目的必须一致努力推行兵役制度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土地政策草案、工业政策实施大要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确定文化政策案，等等。

大会主要议案，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决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国民参政会。大会还发表了宣言。

材料：

·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

· 会议经过

材料一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议决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纲领如下：

甲、总　则

（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乙、外　交

（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弃实其权威。

（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

丙、军　事

（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湜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

（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　治

（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

戊、经　济

（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二十四)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己、民众运动

(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二十七)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

(二十八)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使能辅助政府肃清反动,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

庚、教 育

(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

(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摘自《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二 会议经过

中央社讯: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月二十九日开幕后,当日下午举行预备会议,推定蒋中正、汪兆铭、居正、于右任、李宗仁、吴敬恒、冯玉祥、戴传贤、陈果夫、孔祥熙、丁惟汾、巴文峻、伍智梅、王宪章、李振殿、周受来、罗霞天等十七同志为主席团,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自二十九日起迄前(一)日止,共开大会四次,出席代表及全体中委约五百人。大会中,中执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均有详细报告,出席代表聆取之后,深表满意。关于今后应行改进之点,亦各有精密之指示。四日来各代表所提议案甚多,均经缜密讨论,逐案决议,俟由秘书处加以整理后,即交各主管机关切实施行。兹将探悉决议重要案件内容略志如次。

关于党务者,大会以本党负救国建国之重大使命,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交,为增强抗战力量,必须整饬领导抗战之机构,改进党务,加紧工作。故决定(一)确立全党领袖制度,由大会修改党章,选举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俾革命的集团有一稳固的重心;总裁代行党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常务委员会开会时,由总裁主席。而中执会下各部会组织,亦将酌予调整或变更。(二)设立青年团,为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将预备党员制取消,设立青年团,在统一的组织之下,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此外对调整党政关系,各级党部之组织,党员之训练与监察及一般组织工作,亦均议有确定原则。关于政治者,大会以现值敌军入寇,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即行召集,同时在非常时期中亟应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故决议组织民意机关,俟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即召集国民参政会。关于委员产生方法及该会职权等,由中央制定,颁布施行。又大会为使抗战任务与建国目的同时达成起见,复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见另条)议决公布,以整齐抗战行动中之一切步伐,使所有全国抗战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发挥其集体之效能。此于振肃国民之精神,增发抗战之力量关系极巨。其他如教育方面通过有战时教育实施方案等。经济方面,通过有增加战时生产等案。前日大会各案议毕,即通过宣言(见另条),举行闭幕式。

(摘自《民国日报》1938 年 4 月)

国民参政会召开

背景介绍

1938 年 4 月 12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职能和组织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几条是:"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显然,国民参政会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民意机关。它的一切决议必须经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因此,它对国民政府起不了约束作用。在参政员候选人资格的审查和参政员的选定等方面,规定最终都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之",依然未能摆脱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羁绊。

6 月 16 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参政员名单。7 月 6 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正式开幕。参政员名额,依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为二百人,实际出席会议的为一百三十六人,加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官员,外宾及中外记者,共一千多人。参政员来自各省市、各党派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国民政府指派的。其中有国民党员八十八人,共产党代表

只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其他党派代表亦甚少。工农群众团体没有代表参加。国民党人在国民参政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均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大会作了报告。何应钦作了军事报告，王宠惠作了外交报告，何键作了内政报告，孔祥熙作了财政报告，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张嘉璈作了交通报告，陈立夫作了教育报告，陈诚作了民众运动报告。

大会收到提案一百二十五件，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国策；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设立省县参议会案》、《实行民主政治案》和《在抗战时期改善民主案》等；选举汪精卫和张伯苓为国民参政会正、副议长。

大会还发表了宣言。它向中外宣布：中国要"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各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要"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材料：

・国民参政会始末

材料　国民参政会始末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关于政治部分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大会还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四月六日至八日，国民党的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个条例于四月十二日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六月六日，国民党政府聘请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六月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任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同日，公布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四条，将参政员名额由一百五十名增为二百名，并公布了参政员名单。

从六月下旬至七月初，有七十名参政员在报刊上发表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七月五日，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我们确信：巩固民族团结，驱逐日寇出境，是中国人民今天最迫切的要求。我们将不倦息，不畏难，坚定忠诚地为着完满地实现这个最迫切要求而在国民参政会内及会外去努力奋斗。"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举行了五次大会。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至十五日在汉口召开，到会参政员一百三十余人。毛泽东"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未能出席。在致国民参政会电中，毛泽东指出："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足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听取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关于内政、外交、教育、财政、交通等方面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胡景伊、邹韬奋、沈钧儒、陈绍禹等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等提案；大会发表了宣言，并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宪、沈钧儒、陈绍禹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六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二十余人。大会开幕当天，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指出："第二次大会的环境，很显然的与第一次大会的有很大的不同。欧洲自慕尼黑四强会议、捷克强被侵占以后，自然助长了世界侵略者的气焰。虽国联关于日寇侵华战争，通过了盟约十六条，但因支持国联的主要国家，拒绝合力制裁，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决议变成了一纸空文。广州的突然陷落，武汉亦终于撤退，第二次大会恰在这个时候开幕，其所负的使命重大，自不待言。""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变更，人心惶惶之际，参政会议决政府应付新形势之重要施政方针，可以安定国内的人心，可以端正世界的视听，更可以击破日寇汉奸挑拨离间无稽谰言。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地位，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以达建国的成功，这是我国抗战以来久经确定不移的国策。参政会遵照这一国策，议决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针，实是第二次大会的最重要任务。"大会听取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关于政治、外交、军事、财政、交通等方面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陈绍禹、胡景伊、陈嘉庚、林祖涵、邹韬奋、吴玉章、梁漱溟、史良等参政员提出的《拥护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完成抗

战建国之任务案》、《严惩汉奸傀儡案》、《加强国民外交案》、《改良兵役实施法案》、《确立战时新闻政策案》、《请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等提案。大会选举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一十余人。由于汪精卫已叛国投敌，国民参政会议长改由蒋介石充任。这时蒋介石国民党开始将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国民参政会严加控制和敷衍。这次大会听取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关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林祖涵、董必武、许德珩、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提出的《拥护政府国策案》、《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挥民气以利抗战案》、《请政府实行选贤与能以澄清吏治案》、《加紧扩大空军建设案》、《改善兵役实施，加强敌后工作案》等项提案。大会选举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张澜、董必武、沈钧儒、许德珩、秦邦宪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召开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指出："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经集会三次，总观国民参政会既往之工作，其最大之成就，就在于今日中国的最迫切的最中心的政治问题上——在坚持民族自卫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及打击各种中途妥协的倾向与罪恶活动上——能够真实地反映起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见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热切希望。""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是敌人经过两年的侵略战争之后，困难日益增长，我们抗战前途日益呈现出胜利的远景。但是另一方面，日寇非但没有改变其亡华灭华的方针，而且更加阴险，更加凶残，更加恶辣地实行他的一贯的灭亡我国的既定方针，更加狡诈地实行着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在这一新的国内外局面下，全中国人民的当前严重任务，就是明确认清新的国内外情势之各种特点及其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同时，努力争取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每一有利于我的事变和因素，以增强我国的外援，以便克服一切危险，冲破一切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二十余人。大会讨论并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指定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干、钱端升、褚辅成等十九人为委员，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声讨汪逆及附逆诸奸案》、《慰劳前方将士暨战区同胞案》、《川康建设方案》等项提案。还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讨汉奸汪精卫。还发出《"九一八"八周年慰问东北同胞书》。大会选举张澜、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许德珩、史良、董必武、秦邦宪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召开的同时，重庆、成都、桂林、上海、延安等地人民纷纷组成宪政促进会、座谈会，讨论宪政。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至十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四十余人。大会发出通电声讨汪逆伪组织。在听取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的有关报告的同时，还听取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章）起草经过及其内容说明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平抑物价案》等提案，选举孔庚、董必武、左舜生、黄炎培、张澜、秦邦宪、章伯钧、许德珩、王造时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共举行两次大会。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的七名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阴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二月十五日，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致电国民党参政会秘书处，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即"（一）制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邮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教，（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并声明"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同时，周恩来又将此公涵抄送各党派参政员二十多人，并和各党派代表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张君劢聚谈中共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至十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鉴于国民党蒋介石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未出席这次大会。

三月二日，周恩来致张冲公函，董必武、邓颖超致国

民参政会公函，提出"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即："(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军任职。(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要求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明令保证实行。

三月三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申明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参政会的理由，并表示愿与各党派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与此同时，著名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陈嘉庚致电全体参政员，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一面仍强调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允许存在，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另一面被迫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同日，国民参政会又电致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三月八日，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联名复函国民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国民参政会的理由。

三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增刊，发表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的全部文件：(一)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二)周恩来致张冲公函；(三)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四)周董邓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五)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致中共七参政员鱼电；(六)中共七参政员复电；(七)最近军事政治压迫事件。

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揭露蒋介石急于压服共产党的阴谋，并指出："到三月一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蒋介石曾用极大努力，诱骗我出席参政会，为我方坚持拒绝。彼方乃在参政会通过一个反共决议，以掩饰其面子，实则已为退兵时之一战。""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们以佳电迎接了他的开始，以一月二十日的攻势(老十二条)对抗了他的高潮，以三月二日的新十二条打退了他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七十余人。大会决议案，请国民党政府早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充实战时民意机关与保障言论自由，以促进民治。大会还听取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的有关方面的报告，并选举了孔庚、黄炎培、董必武、沈钧儒、许德珩、张澜、梁实秋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共举行了三次大会。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名单。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等六人，以文化团体代表或文化界人士被聘为参政员。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参政员二百余人。参政员左舜生、张君劢、张澜等缺席，极引人注视。大会发出致前方将士，各战区及东北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慰问电；通过了《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等项提案；还听取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关于有关各方面的报告；最后选举了孔庚、黄炎培、董必武、沈钧儒、许德珩、褚辅成、王云五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此次会议进行中，参政员自由退席之风始终未减退，而且有些坐在后面的参政员，不时坐在旁听席上，与宾客作侃侃之谈。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在重庆召开，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五十余人。大会听取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关于各个方面的报告。何应钦在作军事报告时，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在会上驳斥了何应钦的诽谤，并宣布退出会场，声明不再出席本届参政会。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和经济建设等项提案；并选举林虎、褚辅成、孔庚、王云五、许德珩、黄炎培、董必武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至十八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出席大会的参政员一百六十余人。大会在听取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关于各方面的报告时，许多参政员痛切陈词提出许多质问。十五日，由中共参政员林祖涵和政府代表张治中分别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和真相。林祖涵在报告中介绍了国共谈判的重要问题、谈判的重要分歧和失败的症结，并指出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和团结全国力量，拯救民族的灾难。林祖涵在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联合统帅部。该日，来宾和旁听席达八百余人，为国民参政会成立七年举行的十次会议中所未有的盛况。

大会通过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并推荐参政员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为视察团团员。大会还通过了严惩贪污案、关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加强中苏合作等项提案；选举了褚辅成、林虎、孔庚、王云五、左舜生、董必武、胡霖、许德珩、黄炎培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国民党政府决定于本年七月七日召开的所谓"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复褚辅成等七参政员，欢迎他们到延安参观，并商谈国事。七月二日，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人飞抵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热烈欢迎，并商谈了国事，进行了参观。七月五日，褚辅成等六人返回重庆。

（摘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徐州失守

背景介绍

1938 年 4 月 18 日，北路日军第十师团在枣、峄地区转入攻势，由于受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和反击，陷于苦战状态。"第五师团在 4 月下旬先后攻占临沂、郯城，从陇海路东端形成对徐州的包围。5 月 12 日，第一一四师团向台儿庄以西地区推进，并在峄县地区抽调第十师团在夏镇附近渡过微山湖，配合由济宁南下的第十六师团，迂回到徐州西北侧作战，使徐州附近中国守军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南路日军第六师团在占领安徽和县、巢县之后，5 月 14 日攻占庐州。第一〇一师团由江苏东台出发，占领盐城，5 月 7 日陷阜宁。海军于 5 月 20 日攻占连云港。华中派遣军主力第九、第十三师团，沿津浦路西侧，攻占徐州西南方向的安徽蒙城和河南永城，18 日占领徐州西南三十公里的安徽肖县。第三师团也于 19 日进入安徽宿县。

在南北日军的夹击下，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有被歼灭的危险。因此，战区部队进行有计划地战略转移是十分必要的；以保存有生力量，寻找战机，继续消灭敌人。可是，战区未能组织任何象样的战役，借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李宗仁长官部率一千多人落荒而走。5 月中旬，除留韩德勤第二十四集团军于苏北，石友三第六十九军和海军陆战队于鲁中南，分别进行游击战外，战区主力部队开始全线退却，向豫南、鄂北地区转移。5 月 19 日，徐州失陷。

从南京、济南失守，到日军占领徐州，先后近半年时间，我国军队与敌南北两路军队作战，使其无法打通津浦线，这对整个抗日战争的持久发展是有意义的。

日军控制徐州后，乘势西上，第十六师团于 24 日占砀山，并配合由山东鱼台南下的混成第三旅团，于 29 日攻占归德。

由山东濮县南下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在兰封附近受到薛岳指挥的中国优势兵力的阻击，陷于激战。但兰封最后仍被敌攻占。6 月 6 日，第十四师团再陷开封，次日取中牟。第十六师团先后于 6 月初进入杞县、尉氏、睢县。第十师团直指太康。中国守军第一战区指挥中心郑州，处于日军直接攻击之下。

材料：

- 徐州突围
- 会战结束

材料一　徐州突围

日军在进攻台儿庄受挫后，原攻临沂败退费县附近的板垣师团，获知其友军矶谷师团残部被困于峄县、枣庄、临城一带，也舍去临沂战场而将主力向西移动，与矶谷残部合流，死守待援。同时敌方统帅部也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四月间，敌方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我五战区的野战军。

敌军这次所抽调的，均为其中国派遣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有各种重武器。全军按计划构成数个包围圈，逐渐向徐州轴心缩小包围圈，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战的部署之下，雄师数十万，复辅以飞机数百架，装备窳劣的我军，断难与之抗衡。无奈台儿庄之捷鼓起了我方统帅部的勇气，居然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

我方首先抵达徐州的援军为七十五军和李仙洲的九十二军，我命令周、李两军自台儿庄向东延伸。因此时矶谷残部尚死守峄县待援，敌板垣师团已舍弃临沂战场而向西挺进，与矶谷合伙，企图对台儿庄卷土重来，我周、李两军向东延伸，正拊其背。

四月二十日，樊崧甫的四十六军和卢汉的六十军也奉调到徐，我乃调该两军到运河两岸，加强这方面的防御兵力。不久，李延年的第二军和晋军商震部的一师也到徐，乃加入东线。谭道源的二十二军也尾随而至，加入徐州西北微山湖一带的防线。接着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抵达鲁西，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先后到徐，我即令开拔南下，增强淮河北岸的防御力量。

因此，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人，与本战区原有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而白崇禧从汉口军令部打电话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委员长还在续调大军向我增援。

我说："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我说："现在已经太迟了！"

此时我已判断到敌军向我合围的新战略，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

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因此当大军云集之时，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内线作战无能为力之苦。

统帅部也深知此役关系重大，不久，白副总参谋长即率统帅部参谋团的刘斐、林蔚等到徐筹划防御战。

敌军自攻占宿县与蒙城两个重要战略据点后，除以少数部队固守宿县外，竟放弃津浦路正面，而循西侧的地区，与蒙城之敌相联系，分途向北推进。

四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之敌在土肥原等指挥之下，开始自濮阳、寿张分两路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分别陷我郓城、菏泽、金乡、鱼台，自西北方面向徐州推进；东北方面之敌，则由海道自连云港登陆占海州、郯城，与进占台儿庄和峄县之敌相呼应，自东北方向徐州进迫。

五月上旬，津浦路南面敌人为排除其侧翼常被我军突击的危险，乃以其主力配合大量装甲部队和飞机，向西部闪电挺进，攻占合肥，压迫李品仙十一集团军的三十一军西撤，退守大别山外围的六安县，然后转向我据守淮河中游一带的廖磊二十一集团军第七、第四十八两军防线猛烈攻击，我防守淮河两岸和田家镇、凤台县、寿县、正阳关等重要据点的部队，为避免被敌包围集体歼灭计，乃稍事抵抗即自动放弃，实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与敌人纠缠，使其疲于奔命。不幸敌人不入我军的圈套，而以其第三、第九、第十三等师团和井关机械化部队，配属大群飞机。作战斗开路先锋，然后循涡河地区向蒙城迈进。同时蚌埠南岸附近的敌军也已抢渡淮河，向北急进。至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忽遭受敌军优势力量的压迫，星夜东向皖、苏边境撤退。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原奉命南下增援，师行到夹沟，而战局面貌已非，我遂令该军迅速西向涡阳，突出重围。是时，廖磊总司令见徐州以南津浦路防线已完全洞开，乃调二十一集团军总预备队，师长杨俊昌与周副师长各率步兵两团，驰赴扼守宿县和蒙城两个据点。不料周副师长赶到作仓促布防之际，敌人也已跟踪而至，将蒙城团团围困得水泄不通，敌机械化部队和机群复整日冲击、轰炸。城中房屋火光烛天，变成一片焦土，五月九日蒙城遂陷。后来据少数突围的士兵报告，当敌军猛烈进攻时，周副师长曾数度奋勇反攻，期望冲破重围，无奈敌人火网严密，未能成功，除二十一名士兵乘黑夜蛇行逃出，幸免于难外，其余官兵、夫役、马匹等，则一概为国牺牲。至杨师长俊昌，率所部扼守宿县，因城垣被敌炮摧倒，被迫撤至郊外，损失虽重，尚未全部牺牲。

北上之敌随即切断我陇海路在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蚌埠之敌约三个师团于攻破宿县后，也自津浦路的西侧平原向徐州追近，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

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也于五月初旬作有计划的撤退。敌军此次来势甚猛，构成数重包围圈，志在将我军一举歼灭。我军为打破敌方此一企图，只有迅速作有计划的突围，脱离敌人的包围圈。然大军数十万仓促撤退，谈何容易！

五月初旬，当鲁西与淮河战事同时吃紧之时，我即严令该方面的孙桐萱与廖磊两集团军，自南、北两方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敌人会师于陇海线并乘敌人尚未合围之时，督率徐州东北方面的孙连仲、孙震、张自忠、庞炳勋、缪徵流诸军，凭运河天险及运河以东地区择要固守，以掩护徐州四郊大军向西、南两方面撤退，脱离敌军的包围圈。一待任务完成，即向南撤入苏北湖沼地区，然后再相机西撤，因敌军的注意力概集中于徐州陇海路西部，因此，我军能安全向苏北撤退。

五月中旬，我军其他各部陆续开始撤退，为避免敌机轰炸，多数部队都是昼息夜行。敌军旋即南北会师，唯阵容不无混乱，且因地形不熟，不敢夜间外出堵截，故我军未脱离包围圈的部队也能自敌人的间隙中安全通过。五月十七日晚，汤恩伯军团及其机械化部队因西线敌人已重重合围，乃改向南撤。其他掩护部队也奉命逐渐向东南撤退。敌军遂自北面迫近徐州，其野炮且已可射入城内，长官部数次中弹起火，幸皆迅速扑灭。我乃迁长官部到郊外城南陈家大屋暂住。然该地仍在敌炮射程之内。一次我命一传令兵向附近传达命令，渠刚离开，忽然一颗炮弹落在司令部内爆炸，此传令兵即应声倒地，我连忙前去将他扶起，只见其血肉模糊，臀部已被炸去一大块。当时情况的险恶，可以想见。

到五月十八日，各路大军泰半已撤退就绪，我乃决定于十八日夜放弃徐州。是晚十一时，我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合乘火车一列南开。本拟于车抵宿县后，折向西方撤退，孰料车行方一百华里左右，忽闻前路有猛烈爆炸声，停车一问，才知系我方工兵炸毁铁路桥梁。因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所以将桥梁炸毁。火车既不能前进，全军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翌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汤恩伯军团适亦停止在此，据难民报告，宿县已为敌军所得，不能通行。

汤军团长乃和我作简短会谈。他问我要否将宿县克复，再继续西进。因汤军团此时尚有数师之众，并有十五生的大炮数门随行，克复宿县，可无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此必要，我军今日当务之急，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一小城镇的得失实无关宏旨。

汤恩伯并问我要否和他的部队一起向西突围，因为他的军团实力雄厚，不虑敌人包围。我则认为汤军团是我军的精华，此时脱离战场要紧，我长官部和他同行，恐为

该军团之累。所以我命令汤军团长即刻率部西行，我本人则偕长官部一行东向绕过宿县。此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我们这一千余人的小部队，在本国土地上，可以四处行动，敌人断难捕捉我们。同时，我更电令第七军自皖派部队到宿县以南三十里附近接应。

自与汤军团在宿县以北分手之后，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后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将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军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又一次，我们在途中被数架敌轰炸机发现，我们遂作紧急疏散，匍匐于附近麦田中，敌机群在我们上空低飞一转，并未投弹便匆匆飞去了。此时，敌机如集中狂炸一阵，则吾辈千余人将无噍类了。又一次在宿县东南，几与敌骑数百人相遇，敌我相去极近，而却"交臂相失"，否则其情况也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自东边绕过宿县，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更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

材料二　会战结束

日军在台儿庄地区的惨败，使其清醒地认识到徐州附近集结着中国的精锐部队。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使中国尽快丧失抵抗能力，日本大本营决定由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协力作战，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徐州。而蒋介石此时也为台儿庄的局部胜利所陶醉，为图坚守徐州，因而调来了大量精锐部队。使徐州附近地区的部队达到六十四个师又三个旅，共六十余万人，同时，又将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等中央军主力置于豫东的归德、兰封一线，作为徐州的后援力量，摆出了决战的架子。

华中派遣军稻叶四郎第六师团坂井旅团长率四个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兵大队，四月下旬渡江占领安徽和县，三十日攻克巢县。五月十一日，该旅团由水陆两路并袭合肥，十三日午，日军开始攻城，至十四日晨，日军便突破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团军阵地，攻陷合肥。合肥的失陷，为日军华中派遣军主力北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伊东政喜第一〇一师团之佐藤旅团五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四月下旬由东台出发，二十六日攻略盐城，五月七日占领阜宁，与东坎之韩德勤第八十九军隔旧河对峙，威胁着汤恩伯集团后背。五月初，日军主力吉住良辅第九师团、荻州立兵第十三师团以一部由津浦路向北佯攻，主力却沿涡河两岸及北淝河向蒙城攻击前进，连陷龙亢、张八营。八日，日军约一联队在重炮、坦克的掩护下，全力进攻蒙城，韦云淞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三师一个团奋力抵抗。九日，日军由南门冲入蒙城，守军同敌展开混战，周元副师长中弹殉国，守军伤亡一千多人，是日夜，蒙城失守。十日，第九师团由北淝河西岸地区突破刘士毅第三十一军阵地，到达板桥集附近，该师团以一部约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向宿县佯攻，其主力与第十三师团齐头并进，攻击徐州西南的永城、百善一线，先头部队已抵达石弓山集。永城是战略要地，日军攻克永城，北可切断陇海线，东可进攻徐州。为此，廖磊急调罗奇第九十五师一个团赴永城拒敌，并命令刘汝明军向永城前进，侧击日军；冯治安军、刘士毅军向青町、蒙城间攻击，断敌后路。十二日晨，罗奇师一团抵达永城时，日军已先其一步包围了该城，中国守军为地方团队数百人，不堪一击，永城遂陷。日军攻占永城、百善后，第十三师团由永城北上，经韩道口突袭黄口，炸毁汪阁东面铁桥，切断了陇海线；第九师团由百善北进，十六日向徐州西南二十余公里之肖县进攻。同时，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于十五日进入宿县南部大营集地区，会合第九师团右侧支队进攻宿县。

华北方面军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五月九日从济宁向鲁西第三集团军发起攻击，十二日突破该军万福河南岸阵地，进攻金乡、鱼台。第七十四师以一团守金乡，一团守鱼台，主力向单县、虞城撤退。日军在飞机、重炮、战车的支援下，于十四日晚攻陷鱼台，十五日午后占领金乡。同日，该师团快速机械化部队急攻丰县，县城西墙被敌炮火摧毁，日军一部蜂涌进城，但被守军击退。十七日，日军主力再攻丰县，敌千余人冲入城内，同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一个团展开巷战，俞军一个营伤亡殆尽，其余部队分由东、南、北门突围。同时，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在由济宁西攻郓城的酒井旅团掩护下，于五月十一日夜由濮县附近渡过黄河，连陷郓城、鄄城、荷泽、曹县，由内黄直攻兰封，切断了第一、五战区的联络。在徐州正面，矶谷第十师团把台儿庄西面作战交给了末松茂治第一一四师团，率主力于十五日在夏镇渡过微山湖，次日向沛县进攻，庞炳勋第四十军残部顽强拒守。第十六师团又由丰县策应，东西夹攻，十八日夜，第四十军放弃沛县，向柘城突围。十九日，日军先头部队离徐州仅六公里，并不断炮击徐州城。另外，板垣师团、末松师团也分由郯城、台儿庄之线实施攻击作战。

至此，日军南北数路对徐州的包围已经完成，中国六十万大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五月十五日，武汉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十六日，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徐州

附近各部队由日军兵力不足的西南面向豫、鄂、皖地区突围。并命令张自忠军团长指挥第五十九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七、第一三九师占领徐州西北九里山，陇海路郝寨、夹河寨；西南肖县、凤凰山、霸王山阵地阻击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至十八日，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了凤凰山、霸王山、肖县；由陇海路东进的日军攻陷郝寨、夹河寨阵地；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突破九里山阵地；日军第三、第九师团由南平镇渡过浍河，攻占了宿县。十九日上午，徐州陷落。但此时中国主力部队已撤离徐州。其中孙连仲鲁南兵团一部（第六十军，第九十五师及第二集团军）由徐州西南突出，主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六、第五十一、第七十五军及第一四〇、第一三二师由徐州南面突出，经灵壁、泗县、五河渡淮河向西撤退；李宗仁长官部以及汤恩伯陇海兵团之第二十军团，第二、第五十九、第六十八、第九十二军于十八日撤离徐州移至宿县，因宿县失守、汤兵团向西突围，由亳县、涡阳附近渡过涡河西撤，长官部则在廖磊淮北兵团接应下，偕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第七十七军由太和、阜阳地区突出重围。仅以韩德勤第二十六集团军、石友三第六十九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于苏北、鲁中南进行游击。日军围歼中国军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

徐州会战历时五个月，由于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给日军又以严重杀伤，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迫使日军不得不倾其兵力打通津浦线，为中国的持久抗战争取了时间，也极大钳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但由于最高军事当局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错误，放弃了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调集大军企图与日军在徐州附近决战，因而使这次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最后不得不仓促撤退。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武汉会战

背景介绍

1938年6月上旬，日军展开行动。以第六师团自合肥南下，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的配合下由芜湖西上，13日占领安庆。接着，坂井支队也发动攻势，连陷安徽舒城、桐城，控制了大别山右翼的重要战略据点潜山。波田支队再陷马当、彭泽。7月4日，占领了鄱阳湖通向长江的主要咽喉湖口，26日进占九江，从而取得了攻击武汉的桥头堡。

在长江流域，日军又以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等，由九江夹大江两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在江南，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右路，攻赣北瑞昌，穿幕阜山，谋切断粤汉路，迂回武昌之南。为此目的，日军以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为左路，沿南浔铁路向南昌方向进攻，牵制第九战区所辖薛岳第一兵团，掩护右路军侧背。

8月10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后，遭我第九战区之张发奎第二兵团所部第三集团军的阻击，敌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使用毒气，第三集团军伤亡惨重，第三十二军团增援无效。24日瑞昌失守。日军乘胜分别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两个方向进攻。我以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组织防御，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敌破我封锁，再占富池口。第二兵团续调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至10月中旬以前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而日军一部苦战月余，10月5日占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左路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我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迴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日军进展缓慢。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给敌以严重杀伤。

在长江北岸，敌第十一军第六师团自占鄂东南黄梅后，继续向西进犯。我第五战区之李品仙第四兵团所部，沿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层层布防堵击。双方在鄂东南广济、武穴一带展开激烈争夺。9月6日敌陷广济，续占武穴，继而猛攻长江要塞田家镇。守军第二军在第廿六、第四十八、第八十六军策应下，与敌苦战十余天，終因敌火力优势，阵地全毁，官兵伤亡殆尽。29日田家镇陷落。10月19日敌再占浠水，直指武汉外围据点黄陂。

为密切配合长江两岸敌第十一军作战，日军以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等，在大别山北麓豫鄂皖边境沿合（肥）信（阳）公路，攻击信阳，以切断平汉铁路，从北部迂回包围武汉。我守军第五战区之孙连仲第三兵团等部，沿途布防，顽强抵御。8月27日，敌以第十、第十三师团自合肥向六安、霍山进犯。得手后，连夜渡史河西进，直趋固始、商城，企图穿大别山，沿商（城）麻（城）公路，攻击武汉。我守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集团军等，凭依富金山的险峻地形，与敌血战，给敌以重创。9月16日，商城弃守。我军退守打船店、沙窝等大别山隘口，继续与敌鏖战，歼敌甚重。敌被迫沿合信公路西犯。19日突破我第五十九军防线，进占潢川，再陷罗山。在信阳以东与我第一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后敌以第三师团驰援，10月12日占领信阳，达成对武汉的合围。

是时，日军乘广东沿海我守军疏于防御，乃先武汉而迅速攻占广州。加之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亦被敌突破。武汉三镇已完全陷于敌人包围之中。周围各要隘

纷纷沦陷。10月25日，武汉弃守。

材料：

- 马当要塞保卫战
- 南浔会战
- 武汉大空战

材料一　马当要塞保卫战

六月十七、十八日，我在长山指挥部观测所里，用变倍数(大倍数)望远镜看到在东流一带江面(在封锁线和布雷区以外)有三艘敌舰游弋，紧接着连日发现敌以小艇上装配小口径火炮(即机关枪)，向江面普遍发射，企图以火力探索我雷区位置。有时被敌击中水雷，爆发的浓烟柱冲上二三十丈高，以音测断定，敌艇在我三万公尺以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被敌击中爆发的水雷，有十几个，敌人消耗的弹药，总有数万发以上。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接到马湖区要塞指挥部的通知，抗日军政大学定于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举行结业典礼，各部队的主官届时前来参加，会后即在司令部聚餐。凡上尉以上的主官都有请帖，我也收到一份，我们既没有派人受训，而当前的敌情又严重，所以没有去参加。这天下午只见第三一三团的连长以上的主官，结伴经过我们驻地前的公路，去马垱镇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我们则密切注意敌情，入暮趋于沉寂。

六月二十四日拂晓，我们照例以电话与第三总队防守香口江面的第一大队联系，电话不通，我们又以电话与第十六军第三一三团联系，仍然联系不上。只好派联络兵，一面查线，一面再去取联系。这时我在观测所观察，在薄雾之下，隐约看到有部队行动，引起我们的怀疑。这时联络兵回来报告说："香口街上已发现很多日军。"这样，判断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已全部被敌消灭了！敌人从哪里登的陆？是什么时候登陆的？我们在指挥所一面研究，一面通知各队准备战斗。薄雾已散，见香口街上日军正在整队，似有行动。约上午八时，敌炮弹落在长山后洼地的我炮兵阵地附近，香山约比长山高，香山顶端能看到我炮兵阵地，判断敌炮兵阵地设在香山反斜面，敌我展开炮战。这时，敌步兵组成三个突击组，抬着重机枪，从太白湖的水荡里向我长山阵地突击。太白湖口至江边约有八百公尺宽，纵深约六百公尺，原是一片水稻田，水稻开始放穗。由于长江水涨，漫上江边堤圩，灌进田里，使这片水田变成湖荡，是我长山阵地的屏障。敌突击组一进入湖荡，就有半截身子陷在水里，轻重机枪的火力也就减弱了，我长山阵地的轻重机枪一齐射击，火力异常猛烈，只见敌突击组的士兵和机枪手纷纷倒在湖荡里，未见到有人回去。二十四日上午，敌人组织两次突击，下午又组织两次突击，均被我长山阵地守军全部消灭。

二十四日上午，敌海军舰只闯进我布雷区，在封锁线外向我长山步兵阵地轰击，仅以舰头有限火力轰击。每只军舰，舰首不过两三门火炮。军舰全赖横侧火力，它一横过来，舰首、舰尾的火炮就可以同时发射，舰侧的边炮也都可同时射击，这是军舰火力最强的射击势态，转回来来又可以用那一侧面边炮射击；但横着的军舰目标太大，也就存在容易被击中的不利势态。我们观察敌舰以"∽"形游弋着向我阵地轰击，敌十九艘军舰，每一次回旋射击，就有一百多发炮弹落在我长山步兵阵地上。二十四日我步兵阵地被敌海军火力摧毁了一部份，人员也有伤亡。这天敌人的山炮兵在香山斜面占领阵地后，火力逐渐猛烈，估计火炮在十门以上。由于敌能看到我炮兵阵地，我不能看到敌炮兵阵地，我有两门野炮被敌炮兵击坏。

自二十四日拂晓发现日军后，我们即向马垱要塞司令部报告，要塞司令部的电话总机说，王司令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去了，司令部没有负责的人；马湖区要塞指挥部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好在我们有与汉口江防要塞司令部联系的无线电，当即向谢刚哲司令报告了敌人登陆的情况。

战斗开始不久，有两名第三一三团逃散的士兵，通过我长山阵地前的太白湖公路，阵地守兵怕是敌探，把他们送到指挥部。一问，才知道确是第三一三团被打散的士兵。问敌人是何时和怎样登陆的？他们说："日本人是在今早四点左右从我连阵地登陆的，敌人以小艇靠岸，偷偷上来，上岸后用轻机枪向我阵地射击；班长被敌人打死，我们连长去参加结业典礼去了，有的排长去受训，这时连里只有一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敌人猛烈射击后，我连阵地被敌人占领，敌人不断地登陆，向南沿江岸扩张，我连向黄寄树团部退去，边打边走，敌人就向香山推进。"这时我们才知道敌人登陆的实况。

二十四日下午，敌我海陆军作战正激烈时，忽然敌海军炮火停止向我射击；香口之敌仍在组织突击组，以轻重机枪向我长山陆地突击。我正以火力消灭湖荡里的敌人，只见我飞机九架由宿松方向飞临敌舰上空，敌舰的高射炮火力都向我飞机射击，我机在高空向敌舰投弹后，转向宿松方向飞去。我机去后，敌舰炮火又向我长山阵地射击，战斗十分激烈。

六月二十五日，敌军舰有所增加，以海军火力向我长山阵地轰击，香口之敌陆军依然组织突击组，经长山阵地前的湖荡向我长山阵地突击，全部被我消灭在湖荡之中；我空军又由宿松方向飞临敌舰上空向敌舰袭击。所怪的是，如昨日一样，我机未临空以前，敌炮火已停止向我长山阵地射击，我机一到，就全力射击我空军，我空军只有急忙投弹后向望江、宿松方向飞去。我机飞去后，敌海军

火力仍继续向我长山阵地轰击。这时，由东流方向飞来我机九架，当其飞临敌舰上空，敌舰无所察觉，舰上炮火仍在向我阵地射击，我机却向敌舰投下大量炸弹，炸起的水柱飞溅，遮住敌舰，我们只听得炸声隆隆，震撼江面，飞机则向望江、宿松方面飞去。溅起的浪花消失后，我们在阵地上遥望敌舰，有的中弹起火，有的中弹下沉，我阵地上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这证明轰炸敌机的我空军，是由另一基地飞来的，而被敌舰误认为是自己的飞机。战斗沉寂了个把钟头，敌又以残余海军炮火向我长山阵地射击，但火力已大为减弱了。

与此同时，敌在香口的陆军愈聚愈多，多次企图从湖荡里向我长山阵地突击，但均未得逞。敌人的飞机低空飞掠长山山头，反复轰炸扫射。正巧在我炮兵射击敌舰时，炮弹飞越长山顶巅，碰着敌机，顿即在长山上空爆炸，人机俱毁。人们误认为这架敌机是被我炮兵击中的，阵地上的我军步兵鼓掌欢腾。这一讹传，又一次鼓舞了我军士气。

我步兵、炮兵扼守长山一带阵地，与敌人海陆空军鏖战数日，颇多伤亡。我们屡次向马湖区指挥官李蕴珩请求派部队增援，他一概置之不理。直到下午六时许，接到蒋委员长从武汉来电，对江防守备司令部第二总队和陆战支队第二大队抗敌有功，传令嘉奖；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也来电传令嘉奖。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除传达蒋、陈的电报外，亦来电嘉奖。当时的嘉奖电报，对我们以及在堑壕中的士兵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然而战斗人员伤亡太多，战斗力减弱，急待补充，就又向马湖区指挥官李蕴珩请求派部队增援。回答是："已派一六七师增援。"当时我们在想，为何驻马垱附近的部队不派，却派远驻在彭泽的第一六七师呢？反正已派出部队，比"无兵可派"好。但又认为远水难救近火，就向马垱要塞司令王锡涛请求增援，王司令回答中叙述了无兵的困难。本来马垱要塞司令部编制只有一个守备营（步兵），除担任警卫哨所外，实无兵可派。我们当时希望，即使能有一个连的兵力来增援也好，也可鼓鼓士气。

二十五日下午七时以后，敌炮兵和海军炮火增强了火力，加上敌空军轰炸扫射，我军牺牲惨重，控制太白湖口公路的两个重机枪掩体已被敌海陆炮火轰坏，长山要塞防御工事也已被摧毁，敌步兵从公路上向我长山阵地突击。这时，我长山阵地的步兵和炮兵的轻重武器已控制不住太白湖口公路，敌军在海陆空军的配合下，突进我阵地。我炮弹已尽，又无法补充，炮兵也只好以步枪应战。不过炮兵的步枪是极其有限的，乃掩护着把三门炮装上汽车，准备变换阵地；总队部见敌已突入阵地，也只得转移；长山阵地被敌切为数段，残余官兵也退了下来。我们就在六月二十六日中午退出长山阵地。

我们且战且走，下午四时左右抵马垱附近，见第十六军的一个团，由马垱分两路向长山堵击日军；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堵住敌人，恢复我们失去了的阵地。但结果未能如愿，不仅长山阵地未能恢复，连炮台也失守了。要塞司令王锡涛在马垱镇南头坐着叹气说："我们的责任已完了。"当时我曾想过，我们自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七、八点钟与日军接触，即向马湖区要塞指挥部请求派部队前来长山阵地增援，一直没有派部队来；最后虽允许派第一六七师来增援，但直到我们退出阵地，第一六七师还未来到。我们的残余部队只得向彭泽方向撤退。待我们六月二十七日抵彭泽县附近的流泗桥时，得知第一六七师奉李韫珩之命，由彭泽经太白湖东边的小道向方口方向来增援。一个师的兵力，不去走从彭泽到马垱的公路，而去走崎岖的羊肠小道，这要用多少时间才能达到香口呢？常言救兵如救火，李韫珩下这一错误的命令，不仅失去了马垱要塞的战略枢纽，而且牺牲了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的生命。

（摘自《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南浔会战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九江既陷，寇酋畑俊六率三十余万，溯江窥武汉；而以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第九、第二十七师团、近卫师团一部，配合波田支队，兵舰八十余艘，飞机数十架，水陆呼应，自湖口、九江南下，图先略德安、南昌，再西趋长沙，歼灭长江南岸我野战军，截断粤汉路，对武汉形成大包围，以利全盘之作战。时余以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指挥南浔线作战，所属之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军、第八军、第四军、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任星子一带湖防亘南浔正面金官桥、德安等地之守备。

踞九江之敌第一〇六师团，自八月三日开始，向南浔正面金官桥一带攻击，被我第七十军、第八军、第四军痛击，歼其市川联队长以下甚众；至十五日攻势萎退。敌沿铁道正面进犯企图既挫，乃以第一〇一师团配合海空军，图由星子方面，沿德星公路略德安，包围我之右侧背，切断南浔路。八月十九日开始犯星子，被我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六军痛击于东西孤岭、鼓子寨、七贤峰一带，至二十五日激战未已。敌第九师团之第六旅团，此时已由九江连陷我第三十集团军瑞昌、鲤鱼山、杨坪山、北极峰诸阵地。迄九月一日，星子及金官桥方面之敌，向我继续猛犯。第九师团之第六旅团，被我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三十集团军一部，夹击于小阳铺、和尚洼。至五日，敌全面续犯不已。是时我军占领东西孤岭亘德安东北及乌石门与德安西北之线袋形阵地，如张袋捕鼠，如飞钳剪物，激战兼旬，敌伤亡甚众，未能进展。

敌第一〇一师团既受挫于东西孤岭，第一〇六师团又被阻于马回岭，师老无功，敌酋焦急，乃以九月六日由

九江登陆之第二十七师团发动瑞武路攻击，企图略箬溪、武宁，遮断修水北岸上下游我军联络，以利全般作战。十八日占领茶园陵、白石崖。我第十八军陷于苦战。至二十四日，令第九十一师、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六师，进占坐牌山、乌沙岭、马塞山、火炎坳、风雨岭，及白水街、麒麟峰、九石隘、昆仑山、覆血山之线，与原据阳扶山、甑盖山、老鼠山线瑞武路正面之第一四一师围歼之；并令第八军进占罗盘山、棺材山、张林公、丰良之线，拒敌西进。二十五日以来，敌向麒麟峰、覆血山猛攻，我奋勇争夺，得失往复，敌铃木联队全被歼灭。敌虽攻陷麒麟峰、复血山、马鞍山，但终被拘束于杨访街以西，西崇山以东，昆仑山以北地区，未能进展。

麒麟峰、复血山剧战之日，南浔、瑞武间形成甚大之空隙，我有力一部转用于瑞武路，已为敌机侦知；敌意由此空隙侵入，可以避开正面攻击之不利，且可解救第二十七师团之危，故其第一〇六师团裹六日粮，向西轻装急进，其钻隙冒险之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无忌惮之气焰尤甚可恶，初不料竟为我全歼于万家岭也。

第一〇六师团经闵家铺于二十七日先头窜至面前山、竹坊桂，第四军首挫其锋，迄十月二日全部窜至万家岭、哔哄街、老虎尖、石堡山地区，我为包围聚歼之于万家岭地区计，决抽德星、南浔、瑞武三方面兵力之第六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一八七师、第一三九师之一旅、第九一师、新编第十三师、新编第十五师之一旅、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断行围击，激战至七日，敌犹作困兽斗，我军愈发扬蹈厉，逐渐缩小包围圈，至十月十日国庆，将此敌完全歼灭，敌酋松浦仅以身免，遗尸塞谷，山林溪涧间，虏血几洒遍矣。

第六十六军转用于万家岭时，将德星阵线缩短，敌乘时猛犯，十月九日陷隘口街，继猛犯德安，至二十八日，我移守郑家埠、小竹山、金鸡山、九仙岭、春山李线，拒敌南犯；瑞武永武路之敌第二十七师团，近卫师团第三联队、鲫鱼山之线。此时有利时机已过，且后方修水纵贯，为避免背水作战之不利，三十日，向修水南岸吴城武宁间占领阵地拒敌。

十二月，余奉调任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移驻长沙。战区辖境，东起鄱阳，经鄂南，亘岳阳洞庭，以达长江南滨，其地人物富庶，守之亦所以屏障陪都也。自修水转进之后，在赣北方面，与敌夹修水对战者四阅月。迄二十八年三月中，敌再以第一一六师团一部、第一〇一师团、第一〇六师团、第六师团，于十七日开始向我修水南岸守军预备第五师、第三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八军，自吴城迄武宁间进犯，二十一日，敌自永修渡修水后，以战车向安义、奉新、万家埠、大城、牛行突进，在滩溪、万家埠潦水两岸，演成剧烈争夺战，奉靖方面，演成混战；二十七日，敌第一〇六师团由生米街东渡赣江，我举全力反攻，激战甚烈，惜因死伤过多，而守南昌之第三十二军，又未全力渡赣江，遂于二十八日放弃南昌。武宁方面，第七十八军拒敌于津口一带修水南岸，第七十三军、第八军，与敌争夺罗盘山、棺材山，激战后，同时放弃武宁。

本会战自二十七年八月初，敌开始犯我南浔正面，至十月三十日转守修水南岸为第一期；自二十八年三月中，敌开始犯我修水至放弃南昌、武宁为第二期。

第一期作战时，敌第一〇六师团被挫于金官桥后，其第一〇一师团始向星子方面进犯，迨受挫于东西孤岭攻势顿挫后，又以第一〇六师团、第二十七师团沿瑞武路南犯，似此逐次攻击，实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大忌，作战指导拙劣如是，宜其第一〇六师团被我歼灭。当敌第一〇六师团窜抵万家岭时，此处已形成作战焦点，时间空间，较任何方面为重要；我大胆抽调南浔瑞武三方面兵力使用于万家岭，实合“把握战机”，“争取主动”，“出敌意表”之原则，故万家岭歼灭战，首在作战指导之适切。又我在德星公路方面，原已筑成多线预备阵地，自星子至德安，长约三十公里，与敌第一〇一师团苦战两月，节节抵抗，未尝不战而弃寸土，实得力于多线预备阵地，及守备部队之坚忍沉着，保有转移阵地之自由，此在持久战之指导，似尚得要领。

第二期作战时，因交通破坏不彻底，故敌由永修渡过修江后，得以战车向安义、奉新、大城、万家埠、牛行一带突进，威胁我军侧背，且因防御战车武器缺乏，致演成奉靖方面之混战，可知交通破坏，乃制敌机械化死命之唯一要着地。

（摘自《百战将军——薛岳》湖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三　武汉大空战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下午，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到樊城机场。他对我们说，武汉三镇屡遭敌机空袭，过去无论高射炮、飞机都没有击落一架敌机，我们第四大队过去有过光辉的战绩，现在马上要出发去武汉，希望我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不辜负武汉三镇人民的希望等。讲话完毕，我们立即上飞机。全大队进驻汉口王家河机场，那时候我们估计不出三天，必有一次大战。

二月十八日，天气晴朗，我们担任警戒的战友们在飞机旁边刚吃过午饭，空袭警报汽笛声长鸣，不一会儿，我们大队的飞机全部起飞准备迎战。

当我们升到三千米高度时，敌机已到，这时敌机高于我们，我们处于劣势地位（飞机作战，高度越高越占优势）。一架敌机居高临下，向我俯冲下来，对我攻击。我不慌不忙地开始转弯，好象躲避他的射击，而实际上是引他入套。他果然跟在我的后面和我一起转弯，想咬住我的尾

巴（战斗机格斗，都想咬住对方尾巴，便于射击），我看敌人已经入套，就来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弯，一下子就咬住了敌人的尾巴。敌人知道上当，就拼命想逃。但是，敌人再也无法逃出我机关枪的瞄准镜的火力圈以外。这时，我抓住一个最好的机会，四挺机枪齐射，当时，敌我两机相距只有五十公尺，眼看敌人的脑袋倒了下去，飞机失去操纵，作直线飞行不再转弯。我明知敌人已被击毙，但还怕不保险，又补了一次射击，这架敌机彻底被击毁了。这时，我赶快检查自己飞机的后面，有没有敌机偷袭。检查结束并无敌机跟踪，我就放心地寻找第二个攻击目标。我突然发现一架我军战机被敌机在尾后偷袭，情况十分危险，我立刻追到敌机后面，对敌机进行袭击。正当我准备射击时，我的飞机突然振动了一下，左机翼被别的飞机撞掉了。我完全失去控制，机头向下，机身向左猛烈旋转，我立即从飞机里跳了出来，满天飞机在我四周战斗，我右手握住保险伞的拉环不敢拉，人在空中，头朝下脚朝上向下俯冲，大约在离地面六百公尺高度时，我拉开了保险伞，平安地降落地面。回队后，清查这次空战战果，我军共击落敌机十三架。但我们李桂丹大队长、吕基淳分队长、飞行员巴清正、王怡等都英勇牺牲了。

当我们在空中激战时，武汉三镇的人民，过去敌机来后，都躲到地下室去了，这次都爬上屋顶观战，为我们喝彩助威。

敌人在武汉上空吃了大亏，有两个多月不敢侵入武汉上空。偶然于夜间向武汉偷袭。但是敌人的战术是很狡猾的。有一次夜间，本来是我们派轰炸机去轰炸敌人，回航时，敌人派一队轰炸机跟在我们飞机后面，骗过了我方防空监视哨，使我指挥官产生了错觉，以为都是我们自己的轰炸机。当我们回航飞机打开夜航灯要求着陆时，机场照例开亮了导航灯。我们的飞机刚刚落地，敌人的轰炸机就趁机投弹，我们遭受重大损失。

四月二十日左右，总指挥部派我们大队和苏联志愿队一道去消灭广东海外三灶岛的空军基地，当我们大队飞到南昌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会合后，天气连续下雨，无法起飞。这时，我驻孝感机场的一架飞机，在试飞中，发现在他下面有一架敌机通过，他立即俯冲下去，将敌机击落。在检查敌机残骸时，发现是一架双座侦察机，侦察员佩带着金质领章，知道是一位高级空军军官来实地侦察，并且在他的日记本上发现一个重要情报，敌人准备在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天皇的生日，也叫“天长节”，以疯狂轰炸武汉表示对天皇的祝寿。总指挥部得此情报后，立即更改作战计划，将中苏两个大队的战斗机都到武汉集中，准备迎战。

四月二十九日午后，敌机果然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据说有六七十架，向武汉三镇窜犯。我们中苏两个大队的战斗机起飞迎战。也有七十多架。当时，我是副大队长的僚机，我的飞机在本大队的最前面，高度在四千米时，遇到敌机群。敌机群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我方在高度上又处于劣势。这完全是由于机场指挥紊乱造成的。当空袭警报发出之后，不等战斗机起飞完毕，轰炸机为了起飞到别处躲避，也争着起飞。使战斗机丧失了编队，占领高空有利位置的升空时间。另外，还严格规定战斗机在迎战之前，一定要在武汉上空巡逻，让武汉人民看得见自己的飞机。因此，敌人容易发现我们。造成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不利态势。

空战中，敌机采用经常使用的战术，集中力量打击领队长机。由于我是大队长的僚机，在全大队的最前面，首先与敌机遭遇，我被三架敌机包围，情况十分危险，一阵子弹打得我椅背保护钢板叮当直响，我反而沉住了气，并相信防弹钢板很有效。于是我就想先拼它一架再说，突然一架敌机从我的右侧后向我射击，我的汽油箱被中弹起火，飞机向前飞，火就向后烧，我一看情况不妙，左手立刻拉开保险带，右手将驾驶杆猛力向前一推，飞机机头突然向下栽，一个离心力就把我从火丛中甩了出来。

我离开飞机之后，过早地把保险伞拉开了，离地面还有三千多公尺，满天的飞机在我附近搏斗，我的伞下降得很慢，我先发现右脚皮鞋上被子弹打穿了两个洞，但我的脚并不疼痛，隔一会觉得左肩背有火烧般的疼痛，因为一枚燃烧弹把飞行衣打穿着火，两只手都够不到左后肩。后来越烧越痛，无法忍受，两条腿挂在伞带上，手就够到火，把火抓灭了。两手烧得都是泡。最后，我降落在武昌南湖附近的稻田里。后来被群众抢救送往医院。我在病床上听说这次空战，我军击落敌机二十三架时，高兴得把伤痛也忘了。出院后，我奉命调到云南昆明航校去当高级班驱逐组的飞行教官。当时，我满面伤容，左胸前佩带着击落两架敌机的奖章，左臂上佩带着两次受伤的伤劳臂章，博得全校官生的赞扬，也给后期学生树立了榜样。

（吴鼎臣）

长沙大火案

背景介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日军攻占湘北重镇岳阳，并出动飞机轰炸通城、平江等城，湘北战事日趋激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文电话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接到“蒋委员长文侍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张治中接电后，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

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

十二日中午，张治中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晤谈，张对陈说："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陈说："当然要做的。"下午四时，酆悌、徐权同来张治中处，拿出一焚城准备纲要。酆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焚城指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张以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所以改用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张对酆、徐指示："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同时，张、酆、徐三人商定，"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民众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张又指示酆、徐，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

十二日傍晚，张治中的副官向张报告说："街上警察岗位都撤了，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张很诧异，乃打电话问警察局长文重孚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将岗位撤去？文回答说："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的地方还有岗位。"夜间十点多钟，张治中应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为总理诞辰纪念做广播演讲，沿途看到无论什么地方，皆无警察岗位。张立即令副官王建成打电话给文局长，限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深夜十二点，张叫王副官打电话请文局长来，准备一同上街巡查，但警察局电话已断，无人来接。这时副官又报告说："街上警察局，均从门上用竹板钉起。"

十三日晨将近两点，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王建成来叩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立即披衣起来，看有三、四处都在起火。此时电灯尚未熄灭，再过不久，约三点钟后，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至四时许，酆司令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来的。"

张治中当即作出紧急处置：(一)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枪决；(二)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三)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四)令徐处长、酆司令及伤兵管理处长，迅速救济伤兵及难民，并维持秩序，恢复交通；(五)与陈司令长官商量，设法恢复电讯交通；(六)派保安第一团，担任火车装卸任务；(七)电呈委员长及何参谋总长；(八)派员并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及主动者。

长沙大火激起极大的民愤。火灾之后，灾民们用木炭在断垣残壁上写下"严惩纵火犯"等醒目大字，以抗议这场人为的浩劫。蒋介石为了推卸其责任，平息民愤，在长沙举行了"军法会审"，并以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长沙大火事件的处置结果。谓："最高军事当局曾亲赴湘垣饬令组织军法会审，搜集各种证据，详加研讯。首事人犯，前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以上三人，责任重大，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已于二十二日上午执行枪决。……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于大火后向中央请求处分，顷闻当局将以'用人失察，疏于防范'之罪，将张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长沙大火案，就此以酆悌等三人作蒋介石的替罪羊枪决而了结。

材料：

- 火变一日记

材料　火变一日记

现在要说到长沙大火。

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一座名城，顿成焦土；许多人的生命财产作了牺牲！内心沉痛，匪言可喻！我当时曾发布了一篇《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说的：

此次湖南省会长沙市，突于本(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自起火以至现在，余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恻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现在事隔多年，这历史上的灾变早成陈迹，但真相还不尽为人所明了。每一回想到这次不幸事件，我的心情还是十分沉重的。

我觉得现在可以把我当时所写的《火变一日记》发表了。这是我在灾变以后几小时中记载的实情实况，也是我在蒋亲临长沙时面呈的报告。我应该提供确实的保证：其中所记是没有任何一点不是忠于事实的。

这一文件，也许可以使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得着适宜的表白吧！？

《长沙火变一日记》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我正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适接林主任蔚文电话，第一件事，即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接到蒋委员长文侍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当时我即召集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

同日上午十二时许，陈司令长官辞修来晤，说：长沙市警察岗位都没有了。我很诧异，当时亲自打电话问警察局长文重孚，他说："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地方还

有岗位。”

我同辞修吃饭，我低声问他：“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他说“当然要做的。”

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我先后接见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军管区参谋长滕杰。电报管理局局长张忍。关于伤兵问题，问汪强：“什么时候能输送完毕？”他答：“十六日能运完。”我说：“最好能提前于十四日运完，愈快愈好。”我又对滕杰说：“兵役要加紧办理，在本年内应当能征齐十万人，以应紧急补充需要。”又对张忍说：“电报局对于员工，要加重精神教育，要勉励他们日夜工作，不要懈怠。”又叫他将暂时不需要的机器及材料赶紧运走，并且允许为他设法，请铁路拨车予他装运的便利。

同时又接见席市长楚霖，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征集一千名伕子，交蒋副司令锄欧担任搬运工作。每人一元一天，如市区征不到，可到长沙县去征。

到下午四时，酆悌、徐权同来，拿出一焚城准备纲要。酆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当时我以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所以改用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且说：“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但我和酆徐二人商定，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当时余并命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

下午五时许，我接见秘书长及各厅长，因为他们早已决定分迁沅陵和宝庆，特定于今晚动身。我说：“我暂时不走，我将与野战军同进退。”

下午约七时，副官从外面来报告我说：“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当时我更诧异，乃又亲自打电话与文局长，质问他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又为什么将岗位撤去？他回答说：“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岗位问题，他仍同上午回答的话一样。

下午七时半，我宴请在长沙的英美教会领袖，如葛牧师夫妇，丁牧师夫妇，及其他牧师共十人，我约尹厅长任先作陪。当时表示我在长沙一年中，得他们的帮忙，尤其对于伤兵问题、难民问题，他们帮忙很多，表示感谢。

在座中有德国医生安德生夫妇，他的医院在省政府隔壁。我同他谈话。他说，他要搬到圣经学院，他的夫人不肯。我当时劝他搬家，因为敌人汉奸将来总要烧省府，恐他们遭波及，最好是明天上午七时即搬。

下午十点一刻，我应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为总理诞辰纪念作广播演讲，沿途看到无论重要不重要地方，皆无警察岗位。我到广播电台后，即令副官王建成打电话与文局长，限他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并叫他来与我一阵上街去巡查。这电话是文局长亲自接的。

十点三刻钟，我回寓接见英国沙鸥号舰长兼代领事伊麦斯，因为所有在长沙的外侨，统由他负责保护，我当时请他对于外侨安全作准备，并表示感谢。又同他说：“虽然省府搬走，我在长沙尚有两三日或两三礼拜或较此更多之时日耽搁。”（译员为省府秘书汤武）。我当时还拿一纪念品送他，他表示诚恳的感谢而去。

将到十二点时，我叫副官打电话请文局长来，预备一同上街巡查，但警局电话已断，无人来接，且到处找他不着。在这时又接到副官报告说：“街上警察局，均从门上用竹板钉起”，即在我寓所后面的警察局，门亦封闭。

十三日上午一时许，我已处理过许多事，由寓所搬到二里牌唐公馆居住。因为近日省府搬家，我亦移住大雨厂坪十九号磐园。陈辞修兄本住一处，但他十一日搬走，并劝我此地居住不相宜，因为与电灯厂逼近，烟囱多，又吵人，且出入路狭不方便，我乃与他约好今晚一起搬到唐公馆居住。但这时打电话约他时，他说：他已住在章公馆，各处电话均已装好，不便又搬，至明日再说。

我到唐公馆后，大约快到十三日上午一时半至二时之间。又打电话找着席市长，问他究竟明日伕子有无办法？如果真没有，即将义勇壮丁常备队所余留的五百人调来担任。

将近两点了，我就寝。不久，刚入睡，副官王建成来扣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我立即披衣起来，看有三四处都在起火。这时电灯尚未熄灭，再过不久，约在三点钟后，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

到四时许，酆司令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十三日清晨，以后两日来我即做下面的紧急处置：

一、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

二、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并派员持函往会英舰长，请他转知各外侨，代为慰问。

三、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

四、令徐处长酆司令及伤兵管理处汪处长，赶快对于伤兵难民，加以救济，并维持秩序，恢复交通。

五、与陈司令长官商量，设法恢复电讯交通。

六、派保安第一团归蒋副司令锄欧指挥，担任火车上的装卸任务。

七、电呈委员长及何参谋总长。

八、派员并亲自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及主动者。

蒋在南岳闻讯，十四日亲临长沙视察，我报告了当夜实在的经过以后，坦然承认我自己的过失，请求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

蒋当时并没有答复我的请求。他在长沙留驻了几日，把事态查明，处理办法决定以后，行前，召集了当时留在

长沙的几位同志，就本案作了一番恺切的训示。我记得他曾这样说：

"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次事件上都可以得着明确的教训。

"现在处置的办法已经决定，目前最要紧的事是赶筹善后，收拾人心。文白还应该继续负责，表现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完成责任的精神。至于处分问题，当待中央核议"。

在送蒋上车时，我向他报告：

"我知道自己应负的责任，委员长虽然宽恕我，但是我的内心沉重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不论中央决定的处分是怎样，除了完成善后责任以外，我当知所以自处。希望委员长将来给我一个退思补过的机会。"

蒋在长沙的几天中，举行了军事会审。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依照军法会审的裁定，被处死刑。

酆悌原是不应死的！应死的或者是省会警备司令这一个职务，就是死于"直接责任"这四个字。对于他的责任与处分问题，我曾经两次向蒋申述我的意见，求为减轻。但是我的请求没有能变更森严的裁定。大错铸成，力余（酆悌的字）死矣！

不久，我接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中央的决定显然不是在保全我的禄位，而是要我经历更艰难的地位，体验更苦痛的生涯。倘若那时便容许我走开，在责任上虽然讲不过去，但在精神上是稍可轻松。可是我知道，一个破砖残瓦败壁颓垣的局面谁来收拾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不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恪遵处分，赶筹善后，尽我未尽而应尽的责任。我平常做事是提得起，放得下，而那时是提不起又放不下，这真是太大的惩罚了！

（摘自《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

广州失陷

背景介绍

在武汉会战发起以后，两广地区的中国军队大量北调，致使广州地区的防务十分空虚。守备部队为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所部，重点配置于广州附近，沿海一带几乎处于无警戒状态。

日军第十八、第一〇四师团，于10月11日晚由海军第五舰队从马公运抵广东大亚湾口。日军企图由此突破中国防线，登陆后经东江右岸迂回包抄广州。中国守备部队疏于防范，仓卒应战，未能给日军以有效的打击。次日凌晨，敌第十八师团和及川支队便很顺利地在小亀山、蚱涌、盐灶背等口岸登陆。第一〇四师在岭头山地区未受任何阻碍，也登陆成功，并迅速扩大战果，占稔山，北犯平山（惠东），进而攻击平潭。

第十八师团上岸后，分兵两路，一路于13日陷淡水；一路直扑惠州。战役沿东江右岸展开。15日，日军占惠州和惠阳。16日，再占东江沿岸重镇博罗。日军进入增江地区作战。19日，取增城。及川支队于横沥渡过东江后，采取大迂回方针，19日占领龙华。同日，第一〇四师团主力亦进入增城。这时，广州地区的中国守军已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日军第二十一军军部命令第十八师团，由增城沿公路经龙镇直扑广州。我守军虽顽强抵抗，仍不能抵御敌人的猛烈攻势。21日下午，第十八师团占领广州，并立即切断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的联系。第一〇四师团和及川支队先后攻占广州东北方向的从化城。

为配合大亚湾地区的登陆作战，日军第二十一军军部又决定以第五师团从珠江口溯江而上。21日，第五师团在海军配合下，由大亚湾进入珠江口的伶仃岛。然后，以主力坂本支队发起对虎门要塞的猛烈攻击。守军不支，23日敌占虎门。接着，第五师团向广州西南的佛山、三水方向前进。

从日军自大亚湾登陆，到广州失守，仅十天时间。战局发展如此之快，是与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执行消极防御，不愿发动民众抗战分不开的。中国守军虽英勇奋战，终不能抵御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全部转移至广州北部清远、横石、新丰一带固守待援。

材料：

·广州沦陷前后

材料　广州沦陷前后

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之后，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交通的枢纽，无时不在日军觊觎之中。抗战爆发之初，日本海空军即以台湾、澎湖为基地，经常派出舰队游弋华南海面，封锁海口，检查珠江口外出入广州的外国轮船和袭扰沿海各地。日军飞机，初期从台湾或航空母舰起飞轰炸广州和其他地区，对粤汉、广九铁路线进行破坏。接着又攻占珠江口外的三灶岛作海空军的前进基地，并在台湾集结陆军七、八万人，积极作进攻华南的准备。九月初，日海军突然驶进北海港，并占领在军事上居重要地位的涠州岛。

在日军已摆出跃跃欲试的进攻姿态的形势下，蒋介石及其华南军事当局，对保卫华南未作认真准备和部署，且对于英法等国抱着某种幻想，认为日军不敢进攻英法各国拥有重大利益的华南，以致广东防务空虚，沿海一带

陷于无警戒的状态中，终于铸成了十日间丧失广州的大错。

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日军第二十一军（辖三个师团和一个飞行团）约七万人的兵力，在海军协同下，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后藤中将指挥，向我南海出动。其先头舰艇于十月十日进抵大亚湾附近海面。

这时，国民党军驻粤部队为余汉谋部第十二集团军，"在广州地区虽有八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和其他部队十万余人"，因未作防备，加之蒋介石对于敌情的判断错误，使惠广战役一开始就自陷被动。在战役前蒋介石认为日军对英国有顾忌，不敢大举南犯，至多不过以小部海军舰艇和陆战队，以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虎门这一段的海上交通，作有限目的之攻击而已。因此，蒋以为日军之兵力部署，必以虎门要塞地带为主要攻击目标，在大亚湾附近只有佯攻。"他根据这个判断，早就策定了以确保广九线为目的之作战计划，要余汉谋切实执行，不许擅自变动。"事实证明，这个错误判断是惠广战役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来犯的日军不止有海空军，而且有陆军三个师团，它的全部力量都在大亚湾澳头附近登陆，而不是以虎门要塞地带为主攻。它的目的亦不仅仅在切断我深圳至石龙这条线，而是要占领广州，并进而掠取华南。

十月十日晚，在大亚湾的平海口外和澳头附近海面发现日舰数十艘，"当晚香港各外国通讯社已发出大亚湾日舰云集的消息，但广东省政府还发电否认。"十二日拂晓，麇集在大亚湾海面的日军，开始以海空军掩护，向澳头附近强行登陆。此时驻守在惠阳、淡水等地的莫希德一一五师，怕日军在自己正面澳头附近登陆，曾请余汉谋准许该师何联芳旅全部调往澳头附近，以加强第一线兵力；将该师温淑海旅从深圳、龙岗全部调往淡水，以加强第二线兵力；另请调得力部队防守惠阳。但余汉谋因转报远在武汉的蒋介石，未得邀准，不敢调整部署，仍令莫师照原来部署进行防御。余又打电话给莫希德，对惠阳应否采取防守抑或撤退，可自行相机处置。这就给莫希德以弃城而逃之借口。

十月十二日，实行强攻登陆之日军，一方面使用五、六十架飞机，由航空母舰起飞，分批向澳头附近阵地的国民党守军扫射轰炸，并深入淡水、龙岗、惠阳等地扰乱，一面使用海军舰艇，以二百多门大炮，向澳头附近阵地射击。国民党军因平日既缺乏对空作战之训练，阵地工事又无坚固之防御设施，一经轰炸，守军罗懋勋团的一个营便被消灭，自营长以下大部分官兵均已阵亡。"敌乃未经抵抗，分乘橡皮艇三百只，在澳头附近安然登陆。至上午八时，敌陆军已有一个旅团侵占了我楼下、澳头、沙鱼涌之线，并即向淡水挺进；其他步、骑、炮、工兵及战车队等已陆续登陆，至下午四时，日军已完成了全部登陆任务。"与此同时，驻守在淡水的国民党军两个营，经不起日军优势炮、空火力之压迫，仅作了两小时的抵抗，即行溃散，淡水遂告失陷。

日军侵占澳头、淡水后，当晚除以一小部分向广九线方面的樟木头警戒外，其步兵主力则从山僻小路向惠阳挺进。

十三日，日军步、骑、炮兵及战车队，在空军约三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沿惠、淡公路前进，下午三时，日军先头部队已抵惠阳近郊。国民党守军莫希德师何联芳旅稍与日军接触，亦被敌机轰炸所吓倒，纷纷向后溃退，惠阳失陷。日军进占惠阳后，并未分兵向我樟木头、横沥、石龙等处进攻，以夺取广九线，而集中兵力向博罗、增城进犯，企图沿惠广公路攻取广州。此时，余汉谋急令钟芳俊旅由广九线常平出芳村，待机推进增城以南之福田，并令陈勉吾旅由清溪向增城前进。十四日，由惠阳溃败至博罗的何旅，在敌机袭击下有如惊弓之鸟，渡过东江继向增城溃退，驻博罗的国民党守军也向河源方面逃跑，于是博罗形成空城，不得不弃守而向福田转进。

十五日下午，日军约一个联队，在飞机掩护下，沿增博公路向福田进犯。守卫福田的李振部和张瑞贵部，在福田附近仓惶构筑临时防御工事。这时日军因沿途未受坚决抵抗，便不待详细侦察，即轻率冒进，展开攻击。殊李、张各部是生力军，战斗准备较为充分，所占之阵地地形也较为有利，故不似莫师之一触即溃，作了半天的坚决抵抗，使日军攻势受挫。日军以事出意料，乃向博罗后退，从事整顿，以图再次攻击。

日军知国民党军在增城附近已有准备，又有增江之屏障乃改变计划，以有力之一部从响水、龙门、正果、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并加紧对增城正面之攻击，以图包抄歼灭国民党军队。余汉谋获知后，急令陈勉吾旅向正果前进，以阻止日军之迂回行动，并掩护增城之左翼。陈旅于十七日下午渡过增江，先敌到达正果占领阵地，十九日对阻击少数侦察部队之情况，夸大为击破日军主力的战绩，向余谎报，窃邀战功。可是，二十日日军展开主力攻击后，不及半日，该旅之防御被突破，溃不成军。

十月二十日，增城正面之日军沿增博公路直扑增城，在飞机数十架向增江右岸扫射轰炸和大炮数十门轰击下，李振师、陈崇范炮团和蒋介石由湖南新调来增援的一个重炮团，都被炸损失甚大，连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李振师溃退后，日军遂安然渡过增江，侵占增城。

日军突破增城、正果阵地后，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线；一部则沿广（州）增（城）公路直迫广州。日军在空军的协同下，穷追猛攻，国民党军损失惨重，所有战车和轻重火炮，全部丢掉。

余汉谋获悉增城溃败后，于二十日深夜，打电话向武汉的蒋介石请示，并得到蒋的同意即仓惶撤退。他为欺骗

民众和部属，声言要坚守广州和近郊阵地，继续作战。当时广东国民党军尚有四万兵力，从敌我兵力比较，至少也可以支持五天以上。但余为“保存实力”，乃决定弃守广州，向粤北撤退。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也和余汉谋一样，对广大人民和许多学校机关的撤退工作，未作认真组织工作。“对市民的撤退通知，直至十月二十日夜才由警察局发出，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逃难市民拖男带女，哭声与骂声交作，真是不忍闻睹”。受难的民众骂“余汉无谋，吴铁无城，曾养无甫了！（甫与谱谐音）”“这时余汉谋的参谋长王俊，对丧师失地却还若无其事地谈笑自若。及至在逃命途中携带的私人珠宝财物被敌机炸车焚毁时，竟号啕大哭，捶胸昏倒，无耻丑态毕露无遗。”

二十一日，日军地面追击部队进行到广州的龙眼洞附近，日空军整日不断地向国民党退路以穿梭式低空轰炸扫射，军民死伤惨重。是日，广州部队未经战斗便撤出广州，使我国的南大门，于二十三日沦陷。

（摘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汪精卫投敌

背景介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在上海“重光堂会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亲日派集团加快了投敌的步伐。1938 年 12 月 5 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从重庆抵昆明。18 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也从重庆逃往昆明。19 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 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22 日，日本首相按照预定计划发表声明（即第三次近卫声明），其中说：“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并表示日本愿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29 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所谓“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破坏抗战，卖国求荣，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激起了中国各政党、团体、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1939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5 月 1 日，汪精卫在日本的秘密策划下，从河内到达上海，策划建立伪政府。汪精卫集团投敌，认贼作父，助纣为虐，自绝于人民，也导致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与亲日派的汪精卫集团的公开决裂。

材料：

- 重光堂会谈
- 逃离重庆

材料一　重光堂会谈

重光堂，中国人当时称它叫梅华堂。它地处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是一幢孤零零灰色二层楼西式住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东体育会路七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从附近一家旅馆里借了可供七、八个人使用的被褥、火盆、餐具等一套家俱和摆设，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的布置。日汪会谈的预备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十一月七日，梅思平从重庆到达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了避人耳目，梅、高两人与翻译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于十二、十三两日到达上海，他们先后被接到重光堂，立即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预备会议。从十二日晚至十四日晚，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

这次谈判，主要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如何逃出重庆的详细方法。会上，梅思平首先介绍了在重庆与汪精卫等人协商的意见：汪表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起见，保证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部门的日华合作，向日方亮了底牌。接着，根据今井武夫的意见，双方就具体方案进行讨论。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同时，高、梅也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不肯同意，双方“激烈争论”了六个小时，才达成初步

的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会谈中，高宗武、梅思平还提出，要重建“中国政府”、就不可能同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否则，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立”。他们声称：作为“中国新政府”的抱负，不能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高、梅表示，对于这两个政府中之“善良者”，不妨包容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对此，日方代表予以驳斥。今井声称：“临时”、“维新”两政府“均系日本指导下的政府，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此乃我帝国之信义。因此，不能考虑约定将其取消。”实际上，日本政府为加强对中国沦陷区的统治，早就制订了“分治合作”的方针，并提出对各地的伪政权，要给予“广泛的自治权”，当然就容不得汪精卫一个人去“统一”了。

双方争论不下，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一争到底”，于是就决定待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白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权既已成立，则可自行解散。这一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基本原则确定之后，高宗武、梅思平即代表汪精卫提出了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及其有关政策，提交会议讨论。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汪方的“行动计划”预定如下：

第一、发　动

一、日华代表间如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确定解决和平条件，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人通知在重庆的汪精卫；

二、汪精卫在接到上述通知的一两天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干部同人寻找借口前往昆明，同时梅思平也携带与日本方面接洽的结果情况，自上海经香港到达昆明；

三、日本政府准备在汪到达昆明之际，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

四、汪精卫于其次日发表对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当天乘飞机到河内，再赴香港；

五、汪精卫到达香港后，立即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呼应，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

同时以国民党员同志的名义，联名发表反蒋声明，对中国内地及南洋华侨开始进行和平运动；

六、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

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虽已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他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

七、日本军如能援助上述军事行动，以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可隔断中央军，向贵州等后方进攻，但须预为部署，不可把陕西省及广西省驻扎在西安和梧州等处的中央军赶入四川和广西内地。

第二、建立新政府

一、在非日本军占领地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

二、日本军实行部分撤退，以广东和广西两省为新政府的地盘；

三、汪精卫在他的旗帜下，使同志汇合，以两广、云南、四川四省为正式建立新政府的地区。

第三、新政府的政策

一、政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阐明政策，发表日华提携政策，在海外开始进行和平运动；

二、新政府编成约五个以至十个师的军队；

三、向日本聘请军事及其他教官，以政府的东亚新秩序政策为宗旨，进行教育，培养人才。

上述计划中关于在西南地区组府等主张，是出于汪精卫的授意，还是高宗武、梅思平在重光堂会谈时自己提出的，目前虽无确切资料可判断，据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后的交待，重光堂密约的内容，汪精卫是事后才知道的。周的交待或许是可靠的，然而事实是：其一与日方签订密约的高、梅两人是由汪精卫、周佛海所委派，作为汪方代表参加会议，因而有权决定具体事项；其二后来当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交给汪精卫后，汪是表示同意的。因此，上述计划是汪精卫集团对建立“和平政府”的初步设想。

十一月十五日，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送交了在重光堂预备会议中与高、梅所达成的秘密协定草案。这时，东京陆相官邸，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除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次长多田骏外，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今井前往参加，并作了报告。经过讨论，与会者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

十八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以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翌日晚，日汪双方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二十日晚七时，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

昭，今井武夫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此外，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地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赔偿日侨损失。(六)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据此，会议还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和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

重光堂会议所签订的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最初一份卖身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当时汪精卫等人还在重庆，为了把他们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接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因此，在重光堂密约签订后十天，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的权益的要求，就比重光堂密约广泛、苛刻得多了。可见日本与汪方签订的重光堂密约，不过是引诱汪精卫集团脱离重庆的诱饵。

摘自《汪精卫集团沉浮录》内蒙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逃离重庆

在汪精卫集团加紧准备出逃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按照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计划进行。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首相将于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讲，利用这个机会，将宣布对华"新政策"。

可是，事情发生了波折。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抵重庆，这一下无意中把他们的叛逃计划打乱了。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还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同一天，《新蜀报》所发表的《汪副总裁谒见记》中，汪精卫还在大谈所谓"政治机构的调整和地方政治的改进"，并强调"财政金融的整顿和经济建设的实施"。十二日，汪精卫又身穿平时很少穿的藏青色中山装，出席蒋介石在重庆行营纪念周的讲演会。与此同时，汪还分别接见了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介石的亲信人物，听取他们的"汇报"，但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随时都会流露出不自然之神态。

十二月九日晚上，已经到了京都的近卫，取消了大阪之行，并且将广播演说延期至十四日，接着就回到了东京。

此刻，还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找到了一个脱逃的机会。十八日，蒋介石要发表训话，汪可以不参加。趁此机会，汪精卫就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飞机票。彭是江西安福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又求读于比利时京师大学，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是原"汪系"人物之一。因此，汪要飞机票，彭自然奉命照办。

这天上午九时，陈璧君以及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四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们约定，汪精卫在起飞前数分钟内赶到。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开起飞的时间将到，汪精卫仍然未来，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嘱咐曾仲鸣，如汪精卫迟到，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就在这时，一辆小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说汪精卫是去昆明讲演的。

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在这位"副总裁"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飞行技巧。他走进驾驶室，亲自操作。这一手不要紧，直吓得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虚汗直冒。陈璧君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她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暗中告诉汪的侍卫，要他作好一切准备。正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

汪精卫一伙就这样离开了重庆。

（摘自《汪精卫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张国焘叛逃的前前后后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现叫黄陵驻在县)有座轩辕黄帝陵,当时属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党政府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就要组织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那里祭陵。1937年,为了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次去黄陵扫墓,我也随同去了。从此,每年清明节我方都要去参加黄陵扫墓。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4月1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主席谈,要求去黄陵扫墓。毛主席知道他内心有鬼,回答不同意,并对张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但是,张国焘坚持要去。最后,毛主席说:"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刻回来。"张国焘满口答应说:"是!我很快就回来。"4月2日,张国焘就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鄜县、洛川去黄陵。一到黄陵就看见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员及宪兵队乘的汽车也到达了。4月4日祭陵一完,张国焘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去吧!我还要去西安办事处,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同志,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办西安办事处一些工作)研究……。警卫员张海同志急忙对张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张国焘不答理,转身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里。张海同志只好坐上西安公署宪兵队的汽车随同去西安。张海到西安后,听说张国焘他们坐的小汽车在咸阳抛了锚,还没有赶上来。张海到公署仔细一问,才知道张国焘早已住在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里了。张海同志后来说:在他找到张国焘以后,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了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到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

两天后,张国焘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7日,在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他对张海同志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来等我,我马上就到。"张海打通了电话后,林主席很快就来了。张海一见林主席便报告说:"张国焘副主席说他有事来西安找你研究,怎么没见你的面,就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呢?"林主席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张国焘来到火车站后,林伯渠同志也买了张站台票跟他上了火车。这时,张国焘对林老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老林即说:"中央批准了你去吗?"张国焘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林老当面严厉地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组织领导批准擅自行动呢?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到八路军办事处或回延安去提。"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林老见他执意要走,也就不多说下去了。当林老走下火车来的时候,张海同志追过去问:"林主席,我怎么办呢?"林老想了想说:"你跟着他一同去武汉,要多长点心眼。"张海回答了声:"是",便上了火车。紧接着胡宗南派来护送张国焘的两个便衣特务也跟着上了火车,坐在张国焘的周围。

林老回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立即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发去电报,把这件事情汇报了。中央立即回电,指示林老打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明张国焘去武汉的时间及车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

1938年4月8日上午,周副主席要我找以下几个人到他办公室来:"李克农同志(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童小鹏同志(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科长、秘书)、邱南章同志(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运输科长)、吴志坚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周副主席问:"你们几个人中间有谁认识张国焘?"我回答说:"我认识他。"我先后3次见过张:第一次是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两河口会合时;第二次是毛儿盖的会议时;第三次是1936年秋天在保安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及红军大学组织的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说:"那好,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来了,你们坐上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截住他。你们对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估计他不会来,那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来也可以,你们要紧跟住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我们很快赶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后,分别把守在车站的各个出站口。可是接了两天站也没有见到他。当时吴志坚同志笑着说,我还没见过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见识见识。我用手比划着说,张国焘是一个大个,背稍驼,肥头大耳,说话还带有江西口音。一列火车到站后我们都睁大眼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但直到出站台的人都走完了,还没有看见张国焘的人影。嘿!这家伙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出站口守候,还是没见到张出站。必有可

疑！童小鹏同志说："是否还在车厢内没有下来呢？"李克农秘书长说："好吧！小鹏同志你在站门口盯着，我们3个到车厢内看看。"于是我们就上到列车厢中，挨个车厢查看，终于在靠稍后面的车厢里找见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两个便衣特务坐在他的两旁。警卫员张海同志坐在张的对面，他背的驳壳枪在上火车后已被便衣特务卸去了。他们到了汉口不下车，是正在等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接。当时我走到张国焘面前大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来两辆小汽车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当时把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有事，我有地方住。"那两个便衣一见我们来接，便想溜走。当时张国焘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声提醒张海从便衣手中拿回了枪。我们就这样截住了张国焘下火车出车站。两个便衣溜走了，张国焘也已知无法脱身了，便要在车站门口一个小茶馆停下来。按照他原来在西安和蒋鼎文的策划，等他来到武汉后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在江汉关一个旅馆里，然后再引他同蒋介石会面。但由于我和吴志坚同志紧跟着不放，李克农同志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很快就回到小茶馆，打乱了张国焘的安排。张国焘只好答应由办事处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与江汉关之间的小街上找了几间平房，让张国焘临时住下来。几天之后又让他搬到太平洋饭店住。这些天都是我和吴志坚同志负责照料他，并与张国焘吃住在一起。原警卫员张海同志回办事处招待所待命。

晚上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来到住地整整和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有时不多说话，有时大发牢骚，说什么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来同志义正词严地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点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来住，不和林老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董必武同志说：你是一个较早的党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你还不知道你犯过多少错误？如"左"、右倾路线错误，军阀主义错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你认为这些错还小吗？大家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还向谁大发牢骚呢？

叶剑英同志在谈话时针对他的错误说：你在鄂豫皖发展这么大块地方不是丢了吗？到四川不又是发展了大块地地区后又逃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呢？你的错误难道和你的领导作风无关吗？只能从中吸取教训嘛！不能再错上加错，你还在主观地认为自己高明。

李克农同志说：你是个聪明人，你背着党中央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住到办事处来，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动对头吗？

秦邦宪同志在谈话时说：张国焘，你自己犯错误了，光靠人家帮助是不够的，自己应该认错改正所犯的错误才是，而你对党和同志们给你的帮助还发牢骚，对大家表示不满意，这种态度对头吗？为什么你到了武汉来连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呢？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他，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呆若木鸡。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周恩来同志对张国焘说：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提出来。张国焘顺水推舟地说："我有3个条件请答复，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三是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同志针锋相对地说：这3条都办不到，假如你愿意，下面几条倒可以实行。一是回延安工作；二是到苏联去学习；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苏联看病或休息。张国焘摇着脑袋连声地说"不行"，周恩来同志见张国焘如此顽固，就说："好吧，你先想想，以后再谈。"便起身走了出来，在临上汽车时他指示我和吴志坚同志说，"他到哪里去你们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办事处他不去就不去吧，让你们两个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

由于我和吴志坚同志的注视，张国焘无法与国民党特务直接联系，非常恼火。有次他冷冷地对我说："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我故意拉长腔调回答说："是周副主席派我们保护你的，你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嘛。"张国焘恼火地使劲瞪了我一眼。他认为无法摆脱我和吴志坚同志的监视，便狗急跳墙，阴谋对我和吴志坚同志下毒手。一天，张要到武昌去，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只有吴志坚同志跟他去了。到了江汉关码头过轮渡时，张国焘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吴志坚同志紧跟上船时，船恰好开动了。心毒手辣的张国焘趁机将吴志坚同志使劲往船外推，企图将吴志坚同志推到长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警的吴志坚同志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了站在旁边乘警的胳膊，才避免了这场灾祸。事后，吴志坚同志立即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并问：以后能不能趁张推我们下水的时候，我们顺手将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们会游泳淹不死。周恩来同志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尽量争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头，你就是用绳子捆住他，他也不会跟着我们走。就是一同下水，将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义？他的思想行动坏了，我们不跟他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一天，他伏在桌

子上写了半天信，写完之后就要送出去。我们怀疑他是给国民党写信，就赶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同时，跟着张国焘一起去发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样，看着他把信送进了邮箱。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想办法把信取出来看看。于是我来到邮局，找到一个负责人说，我有封信将地址写错了，请他取出来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军装，还很痛快，不过要求有证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同志说明情况。周告办事处立即派人送来了具保人证明。我们取出信一看，原来张国焘是给他家里的一个大哥写的，信中充满了悲观情绪，说："国民党没法救中国，共产党更没办法。"又说他活不长了，等等。看完后，我们又把信放进了信箱。从这以后，张国焘被盯得更紧了。几天后，张国焘提出要见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先与蒋联系约定在4月17日下午。我随同周恩来同志和张国焘去武昌蒋介石的官邸，周恩来同志领张国焘同蒋介石会面，我在副官室待候。张国焘一见蒋介石便以一副"认罪"的姿态，奴颜婢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同志马上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说得蒋介石和张国焘目瞪口呆。

回来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针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义正词严地向他提出3点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延安去工作；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三是自己声明脱党，由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张国焘的回答是："第一条是不行的，可以在第二条或第三条中选择。"并允许他在两日内闭门考虑答复。

4月17日晚11点前后，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的一伙特务开着两辆汽车停在张住的太平洋饭店楼下，几个人冲到了二楼。这时负责跟着张国焘的只有我一人，吴志坚同志有事出去了。几个便衣特务进房来二话没说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几个特务抢走了张国焘。我一面挣脱一面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抢走我们的张副主席，我要向你们的上面去抗议。"有一个家伙歪着脑袋得意洋洋地说："上面，这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然后特务们把张国焘接上汽车后吹了声口哨，从江汉关轮渡过江到武昌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见桌子上留有一张张国焘给周恩来同志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张国焘就是这样的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我当时在饭店先用电话向李克农秘书长报告了情况，并急忙回到办事处去向周副主席汇报详细经过。这件事好象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意料之中，他们都说，张国焘不肯改悔会走这条路的。当晚，我仍回到饭店过夜。第二天早饭后，我仍去武昌胡宗南司令部找张国焘。正巧，我在门口一眼就看见张国焘坐在里边东房内。站岗的一脸凶像，不让进去，还说这里没有张国焘。我把我的名片给了他，上边印的是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身份。我理直气壮的说，是昨晚你们用汽车去太平洋饭店接来的嘛，怎么能瞎说没有呢？我就用手指着说，张副主席就是在这里。没等站岗的说完话我就闯进去了。张国焘一见是我，抬了一下眼皮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周恩来同志派我来看看你。"他说："不用看了。"过了两天，为了解张是否转移别处，我便借口送毯子和其他用具又去了一趟，他正在写东西，好似心情烦闷，什么话也没说。4月下旬，张的老婆杨子烈及一岁多的男孩从延安被送到汉口，按组织上的指示，我将他们送到了张国焘那里。

1938年10月25日，在武汉失陷之前，我八路军办事处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四川重庆。我们办事处住在红岩嘴（现改为红岩新村）。在后山顶上有个地名叫"大坪"，这里住的是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1939年，张国焘就在这里当上了他们的政治教官，给训练班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选自《纵横》，邱南章）

张国焘叛党的经过

1938年4月，张国焘趁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离开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成了可耻的叛徒。这件事情过去有过报道，但与事实颇有出入。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更是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从1937年起，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和陕甘宁边区代表一同到黄帝陵致祭，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1938年4月4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同祭黄陵。祭毕，张对护送他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要他们先回去，然后带着警卫员张海钻进事先由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到了西安，与国民党官员和特务进行多次密谈。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当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都在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张国焘到西安火车站，才临时打电话给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要林到车站见面。林伯渠匆匆赶到，两人谈话时，张国焘以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手段企图破坏党的团结，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苦口婆心加以劝阻，要张国焘回办事处商量。张国焘无动于衷。林老立即回到办事处，分别给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打了电报，报告张国焘的去向。中共中央也打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4月8日清晨，担任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的童小鹏收到这两份电报，立即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到电报，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嘱咐童立即把电报送给王明、博古、

凯丰等，然后把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和副官邱南章、吴志坚找到他的房间。周恩来把电报给李克农看，并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乘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赶快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又问："你们都认识张国焘呢？"李克农和童小鹏等都说认识。周恩来再三叮嘱，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要说明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去接张副主席的。

李克农等人离开周恩来的房间后，邱南章即去打听西安客车到达时间。当时西安到武汉的客车每天只有一列，下午七点到达。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吃完晚饭。急忙到李克农房中集合。邱、吴都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穿着十八集团军的军服，背着手枪，够威武的。李克农穿一身便服，身材魁梧，戴副眼镜，显得很精神。童小鹏穿一身灰制服，像个秘书。李克农作了一些交代后，四个人即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副主席"。

下午七时，火车准点到站。他们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分头走进车厢去找，也没见到张的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老发现张国焘坐火车到汉口来，张国焘怕我们去接，就回西安去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9日，李克农等又按时到火车站去，还是没有接到。11日，有人说，也许张国焘不坐火车了。李克农说："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下午七时，他们四人又是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邱南章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发现了张国焘，立即请李克农等人上车。李克农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张副主席。张国焘表现出恐慌的神态。两个护送的便衣特务看到李克农带着武装的副官，也就不敢作声。李克农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带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到办事处。两个特务也跟着下来，一个去通风报信，一个仍在后面跟踪。张国焘执意不到办事处，一定要住在外面。李克农决定由邱南章、吴志坚陪张国焘到汉江路找一家小旅馆住下，对邱、吴说："你们两人要负责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邱、吴都是政治保卫局出身的干部，当然心领神会，当即回答："报告秘书长，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于是李克农、童小鹏带着张海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

当晚，李克农陪着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示，是否可以在相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边区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一下就暴露了他投降国民党的思想。王明、周恩来等人没有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到办事处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虽经耐心劝说，张仍坚持不住办事处。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不得已写了一个电报：

毛、洛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周恩来最后对张国焘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临走时交代邱南章、吴志坚，一定要时刻跟着张国焘，并随时抽出一个人用电话报告张的活动情况。周恩来等回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即给陈(王明)、周、博、凯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致张国焘电，到旅馆当面交给张国焘，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十大救国纲领深受全国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反复劝说张先到办事处住，一切都可当面商量。张国焘无言以对，只敷衍了几句，仍坚持不到办事处。周恩来回到办事处后，立即召开长江局会议，大家认为张国焘已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可能性很小，但要按照中央书记处指示，做到仁至义尽。决定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去争取他到办事处来。

14日，张国焘在邱南章、吴志坚两人监护下，还不敢多活动，只打了一些电话，这当然是在西安就准备了的。从车上下来的一个特务也住在这家旅馆，但不敢同张国焘来往，只是做坐探。

这天晚上，为争取张国焘住到办事处，周恩来和王明、博古、李克农又一起到旅馆去劝张，虽然苦口婆心，张却毫无回心转意的表示。李克农是同叛徒、特务斗争的能手，他连劝带拉地把张推上汽车，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

张国焘住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是借口有事外出，外出时由邱南章或吴志坚陪同。他去见过陈立夫、周佛海，也见了被党开除的陈独秀。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他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的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得到蒋介石同意后，16日上午，周恩来陪张国焘过江到武昌见了蒋介石。张一见蒋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语无伦次地谈了一些边区政府的事。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只哼哼哈哈了几

句。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批评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的错误态度。

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为由，要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带钱让张国焘用。张一上街就乱走乱闯，既没配眼镜也没去看牙，只想摆脱吴志坚溜掉。在汉口转到天快黑了，他说要过江看朋友。吴志坚紧跟在后面。在过江码头轮渡边，当旅客上了轮渡要关上铁栅门时，张忽然跳上去，想把吴志坚抛在铁栅门外。吴眼明腿快，一下跳上了轮渡，紧跟张国焘不放。到了武昌天已黑了。吴劝张回办事处，张坚决不回。因乱闯了一下午，又累又饿又渴，吴把张拉到一家小旅馆喝水吃饭，边吃又边劝张回汉口，张仍执意不回。吴只好在旅馆里订一个房间，让张睡里面，他睡门口。在张国焘没有注意的时候，吴志坚写了一张字条，要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个电话，说他同张国焘在武昌某旅馆，要办事处快派人来。办事处正四处寻找张国焘时，接到这个电话，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到武昌找到了张国焘，并说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接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国焘不肯走，他们就连推带拉把张推上轮渡回汉口。张赖着不回办事处，邱南章把他安置在汉口中山路太平洋饭店住下。邱留下来，让吴回办事处报告和休息。这时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和王明、博古听了吴志坚报告后，认为张已决心叛党，为了尽最后的努力，商定明天上午和张摊牌，并确定了谈判的内容。

17日上午，周恩来和王明、博古到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谈判。周恩来对张提出三条：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二，暂向党请假一个时期；三，公开脱党，党亦径告以开除决定。张国焘不答应回党工作，但表示愿意在二、三条中采取一种办法，希望允许他考虑后再定。

周恩来等走后，张国焘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谈话，表示他要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了。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当天晚上，特务机关派来了两辆小汽车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便衣特务，直奔张国焘的房间。邱南章立即迎上去大声问："你们要干什么？"特务二话不说，两个人把邱南章抱住，另一个把张国焘拉到车上后，才把邱放开。特务们向邱吹个口哨，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邱南章回到房里，见到桌上有一张张国焘给周恩来等的字条，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邱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当晚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经过。18日早晨，周恩来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解释，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该决定在4月22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

4月22日，张国焘在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发表了《张国焘声明》，5月6日又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胡说什么他是来武汉与"中共负责人商讨抗日问题的"、"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他找陈独秀企图另组一个共产党，遭到陈独秀的拒绝。张国焘原以为投靠蒋介石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可是蒋只把他当走狗看待。1938年冬，张国焘到重庆，在军统办的特务训练班讲反共课，做反共宣传，上下班都得挤公共汽车。国民党让他当参政员。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他躲在角落里，不敢见共产党的参政员。其他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也不齿于与这个叛徒为伍。他只能每月拿350元干薪而已。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干反共勾当。1948年冬，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他怕当共产党的俘虏，跟着逃到台湾。后又移居香港，过着潦倒的生活。

大约在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人民政府提出，把他唯一的儿子送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经周总理批准，学了五年，成了医生，便在香港行医。

1968年，71岁的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7年他中风后生活不能自理。1979年12月3日晚上，天气很冷，因毯子掉到床下，自己不能起来拿，结果被冻死了。

（选自《人物》94年4期，作者：陈清泉）

《新华日报》揭露张国焘叛投经过

1938年4月22日至24日，《新华日报》一版广告栏内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新华日报》上登出后，立即引起政界人士重视。张国焘又登报声明为自己辩护，因此更有各种猜测。据子健先生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人的信说：外间谣传，张国焘找陈、周、秦三人谈他的不同政治见解，正在谈判中，张国焘就被开除了党籍。张国焘曾经是中共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叛逃不会不为反共势力用来攻击中共。公布真象有利于粉碎谣言。陈、周、秦在公开信中，详细介绍了张国焘叛逃经过，如下：

"4月4日，因为张国焘在边区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参加祭黄帝陵，可是祭陵完毕后，张国焘不通知我党中央即自行到西安。到西安后，住西京招待所两天，没有与驻陕办事处发生关系，只在火车快要开动前，用电话约林祖涵同志在车站上略谈几句，即自动来武汉。到武汉后又不肯来汉办事处，经我们三人累加责劝才勉强搬住办事处。当时他曾电告党中央谓：'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度，表示还有回党工作

的可能，既来武汉，他是边区政府负责人之一，当然应当晋谒中央政府领袖，报告边区政府工作状况。于是由周恩来陪他晋谒蒋先生，不意在见蒋先生后，渡江至江汉关码头时，乘恩来同志与另一同行朋友谈话之际，抽身疾驰而逃，始在汉口继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乱跑乱撞数小时，然后始在武昌寓住一个事先与别人约好的旅馆中。我们见国焘深夜未归，派人四出寻找，比得知他所住旅馆后，即又于深夜渡江劝其返汉，当他于不得已而返汉时，坚不愿再回办事处住，于是随转寓一个朋友家中。在我们与他几次谈话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见说：'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里饭还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同时，他却又私自去找看陈独秀等人。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说什么他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未绝望等，完全系一种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谈。

"张国焘的政治观点既如此悲观，而个人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知道对他已无从迁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他的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条第三条中考虑，并允两日内闭门考虑后答复。不料谈话后不及一小时，即 17 日晚，张国焘竟跑到太平洋饭店，乘一有三人保护的汽车而去。临行时，用书面写交我们三人的信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妥。'从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党中央于 18 日正式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于 22 日才将开除他的决议公布，因为中央还希望他在脱离党后或尚有所考虑。

"只在开除党籍的决定公布后，张国焘才又派人将他写明 21 日和 22 日两信同时送到。在 22 日的信上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涵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突阅报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由此可见，此次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首先由于他不遵守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的起码的党的纪律，由于擅自离开工作而至自动脱离党。

"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的党籍问题，素持慎重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已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象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当然，外面不知此事底细之人，初见张国焘声明，或不免有以为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似嫌过急，但凡是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次事实经过者，相反的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其实，张国焘早应开除党籍。的确，在过去两年中，有不少同志再三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

自此以后，《新华日报》没有再报道张国焘行踪。张国焘找陈独秀，是拉陈独秀出来另组共产党，遭到陈拒绝。后来他便死心踏地投靠蒋介石集团。

（《新华日报史》）

陈独秀是怎样被诬陷为汉奸的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总书记。他的新思想和革命活动，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陈独秀一生，有大功，也有大过，但他的人格品质是为世人所公认和钦佩的。然而，1938 年一顶"日寇侦探"、"汉奸"的帽子却从天而降，扣在了陈独秀的头上。一时间国内舆论大哗，引发了一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的大争论，陈独秀是否汉奸也就成了现代史上一桩疑案。

党本来是欢迎陈独秀重返光明的

1937 年 9 月，被国民党当局囚禁 5 年的陈独秀获释出狱了。此时的陈独秀虽然已是孤家寡人，但由于他非凡的经历，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界依然声望极隆，成为许多党派团体瞩目的对象。蒋介石曾派朱家骅前去游说，以 10 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 5 个名额为代价要陈独秀重组一个新的共产党；胡适曾邀请陈独秀去美国；周佛海等人则想拉陈独秀进"国防参政会"；谭平山也曾请他加入第三党，等等，但是陈独秀却一概断然拒绝。经过狱中 5 年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背离了托派思想，对托派组织也十分不满，曾明确表示自己不再是托派中人，并断绝了与托派中许多人的来往。因此，早在 1931 年即因参加托派活动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的他，出狱后并没有回到托派的基地上海，而是立即托人向我党驻南京代表团表示了联合抗日和要求回到党内去延安工作的愿望。

先是陈独秀的朋友罗汉到南京和叶剑英、李克农会谈，正式提出了抗日和回到党内的要求。对此，叶、李表示欢迎，但由于陈独秀曾是中国托派领袖，事关重大，他们不好决定，所以特为罗汉准备了旅费和介绍信，请他自赴延安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9 月初，罗汉到达西安，会见

了中共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立即将此事电告中央请示，中央很快复电，同意罗汉赴延安商谈，但不巧适遇山洪暴发，交通不畅，罗汉无法亲赴延安。中央遂通过电台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对陈独秀的要求提出了3项先决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罗汉对中央电示不敢擅自作答，准备回武汉向陈独秀汇报。临行前，林伯渠特叮嘱罗汉：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与别人不同的地位，若能放弃成见回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他要求罗汉对陈独秀作耐心劝说。王若飞同志也会见了罗汉，并表示若非延安有事缠身，他很想随罗汉南下专门与陈独秀会晤等。

与此同时，在罗汉去陕之际，陈独秀又再次托人转告我党驻京代表，表示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希望会见党的代表。根据他的要求，叶剑英、博古会见了陈独秀，希望他能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脱离托派组织。陈独秀表示完全赞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承认错误的问题，因自尊心过强，没有明确表态。此后不久，应陈独秀要求，叶剑英同志又专门与他会晤一次。不久，陈独秀到了武汉，罗汉由陕返回向他报告了中央的3项条件。陈独秀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亲笔信，并起草了抗战的7条根本意见，由罗汉到南京转交给叶剑英、博古，博古阅后认为陈独秀的主张与党中央的路线并无原则的分歧。

从这一段党中央与陈独秀的来往商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党对陈独秀是持欢迎、爱护和诚恳的态度的。对于陈独秀的托派问题，周恩来同志也曾对罗汉表示，事情较复杂，要具体分析，他认为托派可分为4派，陈独秀、罗汉代表的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一派。1937年11月20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也曾发表《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文章诚恳地希望陈独秀"虚心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汉奸的帽子从天而降

1938年1月28日和2月8日，延安《解放周刊》连续登载了康生的署名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文中第一次指名道姓地斥责陈独秀、罗汉、俞秀松等人都是日本奸细、汉奸。

此文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此后我党的报纸、杂志便不再称陈独秀为"先生"、"老战士"，而指责为"托匪汉奸"了。这对于正在谋求回党工作的陈独秀无异于当头一棒。为了澄清事实，洗刷冤情，他被迫起而与我党的党报、党刊进行了一场说理论战。而社会舆论界亦均感愕然不解，继而愤慨指责，为陈独秀辩护。为了陈独秀的汉奸案，武汉的报纸上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大辩论。

1938年3月16日，《武汉日报》公开发表了傅汝霖等9人为陈独秀辩诬的公开信，指出中共指斥陈独秀为汉奸，"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陈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视，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全国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并气愤地指出：这是对陈独秀的"莫须有之诬蔑"。"九人之一的张西曼又特意单独致信《新华日报》说："我为什么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呢？""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一个爱国学者"。

一些与我党关系很密切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等人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公开声明，不赞成随意把汉奸帽子扣到陈独秀头上。一些中间人士也纷纷为陈独秀大鸣不平，发表文章，认为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陈独秀真是汉奸，则陈独秀理应受国家法律惩处，但如果没有证据，就随意说人是汉奸，就是诬陷，舆论界一致要求中共做出回答，拿出证据。

诬陷之辞使《新华日报》声誉受损

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新华日报》不得不于1938年3月17日、18、19日连续发表了评论文章，但这些文章既不明确回答陈独秀究竟是否汉奸的问题，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而只强调托派是日寇特务机关的奸细和侦探，"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这种武断、无理的说法激怒了陈独秀，他立即发表了致《新华日报》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受敌人的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为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要求拿出证据来。对此，《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蛮横地指出陈独秀要求中共出示证据是"无赖的口吻"，并推断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也正因为此，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说，陈独秀之所以为汉奸，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推论：托派中有人是汉奸，所以托派是汉奸组织，而陈独秀虽已不是托派中人，但思想上还没划清界线，所以必然也是汉奸，但只要他与托派思想完全一刀两断，也就可以不再是汉奸了。这种说法与康生文章中的说法显然已有了很大不同和矛盾之处。

到4月24日、25日，当事人罗汉又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以一系列事实驳斥了康生的文章，指出："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是以三百元之代价成交，真可谓极廉价之高峰。"并说，文中所言他从日本侦探机关拿津贴的那一年(1931年"九·一八"以后)，他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在上海一间阁楼上过着贫病潦倒的生活，中共许多重要干部都是很清楚的，如有日本津贴可拿，决不至于贫困至此。另外，对康生文中所说那年六七月间罗汉、陈独秀和美国侦探洽谈一事，罗汉斥责道："只管造谣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监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而他本人当时早已脱离政界，在苏沪一带工厂中任职，从未到过南京见过陈独秀。罗汉的公开信以确切的事实完全驳倒了康生对陈独秀的汉奸之说。公开信发表后，我党的报刊可能终觉理亏，所以再没有就陈独秀的汉奸问题作公开答复，对这一显而易见的冤案，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了了之，实际上也就默认了对陈独秀的诬陷，使陈独秀汉奸案这一现代史上的大冤案成了一个历史疑案，而陈独秀本人则最终头顶这一不明不白的帽子离开了人世。

陈独秀汉奸案的复杂背景

为什么在短短1个月之间，我党对陈独秀的态度异若水火呢？为什么康生要存心诬陷陈独秀为汉奸呢？仔细分析起来，背景颇为复杂，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明为了寻找借口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政策，打击党内一大批干部而一手制造了这一冤案。

正当毛泽东 为首的党中央为团结陈独秀等人一起抗日而与之进行谈判，准备进一步教育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他回到党的革命队伍中来的要求的时候，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由苏联回到延安。当时苏联国内斯大林正在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反对派的斗争，在"托洛斯基主义"的罪名之下，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都被认为是专搞判国、破坏、暗杀的巨大的反苏阴谋集团的魁首，成为"丧心病狂的人民公敌"。就在王明等人回国后不久，1938年3月，布哈林等人在苏联被处决。按照当时国际共运中的惯例，苏联国内进行什么斗争，必然同时在各国共产党内进行类似斗争，以肃清影响。王明对此当然是积极奉行的，当过托派领袖的陈独秀自然就成了斗争的靶子。所以王明一到延安，便在1937年12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诋毁党与陈独秀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声色俱厉地坚决反对，并威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甚至说什么：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不能合作；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为了把陈独秀搞臭，王明激烈地对陈独秀进行人身攻击，大肆谩骂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是"杀人狂"、"汉奸"等等。对王明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许多同志表示不满，会上当即就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类，""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而王明则强横地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如此不择手段地诬陷陈独秀，不仅仅是对着陈独秀本人的，他的目的是通过打击陈独秀再来追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与陈独秀进行谈判的责任，借以反对、攻击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并达到搞臭、打击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切与陈独秀事件有过正常接触的同志，以便再次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

为了追随王明，康生便根据王明这种意思在《解放周刊》上突然登出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文章，杜撰事实，无中生有，在国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产生极大不满，以至对我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给反共分子提供了口实。当时一些报刊甚至发文责难我党此举在道德上"负义不仁"，在政治上"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于抗战不利"，等等，而当时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则利用《新华日报》为康生解围，进行难以服人的诡辩，以至使我党及党的报刊在群众中的威信一度受到很大损害。

历史是无情的，尽管王明等人机关算尽，但由于毛泽东、党中央的坚决抵制和斗争，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期间对陈独秀的诬蔑不实之词并未得到立即纠正，陈独秀汉奸案始终以悬案的形式存在着，并在很大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直至建国以后，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康生任中央《毛选》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在对陈独秀的人名注释中，对陈独秀1929年被开除党籍以后的经历，没有沿用康生的"汉奸说"，而是留下了空白，这实际上就已经否定了陈独秀汉奸说。近年来，党史工作者们广征博引，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王明、康生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惜捏造事实、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可耻行径，从而使陈独秀汉奸案大白于天下。

(选自《党史文汇》93年1期，作者：邵建光)

西路军余部在新疆学习和工作的情况

1937年5月上旬，西征失败的西路军余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率领下，在陈云、滕代远等接应下，胜利突围，进入新疆。当时的新疆统

治者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实行亲苏、亲共政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抗日，同意西路军余部入新。因此，西路军余部入新，标志着我党同盛世才统战关系的初步确立。

1937年5月下旬，西路军余部指战员集中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下同）东门外盛世才的一个兵营里。盛害怕红军传播革命火种，以"恐引起中央（指国民党政府）注意及当地人民疑惧"为由，要求我军指战员换军衣、改番号，并禁止他们与人民接触。我党从团结抗日的利益出发，照顾了盛的要求，西路军改称"新兵营"（盛招募的新兵之意），改穿新兵衣（盛军服装）。但同时坚持了我党对"新兵营"的绝对领导，"新兵营"的组织和活动不许盛世才插手过问，盛有意见或要求，须经我党代表和"新兵营"负责人同意。当时，盛世才缺乏基本力量，政权还不稳，故对"新兵营"亦很倚重。他在本部吃饭怕人放毒，在"新兵营"吃饭反而很放心，外边一有骚动，他就到"新兵营"避难。马仲英等围城时，还曾由"新兵营"指战员维护社会治安，安定人心。因此后来他曾多次要求我党从"新兵营"抽调干部到他的政府和部队中任要职。

陈云是党中央派驻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也是"新兵营"第一任负责人。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领导"新兵营"挑起了两副重担：一是利用盛世才标榜联共抗日和执行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的有利条件，组织西路军指战员学习各种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为建立一支特种兵部队培养军事科技人才。二是根据盛世才的请求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选派部分干部参加新疆地方和军队工作，为保卫和建设边疆，保障国际交通，支援抗日前线，作出新的贡献。

"新兵营"的学习分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两大阶段。1937年7月，文化学习正式开学，根据各人原有文化程度，分别编班，开设了政治、语文、数学和外语（日语和俄语）等课程。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同志们的学习，不仅从延安派了文化教员，送来学习材料，还常来电了解学习情况，给予重要指示。

1937年11月，陈云奉调回延安，邓发（化名方林）接任党代表并主持"新兵营"工作。不久，根据党中央指示，在"新兵营"开展了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邓发正确贯彻了党中央指示，始终坚持思想教育为主的原则，使批张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38年春，"新兵营"同志先后进入正规的军事技术学习。全营分四个大队、一个干部支队。除部分年幼同志继续学习文化、干部队学习政治、军事外，其他各队分学各种军事技术。此外，还培训了部分军医、兽医，并两次派往苏联学习情报技术约五十多人。

1939年6、7月间，周恩来赴苏治伤，途经迪化，曾代表党中央专程往野营地看望和慰勉"新兵营"同志。他热情鼓励同志们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

1939年9月，邓发奉调回延安"陈潭秋（化名徐杰）接任为我党驻新疆第三任党代表。同年底，除航空队学员继续深造外，整个"新兵营"教学工作胜利结束。航空队学员在邓发、陈潭秋领导下，在苏联教官帮助下，共坚持学习四年之久，成为我国现代空军和民航事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骨干。

从"新兵营"抽调在新疆工作的西路军干部有二十五人左右，约占我党在新工作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许多同志担任了重要职务。如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新疆日报》副社长、新疆督办公署经理处副处长、和田和阿克苏地区行政长、和田地区警备司令、督署边务处驻哈密等地办事处主任、蒲犁边卡大队长和地方部队中的团、连长等等。他们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反帝会"、报社和边防工作的成绩中。

1938年1月，"反帝会"由西路军干部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出任秘书长，他彻底整顿了"反帝会"各级领导机构和会刊《反帝战线》，创办了反帝训练班。从1938年到1940年，该会在黄火青等共产党人的宣传、组织下，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金"和募集寒衣运动，支援抗日前线，取得了巨大成果。

1938年1月，"新兵营"干部汪小川（化名汪啸春）就任《新疆日报》副社长。不久，我党又派了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了总编辑长、制版科长以及《新疆日报》各地分社等编辑领导工作。从此，《新疆日报》实际上成了我党在新疆的宣传工具，使新疆各族人民听到了真理之声。

为制止英帝国主义在我国土地上的非法活动和特权，盛世才接受我党代表建议，从西路军余部指战员中，选拔了一批同志加强南疆边卡、边务处和地方部队的领导。1938年1月，胡鉴（化名胡东）就任蒲犁边卡大队长。几个月内就卡死了英帝分子和少数民族败类的走私破坏活动。不久，又依法将英国代办驱逐出境，拔掉了英驻蒲犁代办处这个侵略据点，取得了反英斗争的初捷。1940年夏，在和田地区驻军中担任要职的西路军干部，又参加并领导了七县军民大规模的反英帝斗争，又一次给英帝以沉重打击。从此，英帝国主义对我新疆的侵略破坏活动，基本被我摧毁。

在新疆学习和工作的四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陆续返回延安，最后一批四、五十人，由于盛世才反苏反共，被捕入狱，直至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才与其他被捕同志一起，胜利回延。

（摘自《党史研究》1984年第4期《西路军余部入新返延安斗争情况述略》一文，作者：庄严）

花园口黄河决堤真相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以阻挡日军西进的名义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黄河以南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事过50年后的今天，当地的人民对这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

黄河决堤方案，在国民党当局酝酿已久。不少国民党要人很早就提出了决河制敌的计划。还在1935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河北、威胁河南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内部就有掘黄河堤之议。当时在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曾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1938年4月，陈果夫也致函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附近决黄河北堤。他认为只须将地势低下的沁河附近北堤决开，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1938年6月1日，日军攻占睢县等县，进犯开封，郑州危急，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军委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同年6月20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获悉蒋介石上述决策后，随即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开会，研究掘堤地点，最后决定在地势较低、堤防较薄的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决定将长官部迁往洛阳，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留守郑州督工决堤。执行者是守备赵口河防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为此，蒋介石特电令刘和鼎部守备担任郑汴间的游击，以掩护决堤。于是，刘和鼎以三十九军军部和主力进驻郑州，担任郑州的守备，并以所属第五十四师公秉藩部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牵制附近日军，以保证决堤工程的实施。

6月4日上午6时，刘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军一个团在赵口掘堤，由于决口宽度过窄，待掘至水面，宽不过1米，难以继续开掘。至6月5日上午，决堤工程还未完成。蒋介石当即在电话中命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当即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刘和鼎也加派一个团协助掘堤，并悬赏千元法币，限于当夜完成并放水。经工程兵用炸药轰炸后，至下午8时许，开始放水，但因缺口两岸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刘和鼎又另派一个团作第二道之决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败。于是，商震又加派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协助，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刘和鼎派参谋处长黄铎五负责办理决口工程，第一战区长官部程潜也派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这样，决口工程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同时进行。

6月7日午夜，蒋在珍、黄铎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勘查，选定于关帝庙西掘堤。这个地点是黄河湾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贾鲁河，使水东南行，注入淮河。还拟定了施工计划，决定：秘密决口；以花园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以加强联系；黄铎五、王果夫常驻花园口，就近解决问题，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分点掘土，轮流作业；一切准备于6月8日前做好，概限6月9日完成任务。

这次黄河决口重点在花园口。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把当地群众赶到10里以外，周围密布岗哨，不许群众围观。他选出800名身强体壮的兵士，编成5组，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有卡车上的电灯照明，通宵工作。6月9日上午9时许，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宽，又时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高于平地，水流从高而下，水势很急，难以扩大口子。于是蒋在珍又请求调来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对准已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始打开两丈左右，河水汹涌泛滥，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黄水向东南奔涌。

在黄河两岸，视界辽阔，那时日军已逼近黄河北岸，在望远镜中可以窥见南岸动态。日军夜间用探照灯向南岸侦察。为保证决堤工程秘密，第三十九军规定担任赵口、花园口决口工事的部队，在堤岸内侧，构筑掩蔽和交通壕，以及伪装被复等。蒋在珍在花园口派一个团执行警戒，谎称日军即将到来。把周围10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唯恐泄漏出去。

然而，一般百姓，对决口一无所知，毫无应变准备，而国民党当局又没有迁徙、安置居民的措施。在6月15日各点口子大开，河水大量流灌。短短几天之中，要迁移、安置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居民谈何容易。实际上，除少数保长、乡长们迁移外，一般平民百姓逃避不及，或被洪水夺去生命，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改道后的新黄河，主流宽达70余里，最宽处达120余里，洪水所至，泛滥成灾，吞噬了无数生命财产，淹没了无数肥沃良田。据当事人黄铎五视察所见："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汹涌的波涛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飘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于洪流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这次决河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34万4千多公顷耕地被淹没，89万多人死于非命，125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达95280多万元。三省中，河

南受害最为严重，有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多人死亡，造成了大片无人区。尤其中牟及花园口、赵口两个决口附近水势也特大。余如尉氏、扶沟、通许、西华、商水等县也都遭到严重水灾。至1947年，这6县(加中牟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花园口地区首当其冲，受灾情景更为凄惨，离决口口门只有半里的邵桥、沙家堤、史家堤、南省庄等4个村庄全都被洪水冲掉。花园口地区的耕地几乎全被淹没，将近1/4的人被淹死。

黄河河水人为改道，河水向东南倾泻，顺着淮河的支流贾鲁河、颍河、涡河，流至淮河干流，再顺着淮河南流注入长江入海。周口镇以北，包括贾鲁河与涡河之间和贾鲁河以西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北部；周口镇以南，包括从涡河到泉河之间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南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黄泛区"的地方。从此以后，"黄泛区"这一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便在地理书和历史书上出现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黄河夺淮汇入长江，这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每年把约100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水潦四集，不能排泄。洪泽湖湖底泥沙淤积1米多高，沿湖积水成潦，芦苇丛生，蝗虫繁殖，使附近各县连年发生蝗灾，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这次黄河决口给"黄泛区"造成的灾难持续五、六年，有的地方长达八年之久。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这次决河使陷入泛区的日军4个师团损失了2个。掘堤时，敌十四师团所派骑兵团的1个支队一度截断平汉路郑汉间的交通，决河以后，该支队因后路被截断而被消灭。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亦被阻遏。然而，这些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无法相比拟的。虽然日军不能再实施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但日军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继续西进。6月12日，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电告蒋介石，黄河虽已决口，日军仍可自由活动。13日又来电报告，黄河决口后，日军仍西进，并请求增兵固防郑州。不久，郑州、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决黄拒敌的计划归于破产。

早在掘堤之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决堤后，6月11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发了一项密电，要求向民众宣传黄河堤是敌机炸毁的。花园口一决开，蒋在珍即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并发出电报，说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6月11日、12日、13日，国民党中央社在从郑州发出的专电中，编造说："敌机30余架，12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6月30日，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亲自出马，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重复中央社的谎言。接着，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第一战区司令部急忙转令新八师编套日机轰炸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全体官兵、两千左右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以掩盖事实真相。

但是，国民党的这种表演，漏洞百出。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并提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在花园口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当场提出许多质疑，如黄河堤岸约有20米厚，而炸弹的弹痕不过1米左右深，这是为什么？等等。可见，不少记者已窥知其中秘密。

蒋介石决河拒敌的结果，不仅未能达到阻敌西进的目的，反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又丧失了大片国土，加重了民族危机。扒河拒敌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消极抗日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胡臣友）

"古董商"斧劈唐绍义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日伪包围下的上海孤岛。

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了法租界福开森路(今上海武康路)戒备森严的唐绍仪公馆的铁栅门，在洋房前的庭园里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四个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男客，他们立即被守卫在庭院中的唐府门卫与保镖们包围与查问。四名来客中一个较年轻的首先上来打招呼，门卫与保镖们认识他是唐绍仪家的远房亲戚，叫谢志磐，唐府称"谢大少爷"。这谢大少爷指着来客中为首的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说："这是唐总理请来的古董商，给唐总理送几件古董来的。这两人是他的随从。"唐府的门卫与保镖这天早就得到唐绍仪的关照，知道今天上午要有古董商来唐公馆送货，现在又见是常来唐公馆的谢大少爷引导，就放心地让这四名来客由一名唐公馆仆人陪同走进客厅……

然而，就在十分钟以后，在唐公馆客厅里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血案：清末民初以来的政界大员、全国注目的国民党元老、78岁的唐绍仪被暗杀了。暗杀的政治背景怎样？主使者是谁？刺客又是什么人？在当时与以后都一直是众说纷纭，此案成为民国史上一件著名的悬案。

要说清唐绍仪被刺的来龙去脉，弄清事件的真相，首先要了解日本特务机关在1938年从事的所谓"土肥原工作"。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想在三至六个月内征服中国。但出乎他们的预料，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将日军拖进了长期消耗的持久战困境中。而他们在各地拼凑制造的各种汉奸傀儡

政权，如华北以王克敏为头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以梁鸿志为头子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及什么"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等，或由于其头子名望不高，或由于其成员名声太臭，对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与吸引力，不能起到日本侵略者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秩序、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欺骗中国人民的作用。

1938 年六七月间，日本侵略者为了摆脱侵华战争所陷入的持久消耗战的困境，进一步在中国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决定迅速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1938 年 7 月 12 日，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议决，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生政权"，并要求"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在 1938 年 7 月 26 日决定设立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陆军派出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派出的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派出的陆军退伍将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经三名中将协商，由在中国从事过 20 多年特务活动、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为总负责人。因此，外间又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或称"竹机关"。

土肥原上任后，积极开展了对中国的政治诱降与筹建全国性汉奸中央政府的工作。他首先在中国物色汉奸中央政府头面人物。遵照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决定的精神，他企图找到几个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充当未来汉奸中央政府的首脑。

经过一番挑选与研究，土肥原最后确定了三个人作为他争取的重点对象：原北洋军阀直系的军事统帅吴佩孚，原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以及在清末民初历任要职的唐绍仪。对唐绍仪，土肥原尤为看重。土肥原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北吴南唐"的中央政府，以吴佩孚管军，唐绍仪管政。因此，对唐绍仪的工作成为土肥原的头等任务。

唐绍仪是当时中国有很高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的人。他的动向必然要引起中日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密切关注。1938 年初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曾托人捎口信及亲笔信给唐绍仪，要他赶快离上海赴重庆，但被唐绍仪拒绝了。1938 年 3 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落水当汉奸时，广州"抗战后援会"曾发电报给他，要他脱离上海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下。接着，广州各界人士和社团，又假座民众教育馆二楼召开大会，即席决定由广州市各社团联衔电催唐绍仪南返，并汇去旅费二万元，唐绍仪没有接受，也未给答复。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唐绍仪的工作。1938 年 7 月，以土肥原贤二中将为首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幢西式洋房里设立办事处，土肥原命名为"重光堂"，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1938 年 9 月，土肥原亲自跑到上海，登门秘密访问了唐绍仪，同唐进行了二次会谈。唐绍仪让其女婿岑德广代表他对外活动，与日本会谈具体问题。唐并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在里面草拟种种关于建立未来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在日、唐会谈中，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唐绍仪方面，在会谈中就唐出山上台"收拾局面"、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等问题。向日方提出了种种方案、保证与要求。其中，在最重要的《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求永久和平之方案》中，唐绍仪向日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唐绍仪还对他将组织的未来汉奸中央政府作了如下设想：关于基本国策，唐绍仪提出"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唐绍仪并拟定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关于军事，唐绍仪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须建立国防常备军 80 万人。除此以外，唐绍仪还对其汉奸政府"干部人才"的罗致、"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的注意点、反蒋倒蒋计划、中日关系，以及唐绍仪在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的提纲，甚至对他未来汉奸政府的组织系统，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划。

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方的来往与秘密谈判，不久即为国民党军统上海特区侦察到了。

事情是这样的：国民党政府从上海西撤时，布置了几千名特务潜伏在上海各地，统由军统上海特区管辖。特区区长兼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是军统著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副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是在上海滩上活动多年的老特务与暗杀能手，曾一手指挥暗杀杨杏佛与史量才。上海沦陷后，戴笠指示他们严密监视那些留沪的军政大老与名人，严防他们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政权。由于唐绍仪的地位与影响，自然更成为军统特务们最为重视的对象。军统上海特区除派人化装对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的洋房住宅及其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又派其情报员谢志磐到唐宅内侦察。谢志磐此人在 30 年代初曾参加过上海托派的组织，做过陈独秀的秘书，在 1932 年出卖了陈独秀后转入军统任情报员。谢家与唐绍仪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谢志磐得以有机会常到唐家走

动。1938年初，他从唐家人员口中得知日本方面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拜望过唐绍仪，邀请唐出山，出来维持日占区的行政事务，唐虽未立即答应，但此后往来不断。谢就向上海特区作了报告，引起特区的高度重视。周伟龙要谢志磐继续经常到唐家搜集情报。谢就不断将唐与日方日益加紧的勾结与秘密会谈向军统报告。到1938年七、八月间，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得到同意后，下令上海特区对唐绍仪实行“制裁”——暗杀。

军统上海特区从1938年8月间开始部署暗杀唐绍仪。他们从侦察中获悉：唐绍仪在福开森路的住宅是一幢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房。大门是铁栅门，经常关着，法租界特派来几个安南巡捕任门卫，对进入唐家的可疑的人要搜查。唐还雇有多名白俄保镖，日夜在庭园警卫。住宅里，只有唐绍仪与一个女儿同住。女儿常自居一室，不大出厅。唐绍仪也独居一室，深居简出。另有几个佣仆与丫环伺候他们。根据这个情况，军统上海特区拟定了两个暗杀方案。一是让谢志磐去串通好唐的汽车司机，在唐出外时在马路上狙击。因当时马路上难民太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这个方案未必可行。二是通过谢志磐作内线，组织一批人武装冲入唐宅刺杀。因唐家警卫多，军统特工人员一有动作便会被发现，附近的巡捕会迅速赶来。不仅暗杀难以成功，而且事情张扬出去，将对重庆方面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却于无意中了解到唐绍仪有酷爱古董的嗜好，常与上海的一些古董商来往，鉴赏与收购一些精美的古董，于是定下一计。

他们先派遣谢志磐与另一个小特务王兴国赴唐公馆。向唐绍仪报告有一古董商带有不少名贵古物来沪，愿意廉价出售。唐绍仪闻之大喜，迫不及待地要古董商早日将文物送到唐公馆，让其鉴定与收购。双方约定在1938年9月30日由古董商送货上门。

在这同时，赵理君设法到上海社会上收购来一些古文物，其中有一件假宋瓷花瓶，放在一只精致的楠木盒内，最为引人注目。

9月30日上午9点钟，赵理君亲自出马，打扮成古董商模样，携带几件文物，乘坐一辆借来的小汽车前往唐公馆。准备杀唐用的小斧子就放在瓶盒的夹层中。他带着谢志磐与王兴国做向导，另带一位专门搞暗杀行动的李阿大作实施暗杀者。汽车司机也是军统特务充任。

小汽车开进了唐公馆的铁栅门，停在庭院里。赵理君等人下车后，司机立即将汽车调好头，车头向外，并不熄火，一直让马达在空档上转，以备事成后迅速逃离。谢志磐以熟客身份与门卫保镖们打好招呼后，就与其他人由一位唐府仆人带着进入了唐公馆客厅。

唐府仆人将众人安排坐下后，就上楼去请唐绍仪下楼接客。当那仆人离去后，赵理君见四下无人，就按预定计划，迅速地将客厅里的四盒火柴装到自己口袋里；李阿大则将小利斧从盒中取出藏在身上。一会儿，唐绍仪由其仆人挽扶着从楼上走下来。赵理君见他约80岁的年纪，须眉皆白，双目有神，身穿接客时穿的礼服，颇有外交家的风度。唐先招呼仆人给来客敬烟倒茶，但仆人在客厅里四处都找不到火柴。唐绍仪便命仆人到后面储藏室里去拿火柴。仆人转身走出客厅后，“古董商”便请唐绍仪鉴赏文物。年迈的唐绍仪带着老花眼镜，低下头去细看花瓶，啧啧赞叹，爱不释手。就在这时，李阿大转到其身后，举起利斧，对准其脑部用力劈去。唐绍仪连“啊呀”都未叫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地，脑浆与鲜血染红了地毯。

赵理君见状，知唐无救，便指挥李阿大等三人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到客厅门口时，还一面抓着门把手，一面假装与里面打招呼，说：“唐总理，请不必送了。你再仔细看看，若满意，我回去再送几件来。”似乎他在与里面的唐绍仪打招呼告别。他的这一举动果然迷惑了守卫在院中的几个保镖门卫，不仅没有阻拦他们上车，还与他们友好地招呼告别。赵理君一行上车后，迅速地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

这时，唐府那位去拿火柴的仆人回到客厅中，见到几位客人已不在，而主人唐绍仪倒在血泊中，腿在抽搐。他惊吓得大叫起来：“抓强盗！”在庭院中的保镖听到叫声，如梦初醒，急忙拔出手枪去追汽车，向已经开得很远的汽车放了几枪，但汽车一转弯就不见了。

唐绍仪的家人急将唐送往附近的广慈医院。但抬上手术台时，就已断气。

法租界巡捕房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查勘。他们根据唐公馆门卫提供的小汽车号码是6312号这根线索，出动几辆装甲汽车去马路上巡查搜捕，结果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找到这辆车，但车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又去拉都路谢宅抓捕谢志磐，可早已是人去楼空。几名刺客已被上海特区安排，撤离上海，辗转去了重庆。

日方眼看即将成功的“土肥原工作”毁于一旦，虽十分恼怒，却又不便过分张扬。而重庆蒋介石政府为了遮人耳目，应付于右任、张继一班元老的责询，装模作样地颁布了一个《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并以蒋介石个人的名义，给唐绍仪家属发去一份唁电，声称对唐之死“痛悼何极，顿失瞻依”；还由国民政府发给治丧费五万元。后来又由张继提出，将唐绍仪生平事迹交付国史馆褒扬。蒋系特务还故意散布谣言，称唐绍仪是因不肯接受日伪邀请出山当汉奸，遭日伪忌恨，而被日伪特务暗杀。这样一来，社会上关于唐绍仪的死因一直议论纷纷，一般人都难以了解事件的真相。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历史考证

王明也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过贡献

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王明带着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失误第二次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这位著名的小个子又一次远离祖国，在莫斯科待了整整6年。这6年他的“左”倾路线曾继续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然而，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又始终关注着国内斗争和祖国的命运，并为提出和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做出了贡献。

《一·一七宣言》，王明提出全国武装集团联合抗日的主张

王明出国后3个月，即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影响下，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延锴违抗蒋介石命令，率19路军奋起抵抗。张治中将军亦率所部共同作战。茅盾、鲁迅等43人联名发出《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世界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淞沪抗战同仇敌忾，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触动着王明对中国国情的新认识。

8月，共产国际第一次向中国党提出“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并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底独立和统一”作为首要任务。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促使王明考虑如何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方针和对策。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又占领了象征中国关内关外分界的山海关，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入华北。当此新的民族危机关头，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三个条件是：“(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王明起草的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以来方针政策的重大调整。它提出了全国武装集团联合抗日的主张，是一个顺乎民意、合乎国情的方针。如果说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仍未跳出“左”的束缚的话，那么在民族革命方面王明的认识已经深化了一大步。

《一·二六指示》，王明提出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一·一七宣言》发表不到10天，王明和代表团又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关外关内情况不同，斗争方式亦应有别的精神，提出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即“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仅已经明确，而且统战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这是符合东北实际斗争需要的。当时，东北抗日武装既有我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又有揭竿而起的义勇军；既有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农民游击队，也有国民党的东北军旧部。尽管指示信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采取的具体途径和组织形式，但已经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东北四种抗日武装部队的阶级性质、特点，并且提出了党应分别采取的具体政策。

诚然，作为抗战的早期文件，“一·二六指示”及王明的文章仍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如在提出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要求“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等等。但瑕不掩玉，“一·二六指示”及王明的具体论述，毕竟率先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制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奠定了基础。

《王、康来信(10月)》，王明提出著名的对日作战“六大纲领”

《一·一七宣言》与《一·二六指示》发出后，抗日救国由举国上下的强烈呼声发展为更多的爱国将领的实际行动。5月，冯玉祥将军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11月，蔡延锴等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政府，并与红军订立《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群雄竞起，然而又群龙无首。面对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抗日运动的新形势，王明认识到“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这个分析应当说是很具政治眼光的。

"实际上""解决"抗日救国问题，就是具体地提出抗日救国的方略和对策。为此，1933年10月，王明与代表团主要成员康生联名致信临时中央政治局，"专门说明我们目前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与运用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在信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样，我们党就在率先倡导军事力量联合抗日后，又率先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抗日救国具体方略，并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1934年4月，这个纲领就以"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名义，由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发表，对推进民族抗日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王、康来信在提出"六大纲领"的时候，仍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可见，由"反日反蒋"到"联蒋反日"政策的转变，还需要中国政局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国共两党对联合抗日必要性认识的转变。

《六三指示信》，王明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前夕，王明又两次写信给中共中央，严肃批评五中全会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提出红军长征后东北的工作改由驻国际代表团负责。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联名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指示东北党组织也要打破关门主义，以扩大东北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吉东特委代行满洲省委工作——笔者)。

指示信指出：党在东北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为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第二，要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四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是要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比较《一·二六指示》，思想更解放了，统战面更扩大了。贯彻"六三指示"及不久发表的《八一宣言》，东北的抗日形势发展很快。半年后，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与2——6军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宣言，组成东北抗日联军。这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抗日的最前线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六三指示信》也还带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色彩，如那时王明在对关内党的工作的指示中，已适时提出"抗日"与"反蒋"不并提，适合关内统战实际。但王明把这一方针机械地引入东北，演绎为"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这就混淆了汉奸傀儡政权与国民党政府的界限，给东北部分党组织和抗联部队造成过一些混乱，这是应该指出的。

《八一宣言》，王明代表中央提出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著名主张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筹备期间，王明主持中共代表团讨论适应国际政策转变，制定党的新政策问题。他亲自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代表团反复酝酿并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史称《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不再坚持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作用，提出组织一个统一的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民族的国防政府来领导抗日，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组成抗日联军，共同救国。这两项重大政策的提出，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过去已有的"三条件"、"六纲领"及抗日、反蒋不并提的基础上又朝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我们党捐弃前嫌、救国图存的真诚愿望再一次剖肝沥胆于国人面前；"共产党愿意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共产党人深明大义、以国为先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至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已发展到全体国民、整体国力的总动员。如此深刻而广泛、如此符合民意和国情的政治主张，象一面庄严的旗帜，树立在全国人民当中。

《八一宣言》标志着我们党正式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而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中心工作由国内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移。宣言由王明为首的驻国际代表团提出，也说明王明和代表团已经突破了

长期以来"左"的束缚。《八一宣言》是我们党对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贡献，在党的奋斗史上和民族奋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提出到初步形成，王明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对于一个年轻的领导人来说，确实可谓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实践起来，王明就显见缺乏功力了，在一些方面甚至走向了自己主张的反面。

早在《一·二六指示》中，王明就曾提出必须坚持和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并反复告诫各级党组织"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东北情形与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一文中又曾论述道："共产党要绝对……保持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的面目。要使自己有无情地批评同道人的任何动摇、任何不彻底、任何叛变及投降行为底自由；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任何企图和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要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变成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策略。"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很可惜，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正建立起来后，王明这些非常正确的见解和观点，首先由他自己违背了。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王明自己"要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变成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策略"。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悲剧。

（吕兴光）

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观原因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起来的，是在原东北的抗日救国军、自卫军（统称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至1933年相继失败溃散之后，由中共满州省委重新发动东北人民创建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35年已初具规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1936年初又统一了番号，将各特委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游击军等统一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先后编为第一军至第七军。以后又将非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也授予抗日联军的番号，编为第八至第十一军。各军人数有的四五千人，有的二三千人不等，最高峰时期总数曾达四万人。

东北抗日联军曾于1936年至1937年得到蓬勃发展，活跃在松花江下游南北两岸，攻占过四五十个县城以下的城镇。日本侵略者曾大为惊恐，称三江平原不是他们自己的"王道乐土"，反倒变成了"共产乐园"。但是本来处在有利形势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没能进一步发展为全东北的抗日高潮，反而在1938年以后遭受到严重挫折。仅1938年这一年，就有一个非党的军长（八军谢文东）带着自己的队伍投降了日寇；有三个党员军长（三军赵尚志、八军戴鸿宾、十一军祁连中）携带了自己的部分队伍越境去了苏联；有一个军的军长和副军长（四军的李延平和王光宇）战死，部队也遭到严重伤亡；其余各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还有一个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宋一夫）逃跑后投敌。到1938年底，东北抗日联军所剩人数已不多了。1939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仍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抗日武装斗争，直至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东北抗日联军1938年以后受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日本侵略者的强化统治及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因素外，从主观上讲首先是全东北缺少一个党的核心领导机构。原来的满洲省委在1935年被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王明莫名其妙地否定以后，虽然分别建立了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但始终未能形成东北党的一个领导核心。抗联十一个军中有四个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在共产党领导的七个军当中，也都收编了相当数量的山林队，有的达百分之五十。这些队伍中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多数时间单独活动，与抗联只能保持松散的联合形式，所以游击队的政治素质不高。其次是没有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当时各省委对抓武装斗争有足够的重视，但对如何发动农民这一课题却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共产党没有能够使广大农民认识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他们自身解放的关系，没有激发起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没有把农村中属于贫雇农阶层的群众紧紧地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因之也就没有在抗日队伍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生死与共的关系。由于这种情况，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在没有农村根据地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农村中没有自己的政权机构，也难以掀起广泛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致使兵员来源短缺。鉴于此，日本统治者所推行的"匪民分离"政策也就易于实现了。

（摘自《党史通讯》1983年第10期《一九三八年以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一文，作者：彭施鲁）

汪精卫致重庆政府的艳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

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义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余年，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

（摘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四册）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公布

第一条　国民政府为战时统辖全国军民作战便利起见，特设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并授权委员长执行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条所规定之职权。

第二条　本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七至九人，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选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此外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四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为当然委员。

第三条　本会之组织系统如附表。

第四条　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并指挥全国负国防之全责。各委员襄赞委员长筹划国防用兵之大计。

第五条　参谋总长为委员长之幕僚长，指导本会所属各部会厅，襄助委员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副参谋总长，辅助参谋总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

第六条　军事参议官，备委员长之咨询。

军事参议院，为军事研究及建议之机关。

第七条　办公厅、掌管命令、文书，之呈递传达，及总务警卫诸事宜。

第八条　军令部，设总务厅及第一第二两厅，掌理下列事务：

一、国防建设，地方绥靖，及陆海空军之动员作战。

二、后方勤务之筹划运用。

三、情报，及国际政情之搜集整理。

四、参谋人员，陆军大学，测量总局，及驻外武官之统辖与运用。

第九条　军政部，设总务厅及军务，军需，兵工，军医等署，掌理下列事项。

一、陆海军之建设改进，人马之维持补充，交通通讯之整备，及全国总动员之筹划。

二、陆海军军费粮秣被服装具营缮及其他军需品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及民间有关工业资源之利用。

三、军械弹药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及民间有关工业资源之利用。

四、陆海军之卫生保健，及卫生机关之筹划运用。

第十条　军训部，设部务厅及第一第二两厅，掌理下列事项。

一、陆海军之训练整理，及陆海空军之校阅。

二、军事学校之建设改进。

第十一条　政治部，设总务厅，秘书处，第一，第二，第三厅，指导委员及设计技术两委员会，掌理下列事务。

一、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

二、国民军事训练。

三、战地服务，及民众之组织与宣传。

第十二条　军法执行总监部，掌理军队纪律之维持，与军法之执行事务。

第十三条　航空委员会，掌理空军之建设，保育，训练，与指挥事务。

第十四条　铨叙厅，掌理陆海空军人事之铨衡考绩，与恤赏事务。

第十五条　本会各部会院厅之组织条例及内部编制，另定之。

国军战斗序列

陆海空军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1.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程潜

作战地区平汉路方面

兵力——

第二十集团军商震

第三二军商震(兼)

骑兵第十四旅张占魁

第一集团军宋哲元

第五三军万福麟

第七七军冯治安

第一八一师石友三

第一七师赵寿山

第六六师杜春沂(直属)

第七一师郭宗汾(直属)

第三三军孙楚(直属)

第三四军杨澄源(直属)

以上共辖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三个骑兵师，其他特种部队在外。

3. 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顾祝同

作战地区苏浙方面

兵力——

第十集团军刘建绪

第二八军陶广

第七十军李觉

第七九师陈安宝

暂一三旅杨永清

宁波防守司令辖第一九四师陈德法

温台防守司令徐旨乾辖暂编第一二旅李国钧

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

第四军吴奇伟

第十八军罗卓英(兼)

第七九军夏楚中

第二五军万耀煌

第七三军王东原

第二三集团军唐式遵

第二一军唐式遵(兼)

第二八集团军潘文华

第二三军潘文华(兼)

新编第四军叶挺(直属)

独立第六旅周志群(直属)

游击总司令黄绍雄

以上共辖二四个步兵师，六个步兵旅，其他特种及游击部队在外。

4. 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何应钦(兼)

作战地区两广方面

兵力——

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

第六二军张达

第六三军张瑞贵

第六四军李汉魂

第六五军李振球

第八军团夏威

独九旅李振良

独二十旅陈勉吾

虎门要塞司令陈策

以上共九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其他特种及要塞守备部队在外。

5. 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李宗仁

作战地区津浦线

兵力——

第三集团军于学忠

第五一军于学忠(兼)

第一二军孙桐萱

第五六军谷良民

第五五军曹福林

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

第三一军韦云淞

第四军第四支队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
第七军周祖晃
第四八军廖磊(兼)
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
第四一军孙震
第四五军邓锡侯(兼)
第二四集团军顾祝同(兼)
第五七军缪锵流
第三军团庞炳勋
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
第五九军张自忠
海军陆战队
以上共辖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
6. 第八战区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副朱绍良
作战地区甘宁青方面
兵力——
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
第八一军马鸿宾
第一六八师马鸿逵(兼)
骑十旅马全忠
骑一旅马光宗
骑二旅马忠义
宁夏警备第一旅马宝琳
宁夏警备第二旅马得贵
第八〇军孔令恂
第八二军马步芳
骑五军马步青
第一九一师杨德亮
挺进军司令马占山
以上共辖五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
7.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
总司令陈诚
兵力——
第二军李延年
第七五军
第六十军卢汉
第五四军霍揆彰
第一三师吴良琛
第一八五师郭忏
第七七师彭位仁
第四九军刘多荃
江防总司令刘兴
海军陆战队
第五七师施中诚
第一四师之一旅
以上共辖一四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其他特种及江防守备部队在外。
8. 西安行营
主任蒋鼎文
兵力——
第十一军团毛炳文
第三七军毛炳文(兼)
第四十三师周祥初
第十七军团胡宗南
第一军胡宗南(兼)
第八军黄杰
第四六军樊崧甫
第三八军孙蔚如
第二一军团邓宝珊
新编第一军
第一六五师鲁大昌
第八六师高双成
暂编骑兵第一师(直属)
骑六军门炳岳(直属)
以上共辖十二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三个骑兵师，其他特种部队在外。
9. 闽绥靖公署
主任陈仪
兵力——
第八十师陈琪
第七十五师宋天才
福建保安第一旅陈佩玉
福建保安第二旅李树棠
福建保安第三旅赵琳
海军陆战队第二旅
以上共辖两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其他地方要塞部队在外。
10. 军委会直辖兵团
第二十军团汤恩伯
第五二军关麟征
第十三军汤恩伯(兼)
第八五军王仲廉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
第四二军冯安邦
第三十军田镇南
第二六集团军徐源泉
第十军徐源泉(兼)
第八十七军刘膺古
第八集团军张发奎

第三六师蒋伏生

第五〇师成光耀

第九二师黄国梁

第九三师甘丽初

第一六七师薛蔚英

以上共十七个步兵师。

11. 整训部队及未经调动部队

计后方整训部队二六个步兵师，未经调动部队十四个步兵师，七个步兵旅。

全国总兵力，共二一〇个步兵师，三五个步兵旅，一一个骑兵师，六个骑兵旅，十八个炮兵团，八个炮兵营，其他特种部队在外。

（选自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

蒋介石何以要杀韩复榘

1938 年 1 月 24 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陆军上将韩复榘，在汉口被蒋介石处决了，这一事件震动中外，许多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但也有一些人困惑不解。毫无疑问，这一事件的内幕非常复杂。笔者认为，52 年来还没有人真正解开韩复榘被处死之谜。而要想说清楚韩复榘之死的远因和近因，必须从韩复榘本人的历史说起。

一、冯玉祥的一员战将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县人。生于 1890 年，即清朝光绪十六年。其父韩静原，是位清末秀才，在本村当私塾老师，经济收入寥寥无几，但因兼种土地，家庭生活比一般农民强得多，算是小康之家。韩复榘从少年时期便随父读“四书”、“五经”。这样一来，他不但得到了念书识字的机会，而且也受到很深的封建思想的熏陶。正是在这种旧的封建思想的环境气氛中，韩复榘逐渐长大成人了，并且结婚成了家。这时义和团运动波及霸县境内，社会动荡，家境日渐衰落，韩复榘已不安于念书，常到县城闯荡，出入于茶馆、酒店、赌场等场所。到了 1910 年，韩复榘已经 20 岁。开始明白了一些人间世事，看到自家的经济状况日渐拮据，便不愿意厮守这个破家，恰好他新婚不久的夫人高艺珍是个开明之人，一日高氏对韩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你何不到外地闯闯？”这话正中韩的下怀，韩便投笔从戎。后来韩复榘发迹，当了山东省主席，非常感激原配夫人，把她接到省府大院供养起来，还口口声声称之为“大姐”。

说起来非常凑巧，韩复榘投笔从戎，投的是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冯玉祥营，从此他与冯玉祥结下了不解之缘。营长冯玉祥那时也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血气方刚，智力过人。他发现韩复榘有文化，即叫韩当司书生（相当现在的文书），不久提升为排长。1911 年武昌新军打响第一枪，爆发了辛亥革命。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一起秘密商议发动滦州（今河北滦县）起义。失败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王金铭、施从云被斩首。冯玉祥、韩复榘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当然也是要被杀头的。然而时局的迅猛变化，却让一些人保住了脑袋。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的诞生，不久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迫退位。这样一来，在滦州起义中被捕的人就统统释放了，其中自然也有冯玉祥和韩复榘。历史老人真会开玩笑，这两个保住了脑袋的人后来都成了名闻全国的人物。

1914 年，北洋要员陆建章在陕西省当了督军，成了独占一方封疆大吏，他重新起用冯玉祥，由营、团长而升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此时，韩复榘又投靠冯玉祥，任基层军官。他跟随冯玉祥，成为十六混成旅乃至后来的西北军重要军官之一。

1922 年，冯玉祥升任陕西省督军兼第十一师师长，此时韩复榘即升为团长。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在这之后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从此冯的军队称为西北军。这时韩复榘升为冯部的第一师师长。后来韩复榘跟着冯玉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特别是 1926 年冯玉祥响应北伐军由绥远出兵陕西，任韩复榘为第六路总指挥。韩部千里跋涉，十分艰辛。在 1928 年的所谓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作战对象是张作霖的奉军，冯派韩为前锋，直捣北京，被人们称为“飞将军”。

韩复榘完全是冯玉祥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为独立作战的西北军将领，他们两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真是亲如手足，情同父子。后期的西北军已发展到 30 余万人，除最高统帅冯玉祥以及老资格的宋哲元、刘郁芬、鹿钟麟外，下面就可轮到石友三、孙良诚、韩复榘、张维玺等人了，实际看来，韩那时在西北军的地位可算得上二三等的角色，人们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二、叛冯投蒋

1928 年春季，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相联合，举行第二次北伐，攻打实力雄厚的奉军。在这次战争中韩复榘立了功，于当年的冬季，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成了封疆大吏，十分得意。不久就娶了小老婆纪甘青，十几年的征战，腥风血雨般的岁月，似乎一下子都成了遥远的过去，已经化为梦幻。

可是韩复榘高兴得太早了。他虽然成为中原之地的河南省主席兼二十师师长，但他并不知道上层人事的变

迁。他只看到奉军被赶出关外，却不知道在蒋、冯、阎、李四雄之间还存在深刻的利害冲突。不久，冯玉祥派来了自己的参谋长石敬亭来接替二十师师长的职务，这使韩复榘不但产生了许多疑虑，而且甚为恼怒。二十师是韩复榘的老班底，旅长以下的多数军官都是他从"娃娃兵"提拔起来的。这一下眼睁睁看着石敬亭把师长的位置接替过去，只剩下空头省主席还有什么意思。在那个年月，有了兵权就有了一切，兵权是一切有野心人们的命根子。自此，他开始对向来视为恩师的冯玉祥心存芥蒂。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调拨10万军队给韩复榘，令他支援蒋介石。桂系失败后，蒋介石在汉口召见韩复榘。这次召见，是一次特殊的机遇。蒋热烈地欢迎韩，为他大摆宴席。更有甚者，在宴会上蒋夫人宋美龄也竟然出席作陪，并亲自给韩斟酒，口称"向方是北方的常胜将军"。这一下真正叫这个韩复榘六魂出壳，喜不自胜。

1929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因为地盘划分与军队编制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合作了还不到两年的蒋、冯，便宣告决裂。冯决心反蒋。为了集中兵力，冯下令在河南、山东的西北军全部西撤到陕西、甘肃一带。按照冯玉祥的说法，这是效仿拳师打拳那样，只有收回拳头，才能打人。在西北军往西开拔的问题上，一些上层军官产生了分歧，冯玉祥在华阴县召开的一次军官会议上，首先是韩复榘对西撤问题提出反对。他说："陕甘是贫困之地，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冯玉祥斥责说："只要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你韩复榘挨饿，你不懂兵法，是小孩子见解。"冯的这些话虽然份量重些，但说过就算，并未放在心上。可是韩复榘却受不住了，他认为冯是有意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从而含恨在心。

韩愤而返回自己的驻地陕州，立即秘密召集二十师的旅、团长开会，一致通过撵走石敬亭，带整个二十师脱离冯玉祥。当时韩的二十师驻在陕州附近的甘棠镇，决定部队即从此地出发向东开拔。冯玉祥的其他部队均向西开，而韩复榘的二十师则往东开，真正是反其道而行之。韩搞的这个名堂，人们习惯称为"甘棠东进"。几天之后，韩复榘即发出通电，表示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脱离冯玉祥。

韩复榘搞的"甘棠东进"事件，在西北军的历史上非同小可，韩本是冯的宠将，却是第一个背叛了冯，与其说是"甘棠东进"，倒不如说是"甘棠叛变"。这一下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1930年的春天，爆发了震动中外的中原大战。冯玉祥与蒋介石彻底撕破了脸，冯联络阎锡山等实力派，一心要打倒蒋介石，于是爆发了以蒋介石为一方和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不下百万，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内战。

这时韩复榘已经投靠了蒋介石，当然是站在蒋的阵线上。不过处境却十分尴尬，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不与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蒋自然会意，就同意他把军队开到徐州以北的津浦线上同晋军对垒，并任命他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当时阎锡山的晋军以四个军的优势兵力，由河北向山东推进，韩招架不住，即放弃济南而东撤到濒海的胶东一带。他的内心是有个小算盘的，就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最高准则，并不愿为蒋介石卖力。中原大战之初，冯、阎的力量远远超过蒋军，在战争这盘棋上，谁胜谁负还很难说，韩把兵力拉到胶东半岛上，实际是观察形势，保存实力，不轻易将兵力投入战场而牺牲自己，他在那个混乱的战争棋盘上走了一步很得意的棋子。

阎锡山的晋军占据济南之后，不期遇上阴雨连绵的天气，后方供应和宿营都发生了困难，士气逐渐低落。不久蒋介石又调颇有战斗力的十九路军北进，晋军有些招架不住。在胶东半岛上观望的韩复榘，看到时机已到，便沿胶济路西进。晋军抵不住十九路军和韩复榘的凌厉攻势，遂败退黄河以北。

中原大战结束，作为胜利者的蒋介石论功行赏，进爵封官，在1930年9月宣布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

三、主鲁八年政闻

韩复榘是个典型的军人，现又兼任山东省主席，即要从政。而治理这个"齐鲁大国"谈何容易！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他居然当了将近八年的省主席，其施政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韩复榘的省政府设在济南市院前大街旧统制府内（现珍珠泉大院）。省政府是委员制，全称叫做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委员由各厅厅长和省府秘书长组成，秘书长是来自西北军的张绍堂，那些厅长们，除教育厅长何思源外，其余厅长如李树椿、王向荣、张鸿烈、王芳亭等，都是西北军的老同事。韩复榘既然出身于西北军，在许多方面受到西北军的熏陶。一些老人们还记得，西北军向来是穿灰色军装，韩复榘率部背叛西北军后，仍保留这个传统，他的军队仍着灰军装，唱西北军军歌。韩复榘对那些省政府的文职官吏们，也要求他们一律穿灰色制服，每天上班前要召集省府人员训话，发现有人迟到，就要大声训斥，象对待士兵那样对待他们。他要求官吏们要简朴，不能有任何不良嗜好，对于吸毒品者惩罚得特别厉害，轻则革职，重则处死。他自己虽然爱喝酒，但绝不在公开场合喝醉。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韩复榘还是比较严谨的，他在河南当省主席时娶了小老婆纪甘青，来山东后没有再纳妾，外界也没有关于他生活不检点的传闻。他有时带上几个便衣警卫骑上自行车在济南街上巡视，主要是看街道是否卫生，有没有捣乱市场的分子，而且他对女同胞特别关注。若在

夏天，他不许女人穿短袖衣衫，在巡视时发现穿短袖衣服的女人总要劝她们改穿长衫，在他看来，女人的肌肤露在外面是有伤大雅的。

为了提高政府各级官员的管理能力，他办了地方官员训练班。从高中毕业生中招考一些人，分别进财会班、统计班、督学班、警官班学习，时间半年或一年不等，结业后分配到各厅或各县工作。他轮训县长，定期考试，对那些考试不佳且政绩亦不良者及时撤换。他如发现优秀人员，凭他一句话就可马上去当县长。有人利用他这种简单的作风，专门投其所好。据说有位省府科员就是这样，有意在他面前讨好，韩即提他去当县长。

在中上层人士中，韩复榘也有一套维系人心的办法，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他成立了“山东省进德会”，这个进德会似乎象个高级俱乐部，实质上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凡是文职厅级以上、武官校级以上都是进德会的当然会员。普通军政人员和工商界人士及学校教职员等也可以加入，叫做普通会员。但必须有二人以上介绍，填写入会志愿书或持有介绍信方能认可。这些会员曾经发展到 2422 人。进德会有专门办事机构，下设俱乐部、社务、会计、文书四股。还办了一份报纸，每周出两期，专门报道进德会活动情况。韩复榘每逢星期一在进德会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会，那时要求会员一律穿规定制服，佩戴三角符号。他在纪念周会上发表谈话，大谈做人道理，宣扬孔孟之道，目的是让他们安心服务。此外，进德会还经常开展演话剧、看京戏等文娱活动。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就曾到济南进德会演出过。

谈到韩复榘“问案”一事，声名狼藉，几乎妇孺皆知。民间传说很多，不免有些渲染，说得过于离奇了。韩本人不懂法律，因喜欢读《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小说，受到影响，居然亲自审起案来。在他看来，审理案件就象处置一个违纪士兵那样简单，这种极端幼稚可笑的想法，使他出了许多洋相。由于他那独特的军人作风，处理案子极其干脆，有时碰巧了，也真的法办了一些坏人，于是就有人叫他“韩青天”。实际上是带有很大讽刺意味的。因韩是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他处理案子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而是命令三路军的军法处进行办理，这是典型的以军代政，以权代法，必然带来恶果。他来山东的初期经常干这种荒唐事，后来因形势所迫大为收敛，但这种不良影响却是深远的。

韩复榘积极反共，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镇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31 年 4 月著名的共产党人邓恩铭、刘谦初、郭隆真等 20 余人被枪杀。不过有的材料上说，那是国民党的党部主任张苇村干的，目前难以澄清。但韩派军队镇压共产党人领导的日照暴动、苍山暴动却是铁的事实。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扣住了不积极抗战的蒋介石，要求蒋联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事变爆发后，不仅震动了全世界，而且对每个手握兵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都是个严峻的考验，这时的韩复榘毅然站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边，发电报支持他们的正义主张。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韩复榘放弃了过去的屠杀政策，开始同情爱国人民。当时周恩来派张经武将军来济南同韩复榘会谈多次，韩初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释放了在山东省法院监狱关押的政治犯 200 多人，并且同意在他的部队里成立政训处，聘请冯玉祥将军的好友余心清为处长，以共产党员张友渔、齐燕铭、黄松龄等为教官。组织以中共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进步青年和平津学生共千余人进行训练，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培训了一批人才。

看来韩复榘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有可能由一个土皇帝似的军阀而变成一个爱国将领，但是遗憾得很，他没有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还是那个封建主义害了他。愚昧的封建割据思想，视军队如自己的命根子，一昧保存实力等等，加上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使他很快地葬送了自己。

四、蒋韩交恶

蒋介石与韩复榘之间没有任何历史的渊源，当初他们的结合就显得有点勉强。蒋与韩的矛盾，首先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上，韩复榘要当山东的土皇帝，最重视扩大军队。当他背叛冯玉祥而投降蒋介石的时候，是以他的嫡系部队二十师的万余官兵为政治资本的，那时蒋很器重他，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就委任他为山东省主席。韩即以二十师为班底扩编成两个正规师，那是经过蒋介石认可的。韩复榘仍感兵力不足，又在这个基础上扩编为五个正规师，外加一个独立旅，发展到 14 万人马。这对蒋介石来说，就感到有尾大不掉之势。可是韩复榘的野心继续膨胀，又扩充了五路民团 6 万余人，这五路民团与正规军几乎一样，蒋介石原先许诺的每月 65 万元的军饷远远不够了，而且这 65 万元也常常不能兑现。韩复榘一气之下，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在山东的税务机关，也就意味着山东的地方税收再也不向南京政府缴纳了。这样一来，蒋与韩和矛盾一下激化起来，双方曾经调兵遣将，大有战场上见高低的架势，后来由孔祥熙出面调解，才逐渐缓和下来。

蒋介石与韩复榘虽然在反共上是一致的，但在隶属关系上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原来蒋介石对韩复榘不放心，派了一批特务和政客来山东，这些人除了策划反共反人民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监视韩复榘。韩对这点格外恼

怒，他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辱骂国民党山东党部主任张苇村是无耻的党棍子，后来又用巧妙的办法杀了他。1932年韩复榘以财政困难为由，下令解散了全省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使那些大小党棍子们个个走投无路。有的上告到国民党中央，终因韩复榘手中握有十余万大军，拿他毫无办法，连蒋介石也只好忍而让之。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表面上对韩复榘一如既往，但对韩发电报支持张、杨的举动最为忌恨，伏下了杀机。

五、违抗军令，被蒋诛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到了那年的12月，日军已经占领德州，逼近济南。当时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发电报给韩，要他守住济南。韩曾亲自带领警卫团北渡黄河到达济阳县，不久与日军遭遇，他所带部队抵不住日军凌厉攻势，激战中他的卫队长牛耕林阵亡，其他卫士几乎伤亡殆尽，他率少数人突围，逃回济南。这一遭遇战使他吓破了胆，决心以保存实力为上策，未经第五战区同意即指挥部队撤出济南，退到泰安，这使李宗仁大为恼火，又发电报令他“扼守泰安”，韩回电说“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这种儿戏般的电文在军内是最为忌讳的。刚愎自用的韩复榘却不在乎这些，他又放弃泰安，退到山东最西部的曹县。李宗仁以韩复榘违抗军令罪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平时对韩复榘已有反感，现在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必然要严肃军纪。韩复榘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如不处置这种逃跑将领，整个局面将不可收拾，于是蒋介石决心严厉处治他。

1938年1月的某一日，蒋介石秘密地乘军用飞机抵达河南的开封市。1月9日，蒋介石从开封给驻在曹县的韩复榘打电话，说：“我决定召集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到开封开会，请向方兄偕同孙军长务必到会。”韩接电话后有些犹豫，感到多年来与蒋的关系不好，骇怕发生意外，他的几个幕僚也不同意参加会议。其中有个叫蒋伯诚的人却竭力劝说韩务必到会，说是现时大敌当前，委座召开军事会议，若不出席更会引起麻烦。韩考虑再三决定亲自赴会。

1月10日，韩复榘偕同参谋长和孙军长乘车抵开封，下榻于一个老朋友家里。多年的朋友相见，自然要举行一次不寻常的家宴。大家愉快地饮酒叙旧，好象天下还是那样的太平，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似的。

1月11日，韩复榘接到委员长侍从室的通知，说是下午两点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开会。韩复榘率领参谋长和孙军长按时到会，其中有著名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于学忠等。他们都是老相识了，见面后都是一阵友好的寒暄。特别是那个宋哲元，过去在西北军时是他的老同事，也是他的老长官，他们见面格外亲热。

开会的时间到了，蒋介石最后一个到会，他一出场，全体军官起立。蒋介石走到讲台上，显得很谦恭的样子，他摆了摆手让大家坐下，然后开始训话。因为蒋说话时经常带有“这个”的口头语，不知为什么，蒋介石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这个”，大家都莫明其妙，但是谁也不敢笑。可能他有点紧张。蒋说：“这个，今天开会，先要考考军人守则。”接着提了军人守则上的几个问题，然后拿起花名册点名，那些带兵多年的军官们对委座提出的问题都能回答出来，蒋一连说了几个“好”。蒋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说道：“大家对守则都回答得很好。但有的人不按照守则去做，为什么山东方面不战而退？济南、泰安为什么失守？”蒋介石这么一说，到会的军官们都很愕然，韩复榘更是如坐针毡，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会后有人通知韩，说是委座接见。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他马上被扣押，瞬息之间成了阶下囚。不日，韩复榘被解往武汉，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院内一座小楼上。

然后就是以何应钦、鹿钟麟等组成的高等军法会审。军事法庭对韩提出的罪状，他多有申辩。但这种申辩毫无结果，最后的一次审判未让韩复榘出庭，说是因故缺席审理，虽是被告缺席，但却宣判了韩复榘十大罪状，判处死刑。当即公诸于报端，十大罪状的主要内容是：违抗军令，擅自撤退；按兵不动，拥兵自保；收缴民枪，纵兵殃民；破坏司法独立，侵吞国防经费；截留国家税收，扰乱金融等。

1938年1月24日晚7时左右，天色已经昏暗，有人乘着傍晚的昏影窜到韩复榘住的楼上，喊了声“何审判长请你”。韩听到喊声，立即下楼。当他走到楼梯半腰时，那人向他连开数枪，韩复榘倒在血泊中，时年48岁。

（鲁笛）

风云人物

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组织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职工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坚持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错误观点，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被取消党的领导人的职务。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在北方做铁路工人运动工作。1925年1月在中共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阴谋活动，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时，他坚持执行陈独秀的的妥协退让政策，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革命产生动摇，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被派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主持开展错误的“大肃反”，致使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同年12月，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基于对形势的右倾错误的估计，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擅自率一部分红军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党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由于他的分裂活动和退却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第四方面军蒙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向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党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病死。著有《我的回忆》。

冼星海

冼星海(1905—1945)，中国现代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广东番禺人。出身贫寒的船家，系遗腹子，由母亲抚养成人。1912年，随母亲去新加坡。1918年回国，入广州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学习。1920年，入岭南大学附中。1924年毕业后，考入岭南大学文科，并兼任音乐教员。他坚持刻苦自学音乐，有了长足的进步，最后成为一名“南国箫手”和青年提琴家。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小提琴和作曲理论。1928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乐学院(这是中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结识田汉等人，并加入田汉组织的“南国电影剧社”(简称南国社)。1929年夏，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校方开除。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为了生活，他做过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也做过守电话的佣人，常常处在失业与饥饿中。他写的女高音独唱曲《风》获得巴黎音乐学院荣誉奖，当主持发奖人问他需要什么物质奖品时，他的回答是“饭票”。在十分艰苦的半工半读条件下，他先后向巴黎著名的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作曲家加隆、里昂古特、丹地等学习音乐。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师事法国著名的印象派作曲家杜卡斯。

1935年，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回到上海，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影片公司担任配乐和

作曲，为《复活》、《大雷雨》、《日出》、《太平天国》等话剧和《时势英雄》、《小孤女》、《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电影写音乐和插曲。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一二九学生运动写了《我们要抵抗》等歌曲，接着又创作了《战歌》、《流民三千万》、《救国进行曲》、《青年进行曲》、《黄河之恋》、《热血》等抗日歌曲，很快流行全国。1935年底加入上海歌曲作者协会。1936年鲁迅逝世时，曾作《鲁迅追悼歌》。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洪深等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到内地进行抗日宣传。同年冬到武汉，任武汉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举行过大规模的民众音乐会、救亡歌曲音乐会。1938年初，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工作，任第三厅第六处属下的音乐科主任。在此期间，创作了《起重匠》、《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五一工人歌》、《新中国》、《到敌人后方去》、《抗敌先锋歌》、《江南三月》、《在太行山上》等歌曲。

1938年11月，冼星海应邀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阶段。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共写了四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其中《生产大合唱》，表现了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为革命而生产的朝气蓬勃的形象；《九一八大合唱》（又叫《打到鸭绿江大合唱》）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乐观主义精神；《黄河大合唱》以宏伟的气魄，奔放的旋律，描绘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壮丽图景，刻划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英雄形象，是冼星海的代表作。两部歌剧是《军民进行曲》、《滏阳河》；歌曲中著名的有《三八妇女节歌》、《路是我们开》等。

1940年5月，党中央派冼星海赴苏联，为电影《共产党和八路军》配乐。不久，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交通断绝，未能回国。在苏联期间，他继续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并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以及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阿曼盖尔达》交响诗，还有交响组曲《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除音乐创作外，他还写有《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等论著。1945年10月，冼星海因病在莫斯科逝世。

冼星海是中国现代史上继聂耳之后又一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中国无产阶级的音乐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　诚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年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青田县人。父陈希文，清末诸生，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陈诚九岁入小学，1912年赴丽水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读第十一师范。1918年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卒业后，由其父执、众议院议员杜持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八期炮科生。

陈诚于保定军校卒业后，被分发在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当见习官，驻绍兴，旋补为排长。1922年，陈到上海投考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入粤军第一师，在邓的第三团充任连长。1924年5月黄埔军官学校创立，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陈诚被派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1925年两次东征，陈诚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任炮兵营连长，在淡水之战、棉湖之战与攻惠州城诸役中，均立战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诚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前进；旋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1月成立第二十一师，陈团编为第六十三团，在师长严重率领下，由韶关经赣州、南昌入浙至衢州。1927年1月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后，又与孟昭月部苦战数日，后夜袭孙军司令部，迫使孙军后撤。2月15日，第二十一师克复新登，继入杭州，陈诚被擢升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嗣后攻平望，薄苏州，下松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不满蒋介石所为，挂冠而去，陈诚继任师长。嗣后，陈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军务署长、军政厅副厅长。翌年初蒋介石复任"北伐全军总司令"，陈诚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出征奉张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集团指挥，与蒋介石关系日趋密切。

1928年9月，蒋介石借"编遣"之名扩充自己的武力，命陈诚率两个警卫团与曹万顺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一师，曹任师长，陈副，兼代第三十一旅旅长；翌年7月，升充师长。陈诚将第十一师重要人员全部调换，代以清一色的"黄埔生"，成为蒋介石的一支嫡系部队。1929年蒋先后与李宗仁、唐生智混战，陈竭力为蒋效命。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陈诚被蒋派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沿陇海路西进，守归德附近阵地。时阎锡山军沿津浦线南下，入济南，占泰安，徐州吃紧。陈诚奉命东调，率十一师以日行一百二十里之速度昼夜趱行，赶到兖州，协同第十九路军解曲阜之围，继又抢先攻入济南

城。8月，不足三十三岁的陈诚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十一师师长。嗣后，陈诚又奉调转赴平汉线，自济南抵周家口，率部向中牟推进，直趋郑州，蒋介石奖给十八军三十万元。

陈诚因为在反革命"围剿"战争中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进一步受到蒋的重用。1935年春蒋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兼任处长；6月蒋又下令全国骑兵、炮兵、工兵均归陈督导整理；7月蒋开办峨嵋军官训练班，又命陈实际负责。1936年3月，陈奉派去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渡越黄河，被任命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6月又在太原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正值此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发表"冬电"宣称抗日反蒋。陈诚被蒋介石临时召回。他以武昌行营参谋长名义，急调所部三个师进占衡阳，防杜两广。不久，两广事件平息，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扣捕蒋介石的同时，也扣捕了蒋方要人，陈诚亦在其中。后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获得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仅扣留了张学良，还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陈诚被派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经洛阳出潼关，屯兵渭南，"运用剿抚并举方式"威慑镇压和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八一三"日军又进攻上海，全国军民奋起抗日。陈诚奉命到上海视察后，主张在上海利用碉堡和水网地障，牵制住日军主力对华北的攻势。蒋介石采纳陈诚意见，组织淞沪会战，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调集大量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打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激励下，参战军队英勇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只是陈在指挥上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是失着之处。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金山卫后，我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淞沪遂告陷落。但淞沪战役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转变了敌'沿平汉线南下'之原定计划"，其意义是积极的。国民党人称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指挥为"战术战斗之败北，而得政略战略之成功"。

1938年1月，陈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被任为武汉卫戍总司令。6月，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自为团长，任陈诚为中央团部书记长。6月14日蒋介石下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次日又任命陈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担负保卫当时我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地武汉之全责。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于8月以三十五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分兵五路西侵，并以海军溯江而上，目标在夺取武汉。陈诚指挥第九战区各军，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一道，以三倍于敌的兵力展开武汉保卫战。陈遵照蒋介石指令，以"战而不决"的消耗战术御敌。我抗日军队先后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在星子、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辛潭铺、大冶等地，也都与日军有激烈的战斗。10月，日军次第侵占信阳、大冶、鄂城和黄陂，25日汉口弃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中，一百余万我国军队迎战日军十二个师团，杀伤日本侵略军逾十万人，对于抗日军队组织战略退却和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撤守后，国民党转入消极抗战阶段。这时陈诚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交严重代，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交薛岳代，自己去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之职。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威胁四川。为加强重庆外围的防御，陈诚于9月奉蒋介石命赴鄂西恩施，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再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他以"建设新湖北"、推行"新政"相号召，如"二五减租"、田赋改征稻谷、用物物交换来对付通货膨胀、凭证分配日用品等等。但在执行中许多官吏贪污中饱，湖北人民仍难免于沉重的负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联合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为统帅，史迪威为参谋长。1943年2月陈诚奉派为指挥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5月又奉命回恩施，指挥所部抗御日军西犯。翌年7月，陈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2月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进一步重用陈诚，任命他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以名位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之下，扬言"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竭力安插亲信，扩充自己的势力，企图独揽国民党军事大权，因而招致白崇禧等人的嫉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陈诚跟着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辅蒋调兵遣将，并先后去郑州、徐州、济南、北平、张家口及苏北等地督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即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一百一十二万人，陈受到各方责难。蒋介石被迫自己出面指挥战局，命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1947年9月，陈诚飞抵沈阳就职。此时，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南新开岭地区、临江地区、四平地区大量被歼，已被迫困守在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几座城市。陈诚到东北本是想创造个奇迹以挽回名声，到职后即声言"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为此他大力扩充部队，把在东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由九个军增加到十四个军，又新增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但从10月起，东北人民

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陈诚指挥频频失误，五十天内被歼六万九千余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队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他吓得胆战心惊，然为安定军心计，仍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翌年1月6日，他下令新五军向沈阳集结，结果这支号称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新五军7日一个晚上即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均被活捉。陈诚闻讯，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第二天亲飞沈阳，陈不得不向蒋承认"自己指挥无方"。这时，他嘴上给各将领打气，说自己"决心同沈阳共存亡"，实际上却让谭祥去南京，求宋美龄要蒋介石将他调离东北。2月5日陈诚悄然飞回南京。为躲避舆论，他借口胃疾，去上海求医。国民党反动派在4月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对陈诚群起责难，"声色俱厉"，有些人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闻讯，急忙躲进陆军医院。5月20日，他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

半年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被迫发出求和声明；在退居幕后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陈于1月5日到台湾就职，收容从大陆撤退去台的国民党文武官员和残余部队，锐意经营。7月9日，陈又被委兼"东南军政长官"，辖台、苏、浙、闽和潮、汕沿海区域。

1950年3月，陈诚在台湾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翌年1月兼"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3月任"副总统"，11月兼"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任国民党"副总裁"。1963年12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副总统"、"副总裁"。陈诚在台湾主政期间，注意到应缓和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曾推行了一套"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的办法。他还主持兴建了石门水库。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在台北死去。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徐永昌

徐永昌，字次辰，1887年12月15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一）生于山西崞县。其父徐庆，初务农，后携带家眷迁居大同经商。徐永昌七岁起在私塾读书，十四岁时父母相继病故，生活无着，执役于父友曹氏所设旅店。后被清军武卫左军某营书记官徐椿龄带入军营充当杂差，曾随军去晋、陕、豫、冀等地，备尝艰辛。1906年，徐正式列名毅军军籍，生活始较安定，业余发愤自学文化。1908年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三年毕业，以成绩优异，派任左军左路前营副哨长，驻北京琉璃河。

1911年武昌起义后，京师震动。左军左路前营奉命派赴大同镇压革命党人，徐永昌不愿回乡作战，留京改任毅军新兵营哨长，不久进入陆军部所设将校讲习所学习。1913年冬，学习期满，成绩出众。为求继续深造，先后辞去所派连长、团副等职，于次年考入陆军大学为第四期学员。1916年春，曾辍学赴沪转鲁，参加居正等人组织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6月，袁死后，重回陆大学习。是年冬以名列第一的成绩卒业。他与革命党人孙岳、续桐溪等人交谊甚厚，辞去外调的任命，留北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

1917年冬，孙岳创办直肃军官教育团于廊坊（后迁保定），邀徐永昌任教官主持教学工作。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的骨干。1920年7月，孙岳组成直隶保卫团，徐永昌任参谋长。1922年直奉战起，孙岳任直军西路军司令，派徐督队作战。战后，徐调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1924年5月，调任该旅第一团团长，驻河北定县。

1924年10月，冯玉祥与孙岳、胡景翼在北京举行政变，组成国民军，孙岳就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徐永昌升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保定。1925年1月，孙岳被委为陕豫甘剿匪总司令，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率部从保定南下，经潼关，7月抵达渭南，遇新任陕西督军吴新田的北洋军第七师在临潼一带布防抗阻。徐以所部多为新兵，且后无退路，乃决死猛攻，速战而胜，进据西安。8月，孙岳兼任陕西督办，徐升任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1月，国民军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倒奉，孙岳命徐永昌率部经郑州直入保定，猛扑任邱、大城，与张之江部会师天津。孙岳遂于12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徐率部驻盐山、沧州。

1926年1月，李景林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反攻国民军。3月，各系反动军阀反对国民军的大联合形成，国民军四面受敌，于21日退出天津，退守北京附近。徐永昌率所部出居庸关，退集包头。时孙岳病，委徐代理第三军军长职，率部移驻五原。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五原誓师。徐因反对冯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返归包头，旋赴山西访阎锡山，受到礼遇。11月冯玉祥率部进陕，徐即率第三军从榆林间道入晋，被阎锡山以客军名义留驻汾阳、榆林一带。

1927年6月，阎锡山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9月对奉系作战。徐永昌部被编为南路军，计划自井陉取石家庄再攻保定，但被奉系戢翼翘部夺取定县受阻，遂退集获鹿、平山，构筑工事，固守井陉山地。10月，徐部阻击奉军于井陉一带，使其无法南下。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委徐永昌为第十二军司令、右路军总指挥。5月，徐率部与第四集团军南路军配合反攻奉军，出石家庄循京

汉路北上，5月底攻克保定。此时孙岳病死，徐辞去第三军代理军长之职，将该部移交阎锡山，正式归阎统率。6月，徐永昌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协助该省主席商震处理省务。10月12日，绥远设省，徐任省政府主席。1929年8月10日，徐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0年5月，蒋阎冯三方爆发中原大战，阎锡山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兼陇海路司令。鹿、徐率部东进，在考城、兰封一带与蒋军对峙，双方拉锯激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驻考城的冯部石友三倒戈投蒋，使阎、冯方面受到严重打击，战局急转直下，迅即以阎、冯失败而告终。徐永昌率领阎部晋绥残军退入山西境内，被阎任命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司令。阎于下野前委托徐主持晋绥军政。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办理晋绥善后事宜，张将晋绥军缩编为四个军。1931年1月，徐永昌任缩编后的第卅三军军长、山西省政府副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阎、蒋重新合流，在此契机下，徐永昌被蒋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懂得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自己又非阎系，故任省主席后力求韬晦。每届省府例会，徐纵然出席，亦任凭阎派诸厅委自行其是，以避疑忌。即使如此，徐仍不能久假省主席名义，1933年被阎以"照顾"徐的"肺疾操劳"而免去省主席职，由阎之亲信赵戴文继任。徐仅留下三十三军军长空衔，从未到过司令部视事。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被任命为中国全权代表，参加盟国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代表中国政府与苏、美、英、荷等国代表共同签署了受降书。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徐永昌为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12月22日孙科接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委徐为国防部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机成熟。1月21日，徐永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名义，携带蒋的亲笔长函，飞平面见傅作义，要傅部分海陆两路南撤青岛，遭傅拒绝。7月29日，国民党绥远驻军酝酿起义之际，徐永昌再度奉派与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携带代总统李宗仁信件，飞往绥远临河陕坝镇游说，约见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等人阻挠起义，力图劝说董将主力西撤，联合马鸿逵、马步芳负隅顽抗，复遭董等拒绝。8月，傅作义为促成绥远和平起义，前往包头。9月15日，徐永昌第三次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三人的亲笔信前往包头游说，妄图对起义作最后阻拦，并邀傅作义南下，又遭傅回绝。徐见无法回去复命，竟装病赖着不走。傅等识破诡计，晓以民族大义，要徐领衔一起参加起义。徐只得于9月19日绥远宣布起义的当天早晨，"铩羽而归"。徐回广州后不久，即仓皇逃离大陆飞往台北。

徐永昌在台湾被蒋介石任为"总统府"资政院资政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7月12日病殁于台北。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范筑先

范筑先，原名金标，字夺魁。1881年12月12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山东馆陶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九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父病故，辍学在家务农。壮年曾为脚夫，推独轮车为地主家运粮，来往于鲁西及直南各县。

1904年卫河泛滥，无法谋生，适清朝扩编北洋军来鲁西招兵，范遂弃农到马厂投军，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当"备补兵"。不久升为"副兵"。由于他有一定文化，被选拔入第四镇随营学校学习，回队后升为正目。以后又选调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结业后回部队升为哨官。民国成立后，北洋陆军第四镇改为中央陆军第四师，范任炮兵连长，仍驻防马厂一带。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杨善德率第四师进驻沪杭铁路沿线。以后范筑先在这个部队中逐步提升为炮兵营长、补充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第四师隶属于浙江督军卢永祥。孙传芳出兵抄袭了沪浙联军后路，卢永祥失败下野。孙传芳拟收编第四师，范拒绝收编，尽发军中公积金给士兵，将部队遣散，改名为"竹仙"隐居，后遂以"筑先"为名。

1926年冯玉祥配合北伐，师出潼关。范受冯部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范的同村人）的邀请参加西北军，任参赞。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范任张维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赞，协助张指挥本军与蒋军何成浚第三军团激战于京汉路漯河、北舞渡一线。后阎、冯失败。张维玺率南路军六七万人集结在新郑，正待往陕甘退却，不料孙良诚第二路军的梁冠英、吉鸿昌两个军被蒋收买倒戈，蒋军通过梁、吉两军阵地，直插张维玺军后方，将张部包围缴械。张和范遂离军去天津。

1931年范筑先由张维玺介绍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参议，并先后任沂水、临沂县县长。由于范为官清廉，断狱公平，为地方所称颂。1936年冬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1938年春夏之交，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雏形。当年春，鲁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三次对濮县、范县的进攻，驱逐了堂邑、高唐的伪军。6月间，范筑先与率部东来的徐向前、宋任穷在威县会晤，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从此，范部获得了八路军的援助，不再是孤军抗战了。这

时范的抗日武装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计五万余人，控制了鲁西黄河两岸，建立起二十多个抗日县政权。

当年夏，日军溯长江西上，开始围攻武汉。范筑先积极执行武汉统帅部命令，亲率十几个游击支队，于8月13日和9月18日两度进攻济南，破击宁阳至德州的津浦铁路。范之次子、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8月28日于齐河坡赵庄之战牺牲。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团结国共两党的力量坚持冀鲁两省敌后的抗战，派朱瑞来南宫，于9月23日举行冀鲁两省联席会议。会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企图制造分裂，联合反共。范筑先义正词严地抨击了他们破坏抗战的滥言，表示欢迎八路军入鲁，他抛开沈、鹿，与徐向前签订了冀南、鲁西北两抗日根据地的联防协定。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他回聊城后于10月4日召开军政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鲁西特委以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提出的《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作为今后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会上决定把三十多个支队整编为四个纵队，除齐子修部编为第一纵队，范自兼第四纵队外，另由袁仲贤、张维翰分任二、三纵队司令。

军政联席会议的成功，表明范筑先公开和国民党顽固派摊牌。沈鸿烈等气急败坏，竟不惜勾结日伪，准备对范下毒手。他们派兼任鲁西行辕参议的阳谷"忠孝团"总团长赵长衔去济南，与日本驻济南特务机关联系，商定了发动会道门暴动、配合日军进攻聊城的计划。赵回阳谷后，由李树椿亲自召开"忠孝团"长会议，于11月中旬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掀起了数万人的"忠孝团"大暴动。他们阴谋请范筑先前往安乐镇对会徒作宣抚讲话，就地将范刺死。恰巧范由于部署军务，临时派曾任四区专员的韩多峰代他前去，结果韩替范挨了一枪，范侥幸免遭毒手。

差不多在寿、阳、阿会道门暴动的同时，驻济南日军末松师团派平田大队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驻禹城、大名的敌人也配合进攻。11月13日下午，平田大队步、骑、炮兵三百余人从东阿鱼山渡过了黄河，由于沿途未遭到驻军的抵抗，14日上午九时即到达距聊城十八里的明王官屯。范正要出城指挥作战，李树椿突然坐汽车来到聊城，借口谈问题把范缠住。延至中午，敌机来聊城上空侦察。不一会，城外枪炮声大作，敌人已经来到。原来部署防守东关和运河渡口的王来贤民军一路放弃阵地逃走了。王金祥趁机提出由他出城追赶部队，溜出了聊城。接着，李树椿也上汽车从北门溜走。这时已是下午三时，范要出城，四门已被敌军封锁。他不得不亲自指挥守城，以待黄昏后再设法突围。黄昏前，敌人对东、南两门猛烈攻击。由于范亲自指挥，守城部队勇敢抵抗，敌均被击退。但守军力量毕竟单薄，必须突围方可脱险。如城外有部队接应，突围还是有希望的。无奈范部的主力第二支队去东平扩军，特委的主力第十支队在汶上、宁阳协助地方党开辟工作，均赶不回来；济南前线和黄河各口的十几个支队又被红枪会暴动所阻拦；鲁北驻军也被日军攻击；而堂邑、博平的两个支队系民团改编，不敢对日军开仗。王金祥出城后也不积极组织城外部队反攻。这样，破城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15日黎明，日军对聊城东门守军发起了猛攻，并以飞机沿城墙扫射。范筑先和姚第鸿率执法队亲自督战，范左臂负伤。上午九时东城门被炮火击毁，敌人蜂拥入城。范裹创退至市中心继续抵抗。但被日机扫射，打断腿骨。在抬送天主堂医院路上，范不愿被敌人俘获，勇敢地举枪自戕。随后守城部队即陷入混乱状态。一部分部队散在城内和敌人巷战；大部分部队退聚西城门内瓮城，企图夺路突围不得，均跳河而死，没有人投降。

1938年11月15日下午四时，敌人完全占领了聊城。范筑先和僚属张郁光、赵佩川、崔芳德、姚第鸿及守城军民七百人壮烈殉国。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孙连仲

孙连仲，字仿鲁，陆军上将。他原是冯玉祥的主要将领之一，中原大战后，接受蒋介石的改编，被任命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在台儿庄战役中，以卓著的战功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称誉。后来，出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祖国大陆解放前夕，飞往台湾。

孙连仲七岁入私塾，后入保定旧制学堂读书。他读书很努力，寒暑不辍，不旷课，不请假，博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但孙连仲对武术技击，更感兴趣。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青年中颇流行"从军报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2月，北洋军第二镇派孔祥标到雄县招兵。时年十九、并已与同邑苏姓女子结了婚的孙连仲秘密赴招兵处报名应募。其母闻讯，命他的哥哥孙连喜赶至招兵处婉劝，以家道富实，田产年年增加，不但不必去当兵，而且家业尚需他帮助料理为词，要他回家；同时托雄县县长王瑚代为向招兵处交涉除名。孙连仲表示："男儿应立志报效国家，岂能终老田园与草木同腐？从军之志，不可更改！"其兄为之感动，放弃劝说而归。入伍后，孙连仲被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为学兵。清帝退位后，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孙连仲隶王占元的第二师之下。此时孙已调入炮兵营，并由学兵升为正兵。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京卫军被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军，行军前在各旅成立炮兵营，从他部调选人员，孙连仲被选中，来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充

任班长。有一次，冯下连检查，适逢孙连仲所在连的连长正在考问士兵“五十二条精神训条”（此为冯玉祥为部队所规定）的内容，就悄悄站在后面听。不料长时间无人主动回答，最后孙连仲站了起来，不仅流利地背诵了一遍，还头头是道地讲解了一番。孙连仲从此为冯玉祥所赏识。

孙连仲颇具军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然诺必行。军旅生活中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骄色。因此，同阶青年军官与之友好，士兵拥护。这些，都为他地位的不断上升创造了条件。

1930 年 4 月，东调的孙连仲被任命为冯部第八路军总指挥。他率领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连同骑、炮、工兵等部队经陇东、陕西到河南，留雷中田师驻防兰州，维持后方秩序。孙连仲对这场即将掀起的蒋、冯战争的看法是：西北军实力不够，后方地方军阀势力未完全削平，民变、土匪活动时有发生，仗还不到打的时候。如果孤注一掷，打败了连退处都没有。但多年养成的对冯玉祥的服从性格，使他还是遵从命令全力投入了战斗。孙部入豫后，驻防漯河、大康、归德及安徽亳州等处。6 月，孙部与蒋方的何成浚、朱绍良部激战，打败了何、朱。此时孙连仲电请冯玉祥允许他南下攻取武汉，冯来电阻止，要孙进攻杞县，以解亳州之围。解围后，孙又提出南进，冯仍不允，要他东进解商丘之围。商丘解围后，交给孙殿英守备。7 月，战场形势开始转向有利蒋方，冯军在陇海线上奋力支撑，希望能依托郑州扭转战局。但原先支持冯玉祥的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令其部队撤出主要战场，冯军独木难支，退往豫北。9 月 18 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并派大军入关参战，冯军失败已成定局。10 月，冯玉祥离郑州北去。孙连仲离部到新乡，西北军拥鹿钟麟为总司令，孙为副总司令，高树勋、张自忠师归孙指挥。鹿、孙请刘骥去向冯玉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冯回电只四个字“西望长安”，意思是带部队向西开。这时，鹿钟麟亦准备离部队去天津，孙连仲赶到火车上去挽留，无奈鹿执意要走，并请孙收拾西北军残局。孙怏怏而归后欲说服部队西退，但部下都不愿意。孙也明白，大战前西北军几乎倾巢出动，陕甘地盘实已放弃，西退也是绝路一条。乃于思危再三后派田镇南、李显堂、冉寅谷为代表，赴郑州谒见何应钦，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军队静候改编。10 月 18 日，在新乡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孙连仲接受蒋介石改编后，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不久，孙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就食。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

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同孙连仲交情较深。孙到山东后，韩打起了如意算盘，企图利用孙的力量壮大自己。孙此时亦有与韩互为依托的想法。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极力笼络。蒋派曾任冯玉祥部参谋长的曹浩森去济宁做孙的说服工作；继而分批邀请孙部将领到南京一一召见，赠款甚厚。孙连仲派其军需处长兼秘书长袁其祓等赴南京谒蒋，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对孙颇多称赞。蒋怀柔备至，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在华北保定地区作战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畏敌如鼠，仓惶逃遁河南，时人讥之为“长腿将军”。蒋介石为树军威，撤刘峙之职，而以孙连仲代之。但孙所辖之军仍是原有部队，几番激战，伤亡甚大。他到河南后立即派人到豫东、鲁西一带招募兵员，还吸收了不少从家乡河北逃亡出来的青年学生，在许昌设立干部训练所，培养干部，充实下级军官队伍。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伤亡严重，但仍在运河东岸参加了掩护徐州国民党军大部队撤退的军事行动。接着奉令撤到信阳、许昌一带休整补充。武汉弃守后，孙部退驻南阳。

1945 年 7 月，蒋介石命孙连仲改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华北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并嘱其负责将来在华北对八路军作战事宜。为了表示对孙连仲的信赖，蒋同时委孙为河北省主席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孙在重庆组成了河北省政府后，又到西安筹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接着，一班人马到新乡，开始指挥军事北进。

日本投降后，孙连仲受命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9 月 9 日，孙派前进指挥所进驻北平，安排受降事宜。10 月 9 日，孙本人由新乡飞抵北平。次日，在故宫太和殿主持了受降典礼。北平群众二十多万人聚集在殿前及天安门广场观礼。当敌酋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根本博等向孙连仲俯首呈上降书，并交献出他们视为最珍贵之物的“武士道”军刀后，欢声雷动，震撼古城。

1945 年 10 月，第十一战区所辖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共四万五千多人，奉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下旬侵入磁县、邯郸地区，遭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人民军队的痛击。30 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阵前起义，归向人民阵营。31 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漳河以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遭到大败，马法五及其部下二万多人被俘。鲁崇义的第三十军此役中也遭到重大损失，不久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样，孙连仲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几乎没有了。以后调归第十一战区的第九十三军、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皆各有背景，人事黜陟和兵力运用，孙均不能干预。他抱着勉为维持现状的思想，在任内坚持了两年。其间第十一战区于 1947 年 3 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任主任。

是年 4 月，孙连仲就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想要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

河北。为达此目的，最好将傅作义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孙连仲"知难而退"的原因是他考虑自己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以来，往往一筹莫展，处境艰难。更深刻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讲，孙系一职业军人，长于军事，不善主政，任青海、甘肃主席，均为时不长，其于国民党官场交际，缺乏手腕，河北省主席一职对他压力甚大；华北军事力量的调动，孙因此时失去实力，亦指挥不灵。客观方面讲，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已改为"重点进攻"，孙瞻念前景，不愿在无权力运用、束手坐困的情况下为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的失败承担责任。11月底，蒋介石莅北平视察，孙又一次当面向蒋提出辞去自己在华北的本兼各职，终获蒋的同意。12月，孙连仲被调往南京出任首都卫戍司令。1948年6月，奉令特派为总统府参军长，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

蒋介石于1949年1月引退后，孙连仲亦辞职到上海暂住。2月，孙往溪口见蒋，蒋告以陈仪被扣事。3月，孙偕夫人罗毓凤飞往台湾。孙在台初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6年1月退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由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孙连仲有子女八人，长子湘德、长女蕙书为苏氏所出；子鹏九、鹏程、鹏万，女少茹、幼茹、小茹，均为罗氏所生。子女皆受高等教育或留学。女少茹曾在意大利音乐学院深造，1963年获法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第一位来冀南考察的西方军人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成千上万的墓碑。在第653号这块极为普通的墓碑上，刻写着下列文字："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1896年2月26日——1947年5月27日"。

这位卡尔逊将军，曾被周恩来和朱德称为中国人民的挚友，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位到冀南进行考察的西方军人。

卡尔逊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927年奉调到达上海。刚来时，由于受国内教育的影响。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了偏见和敌意，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与落后、愚昧连接在一起的。后来，他通过学习汉语才对中国有了初步了解。不久他又结认了斯诺、艾黎等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谈起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景问题，卡尔逊忽发奇想，问：

"斯诺先生，我能否象您一样，有幸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我很欣赏中国人的这句古话，叫作'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斯诺对卡尔逊的想法非常支持，并表示尽力协助。斯诺回延安后，及时向毛泽东转达了卡尔逊的想法，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37年底，卡尔逊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卡尔逊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身份，先后两次深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在第一次考察中，他在山西省辽县受到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亲切接见。

1938年5月，卡尔逊第二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考察。刘白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四位年轻人共同组成"延安文艺工作组"，专程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晋绥、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各抗日根据地。

7月16日上午9时，卡尔逊一行到达冀南首府南宫县城，住在北大街华兴公烟草公司院内，当即受到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这是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见到徐向前副师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互致问候之后，他不顾一路鞍马劳顿，立即开始了战地记者采访式的座谈。徐副师长根据卡氏连珠炮般的提问，微笑着进行回答或解释，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率部从山西来到冀南的原因和经过，随后就冀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作了详尽回答。当卡尔逊向徐向前询问八路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内容时，徐向前向坐在旁边正在吃水果的邓小平使了个眼色，说："这个问题轮着小平同志回答了，他是我们师的政治委员。"

邓小平这才冲卡尔逊点点头，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说起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详尽的解释，卡尔逊听后，点头称赞。

翌日下午，邓小平同卡尔逊就当时的国际局势进行了广泛讨论。邓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卡尔逊大为吃惊，更为邓讲的一则消息感到震惊。

邓小平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听到这则消息，卡尔逊全身象遭到电击似的不由一颤，深陷的蓝眼窝里透出一丝惊诧疑惑的光。停了一会儿，他才试探性地问："你敢肯定这一点吗？"在他的心目中，他们美国政府主要同情的应是受到侵略的中国，而不会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正在进行侵略的法西斯国家。他希望邓小平能最后否定这个消息。

然而，邓小平却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结束时，从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说的。"

既然来源于自己国家的电讯，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就不容置疑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亲眼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一想到美国政府竟然在背后助长这种大屠杀，他就感到难过和愤怒。

这次与邓小平的谈话，对卡尔逊日后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冀南的考察，卡尔逊深为八路军的抗日热忱、游击战术、政治和军事素养所折服。他在考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八路军的人是满怀自信心的。他们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年月里，深入而全面地考虑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自己运用这个战略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信心。"

卡尔逊不仅考察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也多次考察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在对这两种考察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人，而对国民党人的无能与腐败深恶痛绝。在考察国民党统治区时，他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从抗日前线撤逃时，强迫部下为他搬扛火腿，而不让往前方运送军火。卡尔逊听后极为愤慨。说来也巧，正是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一次在陕西宴请卡尔逊，席面上的几道主菜都是用火腿做成的。卡尔逊那满含鄙夷的冷冷的目光，象两把利剑，刺向了火腿的主人，但他强行抑制住了自己心头的怒火，连筷子都没摸，便愤然退席了。而在冀南考察时，虽然根据地的生活艰苦，吃的是粗茶淡饭，他却吃得又香又甜。离开南宫时，徐副师长送给他的"礼品"，是些八路军战士常用的草鞋、水壶等物，他都愉快地接受了。

卡尔逊在广泛、深入的考察中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坚信共产党人一定能领导人民赢得抗战胜利。他从根据地回到汉口后，公开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将战争物资运往日本，受到了美国官方的责难。他于1938年底回到美国，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准他如实反映考察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甚至还限制他公开谈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事迹，也不准他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但他冲破重重阻力，不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八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事迹，在1940年出版了《中国的双星》和《大兵》两本书。

（选自《党史博采》90年1期，作者：刘连源）

中共建立的第一个汽车队

每当我一早起来散步，路过机关汽车队的驻地，看着那一间间整齐的汽车库，那一辆辆明光锃亮的大小汽车，以及那宽敞的修理间、值班室、司机宿舍，就会使我不禁想起我在我军第一汽车队工作时的难忘岁月。

那是1938年3月，当时我正在延安摩托学校学习。有一天，校长刘鼎召集全校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汽车队的指示；刘校长宣布全校两个队的学员除6人调前方工作外，其余40多人都到汽车队工作，并且具体地宣布了哪两个同志到哪辆车。听了这个消息，同志们都欢天喜地，议论纷纷："我们在摩托学校学了快一年，只开了8个小时汽车，到了汽车队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开车了。""打了几年仗，一下子坐下来学习近一年，真把人憋坏了，这下可以开车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第二天，刘秀发、彭传清、安东、余德成、孙春廷、叶光华、杨子荣、程子旺、张金海等都高高兴兴地背起背包到汽车队报到去了，而我却被暂时留在学校，修理一辆大卡车。

1938年4月，汽车队的政治指导员刘秀发调走，我正式到了汽车队，担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当时汽车队归总后勤部供给部领导（后来归兵站部领导）。汽车队成员中的骨干力量是摩托学校来的教员和学员，其余的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的爱国青年中会驾驶汽车的，以及新疆盛世才、山西阎锡山送给我们汽车时留下来的司机，全队共有50多人。队里有汽车23辆，其中有宋庆龄送的大轿车两辆，华侨办的南洋缝纫公司送的大小救护车各一辆，苏联制造的吉斯5型、吉斯6型10辆，各种牌号美国制造的卡车9辆。

当时延安各方面的条件很艰苦。我们汽车队开始时是住在延安城里的旧公房里，1938年底由于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就搬到了十里堡，借住老百姓的土窑洞。汽车都没有车库，不论春夏秋冬，检查、保养、修理都是露天干。延安没有汽车修理厂，车子坏了就自己修，自己进行充电，自己制作配件。有的零件实在制做不了，才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购买，有的车自己实在大修不了，才送到西安找商行修理。油料也很紧张。机油不足，我们就用一部分蓖麻子油来代替，汽油紧张，就加一部分酒精掺和着用。有时车上油路不通，一时又修不好，我们就把油箱拆下来装在驾驶室顶上，让它向化油器直流供油。

我们队的任务，除了那辆小救护车派驻杨家岭作为毛主席的专用车外，其余车辆都用来接送中央、总部和各战区的领导同志、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一

般干部和来延安的爱国青年等；运送各种物资器材，主要是被服和电信、医疗器材。行车路线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向南到西安，再向东到东潼关，或向西到宝鸡；一条是向北经延川、绥德到榆林。开始的时候，由摩托学校调来汽车队的同志，由于在学校实车驾驶的机会不多，绝大多数人技术不熟练，单独开车执行任务有困难。我们让技术生疏的同志跟车向技术熟练的同志学习，并且利用车辆空闲和晚上休息的时间，互帮互学，突击学习驾驶技术。这样一来，所有同志很快都能单独开车执行任务了。

当时的公路都是土路，路面窄，且坎坷不平，沿途地形复杂，特别是延安南面劳山一带更是这样，来往的商车常有在这里翻车的。一次，博古、王若飞、罗炳辉同志要到西安去，当时正赶上下大雨，道路泥泞难行。为了保证首长们安全准时地到达西安，由我带 3 辆汽车去送。路上汽车多次淤陷，一遇到这种情况，我和几个驾驶员就下去用铁锹挖泥，大家一起用力把汽车推出来。如果车子实在陷得太深了，怎么也推不出来，我们就用汽车拉，一辆不行就用两辆。就这样又推又拉，艰苦奋战了两天一夜，终于把首长们安全地送到了西安。首长们看到我们一个个都被雨水浇透，浑身泥污，感动地说："路这样坏，你们却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并且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换干衣服，准备饭菜。

抗战初期，许多爱国青年毅然离开城市、家乡，前往延安参加抗日。我们汽车队担负着把他们从西安送往延安的任务。从西安运物资回延安，大家对物资十分爱护，细心装载捆扎，途中经常检查，因此很少发生丢失和损坏。

从 1938 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军队开始和我们闹摩擦，对我们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对我来往的车辆设卡检查。这样一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1938 年 10 月的一天，总后勤部叶季壮部长把我找去，亲自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3 天以后由我带一个步兵排分乘 3 辆卡车，护送朱德总司令去宜川，然后去西安。他还细致地向我交待了注意事项。接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十分高兴。回到队里以后，我慎重地选定了驾驶员，向他们作了动员，并且和他们一起认真地检查保养车辆，把 3 辆吉斯 5 卡车擦得干干净净，加足了油。临出发的那天一早，我就带着 3 辆卡车来到王家坪，步兵排上了车以后，参谋就进去向总司令报告。不多久，总司令就从院里走出来，穿着一身八路军灰军装，腰系皮带，扎着绑腿，虽然那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仍显得精神矍铄，既威严又慈祥。等总司令和随从人员上车以后，我们就出发了。那天天气很好，中午就顺利地到了宜川。住下来以后，总司令出来散步见到了我，就和我亲切地交谈了起来。他问我多大了，什么地方人，哪年参加的红军，还问了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和队里的情况，他就象兄长一样和蔼可亲，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第二天早晨，总司令就骑马由步兵排护送去山西柳林同阎锡山谈判。临行之前，朱总把我找去，再三嘱咐我在宜川等候，要好好休息，因为宜川是国民党统治区，不要乱跑，防止出事。4 天之后，总司令回到了宜川。第二天早晨，我们又送他去西安。在行车途中，总司令非常关心驾驶人员，车行两三个小时，就叫停车休息一下，问大家累不累，饿不饿，中午路过耀县，还叫警卫员到商摊买烧饼给大家吃。对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大家都非常感动。一路行车非常顺利，可是下午 3 点多车到西安西边咸阳桥时，却被国民党宪兵六团的部队拦住了。我立即下车去交涉，一名国民党的上尉带着 3 个士兵迎着我走来，一开口就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回答他："我们是第十八集团军的，专程护送朱德总司令来西安，你们快让我们通行。"

"你们过去可以，但必须把武器留下，不准带枪进城。"

他蛮横无理的要求把我惹火了，我愤愤地说："我们是护送总司令到西安的，不带武器怎么行?! 现在国共合作打日本，你们却要留我们的枪，这是谁的命令？朱总司令刚去山西同阎长官谈判回来，你们就这样对待，这难道是你们合作抗日的诚意吗？"

一番话把他问得张口结舌，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我只好回来向总司令汇报。总司令见我满脸怒气，一边平静地说"小熊（我当时叫熊宗存）啊，不要急嘛！"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要我拿去给他们看看。我按总司令的吩咐把名片交给那名军官，可他还是不让通行。这下我更火了，就高声斥责他："你们这叫什么合作抗日，有什么理由不叫我们过去？"这时总司令下车走了过来，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小熊，算了，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给八路军办事处打个电话，要他们来处理。"于是我立即乘车赶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半个多小时以后，一辆黑色卧车开到了咸阳桥头，下来两位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同守桥部队进行交涉。十几分钟后，他们同意放行，我们就开车直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办事处，总司令要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安排好食宿，他老人家自己却顾不得休息，过了一会儿就换上将军制服去会见驻西安的国民党军负责人。3 天之后，总司令离开西安，转去山西前线指挥抗日战争。我们就运送 12 名青年学生和一部分物资返回延安。

护送朱总司令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我们很快又要回到延安，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大家都把车子开得飞快，可是到了咸阳桥，又被那一伙国民党宪兵拦住了，说是要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他们从两名青年学生所带的东西中发现了两本马列主义书籍，便要扣留两名学生。我见此景就从车上跳下来，质问他们为何要扣人。他们的一名少尉过来说是两名学生带了赤色主义的书。我说：

"他们有信仰自由。"他说:"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只能信仰一个主义。"我说:"蒋委员长同意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国民党员,怎么能说是一个政党呢?陕甘宁边区政府是蒋委员长承认了的,八路军是蒋委员长下令整编的。两党各有各的领袖,青年学生愿意到陕甘宁边区学习、抗日,这有他们的自由。"那名少尉被我说得理屈词穷,便跑回去请示他的上司。过了一会儿,来了个上尉军官,看见我佩戴着少校军衔(为了工作方便,在国民党统治区临时佩戴的),上来就给我敬了个礼,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放行了。第二天,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1939年9月,我离开汽车队奔赴抗日前线,由彭传清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

(选自《纵横》1988年6期,作者:林彬)

一个侵华日军女战俘的转变

1938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山西省洪洞县韩略村民众自卫队的岗哨,盘查住一位青年妇女。此女身条颀长,皮肤白嫩,在一张瓜子形的脸上镶嵌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两道弯眉伸向发际。再从装束上看,头绾村妇女髻,身着蓝布旗袍,脚蹬长腿线袜和布底便鞋,给人的印象:非城市富贾的小姐即县府官员的姨太太。

但是她为何神色慌恐、踽踽独行呢?尤其是她那碎步疾行的走路姿态,异乎常人,引起岗哨的注意。向她要路条,她摇摇头;向她要通行证,她还是摇摇头。问她为什么不答话?她仍然摇摇头。这就更引起了岗哨的重视,于是对其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在其随身携带的包袱里,发现几件颜色鲜艳印有扇形画面而式样却与中国衣着迥异的服装。其实那是几件日本女人穿的和服,中国村民哪里见过,只觉得这女人非同一般,决定带回队部交给队长审问。此时,这个慌恐不安的女人一反常态,凶相逼人,把自己的衣襟撕开,指着胸膛向哨兵说:"我的死了死了的。"意让哨兵开枪打死她。让她走,她却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拽也拽不起来。哨兵只得把她架起来送到自卫队队部。

1938年6、7月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打击下,遭受惨重损失。驻临汾日军出于"劳军"的动机,派了几名军妓送往安泽县城,其中一名叫川岛秀丽子。

川岛秀丽子,日本国人,幼年在国内女子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随父母来到中国的东北。"七七"事变后被迫从军,1938年春作为一名军妓随侵华日军来到临汾。日本国素有重男轻女陋习。川岛秀丽子被派往安泽县城半年多的时间里,受尽了日本军人的凌辱与欺侮,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她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心只身逃回临汾,伺机重返东北与父母团聚。

原来这人就是由安泽下山的川岛秀丽子。她被俘后,被送到了赵城县石门峪山西省第六专署河东办事处。河东地区抗战一年多来,大小战斗不下百次,俘获日本军人少说也有好几百,可是抓到日本女俘,这还是第一个。为了保证安全,办事处主任裴丽生指示安排川岛秀丽子住在办事处大院的北房西套间里,并且还规定:除看管人员外,其它人一律不准与她接触,以免引起她不必要的恐慌和不安。

川岛秀丽子来到办事处后,不吃饭,不喝水,大哭大闹,有时还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向墙壁上乱磕乱碰。门外站岗的看管人员碍于男女之别,不便动手,对她没有办法。于是,办事处领导找来在宣传部工作的李秀英和贾莹两个女干部,请她们与川岛秀丽子住在一起,安慰她,照顾她,使她尽快安静下来。也许是出于戒备吧,川岛秀丽子一直与李秀英、贾莹她们保持一定距离,有时还把坐椅拉到身边不让对方靠近,表示反抗。李秀英秉性和善,娴娴静耐心。知道川岛秀丽子两三天还没吃饭,就主动热情地和她接近,替她梳头发,整衣服;打回饭端到她跟前,自己先吃上两口,然后用手比划着再请她吃。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川岛秀丽子仍然坚持不吃不喝,不时投来敌意的一瞥。这天下了雪,室内寒冷,川岛秀丽子由于晚上时刻戒备不敢睡觉,实在困顿难支终于睡着了。李秀英把被子轻轻盖到她的身上,还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加上去。她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盖着李秀英的棉衣,而李秀英却穿一衬衫坐在火炉旁取暖,她楞了好半天,第一次向李秀英投去感激的目光。秀英见它醒来赶紧上前招呼,但川岛秀丽子仍然是问而不答,独自落泪。

从安泽到临汾连日长途跋涉,几天水米不沾,川岛秀丽子身体极度虚弱,患病躺在炕上。医生给她打针,她捂住臀部不让打;喂药,她咬紧牙关不张嘴,只是一个劲儿的哭,陪在她身边的李秀英、贾莹耐心地替她擦眼泪,遵照医生嘱咐一块接着一块的把湿毛巾敷在她的额头上。川岛秀丽子渐渐进入了梦乡。等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已是晨光熹微,天将发亮了,她环顾左右,李秀英和贾莹仍然在她身边守候着,向她点头微笑。是受到良心的谴责,还是出于感激之情,她第一次扑向李秀英怀抱失声痛哭,双手交替着捶打自己的胸膛,很久才平静下来。医生给她测试体温,高烧已退。遵照医生的安排,炊事员端来一碗挂面,外加三个荷包蛋。李秀英正准备先吃两口,却被川岛秀丽子夺过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场异国姐妹的"哑战"终于结束了,李秀英、贾莹相视而笑,这是胜利者的喜悦。

川岛秀丽子病好后的第三天,办事处的日语翻译从前线回来了。

"这两天生活的还好吗?那些日子真让人着急啊!"裴

主任通过翻译关切地问。

川岛秀丽子慌忙站起来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听说前几天你在闹绝食，是这样吗？"翻译开门见山地问。

川岛秀丽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的，那些天我真想死，死了就是对天皇最大的忠诚。"

"那么现在活下来就不准备为天皇尽忠了吗？"

这时，川岛秀丽子脸上出现了悔恨而又痛苦的表情。接着谈了她从小所受的蒙蔽与欺骗。

川岛秀丽子从小学读书开始，就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侵略扩张政策的教育。一天上地理课，教师拿出一张彩色图画贴在黑板上，图画上画着一片肥而光泽的桑叶，一条饥饿的桑蚕，爬在距桑叶不远的地方，昂着头垂涎欲滴地觊觎着。老师讲：这片硕大的桑叶就是美丽而富饶的中国，那里是我们黄族人的故乡，我们要到那里去，去过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高等小学毕业后，她真的随父母来到中国的东北。在芦沟桥事变的弥漫硝烟中，她被迫当了军妓，接受了专门训练。她还清楚地记着教官训导：作为一名大日本天皇的军人，应当绝对忠于天皇。在万分危难之际，要毫不犹豫的以身殉职，宁死不投降，宁死不作俘虏……作了中国人的俘虏，要承受惨无人道的酷刑，下场是极端可悲的。因此，她以为被俘后生还无望，只求速死。所以饿了不吃饭不喝水，病了不打针不吃药，将热心照顾她的人视为仇敌。

"那你为什么又吃起饭来了呢？"翻译象逗小妹妹似地问。

"是眼前的事实教育了我。"川岛秀丽子接着说："我觉得我们来中国并不象他们所说的回家，哪里有拿起武器残杀家人同胞的呢？我觉得中国人也不象他们说的那么凶残，李秀英、贾莹姐姐们不就是中国人吗。他们都有一颗慈母般的心，忍辱负重，休贴关心我，使我的良心受到责备。"她哭了，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裴丽生主任刚要劝解，翻译挥手示意，让她哭个痛快。大约过了四、五分钟，她一把抹去眼泪，迷惑不解地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给中国民众带来严重灾难，为什么中国人不憎恨他们，反而以德报怨，给予优待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裴主任说："侵略中国是日本上层统治集团的狼子野心，日本人民只是被迫给统治者当炮灰，我们不能把侵华的罪责强加到日本人民包括日本军人的头上。所以我们执行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战场上，只要停止抵抗，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官佐，我们绝不侮辱虐待，愿回去者一律放 回。就拿你来说吧，如果愿回临汾去，我们还要送你进入日军占领区呢！"

"不，不！"川岛秀丽子的情绪马上一落千丈，面颊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我不回去，我能做很多事，比如：洗衣服、做饭，还有照顾伤员……"

"你不必惊慌，就是让你回去也要征得你本人的同意。"翻译给她作着解释。

两天后，翻译在办事处大院里碰到川岛秀丽子，便关切地问："想好了吗？李秀英同志的家就住在日军占领区的临汾城外县底镇，她可以把你安全地送进临汾城。"

"想好了。"她脸上充满了自信："不回去。再说一遍，不回去了！""为什么？"翻译故意寻根刨底，她只是笑而不答。

大约过了一个来月，第六专署河东办事处在石门峪召开盛大欢迎会，欢迎川岛秀丽子放弃侵华立场，参加抗日队伍。会场设在离石门峪约一公里的大庙上，讲台就是大庙台子。附近村庄的民众和周围各县的代表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涌向会场，川岛秀丽子今天穿了一套漂亮的浅蓝色的和服，骑了一匹高头大马与办事处裴丽生主任并辔而行。为防万一，李秀英、贾莹，还有两位男同志在马的前后左右围护着她。他们刚进会场，与会民众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呼声。

大会开始了。裴丽生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从当前的抗战形势，讲到了抗战的前途。请看，川岛秀丽子不就成了我们的朋友了吗！全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掌声中，川岛秀丽子拖着木屐缓慢地、几乎是一步一停地走到台前。此时此刻，她面对台下数千张陌生而又和善的面孔，百感交集。川岛秀丽子强自镇静了一下开始了她的讲话："作为一个被俘的侵华日军，我能说些什么呢？是我们的国家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我是他们的帮凶，我有罪，我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四十多天的战俘生活，耳闻、目睹和切身感受，使我明白了一切。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神圣的；在中国，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都有作人的权利。我热爱这个国家，这里的土地、人民和一草一木，我更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我愿意投身到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去，立功赎罪。请收下我这个异国孤儿吧！"说完便跪在台前。会场上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川岛秀丽子参加抗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几天后，川岛秀丽子被分配到宣传部门工作，以一名抗日女战士的身份活跃在游击区的集镇和乡村，她学会了很多抗日歌曲，以其圆润、高亢的歌喉向山庄窝铺的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有时还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向日军战俘讲解共产党的优待战俘政策。

（选自《纵横》1995年1期，作者：刘道生）

智收“救国军”

一、“救国军”作恶多道

1937年10月，日寇乘几只汽艇顺釜阳河南侵，占领衡水县城，吓得附近各县镇的国民党保安团、警察局惊慌向南逃窜。此时，枣强县的国民党县长祝循安和保安队长宋鹤鸣也乘机混水摸鱼，在砸抢盐店、勒索钱庄后，携带钱财珠宝，带领保安、警察及几个区公所人员300多人经恩察镇，向大营镇方向南逃。在日军压境、人心慌恐万状之际，杨玉昆乘机组建了一个县民团，打着抗日旗号，招兵买马，很快聚拢成上千人的武装，来聚的士兵多数是农民，也有散居乡村的散兵游勇及地痞流氓。他们的武器装备有捷克式步枪，还有马拐子、土枪、手榴弹、盒子枪、特别是还有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民团团长杨玉昆是枣强县大营区杨白塔村人。他叔父曾任过直隶督军李景林的财政厅长，依仗权贵关系，他当过枣强县长、阜成县警察局长，此时自立民团当团长。副团长刘其风，辽宁人，原是二十九军排长，在蒋介石令二十九军南退时他未随军南撤，而带着二十余名士兵及两挺捷克式机枪参加了杨玉昆的民团，被杨封为副团长。杨玉昆是个被日特收买的汉奸头子，民团在他把持下变成一股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1938年4月中旬，杨玉昆将民团改为所谓“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自封为旅长，封刘其风为副旅长。这时，他撕下了“抗日”的遮羞布，公开与八路军对抗。5月，他指使控制下的大营区的反动会道门“六离会”三千余会徒参加了在南宫县张马村、小屯的武装叛乱，向八路军东纵攻击。之后，他命令民团在所踞村庄周围设岗，阻止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刘建章进枣强县开展抗日工作。他专横地卡掉了枣强抗日战委会的经费，并扬言要把八路军从东纵训练班回县战委会工作的李衡甫、李晓明、杜道周等“赶出枣强城！”他指使“救国军”卡断了枣强、景县、衡水诸县与驻南宫的八路军东纵的联系通路，直接阻碍着八路军津浦支队东进抗日活动。枣强县局势变得异常紧张，事关八路军发展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计。为此，枣强县战委会齐涵生、王力生星夜赴南宫向徐向前副师长、陈再道司令汇报情况，并要求速派部队前往解决“枣强问题”。

二、陈再道先礼后兵

徐副师长、陈再道司令听了齐涵生、王力生的汇报后，徐副师长看了看墙上挂的军用地图，指着枣强县地理位置对陈司令说：“枣强的问题不解决，影响我们向北向南发展”。他指了指南宫县中心位置接着说“你看，南宫西部、南部、东部的一些问题解决了，稳住了阵脚，我们站住了脚跟。现在只有北部这一带还很混乱，应快解决枣强问题，以便向北发展，实现我们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意图。”稍停，徐副师长对陈司令接着说“我看，对杨玉昆这个地头蛇也要先礼后兵，目的是争取‘救国军’的官兵抗日。”

陈司令同意徐副师长的想法。先派人找杨玉昆谈判，讲明大义，劝他抗日。如果谈不拢，就派部队包围，强行改编，把队伍拉过来。

当即决定，先派中共南宫县委书记王裕国作为八路军东进纵队代表去找杨玉昆谈判。王裕国到枣强县城找到杨玉昆旅部说明来意，尔后进行面对面谈判。当王裕国提出要杨解散“六离会”，停止阻挠、破坏县战委会的抗日活动时，杨玉昆听不进，火冒三丈，态度蛮横，拒不接收，谈判没法进行下去。王裕国回到南宫后，向徐、陈首长作了详细汇报，分析杨玉昆抗日的可能性不大。

徐副师长、陈司令便当机立断，派东纵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率七六九团赴枣强县解决“救国军”问题。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以老红军为主体、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是个能攻善打的团。团长是孔庆德、政委黄振堂、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特务连长李德生。刘志坚主任率七六九团急行军，于5月25日开进枣强城，将部队布防好后，刘主任和团部驻进南关大地主王家的后院里。

杨玉昆听说八路军突然开进城里来，惊恐万状，在参谋长出主意劝说下，他以“欢迎”友军为名，在南关露了一下头，迅即躲进旅部，再也不露面了。刘志坚主任先是邀请杨玉昆到团部吃饭，目的是做争取工作，边吃边谈，晓以大义，以抗日大局为重，应共同打鬼子。可杨玉昆根本不听劝，点头是假，对抗是真，执迷不悟。他回旅部后更变本加厉，下令不许官兵和八路军接触，违令者杀。

三、妙计擒捉杨玉昆

刘志坚主任争取杨玉昆无效，便决定施妙计采取第一个方案，即以商讨共同打鬼子为名，派人去请杨玉昆、刘其风到七六九团部来，届时相机行动。第二个方案是，如派人或打电话请不来杨玉昆、刘其风，就令部队将“救国军”分割包围，进行瓦解，强行改编。为了实施第一方案，尽量避免流血，以计取为上，事先作了精密部署。将特务连埋伏在团部大院的两侧，届时特务连长李德生还接杨、刘进后院，而不须其多带护兵，除可带两个随身护兵外，其它护兵迎拦在前院。后院屋中央摆上八仙桌和长宽大板橙、不摆椅子，以便动手时方便，墙上挂着军用地图，刘志坚主任以看图指挥行动，杨玉昆、刘其风进屋后，黄振堂、鲍先志负责逮捕杨玉昆，孔庆德、范朝利负责逮捕刘其风。大家都听刘志坚主任发出的信号行事。一切准备

就绪，派两位参谋去请杨玉昆、刘其风。参谋回来后，一等再等，不见人来。孔庆德打电话催促，连打三次电话，杨玉昆没法推辞才接电话。孔庆德质问杨玉昆为商量对日军作战计划为何不来？为何不见友军？杨玉昆理屈，连说“去，去，去，马上去。”很快，杨玉昆、刘其风带着全副武装的20多名护兵来到团部前院。李德生同志上前拦住说“长官商量对鬼子作战计划，需要保密，这是军界常识，有两个马弁随杨旅长、刘副旅长进去，其他弟兄不必进去了。”杨、刘无言可答，只得把20多名护兵留在前院，由特务连的战士们用茶水、花生对护兵们热情“招待”。杨玉昆右后拄着一根暗藏匕首的“文明棍”，刘其风带着一支手枪，和两个提着二十响匣子枪的护兵，跟随李德生到后院正屋里。刘志坚主任正站在地图前看图，一看杨玉昆、刘其风进来，刘主任便招手叫他们到地图前，向他们介绍了近日衡水、德州日军活动情况，然后请他们分别坐到八仙桌两边，他们的护兵持枪各立背后。此时刘主任沉着地向门外一喊暗号——“倒茶来”，立时孔庆德和特务连的勇士们一拥而上，把杨玉昆、刘其风捉了起来，把他们的护兵缴了械。同时，听到信号后，前院特务连的战士们按预定分工也将20多个护兵顺利地缴了械。紧接着号兵吹起冲锋号，七六九团的指战员们按计划包围了“救国军”各营团及旅部。经过政治喊话，没放一枪没费一弹，“救国军”全部缴械，听候改编。

在搜查杨玉昆的宿舍时，发现了杨玉昆与德州市日军特务机关勾结来往书信几封，特别是有一张日特机关任杨玉昆为枣强、景县、故城三县“剿匪司令”的委任状，白纸黑字，投敌当汉奸，罪证俱在。特务连将杨玉昆、刘其风押送南宫八路军东纵司令部审理。

刘志坚主任将“救国军”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三十支队。

1938年9月，三十支队升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该团活动在冀南地区，在长期与日伪战斗中，成长为能打善战的主力团。

（选自《纵横》95年1期，作者：蔡维才）

八女投江记

1938年10月，抗联第5军第1师师长关书范带着100多名参加西征的指战员，返回远征出发地刁翎，以寻找第5军军部。途中，他们露宿在林口县乌斯浑河西岸柞木岗山下老道沟草甸子柳毛丛子里。由于当地的汉奸告密，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连夜向他们袭来。

拂晓的时候，关书范命令部队收拾好行装准备到附近的渡口去渡河。但时，当他们来到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野渡无人舟亦无。

“金参谋，你先去试探一下，看看水有多深！”关书范向水性较好的金石峰命令道。

金石峰向对岸游去。关书范又对妇女团的人说：“你们妇女团的人准备好，呆会儿你们跟金参谋先过河。”

妇女团原先有30多人，而现在只有指导员冷云等8个人了。听了师长的命令后，她们便向河边走去。可就在她们准备下河的时候，敌人从后面打过来了！

敌人一来，关书范立即指挥部队一边还击，一边向柞木岗山里退去。而冷云等8人则被敌人的火力隔在了河边。

“姐妹们，打呀！好让大部队撤走！”冷云一边喊着，一边带头向敌人猛烈射击。她们的火力果然起到了牵制作用，大部队很快就撤进了柞木岗的山里。

进山后，他们回过头来一看，那8名女战士还据守在河边向敌人射击。关书范立即命令部队返回头来，去接应她们。但是，由于敌人太多了，他们冲了几次都没能冲过去，部队又增加了不少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关书范只好下令让部队又撤回了山里。

大部队一撤，敌人立即集中力量来对付河边的8个女战士。他们一边高叫着“活捉这几个娘们！”，一边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冷云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不断有敌人被打倒。但是，这毕竟是难以持久的。当子弹打光了的时候，她们面前的敌人便开始放心大胆地往前冲了，他们满以为这下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抓到她们了。可也就在这时候，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8个女战士正互相背扶着毅然决然地走向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

八位女英雄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祖国的江河。“八女投江”的故事早已传遍了神州大地，但有关这8位巾帼英雄的具体情况却鲜为人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遗憾。所以打算在这里为她们建立一个小小的档案：

冷云　　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桦川县悦来镇人，汉族。

1925年春入悦来镇北门里两级小学，开始表现出刚强的性格。有一次被先生把手打肿了，手背也出了血，但始终未哭一声。

1931年考入吉林桦川县女子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很好学，思维敏捷，渴求真理，接受新思想快，关心时局形势。她经常与高明世、范淑杰两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借问课程之机，要求班主任董仙桥老师（地下党员）讲些国家大事……，她在班上很活跃，敢说敢讲，表现出一派正直刚毅的气概，与高明世、范淑杰一起被同学们称为‘三杰’”。

1934年夏天，经董仙桥介绍入党，开始在学生中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1935年12月，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悦来镇南门里初级小学教学，讲授算术、语文、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担

任班主任。经常向自己的学生讲："英雄爱他们自己的国家，打击外来侵略者"。并积极搜集日伪情报。

1937年秋，根据周保中的要求，下江特委向抗联五军输送知识分子。当时，中共悦来镇支部考虑到郑志民因对父母包办婚姻不满，早就提出要参加抗联，决定将她由地方转入第5军工作。

杨贵珍　1920年10月生于林口县柳树河子村一个农民家庭。她7岁丧母、15岁出嫁，16岁丧夫。夫家逼其"走道"(改嫁)，常挨打受骂。其父杨景春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常让路过的抗联5军战士住其家中。杨贵珍在战士们的影响教育下，于1936年冬毅然离家，走上抗日道路。入伍后先后在小锅盔山和西道河子被服厂工作。1937年入党。

安顺福　朝鲜族，中共党员。1915年生。穆棱县穆棱镇新安屯人。其夫朴德山为抗联4军4团政委(已牺牲)。"九·一八"后，她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为新安屯抗日儿童团员，后于1933年加入青年团。1934年参加抗联第4军，任第4军被服厂厂长。她举止稳重，颇负众望，在妇女团里被称为安大姐。

郭桂琴　乳名菊花，1921年生于林口县刁翎四合村。早年丧母，被寄养在姥姥家。她性格开朗，喜唱民间小调、扭秧歌。1936年6月在抗联第5军一位姓王的连长和一位女战士的引导下剪掉长辫，离开姥姥，参加抗联。

王慧民　1925年生于林口县刁翎四合村。爱说爱笑，肯于吃苦。其父"王皮袄"是抗联第5军的一个副官。1937年，王慧民随父上山，参加抗联。

胡秀芝、黄桂清、李凤善三人出生年月不详。三人都是林口县人。胡出嫁后即参加抗联，再没回过娘家；黄全家抗日，是抗联的堡垒户；李为朝鲜族人，中等身材，长得丰满结实。

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吧！

(全勇：《黑白关东》)

冷云传奇
——"八女投江"主要人物纪实

她是个文静的姑娘。却以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谱写了传奇式的人生。她的名字叫冷云。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

她10岁时入悦来镇小学就读。16岁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4年，转入佳木斯桦川中学师范班学习。

这年她19岁。

就在这年，青年共产党员周维仁在佳木斯桦川中学师范班，开展了党的活动。这时，周维仁与冷云有了接触。

在周维仁的培养下，冷云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年底，冷云毕业后回到悦来镇第三小学当教师。冷云仍然与周维仁保持着联系。

早在冷云读小学时，父母就给她订了婚。

她的未婚夫名叫孙汉琪，后来当上了伪警察。

冷云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多次向与她保持联系的地下党员周维仁提出要求，要与孙汉琪中断婚约。

但是，为了争取孙汉琪，周维仁没有同意，而是让她与孙汉琪结婚。

1936年2月，冷云与孙汉琪成了婚。

婚后，冷云按组织的要求积极作孙汉琪的思想工作，想让他参加抗日斗争。然而，孙汉琪非但没听，反而变本加利地染上了旧警官吃喝嫖赌、勒索群众、搜刮民财的恶习。

冷云见争取无效，自己又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于是，她向周维仁再次提出要求，要坚决与孙汉琪离异。

这次他俩谈话的地点是悦来镇会仙居酒馆。

事情也算凑巧，当他们二人正在说话时，孙汉琪也只身来到这里吃酒。

冷云见势，以"任维周"名将周维仁介绍给孙汉琪。

这次会见后，周维仁代表党组织同意了冷云的要求。并要冷云离开家乡悦来镇，到抗联五军中去工作。

一天，借去学校上课的机会，冷云悄悄地出去了。前来接应冷云的，正是周维仁。

为了隐瞒身份和迷惑敌人，周维仁要冷云以"男女私奔"名义给孙汉琪写封信。

冷云是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又喜欢文学，精通诗词歌赋，当即作一首《西江月》词从沈阳寄给孙汉琪。词云：

闺房怨偶相对，
枕边吵骂惊邻。
积恨成仇无求解，
别求生路作人。

新爱原是故友，
两心相印情深。
比翼双飞凌云去，
告你枉想追寻。

孙汉琪见信后信以为真。敌伪报纸还把这事当作桃色新闻刊出。

但是，孙汉琪仍然不知带走冷云的是谁。

抗联五军与四军同属第二路军，它的总指挥是周保中。活动的地点在黑龙江宝清县一带的密林里。

到五军后不久，冷云与周维仁结了婚。

二人恩爱非常。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在宝清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周维仁牺牲了。

周维仁牺牲后，敌伪将他的遗容照片刊登在报纸上。

这张报纸被孙汉琪看到了。他联想到那次在悦来镇会仙居酒馆所遇上的与冷云喝酒的那个人。这时他明白了。那个人，根本不是"任维周，而就是这个周维仁。同时他更明白冷云是做什么去了。

事隔不久，孙汉琪调转到林口县刁翎口子警察所，并被提升为警察所长。

转眼间到了1938年。

这年5月，抗联五军与四军根据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指示，作西南远征，准备与活动在五常、舒兰的抗联十军和活动在南满磐石一带的抗联第一路军会合。当队伍离开宝清，经林口刁翎、珠河楼山，来到五常境内时，遭受到日伪军的强力阻击，队伍伤亡惨重。尤其是五军一师，队伍几乎所剩无几。

冷云就在这支队伍中。

此时，冷云的职务是五军一师妇女团小队长兼指导员。

这时，冷云所带领的妇女团，加上冷云在内，只剩下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带领着这7个人，随着五军一师的残部，重返牡丹江沿岸的刁翎一带，准备寻找五军军部。

这天夜里，她们露宿在乌斯浑河岸边的柞木冈。

10月的夜里天气寒冷。

她们为了取暖，燃起了篝火。

结果，被住在附近的样子沟屯的汉奸特务葛海禄发现了。他为了抢功领赏，当即报告了驻在当地的日军守备队。

日军守备队深知这一带有抗联队伍活动，生怕自己力量不足，便又纠集了刁翎口子所的警察。

这伙警察的领队就是所长孙汉琪。

待孙汉琪带着警察赶到时，天已拂晓。

这时，冷云8人已被日军守备队赶到乌斯浑河岸边。

前面是大河，后面是敌人，队伍何去何从？

冷云选取了抢渡乌斯浑河的路。

河面无船，只好涉水。

带领冷云她们涉水的是五军一师参谋金石峰。

金石峰会泅水。

此时，乌斯浑河河水上涨，下边不远处又是与牡丹江的汇合口，河水很深，水面很亮。这会儿，天光已经大亮。蓦地，孙汉琪发现了冷云。无意中，冷云也认出了孙汉琪。她俩相距不足百米。

这时，孙汉琪眼睛一亮，心头一惊，竟发现冷云从来没有这样美。

他将端起的枪放下了。

他情不自禁地呼喊起冷云的名字。

冷云没有回答。

她用重重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她身边的众姐妹，她们都是那样年轻，那样漂亮。她们中，顶大的才25岁，最小的仅13岁。众姐妹也同样用目光在盯注着冷云。

冷云那齐耳短发闪动在朝露里。

日军守备队的官兵们，面对着眼前的一切，闪动着豺狼般的贪婪的眼睛。他们呼喊着要她们回来。他们呼喊着要她们投降。

回答他们的是"无声"。

孙汉琪再次从嗓眼里推出呼唤冷云名字的声音。

冷云和她的姐妹们没有回头，只一步步向河心走去。

前面就是河心。

蓦地，孙汉琪又炸响一声呼唤声。

冷云停住了脚。

冷云再次地看看跟随在她身边的众姐妹，最后把朝霞般的目光落到年龄最小，仅有13岁的小妹黄桂清的身上。

她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她用胸脯贴着她的胸脯。她用嘴亲吻着她的嘴。她说："如果有一个能活在世上，也让你剩下，因为你最年轻。"

黄桂清没有答出话，只是嘴角颤了颤，眼角闪着晶莹的泪花。

冷云用舌尖吮掉她的泪花，说道："看你，别把脸弄模糊了。"

当孙汉琪想再次呼唤冷云的名字时，见冷云抱着黄桂清带领着众姐妹已走向了河心。

片刻，河水淹了她们的头顶。

1938年11月4日。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五军……于西南远征归抵刁岭（翎）。半月前，在三家方向拟渡乌斯浑河。拂晓正渡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金世（石）峰及妇女冷云（郑××）、杨秀（贵）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躯……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党史纵横》95年3期，作者：杨子忱）

中共建立的第一个航空队

党要建立一支航空队的决策最早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来的。1937年，由于我们党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民党向着抗日方向转变，实现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时期。当时，国民党驻新疆督办盛世才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一度成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拚命抓军队，他向苏联要来了一批武器装备和顾问人员，开办了军事技术

学校，还办了一个新疆边防航空队附设航空教育班。1937年5月，陈云担任中央驻新疆代表，他适时地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借助苏联援助盛世才的武器装备，组织进入新疆的数百名红军西路军干部战士成立"新兵营"，学习各种军事技术。同年11月，他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建议：挑选一批既年轻、又稍有文化的红军干部去新疆边防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党中央、毛主席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并决定从延安抗大、摩托学校和新疆"新兵营"挑选一批干部学习航空技术，培养我军第一支航空队。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件有关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要分别从三个方面军挑选干部，并且委托陈云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这项工作。从延安抗大和摩托车学校一共挑选了十九名同志，其中大多数是团、营级干部。陈云逐个谈了话，鼓起了我们学习掌握航空技术的勇气。1938年1月初从延安出发，3月中旬，我们与"新兵营"中选调的吕黎平等二十五名同志会合了，建立了支部，编成了班组，成立了"航空队"。飞行班25人，吕黎平任班长；机械班十九人，严振刚任班长；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上第一堂《飞行原理》课，就受到了冷落。教官逐个问我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见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上过中学，便恶意讥讽说："象你们这样低的文化，还能进入航空界?!"然而，我们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并没有被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所畏缩，大家团结一致，迎着逆境而进。首选以极大的毅力攻克了文化理论关，并以优胜于那些纨绔子弟的成绩，学完了一门又一门课程。两年之后，机械班的同志毕业了，他们当时就能维修三种飞机；飞行班的同志也飞完了Y－2初级教练机和P－5中级教练机(轰炸侦察机)的课目，我们这些在人民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子弟终于跨进了航空界的大门。

1940年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盛世才对我党转而冷淡，并逐步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自此以后，我党同盛世才的关系由于盛本人的反动逐渐破裂了。我们的学习不断受到刁难，时停时续，只是由于党驻新疆代表机构的坚持斗争和苏联顾问人员的帮助，才勉强地维持了最后一段时间。1942年7月，蒋介石派宋美龄等人到新疆与盛世才订立了联合反共密谋，我们这些学习航空技术的同志和所有在新疆工作的同志都被盛世才监禁起来，度过了将近四年的铁窗生活。直到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中央、周恩来的营救和张治中先生做了顺乎革命潮流的好事，才得以出狱，于1946年7月12日回到延安。同年8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航空队，方子翼任队长，方华任副队长，严振刚担任党支部书记，建立在艰难环境中的我军这支航空队终于成长起来了。

(摘自《革命回忆录》第13期《我们终于有了一支强大的空军》一文，作者：方槐)

冼星海的见面礼

抗日战争初期，我曾有幸接触到两位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和何士德，受到他们的影响和熏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38年，我从家乡江苏丹阳流亡到武汉，参加了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支持组建的十三军青年战区服务团。同年2月，服务团成立，在驻地武昌女子师范学校集训。

当时，冼星海同志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二队(队长洪深)，从上海出发，一路进行抗战宣传，辗转到了武汉。团部得讯后，认为机不可失，当即由朱穆之同志出面，请冼星海来团教歌。星海同志不顾旅途劳累，欣然接受邀请，并迅速拿出他刚在旅途车厢内构思创作的《游击军歌》手稿，让朱穆之带回，预先用大张白报纸抄好，以便给大家教唱。

第二天上午8时，星海同志准时到达。他身穿一套咖啡式西装，身材魁梧，脸色稍带苍黄，进入排练场时笑容可掬，在热烈掌声中拱手招呼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从孤岛来到武汉，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我刚创作了一首《游击军歌》，初步定稿，今天就以此作为献给大家的见面礼吧。"说罢，从手提包里取出指挥棒，对着大字歌谱轻声试唱了一遍，接着就挥舞着指挥棒逐句教唱："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高山上，在河道边，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歌曲开头并以摸拟战士脚步声的"切嚓切嚓"作为前奏。歌声由轻而重，由徐而疾，我们跟着他的指挥棒唱着唱着，眼前仿佛展现一群游击战士，化整为零，在敌后神出鬼没地战斗行进。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跳宕，起伏有致，和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题材相同而风格各异，却又同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艺术魅力。

星海同志教完时似感吃力，微微喘息。但仍谦逊地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歌曲结尾的呼号是用"杀!"还是用更能表现游击战士矫健活跃战斗风貌的呼号"格拉拉青，格啦啦崩，格拉拉青青格拉拉崩!"好?充分体现了星海同志的虚怀若谷和对创作的一丝不苟。他还谆谆告诉大家，合唱时要把目光和心音集中到指挥棒的尖端，并以动人心魄的歌声，去呼唤仍在沉睡的人们。

(选自《党史月刊》，睦新亚)

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游南岳

同游祝融峰

1938年11月，巍巍衡山，菊花吐艳，枫叶摇红，尽管大半个中国遭到日寇铁蹄的野蛮蹂躏，但五岳独秀的南岳依然秋色无限，风光如画。

一个全国性的抗战会议即将在这座名山举行。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汤恩伯、周恩来、叶剑英、边章武等风尘仆仆分别从重庆和武汉赶来南岳，下榻在风景秀丽的磨镜台宾馆。正式开会的前两天，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蒋介石心情舒畅，雅兴忽发，叫来两乘竹轿，邀请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同游祝融峰。

随行侍卫副官奉命来到周恩来的住地，见他正与一位力主抗日的地方名流侃侃而谈，兴味正浓，不忍打断。等了10来分钟，副官深恐蒋介石不耐烦，便故意干咳了两声。

周恩来听到声音，侧过身子一看，见是蒋介石的随行侍卫副官立在门边，站起身来客气地说："副官先生，你有何贵干？"

这个副官跟随蒋介石的左右已有7年了，他早就听说共产党里的大人物周恩来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待人谦和，几天的接触，名不虚传，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连忙脚跟一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周恩来先生，委员长有请！"

周恩来还了一个礼道："请转告委员长先生，我即刻就到。"随即将副官送出门外。

蒋介石忙于政务，平日难得有闲，五岳独秀，到此天下名山，岂能不作一游？他脱下戎装，换上绅士礼服，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一根文明棍，早在屋里等候，见侍卫副官一人前来，忙问："噢，周恩来先生呢？"

"正在与一个地方名流谈话，即刻就到。"副官报告道。

蒋介石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在屋内踱了几步，正待出门，却见周恩来大步跨了进来，说："委员长先生，晚来了一步，恕罪恕罪。"

蒋介石迎了上来，微笑道："周先生，难得今日有暇，天气又好，特邀你去祝融峰观景，不会拒绝吧。"

周恩来望着蒋介石，深沉地说道："多谢委员长，如今遍地烽火，金瓯半缺，生灵涂炭，游兴早已殆尽。不过委员长既有这个雅兴，岂有不陪之礼？"正说着，副官已叫轿夫把油布竹轿抬了进来。周恩来见是坐轿，便委婉地说："委员长先生，坐着轿子观赏风景，不太自由，再说山路陡峭，人苦我乐，心中也不自在，我看还是不坐为好，古人说'安步当车，捷足先登'，我们就来个'安步当轿'吧。"

蒋介石平素喜欢坐轿，被周恩来一番话顶了回来，心中顿时颇感不快。但想到在共产党人面前，思想要开明进步一点，大度地苦笑了一下："周先生说得对，我等遵循总理教诲，为民众效劳，如今坐轿游览，必为天下人笑矣。"说完向轿夫摆摆手，叫他们回去。

周恩来却叫住一个轿夫，拿出4块银元放在他的手里，说："老乡，对不起，耽误了你们的时间，我给你们每人一块工钱。"

"不，先生，您又没有坐轿，哪能要你的工钱？"轿夫慌了，连连后退。

"老乡，拿去吧，过日子不容易啊！"

轿夫捧着银元，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双目湿润润的。

蒋介石面孔微微发红，他装着没看见，在侍卫副官的陪同下，与周恩来一道向祝融峰攀登。

投龙潭寻古

在抗战会议上，国共双方的气氛比较融洽，而且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共产党派出教官，帮助国民党中层军政人员训练游击战术，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具体培训对象是全国各部队的营长以上，师长以下和各地方县长以上，专员兼保安司令以下的干部。

在此之前，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曾代表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日寇的战略战术是速战速决，我们则要打持久战，战术上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为主，正规战为辅一套战胜敌人的方法，因而建议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面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泛开展游击战克敌制胜的事实，以及国民党军队都不懂游击战术的弱点，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天下午，山风不吹，气候暖和，是南岳山区初冬难得的好天气。蒋介石同周恩来离开磨镜台住所，边走边谈，不觉来到水帘洞。这水帘洞又叫"紫盖仙洞"，是南岳"四绝"之一，向有"名山洞府"之称，经过历代道家羽流玄虚地张扬，更是神乎其神。

"南岳真美！祖国的河山真美！"周恩来仰望着瀑布飞流，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是呀，周先生，到下面的投龙潭去看看，那里真有趣呢！"蒋介石撇开副官，拉着周恩来的手往下走，边走边说："这个投龙潭，原叫湃水坑，传说唐代天宝年间，李隆基派钦差大臣千里迢迢，赶来南岳祭奠，投下金龙玉简，祈求长生不老……"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历代的皇帝都想长生不老，寿如松鹤，但适得其反，他们都是短命的；唐朝从德宗到

文宗，6个皇帝平均寿命不到39岁。"

衡山历来石刻很多，蒋介石边走边看，从这一块石头跃到那一块石头上，寻寻觅觅，指指点点，兴致极高。这时，他似乎成了一个与世无争、超凡脱俗的闲客。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一块高平如台的大石上，上面刻着两尺见方的4个大字："醉眠观瀑"，下面自题一行小字："次青仿陶"，蒋介石瞧了好一阵子，嘴里喃喃念着"醉眠观瀑"，神情似有不解。

周恩来说："委员长先生，这字的功力不错，遒劲如虬，坚质浩然。"

"对，对，见字度人，看到它，我的脑海里便立刻出现了一个烂醉的狂人，躺在这石头上观看水帘洞的瀑布，但不知道这个自题'次青仿陶'的狂人究竟是谁？你看，那边石头上边刻有'冲退醉石'的题解呢。"

周恩来笑了笑说："委员长，'次青'就是清末湖南平江的李元度嘛，元度字次青，晚年自号醉壶老人。他曾辅佐曾国藩、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官居高位。我们在水帘洞石蹬上看到的'夏雪晴雷'4个字，也是他题的。你读过他的《水帘洞新建雪浪亭记》吧？他在那文章中自称仿效陶渊明，当冲退居士。这冲退居士就是宋代成都人章察，他不愿做官，整日酗酒，高傲跅狂，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去，宋神宗还算开明，没有要他的脑袋，还赐了他'冲退居士'、'冲退醉石'的雅号呢。"

蒋介石一听，连连顿首，对周恩来的博闻强记内心深深叹服。其实，来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就这些知识向颜友民问个清清楚楚。颜友民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是个老学究，也是一个"南岳通"。他之所以故作不知，为的是摸摸周恩来的"底"。

(选自《炎黄春秋》，梁贤之)

党的民主集中制四项重要纪律的产生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进一步规定："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好象一个人一样的程度。"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重要纪律就被提出来了，为后来党的民主集中制纪律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中共党史导读》)

举世无双的"将军科"

说起我党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无人不晓，但"抗大"的"将军科"却又鲜为人知了。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但沿途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到达陕北后，仅剩3万人，而且军队干部也损失颇大。为培养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技术水平，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的前身)。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在保安县城，红大召收第一批学员。他们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学员38人，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有伤疤3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200万银元之巨。

(选自《党史纵横》，张告)

十二烈士山

1938年3月18日，第5军第3师8团1连的14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的带领下，准备和总指挥部派来的交通副官张凤春一起到蓝棒山的李炮营集中。当他们行至宝清县石灰窑南沟的时候，突然与200多名日伪军和100多名伪兴安军骑兵遭遇了。伪兴安军是日本人在伪兴安省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个个善于骑射，人人凶狠残暴，烧杀成性，战斗力很强。为了迅速剿灭松花江下游的抗联队伍，他们特地将伪兴安军的3个团调往富锦、宝清一带。

此时，李海峰他们可以继续前行进到山里去，那样他们自己可能安全些，但李海峰怕抗联密营因此会被敌人发现，所以他没有进山，而是带领战士们抢占了头道卡子附近的小孤山，与将近20倍于己而且装备精良的敌人进行了长达一天的鏖战。

稍具军事常识的人就可以想象出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会是多么惨烈。但想象毕竟是虚的，还是让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张凤春的述说吧：

"李连长带领小队抢占了前方一座小孤山沉着应战，

我们利用小孤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与400多敌人鏖战一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在面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活着的人用白雪匆匆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后继续战斗。李海峰连长发挥了'射手之王'的威力，由杨德财给他押子弹，三支连珠枪轮着用，一枪一枪地打，枪响人倒。后来他双腿打断了，就由我和杨德财两人抬着他转移阵地继续战斗，……班路遗指导员和张全富都受了重伤，他两个共同抵挡20多个日本兵，结果班指导员光荣牺牲，张全富拉响了最后两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战士小王黑子是依兰人，牺牲时一条腿跪在深雪里，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呢！他只有18岁……"

日本人见强攻不下之后，便在东山上架起了迫击炮，向小孤山猛烈轰击。临近傍晚的时候，李海峰命令张凤春和另外3个人转移，他自己在掩护张凤春等突围之后，和留下来的战士们把枪摔碎……

当敌人再次冲上来时，他们痛骂不止，最终以身殉国。

此一战，李海峰等共击毙击伤日伪军100多人，攻上山顶后的敌人极为恐慌，只拖走了30多具同伴的尸体便匆匆离开了那里。

不久，第2路军总部为李海峰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季青饱蘸浓墨，写下了一篇"十二烈士山记"。在这篇记后，有诗赞道：

蓝棒山顶云雾重，
宝石河边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
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
倭奴蒙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
胆壮气豪动鬼神。
不惜捐躯为革命，
但愿失土早回归，
他年民族全解放，
指点沙场吊忠魂。

（全勇：《黑白关东》）

宝塔山的述说
——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纪实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我只讲一件56年以前耳闻目睹的往事，说说日本强盗的残暴和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8年的初冬季节，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大队，担任第一队的队长。第二大队驻地在柳树甸，处于延安城东5公里，经过桥儿沟和飞机场，就到达延安城的东门。

一个星期天，上午10时左右，我正在队部召集一个会议，听取区队长、司务长汇报工作情况。忽然听见嗡嗡嗡一种巨大的怪声传来，我们赶快跑出去，登高了望。只见10多架日本飞机，飞得很低，自东向西，编成三角队形，冲向延安城。接着就辟哩啪拉，投下大串炸弹，很快又听到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袭击耳鼓。延安城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心里很清楚，这是日本侵略者的空军肆虐、屠杀中国人民。

第一批飞机扔完炸弹之后，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千百颗炸弹，把小小的延安城，轰得断墙残壁，成了一片废墟。人民的血肉横飞，死伤难以计数。因为是星期天休假，上街的人特别多，我们第一队的学员，也有一些人去访亲问友，幸而他们亲友大多数住在清凉山和宝塔山，到城内去的只有数人。大轰炸过后，学员们赶紧回队，向我汇报情况。那时候延安城内还是经济文化中心，商店林立，物品丰富，尤其是西山（凤凰山）脚下的新华书店，总是挤满了人。许多新到延安的人，更要利用星期天这个机会，去逛逛大街。

本来对于日本飞机要轰炸，上级早有通知，并三令五申，大集会、听大课都不在延安城内，都是在城外的山沟里。可是星期天休假，无法规定禁止进城。所以，这第一次大轰炸，损失很大，人员伤亡很多。

据回队的学员说：延安防空戒备很差，先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后听见拉警报，实在是猝不及防。千百颗炸弹连续轰击，房屋倒塌，火光冲天，人员也缺乏防空常识，刹那间尸横满街，血流成河。

居住在延安老城内的老百姓，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从来没有遇见空袭，不知道大轰炸这样残酷。外地来延安学习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也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同样缺乏防空经验。

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的大队长徐清操同志，在星期六晚上刚刚结婚，星期天这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妻上街，恰巧碰到这次灾难。徐清操是红军指挥员，经历过无数次的轰炸，听到炸弹声呼啸而至，就赶紧就地卧倒。他的妻子张放，是一位能歌善舞唱一口好京剧的活泼女郎，却不懂防空常识，在炸弹落地时乱跑，当即被炸死。事后，徐清操把爱妻埋在宝塔山下，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亡妻张放之墓"。以后我们每次路过此地时，面对石碑沉思，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

延安城内的机关学校，大部分早已疏散到附近的山沟里，挖了黄土窑洞，住在里面很安全。中共中央组织部

尚未迁移，仍住在西山半腰的几排窑洞内。陈云部长的窑洞周围落了好多颗炸弹，虽然十分危险，但他安然无恙。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些窑洞，住着来来往往调动工作的许多干部，其中有一个窑洞的土层不厚，被一枚重磅炸弹命中后，窑洞倒塌，里面有数十人埋在黄土之下，为革命事业殉难。

吃一堑长一智，原来不乐意搬家的老百姓，这次不要动员，都自己另找新居，延安城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空城了。至于机关、学校、部队，领导上早有安排，迅速迁移到城外。此后延安的经济贸易商业中心，搬到南门外的新市场，是一条既深又长的山沟。延安的文化、政治中心，集体活动在北门外两三公里处的若干山沟里。中央组织部住的山脚下新建了礼堂，供各种会议之用。杨家岭住着中央大部分首长和办公厅，王家坪是中央军委机关，住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

第一次大轰炸之后，日本飞机仍然不断空袭延安，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有些收获。1939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延安缺少钢铁农具，我们在炸弹废坑中挖出许多炸弹皮，为大生产制造农具。

有一次我带领学员在清凉山上一个弹坑里，挖出了一个完整的飞机炸弹。我们请来军工局的技术人员，他们把引信取下来，这颗直径60公分、长度两米多的钢筒子和里面的黄色炸药，全部被兵工厂利用。据延安各单位的统计，数年内挖出的炸弹皮有5万公斤以上，这都是优质钢，解决我们不少问题。

（选自《党史纵横》，作者：曹慕尧）

《西行漫记》问世记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的时候，一位美国人约翰·里德以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报导了十月革命起初几天的情形，书名为《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曾为它写了序言。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伟大转折的时期，另一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惊人的洞察力和生动的笔触，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不朽之作，第一次向全世界报导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色中国的情况。

约翰·里德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埃德加·斯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作为记者和作家，为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作了一次被西方人称为惊人的冒险行动。

1936年3月，斯诺与马海德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帮助下去陕北，因故受阻于西安。同年6月，他又一次从北平出发，这次旅行受到我党极大的重视。柯庆施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由在北平做秘密工作的徐冰转交给斯诺。在西安，同上海地下党有关系的王牧师（董健吾）与斯诺取得联系。红军联络员刘鼎和邓发为斯诺的行程作了妥善安排。在苏区前敌指挥部，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个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

斯诺在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他又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堡——这里是和国民党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采访了驻守该地的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最后他又冒着炮火折回保安。

当时陕北红军还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之中，环境非常严酷，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斯诺在陕北四个月，到处奔波，深入采访，许许多多动人的事例，使他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红军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妇女、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比较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他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爱憎分明，把自己的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3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抗日剧社在保安县城西南的周河边演出话剧《侵略》，内容是讲一个日军闯入东北一农民家中喝酒，要这个农民爬在地上给他当椅子坐，喝醉了酒又侮辱农民的妻子。正演到这里，愤怒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了用生硬的中国话喊的口号："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死日本凶手！"大家举目望去，只见一个手拿照相机的"洋人"，正怒气冲冲地举着拳头。他身边草地上还坐着毛泽东，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洋人就是斯诺。

斯诺回到北平，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导。然后汇编成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到11月已发行了五版。原书很快被译成俄文，在苏联销行极广。不久又被译成法文、瑞典文。美国版也在1938年1月发行。以后又被译成德、西、意、葡、蒙、荷、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以及印地安方言等近20种文字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被西方评论家称誉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斯诺从北平回到上海英租界的旧居麦特赫斯脱公寓。11月下旬，斯诺接到伦敦戈兰茨公司航空邮寄的《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正好在他家里，就向他借阅，阅后觉得应该尽快翻译出版。斯诺表示积极支持，愿意把一些材料和中译本的版权让给复社。

为了尽快翻译出版，中共地下党员和一群进步人士，

聚集在巨籁达路(今巨鹿路)156号胡愈之寓所开会商量,决定由王厂清、吴景崧、邵宗汉、林淡秋、胡仲持、倪文宙、陈仲逸、梅益、章育武、傅东华、冯宾符等11人参加翻译。其中,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为了争取时间,将全书拆成11份,每人翻译1份,要在一星期内完成,然后集中起来,再由胡仲持统一校对。

翻译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上海对苏区的情况很少了解,书中提到的一大堆人名,像毛、朱、周、刘、彭、贺等是大家知道的,有许多不清楚的人名,就只能根据音译,中文究竟应该怎样写就吃不准。例如康克清,现在已为大家所熟知,在50多年前,谁也不知道是哪三个字。后来刘绍文到上海,才弄清楚一些人名,但仍有许多写错的,如谢觉哉写成谢觉之,贺子珍写成贺紫莲,因此在初版的译者附记中写了以下一段话:"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曾经用极大的力量,查出那些英译人名、地名及各种专用名的原文,这对于读者有许多的便利。自然还有一小部分无法查出,只好音译。读者如有知道这些原名的,希望通知,在再版时改正。"

斯诺为中译本的出版,赶写了一篇《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并对原著作了一些增删,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差不多都是英、美版本所不曾发表过的,不少人物照片,是破天荒第一次发表。另有一部分照片,是继斯诺之后,于1937年4月去陕北采访的尼姆·韦尔斯(斯诺前妻,《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提供的。

对于书名究竟如何翻译,颇使大家伤脑筋。上海的中国军队已于1937年11月11日撤退,英、法租界当局宣告中立。但整个租界也在日军包围之中。当时称为孤岛。一天,于伶等去新光大戏院准备租剧场演戏,受阻于南京路。原来那天侵华日军为庆祝占领上海,在南京路举行大游行;游行至南京路靠近福建路时,一位爱国同胞从高楼上纵身跳落在日军队伍中间,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中国人的这种不畏强暴勇敢牺牲精神,把不可一世的侵略军吓得惊惶失措,立即在南京路一带实行戒严。在这种情况下,要用《红星照耀中国》的书名公开出版发行是不可能的。大家几经推敲,并征得斯诺的同意,选用了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作书名。

出版《西行漫记》最大的问题是经费问题。地下党是没有什么经费的,革命者是提着头干革命的。参加翻译的人虽然分文不取,但要出书没有钱可不行。只得通过党的外围组织和救国会的各个系统在内部预约,先付钱买购书券,待出书后凭券领书。单凭这些钱是不够的,还得设法向社会募集资金应急。

当时上海的企业家、银行界、文教界的上层人士章乃器等,在八仙桥青年会组织"星期二"聚餐会。在一次会上提出要为"复社"出《鲁迅全集》筹集基金。参加会议的中汇银行经理姚惠铨等曾捐助了一笔钱,这笔钱就先拿来出《西行漫记》。

据于伶和杨帆讲:1937年潘汉年正在上海,他是由我党任命的与国民党中央谈判的代表。杜月笙知道国共要合作,也派人找共产党代表谈谈。潘汉年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与杜月笙多次接触,还应杜的要求请章乃器去讲《资本论》,艾思奇去谈《辩证法》。杜月笙听后还要求了解共产党和苏区的具体情况,问潘汉年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可以给他看看。潘说有一本刚出版的具体介绍共产党和苏区情况的书,是一位美国人写的。杜说洋人写的更好。潘说不过是英文的。杜说:"赶快找人翻译出来,我要一千本,先付一千块银元。"

《西行漫记》就是这样千方百计筹钱出书的。用现在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多渠道集资。有了钱立刻交由科学图书馆印刷。这本有30万字和许多图片的《西行漫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翻译到出版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工作效率之高是非常惊人的。

出书后,通过救国会以及各种进步组织在内部多渠道发行。南京路的德商别发洋行也公开发行一部分。杜月笙买去的一千本,签上他的名字后分发给各路门徒阅看。因此,《西行漫记》不仅在爱国进步群众中广为传播,三教九流、诸色人等在暗地里也争相传看。出版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港、澳及海外华侨、华人集中的地点,并且出版了许多重印本和翻印本。

后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写了一个关于1938年和1939年工作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志阅后在批示中,对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新闻、出版、戏剧活动、难童教育等四方面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在出版工作中特别提到《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翻译出版工作非常及时,印刷装订很出色,在当时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使人看了会产生中国人的自豪感。

《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确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那时正在上海读书的陈一鸣说:"我们拿到这本红书,争相阅读,心情振奋。在上海的一百多所大、中学校里,特别是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里,普遍传阅或讨论。有的地方,一本书被拆成几部分,几个同学交换着看。青年们热爱这本红书,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热情,走上坚持抗战和革命的道路。我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促进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确立而投身革命的。"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在《崇敬和感激》一文中也谈到:"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秘密地离开上海……最后到达了陕北,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七·七"事变后,爱国将领何基沣率一七九师参加保卫大名的血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何悲愤

已极，感到报国无门，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言而自杀。被救后，他在迷惘之际，中共地下党员李萨南介绍他看了《西行漫记》，使何精神振奋，改变了消极悲观的情绪。以后他又秘密去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多次交谈，深受教育。他断言“没有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希望”。不久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与张克侠将军共同率领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起义；以后又率部抢渡长江天险，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下新功。

《西行漫记》这本光辉著作，自1938年首次翻译出版，至今已整整55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沧桑变化，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这本巨著的时候，仍会感受到它的巨大生命力。

55年前，为《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发行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可贵贡献的同志，有的留下了姓名，有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今天，当年参加工作的同志，大多已长眠于地下。在纪念《西行漫记》翻译、出版55周年之际，我们深信，他们的业绩，将和这本光辉著作一样永垂不朽。

（孟波，《大江南北》94年2期）

戴笠香港被扣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连同由他控制的军统组织撤到了重庆，以重庆为基地，继续从事搜捕、刑讯、暗杀等活动。

戴笠到重庆不久，为处理国民党密码专家温毓庆久留香港，不肯回重庆这一事件，曾专程去了一次香港，演出了连戴笠自己也不能想象的一幕。

温毓庆是国民党的密码专家。抗战开始不久，他即前往香港，不愿返回重庆。尽管他滞留香港，并无显明的投敌意向，但因他在国民党中主持密电破译工作多年，知道的机密极多，因此他的滞港不归，对国民党来说，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对于温毓庆的异动，戴笠大为光火。但因温身处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戴老板不能采取强硬措施，而只能采用缓和的解决办法。他先急电军统局属下的香港组织，让其设法劝说温从速返回重庆。这一招失灵以后，戴笠便决定，亲自出马，奔赴香港处理此事。

戴笠赴港的消息，很快地为温毓庆所得悉。温深知，戴笠的香港之行，是奔他而来的，便马上采取预为防范的措施。他一方面要求港英政府加以保护，一方面制造戴笠要来香港从事恐怖活动的舆论，借此阻挠戴笠的行动。香港总督葛洪量本来就对戴笠过去一贯派遣特务在香港从事暗杀活动深为不满，现在得到他自己要到香港从事恐怖活动的报告，就立即作出安排，要警务处在戴笠抵港时将他扣押，以此煞一煞他的嚣张气焰。

一天，军统局在香港的特工人员郭斌，按戴笠拍来的电报的要求，赶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他看到港警如临大敌，就揣测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当他发觉港警手中都持有戴笠的半身照片后，他就明白了一切。

事态严重，郭斌感到，按当时的情形，他要把自己侦察到的情况直接报告戴笠是不可能的，或许能通过内线作出暗示，让戴笠加以防范倒是上策。主意打定以后，郭斌寻机接近由他安插在机场上的特工人员，扼要地向他介绍了事情的缘由，嘱咐他务必寻找机会接近下机的戴笠或其随员徐锦成，向他们透露消息，以便他们有所准备。

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后，戴笠随着旅客的人流走下舷梯。他扫视了一下机场，凭着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马上感到机场上的戒备是不同寻常的。在他的判断得到了安插在机场上的内线所作出的暗示的印证以后，便不动声色地同徐锦成交换了手中的小藤皮箱。由于他们两人所提的皮箱完全相同，他们的“调箱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徐锦成从戴笠手中接过装有戴氏常用的手枪、密电码本的皮箱以后，悄悄地向内线示意了一下，就把皮箱放在一旁，让他妥善处理。内线得到暗示，心领神会，就很随便地将那个皮箱归并到其他从飞机上取下来的行李之中，装上板车，由机场边门送了出去。

戴笠和徐锦成把足以使他们被羁押的证据藏匿起来以后，便若无其事地走向出口处，应付港警的检查。

港警满以为在戴笠随身携带的皮箱内能得到指控他的证据，可当着他的面打开皮箱一看，里面除了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他平时洗涤鼻子用的药水、器具外，别无他物。这使港警极为尴尬。尽管，港警没能发现戴笠携带的违禁物品，但考虑到他不会无缘无故奔赴香港，而且事先已经得到了举报，香港警务处仍将他囚禁了两天。

戴笠至死也想不到，象他这样一个动辄可以捕人、杀人的混世魔王，竟然会成为阶下囚。因此，当港警查不出戴笠从事恐怖活动的确凿证据，向他说明事出误会，让其自由行动时，他坚决予以拒绝，要求香港总督说明扣押他的理由，以挽回他的面子。

香港政府并不理会戴笠的要求，但顾及到国民政府军令部和外交部分别就此向港英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和抗议，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由总督葛洪量亲自护送戴笠乘专机返回重庆，并就此事向国民党政府正式道歉，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自从那次在香港丢了面子以后，戴笠一直耿耿于怀，经常大骂英国人，以发泄他曾栽在英国人手下所产生的

愤懑。

（蒋纬国）

侵华日军中的军妓

抗日战争的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派遣大量作战人员来华的同时，为解决官兵的性欲问题，还强征了数以万计的妇女来到中国，以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发泄兽欲的工具。这些强征来华的妇女，就是使世界为之震惊的随军慰安妇。

随军慰安妇，是日本军政当局鉴于本世纪初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在西伯利亚肆意践踏妇女，结果有七分之一的官兵染上性病，无法继续服役，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日本官兵的强奸行为，避免激起各地的抗日烈火而强行征招来的随军妓女。这种军妓制度，是在1938年由军部通令开始实施的。通令指出："为能有效地降低日本驻海外士兵的强奸发生率，以减少被占领国人民因此而采取的对日军巡逻队的报复行动，各部队应迅速建立一个能使日本兵士在作战空暇时，在性方面可得以充分满足的机构。"由于军方提倡甚力，这种机构便在中国各地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来。

最初被遣来华的日军慰安妇有两大类：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日本妇女是由军方授意某些商人、流氓在各地征招的。军方之所以不直接出面，是因为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引起民众的厌战，使战争能按他们的要求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万一东窗事发，他们可以推卸责任，逃脱罪责。毕竟是在日本国内，由那些商人、流氓招募随军慰安妇，并不是无所顾忌。于是，他们不是把本来就以出卖肉体营生的日本妓女当作目标，就是转而把目标指向朝鲜。

朝鲜从1910年起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样朝鲜在各方面都成了由日人任意宰割的对象。包括强征朝鲜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在日本本土，招募军妓，只能偷偷摸摸进行；而在朝鲜，那些以后被派遣到中国等地的慰安妇，大多是由日本军警把她们抓起来后迫使他们就范的。

日军强征随军慰安妇，开始是把中国妇女排除在外的，目的是避免刺激中国人的抗日情绪。然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战斗人员的迅速增加，军方就不再顾及这一点。于是，强迫中国妇女为妓的现象便大量出现。1992年2月6日，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伊东秀子在东京向新闻界披露，仅在侵华日军驻守南京的第十五师团中，就有940名随军慰安妇，其中的百分之四十是中国妇女，其余为日本和朝鲜妇女。这部分以往从未公开过的历史资料向世人表明，侵华战争作为随军妓女被日军蹂躏的，不仅有中国妇女，而且所占的比重还不小。

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妇女被日军强迫征募到军队成为慰安妇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当军人泄欲的工具。据现住在九州的老妇栗富士回忆，当年在从上海开发到杭州的180公里路程中，她们走走停停，一共花费了20小时的时间。其间，光她一个人，就接了19个客人。当她们再次出发前往长兴之时，军医鉴于栗富士虚弱腹痛，为她开出了诊断书，交待部队让她抵达长兴后休息3天。然而，到长兴后，贾富士根本得不到休息，第一天，她和另外两名朝鲜妇女仅在白天就为贪婪的日军提供了60次特殊的"服务"。

除了在泄欲之时，那些疯狂的军人尚把慰安妇当成是人外，其他场合，她们的处境则与畜牲没有多少差别，有时甚至连牲畜也不如。按照日本军方的规定，军船所能运载的"动物"，限于军人、军方聘雇人员、军马、军犬、军鸽五种，连日本红十字会招募来的护士，也得补办聘雇手续才能上船。军方不愿意正式聘雇随军慰安妇而徒留罪证，便以"军用品"名义暗渡陈仓。于是，慰安妇只能呆在船的底舱里与马匹为伍。

与牲畜呆在一起，对于慰安妇来说，境遇还算是好的。更糟的，是她们在慰安所里的遭遇。据当年驻扎在河北定县灵山镇的前陆军中士原田和男追述：1941年，当他在北平完成了一项任务回部队驻地的时候，被一位上士拉到了一家"慰安所"。接待他的慰安妇是日本熊本县人，是一个大美人，但脖子上已有一道很显眼的疤痕。当他问起他的伤痕的来由时，她说，有一次一个军官让她把香烟插到阴道里去，因为她说她不是玩具而加以拒绝了，这个残忍的军官就用军刀割了她的脖子。

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而遭受的又是非人的折磨和摧残，绝大多数慰安妇不是遭到日本兵士的虐杀，就是死于疾病和贫困，还有些因经受不住压力而自寻短见，侥幸活下来的只是极少数人。即使是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生活对她们来说已无甚意义了。据17岁时就被日本人骗到九州的朝鲜妇女金浩淑称：当她被装上船运到中国北部、强行分配到日军妓院里、成了日军的慰安妇后，她感到她的"青春被毁了"，她"所想的是不如一死了之"。

事实上，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慰安妇本人。曾出面带人去朝鲜抓过妇女的日本山口县前劳务报国会动员部长吉田清治说："我们抓到的妇女几乎都是结过婚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孩子的母亲。孩子们死活不愿离开妈妈，我们用暴力拆散了他们"，"那些孩子现在已50多岁了，打那以后再也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他们不会忘记与母亲生离死别的情景……"

日本在侵略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时所推行的随军慰安妇制度，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它给人们所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一点上，当时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的不少人在醒悟以后的表述是颇有说服力的。"把殖民地的良家妇女抓来当军人发泄性欲的慰安妇，在现代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纳粹德国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全世界只有日本犯了这种罪”。“战争时期的日本军队不是有纪律的军队，而是始终根据天皇的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被拉到军队的随军慰安妇的悲惨情形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的。”

对于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我们绝不能够忘记！

（裘适）

郭沫若戏为陈铭枢作嵌字对联

陈铭枢，字真如，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与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相识。“九·一八”事变后，陈任京沪卫戍司令，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是著名爱国将领。抗日战争初期，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陈铭枢任政治部指导员，这对离别十年之久的老友又聚首了。

陈铭枢笃信佛教，是有名的佛学家桂百炼的弟子，他的字曰“真如”是取自佛教经典《成唯识论》：“‘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约言之，“真如”即是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的意思。这表现了陈铭枢的真理观。

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患病。有一次陈铭枢来看望他，谈话中议论起桂百炼先生的辞世诗，这时陈请求郭把他的名字“真如”拆开嵌入对联。郭沫若早年在留学日本时，曾听过桂百炼先生讲《大乘起信论》，对陈铭枢的这位老师颇有印象，但他从1924年起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不信佛。他在陈铭枢提出作对联的要求后，略加思索，即写下了如下一副对联：

真理唯马克思主义，

如来是桂百炼先生。

这表现了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说明科学的真理观与宗教的真理观根本不同，其意是劝老友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流 行 风

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保卫我们的土地》——完成于1938年1月，是“中制”成立后的第一部故事片，吴蔚云摄影，魏鹤龄、舒绣文主演。影片描写东北的刘山（魏鹤龄饰），在“九·一八”事变后，带着妻子（舒绣文饰）和弟弟老四（戴浩饰）流亡到南方小镇洛店。经过夫妇俩辛勤劳动，重建了新家园，过着安定的生活。6年后，“八·一三”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洛店小镇，刘山夫妇决定不再逃难，并动员乡亲们，大家一起拿起武器与守军共同抗敌。但一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刘老四，却被汉奸收买，替敌机指示轰炸目标。刘山识破后，向他晓以大义，在劝阻不听时便开枪击伤了他。老四临死前醒悟过来，告诉哥哥汉奸藏在何处。最后，军民团结，消除了汉奸，向敌人冲杀而去。

电影《热血忠魂》

《热血忠魂》——吴蔚云摄影，高占非、黎莉莉主演。影片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一个旅长和他的家庭展开的。抗战爆发后，旅长告别老父与妻儿，奔赴前线，尽忠国家。不久，日寇侵占了他的家乡，对村民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旅长的父亲、妻子、妹妹及幼儿，也都遭敌人惨杀。后来，旅长带着军队打到家乡，这时，他的家已成为日寇占领军的司令部，如果消灭敌人必毁坏其家园。经过“保家”与“救国”的权衡后，他终于下令炮轰自家宅院，消灭了敌人，为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这部影片中，作者暴露了敌人的残暴，表现了爱国军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象旅长这样的军官，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少见，可以说《热血忠魂》体现了当时抗日时代的生活真实，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情绪，受到观众的欢迎。但影片在描写旅长的爱国精神、英勇抗战的同时，对人民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则未予注意与表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电影《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王士珍摄影，袁牧之、陈波儿等主演，完成于1938年7月。它表现了1937年11月下旬，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的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事迹。影片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除描写谢团长和杨营长两个爱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外，还以不少的战斗场面和生活情

节表现了爱国士兵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誓与国土共存亡的爱国精神。同时，影片还突出了上海各界人民对八百壮士在物资上、精神上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女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送去国旗的情景，十分感人，使爱国主义的主题得到艺术的升华。影片表现出一种“新闻式”的纪录“新格调”，虽有人感到“故事的连接不够紧凑，几处应有的高潮，都没有把它强调起来”，但它那纪实的内容，昂扬的激情，仍给奋起抗战的中国人民以极大鼓舞。

影片《八百壮士》仍然保留了阳翰笙一贯的热情磅礴的艺术风格，应云卫的导演也很成功。扮演谢团长的袁牧之和扮演杨惠敏的陈波儿，在表演上都很真实，又富于激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八百壮士》在大后方上映，极受观众欢迎。在香港、菲律宾、缅甸等地上映，也很轰动，在法国、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映出时，也博得好评。

电影《血溅宝山城》

《血溅宝山城》——蔡楚生、司徒慧敏编剧，司徒慧敏导演，李清主演。是根据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编写的。上海“八·一三”战役中，日寇从虹口正面攻打不下，便派援军从北面宝山一带进攻。当时防守宝山的营长姚子青和全营官兵坚决抵抗，英勇战斗，接连打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当地居民深为感动，纷纷给以热情支援。在军民合作下死守孤城，最后全体壮烈牺牲！影片表现了中国军队为国捐躯的民族气节，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爱国精神，曾在香港和南洋各地放映，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武汉上映时也非常轰动，得到爱国舆论的好评。

小说《春》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高老太爷死后，加速了高家的崩溃。高家第二代克字辈顽固、腐败、堕落，年轻一代有的在痛苦中牺牲，有的在奋斗中新生。觉新继母的侄女蕙，虽不满父亲替她安排的婚事，却隐忍着对觉新的爱情，终于在婚后病死。淑英也遭到封建包办婚姻的折磨，但觉民逃婚和觉慧出走的胜利，给她以巨大的吸引力，后在觉慧等人帮助、鼓励下，终于逃出黑暗的家庭，去上海寻找觉慧。她在信中自豪地宣称：“春天是我们的！”琴在高公馆中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星，她与觉民积极从事反封建的宣传活动，鼓励着高家的弱者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成为沉溺于苦海的淑英等人的救援力量。书中还描写因克定奸淫丫头而引起兄弟争斗；克明无法约束兄弟的淫乱，还包办女儿淑英的婚事；周伯涛的专制和顽固引起了蕙的惨死，通过这些场景的描写，预示了黑暗王国末日将临的趋势。

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

以“八·一三”抗战为题材，描写了从抗战开始到上海沦陷四个月中上海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表现各阶级、各阶层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广大市民动员起来热烈地投入募捐、慰问等帮助难民的救亡活动；转运行老板陆和通为爱国热情所鼓舞，主动地捐出卡车并亲自随车向士兵慰问；民族资本家何耀光从祈求同日本和平以发展民族工业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终于走上抗日的行列。另一方面，汉奸分子嚣张地利用伤员的不满情绪，散布失败主义；托派分子利用刊物，散布种种消极论调；奸商勾结国民党要员利用抗日大搞投机活动，国民党政府人员纵容汉奸，为非作歹。经过八十多天的血战，上海终于沦为孤岛，广大爱国青年在斗争中练就了坚强的意志，有的转向农村去做群众工作，有的留下来坚持地下工作，有的奔赴抗日根据地。作品痛斥侵略者的暴行，揭露汉奸、托派的嘴脸，批判国民党当局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错误，歌颂了上海人民英勇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

小说《梦之谷》

作者萧乾，主要内容：

写一场被摧残的初恋的悲剧。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北方知识青年，因遭政治迫害流浪到岭东，后在某中学任国文老师。一次，在为推广国语运动筹款中与受后母虐待的姑娘相恋，并在岛上充满情趣的幽谷中欢度蜜月。一个有“党部”作后台的地痞刘校董，倚仗财势，将孤女霸占，使那场美好的姻缘以悲剧告终。

作者把“我”当作星星，姑娘当作月亮，想时刻相伴，但云彩（刘校董）还是遮住了明月和疏星的爱的光辉。小说揭示了穷人没有享受爱的权利，对吃人的旧社会作了有力的控诉。作品受英国心理派小说影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浓郁的抒情融会在一起，抒发一个在华北平原长大的青年对海的赞美，写得富有诗情画意。

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田间）

诗《走向北方》

穿过了滴绿的树林
与淡墨水的远山，
赭石色的大路上，
我们以沉重的脚步
走向北方。
北方是广阔的，
那些线条模糊的地方
我们走近了，
更想望着
那更远的
蒙在白云下
爬上青苔的古城，
以及插上瓦松的黑色的屋脊。……
每天，
我们跋涉在
灼热与尘封的大路上。
沙子与汗水填在耳根，
贴在背上的
是湿答答的汗衣，
沙子钻破了草履呵，
一天天
我们底脚掌磨得更粗糙了，
我们将以粗糙的脚趾
快乐而自由地行走在中国底每一条路上。
吻合着祖先们底足迹。
晚间，
我们投落在
墙壁霉湿的屋子里，
围着跳跃的烛光，
用生水吞着那走了味的麦饼，
草席上我们脱下沾着泥土的鞋，
“记忆”数着大路上的脚印：
哦，那停住了呼吸的农场上底风车，
那悬在木门上的锈绿的铜锁，
它们底主人走了，
只留着黄犬叫着寂寞。……
烛火跳跃着，
灼热的心也随着烛水跳跃着呀！
祖国呵，
我们为着争求您底自由与光明，
灼热的心无时不是在追逐着遥远的风沙，
而不辞万里的行程啦。
烛火以微弱的光
剪破了黑暗，
我们微弱的力量
将也能如一星燎原的火
而递燃着四万万五千万支灯芯焰吗？
烛火跳跃着，
我们以红色的笔
勾写着明天的计划与行程，
在明天呵，
我们更将坚决勇敢地走向北方的北方。

（邹荻帆）

歌曲《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铁壁铜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歌曲《歌八百壮士》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战旗在重围中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
十万强敌不敢当。
我们的行动伟烈，
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历史档案

1938年2月新四军战斗序列表

军　　长　叶　挺
副 军 长　项　英
参 谋 长　张云逸
副参谋长　周子昆
政治主任　袁国平
政治副主任　邓子恢

部队	职务	姓名
第一支队	司令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傅秋涛
	参谋长	胡发坚
	政治主任	刘　炎
第一团	团　长	傅秋涛(兼)
	副团长	江渭清
	参谋长	王怀生
	政治主任	钟期光
第二团	团　长	张正坤
	副团长	刘培善
	参谋长	王必成
	政治主任	肖国生
第二支队	司令员	张鼎丞
	副司令员	粟　裕
	参谋长	罗忠毅
	政治主任	王集成
第三团	团　长	黄火星
	副团长	邱金声
	参谋长	熊梦辉
	政治主任	钟国楚
第四团	团　长	卢　胜
	副团长	叶道之
	参谋长	王　胜
	政治主任	廖海涛
第三支队	司令员	张云逸(兼)
	副司令员	谭震林
	参谋长	赵凌波
	政治主任	胡　荣
第五团	团　长	饶守坤
	副团长	曾昭铭
	参谋长	桂蓬洲
	政治主任	刘文学
第六团	团　长	叶　飞
	副团长	吴　焜
	参谋长	黄元庆
	政治主任	阮英平
第四支队	司令员	高敬亭
	参谋长	林维先
	政治主任	肖望东
第七团	团　长	杨克志
	政　委	曹玉福
	参谋长	林英坚
	政治主任	胡继亭
第八团	团　长	周骏鸣
	政　委	林　凯
	参谋长	赵启民
	政治主任	徐祥亨
第九团	团　长	顾士多
	政　委	高志荣
	参谋长	唐少田
	政治主任	郑　重
手枪团	团　长	詹化雨
	政　委	汪少川
军直教导队	队　长	周子昆(兼)
	教育长	冯达飞
	政治主任	余立金

《新华日报》发刊词

在民族自卫战争的怒潮中，本报得与读者诸君及全国同胞相见，本报同人实觉无限之感奋及欣幸，甚愿于此相见之初，一倾本报创立之初衷及今后努力之鹄的。

日寇猖狂，国家破碎，我前方数十万将士正以热血头颅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流血牺牲，我后方千百万民众亦正以英勇坚毅之精神为前线之胜利而努力奋斗。全中国沸腾着。"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今天成为响彻于全中国的雄伟壮烈的呼声。我们坚信在伟大的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力量更广泛的动员，更严密的组织，更亲切的团结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战胜日寇，维护我们珍贵的民族生命的。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下，本报将尽其棉薄提倡与赞助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力求其迅速确实的实现；而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本报亦将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本报愿与全国一切志在救国的抗日战士与同道，互相勉励，手携手地共同为驱除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不仅如此，我们深信，当前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自卫抗战实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必经途径及其起点。为我们民族的光辉的前途计，不仅需要在今天全国同胞精诚团结共同救国，而且需要在抗战胜利后和衷共济共同建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儿女们近百年来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所力求实现的理想，我们愿意在踏着先人们奋斗的血迹而为这崇高的理想而斗争时担负其应尽的职责。

欲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欲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其在今天和将来，除应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这是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本报同人前曾为创造此伟大的团结而努力奋斗。于今团结初成之时，本报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本报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声；同时本报将无情地抨击一切有害抗日与企图分裂国内团结之敌探汉奸及托派匪徒之阴谋。务使实现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老幼男女之铁一般坚固的团结，并且在这个团结之中，各种力量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坚强团结，将成为牢不可破的新的长城，保护我们民族的生命，将成为坚不可碎的新的基石，创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

当此发行之始，本报更希望全国人士及读者诸君，对本报力加扶持赞助培植指导，使新华日报能与我们光明灿烂的新中华同时生长发育与同垂永久！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

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那怕它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会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选自《抗战歌曲集》，作者：贺渌汀）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国民政府令准兼行政院长蒋中正辞职，选任孔祥熙为行政院长，所遗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选任张群继任。

1月4日　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及各部长通电就职。同日，行政院举行例会，决议豁免抗战被灾区域内二十五年度以前田赋旧欠暨二十六年度田赋附加，并重申前令，责成各级政府"救济难民，抚辑流亡"。

1月14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行政院组织法》第一条条文，规定行政院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七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公布《经济部组织法》，规定设立农林、矿业、工业、商业、水利各司；修正公布《交通部组织法》。

1月19日　武汉行营正式宣布韩复榘之罪状：一、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二、强迫鲁西人民购买鸦片；三、强征捐税；四、侵吞公款；五、没收人民武器。

2月3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3月29日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月30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要案。

3月31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及《改进党务案》。《改进党务案》中决定改建总裁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

4月1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国民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宣言，蒋介石致闭幕词，旋即闭幕。

4月9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李济深、陈铭枢、方振武、谭平山、陈启修、徐谦、刘震寰七人党籍。

4月12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十五条，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性机关，"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参政员由国民党遴选产生；正副议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

4月15日　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提出重振党纪，实行民权，停止党派斗争，贯彻抗战建国目的，严惩汉奸及改善庶政等主张。

4月28日　蒋介石对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法国《巴黎晚报》记者色斯谈话指出：中国"党派之争，现已不复存在，国民政府在孙总理各项原则不受破坏下，愿与各党派携手合作，以对付共同敌人"。

6月3日　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在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代表大会发表演说，要求制止日军侵略。大会决议谴责日、德、意三侵略国轰炸中国和西班牙和平居民的暴行。

6月15日　国民政府任命王郁骏代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原任孔祥榕免职；任命陈诚为湖北省府主席，原任何成浚免职；任命蒋鼎文为陕西省府主席，原任孙蔚如免职；特任陈介为驻德国大使，原任程天放辞职照准。

6月18日　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分别发表"和平"通电，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焦土抗战政策"，蒋介石"自行下野"，北方抗日将领"回返其梓里"，两伪政权即可停止战争，恢复和平。

7月5日　行政院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参政会全体参政员，到汪精卫、张伯苓等一百五十余人。孔祥熙致词，代表政府致词表示诚挚欢迎，希望各位参政员"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随时匡助政府之不逮"。张伯苓致答词，表示此次参政会将以开诚布公、团结一致之态度，帮助政府，推动一切。

7月5日　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辞职并派其密赴日本。是日，高抵横滨。旋会见陆军大臣坂垣及首相近卫。高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把中国看成对等的国家，以利于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进行议和活动，并要求近卫首相保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

7月9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团部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指定陈诚等三十一人为临时干事，以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由朱家骅代），组成中央团部干事会。

7月11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经济部书面答复参政员关于经济部之询问九件；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答复参政员对财政部之询问七件；政治部长陈诚报告关于民众组织训练事项；中政会秘书长张群说明国民政府交议之《节约运动大纲》，并获通过。

7月13日　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口头答复参政员张申府等关于抗战建国具体计划之询问案。

7月15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闭幕。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7月28日　北平日伪当局因近日游击队活跃，出动全部警察在全城挨户搜查，并出动坦克六辆及机关枪队沿西城各街来往巡逻。警察局并发出传单，称大量日军及坦克、飞机已开到北平，要求居民对日军采取"友好态度"。

8月1日　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移重庆。

8月9日　国民政府特派张群、李国钦为中央银行理事，原常务理事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陈行、叶琢堂、唐寿民、徐堪，理事叶楚伧、王宝仑、钱永铭、陈光甫、周宗良、监事李铭、虞洽卿、林康侯、贝祖诒、徐陈冕、秦润卿、谢铭勋任期届满，均着连任。

8月11日　被困于上海胶州公园之"四行仓库孤军"第八十八师八百壮士，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悬挂国旗，与公共租界白俄商团发生冲突，被商团击毙二人，伤九十四人，团长谢晋元等十六人被扣留。

8月15日　国民政府颁布《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计十九条；废止《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

8月18日　上海"四行孤军"被辱事件，经上海各界抗争，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赞同恢复8月11日以前状态，严惩肇事者，抚恤被难士兵，四行孤军今后自由悬挂国旗，不得干涉。

8月22日　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在香港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只有将中国政府及国民党内一切与北平"临时政府"及南京"维新政府"声气相投之分子全部肃清，而后中国抗战力量在物质上、精神上始能突飞猛进，始能运用中国无尽之人力物力，驱逐日人于境外，而争取最后之胜利。

9月6日　国民政府通令各军政机关"切实保障人民合法权利"，并随令附发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之沈钧儒等人所提《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

9月9日　国联行政院会议开幕。武汉、重庆、长沙、南昌、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兰州、宁夏、迪化等各城市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国联制裁日本，援助中国。

9月16日　顾维钧在国联发表演说，提出三项要求：(一)实施盟约第十七条以制裁日本；(二)实施国联禁运军火往侵略国及在财政、物资上援助中国之决议案；(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日军使用毒气及轰炸普通人民。

9月26日　国民政府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及《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省市参议会均为咨询性机构，其决议案对同级政府均无约束力；参议员由国民政府遴选产生，正、副议长由行政院提请国防最高会议决定。

10月13日　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同日，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亦发表《告广东同胞书》，呼吁保卫广东。

10月28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汪精卫、张伯苓及参政员一百二十八人出席。林森、孔祥熙、孙科、居正、于右任等到会。林森、汪精卫致词。蒋介石未出席，致电大会望参政会研讨大计，冲破难关。大会通过致蒋介石及前方将士两电。

11月2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将会议通过胡景伊等二十一人所提《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送请政府采择施行。另通过《职业教育实施案》、《调整农业金融机构案》、《重建战时经济政策案》，并根据钱端升提议，决定设置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管理外汇及对外贸易。

11月4日　国民政府发言人驳斥日本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指出：日本之声明"实欲中国牺牲其自由独立国家之神圣权利，中华人民对此决抗拒到底"。

11月5日　国民参政会二次会议通过林祖涵等所提《严惩汉奸傀儡案》、吴玉章等所提《加强国民外交案》、陈绍禹等所提《关于持久抗战争取胜利案》、梁漱溟等所提《改善兵役实施办法案》、史良等所提《从速发展农村事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等十四项提案。

11月19日　国民政府明令废止《反省院条例》。

11月29日　行政院第三九一次会议决议通过财政部《节约建国储金条例》；福建省参议会限元旦成立；聊城专员范筑先父子殉国，呈请国府明令褒扬。

12月1日　国民政府以西康建省事宜筹备告竣，颁令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成立西康省政府。

11月30日　蒋介石下令中等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军，蒋自兼总司令，教育部长及军委会军训部长为副总司令，各省主席为各区司令，各校校长为分队长。

12月8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拟定《中国国民党党员特许登记办法》，规定凡自同盟会时期加入国民党者，只要有证件或二人以上证明者，皆可重新登记。同时决定，在陆军中设党务特派员，以政治部主任兼任；在宪兵、海军、空军、保安队、军校内，设特别党部。

12月17日　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段班级、李万华、叶秀峰、韩孟钧、王靖宇、格聪呼图克图、杨永浚、黄述为西康省府委员；任刘文辉兼西康省府主席，段班级兼民政厅长，李万华兼财政厅长，韩孟钧兼教育厅长，叶秀峰

兼建设厅长，王靖宇兼保安处长。

12月19日　汪精卫叛逃河内，周佛海、陶希圣同往。旋国民政府派正在河内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见汪，又派陈布雷前往河内劝汪改弦易撤，被汪拒绝。

12月21日　日军指使汉奸成立伪"广东省政府"，伪省府正、副主席彭东原、吕春荣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

12月25日　重庆五万民众集会纪念云南护国起义二十三周年，抗敌后援会委员郭一予主席，通过建议以"一二二五"为民族复兴节等三项提案。会后火炬游行。

外　交

1月1日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汉口成立，方振武等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

1月30日　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在经济与物质上予以有效援助。

3月29日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瑞士巴登卜郎比公司签订技术协作合同，协助机器制造厂生产发电机等各种机器，有效期十年，报酬不少于七十五万五千瑞士法郎。

4月7日　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致书中国人民，祝贺中国抗战取得的胜利，表示支援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5月5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办法。30日，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之茶叶、羊毛、生皮、锡、锑等货物。

5月17日　孙科自巴黎返抵莫斯科，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部委员莫洛托夫，次日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接见，29日返回巴黎。

6月1日　中国驻国联代表胡世泽就日机连续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残杀和平居民事，致牒国联秘书长艾文诺，要求制止日军暴行。

7月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广播演讲，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切实步骤制止日本侵略，勿以物资助日，指出："道义上之援华与物质上之助日，绝不相容。"

7月21日　日驻苏大使重光葵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从满洲境内撤退苏联边防军，否则日本当诉诸武力。李维诺夫依据1869年《中俄珲春条约》所附之地图，指出张鼓峰属苏联领土，苏联政府决不以重光葵毫无根据之要求而变更苏联部队之驻扎地点。

8月24日　外交部发言人否认英国所传意大利调解中日战争已与汪精卫达成初步谅解事，重申："我国此次抗战乃为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非至敌人放弃其侵略政策，绝无和平可言。"次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亦作同样之声明。

9月23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日本拒绝国联邀请事发表声明，要求国联立即实施盟约第十六条制裁日本。同日，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朱家骅电国联提出同样要求。

11月18日　意大利与"满洲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所订友好条约亦在罗马换文。

12月29日　新任驻瑞典公使兼任驻挪威公使谢维麟向瑞典国王巨斯达夫五世呈递国书。

10月12日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海上国际联络，在台湾集结兵力四万余人，拟犯广州。

10月14日　日军进攻广东惠阳城，守军第一五一师何联芳旅及师直属队撤往博罗，惠阳失陷。

10月25日　汉口弃守，武汉会战结束。

10月27日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高品支队及第六师团牛岛支队，相继攻陷汉阳。

10月30日　蒋介石抵南昌，批准薛岳兵团撤至修水南岸之计划，饬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统一执行。

11月9日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自东江、西江及粤汉线分三路反攻广州。是日，北路部队自银盏坳长驱南下，进抵广州北郊之江村。

11月10日　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通电誓死雪耻，宣布现已部署就绪，即行大举反攻，决心恢复广东精神而慰国民。

11月26日　南岳军事会议继续举行，蒋介石在听取新编各师师长报告后，指示应特别注意之事项十一条，其要者为：注重学习，提倡研究；整理各指挥部与司令部；注重通讯联络；整顿军纪军风；发扬官兵的企图心；建立彻底统一的国军。

12月2日　日机轰炸桂林，投弹七十余枚，延烧半日，死伤千余人。柳、邕、梧、龙、色、浔、贺各县亦遭轰炸。旋国民党桂省党部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12月3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主任。

12月7日　蒋介石视察西江，并向该地各指挥官面授机宜。次日，在桂林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复广州及防卫西南策略。

12月20日　蒋介石飞往西安视察军事，在西安接到云南省府主席龙云电报，报告汪精卫忽飞昆明，欲与日本谈判和平，询蒋曾否预闻其事。蒋复电称：此事事先并未预闻，目前绝无谈判和平之余地。

军事

1月3日 晨，日军第十师团五千余人，炮三十余门，坦克五十余辆，侵至兖州北十五里处，曲阜车站亦被陷。韩复榘炸毁兖州北之铁路桥并将军队南撤。次日，兖州、曲阜失陷。

1月7日 川军邓锡侯部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第四十一军奉最高统帅部令，开赴山东临城以北津浦线正面，支援孙桐萱部作战，是日先头部队抵滕县，即在铁路正面布防，并以一二二师守滕县。

1月8日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宋哲元等人出席，会后各携新计划分赴前线。

1月10日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特任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兼副参谋总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白崇禧为军训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

1月11日 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集第一、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报告《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承认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高级将领缺乏攻击精神，望风退却，步步后撤；提出当前的策略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

1月15日 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月17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并进行改组。

1月25日 津浦线战局吃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前线视察，部署防务。

1月27日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会同前临沂专员张里元，在当地民团配合下，进攻蒙阴，激战三日，敌不支后退，是日攻克蒙阴城。

2月4日 军政部长何应钦通令各师管区及各部队实现兵役法制精神，停止募兵，所需新兵概由各县、市义务壮丁常备队征调，入营编练；若再有募兵情事，即由地方制止。

2月5日 军事委员会公布蒋介石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演稿，长达三、四万言，自是日起此文在各报发表，并由电台陆续播发。

2月11日 平汉线第五十三军新六师高树勋部与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激战四昼夜，是日退至淇河以西，濮阳、内黄、清丰一带均陷敌手。

2月18日 日机三十八架空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武汉上空与日机激战，击落日机十一架，创武汉空战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之、李鹏翔五人殉国。

2月23日 空军远征台湾告捷。晨，空军数队集合飞往台湾，在台北及台湾西部各投弹十余枚，炸毁台北日军机场飞机数架及机场油库，午后安全返航。

2月25日 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团长濑武支队，突破济宁前线重围，以主力渡过运河，向嘉祥、金乡进攻。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曹福林部与敌苦战三昼夜，嘉祥失陷。

2月27日 临汾失陷。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犯山西省政府临时驻地临汾，在曲亭与决死八纵队激战，八纵奉命转移到翼城一带，日军攻入临汾，激战一日，是夜临汾失陷。

3月11日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发布维护治安布告，宣称嗣后各部队如有"强拉民夫，私宰耕牛，奸淫掠夺，扰乱地方"及"抢劫民财，绑架勒赎"等项事情，定以军法从事。

3月19日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奉命率部开赴台儿庄地区阻击日军，固守台儿庄，保证徐州。是日，该部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先行进驻，构筑工事。汤恩伯部张轸第一一〇师亦抵台儿庄附近，在运河南岸防守，邓锡侯部在韩庄南整理。

3月28日 蒋介石视察前线后返抵汉口，下令晋、豫、鲁、皖、苏、浙各省同时实行反攻，并颁令嘉勉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拨款二万元抚恤师长王铭章遗族，五万元抚恤其余殉国官兵家属。

4月4日 李宗仁以鲁南战场日军已陷重围，电令汤恩伯军团各部长官再接再励，奋勇猛攻，务在战场内将敌捕捉歼灭；"本长官亲临前线督战，决按军律明定赏罚"。

4月5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奉命抵徐州督战。当日，程潜命令："(一)台儿庄之敌限自鱼(6日)起至齐(8日)止，三日内务捕捉歼灭。(二)树立首功者奖洋十万元，否者师长以上定予严惩。"

4月6日 台儿庄大捷。晚，守军全线反攻，以重炮摧毁日军园上火药库，日军四窜，池峰城师乘胜自庄西北角进攻园上，旋即占领，续占西北门、东门，庄内日军全部肃清。10时，将刘家湖、三里庄日军歼灭。濑谷支队残部向峄县、枣庄一带撤退。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共击毙日军六千人，击伤数百人，生俘千余人。

4月29日 武汉空战告捷。日机三十六架空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与我国空军机队起飞迎战，击落日机二十一架。空军战士陈怀民以负伤之坐机猛撞日机，与日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5月9日 蒙城失陷，第四十八军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及以下官兵二千人壮烈牺牲，日军亦伤亡千余人。旋敌继续向北前进，廖磊率部西撤。第五战区调冯治安七十

七军自徐州到宿县阻敌北上。

5月13日　合肥失陷。月初，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团军由合肥向东侧击津浦线之日军，日军第六师团反攻，是日陷合肥。

5月18日　蒋介石在郑州令第二十七军、七十一军由兰封向东扫荡仪封一带之敌。令薛岳率豫东兵团主力由归德向西夹击日军第十四师团，留置一部于砀山、归德一带迟滞敌主力之西进；另令第二十集团军商震向东侧击敌人。

5月19日　刘汝明部六十八军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于是日放弃徐州。徐州会战结束。旋蒋介石以刘汝明部掩护撤退有功，特电嘉奖，并对最后撤离战区、沿途与日军作战迭获胜利并掩护各军之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奖洋三万元。

5月21日　何应钦、徐永昌密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部署皖北鲁南撤退阻敌西侵作战计划。

5月23日　兰封失陷。薛岳兵团各部连日在兰封附近追逐堵截日军第十四师团，是夜，该敌一部乘兰封守军沈克第一〇六师之不备，攻占兰封。

5月27日　宋希濂军克兰封，李汉魂军克罗王车站，陇海铁路恢复交通，火车四十二列安全西撤至郑州。至此，薛岳兵团完成迟滞在豫东之归德、兰封一带，以便第五战区主力乘隙安全撤退至皖西和豫南地区的任务。

5月31日　武汉第三次空战，击落日机十五架，空军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队长陈怀民、孙金鉴壮烈殉国。

6月1日　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黄河堤，以阻日军西进，并指定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实施。

6月5日　第一战区拟定《作战指导纲要》，拟乘日军沿平汉线南犯之机，在许昌、确山间将敌包围歼灭。同日，战区前敌司令部发布作战令。

6月6日　开封失陷。凌晨，日军第十四师团以重炮轰毁开封北城，旋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入城内，开封遂陷。宋肯堂师退向中牟，日军随即向中牟急进。

6月12日　安庆失陷，武汉会战开始。晨3时，波田支队在安庆南北两岸分别登陆，6时占领安庆机场，旋冲入城内。守军第一四六师八七二团及保安队伤亡过重，第二十七集团军受无为方面敌军牵制，无法应援，安庆遂弃守。

6月14日　蒋介石命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仍兼辖武汉卫戍司令部。

6月17日　潜山失陷。安庆陷落后，日军坂井支队奉命南下攻潜山，与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激战，是日上午陷潜山城，杨森部撤退至潜水（潜山西面）对岸设防继续抵抗。

6月26日　马当要塞失陷。23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巡洋舰、驱逐舰多艘支援下，续向长江天险之马当要塞进攻。冷欣五十二师、薛蔚英一六七师配合要塞部队第十六军李韫珩部在香山、黄山一带与敌反复争夺，终以敌占优势，旋得旋失。是日马当失守。

6月29日　彭泽失陷。日军波田支队主力乘装甲汽艇四十艘自安庆上驶，是日越过封锁线在彭泽下游将军庙强行登陆。周启铎第五十三师与敌激战数小时，阻击无效，退守娘娘庙，彭泽遂陷。

7月3日　第九战区江防军刘兴部由黄土岭进攻彭泽，在流澌桥一带同日军激战，是日克流澌桥（彭泽西十里）。

7月16日　军事委员会制定《难民移置办法》，规定凡长江北岸之难民，应沿汉水向陕南、陇南移置；其在江南各地者，应沿湘黔公路向贵州移置；如交通工具缺乏，则由救济机关统率步行，沿途设站供应茶水食宿并保护安全。是日，分电有关各省遵照。

7月30日　第二战区卫立煌部克晋城、沁水。山西日军自阳城、河头东窜，卫部在川底附近截击，是日收复晋城。同日，沁水之日军将城厢附近村庄焚毁后，倾巢西窜，卫部占领该县城。

8月6日　薛岳兵团李觉第七十军与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南浔线之金官桥鏖战，连续两日，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毙一一三联队队长田中贞造，毙伤日军一千二百余名，开始塘退守以来未有之例。

8月8日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公布《民众团体高级组织法》，规定各民众团体均须联合为高级组织，由卫戍司令部指定负责人并派员指导；各负责人均须宣誓服从政府命令，如有违背，予以严厉制裁。

8月17日　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自渝抵蓉，联合发表讲话，表示拥护中央，抗战到底。

8月20日　星子失陷。拂晓，日舰数艘、艇二十余只炮击星子城，续以飞机六架轰炸，旋第一〇一师团千余人陷大小安山，复炮毁星子城工事殆尽。入晚突破城东南，同薛兵团第五十二师冷欣部守兵混战，至10时城陷，冷师退扼樟树桥、玉筋山。

8月26日　瑞昌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三千人，附炮八门，向笔架山、鲤鱼山（均瑞昌西南）进犯，与第二兵团第七十二军王陵基部新编十三师守兵激战，是日陷笔架山，次日陷鲤鱼山。

8月30日　第九战区张发奎第二兵团向瑞昌以西之大尖山（距瑞昌七公里）全线反攻，同日军血战竟日，击溃两个联队，击毙敌联队长一人，克复大尖山，敌残部退向瑞昌。

8月31日　第一战区程潜部分头进攻豫北济源、沁

阳，日军向济源以东撤退，济源、沁阳收复。

9月8日　李品仙兵团八十四军及三十一军自黄婆凹方面向敌侧背攻击，盘据广济之敌仓惶败走，广济克复。

9月15日　晨，日军第六师团自广济进攻田家镇要塞，在铁石墩击败李延年军，于当晚进入要塞前沿阵地松山口附近。

9月16日　商城失陷。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自樟柏岭、方家集分头进犯商城，迭次猛扑第五战区左翼兵团孙连仲部守军阵地，均被击退。是日敌进迫商城城郊，以机炮猛轰城垣，守军弃城向西南方向转移。

9月20日　蒋介石令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以罗卓英为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全力指挥江南战事。

9月22日　第一战区程潜部夜袭济宁，自南门缺口冲入市内，与日军彻夜巷战，日军退去，济宁克复。

9月24日　汤恩伯集团军第一九三师师长李宗鉴弃职潜逃，富池口要塞失陷。

9月27日　瑞武方面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陷麒麟峰。新十三师刘若弼协同六十师陈沛部乘夜反攻，敌施放毒气，刘部损失颇大，未能得手。

10月1日　蒋介石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在江西瑞昌、武宁及鄂东南阳新湖一带阻击日军有功，传令嘉奖。同日，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以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在南浔线以西麒麟峰作战有功，令记大功一次并赏洋五千元。

10月7日　薛岳兵团向万家岭总攻，与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长岭、张古山一带高地激战甚烈，卒将该敌击溃，克复张古山、长岭。

10月8日　蕲春失陷。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志摩支队进犯蕲春，第三兵团第一九九师罗树甲所部营长谭灿华率全营守兵奋起抵抗，终以寡不敌众，全部殉国，蕲春陷落。

经　济

1月21日　行政院公布《特许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该公司股本总额为国币二千万元，分为二十万股，每股一百元，由铁道部认十万股，云南、四川两省政府各认五万股，用以修筑昆明至叙府铁路干线及其它支线，营业期限为三十年。

3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广东省国防公债条例》，债额一千五百万元，3月1日发行，年息四厘，自1941年2月起分十九年偿清。

3月2日　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规定：贷款用于购买苏联工业品及设备，年息三厘，自1938年10月31日起，分五年用茶叶、皮革、兽毛、锡、锑、锌、钨、桐油等十三种商品作价偿还。

3月3日　行政院通令各地工商企业"加紧生产，调节物品，以期充实后方，增加抗战力量"。

3月12日　国民政府明令实行外汇统制，规定请核办法三条及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六条，并指定中央银行从3月14日起负责办理，以限制外汇流入日伪之手。

3月20日　天津美孚油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华北公司及德士古洋行，因受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新币之影响，均于本日停业。

3月26日　财政部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第二十八次检查公告：四行发行总额为十六亿七千九百一十八万七千七百七十一元。其中：中国银行为六亿五千余万元，中央银行为四亿四千余万元，交通银行为三亿一千余万元，中国农民银行为二亿六千余万元。

3月30日　中英庚款董事会设科学事业临时协助委员会，由李四光、周鲠生、傅斯年等七人组成，决定以十万元协助自然科学，三万元协助人文科学，五万元协助其他科学，另以五十万元补助西安、长沙两临时大学，五万元补助贵阳医学院。

4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国防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五万万元。同日公布《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条例》，该公债为收换金类外币、外汇、国外有价证券而发行，定额关金一万万元，英金一千万镑，美金五千万元。

5月2日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实施《出口贸易外汇集中办法》，所有出口贸易外汇，一律归中国、交通两行购进，转中央银行承受。

6月1日　财政部第一次金融会议在武汉召开，讨论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之实施办法，孔祥熙到会讲话。

6月15日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瑞士温脱多机车厂签订技术合作合同，制造各种柴油机、煤气机、水上柴油机之油齿轮具，有效期十年，报酬不少于四十万五千瑞士法郎。

6月8日　经济部制定《奖励输出物品办法》，并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促进对外贸易。

6月30日　行政院设农村促进委员会，聘请前实业部次长穆藕初主持，以翁文灏、叶琢堂、何廉等十五人为委员。

7月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振济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一亿元，年息四厘，民国五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全数还清，自公布日施行。同日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湖南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一千八百万元，年息六厘，民国四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数还清，自公布日施行。

7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河南省六厘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五百万元，年息六厘，民国五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还清，自公布日施行。同日公布《民国二十七年甘肃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二百万元，月息五厘，民国四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还清，自公布日施行。

7月25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七年福建省建设公债条例》，定额国币八百万元，年息六厘，民国四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还清，自公布日施行。

8月3日　经济部长翁文灏在重庆对新闻界人士谈战时经济政策，要点为：首应顾及抗战建国之需要，实行门户开放，中外合作，以加速发展各种事业为前提，而不造成某一国势力范围；以自给对封锁，以公开合作对一国专利，既为我国自主之要计，亦为远东和平之基础。当前，以开发西南、西北各省最为重要。

8月7日　北平伪"临时政府"公布旧币贬值令，自8日起，所有在华北流通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纸币，按其票面金额九折流通。

8月24日　财政部在重庆召开第二次金融会议，讨论制止伪政权增发伪钞、投资西南国营事业、开发西南宝藏、发展边省经济、救济农村、提高农产品价格及巩固国币地位等问题。

9月22日　行政院通过《积极充实后方交通案》，内容有整修西北、西南公路，修浚河川，增辟航线，增加车辆船舶设备，统一经营管理等项计划。

10月6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可以对各类企业实行"代管"、"投资合办"及"收归政府办理"，并规定"各企业之员工，不得罢市、罢工或怠工"，违者课以千元以上的罚金或判处徒刑。同日，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遗产五千元以上者，除依法免除者外，征税百分之一以上。

10月7日　经济部制定《内移各厂矿限期复工办法》，规定：凡逾期不能复工而又未经呈报准予展期者，给予各种不同处分。

10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规定对资本在二千元以上之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其利得超过资本额百分之十五者及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价额百分之十二者，除依照所得税暂行条例征税外，加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

11月7日　林森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上就征收过份利得税事发表讲话，略谓：现时抗战期间，工商业中一部分人，抬高时价，大发横财，使人民负担倍增；这种过份利得，应当缴交国库去做抗战经费一部分的财源才合理，也是调剂贫富、抑平物价的一种好方法。

12月3日　中国经济学社在重庆举行第十四届年会，马寅初任主席，集中讨论外汇管理与经济建设问题。

12月11日　财政部公布《限制私运黄金出口办法》，规定限制黄金及金类，禁止携运出洋或运往沦陷区域。

12月15日　中美成立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协定，由美联邦进出口银行贷款，用以购买美农工产品，并由中国输入桐油，作为偿付贷款。该借款由中国中央银行担保，定期五年偿还。

12月29日　中国复兴公司董事陈光甫、世界贸易公司总经理席德懋在纽约与美方代表签订中美购售桐油合同，规定五年内售给美国桐油二十二万吨。

文　教

1月3日　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成立，宣布组织简章及各组长人选：教育组长周天放，新闻组长彭革陈，出版组长张九如，文艺组长陈西滢，电影组长罗刚，戏剧组长阳翰笙，音乐组长冼星海，图画组长梁鼎铭。

2月12日　全国战时教育学会在汉口成立，选举张申府等十九人为理事，通过宣言及会章，决议设重庆、西安、长沙、广州等分会，并通过《全国战时教育实施要则》十九条，提供政府采纳。

3月3日　教育部公布《战区内专科以上学校处理办法》，规定凡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未经部核准者，不予承认；业经核准者，用特种办法加以考核；办理不合格者，得随时撤销。

5月10日　北平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恢复北京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及艺术学院，鲍鉴清、庞敦敏、王石之分任院长。

6月3日　中苏文化协会俄文专修学校在武汉成立，校长张冲，并决定以后迁重庆，在桂林、贵阳、昆明成立分校。

6月6日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同时举办抗敌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冯玉祥、郭沫若、何香凝等为名誉理事，张善子、徐悲鸿、吴作人等四十三人为理事。

6月21日　教育部制定《民国二十七年度全国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福州等二十一个城市举行招生考试。

8月13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国讯》在重庆复刊，编辑委员会及发行人为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叶圣陶、孙起孟、孙几伊等。

8月30日　伪"东亚文化协议会"在北平成立，到王克敏、汤尔和、日人酒井忠正及各机关、学校代表共千余人。推汤尔和为会长，通过该会宣言。

9月1日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武汉纪念记者节，

沈钧儒、胡愈之、田汉等百余人出席，范长江主席，郭沫若、王芸生、吴克坚、蒋百里、鹿地亘等演讲。大会致电世界新闻界，吁请以舆论援助中国抗战。

10月1日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开始办公。该委员会由宣传部、社会部、教育部、内政部、政治部派员组成。云南、贵州、兰州、浙江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亦于本月上旬陆续成立。

12月25日　中国文化服务社成立。该社由国民党中宣部发起创办，王世杰任董事长，刘百闵任社长，程希孟任总编辑，总社设重庆，各地分支社共六一六个。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39年

导　言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是国民党的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武汉失守后，日本改变了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转以政治诱降。国民党的政策也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抗战方针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消极、退步方向转化。

四月间，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在河间齐会地区进行了一次重要战斗，共歼敌700余人。这是八路军首次在平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气焰，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部于四月三十日对随县、枣县日军发起了总反攻，随枣战役爆发。由于日军兵力分散，国民党军乘机反攻，收复新野、唐河、南阳等地，随、枣失而复得。

六月，国民党军队杀害新四军和八路军官兵，制造平江惨案，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杀害抗日军民的罪行之一。此举遭到各界人士强烈抗议。

九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第九战区为保卫长沙在赣北、鄂南、湘北地区展开抗击日军的作战。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作战，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达目的，十月七日，日军退回原阵地，会战结束。

继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又于十一月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会议核心内容是将五中全会对共产党实行的以政治限制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改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全会选举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此次会议后，国民党加紧了与日本的妥协和与中共的摩擦。

十一月，桂南战役爆发。日军为截断中国桂越国际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投降，先后侵占南宁和昆仑关。国民党为了保持桂越国际交通线并防止日军深入，调集大军进行反攻，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复昆仑关。

十二月一日，晋西事变爆发。山西军阀阎锡山为破坏团结抗战，进攻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反击，沉重打击了阎锡山顽军。

本年年底到次年三月，中共领导抗日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按其既定反共方针，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八路军奋起反击迫使国民党承认八路军在华北的优势地位，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 晋西事变
- 平江惨案
- 黄土岭战斗
- 陈庄战斗
- 齐会战斗
-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 随枣会战
- 第一次长沙会战
-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
- 桂南战役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背景介绍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制造了一系列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后方工作人员、伤员、家属的事件。这种反革命活动随着日本诱降的加紧和英美东方"慕尼黑"政策的推行而愈演愈烈，终于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战线从陕西到山东，长达两千余里，其军事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

(1)陕甘宁边区。1939年5月，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由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它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达黄河，绵延千余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弯月形包围圈，切割边区与外界联系。同时，还派置重兵包围、封锁边区，其总兵力达三十万之多。1939年12月，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策划，并经蒋介石的同意，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边区，先后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县五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了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并集结重兵准备进攻延安，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2)山西。1939年12月初，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突然进攻驻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惨杀共产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接着，阎锡山又图谋控制晋西北，派两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四纵队，并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一二〇师彭绍辉三五八旅)。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部队，由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破坏了阳城第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近两千人。

(3)太行山地区。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是华北游击战争的中枢和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其中太行区是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所以这里也就成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冬，蒋介石指令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纠合庞炳勋、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分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翌年1月下旬，石友三在冀南向我发动武装进攻。四十军庞炳勋部进入林县，张荫梧、侯如墉等部控制邯长路南山区，由南向北压缩，以为策应。3月间，作为进犯军主力的朱怀冰部，在日寇配合下，由磁县、武安一带猛攻太行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

对于国民党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对非理性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7月7日，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进一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一切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作斗争。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表明共产党的严正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指示》中，又强调指出：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调回陕甘宁边区，协同萧劲光、谭政领导下的边区留守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驱逐了绥德分区五县的反动军队，使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给阎锡山军队以重大打击之后，分别转移到晋西北和太岳区，正式编入八路军。阎锡山的旧军溃败后，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主动提议休战。经过谈判，

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双方商定划区作战，以汾阳、离石、军渡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和抗日决死队活动地区，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在太行区，八路军对国民党反共军的进攻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英勇反击。1940年3月初，八路军乘国民党反共军喘息之际，在平汉路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朱德、彭德怀亲自指挥。在战斗中，根据敌我力量悬殊和顽军营垒矛盾重重的情况，我党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利用顽固派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集中力量加以歼灭。据此，刘伯承、邓小平和聂荣臻率领13个团的兵力，经过周密部署，奋战八天，歼灭朱怀冰主力两个师大部及游杂武装共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军进攻八路军总部的企图。同时，冀中、冀南地区八路军，集中17个团的兵力，在宋任穷、程子华的统一指挥下，于平汉路东发起卫(河)东战役。战役开始，八路军首先奔袭顽军总部，歼八百余人，继之展开全线攻击，又歼顽军五千余人，石友三仓惶逃窜老黄河以南，八路军控制了冀南地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了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当八路军把朱怀冰、石友三部歼灭后，我党即主动提出休战，命令八路军停止对朱残部的追击，并派人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双方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驻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被彻底粉碎了。

材料：

- 反顽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
- 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 以牙还牙
  ——彭德怀谈武装反摩擦

材料一　反顽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去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摘自毛泽东1940年3月11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749页)

材料二　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尚是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之区域……，三年以来，均属八路军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内，遗笑友邦。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围两个月，旬邑则杀人夺城，鄜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已，安定则两次袭击，而绥米河防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所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然自七月蒋委员长令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磨擦从此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城略地之消息，又不绝于耳矣。蒸日九十七师千余人及保安队袭攻宁县，我驻军罗营长受伤，兵士死伤过半；寒日九十七师二千余人袭攻镇原，我驻军五营死伤百余，两城均被九十七师夺据。现复集中大军准备向庆合进攻。陕西方面，则闻正在计划夺取淳化、鄜县，准备进攻延安。而其欺骗群众动员士兵之口号，则为共产党捣乱后方。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

(摘自1939年12月25日《朱彭总副司令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见《新中华报》第九十三号，1939年12月30日)

材料三　以牙还牙
——彭德怀谈武装反摩擦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

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同志。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墉[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外，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这样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岩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〇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选自《彭德怀自述》）

晋西事变

背景介绍

1939 年 12 月，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成立了抗日决死队(新军)。到 1939 年时，新军已有 50 个团，占山西建制部队的 1/3，人枪数的 1/2。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敌视，他把“决死队”、“牺盟会视作绊脚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39 年 3 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旧军军政干部会议，开始了由联共抗日到反共亲日的转折。3 月 23 日，阎锡山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会议，提出要取消新军和“困死八路队、饿死八路军”。他煽动手下将领说：“不如此，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解决新军、牺盟会，接受日本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生存之目的”。

会后，阎锡山授意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准备进攻“决死队”。12 月 1 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于 5 日向同蒲路日军攻击，实行“冬季攻势”，二纵队正在动员执行命令时，阎军与日军突然同时向二纵伍包围进攻，二纵队苦战旬日，损失很重，始突出重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部分转入晋东南。

在晋西北方面，阎锡山令第七团总司令兼骑兵军长赵承绶放弃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向决死队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原已去汾阳袭击日寇，此时遂坚守自卫。为打击阎军，保全抗日武装力量，接应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到晋西北，决定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分左、右两纵队，自卫并反击赵承绶及另一支前来侵犯的郭宗汾军。经过艰苦奋战，攻克郭宗汾军驻地临县。两支部队会合并与晋西抗日武装胜利会师。

在晋东南方面，由戎伍胜，董天知等领导的决死三纵队，遭到了日阎军的夹击。阎锡山除派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军进犯阳城、晋城一带，进行所谓的“讨伐叛军”“收复失地”以外，并且密令派遣到决死第三纵队担任军官的反动顽固分子作内应，拉出三纵队的部分军队策动军事叛变，大批逮捕、屠杀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青年，使太岳山区的抗日革命力量遭到了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有准备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军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晋西北的八路军于 1940 年 1 月发起反攻，2 月底，肃清了该区的国民党军，晋东南的新军除决死三纵队部分被反动军官拉走外，其余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编入一二九师和一二〇师，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军以严重打击，恢复了失去的部分地方。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阎锡山部已分崩离析。

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休战，派人与阎锡山进行谈判。这时，阎锡山已别无出路，只好被迫接受八路军提出的通过谈判以解决新旧军之间冲突的主张。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公路南的晋西南为国民党军活动区域，以北的晋西北为新军及八路军活动区域。这样，到“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晋西的数十个县了。

材料：

- 反共摩擦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 晋西事变中的一夜

材料一　反共摩擦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阎锡山充当急先锋

抗日战争前夕，当日本侵略者严重威胁晋绥地区时，一贯亲日反共的阎锡山，为了自身的生存，他采取联共抗日的策略。真正促使阎锡山这一转变的，是毛泽东亲自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1936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释放红军东征期间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时，对他晓以大义，要他带亲笔信给阎锡山，并转达合作抗日的具体意见。经过繁复地折冲尊俎，阎锡山才逐渐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当即派彭雪枫于 10 月 20 日起常驻太原，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谈判，后又多次派周小舟携亲笔信前去太原。1937 年 7 月 28 日，阎锡山回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述及先生抗日方针，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共赴国难也。”7 月 31 日，阎锡山向彭雪枫正式表示：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这样，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实行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军事上抵抗日军也比较坚决。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以后，阎锡山撤到临汾，他半生经营的这块地盘大部地区已沦陷。山西是阎锡山魂之所系，离开山西他将一无所有。而要坚持山西抗战，只有依靠八路军以游击战争拖住日寇，依靠共产党发动全省群众，组织新军，积蓄力量，才能

进行长期抗战。这年10月下旬,阎锡山急切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并与中共商谈具体指挥事宜。毛泽东通过彭雪枫向阎详细提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阎锡山基本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至此,出现了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的高潮。

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固然有"共同抗日"的因素,但他信奉"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唯我哲学,他的一切措施和出发点,都以能否"自存与自固"为转移。在大敌当前,他和共产党联合,是为了维系他"山西王"的地位,一旦进步力量及群众运动兴起,使他感到控制不了的时候,又会变"联共"为"反共"。

因此,毛泽东多次指示,在同阎锡山合作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斗争求团结。1937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一个基点上。"

随着抗战时日的延长,阎锡山对抗战开始动摇,山西政局迅速逆转。1939年3、4月间,阎锡山在他的战区总部所在地陕西省宜川的秋林镇召开的布置反共投降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制造对日妥协空气,说:"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公开抛出一个《军事统一方案》,取消由中共帮助建立的新军番号和政委制,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他还向旧军官说:"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意谓形势将有巨变,和日将要代替抗日,要打八路军和新军了。

秋林会议结束后,山西新军决死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共产党员雷任民受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委托,绕道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谈到阎要取消新军的政委制时,毛泽东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叫新派别听他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毛泽东还会见了途经延安返回晋西北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会主任续范亭,进一步了解了阎锡山的动向。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王世英关于阎锡山动向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了客观的分析: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并指出: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团结他,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5月13日,中共中央本此方针发出《关于宜川会议后对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

9月初,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研究加强反逆流斗争问题。林枫与毛泽东谈话时曾经问道:"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就在这时,9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公开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晋西新军奋起自卫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事前曾与日寇有过密谋策划。阎锡山抗战后与日寇勾结也从未间断。1939年10月下旬,阎锡山就决定成立"讨叛军总指挥部",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游击区行署主任陈长捷任总司令,联合日军"讨伐"驻扎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11月1日,阎派其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吕瑞英,第十九军副军长梁培璜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长的代表山下会谈,达成共同反共的协议。11月初,日军即分兵3路向第二纵队进行合围。阎锡山为了顺利实现其消灭第二纵队的阴谋,就将前去秋林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羁绊在秋林,不让返防。韩钧得知阎锡山许多勾结日寇加紧准备进攻新军的情报,机智地冒险离开秋林,赶回纵队驻地隰县义泉镇,即刻召开紧急会议,向部队领导成员指出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形势,强调不能坐以待毙,而要先发制人。果然不出所料。紧急会议刚完,就收到阎锡山命令第二纵队务于5日准时向同蒲路灵石至霍县段日军"大举破击"的电报。

第二纵队领导人十分明白,如照阎锡山的命令行事,必将立即坠入日顽夹击的陷阱。此时,阎锡山的第六十一军从南向北,第十九军由西向东,共计47个团的兵力,正向第二纵队包围逼近;同时同蒲线上灵石、霍县的日军正在增加兵力。韩钧即于2日在下桑峨召集第一九六旅团以上军政干部开会,进行迎击顽军进攻的紧急动员和作战部署,并下令把第六十一军先前安插在纵队司令部近旁诸正村的一个营解除武装。3日,第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原是旧军官,他勾结第十九军在永和驻地叛变,捕杀政工人员;顽军先后捣毁了永和、大宁、蒲县、临汾、洪洞、赵城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杀害了蒲县县长李玉波、临汾县县长李从文、牺盟特派员陈祖辰以及第六区专署秘书、原洪洞县县长高希敏夫妇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干部。

12月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即就晋西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发出电报,指出:"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既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军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反磨擦问题。在12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我们对付的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摩擦。现在阎锡山样子上还未投降，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锡山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当着内战行将爆发的紧急关头，决定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为总指挥，韩钧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廖井丹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统率晋西南所有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政卫第二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一致行动，而以八路军为后盾。

这时旧军的进攻有增无减。韩钧等多次向阎提出抗议，均被置之不理。韩钧气愤难忍，12月7日，以他个人名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奋起自卫的决心，声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锡山当天收到此电后即召集高干开会，宣布"韩钧反了"，诬指第二纵队为"叛军"，即令："韩钧着即撤职拿办。

第二纵队即在八路军晋西支队支援下奋起自卫。12月10日，韩钧指挥晋西支队第一团和第二纵队第六团出击隰县，一举歼灭第十九军一个营及一个团部，顽军一个旅逃走。

部队连续苦战20多天，极度疲劳，兵员、弹药无法补充，有三四个团尚未着冬装，而且仅有12个团对抗顽军47个团，兵力悬殊。为保存革命实力，配合晋西北我军行动，区党委乃果断决定向晋西北转移。

12月27日，区党委率晋西南新军和晋西支队，进至方山、交城地区。政卫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以及八路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等部，均于粉碎顽军的围追堵截和日伪军的阻拦之后，先后到达太岳区沁源县境。

顽固势力全部肃清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山西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即将骑兵第一军、第三十三军各部从抗日前线调到后方的兴县、临县，监视新军及八路军。毛泽东在给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等人的电报中说："赵承绶在没有公开打我们以前，还是要联络他或敷衍他，使他的反动行为慢一点，以便我们及新派有时间巩固四纵队与牺盟，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此时派一个适当人去见赵谈一次，是否有益处，目的在于使赵稍微犹疑一下，以便争取少许的时间。对赵部下比较好一点的人，更要注意影响他们。对赵下级干部及士兵，更要设法争取，不可无分别的骂他们。"

晋西事变爆发后，中共决死队第四纵队党委连续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采取主动，逮捕部队内部的顽固分子、纯洁队伍，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外部的顽固分子的进攻。12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第四纵队各团同时行动，除独七旅旅长卢宪高和第二十团团长刘鸿绪等少数逃跑外，反动旧军官全被逮捕。

12月15、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拟定向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进攻计划。参加会议的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寻机离开会师，于18日赶到岚县史家庄，向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报告。

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即于23日指示晋西北反顽斗争方针。12月28日，毛泽东、王稼祥又来电指示"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之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对郭挺一及其同类人物应严防其背叛新军的阴谋"。

郭挺一是二〇七旅旅长，并兼任第二行政区委员兼保安司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产党，1928年被捕后叛变，后来投靠阎锡山。是埋藏在新军内部的一个隐患。郭挺一按照阎锡山、赵承绶的部署，准备将部队靠拢赵承绶骑一军，企图消灭工卫旅内部的共产党员，控制工卫旅。该旅的中共组织于1940年1月3日将郭挺一逮捕，并于12日在岚县东村黑龙沟将其处决。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阎锡山进入晋西北、隔断我华北区域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将牵动华北全局，是关系全党的重大事件。要求新三五八旅和新军做好战斗准备。30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一二〇师的贺龙、关向应："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

晋西南我军越过离（石）军（渡）公路，震撼了晋西北的顽固派。赵承绶以骑一军8个团拦阻我军南下接应，以第三十三军6个团阻挡晋西南我军北进。

12月30日，晋西北区党委召开军政干部紧急会议，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一致推举续范亭为总指挥、雷任民为副总指挥（经续邀请，罗贵波，彭绍辉协助他指挥作战）。会议还确定了行动部署和作战计划。翌年1月2日起，总指挥部指挥各部开始在临县、方山地区向顽军进行自卫反击。歼灭顽军近3个团。

1月8日，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抵达晋西北。10日由他主持召开会议，组织统一的行动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军事行动及行政问题；同时商定两个地区部队分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夹击顽军；中央军委并令第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由陕北东渡黄河配合作战。

1月11日起，滕代远统一指挥各部相继攻占临县外围据点。守敌于13日夜弃城越离军公路南逃。我军乘胜歼其后尾一部，赵承绶只身光脚逃走，连老婆和银行的金柜、印钞票的机器都丢失了。

贺龙、关向应于1月下旬率第一二〇师主力由晋察

冀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我军；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集结14个团的兵力将在晋西北地区顽固派势力全部消灭。至此，晋西北反顽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结束了两年多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使晋西北成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妥善解决晋西事变

对于这场战争，蒋介石格外"关注"。他在耸恿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准备随时把他的力量伸入山西。12月下旬，蒋令阎"将本战区所属各游击队主官姓名，现有人马枪支数字及经费"向他报告。30日，又命令其西安行营主任程潜"迅即亲往山西视察现况，询问百川兄对该案意向，交换意见，俾以后易着手处理"，并"考察晋绥军内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机"。1940年1月10日，蒋更下令阎锡山"藉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极力反对政治解决，坚主武装进攻。阎锡山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又趁机向阎提出愿派两个军过黄河"增援"，接替原第六十一军防地，而其原在晋南稷王山区的第九十军李文部已奉胡宗南命令北进乡宁，续向吉县移动(吉县是阎的老巢)，致使蒋阎矛盾激化。阎为巩固晋西，令第十九军、六十一军停止北进、赵承绶南撤，改变了原先的计划。

阎锡山原想一举消灭山西新派，打击八路军力量，结果损兵折将，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在政治上也把绥东抗战以来多年捞到的一点政治资本丧失殆尽，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中央及时指示："我们应利用这种状态"，"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要新军、牺盟会领导人不断打电报给阎锡山，痛陈旧军进攻的罪行，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保持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恢复山西内部新旧两派的团结，拉住阎锡山继续抗日，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大局有利。2月1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发出电报，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肖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中共中央在1月27日以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锡山提议调停。阎已山穷水尽，只得表示："如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2月25日，毛泽东即派肖劲光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达秋林，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他给阎锡山的信中写道："百川先生勋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目前国际形势日渐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兹派肖主任劲光、王部长若飞趋谒左右，敬祈接见指示一切，未尽之意统由肖、王二同志面达，专此敬颂勋祺。毛泽东谨上。二月二十三日。"

4月初，经过谈判，中共与阎锡山终于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以汾河为晋东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第二战区和晋绥军活动的范围，晋东南和晋西北地区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地区。

表面看来，新军和八路军的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晋西南地区，但是阎锡山集团的反动势力却被彻底从晋西北和晋东南地区清除出去，这些地区从此成为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国坚持抗战的重要基地。毛泽东曾在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11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

阎锡山经此教训，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他就未敢附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阎锡山困居晋西南一隅，虽消极抗战，暗中虽与日军信使往返不断，但始终未敢公开投降敌人。

(穆欣，选自《炎黄春秋》责任编辑：方实)

材料二　晋西事变中的一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个下雪天，我又被团部召去了。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大概又有新的任务下来，又有仗可以打了，心里着实高兴。我到了团部。团长却到我们营里开会去了。营部是在离我们连不远的一个山脚下一家民房里。我又赶到营里，找到了那间开会的屋子。一进门，就看见旅部刘主任、冯团长、王营长等都在场。他们个个脸上严肃而镇静，有的脸上还有些怒意。这个局面使我有些惊愕。刘主任指着我问冯团长：

"他是谁？"

团长说："周玉清同志。"

这才让我坐了下来。我坐在王营长身旁。他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今天开会的意义。原来阎锡山想做儿皇帝，破坏统一战线，准备叛变了。他唆使我们二〇三旅旅长刘武铭和独七旅旅长卢先高在会立村开秘密会，想谋害我们，

阴谋策划当天(大概是十二月八日,记不太清)夜里,首先逮捕共产党员,一律杀掉,对于进步的知识分子,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也一律杀掉;然后再把二〇三旅和独七旅改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队"投降日寇。这个消息,好象晴天霹雳,惊醒了我,使我悟了过来:好狠毒呀,这些汉奸们!他们打算要我们的脑袋了。想到这里我浑身直起疙瘩,心中无限激愤,我真想把这些人面兽心、认贼作父的家伙撕碎,看他们长的是什么心。

这时,刘主任又说,阎锡山还命令他的骑兵司令赵承绶来支援。但是赵承绶的骑兵远在忻县,离这里有几百里路,当天是赶不到的。这就给我们造成有利条件,我们要争取主动,给叛徒们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自食其果。他说:

"我们多年来,一直遵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我们不能这样任人宰割。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挽救抗日的局面!"

我们连的任务是解决旅部,活捉刘武铭和他的参谋长。团长把任务分给我以后,郑重地说:

"今天大刘二刘要你去牵。"

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我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说:

"不管大刘二刘,就是再有个四刘五刘,只要我的头还长在肩上,我也要把他们牵回来!"

当我临走时,刘主任还提醒了我一句:

"千万不要大意,要防备着,可能进入浴血战。"又说:"玉清同志,今天晚上要出力呀,这是挽救我们的脑袋和我们的抗战事业。"

已经是三点多钟了,团长仍然按兵不动,在山头上徘徊着,犹豫不决。原来这里只有我们一个连,兄弟部队临时有别的任务,不能来支援我们了。这样,要包围就不能进去,要进去就不能包围。可是时间不允许再延宕下去。我的心情象临阵的战马一样,抖擞不安。我真想变成一只猛虎,猛扑下去,噬了这些城狐社鼠。我对团长说:

"这些妖魔小丑,有啥了不起,我们赶快动手吧!"

团长见我沉不住气,严肃地说:

"刘武铭是个行伍,不是个草包。他们早有准备,黑夜睡觉,枪都上着顶门子儿,有时放在枕头底下,有时捏在手中。何况他还有哨兵、内卫。光凭勇敢,你能进得去吗?"

团长的话很对,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不费一枪一弹,抓住大刘二刘,或者把他们打死。如果捉不住打不死,让他们逃走了,就等于放鱼入海、纵虎归山。可是哪来一个连呀,我说:

"我们也不能捉蚂蚁凑数。团长,事不宜迟,你下命令吧!"

团长沉思了一会说:"事到如今,只有这样;不过不能盲动,得动动脑筋,想个办法,以防万一。"

我的心里真象一团乱麻一样纷乱。看看时间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忽然心生一计,便说:

今天晚上口令是一致的罢?"

团长说:"是一致的。"

我说:"这样便好,我们有没有空白信封?"

团长有些奇怪:"要这干什么?"

我便如此这般对他说了一遍。他听了连连点头说:

"好好,这办法好,这办法好。"

说着便把文书叫来,在文件袋里找出一个信封,让文书在老乡家里恭恭正正地写了"刘旅长、刘参谋长亲启"九个字。写完,冯团长又说:

"玉清呀,不行,你们虽然通过了哨兵,可是找不到刘武铭住的屋子呀。"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团长想了想说:"文化教员过去曾和刘主任到刘武铭那儿去过,他又是忻县人,让他给你们带路。"

我听了非常高兴,便把文化教员叫来。文化教员满有把握地说:

"旅长屋子我知道,他和参谋长住在一个炕上,中间放着一个炕桌。"

我听了又是一阵高兴,这大刘二刘如今真是瓮中之鳖,手到擒拿了。团长便决定我和梁排副、文化教员三个人在前面开路,部队跟在离我们一百米的后面,万一发生意外,就坚决抵抗。我说:

"团长,你放心,我是一个党员,只要我活着,就不怕捉不住打不死这两个家伙!"

团长没有说什么,但是从他的闪耀的眼睛里,我看出他心里很激动。他用冻得冰冷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才说:

"我信任你。祝你成功!"

旅部的门是很难进的,就是白天也是门卫森严,慢说晚上。我们在门口徘徊了好久,觉得毫无动静,便扬长走了进去。也是这大刘二刘活该倒霉,原来这班内卫因为天气太冷,偷了个懒,回去睡觉了。

旅部是四合套的房子,庭院宽敞,房屋也很讲究,看来这原是个地主之家。文化教员一进门就低声告诉我说:

"这就是旅部。旅长和参谋长住在上房里,右手是警卫排。"

我把兵力布置好,径直向上房走去。我老远就听到鼾声如雷,轻轻推开门,踮着脚走进去:屋子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随后才模模糊糊看见炕上委实睡着两个人。他们中间放着一张小小的四方油漆桌,桌上竖着一截灭了的泪蜡烛。我一看见这两个贪生怕死的卖国贼,不禁七窍生烟,便啪啪放了两枪。两个家伙惊醒了,惊慌地喊着"谁!谁!"伸手从枕头下面摸出枪来。我说:

"不要动。可惜我没有把你们打死。把枪交出来,枪口不要对着我!"

其实我哪里想打死他们,只不过给他们个下马威。他

们颤抖抖地缩成一团，把枪把子从被窝里伸了出来交给我，然后坐了起来，用阴险、冷酷的眼睛看着我。这时我才感到他们这些人，真是人们所说的狮子似地凶残，狐狸似地狡猾，兔子似的怯懦。这时，参谋长惊慌失措地说：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

我说："我们是十九团的，奉刘主任的命令，逮捕你们！"

他们一听"逮捕"，便傻了似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面面相觑了一会，又问：

"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说："你们自己拉的是啥屎，自己知道！"

刘武铭自知理屈，用手指把搭拉在前额的头发，往后掠了掠，说：

"知道了，这是政治问题。好，你们要拿我们，就拿吧！"

便举起两手走下炕来。

我们把大刘二刘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连同警卫排和枪栓都交给了后面的部队，便领着部队直捣特务连。

（选自《红旗飘飘》，作者：周玉清）

平江惨案

背景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众，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活埋。这个惨案激起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人们的公愤。

材料：

- "平江惨案"
- 忆平江惨案

材料一 "平江惨案"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的午饭后，天气闷热，通讯处的办公室里，涂正坤与罗梓铭二同志，正低声商讨问题，由于时局紧张，抗日工作繁忙，他们已三四天没有好好地休息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个国民党的副官，嘻皮笑脸地拿出公文要请涂书记到国民党的部队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涂书记出了通讯处，走到一片田野里，一阵乱枪，将涂书记打死了。

枪声一响，一群恶狼似的国民党兵，冲进了通讯处的房子，大喊："不许动，搜查！"将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捆起来。同志们都怒斥道："凭什么逮捕我们？你们这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日……"那些匪徒，毫不讲理，接着便翻箱倒柜，一味蛮干起来。

女党员徐敏，正要冲出去，被房东显老一把拖住，推进了自己的房间。这房东显老，为人耿直，对通讯处的人员如待子女一样。当下，他死守在拉进徐敏的房门旁，一口一口地吸起烟来。

徐敏手里带了一卷文件，要销毁已来不及，忙往床底一塞。这时，一个持短枪的国民党军官嚷道："老东西，干什么的？"显老假意双手作揖道："家里都是女人，老总行行好吧、！"那家伙把显老一推，骂道："去你妈的，给老子滚开！"便一脚跨进房来。显老在后面跟着说："老总，别吓坏人。"徐敏压住愤怒，心里象烧起来一样，但也只好装作镇静，坐在床沿折衣服。那家伙扫她一眼，问显老道：

"这是什么人？"

"老总，是我儿媳妇。"

那家伙四下看看，便搜查起来。刚要搜到床底，徐敏心中一急，豁地一下站起来说："有什么好看的？"那家伙被这突然的举动吓得一楞，徐敏又继续说："这是人家的闺房，你们怎么随便进来乱翻？"那家伙停住不翻了，象看出什么名堂似的盯住徐敏，一把抓住她，大吵大嚷地说："走，给我出去！"连推带拖，把徐敏扭出了房，显老见势不好，忙拦住说："老总，得罪你啦，饶了她吧！她不懂事！"那家伙使劲一脚踢倒显老，把徐敏拖到天井里。这时，她见自己的同志，都被反绑着，天井里扔满了东西。一个兵用刺刀对着她，那当官的说："快讲，哪件是你的？"他们想用这方法诈出徐敏的身份。

"怎么会有我的呢？你们找邻居问问看。"徐敏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这些反动分子，只知道通讯处有一个女的，但并不认识就是徐敏。前几天，刚从延安大学调来个赵绿莹同志，她被抓了。又见从徐敏嘴里逼不出什么来，显老又在一旁磕头作揖，那家伙便向徐敏说："没有你的就滚吧！"接着，满身杀气地到办公室去了。

徐敏回到屋里，和显老商量，要设法闯出去，坚决不让他们一网打尽。但是，从哪里逃出去呢？前门架满了机枪；屋顶上的瓦也在咯咯作响，显然房子上也有敌人。后门外是河边，是徐敏平时洗衣挑水之地，虽然也有敌人把守，但也许可以混过去的。显老同意这样做，故意到屋外去转一圈，大声嚷道："天不早啦，挑水、洗菜准备做饭去。"徐敏也响亮地回答一声："知道了，这就去。"她挑担水桶，拎个菜篮，和显老的儿媳妇一起，向后门走去。

窄小的后门，有十几个敌人把守。见她要出去，嘻皮笑脸地搭讪道："你们是新四军的姨太太吗？"徐敏很生

气，绷着脸说："什么姨太太，我们是老百姓，要去挑水洗菜。"那些敌人也不加阻拦，说了声："不是就算了。"放了她们过去。

到了河边，徐敏想找个地方渡河，但河水很深，她又不会游泳，只好回到街上，走进一个地方党员的家里。这家人见了徐敏，惊喜万分，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想不到你还在呀！"徐敏忙请他们帮助化装，约定了联络地点，随即扎块黑头巾，冒险经过大街出镇。

街上哨兵甚多，恶狠狠地端着刺刀监视行人，徐敏走在街上虽然化了装，镇上的人还是认得她，都担心地目送她过去，有的还向她使使眼色。后来，总算通过了敌人的最后一个哨兵；走这段路比走几十里还累。

天黑下来了，徐敏爬到有破碉堡的那座小山上，约定联络的党员和一个青年也来了，他们满身泥污，喘息不止。原来，街上已戒严，他们是从水沟爬出来的，当下气吁吁地告诉徐敏："徐正坤书记和吴渊秘书长已被他们枪杀了。其余的同志，听说晚上要解到杨森总部去。"徐敏悲愤已极，忙叫两人去找区委，不一会儿，区委的同志就上小山来了，一个个都握紧拳头，要找反动派算帐。但他们才三支短枪、几个人，去和敌人拚了也无济于事，只能抑制了感情，冷静地商量对策。决定赶快通知其他同志做准备，给反共分子以有力的回击。

商量完后，已过半夜，同志们都要各自走了，徐敏请求留下观察动静。

天黑如漆，镇上的手电筒光，闪闪悠悠，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还在继续搜索着……不一会，突然转来一阵"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呼声。这是罗梓铭同志喊的，接着，赵绿莹同志唱起了激昂的歌："……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山下的枪声响起来！万恶的匪徒，竟在黑夜庇护下枪杀最优秀的抗日志士！

第二天，镇上传开了敌人的罪行：晚上在山沟里杀了罗梓铭与赵绿莹同志，后来，又用毛巾塞住曾金声、吴贺泉同志的嘴巴，把他俩活埋了。

此后，反动派便在当地屠杀革命群众、地方工作同志、伤病员与革命军人家属。其中还有共青团县委书记张德华等。

为了把反动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公诸于世，未遭毒害的共产党人，立即印发了"快邮代电"，把消息散布到全国各地去。党在当地群众的掩护支持下，组织疏散转移伤病员与烈军属，为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作坚决斗争。

（选自《新四军故事集》）

材料二 忆平江惨案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午后两点钟左右，我们通讯处的全体同志，因上午参加了破坏公路的劳动，正在安静地睡午觉，只有涂正坤同志的办公室内不时传来低微的咳嗽声和谈话声。他和曾金声、罗梓铭等同志，已经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好好休息了。我因下午要到三里外的村子里去开会，天气又闷热，也没有入睡，起来收拾了一下文件，就到窗前来洗脸。就在这时，我一转眼，瞥见了一个人影急促地从前面天井边掠过。片刻之后，涂正坤同志摇着把大蒲扇从办公室走出来。单薄的衣衫显出他那背脊微驼的高高的侧影。他一面走，一面象是在沉思。后面跟着一个脸色蜡黄，獐头鼠目的国民党副官。这家伙以前来过几次。我留意地听他跟在后面说："破坏公路……桥梁木头……"继断续续不甚清楚。他们走出大门去了。约过了三四分钟光景，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乱枪声。这使我疑惑起来，便决定到前面去看看动静。可是还没有出房门，一群饿狼似的国民党士兵就蜂拥而入，一批冲进警卫班的房子里，一批冲进办公室，乱叫乱嚷："不许动！搜查！"当时，我正要冲出去责问他们，房东邓选成，我们都亲热地称呼他为"选老"，一把扭住我，大声吼道："进去！"把我拖到房子里去了。

接着，我听到一阵呼呼嘭嘭的毁坏家具、翻箱倒柜的声音和同志们的愤怒斥责："你们这是什么行为，抗日还有罪？"凭什么抓我们？""这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行为！"

过了一会，反革命便来搜查选老的房间。我带的一卷文件来不及销毁了，就连忙塞在床底下。选老随即拿根水烟袋，坐在房门口吸烟。反革命分子手持短枪，横眉瞪眼地对着他叫道："你这老东西干什么的？"选老抑住愤怒，双手作揖，假意哀求说："我们家里尽是女人，你做做好事吧，不要吓坏了人。"反革命分子不耐烦地把选老一推，骂道："去你妈的，滚开！"一脚跨进房来。选老赶快跟在后面说："求求你，老总，不要吓坏了人。"这时我愤恨交织，虽然强装镇静，默不作声地坐在床沿上折衣服，可是，心如火烧，几乎压抑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反革命凶狠地问选老："这是你的什么人？"选老回答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反革命又恫吓了一番，向我扫了一眼，便四下搜查起来。眼看就要搜到床底下来了，我心里一急，猛地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有什么好看的！"那家伙被我的突然举动吓得愣了一下。我继续斥责说："你怎么可以到人家闺房里来随便乱翻！"那家伙竟停住不翻了。一双贼眼直瞪着，大概见我这种神情，便有点怀疑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狠狠地叫嚷说："走！出去！出去！"连推带拖地把我扭出房去。选老见情况不好，连忙拦住说："老总，得罪你啦，得罪你啦，

饶了她吧，她不懂事。”那反革命凶狠地一脚把选老踢倒，使劲把我拖到天井里。这时，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共产党员、抗日志士被反革命捆绑着，用刀枪押着，关在救亡室里。“快说，哪件是你的？”那反革命指着丢满一天井的东西问我，他妄想用这种办法诈去我的身分。

“怎么会有我的，我又不是新四军！”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这些反革命只知道通讯处有女工作人员，但并不认识我，又从我嘴里诈不出什么来，同时选老在旁边一个劲地帮我说话，他便朝我狠狠地瞪了几眼，说：“没有你的，那就滚吧！”手一扬，凶形恶相地转身向救亡室去了。

在救亡室前，被敌人捆绑着的罗梓铭同志看到我，几次努嘴，示意我赶快设法脱离险境。我回到屋内，心想应该千方百计闯出去，不能蹲在这里白白地让他们一网打尽。可是从哪儿出去呢？从天窗上爬出去？不行。刚才屋顶上的瓦还在响，一定有敌人守在上面。前门呢？架满了机关枪。后门外又有一条河，是我们平素洗衣、挑水的地方，肯定也有反革命把守，不管它，去闯闯看。我想来想去，觉得也只有这样去试试看了，便和选老商量了一下。他同意这样做，并且随后就到房子外面去转了一转，故意大声叫道：“天不早啦，你们好去挑水洗菜准备做饭啦！”我听到这话，也故意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知道了。”接着我便和他的儿媳妇挑担水桶，提一篮菜，向后门走去。

窄小的后门口已经围着十几个反革命，都小心地内外张望，生怕走掉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毫不理睬地走出去。他们早就打量起我们来了，等我们走到跟前，便把枪一横，下贱地嘻皮笑脸说：“咦！你们是新四军的姨太太吗？”我一听这话，绷着脸，气愤地说：“什么姨太太！我们是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去挑水洗菜的，看吧！”我把菜篮一举，迈步就走。

混出虎口，下到河边，我利用河边草木的掩护，急忙向前爬去，准备找个地方渡河。可是这里的河水很深，我又不会游水，怎么过得去呢！只好改变原来的计划，走进一个有地下党员的店里。当时，我的出现使他们都感到非常意外。他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半晌才说：“你还在呀！怎么逃出来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的感情。我连忙请他们帮我化装，并同他们约定了联络地点，随后就扎上块黑头巾，提个篮子，沿着大街冒险地走出去。

当时，街上每隔几家就站着一个敌人的哨兵，手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凶狠地监视着行人。街上行人非常少，我的行动很引人注意。镇上的人和我都很熟，我虽然化了装，但是他们还都认得出我，担心地目送着我走过去，有的还向我挤眼示意。我心里很紧张，但仍不慌不忙地朝前走着，暗中盘算应付敌人查问的办法。就这样，终于平安地通过了最后一个反革命岗哨。本来，这段路并不算长，可这次走起来就不同了，简直觉得比走几十里路还吃力。

我走出小镇，加快脚步走了一里多路，爬上一座有个破碉堡的小山。天色已经黄昏了。我凝望着通讯处的屋脊，心里异常焦急，坐立不安。涂书记和其他同志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的生命有无危险？我怎样才能得到一点他们的消息？……一连串的忧虑盘绕在我的脑海里。

天黑的时候，我约定的那个地下党员和一位青年人来到小山上。他们全身都是污泥，因为敌人在街上戒严，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小水沟里爬出来的。这时，我才知道，那个贼头贼脑的副官，说是奉了长官的命令，要请涂参议去乡公所开个会，商量抗日的紧急事宜。涂书记预感到事情蹊跷，凶多吉少，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在吩咐身边的同志“今天可能会出事，快给大家打个招呼”后，还是大义凛然，前去赴会。但这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骗局。涂书记走出门外只有五十多步远，就被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一阵乱枪杀害了。后来又枪杀了秘书长吴渊同志。其余的同志，听说晚上就要解到杨森总部去。听了这消息，我差一点昏过去，喉咙就象被棉花塞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真恨不得立刻冲到敌人面前打死几个刽子手，替同志们报这不共戴天之仇。我马上打发那两个同志去和中共嘉义区委会的同志取得联系。不一会，区委的同志就到小山上来了。没等我开口，他们就万分气愤地说：“我们上当了！”“马上和他们去拚！”我看到同志们手里握着的短枪和那结实的拳头，心里又一次激动起来。可是，我们一共才几个人，三支短枪，和敌人去拚是徒劳无益的。我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劝同志们冷静下来。无谓的牺牲是不应该的。紧要的问题是，赶快通知附近的同志们作好准备，以便给反革命有力的反击。同志们渐渐冷静下来了。他们要我下山到村子里去。我要求留着观察镇上的动静。当同志们分头下山的时候，已是半夜了，黑暗笼罩着大地，伸手不见五指，镇上除了狗的狂吠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反革命打着电筒满街乱转，象鬼火一样，忽隐忽现。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在继续搜索……

大约过了半小时，突然，传来一阵“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我浑身一震，心收缩起来了。因为我听出这是罗梓铭同志的喊声。接着又听到了激昂的歌声：“……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这是赵绿莹同志唱的。我迅即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股骤然的冲动，使我猛地从地上站起来，向前冲去。小树把我绊倒在地上。山下传来“砰！砰！砰！”的枪声。口号声和歌声都中断了。这时枪弹象是射穿了我的胸口，一阵绞痛，牙齿都咬得格格发响。接着又传来嚓嚓的铲土声，原来敌人惨无人道地枪杀了罗梓铭和赵绿莹两同志，活埋了曾金声、吴贺泉等同志。我痛入骨髓，悲愤极了。万恶的国民党匪徒，乘黑夜的掩护，枪杀和活埋抗日最坚决的革命志士。我们严正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是杀不绝，吓不

倒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这笔血债，为死难烈士报仇！

（选自《红旗飘飘》，作者：徐敏）

黄土岭战斗

背景介绍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涞源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我八路军奋起抗击，取得了涞源战役的胜利。黄土岭战斗就是在涞源战役中发生的。号称日军"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率领一千多日军前往雁宿岩一带扫荡，我军年轻的师长杨成武在黄土岭设下埋伏，专等阿部来钻。阿部果然中计，在黄土岭被我军炮弹击中而死。52岁的阿部规秀居然不是25岁的杨成武的对手。日本军部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黄土岭战斗打死阿部规秀，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材料：

- "名将之花"调谢在太行山上
- 凋谢太行山东京致哀名将花
- 日本皇军名将之死

材料一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东京有家报纸辟专栏，哀悼日本侵华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察南黄土岭战役中被打死。其中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悼文里，如泣如怨地写道：

"自从皇军成立以来，对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这次阿部规秀中将的隆重牺牲，我们知道，将士们一定是很奋力作战的，战斗力已超过了阶级的区分。"

阿部规秀中将是日本的名战术家，对日本的霸业"赤胆忠心，战功卓著"，因而取得了日本军阀给予的"名将之花"的称号。然而，法西斯将军中的"名花"，毕竟经不起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风暴的冲击，终于"花落瓣碎"，"饮恨"在太行山上。

雁宿岩歼灭战，使得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于十一月四日，倾张家口之兵力一千余人，亲自率领，出动数百辆卡车急驰涞源，沿着瑽村大佐的旧路，向我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再让我在雁宿岩伏击，以优势兵力反击我们，消灭我们的主力，然后扑银坊，再西取走马驿或东进黄土岭、寨坨一带实行"三光"，以挽回"皇军"的"体面"，巩固其察南占领区。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在电话上向聂司令员报告。

聂司令员决心让这个"名战术家"领略领略毛主席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给他一个下马威。指示我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荫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游击队一部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除以一、二、三、二十五团和炮兵营等参战外，并命令一二〇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我们指挥，参加这次战斗。

部队立即进行再战动员。"给阿部规秀中将一个下马威"，"再来一个歼灭战"的战斗口号，强烈地扣动着指战员的心弦。

十一月五日，一千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曾雍雅同志指挥的游击支队，在白石口与敌打响。以忽而坚堵，忽而大踏步后退的巧妙战术，紧紧缠住敌人，使敌人求战不能，追又追不上，气得暴跳如雷，到达银坊后，只能以"三光"泄愤。当晚，银坊一带，熊熊大火，彻夜不熄。

阿部规秀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次日即挥师东进。我们则放长线钓大鱼，丝毫不惊动我们，让他们"平安"地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这时，我一团和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的去路，三团、特务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形势。

是夜，黄土岭上暗然无光，寂如坟墓。从太行山上吹来的寒风发出嗖嗖的声响，好象为法西斯匪徒敲起了丧钟。

七日，黄土岭上阴雨绵绵，群峰被白雾覆盖着。拂晓，敌人继续东进，十二时进到上庄子，先头部队已到达寨坨附近，十五时，其尾巴才离开黄土岭。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拦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及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二公里长，宽仅百十米的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喷射出的子弹象暴风骤雨一样倾泻在敌人头上，炮兵部队也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沟底密集的敌人。只打得黄土岭上火光闪闪，硝烟蔽天。

敌人依仗其雄厚兵力，向我寨坨阵地冲击，企图跳出我包围圈；遭到我军坚决反击后，乃掉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窜涞源。我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把口袋口紧紧扎住，逼使敌人步步后撤。

经过反复冲杀，把他们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这是发挥我炮兵威力的大好时机，炮兵营长杨九秤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中射击。只震得群山抖动，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嚎。阿部规秀中将这朵"名将之花"，就在我们神勇的追击炮兵的排炮下"花落瓣碎"了，他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也成了我们的战

利品。这朵“名将之花”被打死的经过情形，东京那家报上的那篇悼文里也有详细的叙述：

“皇军被敌人逼退到上庄子，中将仍很果敢地到第一线观察地形、敌情。忽然，飞来了敌人的迫击炮弹，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破片打中了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等到下午九时五十分遂与世长辞了。”

阿部中将被击毙后，敌人恐慌异常，八日晨飞来了五架飞机，投下几个指挥官维持黄土岭的残局。我围攻至八日下午，消灭了九百多敌人主力之后，正在围歼残敌之际，敌人以重兵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分五路向黄土岭合击，均进至距黄土岭三十里左右，企图围歼我们，来个大规模的报复“扫荡”。我们遵照军区的指示，主动撤离黄土岭，跃出外线，转入积极的反“扫荡”斗争，不断从敌人侧背打击他们。至十一月底，敌人终于经不起我们的打击，垂头丧气地全线溃退，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彻底胜利。

经过了近一个月反“扫荡”斗争洗礼的太行山，此刻显得格外威武。“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了，但是中国人民英勇、知慧之花——八路军，却以更鲜艳多彩的姿态盛开在太行山上，开遍敌后战场。

经过雁宿岩、黄土岭两次致命打击，阿部规秀中将和辻村大佐相继被击毙以后，平时如狼似虎，咆哮惯了的日寇，却换成了一副狐狸的狡猾脸孔，发出嘤嘤哀鸣之声。黄土岭战后不几天，敌警备司令小柴，突然给我一信，里面写道：

“杨师长麾下：“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之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钦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情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岩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们立即回他一信，首先揭穿其所谓“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的胡说，指出他自己就是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是全中华民族的死敌。并告诉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已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他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侵华罪行，表示反对侵华战争；对于作了你们的“炮灰”，蒙受你们给予的灾难的战死者，我们已妥为埋葬，并立有石碑，以资标志……。

法西斯匪徒的嘤嘤哀鸣之声，当然丝毫牵动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我们以更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日寇，太行山上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让万恶的侵略者永远在英雄的太行山面前发抖吧！

（杨成武，《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二　凋谢太行山东京致哀名将花

1939年10月30日，座镇张家口的日军北线进攻边区总指挥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出十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1大队和伪军1000人进驻了涞源城。随后，这支日军又在十村大佐的率领下对我晋察冀军区1分区根据地，分三路开始了扫荡。这1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部对进至雁宿崖地带的东路敌军进行了围歼。一仗打下来，这一路的600多日军被我歼灭了500多人，并生俘了13名日军。此外，还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

雁宿崖之败，使阿部规秀立时被气红了眼。这个阿部规秀可非寻常之辈，而是个在日本军界中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被称为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日军旅团长一般都由少将出任，中将则够得上出任师团长了。阿部规秀因担任北线进攻边区总指挥，上个月才刚刚晋升为中将。没想到刚一晋升，还没来得及报效天皇，其麾下的一个大队的人马就几被全歼。他感到这就如同挨了八路军一记响亮的耳光，简直丢尽了他这个山地战专家的脸了。所以他当即就作出决定，要亲率精锐之师，出兵扫荡。

骄野成性、轻狂自负的阿部规秀，一向以山地战专家自诩，根本就没有把八路军晋察冀部队的几个团放在眼里。这点可以从他当时的一封家信中看出。该信曾刊载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是写给其儿女的：“……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4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时30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狂妄之相，跃然纸上。

11月4日，阿部规秀率其独立混成第2旅团4个主力大队，约1500人，以及千余伪军向涞源杀来。企图趁我1分区部队“消化”胜利果实之机一举全歼，以报这一箭之仇。

杨成武又赶到阜平晋察冀军司令部，向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汇报敌情。

“部队情况怎样？”聂司令员问道。

杨成武痛快地回答：“刚打了个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也很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有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就一定能伏击成功。”

“这阿部规秀可是日军著名的山地战专家，你也喜欢在山地打伏击。”聂荣臻指着杨成武，笑着说道，“那好吧，你们俩就比试比试，看看倒底谁是真正的山地战专家！”

聂司令员接着又就作战方案，向杨成武进行了具体布置。随后，又要通了彭真和贺龙、关向应的电话，分别向

他们进行了请示和通报。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正在阜平青山村召开，因此分局书记彭真及120师的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也都正好在阜平。

放下电话后，聂荣臻高兴地对杨成武说："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赞同我们的意见。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120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战斗打响之后，易县、满城、徐水及涞源的敌人肯定会出动增援。我已安排20团、26团和34团进行箝制阻击；涞源出动之敌，由贺龙的359旅对付。"看到杨成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后，又说道："成武同志，你就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

杨成武飞身上马，向自己部队驻地赶去。这次伏击归他指挥的不仅有1分区的4个步兵团（第1、2、3、25团）及分区炮兵部队，而且还有3分区的2团和120师的特务团，以及游击队第3支队，看你阿部规秀还往哪跑！

11月5日，1500多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进犯。1团和25团各一部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像翻飞的鹞子一样紧缠猎物不放。使阿部大军既求战不能，又追赶不上，气得暴跳不止。

当日晚，敌人到达银坊镇，不但八路军已不在了，连老百姓也早已撤离。两次扑空的阿部规秀，更是急不可耐，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向东面的黄土岭杀来。

6日晚，日军在黄土岭、司各庄带宿营。而八路军各团已乘夜展开，在敌人第二天必经之地黄土岭布下了"口袋"。"黄土岭"可不是像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土山。它是太行山北部涞源、易县交界处群山中的一座垭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太宽的河滩。日军一旦钻进了这个易守难攻的"口袋"，就将插翅难飞。

11月7日下午，日军终于陆续进入了黄土岭峡谷中的小路。说时迟，那时快，1分区的1团、25团立即迎头杀出，挡住了敌人的去路。3团及3分区的2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去，将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公里，宽不过百米的山沟里。参战部队的100多挺机枪及步枪，从各个山头上向下猛扫猛打，分区炮兵也不断地各向山沟日军密集处开炮。狭小的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笼罩。

被困日军在阿部规秀的指挥下，凭借其雄厚兵力和精良武器，企图突破八路军寨坨阵地后继续前进。但扼守阵地的八路军两个团如同一道石壁一样，纹丝不动，使敌发起多次进攻，都未能前进一步。阿部规秀终于被迫放弃进攻，企图向后突围，逃回涞源。但担负扼守西南阵地的3团，尽管伤亡很大，却硬是死守不退。不久，第120师特务团终于赶到，投入战斗，日军的退路则被完全切断。欲归无路的敌人只好就地抵抗，并组织兵力抢占了教场村南的一个狭窄的小山梁，企图等待援军的到来。

正在指挥1团作战的陈正湘团长，从望远镜里发现，南山梁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军官也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战场，山下100米处的独立小院内，还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军官不断地进进出出。陈团长判断，这独立小院很可能就是阿部规秀的指挥所，小山梁则是敌人的观察所。于是，他立即将团炮兵连调了上来，命令他们先向山梁上的敌军官开了4炮。4发炮弹均命中目标，眼见得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独立小院里的敌人则跑进跑出，乱成一团。

陈团长命令炮兵再瞄准独立小院开炮。当时被日军关在独立院落东边小屋子里的群众，亲眼看到炮弹在小院屋前爆炸。日军指挥官被炸倒了，其身边的狼狗的肚子也被炸开。可这时竟没有一块弹片飞进东边小屋里来，群众无一人负伤，心中不禁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了！

黄土岭伏击围歼战斗，一直持续到8日中午。此时日军已派出驻保定的第110师团和驻大同的第26师团等众多部队，企图对我黄土岭地区的部队实施更大的包围，将我参战部队一网打尽。鉴于战局已发生了变化，全歼敌人已不可能。聂荣臻司令员遂指示部队撤出战斗。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发动的这次黄土岭战斗，是继雁宿崖歼灭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黄土岭战斗共歼灭日军900多名，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大车，5门火炮，几百只长短枪及大批弹药。最重大的胜利还在于击毙了日军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人民自抗战以来，所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级指挥官。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来电祝贺。杨成武亦将缴获的阿部规秀的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指挥刀送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被展示在军事博物馆。

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日本《朝日新闻》还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三天刊登悼念文章，其中说道："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先例的。"

日军急切想得到阿部尸体。黄土岭战斗后不久，即由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给杨成武写信讨还尸体。其信写道：

杨师长麾下：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杨成武当即复信，除对其信内容给予痛斥外，亦告诉了阿部及其他日军尸体所埋之处。

当阿部规秀的骨灰被送到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并"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

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悼旗致哀”。可谓“哀荣”至极！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三　日本皇军名将之死

河北涞源以南，群山莽莽，奇峰突兀。雄伟的内长城，从八达岭蜿蜒曲折到此。这里的古战场遗址有祭刀岭、插箭岭、将军岭、斗军湾、点将台，还有60座烽火台，42座古炮台，150座了望楼。古书记载，杨六郎与韩昌曾在此大战九天九夜。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把泥土都浸透了古代士兵的鲜血。

1939年11月3日下午5时，从拂晓开始的雁宿崖战斗已经结束。夕阳西坠，山色血红。部队打扫完战场，押着俘虏，沿着崎岖的山路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驻地——管头镇走来。此时，一分区司令部会议室里，正在召开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25岁的杨成武司令员主持会议。平均年龄不足22岁的指挥员们，正聚精会神地听参谋长黄寿发讲话：“今日一仗，歼敌600多，这是我分区抗战以来歼敌人数最多的一仗，我认为，经验有三……”

“报告！”

“请进”杨成武一抬头，见一团宋玉琳营长手拿一件大衣，走了进来。

“宋营长，有什么事吗？”杨成武问。

“杨司令，你看。”宋营长递过大衣。杨成武在油灯下一看，大衣胸前披佩着一条金黄色绸带，带子两边是大红色穗子，两肩分别佩有四颗闪光的金星。“阿！”杨成武吃惊地叫了一声。宋营长说：“司令员，还有一把金柄指挥刀呢！”

“哦！”杨成武急速翻开大衣，只见那绿色的里子上有一黄框，写着：姓名瑽村，血型A型。他急忙问：“这件大衣是在什么地方缴获的？”

“这是七连连长钟茂华，迂回到敌人炮兵阵地侧后，用步枪打死一个胖军官，从他身上缴获的。”顿了一下，又说：“我们不认识衣服上的这个字。”他指指“瑽”字，“我们分析一定是个大官，就急忙送来了。”

“这是日军瑽村大佐的军大衣，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杨成武急问。

“一起埋了。”

“不好！”杨成武站起身，在屋里快速地来回踱着步。副司令高鹏、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及黄参谋长也凑在灯下，仔细地翻看着大衣，小声议论着。大约三分钟时间，杨成武突然止步，大声说：“大家立即回部队，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随时听候作战命令！”

陈子端参谋瞪着惊奇的眼睛问：“司令员，这大仗恶仗是指——”

“鬼子死了个大佐，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杨成武肯定地说：“鬼子的特点就是，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是败兵刚归巢，报复的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是想乘我们庆祝胜利之时，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

指挥员们都赞同杨司令的分析，火速返回各部队去了。

杨成武又立即拿起电话，向聂荣臻报告了战斗情况及所缴获的瑽村的大衣。聂荣臻听到此处，对杨成武说：“部队要立即转移到银坊、司各庄一带隐蔽待命。”

“是。我立即作出安排。”

“好！”聂荣臻赞赏地说：“我就守在电话机旁。你们要密切注视日军动向，随时报告。”

不出所料，当天夜里，侦察参谋崔喜峰从涞源城送来情报：“张家口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四个大队，共1500人，分乘90辆卡车。向涞源急进。涞源城内彻夜不宁，日军到处抓夫。”接着，侦察参谋崔明贵从易县发来情报，内容与崔喜峰的情报吻合，说敌人要沿瑽村的进攻路线，经银坊到雁宿崖，寻找八路军主力，决一死战。

杨成武阅罢情报，思索片刻后，拿起电话，要通了晋察冀军区，向聂荣臻司令汇报，并要求再打一仗。

聂荣臻问：“部队情绪怎样？”

“很好！”杨成武信心十足地说：“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少，士气鼓得足足的，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他怕聂荣臻不放心，又追加一句说：“这一带地形我很熟悉，极似平型关，有利打伏击。”

部队刚到那里，杨成武怎么就熟悉那里的地形呢？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杨成武带兵打仗，养成一个职业习惯，他每到一地，总是首先摊开那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仔细地看，认真地记，决不放过一条小沟，一棵树木，然后，便是马不停蹄，立即考察实地，让两者在脑中合而为一。举凡山川河流，村镇桥梁，针叶林，阔叶林，他均一一熟记心中。记得有一次，侦察员向他报告倒马关地形后，他问：“倒马关南面有一条水沟，你怎么没讲？”

那参谋一拍脑袋记起来了，惊异地问：“首先，你是怎么知道的？”

杨成武严肃地说：“这种事马虎不得，一沟一坎都不能忽略，这关系到战争的胜败。”

话转回头。当杨成武在电话中向聂司令要求再打一仗后，聂荣臻略略思索片刻，说：“很好，正巧彭真、贺龙、关向应都在这里开会，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大约五分钟后，聂荣臻就来了电话，他说：“成武啊，我们一致同意你的要求，赞成再打一仗。11月7日，是军区成立两周年，同时，又是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日，我们准备召开纪念大会。你们打个胜仗，是向大会最好的献礼。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够，已通知杨嘉瑞特务团，连夜开到你那里；还通知三五九旅七一五团开到涞源牵制敌人。孙参谋

长已通知二分区、三分区、四分区部队，大约十个团兵力，赶到管头，归你统一指挥。我们吃、住在电话机旁，你有什么情况，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杨成武放下电话，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战斗方案后，用电话向各团传达了战斗任务，动员大家打一个更大的歼灭仗。各团领导听说要打大仗，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次率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出征作战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现年52岁，早年毕业于陆军教导团，是由下级军官逐级晋升的中将。他的巨大声誉来自他潜心研究战术，他曾撰著过《战争论》、《战术学》、《现代战术探讨》等，被日本军界称之为人间少有、天上不多的战术名将。前任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一年前被王震的三五九旅击毙在山西广灵县邵家庄后，阿部则以蒙疆驻屯军总司令身份，顶替了他。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担任，师团长由中将担任。当时，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也只是中将军衔。

11月3日晚，阿部得知部下辻村在雁宿崖命归黄泉，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失败，对他自尊心是一次强烈的打击，他是个视荣誉比生命还贵重的人。他想象着下次会议上，该死的顶头上司桑木师团长一定会嘲笑自己。因为一周前，他曾越级发电报给华北派遣军烟俊六大将，提出山地作战八点经验体会，发誓要在一个月内荡平五台山，彻底摧毁晋察冀根据地。可是，一开始就失去了一员大将。他想到此处，又痛又恨，他痛惜的是自己在历次战争和同中国国民党作战中，战果累累，此次却栽在八路军手中；气的是八路军让他赫赫有名的声誉，蒙上了不可抹灭的耻辱和难以洗刷的污点。他咬牙切齿，决心与这个乳臭未干的杨成武决一雌雄。为出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他就率部向雁宿崖扑来。

一路上，他头脑里乱哄哄的。此时，《朝日新闻》女记者川崎秀子的影子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一出发，川崎就找到他，请他谈谈关于如何运用迂回战术，破除八路军的游击战。可是，因雁宿崖战斗的惨败，他的心情极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了。11月5日下午，阿部到了龙虎村，他令部队就地休息。川崎见缝插针，又笑眯眯地站在阿部的面前，要求阿部回答她昨日提出的问题。阿部推脱不了，只好点点头说：“可以，可以。”

川崎迅速取出笔和本子，阿部一边踱步一边说：“抓住战机，迅速采取迂回包围，再穿插分割敌人，是我皇军与八路军作战的基本战术，最大的特点是突击性和速决性大。”

“将军阁下，你能否举例说明？”川崎歪着头，认真地问。

“这个……”阿部语塞，他知道吃了败仗，谈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发表出去将会遭到桑木和同僚们的讥讽。突然，他想了个脱身之计，便笑着对川崎说：“小姐，今晚我们要赶到银坊，明晚将在雁宿崖与八路军决战。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处理，能否等决战后再谈？”

“那好吧。”川崎无可奈何地望着阿部跳上指挥车，向白石山方向驰去。

白石山，是个美丽的地方，有一个向阳背风的山坳——野花坡，这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阿部每次出征来到涞源附近，不论战事有多繁忙，他都要抽空来此一游。

指挥车一进山坳，阿部就叫驾驶员停车。他走下车，一面欣赏着满目的奇花异草，一边扭过头，对应他召唤而匆匆赶来的川崎说：“川崎小姐，你看，这风景与富士山相比如何？”他指着山坳又说：“这里从初春到晚秋，甚至在冬季，都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奇妙世界。冬天的兰花；春天的樱花、山桃花、杜鹃花、黄玫瑰、红玫瑰；夏天，开满了桔梗、旱金莲、大黄花；秋天，则是漫山遍野的野菊花。”

此时，正值深秋，漫山的金黄色野菊花，远远望去，犹如一层金黄的地毯，微风一吹，清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站在这美丽的鲜花丛中，有如身临仙境之感。川崎拍着手，高兴地说：“真是太美了！”她指着山上的粉墙青瓦，飞檐立柱的亭阁问：“这是古代的皇宫吧？听说春秋战国时期，曾有三个皇帝在这里修筑过行宫呢！”

“是啊，这方圆几十里，有72亭，36庙。传说，姜太公、秦始皇、唐太宗，还有乾隆，他们每年冬天都要到此一游，晒太阳呢！”阿部兴致勃勃又说：“据我爷爷说，唐朝大将军薛仁贵征东，到高丽、日本之前，就在此祭天出征的。”

“对，对！”川崎点点头说：“我爷爷也说，薛仁贵是我们的老祖宗。”川崎轻声叹口气说：“我们怎么同老祖宗打仗呢？”

阿部听她这一问，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立即拉下脸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讨论。”然后，他抬手看表，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快赶路吧！”说罢，邀川崎坐上他的车。

看罢白石山景，阿部的心情好多了。在车上，他对川崎说：“白石山处处是秦砖汉瓦，大有踏过杨花又过谢桥的感受，等打完这一仗，我们再来好吗？”

川崎点点头，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便侧过脸问：“将军阁下，我能不能问一下，此次讨伐前景如何？”

“可以。”阿部沉思片刻，问道：“川崎小姐，你一定听说辻村大佐阵亡的消息了吧？”

“听说了，只是具体情况不甚清楚。”

“辻村的阵亡，我们吃了一点小亏。”阿部死要面子活受罪地说：“但是，不吃亏怎么能占大便宜呢？我打算将战场设在辻村阵亡的雁宿崖。计划是：以火葬阵亡官兵为诱饵，将八路主力引到那里，然后四面伏击。川崎小姐，你看如何？”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就是阿部将军的套狼战术。”坐在一旁的丰田参谋长插话说。

“高明，高明！”川崎竖着大拇指说。

当晚，他们到达雁宿崖。阿部立即召集作战会议，他对大家说：“几天前，璈村大佐在此遇难，八路军正在疯狂地庆祝他们的胜利。我们这一路行踪，他们也一定侦察到了。只不过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来收尸的，因此——”他打住话头，扫了众人一眼，得意地说：“我们来个将计就计，在此伏击。我决定：将兵力分散，驻在银坊、西流水、雁宿崖、司各庄一带，一处发现八路军，大家便集中火力攻之。”说罢，他一一分配了四个大队的任务。

“报告！”绿川大佐说：“寻找璈村大队官兵遗体的工作何时开始？”

“从现在开始！”阿部狡诈地说：“你们每人举一枚火把，将黑夜照得通亮，让八路军看清楚一点。”说罢，“嘿嘿嘿”地干笑几声，眼中露出杀机，咬着牙说：“我就不信八路不上钩！”

阿部一声令下，日军纷纷出动。他们在银坊、西流水、雁宿崖、司各庄一带烧杀抢掠。阿部和川崎站在高坡上观望。夜光下，川崎注视着头发斑白，胡须又乱又硬的阿部，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她肃然起敬地说：“将军阁下，川崎万分佩服您的临难不惧、身先士卒的精神，我一定要写一篇报道，叙述你这次率部亲征的感人事迹。”

“为了帝国的霸业，我应该这样做。”

“为了帝国的霸业！对对对，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它启发了我的灵感，我马上回去就写。”川崎兴奋地回到屋里，半小时后，一篇报道写成：

华北前线记者川崎季子报道：11 月 5 日，华北涞源前线，冷风时作，天气骤寒。蒙疆驻屯军最高指挥官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冒太行山奇寒，翻越 1800 米高的白石山，趋赴银坊、西流水、雁宿崖、司各庄前线，实地指挥作战。阿部是常胜将军，功勋卓著，乃名将之花。记者亲眼所见将军身先士卒，这种大和民族精神，令人钦佩异常。用将军自己的话说：“为了帝国的霸业，我应该这么做。”这种精神，实为所有皇军军官之楷模。大战在即，有将军的英明指挥，皇军一定所向披靡，乳臭未干的杨成武一定是将军手下的败将。

阿部拿着这篇报道，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指着最后一句话说：“这乳臭未干不能写。”

“为什么？”

这样降低了我的身份。”

“哦！”川崎想了想，明白了阿部的意思：一个大将军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打，有失身份。

很快，川崎的这篇报道，通过电波，发到了东京的《朝日新闻》。

这天半夜，川崎起来解手，见阿部屋里的灯光还亮着，不禁好奇地趴在窗户向里张望，只见阿部正披着大衣，全神贯注地捧着《孙子兵法》阅读着。川崎差点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回房后，她拿起笔，“刷刷刷”，一篇《将军夜读孙子兵法》的文章一气呵成。清早，她给阿部过目后，又发给了《朝日新闻》。

阿部看完川崎的稿子，刚打发走她，译电员递来一份电报，是桑木师团长从保定发来的。电报说，此次行动本来是桑木亲自组织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三旅团、第四旅团、第八旅团统一于 11 月 8 日，兵分七路，向晋察冀根据地的一次大扫荡。而阿部擅自提前行动，打乱了计划，命令阿部立即返回张家口整顿。

看着这份措词激烈、语气严厉的电报，阿部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所措地愣住了。半晌，他慌慌张张地从皮包内找出前几天桑木的一份电报，仔细一看，果然是 8 日。只是由于译电员将 8 写得潦草些，阿部当时竟看成“3”了。这怎么办。阿部一阵慌乱，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象一只斗败的公鸡，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许久，他才自语道：“完了，这下全完了。桑木本来与我不和，这下把柄抓在他手心。他一定会整我的……”就在他胡思乱想之时，绿川大佐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报告说：“在孙庄子发现八路主力，先头部队已在梁村、司各庄与八路交上火，战斗激烈。”阿部听完报告，又是一阵焦虑不安。这一下，他是进退两难，打又违抗命令，不打又接上了火。怎么办？他焦急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半晌，他下定了决心，便对丰田参谋长说：“我们现在只有硬着头皮上阵。打赢了，也许能将功补过。命令银坊、西流水、雁宿崖、张家坟部队，向梁村、司各庄迂回前进。”

从雁宿崖到司各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汽车无法行驶，阿部他们只能弃车而行。日军的大皮鞋走在满是大大小小鹅卵石的地上，不是被滑倒，就是鞋子陷在石头缝里。此时天公不作美，枡枡细雨增加了他们行军的艰难。阿部走在队伍前面，由于不时被滑倒，人成了泥猴，不得不由士兵们轮流背着前进。一段七里路程，本来用不了一小时就可到达，他们却用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司各庄，阿部却没见到八路军一个人影，不由得怒气冲冲地问绿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绿川神气活现地说：“八路军害怕皇军，打了几枪便向黄土岭方向去了。”

阿部立即拿起望远镜观看，果然，黄土岭上空烟尘滚滚。他立即挥挥手说：“部队向黄土岭进攻！”

待他们赶到黄土岭，已是黄昏。淡淡的紫霞照红了山峰，山谷光线渐渐暗淡，夜色越来越浓。阿部又冷又饿，左顾右盼，仍不见八路军一个人影。这一下，他气得吹胡子瞪眼，骂道：“八路的，太狡猾！”

这时，参谋长听阿部说还要追，便走上前，小心翼翼地说：“将军阁下，现在天黑路滑，小心上八路的当。我们还是就地宿营，等天亮再说吧。”

阿部听他言之有理，只好点点头同意宿营。

话分两头。此时，杨成武正守候在电话机旁，对于敌人的一举一动，他均了如指掌。只是，他只知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主力1000多人向我进攻，却不知道为首的竟是阿部这么个日军大人物。半小时前，他接到担任诱敌深入的一团报告，鬼子已全部在黄土岭、司各庄宿营。他立即与高鹏、黄寿发分别通了电话，下达命令：一团、二团、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集结，卡住敌人东进道路；一二〇师特务团、三团占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地；二分区的二团绕到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就这样，五个团一万兵力，刹那间将黄土岭、司各庄围了个水泄不通。此时鬼子正在呼呼大睡呢！

第二天早饭后，鬼子如爬行的蜗牛，向东移动，直至下午三点，才全部脱离黄土岭。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支人马迎头杀向敌人。就在敌人惊慌之时，早已守候在敌两侧与后尾的部队也同时合击，把敌人团团围住。敌人退无去路，只得就地抵抗。打了一会儿，阿部带着指挥所到了路边校场村，召开了十分钟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立即发电报给桑木师团长，陈述被围实情，请求派兵解围；二、集中兵力向来路方向突围。

电报发出半小时后，保定、石家庄方向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敌人派出20架飞机增援。可是，整个黄土岭、司各庄上空硝烟弥漫，加之细雨栩栩，整个天空犹如一团吹不散、赶不走的黑棉团，能见度极低，飞机只好盘旋了十几圈，摇晃着翅膀飞走了。

一团长陈正湘，手持望远镜，正在向校场村方向观察。他发现一群敌军官正在观望前方山头，其中一个满脸胡须的军官，手扶军刀，坐在湿漉漉的大石头上，他的左右有两个军官正在跟他说什么。陈团长分析，这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立即命令炮兵连长杨九秤，向敌军官群开炮。

陈正湘分析得不错，这群人正是阿部和他的下属。阿部听完汇报后，川崎递上自己写好的一则报道：忠勇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蒙疆驻屯军精锐部队，11月7日，冒雨长驱直入黄土岭八路军杨成武司令部。敌军伤亡惨重，遗尸遍野。至记者发稿时间，皇军已经取银坊、西流水、校场重镇，不日可直捣聂荣臻司令部。但敌军为挽救即将覆灭之命运，于黄土岭、上庄一线步步设防。忠勇果敢的阿部规秀中将，正指挥部队杀出重围，不到一小时，这一带八路军即将一举摧毁。

阿部看完报道，正欲说话，“轰隆隆”几发炮弹从天而降，在敌军官群中开了花。敌人顿时倒下一片。阿部也没能幸免，他倒在血泊之中，两腿被打断，肠子流在地上。丰田的臀部飞进一块弹片。绿川大佐断了一条胳臂。川崎的左眼被炸瞎。这时，一条狼狗在阿部的周围窜来窜去，结果，它的一条腿被阿部的肠子缠住。堤赳大佐侥幸没有负伤，他拍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抽出指挥刀，一刀将阿部的肠子斩断。狼狗获得了自由，摇着尾巴走了。这时一群士兵围上来，阿部用力睁开双眼，无力地说了句：“快发电报给桑木，派兵来……”话没说完，就断了气。这个在日军中战功赫赫，52岁的将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败在一25岁的中国年轻指挥官杨成武的手中。

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极度恐慌，几次突围未成。第二天清晨，桑木派来12架飞机，投下几十个降落伞，送来了粮食弹药。桑木的副参谋长——少将片山伍郎带着五名军官，也降落下来，他是奉命来指挥突围的。

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战斗结束时，除少数敌人突围外，共歼日军千余名。11月12日，《朝日新闻》用第一版整版篇幅报道了阿部阵亡的消息。在粗粗的黑框中，刊登了阿部的戎照，生平。还有日本国降半旗致哀，政府官员和军界20多个将军亲赴东京车站迎接阿部中将骨灰和吊丧的消息。消息内容是：

本报华北前线记者川崎秀子报道：11月7日，富有山地扫荡经验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精旅，冒雨酣战，官兵争先冲杀，战至中午，皇军完全置于必胜位置。下午4时，不料敌军炮弹从天而降，将军右腹和双腿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大声疾呼，要坚持打下去；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军人的本份啊！”中将负伤后半小时，晚7时50分，一代枭雄壮烈阵亡。

却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拿着电话，对杨成武说：“成武，毛主席、朱总司令打电报祝贺你啦！”

“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祝贺？”杨成武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地问了一句。

“是的。这次黄土岭战斗，你立了一大功啊！”

“什么大功？”

“延安听东京电台广播说，黄土岭战斗中，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了不起啊！”

“中将啊！我的乖乖。”杨成武惊喜地大叫起来。他说：“聂司令，这是军区首长亲自指挥的战果哦！”

“小鬼，我们可不与你抢功哦！”聂荣臻开玩笑地说。

黄土岭战斗后，全国各地贺电如雪片般飞向杨成武司令部。

（选自《八路军演义》略有删节。）

陈庄战斗

背景介绍

1939年9月25日，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和灵寿、行唐等县伪警备队共一千五百余人，在敌旅团长水原少将率领下，从河北灵寿地区出动，向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腹地进攻。当日占领慈峪镇，并向我驻东西

五河之第 719 团阵地进攻。我第一二〇师正奉命回晋察冀边区整训，途中遇敌侵犯，遂决定诱歼该敌，争取打好返回晋察冀边区之第一仗。

日寇攻占东西五河后，26 日按兵不动，下午佯装撤回慈峪镇，企图迷惑我军。27 日拂晓前，敌主力一千一百余人轻装出动，沿小径直奔我边区重镇之一的陈庄，企图乘我军民欢渡中秋节之际，加以奇袭。我驻陈庄部队英勇阻击该敌，掩护机关学校安全转移，当日 11 时，敌占陈庄。我师部判断该敌孤军深入，进占陈庄毫无收获，必将撤退，按敌行动规律，多不走原路，乃布置部队分头设伏。

28 日清晨，敌火烧陈庄后，沿磁河南岸向东撤退。8 时，其先头部队到达我预伏地区，遭我第 716 团猛烈打击，敌我反复冲杀四次，双方对峙不下。此时，我第二团赶到，由南向北攻击；师特务团也从陈庄追来，由西向东攻击，将该敌包围起来。敌则退守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等村庄及附近高地顽抗待援。当日 19 时许，我发起总攻，716 团一举攻占破门口和冯沟里之间的敌军阵地，将敌分割为两部分，并由一部兵力入破门口村与敌展开巷战，但由于我军刚从冀中水区归来，所带手榴弹大部受潮失效，未能歼敌，遂撤出村外。此时，特务团已攻克高家庄阵地从西面逼近破门口，第四团也从南面逼近破门口，第二团则攻占了冯沟里周围之高地；至 23 时，我已将敌分割包围于破门口、冯沟里两个村内。同日，灵寿之敌会合慈峪之敌共千余，沿磁河前进企图增援，结果被我 719 团英勇阻击于白头山下。敌军以优势火力向我轰击，并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向我多次猛攻，均被我击退。29 日晨，破门口、冯沟里之敌已伤亡过半，眼看待援无望，只得向南突围，企图越过鲁柏山逃窜。我军以一部正面节节抗击，迟缓其前进；一部尾随该敌，待机进攻；另以一部从左翼绕到敌之退路上截击；其余部队自两翼平行追击。敌逃至万寿岩，遭到我第二团及四分区第五团截止后，退回鲁柏山高地固守。是日 10 时许，我军已将敌包围在一块狭小地区内；13 时，我又向敌发起总攻，并以炮兵实行抵抗射击，掩护步兵攻占敌之前沿阵地。此时，敌派飞机向我低空扫射，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反扑，又夺回了原阵地。当日黄昏后，我再次发起总攻，716 团第七连首先攻占敌主要阵地，各部也从四面突入，将敌大部分围歼之。残敌向南溃逃，在万寿岩附近复遭我特务团和四分区第五团伏击，终将敌全歼。

陈庄战斗，我歼灭敌第八混成旅团长水原少将、田中大队长以下一千二百余人，创造了山区歼灭战的范例。

材料：

· 陈庄战斗

· 神兵奇智战水源——陈庄歼灭战

· 模范的歼灭战

材料一　陈庄战斗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我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四团、独一旅的二团、独立一支队及津南自卫军等部，奉命由冀中平原转到平汉路西，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整训，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就在这时，聂荣臻司令员和关向应政委来信通知，敌人正调动兵力，有向我进犯模样，要我们在北岳区军民协助下，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告诉我们，各地的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学校和群众，也都作了反“扫荡”的准备。

果真象聂、关首长所料，驻守正定、无极、行唐和灵寿等地的日军步兵独立三大队和伪军守备队共约一千五百余人，突然于二十四日集中于灵寿，企图袭击陈庄，捣毁我军后方机关，破坏我根据地建设。

陈庄，位于鲁柏山区的西侧，慈河北岸，距离灵寿仅百余里，是我晋察冀边区比较大的集镇之一。许多机关、学校、团体都设在陈庄附近。在这以前，敌机曾四次轰炸陈庄，敌军曾一度进扰。这次陈庄又是敌军进犯的目标。

从灵寿到陈庄，除几条绕行道路外，主要道路是经慈峪镇到陈庄的一条。我们按常规估计，敌人会经慈峪进攻陈庄。因此确定，除以四团进至口头镇以南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以外，其余各部集结于北谭庄至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布成一个袋形阵势，等待来犯之敌。

二十五日早晨，隐约的炮声自南方阵阵传来。不多会儿，我们接到报告：敌已自灵寿出动。

就在这时，贺龙师长带着一二〇师师部和七一六团也由冀中回到了北岳区。这就更加增强了我们战斗的力量和胜利信心。

在慈峪镇附近，我们只有四分区五团的一部在那里警戒，对敌人本来没有多大的阻力。可是，敌人却象示威一样，几乎用出了全部火器，作正式进攻。敌人占领了慈峪。我们命津南自卫军逼近敌人，且战且退，诱其深入。敌人的炮火更加炽烈了，消息也不断传来：

“敌人进占北霍营！”

“敌人进到了东西五河！”

“……”

敌人向着我们设伏的方向来了，我们等待着，等待着……从中午等到黄昏，连敌人的影子也没等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敌人进至南谭庄以后，便停止前进。当夜，津南自卫军曾以白头山为依托，几次向南谭庄之敌发起攻击，诱敌出战。然而，狡猾的敌人只以火力还击，不肯前进一步。

敌人不肯上钩，我们只好抑制着急切的求胜心情，把

胜利推迟到明天了。不料，次日上午敌人仍按兵不动。下午四点钟，南谭庄、东西五河和北霍营一线的敌人却出乎意料地全部退回慈峪镇去了。傍晚，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四分区五团转来的电话说：慈峪镇的敌人正向灵寿撤退，大炮、辎重已退去很远。

难道敌人真的会这样轻易撤走吗？分析各种情况，回答是否定的。

日军和我们打交道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前吃尽了苦头。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给其部属的一份指示说："……对付八路军必须采用一套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精神和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在近距离进行很快的奇巧袭击……"看目前敌人的行动，可能正是采取"新战术"哩！突然撤退，不过是一种假象。

二十七日一早，军区司令部从电话里告诉我们：敌人只留下几百人控制慈峪镇，主力一千多人正沿小路向陈庄疾进……。这完全证实了我们昨夜的判断。

敌人的花招是徒劳的，既没有达到迷惑、欺骗、暴露、调动我军的目的，也没能破坏我军后方机关。因为驻陈庄的我军机关、群众早已作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正象贺龙师长对敌人"新战术"的评价："班门弄斧！"贺师长用电话指示我们：敌人是孤军深入，北无据点接应，南边接济也十分困难，因此它在陈庄不敢久留。敌回窜时，必须抓紧战机，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掉！

遵照贺师长的指示，我们立即作了部署：津南自卫军以一个营绕道小路尾敌前进；其余继续控制白头山、北谭庄以南阵地，严密监视慈峪镇的敌人；主力二团、七一六团、一支队等部，即刻顺大路向陈庄方向前进。

下午，我各部先后赶到陈庄外围。扰敌的部队也派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敌人会从哪条路逃跑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向我根据地进攻的敌人，往往是从哪条路来再由哪条路回去。我们也正是依据这条规律设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敌人的行动开始有了变化，我们却不能不重新考虑，既然敌人来时耍了一套"花招"，那么走的时候也可能来个"新战术"——改变过去的老规律，不走来时的小路，而顺东南的大路逃跑。敌人这样做，既可避免象过去一样遭我伏击，又可与慈峪之敌相呼应。

敌变我也变！我们决定改变以往在敌来路上设伏的做法，确定以二团和七一六团在陈庄以东占领慈河两岸的高地，严密控制敌人东逃的大路。为了防备万一，另以一支队的三营进至陈庄以南的长峪，准备堵截可能由来时小路逃跑的敌人。一支队的另一部顺大路向陈庄靠拢，占领陈庄东侧的七祖院，与敌保持接触。这一方案经师部批准后，部队便开始调动。

占领陈庄的敌人，以为他们的"新战术"取得了胜利。后来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敌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陈庄附近的机关、学校和群众早已转移了。八百多户的村镇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家家户户都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而满街的墙壁上却到处涂写着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入夜，我一支队和原驻陈庄的"抗大"二分校，又分别从东西两面不断向陈庄袭扰。敌人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得不到任何情报，只是躲在村里盲目还击。

二十八日拂晓，陈庄上空腾起了冲霄的烟柱——敌人放火烧房子了。这是敌人逃跑的信号，我们命令部队马上准备战斗。

约八点钟，陈庄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侦察人员报告："一支队在七祖院打上了。"根据情况判断，敌寇大概要顺大路向东跑。

这个消息实在令人兴奋。可是，半个钟头以后，独一旅来电话说："一个侦察参谋亲眼看见，敌人的主力已渡过慈河，正向南顺来时小路退去。"接着，一支队也报告：向七祖院进攻的敌人已经后撤，正涉渡慈河，准备南逃。好狡猾的敌人，果真又来了一个新花样。

综合各方面情况，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仍肯定原来的判断：敌人并没有发现我军的位置，更没有觉察我军的部署。因此，他们向来路南逃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指令二团再抽些部队赶往陈庄西南的长峪一线，防止敌人真由来路逃走。

一个钟头以后，前沿侦察部队送来了报告：敌人又转换了方向，利用河边的芦苇树丛作掩护，正沿着慈河南岸鲁柏山脚下的大路向东逃跑。大家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敌人到底还是朝着给它安排好的死路上来了！

战斗很快打响了。开始，敌人以为我们受了他们"新战术"的欺骗，主力集中在来路上，这里只不过是些小小的游击队，因而并不在意，大摇大摆地向东逃窜。但当它进至冯沟里一带时，却遭到我七一六团的猛烈阻击，再也前进不动了。向长峪急进的部队，听到这边的枪声，也从敌人屁股后面追来。敌人开始慌乱了。

七一六团一营据守的阵地，是伸向慈河的一个突出而又光秃的小山包，象一扇闸门一样，死死卡住敌人东逃的大路，对敌威胁极大。敌人为了夺路逃跑，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向这个小小的山包发起了连续的强攻。于是，这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我一营从中午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先后向敌人进行了四次冲击、三次肉搏，阵地坚如磐石，始终紧紧地掌握在我们手里。敌被压在河沟里，成群地挤在一起，火力发挥不了，又无处藏身。据守在北山上的我军部队，则越战越勇，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军一批接着一批倒在淤泥里。

敌人丢下了数百具尸体，好容易闯过了这一关，却又落入了一个更大更紧的包围圈里。敌军向右冲，被我二团顶回；向左突，又被我七一六团另一部杀退。南面是陡峭的鲁柏山，其他三面都有我们的部队堵击。敌人被紧紧压缩在破门口一带的几个村落里。

这时，老乡们送饭的送饭，送水的送水，有的扛着担架，翻山越岭，从四面八方来到了阵地上。群众的热情，给部队很大鼓舞。战士们吃饱了饭，喝足了水，借着夜色的掩护轮番袭击敌人。鬼子又饥又渴又累，几次企图突围，都被打了回去，只得依靠村子垂死挣扎。

直至最后，敌人还幻想着以出我意料的行动来逃脱被歼的命运。次日上午，他们集中全力，拼命往鲁柏山上爬去。鲁柏山又高又陡，他们趴在光秃秃的山崖上，既无掩护，又无依托，我军以各种火器猛烈射击，又给了敌军很大的杀伤。敌人爬到山顶时，辎重和重火器全部丢掉了，活着的也只剩下二三百人了。

残余的敌人满以为爬上了鲁柏山就可摆脱我军的重围，从山背后溜走。可是，四分区的五团早在山后的万寺崖堵住了敌人从这里的逃路。民兵、游击队和群众卡住了所有的大小山沟和荒僻小道。敌人被围困在方圆不过一里路的山顶上，无粮无水，又缺弹药，而且不断受到我军火力杀伤，处境更加困难。只好不住地呼救。从战后缴到敌人的电文中知道，他们垂死前曾哀鸣："现在西側鞍部苦战中，刻下身边忧虑，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并增派讨伐队。"

敌机倒是来了，在上空绕了几个圈子，丢下了几大包弹药和饼干，但大部分都落到我军阵地上了。"讨伐队"其实也早来了，慈峪镇的敌人最多时增至八百多，不断向津南自卫军扼守的白头山阵地攻击，但均被击退。

下午，贺师长来到我们指挥所。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发起了总攻。霎时间，鲁柏山上枪炮齐鸣，杀声震天。五连战士们首先冲上山去，接着，后续部队陆陆续续冲上来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在我军勇士们面前，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就地被歼。剩下的十几个钻进了偏僻的山沟中，最后也被民兵、游击队一一捕获，无一漏网。

在我军民协同一致的行动下，敌人又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张宗逊，《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二　神兵奇智战水源
——陈庄歼灭战

1939年3月至5月，日寇为摧毁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与设施，侵入晋察冀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合击和分区"扫荡"的方法，对我北岳区的东部、西部先后进行疯狂的"扫荡"。陈庄因驻有晋察冀边区的后方机关，而成为日寇屡次"扫荡"的重点。晋察冀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抗击，连续粉碎了日寇的几次"扫荡"。

日寇前几次进犯失败后，经过4个多月的准备，重新制定了"秋季大讨伐"作战计划。规定，驻石家庄及正太线的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于9月下旬向北岳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

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长水源带着日伪军突破第4分区独立第5团的阻击阵地后，直扑陈庄，对陈庄发起猛烈攻击。由于兵力众寡悬殊，驻守陈庄的抗大2分校和地方武装，被迫且战且退。上午11时许，日寇占领陈庄。

望着硝烟还未散尽的陈庄，水源旅团长得意洋洋。这天正是一年一渡的中秋佳节。水源命手下杀猪宰羊，庆祝中秋和皇军取得的"赫赫战功"。听到这一命令，日伪军犹如一群嗜血成性的野兽，用那血淋淋的双手屠杀着陈庄的鸡鸭牛羊。一时间，牲畜被宰杀时的惨叫声和日伪军的狂呼乱叫声交杂在一起，鬼哭狼嚎一般。远在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这一报告，敌酋不禁喜形于色，大肆吹嘘"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新战术的胜利。"

正当日寇沉醉于进占陈庄的"胜利"之时，我120师已星夜回师陈庄。其实，早在日寇从北谭庄一线撤兵，继而又把辎重撤回灵寿时，贺龙师长就判断出，敌进袭陈庄的目的尚未达到，其主力未经激战就退却，其中必然有诈。当27日拂晓，日寇准备走小路偷袭陈庄时，我已有所察觉。不久，又接到了第4分区独立第5团送来的敌经北燕川进袭陈庄的消息。见敌情已发生了变化，已不能实现在北谭庄至东岔头伏击敌人的计划。贺龙立即命令于25日下午赶到南北城寨地区待机的第716团和第2团、独立第1支队向西转移，隐蔽集结于陈庄以东大庄、南北台头地区，同时命令独立第1支队到达后，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与抗大第2分校配合，不断袭扰陈庄的敌人，消耗疲惫敌人，为主力歼灭该敌创造条件。

27日夜晚，中秋的皓月，又圆又亮，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远山近树依稀可见。喧嚣了一天的陈庄，此时此刻也落入了平静，只是偶尔能听到日寇的哨兵查问口令的声音。

约11时左右，独立第1支队和抗大第2分校根据第120师首长的命令，从东西两个方向突然向陈庄发进攻击。顿时，陈庄周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激烈的枪声把烂醉如泥的日寇从迷梦中惊醒，睡眼朦胧的水源旅团长一反平日矜持的姿态，惊惶失措地指挥日伪军拼命死守陈庄。这下搞得水源彻夜不得安宁，内心十分恐慌，生怕被八路军包围。此时，水源觉得偷袭陈庄的目的已经达到，应该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第2天，也就是28日一大早，他便令纵火焚烧陈庄的房屋，然后带兵开始回撤。

见敌突然调头东窜，贺龙师长当即命令 716 团以一部兵力迅速抢占敌东窜路线上的有利地形，坚决阻敌撤退，716 团主力迅速涉过磁河，向南攻击敌行进纵队的翼侧。命独立第 1 支队尾追敌人，由西向东攻击敌人的侧后。同时，传令已向长峪转移的第 2 团迅速回师，从南向北攻击敌人的翼侧。顿时，枪炮声大作，120 师从四个方向，向敌发起围攻。

听到四周响起激烈枪炮声，水源旅团长险些从马上栽下来。急忙命令先头部队迅速克服八路军的阻击阵地，打通回撤路线。

此时，担任阻敌向东撤退任务的是 716 团 3 营。3 营据守的叠谷崖阵地，是伸向磁河的一个突出的小山包，它象闸门一样，卡住了敌人东逃的去路。1000 多人的日伪军拥挤在泥泞的河滩里，既无法逃窜，又难以发挥火力，在我 120 师居高临下的打击下，象无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死伤狼藉。

水源见自己已经被包围，忙命令残部占领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等村落及附近高地顽抗。同时，命一部兵力由冯沟里涉河抢占南台头西侧高地，一部兵力向高家庄东侧第 2 团阵地猛烈攻击，企图夺占有利地形，等待援兵救援。但是，尽管日寇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却始终没有进展。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到下午 13 时许，我 120 师的攻击部队先后攻占了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等村落附近的大部分高地，将敌人压缩到村内。14 时许，第 4 团根据师首长的命令，由牛下口进至石咀附近，占领了破门口以东高地。至此，日寇东窜逃跑的道路被完全封住，陷入绝境。

得悉水源旅团长被围之后，28 日 15 时，灵寿之敌向慈峪镇增兵 300 余人，16 时，会同慈峪镇的敌人共 800 余人沿慈峪镇至陈庄的大路向北进犯，企图接应水源旅团长和被围的部队。当进到南北伍河、白头山地区时，遭到早已等候在此的第 120 师第 719 团的顽强阻击，被挡住去路。

为了保证全歼被围之敌，贺龙师长又对部署作了调整：独立第 1 支队向东攻占高家庄与冯沟里之间高地，尔后向冯沟里发展进攻；第 2 团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冯沟里南侧高地后，向冯沟里村南发展进攻；第 4 团由东向西攻击破门口之敌，并控制该村；第 716 团涉过磁河，由北向南进攻，协同以上各部，力求歼敌于冯沟里、破门口地区。

根据师首长的部署，各部队于黄昏时分，向被围之敌发起最后攻击。战至 20 时，日寇所占高地均被我攻占，只好退守冯沟里地区据村顽抗。我攻击部队又从四面对村子发起围攻。这时我军发现携带的手榴弹大部分已受潮失效，大大地降低了部队的攻击力，一时间部队没能攻进村中。

晚上 23 时许，进到南北伍河的敌援兵继续向白头山第 719 团的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英勇的第 719 团的指战员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白刃肉搏战。日寇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虽然夺占了 719 团的部分阵地，但在第 719 团的顽强阻击下，始终没能通过。为了防止援敌一旦突破 719 团的阻击阵地，与被围之敌合兵一处，难以实现预定歼敌目的，贺龙师长又命令第 4 团迅速向东西岔头、桥塔崖一线转移，以便在这一地区设置第 2 道阻击阵地，坚决阻敌增援，以保证主力歼灭被围在冯沟里村的敌人。29 日拂晓，为了夺回被敌占领的阵地，719 团向白头山增援之敌发起反击，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在歼敌一部后，重新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此时，困守于冯沟里的水源残部经过两天两夜的浴血苦斗，早已精疲力竭。眼见援兵迟迟不到，身边的人马又急剧地减少，再也难以坚持下去了。29 日拂晓，水源带着残兵败将拚死向冯沟里南山突围。见此情况，我 120 师立即以一部兵力节节抗击，其余各部队迅速向敌发起追击和截击。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贺龙师长又令进到东西岔头的第 4 团立即回兵向沙湾前进，截断残敌逃路，阻敌增援。9 时许。水源又带着残兵败将向万寺崖方向溃逃。然而，晋察冀第 4 分区独立第 5 团早已抢先占领了万寺崖附近的制高点，截断了水源残部的去路。10 时许，各路追击部队赶到，将水源残部再次包围于鲁柏山以西的鞍部。水源见已陷入绝境，一面督促残部作困兽之斗，一面向石家庄、灵寿方面频频告急求援，电称："现在（鲁柏山）西侧鞍部苦战，阁下身边忧虑，希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及增派讨伐队来"。

下午 14 时许，我炮兵部队运动到山上，向顽抗之敌猛烈射击。716 团和独立第 1 支队趁敌混乱之机，向残敌发起总攻，歼敌大部。这时，自石家庄方向飞来 3 架敌机，凌空助战。水源见状，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忙纠集残部，拚命反扑，夺占了部分高地。6 时许，又有敌机 3 架飞临鲁柏山上空，投下 6 大包弹药、饼干，但其中 3 包落入我军阵地上，连日苦战的抗日勇士，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皇军"的"慰劳品"。

29 日夜晚，一轮明月慢慢地爬上山头。10 时左右，贺龙师长下达了最后总攻的命令。顿时，枪声、炮声、喊杀声响彻整个鲁柏山区上空。英勇的 120 师的抗日健儿，端着雪亮的刺刀，向日寇猛冲过去。在我强大的攻势之下，水源及其残部被打得七零八落，毫无招架之功。这时，一颗复仇的子弹射进了水源的身躯，水源一头栽倒在地，倒在血泊之中，结束了恶贯满盈的一生。日寇群龙无首，更是溃不成军，到 30 日拂晓，残敌悉数被歼。

与此同时，在白头山阻击援敌的 719 团，也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日寇死伤惨重。于是，日寇又从后方增调 200 余人及 3 辆坦克，以加强进攻力量。在坦克的支援下，日寇又对 719 团阵地发起轮番攻击，但仍未取得半

点进展，被阻于白头山一带不得前进。30日8时许，当援敌得知水源旅团长向鲁柏山区突围后，即以一部兵力在南伍河与719团纠缠，主力向沙湾方向迂回前进。没料到，刚进到沙湾附近，就被早已守候在此的第4团打个正着。这时，援敌获悉水源旅团长及所带人马已全部被歼，为免遭水源旅团长的下场，急忙溜回慈峪镇去了。

战场上的枪声终于渐渐地停息下来了，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鲁柏山区，朝阳之下，120师的抗日勇士正怀着胜利的喜悦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这一战，历时6天5夜，水源旅团长亲自率领的日伪军1500余人，全部就歼，无一生还，我军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步枪500余支，战马50余匹。这也是120师由冀中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的胜利，给进犯我边区的日寇以沉重打击，大大地提高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日寇"秋季大讨伐"的胜利信心。

（选自《百战图》，作者：袁静伟）

材料三　模范的歼灭战
——一二〇师陈庄歼敌记

1939年9月，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即冀西）进行秋季大"扫荡"。正在冀西行唐、灵寿县境内集结待命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立即投入了反"扫荡"作战。

鱼儿不入网

巍巍太行深处，绵绵慈河上游，座落着一个有八百多户人家的大镇子——陈庄。它位于灵寿县西北，距县城百余里。庄上驻有抗大二分校和不少边区机关团体，庄北不远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9月25日，日军第八混成旅团长水原义重派得力干将谷见，率该旅团独立三大队和伪军守备队约1500余人，由灵寿县城出发向慈峪、陈庄进犯。

敌人从灵寿县城一出发，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向贺龙师长通报了消息，并研究决定由一二〇师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晋察冀军区抽调部分部队、民兵协同作战。敌人此次出动，不仅携有山炮、迫击炮等重型武器，还备有装甲车、马车等粗笨辎重。据此，贺龙等断定敌人顺大路从正面进攻陈庄的可能性大，决定采用"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战术将敌歼灭在通往陈庄的必经之地慈峪附近。

26日上午，敌人占领慈峪。下午向南北潭庄攻击。贺龙命津南自卫军（后编入一二〇师）且战且退、引"鱼"入网。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一路疯狂向我军打炮，空中还有3架飞机助战。然而，当敌人进至我军伏击圈附近的北潭庄时，却突然停止了前进，只是不停地向津南自卫军阵地猛烈开炮。津南自卫军虽多次引诱攻击，敌只是就地还击，就是不前进一步。战斗持续到傍晚，敌反而全部撤回慈峪。

敌人为什么后撤？"鱼儿"为什么不入网？设在陈庄以东刘家沟村的一二〇师司令部里，贺师长、关政委和周士弟参谋长等师部领导正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个问题。贺师长凝视着军用地图，紧锁双眉，烟斗抽得哧哧作响，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敌人并未遇到强有力地阻击却停止不前；我军并未反击，敌却主动后撤；难道鬼子发现了我们的埋伏？一会儿，贺龙同志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他转身对周士弟说："老周啊，看来小鬼子要耍花招啦，敌人的秋季'扫荡'是预谋已久的，这次出动又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在没受到沉重打击时，它是不会轻易缩回它的王八脖子的嘛。"周参谋长会意地点点头说："看来敌人是不想从大路进攻陈庄了，可能要偷袭陈庄。""对！"贺龙磕掉烟斗灰接着说："白天敌人猛攻潭庄，是想探我虚实，吸引我主力。可能趁夜晚偷袭我陈庄。哈，小鬼子也想搞个'声东击西'呀，三十六计学得不错嘛。""不过这就逼着我们改变作战部署。"周士弟放下手中铅笔，似乎有点惋惜地说。"是啊，看来鱼儿是不想入网了。"贺龙若有所思地说。"鱼儿不入网不要紧，我们可以赶鱼入网嘛。"一直静听二人对话的政委关向应从容地补充了一句。贺龙听了高兴地说："对，敌变我变，在北潭庄鱼儿未入网，我们可以把网撒在陈庄，将计就计，来个赶鱼入网。"

赶鱼入网

26日傍晚，慈峪之敌留下伪军数百人，其余主力千余及重炮、辎重向灵寿方向撤退，一直密切监视敌人动向的我津南自卫军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师指挥部。贺龙得悉后，笑着说："是狼总想吃肉！狐狸嘛，总忘不了偷鸡。陈庄是一块肥肉，鬼子早已垂涎三尺。得不到陈庄，他们是不会回去的。"贺龙一面命令津南自卫军派一个营尾随监视敌人；一面命令三五八旅的三个主力团沿大路向陈庄外围飞兵急进；同时通知陈庄军民做好战斗准备。

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向灵寿方向撤退的千余日军，突然杀出回马枪。谷见指挥官让重炮、车辆辎重继续撤往灵寿，亲率千余日军轻装折回，沿小路向陈庄方向奔袭。我尾随部队边追边打，迟滞敌人的前进速度。一心想夺取陈庄的谷见，置后面实施攻击的我军而不顾，只顾率军向前狼奔豕突。27日上午10时许，敌攻占陈庄。这天正是农历中秋节，谷见曾许诺部下："攻下陈庄后，用土八路的羊羔美酒庆贺中秋佳节。"岂知，谷见的许诺成了画饼充饥。敌人进庄后，陈庄的机关、学校和群众早已转移到山上，八百多户的村镇找不到一个老百姓，也找不到一粒粮食，家家户户都空空荡荡，更没有什么羊羔美酒。迎接"皇军"

的是满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等醒目大标语。谷见见状，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然而，敌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不知是对其上司的吹捧还是讽刺。

一网打尽

正当日军沉浸于占领陈庄的喜悦之中时，我军已在贺龙的指挥部署下，完成了对陈庄的包围。担任围困、袭扰陈庄之敌的一支队主力及当地群众武装，不停地进攻和袭扰，使敌人白天晚上都得不到休息。敌人找不到老百姓，找不到粮食，更得不到情报，外面有多少中国军队，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不敢贸然突围，想坚守待援。但从慈峪出援的数百敌人，被我津南自卫军在白头山一带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回。入夜，谷见气急败坏，下令放火烧房，中秋的月亮被焰云遮住，日军的暴行，使小溪淌泪，松涛怒吼。28日晨6时许，敌人第二次焚烧。一见村中烟火又起，贺龙同志立即传令各部："鬼子要逃，作好战斗准备。"

上午8时，敌军突出陈庄向回逃窜。开始，敌沿来时小路回窜，方向朝南，妄图以此迷惑我军，将我军主力吸引到小路上来。一个小时之后，敌渡过慈河到大庄，便不再沿小路南窜，而是沿河东行奔向大路，这就必然要钻进我军的"网"中。谷见为了继续迷惑我军，又派出一支人马，由大庄继续向南，朝我一支队三营把守的长峪猛攻。谷见自以为得计，率主力由大路突围，大队长田中省三郎也吹捧谷见又下了一着"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的好棋。然而，当敌行至冯沟里时，早已恭候多时的我主力七一六团三营轻重火力齐发，将敌打得落花流水。敌疯狂反扑，向三营阵地强攻四次终不得手。千余人被迫拥挤在河谷里，火力发挥不了，又无处藏身，在我猛烈火力射击下，敌人一批批倒下去，最后丢下数百具尸体，才总算冲过了三营的封锁。然而，敌人又落入了我军一个更加严密的包围圈里。谷见嚎叫着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敌军向右突，被我独立二团挡回；向左突，被我七一六团另一部杀退。敌南面是陡峭的鲁柏山，其它三面都有我军堵击，敌人被迫龟缩在坡门口村一带的几个小村落里，凭藉村落作垂死挣扎。

29日上午，敌抛弃了抢劫的财物和背包行李，拼命地向鲁柏山上爬去。敌人爬在光秃秃的山崖上，既无依托，又无掩护，我军集中各种火力向敌射击，敌人成了活靶子，尸横遍野。等爬到山上，谷见手下只剩下二三百大兵。上山后，敌人想从后山溜走，我晋察冀四分区五团早在后山的万崖寺等候多时，一阵冲杀又将敌人赶了回来。敌人被困在不到一平方华里的山顶上，无粮无水，又缺弹药，同时还不断遭到我军火力杀伤，狼狈到极点，只好拼命呼救。从战斗结束后缴获的敌军电稿中得知，在敌被彻底消灭之前，谷见曾向上司哀鸣："现在西部鞍部苦战中，刻下身边忧虑，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并增派讨伐队。"飞机倒是来过两批六架，弹药粮秣投下了许多包，但大部都落在了我军阵地上。讨伐队也增派了许多，水原旅团长纠集了灵寿、行唐、慈峪之敌千余人，并亲自率领，驰援谷见，但被我阻击部队挡在伍里河和白头山一带。水原指挥援军多次向我军阵地冲击，但终难奏效，不能越雷池半步。在我强大火力下，敌人死伤惨重，一颗复仇的子弹射入水原腹中，水原坠落马下捂着肚子嚎叫。敌军见指挥官负伤，群龙无首，无法再战，便急匆匆保护着水原逃命而去。

下午4时，我军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与敌人争夺山头阵地。部署在周围山头上的迫击炮，吼叫着将一排排炮弹射向敌军阵地，随着炮弹的呼啸声，部队开始向主峰冲击，枪炮声、军号声、战士喊杀声，汇成巨大的声浪，在山谷中回荡着。谷见率残部拼死顽抗，使我军攻夺山头阵地的战斗异常艰苦。到晚12时，残敌全部被歼。被称为"天才指挥官"的谷见和他所率领的千余名日军，都成了异乡之鬼。侥幸漏网的十几个残敌，恰如丧家之犬，钻进了附近的山沟里，最后也被我从附近村庄赶来助战的民兵游击队所抓获。

陈庄歼灭战打得干净利索，共歼敌千余人，是抗战以来，我军最漂亮的一次歼灭战。当时被我方报纸誉为"模范的歼灭战"

(选自《党史博采》90年6期，作者：张树昌)

齐会战斗

背景介绍

1939年4月20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八百余人，由河北沧县开赴河间，22日进到河间以北之三十里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这时，我一二〇师师部及主力独一旅、独二旅驻在齐会地区。师部判断该敌有向我进攻之可能，但周围敌军不多，而我师驻地附近有七个团的主力，有把握消灭敌军一路，乃决定在齐会地区作战。当即，我师部向各旅、团干部布置战斗，并作了紧急动员，全体指战员决心以胜利来庆祝一二〇师在冀中与主力的大会合。

4月23日9时，敌占南北大齐，炮击齐会，且将我驻齐会之716团第三营包围起来，双方激战。716团7连突然勇猛动作，打开了一个缺口，冲进齐会村，加强了防守力量。敌立即反扑，把7连打开之缺口又加封锁。正当双方进行争夺时，我后续队伍赶来，对敌构成反包围形势。敌与我经八小时激战，伤亡过大，既无力击破齐会村内之

守军，又无力打破我之反包围，双方形成对峙之势。23 日 17 时，敌对我守军施行火攻，并向齐会和师部驻地大朱村猛烈发炮，打毒气弹，正在前沿阵地指挥的贺龙和其它同志因而中毒。但敌人企图突围之阴谋并未得逞。同时，从任邱和吕公堡向南进犯之敌也被我独二旅第 5 团所阻击，从大城出发增援之敌则被我冀中三分区第 27 大队所阻滞，无法与齐会之敌会合。一二〇师部队为齐会之敌已成孤立状态，有乘夜突围之可能，遂决定一面加紧进攻，一面作好防突围之准备。

4 月 24 日晨，我 716 团主力与齐会村内之守军打通了联系，敌乃向南逃至马村，遭我 715 团伏击，于是折向东北抢占找子营，并向南留路猛攻，企图夺路东窜。但遭我独一旅第 3 团的顽强反击，该团虽系新部队，但在我师派去老骨干带领下打得非常英勇，团政委朱吉昆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英勇牺牲。激战终日，敌仍未攻下南留路，而我主力已将敌团团围住。是日夜，我军发起攻击，占领找子营。4 月 25 日晨，敌向张曹方向溃逃，遭我伏击；窜回南留路，又被第 3 团击退，我追击部队终将敌包围于南留路西南之张家坟坟地中。敌经两昼夜激战，伤亡惨重，已无攻击力量，被迫挖壕固守，并掩埋枪炮、尸体，准备夜间突围。当日黄昏，我军发起总攻，敌人死伤累累，战斗将结束时，骤起狂风，残敌八十余人乘隙逃脱。

齐会战斗，我集中七个团之兵力，经三昼夜连续作战，歼敌一个大队七百余人，首次取得了平原歼灭战之胜利，严重打击了日寇之疯狂气焰，坚定了冀中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的胜利信心。

材料：

- 齐会激战
- 巧布罗网，智斗吉田

材料一　齐会激战

1939 年 4 月下旬，贺龙率领一二〇师在安国、博野、蠡县广大地区乘胜东渡潴龙河，深入河间、任丘、大城、沧县之间的敌人心腹地区，与魏大光、高士一两支新的抗日部队进行合编。

从河间出来的敌人，当晚在我驻地西面的三十里堡宿营。师首长估计敌人第二天可能继续东进，便决定我军原地荫蔽，等待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第二天一早，敌人果然向我们七一六团三营驻地齐会村扑来。刚刚接触，便展开全部兵力进行猛烈攻击。我团根据预定计划，急调一、二营向敌人背后运动，以配合三营夹击敌人。很快，在二三里方圆的齐会村形成了敌人包围三营，一、二营又包围了敌人的犬牙交错的形势。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敌人包围了齐会村后，即以步兵、骑兵在炮火配合下发动了进攻。我们的战士不慌不忙，象在雁门关伏击敌人那样，单等敌人冲近了，才开火还击。就这样，连续打垮了敌人的三次冲击。后来，敌人见硬攻不行，便向我们发射了毒气弹。战士们看见一团团白烟在头上散开，便喊起来："鬼子放毒气啦，快防毒啊！"大家把事先准备好的大蒜吃下去，又用水浸湿毛巾捂住嘴。这时，有人举着水壶喊道："共产党员们，把水让给机枪班，保证机枪打响！"这一喊，战士们纷纷把水壶送给机枪射手，自己打喷嚏、流眼泪、呕吐，仍咬牙坚持。

敌人估计毒气已经奏效，就端着刺刀"呀呀"地叫着冲上来。哪知我们的机枪比以前叫得更欢，战士们跃出堑壕，完全不象中了毒，和敌人拼起了刺刀。九连长曾祥望从敌人军官手里夺过一把战刀，一口气砍死三个敌兵。半小时以后，敌人再次猛烈攻击。由于三营伤亡较大，弹药也不足了，敌人冲进了村北我军阵地。战士们转移到房子里、屋顶上，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敌人每占领一堵墙、一间房子，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于是又使出了更加毒辣的手段，运来大桶汽油放火烧房子。王营长站在一间房顶上，眼看滚滚的黑烟冲天而起，他振臂高喊："同志们，一、二营就在村边，敌人快完蛋了，我们要沉住气。东南角隔着一条街，火烧不过去，我们往那里撤！"十二连几个战士站在燃烧着的房子上掩护部队撤退，子弹打光了，就把小炮弹的保险卸掉，当手榴弹打。有一个班被敌人围在房子里，一边迎击敌人，一边和火焰搏斗。敌人边攻边喊："捉活的！"后来这个班只有四个人了。班长的左臂又挂了彩，但他连伤也不包，瞪起大眼睛对大家说："敌人有枪，我们也有，敌人的刺刀是捅我们的，我们的刺刀也饶不了敌人，准备拼！"这时，敌人见屋里没有动静，以为我们的人全牺牲了，便冲进门来，班长大喊一声："捅！"四把刺刀一齐穿进了敌人的胸膛。他们趁势冲出了房子。

撤到村东南后，三营的阵地只剩下几座大院套了。营党委召集紧急扩大会议，向全营同志提出了"战胜火攻，战胜毒气，坚持到底，保证胜利"的口号，各连队支部也都在工事里开了会，表示决心打到底。会后，全营调剂了仅有的弹药，伤员们拿起了武器，干部和共产党员们守在最危险的地方，并且向敌人进行了反击，夺回了村南的石桥阵地。

当晚，敌人慌忙向马村方向撤退。

二十四日，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们汗流浃背，在田野上、大路小路上，跑步追击。他们已经一昼夜没休息了，但跑起来却象是一群猛虎。有的脱掉了被火烧烂了的棉衣，有的丢掉烧坏了的鞋，猛向前赶。附近的老乡都跑出来，看热闹，男女老少拍巴掌、呼口号给子弟兵助威。

敌人从齐会跑到找子营，早在那里等候的七一五团一部分迎头就和敌人打起来。二十五日拂晓，敌人又向南

逃到南流路，在村头等候多时的三团又堵住了去路。敌人象无头苍蝇一样，连向三团猛攻九次，结果死伤惨重，还是没打通逃命的道路。

这一下，敌人可就慌了，活象野兔子，在麦地里乱跑乱窜。我军用机枪把几百鬼子和百多辆大车一齐压到南流路到张曹村的交通沟里。晌午，我团赶到沟旁，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人展开猛攻。残敌又退到附近的一片墓地里，我随即又将其团团围住。

当晚大风骤起，部队一举冲入柏树林，最后消灭了敌人。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墓地里挖了一个大坑，原来敌人饥渴难挨，想挖井掏水喝，但挖了一丈多深还未见到水，我军就攻上来了。

齐会战斗，使河间出犯的日寇吉田大队一千余人，除几十个侥幸逃回了城里，其余全部被我消灭。这一仗轰动了冀中平原，有的老乡见了我们就说："怪不得你们师长叫贺龙，你们打起仗来，村里村外，房上房下，真象生龙活虎一样！"群众称我们的师长为"活龙"。从此，冀中平原上传开了许多"活龙"的故事。

（王绍南：《齐会激战》，《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二　巧布罗网，智斗吉田
——齐会歼灭战

齐会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较大的村落，全村 400 多户，近 2000 口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横贯全村，两边都是高大坚固的房屋。村子四周的西、南、北三面都有树林、坟地和小丘，地势复杂，易守难攻，村东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房屋坚固，也有利于防守。

为了完成师首长交给的任务，坚决拖住敌人，第 716 团 3 营的勇士，在营长王祥法的带领下，连夜赶修工事。为了灵活作战，指战员群策群力，把各家院落打通，又用长条木板和梯子架在房顶之间，使许多房屋连成一片。望着眼前即将变成一座攻不动、打不破的坚强堡垒的齐会村，王祥法营长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禁不住想起了参加师作战会议时的情景。

在确定由 3 营担任坚守齐会村，拖住敌人的任务后，贺龙师长表情严肃地对王营长说道：

"这次任务可不同往常，是要你们学孙行者，钻到敌人肚子里，紧紧拖住敌人"。

……

客观地说，这次 3 营担负的任务的确不轻，对手不仅在兵力、装备上占有优势，而且还以"残暴"而著称。然而，看到全营指战员高涨的战斗热情和已准备就绪的阵地，王营长的信心大大地增加了。

果然不出所料，23 日一早，吉田大队就气势汹汹地向齐会村扑来。渡过古洋河后，于 9 时许，占领了南齐曹、北齐曹地区，然后用机枪、山炮暴风雨般地朝齐会村猛扫过来，随即以主力发起进攻，将齐会村团团围住。我 3 营的勇士们依托构筑的工事和房屋，奋起抗击，顽强坚守，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使敌伤亡惨重。吉田恼羞成怒，先是命令焚烧房屋，继尔又命令向齐会村里施放毒气，最后又招来几架飞机对齐会村狂轰滥炸，企图一举消灭村里的我第 3 营。顿时，硝烟笼罩了整个齐会村，弥漫了平原的上空。

王祥法营长一面指示各连注意防敌毒气，一面命令各连把队伍拉上房顶严密监视敌人，以防敌乘势攻进村来。3 营在以前的作战中，也曾遇到过敌人施放毒气。经过总结经验，研究出一套防敌毒气的土办法。眼前见敌又施放毒气，有的用大蒜堵住鼻孔，有的用湿毛巾蒙住了嘴巴，继续坚持战斗。

这时，争夺村头阵地的战斗更加激烈起来。敌人利用村南石桥上的重机枪阵地和西北角上土地庙旁的炮兵阵地，构成交叉火力，切断了 3 营和外边的联系。

为了援助 3 营，贺龙师长急令 716 团的第 1、2 营和 715 团的第 7 连，分别由齐会东北、东南方向攻击敌侧背，配合 3 营夹击敌人，打通与 3 营的联系，拖住进攻之敌。吉田大队在我内外夹击下，被迫退到齐会村边，依托有利地形与村边房屋进行抵抗，我 715 团 7 连乘势突入村内，与 716 团 3 营会合。这时，敌我已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吉田大队的人马死伤无数，尸横遍野，既攻不下齐会村，又摆脱不掉可能被我包围、全军覆没的困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任丘、大城和吕公堡的援军上。然而吉田哪里知道，他的援兵早已被贺龙师长布置的阻援部队打得丢盔卸甲，逃回了老窝。23 日，当吉田大队对齐会发起进攻时，为配合其行动，任丘之敌 300 余人也开始向齐会方向运动，进至麻家务附近，遭到我独立第 2 旅第 5 团一部的顽强阻击，被迫撤回任丘；大城之敌 200 余人，在进至大广安地区时，也遭到了我第 3 分区部队的迎头痛击；吕公堡之敌，由于受我地方游击队的不断袭扰，压根未敢出动。

至此，吉田大队[illegible]地陷入孤立。为了防止齐会之敌待援无[illegible]注一[illegible]夜逃走，贺龙师长决定立即包围歼灭该敌、[illegible]令独立第 2 旅第 716 团向齐会村东北及外围之敌进攻，该团 3 营及 715 团 7 连，由村内向外反击，内外夹击敌人；命令第 4 团进至齐会以西四公村设伏，第 5 团一部进至张庄附近设伏，准备协同追击部队歼灭可能向西撤退之敌，并向西、北两个方向警戒，阻击任丘方向可能增援之敌；命令独立第 1 旅第 715 团及第 2 团一部，进至刘吉寺、东、西保车附近设伏，协同追击部队歼灭可能向南撤逃之敌，并向河间方向警戒，阻击可能增援之敌。

23 日 20 时，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第 716 团即对

齐会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刹那间，齐会村周围枪声、炮声和喊杀声交炽在一起，震耳欲聋，划破宁静的夜空。吉田大队依托村沿工事和部分房屋负隅顽抗，一直与我激战到24日拂晓。这时，吉田眼见援兵无望，只得率残兵败卒拚死向马村方向溃退。我716团立即紧随其后展开追击。当时，715团正好在东、西保车进行设伏，得悉敌人南逃的消息后，立即以一部兵力迅速抢占了马村，待敌靠近后，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见南逃道路被堵，吉田又率残兵向东窜去。然而我独立第1旅的第3团又先敌抢占了南留路村，吉田大队东逃的道路也被堵死了。这时，第716团也尾追逃敌进至孙庄、刘庄、李赵庄地区，并于9时向敌后尾猛烈攻击。吉田急忙命一部日寇抢占找子营顽抗，掩护主力进攻南留路，企图夺路突围。我第3团的勇士依托南留路村庄英勇抗击，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吉田见突围不成，于是又率残部逃回到南留路与找子营之间，企图依托树林、道沟，进行防守，防止被歼，以便等待时机，再谋突围良策。

找子营地区，地势比较平坦，残敌占据村中房屋和树林，我如白天发起攻击很难奏效，于是120师首长决定昼围夜攻，并将部队重新作了部署：独立第1旅715团自孙庄、刘庄向找子营及村东之敌实施进攻，第2团自北留路向南、第3团由南留路向西进攻；独立第2旅716团一部，占领张曹，断敌南逃退路；独立第1旅第1团在候安、小王庄地区，独立第2旅第5团在麻家务，分别阻击由大城、吕公堡、任丘方向增援之敌，保障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原设伏于四公村的第4团及张庄的第5团一部，分别撤回到卧佛堂、河心庄地区待机。

眼见歼灭这股日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贺龙师长几天来一直紧锁着的眉头放松下来，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出指挥部。这时，几个参谋、警卫和"战斗篮球队"的队员正围在一起，议论着齐会的战况。贺龙师长见到后，立即高声喊到："小伙子们，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不抓紧时间练练球哪？呆坐在一起穷叽咕什么？"边说边摸出烟斗往地上一坐，摆出一副观战的姿态，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不知底细的人听到这话，一定会面面相觑。前方正在激战，最高指挥员还能有闲心看篮球比赛？然而知道内情的人，就不感到奇怪吃惊。原来贺龙师长对篮球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到120师担任师长后，立即组织了一个"战斗篮球队"，每到部队休整期间和战斗间隙，都要组织篮球比赛。眼见胜利在望，贺师长的球瘾也上来了，同时也想借机松弛一下紧绷了几天的大脑神经。

听到贺龙师长的喊声，大伙立即围拢过来，一边说笑，一边脱衣服。随着一声哨响，一场紧张的篮球赛开始了。贺龙师长安详地坐在球场旁边，含着烟斗，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指点着大家的战术和动作。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仿佛战斗发生在千里之外。

球赛结束后，贺师长把大家叫到一起，说道："打球和打仗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和战前的准备工作。心中有数，才能战胜对手。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着又浓浓地吸了口烟斗，继续说道："打起来呢？就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必胜的信心，勇猛顽强，敢打敢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夜幕渐渐降临，这时，几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宁静的夜空。总攻时刻到了！瞬时间，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我120师各部队按预定部署向敌发起全线攻击。独立第1旅715团率先冲进找子营村内，与敌逐屋逐巷争夺，将吉田大队残部一步步逼出村外，其他几个方向的攻击部队也有所进展，最后将残敌逼退到南留路西南的张家坟地。

25日3时，吉田率残部开始向张曹我716团2营的阵地发起反扑，企图夺路南逃，被我2营的勇士击退，拂晓，吉田又纠集残部转攻南留路我第3团阵地，企图东窜，又未得逞。这时，吉田残部已被我压缩包围在张家坟地狭小地域内。

望着身边的人马日趋减少，吉田自知末日就要来临，于是狗急跳墙，又命令手下灭绝人性地向我攻击部队乱扔毒气弹和毒气罐，进行垂死挣扎。在第120师的勇士早有准备，继续采用土办法对付敌人的毒气。这时，吕公堡之敌百余人，任丘之敌200余人，再次向南进犯，企图援救被围的吉田残部，但均被早已等候多时的第1、4团迎头击退。

为了保证全歼残敌，贺龙师长命令各部紧缩包围圈，准备于25日黄昏，发起最后攻击。就在这时，突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战场一片昏暗。吉田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率残部背风向南逃窜，我第715团立即展开追击，在尾追残敌20余里时，追上逃敌，歼灭其后尾一部。最后吉田只带不足百名残敌，丧家犬似地逃回了河间城。

晨风吹开了黎明的帷幕，也驱散了齐会上空的硝烟毒雾，明媚的阳光直射冀中大地。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英勇的第120师抗日健儿共歼敌700余人，俘敌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200余支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围攻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气焰，增强了冀中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对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选自《百战图》，作者：袁静伟）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抗战和反共方针。

在抗战问题上，王秉钧等十二人，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向会议送了《动员全体党员推动全体民众配合军政共同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的提案，主张："驱逐强盗出境，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竭智尽能，出力出钱，共同一拼"。可惜，这个提案没有为会议所采纳。会上，蒋介石也表示要抗战，并作了《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的演说。军事委员会根据他的意见，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这种"有限度"的作战方针，已不再象抗战初期那样积极，而是开始走向动摇、妥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议极力制造反共舆论，说什么："本党领导全国从事抗战，已届年半，乃异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蒋介石在会上也扬言："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除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即"防共委员会"和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外，还强调发展组织，扩展势力，以与人民力量相对抗。他们提出了发展党员的设想："现在普通党员总数为六十三万零八十六人，普通党员全中国合计只七百人中一个，连军队党员在内亦仅二百六十人中得一党员。""现拟于一年后征求党员增加比率至第一期五百五十分之一，第二期三百七十分之一，第三期二百二十分之一，如此一年后十八省区普通党员至少应增加五十六万余人，二年后至少应增加八十四万余人，三年后至少应增加一百四十一万人。"并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革命的情况，强调要在农村中发展国民党员，扩大势力。为此，五届五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蒋介石指示："加紧努力，切实实行。"会后散发了一系列的反共秘密文件，如《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从各方面，采取种种手段，加紧防共、反共活动。国民党的舆论机关，大力进行反共宣传；对陕甘宁边区加强军事封锁；在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制造磨擦。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材料：

- 蒋介石致开会词
- 会议经过

材料一　蒋介石致开会词

各位同志：

这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于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意义是非常重大，任务也特别艰巨。我最近屡次指出，我们抗战应该分为两大阶段，自从广州失守武汉口〔退〕出以前，是第一期；武汉退出以后是第二期。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所以这次全会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以我们的努力来决定兴衰存亡的一个大关键。临到这个存亡兴衰的大关键，我们到会同志就应该检讨过去的事实，确定今后的方案，提高奋斗的勇气，以从头做起的精神，脚踏实地来贯彻到底。近来抗战形势，一方面我们军心民心比前格外坚强，内外情势亦是日趋有利，全国同胞皆认为我们国家危险已经过去，对国家前途非常乐观，必胜的心理亦更加坚强；可是我们本党的使命也就日益艰巨，因此全体同志必更关心于党国的前途，研究有没有更好的策略和计划。本席的意见，认为我们革命党的精神是只问我们本身做不做，就是问我们本身革命不革命。换言之，就是说，我们抗战不抗战。如果我们能做，能抗战到底，那就不怕没有计划，也不怕没有办法。要知道，我们革命真正的办法就是"以拙制巧"，"以寡克众"，本着我们三民主义向前迈进。我们如果能象第一期抗战的精神一样的牺牲奋斗，而且能更进一步实事求是的做去，那么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就毫无疑问；如其不然，或知而不行，或行而不力，或一时努力而不能持久，或开始积极而半途消极；或只讲形式而不求实际，或徒有志愿而没有确切实行的方案，或有了方案而不能勇猛的执行，那么有利的时机也就会轻易放过，好转的形势也将无补于事实。所以一切成败兴亡的根本，全在我们有没有革命的精神，和有没有必达目的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有了这个决心，才可以根据决心来定出有效的方案，我们对革命救国和抗战必胜有了坚强的信心，才能够不怕艰难，不畏危险，来切实执行所定的方案，以底于成功。

所以我要求我们同志第一件事就是要确立决心和信心。

决心和信心，从什么地方生得出来呢？就是要对我们抗战目的和抗战局势有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决心才不是血气之勇，才可以持久奋斗，到底不懈；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的信心才是有确实根据的信心，才能够坚忍不拔。我们为什么要抗战？为的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的生存自由，要遵奉三民主义来革命救国。而敌人根本不许我们生存，更不许我们自由。我们此时如果不能抗战，妄想中途妥协，这就是半途而废，这样我们民族就要整个灭亡，世世子孙就要永为奴属牛马，万劫不复；我们若不能抗战到底，我们国家就要沦为敌国的奴隶国与殖民地，而且从此国际正义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永无保障，我们总理一生倡导革命救国救世的抱负都要付之东流。自从敌国政府和他首相近卫先后发表声明以来，他这一个并吞中国以独霸太平洋、侵略全世界的阴谋，已是举世共晓，不待再说。我现在所要向各位同志讲明的，就是敌国目前已经失败，且有种种理由证明他最后一定要遭受最大的失败，我们只要奋斗下去，就有必然胜利的把握。

先就敌人方面来说，且不提这十八个月以来他在我中国南北各战场上死伤了七十万以上的官兵，消耗了九十万万的战费，弄到他国内罗掘俱穷，农工停滞，社会堕落，酿成政治上的骚乱不安，这些还都是有形的迹象。就是从他发动侵略到现在，一切战略政略上的运用以及对我们中国的观测、预计，和他对时代的认识来讲，实在是处处违反了原理，步步陷入了错误。当此成败利钝、存亡绝续之交，我要根据真切的事实，为全会列举敌人必然失败的事例，对各位同志提出详尽的分析报告。第一，敌国这次发动侵略，人人知道是实行他的大陆政策。所谓大陆政策，依照他们内定机密的传统政策和他们公开的田中奏折，是要先占满蒙，再图侵略我们中国的全部，乃至独霸亚洲，统一全球。但他在占领东北尚未稳定之时，而就要来侵占华北，他的力量达到华北以后，又由慢性的侵蚀变为急性的鲸吞，于是公然来占我们平津，这已经和他所谓大陆政策既定的国策与战略完全是背道而驰了。不单如此，他还要再进而至于华中，甚至侵入了华南，占我广州，这是他更进一步的来破坏他们自己的传统政策了。他进入华中华南以后，不但战略上陷入进退不能的地步，就是政略上也迫令他不能不倒行逆施，与世界列强为敌，陷入于四面楚歌的绝地了。这是他第一件必败之道。第二，他对我们中国最初的企图是要不战而屈，但我们终乎战而不屈，已经非其意计所及了。既战之后，他就想速战速决，但自南口、淞沪、忻口、南京，一直到了鲁南会战，以及鄱阳湖边、大别山脉之战，一步步深入，终于不能速战速决，于是反转来又渴望速和速结。在我们未退出武汉以前，他的杂志报章上就竭立鼓吹中止战争，或设法停战，一而用种种狡计诡谋想诱我们入彀，欺骗世界，图取便宜。但是不久他又图穷匕见，拿出他所谓“兴亚院”、“东亚协同体”一套狠毒计划出来。现在不但我们全国民众洞悉其阴谋，就是世界上也灼见其野心所在，他这个企图又明明失败了。这是他战略企图上的第二次失败。第三，从战略上来看，他不单违反二个军事上的原则，而且更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没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十八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没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他五个人来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在第二战区，有我方死一人，而敌军要死十四人半的统计)。(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神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麿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实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九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纵横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陷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已经踏入了孙子所说的“诸候〔侯〕乘其毙而起”的危机。简单说来，目前形势，敌人确已自陷于孙子所称的“挂形”的境地，真所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到了“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的地步了！这是他战略上最显著的失败。第四，就政略上来说，他对于中国只能拉拢若干形体不全、声名狼藉的败类做傀儡，利用流氓土匪做爪牙，一方面加深他军人的腐化，他方面更暴露出他种种罪恶与愚蠢，供举世的嘲谑；而且不自量度，妄想以他东扯西凑仿效模拟而得的文化来并吞我们中国悠久独立的文化，以武力和政治侵略来掠夺我们的经济。结果不但弄到他束手无策，一事无成，而且反加深了他国内以下犯上的现象。至于在外交方面，他本来企图缓合苏俄，结果只自形其卑怯；妄想交欢美国，更引起其反感；存心拆散英法美的阵线，而结果又适得其反；卡卡支离，，处处矛盾，这就是所谓根本既错，枝节就一无是处了。第五，讲到他对于我们中国的认识，他既不认识我们中国自来民族之潜在抵抗力的雄厚，也不认识现在是民族主义发达澎涨而不可遏制的时代，又不认识我们中国历史的真相。他一味以辽、金、元、清自待，终以中国民族为可欺可亡，不成问题，而不知道中国当年挫败的主因，在于当年朝廷内极少数人不明敌情，不辨利害，精神受敌胁制，终于被敌欺诱降服，并非我们全民族的灭亡。现在敌人竟妄想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之下，于短期内遂行统治我们中国的梦想。他全不想想他侵略我们东北费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阴，用了很大的兵力，耗了不少的经费，至今依然不能控制我们的东北，更无论乎统治。这种

眼前的事实教训，他还不知省悟，反而要变本加厉，并吞我们中国的全部，甘蹈最近失败的覆辙。这就是由于他根本不认识我们中国民族，不认识我们三民主义的力量，不认识我们国民政府的特性，更不认识今日的时代以及今日中国的革命战略与革命战术。老实说，从前拿破仑侵略帝俄，那时节全面攻击和长期抗战的战略战术还没有发明，拿破仑以如此雄才，拥有如此大军，尚且不免于覆败，何况今天我们是一个民国，民族精神普遍发展，举国民众敌忾同仇，在国民政府命令之下，实行现代革命的战略和战术，任何武力也决不能侥倖求逞。孙子地形篇有"知敌之不可击，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地形之不可以战"之三大原则，我今再为孙子续一原则曰："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知地形之可击，而不知时代之不可以击者，则无胜之道也"。敌人不知对方之情势，尤其不认识时代，更不待烦言而可证明。只就上面所说的五点，已可断定敌人有必败之理。现在敌我相持，胜败异势，敌之必败，就证明我有可必胜之道。单就军事来说，在第一期作战的时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带作战，他的陆海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可以进出运用，纵横自如。在这样的战场上，作战到了十八个月之久，他不但不能使我们失败，而且我们还愈战愈精，愈战愈强。此后第二期作战，进入到了地形复杂、山岳交错、沙漠无际、交通给养皆极不便的战场，他的伎俩当然更难施展，何况他全国兵力已使用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大家都知道，敌国的军备本来以百分之三十准备用于中国，而其他百分之七十全为备俄之用，今日他在我中国，不仅使用的兵力已超过了他预期的一倍以上，而且在中国死伤人数已经到了他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了。至于敌军详细的数字，等到军事报告时，再对各位同志详细说明。各位看敌军的兵力使用与死伤已经到了这样程度，这就可证明他侵略的失败已经是确定了。而且以后的战场，彼我难易相较的话，我们一个子弹至少可当作三个子弹来用，我们一个士兵至少可抵敌人三个士兵的力量。而敌人方面，适得其反。以后作战由我们这一年半过去的事实和经验来说，敌人至少要以三个人当我军一个人，要以三个子弹当我军一个子弹来用，或许还要加多几倍，亦未可知。所以今日问题，只要我国不授敌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后胜利确有保障。什么是授敌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胁，意志为所动摇，自甘屈服，急求妥协，那就是敌人所大欲。惟有这样，敌人就可以解脱他无法自拔的苦境，补救他无可挽回的弱点，而我们国家民族亦就要自此永远沈沦万劫不复了！总之，我们能持久抵抗，必能得到胜利，如不能坚决抵抗，而与敌妥协，订什么和约，那敌人就可根据着屈服条约上所享有的地位，更无止境的深入。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中国就要在敌国所称"东亚新秩序"、"日满支不可分"、"东亚协同体"等等新造名词烟雾笼罩之下，停止了呼吸，蔽塞了耳目，受尽磨难，历尽牺牲，全部中国无论何地、无论何人都要受敌人宰割蹂躏，万无幸免之理。精神一被胁制，局势立即变迁，而且屈辱条约一经签订，主奴名分随之确立，这样就无异于牺牲我们中国自己世世子孙未来的生命，反而去救了敌国的危亡了！

明白了我上面所列举敌人方面自造失败、自作罪孽的各种事例以后，各位同志就可以知道这一次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能获得胜利，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战略战术或所有军事学说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则原理都可证明为无用了。明白了今日敌人多方胁制诱降的意义以后，各位同志就更可以明浔我们所应该竭力坚持的是什么，明白说一句，就是要立定决心，不屈不挠，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我郑重告诉各位同志，这是我以受全国安危重托的统帅地位就十八个月来深切体念而得的结论，特别提出来贡献我们全会同志的。诸位同志更应该使全国同胞明浔我们今天务必要以宋明历史为前车之鉴，要知道宋明的灭亡，并不是敌人外族有如何优势的力量，而完全由于当时政府少数将吏以及社会士流意志精神动摇的畏怯，乃至全国人民受他影响，弄到全局败坏，不可收拾。我们今天有如此良好的国民精神，有如此深厚的革命基础，又有我们本党适合时代的三民主义，只要不自暴弃，任何力量也不能灭亡我国。今天的事势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敌人必然将更凶横的凭借其武器兵力，来作孤注一掷的挣扎。我们的方针却是很简单，很明浔，我们从第二期抗〔战〕开始以后，就要用我们革命的战略战术，以更奋勇坚决的抗战，根本打击敌人已动摇的意志、已疲竭的力量，很迅速地促起敌人的总崩溃和最后失败。来完成我们革命的任务。我再告诉我们同志一句话，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首相近卫上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我们中国民族有志节，有廉耻，有前途，抗战一年有半，牺牲尽管重大，力量愈战愈强。凡是我们中华民族黄帝的子孙，为要对得起我们的祖宗父母，对得起后代，对得起自身，对得起无数为抗战牺牲的先烈，就决无甘心降服之人。

我们今天惟有全力决战，以必死之心来抗战，战到达成目的之日为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决无倖生之望；战则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我现在再就我们中国抗战自身作一检讨。我可以说不但敌人有必败之道，而且我国有必胜之理。孙子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做到不可胜，当然要我们澈

血流汗来努力奋斗。但是我们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来看，拿以往事实来说，我们先天条件上实有使敌必不可胜的基础，只要配合上我们人为的努力，必可以战胜敌人而绝无疑义。

由于上面的叙述，各位同志可以确实认识我国自身支持奋斗的实力，认识敌国的战略政策，认识其他方面各种实际情势与演变的过程，由此体悟到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即可晓然于成败胜负之数之所在。自古大勇生于大智，我们对于抗战之使命和前途，既有这样颠扑不破的正觉，就必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勇往无比的决心和信心。

现在我们抗战是已经进入了第二时期，无庸讳言的，我们已损失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部份的交通线，牺牲了同胞不少的生命和财产，被攫夺了无数的产业和资源。可是我们要知道，革命的工作，多半是从平地做起的，我们今后就要以现有的土地、人力、军力、财力作打算，恢复我们同盟会以前革命先烈手无寸铁毫无凭借，而举起义旗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从小处、低处、极艰难困苦处，脚踏实地，定下具体行动的方案和计划；定出了方案计划以后，就要竭我们的心血时力，一条一字一句都要切实做到。敌人宣称"战争要百年化"，我们认为抗战建国的工作是没有时限可定的，五年不成则十年，十年不成则百年，一天不达到目的，我们就一天不停息。我们怎样来努力呢？我们要针对着敌人的情形来努力。今日的敌人正如孙子所谓"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要以我们的统一团结来对付敌人的骄妄凌乱、以下犯上的败象；我们知道敌人在战争期中工业停顿、经济破绽日益显露，我们就要发挥我们农业国家的特长，刻苦节约，坚忍支持，来加深敌人工业国家的弱点；我们知道敌国大欲所在是要根本毁灭我民国经济基础，我们就要加紧充实我们战时一切的建设；培养持久抵抗的力量，以促起敌国社会崩溃的危机；我们知道敌国去年以来天灾流行，风灾水灾加以继续发生不断的大地震，使他们国内被迫作战的民众格外受到痛苦和损失，我们就应该利用我们天时地利的优点，加紧农业生产，以对抗天灾人祸不可终日的岛国的缺点；我们知道敌国人民痛苦日深，敌国政府统御无力，他的朝野上下反战意识日浓一日，我们就要真实力行我们的三民主义，来打击敌人残民以逞，害人自害的黩武主义。总之，我们今天的要务，是要以精神胜物质，以勤俭补缺乏，以加倍努力补已往的蹉跎，以牺牲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来补我们武器和近代军备的不足。

同志们更必须认识本党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党员对于革命的责任。我们在抗战紧张中这样的集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使这一届全会为抗战第二期定下了确实具体贯澈到底的方针和计划，我们自身也必须在总理遗像之前，确立自身负责尽职奋斗到底的誓愿，实行党的决议，尊重党的纪律，巩固党的基业，竭尽党的使命。我们不必理会抗战期中有多少枝节或困难，我们应该时刻抚衷自问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世界上决没有一个自强自立的革命党而不能领导革命以底于成功的，也没有一个有悠久历史、广土众民、基础深厚的民族而不能求得完全的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同志们，请记着"知难行易"是我们的信条，"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只要能行、能干、快干、硬干、苦干、实干，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我今天以最热烈最真挚的精诚，期望本届全会的成功，祝我们抗战建国革命大业的成功！

（摘自《五中全会开会词及宣言》广西 1939 年）

材料二　会议经过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一月二十一日开会，三十日闭会，共开预备会一次，大会七次。到中央执监委员共一五五人，较前三次全会人数均多。蒋总裁亲临主席。提案共三十五件，均要言不烦，计党务十件、政治七件、经济十二件、教育三件、军事三件。大会均悉心讨论，分别决议。对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各项报告，亦均作缜密透辟之检讨，各予以重要之决议。会议中对各院部会施政实况，不厌求详，提出质询，由主管人员详加解答。此种娓娓不倦之探讨精神，尤值特书。兹将会议经过、出席委员及重要决议各项记下：

会议经过

二十一日举行开会式，由蒋总裁致开会词（全文二十六日已发表）。开会式后，接开预备会；推举王法勤、丁惟汾、居正、于右任、冯玉祥、戴传贤、邹鲁、孙科、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等十一委员为主席团；朱家骅为秘书长，甘乃光为副秘书长。二十二日（星期日）休会。二十三日开第一次大会，全体肃立为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念三分钟。以后每日开会，至二十九日提案讨论完毕，并通过全会宣言（全文见另条）。三十日举行闭会式，大会遂圆满告成。

决议要案

1、改进县以下党政机构之实施案。
2、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
3、编纂三民主义丛书案。
4、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案。
5、改善征兵办法案。

6、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案。

7、奖励调换现金白银与加强产金工作及效能案。

8、提倡并奖助手工业生产，以裕战时国民生计案。

9、调剂地方金融办法案。

10、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案。

11、改善对外出口贸易及售结外汇办法案。

12、加紧推进合作事业案。

13、党政军各级人员应率先遣送应服兵役之子弟入营服役案。

1、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案。

15、常务委员陈公博离职，推王法勤为常务委员案。

16、宣传部部长顾孟余迄未就职，副部长代理部长周佛海离职，推叶楚伧为宣传部部长案。

（重庆《中央日报》，1939 年 1 月 31 日）

随枣会战

背景介绍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日军占领了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后，即将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配置于九江、岳州、钟祥、信阳间地区，藉以拱卫武汉。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攻占南昌，获得了武汉安全圈的东南屏障。但是，中国军队的主力仍然在其周围，战略形势对日军不利。

四月上旬开始，中国军队发动了"四月攻势"，特别是第五战区从东、西两面向平汉路南段频频袭扰，并派廖磊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鄂豫皖边区游击，同时汤恩伯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由湘北移驻枣阳，加强了第五战区的实力，使日军侧背受到威胁，牵制了日军南进长沙、衡阳或北上打通平汉线的战略行动。为此，日军企图围击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以解除困扰。

五月一日拂晓，日军分兵两路向中国军队进攻。一路以第十六、第十三师团为主力，借助优势炮、空火力支援，在钟祥、东桥、大龙档向中方右集团军所辖之第三十七、第一八〇、第一二二师阵地进攻，试图沿大洪山、襄河间地区进军枣阳。另一路以第三师团为主力，在炮、空火力掩护下，向左集团军所辖第八十四军徐家店附近守军发起进攻，欲夺取随县、桐柏地区。此外，日军另有一部，在沙洋附近进行佯攻。

由于中国军队采用机动的运动战，致使日军合围中国军队主力的阴谋破产。为了变守势为攻势，保住随、枣地区，李宗仁电呈军令部，提出了反攻计划："第五战区目前已成外线作战有利态势，且掌握汉水东岸地区有利地形，似应乘机先以河防部队两、三师向汉（口）宜（城）、京（山）钟（祥）两路出击，牵制襄花路方面之敌，尔后第五战区左右集团军全线开始反攻。"九日，中国右集团军率先发起大规模反攻，第三十七师克复丰乐河、清水桥一线，第三十八师击退耗子岗附近日军，第一三二师切断了长寿店以南交通。日军第十六师团深恐孤军悬入，补给线被切断，除一部分协力与第十三师团进击新野外，主力全部回师增援，先后在田家集、耗子岗等处与中国军队激战，以维护其补给线。

十二日，日军占领唐河县，但由于中国军队主力已撤出敌军包围圈，只得徒劳而返。中国军队跟踪追击，十四日，克复唐河县城。

在桐柏方面，中国第六十八军向日军发起了反攻。十六日拂晓，该军第一一九师第七一三团将桐柏之敌击溃，克复桐柏。中国军队继续追击，进驻小林店、桐柏等地。

至五月二十日，中国军队先后将新野、唐河、枣阳、桐柏等地区收复，日军重新退回钟祥、应山等地集结，中国军队达到了保持守备区域的目的，随枣会战遂告结束。

材料：

- 武汉弃守之后
- 枣阳战斗亲历记

材料一　武汉弃守之后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间，我偕五战区长官部退至枣阳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该处，与我会商防务。李部所辖的第八十四军在应城一带突破敌人包围圈，到达随县，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自左翼退下，同时到达。我便命令两军在随县布防，以待敌军来袭，我长官部则暂设于樊城。因按军令部于武汉失守后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地，计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侧敌后的大别山和皖北、皖西、鄂东各县也在本战区防地之内。故樊城实为指挥本战区内战事的最适中地点。

长官部到樊城后，我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残了的部队约十余万，加以整顿，重行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能。

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心所在，敌视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第五战区。我们因而有充分时间来重行部署。而二十七年岁暮，我们在樊城也能从容过年，未受敌军骚扰。

孰知正当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之时，我方阵营的

悲观论者，却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战，开始作投降的活动。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突然秘密离渝飞滇，转往越南的河内，并发表反对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精卫的叛国虽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对抗战，我实早已亲自领教过。我在上年十月抵京的翌日，便专程去拜望汪氏，见汪的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自动的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们抗战呀！我们不打，难道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多言，也许他已认定我是好战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时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个"低调俱乐部"。当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这批悲观分子却唱着"低调"，在后方泄气，实是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地区全部沦陷，他们悲观到了绝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顾一切，掉头投敌，当起汉奸来了。

汪氏投敌后，五战区中袍泽虽亦纷纷议论，然究以敌忾同仇之心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民国二十八年初，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师，自平汉路东大别山区潜至路西。原来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在安徽太湖、潜山一带作战的，为徐部和川军杨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川军王缵绪部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时，杨、王两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奉命入大别山，协同廖磊在该山区有游击战。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敌人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之后，乃思荡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四月下旬，敌方乃结其华中派遣军的精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四骑兵旅团，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其初步略，想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的部队，以占领随县、阳。其第二步目标，似在占领我襄阳、樊城与南阳。敌方如能成此两项战果，则武汉可以安如磐石，而我军对平汉路的威胁也可解除了。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的两据点，以与敌长期周旋。

我判断敌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破，直捣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第八十四军和第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以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而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山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到我方谍报大员何益之自上海拍来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第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结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第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第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所以军令部曾迭次来电嘉奖第五战区情报科，殊不知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君因反对侵华而调职，乃另介一人与益之合作，继续供给情报。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何君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此地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是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我既获何君的情报，乃一面转报中央，一面在敌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布一陷阱，预备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当随枣吃紧时，中央军令部曾调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的五个师前来增援。汤部自徐州撤后，即调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多，乃又北调，自沙市渡江来第五战区。汤军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轮赴渝，向委员长有所请示。所部陆续于四月中到达襄、樊一带，听候调遣。我便命令汤部五个师迅速开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为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我军正面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地区后，汤军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

我判断敌人此来，是以骑兵与机械化部队为主，意在速战速决。且因不知我方在侧面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进，而堕入我袋形部署之内，自招覆灭无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线敌我已有接触，汤恩伯适自重庆返抵前方，到樊城来看我。我便将我所得的情报及计划歼灭敌人的部署，说给他听。未待我解释完毕，恩伯便大发脾气，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我再耐性地向他解释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不待我说完，恩伯便牛性大发，竟不听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战争中，当前线危急之时，部将不听主官约束而擅自行动，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以为常。当时作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

四月三十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敌与我军开始接触，

随枣会战之幕遂启。襄花公路沿线俱系平原，敌人因而可以尽量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来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然血肉之躯终究难敌坦克、大炮。以致敌人坦克过处，我军的战壕每被压平，守壕士兵非被碾毙，即被活埋于壕内。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密集扫射，弹如雨下，锐不可当。

但是纵在这种劣势下作战，敌我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结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

正面我军因无友军自侧面接应，无法与敌长期消耗，遂失随县。五月八日以后，敌人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面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对桐柏、大洪两山区内的我军作大包围。我乃严令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十四日克复新野、唐河，与包围圈内的友军相呼应。我乃令我军于十五日起作总反攻。激战三日三夜，至十八日，敌卒开始总退却。我军克复枣阳，乘势追击，敌军死守随县。我军因无重武器，无法攻坚，乃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入于休战状态。

综计此次随枣会战，敌军以十万以上的精锐部队，猛烈的机械化配备，三个月以上的调度布置，对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游击基地及襄(阳)、樊(城)、南(阳)发动攻势，志在必得。孰知经三十余日的苦战，卒至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返。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节选自《李宗仁回忆录》)

材料二　枣阳战斗亲历记

四月中下旬，日军由武汉等地大量增调兵力，向我方发动进攻。我阵地前面的敌军是第三师团，其攻击重点就是我所占据的阵地。因该地区为由随县经塔儿湾直达历山、唐县镇，以至枣阳和襄樊的捷径。而塔儿湾即在我阵地的前面烽火山麓，倘我阵地被敌人突破，北向可以席卷第一七三师全部阵地，南向可以截断第一七四师和第一八九师两师的后路，并可以包围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因此，我阵地是关系全线安危的关键。敌机随即由六架增至十二架，并集中炮兵火力向我阵地作回环不断的轰击。全战役的战斗，此处最为激烈。

一九三九年五月，横流于我阵地前的蒋家河两岸的麦苗仅数寸，展望无碍。蒋家河宽三十公尺左右，水浅仅及胫，到处可以涉过。我阵地构筑于低平土岭之上，岭上有土丘数十个，连绵参差而有相当的间隔和距离。我嘱刘栋平于土丘的上面作伪装工事，堆高其黄色的泥土于工事前沿，以欺骗敌人而吸引其炮弹。在土丘前面相当距离处，则挖前后参差不齐的散兵坑。泥坑后面死角之处，则构筑能容一班兵的掩蔽部，以便与散兵坑中的士兵更替休息。土丘的两侧，则构筑轻机枪的掩体各一个，而使其射线交织成十字火网于阵地面前。邝越营则在蒋家河沿岸隐蔽之处，占领前进阵地，以掩护刘团构筑工事。

开战的第三日，敌阵后忽升起一只艇形的轻气球，观察我方阵地，为其炮兵指示目标。天破晓后，敌炮数十门循其气球指示，对我阵地连续射击了两小时。其炮弹落在我阵地上，自右而左，复自左而右，循回不停。敌炮停射时，随派大队步兵，用密集的队形，向我阵地蜂涌而来。敌军以为我守兵即使未死伤殆尽，也已被吓跑；岂知当敌接近我阵地四百公尺内外时，即遭到我散兵坑中和各掩体内轻、机枪的突然交织射击，敌死伤累累，逃脱者为数廖廖。

这一仗获胜的主要原因是：敌军炮弹多数被我伪装工事所吸引，而我散兵坑中的官兵，能自动地在坑底挖一斜洞，称之曰"蛤蟆洞"藏身，当敌炮击时，则伏处其中，敌炮停射后，则起而狙击，故能收杀敌之效。当少数敌军逃回去后，其炮兵不断对我连续射击，两小时后，密集的大队步兵又猛冲过来，复遭到我阵地内各种火器的交织射击，将其打退。如此的战斗情况，持续五日之久。敌人每日所耗炮弹，约六千多发；在七天的战斗中，总数在四万发以上。而敌步兵的伤亡，七天累计也在四千以上。此后据闻，日军第三师团因此次战役损失太大，师团长被撤职。而我方的刘栋平一团兵力，最后整编时也仅剩一营兵了。

此役作战最勇敢者是刘团第一营营长黄玖辉。他自备两箱手榴弹，控制着两挺重机枪，扼守在通塔儿湾的要道上，拒敌猛攻。当他足部被敌军炮弹破片击断后，他仍坚持不退；其他官兵深受感动，也固守岗位以至牺牲，而不畏缩。

敌军此次进攻，先是从我军阵地右端发动，被我反击惨败；后又改攻我阵地的中央，又伤亡累累而败归。于是敌又改攻我阵地左翼，即与粟旅相衔接之处，终于被敌突破一个缺口，冲进二百余米，我军遭到敌军侧射，以致伤亡颇多。我乃用电话约定粟廷勋旅长派出预备队夹击，毙敌二百余，而将其击退。这是第五日的战况。此时，我见兵员日益减少，致电话钟毅师长，要求他派杨剑亭团前来增

援，他重申了杨团不能轻易调用的原因，如我需要，可直接向军长请求。我乃以电话报告覃连芳军长，军长答复："杨团我已派去增援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那里通公路的正面，恐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从该方袭来，故预先给他增援，距你阵地的右侧约六十里，一时不及调回，就近派川军李岳嵩团暂归你指挥，今日午后即可到达。"

当日下午四时，李岳嵩派少校团附携官兵花名册和武器册来到我旅部的指挥所报到。我见这一团只有两营兵力，武器是成都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无轻机关枪和迫击炮装备，仅有马克沁式重机关枪四挺，手榴弹也缺乏。我对他说："我的刘团已苦战了五昼夜，正希望贵部暂来接替，给他们以片刻休息。但阵地的正面颇宽，深恐你部的两个营不够分配；而且你部缺轻机枪和迫击炮，刘团所构筑的工事，不适合你部应用。怎么办？"他说："请旅长放心，我们这一团原是完整的一个师，参加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各战场作战后，仅剩下来缩编而成的一个团，官兵都沉着勇敢。阵地不合我们应用，可以修改。"我问他们现在要补充什么？他说："七九步枪子弹和手榴弹。"我即电话报告覃军长请发李岳嵩七九步枪弹药十万发和手榴弹二百箱。得覃军长许可，派骑兵送来。五时许，其部队到达，我嘱他们暂在后面村落隐蔽处休息。先派营附、连长或连附到前线来，由刘团分别派员导观阵地，预作分配各连担任地段，黄昏后乃交代接防。刘团退到后面村庄休息整理。

次日，天破晓后，敌人的炮兵又继续射击，李团的机枪两挺被击毁，另两挺发生故障，不能使用。敌步兵此次以疏散队形前进，徒涉过蒋家河后，蜂涌冲来。李团沉着迎敌，先以步枪射击，后投手榴弹，继之以肉搏。但敌人仍冲进阵地数百公尺的纵深，情况至为危急。我即电话调刘栋平团复上前线增援。刘团长说："白天易被敌人的轻气球望见，行动不便。"我说："现在我军正与敌人肉搏，敌人一定不敢开炮，你用疏散的队形前来，可保无恙。"正午十二时，刘团增援到后，又将敌人击退，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敌人被击退后，又发来炮弹，但爆炸声不似往时响亮。下午四时左右，旅部的饮事兵送晚饭来时，我见不少官兵作呕不止，怀疑炊事兵误用桐油炒菜，正拟派副官聂某前去查问，忽见卫士跑进来说："报告旅长，毒瓦斯，毒瓦斯！"此时只见大家又流眼泪，我也呕吐流泪了；我这才确信是敌人施放毒瓦斯所致。我命卫士将我的防毒面具取来，然已不及了；我在呕吐流泪之后，鼻孔及胃腔内，觉得热辣辣的，痛如火烧。从而断定敌人所施放的毒瓦斯，系窒息性和催泪性两种。时近黄昏，敌炮已停止射击，我忆及毒瓦斯比空气重，当即令众人迅速离开低凹的指挥所，登上高处，用浸湿的面巾，涂以肥皂蒙面，暂作抵御。并由电话通知刘、李两团照办。次日天明后，敌人的炮击较稀，步兵亦不见冲过来；是日东风微吹，敌人在东，我阵在西，敌人又利用风力将毒瓦斯唧筒向我方喷射过来。毒气弥漫我军阵地，晕倒的官兵很多，经过迅速抬离阵地后，始苏醒过来，便又重上火线战斗。

晚间八时许，忽接覃军长电话："枣阳已被敌人攻占。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到唐县镇来，吩咐前线官兵不要后退，只能向北转入河南境内。"他命我担任掩护张光玮和凌压西两部的撤退。我说："刘栋平团苦战七日之后，缩编不满一营；川军李岳嵩团参战两日，连长皆已阵亡，缩编只剩两个连。兵力如此单薄，何能担当得起掩护两师部队的撤退？"覃军长说："好吧，如此我就另派白勉初团接你的防，担任收容。你交代防务后，转回厉山，经唐县镇退入河南。"午夜十二时，白勉初到达，我即率旅部及刘栋平团残兵，向厉山转进，李岳嵩团则归还原建制部队。

天破晓后，我部离厉山街有五六里之遥，而敌人的迫击炮弹，从我们的头顶上空呼啸而过，飞落到厉山街上。当行至厉山街边时，师部的传达兵送来命令，命我率刘团、李剑光团在厉山附近占领阵地，收容前线退下来的部队。我问该传达兵，李团现在何处？他说就在厉山街上。我命他将命令转与李看，但遍寻不见李团团部所在地，只见该团十余名伤兵坐在房前。问他们也不知其团部所在地。我派传达兵多名，在厉山周围五里内遍寻，始终不见。后来才知道，李团当敌人的炮弹落在厉山街爆炸时，伤其十余名士兵，全团恐慌，自行向河南境内溃退。

当我派人寻找李剑光团时，未及告知刘栋平团负有收容任务，而他已率部由厉山街外向北开去。我只得率军士队在厉山西面的隘路口占领阵地。以收容前线退下的官兵。只见退下来的士兵三三两两、间间断断地经过，终不见整个部队。晚九时，我乃率旅部人员和军士队向唐县镇转进，于当晚十二时到达。只见负伤官兵八百余人横七竖八卧于街头，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而我派人找师部、军部或总部，也遍寻不着，对此负伤约八百余官兵，虽有同情之心，实也爱莫能助。翌晨九时抵吴王店，军部正在此处，见覃连芳军长愁眉不展，他叹息地说："张光玮、凌压西两师部队未见来，不知他们能否安全退出？真对不起朋友了，暂在此处等等他们吧！"我因数日夜未得睡眠，很觉困顿，乃在附近村落觅宿营地休息。

次日行到豫境的刘博士店。覃连芳军长因未见张、凌两师部队到来，迟迟不肯行。我建议他可预先指定行进的目的地，先行前去；掩护和收容的任务，由第一七三师负责；他默不作声。继而钟毅师长也来劝他先行，他忽然声色俱厉地说："你走你的，我不走。"使得钟毅尴尬不堪。当时，我见覃军长的态度如此，乃与师部分别在附近觅宿营地驻下。

次日，不见师部、军部去向，我无奈只能率军士队抵还潭镇，与刘栋平团的残部相会合。

（摘自《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次长沙会战

背景介绍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这是中国第9战区部队为保卫长沙在赣北、鄂南、湘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九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半师团10万余人，在大批舰艇、飞机支援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其部署是：一部分为助攻，由赣北西进湘北，与鄂南出动的日军会合，进攻长沙；一部分为助攻，由鄂南南下，与赣北出动的日军会合后，进击长沙以东地区；另一部分为主攻，由湘北向南攻击，直取长沙。日军还动用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5个师的兵力抗击日军的进攻。其作战意图是：阻击日军于湘北、赣北地区。9月14日，赣北日军在空军配合下向高安地区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在高安、上富等地与之展开激战。至10月3日，日军付出重大伤亡仍未达目的，被迫退回靖安、武宁地区与中国军队对峙。9月22日，日军由鄂南通山，通城地区向平江方向发起攻击，沿途遭到不断袭击。28日，在嘉义、献钟、三眼桥地区双方发生激战。日军不支，向修水方向撤退。中国军队追击，直至该路日军退向阳新、通城。9月18日，湘北日军开始向新墙河北岸进攻。中国军队在新墙、汨罗之线顽强抗击，激战5昼夜。22日晚，新墙河北岸被日军突破。23日拂晓，日军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守军与日军血战至中午，被迫放弃阵地。24日，日军一部突袭营田成功，抢占了强渡汨罗江的有利地形。26日，日军主力强渡汨罗江，中国守军激战竟日，向长沙东南地区撤退，日军迅速追击至长沙外围的捞刀河附近。10月2日，中国守军发起反击。此时，日军运输线遭到破坏，粮秣弹药供应不上，无力再发动新的军事攻势，冈村宁茨下令撤退。4日，日军退过汨罗江，7日退至岳阳、临湘、通城等原阵地坚守。第一次长沙会战始告结束。

材料：

- 湘北大线
- 日军未到长沙而退

材料一　湘北大战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侵入赣西奉新附近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及第一〇一师团一部，首先向驻会埠的中国守军第一八四师发起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这次会战，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进攻，其主力配于湘北方面，并在赣西、鄂南进行策应性作战。

湘北日军，集中了第六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守卫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是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下辖第五十二、第七十九、第三十七共三个军）。九月十八日，日军主力约五万人配有飞机支援，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第五十二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一场激战由此展开。十八、十九日两天，双方在下燕安、大桥岭等阵地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本着逐次抵抗、消耗敌人的方针，顽强作战，失去阵地后，“几经肉搏冲击，又完全夺回”。在草鞋岭阵地，中国守军战至仅剩一名新兵，仍坚守阵地。日军因进展缓慢便加增兵力，连续进攻。二十二日，中国军队被迫放弃草鞋岭、马家院等重要阵地。日军继续南犯，压迫第五十二军主力退到新墙河南岸。

九月二十三日晨，日军第六师团在猛烈炮火的支持下，从七步塘附近强渡水可没膝的新墙河。中国守军乘日军行至河中央时，轻重火器齐发，日军死者无数，联队长山村治雄亦被击毙，残余者逃回北岸。日军随即出动十多架飞机，对中方阵地狂轰滥炸，工事多被炸毁，不少人被活活埋在掩体内，但守军并未退缩，待日军第二次渡河时，又奋起阻击。就这样，日军八次渡河，均未成功。他们大量施放毒瓦斯，毒气顺风飘向南岸，中国军队中毒牺牲者甚多，五街坊阵地上的守军竟全部被毒气熏死。如此，日军才得以渡过新墙河。

日军奈良支队也在河床较窄的杨林街等处强渡，企图绕过我方依新墙河、汨罗江筑起的两道防线，从侧面把中国军队压迫至洞庭湖岸进行围歼。守军第一九五师（师长覃异之），为挫败日军企图，保证战区其他部队的行动，在此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汨罗江边的攻防战尚在激烈进行时，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二十六日，电令第九战区：“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敌，予以严重打击”。据此，薛岳制定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确定：“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附近及其迤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迤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同时，将战区部队分为正面部队、伏击部队两种。正面部队的任务是：“亟力诱致敌人于伏击区域，尔后转移于右侧后方待机。”伏击部队的任务是：“俟敌突入伏击区域，则突起奇袭敌人。”九月二十七日，第十五集团军集结自湘北前线后撤的部队，做好了在长沙周围与日军决战的部署。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也由长沙迁往衡阳，薛岳“率少数幕僚至株州设立指

挥部”。

二十八日，日军奈良支队占领雍江，并继续沿汨罗江东进，攻击平江，准备与自鄂南而下，从东北方向威逼长沙的第三十三师团会合。奈良支队在平江未遭任何抵抗，三十日便与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会师于三眼桥。日军的三条战线中，有两条联结了起来，但中国第二十七集团军与第七十九军协力阻击，使其未能取得更大进展。

二十七日下午，日军第六师团分两路南下。一路约一千人到达福临铺。中国守军第一九五师以福临铺为中心，在距长沙八十至一百四十华里的地带构成了新的防线，主力埋伏在福临铺大路东侧，选择背山面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并派出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出没在丛林山岗间，打乱日军的部署，阻滞其前进速度。二十八日，当敌主力进入伏击圈时，守军万枪齐放，日军措手不及，毙命者五百余。双方在福林铺展开了拉锯战，日军为迅速突破防线，以猛烈炮火轰击中国军队阵地，尔后，以全力攻击中国军队的一点。中国士兵在防线被突破后，且战且退，双方形成混战。日军援兵赶到后，第一九五师又迅速退至上杉市附近布防。三十日占领福临铺的日军在向上杉市进军时，又遭到该师的伏击。一天激战，日军被歼七百余。日军第六师团连日征战，两遭伏击，损失惨重。

同日，日军一部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越过捞刀河，直扑长沙以北三十多公里的永安市，与第二十五师发生激战。后将该城占领。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最远的地方。日军自新墙河北岸开始攻击，进军的直线距离达一百三十公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部为其占领，但沿途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阻抗、伏击，损失颇重。中国军队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较为灵活的方式。日军原订“捉捕敌军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作战计划，显然不能实现。同时，日军也发现“重庆军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在赣北、鄂南进攻，策应湘北战场的日军，也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进攻不利。到十月一日，日军停止了攻击，计划退却。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断定日军退却之后，向各部队发出命令，要求“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各追击部队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同时要求已深入敌后的各挺进部队破坏日军交通，阻碍其退却计划的实施。

五日，冈村宁次下令全线退却，称：鉴于中国军队潜伏于汨罗江、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退却令是用飞机空投下达的，该飞机被中国士兵击落，命令的内容也为中方获知。

五日，第五十四军新编第二十三师一部袭击了上村支队的船队，敌乃由营田等处登船，从洞庭湖上渡回岳阳。

八日，第一九五师到达新墙河南岸，占领了鹿角、荣家湾、新墙及杨林街等重要阵地，“并派一部渡新墙河搜索”。正面的日军则已先渡河返回北岸。

大致在十月十日，中日两军在湘北地区各自又回到九月十八日前的阵地。经过二十三天激战，双方伤亡损失都很大，但攻防态势却无多大变化，依然夹新墙河对峙着。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日军未到长沙而退

日军在这次战役中出动的人数，不算太少，4 个师团近 10 万人，从其武器装备及海空军配合来看，应是一支较强的力量。然而，日军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虽说创伤中国军队 10 余师，但没有一个师受到致命打击。当日军主攻方向还离长沙有几十里时，就不再深入了。日军不再继续深入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受到大本营指令限制。欧洲大战爆发后，希特勒闪电式的进攻，使法英等国纷纷溃败，美国被希特勒的气势所吓倒，也准备放弃大太平洋政策。这样，南洋的大片殖民地就将日本深深地吸引住了。日本国内到处流传着“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暗语，军阀要求“强行南进，确保东亚圈”。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南进问题时，陆军方面主张“即使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地也要马上干”。由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没有能力同时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因而主张对中国方面暂时实行不扩大战争的政策，并规定中国派遣军不许超越现占领区作战。这样，西尾寿造接到命令后，即转令冈村宁次停止作战，不要再继续深入了。按照第 11 军当时的战斗状态，还是有力量继续深入并占领长沙的。不过，湘北方面的日军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要冒较大的风险。所以，冈村宁次也就不强行要求南进，攻占长沙。

第二、日军在战略指挥上犯了错误。首先是日军低估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冈村宁次是指挥日军攻打武汉的主要将领。他认为，中国军队经过武汉会战后，其战斗力已经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他的第 11 军作战课在制定这次战役作战计划时，是以日军一个大队（即一个营）等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日军方面认为，如果把他们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一个大队完全可以压倒华军的一个师。根据这种估算，他们认为第 11 军参战大队数量比第九战区参战师要多，获胜是有希望的。但是，日军估计第九战区当时的兵力只有 30 多个师，而第九战区实际上驻有 52 个师。其次是日军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由于冈村宁次的战略部署建立在上述力量

判断基础上，因而在部署攻击方向时就把力量使用在三个方向：一路从赣北由东向西，一路从通城由东北向西南，一路从湘北由北向南，预期三路会合长沙附近，将第九战区主力捕捉击灭于湘赣北境山地。湘赣北境地域，东西有200余公里，南北有100公里左右，周边达600余公里，要在如此多山而又行动不便的地域内达到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再次是日军兵力分散，不能形成优势力量。冈村宁次三路出击，分兵使用，使本来有限的兵力过于分散。湘北虽说是主战场，但仅仅用了不足两个师团的兵力，在赣北高安方面则用了一个半师团的兵力，通城方面也用了一个师团的兵力。这样，日军虽有4个师团的兵力，然而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形成优势和打击的重点，更无力完成四面包围。由于兵力不足，即使继续深入下去，也不会有大的战果。

第三、交通破坏对日军起到障碍作用。日军此次进攻地区，大都是山岳地带，大部队行动本来就不方便，加之此次战役前，战地民众纷纷起来参加抗战活动，将所有道路全部毁坏，给日军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有些外国记者巡视战场后写道："记者从长沙出发，时而乘轿，时而乘马，有时还须步行，因为长沙以北及东北100英里以内的公路乃至一切小路，都被彻底破坏了，无论那一种双轮车，都绝对不能通过。如果一定要通过的话，那只有把车身拆散肩负半英里以外，才稍有平坦的地方。无奈这种障碍随地皆是，所以车子也没有办法边行边拆。公路上更掘成深宽之坑，有时连路基都犁如稻田，至于一切桥梁，也都荡然无存。""马路被掘有时竟长至一百码左右，所以日军的坦克车和大炮一入其中即无法走出。"从一般情况来看，公路大约每隔30米左右挖有宽约30英尺、深约15英尺的大坑，有些地方还要大一些。武宁和高安附近，老百姓还在沟里照样种植庄稼和蔬菜。还有的地方把坑里挖出来的泥土堆成一座小山，横亘于道路中间。公路两边都是水池或泥泞的稻田。公路的破坏，使日军辎重无法前运，严重阻碍着日军的继续深入。

第四，人民群众自动参战，协助打击日军。日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人民痛恨至极。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组织交通破坏队，而且组织起服务队、运输队、担架队帮助守军作战。湘北人民的口号是：支持军队杀敌，做到"湘北战场上不遗弃一个伤亡士兵"（白崇禧语）。合众社记者曾经报道说：记者曾与"普通人民谈话，彼等均表示愿意抗战到底，并准备与军队随时合作。普通人民皆以军队为彼等之友，彼等人手不足时即助之收获，购买各物亦照价给钱，故各地农民及工人皆自动组织服务队协助军队作战，无须政府之强迫。记者曾亲眼目观数千农民从事掘战壕、破坏交通以及运输军火之工作，彼等各有队长领导，并无武装士兵在旁监督。"湖南邵阳《力报》一位记者，看到人民群众积极性十分高涨时写道："凶残的敌人尽管逞着他仅有的一点余威，作出垂死挣扎，可是今天我们破坏公路的勇敢农民，明天便是拿起锄头去埋葬倭寇的掘墓人。"陈诚、白崇禧、薛岳在解释这次胜利的原因时，都曾再三说到，"破坏公路和空室清野都需要军队和人民两方面协调一致的努力，在湘北进步着的军民合作，正给予这两项工作一个美满的成功"；"军民的亲密合作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这次湘北会战中的一个特色，也是这次胜利的原因之一。"

日军指挥上的错误，兵力部署上的分散，尤其是人民群众自动起来参战以及良好的地形条件，使得日军不敢深入湖南境内。

（摘自《从长沙大失到衡阳陷落》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39年11人12至21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是国民党继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政策调整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将五中全会对共产党实行的以政治限制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改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大会听取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居正的党务报告，并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案》；听取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的政治报告，并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听取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并通过了《军事报告决议案》等。会议制定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教育等规划。大会对抗战建国纲领作了概括，但多空洞词句，少实际措施。关于抗战方针，完全是重弹老调与空调，以欺骗国人。宣言说："一曰日本一日不觉悟，则抗战一日不停止；二曰信任友邦，自强自励，以求得抗战胜利，保障世界和平；三曰遵守'九一八'以来所定的(一)反对日本侵略，(二)尊重国际公约，(三)不参加防共协定，(四)外交自立自主四大原则之国策，秉此奋斗，始终不渝。"全会通过《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加紧促成县政建设，制定全循之永久大法，而后可以应付未来之变局，保障国家之生存。全会选任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党政军大权从此全部集中在蒋介石一人身上，更加强了独裁专制的统治。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当时还是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上限共为辅。而到五届六中全会后，则逐步转变为军事进攻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此次会议以后，国民党加紧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掀起了抗战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摩擦事件。

材料：

- 会议宣言
- 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案

材料一 会议宣言

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举行于抗战第三年之总理诞辰纪念日，聆取党务、军事、政治各部门之报告，以及慰劳前方与视察团各同志在战地与敌后所亲见亲闻之民心士气，深感此十阅月来之进步与胜利，实我前方将士忠贞勇敢，与战地民众坚忍奋斗所造成。而后方负责人员尤其技术专家，以及各级员工与服务民众之不避艰苦，为国努力，所助于战局之进展与建设之推进者，至为伟大。本会议对于先后诸战役之死事官兵，首致崇高之敬礼；对我前敌将士特致深切之慰劳；对海外同胞输财输力，以贡献国家之热忱，深所敬佩而嘉慰。关于前后方受难同胞与流亡之老弱妇孺，国家必当竭其全力，以从事于慰恤与安置。至于抗战军人家属之教养护卫，宜有更切实有效之推行，业已作成决议，督促政府特别注重提前实施，以彰崇德报功，与救死扶伤之义，而益励同仇之勇。溯自二期抗战开始至今，敌人则迷途愈深，奸伪则阴谋日著，而吾全国同胞胥能发扬正气，坚定不摇，且更淬励奋发，视昔有加，由军民合作之进步，造成晋、鄂、赣、湘迭次之光荣战绩，强敌之锐气已摧，胜利之基础益固。本会议开幕日，总裁详切之指示，指出敌人所以愈战愈绌之原因，指出吾民族所以自救救人之要务，指出吾一贯国策之正确不磨，指出欧战发生后吾国民应有之认识与努力，更使吾人确认今日吾国抗战成败与世界福祸安危一致之原理。本会议在开会期间深思熟察于国事之前途，以为军事胜利更有确实之根基。而吾同胞所宜共信共行者，厥为遵奉总理遗教，贡献吾民族一切力量，竟抗战之伟业，成建国之全功，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以负荷对民族前途，对世界人类伟大之使命。由今伊始，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之二语，已不仅为全国国民之决心，且为当仁不让之责任。自来御侮建国，必于同时观成。本会议一周以来之讨论，悉以加紧奠立建国基础之一要旨为中心，亦愿吾同胞认识成败已分之灼然至理，勿摇移于变幻之事势，勿假借于战时应重治标之口实，而当专心一意，从立国久远之基础上着想，竭我全国之心思才力，以尽瘁于建国工作之推进。吾同胞必须确认抗战必胜，只待努力，已无疑问。今日唯一之责任即为于抗战紧张之中，急起直追，以完成建国事业之一切准备。对于今后政治、经济、文化及前方后方努力事项之改进，已本此主旨，详为决议，付之实施。特就当前要计，与吾全国同胞在此时期如何善尽责任之途径，与今兹努力之方针，综其概略，而宣告之。

一、本党革命之使命，厥为救国建国，以求民族之独立平等。今日长期的全面抗战之国策，实决定于二十四年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国防建设渐有规模之时。为培植国家对外奋斗，对内建设之国力，爰有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举十项之宣言。此一宣言，实为本党革命救国之政治纲领，亦即抗战建国之奋斗目标。其内容为汇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历次之决议而成，亦即为临时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之所本。举其要目，一曰崇道德，以振人心；二曰兴实学，以奠国本；三曰宏教育，以培民力；四曰裕经济，以厚民生，五曰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六曰尊司法，轻讼案，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七曰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八曰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九曰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十曰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平等独立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盖诚有见于抗战建国必为同时并举之伟业，亦为中国革命救国必经之历程，必须合全国国民之力，以恢复民族精神，实践革命道德，尤必集合政府人民之心力，从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上造成真实力量，以奠自立自强之基本。本党总裁于此次会议特举斯文，谆地告勉，唤起全党同志郑重注意。于此早经确定之对内对外总方案，亦更要求吾全国同胞及一切在职人员，视此为救国建国共同努力之目标。其未实施者，务急起直追以从事；其未完成者，当排除万难以图成。至其实现之道，自以增强抗战力量与推进后方建设为中心。故一面必以军事部勒之精神，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之使用；一面更当力求效率之提高与管理之改进，从愈战愈艰之状况下造成全国各部门愈战愈强之力量。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此一真理，必以全国一致之努力证实之。盖战时之打击暴敌，消灭奸伪，以排除革命之障碍；战后之复兴国家，贡献世界，以完成革命之全功；皆赖全国同胞一体信行五全大会宣言所示之准则而奋斗，而三民主义之实现，亦全系于此也。

二、本会议对内最重要之决议，为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与加紧促成县政建设。此两者实有密切之关联，同为完成建国工作必需之步骤。召开国民大会为本党多年一贯之期望，本党总裁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以后，即提出加紧完成训政，提早开始宪政之主张。盖鉴于国难之严重，与世变之不测，认为必须早日完成建国大纲之程序，制定全国共循之永久大法，而后可以应付未来之变局，保障国家之生存。自民国二十二年开始起草宪法草案，二十三年公布初稿，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迭有关于国民大会之决议，徒以连年忧患，准备甫经着手，障碍辄复迭生，二十六年国民大会之召集本已确定日期，抗战既起，卫国为先，选举事务遂致停顿。本会议今特郑重决议，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召集国民大会，以期早日制定宪法，俾于抗战胜利接近之日，完建国工作未竟之功。远溯总理与革命先烈奋斗之途径，近鉴于世变方殷而吾国家犹未脱飘摇风雨之危

实二录三卷4正

境，本党以建立民国为历史的重大使命，其对于宪政实施之期望更切于吾全国同胞。唯望吾同胞深念总理谋国之诚与救国之勇，认识总理革命目的在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之二大要典创后来居上之民国。在此国民大会即将召集之时，当从积极方面相互激勉以履行吾人革命之义务。盖革命民权之获得，第一步在国民革命初期事业即推翻军阀之成功，第二步在国民革命之后期，即以全国国民一致之努力，求得对日抗战之胜利，以保障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平等者，保障我国民各个人之自由与利益。义务所在，权利随之，此非任何人所得而予，亦非任何人所得而靳。吾国近年国力衰弱，民力散漫之现象，推其本源，实由忽略总理革命程序，以县为自治单位之精义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之规定，因而筹备自治未彰其实效，一切政治建设既未能确奠其基础，而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工作遂末由推进。抗战既起，此种缺陷更见显著。中央爰于本年九月有县各级组织纲要之颁布，期使管、教、养、卫各事项逐层贯注，由当地人民自身之努力，谋地方实业确实之推进。而以训练合格之人员分配于县、区、乡、镇，以为实际之辅导，于督劝民事之中，收培植民权之效。本会议认为此一法案乃实行宪政真实之保障，亦为使中国造成近代国家必由之途径，不惟后方各省胥当全力进行，即战区各地亦宜排除万难普遍推动。所望全国贤智，一致提倡，各地同胞共同致力，而后民力得以发扬，国力由是增进，而后长期的全面抗战得因各地基础力量之培成，而益增其最后胜利之因素。由此而实施宪政，乃能使国基巩固，而五十余年来本党革命先烈与全国同胞为建立民国之牺牲奋斗，始不蹈于空虚，国家人民久远之福利，亦必造端于此。

三、对于抗战方针，本党总裁在开幕词中已明确揭示：一曰日本一日不觉悟，则抗战一日不停止；二曰信任友邦，自强自励，以求得抗战胜利，保障世界和平；三曰遵守“九一八”以来所定一反对日本侵略，二尊重国际公约，三不参加防共协定，四外交自立自主四大原则之国策；秉此奋斗，终始不渝。凡兹要义，已为我全国同胞所一致接受。吾人由此十阅月中之经验，回溯九国公约签字国与国联各友邦寄与吾国以一贯的精神物质之援助，尤其对于伤兵难民之救济，不断以医药物品相馈赠，以技术资财相扶助，欧洲虽有战事，而对我国之同情与关切迄不少衰，且更增进。我全国军民对于如此始终仗义之各友邦与其人民，愿深切表示衷诚之感谢，更由此而深感于得道多助之至理。诚以敌国军阀之野心一日不戢，即世界共同之祸患一日不除。中国抗战两年余之经验，更使吾人确认今日世界一切国家安危祸福之不可分，举世乱，则一国不能独安，果各国之间胥以和平相安，则世界均蒙其福利。今日欧洲之战争方殷，人类之祸患莫测，本会议对世界前途不能不更促全世界爱好正义与和平者之注意。吾人认定中国自尽其抗战之责任，必可以有助于战祸之缩小与世界之和平，同时更深切感觉此次东亚与西欧战事结束之时，诚能产生一种包括全世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则人类和平共存之光明，庶几随战争之终结而开始。深信此一深切之感觉，在东西两半球负责任具远见之政治家，必与吾人有其同感。吾人更希望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皆为此一崇高目的，即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也。

本会议对于抗战建国努力要点及世界和平之观察，具如上述。最后尚欲为吾同胞同志一言者，吾国今日举国一致之奋斗，在事势上，为继往开来之必然过程，由责任言，则为扶危定倾责无旁贷之天职。抗战胜利之始基既已由吾军民先烈无量牺牲而奠定，继此以后与日俱增之艰难重责，必须由吾侪后死者竭尽忠诚以毅然负荷。关于物质方面，固宜一致贡献我全国之物力财力，善用一切智力与技能，以谋生产数量之增加，求抗战军需之不匮，然根本之计，必须人人自承为继续革命救国伟大事业不可或缺之一员，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信条，发挥吾人革命之精神，以坚持于最后。于此所首应注意者，在国民自身之修养而言，必须明礼义知廉耻，以严是非、邪正之分别，而励百折不挠之勇气。在国民对国家之贡献而言，则必负责任，守纪律，以维持国家政令、军令之绝对的尊严，而后乃能精诚团结，以求得国家之荣誉与光明。唯此四端，实为吾同志同胞致力建国伟业之基本。今我国胜利之基础已立，敌人之惶惑无措更甚，临此重要时机，不唯本党同志宜回溯革命先烈奋斗之往绩，振作革命精神而为冒险犯难之前驱，即我全国同胞亦必须深思熟念于总理临殁时“不妥协不受骗”之遗教，发扬我至大至刚之民族精神，恢复我自立立人之民族道德，然后当前一切险阻艰难皆可为三民主义之伟大力量所征服，内外环境任何变迁，胥不足以动摇吾人救国救世不屈不挠之意志。总之，抗战建国，事无后先，抗战之目的在于使敌军完全撤退吾国国境以外，建国之目的必须真实努力以奠定宪政之基础。此为本党同志今兹努力之方针，亦望吾国同胞黾勉同心，向前奋斗，以期三民主义由吾人而实现，民族百世无疆之光荣福利，由吾四万万五千万之黄帝子孙共创之，亦为吾四万万五千万之黄帝子孙共享之。谦撝诚悃，以相勖勉，凡我同胞，愿矢勤矢勇以赴之。

(摘自《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材料二　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案

查国民大会之召集，肇议于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旋经本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议决，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为大会召集之期。当经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由政府公布施行，并设置选举总事务所办理选举事

宜。乃以事属创举，法定手续复极繁重，大会代表之选举未能如期办竣，爰经常会决议，延期举行。

本届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常会报告，复决议督促该管机关继续办理选举，重定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事务所秉承此旨，督饬所属积极从事，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因环境特殊，各种选举迄未能正式举办外，其余各地均分别赶办，原期于八月中可将全部选举地束。不意"七七"芦沟桥事变突发，全面抗战于焉开始，选政〔举〕进行不免蒙其影响，而大会之举行又因之而有第二次之延展。

大会之举行虽因事实上之障碍而一再延期，而本党企求宪政之早日实施，实始终无间。今抗战已历两载有余，赖全国人民于本党领导之下，同心一德，艰苦奋斗，最后胜利之期已不在远。揆之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之义，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确立建国基础，实有积极进行之必要。最近国民参政会曾有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之建议，亦足征国人对此期望殷切。

至于大会代表选举情形，近据选举总事务所报告，区域选举与职业选举(农工商团体)，除冀、察、平、津尚未举办，山东已办而未报外，余均办理完竣。其尚未蒇事者，为自由职业团体之选举与特种选举中东四省选举及蒙藏、海外、军队选举之一部份。综计全部应选代表依法产生者，约达四分之三。所有未能依法办竣之选举，或因地方情势变迁，如冀、察、平、津、山东之类，或因事实上不易适合法定手续，如自由职业团体及东四省之类，其中自有不少困难，惟究属一部份之特殊情形，当可于法律事实兼筹并顾之中，妥谋补救之道。

依上述情形，常务委员会认为国民大会召集日期亟应重行确定，并限期办竣选举，俾能如期集会。谨提供具体意见如下：

(一)国民大会会期为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二)大会代表之选举尚未办理完竣者，应即由选举总事务所督饬赶办，限于二十九年六月底以前结束一切选举手续，确定全部代表名单。

(三)其因地方情势变迁，或事实上之窒碍致选举发生困难者，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妥筹补救办法。

以上所拟，是否有当，谨附同选举总事务所办理选举情形之报告，提请公决施行。

决议：

一、国民大会定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之。

二、大会代表之选举，尚未办理完竣者，应即由选举总事务所督饬赶办，限于二十九年六月底以前结束一切选举手续，确定全部代表名单。

三、其因地方情形变迁，或事实上之窒碍致选举发生困难者，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妥筹补救办法。

(摘自《五届大会决议案》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9)

桂南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三九年冬，日军在希特勒闪击欧洲各国的刺激下，在我国南部钦州湾登陆，向广西省进攻。国民党军队抵抗失利，弃守广西首府南宁。昆仑关一战，国民党军取得了歼敌五千余人的胜利，此即桂南战役。

日军进攻广西，攻占华南重镇广西首府南宁，其战略目的据日军大本营作战命令称，要"彻底切断敌之西南补给路线"。即切断中越国际交通线，以威胁桂林、柳州、贵州、昆明等地，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早日屈服；同时，为日军南下入侵东南亚准备条件。日军经过长期而周密的准备，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快速部队在我钦州湾登陆，占领防城、钦州。日军参战部队为第二十一军之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中将)和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盐田定七少将)以及海军舰队。国民党政府在南宁设有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对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西南行营毫无准备。钦州湾附近的守备部队新编第十九师，因兵力单薄，正面广大，在日军的攻击下，被迫节节败退。驻合浦之第一七五师，因距战地甚远，运动需时，直到十八日，才有一部到达板城、长滩附近，未能阻滞敌人北进。其他大约有四个师的兵力，均在南宁以东之粤桂交界处，正准备北上西江。钦、防失陷后，奉令即刻回师参加南宁保卫战，二十一日，日军迫近邕江南岸，隔江与南宁遥遥相望。二十三日，日军一部渡过邕江，向我左翼迂回，占领南宁外围四塘等地。接着日军各路围攻南宁。我援军一部在老渡口一带进行阻击未能奏效，旋即向北方退去。二十四日南宁遂告陷落。日军继续向我撤退部队跟进追击。十二月一日，占领高峰隘，四日占昆仑关，南宁北部屏障尽落敌寇之手。至此，日军截断了我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通道，正在赶修的南(宁)镇(镇南关)铁路遭到破坏、被迫停止。大批军用物资、工业材料被日军掳获。

南宁是我国南大门，它的失守使日寇在广东沿海与广东南部战线联结起来，对中国威胁很大。国民党政府决定调集大军收复南宁，打通中越国际交通线。白崇禧重新调整了在桂各部队，从全州调机械化部队第五军主力，南下进入宾阳一带阵地，准备夺取昆仑关。同时，从湖南、四川和广东等省急调六个集团军共十九个师，以及空军一部参加收复南宁的战斗。攻占昆仑关，则成为收复南宁的前提。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五十公里处，山峦起伏，是标高三到五百公尺高的山岳地带，地势极为险恶。从南宁至柳州

的公路从此通过，是由桂南进入桂中腹地必经之道，是攻克南宁的重要门户。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是中村正雄少将率领的第九旅团之松本大队。日军占有附近高地及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虎视着昆仑关一带，而且可以从南宁得到增援。国民党军由进入宾阳前线的杜聿明第五军担任主攻，指挥部设于通往昆仑关的半山壁，担任正面攻击的是郑洞国为师长的荣誉第一师；而以邱清泉的第二十二师，戴安澜的第二百师以及其他部队相配合，从东西两侧截击敌之后方联络线。十八日开始进攻，进展颇速。日军居高临下，不断进行反扑。国民党军以步炮结合，充分发挥了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多次击退敌人的反击。南宁日军先派出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长三木大佐指挥部队往援，均被国民党军队从两翼分割包围，使敌处于孤立地位。二十日拂晓又派出中村正雄旅团长率主力向昆仑关增援，日军海军飞机不断从空中支援。国民党军队英勇杀敌，连续两天将中村及其援军阻击在六塘一带。正面攻击部队在战车配合下向昆仑关接近，经过反复冲锋和肉搏，夺得敌人几个高地，全歼守敌。日军为了援救昆仑关及其补给线上被围困之部队，乃调驻钦州附近的台湾旅团以及其他部队开入南宁，并往援昆仑关。国民党军加强了对昆仑关一线的攻击。炮兵观察所推进到第一线，因而使我方炮火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同时，空军也加强了对敌人阵地的轰炸，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敌中村旅团长所部援军进至昆仑关以南之九塘附近，我侧翼部队跟踪追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中村正雄被我击毙，所率主力伤亡惨重。昆仑关及九塘附近敌第一线守军，经国民党军反复突击，白刃格斗，已现不支之势，在南宁的敌师团参谋长一再电示：“只要一卒尚存，就要绝对发挥军旗之光荣”，部署守敌做最后挣扎。国民党军将士怀着为牺牲将士报仇、誓死收复国土的无畏精神，于二十八日，向昆仑关守敌发起总攻，经过反复争夺，终于攻占了周围的高地。

三十一日收复昆仑关，守敌除少数逃窜外，全被中国军队消灭。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在其他部队和当地群众配合下，在阻击援军和攻克昆仑关作战中，歼灭了在日军中素有“钢军”之称的中村旅团约五千人，中村亦被击毙。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昆仑关战役期间，国民党军西南行营调集大军，准备夺回南宁。蒋介石亦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七日亲自飞抵桂林、柳州，进行军事部署，还视察了驻守迁江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但是，由于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的时间不一，而且指挥不利，因而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攻击力量，贻误了战机。日军的反击却早有准备。昆仑关战役进行中，即调遣了在广东作战的第二十一军主力，进驻南宁。日军制定了《宾阳会战指导方案》，以打击和消灭南宁附近之国民党军，从一月二十八日起，日军开始从正面向踞守宾阳至南宁公路线的国民党军展开猛烈反击，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形势一度稍有好转。此时，日军以两个旅团的兵力，向国民党军队的侧后方的武陵、甘棠等地迂回，形成双层的包围态势。日军飞机依靠空中优势，炸毁了国民党军后方的公路、桥梁，企图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日军飞机更飞临宾阳上空，对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进行狂轰乱炸（总司令徐庭瑶，昆仑关作战主力第五军即属其统辖），使整个指挥系统遭到破坏，从而终断了与各部队的联系。二月二日，国民党军队开始从宾宁公路一线撤退，宾阳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昆仑关亦再陷敌手。在激战中，国民党军伤亡惨重，终于退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收复南宁的计划，未能实现。

材料：

- 日军偷袭钦州湾
- 激战昆仑关

材料一　日军偷袭钦州湾

同年九月，日本大本营将第五师团分别调往青岛、博山进行登陆及山地作战训练，并扩充编制和增补装备，准备南调进攻南宁。同时，日军台湾旅团也奉命在广州加强登陆作战训练。十月十四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三七五号”作战命令，陆海军达成了执行作战命令的协定。协定指出：“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敌人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联络补给路线。作战时间预定为十一月中旬。”协定还规定：“此次作战陆军代号为‘和’号作战，海军代号为‘N’号作战。”

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意图已有觉察。第十六集团军对其作战行动作了初步判断，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敌军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水东、梅绿登陆，然后向宾阳推进，威胁南宁；二是敌军主力由北海登陆，攻取灵山、横县后，溯江而上，直逼南宁；三是敌军一部由北海登陆作佯攻，主力则由钦县、防城登陆，沿邕（宁）钦（县）公路向南宁进攻。由于电白等地登陆不便，钦县、防城地形不良，北海登陆也受到公路破坏和防御工事的影响，故采用第一种方案的可能性大。据此，桂林行营订定了桂南会战指导方案，要求桂南驻军确保或掩护桂越国际交通线。然而，当时桂南兵力十分空虚。原驻桂南的第三十一军已被调驻西江，桂南驻军仅剩下第四十六军及两个独立团与地方团队，配置于南宁、贵县以南亘北海沿岸既设阵地，防守着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第十六集团军决定有计划地集中兵力，重点守备若干战略要点。迄十一月中旬，这一调动尚未完成，而日军突然进攻，揭开了桂南会战的战幕。

日军以今村均第五师团和盐田定市台湾混成旅团为

参战主力，配以海军第五舰队、海军第一、第二航空队协同作战，统一由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早从十月下旬开始，日军已着手侦察登陆地点，在钦州湾测量水位，十一月上旬，第五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先后被运抵海南岛。迄十四日晚，日军海军在钦州湾的舰只大量增加，泊于企沙海面的舰船约十二艘，北海附近约有舰船十一艘，由七十余艘运输船组成的运兵船队也载着参战部队驶抵钦州湾。

十一月十五日黎明，云集钦州湾企沙附近海面的日舰已达四十余艘，汽艇约五十多艘。这些舰船以舰炮猛烈轰击海岸。第五师团先遣队——及川支队，以约两个步兵大队兵力，在海、空军掩护下，强行登陆。漫漫海岸，顿时成了枪林弹雨的茫茫沙场。

由于中方对敌登陆地点判断失误，加上部队调动部署尚未就绪，故从作战开始便陷入被动，当时在钦州湾地区，仅有夏威所辖第四十六军新编第十九师，防线正面达二百公里以上。日军登陆开始后，新十九师师长黄固急令部队"务于敌登陆立脚未稳之际，努力将敌歼灭于海滨"。中国将士对登陆之敌进行了顽强的狙击。海滨滩头，变成了血池火海。下午，敌舰又对钦州湾龙门地区猛烈炮击，并以步兵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登陆冲锋，双方交战十分激烈。傍晚，中国军队鉴于敌火力甚猛，遂放弃滩头阵地，退守防城附近后备工事。

十六日，由企沙登陆之敌，向中国防城守军阵地进逼。另以一部在钦县附近的犁头嘴登陆，一部乘大雨涨潮之际，以汽艇沿渔洪江直趋黄屋屯。中国军队逐次退守钦县以南第二线阵地，丧失了又一个滩头阵地。防城守军也因受敌机、大炮的轰击，阵地全毁，以致无险可守，弃城转移。日军乘胜占领了黄屋屯。面对严峻的局势，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命令新十九师："竭力固守平旺、钦县附近第二线阵地，无令不得退。"

十七日，犁头嘴登陆之敌，藉飞机掩护，以主力猛攻钦县，并以一部从中国军队侧背冲入城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街一巷，敌我反复争夺。巷战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中国军队退出钦县。

由于防城、钦县的失陷，使日军巩固了滩头阵地，给以后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陆日军马不停蹄，以南宁为目标，形成三路攻势。一路由防城出击，于十九日晨在贵台墟附近反复冲锋后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进抵唐报，从西南方威胁南宁。又一路在占领黄屋屯后长趋直入，于十八日抵达大寺，直逼大塘。第三路以钦县为出发地，沿邕钦公路向小董进攻，于十八日攻占了小董。中国新编第十九师主力在日军的全面进攻下，被迫退守板城。至此，日军从东南、南、西南三面形成了对南宁的包围圈。

（摘自《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材料二　激战昆仑关

针对南宁陷落后的战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示桂林行营："南宁失陷后，我军作战不可急求速胜，应以慎重出之"，在"武鸣、宾阳间地区应以运动战方式阻止敌军北进"，在邕钦公路"尽力妨碍其后方之交通"，并对邕宁公路"速作破坏准备为要。"桂林行营拟就了反攻南宁计划，并于十二月十六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军以攻击北犯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根据作战计划，反攻部队分成东、西、北三路军。由蔡廷楷任东路军指挥官，率第四十六、第六十六军，担负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敌后交通的破坏和袭扰任务；由夏威任西路军指挥官，其第一纵队两个师担负高峰隘攻击任务，吸引敌军主力，第二纵队两个师及挺进第一支队，负责破坏敌后交通，并以部分兵力进至邕宾公路上的四塘，阻止南宁敌军增援，孤立昆仑关之敌；由徐庭瑶任北路军指挥官，指挥第五军、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作为主力作战部队，攻击昆仑关，然后与东、西路军协同攻取南宁。

北路军所辖第五军，由杜聿明指挥，实施主攻昆仑关的任务。第五军拥有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二〇〇师、军补充第一、第二团，并有装甲兵团、炮兵队、骑兵团、工兵队、高射炮队，是国民政府的"王牌"机械化部队。依据第五军的作战部署，由邱清泉率领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队，袭击五塘、六塘，以截断敌军退路；由郑洞国率领荣誉第一师为左翼队，协同由第二〇〇师之一部和军补充第一、第二团组成的左翼支队，包围攻击昆仑关及八塘正面之敌；由第二〇〇师主力和骑兵团充任总预备队。十八日凌晨，荣誉第一师开始了局部夜袭。拂晓时分，在战车及炮火支援下，对昆仑关发动正面攻击。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松本大队，在中国军队猛烈攻击下，纷纷向核心阵地退却。中午，我军攻克罗塘、同兴西北高地，接着又占领了石寨隘、同平、枯桃岭，并有一部进于九塘附近。

日军为了挽回败势，今村师团长急调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增援该联队分乘三十一辆汽车，于十八日夜晚自南宁出发，沿邕宾公路急进，当晚抵达九塘，并立即发动夜袭。双方激战不休，阵地上展开了白刃战。至十九日凌晨，罗塘及同兴北方高地又被日军夺去。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令荣誉第一师继续攻击，重点指向六五三高地，并以一部截断昆仑关敌军后方补给线。

当日上午，荣誉第一师左翼部队向六五三高地猛攻。六五三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点，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日军据守顽抗，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此危急之际，连长安朝宣、排长杨讣明率部携带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最终控制了这个制高点。同时，新编第二十二师在五塘狙击增援昆仑关之敌，西路军在高峰隘也展开

了猛攻，东路军则在敌军后方四处袭扰，在钦县、小董、大塘、蒲庙等重要地域频频出击，打击敌人牵制敌军行动。

二十日，鉴于荣誉第一师两日来伤亡较大，杜聿明令第二〇〇师超越荣誉第一师阵地，担任主攻任务。第二〇〇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强攻昆仑关。中国军队在日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下，攻势受挫。八塘方面，中国军队控制了八塘东、西两侧高地，破坏了交通线，从而切断了南宁至昆仑关的敌军补给线。但是，经过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的猛攻，昆仑关仍然未能攻克。

二十三日，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以重点指向罗塘高地附近，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荣一师准备对罗塘据点之攻击，同时第二〇〇师由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

罗塘为昆仑关西侧高地，是昆仑关西南的天然屏障，也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支撑点。二十四日，荣誉第一师以第二团和迫击炮营担任主攻，由老毛岭北方高地向罗塘高地两侧攻击，以排为单位，梯次配备，前仆后继，用大刀等简陋的器械连破敌军两道铁丝网防线，冲入敌阵。三木联队长一面命令准备烧毁军旗，一面向中村支队长发电求援，哀叹："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但是，日军援军根本无法到达罗塘高地。身陷绝境的日军作困兽斗。在中国将士的冲杀面前，日军渐渐不支，当晚，中国军队克复罗塘高地。守备该高地的日军第五中队几乎一卒未剩，全部被中国军队消灭。第二团突击营也仅剩下数十人。

当罗塘战斗激烈进行时，日军第五师团步兵第二十一旅团前往驰援，被荣誉第一师狙击在九塘东北地区。日军伤亡惨重，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

同日，第五军命令第二〇〇师沿公路两侧，以重点向界首附近高地继续对敌攻击。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东侧，峭壁悬崖高耸，与罗塘高地南端成犄角之势，可东西俯瞰昆仑关。二十五日下午，中国三架轻型轰炸机、一架驱逐机，飞抵昆仑关上空，日军误认为是己方战机，遂铺置信号板示意。中国驱逐机乘势俯冲扫射，轰炸机投弹十八枚，全部命中目标，日军受到严重杀伤。第二〇〇师迅速发动强攻，于傍晚攻克界首南端高地，但不久又被日军夺回。二十九日，第二〇〇师继续进攻界首。经过重炮轰击、白刃肉搏，终于重新攻克了界首附近敌军各据点，并顶住了日军的猖狂反扑。入夜，第五军命令新编二十二师超越第二〇〇师阵地，担任正面主攻突击任务。其左翼为第一五九师，右翼为荣誉第一师，协同作战，围攻昆仑关。

三十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其东南各高地，为完全收复昆仑关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日敌遗尸百余具，我官兵伤亡亦达三百余名。"三十一日拂晓，该师在友军的协同支援下，攻入昆仑关，并完全收复了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日军向九塘溃退。

（摘自《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板社）

历史内幕

一出亲痛仇快的历史悲剧
——高敬亭被错杀始末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鲁迅

我入伍不满一年，碰到的第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便是高敬亭同志的被杀。半个世纪过去了，尘海茫茫，世事沧桑，早年的许多事情，多已淡忘，唯有高敬亭同志被杀这件事，每一念及，当时情景，便如在眼前。长期以来，总有一连串问号，在我的脑海沉浮不已。

新四军创建之初，共有四个支队。一、二、三支队展开在大江之南，第四支队背靠大别山，伸向大江以北。军部则在皖南。第四支队的司令员就是高敬亭同志。他原是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他在鄂豫皖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战功卓著。"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他率领1800红军健儿，走出大别山，后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奔赴抗日战场。

高敬亭同志是河南新县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贫，只读了六年私塾便辍学在家种田，1927年，中国共产党点燃了土地革命的烽火，烈焰在鄂豫皖辽阔的农村、山庄燃烧起来。不久，高敬亭就投入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土地革命战争。他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参加革命，他的父亲和妻子先后被反动派活活打死，房屋被焚毁，一个孩子无依无靠，从此不知下落。在反动派屠刀面前，高敬亭没有被吓倒，他在血与火的熔炼中，思想觉悟更加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他掩埋了亲人的尸体，勇往直前地继续战斗！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

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两年后，1934年11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又奉命越过平汉铁路，向陕西作战略转移。红军主力一再撤离，鄂豫皖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情况紧急，省委来不及通知高敬亭（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与会，临撤出时派人将省委决定告知他，要他把留在苏区各地的部队统一组织起来，由他指挥，将鄂豫皖革命斗争坚持到底。1935年1月下旬，高敬亭收到省委指示信。此时国民党"围剿"大军正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在这万分危急的形势下，高敬亭毅然肩起这付千斤重担。2月3日，他在太湖县凉亭召开了紧急的干部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拥护省委指示，并作出如下决议：一、重建红二十八军，推举高敬亭为军政治委员（无军长）；二、成立四路游击师，广泛发展地方武装；三、建立以太湖、潜山、霍山、英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这几项决定，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值得补充一点的，就是"便衣队"这一斗争组织。它既是部队的耳目，又是联系部队和地方党政群组织的纽带。它镇压凶顽，保护人民，筹集给养，安抚伤病。它最盛时发展到80多个队，星罗棋布，神出鬼没。高敬亭十分重视和关怀"便衣队"的斗争和发展，这是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独创。

在高敬亭领导和指挥下，鄂豫皖的游击战争展开了。国民党调动大军，一次又一次地实行"围剿"，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兵力，最高时多达17万之众。采用的手段也一次比一次残酷，包围、奔袭、封锁、并村、烧光、杀光等等，想把鄂豫皖的革命烈火扑灭。红军战士尝尽了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九死一生之苦，终于粉碎了国民党斩尽杀绝的反革命计划，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策应了南方各省兄弟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38年2月，戴季英同志从延安来到四支队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红二十八军的评语："在鄂豫皖奋斗了三年，很不容易，是很大的功绩"。1938年春，高敬亭到武汉，周恩来同志在接见他时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你们的功绩很大，你们能在敌后保存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高敬亭又一次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多次派人去找红二十八军，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和部队流动作战，都没有联系上。

1937年3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统帅，调动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规模空前的"三个月大清剿"，妄图乘国共谈判之际，彻底消灭红二十八军"以杜后患"。战斗十分激烈。7月13日，高敬亭率部转战到达岳西。此时得到有人从西安带来的几份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告全党同志书》、《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多年没有读到党中央的文件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仔细一想，不知这些文件是真是假？他读之再三，直到深夜。他反复推敲琢磨，审时度势，最后认定文件是真的。特别是文件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及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要提高警惕，保持独立性，以免遭受不测"等语，肯定它是党中央的精神。他立即和大家商量，取得了一致认识。于是派人主动去找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议举行停战谈判。经过一番交涉，高敬亭化名亲自参加谈判，贯彻执行了中央指示的原则。7月27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8月上旬，部队开始到湖北黄安七里坪集中待命。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时，已有3100多人。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1938年3月8日开赴抗日前线。5月16日首战巢湖边蒋家河口，旗开得胜，毙伤日军46名（其中毙32人），为新四军抗日战争揭开了序幕。

一年过去，悲剧开始。授人以柄，借刀杀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高敬亭自然也不例外。翻开历史，无论"是很大功绩"的三年游击战争，还是取得90余次战斗胜利的抗日第一年，他在领导上也有过某些失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某些缺陷也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应当分清错误的性质、产生的原因，特别应当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在高敬亭问题上，当时新四军某些领导人恰恰没有这样做。高敬亭同志的被杀，原因是复杂的，但在今天看，又是清楚的。

1939年5月初，几位新四军领导人渡过长江，从皖南来到江北。5月5日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加强和统一对江北部队的领导。5月10日莅临四支队，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作出工作指示。一切正常。5月13日，军主要领导人应安徽省主席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之约，前往省府所在地位煌县，情况顿起变化。5月24日，廖磊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捏造了七条所谓"罪状"。第五战区即将这份诬告转报蒋委员长。蒋介石立即批复："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那末，是谁提出"处以枪刑"的呢？是廖磊？是第五战区？还是别的什么人？众所周知，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对高敬亭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悬重金购高敬亭首级而不可得。如今竟然有人"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求之不得，焉有不"照准"之理？

6月中旬，高敬亭还蒙在鼓里。他奉军首长命，率教导大队从舒城西蒋冲启程，前往合肥青龙厂。当他到达青龙厂尚未住下，军部即来人说，军首长在等他，请他马上去。一到军部即被关押，紧接着，6月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储家圩子举行斗争大会，宣布所谓"罪状"。高敬亭哪里知道，此时在军首长的口袋里就装着蒋介石要将他执行"枪刑"的命令。

斗争会上宣布的高敬亭的"罪状"是："对抗领导"、

"不服从命令"、"排斥中央派去的干部"、"反党反中央"；还有"同张国焘亦有往来"；还有"与广西军密码通电、及派特务来"。要害是这三条。

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关于第一条，是有点根据的，如高敬亭居功自傲，自以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对上级尊重不够，不善于团结同志，对要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做法，他是不买账的。有些，他是错误的，应予以批评教育，有些，他并没有错。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上纲上到"反党反中央"的程度。

至于第二条"同张国焘亦有往来"，纯系子虚乌有。就是在当时，也没有举出任何一点事实。1938年5月下旬，董必武同志亲自从武汉来到四支队，向高敬亭和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到会同志包括高敬亭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对张国焘，高敬亭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张国焘历史上领导过鄂豫皖苏区，难道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如高敬亭)都会跟随着这个叛徒反党？

最后这一条和广西军的关系，岂不自相矛盾吗？"广西军"，即当时的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当局，和它关系最密切的不是高敬亭，恰恰相反，高敬亭和它的关系最不好，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高敬亭和他领导下的四支队是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和鄂豫皖人民血肉相联，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信誉。如今"广西军"统治这块地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广西军朝思暮想的是要把四支队赶走。现在它利用新四军内部矛盾，正好"借刀杀人"。

尽管枪杀高敬亭是违背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精神的，当时新四军领导人还是按蒋委员长的命令执行了。第二天，6月24日一早，32岁的高敬亭就含冤倒下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肃清高敬亭流毒"的运动，株连一批革命干部，有的关押，有的调离，这支英雄部队，脸上被抹上一层灰，许多同志，多年抬不起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公正的

布哈林在被斯大林处决的前夕，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在这生命的最后时日，我相信历史的清滤器迟早必然会洗掉我头上的污呢"。(《绝笔信》)高敬亭没有、也来不及写下什么，但他是一条硬汉。在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会上，泼向他头上的那许许多多"罪行"，他一条也不承认。他的回答是："我没有罪！"的确，他没有罪。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处决高敬亭一年半以后，国民党当局又用同样的一顶"帽子"——"不服从军令政令"而制造了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皖南事变！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借刀杀人，而是蒋介石自己动手。

1975年11月，高敬亭的亲属写信给毛主席，毛批示军委复查此案。12月14日复查报告送到他那里，他再次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高敬亭蒙冤38年，终于水落石出，清洗了脸上的污秽，得到了平反昭雪。

50年过去了。昔日的当事人，差不多都先后离开了人间，是耶，非耶，皆已无言。但是，后人需要知道，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崎岖的革命道路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亲痛仇快的事情，并记住：永远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江岚，选自《大江南北》89年3期)

罗荣桓引导"山大王"走向革命

罗荣桓是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是人所共知的。"山大王"乃何许人也？罗荣桓与"山大王"又是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军鲁南说起。——

1939年9月1日，遵照毛主席"派兵去山东"的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师司令部及一部分主力部队挺进鲁南抱犊崮山区，到达大炉。中共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县委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到村外迎接，上大炉的万春圃忙着为部队安排食宿。当晚，宋子成到师司令部向罗政委汇报工作情况，在谈及鲁南的统战工作时说："今天和我一起去迎接部队的那位万会长，叫万春圃，字鸿源，今年57岁。他和他的仁兄弟都是抱犊崮山区有名的地主。他担任临沂县联庄会长，一声令下，就能调动几百人的队伍，所以又称独霸一方的'山大王'。此人秉性刚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早在1935年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并掩护过我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党合作抗日，拉起了抗日的队伍，并把家中的粮食、枪支、弹药献出支持抗战。今年春天，日寇'扫荡'抱犊崮山区，万春圃率队参加阻止，其次子万国英冲锋陷阵，为国捐躯，他强忍悲痛，带领部队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罗荣桓听完汇报后指出："像万春圃这样的开明地主，我们应该相信他、团结他、鼓励他、支持他，以诚相待，继续与他合作抗日，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真正在抱犊崮山区扎下根来。对于他的缺点错误，我们应循循善诱，帮他逐步克服。"

次日，在宋子成的陪同下，罗荣桓亲自登门拜访了万春圃。罗荣桓紧紧握住万春圃的手说："万会长是抗战的英雄，您为四县边联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我代表一一五师全体同志向您表示感谢！"万春圃激动地说："罗将军过奖了，抗战的英雄不敢当。鄙人才疏德浅，还望首长多多指教为好！"当日，万春圃举行家宴为罗荣桓洗尘。罗荣桓推辞不过，只得应邀前往。席间，万春圃再三要求罗荣桓到他家去住。盛情难却，罗荣桓只好将爱人林月琴搬了过去。罗荣桓有时也去万家住住。从此，万春圃更有机会接触罗荣桓。他们经常促膝谈心，有时一直谈到深

夜。在罗荣桓的影响下，万春圃抗日的觉悟大大提高。为了支援部队，解决物资供应困难，他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自己的粮仓，砍伐了南山的树木，并先后动员自己的仁兄弟——尚岩的陈毓山、银厂的盛清沂、向城的刘子才、万村的王拱辰、城后的赵剑南等人，纷纷向八路军靠拢，有的捐粮捐款，大力支援抗战。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在罗荣桓的巧妙指挥下，先后拔除了白山、石河、孔庄等日、伪、顽据点，以武装斗争打开了抱犊崮山区的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踊跃参军参战，抗日武装大发展。1940 年春，"讨李(长胜)驱王(学礼)"战斗胜利结束后，根据罗政委、鲁南三地委的指示，边区县委将边联地区各支地主武装统编为四县边联游击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从此，这支地方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抱犊崮山区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41 年春，鲁南发生严重灾荒，驻鲁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被迫转至滨海地区。临行时，罗荣桓再三嘱咐万春圃："跟着共产党，坚持抗战不动摇。"同年 4 月 25 日，国民党反动派乘我后方空虚，勾结日伪，突然袭击鲁南抗日根据地，制造骇人听闻的"四·二五"事变，残酷地屠杀我党员、干部、家属。同时，将万春圃年仅十几岁的儿子万国平、女儿万国荣抓去，企图作人质，迫万春圃就范。面对前来劝降的人，万春圃怒不可遏，气愤地说："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这条路我走定了。孩子如何处置，随你们的便吧。想让我投降，那是白日做梦！"在我内线的周旋下，顽军始终未敢对万春圃的两个孩子下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将其放回。

罗荣桓离开鲁南后，并没有忘记万春圃。1942 年秋，万春圃 60 寿辰快到了。根据罗荣桓的建议，为了动员群众，度过难关，中共山东分局决定为万春圃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金秋十月，抱犊崮山区硕果累累，一片丰收景象。万春圃 60 大寿庆祝活动在环山傍水的云峪村举行，鲁南各界代表、边区县干部群众数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鲁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频频为万春圃祝酒，并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等分别发来贺电，罗政委并派一一五师战士剧社专程从滨海赶来演出，为万春圃祝寿。万春圃激动得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说："我万春圃有什么功劳，敢担这么大的荣誉。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罢了。我万某有今天，多亏共产党的好领导，罗政委的指教。"

万春圃没有辜负罗政委的期望，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坚持不懈地工作。1943 年 4 月，边联支队奉命改编为鲁南军区五团，万春圃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他地位变了，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变，仍然呕心沥血地为部队的建设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46 年 2 月，64 岁的万春圃，由张雨帆、来光祖介绍，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喜讯传到远在东北解放战场上的罗荣桓耳中，他兴奋地说："一个封建地主出身的'山大王'，能够坚决站到人民一边，并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

(选自《纵横》95 年 3 期，作者：张立法)

剿灭闽中张雄南匪帮始末

以张雄南为首的股匪，是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猖獗于福建中部地区的一支土匪武装。此股土匪，土生土长，势力雄厚，屡剿不灭，残害闽中地区达 10 余年之久。抗战爆发，政府当局为消除此肘腋之患，特派省保安处长黄珍吾为司令，负责清剿，终经数月围攻，将其彻底消灭。

一

闽中巨匪张雄南，承袭其舅父、著匪黄其明、黄其澜的势力，盘踞福建德化、仙游、永泰一带，自 1926 年以来，广罗羽翼，购置枪械，凭藉闽中戴云山脉深山老林天险，绑架勒索，搜刮民财，残民以逞，匪焰日张。这股土匪，虽经第十九路军于 1933 年及陆军第九师第二十五旅谢辅三部于 1936 年一再进剿，均以种种原因，中道回师，未能予以彻底肃清，以致匪祸愈演愈烈。

闽中之匪，以张雄南、张克武分别所率之部为基本力量。张雄南所率者，为特务排(后扩充约一连)、旅差队及所属吴俊昌等部，人数约 300 余，有轻机枪四挺，步枪约 400 支，且性能优良。张克武所率者，为原保安第五团的两大队(一大队辖三中队)及机枪一中队，后又增编三中队。其中张元景所率的第一大队奉张雄南之命，窜扰仙游，第二大队的李启钗中队，由李本人率领，窜扰永泰。故张克武所率之部，实有步兵五中队及机枪一中队，步枪约 500 支，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8 挺，性能亦佳。

张雄南、张克武的附属力量，大致上为：仙游地区为张元景大队(含张逸舟、黄玉树、蔡七等部)及颜景星、陈舜英等股匪与零星散匪，人枪约五、六百。永泰地区为李启元、李启钗、侯访洲、林成栋、林越、陈亚坡等股匪，加上地方散匪，人枪约三、四百。德化北区为周公辉、邱玉成、赖永念、苏永显、赖春台等股匪及其他散匪，人枪约二、三百。德化东区为颜春进大队及吴给、吴杰、陈南明、曾振华等股匪及其他散匪，人枪约二、三百。大田地区为张金鳌、陈嘉帛等股匪及其他零星散匪，人枪约八、九十。如按该匪的历史、地理关系划分，德化东、中区及仙游区由张雄南本人直辖，德化北区及永泰区由张克武负责指挥。

二

1938年夏，政府当局为了“消弭反侧”起见，给张雄南以绥靖公署上校参议名义，并命其充保安第四旅旅长，驻于永泰。但张氏匪性不改，仍为非作歹，甚至变本加厉。当局不得已，乃于1939年5月调其改任省政府参议，而以副旅长涂友情升任旅长，以期消患于无形。不料该匪抗不交代，并率匪众他窜。福建省主席、驻闽绥靖主任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遂明令将张雄南、张克武撤职查办，并取消张克武保安第五团番号。同时，命令保安第三旅旅长少将梁为焯亲率两团兵力，跟踪追剿。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经成立德仙永清剿指挥部，任命梁为焯兼指挥官，第四行政区专员林梦古兼副指挥官，负责清剿事宜。预定作战地区为德化、仙游、永春、永泰、大田、安溪、尤溪等县。陈仪提出的进剿方针是：“以清剿为主，以围剿堵击辅之，务期将匪驱逐于其原有地区之外，将其消灭。并先期以优势兵力击溃其主力后，以军事与政治配合，清剿零匪，从事清乡，将匪根本肃清。”该指挥部的兵力编组，系以保安第三、四两团，保安第六团(欠一大队)，保安第十团第三大队(欠一中队)，独立保安第三大队，第四行政区特务大队，德化、仙游、永春、永泰、大田、尤溪等县保安队组成之。另以新编第二十师第三团位置于嵩口、伏口附近，保安第九团(欠一大队)位置于柚口附近，保安第一团一个大队、第八十师第四七六团两个营位置于仙游附近，分别策应。上述新编第二十师第三团及第八十师第四七六团(欠第一营)，奉令归新编第二十师旅长少将李逾群指挥。

是年5月，梁为焯先率保安第四团进入德化，以一部守备德化城防，主力逐步推至雷峰、南埕，随后又推进水口、嵩口，以监视匪部行动。陈仪将这一部署向蒋介石报告，蒋复电表示赞同：“处置甚当，仰即努力剿办，以遏乱萌为要。”6月初，陈仪加派省保安处副处长少将严泽元前往德化督剿。保安第三团由古田经永泰向仙游进出，并以一部守备永泰，以主力集结仙游西南地区待机。保安独立第五大队也于同时进出大田、赤水之线，警戒永安、德化交通线。在此情况下，该匪分两股逃窜，一由张雄南率张元景大队之一中队窜德、仙边境，一由张克武率一大队(欠一中队)又一机枪中队窜永、德边境。后张克武以匪势穷蹙，表示悔悟，愿率所部(保安第五团)人枪来归。陈仪当即令其集中嵩口待命，并派人宣示政府意旨，声称“只罪张逆雄南一人，胁从罔治”。不久，匪首张雄南也向陈仪具悔过书，表示不敢再冒背叛罪名，一俟保安第五团集中完毕，即在嵩口赶办保安第四旅旅部移交，并愿于离开部队后，在乡村从事农垦事业。当局信其言，派新任保安第四旅旅长涂友情前往嵩口办理善后。保安第四团遂由嵩口撤回南埕，又由南埕撤回雷峰附近。至8月初，保安第六团第三大队也以汽车运抵德化。但张雄南之具书悔罪，并非真心，他仍率一部匪众，窜匿于德、仙边境，伺机而动。陈仪被迫仍派队予以严密监视，并于8月初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旋即复电称，“仍盼努力清剿为要”。

8月下旬，因张克武保安第五团抗命，拒赴大田接受改编，情况突变，保安第六团乃由建瓯一带再抽调一大队及团直属队，经梅列向德化县城集中。9月初旬，保安独立第三大队也由梅列经永安到达赤水、上涌一带，接替独立“五大队防务(该大队调永安整训)。同时，新编第二十师第三团由古田附近经永泰向嵩口、水口推进集中，以应付局面。

这次清剿，由于张雄南、张克武匪部固守天险土云岐主峰，梁为焯指挥部队团团围攻达两月之久，屡攻不克，反而死伤枕藉，以无功而告终。

三

福建地处东南海滨，位于国防前线，此匪不除，后患堪虞。陈仪以梁为焯久剿无功，遂将其调回，并撤销清剿指挥部。1939年9月中旬，陈仪在永安主持召开剿匪会议，决定在德化另行成立闽中剿匪司令部，并派省保安处处长中将黄珍吾兼闽中剿匪司令，新编第二十师师长中将钱东亮兼副司令，少将柯远芬为参谋长。其下设秘书、参谋、政训、副官四室。命黄珍吾率正规军一部及保安队兵力(主要有新编第二十师第二旅第三团，新编第八十师第四七六团，保安第一、三、四、六、九、十团，保安独立第三大队，别动总队，第四区专署特务大队及侦缉队等)，共10余团1.4万余人，负责清剿。9月20日，剿匪部队开始作战。23日，司令部于德化成立，正式接替原清剿指挥部的作战指挥任务。军事发动后，为求速战速决，除原有兵力外，又逐步抽调一部兵力加入。

剿匪军的进剿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自9月20日兵力动员集中至11月10日攻占重要匪巢土云岐止。其间经久住战斗、惇湖战斗及土云岐战斗。

久住战斗：9月25日，该军保安第四、六两团，分为三路同时向久住推进。久住东南北三面临水，峰峦环抱，森林丛什，有坚固碉楼两座，瞰视全村。张克武匪部及零星小股进占久住，利用其优越地形，作为根据地。自9月26日起至10月10日止，剿匪军先后发起三次攻击。张匪始不支，于11日傍晚由下洪田向上游方面逃窜，遂结束久住战斗。

惇湖战斗：盘踞久住之匪，于11日晚窜至惇湖后，与该地李启元、侯访洲等股匪会合，共人枪四、五百，在惇湖附近高地构筑工事，准备再行顽抗。剿匪军于部署围攻久

住时，即令旅长李逾群率主力进至尤溪、永泰、德化边区，相机堵截，遂于惇湖附近遭遇。10月15日，李逾群率第四七六团(欠一营)等到达惇湖，当即部署攻击，匪徒凭险顽抗，后不支乘夜向安村方面逃窜。

第一次土云岐战斗：土云岐为戴云山最险要的山峰，标高1510，碉堡工事密布，历来剿匪军，均未能攻破。张克武匪部自惇湖被李旅击溃后，于10月18日经科山及桂阳附近山地乘夜窜至土云岐，与当地积匪周光辉股百余人会合，约共四、五百人，在土云岐高地构筑坚强工事，企图凭藉天险，作最后顽抗。保安第四、六团各一部，由旅长梁为焯统一指挥，于10月30日发起进攻，匪徒凭高据险，顽强抵抗，官兵伤亡颇重，各部奉令退往梓溪，待命再攻。

第二次土云岐战斗：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于11月8日率保安第九团及别动总队由德化城经南埕、张岭脚向土云岐推进，于张岭脚成立战斗指挥所，黄珍吾亲自坐镇，统一指挥。保安第一团于11日拂晓，发起攻击，匪主力溃退，遂于午前七时占领土云岐最高峰。

第二期为自土云岐攻下至12月18日匪首张雄南被击毙止。土云岐被攻下后，该匪化整为零，到处流窜，企图潜匿，苟延残喘。剿匪军各部于11月中旬重新部署完毕。陈仪于26日电示黄珍吾应"军事、政治并用，搜剿、封锁兼施"，争取于一月内"克竟全功"。由于实行匪区封锁，移民并村及严密保甲组织等，匪区粮食顿感恐慌，匪徒走头无路，被迫纷纷缴械，计有德化苏永显第八股，永泰侯访洲等四股，仙游颜景星等五股。黄珍吾发电指示所属各旅团，"现阶段作战，应全力着意于捕捉匪魁"。并在其《告闽中民众书》中表示决心："这一次政府的剿匪，是下了绝大的决心，非将张雄南及其匪众彻底消灭不可。"

此时，张雄南率所部200余人，潜匿于坂里深山。德化司令部为将其消灭，于12月15日令保安第三旅旅长梁为焯迅即部署，于19日开始行动。而张克武匪部人枪数十，潜伏于祥光、莱洋、丘坂间的山林内，张本人则在祥光之水尾，已"病重难行，动辄悲泣"，状极狼狈。为了尽快消灭以张雄南为首的匪魁，司令部在《告武装同志书》、《告匪众书》中，具体颁发赏格：生擒张雄南来献者，赏洋一万元，格杀张雄南呈献首级者，赏洋五千元；生擒张克武来献者，赏洋五千元，格杀张克武呈献首级者，赏洋二千五百元。在此之前，司令部尚电令德化县府，动员民工二百余人，将匪巢土云岐"彻底破坏"，而12月15日，又令参谋长柯远芬率部于即日起开始全面搜剿，并乘势以火烧山，重重埋伏，使匪无法逃逸。梁为焯等奉令后，重新作了战斗部署。经侦察，张雄南匿伏于石牛山软岭头附近罗狗坑地区，他曾托人下海向日军求援，但鞭长莫及。保安第一团即分路进行搜索。18日下午，该团于凤顶格附近追及匪踪，匪徒一面仓皇抵抗，一面向深林逃窜。张雄南被"当场击毙"。其妾叶锦文腿部受伤，被生擒，余匪散窜。是月22日，在德化城召集各机关及民众团体的剿匪胜利万人大会。司令部特向军委会、军政部等报告击毙张匪的经过，并呈送张匪尸身照片。陈仪于20日、蒋介石于23日，先后致电表示祝贺和嘉奖。另外，仙游、永春、永泰等县也先后举行庆祝剿匪的胜利大会，盛况空前。

第三期为12月19日至结束。自张雄南被击毙后，群龙无首，残匪瓦解，大多埋枪潜伏下来。此期采取政治与军事相辅并进方针。这时张克武率匪众百余人潜伏于天花寨、百洋一带。剿匪军以两个机动纵队及保安第六团一部，专门搜捕张克武，其余则分区清乡，大小匪首乃相继率众缴械投降。张克武眼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遂派张移风为代表前来司令部请求缴械投诚。当局允其所请，并于28日令各部停止战斗行动，准备复动。次年1月3日，张克武率其家属来司令部请降，并再次表示愿将全部枪械献出，请给予自新之路。司令部旋即派人前往其老巢西山收缴余枪，并令各自新匪首负责检举藏匪及藏枪。

综合各期卤获及收缴枪支，总数为1600余支，自新匪首共计80余人(包括著匪张克武、张承福等)，匪徒500余人。其后，主要匪首张克武于1940年2月6日病死，张承福、张移风、周公辉等均明正典刑。此役，共击毙匪官17人、兵374人，俘获匪官12人、兵195人；剿匪军方面阵亡军官5人、士兵52人，受伤军官10人、士兵83人。

历时三月，闽中匪患叛平。黄珍吾于1940年2月致电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于是月20日复电嘉奖。

(陈长河)

河内刺汪

1938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地不久，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率领其亲信死党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曾仲鸣等人叛逃出国，乘飞机到达法属殖民地越南河内。

汪精卫等人在河内先住在朱培德夫人的寓所里，随后移至近郊一处名叫"丹岛"的避暑地。可是没过几天，汪精卫发觉这里也不大安全，又租定河内市内高朗街27号作为住居地。这是一幢三层高的楼房，楼房前有庭院、树木与围墙，居住条件相当好。这里离闹市区不太远，属于高级住宅地区，街道宽阔，两旁长着高大的棕榈树，中间夹着几棵挺拔的大王椰子树。行人不多，十分幽静。汪精卫避居在楼里，几乎从不外出。他留曾仲鸣在身边处理日常事务，而派周佛海、陶希圣到香港开展活动。陈璧君则往来于香港与河内之间进行联络。

汪精卫叛国出逃与发表《艳电》，给重庆国民政府带

来极大的震动。

开始，蒋介石对汪精卫出逃消息，下令严密封锁，各报一律不得报道。但纸包不住火，这样一名政界大人物的出逃不可能长期隐瞒其事。为了应付国内与国际的舆论，国民党当局授意中央新闻机关于1938年12月23日发布消息，假称汪精卫到昆明旅行，因旧疾复发，一时不能回重庆。12月26日，蒋介石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讲演，仍声明汪精卫的出走与军政当局均无关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等到汪精卫在12月29日公布发表《艳电》后，汪叛国真相大白，全国掀起讨汪浪潮，国民党中央才在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处置办法。最后，以汪精卫“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为理由，将汪“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但这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存有一些幻想，在处理中也留有一些余地：他没有对汪下通缉令，并对汪的出走表示“惋惜”，希望汪能“翻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这是因为蒋介石了解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历史长，地位高，影响与潜势力都很大，深恐汪的行动会造成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他尤其害怕汪精卫另组政府，给他带来更严重的威胁。因此，他希望汪精卫能重返重庆，或赴欧洲休养，对中国政局减少影响。基于这个考虑，蒋介石于1939年2月中旬，秘密派遣汪精卫过去的政治同伙谷正鼎专程去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游说。

谷正鼎是20年代汪精卫改组派的老人。这次他凭着这个关系，根据蒋介石指示，带着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与巨款，来到河内面见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谷正鼎也以个人身份劝汪，对和战问题可以谈，主张可以表示，但不要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将来还可以与蒋取得谅解。

汪精卫断然拒绝，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多次政争中，是深知蒋介石的手段的。因此他在出走后，就警告陈璧君与曾仲鸣：“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汪精卫的估计没有错。蒋介石在派谷正鼎到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最后劝告游说之前，早就指示军统戴笠派特务到河内对汪精卫一伙进行秘密监视。谷游说失败后，随着日汪勾结的加紧进行，蒋介石向军统正式下达了对汪精卫严厉制裁的命令。

1939年1月，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根据蒋介石的秘密指示，亲自部署对河内汪精卫的监视控制。他调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以及精于暗杀行动的王鲁翘等人到香港集中，由他亲自率领乘飞机到达河内。另外，他派军统另一名特务方炳西提前赶到河内，租到一座两层楼房子，买来一辆福特牌汽车，作好各方面准备。然后，他才郑重地向这三个人宣布了要他们到河内来执行任务的内容。戴笠讲述了汪精卫叛逃出国匿居河内的经过，及《艳电》的内容，告诉他们汪在河内现正积极地与日本政府接触谈判，后果严重，因此要对汪严加监视，并随时听取上面指示，采取进一步行动。戴笠任命陈恭澍为军统河内行动组组长。

戴笠回重庆后不久，又给陈恭澍精心挑选了一些各种类型的特务分子，如善搞暗杀行动的唐英杰、陈邦国、余鉴声、陈步云，精通法语的曹师昂与他的法籍妻子等人。命他们携带武器。毒药，先后从昆明、广西、香港等地潜入河内，充实与加强陈恭澍行动组的力量。同时，戴笠特地指派一直潜伏在河内华侨社会中的军统特务“徐先生”配合与支持陈恭澍的行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陈恭澍了解掌握了汪精卫一伙的动态及其住地高朗街27号的情况。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侦察到汪精卫正在河内与两名日本军官(一是大佐，一是中佐)进行密谈。这情报引起了重庆当局的高度重视。重庆当局综合各方面情报，确认日本即将正式承认汪精卫的地位，并将扶植他出来组织伪中央政府。形势已十分紧急。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戴笠从重庆给河内行动组拍来绝密电报，下达紧急指示：“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河内行动组接到制裁令后，十分紧张。经过密议，陈恭澍决定3月20日深夜采取行动，并制订了详尽的行动计划：由唐英杰带路，王鲁翘、余鉴声带人进入汪宅强行枪杀；其余人在汪宅外接应掩护；一切行动由陈恭澍指挥，进入汪宅的人由王鲁翘指挥。

正当他们进行最后的准备时，突然接到情报：汪精卫及其家人等分乘两辆大轿车，于3月20日上午离开住宅向红河大桥开去。陈恭澍一听大惊，以为汪得知什么消息准备逃走，于是急忙率行动组成员乘福特小汽车跟踪追击。在追上汪的汽车后，陈恭澍本想在路上狙击，可是由于汪精卫一伙极为警惕，陈恭澍等人无从下手，只得颓然而返。幸喜汪精卫一伙当日仍回到高朗街27号住宅。

3月20日晚11时40分，陈恭澍率河内行动组按计划出动了。他们总共7个人乘福特车到了汪宅附近。组长陈恭澍留在车上，任总指挥，发出命令：“开始行动!”其余6人来到汪宅围墙外。唐英杰、陈邦国、王鲁翘、余鉴声翻墙跳入院内。张逢义防守于后门外，陈步云则游弋于街巷中进行联系。

唐英杰早就对汪宅进行多次侦察，对里面的构造与路径十分熟悉。此刻他任向导，带着三个人进入楼内，碰到一扇门紧关着。力大无比的陈邦国抽出小斧头，连劈带砍，用脚一踹，门应声洞开。这一声巨响，惊动了汪宅的人。有人探头偷看，被陈邦国几枪打了回去。在这同时，负责执行暗杀的王鲁翘与余鉴声早就穿过门洞，飞步登上三楼，来到预先侦察清楚的汪精卫卧室前。王鲁翘用力猛推房门，但推不动；就由余鉴声用斧猛劈，劈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窟窿。王鲁翘蹲下身子，歪着头朝里望，借助楼梯的微弱灯光，看到床下趴着一个男人。王鲁翘断定此人必是汪精卫，就对他连开数枪，打得此人血流遍地，不再动弹。王鲁翘以为目的已达，就迅速撤离。

陈恭澍等人回到住地不久，就得到情报：他们这次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失败了。被王鲁翘打成重伤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的秘书曾仲鸣。

原来恰巧这天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就将自己的住房让给他们夫妇住，汪与陈璧君住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而军统行动组却没有得到这一情报，就将曾仲鸣当成汪精卫枪击了。

枪声响起后，当地的军警闻声赶来。行动组三名没有来得及撤离的成员被捕。奄奄一息的曾仲鸣被送到医院中抢救，终因流血过多死去。刺汪案发生6天后，即1939年3月27日，汪精卫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揭出蒋介石原与他一道企图与日本政府谈判的内幕情况，以图报复。而重庆的军统局总部戴笠闻讯也十分不快，下令立即解散河内行动组，召陈恭澍回重庆述职，其余的人分别派往别处。被捕的三个人被长期关押，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

（摘自《民国暗杀要案》）

蒋经国在赣南建立"新苏维埃"

遵照父命，蒋经国在奉化"闭门思过"期间，尽管内心不是滋味，但并不寂寞，围绕在他四周的，有几名关键性人物：

徐道邻，政学系的名士，博学多才，国学根底深厚，也留过学，曾经当过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嘱咐徐道邻，给儿子的课本是四书五经、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拿传统的八股给蒋经国来一次"再改造"，彻底洗涤十多年在苏联所承受的共产党思想。

这时候的蒋介石，显然对苏联革命辉煌成就的热潮已降到冰点，一心要如何消灭局限在陕北窑洞的毛泽东。自然，要抹掉共产党思想并不容易，但也不无效果，现简述于下：

（一）一年下来蒋经国的国学根底大有进步，这对他以后著书立言，帮助不少。谁都知道，蒋经国的著作从不假手于人、文字洗练、文笔流畅，自应归功于徐道邻的教学有方。

（二）在赣南期间，蒋经国初试锋芒，仍旧以共产党思想，创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政权，与中共在井岗山的苏维埃政权大打对台。由于新的苏维埃，注入不少中国传统思想，深为地方民众所接受。甚至延续到台湾的"开明政治"，亦与他这一年闭门思过有关，这不能不让我们很钦佩徐道邻的功力。

蒋经国回国，正逢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幽禁在溪口，并从徐道邻研究明史。这段期间，蒋经国与张学良时相往返。蒋经国对张学良的处境，虽寄予同情，也莫可奈何。何况当时自己的"闭门思过"，与张学良相去无几，只是行动较张学良自由而已。然而，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是极为浓烈的，也为此铸成终身之憾；随后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张学良以不能献身抗日忧心如焚，时常发出感喟，更激起蒋经国的爱国思潮。这些潜在意识，不时在父子书信往返中浮现出来，致使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了，不妨让他去江西一试。

高理文——蒋经国的苏联同窗，俩人是穿一条裤子的至友，是蒋经国向父亲要求的唯一伴读。很显然，高理文不如蒋经国专心，正如历史上宫廷中的王孙公子，不过是陪太子读书而已。有一次高随同蒋经国到"妙高台"，这里原是栖云庵旧址，蒋介石于1928年改建为二层楼别墅，经常是蒋介石和宋美龄避暑之处。进屋一看，室内电灯、电话、寝具、浴室一应俱全。高理文高兴得往沙发上一坐，便狂妄地说："今天老子可沾了蒋委员长的光，经国兄，有朝一日你继承了父亲之职，当上委员长，到那时，你给我这个老同学一个什么官当？"

蒋经国笑笑说："我当委员长，那就封你个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干干，怎么样？够朋友吧！"高理文一骨碌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来了个俄国式的敬礼，并说："多蒙委员长提携。"后来，高理文果然跟蒋经国到江西，成为得力助手，赣南青干班、上海"打老虎"，他都是要角。不料，到台湾后，蒋经国掌了权，却把这位老同学放到中信局"冷藏柜"，只是一位拿干薪的顾问而已。

太虚和尚——提起此人，可是大大有名，又有"政治和尚"之称，专门攀结权贵，见风使舵，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当权时，无不一帆风顺。毛福美求签得知的"秀才出门，状元回家"，便是他的杰作。太虚和尚原名吕沛林，光绪15年（1889年）出生于海宁县。16岁出家，在宁波天童寺从著名的诗僧寄禅（八指头陀）受戒，青年时参加过反清活动，主张佛教改革，写了不少佛学著作，曾游欧美、日本，讲经于北京、上海、武昌、福建、台湾等各大寺院，在太虚任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时，康有为为他书"兜率寺"。孙中山、胡汉民也为他题过辞。1927年，蒋介石第一

次下野回溪口，太虚刚巧应邀在雪宝寺讲经，他给蒋介石算命写下八个字："飞龙在渊，腾骧在望。"果然四个月后重掌大权，蒋介石因此对太虚极为相信，后来从杭州灵隐寺，延聘到雪宝寺为方丈。你看他和蒋经国第一次见面，如何扯了个天大的荒言："蒋公子对佛门有缘啊！早在南梁时，先祖蒋宗霸就与岳林寺游方僧布袋和尚为友，布袋和尚教他念'摩诃磐若波罗密多'，乡人遂称先祖为摩诃居士。此后，先祖随布袋和尚出家，两人无疾而化。布袋和尚现在就是各大小寺院门前的弥勒佛。因此先祖阴福子孙，蒋门万代风发。"南梁距当时一千三百多年，而蒋介石新三房一世祖蒋宗霸不过数代，时间上怎么算也拉不近，真是神化似的马屁"经"。徐道邻曾摸清过他的底细，事后对张学良说，北洋军阀徐世昌也以大总统名义，颁给太虚一方"南屏正觉"的匾额，那时候他为一百多位北洋名流皈依受戒。

以上这些人物的感染，愈使得蒋经国有壮志未酬之感。蒋经国写信给父亲说："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在蒋介石身边，其时有一位很得宠的人物，显然了解他们父子之间的恩恩怨怨，他就是江西的封疆大吏熊式辉。熊趁机说："经国雄心勃勃，他既然一再表示很有前进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目前江西就是最艰难的地方，何不让他去亮亮从苏联学来一套的本事？"

一点不错，在江西，国民党和共产党厮杀了5年，蒋介石创导的新生活运动，也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也在江西。就这样，蒋经国从一名俄国少尉，一下子跃升到少将保安处长，在中国军中官阶史上，创下空前纪录，也恐怕是绝后的。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政学系的政治艺术高人一等，蒋经国的处长职位极短，随后选在他生日的那天，又加官晋级，改派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这正是1939年的3月18日。两月之前，南昌已被日寇攻陷，而蒋经国是1938年的春天到江西，翌年6月，熊式辉又发表蒋经国兼任赣州县长。在此之前，蒋经国也做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他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床同宿，同吃大锅饭，亲如家人，给人留下极佳印象。

专区管辖有南康等11县市，都是政令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区，面积约台湾2/3大。境内多山，连绵不断，是理想的游走区，毗邻的井冈山，中共于1931年在那里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1935年之前，一直都为红军所控制，国民党曾经多次围剿都未成功。至于国民党管辖的地方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苛捐杂税任意征收，兵役公开买卖，烟馆和赌馆在官吏掩护下开设，械斗经常发生，土豪劣绅的嚣张就更不用说了。

在俄国，蒋经国学的是如何运用群众力量，中共那一套，自然难不倒他。一上任，下令禁赌，一位监务处长太太不信邪，被判在阵亡将士碑前罚跪3天。国家银行主管打牌，派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一概枪毙。诸如此类，蒋经国一面喊出不少创新口号，一面毫不容情严厉执行。于是，蒋经国的声望上升很快，"包龙图"、"蒋青天"的盛名，传遍江西。至于中共惯常使用鼓动风潮，制造舆论，蒋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更为高明。并成立报纸、通讯社，发行杂志刊物，文化宣传也办得有声有色。他最响亮的口号是"良心政治"。教育方面办学校，着眼智力开发、培养人力。社会方面整顿风气，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经济方面成立合作社，实行公平交易。更有成就的就是培育人才，成立训练班，大门写着两行醒目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这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民族意识高涨，蒋经国的宣传，处处打动人心。立时，不但引起国人的瞩目，连洋人也知道国民党在江西有个"新苏维埃"，比中共的苏维埃更苏维埃，使得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顿即失去了市场。

如果按照蒋经国的理想，是可以江西为榜样，推及全国。但是，若他的理想得以实现，照此下去，恐怕连老子建立的独裁政权，也要被"革命"了，这不正是共产主义的一体两面吗？于是，各方反应涌向重庆，1943年底，蒋经国的新任命终于发表了：江西省府委员。次年6月，调重庆，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随着蒋经国的离去，江西的革新，一概付诸东流，江西"蒋青天"时代也宣告结束。

但是，蒋经国也不无收获，在国人的心目中，他是新时代青年偶像，也从此与青年结了不解之缘，一直到台湾，担任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始终未脱离青年群众。

（摘自《蒋氏家族秘闻》华南出版社）

历史考证

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问题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在1939年8月至11月间，是从湖边地委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接着扩大到整个苏鲁豫边区。在这个事件中，我党、政、军干部被杀者约三百人，先后被捕受审查者达五、六百人，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损失是极其严重的。1939年11月罗荣桓、郭洪涛赶到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据现已查实的材料证明，当时开展这一运动的所谓根据，是发现了"托派分子"、"托派组织"和"托派暴动计划"，一开始就是采取严刑逼供搞出来的纯属捏造诬陷，毫无事实根据。1941年秋，山东分局派员到湖西进行善后处理时，宣布了七个"真托匪"，后来在多次"处理"或"再处理"中，均未曾提及过他们。现已逐个查明，单子英(金乡县)、牛籍庵(单县)两个健在，现已退休，在肃托时并没有参加工作，建国前后经历次政治运动审查，均未发现他们与托派有任何关系。朱华(原江苏铜山县)、朱新民(单县)、王文章(单县)、曹广善(江苏沛县)经过多次审查，与托派毫无关系，他们四人已分别由所在地、县委予以平反。魏定远(河南南阳县)、也没有发现他与托派有什么关系。所谓七个"真托匪"，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真的。这次以肃清"托派分子"和"托派组织"为目的的肃托运动，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因此，这一案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为了彻底处理好湖西肃托这个重大历史冤案，我们研究了如下意见：

一、首先明确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以彻底平反。

二、原定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等七位同志为"真托匪"是毫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三、对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对受株连尚未纠正的家属、子女，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1941年中央对被难家属已按烈属对待，这些家属今后可仍享受烈属待遇。对受冤枉的同志所戴的各种政治帽子和给予处分的，凡未纠正或纠正不彻底的，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的档案中如存入有关肃托的结论、处理材料等，应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

(摘自《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一文,作者中共山东省委)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究竟有多少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的次数与总额，现有多种说法，有说3次2.5亿美元，有说5次4.5亿美元，也有说8次5亿5千多万美元，等等，苏联学者一般都说3次2.5亿美元，但也有说4.5亿美元的。那末，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究竟有多少呢?现在已有确实史料可以证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只有3次，总数为2.5亿美元。这3笔信用借款条约签订的日期是:1938年3月1日5000万美元，1938年7月1日5000万美元。不过这两笔信用借款虽然当时已经商定，但正式签字均为当年的8月12日。另一笔是1939年6月13日1.5亿美元。这三笔苏联对华信用借款的条约，过去只见俄文本，最近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到了中文本抄本。同时从当时中国国民党当局蒋介石与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条约的中方签署人杨杰、孙科的来往函电看，也可以确认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只有这三笔，除此之外，没有第4笔信用借款。1944年10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偿还苏联信用借款的一份文件也称:"中苏信用借款，前后共计三次:第一次美金五千万元，第二次美金五千万元，第三次美金一万五千万元。"并且，由于苏联的这三笔信用借款是专供中国政府购买苏联的飞机、大炮与其他军火物资用的，是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每笔并不是一次拨给的，每次动用借款，根据条约均得签订具体的购货合同。苏联的第一、二两次对华信用借款总数1亿美元，至1939年9月1日已全部用完，但苏联的第3次信用借款1.5亿美元，前后只动用73175810.36美元，后因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而中断了第3次信用借款的使用。因此，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3次，总计2.5亿美元，实际动用为173175810.36美元。

中国最早向苏订购的几批军火物资，苏联方面曾要

求中方付一部分现金，后经商量苏方同意以苏联必需的中国农、矿产品偿还。当时中国政府曾决定拨出国币3200万元，约合美金969.7万美元，购足中国的农、矿品尽速运抵苏联，但最后几经交涉，这部分货款仍由苏联在第一次信用借款中拨付，而1938年10月31日以前已运抵苏联的中国农、矿产品，价值630万美元，也算作1940—1941年度中方应偿还苏联信用借款的物资，并算还中方应得的利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向中国输送一部分抗战所急需的汽油、机油，中方则以苏联所需要的货物交换，从现有的资料看，这种易货贸易，数额不大。

（李嘉谷）

最早空袭日本本土的是中国飞机

日本《文化评论》1990年9期所刊山崎元撰写的文章称：人们认为，二战时最早空袭日本本土的是1942年4月18日从美军航空母舰大黄峰号起飞的B52轰炸机。其实，在4年前，即1938年5月20日，中国飞机就曾飞抵九州上空。是年5月21日的《东京朝日》等报纸曾作过报道："20日上午4时许，熊本、宫崎两县上空出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约1小时后便消灭在太平洋上。飞机飞走后，椎叶山及宫崎县附近发现大量反战传单。这架怪机的来历虽然不明，但从散发的传单内容看，可能是中国飞机"。

当时北九州各报对此均有大量报道。《福冈日日新闻》甚至发表号外，以《支那"飞机"突然出现在南九州上空，从四千米高空撒下反战传单》为题，宣传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日本的军部及警察虽说"一笑置之"，但却对报道采取了限制措施。由于这些限制，中国飞机最早空袭日本这一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至今鲜为人知。

当时极为秘密的《特高外事日报》（1938年5月号）曾以《支那飞机在南九州散发反战传单情况》为题，对此历史事实作了报道。据该报道说，5月20日拂晓，熊本、宫崎两县上空出现飞机，散发了5种反战传单，时间大约是凌晨3点40分到5点20分之间，往返线路相同云云。

当时，引起世界重视的并不是日方的报道，而是中国方面对空袭成功的宣传。在5月21日夜里，汉口的日语广播说，"中国空军19日飞抵日本九州、长崎及大阪一带，散发了大量传单后平安返回。""日本空军无视国际公法，轰炸文化机关、医院的患者等，中国的空军勇士却并未做有悖中国四千年固有道德的行为……在长崎等地散发数万张传单。中国飞机飞临日本上空，使日本当局狼狈不堪。对我空军未作任何抵抗。中国飞机投下照明弹，将10万传单全部散发完毕后，于20日安全返航。这是中国空军远征的新纪录。"

5月22日晚，伯力的中文电台广播了孔祥熙的讲话："没投炸弹，是中国崇尚人道。我们的飞机散发传单，不扔炸弹，是要告诉日本人民，……中国青年飞行员在维护自由与民主独立上是勇敢的。"

最初空袭日本的中国飞机是两架重型轰炸机，乘员19人。当时中国的首要目的是阻止日本侵略，从这一角度出发，没投炸弹，而是撒发了10万张反战传单，的确是适合时宜的战术。

（唐志摘自《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1年2期，何培忠译）

风云人物

白求恩

白求恩（1890—1939）　加拿大安大略省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学毕业后，进多伦多大学学习，专政生物学。1911年，因经济拮据辍学，应聘到伐木工人劳动营当工人教师，一年后回到多伦多大学医学系学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加拿大远征军，在法国和比利时任战地担架队队员，负伤后重返多伦多大学学医。191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冬，到美国底特律市挂牌行医，后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目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状况，开始探索人生的道路，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工人运动。1935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6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他投身于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斗，在马德里建立加拿大战地输血站，抢救伤员。1937年6月回国，连续四个月，在加拿大和美国许多城镇作巡回演讲，揭露法西斯的罪行，介绍西班牙人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1937年7月7日，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毅然参加国际援华会组织的加美医疗队，于1938年1月奔赴中国解放区战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同意他提出的到前线去的请求。随即到晋察冀根据地，任军区卫生顾问。在后来

的一年多时间里，忘我地工作，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伤病员非常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拒绝接受毛泽东批准给他的每月一百元津贴费，并全部献给后方医院。注意培养八路军的医务人员，兴办卫生学校，亲自编写教材，为发展解放区的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1939年10月，日军出动五万兵力进行冬季大"扫荡"，沿平汉线两侧分五路向八路军包围。白求恩随军区卫生巡视团奔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不慎划破左手中指，在为一伤员做紧急手术时感染转为败血症。但在生命垂危之时，仍然要求上前线为伤员治疗。解放区医院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对他进行全力抢救，终于无效，1939年11月12日逝世于河北完县。白求恩临终前，在给聂荣臻写的报告中认为，在中国的两年是他"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939年12月1日，延安召开了白求恩追悼会，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毛泽东写了挽词。并于12月21日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对他作了高度评价，1952年白求恩的灵柩迁至石家庄人民解放军烈士陵园，重建了陵墓，并建立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

材料　聂帅深情回忆白求恩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世界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是一九三九年六月来到晋察冀的，我在五台金刚库迎接了他。白求恩告诉我，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来后，曾对我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白求恩的一番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

白求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工作精神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到晋察冀，立即去松岩口创办模范医院，后来，又穿过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作为军区卫生顾问，为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骨干，亲自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雁宿崖战斗前夕，他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名患头部峰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染。但他仍然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后，他还在坚持，直到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了两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离开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我写了一封信，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那封信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他在临终之前，还想到了军区卫生工作的建设，写道：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得到白求恩逝世的消息，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白求恩同志逝世的时候，我们正在抗击日军的疯狂"扫荡"，但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边区军民，依然在反"扫荡"的间隙，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来，还在河北唐县军城村，精心设计修建了白求恩墓。这在当时边区的条件下，可说是最高的规格了。毛泽东同志为悼念白求恩同志，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这是人们都知道的。

（《聂荣臻回忆录》）

张　宗　逊

张宗逊（1908——　　），陕西省渭南县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3师9团营政治指导员，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排长、连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团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纵队9支队支队长，红1军团第12军代参谋长，红12军第36师师长、军长、独立团团长，红5军团第14师师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中央纵队参谋长，红3军团第4师师长，红四方面第4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

杨成武

杨成武(1914—)，福建省长汀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第12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11师32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师4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师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高敬亭

高敬亭(1907—1939) 河南光山人。原名高志员。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身农民家庭，读私塾六年后从事农业劳动，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秋任乡苏维埃政府武装委员。不久任弦东区苏维埃政府武装委员，参与组建区独立团，配合红军主力作战。1930年5月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秋，任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3月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5月被选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常务委员；6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委员、常务委员；7月被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兼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参与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各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后，留在原地坚持斗争；11月重建红二十五军，任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同年底与沈泽民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批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率部参加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多次战斗。1934年9月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11月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后，被留下坚持斗争。1935年2月主持重建红二十八军，任政治委员(无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的党政军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发展了一批红军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停战联合抗日协定。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在安徽舒县、桐城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但在执行东进敌后命令等方面，犯有严重错误。1939年6月在安徽合肥青龙厂被错误处决。1977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一级陆军上将，先后曾任贵州省主席、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广东省主席等职。抗战期间，指挥过四次长沙会战，曾获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的自由勋章。张治中称他是"百战名将"。

薛岳系广东省乐昌县人，于1896年12月2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907年春，刚满十岁的薛岳，进入黄埔陆军小学学习，于1910年毕业。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又加入中华革命党，与党人邓仲元、朱执信等一起，继续进行反袁护国斗争。次年春，被送往武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转入保定陆军学校第六期深造。1918年，在保定陆校尚未毕业，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上尉参谋。6月，随部前往福建，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二十多个县的根据地。

1920年8月，薛岳随部回广东讨伐桂军。不久，任邓仲元建立的粤军第一师机关枪营营长。次年5月，与叶挺、张发奎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营长。8月，护卫孙中山溯西江到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破坏后，于4月又护送孙中山从广州北上，改设大本营于广东韶关。1922年6月初，带领第一营大部随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从韶关返广州。

6月16日凌晨3时，陈炯明公开叛变革命，令所部叶举、洪兆麟等部围攻越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指挥所部固守后门，多次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叛军便断水断电，企图困死革命卫士。战斗持续

了十多个小时,警卫团便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冒着枪林弹雨,将孙夫人护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寓所石屋。孙中山则在事变即将发生登上了永丰舰。

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战士到珠江"永丰"军舰,继续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不久,奉孙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在粤军第四师的营长莫雄帮助下,与该师师长关国雄取得联系,召开了驻梧州陆海军少校以上军事会议,商量出兵平叛事宜。正在这时,得到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受阻被迫开往福州的情报,便决定暂停这次军事行动。两天后,秘密地乘搭"大明号"港梧轮船赴香港,转往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广西请兵情况。

8 月,薛岳与李章达、叶剑英等被孙中山派到福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中服务,任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不久,任第八旅十六团团长。1923 年 4 月,率部随东路讨贼军南下,到达广东潮梅一带,协同西路讨贼军,夹击叛军陈炯明的洪兆麟、尹骥、李云复、翁式亮等部。5 月 9 日,前往揭阳的东路讨贼军遭到叛军袭击,通往丰顺要地言岭关被占,道路受阻。在这危急关头,他带领全团官兵,在旅长张民达指挥下,与其它部队一起,反复猛攻,夺回言岭关,使全军转危为安。事后,第八旅全体官兵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和表扬。

1924 年,薛岳先后担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和师参谋长。次年 2 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中,常常以少胜多。3 月 27 日,他在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汪精卫、蒋介石等电报中说:"3 月 11 日,逆军残部由赣边来犯兴宁。职团由大埔星夜赶到合水,与逆军激战半日,被我击溃,向平远逃走。13 日,追至东石,被我夜袭。18 日,追至大宗祩,我乘雨袭击,敌伤之数百余人。我伤亡百余人。职团获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四百余名。现敌一部退往福建,一部退往江西,敌之将官,俱已退往香港、上海。"由于战果显著,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1927 年 3 月底,蒋介石、李宗仁等在上海密谋"清党"。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二师师长严重被视为"具有左倾迹象",其部也被视为"不可靠"。4 月 2 日,第一、第二师的政治部被蒋介石下令解散。这时,武汉革命政府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共产党员)携邓演达给同乡好友薛岳的亲笔信,率总政治部先遣队赴上海开展工作。薛岳与李会见时,对蒋介石不信任自己"深为不满",劝李说"情况不好",要"谨慎"。没多久,他知第一师将要调离上海的消息,便赶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但是,"共产党不同意,而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4 月 5 日,第一师就被调离上海到京沪线护路。薛岳被解职之后,南下广东,投靠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担任广东新编第二师师长。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朱德、叶挺等率起义军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薛岳奉李济深命令率新编第二师迅速开往揭阳、普宁地区,协同陈济棠、徐景唐部,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所部四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这时,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他便抓住这个时机,在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弹药将尽,被迫撤退。

汤坑会战一结束,薛岳立即率领特务连轻装前进,迅速地占领汕头市,不准其他部队开进汕头。凡是各部要津、各种肥缺,都分别安排自己的亲友掌管。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 年 2 月,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3 月,经补充了的日军一〇一师团,以及一〇三、一〇六师团一部,分路向南昌进犯。他决定诱敌于安义、奉新之间地带进行决战。以第四十九、七十九和七十军布防于修水河南岸阻敌南犯;以部分兵力布防于鄱阳湖西岸,一部兵力防守南昌;而将主力布防于安义、奉新东西两侧山地。

当日军开始渡修水河时,薛岳还急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率领两个军驰援安、奉;俞济时率两师向高安急进。电令前敌各将领:"南昌方面取守势,宋肯堂担任指挥;安、奉方面取攻势,罗卓英总司令任指挥,以俞军击其首,刘、夏诸部击其腹;武宁方面亦取攻势,以所部夏、李、彭诸军击其尾。"

27 日,南昌失守。4 月 24 日,薛岳奉蒋介石按时收复南昌之令,指挥罗卓英部兵分三路开始反攻。左路由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五十八、六十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中路以宋肯堂等军沿赣江西岸北上,直接进攻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和通讯。右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5 月 4 日,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奉蒋介石之命,投入反攻南昌的战斗序列。6 日,陈安宝中弹殉难。这时,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反攻被迫停止。日军虽然保住了南昌,但死亡一万五千多人。

5 月 7 日,薛岳电告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在电文中,他还承担了南昌失守的责任,说:"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

1939 年 9 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大会战。这时,他已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开始,蒋介石决定:"不守"长沙。他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十一军为主，派遣四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十五万人，在一百多架飞机、两百多只舰船支援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十七个军共二十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时，将七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敌人。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

12月，日军又以十二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侵犯。早在11月中旬，薛岳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官兵代表大会，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会上，他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 性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选定了新墙、汨罗两河为伏击、诱敌地带，捞刀、浏阳两河为决战地区。令第十军死守长沙。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进攻浏阳，指挥萧之楚、夏楚中两军及郭礼柏师，待敌进至浏阳河继而进攻长沙时，分别自南向北击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领夏首勋军等进驻平江，待敌向浏阳河进犯时，自东北向西南对敌侧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平江指挥两个军，先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敌力；后待命转移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陈沛军在汨罗河南岸既设阵地顽强抗敌。在逐次消耗敌力后，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俟敌向岳阳、长沙进攻时，协同夏军从东北向西南击敌。各路兵力共三十余万人。

12月下旬，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敌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次年1月1日，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他立即命令各部按预定部署，对敌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说："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并发指挥，"倘有作战无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球心攻击，将敌击溃。薛岳见残敌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之敌伤亡五万多人。战后，他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淮海战役后，薛岳与张发奎等粤籍要人提出以："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继续主粤。蒋介石为笼络广东地方要人，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请求，并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府主席，张发奎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职务。

1949年2月，薛岳前往广州上任，决心在广东与共产党继续较量。他首先亮出"广东人民大团结"的旗号，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各厅、局、处、科级干部的任免，都由自己说了算。同时，将原来十五个保安团，扩充为二十个团，编成五个师。由其亲信分任师长。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还在各师配备重型大炮、战车，并把部队从各地调集到广州附近和省内各重要铁路沿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广东进军。

5月14日，薛岳的老部下吴奇伟在粤东起义，广东省内政局大乱。10月11日，他来到海南岛。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为了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在全岛设立三道防线：从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山县在长坡、烟矿、黄竹、定成、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为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其部署兵力达十万之众。薛岳认为这三道防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支持下，渡过琼州海峡。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他从海南岛飞往台湾，担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58年8月，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5月，任台湾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杜聿明

杜聿明，字光亭，陆军中将。杜是国民党军建立的第一个装甲兵团的第一任团长，还担任过第五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昆明防守总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剿总"副司令及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长官等职。

1949年1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于1959年12月被特赦后，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并相继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杜聿明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嵛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生母叫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名聿德。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获悉

这一消息，决心南下归队。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老虎桥监狱。一天深夜，他约同牢囚犯数人，越狱逃出，乘船到达武汉。

杜聿明逃到武汉，就去见邓演达（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邓向他了解北方一些情况后，问："你现在准备到哪里去？"他说："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邓只叫他到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

宁汉彻底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倒蒋运动达到了鼎沸的程度。有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将枪决洪君器。洪是张治中的内弟，在学生兵团任职。洪的传令兵告密说："张治中、洪君器等企图将学生兵团带到南京。"于是，武汉当局逮捕了洪。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的口号时，杜既不举手，也不呼喊。当天晚上，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杜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有一天，他听到正在闲谈的一个守卫说："这些都是反动分子，很快就要枪毙掉。"当晚，杜冒死逃了出来，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

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张治中，此时张任总司令部训练处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又带杜去见蒋介石。蒋很高兴，给了杜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遂委任杜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军长徐庭瑶）。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杜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依靠步兵来完成，机械特种兵，只有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倒敌人，要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灭敌人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此时，杜聿明年仅三十四岁。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是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杜聿明在此期间，集中全部精力掌握战机。虽然敌人的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杜的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他随时传令嘉奖并用物质鼓励作战英勇的部队，以鼓舞士气。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着敌军炮火的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不计个人安危，来到便于瞭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经过缜密的研究比较，并同各师长研究后，他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1942年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此间，史、罗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瀋藻撤退，而蒋介石又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第五军各部回国经过之处，都是些祟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困难，而又蚊蚋成群、蚂蟥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在同敌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

杜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杜见蒋还是选了下策，认为这下子没有希望了。

果真，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

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被迫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之后，他仅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所俘。

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马上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未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不满，便到"总统府"吵吵闹闹，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当时小报登载"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文章，就是描写这件事。南京解放前夕，曹独携四个子女飞到了台湾。

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有巨大的影响。开始，他对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持怀疑态度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国内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崇美、恐美思想，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震荡着他的心灵。他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57年，美籍华裔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立即派人与杜聿明联系。此时，杜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他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

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他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慨。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薄一波智斗阎锡山

1939年秋，阎锡山让山西新军决死队的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参加他的"秋林会议"，即新军和旧军官的头头会。一天早晨，阎锡山正在洗脸，薄一波走了进去。阎锡山一面洗脸一面问薄一波："你那个地方有没有共产党？"薄一波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阎锡山对他不放心，有意出个难题进行试探，便很巧妙地回答道："我怀疑我那个地方一定有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我一向都是很注意的。为了以防万一，请司令长官再给我们调去一些部队，增发一些枪支弹药，要不然，请你把我调回去，我实在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干了。"薄一波的这番话，使阎锡山顿时消除了疑虑，对薄一波更信任、更放心了。以后阎锡山出于对付共产党的目的，果然给薄一波调去一些部队，增发了部分枪支弹药。这正为以后粉碎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选自《军史资料》89年5期，作者：吴培西）

彭雪枫卖马

1939年1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司令员的率领下，由肖县进驻永城县书案店。当时我在所属第六中队三排当战士。

由于日军到处修筑碉堡，不断"清剿"，这一带群众生活很困难。为了不增加群众的负担，支队首长指示要把原来每人每天5分钱的油盐钱减为3分。当时部队生活也很困难，大部分同志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开始，我们吃红薯和高粱面下的菜糊糊（无盐），按规定每人一个红薯一碗糊糊。那时我们饭量大得吓人，就是再增加几碗也填不饱肚子。一个星期后，又由原来的每天两顿饭减为一顿，许多人因饥饿两眼发昏。据说，由于敌顽重重封锁，我们和八路军竹沟办事处的联系被切断了，那边送不来钱和东西，就是彭司令员也和大家一样节衣缩食。

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后来实在没办法，组织上派了一部分人到"国统区"募捐，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欺骗宣传，收效甚微。又过了几天，彭司令员来到我们中队，他望着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眼圈有些发红。他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小同志，坚持点，长征那么

艰苦都闯过来了，我就不信度不过现在的难关。

他回去以后就同当时的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商量，决定把仅有的 12 匹马卖掉 11 匹，换回点粮食（只留下彭雪枫同志的一匹），就这样对付了半个多月。眼看要过春节了，为了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彭司令员说服了张参谋长和吴主任，把自己最心爱的大白马也卖掉了。

除夕的晚上，各伙食点都点燃了干柴，我们围着熊熊烈火开了联欢会，并吃上了玉米饼子。

彭雪枫卖马的消息传开后，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歌谣颂扬他：

“彭司令，真是强，
谁提起来谁夸奖，
爱护群众是模范，
关心战士象爹娘。
日本鬼子大扫荡，
抗敌拿起刀和枪，
只要团结一条心，
抗战胜利有希望。”

（选自《军史资料》89 年 3 期，作者：花怀真）

彭雪枫夜宿岳王庙

1939 年年底，彭雪枫司令员率领新四军第六支队，驰骋于豫、皖、苏边境，杀得日伪军蒙头转向，屁滚尿流。两个月时间，就平毁了敌碉堡 108 座，部队也由 1000 多人扩大到万把人。老百姓赞誉说：“鬼子恶，伪军凶，就怕碰上新四军，就怕听说彭雪枫。”

这天，部队刚到东凌乡，天色已晚。彭雪枫听取了李乡长等地方干部对敌情的分析汇报后，决定在此宿营。李乡长 50 多岁，是个肚里插了绣花针的细心人，他为了让彭司令夜里有个宁静而又安全的办公地方，考虑了好久，决定住到附近的岳王庙里，彭雪枫一听，皱了皱眉头，笑着说：“军有军纪，庙有庙规，你先征求一下当家僧的意见。”李乡长眨巴着眼睛，一摆手答道：“还征求意见呢，岳王庙被鬼子的炮弹毁了一角，当家和尚早逃到江南去了。守庙的只有一个小哑巴和尚，还是从别的庙请来的呢。”

彭雪枫怔了怔，才带着警卫员小丁，随着李乡长走了。

岳王庙是宋代古刹，高墙大院，石阶铁门，门口两棵白果树参天而立。李乡长与每晚出来挑水的哑巴和尚打了阵手势，才进了门。

彭雪枫就在大殿一角的桌子上，点亮腊烛，看起军区刚发的文件来。李乡长却象热锅上蚂蚁，急得在殿堂里团团转，心里暗忖：司令员被我领来，今夜睡在哪里呢？他东一窥，西一瞅，陡然盯住了西侧的一间厢屋。再打亮手电，从门缝里一瞧，里面有竹榻，有叠得好好的被盖，于是找了个烛台，就敲门销。这下可惊动了彭雪枫，他拧着眉，沉着脸说：“老李，你这是在干什么？”

李乡长用手指将帽舌一顶，咧着嘴说：“彭司令，这是当家僧月山的卧房，里面干净况且暖和……”

彭雪枫连忙制止住：“不行！主人不在，岂能随便。我彭雪枫进了佛殿，就觉得不安，怎么可以再越轨？”

“这有啥？新四军流血流汗打鬼子，司令员借他张铺宿一宿，说千说万也应该啊！”李乡长搓搓手，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我们又不拿他一针一线！”

“话可不能这么说。出家人四大皆空，佛门为重；新四军为国为民，拼杀沙场，都是同等重要。借宿看来是小不丁点的事，损了政策，我可担当不起。”彭雪枫睨着手执佩刀的岳王菩萨，陡然笑道，“我和岳王爷爷都是带兵的头头，就在这里陪他一夜，还挺有意思呢。”

说着，他反剪着手，睨着吹胡子瞪眼睛的岳王菩萨，长长叹了口气：“鬼子来了，岳王爷爷也遭了殃。那只炮火炸断的胳膊，待当家僧回来，还得请你李乡长帮助他修接好，庙里没有好端端的菩萨，哪能成方圆哪！”

听到这话，李乡长心里的轱辘车翻滚起来：怎么一个新四军的带兵将领，也讲起迷信？于是微微一笑，搭讪道：“彭司令，你过去信过佛么？”

彭雪枫闪着炯炯有神的大眼，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信佛。但是，咱们新四军也有约法三章，杀鬼子，打敌人，不光是为了保护劳苦大众，也要保护正当的宗教佛事，坚守信仰自由啊！”

李乡长不便再打扰彭雪枫，仔细在殿堂内外又察看了一遍，便和哑巴和尚打了几个手势，先走了。

大殿里静悄悄，只有彭雪枫沙沙沙的写字声。小丁倚着圆柱闭了一会儿眼，见司令员从挎包里掏出个馒头咬着，忙轻轻走了过去：“彭司令，我去和哑巴和尚商议一下，替您烧点开水，将馒头蒸一蒸。”

彭雪枫将风纪扣一解，光火了：“你怎么也婆婆妈妈的了？这里不是军营，是佛门！”说罢他环起食指，在桌上敲了敲，“别管我了，你抓紧时间休息。”

小丁搔搔头皮，不再着声了。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殿堂后屋里“啪”的一响，不由得惊跳起来，端起冲锋枪，就窜了过去。

这后屋阴惨惨的，老鼠吱吱叫着。他手电一照，望着几尊断臂残身菩萨和一口棺材，不禁汗毛倒竖。半晌，棺材盖又“啪”的一响，忽地钻出个人影来。小丁双眼瞪得有酒盅大，扣着扳机吼道：“不准动！你是什么人？”

那人一推棺盖，直愣愣站着：“我……我……我是当家僧月山。”

小丁逼进一步，又吼道：“举起手来！”

月山结结巴巴地回道：“小僧双臂……双臂酸痛，我

……我想见见……不，不，想拜见你们的彭司令。”

小丁将他上下一顿搜查，才押着他进了殿堂。

原来，这月山为逃避鬼子的“扫荡”，打发其他和尚早转移到江南去了。他自己舍不得庙产，加之腿脚不灵活，于是随身带着点细软，一直躲在庙里。遇到来人，立即藏到棺材里，外面由哑巴和尚应付。

彭雪枫问明情况，深情地说：“难怪啊，这世道太不安定，鬼子、汉奸、强盗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话没说完，月山已跪在地上，叩了个响头说：“今日见到贵军司令长官，请受贫僧一拜。”

彭雪枫连忙拉起他，双手合十，诙谐地说：“阿弥陀佛！我可不是岳王爷啊！至今只知道打仗，没有任何功德。”

“不，不，不，刚才你和李乡长讲的话，贫僧都听到了。我早就听说，彭司令、新四军都是好样的，但是，万万想不到你们对出家人也如此尊重。”月山说着，花白的胡须乱颤，声音都嘶哑了。

“出家人、新四军，都是我们中国同胞啊！咱们都有一颗心，要赶走鬼子，对不对？”彭雪枫将月山扶坐到椅子上，然后掏支烟抽起来，谈笑风生地说：“你们供奉岳王爷，我们也要学习岳飞当年尽忠报国的精神呀！”

月山望着亲切、和蔼的彭雪枫，胆也大了，声音也高了，他掸了掸袈裟，轻咳了一声：“贫僧有句话想请教彭司令：新四军纪律严明，打仗勇敢，只是不知道将来共产党坐镇了天下，对我们佛门如何发落？”

彭雪枫将军帽一脱，指着菩萨龛左侧的半副佛联笑着说：“‘蓬壁生辉，愿者信，信则灵这句话有道理，我们永远不会干涉宗教信仰。抗战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佛门还是永远朝南开。到那时，你们有什么困难，除了随缘乐助，我们还要尽力支助你们！”

听罢，月山老泪纵横，抬起头望着皎洁的明月，望着烛光映照下的岳王爷，对彭雪枫双手一拱，激动地说：“司令光临寒寺，为我佛增辉。贵军政策如此英明，一定所向披靡！”

彭雪枫连连摆手道：“老师父见外。我个人微不足道。我们的胜利是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就在这时，月山一招手，对站在一旁的小和尚说：“顺连，你不必装聋作哑了，代我再谢一声彭司令。”话音刚落，小和尚就地叩了个头说：“谢恩人！”

原来顺连本不是小和尚，更不是哑巴，而是月山的侄儿。彭雪枫抚摸着这个小青年的肩膀笑着说：“我不是什么恩人，真正的恩人是共产党！你要好好服侍老师父，如有不是，别怪我彭雪枫打你的板子呀！”

“彭司令，我有个请求，我也想参军打鬼子。”顺连看了一眼月山。月山毫不犹豫地说：“这也好，这孩子血气方刚，是个好苗子。他爹妈都死了。我就托付给新四军吧！”

彭雪枫望着面前的一老一少，感慨地说：“这事带不得半点勉强，你们再和李乡长商议商议吧！”

月儿斜西了。月山见彭雪枫抓着笔在专心致志地写着报告，忙叫顺连去厨房里烧几个鸡蛋给彭司令员吃。小丁一把拖住月山，悄悄地说：“你不知道咱彭司令的脾气，千万别忙这弄那。”月山听了，望着闪跳的烛光，轻轻到了岳王菩萨面前，拜了又拜，嘴里喃喃祷告道：“祈我佛主保佑新四军连连打胜仗，早日消灭鬼子。”

（徐梓，《大江南北》89年3期）

白求恩请客

据《军事资料》杂志报道：1939年春天，边区的生活很困难。一天，负责白求恩生活的管理员好不容易买回了几斤肉，心想，这一下可以让大夫改善一下生活了。

白求恩看见了买回的猪肉也很高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再有一只鸡就好了。”管理员便到集上买来一只鸡。白求恩平时一贯生活俭朴，对自己要求严格，今天对吃如此讲究，大家不免有些纳闷。便问：“今天是不是有客人？”白求恩微笑点头：“对！”并诙谐地补充了一句：“是很重要的客人，我要亲自上灶。”

不一会，白求恩把亲手做的菜都端上来了。他招呼他的工作人员坐下，伸出大拇指说：“我今天要请的，就是你们。你们才是最高尚的。我只是个普通的外科大夫，没有伙夫为我做饭，我就吃不上饭；没有马夫为我养马，我哪儿也去不了；公务员照顾我的生活，翻译为我和中国人民架起感情交流的桥梁……没有你们，我什么也做不了，今天请你们尝尝我亲手烧的饭菜，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一点心意。”

（选自《党史博采》1990年1期）

异国战友同心曲
——记白求恩与林金亮的友谊

1

一张磨损严重的照片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是一张由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新闻记者路易斯·斯诺拍摄的照片，反映的是1939年10月白求恩大夫在河北省涞源县孙家庄外小庙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情景。这张珍贵的照片，珍藏在上杭县才溪乡王元凤的家中。

她指着照片左边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和白求恩一起作手术的人说：“他就是我的公公林金亮。”

林金亮是谁？他怎会和白求恩在一起？由此引出一个

动人的故事。

1938 年初夏，白求恩来到山西五台山晋察冀后方医院，受到院长林金亮和全体医务人员的欢迎。白求恩来不及休息便投入工作。手术台很简陋，是用木头打个架子，放上门板搭成的，手术器械只是止血钳子，几把剪刀，骨锯、骨凿、骨锥各一把，还有一个麻醉罩，而且都是粗陋破旧的。白求恩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林金亮："就这些东西？"林金亮回答："这是全部家当。"白求恩不信，摇头说："咱们今后要一起工作，你可不要瞒我呀！"当军区卫生部长告诉他事实确凿时，白求恩惊讶地再一次把那些器械一件一件地拿起来，仔细端详一番后，紧紧握住林金亮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做这么多工作，真是伟大啊！我万分幸运能和你们一起工作。"初次见面，互相间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白求恩年愈半百，却对工作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他一来医院就定了一条规矩：凡是前线下来的伤员，不论伤势轻重，都要先由他检查治疗。一次深夜，前线送来一个轻伤员，林金亮考虑到白求恩劳累了一天，刚睡下，就没喊他，自己作了处理。第二天一早查病房时，白求恩得悉后，他严肃地批评林金亮："以后这样不行。就是我睡了，来了伤员也要通知我。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负了伤来医院治疗，我们如对他不负责任，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白求恩对每一个伤员都关心备至，对手术后的重伤员，他常常夜里起来几次查看。为了到分散在老乡家病房巡诊，他常常在夜间提着马灯，行走在坎坷的乡村路上。

白求恩对伤病员不仅在治疗上十分精心，而且在照顾上也是体贴入微的。一次，林金亮陪白求恩检查病房，走到每个伤员身边，白求恩都要伸手摸一摸褥子，如果是湿的，当场就要护士解决。如果碰一下伤员的身体，伤员猛一动，也就知道生了褥疮，这时他就要批评护士。他常对林金亮说："病人生褥疮，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罪过，一定要经常帮病人翻身，被褥湿了，就要马上换。"至于白求恩给伤病员输血，不计报酬给当地老百姓看病，更使林金亮从内心对他产生了无比崇敬。

艰苦的生活、繁忙的工作、频繁的战斗，使白求恩的身体消瘦了很多，他那微高的颧骨越来越突出了。林金亮指示炊事员尽可能把伙食调剂好一些，但白求恩对此很有意见。不是拒绝进餐，就是把鸡汤端给伤员吃。他风趣地说："组织上可以照顾自己的战士，我就可以关心自己的伤员。"军区首长常常把缴获来的香烟、罐头等战利品送给白求恩，而他差不多又都转送给伤员。他说："我是个八路军战士，也要和你们一样生活。"有天深夜，林金亮看到白求恩的屋子还闪着灯光。便关切上前，只见他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光下打草鞋，可打来打去总不成样，看到他那着急、滑稽的样子，可乐坏了林金亮。在林金亮的指点下，白求恩总算完成了这份杰作。在这次交谈中，白求恩了解了林金亮的身世，知道他是位来自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县才溪区的红色医生，尤其听了他在长征途中艰苦行医的壮举，白求恩对这位 30 来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夜以继日地在手术台边工作，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在战斗和生活中，林金亮和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次林金亮在给伤员治疗时，被滚烫的消毒水烫伤了脚。白求恩亲自为他敷药、包扎。晚上，白求恩披着大衣走进林金亮房间，默默地坐在他身边守着。林金亮再三劝他早点休息，白求恩摸摸他的被子，把大衣脱下盖在他身上，林金亮挣扎着拒绝，白求恩轻轻地把他按倒在床上，摆摆手，笑着走了。半夜，林金亮脚正火辣辣地难受，白求恩第二次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检查了包扎的敷料，见林金亮没睡就说："痛得厉害吧，服一点止痛药吧。"说着倒了一碗开水，把随身带的止痛药亲自给他服下去，又整整被子，轻轻地离开了。服下止痛药，林金亮的疼痛减轻了，迷迷糊糊地睡了。不知过了多久，他隐隐约约觉得耳边有声音，猛一睁眼，只见白求恩又一次站在床前。望着白求恩那双慈祥的、因过度劳累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亲切、和蔼的面庞，一股暖流涌上林金亮的心头，两汪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紧紧握住白求恩那双温暖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后方医院，除了林金亮是位"资历较深的大夫"(引自白求恩《给聂荣臻同志的工作报告》)，其他医务人员虽然具备一些临床经验，但大都没受过专门训练，无法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白求恩考虑到自己即使用几倍的工作量亲自为抗战做事，但毕竟是势单力薄，只有尽快培养造就一大批技术骨干，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白求恩的提议下，一个培养训练医务骨干的工作在后方医院开展起来了。白求恩把工作人员分成两个班：一班是医生、医助，学习野战外科基本技术；一班是护士，学习野战护理技术。两个班都由他亲自讲课，实在抽不出时间时，就让林金亮代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许多医务人员从只会做简单战地外科手术到能做较复杂的胸、腹部手术。有个司药长还成为一个外科手术的多面手。看到医院医疗护理技术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提高，院长林金亮有说不出的高兴。白求恩讲课认真，要求严格，并时时处处注意技术干部的思想作风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次，白求恩正在指导医生给伤员检查，林金亮有事匆匆从担架走过，白求恩叫住了他："林大夫，你不觉得刚才的行动不正确吗？"林金亮和大家都很愕然。白求恩向在场的医务人员说："一个医生或者护士是不应该在伤员面前昂首而过的，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我现在来做给大家看。"只见他走到担架旁，俯下身去，认真、仔细地查视一番伤情，亲切地安慰了伤员几句，然后起身离开。他走回来继续讲道："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虚伪呢？不是的，对这些负了伤的抗日战

士，我们除了给以最大的关怀和技术处理，没有别的办法来补偿他们为我们而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们负伤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更是为了实现明天伟大的没有阶级剥削的新中国，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白求恩的话赢得了伤员和医务人员的掌声。

“林大夫，我利用你的一次小过错，形象地给大家上了一堂爱护伤员的课，你这位院长如果介意的话，我向你道歉。”事后，白求恩主动找到林金亮，不无诚恳地说。

“白大夫，您不需要道歉，我不仅不介意，还要感谢您的批评呢。”林金亮对白求恩的这种真诚的同志友爱很感动。

白求恩和战地流动医疗队经常行进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运输医疗器械的大车由于山路颠簸行动缓慢，经常碰碎药瓶。为此，白求恩十分着急。他忽然看见一个老乡赶着一头小毛驴从身边过去，望着毛驴背上的“粪驮子”，他高兴地叫起来“嗯，有办法了！”回村后，白求恩借鉴粪驮子，设计了一个桥式药箱，为了纪念芦沟桥起名“芦沟桥”。这种药驮子用木板做成，两边各有三个抽屉，能装一个手术室和一个换药室的全部必需品，很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

“芦沟桥”药驮子的试验成功，给林金亮很大的启发。在林金亮的带动下，后方医院掀起了改造或创造适合游击战的医疗器械的热潮。林金亮自己也改进了两件。一种是盛放凡士林纱布用的铁盒。战地外伤用凡士林纱布较多，伤口局部的面积大小不一，所用的油纱布必须裁剪，遇到寒冷的天气，因裁剪困难而造成浪费。林金亮设计了一种双层的铁盒，分别把三寸、一寸和半寸的凡士林纱布弹在三个大小不同的转轴上，需要时根据伤口的大小选择不同宽度的纱布进行裁剪，方便省时，春夏秋冬，室内室外使用都便利。林金亮还设计了一种消毒器械。他利用民间“笊篱”的原理，用两个提柄的铁丝筐，把器械放到上面，再放锅里进行煮沸消毒。需要哪种器械只需把铁丝筐提出水面，各种器械便呈现在面前任挑选，不烫手不污染，同时还可利用锅中的开水洗器械。在冀中军区第二次卫生会议上，林金亮这两种器械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赏。白求恩左看右看，反复摆弄，连声称赞：“改进得很好，要大力推广，广泛使用。”

1938年冬，日寇对我冀中地区进行残酷的“冬季大扫荡”。由于战斗频繁，伤员很多，又因缺医少药，困难重重。白求恩主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请缨，要求到冀中工作。1939年2月31日，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以白求恩为首组成的一支18人的“东征医疗队”前往冀中。林金亮被白求恩点将，他是这支队伍的主要骨干。

一到冀中军区医院，东征医疗队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三天内检查了200多名伤员，给40多名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常常不畏艰险地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抢救伤员。有次因为离火线太近，情况变化又快，部队转移了，差一点被日寇俘虏。林金亮婉劝白求恩，但白求恩毫无惧色地说：“做军医，就是要到前线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冀中平原上到处流传着令人崇敬的名字——白求恩。“炮火前沿做手术”“慷慨献血救伤员”“封锁线上救亲人”等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断从前线传来。

白求恩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负责。有时正在吃饭，从前线送来了伤员，他马上第一个搁下饭碗，走出房门，亲自察看伤情，并进行手术治疗。做白求恩的助手，林金亮每天都要协助他处理几十个伤员，有时一顿饭常分好几次才能吃完。一次贺龙师长在百忙中来到战时医院看望白求恩，白求恩正在做手术，只说了一句：Excuse me!（对不起）”就又满头大汗地工作。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着林金亮和中国医生。

一二○师某游击区距日寇的据点很近，白天汉奸特务活动猖獗。伤员们被分散在老百姓家中，给他们治伤换药必须在夜间避开敌人耳目秘密进行。师部分析了环境，不让白求恩去，说：

“还是让林金亮大夫带几位同志去吧，回来他向你汇报情况。”

白求恩不依，他说：“我也是八路军，我要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和工作，你们不能把我当客人。”师长对他这犟劲没办法。

林金亮深知这样与他“谈判”，只能徒费口舌，他灵机一动说：

“白大夫，我们是要化装成老百姓走亲戚的，您化装看看。”

白求恩化装来化装去，就是不象中国老百姓，那滑稽样让周围的人笑疼了肚子。林金亮趁机说：

“白大夫，您是外国人，不便于化装，碰上汉奸特务容易暴露目标，这样不仅您危险，我们也危险。”

白求恩觉得有道理，只好同意了。

林金亮率队巡回医疗回来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白求恩就亲自找上门来急切询问情况。听完汇报后，他对林金亮的工作很满意，说：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虽没亲自去，但总算放心了。”

随着战争的不断变化，为适应部队的需要，东征医疗队一分为二。一队由白求恩大夫带队，随冀中军区活动；一队由林金亮带队，继续留在一二○师随师卫生部活动。和白求恩大夫一起，林金亮学到了许多技术，也和他结下了友谊，现在要分开了，他真有点难舍难分。白求恩也动了感情，他在临别之际，把聂荣臻司令员送他的手枪，亲自转赠给林金亮。

分别后，林金亮对白求恩的惦念之情有增无减，一有可能便到冀中军区看他。这种同志间的纯洁友爱很使白

求恩感动，他在战斗和工作的空隙也来探望林金亮。

人们只听说过白求恩大夫为别人做手术，可这位著名的医生在中国也曾被做手术，手术医师就是林金亮。

那是1939年夏，白求恩的脚上长了一个脓肿，当时白求恩正利用战斗的间隙编写他的医疗技术著作《游击战中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忙得很。一时没在意，不久脓肿又红又胀，疼得厉害，上了药也不见好转。林金亮一次来看他时，见他走路一跳一跳，过去一问，白求恩无可奈何地指了指脚上的脓肿。林金亮一看，不禁惊叫起来："白大夫，您怎么拖成这个样子？"

林金亮坚决要白求恩住院治疗，白求恩摇头摆手说："如果病在手上，那我同意你的意见，可却病在脚上，我怎么能叫两只手空着？"

林金亮大胆地采用白求恩新教给他的一种新的麻醉方法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受到了白求恩的赞扬。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启程回国的日子。正当林金亮欢送他上路时，军区送来了紧急命令：日寇以5万兵力配以飞机、大炮、装甲部队向我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军区命令卫生部即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奔赴前线。白求恩毅然要求参加战斗，等胜利结束后再回国。军区批准了他的请求。林金亮和他再次战斗在一起。

战地医疗队在离火线7里的涞源县孙家庄外小庙设立手术站，紧急进行救护工作。战场形势急剧变化，一天700名鬼子突然朝这方向集结过来。司令部命令医疗队立即转移。可此时还有10名重伤员没做手术，白求恩决心做完手术再撤。

从哨兵报告中，敌人离做手术的地点越来越近了。白求恩泰然自若，仍在以最快的速度埋头给伤员做手术。情况万分危急！林金亮急了，忙上前拉着他的胳膊，急切地说：

"白大夫，请您马上离开，我来接替您，您一刻也不能继续在这里了。"

"不，谁也没权力命令我离开！"白求恩用力推开林金亮的手，"林大夫，你只有密切配合，才能最快完成手术！把手术刀给我！把剥离器给我！"

林金亮含着热泪和白求恩一道做完最后一个手术，才在警卫队的掩护下撤走。当日寇的先头部队占领孙家，窜进刚撤走的手术室时，泼洒在地上消毒用的开水还在冒着热气。

就在这场紧急的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不慎被手术刀划破。安全转移后，林金亮见白求恩的手指已经轻度肿胀，劝他休息，等手指好了再工作。白求恩摇摇头说："我很感谢你的关怀，可这么多需要动手术的伤员，我怎么能闲得住？"听到黄土岭战斗打响了，他折[illegible]枝撑着，冒着寒风秋雨抱病和医疗队赶赴前线。在给一位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手术后，重病号身上的无孔不入的细菌给了白求恩致命的感染。但白求恩不顾劝阻，以惊人的毅力挣扎着主持疗伤工作。11月7日，白求恩做完手术后，竟昏倒在林金亮等医务人员的怀里。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白求恩病情后，从延安发来急电，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由于当时特效药被国民党、日寇劫走，白求恩的病情日益恶化。林金亮想尽了一切办法，仍没有奏效。

一天，林金亮在花盆医院检查医疗工作时突然得到白求恩大夫病重的急报，心头一惊，不顾一切立即带着急救药骑马赶去抢救白求恩。推开病房后，只见白求恩面色苍白，两颊和眼窝深陷，身体已衰弱到了极点。

"白大夫，我来迟了！"林金亮趋步来到床头，哽咽着说。

白求恩见到林金亮，非常高兴，伸出那滚烫的右手，紧紧握住他的手，轻声说："林大夫，谢谢你，谢谢同志们，这样冷的天气……"

见此情景，林金亮想到一年多与白求恩生死与共，得到了他无私的关心和培养，这个战争年代摔打滚爬都不怕的硬汉，今天再也抑制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他抽泣说：

"白大夫，我们还是马上赶回花盆医院吧，那里的条件比这里好，何况这里离前线太近……"

"不必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做到的办法都用过了，我们没有特效药。"白求恩摇了摇头，忽又愤怒地说："不！我们的药被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和蒋介石给劫走了！"缓了缓口气，他说，"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完成我的遗书和报告吧。"

林金亮熟知白求恩的脾性，只得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守在他身边。看着白求恩在吃力地写着，林金亮真不敢相信10多天前能使病危的伤员变得生龙活虎的白大夫，现在却生命垂危，他是多么希望白大夫能和大家继续战斗啊！

"我为伤员们感到焦虑，假如我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林大夫，你可以使用我那一套手术器械，我已写信请聂司令员批准了。"听完翻译，林大夫失声哭了。

"这是一封写给聂司令员的信，请你亲自交给聂司令员，告诉他，我很想念他。也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林金亮从白求恩颤巍巍的手中接过信，白求恩就又昏死过去。林金亮与助手们忙紧张地抢救，给他身上注强心剂。

慢慢地，白求恩苏醒了。他再次握住林金亮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林大夫，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黄土岭战斗的伤员……战斗结束后，继续完成四

分区的检查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依然想的是中国人民的事业。林金亮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泪痕满面，告诉白求恩一切都有安排，请他安心休息。

白求恩大口喘着气说："非常感谢你……和同志们给我的帮助……我多么想继续和你们一起工作啊！"停了一会，又望着林金亮说："你还很年轻，今后……一定要……继续更好地……工作。"

白求恩抖动着双手，指了指墙边的手术器械和其它珍爱的物品，满怀期望地嘱咐："这是武器，拿上它去战斗吧！"见林金亮他们非常难过，白求恩安详地微笑着，用最坚定的声音说完他最后一句话："不要难过……你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白求恩逝世后，林金亮接过了白求恩临终前赠送给他的一套医疗器械，又参加了战斗。在解放战争中，他与印度著名的外科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柯棣华一起工作。他始终没有忘记白求恩生前对他的重托，把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作为座右铭发扬光大。他工作上认真负责，技术上精益求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赢得了华北广大军民的衷心爱戴，在晋察冀解放区享有"华北第一刀"的美誉。

建国后，林金亮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中心血库主任。1952年6月我国卫生考察团到苏联考察，林金亮任防疫组组长，回国后，任中央军委121疗养院院长等职。

林金亮把那张与白求恩大夫一起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照片放大成二尺见方，端端正正地挂在厅堂正中，视为传家宝。他常应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邀请，为学员们讲课，颂扬白求恩的光辉事迹。每年总要带儿女们到北京军区烈士陵园白求恩墓前敬献花圈，以寄托他对这位国际友人的哀思。在他病危前，立下遗嘱，要家属"丧事从简，听从组织安排。要学习白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

（钟兆云，《党史纵横》94年3期）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及其作用

1939年11月7日，由于朱德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在华北林县麻田村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很快在华北发展成6个支部。在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的指导下，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反战同盟本部设在重庆，负责人鹿地亘），随后在华北也成立了一些支部。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加反战活动的日本士兵。他们在新四军第五师建立后，紧接着效仿延安和华北各地的做法，按照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列，于1941年11月，在鄂豫边区大悟山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简称"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推选坂谷义次郎任支部长，森田博美任副支部长，盟员计达20余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鼓励他们："你们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你们的工作，代表了日本千百万人民的要求和希望，一定会胜利！"

1944年3月，经长住延安的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日本共产党组织批准，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内部，不公开地建立日本共产主义同盟鄂豫边区支部，吸收了坂谷义次郎、森田博美、森增太郎、星文治、松原秀雄、北村宪夫、西部、山本、平松、田中共10名同志参加。

1944年9月，坂谷义次郎在湖北应城执行任务途中，不幸被捕后壮烈牺牲。森田博美代理支部长职务。是年底，野坂参三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日共产党冈岛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到鄂豫边区主持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工作。到日本投降时，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尚有30余人，其中共产主义同盟盟员10人。

1945年11月，新四军第五师师部为了日本战友的安全，成立了日、朝反战战士参加的国际中队（又称日鲜队）。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经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与国民党军方达成协议，将日鲜队中的绝大部分送往国民党军方，由他们遣送回国，仅留下10位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小组成员跟随领导机关行动，后将其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干部旅，随中原军区一道参加了中原突围。

在中原突围战役中，冈岛、森田博美、松原等数位同志因病掉队后下落不明；森增太郎被国民党俘去于陕西镇安县城监狱饮弹自尽；中野重美和星文治跟随三五九旅转战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盟员来自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森田博美是东京的小学教员，大久保良志是大学肄业的一家株式会社的小职员，星文治是工人，北村宪夫、中野重美是农民。他们又都是日军中的低层士兵，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希望早日结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从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成立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3年多时间里，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为了日本人民和他们自身的解放，在反对侵华战争的共同事业中与新四军第五师的战友们并肩作战、互相协作、密切配合，是瓦解敌军工作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 截听日军的军事电话，为五师提供军事情报。

日军的军事行动经常是靠军用有线电话进行联系。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同志向五师领导建议：如果能事先截听到日军的军事电话，就能及时了解日军的军事动态，防止突然袭击。这个提议很快取得了五师敌工部和情报

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反战同盟的盟员不畏严寒酷暑，坚持深入到日军的交通线，通过日军军用电话线路，截听到不少日军活动的军事情报，使五师部队对日军的"扫荡"和偷袭，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有利的情况下，还进行了反"扫荡"、反袭击，打了不少伏击战，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1942年12月16日，日伪军集中万余人对五师师部驻地大悟山进行大"扫荡"。之前，反战同盟盟员松原、山本与师敌工部派出的敌工人员一道，截听敌军电话，了解到平汉（京广线）铁路、老河口至汉口公路沿线，有日军增兵的现象，就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后来，五师情报部门在侦察中，印证了相同情况，从而使师首长及时作出了反"扫荡"的部署，避免了损失。

五师代政委任质斌十分重视阅看截听敌军电话的记录，赞扬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所起的作用，并反复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保护日本反战同盟同志的安全，不致在深入敌交通线内截听电话时出事。

2. 创办反战报纸，编写对敌宣传品，从政治上瓦解敌军。

从1942年起，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先后创办了《士兵之友》、《新导报》、《反战旗》等多种日文报纸。《士兵之友》是由坂谷义次郎、森田博美、中野重美、岩崎、松原等编辑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的八开期刊。内容有反战小说、诗歌以及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各地方武装在战斗中缴获的一些日军家信。《新导报》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反战报纸，以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名义出版。该报的内容，是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实质，宣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宣传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宗旨和任务。《反战旗》是其机关报。它的任务是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内容多属反战运动的政治言论、诗歌等类的文章。到1945年8月，该报大约印了六七十期，每期千余份。

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利用语言上的优势，熟悉日军内部的情况，所编写的报纸、对敌宣传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打动其军心。日文宣传品形式各色各样，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有短小精悍的宣传标语、传单，有告日本士兵书，还有日本士兵经常携带的护身符形式的小型安全通行证。这些报纸、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在日军内部悄悄扩散，在敌人心灵中开花爆炸，震撼了广大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战斗。

3. 担任日语教学工作，为五师培养了一大批会日语的敌工人员。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五师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直接对日军展开政治攻势的干部学校——对敌工作干部训练班（简称"敌工训练班"）。为了使学员学好日语，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派出森田博美、大久保良志、松原秀雄等人专门负责教授日语。后来在训练班学员学习进入生活口语化阶段，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又增派平松、中野担任训练班的教员。这些日本老师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行军，在学习中随时辅导。日常交往运用口语时，他们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语句和教授尚未掌握的词句，同时还重点帮助个别接受能力差的同学跟上学习进度。他们教学认真负责，孜孜不倦，除白天讲课辅导外，还夜以继日地编写日语教材。在教学内容上，他们费尽心血，逐字逐句、一章一节地进行认真讨论，然后才定稿付印。他们的辛勤劳动，为五师培养了敌工战线上百名能直接对日本士兵宣传我党政策的精兵强将，赢得了中国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在鄂豫边区的出色工作，受到了五师领导高度的赞扬和边区人民群众的信任，1942年3月1日，坂谷义次郎出席了在京山召开的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

日军当局对第五支部恨之入骨，在武汉的日军特务部命令在黄陂县城驻扎的武装特务松山部队专门对付他们，极其卑鄙地写信恐吓、劝降，挑拨离间，甚至连续三次派宪兵特务打入反战同盟第五支部。这些都被觉醒了的日本反战同盟的战友们识破，给予痛击。

（彭剑青，《大江南北》，95年6期）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

1939年7月，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女干部的学校。校址在延安北门外一带的土窑洞里。校长原为王明，后来由李富春担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教育长张琴秋，总务处长吴朝祥。全校一千余人，来自全国各地。学校根据学员文化程度悬殊很大的情况，分别编成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初高中程度的爱国青年。高级班有部分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有从敌占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陕干班，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干部。特别班，多数是经过长征，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

女大的教育完全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到女大作过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还亲自讲授中共党史课。政治课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抗日游击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等等。并特别强调保密及气节教育，教员大多数由马列学院及政治研究室调入。每人队还配备正副两名指导员。高级班的指导员是赵一民、张鼎丞、刘澜波。特别班的指导员叫桑珂，是安徽人。

两年以后，女大与其他学校合并，改编为延安大学，女子大学以向各部队输送了十二个班、一千余名优秀妇女干部的成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摘自《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纪事》一文，作者：罗琳）

怒吼的弦律——《黄河大合唱》诞生记

《黄河大合唱》至今传唱、演奏不衰，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风格的音乐艺术珍品。

这部作品是音乐家冼星海与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合作成功的。两人1936年就相识于上海，曾经合作过《高尔基逝世纪念歌》。抗战爆发后，两人先后参加了救亡演剧队来到武汉，同在政治部共事。后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聘请，1938年冬，冼星海转赴延安。与此同时，光未然则率抗敌演出三队在武汉沦陷后由陕北宜川县壶口东渡黄河，转入晋西南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经黄河时，亲眼见到了这条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伟大风采，加之船夫们的深沉有力的号子，令人惊心动魄，诗人激情满怀，萌生灵感，决意付诸文字。不久，诗人坠马，手臂负伤，转赴延安治疗。此时，已在鲁艺任教的冼星海闻讯，步行20里来到二十里铺和平医院探望旧友。诗人畅谈对黄河的感想，一往情深。冼星海的创作灵感受到激发。当即决定合作完成一部诗歌《黄河》的大型音乐作品。年仅25岁的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口授，别人记录，仅用5天写完全部歌词。1939年3月26日，冼星海开始谱曲，连续6天抱病奋斗，完成不朽之作。5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庆祝会上鲁艺师先首次演唱，冼星海亲自指挥。中华民族的怒吼声，从此，更加强劲地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钟威，《党史纵横》）

日伪最大的鸦片公司宏济善堂

利用鸦片侵略中国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特务机关就驱使日本、朝鲜浪人，以领事裁判权为护符贩运鸦片，毒害我国人民并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利用关东、热河一带出产的烟土，公开推行其毒化政策。"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财政日益困难，为贯彻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和军方遂决定在中国大规模地贩卖鸦片，以贩卖鸦片的巨额收入来维持汉奸政权，支付一部分战争经费。日本占领了内蒙以后，遂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所得收入直解东京，由日本大藏省支配，一部分拨给蒙奸政权德王政府作政费，其余则为大藏省所截留。

1938年，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指使下，维新政府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并在各主要都市设立了分局，公然准许开设烟馆，以便大量倾销鸦片。为了避人耳目，逃避贩卖鸦片的恶名，原田又指使在戒烟总局下开设了日伪最大的鸦片公司——宏济善堂，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负责。里见甫是日本著名浪人，因其久左伪满依附关东军，与原田中将和日军上海特务机关长楠本少将成为莫逆之交，故原田极力怂恿其出面主持宏济善堂。盛文颐字幼鑫，江苏常州人，行三，上海人称盛老三而不呼其名，是清末著名官僚买办盛宣怀之侄。此人在清末民初曾任浙江、湖南等地知州、河南候补道、盐务局总办、津浦铁路局长、三省巡阅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顾民族大义，观颜事敌，竟投靠见甫，因此被日本委为宏济善堂主持人之一。宏济善堂中央行设在上海虹口，在盛文颐的拉拢下，上海郑芳熙等人参预投资，经营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从伊朗等国购运而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伊朗等国鸦片来源断绝，改从东北、内蒙等地采运，交宏济善堂出售。里见甫、盛文颐还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设立地方行负责承销宏济善堂的鸦片，这样苏、浙、皖三省鸦片贩卖遂为宏济善堂独家经营。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使沦陷区烟馆林立、乌烟瘴气，以南京为例，日军占领不到一年，鸦片泛滥成灾，至1938年11月止，吸烟者不下5万人，沉溺于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不能自拔的人尚不在此数。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专营鸦片的土豪行30余家。

维新政府所设立的戒烟总局名义上是宏济善堂的监督机关，实际上除每月照收少数捐税外，一切不能过问。宏济善堂运销鸦片的数量及经营情况从来不呈报戒烟总局，所以其收入戒烟总局也无从稽考。它的业务直接由日本兴亚院负责监督，每年运销鸦片的数量也由兴亚院核定。据汪伪实业部调查：宏济善堂1940年约销鸦片500万两，1941年约销450万两，1942年约销350万两，1943年约销350万两。至于该堂历年盈余除中央行抽取极少数外，全由里见甫、盛文颐及秘书主任兼会计调查科长日本人大西直接解往东京，在华日本机关也不知其详。惟据原临时政府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供称，日方每月从中拨政费20万元，其余的则成为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

汪伪汉奸对宏济善堂的巨额收入早就垂涎三尺，但知道它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不敢公开惹它。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就指使他的党羽门徒到上海各处的土豪行、售吸所"登门拜客"，以种种借口用手枪威逼，迫使各行各所向他们交纳"月规"。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后，陈璧君、林柏生要宏济善堂每月"补贴"4000万元，盛文颐不同意。后减至1000万

元，陈公博亲自找盛谈，盛文颐自恃有日本人撑腰，仍然不买账。因此，陈璧君、林柏生对宏济善堂恨之入骨。

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早已义愤填膺。1943年12月南京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17日，伪中央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揭露日伪贩毒罪行，捣毁了宏济善堂南京分行。次日南京大、中学生3000多人从朱雀路到夫子庙，打烟馆、砸烟具、轰烟客。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乘机捞取政治资本，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此时，日本国内反对派也借此大肆攻击东条英机，有的在国会揭露了日本军方利用海军舰艇把宏济善堂的鸦片大量运往广东、海南岛等地销售，朝野大哗。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日本大本营报导部部长谷获少将公开发表声明："在华日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并说"宏济善堂系中国人盛文颐主持，与日军并无关系"。但这样一来，日本与宏济善堂的微妙关系反而更加引人注目。当时，被人称为"战争之神"的冈村宁次手下的实权派、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达政信大佐对里见甫主持宏济善堂也持反对态度，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军方遂告诫其侨民及士兵"不得再干预烟土问题"，里见甫被迫停止贩卖鸦片的活动。盛文颐见主子态度骤变，不得不于1944年春将宏济善堂解散。

（杨宗仁）

吴佩孚失势以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2月对在华北沦陷时期保持民族气节，不当汉奸的吴佩孚下褒奖令并实行国葬，蒋介石特派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代表他主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与北平市长熊斌陪祭，国民党军政要员，吴佩孚旧日袍泽及各方亲友，不约而来者近万人，由浮厝之拈花寺起灵，沿途观者如堵，为光复后北平最隆重的一次大出殡。

吴佩孚一生刚愎自负，政治上野心极大，当其全盛时代，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幻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真有"天下舍我其谁"之概。迨1924年第二次直奉之战，以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而一蹶不起。不久，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两次把他打得丢盔卸甲，走投无路，往依四川杨森近4年，最后定居北平东城什锦花园胡同。总结他的前半生，这位北洋军阀直系头子，确实是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乏善可述的；但其晚节，不怕日伪的威胁利诱，绝不当汉奸，故盖棺论定，尚有值得称许的地方。

我和吴家后人多年交往，仅就所闻吴佩孚晚年轶事，公诸于读者诸君。

"张勋就要败了，还打什么贺电"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中过秀才，因穷困曾在北京崇文门外摆卦摊给人看相，算卦维持生活，后投奔驻防东北长春的清军第三镇统制曹锟，由士卒而司书、军佐、营长。吴文思敏捷，书法也好，又机智过人。曹锟卖布出身，为人粗犷，不通文墨，故对吴佩孚甚为看重。张勋复辟，曹嘱吴拟稿电贺，吴将稿拟好后，适有至友请吃饭，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将稿丢掉了。曹派人将吴叫去，要他把电稿读给他听，以便发出。吴酒尚未全醒，就含糊地回答曹说："张勋就要败了，还打什么贺电！"不久，张勋被段祺瑞击败，曹锟从此对吴佩孚言无不从。曹锟贿选大总统后，吴遂成为直系的灵魂和主帅。直系军权，均操于吴一人之手。

"我一生无悔字，和拿破仑无难字一样"

第二次直奉战后，吴佩孚由天津乘舰败逃，浮海溯江先到湖北黄州，虽一度回到洛阳，但四面楚歌，难以久留，乃入鸡公山，最后乘决川舰，到岳州寄泊于岳阳楼下，过水上流亡生活一年有余。吴谈笑自若，虽已穷途末路，但还倔强不服输，毫不灰心。对吴夫人说："战斗一旦过去，我就不再怀恨。我一生无悔字，和拿破仑无难字一样。"在岳州船上期间，值吴过生日，各省代表前来祝寿，谋和张作霖合作"讨赤"，成立联军让吴任总司令。但有的旧部见吴已无重兵，虽然声望依在，却难成功，于是持观望的态度。此时，湖北督军肖耀南派专人给吴送来寿屏，上有七律一首，诗句里有"蓬莱此去无多路"一句，引唐诗以挖苦讽刺吴。吴看后，哈哈大笑，即执笔在原句下写"从此肖郎成路人"句，令幕僚电复。吴佩孚的胸襟开朗，非一般失势军阀所能及者。

"中国人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来管"

吴佩孚兵败入川投靠杨森，是因为在1922年夏四川军阀内战中，杨在川东败退鄂西，后由吴支援得再入川。杨森为报当年援救之恩，才迎吴入川的。吴佩孚在白帝城（现四川奉节县）居住期间，韬光养晦，闭门读书、练字自遣，不问时事。日本曾派驻上海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荒城二郎、海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专程前来访吴，转达日本军方意旨，愿意帮助山炮500门、机枪2000挺、步枪10万支，以及弹药被服，并赠银元100万元，支持吴东山再起。

吴说："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我还是失败了。由此可知天下事的成败利钝，决不在于有多少枪和多少钱啊！我们中国人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

管。日本人的好意，我吴佩孚敬谢不敏了。"弄得这两个日本人灰溜溜而去。后来，吴夫人怕吴再遭逢不测，也为躲避一些失意政客想利用吴的威望多次的登门游说纠缠，就迁移到大竹县去住了。

蒋介石要重用他，但为四川军阀所阻

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双方势均力敌，戴传贤等向蒋建议将吴佩孚请到南京去，任以军事参议院院长，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既可表明国民党政府能礼贤和优容，对阎冯作战取胜也会起极大的作用。但四川军阀刘湘命令部下王陵基在万县阻吴出川，未能成行。

寓居北平，陷入迷信的深渊

吴佩孚晚年定居北平时，因思想封建守旧，固步自封，不愿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政治经济，一窍不通。过去想靠着用武力统一中国，这迷梦终于彻底破碎，为了寄托精神上的空虚，先信道教，后来又改信佛教，并且当了悟善社的社长，终日设乩坛，过着念经、写字、作诗的生活。吴佩孚缺乏固定的信仰，因而思想也常变化不定，读了有关吕洞宾的文章，便信起道教来；朋友江朝宗送他一部《金刚经》，于是乎又改信起佛教来。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加入了旁门左道的悟善社，竟迷信起扶乩来。这些都反映了吴佩孚的思想游离，陷进迷信的深渊里。

吴晚年治学驳杂而不纯，和家人幕僚好谈迷信。如常和吴夫人说梦和神鬼的事，对国家政治和世界形势，则毫无认识。而为人始终傲岸自负，去现实太远。段祺瑞于1936年11月，在上海病逝，吴佩孚挽一联云：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山河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吴既伤逝者，又复自叹，倔强之性至死不改。吴的为人本色也在挽段的长联中充分流露出来。此联的上款称呼，吴写的是："慧本教统归真"，下款写为："同门学生吴智玄拜挽"。吴大概是根据反动会道门的乩坛所谓祖师授受的称呼，才这样写的吧！我国解放前的官僚军阀们，在他们下台后晚年失意，都好和神鬼混在一起，吴佩孚虽一生倔强，也不免走到这种歧途上去。

不纳妾，不积金钱，不进租界

吴佩孚蛰居四川时，曾自撰一副很得意的自挽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此自挽联，吴佩孚还是说到做到了的。

吴夫人谈和吴佩孚由川来北平一段过程，生活极为艰苦，来北平骑骆驼，绕道长城外到包头，得知日本已进兵东北了，幕僚说去北平无异入虎穴矣。吴说："如此才不会受人包围也"。车到丰台，张学良亲来迎候，吴见张头一句话，就问东北战况，张即以实告。吴闻后大骂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吴接着又说："你怕抗日，我帮你抗日。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笑话！笑话！"张学良在蒋介石严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放弃东北，代人受过，真是有口难辩，从此不敢见吴佩孚的面。据父执辈周大文（张学良的亲信幕僚，曾任北平市长，"七·七"事变后投敌，解放初，立功自赎，被聘为北京市文史馆员）说，在张学良主持北平军分会期间，每月由他代张亲送吴生活费5000元。

身陷虎穴，仍与重庆政府有书信往还

1938年12月，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奉蒋介石命，派吴佩孚旧部刘泗英潜来沦陷中的北平（刘曾任吴政务处长），在所穿的皮袍中，缝有孔祥熙亲笔信。孔原嘱刘抵天津时，从租界中的中央银行取现款10万元赠吴，因数字太大，刘怕被日伪军警检查发现，未允。刘在北平东城什锦花园吴家，潜住八日，长夜密谈。刘返重庆复命时，吴用白色绸，以墨笔复信，由吴夫人张佩兰用针线密缝在刘泗英所穿皮袍夹缝中。吴佩孚又嘱刘泗英见蒋介石时，代为面陈三事：一、政府自武汉失守迁渝后，必须修明内政，彻底肃清贪污以收人心；二、在外交上必须加强，善于运用，英美两国绝对不能坐视日本把中国灭亡，将来攻东京日都者，必为美军矣；三、日本早晚必败，共产党已在华北发展，蒋公对于共产党应妥谋善后之策。刘泗英向吴辞行，吴又赠一首七绝，请刘转蒋：

飒飒西风里，秋声动地哀。斯民何所恃？端仗大英才。

据吴夫人云：吴佩孚和蒋介石的关系，从1936年春，即有往来。蒋深佩吴之人格，吴亦极佩蒋之才干，后蒋偕夫人宋美龄北巡，曾宴吴于外交大楼，只此一面而已。

刻苦自励，潜心书法与诗词，画竹石以自娱

吴出身清末秀才，垂髫入私塾，除旦夕吟哦外，塾师督责甚严，吴家境贫寒，故能刻苦自励。从军后，复锲而不

舍，自强不息，所以书法和诗词，均颇有造诣。少年积习，晚年未改，于写字作诗之外，又好画竹石。1921年，吴曾出版竹石画集两册。后北京、天津不少商家，常请吴书写店匾，中有四方形"孚威上将军印"图章，下款则题"子玉吴佩孚"，镌"吴佩孚印"图章。吴的书法，兼颜柳之长，颜筋而柳骨，写得殊为潇洒豪放，颇有神态。吴诗做得轻松自然，如他写给杨云史的《赤壁春夜》七绝：

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

又有《寒溪寺偕云史看梅》七绝二首云：

陶公高咏此山中，上有孙权避暑宫。寻个渔樵说闲话，晋朝名士汉英雄。

折得梅花香满衣，溪云山雨送将归。一蓑一笠临皋去，十里春江明翠微。

杨云史是1921年经张謇介绍在吴幕当秘书长的，第二次直奉之战，吴势穷入川，杨始离开吴幕，住在北平。等到吴到北平定居，两人又重聚首。杨在吴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宾主异常相得，如鱼水之欢。杨为江苏常熟人，为江南才子，他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很负时名，和汪荣宝、翁之润、何震彝，有"江南四公子"之称，杨的夫人，又是李鸿章的孙女。吴、杨两人经常诗酒唱和，杨称吴"主公"，备极尊崇。吴在失势后，曾书一联赠杨以表心迹：

杜老歌诗出忠爱；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逝世，传说由于吴不屈从日军的威胁，不投敌当汉奸，得罪了日本特务机关，被日本牙科大夫以拔牙害死。杨云史挽云：

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

大名垂宇宙，长留正气在人间。

此可为吴佩孚一生的总结，也是较公允的评价。

（王振中）

马寅初三难孔祥熙

193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突然宣布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市场物价飞腾如脱缰骏马。当时四大家族及部分政府要员，在降低法币比价的前夕，趁机大量购进美钞、黄金、白银和物资，一夜之间财产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马寅初对此行径十分愤慨。他随即假道门口银行公会，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并特邀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因孔也是中国经济学社会员。马寅初致开幕词说："抗战以来，财政紊乱，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救亡图存，要从安定后方入手。我们经济学社是研究国家财政经济的学术团体，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共商对策，以挽狂澜。因此本届年会，即以这一问题为中心，作为专题讨论。"马致词毕，即请孔祥熙讲话。孔只得上台，敷衍一番，但马寅初不待孔发言完毕就站起来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不设法稳定币制，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更造成财政大混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是何用意？要请部长指教。"马寅初接着又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拚命向市场抢购美钞、黄金，还通过各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大发国难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马寅初更进一步陈词："我们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末的积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法币继续贬值，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到会社员，以马寅初不避权势，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报以极为热烈的掌声，致使孔祥熙在台上面红耳赤，呆若木鸡，无言可答，下不了台。后经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才了此僵局。孔祥熙趁休息时，托言有事，溜之大吉。孔祥熙经此次无情的揭露，从此对马寅初恨之入骨。

（黎渊摘）

流行风

电影《风雪太行山》

《风雪太行山》——贺孟斧编导、杨霁明摄影，描写太行山区矿工与农民联合斗争的故事。农民马老汉（谢添饰）和他儿子小马以及媳妇（欧阳红樱饰），以务农、放牧为生。日寇侵占后，在此地建立了煤矿，小马与许多农民被抓去做矿工，受尽压迫与摧残。马老汉为救儿子出矿，被骗为敌人带路。而小马并没因此被释放，甚至因他反抗敌人暴行而被敌人弄瞎眼睛。现实使马老汉认清了敌人的本质，最后，矿工和农民联合起来，与日寇进行武装斗

争，马老汉也投入战斗。

影片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由屈辱到反抗的普通农民的觉悟；不仅暴露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同时有力地表现了太行山地区工人农民联合战斗的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

影片拍摄外景时，贺孟斧在西安遇见了去延安的冼星海，便请他为影片作曲，于是冼星海为影片谱写了《在太行山上》的歌曲，还以此作为影片音乐的基本旋律，这支歌曲后来成为流行全国的著名抗日歌曲之一。

电影《老百姓万岁》

《老百姓万岁》(原名《大地烽烟》)——1939年沈浮着手编导。剧本是根据《新华日报》一篇通讯报道《井疙瘩村的血》写成的。男主人公是井疙瘩村青年农民(吴雪饰)，热爱劳动，积极抗战，和本村姑娘环儿(金淑艺饰)结婚。这时，日军打来，青年农民参加了抗日军队，环儿则和留下的农民们一起转移山中，利用窑洞、山头与敌人进行顽强战斗。最后，敌人从山后爬过来，环儿及其母亲和全体农民都壮烈牺牲，只留下两个小孩活了下来。青年农民随部队打回家乡，见此惨状，更激起他对敌人的仇恨，带上这两个小孩回到部队，投入新的战斗。

电影《孤岛天堂》

《孤岛天堂》——蔡楚生根据流亡学生赵英才原著故事改编导演的。它描写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同汉奸特务作斗争的故事。青年首领(李清饰)是一个神秘人物，他与东北流亡舞女(黎莉莉饰)同住一楼。他们的活动被舞女得知后，得到了她的同情与帮助。这个爱国组织先后暗杀了好几个汉奸特务，后又得到哑巴小贩(李景波饰)、傻子(兰马饰)、报童等贫民群众的支持。最后在一次盛大舞宴上，他们借舞女的帮助，巧妙地将汉奸特务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而逃，投奔抗日游击队。

影片生动地表现了上海爱国青年和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了汉奸特务卖国求荣的嘴脸。影片体现了蔡楚生一贯的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重视影片的趣味性，但有点过分强调了个人英雄作用和暗杀手段。影片于9月22日上映于香港，连映12天卖座不衰；后在重庆、南洋各地放映，更受观众欢迎，每当剧中人讲"中国是不会亡的"时，观众便自动站起来热烈鼓掌，情绪激昂。

电影《中华儿女》

《中华儿女》——洪伟烈摄影。影片通过四个小故事，表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是如何走向抗战的。影片开始以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南昌、宁夏、桂林、昆明等地风景名胜为序幕，以唤起观众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接着展开四个小故事：第一个是《一个农民的觉醒》，写南京郊区农民刘二哥(赵丹饰)逃难回来，看到妻子被鬼子蹂躏而死，母亲也奄奄一息，激起他对敌人的无比愤恨，最后为给亲人报仇而参加游击队。第二个是《一个老公务员之死》，写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顾而已饰)，在当地陷落后，拒不为敌人组织"维持会"，并以毒酒宴请日军司令及其随从，最后同归于尽。第三个是《抗战中的恋爱》，写由上海撤往内地的三个青年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其中着力写了一位"中间人物"，(施超饰)由于敌机轰炸，爱人死亡，使他觉醒，投入抗战。第四个是《游击女战士》，写一个刚入伍的女战士(白杨饰)扮演村姑将哨兵引开，使游击队顺利通过封锁线，完成破坏敌人重要交通线的任务。

电影《孤城喋血》

《孤城喋血》(徐苏灵编导，王雨生摄影)，它取材于"八一一三"抗战姚子青营爱国官兵死守宝山城、壮烈牺牲的事迹，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和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

电影《华北是我们的》

《华北是我们的》(6本)——陈晨摄影，瞿白音剪辑并写解说词，影片大部分镜头是纪录当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东南地区从1938年冬至1939年春的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影片共分五部分：(一)表现当时西北战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景；(二)介绍华北抗战的形势，以晋东南军民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寇的情形，说明华北广大地区仍在中国人民手里；(三)表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纪录了晋东南的中心长治市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四)表现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与群众组织的活动等，(五)反映根据地军民抗战，特别是纪录了八路军129师，在群众支持配合下，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的情景。此片是国统区纪录片出品中唯一一部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影片，让观众从银幕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民战争。影片曾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上映，给大后方群众以极大鼓舞，并受到进步舆论的赞赏。重庆《新华日报》评论说，影片"将在抗战文化史的

电影部门中写下最光荣的一页”。

电影《木兰从军》

《木兰从军》——1939年2月上映，“华成”出品。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陈云裳、梅熹主演。剧本是作者在香港根据古诗《木兰辞》和明清两代笔记中有关花木兰传说改编的，它描写的是人们熟知的花木兰代父从军，抵抗外侮的故事。影片注意将历史故事与抗战现实相联系，增添了某些虚构情节，赋予人物以新的生命。它不仅以木兰为保卫边关挺身而出的爱国行动和“扫灭狼烟”的抗敌气概，给处于民族危机的中国人民以正面启示，而且在剧中一些细节和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讽喻。如在木兰周围安插的几个反面人物，讽刺了当时的卖国贼、两面派和动摇分子。木兰升为元帅后制订了“不许贪赃枉法，不许欺侮百姓，不许临阵逃脱，不许营私舞弊”等法规，也是对时政的针砭。最后，木兰与本村儿童同唱儿歌“太阳一出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它，强盗贼来都不怕，一齐送他们回老家”也寓意深长。

《木兰从军》是在“孤岛”环境下巧妙地以历史题材教育民众抗日爱国的第一部优秀古装片。上映后受到观众和评论界热烈欢迎。它在新光大戏院连映85天，创电影史上空前纪录。阿英撰文称赞该片“是抗战以来上海最好的影片”，它使古老的民间传说生发新意，配合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及其需要”，为“孤岛”进步电影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输送了新的血液”。

诗《高粱长起来吧》

夏天来了
战士们好象这样低唱着
高粱长起来吧，
高粱长起来吧！
我们要去铁路东，
那大平原上逛一逛呀！
大平原，
一眼望不到边的
绿汪汪的海啊！
我们到那里去随便地逛逛，
背起我的小马枪，
把手榴弹别在腰里。
顺便到保定城也去逛逛吧！
好久不见的城，
好久不见的街道，
好久不见的生意呀！
跟好久不见的老乡
见一见面，我敢说
那儿的老头儿、小兄弟、姑娘们，
在合着嘴巴想我们哩！
呵呵，山哪，
不管你多少野花
都留不住我，
放过夏天
就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年成呵！
高粱长起来吧……

（魏巍）

小说《骆驼祥子》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

以二十年代旧军阀统治下的北平为背景，描写人力车夫祥子在黑暗社会的摧残下，逐渐丧失生活理想最后被迫走向堕落的悲剧。贫苦农民出身的祥子在封建势力压迫下失去了土地，便跑到北平靠当人力车夫谋生。为了不受别人盘剥，苦干三年，积得一百块钱，买了一辆新车。不久，他被军阀抓去当伕，车被乱兵抢走，但他并不灰心，继续拉车攒钱，准备再买车子。结果，辛勤挣得的一些钱被反动侦探敲诈干净。后来，用妻子虎妞私房钱买了一辆旧车，不久因虎妞难产而死，被迫卖掉。为买车，祥子三起三落，心灵和肉体遭到严重摧残，而他所喜爱的小福子因不堪非人的生活而自杀。从此祥子心灰意懒，消极颓丧，慢慢染上各种恶习，终于走上堕落的道路，到处骗钱，醉生梦死，成了一个自私的无赖，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作品着力描写各种恶势力对祥子的残害：兵匪的肆意掳掠，特务的敲诈勒索，厂主刘四的剥削，杨家老爷太太的欺压；以至自私贪婪的虎妞给他带来心身的磨难。小说揭示了祥子的悲剧来自整个旧社会，从而控诉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宣告了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全书以祥子的希望、奋斗和毁灭为主线，把不同阶级、阶层的生活面貌和各类人物的活动组成一幅复杂丰富的社会图景；除塑造典型人物祥子外，其他人物如虎妞的泼辣，小福子的温顺，刘四的狠毒，二强子的刁懒等都写得神态逼真。语言单纯明快，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小说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色彩，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名作。

小说《新生代》

作者齐同，主要内容：

以“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刻画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各类知识分子的形象。主人公陈学海最初是一个不问政治，埋头读书，一心想出国留学的T大化学系学生，后在学生自治会干事魏玲、刘时等人的影响下，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参加了“一二·九”游行和反对“新边政委会”的“一二·一六”示威，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广大爱国青年一道，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众多的知识分子中，有热情、勇敢的女青年魏玲，有“越斗争越有力量”的坚强的革命者刘时，有由高谈辩证法而沦为叛徒的郭用，有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授杨立君等等。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反映了在动荡年代里各类知识分子的分化。写人物思想性格各具风貌，写示威游行的场景声色壮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主人公陈学海的思想转变亦有典型意义，是抗战前期描写学生运动的名篇之一，作品发表后曾受到读者的好评。

小说《大地的海》

作者端木蕻良，主要内容：

以关东平原为背景，写农民进行护田反筑路的斗争故事。日寇为防范义勇军破坏铁路，强迫农民毁掉青苗，铲去庄稼修筑公路，引起农民极大愤懑。共产党员王丁和朝鲜革命者金德水向农民灌输革命意识，启发阶级觉悟，动员农民起来与日伪作斗争。终于，愤怒的农民群众犹似大海的怒涛，纷纷拿起武器，截击警车，释放囚犯，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激战，取得了胜利。作品歌颂了广大农民在民族斗争中的反抗精神。艾老爹父子通过这场斗争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民族爱国意识的觉醒。主题富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故事性强，但其中穿插虎头兄弟与杏子的恋爱情节，与主题相游离。

歌曲《祖国已受创伤》

祖国已受创伤，怎能离它身旁？
我们应该鞠躬尽瘁，
使它早复健康。
我们是未来栋梁，
肩头有多少重量，
将怎样努力建设，
造成辉煌的殿堂！
努力建设，教育为尚，
文化普及，政治明朗！
牺牲一切享受，
为国扫除文盲，
我们该害己为群，
共建祖国永昌！

歌曲《中华儿女》

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是黄帝子孙；
日寇的暴行只增加我们的仇恨，
敌人的炮火毁不了我们的决心，
轰炸、屠杀、掳掠、奸淫，
后方、前线同样牺牲，
倒不如拿起枪杆，去和那鬼子把命拼！
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是黄帝子孙，
日寇的暴行只增加我们的仇恨，
敌人的炮火毁不了我们的决心，
尖兵、义战、义战、尖兵，
尖兵必胜，义战必成，
大家是背城借一，从死里求生！

历史档案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暨五中全会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重庆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大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致民族革命之敬礼。盖自一年半以来，由于坚持抗战国策与全国英勇奋斗，已使日寇之进攻大受打击，国际之同情日益增长，中国之胜利奠定始基，牺牲虽大，效果已彰，循此奋进，定能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日寇乃于军事进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国内部之阴谋。吾人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实行新的战时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党务、民运、文化诸政策，以便增加力量，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救国之道，端在于此。伏读蒋委员长十月三十日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驳斥近卫演说，名言至论，举国同钦。乃汪逆精卫自绝国人，逃奔就敌，高张亲日反共之旗，实行背党叛国之计，贵党中央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职务，辞严义正，千古不磨。适于此时，贵党五中全会开会于重庆，同人深信，必须总结过去之经验，昭示今后之方针，严整抗战阵容，密切军民联系，刷新政治，发皇民运，以慰全国国民如饥如渴之望，以固国共两党之长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团结则为一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利器。同心断金之义，同舟风雨之思，知诸先生必有同情也。肃电致贺，敬颂勋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叩敬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执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敌，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

民族解放战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显明的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的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

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贰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伏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播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音，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雠，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为恐不力，去之为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诬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磨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盖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那末，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人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的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的特点，可能的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

今日而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食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吗？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他白白的流去吗？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言蜜语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吗？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吗？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要：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

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

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对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

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选自《汪兆铭开除党籍之经过》)

中央执行委员会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之决议案

1939年1月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民国一案，经决议：汪兆铭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决议案全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二十九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悖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载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之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即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民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我国家民族万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诚团结，将士则涌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图我之野心益彰，技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能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行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为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党规，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唯在意志统一，精神不二，我民族往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我民族之责，择其致败之原，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法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祛除携二，不足以战胜强寇，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裂覆亡，本党深知我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廿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词，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旨，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摈弃，以保持战时意志之严整，而完成我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

汪精卫重要声明

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

余读本月五日路透社电所传余与日本首相缔结五项条款，不独不引为骇异，且目为重庆方面应有之宣传。路透社消息之来源，乃根据重庆《大公报》所登载，而《大公报》久为政府中个人之机关，失却报纸应有之职责，此又为中外所深悉者也。余对于此种毫无根据之谣传，本不屑置辩，但为正中外之观听关系，用特郑重举余主张，以告国人。

余去年之离重庆而发艳电主和，已预料重庆方面之宣传，将必目余为汉奸，为卖国。甚且有个人或团体不断加以有组织有计划之谋害。第今日不得不和已为全国爱护中华民国者共同心理。各人皆有和平之心，而皆不敢出之于口者，盖恐遭不测之谋害，而又苦无一自由行使职权之民意机关以公开讨论之也。余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不忍灭亡于无识者之手中，故毅然排万难冒万险以主张之。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则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决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此应为国人声明者。

此次中日战争，两方均蒙历史上未有之牺牲。而尤惨痛者，则为吾国得不到政府保障之人民。其丧失生命财产于战地者无论矣，即能悉索以避难者，由沿海流亡而至武汉，更由武汉流亡而至滇黔，将来战事再复延长，必将沦为饿莩，转乎沟壑。此种牺牲惨痛之责，两方当国者，皆不能辞。在日本之估计，以为中国可不战而屈，甚或一战而使中国沦亡。在中国之估计，以为日本之经济可以旦夕崩溃，甚或因战事而起革命。今战争将已两年，双方皆知中国之最后胜利不可期，而日本欲达其吞并目的亦不可得。两方皆知之，且洞知之，而犹以两国之人民为牺牲，匪特不智，抑且大悖人道。长此相持，东亚之文明可以全毁，而中日两国人民将必相与枕籍，而两皆沦胥。余确信战则两伤，和则共存。艳电之主张，盖本诸良心之所驱，而为全国人民之所共信。此应为国人声明者二。

芦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本充满和平之机，屡次可以和而终不能和者，两方皆缺诚意及责任心也。在日本当局岂不能以中枢之力，抑制驻华军人无厌之求？其所以不为者，无诚意及责任心也。在中国当局岂不能体察国力，提出正当对案之主张，其所以不为者，无诚意及责任心也。而尤痛心者，自西安事变，更闭和平之门，是谁之咎？则主持事变者，与屈服对于事变者，皆当尸其全责。余之

反共,中外所知,余决不恤膺反共之名,而谋中日和平之实现。尤望日本当局,深察事实,推诚磋商,必使中国为一领土主权完整之国家,始得对于世界与东亚之和平,有良好之贡献。此应为国人声明者三。

余更声明者,余既发艳电,则此后一切行动,当根据艳电,而贯彻和平主张。余决不愿中国再以战事失败,而再失地,而重苦人民;余更反对日本再以战事胜利,而变其觉悟,改其条件。至于近日之各地军事紧张,余尤引为痛心。犹忆重庆军事当局,曾指出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将必进取西安与南宁;知之而故意指谓余与日本当局缔结条款之结果,岂御侮无方,预料失败,而希图卸其责任耶?余更不屑辟之矣!

(二十八年四月九日)

(选自《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实施宪政应有的确切认识

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讲

关于政治方面的设施,政府各院部已均有详细报告,我所要说的,乃是大家所关切的宪政问题。我认为这次本会有两个很大的收获:第一,我们通过了川康建设方案;第二,我们决议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议案。

关于提早颁行宪法,使国家得有永久性的根本大法,使建国的规模完全确立,使国民努力于国家之事,在义务上、权利上,更有灼然共循的准则,这不仅是全国贤智一致所期望,也是中央这十年来所不断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就中正个人来说,自从民国二十年举行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以后,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使宪法早日实行,使全国国民共同担负国家的责任;我时时感觉到总理未完的志业,革命最后的目标,要由我们急起直追来完成。我急切盼望宪法早日制定颁布的意志,不待我自己说明,也一定是在座同人和全国同胞所深深了解的。现在我们在抗战中间努力建国,为要提高我们国民责任的自觉,为要奠立我们国家前途久远稳固的基础,昨天通过的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案,一定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占很重要的一页。我和各位同人以风雨同舟的关系,不但是患难与共,而且是休戚相同,感于各位讨论的热烈,和披诚相见的真挚,今天要向各位贡献几点坦直的意见。

一、关于宪政和训政的关系,昨天在议场上已讨论得很详尽,各位在共同建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的共信下,开诚商榷,言无不尽,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促成宪政和实施训政,不但不相妨害,而且是相需相成。我以为训政工作,不仅在训政时期要积极进行,而宪政也不一定要训政完全结束之日才开始;这是从总理遗教的精神中间,大家都能体会得出来的。换言之,早日实施宪政,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并不违反本党的政策,同时也唯有真正努力于训练人民的工作,才足以确实奠立我们宪治的基础。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求实施宪政,一方面要在宪法颁布以后,继续进行训政未完的工作。

二、所谓训政具体工作,当然是实施地方自治,训练人民行使职权。但是训政的意义,却是要训练人民,使具备足以担当国家政治的资格,而这个任务,在中国经济、文化百事落后的情形下,尤其是承几千年专制腐败政治之后,是件艰难巨大,而不是旦夕所能完成的工作。我以为宪法尽管及早颁布,但大家不能忽视总理设定训政时期的一番苦心精意,一定要全国贤智之士,尤其是领导人民的分子,一致热心积极,有公心诚意,来共负训政的重任。将来虽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训政的工作;我认为训政并非一定要中国国民党来担当,而是热心国事的人士,共同应有的义务;我认为训政的意义,不仅是政府训练人民,还得要人民训练自己,并且由各级民意机关,来监督政府和训练政府。各级民意机关设立以后,他的地位一方面是代表人民,表达民意;一方面是监督政府,亦即是训练政府。政府和民意机关,并不是对立的,总理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在民意机关的分子,今天在议会,明天可以在政府担当工作;而且尤其在地方基层,每一个人民代表,同时在民意机关,同时要实际参加地方公共事业。所以互信互尊的态度,应当培养,休戚共同的关系,应当认定,提携共进的习惯,应当养成。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本会同人应该率先为全国国民的领导,我们要认定自身地位的重要,尊重自身的职权。我们在抗战建国之中,一切的言论,不能违反我们所共矢遵循的三民主义,不能违反我们自身所议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否则我们的一言一动,在国民面前,就没有信用,没有功效。再则,我们大家一定不愿蹈过去议会的旧习,因之对于政府施政成绩的批评,务必出以积极而善意的态度,要根据法律或事实,不可根据谣言和恶意中伤的传说,随便提出讥弹。现在我们已决议要定期颁布宪法了,今天的参政会,就是为将来宪治建立健全的基础,为来日的议会立良好的模范,同时更要为今天一般国民作楷模,我们要自觉我们是负有师保人民,和培育宪治的责任。

三、宪政实施的功效,不在于宪法的条文和形式,而在于具备宪治的精神。我们中国在古代时候,早已具有人民议政、参政的宪治规模;民国以来,更有约法宪法的颁布,和参众两院的设置。但是究竟这个宪法,这个议会,于中国国家和人民福利有多少贡献呢?可以说,对于国家、人民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今天在座的同人中,也有参加

过从前的国会的，也有为主义和宪法奋斗而被捕入狱，不惜牺牲一切的，各位对于既往的议会历史，一定有很多的感慨。为什么我们一样的有宪法，有议会，而不能有益于国呢？为什么我们国事一步步的腐败凌乱、到了今天要受敌国如此的侵凌侮辱呢？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以中国国民党的地位而言，我对于国事和外患，当然要自承应负的责任；在北洋政府时代，我也并不是说袁、徐、曹、段政府没有过错，但我们当时的议会，实在不能不负很大的责任。

我以为民国以来，我们宪法和议会，都是没有根基的，宪法是虚伪而不合国家的需要的，国会是不明湜自身对于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的，议员本身是不能尊重人民，代表应有的职分和道德、义务的。总理致力国民革命，手订建国大纲，所以要规定训政，就因为根据这种种事实教训，认为要产生健全的宪政，造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非经过训政的阶段不可。现在我们内省国势，外察环境，既要提早实施宪政，就必须从根本症结所在加以救治。我以为过去我们议会最大的毛病，就是忘却了我们中国立国的固有精神。我们的固有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礼、义、廉、耻”这四个字；拿现代语来解说，礼就是秩序，义就是责任，廉就是尊重他人，耻就是尊重自己。这又和我们古语所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三句话的意义相通的。我们过去当做人民代表的议员，因为忽略了这个意义，不知道守法负责，尊重他人，尊重自己，那就无怪要凭藉地位，贻误国事，结果污渎了宪法的尊严，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了。我们今天要认定我们实施宪治，是要为国家立百年之久远的规模，问题不在宪治是不是实行得太早，而要问我们有没有为国家产生真正宪政的诚意？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诚意的话，我们尽不妨在训政没有完成以前，来颁行宪法，而同时仍可以贯彻训政的精神，一方面训练人民，提高他们对于国民责任和国家政治的认识；一方面训练政府，来提高各级政治的效率。我在上次大会曾经对各位说：“我们参政员要以伊尹训太甲、周公训成王的精神，来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但以这种精神训导人民，也要以这种精神来辅助政府。所谓训政的训，本来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意义的，训政的训字，并不是训斥而是训迪。要像学校的导师循循不倦，设身处地来训诲学生，导之向上；并不像傲慢的主人，盛气呵斥来教训奴仆，使之难堪。所以不论是监督也好，批评也好，总是好意的辅导，而不是消极的责备。我们拿伊尹训太甲、周公训成王，诸葛武侯辅后主的先例来说，他们自身都先有一番公忠负责的精神，必庄必敬的态度；又如历代大臣正色立朝，尽管是蹇蹇谔谔，不肯苟且迎合，但必正其衣寇，肃其仪容，端谨庄重，若临大事。这就是现代所谓负责守纪的精神，也就是许多民治国家，自尊人格和尊重他人人格的良好习惯。我们中国因为政教陵夷，这种民族固有精神，固然丧失殆尽，现代宪政的习惯，也一无基础，一般国民和青年习于轻浮，百事随便；我不能希望个个国民都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振衰起敝，但我实在恳切希望我们参政会同人，从这些意义上躬行实践，为国民树立良好的模范，也就是为国家培养实行真正宪政的基础。

最后更有一点，不惮反复为我同人申说的。我个人因为切望我们革命建国事业的早日完成，切望我们国家早日实施宪政，具备现代国家的规模，确立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础，我常常深思熟考于我们国事所以凌乱不整，永久不能扶入轨道之故。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政治教化的演变，秦汉以前和秦汉以后，真是大大的不同。在周朝时候，我们有完美的议政制度，有严密的行政组织和军政组织，甚至实行井田制，民生主义有具体而微的实现，社会、经济没有垄断压迫，不均不平的现象，一切政治、社会都是有条有理，为什么后来一天天的陵替败坏，以至于今日纷乱衰敝，国弱民困的现象，要遭受如此严重的外患？我一再深思其故，认为这不独是秦汉以后失政失教，少数君相、豪绅盗窃威权，把人民权利剥削殆尽之所致，而实在由于周代以前，我们是以礼治为法治的纲维，以社会组织为政治组织的基础；那时节一切都有组织，有训练，无论学校、军队、社会、家庭，最重要的是重礼义，守秩序，所有的国民，都不能规避责任和义务，不仅是法律的，而同时是道德的；唯其如此，所以周代政治能够这样的昌明。我们以后要革命建国，必须把握这个要点。我们要知道，无论宪法和其他法律订得怎样完备，如果没有行法、守法，积极为国家担当责任的人民，这些根本大法，就成为一纸空文，丝毫无补于国事。我们不怕抗战不胜，建国不成，只怕不能恢复我们民族重礼守法的固有精神，那才是我们国家前途真正的危险。各位同人决不可以我这些话为空疏迂远之谈，实在这是我们民族兴替存亡的关键所在。希望各位同人以身作则，领导国民，发扬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样我们就必能获得宪政的实效，就必能造成更巩固的团结，更坚实的力量，就必能负起我们艰巨的责任，达成我们神圣的使命。

（选自《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编印）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以汪精卫"艳电""对国是妄作主张，危害党国"，决议永远开除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同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临时常会亦通过上述决议

1月21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到中央执监委一百五十五人。蒋介石致开幕词后，接开预备会，推举王法勤、丁惟汾、居正、于右任、冯玉祥、戴季陶、邹鲁、孙科、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十一人为主席团，朱家骅为秘书长，甘乃光为副秘书长。

1月23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秘密报告，指出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就是党魄、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宣称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若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会遭受危险。

1月28日　重庆、上海、成都、昆明、贵阳、宜昌、长沙、南昌、韶关、桂林、西安、兰州等地分别集会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

1月29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整顿党务要点，提出在最近半年中必须"增加有组织有训练的党员，至少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

2月13日　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孔祥熙政治报告、何应钦军事报告及王宠惠外交报告。

2月21日　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闭幕。此次参政会共举行大会九次，通过确立民主法治制度案等提案九十余件。蒋介石致闭幕词，许诺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实行彻底民主政治，但又强调"断不能忽略程序与步骤"，在抗战未结束以前，"要以军政时期的工作为主，一面积极进行训政工作"。

3月11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补充修正的《国民公约》十二条及《国民公约》誓词。

3月12日　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为"建军建国、克敌制胜之基本"，"务当表里贯彻，切勿视同寻常"。

4月11日　甘肃省海(原)固(原)地区回民暴动，几天内暴动群众增加到七、八千人。

5月1日　美国五十万工人在华盛顿集会庆祝国际劳动节。中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代表朱学范在会上讲话，指出：日本现在屠杀中国人的武器百分之五十四都是美国供给的，希望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供给日本武器并抵制日货。

5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通报天津民先队活动情况，要求各省、市党部及教育部参照《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对策。

5月20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制订《推进陕甘边境党务办法大纲》十一条，决定对于陕甘边境党务实行长期分区督导制，采秘密方式活动。

6月8日　国民政府明令严缉汪精卫。令称汪通敌祸国，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7月7日　蒋介石为抗战两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日本民众书》、《告友邦人士书》、《致慰抗战阵亡家属电》及《对战地民众之广播讲演》等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

7月9日　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十三周年纪念，蒋介石主席，吴稚晖报告"总理三十年完成国民革命之意义"。

7月24日　蒋介石在重庆国府纪念周讲话称，抗战国策决不受东京谈判影响，并说：现在外国舆论说敌人希望造成"远东慕尼黑"，这是新闻界揣测敌人心理的说法，事实上决不致有远东慕尼黑发生，国民不要为汉奸播惑而有所顾虑。

7月29日　国民党中央为了解党员"最近从业情形"，通告举行全国党员总调查。

8月3日　四川自贡市政府强拉壮丁，枪杀工人一名、刺伤数名，激起盐业工人大罢工，参加者达两万人。罢工工人齐集市府请愿，并包围国民党自贡市党部。当局被迫答应工人要求，同意惩办凶手，抚恤死亡工人家属。

8月11日　蒋介石发表《再告各界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要求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实行精神总动员，实践国民公约，协助地方整理财政，剔除各种积弊，帮助政府实行"管、教、养、卫"。

8月14日　汪精卫由广州返上海。汪在广州期间曾和日华南派遣军代表秘密达成在广州建立伪政权协定，规定在汪筹建伪中央政权同时，派代表立即筹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伪政权，对国民党实力派进行诱降，使其与日实行、局部停战"，迫使蒋介石下野。

8月31日　三青团组织机构变动。中央干事委员会

由陈诚任书记长，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朱家骅任常务监察。下设六处一室：总务处长庄明远，组织处长康泽，宣传处长叶溯中，训练处长王东原，经济处长何廉，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书记长办公室主任柳克述。

9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凡参加汪伪代表大会各人，有党籍者开除党籍；褚民谊、何世桢附逆降敌，应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通缉法办。

9月10日　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继续举行。是日至18日共开会议九次。第一至四次会议由驻会委员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及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主管官员分别报告半年来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交通、外交、内政、教育概况并进行讨论。第五至九次会议集中讨论各项提案。

10月10日　国民政府发表双十宣言，重申主权完整不容破坏，"倘有汉奸集团，傀儡组织，僭窃名义，擅发文告，或竟与任何国家订立文件，任何时期概不承认"。

10月15日　桂林《国民公论》、《中学生》、《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具呈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取消所谓《抗战时期名词正误表》。

10月16日　蒋介石出席成都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宣布治川要旨十条，以清剿盗匪、禁绝烟毒、筹备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而以改革社会、转移风气、变化气质、振作人心、提高公共道德，奠定复兴基础为急务。

10月21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同时废止1937年8月24日公布之《战时军律施行条例》。新律规定，除通敌叛国、临阵退却等罪处死刑外，对于"主谋要挟或指示不利于军事上之叛乱行为者"，"意图妨害抗战扰乱后方者"，"意图妨害抗战而造谣惑众摇动军心者"，均处死刑。

12月9日　国民政府令发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决议案，通饬所属"查照办理"。

12月30日　汪精卫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上海签字。该要纲包括《调整日支新关系之原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等附件。

外　交

2月13日　英、法驻日大使克莱琪、安利各奉本国政府令，就日军侵占海南岛后英、法在华利益问题向日外务省提出交涉。

3月7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驳斥日本"东亚新秩序"，指出"东亚新秩序"实是破坏中国的独立完整、打破太平洋区域的安宁秩序和扫除欧美在远东利益的代名词。

6月16日　中国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孙科与苏联特派全权代表米高扬在莫斯科签署《中苏通商条约》。

7月6日　驻国联常驻代表胡世泽将日军1月至5月在华滥施轰炸情况照会国联行政院与各会员国。

7月15日　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与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就天津英租界汉奸程锡庚被刺案在东京开始谈判。

7月21日　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联第二十届大会代表。

7月25日　外交部就英日会谈发表声明称："中国当局对英国政府在此东京会谈所采取之态度，不能不引为失望。"

8月23日　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访华抵重庆。重庆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吴稚晖致欢迎词。

8月31日　驻英大使郭泰祺照会英外交部，要求在两方继续谈判前不得以程锡庚案四华人送交日方。

9月28日　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国合众社远东部总经理毛勒士发表谈话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只要合乎"光荣和平的条件，中国无不乐于接受，尤其希望爱好和平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此后不久，张群、魏道明等政府官员纷纷赴香港作"和平试探"。

10月9日　苏联政府决定关闭驻北平、天津、上海领事馆，驻上海领事馆事务委托挪威驻上海领事馆代办。

12月20日　驻美大使胡适访罗斯福，告以中国目前情形并不如想象之窘迫日军侵略华南致南宁与法属越南边境公路交通中断一事，并不如何严重。胡并与罗斯福再度商谈向美借款事。

军　事

1月1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桂林发表《元旦告军民书》，指出：日寇是我们的死对头，只有实行持久战消耗他的元气，锻炼我们自己，将来才能一击而置之死地。要由军事抗战到政治抗战，由军队动员到全民动员，以最大努力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运用民众。

1月3日　日军陷山西乡宁、吉县，分三路续向西进犯。

1月4日　豫北日伪军两万余以日军十四师团为主力，集中获嘉、修武、博爱、沁阳一带，图威胁郑州、巩县、洛阳等地。

1月5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兵役法》施行以来，应征服役者多为农村青年，党政机关人员子弟尚少参加，为振奋人心，增厚抗战力量，特命令各级党政机关长官以身作则，率先送子弟参加兵役，踊跃从戎。

1月7日　日军第十师团主力及一一〇师团、十四

师团、二十七师团、一二四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向冀南地区大规模扫荡。是日，由邢台出犯之敌，侵占平乡县城。

1月10日　空军轰炸广东虎门，毁日军高射炮阵地及停泊珠江口日舰两艘。

1月11日　军事委员会令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正规部队归第二战区建制；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

1月15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重庆招待记者谈第二期抗战战略，指出今后战事用正规军固守要点，巩固国家政权根据地；在敌人后方以游击战为主，着重摧毁伪组织，肃清汉奸，以及动摇伪军为其任务。

1月19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要求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尽力协助推行兵役，开发地方资源。

2月1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工会议开幕。到各行营、各战区及中央军校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及有关人员六十余人，讨论执行五中全会及南岳军事会议政训工作决议。

2月7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常委为五院院长、外长、正副参谋总长及中常委三人共十一人，秘书长张群。另决定除推定之常委外，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亦得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

3月1日　顾祝同电蒋介石报告江南游击战区作战计划：以摧毁敌在沪杭一带根据地为目的，计划以第十集团军一师一旅配合沪杭挺进队向沪杭地区挺进；以第三十二集团军两师配合京沪挺进队，向京沪地区挺进；苏浙省府及党部派员随军行动，恢复游击区政权。计划定30日前准备完毕，4月1日夜开始行动；江岸游动炮兵同时破坏由安徽铜陵至江西湖口间日舰运输。

3月4日　驻国联常任代表胡世泽照会国联秘书处，再度抗议日空军狂炸罪行，照会称：中国军队曾在洛阳击落日机中搜出着该机向人烟稠密之非军事区投弹轰炸的训令一件。

3月5日　日军十六、十九师团等部猛犯湖北钟祥，一路沿京钟公路进犯，一路由东桥镇南犯，一路由白口北犯。是日晨，迫近钟祥城关附近。张自忠部黄维纲第三十八师、冯治安部王长海第一三二师等部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至次日撤出钟祥。

3月23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军队党务整理办法》十九条，确定陆军党部工作的指导考核由中央组织部掌理；陆军训练宣传工作的指导考核由军委政治部掌理；军队党部委员名额及人选由组织部商同政治部呈请总裁决定。

3月27日　南昌失陷。赣江西岸日军一〇一师团主力由炮兵掩护并施放毒气，分由牛行及生米街附近渡江，直攻南昌。日机竟日轰炸，市区重要建筑及沿河屋宇悉毁。

4月3日　第五战区张自忠部渡襄河分三路围攻钟祥；5日在城西与日军激战四小时，毙伤敌三百余。

4月7日　第五十八军刘正富部新十师反攻高安，经两昼夜激战，一度夺回西城。后因应援部队第四十七军未及时赶到，在日军增援部队逆袭下退回原阵地。

4月8日　日机二十五架袭昆明。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二架。

4月17日　蒋介石制定南昌失守后攻略计划，致电白崇禧、陈诚、薛岳、顾祝同密令"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时机预定4月24日。"

4月22日　南昌反攻战开始。第三战区上官云相部第三十二集团军完成反攻南昌准备工作。同日，第九战区高荫槐部第一集团军以主力向江西奉新、靖安之敌开始攻击，另一支队向靖安北滩溪市挺进。

4月25日　第一战区第五集团军第十二师与日伪军在豫东鹿邑、太康、淮阳等地展开激战，十二师一部于下午2时攻克淮阳县属朱集，毙日伪军三十余人，俘伪军司令辛靖云以下四百五十余名。

4月30日　日军第三师团山胁正隆部自应山进至郝家店、徐家店一线，与第八十四军覃连芳部激战竟日，覃部退至塔儿湾阵地。随枣会战开始。

5月1日　蒋介石电令南昌参战；各总司令亲赴前线督战，限5日以前攻占南昌，并令将、决心不坚，畏缩不前，坐失战机"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军前正法，以昭炯戒。

5月5日　上官云相部何平第十六师、刘雨竹二十六师、豫五师等部会攻南昌。是日至次日，一路袭入新飞机场，一路冲至汽车总站，另一路进至南昌东门外之金盘路附近。二十六师主力及段朗如七十九师一部，在莲塘附近与日军激战。

5月9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下令停止攻击南昌，南昌会战结束，各部队奉命回复原有态势，在赣江、抚河间[illegible]河东岸之线暂取守势。

5月12日　信阳日军第二十九旅团乘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转移兵力之际，袭占桐柏县。同日，敌陷唐河及南阳。

5月19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鄂北枣阳，随枣线日军主力向大别山以南原阵地转移。

6月11日　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革命将士四百多人，造成"深县惨案"。

6月13日　为阻止日军攻占汕头，第四战区驻翁源

以南地区部队遵照余汉谋命令，开始向汕头方向移动。

6月30日　军令部批准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调派暂编骑兵第二师进驻陕北，以排挤八路军河防驻军。同日，程潜电蒋介石报告，调派暂骑二师接替陕北河防事，已征得阎锡山同意，划归邓宝珊指挥。

7月1日　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分别从道清路西段、同蒲路南段、正太路及平汉路中段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先打通白晋公路，然后分区、"扫荡"，晋东南根据地"扫荡"和反"扫荡"激烈展开。是役持续约两月余。

8月1日　军事委员会调集四十个军进行第二期整训，由军训部派员督练，至11月结业。

8月7日　日军第一〇九、第三十六、第一〇八师团开始对太岳地区进行"扫荡"作战。

8月15日　武汉日第十一军司令部制定江南攻势作战方策，决定乘汪精卫企图加快建立伪中央政权之际，于9月下旬进攻长沙，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于赣湘北境地区。次日，此计划经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裁决执行。

9月13日　军政部长何应钦对重庆报界报告最近战况称：现在日军占据之十二省内共有九百三十三县，日军仅占有五百二十一县。

9月14日　赣北奉新、靖安一带日军一〇一、一〇六师团开始向西进攻，企图夺取修水、铜鼓，直下平江、浏阳，与湘北日军相呼应。同日，鄂南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亦自祟阳南下进攻湘北。

9月18日　湘北新墙全线发生猛烈炮战。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及第十三师团一部、海军陆战队二联队自新墙河北岸发动进攻，一路由岳阳攻大桥头、姚梅洲，一路由桃林攻黎家湾，来势甚猛。

9月23日　日军主力分三路向长沙大举进攻，一路渡过新墙河进犯平江新市；一路在洞庭湖东岸之鹿角市及营田附近登陆，进犯桥头驿，与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部遭遇；另一路由通城南窜与杨森第二十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等部在麦市、长寿街附近发生激战。

9月28日　湘北平江巷战。上午9时，日军十三师团一〇四联队等部占领平江。同日，长沙外围日军在福临铺一带与五十二军覃异之部一九五师展开激战。晚，日军进至上杉市，遭覃师伏击，被歼千余人。覃师亦伤亡惨重。

10月3日　进攻长沙日军分三路溃退，一路由长寿街向修水溃退，一路由平江向通城溃退，一路由铁路正面向岳阳溃退。长沙东北金井等日军重要据点已克复。

10月18日　罗卓英部第十九集团军与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在鄂赣边界九宫山地区夹击通城北窜日军甘粕师团残部获胜，计毙伤敌千余，生俘八名。

10月20日　第二战区一部克复山西静乐，生俘日伪军八十余，毁汽车多辆。另一部一度冲进临县，与敌巷战四小时后撤出。

10月27日　国民政府据航空委员会呈请，是日指令批准定"八一四"为空军日，前定"九二〇"为空军节，"三二九"为航空先烈纪念节一并废止。

10月29日　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话称：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要彻底转变，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

11月1日　阎锡山委派之山西省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抵阳城，进一步加紧反共活动。

11月7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中将阿部规秀所部一千六百余人在河北涞源上庄子附近被八路军晋绥军区第一、二团及杨成武支队主力击溃，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及其部下五百余人丧命。涞源战役获胜。

11月24日　南宁失陷。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以飞机大炮向南宁南北地区猛烈袭击，下午先头部队侵入南宁城，守军一三五师、二〇〇师等部退至邕宁北之高峰隘。

11月26日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到迁江指挥作战，同时征集汽车将杜聿明第五军急向宾阳输送，以期确保昆仑关附近山地。同日，南宁日军第五师团三木部队在飞机炮火掩护下猛攻高峰隘阵地；另一部犯石埠圩，企图迂回高峰隘侧背。其余日军分路围攻南宁外围各据点。

11月29日　日军向昆仑关阵地猛烈炮击，一八八师派队增援。同日，日机轮番轰炸高峰隘方面阵地，其进犯部队以公路破坏无法前进，加紧抢修小董以南公路。

12月1日　第一战区冬季攻势开始。孙桐萱部第三集团军先以游击队遮断陇海铁路罗王至兰封、兰封至内黄段，并遮断通许、淮阳、鹿邑间公路，然后以八十一师一部向兰封袭击，主力向开封进袭。郭寄峤第九军主力协同李家钰第四十七军遮断沁阳至博爱交通线，攻击沁阳城外及武陟各日军据点。

12月4日　日军占领昆仑关，随即在该处构筑坚固工事企图固守。第四战区所部分别退至昆仑关以北及武鸣附近地区集结整顿，准备尔后会战。桂南战事暂处于对峙状态。

12月7日　阎锡山以重兵包围韩钧、张文昂决死第二纵队，进行围歼。决死第二纵队起而自卫，双方发生激战。

12月10日　卫立煌部第十四集团军向晋南翼城、绛县一带日军四十一师团及一〇八师主力发动攻击，经九昼夜激战，敌向西退走，据守曲沃、新绛与卫部相持。

12月12日　第五战区冬季攻势开始。以江北兵团牵制天门、皂市之敌主力，准备由随县、钟祥间向武汉攻击；另以鄂北兵团、豫南兵团进攻信阳以南；以豫南游击队袭击信阳之东；以鄂东游击队袭击汉口及其以北。

12月13日　李家钰部四十七军开始扫荡太行山南、道清路北各山口日军据点，东阻新乡之敌西援，西攻博爱之敌后背。

12月14日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渡襄河出击洋梓镇、黄家集日军获胜，毙伤敌二千余。

12月19日　第八战区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等部夜袭包头，翌日拂晓攻入城内，与日军巷战两昼夜，摧毁敌司令部及据点数处。另一部在包头安北间阻击来援之敌，毁敌汽车八辆，毙敌百余。

12月23日　日近卫混成旅团占领粤北从化至翁源间重要据点牛背脊，第四战区所部组成两个纵队迂回包围日军，在梅坑、吕田、牛背脊、良口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同日，日军陷粤北龙门。

12月24日　粤北日军以机炮掩护强渡琶江，溯北江而上，直趋英德。旋英德沦陷。敌占英德约一星期，民众被杀二百四十余人，房屋被毁三千余间。

12月28日　桂林行营下令反攻昆仑关。杜聿明部新二十二师及余汉谋部一五九师等部与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在昆仑关外激战。

经　济

1月15日　财政部发表通告，宣称因日军扣留关税，不能按期偿付以关税担保之债务。同日，财政部发言人就上述通告招待外籍记者，透露关税担保之债务总额约等于国币二十五万万元，其中外币借款约六万万元，庚子赔款约一万万元，国币借款约十八万万元。

2月4日　中华工商协进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孔祥熙、翁文灏、张道藩、黄中及会员四百多人出席。

3月6日　财政部召集之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在重庆开幕，孔祥熙致开幕词，要求地方金融机关负起战地服务责任，扶助地方生产事业及抵制经济侵略，协助中央推行经济政策，中央及地方应密切合作。

3月10日　财政部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闭幕，通过发展经济力量、维护币制信用、便利收购物资、平衡物价涨落等决议案多项。

3月15日　中英正式签订贷款合同，英国同意给中国信用贷款五十万英磅，用以购买卡车行驶滇缅公路。

4月14日　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二十八年军需公债条例》，总额六亿元，年息六厘，至民国五十五年还清。

5月27日　国民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八年广西省六厘公债条例》，定额八百万元，民国四十四年还清。

6月24日　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公库法》施行日期及区域，规定国库除新疆、云南、青海、宁夏等四省暂予展缓施行及游击区或接近战区地方确有特殊障碍者外，均着自本年10月1日起施行；各省市县库定自翌年1月1日起施行。

7月1日　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禁止二百余种货品进口。同日，又公布《出口货物结汇领取汇价差额办法》，规定商人售货所得外汇需交中国、交通两银行换取法币。

7月6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规定工商业资本在二千元以上，利润超过资本百分之二十者，概须交纳此税。财产租赁之利润超过产业所值百分之十五者，亦须交纳。新税自本年1月1日起征。

7月30日　蒋介石电驻美大使胡适，促请美政府积极增援中国外汇平准基金。

8月18日　中英成立信用贷款，由中国在英发行不记名英金购料公债二百八十五万九千镑，周息五厘。

9月6日　孔祥熙对记者谈欧战爆发后形势，认为对抗战前途并无不利影响，今后当以从容谨慎态度应付财政金融上一切演变。

文　教

1月30日　社会部拟订《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决定限期"举行文化团体总登记"，以整理现有文化团体；并有"指定文化团体理事中之忠实党员若干人，秘密组织党团，俾在该团体中起核心作用"等项规定。

2月5日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决定参加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推王正廷、张伯苓、朱家骅、郝更生、马约翰、董守义、董显光七人为筹备委员。

2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修正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草案》及《修正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草案》，规定对出版、发售未送审图书及违禁出版品者，分别情节给以警告、没收、罚款、封闭等处分。

2月22日　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会长孔祥熙，名誉会长宋美龄、史汀生。

3月26日　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吴稚晖为会长，王宠惠、邹鲁、周恩来、吴玉章、叶楚伧、邵力子等四十人为名誉理事，毛庆祥等二十五人为理事。

4月1日　国民政府令免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本职；遗缺于5月5日以叶元龙继任。

4月8日　新疆省文化协会成立，茅盾为委员长，张仲实、李佩柯、阿不都拉为副委员长。

4月23日　中国地政学会第五届年会在重庆开幕，陈立夫、邵力子及各省地政机关代表与地政会员一百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五项决议。

6月1日　教育部公布《私人讲学机关设立办法》，规定："私人讲学机关设立后，本部将随时派员视察。其有违反规定者，即予取缔。"

6月12日　教育部规定以8月27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以前部分教育界人士发起之6月6日教师节本年起不再举行。

6月26日　教育部决定本年度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考新生，聘罗家伦、王星拱等十九人组成招生委员会，设重庆、成都、南郑、昆明、贵阳、辰溪、桂林、延平、上海、兰州、恩施、泰和、永康、曲江、镇平十五处为招生区。

8月2日　教育部举办全国统一高考，10日试毕。参加高考人数两万两千人左右，超过上年度统一招生应考人数一倍。

8月12日　考试院公布《公务员高等考试分为初试再试并加以训练办法》九条，定9月20日（后延期为10月11日）分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城固、兰州、永康（后改为丽水）七城举行初试。

8月25日　《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列举四川泸县、资中等地国民党当局勒令代销书店具结停售《新华日报》，强索订户名单，或无理扣留，擅行没收，甚至逮捕订报人，要求彻查纠正。

8月26日　教育部根据行政院定8月27日　孔子诞生日为教师节制定纪念办法，规定孔诞与教师节分别举行仪式；教师节以表扬优秀教师，阐扬孔子言行，鼓励尊师重道，开展学术讲演等为主要内容。

9月20日　教育部颁布《文化团体组织大纲》，社会部颁布《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规定凡有违反三民主义言论或行动者不得为会员，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外进行政治活动。

9月21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以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

11月5日　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成立，盛世才、李溶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为名誉会长，王宝乾为会长，沈雁冰、张仲实等为理事。

11月22日　第七届太平洋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开幕，会期两周，讨论内容侧重中日问题。中国参加会议代表为前驻苏大使颜惠庆、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武汉大学教授周鲠生、美国美亚杂志助理编辑冀朝鼎及林语堂和其它银行实业界人士。

12月19日　教育部筹划在海外各领事馆附设侨民教育专家，分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西贡、巴达维亚五个区管理侨胞教育事宜。20日又颁布小学《特种教育纲要》，强调对儿童"精神训练"。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0年

导 言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该文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什么等问题，论证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这篇文章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代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汉奸。在继承"法统"口号下，伪政府完全采用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形式。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出卖国家利益，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侵略军为了确保其武汉占领区的安全，进一步威胁四川，于五月发动枣宜战役，企图消灭第五战区主力。国民党军在枣阳、襄阳一带与日军反复死战，枣阳几度易手，激战甚酣。双方伤亡颇大，六月中旬国民党军收复襄阳，与日军形成僵持之势，枣宜会战结束。

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陆军上将在南瓜店战斗中不幸牺牲，壮烈殉国。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后一度被国人视为"汉奸"，遭受不白之冤，为洗清冤名，率部死战，为台儿庄战役立下殊勋，在各战场上往来驰骋，战功赫赫。五月十六日，为阻击日军回撤，率部在襄河东岸展开战斗，由于孤军深入，被包围后战死。

七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全面讨论了各项报告，尤其是战时经济问题。会议决定把经济部改为工商部，专管工商及矿业。八日，会议结束，在宣言中号召继续完成抗战大业。

为了打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破坏日军进攻西安的计划，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战役共分三个阶段，至十二月结束。此次战役战线5000公里，毙伤日伪军44000余人，取得了辉煌战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十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3万余人向黄桥发起进攻，黄桥决战开始。新四军在通过周密布署后，彻底击败顽军对黄桥的进攻，并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主动结束了这场决战，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 百团大战
- 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
- 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
-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 枣宜会战
- 张自忠战死
-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背景介绍

国民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发动了一系列反共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宣称中国只能有蒋介石一个领袖、国民党一个政党、三民主义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应该收起；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必要，要取消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给全国人民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给革命者以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武装，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光辉论著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但在现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特点。

其次，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后者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再次，它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再其次，它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其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经济纲领是废除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其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文化。

最后，它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决不能成功。决不能象国民党顽固派叫嚣的那样，“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宣告了国民党在思想上进攻的破产，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推动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它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由于它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从而形成了关于民主革命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发表的其他重要著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

材料：

- 它宣告了新的“主义”的诞生

材料　它宣告了新的“主义”的诞生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理论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重要的著作。它所系统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理论成果。它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性著作之一。

不容置疑，《新民主主义论》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产物，它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一个主义"等独裁论调。毛泽东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是为驳顽固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战表现出更多的动摇，对内加强了独裁专政，突出表现是于1939年初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国民党更积极地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等反动论调，在政治思想战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为了从根本上驳斥国民党的各种无耻滥调，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

同样不可否认，《新民主主义论》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毛泽东为回答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阐明了他对中国应当建立的新国家新社会的构想。这对澄清人们思想上存在的模糊认识，指明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向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右倾倾向和超越客观条件发展的"左"倾倾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克服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注意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同时，还应充分重视《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此前后，他还提出了"我们要出主义"的论点。他在1938年8月5日给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作报告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出的。我们从抗大出去，要虚心学习，我们要出主义。我们出去对于任何一件事，都要想想，把它变成一种方法，一种主义，一种议案，然后去做。在另一次会议上，他又指出，在民族压迫的时候，就有了政治，要达到政治的目的就要提出政党，提出主张，建立主义。毛泽东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换句话说，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力图创造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革命迫切需要的新的"主义"、新的理论。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这个新的"主义"、新的理论终于正式诞生的标志。

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既是为着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需要，也是为着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需要，但更是适应着毛泽东要创立新的主义的要求。毛泽东对理论的指导作用一贯重视，特别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远考虑，《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正式提出都不是偶然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创立一种具有为中国民族特色的革命理论，正是《新民主主义论》问世的高层次、深层次的原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宣告了一种新的主义的诞生。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后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创新精神。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更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革命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典型的中国特色和理论高度，以及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堪称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理论成果。

（作者：李蓉，《党史纵横》95年10期）

百团大战

背景介绍

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1940年在华北敌后对日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也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重大胜利的名战之一。因当时参战的八路军部队多达一百余个团，遂被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称为"百团大战"。

1940年夏，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爆发后的三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0年7月，除原有的陕甘宁解放区外，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等六个大的敌后解放区。各解放区拥有人口九千多万、民兵二百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发展到四十万人和十万人，共同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四万人发展到了八十万人。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也为八路军对日寇发动百团大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希特勒闪电战的一时得逞和英、美等国推行"东方慕尼黑"政策，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有增无减。它

为了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公然确定了狂妄的"南进"方针，并企图尽快结束中日战争。1940年7月，正当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与日本达成新的妥协，封锁滇缅公路，断截中国西南的重要国际运输线之际，日寇加紧对蒋介石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一面扬言进攻西安、重庆和昆明，企图迫使国民党政府向它投降；一面将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华北，大力执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用分割包围和"竭泽而渔"的办法摧毁我解放区，使华北变成其南进的"兵站基地"。因此，在百团大战打响以前，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不但国民党统治区弥漫着浓厚的妥协投降空气，而且我敌后抗日斗争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尖锐地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刻"、"全国应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正是在上述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利用青纱帐旺盛和日寇在华北铁路沿线兵力分散等有利时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谋长签署了上报军委，下达八路军各部队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的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意义：一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段，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该地区若干据点，较长时间截断该线交通，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开展正太路沿线两侧工作，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二是打破日寇进犯西安之企图，振奋抗战军民的士气，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8月20日晚，在八路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下，我军经过充分的战前准备，在敌人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同时发起了攻击。

百团大战前后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中心任务是实施交通总破击战，破坏和截断华北敌人的交通线。由于正太路横贯太行山脉，既是华北敌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敌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的重要封锁线，同时铁路沿线又有日军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和井陉煤矿，以及天险娘子关等，因而成了破击的主要目标。这一阶段，参战的八路军部队主要有三支：第一支是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40个团，任务是以其中的15个团破坏平定至石家庄段的正太路，另外25个团分头破击北宁路、津浦路、平古路、平汉路和平大公路北段；第二支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和晋东南新军、冀南部队等46个团，任务是以主力15个团和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进攻由平定至榆次的正太路，以八个团进攻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以九个团破坏德石路、平大公路南段及邯济路，以12个团分别进攻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平遥至壶关段的白晋路，另以两个团破坏临汾屯留公路；第三支是贺龙、关向应指挥的一二〇师和决死第二、四纵队等部队22个团，负责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和汾阳离石公路全线，并阻击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经过二十余天的战斗，在我军打击下，正太路全线瘫痪，沿线据点、桥梁、隧道、车站等均被摧毁，同蒲路北段、平汉路、德石路、北宁路以及其他主要公路被切断，敌人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受到严重破坏，我军还歼灭敌伪军七千六百余人，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的预期目的。

第二阶段，从9月20日到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破坏交通线，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敌后各根据地中的敌伪据点，作战的主要形式是攻坚战。这一阶段的主要战役有太行、太岳部队进行的榆(社)辽(县)战役，晋察冀军区发动的涞(源)灵(邱)战役，冀中军区进行的河(间)任(邱)战役，以及晋西北地区八路军一二〇师同蒲路北段的破袭战等。在这些战斗中，我军攻克据点，歼灭守敌，破击铁路公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因敌人已有所准备，我军未全部达到预期目的。

第三阶段，从10月6日到12月5日，中心任务是反"扫荡"。经过前二个阶段的作战，敌人为了扭转不利局势，增调兵力，集结了十多万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因此，这一阶段我军作战的中心任务是反"扫荡"，主要作战形式为游击战。我军的反"扫荡"战斗首先在太行区开始，接着又在太岳区的沁源地区，晋察冀的平西、北岳等地区，以及晋西北、大青山、冀中、冀南一些地区进行了多次反"扫荡"战斗。经过根据地军民英勇作战，至12月5日，敌人的"扫荡"终于被粉碎，第三阶段的战斗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取得重大战绩。据统计，整个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三万余人，拔除敌人大量据点，缴获马步枪五千余支，轻重机枪二百多挺，破坏敌人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余公里，使华北敌人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我军在作战中伤亡一万七千余人。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寇围困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使日寇在华北陷于困难的境地。这次战役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克服投降危险，推动全国军民坚持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次战役过早在战略上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极大地震惊了日寇，致使日寇决定对华北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战"。此后，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时期。

材料：

- 大破袭战役
- 百团大战八路军伏兵丛生，集体自焚武士道明火

执仗

·八路军百团大破袭

·百团大战胜利赋四绝句·慰百团将士

材料一　大破袭战役

1940年2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认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方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摧残。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1940年3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区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在随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7月上旬开始准备，8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芦沟桥，娘子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总部决定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7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惶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22个团，共有104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曰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3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个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26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6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3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4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8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碉堡，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

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选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二　百团大战八路军伏兵丛生，集体自焚武士道明火执仗

百团大战，筹划于1940年7月。当时，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签发了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达第120师、第129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这个命令明确地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华北的整个战局，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意义，规定了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以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恢复若干重要关隘据点，较长时间地截断该线交通线，并乘胜扩大，拔除该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命令还要求各兵团，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各兵团接到预备命令后，重点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北段沿线及其两侧地区的敌情、地形和居民社会等情况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各参战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以及物资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地方政府则大力动员群众，积极准备支援前线作战。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命令规定了参战的部队及任务，并定于8月20日在全线发起进攻。

战役首先从正太路发起，尔后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参加战役的部队从最初计划的几十个团迅速增加至105个团，共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正太路，从正定到太原，全长249公里。它横贯太行山脉，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西去，把巍巍太行山劈为两截。它是华北日军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敌军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破坏的重要封锁线之一。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陉煤矿。如果正太路被毁，山西境内日军的给养补充和外运掠夺的战略物资将发生极大困难。因此，日军历来以重兵把守。除太原与石家庄外，日军还以3个旅团计3600余人，分布在50多个据点里，守备这条线路。日军在沿线的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在铁路两侧10—15公里地区，还设有外围据点，可谓沟深墙高，戒备森严。

9月20日，正太铁路破击战全面展开。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挥下，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重点破击阳泉至石家庄段。

在阳泉和石家庄之间，有一座煤矿叫井陉煤矿。这个煤矿的煤质优良，开采量大，挖出来的煤除供给华北日军外，大部分都运到日本去了。因此，晋察冀军区领导指示一定要消灭占领矿区的守敌，对矿里的机器，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就地炸毁，使煤矿瘫痪，决不让宝贵的矿藏白白地为日军掠夺。

担任破击井陉煤矿任务的是晋察冀军区1分区3团。为了完成这一任务，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和3团团长邱蔚亲临煤矿附近侦察，选择突破口，区分各营连的任务。尔后组织部队悄悄进至距煤矿10多里的山沟里隐蔽起来。天黑后，各部队陆续钻出山谷，进入各自的预定展开位置，等待着攻击的命令。22日，随着指针指向晚10时，在整个正太路上几乎同时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3团的官兵在这爆炸声中，由一位向导指引，直扑井陉煤矿新矿区。1连的战士爬上电线杆，剪断了电源线，灯火通明的矿区顿时一片漆黑。乘着夜色，3团向日军的碉堡冲去。日军突然被袭，情况不明，只好胡乱放枪打炮。炮弹、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犹如一朵朵嫣红的花朵在夜幕中闪亮。

当3团快要接近新矿区的日军碉堡时，突然被外围的外围电网挡住了去路，有的战士，硬往上闯，结果有好几人触电身亡。有个叫刘金山的战士长得五大三粗，他一见电网这样可恶，火冒三丈，手上裹着两层篮球胆，举起一把大铡刀就朝电网砍去。好大的力气！电网硬是被他从上到下齐齐斩断。后面的战士扛来木板，挡在电网缺口的两边，大家飞快冲了进去，很快就攻克了日军的两座碉堡。正当3团的部队向矿区纵深攻击时，日军设在矿区制高点上的一座中心碉堡复活了。阴森的碉堡孔里，喷射出一道道火舌，子弹打在部队前进路上，溅起一串串火花，许多战士被压在了碉堡下的山坡上，抬不起头来。时间一分一秒地增加，部队伤亡也越来越大。打不下中心碉堡，井陉矿井就破坏不了。而且时间延长，附近的日军也会赶来增援，到那时，这块硬骨头就更难啃了。3团团长见此情景，立即将预备队投入战斗，几个连队的火力象飓风一般朝一个目标扫去。几名无畏的勇士抱着炸药包，前仆后继地冲了上去，终于把中心碉堡炸毁。敌人消灭了，天也大亮了，全身乌黑的矿工从各个角落涌了出来，欢迎八路军的到来。

于是，矿工和八路军战士一起，把日军的枪支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搬了出来，尔后将矿井和机器设备全部炸毁。

井陉矿井的硝烟未散，盘距在岗头志矿的日军慑于被歼，不敢向这里反击，只是疯狂地打炮。结果，井陉煤矿火车部副部长加藤清利夫妇被炮火炸死，遗留下的一对

日本小姑娘在硝烟中大哭大叫。八路军战士见了，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将这对日本小姑娘从火海里救了出来。杨成武司令员听说这件事，立即令人把这两个小姑娘送到前方指挥所来。

这两个小姐妹，稍大的那个约莫五六岁，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小连衣裙，头发乌黑，圆圆的小脸蛋上挂着泪珠，一双大眼睛闪着惊惧不定的眼光，令人爱怜。小的那个，最多只有一岁，右肩胛还受了伤，此时，她合上睫毛长长的眼睛，已经在战士的怀里睡着了。

当杨成武司令员将3团在炮火中抢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的事，用电话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后，聂司令员高兴地说："很好！很好！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要把孩子照顾好，等他们吃饱后，马上派人送到我这里来"。聂司令员见到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后，亲自给她们买糖果、饼干，派军医给他们治伤看病。后来，聂司令员还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将两个小女孩送到石家庄，请日方将两名孤女转交其亲属抚养。

八路军从战火中救出日本两个小姑娘的事迹，在日军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事隔40年之后，中国新华社发表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日本《读卖新闻》转载，轰动日本各界。几天后，就找到了当年那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美穗子。美穗子应聂荣臻元帅之邀，前来中国访问，以触聂帅之手，感谢当年救命之恩。此是后话。

在晋察冀军区部队对阳泉至石家庄段进行破击的同时，八路军第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组成左右两个破击队和1个总预备队，破击阳泉至榆次段。8月20日晚，各纵队以秘密神速的行动、果敢而勇猛的动作，开始向阳泉至榆次段的守敌发起进攻。由于第129师集中了优势兵力，又经过周密的准备，摸清了敌情，所以进展非常顺利。日军在他们强大的攻势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战役一开始，战场的主动权就始终掌握在129师手中。经过一夜激战，左右纵队连续攻克芦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等车站、据点，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到25日，他们又连续攻克上湖、燕子沟、坡头、狼峪等据点，至此，正太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已基本为八路军控制。

随着正太路上车站、据点一个又一个地被拔除，参战的八路军、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在"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冒着日机的低空轰炸扫射，对铁路、公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车站、水塔、桥梁、路基被拆掉、被炸毁，有的还把拆下的铁轨抬到数十里外埋起来，把枕木放火烧掉。

就在破击战开始之前，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根据对敌情的分析，预料到敌指挥官骄横跋扈并且器小易盈，战役发起之后，驻扎在这条铁路线上的日军片山旅团将会抽集大部兵力，进击第129师右侧背。所以在部署兵力时，除编左右两个纵队外，还以主要兵力编为预备队，预伏在狮垴山一线，以防敌人侧击。

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是控制正太铁路的咽喉要地。第129师预备队集结于这一要地的隐蔽位置上，静候日军的到来。果然不出所料，日军片山旅团为挽救其分散守备部队被八路军各个击破的命运，纠集了当地可以调遣的兵力，并武装了住在阳泉的日本人，自8月21日开始，对八路军第129师据守的狮垴山高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兵力从670人增加到1500人。日军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掩护下，向狮垴山拼命攻击，企图夺占这一关系战役成败的要点，阻挠八路军战役计划的进行。

守卫狮垴山的部队凭险阻击，顽强战斗。他们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仅21日，日军就伤亡百余人。22日晨，日军200余人又向狮垴山东高地进攻，激战终日，日军仍无进展。次日，日军再次对狮垴山阵地实施炮击，并发射了带有毒气的化学炮弹。午后，日军飞机20余架，轮番低空轰炸扫射，均未奏效。狮垴山争夺战，八路军第129师整整坚持了6昼夜，有力地保障了左翼部队的行动，大煞了日军的威风。八路军左翼部队连日在高平、道坪、红凹、卷峪沟地区歼灭分散守备的日军，炸毁日军的据点后，均安全转移。其中八路军第386旅和决死1纵队在榆社西北的双峰地区，把从太谷出犯的日军第36师团永野大队包围，经一昼夜激战，歼灭日军400多人，永野大队长亦被击毙。

正太路上，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和第129师把日本守备打得丢盔弃甲。9月20日，第120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指挥下，对同蒲路北段及其两侧主要公路日军之据点，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将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铁路扒掉，桥炸毁，将忻县至静乐公路以及神池至五寨公路、太原至汾阳公路和汾阳至离石公路的路基挖断，桥梁破坏。在破击战中，军民齐上阵，万众一条心，把铁路公路破得百孔千疮，使日军很长时间不能利用。在破击战中，第120师还与同蒲路沿线守备之日军进行了160余次战斗，一度袭入宁武、五寨等城镇。同蒲路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一到夜晚紧闭城寨，不敢外出，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正太路主战场的作战行动。与此同时，八路军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对华北其他主要铁路、公路也进行了广泛的破击，并攻克了一些据点，歼灭了部分日军。

在八路军突然猛烈的攻击下，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在数日内联络中断，情况不明，陷入混乱状态。当日军察明情况后，紧急调集兵力，进行疯狂的反扑。在正太路西段，日军抽调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向八路军第129师反击。在正太路东段，日军从冀中、冀南抽调5000余人，向晋察冀军区反击。它们采取东西对进的战术，企图消灭八路军，重新打通正太路。

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了作战部署，抗击日军的反击。9月2日，日军8000余人，合击正太铁路南侧的安半、马坊地区的第129师，该师英勇抗击，先后毙日军600余人，尔后转移。晋察冀军区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北侧较为空虚之际，主动向盂县周围的日军出击，收复了会里、上社、下社等据点，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在此期间，第120师也频频出击同蒲线之日军，使日军难以抽调兵力增援正太路。至9月10日，八路军基本达到了瘫痪华北日军各交通线的目的，结束了第一阶段作战。

早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之前，彭德怀副总司令就提出了乘胜扩大战果的设想，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委同时下发各部队指挥员。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要求全军应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明确指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至几次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大战之战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给日军以更大的打击，八路军总部于9月16日发出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要求各兵团继续破坏敌之交通线，摧毁日军深入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各部队，按照八路军总部的这一指示，展开了第二阶段的作战。9月22日，晋察冀军区发起涞(源)灵(丘)战役和一系列对铁路公路的破袭战。涞灵地区驻有日军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决定先打涞源县城，同时拔除涞源县城附近的各据点，尔后再向灵丘之敌发起进攻。根据这一决心，晋察冀军区部队组成左右两支攻击队，右翼队主攻涞源县城，左翼队阻止灵丘、广灵、蔚县方向可能增援涞源之敌，并以1个团为总预备队。

22日，右翼队向涞源县城发起了进攻。战士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匍匐前进，砍开涞源县城外围据点的铁丝网，紧接着把日军哨兵也砍倒了。正在碉堡内睡觉的日军被惊醒，可未等他们还击，八路军战士就把成捆的手榴弹扔进碉堡内，把守堡日军炸成肉泥。接着，八路军就向城内冲去。但是，由于日军城内工事坚固，防守严密，攻城部队虽发起多次攻击，恶战了一夜，仍未能攻克，反而伤亡较大，聂荣臻司令员随即命令停止攻城，重点扫除外围日军据点。

当晚，晋察冀军区1分区3团在1团的配合下，向涞源县城外围的日军重要据点三甲村发起进攻。攻击部队把三甲村团团围住，1团3营副营长张英辉带着3个连包围了一座小山，用铡刀劈开铁丝网，朝1个碉堡里扔了几百颗手榴弹，把碉堡炸开一个口子。三甲村的日军垂死挣扎，各种枪支通通从枪眼里伸出来射击。2团和1团也打得更猛了，十几名爆破手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接连冲到碉堡附近，将炸药包、爆破筒掷向碉堡顶上、墙下和射击孔内，随着轰轰的巨响，碉堡被炸开了，日军死的死，伤的伤。至24日清晨，三甲村150多名日伪军，全部被歼。

三甲村拿下了，可攻击涞源外围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的1分区3团却仍在血战中。东团堡的日军，全是战斗经验丰富，武士道精神十足的军官和士官。他们凭借坚固工事，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打得如泼水一般，还不时地施放毒气和实施反冲击。战斗打响时，正巧士官教导大队井出大队长接替原大队长甲田，这两个家伙都被困在里边，所以日军打得更加疯狂。24日上午，被打红了眼的日军甲田大队长赤膊上阵，亲率数十名日本兵向3团9连的阵地扑来。9连1排长见状也带领全排冲了过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他1人连续刺死4名日本兵，自己也受了重伤，最后拉响了手榴弹冲入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9连与日军激战3个多小时，打退敌人的6次冲锋，冲进敌群与日军肉搏战的1排全部牺牲。当日20时，3团对敌核心工事发起总攻，日军抵抗不住，连连败退，最后退守东北角碉堡顽抗，并施放毒气，致使3团人员大部分中毒，攻击只好暂时停止。25日下午，3团经过准备，再次从四面对日军固守的碉堡猛攻。日军甲田大队长见大势已去，便把粮食、物资和弹药堆放在一起，命令所有的人跳火自焚。他还挥舞指挥刀，把一个不愿自焚的日本兵的肚肠挑出来，杀一儆百。等到3团冲入碉堡时，日军官兵已全部烧死。东团堡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八路军全歼，使华北的日军受到很大的震动。

28日，张家口日军3000余人乘汽车，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急速向涞源地区增援，并于当日进抵涞源县城。10月1日，八路军攻克的大部据点，又被日军占领。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右翼队放弃夺取涞源，向灵丘、涞源方向转移。10月7日至9日，左翼队在右翼队一部配合下，先后攻克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9日下午，大同日军千余人增援至浑源，并继续向灵丘地区进犯。于是晋察冀军区于10月10日结束涞灵战役。

八路军第129师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主要实施了榆辽战役。榆社到辽县的公路是日军楔入抗日根据地平辽公路的前锋段，日军早就企图把这条公路再向榆社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路连接，以达到分割八路军太北区根据地和便于运兵的目的。日军在榆辽公路上共设有榆社、沿华、石匣、管头等7个城镇与村落据点，由日军第4混成旅团池边大队主力守备。这段公路突出伸入抗日根据地内，工事设施坚固，兵力兵器较强，榆社和管头据点都各有一个日军加强中队守备。

八路军第129师根据总部的指示，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心是拔除辽县至榆社公路沿线日军据点，相机收复和顺、辽县两城，并准备在辽、榆、武地区歼灭可能由平辽或白晋方面的增援之敌。其部署是：以第386旅、决死1纵

队共 4 个团为左集团，攻取榆社、沿华、王景 3 个据点；以第 385 旅并指挥 23 团为右集团，攻取管头、铺上、红崖头、关帝垴、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抢守辽县以西之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日军。以新 10 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止昔阳、和顺出犯之敌，配合作战。

榆辽战役于 9 月 23 日发起。正如预料的那样，辽县之日军即行西援，预伏在辽县以西狼牙山的第 129 师一部兵力，立即伏击增援之敌。日军遭到突然打击，抵挡不住，仓皇退回。第 129 师左集团和右集团同时发起攻击后，连克沿华、王景、小岭底和铺上等日军据点。此时，进攻榆社的部队激战方酣。日军在攻击部队强烈火力与猛烈攻击下，开始施放毒气，攻击部队采取防毒措施，继续战斗。榆社有城墙，有暗堡，有充足的弹药和丰富的粮秣，而且日军有飞机支援，易守难攻。在日军的猛烈还击面前，攻击部队进行了坑道近迫作业，用炸药炸开碉堡，乘硝烟攻入城内，终于攻占了榆社。

而进攻管头据点的第 129 师右翼集团，由于受地形所限，在攻占敌 1 个碉堡后，未获进展。于是，除以一部兵力围困管头，其余兵力转攻石匣，然后再相机夺取管头。经连续激战，被围之敌已弹尽粮绝，右翼集团攻占了石匣并乘胜攻克管头。

第 129 师新编第 10 旅进攻辽县的战斗尚未发起，和顺、武乡之日伪军 800 余人即前来增援。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果断命令攻打辽县的部队，除以一部围城外，主力撤回，预伏于榆辽公路的红岩头一带，准备打伏击。攻坚战斗马上变成了围点打援，把日军调出坚固的筑城地域，在崎岖山地上歼敌。半夜 12 时，伏击部队到达预伏地点，拂晓就打了个成功的伏击战。后来，由于武乡东援之日伪军不断增多，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同时，辽县西援之日军也突破了八路军狼牙山阻击阵地，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第 129 师各部撤出战斗，结束榆辽战役。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 1824 次，歼日军 20645 人，伤敌军 5155 人，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八路军伤亡 1.7 万余人。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其深入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百团大战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动了世界。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冲破了日伪军的严密封锁，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对百团大战作了这样的描述：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到长城边，都成了战场，"一百个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百团大战，以它的辉煌战果而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战例的史册。

（选自《20 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三　八路军百团大破袭

8 月 20 日，夜幕渐渐降临，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日寇的交通大动脉正太铁路线也渐渐地隐没在这雨夜之中，据守正太铁路的日寇依旧在饮酒作乐，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这雨夜中，八路军抗日健儿正跨山涧、走小路，向他们自诩为"钢铁封锁线"的正太铁路逼近。

20 时许，正太铁路沿线突然枪炮声大作，火光冲天，我八路军向日寇的"钢铁封锁线"发起了总攻，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战役部署，晋察冀军区以 18 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又 2 个骑兵营、3 个炮兵连、1 个工兵连、5 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了左、中、右纵队、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在聂荣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组织指挥下，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的车站和据点发起猛烈攻击。

22 时，右纵队的第 5、第 19 团等部向娘子关至乱流间日军据点发起攻击。娘子关是晋、冀两省交界的要隘和正太铁路的咽喉地区。日军依托该地峭壁悬崖、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增修了 4 个大堡垒群，周围密布以明暗火力点。此外，在娘子关下村庄还驻有伪军。我担负主攻任务的第 5 团，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了村内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娘子关日军展开强攻。在日军浓密火力封锁下，攻击部队前仆后继，向娘子关仰攻。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用绑腿带连结在一起搭上悬崖攀登。但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和优势的装备，拼死抵抗，攻击部队伤亡较大，正面攻击一时没能得手。就在这紧要关头，日军堡垒群侧后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原来这是第 5 团由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从翼侧向日军展开了攻击。日军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顿时阵脚大乱，慌忙组织反扑，经激烈的肉搏拼杀，日寇被歼一部。正面攻击部队乘势以手榴弹、手雷及缴获的爆破筒对敌人的碉堡实施爆破，随着几声轰隆、轰隆的巨响，敌堡一个个被炸成废墟。经 3 个小时的反复冲杀，我第 5 团的抗日勇士终于夺取了敌人的堡垒群，攻上了娘子关山头。黎明时分，娘子关日军大部被我歼灭，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寇盘踞 3 年之久的天险娘子关。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兴奋得流出了热泪，敲锣打鼓地给八路军部队送鸡蛋猪肉等慰问品。攻占娘子关后，5 团的勇士乘胜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并收割了敌人的大批电线。与此同时，右纵队的第 19 团对移穰、巨城、乱流和上、下盘石等日军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21 日，日寇得悉八路军攻陷娘子关天险，大为震惊，急忙抽调大批增援部队直扑娘子关企图歼灭我攻占娘子

关部队，夺回娘子关。然而，我5团的勇士早有所料，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在破坏了敌大批堡垒工事后，即主动撤离了娘子关。日寇赶到娘子关后，哪里还有八路军的踪影，只好对着已化为废墟的堡垒工事，望"堡"兴叹。

根据晋察冀军区首长的部署，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的第2、第3、第16团和井(陉)获(鹿)支队一部，于20日23时向娘子关(不含)至微水(含)段日军的据点展开攻击。担任进攻井陉煤矿的第3团，在矿工的配合下，首先切断了矿区的电源线，然后乘矿区灯光全部熄灭的黑暗之机，迅速发起冲击，激战至黎明，将日军全部歼灭，并占领了东王舍新矿，对厂房、矿井进行了彻底破坏，使其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生产。与此同时，第2团攻入了蔡庄，破坏了乏驴岭桥梁；第16团攻占了地都、北峪、南峪等据点，破坏了南、北峪之间的桥梁。

战场上敌我刀枪相见，然而其中也不乏会出现一些充满温情的动人插曲。这里要提及的是，我3团的勇士在进攻井陉煤矿时，发生的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当时，我3团1营的几个战士从燃烧的房屋中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孩子的父母已在战火中殒命。聂荣臻司令员得知后，极为关注，指派专人照顾，随后又派人将两个小女孩送还日军据点，并附信一件，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日本士兵和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发动的不义战争。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日军内部引起震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被救起的日本小姑娘，一个不幸死于伤病，另一个名叫美穗子的小姑娘，几经辗转回到了日本。中日重新修好后，美穗子曾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访问，聂荣臻元帅还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于是，这段感人的故事，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

在右纵队、中央纵队向敌发起攻击的同时，晋察冀军区的左纵队向微水至石家庄段的岩峰、上安据点发起了攻击，并破坏了平汉铁路线正定以北的铁桥。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我129师担负对正太铁路西段的破击任务。当时据守正太铁路西段的是日军片山第4混成旅团的4个步兵大队和日军山冈第9混成旅团一个大队，根据当面敌情，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决定，以10个步兵团、3个独立营、4个工兵连，组成左、右翼破击队、总预备队和平(定)和(顺)支队，并确定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统一负责前线指挥。

20日20时，我129师左、右翼破击队同时向正太铁路西段发起攻击。由于攻击部队行动隐蔽，战斗动作勇猛突然，使日军措手不及。经一昼夜激战，左翼队的第16团攻占了芦家庄，歼敌80余人，右翼队的第30团，攻占了桑掌和铁炉沟，全歼守敌130余人。在左、右翼破击队向正太铁路展开攻击时，总预备队进至平定以西的天华池、韦池村地区，为了防止日寇对破击队右侧背的攻击，根据师首长的指示，总预备队的第14团占领了阳泉西南正太铁路上的咽喉要地狮垴山。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后，立即组织反扑。驻阳泉的日军独立第4混成旅团长片山省太郎纠集其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并武装了阳泉的日侨，自8月21日起，向第14团防守的狮山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日军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支援下，连续向狮垴山进攻，并不断增强兵力，由开始的数百人增至1500余人。守卫狮垴山的我14团的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凭险阻击，打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仅21日，就毙伤敌百余人。翌日，日军数百人又向狮垴山东北高地猛攻，激战终日，仍无进展。眼见伤亡不断增加，而狮垴山阵地却久攻不下，片山旅团长恼羞成怒，于是以优势的空中和地面炮火对阵地狂轰滥炸，并大量施放毒剂，然而狮垴山阵地仍是岿然不动。就这样，狮垴山争夺战持续6昼夜，日军使出其全身解数猖狂进攻，不仅丝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伤亡400余人，使"赫赫皇军"威风扫地。

在14团的掩护下，各路破击部队经数日连续战斗，又陆续攻克了上湖、燕子沟、坡头、狼峪、张净等日军据点及车站多处；同时，还攻克了冶西，落摩寺等外围据点数处。到26日，日寇又纠集了数百人向狮垴山展开猛攻，我坚守狮垴山阵地的14团，在坚持7小时后，为避免同敌人决战，主动撤离了狮垴山阵地。

8月31日、9月1日，左翼破击队在高坪、道平、红凹、卷峪沟等地区，对由榆次、寿阳出犯的日军予以连续的打击，特别是卷峪沟进行的长达15小时的阻击战，打退了日军10余次的进攻，毙伤日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合击安丰、马坊的企图，争取了主动，掩护了八路军总部、129师直属队、右翼破击队的安全转移。9月6日，我386旅和决死第1纵队于榆社西北的双峰地区，将由太谷出犯的日军第36师团永野大队包围，经一昼夜激战，歼其400余人，敌大队长永野命归黄泉。

担负破击正太铁路任务的我晋察冀军区和129师的部队，经连日激战，将正太铁路沿线日军的据点和车站一个又一个地拔除，基本控制了正太线。随后，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在"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冒着敌机的低空扫射，对铁路、公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车站、水塔、桥梁、路基都被拆毁或炸掉。拆下的铁轨，来得及时就运到后方兵工厂作原料，或抬到数十里外埋掉，来不及就把铁轨放到枕木上烧坏。就这样，仅十几天的时间，蜿蜒2百余公里的日军所谓的"钢铁封锁线"，被我八路军、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破毁三分之二以上。

在我晋察冀军区和129师的部队对正太线展开破击的同时，我八路军120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指挥

下，也以20个团的兵力对同蒲铁路北段和晋西北地区的主要公路展开了破击。8月21日夜，我120师358旅强袭忻(县)静(乐)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50余人，并歼灭了由静乐增援的日军40余人。同时，独立第2旅收复了同蒲铁路上的重要据点阳方口；暂编第1师一度袭入五寨城；决死队第2、4纵队破击了汾(阳)离(石)公路，袭入王家池日军据点；独立第1旅袭占了石门坞，袭击了寨子村，并围困了岚县城；工卫旅破击了太(原)汾(阳)公路。到9月5日，我120师共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及汾离、太汾等公路。

空前规模的大破袭，自正太线首先发起，尔后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其中包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和热河南部地区；正太、平古铁路全线，安阳以北的平汉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铁路，临汾以北的同蒲铁路，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北宁铁路的山海关至北平段，白晋铁路的平遥至壶关段，以及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沧石公路等。八路军在各线先后参战的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46个团，第120师20个团，共105个团，总兵力达20余万人。

八路军的百团大破袭，发起得迅速、突然。在我八路军突然猛烈的打击下，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数日内联络中断，情况不明，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待查明情况后，华北敌酋多田骏紧急调集兵力，进行疯狂反扑。在正太铁路西段，日军从白晋铁路沿线和同蒲铁路临汾南北段，抽调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4、9旅团向我129师进行反击。在正太路东段，日军从冀中、冀南抽调约5000人，增至石家庄、娘子关及其以北地区，配合独立混成第8旅团向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反击。反击的日军采取东西对进，企图重新打通正太铁路，恢复其所谓的"钢铁封锁线"。在同蒲铁路北段及其他铁路、公路沿线，日军也在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进行反击。

面对日寇疯狂的反扑，八路军各部一面以部分兵力开展游击活动，阻击袭扰反击的敌人，一面继续对铁路、公路展开破袭。至9月10日，正太铁路已全部陷入瘫痪，预期的作战目的已基本实现，于是，八路军总部下令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在这一阶段，八路军各部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日军据点91座，破坏铁路300余公里，公路700公里，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关于这一点，用日寇自己的话来表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当年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上曾作了如下记载："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18集团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选自《百战图》，作者：袁静伟)

材料四　百团大战胜利赋四绝句(录三首)寄慰百团将士

一

青天霹雳太行头，
万里阴霾一鼓收；
英帅朱彭筹此役，
竟扶危局定神州。

二

百团将士腾蛟龙，
南扑北捣扫西东；
一脉阴山河两岸，
杀声吼处敌无踪。

三

捷报纷纷足自豪，
坚持敌人已堪劳；
荡平倭寇铸新鼎，
功建昆仑万丈高。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鲁克)

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

背景介绍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华北局势趋向平静，反磨擦斗争中心转向华中。我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决反击向我进犯的顽军，进行了著名的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在这之前，还先后在苏皖的定远、半塔集、古城集等地反击李品仙、韩德勤所部的进攻，共歼顽军三千余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韩德勤指令苏北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于二十八日，纠集十三个团，进攻我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我江南指挥部一面呼吁两李停止进攻，一面调主力北上增援，挺进纵队在兄弟部队支援下进行反击，歼李部三个团。李部向泰州溃退。为争

取两李，孤立韩德勤，我释放全部俘虏。两李表示中立，我将郭村交与两李。我军东进泰兴黄桥镇，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

十月一日，韩德勤主力，由海安、曲塘、泰州三路向黄桥我军进犯。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等执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先争取李明扬等部中立，集中力量打击韩德勤部。十月四日，韩军第八十九军等部一万五千余人，开始向黄桥进攻。我军诱敌深入，于五日上午将其大部歼灭，六日又在追击中歼其残部于营溪。是役共歼韩军第八十九军军长以下一万一千余人，并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由涟水以北，南渡盐河，进占阜宁、益林、东沟、盐城等地，歼韩军保安第十旅一部。十月十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于东台以北白驹镇会师。经过一九四〇年郭村、黄桥战斗等反顽斗争，华中我军巩固了皖东、苏中、根据地，并开辟了苏北根据地。

材料：

- 东进序曲——记郭村保卫战
- 保卫郭村
- 决战黄桥
- 黄桥鏖战
- 黄桥大战
- 黄桥烧饼歌

材料一　东进序曲
——记郭村保卫战

〔*编者按　我国60年代曾经摄制过一部名曰《东进序曲》的故事影片。该片成功地描绘了新四军老一辈革命家高超的斗争艺术及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高度责任感，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文则是根据当年亲身参加过郭村战斗的老同志的回忆编写而成的，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斗争场面……*〕

一、陈毅三进泰州城

苏北地区指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黄海以西，拊沪、宁、徐、蚌的侧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苏北地区的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形势错综复杂。日军为兵力所限，沿长江占领了几个重要县城，例如扬州、仙女庙、靖江、南通等，大部分城镇和农村则无力顾及。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韩德勤盘踞兴化、东台、盐城一带，自谓拥兵10万。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设总指挥部于泰州地区。他们拥有九个纵队3万余人的部队。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都属于地方实力派，受到韩德勤的排挤打击，与其有尖锐的矛盾。韩德勤一就任江苏省主席，就把李明扬、李长江原任的江苏省保安处正、副处长(即正、副保安司令)的位置抢了过去，留给自己和李守维。韩德勤还将发给两李的军饷弹药，克扣侵吞。

陈毅司令员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决定采取"联李、击敌、孤韩"的方针，有步骤，有计划地打开和发展苏北的抗战局面。新四军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不过3000人。陈毅指出："今天的苏北，日寇是老大，韩德勤是老二，两李是老三，我们新四军名副其实是老四。不过我们坚持抗战，得到人民拥护，我们一定能先变老三，再变老二，最后把日寇赶出苏北，赶下东洋大海。"

8月下旬，陈毅司令员在管文蔚、惠浴宇等同志陪同下一进泰州城拜访李明扬和李长江。李明扬没有出面，只有李长江在大庙门口迎接。他们对陈毅的接待显然只是接待"少将支队司令"的规格。第二天中午，李明扬才出面，与李长江在泰山寺办公大厅摆了几桌酒席款待陈毅一行，席罢在会客室就坐后，陈毅同志虚怀若谷地对李明扬说："久闻李总指挥是抗战名将，为国家立下很大功劳，积累许多宝贵的抗战经验，故特来拜访，请求教益。望李总指挥多多给予指教。"李明扬一边回答："不敢，不敢。"一边又叙说他怎样在广东见过周恩来，怎样认识朱德。

事后，李明扬对身边的人说："这位陈司令谈吐直爽，似可信托。"江南是鱼米之乡，军粮还好筹措。但军火供应十分紧张。国民党第三战区下属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五军军长王敬玖是李明扬的同乡，王敬玖是顾祝同的亲信，还和韩德勤有多年的同袍之谊。他既同情李明扬的处境，又想为顾长官助一臂之力，帮助调处两李和韩德勤的矛盾。在征得顾祝同的同意之后，王敬玖答应送给李明扬迫击炮弹5000发，手枪子弹2万发，步、机枪子弹50万发，手榴弹2000多箱，但必须由李明扬自己派部队到第三战区的仓库去提取运走。这个仓库位于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行程曲折达五六百里，沿途要通过日军严密控制的铁路、公路、运河和长江等重要封锁线，又有日军、伪军、顽军、杂牌军和土匪的截挂掠夺。两李计算要抓600个民夫，派一两个支队(相当于团)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成败还不能预料。

开始，韩德勤自告奋勇帮助李明扬送了一小批军火。可是等这批弹药送到后，李明扬开箱一看，大为恼怒。这批弹药全部是残次品，没有一件武器可用，有的还生着铜绿色的锈。李明扬上当受骗，十分恼火，但他又找不到凭据，证明这是韩德勤搞的鬼，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李明扬了解到三纵八支队陈玉生部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联

系，而运送弹药的路线都是新四军活动的区域。他亲自找陈玉生谈话，交待任务："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完成，我信任你。"李明扬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陈毅司令员，称他为老友，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原则下结成友军，一致抗日，请新四军沿途关照其运输弹药的军队并要陈玉生携带现款代表二李慰问新四军的伤病员。陈毅同志得知此情况后，非常重视。助运弹药可使二李消除戒心，与我军合作。陈毅马上复电："陈玉生率一个团的兵力，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有受日寇打击的可能，建议他只带一个营，并由新四军调派一个熟悉地形的营护送。"陈玉生接受陈毅的意见率部于9月下旬出发。新四军动员了500多副担子分批启运，突破日军重重封锁线，把这批弹药先后安全运送到二李驻地泰州城西门外的码头上。陈毅亲笔给李明扬写了回信，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并肩抗日的重要性。

12月初，陈毅在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等陪同下二进泰州城。泰州城大街上贴出一些"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的红绿标语。这次欢迎的阵势与上次大不相同。李长江亲迎到城外，李明扬率领一百多人在司令部大门前迎候。酒筵也摆在二李私人办公的秦家花园。席间，陈毅开诚布公地谈到，坚持联合抗日，保证不侵犯二李的利益。宴会之后，李明扬请陈毅司令向其较亲信的部队教导团全体官兵训话。陈毅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谴责了某些国民党顽固派只知反共扰民从不抗日的罪行；提醒他们提高警惕，当心被顽固派排挤与吞并。这次训话受到教导团官兵的热烈鼓掌欢迎。事后，李明扬特地到新四军驻地吴家桥回拜陈毅司令员。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以华北地区为重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便把摩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华中。韩德勤乘新四军淮南五支队和苏皖支队离开淮南路东根据地开赴津浦路西参加反摩擦战斗之际，突然率领其主力部队独立第六旅等八个团向淮南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半塔集大举进攻。邓子恢率领淮南党政机关、后方医院，再加上教导大队，各方面工作人员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叶飞率领挺进纵队一团和四团的两个营共五个营紧急驰援。经半月激战，新四军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开辟了以来安、天长、盱眙、嘉山、六合为中心的津浦路东的抗日根据地。驻守在以吴家桥为中心根据地的新四军兵力不足一个营，如果二李在国民党顽固派压力下对新四军发动进攻，局势将急剧恶化，后果不堪设想。陈毅在惠浴宇的陪同下三进泰州城。双方在宴会上杯酒言欢，以前产生的矛盾与误会自然得到缓解。陈毅司令员豁然大度，谈笑风生向二李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明辨是非，分清利害，坚持正义，保持中立。在谈兴正浓的时候，传令兵突然急匆匆地进来报告：韩德勤的参谋长陆某带来了20几个卫士已到客厅候见。李明扬有些不知所措，李长江连脸色都变了。陈毅司令淡然一笑说："他来了有什么主意好打？不要说是韩德勤的参谋长，就是韩德勤本人也算不了什么。我们也是老交道了。早年在江西他就是马前败将。眼下在你们的泰州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镇定了一下情绪，用手绢擦了擦嘴，整了整衣服，对李长江说："长江，你陪陈司令、惠主任吃饭，我去招呼一下。"李明扬去后，李长江仍然惶惶不安，掩饰不了其内心的紧张情绪，一个劲地催着上菜。总算匆匆终席尽礼。陈毅从斗争策略考虑，此处不宜久留，不能让韩德勤抓住二李"私通异军"的把柄，加之进城时曾路遇特务，且此行目的已达到，乃表示：天色已晚，先行告辞，明日再议。陈毅交代周秘书明晨转告二李，说吴家桥派人报告，因我军驻地发现敌情，陈司令已连夜赶回，不及告辞，望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下次再来就教。

5月底，日军出动5000人的兵力开始大规模扫荡，新四军以一当十，时而游击、时而运动，在大桥镇、吴家桥等地相继予敌痛歼。但因为地区狭小，回旋困难，连续作战后急需休整。于是经与二李部下相商借道后，我挺进纵队进入郭村地区休整，待机打击敌人。韩德勤为了配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专门召开了反共军事会议。会上根据蒋介石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嚣称"日人不足为患，共党乃心腹大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采取"一律严缉，以遏乱萌"的措施，竭力制造摩擦事件。韩德勤挑动二李说：新四军已被日军打败，损失极大，残余部队逃到郭村一带，你们可以乘机消灭他们。汪精卫也派人劝说李长江，不要坐失良机。李明扬托词开会，主动到韩德勤省政府所在地兴华作客。李长江经不起韩德勤的威逼利诱，他限借道郭村的新四军三天内退出其防区，如不照办，兵戎相见。

正在江南率部反"扫荡"的陈毅对此险恶形势，心情十分焦急。他说："叶飞这支部队、陶勇这支部队，都是党的精华，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老骨干，怎舍得去跟国民党部队拼消耗哪！"为了有利于稳定团结抗日的大局，保存党的军事力量，有利于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陈毅特地从江南发电给挺进纵队，要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继续坚持孤立韩德勤，中立二李，一同抗战。

二、陈同生深入虎穴

新四军挺进纵队按照陈毅的指示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作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的秘书长，在调查科周山的陪同下，带着陈毅的信去泰州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要二李遵守过去的诺言，合作抗战，不要误信别人的挑拨。叶飞对陈同生说："内战不利于抗战，顽固派不懂这条

道理。现在陶勇同志虽说回来，尚未到达，王必成、刘培善还未过江，你还是到泰州去谈判，将陈司令给他们的电报转去，让苏北人民了解我们内求团结、一致抗战的诚意。”叶飞、吉洛（姬鹏飞）等为陈同生送行时再三叮咛，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陈同生向他们表示：“同志们放心吧！我相信会不辱使命平安回来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反扫荡、反摩擦，都会打胜仗的。同志们请相信我吧！一定尽我的努力，作为你们的代表，不至损害共产党员的尊严！”

陈同生一行四骑快马加鞭直奔泰州城。突然一个警卫员勒住了马头：“报告！路挖断了，前面有友军的岗哨。”周山前去交涉了20几分钟才被允许通过。本来从吴家桥到泰州从从容容走路只需二三小时。可是，这次从上午8时出发途经10余道哨卡，无处不盘，无处不查，一直到下午4点才到达泰州城。

按照预定计划，陈同生先到二纵队司令颜秀五家里。颜秀五把陈同生一行迎进客厅之后，焦虑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老兄还到是非之地来，难道天气不好，你们未得着一点消息吗？”陈同生说：“泰州既无名山大川，我也不是吟风弄月的雅人，天气我倒不关心，你们这里的人气如何？要向老兄请教！请教！”颜秀五又说：“你们总想联二李，抗韩李（守维），打日本强盗，可是东吴却最恨你们借了他们的荆州（指新四军暂驻郭村之事）。仗是非打不可的，你们准备怎样？”陈同生反问道：“老兄准备怎样？在这一出新群英会中，你打算此去做周郎还是鲁子敬呢？”“我虽未读几本书，但我是汉室子孙，只好去做鲁肃了，不过免不了要被人笑我太无用。总之，我不会对你们放一枪”。“秀五！你真够朋友，我们共产党人做事，绝不背信弃义，先‘扒香头’①的”。说罢，双方都笑了。突然，一个勤务兵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陈司令来了。”话音未落，只见陈才福带着七八个手握驳壳枪的彪形大汉闯了进来。陈才福气势汹汹地说：“新四军占领了我们的郭村，断绝我们的交通，还派人到泰州宣传赤化。大哥！我们老弟兄，你说气不气人！我今来缴他们的枪，请你……”陈才福穷凶极恶的表演使颜秀五感觉在客人面前失了面子。颜秀五打断了陈才福的话：“陈阿四！你天天在我面前称哥道弟，今天打进我的家来，骂我的朋友，真是岂有此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非曲直，各有所属。共产党、新四军的代表，是来找副总座谈判的，不是来找你我吵嘴的。我是奉副总座的命令待客，你是奉了何人之命来骂客的?！来人！”话音未落，从四厢拥出一群卫兵。“陈阿四！你要与我见个高低？你们（指卫兵）手里拿什么东西的？你们的家伙恐怕是吃素的罢？”立即，陈才福带来的打手被颜秀五的卫兵两个对一个的挟起来。陈才福气极败坏，狼狈不堪，直打哆嗦：“大哥不必动气，是做兄弟的不是，是做兄弟的不是！”这时，颜秀五家的女眷们都吓得躲到房间里去哭。颜秀五非常生气，也拔出手枪，对着陈才福。在这情况险恶，一触即发的时侯，新四军代表陈同生只好权且以调解人的身份劝了几句：“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兄弟的和气吧！谁在真心求团结，谁是真心要抗战，一手掩不了天下人的耳目。闹意气，闹分裂，只有日寇、汉奸喜欢。至于我们两军间问题，我来是同你们副总指挥谈判，只要爱国抗日的宗旨不变，我们双方的关系是一定可以改善的”。陈才福只得连连告罪带着打手走了。

这场风波停息后，颜秀五对陈同生说：“李长江是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想吃人肉，翻脸不认人的！现在总座已去兴华。你去找李大麻子，是凶多吉少，不如我送你们回郭村，你们准备打罢！”“怕凶险便不要革命，更用不着到泰州来。”“你们共产党都有这股劲，你既要去，我陪同前往。”他们一行来到了李长江公馆。李长江一反常态，过去他是在大门外边迎接。这次是陈同生进了客厅，他才站起来，指着对面的椅子说：“请坐！请坐！”陈同生将陈毅司令员的电报念给他听，他只是“嗯”“嗯”“嗯”的不表示态度。他回头问颜秀五：“秀五！你的部队调动好了吗？”“是的，都按照副座命令布置妥当了。”“那你应去检查一下，别让人说我们军队的纪律不好”。颜秀五回答个“是”即告退了。李长江支走了颜秀五才开口说：“你们共产党口里一套，心里一套，上面一套，下面一套，断我们交通，截我们货物，占我们防地，还派人到泰州来宣传赤化……你们未免欺人太甚了！”陈同生说：“副总指挥的话好象是从顽固派的‘特种宣传纲要’上抄来的一样。看来你虽年高，记忆力倒很好！不过，请你讲出一两件事实，我们有错我们改，你们无根据地指责友军，也要你们自己负责，看是谁欺人太甚！”李长江举不出事实，恼羞成怒地说：“同你们讲道理，我这大老粗是输定了，当兵打仗的本领不在那里，而在这里。”他举起拳头：“你们是天兵天将，叶飞、陶勇不过两三千人，我们鲁苏皖游击队就是豆腐渣，也有十七八大堆，也要胀破老母猪的肚皮的！”“我们不是老母猪，是人，是会战斗的人，是从来不怕打仗的人，只是不愿打亲痛仇快的内战而已！谁要不讲道理，逼着我们拿起武器来，我们虽然很年轻，但我们的奋斗也近20年了，应当说，不是随便可以被侮辱的毛孩子了。这一点倒要副总指挥三思而行，免贻后悔！”“我要你们三天内退出郭村。请你立即写信给叶司令，告诉他我们第四天要进入郭村！”“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接受谁的命令的。我军人数虽少，但组织坚强，士气昂扬，老百姓拥护，而贵部愿做亡国奴者少，不愿内战者却是很多。我们冒险来到泰州，苦口婆心，忍受你部属的辱骂，不是我们软弱无力，更不是我们担心郭村保卫不住，而是让全苏北和泰州的人民看得见

---

① “扒香头”：“撕兰谱”都是哥老会的行语，意即背叛盟誓。

我们爱国爱民的诚意，听得到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声音。如果你们一定要诉诸武力，可以告诉你：打下去，扬州的日寇会赞扬你们的‘勇敢’，苏北的老百姓会指责你们挑起内战的罪恶，泰州到底是谁的天下还难定。请你考虑考虑！得人心者王，失人心者亡，这古训，今天还是真理。”“我们可以暂缓几天出兵，但你必须给叶司令去信。”“这倒可以商量，双方提出条件来共同考虑。你们何时出兵那是你们的事，我们绝不向你们先放第一枪。必须说清楚，谁先打第一枪，便要负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责任。”

李长江起身送客，刚出了客厅，还未下台阶，陈才福带了100多人好像打冲锋一样拥了进来，乱嘈嘈地叫喊“缴枪”“缴枪”他们当中有的提着驳壳枪，有的端着冲锋枪，门口还如临大敌地架起了几挺轻机枪。周山同志和两位警卫员也拔出了手枪，他们恰好站在李长江的身后。与李长江并肩站着陈同生问：“李副总指挥！看来第一枪你们先要打响了，真是要‘流血五步，伏尸二人’吗？”陈同生又对满脸横肉、斜眉斜眼的陈才福说：“有本领的，敢在日本强盗面前逞能恃强，才算得英雄！”李长江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这场“鸿门宴”真要演下去的话，他自己也很难脱身。他气极败坏地指着陈才福等人破口大骂：“你们都是些混蛋！还不给我滚出去！”陈才福只得带着手下人退下。

陈同生一行4人被安排在招待所休息，实则被李长江软禁起来。

6月27日，在二李部队第二纵队颜秀五部政训处做地下工作的郑少仪（化名李欣）获悉，二李部队28日拂晓就要向郭村发起攻击。她还收到中共泰州县委的一封信，里面有李长江进攻郭村的兵力部署。为了将情报马上通知新四军，郑少仪化装成农村妇女摸黑赶路，终于在拂晓前把信交给了叶飞，为郭村军民争取了极其宝贵的几小时准备时间。

三、以少胜多

郭村战斗一触即发，挺进纵队将情况急报陈毅司令员。陈毅深感挺进纵队兵力不足，形势危急，非常着急。在半小时内，他发出二份急电，一份给远在200里外的苏皖支队陶勇司令员，命令他立即星夜驰援郭村。另一份给管文蔚、叶飞：“我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

李长江先集中4个支队，保四旅何克谦部也派两个团要缴陈玉生支队的枪。挺进纵队的四团被派去泰兴地区虾蟆圩支援陈玉生支队。战斗打响时，在郭村的新四军只有挺进纵队一团和教导大队。他们要对付李长江部4个纵队和韩德勤部保三旅张星炳部共13个团的围攻。陈中柱、陈才福两个纵队并肩猛攻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挺进纵队在上午和黄昏时打了两次反击战，李部遭受重大损失，被打垮了两个团。李长江大梦初醒，方知上当了，他感到无法收场，只好百般威胁陈同生，要他写信回去劝降，遭到陈同生的严词拒绝。李长江一不做，二不休，再次组织兵力发动第二次进攻。挺进纵队在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浴血奋战。苏皖支队司令陶勇率部克服路远、湖大、封锁线多的困难，迅速赶到了郭村地区，于6月29日进入郭村，接受了该村北面的防务。挺进纵队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打垮李长江第二次总攻后，于30日夜间出击接应四团和陈玉生支队。驻守郭村部队巧妙利用敌人互不配合、勾心斗角、保存实力的弱点，一举歼灭二李部三个团。战斗激烈时，陈玉生率领六纵八支队起义，与前去增援的四团会师一同西返，抵达吴家桥地区正抵李军之背。驻港口镇的颜秀五第五纵队五支队四大队也在共产党员王澄、姚力等同志的带领下起义。再加上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迅速东来，大大增加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防御力量。7月3日凌晨，李长江进行最后的挣扎，发动了第三次总攻。经过7昼夜的激烈战斗，新四军终于把李长江部打败，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挺进纵队和中共苏北特委在接到陈毅司令员的电报后，立即派出特委副书记惠浴宇、作战参谋张宜友带领一个连连夜赶到江边去迎接陈毅。陈毅见到接应部队后，立即询问敌情，并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粟裕副司令：“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他给李明扬、李长江写了一封长信，通过一个两面乡长送给二李，向他们陈述利害，晓以团结抗日之大义，警告他们绝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要他们悬崖勒马。陈毅还对惠浴宇说：“我接连三次打电报给叶飞，叫你们不要同二李打。他们打，我们也不要在郭村打，你们为什么硬是要打……我们打仗，要对准主要敌人，对于中间力量，不能轻举妄动。要打就要争取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有利于团结抗战，打了再拉。”郭村保卫战胜利后，陈毅司令员前往郭村。叶飞、韦一平、管文蔚、吉洛、张藩、陶勇等齐集郭村路口迎接他。陈毅一见面就说：“你们这几个冒失鬼，我真担心你们给人家捉了当俘虏！”陈毅在召开的欢迎大会上诙谐地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不过，你们打得很好，我也就不好骂了。但是，我们头脑要清醒，要总结经验。李长江背信弃义，已经遭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就是要教训他一顿以后，再争取他抗日。我们是自卫反击，并不是为了进占泰州。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陈毅等又连夜部署全面反击的措施。

四、城下之盟

7月4日，新四军全线出击，挺进纵队正面攻击，苏

皖支队侧翼迂回，直取东进要道塘头镇，进逼泰州城。捷报不断传来，塘头镇迅速被攻克，俘李军两千多人，活捉支队长一名。新四军先头部队一直打到泰州城外的碾米厂。城内的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乱成一团，紧急装船准备向东撤退。在这兵临城下的胜利形势下，陈毅司令为了争取二李，下达指示：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泰州城。此时正在兴化"开会"的李明扬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在进攻郭村前夕避到兴化是老谋深算，用心颇深的。其一，他不愿亲自出马打新四军，使两败俱伤，让韩德勤坐收渔利；其二，一旦副总指挥李长江出师不利，他尽可以回来与新四军握手言和。6 月 29 日下午，李长江在电话里告诉他收到了陈毅写来的信，他俩决定不予理睬；30 日李长江再次发动总攻时，他也未置可否。如今李长江被新四军杀得弃甲损兵，新四军兵临泰州城，却使李明扬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追悔莫及了。泰州城不丢给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就得丢给陈司令的新四军。正在李明扬举棋不定的时候，他却收到李长江打来的长途电话，新四军没有攻泰州城，撤回塘头镇去了。李明扬精神为之一振，立刻向韩德勤告辞迅速赶回泰州。

枪声已停，硝烟未散，陈毅命令将活捉的二李部队一个姓俞的支队长放回，并让他带一封亲笔信给李明扬，重申新四军"团结抗战，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主张。从塘头镇到郭村的电话接通后，陈毅司令员打电话给李明扬说：反共摩擦是一条自绝于人民的歧路，但只要回过头来，双方仍能和好如初；新四军欲放回全部被俘的二李部队人员，并归还部分枪支，新四军从来没有占据友军防区的意图，所以一旦能如去年 12 月协议那样，则郭村、塘头镇、宜陵等地一定归还二李。李明扬忙说："是，是，明白了！仲弘（陈毅同志字）将军伟大！伟大！"李明扬放下电话机对围在周围的李长江和纵队司令们说："记住啦，今后可是再不要打这种倒霉仗了！共产党反不得，外人的话信不得！"陈毅司令还派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去泰州谈判。朱克靖在北伐战争时期当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当时第三军军长是朱培德，李明扬是该军的副军长，交谊颇深。李明扬领新四军尊重他的情，深感新四军的宽仁厚义，于是设丰盛筵席请朱克靖、陈同生、周山赴宴表歉意。二李派副参谋长许少顿陪送朱克靖、陈同生、周山等返回部队，并带 1 万元现大洋和一车烟酒罐头慰问新四军。新四军如约释放了全部俘虏 700 余人，内有支队长 2 人，并送还部分枪枝。

陈毅司令员在郭村保卫战前后正确运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争取了二李，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选自《纵横》88 年 6 期，作者：石雷）

材料二　保卫郭村

郭村的地形确比吴家桥好，吴家桥是七里长庄，摆成狭长一条线，不好守；而郭村三个庄子三角形，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边张星炳部所占，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于部队运动，只有南面和西南面是开阔地，利于部队固守。我纵确定保卫郭村以后，根据胡服同志固守一个星期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将在吴家桥地区的后方机构、医院分散到农村群众中去隐蔽，将随部队到达郭村的地方机关、后方机关全部集中郭村；在郭村构筑工事，设置防御阵地；由于全部只有一团和纵队特务营合计四个营的兵力，一团全部担任防御，北面以一个营防御张炳星进攻，两个营在南面、东面防御李长江进攻，纵队控制特务营为机动兵力。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针对李长江各部政治态度不同，配合不会十分协调，张星炳攻击不会十分积极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以阵地前的短促突击，击退敌人进攻，稳定郭村阵地。

李长江为什么选择 6 月 28 日向郭村我军发动进攻呢？

以后查明，6 月 27 日韩德勤发出电令："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内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除授予八十九军等部武装进攻我军的任务外，电令规定："着李总指挥（明扬）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队，并泰州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灭之。"可见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是韩德勤反共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长江部先后到达董家桥、白塔河、杨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对郭村的包围态势。6 月 28 日拂晓战斗打响后，可以看出敌军部署和郑少仪送来的情报一致。李长江部队的来势很猛。郭村西南面是旱地，一片坟包，便于敌军接近。果然，陈中柱一个纵队从那个方向猛扑过来，来势汹汹。这里我军只有一个加强连，李长江部队逼近我军阵地，子弹打到了驻在村西端的特委机关。我在阵地上，从望远镜中看到，李长江部队正以密集队形向我阵地扑来，在我军密集手榴弹反击下仍是蜂拥而上。我判断很可能这是李军主攻方向，立即命令特务营出击，在炽烈的火力掩护下，特务营一个猛烈的反冲击，将李军击溃。一小时后，特务营押着 200 多俘虏胜利归来。从俘虏中一查，果然是陈中柱的部队。陈才福部从东南方向来犯，也被我军以反冲锋击退。其余各部李军气焰稍敛。激战至黄昏，李军仍不死心，倾全力占了郭村外面的小庄子，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在我短促反击下，歼其两个大队。这一天李军的总攻，共动用了 13 个支队（团）。

29 日拂晓，李长江发动第二次总攻。进攻的重点改

在南面，战斗开始就很激烈。据俘虏说：李长江下了死命令，要陈中柱、陈才福坚决拿下郭村，并且对部队许愿，打下郭村，放假三天。旧军队的所谓"放假"，就是任凭奸淫掳掠。这就更激起我军民的无比愤怒，斗志愈加旺盛。郭村人民冒着炮火直接支援战斗，纵队司令部侦察连连部驻地的房东全家上了战场，由老大爷领着，男女老少五口，扛着锄头钉钯，一上阵地就帮着修战壕，劝说他们下去也无效。年轻人偷跑到战场与战士一起作战，老奶奶送来麦饼、猪肉……。部队也打得特别顽强和勇敢。教导队队长蒋鹤林亲自端起机枪向突破了前沿阵地的敌军猛扫，硬把那些兵痞压了下去，自己也身负重伤，高呼口号，壮烈牺牲。一团参谋长廖政国患疟疾，发烧40度多，躺着昏昏沉沉的，听到枪声密集，越打越近，硬撑着爬起来，抱病带领部队出击，把李长江部队打得抱头鼠窜。激战终日，终于把李长江部队击退到离郭村二里路的王家庄。

30日，比较平静。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熟悉李长江的草包脾气，程咬金三斧头，只要挡住他前三斧就好办。他连续两天拂晓进攻，吃了苦头，会不会改为夜间攻击呢？夜战是我军特长，对手一般说不会采用这一战法，但郭村我军兵力薄弱，防御空隙大，李长江也就有可能在夜间将他的第三斧砍来。北面张星炳那里估计不会有积极动作；西南、南面都已经攻过，连续碰壁；东边还没有攻过，这个方向是个空隙，水网地带，由颜秀五二纵队担任进攻，颜部攻得不积极，我们防得也不严密，李长江很可能选择这里趁虚而入。根据这个判断，我加强了东边的防御，派廖政国同志带一个营去，夜间派出游动哨，发现李长江部队正在运动，我即主动出击，短兵相接，把进攻之敌逐出数里以外，李长江的进攻尚未形成就被粉碎了。

此时，突然收到少奇同志6月29日来电：八路军五纵队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我一看，急得浑身冒冷汗！江南我军正在遭受冷欣的进攻，一时过不了江。惠浴宇同志带了一个连去接陈毅同志，但被隔在新老洲。千斤重担全部压在我身上了！

正在此时，陈毅同志急电调来增援的苏皖支队，由陶勇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二百里，到达了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对北面张星炳部的防御任务。这样，郭村我军增至七个营的兵力，形势有所缓和。

战斗的第四天，也就是7月1日，我和陶勇、管文蔚、韦一平、张藩、吉洛等同志开会研究，认为八路军五纵队和新四军五支队已不可能来援，江南部队也一时来不了，如果仍按原定部署固守待援，旷日持久，如韩德勤投入主力参战，前无救兵，后无退路，万一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已有七个营兵力，可以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局部反攻，打破被包围的局面。遂决定由一团乔信明团长、刘先胜政委率领两个营，向扬泰线出击，趁李军后方空虚之际，直取宜陵，撕开缺口，打通与吴家桥地区的联系。一团两个营连夜出发，插入李军后方，以坚决勇猛的动作一举攻下重镇宜陵，横扫敌阵，歼灭李长江部队三个支队(团)部。

这时，陈玉生同志率部起义，在四团接应下，到达了吴家桥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交通要道。王澄、姚力等同志也在泰州北面的港口率领李军五支队四大队和重机枪连暴动成功，逮捕了反动的支队长陈东生，进入郭村。这样我军兵力就相当于五个团了。非但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打破了李长江的包围，郭村到宜陵、到吴家桥连成一片，使江南部队能够顺利北上，北上之后也有了集结基地。

李长江损兵折将，头破血流，一气之下，从泰州城跑到了前线。7月2日拂晓，李长江亲率高级军官指挥部队向郭村发起猛攻。我们除留少数部队监视和抗击张星炳、颜秀五两部外，全力反击。在李长江亲自督战下，李军的攻击气焰重起，整团整营的兵力猛扑上来，逼近我军阵地。我一团一营不断反击，但一进入开阔地就遭到李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廖政国同志抱病上阵，带着部队冲出圩子，展开了白刃战。苏皖支队将张星炳部的进攻击退后，由参谋长张震东率领一个营，从另一个方向向李长江部队侧击。刺刀撞击声里，李军的攻势被打垮了。李长江三次总攻，被歼三个团，击溃十个团，对郭村的包围被粉碎了。

清理战俘中，发现了反共骁将陈中柱，衣衫破碎，狼狈不堪。

战局大变，攻守易势，李长江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本人仓皇逃回泰州城。陈玉生部队和四团由吴家桥开回郭村，我军全部集结在郭村、宜陵之线。

(选自《征战纪事》，作者：叶飞)

材料三　决战黄桥

1940年6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领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顾祝同、冷欣以其第四十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五团等部对我突袭。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山地区，余部溃逃。我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日寇的几道封锁线，于7月8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此时刘炎同志尚在苏南，政治部工作由钟期光同志主持。部队整

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第四、第五团；第二纵队以王必成同志任司令员，刘培善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二、第六、第九团；第三纵队以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全部共七千余人。

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7 月 25 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我军以战斗姿态于 7 月 26、27 两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我东进的消息后，即令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太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们对于何克谦、陈太运两部，决计采取不同对策。当我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时，突然调头向北，击溃陈太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当陈太运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方如数遣还了俘虏，还主动地送了部分枪支给他，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摩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

在对付陈太运的同时，我们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 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军于 29 日凌晨，解放了黄桥。此战歼何顽主力近二千人，在我党团结抗日号召之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同志率领于战后起义。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并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这时陈丕显同志已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同志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展异常迅速。8 月 10 日，我们向中央报告："我占领黄桥以后，便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四个税卡，十天内扩大新兵一百余名……"接着，我们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

我军自北渡以来，经过四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东西二百里、南北数十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说，还只是初步的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已给顽军以一定的打击，但是同韩德勤的主力还没有交锋；虽然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地方，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确立；虽然我江南主力已经过江，但与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有打通。所以我们还没有在苏北站稳脚跟。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我会师，又以我退出姜堰为虚弱，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歼我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于是亲自指挥二十六个团共三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歼灭我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

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第六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分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部及苏北游击第八军(由税警团等部编成)陈太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五共十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我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目的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我们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以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我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顽军出师不利，9 月 30 日出动后，受阻于暴雨。10 月 3 日雨过天晴，才又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10 月 4 日，攻城战幕揭开。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4 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我方代表见面(一直到 6 号我军已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日夜询问战况；陈太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日探也进到黄桥以西 15 华里的石梅(失迷)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黄桥风云变幻。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我们，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正当顽军第三十三师一部向我黄桥东门进攻进入高潮时，翁达旅也从高桥南下了。4 日下午 3 时，据报翁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五、六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我赶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五、六里路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六旅的先头确已来到。

我在征得陈毅同志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

我一纵队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 3 小时的激战，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翁旅被歼后，战场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拚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我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

队伤亡颇大。敌人三十三师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恰在这时，听说奉命增援的老四团一个营由江南过来了，离黄桥镇还有二十里路。我便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同志们受到鼓舞，士气大振，都兴奋地回答："我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迎接江南主力！"陶勇同志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同志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顽固派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敌人死死顶住。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4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自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村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村附近构筑工事固守。而我第二纵队在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等同志的带领下，于当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一、第二纵队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并首歼三十三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然后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村附近的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

正当围歼战激烈地进行的时候，陶勇同志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军第三十三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加强了对李守维的围歼。

顽军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之一。虽然已被包围了，但李守维还想作困兽挣扎，拚命抗击我军的进攻。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我军多次攻击，进展不大。我军组织力量，调整部署，黄昏后发起总攻。

经过一夜激战，6日清晨，顽八十九军的军部被彻底歼灭了。李守维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极度混乱。但第三四九旅仍在拚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我展开逐屋争夺战。我军经多次白刃格斗，终将顽军反抗气焰彻底压倒，第三四九旅大部被歼灭，其残部沿原路溃退。但因地形复杂、桥梁早被我人民武装所控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呼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

（摘自粟裕：《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材料四　黄桥鏖战

独立六旅被歼后，韩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就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担任黄桥守卫任务的三纵队，战斗异常激烈。八十九军的三十三师猛攻黄桥东门，陶勇同志指挥部队连续击退韩军进攻。东门阵地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李守维亲率军部和一一七师三四九旅向黄桥急进途中，得知独立六旅被我军围歼，不但不去救翁达，反而在黄桥东北十来里的野屋基停留下来，紧急构筑工事。

根据指挥部部署，我二纵队于4日夜，插入三四九旅和八十九军预备队的空隙，经过八字桥，赶向如（皋）黄（桥）公路上的分界地区，切断韩军退路。一纵队根据战斗结束先后，在午夜之前，依次出发，向东穿插，绕过分界以北。一、二纵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配合三纵出击，首先歼灭三十三师主力。

5日上午8时，我率一纵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在距离野屋基七八里外的独立房屋设下指挥所，立即与二纵取得联系，查明敌情，勘察地形，组织进攻。与此同时，命令部队休息待命，不进庄子，露天休息，争取睡眠两小时，恢复体力，以利再战。

二纵已于拂晓开始攻击小二房庄的三十三师，并与三纵取得联系，战斗正酣。

正在此时，只听得野屋基方向枪声绵密。原来是李守维得知翁旅被歼，三十三师又正被我二、三纵围攻中，知道情况不妙，即率一一七师企图向东逃窜。正在此时，四团团长廖政国同志带着部队来到野屋基附近的小村庄，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杂乱，不象我军。他立刻派二营营长焦勇同志去搜索，一下子就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一个竟是八十九军军部的副官。当时，两军都在不断变更部署，我军上下都不知道八十九军军部正在野屋基。这一审问，便查明了他们统率机关的位置。焦勇问道："李守维呢？他在不在野屋基？"俘虏说："也在。"焦勇马上报告廖政国，并且建议趁李守维不知道我军已到他的侧背，猛一下捣烂他的军部，活捉李守维！廖政国是何等样人，胆大包天的！大腿一拍，立即采取断然行动，一面派人找纵队部报告，一面就指挥部队突然向野屋基进攻。

枪炮一响，一团也立即投入战斗。

于是四团从东南面，一团从东北面，向野屋基进攻。随后，五团也从三里庄向东插去，向东南方向攻击，这一下把八十九军军部打得大乱。

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赖以横行苏北的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李守维慌乱一阵后，还想作困兽挣扎，组织火力拚命抗击

我军进攻。我军在野屋基东北的土坝上，顶住了大部队顽军的突击。李守维甚至组织敢死队，一手快慢机，一手大砍刀，和我军肉搏拚杀。韩军要突围，子弹箱反正带不走，机枪真如急雨一般扫射。四团五连长马飞云左臂的伤口里不偏不差地射进了两颗子弹。一团政治处主任曾如清的军挎包上穿了两个子弹洞，又一颗子弹把军帽帽沿穿了个洞，帽子被掀落在地，居然没有伤及皮肉，真是靠马克思保佑！据指挥部告诉我：二纵攻打三十三师也十分激烈。所以陈毅同志战后向中央报告说："拼刺刀七八次"，"空前恶战"。

我赶到一团指挥所，一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到我来了，立即带着警卫员赶到第一线去了。乔信明同志是老红军了，曾经和方志敏同志一起被捕坐牢，被营救出狱后，又奔赴前线继续奋战。

黄昏，在前沿开了个小会，乔信明、廖政国一致同意趁着夜幕来临，进行近迫作业，挖到距野屋基二百米时，发起攻击。

半夜以后，我军突进野屋基，逐屋争夺，战斗更加激烈。2时许，李守维终于顶不住了，带着军部向北突围。他们溜到挖尺沟河边，只有一座小木桥，人马挤成一堆，木桥边沿断了，人马纷纷落水。我军在北面警戒的一团三营立即开火，顽军又向西边突。李守维将军部躲避在小周庄后靠河边的窑里，一面仓促组织火力掩护，一面驱赶士兵下水，企图泅水过河。我一团三营追到河边，向泅渡的韩军猛烈开火。李守维骑着马仓皇逃窜，在人马践踏中，抢先过河逃命，因躯体肥重，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河中。

顽军不善夜战，加上建制已乱，好象一群没头苍蝇到处奔跑。我纵队指挥所刚从野外坟包丛中移到村头小屋，架起电台，点上蜡烛，打开地图，便听得一片杂沓的脚步声。探头一看，黑压压的尽是人影。急忙吹灭烛火，奔出屋外。我和张藩同志带着指挥人员及电台竟和突围败军混到一起了。我们一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便命令司号长把顽军带到河对面我担架连方向去。司号长一声高喊："弟兄们，不准乱跑，跟我来！"顽军乖乖地跟着过桥。担架连一下抓俘虏500多人。

三四九旅不愧是李守维的嫡系，李守维把他们丢了以后，他们仍在野屋基拼死抵抗。我一纵发挥白刃肉搏特长，终于将他们压倒。溃散之敌，陷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呼喊的感召下，纷纷缴枪投降。

至此，韩军主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消灭殆尽，其余如保安十旅、保安三旅、保安五旅之大部，也被我军消灭。

（选自《征战纪事》作者：叶飞）

材料五　黄桥大战

在退出姜堰之前，陈毅同志就提醒各个纵队的干部：不论新四军是否撤出姜堰，韩德勤的大举进攻是必然要来的，各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

果然，韩德勤一次最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他命令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统一指挥，八十九军、独立六旅为中央纵队，由海安出动，经营溪、古溪分三路进攻黄桥以东和以北地区。命令十个保安旅为左翼纵队，由郭心冬指挥，进攻黄桥以东地区；命令两李部队和税警总团为右翼纵队，由李长江指挥，进攻黄桥以西地区。动员总兵力达十万余人。黄桥以南即是长江，韩德勤得意忘形地喊出："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

现在看来，韩顽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进攻，是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整个反共阴谋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月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

新四军撤出姜堰的时候，估计李明扬、陈泰运与韩德勤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便主动通知李、陈来接收姜堰。陈毅同志派朱克靖、吴肃同志乘坐大汽艇到曲塘，送了一批枪支给陈泰运。随后换乘小汽艇，吴肃同志回到指挥部，朱克靖同志去泰州见李明扬。他也随带一批枪支作为礼物，送给二李。他们向李、陈作最后呼吁，要他们深明大义，保持中立，自留后路。李明扬说："我目前不能再做调人，但也决不参加反共的内战，陈泰运也不会出力的。"朱克靖同志就留在李明扬那里。这样就解除了我左翼之患。

东线的各保安旅，名义上是韩德勤所属，事实上是各霸一方，热衷于设卡收税，敲诈勒索，真要打仗拚命，他们是不积极的。他们懂得，如果部队被消灭，官也就当不成，什么都完了，所以迟迟不前。如果新四军能够初战获捷，各保安旅就不敢蠢动了。

接着，我苏北指挥部召开各纵队负责同志的会议，陈毅同志作了报告，他指出了目前统战工作的成功，基本群众已经发动，已争取李、陈中立等等有利条件后，说道："现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就看你们指挥员的了。这一仗打得好，就能决定苏北的局面，反共浪潮就会低下去；打败了，就得重回江南，而且长江也过不了，只好象韩德勤说的：'到长江里去喝水。'"接着由粟裕副司令员作了战斗部署：三纵队守黄桥镇，待韩顽军进逼到黄桥，一、二纵队担任攻击，从黄桥镇以北迂回到韩顽军侧背，首先在营溪地区歼灭韩顽独立六旅，而后转向分界围歼八十九军。并指定第一纵队先派出两个营与顽军纠缠，查明情况，争取时间。

负责守卫黄桥的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团营干部会议，分配好战斗任务后，指着预先摆在桌上的一把马刀和一支驳壳枪说："同志们，黄

桥一定要守住,大家表表决心吧!如果谁让韩德勤的一兵一卒攻进黄桥,要杀头,要枪毙,随你们自己挑。"参加会议的人都说:"有我们就有黄桥!"

部队经过动员以后,士气十分高涨,情绪火热,到处都是磨刺刀的"嚓嚓"声。战士们说:"韩德勤要逼我们到长江去喝水,问我的刺刀愿意不!"提出了要三好三快:鞋子准备好,跑得快!子弹准备好,打得快!刺刀准备好,杀得快!

十月五日,李守维的八十九军前锋直逼黄桥来了。新四军第一纵队即派出先头两个营向东插去。和顽军接触后,查明从海安经古溪到分界一线为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其左侧为独立六旅,从胡家集经营溪直叩黄桥。一一七师为其第二梯队。

顽军拥塞道路,乱麻麻有如蚁群,到一村抢一村,到处捕捉民夫,强迫民夫抬弹药,挑东西,稍不如意就地枪杀,村庄被焚,烟火弥漫,大路旁倒着一具具尸体……真叫人惨不忍睹。正如黄桥战斗前夕流传开来的一首歌谣所唱的:

天上有颗扫帚星,
地上有个韩德勤,
手下白养几万兵呀,
专门欺压老百姓!

现在,这个"扫帚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激起了战士们的仇恨和义愤。

陶勇同志带领第三纵队坚守黄桥,英勇无比地战斗着,非但不让顽军进入黄桥一步,还给予顽军以重大杀伤。战斗非常激烈,炮声轰隆隆吼成了一片……。

担任出击的一、二纵队,隐蔽在顾高庄、横港桥一线。他们选定的首战歼灭目标是顽军最精锐的独立六旅。

这独立六旅装备非常漂亮,外号"梅兰芳部队",一色崭新的中正式七九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枪上火漆一点没褪,照得见人。在顽军中地位很高。旅长翁达还是个中将衔。一纵与这个部队是交过手的。半年前当韩德勤包围津浦路东的我根据地中心半塔集时,一纵一团及四团一个营西进增援,打的就是独立六旅。一纵部队一听说是老对手,大为高兴,营长汤万益同志说:"上一次我带着一个连追他一个团,追得他丢盔弃甲,七零八落,这一次一定不让他逃出我的手心。"叶飞司令员对他说:"给独立旅逃掉一个兵我就找你!"叶司令员决心以一团作主要突击,四团在右翼协同突击,迂回到独立六旅侧后。于是一、四团直冲向敌阵,到达八字桥后,战斗就打响了。

开始,敌人的机枪声压住了新四军的手榴弹声,但过了不久,手榴弹声就压住机枪声了。战斗顺利地发展,敌人逐渐退缩。到了黄昏时分,一纵队指挥部不断地接到一、四团的战斗报告:"敌十六团团部被歼灭了,捉了四百多俘虏!""十八团被歼灭了,轻机枪缴了几十挺!"最后来了这样的报告:"据俘虏来的独立六旅旅部副官说,中将旅长翁达自杀了!"

这时侯,距离打响的时间还不到两小时。枪声还在响着,但已经是新四军的战士们带着欢乐的心情,试打新缴获的枪支了。

(选自《新四军故事集》)

材料六　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嗳,
黄黄烧饼慰劳忙嗳。
烧饼要用热火烤嗳,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同志们呀吃个饱,
多打胜仗多缴枪。
………

黄桥烧饼圆又圆嗳,
圆圆烧饼多好看嗳。
烧饼劈开不好卖嗳,
国共分裂更危险。
同胞们呀团结紧,
反共就是准汉奸。
………

黄桥烧饼千万千嗳,
千万烧饼上前线嗳。
保卫黄桥总动员嗳,
苏北换了新局面。
同胞们呀团结牢,
一打打到黄海边。
嘿呀呀咿哟嘿嗬嗨,
一打打到黄海边,咿呀嗨。
………

(选自《新四军故事集》)

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

背景介绍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经济困难的号召,执行"屯垦"政策,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于1941年3月,由王震旅长率领,开进南泥湾。南泥湾是陕西省延安

东南90华里的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西界鄜甘境内洛水与延水的分水岭，北靠临镇川与延水的分水岭，东与金盆湾地区接壤，南迄固临境内黑蛇川与临镇川的分水岭，纵横各80里，计6400平方里。1940年前，仅有二三十家老户集中于南阳府川下游一带。若干年来老百姓所以裹足不前的原因：一是怕吃柳根水，小孩成了柳拐子，妇女不生孩子；二是怕霜害，庄稼难成熟，这里全年只有100天左右气温适合种植；三是怕土匪和野兽，这里时有野猪和豹出现，危害人命。

部队初到南泥湾的时侯，那里是一片荒山丛林，树木丛生，野兽群游，地气潮湿，房子极少，特别是九龙泉、史家岔一带，连老百姓都没有。指战员们先选择干燥的草地支起帐篷暂住，开始打窑洞，只花了两个星期就打出了窑洞。当时生产还没有基础，只能从群众及政府机关借到少量工具，依靠指战员们的生产热情和集体的劳动力来开荒种地。当时指战员们是在随时准备作战的情况下执行艰巨的生产任务，一个连约种3至4千亩地，一人最少种35亩，平均每人种40亩，有些劳动力最强的同志，自动提出种80亩。一般的每天每人挖生地6.7分至1亩多，熟地每天每人可以挖几亩地。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下山。开始的时候，大家手上都打了许多血泡，手指屈伸不得。任务重，很艰苦。有一个时侯缺乏粮食，大家多吃黑豆充饥，有时只好吃尚未成熟的南瓜、土豆、西红柿，直到秋收打下粮食，才开始好转。在衣服方面，没有布来添置，发给每人6斤生羊毛，将它撕碎、晒士，用树枝弹，放在口袋里，经常是一边走，一边拈线。他们还自己动手，开了许多工厂，有木工厂、织布厂、染料厂、鞋厂和其他工厂，有的连还养了猪、羊、鸡等。

经过三五九旅指战员的艰苦奋战和辛勤劳动，1941年开荒种地1.2万亩，粮食自给达到70%，经费自给78.5%。1942年，种地2.68万亩，达到粮食自给78%，经费自给90%，蔬菜、肉、油及鞋袜已全部自给。1943年，种地达10万亩，粮食全部自给还有余。1944年，种地猛增到26.1万亩，产粮3.5万多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缴公粮为1万石。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毛泽东、朱德、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续范亭等人都先后视察了南泥湾，并赋诗盛赞南泥湾。朱德在《游南泥湾》诗中，兴致勃勃地称赞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英雄事绩，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大生产运动锻炼的三五九旅，人强马壮，斗志昂扬，1944年秋天又开赴抗日前线，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立下了新的战功。

材料：

- 南泥湾屯垦
-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 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

材料一　南泥湾屯垦

安营扎寨

一九四一年三月，我们肩负着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三五九旅部队，从绥德向延安的南泥湾出发了。

陕北的春天总是来得较迟。延河刚刚解冻不久，从塞外吹来的风还带着几分寒意；可是，每一个指战员的心却是热烘烘的，而且仿佛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兴奋而又激动，歌声和欢笑一直伴随着进军的行列。

部队自从驻守陕甘宁边区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反投降，反妥协，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现在又要以开垦南泥湾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

毛主席的号召和指示，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当我们经过延河和雄伟壮丽的宝塔山附近时，不由得时而回转头来，以崇敬的心情望着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杨家岭。回忆在党校学习时，我们伟大领袖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的教导；那种深入浅出，智慧、乐观的讲话，真使我终生难忘。毛主席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出：“……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些话，一字一句地在我的脑子里跳跃。

“毛主席啊！请你放心吧！我们决不辜负你的教导，一定用我们的双手，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我一面走，一面望着杨家岭心里暗暗地说道。

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延安，踏上通往南泥湾的大路。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百余里，是延安县金盆湾区的一个乡。浩浩荡荡的开荒大军，通过七里铺，转入山沟，渐渐地看到了茂密的山林和宽旷无边的荒草地。早晨的阳光，透过山沟里升起的薄雾，照射着这座寂静的山林，照射着刚刚解冻的清水河，为山林溪流披上彩色的外衣。山沟里，古木丛林遮蔽着天空，从正在发绿的枝芽上，筛下了点点阳光，撒在松软的土地上。部队在丛林中行进，但见高大的白桦挺立在丛林之中，一簇簇的海棠、栗树、红枫和正在发芽的野葡萄、山楂、杜梨，构成了花团锦簇的百果林。

多么美好的境地啊！每个指战员走过这景色如画的

地方，都兴奋得欢笑起来。

越过五六十里的山沟，登上山岗，纵眼一望，到处是大片肥沃的土地，漫山遍野蒙着白蒿、野花和荆棘。抓起一把泥土放在手心里，在阳光下黑油油的直打闪。南泥湾啊！你原是边区的宝地，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把你开垦成为富饶美丽的田园。

这条山沟，从前有通往临镇、宜川的商道，后来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成了"绿林豪杰"的出没之地，有名的曹老九、王二登都曾经纠集一伙人马，在这里干过"劫路买卖"。直到陕北红军到了这里，他们才逐渐销声匿迹了。因为多年的荒乱，老百姓早已逃光，道上野兽出没无常，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再走这条路了。这样美好的土地，这样富饶的山林，竟因此沉睡了许多年。

近几年来，虽然已有人来过这里，砍伐林木，烧木炭，锯木板，但都是时来时去，所以这里还是很不容易看到人的踪迹。

陈宗尧团长领着部队，刀劈斧砍，开辟了一条进入南泥湾的道路，把队伍带进了金盆湾。

金盆湾这地方，有三五户人家，他们春耕时来，秋收后就又走了。留下几孔古老的窑洞，零散地、静静地排在这里，据说这还是清朝同治年间修建的。窑门已经塌了，里面熏得乌黑，有经验的人说：熏黑的窑洞结实。于是，这儿便成了我们七一八团的生产指挥所。也和战时一样，全团指战员立刻围绕着这个指挥所安营扎寨，用树枝架起草棚，尽量舒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第一个劳动日

三月十二日，我们正式进入了消灭梢林荒山的激烈战斗。这天，东方的启明星还在眨眼，陈团长就带着参谋长、营长和其他的干部，从指挥所出发了。他们就象战时观察地形和部署战斗一样，从这个山沟到那个山岗，细心地观察着一片片的梢林荒地，分配着任务。与此同时，战士们也象战时一样，紧张地进行各种准备。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是擦洗武器和检查弹药，而是给镢头安上新的木把。可是镢头太少了，每个连队只有三十来把。没有分到镢头的，就整理斧头、绳索，准备去砍伐修盖住所的木材。

新的战斗开始了。陈宗尧团长背着镢头，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就象每次冲锋陷阵时一样。山沟里，山顶上，霎时荡起一片欢腾的歌声。

处女地上燃烧着狼牙刺的烟火，一团团烟云冲上天空。欢乐的笑声刚刚平复，又荡起歌声：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炊事员、勤务员们干完了自己的工作，也都悄悄地爬上了山梁，抢镢头替换挖地的同志，于是，歌声中又掺杂了阵阵欢笑和友谊的争吵。

在夜色笼罩大地的时侯，指战员们才背着枪和镢头，回到新的营房。新的营房就是各连队用砍伐的树枝才搭起的新木棚，有宿舍、厨房，有俱乐部兼食堂。新房整整齐齐的，新鲜而又凉爽。经过一天的劳动，人们都有些疲乏了，尽管月牙儿已挂在蔚蓝的天空，可是，谁又愿意立即入睡呢？干部们都在交换情况，总结经验；战士们在新居的周围，三三两两地谈论着生产自给、保卫边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生活。

忽然，随着一股风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呜——呜——"的吼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原来是一群野狼从山梁上跑过，逃进森林深处。

野兽，这昔日荒山的主人，不得不给我们这些高擎火炬、放声歌唱的不速之客让位了。

陈宗尧开荒小组

陈宗尧团长是战斗中的英雄，又是生产中的模范。他亲自领导的团部生产小组，是由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八人组成的。这个小组在开荒战斗中，一直走在最前面。

部队中很多老战士都熟悉陈团长。他从小给地主放牛，十七岁参加土地革命。二十岁担任湖南茶陵县的军事部长。一九三二年起，先后在红军里担任独立营政委、模范团政委、师参谋长。抗战开始后，曾率领著名的"平山团"在晋察冀的滹沱河畔、井陉煤矿附近打击日寇。和王震旅长会合后，又转战同蒲路侧的雁门关内外，打过不少胜仗。一九四〇年，部队被调到陕北，又协同兄弟部队，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长期的战斗生活锻炼，使他养成刻苦耐劳的作风。开始到南泥湾生产时，部队没粮吃，他领着战士们用来回四天的时间去延长背米。他第一个渡过流着冰凌的延河，脚被冰块碰破了，战士们要帮他背，他怎么也不肯；要他少背些，他还是要背百儿八十斤，一歪一瘸地走了回来。

和他在一起劳动的战士，象一群和睦的弟兄，边唱边说，兴致勃勃，各人谈论着自己家乡的风俗和耕作方法，边谈边研究生产技术，学习生产知识。陈团长举起亮晶晶的镢头，弯着腰，挥着汗，领着大家不停地挖。挖倒的梢林，大的当木材、作柴火；碎小的树枝和草根，烧在地里，作了肥料；把整块整块的梢林土地，一镢一镢地翻得平平整整，土块打得碎碎的，然后播上了谷子。

尹参谋长和身体健壮的苏虎明比赛。他们都已经挖了一亩五分了。陈参谋量了参谋长挖的那块地以后，又去量小司号员王鸣章的。他一边量一边问："小劳动英雄，你挖了几行啦？"王鸣章抿着嘴，微笑着，抬头看看团长，团长正举着镢头，猛往前赶。他没有作声，又埋下头挖起来，恐怕团长走在他前面去了。谁也不肯落后一步。

天色已晚，大家收工回营。坐在破窑前面，边吃饭，边聊天。陈团长笑着说："我今天挖得太少，还不够一亩呢。"通信员李吉子说："你今天跑了几个山头，还帮各连去挖，这难道都不算吗？"

梢林月夜，阵阵凉风吹起，尹参谋长说："天凉了，我们回窑吧！"陈团长兴致勃勃地说："找几个人打几把扑克吧！看哪两个输了，明天罚他多挖三分地！"小伙子们笑着，在那眼裂了半边的破窑洞前，围着团长玩了起来。

玩完扑克已是深夜了，可是精力充沛的陈团长，仍然不肯休息，又请来团党委委员们，研究明天的工作，决定对各连的工作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第二天，陈团长背着镢头，从南山走到北山，查看各连的开荒情况。一个老战士远远地看到团长的身影，兴奋地说："同志们！团长看我们来啦！"一个刚从伪军中解放过来的新战士望望那个背镢头的人，有点不相信。因为在反动军队里，他见到的团长，一出门后面至少跟三个护兵。瞧那人背着镢头，怎么会是团长呢！直到他确定知道是团长，才感慨地说："我今天才真正知道，八路军的官兵完全一样。在反动军队里，一个班长、排长，都摆起臭架子，随便打人，谁还敢见团长啊！"

陈团长经常这样地走遍各连工地，一面检查研究，一面了解下面有什么问题，和大家说说笑笑。战士们开荒的劲头更大了。他们又听说，陈团长的开荒小组，只有八个人，十七天里就开荒一百三十多亩，都受到很大的鼓舞。十连战士就自动发起十镢头运动，在收工前后，战士们喊着："这是给团长代耕的十镢头，使劲挖啊！"三营战士们，向团长保证：每人每天，都要超过一亩。"

热气腾腾干劲冲天

战士们干起活来，真象打冲锋一样，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山上山下，到处听见刀劈斧砍的响声，但见镢头挥舞，泥土纷飞，什么狼牙刺、老蒿子、蝎子草、羊胡子草……都在战士们面前纷纷倒下，一块一块新开的土地，在战士们脚下展现出来。有的被狼牙刺、梢子划破了脸，戳伤了手，他们包扎一下，又投入战斗。手磨肿了不喊苦，腿痛腰酸也不停脚。炊事员送饭来了，生产小组长向前又指出一个目标："同志们，再加一把油，挖到那儿再吃饭。"战士们一声呐喊，镢头象雨点一样，劈里啪啦翔向前去，一块新地片刻之间又开了出来。有些同志饭碗一放就跑去挖地了，领队同志劝也劝不住。到收工的时候，战士们总要再发起几个"冲锋"，非要开到一个山洼或一个山峁才肯停止。

劳动竞赛的热潮，象春风野火一样，迅速遍及整个工地。班与班提出挑战，排与排、连与连展开竞赛。不断传来了新的捷报。李位同志一天开荒三亩三，赵占奎同志开荒三亩二，五连平均每人开荒二亩五……山上那个班里，唱起了快板：

镢头低，要用力。
慢慢挖，莫着急。
挖的深，挖的细。
要求并不高，每天一亩一。
山下的战士马上应和：
分开地，见高低。
每个人，要尽力。
谁先完，谁胜利。
接着，另一个山头上又响起了歌声：
铁打的胳膊铜打的肩，
一镢下去尺二三，
草根儿嘎巴声响，
土块儿似浪向上翻。
歌声一起一落，又有人回答：
你一镢啊！我一镢啊！
比比谁的气力壮！
你一镢啊！我一镢啊！
开荒好比上战场！
……

快板和歌声，就这样此起彼落，震荡着整个山野，即使你闭上眼睛，也能感到战士们那种火一样的劳动热情。一个个不但干劲冲天，还个个献计献策，动脑筋，找窍门，有的用"火攻"战术，先烧野草，再来挖掘；有的用"打包围"战术，四面包围，向中进展；有的用"突破"战术，中央突破，四面开花，先行分割，再分别"歼灭"……因此开荒纪录日日上升，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三营模范班长李位，不但自己干得好，而且领导全班经常保持平均每人每日开荒一亩五以上的纪录。他自己使的那把镢头，足有五斤重，六七寸宽，高高举起，狠狠落下，一镢一大片。在一次比赛中，他一天开荒地三亩六分七，激励了全团同志的斗志。九连连长白银雪，急起直追，在连续十五个小时的劳动中，挖了五亩四分六，获得了全旅第一名。战士杜林森决心要突破这个纪录。他身高力大，干劲足，技术高，善于使劲，又善于用气。他抡着大镢，一分钟里，能连续挖五十多下，在一天里开了六亩三分五，达到了更高的纪录。

巨大的鼓舞

五月里，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树木下已出现黑乌乌的浓荫，海棠开出白花花的花朵。第一次播下的谷子，已长出茁壮的嫩苗。

一个晴朗的日子，王震旅长陪着朱总司令，骑着马来到了。他们从孙家砭开始，沿途视察新开的土地，一阵儿策马前进，一阵儿下马步行，边走边看地来到了金盆湾。

为了招待总司令，陈团长派通信班的同志，到窑门前的小渠里去捉小鱼，另几个人到附近的山沟里，去采野芹菜。总司令在窑门口坐下后，一边听汇报，一边慈祥地笑着，并不时地点头，就象老朋友们在一起谈天似的。

总司令总是笑着，谈着南泥湾的美好远景。他离开指挥所，又找了好几个干部和战士谈话，征求他们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他又向我们讲解了"屯田政策"的伟大意义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伟大号召，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有其更深远的意义。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我们这么多机关部队，都要靠人民负担，怎么行呢？我们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我们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毛主席说：敌人要封锁我们，我们对敌人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人民的军队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

我们正在思索体会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总司令亲切的教导，通信员端来一盆辣子炒的香喷喷的小鱼。大家立刻围着一个小桌子，陪总司令吃饭。总司令一边吃着，一边称赞烹调技术和南泥湾的生产。王旅长对我们团的几个干部说："今年你们要达到自给，明年要向边区政府交公粮，做到'耕二余一'，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陈团长当即表示：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这样好的土地，有我们这些如龙似虎的战士，相信可以做到的。这一餐饭大家吃得特别有味，心情也特别畅快。

夜里，皎洁的月光照在我们新开垦的土地上。总司令和王旅长同干部们谈话后，站在窑洞门口了望着新营房的万家灯火。五月的夜，在新开垦的稻田、水渠里，到处是一片呱、呱、呱的青蛙的叫声。这种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蛙鸣，使人们仿佛回到了江南的农村中。南泥湾的景色很快变了。总司令欣赏了这工地夜景之后，就在这个塌了前沿的窑洞里，和战士们一起度过了这舒适的一夜。

丰盛的收获

从旅首长、团首长到战士、饲养员、炊事员、干部家属，积年累月的辛勤劳动，在南泥湾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已经做到两人一头猪，一人两只羊，鸡鸭成群，牛羊满川，不仅做到全部自给，而且粮食可以积余一年，做到了"耕二余一"。我们不只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战士们吃得好，穿得好，丰衣足食，人人红光满面，身强体壮；而且在生产斗争中，还大大加强了军事政治训练，加强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使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不可战胜的钢铁部队。

此时的南泥湾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遍地是庄稼，
到处是牛羊。
…………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

（左齐，《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二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1943年7月，一天中午，我们正冒着炎热，在玉米地里锄草，从旅部跑来了个通信员，老远就喘吁吁地喊着："快点，旅长叫你们回去几个人！"我插上锄，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也不知道，快走吧！"听说旅长叫快点回去，心想：一定有紧要的事，不然旅长怎么会叫人跑二十多里路来叫我们。我们几乎象长了翅膀，一气就"飞"到了旅部驻地——金盆湾。王震旅长象是刚刮过脸。我们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们回来了。快准备，明天毛主席要来！"我一听，简直要跳起来，生怕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又问了一句："是毛主席要来吗？""是毛主席！"王震旅长笑了："怎么？高兴吧！"

真的太高兴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接受了旅长的吩咐，我们忘了吃饭，愉快地忙起来。有的同志去打扫窑洞，有的去收拾新盖的房子。炊事房的同志，更是个个乐得闭不上嘴，到菜园里去洗青菜，到猪圈里去捉肥猪，也有的去抓小鸡。这个说："咱们要把生产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一点，让主席看看。"那个说："那怎么行？凡是生产的都拿一点，一间窑洞也放不下啊！"

第二天一早，窑洞外刚刚放明，我们就起来了。心里跳着，脸上笑着，一个劲向通往延安的路上看。从延安到我们这儿，大约六十华里。我们计算着：毛主席吃过早饭出发，要是骑马，三个多钟点就到了；要是乘汽车，只要一个钟点就到了。

等啊，等啊，一直到快开午饭的时候，还是不见主席来。有的同志说："主席工作太忙，可能又给什么大事耽误了，不会来了！"有的说："你别瞎参谋，主席说今天来就一定来！"其实就是说这话的同志，也暗暗担心：可不要真有事耽误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汽车驶来，毛主席微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不禁欢呼起来。主席挨个和欢迎的人握手，并向王震旅长说："庄稼生长得满好啊！"

随同主席来的警卫员同志告诉我们，主席一路来，一路察看了田里的庄稼。还和在田里生产的同志谈了话。因此，整整走了一个上午。

已经是开午饭的时候了。旅首长请主席到新盖的房

子里休息，嘱咐我去厨房准备饭。主席笑着说："刚刚来到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罗！"说着也没进房休息，同旅长、政委、副旅长等首长去看新盖的房子，看新开的窑洞。

我顾不得跟主席去走，赶忙往厨房跑去。大师傅已经喜气洋洋地忙开了。不论是炒的、煎的、炖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赶忙向主席敬礼，同时回答主席说："过去没养过猪，养得不肥。"

主席和他握过手，问他多大岁数，家乡是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侯开始做这养猪的工作。

老杜头回答主席说，他干这工作才两年，经验不多，摸索着干的。主席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很光荣。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生活，你说对吧？"

"对，对！"老杜头快活地回答说。

主席最后向老杜头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不远处山坡上，是成群的牛羊，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动的小河边生长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稻苗，还有一块块绿色的菜田。万物在生长，万物都象是在歌唱。

主席走了许多地方，仍是毫无倦意，在旅首长的陪同下，沿着田边的小路，边谈边走，视察着战斗的南泥湾，美丽的南泥湾。……

（摘自董廷恒：《毛主席视察南泥湾》）

材料三　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响应着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号召，我们革命军队经过春天竞赛开荒和播种，南泥湾荒野变成了良田；经过夏天突击除草和战斗中辛苦的经营，南泥湾长遍了蓊郁的稼禾；现在是秋天，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南泥湾，正满山遍野弥漫着一片丰饶的果实。

南泥湾有群山环绕。一望不断的山峦，恰象海洋里波涛起伏；有密林大树，吃不尽的野果：野杜梨，一颗象一撮果子酱；甜美多浆的野葡萄，还有山里红，野林檎……。大树可以作梁作柱，作建筑木材。纯朴的农家，家家呈现着一种安乐气象；妇孺老人都吃得红红胖胖的，透露出饱暖健康的颜色；树边散放着牛羊，屋顶窑前堆放着鲜红的辣椒，金黄的包谷，硕大的南瓜。军队和人民象一家人似的亲切，遇到旅长，一大群人又笑又说的问："同志哪哒去？"这里是繁荣而又热闹的，象朱总司令说的，是"花花世界"！

据说一两百年前，南泥湾曾经繁盛过一个时期，山庙里残碑记载，说这里曾有过街市，后来满清专制，造成的民族牢狱，逼得陕甘回民群起暴动，这一带的居民才纷纷逃难，奔走他乡；在这里新开窑洞的时侯，曾开到过旧窑，里边古老的碗钵家具还历历可辨，想是那时居民一听乱信，连收拾都来不及，就慌忙逃跑了，情景该是很惨的。自那以后，这里田园就交给了荒野，窑洞房屋任风雨侵蚀倒塌，日久年远，就遍地是蓬蒿，遍地是梢林乱树，成了豺狼野兽的巢穴，成了土匪强盗出没的场所。

我们革命队伍，八路军，到这里屯田，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自己动手，从榛莽丛里开出道路。曾必须露宿野餐，就荒山坡上开窑洞，盖房屋；从烧石灰，烧砖瓦，伐树解板，安门窗梁柱，以至钉头木楔，置备桌椅家具，无一不是自己动手，终于有了安适的住处。住处安置未完，就开始垦荒种田，朱总司令说："生产与战斗结合"，这开荒正是一场剧烈的战斗；征服自然，而又改造自然。

开荒计划，每人六亩，随后变成群众突击、竞赛运动。两位团长的手上两次三次地磨起了泡，一连、九连出现了一天开荒五亩的劳动英雄。最后，纪录打破到这种程度：每人平均开到二十亩，三十亩！走到无论那个单位听听，都是一些惊人的数字；二营一个连开二三千亩，"美洲部"二万亩，一个模范排长，一个人开了四十亩，保证一天是一亩八分到二亩，迷信的人会说："这怕有神灵帮助吧！"但我们革命者要告诉他：这是集体主义的威力，是革命英雄主义！

现在的南泥湾：上下屯直到九龙泉，一连一二十里都是排列整齐的窑洞，窑里窑口用石灰粉的雪白。列在山脚下的房屋顶泥上了白垩，或盖了青瓦；一条山沟，成了宽阔绵长的街衢。山沟溪流的两岸，自然修齐的树行，伸展着清幽的林荫路。另一处有造纸厂、木工厂、铁工厂。造纸厂，用马兰和稻草造纸，足够战士学习及办公应用，还有多余的用来换书报读物。木工厂里造着精致坚固的桌椅、风车、纺锭；铁工厂，造铁铣、镢头、各种农具，也打锋利的梭标，给群众以保卫边区的武装。又一处有闹市，三十户至六十户的商家，有合作社，也有私人营业。他们每天早晨把街道扫得干净利落，熙来攘往的军人和农民，亲切地招呼着，呈现出一种蓬勃活泼的气象。——就在这里，映入我眼前的一座楼房，那是一座休养所。建筑都照科学方法：壁炉、阳台、通气道，各种设备都有。这是屯垦的战士自己动手为我们休养员建造的，从设计，取材，烧砖瓦石灰，到垒墙架柱，铺地板，安门窗，完全出自战士的心裁与劳力。这是革命战士爱护自己阶级战友的表现，是精神行动团结一致的典型。

现在的南泥湾：水地种稻，旱地种麻，种菜蔬，种烟叶，山地种谷子，糜子，洋芋，杂粮。还没开垦完的水草丰茂的地方，就是天然的牧场。稻田傍着清溪，一路蜿蜒迤逦而去，恰以用黄绿两色铺绣而成的地毯。沉甸甸的稻穗，已吐露了成熟的颗粒。论麻，只"美洲部"就种了四千亩，麻子可收三百五十石至四百石，估计榨油两万斤，食油灯油足够全部自给。二营种的，每个战士可分五斤麻，

足够打三四双草鞋。论菜蔬，长的茶碗般大的大宗洋芋不算在内，只南瓜、辣椒、茄子、西红柿，每班战士门口都红红绿绿堆满了。其它秋白菜、萝卜、葱，细致些的如芹菜、芫荽，茴香，还都长在地里。贺营长说"战士们一个班象一个小家庭，除了全团、全营大家种植而外，他们还各有小单位的经营。利用整训闲暇，分工劳动，你种烟，我种辨椒、西红柿，他种地瓜、甜瓜。我们战士今年每个人吃了二十个西瓜呢……"。×团里，战士吃西瓜没有这样多，每人吃了十四个，但每人却又外加了一筐甜瓜！

谷子、糜子是部队的主要食粮，自然也是主要的生产。因此在南泥湾，只要抬头一望，满眼都是谷子、糜子，亩数是没有方法确切统计的。谷子长的好，大都是齐腰那样高，穗头大的有一尺六寸，普通在一尺左右。糜子稍差，因为正当应该除草的时侯，部队开到前方，以致失了农时。但估计收获，成绩还是可观的，某营四十二个劳动英雄，每人可收八石粮，在营部整修下可盛一千八百石的米仓。今年部队粮食全部自给是绰绰有余的。目下，各部门准备秋收已鼓起了热潮，处处都预备齐了扁担、绳架、镰刀；修好了筐篓、地窑、仓库（仓库怕遭老鼠，都填了石灰，又铺了木板；粮食怕潮湿生霉，仓底下特别预备了火坑）。一个战士王子耕在他们班的墙报上写着："秋收要注意两点：不要糟蹋一粒粮食，用突击精神来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战士对秋收的热忱和信心。

农业生产外，有工业生产。捻羊毛线在普遍经常地进行着，每两捻到四十丈到八十丈，每斤按成品质量，分别分给四十、一百到二百元的奖金。每人缴了四斤羊毛的毛线，到今年阳历年底，就可都有一身黄呢子军衣。此外，绩麻，编筐、打草鞋，用桦树皮制玲珑的饭盒、菜盒、墨盒，各有熟练的技巧。

除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还有畜牧。部队单位左近，常常有成群的牛、羊、马匹。牛不穿鼻，马不系辔，就那样无拘无束地啃草、饮水，用尾巴打着蝇虻。关于养猪，这里部队研究出了最好的科学方法：猪卧的地方（要干燥，特别打了窑，铺了木板），散步的地方，大小便的地方，喂食的地方，都隔了木栅栏，分的清清楚楚；为了防备狼和豹子，周围又打了土墙。因此，猪也能保持它应有的清洁，不瘟，不病，一天喂三顿食：酒糟、糠秕、剩菜、剩饭、碎洋芋。架子猪（三十斤以内）每天可长四两肉，肥猪可长十二两。因此战士能保证，每人每月吃大秤四斤肉，现在军队首长又提出号召：今年年底要做到战士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口猪，十人一头牛。张团长说："我们一定要完成！"有谁惊讶地说："这不成了'地主老财'了么？"是的，这是革命"地主"，建设的是革命家务。这地主，不剥削人，用地利，和自己的劳力，自手起家，大家动手，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没有！我们每个战士，节约储蓄，加入军人合作社的，三十元一股，常常有人入到三十、四十股呢。过中秋节，每人吃到半个西瓜，三个月饼。

其实，八路军在南泥湾，生产还是次要的，但已做到了全部自给，衣食住行，不要群众一粒米，一寸布，还反过来帮助群众，保护群众，成了古往今来世界上少有的军队。——它主要的还是整训与教育。关于习武，营房附近，处处都是靶场，投掷手榴弹场。靶场里从早到晚都有步枪声，机枪声，战士普遍打起靶来都是十环，八环，特等射手，更是百发百中。投掷场里，也是从黎明就有人拿了手榴弹练起，连文书、炊事员都参加。掷的又远又准的投弹手，各单位天天都有出现。在文化教育方面：每个战士都要识字，学文化。战士差不多都能写日记，有很多能听讲记笔记。学习模范朱占国同志就在这里。随便拿一个战士郭文瑞的"练习写作"的本子来看，就可以发现这样简洁朴素内容具体的文字！

"卫生员高苏文同志，入伍前不识多少字，可是他对学习很虚心，特别是在开始生产以来。

上山劳动时，大家都休息、吸烟，他一个人坐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书。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画字。不认识的字就把它记在小本子上，回到家脸也顾不得洗，就向指导员问字。

劳动一天够疲劳了，夜晚他还在灯光下面写日记。从开始生产到现在，他的日记从没间断过。

他已经读完了很多青年读物：如怎样把庄稼种好，地球和宇宙，小尾巴的故事，临机应变、水等等。

他现在已识了二千字。日记写的通顺。他的学习是在一天一天地进步着。"

"当了三天八路军，什么都学会了。"副团长说。的确是这个样子。在一个班的墙报上有一张画，题字是"擦拭武器，打击敌人！"竟也画的极生动有力呢！在部队里文盲是肃清了的。

更真切地说，八路军生产、教育、解决供给，提高质量，更大的目的是为了战斗，那战斗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在敌人后方，抗击敌军伪军，八路军是常胜军，是世界闻名的武装，日本强盗听了常打哆嗦，在这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它更表现了忠贞与英勇。

去南泥湾的道路是开阔的，汽车可径直上下，大车畅行无阻。那是革命军队自己动手开辟的路。是走向崭新的幸福的社会的路。

（载1943年10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作者：吴伯箫）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背景介绍

1940年3月20日，在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青岛会谈的基础上，汪伪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伪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案，决定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旗，但另附加标志，成立日期为3月30日。21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等提案，并决定废止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名称，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等。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宪政》、《重庆政府处置方法》等提案，并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各部各委员会的人选。会议于22日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10人：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未计汪精卫)；临时政府5人：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维新政府5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国家社会党2人：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2人：赵毓松、张英华；无党派4人：赵正平、杨毓洵、岑德广、赵尊岳；蒙疆联合自治政府2人：卓特巴札布、陈玉铭。这次会议，完成了汪伪政权成立的全部准备工作。

3月30日，在日本特务在华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的首脑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还都宣言"。同日，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宣布取消，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伪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形式，设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汪精卫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为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院长；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等14个部；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长由汪精卫兼任；下设办公厅、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等。伪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政府，以及南京、上海、汉口三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其先后成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有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开封绥靖主任公署、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等。伪国民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对广大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和经济掠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犯下了滔天大罪。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即告瓦解。

材料：

- 粉墨登场
-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向内阁报告

材料一　粉墨登场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虎踞龙盘，气势雄伟，然而这六朝古都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沦陷以来，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已是满目疮痍。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早给日军捣毁得支离破碎，汪伪国民政府就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国旗"，可在每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上方都附有一片黄色飘带的"辫子"，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黑字，字体却五花八门，有楷书、行书、隶书，还有手写体、印刷体，应有尽有，真是"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而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又出现了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按照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算是完成了任命手续，他们已经挟着由印铸局为之预制的各该机关印信，回到自己的"衙门"，准备启用。伪政府各院、部、会、署所分得的地址是：

（甲）伪中央政治委员会
-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 办公厅——前考试院衡鉴楼

（乙）伪国民政府
- 大礼堂——前考试院明志楼
- 办公厅——前考试院衡鉴楼

（一）伪立法院
-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 办公厅——前考试院西部

（二）伪行政院
-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 办公厅——前考试院公明堂

1. 内政部——前南京市政府原址
2. 外交部——伪考试院东部十九号至二十二号
3. 财政部——前财政部原址
4. 教育部——前中央庚款委员会
5. 军政部——伪中央党部九号楼下
6. 海军部——前海军部原址

7. 工商部——前教育部原址

8. 农矿部——前中南银行旧址

9. 交通部——前行政院后座

10. 铁道部——伪交通部前座房屋

11. 宣传部——伪国货银行一、二、三楼共三层

12. 司法行政部——新建房舍

13. 社会部——伪中央党部四号楼上

14. 警政部——前中央研究院原址

(三)伪司法院——前南京市政府原址

(四)伪考试院——前国民政府原址

(五)伪监察院——前国民政府原址

(六)伪五院外:有赈务、边疆、侨务、水利四个伪委员会及各伪院部会署队等伪组织其地址如下:

1. 赈务委员会——伪中央党部八号

2. 边疆委员会——伪中央党部二十四、二十五两号

3. 侨务委员会——伪中央党部二十三号

4. 水利委员会——旧址

5. 参谋本部——前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

6. 军事训练部——伪中央党部九号楼下全部

7. 政治训练部——伪考试院西部四、五、六号

8. 军事参议院——伪绥靖总司令部

9. 军事委员会——前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

10. 航空署——伪考试院西部三十四号

11. 宪政实施委员会——伪国民大会会堂

12. 伪国府音乐队及卫队——伪考试院西部二十六至二十九号

这天清晨,汪伪汉奸头目一个个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下车后鱼贯进入大礼堂,参加"还都"仪式。会场气氛沉闷,与会者有穿军装的,有穿蓝袍黑褂的,彼此见面后,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便默然地站到早已用粉笔圈好的位置上。汪精卫身穿一套晨礼服,白净净的脸上失去了往日趾高气扬的神采,显得格外的苍老憔悴。他悄然走上主席台,以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身份,有气无力地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当天,伪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其内外方针。对外强调"与日本共同努力,本着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叫嚷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同时煞有介事地规定重庆政府军政人员务必于近期内到南京报到,规定国民党军队"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并宣布:"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同一天,临时、维新政府分别发表解散宣言,竭力粉饰其卖国行径,说他们"鉴于国势濒危,民生垂绝,凛匹夫有责之义,鸠合同志,不计毁誉,于水深火热之中,为被发缨冠之举,以冀保一隅之元气","殚心竭力,尽瘁国事",现在汪伪国民政府已举行"还都"典礼,新老汉奸之间"趣旨既合","自当归于统一"。

晚上,天字第一号汉奸汪精卫发表了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政府支持他建立伪政权表示感谢,并再次发誓说,他"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伪政权的二号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词,声称"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因此必须要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陈公博的标准是必须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国人要和日本人一样互相平等友好,为傀儡戏的开场大加捧场。

可就在这时,南京城里却发生了几处煞风景的镜头。这天,原维新派政府的御用工具——"大民会"强迫了一批"民众",稀稀拉拉地跑上大街,呼几声口号,就算是庆祝游行活动,但却没有一点"节日"气氛。这是不足为怪的。处于日军刺刀下生活的南京市民,倍受国破家亡的苦难,对侵略者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哪有好感可言?为了表示抵制,他们在奉命挂起"国旗"时,有的并不按规定加上"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这下可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作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占领军当局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更使汪精卫一伙难堪的是,伪政府成立之日,既没有外交上应有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连住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也是到了第二天上午才到汪政府作表面上的周旋。难怪有个当过伪官的人曾经为此感叹说:"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摘自《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黄美真　张云)

材料二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向内阁报告

汪精卫在昭和13年12月18日自重庆出走,22日响应近卫声明,29日在河内发表了第一次的和平声明。至此,汪精卫的运动便表面化了。高宗武从上海到香港,2月1日在河内与汪精卫第一次见面,当时决定的结论是:

(1)由国民党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及军队。

(2)中日两当局发表共同宣言。

(3)取消"临时"和"维新"两政府。

(4)"国民政府"设在南京。

(5)交换使节、签订亲善协定。

高宗武携带这些条件赴日,2月21日在长崎登陆。影佐机关和汪精卫的运动,从这时起,与政府的外务机关发生关系,高宗武除首相外,并和其他要人会谈。他曾把汪精卫对和平结束的方法表示为:(1)如果日本与蒋介石

接触，他援助斡旋；(2)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3)如果要他出来负责，他将出马。帝国对这个意见以五相会议的决定，促汪出马，3月18日，由田尻总领事把它带至香港，面交高宗武(尽管他看见了帝国的意见，但是他在赴日时得到帝国有意与蒋介石妥协的印象，而且也不满帝国对华方针，后来脱离了这个运动，于昭和14年1月，在香港公开了日华交涉的经过。在汪精卫工作的发展中，昭和13年4月5日，蒋介石曾作过暴露战术。)，影佐、犬养和矢野总领事，赴河内与汪精卫会谈，昭和14年(1939年)5月8日，汪便到了上海。

在此以前，军部内也有人从作战的角度表示反对汪精卫工作的，但是经6月6日五相会议决定：为了配合对现阶段全面战争的指导，基于自主立场处理问题，建立新中央政府，可以作为一般的方针。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既成政权、以及翻然悔悟的重庆政府为组成分子。虽系中国方面的问题，但我方应适当协助其建立。同时将来的政治形式，应按照历史和现实情况，采取分治合作原则。至于其内容，除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外，内政问题，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并决定承认以放弃抗日容共、采取亲日"满"防共为方针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同时准备使汪精卫与吴佩孚及既成政权等合作，建立具备文武实力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期间，并制订了积极争取重庆要人的指导腹案　其次，关于"临时"、"维新"两政权的处理，要使汪尊重两政府的功绩，表示与两政府合并的意见。

这样，汪精卫于5月31日从上海到东京，与平沼首相，近卫前首相、陆、海、外、大藏各大臣会谈，6月18日离开东京。于是帝国政府以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并与汪精卫达成谅解。他便本照他的信心一意地向前迈进。

汪精卫于6月18日离开东京，24日到天津，与王克敏和杉山司令官会面，并与吴佩孚会见，但意见不合。28日到上海，与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会见。7月3日在南京与山田军司令官会见。7月23日到广州，与军司令部协商，8月15日回到上海。8月28日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发表宣言政纲，决定建立新中央党部，开始了各地党部的重建工作。9月1日向全国发出通电。19日和20日召开与梁、王的所谓三巨头会谈，商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从9月下旬起，积极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财界、政界、文化界联络，完成与国家社会党的联络，继续与吴佩孚联络。军事工作方面主要侧重广东，以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为对象。其他则以东北系的鲍文樾、杨毓珣，西北系的刘郁芬、郑大章、刘骥，湖北、四川方面的杨揆一、叶蓬等。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制订了研究方案，研究华北、华中的既成事实。12月30日，暗中与梅机关签订日华协议文书。昭和15年(1940年)1月16日，汪精卫对蒋介石发出最后的和平劝告。2月12日，汪与各党各派社会上孚有声望的人士会谈，认为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大纲和政纲等的意见一致，接着在1月23日和24日两天召开所谓青岛会议，于是在3月20日起的3天内召开了奠定新政府基础的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在昭和15年(1940年)3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成立了新中央政府。

(杨凡译《文史资料选辑》)

枣宜会战

背景介绍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开始。日军为了确保其武汉占领区的安全、进一步威胁四川，动员6个师团约20万兵力，兵分三路，由河南的信阳、湖北的随县和钟祥三地出击，进犯湖北的枣阳、襄阳、宜昌等地，企图消灭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由信阳出发的日军右翼于1日攻占明港，8日攻占唐河；中路日军由随县出动，于8日攻占枣阳；由钟祥出发的日军左翼则于7日攻占张家集后，又北取新野。第五战区指挥部队，逐次抵抗后撤，伺机向外线转移。8日，攻占枣阳的日军与担任撤退掩护的第五战区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该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境内阵亡殉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则赖以跳出日军合围圈，从外线向枣阳实施反包围。10日，日军合围襄阳；而第五战区部队则在襄阳以东地区先后收复唐河、泌阳、枣阳。17日，日军向北窜犯，再陷枣阳。5月31日晚，由随县进犯襄阳的日军渡过汉水；6月1日，襄阳被日军攻占。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攻陷荆门、江陵，击败第五战区的第二、二十六、七十五、九十四军。日军的进攻目标随即指向宜昌。6月12日，入川门户宜昌被日军攻陷，中国军队退守长江三峡出口处的两岸山地，与日军对峙。在日军南下进攻宜昌时，第五战区在豫南、鄂北的部队随后跟进攻击，6月3日克枣阳、4日克南漳、8日进至宜城，6月中旬大体进至钟祥、荆门、当阳、宜昌以北一线，与日军形成僵持之局，并收复了襄阳。枣宜会战至此结束。这次会战也称豫鄂战役、(第二次)随枣战役。

材料：

- 战斗经过
- 襄阳争夺战

材料一　战斗经过

在第八十四军正面，战斗于五月二日开始，敌军一个步兵师团配合骑兵部队，以坦克作掩护，从应山、随县城分向我第一八九师和一七四师阵地猛扑，敌机则对我地面阵地更番滥炸；同时敌军一部压迫我均川、安居地区友军后退。其左翼部队也配备了坦克群和数十架飞机加骑兵部队，从孝感、云梦、应城、安陆方面沿汉水东岸京（山）钟（祥）公路进犯我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装备较差，抵挡不住，遂向大洪山中心基地撤退。

我第八十四军的第一八九、一七四师，战斗一开始，在敌机械化部队不断冲击和敌机更番滥炸的恶战中，伤亡惨重，几次发生动摇。我严令全军，非有命令，即使到最后一人，也不能擅自撤离阵地。违者军法从事。他们坚持在阵地上与敌搏斗了两昼夜，曾一度击溃敌人的进攻，有的士兵见到敌军坦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气愤不过，便跳出战壕，爬上敌坦克，往车里扔手榴弹。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到我战壕边，我们无法用火力制止，或因弹药用尽，便在阵地上同敌人进行白刃战。虽伤亡很大，仍不退后一步。战斗进行到第三天（五月四日），敌人由于经过两天猛烈攻击，未能突破我阵地，便改变攻击路线与攻击目标，专从山地向我大竹山、滚山两重要据点进行地空联合更番猛袭，战壕全被夷平，防守大竹山的一个营伤亡过半；守滚山的一个营伤亡殆尽，终以劣势装备无法阻扫，被迫于当晚撤入第二线阵地应战（净明铺至厉山一带）。为了执行上级指示，正面要坚持七天的战斗任务，我命令第一七四、一八九师立即组织突击队进行夜袭，企图收复大竹山、滚山等重要据点未果。翌晨（五月五日），敌联合兵种继续向我第二线阵地进攻，此时又发现敌骑兵已由我第一八九师左翼向高城地区疾进，企图截击第一八九师后路；该师被迫放弃第二线阵地，向军部所在地夏家垱附近撤退。第一七三、一七四师主力亦同时被迫后撤至唐县镇之线。与此同时，据悉我左翼桐柏北友军阵地已被突破，敌骑向西疾进。我们判断，这显然是企图与正面进攻随枣地区之敌相呼应，围歼我军于枣阳地区。我军为了迅速摆脱敌包围圈，决定以第一七三师为后卫，掩护军主力先向枣阳集中，再作下一步行动计划。随县地区我军防守线，至此结束，进入枣阳地区的战斗阶段。

军部及第一八九师之一部，沿桐柏山南侧经鹿头镇，于五月六日到达枣阳东地区附近集结；第一七四师及一八九师之一部沿襄花公路经唐县镇、随阳店向枣阳转进，同日到达枣阳附近。军部和第一七四、一八九师到达枣阳集结后，接战区司令长官部电令，着我军在枣阳城郊占领阵地，拒止当面西进之敌，确保襄樊。

五月六日，敌联合兵种在唐县镇一带向我军后卫部队第一七三师猛袭，虽经该师正面部队（凌云上之五一七团）坚持抵抗，屡挫敌锋，终因不能阻止敌优势装备的猛烈攻击，阵地被突破，该师被迫向北转移。敌机械化部队在敌机掩护下，继续沿襄（阳）花（园）公路向枣阳疾进。五月七日中午，枣阳城南公路上和城西北地区，均已发现有敌坦克数十辆和大批骑兵活动，并开始向枣阳城西郊我守军阵地攻击。但敌军对我城西阵地的攻击，只是牵制，其意图是集中优势兵力，摆在城北面，将我军围歼于枣阳附近地区。我军部对敌情作出了如上判断之后，当即命令守城部队迅速脱离火线，于当日下午全军主力（缺第一七三师，当时军部与该师已失去联系）经苍台（新野县属）地区向新野、邓县（均河南属）方向撤退。五月八日，枣阳沦于敌手。

我军主力从枣阳撤退，虽已基本脱离了敌包围圈，但担任后卫的第一七四师周敬初团（第五二二团）和第一八九师白勉初团（补充团），于撤退时被敌截击或冲散，未能随主力转移。还有第一七三师自唐县镇掩护军主力向枣阳撤退任务完成后，即被敌压迫向鹿头镇转移，同时与军部失去联络。后来才知道，该师自唐县镇脱离火线后，未见敌军尾追，料敌主力一定直指枣阳，并有抄袭我军可能，该师乃决定两路纵队由鹿头镇经清凉寺、小河街、太平镇等地区向吕堰驿以北附近集结待命。午后开始行动，不料该师钟毅师长直接指挥的左翼纵队（第五一八团、五一九团及师直属部队），行进至枣阳北太平镇与苍台之间地带时，便与敌遭遇被冲散，陷于各自为战状态，处境十分险恶；师长钟毅在距苍台五六里处河曲中与敌力战，壮烈殉国；所属随员及卫士数十人，绝大部分亦同时牺牲；该师第五一八团团长李俊雄率领该团一部，在太平镇唐河东岸被敌围攻，李团长亲自督率所部与敌搏斗，终以弹尽援绝，李俊雄团长以下官兵数十人被俘；该师伍文湘的第五一九团，在苍台北十余里唐河东岸被敌拦头迎击，经过激烈战斗，当晚主力向北突围。该师右翼纵队第五一七团以及左翼第五一八团主力（由副团长彭挺华率领），均因未能突出敌包围线，于次日午前退入祈义镇（河南属）以南山地休整待命。枣阳地区我军反包围战，至此告一段落。

军主力在枣阳西北地区敌后，当日深夜陆续到达河东岸杨附近宿营，次日（八日）拂晓越唐白河向邓县撤退，九日、十日先后到达光化（距老河口战区长官部约六七里）附近集中，旋即投入反击战，卫护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安全。

五月十一日（或十二日），敌骑二千余越唐白河直扑老河口，企图冲击我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于长官部先已料到敌军这一行动，除派部队驰赴老河口东面约四五十里处竹林桥一带布防阻击外，并着第八十四军即派有力部队（两个团）驰援，以便掩护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安全。并作后撤的准备（其实，自第八十四军越唐白河后撤时，战区

长官部除作战处外，大都已越襄河向石花街转移。光化、老河口两镇居民亦已进行了紧急疏散，社会秩序非常慌乱）。越唐白河之敌，经我阻击，其进犯老河口企图未能得逞，退回唐白河东岸，旋集结其兵力转向双沟、张湾之间，强渡唐白河，进袭樊城。我军奉令派第一八九师驰援。

当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正在樊城直接指挥所属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与敌在唐白河隔岸对战中，由于敌联合兵种的猛烈攻势，我第三十九军阵地已呈动摇，第八十四军之第一八九师星夜赶到，加入战斗，我方阵地甫告稳定；不意第三十九军当发现小股敌人在其炮火掩护下，强渡唐白河西岸活动后，便乱了阵脚，既不坚持抵抗，又不事先通知我一八九师，便悄悄地陆续向樊城东郊撤退，使我第一八九师突陷于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在这紧急情势之下，黄琪翔总司令才命令第一八九师迅即转移樊城北面布防，负确保樊城及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安全之责。

第一八九师开始向樊城北面阵地转移时，虽已接近傍晚，但敌仍衔尾追击，并对我樊城守军展开全面攻击。战斗很激烈，右翼之第三十九军节节后退。夜半，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仓皇撤离樊城，向老河口方面去了。当第一八九师发现右翼第三十九军阵地战火沉寂，派员入城进行联系时，才知道樊城已是空城。而敌军则不知城内虚实，不敢入城，有日城北面空隙西窜模样；我第一八九师根据这一敌情，为了避免敌军对该师的抄袭和对老河口的威胁（此时该师与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九军已失去联系），当即派部队抢先占据樊城西面竹条铺，以便掩护全部向太平镇撤退。当该师先头部队到达太平镇时，接战区司令长官部电示，着即掉转队头，向樊城疾进，于是我军主力第一七四师（缺第五二二团），一七三师一部，随即向樊城推进。与此同时，在桐柏山北面的汤恩伯兵团（第一、五战区机动部队）一部向随枣之线推进；被敌截击留在敌后之我第一七三师第五一七团、五一八团主力，和第一七四师之五二二团，以及第一八九师的白勉初团一部，则奉令继续在敌后不断向随枣地区、襄花公路交通运输线进行袭击；其他方面友军兵团，亦同时奉命对敌进行反攻。这就是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部署对敌反攻"的开始。时间是五月十四、十五日。

当我军向樊城疾进时，犯樊城之敌正掉头转沿襄河左岸退去，在宜城附近强渡汉水，与钟祥西进之敌配合江南敌军，向宜昌进犯。这时，进据枣阳之敌因受我各路反攻部队压迫，于五月十六日放弃枣阳，向随县匆忙退去。十七日我军收复枣阳后，继续向前推进，基本恢复了原来阵线，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摘自《枣宜会战纪实》莫树杰）

材料二　襄阳争夺战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开始，敌之北方兵团分三路向西进犯：

右路之敌五月二日攻占确山、竹沟。我军孙连仲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之第一一九师、第一四三师和第三十军池峰城部之独立第二十七旅被敌攻破后，向西节节败退。敌于五月五日占领泌阳县城，五月六日占领泌阳与唐河之间的大河屯，五月七日窜抵唐河县。

中路之敌五月一日攻占明港、平昌关，五月三日攻占小林店。我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之第三十师和第三十一师被敌击破后，五月五日桐柏县城被敌军攻陷。

左路之敌，沿襄花公路及其两侧西窜，在攻破我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之第八十九师和孙震部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三师、第一二四师和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二五师后，五月五日占领随县以北的高城镇、以西的安居镇和西北的澴镇、厉山镇，五月六日占领随县的唐县镇和大碑店，五月七日又占领阳镇和吴家大店，五月八日攻占枣阳县城。

日军"南方兵团"沿京（山）钟（祥）公路向北、向西进犯。自五月三日突破安陆以北我军前进阵地以后，即进入大洪山地区，与我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之第三十七师、第一三二师、第一七九师，第五十九军之第三十八师、第一八〇师、骑兵第九师和王缵绪部第四十四军之第一五〇师展开激战。五月五日，日军攻下大洪山的峰顶阵地，并占领大洪山西麓的长寿店、张集、丰乐河诸要地和距襄阳九十里之襄河渡河点流水沟。

五月六日，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即在流水沟以北、襄河以东地带与敌鏖战，形势极为不利。此时，在襄阳以东五十里双沟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师，奉命驰赴流水沟以北之田家集支援第三十三集团军之作战，合力阻击敌军北进。

当时的第一二二师，战斗力非常薄弱，不仅装备很差，而且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新三六四团和三六六团）是才从四川补充而来训练还不足三个月的新兵，其中一个团（第三六四团）还缺少一个营。五月七日，我师在田家集附近与优势之敌激战一昼夜，力不能支，败下阵来，乘夜退回双沟镇。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在枣宜会战之前因事请假回川。当会战发生时，李宗仁指派黄琪翔临时代替孙震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

黄琪翔原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总部组织倒齐全，只是所辖的两个军已经调走。他于奉命后即带着他的各处室幕僚人员和警卫、通信等直属部队，设指挥所于襄阳城内。原驻樊城之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会战开始后不久，即由参谋长陈宗进率领，从樊城移驻襄阳以西三十里之泥咀镇。

第二十二集团军辖有第四十一、四十五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震兼任，辖有第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三个师和一个军直属独立团。第四十五军军长孙鼎勋，辖有第一二五、一二七两个师。

到五月底，第四十五军全部和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三师，已被隔在襄河以东，留置在大洪山区与日军打游击战。退到襄樊附近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只有残破不全，新兵参半的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和军直属的一个独立团。

当日军在五月初开始发动进攻时，黄琪翔曾经再三强调：敌人绝不会进入大洪山隘口，决不会越过大洪山以西。及至敌人攻占了大洪山顶，越过了大洪山西麓，黄琪翔又非常肯定地判断：敌人决不会渡过襄河右岸（即西岸、南岸）。因此，对于襄樊两城和襄河河防，未作守备计划，亦未预行构筑防御工事。五月下旬日军的北方兵团越过了唐、白河西岸，南下与其南方兵团会师，扑到了襄河左岸（即东岸、北岸）准备渡河；到了五月底，黄琪翔才匆忙命令第四十一军（欠第一二三师）担任右自小河与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相衔接，左至襄阳城沿襄河右岸六十里的河川防御和襄樊两城的守备任务。

由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兼任着第四十一军军长，军部的一切事务也都由集团军总司令部兼办，另外没有成立军司令部的机构，也未设置专职副军长。在孙震请假回川时，他临时指定第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暂为代行第四十一军军长职务。

第四十一军奉到黄琪翔的布防命令后，曾苏元即命第一二二师担任小河亘刘集、欧家庙至襄阳城南门襄河右岸的河防，第一二四师则担任襄樊两城的城防；军直属独立团原驻襄河右岸襄阳以东十五里之东津湾，即在原地作为前进据点，与襄樊成犄角之势。

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受领任务后，即令副师长兼第三六五团团长胡剑门指挥第三六五、三六六两个团担任河防，第三六四团（两营新兵）摆在襄阳南关作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位置于襄阳南门外周公庙。

第一二四师对襄樊两城并未作出坚决的守城部署，襄樊两处，每处也只摆了一个营，而却派出一个团（第三七二团，团长卢高暄），摆在第一二二师河防部队的后边作支援河防的态势；其师部则率着其余部队搁在襄阳至南漳道上距襄阳二十里之习家池及其附近。

日军于五月底直接控制襄河东岸以后，进行了三天的渡河准备，于六月四日入暮时乘夜暗（那天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正是月黑头）在刘集对岸集中炮火，向我河防部队第一二二师之第三六六团及其右翼（小河以南）友邻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部队猛烈轰击，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掩护强渡。

我河防部队凭借临时构筑的简单阵地工事，尽力阻击强渡之敌。但终以阵地工事被敌炮火摧毁，同时因缺乏防毒面具，对日军施放的催泪瓦斯无法抵御，致使敌人从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新四旅（系由四川保安部队改编而成，才由四川开到宜城的）与第一二二师和第三六六团接合部之小河、刘集附近强渡成功，突破了襄河西岸我军防线。

日军强渡襄河时，其渡河工具中有装着动力机的船只，我河防部队过去尚未见过；加以强渡是在月黑天的夜间，又在敌人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的状况下，很不容易辨别清楚，只是影影绰绰地望见它在河面上沉重地爬行着，又听到它发出轰轰隆隆的巨响。担任河防的第三六六团团长陈择善，未经调查研究，就慌里慌张地向师部报告说："敌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向我强渡猛冲。"师部也未经过分析判断和复查，就糊里糊涂地转报给黄琪翔。

黄琪翔先已得到敌人施放毒瓦斯掩护强渡的报告；这时候又听到敌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冲过河来的报告；于是急忙带着指挥所的幕僚人员和警卫部队，从襄阳西门向谷城撤逃。

渡过襄河西岸之敌，系北方兵团。六月一日拂晓，其主力沿襄宜公路向宜城方向南窜，其一部约万余人，向北直奔襄阳。六月一日上午九时许，日军兵临城下，大炮、机枪齐向城上轰击扫射。在力量对比过分悬殊的情况下，第三六四团实在难以支持，遂西门撤出，退西关外真武山、周公山一带高地；第一二二师师部则移至城西十里云万山。至此，日军随即入城，襄阳落入敌手。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得知在襄阳附近与敌周旋之第一二二师，仅有两营新兵，乃令由东津湾撤退到泥嘴镇之第四十一军军直属独立团开到万山附近，归第一二二师师长指挥，与第三六四团合力拒止敌人西进。

日军占领襄阳城后，只顾在城关内外和四邻村落烧杀奸淫，掠夺财物，而未继续向西进攻，敌我双方只是对峙地互以枪炮时断时续射击而已。

到六月一日入夜，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接到黄琪翔转来蒋介石的一道"死守襄阳"的电令。黄琪翔还在蒋介石的电令后边加上一句："等因奉此，着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立率所部即日克复襄阳为要。"

六月二日拂晓，王志远亲率郑道东的军直属独立团为前驱，反攻襄阳城。在前进途中，未见敌人动静，及至冲进西门，始知敌已由南门出城，正向南漳方向转进。郑团先头部队进至南关时，遇上日军后尾部队，随即展开战斗。日军且战且走，并在城南十里之岘山隘口摆下了后卫部队，占领掩护阵地。我郑团追击至南关外，因南关与岘山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前进困难，伤亡了二三十人之后，即停止追击。

日军在这次发动所谓的"襄东进击战"中，只是以打

击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到处寻求我军的野战部队作战，而对于攻下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在其蹂躏践踏破坏之后，通通丢掉，而不据守，襄阳也不例外。所以襄阳县城就在六月二日失而复得。而日军则向南漳开去。

六月二日下午，我左翼兵团司令孙连仲亲率第三十军，从谷城方向前来救援襄阳。进抵城西十里万山村附近时，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前往迎接，并当面报告敌人已向南漳转进和襄阳已经克复的情况。孙连仲在听报告后，即由万山折向襄阳西南三十里之隆中宿营，未进入襄阳城。

黄琪翔在谷城得到襄阳方面之敌已向南漳前进的消息之后，急命第一二四师布置城防，固守南漳。六月三日，从襄阳而来之敌对南漳展开攻击，猛扑竟日而终未下。六月四日，敌未再继续进攻，竟然自动撤离，转趋荆门方向而去。

至此，第二十二集团军在这次会战中之作战任务，遂告结束。

（摘自《襄阳失而复得真相》张宣武）

张自忠战死

背景介绍

1940 年 5 月 16 日，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会战的南瓜店战斗中战死，以身殉国。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7 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军官学校校长，第二十五师师长，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等职。1933 年长城抗战时，任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积极抗击日寇。1935 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市长。七七事变后，一度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曾受国人非议。日军占领北平后，他拒绝与日本合作，逃出北平，辗转到达南京参加抗日。1937 年 11 月，回部队任第五十九军军长。其后，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重创日军，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五十九军军长。1939 年的随枣战役中，他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取得了田家集作战的胜利。在这次枣宜会战中，他奉命率部渡过襄河，侧击南撤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襄河东岸宜城的南瓜店，由于无线电报被日军破译，他所率的总部直属队和第七十四师遭到日军包围。在激战中，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张自忠战死后，国共两党都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周恩来送了“为国捐躯”的挽词。朱德在祭文中说：“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悲悼！”1982 年 4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特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材料：

- 李宗仁忆张自忠
- 殉国南瓜店

材料一　李宗仁忆张自忠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二十八年九月，敌方成立所谓“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二十九年四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第五战区。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守襄花公路正面。(二)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战事于五月一日开始。敌军仍分三路西进，大致如前次随枣会战时的姿态。不过，此次敌方对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辆和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我许绍宗部。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满，拟与北部会师，对我方主力进行大包围的歼灭战。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围。敌于五月八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我方以众寡不敌，且战且走，节节抵抗。第一七三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而我方主力却赖以撤出敌人包围圈。敌人既扑一个空，我军乃自外线实行反包围，由两翼将敌军向中央压缩，加以歼灭。双方战斗至为激烈。至十一日，敌卒不支，向东南撤退。十六日，我军且一度克复枣阳。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总司令自忠“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俄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

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瞑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来报答"知已"为最高德性，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张自忠死后，我方虽损一员能将，然敌在随、枣一带，终不得逞。各路敌军与我军均陷入胶着状态。

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乃在六月初再度增援，舍开五战区正面，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采取攻势，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六月一日，敌人一度侵入襄阳、樊城。经我们自外线反击，敌人不敢死守，乃将襄、樊焚毁一空，于六月二日向南窜撤。我军乃于六月三日连克襄、樊与枣阳。惟六战区方面之敌，于六月十四日侵入宜昌，踞城死守，我军屡攻不克，宜昌遂为敌所有。

自此我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岭，改走巴东一线了。

敌人虽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带，我军对其威胁始终无法解除。二十九年九月我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对宜昌之敌发动反攻，以牵制其兵力。故敌人对随、枣一带我军根据地，终视为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是年十一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伪政府正式获得敌方承认。敌人以军事配合政治，又以几个师团兵力再向随枣地区进攻。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经七昼夜的苦战，襄花路上敌遗尸数千具，仍一无所获而返。

(节选自《李宗仁回忆录》)

材料二　殉国南瓜店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军为了进一步"扫荡"武汉外围，并对国民党军的"冬季攻势"施行报复，遂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及第六、第四十师团各一部，在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沿随县、枣阳之线以北地区展开攻势，企图首先歼灭襄河以东中国军队，尔后将襄河以西中国军队压迫于宜昌附近加以围歼。第五战区以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居中，守备襄花公路正面，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扼守襄河以东地区，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襄河以西的防御，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等部守卫桐柏山以北地区。

五月一日，枣宜会战开始。日军首先按计划兵分三路猛攻襄河东岸，二十九集团军力战不支，向大洪山核心退却，日军遂得以长驱直入。战区急令正面十一集团军北撤，以防后路被断。敌继续猛攻，拟先取枣阳，尔后克襄樊，威胁五战区总部所在地老河口。形势十分危急。

本次会战一开始，张自忠就意识到这又是一场生死决战。他直属的三十三集团军驻守河西，不是日军第一期进攻目标。但他不认为自己可以隔河静守，作壁上观，而决心主动出击，挽救危局。于是将三十三集团军第三十八、第一七九师首先遣赴河东参战。五月一日，张自忠亲书手谕以告所部将领：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不久，李宗仁电令张自忠派有力部队渡河出击。张自忠深感战局不利，不顾身患痢疾和众将领的极力劝阻，决定亲自过河督战。五月六日，他留书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以死相嘱。信中说：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据当事人回忆，由于抱着必死之心投入战斗，张自忠在每次出征之前，都写下类似遗嘱的东西，回来后烧掉。以上两封信就是依例写下的。

五月六日，张自忠将自己身边仅有的一支机动部队马贯一师(七十四师)两个团和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共二千余人迅速集中起来，当夜冒雨由宜城北垭口东渡襄河，向北急进。九日，到达方家集。时河东中国军队已由外线包围突入枣阳之敌，日军被迫向东南突围。张自忠奉令改变方向，连夜冒雨向枣阳以南攻击前进，截击南窜之敌。十一日至十四日，在枣阳、襄阳间与敌激战多次。十五日，复接战区命令：日军大部已由襄阳沿汉水南下，令即回截击。张自忠即令已取得联络的三十八师由枣阳经吴庄、平林、板桥一线截击；自己则仍率二千余人前往张家集截击。十五日拂晓，张自忠赶到方家集，发现溃逃之敌先头已越过方家集。为阻击敌人南逃，张自忠下令猛烈腰击行

进之敌，将其斩为两段。敌被迫停止逃窜，集重兵五千余人南北夹攻方家集。张自忠督部迎战，拖住日军，同时令自己的主力部队三十八师、一八〇师迅速向方家集靠拢，从外线对敌实施反包围，以期全歼该敌。这样，双方形成了相互包围的态势。自晨至暮，双方冲杀了十几次，战况激烈异常。张自忠虽然被围，但由于外线主力逐步靠拢，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完全可能扭转战局，击败强敌。不料，第五战区又来电，称钟祥方面日军大部队有渡河西进之企图，令张自忠放弃当面之敌，攻击钟祥敌后，阻止日军渡河。为了顾全大局，张自忠十分惋惜地放弃了有利战机，于当夜率七十四师两团及总部特务营突出包围，向钟祥开进。经一路鏖战，十六日拂晓到达宜城洪山山区罐子口。张自忠将指挥所设于罗家榨屋。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少将横山武彦率优势日军跟踪而至，攻占了罐子口两侧高地，以炮火集中轰击张自忠部队。敌我双方往来冲杀，血肉横飞。八时，钟祥援敌五千余人赶到，随即发动猛攻，七十四师阵地被突破，经奋力反击才得以规复。鏖战至午，张自忠身边仅余千人左右，敌迫近罗家榨屋。张自忠沉着指挥，左右督战，官兵士气旺盛，视死如归，与敌展开白刃厮杀，罗家榨屋附近山头得而复失者四次。激战中，张自忠两处负伤，退守南瓜店。此刻，西渡过河，或东移退入大洪山，仍可脱险。为保护总司令安全，部下再次劝退，但张自忠严厉喝斥："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为了拖住日军，阻敌西进，张自忠严令三十八师、一八〇师加速驰援，同时致电附近的第十一集团军请援，但未见答复。战至下午二时，官兵只剩数百人。张自忠右胸被敌弹洞穿，血流如注，但仍从容指挥，高呼杀声。至下午四时，部队伤亡殆尽，仅余随从副官数人。张自忠已负伤六处，他自知不救，对随从们说："你们走吧，我自有办法。"语毕，即拔佩剑自戕，被副官朱增源所夺。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最后的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及援军三十八师赶到，一代抗日名将已战死沙场。此役，张自忠所率二千官兵几乎全部战死，但他们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遭此重创，也不能不感佩张自忠的忠勇，于是盛殓遗尸，举行军祭，并制一灵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尔后拟将遗体运往汉口。

第五战区及重庆当局得知张自忠殉国，立刻严令战区右翼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尸体，右翼各部即与日军展开争尸战斗。经两昼夜激战，歼敌数百人，终于在方家集夺得遗骸。

（摘自《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33人出席。会议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全面讨论了党务、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内政、交通的各项报告，尤其是关于战时经济问题。会议决定在中央党部中设立妇女运动部以促进全国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在行政院内增设经济作战部和战时经济会议以适应长期抗战；会议还决定把经济部改为工商部，专管工商及矿业；会议并决定设立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等机构以建立设计、执行、考核的"行政三联制"的基础。8日，会议结束。会议闭幕后发表了宣言，其纲要称："暴日野心无止境，为世界各国之公敌；加强奋斗，纠正缺点，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同胞同志积极奋起，完成抗战大业。"

材料：

- 会议经过
- 会议宣言

材料一　会议经过

二十九年五月中旬，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四八次会议决议于二十九年七月一日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当由秘书处发出通告，并分电各地中央委员届时出席。

全会于七月一日晨如期开幕，八日晚闭会，中经八日。共开预备会一次，正式会议六次。对于八个月来党务、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各项报告，均有缜密检讨，并于今后努力之方针分别为周详之指示，另见大会对于各项报告之决议案。至对于各项提案之讨论，亦备极周到，尤以关于战时经济问题，研讨至为详尽。大会议案共六十五件，关于党务者九件，关于政治者二十件，关于财政、经济、交通者二十三件，关于军事者十件，关于教育者三件。其决议各案中，对于党务、政治机构均有新的设施：在党务机构方面，决议中央设立妇女部，以促进全国妇女运动之发展。在政治机构方面，决议行政院增设经济作战部，以加强经济行政效率，适应长期抗战之需要，现有之经济部则改为工商部，专管工商及矿业事宜。此外并决议设置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审核。另设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主持党政机关工作、经费、人事之考核，与中央设计局确切联系，以

矫正设计、执行、考核分立之弊端，而树立行政三联制之基础。上述各种重要决议，于大会闭幕后，均已分送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政府各主管机关切实施行。兹将大会逐日会议经过择要分志如次：

七月一日大会于总理纪念周后举行，开幕仪式由总裁主席，领导行礼，致开会词，于国际大势之所趋，敌寇实力之穷蹙，以及我国抗战建国已露胜利成功之机绪，指示周详；进而说明本次会议之重要任务。旋即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人选及各组审查委员会名单与召集人，并决定本次全会会期及收受提案截止日期。

七月二日上午六时，举行第一次会议，总裁主席。听取党务政治两项报告，并决定分交各该组审查委员会审查。是日下午六时，举行第二次会议，主席于委员右任。决定宣言起草委员会人选及设立物价审查会，并指定其人选。听取外交、军事两项报告，分交政治、军事两组审查委员会审查。

七月三日下午六时，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孔委员祥熙。通过要案十四件。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举行第四次会议，总裁主席，讲述最近抗战形势及外交形势，均有详确之训示。决定组织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并通过其人选。听取经济、交通两项报告，均交经济组审查委员会审查。上午九时休息，下午六时继续开会。听取内政、教育两项报告，决议分交政治、教育两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及关于恢复设置中央妇女部等要案共三十一件。

七月六日上午六时，举行第五次会议，总裁主席。由孔兼部长祥熙作财政报告，大会决议交经济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对于党务、政治、财政、经济、交通报告之决议案，及关于物价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等要案二十四件。总裁于六中全会所讲改进党务、政治、经济之要点，及六中全会今后〔以〕党政军当前急务，唤起全会注意，各自检讨，尤于负责任、任劳怨、立己与立人，健全人事组织，祛除迟滞诿卸之弊病诸端，再三申述，共资策励，详加提示，大会秉承斯旨，特于宣言中郑重引申惕励。

七月七日上午七时，举行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全体中委出席参加，由林主席领导行礼，并由吴委员敬恒作警惕扼要之报告。

七月八日上午七时，举行总理纪念周，下午六时举行第六次会议，总裁主席。决定以全会名义致电慰劳抗战将士及海外侨胞，并通过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及本次全体会议宣言。讨论完毕，总裁致闭会词。词毕，举行闭幕式，礼成，散会。

（摘自《中央日报》1940年7月）

材料二　会议宣言

本党第五届第七次中央全体会议，举行于神圣抗战第四年开始之时，外观世局变动之剧烈，内察我中国责任之重大，爰就半年来抗战建国之工作澈底检讨，补其缺陷，促其改进，分别决议，付之实施。兹当会议完竣，特将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安危关系之切，及本党与吾同胞所以共同努力之道，撮其要旨，为吾全国同胞同志简切陈之。

其一，我国今日抗战，已成为保障国际正义和平最重要之力量。吾人自省对民族祖先、对世界人类之责任，便当坚守一贯国策，与暴敌抗战到底，非至驱逐敌军于我国境之外而不止。当三年以前抗战开始，吾人即认定此次作战意义，不唯自保民族之生存、国家之独立，更所以维护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诚以安定亚洲之重心，必为我独立自由不受侵犯之中国，且必亚洲有真实之和平，而后世界始有安全之基础。去年二月本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曾列举总理三十年前遗教之要义，指出“日本欲在中国实行侵略政策之绝不可能”；指出“列强之行动，若真实协力而为共同利益计，则彼欲为一民族之私利而向中国战争者，必归消灭”；更复剀切指出日本侵略吾国为威胁太平洋与印度洋间最大市场之开始。今欧战方酣，变动未已，日本经中国三年抗战，在国力大损之余，仍思竭其余力，在太平洋上试其威胁掠夺之伎俩。设无中国坚决抗战，则欧战一经发生，远东局势之危乱，自更不堪设想。日本既已在太平洋肆行劫夺，凶锋所至，野心无限，若不及时加以遏止，则世界任何国家不仅无以保存其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之权益与地位，且必将永无立足之余地。待至今日，彼日本之野心决不仅限于东亚一隅，实欲遂行其田中奏折所谓“征服中国以征服世界”之传统政策，盖已灼然而无疑。世界各国于此更应认识日本已为世界之公敌，与吾国抗战对世界和平关系之密切，吾人在最近欧洲局势剧变之中，更深切感觉吾人对安定远东与重建世界责任之重大，必当竭我全力，与世界各友好国家讲信修睦，共济世变，以求有助于来日之光明。此我全国所必须认识，亦世界各友邦所宜周知者也。

其二，我三年抗战经过，已使暴敌之力量日衰，胜利之基础益固。吾人益信吾民族历史文化基础之深厚，与三民主义力量之伟大，我中华民族不可征服之精神，已由事实昭示于世界。唯吾人奋斗目的，在以建国之成功，保障抗战之胜利，事艰责巨，必当使民族伟力愈战愈强。故就战事言，暴敌末日穷途，其必尽最后挣扎，固在吾人意计之中。而吾人鉴于最近之世变，更应知立国今日，凡凭借愈厚，环境愈优者，尤须竭尽刻苦之努力，乃能保国基于巩固。总理昔日垂训吾人以凝结民力强固国防为国家一切建设之根本者，益证为绝对真理。而战时艰困之环境，实为吾人急起直追实现三民主义之良机。是以吾人今日

应感念先烈之牺牲，珍重已得之成绩，认识后死者职责之艰巨。尤应坦白自知过去之刻苦不足，努力不足，自今伊始，必更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之奋斗，尤应遵行本党总裁所昭示"一切行动军事化"之真义，一切党政工作，尤其各级行政，必须确切迅速，整齐严肃，廉洁勤慎，守法奉公，使时无虚耗，人无旷废。吾人检讨党、政、军、学各级行政上所有不密切，不敏捷，不合理，不切事实，不应事机之现象，实为战时最大之缺点。此后更应澈底反省，迅速改正。凡我全体党员与一切公务人员，必须痛切自检自觉，全神贯注，以求组织之严密，人事之调整，与工作效率之提高。关于工作之考核，必严必勤；命令之下达与执行，必求确实贯澈；工作之处理，必力避不必要之转折与繁冗；尤须事事为军事胜利、人民生计着想；疏忽贻误者，在所必儆；泄沓因循者，在所必弃。则军事之胜利，民生之充实，建设之完成，与三民主义之实现，必皆有超越吾人预期之发展，可断言也。

以上二大要义，为本会议所特别举出，以告全国同胞与全党同志者。其他应行之具体事项，见之于大会各项决议及本党总裁最近在"七七"纪念日所发表之书告者，自皆为本党党员及吾军民同胞同志所宜切实遵行而无待于赘述。本会议更愿吾同胞当此世局变幻、抗战胜利日近之时，益深切信仰我总理数十年前为中国所定革命方略之确切不移，尤须知最后之成功有赖于吾人之共同一致牺牲奋斗者，实至为远大。世界上唯至诚为不可磨，至公为不可破，唯一心一德，自立自强，以赴救国家救世界之使命，为能经历一切巨变，克服一切艰难，最伟大最刚强之力量。以吾人必愈坚定而愈奋勇，以坚忍之意志，当举世震惊之变局，以刚毅之努力，赴瞬息万变之时机，抗战胜利与建国大业之完成，必使中国立国精神三民主义之光辉照耀于世界，而永为人类文明之导炬，愿吾全国同胞益坚自信，积极奋起以图之。

（摘自《五届大会宣言》国民党中央党部）

历 史 内 幕

毛泽东延安遇险

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蒋介石把战略方针由对外转入对内，由比较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国民党顽固派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的同时，又从重庆、西安等地向陕甘宁边区、向延安派遣特务。

当时在延安有两名以联络参谋身份出现的国民党高级特工人员。一个叫郭亚申，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后来升为少将，改名郭仲容。另一个叫周历武，是中校，后升为上校。周历武负责收集情报，郭亚申负责往西安、重庆传送情报。他们直接受中统局领导，与西安特务机关发生横的关系。由于他们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活动比较自由，有时也可以提出见毛泽东，但必须经过我们保卫部门批准。

对他们，我们一方面提高警惕观其行踪；另一方面从统战工作的需要出发，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对于监视这样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人员，我们的保卫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对他们的活动大体了如指掌。

1939 年末，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派胡宗南部包围了延安。绥德警备区的反共专家、"摩擦专员"何绍南趁机大搞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对我边区和驻军搞暗杀和破坏活动。这是一些暗藏的直接从事破坏活动的敌人，非常凶狠残暴。

我们每次跟随首长出去，都特别警惕。每到一处，要敏锐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人们的活动，掌握值得防范的蛛丝马迹。这也成了我们的职业习惯。

1940 年 2 月，绥德警备区的何绍南带人哗变逃跑。经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王震旅长兼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王震上任后，首先召集地区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主事宜，按"三三制"的原则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秋天绥德地区已面貌一新。

9 月中旬，绥德地区有位副专员在去西安的途中来到延安，在这里参观了几天。他被延安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深深地吸引住了，很受感动。同在黄土高原，同在一个省区，延安和西安竟是两个世界，天壤之别，他从心里佩服共产党，向我们提出想见毛泽东主席。

我们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嘛，副专员来了，我们欢迎！我明天下午去拜访他，并留他吃饭。你们告诉有关同志，要服好务，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幽默地说："摩擦专员跑了，抗日专员来了，这是喜事啊！"我们都笑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我和叶子龙来到大边沟青年食堂。这在当时是条件比较好的一个

食堂，一般招待外来的客人都在这里。我们通知食堂管理人员，下午3点左右准备两桌饭。

将近3点，毛泽东带着陈伯达和政研室的两位书记员，由叶子龙和我跟随，坐上那辆救护车去接见绥德来的副专员。秋后的阳光从车窗射了进来，暖融融的，坐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更有一种温暖亲切之感。

我们来到了南门外交际处，大家下了车。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笑容满面地走在前面，轻轻地推开了房门。屋内的副专员见进来的竟是毛泽东，立即起身迎了上去，激动地睁大了眼睛，说："啊！毛主席！"

毛泽东紧走两步，握住了他的手，亲切地说："您来了，我们欢迎！"

副专员握住毛泽东的手，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们坐下后，经过简短的问候转入了正题，副专员提出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态度和蔼，认真解答，有些问题谈得既透彻又详细。副专员不住地点头。陈伯达有时在旁边插入几句，进行补充。两位书记员在旁边迅速地记录着，准备当天晚上整理出去，第二天送《解放日报》发表。谈话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3点左右，谈话结束。毛泽东微笑着说："副专员，请您吃顿饭，尝尝我们大生产种的菜，喝喝我们自己酿的酒，怎么样？"

"谢谢！谢谢！"副专员高兴地连声应诺。

毛泽东陪着副专员出了屋，有礼貌地先将副专员让进车，然后自己坐到司机旁边，陈伯达、叶子龙、书记员和我也相继上了车，汽车向青年食堂驶去。

汽车还没有开到青年食堂时，我从车窗望去，远远看见食堂东侧的小空场上聚集着二三十人，有大人、也有小孩，警卫排的冯云贵班长正领着五六名战士在那儿站岗，维持秩序。

按常规，食堂这时早已开完了饭，这些群众坐在这儿干什么呢？谁让他们来的？难道他们知道主席要来这里吃饭？他们怎么知道的？我的脑海中立即闪出一连串的问题。汽车在离食堂几米处时，我让司机老梁停了车，然后跳下来，问旁边的一个警卫战士："这些群众到这里来干什么？"

那个战士回答："不知是谁传出今天下午有重要首长来食堂吃饭，有的人猜测可能是毛主席要来，这样相互传开了，这些群众就陆续地来到这里等侯。无论我们怎么劝，我们也不走，说等见了主席后再走。"

我听后觉得还属于正常情况，又向人群扫视了一遍，都是当地一些群众，青年人颇多，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我心里踏实了。我立即跑到车前，打开了车门，毛泽东先下了车，我站在他旁边。副专员和陈伯达他们也相继下了车。

群众见毛泽东来了，立刻站起来向前涌去，激动得一遍又一遍地吹呼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好！我看见毛主席啦！……"小广场上一片欢腾。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又向人群望去，发现一个青年人也从地上站起来，双手倒背在后面，挤在人群里，他为何背着双手呢！我立即向他身后望去，只见他背后的手里拎着一根一米多长有茶杯口粗的柳木棒子；棒子拖在地上，看样子是新砍下来的柳树，沉甸甸的。啊！他是谁？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急速地审视着。见他有二十多岁，比较清瘦，穿一件旧衬衫，一条旧裤子，当地人打扮，两只眼睛贼溜溜地乱转。我的神经立刻绷紧了，紧紧地站在毛泽东身边，我又下意识地摸摸腰上的手枪，严密地注视着这个青年。

这时侯，走在前面的副专员已进了屋，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点点头，挥挥手，也向门口走去，我紧紧跟随。正当毛泽东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这个青年猛然两个箭步窜到了门前，抡起大棒子就向毛泽东的脑后狠命地砸去。他用足了所有力气，大棒子带着呼呼的风声，而且动作又快如闪电。眨眼之间，棒子已经下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呼喊、开枪全都来不及了，我急速地抬起了右臂，挡住了凶猛飞来的大棒子。棒子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右臂上，像大石头似的砸下。我险些被砸倒，身体晃了两晃，感到胸口发热发闷，右臂失去了知觉。我急忙稳住了脚跟，就在他想抽棒重起时，抬起了左手一把抓住棒子，使尽全身之力夺了过来，随着飞起右脚把他踢倒。由于用力过猛，夺过来的棒子落到了地上，我也险些摔倒。

刺客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凶狠地向我扑来。正在这时，冯云贵领着两个战士赶到了，冯云贵飞起一脚向刺客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刺客扑通一声摔个嘴啃泥。两个战士扑上前把他按住。冯云贵从兜里掏出一团东西塞进刺客嘴里，防止他喊叫。这团东西是布还是毛巾？我当时没有看清。我低声对冯云贵说："把他抓起来送走！"

刺客已经摔得满脸流血，用鳄鱼一样凶狠的目光瞪着我们。冯云贵领着这两个战士用绳子迅速地把他绑好，装进那辆救护车里，押送到公安厅，交给厅长周兴。后来据说，此人是国民党顽固派派来的暗杀毛泽东的刺客。

好险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二分钟内。冯云贵他们动作迅速，又无声无息，做得干净利索。毛泽东平安地进了屋。

周围的群众被刚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但是转瞬间又醒悟过来，扑向救护车，扑向刺客，高喊着："打死他！打死这个坏蛋！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汗毛，我们就和他拼了！"也有的人问我，打坏了没有？

冯云贵向愤怒的人们摆了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喊叫。危急时刻的人们特别敏感，马上理解了冯云贵的意图，喊声立即停止。他们向食堂里面望去，知道里面有毛主席，

也有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不要惊动他们。

此时的我尚不知主席的安危，心中油煎一般，哪顾得上群众的问候，嘱咐完冯云贵就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食堂。

我来到屋内，见毛泽东安然无恙，正坐在桌前和副专员说话呢。"啊！没事了！"我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乱跳。豆粒大的汗珠也从额头上滚下来，右臂疼痛，直刺心田。

这时毛主席投来目光，关切地望着我，他的眼睛好象在问："泽民，你怎么啦？"我心头一征，莫非主席知道了？不！主席不能知道。那么，他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我咬了咬下嘴唇，暗暗告诉自己，不能让主席发现异常。

我慢慢地活动一下右臂，站起身，微笑着向毛泽东走去。

（摘自《党史纵横》94年2期
作者：蒋泽民　吕荣斌）

百团大战的插曲
——聂荣臻拯救日本小姑娘

战时的生活，并不都是炮火轰鸣、刀光剑影的场面，也常常遇到一些曲折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留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想起来，好象并不遥远。百团大战中，我们部队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是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我们的部队——三团一营的战士们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他们请示我如何处理，我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子，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象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一九八〇年来我国探望的时侯，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子，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那里，她跟到那里。《人民日报》在一九八〇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侯，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丁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徬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

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枪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一九八〇年，报纸上发表了姚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美穗子这件事，对中日友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日本人民很受感动。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感慨。他们说，八路军拯救日本小姑娘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要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收到了一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这些信电来自日本各地，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有的是请美穗子带来的，有的是直接寄来的，有的还送来了礼物。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信和礼物，还称我是什么“活菩萨”。

美穗子及其全家来我国探望的时候，我接见了他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北海道的渔民托她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她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我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今天的美穗子，纯朴善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中这个小小的“插曲”，四十年后，竟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

（《聂荣臻回忆录》）

进入南泥湾的第一人
——南泥湾的勘察、设计者刘宗义

勘察南泥湾

1940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和残酷的“扫荡”，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边区军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

1940年12月初，庆阳专署副专员马锡五找到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建设厅公路管理局庆(阳)——临(真)公路分局局长刘宗义谈话。马副专员讲，边区政府接中央军委来电，为战胜困难，边区政府要负责找到一块地理条件好、能垦荒种地的地方。因为刘宗义是搞公路工程建设的，在土木勘察、设计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专署决定把任务交给刘宗义，刘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刘做好准备工作之后，立即从庆阳动身，经河水，行程300华

里，到了富县，找到县长罗德成。因为富县离国统区只有18华里(当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一个人前往，危险性极大。于是罗县长调一个排30名战士给刘指挥。第二天，刘带领带足武器弹药的队伍，继续赶路，途经牛复城，晚达司家岔村(小屯，只有3、4户农家)，借住在王老伯家里。王老伯介绍说，30年前曾经去过南泥湾，那个地方很好，可现在没有人烟，了解的情况不多。王老伯要给我们带路，当时考虑到从司家岔村到南泥湾有80里路，是蒿深山高的原始森林，虎豹成群，野兽遍地，送到南泥湾容易，可没有人送回，危险极大，让王老伯给指个方向即可。第二天，刘等带足了干粮和水，按照王老伯指引的方向上路了。其实无路可走，在山高路险，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中长途跋涉，森林中树叶有一尺多深，仿佛走在像皮上，忽上忽下，但一想到为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为壮大声势，驱赶野兽，给三头小毛驴各佩带一个小铃铛，陕北籍的战士引亢高歌，既壮大了声势，又赶走了疲劳。太阳要落山时，刘宗义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南泥湾。

南泥湾是个寨子，曾经繁盛过，山庙里残碑记载说这里曾有过街市，后来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专制，官逼民反，这一带的居民才纷纷逃难，奔走他乡。刘守义等到达时，那里荒无人烟，一片狼藉，有碾子、石磨残迹，多数一半埋在土中，一半露在外面。房屋经风雨侵蚀，到处是断壁残垣，“遍地是蓬蒿，梢林乱树，成了豺狼野猫的巢穴，成了土匪出没的场所”。曾有个地主武装的团总率一团的土匪盘踞在此，后来被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给消灭了。

刘等一行人首先到达了离南泥湾不远的九龙泉，以班为单位，各自埋锅造饭，安排宿营。三头毛驴拴在一起，生三堆火，渡过了在南泥湾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开始了勘察、设计工作。刘带了一个测准仪，一个20米皮尺，还有滑杆等，进行简单的测量。主要是勘察地形、地貌、土质、水源、河的宽度、山的高度等等。南泥湾群山环绕，“一望不断的山峦，恰象海洋里波涛起伏”，荆棘丛生，野兽遍地，蒿草一人多高，是一个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气侯适宜的小盆地，极适合垦荒种地。近万亩沃土一旦全部垦出，不但陕甘宁边区自己够吃，还能支援其它解放区。对解放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极为关键：不但能解决解放区的物质供应，而且也开了大生产运动之先河，将给边区军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其开创性意义可谓重大。

勘察工作首先从九龙泉开始，向北到南阳府。南阳府当时也是破石残片遍地，树木荒草丛生。再向北到达金盆湾，当时王震率领359旅为保卫革命圣地延安，镇守此地。勘察完毕，一天半后回到延安，把勘察南泥湾的情况详细地绘制了一份草图，经整理，形成材料，这便是勘察、设计开垦南泥湾的第一手材料。

中共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救，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朱德总司令亲自负责。朱总创造性地坚持、丰富、发展了这一方针。主张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以保证边区军民所需。朱总一贯不尚空谈，遇事都要调查研究。当朱总知道刘宗义勘察了南泥湾后，通知刘休息两天后去汇报勘察情况。朱总当时住在延安桃园。刘未带介绍信，向门卫说明了情况，就径直走到朱总的居室。屋中有一方桌、一个简易沙发、两把椅子，简朴大方，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毫无特殊之处。当时朱总不在屋内，过一会，朱总回来了，刘自我介绍，建设厅刘宗义勘察南泥湾完毕，特向总司令汇报勘察情况。汇报大约用了90分钟。汇报时，朱总认真地看墙上的地图，并不时地圈圈点点，作下标记。朱总问得非常详细，如有无村庄、风俗习惯、土地面积、土质好坏、水源状况、河水宽度、山峰高度等等。

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印象很深，与想象中的威风凛凛、严肃可敬的将军相去甚远。朱总象个慈爱、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工作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又严肃认真，密切联系群众，是执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光辉典范。朱总告诉刘，你已是工程师了。刘说是工程员，朱总坚定地说，是工程师，我们的事业需要千万个象你这样的工程师。并亲笔写一封信，让刘亲自交给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与之密切合作，共同开发南泥湾。

首垦南泥湾

刘宗义带着朱总的亲笔信，见到了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共同研究了开垦南泥湾的具体计划。第二天，刘与武团长带两个警卫员4人骑马二进南泥湾考察。回来后确定了开垦南泥湾的具体日期。

1月末2月初，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全体指战员开进南泥湾。当时进度快、效率高、说干就干。具体分工是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开垦南泥湾，刘宗义带一个营负责开辟延(安)——南(泥湾)公路。成立了延——南公路工程处，行政、技术方面的工作由刘宗义负责，其它工作由营教导员丁本淳负责。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这是革命圣地延安与军需大本营南泥湾的必由之路，以后南泥湾生产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输到抗日前线，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任务的圆满完成。

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同时开进人烟稀少、虎狼出没的南泥湾。风餐露宿，自己动手，搭起草棚子；生活条件极端艰苦，没有粮食就挖野菜，没有油、肉就吃山羊、野兔。全体指战员都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三、四月份就开荒种地了。不久，王震359旅开进南泥湾，使开垦南泥湾的队伍迅速扩大。以后许多部队及边区政府，中央军委等单位相继开进南泥湾，划块屯田，建立各自的农场，展开劳动竞赛，南泥湾荒野变成了良田。

战士们发扬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利用农闲季节，打窑建房，烧灰铺路。到了秋天，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朱总亲自到南泥湾视察，称之为"花花世界"。南泥湾变成了米粮川，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刘宗义勘察、设计南泥湾，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首垦南泥湾，树立了"大生产运动"的榜样，实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战略方针，为以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现实意义也是重大的。

（木易：《党史纵横》92年4期）

高树勋捕杀石友三经过

安徽蚌埠市政协委员李席儒先生，1925年留学苏联，回国后在西北军汾阳军校任教，1933年参加抗日同盟军，为方振武部骑兵师长，失败后，投高树勋所部河北省保安处，任上校督察员，之后，随保安处改编新八师，任旅参谋长；1939年秋，调任高树勋军部任参议，代表高多次进见石友三；1940年冬，受命参加了捕杀石友三的活动。现将其亲身经历的捕杀石友三的经过，以问答录下，以补此段史料之阙。

问：李老，高树勋将军如何选中您参加捕杀石友三的活动？

答：石友三早就投靠日本人了。到了山东，他想把队伍拉过去，卖身求荣么，拉过去的队伍越多自然价码就越大，所以石想把高树勋也拉下水。但高为人正派，不为其所动，这就招了石的忌恨，慢慢地关系就恶化了。

石友三这个人，西北军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反复无常心狠手毒的人，在他身边干事的人都提心吊胆，格外小心。所以高树勋反了他，时刻提防着他的毒手，但表面上还得应付他呀。石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归他领导，可是高又不愿去见他，就想物色一个代表自己的人去应付周旋石友三，派谁呐？后来就选中了我。

高所以选中我，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我是方振武的至亲，(方振武胞兄方运震是我的外祖父)，又是方的旧部，石与方拜过金兰，关系极好，石决不会冲我下手；二，石友三的胞弟石友信是我留苏同学，回国后我们还有过来往。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与高的观点一致，坚决反对石的乞降叛国行为，深为高所信任。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便参予了捕杀石友三的活动中。

问：您在与石友三接触中有什么感觉？

答：石友三很生高的气，但又无可奈何。有一天，我陪石打牌，石说："建侯一直跟着我，现在人家可是阔了，尾大不掉呀！"建侯是高树勋的字。从1918年高在石的连队当班长，后来便跟着石步步升迁，石言下之意是：高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却忘恩负义不听我的了。我当即回答说："总司令，高军长至今还是您的部下，只要抗日，您指哪我们打哪，谁个敢抗令！"

石友三接见过我几次之后，或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吧，后来就不见我了，出来接待我的，是石的女秘书名叫林慰君(她在1940年秋在濮县与石友三结婚)，我称呼她林小姐，自然我们之间都是应付差事，大家心照不宣，如此而已。

问：请您谈谈如何逮住石友三的？

答：史料上人家说过的我就不再噜苏了，说一点大家不知道或不清楚的。

1940年12月1日上午八点多钟，石友三在孙良诚的陪同下，带着一连骑兵卫士来到柳下屯(高的军部驻地)，早有人来向高报告："孙总指挥和石总司令来了！"高先是一惊，跟着赶忙把手枪团长马金梁、卫士队长高金兰和我召到一起，作了逮捕石友三的部署：马解决石的骑兵连；我负责屯周围警戒，不准进出一个人；高金兰负责逮捕石友三。于是我们便分头行动了。

大约过了个把钟头，有人来给我报信，说石友三已经被抓起来了。我向警戒部队交代了几句就奔军部大院子去了。刚进大院子，就听上房里孙良诚破着嗓子在骂："高猴子，你太对不起人了，都是西北军的老弟兄，犯得着嘛！……"我轻步走近窗边，往里一瞧，并不见高树勋，是孙良诚正冲着高的师长马运昌在大发雷霆，马不敢吱声，低着头听着挨骂。孙良诚骂了一气，冲着马运昌："去，你去把建侯找来，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马一听这话，立即说了声"是"，就溜出来了。

问：石友三被逮捕后当晚就杀了吗？

答：没有。为什么没当即杀石，其中还有一段曲折，我也直说了吧。

石友三被逮住后，押到南寨一个灰砖的小四合院子里，周围布满了警戒。当天下午我去查岗时见过石友三。石一见我，双手一摊，说："有啥事不好说，这是干啥？"我不便多说什么，就说："总司令有什么话我可代转。"石友三气呼呼地："你先把我的皮大衣找来！"我说："可以。"扭头就往外走，刚跨出门槛，石友三又发话了："等等，你拿笔墨来，我要亲自给建侯写几个字。"我点点头就走了。

我找到高金兰，把石友三要皮大衣的话告诉他，请他代劳去查询一下。金兰是高树勋的侄子。1945年邯郸起义时，他背叛高树勋，带领一营人投奔青海马家，被蒋介石破格提拔为少将骑兵师长。1949年被解放军在战场上击毙。这都是后话了。金兰听说石友三要他的皮大衣，嘿嘿地笑了，说："小命都保不住了，还舍不得那件狐皮大衣。"我知道皮大衣准被他"没收"了，就随便摸了件士兵穿的灰布棉大衣，又拿了纸张笔墨送给石友三去了。

当天傍晚，我取了石友三写给高树勋的亲笔信，一共7页，信中先是追忆自己20多年来在西北军的经历，接着说到蒋介石杀韩复榘，排斥西北军，末尾表示自己想解甲归田，把六十九军交出来，决不反悔，等等，最后石还引用了一句古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赶忙把信交给了高，高一边看一边叹气，似有所动，看完了信沉思不语，我就退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杀石一事高的确犹豫过，原想把石押着，夺其兵权，使六十九军不致为敌所用，但马师长不同意，说："日子长，引来日本人，将酿成大祸，必须当机立断，除掉这一祸根！"特别是毕载奕、臧元骏，他们都是石身边的人，但都参与了捕石的活动，现在看到高对杀石之事动摇不定，认为：高如不杀石，咱们就要遭殃了，所以力促高一定要按预定计划行事。高这才下了杀石的决心。

问：一些资料中述及杀石的过程都是一笔带过，您能谈谈这个过程吗？

答：好，我来谈谈吧，不然这段史料就会人亡史佚了。

第二天，高树勋秘密下达了杀石的命令，执行人是高金兰和我。那天半夜里，高金兰拎着一盏马灯带着一班人随我一起去南寨，到了大门口，高拎着马灯走进院里，在石的房门口高喊："总司令，高军长有请！"连喊了两遍，屋里才有了动静，不一会，石披着棉大衣走到门口，看着高金兰，说："深更半夜的干啥？"

高金兰不慌不忙地说："军长说有急事叫我来请总司令。"

石友三一边穿好大衣一边跟着高金兰出来了。高金兰走在前面提着灯引路，当石友三刚迈出大院子门口，冷不防被埋伏在门外的一个大个子士兵来了个"背白狼"，背起就跑。石身材矮小，被大个子士兵用麻绳套住脖子一背起来，两条腿就悬空了，起先，石还手拉脚蹬，岂不知越折腾那麻绳就勒得越紧，不一会工夫，石的胳膊腿就挺直了。

那个大个子士兵一口气把石背出一里开外，走进一片树林子里停了下来，树林里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坑，我下令把石的尸体扔进坑里，士兵们七手八脚地就把坑填实了，这个民族败类终于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我和高金兰回到军部向高复命之后，部队便开始了紧急转移。

（作者附记：李席儒先生不幸于1988年冬病逝，享年87岁）

（侯鸿绪）

国民党政府主持第14代达赖"转世"

西藏政教的最高领袖达赖的确立，从清乾隆以来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方可发生效力。1940年，国民党政府就曾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第14代达赖喇嘛的转世和坐床大典。

达赖转世制创立于明初的宗喀巴大师。他是黄教创立者，逝世以后，其两大弟子达赖喇嘛根敦朱巴、班禅克珠杰承奉师嘱，世世代代以呼毕勒罕转生，袭继衣钵。呼毕勒罕是根据达赖与班禅临终前预示，用观海、问卜、降神等宗教方式，选觅"灵异幼童"来确定。按照藏族佛教的说法，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他们来到人间是为了宏扬佛法，拯救众生出苦海。佛徒把达赖和班禅当作全智全能的神来信仰。达赖和班禅同为西藏两大宗教领袖，但从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开始，清朝皇帝就将西藏政教大权交给历代达赖，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在西藏享有崇高无上的地位，被尊为"雪域一神"。因此，达赖的转世关系到西藏政教大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在平定了廓尔喀叛乱之后，对西藏政务作了全面整顿，对达赖转世规定了金本巴瓶掣签制度：即制两只金瓶，一置于北京雍和宫，一置于拉萨大昭寺。凡转世之呼毕勒罕，如同时选得数人，即将所选灵童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牙签上，将牙签放于瓶中。选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7日，用抽签方法确定哪名灵童为达赖化身。在北京举行掣签，由理藩部尚书到场监视；在拉萨举行，则由清廷驻藏大臣到场监视。如选觅灵童只有一人，除将写有其名的牙签放进瓶内外，还要放一个空牙签于瓶内，如抽到没有名字的空牙签，就不能认定已经寻觅的灵童是达赖化身，须再去寻找。如果是特别灵异的幼童，全藏僧俗一致公认为前代达赖化身，那么，可由驻藏大臣转呈朝廷，免除掣签。第10、11、12代达赖都是以掣签而定，第9、13两代达赖则是由西藏僧俗推定，得到中央政府承认的。

民国成立以后，对于蒙藏各项问题的处理，悉依清代旧制。

1933年12月17日，第13代达赖逝世，国民党政府特派黄慕松为专使，前往拉萨册封、致祭，并就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了交谈。按照藏族制度，达赖圆寂后，应从热振寺、木隆寺、功德林、策觉林、泽墨林五庙之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清朝政府授予蒙藏地区大活佛的封号）和噶凡池寺之噶丹池巴（噶丹池巴为宗喀巴法位继承人）中选一人为摄政王。经西藏僧俗代表大会占卜，决定热振呼图克图为摄政王。在热振主持下，开始选觅第14代达赖之呼毕勒罕。1937年被派到青海的格仓佛在西宁地区初选幼童14名，嗣经研究，以塔尔寺大泽祈家土司辖地曲却策仁之子拉木登珠最为灵异，因此当选，而在西藏境内亦选获灵童2人。西藏驻京办事处于

1938年9月22日电致蒙藏委员会：

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钧鉴：本月养日奉西藏政府结造司伦（西藏政府中帮办政务的官职，地位极高）、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等联合来电，略开：关于达赖佛转世一事，经僧民代表在各地详细访寻之结果，在西藏内部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2人；在西宁塔尔寺方面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1人。依照西藏宗教仪式，所寻选之幼童应聚集西藏，降鸾掣签，认定真正达赖之转世。既多灵异，后复经庄严之本巴瓶内典礼拈定。现典礼期将近，关于西宁塔尔寺地方各寻选者，请中央俯允该主管人员迅将寻选幼童送至西藏参加典礼，并恳发给执照以利行程。如何之处，希速转呈中央请示电复，等情。据此，相应电陈钧座鉴核示遵。

蒙藏委员会接电后，即与行政院和西藏地方政府频频相商入藏主持达赖转世办法。1938年1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发布：

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14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此令。

此时，西宁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拟留拉木登珠在寺升座，受众膜拜后再送往西藏，藏人恐错过掣签日期，恳请国民党政府派员赴青洽催，蒙藏委员会也因转世大典尚未举行，拉木登珠升座与制不合，电请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转告阿嘉呼图克图，不可强留灵童。马步芳在与阿嘉呼图克图商议后，派师长马元海为护送专使，于7月1日护送拉木登珠赴藏。

1939年10月1日，经最高国防会议核准，吴忠信在重庆组织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积极筹办入藏事宜。其主要成员为秘书长罗良鉴，顾问曹经沅、奚伦、吴叔仁、张国书，秘书周昆田、朱章、李国霖，第一组组长孔庆宗，第二组组长奚伦（兼），第三组组长周昆田（兼）。不带一兵一卒，拟以藏军为护卫。孔庆宗等人携带大批礼品先期启程，经西康入藏。吴忠信则于10月21日由渝飞港，取道缅甸、印度、锡金，经西藏亚东、江孜，于1940年1月15日晨到达距拉萨城30里的铁桥，受到热振代表札戈布及在藏的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商人的欢迎。当到达拉萨哲蚌寺时，西藏高级僧俗70余人、拉萨所有藏军、驻藏英国和尼泊尔代表都出来欢迎，沿途观者如堵。

吴忠信到拉萨后，除拜访西藏上层人物以外，还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项是分赠礼品。将在重庆、上海、香港、成都等地采办的300余驮钟表、杭绸、库缎、湘绣、景泰蓝、闽漆器具、景德镇瓷品普遍馈赠，上至达赖、下至僧俗300余人均有礼品，送达赖的礼品要用80余人搬运。

当初，西藏地方政府呈报时称，在西藏尚选有灵童2人，吴忠信抵拉萨后，才知仅有拉木登珠1人。热振等于1940年1月26日具文呈请：

吴委员长钧鉴：为欲明雪地仰赖大佛第13辈达赖转世与否，谨于乙亥年在达赖寝室内所奉发言女神前拈有卜丸，神示已经出世……决认青海大泽祈家之灵儿为真身……因群众情投意合，不须掣瓶，照例剃发受戒，业已呈报中央在案。兹遵乃冲大神所示，庚辰年坐床为吉，谨诹定正月14吉日举行坐床典礼。其应如何转报中央之处，即请代达为荷。西藏代理藏王摄政、云燕热振呼图克图。乙卯十二月十七日。

吴忠信接函后，于1月31日上午11日时亲往罗布岭冈，访晤拉木登珠，面加考察。吴频以问题询之，拉木登珠均能含笑作答，言语举止沉着，且通汉语，吴也深感欣然。两人谈话之后，在小花亭前摄影留念。行政院在接到吴忠信转送的热振信函后，电致行辕：

奉国民政府二十九年二月五日令开，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13辈达赖转世，应即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14辈达赖喇嘛。此令，特因。又奉令开：拉木登珠业已明令特准继任为第14辈达赖喇嘛，坐床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40万元，以示优异。

吴忠信与热振商定：坐床大典于2月22日（藏历正月14日）举行，并将此呈报国民政府备案。

2月21日，西藏地方政府以盛大仪仗将拉木登珠从罗布岭冈迎到布达拉宫。第二天上午5时，达赖与吴忠信并排坐北面南，中央官吏坐东面西，热振率僧官坐西面东，噶伦（是西藏政府的高级官员，通常有四人、三僧一俗）及各世家公子坐南面北。

参加大典有500多人，首由热振向达赖行三叩首礼，三噶伦继之。热振立殿之中央，对达赖诵经并宣读疏文，随后一堪布（即寺庙之主持）持丁钢多尔济一幅挂达赖座上，祝福其长寿不老，另一堪布将宗喀巴僧帽（尖顶黄帽）戴在达赖头上。热振率各活佛献哈达及五供。吴忠信及随员也献了哈达。司伦、噶伦等鱼贯而入，依次献哈达及五供。贺礼完毕，两位辩经师就佛学展开辩论。辩论结束，20余手持短钺的儿童入场舞蹈。继之，进茶进饭，最后用糌粑制成经油炸的面饼运至殿中，堆积如山，高及屋宇，上面排列牛羊肉，此时几十个平民和仆役蜂涌而入，争抢食物，堪布们手持木棍乱击，声音嘈杂，以此象征将来之吉祥。9时30分，大典告成，拉木登珠正式就任第14辈达赖。3月8日，热振暨噶厦电呈林森及蒋介石：

14辈达赖佛慈念众生，化身早临，僧俗群众皆大欢喜，乃于藏历正月14日升布达拉宫宝座举行大典。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暨。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禳，祈祷中央胜利。

3月25日，吴忠信在拉萨宣布：孙庆宗、张威白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副处长。4月14日，吴忠信率行辕其他人员启程回重庆，西藏地方政府派代本（藏军军

官，率500人，相当于团长）为护送专员、沿途侍护。7月4日吴经锡金、印度、缅甸回到重庆。

（林林）

侵华日军细菌战和用活人实验的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建立的细菌战部队，除设在哈尔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外，还有设在北平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字一八五五部队），设在南京的“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荣”字一六四四部队），设在广东的“南支那防疫给水部”（“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和设在新加坡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威”字或“冈”字九四二〇部队）。这些部队，除七三一部队早在1936年就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奉天皇敕令建立外，都是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在1939年至1941年间设立的，核心人物都是罪恶昭著的细菌战思想家和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属下的军医官们。在这些部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七三一部队，但南京一六四四部队占有重要地位，在华中地区的细菌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揭露该部队的罪行。

一、一六四四部队概况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把南京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新的基地。石井四郎向日本陆军提出，在南京设立新的机构，作为扩大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于是，1939年在南京设立了“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这个部队通称“多摩部队”，1943年12月以来称“登”部队，有时也被称之为“桧”部队，秘密名称是“荣”字一六四四部队。

这支部队，下设12个支队，全部工作人员约1500人。第一任部队长是石井四郎，第二任为太田澄，第三任为增田知贞，第四任为佐藤俊二，战败投降时为山崎新。部队长以下设一部四科，即总务部，管理全面工作，如人事、教育、领导等；防疫科，掌握细菌的“检索”、培养，传染病的防疫和其他一般防疫业务；材料科，掌管各种卫生材料、供水器具及其他一般资料；理化科，掌管毒品的检查、预防注射液的制造、水质调查及其他理化研究；经理科，主管部队内部的给养。

部队本部设在南京原中国中央医院旧址，现在，在美国国家档案中心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各藏有一张一六四四部队本部的位置及平面图。据美国档案记载，该部队地处中山东路路北，路南是明故宫飞机场，东面是汉奸伪政权的军官学校，西面是航空队宿舍。该部队本部范围内，建筑物A是培养霍乱、斑疹、伤寒、赤痢和鼠疫菌的四层大楼，B是豢养动物的建筑，C是该部队办事处六层大楼，兼作本部工作人员宿舍及仓库，D是本部“军属”及部分军官居住的房屋，E是锅炉房，F是用作教学的三层楼房，G是作为药局的二层楼房，H是车库和厨房，J是高烟囱（原图未标明所在位置——本文作者），K是仓库，L是该部队所属庭园，种植毒草及盐基性植物，M是用作航空兵宿舍的建筑，M－1是四层楼航空兵宿舍，N是伪政权军官学校。

中国档案馆所藏的草图，是一六四四部队原防疫科科员榛叶修，在1946年4月17日写《日军罪行证明书》时绘制的。这一草图，与上述美国档案馆所藏平面图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A标载为培养室、研究室。并注明二楼以上除将校外，禁止出入，G为病房，L为植物园。

此外，在该部队本部北面城北太平门沿城墙一带，当时极为荒僻，是收埋无主尸骸的义冢地和军队打靶的地方。该部队在太平门附近九华山下设立了一个附属机构，伪称“血清疫苗制造所”，实际上是生产细菌的工厂，平时极为机密，日军投降时即加以破坏。

二、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

一六四四部队的罪恶活动之一，是研究和繁殖各种致命的细菌，用作进行细菌攻击的武器。1944年12月，美国驻华空军司令部参谋二处在向美国军方的报告中，第一次证实了一六四四部队在繁殖各种致命的细菌。这份报告说，据两名被俘的日本卫生兵供认：“荣”字一六四四部队从事于培养霍乱、伤寒、赤痢等传染病菌的工作，1944年1月，又开始培养鼠疫菌。并说，上述建筑物A二楼以上，只有持有特别许可证的将校及准士官才能进入。在这一建筑物内工作的人员，大多数是所谓的“军属”，而多数“军属”，具有相当于少佐以上的军衔。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中国方面清理了太平门附近日军生产细菌的工厂。据参加清理者证实，当时那里还有一座象一间房子一样大的高压消毒器残体，其旁装置一座大锅炉，用以供给蒸气。里面有铁轨，一切培养细菌的材料，先用车子载进去消毒，可见其制造规模之大。试验的动物，当时还有2000多只小白鼠和几百只天竺鼠，但不久就全部死掉了。培养细菌用的仪器，有试管、平板各数十万只，温箱（孵卵箱）、冰箱各数十个，铝质培养箱数百个。培养基，有东洋菜（琼脂）30余吨，鱼肉精膏百余箱。据大略推算，每2至3公斤琼脂可制造细菌悬液20至30西西，则仅就日军所余的这一批培养基，就足以制造绝灭人性的细菌武器3万万西西。

1946年4月17日，一六四四部队原防疫科员榛叶修揭露说，“该部队确实生产下列细菌，但在部队内对一般士兵也是秘密，〔仅〕直接有关的军官了解。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制造下列细菌是事实：一霍乱、二伤寒、三

鼠疫、四赤痢。制造有关者为防疫科全部人员。"

1949年12月，一六四四原部队长佐藤俊二在前苏联军事法庭供认：一六四四部队"进行过研究大量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我在任'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究和大量生产细菌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部队内所设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三百名细菌学干部，以便进行细菌战的需要"。供大批培养细菌用的设备，有"石井式培养器约二百具，孵育室(容积5×5×3公尺)一所，管式营养液消毒器(直径一公尺半，长二公尺半)两具，孵育器约四十至五十具，蒸汽灭菌器四十至五十具，科哈式锅炉约四十至五十具。此外，还有蒸馏营养液的大玻璃蒸馏器"。他说，"其中有一部分安置在司令部"。生产能力，"在利用全部设备时，每生产周期能制造出细菌十公斤"。此外，还大量繁殖跳蚤，佐藤说，"繁殖跳蚤的工作在我未到一六四四部队供职以前，就已在进行了。为此曾备置有大约一百个汽油桶"。

这些资料说明，一六四四部队研究繁殖各种致命的细菌，作为细菌攻击的武器，且规模巨大，是确凿无疑的了。

三、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

前苏联在审判一六四四部队原部队长佐藤时，公诉人曾问："一六四四部队曾用活人进行过何种实验？"佐藤回答说："该部队未曾用活人进行实验。"但这完全是假话，事实是，一六四四部队同七三一部队一样，除了用动物进行细菌试验之外，还用活人进行试验。

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一位当时有机会接近该部队的台湾籍同胞谢金龙，就向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控告一六四四部队长山崎新等用病菌杀害人民。谢金龙说，1942年，他曾亲眼看见日军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第三科科长广本上尉的命令，挑选百余名中国俘虏，到中山门内中央医院旧址，交多摩部队(一六四四部队)供细菌试验，把各种病菌注射到较强壮的俘虏身上，观测变化。结果在数日之内，百余人全部死亡。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对此案调查后获知：一、"该部队初系野战医院，继改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设于中山门内中央医院原址。该部队之第一部系主管特殊研究与实验等秘密工作，即选择国军俘虏而将各种病菌药品注射其身体，作为实验上之研究，前后致死者甚多，但其极端秘密，除该第一部人员外，无从知其详情。"二、"敌日在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原址设有俘虏收容所，森田中尉任所长，隶属于敌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该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以为俘虏人数众多，开支甚巨，遂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选送俘虏百人至多摩部队，以供特别残酷之(行为)研究，用作病菌药品之实验。结果全数死亡，无一生存。而在此事之前后，尚有多次，但现无人证备考。"

中国法庭的调查材料，曾呈送远东国际法庭。1946年8月29日，国际法庭代表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萨顿，宣读了这一材料，说"敌方'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入其体内，试验其变化。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切查明的。"这一材料引起了法庭的注意，文件宣读后，审判长韦伯对萨顿说："您不想再供给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试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么？"并说，对法庭说来，这"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这点。难道你就只说到这里为止么"？当时法庭正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萨顿回答说，"此刻我们不想拿出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以后，国际法庭没有审理细菌战案件，其原因后面还要谈及。

战后，在日本方面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证据。如一个曾在南京日本陆军医疗队工作的下级军医中西义雄，战后在《赤旗报》发表声明，说他曾与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一六四四部队)人员来往，这些人告诉他说："该部队的工作是从事培养传播疫苗的细菌，他们还曾用中国人作实验。"《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为了收集证据，访问了17个人。结论是："用活人进行试验，是在(一六四四)部队本部供研究用的建筑物中进行的。一楼是霍乱、伤寒、鼠疫等细菌的培养室和消毒室、验水室，二楼是饲养老鼠和跳蚤的地方，三楼是实验室和研究室，最高层四楼是监禁实验用囚犯的地方。监禁的囚犯最多时近百人，一般大体上是二、三十人，其中夹杂着妇女和幼稚的孩子。"朝野富三还记述了该部队一次活人试验的情况。这次实验是和"九研"(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也叫登户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他写道："实验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于一六四四部队供研究用的建筑物中进行，为防泄密，直接参加者限于'九研'工作人员七人，一六四四部队军医二人和翻译。实验从把俘虏和囚犯由四楼监禁室带到三楼实验室开始，他们进入实验室后，就使之躺在床上，'九研'工作人员和军医站在旁边。翻译对俘虏说'这是日本医生，不要担心，用药物给你们治疗'。这当然是假话、目的是使察觉到气氛异常而极度恐怖地注视着的俘虏安心，以防止乱闹。实验者都穿着白大褂，装作医生。接着在躺着的男俘胳膊上注射大剂量的剧毒和氰酸，以观测其反应。一个亲自把氰酸注射到中国男子胳膊上的'九研'技术员A(住在东京，1905年生)说：'若被(俘虏)察觉而闹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干净利落地注射。该男人立即发生痉挛，身体哆嗦，微微颤抖。仅几十秒钟，就一边抽搐，一边气息奄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只几分钟。'"

朝野的调查，说四楼监禁的俘虏有时近百人，这一数字与前述谢金龙的揭露和中国法庭的调查是一致的。

四、进行细菌战

一六四四前部队长佐藤曾供认："当我在'荣'字一六四四部队供职时，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这几次细菌战，都是与七三一部队一起进行的。佐藤说，七三一远征队到达南京时，驻扎在一六四四部队营舍内，一六四四部队是该远征队的基地，并供给远征队相当数量的跳蚤进行细菌战。

宁波是华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上海陷落后成为中国向后方补给的重要通道。为此，1940年9月至12月，日军向宁波、衢县、金华等地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原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供认，1940年9月，他在北平防疫给水部时，曾看到一份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关于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攻击的文件，并看到一部1940年间七三一远征队在宁波一带撒布细菌的纪实影片。他说，"起初在银幕上映演的，是装有染上鼠疫跳蚤的器皿怎样安置到机身下面去。随后映演的，是撒放器怎样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接着就是一段解释，说明这一器皿内盛有鼠疫细菌。……那架飞机飞到敌军上空，……就出现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随后飞机就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 战完毕'几字。……随后出现'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道，在宁波一带忽然间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最后一副镜头，是表明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衫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情形。我正是从这部影片上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武器的经过。"原七三一第四部即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则供认，他在这次细菌攻击中，受命制造了伤寒菌70公斤，霍乱菌50公斤，同时还知道该远征队还带去了5公斤鼠疫跳蚤。

中国方面关于这次受害情况的资料甚多。如宁波元泰酒店幸存者钱贵法证明：1940年"11月22日，有一架单翼飞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并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投下许多小麦、面粉和粟子……29日开明街等地即暴发疫病，次日即有人死亡。不几日，我也染疫被送进隔离医院，眼见同我一起住院病人都相继死亡，只有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当地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等对死者检验结果，都断定为鼠疫杆菌。日机投落物最多的地区，暴发疫疾的人也最多。当年参加灭疫工作的钟辉说，日机在宁波空投麦粟杂物后不久，就发生疫病，"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筒靴在疫区里工作后出来时，下半身爬着很多颜色红红的比平常小的跳蚤"。宁波医师们认为，日机投落物与奇异红小蚤和发病时间、地点"完全吻合"，足以证明是日军制造的。总计宁波患疫者99人，其中97人死亡，开明街等地30户中，12户全家患病，内9户全家死亡。

与此同时，日军还在浙江鄞县、衢县、金华等地撒布细菌，致使这些地区均发生鼠疫，情况严重。为此，1940年12月6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告重庆："敌机在浙江省境内撒播毒物，业经该省卫生署检查断定为鼠疫杆菌"，要求"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总计衢县死亡200余人，金华死亡1600余人。

常德是当时中国后方的重要补给线和交通枢纽，为了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1941年6月，日军派出了太田大佐领导的第二次远征队。全队100人，其中有30个细菌学家。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供认，该远征队回来后，太田向石井报告，川岛列席。太田说，他们在常德城及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散播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在常德一带居民中引起大量鼠疫流行。石井和太田都非常满意这次远征队的成绩。

中国方面，经军医署和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调查，均证实属腺鼠疫流行。而且，确认"常德鼠疫来源，系由敌机掷下的鼠疫传染物内有鼠疫传染性之蚤所致"。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也调查确认，"常德鼠疫确系敌机散播染有鼠疫杆菌之异物所致，传染媒介为隐藏于谷麦棉絮内之活性染疫鼠蚤"。流行时间为日机投掷谷麦等物后的第七日，即1941年11月11日至1942年1月13日，其中11月12日至24日，即死亡17人。又由于该染疫鼠蚤侵入当地鼠族，致使1942年3月24日起至7月，又再度流行。而且，由于乡民李佑生染疫后潜返故乡桃源县后死亡，其所染肺鼠疫又直接传染别人，致使桃源县莫林乡探视李佑生之亲属及邻居，相继染疫死亡者16人。

到1942年年中，一六四四部队与七三一部队在浙赣地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这年4月，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空袭东京、横滨和名古屋等地。但由于距离过远，无法返航而在中国浙赣地区降落。日军为了拔除浙赣地区的中国军基地和消灭集中在金华、龙游、衢县、玉山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这次进攻。日军主力为第十三军团（司令部设上海）、第十一军团（司令部设武汉）一部及一六四四等细菌战部队。在这次进攻中，一六四四部队和七三一部队在6月至7月，把所培养的细菌散布在金华、衢县一带日军退出的地区。方法与上两次用飞机空投不同，而是将细菌投入水井、沼泽和民房，还特制了一部分"蛋形和长扁形的饼干，……染有细菌，预先对日军兵士说明这是什么饼干之后，就把饼干发给他们，而他们就把这批总数共约有三四百块的饼干掷于院墙下

面、树木下面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仿佛是他们偶然忘掉的”，使中国人吃了染上细菌。

关于这次细菌攻击，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兼第四部长川岛清、第一部（研究制造细菌武器）工作人员古都良雄、原十三军团司令部侦探科长三品和一六四四部队防疫科员榛叶修都有交待。如川岛交待说：在这次细菌攻击前，石井四郎中将于 6 月召集全体指挥人员宣布，“很快就要派遣远征队到华中去，以期探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这个远征队是遵照参谋本部所下命令组织起来而派走的，其主要任务是要研究所谓地面传染方法，即在地面上施放细菌的方法。……6 月底到 7 月初，抵达驻屯南京的‘荣’字部队”。以‘荣’字部队为基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据点。攻击原定于 7 月末。但因日军在浙赣一带采取的战略退却动作稍微迟了一点。所以这次细菌攻击动作是 8 月底举行的”。“采用的细菌，是鼠疫菌、霍乱菌及副伤寒症菌三种”。古都良雄交待，远征队与一六四四部队部分官兵一起将细菌投入水井、沼泽和民房，以引起瘟疫。在三品的交待中，说当时日军缴获了一份中国军队 9 月初发给师级指挥部的文件。该文件说日军在退却时在衢县一带撒播鼠疫细菌，命令师部要特别注意，并采取防备措施。榛叶修则交待，细菌武器是一六四四部队用飞机运到前线去的，当时一六四四部队至少有两架这样的飞机。

这次细菌攻击，使中国大批和平居民死亡。以义乌县祟山村为例，全村 380 多户，因被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 320 多人，全家死光的就有 30 户左右。

五、国际法庭为何未予审判

1925 年 6 月 17 日，各国在日内瓦签订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日内瓦议定书的墨迹未干，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占我国东北后，就为准备细菌战成立了秘密的细菌实验室，不久发展成为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关东军马匹防疫部，设长春孟家屯）。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又在中国南京等地和新加坡建立细菌部队，大肆研究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和制造足够的细菌武器，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战部队。

关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获得确凿罪证，证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1946 年 6 月，南京一六四四部队中因不愿参加非人道的细菌战而逃到中国方面去的队员，曾向国际法庭检察局提出证词，说在南京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秘密研究霍乱、伤寒、鼠疫、痢疾等传染病菌，并于 1942 年 6 月至 7 月把这些细菌散布在以金华为中心的地区。事实上美国早就在调查日军的细菌战活动了，而且早就了解中心人物是石井四郎，本部设在哈尔滨。战争结束后，美国继续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报告。同时中国方面也不断向美方提供有关情报，如 1942 年 4 月 11 日，美驻华使馆致函国务院，其中引用了中国外交部和卫生署的声明，谴责日军 1940 年 10 月在宁波、1941 年 11 月在常德散播鼠疫细菌。

1944 年 12 月，驻华美军司令部参谋二处又将南京一六四四部队的情报上报美国军部，说 1942 年浙赣作战中，日军散播的细菌，就是在一六四四部队建筑物中生产的，运载细菌的飞机，是该部队拥有的特殊飞机，该部队有三架这样的飞机，停放在该部队本部南面的飞机场上。在细菌战中运载细菌武器的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此外，前苏联也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等情报送交美国，并一再要求引渡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但美国却拒不引渡，也不进行审判，原因是美国也在进行研究，而且很多项目与日军细菌战试验的项目类似。日军的试验结果，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美国急于把这些技术情报弄到手。特别是用活人进行试验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因为，用动物进行试验所得到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适用于人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有关技术情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免于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责任。对于麦克阿瑟的要求，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研究同意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给石井等人免于追究其责任的特殊待遇。这就是国际法庭没有审理日军细菌战案件的原因所在。

（高兴祖）

历史考证

百团大战参战部队应是一百零五个团

百团大战，是我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在这次战役中，我参战部队究竟有多少个团？至今说法不够一致。据我的初步考察，参战部队共一百零五个团的提法比较准确。其主要根据是：①1940 年 8 月 22 日，以朱德、彭德怀等人署名，发给阎锡山、卫立煌等人的电报中称：“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

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求参战部队共一百零五个团。”②1940年9月14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发布的《百团大战战绩初步总结》中宣布，我参战的“正规军、地方军，共一百零五个团”。③从参战部队分布情况来看：正太线三十个团；平汉线由卢沟桥至邯郸段十五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十二个团；津浦线由天津至德州段四个团；汾离公路六个团；白晋线六个团；北宁线二个团；平绥线二个团；沧石线四个团；德石路四个团；邯济路三个团；代县至蔚县四个团；平大线（北平至大名）六个团；辽平线（辽县至平定）三个团；宁武、岢岚、静乐线四个团，总计一百零五个团。④彭德怀《往事回忆》中提到百团大战我参战部队共一百零四个团，这与一百零五个团数字很接近。这一个团的误差，可能是彭德怀记忆的差错，因他写这回忆录时处境困难，资料不可能齐全。

关于一百一十五个团之说，我认为，是由于把百团大战爆发后，我山东等地的八路军及地方部队的积极配合，如一一五师向津浦路天津至德州段之破击和山东纵队在胶济路之破击战的部队，也划入了百团大战的范围。1940年8月22日，朱德、彭德怀等署名，给阎锡山、卫立煌等人的电报中说：百团大战除“一一五师主力及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求参战部队共一百零五个团”。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中曾要求，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由此可见，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及山东地方部队不属于百团大战的战斗序列。

从作战区域来看，“百团大战作战地区包括着冀察全境，晋绥之绝大部分领域，热南地区。”而不包括山东。从当时所发布的战报和战果来看，也未包括一一五师及山东部队。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说明，百团大战我军参战部队应是一百零五个团。

（摘自《军学》1984年第3期《“百团大战”我参战部队究竟有多少个团?》一文，作者：刘家国）

中央军委为何没有批复百团大战计划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正太路破袭战（即百团大战）预备命令的电报，是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共同署名发的。电报是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军委”，直到8月20日战役发起，军委没有批复。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彭搞“独立王国”，“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彭德怀也承认，“未等到军委批准，就提早发起了战斗”（见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第236—237页）。为什么军委对此电没有批复？据成普（1940年前后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写的材料证明，王稼祥在“七大”期间，曾说明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医院养病，电报是他收的，他疏忽了，没有转送毛主席，也没有批复。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

保镖林怀部为何刺杀张啸林

香港影片《大上海1937年》把张啸林与日本特务勾结，被保镖林怀部刺杀的经过搬上银幕，情节离奇曲折，险象环生。但这是艺术作品，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1940年8月14日下午一时许，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4号张啸林私邸天井里张的保镖林怀部同张的汽车司机王文亮（又名阿四）发生吵闹。林说，这几天他身体不适，浑身发燥，发了寒热，要求请假。王不准，叫他同保镖领班说。林火气上来，骂王不帮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正在二楼接待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的张啸林听到吵闹声，不禁探身窗口看个究竟。

“妈特个××！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体，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触那，老子好多叫点东洋宪兵来了，用不着你们哉，些快（要死了），一个个的把枪给我缴下，统统滚蛋！”张啸林向楼下的林怀部和王文亮厉声骂道。

林怀部向张诉说：“我来时米价15元一担，现时涨至70元，我每月工资20元，实在无法养家活口！”

张啸林一听大为光火，命令王文亮立即把他的枪缴下。

林怀部一面拔出手枪，一面抬头骂道：“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骂声未停，枪声已响。只见张啸林身子向前一仆。林怀部几个箭步，早已登上二楼。张啸林倒在血泊之中。吴静观正在打电话报告巡捕，见林怀部上楼，急忙丢掉电话筒，前来抱住林怀部。林见状，一不作，二不休，扳动手枪扣机，“砰砰”二声，吴静观便一命呜呼！

林怀部打死了张啸林和他的“学生”吴静观，知道事情闹大了，匆匆下楼夺门而出，但终究还是被张啸林的保镖逮住，立即被送到法捕房。

法捕房接到张啸林被杀的电话，火速派出一批中西探捕来到张啸林私邸，但见张已直挺挺躺倒在地上，子弹是从喉部进眼部出的。眼珠被射了出来，血淋淋的，甚是吓人。

张啸林私邸的枪声、喊声早已惊动了仅隔一扇月洞门的杜月笙私邸的留守人员，他们过去探视“张家伯伯”，

一个个目瞪口呆，胆颤心惊。远在香港的杜月笙闻讯眼泪横流，悲痛万分，这毕竟是他多年来同甘共苦的把兄弟！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张20岁那年，因在乡下混不下去，便举家迁至杭州府拱宸桥。拱宸桥一带是流氓地痞出没之地，张啸林原是游手好闲之徒，一到拱宸桥，便同这里的流氓地痞打得火热，专以寻衅打架、豪赌敲诈为生，后因打死人，举家迁往上海。

张啸林一踏进上海滩，即与上海滩的流氓臭气相投，称兄道弟，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勾当。后又拜了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师，成为"通"字辈成员，在沪、杭一带广收门徒，发展黑势力。张身材魁梧，颇有力气，凶险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凑趣捧场称他为"张大帅"。不久，张啸林又与黄金荣、杜月笙勾搭上，结为把兄弟，进而合伙贩运鸦片，大发横财。1924年，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两亩地基分赠张、杜，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两家亲如一家。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啸林伙同流氓、地痞组织了所谓"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屠杀工人纠察队的急先锋，于是成为蒋介石在上海滩的大红人。为了与蒋介石勾得更紧，他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曾以及杨虎、陈群八人结为兄弟，这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老八股党"。

30年代后，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超过了黄、张，于是张对杜便产生嫉妒之心。1935年，蒋介石施行"法币"政策，杜月笙事前得到了消息，没有告诉张，自己趁机狠狠地捞一把，张对此深为不满。张是个武夫，脾气暴躁，行为粗鲁，动辄训人。而杜有时还能假装斯文，善于笼络人心，玩弄小恩小惠。因此，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门下。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张曾托杜向蒋介石引荐，一直未能得到蒋的重用，张以为杜不帮忙。如此等等，张、杜之间便产生了裂痕，张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吩咐杜月笙拉黄金荣、张啸林去香港。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为由，留居上海，闭门谢客。张认为这是他独霸上海的大好时机，不听杜月笙劝告，决定留在上海。"八·一三"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张却躲到莫干山他的公馆避暑。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潜往莫干山与张密谈。不久，张返回上海，同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派其门徒四出活动，为日本侵略者收购急需的煤炭、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甘心情愿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大发国难财。1939年冬，张取得日本特务机关支持，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军统"特务探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除奸杀张。

抗战爆发后，军统局在上海建立"上海区"，特务多至千余人，除了干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勾当外，对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也进行恐怖暗杀活动。

就在张啸林被枪杀之前，上海孤岛已有几个汉奸先后毙命，如伪上海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黄道会"会长周树人、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等等。而张啸林因与日本特务打得火热，早已引起军统的注意，戴笠曾经提示杜月笙要"大义灭亲"。只因他与张毕竟还有兄弟之情，不忍心亲自对张下毒手。几次劝张远离上海到香港，无奈张不仅不听劝告，反而继续同日本特务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其实，早在1939年，军统"上海区"的头目陈荣澍已经接到戴笠指令，要他们干掉张啸林。其后，军统局又多次发出同样的对张制裁令。

此时，杜月笙的门人纷纷加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阵营，大搞"铁血除奸"恐怖活动。张啸林已成为他们狙击的重要目标。有一天，杜月笙的学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奉军统之命，来到福熙路(今延安西路)、同孚路(今石门一路)附近，守候了一阵子，只见前面开来一辆汽车，于松乔接到指示，马上走近向车后座射击。当他开枪的时候，一看原来车后座坐的是张啸林。等他看清，子弹早已飞射出去，他不禁思想一震，手忙脚乱。张啸林坐的是保险车子，车身护有钢板，车窗玻璃也是子弹打不穿的，因此没有被打死。但他却看清了开枪的是于松乔。回到家里，惊魂未定，破口大骂杜月笙不讲交情。于是，张、杜两人的结冤日深。

张啸林不遗余力为日军采购急需物资。他与儿女亲家俞叶封一搭一档。俞原是一个缉私营统领，同张攀上亲后有恃无恐，为张四出奔波，搜刮民脂民膏。他的活动也早已为军统特务所掌握。军统局决定先干掉俞叶封。那一夜，俞叶封照例到更新舞台，为某女名伶捧场。俞正聚精会神地听她唱戏，听到开心处，情不自禁地击节拍手。蓦地包厢里响起机关枪声。俞急忙向前一仆，趴在地上。枪声过后，睁开眼睛，自己安然无恙，可是陪同他来的"久记社"名学友吴某身上已中数弹，当场气绝身死。俞如丧家之犬，急急匆匆逃回张公馆。张见状，劈头便骂："×××，天底下女人多的是，你热昏了呀，连×××这种白虎星，你也要去×！"

俞叶封被杀未遂，这不能不引起张啸林的深思，他何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也会被军统制裁！但此时的张啸林已利令智昏，他同日本特务的勾结越来越紧，采购范围越来越广，生意越做越大。1939年夏天，他又借避暑为名，躲到莫干山张公馆。一回到上海就大肆招兵买马，发展黑势力，并把他的保镖增加到20多个。林怀部就是在这时招进来的。

林怀部何许人也？他原是法捕房的一名华捕，其父曾为北洋军队的团长，与张啸林颇有交情。张曾出资赎过一名妓女，她后在林怀部家当婢女(原以为是林的姐姐)。张

60岁时，林母曾备丰厚的礼物向张祝贺，林即拜张的司机王文亮为老头子，并恳求王推荐其到张家干活。张念林父生前与之交情不薄，就安排林在门口看门，月薪20元。七八个月后，张有一保镖缺职，林就向张"毛遂自荐"，说他在当华捕时，射击屡得当局奖状，对使用手枪颇有经验，要求填补保镖职司。张见其枪法不凡，即允其请。

俞叶封不思悔改，他早恋上了那个女伶，照样每天去为她喝彩捧场。1940年年初一天晚上，俞叶封兴致勃勃地来到更新舞台，坐在楼上第一排听她唱戏。这晚她唱的是《玉堂春》。清脆婉转的唱腔使全场鸦雀无声。俞叶封更是眯起眼睛在听他心爱的人一曲绕梁。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邻座，军统特务却悄悄地拔出了藏在腋间的手枪，对准他的心脏部位，"砰"的一枪。台上台下一听到枪声，顿时秩序大乱。在场的巡捕、包打听却依然袖手旁观。军统特务执行任务完毕，混杂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撤退了，留在座椅上的是俞叶封的那具尸体。

俞叶封在大庭广众中被杀，震动了上海滩。张啸林兔死狐悲，惊慌万状，他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将至。从此足不出户，加强戒备，但是，流氓成性的张啸林实在熬不住这种寂寞的日子，每天晚上还是要到大新公司五楼俱乐部里去消遣、赌钱。出门回家，总是有10多名保镖分坐三部汽车，首尾相衔，为他开路。有一天晚上，当张啸林的车队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交叉处，突然亮起了红灯，张的车队不得不停下。就在这刹那，埋伏在街角的军统特务手提机枪猛烈射击。张的汽车司机王文亮见状，吓破了胆，但他又异常机警，立即猛踩油门闯红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汽车飞驰而去，张啸林才得以免死于乱枪之下。

虽然，张啸林逃过了这次鬼门关，每天闭门在家，连晚上也不敢再出门，可是，他终究逃不出厄运。就在这一年的8月14日，他的保镖林怀部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生命！

林怀部为什么要杀张啸林呢？对于这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还没有弄清楚，但笔者以为同军统特务是有关系的。

据林怀部被捉拿归案的自供，他仅仅是为了每月20元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计，又加上其时请假不准，遭到张啸林的辱骂，因而出于一时的义愤而开枪打死张啸林的。从林的自供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

杜月笙的姑表兄弟、杜宅的总管家万墨林在70年代撰写的《沪上往事》（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书中说："林怀部和我毫无渊源，而且彼此并不认识，可以说连泛泛的点头交情都没有。""他（林怀部）杀张大帅和吴金桂（即吴静观），纯粹出于发泄私忿，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嘱托，充其量只能说'汉奸国贼，人人可以诛之'。一时激于义愤锄奸报国而已"。章君穀著的《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说，杜月笙听到张啸林的死讯曾经叹息地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杜月笙"学生"、军统特务）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拜兄弟，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无论万墨林，还是章君穀都矢口否认林怀部枪杀张啸林与杜月笙有直接关系。当时"上海区"的军统特务头目陈荣澍在80年代著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的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然而，在陈荣澍的这本书中却另外披露一些事实，如他说1940年五六月间，曾经接到"行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说"已经在张某（张啸林）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援，一待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张被杀后，陈荣澍又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林怀部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林枪杀张也是由军统特务布置的。尽管作为"上海区"大头目的陈荣澍不知其详，但他手下的特务却是与林怀部有联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军统特务杀张除奸的计划已定，至于由何人执行，特务人员可以自己找出合适的人选，陈荣澍未必十分清楚。林怀部自供否定枪杀张啸林与军统特务有联系，在于不敢得罪国民党政府。同时，还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军统特务系统的保释。

林怀部与军统特务的联系，还可以从《魔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书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本书是根据杜月笙的"学生"、汉奸汪曼云等在上海一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供词编撰的。1986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说："张啸林的死，还是逃不了杜月笙，因为有万墨林轧脚在内。打张的刺客，就是张身边的保镖，这个保镖是由万墨林通过张的汽车司机介绍给张的。他打张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特务行动"。"不必说自然是得到杜的同意的，甚至是杜的指示"。杜月笙去香港后，仍然同戴笠有密切的联系，杜的许多学生也成为军统特务"上海区"的成员。而杜宅的总管家万墨林则亲自多次参加"上海区"的"铁血除奸"活动。就在张啸林死后不久，他被汪伪特务诱捕了，在一次同汉奸汪曼云的秘密交谈中，万墨林透露了真情，他说："他们（指汪伪特工总部76号）问我两件事：一是傅筱庵，一是隔壁（指张啸林，因张住在杜月笙住室东隔壁）的事。傅的事（1940年10月11日，被军统暗杀），我承认的；隔壁的事，我没有讲（张啸林的被杀，万系奉杜命在暗中主持的）。"汪曼云说："那好，隔壁的事你是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关系到'先生'的做人问题。关于这件事，如再问你，你还要咬紧牙关，不能讲的。"万墨林

说："这我知道了，曼兄，我自杀好不好？"汪曼云说："为啥？"万墨林说："杜先生叫人关照我的。"这些情况是万墨林当时亲口对汪曼云讲的。七十年代万墨林撰写的《沪上往事》一书中居然回避了这一事实，分明这件事关系到杜月笙的"做人问题"。杜有恩于万，万隐瞒这段事实乃在情理之中！

（施宣圆）

风云人物

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 原名彭德华，曾用名彭石穿。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幼时，母丧父病，无以为生，仅读书两年，即当牧童、学徒、矿工及苦工，深感人间不平。1916年春，投奔湘军，曾在他所在的连队，秘密组织"士兵会"、"救贫会"，维护士兵利益。1920年初夏，升为排长。1922年初，到广东鲁广厚独立营任连长。8月，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1923年8月，回湘军六团一营任连长。1926年5月，任六团一营营长。湘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后，同年11月代理一团团长。1926年秋，在北伐军围攻武昌时，与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的中共党员段德昌结为好友。经段介绍，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共产主义ABC》等书，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4月以后，反对新军阀，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的革命活动。1928年1月任一团团长。4月，经段德昌和南（县）华（容）安（乡）特委集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11月初率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军。12月初，到达井冈山。12月11日，在宁冈县新城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合。随后坚持井冈山斗争。1930年6月，红军第三军团成立，任军团长、前委书记。8月23日，与红一军团会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副总司令。1931年11月25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数次"围剿"中，屡建功勋。1933年7月，任东方军司令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10月，率三军团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1935年6月，三军团改为三军，任军长。9月下旬，中央组织了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9月，在指挥攻打天险腊子口前夕，毛泽东曾电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高度评价他在长征中的杰出贡献。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1936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2月，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5月14日，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副书记，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敌后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1942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党、政、军、民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6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6年3月，任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书记。1947年，当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时，彭德怀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指挥部队在陕北地区同十倍于我之敌作战。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击退进攻，并转入战略反攻。1949年，解放西北五省。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彭德怀于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几十万大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英勇奋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52年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上，被选为中共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

议)期间,对"大跃进"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正确意见,但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并在实际上被停止了一切领导工作。1965 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即战略大后方)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于 1974 年 11 月 29 日含冤逝世。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存世的有《彭德怀自述》一书。

材料一　艰辛的少年时代
——彭德怀的回忆

我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旧历九月初十日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亲并我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

我六岁读私塾,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孟子》,余读杂字——《百家姓》、《增广》。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作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以后,我就砍柴,捉鱼,挑煤卖,不再讨米了。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和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

(选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二　彭德怀和百团大战

1940 年 8 月,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健儿在敌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从高低纵横的山岳沟壑中,从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里,万箭齐发,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扑向敌人控制的数百里铁路线和数千里公路线。一夜之间,把敌人在华北苦心构筑的"囚笼"砸得支离破碎。

这次战役的胜利曾震动全国。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敌人铁蹄下的沦陷区,都引起了空前的兴奋。

这便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的第一次主动进攻,也是敌后军民向日军发动的一次最大战役——百团大战。

8 月 20 日,总部所在地上空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过午下起了小雨。总部作战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作战科专门为这次战役准备的"战斗日记"本打开了,所有的无线电台和有线电话,都编组好轮流值班的顺序,以保障战斗指挥和联络的畅通。

彭德怀镇定自若,不时和左权交谈,或听参谋人员汇报情况,或对地图沉思。晚上 8 时正,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和同蒲、平汉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太路象一条火龙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荡。

王家峪四野寂静,一片漆黑。夜深了,只有总部作战室,气氛炽热,灯火通明。电台、电话都处于工作状态。彭德怀、左权和工作人员整整一夜没合眼,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21 日天明时分,消息陆续传来。首先收到刘伯承师长发来的电报,报告一二九师左翼出击情况:陈赓旅连克碉堡四座,全歼守敌,完全占领了寿阳西南之芦家庄车站,将车站西十里内的铁道、桥梁全部破坏。

紧接着,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告晋察冀区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出击情况:杨成武部连克乏驴岭、北峪、北都等据点,歼守敌 200 余名。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

悉被破坏，万余民众参加了破击。聂区的另一部，则完全占领了井烃煤矿，歼守敌百余，解放工人2300余人，矿井机器全部炸毁；郭天民部正猛攻娘子关；冀南军区徐绍恩团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五里。

晚上八点钟，贺龙师长发来战报：张（宗逊）旅全歼静乐东康家会守敌，毙敌200余，俘日兵十余名，缴获甚多……

21日、22日，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各公路干线上的捷报一份份发向总部。根据彭左指示，即向前线各部通报战况，并上报中央军委。

22日午饭后，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内听取汇报。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实际参战兵力：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芦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四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县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

王政柱话音刚落，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接着说："不管一百零几个团，这次战役，就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八路军总部对第一阶段作战的总结报中央军委后，很快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说："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1940年9月10日，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关于时局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抗战阵营中存在的妥协危险倾向后说："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同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指出："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打击敌人的方面去，藉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战果的数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以延缓作用。"

彭德怀、左权仔细研究中央的指示和战役情况，于9月16日签发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这时，日军大批援兵已由东西两端行入正太路地区，在正太路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彭、左命令各部，在继续破袭交通线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要求于9月20日开始战斗。与此同时，总部下达了各部的主要攻击目标。

根据总部的命令，从9月20日起，晋察冀军区在晋冀边区发起了涞（源）灵（邱）战役；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发起了榆（社）辽（县）战役；一二〇师在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发起第二次破袭战役；冀中军区发起了任（邱）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冀南军区发起德石路、邯济路破袭战役。

第二次战役发起时，敌正调集兵力向八路军各出击兵团实行反击作战，在八路军再次发起广泛突袭的情况下，敌军东奔西突，顾南失北，被八路军拔除的据点多时达2000余个。一二九师在第二次战役中攻克了榆社县城。

在第一阶段战役中，八路军在敌占区群众的掩护下，进行了巧妙的侦察，使敌人回顾心惊。在第二阶段战役中，根据地民众踊跃协助八路军作战，陷敌于狼狈境地，使敌人言之色变。

八路军连续一个多月向敌人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但连续40余天的紧张战斗，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减员也很大。10月2日，总部彭、左、罗（瑞卿）、陆（定一）发出命令结束第二阶段作战，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发动再次进攻。

10月6日，日寇在对其主要交通线进行应急修复后开始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未得休整即转入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

（摘自何定：《彭德怀和百团大战》）

王　震

王震（1908～1994）　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长沙当铁路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队长。1929年组织茶陵游击队，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1930年9月任红军湘东独立师三团政治委员。1931年冬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1月任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2月成立湘赣红军第八军，任代理政治委员。同年10月正式成立红八军军部，任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春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夏任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参与领导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荣获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8月正式成立红六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与任弼时、萧克率部西征。1934年10月后，参与领导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1935年11月率部队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1936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同年秋积极率军团

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师。后改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和卫戍区司令员。1940年底率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成为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1944年11月由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任司令员，率部穿过鄂豫皖挺进到湘粤边。1945年5月成立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兼湘鄂赣军区)，任司令员，兼任中共湘鄂赣边区区委副书记。中共七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第二十二兵团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第九、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4年逝世。

杨靖宇

杨靖宇(1905—1940)　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确山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抗日民族英雄。1912年进私塾读书。1923年秋，考入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0月，受党团组织的派遣，回确山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2月，确山县农民协会成立，被选为会长。同年4月，领导确山县农民暴动，攻占县城，并建立了确山临时人民委员会，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率领农民武装，转移到确山县东南农村坚持斗争。1927年9月末，发动了以刘家店为中心的秋收起义，任确山县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被派到开封、洛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等职。曾先后三次被捕，但均因"查无实据"获释。这年冬天，到上海进行短期学习。

1929年春，到东北工作，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因叛徒告密，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被转送沈阳中国法院判一年半徒刑。九一八事变后，被调往哈尔滨市工作，改名张贯一，先后担任东北反日救国同盟总会会长，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等职。1932年秋，以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身份，赴南满巡视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南满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将他留在南满游击区担任领导工作。次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从此，他便结束了白区地下工作，走上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场。

1933年9月，以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他任师长兼政委。1934年1月，在江西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同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任军长兼政委。部队发展到上万人。1936年初，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同年6月，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他率部到处打击敌人，队伍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

1939年冬，日寇调集数十万军队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围攻。11月间，他率部由金川去傍江，被敌人重兵包围。经血战突围后，他把部队化整为零，带领五、六十人的小分队东进。因一团参谋叛变投敌，小分队又陷入敌人层层包围之中。次年2月23日下午，他被敌人包围在傍江县保安村(现靖宇县靖宇村)外的树林中，他依托着大树，与敌战斗，最后壮烈牺牲。敌人剖开他的腹部看到的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全国解放以后，为了表达对杨靖宇的尊敬和怀念，人民政府将傍江县改为靖宇县。

材料　"东北第一大厉害"与"山林之王"的较量

在东北的汉奸中，邵本良、王友成、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又称为"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这个人其实本来就不良，他是一个有20多年匪龄的老胡子头，做过东北军的团长。"九·一八"以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人发现了他这个"人才"，于是他又成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为虎作伥者猛于虎。邵本良在打抗联这方面就比日本人厉害。日本人虽然枪法好，又有武士道精神，但他们一进山就玩不转了，经常被抗联战士们把他们当驴在山里牵来牵去，然后再打上一顿。邵本良可不吃这份亏，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手下的那些兵多是土匪出身，这些人打仗的时候不但带着枪，而且还要带上一把刀，一进林子就开始砍路标，这样，他们在山里怎么转也迷不了路。冬天下雪时，抗联的人在和日本人打完仗后，钻进林子，然后把地上的雪印一扫，日本人就不知他们的去向了，但这办法对久钻山林的邵本良却不管用，你就是把雪扫得再干净，他也能找到踪迹。也正因如此，邵本良才敢在日本人面前夸口说：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杨之间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11月15日。当时，

杨靖宇率部初到辉发江以南地区活动,其后卫部队就与邵本良的部队遭遇了。那一杖,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人11名的战果,但却付出了3伤4亡的代价,在死的4个人里就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州省委巡视员金伯阳。

邵本良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是实实在在地得上了一分。但杨靖宇也不是好惹的,就在那次遭遇的一个多月以后,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功地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了他的老窝——柳河三源堉,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他的几十间营房,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源堉不但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且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堉比虎口拔牙还难,但杨靖宇却把它一举打了下来。正在张着大嘴吹牛的邵本良挨了当头一棒,但他却并未就此认输,反而时刻寻找机会想把损失捞回来——"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在第二次较量结束不久,第三次较量就开始了。这一次,除了邵本良的部队外,还来了2000多日本兵,他们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对杨靖宇的部队形成了包围态势。

虽然敌人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但却轻意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谁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要想进山打他恐怕要吃亏。那怎么让他出来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于是,他虚发了一封给其部下的信,信中假称东部有他的重兵,然后又故意让这封信落入了杨靖宇的手上。

杨靖宇得到这封信后,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敌情和地形情况,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因为他知道,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是不可能把重兵摆到那里的。一定是敌人怕我突入东部深山里,才故意发出这封信以把我引入他在西部地区设下的"口袋"的。看破了这一点后,杨靖宇便决定将计就计,也发出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并故意让邵本良将信得去。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部突围出去,让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得信后,长出了一口大气:"她杨的,你到底上套了!"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那天深夜,就在他憋足了劲在西部等着杨靖宇的时候,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部突围而去。次日上午,杨靖宇又带队向北急行30多里,乘虚打下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金川县凉水河子,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邵本良听说杨靖宇打下了凉水河子,急忙回援。但此时杨靖宇已经撤走了,并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兵发柞木台子,但哪想到杨靖宇却去攻打八道江镇。

经过这一个回合的较量,邵本良算是知道了杨靖宇的厉害了。他私下里说:"我邵本良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邵本良的一个兵可以打10个胡子,一个红军却可以打我10个兵。"

在连得两分之后,杨靖宇的头脑没有发热。他知道,邵本良决不会白吃了这个亏,他一定还会找上门来的。虽然他和战士们一样,恨不得一个子就除掉这个家伙,但他更知道打邵本良并非易事,弄不好可能会闹个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的结果。他在想出怎么打的办法之前,先想出了几个"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

那么怎样打呢?杨靖宇也想出了4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1935年8月,杨靖宇下决心要集中自己的主力部队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7团——这是邵本良的家底、是要害。但就在杨调动好部队,马上就要向柳河发起进攻的时侯,邵本良那只好使的狗鼻子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堉向柳河增兵。

敌变我变,杨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的部队前脚一撤,邵的兵马后脚就跟了过来。两天后,双方在一条山岗上打了一仗。虽然这次敌人没占着什么便宜,但他们却象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粘上了。当杨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的时侯,一看地形不错就下令停下来,在那里埋伏好,等着邵。而这时的邵本良却只忙着往前追,没有想到杨敢停下来和他打,结果把他手下的一支200来人的队伍和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几挺机关枪,都送到了杨靖宇的口袋里。杨邵之间斗智斗勇的第4个回合结束,杨靖宇又得了一分。

正当邵本良为这次失败气得不得了、准备找杨报仇的时侯,杨靖宇则主动来找他了。

9月份,杨通过安插在邵身边的内线知道,邵本良的老7团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其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便在他们的必经之地——金川县境内的朝阳沟设伏。结果,不但消灭了那一个连的伪军,截下了几十辆大车,而且还抓住了邵的小老婆。邵本良陪了夫人又折兵,杨靖宇再得一分。

转年2月,杨靖宇又接到内线关于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里的报告,就派出了一个由25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半夜一点多钟准确地袭击了伪军的团部。虽然由于邵当晚不在而躲过去了,但那个伪军团的副团长以下的六七十人连同他们的武器、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都落到了杨靖宇的手里。

杨靖宇在连连得分后,便把部队拉回到河里地区的密营中休整练兵,等待时机准备再次出击。

3月上旬,杨靖宇又接到报告: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回来,邵向日本的三毛司令夸下海口,说是要在

3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和答应派飞机支援外，还调了不少伪军归他指挥。

接到报告后，杨靖宇立即连夜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歼敌方案。第二天，整个部队就开始了战前训练，内容主要就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

4月初，邵本良率领部队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就都做好了与其进行决战的准备。但杨靖宇给他们下的命令却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要走，战士们就走。可这一走就好象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之后，有的人就有点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呢？这仗到底什么时侯打呀？

杨靖宇看出了战士们的心思，他派军部的徐处长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第1师和军部，然后再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区及桓仁、本溪地区的部队。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定，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字'走'和'拖'！"

日本人和邵本良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了我在老秃岭子地区的第1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看出了他们的这一伎俩后，便来了个将计就计，不顾连日的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敌人一见杨靖宇"上了圈套"，便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可没想到杨靖宇带着部队到了老秃岭子转了一圈以后，就又走了。与此同时，被敌人包围的第1师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的部队在宽甸县的佛爷沟门汇合后，让部队在那里休整了几天，然后传下令来：走！

离开佛爷沟门后，部队便开始兜起圈子来了。今晚向南走50里，明晚又向北走60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走了一夜。这样一连几天下来，把许多战士都走糊涂了。他们开始在下面悄悄地议论起来了：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去了？此时敌人高兴了，他们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进入4月中旬以后，杨靖宇又带着部队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有时部队刚刚到一个地方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了上来了，杨靖宇就又开始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不断地扔下一些衣服和其它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

邵本良一见这种情形，高兴得没法说。那乐得快合不拢了的嘴里吐出了一大串的"追"！

4月末，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了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他对大家说："咱们一连走了20多天，现在不走了。原来我们一直走，那是因为打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加之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打的时侯到了。现在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早就等着杨靖宇下打的命令呢，现在一听，顿时来了情绪，连夜构筑好了工事，然后就在里面静等着邵本良了。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一个先头营一进"口袋"，负责扎口的1师3团就立即把他们的后路给切断了。邵本良一见后路断了，便只好让伪军往沟里冲，可他们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6团给打了回来。这时，杨靖宇下令，让教导1团和第1师少年营将敌人拦腰斩断，然后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奉命坚守北面制高点的我少年营营长一见下面打得这么热闹，便再也忍不住了，他不等上面的命令，就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了，山头上只留下了一个班的人。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他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于是便带着人拼死夺下了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也表现出了十足的"鬼"劲——他一看不行了便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后，又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和3个月的军饷等准备于8月初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后，在邵本良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迎接"他的老对手。虽然这次邵本良又一次侥幸逃脱了——战斗打响后，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的家里抢了一件衣服，落荒而逃。但却再也无力与杨靖宇作对了。

（全勇《黑白关东》）

材料　将军英魂威不倒
——杨靖宇将军殉国前后

1940年2月下旬，由于日伪的步步追剿，杨靖宇已数日粒米未进，只以草根、树皮和棉絮就雪充饥。所患感冒和左臂所受枪伤皆未痊愈，身体十分虚弱，因此跑得很慢。23日午后4时左右，当他发现敌人追来时，便强忍饥饿和伤病的折磨，奋起应战。双手持枪，打一枪转一处，巧妙地和前来包围的敌人周旋。最后，杨靖宇被逼到山谷中的老恶河旁。在敌我相距50米时，敌人大声高喊："你怎么抵抗也没用！归顺吧！"叛徒跟着狂叫："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杨靖宇宁死不屈，回答敌人是手枪里的子弹。在敌人包围之中，杨靖宇只身一人，毫无畏惧，隐蔽在小河岸边的石头旁、大树旁，顽强地与敌人展开着最后的斗争。

开始时，敌人还执行着伪警察队本部"想办法活捉杨靖宇，劝他归顺，以便把他的才能引导到于我们有利的方

面来"的指令。但这只是敌人的妄想。敌人见杨靖宇根本没有归顺之意——"讨伐队虽屡次劝降,但毫无答应的神色,仍然打来手枪。"于是便下令"干掉他"。这时敌人进一步向杨靖宇迫近,双方最近距离仅约20米,敌人开始从两面向依在大树旁的杨靖宇进行射击。他被敌弹击中了,洁白的雪地,洒下了殷红的鲜血。4时30分,英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杨靖宇倒下后,敌"讨伐队"的益子理雄狂叫"击毙了!"敌人跑上前去一看:一个胸部中三弹、手上亦中弹的大汉仰面倒在地上。和平常看熟了的"人像图"一比较,认出他就是杨靖宇。敌人从他身上搜出毛瑟手枪一支、子弹160发;考尔特二号手枪一支、子弹30发;考尔特三号手枪一支、子弹40发;现金6660元;此外还有手册、怀表及钢笔等物品。

杨靖宇牺牲后,伪通化警务厅向伪满治安部作出《关于枪杀杨靖宇经过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称:"匪贼(按,指杨靖宇)发现讨伐队到来,遂利用密林一面巧妙地应战,一面逃避。但占据有利地形的讨伐队,协力交战约20多分钟。经左右两部队的夹击,在490高地将其枪杀,时间是16时30分。其间,讨伐队曾数次从缓攻击,劝其投降,但他毫无投降表现,两手拿着毛瑟一号手枪和考尔特式2号手枪(枪的种类和型号是枪杀后查明的),进行顽强的抵抗。因此,不得已而予以猛烈攻击、枪杀。从像貌等来看,认为是杨靖宇,遂将尸体收藏起来,送回蒙江县城。"

敌人将杨靖宇遗体运下山后,伪警察署官员令叛徒程斌和前不久投降敌人的张秀峰辨认,证明确是杨靖宇无讹。而后,残暴的敌人又令叛徒程斌让其部下用铡刀将杨靖宇头颅铡下。又令县城民众医院医生剖腹化验,经检查,他胃肠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有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参加解剖的中国医生都深深的感慨,无不为之动容,暗暗地流下热泪,都认为杨靖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男。……甚至于连敌人们也暗暗地佩服了他那壮志烛天的豪气,不得不惊叹:中国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人。

杨靖宇牺牲后,日伪当局大肆宣扬其"武功"。2月24日在蒙江伪警察队本部门前召开了"庆功会"。接着将杨靖宇头颅装入长25公分、宽25公分、高35公分,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内,用汽车载到通化。

1940年3月26日,伪治安部警务厅长谷口明三向通化警务厅及"讨伐队"拍去赏功犒劳电。3月31日,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三源浦伪警察署主持召开了有直接参加枪杀杨靖宇的益子理雄(伪通化省警务厅警尉补)、绪主忠雄(伪通化省警务厅勤务警佐)、古高敏昭(伪柳河县副县长)及叛徒、敌"讨伐队"队长程斌、王文科、申麟书,叛徒、敌工作班长胡国臣、尹夏太等参加的所谓"杨靖宇讨伐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敌人大肆吹嘘其枪杀杨靖宇的所谓"狗蝇子战术"。但同时,敌人也流露出不得不承认杨靖宇所从事的抗日救国事业的巨大影响及其确实不愧为一大英雄的感慨。益子理雄称杨靖宇"不但有武功,而且有学识,曾经率领2000人的部下,值得十分敬佩。"又说,"的确是了不起,他的活动力跨越间岛、安东、通化、吉林和奉天5个省30个县。""他才干不一般,不是寻常人物可以比的,是个英雄。"岸谷隆一郎也称杨靖宇"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人物。"但积极参加捕杀杨靖宇、甘心为敌效命的叛徒程斌在这个座谈会上并没有让日本侵略者高看一眼。座谈会上,"记者宫本说:请大家先谈谈杨靖宇的履历和风貌吧。"岸谷隆一郎不无讽刺意味地说:"这方面程君是最了解的,因为早先他是杨司令的臂膀嘛……"随之发出嘲笑。而程斌则低着头:"不要開笑话,对于杨匪我大概知道一些。"话音落地,大家又是一片嘲笑声。在"座谈会"上,叛徒程斌不时被人嘲笑、奚落,连头都不敢抬;他无地自容,不敢面对民族英雄杨靖宇的在天之灵。

(赵俊清,《党史纵横》95年9月)

马本斋

马本斋(1901—1944) 河北省献县人。回族。早年在旧东北军中当兵,后升至团长,1932年弃官回乡。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8年率队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任命为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遂率部转战于冀中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伪军。1942年6月任回民支队司令员兼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1944年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马本斋因病不能随行,同年2月7日在山东莘县逝世。

张自忠

张自忠,字荩忱,二级陆军上将。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姊妹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五。其父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巡检,颇有政绩,后病故于任上。

张自忠早年就读于本村私塾;1905年考入临清县立中学。十六岁时,由母亲做主,他与县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求学时,由于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第二年,他考入天津政法学堂。

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戎,与同乡五人一起前往奉

天新民屯，投奔陆军第二十镇（相当后来的师）三十八旅八十七团团长车震。车震亦是临清县人，且与张自忠的三兄张自清相识。由于十分赏识张自忠报效国家、吃苦耐劳的精神，车震不久便提拔张为司务长。后车震升为师长，又提升张为师部参谋。1916年车部入湘与护国军作战，被击溃，车震解甲归田。张自忠靠同乡资助也返回临清。

第二年，车震亲自带张自忠前往驻兵于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见冯玉祥，张自忠被冯玉祥留在本部暂当差遣。1919年，他进入鹿钟麟的教导团学习，因刻苦求进、品学兼优，被冯玉祥誉为"标准学员"，学习结束后升任连长。此后到1925年底，张自忠相继任学兵连连长、学兵队队长、营长、学兵团团长、第五师十五旅旅长等职。

在军中，张自忠受冯玉祥的影响而以善于训练部队著称。他向来自我带头、严肃军纪，极重训练和管理，所辖部队考绩常常为军中第一，号称"模范"。有些部队官兵纪律松驰，举止粗鲁，难以调理，张自忠常被临时调去整饬。而张一到，部队面貌必有好转。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省，并向长城各要塞推进。宋哲元奉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之命，急率第二十九军前往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阻敌进犯。敌我双方于3月9日在喜峰口塞附近发生大规模遭遇战后，形成两军山地对峙态势。张自忠此时为前线总指挥。为了消灭敌人，争取主动，张自忠与前来指挥部的宋哲元、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师长）一起研究，决定从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中抽调出董升堂团和杨干三营趁夜从侧面偷袭敌营。是夜，这两支精锐部队由当地樵民、猎人带路，绕行山间小道，秘密接敌。董升堂团在喜峰口至潘家口之间狭长谷地中，迅速消灭在两个村庄宿营的日寇，并利用夜暗袭击日军炮兵阵地，消灭敌人炮兵一个连，焚毁敌辎重武器，大胜而归；杨干三营直奔董家口，先解决敌前哨排，尔后分路以猛烈火力袭击喜峰口日军，趁乱消灭敌人百余，并缴获部分武器。这次夜袭战，大长了前线抗敌部队的威风，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

张自忠部与敌在长城一线较量四十余日，取得一次次的胜利。5月30日"塘沽协定"签订，战斗停止。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作为"守边大臣"，他在不战不和的境地中审时度势，加紧整训部队，他收编了一个旅扩编了两个新兵旅，淘汰了部分旧武器，设法装备了两个旅新武器，并给每连补充了四挺机枪、两门掷弹筒，每班增配两支枪榴弹。他还根据作战需要，毅然淘汰了在长城抗战中曾大显神威的大砍刀。通过整训，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也大有增强。

1936年5月，张自忠又兼任天津市市长。当时在天津地区，同时驻着中日军队，天津市内又有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租界，情况极为复杂。张自忠曾拒任，由于宋哲元坚持不允，只得"勉为其难"。在这段期间，他"迫主津政、忍辱待时"，"为人之所不能为"（周恩来《追念张荩忱上将》），既不意气用事，又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坚守民族尊严。1936年夏，天津英租界英国巡捕毒打人力车夫激起公愤，张自忠令人通知数千车夫全部进入华界，一律不在英租界拉座。这个报复措施顿时造成英租界的交通困难。在英国领事馆向中国方面请求解决时，张自忠提出惩办行凶者，保证不再犯的要求。英领事无可奈何，只得接受了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平津局势变得极为复杂特殊，内在战、和问题上斗争激烈。当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接到日军发出的他和第三十七师撤离北平的"紧急通牒"，处于进退维谷境地。是宋召开北平军政首脑特别紧急会议，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同时留一个适当的人在北平与敌周旋。留者是要担风险的，且此着实为宋"金蝉脱壳"、"丢卒保帅"之举。会中，宋哲元数次注视张自忠，意欲由他担此重任。张自忠经过考虑，毅然站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及时脱离被敌人包围的险境，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目前这个任务我愿来担，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宋哲元当即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不久，日军进入北平。

此后一段时期，外界对张自忠非议颇多。当时盛传张"逼宫"赶走宋哲元，在沦陷区北平与日本人合作。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其实，这种谣传从张自忠率考察团从日本返回时就开始了，有人说张在日时与日方订有"密约"，日方赠其巨款，并送了一个日本美人给他……对于这段历史，冯玉祥在张自忠为国捐躯后撰文《痛悼张自忠将军》时予以澄清，他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指张自忠）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与日共同反共，张设法借故拒绝。他先称病躲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继藏入美国朋友家中，后又化装成汽车司机助手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的外国租界，接着乘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9月在济南时，他在一封信中写到，"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言一切。……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其时部队已编为第五十九军，张自忠任军长。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请，第五十九军被调往五战区。李宗仁对大有毁词的张自忠以诚相见，使张自忠由衷感激。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南沿强行登陆。一路西侵，进逼鲁南军事要地临沂，企图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然后齐头并进，继续深入。3月上旬，日军进至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第四十军的五个团。临沂告急，张自忠部即应调前往增援。

张自忠全力增援庞炳勋部一事，体现了他豁然大度、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品格。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军旅中，彼此视为兄弟。但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混战中，庞被蒋介石收买，阵中反戈，并且突然袭击张自忠的师指挥部　张险遭不测。张自忠在临沂战前曾对人说过，在任何战场皆可拼死一战，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作战。然而，临沂战起，庞炳勋部为日军所困，情形危急，第五战区除五十九军外无兵可调，司令长官李宗仁只得对张自忠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难。不过以前的内战皆为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战机！"张自忠听后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后有张宗衡谈及此事时说，当时"若非张大义凛然，不挟前嫌，及时赴援，庞氏已成瓮中之物，必致全军覆没，更谈不上临沂、台儿庄大捷了！"

1940年5月15日，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仅两千余人的张部夹攻，作战竟日，张部苦撑待援。张自忠曾严令第三十八师和第一八〇师迅速驰援，然而，此时第三十八师还在四十里路之外，第一八〇师和骑兵第九师在襄阳以东被敌牵制于激战中。张部在苦战中又接到第五战区来电："敌人大军由钟祥方面渡河西进"，令张自忠"放弃当面之敌，向钟祥敌后攻击。"张自忠服从命令，当夜便率疲苦已极的部队出发，沿途每经一个村庄都与敌发生一场战斗。16日拂晓，张部进至宜城大洪山山区罐子口，遭到两侧山头日军的猛烈炮击，张部被迫退至南瓜店。南瓜店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已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负伤仍坚持指挥作战。当前方伤亡惨重时，他把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增援。不久，除了身边的张敬高级参谋不肯离去外，其他副官、参谋人员均被他指派走了。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关枪子弹击中，他卧在地上浴血督战。在战斗后期，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当敌人围上来时，高参张敬用左轮手枪击毙敌兵数名后牺牲。两名日本兵冲向张自忠，用刺刀向他刺去。身中七弹的张自忠顺势抓住刺来的枪，挺立起来，可是立即被另一日兵猛刺一刀而倒下。

张自忠壮烈殉国。时16日下午二时许。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伤亡殆尽。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李士群

李士群，浙江遂昌县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早年丧父，依靠母亲种田为生。少时在本乡读私塾，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曾游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值国内北伐军兴，投袂回国"。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影响下，经上海大学同学方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当局，即向青帮大流氓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1932年，李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并与另外两个叛徒丁默村、唐惠民在上海新光书局编《社会新闻》杂志，对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进行诬蔑诋毁。

1933年，李士群在特务内部的争斗中，因参与谋杀上海工作区首任区长马绍武，被逮捕押解南京受审，饱尝酷刑，险些丧命。后由他的妻子、叛徒叶吉卿打通了常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李士群才获释，但仍不准擅离南京。此后，李先后被委为党务调查科编译员、南京区侦察员和国民党办的"留俄同学会"理事、"留俄招待所"副主任，很不得志。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与另外两个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潜伏"。此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已在上海设立特务机关，派一女特务到南京活动，并与李姘居。具有强烈领袖欲和政治野心的李士群感到自己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爬不上去，决心投靠日本侵略者。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趁"中统"委派他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的机会，席卷了全部特务经费，逃到香港，拜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由革命叛徒、"中统"特务又变为叛国投敌的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鹰犬。以后，李常对人说："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活露出一副无耻汉奸的嘴脸。

李士群到上海后，为了站稳脚跟，首先把手伸向国民党市党部等机构，将"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章正范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刘坦公拉下

水，一起搞情报。接着，又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杜月笙的“学生”汪曼云取得谅解，进而与当时已到香港的杜月笙接上关系。同年底，“军统”派上海区行动股长于松乔谋刺李士群，汪曼云将此消息透露给李，使他免于丧命。

随着李士群在上海情报活动的开展，日特机关对他越来越重视。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不久发表了投敌的“艳电”。日特机关示意李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以便策应汪的“和平运动”。李深知自己在蒋党特务圈子里的声望不足，于是便把原“军统”第三处处长丁默村从昆明邀来入伙，并允推戴他为首领。

1939年2月上旬，在清水董三的陪同下，李士群、丁默村拜见了土肥原贤二，表示：为了“收拾时局”，他们要“纠合国民党同志”“推进和平运动”，“希望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并强调说：“为对付重庆的恐怖活动，我们也有必要建立特工组织。如有日军援助，我们俩人组织特工。”3月20日，日本参谋总长给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发出训令，决定“援助丁默村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上海恐怖活动的对策的一部分”。每月贷款三十万元，出借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李士群当即开始在上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一方面，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四宝为首的大批地痞流氓和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作为特务打手；另一方面，利用丁默村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以及失意军人，作为特务骨干，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工队伍。李士群和丁默村、唐惠明、茅子明、萧建午、叶耀先、章正范为核心人员，即所谓“七人委员会”，对外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为掩护。

在日特机关的全力支持下，李士群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将“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大加扩充，设立八处（第一处专管“军统”，第二处专管“中统”，附设“CP股”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三处专管“忠义救国军”，第四处专管租界，另有机要、总务、电务、情报处）、四室（即督察、专员、审讯、化验室）、二所（招待、修械所）；又将特工武装队伍编组为一个行动总队（下辖六个行动大队）、一个警卫总队（下辖五个警卫大队）以及一些直属总部的警卫队、行动组；还建立了不少外围组织，如负责“学生运动”的“海社”，拉拢租界司法人员的“法院同仁会”，负责宣传舆论的“国民新闻社”，筹措特务经费的“立泰银行”、“上海实业银行”等，并先后在南京、杭州、青岛、武汉以及其他沦陷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完备、行动诡秘的特工机构，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凶恶鹰犬和汪伪政权的重要支柱。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成立伪“国民政府”时，李士群在周佛海的支持下，依靠手中的实力，将丁默村排挤出“特工总部”，自己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兼“特工总部”主任。同年12月，周佛海辞去警政部长职，李士群升任，权势更盛。

1941年8月，汪伪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成立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任部长。12月李挤走了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自己继任。李一身兼任伪军委会部长、省政府主席、特工总部主任三要职，踌躇满志，频繁往返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权势发展到顶峰。

1943年5月，蒋介石下达了除去李士群的命令，交周佛海执行。周“历四月之久，费了千多万”金钱，终于在9月4日勾结日本驻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由冈村出面邀李、熊两人至上海百老汇大楼（今上海大厦）赴宴。冈村妻子于食物中投下毒药，殷勤请李品尝。第二天，李士群回到苏州开始发病，挣扎至19日毙命。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延安时期毛泽东“发愤”读马列

遵义会议前后，当时一名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同志曾指责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山沟里还能出马列主义？（大意）毛泽东确实是在山沟里长大的。也确实在山沟里长期斗争，但毛泽东并非没有读过马列，早在1920年他就读过《共产党宣言》。那位同志的话却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他一到延安就“发愤”读马列，这并不只是为了争口气，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这样，他“发愤”攻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书。马列原著方面，他几乎搜集了当时国内出版的所有著作。他读过《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仍然经常阅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就是这样，反复阅读马列著作，结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

（《中共党史导读》）

挡驾总司令

1940年春天，赵凤欣刚来延安杨家岭警卫连当战士，领导告诉他：警卫连给中央领导同志站岗，特别是给毛主席站岗，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使命，责任重大，不得有半点马糊。他牢牢记在心里。

一天，正是赵凤欣值班站岗，一位身材魁伟、面容慈祥的人走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有补丁的军装，看上去大约40多岁，后面还跟着一位年轻的小战士，他们要进去见毛主席。赵凤欣刚来不久，认识的人不多，他虽然看着来者象个中央首长，但并不认识是谁。心想，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不管是谁，没有命令就不能放进去。于是，他挡住了这位同志。跟随在后边的小战士刚要说话，长者马上拦住，静静站到一边等候。正巧这时保卫科长王丙臣来查岗，一看朱总司令在一边站着，马上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又连忙对赵凤欣说："这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快请进！"小赵一听，脑子里"嗡"的一响，连连说："总司令，我不认识，对不起！对不起！"朱总司令微笑着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做得对。"边说边走了。赵凤欣看着朱总司令快步走去的背影，心里又惭愧又不安。

下岗后，赵凤欣听说朱总司令是从王家坪住地到杨家岭找毛主席研究工作的，心里更是不安。他想：我挡了总司令，耽误了首长时间，若误了大事怎么办？思来想去决定先写个检讨，向总司令赔礼道歉。因为自已没文化，只好找警卫班长刘占彪代笔。正巧让连长看到了，告诉他："不用写了，总司令不会怪你的。"

第二天一早，通信员通知赵凤欣，说总司令叫他去一趟。小赵一听，心里马上又紧张起来。说不定总司令生了气，要训我一顿呢。他急急忙忙到了王家坪，值班的警卫战士问清了是赵凤欣后，让他进去，说朱总司令早等着呢。小赵先喊了报告，听到屋里传来"进来"的声音，几步走进屋里。一见总司令，马上行了军礼，紧张得说话都有些颤抖，没等总司令说话，小赵就检讨开了："不让首长进，对领导不礼貌。"总司令慈祥地笑着，又让座，又倒水，连连说："不用检讨，不用检讨，你做得对。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应当这样做，应当向你学习。"之后，总司令又和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是哪里人，哪年参军，多大了。越凤欣一一回答。接着总司令又问赵凤欣家里还有什么人，种着多少地。赵凤欣如实回答："7岁没了父亲，只有母亲一人，家里没地。"听了他的回答，总司令疼爱地说："真是苦命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好好干革命。"听着朱总司令的亲切教诲，赵凤欣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激动。

（选自《党史博采》90年7期
作者：李运棉，卢国桢）

延安时期的"五五学习节"

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学习经验，并进行奖励，同时制定计划，安排今后的学习任务，使干部学习运动制度化。经常化、卓有成效。是年5月5日为第一届学习节，时称"五五学习节"。

"五五学习节"是延安时期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广泛深入开展的产物，是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和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奔赴延安。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抗战建国事业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由于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家庭，文化程度低，甚至文盲占很大比例；党又处于长期的战争环境，不能集中精力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流毒还没有肃清，使党的干部队伍的马列主义水平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党中央为了"克服自己理论工作的落后性"把"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作全党"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和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局势相对稳定，用马列主义教育干部，也是一个好机会。因此，毛泽东同志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要求干部、尤其是在职干部，一面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用"挤"和"钻"的方法，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到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不久，3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中央1月3日的指示作了补充规定，并规定从当年起，每年马克思诞辰日为学习节。

在开展"五五学习节"活动的推动下，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中的干部逐步掀起了学文化、学理论的高潮。随着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干部队伍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提高。

（《党史博采》92年7期，作者：任学岭）

向往延安的民国总理

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福建福州人。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曾任过福建省长、三任海军总长，被授为肃威上将军。1920年5月，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抗日战争期间他前往延安一事尚鲜为人知。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因萨镇冰支持北洋政府并任要职，故不为蒋介石所重用。但是他的资历深、威望高，蒋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其间，萨镇冰对红军认识不足，曾支持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抗日战争期间，流传日寇占领福建后，要借"闽人治闽"之策，组织维持会，人选首先属意萨镇冰。因此，蒋介石电令当时福建省主席，设法送萨镇冰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1940年，萨镇冰到了重庆。这时，他从多年的所见所闻中改变了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认识。他在闲居重庆时，就去西安游览古都风物。他心想到神秘的延安了解情况。一天，他沿着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走，举目观望，向一驴夫探查到延安的路程及沿途住宿等情况，并当即与驴夫商量好，要乘驴车往延安旅行。那驴夫见他要到延安，便问他去延安干什么？萨镇冰只说到那边去看看。于是他与驴夫约定，次日清早到旅馆门前等候。

第二天早晨，萨镇冰便轻装搭上了驴车，沿往延安的公路而去。岂料车行才一个多钟头，大约去了十多里路，从后面赶来一辆小汽车，把驴车截住。只见小汽车上走下一位官员，礼请萨镇冰回驾。随接，蒋介石来电，令他速回重庆。

尔后，因为萨镇冰要去延安之故，所以，傲被有关方面"安排"到湖南辰溪水雷所休息。

（选自《党史纵横》91年6期，作者：黄建聪）

叶挺在狱中的心愿

一九四〇年一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叶挺军长不幸被捕，开始了长达五年零四个月的铁窗生涯。在狱中，叶挺的心始终向往着抗日救国，始终向着党 1943年春，叶挺被囚居于恩施期间，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转送了周恩来同志的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囚居中的叶挺得到了党的指示，心情激动无比。接连几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反复地阅读这封信。党的"七大"以后，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部下，秘密地给叶挺送来一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欣喜万分，如饥似渴地学了一遍又一遍。一次，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试探地问他："你出狱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叶挺毫不犹豫，爽朗地应声答道："我如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复共产党员的资格！"1946年1月，在我党的坚决要求和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声援下，蒋介石不得已释放了叶挺将军。出狱的第一天，叶挺即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中共党史导读》）

黄桥之夜
——忆陈毅司令员过生日

1940年7月29日，陈毅司令员率领新四军一部兵力，一举攻占了南控长江、北接苏北平原的重镇——黄桥，使这座人间地狱，获得解放。人民群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前来慰问，军民一片欢乐。

当时，陈毅司令员住在桂花厅，我们政治部住在黄桥中学内。8月23日晚上，已近9点钟了，和陈司令员结婚不久的张茜同志，笑嘻嘻地走来对我讲："陈司令员请你去，并要你约楚青和罗伊同志一起去，"我心里想，这么晚了，去干什么？就问张茜："有什么事？"她笑了笑说："好事，要保密。"

楚青和罗伊是速记员，我想，大概是陈司令员高兴，又讲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了。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一路小跑去找楚青和罗伊，3人一起向陈司令员的住地桂花厅走去。

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内放着一张桌子，在月光照射下，看到桌上有切开的红瓤大西瓜，还有一个冷盆及酒杯餐具等，我们正惊奇时，陈毅司令员、张茜和新四军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笑着出来了。张茜和我们一见面就说："今天是陈司令40寿辰，进入黄桥后，大家都很高兴，今晚在这有意义的地方，乘兴庆祝他的生日"，又说："今晚的冷餐，是朱克靖同志筹办的，首先要敬他一杯。"我们一听是陈司令员过生日，都高兴地举起酒杯，热情地向陈毅司令员祝贺，祝他健康、长寿！我还大胆地祝张茜同志早生贵子。陈司令员哈哈大笑说："今晚，除朱克靖外，就请了你们三位女兵，再无别人了，你们可以尽情地欢乐一番！"

我们不会喝酒，以水代酒，轮流向陈毅司令员和张茜同志敬酒，真是无拘无束，高兴极了。

陈司令诗书满腹，朱克靖博学多才，又逢这一天晴空万里，月光皎洁，他们边赏月，边喝酒，边高谈阔论，说古道今。我记得最深的是他们谈赤壁之战，说：当年曹操带领80多万人马，兵临长江，豪情满怀，在营中赏月，并吟咏了"月明星稀，乌雀南飞"有名的诗句，颇以为吞灭东吴、统一中国之大业，指日可待，而周瑜在大军压境之下，羽扇纶巾，运筹帷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真是一时多少豪杰。我们打下黄桥，在江北有了一个立足点，但仍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之中，也是三角斗争。当前我们要大力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与山东的八路军相呼应，将来两军对进，连成一片，然后南下，夺取京沪。当时听了，很感兴奋，希望陈毅司令的设想，早日实现。

月亮渐渐升高西移，不觉已10点多钟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返回宿舍。

（陈模《党史纵横》）

史沫特莱和她的新四军儿子

著名的美国作家、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生曾两度结婚，从未生育过。但她却有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她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于中国湖北收养的。她曾自豪地称这孩子为“我的中国儿子”。

1939年9月，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的护送下，北渡长江，辗转皖中、皖西、豫南等地区考察和访问。1940年1月中旬，她抵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鄂豫纵队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同志的热烈欢迎。

为了照顾史沫特莱的工作和生活，一名小鬼被派到她身边作勤务员。他叫沈国华，约10岁，个儿不高，营养不良，瘦弱的身躯上裹着肥硕的棉军服，里面生满了虱子。他每天为史沫特莱做些清扫房间、打开水、端送饭菜、送信等工作，余下的时间则用于写字或上课读书。同往常一样，史沫特莱对派来为自己作勤务的“小鬼”，总感到内疚，对他们十分爱护和关心，总要先将他们“整治”一番。寒冬腊月中，她在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烧开了水，把小国华从头到脚洗个干净；还把他穿的棉衣悬在火盆上烘烤，虱子纷纷落在火盆里，发出噼里叭啦的声音，有些虱子躲藏在棉衣夹缝里，她就把夹缝处打湿后，用烧热的火钳反复烫熨……小国华看史沫特莱忙个不停，浑身不自在，心里嘀咕着：自己的任务是照顾她，怎么倒让她来照料自己呢。

相处的日子长了，史沫特莱免不了要打听国华家庭的情况。国华流着泪告诉她，自己的老家在河南，家里原有几间破草房，生活很贫困。一次，一群土匪烧了他家的房，杀死了他父亲，打伤了他母亲。为生活所迫，他的两个哥哥只得当兵去了，他则靠乞讨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起初母亲叫他拿着碗到富人家讨要，他战战兢兢来到一座高门大院外，站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得着。那时他浑身也生满了虱子，还长了许多疮，常常病倒。他看到富人的孩子上学堂读书，很羡慕。他小小年纪，就给地主放牛，一年的工钱只有80文钱……一年前，他听说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就到处打听，还因向警察询问而挨了打……最后，他遇到了王老汉，经王老汉介绍，他参加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在这里没有打骂，有饭吃，有衣穿，还能读书……

听着国华的述说，看着国华那时而忧伤、时而欢悦的脸孔，史沫特莱深深思索着：尽管部队的生活已令他十分满足，但这种生活，对儿童来说是太严峻了。为了将来，孩子们需要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然而，在眼下这动乱的中国，除去富裕家庭的孩子，其他孩子不来部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她不由得把国华拉近身边，爱怜地替他梳理头发，扣好钮扣。国华抬起了头看着她，亲昵地说：“你就像我的母亲！”

史沫特莱发现国华年龄虽小却具有“中国儿童特有的聪明”。一次晚间行军时，迷失了方向，国华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很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雪，北风呼呼，史沫特莱为天明后的行程担忧。国华走到窗前，向外观察了一阵，说风和雪很快就会停。他向史沫特莱解释说：当风声那样的呼呼，雪花这样的飘飘，暴风雪会很快停止。果然，国华的话应验了。

史沫特莱要到很远的汉口西的洪湖游击区采访了。她考虑带小鬼前往太危险，就告诉国华，向他告别。国华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史沫特莱也很难受，不忍国华离开自己。她知道，国华很瘦弱，再生虱子，感染上斑疹伤寒会送命的。

史沫特莱向鄂豫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写了封申请带国华同行的信。国华拿着信一溜烟地跑去了。司令员答应了。但史沫特莱事后从司令员那里了解到国华并没有交出那封信。他只是连蹦带跳地进了司令员的房间，行过军礼后，就向司令员反复说明他要随史沫特莱前往洪湖的理由。他说他了解她的种种习惯和需求，而别人不一定知道；他个子虽矮，但能挑重担，还能整夜行军等等。史沫特莱说：“这个小鬼真‘鬼’得很，不知他是怕我的信中有诈，还是不愿把责任推给我。”

在新四军一个排的保护下，史沫特莱带着国华向洪湖沼泽地区进发了。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们来到一条公路边。这条公路是日军从汉口通向大洪山前线的交通要道，控制很严，沿线所有村庄都驻有日军。深夜里，当队伍绕过一个村庄正越过公路时，敌人发觉，开来了数辆汽车追击。新四军战士迅速投入战斗，掩护史沫特莱和非战斗员过路。慌乱之中，史沫特莱骑的马受了惊吓，失去了控制，带着史沫特莱向前飞奔。史沫特莱与队伍走散了。待马平静下来后，她往后走了一阵，爬上一个小山岗，拍着手掌发信号联络。不一会，远方有人作出了同样的反应。她拔出手枪，打开保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向前迎去。国华急急地扑上前来，两只小手紧抓住史沫特莱的胳膊，象怕她又跑了似的。大家告诉史沫特莱，国华发现她走失后，急得流了泪，在黑暗中到处奔跑，非要找着人不可，甚至要返回原路找，任凭别人怎样拉他劝他，都不听。听着这些，史沫特莱的双眼湿润了。

不一会儿天亮了。队伍来到一个湖边的镇子上。起先镇上的人疑是敌人来了，都坐船逃往湖心，后来人们陆陆续续回来，团团围住史沫特莱打量着，猜她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英国人。一个妇女把惊恐的小孩拉到身边：“哟，她的眼睛象猫眼睛一样！”

国华按纳不住了："她的眼睛决不象猫儿的眼睛！她是一个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在丁家冲给伤兵喂饭、洗澡。"他边说边抬起史沫特莱的一只手招呼大家看她包裹着绷带的手："这就是她给伤兵洗澡时被一锅开水烫伤的！"

看着国华那副认真样儿，史沫特莱打心眼里喜欢，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忽闪着，何不收养一个孩子，小国华多可爱呵！她曾听说过，重庆有一所由受过美国儿童教育专门训练的教授创办的儿童学校，儿童们自己管理自己，衣食简朴，费用不多。国华去那里可以学习文化和科学，将来还能送他到美国深造。国华虽小，却具有科学的头脑……

随着史沫特莱离开鄂豫边区的日子愈近，她收养国华的愿望也愈益强烈。但她又不得不经常冷静下来思忖：自己至今孑然一身，四海为家，漂泊不定，收养一个中国孩子，能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同时，收养一个中国儿童，部队的领导会同意吗？

在即将离开边区前往国民党大后方重庆之际，史沫特莱找到了李先念，谈到了收养国华的事。李先念很惊讶，笑着问她何以愿意收养国华？她说，国华具有科学思维的头脑。如他对虱子病（斑疹伤寒）、对暴风雪的细致观察与判断，看星星识别方向等等。李先念说："很好，如果您愿意而且孩子本人也同意的话，您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史沫特莱又找来了国华，告诉他，她将要收养他，并送他到重庆的儿童学校去读书，将来还能去美国……国华默默无言，最后，他要求史沫特莱允许他和别的小鬼商量一下。次日，国华眼圈红红的，和另一个小鬼来了。他很为难地说：你比我的亲生母亲还要亲！你要收养我，我很感谢。我们讨论了这件事，"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方"。她怔住了，盯着国华，半晌，深深叹出了一口气。国华不知如何是好，用手抚摸着她的手背，低声说："你可以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收养我！"多好的孩子，多体贴大人心情的孩子啊！史沫特莱激动不已，把国华紧紧搂在怀里。她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与满足。她理解国华！

几年以后，在美国的史沫特莱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有一次曾企图收养一个新四军的瘦小的战争孤儿，送他到重庆的一所学校里去，然后把他带回美国。这个孩子为此想了一整夜。最后他拒绝了，告诉我在'最后胜利以后'收养他，因为'现在前线需要一切人'。这是一切孩子的呼声，五千万人① 的呼声，现在充满了我的工作室……"②

临行之前，史沫特莱放心不下国华，她向纵队领导请求将她所称的"我的儿子"国华安排到纵队的儿童剧团去。该剧团由一位青年女教师领导着，半天读书，半天排练各种戏剧、集体舞蹈或练唱。纵队领导答应了她的请求。

一叶扁舟载着史沫特莱离开了洪湖边。国华挤在送别人群的最前面，使劲地挥动着一双小手。史沫特莱久久伫立在船头，直到湖岸上的一切为烟霭所笼罩……

（选自《大江南北》90年6期）

捉放"省主席"韩德勤

话说黄克诚得知活捉韩德勤消息，喜不自禁。平时很少作诗的他，却诗兴大发，脱口而吟道：

不打倭贼，与我纠缠。
口是心非，得势便忘。
不除韩顽，铁军心患。
今日捉韩，军民皆欢。

韩德勤如何被捉，列位落座，听我慢慢道来。

且说这年三月中旬，万余日军对淮海区"扫荡。"同住此地的韩部和新四军三师，态度却迥然不同：新四军以满腔怒火，杀声阵阵，与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韩部则惶恐不安，一触即溃，节节败逃。在危难之际，韩德勤想到了新四军。在韩派人向新四军求援时，黄克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念旧恶，即派彭明治、郭成柱率七旅奋勇阻击日寇，用生命和热血救韩部于三师驻地涟水、苏家嘴地区休整。黄克诚见韩部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以救人救到底之心，派人送去粮食、衣物和经费。新四军的见义勇为，深得韩部官兵和社会各界人士称赞。韩德勤感激不尽，并特意登门致谢。那天下午，韩一见黄克诚，又是敬礼，又是打躬作揖，眼眶里还含着一包热泪，说："幸亏新四军拉我一把，不然我这万把人不就成了鬼子的刀下鬼了。我韩某今生今世也忘不了新四军的大恩大德，忘不了黄师长的救命之恩，我……我……"说到此处，他激动得直擦泪水。一时间，世界上好听的词句全用上了。这时的韩德勤虽是在演戏，却也动了点真情。黄克诚自南下华中，与韩打过数十次交道，深知此人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辈。他见韩德勤这般模样，淡淡地一笑，说："韩主席，救你部乃是我军应该之举，你我是中华民族子孙，理应共同抗日，一致对外，你说是吗？"韩德勤连声说道："黄师长说的极是，今后，我韩某一定与贵军携手共进，共歼日寇。"黄克诚反问："此话当真？""我若反目，天诛地灭！"韩德勤手指天地，发誓赌咒，还怕黄克诚不相信，又说："我们可以签订协议为证，黄师长你看如何？"黄克诚一为预防韩出尔反

---

① 意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总人口数，实际人口超过此数。

② 史沫特莱：《驳"时代""生活"杂志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见美国《纽约下午报》，1944年12月10日。

尔，二是想到为了共同抗日的大局需要，同意了韩的建议。双方协议如下：

一、韩部与黄部团结友好，共同抗日。日军离开车桥、曹甸，韩部返回原地。

二、日军如犯韩部，黄出兵援韩；日军如犯黄部，韩出兵援黄。

三、黄、韩二部情同手足，永远友好，直至抗战结束，不得背信违约。

谁知墨迹未干，韩德勤已把协议抛之脑后。他一接到蒋介石密令，即以回师休整为名，要津浦路西的王仲廉部兼程东进，韩部由东向西，妄图两面夹击刚与日伪军连续作战33天的彭雪枫四师。3月15日，韩部侵占里仁集、陈道口。彭雪枫对韩的动机已有察觉，遂派员交涉，婉言相劝，呼吁团结抗日。此时的韩德勤，狂妄之极，利令智昏。他亲率八十九军和李仲寰的独立第三旅、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一夜之间偷渡运河，占领山子头、盛圩一线。彭雪枫将韩部情况及时向军部报告。

陈毅接到报告，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对策。张云逸愤愤地说："韩德勤这个王八羔子，真乃是不识好歹，恩将仇报，我们要狠狠教训他一顿。"

赖传珠说："岂止是教训他一顿，而且要彻底收拾他，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分析说："韩部实为我抗日之阻力。新四军挺进苏北，韩德勤多次阻扰。我们在半塔、郭村、营溪、黄桥、曹甸等地多次交锋，未能彻底歼灭，留有后患。这次又是他挑起事端，我出师有由。二是韩部长途跋涉，刚到山子头立足未稳，部队疲惫易于攻取。三是山子头一线我军力量雄厚，不仅二师、四师驻扎在此，而且三师七旅一两天路程就可赶到。在兵力对比上，我军为优势，此举必胜！"

饶漱石每逢开作战会，生怕说外行话，从不抢先发言，单等倾向性意见形成后表个态。今天，他听完赖传珠发言，扫了大家一眼，见无异议，便总结性地说："大家的意见很对，我同意全部彻底歼灭韩部。"

陈毅见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同，便叫来秘书罗若遐，口述命令：

二师、三师、四师：

韩顽率部占山子头、盛圩一线，图与路西王部合击我彭部。若韩、王之企图实现，淮南、淮北局势严重，对我华中斗争任务有极大影响。在韩、王未会合之前，首先集中兵力全歼韩部。此次战役以四师为主，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参战，由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

各部接电后，主动与四师联络，听从彭、邓指挥。为给韩最后一个机会，淮海军分区派员，劝说并警告韩、王，希望他遵守协议，顾全大局，退返原防；如不受劝告或故意拖延，一切后果咎由自取。

陈、饶、张、赖

3月15日

话说各部接令后，秣马厉兵，听从彭雪枫、邓子恢调遣，开赴指定地点，只等一声令下，捉拿韩德勤。

却说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接令后，即派张参谋和李干事去韩部。谁知韩一听要他遵守与黄克诚签定的协议，竟两眼一翻，颠倒黑白地说："你们知道协议是如何产生的吗？那是黄克诚被日本人追赶，被我方救援后，向我屈膝投降的时候签订的。再说，我方签定协议的两个代表是通共分子，他们擅自作主，不能代表我的意见，是无效的。"看到韩这副无耻嘴脸，真真气坏了张参谋、李干事。他俩强压怒火，责问道："你韩主席如今占了彭雪枫地盘，枪杀我抗日干部，委任乡长，作何解释？"韩狡辩道："苏北本来就是我姓韩的天下，你们新四军硬挤进来，现在还出尔反尔，说我占你们地盘，真是岂有此理！"

当下，张参谋、李干事见韩已铁了心，不分黑白是非，觉得说破嘴皮也无用，便气愤地返回部队，向军部作了汇报。

陈毅军长接到淮海军分区的汇报，情况在他意料之中，感到此战不可避免。他又仔细分析了形势，想到如今国共合作没有破裂，要打这一仗还有不少棘手问题。如全歼韩部，是否会给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借口呢？又如捉了韩德勤怎么办？捉了王光夏、李仲寰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涌入他的脑海，他立即带着随员策马飞奔四师驻地。

此刻，四师正在界头集小学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九旅旅长韦国清、政委康志强、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委赖毅、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彭雪枫下达了各单位的作战任务后，大家议论了如何打好这一仗，给韩一个下马威，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时，门外马蹄声止，大家见是陈军长赶到，纷纷握手让座，并把问题交给了陈军长。陈毅笑着说："大家提得好，我正为这些棘手问题而来的。三个臭皮匠赛个诸葛亮，我看还是大家研究想办法。"经过一番讨论，陈毅见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双手抬起，向大家按按手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陈军长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说了三点，大家一致说好。

且不说陈毅说了哪三点。却说当天黄昏，各部向攻击点开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韩部。这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顷刻间，倾盆大雨从天而落。

话分两头，却说韩德勤此时望着瓢泼大雨毫无睡意，高兴地说："天助我也！"他想到自己的周密计划：等到明天中午，王仲廉部一到，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彭雪枫部，把他们赶到洪泽湖喂鱼虾去！哼！什么协议不协议，见鬼去吧！我那时是没办法，做做样子而已，他们还当真的。他越想越高兴，良久，才渐渐进入梦乡。

这阵大雨，不仅麻痹了韩德勤，也麻痹了哨兵，韩部四周的游动哨都躲进了房子里，有的干脆进了被窝。

12时，雨停了，两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同时发起攻击。担任主攻的韦国清九旅，兵分两路，一路由南向北，一路由北向南，向山子头韩总部及保安三纵猛攻。滕海清的十一旅围歼独立六旅。彭明治的七旅在姜王庄、胡圩、陈楼一线阻击八十九军。仅半小时，保安三纵和独立六旅被全歼。李仲寰被击毙。

猛烈的枪声和喊杀声，惊醒了梦中的韩德勤，他料到不妙，吓出一身冷汗，嘴唇直打哆嗦，上下牙直打颤。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完了，完了！"此时的韩主席，哪里还有先前的威风，却如被剔了骨头的猪肉，瘫在坐椅上。

"报……报告！"王光夏慌慌张张闯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们已被……包围，到……到处是新四军。韩主席，我已吩咐拼命……抵抗，我们赶快逃吧！"王光夏一席话，使韩清醒过来，他气急败坏地说："不能反抗，不能反抗！谁反抗就毙了谁！"王光夏愣住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韩见他迷惑不解，骂道："蠢驴，你想叫我送死啊？共产党优待俘虏，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出去，叫新四军不要开枪，说我韩主席在此，请他们来谈判！"

王光夏一听叫他出门，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他哀求说："韩主席，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亲手杀死过不少新四军，他们不会饶过我……"

"少罗嗦，快去，快去！"韩眼一瞪，生气地说："你不去谁去？你对共产党有血债，我不一样吗？快去，快去！"

王光夏想想自己这几年在半塔、高宝、曹甸、东沟、凤谷村多次制造摩擦，杀过不少新四军，新四军怎么会饶了自己？他越想越怕，可是背后的脊梁骨上冷冰冰的一支手枪抵住自己，韩德勤逼自己去，不去不行。他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迈去。他一边走，一边喊："我是王光夏，韩主席请你们……"话没说完，"叭"的一声，王光夏应声而倒。原来，九旅二十六团八连指导员孙长兴，带着战士们把大院围得水泄不通，他见王光夏出来，满腔怒火腾地一下喷出，咬牙切齿地骂道："狗娘养的，我要为烈士讨还血债，不打死你王光夏，我誓不为人。"他举起枪，王光夏饮弹而毙。

孙长兴带着战士们冲进院内，高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韩德勤亲眼见王光夏被毙，生怕落得一样下场，便混在俘虏里，举着双手走出院门。

战斗胜利结束，陈毅接到活捉韩德勤消息，电告延安：

毛主席：

韩德勤已于18日晨被俘，其大部歼灭。韩被押，我们装着不认识，拟即混在俘虏中释放。如何？请立复。

陈毅

3月18日

两小时后，毛泽东、刘少奇复电：同意释放韩德勤。

说到此处，列位看官可能要问，这韩德勤罪孽深重新四军为何不把他一枪崩了，却要放他，留有何用？看官莫急，且听我细表。

话转回头。却说战斗前夕，陈军长参加了四师作战会议，会上如此这般地说了三点意见。会上，他们研究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对韩德勤如何处置的问题。列位要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吗？是的，因为韩身为国民党上将，江苏省主席，杀了他，则直接影响国共关系，蒋介石很可能借机翻脸反共。

再说，这次韩被俘，王光夏、李仲寰被杀，打了他的威风，灭了他的志气，卸了他的膀子，丢了他的面子，从此，蒋不会重用他，他也无脸、无力再与我为敌，所以不必杀他。

那么，会议上陈军长提出哪三点意见呢？

第一，消灭韩部；第二，韩德勤要抓活的；第三，王光夏、李仲寰死活都要。这三点，战前传达到每个战士。战斗结束，三点全部兑现。

书归正传。却说陈军长接到毛泽东、刘少奇复电后，随即派人释放韩德勤。不知这韩德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释放他时，非但不肯走，还供认自己是韩德勤，并要求面见陈军长。负责放他的孙长兴恼火地说："韩德勤，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放你走你不走，你是不是鬼迷心窍啦？凭你这德性，也想见我们陈军长？快走吧！"韩德勤仍然一个劲要见陈军长。此时，负责俘虏工作的九旅政治部主任张震寰路经此处，上前询问。韩点头哈腰地说："麻烦你转告陈军长，必须见我一面。"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要求，陈毅好生纳闷，找来彭雪枫、邓子恢商量。彭雪枫说："韩德勤落到如此地步，是他自找的。我军所为有理、有节，不怕他找岔。"

邓子恢说："这只丧家犬，连老本都输光了，这下该清醒了。不妨见他一面。"

当晚，陈毅见了韩德勤。韩见陈毅走来，大有受宠若惊之状，他连鞠三躬道："久仰，久仰！陈军长如此大度，今日屈身会见我这败军之将，实感荣幸。"

陈毅回礼道："韩主席，你我是老熟人了，不必客气。"

韩德勤一听，脸"刷"地红到耳根，苦笑道："陈军长如此看得起韩某，实在是羞愧难当啊！你我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能相提并论呢。"

"此话怎讲？"

"唉！你陈军长乃常胜将军，我只是你手下败将。三次被你们生俘，我是终身难忘啊！第一次是1931年4月4日，在安福城里，我当了你们的俘虏，损失了一个师；同年9月，在方石岭，我二次被你方生俘；此次是第三次。"说

到此处，韩德勤不无凄惨地说："这次惨了，全军覆没。要给人当笑柄了。"韩德勤边说边摇头叹息："三年前，你们刚过江时，我有十万人马，你只有7千人。古人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三年不到，我们之间的兵力却翻了个个儿，共产党实在是了不起啊！"说到此处，他不由得竖起了大姆指。片刻又说："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我如今落到此地步，已是无脸见人了。"

陈毅微微一笑说："韩主席此言差矣。古人曰："吃一堑长一智。过去的事不要再想了，要想想今后怎么办？"陈军长又严峻而庄重地说："现在，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战火连天，生灵涂炭，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拿起了武器，对付日本的侵略。而你们却不断破坏国共合作，和新四军搞摩擦，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次战斗，我方实在是迫不得已，为的是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为了减少摩擦，避免战斗，我方还多次派人与你联系，可是你不听劝告。"韩德勤听着听着，头越来越低，还不住地点头说："都怪我鬼迷心窍。我是咎由自取。"陈毅继续说："这次虽然全歼了你部，但我方仍本着团结抗日的意图，放你一条生路。希望你接受教训，不要再站到反共立场上，与人民为敌到底。"

韩德勤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连声说道："陈军长说的极是，我韩某真正是心悦诚服了。今后我一定……"韩德勤刚想发誓，一抬头，见陈毅笑着看着他，马上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唉，都是我不好，老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还恩将仇报。我再发誓你们也不会相信了，我不知怎么讲才能表达我内心的悔恨呢！"

陈毅见韩德勤急得满头大汗，谅解地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讲，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嘛，只要你讲的话兑现，我们会相信你的。"

韩德勤一听此话，睁大了双眼，惊喜地说："陈军长海涵。我韩某和你做朋友实不敢当，只求你大人不记小人过，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陈毅打趣地说："看来韩主席是不愿和我交朋友罗？其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可有不少朋友。毛泽东同国民党参政员章士钊是老朋友。周恩来同张治中、冯玉祥是好朋友。我到了苏北，和李明扬、朱履先、韩紫石也交了朋友。韩主席莫非是看不起我？"

"哪里，哪里！"韩德勤急得直摆手说："我韩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三生有幸，哪还有不愿之理呢？"

"那就一言为定！"陈毅伸出小手指。

"一言为定！"韩照陈毅的样子，伸出小手指，勾在陈毅的小手指上，两人哈哈大笑，似乎都回到了童年时代。韩德勤被陈毅感染了，情绪好起来，他谨慎地问："老朋友，你这次放我回去，是否还要打我？"

"朋友归朋友，公事公办嘛，不能徇私情哟！"陈毅幽默地说："今后打不打你还是取决于你的态度啊！"

韩德勤急着说："我今天把心交给你，从今往后，我如做一件对不起新四军的事，决不是人。我的为人你还有所不知，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讨小老婆，至今连个儿子也没有。"

陈毅仰脸大笑，插话道："哎呀，老朋友为人廉洁，我就不如你罗！我又抽烟又喝酒，去年还生了个胖小子。"陈毅的笑话逗得韩德勤一阵苦笑说："我虽为蒋介石的嫡系，但不被重用。今后，我决不向新四军放一枪。但要我彻底反对蒋介石还做不到，这里的原因你是清楚的，我还要端他的饭碗，当他的省主席。"

陈毅体谅地说："你的苦衷我们知道，只要你不反共，尽量为抗日做力所能及的事，或保持中立就可以了。"说完话锋一转问道："韩主席找我有何事呢？"

韩笑笑说："我要见你一面，一是想谈谈心里话，向你请罪；另外想请你答应我几个要求！请老朋友务必帮忙。"

"你说吧，只要提得合理。"

韩德勤掰着手指说："第一，片甲不留地让我回去难以交待，能否归还我一部分人和枪支；第二，回去后无立足之地，请你指定个地区让我混下去；第三，省政府的牌子让我挂下去，不然面子难看。"韩一边说，一边观察陈毅的脸色，见陈毅认真听，无恼怒之情，便又说："我斗胆说一句，提这三条要求，也不单是为我，也是为新四军好。"

"此话怎讲？"

"我带一部分人枪，挂上省政府牌子，继续当省主席，蒋就不会再派人来顶我的位置。据我所知，汤恩伯、李仙洲都想来争我这个肥差呢！只要我在这里，决不与你们为敌，还向你们提供情报，做你们的内线，这不是对你们好吗？反之，如果把我挤走，蒋介石再换一个人来，情景会怎样呢？"

陈毅边听边点头说："言之有理，我答应你的要求。"

陈毅与韩德勤的这次单独谈话，长达七个小时。

当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研究决定，将陈与韩谈话内容报告中央。毛泽东、刘少奇立即批复："赞同释韩条件，因情况复杂，不必发展韩为内线。"

第二天，陈毅不但满足了韩德勤的要求，还借了八万元给他重建部队。由于韩当时身体不适，还派人用担架送他到宿迁陆圩子。

此后，韩德勤判若两人，他信守诺言，还及时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密告新四军。

（选自《新四军演义》，作者：胡兆才，略有删节）

将军浪漫曲
——陈毅与张茜婚前二三事

1938年，新四军从江西南昌挺进到安徽泾县，军部设在泾县的云岭。

军部战地服务团也在云岭，17岁的张茜就是该团的演员。她出生在武汉一个贫民之家，抗战爆发时还在湖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当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到武汉招募思想进步而又有艺术天才的青年学生去充实战地服务团时，张茜(当时还叫张掌珠)瞒着母亲，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张茜聪明美丽，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艺术天赋，是战地服务团里顶呱呱的“台柱子”，也是云岭一带颇有名气的“军中云雀。”

张茜和她的团友们经常在军部演出，有时也下到各支队慰问演出。军部下辖3个支队，一支队驻在苏南的溧阳县茅山根据地，司令员是陈毅，这位38岁的诗人将军，智勇双全，能征善战，是一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茅山大鹏”。

一次，陈毅来军部开会，军部组织看演出，节目是《一年间》，张茜在剧中扮演主角。

这一看，看得陈毅终生难忘。他早就听说服务团有个从江城武汉来的女团员叫张茜，长得水灵灵的很动人，学习工作很用功，戏也演得非常出色，今天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啊！

散场后，陈毅回到住处，舞台上那位身材苗条、长着一张鹅蛋型粉红笑脸和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新娘子总是在眼前闪来闪去，他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个劲地热望着见到她。

怎样接近她呢？陈毅决定去找他的老朋友——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要求他派一些团员到一支队去做战地服务工作。茅山根据地要扩大，战地服务自然要加强，如果张茜去了，岂不是两全其美！

从服务团出来，正好碰上张茜和几个团员，朱克靖和她们打过招呼后，就指着陈毅介绍说：

“这是一支队的司令员陈毅同志。”

“啊！这不是在《一年间》里演新娘子的小鬼吗？”陈毅见到张茜，眼亮心热，话也说得欢快了。

“首长，我叫张茜哩。”张茜说。

“我知道你叫张茜，不过，‘小鬼’是我们对青少年同志的爱称咧。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张茜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

我的乳名叫春兰，读书时叫张掌珠。”

“唷！名字还不少吗，以后我不叫你小鬼，就叫你春兰，好么？”陈毅说得兴致勃勃。

张茜微笑地点了点头，便和其他团员一起匆匆而去了。

朱克靖见陈毅对张茜很有好感，就试探说：

“仲弘(陈毅字)，大革命失败后，你在井冈山打了10年游击，如今年近40，也该有个家了吧！”

“哎哟！同志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呀。”陈毅故意摇着头。

“抗战是持久战，你要作长远打算啦！”朱克靖说得语重心长。

老朋友如此认真，陈毅就开门见山地说：

“这事要靠你老兄罗！嫦娥、西施、天上人间，还不都在你服务团这个仙窟里吗？”说得两人哈哈大笑。

朱克靖进一步问：

“你觉得刚才的小张怎么样？”

“嗯……这个，可以先交往一下。”陈毅又故作不急。

已是知心多年的老朋友了，陈毅心思哪里瞒得过朱克靖呢？“我要亲自出马，成全这桩美事！”望着陈毅远去的背影，朱克靖笑眯眯地想。

朱克靖平易近人，服务团团员都亲切地称他“老妈妈”。

当“老妈妈”向张茜提出陈毅的意思时，张茜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而是微笑着默不作声。“老妈妈”犯难了，该怎样往下说呢？女孩子家的心事难得把准啊！

张茜也不是故意“兜圈子”。团内团外，已有不少人在追求她，对那些追求者，她不乏良策以待，而现在，以“老妈妈”朱团长为信使的这位追求者，的确太不平常太让她没有思想准备了，她怎能在几分钟内断然作答呢？

她找到最要好的女伴，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先前，那么多人都想和我好，而我主要想到自己参军不久，受锻炼较少，年龄也不大，所以对谁也没那份心意，现在答应了首长的追求，岂不是有高攀的嫌疑？再说，陈毅同志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而我才疏学浅，如果和他结合，将来我就是天天跑步，紧紧追赶，恐怕也难以学到他的十分之一啊！两个不般配，那还有什么意思？”

女友据理力辩，说说笑笑中把张茜的顾虑打消了许多，但张茜仍觉得此事不可匆忙。

正在这时，服务团里一位对张茜有意思的同志听到风声，不问青红皂白地吃起醋来，他挖苦地说：

“张大明星，听说陈毅正在对你‘穷追猛攻’，是吧？他把追击敌人的精神都用来追你了。不久的将来，你就是显赫一世的夫人啦！”

受到这浅薄的挖苦，张茜大受刺激，她愤怒、苦恼。后来又有些人风言风语，更让她伤心得很。她不愿再提此事，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外出慰演，她也尽量不去一支队。

张茜还是被派往一支队去了，这是朱克靖的特意安排，他劝导了张茜好一阵子才成功的。领队人也知道陈毅

在追张茜，他私下对朱克靖说，一定要设法让张茜与陈毅多多接触。

到了一支队，领队人既让张茜作主演，又要她管理服装，那时演出服装经常要借，管理服装的人自然要多和外面打交道。

即将上演的剧中人有一位是我军首长，领队人就指名要张茜去找陈毅借。张茜嘀咕着：怪事！偏偏要我去……她觉得别扭，不大情愿去。领队看在眼里又故作不经意，只是不断地催她：

"时间紧迫，动作要迅速，赶快去把服装借齐！"

张茜硬着头皮去了。

见到张茜，陈毅喜出望外："哦，原来是在云岭见过的老朋友哇！"

陈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该由警卫员做的他都亲自动手了，他以为朱克靖已经搭好了鹊桥哩。

"首长，我们今晚要演出，想向您借一套衣服，好么？"张茜直奔"主题"。

"借衣服，那还不容易！我身上这套可以吗？"

"可以的。"

陈毅高兴地叫警卫员拿了一套半旧的衣服把身上的那套换下，张茜接过衣服，说了声"谢谢首长"，行了个举手礼就匆匆而去了。

陈毅非常失望，人家来借衣服的，别无他意，自己太好幻想了。

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急冲冲地喊。

"警卫员！警卫员！"

警卫员进来了，陈毅又恍恍惚惚地说：

"啊！啊！没有什么。"

警卫员刚走出门口，陈毅又急冲冲地喊：

"警卫员！警卫员！"。

警卫员马上回转身奔进屋来，可陈毅又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去吧！"

警卫员莫名其妙，似乎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于是更加警惕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服务团员到达一支队那天，陈毅也刚从前线回来，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事，他坐在那里又想起张茜了，越想越心切，忽然灵感涌来，他拿笔在纸上随手挥诗一首，刚刚落笔，还没来得及推敲修改，秘书就推门进来，送上一份文件请他审阅。

陈毅慌忙把诗稿抓起往口袋里一塞，接过文件，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张茜来了，陈毅在高兴中换了衣服，却忘了口袋里装着一首情诗。他想叫警卫员去把衣服追回来，但又觉不妥，如此而再，以致让警卫员担了一场虚惊。

"要出洋相哟！"警卫员出去后，陈毅在屋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并喃喃自语道。

老天保佑，张茜拿到衣服后并没有马上分给演员，而是集中整理了一下。

当她整理到陈毅的那套衣服时，发现口袋鼓鼓的，她心中一惊：难道是什么重要文件带出来了？掏出一看，是一团揉得皱巴巴的纸，再展开一看，张茜吓了一跳，是一首诗，上面写着"赞春兰"！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她马上把诗塞到自己的口袋里继续整理衣服，心却"怦怦"地跳得好厉害。

忙完后，张茜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来：

赞春兰

小箭含胎初出岗，

似是欲绽蕊露黄。

娇颜高雅世难觅，

万紫千红妒幽香。

读着读着，她的眼睛模糊了，泪花在睫毛上闪耀着，她心想：

"平生能得到如此真挚可贵的爱情，难道还不该知足吗？难得他惠赠我这么深情的诗篇，只怕是受之有愧啊！……"

张茜一个人坐在那里长时间地、呆呆地沉思着，她开始怨恨自己那过分自尊的性格，她觉得自己对陈毅太冷淡，太对不起他了。她又想起在云岭时朱克靖团长和好友的劝告、开导，眼下在一种十分奇妙的情况下读到陈毅为她所写的诗，思前想后，她的情怀渐渐在转变，她似乎有几分心酸地想：对这样理想的伴侣，怎忍心继续抛在一边呢！

陈毅万万没想到，他为之焦虑不已的那首诗，象一支神奇的丘比特神箭，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张茜，使张茜的态度升温了许多。演出那天晚上，她多么希望陈毅能去看戏啊！而在这之先，她见了陈毅惟恐避之不及呢，哪里还谈得上渴望见到他！那晚陈毅因有事没去看戏，张茜惆怅极了，演出结束后，她忘了疲倦，毫无睡意，她想着陈毅，想得一夜未眠。

张茜还衣服来了。

她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对陈毅，她既不称陈司令员，也不称首长，而是含情脉脉地说：

"我把衣服送还给你。"

陈毅"啊！"了声接过衣服就赶快摸口袋，发觉"东西"还在，他才装得若无其事地说：

"坐会儿吧。"

张茜把陈毅的动作看在眼里，想笑，但忍住了。她默默地坐下来，深情地看着陈毅。他30多岁了，可依然眉清目秀，十分精神。

陈毅给他倒了一杯茶，见她眼圈儿发黑，很疲惫的样子，就关切地问："是不是太累了？"

他们离得很近，彼此深情地注视着，他们都感到了对方的巨大的吸引力，但又都极力控制着自己。张茜的脸飞红起来，她放下茶杯，望着陈毅轻轻地说："我走了"，接着站起身来默默朝门口走去。

陈毅发觉今天的张茜与昨天借衣服时的张茜完全不同，那眼神，那语气，全变了。是的，她变了——哦！是时候了！他一个箭步走到张茜身边，温柔地叫了一声：

"春兰！"

张茜立刻回过头来，微笑着应了一声："嗯！"眼睛注视着陈毅。

陈毅走上前，握住张茜的手，放在胸前，然后动情地说：

"我一两天内又要到前线去，回来时可能你已到别的支队去了，见不到你，但我会写信给你的。"

"你要去多久？"张茜也很激动，声音虽低却充满着柔情蜜意。

"很难说，战局正在变化，也许个把月，也许更长时间，今晚你有空吗？"

"那好，今晚我来找你。"张茜急切地说。

"我等你。万一到时我有事出去了，那就只有留待以后再说了，我一定给你写信，你也可以给我写信嘛！"陈毅深知军情紧急，随时都会提前出发的。

他们就这样握别了。

晚上，张茜开完服务团小组会后，马上来找陈毅。可惜，陈毅因急事出门了。

是夜，陈毅即动身去前线，他来不及见张茜，只好到前线后再写信给她。陈毅抑止不住满心的喜悦，出发前特地给在山岭的朱克靖写了封信，他俏皮地在信中说：

"……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是大局已定了……"

爱情碰上动荡的岁月，总会让人揪心不已。陈毅和张茜因分离而产生的思念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豪迈的将军即使戎马倥偬也还是鸿雁频传。茅山一别后，陈毅和张茜就以纸墨为弦，共奏心曲。

1940年新年前夕，军部决定派一些服务团团员长期跟随支队，加强宣传和鼓动工作。朱克靖考虑到陈毅和张茜已经亲密融洽，就决定派张茜到一支队去。张茜此次被派到一支队，与其说是去演出，还不如说是"朱老妈妈"忍痛割爱送姑娘出嫁了。

别后重逢，陈毅和张茜皆大欢喜，他们再也不必老惦记着写信，再也不必想方设法拜托"邮递员"了，直面相看，尽诉衷肠。支队部的干部和警卫员都为他俩祝福着，有人还打赌说："等着吧，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喝陈司令员的喜酒了！"

没错。1940年1月的一个夜晚，陈毅和张茜结婚了。陈毅第一次见到张茜时，她正在舞台上扮演新娘子，而现在，她真的成了新娘子，陈毅自己也由观众变成了新郎，时代风云际会，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一片热闹的玩笑声、祝贺声和碰杯声中，陈毅张茜容光焕发，幸福地被人们簇拥着。

从这天起，"大鹏"陈毅就和"云雀"张茜比翼双飞了。

（摘自《党史文汇》93年2期，作者：武浪）

陈毅与张茜的诗中情

陈毅和张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结合为终生伴侣，在30余年间，以沫相濡，心心相印，风雨共济。他们将这份爱情附丽于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时时更新，新美如画，成为人间的佳话。他们之间那种令人羡慕和赞颂的忠贞高洁的夫妻感情，可在他们留下的一些诗篇中见之一斑。

陈毅与张茜相识，是在1938年之后。这要从张茜说起。张茜1922年生于武汉市。她从小读书认真，追求真理，上中学时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1938年春，她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是军部战地服务团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她丽质天成，端庄而苗条，再加上声音甜美，演技出众，短短的一年间，便在全军名声大震。当时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观看张茜她们的演出。一个是英俊潇洒、具有诗人气质、文武双全的将军；一个是年轻漂亮、才华出众的进步女性，两人很快就相恋相爱了。爱情使陈毅如痴如醉，1939年3月，他写下这样一首幸福甜美的情诗：

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
豪情廿载今安在，输与红芳不自知。

此外，他还曾以张茜的乳名"春兰"为题，写了一首《赞春兰》：

小箭含胎刚出岗，似是欲绽蕊吐黄。
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张茜读了这两首诗，感到陈毅对自己虽没有海誓山盟般的柔情蜜意，没有情牵梦绕般的形影相伴，但对自己的爱却是如此执著热烈，深沉似海，真是难得的知己伴侣啊！

1940年春，陈毅与张茜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地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婚。陈毅写下了题为《佳期》的一首诗：

灯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
同心能偿浑疑梦，注目相看不语时。
一笑艰难成往事，共盟奋勉记佳期。
百年一吻叮咛后，明月来窥夜正迟。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数千健儿被淹没在皖

南茂林的血泊之中。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北盐城镇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被任命为代军长。在新军部成立大会上，陈毅热泪盈眶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高声朗诵了“血债千重又万重，立将莫邪斩苍龙”的豪壮诗句。大会上，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夹杂着战士们的哭泣声。张茜在会上也激动万分，泪珠夺眶而出，流满了脸腮和衣襟。会后，张茜感到，从此陈毅的责任更重大了，自己要承担的担子也就更重了，于是她写了题为《在新军部成立大会上》的一首诗，以表达自己对皖南事变的极大义愤和与陈毅永远患难与共，将抗战和革命进行到底的情怀：

茂林四落碧血溅，千万人群泪涟涟。
君曾劝妻莫啼哭，今却当众热泪挥。
见君洒泪添伤悲，悲中添恨入骨髓。
君之壮志与誓言，踏破山河也相随。

陈毅看了这首诗，十分感动，深情地对张茜说：“原来你也是诗人情怀，你真是我的好春兰，我的，我的好春兰啊！”

新四军军部成立不久，军部在审干工作中对张茜的历史产生怀疑，陈毅虽然信任年轻的妻子，但也不好辩白。性情刚烈的张茜，便提出接受组织审查，离开军部去一师部队工作。两地分居隔不断彼此的情思，在张茜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吟就了表达对妻子真挚感情的一绝——《内人东来未至，夜有作》：

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
漏尽四更天未晓，明月知我此时情。

后来，张茜每当想起这首诗，眼前便时而出现陈毅纵马飞驰的英姿，时而出现陈毅在皎洁的月光下为思念爱侣而挥笔写诗的优美画面，使她无限神往。

1943年，饶漱石为了达到独揽新四军最高权力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向中央诬告代军长陈毅。一时间，新四军的创始人陈毅竟成了新四军的罪人。这年11月25日，陈毅奉中央电召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路途艰险，加上张茜产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陈毅想到张茜除要独立承担抚育两个孩子的重担外，还要经受战争环境和党内斗争的双重严峻考验，在启程前，专门为她写下了一首诗：

我行访塞北，君留守淮南。
彼此单形影，独自料温寒。

陈毅经由淮北、鲁南，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2月。他时刻都在惦念着张茜。在一个风雪之夜，陈毅吟出了动人心弦的诗章——《寄内诗》：

地冻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
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也同样思念着陈毅。1945年9月间，与陈毅离别已近两年的张茜，喜出望外地得到陈毅即将由延安返回苏北的佳音。不料，刚接到这佳音没多久，又传来消息，说山东八路军要向东北集中，以配合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东北；山东军区由新四军部队接防，新四军军部不久将北上到山东。为此，中央电令从延安经山东正要回苏北军部的陈毅，即留在山东承担指挥重任。张茜闻讯后，思绪翻腾，百感交集，立即挥诗一首，名曰《寄怀》，把她两年来对陈毅的切切思念都倾泻在其中了：

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
行云慵步回苍穹，游子久留羁旅中。
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
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
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

抗战胜利后，陈毅仍然回到华东战略区担任主要领导人。这期间由于战事激烈，陈毅与张茜团聚后又再度远别，张茜带着孩子们撤到大连。陈茜在大连致书留在华东前线的陈毅，她仿照当年陈毅写的告别诗，也吟成一首：

君转战苏鲁，我偏安大连。
隔沧海关山，彼此形影单。

当时我们没有海军，从胶东撤往大连只能趁着黑夜抢渡。据说有的渡船在途中遭遇危险，消息传出，陈毅十分忧虑，他写了一首诗《所思》，那是1947年8月：

战争遮断音尘绝，日日相思鬓带雪。
朝朝暮暮理戎机，公义应将私情绝。
自宽自解来复去，惧将生离成死别。
誓祝再聚不分离，誓祝再会长欢悦！
蓦然昨夜梦中寻，又见汝身尽是血。
醒来虽然知是梦，难解愁肠千百结。
长忆送汝登车日，屈指迄今已三月。
但望渡海天地宽，稳渡勿为蛟龙得。

新中国诞生后，陈毅和张茜的家庭生活趋向稳定，团聚的日子不少，但也有许多短期和长期的别离。在别离之际，仍然能引起浓郁的诗情。

1958年9月的一个凌晨，张茜参加机关组织的队伍下乡，去当时很有名的人民公社参观。陈毅因为开会，睡得很晚，起得迟了。张茜离家之际，留下一张便条和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夜雨淅沥秋漏长，参观公社心意忙。
为怕酣睡误时刻，未曾入眠即起床。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陈毅陪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并单独访问了肯尼亚，而张茜只是陪同访问其中的亚洲3国。陈毅曾于西非某国写诗致张茜：

去国已飞四万里，仰天皓月又新弯。
黑非独立惊鼙鼓，数言韵语报平安。

在“文革”时期，“史无前例”的劫难把陈毅卷入政治

斗争的旋涡中，使他的生平历史增添了新的坎坷记录。“文革”中期，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逐渐败暴，长期处在逆境中的陈毅可以指望得到比较公正的待遇了，不料在1971年1月患了癌症。张茜看到陈毅骨瘦如柴的身体，忧心如焚。为了尽可能给予陈毅以慰藉，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陈毅于1936年写的《赠同志》的挂轴带到病床前：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此外，张茜还饱含着情思和泪水，写了一首不仅包含着对亲人、战友的安慰和勉励，也包含着对人生的热切期望的诗：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生征途屡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

陈毅读了这首诗，热泪纵横，有气无力地说：“等我康复之后，一定给你唱和一首。”

张茜知道，这是陈毅在宽慰自己。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1972年1月6日，陈毅就过早地溘然长逝了！

陈毅逝世后两个月，残酷的病魔也摧残着张茜。1972年3月，她被确诊患了肺癌，必须尽快动手术。就在张茜动手术的前夕，外交部干部司决定选派她心爱的女儿珊珊到英国学习英语。陈毅生前善于用诗歌熏陶孩子们的心灵，教育孩子们成长。在1961年7月，他的次子丹淮远行就学之际，陈毅就写了《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为丹淮送行。为了教育孩子们继承父亲的遗志，走父亲革命道路，也为了抒发自己对亡夫的无限思念之情，在珊珊出国之际，张茜在病床上构思了一首长诗《送珊珊出国》：

丹淮昔离家，父写送行诗。
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
临别意怆恻，翻检父遗篇。
与儿共吟诵，追思起联绵。
汝父叮咛语，句句是真知。
情义最深沉，尽述平生志。
平生宣马列，口播并笔耕。
真理唯坚守，政策能阐明。
平生重团结，气度同广宇。
恩怨非所计，牺牲全大局。
劳绩长不没，遗爱在人间。
文稿盈数尺，诗词三百篇。
父丧永默默，诗教仍旦旦。
寥寥虽数言，根源于实践。
写诗送儿行，吟罢泪涟涟。
汝父平生事，愿儿记心间。

……

张茜没有向病魔屈服，但已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怀着对陈毅的无限深情，强扶做了肺癌切除手术的垂危病体，争分夺秒地去完成陈毅生前嘱咐她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整理陈毅的诗词选集。当她打开陈毅的遗稿，目睹陈毅的字迹时，又是一阵阵心酸。多少个夜晚，她夜不能寐，陈毅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一天，她拿起笔来，吟诗寄怀：

漏尽更残，
肝肠痛断，
孤灯独照未亡人，
往事历历在眼前！
手持文稿，
如见笑貌，
依稀在身边，
却为何不闻你柔声唤春兰！
却为何……

把《陈毅诗词选集》编成后，张茜吟诗二首，用以告慰陈毅的英灵：

（一）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二）

强扶病体理遗篇，争取分阴又一年。
把卷忆君平日事，淋漓兴会溢行间。

（选自《人物》94年6期，作者：黄子云）

50年前的红色电波
——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这第一次为全世界所惊奇的呼叫声是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西北三十余华里的王皮湾小村庄的土窑洞内发出的，时间是1940年12月30日8时整。这一红色电波，宣告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

五十年过去了，作为第一代播音员，每每忆及这难忘的岁月，感奋不已。

朱总司令具体领导筹建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下，器材奇缺，又无电源条件，但为了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显示中华民族反法西斯的力量，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筹建我党自己的广播电台。成立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广播委

员会。当时，他从苏联带回一台广播发射机(原物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朱德总司令具体领导电台筹建工作。朱老总到电台时，与工作人员一一亲切握手，嘱咐大家努力工作。一次，热情地鼓励电台的同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辛苦了！"并殷切指示大家："听说你们就要试播了，这是件大喜事，目前战争形势很紧张，日本鬼子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国民党反动派配合日本鬼子大举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电台一定要狠狠地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团结全国人民一心抗战到底，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主席对电台筹建工作也十分关心，听说我们有了一台手摇留声机，随即派人送来了他珍藏的20多张唱片。张闻天、邓发等同志也都到电台视察过。

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的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王局长及三局技术骨干、工程师等，经常在电台协助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当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足50人。其中少数是红军老战士，担任党政技术负责工作；10余名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事各项业务工作：如台长傅英豪夫妇是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报务主任汤翰璋，以及报务员、机务员、播音员等，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还有20余名警卫战士，大部分是陕北青年，在郭排长带领下，除担任电台警卫工作外，还要承担烧运木炭、粮食、开荒种地种菜，摇马达发电机等繁重体力劳动；另外还有几名炊杂人员。

总之，这是一支有朝气、能战斗的工作队伍：政治素质好，热情、肯干，把办好电台当做党中央交给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调配干部；选台址，凿石窑；打土窑；建土窑；挖水井……。电台建立后，又进行了艰难的安装和调配机器的工作，终于于1940年12月30日正式试播。这样的速度，堪称世界广播史上的奇迹。

建电台首先要解决电源问题。当时没有汽油发电，我们就发挥集体智慧，反复试验，用两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炉子，成功地燃烧木炭，产生煤气，以煤气发动汽车引擎，再以它为动力带动发电机。技术干部成了"锅炉工"，烟熏火燎，满脸、满手都是炭灰。女机务员徐路同志被煤气熏倒，抬到窑洞外抢救，醒过来后，爬起身接着干。

没有钢铁做铁塔，就找来三棵粗直的大树干，用铁丝捆绑，架在山顶上成了独特的天线杆。

那时一群多么好的年青人啊！至今，我闭上眼睛就又回到了那个集体当中。

麦风变成了"麦克风"

生活中常有一些有趣的巧合。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1939年夏天，我在重庆进入了抗敌演剧第三队，赴西北前线途中，经关中大平原，正值麦收时节：大片麦田被风吹拂，金浪滚滚。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美景，我惊喜不已。同行的诗人遂为我起了"麦风"这个化名，而后，也就使用了。1940年2月到达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毕业后，与同学姚雯一起被分配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任播音员。翌年春，姚雯调走，夏肖岩调来。我叫"麦风"，万万没有想到我走上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每天面对麦克风，这种巧合，使我与同志们都感到惊奇和喜悦。从此，同志们都开玩笑，叫我"麦克风"，还说我是"延安第一个麦克风"。目前，健在的延安第一代播音员，还有姚雯和夏肖岩二位同志。

带羊膻味的播音室

播音室需要安静的条件，特意远离机房，建到了小河对岸的土窑洞内。这是有一个小甬道相连的两孔窑洞：外间是预备间，一张小木桌上有一台与机房联系的电话，还有一张值班用的木床；里间是播音室，约20平方米，为了隔音，墙上挂着、地下铺着延安自产的灰色粗羊毛毯，中央摆着一张小木桌，上面放一个麦克风、一盏马灯、一个手摇留声机及二十几张唱片。播音员就坐在木条凳上，置身于这潮湿而带有羊膻味的播音室内工作。时常听到山坡上传来老乡的山羊、公鸡及毛驴的叫声；羊毛毯是难以隔音的。

我和姚雯都是18岁的江苏姑娘，文化程度高中，没有受过播音的正规训练。台长与老汤同志就耐心地教我们，让我们朗读《解放日报》，反复练习。我们在稿件上标出抑扬顿挫、速度快慢的记号，互相切磋琢磨。幸好我有过一段当话剧演员的生活体会，学起来比较容易。我们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掌握广播要领，待机器运转正常后，立即上机广播。记得，当时我们身边唯一的工具书就是一本汉语小字典。

我们电台每天定时两次播音，每次约一小时。稿件由新华通讯社广播科编写。内容为国内外新闻、战报、《解放日报》社论、中央文件等。每日由通讯员往返几十里路送递。遇到山洪暴发、延河涨水时，通讯员就要用油布包好稿件，顶在头上，涉水过河。

试播阶段，机器运转常出毛病。有时播音播到一半时，机房就来电话告诉我们停止播音；机器运转正常了，又不分白天黑夜立即开播。从住处到播音室要走20多分钟的路，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我们都要往来数次；特别是夜间，山上有狼，都是由警卫员提着马灯护送。

没有文娱节目，京剧唱片又不能反映现实生活，我们自己就充当演员，在播音中插播我们自己演唱的抗日歌曲。有时老汤同志用口琴给我们伴奏，有时他自己独奏。

1941年春节，我们电台请来延安鲁艺合唱团实播“黄河大合唱”。几十个人把播音室小屋挤得满满的。这是建台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一次特殊的试播

试播期间，为了了解各战区、各根据地电台收听试播情况，以往都是由电台报房提前一天文字发报，通知播音时间、波长。试播后，各分台进行回复，但总得不到满意的回答。经老汤同志研究、改进，决定用相同的频率、文字与语言同时进行。一天晚上，老汤等人把手摇马达、发报机抬到播音室，机务员首先用发报机与各地分台联络，然后我们立即开始播送稿件。我反复地呼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各地新华分社电台请注意，广播收听情况如何，请立即回电……”老汤立即用电键呼叫各分台，逐个联络、询问。很快，晋东南、晋察冀、晋绥等分台的复电来了。都说收听情况不错，音量尚好，音质清晰；也有的说声音小、听不清楚。老汤把复电情况告诉了等候在外面的电台的全体同志，并立即用电话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领导向电台全体同志表示祝贺，并告诉我们局监听台已经收到了这次特殊试播的全过程。同志们如同打胜仗一样，情不自禁地欢跳起来。

皖南事变后的重要播音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看见新华社通讯员骑马奔驰而来，意识到今天一定有重要文件。果然是毛主席亲自执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我们立即到播音室，在小油灯下熟念稿件。机器开通后，我先激昂地播完一遍，接着，姚雯再播一遍；我们轮换着，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们的声音、每个字句都变成了愤怒的子弹，射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胸腔。冬夜是那么寒冷，但我们播音完毕，已是满头大汗。这次播音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说我们广播得有力量。

台歌永在我心中

当时因条件所限，机器常发生故障，播音时播时停。1941年冬，机器主要零件烧坏，一时难以修复，播音员被送回清凉山新华社，临时安排作中文新闻稿译电工作。1942年，我离开新华社去鲁艺，从此离开了新闻单位；后来又改行学医，做起卫生防疫工作。

几十年来，不论我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当年我们电台那群年青的广播战士所喜爱的一支歌——XNCR之歌，却永在我的心中咏唱：

这首新华广播电台台歌是丁戈（汤翰璋）同志作的词曲。歌词是：

我们向着明朗的晴空，
我们向着辽阔的原野，
我们向着祖国的山河，
我们向着无边的海洋，
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
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
我们是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
我们播送党的声音，
我们放射党的光芒，
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
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

（1991年2月于北京）

＊XNCR：按照有关规定，我国无线电台呼号第一个字母应为X；NCR系New Chines Radio新华广播电台一词缩写。

（选自《党史纵横》91年4期，作者：徐瑞璋〈延安第一代播音员〉）

上将中将不如芝麻将

“上将中将不如芝麻将”，这句流言，蜚声于胡宗南一统的西北天下，来源于胡的中校副官唐西园击败了一名上将，无数名中将少将的故事。

1941年，胡宗南已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实权大于司令长官，有“西北王”之称。他中等偏矮而结实的身材，走路稳健而神气，一步一趋地模仿着蒋介石的姿态，他的左右都明里暗里说他必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人们称蒋介石为蒋先生，称胡宗南为胡先生。在胡的身后，紧跟着一个身材魁梧，长相帅亮，神气十足的三十不到的青年军官，比胡宗南高出一头，一身华达呢军服，腰系斜宽皮带，左右各插一支白郎林，脚套马刺高靴。特别领章只是两块金黄色光板，不缀星花，官衔可大可小。他是一名中校随从副官，名字叫唐西园。

这个人官虽小，来头可大。

他是浙江嵊县人，蒋介石的母亲就是嵊县人，和蒋介石攀上了小同乡。胡宗南又是浙江孝丰人，唐副官又和胡长官是大同乡了。二则，他是戴笠一手培养起来的军统特务，是戴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戴笠、胡宗南是西湖拜把的难兄难弟，因此将唐推荐给胡宗南当随从副官。戴为蒋在胡的身边安置一个心腹，也就更得到蒋的开心。因此在蒋介石、戴笠、胡宗南、唐西园之间，无形与有形中有共裤联裆之势。

唐副官枪法相当准。胡宗南每次请名流去黄埔七分校、干四团、游干班作精神讲话，总是立正站在讲台前沿。唐副官则离他 2 米左右站在他背后，以策安全，两只眼虎视眈眈地望着台下。由于胡宗南这样木鸡似地立在台沿，台下成千上万学生立正听讲，鸦雀无声。有一次讲课达 3 小时，站在最后排的一个学生，尿胀极了，举手报告要求小便，这手一举，叭的一声，一颗子弹不偏不歪正好打中手心，应声倒下。这就是唐副官为了力保胡的平安，在万分之一秒下应急甩手一枪的效应。唐副官这一手，谁人不畏三分。

从此唐的声名大振，只要胡宗南到场的大会小会，无一人敢轻举妄动的，就是尿湿了裤裆，也不敢作声。从此，胡宗南待唐副官加倍信任，加倍亲热，已经达到把唐西园当成了"掌印夫人"的格局。抗战八年，胡宗南标榜自己一心为国，不娶妻室，住在东仓门 1 号官邸，孤家寡人而已。家中里里外外，全靠唐西园一手掌管，连胡宗南的专用手谕笺条，私人印信，全由唐副官掌握，虽有机要秘书王微、刘大钧等人侍奉左右，但王、刘也得看唐的眼色行事。

问题就发生在这儿。

旧社会风行裙带关系，在胡宗南一统的西北天下，又加上一层副官关系。团长有上尉副官，军、师长有少校副官。找这些头头办事先通过副官，事没有办不成的。而唐副官的魔道更高，要找胡长官，必先得到唐副官首肯。有时，胡长官本来不同意的，事后请唐副官说说情，竟能扭转长官意志，取得成功，关键时刻，唐副官可施展手边掌握的手谕印信，瞒天过海达到目的。这些私情秘密，号称"喜怒不形于色"、"沉默寡言而明察秋毫"的胡宗南就睡在鼓里了。

一级上将蒋鼎文　赔了干女又丢官

1940 年左右，蒋鼎文以一级上将官衔任陕西省府主席，蒋鼎文的来头是相当大的，与蒋介石的关系，自不待言；更是在西安事变中第一个受命由西安飞南京报信取得联系的有功之臣。胡宗南能在西北坐得稳，首先得拍他的马屁。可是唐副官就敢在他的头上动土，他利用胡、蒋在新城官邸接触频繁之际，利用他那出奇制胜的风流，轻巧地与蒋鼎文的干女儿小名小白兔私通了。

当时有人误传小白兔就是豫剧名演员常香玉，这是绝对错误的。当时常香玉正因受另一豫剧名演员的排挤，在西安不能演出，只得在渭南、宝鸡等外地巡回出演。1943 年回西安，常香玉又坚决拒绝蒋鼎文所安排的堂会，表现出坚贞不屈的女中英雄气概，因之私离剧班，和陈宪章结婚，密住西安骡马市一带。笔者当时受陈宪章之托，写了一篇特写，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呼吁常香玉的观众支援常香玉的自由结婚。常香玉作风正派，卸装后，藏青细布旗袍一身，不涂胭脂不打粉，寡言少语，和舞台上的红娘判若两人，绝非小白兔可比。小白兔究何人，因为她也是受害者，姑隐其名。

小白兔虽是蒋鼎文的干女儿，实是蒋鼎文的怀中物。蒋得知此事，竟不敢亲手处理，只得一个电话告知胡长官，胡长官也不便打掉唐副官，而是交给侍勤队刘队长看管。按当时情况，唐副官犯了这样大的罪过，蒋鼎文完全可以亲手枪毙之，胡宗南更可亲手枪毙之，而蒋、胡竟不敢下手，碍在戴笠的面上而已，所谓打狗看主人。事情到此并未完结。胡宗南为此，将前后情况电告戴笠，唐副官更不肯罢休，暗托刘队长以秘电告知戴笠，将蒋鼎文在西安利用权势、私玩名伶美女事，一揭无遗，甚至说"这是给委座脸上抹黑"。这逼得戴笠非上告委座不可。蒋介石得知，也以秘电形式，告知蒋鼎文，令其即日去重庆述职，就此免去蒋鼎文省主席职，另调高官。

蒋鼎文坐上飞机离开西安上空，胡宗南迫不及待地将唐副官放了出来，并升之为侍勤队队长。一个一级上将竟为此赔了"夫人"又丢官。

中将师长无端受辱

胡宗南手下有位中将副军长兼师长的官儿（姑隐其名，因为他也是个可怜虫，也未做过多大坏事）。这位师长信佛，虽不是常胜将军，也不是常败将军。胡宗南打败仗时，曾多次调这位将军上阵，每能转危为安。因此人们称他为"福将"。

这位"福将"常驻华县，每逢星期天必上少华山少华寺，主持岫云法师讲经念佛。把他的姨太太安排在西安西关外离大雁塔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的小别墅中，三五天回家一次，倒也过得惬意。唐副官这个色狼看中了他这位姨太太，一钓上了钩，但苦于三五天这"福将"要回家一次，难免被发现，于是心生一计，不是"调虎离山"，而是"囚虎坐山"，让这位"福将"就蹲在少华山上不回家。正当"福将"和岫云法师坐坛念经之际，唐副官出现在他俩面前。随手掏出事先写好的"圣旨"——胡长官手谕"×××师长，身为一师之长，在国难当头，敌军压境之际，竟念经打坐，疏忽整军，着禁闭三月。"

"福将"见此，乖乖地瘫了下来。

唐副官随即向岫云法师说：

"胡长官叫师长陪你念三个月经，为抗日殉难将士超度，不得告诉任何人，如有泄漏，军法是问。3 个月后，由我来接回，我派两名卫士在此看护，保卫师长安全，不得外出……"

就这样，师长以念经代禁，很感谢唐副官的"照顾"，唐副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一个月过去，胡宗南在华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席间

独不见这位“福将”，就问他的机要处长王微，唐副官忙插上说：“一定又去少华寺念经去了，我去接来。”

唐副官自开吉普车赶来少华寺说：

“胡长官提前放你回去开会，你心中有数，在会上要少言语。”“福将”听此，好不开心，如获大赦，真是感激不尽。到了华山会议上，向胡宗南行了一个军礼。胡宗南只含笑问道：“以后不能再念经了，免误军国大事。”“福将”轻轻答一声“是”就坐了下来，自以为真是唐副官为他帮了大忙，他那里知道这中间的机关巧合，把上将胡宗南、中将阿弥陀佛都蒙在鼓里。要不是唐副官在向西安有名的吉普女郎张慧慧自我吹嘘时吹了出来，笔者也无从知晓。须知张慧慧曾在笔者所在的报社当过广告员，这秘密中的秘密，到今日才得公之于世，不亦晚乎！

（彭古丁）

伪市长傅筱庵受惩记

1927年3月26日深夜，上海十六铺码头。昏暗的路灯光下，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挺直腰背，紧握“三八”大盖，如临大敌。“嘟嘟——”一辆米黄色轿车直驶到碇船上，嘎然刹住。车门开处，钻出一个略显臃肿的半老头，在他身后，紧跟着几个服饰华贵的男女，似是半老头的妻妾儿女。这一群人神色慌张地跨上了开往大连的日本邮船。

那个半老头是谁？十年后叛国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大汉奸傅筱庵。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他已是上海滩上集官僚、买办、金融巨子、商号老板于一身的显要人物。因他曾投靠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孙传芳，故北伐军到达上海后，总司令蒋介石发布命令，通缉傅筱庵。傅筱庵既怕又恨，却又无可奈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密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求援，带着家眷及金银细软，在日军保护下，趁夜登上日本邮船，北逃大连。

经傅筱庵多次托人疏通，至“九·一八”前夕，南京政府终于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一·二八”事变后，由大连南返上海，再度出任通商银行董事长。鉴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不敢轻举妄动，深居简出。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陷于敌手。良机已至，傅筱庵再也不甘蛰居，与日本政客、浪人公开来往，并与日军搭上了关系。又常邀集亲朋故旧来家中作客，其中大都是失意的绅商闻人，往往三杯黄汤落肚，便七嘴八舌咒骂起南京政府来了。他们都劝傅筱庵把握时机卷土重来，傅筱庵正中下怀，公然声称将不负众望，适时出山。

日军于占领上海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根据上司指令，着手特色伪市长的人选。傅宅的座上客中，有位名周文瑞的，与松井的翻译知交，两人合力向松井推荐，由傅筱庵充任市长。松井早已掌握傅筱庵其人其事，遂派人去傅宅接洽，傅筱庵假意客气一番后，半推半就答应了下来。伪维新政府于是颁令，委任他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汪精卫逃出重庆，经河内到上海后，谋组伪政权。蒋介石指示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潜来沪上，通过策划，由与傅筱庵私交甚密的开滦煤矿经理许天民，设法勾通傅，待汪精卫来上海时，设宴诱杀之。傅筱庵一面佯为允诺，一面向汪精卫告密，许天民等因此被捕。汪伪南京政府建立后，继续委任傅筱庵为伪上海市长。蒋介石对傅筱庵的举动极为震怒，命令戴笠迅速将其诛灭，戴笠不敢怠慢，向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达指令：用暗杀手段打击沪上汉奸，以伪市长傅筱庵为头号目标。

一天上午，傅筱庵在日军司令部议事完毕，返回江湾伪市政府。刚钻出汽车，砰然枪响，子弹“啾”的一声从他耳边擦过，吓得他魂飞魄散，撅着屁股拼命往车底下钻，连堂堂市长大人的体面都不要了。行刺者正要再打第二枪时，子弹卡壳，被当场抓住，原来是伪市政府的警卫士兵。

转眼到了1939年10月16日，这天是他任伪市长一周年。晚上8点，国际饭店灯火辉煌，应邀赴宴的客人纷纷入座。一阵掌声过后，傅筱庵致祝酒词，当他放大嗓门高喊“为东亚圣战胜利、为大日本天皇陛下健康长寿干杯”，来宾一齐起立，举杯在手趋声附和时，标着“厕所”字样的门帘里，伸出了一管乌黑的枪口。可惜在扣动枪机的一瞬间，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的闪烁，破坏了杀手的瞄准线，子弹稍稍偏高了一点，使傅贼再次逃脱一死。枪声过后，大厅里大呼小叫声、杯盘落地声、桌椅翻倒声连成一片，男宾女客你推我拉，互相践踏，拼命向门口涌出，各自逃命。刺客混入人流中，从容逸出。

是年冬天，傅筱庵的妻子朱氏因病不治身死。其后不久，他去戈登路寺院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官运亨通，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超度朱氏亡魂。

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傅筱庵跪在蒲团之上，两眼微闭，双手合一，轻声祷告。突然，一个小和尚手握杀猪刀，向他猛扑过去，举手就戳。保镖眼明手快，飞起一脚，刀被踢落。傅筱庵把佛堂当作刑堂，严加审讯，厉声骂道：“佛门弟子，应以慈悲为本，我与秃驴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和尚破口大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凡我同胞，谁不想食你之肉，寝你之皮？我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傅筱庵暴跳如雷，令将和尚活活打死。

出任伪市长未满二年，傅筱庵连遭三次暗杀，虽然侥幸未死，却成了惊弓之鸟，终日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夜间狂呼乱叫，恶梦不断。为了保命，他向日军司令部要了一辆防弹汽车又亲自物色了23名中外保镖，个个有一手好

枪法，精于擒拿格斗。日军司令部为了给他壮胆，特地调拨一小队士兵，常驻在他的宅邸虹口施高塔路26弄2号。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也派来了20余名特工，专门充当傅宅的警卫。傅宅内外明岗林立，暗哨密布，四周巡逻昼夜不绝。层层保护之下，傅筱庵的心稍微宽了一点。

军统设计　笼络仆人作内线

一日早晨，朱升买了小菜，仔细检点了一下所买的毛蚶、火腿、对虾、猪心、毛笋、豆腐，认定一样不缺，便跨上自行车，吹着口哨向施高塔路驶去。

忽然，从弄堂里走出三个穿香烟纱短衫，嘴角叼着香烟的汉子，勾肩搭背横穿马路。朱升一边打铃，一边刹车，嘴里还喊着"当心"，可是晚了，前车轮碰着了高个子。

"瘪三，眼睛生到头顶上去了？赔我的裤！"高个子用手在裤腿上一拂，果然裂开了寸把长的口子。

"先生，对不起，你说该多少钱？我赔。"辰光不早了，傅筱庵每天8点钟要吃早饭，朱升不敢耽搁，连连陪不是。

"阿拉迪是洋货，穿了一个礼拜，打8折拿80块钞票来。"高个子也斜了朱升一眼，把手伸了过去，"快，铜钿拿来！"

朱升一听这数目，明知对方要敲竹杠，压住火气陪着笑脸说："实在不好意思，今朝钞票没带足，身边只有25元，您先生就将就了吧。"说着知趣地抽出香烟递了过去。

"介便宜，侬倒开得出口，真是碰着赤佬！"高个子眼睛一瞪："不满八十块就勿要想走！"他一呶嘴："把这小菜留下来作抵押。"另两个不由分说，来抢菜篮子。

朱升心里发急，伸手去拦，脸上早挨了两记耳光，不由得怒火中烧，仗着有几分力气，将自行车往行道树上一靠，扑了过去。只可惜双拳难敌六手，刚一交锋，就被打翻在地，拳头脚尖纷落，痛得满地乱滚，呼爹喊娘号叫不止，引来众多行人围观。

正在这时，救星来了。一个身穿长衫的高大汉子拨开人丛挤了进来，面向高个子，双手抱拳为礼："区区小事，何必大动干戈？钱由我来付，请高抬贵手，放他去吧！"

高个子冷笑一声："哪里冒出来的杂种，多管闲事，当心吃生活，识相点，快走开！"

"有话好话，何必出口伤人？"大汉也不示弱，"你们三人打他一个，太欠情理，也不显得本事。"

"灰孙子阿是要自讨苦吃？"高个子近前一步，捋起袖子就要动武。

"俺山东人就是爱打抱不平。"话音未落、"咚"的一拳，高个子一个趔趄，仰天跌坐地上，大汉跃上前去，脚尖轻轻一点，痛得他抱着小肚子蜷缩成一团。其人出手之快，令人惊叹！

"上！"另两个异口同声，从左右两侧抢了过来。大汉也不躲避，待近身的一霎那，猛地往上一窜，分腿出拳，脚踢中两人小肚，拳击中两人面门，双手捂住眼鼻，连连后退。高个子见势不妙，正欲爬起来逃走，大汉一个"喜鹊登枝"，只一纵，左脚踏在他背上，右脚尖顶住他头颅，厉声喝道："还欺侮人不？说！不说老子就叫你红的白的一起淌！"

"爷叔饶命，兄弟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高个子苦苦哀求，刚才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滚！"大汉一声吆喝，三人如遇大赦，挣扎着爬起来，一溜烟狼狈而去，人群中爆发出一阵轰笑。

"快回家去吧，朱先生。"大汉俯身弯腰去扶朱升。

"你是……"朱升揉揉眼睛，"是陈老板！"他刚起身，复又跪倒尘埃，"多谢陈老板相救，不然俺就没命了"。

"自家兄弟，不必客气。"大汉把自行车交给他。

三个月前，傅筱庵宅邸斜对面百余步处，新开了一家酒菜馆，老板陈默，山东人氏。朱升性嗜酒，每晚服侍傅筱庵安寝后，必要来店中饮几杯，渐渐与陈老板混熟了。因为是同乡，话也好说，买卖也好做，朱升打四两，陈老板往往给半斤；一块一盘的白斩鸡，他只需付半块。好几次朱升酒完菜尽时，陈老板笑眯眯地托着酒菜过来了，挨着朱升坐下："来，俺兄弟再喝一杯。"于是重整杯筷，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当晚8点敲过，朱升手拎礼盒来到酒店，向陈默道谢来了。寒暄几句后，陈默的妻子翠姑端上菜肴，摆好杯筷。三人谦让着入席后，朱升满斟一杯，双手捧与陈默："陈老板仗义救助，不胜感激，今日借花献佛，向陈老板敬一杯，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陈默站起来，躬身接过，一饮而尽："见义勇为，古有明训，更是俺山东好汉的秉性。亲不亲，家乡亲，尔今尔后，你我更应常来常往，互助共济。"

几杯落肚，话也多了，陈默自我介绍说："十年前离家漂泊来上海，在她父亲店里当伙计。"他望了翠姑一眼，接着说："后老人家因病去世，临终前让我俩结成了一对。两个月前搬来施高塔路，经营这小买卖，生意还算不错，每月有二三百块赚头，不知朱先生在何处营生。"

"在傅市长家里当佣人。"已往朱升为谨慎起见，加之不满傅筱庵为日本人做事，耻于为伪市长家佣人，故而从不提及。如今在恩人面前，他自然不再隐瞒而直言相告了。

陈默听了，肃然起敬："黄牛身上拔根毛，也比苍蝇脚粗，市长家里的当差，薪水一定大得勿得了，比我这小生意强多了。"他见朱升沉默不语，便挟了一块板鸭送了过去，"不过，傅筱庵为东洋鬼子做事，名声太坏，上海大人小孩都知道他是汉奸。朱先生身强体壮，哪处不能混饭

吃，偏要钻到这是非之地？”

“吃饱了老酒只管瞎嚼瞎话。”翠姑嗔怪地瞪了丈夫一眼，“好得朱先生不是外人，不然一句话叫你吃官司。”

“嫂子说哪里话来？陈老板救了俺的命，即使他是共产党，俺也不会去报告。”他端起酒杯重又放下，喟然长叹：“别人以为我薪水高，实际上只有22块。”

“只有22块？”陈默夫妻异口同声，口气中既惊奇，又不甚相信。朱升于是一五一十，将在大连被傅筱庵收留经过叙述一遍，末了问道：“陈老板是个生意人，看上去斯斯文文，想不到有非凡本事，三拳两脚，就把几个狗东西打得屁滚尿流，痛快痛快！不知陈老板这套功夫是祖传还是名师传授！俺也想学一点，以后再遇到这些狗东西时，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陈默微笑道：“不值一提。当年离家后，途中在一所寺庙里当过年把杂役，跟当家和尚学了几路拳脚。上海滩地痞流氓多，特别如我等这种外地人，最受他们的欺，学点防身本事，紧要时可派上用场。朱先生若有兴趣，有空时多来走走，一道练练。”

时针指向10点半，朱升起身告辞，送至门口时，陈默说：“下次来时，何不把嫂夫人带来认识认识。”

朱升凄然苦笑：“象俺这种人，流落异地，一无钞票，二无存身之处，哪个女人肯嫁给俺？看来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有个表妹，春上从苏北来上海寻生意，在碧螺春茶馆烧老虎灶，今年25岁，还没许配人家，字虽然识得不多，人倒长得蛮标致，朱先生如果有意，可以帮你们拉拉线。”翠姑以征询的口吻说。

“老婆是想要的，只是实在讨不起。”朱升两手一摊。

“先见见面再说，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只要两厢有意，别的事情都好办。”陈默说。

双日初八，朱升与翠姑的表妹阿凤见了面，真可谓一见钟情，两个月后，两人便结为夫妻。结婚的排场虽不算大，也耗费300多元。新房在南京路，是陈默垫钱买的一处亭子间，一套硬木家具也是陈默送的。婚后第二天，朱升夫妻双双去陈默店中，拜谢玉成之恩。当朱升把买亭子间的借据交给陈默时，陈默往煤炉里一掷，说：“钞票本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多了也是个累赘，我陈某重情义而轻钱财，谁要你还钱？再说与人方便是与己方便，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有难事时，还要请你帮忙呢。”

“这个自然，你们两位的恩德，俺朱升牢记在心，今后陈老板有什么事要俺出力时，即使上刀山，俺决不说半个‘不’字！”

乡亲加姻亲，从此以后，两对夫妻常来常往，兄弟姐妹相称，亲如一家。朱升夫妻收入不高，手头拮据，陈默屡屡慷慨资助，或送去实物，或送去现款，每使朱升感激不尽。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940年中秋节，是日黄昏以后，陈默提早打烊，与翠姑带着桂花佳酿，各式月饼及香肠、烧鸡、对虾等菜肴，前去南京路朱升家中，与朱升家人共度佳节。朱升感谢地说：“前天大哥就已给了30块钱过节，今日又买了许多东西，屡次让你们破费，实在过意不去。”

阿凤摆好酒菜月饼，招呼入座，四人各坐一边，与往常一样，边吃边谈。和已往不同的是，陈默不是侃侃而谈，谈笑风生，而是寡言少语，脸无表情，好几次答非所问。翠姑的话虽然多些，但也眉中锁若隐若现。

朱升是个乖巧的人，自然看在眼里，忍不住问道：“看大哥大嫂神情，好象有什么心事？”

陈默轻轻叹了口气，欲言又止。阿凤盯着翠姑追问：“出了什么事？快说呀？”翠姑低下了头，眼睛连眨，两颗泪珠从眼角渗出，顺着脸颊缓缓淌到嘴角，她急忙掏出手帕揩了揩，掩着脸说：“人命关天的事，说了也没有用。”说着抽泣起来。

朱升急了，直着嗓门道：“究竟是何事？大哥要是相信俺两个，就只管说，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即便代大哥去死，也没二话！”

经不住朱升夫妇催促再三，陈默把香烟屁股狠命一捻：“事到如今，就直说了吧！”他望了朱升一眼：“不瞒兄弟说，我本是国民政府的军统特工人员。”

他此言一出，朱升蓦地一惊，伸出的筷子缩了回来：“大哥是老蒋那边的人？”

陈默点点头：“不错，最近蒋委员长下达指令，要我们限期刺杀伪市长傅筱庵，假如完不成任务，按军统家规，不是送前线当炮灰，就是监禁终身。”

翠姑边哭边说：“真的到了这般地步，丢下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活得下去？倒不如早点死了的好。”

“阿姐，你别哭。”阿凤嘴里在劝，自己也忍不住汩汩泪下。她推了朱升一把：“你怎么老不开口？快给大哥阿姐想想办法呀！”

“大哥要俺帮什么忙？”许久沉默不语的朱升，终于冒出了一句。

听了这话，陈默那颗吊着的心稍稍松驰，看来有一线希望！他压低了声音，吐词却很清晰地说：“兄弟愿不愿帮我把傅筱庵杀了。”

“要俺杀傅筱庵？”朱升抬了抬眼皮，重又低下了头。

“是的，由兄弟直接刺杀他，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杀手，可随时随地伺机下手，既有成功的把握，又不致泄漏机密。”陈默望着朱升，紧张地等待他如何回答。

朱升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坐在椅子里，如泥塑木雕一般，上下两排牙齿在“咯咯”地锉动着。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考。

小屋内的空气沉闷到了极点。四个人谁也不说话，进

退成败就在此刻？陈默决计作孤注一掷。他站起身来，拍拍朱升的肩膀："兄弟一向爽快，事到如今倒拿不定主意了？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件事关系重大，弄不好要家破人亡，确实使你为难。"他观察了一下朱升脸色，接下去说："论私，你我同乡加亲戚，胜似同胞手足；论公，你是为汉奸头目做事，我是为抗日救国效力，各为其主。傅筱庵搭救收留了你，你感谢他，报答他，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不想过多为难你。你若愿意帮这个忙，事成之后，一起去重庆，成为抗日英雄，名垂青史。你若不愿杀他，就请把我绑去邀功请赏，等待你的自然是升官发财。"

"要死，就死在一起，兄弟把我也绑了去吧。"翠姑吊在陈默臂上，带着哭音说。

"你这个没良心的，真的要把大哥阿姐绑去请赏？"阿凤推着朱升，她猛地转身扑到床上，"你若真的这样，就和你一刀两断。"说着呜呜咽咽痛哭起来，好不伤心。

"哭什么！"朱升一拍桌子，抓过酒瓶，"咕噜咕噜"把小半瓶桂花酒喝了个精光，将空瓶往桌上重重一搁："大哥大嫂，俺朱升决不是那号甘心为汉奸卖命的孬种！俺是个中国人，早先在日本人厂里当童工时吃足了苦头，俺也恨小日本，也曾劝过傅筱庵别当伪市长。再说，俺受了大哥大嫂许多恩惠，总不能见利忘义，恩将仇报，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一言为定，决无反悔！"

陈默暗自高兴，复又坐下说："总部戴局长已有指示，得手之后，赏5万元，需要人帮忙吗？"

"人多了反倒不好办，象傅筱庵这号老半死的人，俺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朱升满有把握地说。

"祝兄弟马到成功！"陈默满斟一杯，递了过去，朱升接过来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陈默向陈恭澍报告策反朱升成功，并就刺傅成功后，如何接应朱升夫妻离沪作了具体安排。

陈默是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的分队长，与朱升同乡不假。至于开设酒菜馆、朱升挨打、马路救助以及做媒赠款等，都是军统定下的计策，只是瞒着朱升罢了。

祸生肘腋　伪市长被刺授首

1940年10月10日，这本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庆节，汪伪政权为欺蒙国人，也把这一天作为国庆节。朱升得悉傅筱庵要在国庆节之夜举行招待宴会，必半醉而归，于是决定当晚行刺，并通知了陈默。

双十节之夜，傅筱庵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驻沪上军政头目，伪市政府官员亦应邀赴宴。前不久，傅筱庵接到日本政府邀请，要他东渡日本参加东亚大都市联盟会。主子赏识，喜不自胜，与来宾频频碰杯。

朱升仰卧在床上，焦急而又不动声色地等待傅筱庵回来。按多年来的习惯，不论傅筱庵什么时候回家，他都得等着，直至服侍其上床后，才能去歇息。今天晚饭毕，朱升取出磨得锋利无比的大号剔骨菜刀，放在刀架上，然后去门房间与警卫乱吹了一通，至9点半回到卧室，往床上一抑，双手垫在后脑勺，竖起耳朵听着。

夜深人静，合宅男女老少都已进入了梦乡，仍不见傅筱庵回来。朱升心神不宁，暗暗担心：陈默莫非不是军统，而是李士群手下的人，故意装成军统试探我？傅筱庵一向重视养身之道，平时即使遇重大事，就寝时间也不过十一点，莫非他已得悉风声？不然为何迟迟不归？想到这里，不禁心头"呯呯"，忙关灭电灯，摸了摸藏在内衣里的手枪。这是陈默昨天给他以应付紧急情况的。

"嘟嘟嘟——"正当朱升胡思乱想时，大门方向传来了熟悉的汽车喇叭声。朱升一跃而起，蹑手蹑脚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望去，见两扇铁门洞开，傅筱庵坐着黑色防弹轿车缓缓驶入，停在院中，朱升急忙开门迎了上去。

原来今天晚上，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因故未参加宴会。李士群手下的密探、杀手遍布上海滩，一则对付共产党、军统，二来对不顺他眼的自己人也是要"吃"的，莫说傅筱庵，就是日本人也难以驾驭他。正因为此，傅筱庵对李士群竭尽巴结之能事，今晚散席后，他特地驱车特工总部，向李士群馈赠了一份厚礼，算是对他未来赴宴的补偿。闲话一阵后回到宅邸时，已近半夜12点半了。

"老爷回来了。"朱升见傅筱庵步履踉跄，便将他的一只手臂搭在自己肩上，搂着他那粗壮臃肿的腰部，用足力气，一步一挨进了卧房，扶坐在太师椅里。

傅筱庵两眼通红，面孔肿涨得象隔了夜的猪肝，连连打着饱嗝，想要说话，一股酸气直冲脑门，呛得咳嗽不止，只是用手指了指床铺。朱升知道他意思，又吃力地把他扶到床上，傅筱庵乘势往枕上一倒，任朱升为他脱去鞋子，盖上被头，如死猪般一动不动。

朱升连喊了两声"老爷"，回答他的是如雷鼾声。便拉上窗帘，虚掩房门，去厨房刀架上取下剔骨菜刀，撩起上衣，收紧小腹，插入腰带，拎起两只热水瓶，慢悠悠回到傅筱庵房里。关紧房门，抽刀在手，轻轻挨步床前，暗暗道："俺为你辛苦了10多年，也算对得住你了，只怪你出卖良心，认敌作父，冤有头，债有主，去找蒋介石算帐吧。"他猛吸了一口气，用足力气，对准傅筱庵颈下用力一刀，立时污血喷溅。傅筱庵两手乱舞，双脚乱蹬，张嘴要喊，怎奈喉管已断，发不出声来。朱升又连砍几刀，谅已活不成了，拉过被子，将他的头蒙住，熄灯关门而出。回到自己卧室，换去血衣，洗脸洗手毕，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噹、噹、噹、噹"，时钟敲了四下，朱升披衣出房，"啊"的一声伸了个懒腰，去廊下推过自行车，将竹篮往车把上一挂，从容而出。快至门岗时，故意咳嗽两声，警卫正在坐困，蓦然惊醒，见是朱升，打着哈欠道："朱师傅早。朱

升停住脚步，摸出两支“哈德门”，递过去一支，警卫一边道谢，一边取出火柴。朱升凑过去点燃了烟，说了声“回头见。”跨着自行车，脚下一用力，打着铃飞驶而去……

“辰光勿早了，老爷还没起床？”张氏昨晚解手后朦胧睡去时，似听得傅筱庵房中有响声，因知丈夫常有梦呓，不曾介意。如今已是日高三丈，时过九点，仍不见丈夫起床，心生疑窦，便走到门前连叫几声，屏息静听，毫无声息。急得敲起门来，先是“笃笃笃”，后是“嘭嘭嘭”依然没有反应，吃惊不小，喊人撬门入室。

“老爷该起床了。”张氏见丈夫蒙头而睡，下半身露在外边，忙伸手掀去被子。这一掀不得了，吓得她尖叫一声，往后便倒，人事不省。众人不知出了什么事，跑进去一看，但见傅筱庵身首异处，血已成了粥样，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

常驻傅宅的日军一面向上司报告，一面关闭大门，逐个查询，内中独缺朱升，放出摩托去南京路他家中搜寻，哪有踪影？除了些搬不动的硬木家具外，细软值钱之物荡然无存，于是确信凶手正是朱升。日本海军陆战队及汪伪特工一齐出动，在虹口地区实行紧急戒严，盘查过往行人车辆；又令沪杭、沪宁两线火车停开，不许杨树浦沿岸船只离岸。霎时间，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警车呼啸，兵丁穿梭。

10月12日，“祸生肘腋，傅筱庵被刺身亡”的新闻见诸报端。上海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悬赏5万元缉拿凶手朱升的通告，大搜捕也在继续进行。然而始终未见真凶归案的消息。

（陆茂清）

陈树人因同名被扣

川黔公路出重庆第一大关卡为“三公里检查所”。此处是通往西南、东南各省要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在此特设“检查所”，上校级军官任所长。

1940年春，交通部湖南电政管理局局长陈树人在渝公毕乘小汽车返湘。途经“检查所”，有两名手执红绿旗武装士兵拦住检查。他从小汽车内递出名片（上面没有官衔），不一会，陈树人被请进所长办公室。有一上尉衔军官接待，问：“你贵姓？”答：“我叫陈树人。”上尉瞄了陈一眼，就把“讲义夹”打开查看。抬头又问：“先生是……”陈树人加重语气答道：“我是湖南电政管理局局长，来重庆开会，公毕返湖南……”上尉犹疑不决，后向陈递一张白纸，说：“写下你的名字。”上尉看了陈所书姓名，即吩咐客人：“请陈先生到‘会客室’坐坐。”士兵紧跟，送陈树人进另一间空屋，门外还站一名武装士兵。陈树人意识到已被扣留了。

外出的检查所长，得悉所内扣押一名外逃“要犯”，赶回提讯：“你叫？”答：“陈树人。”所长慢条斯理：“请你再说一遍。”上校和上尉动作一样，问一句翻一下夹子。半晌，又迸出一句：“你写的名字，有错没？”“没错。陈，耳东。树木之树。人嘛，一撇一捺。”陈树人提高嗓门一字一句答。上校和上尉交换了一下眼色，上尉退出。上校正准备往下问，勤务兵在门外喊：“报告，局里（军统局）电话，请所长接。”所长接完电话，还没进门，只听他边走边说：“这简直是……”他跨进门满面堆笑说：“是一场误会。对不起，是我们……”陈树人摸不着头脑，反问：“所长先生，我究竟为……”上校一面摸出香烟并为陈点火，一面解释说：“自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后，汪系上层人物除随其出逃外，在渝关联人物行动上受到监视，陪都形成外松内紧严峻情势。军委会开列名单行文各空、陆、水、站所等严密检查，以防外逃。”稍停，语带歉疚：“先生名字，与行文中一个人名相同，闹出一场同名误会。”原来陈被扣时，司机急用电话向交通部报告，才得迅解这场误会。

陈树人因同名被扣，哭笑不得。据说，他后来将“人”改为“仁”。1948年，在代理电信总局长任内，曾见他用“陈树仁”这个名字。

（王正元）

流行风

电影《东亚之光》

《东亚之光》——根据同名舞台剧改编，罗及之摄影，由30名觉悟了的日本战俘参加演出，中国演员郑君里、张瑞芳、王珏、虞静子、杨薇也参加了演出。完成于1940年，影片表现了被俘日军士兵的遭遇和觉醒。主要情节是：在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里，一群觉悟了的战俘在排演话剧《东亚之光》，记者来现场采访，战俘高桥三郎沉痛地回顾了他参加侵华战争和被俘始末。随着他的讲述，影片展现的画面：两年前他被征入伍，到中国后不久，他们被抗日游击队俘虏，送到后方收容所，中国宽大俘虏的政策，深深感动了他们，高桥等人先后转变，只有山本大

尉执迷不悟。后来，当一名重伤战俘中村在临死时请他转告其家人"千人针并不灵验"时，山本才受到了震动，感到了羞愧。接着，日本战俘参加了妇女工作队征募寒衣的公演。在演出时，舞台上母女俩的戏勾起山本想到自己妻离子散的情景，思想终于转变了过来。影片结尾是，觉悟了的战俘到前线参加反战宣传，有的还为之牺牲了性命。影片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从而表达了中日人民共同反战的愿望。

电影《白云故乡》

《白云故乡》——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抗战影片。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卢敦、凤子、江村、黎灼灼主演。它写知识青年林怀冰，摆脱女特务的引诱和威胁，并在参加抗战同学的影响下，觉悟过来，投身抗战，最后回内地参加敢死队，炸毁敌人军火库而阵亡。该片由重庆的"中制"最后完成，1940年3月上映。

电影《孔夫子》

《孔夫子》——民华公司出品。唐槐秋、张翼、司马英才、裴冲、陈琦、屠光启、慕容婉儿、李景波主演。费穆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和爱国主义思想，他能从时代出发把握历史人物，挖掘表现题材。在影片里他扬弃了孔夫子的"天"(命运)观念、"愚民政策"、旧伦理观念以及封建迷信观念，而积极地发掘了孔子"德育精神"以及"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强调了"勇者不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的浩然正气和对乱臣贼子的严正警告。如颜回听到孔子唱"诛尽奸乱兮逐豺狼"的歌时，把射死汲水门徒的箭，折成两截，有发人深省的意味。可以说作者对孔子的认识是发展的，辩证的，对孔子的理解是正确的、进步的；缺点是没有指出诸侯之争的社会根源。

电影《乱世风光》

《乱世风光》——吴仞之导演，石挥、英子、韩非、于素莲、张伐、史原主演。影片描写抗战中失散的一对夫妻，各自来到上海租界，丈夫遇到贵妇，成为一名投机市场的银行经理；妻子和女儿则过着贫困的生活。为给女儿治病，妻子被迫出来"交际"，并在"交际"场合夫妻意外重逢。女儿误解母亲的行为，愤然离家去内地参加抗战。妻子悲愤之下投江自尽，丈夫因投机失败而成疯子。影片反映出"孤岛"上海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发国难财的奸商在交易所中兴风作浪，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方面是物价上涨下贫苦市民生活难以维持。对比鲜明，生活真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小说《秋》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着力描写高公馆的溃败衰亡中的种种景象。淑英的出走对克明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又见到幼子觉英的堕落，加上克安、克定声明要出卖高公馆房产，不久气愤致死。克安在外私置公馆，迷恋旦角；克定自纳妾后又偷卖祖宗遗产。克明死后，克安兄弟终于变卖了高公馆。至此，高家彻底土崩瓦解。书中还描绘淑华、觉民与陈姨太的冲突，觉民等人建立均社的活动，淑贞因包办婚姻而自尽，枚在婚后病死，淑华向家庭反抗等等。处于高家上下漩涡中心的觉新，目睹新与旧的冲突嬗变，经受了一系列的痛苦与折磨，最后在搬出老宅后，娶了丫头翠环为妻，在给觉慧信中他表示自己上进心未泯灭。小说以"秋"为题，寓意高家已是叶落枝枯，行将死亡；又暗示"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新的一代仍有生机。

小说《科尔沁草原》

作者端木蕻良，主要内容：

以"九·一八"前十年东北农村为题材，反映封建地主的没落和农民的反抗。关东草原上的首富丁四爷和他的三个少爷，欺压佃农，奸淫农妇，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丁府的魔掌笼罩着科尔沁旗草原。后丁府遭到佃户大山等群众的反抗和土匪的绑票，逐渐没落。小说还描写知识分子丁宁由于不满腐朽的封建家庭，在苦闷中接受了托尔斯泰《复活》中回归自然的思想，企图寻求精神解脱，但丁府的罪恶，家庭的动乱，现实的黑暗，使他精神陷入了疯狂。在狂乱中淫乱了丫头，使她怀孕而自杀，重演了《复活》中玛丝洛娃的悲剧。结尾写"九·一八"事变爆发，由大山率领的义勇军攻入县城，号召人们揭竿而起，奋起抗日。科尔沁旗草原终于爆发了怒吼。作品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广阔历史画面，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揭露得比较深刻，写丁宁的思想矛盾相当精细，但大山的形象写得不够鲜明。

歌曲《祖国之恋》

天苍苍，海茫茫，
在遥遥的彼岸，那白云深处；
烽烟急，血火流光；
不止是你我的故乡，
千百万侨胞热爱的宗邦？
爱与恨拔出了剑，
铁和钢在交响；
这斗争岂容有一个站在于彼岸！
是爱她的岂能不为她奔驰战场。
去拿起枪，拯救它脱出敌人的魔掌；
去献出力量，争回那祖国不朽的荣光！
要看她站起来，欢展世界最美丽的旗帜，
迎风飘荡。
从昆仑到鸭绿；从中原直到边疆，
遍中华圣土，红旗招展。

诗《憎恨》

不问群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着繁星开了，
不问月光是怎样敲着我的窗，
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
好久好久，
这日子
没有诗。
不是没有诗呵，
是诗人的竖琴
被谁敲碎在桥边，
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杀死那些专门虐待着青色谷粒的蝗虫吧，
没有晚祷！
愈不流泪的，
愈不需要十字架；
血流得愈多，
颜色愈是深沉的。
不是要写诗，
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

（绿原）

诗《山！山！》

山！山！
一眼望不到边，
象大海的波涛，
起伏，连绵。
山连山，
山套山，
翻过一架山，
又是一架山……
插箭岭，
倒马关，
九曲连环鸟迷路，
七十二盘鬼破胆。
我们象
大海的鱼儿，
自由自在
浪涛里钻。
登高一呼，
万山响应，
草木听命，
山随人意转。
任凭你
撒下天罗地网，
日本鬼子！
管叫你网破船翻。

（方冰）

历史档案

十五个中央局建立的时间及名称演变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先后在西北、华北、华中、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地区建立了十几个中央局，其中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东北局、中南局、西南局到建国后的1954年下半年先后结束工作。现对部分中央局的名称及建立、结束工作时间作些简单介绍。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　1940年9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

并，建立西北局，边区中央局即结束工作。

西北局 1941年5月13日建立。1954年10月15日停止与各省市委之间行文，12月10日正式撤销。西北局自建立到结束工作，有三种全称。1.1941年5月13日——1943年3月3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中央局"、"西北局"、"中共西北中央局"。2.1943年3月20日——1950年3月31日，全称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简称"西北局"、"中央西北局"。3.1950年3月29日西北局办公厅通知自4月1日起启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北局"新印章，同时西北局在行文中用的落款为"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局"。

北方局 其建立时间在1937年7月8日以前，根据现有的档案还不能确定其建立的具体时间。1945年8月20日结束工作。北方局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简称"中共北方局"、"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北局"。

晋察冀中央局 前身为1938年11月9日建立的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分局的全称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简称"北分局"、"晋察冀分局"、"中共北方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中共晋察冀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1945年8月20日北方局撤销，晋察冀分局改称为"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

晋冀鲁豫中央局 1945年8月20日建立，1948年5月20日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冀鲁豫中央局的全称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简称"晋冀鲁豫中央局"、"邯郸中央局"。

华北局 1948年5月9日中央指示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正式成立。1954年8月7日停止接收所属省市委的文件电报，停止办公，结束工作。华北局从建立到结束工作，全称有三种。1.1948年5月20日——1950年1月25日，全称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简称"华北局"。2.1950年2月1日——3月31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简称"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局"。3.1950年4月1日——1954年8月7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北局"，简称"华北局"。

中原局 1938年9月——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原局。1938年11月9日，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成立。1941年5月20日中原局与华中局正式合并。中原局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原局"，简称"中原局"。

华中局 1941年4月27日华中局召[illegible]次会议，会上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决定，宣布了华中局委员名单及所辖工作地区；讨论决定了华中局委员分工、华中局名称、华中局正式建立后设秘书处及负责人选等问题。1941年5月4日，中央书记处电示华中局："一、同意中原局改用华中局名义。二、同意华中局委员分工。三、军分委以刘少奇为书记"。1945年12月18日华中局结束工作。从现存的华中局档案判定，华中局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中局"，简称"华中局"。

华东局 1945年12月18日中央给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的电报中，批准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舒同五人为华东局常委，并指示即开始执行常委职务，华东局即建立。1946年1月1日华东局通知所属各区党委，华东中央局已成立。1954年11月15日华东局停止对外办公，结束工作。华东局全称有三种。1.1945年12月18日——1949年7月12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华东中央局"，简称"中共华东中央局"、"中共华东局"、"华东中央局。2.1949年7月13日——1950年11月6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简称"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局"。3.1950年11月7日——1954年11月15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东局"，简称"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局"。

东北局 1945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建立东北局，9月15日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区党委，中央东北局已成立。1954年11月15日东北局结束工作。东北局从建立到结束工作全称有二种。1.1945年9月下旬以后东北局行文中使用的落款为"东北局"，1946年下半年始在行文中使用"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的印章。2.1947年6月6日——1954年11月15日，东北局行文中使用的印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北局"，落款用"东北局"，"中共中央东北局。"

鄂豫皖中央局 1945年8月12日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9月25日鄂豫皖中央局正式成立。1945年10月30日中央决定鄂豫皖中央局改称为中原局。鄂豫皖中央局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鄂豫皖中央局"，简称"鄂豫皖中央局"。

中原局 1945年10月30日建立。1945年10月30日——1949年3月16日，这一时期中原局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简称"中原中央局"、"中原局"。1949年3月17日——1949年5月30日，中原局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原局"，简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局"。

华中局 1949年5月31日建立，1950年1月1日改称中南局。1949年5月31日——12月30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中局"，简称"华中局"。

中南局 1950年1月1日建立，1954年11月15日结束工作。1950年1月1日——3月31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简称"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局"。1950年4月1日——1954年11月15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南局"，简称"中共中央中南局"，"中

南局”。

西南局 1949 年 7 月 17 日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11 月 25 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委员名单及其分工。1954 年 11 月 1 日西南局停止办公，结束工作。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南局”，简称“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

时代的灯塔
——建党以来党中央创办的机关报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重视报刊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创办机关报刊，宣传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

《新青年》 1920 年 8 月，陈独秀、李达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后，把《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作思想准备。1923 年 6 月 15 日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瞿秋白担任主编。1925 年 4 月又成为月刊。1926 年 7 月停刊。

《共产党》 1920 年 11 月，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以在全国建党做理论思想准备。根据建党需要，着重宣传共产党的知识，介绍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的材料、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第一次在中国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旗帜，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指出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1921 年 7 月共产党成立后停刊，完成了历史使命。

《向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1922 年 9 月 13 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为主编。它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批判各种错误主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27 年 7 月 18 日停刊，共出版 201 期。

《热血时报》 1925 年 5 月 31 日，五卅运动高潮时，中共中央决定出版的第一张机关日报。瞿秋白任主编。6 月 4 日创刊，报纸包括社论、专论、国内外紧要新闻、汇志等，还辟有《外人铁蹄下的中国》、《外人铁蹄下之上海》等。重视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和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道义、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批评对帝国主义实行退让妥协的谬论。富有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是真正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战斗者的，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战斗号角。6 月 27 日被封禁。

《布尔塞维克》 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第一卷到 1928 年 9 月为周刊，第二卷（1928 年 11 月至 1929 年 12 月）为半月刊，三、四、五期（1930 年 1 月至 1932 年 7 月）为月刊。出版第五卷第一期后停刊，共出版 53 期。辟有社论、国内政治、外交问题、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国革命问题、党内问题、理论问题、经济与财政、妇女等栏目，多是理论性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宣传我党“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方针、政策。由于在国统区，封面多以“中央半月刊”、“中国文化史”等书名伪装。

《红旗》 1928 年 11 月 24 日，党中央创办的机关刊物，由中央宣传部主编。第 1 至 22 期为周刊，以后每周两次。辟有社论、国内消息、国际消息、短斧头（政治讽刺小品）等栏目，多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的报告、决议、宣言等，各省委给中央的信，也报导各地工农群众与敌人斗争和红军的发展情况。1930 年 8 月 14 日停刊，共出版 125 期。

《红旗时报》 1930 年 8 月 15 日，党中央把《红旗》与《上海报》合并之后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辟有社论、专载、专论、莫斯科通讯、各地通讯、根据地来信，欧洲通讯、国际消息、红旗俱乐部、短斧头、小说等栏目，用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篇幅出版。它是在第二、三次左倾统治时出版的，曾反映了“左”倾错误论点，但也指导人民同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931 年 3 月 8 日停刊，共出 182 期。

《红色中华》 这是第一次在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根据地创办的报纸，1931 年 12 月 11 月在赣南瑞金的叶坪创刊。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从 1933 年 2 月 10 日第 50 期开始改为中央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机关报。因为临时中央已搬入苏区，原机关报停刊，它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通常以四开版面出四至八版，最少两版，最多十版。第 1 至 49 期为周刊，第 50 至 147 期为 3 日刊，从 148 期起改为双日刊。辟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长征前在瑞金出版了 240 期，长征时停刊，到陕北后又出版 84 期，共出版 324 期。《红色中华》报在第三次“左”倾统治时传播过不少“左”的错误主张，但在帮助党建设苏区和组织当时的革命战争，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各种罪行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等方面曾起了重大的作用。

《新中华报》 为适应统一战线形成后的新情况，1937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把《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1939 年 2 月 7 日正式成为中央机关报以四版小型 3 日刊发行。1941 年 5 月 15 日停刊共出版 230 期。在抗战

前夜，进一步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方面，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解放周刊》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辟有时事评论、论著、理论研究、文艺、捷报、特辑、各地通讯、翻译、来信等。以时事评论为主，着重报道中国共产党对时事的想法和看法。16开本，每期24页以上。1941年8月31日停刊，共出版134期。

《共产党人》 193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又创办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月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它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辟有论著、转载、支部通讯、乡村通讯、学习通讯等栏目。大篇幅刊载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及有关理论问题、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问题的论文。32开本，每期70页以上。1941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19期。

《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创办对开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1947年3月27日，由于战争的发展和党中央转移撤离延安，报纸停刊。共存在5年10个月11天，出版2130期。它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十分鲜明地向全国人民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各种主张，揭发国内外敌人的阴谋和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英勇的斗争，被誉为党在这一时期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强大助手。

《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出版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请毛泽东题写新报头。1949年3月迁到北京，8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出版至今。她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红旗》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机关刊物《红旗》，毛泽东题写刊名。1988年6月底停刊，共出版544期。

《求是》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停办《红旗》，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力全党性理论刊物《求是》。1988年7月创刊，为半月刊。它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验，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求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地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怎么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陈公博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

自从去年汪先生发表艳电主张，到现在整整一年，中日和平运动慢慢展开，而我则日夕不息的在那里想，如何才可结束中日的战事，如何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因为这不单纯是原则问题，而要到提出具体办法的时候了。

实在说，在芦沟桥事变以前，我虽然没有主张过战，我却没有主张过和，因为我总觉得中日之间，横着有不可解的怨恨，而两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敌意，这种怨恨和敌意一天不能消除，暂时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来的危机，因此我曾费了很长的时日，去探讨怨恨的来源和敌意的症结。

我很觉得奇怪，日本人和欧美人对于中国同是一个外国人，但一个中国人碰到一个日本人，他比碰到一个欧美人容易了解容易作朋友；尤其在欧美地方，一个中国人碰到一个日本人，他格外容易了解，格外容易作朋友。可是我更觉得奇怪，这个中国人和日本人一分手之后，便在背后，互相敌对，互相蔑视。

我不知自己对不对，我以为这种敌对和蔑视，实在基于内心的嫉妒。在中国这一方面，以为中日好象兄弟一样，在日本没有维新之前，中日的命运也正相同。可是日本强了：中东之役，中国是失败了，日俄之战，日本又战胜了：不但如此，日本且模仿欧洲帝国主义的方式和办法向中国侵略和压迫了。好象两兄弟，以前同受惨苦的命运，现在一个是强了，一个是弱了，这个强的不但不援助弱的兄弟，而且加紧和外人向这个弱的兄弟压迫，这个弱的兄弟怨恨强的兄弟，自然比怨恨一般外人更深刻。不过日本之强，中国知道没有方法可以遏抑的，于是把怨恨都寄托于蔑视，以为日本虽然强，她的文化是由中国去的，中国既是日本文化的泉源，无论日本怎样强盛，我还是一个老大哥，我尽管强，我尽管瞧你不起。

至于日本方面在维新之后，国力未充，其势不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争雄，也只有向中国下手，以为中国老大了，腐化了，很有种"天与不取实受其殃"的神气。不过在内心一想，日本文化虽然不是全部来自中国，至少有若干文化是孕育于中国，于是她极力模仿欧美，极力想忘记她的兄弟国家，好象强的兄弟，以不认他的弱的兄弟为荣，以为一个强人有了弱的兄弟，是丧失他的身份和体面。不但要忘记他的兄弟，反而更压迫他的兄弟，以为这样才能

表示出他有资格和欧美齐观，而非和中国等量。

他们彼此都具有内心的嫉妒，不特不设法互相了解，而且故意的不求去了解，就是中国人方面的所谓"日本通"，而日本方面的所谓"中国通"，也都本着互相蔑视的心理，互相的侦察，而不试求相互的了解。"日本通"所得到日本的结论，就是"日本人不可靠"，而"中国通"所得到中国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容易欺负"凭着这种内心的嫉妒，已足打仗而有余，所以我常说，纵使没有芦沟桥事变，纵使没有九一八事变，中日两国始终要打一次大仗，非大家沦入血海不可。这种惨运似非凭少数有识之士在短促时间所能挽回，我无以名之，只有名之为历史上无可避免的悲运。

现在中日两国已战争了两年多了，双方同蒙重大牺牲，日本方面已经有根本的觉悟，知道以前的观察完全错误，从前以为中国可以不战而屈是错了，一战而可以使中国瓦解也错了。中国方面也有了根本的觉悟，以前以为相斗下去日本经济必定崩溃是错了，中日战争可以惹起日本的革命也错了。两方已经觉悟到，中国没有最后胜利的把握，而日本也不能灭亡中国。两方更同时感觉筋疲力尽，内心的嫉妒也在战争中彼此认识而消除，这时是中日两国弃嫌修好的时机，也是中日两国幡然缔结永久和平的机会。

但是中日怎样才能永久和平呢？我想了一年，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具体办法的问题。因为和平的原则，早在近卫首相的声明和汪先生的艳电主张之中确立，而所谓具体办法，实质言之，就是媾和的条件怎样才使中国依然保持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目前虽然和平运动正在扩展，所谓具体条件或者离决定的时机还远，但我不能不提出几点主张，希望双方加以注意。

第一，中国所要求的是独立自由，换言之，是国家主权和行政完整。我读过许多日本的杂志和朝野的言论，他们很了解中国的独立自由，不只于中国有利，于日本有利，而且于东亚更有利。但言论终是言论，而希望双方将来能够根据这个原则来讨论和平条件，凡任何事实足以妨害中国的独立自由的，应该下绝大的决心把它去消灭。

第二，中国所要求的是统一，凡含有分裂意味的行动和设置，都是违反中国的历史，违反中国的国情，违反中国的利益。我们也知道在战争之中，免不了为军事的便利，形成地方政权的临时设置，但是是一时的，或者是不得已的，倘在和平之后依然支持这些地方分裂，中国必不会安定，而会形成中国的长期变乱，结果中日得不到永久的和平，结果还是一个草草和议的暂局。因此我希望双方于讨论和平条件时，把一切"特殊化"的事实，一概删削。

第三，中国所要求的是立刻实现的事实。我曾见过日本有识之士的言论，都一致确认中国应该独立自由是最高原则，不成问题，然因军事发生的既成事实，在不得已之下，不妨暂令继续，以后使之逐渐改正，以期符合最高的原则。但是最近历史曾告诉我们，这种希望完全是理想，是很难实现的。我还记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为一般欧洲的现实政治家所阻挠，他对于既成事实都让步了，但有一点不肯让步，那就是国际联盟。他以为国际联盟一旦成立，凡尔赛条约总有一天得到合理修正的机会，可是凡尔赛条约是签定了，国际联盟是成立了，二十年中凡尔赛条约未曾修改过一个字，终于引起这次欧洲再度的大战。我们鉴于已往，怵于将来，深不愿徒然定有空洞的原则，而继续许多既成事实。

第四，中国所要求的是日本信赖中国。日本有识之士曾三翻五次的说，中日和平是需要互相信赖的，这话确是对的。但我们固然不希望日本以战胜国自居，然而日本到底是军事胜利者。现在沿海是受到日本控制了，中国许多省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目前要中国信赖日本，倒不如日本先信赖中国。换一句话，日本应该大大方方的给予中国以最好的和平条件，不特昭示中国，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并且也无控制中国之心。这种事实俱在，互信必生，中日的百年大计，也可以立时大定。

中国具体的要求，本不是今天一纸短文所能详写的，末了我还希望日本应该了解这次中日和平，日本是和中华民国媾和，而不是单单和汪先生媾和。中国最需要是和平，汪先生才本着国民的需要和期望，不避艰难，不避牺牲来领导这个运动。日本所提的条件，中国国民能接受的，汪先生才能接受，中国国民不能接受的，汪先生也决不能接受，我希望两国人士本着悲天悯人之怀，商讨东亚的百年大计，而不希望两国人士本着外交形式，作讨价还价的和议。

中国四万万的人民正期待着合乎正义的和平条件，中日两国人士应该认识自己的责任，日本人应该替中国着想，中国人也应该替日本着想，同时两国更应该替东亚着想。若两方牵于现实，没有最高的理想作根据，我们不特不能解决这次中日事变，或者更种上了未来的无穷事变。

（选自《中华日报》1940年1月1日）

日汪密约与我国抗战前途

孔祥熙

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重庆中央纪念周报告

各位同志，今天奉命出席总理纪念周报告，原有意把

最近施政情形作一简括的报告，以就教于各位同志，惟自日汪密约被揭发后，举国痛愤，世界震骇，街谈巷议，已为社会上注意的焦点。本人感想所及，愿就此问题贡献几点意见，以供各位同志的参考。自高陶揭发日汪密约，汪精卫及逆党均张皇失措，纷纷诡辞交辩或谓高陶所发表的文件，是日本一部份人的希望，不是日本所提的条件。或谓日本虽曾提出此项要求，但已经一再修改，与最后所签字者不同。或谓高陶二人未得汪之信任，根本未参加此项协议。凡此诡辩，均属遁辞狡赖欺骗国人，想掩饰其卖国的罪恶，以达到他们建立傀儡政权的欲望。因为我们看日本此次代表人为影佐犬养健，与清水三人，即可知道此中的内幕。因影佐为日本少壮军人的中坚分子，在参谋本部负重要责任。其一切行动当然代表敌阀的意见。犬养健为已故首相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在日本政界甚为活跃。清水为日本大使馆重要职员，经办中日外交，历有年所，为日侵华工具。如谓此三人所提出的文件非日本政府之意见，虽三尺童子，亦不能相信，再就汪逆精卫与日本交换的文件来看，不但该项条件为日本政府所提出，且已获得汪精卫的承认，仅对于防共条件四五两条略有修改而已。至签字者是否为该项文件，及现时是否已经签字，在事实上并无何种差异。盖南京伪政权尚未成立，汪精卫既为未来傀儡组织的首脑。现在既已答应日本的要求，则签字仅属时间之迟早问题。将来所签者，恐较今日尤为严酷。如果另有和缓的条件，则汪又何必不公诸国人？至谓高陶二人未参与此项协议，尤属遁辞。须知高宗武助汪理外交已有多年，又为日汪关系之最初牵线者，且曾陪汪赴东京向日乞怜。陶为知名学者，向为汪所器重，对汪且有多年知遇之感。今因二人暴露其丑行，乃不得已而否认二人之地位，益足见其伎俩之恶劣。至于日本之所以玩弄汉奸，提出此项要求，亦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汪精卫自绝于党国，为举世所共弃，无论其签订何种条约，日本亦知毫无效力。徒以对华战事，深陷泥淖，已引起国内之焦燥不安，欲罢战撤兵，又恐示弱于我见轻于世，故拖出傀儡汉奸，悉举其心之所大欲者，逐一列举，迫其承认，以撑持其颜面而欺骗其国民。吾人于此，益知日本军阀，已陷于日暮途穷，不能自拔之境地矣。

日汪密约，是国际政治上空前未有的大阴谋，其内容的严酷。与措词的闪灿，较之田中奏议天羽职明，更有过之。于此知广田三原则，近卫声明，均系欺人之谈。其中之重要者，虽实现一条，即足以亡中国。汪精卫叛党卖国，为众所共弃，此种密约，无论在法律上或民意上，当然皆不发生丝毫效力。但日阀能将此类密约向汪提出，迫其签字，实不啻为其野心的总暴露。此种野心，若任其侥幸得逞，不但吾民族子孙世代，将永沦于奴隶的地位，各国在远东权益，将悉被侵夺。即世界和平，亦必大受威胁，人类从此永无安宁之一日。关于日汪签订伪约一事，总裁已有严正的表示，中外舆论，亦多正义的诛讨。本人所愿提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此事所给予我社会人心的影响，及其对我抗战前途的关系。高陶二人，久受国家的栽培，在社会上本有相当地位，徒以意志薄弱，对于抗战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遂竟变节附逆。及至参与敌伪密谋之余，懔于国家存亡，悬于一发之危机，受良心的责罚，于愧愤交迫下，乃悉举敌伪的丑恶诡谋，公诸于世，此种举动，姑无论其动机如何，要不失为良心未泯之表示，实予社会人心上一大震动。而敌阀对于汉奸的欺压凌辱，在国家未亡之前，已如此残酷，则其面目之狰狞，态度之凶蛮，可以想像而知。在此种情势之下，稍有天良者，必当知所憬悟，翻然改图，所以汪精卫的众叛亲离，乃为必然的结果，而敌阀之所以玩弄汉奸傀儡者，亦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至此事对于国际间的印象，亦必至为深刻。日汪密约中所表现的真实意义，就是日本要吞并东亚，称霸全球。其对欧美各国的具体态度，在政治上采绝对排斥英美势力政策，在经济上，企图独占中国资源与市场，而在军事上，则扼据我国一切陆海空军根据地，以威胁列强。其对苏联，则不但在思想上表现一种绝对嫉视的敌意，尤其在军略上政治上皆有甚大野心。该项日伪密约中，除胁迫汪逆承认伪“满洲国”及蒙疆驻兵而外，基于“防共需要”，日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中国的资源人力。换言之，日本不但在地理上获得包围西伯利亚的绝对优越地位，以为进攻苏联的准备，且妄思将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他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侵略亚欧大陆，而首当其冲者，就是苏联。合中日两国之力以进攻苏联，固非苏联之所能堪，故日汪密约在对苏政策上意义尤为重大。再就一般国际关系言，其主要目的，在毁弃一切国际公约，破坏集体安全制度。尤其与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的精神，绝对相反。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自海约翰倡导以来，不但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凡与太平洋有关各国，均相约毋违。惟日本则处心积虑，必欲根本破坏以实现其独霸远东政策而后已。其蔑弃公理损削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威信与利益，更为各国所不能容忍。上述日本的种种阴谋，在吾人固已洞若观火。但各国之中，尚有一部分人士，惑于日本的欺骗宣传，仍疑信参半，而冀其非真，今日汪密约的公布，全世界爱和平重正义之人士，当悚然憬悟日本军阀之凶悍，而谋所以急起制止之道。

吾人之对日抗战，不仅为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尤在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两年余来，吾全国军民，前仆后继，奋勇牺牲，而不稍返顾者，正为有此重大而神圣之使命。日阀倾百万大军，从事于侵略战争，到现在已将三载，不但军事上师老无功，其国内财政经济皆已呈整个崩溃现象，原料缺乏，人工缺乏，电力缺乏，米荒煤荒，一切生活品的价格，日益飞涨，风潮澎湃，政局险恶。乃于图穷匕

见之余，策动政治阴谋，希图掩饰其军事上的失败，而侥幸获致战果。吾人对此，惟有报之以坚强抗战，使日汪密约成为吾人抗战过程中一大兴奋剂，而益坚吾人必胜之信念。惟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由于汪精卫之叛国，吾人可得到一种教训。今日中国之大患，不仅为强邻侵略，尤在于汉奸卖国。故应一方严密内部组织，使奸邪无法匿迹，一方发动舆论力量，摘奸发伏，声罪致讨。内部健全之后，对外自能发挥效能，抗战胜利方有确切保障。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二辑）

日满华共同宣言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大日本帝国政府
满洲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原来的特质，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并以此为核心，对整个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发表宣言如下：

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其主权的领土。

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

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

昭和十五年年十一月三十日，即康德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南京签订。

〔署名略〕

（选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一月一日　华北《新华日报》出版一周年。销数达五万份，遍及华北六省，深入平津敌占区。

同日　晋察冀边区《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

同日　国民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通电就职。

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强调共产党的干部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时事政治等，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一月四日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新年聚会，希望美国停供日本军火。

一月五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洛甫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说，勉励文化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为工农兵服务。

一月六日　国民党政府禁止《新华日报》刊登《论冬季出击的胜利》和《起来扑灭汉奸》的社论，报纸开天窗。

一月八日　日本内阁批准制造汪伪政权的计划。

一月九日　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韶关演说，诬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十五日，朱德、彭德怀特电驳斥，并请其亲自来华北巡视。

一月十四日　日本米内光政组阁，其政策是：（一）保持日本对中国的支配；（二）实现为战备而实行的国民总动员；（三）以“国防外交相辅为用”，努力发展日本在南方的利益。

一月十六日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王君璋被阎锡山军杀害于山西临汾。

同日　汪精卫发出铣电，劝告重庆共同致力于“全国和平”。

一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

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召开第三届全体会员大会，选出理事，并成立新闻界宪政促进会。

同日　浙东国民党军队退出萧山。

一月二十三日　汉奸汪精卫与梁鸿志、王克敏等在青岛开会，二十六日结束，共商在南京建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日　包头、归绥日军于本日至二十九日向绥西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一度侵陷五原、临河、陕镇等河套地区，进窥银川。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决定增设农林部。

同日　日本重新封锁天津英租界。

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起草《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

局好转》的党内指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一月二十九日　美大使詹森自沪抵汉口。

一月三十日　国民党军石友三发动所部围攻驻在冀鲁边的八路军东进纵队一、六两大队。东进纵队两个营及两个连，以未加防范，遭到暗算。

一月三十一日　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反对汪精卫与日订立卖国密约。

二月一日　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声讨和抨击与汪派里应外合的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并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

同日　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续范亭为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内称："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

二月二日　晋西北召开边区行政会议，建立晋绥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下设晋西北、绥察（大青山）两行署、八个专区、一个察东游击区办事处、四十余个县政府，包括山西西北部及绥远东南部。全区面积三十三万一千平方里，人口三百二十二万余。

同日　日议员斋藤隆夫在议会提出质问"中国事变"之目的，遭到众院惩戒，开除议员资格。

二月三日　毛泽东、陈绍禹、林祖涵、吴玉章为"华北视察团"事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揭露国民党当局御用视察团前来"搜集"各省磨擦事件。

同日　绥远、五原失陷。

二月五日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

二月七日　山西新军二十二旅长孙定国率部于稷山举起抗日讨逆义旗。

同日　皖北国民党五区专员兼第十纵队司令李本一部约千余人配合皖北行署颜仁毅部千余人，向驻土桥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攻，被击退。

二月十二日　山东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徐向前、黎玉、张经武、朱瑞等六十余人为促进会执行委员。

同日　晋西北新旧军冲突，激战于临县附近。新军攻克县城，旧军南撤。

二月十三月　八路军晋豫支队奉命北调，于阳城附近，遭国民党军围击，损失两个连。

二月十五日　《中国文化》月刊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一年八月停刊。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转载，题为《新民主主义论》。

二月十六日　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日本傀儡组织签订解决沪西越界筑路区警权问题之临时协定。

二月十八日　国民党朱怀冰部九十七军进攻磁县西贾壁村八路军驻地，杀害指战员百数十人，抢去军用品计值两万七千余元。

二月十九日　八路军挺进军攻克平西门头沟。

二月二十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选吴玉章为理事长，并发表《延安宪政促进会宣言》。

二月二十二日　达赖十四世坐床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大殿举行，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主持。同年四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办事处。

同日　皖南日军进犯繁昌。

二月二十七日　聂荣臻、吕正操到达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

同日　上海永安纱厂工人三千余因要求提高待遇不遂，实行罢工。

三月一日　上海工部局与日本驻沪总领事为虹口警权问题签订协定。

三月五日　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三月六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

三月十一日　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在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斗争问题上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三月十二日　汉奸汪精卫发表《和平宣言》，要求"重庆方面抛弃成见，立即停战"。

三月十三日　日本首相米内发表谈话称：对中国新"中央政府"之成立，"日政府不惜全力支持之"。"昔日近卫首相所发表声明，提倡'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帝国政府继承此种声明，作为日本政府及中国'新中央政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具体方案"。

三月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电天水行营，要求在边区二十三县行使行政职权。

同日　成都《时事新刊》被查封，编辑米亚凡被杀害。

三月十五日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发表《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陈济棠为农林部长。

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

同日　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兼《新华日报》成都经理处主持人(分社社长)罗世文、中苏文协负责人车耀先等,在成都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囚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被同时杀害。

三月十九日　王明在延安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加了序言,第二次出版。

三月二十日　晋察冀边区政府令设冀中行署,任吕正操、徐达本为正副主任。

同日　汪精卫在南京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组成伪中央政府。汪发表所谓"还都宣言"。

三月二十三日　山东国民党军新四师抢夺八路军第一纵队部郝陵兵工厂。

三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任弼时、蔡畅、邓颖超等人从苏联返抵延安。

同日　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致电蒋介石等,请其制止进攻新四军。

三月二十九日　林森发表广播演说,斥责汪精卫的卖国罪恶。

同日　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兼"代国民政府主席",褚民宜为外交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陈群为内政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任援道为海军部长,赵正平为教育部长,李圣五为司法行政部长,梅思平为工商部长,林柏生为宣传部长,丁默为社会部长,傅式说为铁道部长,诸青莱为交通部长,赵毓松为农矿部长。

同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

本月　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同日　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在日冠配合下,由磁县、武安一带猛攻太行区,直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进犯。国民党第十集团军石友三也向冀南八路军进攻。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聂荣臻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率部三、四万分头南下,在太行、冀南区部队及广大群众支持下,痛击国民党反共军,一举歼灭朱怀冰三个师,石友三大部被击溃。这样在太行区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四月一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发表讨汪通电。

同日　日本任命阿部信行为驻南京汪伪政权的全权大使。

同日　国民党军石友三及专员丁树本配合日军进攻冀鲁豫边区八路军,进占东明。

四月六日　冀南大名、濮阳、清丰、南乐、东昌、长垣等六县人民以专员丁树本潜逃,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民选专员、县长。

四月十一日　日军一一四师团、二七师团、独立第八混成旅团三万七千多人,对冀中区进行分区扫荡。经过冀中军民历时五十天的苦战,将敌击溃。

四月十四日　晋察冀边区成立宪政促成会。

四月十五日　彭德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期开学典礼大会上作《民族危机加深与怎样争取时局好转》的报告,指出:要继续实行孙中山先生遗教,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四月十九日　邵力子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

四月二十日　山东日军二十一、三十二等师团、独立第十旅团及伪军共万余,"扫荡"抱犊固,继续至五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一日　山东国民党军进攻驻竹镇、井集、半壁寺等处之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部。双方激战五日之久,竹镇被国民党军抢劫一空。

五月一日　冀南行政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穷,抵达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

同日　宋庆龄在渝发表谈话,主张加强团结。

同日　豫南日军侵占明港。

五月二日　皖南新四军克复南陵。

五月三日　鲁西各界举行代表大会,决议成立行政主任公署,选萧华、董君义为正副主任。

同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缪微流为东北四省主席。

五月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要求在新四军活动的区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顾国民党阻挠,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武装。

同日　据《新华日报》载,解放社出版《马恩与马克思主义》一书。

同日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冀中区青年抗日救国会,晋东南青年救国总会,冀南青年救国总会,山东青年救国联合会等十个组织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磨擦。

五月五日　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并载文介绍马克思生平。

五月六日　苏北国民党韩德勤部攻击半塔新四军。

五月七日至八日　日军连陷确山等地。

五月九日　冀中交通战激烈展开,沧石路西段被彻

底破坏，久不能修复。

同日　日军进犯宣城。

五月十日　皖南新四军克复繁昌。

五月十一日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在皖南“清乡”，到处逮捕抗日群众、进步士绅和共产党员。

五月十三日　日本重光向友田报告谓：据国际情势来看，确立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是极迫切的问题。不首先解决中日纷争，日本将处于不利地位。他建议不惜任何牺牲，日本都必须与蒋介石获致妥协，或是直接进行，或是通过“汪政权”进行。

五月十四日　抗战救国教学团团长李公朴等到达八路军总部。

五月十八日　国民党军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地带及新正县。

五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军开进中部宜君一带，向陕甘宁边区鄜县店头八路军进攻，屠杀当地人民。

六月一日　山西牺盟会总会、山西省总工会、农救总会等组织由晋西北移抵晋东南黎城正式工作。

同日　日军占襄阳、樊城。

六月七日　冀察热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昌平、延庆、龙关、赤城、丰宁、密云等六县设立三个联合县政府。

同日　日军调集二万人对晋西北进行夏季大“扫荡”。经过五十八天，日军“扫荡”被粉碎。

六月八日　八路军挺进军一部进迫朝(阳)承(德)铁路。

同日　鄂中日军六万余人分三路西犯。

六月十日　鲁南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民选产生行政专员公署。

同日　冀东八路军粉碎日军万人“扫荡”。此役始于上月五日，今日结束。

六月十三日　伪满实行农村生活必需品配给制。

同日　宜昌沦陷。

六月十五日　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县区村暂行条例、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及暂行选举条例。

六月十六日　罗瑞卿就任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六月十七日　鲁中一一五师展开反“扫荡”战。

同日　文水、交城日军“扫荡”晋西北地区。

六月十九日　苏日成立划分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协定。

同日　英日对天津问题，达成协议，英国允准交出中国所存之白银，损害中国利益。

六月二十日　日本解除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

六月二十四日　沪法租界当局将徐家汇移交日本。

七月一日　刘少奇发表《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

同日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八日结束。决议设立妇女运动部、经济作战部。

七月二日　香港日本领事馆大量翻印天水行营之反共报告。

七月三日　汪精卫与阿部开始进行关于亡华条约之谈判。

七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剿共’的政策”。“必须实行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必须释放一切被捕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分子，必须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必须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必须废止有害的特务作风，必须改变不适时宜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与兵役政策，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面。”

七月七日　延安八路军总部公布：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创造了包括将近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共产党员也由战前的四万余人发展到八十万人。这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日军达四十万，占侵华日军六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了全部伪军。

同日　八路军总部颁布优待俘虏的命令。

同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婚姻条例(草案)。条例规定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严禁买卖婚姻、童养媳、蓄婢纳妾等内容。

同日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要求制止磨擦，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建国既定方针。

七月十日　黑龙江穆棱附近发生七点三级地震。

七月十二日　日海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

七月十八日　《新华日报》刊文介绍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一书。

七月二十二日　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签发的一项八路军指挥部关于《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的决定》上报军委批准，下发至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军区作为预备命令。

七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非常时期肃清汉奸、维持治安及保卫公共序秩为名，限制束缚人民的抗日民主斗争。

七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中央关于在敌后地区没收大汉奸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

本月　晋察冀边区至本月止，已辖有两个政治主任公署，九个专署，七十五个县政权。较之一九三八年一月边区政府成立时，人口增加了两千万，抗日的县政权增加了三十六个。成为有两千五百万人口、地跨五省分为三个区的华北最大的解放区。

八月一日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戎伍胜开始就职视事。

同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提出：日本外交政策的当前任务，就是以日、“满”、华为核心确立大东亚共荣锁链。

同日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大军围攻泰兴城东地区苏中新四军，被击退。

八月四日　晋西北八路军及当地人民展开了交通破击战，奋战八天破坏同蒲线大同至曲阳段及汾离公路全线。

同日　豫北沁阳日军挖溃沁河，沁阳一带尽成泽国。

八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对野战军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指示》。

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八月二十日　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同时出动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二十万民兵，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敌占主要交通线开始总破击。聂荣臻指挥四十六个团的兵力，以十五个团分三个纵队破坏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路；以二十五个团的兵力分路向北宁路、津浦路(德州以北)、沧石路、平古路、平大公路北段、平汉路(正定以北)实行正面破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四十个团、总部炮兵团、特务团和决死一、三纵队五个团参加战斗。以主力十五个团和炮兵团进攻由平定至榆次的正太路，以八个团的兵力对付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另以九个团兵力分头破坏石德路，平大路南段及邯济线，平遥至壶关段之白晋路，则由一二九师七个团及决死队五个团分头担任，另以两个团破坏临汾屯留公路。贺龙、关向应指挥一二〇师及决死队共二十二个团破击同蒲线，(大同至阳曲段)及汾离公路全线、置重点于阳曲南北。

八月二十四日　韩德勤以二十个团的兵力向姜堰、曲塘、海安等一带新四军猛攻。

八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自延安飞抵重庆，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办法，作为对国民党七月十六日所谓“中央提示案”的答复。

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公布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党委所提拟的《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

同日　日法签订《松冈亨利协定》。法国同意日军进驻越南北部。

本月　绥远蒙汉人民及各抗日团体在大青山根据地西梁村召开各界抗日团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绥察施政纲领》，决定成立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简称绥察行政办事处)，作为领导绥远地区抗日斗争的最高行政机关。

九月一日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在山西辽县成立，共辖九个分会。

同日　河南尉氏、太康、扶沟等县黄河新道决口成灾。

同日　张治中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主持，沈雁冰、阳翰生、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杜国庠、吕霞光、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均是委员。

九月四日　美国记者太平洋考察团抵渝。

同日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进攻驻营溪、姜堰之苏中新四军，未得逞。

八月六日　国民党政府全国粮食管理局公布四川省政府《管理川省粮食办法》，规定省、市、县设粮食管理部门，管理粮食的收售等事务。

九月十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中共五十万大军积极活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力量和希望。

九月二十日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这个阶段到十月初结束，作战的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的战果，继续破袭交通线，重点是歼灭敌人，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之敌伪据点，主要攻击目标是太行山之榆、辽地区；晋察冀之涞源、灵邱和任邱地区；晋西北同蒲铁路朔县至原平段。

九月二十日　日军向越南提出最后通谍。

九月二十二日　日寇与投降德冠的法国贝当政府达成协议，允日军在海防登陆。

下旬　国民党军为策应长沙会战，进攻宜川。

九月二十四日　沪公共租界公共汽车公司全体工人一千七百人实行罢工。

九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根据地各种建设及政策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　《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九月三十日　韩德勤调集一万五千余人向苏北新四军黄桥阵地进攻。

同日　天津英法租界当局将中国电话局移交日本。

十月四日　韩德勤部再次进攻新四军驻苏中泰兴县黄桥陈毅部，制造黄桥事件。陈毅率部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韩部主力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一千一百余人。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

同日　近卫发表谈话，阐明侵华政策，谓：解决中国事件，当然有各种手段，此次缔结德、意、日军事同盟之出发点，亦在于解决中国事件。

同日　日军发动“七月功势”，分四路在苏南、浙江一带出击，均未得逞。

十月六日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开始。日军以三万兵力进行报复性扫荡，华北根据地军民英勇反击，打退了敌

人进攻。百团大战于十二月五日结束。此次战役共进行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和俘虏及投诚的日伪军四万六千四百人，攻克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个，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

十月十日　新四军陈毅部与南下的黄克诚所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

十月十三日　晋察冀边区决定设立第十三、十四两专署，管辖平谷以西，北宁路以东地区。

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优待反共俘虏问题的指示》。

十月十九日　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议发出皓电，强令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十月二十四日　中共晋绥分局决定将大青山和雁北根据地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以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统一指挥塞北军事行动。

十月二十八日　日军退出南宁、龙州，为诱降钓饵。

十月三十日　日汪成立《中日邦交调整基本协定》。

十一月三日　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我对于抗战的透视》的演讲，指出，日冠大举撤兵系“和平攻势”，我应求进步坚持抗战到底。

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同日　晋西北军区成立典礼大会在兴县举行。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一二〇师领导机关兼晋西北领导机关，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任参谋长，军区下分六个军分区。

同日　延安举行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

十一月九日　朱、彭、叶、项电复何、白（即佳电）请对江南新四军北移宽以期限，江北部队暂不调；对八路军编制酌予扩编、并补充弹药器械；解放陕甘宁边区血案、制止对边区封锁；明示时局方针，裁抑反动，驳斥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

十一月十日　重庆《新蜀报》载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共计一千一百五十六名。

十一月十三日　广西钦县日军向龙门港撤退。

十一月十四日　国民党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作战，集中力量，迫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并限期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完成该计划。此计划于十二月七日经蒋介石批准下达执行。

同日　英国成立远东军总司令部，由空军上将普法姆任总司令，辖马来亚、缅甸、香港。

十一月十六日　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毁灭扫荡”。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央命令项英，新四军军部必须在十二月底以前北移完毕，限期二十天完成一切北移准备工作。

十一月二十五日　石德路完工。

十一月二十九日　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职。

十一月三十日　日汪所谓《调整中日关系基本条约》在南京签字，并发表所谓中日满三国共同宣言。

十二月三日　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通敌叛国、判处死刑。

十二月五日　马寅初因主张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资本税并没收不义之财，在渝被特务绑架。

十二月八日　“冀太联办”颁布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暂行条例。

同日　何、白再次致朱、彭、叶、项代电（即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

同日　东北抗联将领陈翰章于镜泊湖头小湾沟村南光荣牺牲。

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发出要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次日，秘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立即解决”。

同日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宣布“南京政府并未关闭与重庆的和平谈判之门”。

十二月十五日　晋察冀边区自月初起破击阜平、曲阳及涞源、涞水的交通线，计破路九十余里。

十二月十六日　晋东南、正太、同蒲等总工会成立华北总工会。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八路军总部召开晋东南后勤工作会议。

同日　日海军宣布对华扩大封锁，自粤省大连澳起至北海止。

十二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将皖中、苏北、鲁南、豫东成立特区，设立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委员会，以汤恩伯为主任。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总结了我党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正确分析了形势，批判了党内某些同志在政策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进一步全面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具体政策。

十二月二十八日　新四军召开军委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案，决定皖南部队全部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天目山脚之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

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颁布进剿新四军计划，决定“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毁皖南方面的新四军，务求彻底肃清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

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

军　事

一月二十三日　日军一万二千余人分兵六路进攻岢岚、临县、方山，合击兴县，企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进行了三十八天的反"扫荡"斗争，至四月一日收复三县，日伪"春季大扫荡"失败。

一月二十八日　南宁日军约三个师团分三路北犯。绥远日军自包头分路西犯。

二月二十三日　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率部在蒙江地区与日军激战时英勇牺牲。

二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军与日军在豫南信阳激战。

二月二十八日　皖南日军向宣城进攻。

四月二日　傅作义部攻克五原，将日军逐出河套。

四月二十七日　苏南日军由宜兴南犯。

五月十三日　日军以三十八师团为主力约二万多人对粤北发动攻击，侵占从化。

五月十五日　鄂南国民党军攻入蒲圻，围攻通山。

五月十六日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阳南瓜店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六月一日　日军乘新四军在兴集集中进行检阅之机，分兵三路合击，均被击退。

六月二十四日　晋察冀八路军克复曲阳、唐县、平山。

七月二日　龙州、镇南关失守。

八月十三日　东北抗日联军陈翰章部在额穆东南沧口桥梁附近与日军激战。

八月二十日　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同时发动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二十万民兵，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敌占主要交通线开始总破击。

九月十日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

九月二十三日　第七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令其部向越南高平省以南进击，袭镇南关西进之敌。

十月六日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开始，至十二月五日结束战役。

十月二十日　东北抗联攻打密山县二道岗开拓团。

十一月八日　抗联三路军攻打郭尔罗斯后旗城，一度攻克。

十一月二十四日　李宗仁部在随枣地区与日军作战。

十二月九日　洪泽湖畔八路军协同新四军粉碎日军扫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新四军一部一度攻入南京城。

经　济

一月一日　国民政府实行土货转口免税办法。

三月七日　美国财政复兴局公布，美国出口银行已指拨二十万美元贷给中国。

四月二十七日　晋察冀边区银行举办三百万元春季贷款。

七月七日　孔祥熙公布抗战三年来的财政金融情况：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共发行公债四十七亿元。

七月十八日　太北区财经会议结束，决定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基本政策，制订了合理负担办法。

八月七日　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完全控制了金融事业。

八月八日　国民政府通令征收战时所得税。

八月二十五日　鸭绿江水丰发电站开始送电。

九月七日　《新华日报》载：米价飞涨，六月间十元一旧斗，八月间三十元一旧斗，重庆米奇缺。

十一月二十二日　"冀太联办"公布《保护与兑换法币暂行办法》。

十二月十九日　"冀太联办"颁布征收爱国公粮暂行办法。

外　交

一月四日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抵重庆。

一月二十三日　国民政府批准中苏商约。

一月二十五日　美国政府以《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期满，宣布废除。

三月二十九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痛斥日本制造汪精卫傀儡政府。

四月一日　英法声明不承认汪伪组织。

六月二十一日　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抗议法国封锁滇越货运。

七月十七日　英国正式宣布封锁滇缅路。

十月十四日　英国重开滇缅公路。

文　教

一月一日　鲁迅艺术学校在晋东南成立，李伯钊为校长。

一月十五日　苏北解放区《江淮杂志》创刊。

一月二十五日　《戏剧与文学》在上海创刊。

二月七日　《中国工人》月刊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写发刊词。

二月八日　江南东路地区抗日报纸《大众报》创刊。

三月二十五日　陕甘宁《边区群众报》在延安创刊。《大众呼声》半月刊在上海出版第一集。

六月六日　太岳区《太岳日报》创刊。

六月十日　抗大五分校成立于晋东南。

八月一日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对敌占区宣传刊物《中国人》周刊。

八月二十二日　夏衍等主编的《野草》在桂林创刊。

九月十八日　晋绥解放区《抗战日报》在兴县创刊。

十月二十日　晋绥解放区《晋西大众报》在山西兴县创刊。《抗战日报》出版《通讯生活》月刊。

十一月一日　《中国青年》晋西版在山西兴县创刊。

十二月一日　延安中国青年通讯社正式成立，并开始发稿。

十二月二日　《江淮日报》在苏北解放区盐城创刊。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1年

导 言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直属队伍共9000余人从茂林地区经过时，遭国民党顽军伏击，除一千多人突围外，大部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和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这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反共事件，使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事变发生后，中共进行了坚决回击，对国民党予以沉重的政治打击。

三月，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兵力，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上高，上高会战开始。国民党第七十、七十二军顽强抵抗，取得了有利的作战态势。战役击毙日军近2万人，是抗战正面战场打得较好的战役。

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于三月二十四日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三年八个月以来，奋斗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出现了极大的精神危机。会议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新四军和八路军，强调要"服从最高统帅之指挥"。

从春季开始，日军开始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华北地区提出了长期坚持，不过于消耗的原则，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跳出敌人合击圈，终于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日军为了截断陇海路，威胁西安，集结了十万兵力，分三路由中条山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驻守的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军被日军分割为南北两部，溃不成军；八路军从侧翼进袭日军，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但国民党军仍然没有逃脱失败命运。这次战役国民党军损失5万余人，日军伤亡2万余人。

九月七日，第二次长沙战役开始。日军第六师团猛攻大云山中国守军，第二次长沙战役开始。由于第九战区对敌情判断有误，正面防备不足，日军很快突破防线，推进到汨罗江北岸。由于日军战线过长，攻进长沙后立足不稳，退出长沙后北撤，但国民党主力部队损失过大，在追击战中无法扩大战果。这次战役，日军伤亡万余，中国伤亡、失踪近十万人。

在华北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中，一股日军向易县狼牙山合围。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五名战士发扬高度自我牺牲精神，把敌人引上狼牙山，打退日军多次进攻。黄昏时分，弹尽药绝，5位战士毅然跳下悬崖，后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十一月九日，在黄崖洞保卫战中，八路军一二九师以不满千人兵力，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余人，创造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

十二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大会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提出"中国抗战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已联成一片"。大会宣言提出"坚定信仰"、"奋斗到底"、"加强动员"等口号，决定给予蒋介石以"全权处理国事"之大权。

年底，第三次长沙战役开始。日军在汨罗江南岸取得较大进展后，阿南惟口被胜利冲昏头脑，改变原计划继续南犯，占领长沙。第九战区以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他部队从三面围攻日军。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北撤时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原阵地，共计伤亡五万余人，遭到惨败。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皖南事变
- ●1941的反“扫荡”作战
- ●狼牙山五壮士
- ●黄崖洞保卫战
- ●上高会战
-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
- ●中条山战役
- ●第二次长沙战役
-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
- ●第三次长沙战役

皖南事变

背景介绍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即将制造摩擦的重点，由华北八路军转到华中新四军。1940年7月，国民党提出一个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作战区域的所谓“中央提示案”。这是其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中共中央拒绝了这个无理的方案，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了《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修正案，遭到国民党的拒绝。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三十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大举进攻。

中国共产党鉴于当时的严重局势，决定在皖南采取让步，在华中采取自卫，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的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方针。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名义发表的致何应钦、白崇禧“佳电”，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限期将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佳电”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可是，蒋介石对此让步并不满足，他的阴谋是消灭华中新四军，并为此而加紧暗中策划与部署。12月7日经蒋介石批准，国民政府军令部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第一步，以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李宗仁所部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为了进一步作反共内战的舆论动员，12月8日国民党又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齐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底以前“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蒋介石还亲自出面，于12月9日发布要新四军限期北移手令；第二天，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按照蒋介石的密令，顾祝同在皖南集结七个师约八万人的兵力，准备包围聚歼新四军。

在这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下，194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指示新四军军部应“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但是，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和副军长项英，认为“北移困难”，不愿意军部离开皖南泾县云岭，坚持新四军留在皖南的错误主张，拒绝北移。12月14日、24日，中共中央又两次指示叶挺、项英立即北移，但项英仍迟疑不决，拖延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对项英的错误态度进行严厉批评，在严令督促下，项英才同意部署部队的转移。当时部队北移有三条行动路线可供选择：第一条路线，由驻地往北，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第二条路线，由驻地往北再往东转苏南，从镇江渡长江；第三条路线，由驻地往南，经泾县茂林、旌德、宁国、广德到苏南，再渡江北上。第一、二两条路线，都经过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情况熟路程近，便于渡江；第三条路线，需要经过国民党部队的防区，在国民党阴谋反共的情况下，走此路线对新四军极为不利。据此情，中共中央一再指示项英应走第一、二两条路线北渡长江，并曾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交涉。正当项英准备北移时，国民党却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路线，使日军在铜陵、繁昌和无为沿江增加了封锁巡逻；国民党又命令李品仙部三个师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以增加新四军北移的困难。12月26日，新四军召开军分会会议，讨论行动方案，项英只看到走第一、二两条路线的不利情况，而看不到有利条件，同时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通过“友军”防区较为安全，因而决定了走第三条路线北移。这个行动方案，在政治上因为是向国民党控制区后方行动，无异会授以进攻

的口实；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地区行动，则等于自投罗网。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由驻地云岭出发往南行，国民党军队亦随之行动。5日，新四军部队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6日，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部八万多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突袭的总攻击。新四军英勇自卫，7、8、9三天曾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10日以后，因给养困难，陷于险境。叶挺致书上官云相，斥其背信弃义，望以抗战为重，不再自相残杀，并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上官云相回信表示欢迎叶挺前往面商。13日，叶挺军长一到上官总部，即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经过七昼夜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新四军九千余名抗日英雄，除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一千余人突围出去外，大都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军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战斗中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集团在制造这场血腥大屠杀之后，于1月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2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对蒋介石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海外爱国侨胞纷纷通电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在国际上，美、英、苏都表示反对中国分裂内战。蒋介石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被迫暂时受敛其反共活动。在同年3月召开的参政会上，蒋介石只得表示要缓和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至此，国民党第二反共高潮被击退。

材料：

- 同室操戈中国人剿灭中国人
-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 蒋介石命令"解决"江南新四军给顾祝同的密电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 分散突围
- 我是怎样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
- 皖南事变亲历记
- 皖南事变遇项英
- 老百姓不答应

材料一　同室操戈中国人剿灭中国人

4日黄昏，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特务团、第1、第2、第3支队的各团共9000余人，告别驻扎了3年的皖南，在一片悲壮的歌声中，冒着大雨，由云岭起程北移。蒙蒙细雨中，叶挺望着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不知能否安全转移，心情十分沉重，随口朗诵出"雾里美人云里山，层峰直上三千丈。凭崖勒马往前看，出峡蛟龙几时还"的诗句。

雨天的路特别难走，走了两天才离开云岭20多里，而且部队已累得疲倦不堪。无奈，军部只好下令部队在茂林休息一天，次日再继续北进。结果，当日黄昏，新四军侦察部队发现周围山上有可疑情况，马上报告军部。新四军军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叶挺军长主张改变原定行军路线，不从东南翻山过丕岭去旌德，而应从西南樵山岭去太平，再向东南进军转移北上，以打乱敌人的部署，甩掉敌人。然而，项英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军。结果，部队于6日到达丕岭脚下时，便遭到国民党顽军第4师的阻击，顽军第144师也前来拦截，双方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新四军官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早已无比愤慨，见敌人围了上来，一个个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这些顽军平日里只知欺压百姓，怎经得新四军的冲杀，不一会就被杀得血肉横飞，四处逃窜，新四军一直追击到三溪河边，并顺势翻过丕岭。过丕岭后，新四军各纵队按原定计划分3路继续向旌德方向前进，拟于星潭会合。

7日，新四军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又遭顽军拦击，该纵队遂以2个营对拦击之顽军展开攻击。这时，军部就在星潭附近的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议从早到晚整整开了一天。叶挺建议组织3个主力团，从顽军第108师阵地或第144师阵地冲杀出去。因为这两支顽军部队战斗力较弱，况且对蒋介石的排除异己政策早就心怀不满。冲过他们的阵地，即向旌德、宁国进军，那里是上官云相总部的后方，没什么顽军主力。然后再转向江南，和江南的友军部队会师，待机渡江北移。同时，江北有陈毅、粟裕的部队接应，突围胜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叶挺的这一正确主张，却又被项英拒绝了。他说这样做，伤亡大，太冒险。叶挺气愤地说："现在不是冒险不冒险的问题，更不是过去3年游击战的时代，可以打不过敌人就走；现在我们是被顽军重重包围，你想走也走不掉了。只有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才能保住这支队伍。"但是项英还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叶挺又说："我的主意你不同意，现在是兵临城下十万火急，究竟怎

么办，总要拿个主意，项副军长你决定吧！”谁知项英却作出了返回丕岭经廉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的决定，并派敌工部长前往顽军与对方谈判，幻想顽军作出让步，结果竟被顽军扣留，叶挺气愤地说：“在战场打败仗，除了杀出血路冲出去外，只能是无条件投降，还有什么和平可谈。”

写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叶挺身为新四军军长，为什么在军事上却作不了主，事事都由项英说了算呢？原来项英是新四军政治委员，而叶挺军长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此项英对叶挺由政治上的不信任到工作上的不尊重，发展到个人说了算的严重地步。毛泽东看出了这一点，特在电报中提醒项英，要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这里用了同志两字，表示党中央对叶挺同志是信任的。然而，项英依然我行我素，重大问题不与叶挺商量甚至不让叶挺参与，叶挺曾气愤地先后两次出走，后来经周恩来做工作，叶挺才又回新四军工作。所以在新四军中，主要问题都是项英说了算。

项英的这一决定，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增加了突围的困难，实际上是把新四军引向了绝境。顽军见新四军又返回来，按照蒋介石“前堵后追，两翼夹击，消灭新四军于山地，活捉叶、项”的命令，对新四军的包围越缩越小，新四军也越来越失去行动的自由和主动。8 日，新四军向西南方向行动，遭顽军第 79 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这时顽军第 40、第 144 师加紧向新四军两翼进攻，云岭、茂林等地也被顽军新编第 7 师、第 144 师占领，新四军的退路已被切断，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当日晚，新四军进到茂林东南 5 公里的高坦地区附近，遭顽军第 144 师猛攻。叶挺一面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一面派人找项英，结果到处都找不到。叶挺气愤地说：“平时他什么都要管，什么事都要经过他，现在情况这样严重，他却不要部队，自己跑掉了！”叶挺独身一人，沉着指挥作战。他冒着炮火到前沿观察敌情、地形，了解顽军的火力点和阵地部署情况，然后下令将教导队、机枪连全部集中。他对教导队的干部们说：“我们现在被敌人包围了，只有冲出重围才有出路。我们教导队是党的骨干力量，是不轻易使用的，现在党需要同志们出力的时候到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可以消灭敌人，冲出敌人的重围。同志们有信心吗？”众口一声回答：“有信心。”叶挺又说：“这次我们把全队号兵集中，机枪集中，手榴弹 10 个一捆，等冲锋号一响，机枪就集中火力向敌人指挥部射击，同时消灭敌人火力点，掩护手榴弹队冲锋。大家动作要迅速、勇猛，只有这样才能冲出重围，大家能做到吗？”又是众口一声地回答：“能做到。”

于是，他们于当晚冒着暴雨和刺骨的寒风，静悄悄地向顽军摸去。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难行，一边是无底深渊，一边是高耸峭壁，大家的棉衣全被冰冷的雨水淋透了，而且已经一天滴水未进，一口饭未吃，但他们还是斗志昂扬地前进。

当新四军教导队到达高坦村后，按照叶挺军长的命令，把全部机枪集中起来，猛烈地向顽军的阵地射击，然后分两路猛扑顽军的两个营部。经过一夜激战，终于消灭顽军这两个营，为突围创造了条件。

新四军占领高坦村后，叶挺马上向中央报告了这个胜利的消息，并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和项英等人失踪的情况。尔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鼓励大家在危急关头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下去。会议之后，他们又继续进军，于 10 日进驻茂林以东 5 公里的石井坑，整顿队伍，准备继续突围。

这时，顽军第 40、第 52、第 108、第 144 师等部团团围了上来。叶挺见状，立即电告中央，“我军已处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全体指战员坚守阵地，同生死，共存亡。我们皖南的部队即使被消灭了，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种坚如磐石般的信心，指挥若定的态度和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对全军振奋很大。叶挺向中央发完电后，又把各支队各团负责人召集一起，研究突围方案。有的人建议组织一支精悍力量，保护军长先突出去，被叶挺严辞拒绝。最后一致同意，把现有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坚决守住以石井坑为中心的阵地；同时以一部兵力作为机动力量，消灭来犯之敌，争取机会，坚决突围。正在这时，他们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大意是，命令叶挺、饶漱石（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全权指挥，坚守石井坑阵地，坚持两个星期。中央已命令陈毅、粟裕部队立即过江支援你们。中央的指示，真如雪中送炭，参加会议的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惦念着我们，我们并不孤立，我们一定能冲破顽军的封锁。大家表示，一定遵照中央的指示，守住阵地，伺机突围。

中共中央在电令叶挺、饶漱石的同时，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其在皖南停止进攻，撤围让路。蒋介石一面口头答应下令查处，一面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于是皖南的新四军在石井坑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与重重包围的国民党顽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浴血苦战。

石井坑，是一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叶挺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村子的小山坡上，东面是丘陵地，南面是开阔地，西面是东流山脉。东流山是一个俯瞰石井坑的制高点，叶挺将重兵布于东流山上，以保证指挥所的安全，亦可依托高地出击敌人。

就在新四军进行抗击部署之际，顽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用美国人支援打日本的飞机、大炮，来对付源

临弹尽粮绝的同胞。顽军炮火猛烈，东流高地失守，新四军指挥所已经直接暴露于顽军的炮口之下。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叶挺军长指挥若定，他下令将顽军的机枪炸毁，组织指挥所的所有人员拿起武器，接连几次打退了顽军的进攻。然而，指挥所与周围各支队的联系被顽军切断，人员伤亡过大，弹药不足，一粒粮食也没有，大家纵有旺盛的士气和必胜的决心，再坚持也很困难。叶挺看到这种情况，下令宰杀军马，吃饱后与顽军决一死战，伺机突围。13日，撤离石井坑的新四军军部，在叶挺的率领下，边打边向大坑王山脉前进，顽军在后面紧紧追踪，始终摆脱不掉。由于数日来连续与顽军激战，加之弹尽粮绝，大家体力极端虚弱，没走多远，就坐在一个山头上休息。叶挺见皖南9千健儿已牺牲过半，剩下的也分散在各处，联络不上，心情十分沉重。这时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我军下山回苏北。"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根本没有谈判的条件，我不去。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饶漱石又说："不是你自己要去，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当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几位中(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张元寿、王聿先)，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叶挺听后过了许久才回答："我服从组织决定。"便下山去和国民党顽军谈判，结果被扣留。叶挺被扣留后，先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后来经中国共产党多方营救，获释出狱，没想到飞机失事遇难。

叶挺下山后，顽军又展开疯狂的进攻，新四军无力坚守阵地，只好分散突围，大家毫无目标地东奔西闯，纷纷的弹雨把奔涌的人群成片成片地扫倒。许多战士见突围不成，索性冲入顽军队伍，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混战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项英、周子昆遇害，袁国平牺牲。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选自《20世纪军事演义》，作者：西尔枭)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

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的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定。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慷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

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呵,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材料四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八千余人于本月四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部覆没。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

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

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面前,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

(1)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

(2)立刻停止华中二十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

(3)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

(4)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5)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的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件)

材料五 蒋介石命令"解决"江南新四军给顾祝同的密电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

特急(有线加表)。上饶顾长官:同日 密。(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三)右二项仰即遵办具报为要。中①、灰(十日)酉令(游印)。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原件)

① 中,指蒋中正,即蒋介石。

材料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日）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元（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鉴。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籍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原载 1941 年 5 月大众出版社初版《中共问题重要文献》）

材料七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籍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〇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乃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晓，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击，不得不加以抵抗，籍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军长叶挺，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十三日）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该项供词如下。

（一）叶挺等自奉命令开动时，即决意不遵令北调，早已定谋，移赴苏南，先盘踞金坛、丹阳、句容、郎溪、溧阳等县，扩充东南政治分局，加强机构，期于短期内，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

（二）先以政工人员干部官佐武装士兵，陆续开赴苏南，在金、丹、句、郎、溧五县间，扩充细胞，以待全部到达后，展开反抗，并并吞第二游击区内之抗战国军，再演苏北黄桥之局势，以便向太湖浙西扩展。

（三）为要挟开拔费及弹药各五十万计，集中全部兵力于泾县繁昌一带。

（四）嗣奉令规定由皖南原地渡江，颇为失望，但仍希领到弹款，再籍口敌舰封锁，决不由皖南渡江，以贯彻盘踞苏南之目的。

（五）第四〇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详悉其行军道路。嗣知该师于一日下午，到达三溪与榔桥镇之间，新四军认为此乃其袭击第四〇师唯一之机会，遂于江（三）日定谋，支（四）日夜全军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发制人手段，以期各个击破。其所定计划，系歼灭第四〇师后，即以其左支队在丁王殿板桥一带，牵制一〇八师，以中右两支队急趋胡乐司甲路东岸一带，夺取仓库被服粮弹，直袭某地上官总司令部，然后与左支队分趋郎溪溧阳，会同苏南部队，再夹击冷欣部，与郎溪一带抗战之国军造成扩大纷乱之局，使中央穷于应付，胁迫中央容纳其要求。

（六）叶项等微（五日）辰分发各电，婉转陈词，系故作缓兵之计，且佯示无意启衅，以便嫁祸国军等语。

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第四〇师仓卒应战，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

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变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原载 1941 年 5 月大众出版社初版《中共问题重要文献》

材料八　分散突围

皖南事变的全过程，我曾向中央有一个系统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我到香港以后请廖承志代发的，所以把它抄在香港的那一节去了。但要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能包含在内，还是不够的。

因此，我的回忆就从战争的最后时刻说起。

我找机要员译出叶挺署名的向延安发的最后一份电报，并要求电台立刻拍发。拍发完这份电报以后，我就招呼电台台长立刻把电台的所有设备全部砸毁。回头我又来招呼机要员把所有的密码本全部烧毁，为求烧得快些，分成两处烧。等到我去检查完电台砸毁情况，回头来那些密码本就已经烧光了。于是，我就带着这两批人从后院出来。但是作为军部指挥的前院，上至军长下至勤务员，一个人都没有了。

当晚天色很暗，周围的一切都看不清。出大门后，只看见山坡上密集的人影很纷乱地在奔跑。我也爬上山追上了一个战士，我问他军长他们哪里去了，他就用左手指了一下。我要跟着上去的时候，后面也不知是谁把我挡住，不准我向那个方向去，说："不要去增加他们突围的困难，人多了，目标大"。这时，我身边报务人员已经没有几个，机要人员也跑散了。我们跑到一个山沟里面。我估计乱跑也跑不出名堂，还不如找个茅草深、树木多的山腰隐蔽下来，等天明了再想办法。

在行动中，我遇到了一个警卫班，我立刻要他们跟我一路走。同行的还有几个干部，我就说服他们同我在一起。反正只要我们没有什么动静，不被国民党的包围部队发觉，是绝对安全的。当然，从这时起只好挨饿了。听到山沟里有流水的声音，找人弄点水来解渴这是完全办得到的。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左面二里外的山上山下枪声非常密集，但是没有几分钟枪声逐渐停止了，我猜想叶挺去的那个方向发生了问题。后来证明，就是那阵枪声后，叶挺就被俘了。叶挺怎么被俘的，后来听到有不同的说法，我不在场，就不清楚了。当天晚上，我把图囊里面所带的重要文件，如我回四川时毛泽东写给我的指示信；叶挺和项英之间互相不满意，叶挺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还有我那一本仅仅整理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的、其他还都是素材的长征日记，都埋在皖南的山上了。埋的时候是很舍不得的，现在也还是很后悔的。

实在太疲劳了，我在茅草里睡熟了。但醒来左右一望，又少了好多人，各奔前程去了。特别是那个警卫班都是短枪，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我留他们在一起，意思是即或冲不出去，有这么一班人，我们也会在皖南的山里活下来。他们一走，使我全然不知所措。此时这些被打散的部队已完全没有了组织、纪律，盲目的各自寻找着出路。

我依然想的是多找些人在一起，找到地方党的关系，做有组织的突围。但是，这是极困难的，由于形势紧张，白天只好躲在山沟、树林或茅草丛中忍饥挨饿，夜晚，便大着胆子下山到农民家去弄饭吃。有时被地主武装发现，饭不但吃不成，还要受一场惊吓。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聚拢起来的二三十人又散了，跟我在一起的只剩余立金、钱俊瑞和三个教导队的学生。又在山沟里住了二三天（1月20—22日），找到一家同情我们的农民，这样，每天晚上都能弄到饭吃了。

我们估计，国民党部队已经撤走了，而这样无限期地住下去，总不成一回事。商量的结果是一起下山，先到徽州，然后分散。我决定去桂林转重庆，余立金、钱俊瑞去宁波转上海回苏北，三个福建青年要求回家去，这样也比较好。算起来离旧历新年不远了。

晚上到那位农民家里吃饭时，我们向他提出要下山的计划，要求找几套冬天农民的衣服来改换便装，他满口答应好办。果然，第二天晚上他拿来一些棉衣和棉裤。大家选择了自己适合的棉衣，当然都是粗布的，我们脱下了军服，并把所有涉及军队的东西，不管有用没用全丢给主人了。其中包括我用了十年的一支红色派克笔，实在有些舍不得。有些短武器，没有告诉主人，都悄悄塞进他的粮食堆里了。主人还替我们设计了一些道具，装成年底要回家过年的样子。

装扮停当，由主人带了我们三四里路，指给我们一个去太平的方向。为着感谢主人招待我们吃饭，并且帮助我们做上路的准备，我们送给他50个银元。我们六个人分为四起，一个教导队学生在前，余立金、钱俊瑞第二，我第三，再有两个教导队学生殿后。中间相隔二三百米。只要前后能够照顾到就行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走起来，前边的人是走得很快的。一个晚上，一个白天，这四股人就各不相顾了。我是走得最慢的。第二天下午绕过太平城下山上公路，就连走在我后面的两个青年都超过去了。我拼命地赶，傍晚到了公路旁边一个小茅店的时候，他们已在那里吃过饭睡觉了。当然我们装作不认识，他们睡他们的。第二天早晨，他们比我起得早，又走了。实际上，一路只有我一个人，第三天傍晚我才赶到潜口。一连走了三天，实在太疲劳了，也顾不了许多了，在街上吃了两大碗面后，找了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后，便雇了一辆人力车向徽州赶去。

到徽州时，已是阴历除夕，不仅当天没有，就是第二天（正月初一）也没有去金华的车。我只好住在旅馆里过年初一，到初二再说。好不容易熬到第三天，请旅馆的人帮忙，在去金华的出租小汽车上买了一个位置。大概9点钟的时候，就上车去金华了。到了金华，我住进金华的花园饭店。趁等车的机会，我又在金华街上买了一件绸面的丝棉袍子还有一些用品，改换装束。这件丝棉袍我一直穿

到香港。以后我就顺浙赣路的一段火车到了江西的鹰潭，这一段火车没有煤炭作燃料，烧的是木柴，因此车速很慢。窗外一片战时的后方景象，现在也很少有人记忆得起了。从鹰潭又改乘长途汽车到了湖南的衡阳，又坐火车从衡阳到桂林。从皖南脱险逃出，一直到桂林，旅途上还算顺利。在遭此大难之后，我能安然到达桂林就真算幸运中的幸运了。

（选自《李一氓回忆录》）

材料九　我是怎样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

每一个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人，各有一个独特的机遇。

我是怎么突围出来的呢？

1941年1月13日清晨，我从泾县茂林附近的东流山回到石井坑，军政治部的队伍已从石井坑上山，我和警卫员，饲养员紧紧地跟上。队伍伏在山上，枪炮声整天不息，焦点在东流山。到下午四五点钟，天色渐渐暗下来，对面东流山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了。第一个起身谈话的是敌工部长林植夫同志，他长叹一声说：“我们终于把敌人打下去了。”东流山是石井坑周围许多群山中的制高点。对突围部队至关重要。叶挺军长曾下过命令：“必须把东流山的制高点守住，违者军法处理。”

没有人呼应林部长的估计，但大家都从山坡上站起身来。这时，我望见前面山坡上叶军长正走过来。我对宣传部长朱镜吾同志说：“我看到了叶军长，我过去问一声情况。”他说：“好的。”我就离开了政治部队伍所在的山坡，向叶军长走去。

我还未走近叶军长。忽见军长背后，有随从副官赶来，遥呼军长。军长停步转身问什么事？副官答：“任光同志带花了。”军长问：“伤在什么地方？”答：“在腰部。”军长大声说：“回去把他背着赶来。”

这时，我侧身看到右边山坡上正坐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同志。我本来是在文委，和军部机关住在一起，不自觉地向他们那里走去，在他们身边的山坡上坐下来。只见袁国平叫他的警卫员把另一支快机交给他自己使用。杨帆同志带着几个向导，站在项英同志旁边，等候吩咐。离我坐着的山坡不远，有一条通向下面的山沟，里面排列着队伍。教导队军事教务长冯达飞同志在这一带巡视，看到我挂着木壳枪，招呼说：“黄源同志，你也武装起来了！”语调并不紧张。

不久，项英等同志站起身来，向东流山对面的方向走了。我这时意识到我已列名在政治队单位，不便跟他们行动，于是我也站起身来，向政治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料，却已见不到政治部队伍的踪影，也看不到军部的熟人。我想，我已和直属机构失去联系，只好跟着大流走吧。走了一段路，又有从对面冲过来的人群。这时天色已暗，东流山方向的火光枪声，在暗空闪响，山头上人群混乱。我和警卫员、饲养员退回到原来项英他们坐过的地方，看到山沟里的队伍还整齐地排列在那里。我想，跟着队伍走总会和军部碰头的。我们三个就插入这队伍中去，队伍里谁也没有过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团队，前进方向是哪里，跟着走就是。这时，枪声愈来愈密，天色已经墨黑，只听得前面传下来“冲”，队伍就向前直奔下去。我们跟着跑，一听到机枪向我们射来，队伍就地伏下，枪声稍停，又起身直奔。我并不惊慌，心里暗想：这才尝到在敌人机枪下突围的滋味了。我前后跟着跑的都是非战斗兵，在领队的带领下，不顾山路崎岖，向前猛跑。后来前面抓到一个往前方送信的国民党部队的四川兵，队里送来交给我管。我和警卫员持枪夹着他跑，我边跑边做他的工作，要他听到国民党部队问口令时，就用他自己队伍的番号回答，说是从前方回来的。果然，碰到几次敌哨问口令，他一回答，敌哨听是四川口音，迟疑一下，我们就从他们旁边的树林里直奔下去。这样逃过了好多关口，终于跑到山下的大路上。

大路上，没有阻挡，我们跑步前进。大约到半夜时分，队伍在大路边停下来休息。

我的饲养员是皖南本地人，他看这杂乱的队伍，轻声说：“首长，这不是战斗部队，我们自己走吧。”

我严厉地说：“跟着队伍走，生死在一道！”

饲养员不响了

稍憩，起身又跑，一直跑到天色微明，路旁的村子显现出来，甚至看到有敌军在村前门口漱口。

饲养员说：“前面是章家渡。”我们突然发现路旁房屋里有敌人，便冲进去，我和警卫员抓出两个敌兵。

我对领队说：“前面是清弋江，我的饲养员常牵骡马过江，他知道哪里深，哪里浅，过江由他带路好。”

领队的同意我的意见。饲养员带队伍涉水过清弋江，江水齐腰。但刚过半途，对岸敌军的机枪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回头跑，不少同志被子弹击中倒下去。我的警卫员也倒下了。饲养员拉着我直向江岸奔去。一到岸，他把我的黄色日本军大衣脱下，向章家渡奔去。进入镇口的一家商铺后，我们换去湿衣。店员惊慌地说：“你们不能在此久留，赶快走吧！”

这时，只有我、饲养员和一个年青的号兵在一起。整个队伍被打散了。

我们出了镇。两岸的枪声不断。我们拣小路走。走了几里路，前面有几户人家，门前有几个稻草堆，饲养员说：“你在草堆里休息一下。我找老百姓问问情况。”

我在草堆中躲着。中午时，饲养员拿了一碗饭菜来，说：“村外有敌人部队，到晚间才能走动。那个小号兵不见了。”

到傍晚，饲养员领来的一位老乡说："你躲在这里不安全，附近驻的部队，可能要来搬稻草烧夜饭；我领你们走一条沿江的小路，晚上走一定安全。"

我和饲养员跟着他走。午夜，来到一户群众家。房主人同情新四军，深夜开门接待了我们。拂晓，在他家吃了早饭动身。到早晨，走到一个村子，我们进了一家屋子。

饲养员说："我出去看看情况，你在这里留一下。"

他走不久，房主人出来，惊慌地说："有部队来搜查新四军，你快从后门走吧！"

我拿起包袱，从后门跑出。走不多远，饲养员追赶上我。

他说："前面有渡船过江，这里离宣城不远，过江后比较安全。"

我们急切向渡口走去。赶到渡口，一条船里已有一些乘客。我们刚上船，只见两个穿着新四军军装的战士跳上船，急叫"开船"。前面是清弋江，过江要付渡口钱，我看见两位新四军战友和老百姓一样付了钱，心里很感动。在兵败逃亡之际，他们还严守群众纪律，我和饲养员因为没有零钱，饲养员操本地口音，对船老大说："我俩没有零钱，回头一齐付，好吗？"

船老大客气地答应了。

船到岸边，两位战友一个虎跃，一齐跳上岸，飞跑而去。

我们上了岸，找人少的小路走。路上碰到的人都对我们注目而视，因为我们的衣服不合身，脸和手都有血痕。

饲养员路熟，一路无事，终于赶到饲养员的老家。我躲藏起来，没有惊动大家。

我在他家休息了几天，脸上手上的血痕已不显露。饲养员陪我在他家附近的小镇上，做了一套棉衣裤。他又带我到他的亲戚家里，每家住二三天。这时已临近春节，每家都忙着过年。他的亲友家把我作为贵客款待。

我决定去苏北，到新四军归队。但怎么走呢？有三条路：一、到浙江、上海，转苏北。这是国民党地区，路远，一路又没有熟悉的关系，危险性大。二、从繁昌过江到江北，找新四军。这条线路近，但也没有好的关系，情况也不熟悉，容易出问题。三、比较起来，我熟悉苏南茅山地区。1939年，我曾跟陈毅同志经过茅山地区和丹阳访仙桥管文蔚同志地区，设法渡江到苏北。这条路较有把握，钻敌伪军的空隙容易，茅山地区群众基础好，容易找到组织。我决定走茅山一路。

我告诉饲养员，要他在亲友中物色熟悉去镇江小路的人。我事先不说到茅山，怕引起别人注意。一到镇江附近，转入茅山就不难了。

一天晚上，饲养员回来告诉我：从这里到镇江，有一条深山小路。过去是私盐贩子走的，他们从镇江贩私盐到皖南，走这条路可以逃避关卡、缉私。他有一批熟悉的人，过了正月半，要走这条路到镇江贩卖竹篮子。

我一听很高兴，就说："我们也买些竹篮子，我充当老板，混在贩卖竹篮子人群中，一起走。到了镇江附近，我有办法找到自己的部队。"

他又说："我们在亲戚家里过了年，再搬到一座山上，那里只有二三户人家，和外界隔绝，更为安全。过了正月半就从那里出发，下山跟贩卖竹篮子的群众一起走。"

我们准备了两条香烟，送给保甲长，安全上了山。

山上有一家做豆腐的，过年闲着在家。我约他参加我们贩卖竹篮子的队伍，我出本钱。这样，在饲养员一伙亲友中，又多了一个我自己安插的伙伴，心中更踏实一点。

正月半过后，我们的竹篮子队伍出发了。第一夜宿在山里的一家夜店里。老板特别注意我，因为我在队伍里很明显不是粗壮的农民。队里叫我老板，店老板疑心我是贩鸦片烟的。

一路平安无事，没有碰到一个岗哨。过茅山地区溧武公路时，我看到一张伪军告示，说叶军长被俘，项英逃亡在缉拿中。我大吃一惊，但不相信。我到茅山地区找老百姓，他们都远而避之。原来伪军在皖南事变后即驻防在这里，直到最近一二天才撤离。

在那里，我们和到镇江卖竹篮子的分手了。我、饲养员和做豆腐的三个人向丹阳方向走。饲养员一进敌占区，就有些惊慌。我告诉他，三天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你们可以回皖南去。

这里本是陈毅同志的一支队王必成老二团和叶飞六团最早活动的地区，我经常在《抗敌》月刊上用报告文学形式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许多小地名我都记得。因此我知道到丹阳，可走九里这条路。我领头向九里走去。

天色已晚，我们找到一家，向其借宿。房东招待我们吃过夜饭后，就和我们谈开了，他说："这里本是新四军的根据地，现在新四军北上，这里又变成敌占区，老百姓受难。新四军才是真正老百姓的队伍。"

我说，我们要到丹阳去，请他代雇一辆小车，免得时时问路。

他说："现在伪军每天派工筑路，小车雇不到。我明天亲自送你们到九里，那里有船到丹阳。我同船上熟悉，托他们照顾。不过进丹阳城要通行证，我可以关照船上，让你们在丹阳城外上岸。"

第二天早饭后，他热忱地送我们到九里上船，并向船老大打了招呼。船老大把我送进内舱坐。我看舱内坐着的都是伪区、乡公所的人员。我很大方地把桌上的伪中央日报拿来细看。饲养员和做豆腐的坐在前舱的乘客中。

快到丹阳时，我看到在后舱的船主，来到前舱闲谈。我懂得他的意思，也从内舱转到前舱，并和饲养员他们打招呼。船主立即转到船舱头，我紧跟上去，把钞票塞在他手中。他说："快到了。"我招呼饲养员起身跟上。船主一篙

落水，把船头撑到岸边，我们三人快速跳上岸。船又撑到河中，照常行驶。

上岸后，我们走了一会，来到路旁有一个老农在田里做活，就走过去问道："过铁路打哪个方向走？"

老农朝我们看一下，说："铁路过不去，皇军装上了电网。电网杆子上挂着新四军的人头。"

我说："明的过不过去，另外有什么办法？"

他说："办法总是有的。我就住在铁路旁的太平村。"

我说："我就跟你到太平村，请你帮忙想想办法。"

他说："好的。我在这里帮工，要对东家讲一声。"他说着背起锄头往附近一家人家走去，我们跟着。

他对东家说："我有几个客人，回家去一趟。"东家同意后，他就领着我们到他家去，路上我们自己买了肉和米。

一到家，看见一个汉子坐在房子正中，见我，对了一句黑话。我说承他老汉帮忙，答应我们在此宿夜。

他说："这是我的家，欢迎光临。他是我的叔叔。"

我说："我是教书先生，家在常州。过年，东家派两个伙计送我，现在路不好走，出门靠大家帮忙。"

他说："对啦，出门靠朋友。你们住下，我帮忙。到常州，乘火车方便。进城要县民证，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

他说："你交给我五块钱，我的阿弟在城里当密探，几天功夫就能把县民证办出来，买火车票也要县民证。"

我说："那就拜托你了。"

我们一起吃过夜饭。我很怕再坐下来交谈，因为我的两个同伴只会说皖南话，容易露马脚。这时，房东说："来，我们搓四圈二块钱的小麻将吧。"

我连忙说："好，我来一个。"同时关照饲养员他们："你们走累了先去睡，我玩一下就来。"

搓了二圈光景。我说："今天走累了，我要去睡觉，请哪位代搓？"老汉坐在旁边，他不会。我请另一位代我，说账明天我来算。说着我就站起身，到饲养员睡的地方。见他正埋头在被中暗哭。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鬼子地方，我们怎么能住下去？"

我说："我誓死要到目的地。你们觉得不安全，我明天送你们上船回去。至于我，你们不必担心，我能对付。"

他们同意明天回去。

第二天早晨，叔侄两人，还有那位麻将伙伴，陪我们到丹阳城外，先送饲养员他们上船到九里，再陪我去照像。我付了办县民证的手续费，托人把我的照片送进城去。

我在他家住了五六天，伪县民证拿到了手。他们陪我进城，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我去附近兑换了日本钱，到火车站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他们看我进了车厢才回去。那几天好像伍子胥过关，一下子头发都白了。

到了上海，我先到离沪前住过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天，我就去许广平先生家。她看到我意外地高兴。我托她转告组织。第二天组织上就派人来看我，来的人，就是军部印刷所所长陈昌吉，老熟人。他给我另外安排了住处，并通报盐城军部。以后，又派交通送我到军部。

陈毅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我以为你尽忠报国了。欢迎你胜利归来。送你一匣英国上等雪茄烟，慰劳。"

叶军长1月13日晚上，即我突围出去的那个晚上，从军政治部得到消息：黄源在撤离石井坑山头后失落了。他以为我被敌弹击中而身亡了。他在被监禁后，给周总理的第一封信里说："黄源大概身亡了。"重庆《新华日报》据此发表了石西民同志对我的悼念文章《忆黄源》。我却活到现在，已85岁了。

1990年11月22日夜于西湖北山葛岭

（选自《大江南北》92年1期，作者：黄源）

材料十　皖南事变亲历记

洪季凯①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驻在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正在积极进行北移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我奉命到新二、新三两个支队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元旦刚过，我二纵队政治部就告诉我："军政治部通知你，赶快回军部接受新任务。"于是我把在新三团了解的情况向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汇报后，连夜赶回军部。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对我说：根据中央电令，军部决定立即撤离皖南，经苏南北渡长江。他要我明天一早向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汇报请示。第二天上午我见了袁主任，他很高兴，同我握手。我正要向他汇报情况，他说："不要汇报了，到江北再说吧，军部决定调你到新二支队工作，任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还兼营政委。"他又说："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是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是你的老熟人，军部已决定派张日清任团参谋长，加上你一共四人，组成团的领导核心。你年轻，又是学生出身，一定要尊重他们，搞好团结。"我当即表示："一定向老同志学习，搞好工作，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后，袁主任向我介绍了部队北移时的编队情况，并且嘱咐我赶紧到新三团报到，说军部已决定当晚（四日）出发。

这天，我在军部办了各项组织手续，晚饭后就背起背包出发了。过了章家渡恰巧遇到张日清，于是两人结伴而行，在茂林附近赶上了新二支队，见到了黄火星政委和钟

---

① 洪季凯，当时任第二纵队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兼营政委。

德胜主任。他们向我简单地介绍了新三团的情况。在支队部稍稍停留，我们就到了新三团团部。

五日，军政治部下达了北移宣传动员要点，要各部队作好动员，准备碰到阻击时进行自卫。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作了部署。

六日晚，我们二纵和教导总队、军直属队从茂林出发。按照军部的计划，一纵、二纵、三纵分三路向榔桥、星潭、三溪前进，然后沿天目山脚，经宁国、郎溪境内到溧阳，与苏南部队会合，待机北渡。

七日拂晓，二纵到达离星潭很近的两山夹口处，遭到顽四O师的突然袭击。顽军在两边和我对峙的山头上架设多挺重机枪，用交叉火力封锁了夹口，使我们无法通过。老三团走在前面，与顽军对峙着。于是纵队司令部下令新、老三团各一营迅速占领星潭北面的两个山头，消灭顽军的火力点，从山上俯冲星潭，各营暂留坑内作预备队。这时我参加指挥的这个营也上了山头，待命出击。前面部队和顽军打得很激烈，但我们这个营一直没有得到出击的命令。等到八日早晨，命令下来了：要我营立即随团部、纵队部撤出，转向西南。我们原路折回，然后沿着一条山溪向西南前进，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忽然前面传来消息，说先头部队在高岭受阻。不久，又接到命令，要部队再次转回，向茂林方向突围。这样，我们随纵队部进到高坦附近停了下来。

高坦在茂林的东南约十五里，当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时，顽军已占领前面山头展开阻击。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以新、老三团为主力和顽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下午三四点钟特务团也调上来了，经过一天的战斗，终于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稳住了阵地。九日傍晚，叶军长下令敞开正面顽军向北突围，拟经石井坑转丁家渡一带过河，然后直插铜、繁之间，北渡长江。但是，由于在高坦出发时部队未整顿好，战斗部队和非战斗人员混在一起，加上天雨路滑，行动缓慢，一个夜晚只走二十里路，到达石井坑时，已是十日凌晨三四点钟。这时，部队已十分疲惫，军长命令架设电台和延安、重庆联系，并下令各团、营占领周围山头，挖掘临时工事，准备固守。

十日中午，部队进入阵地，和顽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二纵布防在石井坑北面一带的山岭。我和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带一个营和直属连驻守在前沿阵地。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纵队部的一个胡参谋。

十一日午后，一纵有三四百人退到我们的阵地附近，我们立即把他们收容起来，编成一个营。同时将这个情况向纵队部汇报，纵队部黄、钟两同志要我立即找袁国平主任汇报。袁主任听了之后，又带我去找到了项英和饶漱石，并一道去见了叶军长。袁主任向叶军长介绍说："这是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曾在老一团工作过。他汇报新、老一团三四百有战斗力的干部、战士退到了他们的阵地附近，现已编成一个营。这样计算起来，军部还可以掌握两千多战斗部队，加上教导总队，就可以组织起来强行突围。"项英、饶漱石都没吭声。叶军长说："刚刚和周恩来同志接通了电报，他正在重庆呼吁谈判，要蒋介石下令撤围让路。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不必马上突围。"叶军长讲完后，项英、饶漱石均未吭声，袁主任说："好吧，你（指我）立即回到前沿阵地去，坚守待命。为了掌握好这几百人，可以从老一团干部中选一人当营长，你就兼这个营的政委！"他当即写了一张便条，交我带给黄政委和钟主任。他们接到便条后，当即写了命令交我带回前沿阵地。在阵地上和熊团长、胡参谋碰头研究后，决定由我带着这个营坚守在阵地的最前沿。

从十一日晚上起，我一直和营长（原新一支队政治部秘书，姓辛，读过军校，名字记不起来了）一起在最前沿指挥战斗。开始还留一个连作预备队，后来全都拉上了火线。在这场血战中，同志们都打得十分顽强。没法做饭，我们就吃生米、啃干粮来充饥；子弹不多，就靠手榴弹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由于我们这个营是临时编成，没有医护人员，指战员受了伤，除了用随身带的急救包外，得不到其他治疗，重伤员就更没有办法了。即使在这样的严重情况下，战士们没有一个退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十三日上午，顽军派几个人打着小白旗向山上走来，一路高喊是来谈判的。我和营长商量后，一面布置好火力封锁来路，一面准备派人下去接待。这时从远处望见，这几个人后面蠕动着黑压压的一片，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是顽军的花招，当即下令开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中午，顽军放火烧山，因为从十日起天气转晴，山上茅草干燥，火势很快从山下漫延到山上，短树丛也跟着起火了。顽军乘着火势，用密集的火力掩护数倍于我的队伍冲上山来。这时我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剩下的也只有五六十人了。我只得命令边打边撤，又伤亡了二十多人。我们退到离石井坑不远的山边，遇见了熊梦辉团长和胡参谋。于是，在熊团长的指挥下我们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就在我们反转身来冲上一个小山头时，我的右腿被顽军的一阵排枪打中了，大腿股骨被打断，负了重伤。熊团长连忙下令撤退，顽军也没有再追。当通讯员把我背回石井坑时，天已经黑下来。

在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给我看了伤，采取了简单的止血、包扎措施，然后就由团部派人把我抬到一个老百姓家中，放在木床上，还派了一个卫生员来照顾我。没多久，团部军需处来了一个干部，给了二三百元法币，大部分用纱布绷带绑在我受伤的腿部，一部分交到我的手中。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洪副主任，袁主任和纵队首长都知道你受了重伤，很关心。但是军部已决定今晚突围，不能来看你了，派一个卫生员来照顾你，你安心养伤吧！"我

说："革命是免不了牺牲的，只要军首长和部队能突围出去就好了。反正我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如果被俘了，我一定会坚持革命，决不会投降叛变的。请你转告首长放心！"接着，四周山头就响起了更加密集的枪声，我还从门窗中看到了山上的火光，很明显，突围又开始了。正在这时，卫生员给我吃了几颗止痛片和安眠药，慢慢地我就入睡了。等我早晨醒来时，卫生员已不知去向。那家老百姓很好，喂了我一碗稀饭，并把我隐蔽到一座柴草房里，我给了几块钱感谢他们，还请他们买了一床棉絮和旧棉衣御寒。第二天，顽军搜山部队发现了我，抢走了我口袋里的钱和身上的毛衣，并限令民夫把我抬走。这样，我就落入虎口了。

在被俘期间，我军被俘人员过着非人生活，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绝大部队同志都忠贞不屈，表现坚强。一批又一批轻伤痊愈的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挖洞破墙，逃回了部队。由于我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又是重伤成残，顽军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和三四十名重伤成残的同志一起转到福建浦城国民党残废军人教育院一个附属中队囚禁起来。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与程钊生（与福建地下党同志有历史关系）、杨贞泮在押解途中，乘他们看管松懈之机逃了出来。而后历尽艰辛和曲折的变化，又在斗争中找到了党的组织，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洪季凯，选自《皖南事变》）

材料十一　皖南事变遇项英

1987年3月，新四军史料丛书第七师顾问组在安徽合肥召开审稿会，讨论到皖南事变的情况时，引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虽然时过境迁，几十年岁月流逝，但在皖南事变中与项英见面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当时我们两个人在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二营分别任正副营长。我们7日抵丕岭，8日拂晓赶到高岭，歼敌第七十九师1个营，阻敌3天。11日晨赶到石井坑口，又奉叶挺军长之命奔赴东流山、长龙山一线坚守阵地，战斗异常残酷，部队伤亡很大。13日下午3时许，我们二人先后负重伤。团部派曾水元、王荣森两同志来接替我们。之后，我们离开阵地。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前来看望，并说晚上组织人员抬着我们突围。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抬着突围是很困难的，不如就地潜伏养伤，待伤愈后再突围到江北归队。经何志远请示，团领导同意我们带人就地隐蔽养伤，尔后待机突围。13日夜，侦察班、通信班的战士用担架抬着我们，暂时离开了部队。

皖南山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我们一行20余人在丛林中走了二三天到达石板坑。我们运用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积累的经验，选好一个隐蔽的山坡，暂时安顿下来。这时敌人还在大肆搜山，我们只好几餐露宿，以生米野菜充饥。过了一个月，形势渐有缓解，我们的伤口也逐渐好转。

2月中旬的一天，时近黄昏，我们二人爬到山顶观察情况。此时搜山的敌人已撤走，北坡山腰间有袅袅炊烟升起，隐约听得狗叫，估计有人家。我们决定下去搞点东西吃，顺便弄清情况。

晚上，我们带着几个战士，来到山腰，找到一户人家，经说明身份及处境，老乡才消除疑虑。这位自称凤木匠的老乡热情地做饭招待我们，并把半口袋蜜枣和一大口袋炒玉米，洒上盐水送给我们。我们给了他几块银元。正准备走，突然门外的哨兵报告说抓到了四个人，原来他们是项英派来搞东西吃的。除彭司宝和另一个现已记不起名字的以外，康东北原是项英的警卫员，吴生茂原是我营五连指导员，我们都认识，便放开了他们。饭后，他们悄悄告诉我们，项英副军长及周子昆副参谋长等40余人还在山上隐蔽，已断炊数日，也没有盖的，派他们下来搞点吃的。我们一听很高兴，随即在凤木匠小屋里给项英写了一封信：

项副军长：

您好，听到您安全隐蔽，我们很高兴。我们二人是五团二营正副营长，在长龙山作战时负伤，经领导批准，带20多人潜伏养伤，现已基本痊愈，能活动。如果首长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愿随首长一起突围，因为我们对铜陵、南陵、繁昌一带的地形很熟悉。

附马长炎同志履历表1份

陈仁洪、马长炎

2月××日

信写好后，我们将买的食物分给了他们一大半，还有一包烟叶，让他们带给项英，然后我们悄悄潜回隐蔽点。

第二天晚上，吴生茂、彭司宝按指定地点找到了我们，并送来一封项英的亲笔信：

陈、马：

你们带来的信和东西收到了，希望你们很好隐蔽养伤，注意团结，等形势好转了，会通知你们一道突围。吴原是你营指导员，如需要可留下，与我保持联系。

如健康允许，请你们二人来我处一趟。

项英

2月××日

收到信后第二天晚上，我们把人员安排好，便带上仅有的一条毡毯和一块油布，由吴生茂、彭司宝带路去见项英。他们的隐蔽点离我们并不太远，这个地方叫石廉坑，由于两山之间呈马鞍形，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与项英在一起的除周子昆外，还有李志高、谢忠良等40多人。

项英把我们二人叫进他住的小茅草棚，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关切地询问我们的伤势和同志们的情况。他穿一

件破烂的军棉袄，须发很长，人很憔悴，眼里布满了血丝。我们简单汇报了战斗经过和隐蔽养伤以及收容十几名失散人员的情况。项英沉重地对我们说："这次皖南事变造成这样重大的损失，我负完全责任，是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突围出去后，我会向中央作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苏联学习，回来后再继续为党作一点工作。"项英接着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还在搜山，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以求共同突围出去。皖南事变中剩下来的人，我们一定要争取安全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说到这里，项英流下了眼泪，我们心里也很难过，便提议早日突围。项英说，我们现在要好好隐蔽，敌人大规模搜山虽然已经过去，但重点搜捕还未结束，要隐蔽好，不要暴露目标，我们这里有些同志急于突围，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地下党负责人还未找到，地方党的工作还没有布置，我还不能走；二是目前的形势还很紧张，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付我们分为三个阶段，首长是大规模搜山，搜捕我被打散的同志和伤病员，这一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第二阶段，敌人还在所有路口设埋伏，堵截零星突围人员，所以目前突围也是不安全的，敌人的第三步是撤换保甲长，这时就会松下来，就可以安全突围出去了。所以说现在走的时机还不太成熟。项英接着又焦急地说："这次事变后皖南地区的斗争形势将会变得更复杂，我已派人去找地下党负责人胡明同志了，但至今还未找到。等他来后，我们好好研究布置一下，党的斗争形式要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而转入地下活动。我一定要把工作布置好后再离开皖南，使地下党少受损失。"

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周子昆躺在窝棚内一言不发。项英叹了口气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天天吵着要突围，说还要把周副参谋长丢下，只带我一人走，那怎么行呢？周副参谋长虽然腿部残废，但还是可以突围出去的。老周平时对他们要求严，批评多一些，有意见就要把他丢掉，那怎么能行呢？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老周一起带出去。"我们十分理解首长的心情，又感到现在突围确有危险，便向项英表示，我们愿意留下来担任警卫，等时机成熟带路突围。项英急忙说："那还行，你们内战时就是团营干部，并且还带着20多人呢！"我们说，可派个人去带他们，等突围时一起走。项英考虑了一下表示同意，便走出茅棚找人商量了一下，回来对我们说，他们都不愿意去带，怕突围时被丢掉。最后，项英说："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如果你们那里万一出事，暴露了目标会引起敌人注意，形势又会紧张起来，大家都不安全。你们的心意我知道了。回去后要好好隐蔽，注意保持联系"。当晚，我们回到原地。之后，我们又派人给项英处送了几次食品等物。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们与项英、周子昆的最后永别。

不久的一天下午，项英处提前做饭冒烟，敌发现后准备第二天搜山。老乡连夜告诉我地下党，项英等人闻信迅速转移。半夜时分，项英派人送来一封信：

陈、马：

我们隐蔽地点被敌发现，今晚已转移，联络地点由送信人告之。你处尚未暴露，转移否自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

项英、周子昆

3月××日

我们接信后，也立即转移到不远的地方隐蔽 3月16日晚上，李志高、谢忠良派10来人，抬着身负重伤的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来到我处，告诉我们，3月14日项英、周子昆已在蜜蜂洞遇难，我们悲痛万分。第二天晚上，黄诚留下治伤，其余的人返回原处。

两个星期后，李志高、谢忠良等带领40余人到石板坑和我们会合，除留下刘奎、李建春带领十几人组织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皖南游击斗争外，我们一行70多人，当晚从凤村出发，连续4天夜行军，终于一枪未发，安全突围，经北公里、六里墩、老虎山、油坊嘴，顺利到达江北无为东乡白茆洲大胡家，返回了部队。

（选自《军史资料》89年1期，作者：陈仁洪，马长炎）

材料十二　老百姓不答应

京沪敌胆寒，
东南健儿兴，
大江之南北，
奋战立奇功，
中流当砥柱，
惟我新四军。
亲日反动派，
太没有良心。
无端陷忠良，
碧血染茂林；
天仇与地怒，
举世起悲愤！
赏罪罚有功，
赏罚不分明。
军纪又军纪，
命令又命令，
乱命非治命，
鬼话无人听。
"执法的人儿，

就是犯法的人”。
全国老百姓，
大家不答应，
靠命令吃饭，
恐怕吃不成。
一九四〇年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邓洁）

1941的反“扫荡”作战

背景介绍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确定对华作战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战略，重点是确保由蒙疆及华北、汉口附近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沿海地区。敌伪将华北分为三种地区。敌伪统治区为“治安区”，主要由敌伪政权维持。敌我双方都可进入的游击区为准治安区，要派兵控制，不断“清剿”。抗日根据地为非治安区，要进行“讨伐”，反复“扫荡”。根据这一方针，从一九四一年春开始，敌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全面“蚕食”“封锁”“扫荡”“清剿”，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党中央、中央军委预料到一九四一年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对华北地区提出了长期坚持，不过于消耗的原则。华北、华中我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平时以小部队战斗于边沿区，打击敌人“蚕食”，主力部队休整。敌军“扫荡”时，以小量部队坚持内地，主力跳出合击圈，转移外线，组织游击集团，深入边沿区，敌占区，打击敌人心脏。各地区广泛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一九四一年各主要地区反扫荡作战简况：

七月二十日，华中日军集中一万七千余人，四路“扫荡”苏北盐城地区。新四军以第三师之第七、第八旅，第一师之二旅，在苏北进行了反“扫荡”作战。以一师其余部队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围攻泰兴、泰州，攻克古溪、黄桥。当敌主力南进“扫荡”苏中时，苏北军民收复阜宁，使敌被迫停止对苏中的“扫荡”。

八月十四日，敌军在全面蚕食、封锁的基础上，集中七万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铁壁合围”，号称“百万大战”。当敌集中合击时，我军以营为单位分散作战，摆脱了敌人合击，向敌之侧后出击。当敌分散时，我则适时集中兵力，歼其一部。经过两个多月作战，歼敌五千余人。

六、七、八月，敌军集中两万兵力扫荡冀中，大肆修路、筑碉、挖沟，进行所谓交通建设。到年底，据点、碉堡由一九四〇年的五百三十四个，增至一千多个。封锁沟、墙由一千五百余里增至三千五百余里。我冀中军民开展了交通战、地道战、地雷战，坚持根据地斗争。

五月下旬，日军集中四万兵力对冀东实行大包围，将我主力压缩在蓟县、玉田狭窄地区，我军苦战两昼夜胜利突围，六月九日基本结束反围攻战斗结束。八月后，我趁敌调往北岳“扫荡”之机，集中主力，跨越长城，进入热河境内，开辟了东起青龙、西迄潮河、北到平泉的热河南部地区。

在晋察冀军民开展反“扫荡”的同时，华北其他根据地也主动出击，予以配合。晋西北第三五八旅、于八、九月出击同蒲路北段，攻克忻口车站。晋冀豫太行我军，于八月开展了邢(台)沙(河)永(年)战役，经三昼夜战斗，摧毁敌平汉路西的第二道封锁线，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据点八处。冀南部队，于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一日，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次破击境内公路及附近据点，开辟了新区。第三八五旅及新四旅等主力部队，于十二月底，破坏了平汉铁路高邑至邯郸段，并将元氏至内邱间的封锁沟墙破坏。

四月十二日，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合击冀鲁豫内黄以南沙漠区，我第二纵队机关陷于重围，经苦战突围，转向外线，在濮阳县西南歼敌百余，迫敌于二十日退出沙区。

十一月三日，日军五万余人，对山东鲁中沂蒙山区实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我军跳出合击圈转至外线。当敌分区“清剿”时，主力又转入内线，积极打击敌人，迫敌撤退。作战五十多天，共消灭日军两千余人。

十月底，日军七千余人连续袭击黎城县境的第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十一月九日，黎城敌五千余人奔袭我设在辽县、黎城、武乡三县交界处的黄烟洞（黄崖洞）兵工厂。“集总”特务团在兄弟部队、工人、民兵的支援和配合下，进行了有名的“黄烟洞保卫战”，从十一日至十九日激战八昼夜歼敌一千余人，圆满地完成了保卫兵工厂的光荣任务。

材料：

- 铁道游击队
- 桑园突围
- 刘官屯歼灭战
- 雁翎队

材料一　铁道游击队

1938年，华东主要煤城之一——山东枣庄被敌占领后，一些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成立了一支游击队，由八路军苏鲁支队领导。队员武器很差，主要依靠大刀，但每个人都有飞车绝技，能飞身扒上高速奔驰的列车，也能纵身

从车上稳稳跳下。这支队伍在斗争中逐渐扩大，到1940年5月，根据八路军鲁南军区指示，公开打出了“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旗号，下辖四个队，每队十余人，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三条铁路线上，打票车、截军车，劫货车、扒铁道、炸桥梁，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严重打乱了敌人的战略运输线。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民众完全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著名的抱犊崮山区，是八路军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铁道游击队时，游击队员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进湖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上与敌人作斗争。

1941年春，日寇对我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铁道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的反“扫荡”斗争，在敌人的战略运输线上发动进攻。“夺车撞车”事件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战斗。那天，铁道游击队员跳上了一列飞驰的货车，控制了火车头，摘除了火车头与车箱之间的挂钩，将一长串车厢正好停在一座桥梁上，车头则继续前行，然后高速开倒车，向车厢撞去。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中，桥梁断裂了，倒塌了，十几节车厢象一条大蟒瘫倒在桥下，使铁路运输中断达一星期之久，阻滞了敌人对山区的“扫荡”。1941年冬天，我军棉衣无着。鲁南军区指示铁道游击队设法向敌人要冬衣。游击队了解到将有一列满载布匹、军衣的列车在津浦线上通过，就利用大雾的掩护，对列车发动突袭，夺到布匹一千余匹和大批军衣、军被，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部队的冬衣问题。

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的重大任务。由于铁道游击队的活跃，敌人加强了对铁道的守护，沿线碉堡林立，探照灯彻夜不绝，敌人还在铁道两侧挖了与铁道平行的深沟或筑起封锁线，以限制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因之，护送干部过铁路，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但铁道游击队员们依靠自己的忠诚、勇敢和高超技术，多次把从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到延安或从延安来华中的干部安全护送，越过铁路。仅1943年，便护送了三百多个干部，均未遭受损失。1943年5月陈毅同志去延安，就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越过津浦铁路的。

英勇的铁道游击队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大动脉上。他们不但取得了对日寇作战的一连串胜利，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也仍然在铁路线上同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徐矛，《抗日战争事件与人物》）

材料二　桑园突围
——冀中斗争生活片断

一九四一年，冀中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紧张，敌人“扫荡”更加频繁，敌占据点不断增多，特别是大清河北的十分区，在这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变成游击区，环境残酷，斗争尖锐。四月底，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军民。工作组有二十来个干部，出发时我们只带了警卫连的两个排（七十多人）和一部电台，还预定带回民支队一个营，和该支队的一个剧团，当时这个营和剧团正在徐水一带活动。

我们先到安新、容城一带，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当地群众扶老携幼，终日和敌寇周旋。当我们过漕河时，都要下马走过一座独木桥，我和警卫员骑的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高大的洋马，其它同志骑的是本地的蒙古马，结果几匹洋马过桥时都掉到河里了，随即趟水过到岸上来。这时，发现前方有小股敌人，没有接触。我们继续行军到了安新县的三台，十分区的二十九团正驻在那里。我们吃完早饭就休息了。九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因为我们除警卫部队外，还有一个主力团，完全有把握打退来犯之敌，所以边打边轮换休息，我还睡了一觉。击退敌人以后，傍晚我们整队出发了，到徐水县属的崔庄，跟回民支队的一个营及剧团会合了。

这天夜里在崔庄休息。拂晓前，徐水的敌人就出来了，于是又和敌人接触一次。回民支队掩护我们转移，从容城西面转到容城北面，再转到容城东南面。这时，敌人飞机不断侦察。我们原想过白沟河以东到大清河北部地区，但是经过地方游击队侦察，得知白沟河的敌人增加了兵力，拦河堵截，于是我们就又转到容城的南面，到了雄县白洋淀边的留通。在这里，和分区、地委的领导同志会合，表示军区对他们的慰问。这时他们也准备去白洋淀，研究下一步的斗争。于是我们一起到了白洋淀的郭里口。村庄四周都是芦苇，很隐蔽，在这里停了两天，连夜开会汇报研究工作。之后，就分头转移了。我们带着回民支队和剧团坐雁翎队的船，夜行穿过白洋淀，拂晓时到达白洋淀南边的北冯村。我们住在西街卫家大院休息了一天，当晚出发，穿过高保公路。我在前边，走得快一些，下半夜先到蠡县桑园。我睡了一觉后，后边的同志才陆续到达，还没休息，就听到枪响，被敌人包围了。原来是县大队驻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经转走，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丁铁石分别在村边布置了岗哨和警戒部队，紧接着回民支队就首先和敌人打响了。

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我们立即突围，出村进了道沟往西走，向着靠近敌人据点的方向转移。因为敌人出动，据点兵力必然空虚，靠近据点走比较安全。回民支队没有赶上我们，就向东南方向转走，突围出村后不远又和我们会合在一起了。

敌人紧跟着我们追了一阵。当时的战士对连续作战已是习以为常，连剧团的男女青少年，在他们年轻的女指导员指挥下都非常勇敢，可亲可爱，身上的棉袄、背包丢

掉了，却紧握手中枪，向敌人拼搏冲杀。敌人跟踪追击，我们总是边打边走，一天之内往返接触多次，当时真觉得白天长得很。那天打仗，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因为蠡县三区普遍挖有地道，连敌人的公路下边都通过去了，有的是村村相通，也叫地下三区。洋马目标大，一经跟敌人打响，我就不骑马了，徒步随部队行军转战、突围。后来，这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几经周折，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转到清苑至张登的公路边上，在旁就是敌人据点，因只有少数兵力龟缩在炮楼内，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从据点旁边跨过公路，胜利地摆脱日寇的追踪合击，进到了高蠡公路以西地区。黄昏时又折回到博野县的城东村，进入比较安全的地带。我们住在一个逃亡大地主的高墙大院里。经过一天的激战和急行军，一停下来才开始感到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我一扑到炕上连腿都抬不起来了。酣睡一觉，已过午夜，身心舒畅，精神焕发，昨天的紧张、疲劳消逝得无影无踪。随后，在朦胧的夜色中又整队出发了，从博蠡公路中间插过去，翌日晨回到了军区司令部驻地，正赶上庆祝“五四”青年节和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在东张岗搭台子开庆祝会，会后还举行了千人阅兵式，演了戏，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纪念活动，军民同庆，一片欢腾。突围中失散的马匹，还有文件、行李等，当地老乡都给全部送了回来。我们除警卫连有几个负轻伤的同志，没有其他损失。日军急如星火地调兵遣将，尾随追击竟日，一无所获。

桑园突围，仅仅是冀中一九四一年春季反“扫荡”的一个片断，就在这次突围前后，军民团结亲如家人，充分体现了冀中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时隔四十多年，忆及当年情景，犹在眼前，感人至深。事后诌诗一首，聊以抒情。

桑园突围破晓间，战士奋战苦衣棉。
寇追情急急似火，春日昼长长如年。
马逸人散阵不战，往来冲突西复东。
天似有罗地似网，此起彼伏相呼应。
回支骁勇天下闻，有女如龙叱风云。
从容迫敌却追兵，过路入营日西沉。
就榻疲顿举足难，梦少神安醉黑甜。
翌晨欢庆青年节，人马一一散复还。
地下有道道有沟，是真罗网疏不漏。
倭寇纵有黔驴技，人民眼底一蜉蝣。

（选自《纵横》84年2期，作者：吕正操）

材料三　刘官屯歼灭战

1941年10月中旬，《冀南报》、《太行报》、《延安报》相继刊登两则新闻《炮楼坐飞机》、《炮楼跳舞》，报道了我军用地道炸飞日伪军刘官屯炮楼的重大胜利。这次战斗是当时冀南区有名的漂亮仗，我是这次战斗的主要引爆者，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战斗过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41年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冀南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继频繁疯狂的扫荡，（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后，又推行“囚笼政策”，在公路铁路旁挖封锁沟，修炮楼，设据点，5里一炮楼，10里一据点，把根据地分割成“格字网”，企图消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军民生存的条件。从此，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时期。

我们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同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游击队积极活动，不断袭击敌人，主力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1941年10月11日，冀南军区七旅二十团，在故城县境内刘官屯打了一次漂亮的歼灭战：这一仗，打掉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打破了所谓日军坚固据点攻不破的神话。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里取得这一重大胜利，有力的鼓舞了冀南抗日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刘官屯位于故城至清河县之间，是运河以西一个重要的日伪大据点。东面是运河，北面是德石铁路和衡水重镇。它是疏通日伪军东西联络，防守跨运河的武城桥，保障敌人水陆运输，防我抗日部队伏击的主要据点之一，也是为分割抗日根据地，瓦解我军民游击战，运动战的重要据点之一。

1939年6月19日，日伪军驻扎在刘官屯，该村共有五六百户居民。日军在村子的西南角上，开始修筑一个大据点，到处要人抓夫，扰得这一带民不聊生，鸡犬不宁。这个据点占民房居宅百亩左右，四周筑有围墙，墙高约10公尺，宽约4公尺，围子中间又修筑一道高墙，把围子分成南北两块，南部驻日军，北部驻伪军，有南北三个大门，北大门接连刘官屯村口。整个据点，共修筑大小碉堡十五六个。围子正中的一个大炮楼共五层，高30公尺，由日军控制。围墙外挖有三道壕沟，各宽5公尺，深4公尺，外壕和围墙之间，设有三道梅花形铁丝网。围墙上还有各种工事、交通壕和射击孔。据点内平时常驻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连队和伪区政府一个保安队，除日伪军昼夜警戒外，还强迫群众为日伪军站岗和巡逻。日伪军吹嘘刘官屯据点是攻不破的堡垒，而且可以孤守三个月不要外援。刘官屯据点对我军民的活动构成很大威胁，因此，冀南军区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根据刘官屯敌情，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再道、参谋长范朝利、部长刘华清决定，七旅发起进攻刘官屯和武官寨的战斗，由十九团负责攻歼武官寨之敌，在刘官屯的北面10华里，该据点内汉奸皇协军一个中队百人左右。二十团负责攻歼刘官屯之敌。其他部队则在故城、清河、武城和枣强等待打敌援。

根据军区和旅首长的指示，团长徐绍恩、政委李汉英决定以奇袭的战术全歼刘官屯之敌。其具体部署是，以二

营五连，七连为突击连，六连为预备队，一营为二梯队，由七连从据点北门实行攻击，五连从据点东北角上实施偷袭。任务下达后，二营教导员张广和立即对部队进行了政治动员，说明此战斗的意义和胜利条件，号召大家发扬我团善于夜战，近战，村落战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动员后，人人精神振奋，士气高昂，指战员们争着要求参加突击班，突击排。全连一致表态要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日军的扫荡，以胜利来保卫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战前准备工作一片紧张，战士们有的修梯子，有的磨刺刀，有的擦拭武器和准备手榴弹。五连长陈世范对战斗作了更具体的部署，划分了侦察组、破坏组(扫清前进障碍物)、梯子组，火力组和突击排。战斗即将展开，指战员们心里都充满了喜悦和激动心情。

1941年10月11日夜间，部队出发了，全团成一路纵队由驻地向刘官屯急速前进。夜间天空中月隐星稀，田野，村庄全都隐进夜幕深处。突然，天气大变，狂风大作，刮得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指战员们顶着迎面扑来的风沙，互相拉着背包带继续前进。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虽然给行军带来困难，但是对我们完成偷袭刘官屯的战斗任务是最好不过了。尖兵班在一位老大爷的带领下行进。为了高度保密，部队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遇村绕道而过。经过6小时的急行军，进入刘官屯村边，行军放慢了速度。全连进村后，没有发现群众放的岗哨，整个村庄一片肃静，真是人不知，鬼不晓。各突击连队到达了指定位置。五连长陈世范亲自带领侦察组走出村口，突然看见据点的炮楼上有微弱的灯光。再向前摸原来是一片干水坑，数道梅花形铁丝网设在干水坑两侧连接护围壕，陈连长和战士们一看到这种地形，又高兴又紧张。当时对我们最严重的考验是一切行动都要保持高度的肃静，并迅速剪断数道铁丝网，秘密打开一条通道。

连长一面命令机枪组准备掩护破坏组行动，一面命令破坏组开辟通路。组长吴明东同志，带领全组人员秘密摸到铁丝网前。这时狂风刮得呼呼作响，在大风掩护下，吴明东手握破坏剪咬住铁丝网，再垫上棉布，两手慢慢用力，只听"咯嘣"一声，铁丝网被剪断。约半小时三道铁丝网都被我们破坏组的英雄们弄开了，而碉堡中的敌人丝毫也没有发觉。连长一声命令："投弹组，梯子组，突击排!"投弹组迅速冲到围墙下，掩护梯子组，梯子组的六个战士抬着梯子，迅速穿过通路，把梯子靠在围墙上。紧跟在后面的突击排，在排长赵贵海带领下，像猛虎一样登上梯子，压得梯子嘎吱嘎吱直响。突击排刚跳上围墙，在村里狂欢嫖赌的据点伪军队长李凯竹发觉我军进入刘官屯后，拔腿往据点内跑，在据点北大门以外被我军俘获。我们教育他立功赎罪，让他领路到据点喊大门。守门的伪军一听是队长回来了，马上打开了据点北院大门。我军指战员一拥而入。伪军有的睡觉，有的赌钱，毫无防备。我军一枪未发，进入据点院里，听到碉堡的哨兵喊"干什么的!"我们突击勇士立即冲进碉堡，一刺刀结束了哨兵的生命。这时围子墙顶上和营房门口都有我军。在院里隐隐闪出一个解小便的伪军，这伪军听到声音，又看见围墙上的人影，知道情况不妙，便狂叫一声："八路来了!"扭头就跑。我们突击班的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爆炸声、枪声四起，震醒了正在睡大觉的敌人。还没有等敌人搞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勇士便冲进伪军宿舍门和窗口，用刺刀对准炕上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的伪军，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有一个屋里的伪军妄想逃跑，我二班的战士堵死门口，大喊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伪军们乖乖地缴枪投降了。战斗很顺利，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攻克了围子北半部的伪军据点，生俘伪区长吕相亭和伪军200余人。我军无一人伤亡。为平民愤我们当晚处决了吕相亭。之后，陈连长命令三排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日军反扑，命二排打扫战场，一排占领围子北部所有碉堡。

10月12日上午，驻在围墙内南部的日军依靠有利的地形条件，企图夺回伪军丢失的阵地。日军顿时疯狂起来了，机枪、步枪、掷弹筒、手榴弹一齐向我军扑来，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弹片横飞，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指战员坚守的院子里和房项上，战斗十分激烈。连长大喊一声："敌人要反扑!三排机枪班封锁日军大门?"果然，日军约十几个人在火力掩护下，领头的端着机枪一边射击，一边向北跑，从中大门冲了出来。在这紧急情况下，我三排机枪班两挺机枪一齐射击，同时我九班投出一排手榴弹，打得敌人连滚带爬，拖着死尸又跑了回去。敌人反扑失败了，但是经过"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军又利用大炮楼居高临下，对着我们占领的所有房屋，投掷大量手榴弹、燃烧弹和毒气弹。靠近围墙的一片房子被烧光了，熊熊烈火冲天而起，风助火势，越烧越大，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毛巾沾上水捂在嘴上，一边战斗，一边扑灭大火，看来日军企图再次反扑。对日军这种疯狂气焰，战士们毫不畏惧，连长立即命令，"全连上刺刀，准备同日本鬼子拼!机枪班封锁大门和围墙!"还没有等到日军反扑，我们两个连队便组织了两个排，在距敌人20公尺左右的地带，与围墙内日军展开了一场手榴弹较量。无数颗手榴弹像下饺子一样投进日军大院内，炸得日本鬼子不敢靠近围墙，都龟缩在炮楼内和房子里。狡猾的敌人一招未成又来一招，他们利用火力优势，从各个碉堡的枪眼里向我们实行火力封锁，切断我连与周围部队联系。双方又展开了封锁与反封锁的战斗。日军的炮楼在高处、明处，我军在低处，暗处，我们便从房顶上、窗子里、房角、墙边瞄准敌人的枪眼进行还击。冷枪实弹，弹无虚发。果然生效，打得敌人把炮楼上的枪眼都堵起来了。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老实多了。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我们又发起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让其投降。但敌人死守待援，拒不投降。我们如果硬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团长、旅长决定，为了全歼日军，采取挖地道用炸炮楼的方法歼灭该敌。并在天黑后，命四连、六连换下五连、七连。

六连连长吉振江，四连连长苟正银，亲自勘察地形，布置兵力、火力。六连指导员动员大家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尽快挖通地道，抢到敌人援兵到来之前，炸毁大炮楼。

10月12日，军区首长指名，叫我带着两桶自制黑色炸药和40公斤黄色烈性炸药，及电池、电线、火具等必需引爆物进驻刘官屯据点北院。根据指挥部决定，在北大院靠近大炮楼最近一座房子里，一场挖地道的战斗开始了。当时旅长、团长、政委昼夜不停和我们干在一起，一边指挥，一边亲自用脸盆往外传运土。苦干一天一夜挖了30公尺穿过围墙的地道。当时没有测量仪器，在洞内用目测。挖地道必须保持深浅方向绝对正确。为此，我们每挖10公尺就向上打通一个小孔儿，伸出标杆以测方向和深浅。在地道内指战员挖掘坚硬的粘土很费力，汗流浃背，汗水和泥水搅在一起。开始用脸盆往外端土，为加快出土速度，改用四轮的木箱运土，大大加快了挖掘进度。同时，部队还针对有的战士情绪急躁，对挖地道不理解，展开了热烈的民主讨论。易良品旅长说："我们挖地道流了汗，是为了少流血。我们没有打炮楼的炮，可以用土炸药代替洋大炮。我们只用手榴弹、刺刀攻打敌人炮楼困难大，而且也不适合我军不打消耗之仗的策略。"通过军事民主，战士们统一了思想认识，干劲越干越大。

被围困在炮楼的敌人不甘心束手待毙，他们从炮楼里经常对我军进行猛烈扫射，小炮、手榴弹又轰、又炸，并借着猛烈炮火的优势不断地向外反扑，在我军指战员的奋勇还击下狼狈地缩回楼内，连续的震耳爆炸声，冲散了战士们连日的疲乏，而且振奋了精神。

10月13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武官寨皇协军据点已被我军攻克。胜利鼓舞了我军斗志，指战员发出了欢笑声，大家忘掉了疲劳，只有一个想法，快点挖，挖到炮楼下就是胜利。

第三天(14日)，太阳偏西，我们终于挖通了60多公尺地道。为了充分发挥炸药的威力，我们又从大炮楼西北面洞内墙底脚抽出20多块砖，我一人把40公斤黄色炸药和两桶黑色炸药用运土箱送入地道，放入炮楼墙底脚洞里，把八个自制土信管分别插入黄色炸药管槽内，接好信管，把四条线引出洞外，连接上两块大方电池。这时，易良品旅长在房顶我军掩体工事里，观望被围困敌人的动向，并转身对我说："武城来了增援敌人，只距我们8华里。争取时间，尽快引爆。"我回答说："保证不误。"几分钟之后随着一声巨响，炮楼同坐飞机一样上了天。大地被震得乱晃，翻滚的黑烟和尘埃构成了我有生以来未见过的壮观场面：天昏地暗，好似八级地震，周围方圆20里村庄房屋的窗纸震破，砖瓦泥土四处飞扬，铺天盖地砸在地面和战士们的身上，我也被砸成骨折以致伤残。突击排的同志成了黑人，呛得大家嗓子发辣。围困炮楼的我军指战员欢呼雀跃，叫好不止。只见五连连长陈世范，七连连长胡孝连命令两连梯子组一齐把梯子靠在墙上，战士们迅速登梯，翻墙而过，冲进敌据点，只见日军大炮楼被炸成一个"大坟包"。七连上围子南侧碉堡群，五连冲进日军营房，逐屋搜索。在大炮楼西边的小岗楼内的七个日军看到大势已去，用碰火无柄手榴弹自杀身亡。在另一间房子里，发现一个日军正向床底下钻，我们向前用刺刀对准他大喊："缴枪不杀，出来！"他转身跪在我们面前求饶："我缴枪。"我们感到奇怪，怎么日本人也会说中国话？一问，才知是个汉奸翻译官。

这时，我们五连奉命来挖"大坟包"了。据翻译官讲，日军小队长宫地和大部分日军都埋在"大坟包"里。因为在我们挖地道时，日军小队长误认为我军从地道冲进大炮楼，所以把大部分日军布置在底层。

我们当时挖"坟包"的劲头可大哩！希望捉几个活的，于是挖的挖，搬的搬。埋在上层的敌人，被砸得半死，迷迷糊糊。等挖开木料和土坯，通了空气，他们才慢慢地又活了。突然有一个日军亡命徒，拼命挣扎推倒我们一个战士，翻手抓到腰上的手榴弹，想同我们同归于尽。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王士英和李广和立即扑过去，抓住日军的手腕，大喊："不准动！"另一战士用刺刀对准日军的胸膛。翻译官随即向日军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时日军的狼狈相毕露，双膝跪在地上向我们求饶。我们高兴地喊："日本鬼子向我们磕头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先后共挖出活日军六个。另有三个日军从军犬出入的洞口爬出潜逃，结果被我军发现击毙在吴家道沟。为了解除日军俘虏恐惧心理，叫翻译官向日俘宣传我军对日军俘虏政策。最后从底层又挖出日军小队长(负重伤)及12具尸体和一大批枪支弹药。

炸炮楼的巨响声，传到冀南军区指挥部，刘志坚主任和张双群同志(陈再道的夫人)立即骑着战马急驰到刘官屯。这时烟雾灰尘还未全消。刘主任发表了简短讲话，我军的俘虏政策是对生俘优待，死的按我军战士同样安顿。把敌人尸体同样装入木棺材后，排列在被炸炮楼的北面，以便敌人对我军俘虏政策的了解。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我们以极少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又动员群众，拆除据点的围墙碉堡和房屋，平整外壕和铁丝网，彻底拔掉了刘官屯这个安在我们根据地的"钉子"，拉开了平原消灭日军炮楼的序幕。

军区首长为了保护我不致于遭敌人报复暗算，对外宣传，爆破参谋张增林同志光荣牺牲。还宣布给张增林同志以表彰，并称张增林同志是抗战的支柱、建国的栋梁、

国家宝贵财富。

刘官屯的胜利，惊动了日军侵华司令。10月15日，日军从北面一些大城市调来了30辆满载的日军汽车，进入刘官屯，企图寻找八路军，可是我军早就转移了。敌人架起机枪，把刘官屯老百姓集合到一起，追问我军动向，还在村外打了两发炮弹。为了防止我军再挖地道爆破，从此，敌人再修据点时一定把炮楼建在村外开阔地带。

（选自《纵横》95年4期，作者：张增林）

材料四　雁翎队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啊，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敌人的小汽船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每年三千万元的勒索，和无止境的奸淫烧杀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渔网和雁袋，划着鱼船掮着猎枪，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结起来了。

一个月，两个月……

无数的鱼船和猎枪，在打雁人殷金芬的奔走号召下，"为着咱们的白洋淀，也为着咱们的大雁和鱼虾……"的誓言声里，组织起来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每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的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硬排子"，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

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缜密的埋伏网，猎枪从每一片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白洋淀湛蓝的湖水，被枪声翻搅起来了，一望无际的荷莲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傍晚再听不到饲鸭人嘎哑的吆唤，清晨再听不到那幽美的采菱歌。

秋天，数十里深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苍白的芦花，偶而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刺刺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和野鸭，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上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他们依仗着惊人的水性和射击，依仗着芦苇和水藻的保护，三三两两驾着行驶如飞的硬排，到处分散活动，袭击敌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一声呼啸，几发信号枪，周围所有的雁翎船，便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有时为着某种必要，他们也曾在夜雾和晚风飘拂着的湖面上，将成百的雁翎船集中起来，趁着月色，悄悄地掩护着我们的水上运输物，安然行进。有时他们也会在一个桔色的黎明，突然包围了敌人的水上据点，给以猛烈的袭击。

冬天，白洋淀广阔的湖面为明净的冰块凝固，我们又将看见无数只插着雁翎的冰橇，象一枝枝的飞箭，在湖上穿过。

1939年的初秋，为了截击敌人一个运输汽艇，他们以十几只硬排，二三十个勇敢的队员，潜入了赵北口至葛利口的中间地带。那里是一条长十里，宽半里至一里的水路要道，两旁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蒲草，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去，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了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

不久，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暗哑了的运输艇，近来了。突然在芦苇的边缘，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猎枪之一种，枪筒特别长，射程较一般土枪为远。）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

这样，他们安然地割断了两船之间的绳索，捆绑了所有的五个敌兵，用自己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着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最使他们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支三八式，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

他们锻炼了自己的勇气，继续着这样的战斗。……

不久，敌人高叫着"平靖湖面"，向雁翎队复仇，砍倒了芦苇，刈割了蒲草，用大批的汽船和木船巡逻湖面。同时在每一只船上，高高地竖起了梯凳，设立了了望哨，依仗着他们优越的火力，使二百米以外的大小船只不能靠近一步。这时，我们的雁翎队，便不得不转变他们的战斗方式，采取更分散的行动，实行村庄伏击。就在散布于白洋淀广阔湖岸，象无数岛屿似的村庄边缘，雁翎队的队员们，化装成包着头巾的洗衣妇，或是悠闲地垂钓者，在相隔不远的距离内，默默地工作着。一遇到了单独的敌船，或其他可乘的时机，呼啸一声，很快地从岸边隐藏地里，拔出自己的枪枝和马刀，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一面泅水前进；直到完全消灭敌人的抵抗为止。有时候，他们也用衔着空心的苇杆透换空气的方法，带着武器，作数小时以上的水底埋伏，以待机颠翻敌船。虽然他们的血，也常和敌人的血一同染红着白洋淀的湖水，但这样自发的群众自卫战争，更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憎恨，使他们对敌斗争更加坚决。

1940年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模范的农村共产党员殷金芬同志，把这些勇敢的雁翎队员们集中起来了。经过许多次船上座谈会，和八路军的一些教育和训练，雁翎队开始变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队伍，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殷金芬同志的率领下，有计划地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了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方法，封锁了白洋淀中

的每一条水道，又配合着我八路军水上部队，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不仅使我们的首脑机关得到屏障，而且在一旦发生敌情时，更可使我们的部队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在洪水第二次淹没了冀中，波浪泛滥的白洋淀上，我们光荣的雁翎队的弟兄，从年轻的采菱者，到白发苍苍的打雁人，又全部投入了险恶的战斗。他们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大批能漂浮于水面的"葫芦水雷"①，把它们普遍的埋伏在每一条航路的水藻下，人不知鬼不觉的爆炸了无数只往来于天津保定间横行无忌的敌船。

这样，在保卫白洋淀的战斗中，雁翎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白洋淀周围的群众。在整个夏季和秋季，除去每日回家做饭外，已长期的生活在船上，配合着雁翎船和八路军的水上部队，向敌人战斗。

四五年来，我们勇敢的雁翎队弟兄，就是这样灵活的与敌人战斗着，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因此在这个长长的时间内，白洋淀始终是冀中最坚强的堡垒之一，它同着千万只神出鬼没的雁翎船，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

让我们遥向着雁翎队的弟兄们致敬吧，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

1943年8月7日

（1943年8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作者：穆青）

狼牙山五壮士

背景介绍

1941年秋，日本侵略者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扫荡。9月25日，3500多名日军分几路包围了狼牙山区。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广大群众安全转移。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5名战士奉命在狼牙山阻击敌人，打退了鬼子的无数次进攻。在最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5名战士宁死不当俘虏，一起跳下悬崖。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挂在树枝上，最终得以生还。五壮士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日到底的坚强决心。

材料：

- 难忘的狼牙山战斗
- 狼牙山——牛角壶山五壮士
- 棋盘陀上五壮士

材料一　难忘的狼牙山战斗

我出生在河南省沁阳县（今沁阳市）。1939年夏天，我在济源县（今济源市）王屋山上，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太行支队部队。部队改编后，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

一

1941年秋天，日本鬼子调集大批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军主力。

9月25日，3500多名日伪军，分几路向狼牙山区合围。为掩护主力部队、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我们班奉命坚守狼牙山，牵制敌人。

我们六班共有五个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还有胡德林、胡福才和我。天黑以后，我们集中在一个小山坳里，刘福山连长和蔡指导员向我们详细地交代了阻击任务和具体方案。刘连长说："你们班带领一个机枪组顺这条岭占领西边小山头，那下边是'小鬼脸'，再下边是'阎王鼻子'、'南天门'、'上天梯'，你们要充分利用这些险要地形，顽强抗击敌人，胜利完成这次阻击任务！"蔡指导员说："你们一个人要对付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日本鬼子，你们的任务很光荣，很艰巨。我军主力和群众能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全看你们能不能死死地拖住敌人！"我们齐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机枪组长孙得胜带领两名机枪手，扛着三挺轻机枪，跑步赶到。刘连长说："你们要密切配合六班，胜利完成这次阻击任务，明天12点前，不准敌人越过这个小横岭！"这时，邱蔚团长来了。他看看我们，又看看机枪组的战友，满意地笑了。他说："你们要象狼牙山一样，巍然屹立！"

当最后一批部队和群众攀上来以后，我们就和机枪组的战友一起，踏着星光，开始埋设地雷，从"上天梯"、"南天门"、"阎王鼻子"一直埋到"小鬼脸"，还把敌人可能经过的山梁、沟岔都埋了。地雷埋完了，就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串通导火索当地雷用。

埋完地雷已是后半夜了。班长对我和胡福才说："你们两人放哨，监视敌人，其余同志抓紧睡一会。"一直等到东方发白，还不见鬼子动静。胡福才急了，我把刺刀扎在地上，耳朵贴着枪柄，仔细听了一会说："福才，鬼子开始

① 此种"水雷"系将葫芦剖开，挖去肉囊，把炸弹放入制成。其作用不亚于手榴弹，若一处集中数枚以上。爆炸力当更为猛烈。

行动了！”我俩赶紧跑去把情况报告班长。马宝玉立即叫醒大家，让作好战斗准备。

二

天亮了。我们爬在小山头上，看见漫山遍野都是鬼子兵。班长果断地说：“葛振林，你和胡德林带一挺机枪在左边，胡福才和宋学义带一挺机枪在右边，我和孙组长在中间。咱们拉开距离，鬼子一上来就来个全面开花，让他们听听咱这八路军‘主力’的枪声”。

话没说完，“轰隆隆”，南天门传来了山崩地烈的巨响，鬼子已经走进地雷区了。紧接着，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整个狼牙山到处都是落地炸雷般的响声。后边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疯狂地向山上扑来。等鬼子快到“阎王鼻子”的时候，班长大喊一声：“打！”随手扔出一颗手榴弹，炸翻了爬在最前头的几个鬼子。接着，大家也一连串地把手榴弹投入敌群。左中右三挺机枪同时喷出火舌，向敌人扫去。爬在天梯上的鬼子，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蹶着屁股等挨揍。一个鬼子被打倒，后面的鬼子跟着被撞下悬崖。

躲在天梯下面的日军指挥官，望着狼牙山顶峰——棋盘陀下的一座山神庙和小庙上空的无线电天线（当时，八路军团以上机关才有）以为是八路军主力，于是，命令几十门山炮一齐对着小山头轰击，两架飞机轮番轰炸、侦察。刹那间，我们阵地上硝烟滚滚，铁石横飞。这时我们躲在山洞里隐蔽。炮火一停，班长说：“敌人就要进攻，赶快进入阵地！”

果然，鬼子向山上扑来。当鬼子爬过“阎王鼻子”，快到“小鬼脸”时，只听班长大喊一声“打！”我们五支步枪和三挺机枪立即喷出仇恨的火舌，密集的子弹射向敌群。班长使出神枪手的本领，一枪一个，枪枪不空。我和胡德林、胡福才瞄好准星，沉着射击。有谁不小心放了空枪，就连喊“可惜”、“浪费”。机枪手们采取“点射”的方法，一枪一个。敌人偶尔扔过来的手榴弹，我们拾起来随手往山下一扔，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敌群就又倒下一片。

就这样，鬼子的第二次冲锋又被击退了。他们摸不清山上到底有多少兵力，攻不敢攻，退又退不得，企图寻找另一条进山的路。但我们坚守的小山头，正卡在山道中间，是进山的唯一通道，只要扼守住这一点，鬼子插翅也难进山。无奈，他们又组织了两次冲锋，都被我们打下去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当打退敌人第五次进攻以后，太阳已经偏西，估计早过12点了。班长大声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一纵身跳起来，转身朝山上走去，我们也大步跟了上来。

翻过小横岭，眼前出现了三岔路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向北，是主力和群众转移的路，走这一条路，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主力部队。可是鬼子就在后面跟着，这会给主力和群众造成严重的威胁。另一条路向南，这是通向狼牙山顶峰——棋盘陀的路，这是一条三面峭壁、一面陡峻的绝路。走这一条路，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见班长在那里沉思片刻，右手一挥，说：“跟我来！”毅然地朝南路走去。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对跟上来的孙得胜说：“孙组长，你带领机枪组的同志向北撤！”孙得胜三个一听，惊呆了。他猛然走前几步，紧紧抓住班长的手，说：“六班长，我们活，活在一起；打，一块儿打；死，也死在一块儿！”班长坚定地说：“不行！机枪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是目前我军消灭敌人的主要武器。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安全地带回主力部队！”

他们走后，我们抬头看看棋盘陀，它象一尊巨人一样，巍巍地站在那里。棋盘陀下边，山神庙上空的天线，随风摇动，呜呜作响。胡德林说：“天线怎么还不拆除！”班长说：“怎么能拆除呢？我还怕鬼子看不见呢！”他俯身拾起一块白灰石，在三岔路口的石壁上，朝棋盘陀方向醒目地划了一个路标，然后一纵身，向三面都是悬崖陡壁的狼牙山顶峰攀去。副班长提起枪，第一个跟了上去。我和胡德林、胡福才也一跃而起，跟着向上攀去。

鬼子爬到三叉路口，顿时没了主意。班长急中生智，“呼”的一枪，把鬼子指挥官的帽子打飞了。我们几个人也打出了排子枪，打倒了几个鬼子，把鬼子吸引了上来。

棋盘陀顶峰是一个方圆很小的地方。后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谷。悬崖边的一条古柏树下卧着一块大青石，青石上刻着一副棋盘。相传有两位神仙云游到这里，曾在此下过棋，棋盘陀即由此得名。我看看棋盘，又瞅瞅副班长，心里痒痒的，说：“这里上有蓝天，下有白云，中有清风，西有斜阳夕照，能在这里杀上几盘，那才过瘾呢！”副班长说：“等打退鬼子的进攻，咱俩杀上几盘，分分高下。”

我们阵地的工事还没修好，鬼子的炮弹就象冰雹似地打来。炮火很猛，山上的蒿草、灌木和断树残叶都着了。副班长隐蔽在一块大石头的草丛里，只听胡德林大喊：“班副，着了！”我扭头一看，只见副班长的肩背上冒起了火苗，他连扣子也没解，使劲一撕，就把棉袄脱下扔了。嘴里还说：“刚发下的新棉衣，多可惜！”

鬼子的第一次进攻被我们击退了。

当鬼子再次冲上来时，班长发现自己没有了子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与此同时，我一扣扳机，枪膛也是空的。胡德林、胡福才和副班长也都一齐问，“还有子弹没有？还有手榴弹没有？”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枪膛里竟然都空了。我们都十分紧张。不知谁先用石头向敌人砸去，随即我们就向敌人发起了一场滚石战，又把敌人压了下去。

棋盘陀又静了下来，只见班长叫过副班长，他二人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回身对我和胡德林、胡福才说："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经过这次战斗的考验，证明你们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根据你们平时的要求，我和老葛介绍你们入党。"我们三人听说被批准入党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们急忙举起右手，由葛振林带领我们向党宣誓。班长迅速掏出小本子，给我们三人分别写了入党介绍信，又在小本子上写了几句，然后装进上衣口袋说："你们把介绍信保存好，即使我们都牺牲了，党组织也会从我们身上找到你们三人的入党证明信的。"

鬼子又冲上来了。他们摇晃着膏药旗，嗷嗷叫着："抓活的！抓活的！"山上活动的石头已经搬完，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杀伤敌人了。班长从挎包里掏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拧下盖子，拉出导火索，稳稳地握在胸前。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班长留给我们自己用的，大家也都会意地紧紧围住他，说："班长，拉吧，我们死也不当鬼子的俘虏！"就在这时，窜在最前头的几个鬼子恶狼似地扑了上来。班长忽然右臂一挥，又把这颗手榴弹扔了过去，炸得鬼子晕头转向，不敢再贸然向前扑。班长操起三八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神情严肃地说："砸吧！我们人牺牲了，武器也不能留给鬼子！"说罢，举起枪，朝棋盘石上猛地一摔，"咔嚓"一声，枪成了两截，随手一扔进了深谷。接着，我们四人也都摔坏枪枝，扔下悬崖。班长整了整军帽，拍了拍身上的灰土，从容地走到悬崖边，举起双手高呼："现在，就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对党、对民族、对祖国的忠诚吧！"一纵身跳下了万丈深谷。紧接着，我和副班长、胡德林、胡福才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相继跳了下去。

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苏醒过来了。我慢慢睁开了眼睛，看到太阳快要落山了，西边半个天都是血红的，狼牙山的石头、树木、蒿草也都是血红的。我想翻翻身，翻不动，浑身仿佛针扎一样疼。我伸手向身上摸摸，我的衣服到处都是豁口，抬手一看，满手鲜血。我又伸手向身下摸摸，身子下边并排几棵小树和一块石头，我正是被这些东西挡在半山腰而活命的。我吃力地抬起头，扒开树杈子往下一看，吓得头发梢都支撒起来了，再往下不远，就是直陡的悬崖，要不是被树杈拦着，我早已摔得粉身碎骨了。我侧耳细听，山上山下没有一点声音。我断定鬼子已经走了，就咬着牙，用力翻过身，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正爬着，忽听"哗啦"一声响，我一骨碌躲在石头后面喊："谁？"

"我，你是宋学义吗？"我一听是副班长的声音，忙回答说："是我呀！你怎么样？能动吗？"副班长说："我摔坏了，还能动。他们几个呢？""一块下来的，不知道。"

副班长的伤略轻些，他爬上了以后，连喊了我几次，好一会儿我才爬了上来。他拉住我的手，把我拽上了崖头。我的腰骨摔坏了，一上来又大口大口地吐血，好一会儿才止住。我俩休息了一会，爬到班长他们跳下去的地方，放开喉咙喊："班——长——，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我们喊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可回答我们的，只有空谷的回声。我想起班长刚才还为掩护我而负伤的情景，想起胡德林、胡福才平时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痛心地大哭起来，副班长也放声大哭起来。

我和副班长一路走，一路打听，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找到部队。刘连长和蔡指导员老远就来接我们，还派担架抬着我们。全连同志、机枪组的战友都来看望我们。我们和着泪水，讲述了战斗经过，讲述了班长和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的情景。全连战士、机枪组的战友都哭成了泪人。我俩随即就被送到了团部卫生队治疗和休养。

反"扫荡"结束后，晋察冀军区召开了庆功大会。司令部专门颁发了嘉奖令，杨成武首长代表中央军委和聂荣臻司令员给我和副班长佩戴了独立自由勋章，还号召全军将士向我们学习。后来又在狼牙山主峰棋盘陀修建了"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还将山下的五马义村更名为"五勇村"。

（选自《党史文苑》89年3期，作者：宋学义）

材料二　狼牙山——牛角壶山五壮士

编者按：

这是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作者在纪念抗战胜利50年之际，再次采访了当年跳崖的幸存者之一，湖南省衡阳军分区离休干部葛振林。除了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之外，作者认真地核实了五壮士跳崖的山头。它是狼牙山众多山头的一个，但不是像歌里唱的，"棋盘坨，山连山"中的棋盘坨山，而是至今仍名不见经传的——牛角壶山。

时间虽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也是78岁的老人了。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击日军侵略者的可歌可泣动人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我的老家在河北曲阳县。我8岁失去了母亲，从小给地主干活，受尽了压迫和剥削。1937年4月，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斗地主恶霸。后来八路军来到我们村，帮助我们成立了各种组织，我当上了民兵队长，带领民兵减租减息，征粮运粮，拥军优属，支援前线。1938年2月，我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

在抗战期间，我曾参加过宋城、阜平、东庄、大龙华、黄土岭、南坡头、狼牙山、百团大战等大小几十次战斗。

1941年8月，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兵力，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实施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进攻狼牙山地区的日伪军是旅团长高见指挥的部队。

狼牙山座落在河北省易县，因其峰峦状似狼牙而得名，有5坨36峰地势险要，是晋察冀边区的东线大门。它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而且是我根据地的仓库，山上存放着许多弹药、装备和粮食。

9月23日，我们团长接到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通报，得知正在扫荡的敌人，对狼牙山周围可能有大的行动。他便立即进行部署。当时，团主力调出去保卫军区机关了，留在狼牙山只有我们七连和部份民兵。我们驻扎在林泉，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接到命令，立即集合部队出发。

9月24日凌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着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包抄。被合围在狼牙山上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和周围村庄的群众达三四万人。团长命令我们七连担任后卫，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突围，等大家安全转移后，留下一个班拖住敌人，最后转移。

我们班得知这一消息，便跑去找指导员求战，要求把最后拖住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连长和指导员一商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时，我们班除因伤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人：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还有我。我是副班长。

24日午夜，团长接到杨成武司令员命令："敌人口子已开，马上突围。"

眨眼工夫，在清冷的月光下，三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由部队掩护着，顺着棋盘坨路，悄悄地向碾子台方向转移。

团长临走时，特地看望了我们班，并对我们说："突围的队伍和连主力能不能安全地跳出包围圈，全看你们能不能把敌人死死拖住。从现在起，你们一个要对付敌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如果你们充分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就一定能完成任务。"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请团首长放心！"

1941年9月25日，天刚蒙蒙亮，突围部队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狼牙山，敌人却认为我们的主力被他们包围住了。天一亮，便像群饿狼一样扑了过来。我们七连和留下的民兵密切协同，分兵把口，灵活御敌，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地雷，从各个方向隐蔽朝敌射击，造成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棋盘坨是狼牙山的最高点，海拔1105米。从东西水村往棋盘坨爬上来的敌人，一路上伴着地雷的爆炸，死了四五十人。日军山地指挥官高见和叛徒赵玉昆确信网了一条大鱼，于是更加疯狂地进攻。

在激战中，连长刘福山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的战士大都牺牲了，情况危急。指导员把连长转移到一处草丛里，让一个战士守着，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在山上掩护，争取让同志们走得更远些，让连队的主力安全突围出去。你们坚持到中午，然后看情况，能往那儿撤就往那儿撤，明天到规定的地点集合"。说完后给我们补充了一些弹药，并留下所有的地雷，接着就带着连队主力向龙王庙方向突围。

这时，我们班的五人赶紧在各个要道口埋上地雷。指导员带人刚刚钻出敌人的火力网，我们就跟敌人打响了，为了吸引敌人，我们站着举枪向敌人射击。500多名日军和赵玉昆的伪军嗷嗷叫着，向我们扑来。他们踩响了地雷，炸得鬼哭狼嚎，尸体横飞。未死的颤颤兢兢挪动脚步，仍然穷追不舍。见此情景，班长马宝玉爬着身子悄声说："注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在这儿，每人最多只许打五颗手榴弹。"

日军越来越近，我们死死盯着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

突然，班长马宝玉挺起半截身子，猛地摔出一颗手榴弹，大喊："打！"

手榴弹和子弹呼啸着飞向敌人，鬼子被炸得东倒西歪，退下去了。

打退敌人后，招来一阵猛烈的炮火，山上的石头炸得满天飞，硝烟把我们笼罩着，啥也看不见，五人都彼此担心战友们遭到不幸。好不容易挨到敌人炮击停止。班长仔细一看，嗬！五人都在，谁都没伤一根毫毛。

我们一边用稀疏的枪声吸引敌人，一边往棋盘坨山峰爬。突然，碰到一个叫冉元同的老乡，就赶快喊："老乡，鬼子来了，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冉元同便问："你们上哪儿去？"我告诉他上棋盘坨。他便劝我们不要上那儿去，说是附近有山洞，鬼子找不着，叫我们跟他去。我们感激地告诉他，我们不能躲，要把敌人引上棋盘坨。

这时，传来了日军的怪叫声，我们赶紧往棋盘坨山峰上爬，谁知那儿早已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我们打。我们只好攀上棋盘坨附近的一个山峰。

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那凌空而起，伸出来象只牛角的悬崖叫人望而生畏。牛角壶三面是悬崖峭壁，我们等于走向了绝路。冉元同远远望着发呆了，日军发现了他，向他开枪，他连忙藏进牛角壶附近的大莲花瓣山上去了。

我们往牛角壶爬了一阵又停住了。大家知道，前面是一条绝路，这时我们仍可沿着隐蔽的棋盘坨路摆脱敌人。但是，大家担心部队和群众还没走远，敌人还会继续追击。

班长瞅着周围的地形说："在这儿顶一阵子吧，大家便卧倒，打开手榴弹盖，在前面摆了一溜。这里有小树，有半人多高的草，藏下百儿八十人完全没问题。正因如此，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行动。对我们来说，又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扑向牛角壶的几百名日军，头一回冲上来7个，2人

在前，5人在后。只听到“啪”的一声枪响，一个端机枪的日本兵往后一仰，旁边的那个赶紧扶住他，把他放到一块小平地上，用布给他缠头，然后把他背下去了。有个鬼子一摇小旗，又上来30多个鬼子，并在松树坨摆上小炮，在东西水村架上了重机枪，往牛角壶猛烈射击。

一阵炮火过后，敌人开始冲锋。我们连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五个人一个也没少。“鬼子又上来了，打！”班长马宝玉喊道。宋学义抓起手榴弹就扔，我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半人深的山草被炮火打着了，火苗窜得好高。胡德林推了我一把：“班副，着了！”我一看棉袄背上冒火了，连扣子也顾不得解，使劲一撕，脱下扔掉。敌人的第五次冲锋又被击退了。

太阳偏西了，亲人和战友早已远去，掩护突围的任务早已完成，现在该撤了。可是，已经走不脱了。

一个指挥官指使敌人把日本旗插在地上，将另一日本旗铺开，我们看得莫名其妙。忽然，空中一声巨响，两架敌机俯冲下来，我们刚卧倒，敌机便射出一串子弹，呼啸着擦地而过，弄得小树像醉汉似的直摇晃。接着山下的指挥官战刀一挥，敌人又冲上来了！我们往悬崖顶上爬，敌人紧跟着往上爬。为了不让敌人跟得太紧，凡是到了能射击的地方，我们都举枪向敌人射击。就这样，牵着敌人的鼻子往山顶上带。

太阳西斜时，我们登上了险峰之巅，再也无路可走了。三面都是万丈悬崖，一面堵满了鬼子兵。

“八路的，跑不了的……”秋风送来了鬼子得意的叫嚣。我们的手榴弹、子弹都打光了，大家非常着急。

“哎！”胡德林叫了一声，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他扬起后正要往下扔，班长马宝玉夺过来，别在腰上。大家明白，这是留给自己的。敌人呀呀乱叫，我们站起，举着石头往下砸，大的搬不动，就两人抬。石头滚下去砸得敌人乱叫。敌人象蝗虫一样，一批一批地往上涌。最后连石头也没有了，班长马宝玉拔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用一种异常严峻的眼光望了望，其他四人全明白，一齐靠向班长。

“八路的，投降！”

“抓活的，抓活的——”

班长扭头一看，吼了一声：“去你娘的！”将那颗手榴弹甩向爬上来的敌人。

“轰”的一声，前头的几个日军被炸翻了。

“撤！”马宝玉同志说。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下意识涌到嘴边的一句话，周围三面悬崖，从前崖到后崖，只有十来步，往哪里撤？

我走在最后，等我赶上去，班长带着其他三人已经站在崖边了。这时大家的表情都异常平静。班长抓住我的手臂断断续续地说：“老葛，咱们牺牲了，有价值，光荣！”我明白班长的意思。我是副班长，五个人中只有我们俩是党员，应该做出榜样，便说：“人牺牲了，枪也不能叫敌人得。”

敌人上来了，班长随手一扔，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飞到悬崖下去了。我举起手中的枪往石头上砸，没砸烂也随手甩下悬崖。宋学义他们三人噙着泪，举起心爱的枪，狠狠地摔了几下。

敌人疯狂地嚎叫。

我们五人昂起头，一步一步走向悬崖边。

狼牙山像巨人一样耸立着，易水河像条玉带飘向远方。在这座狼牙山上，我们学习、练兵，欢迎新来的战友，不止一次地消灭过敌人；在这座山下边，我们吃过老乡们慰问时送来的榛子、红枣，听分区领导讲过古代壮士荆轲的故事，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一直回旋在耳边；我们在易水河畔洗过澡、做过饭，阻击过日本侵略军；如今我们又在这座山峰上掩护战友和乡亲们突出了重围，并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任务完成了！我们可以无愧地与祖国的山河诀别了！

敌人来到跟前想活捉我们，马宝玉正了正军帽，像发起冲锋一样，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

顿时，狼牙山的群峰峡峪回荡着一阵阵气壮山河的口号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同志们，乡亲们，永别了！”

惊得目瞪口呆的日本军，望着我们五人一个个纵身跳下悬崖……

(选自《党史博采》88年4期，作者：葛振林)

材料三　棋盘陀上五壮士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易水南畔矗立着一座齿形的插入云霄的大山，巍然以其险峻雄姿俯瞰着易、满、徐、定、保区域的平原和山地。这座铁壁样的大山，就是狼牙山。在狼牙山西边的巅崖，这里安置着数百千年来为远近人们所景仰的名胜——棋盘陀。

(人们对棋盘陀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当时附近的一个樵夫曾经在陀上旁观两个仙叟下棋一局，世上已经逝去若干年月了；而留在陀上的大石棋盘和樵夫吃剩的桃核——后来变成一片铁块——便是那传说永久的纪念。)

然而，自从9月25日以后，人们已不醉倒于那用一块大石头来作为标记的奇诞的传说；即是那曾经为诗人所歌颂的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的壮士的故事，在今天为人们所亲眼见到的五个“神兵”鬼泣神惊的新战绩的面前，也将显示了前者的颜色的黯淡。

今天歌唱反扫荡胜利的边区东线的人民和军队在唱出他们最高昂的音调，在齐声颂扬着棋盘陀五个壮士英勇奋战的功绩。承受了八路军传统的顽强战斗的五个壮士，给青年边区子弟兵添上了高尚的骄傲和无限的光荣，人民以有了这样的子弟兵而获得了更多的夸耀和勇敢。

棋盘陀也给予了进攻的敌人以威服。敌高见部队长9月27日召集其部下数千人在管头开了两天“庆祝占领棋盘陀”的大会，他训斥着他的部下：

“学学八路军顽强战斗的精神吧，他们五个，我们连被地雷炸死的却去了一百多！……”

敌人是可以开两天会唱两天戏的，因为他们的“一百多”，因为他们曾经在棋盘陀上“占领”过一个钟头。可是关于“地雷”，高见“太君”却说错了，八路军的地雷还舍不得拿去放在象通狼牙山和棋盘陀那样的羊肠曲道上（八路军的地雷是要拿去炸铁路的）。在那些小道上所安置的和每处都给日本皮鞋所踩到而爆炸的，是地道边区造的三个一束的手榴弹（只是安置了机关而已），可是就是这样的“地雷”，也曾让五十多个“皇军”飞舞起他们的“无言旋归”了。

就从9月25日起，狼牙山下数百里方圆里的每个人都在仰望着傲然的棋盘陀，不管他是抗日的人们抑或是敌人。

9月25日晨四点钟，狼牙山内外线两面敌人同时向我腹地狼牙山“搜剿”：内线之敌约二千余人，从三道河、龙王庙、东水、西水、石家疃、菜园、杨树林七路游击；外线之敌一路百人由管头北沟、乌马骡，一路三百余人由沙岭搜索前进。这样，整个狼牙山每条山沟都有了敌人。搜索的网是张得密密的，敌人下了最大的决心来捕捉这网里的“鳄鱼”。

一个多月来“扫荡”失败的经验，使敌人感到，假如这条守在棋盘陀上的“鳄鱼”再继续存在的话，那末，一切仍象以前一样，敌人在保、定、徐、易、满的动作，杨成武及其主力是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敌人在我游击作战之下将仍是节节失利。于是，经过几天的武装侦察和布署，调动了三千兵力，企图给这条山里的“鳄鱼”以最后的歼灭。

敌人也是知道的，守卫着要隘狼牙山不是别的，而是威震华北，曾经在黄土岭、南坡头和涞源城下等处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而为它所最惧怕的“丘部队”。敌人更明白，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敌伪报纸上所捏造的“丘蔚被俘”的消息是玩的什么把戏。实际上这位邱团长现在正和他的一部分战友及电台站在棋盘陀的巅崖。所以，不惜织起偌大的战网来网罗这凶猛的“鳄鱼”。

“鳄鱼”没有象敌人那样傻，他留下了他的天线和二个班，一溜身，就撤走了。

“皇军”若有所得似的向着天线竿前进，准备显一下他们的好身手。

七连三班和六班节节抗击。

午。太阳照亮了人眼，可是三班和六班的一部分也奉令象烟一样的钻到山的海里去，找不到了。

留下的是六班五个健壮的年纪都在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

五个人从横岭由北往南向陀上靠。这样，就转到敌人和连的主力的侧面，可以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安全而从容地移撤。

“简，简，……拍……”四支套筒和一支三八枪在响着。

枪吐出勇敢的花朵，把拉网的敌人都吸引到五个人的周围来了。——

“空，轧轧……空空轧轧轧”敌人的掷弹筒和机枪全向五个人伸出长长的火舌。

班长马宝玉，仍象往常一样的稳重，不多说话，沉着地指挥：

“宋学义，先走。”

“不，你先走。”

“我比你走得快，快走嘛！”班长怕矮个子宋学义走不快，急起来了。他永远关心着旁人，为了旁人，他宁可自己落在后边掩护撤退。也就是因为他对人忠诚，获得了全连人的热爱，并被选为党的小组长。

“胡福才跟着胡德林，向上爬，走这条路。”

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一句话：不是深崖绝壁而能够借着荆条草根攀爬的就算是路了。在这条路上，日本人的皮靴没有能够站稳，有八个“皇军”摔下崖去了，没有等到那五个人的子弹赶上去迎接他们。

而这五个两年前是贫农的战士，是在敌人的炮火追击下爬上去了，就象两年前他们在家里上山去割草一样。

机枪热得伸长它的火舌，掷弹筒的心“空空”地跳着向前追赶。

“拍，简简——简简，拍……”五支枪在断断续续地抵抗。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葛振林用着他的曲阳土话喊了，“情况紧急，敌人都跟着来了，坚决抵抗呀，完成任务呀！”

“对，完——成——任务，咱们坚决完成……”胡德林用年青人的嗓音回答着，并打了敌人一枪。

五个人节节向陀顶撤。

“轧轧轧轧……”火舌跟着。迫得只有向南退。

“班长，班长！”胡福才嚷起来了：“糟糕！”

“什么？”

“咱们这块地方三面都是绝崖！”

一点也不错。三面绝崖，当中是三米阔的长条凹地，只有一条“路”可以从西北面两个小坡头之间过来。三架机枪在左右和前面叫啸着，三个掷弹筒就离小坡头有三

百多米达远。

然而，凹地和长草可以隐蔽，小坡头可以利用，机枪不发生效力，敌人也难于上来。

班长看完了地形。"同志们，"他音调沉重地说："只有拚了，敌人很难上来，他来一个就打一个。"

"在这里反正是不会赔本的了。"胡福才说。

"轧轧轧……"机枪在三面咆哮。敌人离开坡头有二百多米达。

"瞄准，"班长命令着，"放！"一个在草里抬起头来的敌人滚下山去了。

敌指挥官挥着红旗在吆喝着。

机枪加紧，掷弹筒的炮弹落到崖下去。

"呀……"三十多个敌人从一百米达处冲上来了。

"优待优待的——优待的……"日军的叫声。

班长的脸胀红了："优待你一个手榴弹！"

"轰！"大家都掷下手榴弹："轰轰轰！"

"皇军"们习惯于打滚——一翻身就下去了。血染红了山坡……

枪和手榴弹接连打下去了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冲锋。

第四次：大山经过一度静默，忽然又象从梦里惊醒过来似的——

"轧轧轧轧轧空，空。轧轧空空，……"机枪弹筒齐声咆哮，山岳震动。

"简，简别——班长"胡德林叫着，"我的子弹没有了。"他挥着他的空弹夹子。

"手榴弹。"

"手榴弹也只有一个了。"

"谁不是一个，看我的——"宋学义举起他的手榴弹在旁边咕噜着。

"呀……呀……呀……"这回三十多个尽是日本兵。

"轰轰轰……"皇军们又一次地翻了他们的跟斗，留下几滩鲜血滚下去了。

班长还有一个手榴弹，这是全坡最末一颗手榴弹了。

手榴弹给手握得紧紧的发热。

沉默，班长眼望着前面的青天：坡顶上有一朵小野红花在秋风里摇曳。

班长思念着：这最后的一响爆炸是给敌人还是给现在都齐集跟前用灼热的眼望着自己的同志们？

山坡下有一个头在伸探。

"轰！"惊天动地的声响从班长手里摔下去。

沉默。五双眼睛在交换，五颗心在奏着一个节拍，燃烧过的枪枝紧握在各人的手里。

"好的，同志们！"班长拍了一下大腿，"只有一条路——"接着是低哑的语声："咱们跳崖！"每一个字都象铁锤一样地打入五个人的心坎。

"对！"葛振林响应了他的党的小组长的号召："咱们坚决抗日到底，为了保卫边区，咱们死也是光荣的！"

"都是八路军，不是边区的也是中国人！"河南人胡福才胀红了他的脸。

"行啦，跳吧！"胡德林站来，山坡上映着伟大的身影，"要死咱们都死在一块吧！"

山坡下。机枪轧轧轧地又在咆哮了。

"呀……呀……呀……"那是敌人第五次冲锋。

敌人的头也看到了。

班长叫着："同志们，我们的武器也不要给敌人拿去呀！"

"拆！"班长那支曾经用血去换来的三八式步枪，被他自己的手砸在大石头上断成两段。四支套筒枪接着也给毁坏了，这是战士的伴侣、生命的枪呀！

"剥！"是敌人没有响的手榴弹落在脚下。

"跳吧！同志们！"班长喊着。

五个人一齐，向下……

葛振林和宋学义给树枝挂在半空，二十丈绝崖的沟底有着三堆血肉……

敌人"占领"了那小块凹地和棋盘陀。风在吼，衰草萋萋。

崖边的日军都惊呆失色了："五个的？五个的五个的！"翻译官向清乡队叫喊起来，"八路军真坚决啊，摔死不投降！"

"我们是个什么东西呢，老乡们？"伪军们手指着崖下，哭了，"这才是中国人哪！"

寂寞的夕阳洒在血的山坡上。

后来日军进到老经堂，和那个曾经在甲午战争时参加过战争的八十多岁的老道谈起这五个勇士。

"我当过几十年的兵，"老道说，"还没有见到过象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真是神兵啊！"

"神兵的？"日本小队长问。

老道点点头。日本小队长是为"神兵"所惊服了，他向空礼拜着。在他以为五个壮士都是英烈牺牲了；然而，那个日本小队长是错了，挂在树上的两个壮士在第二天早晨就回来了。宋学义的腰受了重伤，葛振林却已经回到他岗位上，率领他的班每天早晨在操场里跑步了。

现在，他们两个仍然是以其顽强的姿态屹立在棋盘陀上。

棋盘陀，象雄伟的烈士塔上不可动摇的石象，在守卫着边区东线的门户。

——秋天反扫荡手记之一，10月19日易县。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晋察冀日报》）

黄崖洞保卫战

背景介绍

1941年10月底，日军集中七千兵力对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捕捉奇袭”的扫荡，妄图歼我首脑机关，毁我军工建设。

10月30日，敌三十六师团四十四余人，连续夜袭黎城、赤岸（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西井（第八路军集团军总部驻地）等地；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二千余人，亦奔袭我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太行军民早有准备，加强游击集团，实施空舍清野，故敌“扫荡”开始即遭我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的不断打击。11月6日，敌分南北两路撤至黎城、辽县地区。11月9日，敌三十六师团主力，配合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一部，以“电击反射”的战术，又重占涉县，猛犯黄崖洞地区的水腰山、桃花寨等地。八路军总部为使水腰兵工厂不受损失，命特务团坚守阵地，进行保卫战。

11月10日，敌终日以炮火轰击，并使放毒瓦斯，我军坚守阵地，敌无进展。11月，敌续以千余人强攻我水腰南陵口、桃花寨东南阵地，我英勇杀敌二百余人。13日，敌集中炮火猛击我阵地，血战竟日，我工事数次被毁。黄昏时，敌乘机疯狂进攻，我军奋起迎战，反复冲杀，我阵地失而复得者再，敌终不得逞，又死伤三百余人。14日，敌又冒死进攻，又被我杀伤六百余人。高度表现了我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气慨。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我军打退敌军数十次的冲锋，我攻击部队换班三次，毙伤敌官兵计一千八百五十余人，我军仅伤亡三百五十人。

11月19日，我特务团主动转移。敌进入黄崖洞镇后，遭我民兵地雷战的围困，使之寸步难行，坐立不安。与此同时，我外线部队为策应内线对敌作战，亦从11月14日起，分向敌人的侧背和后方袭击，先后攻克了东崔店等十余个村落。在八路军不断打击下，日军终于11月19日开始撤退，在横庄间复遭我主力伏击，死伤数百余人，11月20日逃回潞城。至此历时22天的黄崖洞保卫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三千以上。

战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将军发表谈话（《刘伯承师长谈黄崖洞胜利》，见《解放日报》1941年12月7日）指出：此胜利原因有三：首先，在战略上采取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待其彷徨迷惑之际，主力部队乃出动予以致命打击，因而获得极大战果；其次，是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发挥全面对敌斗争，此次配合作战的民兵在二万以上，使日寇疲于奔命，无法立足；再次，是广泛埋设地雷，予敌杀伤，威胁极大。

材料：

· 黄崖洞痛歼日寇

材料　黄崖洞痛歼日寇

从1941年10月底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太行山区发动了为期22天的“捕捉奇袭”扫荡。他集结晋东南井关仞中将指挥的三十六师团之步兵二二二联队，由联队长葛目直幸大佐统一指挥，辅以惯于搜山“清剿”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第九混成旅团的津田、安尾、青柳等三个混成步兵大队共5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之下，由辽县、沁县、潞城、襄垣出动，分多路以强兵夜袭的手段，向八路军驻地的黎城、赤岸、西井等地扑来。11月3日，日军以两千余众为一路，由辽县、武乡向着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奔袭，凶锋直指黄崖洞兵工厂。

11月7日，左权带着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参谋陈良诚、刘力克以及电务员、机要员和几个警卫人员，由武军寺到达离黄崖洞以东约8里的小寨岭上，直接指挥黄崖洞保卫战。

当天晚上，左权从小寨岭临时指挥所给欧致富打来电话：“欧致富同志，井关仞师团的部队找上门来了，请立即作好迎战准备。你们特务团要储足半个月的饮水和给养。”

“保证完成任务！”

“好吧，5天以内，一定要把敌人挡在阵地前面。要拖住它不能走，又要挡住它不让进。”

11月8日，麇集黎城的葛目直幸大佐的部队，为隐匿意图，向东佯攻涉县，至石门、五十亩一带，又掉头北进，占据了西井，虚晃几枪之后，突然用奇袭包围的方法，向黄崖洞扑来，抢占了山下的赤峪村，然后分兵占领东崖底、赵姑村，以挡住侧翼不挨打。

日军运用“乘夜包围，拂晓进攻”的所谓“奇袭包围法”，凌晨便偷袭南口，踩响了“瓮圪廊”的地雷，光烟四起，弹雨横飞，大和武士们的鲜血，污染了黄崖洞贫瘠的山地。3次偷袭，都没进得“瓮圪廊”一步。

奇袭包围不成，日军又恢复了德国兵法上使用军队的旧原则，重新用炮兵开始战斗。10时左右，他们集中所有的重炮、山炮、迫击炮，直接瞄准南口阵地轰击。炮火一停，步兵以火力进行镶边射击，掩护冲击部队驱赶数百只羊，向南口的地雷阵踏雷，奇怪的是中国的羊踏不响中国的地雷，地雷都在日本军队当中开花。守卫在南口断桥两侧的八连副连长彭致海和战士们见300多日军跟在畜牲后面挨炸，嘲讽地说：“‘皇军’还不如中国的一群羊！”

葛目直幸恼羞成怒，想用强攻突破南口阵地，命令他的部队死命朝南口猛扑，八连从左右两翼的3个阻击点，在决定方向构成密集火力，把日军堵在眼前那条狭窄的

山涧里。前面用步枪、机枪、手榴弹杀他个仰面倒，后面用麻尾弹揍他个屁股墩，使日军进没进路、退没退路，断桥前的一泓山泉，变成了血流。日军发疯似地把死了的同伙，像垒砂包那样堆架起来，想以尸为梯，爬上断桥平台，那知尸体越垫越高，活的却一个也没有爬上来。

敌人变换部署，一路主攻南口，一路迂回侧后的左会山垭口，以截断特务团退路，造成前后夹攻之势。这一步棋早已在左权的预料之中，预伏的一二九师部队将他们赶回原地。迂回包围已不可能，唯有采取突破南口防线之一法。日军加强火力密度，除了劈天盖地的炮击，还发射能使石头都起火的燃烧弹。日军文件中曾有如下指令："当你遇到重大威胁的时候，不要忘记发烟筒。"所谓发烟筒，就是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现在，敌人开始"发烟筒"。特务团各处阵地火光烛天，毒雾弥漫，指挥员们纷纷中毒，扼守南口阵地的三营部分人员伤亡，敌人趁机向南口阵地突击。

电话铃响成一片，欧致富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很艰难地抓起电话，是左权亲切的声音："欧致富吗？我已接到报告，敌人放了毒气，能不能坚持下来？"

"能，能坚持！"

"注意，敌人如此疯狂挑战，是想诱我出击，你们要坚守勿出！要坚持以静制动的战术原则！"

冈村宁次最赏识的搜山狗——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九混成旅团以1个小队、1个大队，8次向七连阵地冲锋。七连依托残存工事，沉着应战，并以冷枪射杀日军指挥官，使他们连续4天还滞留原地。敌指挥官不得不将他们撤换下来。

12日，日军既不打炮，也不放枪，不冲锋，不撤退，战地沉寂了。欧致富将此情况报告左权。左权要欧致富注意观察敌人的企图，一定是他们在调整部署。欧致富立即派出侦察员出去侦察，可是日军封锁很严，没有弄回情报，只捡到几条日军用汉字写的标语，什么"皇军是钢，八路军是铁，钢比铁硬，铁怕钢碰。"战士们说："皇军是瓦菩萨，怕八路军这根铁棍子打！"

13日拂晓，日军集中10余门大炮，开始猛烈炮击。炮弹落到的地方既不是南口，又不是断桥，也不是桃花寨，而是南口东侧那座鸟都站不住脚的悬崖——跑马站一四六一高地和两侧工事，按照一般军事原则，进攻的部队一般不在过分困难的地形上选择攻击点，天下最愚蠢的指挥官也不会选择这样又高又陡的突破口。但是，日军为什么把这块不足100平方米的长形高地作为炮击目标？在战斗中，任何疑问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解答，否则就会陷入被动。

欧致富将情况报告左权。左权认为，日军在战术上最会乘虚、最惯攻弱。他们是否发现了跑马站是八路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而把它作为正面突击的突破口？原来，特务团有个姓陈的参谋通敌叛变，日军指挥官得知跑马站防守薄弱，决定以跑马站为突破口。左权当即命令欧致富说："除南口西侧留少数守备队以外，其余每个工事只留两个人，部队集中起来作预备队使用。到处防备就会到处薄弱，应以跑马站为重点防区，注意以变应变！"

占领跑马站的日军向我南口第一线阵地侧击，正在阵地正面突击的敌人得到策应，立即向水窑核心阵地作试探性进攻，企图占领一五六八高地，南压水窑口，夹攻南口弹若飞蝗，炮似连珠，漫山遍野，云连雾接，翻搅得日月无光。……左权知道虽然跑马站失陷了，只要以稳定原有火力配系为基础，适当增加机动力量，阵地不会被全部攻陷。左权立即给欧致富打电话："5天已经到了，还能坚持吗？"

"能！"欧致富说："首长，我们还能坚持5天！"

左权告诉欧致富说："再坚持3天就行了。"

原来，为了配合黄崖洞保卫战，陈锡联指挥的五旅十三团，11日起围袭东阳关、赵店的日军，并于14日奇袭黎城守敌，攻入城内，在民兵的配合下，当日又神速驰援黄崖洞，恢复了东崖底、赵姑村等地，夺得了日军的右翼阵地，予敌以极大的威胁。七六九团、七七二团、新一旅二团和十四团主力正在集结。为了使敌人不致怀疑八路军的后援反击部署，左权令欧致富将部队撤至第二线——水窑口。

这时，日军已经和特务团处于同一高度上作战。他们以钳形攻势向特务团指挥所追近，战斗出现了几天以来最激烈的场面：一营、三营与指挥所的电话完全中断，部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一营有些战士已经转移到指挥所的后面去了。警卫员报告欧致富说："团长，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赶快撤吧！"

欧致富走出指挥所一看，只见一连长带领一连战士在向后撤，一群日本兵就在他们后面叽哩哇啦地追。欧致富命令一连长说："去！把敌人给我打回去！坚持半个小时，听命令再撤！"一连长拨转枪头，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呀！"一个反冲锋，把日军进攻的队形冲散了。欧致富根据左权"以变应变"的命令，将组建起来的预备队一部调往一连阵地，依托原有残存工事，抵抗日军的进攻。

团指挥所已暴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参谋和警卫人员劝欧致富将指挥所向后移动。欧致富懂得"一将稳定军心安"的道理，坚持要在这里指挥战斗。

在特务团的诱攻之下，日军果然改变了进攻战术，分兵4路进击水窑：一路由东口和西口合击断桥；一路由四沟顶正面突击水窑；一路由水窑山后侧的四窑蛟迂回水窑口；一路由一六五O高地居高临下，压迫水窑。进攻中的日军以毒气、燃烧弹开路，向特务团水窑阵地合围。左权得到通报后，知道敌人包围我军的目的，一方面是因为兵力的向心攻击，比平行攻击有利；另一方面，是想切断

特务团的退路。左权命令留少数部队在原来阵地上牵制日军，由一营营长魏传连率部扼守左会山垭口，阻击追击的敌人，特务团主力撤出水窑口和南口阵地，分多路向拴马、大井方向转移。

坚守在水窑内线阵地的特务团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他们凭借残存工事，奋勇杀敌。排长王振喜带领战士韩立合、李如坤等在工事起火、三面被围的危机关头。他像根燃烧着的火柱，挺立阵地前沿，向敌人投弹射击，70多个日军被他射杀，但他自己也壮烈牺牲了。战士晁成，一人坚守断桥，两面受敌，他投掷了100多枚手榴弹，敌人被炸得血飞肉溅，阵地仍然在他手里。

16日，特务团主力奉命撤出战斗，仅留一营坚守着左会山垭口。这一天日军占领了黄崖洞兵工厂，轰隆隆的地雷爆炸声，是兵工工人欢迎"皇军"大驾光临的"礼炮"。

日军想向左会山垭口追击，但遭到一营火力的猛烈阻击。他们急欲从潞城方向得到补给增援，但被八路军外围部队切断。左权根据情况判断，攻占黄崖洞的日军将于18日、19日向黎城撤退。彭德怀、左权命令七六九团、七七二团、新一旅二团、十四团，在黄崖洞与黎城必经之地的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伏。19日，日军果然沿这条路线退走。当天，风狂雪骤，漫天皆白，狡猾的日军虽多次派出侦察开路，但伏兵与山川混为一色，他们一点也没觉察出动静。11时，敌人像一群鬼鸭一样进入伏击圈，顿时，枪声四起，弹如急雨，敌军丢下500多具尸体，败窜黎城。左权命令部队乘胜猛追，21日收复黎城。

战斗结束后，左权来到特务团的驻地——黄崖洞以西的湾则村，总结了这次战斗。是役，敌人进攻部队换班3次，陆续增援达5000余人。特务团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与日军激战8昼夜，毙敌1000余人，其中大队以上军官5名。我方伤亡营长庞栗以下166名，敌我伤亡人数为6比1，"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之空前未有的记录"，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为此，八路军总部通电表扬特务团，授予"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彭德怀代表总部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窑立战功"锦旗一面。

（《左权传》王孝柏、刘元生）

上高会战

背景介绍

1941年3月15日，上高会战开始。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余人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于是日拂晓发动进攻，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上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北路兵团，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于15日攻陷奉新，17日推进到高安，但在国民党第七十军的逐次抵抗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合击上高的计划，于19日向安义北撤。日军独立混成二十旅为南路兵团，在16日强渡锦河后，遭到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的痛击，被迫向曲江方向退却。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为中路兵团，是进攻上高的主力。18日，日军攻陷高安，但在上高一线却遭到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的顽强阻击。为了加强第十九集团军的力量，第九战区又从赣西北抽调川军第七十二军投入上高会战。19日，北路日军被第七十军包围，伤亡严重，经过苦战才突破包围，向安义回窜。日军合击上高的左臂被斩断。20日，南路日军的攻击再度受挫，不得不由灰埠北渡锦河与中路日军会合。日军合击上高的左臂也被斩断。中国军队开始反攻，由南北两翼对日军实施包抄，决心围歼中路日军。22日，中路日军被第七十四军包围在上高东北地，后经数次包围和突围。28日，中国军队全线追击，追歼逃敌，收复失地。到4月2日，中国军队除收复战前地区外，又攻占了西山万寿宫。4月9日，又攻克安义日军的外围据点，取得了有利的对敌态势。上高战役遂告结束。此役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日军伤亡近2万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打得较好的战役之一。

材料：

• 上高争夺战

材料　上高争夺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晨，北路长樱井指挥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由安义分成两股向中国第七十军正面进犯。一股约千余人，自安义城北宋埠出动，另一股约万余人由安义城西干洲出动南下，两股日军成钳形向西伸展，包抄奉新。第七十军预备第九师在奉新城东迎敌，第十九师在奉新城西设防阻击。日军凭藉空军和重炮掩护，急速向奉新外围阵地推进。预九师第二十六团一部还击敌主力，因众寡悬殊，敌军炮火猛烈，被迫向奉新城内撤退。外围阵地失守后，奉新成了孤城。是日晨，攻至奉新城东南洪田的敌人，借助炮威侧击奉新。日军正面炮兵也向奉新城猛射，九架敌机在奉新城上空滥肆轰炸，很快奉新陷入敌手。预九师退守奉新城西南的凤凰山至五步城一线阻击敌人。日军占领奉新后，即越过潦河向五步城一线攻击，一部向第十九师阵地肺头赵进犯，掩护其主力向西突进。此时预九师又北撤到米峰、石子凌一线与敌相持，第十九师与预九师阵地隔潦河相望。黄昏后，千余日军由潦水南岸第十九师与预九师结合部的间隙钻入车坪、棺材山一带。预九师第二十六团与敌激战一夜，由于第十九师未能配合夹击，使日军乘隙西进，十六日拂晓，敌进入水

口甘附近。而日军另一部攻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巴茅山阵地，遭到该团猛烈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十七日晨敌军向东退去。第十九师派兵尾追，并向伍桥何搜索前进。此时，敌主力正南犯铁夫岭、樟树岭。

三月十九日后，敌北路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在苦竹坳山地遭中方第七十军一部伏击，经苦战得以突围溃退。该师团进犯伍桥何的部队又遭中国军队第十九师主力及预九师一部包围，首尾被钳击，伤亡严重。日军分进合击企图遭受严重挫折，不得不突围回犯，中方左翼部队第七十军得以从侧翼对中路日军实施围歼。

南路日军池田独立第二十混成旅团一部三月二十日再次向中方锦河南岸第五十一师鸡公岭一线主阵地发动攻击，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军队连长樊逢春在迫击炮掩护下，率部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在团预备队的配合下，血战竟日，敌遗尸二百余具，樊逢春及以下百余人亦以身殉国。当日，池田所部五六百人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鸡公岭阵地猛犯，炮击五百余发。中国守军一营大部伤亡，日军乘机蜂拥而上，妄图抢占中方阵地。中国军队一部发起奇袭，出敌侧背，毙日军三百余，日军残部退到猪头山负隅顽抗。两小时后，日军池田旅团的三个独立大队联合反扑，反复争夺第五十一师主阵地线，中国守军拼死相拒，歼敌达千余名。南路敌军攻击受挫后，其主力乘夜由灰埠北渡锦河与中路日军汇合。至此，经十九日与二十日两天激战，日军左臂被斩断，这就为中国军队从两翼对中路敌军达成包围创造了条件。

中路第三十四师团，是日军的主力。自十九日起，被中国军队阻击在上高东北泗水东岸的泗溪附近。二十日，日军以十余门大炮，三十余架飞机集中轰击泗水西岸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阵地。第七十四军阵地只有第五十师、第五十八师两师兵力，该部李天霞第五十一师已奉命作机动深入日军侧翼，所以阵地防广兵单（每营守备约七公里）。为了确保上高，中国军队第十九集团军根据敌军倾巢西犯，赣江东岸兵力单薄的情况，自两翼抽兵以加强第七十四军主战场，与敌决战，实行围歼。

三月二十二日　进犯上高的日军独立第二十混成旅团及第三十四师团一部被第七十四军包围在上高东北地区，于是北路敌军出动第二一五联队，由奉新附近西犯伍桥何企图解救被围之敌。

中国军队为缩小正面战线，将核心阵地转移至下陂桥一带。二十二日晨，被围中路日军集中近万兵力，凭藉飞机三十余架的掩护，向第七十四军阵地猛犯。中国官兵"拼死力拒，虽然血肉纷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为增强第一线兵力，赢得两翼靠近时间，争取增援部队，当日集团军司令部特务营奉命开赴第七十四军阵地参战。

二十三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主力约六千众再次进犯聂家、下陂桥、徐楼一线中方主阵地，日军师团长大贺坐镇毕家指挥，意在必得上高。中国守军集中迫击炮轰击，日军受创严重。敌再以飞机十余架对中方阵地低空轰炸，掩护其步兵猛冲，中国守军奋勇抗击，往返冲击，下陂桥失而复得三次。入夜，敌倾全力再攻，中国官兵死伤枕藉，仍死力固守。二十四日晨，一度被日占领的白茅山阵地又为中国军队克复。

同日上午，日本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并纠集南路池田残部三千，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狂炸五十七师下陂桥阵地和第五十八师白茅山阵地，投弹多至一千七百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第七十四军预备队先后七次与敌肉搏，毙敌二千余。第七十四军将士舍身拼杀，为实施两翼对敌包围，争取了时间。中国军队右翼第七十军张言传师由官桥指向敌大贺师团部所在地毕家，唐伯寅师由杨公圩指向泗溪，第七十二军付翼新十五师亦展开于水口圩东南。至此完成了南北直径十华里，东西三十华里的椭圆形包围圈。

当中国各军逐渐将敌合围之际，大贺急电其汉口日军司令部求援。二十四日午，日军派出增援部队约二千余人，自九江沿湘赣公路南驰；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五联队又从奉新再西犯伍桥何、村前街，分向棠浦、官桥急进。

被围之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得此救援，于二十五日晨开始向中方左翼包围部队预九师正面的坑口岭、介子坡、南茶罗一线猛扑，企图突围。中国官兵奋勇抵抗，彼此伤亡均重。激战至中午，预九师因敌援军已迫近棠浦、官桥，深恐全师陷于前后受敌危境，即于黄昏前擅自决定东撤，想与第十九师唐伯寅部取得联系。而此时敌正猛犯第十九师阵地，第七十军副军长鉴于形势不利，则决定第十九师、预九师两师分向北凤凰圩、庄坊附近撤退。这一撤，使包围圈扯开了缺口，敌援军第二一五联队径直进入官桥与第三十四师团主力会合，为中国军队日后围歼造成了困难。

在日军突围之际，第七十四军正分途挺进追击敌人。二十七日拂晓，第五十七师克复泗溪，中午第五十八师又几经血战后克复傲古山、炉下、河垠一线。日军在强大攻势下，后退不及，于是集中投掷大量毒瓦斯弹，第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者很多，但仍然奋勇猛进，下午收复了毕家（原第三十四师团指挥所所在地），然后乘胜追击，距官桥仅四里。正在前进之际，第一〇七师忽报白茅山发现敌人，并自动后撤，使中国军队左翼完全暴露。第五十八师考虑到回师防范，不得不停止前进，另作部署。至此，中国军队攻取官桥的计划又成泡影，日军一部得以乘隙突围东逃。

集团军司令部从缴获敌命令的文件中判断，日军所以困兽犹斗，是为掩护大贺以下高级指挥官及伤兵后运。

于是当晚饬令各部于二十八日午以官桥街、南茶罗为目标，猛烈进攻，彻底消灭残敌。

二十八日　中国军队主力进迫官桥。第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亘蛮眉高地一线，与日军后卫发生激战，日军为掩护其主力东遁，拼死顽抗。激战至中午，第五十一师李天霞部先头部队赶到，于上罗家、山源李、方头脑一线袭日军右侧。第五十七师一部也进抵龙形山，包围官桥街南，日军被迫退守官桥市内。第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战斗到下午，官桥街全部被收复，日军在官桥市内守军六百余人全部被歼，遗尸累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中国军队打死。

同日，第一〇五师王克俊部在杨公圩南北高地对突围东遁之日军进行截击，逃跑日军两千多人，经拼死挣扎，仍被中国军队遏阻于虾蟆碑、虎形岭一线。自湘赣经高安赶来接应的千余敌人亦被中国军队阻击于龙团圩附近。

二十九日午，战区司令部电令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率第二十六师、第一〇五师、新十四师、第三师为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大城，向牛行追击；第七十军军长李觉率予九师、第十九师、第一〇七师为左追击军，沿伍桥何、奉新道向安义追击。

三十日，第二十六师、第一〇五师、予九师、第十九师自东、西、北三面围攻，将龙团圩、杨公圩附近负隅顽抗的日军两千多人，大部歼灭，各部按追击部署向高安、奉新追击。

在龙团圩、杨公圩围歼日军的同时，第二挺进纵队已进抵高安附近与敌激战。三十一日晨由高安东北冲入城内，守城之敌招架不及，四散溃逃。陷入敌手半月之久的高安，又重新为中国军队克复。

高安克复后，日军东遁归路被截断。四月一日晨，日军以飞机十五架掩护突围，向斜桥方面逃窜。中国军队右追击军经高安向西山万寿宫、牛行方向追击，左追击军向奉新、安义方向追击，沿途收复陷于敌手的城镇据点。迄四月二日，中国军队除恢复战前原态势外，并攻占西山万寿宫。四月八、九两日，又克安义外围的长埠、宋埠、干洲、弓尖各要点。上高战役始告结束。此役中国军队伤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一万五千余人，军马二千八百余匹，击落飞机一架，俘虏日兵百余，缴山炮、迫击炮十门及步枪千余支。

（摘自《十九集团军战记》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一年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33人出席。在会上，居正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朱家骅代表组织部分别作了党务报告，王世杰作宣传报告，孔祥熙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行政院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康泽作三青团工作报告，张家璈作交通报告，陈济棠作农业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周钟岳作内政报告，朱家骅作特种问题报告。会议通过了《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恢复省县党部选举制度案》、《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加强政府机关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大量培植各级行政人才并制定党员从政办法借以加强党政联系促进建国工作案》、《党务工作纲要》、《改革党政建议书》、《建党纲领案》。会议决定田赋归中央、增设粮食、贸易两部。会上进行了人事调整。由于柳亚子先生在关于皖南事变的通电以及报刊和公开场合激烈地抨击过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开除柳亚子先生的党籍。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自过去三年八个月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间，奋斗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出现了绝大的精神危机，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会议的宣言提出以“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为国策，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并居心叵测、含沙射影地攻击新四军和八路军，强调要“服从最高统帅之指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会议由此还通过了《加强学校训导工作以期青年思想均能导入三民主义正轨案》、《改善专科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案》。会议于4月6日闭幕。

材料：

- 蒋介石致开幕词
- 会议经过

材料一　蒋介石致开幕词

各位同志：

今天八中全会开幕，距上次七中全会开幕之日已经有八个月之久。自从上次全会以后，到去年年底为止，这半年间乃是我们党国在革命过程中最危险、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我们今天回想起来，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能够安然渡过这个危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次各位同志——尤其是一般远道而来尽有许多位是阔别了一二年的同志，能够集合陪都，聚首一堂，就今后党务、政治、

经济、社会各种工作，集思广益，共策进行，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的快慰！非常的兴奋！我常说，我们革命是不怕危险，不怕困难的，只要本党同志能够领导全国同胞共同一致，努力奋斗，则任何危险困难都没有不能克服之理。证之本党过去的历史，我们每经一次危险困难，就多获一次进步与成功！而且困难愈大，成功亦愈大！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凡事临到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我们快要达到成功的时候。回想八个多月以前的情形，我们抗战的环境在当时真像是非常黯淡。而现在一般同志和全国同胞，看到我们军事和外交的形势日见开朗，日见巩固，又皆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因之对于今后抗战的前途，乃觉得非常乐观。我要告诉各位的，我们最大的危机确已过去了，但以后并不是没有危险，切不可有一点疏忽和懈怠之意，我们今后要求得抗战的胜利与革命之最后成功，不知还要经过几许艰难与牺牲。因此我们在克服一次艰危之后，更要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更加奋发，更加努力，来尽到我们的职责。必须是安不忘危，然后能渡过任何的艰难和危险。要怎么样痛自检讨，猛加鞭策，使我们国家转危为安，使抗战转败为胜，这完全是我们八中全会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

各位同志要知道这一次全会的责任，是非常重大。正因为抗战环境好转，我们胜利的光明愈益接近，更应该省悟到我们的前途无量和事业无限，而我们的任务也因之而格外加重了。所以不能不兢兢业业，戒慎恐惧，以求获得最后的成功。须知我们经过这一次空前的大战，全国将士同胞牺牲了如许的生命财产，受尽了这样痛苦悲惨，如果还不能使我们中国在抗战期中完成革命建国的大业，获得永久的自由独立，那我们不仅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而且无以对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但是我们观察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此次全会既然担负了继往开来的责任，第一件事就是要彻底反省我们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为什么一般国民要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自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将我们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完全洗刷一新，然后我们革命的前途才有希望，抗战建国的大业才可以成功。更须知道此次全会开幕，适在我们抗战建国最紧要的关头，不仅要对党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树立我们自强自立的基础，而且要负荷我们对于当前世界大局安危的责任。所以我们对于目前党务、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种问题，都要彻底检讨。同时对于今后实行主义建设国家的方针，以及本党对内对外的政策，更要精详研究，成立具体的决议，使在全会之后得以切实施行。

就军事而言，经过我们全国军民过去三年又八个月的艰苦奋斗，在军事上所表现的精神和力量，不仅使得我们本国的同胞为之振奋、兴起，而且世界友邦亦为之同声赞许，就是我们的敌人——日本——亦不得不承认此后要以武力来灭亡中国是决不可能的事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事上的危机已经过去，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不过我们以往的成就有种种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一大半是凭着主义和精神的力量，运用革命的政略战略，幸而克服了许多的危险和艰难，打破了敌寇武力并吞中国的阴谋和野心。若论我们军队的本身，如果要能和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要能在抗战之后使我们国防的力量真正足以自卫，那还要我们本党的同志再加上十百倍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军事上虽然乐观，但绝不容有丝毫的懈息，更不能以为我们此次能够和敌人作这样持久的战斗，就可以自得自满，而不更求进步了。

我更要提醒各位的，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我们全会同志务必认识这个意义，对于今后经济问题的措施，要象过去三年前对于军事一样的看重，一样的努力。我可以说，我们在军事形势上已确立于不败之地，而今后胜负的关键，一大半要取决于经济了。所以大家对于加强经济上的持久力，改善经济上一切设施，增进经济战斗的效能，一定要积极奋斗，不惜牺牲，来克服我们这次抗战期中最后的困难。尤其是今天出席全会的各位，负有领导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的责任，格外要知道经济实在和军事一样的重要，无论文武同志，无论在前方后方，大家都可以尽力。而且经济的范围比军事更为广阔，其推动亦更为容易，只要我们能切戒过去消极敷衍、因循怠忽的积习，发挥刻苦耐劳、积极奋斗的精神，共同努力，则以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我相信无论甚么难关都可以打破，而获得最后的成功。反之，如果我们因循懈息，畏难偷安，不能苦干实干，不能互助合作，那么无论我们有了怎样优越的条件，都没有用处。而且一旦失败，其危险的程度比军事失败还要来得严重。

现在一般舆论对于我国目前经济问题，不免有许多抱着过分的忧虑的。依本席的观察，我国的经济实在并没有甚么可忧虑的地方，惟一值得忧虑的问题，就是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刻苦奋斗，能不能积极建设。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讥笑我们，说本党的工作不紧张，太懈怠，甚至说我们是腐败了，衰老了。这种种批评，我们都要承认，都要接受，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彻底反省，以期补过图功。对于任何事业，都要拿出我们革命的精神来研究新的方法，来克服一切困难，以求日新又新，能够不断进步。如此急起直追，我相信要解决目前经济的危机，实在并非难事。各位要知道，我们此次全体会议正当建国工作真正开始的时

期，我们实负有继往开来领导建国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树立起建国的精神，不能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同胞一致从事于建国工作的奋斗，那我们过去三年多的牺牲努力，真是要前功尽弃。但是我们观察过去三年八个月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间，我们奋斗的精神，确是一天不如一天，从党到政府，从我们中央到地方，无论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种事业，都没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生力。我以为这一点，就是绝大的危机，值得我们惊心怵目。为什么我们全国上下在抗战初起之时，明知我们是以弱国而当强寇，都能紧张振奋，不惜牺牲一切，而到了今天抗战紧要关头，最后胜利已在不远，反而要有因循怠忽的现象呢？这个责任我们不能归之于政府，更不能归之于民众，也不能归之于内外环境之险恶，而完全在于领导抗战建国的本党。尤其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委同志，我们应该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的一句遗教；尤其要知道此时真是我们存亡绝续的最后关头，哪里可以有一点侥幸自矜之心，哪里可以有一点苟安怠忽之意。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百五十余位同志，大家都能一致振奋，仍旧象过去三年以前一样来发扬我们悲壮奋斗的精神，和凌厉无前的气概，那末全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在我们精神感召之下，一定能重新鼓舞起来，向危险艰难的路上奋勇前进。反之，如果我们有一件事不努力，不振作，那就要使得全体部属以致全国同胞都要随之松驰懈怠下来，国家的前途也就不堪设想。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要一致懔于目前这个内在的危机，从此革除旧习，共同黾勉，力行不懈，振作我们愈困愈奋的大无畏精神，来领导自己的部属和全国的民众，使我们一致相信有本党和政府领导，一定可以达到抗战胜利，促进建国成功。必须如此，才能不负国民的期望，不负友邦的同情，也才能增加我们抗战建国的力量。

最后，讲到党务和政治，这是我们革命的根本所在。各位都要知道，目前根本问题，是要使政治有新的气象，党务有新的精神。我们今后要完成建国，必须从刷新政治着手，但要政治走上轨道，就必先求本党的健全。因此本席今天特别要就党务方面对各位同志简单的说几句话。我们无论在中央或地方的同志，对于我们现在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以及本党的立场，都要有一个明白的认识。要知道本党在中国的地位与别的国家已有相当基础的执政党象德国的国社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以及苏联的共产党都不相同。我们现在还在革命时期，我们一般党员人人都要为实行主义而作最基本的、最实际的奋斗，尤其要从基层工作、社会工作上来努力。我们现在不怕本党的政权不能强固，亦不怕中国政治不能健全，而只怕我们的党和社会隔离，以致我们的政治不能确立普遍而深入的基础。我们作了党员尤其是作了中央委员，当然是为担负革命天职而来，不是为高官厚禄或要求个人的权位而来。不仅是如此，我们做中央委员的同志必须时时要听取民众的呼声，处处要体察将士的痛苦，所以我们更要服务社会来尽瘁职责，真正能与民众打成一片。因此无论那一个委员，如果在政治上或社会上能够到最基层的事业中去努力，到最接近民众的地方去服务，才是我们致力革命最正当的途径，才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党员。如果我们党的基础还没有巩固，党的信仰还没有确立，而一般同志，就以为我们应该有特殊的地位，应该享特殊的权利，这就完全错误。要知道革命还未成功，主义还未实现，我们的耻辱未雪，职责未尽。今后要振奋全国人心，其责任全在于本党，全在于我们一般中央委员；要树立党的社会基础，其责任亦全在本党各级干部，亦全在我们一般中央委员。我们一切革命事业的进行计划和努力途径，总理在全部遗教中已给我们详悉的指示和安排好了，只要我们认清自己职责所在，遵照遗教，切实努力，那我们对于社会多一份服务，即是多尽一份党员的责任，为本党多树立一份社会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不惮艰苦，深入社会，接近民众，使本党在社会上的基础日趋稳固，则我们革命建国的大业就可以迅速成功。因此我们全会对于本党党员参加地方自治与社会服务工作的方针，应该有一个切实的决议。要使此次会议之后，我们党的组织、党的精神以及党纪党德，都能进步充实，积极提高，有一番新的改革，以造成新的气象，才能真正负担我们革命建国的责任。

以上所说，不过是几点简单的指示，而实在是我们革命成败最切要的关键所在。希望各位同志在此次全会期中，专心致志，尽量研讨，来完成本届全会所负继往开来的使命。

（摘自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4月1日）

材料二　会议经过

中央常务委员会以自七中全会举行后，时逾八月，依照党章亟当召集八中全会。爰经第一六八次常会决议，定于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渝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当由秘书处发出通知，迨三月中旬各地委员纷纷莅渝，极形踊跃。全会即于二十四日开会，四月二日闭幕，其间除开会式、闭会式及预备会与审查会外，共举行大会十一次。其中八次为听取报告，三次为讨论提案。此次除中央党务、政治报告外，并由兼任省党部主委、省政府主席及战区司令长官之委员之特许列席之各地党部负责同志，分别就各地党务、政治、军事情形，作详细之报告。大会议决案共八十八件，关于党务者二十二件，关于政治者二十五件，关于财政、经济、交通者十九件，关于军事者六件，关于教育者十六件。兹将大会逐日经过择要列述如次：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幕典礼，由总裁主

席，领导行礼，并致训词。首对抗战局势作概括之论述；嗣即指明此次全会之重大责任，应以至诚反省之精神，对于党务、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种问题作彻底之检讨，对今后实行主义建设国家的方针以及本党对内对外的政策，成立具体之决议，在全会之后得以切实施行；最后说明军事、经济、党务之一般情形，进而指示努力之方法。礼毕，即接开预备会议。当通过主席团人选；并决议依照规定组织各组审查委员会，其委员名额人选由主席团决定，报告大会；并决定全会会期及收受提案截止日期。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开第一次大会，由于委员右任主席。如仪开会后，全体起立为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志同胞默哀三分钟。嗣为党务报告，由居委员正代表常务委员会报告；组织部朱部长家骅、宣传部王部长世杰分别报告组织宣传工作。休息十分钟后，为政治报告，由孔委员祥熙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兼报告行政院工作；继由何委员应钦作军事报告。至十二时散会。

是日下午三时举行第二次大会，由居委员正主席。由王委员宠惠作外交报告；孔委员祥熙作财政报告；翁部长文灏作经济报告；张委员济棠作农林报告；张部长嘉璈作交通报告。至六时五十分散会。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开第三次大会，由丁委员惟汾主席。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推定召集人及起草委员。由谷委员正纲作社会报告；陈委员立夫作教育报告；周部长锺岳作内政报告。嗣为各地党政报告，由熊委员式辉报告江西省党务政治情形。至十一时五十分散会。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开第四次大会，由陈委员果夫主席。首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报告，由康泽同志代表报告。嗣继续各地党政报告，计有蒋委员鼎文报告陕西省政治及党务。黄委员季陆报告四川省党务，张委员群报告四川省政治。苗委员培成报告湖北省党务，陈委员诚报告湖北省政治。此时适接罗军长卓英宥电，陈报赣北上高东北地区获胜情形，由秘长宣读来电，全场欢忭，当经决议由大会复电嘉勉。继为李委员敬斋报告浙江省党务。张委员强报告河南省党务，卫委员立煌报告河南省政治。至十二时散会。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开第五次大会，由孙委员科主席。首由朱委员家骅作特种问题报告。报告毕全体起立，为各地被某党残害之同志默哀一分钟。继为边疆情形报告，由章嘉、麦斯武德、罗桑坚赞三委员分别报告。嗣为朱委员绍良报告甘肃省党务，王委员漱芳报告甘肃省政治。至六时三十分散会。

三月二十九日，适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全会于上午八时举行纪念仪式后，接开第六次大会，由冯委员玉祥主席。主席团报告发起为三月二十九日四川革命先烈及巴县先烈邹容、张培爵建立纪念碑。本日仍继续各地党政报告，计有袁晴晖同志报告广东省党务，黄委员麟书报告广东省政治。高廷梓同志报告港澳党务。黄委员同仇报告桂省党务。廖维蕃同志报告湖南省党务，李委员扬敬报告湖南省政治。至十一时四十分散会。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举行第七次大会，由孔委员祥熙主席。仍继续各地党政报告，计有陈委员访先报告重庆市党务。黄宇人同志报告贵州省党务。陇体要同志报告云南省党务。张遐民同志报告绥远省党务。陈铁同志报告安徽省党务。武文同志报告西康省党务。至十二时二十分散会。

是日下午三时举行第八次大会，由戴委员传贤主席。由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各委员报告各战区军事概况。至七时五分散会。

四月一日上午九时开第九次大会，由孔委员祥熙主席。讨论党务政治两组审查提出之提案，计共四十二件，其经决议通过而较重要者计有："恢复省县党部选举制度"、"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加强政府机关内本党组织及活动"、"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等案。至十二时五十分散会。

是日下午三时开第十次大会，由总裁主席。讨论政治组提出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经修正通过。当由总裁指示此后全会审查工作报告，应注重上届决议案之执行情形；并就党政机关在行政方面应注意之要点，有所指示。休息十分钟，至五时继续开会，由孔委员祥熙主席。讨论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组审查提出之提案，计共三十七件，其决议通过而较重要者，为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及"改进财政系统统筹整理分配"、"实现本党土地政策，从速举办地价申报"、"推行注音识字运动"等案。七时散会。

四月二日上午八时开第十一次大会，由李委员文范主席。讨论党务组及特种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及总裁交议案，计共七件，其决议通过而较重要者，为"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战时三年建设计划案之一部份与"党务三年计划之方针"，以及"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等案。至十一时三十分休息。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由总裁主席。当通过在行政院设置贸易部与粮食部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海外部部长、副部长及组织部副部长之人选案，及全会宣言。至此议案全部完毕，乃由总裁训词，对于党务工作为周详之指示。旋于六时举行大会闭会式，仍由总裁领导行礼，于委员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全会乃圆满结束。

（摘自《民国日报》1941年）

中条山战役

背景介绍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战役开始。是日，日军为了截断陇海路，威胁西安，集结了六个师团、三个旅团以及第三飞行团共10余万兵力，兵分三路，由中条山外围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据守在中条山的25万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8日，日军占领黄河渡口垣曲；9日，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合围；12日，黄河各主要渡口都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部队被分割成黄河南北两部分，北岸的部队丧失了抵抗能力，溃不成军。为了策应中条山战役，八路军总部命令太岳、太行区和晋察冀第一、第二军分区等部队向同蒲、白晋、正太、平汉、平绥各线出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使平汉、同蒲两线经常处于中断状态。尽管如此，国民党军队仍未逃脱失败的命运。27日，平陆、垣曲、高平等6县全部失陷，中条山各山隘阵地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被迫全部退出了中条山地区，大部分渡过黄河西撤南退，少数转入敌后。这次战役从7日到27日，前后共进行了21天，国民党军队损失5万人以上，日军伤亡约2万人。这次战役又称晋南战役或晋南会战。

材料：

- 扼守中条山
- 中条山失陷

材料一　扼守中条山

日军对卫扼守中条山，恨之入骨。原与我军对峙者为第二十五、第三十六、第四十一、第二十七四个师团，分布于豫北之沁阳、博爱及晋南之晋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带。中条山广约二百七十公里，深约五十公里，前扼山隘，背临黄河，是黄河的天然屏障。日军两次进攻泽潞，八次进攻中条山，均被卫运用灵巧战术和不断更换部队的办法，使日军连连失败。日军称我中条山防线是他的盲肠症。卫请进步作曲家谱成一曲，他自填歌词，前三句是："中条山高又高，他是我们的齐格菲，他是我们的马奇诺……"(齐格菲和马奇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法双方的永久性工事)这首歌在洛阳西工，几乎人人会唱；日军来攻中条山，大家唱得更欢。

1941年5月初，日军由山东、河北、晋北各处抽调兵力，向中条山外围集结。其中集结在豫北潞西、沁阳、博爱一带共约两个师团；集结于晋南的晋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带约五个师团。总兵力达十一个师团，共十五万余人。这次调动，都是用的代号，严格保密。航空部队徒然增加，对我发动攻击的时间已迫在眉睫了。

我军此时在中条山后晋南等地，多为有地方色彩的部队，比较重要的如曾万钟、庞炳勋、何柱国、孙殿英等军；加上其他部队，共约二十六个师，没有航空部队。以上各部队，平日与卫关系颇好。5月7日，突然接获前方十万火急电报，日军已向我偷袭。这时，司令长官部只有参谋长郭寄峤在主持军务，遇此情况，要他以参谋长身份指挥这些部队就实在太吃力了。他急电何应钦。何明知卫在何处，却不去通知卫。还是卫从峨嵋山回重庆的途中自己得悉前线的紧急情况，当即日夜兼程赶回洛阳。5月12日，我军仍在中条山各山隘与日军苦战，但形势恶化。卫立煌回洛阳后，即刻与前线作了联系，电令一个军留守中条山内，继续与日军周旋，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其余各部队，从敌之薄弱环节处钻出包围圈，向敌人背后攻击。18、19日两天，我其他各军均分别突围转回敌后，使敌腹背受击，攻势混乱。27日，敌军在慌乱中停止行动。这次大会战，自5月7日起至27日止，共21天。敌军除空军外，还施放了毒气，并曾占去了几个渡口。我军虽失去了中条山的几个山隘，但主力部队在极恶劣的条件下，突破包围，转向敌后攻击，使日军不知所措，始终不能确实占领中条山全境，只是我军在开始遭到突袭时，伤亡较大，卫立煌长兄之子道钧，也于此役阵亡。

第一战区长官部各有关部门汇报：此次中条山战役，日军的作战方案是得到上自其大本营，下至各师团精心策划。除由华东各战役区抽调师团外，其空军部队是由日本大本营于4月19日命令从关东军调来的第三十二、第八十三战斗队，使原有的第三飞行集团主力达到轻轰炸机六个中队、侦察三个中队、直协二个中队、战斗一个中队，其集结基地为运城和新乡两处机场。

日军前线指挥机构为第一军，司令官为筱冢中将。协调策划机构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为多田大将。他们于5月7日晚开始，用一天一夜的时间穿过我军防线，占据了我重要黄河渡口垣曲县渡口。随之，又以两天一夜的时间，跑坏了许多汽车，用空军配合，达到其大包围的态势。他们便以主力师团由黄河转向北方攻击我军。在到达指定界线后，再由北向南，反复进行"篦梳扫荡"。日军在中条山会战后，虽大吹其扫荡的胜利，但从前线缴获日军的文件中看到，其伤亡人数高达三千人。

在中条山会战后期，卫命令在陵川附近的第二十七军与第九十三军会合，见机打击，以牵制在中条山的敌人。日寇第一军只有在慌忙中抽调其第三十六、第三十三师团配合阻挡我军。直到六月初，日军仍在忙于调兵遣将，其第三十三师团是由华中调来的。

中条山会战，日军的战略和政略目标均未全部达到。我军各部队在战略转移后，原有地区立刻由机动灵活的

八路军进入，频频出击日军，对日军造成更大的威胁。

这次战役，延长了卫的任期。他在作战役总结时，指责何应钦乘他不在，任意改变他的原来部署，并调走了主力部队和中央炮兵团。何应钦采取了忍耐不言的"战术"。当卫把总结报告呈给蒋介石，蒋复电要卫只许承认错误时，卫也学了何应钦的"战术"，忍耐不言。

在重庆的国民党顽固派军政人员，乘此与在西安反共的蒋军将领，共同谋划推倒卫立煌，他们对"中条山失败"这类消息极为灵通，都已伺机多时了。

（摘自《卫立煌将军》卫道然）

材料二　中条山失陷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四日，日军将主力分别集结于豫北道清铁路西段阳城、绛县、闻喜、夏县及张茅大道一线。五月七日下午以钳形与中央突破方式，由东、北、西三方面发起进攻。

此时中日兵力部署如下：

（一）豫北（道清西段）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一部、第二十一师团一部、骑兵第四旅一部，共一个半师团，计二万五千余人；中国军队为第九军裴昌会部及丁树本部，共约四个师三万余人。

（二）晋南（阳城、绛县、闻喜、夏县、平陆一带）日军主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第四十一师团一部、独立第九混成旅团、第三十六师团、独立第三混成旅团、第二十四师团共五个师团计七万余人；中国军队为第九十三军刘戡部、第九十八军武力敏部、毕梅轩纵队、第十五军刘茂恩部、第四十三军赵世铃部、第七十四军一部、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第八十五军李楚瀛部的第九十四师、第三军曾万钟部、第八十军乔明礼部。总计敌军约七个师团，计十万余人，中国军队十九个师一个旅三个游击纵队，兵力约十五、六万人。

豫北道清路西段沁阳、博爱的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第二十一师团及骑兵第四旅一部，于七日下午分二路向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滥炸。中条山会战由此开始。分段防守济源地区的第二战区第九军郭寄峤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见日军来势凶猛，不加抵抗，于八日中午自动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至黄河北岸封门口既设阵地。封门口为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道隘口，长期以来中国军队疏于防守，自九日上午激战至十日晨，封门口被日军攻破，第九军又分别西撤至济（源）垣（曲）大道南北地区。战至十一日，第九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及第四十七师由狂口南渡。十二日晨，日军以一部经洪阳、毛田西进，占领并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该路日军主力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附近，与由垣曲东进之敌会合。由于中国第九军"并未坚强抵抗，全军自由后退未加制止，使敌得以迅速合围，影响十四集团军作战甚大，狂口渡亦早落敌手，豫北退路全被闭锁。"

晋南阳城方面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以牵制中国军队为目的，于七日下午在阳城以西董村东西一线，向第九十八军阵地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至十二日，阵地仍未被日军攻破。日军一个大队侵入董村东南二里腰被中国军队全部围歼。十三日，敌增援反攻，董村失陷。守军第九十八军、第十五军撤退至横河镇东西地区。

晋南绛县、横岭关方面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第九混成旅团约二万余人，以中央突破的战法，直指黄河最重要的渡口垣曲，于七日下午向横皋大道西侧猛攻。在此设防的中国第四十三军赵世铃部历来战斗力低劣，在强敌攻击下，只抵挡几个小时，八日凌晨，阵地正面就被日军突破，第四十三军被敌压迫至望仙庄附近。八日上午，敌不顾一切，将主力分成数股，以钻隙行动向垣曲深入，第四十三军纷纷后退。八日黄昏，垣曲失陷。自此，中条山的中国部队被日军截为东西两部，通讯断绝，失去联络。

九、十两日，日军又由垣曲分股向东向西挺进，分别包围刘茂恩、曾万钟集团军，整个战局十分危急，但此时战区长官司令部"并无重大处置，任各军各自为战"，延至十日，曾万钟全军陷于重围。战区虽命令其向北转移，但该军因"通讯工具全毁，与各部已失联络，命令无法下达。"五月十一日，与战区长官部失去联络的刘茂恩直接向重庆蒋介石发电，一方面电告战斗失利情况，一方面求援，电文中称："狂口补给线已被截断，潦山内瘠，苦又无屯粮，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原来"中条山地区未有按作战要求屯粮，应需给养只输送至黄河各渡口为止，各军不得不抽派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兵力不断往返搬取，以应每日所需。因此部队战斗力减低，且战斗开始即告断炊，致因饿而致死者甚多。"

十二日晨，东进日军攻至邵源，与济源西进日军会合后，又分路向北攻击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西进敌军于十一日占领五福涧，掌握黄河北岸各渡口。

晋南闻喜、夏县东南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三十七师团及独立第十六旅团各一部，于七日下午向张店镇以东第八十军、第三军的结合部猛攻，激战数小时，守军阵地被突破。日军分若干小股向守军阵地后方钻进，八日下午，第八十军、第三军撤至四交河亘望原一线，节节抵抗。九日午夜，日军攻势益猛，守军被迫退至台砦村附近，与日军坚持战斗。激战中，新编第二十七师损失较重，师长王峻、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均壮烈殉国。十日晚，余部奉命陆续南渡。

中方第五集团军因绛垣大道被日军截断，腹背又遭敌预伏的特务在各司令部附近袭扰，破坏通讯交通，致指挥陷于紊乱。九日拂晓，卫立煌下令该部调整部署，将第

三军、第十七军主力转移至夏县通皋落大道南侧山地继续战斗。因该区域地形复杂，联络困难，又加上当时下雨，转移计划未能实施。十日，日军从四面进逼，情况紧张，曾万钟决定以团为单位向西北突围。至十三日，只有第三军，第十七军各四个团突破敌包围，向汾河西岸转移。

五月十二日以后，中国军队第五、第十四两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在中条山各山隘内各自为阵，独立战斗。此时各军补给不足，情况危急。日军自十一日起进行南北"篦梳扫荡"，中方各军主力于十三日开始突围。几经艰苦周折，至二十日，第九十三、第十九两军分别突围到达乡宁，第九十八军的两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部队都被冲散，有的被日军阻袭折回济垣路以北地区。

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五月二十二日以后，八路军为团结对敌，应蒋介石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南北，进行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奉命渡河南撤的国民党突围部队，沿途无不受到日军截击，加之缺乏渡河船只，部队损失惨重。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总部及第十五军军部就是靠仅有的两只小船(每只仅能容七人，往返需一小时)往返数十小时，至二十六日才脱险南渡。二十七日战斗结束，国民党军被打死四万二千余人，被俘三万五千余人，日军比近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长沙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第二次长沙战役开始。是日，日军第六师团进攻岳阳东南大云山中国守军，双方展开激战，拉开了第二次长沙战役的序幕。18日，日军集中兵力向新墙河一线展开猛攻，战役正式开始。由于第九战区对敌情判断有误，中国军队正面防备不足，日军在两天内便完全突破新墙河防线，并推进到汨罗江北岸。第九战区急忙布置汨罗江南岸防御，并集结部队，伺机自东南向西北侧击南进日军。由于双方实际战斗力不相上下，战役打得十分激烈。后来，第九战区的作战密电两次被日军破译，致使第九战区部队遭到严重损失。20日，日军在骆公桥至浯口之间强渡汨罗江。26日，日军主力向长沙猛攻，在捞刀河一线击破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七十四军。27日，日军早渊支队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三师团一部攻入株洲。10月1日，由于日军战线过长，后方交通经常被中国军队切断，加之第五、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向宜昌、荆门发起攻击，迫使日军退出长沙北撤。中国军队迅速组织反击，对日军进行追击，阻击和侧击，但由于主力部队在遭到严重打击后，战斗力幅度下降，力不从心，以致在追击战中无法扩大战果，仅获得一些小胜。10月9日，日军撤回新墙河北岸，战役至此结束。这次战役，日军伤亡万余，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约10万人。

材料：

- 日军占而复退
- "第二次长沙大捷"

材料一　日军占而复退

九月十七日，日军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并列于新墙河北岸，并以两个联队配置于两翼。十八日拂晓，正好与第一次长沙会战相隔两年，日军又发动了全面攻击。在杨林街以西二十公里的狭窄地带，四十五个步兵大队同时行动，三百多门火炮齐放，轰击中方阵地。中国方面对敌大举进犯准备不足，配置在日军正面的部队为第四军(军长欧震，下辖第五十九、第六十、第一〇二师)，已连日参加或策应大云山战斗，人员伤亡颇多，明显抵抗不住日军大兵团的攻击，只几小时，新墙河正面防线即被日军完全突破。第四军"转至胡少保、关王桥以东及洪源洞、向家洞一带地区，对敌侧击"。但其新设防线当天下午又被日军突穿。在日军强大攻势下，中国军队不能继续进行正面阻击，乃向右翼山地转移。十九日中午，日军各师团均已抵达汨罗江北岸各要点，开始强渡，其中第六师团一部在十九日上午从长乐街渡过汨罗江，先后占领颜家铺、浯口。

九月十八日，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护卫下，穿洞庭湖在湘江口两侧的青山强行登陆，中国守军第一九七师奋力阻击，终因"四面环水，联络断绝"而失利。日军登陆成功后，以此为据点，策应主力正面攻势。

中国军队防备不足，使日军在两日之内即完全渡过了新墙河，并迅速攻抵汨罗江北岸。第九战区从惊慌中清醒过来，急令第九十九、第三十七军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设防阻击；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四、第二十、第五十八军对渡过新墙河南犯之敌"向敌后侧，攻击前进"，迟滞其进军速度。

十八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战前计划，布置对汨罗江的防守。他指示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九军守备汨罗江南岸，"第二十六军军部率第四十四师推进至金井附

近”，该军其他部队也集结于金井周围，伺机自东南向西北侧击南进日军。这个命令在下达时被日军特情班收悉并破密。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使用的密码简单，且一种密码使用多次，日军因此而破译战区以无线电传递的作战命令，这是中方在战斗中屡遭挫败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军队电讯被日方破译，日军第十一军获知中方作战部署，二十日，决定放弃战前“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会战指导方针，而在中国军队的“更东方对之进行包围”，“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并命令各师团迅速向东挺进。这样，企图包围敌人，在外围作战的中国部队，反而有了被围歼的危险。

同日，日军各部在骆公桥至浯口之间强渡汨罗江。二十二日，第四、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在汨罗江南岸对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展开围歼战。日军在窃获第九战区将向该地区增派兵力的情报后，“将原定当日傍晚开始的攻击时间提前”。第四、第三师团在飞机掩护下，攻击第三十七军的主阵地下武昌、狮形山、兴隆山。经过三天激战，到二十四日，日军不仅突破了第三十七军的防线，且已进抵中国军队侧背后的新开市、麻峰嘴，形成合击之势。第三十七军被迫“向上杉市、麻林市、新桥之线转进”。二十二日，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也开始对第二十六军进行围歼。中国军队虽奋力反击，无奈日军火力强，情报准，始终未能逃脱被围被打的境地。二十五日夜，日军一部攻下何家坪、五台洞，逼近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薛岳令其“迅速集结兵力，攻敌一点，切勿对各方均取守势”，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

当日军围攻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六军时，中方第十军奉命前来增援，九月二十二日到达明月山、栗桥、福临铺、高仓瑕、金井一线。日军又乘势向立足未稳的第十军发起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十军所属第一九〇师师司令部被日军包围，激战中，“师长朱岳重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全师陷于混乱，纷向福临铺突围；方先觉的预备第十师亦被日军第三师团击破，全师向后溃退。到二十六日，第十军“伤亡过大，转移至石鼓牛、徐家桥及万家铺、天雷山之线”。

在日军猛烈攻势下，中国军队呈溃散之势，贪生怕死，“不战而走者，不在少数”。二十六日，薛岳令各军、师组织“督战队”，于重要路口收容离队士兵，使其归队或重新编组，“如有不服从收容者，就地枪决”。

九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四师团及早渊支队在枫林港附近击退中国军队之后，借追击之际，沿白沙河河谷向长沙挺进。早渊支队渡过捞刀河后立即趁夜色攻占南岸阵地。二十七日晨，早渊支队受第九十八师阻击，双方在三窑堂，白茅铺激战。日军在飞机支援下，突破第九十八师阵地，南渡浏阳河，攻击长沙。浏阳河岸仅少数中国守军，日军在猛烈炮击对岸后，“未经战斗即渡过浏阳河”。

二十七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守住新开至武城门，掩护其它部队入城。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二十九日，第四师团主力也开进长沙。

在日军第四师团攻击长沙时，第三师团则决定向株洲方向追击，企图歼灭南撤的中国军队。二十九日上午，第三师团一部冲入株洲，“将军事设施予以破坏”，下午，即撤向金潭附近集结。

第十一军发起总攻时，日本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到九月二十七日夜，日军认为已对第九战区主力第七十四、第三十七、第二十六和第十军予以严重打击，达到了作战目的。且日军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九月底，其向南“追送粮弹之装甲车五十余辆悉数击毁，死援兵一千余人”，“不能增援补给，继续作战”。因此，十月一日黄昏，日军各师团开始退却。

在各主战场鏖战之时，第九战区各部队利用日军战线过长，护卫供应联络线路的兵力较少等弱点，在日军侧翼和主力背后发起攻击和袭扰，给日军造成了不少困难。如原守卫新墙河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所属各军在阵地被突破后，一直奉命尾随日军主力之后，攻击敌人。虽有斩获，但并未起到拖住日军、使其停滞不前的作用。

二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薛岳：“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牵制敌人向北转移，使五、六战区作战有利。”中国军队迅速对日军进行追击、阻击和侧击，并取得了战果。其中第九十八师在捞刀河北岸伏击早渊支队，日军措手不及，两名大队长被狙击而死，士兵伤亡甚众。第九十九军也一路袭击后撤的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十月一日，在路口畬附近袭击正在宿营的第六师团部队，“毙敌人马七百余”。第二十七集团军所辖的三个军，亦由尾随变成了阻击日军北撤的主力，歼敌俘获颇多。

湘北日军主力退却之时，第六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城内日军固守待援，朝不保夕。这时，第九战区部队应尽全力迟滞日军退却速度，阻止其回援宜昌。无奈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已受到严重打击，战斗力所余无几，虽尽力阻击，却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第九战区的失利，也导致了攻克宜昌的计划攻败垂成。

十月九日，日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北岸，转为守势。中国追击部队，随后赶到，双方再次对峙于新墙河。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湘北主战场战事遂平。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第二次长沙大捷”

第二次长沙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最

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失败最惨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湘北战场中国方面出动了35个步兵师、7个挺进纵队（相当于步兵师）、6个保安团、1个炮兵旅、3工兵团，共计378000余人；日军方面出动步兵4个师团、1个个独立旅团、两个支队（加强联队），共计1150000余人。此外，日军还有一个装甲车联队、一个重炮兵加强联队、两个山炮兵加强联队、3个工程兵联队参战。根据第九战区9月9日到10月8日的统计数，这次战役中国方面的损失是：军官负伤1310人、阵亡760人、失踪421人，合计2491人；士兵负伤33793人、阵亡22667人、失踪11066人，合计67426人，湘北战场总计损失官兵达69917人。如果连第六战区计算在内，损失部队共约10万人（第一、三、五战区伤亡不计算在内）。各军的损失情况是：第74军第58师伤亡55%，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10军第3师伤亡35%、第190师伤亡28%；第4军第102师伤亡45%；第26军第44师伤亡24%；其余各师伤亡在20%以下。武器损失情况为：步骑枪12000余枝，轻重机枪1100余挺，手枪1000余枝，火炮数百门。日军方面的损失要小得多。根据日方公布的材料，日军战死1670人（内将校122人），负伤5184人（内将校272人），去向不明者14人，军马战死1168匹，负伤1092匹，共计日军损失6868人，马匹2260匹。

薛岳、吴逸志在这次战役中遭到惨败后，远没有上次战役那么神气了，战争结束后，他们没有主动向外吹嘘打了胜仗，但是重庆的广播电台却帮他们吹开了，说湖南战场又传出了"第二次长沙大捷"。日本东京的广播电台则与重庆唱对台戏，说日军在长沙消灭了中国5个军十数万人。这样一来，又吸引了外国记者，他们由军令部人员陪同，与中央社、《大公报》、《扫荡报》等记者一起，前来采访。薛岳指派参谋处长赵子立，将重庆广播的新闻和报刊上宣传的资料收集起来，整理加工，编成一套没有漏洞的"胜利"经过来对付中外记者。记者们信以为真，大肆宣传，于是"第二次长沙大捷"又传开了。当时有一名记者，根据薛岳和赵子立的宣传，曾将第二次长沙战役的情形写成了《壮志千秋》一书（1947年出版）。这本书把第二次长沙战役说成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诱敌歼灭战"，并认为成功的经验主要有4点："（一）大云山序战告捷，挫伤了敌人锐气；（二）依据首次防卫长沙之经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敌则忘却前次教训，将我新墙河、汨罗江正面开放，误以为我军溃退，乃深入浏阳河一带，为我包围歼灭；（三）我方处于外线，使敌无法策应。敌由汨罗江东犯瓮江，企图抄我后路，向我右翼大迂回，进而压迫我军于湘江河畔，以直下长沙。我方使敌始终处于内线，其后方补给，处处遭我截击，致使弹尽粮绝；（四）我方以重兵控制在敌后，破坏了敌人稳扎稳打计划。敌军此次进攻长沙，鉴于上次的失败，乃集中兵力于湘北一地，不似上次赣北鄂南湘北，各路齐进。由新墙河至捞刀河不过200里，由平江至洞庭湖滨不过150里，集中兵力18万，民伕15万，实可谓开战史上未有的先例。而其战术亦较前不同，如敌在渡过新墙河后，即将其部队分为若干小队，不顾后路，四处窜扰，以为触及我军之背，我即发生动摇。殊不知我已改变战略，以小部队正面抵抗，以大部队控制在敌后，任其前进，等到敌通过时，再行侧击，使敌首尾不能兼顾。"经过这样的宣传，败仗变为胜仗，薛岳又成为"英雄"了。当时不仅蒙哄了中国人，也蒙哄了外国人。

第二次长沙战役败得这样惨，军委会直接指挥的王牌第74军又败得这样快，使蒋介石感到震惊。战役刚结束，蒋介石就乘飞机到南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会议，要追查第26军、第10军、第74军的失败责任。因为薛岳早在战斗中就向蒋介石打电话，说这几个军作战不力，尤其是第26军肖之楚作战不力，失败太快，以致长沙东北的防务没能配备好，日军就到了。在会上，薛岳把所有责任包括第10军和74军的责任都往第26军、第37军身上推，要求蒋惩办肖之楚。蒋事先曾听取过军委会汇报的战斗情况，心中还是有底的。因此，他并没有处分肖之楚，而是把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给枪毙了，同时对第10军军长李玉堂、预10师师长方先觉给予撤职处分。

第二次长沙战役惨败的责任，主要应由薛岳自己来负，但他却委过于人。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说过：人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导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第二次长沙战役，正如毛泽东所说，关键在于第九战区长官部的部署和指挥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南辕北辙，导致了战役的失败。

首先，第九战区长官部对变化了的敌情没有进行及时侦察、了解和认真分析。要使自己的战略部署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就要对敌情进行深入了解。不了解敌人底细，是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的。指挥这次作战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曾经担任过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的次官，具有相当的战略头脑，精通战略战术。他几次修改作战计划，吸取冈村宁次分兵使用的教训，将力量全部集中于湘北，使湘北方面的日军达到4个师团另9个大队，在战略局部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如果从火力方面以日军1个师团等于华军6个师计算的话，这些日军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28个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其幕僚，对日军方面这么重大的变化竟一无所知，一直到王牌第74军迅速惨败，他们才惊醒过来，但还是不知道日军究竟有多少人。实际上，如果第九战区长官部善于分析或者认真分析的话，当时是可以大致了解日军情况的。在战

役的序战时期，侦察员曾报告岳阳方面的日军已出现四、五个师团番号；15日还侦察到岳阳方面已有数万日军集结，特别是日军第6师团长亲临新墙河视察等情况。对于这么多重要的反常现象，他们却不进行认真分析，视而不见。对第6师团长的出现，他们判断是日军为了"秋后劫收"。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日军这次作战的目的，根本不是为抢夺物资，而是专为消灭第九战区有生力量而来的。薛岳等人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因而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日军在进攻长沙以前，老早就在宣传，说要对"大云山游击根据地"进行一次"扫荡"。薛岳听信日军宣传，忽视被大云山序战所掩盖的日军主力集结，这样就使日军收到了数重的奇袭效果：第一，由于向湘北集中兵力极度机密，在攻击发起时间上收到奇袭效果；第二，日军兵力如此集中使用，出乎薛岳的意料；第三，行动迅速，两天到汨水，7天到长沙，这也是薛岳没有估计到的；第四，日军攻击目标远向株洲，就更没有想到了。

其次，战略方案陈旧。由于第九战区长官部不了解变化了的日军情况，因此在战役打响前，就把在4月份作了一下修改的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计划拿了出来。这个计划还是三路迎敌，即湘北、赣北、鄂南三面同时反击日军，造成兵力分散，防守没有形成重点。

薛岳依然使用他的陈旧方案，主要是第一次战役影响所致。根据上次战役情况，他断定：日军一定会继续按三个方向（至少也会从两个方向）进攻长沙。此前不久所发生的上高战役，更使他坚定了这一看法。1941年3月，日军使用了大约两个师团的兵力向奉新、上高方面进攻，经过半个月战斗后恢复原态势。因此，上高战役之后，他部署在这方面的兵力基本上没有作什么调动，等待着日军从赣北方面的到来。但是，日军没有走过去的老路，使薛岳的计划落了空。战役结束之后，薛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一直认为日军不从鄂南赣北两方面进攻，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缺陷。他说：日军在进攻初期之行动，"必须对赣北鄂南取佯攻态势，牵制我军，最低限度，亦应以有力支队攻取通城，南下平江浏阳，以掩护其左侧之安全"，日军没有这样做，他认为是"敌昧于此计"，太愚蠢了。其实，这并不是日军的愚蠢，而是它的狡猾。日军最初部署时，是有这样的打算，正因为他们估计到第九战区会从鄂南赣北展开夹出，并分散它的兵力，所以才改变部署的。愚蠢的正是薛岳本人，既不知道分析日军变化了的情况，也没有变更自己的陈旧部署。

第三、选择决战地带过早。第九战区第一次长沙战役的决战地带是在捞刀河流域，而第二次长沙战役时薛岳却将决战地区向北推进到汨罗江南岸地区。他在作战指导大纲中说："务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将向该方面进攻之敌，反击而歼灭之。"汨罗江离长沙大约还有七八十公里，福临铺离长沙大约有四五十公里，从新墙河北岸到长沙一共才120公里。在离长沙大约60公里的汨罗江南岸地区决战，不符合诱敌深入的战略要求。日军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不过两三天的行程，其攻击力还处于旺盛阶段，而且日军事先破译了第九战区的作战命令，具有充分的攻击准备。因此，薛岳各部所抗击的不是疲劳之敌，企图以两个军7个师的兵力将优势日军阻挡在汨水一线，是不可能做到的。薛岳不顾（不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强行命令第26、第37两军坚守阵地，当然只能失败。假如说，薛岳还象第一次长沙战役那样，决战地域再向长沙方向延伸，利用捞刀、浏阳两河流域的有利地形，将第26军、第37军埋伏在两翼，等第10军、第74军、第79军、暂2军到达战场后，一齐投入战斗，再以留置敌后的第27集团军切断日军补给线，四面围攻，作一场拼杀，这样就有可能将日军消灭在湘北地区，至少是不会惨败到如此地步。

（摘自《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一年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23日闭幕。蒋介石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50余人出席会议。在会上，吴铁城宣读了《对德、意、日宣战书》，蒋介石宣读了《告全国军民书》，并在训示中说："此次全会举行之际，正值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大会宣言提出"坚定信仰"、"奋斗到底"、"加强动员"等口号。居正、王世杰、朱家骅、康泽、刘维炽、周钟岳、谷正纲、郭泰祺、徐堪、何应钦、王宠惠分别作了常委会、宣传、组织、三青团、海外党务、内政、社会、外交、粮食、军事、国防等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授予总裁大权案》，给予蒋介石以"全权处理国事，以驳万变而赴事机"之大权。大会还通过了《总裁交议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置战时重要政务之赞襄审议机关案》、《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案》、《加强国民动员实施纲领案》等。大会还决定由宋子文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原外交部长郭泰祺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并决定成立"特种审查委员会"以对付中国共产党。

材料：

- 全体会议宣言
- 会议快讯

材料一　全体会议宣言

今年三月本党第八次中央全体会议曾昭告国人谓："吾国抗战已成为太平洋上制裁敌寇之基本力量，亦为世界人类安危祸福之重要关键，必以百折不挠之战斗，使世界咸知我中华民族自救救世坚强无比之决心，务使敌寇全部退出我国境之外而后已，务使其经此教训不敢再存独霸东亚、破坏世界和平之祸心而后已"。九阅月来，我举国军民在总裁领导之下，同心一德，毕矢精诚，喋血抗战，再接再励，已使敌寇疲于奔命，愈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至今年十二月八日，敌寇竟以十年前突袭我沈阳之故智袭击英美，爆发太平洋之战争。其积年破坏世界和平之野心乃终于无由挽救，而演成人类空前之罪行。吾国既于事变翌日即对日本及其同盟国之德、意正式宣战，总裁更昭告全国军民与海外侨胞，今后誓当竭其全力与英、美、苏联及各友邦并肩作战，除此人类之公敌。本党第九次中央全体会议适逢此世界巨变之时，回顾四年余之苦斗，远瞩世界之前途，深觉我中华民国当前之使命，至为神圣而光明，而吾人今日所负之任务，则弥见其艰辛而重大，诚有使吾人兴奋惕励而不能自已者。谨将吾国革命建国之方针，国民当前应有之认识，与政府人民今后所应黾勉致力之途径，为国人恳切陈之。

其一，愿吾全国对于立国之三民主义有更深刻坚定之信仰，奋斗到底，以达成吾中华民族之神圣责任也。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其毕生奋斗，领导国民百折不回以求实现者，厥为救国救世之三民主义。盖有见于人类社会之进化，实以人民生活问题为中心，而近代人类之生活方式，随知识与能力之扩展而演进，又实归宿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大问题。数百年来，世界之纷扰变革，无一而非由于此三大问题未得合理之解决。良以人类在民族、政治、经济三方面，皆非循守和平之义，使人与人、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咸能平等而协作，即不能臻于共同生存发展之途。而我国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之国家，倘不能获得真正之自由平等，即世界亦决无从获得真正之安定。国父本于吾民族五千年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美德，与继绝举废，治乱持危之大义，更汇合欧美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以谋人类生活之彻底改革，乃有三民主义之创立。其本此主义领导革命，则以"建民国而进大同"为最大最高之职志。此一伟大之主义，为东西文化之总汇，人类生活至高无上之真理。观于本年六月德国侵苏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联合宣言，标举八大原则，为将来重奠世界和平之方针。其所包含关于民族自由、政治独立、经济平等及全面合作，以求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全之要义，悉与吾三民主义之原理若合符节。吾政府与人民既予以热烈之赞同，更认为今日各民主国家对侵略国家之战争，胥应以此为共同之目标，必使凡被侵略之国家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后，咸得独立自由平等之保障，庶几今后人类不再受战争之惨祸。吾人今日既深幸此一真理之日益昌明，自当举我国之人力物力，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故吾人当前之急务，即在以安危与共、患难相扶之精神与反侵略各友邦迅速成立统一强固之阵营，力谋军事、政治、经济之密切合作，相互提携，团结一致，决不为单独之媾和，必期达到解除侵略国家之武装，保证人类经济生活之机会平等，与重奠世界永久和平秩序之目的。回忆吾国父于民国成立之日发表告友邦书，曾谓"今后当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此一伟大之志事，至于今日乃为我国民所实际负荷而无可旁贷之责任。诚愿吾海内外全体同胞一致遵奉三民主义，认识我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贡献之重要，发扬蹈厉，奋勇无前。与反侵略各友邦携手并肩于此历史上未有之义战，以扑灭侵略之恶魔，建设正义和平之世界，乃为无负吾人所处之时代，无负我友邦与世界上爱好和平人类数年来对我抗战之同情也。

其二，愿我全国对于战时之生活行动有更紧张严肃之觉悟，加强我全国总动员，以争取吾反侵略阵营之胜利也。吾国四年半以来之对日抗战，其意义曾历次宣言，不独为图民族之生存独立，实并为求世界之正义和平与人类永远之福祉。今敌国日本既由逞凶于东亚转而肆虐于全球，轴心国之同恶相济已形成为凶残无比之寇盗集团，而民主国家亦益加紧密团结，筑成伟大坚强之壁垒。就此两大阵营观察，我仁彼暴，我直彼曲，胜负之数固无待于蓍龟，然兵凶战危，不可轻忽，胜利之来，万无坐致；以吾国人力物力之富，四年来抗战虽已陷敌于泥淖之中，而尚未能逐敌于国门之外；此在我全国朝野，诚当加以严格之反省。须知现在〔代〕战争乃国家总力之决斗，欲期战争之胜利，必须集结全国所有之人力物力，统一全国之精神、意志、力量与行动，悉为国家而效命，供战斗之使用。我过去四年半以来，全国各方面之动员，其与战争之要求实相距甚远。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要义，吾人诚一加检讨，实亦深觉笃行之未逮。否则我抗战力量之增强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建设事功之猛进，必当倍蓰于此时，可以断言。今者吾全国已与各友邦并肩共荷世界安危之重任，凡我全国同胞更应严肃紧张，共起真诚之觉悟。当知吾人此次战争之成败，不独为我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亦且为世界全体人类祸福之所关。际此反侵略各国共同担任战争任务，各自争献能力民之时，吾中华民族之荣辱存亡，实胥视吾人在最近将来淬砺濯磨之何若。自今伊始，必当加强全国总动员，使每一个国民皆克尽其对于战斗之任务。每一物资皆能增其对战斗之效用。人人牺牲自由，贡献能力，使全国成为一统一坚强之战斗体，无论任何部门之工作，皆须适合于现代战争之条件，以配合友邦共同作战之行动，然后方无愧为世界战争中之一

员，方为克尽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所应尽之义务。所期举国一致，各自振奋，人民则服务奉公，官吏则尽忠职守，将士则杀敌致果，而本党同志尤须抱坚苦卓绝之精神，为整齐严肃之行动，率先奋斗，为民前锋，务使全国人人咸能提高战斗之意志，严守战时之纪律，以表现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抑强扶弱，继绝举废之固有道德，而无忝其继往开来之大责重任也。

其三，愿我全国对于今次中央决定之战时各种政策与措施，有更忠诚笃实之践履，以树立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基础也。自国父逝世，本党为完成革命之使命，决以两大任务分期贯彻。其一为求国家民族之统一，其二为求国家民族之自由平等。其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之实施，虽以环境艰困，不能不斟酌其先后缓急之宜，而凡百决定，则无不以国父遗教为准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既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而国民参政会又一致表示拥护，自兹吾国国是之前途即已悬一鹄而同趋，而今日世变更亟，尤应以亲爱精诚之旨团结全国之力量，以努力于实践躬行。此次全会检讨过去工作，决定今后途径，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事业各方面，均已分别成立决议，而当前要政尤为注重者，简括言之，厥有四端：

一曰厉行基层建设，树立民治基础。在地方当限期完成新县制之实施，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以充实民权自治基层之力量；在中央则集中人才，广罗贤俊，俾能共负国事之责任。

二曰加强经济管制，保障国民生活。对于军需物资之生产与运输，力求其增进；对于民生必需品之分配与供应，严密其管理；对于物价工价之平定，囤积居奇之取缔，与粮食之供应管制，尤必严格执行，以安定军民之生活。

三曰实施土地政策，发挥土地效用。于政府成立专管地政之机构，期于厘订地籍，平均地权，促进土地利用诸要项，充实各种法令与组织，以谋迅速之推行。

四曰加强实施动员，发挥战时人力物力。对于全国总动员，重新订定实施纲领，对于兵役之推行，更求方法之完善，而于国民普服工役之义务，亦当作切实有效之规定，以期人民对国家担负之平均，确立战时坚强持久之力量。

凡此荦荦大端，皆为战时之要务，建国之大计，亦为吾国今日参加世界战争之所必要。政府当本至公至诚之态度，排除万难，以求战时措施与政策之实现。更期吾全国同胞人人以战事为念，事事以战事为重，必使今日各级政治成为战时之政治，全国经济成为战时之经济，社会与教育皆成为战时之社会与战时之教育，然后不愧为现代战时之国家，方能完成此次神圣战争之任务，而吾国家民族始能具备独立平等之资格，以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获得战后之自由与光荣也。

总之，吾国从来之外患，实未见有如今日之严重，世界从来之战争，亦实未见有如今日之凶残。而立国大道，则亦从未见有如国父三民主义之崇高博大而切实者。欧洲文艺复兴之运动，为代表人类自我之觉醒，既使人类之知识能力有空前之飞跃，而我三民主义之运动，实为代表人类全体之觉醒，其必使人类之诸般生活日臻于文明康乐之境，尤为吾人所深信而无疑。吾民族有此主义，真宜引以自豪，奉以自勉。五千年之古国正在复兴，二十世纪之新世界正当改建，救国救世之神圣任务今已并落于吾人之双肩。国父诏示"当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奠国家亿万年不拔之根基"；总裁训勉国人以"生活之目的，在增进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吾人之信仰在此，吾人之希望亦在此，吾人之努力亦悉在于此，愿我中华民国全体同胞共勉之。

（摘自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6日）

材料二　会议快讯

中央社本市讯：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十五日晨九时举行开幕典礼。到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孙科、孔祥熙、邹鲁、冯玉祥、陈果夫、李文范、邓家彦、陈树人、顾孟馀、叶楚伧、吴铁城、何应钦、陈布雷、朱家骅、麦斯武德、乐景涛、林森、张继、吴敬恒、蒋作宾、章嘉等一百五十余人，列席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省政府主席及青年团中央团部干事、处长等。总裁主席。领导行礼后，由秘书长吴铁城谨敬宣读：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国民政府对德意志、意大利宣战布告，蒋委员长告全国军民书。全体肃立静听，会场空气严肃。旋总裁致词，对本次大会任务指示甚详。至十时半礼成。休息十分钟后，举行预备会议，仍由总裁主席。秘书处报告报到委员人数后，讨论议案：组织主席团案，决议推居正、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戴传贤、邹鲁、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叶楚伧、顾孟馀等十一委员组织主席团。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案，由主席团推定后报告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十六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右任主席。主席团报告各组审查委员会人选后，大会听取党政报告，依次为常务委员会居常务委员正报告，组织部朱部长家骅报告，宣传部王部长世杰报告，海外部刘部长维炽报告。下午三时续开第二次会议，主席居正。继续听取党政报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康处长泽报告，国防最高委员会王秘书长宠惠报告，内政部周部长钟岳报告，外交部郭部长泰祺报告。至晚六时散会。兹志各组审查委员名单如下：

党务组：邓家彦、贺衷寒、张继、段锡朋、黄季陆、张强、姚大海、朱家骅、马超俊、余井塘、陈访先、林翼中、李

敬斋、李绮庵、陈立夫、谢作民、胡文灿、王秉钧、潘公展、邓青阳、苗培成、丁超五、陈树人、萧吉珊、谷正纲、周启刚、王世杰、李任仁。召集人邓家彦、陈立夫、朱家骅。

政治组：王宠惠、张厉生、蒋作宾、焦易堂、甘乃光、熊式辉、郭泰祺、黄旭初、张群、何键、刘文岛、萧同兹、薛笃弼、陈耀垣、陈布雷、黄绍竑、茅祖权、吴忠信、傅秉常、沈鸿烈、陈泮岭、杨杰、洪兰友、张知本、赵丕廉、王用宾、杨庶堪、覃振、李宗黄、王昆仑、吴经熊、乐景涛。召集人王宠惠、张群、黄旭初。

军事组：何应钦、何成浚、许崇智、陈绍宽、秦德纯、陈策、陈调元、程潜、夏斗寅、熊克武、陈庆云、张任民、刘峙、杨虎、唐生智、李福林、商震、谷正伦、徐永昌、钱大钧、张定瑶、张贞、鹿锺麟、陈仪。召集人何应钦、程潜、商震。

经济组：王伯群、贺耀组、梁寒操、吴保丰、徐恩曾、李扬敬、林云陔、罗翼群、叶秀峰、徐堪、萧铮、闻亦有、王懋功、刘维炽、洪陆东、区芳浦、曾养甫、俞飞鹏、王漱芳、孙镜亚、詹菊似、陈济棠、刘纪文、彭学沛、傅汝霖、黄实、赵棣华、黄季陆、赖琏、程天放、陈泮岭。召集人王伯群、贺耀组、徐堪。

教育组：吴敬恒、吴挹峰、王正廷、方治、黄麟书、陈继承、时子周、麦斯武德、邵华、戴愧生、余俊贤、李次温、王泉笙、雷震、张默君、王子壮、陈立夫、崔广秀、陆幼刚、萧忠贞、罗家伦、狄膺、乐景涛、张道藩、张治中、鲁荡平。召集人王正廷、陈继承、张道藩。

（摘自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7日）

第三次长沙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一年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战役开始。是日，日军第四十师团突破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北岸的前哨阵地，将主力推进到新墙河岸，24日晚，日军强渡新墙河。28日，日军强渡汨罗江，并在汨罗江南岸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按日军原订作战计划，日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应收兵北撤，但日军司令官阿南惟玑却被胜利冲昏头脑，突然改变原订计划，下令部队继续南攻，占领长沙。1942年1月1日，日军向长沙发起进攻。第九战区命令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余各部则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做"求心攻势"，围歼日军。从1日到4日，第十军挡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猛攻，以惨重的伤亡大量杀伤了日军，为主力围歼日军创造了条件。4日，中国军队全线反击，日军向北退却。第九战区将在长沙围歼日军的计划改为分路追杀日军。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弹药缺乏，而中国军队准备充分，士气较高，日军的北撤十分艰难，几乎每日都在激战中渡过，伤亡十分惨重。15日，经过10余天苦战，依靠空军援助，日军突破重围，狼狈撤回了新墙河以后阵地。这次战役，日军伤亡达5万人，内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10人，遭到了惨败。

材料：

- 长沙保卫战
- 诱敌深入成功

材料一　长沙保卫战

阿南惟玑在作战之初就有乘势攻占长沙的企图，日军的顺利进展，使他觉得可以象三个月前那样，轻而易举地攻下长沙。他认为，虽然牵制中国军队已无必要，但攻占长沙仍可"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把（中国）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到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有可能受到袭扰之感"，"表明皇军尚有余力"，"予第六战区以威胁"等等。同时，他过低地估计了受到打击但已迅速恢复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中国军队在长沙周围集结的情况知之甚少，错误地判断长沙守军兵力薄弱，无二线兵团可以阻止日军的进攻。便不顾日军是仓促作战，准备不足，供应困难及敌情不明等兵家大忌，于十二日二十九日独断地下达了"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作战命令，要求第三师团攻长沙，第六师团一部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的梨梨市，第四十师团向金井挺进，保护主力的侧后翼。

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得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日军第一线官兵感到不解，他们对今后的作战行动毫无所知，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因而士气低落。

守卫长沙的第十军（军长李玉堂，下辖第三、第一九〇和预备第十师）。奉命"死守长沙，第一九〇师号（二十）日晚由渌口开长沙，任长沙外围据点之守备。第三师任长沙核心工事之守备，预备第十师固守岳麓山及水陆洲既设据点工事。该军第一步确保长沙；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三天以后，待命向东反击敌军"。

二十二日，薛岳又指示长沙市内的警备司令部、宪兵第十八团、长沙县政府、三民主义青年团等部队、机关，协助第十军固守长沙。长沙军民开始向后方疏散人员物资，同时，加紧在城墙内外、交通要道等重要地点，修碉堡、筑工事，布置阵地，准备与日军作战。第七十三军则接替了第十军在岳麓山和湘江西岸的阵地，与第十军形成呼应之势。

十二月三十日，长沙保卫战已势不可免，军委会指示第九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

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齐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

第九战区命令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余各主力部队则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按规定，各部队第一次攻击到达线为桥头驿、安沙、春华山、莲塘、枫树河、白田铺、大托铺等距长沙稍远的四周地区；第二次攻击到达线为捞刀河、傅家冲、长桥、椝梨市、东山、金盆岭等长沙附近的四周地区，以求在日军攻击长沙时，不断缩小包围圈，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围歼。

日军第三师团渡过汨罗江后，已于二十九日改变由北向南的攻击方向，准备由西而东参加围歼中国第三十七军的战斗，但当晚，却接到了“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的作战命令。三十一日夜，第三师团主力移师至长沙附近的椝梨市和东山附近，准备攻击长沙。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从椝梨市及东山附近渡过浏阳河，在二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的高地阿弥岭、林子冲、金贫岭阵地发起攻击。

预备第十师与日军在长沙效外展开了激烈争夺。中国军队在阵地被摧毁，人员伤亡很重的情况下，决定放弃第一道防线。一日下午，后退到半边山、左家塘、农林实验场一线阵地，继续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全力攻击。夜晚，其一部突破邬家庄和军储库附近阵地，乘势攻击白沙岭，威胁市内的天心阁。中国军队奋力反击，重又夺回邬家庄和军储库，迫使日军后退。善长夜袭的日军加藤大队，在夜战中受挫，大队长加藤及数名军官被击毙，从加藤的尸体上搜获的文件，反映出日军弹药严重不足。这一情报，鼓舞了中国将士的斗志。

二日，预备第十师仍与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激战于长沙东南效的南元宫、邬家庄、小林子街、黄土岭一线。这里是保卫长沙的第二道防线。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几乎每一据点都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呈胶着状态。中国军队利用配置在岳麓山上的重炮猛烈轰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预备第十师的作战。

同日，到达椝梨的日军第六师团接到了“以主力进入第三师团的右翼，攻击长沙东侧和北侧”的命令。其一部在当下午即向长沙城北的中国守军第一九〇师阵地发起了攻击。

三日凌晨，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全部投入对长沙东郊、北郊的攻击，很快把第一九〇师压迫后退至第二线。这样，长沙城的东侧，从北到南，都成了激烈的战场。第十军官兵英勇抵抗，使日军终日作战，死伤惨重，进展甚微。第六师团虽有少数部队从北郊冲入长沙城内，但中国守军用岳麓山上的重炮猛烈轰击，将城北建筑物炸平，日军无法立足防守，在守军的反击下，又被迫退到城外。在城南的激战中，日军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又被击毙。

日军弹少粮缺，虽取攻势，却已是强弩之末。在一些战斗中，因缺乏弹药，只能同中国士兵拼刺刀、肉搏。飞机空投的物资，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激烈战斗的需要。

第九战区为加强长沙城内的力量，于三日命第七十三军所辖第七十七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协助第十军作战。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压来，基本上到达了战区规定的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局势对日军极端不利。

在攻击长沙无结果，背后又出现包围圈的情况下，日军第十一军指挥部于一月三日讨论停止攻击长沙的问题。经幕僚反复陈说利害，阿南惟玑才在当晚下达了“反转”的命令，限各部队“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一月四日夜开始反转”。

在长沙前线的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接到“反转”的命令后，曾以第一线部队已冲入长沙，展开巷战，“现在只差一把劲”为理由，“希望把反转的时间再延期一日”，遭到拒绝。因此，长沙城外的日军便在四日晨发起了全线攻击，做了攻占长沙的最后努力。此日，战况空前激烈，已经过数日激战的双方军队，都以疲残之师做最后一搏，日军“施放毒气，全力攻城，我第十军浴血搏斗”。预备第十师苦战三日，伤亡惨重，又将辎重营及卫生队编成战斗部队，在阵地上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厮杀，终于抵抗住了日军的频繁进攻。日军最后一天的努力，除在阵地上多留下一些尸首外，并没有取得进展。第三师团、第六师团便在四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椝梨市撤退。

此时，处于长沙外围的中国军队仍在向长沙开进。薛岳限令各部队在四日夜进展至第二次攻击到达线，缩小合围圈。

长沙保卫战，前后四天，日军由于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贸然攻打长沙，企图顺手扩大战果，结果遭到惨败。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诱敌深入成功

日军第6、第40师团于12月中旬开始向新墙河北岸集结。18日，日军开始炮击并以小股部队进攻守军前哨阵地，一方面掩护主力集结，一方面对前沿阵地进行侦察。第40师团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准备向第20军第134师阵地攻击。这时的油港河水，只有30公分深，徒涉极易。然而，当时正是数九寒冬季节，气温很低，第40师团长青木成一为保护部队攻击力量，命令工兵架设轻快便桥两座。第6师团准备向第20军第133师阵地进攻。其当面河水也只有30公分深，两面提高3米，略施工事，人马通过可无困难。新墙河在冬季的障碍力虽然较小，但

日军要在白天通过，也还是不利的。因此，日军的攻击发起时间仍然选在清晨或傍晚前后。

驻守新墙河南岸第一线的是第20军的第133和第134两个师。薛岳给军长杨汉域下达战斗命令，要他们在此坚守10天以后再转移阵地。杨知道要坚持10天时间不大可能，但仍然还是尽力去做。12月22日，他给两个师长详细指示防守注意事项：即在以据点工事（半永久性工事）和野战工事（一般有三线）组成的网状阵地内，要以据点工事为骨干，同时加强野战工事的纵深配备，占领阵地时要做到据点工事与野战工事同时占领。在使用兵力时，各师应以一部兵力分置于连排据点，尽力死守；以一部占领野战工事（同时占领两线），利用阵地纵深逐步抵抗，将主力放在最后一线阵地，机动使用。作战时，如果敌人向野战工事前方据点守军攻击，占领野战工事的部队，立即以火力支援，或适时派部队反击；如果敌人向野战工事守军攻击，在据点里的守军立即以火力向敌射击，或者离开据点向敌尾击。各师主力此时应乘敌混乱之际，不失时机地对敌反击，消耗敌人。经过这样逐步抵抗，到最后一线预备阵地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再向侧面阵地转移，向敌侧击尾击。

是时，日军第23军在香港方面作战已进入紧张阶段，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决定先行到达阵前的第40师团于23日提早发动进攻。第6师团集结准备完毕后于24日发动进攻。

23日早晨5点，天还未亮，日军第40师团在第134师阵地对岸分3处渡河，重点指向第400团。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天色渐明，一架日机飞临第400团上空侦察后，给第40师团师团长作通讯投掷。青木成一即派1000余人增援，但到天黑时分，日军未能攻破阵地。当日，天气突变，雨雪交加，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而且持续数日之久。24日晨，日军继续增援。上午11时，日军4000余人向第400团猛攻，经过4小时战斗，日军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守军撤至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下午3点，杨森见日军攻击已正式展开，于是命令第58军新编第11师开到杨森街附近，协助第20军作战。是日傍晚，日军第6师团开始渡河向第133师阵地进攻，到午夜12点，新墙河南岸第一线据点阵地，全部为日军占领。

12月25日，日军以东、中、西三路齐头并进，向南步步进逼，守军则步步撤退。东路日军是第40师团，它以4000余人继续进攻第134师第二线阵地，经过一天战斗，第134师伤亡500余人。中路为日军第6师团第23、45两个联队，在飞机掩护下向第133师第398团据点阵地进攻，其中傅家桥和洪桥两据点急夺最激烈。第398团第2营营长王超奎和他所率的官兵数十人与日军经过反复争夺后，被日军炮火埋葬在傅家桥据点，第3营副营长在洪桥据点中弹阵亡。中路日军向南钻隙深入时遭到第397团伏击。西路日军为第6师团第13联队4000余人，由粤汉路两侧南进，与第133师第399团各据点阵地守军发生战斗。杨林为使第20军争取支持较长时间起见，命令第58军向第134师方面日军攻击。晚上，第20军全线与敌在战斗中，各重要据点电话先后中断。军长杨汉域在军部所在地关王桥登高观察，只见数十里纵横据点，与敌处于混战之中，枪炮声、爆炸声不时传来。杨汉域根据第133师、第134师伤亡较重的情况，命令他们按计划实行逐步抵抗，向预定地区——梅仙、平江以东地区撤退。

26日佛晓，日军跟踪追击，向第20军最后一线阵地（野战工事第三线）压迫过来。同时，日军第3师团也已渡过新墙河，与第6师团西路日军一起沿粤汉路南下，向汨罗江突进。杨森见第20军遭敌围攻，情况陷于不利，命令第58军孙渡率两师夹击围攻第20军之敌，切实协助第20军作战。天黑以后，气温继续下降，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战壕无遮无盖，许多士兵饥寒交迫，当晚有10多人冻死在战壕里。而第20军各部仍在凛冽的寒风中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这时，日军第6、第3师团以一部围攻守军各据点阵地，主力则乘夜南进。在白雪的映衬下，清晰可见的日军南进队伍蜿蜒数十里，直指汨罗江。

27日，杨森接到薛岳命令，第20军向梅仙、平江以东地区转移，准备向侧后攻击；第58军实行逐步抵抗，次递向东南方斜线移动，撤到汨罗江南岸右翼山地，侧击日军。从日军对新墙河阵地发动攻击起，到27日撤退止，第27集团军在新墙河一线阻击日军4天。

日军第3师团已于28日在第99军阵地前渡过汨水，并于29日开始向东旋转，威胁第37军第一线部队左侧。

按照日军第11军原来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各师团渡过汨水后，第3师团应继续向东旋转，从左向右包抄第37军，第6师团应向西旋转，从右向左包抄第37军，将第37军合围于汨水南岸加以消灭。但是，军司令官阿南惟矶在一开始作战时，就有乘势攻占长沙的企图，已在脑海里考虑好了进攻计划。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和阿南的想法一样，而且还两次向阿南建议，要乘胜攻占长沙。阿南因为有人支持，更加强了他向长沙深入的决心。29日晚上，他接到航空队的侦察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面退却"。于是，阿南便认为攻占长沙的大好时机到了，因而，他断然决定改变原定作战部署，下令向长沙追击。与此同时，阿南致电派遣军总部，申请进攻长沙的理由；并致书大本营陆军作战部，请求支持他的行动。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对阿南惟矶的行动颇为不满，但因他们已经在开始行动，不好追回，只得勉强承认现实，并报请大本营予以追认。

30日，日军前线部队得到进攻长沙的命令后，对第37军的攻势更加猛列。天刚朦朦亮，第6师团在12架飞

机的协助下，向第95师阵地左右夹击，双方经过反复争夺，到中午时仍处于相持状态。这时，日军继续增加，第95师当面日军已达5000多人。下午，第6师团以一部继续围攻，主力则从第95师据点阵地之间的空隙中通过，继续向南前进。日军东路第40师团这时也已突破第60师阵地。军长陈沛见日军主力已经南下，命令第95、第60两师向汨水以南、捞刀河以北的东面山地撤退，转成侧击态势，并企求将日军大部吸引到东面山地，使战区获得充裕时间，以待决战各兵团到来。

（摘自《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
湖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本可避免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先后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1943年，制造三次反共高潮，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皓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限令坚持长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复何、白通电（佳电），表示拒绝国民党当局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共9000余人到达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上官云相部8万余军队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英勇作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利。除黄火星、傅秋涛率领2000余人突围以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却发生了。究其原因，根本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这一点，本文不作详细论述。从党内来说，主要责任应在项英。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至皖南事变发生前，项英忠实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和一系列正确指示置之不理，这在客观上最终为蒋介石制造这一"千古奇冤"提供了机会。

（一）

蒋介石之流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导致大革命惨重失败的历史，使共产党人早已看清楚了蒋介石的面目。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是被迫的，也是包藏祸心的。他企图借国共合作之机，"行根绝赤祸之实。"奢望在抗战胜利之后，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1938年底，蒋介石当着中共要人之面，毫不隐讳地宣称，消灭中共，"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甘，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毛泽东对蒋介石是洞察秋毫的。早在1937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陕北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就及时向全党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并号召全党"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然而，在这之后不几日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王明，在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比较系统地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原则分歧，轻视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

1938年9月至11月间，我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加以论述。这次会议系统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

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得到全会的批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基本上被克服。

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为全党全军确定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等一系列正确原则，而且还从全国各地的实际出发，为各地党组织，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成，次年1月6日迁至南昌。在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开往皖南岩寺集中期间，毛泽东就新四军的作战方向，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项英，指出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最有利于新四军发展。只要向南京、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不久，毛泽东又完整地提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应是"东进作战，直逼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为贯彻这一方针，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以华北平原游击战的成功经验为例，说服项英勿怕困难，大胆向敌后挺进，发展游击队，创造根据地，待江苏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进入江北地区。鉴于项英迟迟不肯积极行动，5月14日，毛泽东又不厌其详地给项英发了一封长达300多字的电报，指出："在敌人的广大后方"，"能更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新四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主动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胆地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

（二）

然而，项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持的是什么态度呢？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抛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与会的项英公开发言赞成王明的观点，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观点与政策。正因为王明得到了项英等资深权重者的支持，因而在他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时，姿意兜售和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时至1938年，沦陷区是什么状况呢？没有国民党军一兵一卒，国民党的行政系统亦荡然无存，日本强盗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已对腐败无能望风而逃的国民党不存幻想，而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身上，渴望新四军迅速挺进沦陷区，领导他们抗日。此时，新四军如果能顺应人民的需要，勇敢挺进沦陷区，定会一呼百应，迅速燃起抗日的燎原大火，建立大块的抗日根据地；久经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上万人的新四军，一定能迅猛扩大。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大发展机会。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1938年上半年，特别是4月新四军各路人马云集皖南岩寺后，心急如火地一份接一份致电项英，催令他尽快率军东进苏南敌后。但项英却以种种借口加以抵制。其中主要理由，即是苏南乃平原水网地区，不利部队发展。这实质上是害怕挺进苏南，不敢在沦陷区与凶恶的民族敌人展开搏斗，同时，对多行不义的国民党存有非份之想，天真地以为"把军部放在皖南，背靠国民党区域安全"。

项英在抵制毛泽东的正确方针的同时，却顺从地按照蒋介石的圈定，于1938年7月1日，将新四军的军部及其所属主力，置于国民党统治区以皖南泾县云岭的罗里村为中心的几个孤立据点中，北临天险长江，东临苏南日寇，西、南两面有10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四面被围，进退维谷。这就为新四军可能突遭袭击埋下了危机。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同项英均应召参加。项英虽因故中途离会，但是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他是听到的。此时共产国际已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为中共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批评了王明，警告王明不要再在党内争领袖地位，全党应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这次会议，为了肃清王明路线在党内的影响，果断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负责领导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决定新设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鄂、豫、皖、苏地区中共党的工作。

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假抗战，真反共，并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形势对孤处皖南一隅弹丸之地的新四军军部极为不利。

为了发挥这支在十年内战烈火中千锤百炼的红色劲旅的作用，同时尽早使其脱离险境，1939年2月，毛泽东特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千里迢迢专赴云岭新四军军部，当面做项英的工作。周恩来严厉批评项英在1938年一年当中屡次拒绝党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的严重错误，而项英固执己见，强调"江南特殊"，仍坚持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说什么江南要一切服从国民党三战区（新四军防地属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严重的右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项英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与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一起，共同研制了落实这一战略方针的各项具体方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一走，项英立即变卦，不仅不照办，而且到处散布新四军不具备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条件的舆论，甚至诬蔑中央"东进北上"的战

略方针是“冒险”、“蛮干”、“乱弹琴”的“左”倾方针，胡说“我们同蒋介石、顾祝同是婆媳关系，婆婆不让办，媳妇就不能办！”在这年10月31日新四军积极分子会议上，他作《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仍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否则就不能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在行动上千方百计阻挠陈毅、粟裕、叶飞、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利用职权压制刁难。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陈毅、粟裕坚决执行中央方针率部开辟出来的。陈、粟深感兵力不足，曾多次要求项英将在皖南的兵力东调，支援、扩大苏南斗争，项英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在苏南前线浴血苦战的两个装备较好的主力团西调皖南。苏南急需增派干部，项英则不仅把住军部过多的干部不放，而且将中央派往敌占区工作的红军干部及大批立志报国投奔新四军渴望到前线杀敌立功的青年学生、归国侨胞，无必要地长期抑留在云岭军部，最后成了皖南事变的牺牲品。项英的所做所为，后来终被周恩来知道。周恩来气愤地说，对于“东进北上”这个方针，“项英表面上没有反对，实际行动中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并对国民党的种种无理要求，一再无原则的迁就退让，这就种下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的根子。”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各地频繁挑起国共争端，惨案迭起，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遵照蒋介石反共指令，调集5个师10个旅共18个团的兵力，将新四军在皖南、苏南的两个主力隔开，特别是重点包围新四军军部，大有一口鲸吞之势。

为免新四军突遭不测，1940年3月29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特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项英：“顽方（即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陈毅所率新四军一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项英接电后不但仍不执行，相反却多次致电中央，要求中央服从蒋介石的无理命令，将在大江以北的新四军统统调往江南以维护蒋的威信。对项英这种卑躬屈膝为蒋张目的投降行径，中央甚为恼怒，断然拒绝。

5月4日这天，毛泽东少有地给项英连拍了两份电报：一份是《关于新四军各支队发展方向与任务给项英陈毅的指示》电，明确命令“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再向“长江以北地区”“发展”。一份是由毛泽东起草，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的长达2700多字的指示电（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在该电中严肃批评了项英的种种错误观点，并指明改正的具体办法，还郑重提醒他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该电要求将中央这次策略指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

时任新四军苏南指挥部总指挥的陈毅，接电后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传达，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渡江北上，向苏北发展。而项英接电后，拒不传达拒不执行，对中央的批评还拒不接受，先后于5月9日、12日、29日连拍三份电报给中央，无端指责该电“系一半告同志书的性质”，“系带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并明确表态：“中央责成我传达，不能负此责。”

陈毅不愧为党性很强的领导同志。他深知，一旦自己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皖南新四军必然更加孤立、危险。为了挽救皖南上万兄弟部队，争取项英同自己一同执行中央指示，陈毅特派专使携其亲笔信函，策马飞奔，日夜兼程赶到云岭军部，劝项速率军部及其所属主力东移苏南茅山根据地。项英听后却以“军部率部转移，不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不行”等错误意见为由，断然拒绝，反命令陈毅率苏南主力西移皖南。专使复命后，陈毅闻之，悖然大怒，以拳击桌，说道：“项英既然这样目无中央，”“不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味相信那个狡猾的朋友，总有一天顾祝同要打到你头上来，打得你头破血流！”由于项英执意不走，陈毅无奈，只好自率苏南主力北渡长江。

毛泽东在陈毅北渡长江后，于9月6日至10月12日，与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至少给项英发了4封令其转移的电报，甚至用了“速速渡江”、“绝对不要再迟延”等措词。然而均被项英拒绝执行。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之流公开发布精心炮制的反共檄文《皓电》，无端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游而不击”、“专事摩擦”，并限令坚持长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电到一月之内悉数开到黄河以北，否则即以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论处，决以武力制裁。《皓电》发出后的第二天，顾祝同奉蒋密令，调兵遣将，欲从最易得手的皖南开刀，一举消灭皖南新四军。

《皓电》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异常重视，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致认为，蒋介石此举非同寻常，是他企图发动大规模反共内战的信号。毛泽东特别想到了皖南的局势，深知一旦打起来，皖南定会吃亏，必须从速催项英离开险境。于是他又与朱德、王稼祥等人联名多次致电项英，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应迅速渡江”。11月1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严词驳斥《皓电》的恶毒诬蔑，坚决拒绝国民党当局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江北。此举也可解救皖南新四军出险境。12月14日、18日、24日，中共中央一再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

南部队迅速北移。

然而，项英在国共两党中央都命其转移的新情况下，还是以“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实现这一方针”为由，加以拖延。12月下旬，蒋介石“围剿”皖南新四军的一切部署已经就绪，险象丛生，项英六神无主，只好连电中央，请示去留大计。毛泽东接电后，愤怒至极，于12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破例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发了一份措词空前激烈的电报：“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缓犹豫不决无办法无决心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再拖。此电发出的当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给项英个人发了专电，提醒他“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遭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为此，特命项英“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稿件随看随毁。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毛泽东要项英北移的决心，已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项英接电后，在情急之下，在广大新四军官兵强烈要求之下，终于最后决定离开国民党为其圈定三年之久的弹丸之地。

（三）

蒋介石公开规定皖南新四军最后撤离日期为1940年12月31日，若逾期不走，后果不言自明。项英作为一军主帅，却昏昏然，12月28日才召开军分会会议决策转移事项。而此时，负责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7个主力师8万多人，已分成左右两个集团军，在国民党第32集团军司令、铁杆反共分子上官云相的统一指挥下，对皖南新四军形成钳形包围之势，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然而，项英硬是拖到1941年1月4日才姗姗而走，从而更为蒋介石制造事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与准备时间。

项英不选东路、北路这两条比较好走的路，却偏偏要走丛山峻岭的南路。富有实战经验的军长叶挺当时就坚决反对，项英不听，说什么南路是顾祝同指定的，顾保证走此路绝无日军一兵一卒，同时到了旌德县后，将把国民党所欠新四军粮食、弹药悉数补发。叶挺因非党员，项英有最后决策权，胳膊扭不过大腿。

果然不出叶挺所料，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主力近万人的大部队于1月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

1月17日，蒋介石恶人先告状，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的孤立。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部队经过整编，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选自《党史文苑》94年6期，作者：汤胜利）

项英被害始末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奉蒋介石之命，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悍然袭击我遵令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余抗日将士浴血奋战，几次组织突围，终因寡不敌众，迭遭挫折。至13日，新四军所守之石井坑各阵地均被突破，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决定分散突围。在部队掩护下，项英及副参谋长周子昆带着警卫人员李德和、夏冬青、黄诚等突出第一道包围，来到大康王一带荆刺丛中隐蔽待机。

14日傍晚，项英一行突然遇上突围出来的军部副官刘厚总，便让他跟着一起走。刘厚总系湖南茶陵人，曾打过游击，参加新四军后一度被送到抗大学习。但他怕苦，不久开了小差，后来又被新四军办事处介绍回新四军，这时任军部副官处副官，管理勤杂人员。他黑粗高大，力气过人，枪法很准，平时又爱吹吹拍拍，深得项英赏识。项英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突围中，走到哪里都带着他。

18日晚，项英带着大家离开大康王，来到罗丝坑。这里只有两三户人家。他们弄来一些油菜、细糠充饥。第二天，发现附近山凹里冒烟，项英说，肯定是我们的人。于是派人去找，果然在一个棚子里找到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等几个同志。彼此见面、百感交集。项英拉着谢忠良的手，难过地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周子昆也插话：“我也有责任。”项英又说：“将来到延安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会合后的第三天，项英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他指定李忠高为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并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不久，他们与突围出来的五团二营营部

取得了联系，两股力量共有四十多人。

当时敌人搜山很紧，把山里的群众都集中到茂林、铜山、南容的大村庄去住，企图割断新四军与群众的联系。项英他们找不到粮食，只搞到一、二百斤红枣，每天就靠一把红枣充饥。

在罗丝坑蹲了一、二十天，项英、周子昆及军部的一些同志又转移到丕岭下面，在里潭仓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隐蔽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们通过老百姓与军教导总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取得了联系。通过刘奎又联系上了军部直属队政治处的杨汉林、军需处长罗湘涛等。刘奎还向项英介绍了一个较好的隐蔽地点，这就是里潭仓东面的田坑里。为慎重起见，项英派李志高、刘奎等去侦察了一次。他们回来向项英作了详细汇报，说那里地处两县交界，地势很好，都是大山，翻过去就是旌德县。项英听完报告，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说："搬到田坑里去！把胡明找来（胡是留在皖南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这样我们和地方党的关系就打通了！"又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这样，很快就可以发展到一个营或两个营。我们有李志高，谢忠良可以管机关嘛！管情况的有，经济的有，管地方的还有胡明。不是很好嘛！那我管什么呢？我管个嘛！我们的条件是很好的，比我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强多了。

2月下旬，项英和一部分人员到田坑里。这里地形确实很好，势绵延峻峭，四周树木丛生，鸟羊肠，绝无形迹。刘奎还从地下员姜岳凡那里打听到这里有个赤坑山，半山有个蜜蜂洞，非常隐蔽。项英决定在这里隐蔽一段时间。

蜜蜂洞位于赤坑山半腰，地势险要，进洞时要攀住凸起的石头或树枝才能上去。洞很小，也不平，进去时头部不能抬起来，只能容纳四、五个人。项英、周子昆、刘厚总、黄诚住在洞里，其余十多人住在山下一个大岩石下，与蜜蜂洞相距三、四百米。当时项英跟大家开玩笑说："下面是第一线，如果发现情况可以抵抗，掩护我。我们住在上面，我如果走不动，刘厚总他力气大、枪法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背我上山。"

在蜜蜂洞的二十多天，项英一直在筹划突围渡江问题。他派人侦察了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无为的路线；与地方党联系，买了一批布，给每人做了一套便衣，并筹备了突围所需的干粮，准备工作进展较顺。

3月13日夜，项英、周子昆的心情似乎比往日轻松一些。他们边下棋边谈心：

"找到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

"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

"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夜很深了，警卫员黄诚对他们说："首长睡觉吧，天很晚了。"周子昆说："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不一会儿，大家都睡下了。从里到外的顺序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就在这天夜里（凌晨三、四点钟），刘厚总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请赏，向项、周、黄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刘厚总行凶后，仍按头一天的安排于黎明前下山邀警卫排长李德和去执行任务。他们在石牛窝地下党员姜岳凡家里遇到执行挑粮任务在此休息的郑德胜等人。刘掏出一包小刀牌香烟给大家抽。郑说："这香烟是首长吸的，你从哪里搞来的？"刘说："管他哪里搞来的，你抽就是罗！"这时李德和问："你们刚才听到枪声没有？"大家说没有。刘厚总说：天快亮了，我们走吧，说完拉着李德和就走。他俩走到一个岔口，听到狗叫，刘厚总说：前面有个戴军帽的人，可能是个敌人，你等一等，我先下去看看。说完他丢下李德和，就慌慌张张跑起来。李见他不回来，就在后面喊他等一等，他不理，反而跑得更快了。李德和追不上，联想到出发前听到的枪声，估计山洞里首长的安全可能出了问题，便转来要郑德胜他们赶快下山。

李德和等几个跑到赤坑山，喊醒正在睡觉的谢忠良。大家一起跑到蜜蜂洞，只见项英、周子昆、黄诚倒在血泊中。项英躺在洞口，头朝南，头部中了两枪；周子昆头朝北，胸部中了一枪。黄诚中了三枪，一枪在右臂穿透，一枪在脖子上，还有一枪从左臂擦过。当时黄诚昏了过去，刘厚总以为他死了，大家见到他时，他已醒过来，爬在洞口，一边哭，一边说刘厚总叛变了，首长完了，我没保护好首长。大家检查洞里东西时，发现项英、黄诚的手枪没有了。项英的手枪还是斯大林送给他的。项英、周子昆所带的经费（计有黄金八两五钱、法币二万多元，还有一些银元等）以及项英用的金挂表、派克自来水笔等都被刘厚总拿走。洞里还剩下一盏油灯，半截蜡烛和一些象棋子。谢忠良和大家商量，觉得这里呆不下去了，刘厚总要是投敌，一定会把敌人引来。他对大家说："我们先把项英同志和周子昆同志的遗体埋葬好，做上记号，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再取回去。项英穿布鞋，容易腐烂，周子昆穿皮鞋，三、五年不会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了。"这样，他们就在离蜜蜂洞一百多米的一个地方挖了两个坑，项英埋在稍高一点的坑里，周子昆埋在下面一个坑里。谢忠良向大家交待说："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几个人，总有两个在的。"黄昏，他们便转移了。不久，这批人员渡江到了无为，与新四军第七师汇合。

解放后，根据刘伯承的指示，项英、周子昆的遗骨被移至南京雨花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在那里为项英、周子昆以及在突围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造了三座墓，项英的墓置于中间。人们称作"三烈士墓"。

项英同志被害时年仅四十三岁。他在敌人白色恐怖

下，在深山老林里，为党和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息。虽然他在主持新四军工作期间，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仍然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李仲元，《历史大观园》88年1期)

项英、周子昆二烈士遇难真相

我是1937年8月参加革命的，1939年9月份调到新四军军部跟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皖南事变发生后，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我跟随周副参谋长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我们二人在顽军的眼皮上隐蔽下来，转来转去转了两三天，躲过顽军的搜山追捕，寻找着突围出去到江北找部队的路。

几天后，在一个深山的一个大坑里碰上项英副军长以及他带领的几位同志。当时，我们会合在一起的共有：军部一科科长李子高、二科科长谢忠良、军部副官刘厚总、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包子(名字就是叫包子)等约十人。会合后，我们便在一个大山上的包谷棚里隐蔽下来。大概住了个把月。每天派人到外面了解情况和联系寻找打散的同志。在3月初与军部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地下党组织。3月11日晚上刘参谋带领我们转移到濂坑，住在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吃了一餐包谷饭。休息到拂晓时即转移到山上的一个石洞里隐蔽，当时顽军的搜捕还是很紧。

山洞叫蜜蜂洞，在半山腰上，地势极为险峻，人要进洞一定得攀住那些凸起的石块或枝桠才能上去。那个洞很小，进去头都抬不起来，只能容纳三四个人，二位首长、刘厚总、我和包子留在洞里，其余的同志都在山下一个山坳处隐蔽，并负责附近的警卫。安排好住处已是白天，我和包子到山顶上守卫。

傍晚时分，包子下山弄水洗澡，突然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后来又下雪，包子在下面就没有上来。洞里只有二位首长、刘厚总和我，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对坐着在下棋(用树枝及小石块做的土棋)。我们睡觉的“床铺”就是一块比较平的石头。靠近洞壁深处还不断滴水下来，只有一床破军毯是给二位首长盖的。大概在十一点钟左右，我说：“首长睡觉吧！”项英副军长说：“小黄你先睡吧！”我就靠在洞壁有些潮湿的地方躺下来，睡了一会儿。洞里的小灯熄了，二位首长和刘厚总也睡下了。我们躺下的位置由里到外，顺序是我、周子昆、项英、刘厚总。拂晓前正当我睡得烂熟的时候，被两声“砰、砰”的枪声惊醒，我连忙往怀里抽枪，这时一道手电筒光射在我脸上，同时我的右手臂挨了一枪，接着又是一枪，我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刘厚总这个叛徒那天夜里打死二位首长，以为我也被打死了，就下山去和李德和执行一个任务(事先已经安排他俩去的)。他们一同走，李见到刘厚总神色不对，刘越走越快，李德和叫他都叫不住，就生气地跑回来告诉刘奎参谋。山下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情况，就估计山上可能出了问题，刘厚总一定是叛变逃跑了。刘奎带了几位同志赶快跑上山来看，发现我们三人躺在血泊里，他们摸到我心还在跳，就呼喊我。当我知道叛徒打死了首长，自己颈脖子后面及右上臂伤口还在流血时，心里很悲痛，懊恼自己没有保护好首长，就哭着一定要刘奎赶快再补给我一枪，让我和首长死在一起。刘奎和同志们劝我，刘奎说：“小黄你受了重伤，我们不会丢掉你的，把你转移到老乡家里去，首长不幸牺牲了，刘厚总这个可恶的叛徒，他会带着顽军来的，我们得赶快转移。”我们把首长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里用石头盖好，顽军找了多次也没有找到，直到解放后移至南京雨花台。我被转移到泾县濂坑一个名叫徐老三的家里养伤，伤还没有完全好，我就要求参加皖南游击队，一直坚持到解放。刘厚总那个叛徒投靠顽军后带人来找项英、周子昆的尸体请赏，结果没有找到，他怕顽军不信任他，不敢回到太平县国民党党部去，就投靠到旌德县国民党党部。

皖南事变虽然过去几十年了，这惨痛的历史教训，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选自《皖南事变》，作者：黄诚)

打进日伪最高层的情报战士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注一)。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20个师30余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军阀乘机抓权专政。两个月

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风云际会中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1937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1年1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

中西功于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

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上海后，就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筹组的特务机构，用以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

二、潜入敌心脏，密报频频传

西里龙夫入党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曾以日本记者身份去国民党南京活动。其间，他向组织上提供过颇有价值的材料。例如：日蒋秘密勾搭，蒋党暗斗内幕，蒋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倾轧，以及当时日本侵华的具体策划等。“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华战场的迅速扩大，西里龙夫及时向组织上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其中有：关于攻沪日军的兵力，指挥，攻击方向，后援部队，作战部署；关于华中占领区日军分布和意图；关于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广州作战，南昌作战的指挥、番号、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这里也有中西功的贡献。此外，“同文书院”同学、革命志士白井行幸还送来了日军武汉作战军用地图。

中西功于1938年来到上海后，他同西里龙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真是如龙腾云，如虎添翼。

从武汉沦陷、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1938年冬到1939年冬)，这一年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凭借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向组织上不断提供了可对日本当前国策(战略方针)作出判断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一、武汉沦陷后，日本前线将领同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为不可取。

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外相宇垣一成大将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首相为代表的“冒险派”，坚持要蒋介石投降，否则就扶植汪精卫登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卫曾发表过“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岐，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三、“冒险派”得势后，施展两手策略。一手，不断派人与渝方要员密谈，劝蒋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卫等一批汉奸，拟另起炉灶。为此，起用特务派军人如土肥原等来沪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

四、其间，新旧财阀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设立“兴亚院”，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分裂出来，便于进行直接的掠夺，下设之“华中联络部”是其执行机构之一。

五、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为了减轻负担和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它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此加强前方的统一指挥，对蒋软硬兼施，对汪扶植登台，以及准备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

西里龙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还有华中日军分布，华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军特务部任职期间，除了及时提供日本统治当局内部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以上海为中心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等外，还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了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作为日方提交汪派汉奸重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并把日本这一图谋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三、敌方战略，了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于法西斯德国之手，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客观形势导致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重新组合并寻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南进政策”推上了实际的进程。为此，它加速国内法西斯化，力图减轻在中国战场的负担，并开始向印支(越南)、泰国进军。在国际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40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为我战略侦察员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良好时机。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东京同近卫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相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关于军部搞垮阿部、米内两内阁，扶持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以推行“新政运动”加强政治法西斯化的内幕；关于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扩张战略的阴谋；关于制定“时局处理纲要”即力图解脱中国战场的重负以实施“南进政策”的策划；关于日本工业原料和战备物资匮乏的情况；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在日、德之间的斗争情况；关于压蒋未遂而向“对支战争长期化”的转变；关于进军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国境纠纷以渔利的内幕；关于日本统治核心正在酝酿新的世界战略的分析和判断等。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与南京、上海的中国同志共同努力，这一年还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继续玩弄两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争“结束中国事变”。诱降一手，由“总军”(日人对“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简称)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蒋介石代表宋子良、钱永铭等进行密谈，并一度策划日、蒋、汪在长沙或宜昌会面(未实现)。同时，以局部进攻，轰炸重庆，断蒋外援(进攻越北、桂南)作为配合，实行诱逼兼施。扶汪一手，经青岛三方会谈、“国府还都”、“调整日汪邦交”，到承认汪伪“中央政府”。至十一月，因拉蒋无望，日本御前会议(注三)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了“对华长期作战”和“以战养战”的总方针。

此外，还有以下重要材料：关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重要会议以及要员配备情况，关于日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沦陷区渝方军、政、特要员纷纷投敌的情况，关于占领区米荒、伪币贬值和日伪加强统治的情况，关于日本高级特务机关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

四、一字千钧，“联德、攻美、防苏”

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被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侦知，报告了莫斯科。七八月，德国大军压境，苏联面临着被德、日东西夹击的危险。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佐尔格、尾崎秀实的报告和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证实，如前所述，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的保卫和反攻。

八月，日本为了施放军事烟幕，大肆宣扬“关特演”(即关东军部特别大演习)，但暗地里却严令关东军司令官不得向苏军挑衅，并密令新闻界不得刊登刺激苏联的文章。其目的表面上是依照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与德国遥相呼应，实际上却一边“威慑苏联”，一边在我国“满洲”调集日本、朝鲜、台湾的兵力进行实战编训，准备南进向美英作战。这时，中西功借口去“满洲”出差，来到当时日本备战中心的大连，亲自看到了伪满各地日军兵运繁忙，公共建筑住满兵员以及积极进行登陆作战演习等情况，并搜集到了南进部队编制表。

十二月中旬，中西功从“满铁”绝密通报上看到了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同时，得到了南京“总军”正在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论据充足的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的预报。果然，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拂晓，日军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了。

这一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还在上海和南京党的隐蔽斗争组织领导下，同中国同志一道，搜集到了以下许多重要情况：

在步步南进的1941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方针是：一、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二、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三、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

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以上亦是配合南进。

此外还有：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三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关于日攻美后日本十三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等。

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总军”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特别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把我们的人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并安插了若干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我建立交通线提供方便。我们掌握这个班直至1942年4月不能再利用为止。

五、生死置之度外，功业永垂千古

1941年冬，即尾崎秀实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撤走”。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到来了。组织上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但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五月间，日驻沪十三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功认为这样走法可以为以后回来设下伏笔。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后，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逮捕并解往东京。

1942年6月16日和中西功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以及“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白井行幸。

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解到东京日本特务总部后，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恶魔面前。

在阴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们绝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侦探。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个人的得失，什么好处和报酬。相反，当组织上遇到经济困难时，我们即以自己的积蓄倾囊支援。”

最后，日本法西斯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叹说：“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媾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在这之前，因西里龙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

翌年，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西功于1973年因患胃癌逝世，终年62岁，遗留有《在中国革命风暴中》等著作。西里龙夫于1982年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斯人已逝，功垂千古。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对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所进行的忘我奋斗，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方知达，《大江南北》90年2期）

蒋汪货币战与“银行血案”

1941年1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由周佛海以伪财政部长的身份兼任总裁，发行中央储备券（简称“中储券”），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汪伪希求组织所谓以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的全国新金融网，并设立省市县银行，农业、商业银行，以形成统一的管理系统。同时，汪伪政府极力推行“中储券”，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推行“中储券”，且可直接打入租界。但事与愿违，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往来，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于是，汪伪急谋对策，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以达其推行“中储券”的目的。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七十六号”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因为法租界的中立态度比较强硬，不象公共租界那样畏首畏尾。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碍于面

子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十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或则勉强寄库，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悄悄种下。

与此同时，为保持法币的地位，蒋介石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及其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以打击"中储券"的发行。一场货币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上海金融界因此陷于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

"军统"特务不断警告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职员，不得为敌伪服务，否则就不客气，以致各职员或托词请假，或上班迟到。更有甚者，"军统"特务接二连三的暗杀和袭击活动，使货币战趋向白热化。1941 年 1 月 30 日，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恐怖分子暗杀；2 月 20 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两枚手榴弹的突然袭击；3 月 21 日，伪中央储备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又被刺毙命。在这种情况下，周佛海对此大为震怒，亲到上海银行召集全体职员训话，声言："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并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令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拘捕四行职员作为人质，施以报复。震惊中外的"银行血案"便以此发端。

抗战爆发后，江苏沦陷区将一部分银行工作人员集中在上海待命。原在南京的江苏农民银行亦租下法租界霞飞路 1411 弄 10 号为来沪职员宿舍。1941 年 3 月，该行苏北沦陷区职员亦来上海，同住于此宿舍内。3 月 21 日深夜 11 时许，"七十六号"的一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霞飞路 1411 弄，将车横在弄口，架置机枪，然后到该弄 10 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狂揿电铃。"茶房"以为是巡捕房人员，急忙将铁门拉开，特务们一涌而入，胁迫"茶房"引导上楼，当时该宿舍中的职员均已熟睡，如职员陶仲琦从梦中惊醒，始知为敌伪特务所执。见特务六、七人均手持二十响快枪，将室内十二人捆缚起来，翻箱倒箧搜索后，再将他们绑至二楼。约 10 分钟后，又迫使他们分站两排，特务 5 人各执快枪，作瞄准状。此时，突由特务一人在三楼向职员举枪射击。瞬间，血花飞溅，惨呼连连。陶仲琦失去知觉，昏厥在地。当枪响过后约两分钟，陶仲琦渐渐清醒，自知中弹，耳边仍闻枪声，只见身旁的沈永祚仰卧血泊中。特务见他们纷纷倒地，便呼哨而去。少顷，陶检点腿部中了一弹，幸未伤及筋骨，能勉强站立。但沪行职员樊端咸、苏北撤沪人员褚化龙、范静江、薛玉珊、张绍尘等均已气绝。当时受重伤的有习深、程修明、李光、沈永祚、张树森及陶仲琦共六人。大约 10 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始派来大卡车一辆，将伤员送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广慈医院急救。但习深因伤在要害，不治而死。事后得知仅戴达官等三人幸免于难，因戴一见开枪，立即卧倒，滚进床铺底下，未被特务发觉。此外还有许汉绶及冯赞元二人，躲藏门后，未被搜获。

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即"中行别业"）就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左近。就在上述血案的次日凌晨，李士群命吴四宝等带了"七十六号"的大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驶至极司斐尔路 96 号"中行别业"，并将其包围，勒令管理员拿出住户名册，挨户搜查、绑架。凡是银行职员，均抓进"七十六号"，一共绑架了 108 人。紧接着，"七十六号"又派大批特务再往"中行别业"，又抓走 70 余人。第二天早上，被绑架的人由"七十六号"转到其它地方看管起来。这些人被关了半个月，经行方央求汉奸李祖莱会同南京分行行长向周佛海求情，周提出必须由被捕人员出具连环保，保证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全体职员的安全。但这种苛刻条件中国银行无法接受。经再三磋商，最后以三人连环保不许离开上海为条件，至 4 月 8 日被捕人员才全部获释。

在制造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之后，3 月 24 日，"七十六号"又袭击了中央银行上海驻地。

中国银行职员获释后半月左右，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长在大华医院治疗时，被人用利斧砍杀。此事传说为"军统"特务干的。周佛海十分恼火，决定"以血还血"，于是命令吴四宝当夜将居住"中行别业"的科长、主任十三人，绑架至"七十六号"。此次行方再央求李祖莱出面要求释放，而周佛海始则欲将绑架诸人悉数抵命，继而减为十人，最后减至三人，并表示不能再少，而且要与死者同姓同职。因为被"军统"特务暗杀的业务科长姓张，"七十六号"要挑三个姓张的。可是被捕诸人之中，仅有两个姓张的，一名张筱衡，一名张立昳，最后只得把一个同是会计科而不同姓的会计主任曹善庆凑数，可谓荒唐之极！4 月 20 日深夜，吴四宝命特务将此三人用汽车送回"中行别业"。当车开至宿舍大门口内，特务就向他们开枪，张筱衡、曹善庆二人当场被打死，张立昳最后下车，听见枪声，就地一滚，帽沿洞穿。另一特务又补了一枪，击中其腿部，张顿时昏倒在地。特务以为目的达到，遂驱车扬长而去。过一会儿，张立昳清醒过来，四顾寂静，料知特务已去，悄悄地赶回家，待至天明，潜入公共租界向行方报告。

"中行别业"因屡遭汪伪特务袭击，4 月 23 日下午，日本宪兵司令部勒令住户立刻外迁，"中行别业"遂由日本宪兵接管。

除上述外，汪伪特务还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军统"特务也不甘示弱，双方你来我往，致使上海金融界一片腥风血雨，全市舆论哗然。如此血战不已，双方均感对已不利，最后由"海上闻人"杜月笙出面调解。一场货币战遂告结束，而这场怵目惊心的"银行血案"，却常使人们不寒而栗。

（沈飞德）

发生在汪伪“首都”的两起刺杀案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后，立即对国民党在日伪占领区域内的特工组织进行清剿。短短几个月，上海、南京及沪宁沿线一带的国民党谍报机构就被破获大半，汪伪特工缴获电台多部，逮捕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党务系统的重要骨干数百人，一部分立即枪决，一部分被“感化”后下水投伪。在这些地区拥有强大势力的中统遭到的打击最为惨重。

对此，蒋介石指令戴笠要立即作出相应的行动。军统局及戴笠不敢怠慢，一方面组织力量对汪伪特工实施报复性攻击，一方面精心筹划了一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

这个任务由戴笠亲自交给了军统干员黄逸光、黄征夫二人。黄逸光在抗战前曾见过汪精卫，其时汪任行政院长，并接见过黄，还同他合拍过一张照片。黄逸光对汪精卫可说是极为熟悉的，决不会象军统当年在河内刺汪时那样认错人；且黄逸光与汪精卫又有过这样一段关系，再配以精干的杀手黄征夫作助手，对此，戴笠自认为此次行动有十分的把握。

二黄接受任务后，在军统各区站人员的节节护送下，几天后就由重庆潜入了南京，下榻在中央饭店一套豪华客房里。军统的行刺计划是，先由黄逸光带着照片去见汪精卫，拉拉关系，取得信任后再从容下手。二人一到南京，黄逸光就外出溜哒串门子，试图通过关系能求得汪精卫的一见。

当时，汪伪特工系统中有大批投降的军统中统人员，他们又与重庆国民党方面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因而，汪精卫拐弯抹角地得到了军统局行刺的全部计划。二黄刚进入伪统治区尚未到达南京，就已被严密监视。二人刚刚跨入南京，汪精卫就打电话把政治警卫总署署长兼南京特工区长马啸天召到官邸，告知了详情，并要他立即行动。

马啸天立即率领精干人员直奔位于大行宫东侧的中央饭店，对二黄的住所实施突击搜查。正巧，黄逸光外出未归，黄征夫一人在饭店走廊里闲逛，马上被擒。马啸天冲入房间严密搜索，在衣柜夹层中搜获专门行刺用的四吋穿甲手枪 1 枝，达姆弹 10 发，照相机 1 架，小型电台 1 部及密码本等物。马啸天立即在饭店周围布下暗哨，只等黄逸光归来。黄昏时分，黄逸光回店，马啸天指挥手下人一拥而上，黄束手就擒。

马啸天将二人押回后，立即向汪精卫作了详细汇报。案情早已清楚，汪精卫遂亲下手令，指示将黄逸光立即枪决，将黄征夫关押。马啸天即以政治警卫总署署长名义在南京贴出布告，将黄逸光押至城南枪决。黄征夫却因与周佛海的军统老关系而被保释。

一计未成，军统又生一计。刺汪计划由于马啸天的果断出击而未能实现，于是，军统又把矛头指向了马啸天等人，计划通过暗杀汪伪特工的几个头目来削弱其特工力量。

马啸天是南京本地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又当上了红帮组织“乾坤正气山”的山主，手下徒子徒孙众多，势力很大；加上又有汪精卫的重用，身兼要职，既是强龙又是地头蛇，要想暗杀谈何容易！

军统局派遣得力干将强一虎只身潜赴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买通了南京特工区警卫大队分队长刘良。刘在马啸天手下担任要职，可以自由出入马公馆，下手十分方便。但军统的强一虎决定不用武器，而交给刘一包剧毒的氰化钾，要他寻找机会把毒剂放到马家厨房的味精瓶中，这样，既可毒杀马，又可在伪特工系统内部制造混乱，以收一箭双雕之效。刘遂按强一虎的吩咐照办了。但此事却被马啸天暗中察觉，但他并未声张，却私下派人侦查此事的来龙去脉，看看究竟是何人所为。对此，刘良丝毫未有察觉。

马啸天手下的特工正在紧张地侦查此案，马啸天始终未能弄清此次行动是重庆方面还是内部所策划，欲行下手逮捕刘良，又恐打草惊蛇。正在此时，位于夫子庙贡院东街的新亚舞厅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枚炸弹炸死舞客 1 人，炸伤舞女多人。另一枚炸弹在舞厅楼梯口尚未爆炸。

案发后，南京伪警察总监苏成德，伪首都警备司令李讴一，以及中央宪兵副司令兼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等人马上赶到现场。当晚，南京特工区行动队在马啸天指挥下，根据现场的线索对状元境的一家旅馆实施突然检查，一举捕获军统特务强一虎，并在强的住处搜出与新亚舞厅同样的炸弹数枚，以及氰化钾毒剂等物。经马啸天亲自提审并出示证据，强一虎只得供出刘良投毒是自己策划，并受军统直接指挥。于是，马啸天立即请示汪伪头目，将强立即枪决，刘良判无期徒刑。

（文丁）

抗战前期的日蒋秘密谈判

“七·七”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蒋介石曾多次号召全国同胞“贯彻执久抗战，全面战争”。然而，在抗战的背后，蒋介石集团却多次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进行着所谓“和平”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日方除军方或政府人员外，还有

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他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友人,有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又和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称虽非代表却是“代表以上之人”。蒋介石集团极为重视和萱野等人的谈判,初期通过孔祥熙,后来则直接控制,由亲信柳云龙、杜石山等在香港进行,甚至派宋美龄亲临指导。时自1938年春至1941年夏,历时最长。

孔祥熙牵线搭桥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同月,萱野长知来到中国,在上海景林巷公寓设立机关,开始寻找和蒋介石政权接触的机会。次年1月,孔祥熙在汉口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即努力开辟渠道,和日方进行和平谈判。3月末,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和孔祥熙的亲信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社秘密会见。4月20日,双方在同一旅馆第二次会见。其后,在松本的安排下,萱野与贾存德见面。5月,贾存德携带萱野给孔祥熙的信件赴港,与宋霭龄同机飞抵汉口。同月,贾存德携孔祥熙复函返回上海。孔在信中提出了和平条件:1.双方同时停战;2.日本声明撤兵;3.日本方面要求解决满蒙问题,中国方面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待商。

萱野收到孔祥熙的回信后,于6月9日回国,向小川平吉汇报。当时,中日两国已经断交,小川对萱野打开了和国民政府的谈判通道表示高兴。10日和11日,小川和萱野访问了外相宇垣一成和首相近卫文麿,他们都支持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的谈判。

6月17日,萱野离日返沪。7月5日,萱野、松本藏次、贾存德等人转移到香港继续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已于6月23日开始了会谈。这样,为着同一目的,由孔祥熙牵线,在香港同时进行着两场谈判。同时孔祥熙又将马伯援和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前者是萱野的老朋友,而后者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孔祥熙正是想借助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来使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然而,谈判中,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难题始终无法解决。7月22日,萱野致电小川,表示将离港返国,借助头山满的力量,促使日本政府对要求蒋介石下野问题再作考虑。

萱野等人赴港之际,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正赶赴东京谈判。他早有撇开蒋介石,由汪精卫出面实现“和平”的打算。抵日后,发现日方正在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便迎合日方意图,提出由汪精卫、张群等二三十人协力一致,迫使蒋介石下野。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的政权”。日本政府所谓“第一流人物”,即指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在这种情况下,萱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自然要碰钉子。

在日本政府内部,宇垣属于柔软派,他仍然支持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的谈判,但不敢过于拂逆陆军方面的意志,表示蒋介石可在签订和约之后下野;如孔祥熙等出面会谈,他本人亦可出面。9月上旬,萱野由日返沪,继续通过贾存德与孔祥熙联系。9日,小川致函萱野,申述了宇垣和他本人的意见。退而主张“规定反共、和平后下野”,作出了某些让步,因此,孔祥熙表示,愿意出面与宇垣谈判。9月15日,萱野第二次赴港,与贾存德等继续谈判。23日,宇垣在五相会议上要求海相米内派军舰供谈判使用,得到米内的同意;同时,宇垣要求陆相板垣征四郎赞成与孔祥熙等人会晤,亦得到板垣同意。此间,宇垣还曾上奏裕仁天皇,得到秘密批准。这样,近卫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似乎取消了。

然而,日本陆军正积极准备进攻汉口,他们热衷于诱降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感兴趣。他们指使少数人面见近卫,指责宇垣为“国贼”,声言绝对反对和议。近卫顶不住陆军的强大压力,于接见新闻记者时声明:“帝国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方针始终不变。”在这一情况下,宇垣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萱野长知等积极安排的宇垣、孔祥熙会谈也随之流产。

蒋介石直接控制谈判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4天后,占领武汉。日本主战派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但萱野却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因此,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进行和谈。

此后不久,日汪关系有了迅速发展。11月20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达成“日华协议”。12月21日,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逃到河内。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集团,一度停顿的日蒋谈判再度恢复。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蒋介石决心起用嫡系复兴社人物。除郑介民、柳云龙外,增派杜石山参加和谈。杜是蒋介石在香港的秘密办事处负责人。蒋介石重视谈判,所以甩开了孔祥熙,起用嫡系人物。

1939年3月16日,宋美龄以治牙为名到港与萱野进行了非正式的晤谈。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会商,柳提出7条条件。会后,杜石山致电蒋介石,劝他抢在汪精卫之前与日本言和,以免夜长梦多。19日,得蒋介石复电,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清商量改删。”

3月24日,小川亲赴香港。30日,小川将一份备忘录交给萱野,令其转交柳云龙,同时还提出一“便案”。至于其内容,小川却故弄玄虚,要求面见蒋介石或其心腹要人“详细谈议”。其实,“便案”很简单,不过是要求蒋介石将

“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实行局部停战。4月10日，小川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明确表态。13日，蒋介石复电，要小川和马伯援联系。小川认为马伯援是适当的人选，准备通过他摸清蒋介石的本意。谁知，正在此时，马伯援突患脑溢血，于14日去世了。

马伯援去世后，小川立即要求重庆方面补派有力人员来港，未见答复。5月11日，小川至函蒋介石，劝他排除畏难情绪，当机立断，速派要员来港，并称愿与萱野共同赴渝，否则即束装归国。但是蒋方仍无动静。小川觉得受到冷淡，便向蒋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将离港归国。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来得十分突然，其中奥妙何在呢？原来，蒋介石是不敢轻易言和的。蒋的副官张铭新说：“蒋自‘九·一八’后，已受国人唾骂，讥为卖国贼、日本走狗”，“今后各事，欲不小心自亦有难为之处，……所以委曲求全，无非想彻底处也”。副官杨洁进一步透露：“蒋氏将小川翁函提出嫡系干部会议，事为共产党所闻，迫蒋履行西安约言，不得中途妥协，并迫蒋迁都西安。事弄糟了。广西系亦出面反对，说如中途妥协，广西决单独抗战。”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密嘱，无论如何要保留此线交谊。

此时，正值日本五相会议确定以汪精卫、吴佩孚组成中国“新政府”之后，汪已经到达东京，正在与平沼骐一郎首相会谈。杜石山等人十分焦虑。6月10日夜，宋美龄、柳云龙等密议后，由杜石山出面通知小川，称蒋此时已有决心议和，希望小川无论如何设法阻滞汪精卫成立“新政府”。

6月11日，小川回日。两个多月前，当他开始中国之行时，曾经踌躇满志地写过一首诗，中云：“胸中自有回天策，笑上南溟万里舟。”此次归国，他再也没有这种心情了。

再次谈判搁浅

小川回国之后，日、蒋双方都不愿中断已经开始的谈判。1939年6月14日，孔祥熙再度出面，致电萱野，要求在具体方法上给予指导。与此同时，小川则在东京竭力向平沼首相等人说明，蒋介石仍有诚意，现在还未到倾全力于汪精卫的时机。自7月上旬时，小川在十多天内连发三函给萱野，指示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方法，表现出他重新打通与重庆谈判道路的迫切企图。

尽管小川态度积极，萱野却认为尚非其时。7月7日，蒋介石为抗战两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等一系列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8月3日，萱野致函小川，声称正在研究使重庆方面“不得不下决心的妙计”。“妙计”之一是策动华侨要求“和平”，之二是策动江西九宫山地区蒋军倒戈，协助日军攻陷武宁、修水，给予重庆以军事打击。

在此之前，7月16日，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人选，规定蒋介石有权实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11条的规定——国民政府有与外国宣战、议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8月1日，杜石山致函小川与萱野，告以此次军事委员会改组，表示“蒋氏已有与共产党分离之决心与准备，且已有议和之决心与准备”。

小川得此消息后，立即向当局大臣汇报。8月10日，小川走访近卫文磨，又连夜进京，与首相、外相、陆相会谈，提出由自己携带首相的书信亲自出马与重庆谈判。小川表示：倘谈判失败，将断然与重庆绝缘，并迅猛地建立“新政权”。

但是，此时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9月1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重庆方面则由此改变了与小川等人重开谈判的计划。10月13日，萱野离港回国，谈判再次搁浅。

尾声

萱野归国之后，小川等人的“和平”工作陷于停顿。不料，就在萱野、小川等“静观”之际，蒋介石方面却又积极起来。1940年6月，日军占领四川门户宜昌，威逼重庆。21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要他邀请萱野来港，谈判“和平”。此前，蒋介石已经派特务曾广冒充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和日方的今井武夫等人在香港、澳门多次磋商，6月6日，双方一致同意，由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举行3人会谈。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桐工作”。但是，蒋介石计划多线进行，故又派郑介民、柳云龙等到香港活动，传达蒋介石的“和平”决心，准备恢复与萱野等人的会谈。

7月29日，小川决定让萱野于8月2日赴港。不料板垣这时正热衷于“桐工作”，而外相松冈洋右正通过银行家钱永铭与重庆联系，二人皆不愿另生枝蔓，萱野之行两度受阻。

9月中旬，“桐工作”失败；继之而起的“钱永铭”工作也困难重重。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从外交上承认汪政权。同日上旬，松本藏次和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三到达澳门，向杜石山传达这一信息以及头山满的意见。12日，杜石山返港，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不久，杜石山得复电，已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合签发命令，限红军五天内退驻西北方边区。16日，蒋介石又派侍从副官陈某乘专机飞港，对松本和头山秀三远涉重洋前来报告有关消息表示感谢。然而，不管蒋介石集团如何表示“殷勤”之意，日本政府还是于11月30日承认了南京汪记政权。讯息传来，重庆方面犹如五雷轰顶，12月15日，杜石山致函头山满和萱野，发泄满腹牢骚，同时批评日本政府失策：“今以两无准备之局势，而遽予汪氏以承认，故英、美轻之如

鸿毛，而以泰山视渝也。”

1941年5月5日，萱野为调查华侨情况，以南方协会顾问身份到达澳门。在此之前，重庆方面已经得知这一消息，派柳云龙及侍从副官一人来港，通过杜石山征询萱野对“和平”的意见，重申蒋介石“绝对维持此线”的主张。5月12日，杜石山抵澳，此萱野相见，萱野提出一切可无条件委托头山满办理。

无奈，此时头山满对蒋介石集团已经很失望，正在转向亲汪立场。6月14日，汪精卫访日。在此前后，头山满发表连载文章，尖锐地抨击蒋介石：“他终竟是傻瓜。对应该提携的日本反戈，以致难免自灭，他现在作最后的挣扎了。他会这样蠢，实在我也是料想不到。”头山满文章的发表，宣布了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对蒋“和平”工作的破产。

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表明：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条船，对抗战是动摇的。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屈服。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蒋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条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谈判的消息泄露，他就会遭到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垮台。这就是他在香港谈判中，顾虑重重的缘故。

不过，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和谈”也并非完全是真心实意的，同时也不排除有策略考虑。或为了延缓日军进攻，或为了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兵不厌诈。战场上固然虚虚实实，风云诡谲，谈判桌上何尝不如此呢？

（杨雨青）

日军杉坂少佐座机坠毁事件

1941年12月1日夜，侵华日军指挥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日本大本营报告了一个使人震惊的消息：本日日本设在中国的中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广州附近的中国军队防区坠落，搭乘该机的派遣军司令部的杉坂共之少佐携带了一份送交驻广州日军第23军司令官的关于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文件。这一消息使大本营受到极大冲击：如果中国军队得到这份文件，就会立即通知英美，英美得知日本开战意图，可能会抢先向日军大举进攻。

事情是这样。日本政府已决定同英美开战，将对东南亚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时发起攻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根据11月25日秘密下达的大陆令第572号，决定向第23军司令官秘密下达关于进占香港的命令草案，并交付有关文件。原决定由总司令部的中吉孚参谋携带前往，因他出差误期，就改由去广州的参谋部的杉坂少佐携带，乘中华航空公司的上海——广州班机前往。他乘的“上海号”12月1日早晨从上海起飞，经中途站台北，在经过汕头上空就失去了通讯联络。下午5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得悉这一消息后，大为惊恐，参谋人员目瞪口呆，深感忧虑。因为命令中写有“开战开始时间定于确认南方军对马来亚方面登陆或空袭之后”，不仅暴露了日军要攻占香港，亦可判明对马来亚的奇袭登陆作战。如果文件落到同盟国手中，日军密谋发动先发制人的突袭作战的阴谋将彻底破产。因此日军紧张地搜寻探听文件的下落。

12月2日，第23军派出飞机、船舰和地面部队在华南一带大规模搜寻，一无所获，监听中国方面通讯的机构也未获消息，而这时大本营发布了“开战日定为12月8日”命令、时间紧迫。

12月3日晨，日军监听到了中国军队发往重庆的电报：大亚湾北方山岳地带发现一架日机坠落，但因天气恶劣，未发现遇难地点。

4日晨，日军第25军已从三亚出发进攻马来亚，甚感紧张的日军又监听到了中国方面电报：已发现坠落日机，机身毁坏；机内7人死亡3人，击毙4人，正搜寻整理飞机散落物。日军据此判断：机身未燃烧，重要文件可能已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于是，“派遣军”至电参谋本部及南方军，指出有必要针对重要文件泄密采取相应措施。

4日上午，日方监听到的电报内容为：所有收集物品及文件一并送交重庆，日军总司令部对此极为惶恐。晚上监听的电报给日军带来一线希望：“昨日深夜发现二人，估计为日本坠机乘客，但两人抵抗后逃遁，正极力搜索中”。日军估计可能其中有杉坂，他可能已将文件作了处理。

5日监听到的中国电报内容为：发现一逃遁者并与之交战，敌挥刀勇猛抵抗已被击毙。日军总司令部推断此人为精通剑术的杉坂，且失事后生存了三天，估计既有时间又有地点处理文件，判明不会泄密，派遣军连夜报告大本营及通知南方军，各方面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有“神灵保佑”。

“上海号”失事后身负重伤的第15航空通讯队的宫原大吉12月5日逃回淡水，也证实了带有作战重要文件和密码本等的杉坂及据判断持有交付第25军的大量密码本的第25军司令部久野虎平曹长脱离了现场，并已将密码烧毁。

12月7日夜，饿得精疲力竭的久野曹长穿过中国军队防线，也逃回了淡水，报告了曾与杉坂一起行动，杉坂

已将作战命令作了处理，两人在3日夜与中国哨兵发生冲突时失散的情况。3个小时后，日军对东南亚进攻开始了。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如果那件绝密文件为同盟国军队得到的话，太平洋战争史也许要改观了。

（小金）

历史考证

胡乔木谈皖南事变

不久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同该书编写组同志谈话的记录，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编写组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文稿。"谈话录"的第四节和"初拟稿"的第一节（经胡乔木审阅提意见后，编写组又写成修改稿，胡表示基本符合要求），就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现摘要刊载如下：

谈话录第四节是胡乔木1990年9月6日的一次谈话。谈话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影响很大"。"在皖南事变前，国民党作了长时间的舆论准备。从何、白'皓电'开始，命令新四军北调，这很毒辣"。"对于'皓电'，我们的反应是低调的。毛主席也觉得应该谨慎。低调的反应使人们认识到共产党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这就争取了中间派。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布一月十七日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党中央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采取尖锐对立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在我们实行了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之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后来中间派形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同这一形势的发展有关。以前阵线没有这么分明。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间派也许就不会独立出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了。国际上，后来美国也报道了皖南事变。我们赢得了支持。"

谈话还说，皖南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对王明右倾路线的认识更清楚了。新四军领导人在这次事变上的失算，是与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有关的。经过这次事变，我们在军事上尽管受了那样大的损失，政治上却有很大的进展。就是在军事上，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利。""这次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毛主席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

谈话还说，"这次斗争，毛主席自己做过总结，我们可再作个历史回顾。本来，皖南事变前，国民党要求我们的军队退到黄河以北，对我们压力很大。我们答以'佳电'，现在看来也很正确。听陈云同志说，毛主席写'佳电'写了一夜，反复推敲，到天亮，看看可以了，其中一些话，后来毛主席反复指示要宣传。'佳电'用词恳切，是一篇很好的驳蒋的文章"。"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战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次运用得淋漓尽致。这是很难得的一段历史经验。""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初拟稿的第一节，首先分析了皖南事变发生的背景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意义。文章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政府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武装摩擦事件。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之局面。毛主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领导全党打退了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这次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抗战期间的政局和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文章然后分别论述了皖南事变发生前、发生中及发

生后毛主席、党中央如何根据当时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果断、及时地采取对策，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形势朝着有利於我、有利於抗日的方向发展。

文章最后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了总结，认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我党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蒋介石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了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苏北解放区，而且使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渐联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明显地强于国内其他任何军队，成为顽固派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

——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了中间派的政治作用，扩大了中间派的成分。不仅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各抗日小党派和多数的杂牌军、地方势力属于这个阶层，连国民党中央军中的许多军官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许多官员也纳入了这个范围。尽管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立场是动摇的，但是经过积极的耐心的争取工作，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重大关头，还是同情和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不断发展，抗击的日寇兵力几乎与国民党抗击的日军数量相等。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我党日益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谈奠定了政治基础。

"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经验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谈形势说：

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指导中国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仍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抗战反汉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仍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拉对拉，以打对打。

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必须有整套战术，不可粗心。对其反共政策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斗争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在反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地方实力派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与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一般的，应以中间派的态度对之。有人以为皖南事变后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完全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中国社会是中间阶级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对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发生动摇，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所以对党的政策也发生动摇，以为三三制的政权不适用了，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不是统一战线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

有些同志把对付国民党破裂的可能性，当作最坏的唯一的可能性，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有些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战政策与阶级政策、统战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不了解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政权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是他准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总结的报告提纲。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赞同这个报告提纲的决议。5月8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政策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解释和概括。这就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篇著名文章。

"从何、白'皓电'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时间，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电'前后和12月上旬顽固派的'齐电'发出之后，是毛主席发出电报最多的时候。11月3

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十一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这些虽多为布置工作、发布指示的急电，但并非全是事务性的应急处置。如上所述，不少文电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电往来，还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从而他的这些认识或决策既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汲取别的同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高于别的同志的思想认识。例如，对于'皓电'，中央最初决定答之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在恩来同志反映了重庆各方意见，提出望'作表面的服从'，以分化顽固势力和'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全国，答复何、白'的建议后，采纳此议，改为发表前述产生巨大影响的'佳电'。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但在了解到国民党围歼皖南的某些布置后，迅即于12月26日发出了皖南部队立即北移的紧急指示，并在12月30日政治局常会上表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也没有发出文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少奇同志也曾向中央表示过这一主张，但在三天后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实行全面军事进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提出'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毛主席接受了这个建议，改为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正确方针。他在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以前的一些看法作了修正，指出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国府命令是否全国破裂的开始，这一点要考虑。这样，实际上就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毛主席从善如流的思想作风使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更紧密了，党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个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对如何坚持团结抗战的认识走向统一了，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更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趋于定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阶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李一氓谈如何评价项英

《中共党中研究》1992年第1期发表李一氓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记录及两次书面答复，其中涉及到如何评价项英的问题。李一氓认为：(一)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共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后来走的这条路线，是曾派人侦察过的。所以，在北移路线问题上，项英无所谓违背中共中央决定之说。如果要项英负失败之责，军事上的责任要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二)叶挺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说来，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三)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张国焘同时期搞工运的，与王明毫无关系。抗战爆发后王明回国并到长江局主持工作。长江局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但项英对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四)讲项英怕去敌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那种环境都过来了，还怕去敌后？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与过

有的同志否认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贡献，把他在新四军中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在皖南事变前，项英就拒不执行中共中央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阻碍新四军的发展，在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中，放弃党的领导，对中共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态度。有的人还认为，项英向党中央闹独立性，他有一套完全违反党中央意图的"南进"主张。这一主张被称为"三山计划"，即南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方向发展，以进入浙赣，甚至到江西老区去，开辟一块与华北、华中三足鼎立的新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第二个延安。

然而，一些历史资料表明，中共中央对项英领导新四军是信赖的，对他在新四军工作中的贡献是肯定的。

第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斗争作了很高的评价。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听取了项英关于南

方游击区的报告，并作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的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之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政治局相信南方过去各游击区的同志同样能够在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之领导之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的任务。"

第二，1939年7月3日到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邓发、邓小平、李富春、高岗、李维汉、张浩、孔原、林伯渠、张鼎丞、谭政、滕代远等二十人。这次会议总结了关于南方局工作和关于新四军、东南分局及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期间，张鼎丞于8月21日至22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的报告，着重总结了新四军建立一年多来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报告》认为，一年多来，东南局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具体工作成绩是：(1)保证了各地游击队集中计划的完成；(2)新四军组建中，扩大了部队，加强了部队的建设；(3)注意了对新四军中广大党员的教育，特别是对老干部的教育，促进了新四军中的党的团结；(4)实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5)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肯定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了下述成绩：(1)发展了统一战线；(2)扩大了党的组织；(3)推进了战争的动员；(4)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5)开展了工农运动；(6)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

第三，1940年春夏，新四军在总结工作中，有些同志对项英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项英一时难于接受，于1940年5月9日和12日两次报告中共中央，请求撤销他的职务。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明确指出："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的错误，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杀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错误。""项英同志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

上述几方面的资料表明，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前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工作，主要是肯定他的贡献，而对于他的缺点错误，是作为次要方面指出来的。中共中央对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功与过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对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领会不深，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没有在敌占区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因此，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不够快。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呢？主要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思想跟不上的缘故，而不能把项英的错误上纲为反对党中央。正如陈毅于1945年5月1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旧的斗争形式、旧的斗争任务结束了，新的斗争形式、新的斗争任务提出来了，在这样的转变关键上，常常使我们的同志转不过弯来……在主观上有了自觉的准备，就能很好地转过来，主观上没有这种自觉认识和准备，就一定要栽筋头。"

关于"三山计划"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证明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有系统的"南进"主张。当时，项英在思想上确实有些留恋皖南地区。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在南方发展根据地有经验，估计日本侵略军将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如果日军进攻浙赣路，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情况下，驻皖南的新四军即可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实践证明，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皖南事变前，日军并没有进攻浙赣铁路。然而，项英的这一错误，仍属于对形势的认识的错误，谈不上向党中央闹独立性。

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一文，作者王秀鑫。

对《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的认识

近几年来，有的同志不同意《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对项英、袁国平的评价，认为对这个决定应予以改正。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有如下认识：

第一，《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项英的评价，是不够实事求是的。(1)对项英在新四军三年多的工作指责过分。如认为项英"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这些提法与党中央过去对项英在新四军工作的评价是不一致的。(2)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损失，客观分析不够；对项英、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上纲过高，甚至怀疑领导机关有内奸。如说："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

的怯懦动摇……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3)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的评论，也不够恰如其分。如说，项英“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他采取“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决定》虽然表明“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但又说“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把项英与张国焘并列起来了。

第二，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不够实事求是的决定呢？(1)《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1941年1月15日作出的，当时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武装摩擦才刚刚基本上停下来，全党全军在这次大的损失面前，都非常痛心，除了仇恨国民党的阴谋外，对项英的错误是非常不满的。在一片对项英的指责声中，党中央为了教育全党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高警惕性，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可以理解的。(2)由于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大规模武装进攻新四军结束的第二天，小规模的战斗还仍然进行，在那种条件下，中共中央不可能把情况搞得很清楚(如对项英是否冲出包围圈、是否牺牲或是被俘，均毫无所知)，因而《决定》中出现不准确或错误之处，是难免的。

第三，《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虽然有不实之处，但不必要正式加以改正。理由是：(1)《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虽对项英等的错误，提得非常严重，但党中央没有对项英等同志作任何组织处理，且对《决定》的传达公布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决定》明确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这种慎重的态度，使《决定》中对项英等同志的不实之词，在当时没有发生更大的影响。(2)《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还明确指出：“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时，陈毅于5月1日在大会的发言中，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陈毅说：皖南事变，是很痛心的……我们当时怕破坏统一战线，要维持和国民党团结的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国，这是国民党箍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项英同志最后是死了，他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很英勇的，这与张国焘有区别。项英和袁国平的错误，党有资格来批评，但是国民党不能动他，动他一根毫毛，就是犯了罪。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陈毅的发言，既表明了这次大会对项英、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性质有了正确的结论，也表明了党否定了过去《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一些不实之词。(3)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对项英革命的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1948年8月1日，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前夕，中共中央于7月29日给大会发了“祝词”。这个祝词把林祥谦、邓中夏、张太雷、项英等，均称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全国解放后，1953年7月，南京军区派刘奎(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和项英的儿子项学成等一起到皖南，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找到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遗骨，并将遗骨送到南京，党在雨花台的望江矶(菊花台)为项英等三人修建了陵墓，以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上述事实说明，虽然中共中央于1941年1月15日所作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项英、袁国平的评价有不妥之处，但党中央早已注意到应该对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在那个《决定》之后，全面正确地评价了他们，从而改正了《决定》中的不实之词。基于这样的情况，对1941年1月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的不恰当的地方，不必要再予以改正。在党史研究中，关于项英革命一生中的功过问题，只要我们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是可以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评述的。

(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一文，作者王秀鑫)

是不是黄桥战役导致了皖南事变

黄桥战役后，蒋介石说新四军违犯军纪军令“见敌则避。遇友则攻”，“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由此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现在台湾当局及其历史工作者也还在这样宣传。这些歪曲宣传，有必要加以澄清。

根据统计，从1938年5月至1940年12月，新四军与敌伪作战二千七百四十二次，毙伤敌伪三万八千八十六人，俘虏敌伪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人。新四军建立以后，收复大片失地，战绩为国人所共见。诬新四军“见敌则避”是毫无根据、自相矛盾的。至于说新四军“遇友则攻”，那更属“莫须有”。事实恰恰相反，“遇友则攻”“专事并吞友军”的是当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一、早在新四军建军之初，蒋介石便将我军作战地区划死在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五六十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企图利用前有日军，后有国民党军的态势，置新四军于死地。二、1939年1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反共中心由华北移到华中，亲自批定了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剿办异党指导方案”，规定“将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可见，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壮大深为恐惧和仇恨，决意加以“剿灭。”这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是一切摩擦和反摩擦战斗的根本原因。三、黄桥战役

是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上述政策的必然产物，是他们一步一步紧逼出来的。新四军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只能在黄桥及其周围迎战国民党顽固派的多路进攻。四、皖南事变的发生，完全是蒋介石的预谋，没有黄桥战役，皖南事变一样会发生。时间上的偶然巧合成了国民党当局制造舆论的借口。

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产物，绝不是什么黄桥战役导致了皖南事变。

黄桥战役以少胜多，国外有些研究者认为有点"神秘"；有的人甚至曲解说"完全出于偶然"，有意无意贬低了黄桥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对此，有必要进一步辨明。

黄桥战役，新四军以五千战斗人员，战胜韩德勤军装备精良的三万之众，一举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这是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必须结果。韩德勤自恃兵精足，骄躁轻率，冒险轻进，自己埋下了"必败"的种子，此其一。新四军在苏南抗日，受到顾祝同、冷欣的威胁、逼迫，不得不移兵苏北；而到苏北后，又受韩德勤的威胁、逼迫。新四军光明磊落，忍让求全，避免内战；韩德勤步步紧逼，必欲消灭而后快。这就使新四军处于"哀兵"的地位，"哀兵必胜"，此其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黄桥战役期间，新四军得到黄桥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人心的向背是黄桥战役胜败的关键。此其三。最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而韩德勤却秉承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反共方针，置民族大敌日本侵略者于不顾，为敌伪张目，这就使他完全丧失人心。这样多行不义的部队，岂有不败之理？

黄桥战役的胜利，是有据可寻，有其内在必然性的，所以它绝非"偶然"。正义必胜，人民必胜，是黄桥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也是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摘自《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关于黄桥战役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作者丁留名。）

说项英拒不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反对黄桥战役，是不符合事实的

说法有三：一是说项英拒不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贻误了抗战初期向苏北发展的大好时机；二是说项英醉心于向南发展，有未见诸文告的"三山计划"或"黄山、天目山计划"；三是说项英不同意在横桥决战，担心风险太大，会"赔光老本"。

让事实来说话吧。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项英任副军长（政委），接着又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以后，他即和陈毅一起，到各游击区传达党的指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编完毕，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尚未提出时，项英即以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各一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从皖南深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4月底，派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平原游击战，在大江南北建立根据地，项英立即要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主力，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并逐步地向苏北的扬州、泰州地区发展。1939年2月，周恩来亲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叶挺、项英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后，项英又派了大批干部到茅山根据地，帮助陈毅进行开辟工作，其中有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1940年，毛泽东著名的"五四指示"发表后，新四军即大力向北发展，陈、粟即率主力部队渡江北上。其间曾发生双塔集、半塔集、郭村等多次反摩擦战斗，较好地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直到黄桥自卫战的完全胜利。新四军军部成立后的这一连串事实，怎么能说项英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贻误了抗战初期苏北发展的大好时机呢？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还说："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可见以党中央的英明，在"向北发展"这一问题上也还有过反复考虑的过程，项英对这一方针如果有过什么疑虑，于情于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有人责备说，在1938年春夏之间，苏北有两个月的大好发展时期被项英错过了。这一分析和要求，即使是正确的，恐怕也不应要项英承担什么责任。

至于说项英醉心于向南发展，还有一个什么没有见诸文告的"三山计划"或"黄山、天目山计划"，这更是无稽之谈。第一，向南发展的"三山计划"，既没有见诸文告，那么又从何得知这一计划的呢？第二，1938年9月，项英参加了党的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报告中，项英没有提到"向南发展"的问题。第三，在周恩来亲到云岭军部商谈新四军战略任务时，项英也没有谈及"向南发展"的问题。第四，对陈毅确定的"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项英是同意并支持的。1939年12月，项英向中央报告了陈毅与两李会谈的绝密内容，特别指出"陈毅到泰州与李明杨等会昭，所谈甚好"。1940年8月12日，《中共苏北特委为创立抗日根据地对目前党的工作任务的决定》中还提到"根据项副军长的指示，一个月扩大主力三千"。这说明项英对苏北的开辟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是不断有所指示的。第五，说项英要"向南发展"，既没有文字根据，也没有行

动根据。自新四军军部成立，至皖南事变项英牺牲止，没有任何事实说明项英有“向南发展”的措施和行动。

黄桥战役的作战计划报到军部以后，项英确曾顿足担心，怕把“老本赔光”。因为黄桥战役，不但要求战略上以少胜多，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也必须以少胜多，以少歼多，不是以二倍、三倍、四倍、五倍于敌的兵力围歼韩军一路，而是以大体上相等的兵力或略少于敌人的兵力围歼韩军一路，这虽然体现了陈、粟不拘一格的指挥艺术，但怎能不叫项英担心呢？特别是对集中三分之二的突击部队全力对韩，对武装的中间力量如两李等方面不派兵、实际上也无兵可派，万一这些中间力量不严守中立，而是乘虚突袭、背后插刀，那怎么办？对上述情况，连陈毅本人也作了最坏的考虑，曾焚去心爱的文稿和书籍，以防万一。何况项英远在皖南，对黄桥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了解，产生这些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黄桥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军部后，项英立刻欣喜万分，甚至手舞足蹈，连声称赞陈毅，并立即开会向大家报告黄桥战役胜利的喜讯，布置《抗敌报》发表社论祝捷。项英的担忧与欣喜是真诚的，完全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的。

人非圣贤，项英在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也可能在策略问题上跟中央有过一些分歧，特别在后来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正如项英1940年5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说：“自新四军成立到今，是绝对服从，未在党内讨论过与表示过我个人意见与不同点。”因此，绝对不能就此说项英拒不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反对黄桥战役，更不能因此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1940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中说：“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当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我觉得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是正确的、公允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

（摘自《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黄桥战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作者丁留名。）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究竟是怎样确定的

对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行军路线是怎么确定的，近年来，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最近，百科军事卷条目《皖南事变》（草稿）中记叙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行军路线时也说“迅经中共中央批准”。

提出这种说法的论点主要有两点：(1)1940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2)新四军皖南部队从皖南泾县云岭开动前，毛泽东、朱德于1941年1月3日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上述论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证。

首先是究竟有没有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的问题。对于中央与项英来往的电报作分析，没有迹象说明中央军委发过这样的“命令”。12月26日中共中央又复电项英，作了严厉批评，指出：“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不能想象在这份电报之前三日（即12月23日）中央会“命令”皖南部队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达溧阳。对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后发表的重要文件作分析，也不能说明中央军委曾经发过“命令”，而且，这些文件内容涉及北移的行军路线时，对项英是持批评态度的。1941年1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说：“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1941年1月20日，军委参谋部发出《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被顽军聚歼的军事方面的教训》中说：“……项关于军事行动的布置与指挥，非常错误。”当年华中局高干会议讨论皖南事变时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看，说明他们对四军北移的行军路线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刘少奇说：“一年多以前与顽固派磨擦的时候要北移，他老是不愿意，不移，结果在北移中找着歧路，走到茂林”。陈毅也说：“无论如何不应走茂林，或走铜繁或走敌顽接合点，走茂林完全是自寻绝路。”“综上所述，可以判断所谓中央军委曾发出12月23日“命令”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确实曾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份电报是对1941年1月1日新四军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致胡（服）陈（毅）“决心经苏南北上”电报的答复，而新四军向中央报告决心移苏南的电报中并未具体报告向南绕道茂林的行军路线，而是笼统的说法：“我们决心全部移苏南……。”这份电报并未把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溧阳的行军路线报告中央；同样，中央的复电只是同意皖南部队移苏南，也不等于批准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行军路线。

那么，这条行军路线究竟是怎样确定的呢？

当年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搜集的“华中、新

四军抗战资料"中有一份《皖南事变要报》，是从当年新四军军部所保存的档案材料中找出的，时日已失，显系草稿。但作为历史文件，十分珍贵。这份《要报》在写到皖南部队北移的"决心与部署"时写到：(一)行动方案：1. 按顽三战区指定路线经苏南北渡；2. 由皖南铜、繁间向北渡；3. 绕道由天目山脚达溧阳，待机北渡。(二)各案之利害(从略)。(三)决心：因苏南情况紧张，同时由铜、繁间北渡之各渡口又为敌严密封锁，不易并渡。故最后经12月28日军委会之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

这份行军路线是项英主持的新四军军分会，从三个行动方案中经过选择作出的决定。文件上写"军委会"，显系"新四军军分会"之误。

(摘自《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2期，作者王明亮。)

国民党民主派与皖南事变的关系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抗日将士、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事件。我在《民国春秋》1989年第4期上曾有《皖南事变中的上官云相》一文，对上官云相及其后台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的所作所为作过披露。

顽固派，是与民主派相对而言。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不少国民党人主张全国团结对外，坚持抗战到底，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实现和巩固做过许多工作。他们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如何，虽然史料较少，也应有所介绍。

作一让步，力争挽救危局
——事变前：分析形势提供对策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顽固派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攻击诬陷，强令限期一个月移往黄河以北。与此同时，他们调动大军，对皖南、皖东、苏北、鄂中的新四军都作了进攻的布置。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一场反共内战迫在眉睫。面对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和在重庆的周恩来、在皖东的刘少奇等电报往来频繁，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还要周恩来以及在桂林的李克农等"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在同周恩来的交谈中，冯玉祥、李济深等都表示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同时提出为缓和局势，共产党要让一步。冯玉祥根据他和蒋介石多年打交道的经验，相当具体地建议：对皓电"应该立即复电，由何、白呈统帅。文章要做得委婉，不带意气，表面添上服从他的命令，实际上可实行自己的办法。""无论如何不与蒋分裂。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实行一个出其不意的举动，一个电报满期，再来一个延期。"冯玉祥还表示，复电到重庆后，他可以约孙科去见蒋介石，从中调解。

冯玉祥的建议，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看法大体一致。周恩来在1940年11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张争取"推延剿共战争的爆发和友党关系的破裂"；"并非说严重斗争能避免，而只是争取推延。这是应该的。欲推延唯一可能的办法，必须作表面的服从，实际的某些让步(指退出江南)，以某些让步避免某些损失。"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采纳了这个意见。11月3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署名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撤。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这个朱、彭、叶、项的答复，就是11月9日的《佳电》。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究竟敢不敢挑起内战?冯玉祥和李济深的看法是相左的。冯玉祥认为蒋介石可能不顾一切蛮干。李济深则认为蒋介石内外矛盾甚多，目前还不敢采取大的反共军事行动。毛泽东赞成李济深的看法。1940年11月30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李任潮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算计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判断，不久就作了纠正。12月间，他一再催促新四军皖南部队赶快北移并做好自卫战斗的准备，就是纠正失误的证明。近几年的皖南事变研究中，有人以11月30日电为主要依据，认为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迟缓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也有责任。我对这个观点不能赞同，但因不属本文范围，这里略而不论。

大敌当前，岂能兄弟阋墙
——事变中：紧急呼吁制止内战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终于对北移途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发起攻击。1月12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和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彭泽民，联名给蒋介石及国民党全体中委、监委写了一封长信。他们写信时显然还不知道皖南已在流血，但是火药味

早就很浓了，因而着急忧虑的心情跃然纸上：

"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旦。而时势所趋又非昔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者！"

信中强调一切需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指出反共分裂是日本以华制华之毒计；只有"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才能使"敌人之挑拨离间、裔割分裂政策，将永无实现机缘"。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香港，宋庆龄、何香凝又和陈友仁联名，于1月18日致电蒋介石紧急呼吁："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但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已被皖南的"胜利"冲昏头脑，在17日发布了取缔新四军的反动命令。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是国民党的元老。冯玉祥、李济深则是一级上将。就当时的职务来说，冯玉祥还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实际上他们都被排斥于国民党的决策圈外。主张国共合作抗日而能参与机密的，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皖南事变前夕，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过不同看法。1月10日，皖南山头正激烈战斗之时，张治中又去向何应钦密陈意见，"以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结果呢？"终以孤掌难鸣，未能挽回。"(《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自坏长城，理应严惩祸首
——事变后：愤怒抗议痛斥秦桧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内外舆情鼎沸，同声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始料未及，颇不自在，曾派要员去香港劝说柳亚子等"不必多发议论"，接着又电邀他们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1941年3月24日，柳亚子发电报拒绝出席全会。电报一开头就讲皖南事变：

"士君子出处大节，自有本末，闻量而后入者矣，未闻入而后量也。此次新四军不幸事变，中枢负责人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含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而当事者犹未闻有悔祸之心，何也？"

这位老诗人和政治家，直指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是杀害北魏名将檀道济的昏君魏文帝，是杀害南宋名将岳飞的汉奸秦桧。要求"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涤宦海之颓波，驱鲳夷于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余虽无状，原当抠衣扶杖乐观太平耳！"

鉴于顽固派并无"悔祸之心"，电报接着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柳亚子借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和张世杰、陆秀夫不事元朝的典故，表示了决不与顽固派同流合污的态度。

柳亚子的这封电报，义正辞严，激昂慷慨，骂得痛快淋漓，句句可圈可点。国民党顽固派的头目们读了自然大为恼火，竟在4月3日的八中全会上以"违反国策"为名，宣布开除柳亚子的党籍，而且居然是与当汉奸已经年余的陈公博一同开除！

4月5日，何香凝为此对记者发表谈话，气愤地说：她和柳亚子等"主张息内争、固团结以收抗建实效"，"虽非在朝诸公所乐闻，但自信可代表人民公意，海内外同胞当有同感。此事可称为违反国策，则何为国策？国策何在？"(1941年4月11日香港《华商报》报道)

经过皖南事变，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一步看清了是谁要分裂、倒退，是谁要团结、抗战，从此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更为密切、更加坚定。

(司马而已)

孙中山"国父"称号的由来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党的领袖名称由"总理"改为"总裁"，"总理"之称为中山先生一人所有，用符崇德报功之意。

孙中山被称为"国父"，始出于陈公博的建议。陈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他在1941年5月2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上提出"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大会通过了他的建议，并制定了致敬办法："各级政府、各合法政党及人民团体、机构均应于礼堂或集会场所正中，于国旗交叉下永远悬挂中华民国国父遗像，并附挂国父遗嘱"；"正式集会开会时，应向国父遗像行最敬礼三鞠躬，并恭读国父遗嘱"；"集会演讲时，于第一次称及国父时应起立或立正致敬"；"关于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于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并由主管机关将主管事项另订检查细则施行"。1942年4月6日，汪精卫下令将中山陵园管理机构命名为"国父陵寝保管委员会"，由伪中央党部秘书长褚民谊任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沿用了国父之称。1946年7月2日，国民政府将原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改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凡提及孙中山均改称为"国父"，孙中山的"国父"之称遂流传开来。

（林奇）

风云人物

项　英

项　英（1898——1941）　原名德龙，化名江钧。湖北武昌人。幼年丧父，靠他母亲帮助别人纺织、刺绣所得微薄收入维持生计。1913年，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满师后，留厂当纺织人。家庭的遭遇，资本家的剥削，工头的虐待，促使他对旧社工会产生了憎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他产生很大影响。1919年，他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创办的工人夜校，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项英（罢工委员会总干事）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江岸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试图营救，由于寡不敌众，未能如愿。1923年6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春，汉口的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4月，到武汉从事恢复工人运动和党的活动工作。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到上海参与对罢工的领导，随后转入秘密活动。1926年秋，回武汉秘密从事党和工会的工作。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任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配合北伐军维持社会秩序，参加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1927年4月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不久，到苏联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同年8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回国后，在中央负责工会工作。1929年11月，在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任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长江局书记。同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陈毅等一起，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向分散游击的转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进行残酷持续"清剿"等极端困难条件下，转战粤赣边，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六届六中全会后改称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由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

项英在突围时，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在1941年3月13日深夜为叛徒杀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遵照总政治部的指示，派专人到皖南赤坑山找出项英的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周子昆

周子昆（1901～1941）　广西桂林人。原名周维宽，字仲和。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入桂军当兵。1924年参加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0月调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北伐战争汀泗桥、贺胜桥和强攻武昌城的各次重要战斗，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营长。后随朱德上井冈山。红四军成立，任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参加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参加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的作战，任红四军一纵队支队长。战斗中负伤，留东固休养。1930年初任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6月成立红一军团，任红三军参谋长。同年10月任红三军七师师长。1931年夏任红四军参谋长。同年9月任红三军军长。率部参加文家市、第二次攻打长沙、吉安等战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3月任红五军团参谋长。6月任红一方面军后方指挥部总指挥。1933年初任江西军区参谋长。6月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第三十四师师长。1934年夏任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

率部参加长征。1935 年 1 月任红五军团参谋长。3 月改任副参谋长。7 月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10 月奉命随红军总司令部南下。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1936 年 7 月随军北上，复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同年 12 月到达陕北保安与军委机关合并，任军委第一局局长。1937 年 1 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兼校教育部部长。后专任校教育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 年 1 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参加江南抗日游击战争。重视加强司令部建设和部队训练。1941 年 1 月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被叛徒杀害。

袁国平

袁国平(1905—1941) 湖南省邵东县人。1925 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历任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八军政治委员。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1936 年后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政治委员、教导师政治委员、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等职。1938 年奉调华中，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善于总结经验，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贡献。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由于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曾使部队的工作受到影响。1941 年在皖南事变突围中壮烈牺牲。

陈毅

陈　毅(1901——1972) 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夏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当局联合押送回国。1922 年回四川，在重庆编辑《新蜀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 年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转为中共党员。在北京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1926 年参与领导了北京三一八大游行。后奉中共北京区委指示，赴四川进行兵运工作，推动川军策应北伐。1927 年 5 月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同年 8 月，随南昌起义部队南进，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和朱德一起力挽危局，率部沿闽、粤、赣边境转战至湖南，将部队编为一个纵队——第五纵队，任党代表。1928 年 1 月参与领导了湖南南部郴州(今郴县)、永兴、资兴、耒阳等十余县群众举行的湘南起义。部队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朱德任师长，他任党代表。3 月他们率领一师和湖南八千余起义农民，分两路向井冈山地区转移。4 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后任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5 月又兼二十八团党代表。同年 11 月中旬，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召开，选举新军委，他为前委秘书长兼士兵委员会秘书长。1929 年 1 月，他兼第一纵队党代表。6 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为前委书记。7、8 月间，他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同年 10 月底至 12 月底，他积极筹备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召开，并在这次大会上，认真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积极协助毛泽东主持制订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为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1930 年 2 月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成立，他任军政治委员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6 月红一军团成立，他任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委。7 月又兼任红军干部学校校长。1931 年 2 月，任赣南特委书记。1　月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委员。1932 年 1 月，任江西军区总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933 年 9 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他任西方军总指挥。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南方，任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军部于 1938 年 1 月在南昌成立。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和党的副书记。1939 年 11 月任江南指挥部司令员。1940 年 7 月苏北指挥部成立，他任司令员。与粟裕等领导所部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苏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 年 10 月，和粟裕等精心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黄桥战役，对进一步发展华中人民抗日力量，开创华中抗战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同年 11 月华中总指挥部成立，他代总指挥兼抗大五分校校长。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他代理新四军军长。5 月成立华中局并成立军委会华中分会，均为委员，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敌后的抗日根据地。1942 年 3 月，他代理华中军分会书记。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5 年 10 月上旬，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6 年 1 月，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7 年 2 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委、华野前委书记。他坚决执行七大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与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华东解放区的军民，在华东战场进行了孟良崮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年秋，率主力一部挺进中原。协同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作战。1948年5月中央决定他赴中原工作，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10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次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三野前委书记。他率部横渡长江，参加了解放南京、上海和东南广大地区的战斗。5月27日上海解放，就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9月华东军大成立，他兼校长。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8月任华东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起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重视知识分子，积极促进发展科学文教事业。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后，为加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党的九大，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党的原则，进行了“二月抗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斗争。他还是一位诗人和理论家，有大量军政论著和诗文存世。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材料　我们世纪的英雄
——纪念陈毅

陈毅，四川省乐至县人，出生于1901年8月26日，是20世纪的同龄人。

现代人已经很难想像20世纪初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怎样屈辱与痛苦的岁月。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清政府的腐朽与媚外，使中华民族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重危机。陈毅在这样的时代度过动荡不安的早年，很小就开始感受社会生活的不平，又从忧患中生长出强烈的济世救民的愿望。他最早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看重个人对于国家社会应尽的责任，向往历代知识分子曾经走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活道路。进入中学以后，他为自己起名为陈毅，字仲弘，这很明显是取自曾子的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大概已经意识到，历史向他们这一代发出严重挑战，也提供新的机遇：在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去实现前辈英雄们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英雄事业；而他没有想到历史的进步将给这一英雄事业注入新的民主、共和、独立、自由、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

1919年8月陈毅从上海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使他进入了新的天地，首先接触到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接着又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在大工厂实际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感情，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者。1921年初，他积极参加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爱国运动，至10月被中法两国当局强制遣返回国。他和他的100多位同志做为青年爱国者经受了第一次斗争的洗礼。

1921年冬陈毅返回国内，适值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他先后在上海、成都、重庆开展社会政治活动，为勤工俭学团体及个人谋求出路，同时也对拯救中国的道路进行慎重的选择。1923年10月他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旋即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曾经回忆说：参加党就是把个人的命运与党所代表的阶级的、群众的、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自身解放事业的组织，而社会主义是中国在20世纪赢得复兴与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样，他就作出了生平最重要的选择，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队伍中坚定的成员。这一选择是他英雄事业的真正开始，他注定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去完成这一辉煌壮丽的英雄事业。

1924——1926年期间陈毅主要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是李大钊领导下的北方党组织中很活跃的干部之一；由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同时也参加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他是群众抗议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经受了第一次白色恐怖的考验。以后受党的派遣，他回四川故乡从事军事运动以策应北伐。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曾提出关于劳动文艺的艺术主张，虽然不够成熟但却不失真率。他还从事过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宽阔眼界。1925年以后，他成为职业革命者，结束了青年诗人作者的创作实践，但同时却又开始了“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的另一种更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学生涯。

1927年，中国革命面临严峻考验。昔日的同盟者背叛革命，把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打入血海。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他们领导工农大众奋起进行独立的武装战争。陈毅在党领导下投身创造工农红军的战斗。3月顺泸起义失败，他躲过军阀追捕，微服出峡，到武汉中央军校任党委书记。7月武汉当局宣布反共，他于8月初赶上南昌起义部队，被周恩来派往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党代表。10月在广东三河坝激战失利后，他与朱德一起领导起义军余部向闽、粤、赣边界退却，成为整个部队的党代表。继发动湘南暴动以后，他在1928年4月与朱德一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革命的巨人们走到一起，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基。

1927——1937 年，陈毅参加红军战争，先后经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的严峻考验。他经常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战在枪林弹雨之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人民的解放洒下了热血。他还在党内斗争中忍辱负重，维护大局，与毛泽东、朱德共过患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曾授予他两枚红星奖章，这是人民给予他在红军创业过程中所建立的功勋的表彰。1934 年 8 月他在老营盘战斗中负重伤，因而未能参加中央红军于 10 月开始的长征。但他却在坚持南方根据地的最为残酷的战斗中为党保存了革命阵地和战略支点。当这一段斗争结束之后，他曾于 1937 年底给自己的亲属写信总结十年征战的历程：“艰难困厄，日夜围攻，毒手尊拳，谁能多让？浴血人生，直至于此，敢谓今人所难至，古人传奇史之所无也。”人们所熟知的《赠同志》、《梅岭三章》等诗作，就是这段浴血人生留在革命史上的绝唱。他的英雄事业在这里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1937——1945 年陈毅参加抗日战争，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他与粟裕首先担负起率领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开辟苏南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使命，把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旗帜插向大江南北。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又一次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一起主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军政大计。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中，大批治理国家的政治干才成长起来，他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一个。1944 年春他应召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后出席 1945 年 4 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期间他参与我党领导核心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共同完成创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工程。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同时也从党的领袖毛泽东那里吸取教益，与全党同志一起走向政治思想上的高度成熟。“八载干戈仗延安”，陈毅的英雄事业随着中华民族向着解放的目标前进而跨越了一个辉煌的阶段。

1945——1949 年，陈毅参加解放战争，为最后完成人民解放的千秋大业而进行决战。他先后担任山东、华东、中原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线战场上进行防御、进攻、决战、追击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他和粟裕一起统率华东野战军连续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然后率部进军豫皖苏，与中原野战军共同实施南线强大的战略进攻，对扭转全国战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8 年 5 月以后，他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核心，致力于南线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战略配合与战役协调，与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一起指挥了胜利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1949 年 4、5 月间，他们又共同指挥了我军渡江作战，直取南京、上海，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迎来人民解放的新时代。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依靠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陈毅终于实现了拯救民族危亡、解放人民大众的愿望，他自己也在这一斗争中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英雄事业因而跃上了胜利的高峰。1955 年 9 月，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是中国人民给予自己的英雄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战争中创建功勋的崇高表彰。

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又踏上新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陈毅先后在上海、华东和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统战等许多方面为新中国的建设作过贡献，他的英雄事业随着时代一起前进。

50 年代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他主要在华东地区承担起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海防边防、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任。担任上海市长的头一年，他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为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军事封锁和经济破坏而从事异常紧张的战斗，终于使上海的工商业以及整个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并按新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改造。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基础就是在这时得到奠定。上海经济的恢复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的艰难创业，而华东的军事建设则保障了共和国的安全。陈毅在上海与华东的出色工作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领导国家的建设事业，同时也向广大人民群众初步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

1954 年 9 月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此他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主要助手。他最初在国务院分管常务、科技、统战、内务等项工作。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并领导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陈毅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表现出极大的创造热情。他曾和聂荣臻共同主持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的制定，为我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勾画了第一幅蓝图。他曾率领阵容庞大的中央代表团乘汽车经青藏公路到西藏去祝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为巩固祖国边疆地区的安定、增强汉藏民族团结而做过有成效的努力。他还曾陪同周恩来总理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在新中国高视阔步登上国际舞台的重大活动中开始接手外交事务。他在紧张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也写了许多讴歌新中国建设的诗篇。他高度评价 50 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并为自己能参与其中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1958 年 2 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由陈毅兼任外

交部长，他的主要活动领域转向国际和外交。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同时拥有元帅军衔和诗人桂冠的外交部长。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他以元帅的坚强毅力和诗人的澎湃激情投身为维护中国的国际尊严和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而开展的斗争。许多周边国家频繁出现他忙碌的身影。他的出访涉及亚、非、欧三大洲，把中国和各国人民友谊的种子播入人们的心田。由于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到60年代又因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受到苏联和它所领导的东方集团的排斥打击，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题是努力打破孤立状态，结成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中国外交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巨人的声望。其间陈毅抵制赫鲁晓夫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倡议中日两国之间开展围棋交流等民间外交往来；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争取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过程中反对苏联插手亚非事务，以及1963年12月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15国等等，都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纪念的篇章。1965年9月他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震动世界的讲话，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以及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自信心，这可以说是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的一次高峰式的发言，他的高瞻远瞩和宏伟气魄在全世界的进步人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陈毅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主要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他也关心国内建设和政治、军事、文化等事务。他在团结知识分子发展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独创性的工作：如发表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支持尖端科学研究的发展；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戏曲改革等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1962年初他在广州会议上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加冕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的主旨是要团结最广大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为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服务。他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智慧，已经为以后三十年间中国现代化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充分证实。

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陈毅的英雄事业又经受了新的严峻考验。他在自己全部斗争生涯中曾多次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因而他特别反对在革命同志之间开展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尽管“文革”初期他并未受到冲击，他也不赞成“文革”的斗争方式。而当这种斗争变成否定党的八大路线，使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斗争的对象，当政治的动乱发展成为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完全否定时，他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奋起抗争，发表了反对“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讲话，这使他被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而蒙受新的不公正的打击。他又一次身处逆境，但他对周围的亲人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因为讲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遭祸，我并不感到后悔。从1967年2月以后，他基本上“靠边站”了，但他仍然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关心保障国家安全的外交事务。在1969年前后他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国际问题，向中央提出有关打开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建议，这是他在逆境中继续为推进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现在，当人们认识到陈毅在“文革”期间所维护的党的八大路线实际上是开辟了历史新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先导，人们不能不为他当年所进行的坚持真理的英勇斗争而感到衷心赞佩。身处逆境而心忧天下，忠诚正直，光明磊落，这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范。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也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他把自己的英雄事业贯彻到了最后的时刻。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短期患病之后不幸逝世于北京。由于是在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陈毅晚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也从回顾陈毅的革命生平中体昧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平凡真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向陈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把陈毅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真正的英雄。他的一首诗因而被广泛传颂，看做是他本人的写照，这首诗就是：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现在已经是陈毅逝世后的第20个年头。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过去20年间又取得长足进展，人们再一次回头审视历史，更多地了解陈毅的生平，将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为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而奋斗一生所创造出来的英雄业绩是何等可贵！

陈毅具有历史上所有英雄人物共有的英雄品格。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毅正是以前辈英雄为榜样，在毕生征战中经受了罕见的斗争考验。他抱着取义成仁的决心团结同志坚持奋斗，“做革命失败时的英雄”，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不居功自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又在雪侮霜欺的考验中保持了“真红不枯槁”的英雄本色。

陈毅又是生活在20世纪的英雄。毛泽东曾说20世纪是新的群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英雄是以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陈毅因而表现出与过去许多英雄不同的特征。首先他来自人民，把人民群众奉为革命者的亲生父母，自觉地坚持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他又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能在

革命遭逢困难的时候为周围的群众指出前进的方向，动员并率领他们为实现自身的解放进行胜利的战斗。他的英雄事业是和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党的队伍中进行革命工作，用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自觉地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把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在他63岁生日写的自述诗中就有这样的警句："人民拥护党，党依靠人民，我是一党员，理应献至诚。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20世纪中国英雄的事业之所以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这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英雄特质。从陈毅身上，人们可以最鲜明地感受到这种新时代英雄的历史特征。

陈毅生前常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人物长期共事看成是自己巨大的荣幸。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进行武装斗争起，他就追随党的领袖并表现出忠诚的品质。他认为党的领袖是阶级的人民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因而要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必须摆正与领袖的关系。他忠于领袖，但并非盲从。在投身革命的早期，他也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对党的领袖进行选择，一旦发现了能代表人民利益的领袖时，他就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及得失，真诚地拥护人民的领袖。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期间，他就经历了对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袖地位由有所保留到竭诚拥护的转变过程，此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在晚年，他发现领袖的意志与群众的利益发生偏离，曾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只针对别人的错误进行批评。对自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发生的认识偏差与行为偏离，要求尤其严格，经常进行彻底的反省及自我批评。对于陈毅这样的共产主义的英雄来说，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服从的历史主义的命令，因而他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及其领袖的深刻尊重，正是新时代英雄的群众观与历史观的鲜明展示。

陈毅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对朋友、同志、亲人的眷恋与真情也为他的英雄形象增添了光彩。以家庭生活而言，他早年写给父母兄弟的家书，中年献给妻子的情诗，以及晚年对儿女们的叮咛嘱咐，都有一种感人的精神力量。在红军战争时期，陈毅曾与江西兴国的妇女干部肖菊英结婚。肖菊英于1933年英勇牺牲。抗日战争开始后，陈毅与张茜在皖南新四军部结识，1940年春在江南指挥部驻地溧阳县水西村结婚，从此组成幸福的革命家庭。张茜1922年6月11日出生在武汉市，从小勤奋好学，热烈地追求光明与进步。16岁那年她离家投奔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在新四军服务团工作。她当时不具备陈毅那样漫长的革命资历，但她自觉地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力求弥补与陈毅在思想文化水平上的差距。当50年代后期张茜随着陈毅一起转到外交战线工作时，他们活跃在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张茜表现出新中国妇女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的风采，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在"文革"中，张茜伴随陈毅渡过了严峻的岁月。陈毅病逝后，张茜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渝生死的忠贞带病整理陈毅的遗稿，编成《陈毅诗词选集》，直至1974年3月20日病逝。她以生命写下共产党人对爱情和事业无限忠诚的诗篇，使陈毅一生留下来的英雄史诗有了一个动人的总结。

与一切英雄人物一样，陈毅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希望对他的介绍变成一种无原则的颂扬或溢美。陈毅本人曾坦然承认自己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犯过不少错误，而且人生有限，任何英雄也不可能完成自己所设想的全部英雄事业，尤其当他们选择的是解放全人类这样宏伟的目标时。陈毅很愿意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向后来的革命者作详尽的介绍，以使后人在革命斗争中少犯类似的错误。在"文革"中他为了说服某些青少年放弃过火斗争，就曾经用自己早年的失误来作苦口婆心的劝说。他在身处逆境中离开人世，因没有能看到民族复兴的伟业走上康庄大道而怀着深深的遗憾，这使他一生的英雄事业带上了某种悲剧的色彩。让他的遗憾变为满足，让英雄的悲剧变成喜剧，这是我们活着的人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作者：陈昊苏）

顾祝同

顾祝同，1891年11月22日出生。江苏涟水县人，家住县城张家巷。幼年时在私塾就读。1908年，入县立高小。1910年，考入江苏陆军小学第五期学习。武昌起义后，他参加革命军，在陆军第九师任排长。南北议和以后，又返校学习，于1913年夏毕业。第二次革命时，调任南京卫戍部参谋，旋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

1917年，他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十二队学习。于1919年毕业后，历任长江上游总部第四旅第七团九连连长；湖南清乡司令部卫队营副等职。1922年冬，他到桂林投奔孙中山，受任为粤军第二军军事教导队区队长，与当时任第二军参谋长的蒋介石结识。该军扩编为东路讨贼军时，顾祝同升任该路军总部副官长。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顾祝同被调任军校战术教官。同年10月，调任军校管理部代主任。

11月11日，孙中山下令组建国民党党军，委任蒋介石为军事秘书。蒋首先成立黄埔军校教导团，顾祝同被委任为第二团第一营营长。

第一次东征时，顾祝同率第一营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作战。他认真执行《告东江人民书》、《告人民同胞书》、《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等文告，军纪较好，人民拥戴。1925

年 2 月 13 日，教导第二团与陈炯明部的叶举、熊略等部激战于淡水城下，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顾祝同率第一营，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的配合下，攻下淡水城，每个官兵都得到学校的赏银三十元。接着，他又率全营参加了棉湖之战，协同主力部队打败陈炯明的主力林虎所部三个师。这年 4 月"孙文主义学会"在广州成立、他立即参加了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

第二次东征时，顾祝同率第一营参加了攻克惠州之战。接着会师安流，参加了潮州、梅县之战，因战功擢升第二团团副，不久升任该团团长。1925 年 8 月 2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将黄埔党军改为第一军，顾祝同调任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旋任副师长，随同军长何应钦驻防潮州。

北伐战争中，第一军第三师编入东路军序列，顾祝同积极协助师长谭曙卿指挥。1926 年 10 月 12 日，率部攻击福建松口周荫人部；接着又击败周军的李宝珩、刘俊部，活促李宝珩，重伤刘俊部而致死。10 月 19 日，他率部迂回永定，激战一天，占领县城。12 月 2 日，进占福州，升任该师师长。尔后，率领所部进军浙江，参加淞沪作战。北伐军占南京后，东路军位于沪宁线，顾部驻防常州。

1927 年 8 月 25 日，孙传芳趁蒋介石下野之机，以七万多人，分三路渡过长江，在乌龙山、栖霞山、龙潭地区向北伐军进攻，情况异常紧张。顾祝同奉命率领第三师向龙潭方向反击，协同其他各师，于 26 日收复龙潭车站，歼敌三万人，迫使孙传芳残部逃至江北，受到上级的表彰。

龙潭战役后，军队实行整编。顾祝同升任第九军军长，下辖第三师（师长涂思宗）、第十四师（师长黄国梁）、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

1933 年 9 月，顾祝同被任命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总司令，进驻江西抚州，直接指挥五个纵队的兵力，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他坚持实行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当时，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遇事越级，直接请示蒋介石；蒋有时也越级直接指挥陈诚和其它各军。他都毫无怨言，对蒋始终保持唯命是从的态度。9 月 25 日，顾祝同指挥所部采取东西对进合围攻击部署，向苏区推进，于 28 日占领黎川县城。10 月 6 日至 7 日，其第六师十八旅在洵口遭到红军第三、第五军团攻击，全旅覆灭。顾祝同闻讯后，立即下令部队，要步步推进，依托阵地作战。

11 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他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镇压十九路军的策略。会后，他下令暂停对苏区进攻，将所部九个师调去福建作战。

1934 年 1 月，"福建事变"解决之后，顾祝同重新部署北路军向江西中央苏区进攻。4 月，他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五十公里的正面上，向广昌逐步推进，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尔后夺占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城。27 日，夺取广昌，继占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一线，使红军和中央苏区蒙受巨大损失。

10 月中旬，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后，顾祝同令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九个师追击。北路军指挥机关改为南昌绥靖公署，顾祝同为主任。他把管辖的地区划分为八个绥靖区。1935 年 1 月，他召集下属的军长、师长部署绥靖计划，要求各部队紧密配合，三个月内肃清留在江西赣南和其他各地的红军，摧毁苏区党、政系统。这年 4 月 3 日，顾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9 月 3 日调任四川行营主任。他定于 11 月 1 日在重庆成立行营，以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继续与红军作战。

11 月 12 日与 22 日，顾祝同参加国民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 年 7 月 18 日，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委员。8 月 2 日，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1940 年初，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华北后，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顾祝同执行蒋的密令，在新四军军部及该军驻皖南部队周围，部署了四个师四万余人的兵力进行监视，形成包围态势。随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是年 10 月 19 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总长副总长名义发出"皓电"的第二天，顾祝同即在长官部的例会上，指定参谋处制定围歼新四军的计划。他强调，执行这个计划要选调战斗力强的部队才管用。当参谋处长岳星明请示增调川军第一四六师置南面防堵时，顾说："一四六师可以调去，但装备差，怕不顶用，不要放在第一线。你再研究一下，应再增调一个师前去为好"。当岳提出调装备好，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第四十师时，他立即说："很好。你就把四十师列入计划，并且要用在第一线。"他还亲自打电话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调第七十九师参加作战；又从浙东调第六十二师到皖南，使进攻新四军的总兵力增加了一倍。他在审定和下达"围攻"计划后，害怕川军不可靠，就把在赣东临川负责指挥对南昌日寇作战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调到皖南宁国，由战区副长官兼该集团军司令的上官云相统一指挥。他听说驻皖南徽州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处长是共产党员，就将其捕杀。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因驻地邻接新四军，与新四军的人员有些来往，顾就将其调离部队。他为保持和重庆的有线电联络，从这年秋天起，在每周两次的长官部例会上，都严令东南电政特派员赵曾珏加快从上饶到重庆的电话线路的施工。在事变前的一个多月，曾三次声色俱厉地斥责赵，并说："如果不按照期限完工通话，你负责，要杀你的头！"这样，线路总算于 12 月中旬开通，保障了他和蒋介石的密切联系。

顾祝同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制造谣言，竭力诬蔑新四军无意北撤，将要“南下”。从11月以来，战区长官部就不断散布“新四军北撤是假，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他经常利用这些“情报”，要求各部队对新四军“严加防范”，做好战斗准备。并三次通令各部加强对皖南新四军的监视和警戒。

1941年1月6日，围攻新四军的战斗打响了。顾祝同严令上官云相转令前线各部队，务必把新四军包围住。又令参谋处迅速把情况上报。1月1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和顾祝同谈判，顾却下令将叶挺扣押起来。1月14日，新四军被围部队终因伤亡过大，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二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六千余人被俘，其余壮烈牺牲。

1月17日，顾祝同把情况报告国民政府军委会，诡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4日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阵地，危害民族，为虎作伥，丧心病狂，我前方被袭部队，对此不测之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日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新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擒获，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

顾祝同为参加这次血腥屠杀新四军的官兵请功请赏，并奖给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第二十五军和上官云相法币各五万元。

在上饶长官部，顾祝同多次宴请叶挺，进行劝降。叶挺指着顾祝同说：“整个民族的生机将要扼死在你们手中，你们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奸徒，你们是多么卑鄙啊！”劝降不成，顾对叶无可奈何，就把叶挺押送重庆。

1942年，日军向衢州发动进攻。顾祝同部没有进行有力抵抗，被日军占去大量地盘，其长官部也仓惶撤往福建，以后才又回到江西铅山。

抗日战争后期，顾祝同升任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官，并指挥第七、第九战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接受了驻浙江日军的投降。9月8日，参加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中国战场日军的投降仪式。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左舜生

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首领之一。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生于1893年10月13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四日）。祖父莘农，前清举人。父子立，为家馆塾师，兼业中医。

左舜生七岁入塾，随父读《三字经》和“四书”之类。1911年冬小学毕业。不久，入长沙新成立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兼习日文。1914年秋，由于得到其长兄的资助，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语，与曾琦、李璜等同学。他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因其长兄失业，失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1917年秋到南京，在同学黄仲苏家任家庭教师。

五四前夜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觉醒，奋起救国。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为团结青年，在科学精神指导下，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即实业和教育），把衰败腐朽的中国改造成青春年少的中国。不久，学会筹备处主任王光祈到南京，介绍左舜生加入了这个学会。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北京学生代表黄日葵、许德珩（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到南京策动学生罢课，左舜生曾与他们一起到金陵大学作发动工作。年末，左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任职，不久任该所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左舜生被推选为学会评议部评议员。翌年评议部主任曾琦出国留学，左接任评议部主任职务，一直到1924年7月为止。

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国内。左舜生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身份伙同他们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报。左任该报总经理，负责发行工作。他经常在《醒狮》上发表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反革命的宣传，叫嚣：“吾人反对苏俄在华宣传共产；对所谓中国共产党之行动，更绝对不赞成”。他还说，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是列强想共管中国的唯一原因。”他把当时以平等待我之苏联与英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恶毒地进行攻击和诬蔑。

1925年春，左舜生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党号谔公。1926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他得到中华书局资助，去法国游学。1927年9月回到上海，仍回中华书局任职。四·一二政变后，青年党与蒋介石在反共、反革命这一点上虽然已经完全一致，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策，因之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没有合流起来。这时青年党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党治”，同时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反动势力大为震惊。左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登载各地的所谓“匪情调查”，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毁灭文化”。还在这个反动刊物上登载《曾、左、李平乱要旨》，详细介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经验”，以资国民党反动派参考，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出谋献策。四川军阀刘湘就曾大量翻印这篇文章，作为军事学校的教本。

1933年5月，根据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政府派人与

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反对和唾骂。左舜生于1934年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时事诤言》，替国民党反动派开脱罪责，说什么：在抗战还没有准备的条件下，主持签订协定的人，处在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已经不大容易。黄郛见到此文，喜出望外，立即邀左到莫干山长谈。同年5月，蒋介石又电邀左到庐山见面。左在上海与曾琦密谋后，于7月上庐山见蒋，陪同前往的还有青年党的重要骨干分子何鲁之。这是青年党头目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1935年春夏之交，左应邀到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时间长达七个学期之久。由于左舜生对沟通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功，在当年7月召开的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37年初，左舜生陪同曾琦前往奉化面见蒋介石，长谈两次，进一步讨论了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设立国防参议院时，左以青年党代表资格被聘为参议员。1938年4月21日，左以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表示竭诚拥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4月24日，蒋、汪复函左舜生，称：“本党念职责之艰巨，尤望集中全国贤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日之艰危，而谋国家之远之福利。”至此，青年党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同年，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废国防参议院，成立国民参政会，左亦以青年党代表资格被指定为参政员。在武汉期间，左还创办了青年党的报纸《新中国日报》，一度任经理。

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党仍坚持其反共立场，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义行动。左舜生在一届三次参政会上就曾发表过攻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言论。这时候，青年党虽然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仍未得到官职，因之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有所不满，声言要求“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其一党专政，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时，青年党参加，左舜生任秘书长。1945年7月，左随黄炎培、章伯钧等到延安参加访问，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及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青年党与国民党秘密勾结，在名额分配上提出无理要求，企图以此来分裂和破坏民盟，结果被赶出民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舜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6年1月，左作为青年党的“东南党务复兴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飞往上海，恢复东南地区的青年党组织，并在上海创办青年党的报纸《中华时报》。11月16日，左以宣传部长名义，代表青年党宣布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伪国民大会，左本人亦作为青年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伪国大。1947年4月，青年党终于撕下“在野”和“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国民党反动政府，左出任农林部长。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全国胜利前夕，左舜生于1949年4月逃离祖国大陆，在香港创办反共刊物《自由阵线》，并先后在香港新亚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1969年9月到台湾调解青年党的内部矛盾，同年10月16日病死于台湾。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热烈的延安五月第一周

从“五一”起，延安各机关放假五日，学校放假十日。

五月一日，大风砂微弱。

这是工人的节日，世界的劳动者都热烈地欢迎着它。

在揭示牌上公布着今天的节目：上午艾思奇在文化俱乐部主讲“五四的哲学”。下午延安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五一”群众大会。晚间八路军大礼堂上演《铁甲列车》（青救总剧团演出）。文化俱乐部举行音乐欣赏晚会。

“五一”展览会，内容有各种照片，统计图表，设计图案，生产成品，工人墙报等类。参加展览的工厂有难民纺织厂、农具工厂、制革厂、振华造纸厂、新华化学厂、中央印刷厂、总政印刷厂、光华制药厂、八路军制药厂、通讯材料厂、机器厂等二十余个单位。

在边区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建立这些工厂，并且能够创造出惊人的成绩，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

在大会上，工会主任宣布：“今年五一生产大竞赛的结果，不仅增加了生产数字和进度，而且创造了二〇七个劳动英雄，涌现了五十余位生产工具的创造家与改良家。”

为什么会得到这些成绩呢？一个劳动英雄说得很清

楚："政府是咱们自己的，工厂是咱们自己的，咱们有民主，有自由，生活学习都有保障，咱们的劳动热忱就自然提高了……"

五月二日，上午晴下午刮风。

今天的活动日程是：上午马相有在桃林公园报告新疆喀什地方生活。下午范文澜在文化俱乐部主讲"五四与反国故"。晚间，八路军大礼堂上演《雾重庆》(陕公文艺工作团演出)。中央大礼堂鲁艺评剧团公演《空城计》，《落马湖》，《出塞》，《打渔杀家》。

五月三日，晴。

今天公布的活动是：上午九时谢觉哉在青年俱乐部报告"边区民主选举运动"。同时，马寅初在桃林报告"回民生活"。下午二时，各机关学校少年队在桃林举行歌咏、讲演、朗诵童谣比赛。晚间，中央大礼堂开保育卫生晚会，节目有健康表演(延安体育会)，舞蹈(女大)，两条阵线的斗争(中央医院)，《公主旅行记》(少年剧团)。八路军大礼堂演《甘露寺》。

早饭后和朋友到桃林游玩，桃林现在已经建成公园了，就是茅盾先生在《风景谈》(《文艺阵地》第六卷一期)一文中所提到的那个地方，是延安胜景之一。

据该园主人说：每天从太阳出到黄昏，男女游客不下千人。

五月四日，晴，天气闷热得很。

本日节目：上午九时艾青在文化俱乐部主讲"五四诗歌"。同时，青年体育场举行刺刀、刺枪、打花棍、武术等各种表演。下午四时开"五四"纪念大会。晚间八路军大礼堂演《铁甲列车》。边区大礼堂延安业余杂技团首次公演，有武术、魔术、杂耍等节目。

今天青年文化沟和北门外总政前面一带，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大有陕北赶"庙会"的盛况。

下午开纪念大会，到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约六七千人，最活跃的是青年队，他们互相比赛，拉破嗓子地唱着"五四"纪念歌。

晚间，本来准备看《铁甲列车》，然而，因为参加一对爱人的婚礼就没有去，据说从"五一"到"五四"，结婚的男女青年不下二十余对。

五月五日，上午晴，下午大风。

本日活动：上午九时光华农场的农业专家范粹农报告"陕北农村问题"。下午二时潘占云在桃林报告"夷民生活"。南门外大操场开运动会，表演骑术。晚间，边区大礼堂演《雾重庆》。青年体育场边区剧团公演《李秀成之死》(秦腔)。

各县来开会的工人，今天就要回去了。他们得到劳动英雄的奖章，一个个高兴极了。带着愉快的精神回去，继续埋头于一九四一年边区的经济建设，他们将创造出比今年"五一"大竞赛所收获的更伟大的果实。

"五五"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马列学院开会纪念他。下午开延安世界语者茶话会。

五月六日，天气炎热，如南方的盛夏。

今天排定的上午九时扎喜在桃林报告"藏民生活"。同时青年体育场篮排球锦标赛。青年狩猎队赴劳山打猎。晚间，八路军大礼堂演《铁甲列车》。新市场商人俱乐部民众剧团演出各种秦腔地方戏，如《小放牛》、《回亲家》、《查哨》等。

天还没有大亮我就起床，早饭后带上干粮和鸟枪，和着狩猎队的同志就向劳山出发了。

这里是森林最繁茂的地方，在冬季，延安各机关都派人到这里来烧木炭。现在是一片葱绿色盖住了山岗，到达这里，精神为之一爽。

我们七个人分三组出发，规定午后二时在原地集合，留一人看守东西。结果：第一组打获两只野鸡，第二组打获三只野兔，第三组空手回来，我也是第三组的，人们都笑我不行，还险些儿跌坏了腿呢！

五月七日，天色灰蒙蒙的，刮风砂带着细雨。

本来今天上午是实弹射击，下午刘卜在桃林报告"蒙民生活"，晚会节目同前，桃林还准备举行露天跳舞晚会。然而，因为风砂和雨，室外的活动改期了。

晚间，带着细雨，看《铁甲列车》，今天是上演的第五天了，然而，看的人依然挤得水泄不通，去得迟一点，简直找不到空位安身了。

出了剧场，一位小鬼对我说："那位农民领袖(华西里)真勇敢，要不是他带头(领导)铁甲列车就夺不下来了……"一般人对于华西里都给以莫大的同情和赞扬，其实，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也出现了不少的华西里呢！

朋友，我要说的话，准备就在这里带住了，然而，这只是我所见所闻接触的最小的一部分而已——就算作十分之一吧，那么还有十分之九，我是无法使你知道了，这不能不是一个大的缺憾！(海佛)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题词和挽诗是怎样刊登出来的

1941年1月14日，当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参加庆贺该报创刊三周年并在会上讲话时，中共南方局机要人员给他送来一分关于皖南事变消息的电报，他当即勉励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第二天，《新华日报》最早透露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就是引述周恩来在庆贺《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会上讲话中插了一句话："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敌寇重重包围。"使用"敌寇"二字是一种临时处置，这二字一般是指日本侵略者，借用来

指称国民党反共顽固军，既可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又表达对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刽子手的无比仇恨。

蒋介石集团干了这桩血腥罪行之后，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等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1月18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说明事变的真相和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方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整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坚决地抗击了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在国民党统治区，兼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皖南事变后，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领导《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向国民党进行尖锐的斗争。

1月17日，周恩来得到国民党的反革命命令消息后，立即给何应钦打电话提出严重抗议，并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那里，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并同叶剑英在红岩村召集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开会，分析当时形势，研究了《新华日报》如何进行斗争，派潘梓年、石西民到重庆几家同《新华日报》关系较好的报馆说明皖南事变真相，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新华日报》写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押，1月17日夜晚，周恩来亲笔写了"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准备刊登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午夜过后，编辑部才拿到周恩来写的手稿，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此时还赖在报馆坐等检查第二天出版的报纸。

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在当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新闻报道，报馆决定拒检直接见报，以强硬态度，给反动派一点颜色看看。为此，报馆由章汉夫、石西民与国民党检查官周旋。据石西民回忆，章汉夫与那个检查官有这么几句对话：

章汉夫："你们以为检扣了《新华日报》揭露围歼英勇抗日的新四军的真相的新闻，不准刊登，就可以一手遮天，人民就不会起来反对你们了吗？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明天的报纸可以不登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但是这种倒行逆施的勾当如果不坚决制止，休想不受到惩罚。你们干的罪恶勾当，快要人神共愤了！"

检查官："章先生，咱们是为了公事。我办完了就走，我无意来同你们吵架。哈哈。至于说新四军嘛，不听中央命令，总是不对的吧！"

章汉夫："新四军奉我党中央命令北撤，有什么不对？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才下得了围歼一支抗日军队的命令。究竟要听什么命令？你说！"

检查官："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的新闻，那就好了。"

章汉夫："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也休想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就这样，我们说过的话算数。不登就一定不登，你去罢，半夜三更待在这山沟里干什么？"

检查官："好！好！好！不登就好，大家都好。我再坐一下，等报纸出来了再回去。"

章汉夫："还不放心？共产党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检查官："唉，唉，没有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嘛！"

章汉夫："你这样卖力，大概可以受奖升官了吧！"

检查官："哦哦哦，好说，好说。"

为了刊登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版面先发两篇同木刻题词挽诗一样大小的稿子，待检查官以为"平安无事"离开后，就换上木刻大量印刷。天蒙蒙亮，大家便分途把报纸送出去。清晨六点多钟，《新华日报》已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送到订户家中。等到别家报纸出版，人们早已看过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在议论纷纷了。

（选自《大江南北》作者：祥子）

威武不能屈
——叶挺在蒋介石劝降后追记的谈话记录

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无理扣押，此后，被押往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囚禁长达5年零两个月。其间，蒋介石、陈诚、顾祝同多次劝降，要他发表反共声明，就任国民党高级军职，都被叶挺严辞拒绝。在上饶李村的墙壁上，他写下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名句。

1941年7月，叶挺被押往桂林，囚禁在七星岩的一个山洞里。1942年1月，又被解往重庆。5月12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见叶挺，进行劝降。叶挺自被捕后，就一直以新四军全体将士的释放作为他理发修面的条件，并以此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在蒋介石的"赐见"之前，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要叶挺理发。叶挺说，"我的须发已蓄了一年多，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修理，我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

在与蒋介石唇枪舌战之后，叶挺整理了一份文字材料。这是叶挺为向党中央汇报而专门作的追记。他以甲（即蒋介石）乙（即叶挺自己）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两人之间的谈话。以"同日　同日　同日　"代表新四军，以"同日　同日　党"代表共产党。文中的"三人"就是蒋介石、叶挺和国民党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

下面就是叶挺记录的全文：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八时半

甲步入客厅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还好。

甲：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对同日　同日　同日　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去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即期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了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期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同日　同日　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

乙：如果这样说，同日　同日　同日　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共产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同日　同日　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还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叶挺亲笔写下的这份记录，是他讨伐蒋介石的又一篇檄文。它如实地反映了叶挺对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反映了他敢于在这个太岁爷头上动土、敢于蔑视他的淫威；也反映了他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立场始终如一。它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井，消灭异己，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有力地驳斥了蒋介石对新四军的诬蔑。同时这份记录也表现了叶挺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

由于叶挺拒绝了蒋介石的劝降，被关进重庆军统局中美合作所的黑暗囚室里。在那里，他吟成了那首遐迩闻名的明志篇《囚歌》。

(选自《党史博览》95年2期，作者：刘明钢)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叶挺在上饶集中营斗争事迹片断

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中，叶挺奉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新四军党组织负责人梁朴(即饶漱石)命令下山谈判。当时，叶挺考虑再三，表示：我军目前失败，尚无谈判条件。何况本人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党10年，惨痛教训应深刻记取。余言之意，表示宁可与将士共存亡，而不愿与敌人讲和。梁朴仍反复劝说叶挺下山谈判，并最后声明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于是，叶挺才勉强接受下任务。下山前，叶挺回头对梁朴声明：我此次下山谈判，是服从党的决定，也是经过你同意的。14日晚，叶挺及随行人员7人抵敌军108师师部，即被扣押。17日，叶挺被由皖南押解至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上饶。

押送专车抵饶后，叶挺被囚禁在皂头李村的原三战区副官接待室。这座房子设在村头，孤零零的与其它房子相隔甚远，四周布满了担任看守和警戒的特务、宪兵。叶挺独处一室，常以赋诗练字排遣心中的忧闷。几天后，当他听说同车押来的随行人员被关押到阴暗、潮湿的七峰岩岩洞监狱，勃然大怒，立即要求与他们见面。敌人答应了叶挺的要求，让随行人员到李村叶挺囚室与叶挺相见。叶挺见到几位随行人员，听了他们的汇报，严肃地说："你们年轻幼稚，要小心，不要充当别人的说客。几位随行人员，抬头见叶挺书写的悬挂在墙壁上的条幅："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雀然无声，对叶挺的高尚品德更加崇仰。

自叶挺关押到李村后，这座原先僻静的小村顿时变得热闹喧嚣起来，各种人物穿梭来往，借口久仰叶挺盛名，要求谒见。但来者大都是给叶挺透话的，说来说去始终不忘"劝降"的宗旨。面对形形色色的"透话者"，叶挺一言不发，自顾不停地吸烟。弄得说客们无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一次，叛徒赵凌波(原新四军参谋处长)厚颜来见

叶挺，没等赵开口，叶挺愤怒地操起耳边的茶壶向他头上仍去，吓得赵从此再不敢来见叶挺了。

将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敌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借叶挺与副司令长官兼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保定陆军军官同学的名义，邀请叶挺到长官部赴宴。叶挺走进大厅，威严地在太师椅上坐下。他想起军部开拔过江前，夫人李秀文用海外资财购置了一批枪枝准备送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路经上饶被宪兵扣押，他闻讯后驱车策马，日夜兼程，赶到这里怒斥三战区长官无理扣押枪枝和故意拖欠新四军补养的情景。不想时过境迁，今天又重返此地，便陷入沉思之中。顾、上官二人借机寒喧客套一番，言归正传，流露出重庆方面蒋介石电函大意：叶挺本人若能发个声明，宣布新四军违犯军纪，将许以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要职之委任。叶挺闻言拍案而起，历数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战绩，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制造事变，破坏抗战团结之罪行。并斩钉截铁地说："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一席话，说得顾、上官二人脸红耳赤，哑然无言。散席后，叶挺给蒋介石发出一封快邮代电稿，要求组织军事法庭判决，并仍明令公布，使全国人民知道皖南事变真相；要求将被俘新四军人员"概予释放，复其自由"，表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坚定地表示"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相而入地狱"。代电末一句："临电泰然，心地光明"。

7月某日，三战区长官部来人说蒋介石"请"叶挺到重庆去。便将叶挺秘密转押到上饶西山监狱，然后由湖北转押到桂林。从此，叶挺开始了他更加漫长的铁狱生涯。

（选自《党史文汇》91年9期，作者：余甘云，任燕平）

皖南事变后陈诚看管叶挺

叶挺和陈诚都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叶挺大陈诚两岁，也比陈诚早两年入保定军校。

北伐战争中，叶挺先后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和第二十四师师长；陈诚也有相似的经历，先后担任第六十三团团长、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他们的地位相当。不过，就对北伐战争的贡献和社会影响来说，陈诚远不能与在"铁军"中指挥作战的叶挺相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与叶挺在武汉同时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时，他们的地位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陈诚则是统领4个军又7个师的武汉卫戍总司令。

时代的烙印，使陈诚与叶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扣。

陈诚对事变的结果感到高兴、庆幸。但是，他对叶挺军长又十分敬重，向蒋介石请求不要杀害叶挺，由他担保。

1942年春夏，叶挺被囚于重庆林森路望龙门22号，他为了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发不剪，须不修。

一天，已经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来到叶挺的住处。

一个是满面春风的将军。

一个是须长发乱的囚徒。

"希夷兄，何必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呢！"

"一个囚徒，还能有什么好样子？"

"我已经在委员长面前保了你，随我到六战区去屈就副司令长官吧。"陈诚的话，确有几分诚意。

"我除了仍旧去担任新四军军长外，别的什么职务也不会担任。"叶挺倔强地说。

"你这样固执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陈诚的话，又是劝解，又是批评。

"我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你们袭击抗日的新四军，这对国家和民族又有什么好处呢？！"

水火不容。陈诚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天，陈诚再次来访。他要继续进行昨天没有完成的任务。

"希夷兄，你有什么话想对委员长说吗？"陈诚终于抛出了谈话的主题。

"没有。"叶挺毫不犹豫地回答。

"如果他想见你呢？"

叶挺开始沉思。从蒋介石对新四军和对自己的伤害来看，没有什么见面的必要；但是，自己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见见面，去碰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于是，叶挺坦然地答复陈诚：

"好吧，尊君旨意。"

陈诚喜出望外，随即又补充了一句话：

"兄既同意见委员长，还是把面容和衣服整理一下吧！"语调已近乎恳求。

"就按我本来的面目去见他，何必改装修容？"

"希夷兄，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如何敢领你去委员长那里！"

"既然如此，那就听便吧！"叶挺不想再为难陈诚，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叶挺整装修容后，他们一道登车来到蒋介石住处。

他们在客厅里坐不多久，即听卫兵大声呼唤："委员长到！"

陈诚立正报告。

叶挺也离开座位，略行礼仪。

"你知道错了吗？"蒋介石坐下后，即大声对着叶挺说。

"我没有错。"叶挺坚定地回答。

"共产党目无政府,目无领袖,不服从军令,以至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惨祸。"蒋介石用他那浙江官话,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当然,新四军的问题在共产党身上,你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嘛。"

蒋介石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你是一名将才,现在抗日,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准备派你到六十二军去当军长,或者到新编二十二军去也可以。"

"委员长,现在我还没有自由,囚徒怎么能去当军长呢?"叶挺冷静地挖苦说。

蒋介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弄得十分尴尬。

陈诚赶忙起立立正,大声说:

"报告委员长,我们回去研究委员长的指示,改天再来复命。"

说完,陈诚便拉叶挺离开客厅,把他送回住地。

这以后,军统便把叶挺从望龙门 22 号移到歌乐山山腰一个叫红炉厂的小村子囚禁起来,一切优待都被取消。

1942 年底,陈诚又作了一次努力。他再次向蒋介石请求,让叶挺住到湖北恩施来,以便由他就近"规劝"。

恩施是陈诚的天下。

叶挺到恩施后,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

陈诚让他在省政府里挂名"高参"。他可以到办公室看报、喝茶、下棋,也可以随意回寝室休息。

夫人李秀文和女儿扬眉被从桂林接来恩施,同叶挺住在一起。每逢演出节目,还让叶挺夫妇坐在前排中座。

陈诚告诉叶挺:

"现在正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候,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已关照民享社,在生活上和物质上给你以特殊照顾。"

"谢谢,不需要。你们的省银行行长周苍柏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负责我的生活费用,日后如数归还。"叶挺表明了自己的志节。

好在周苍柏正好被陈诚委任为兼"物资供应处"经理,叶挺所住民享社东门招待所亦在他的辖下。叶挺的生活费用,究竟是周苍柏私人垫付,还是由陈诚指示在民享社中报销了,不得而知。看来,叶挺的志节和陈诚的关照,都是事实。

1943 年 6 月下旬,《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趁参加鄂西慰问团之机,奉周恩来指示,去恩施看望叶挺,向他通报国内外形势及有关中共营救他的情况。

这时,叶挺与夫人、女儿已经移往恩施西郊朱家河。

陆诒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面交陈诚。陈诚阅信后,爽快地说:

"希夷兄一家就住在恩施西郊,你要去访问他,这不成问题,我会派人带你去。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宽心。"

谈完话,陈诚即派副官陪陆诒驱车赴恩施西郊与叶挺会面。当叶挺留陆诒吃午饭时,副官便告辞离去。这说明,陈诚对叶挺的监视还是宽松的。

叶挺从 1942 年底移住恩施,直至抗战胜利,中间除了有几个月又被押往桂林外,一直住在这里。

陈诚让叶挺长期住在自己身边,固然有劝降的用意,但在恩施的境遇,毕竟比关押在其它地方要好。

历史记录下了这两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将军,在清江岸边微妙而复杂的一页。

(选自《党史纵横》,作者:宅魏,德英)

"将军妙语绝人间"
——陈毅的幽默

列宁说过:"幽默是一种优美、健康的品质。"幽默的语言不仅具有愉悦、美感和启迪教育作用,还有讽刺批判作用。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文韬武略,才华出众,谈吐机敏,风趣幽默,恰如赵朴初先生所感赞:"将军妙语绝人间!"

讽敌人

对于敌人以及不怀好意的人,陈毅善于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或旁敲侧击,或含沙射影,向对手发起进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在此期间,陈毅作为我方全权代表到大余县政府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陈毅借题发挥说:有一个问题我很不满意,以前中央苏区的时候,你们悬赏买我的头,花红由三千涨到五万,朱毛长征以后,由五万降到二百,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对方在陈毅的凛然中透出的幽默天才面前,只能诺诺连声,暗暗叫苦而无法作答。

1962 年 7 月 23 日,在有 14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十四国老挝会议"的全体会议上,陈毅发表讲话,除了对会议成果作出积极的评价外,还讲了要警惕有人(显然指美国)破坏协议。第二天,陈毅见到了他的谈判对手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哈里曼说:我对你讲稿的头二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陈毅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讲了两页你们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这位老资格的美国外交官被陈毅一番嘲讽,无可奈何地表示,他们美国的事情有些难办之处。

战困难

在艰难斗争环境中，为了坚定广大干部和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陈毅总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幽默感，因而，笑声总是荡漾在他的周围。

在从江西突围到赣粤边时，游击队战士爬上了仙人岭后，头朝广东，脚朝江西，在敌人头顶上呼呼地睡了起来。陈毅见此笑着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一句话，使同志们在舒畅的笑声中，驱走了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

1939年的一个风雪交加之夜，部队转移到一个山村。同志们找到一个土地庙，让陈毅司令员住，可是陈毅不见了。同志们找来找去，最后在羊圈旁找到了他。但他已在羊圈旁支好了一张铺。同志们觉得过意不去，陈毅却爽朗地笑了起来，说：革命还没胜利，我陈毅倒先住上"羊房"(洋房)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在下着鹅毛大雪的一天，部队转移到一个新区，战士们又冷又饿，都想早点进屋休息。可是村里没有一家开门，有的战士便埋怨起来。这时陈毅讲话了，他说，同志们又冷又饿，想早点进屋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这儿是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怎么能埋怨他们不开门呢？大家都可以在草堆旁休息，拿点稻草盖盖我看也不错，金丝被(指稻草)压鹅毛毯(指大雪)，蛮安逸嘛！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天亮后，还有许多同志抱着双膝"团"在墙角睡觉。陈毅对着一个冻得缩成一团的通讯员笑着说：小鬼，你也当"团长"了，有这么多"团长"，我们还愁打不走鬼子吗？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一年，在青黄不接的4月，部队来到一个圩，圩里村上10家有8家锅底朝天，陈毅和战士吃的是大麦粥。开饭时，陈毅捧着大麦粥，连吃了3大碗，风趣地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吃到了大麦粥，回到皇宫时还想吃，可御膳房做来做去，他总说没有乡下的那碗"珍珠"汤好吃。你们可别看轻了大麦粥，这可是连皇帝想吃也吃不到的啊！战士们都乐得笑起来。

述道理

无论是在集会上向听众宣传道理，还是在灯光下与朋友促膝谈心，陈毅都善于将他要表达的观点和道理包含于幽默之中，寓理于趣，寓教于乐，让人在欢笑之余有所领悟。

60年代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十几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们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个"脱帽礼"具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它不仅显示了陈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支持和热爱，而且表示了党对知识分了过"左"政策的纠正。这幽默诙谐而寓意深刻的语言和动作，使会场听众为之动容，长久地回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记忆之中。

送"忠言"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常因良药苦口而不肯吃，忠言逆耳而不愿听。能不能想方设法，使良药甜口，忠言顺耳呢？答案是肯定的。幽默的批评，就是甜口"良药"，就是顺耳"忠言"。陈毅就很善于巧送"忠言"。

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上海曾发生一起因某些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使一位老教授投河自杀未遂事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干部。事后不久，在一次高级知识分子聚会上，陈毅一到会场，就关切地询问这位老教授来了没有。老教授应声站起来，心中惴惴不安，惊魂未定。谁知陈毅哈哈大笑，一边热情地请他落座，一边风趣地说：我说你呀，真是读书一世，糊涂一时，共产党搞思想改造，难道是为了把你们整死么？我们不过想帮助大家卸下包袱，和工农群众一道前进。你为啥偏要和龙王爷打交道，不肯和我陈毅交朋友？你要投河，也该先打个电话给我，咱们再商量商量嘛！当然啦，这件事，主要怪基层干部不懂政策，怪我陈毅教育得不够。顿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笑声和掌声。要自杀，哪有事先告诉别人和别人商量的呢？陈毅故意用了这样幽默的话，有助于增强亲切感，有利于解除对方的思想顾虑，放下思想包袱。这样既照顾了知识分子的面子，又点明了问题，使大家在笑声中受到了教育。

守机密

在社交场合，特别是在外交活动中，在答问时，难免碰到国家机密问题。这固然可以"无可奉告"来拒绝作答，但这样会显得不够礼貌，有时还会引起对方的猜疑。陈毅碰到这种情况时，往往是用幽默的语言，巧妙地闪避。

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在招待会上突然问陈毅：中国最近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用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动作，告诉记者：我们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这个巧妙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记者们无不在笑声中被陈毅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但又守得机智巧妙的本领折服了。

1965年国庆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位外国记者企望陈毅披露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情况。陈毅笑道：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你们等

着看公报好了。说到这里，场内笑声迭起，记者们无不钦佩陈毅回答问题的妙语谐趣、机智严谨。

脱窘境

人生在世，有时难免被尴尬的事物缠住或陷入窘境。陈毅碰到这种情况时，往往借助幽默的语言，不但巧妙地从尴尬的局面或窘境中摆脱出来，有时还为自己的形象塑造上添上光采的一笔。

青年时代的陈毅，有一次到亲戚家去作客，进门后看见一本自己想读的书，立即躲到一个空房间里专心地读起来。亲戚几次催他吃饭，他仍舍不得将书放下。亲戚只好把刚蒸好的糍粑和糖给他端去。他边读书边吃糍粑，蘸糖的时候却把手伸到砚台蘸上墨汁往口里送。有人见他满嘴都是墨，便喊来亲友看奇景，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陈毅明白过来，乐呵呵地说："好啊，我正觉得肚子里墨水太少哩。人要多喝点墨水才行。"

60年代初，外交部长陈毅访问亚洲某国。在当地的公众集会上，一位宗教界的长老代表万民众僧向陈毅敬赠佛像。立时万众瞩目。陈毅高高兴兴地双手接过佛像，大声说：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一语引得笑声如雷。

在当时那种场合，陈毅如果不接受佛像，势必伤害对方的感情，影响了双方的关系。但是，如果毫无表示地接受佛像，又很可能被人歪曲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不再坚持无神论原则了。陈毅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幽默的语言，改变了接受佛像这一行为的宗教色彩，同时赋予某种积极意义，十分洒脱地摆脱了窘境，显示了自己高超的说话技巧和外交艺术。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批红卫兵要批斗陈毅，想进行武斗。陈毅却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大圆圈说：现在画圈为界，你们都不要进这圈内了，因为你们都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一进来不也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弄得红卫兵哭笑不得，不敢越雷池一步。

添友谊

在日常生活中，陈毅善于以幽默的谈吐，增进与同志间的友谊。

1955年9月27日，包括陈毅在内的10大元帅在接受毛泽东主席代表党和人民授予元帅军衔和金灿灿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之后，在休息室里，老帅们海阔天空，谈笑风生，由陈毅带头合唱了一曲幽默的凯歌。陈毅问贺龙：元帅阁下，当初你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贺龙回答说：元帅？我连这打的第一枪也未想到，我只想怎样打好这一枪。叶剑英插话问陈毅：要是叶军长还在，贵军——新四军就会有两位元帅了，不是吗？陈毅在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严肃的口气说：不！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这10大元帅中，有两位叶帅倒是真。当周总理走向老帅们时，陈毅故意幽默地向他敬个军礼：周副主席！叶剑英却叫他："我们的总参谋长。"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总理听了，边仰天大笑边摆手说：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陈毅喜欢打网球，水平不高，但喜欢和高水平的人在一起打。他曾诙谐地对人说：岁数大了，跑不动，喜欢玩，又喜欢赢。怎么办？只好找高水平的一起打，你走到哪里，他都能把球打回你面前，把主动权送给你。

正是由于陈毅在日常生活中谈话富有幽默感，所以与他共事的同志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陈毅和蔼可亲。

（黄子云，《党史文汇》91年12期）

爱侣良师益友
——彭雪枫与林颖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许多话题都已成为古老的故事，不变的是人世间的情与爱。读《彭雪枫家书》就有这种感觉。

彭雪枫与林颖，这对在淮北抗日烽火中相识、相恋的恩爱夫妻，只度过了长相思，短相聚的短短3年，却用忠诚、理解、互敬、互助对爱情的涵义作了最好的注解。今天读来，仍让人为之怦然心动。

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

1941年的金秋时节，洪泽湖波光粼粼，几株垂柳在黄昏夕照中随风曼舞，四周寂无人声，这是喧嚣的战争环境中的一块平静处所。

湖边，一对青年男女正在漫步轻谈，这就是彭雪枫与林颖的第一次约会。

彭雪枫，这位"德才兼具、智勇双全"的军中"俊才"，是河南镇平县七里庄人，生于1907年。18岁那年，他加入了共青团。次年，由团转党。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长征。抗战开始后，任新四军游击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开赴豫皖苏边区，创办了《拂晓报》，组建了拂晓剧团和"骑兵团"。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驰骋于淮北战场。这一年他34岁。

林颖，湖北襄樊人。从小性格活泼、倔强，富有奋斗精神，家人称其是具有男子气度的女子。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她决心跳出旧式家庭，做新时代的新女性。在学

校里，她参加游行示威，演文明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久便入了党，武汉失守后，她在国统区从事救亡活动。1939年春，她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在确山县竹沟镇开办的党训班学习。随后，奔赴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主要从事地方妇女工作。在此，她与彭雪枫相识、相爱。

彭雪枫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挚爱自己的妻子，但更爱党、爱革命事业。他希望妻子与自己相亲相知，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

婚后不久，林颖的生日到了，彭雪枫挑选了一份别致的礼物——《斯大林传》，他在书扉页上题词："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在书信中，他又深切指出："我所期望的殷(颖)，是热爱她的爱人，而同时更热爱着党。""林与枫应保持着党的正风和浩然之气，要在政治家的风度上表示共产党人之伟大。""我们永远和谐的为革命事业奋斗！……深深关爱、殷殷期望，均凝聚于其中。"

"共产党员家还是要的。"然而"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处多"，在战争年代，离别是那么频繁，相聚又那么短暂。

新婚才3天，他们就匆匆分别，回到了各自的战斗岗位。

结婚3个月，两人相聚还不到一个星期。然而他们并不因之怨尤，因为"这是为了工作"。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要出世了，年已30多岁的彭雪枫充满初为人父的喜悦。可是，他却无法抽身亲临照料即将分娩的妻子、看一眼期盼已久的骨肉。他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是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他便很难完整地属于那个温暖的家。除了用自己每月的保健费、稿费买些鸡蛋、苹果、衣物托人捎去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夜半写信：

"在异常紧张的时日中，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以至忧虑着你以及那尚未出世的或者业已出世的孩子！这是我们结合以来遭遇到的第一个灾难，这灾难是党所预料而早已指出的，然而在灾难中又加上我们的而主要是你的额外负担，惊忧之中怀着孩子，尤其是将生而未生以及生下而又未满月之时，我日夜为你分心，不胜焦灼！但愿你身心安全，不再有不如意的事，我甚至为你祷告了。……"

一个多月后，彭雪枫喜知这个孩子顺利出生，却抽不开身去看一眼，抱一抱，亲一下。不久，孩子不幸染病夭折，他终于未能见到一面，这种遗憾与内疚是刻骨铭心的。后来，他因公顺路，曾特意去寻找孩子埋葬的地方。可见，他对孩子的感情之深。

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强烈的，即双方的性格和气质虽然不同，却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历史目标，一个宏伟的远景而生活。"这一点在彭雪枫夫妇身上得到很好体现。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我俩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伟大的爱！"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的、人民的，连自己的生命也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征途中，他们的心贴得愈来愈紧。

我们是愈久愈了解，情爱愈浓厚

彭雪枫与林颖于1939年秋相识。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坦率的、负责的。还在认识之初，彭雪枫就抱定"我应当坦白的暴露我的一切，而尽可能的做到不求掩盖"的态度，他请求林颖不要"情人眼里出西施"，诚恳地要求她："你必须还要了解我的另一面，急躁、激动，工作方法上之不够老练，对人对物有时过于尖锐，使人难堪，对干部有时态度过于严肃，加上某些场合下的不耐烦，使人拘束，涵养不到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实行自我批判自我斗争，而同时请求你在更接近更了解的情况下帮助我去纠正的。"并冷静地分析对方："对于你，聪明、豪爽、忠诚、多情、不怕危险困难而忠于党，这是好的一面，优良的一面。可是在另外的一面，高傲、虚荣心，——象你所说的，再加上还欠切实，正是你的缺点，却需要你来克服的。"

随着了解的加深，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加深。然而，林颖当时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她为能有雪枫这样的人作伴侣而感到欣喜；另一方面，她又担心和一位负责同志结婚，会影响个人事业的发展，这在她是十分痛苦的。因为她是求自强自立才走出家庭，并准备干一番事业的。对此，彭雪枫十分理解。他诚恳地对她说："中国人民在反动阶级的长期统治之下，饱受三座大山压迫之苦，而妇女更受几千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生活在最低层。应该说，中国妇女是革命的积极因素。你要求在谋民族解放的同时，为妇女解放多作贡献，你的良好愿望我是理解的，你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为了实现革命的共同目标，我们结婚后，我会尊重你的独立人格，你放心好了。"

1941年9月24日，他们在半城大王庄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他们因了解而结合，也因结合而愈益了解。

婚后第3天，妻子便要离开他到更远的基层去工作。尽管彭雪枫多么想挽留妻子，哪怕再多待一天。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所想的并不仅仅是夫妻之情。在给妻子的信中，他直抒胸臆："女人应有其独立人格，更应有其培养独立人格的场合和环境。即便结婚了，我还是主张你应有独立的工作环境，我无权干涉你，也不会干涉你。""对于培养和帮助我所心爱的所敬佩的终身伴侣，我是早有一个腹案的，那就是为着我们将来的事业……，必须离得远些，才不妨碍彼此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必须更下层些，才能锻炼一个更有力更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女干部来！我所要求的是这样的有信心、有眼光、有志气的终身伴侣，而决不是依恋于温情的梦中而无所事事的小姐或者太太！"这何止是理解，更是尊重与爱护。

别离是一件苦事，为了工作而又不得不别离。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书信成了他们交流感情的唯一工具。多少个月色如洗的深夜，当人们沉入梦乡之际，彭雪枫却在油灯下伏案书写家信，将无限思念与牵挂倾注于笔端：

"'相见时难别亦难'，别离才三天，好象已经三月了。这一形容并不过火，理智排除感情，总是一件需要斗争的事，何况是在24日之后，又何况是在长夜倾谈而话才吐出了千分之一的以后呢！？"

"最急人的是久不接你的信，最恼人的是看不见你的长信！"

"今天是'我们俩的日子'，光阴如箭，已经八个月了！夜月如洗，而你又旧地重游了，不能共月倾谈，真是使人叹一声'如此良夜何'了。"

"我近来，不知什么缘故，心情多少有些异样。时刻总是望着你！时间连续的增长，我们相互之情爱，亦为之日益浓厚。"

"我们是愈久愈了解，愈了解愈敬佩，愈敬佩情爱愈浓厚。"

"我不能把自己的爱人视之为完美无庇的天仙，然而我是与时俱增的在爱着你的！"

……

心声的独白，真情的倾诉，动人心弦。短短3年时间，彭雪枫就写了87封家书，句句含情，字字是爱。

1942年春，淮北区党委调林颖到理论学习班学习。1943年下半年又调她到整风轮训班学习。两次学习班的所在地，离四师司令部都很近，林颖每周得以到司令部去看望彭雪枫。随着相聚时日的增多，俩人愈加了解，感情也愈加浓厚。

我们应互相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侣的态度

1943年7月29日，彭雪枫在信中写道："我觉得夫妇之间，那种庸俗的低级的趣味主义的态度和习性，并不能维持夫妇关系良好友爱于长久，而应相互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侣的态度与习惯，方能保持永恒。"严师、益友、爱侣，是彭雪枫对待爱人的一贯态度。

彭雪枫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革命军人，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向很严，对朋友、亲人也不例外。1941年9月4日——他们结婚的前20天，他在给林颖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才能更多的帮助我。也才能更多的相互帮助。"

彭雪枫认为，相爱的双方若能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上，则双方的感情不仅不会越来越淡，相反必会越来越浓，以至白头偕老。婚后两人别多聚少，在相思相忆的日子里，他常常在深夜料理完日常工作后，才抽暇给林颖写信，以这种特殊方式，与妻子谈心。他对妻子说："在对我的学习上，党性锻炼上，待人接物上，领导方式上，应该主动的帮助我，你不能假想我会比谁更完整些，只需我批评你，而不需你批评我。""请你不断的鞭策我，督导我，批评我，鼓励我！你是最了解我最知道我的人。"对林颖，彭雪枫不仅在生活上体贴入微，更注重在思想和政治上给以帮助和指导。他耐心地教导妻子如何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学好马列理论；他告诫妻子要严于自我反省、自我解剖，在生活上更艰苦些、更刻苦些，更少在物质上讲求些，要有力地截击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的萌芽生长！他希望妻子既是生活中的爱侣，更是事业上的良师、益友。

彭雪枫不仅是一位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将才，而且是一位博学多闻、妙笔生花的文才。他曾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说会讲，又善于写作，下笔千言，倚马立待。"他读书范围甚广，政治的、理论的、军事的、小说；古典的、近代的；苏联的、中国的……只要能搜集到的，他都要仔细阅读。在短短3年时间里，他每天抽4小时看书，共读了50多本书。婚后，他与妻子订立了读书比赛条约，看谁读得数量多，质量高，思考得深刻，并将"埋头，埋头！第三个埋头！苦读，苦读！第一百个苦读！"送给林颖共勉。他对妻子恳切地说："书读得越多越感到自己贫乏，我希望我的最亲爱的人同样有些抱负。"他常常向林颖推荐好的读物，如《列宁传》、《斯大林传》、《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大纲》、《论民主革命》、《论反对党八股》、《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中国史话》、《三国》、《水浒》、《红楼梦》，以及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的作品等。彭雪枫还指导她写日记，帮助她订学习计划，亲笔改正林颖信中的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林颖常说，雪枫同志不仅是自己的爱人，更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选自《党史博览》，作者：杨文梅，童天星）

廖承志在马家洲集中营

1941年，国民党继皖南事变后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廖承志也遭中统特务逮捕，关押在江西泰和县的马家洲集中营。笔者当时是中统特务，而后又送廖承志去重庆，对廖先生在狱中忠贞不屈的精神，深印脑际，今日思之令人起敬，兹回忆、追述一二。

当时中统在江西的特务活动，系由冯琦、庄祖芳为领导，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展开大逮捕，遍查中共地下组织。中统先是发现了中共地下交通员刘群，进而顺藤摸瓜，破获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致使省委书记李自强夫妇同遭逮捕。为了从李自强口里打探中共"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线索，中统对其夫妇二人故示优待，将

李自强夫妇安置在庄祖芳家中。不料李自强夫妇乘看守不备，双双脱逃，这使中统特务乱作一团，极怕李逃后通风南委，影响整个特务计划。于是，中统江西调统室主任庄祖芳急忙率领刚刚叛变的原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原省委青年部长孔昭新以及行动队长李刚等，匆忙奔赴广东曲江(今韶关)，企图破获南委。

一行人抵曲江后，颜福华隐居于小旅社内，按颜保存的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乾辉家的通讯处，投函郭乾辉，假称"脱险前来，请求接见"。果然联系成功，郭接信后即派交通员阿华往见颜福华，预告郭将亲来会见。特务们正待下手，孔昭新又先行发现郭乾辉在一茶楼饮茶，遂讯即将郭密捕。经过威逼利诱，郭供出南委全部情况，具函并附一部分现金，交由庄祖芳。庄化装为交通员，率李刚等4人前往广东乐昌逮捕南委青年部长廖承志。到乐昌以后，他们首先侦明廖宅环境，四周埋伏特务，由庄祖芳进入廖宅，按照郭乾辉指点的交通人员应有的言行动作，持信请见。廖见来者系党内交通，亦未介意。庄祖芳交完钱信，故作局势紧张不容久留状，乃即请辞，廖送庄出门。行至门首，庄又故作神秘还有所言，与廖边走边谈。走到预伏地点，特务一拥而上，声称："蒋委员长请廖先生随我们走一趟。"旋即将廖挟持登车。廖恍然有知已被叛徒出卖，但并不慌乱，反对特务嘲讽说："我正准备好了行李等待出发，想不到你们竟已先来。好吧，那就随你们走一遭。"于是，廖被特务带返江西，关进马家洲集中营。

马家洲集中营是抗日时期中统江西特务机关的看守所，冠称"江西省青年留训所"，实则是关押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恶监狱。所内设有各种不同监号，其中重禁闭室，专门关押案情重大而又拒不交代者。这种监号与一般监号隔绝，阴森黑暗，长年见不到太阳，铁门重锁，警卫日夜巡视，廖承志先生就一直关在此监号。虽是如此，廖先生全然不惧，置生死于度外，长日吟诗作画，高兴时放声高歌，不高兴时破口大骂。起初廖先生对特务们的日夜提审，总是不理不睬，一问三不知，到后来索性明言："你们不必频繁找我谈话，我同你们没有什么可谈，要说你们有权，尽可随时把我枪毙。"冯琦、庄祖芳找他谈话，廖先生张口就说："你们现在都做了官(指冯、庄均为叛徒)，我们还有什么可谈。"噎得二人半晌无语。而后冯、庄逼问，廖先生不是大叫大骂，便是冷笑置之。有一次，中统特邀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几名执行委员找廖先生谈话，大讲三民主义。廖先生讥笑而言："三民主义，我在东京时就听到孙中山先生与我父亲(廖仲恺)谈过很多，那时各位还在襁褓之中，今天何必对我上这种政治课。"弄得这些委员灰溜溜地走了。对廖先生如此倔强表现，特务们甚为恼火，几欲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均被上司制止。他们认为对廖承志纵用刑具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他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不得最高当局允许，谁都无权擅自处置。

那时，蒋介石住在重庆，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先生再三对蒋说明："廖先生(廖仲恺)仅此一条根，我去年到江西想看看承志，结果都未让我见到。你们究竟把他弄到哪里去了?"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廖承志解去重庆转由军统看管。1945年1月，蒋介石电令江西省主席曹浩森，由曹转令军统江西站站长邓树勋负责解送廖去重庆，我作为中统特别派遣人员一同前往。我们抵赣州候机时，由于重庆派来的专机在衡阳上空被日军击落，所以耽搁多日。后因日军从广东韶关和吉安、泰和夹攻赣州，战况异常紧张，赣州机场难于自存，重庆方面临时改令航空委员会就赣州撤退飞机载廖去重庆。1946年廖先生才被释放。

(选自《纵横》88年4期，作者：但功元)

"外国八路"汉斯·希伯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有一位外国记者为抗击日寇，穿上八路军装，拿起武器英勇战斗，血洒疆场，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壮歌。他，就是被誉为"外国八路"的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1897年6月13日出生于克拉科夫(原属奥匈帝国，现属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希伯在德国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因积极从事反战活动而被捕。1918年获释，加入德国共产党，任党报记者。他曾专程前往苏维埃俄国，采访列宁和斯大林。革命导师的谆谆教诲，使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毕生难忘。

希伯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分向往中国。从1925年第一次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开始，他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正值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期，希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参加北伐军，在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发表了《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价》等论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希伯悲愤满腔，耻于与新军阀为伍，辞职回欧洲。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5——1927》一书，评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大革命，他在前言中写道："中国的革命生气勃勃，富有战斗性。尽管还存有暂时性的困难，但千百万贫苦的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胜利。谨以此书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英雄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该书出版后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为中共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1932年秋，希伯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他与《大美晚报》英文编辑巴林博士一起，发起组织了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成员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他们针对当时日本日益显露的侵华野心，希伯用"亚细亚人"这个笔名，在美国

有影响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予以揭露，呼吁立即组织美苏中英法联合阵线，遏制日本侵略。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希伯看到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在怒吼、在战斗，心情无比激动。他除了继续以笔为武器，发表《中国正越战越强》等文章以外，还四处采购医药用品，冒着生命危险，送往敌占区的新四军地下交通站，支援我军抗战。

为了真实地报道抗日战争情况，希伯决定到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1938年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精心安排下，希伯顺利地到达了他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与希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时，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希伯认为斯诺有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曾公开在《太平洋杂志》上撰文提出尖锐批评。毛主席对希伯说，"斯诺他不是共产党员，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中国反动派和世界反动派都在骂我们是'匪'的时候，他却到了解放区，比较真实地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正在战斗！这在国际上起了极大的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毛主席诚恳的话语，使希伯深受启发，认为毛主席高瞻远瞩，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处理问题，不愧是一代伟人。

1939年2、3月间，希伯迎着充满生机的春风，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他欣喜地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叶挺军长，并一起合影留念。不久，希伯又前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采访，会见了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将领。马不停蹄的考察采访，使希伯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素材，他奋笔疾书，撰写完成了一部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当时，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山东敌后战场的情况鲜为人知。为了让世界人民听到那儿抗日的声音，希伯决心深入山东腹地采访。新四军领导同志告诉他，山东敌后，交通不便，敌人经常残酷扫荡，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前往。但希伯坚持自己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从来没有外国记者去过，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他的愿望终于得到满足。1941年9月，新四军派人护送他越过陇海铁路，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辟的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

希伯的到来，在山东抗日军民中引起轰动，受到热烈欢迎。不少老乡是第一次见到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亲切地称他为"外国八路"、"老希大爷"。八路军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朱瑞等亲切会见了这远道而来的外国同志。新华社当时曾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发布消息，指出："在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

沂蒙山区的条件是艰苦的，为照顾好希伯的工作和生活，罗荣桓同志打算将自己骑过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但希伯坚辞不受。希伯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着灰棉布军服，脚穿当地特产布鞋"蒙山鞋"，腰间别着一把盒子枪，爬山越岭，徒步采访。有一次，希伯脚上磨起了血泡，肚子也不舒适，大家劝他骑马外出，但他却说："没关系，这支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铁流，谁能够成为这道铁流中的一员，随这铁流冲击敌人，谁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正是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希伯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一到夜晚，他住的小草屋，油灯往往彻夜不熄，打字机"托托"响个通宵。就是在希伯打字机的键盘上，诞生了《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一系列振奋人心的通讯报道。

1941年11月初，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5万重兵，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举消灭。敌人的包围圈日益缩小，情况十分危急。部队领导本想派一个精干的小分队护送希伯冲出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带去。但希伯表示，他是特意为了解山东敌后抗日战斗情况才来的，一切危险不在话下，决不临阵退缩。领导无奈，只好让他随部队一起转战山林。

11月30日凌晨，希伯所在的部队在大青山五道沟附近被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八路军指战员临危不惧，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同时，一批又一批的指战员倒在血泊之中，希伯持枪射击日寇，不幸，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这位顽强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希伯同志现在长眠于沂蒙山华东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下。他的墓碑上刻有罗荣桓元帅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汉斯·希伯的名字和业绩，必将彪炳青史，光照千秋。

（选自《历史大观园》，作者：陆安）

太田延子的特殊行程
——1941年押送日本女俘纪实

1941年夏秋之交，抗战进入艰苦奋战阶段。就在这时，由我任连指导员的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三营八连，接到押送一名日本女战俘去师部的任务。

这名日本女俘名叫太田延子，是日本大阪人。她是在3月份由我邳（州）睢（宁）铜（山）独立大队俘获的。那天，独立大队临时组织了一支40人的战斗突击队，化装成铁路上的装卸工人，在当地地下党的配合下，袭击了陇海铁路碾庄火车站的日本鬼子据点；一举消灭日军7人，活捉一对日本夫妇。男的叫山中青一，被我军俘虏后，在日军进行"扫荡"时，他大喊大叫，企图逃跑，被我击毙。女的叫

本田石川，后改名太田延子，是刚从日本专程来华完婚的。太田延子的舅父是驻徐州日军的师团长，公爹是日军陇海铁路徐海段军事段长。

独立大队把女俘太田延子送到我们连后，我才见到她的模样：20 岁左右年纪，长得很漂亮，穿着一件日本和服。见到我们这些穿新四军军装的大男人，她缩在连部屋子一角瑟瑟发抖，一双大眼睛里流露着惊恐的神色。我与独立大队的同志简单交接后，当即召开干部会，强调日本女战俘由我们连押送期间，一定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发扬人道主义，切实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予以照顾，并要保证安全送达。

押送时，偏偏老天爷不帮忙，下起大雨来，一些河道河网发水；我连驻地（睢宁的五工头村）离师部驻地（泗洪县半城镇）直线距离就有 200 多公里；沿途还要经过海（连云港）郑（州）公路等大块的敌战区、封锁线，行动真够艰苦了。我们找来一匹小毛驴给这位日本女俘骑，而我们自己却一律步行。一路昼伏夜行；为躲避日伪袭击，尽量绕走安全路线，所以路上花去了好几天。

我们不懂日语，太田延子也不会中国话。行进途中，我默默地走在她背后，夜光下见她双肩不住地抖动，两脚直打颤。我晓得她对我们还心存疑惧，内心发怵。于是我只好走上前，面对她：用手指指她，又指指我的心，还拍拍腰间的驳壳枪，表示她可以对我们放心：绝对不会杀她，也绝对不会侮辱她。经这番手势后，她才稍稍定下心来，脸色也有点活泛。

太田延子到我连后的第一顿饭，是一盆白面面条加一碗韭菜炒鸡蛋。她也许是饿坏了，接过来就狼吞虎咽，仅小半会儿，她就吃完了；站起把碗盏送到门边，交给值岗战士。她一抬眼，发现我们两个战士吃的却是小秫秫煎饼和盐豆子。不知，她心中作何感想？当时，我们指战员因战争环境和经济困难，拉完屎后，一般只能用树枝、草把刮一下。我却命令通讯员去集镇买来草纸，给太田延子使用。押送途中，我特别怕出男女关系的事。为了保证不出偏差，每逢白天宿营，我都让她住在连部跟前，便于连里干部监视；站岗放哨，也专门挑选年纪较大的战士；并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擅入太田延子的房内。

人心都是肉长的。太田延子见我们新四军待她好，感到我军确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大肆奸淫蹂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她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有时给她东西，她还鞠了九十度躬，咕噜几句日本话，表示谢意。

经过 4 天 4 夜的艰苦跋涉，我们押着日本女俘总算赶到了泗洪县半城镇附近的杨井村，并与师部前来接应的部队会了面。这时，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再后来，得知太田延子经过教育，很快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并与男盟员矢口庄司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一直寄养在安徽一位叫刘一孚同志的家里；太田延子回国时未及带走。这孩子后取名刘太山，并在当地娶妻生子，如今已经三世同堂了。只是到现在，太田延子与儿孙尚未接上关系。

（《党史纵横》95 年 9 期，作者：陈同谟）

日俘反战的大本营——日本工农学校

日本工农学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学校，它的建立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争取更多的人站到中国人民方面来，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94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办，1941 年 5 月 15 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出席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是冈野进，副校长是精通日语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干部赵安博。冈野进取中国名林哲，即日本共产党书记野坂参三，他是 1940 年 3 月从苏联到延安的。1944 年 1 月 15 日，华北反战日人在延安集会筹备组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时，他与毛泽东、朱德等八人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任教的有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人。学员主要是战场上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还有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他们大多出身于劳动者家庭，被迫来中国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炮灰。

日本工农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43 年以后，分别设立了晋西北、华中、山东诸分校。后来，山东总分校又分设鲁中、鲁南、渤海分校。工农学校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共培养了几百名的日本士兵，他们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选自《党史纵横》91 年 4 期，作者：黄健聪）

张治中与白崇禧的冲突

在张治中的生平友好中，和他来往最密切的，白崇禧要算一个，够得上谊同骨肉。他们都是保定学生，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从求学时候起，关系就非常密切；从军从政以后，仍然接触频繁，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论派系，张治中属蒋介石嫡系，白崇禧属桂系，利害常常对立，但张为人向重感情，讲道义，往往激烈争吵之后，依然来往如昔。1939 年昆仑关之役，南宁失守，蒋介石亲临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此役国民党以优势兵力而一

败涂地，张治中认为白崇禧是西南行营主任，指挥不力，应负主要责任，于是说服他自请处分，连同陈诚、张发奎也在内，并建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一时全军震动，军威重振，再次调整兵力，终于转败为胜，收复昆仑关。

张、白两人最大分歧在于对共对苏。张是毕生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而白崇禧则力主反共。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大半。同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方案呈阅。15日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军令部原拟甲、乙两案：甲案明令撤消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消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力主采用甲案，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专袭友军，应加惩办。张治中则反对甲案，力主采用乙案，他说：“如照甲案处理，必将引起两党分裂，后果严重。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许，应慎重考虑，顾全大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来回争辩，至于脸红耳热。最后张说：“既然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呈请统帅核夺？”白至此竟拍案而起，大声呵斥：“你身为政治部部长，怎么说出这种话！”张见白崇禧感情冲动已至极点，就不再言，会议不欢而散。

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不会再有来往了。可是后来张治中由兰州飞南京，准备率领代表团去北平谈判时，白亲到机场迎接。那天漫天大雾，风雨交加，能见度极差，飞机绕南京上空几周，不敢贸然下降。后来勉强着陆，白崇禧紧紧握着张治中的手说：“真使人担心，我正反复为你向真主祷告呢！”

（余湛邦）

汪精卫谈《汪精卫日记》

自汪精卫日记露面并陆续公开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一时间，“日记”的真实性问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日记”虽然经过专家从“历史事实”、“笔迹”、“内容”、“口吻”等诸多方面周密和认真鉴定过，被确认为不谬，但汪精卫的子女却以当事人的身份对“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原因之一是“他们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父亲是从来不写日记的。”这番话出自汪精卫直系亲属之口，不能不认真对待。于是有的人对《汪精卫日记》的真实性心存疑惑。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说汪精卫不记日记并非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人莫过于当事者——汪精卫本人。汪精卫虽然早已尸骨腐朽，但他生前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清楚记载了他一生中的重大活动与个人爱好，其中之一便是他说他自己是记日记的。

1941年春，汉奸李圣五由伪司法行政部长调任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对通知他转任伪教育部长的时间较迟表示不满，时有牢骚。汪精卫在1941年8月17日致函李圣五，在解释了通知转任伪教育部长较迟的原因及对汪伪政府上层人事安排考虑上的种种苦心用意之后，明白指出：“凡此，弟死后检阅日记即可大白。”（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这就证实了汪精卫是记日记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汪精卫的这段话，对鉴定《汪精卫日记》的真伪，无疑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周红）

张治中为冯玉祥申请补助

安徽巢县在民国时期出了两位上将，就是冯玉祥和张治中。

冯玉祥出身微贱，为人正直，言行多过人处，为张治中所尊敬，二人过往频繁，交情颇深。

1938年张治中就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张到任后，对湖南政治作了大规模的革新，对抗日工事的修建，躬与其事，策划监查，不遗余力。时冯玉祥正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奉派至湖南视察，冯、张得以畅叙。冯对国防工事仔细检查，认为不错，但亦提了一些意见，为张所真诚接受。

1941年，张治中已先一年调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时日机频繁轰炸重庆，政治部迁至重庆壁山公路上的三圣宫，冯就住在三圣宫的后一站赖家桥。张每周一下乡主持总理纪念周，常便道往访冯玉祥。冯寓极简陋，生活相当困难，在谈话时曾向张表示：旧部太多，抗战以来，颠沛流离，生活极苦，请求救助函件如雪片飞来，无法应付。张说：“好，我愿为你向委员长请求增发特支费，以应急需。”冯表示谢意。张回城后就向蒋介石提出，不料蒋竟当面表示拒绝：“怎么？现在非正主官中就是他一个人独有特支费，还要增加，他人心中怎服？”张转圜说：“委员长所虑甚是，以后过年过节酌送焕章先生一些补助金好不好？”蒋不作声，张就转告侍从室照办。冯手握兵权时，蒋与之拜把子，换金兰帖，称兄道弟，一旦失势，就另眼相待。

（余湛邦）

二次大战中香港杂忆

“树上开花”

港战前夕，重庆人崇拜来自香港的进口货，但可望而不可得。于是一些官员们便挖空心思地凑合几个人，联合办起“运输公司”。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在重庆收了公家、私人运输费和购货款，用这笔款子购买了内地土产运往

香港，高价出售。又在香港向各处驻港机关和商贾贵人兜运东西去重庆，人们称这种无本生意为“树上开花”。

但是，重庆托买的东西永远取不到，香港托运的货物永远收不到，重庆“运输公司”的理由只有一个：“途中被劫”。弄得人有苦说不出，我也是上当人之一。我听了济南惨案烈士察公时内侄郭经伦的意见，将教育部实施社会教育用的12架电影放映机，分出6架由港托运去渝，岂知亦石沉大海。重庆“运输公司”的地点，忽东忽西，缥缈如海市蜃楼。累得我们东奔西走，费尽力气到处扑空。抗战胜利后，我几乎被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控诉为“侵吞公物”。

“银狗”

香港闹市区，设有一开间门面很小兑换店，差不多五步一店，十步一铺。这种兑换店多过米行。社会上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银狗”。它贪婪得象狗，兑出兑进吃的是银子钞票，一块银洋调了几次港币，就无形被吃掉了。旧上海的纸烟店银洋兑铜板也是如此，不过范围小。香港被割让初期，通用银两。1935年，对银币实行管制，发行钞票。“银狗”乘机饱吃银子。抗战爆发后，它又交上好运，留港的人要调美金，逃难的人要换法币，“银狗”又大吃一通。

战时香港发行了一种港币，被日本人仿印伪造，泛滥成灾，后来市面上停止流通，留在手里成了废纸，我身边也藏有近千元，并一直保存着，相信港府金融司和英伦财政部为维持信用和尊严一定会承认的。“银狗”摸得底细，胜利后马上大量贬值收购不用的新港币。1946年5月，港督杨慕琦就职，恢复民政。不久，停用的一批新港币，开始不折不扣地流通了，“银狗”大大发了一笔横财。

救命飞机成了救狗飞机

1941年12月8日，天气晴朗，清早我刚起身，骤听得港大一外国学生，一面奔跑。一面连续高喊：“打仗啦！打仗啦！”他告诉我，这一桩本世纪的骇人新闻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千真万确。我即转告同屋三楼陈布雷胞弟训畲，他是香港《国民日报》负责人，消息灵通。旋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导火线是“珍珠港事件”。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即为南下部署，而英国亦调来了一支加拿大军队，以资抵抗；并组织防护团(ARP)维持秩序。就在12月8日这一天，香港全岛笼罩着战争的恐怖，日空军对港进行了轰炸，一时间炮声隆隆，浓烟滚滚，日陆军则从广东陆地进攻。

8日晚上，国民政府派遣民航飞机，由中国唯一的正式飞机师陈鸿恩驾驶，自重庆起飞降落在九龙启德机场，执行接回政府驻港人员和有关人士的任务。

当时，乘坐飞机撤退人员有一张名单，也有我一份。这张名单是各部汇报给行政院，最后送蒋介石核准。飞机也只有1架。晚10时半，飞机临港，港方误认敌机夜袭，拉起警报，历5分钟才解除，造成一次误会。当晚，飞机腾云驾雾飞回重庆，我却在9日晨才接到中央银行送来的通知书，叫我立即搭机脱险，真令人啼笑皆非。此时港九间航轮已断，渡轮码头无一篷一橹可渡，何况我还有一家10口人。

《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也被列进乘机名单，同我一样，当天没有得到通知。消息灵通的方振武，住九龙新界，得讯后即去启德机场，可榜上无名，被孔家人马拉住，不准登机。前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汗流浃背地挤进舱位，喘息未定，就被孔二小姐(名令仪)的17条洋狗轧了下来。陈济棠孑然一身手无寸铁，自然斗不过生性桀骜、威福任性的孔二小姐。

救命飞机变成孔二小姐专机，褓姆、侍卫和无数的箱笼物件，马桶、洗澡盆及其他家用的舶来品，一古脑儿尽量装运重庆，轰动了山城，“人不如狗”等讽刺文章，竞相刊载于大小各报。

逃难的狂潮

随着局势的剧烈动荡，灾难很快接踵而来。银行存户纷纷提取存款，以便出走，但有钱人存款，提不出，18日，敌只准大通、有利等5家银行存户一次提50元港币，东京派遣的“金融班”人员亦束手无策，只得发军用票来辅助。200多万人口的消费城市，140多万参加逃难行列，街头上一片忙乱景象，个提包拎箱，在嘈杂的人声中挤呀挤，纷纷涌向渡口港口。

因战争交通断绝，来往港九要偷渡，这相当危险。18日恢复航行，买船票的同买米的队伍一样长。人们逃难的路线主要有，从油麻地码头搭船冒险往广州；雇小船经湛江越寸金桥进桂林；摆渡到九龙，经深圳，翻山越岭，跋涉去内地；叫小网船或舢舨到澳门，再乘轮船往湛江转内地。沪港航线通了，三等舱价900港币。敌方为减轻自身负担，还组织了归乡指导委员会，备有疏散难民的小轮船，大举疏散人口，逃难人均须持有敌人发放的“良民证”方可通行。

敌军的政策，贫民一律免费疏散，中产以上的欢迎留港。实恰恰相反，有钱人急欲走，穷人则想住下。1月6日，敌“归乡运动”，第一期拟疏散30万人。13日，敌民政部门公告，有渡轮送难民到深水涉，再步行回乡，九龙不得停留。14日，赴澳门、宝安的难民船开出，嗣后有开往广州的难民小火轮，当天可达。船实在少，敌又在搬运掠得的物资，港府存米极为丰富，亦在他运，14日一天，敌方征到30艘运输船，强拉了大批民夫。

中共部署的撤退线

不等疏散，中共早已利用各种渠道，联系当地爱国人士，组织了秘密地下交通网，营救各界人士，主其事者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在交通网中，中共部署了一条撤退线，由东江游击纵队具体负责，它的根据地在东莞、惠阳和宝安洞一带。1938年冬，广东失陷后，形成了东江游击区，活动范围穿过九龙一直伸到香港。护送工作以惠阳为终点站，此后由地下工作者接手。

游击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王作尧，个个智足多谋，他们保护了许多文化界人士、爱国青年、国际人士和华侨等脱险，据我所知，有茅盾、沈志远、胡绳、张友渔、于伶、宋之的等几对夫妇，孑然一身的侨领司徒美堂、老友戈空权、叶以群、叶赖士、高汾、殷国秀……都打扮成难民或商人模样。吃尽艰辛，攀山越岭，沿这条撤退线脱离了险境。

这条撤退线，全路程顺利时行5天可达安全地带，惟极度辛苦。80多岁的司徒美堂实在吃不消，幸赖向导引路，从香港铜锣湾下小船绕道而行。又改搭宽敞精致的大船过夜，翌晨曙光再乘小船躲进船舱，藏匿舱板下，待敌哨兵换岗时，乘机飞快偷渡，驶入深阔的海峡。

（周尚）

流行风

电影《长空万里》

《长空万里》——洪伟烈摄影，影片描写一群爱国青年投考空军、英勇抗战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航校学生高飞（高占飞饰）流亡到关内，途中与少女白岚（白杨饰）相识。“一·二八”事变后，他激于爱国热情，与同学金万里（金焰饰）、乐以琴（魏鹤龄饰）一起报考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高飞与白岚重逢，又认识了她的妹妹燕秀（王人美饰）。“八·一三”后，高飞等三人都参加了战斗，看到燕秀被敌机炸死时，更激起他们对日寇的仇恨。后敌机又来轰炸，他们三人飞向天空，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电影《游击进行曲》

《游击进行曲》——启明公司摄制，仍由蔡楚生、司徒慧敏编剧，司徒慧敏导演，李清主演。影片描写沦陷区一个农村，在日寇疯狂掠夺和屠杀之下，激起全村人的愤怒与反抗；青年农民王志强带头发起组织青年突击队，并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结成一支有领导的抗日队伍，展开了游击战。最后，在反战日军的内应下，一举歼灭敌军。反战士兵也加入游击队，共同唱着《游击进行曲》向前迈进……。影片揭露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表现了日军士兵的反战情绪，歌颂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揭示了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开展游击战争这一重大主题。影片完成于1938年，但遭到香港当局的禁映，直到1941年6月，经过反复删剪改名为《正气歌》，才得以上映。

电影《民族的吼声》

《民族的吼声》——完成于1941年7月。其主要情节是：香港一家奸商勾结内地某司令，武装偷运军需原料钨砂，卖与敌人牟取暴利。这个罪恶勾当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就在奸商为儿子完婚的礼堂上，群众揭发了他这一丑行；奸商开办的工厂里的工人也进行了怠工斗争。最后，抗日游击队截堵了偷运的钨砂，给了奸商应得的惩罚。影片有力地表现了香港劳动人民、游击队对卖国奸商的揭发斗争以及他们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和昂扬的爱国精神；汤晓丹曾谈到制作这部影片的主旨就是“尊重人民，拥护抗战，反对抗战几年来贪赃枉法、发国难财，操强权于手里、置正义于死地的达官要人”。

电影《花溅泪》

《花溅泪》——张石川、郑小秋导演，胡枫、沈敏、舒适、吕玉堃、徐风等主演。影片以“八·一三”前夜的上海为背景，写出了一群舞女的各种经历和悲惨生活，并表现了他们在炮火下的觉醒，最后终于离开上海参加抗战工作。但由于环境限制，参加抗战的情节，只能用暗示表现，隐晦地表达了抗日爱国的主题。

电影《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取材于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赴西域取经，途过火焰山，向铁扇公主借扇灭火的故事。影片情节曲折，故事动人，长达七千多尺，可映一小时又20分钟。影片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特技，创造了富有民间传说色彩的艺术形象。象孙悟空、猪八戒、玉面公主等，人物造型古朴、细腻，具有鲜明个性，至今仍为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所沿用。而孙悟空的72变、公主的妖法等，也展现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使得美国动画片《白雪公主》再难称霸。影片寓有联合群众力量、战胜魔怪的意味，从而隐晦地表达了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寇侵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思想。影片上映后，国人争相观看，使“孤岛”上海人民为之扬眉吐气。后又输出南洋各地放映，受到侨胞观众热烈欢迎。

小说《新水浒》

作者谷斯范，主要内容：

以1937年浙江嘉兴、吴兴之间的一个小镇为背景，写敌后的游击战争。当时国民党向西溃退，侵华日军兵力又不敷分配，这一带就成了游击队活动之地。但这些游击队，不是旧保安队的化身，就是土匪的变相，他们搜刮民脂民膏，成了货真价实的“游吃队”。后来经过地下党徐明健与黄杰、戚渊等合作，新成立了太湖游击队。这支队伍经过游击战术训练，政治、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在袭击青山镇一仗旗开得胜。根据新四军的指示，游击队成立了党的组织，越发走上了正轨。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浙西行动纵队要收编他们。经过一番争论，决定反对收编。戚渊见机带着队伍投敌。但游击队虽然三面受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踏上了寻找新四军的新路程。小说的主题就是如何把“游吃队”改造成真正的游击队。作者致力于通俗化，利用旧形式，在用语、句法、结构上都是中国式的，曾受到茅盾的赞扬。

小说《腐蚀》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

小说以“皖南事变”为背景，通过对女主人公赵惠明一生经历的描绘，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对青年的腐蚀和摧残。他们一面捕杀爱国抗日的进步青年，一面利用知识青年的某些弱点进行诱骗、威胁，使之下水，干反革命勾当。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密谋反共卖国的历史面貌，暴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荒淫无耻、勾心斗角的种种黑幕以及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残酷镇压；同时还歌颂了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英勇品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借主人公的自讼、自嘲、自我辩护，真切而细腻地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描绘特务统治下阴森恐怖的社会气氛形象逼真，布局严密紧凑，情节发展弛张有度，语言明快而含蓄，是作者后期创作中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小说《呼兰河传》

作者萧红，主要内容：

写作者对家乡黑龙江呼兰镇童年生活的回忆。全书共七章。第一、二章写呼兰的自然风貌和生活习俗；第三、四章写作者的家庭和童年生活；第五、六、七章独立成篇，分别写小团圆媳妇、有二叔和王大姐等人的生活悲剧。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故乡人民在封建统治下的坎坷艰辛的生活画面。跳大神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因天真活泼，违背了做童养媳的封建传统，在残忍的迷信仪式中让婆婆活活折磨致死。王大姐和冯歪嘴子因相爱而同居，在周围人们的冷嘲中，一个凄然死去，一个拖大带小在苦难中挣扎。善良的有二叔在非人的劳动中饱受屈辱之苦。人们在这落后、保守、乃至麻木的精神状态中，维持着残生。作者沉痛地鞭笞人间的苦难，抒情气氛较浓，但调子略嫌低沉。

小说《秋海棠》

作者秦瘦鸥，主要内容：

写军阀时代京剧艺人的悲剧。艺人秋海棠开始唱旦角时被军阀袁宝藩和贵妇人王大奶同时当作“玩物”，备受统治者的凌辱。后与袁的姨太太罗湘绮相遇，出于受蹂躏的相同遭遇，两人相爱，并生下一个女儿。不久关系被袁发觉，秋海棠被袁用刀子将其面容毁坏，使他不得不抛弃爱情和艺术，带着女儿避到乡下隐居。经过十多年的折磨，父女俩辗转到上海谋生，当秋海棠与罗湘绮再度相遇时，生命已奄奄一息。主人公秋海棠为人正直、善良，但在逆境面前坚苦忍耐，他的悲惨经历概括了旧社会许多艺人和弱者的遭遇。由于作品暴露和控诉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倾注着对下层人民的深厚同情，曾在沦陷区读者中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但作者在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中，感伤气氛相当浓重，暴露社会黑暗过程中缺乏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热情。

诗《赞美》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

歌曲《胜利进行曲》

看！
我们庄严的旗帜，
在美丽的晴空里乘风飘扬。
我们的战斗是持久而坚强，
攻取了每一个城堡，敌人都狼狈奔逃。
弟兄们！
昨日的艰难困苦，
今日已有了最大的报偿，
我们要把胜利的歌儿高唱。
这是胜利的开始，
我们更要大踏步走向胜利的明天。
我们越战斗越英勇，
啊！中国的独立、自由、幸福，
招展在我们眼前！

历史档案

1941年3月新四军战斗序列表

代军长　陈　毅
政治委员　刘少奇
副军长　张云逸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主任　邓子恢
第一师　师　　长　粟　裕
　　　　政治委员　刘　炎
　　　　政治主任　钟期光
第一旅　旅　　长兼政治委员　叶　飞
第二旅　旅　　长　王必成
　　　　政治委员　刘培善
第三旅　旅　　长　陶　勇
　　　　政治委员　刘先胜
第二师　师　　长　张云逸(兼)
　　　　政治委员　郑位三
　　　　副师长　罗炳辉
　　　　参谋长　周骏鸣
　　　　政治主任　郭述申
　　　　政治副主任　张劲夫
第四旅　旅　　长　梁从学
　　　　政治委员　王集成
第五旅　旅　　长　成　钧
　　　　政治委员　赵启民
第六旅　旅长兼政治委员　谭希林
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旅)　司令员　杨梅生
　　　　政治委员　刘顺元
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司令员　郑抱真
　　　　政治委员　谭光廷
第三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黄克诚
　　　　参谋长　彭　雄
　　　　政治主任　吴法宪
第七旅　旅　　长　彭明治
　　　　政治委员　朱涤新
第八旅　旅　　长　田守尧
　　　　政治委员　吴信泉
第九旅　旅　　长　张爱萍
　　　　政治委员　韦国清
淮海军区　司令员　覃　健
　　　　政治委员　金　明
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第四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彭雪枫
　　　　参谋长　张　震
　　　　政治主任　肖望东
第十旅　旅　　长　刘　震
　　　　政治委员　康志强
第十一旅　旅　　长　滕海清
　　　　政治委员　孔石泉
第十二旅　旅　　长　饶子健
　　　　政治委员　赖　毅
肖县独立旅　旅　　长　纵汉民
　　　　政治委员　李中道
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
第五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李先念
　　　　参谋长　刘少卿
　　　　政治主任　任质斌
第十三旅　旅　　长　周志坚
　　　　政治委员　方正平
第十四旅　旅　　长　罗厚福
　　　　政治委员　张体学
第十五旅　旅　　长　王海山
　　　　政治委员　周志刚
第一纵队　司令员
　　　　政治委员　张执一
第二纵队　司令员　黄　林
　　　　政治委员　刘子厚
第三纵队　司令兼政治委员　何耀榜
鄂豫边区防安司令部　司令员　郑绍文
　　　　政治委员　夏忠武
随营军事学校
第六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谭震林
　　　　参谋长　罗忠毅
第十六旅　旅　　长　罗忠毅(兼)
　　　　政治委员　廖海涛
第十八旅　旅　　长　江渭清
　　　　政治委员　温玉成
路东保安司令部　司令员　何克希
　　　　政治委员　吴仲超
路西保安司令部　司令员　韦永义

政治委员

第七师　师　　长　张鼎丞

　　　　政治委员　曾希圣

　　　　参 谋 长　李志高

　　　　政治主任　何　伟

第十九旅　旅　　长　孙仲德

　　　　政治委员

军直

独立旅　旅　　长　梁兴初

　　　　政治委员　罗华生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

　　　　校　　长　陈　毅(兼)

　　　　副 校 长　赖传珠(兼)

　　　　副 校 长　冯　定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1年5月1日)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鄜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纪律,增加劳动生产率,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进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保护流亡学生与失业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行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材,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

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实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尊重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103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解放日报》发刊词

本报① 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予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须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通令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

① 本报，指《解放日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1942年9月起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

瞻远前途，病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昨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新编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理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尊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治，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消，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借申军纪，而利抗战”等由准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并将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转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十一册）

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开会训词（节录）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

尤其这几年以来，我们军队的耻辱实在太重了，高级将领太溺职了，太对不起国家和同胞了；反躬省察，真是汗流夹背，实在无地自容！你们各位要知道，现在作战的地方，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所有的民众，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所守的城市与据点，一切环境，都是我们最熟悉，最便利的战场；但是敌人进到我们的国土里面来作战，他反能到处横行，肆无忌惮；甚至我们所不知道的道路，敌人反而都知道，我们所没有侦察过的地方，敌人反而都已侦察，比我们还要熟悉；我们的民众，我们不能利用，而敌人反能利用，乃至为敌人做向导，做输卒，来扰害我们本国的军队；而我们的城镇据点，可以随便给敌人占领。你们看，天下最耻辱的事情，还有过于此的么？尤其是我常听得各位将领这样说：“我在这一阵地上已经守了三天。”“我已经和敌人打了两天两夜。”似乎他在一个阵地抵抗了两天、三天，就已经尽到了他抗战守土责任，就以为在阵地上挨过两、三天之后，尽可以退却下来，有话可说了。这语气，真是丧尽军人的人格！这种心理，真是不堪闻问！这是我从带兵打仗以来，闻所未闻的最痛心的事！这样的军人，还有廉耻，还成将领吗？这种军队还能算做革命军，还能够抗战吗？你问他退却下来究竟损失了几多？有没有全军覆没？如果实在点查起来，他最多损失了三分之一，甚至他的部队，并没有损失，也随便要求退却，乃至不待命令，擅自撤退。这种将领，真是无耻之极！须知军队如果没有奉到命令，决不能后退，虽死亦要死在阵地上，即令全军覆没，亦在所不惜；这样才算是军人，才成为军队；不然，我们守在一个阵地，打了两天、三天，或者是守了五天、六天，就可以藉词后退，这种“挨日退却”的心理，语其动机，与临阵脱逃，不战而退，岂不是同样的可耻可痛？这种恶习，如果不彻底改革过来，那最后只有亡国，大家都要做亡国奴！不仅对不起已死的一般官兵与民众，而且留下千秋万世的污名！这是我这次听了你们的报告以后，所最感耻辱痛心的一点；这就是证明我们将领无耻，军心已死，真是抗战前途最大的危机！我今天不能不特别说明，以提起大家严重的注意！

我们既有了这样极大的耻辱，那就要大家能够痛自警觉，能够衷心忏悔，能够赤裸裸的，明明白白的检讨出来，然后可以悔过自新，知耻自强，不致再招耻辱。因此，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要洗刷耻辱，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我们的短处、缺点与过错，真实报告，坦白自承，使全军官兵都知所警戒，来彻底改革，而不致再犯已往的毛病；然后我们失败牺牲所得的教训，才可以拿来巩固我们最后胜利的基础，而我们大家，才不愧为革命军人！尤其是这次第三、第九两战区各级将领的报告，必须按照这个要领实行，更不必徒重形式，琐碎陈述，只要将我们自身和各部队的缺点与错误，尽量的报告出来，就是对于我们所知道的友军的过错，都要如此坦白批评，才不负生死患难的袍泽之谊，才能尽到我们对于战友所应尽的责任。各位要知道，本委员长虽驻重庆，但对于你们在前方各战区守土抗战一切的真情，我都无不留心。这并不要我派了什么特务人员，有意来指摘你们错处过犯，我只看了你们的报告，就可以将你们的心情虚实，洞悉无遗。你们特别要知道，在这抗战时期，你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两种人是决计欺骗不过的：第一、瞒不过民众与士兵的眼睛：民众与士兵，是时时刻刻看见你们所作所为的；第二、瞒不过敌人的眼睛；敌人也随处随地都在侦察你们的行动，偷听你们的消息的。即如敌人的广播，就可以将你们在前方的消息完全报告出来。当然，敌人所广播的，大部分都是造谣；但是我们可以从反面去研究他的谣言。譬如敌人说打了胜仗，就可知道是他打了败仗；敌人说我军已被包围了，就可知道敌军正被我们所包围。这样从敌人的广播中推测判断，我们军队在前方的实情，有许多你们长官所不能知道的，我都已经十分明白了。即如本年四月中旬，第三战区绍兴失陷的情形，战区长官并没有报告；等到我知道了，下令彻查，你们才报告上来。其实绍兴当晚演戏，敌人便衣队早已混入在戏场之中，而我们当地警备司令与行政专员都不知道，还是行所无事，最后仓皇失措，贻害地方。这样重大的事情，你们长官都隐瞒不报，试问你能瞒过当晚入城的敌人，与当地亲眼看到的老百姓吗？这样的事情还了得！你们一切的行为，下面的部属、民众，没有不知道的，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非你光明磊落，一无愧怍，否

则一举一动，都没有方法隐蔽的，都必然要暴露出来的；如果你有意要想欺瞒上官，那更是有失你的职守！所以你们所必须深切反省的，就是凡事决不能欺骗你的上官，更不能欺骗你自己。又如这次第九战区湘北作战，我自始就完全相信你们。九月二十一日，军令部根据你们的报告，绘给我一张敌我全般态势图，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摆在侧面平江、金井一带；照这样的部署是很对的，我当时很放心。那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我们的主力，竟是完全分散在各地，甚至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所在，而仅有一军人在平江方面。这样你们的报告，还可作为依据吗？因为报告太不确实，以致判断错误！要不然，我们这一次决不会有这样的损失，而且相信可以获得很大的胜利。类此缺点过错，无论罪在本身，或责在友军，在这次会议当中，都要切实详尽的列举出来，使大家都能获得一个宝贵的教训，来改进以后对敌作战的方法，才是我们补过图功惟一的途径。总之，我们各战区一般将领最大的毛病，就是报告不实在，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高级长官，如此层层虚伪，欺人自欺；这个弊病，如不改革过来，那无论你有多大的武力，都要失败！要知道，我们军队的精神，全在三信心—就是对上官要信仰，对部下要信任，对自己要有自信；而要造成这三个信心，首先要报告必信，发言必信，对上官如此，对部下如此，对战友也应该如此，然后精诚孚洽，我们全体国军，都因互信发生完全无缺的共信。必须全军都有此坚定的共信，才能成为坚强的部队。反之，如果你得到了部下的报告，不实际审查，不经过判断，连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时候，就拿来报告上官，或通报友军，试问这样的谎报，如何能信任，更如何能指挥作战？我现在对于你们这种虚伪的报告，实在要相信亦不能相信了，因此对于战局的前途，亦就一天一天感到恐惧忧惶！如果我们以后一切动作、命令与报告，再像过去一样，都不实在，即令日寇不能打败我们，我们自己亦必趋于失败。所以虚伪欺骗，蒙蔽上官，谎报军情，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与缺点！大家以后必须痛切改过，才可以保障已得的战绩，巩固胜利的基础。

还有，我刚才所说的，军队打仗，没有奉到命令，绝对不能退却。这一点，此次长沙会战也没有完全作到，前方部队，往往不奉命令，随便移动，甚至后退数百里或数十里。这样军纪扫地，还成什么军队！军队没有军纪，就是失了生命，军人没有廉耻，就是没有人格，就不能做人。古人所谓“成败荣辱之理，判然不可混淆，有败而犹荣，有胜而犹辱者”，我们高级将领，必须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已死的一般官兵与民众，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于他们的上官和民族祖先，可以说已尽到了他们的职务；但我们做上官的，我们这些后死者，究竟应该如何自处？这一点，你们必须时刻拿来自省。古人讲理学最重尽性，这“尽性”两字，就是现在所说的“尽职”。我们凡事如能尽心尽职，虽死亦可以瞑目；但如果我打了两天、三天，就可以不奉命令，随便退却，甚至于要退到数百里的后方，这样，试问你是否尽了心，尽了职？是否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下？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廉耻，就看他能不能尽职。如果你能尽心尽职，虽牺牲了性命，亦是心安；如你不能尽心尽职，那无论你是“挨日退却”，或取巧避战，都是无耻，必要失败，而且必不能免于死亡！我们在抗战初起的第一二年，上下官兵都能知廉耻，尽职守；但最近两年以来，我们一般将领一天一天的堕落，一天一天的失败，其所以还能维持现在这样抗战的局面者，大家要知道，这并不是我们什么事都行，更不是我们真正能够苟且侥幸，而完全是由于敌人无用；如果敌人真有能力不断进攻，那我们今天还能在南岳开会吗？我们自身这个缺点与危机，必须自行反省，自己解救。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没有办法，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实在是有力量，有办法，但是我们一般将领如此不知研究，不加整顿，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所以敌人一旦来攻，我们就要立即失败，就是敌人一旦退走，我们也终于要失败；这样情形，就是敌人不想来侵略我们，也要来侵略我们了。反转来说，如果大家能和敌人一样的肯研究，和四年以前一样的能确实奋斗，则现在战场上一切土地与人民都是我们的，都可以由我们来尽量利用。而且就现在的敌情、地形与时代环境来说，一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战争条件，都是我们比敌人优胜；有了这两年多的努力牺牲，那我们现在岂止在南岳会议，还不早到北平开会了吗？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抗战还能不败，不是你们各战区各级将领现在这样腐败堕落，苟且偷安的办法所能幸致的，而是敌人已经疲弱衰竭，完全无用的缘故。对此势穷力竭的敌寇，我们现在实在是有办法，有力量，可以驱除他，消灭他，但是我们高级将领有脑筋，有本事，而不肯用在事业和职务上，这才是我们根本的致命伤，真是可为浩叹的一点！

总之，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的缺点：第一、就是怯懦：就是我上面所讲的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要知道，我们部下虚伪欺骗，就是我们上官虚伪欺骗；我们部下贪污怯懦，亦就是我们上官贪污怯懦。这“虚”、“贪”、“怯”三个字，我们都有了，如何能不失败，能不灭亡？仅就这几点而论，我们的耻辱已甚，危险已深！我们各位高级将领必须痛切反省，彻底悔悟，督率部属，严切改正，今后对于业务，不可再有一些马虎糊涂，而军纪所在，亦决不能稍存一点徇私的心理；否则，就等于卖了部下，卖了国家一样！尤其在此抗战局势日趋好转之际，我们格外不可有丝毫虚骄自满之气，须知“满招损”、“骄必败”：何况我们南宁、福州与此次长沙之收复，乃是敌军无力固守，而不是我军实力克复的，这并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我

们的耻辱。我们高级将领如何能不彻底反省，雪耻图功，来完成我们的职责呢？本委员长现在所最感恐惧的，就是我上面说的，惟恐部下精神堕落，纪律废驰。目前无论就国际形势与敌国内情来讲，可以说我们抗战已经获得了胜利，但检讨我们内部的情形，败坏至此，实在是危险万分。因此，对于我今天所说的话，大家务必要切记在心，时刻警惕，在会议期中，一切要彻底检讨，痛切改进，来挽回我们已有的牺牲，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如此，才可对得起我们总理和死难军民的在天之灵，也才能够安慰一般苦痛同胞的喁喁之望。希望各位激发忠良，知耻负责，今后我全军上下，人人都要讲求礼、义、廉、耻的四维，与仁、义、礼、智、信的五德，来发扬我们民族的正气，奠立最后胜利的基础。只要大家能依照我今天的话切实做到，那我们这次南岳会议，就是最后胜利的会议；否则，抗战前途将要不堪设想，而你们各位将领的千秋功罪，本委员长也替你们实在担忧。今天在座没有外人，大家都是共患难的战友，与亲爱的同志，我们一切耻辱与光荣，都是整个的；一切成功与失败，亦是整个的。大家要披沥肝胆，发扬忠义，戒慎警惕，一致努力，来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

（转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

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声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重庆

日本之国家政策自始即欲控制亚洲，称霸太平洋，四年多以来，中国曾经不顾一切艰苦牺牲，坚决抵抗日本之侵略，藉以维护中国自身之独立与自由，并以维系国际之正义，促进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之国家，在它以武力从事自卫之时，就希望日本能认清征服计划之必败。战争发生以来，其他各国亦均表示最大的同样容忍，希望日本能有幡然悔悟的一天，并为着眼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而改弦易辙。

不幸，日本的侵略本性难于悛改，在长期企图征服中国失败之后，不但未曾表示任何悔改迹象，反而变节开始攻击中国的盟友——美国与英国，从而扩大侵略活动的范围，并使日本自身成为正义与世界和平之大敌。日本最近之侵略行动已经暴露它的难以满足的野心，并且已经制造了一种没有一个信仰国际正义与人类尊严的国家所能容忍的情况。

为此，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并进一步宣布有关中日两国之一切条约、协约、协定、盟约，自此一律无效。

国务院于十二月十日清晨收到。

（选自《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

中国政府对德意志与意大利宣战声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重庆

自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缔结三国同盟以来，此三国家即完全结为一侵略集团，为实行他们征服与控制世界的共同计划而密切合作。为了表示他们的团结，德意志与意大利并曾相继承认日本在华北与南京的伪政权。基于此种原因，中国已经在今年七月与德、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现在，轴心国家已经扩展其侵略活动之范围，并且已经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制造混乱，致使轴心国家形成国际正义与世界文明之敌人，此种事态，自不再能为中国政府及人民所容忍。

为此，中国政府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9 日午夜起，中国与德意志之间，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处于战争状况。中国政府并进一步宣布：有关中国与德意志之间及有关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一切条约、协约、协定及合约均属无效。

（选自《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电令项英、叶挺："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　皖东敌伪军向定远东南老人仓新四军进犯，国民党军乘机袭新四军后方。

同日　哈尔滨王岗伪满军飞行队起义。

一月四日　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由泾县云岭出发，经茂林、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渡江北上到苏北的路线前进。次日，到茂林地区。

一月六日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预先布置好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粮尽弹绝，除黄火星、傅秋涛率部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十三日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十日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国民党强行撤销。

同日　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东南成立，通过斗争纲领，誓志推翻日寇统治，与中国人民共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一月十一日　周恩来就新四军被围事向张冲提出抗议，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当晚召集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了事变后的形势和斗争方针。

一月十二日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于本日、二十六日和二月九日，三次电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贯彻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一月十三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表《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指出："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同日　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召集苏北新四军干部会议，讨论有关皖南事变问题。同日，他建议中共中央：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提出具体条件；二、如条件不能完全答复，即宣布"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抗日军队决不再考虑北移，国民党如再向华中进攻，即认为国民党正式与中共破裂；三、在全国全世界实行政治大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

一月十六日　范文澜在《解放》第一二三期发表《提倡民族气节的必要》一文，痛斥国民党顽固派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专事反共的卑劣行径。

一月十七日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同日　周恩来严斥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指示《新华日报》写出"皖南事变"真相的系统报导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文章。

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决定各抗日根据地要对国民党顽固派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反共事变提出严重抗议，彻底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示部队充分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代表全国抗日派声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

同日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报纸开了天窗。凌晨，周恩来挥笔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刻在天窗的版面上。

一月十九日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重要社论。中共在上海、香港等地，也用各种方法公布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同日　菲律宾华侨领袖余清箴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海外侨胞痛恶分裂，希望祖国加强团结，坚持抗战。"

一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方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取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等十二条要求。

一月二十三日　陈毅等发出《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并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一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将中共解决时局十二条办法交给国民党代表张冲。

同日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函电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同日　八路军总部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封闭。

同日　日军在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残杀群众一千二百三十余人，烧毁房屋一千多间。

一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在渝发表演说谓：“‘皖南事件’只限于军令、军纪，不涉及党派与政治问题”。

同日　日寇山田旅团“扫荡”泰山区根据地。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指出：只有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同日　日本东条发表演说称：“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驱逐华中共产军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二月五日　《新华日报》评论《我们的抗议》等文被扣压，开了天窗。报社在天窗处印：“法纪何在！本报横遭压迫，报差四人竟被捕殴，报纸也遭无理没收。”

二月七日　中共中央军委会颁布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

同日　“冀太联办”颁发布告修正减租减息条令，将公私借贷利率一律改为一分五厘。

同日　伪满国务院召开省长会议，讨论在东北强征劳工问题。

二月十日　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皖南事变”后处理办法十二条，并声明在政府未予解决前碍难出席参政会。

同日　周恩来和各党派代表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张君劢聚谈中共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方针。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讨论民主建设，布置选举工作，拟定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

同日　顾祝同所属苏鲁皖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公开叛国，被汪精卫委为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二月十八日　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同时，周恩来又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二十多人。

二月二十二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宋劭文、张苏联合作了关于讨论实施边区地方宪政促进全国宪政的实现问题的报告。

二月二十三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成立。

二月二十四日　重庆《中央日报》于二十二及本日连载潘公展文章与张继演说，诬称共产党为奸党。

同日　日外相松冈洋右谓：大洋洲应为亚洲民族移民地区。

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决定向张冲口头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以第二个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但国民党仍拒绝接受。

同日　邹韬奋声明辞去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

三月一日　鄂豫边区召开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陈少敏当选为大会主席。

同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鉴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未出席。

同日　畑俊六任日本在华派遣军总司令。

三月二日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四军事件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函国民参政会，要求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明令保证实行。

同日　著名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陈嘉庚致电全体参政员，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三月三日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申明中共代表不能出席参政会的理由。

三月五日　晋察冀边区政府决议设立冀北办事处，以朱琪文暂代主任。

三月六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一面仍强调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允许存在，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另方面被迫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三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联名复函国民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的理由。

同日　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采取抗审的办法，将《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因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扣压未能发表)，连同有关“十二条”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继续进攻和压迫中共的材料，出一大号增刊，向广大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面目。

同日　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在反击敌人突袭桦甸县夹皮沟密营的战斗中牺牲。

三月十日　中共太行军区发布《关于实行全区紧急戒严》。

同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闭幕，董必武仍被选为驻会委员。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增刊，全文发表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的全部文件。

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指出，“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实际上被承认”。

同日　陕甘宁边区部队中担任河防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指战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经济困难的号召，执行朱德提倡的“屯垦政策”，开始屯垦南泥

湾。各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党政机关、学校及广大农民先后开展了生产运动。

三月十三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免去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职务。十五日任命朱理治为行长。

三月十四日　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

三月十七日　毛泽东发表《〈农村调查〉的序言》，号召全党同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搞好调查研究。

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题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对党内的指示。

三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为主席，张澜、梁漱溟等为执行委员。

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的文件，揭露蒋介石急于压服共产党。并指出："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们以佳电迎接了他的开始，以一月二十日的攻势（老十二条）对抗了他的高潮，以三月二日的新十二条打退了他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

三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举行，四月六日结束。会议决议田赋归中央，增设贸易、粮食两部。

三月二十九日　华北日伪实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自此时起到一九四二年，共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三月三十日　晋察冀北岳区人民武装委员会提出：广泛开展不疲劳不间断的交通战，实行全区民兵总动员，粉碎敌"治安强化运动"与囚笼政策。

同日　《新华日报》载，旅居香港的人士张一麐等四百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说："国人鉴于十年阋墙之争，友邦有暂缓援华之议，危机四伏、间不容发。"要求"毅然制止内战"。

四月一日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同日　"冀太联办"暨晋冀豫军区司令部公布《军事支差条例》与《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

四月二日　晋察冀军民击溃日军对滹沱河东侧地区之扫荡，并克平山东南北鲍庄等六个据点。

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建设晋冀豫十五项主张。

四月六日　《新华日报》载，数百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抗议枪口对内，要求恢复新四军番号，释放叶军长。

同日　国民党八中全会宣布开除柳亚子党籍。任命吴铁城为该党秘书长，张冲为组织部副部长，郭泰祺为外交部长。

同日　国民党军与地方自卫队收复鄂中潜江，日军向襄河北岸溃逃。

四月九日　华北敌伪成立防共委员会，王揖唐兼委员长。

四月十一日　近卫答记者问，称他打算使"蒋汪合流"，实现"全面的和平"。

四月十三日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

同日　《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字，条约有效期限为五年。苏外长莫洛托夫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声明苏联援华抗战政策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

四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苏日中立条约》的声明。

同日　晋察冀军民展开交通战，徐水、灵寿挖壕改变地形。

同日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拟定。

四月十七日　冀中民兵展开"爆破运动"。

同日　苏北文化界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开会，十八日结束。到会代表共百余人。陈毅、刘少奇均到会讲话。大会通过宣言、文协组织简章、工作计划及重要提案二十余件，并选举钱俊瑞、夏征农、许幸之、薛暮桥、冯定、戴平万、孙克定等二十五人为文协第一届理事。

四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一九四一年四月政治情报》的文件。

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发表《〈农村调查〉的跋》一文，教育党员干部注意联系和动员群众，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四月二十一日　苏北盐城农民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实行四、六分包租、二、五减租，废除额外剥削与牙税等。

四月二十二日　沪商务印书馆职工因要求增加工资遭厂方拒绝，实行长期怠工。

四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

同日　苏北粉碎敌对泰兴以东地区的"扫荡"。

四月二十七日　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训令所属部队严禁踏青苗。

四月二十九日　沪法租界电车公司司机罢工。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应该纠正某些党组织和党员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倾向，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和党内专门家学习，熟练于自己的技术。"

同日　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纪念"五一"节。

五月四日　冀中日军"扫荡"滹沱河南、安平以西地区。

五月七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

五月八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打退第二

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阐明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所采取的策略，着重批判了党内过“左”的错误思想。

五月十二日　晋冀鲁豫八路军全线出击，截断正太、同蒲、平汉、白晋、平绥、平古等交通线，歼灭敌伪军近万人，收复太行山南段广大地区。

同日　国民党政府制定《非常时期粮食治罪暂行条例》。

五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

五月十四日　晋察冀焚毁阳曲敌粮秣仓库，计大米等万余石。

五月十六日　华中局在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刘少奇就“皖南事变”的原因，经过及经验教训作了报告，会议批判了错误估计时局的“左”倾思想。

同日　皖北汤恩伯部骑兵第六师集中两个骑兵团搜索新四军寄居民家之伤病员，加以捕杀。

同日　云南耿马附近发生七级地震。

五月十八日　美国向日本提议，愿与日本缔结协定，要求日本取消不以重庆为对手之声明，日本军自中国内地撤退，保证不向南洋发动战争并不利用三国同盟以反对美国，则美可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支配地位，予日以重要经济让步。

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下旬　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召开扩大会议，陈毅作了建军工作报告，批判了项英在建军工作中的错误，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从政治、军事、行政(后勤)三方面进行部队建设。

五月二十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增设粮食部，任徐堪为部长。

五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同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代写了《论目前战局》的社论，指出世界战争的范围正由欧洲、非洲发展到亚洲，由地中海大西洋将发展到太平洋；中国抗战仍应坚持动员民众、独立自主的原则，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日　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号召地主回乡，保障其收租与身家之安全。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著文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问题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三三制”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

五月二十六日　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举行，讨论边区施政纲领执行办法。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

同日　延安公营商店联合会成立。

五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军委、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布告，规定所有公营商店应照章缴纳政府各项捐税。

同日　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关于十八集团军行动问题，谎说：“截止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日军接触”。

五月二十八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抵制仇货运动周。

六月一日　中共中央颁发《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

同日　伪河北省津海道公署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报告《强化治安实施情况》。

同日　《新华日报》刊载周恩来代写的《论时局中的暗流》的社论，指出，西方的英德妥协、共同反苏，东方的日美妥协是时局中的暗流。

六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令陈克成为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

同日　日军在华北各地大肆捕捉壮丁，仅晋西北已有三万人被捕解往太原。

六月五日　日机狂炸重庆时，重庆防空大隧道洞口堵塞，死亡万余人。

六月六日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与山东伪和平军联合组成“剿共联军”，向八路军山东军区广饶后方机关进攻。被击退后，又勾结广饶日军柳泽大队组成“中日剿共联合办事处”，再度袭击八路军于广饶。

六月十五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贸易局在延安开始平价运动。

六月十六日　汪精卫抵日本神户。

六月二十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令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六月二十二日　德国片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卫国战争。

同日　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为蒋介石政治顾问。七月十八日拉铁摩尔抵重庆就职。

六月二十四日　汪精卫晤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六月二十八日　成都发生抢粮风潮。

六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外交部长郭泰祺、粮食部长徐堪就职。

六月三十日　太原日军将所抓壮丁二千余运往石家庄，将火车铁门紧闭，被窒死千余。

同日　德驻日大使向日外相松冈劝说日本进攻苏

联。

七月一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同日　晋冀豫边区生产贸易局成立，王兴让、林海云分任正副局长。

同日　冀太区行政干部学校成立，校长杨秀峰。

七月二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题为《论党内斗争》的演讲。系统地分析了我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内斗争中的偏向，批判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提出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即要用对党对革命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划清思想原则界限，采取温和的方式、诚恳坦白的态度，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必须给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机会；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这些原则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有力武器。

七月四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

七月七日　八路军总部发表《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

同日　晋冀豫军区、鲁西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

同日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出席会议参议员一百三十三人。当选的边区参议员有李大章、李雪峰、邓小平、何云、滕代远、申伯纯、王悦尘、杨钰等四十六人，通过宋维周、石璜、邢肇棠、王乃棠、李雪峰、王悦尘为主席团。

同日　华北敌伪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同日　日本派冈村宁次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

七月八日　马来亚华侨每月汇账款归国由五十万增至七十万元。

七月十三日　刘少奇《答宋亮同志》一信，阐述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作用。

同日　美红十字会决定以价值百万美元之药品援助中国。

同日　苏英签订联合反对德日法西斯的协定。

七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通知指出，在反法西斯和驱逐日寇的战争中，中共的任务是：力促时局好转，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月十五日　晋察冀军区发表抗战第四年战绩：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五月，计大小战斗二千八百零二次，毙伤及俘虏日伪官兵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二人。

七月十六日　日本松冈外相提出辞职，近卫内阁倒台。十八日，近卫重新组阁，丰田贞次郎任外相。

七月十八日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决议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七月二十三日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政会通过边区政府组织条例。

七月二十五日　英美封存日本在英美的两亿资金，实行经济制裁。

七月三十日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李大章、邓小平等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七月三十一日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选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孙文淑、李一清、游仪声、宋任穷、刘岱峰、王振华为边区政府委员，杨秀峰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浦化人为高等法院院长。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下设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公署，一个鲁西行政区，共辖一百四十九个县、二十一个专员公署。辖区东起津浦路、西抵同蒲路、北至石德、正太路，南逾陇海路。面积六十余万平方里，人口二千五百万。为便于军事指挥，以平汉路为界，划分为冀鲁豫、晋冀豫两个战略区。

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同日　晋察冀抗战烈士纪念塔落成。

同日　晋西北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历行署改称西北行政公署。

八月3日　中国戏剧抗敌协会晋冀豫边区分会成立。

八月4日　沪法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千二百余，总罢工。

八月6日　抗战四年来华侨对祖国献金共达十五亿六千三百万元，购买祖国公债六亿八千二百万元。

八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指出：十四日罗、邱联合发表的宣言，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的决心，这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

同日　"冀太联办"发出紧急指示，救济敌占区青年，反对日寇抽丁暴行。

八月二十日　晋察冀边区政府筹设蒙藏学院，招收喇嘛寺僧入学。

八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冯钦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公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同日　晋冀鲁豫边区总交通局成立，韩永赞任局长。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颁布食盐专卖纲要，宣布自本日起，食盐对外实行专卖。

九月九日　缅甸政府宣布，自本月三日起，所有根据租借法案运华物资，一律免税。

九月十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

九月十四日　美国著名著作家、诗人、小说家及编辑二十九人以版税五百万元援助中国抗战。

九月十五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始发行生产建设公债。

九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布《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

九月二十日　出现日全蚀。此次日全蚀在中国境内经过的宽度、持续的时间和可见地域，为一五四〇年八月十一日以来三百九十九年中所未有。

九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整风学习，成员包括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委员及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负责人。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九月二十九日　苏、美、英三国莫斯科会议开会，十月二日结束。三日，三国会议备忘录签字，英美代表表示决心援苏。

十月一日　陕甘宁边区颁布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营业税税则分营业税、临时贸易税、烟酒牌照费、牲畜买卖手续费四种。

同日　日军由于国民党军第五、第六战区发起攻势，开始从长沙全速北撤。

同日　国民党统治区田赋开始征收实物，预计可收二千五百万市担。

十月四日　朱德、徐向前、郭化若、叶剑英等人在延安成立"延安黄浦同学会"，选左权、徐向前当理事。

十月五日　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开学。

十月十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上发表《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十条。

同日　美国贷款五千万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即"中美外汇平准基金"。

同日　古巴华侨举行"一碗饭运动"援助中国抗战。

十月十六日　美日进行谈判。日本条件为：(一)美日合作开发中国经济；(二)日美恢复通商，日本不南进；(三)如美不包围日本，日本可退出越南。

同日　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十八日，东条英机新阁组成。

同日　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会词，鼓吹失败主义亡国论。

十月十八日

同日　东条英机发表广播演说称："解决中国事件及建立东亚新秩序，决心不变"。

十月二十六日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犹太、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以及中国蒙、回、藏、彝、满、汉等族代表共一百三十余人。毛泽东和朱德出席了大会，并作了讲演和报告。

同日　陕甘宁边区实行物币混合工资，保障工人生活。

十一月一日　华北日伪实行所谓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以经济掠夺、经济封锁为中心。

十一月六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二十一日结束。林伯渠作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五一施政纲领》和一九四二年度概算决议以及关于税收问题的决议；精兵简政施政方针等提案。选举林伯渠、李鼎铭为陕甘宁边区正副主席，高自立等十八人为政府委员。

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之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普遍发展群众武装，并使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密切结合的方针。

十一月十日　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在琼山县成立，冯白驹任主席。

十一月十七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渝召开。二十五日的大会通过决议案，请国民党政府早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充实战时民意机关与保障言论自由，以促进民治。

同日　汪逆伪政府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

十一月二十七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首次政务会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十二月一日　延安货币交换所成立，同时公布《陕甘宁边区货币交换章程》。

月初　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十二月八日　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威克岛、关岛、马尼剌、新加坡、香港等地英美军。

同日　日军武装接收平津沪各地英美租界并解除英美海军陆战队武装。

同日　美、英、加拿大、荷兰、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法国等对日宣战。

十二月九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十二月十日　昆明五万学生示威，要求蒋介石抗战到底。

十二月十四日　重庆国际文化团体举行扩大反侵略大会，英、美、苏三国大使卡尔、高思、潘友新均亲临会议并发表演说。

十二月十五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渝召开，二十三日结束，决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

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学校教育必须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学校应与社会实际、工作部门相联系，学校中的文化课、政治课、专业课三者不能偏废。

同日　台湾嘉义南发生七级地震。

十二月十八日　新加坡华侨成立总动员委员会，陈嘉庚任主席。

十二月十九日　晋西北行署规定兴县、临县、保德三县设市。

同日　日首相东条发表谈话称：重庆如能改变其态度，则日方极愿接受其它任何和平建议，日虽与重庆交战五年，但仍视中国为姐妹国而未改变其与重庆言和之心情。

军　事

一月一日　晋察冀边区粉碎日寇扫荡，收复阜平城。

一月六日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袭击。

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

一月二十三日　信阳日军沿平汉线北上，国民党蒋鼎文闻风而逃。

一月二十五日　日军五万向西进犯，鄂北豫南之战开始。

一月二十九日　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

二月十九日　新四军讨伐叛国贼李长江，歼敌千余人。

三月二十六日　日军二千余人进攻晋西吕梁山被八路军挫败。

三月三十一日　冀南日军千余名合击曲周。

四月五日　新四军攻克常熟五渠镇。

四月十七日　日军在浙东登陆。

四月十九日　日军侵陷福州，大肆杀掠。

四月二十日　山东八路军攻入博山神头。

同日　晋察冀八路军攻入平山城。

五月七日　日军五万余分三路向中条山进犯，国民党部队十一个军二十五万之多大都避战。

五月十六日　晋南八路军攻克枣阳。

五月十七日　晋西北八路军破坏怀仁与同蒲路。

五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军收复广东惠阳。

五月二十六日　冀晋绥八路军切断华北日军交通线。

同日　冀东日军大规模“扫荡”盘山、燕山、别山地区。

六月一日　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与日军发生激战。

六月九日　日军以四万兵力向冀东区大举“扫荡”，被粉碎。

六月二十二日　晋察冀雁北八路军展开交通破击战。

七月十八日　日军集中兵力二万五千人，分四路围攻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奋战三十四天，粉碎日伪“扫荡”。

七月二十九日　苏北新四军攻克黄桥、孟家市。

八月一日　苏北新四军攻克阜宁、东沟、益林。

同日　蒋介石命令：将陈纳德指挥下之美国志愿空军，正式组成中国武装部队。

八月十日　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十三万以上的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地区进行空前的大“扫荡”，到十一月被八路军粉碎。

九月四日　湘北日军调集八万人兵力进攻驻岳阳东南大云山国民党部队。

九月十四日　湖北日军向南进犯，薛岳望风而逃。

九月十五日　豫北道清西段伪军三万反正。

九月十七日　日军十万进攻长沙，使四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退。

九月二十七日　日军攻入长沙，次日占株州。

九月三十日　粤军收复清远、广海。

十月五日　日军侵占郑州。

十月九日　鲁中八路军攻克蒙阴城。

十月十日　八路军取得“黄烟洞保卫战大捷”。

十月三十一日　日军退出郑州。

十一月十日　晋察冀军民反“蚕食”战役开始。

十一月十四日　日伪军五万人开始进攻苏中解放区。

十二月十七日　日军再度攻陷长沙。

十二月十八日　日军在香港登陆。

十二月二十日　晋冀豫对冀西日军交通线展开全面破击。

同日　日军万余人“扫荡”苏浙皖边新四军。

十二月二十三日　日军退出长沙。

外　交

二月六日　美国调高思继任驻华大使。

二月十三日　美国务卿向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表示愿意向中国“贡献适当与切实的助力”。

二月十四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会见周恩来，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三月九日　美国政府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四月一日　《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签订，美贷给国民党政府五千万美元。

四月二十五日　英、美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分别签订《外汇平准基金协定》。

五月十九日　驻苏大使邵力子电告国民党政府，苏联决定继续援助中国抗战。

同日　美驻日大使格鲁与松岗密谈，阴谋制造远东慕尼黑局面。

六月五日　中英五百万磅出口信用借款协定在伦敦签字。

七月一日　德、意、罗、保、匈五国承认南京汪逆伪政府，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与德、意、罗、保、匈断绝邦交。

七月十四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中英两国关于撤消不平等条约之换文，表示战后撤消"治外法权"。

八月十九日　国民党政府因丹麦承认汪精卫政府，决定断绝与丹麦的外交关系。

九月五日　《中苏贸易合同》签字。

九月二十二日　《中缅移民协定》成立。

十一月十六日　中、英、美三国协商决定共同保护滇缅路。

十二月九日　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对日、德、意宣战文告。英、美、中、加、荷、澳、新(西兰)、法等国联合阵线形成。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

经　济

一月一日　陕甘宁边区颁布《各县市地方财政收入暂行章程》，规定各县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

一月三十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

二月三日　"冀太联办"颁发统一货币、巩固金融布告。

二月十八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责令边区银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边币。

二月二十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发行建设救国公债五百万元，开发边区富源。

五月一日　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成立。

五月八日　"冀太联办"颁发《晋冀豫区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

五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滇缅铁路基金公债条例》，债额为一千万美元。

五月二十三日　渝蓉等地粮价飞涨。

六月十日　国民党行政院制定《战时田赋征实物滞纳办法》和《欠赋催征通则》。

九月八日　上海外国银行十四家表示与国民党财政部合作，停止经营外汇黑市。

九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沿海内迁工厂达四百余家，器材约七万吨。

十月十日　美国贷款五千万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即"中美外汇平准基金"。

十月二十二日　中英信用借款委员会在伦敦成立，郭秉文及英代表马可文当选执行委员。

十一月十二日　英美宣布《对华贸易付款新办法》。

十二月二十八日　宋子文与罗斯福、丘吉尔会谈。

文　教

一月十五日　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

二月二十一日　自二月八日至今，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的《生活书店》五十余处被封闭。

二月二十二日　《全民抗战》被查封。

三月一日　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被迫停刊。

四月八日　《华商报》在香港创刊。

五月十五日　《新中华报》同《今日新闻》合并，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六月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取缔书刊一览》。

七月七日　《晋冀豫日报》创刊。

八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决定把陕北公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为校长。

八月三十一日　《解放》半月刊停刊。

九月五日　国民党教育部下令解散重庆大学。

九月十八日　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成立。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五大书店被日查封。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2年

导　言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热情，又有利于联合地主、富农的大多数一道抗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二月开始，晋西北、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反“扫荡”斗争。日军步步进逼，使根据地逐步缩小，使八路军损失较大。中共中央和军委及时指出应内线坚持，外线出击，发动全面攻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扭转局面。经过艰苦斗争，到本年冬季，敌后抗日斗争开始好转。

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蒋介石请美国派遣参谋长来华。三月四日，美国史迪威中将来华。蒋介石本打算通过史迪威获得更多美援，史迪威却主张动员中国更多的力量抗击日本，反对制造内部摩擦，同蒋介石产生了深刻矛盾。

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方面组建了赴缅远征军。但因英军阻挠，赴缅工作时断时续。本年三月，日军占领仰光，英军节节败退之际，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成立，即刻开赴缅甸。由于英军只是想利用中国军队掩护其撤退，中国远征军经过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激战之后，陷入日军追击和合围，遭到惨败。

四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毛泽东年初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明确规定整风的方法、步骤。二十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陆续开始整风；六月后，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这次运动，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为夺取浙赣铁路运输线，破坏机场，日军于五月发动了浙赣战役，进攻金华、衢州。由于国民党军临战怯敌，节节败退，日军很快占领金华、兰溪、衢州。七月下旬，日军因兵力不足，停止进攻，并放弃金华、兰溪等地。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军丧师失地，衢州机场被彻底破坏，损失极为严重。

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声称要集中建国意志，举国一致真诚团结，不应再有政见异同，要以三民主义这一唯一真理统一全国。会议开辟了国共两党今后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的途径。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延安整风
- 减租减息运动
- 1942 年的反"扫荡"作战
- 宋庄战斗
- 史迪威来华
-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 浙赣战役
-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

延安整风

背景介绍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延安成为党领导抗日斗争的中心，全国各地大批革命青年冲破重重阻挠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 4 万人，发展到 1940 年的 80 万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受过严酷的革命斗争考验和党性锻炼，在他们身上往往带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另一方面，1935 年遵义会议以后，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是，对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其错误影响尚未肃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还严重地影响着党的队伍。因此，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是非，从思想上整顿党的队伍。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是党的建设上的一项迫切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普遍整风阶段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的领导，中共中央作了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并且成立中央总学委会作为整风领导机构。

在整风的准备阶段，以党的高级干部为重点，从延安开始，组织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和党的文件，掀起一个全党的学习热潮，为普遍整风打下了思想基础。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自此，转入了普遍整风阶段。6 月，中央总学委会作出决定，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范围。自此，从延安到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和华中地区的各个根据地，以及党设在国统区重庆的南方局，都投入了整风运动。这一阶段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普遍整风阶段到 1943 年 10 月告一段落。从 1943 年 10 月开始，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并作出正式的结论。在高级干部学习讨论基础上，1944 年 4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作了结论，从而统一了全党对历史争论问题的认识。这些结论，后来都写在 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至此，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始终运用了学习和反省两个基本方法，坚持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 22 个文件，普遍自觉反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在自己身上的表现，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作风有了明显的转变。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教条主义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法，帮助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改造了世界观和思想作风，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这次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次整风运动有效地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在各个方面顺利地贯彻下去，使党能够领导解放区军民战胜抗日时期的严重困难，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创举，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

材料：

· 毛主席为啥要搞延安整风

- 延安整风的全过程
-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 王实味与《矢与的》墙报上的论战

材料一　毛主席为啥要搞延安整风

这一点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941年的国内环境是，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全国已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然而蒋介石看日不抗日，还让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和山西的闫锡山、甘肃宁夏的"五马"，陕西的何绍南等军阀对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并且，日伪和蒋介石都派遣了一些汉奸和特务随爱国青年的热流混入延安。当时在陕北工校破获一批特务，他们的代号是"24"。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这些特务有的高举红布、镜子、脸盆、白布，佯装躲藏样向毛主席驻地北门石窑那里跑去。飞机的炸弹都掷在北山和北门那里。轰炸完后，我们清埋尸体时，发现陕北工校的学生最多。其中有的衬衣角内都有"24"的代号。有的特务还冒充"地下党"打进了党的内部。这些特务最经常的活动是煽动群众蛊惑人心，以从思想上瓦解党和革命人民的战斗力。

当时的延安确有些人被这些特务的言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所吓倒，思想上对革命的前途发生动摇甚至叛变革命。在这以前的1938年张国焘就叛变了革命，我们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朱道松也叛变了革命。

在共产党内，与此形成对映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有些人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或是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绝对化，从书本上个别词句出发，生搬硬套，乱搞一气；或从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把狭隘的经验即感性绝对化，满足于局部经验，把它当成普遍真理，轻视理论的指导意义。这就是毛泽东所要整顿的学风，解决主观主义问题。

那么党风呢?毛主席说是反对宗派主义。当时的宗派主义倾向确实随处可见。例如有些党员受了国民党及日伪特务的语言煽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听之任之无形地成了坏人的传声筒；再加上很多党员都还没有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因而和你亲，和我疏和他有意见，弄得党内帮帮派派经常有些不团结的现象发生。

那时的延安为了活跃人们的生活，每礼拜六晚六点都由工会、共青团组织跳交际舞。当时有的坏人就从中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说跳舞是"肚皮磨肚皮"的事情。有些党员不进行冷静的理智思考也跟着乱说，起哄。老百姓对跳舞的意见也很大，认为男男女女成双成对抱在一起打转转，这不是为了"磨肚皮"又是为了什么呢？结果，舞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组织不起来啦。

延安新文化运动难以兴起，党八股之风确极为盛行。有些心怀叵测的人也借着党八股的腔调利用文章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如有一篇叫《叶北荷花》的文章很流行，它客观上就是起到了挑拨前后方关系之作用的。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就一针见血地批判过这篇文章的反动实质。这时的糟粕文化也很抬头，例如"抗大"有一个从白区来的学生，他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却手拿麻将牌在大街上大喊大叫"三缺一"……

所有这些都从思想上、组织上、文化上等不同的侧面极大程度的侵蚀着党的肌体，挖革命营垒的墙脚儿。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很多人都身受其毒却不知其毒，思想都处于麻木的状态。

整风刚开始时，我们很多党员都认为与已无关。

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思想。认为自己也参加过反"围剿"，渡过金沙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思想上是一直要求进步的。革命意志也从来没有衰退过，就是今天的机务工作也干得蛮出色嘛。自己不怕苦，不怕累，整修设备时经常滚一身油，弄得爱看《牛虻》小说的几个年龄相仿的姑娘都躲着我走，怕身上的机油味儿。时间长了，她们开玩笑叫我"油虻"。可是，当我们学习了一些文件之后，尤其是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对我思想振动很大。对照主席讲的那十一条自由主义的言论，才发现自己还真有自由主义呢。如对一些不力于革命的言论听之任之，有时也跟着瞎议论；有时也和党内的同志闹一些无原则的纠纷等等。

总之，延安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发动了这场整风运动，当时的党就很难形成空前团结的局面，就很难说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至于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更谈不上了。延安整风作为一种思想革命运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到了卓有成就的伟大作用，这是全党公认的。

至今我对毛主席那个伟大的创举都是无限崇敬。

（选自《革命春秋》92年4期，作者：贾逢春）

材料二　延安整风的全过程

延安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准备时期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

线问题的学习开始的。1938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组织很不巩固，在发展党的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9 月，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创造了一个根本条件，党中央的领导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全会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会议还提出要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着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 年 2 月 27 日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学习中，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加强对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全党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总结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纲领上分清了两条路线的是非，对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团结全党，起了极大作用。

1940 年 12 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从党的政策上区分了两条路线的是非。

但是，对于王明“左”倾错误的认识在党内存在分歧，这种认识分歧说明在党的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经验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对于党的路线认识还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有必要领导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经验、党的路线问题进行认真的学习。为了领导好这个学习，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件《六大以来》，后又编印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 1 年多酝酿准备的基础上，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正式开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了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对于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方针的指引下，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了党的历史文献，进行了多次讨论，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在这个基础上，1941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的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还检讨了党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了党的领导机关从 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这一段历史中所犯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以后的几个月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同时，中共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性措施，积极整顿党的作风。

在政治思想上，1941 年 4 月，毛泽东主持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委员会，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好了这本书。7 月，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 月，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1 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12 月，中央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这些文件和著作陆续发表以后，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从 9 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社论，引导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

在组织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1941 年底到 1942 年初，中央改组了党校，坚决纠正党校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贯彻整风精神。同时，中央还加强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了调查研究局。

在一般干部中，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有关整风的文件。经过几个月的思想酝酿，广大干部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入地开展整风学习。这样，到 1942 年初，整风运动就由准备时期发展到在全党干部中进行普遍整风的时期。

二、普遍整风时期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转入普遍整风阶段；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发展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以解决对政治路线的认识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普遍整风时期大体上分为五个阶段进行。

(1)普遍发动阶段。从2月1日—4月2日。在这一阶段，各单位普遍传达了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的计划，普遍地向党员和干部作了思想动员。2月28日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了贯彻党的整风精神，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此期间，中央对报纸还进行了整顿。

(2)学风学习阶段。经过两个月的普遍发动，中央研究了各单位的整风学习情况，总结了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对于整风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于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这个决定是中央指导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四·三"决定发布以后，延安整风运动就转入了整顿学风的学习，共进行了四个月，到8月初告一段落。

学风的学习，着重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在学风学习阶段，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有了进一步深入地发展。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锐利思想武器。

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另一场大改论。这次大辩论，由对党的民主和纪律的一般辩论，转变为批判和揭露王实味的反动言行。

在学风学习阶段，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建立和健全起来了。

延安整风学习进行到6月初，中央学习委员会对整风学习作了初步总结，肯定了学习的巨大成绩，提出了纠正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偏向的具体办法，对于整风学习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规定了有力的措施。中央根据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决定不仅在延安党的领导机关中，而且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这时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

(3)党风学习阶段。8月初，各单位相继转入党风学习阶段，至12月中旬结束。党风学习阶段，着重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学习的主要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反对宗派主义部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民主等文件和著作。

在党风学习阶段，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9月1日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是一次整风会议。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历史经验，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纠正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

在党风学习阶段，中央还强调了反对自由主义"小广播"的问题。

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各单位和每个党员着重检查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对于各项工作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4)文风学习阶段。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文风学习阶段，至1943年3月中旬结束。

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习的文件有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宣传指南》等。在文风学习中，各单位和每个同志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检查了写文章、作决议、作报告的党八股作风，特别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的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

(5)总结阶段。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机关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延安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总结的主要任务：一是各单位全面地检查工作，对普遍整风阶段的学习作出总结；一是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在总结中，又重新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以及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等文件。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一文件的发表，

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结束。

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时期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还组织了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把总结党的历史问题和各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详细地阐述了这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回答了干部们在学习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党在七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做了总结。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即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1945年4月23日，中共又召开了七大。七大的召开，达到了团结全党的目的，同时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结果。

延安整风运动促进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完整化。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全面地总结了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随着党在理论、路线、政策上的成熟，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也完整地形成了。其中，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的整风著作和中央有关整风的文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选自《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

材料三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在延安中央党校，我参加了整风学习。

这次整风学习可概括为十六个字：自学为主，互相帮助，刻苦钻研，实事求是。主要是学习《整风文献》一书。对该书每篇文章学习的程序大体是：个人学习、小组讨论、支部大会讨论。三者又互相反复结合。个人学习的方法是：从粗读到精读。粗读的目的主要是明白通篇大意。精读的要求是逐字、逐句、逐段地读，反复钻研，彻底弄懂弄通，然后再纵览全篇，探究它的中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再转入第二步，即以文件的中心思想和精神实质联系个人实际，包括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和现状实际，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有的放矢。真正找到个人实际中的主要问题后，再进而追本溯源，多问几个“是什么”和“为什么”，从而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寻找出正确的方向。在上述两个步骤的各个环节上，都要写详细的学习笔记。不仅个人学习要同小组讨论及支部大会讨论互相结合，而且个人学习的两个步骤之间，甚至它们的各个环节之间也都要互相结合。

中央党校第二部共有十八个支部，我们在支部大会讨论的基础上，也曾开过些第二部的全体大会，有的是讨论问题，有的是介绍经验。

为了在学习中充分发扬民主，在中央党校礼堂，一个多月内曾经先后召开了多次全校性的自由思想大会（以一、二部的学员为主）。一千多人，人人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济济一堂，非常踊跃，登台者络绎不绝。在众多的发言者中，给人印象最为突出的有两位同志。一位是第二部学员、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他坦率提出对知识分子干部的看法，即：“三会、二无、一有。”也就是会说、会写、会拍；一无革命历史、二无工作经验；有政治问题。时隔不久，在另一次同样的大会上，又有一位第二部学员、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登台发言，在全面批驳“三会、二无、一有”的说法后，摆出了他对工农干部的看法，即“三大要求，八项注意”。三大要求是名誉、地位、享受；八项注意是钢笔、手表、马、驳壳枪、老婆等（记不全了）。他们二人的意见一出，全场反映强烈，台上台下，议论纷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一时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意见。后来，大会上又出来第三种意见，对上述两种意见各打五十大板。全校性的自由思想大会休会期间，各支部、各小组都进行学习讨论。全校性的自由思想大会结束后，第二部召开了全体学员大会，上述那两位率先提出尖锐对立意见的同志，都主动登台做了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批评。

在全校性的自由思想大会上，还有一位陕北的老干部，也是二部的学中，登台揭发批评了高岗。当时高岗正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据说他闻讯后就给彭真同志（中央党校副校长）打电话说：“这个干部原来并没有什么意见，怎么一到党校意见就有这么多?!”彭真同志当即回答说：“事实证明，这位同志过去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过去没提，现在才说罢了。”

在整风学习的后期，我们每个人都写了自己的思想总结。以《整风文献》的精神为思想武器，对个人工作、思想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经验教训，力求做出实事求是的总结。从而使个人整风学习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延安整风学习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它推动了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和团

结，为党的“七大”开成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鉴于中央党校当时集中了绝大多数党的“七大”代表以及党、政、军各方面为数众多的高、中级干部，如果说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在当时整个延安的整风学习中起了骨干作用，那也毫不过分。

（选自《党史纵横》90年5期，作者：鲁森）

材料四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虽然身受三座大山压迫，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积极性，在主观上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但由于不同程度地还带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与语言都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革命的大方向发生矛盾。如在文艺思想上坚持超阶级的“人性论”、“艺术第一”等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在艺术上存在着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轻视那些反映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小节目，认为那是“小玩意”、“豆芽菜”。一些人更错误地提出什么在革命队伍内部“反对功利主义”，“反对歌功颂德”，还是鲁迅笔法；分不清延安和西安。在创作上，热衷于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遭遇、生活琐事和消极情绪，对工农干部和劳动人民则不屑描写，甚至歪曲了他们的形象。

为了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经验，端正文艺方向，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当时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服务，我们党在发动全党整风的同时，开展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马、恩、列、斯关于文艺问题的著作和《整风文献》，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进一步暴露了文艺界的思想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集中解决文艺方向和根本道路问题，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杨家岭党中央办公楼内的一间大厅中，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扬、艾青、钟敬之、艾思奇、欧阳山、李卓然、李又然、李元庆、李丽莲、朱德、王稼祥、徐特立、博古、邓发、古元、任弼时、何凯丰、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李伯钊、丁玲、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罗工柳、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周立波、马加、曾克、高阳、张仃、雪苇、蔡若红、胡蛮、金紫光、于明；天兰、江丰、李雷、姚时晓、王震之、袁文珠、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张寒辉、郭小川、胡一川、王朝闻、马达、杨轶、向隅、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潘琦、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纪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阿甲、刘志仁、张季纯、张贞敝、丁浩川、郁文、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王斌、于学伟、张悟真、陈波儿等约百人。

座谈会共开了三次。5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会上，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问题分别作了论述。接着文艺工作者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分组讨论。5月8日召开了第二次会，主要是进行大会讨论。有一位文艺工作者在发言中说到他们的剧团到农村演出，很受欢迎。每到一处演出，农民都送鸡蛋给他们吃，要知剧团在什么地方，顺着路上撒的蛋皮去找吧！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拿出更好的节目为群众演出，不敢骄傲自满，不然的话，下次群众就不给你们吃鸡蛋了，引得全场一片笑声。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接着，朱德讲了话。他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一些看法。如谈到立场转变问题时说：“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拚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在谈到有人抱怨延安不如大城市生活好时，他说：“外面大城市生活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会上，毛泽东作了《结论》的重要讲话，精辟地论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问题。

这篇《讲话》正如中共中央整风学委会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中指出的那样：《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通知要求各地收到这一《讲话》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还要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中宣部也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贯彻《讲话》精神，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摘自1985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期《毛泽东与延安文艺界》一文，作者雷云峰）

材料五 王实味与《矢与的》墙报上的论战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的基本情况是：从未做过任何工作的占百分之六十八，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百分之八十四，抗战以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四，二十至三十岁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知识分子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二。

整风开始前，延安已经存在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在青委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壁报上存在这种思潮。院内以王实味，(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种思潮。尤其王实味，他在 1942 年 2 月 17 日、26 日和 3 月 7 日，连续公开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向党发"牢骚"，就是说，向党开火。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确实反映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整顿三风，对中央研究院来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1942 年 3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一些同志发言后，我也提出了几点意见。我的发言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关于整风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3 月 23 日，为配合整风检查，中央研究院的墙报取名《矢与的》，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这个发刊词强调发扬民主是正确的，把民主绝对化，根本不提集中，是片面的。少数人就利用这个弱点，在《矢与的》上再次挑起了动员大会上的争论。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零感两则》，说："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王实味确实是在煽动人进行攻击了，他的矛头不仅限于院内，主要是我，也不限于我一个人，而且到了院外，影射向上了。除王实味的文章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这些文章和漫画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少数同志，处于"孤立"地位。

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上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在一个晚上也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一部分人因此得意忘形，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3 月 31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矢与的》墙报上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 8 辑《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一文，作者：李维汉)

减租减息运动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后，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1937 年 2 月，党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关于减租的实施办法，根据 1930 年 6 月 30 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法令第一百七十七条关于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总获量 375‰的规定，华北地区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 50—60％的实际情况，党中央提出实行二五减租。规定，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抗战前租额为准，减低 25％。不论公田、私田、佃租地等，均适用。在游击区及敌占区点线附近，可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发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

关于减息，党中央规定，对于抗战前的借贷关系，应以一分计息为标准。如付息已超过原来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至于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

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调整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材料：

· 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与完善

材料　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与完善

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

结各阶层一致抗日，在根据地实行的一种特殊土地政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在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彻底土地革命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到了次要地位，我党土地政策从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开始，就逐步向减租减息政策转变。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四项保证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5月，党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宣布将土地革命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即“实行‘二五’减租”。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如“减租、减息”等等，以“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8月22日至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陕北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了于8月25日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以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二五减租”（照原租额——一般占收入的50%—减掉25%，即地租不得超过收入的37.5%），和“一分减息”（以年利一分为最高标准）、“半分减息”的政策。1939年冬至1941年底，各根据地的中心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

为了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坚持敌后斗争，渡过严重的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减租减息的以下三条基本原则：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是减轻农民的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减租减息之后，农民还须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因而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和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和联合富农，对富农封建性的剥削，也须减租减息。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须责成各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根据这一指示，1943年秋冬，各解放区陆续开展了查租工作，使减租减息的运动进一步深入。

1944年以后，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各根据地又普遍开展了查租减租运动。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把减租减息运动同反汉奸、反恶霸、反贪污的斗争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并取得了巨大成绩，自觉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同时也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减租减息政策仅仅是一项削弱、限制封建剥削势力的土地政策，带有改良的和过渡的性质，并不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势力和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又及时制订了新的土地政策。

（选自《抗日战争时期事件与人物》）

1942年的反“扫荡”作战

一九四二年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筑碉堡七千七百余个，修壕沟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余公里，进行了约七十五次“扫荡”。比一九四一年更残酷。初期，我军民缺乏经验，步步退缩，根据地缩小，损失较大。后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北方局，“集总”多次发出对敌斗争指示，提出了内线坚持，外线出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组织党政军民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把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结合起来，发动全面攻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扭转敌进我退局面。之后，各地区普遍组织了游击集团、“武工队”，提出了“打到敌后之敌后”的口号，深入敌战占区、边沿区，建立游击基地，开辟新区。

从二月开始，敌华北方面军对我太行、太岳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两期“驻晋日军总进攻”。二月三日，以一万二千余人的兵力“扫荡”太行区，以七千余人的兵力“扫荡”太岳区。我军主力乘隙转入外线，一个月作战三百九十余次，歼日伪军三千人。五月，敌发动第二次进攻，以两万五千余人“扫荡”太行北部，七千余人“扫荡”大岳南部地区。经三十八天作战，又歼灭日伪军三千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五月二十五日在作战中牺牲。在“扫荡”晋冀豫根据地同时我晋西北部队也粉碎了敌人集中万余兵力的扫荡，其中著名的田家会战斗，给进犯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

四月底，日军集结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共约五万余人，于五月一日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区进行“拉网大扫荡”（习称“五一大‘扫荡’”）。在冀中八百个村庄，先后建立了一千六百多个据点，根据地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个小块。我军主力一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大部奉命转至太行、北岳、冀鲁豫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先后于深泽县的东白庄和宋庄战斗中给日军以重创，并击毙敌坂本旅团长。与此同时，冀南我军粉碎了日军万余兵力

的"扫荡"。

在冀东，敌于四月和八月分别集中三万兵力和四万兵力，进行两次大"扫荡"把冀东分割成二十余块，制造了东西七百里，南北八十余里的无人区。我以精干部队坚持内线的分散游击战争，主力转至热河南部地区，开辟新区。

九月至十一月，我冀鲁豫、鲁中、胶东等根据地，先后三次粉碎了敌人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坚持了敌后的游击战争。

华中抗日根据地，十一月十日，日军以五千余人合击淮海区，将淮海区分割成若干块，同时，又以六千余人，反复合击与"清剿"淮北区。淮北军民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作战三十余次，其中泗县城北朱家岗战斗歼敌二百八十余人，并乘胜攻克泗县金锁镇、青阳等据点多处。月底，敌二千余人"扫荡"淮南区。

经过我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从一九四二年冬开始，敌后抗日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材料：

- 人类公敌的暴行
- 粉碎"囚笼"
- 共产党员当上"维持会长"
- 地雷战炸破敌胆
- 地道战大显神通
- 洪流溃铁壁　浩气贯长虹
——"四·二九"反"扫荡"纪实
- 向"杀人魔王"佐佐木讨还血债

材料一　人类公敌的暴行

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这一次敌寇集中四万兵力，"扫荡"边区，和过去不同，这次叫做"毁灭扫荡"，敌人企图彻底摧毁边区，把整个边区造成一个"无人区"。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

经过三个月的猛烈的反"扫荡"斗争，边区一千二百万的军民，终于把敌寇打跑了。

但是在这反"扫荡"的三个月当中，在敌寇"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之下，边区遭受到野兽所给予的空前未有的灾难。敌寇的罪行，应该公布出来，让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东方法西斯日本强盗，在中国解放区所干的什么勾当。

不过，我这儿所得到的还只是一些不完全的材料。

在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二十一个县份，约有一百万人的地区里，敌人就干下了这些罪行：

惨杀六千六百七十四人（内负伤者九百七十六人）；

烧毁房屋五万四千七百七十九间；

抢掠与烧毁人民粮食二千九百三十四万斤；

抢走耕畜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头；

抢走猪羊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九只；

抢毁农具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五件；

抢毁衣被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三十件。

显然这统计是不完全的，比如敌人进入解放区到处挖掘人民所坚壁的东西，人民留在家中的一切日用品，这就很难统计了。而人民被杀害也绝不止六千多，并且敌人的杀害的方法据统计当在百种以上，比较常用的是：活埋，打靶，吊死，刺杀，灌水胀死，毒气毒死，铡死，锯死，碾死，喂洋狗，煮死，腰斩，悬崖摔死……以至于肢解，剜心，凿眼，剥皮——这些，有的是在死前就肢解等，有的则在死后还要把心剜出来。

血　海　深　仇

敌寇败退以后，边区的房子到处在燃烧着，甚至边区每一村庄，没有不被敌人烧毁了一部或大部，被屠杀的尸首更处处皆是，在自由的土地上，淤着一片很厚的紫黑的血层。

最残暴的是敌人在平阳的罪行。平阳惨案的罪犯是荒井，他部队里有专门杀人的队伍，叫做"红部"。当他从覆口开会回来，"红部"就忙起来了，在村里逮捕了许多老百姓，驱使到屠杀场去，一天之内杀死了一百四十人。当他的部队被打败，撤退的前夜，他集合了六十多个妇女，问她们是要跟着走，还是要回家。他们没有一个愿意跟着去被污辱的，都被敌人剥去衣服，砍了头。另外，敌人还把村里一些男女捉到广场上，脱掉他们的衣服，强迫他们赤身裸体地跳秧歌舞，然后又强迫他们在大众面前集体性交，不肯的，马上就砍掉头，有的就用裤子包着头，推下悬崖摔死的。

曾经有一位孕妇，被敌人捉住了。失去了理性的日寇，把她放在一口棺材里，另外叫来二十多个妇女，把她们衣服剥光，命令她们站在旁边目睹兽行的进行：首先敌人破开她的胸膛，胸前的皮肉给撕到乳房旁边，摘出了一颗鲜红的心；接着又破开她的肚子，用刺刀挑出一个未足月的胎儿，胎儿何辜，还没有出世，就遭到日本法西斯的刺刀了！棺材里流满了血，母亲就浸在血流里。二十多个勒令旁观的妇女掩面不忍看下去了，敌人趁此威胁她们：说她们如果要回去，就照样的被杀，而且心要炒了吃的。这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威胁的话。实实在在做了，并且不止一次。土山村李小更几个人的心肝，就是被敌人摘下炒了吃的。罗峪村刘耀梅拒绝被敌人奸污，敌人砍下她的头，扔到井里，同时从她腿上割下肉来，去包饺子吃了。

过去，我总觉得"吃人的魔王"不过是愤怒到了顶点

时候说出的一句骂人名词，现在才清楚用在敌人身上是说明一件事实。而且还不能完全说出他残忍的面目来。

这样残忍的罪行不止在平阳。在井陉县黑水坪老虎窝村，村里一百数十个老百姓就中敌人烈性瓦斯弹而死了，皮肤变成了紫色，腐烂，最后化成了血水。村里村外还躺着尸首，有的被敌人烧死了倒吊在屋梁上，有的被开水从头上浇下烫死的，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有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婆被强奸后，死在墙角落里，阴户里塞了一根木头。

在平山县南村，十二月十二日敌人包围了村子，村里大部分老百姓给围住了，敌人带了十七个老百姓走到一条深沟面前，叫他们自己解开钮扣，反缚起手来，马上把他们推入沟内，野兽们就从上面刺下来。一个十五岁的小孩，不忍看见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他掉过脸来，低下头去，他的肚子上旋即中了敌人的刺刀。这是一种。有的，敌人叫几十个老百姓背高粱秸到大沟里，叫他们把高粱秸放下来，前面是一堆火，命令他们面对着火，然后几十个敌人从背后山上冲杀下来，四处都是敌人，中间是火，这几十个人便活活地烧死了。敌人看人被烧焦时发出那种凄厉的叫喊，竟然拍手狂笑起来！

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传遍了边区。至于敌人在平山焦家庄用铡刀铡死二百多人，敌退出时，铡人用的门板的血迹堆得有半寸多高，两个水井里尽是没头没胳臂的尸体。又如柏叶沟，敌人退走时绑去村中所有的人，在路上把妇女的衣服剥光，强迫她们跪在路旁，然后把所有的男子全部杀光，这叫做“陪杀”，其次象在柏崖村，敌人用一口大锅烧水，把水烧开了，扔下两个活蹦乱跳的小孩，活活煮死，一个妇女被轮奸后，也同样被活活煮死了——这样的暴行几乎到处都有，写不完的！

这些事是人能做出来的吗？即连野兽也不会残忍到这步田地吧？只有披着人的外衣的法西斯野兽才能做出来的。

暴行的自供

前面所记的，不过是传闻开来，或者是暴行之后的遗迹，是很不完全的。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当然，这也还是极少的一部分，因为工农学校的学生有限，出席的人不多，但我们从此可以更进一步看到敌人残暴的面目。我这儿仅把那次座谈关于晋察冀之部分记下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独立第三混成旅团有一个长谷川中队长，在河北临城捉了两个八路军，把他们背捆起来，帽子拉下，遮起眼睛，送在壕沟面前站着，让我们五个幼年兵，去练习胆量，去刺杀。我们有些害怕，把眼睛闭起，只是刺上了臂膀他们就倒下壕沟里去了。以后从沟里又把他们拉出，又让别人来刺。最后又由中队长把他们的头割去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月田自称）在太原时，冈村宁次大将，每隔十天，就在太原门外集合六十个俘虏，排成一列，脱去上衣，背绑起来，让幼年兵刺枪，还在痛得呀呀叫的时候，就用石头土块活埋了，一个月内杀了二百多名。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师团小原大队下面宪兵军曹佐藤，在河北任邱，把二十八名八路军放在庙中，周围被带着枪的士兵看守着，让二十四只军犬去咬他们的咽喉、胸膛，人临死挣扎的叫声，军犬的咆哮声，杂在一起，实是惨不忍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混成第八旅团驻在河北省沙河县，佐野中队长的伊藤军曹，解剖了一个老百姓，将肝取出，说是能治妇人病的一种药，而偷偷地贩卖。还有一九四一年九月安部中队长，渡边军曹，佐佐木伍长三人为了医治梅毒，将老百姓的脑袋打破，取出脑子来。

“混成八旅团的田中中佐，在一九三四年‘扫荡’时，曾袭击高悬着红十字旗的八路军医院，把病人钉在墙上，挖掉眼睛，割掉鼻子，耳朵，生殖器，然后烧死。

“同时混成八旅团的井上中佐把一百多名的八路军和老百姓，一部分用轻机枪射死，一部分装在棺材里烧死！

“一九四二年三十六师团，师团长安达中将，在易县狼牙山将五十名避难妇女剥得精光，要他们送水，送弹药，并于强奸后枪毙。还把几十个老百姓放入井里，从上面丢下石头砸死。

“一九四〇年在内黄、清丰县战斗时，三十五师团召集三千多名老百姓训话，刚讲完‘日军拥护中国人民’后，从四面用轻机枪十几挺将他们射死。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一〇师团长桑木中将在宿县射死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孩子不知母亲已死，吸着母亲的奶啼哭。又同一师团上板大佐同年在冀中，将妇女绑在树上，用中国造的手榴弹塞在阴户里，然后在六丈来远的地面拉线炸死她们。

“一九三九年混成八旅团后泽中队长，在晋县用刺刀剖开两个孕妇肚子，拉出小孩来，劈开小孩的脑瓜，并在脑瓜上贴一张纸，上面写上：‘八路军杀的’。

“一九四二年混成八旅团水上少将，在定县把避难在地道的八百余老百姓用毒瓦斯毒死……”

够了，不必再记下去了。

（选自《群众》1945年第10卷第20期，作者：周而复）

材料二　粉碎"囚笼"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巩固其南进的后方，实现"建立大东亚兵站基地，完成华北参战体制"的战略目的，更加强调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而集中兵力于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周围，举行空前频繁的"扫荡"战。"铁壁合围"、"剔抉扫荡"、"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军事进攻的名目举不胜举，敌人妄图用这些残酷手段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我太行二分区，楔于正太、同蒲、白（圭）、晋（城）三条交通线之间，曾被称为"太北的门户"，是日寇"扫荡""蚕食"最凶的地区之一。到一九四二年初，全区纵横九个县境的根据地，已被割裂为一条条一块块，完全变成了"格多网"。敌人想以"囚笼政策"，闷死我们，挤走我们。

所谓"囚笼政策"，实质上是德国赛克特绞杀殖民地的手段与清末湘军头子曾国藩的保甲制度的结合体。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我根据地构成网状压缩包围。在这严重的局势下，许多人都为此惴惴不安，群众斗争情绪也大受影响。我们虽不断地进行反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并不能遏止敌人的凶焰。

敌人为巩固其"囚笼"统治，疯狂屠杀我抗日人民。在昔西西峪村，敌以"通匪"为名，将全村男女老幼六百余人大部分杀害。西峪村血迹未干，日寇又活埋我抗日群众一千余人于昔阳城下……。在血腥的军事镇压之后，敌人以"政治作战"为主的法西斯统治，迅速在占领区内全面展开。不仅伪大乡、维持会之类的招牌堂而皇之地挂起来了，检问所成立了，门牌户口、身份证等等，也都统统发到各户。甚至听说有的村已经开始了全会合用一把菜刀。

反击日寇法西斯统治的风暴，在敌人心脏里卷起来了。我深入到昔西、寿阳、榆太、和西各路的武工队，积极展开了锄奸活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武工队在敌人的"囚笼"中跳来跳去，常常一夜行军百余里，奔袭好几个地方。

我二分区北面的劲敌，是据说"强于政治作战"的敌第四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坐镇在正太线上的阳泉。他趁我武工队立足未稳之时，从阳泉、寿阳、榆次派出了几支轻火器装备的精悍队伍，以小部队对小部队，以分散对分散，向我武工队"合击"和"剔抉"。同时，片山还勒令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特务机关全力对付我们。这个特务机关的头目名叫清水，"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北平从事特务活动。片山称他"中国通"。这个特务头子，亲自率领着特工大队，配合着片山的轻火器队，日夜追捕我武工队。每个村都有他们利用地痞流氓组织的"棒棒队"、"肉电杆"。我武工队每跳到一个村，"棒棒队"就呼啸着鸣锣拿棒赶我们；而"肉电杆"则一村传一村给敌人报信，使我武工队处境极端困难。住不上，吃不上，不得不在荒山野地里熬度寒夜。这时，敌人到处放出谣言："八路军完了，剩下几个跑回大山里去了。"敌伪报纸也狂叫：皇军"囚笼"象铁桶般巩固。

二

我武工队面临着能不能站住脚的严酷考验，少数队员产生了困惑与急躁情绪。地委和分区领导同志，立即根据这种情势，作了研究，指示各武工队，首先要摧毁敌人的"棒棒队"、"肉电杆"，展开宣传、组织工作，使我们的武工队迅速在人民群众中生根。

为免使群众受害，武工队里的"小诸葛"们研究了对重：标语，不再往老百姓墙上贴，专贴在伪政权机关驻的屋墙上、"皇军"的布告栏里以及庙墙上、大树上；武工队员还象邮递员送信那样，挨门挨户塞给群众。另外，还采取了不到会开会的办法：晚上，选个村头高地，让高嗓门的同志拿个喇叭筒，向村里群众"广播"。开春以后，老乡们下地生产，我们的队员便深入田间，一面帮助干部，一面做宣传、组织工作。敌人强迫群众送粮入仓，搜刮得人民饥寒交迫。我们的武工队员就替群众出主意：往粮里掺沙使水，用种种办法拖时间。非送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把"抢"下的粮发还给群众。

各路武工队，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粉碎了敌人割裂我军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阴谋。特别是把"肉电杆"砍掉，使敌人失去了耳目后，我们武工队就不再在荒山野地里风餐露宿，而被群众接到温暖的窑洞里了。一张张笑脸迎着战士，热菜热饭端到桌上。妇女们把战士的棉衣要去拆洗，老太太流着热泪，抚摸着战士的冻伤，说："孩子，你们受苦了！你们可回来了！"

特务头子清水，失去了"肉电杆"，情报不灵了，整天疲于奔命，也找不到我武工队的踪迹。这时，他又出了新花招：勒令所有村庄每天要向附近据点送情报。有"匪"情不报者，杀；情报不确者，烧毁全村。我武工队则控制住伪保甲长，编造各种假情报，要他们往据点里送。这些"情报"，都是按路程、时间编排的我军"行动"图。如：某时，八路军多少人，从南沟村出发；某夜，八路军多少人从李庄路过。敌人各据点接到的"情报"，送到清水手里。从路线、时间一查对，都能碰起头。这样，既掩护了群众，又迷惑了敌人。

这时，我分区主力部队由于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连队人员充足，组织精干，行动轻捷，分散成为若干支小部队，瞅准敌人的空子，跳过去打一仗，打完就走。内线与

外线、主力与武工队，密切协同，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一个月内给清水的特务宪兵队三次猛击。斗争局面有了很大好转。群众暗暗谈论着："天亮了，老百姓该抬头翻身了！""清水那个'中国通'通不过八路军！"

三

这年春天，我军主力部队跳到盘长岭和小堡底，先后打了两个伏击战，歼灭了一百多鬼子。在敌人的"格子网"、"囚笼"里，打这样的胜仗，使敌人惊慌，使群众鼓舞。从此，一些小股的敌人，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各武工队在组织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展开摧毁伪政权、伪组织的斗争。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和依靠群众，在不长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伪组织主动找武工队接头，有的从原来一面应付敌人，而变为两面应付；有的从两面应付，更倾向"暗通八路"这一边。还有的则完全被我掌握和利用。在摧毁敌伪组织的胜利基础上，我军继续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从同蒲路以东，直至平定、昔阳一线，数百里内全面展开瓦解伪军的工作。瓦解的方式，有的打击，有的争取；打击为了争取，争取为了达到瓦解的目的，以便进一步孤立日寇，集中打击日本侵略军。

晋中一带的伪军，大都是当地人，又多是被敌人抓去的，他们跟当地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抓住这个特点，把群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地方党为核心，以游击小组为骨干，发动群众展开村串村、亲串亲、友串友瓦解伪军的活动。人们带上"告伪军书"，母亲找儿子、妻子找丈夫、姐姐找弟弟，用无声炮弹袭击伪军据点。

各武工队，也采用多种方式向伪军据点喊话、散传单、上课，并把宣传内容编成通俗的快板，印成传单。记得有这样一段快板："眼看德国就要完，日本鬼也快滚蛋，他们失败回东京，留下你们怎么办？多做好事留后路，早早回头莫迟延。"

有的武工队，还把一个据点的伪军姓名、经历、家境、个性、嗜好全面调查清楚，夜晚到炮楼下面点着他们的名一个个教育。有的武工队还给伪军立了"黑红簿"，把他们每个人做的好坏事，统统记下，利用喊话的功夫，向他们宣布。这种攻心战，把伪军闹得日夜不安，有的开小差，有的装病回家，有的拖枪投诚过来。一些净做坏事的，也怕了，他们说："坏事干不得，八路一笔一笔都记下了，将来要算总帐啊！"有的伪军开始和我们拉关系，愿做我们的"内线"。在对伪军斗争中，曾有一个"三擒三纵"的故事。

在晋中有一个姓白的伪军中队长，此人在旧军队里混过多年，他的伪军朋友很多，把兄弟成串。我们认为若把他争取过来，对瓦解晋中一带伪军官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曾积极对他展开争取工作。可是，他比较顽固，瞧不起八路军。武工队给他写过几次信，他不但不理睬，还说："哈，八路军那几支破枪，还能放到我白某头上不成！他们有种别写信，来较量一番！"在一次伏击战中，我们把他活捉了。当时他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连口否认他说过的大话。武工队的负责同志对他教育了一番，便把他放了回去。他回到据点里，又大吹大擂起来，说他这次被擒是"运气不好，八路军没敢拔我一根毫毛"。第二次战斗，我们又把他擒住了，问他这次是不是"运气不好"，他连声说："哪里，哪里，你们可调查，自从上次放我回去后，小弟没做一点坏事。"我们的同志回答说："这我们有帐可查。"二次又放他回去。这次回去，比第一次有了转变，替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可是仍然是脚踏两只船，看风头行事。此后我们又第三次擒住了他，经过教育，再度放了回去。从此，他才完全改变了态度。后来他和他的两个"至交"——寿阳的一个伪军中队长，昔西的一个伪军小队长，率领他们的部下，全部反正过来。

经过这一连串的斗争，走过一段艰苦的道路，我们在"囚笼"内，站住了脚，而且根越扎越深，尽管敌人军事上仍占着相对的优势，但他想拔除我们这个"心腹之患"，愈来愈困难了。就在这个时候，垂死挣扎的日寇，发动了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大"扫荡"；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坐镇长治，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中心区，展开了进攻。片山旅团长也指挥他的人马，从昔阳和榆社两个方向出动。片山旅团和大批伪军调走，我二分区压力暂时减轻了。于是军区来电转述刘、邓首长的紧急指示，要我二分区立即组织各种力量，从敌人后方发动攻势，以配合这次反"扫荡"。这时，我们在敌后已不是孤军深入了。凡是有我地下抗日政权的村庄，都有了秘密的民兵武装，许多游击小组已发展成为区游击队了。为加强地方武装，我们从武工队、侦察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到游击队里做队长、指导员，并以缴获敌人的一部分武器，加强了地方武装。

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起来后，曾经在一夜之间，把以马坊为中心的二百多个村的维持会全部摧垮，敌人的一个特工组长，也被老百姓用镢头砍死了。当时，特务头子清水，正在马坊开会"庆祝皇军占领马坊一周年"哩。他得到这个消息，在讲台上气得话都讲不出了。参加会的"代表"，一个个也吓得目瞪口呆。有个伪区长，为了稳定开会人的情绪，强作镇静地说："大家安心开会，不要怕，我们有大军警戒，八路军不敢……"他的话没说完，人群中一声枪响，子弹飞到台上，把伪区长的礼帽打飞了。原来我们武工队已钻到会场里来了。

游击队包围了马坊，敌人从四乡抢征的粮食，也运不进去了，饿得敌人整整吃了四天黑豆。

我二分区主力部队也积极展开活动，在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拔据点、炸桥梁、破路，闹得敌人不知如何是

好。我们还四处放空气说："要攻打平定、昔阳，切断敌人归路！""抄敌人的老巢阳泉去！"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夜晚，游击队把汽油桶装在马车上，轰轰隆隆从据点附近走，伪装主力部队的炮车。正在辽县督战狂叫"夏季扫荡必胜"的片山旅团长，不知他的老巢到了多少八路军，不久，便又慌忙分路往回窜。民兵沿路埋设地雷，准备"欢迎"。被称为三把锁的沾尚、洪水、岭上三个村的民兵联防队，一次就准备了二百多个石雷和"铁蛋蛋"（铁雷）。闹得片山旅团在回师的路上又大吃苦头。

五月反"扫荡"胜利后，我二分区的斗争局面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行与晋西北一度被割断的交通联系，完全恢复了。曾被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地区，又逐渐连成了一片。日寇的"囚笼政策"基本上破产了。

（曾绍山，《星火燎原》之六）

材料三　共产党员当上"维持会长"

五月大"扫荡"后，日寇到处增设据点，挖封锁沟，修封锁墙，采取武装活动与特务活动相结合、恐怖与怀柔兼施的政策，步步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逼近，并强迫各村维持，实现所谓"全县明朗化"。我的家乡——梁集，原是我军的游击区，距离景县城只有二十五里。十月底，开来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修起炮楼，安上了据点。地主阶级组织的维持会，也在醋房南院大门口挂上了牌子。从此，梁集变成了敌占区。

"选　会　长"

敌人一驻下，就拉夫派款。伪县政府的"税总"范克祥下命令说，要催讨五年来的田赋尾欠，每亩一百斤，要现款顶粮。他坐在维持会里，算盘子一响就开催条，限令三天缴齐，延期者以抗"国捐"论罪。逼得农民砸锅卖铁，典房子卖地。

地主阶级趁火打劫，乘机收买土地，和敌伪同流合污，大口小口地喝民血，同时又散布谣言："八路军完了！以后这里是皇军的天下。""当顺民的百事皆无，心归八路军的统统杀头。"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这一带有我们十个共产党员，分布在七个村里。我原在八路军新七旅二十一团被服股工作，因患严重胃病，被派回乡，一面养病，一面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同时，军分区的敌工科张永前科长，区委纪玉兰书记也在这一带，直接领导我们斗争——秘密地串通群众抗捐抗税，采取政治瓦解与武装镇压，摧毁维持会的组织。

维持会刚摆开的摊子被掀掉后，敌人耍了个花招，要民众公选会长。这是想以"公选"的办法软化欺骗群众，借以巩固维持会。如何应付这场斗争，成了党支部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这一天，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郗光同志派人送来信，叫我到王子南庄去一趟，说有紧要任务。我到了那里，他就问我：

"你的病怎样了？"

"全好了。"我把腰板一挺说。同时心想，也许叫我回部队吧。

"全好了？"他微笑着，看了我一阵说："又急着想回部队喽！不要怕没事干，给你个特殊任务，去当维持会长怎么样？"

"什么，当维持会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当维持会长。"他接下去说："敌人占领梁集一带后，以梁集为枢纽，把四处的据点联系起来了，形成了格子网，企图把我们逼出去，我们不但不能退出这个地区，而且还要钻到敌人心脏去。"接着他讲了形势，说我们要把军事的、政治的、公开的、秘密的各种斗争方式配合起来，粉碎敌人的格子网和堡垒政策。

"你这个会长，是白皮红心的啊！"他最后爽快地笑着说，"当然，少不了挨群众骂几句，这没关系，将来群众会分清是非的。这是一条短兵相接的战斗，要有胆量，有智谋。军分区的张科长直接领导你们……"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我们开了个党支部会。张科长和纪书记也参加了会，确定立即展开参加选会长的活动。

梁集有个地头蛇，叫梁洪斌，外号"东霸天"，依仗有钱有势，横行一方。抗日政府成立后，曾多次教育他，只准他老老实实，不准他乱说乱动。他逢人便说："这几年，政府把我教育好了，你不信，走在大街上有人朝我脸上吐口水，我都不吭声。"其实，他笑在脸上，恨在心里。日本鬼子在梁集安上据点，他的尾巴又翘起来了。如今他听说要选维持会长，便四处进行活动，今天去拜访鬼子的翻译官纳春林，明天去拜访伪军中队长王长顺。在他看来，会长的位置，是十拿九稳了。

在这同时，我们也展开了积极活动，先把二十几个伪保长抓住，通过他们去抓"选票"。为了更牢稳，一天我趁伪军中队长王长顺喝醉的功夫，把他拉到家里，这个人是我们敌工科掌握的一条内线，虽然还不巩固，倒也替我们办过些事。

他一进我家大门，看见敌工科的王荣轩同志，吓得酒也醒了一半，结结巴巴，点头哈腰地向王荣轩同志说：

"上次你要的……地……地图，兄弟我照办了，这一阵一点坏事没干，今天喝了几盅……"

"你别怕。"王荣轩同志说，"你做没做坏事，我们账上有。要田赋尾欠，有你的份。"

"是，是，往后不再干！"

"往后不再干，"王荣轩同志说，"听说现在你正忙着保东霸天当会长，对不对！"

“是，是……不，不，我没保东霸天……”。他吓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王荣轩同志叫他坐下，教育了他一番，最后说明要他保我当会长。他连声应承：“照办，兄弟一定照办！”

十月二十九日开会“公选”。党支部事先安排好，由彭希岑同志掌握会场，开口先提出我的名。参加选举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伪保长提出选东霸天。东霸天想不到会如此，两只贼眼直望着伪军中队长王长顺。王长顺这时大概心里正想着王荣轩同志对他的警告，故意不抬头，也不说话，只是翘着腿抽烟。

正在这紧要的时刻，日军小队长板本带着翻译官纳春林闯进来了。他们一听说选我当会长，紧皱眉头，把我打量了一番。我心想：“狗东西，你还看啥？共产党员当你的‘会长’，是千金难买的呀！”

“你们的，明白！”板本气势汹汹地向在场的人说，“会长，心要大大好，他的心坏啦，你们统统杀头”。

“梁延峰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能干！”伪军中队长见大家不动声色，便出来说。

“竞选”胜利后，我这个白皮红心的“会长”就上任了。按照党支部的决定：彭希岑同志当副会长，李国庆管账，王延田管粮秣，梁希勤跑外，里里外外，全是我们的同志。

斩 爪 牙

维持会的牌子刚挂出，敌人就催地亩捐。我们先用“以拖代抗”的办法，看拖不过去，就布置“合理负担”，让地主阶级多拿。这事被东霸天知道后，他就象条狗似的，溜到据点里向翻译官报告了。当天就下来两个伪军，把我拉到据点里。翻译官纳春林把桌子一拍，说：

“你胆子不小，敢在这里布置合理负担。你是八路的暗探！”

我一听，心想糟糕，是真的露了底呢，还是他唬我？不管真假，反正不能露声色，便忍怒陪笑向他说：“我不懂什么叫合理负担。上面要粮要得紧，穷人都拿不出，怕误了公事，才让有粮的人多出些……”

“你不要胡说！”他把眼一瞪，“你是地地道道的八路坐探，我有证人。”

“翻译官，不要听东霸天胡说，”伪军中队长见我直向他递眼色，便笑着说，“他是没当上会长，和梁延峰有私仇！”

不知道这个狗翻译装糊涂呢，还是真糊涂？这件事就这样马马虎虎了结了。我们却加倍警惕起来，决心除掉东霸天。

一天夜里，区分队来了三个同志，把他拉出去枪决了。杀一儆百，从此其他的地头蛇也比过去规矩多了。

敌人处处被动，不能得心应手，不久又增加了一个谍报班，加强特务活动。

这个谍报班里的人，都是一色的烟鬼、流氓，是日本鬼子忠实的爪牙。群众叫他们是“铁心队”。他们一天到晚到处钻，无孔不入，非常嚣张。为了对付这帮坏蛋，敌工科张科长亲自带人来到梁集一带，整天寻找机会准备敲掉它。但是，这群坏蛋非常鬼，我们几次都掉了空。

一天，敌人从高院村抓去四十多人，挨个严刑拷打，向他们要枪。谍报班的班长高哈，还在一边煽风点火，鼓动日军小队长派人到高院村去搜，还下保证说，他们谍报队确实调查出那里有枪。鬼子听了他的话，第二天就出动去搜枪。事先我们得到消息，报告给我军游击队。结果敌人没搜到枪，反被我军打得狼狈而逃。板本小队长也被打伤了。

板本回到据点直骂高哈，说他心坏了。我们借此机会，就鼓动伪军中队长去见板本，说高哈私通八路军。板本一气之下，把这个狗奴才用刺刀戳了。这真大快人心！

随后，区分队又派几个人到梁集来活动。他们经常向据点里喊话，宣布翻译官纳春林的罪状，闹得敌人象耗子似的，不敢轻易跑出据点。罪大恶极的翻译官纳春林，最后也“辞职”跑了。

整掉了高哈，谍报队也不敢那么猖狂了。一天，我们一个同志被他们抓住，经过我们对两个谍报员威胁加收买，他们不得不偷偷放掉了。就在这事发生后，新任的谍报班长彭泽洪跑到维持会里来，劈头对我说：“梁延峰，你暗通八路，暗探军情，瞒了别人，瞒不了我。”我估计他想敲几个钱，便说：“彭班长，可别听闲话。咱祖辈非亲即友，兄弟当这个会长，你该关照点。有困难只管说嘛！”他听我话里有钱，转了两个圈就走了。

天黑，他又来了，进门就说：“咱把话说明白，半袋小米可不行，哪天我也得个一二十块钱花！”原来他嫌给他的太少。我告诉他别急，再替他筹划。

经过党支部研究，决心除掉这块绊脚石。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这天我把他请到家里，灌了几杯酒，便说：“彭班长，我给你想了个弄钱的办法，你干不干？”

这个家伙见钱如命，听说有个生财之道，眼珠子都红了，忙问什么办法。我说咱们村明天逢大集，粮食市上没人收税，你彭班长到那一蹲，大把钱不就抓到手吗！他犹豫了一下说：“好是好！碰上八路怎么办？”我说：“唉，八路军白天哪敢进街！”他把大腿一拍：“好，就这么办！你可别说出去，我得吃独份！”我点头应着，心想：狗小子，保管叫你吃独份。

次日一早，我抱着孩子，装着赶集的样子，给武工队的同志引线。走到粮市，彭泽洪正蹲在那里，大把大把点钱呢。我向同志们使了个眼色，一个同志上去抓住他的衣领，枪口指头皮：“彭泽洪，走！”这小子直喊救命。这时我们呼叫着：“快跑啊，八路军来了！”

集炸了，立刻乱成一团。武工队的两个同志架着彭泽洪，随着奔跑的人群出了村子，把他干掉了。

之后，我们又采用各种办法除掉了几个汉奸。这样一来，伪军个个自危，惶恐万状。新到的见习翻译于占鳌，经过我们多方争取，也和我们拉上了关系。

日军小队长板本挨打之后，一直躺着养伤，据点里的权柄都握在王长顺、于占鳌手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又把一些坏保长整掉。从此，据点里敌人每天得到的情报，只剩下了一句话——"本保太平无事。"

攻心战

日寇对伪军越来越不信任了。从六月以后，不到三个月，接连换了四个伪军中队长，十月初，又换上了一个名叫邢焕章的。这人阴险狡猾，外号邢疯子。他一上任，我们的内线关系便不象以前那么灵了。军分区敌工科决定对他进行工作，曾先后给他写了三封信，但他却根本不理。这一天，我又把敌工科的第四封信亲自送给他。他还没看信，就指着我说：

"你胆大包天，给八路军当起邮差啦？脑袋还想不想要！"

"这有什么办法？"我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他们叫我送，我怎敢不送！你是听说过的，八路军难对付啊，得罪了他们，你钻到牛角里也会给挖出来！"

"我就不怕！"他拍拍胸口说，"我邢焕章从十七岁拉杆子（当土匪），凭着一颗脑袋一杆枪，走南闯北，没栽过跟头落过马，管他八路九路，能把我怎么样？"

我见他死硬，便假装怕事地说："邢队长，我可不管你们的事了，我这个会长，不知哪一天会被八路军收拾掉，我走了！"说要走，其实还坐着。

"你慢着，我看看信。"他说着打开信。这信的内容，是限他几天内和我们接头，不然要他走彭泽洪的路。他看罢信，脸色变了，忽而转了个笑脸说："他们要和我谈谈，你看能谈吗？"

我一听有门，就激他说："谈谈，你敢去谈？"

"怎么不敢！我当着日本人的队长，没干坏事，八路军叫我去谈，他们会不讲信用？你去回他们话，叫他们派人来。"

经过周密安排，一天敌工科的王荣轩同志在我家里见了邢疯子，谈了小半天，邢疯子最后说了这样的话："八路军只要不打我，我决不找八路军的麻烦，咱们各走各的路。"

初步能达成这样的协议，也算胜利。之后，我们的争取重点又放在副中队长刘子恒身上，做他老婆的工作，通过他老婆劝说他。敌工科又三番五次对他进行教育。后来这人慢慢变成了我们的内线。

两个伪军头头一被控制，工作方便多了。这时县委书记郗光同志又给我们指示：应趁机向纵深发展，全力瓦解下层。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便向伪军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

弄到了伪军全部名单，摸清了每个人的底细后，便通过他们的家属给他们写信，带口信，劝他们改邪归正。敌工科张科长还亲自领人围着据点喊话。他告诉伪军，八路军里设了"善恶簿"，当伪军的如对百姓办了好事，给他名下点个红点；办了坏事，就点黑点。够五个黑点，就惩办。他还象点名似的，把伪军的名字念了一遍。

接连几个夜晚喊话后，伪军普遍发生动摇，有的伪军家属跑到据点里哭闹，几天内逃走了四五个伪军，邢疯子也吓慌了，下令白天不放吊桥，人人不准外出，亲友不准会见。

这时，我们"维持会"借口八路军闹得凶，向老百姓要不来东西，便不给据点里送吃的。敌人就派兵出来抢。他们一出动，我们就打伏击。抓了俘虏，不杀不打，经教育后又释放回去。攻心战成绩很显著。有一天，王荣轩同志突然碰上一群伪军，被抓住了。王荣轩同志便说："你们先别捆我，听我说几句话。"他宣传了一阵，最后说："你们捆吧，送给日本人杀了我，你们每个人名下将点上一个黑点，我们的人会跟你们算账的。"伪军小队长陈祖波听了，和几个伪军嘀咕了一番，然后走到王荣轩同志面前，低声说："不捆你了，你走吧！"等王荣轩同志走出来十几步，他又说了一句："记住，我叫陈祖波！"大概他想给自己名下点个红点吧！

王荣轩同志脱险见到我们，谈起这事，大家都笑了。接着趁热打铁争取陈祖波。不久，真的把他争取过来了。

攻心战打了一个多月，根据党的指示，"有打有拉，普遍教育，重点争取"。差不多有一半伪军被我们掌握了。县委书记郗光同志说："好，我们在敌人心脏里挖了个大窟窿！"一天，区委纪书记到"维持会"来，逗趣地说："这个'维持会'维持得不错，成了我们的干部招待所了！"

我们就这样钻进敌人心脏里，与敌短兵相接，配合着我军主力、武工队、游击队，向日伪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梁延峰，《抗日回忆录》）

材料四　地雷战炸破敌胆

依照毛主席的方针，发展民兵以后，敌后抗日的形势有重大的改变。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结成了战斗的三位一体，使敌人胆裂。在临南，今年五月起，地雷之战广泛地发展以后，民兵更积极。地雷一炸，胆小的民兵也变得胆大；民兵的老婆再不扯丈夫的后腿，而且也都参加了妇女爆炸组。每一个村庄，作到人人皆兵了。

村中野外，所有的道路、山沟、山坡和打麦场，都挖了雷坑。敌人一出巢，雷坑里立即安好了地雷。民兵的婆姨们都积极起来，在家里的门边、地下、灶上、坑上和糜草堆上也安好地雷。敌伪随便到哪里都会碰到这种铁蛋蛋，就是不炸死，也吓落了胆子。

地雷种类非常多。有暗叫子、子母雷、拉雷、踏雷、绊雷和碗雷。民兵们认为绊雷最灵，敌人绊着绊雷的绳索，轰隆一声，山崩地塌，火烟与尘土之中，敌人给炸碎了，离得很远没有炸死的敌人，也都吓得呆立在那里，好久都不能动弹，往往因此被我们生擒。地雷的威力是这样巨大，我们捉到的俘虏有这样的口供："就怕你们的地雷伏击战。"

敌人怕地雷，出来走得慢。今年七月间，三交镇的敌人窜到附近的村庄，想捞点什么，每走一步，都要先叫汉奸在前面用棍子探一探路上的土的松紧，整整一夜，走了五里路。因此各个村子都有时间来疏散人口、牛驴、粮食和其他的东西。敌人到村时，除了"开花的铁蛋蛋"以外，别的什么也找不到手。

敌人想出了一条毒计来对付我们的地雷伏击战。他们每一次出来，都抓了许多本地的老百姓，放在前面走。地雷如果爆炸了，往往炸死了他们。这些老百姓多半就是民兵的邻居、朋友、亲戚和父兄。这使民兵使用地雷有莫大的顾忌。

敌人想出了对付民兵的新办法，民兵就得针锋相对地想法子对付。敌人押着老百姓走在他们的前面，去做他们试探地雷的牺牲品，民兵就想出一个新法子，把地雷埋在路上，拉线的民兵埋伏在左边的山上，另一个民兵在右边山上了望着敌人，看着老百姓过尽，敌人正走到埋雷地点的时候，他做一暗号，山上的民兵把线一拉，地雷响了。这样的，每次都炸死许多的敌人，不伤老百姓。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但是富有创造性的民兵制定了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拚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待到民兵跑过，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追来的敌人没有不死的。这叫做拉雷掩护拉雷。现在，要是敌人碰到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

聪明的民兵又使地雷和其他武器相配合。他们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大路旁边，等敌人到时，连放几枪，自己跑了。敌人听见了枪声，慌忙跳进路旁的深坑里，或是低洼的地方。于是，山崩地塌，地雷踏响了。所有躲进深坑或是低洼之地的敌人，全被炸死了。凭着战场上普通的常识，敌人认为深坑和低洼之地总是躲避枪弹的最好的地方。凭着战场上的普通的常识，民兵们揣度着敌人听到枪声的时候，一定会跳进路边的深坑和低洼之地，于是事先就在这些地方埋好了踏雷。

民兵们利用地形地物，利用村中最易备办的器材，创造了许多兵书上所没有的战术，使得地雷战斗有神出鬼没之机，从此敌人不敢轻易走出他们的碉堡。但敌人的阴谋诡计是多的。三交镇的敌人，有一天晚上，出来袭击附近的一个村庄，路上的地雷一个都没响。民兵在事后研究，发现了埋雷的人有问题。

今年五月以后，各村的民兵组织了联防哨。每一个村庄的高处，竖立着一根木柱，上面扎着一捆草。这是民兵联防哨的警报柱。没有敌情的时候，这根扎着草的木柱，高高地竖立在那里，村里谁都看得见，村里的人可以安心地纺纱，种地，做买卖。村里的农民组织了变工队，民兵也都参加变工队。没有敌情的时候，他们和普通农民一样，在地里种地。如果他打一天仗，变工队长就记他一工，如果他守望或探哨一夜，就算他一个夜工，秋收时按照他的劳动日和战斗日的合计，去分配应得的谷物。

村里的人如果看见民兵的警报柱倒了，就知道有敌人出来，于是所有的民兵都四散活动，所有的雷坑都安好地雷，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迅速地转移，所有的资财什物都迅速地"坚壁"。做得很好的时候，敌人走进村子来，往往遇不到一个人，一头牲口，甚至于一把糜草也难于找到，但除了地雷。

民兵给村里带来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带来许多的胜利，特别是他们和游击队、正规军三位一体地行动的时候，增加了敌人巨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年九月，三交镇敌人不得不走了。

民兵与地雷增加了人民的胜利的信心。整个晋西北，传遍了下面这一个故事：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那些阴暗的日子里，什么人编造的这一句话，广泛地流传在民间："要打走日本，除非山上有了无根树，地上有铁蛋蛋开花。"这就是说，日本鬼子是打不走的。今年五月，民兵和地雷活动起来的时候，敌人的灾难开始了。民兵的警报柱在山上竖立了起来，地雷炸开了。老百姓纷纷传说："鬼子可真要走他的路了，可不是，山上有了无根树，地上有铁蛋蛋开花啦么！"

（选自《战场三记》，作者：周立波）

材料五　地道战大显神通

群众性的地道斗争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开初，敌人来了，就跑到村外的洼地里去躲起；四〇年后，敌人扫荡频繁了，单躲躲是不济事的，跑到村外，就挖土窝窝，上面盖着草，敌人不到，是看不见的。后来觉得不如挖深一点，上

面不还是可以种庄稼吗？带了木板去，挖得更深。有的人进一步在坟墓里挖成洞，钻进去，躲在里面。安全倒是安全了，不过坟究竟是有限的呀，容纳不了大平原上的八百万人民。不久，大平原上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坟，有眼子，可以露出头来，徬望敌情。敌人扫荡包围时，在村子里找不到人，就“拉大网”，到村外野地里找，敌人对这做法，叫做“赶兔子”，村外站不住了。

敌人不在村里找，人民就回到村里来了：进村挖地洞。先只是在街上挖，五家共一个洞口。敌人常常突然袭击包围，快得使村里人来不及下地洞，于是改为一家一洞，洞口从街上移到家里来了。

这是死洞。

然而是未来地道斗争的一个有着决定作用的起点。

死洞是很危险的。当敌人进村时，就到处搜寻痕迹，手里拿着二寸粗细的有一二丈长的铁棍，到处敲打，如敲透地面，或有回声，说明下面有洞。这样，有些家庭的地洞被破坏，捕捉到人，遭了损失。由此得到经验，死洞是不行的，要活洞。

于是这家地洞和那家地洞通起来了，可以从一洞口钻入，从另一个洞口钻出，当敌人围住这一家进行搜索时，便能够从另一家洞口走脱了。但是敌人包围整个村里，进行更细致严密搜索时，仅仅两家或者是几家地洞相连，也不能够适应新的斗争需要了。两个洞口的活洞，自然感觉不够。新的地道，出现了。它将一个村庄和另一个村庄，在地底下联合起来了。地底下出现了新的城市，出现了新的阵地。

地道内设有大量的通气孔和出入口，这些出入口大半安置在秘密地方，使敌人不易发觉，只有这一家人知道，当斗争进入更残酷的时候，谁挖的地洞，只有他本人知道，什么地方有秘密的洞口和通气口。地道内挖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掩体（秘密洞），构筑更为坚固，通气孔也开的更多一些，这是当发生情况时，人民掩藏的地方。地道内还挖有许多迷惑洞（又叫做欺骗洞），在地道转弯处，分开若干岔路，有活路也有死路。又利用枯井与地道相通，造成许多“陷阱”，一经跌入，便无法逃走。地道的各个洞口，挖下深坑，坑内插着尖刀，或者埋上地雷，上面盖上翻板。当人民进入地道之后，即抽掉翻板，即使被敌人发觉，追纵下去，因为抽掉翻板，敌人下去，不是中了刺刀，就是中了地雷，在里面送掉性命。敌人是不敢随便下地道的，叫伪军下去，伪军不敢下去，纵然下去，他是很怕死的，一到下面即自己高声报告：“我是伪军……”那意思是叫下面人民不要处死他，这样，他虽然不死，但也不会再上来当伪军了——投诚了我军。

地道中间，都挖有凸凹过门，叫做“子口”，狭小得只容一个人匍匐通过，只要有一个人拿一根棍子便可以守住，真是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去处。每家的地洞，每村的地洞，如果没有熟悉的人领着，不但是走不进去，纵或万一让你碰进去了，也碰不出来的！村与村的地道，有“接合部”，到接界处，过村时即由另村负责领导。甲村的人如到乙村，吃饭时，付粮票，每日计算，由政府用粮食来调剂。

每个“子口”之处，并有防毒设备，一经发现毒气，即可放下吊板，用土堵住。另外洞中通有枯井，敌人即使放水，也不在乎，所有的水便会从枯井流掉。

地道内部每隔相当距离，便有一个大洞，能容一二百人，有人洞，有畜生洞，大洞里经常放有熟食、开水、灯火、被盖、厕所，在里住个几天是不成问题的。村里地道之间，和各村相联之地道，又有很灵便的通讯联络，一拉铁丝，铃声即响，从铃声多少，即可传达敌人多少，互通情况。

地道洞口和顶上，遍处埋有地雷，使得敌人无从下脚，一触即死。万一敌人到了洞口，洞口还有武装警戒，隐蔽在旁边的掩体内，专门守候到地道来送死的敌人，第一是：敌人下不去；其次是：下去了，就上不来。

村庄与村庄之间，地道是贯通的，纵横交错，构成地下的惊人的地道系统，在地下创造了攻不下的堡垒，使得在地面上被敌人占领和分割了上千上百的村庄，在地下，这些村庄连成一气了，造成地下城市的新面貌，敌人称蠡县的三区有两个：一个是地上三区，一个是地下三区，敌人对之却总是束手无策！

有了地道，不仅人民可以生产，工作人员可以坚持工作，民兵能够坚持斗争，进一步，可以打击敌人，坚持了平原的游击战争，开展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选自《群众》1945年第10卷第13期，作者：周而复）

材料六　洪流溃铁壁 浩气贯长虹
——“四·二九”反“扫荡”纪实

南运河畔，春光明媚，座落在故城县霍庄村的“四·二九”烈士纪念塔显得格外壮丽。纪念塔上镌刻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徐向前、宋任穷、王任重、刘志坚、陈再道等同志的亲笔题词。塔北一排排墓群，把人们带进4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正是这些革命先烈，用头颅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反“扫荡”胜利的凯歌。

1942年4月中旬，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机关及部分直属部队，以及公安部队、冀南银行、医院、报社、党校、干校、文工团等数千人，转移到故城县南部冀、鲁两省交界处，进行驻防休整。

不料，我方的这一行动，被隔河遥遥相望的山东省武城县伪县长大汉奸吴寄朴派出的特务得知，他们立即报告了德州日军头目松岛，松岛又马上去天津，报告了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日酋遂下令由济南、德州、石家庄、邢台调集日军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一、第七、第八

等混成旅团计一万多人，从枣强、衡水、清河、武城、郑口、龙华等地调伪军两万多人，在飞机、坦克、装甲车、骑兵、摩托化部队的配合下，以十倍于我的兵力，疯狂对我冀南区党政军机关，进行所谓的“铁壁合围”。

4月29日凌晨，我七旅十九团向军区司令部报告，枣强、大营敌人倾巢而出，向我驻地开来。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及作战科同志，经分析研究，断定敌人是搞大范围的合围，便马上命令十九团和新七旅骑兵连，从大营与枣强敌人中间插过去，断其后路。十九团乘敌人还没有合拢的时机，迅速迂回到敌人背后。七旅骑兵连迅速转移到枣强县潭庄一带树林里。这时住在枣强、故城交界地区的冀南六地委机关与故城县大队也都巧妙地转移出去。

4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各路合围的敌人，在冈村宁次直接指挥下，用坦克和装甲车组成了合围圈，逐渐由北向南靠拢，最后形成三层包围圈。敌人上有飞机侦察扫射，下有摩托，骑兵配合，我军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越来越危急。

上午12点左右，敌从四面向我军区、区党委、行署机关驻地猛扑过来。在这关键的时刻，侦察员报告说：西南面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伪军多，鬼子少，是个理想的突破口。范参谋长和刘主任研究决定，立即组织力量从西南面突围！军区骑兵团在前面开路，特务团在左翼，七旅二十一团在右翼掩护，党政军机关、干校、党校、文工团、报社、医院等人员，夹在中间。另外，骑兵团、特务团、二十一团各抽出一个连来。掩护部队突围。

下午两点多钟，突围开始了，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决心与敌人拚个鱼死网破。3点钟左右，突然，狂风大作，尘沙弥天。敌人在空中侦察、盘旋扫射的飞机哑叭了；吼叫着前进的坦克装甲车迷失了方向。我军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奋力冲杀，一举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

当我骑兵团冲到大辛庄、小辛庄时，又遇到敌人第二道第三道包围圈。日寇立即组织力量，调兵遣将，进行反扑，企图把我军压回来。身经百战，锻炼有素的我军区骑兵团战士，灵活机智，沉着老练，有计划地撤到一个壕沟内。一声令下，所有战马，全部卧倒。集中12挺机枪，埋伏在沟沿。俟鬼子进入有效射程以内，曾玉良团长一声令下“打”！12挺机枪同时开火，子弹象雨点一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乱作一团，敌人发动的三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我骑兵团一鼓作气，乘机越过敌第二、第三道防线，在西南面冲开了一个一里多宽的口子，我军好象一股巨大的洪流，气势凶猛，锐不可挡，将“铁壁”冲垮。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千方百计从西面，南面组织力量，企图把口子堵住。我特务团，二十一团从骑兵团两翼，奋勇阻击，敌人寸步难进。

就这样，骑兵团在前，特务团、二十一团左右配合，党政军机关在中间，组成一股钢铁洪流，冲破敌人三道包围圈，将日军华北司令冈村宁次，挖空心思，精心安排，调动3万多日伪军，组成的所谓“加盖的铁壁合围”，冲了个墙倒壁塌。我大队人马按着既定计划，向清河黄金庄方向挺进。

29日傍晚，少数没冲出包围圈的干部、战士、伤病员，隐藏在霍庄村内。日寇把这个只有60户人家的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敌在村前抓到我军一名腿部受伤的女同志，敌人先以利诱、继而用酷刑逼她投降叛变，她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刺刀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慷慨就义。在村后一个湾坑里，敌人一次就用刺刀挑死我干部、战士、伤病员49人。

原武城县公安局长梁振芝，带领21名公安干部，在掩护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安全转移，又将押解的四名要犯处决后，向外突围时，打死打伤鬼子20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全局21名同志，除一名通讯员侥幸活命外，全部战死。梁振芝，在战斗中腿部受伤，隐藏在霍庄外田野一间小屋内。一群鬼子来搜查小屋时，梁局长用仅有的三颗子弹，打死鬼子两名，打伤一名后不幸被俘。敌人把他带到霍庄，严刑拷打，他刚毅顽强，大义凛然，痛斥敌人。鬼子把他挑死后，又用秫秸浇上煤油进行焚尸。最后只留下了一个皮带钢卡。

日寇在霍庄烧、杀、抢掠奸淫，折腾了三天三夜。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大爷大娘认儿女”，“妇女认丈夫”“青年认兄弟”等方法，掩藏了干部战士60多人。

这次反击“铁壁合围”，打死打伤日伪军数百人，我方伤亡干部战士群众300多人。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深刻教育和锻炼，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昂首挺进，继续战斗。

（选自《党史博采》90年6期，作者：朱新良）

材料七　向“杀人魔王”佐佐木讨还血债

血海深仇

一九四一年的春节来临了。

正当人们盼望着能回家过个团圆年的时候，全家搬到敌人据点的地主潘惠林，忽然给他胞弟来了信。信上说，经过他送礼、说情，日本人答应春节期间不再“扫荡”潘家峪，叫大家只管安心回家过年。潘惠林的弟弟，首先搬回了家，开始，人们还警惕着这可能是圈套。可是，一天、两天、三天，都平安地过去了。于是，人们便认为潘惠林也许不至于把自己的胞弟往火坑里推，就陆续回到村里。人们哪里知道，丧尽天良的潘惠林，正遵照其日本主子的命令，用他的胞弟当钓饵，要把全村人一起送上死路。

一月二十五日的拂晓，潘家峪被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十六个据点的三千多日寇和一千多伪军团团包围了。日本鬼子弹上膛、刃出鞘，把没有逃出去的一千四百多男女老幼，驱赶到村西积满冰雪的大坑里。坑沿上站满了寇兵，乌黑的机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这时候，一个约四十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络腮胡子，呲着金牙，腰挎一把蓝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称为"火神鬼"的杀人魔王佐佐木。他两只眼狞视着人群，迫不及待地一次又一次吼叫着："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快快讲出来！"人们肩并肩站在一起，昂首挺胸，紧握拳头，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的光。

"不说，统统地死啦死啦！"佐佐木兽性大发，"铮"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也竖了起来。

沉默、沉默。人们用沉默回答着野兽的咆哮。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他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可是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无限鄙视的目光。

佐佐木深知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于是他又命令喽罗们，在潘惠林的大院里，堆起洒上煤油的柴草；四周房子上、大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从大坑到潘家大院，沿途刀枪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布作一条胡同。他们杀气腾腾，凶恶万状。

一切布置就绪，鬼子兵们便拳打脚踢驱使群众向潘家大院走去。潘国清的小孙女，看到两边都是凶恶的敌人，吓得一边哭，一边向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潘国清老汉见心爱的孙女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一千多人一齐怒吼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得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场厮打过后，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

大屠杀开始了。随着佐佐木的吼叫，子弹从房子上、院墙上、大门口，一齐射进院子；手榴弹、硫磺弹，冰雹般的落进拥挤的人群；那浇了煤油的柴草，浓烟滚滚，烈火钻天。潘家峪一千多善良的群众，被铁和火紧紧包围着，被死亡紧紧包围着……

英雄的潘家峪人民，并没有求饶。他们在万恶的敌人的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五十多岁的潘国生老汉，脱去着火的衣服，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带头冲向大门。他猛扑向一个端着机枪扫射的日本鬼子，夺过机枪，抡起枪托就猛砸下去。

院子的另一角，潘作史的妻子，带领一群宁死不屈的妇女，用石块、砖头还击日本鬼子。

东墙根下，潘光林、潘福廷等人，把坚固的院墙凿开一个洞，一面用砖头瓦块还击敌人，一面向外冲去。

十几个年青人，穿过弹雨火海，钻进院子西面一间小屋里，用大缸抵住铁叶门，拿起屋里的杈耙棍棒，准备和鬼子兵死拚。

人们怒吼着，冒着弹雨，穿过大火，向大门口冲去。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跨过烈士的遗体，继续冲上去；又倒下了，再冲上去……

潘贵为了留下复仇的种子，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敌人的枪弹，挡着大火，保住了七岁的女儿。

枪声、手榴弹声继续着，大火继续着，人们的反抗继续着。大门被铁和火堵塞了；新凿开的墙洞被铁和火堵塞了。枪在响，火在烧，血在流。英雄的潘家峪，完全淹没在血泊中。

大屠杀一直延续到下午七点。佐佐木唯恐留下复仇的种子，又下令把尚有一点气息的人垛成人垛，重烧一次；然后，把全村的财物抢劫一空；把所有的房屋全点上了火。在隆隆的房屋倒塌声中，强盗们狂饮着潘家峪人民的酿的酒，骑着潘家峪人民饲养的牲口，狞笑着返回据点。

敌人走后，附近村里的群众，立刻悲愤地含着眼泪前来抢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千一百多间房屋，化为灰烬；一千二百三十名同胞，惨遭杀害。虎口逃生的只有躲在院子西面小屋里的十九人、凿墙逃走的十几人和在烈士遗体保护下一息尚存的八十五人。美丽的潘家峪，已变成尸骨成堆，血流成河，一片瓦砾。

就在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每根毛孔都灌满了潘家峪人民鲜血的佐佐木，胸前挂上了一枚六角银质的法西斯"勋章"。

这是血海深仇！

以血还血

潘家峪的人民并没有被征服。在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及附近村庄群众的协助下，他们把亲人的遗体掩埋在松柏常青的南山下。公祭烈士的大会上，幸免遇难的百名青年，组成了潘家峪复仇团。他们手握枪，眼含泪，在亲人墓前发出钢铁般的誓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

噩耗传到我们十二团，全体指战员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活捉佐佐木，为潘家峪人民报仇"的吼声，响遍了每个角落。

事也凑巧，潘家峪惨案后的第五天，我们得悉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一股敌人，由丰润返回玉田。二营长姜士林立即率领着眼泪未干的战士们，由堤北头连夜赶到莱园庄埋伏起来。

果然，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一辆满载刽子手的卡车，驶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五连的同志们机枪、步枪一阵猛射，敌人的汽车立刻瘫痪在公路上。战士们没让活着的日本侵略军下车，一排排手榴弹又紧跟着落进车厢。紧接着，大家一气攀上汽车，一顿刺刀，便把四十多个日本鬼子全部戳死在车厢里。

冀东人民得知潘家峪人民的噩耗后，也纷纷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斗争。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成了敌人的坟墓。我十二团、十三团先后在玉田刘家桥、太子沟、渠梁河、杨家套、葛庄等地，歼敌南木铁作大佐以下两千余名。紧接着，我们又和潘家峪复仇团的同志们一起，在四十里铺、双城子、憋古寺等地，成营成团地消灭了许多伪军。但是，大家对这些胜利仍感不解恨。战士们说："冤有头、债有主，佐佐木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他自己用血来偿还。"冀东军民时刻都在盼望着向佐佐木讨还血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敌伪军的大量被歼，震慑了敌酋冈村宁次。一九四二年二月底，他把已调离冀东的二十七师团又调了回来，并立即纠集起伪军的残兵败将和满洲队共四万余人，从四月一日起，开始了所谓"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六月初，我军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击。首战便消灭了上五岭伪军的一个连，吓得上五岭据点里的敌人再不敢露面。于是我们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调动敌人，予以歼灭。上五岭的敌人被围不到一个月，便断粮了。驻沙河驿的伪军第六集团司令刘化南，亲率两团伪军，押车运粮援救上五岭。行至甘河槽附近，遭我军迎头痛击，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刘化南也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第二天，侦察员报告说："佐佐木率领一百多名日本鬼子到了沙河驿，扬言要'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我们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他据点都未增加兵力，又是青纱帐期间，敌人可能扬言"扫荡"滦西是虚，解救上五岭是实。同时大家也认为，不管他是真"扫荡，还是假"扫荡"，佐佐木既然来了，我们决不能放过他。复仇团的小伙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将他们配属在二营。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在松林起伏的山根下，各营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动员。"以血还血！""为潘家峪的同胞报仇！"的吼声，似天崩，如地裂，震撼着千山万谷。

第三天上午，佐佐木真的来了。他以伪军一个营开路，两个营和一个团部殿后，亲率一百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居中，押着一百四十多辆大车粮食顺公路而来。以往，我们每次战斗后，总是立刻转移。这次佐佐木大概还认为我军已被他"扫荡"滦西的扬言吓跑了，或者象以往每次战斗后一样，我军早已远走高飞了。因此，他毫不戒备。伪军们一路上吆吆喝喝，鬼子兵竟躺在大车上，悠荡着两腿，嘴里哼着淫调邪曲。埋伏在甘河槽附近高粱地里的我军战士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个个咬牙切齿。我们放过了开路的伪军先头营，等鬼子兵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一声号响，全线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扫向公路。鬼子兵根本没防这一手，顷刻间，人撞马，马踩人，车翻粮撒，乱成了一窝蜂。紧接着，我四连一个猛冲就击溃了伪军的先头营。五连也同时猛扑向日本鬼子和殿后伪军的接合部，快刀斩乱麻似的把敌人切成两截。开路和殿后的伪军，被我军当头一棒打昏了，各自逃命。他们这个行动正合我意，我们因此没有追击，立刻从四面八方扑向日本鬼子。鬼子兵招架不住，仓皇爬山。我五连七班，三步并成两步，先敌抢上山头，迎面一阵手榴弹，又把鬼子赶上公路。鬼子被迫退到公路边的一个坟圈里，架起重机枪，拚命向我扫射。我们的冲锋道路被封锁了，连续几次冲击都未成功。就在这时，我一营和团部警卫连赶到了。一营立刻投入了正面攻击；警卫连、复仇团和五连的一部分，趁机插到敌人背后，把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总攻开始了。可是敌人的那挺重机枪，仍疯狂地向我射击。警卫连的排长李学良，绕到敌人重机枪后面，先投出一颗手榴弹，接着一个箭步蹿上去，飞起一脚踢倒了机枪射手，劈手夺过了打得通红的重机枪。就在这一刹那，一、二连和五连的战士们，一跃而起，手端刺刀，从正面潮水般地涌进了敌人的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尤其是复仇团的战士们，面对着残杀他们父母的强盗，个个火燃心头，专找敌人的军官刺杀、扭打。一霎时，刀光闪闪，鲜血飞溅，刀枪撞击之处，发出日本鬼子的惨叫。一个战士和一个日本鬼子扭打在一起，一下子把他摔出老远。可是，当鬼子兵扑向他的时候，忽见他两腿猛地一蹬，把日本鬼子蹬了个脸朝天。他趁势跳起来猛扑过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脖子，抡起拳头，捣蒜似的打一拳说一声："血还血，命抵命！"一气把鬼子的脑袋捣得稀烂。一位沧州籍的战士，一连挑死了七八个日本鬼子，刺刀刺弯了，他顺手拣起一把战刀，又向敌人扑去。这时，一个小同志正被几个鬼子兵逼得步步后退，这个手执战刀的同志，迅速绕到一个日本鬼子背后，手起刀落，把鬼子斜劈成两截；其他鬼子兵吓得扭头就跑。他跟着一个扫堂腿又把一个鬼子兵绊了个嘴啃泥，紧接着蹿上去，脚踩鬼子的后背，两手紧握刀把，刀尖向下，狠狠地把日本鬼子钉在地上。战士们个个满头大汗，哪里有日本鬼子就扑向哪里。很多人的刺刀刺弯了，刺断了，就拣起敌人的刺刀、战刀，继续与敌人拚；敌人的刺刀、战刀又刺弯了砍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抡起手榴弹砸敌人的脑袋，拳打、脚踢、牙咬，和敌人厮打。整个坟圈和附近的庄稼地里，到处是刀枪相击的铿锵声，到处是鬼子兵残缺不全的肢体，到处是日本鬼子的污血，到处响着鬼子兵的惨叫。

一百五十多个日本鬼子，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战斗一

结束，战士们便到处寻找佐佐木。忽然，从一块谷子地里，传来了二营侦察员陈志和同志的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完——蛋——了！"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只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呲着满口金牙的家伙，倒在一摊污血中，一把蓝穗战刀，暗淡无光地抛在身边，一枚六角银质的法西斯"勋章"，还挂在他那血肉模糊的胸前。这就是法西斯强盗的下场！

（曾克林《复仇》，《星火燎原》之六）

宋庄战斗

背景介绍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为了把华北变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于1942年进一步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其中以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集中兵力最多，战斗最为残酷。

5月1日，敌调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在这六万平方公里八千个村庄的地面上，敌人密布一千五百个据点，一万里以上的网状公路，并经常使用七百辆汽车穿梭巡逻。敌酋冈村宁次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采取所谓"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的战法和"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歼我主力，毁我根据地。

冀中区我军由吕正操率领，把大部主力转到外线打击敌人，以一部主力配合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中宋庄战斗是著名的模范战斗。

6月8日夜，我军两个连从七级村转移到深泽东北15里的宋庄。一到营地立即挖掘工事，从村里到村外，共筑了四道工事。我两个连和两个小队民兵游击队一起驻在宋庄的北部；临时组成的混合连，实际人数仅68人，则住在宋庄的南部，准备从侧后打击敌人。6月9日上午9时许，上任不久的冀渤特区司令官板本旅团长亲自带着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参观团，由宋庄北面的冶庄头出发，去白庄调查上次战斗失败的地理原因。旅团长出巡，仪仗煊赫，前有三十几个手执军刀的骑兵，后有两个中队约三百多人的步兵卫戍队。当敌人一出动，我担任警戒的战士已发出"北面发生敌情"的报告，指战员们都已进入工事，作好了战斗准备。当这支参观团抵达宋庄东北离我阵地前沿约三十米的地方，我指挥员一声令下，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射击。坂本旅团长当即被击毙，骑兵随从和参观团，也被我强烈的火力很快歼灭。刚到村北的卫队听到枪炮声后，即分东、北两路猛扑我阵地。这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装备着优良武器和充满着武士道精神的卫队，他们以班为单位进行集团冲锋，但被我英勇的战士用手榴弹打垮。经过几次冲击和反冲击，这支慓悍的卫队只剩下五十来人。在我军和敌卫队群进行激战时，附近各据点的敌人纷纷增援，宋庄的东南面被敌重兵封锁，东、西、北三面都遭到敌人的攻击，情势严重。在此情况下，我方指挥员重新作了部署，决定我军在第一、二道工事要与敌周旋八小时，第三道工事要坚持到天黑，然后待机突围。在战术上，则要充分利用工事进行战斗，敌人不进入我火力圈内不打，没有瞄准不射击。这样，从中午12时到天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我军不仅击溃了坂本的卫队和附近小据点出来的敌人，而且抗击着深泽、无极、定县、饶阳远近各大据点的援敌不下二千五百人。敌人施用了各种大炮和数十个掷弹筒，以至毒瓦斯，把我军修筑的第一、二两道工事几乎全被毁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冲锋，甚至三番五次地争夺房上据点。我指战员则沉着、机智应战，用步枪和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危急时跳上房顶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敌人冲进街就被打出街，敌人冲进村又被打出村，敌人数十次的冲锋均未得逞。天黑以后，敌人已伤亡过半，不得不停止攻击等待明天援兵的到来。这时，我军出其不意，悄悄接近疲劳酣睡的敌人，发起快速袭击，很快就突出重围。敌人怎么也不相信跟自己打了一整天的对手，竟是这么一支不大的队伍，于是仍然紧紧围住宋庄，待第二天冲进村庄却一无所获。

宋庄战斗毙伤敌伪坂本旅团长以下一千二百余人，我军伤亡73人。

材料：

- 冀中宋庄之战（节选）
- 平原枪声　以少胜多歼顽敌

材料一　冀中宋庄之战（节选）

三、坂本旅团长之死

几天以前，在宋庄东南的白庄曾打了一个激烈的战斗，结果敌人吃了不小的亏，死伤约计四百人，还打死他一个晋藤联队长。就任不久的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他对白庄战斗的惨败感到很大的伤心。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将军，因此，虽然在6月9日早上，他在西固罗开了一个忙碌的会，却打定主意还要亲自去白庄一行，追究那次战斗致败的地理上的原因。

九点左右，坂本旅团长带着一个由三个日本人所组成的参观团，由宋庄北面的冶庄头出发了。从冶庄头去白庄，须得经过宋庄的东边。敌人没有知道在自己的鼻梁上就隐藏着八路军，在他们心里，这是也是属于所谓"碉堡区"的。

旅团长出巡，仪仗是十分煊赫，前面是三十几个手执军刀威武的骑兵，后面是两个中队约三百多人的步兵卫戍队。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呢？当他们一出冶庄头的时候，担任警戒的战士，就已经作过"北面发现敌情"的报告。因之每个指战员枪弹都已上膛，取得瞄准待放的姿态了。

九点一刻，坂本旅团长的大驾，到了宋庄东北离我们阵地前沿约三十米达的地方。我们发觉了这是"皇军"的高级官员，便在指军员的命令下，一致开火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马上同时集中火力，瞄准自己的目标射击。掷弹筒打得特别准，一颗炸弹落在坂本旅团长跟前，便把他的脑壳炸碎了。他的骑兵随从和参观团的武士们，也在我们强烈的火力下消灭了。

这边的枪声一响，走到村北的三百多名卫队，立时就分两路从东、北两面直扑我们的阵地。这是一支不同凡响的精悍的卫队呵，他们的钢盔、制服全是新的，武器装备也全是新的，战斗精神也颇顽强，他们以班为单位，端着轻机枪举行集团冲锋，可是一冲近我们第一道阵地跟前，就被手榴弹打垮了。这些武士道们，一班完了，一班又上来。在末了，这群旅团长优秀的卫队，至多只剩下五十余人。

一支笔不能同时写几方面的事情。当我们的战士跟卫队群举行激烈战斗的时候，附近各据点的敌人已陆续增援上来。宋庄东、西、北三面都有枪炮声，都有敌人的冲锋和我们手榴弹的炸响。

战斗已经如此凶猛的展开，西南面的深泽、高庙、大执要一线也有敌人的重兵封锁，一打就走是完全不可能呵。我们坚强的指挥员，一切都了然于胸，决心是敏捷而坚定的，部署是沉着而周密的，我们决定在第一、二两道工事周旋八小时，第三道工事坚持到天黑。这就是说，不管敌人的兵力将达到如何强大的程度，我们这两个连，是必须顽强地坚持地进行一整天的村落战。但我们是进行游击战争，对于村庄的坚持，只是为了把它作为战术上的凭依，以便于达到一个这样的战略目的——即是在消灭敌人中来保存自己。因此我们的指挥艺术和战术动作，是主动而机灵的。

四、两种射击

起先，我们依据着村外菜园土墙边的第一道工事，杀伤猛扑而来的敌人。敌人几次的冲锋都压下去了。

敌人冲锋，"呵！呵！"的狂号，我们的战士默不做声的予以迎击，我们的机关枪和步枪，一点也不乱打，敌人一进入我火力圈内，便猛投手榴弹，大大发扬了近战火器的威力。子弹是宝贵的，我们的口号是："谁能节省子弹，谁就能坚持到胜利！"战士们都奉守着这个信条，不瞄准便不射击。

在东边，我们一连七班长李清斋同志，这个特等射手，他在土墙下用跪射的姿势接连地打了七枪，由北往南运动着的敌人，不多不少的被他放倒了七个。可是他兴奋得忘记了敌人正用狂蜂一样的枪弹对付他，他立起来招呼邻近的同志说："瞧，我要再来一个！"头部暴露，不幸，法西斯的枪弹夺去了他勇敢的生命。

在村西庙台上，发现敌人安起一架电台，同时有三挺轻机枪在那边扫射。二连副连长廖志国同志，选择了敌方的一挺机枪射手和弹药手正在接运子弹的时候，打了一枪，一下把两个敌人都打翻了。这架机关枪也就停止了叫嚣。

二连机枪射手边廷杰同志，这个汉阳兵工厂干了九年的技术工人，他用一梭子子弹，打死了二十七个敌人。后来为了节省子弹，他让机关枪休息着，却拿起步枪跟敌人战斗。他两枪打倒了四个敌人，第三枪打空了他就不再放，握起了自己的手榴弹。

敌人的冲锋是继续着的。在一门三八野炮和两挺九二式重机枪的掩护下，一群敌人，每十个端着一架轻机枪向着我们村的东口冲击。冲锋的武士道们，离我们已经不很远了，我们的手榴弹正准备着拉火，可是敌人掩护冲锋的炮弹直飞过来，却落在冲锋者的人群中，炸了。接着又是一炮，两炮，全落在这一带。三个炮弹替我们省下了一些手榴弹，敌人躺倒了三十几个，剩下的不得已回去算账去了。

敌人把机关枪、步枪扔在死尸的旁边，离菜园墙外也不过丈多远。可是我们不能出去拿，因为敌人的火力很强烈。但敌人也不敢过来取，因为我们的手榴弹也是怪厉害的。通讯员鲁文才同志，他用一根长竿伸出来，机关枪倒没有捞到，却把两支三八式钩过来了。

五、最险恶的两小时

战斗继续进行。

我们的部队坚守宋庄村，不仅打垮了坂本的卫队以及附近各小据点出来的敌人，而且打了深泽、无极、定县、饶阳、旧城、安平远近各大据点增援来的敌人。综计敌人参加宋庄一战的兵力，不下二千五百人。他们用了各种口径的大炮五、六门，掷弹筒三、四十个和众多的轻重机枪及瓦斯筒，炮烟飞绕着村庄。

十二点的时候，宋庄南面我们那个混合连也跟敌人打上了。这六十八个指战员，差不多打完了仅有的一点子弹，苦战了三小时，在下午三点，他们突围出来了。这以后，战斗围绕着村庄北部进行，情势是很严重的。

三点至五点，是敌人最疯狂的两小时，它的突击兵力

最大，火力最猛，冲锋最凶。也就是这个时候，敌人举行总攻，我们第一、二两道工事，差不多全被炮火毁平，个个独当一面的战士，这时按照计划完全退到了第三道防线，在村边房角工事里，战斗已经坚持了八小时以上了。

总支书记来回的走着，他向战士喊："谁能沉着应战，谁就能坚持到底！""谁能去危险地方，谁就能得到安全！"

这些鼓动口号都起了实际的作用。

民兵同志们防堵着西南角，敌人不断朝这个地方射击。战斗的场面是如此凶猛，民兵们直嚷着要三八大盖。于是二连五班长陈文如同志跑过去，把自己的枪交给他们，并说道："我跟你们在一起打！"民兵也都沉着不慌了。

二连四班的战士们，差不多伤亡了大半，可是班长张文生同志，仍然单独坚守了一个房角与三方面的敌人作战。打了两个钟头，他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士王子仁同志，卧倒在街上一座厕所旁边射击着，突然一颗炮弹飞过来把厕所完全打翻。他从土堆里爬起来，依然坚持自己的岗位。

这都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呵。

后来，村西南角被敌冲进，有十五个敌人带着一架轻机枪上了房；二连副连长廖治国同志急了，领着一个民兵通讯员，悄悄跑进这个院里，他们每人手里握住两个手榴弹，同时往房上掷去，把那爬上房的敌人全打掉了。但敌人继续上房，决心要站住个最初的立脚据点，而我们也加上两个民兵前来继续投弹。敌人连上三次，我们连打三次。四个人打了四十几个手榴弹，敌人在房顶上伤亡便有四十多名。

新战士赵端生同志，在西南的另一处朝房顶上打手榴弹，打死了两个敌人，自己也受了伤。

战斗更加紧张剧烈，而天是快黑了。我们又适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再坚持半点钟，我们的天下已经来了！""再熬过半点钟我们完全胜利！"

在一连二连的接合部，村的东南角上，敌人拚死连续四次冲锋都没冲上，碎身和重伤的动物摆了满地。我们眼见敌人一个小队长完全失去了再冲的勇气和信心，他迟疑不前，却被他的上级指挥官在阵前枪决了。

天黑以前，敌人举行的冲锋不下三十次，可是冲进街打出街，冲进村打出村。我们的战士，在指挥员机动灵活的指挥下，发挥了充分的火力，粉碎敌人一切攻击的计划。敌人曾一度施放喷嚏性的毒气，但我们事前有备，没有遭受丝毫损害。敌人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呵！

六、我们的天下

夏天的黑夜，迟迟降临，近九点时，夜幕终于完全拉下来了。这时候，敌人的伤亡已经过半，一天恶战，到现在面对着可怖的尸场的暗夜，不得不停止了进攻。但是疲倦极了的残余敌人，仍然封锁包围着村庄。它在零散的枪声中杂以浓密的鞭炮，借以迷惑我们，同时并在村外道沟旁边点起来了一堆堆大柴火，这样来防止我们不意的突击。

敌人还企图能够把我们围住，等待他们期望的新的援兵到来，为他们的旅团长和横躺竖卧的死鬼们找什么补偿，可是现在我们的天下已经来了。

一连二排向东北角突进，走到道沟旁边，敌人还没发觉。因为他们守在火光后面，反而看不清前方；而且精疲力尽的武士们，一大部分已在死尸旁边沉沉的睡觉了。我们的战士从死尸身上踏过，也从睡了的敌人身上踏过。"嗯……嗯……"敌人在地上发出梦呓似的叫唤。我们一个战士好奇地去摸一个躺着的敌人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却被敌人咬了一口。当敌人的哨兵开枪后，我们便投了几颗手榴弹，扔在敌人躺着的地方。接着我们便跟敌人拚起凶恶的刺刀，有的战士把刺刀都刺弯了。就用枪托去打；英勇的贾满圈同志曾使枪托打裂了一个敌人的脑壳。

一连战士吴吉彬同志，在突围当中用刺刀杀死敌人的机枪射手，夺了一挺歪把子出来。还有一个战士却在敌人睡着的地方背出一架机关枪。

昏睡的敌人被我们一冲便慌乱了。有一个突然惊醒的敌人，竟跟着我们突围的部队跑，后来我们发觉了这顶钢盔，吓得他又猛力往回逃，结果被我们打死了。

我们的部队，就这样突了出来。有的是静悄悄的突出，有的是拚刺刀冲出来的。在突围当中，我们有十四个同志受伤，九个同志阵亡。

可是敌人却不知道我们已经全部突围走了。这也难怪，他们怎会相信跟自己打了整天的对手就是这么一点点人呢！他们以为我们是一支庞大的兵团呵，因之区区两连人突围出去，他们并不以为是我们作战部队的全部。他们仍旧围住村庄，不断用零散的枪声，唬着他们心理上的村中的八路军，使得空村的深夜继续不能安静。

据说第二天，天一明敌人就举行冲锋了，他们冲进村没有发现半个人影，觉得十分奇怪。后来一股敌人冲至圈羊的院外，武士们的叫嚣，把吊住了的羊群惊得乱跳，铁链当当作响，敌人在朦胧中以为遇见了八路军的伏兵，便劈劈拍拍响起枪来，村外的机枪大炮也轰鸣起来。这时候，保定的敌人八百余，已经开到增援，可是现在他们只能把八只山羊歼灭，我们八路军是早已游在平原的大海里去了。

七、副连长的插曲

二连副连长廖治国同志，也带着机枪射手边廷杰向南方突围。突出以后，他不知怎么忽然想起在那儿还有一架轻机枪没有带出。"咱们返回村找枪去吧？""行！"

于是，两条黑影，低低的弯着腰背，飘忽的行走在火

光照射不到的阴暗地带。黑夜盖住了整个战场，零落的枪声和沟边的火丛，反而使人感觉着更加荒凉与寂寞。

幽暗朦胧中，他们摸到了村子，可是摸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枪，其实我们所有的武器都已分散带走了。可是他总觉得丢了一点什么东西似的。

他一定要心满意足地走了才好。整天的恶战，是使他的神经过于紧张和兴奋了。应该补说一下的，这个副连长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性情却有点直爽。五天前的李贵子战斗，他曾被敌人的炮弹埋了一次，耳神经全震坏了。当他和记者见面的时候，他的耳朵还有点聋，要大声说话他才听得见。

没有找到枪，两个人又摸索着出村，在血肉模糊的战地，尸体横三倒四几乎到处都是，副连长在暗中边摸边走，把几具死尸身上的手榴弹和子弹都解下来，挂满了自己一身。

在黑沉沉的道沟里走了一阵，副连长还感觉不满足。“老边，咱们再去让敌人消耗一下吧?”“行!”机枪射手赞成这个新的主意。

两个人重又回来，摸到敌人跟前一连投了十几个手榴弹，口里大声嚷着:“村里的同志们坚决的守呀!我们十七团、十八团都增援上来了!”

于是，敌人的机关枪、掷弹筒一股劲儿向他们这个方向打过来，乱嘈嘈地打个不停。

“痛快得很!”两个人从心底里笑着，便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最后，他们走了三十几里地，天快明时，在大定村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尾　声

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到这里，已经宣告结束了。

现在，我们应该列出几个数目字来表示双方的消耗。

敌人被打死的:计有坂本旅团长一员，以下官兵六百余名，被杀伤的，有官兵三百余名，伪军被打死和被打伤的:有官兵二百余名。合计敌方伤亡约一千二百余名。

我们方面呢?阵亡三十二名，负伤四十一名，共计七十三名，其中连级干部四名。

(周游，《解放日报》1943年4月9、10日)

材料二　平原枪声　以少胜多歼顽敌

1942年6月9日，吕正操所部转战到达深泽县东北的宋庄村，准备迎接残酷的战斗。

宋庄在华北平原上算是一个中等村庄，全村约有400户人家，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00米，分为南北两个庄，两庄相距50米，南宋庄小，北宋庄大。这里是老根据地，村里有一些砖瓦房，有地道，村周围有土围墙。这样的地形地物显然有利于村落防御战。吕正操所部的几支部队6月9日凌晨3点多钟到达以后，22团两个连和藁无大队一部驻北宋庄，警备1旅1个连和晋深极大队一部驻南宋庄。

久经沙场的22团团长左叶，中等身村，能谋善断，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查看村内外地形，划分任务，制定作战方案，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如果发现敌情就坚持打到天黑。团党总支书记贺明有比较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召集各单位的指导员布置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工事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接着，他们开始动员村里老弱向外村转移，民兵和大部分群众都主动留下来配合部队构筑工事，把街口堵死，把院落打通。把第一道工事的掩体挖在村边土墙的墙下，大半在墙里边以便出入掩体，小部分在墙外以便发扬火力，战士们把这叫“壁里藏身”，可以更好地防止敌人炮火的攻击。

早晨7点多钟，太阳像往常一样升起来了，这是初夏季节，到处是一片浓绿，在这临战前的静寂中，吕正操所部的指战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一会，村东北角的一连阵地，战士发现敌情，前边是30多个骑兵，随后是大队步兵，正顺着北冶头庄通往宋庄的道路，向北宋庄奔来。北冶头庄离宋庄只有5里地。战士们在工事里向外观察，凭肉眼就可以看到，在五六个尖兵后面有个带值勤带子的军官，一边走一边和身后的军官在嘀咕什么，边说边打手式，比比划划。敌人越来越近，看上去随在马后的步兵约有300多人。特等射手郧纪斌瞄准值勤军官身后敌人的指挥官，其他战士把手榴弹准备好摆在身边，屏住呼吸用枪瞄准敌人。待敌人距阵地只有30多米时，我军指挥员大喊一声“打!”顿时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和步枪、手榴弹同时向敌群开火。敌人值勤官后面那个军官应声倒下。随即人仰马翻躺倒一片。活着的都躲进道沟里。这种情况下，机枪射击已经无效，掷弹筒向道沟里打了几发，30多个骑兵几乎全部被打死，步兵见此情景，慌忙上来把那个指挥官抢下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指挥官是敌26师团的坂本旅团长。原来在6月8日，敌人探知宋庄北10里的西固罗附近有八路军大部队的情报，特派出主力深更半夜出动准备突然袭击。9日晨赶到西固罗，结果扑空。后由坂本带着一个由三个日本人组成的参观团，在所谓“确保区”参观。一路说说笑笑，比比划划。虽然也利用道沟行进，但骑在马上，身体还是露出沟外。刚一接近宋庄，即遭伏击，命归西天。顽强的日本人尽管遭到迎头痛击，但是决不就此善罢干休。几分钟后，惊魂未定的敌人又挑起燃烧着的太阳旗，开始反击。这是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精悍卫队，全新装备，他们像最凶狠的狼狗一样，向我军阵地扑来。他们以分队为单位进行小集团冲

锋，敌人挺着身子，嘴里叽哩哇啦地怪叫着，向村口阵地凶猛地扑过来，到我军阵地前沿，被一阵手榴弹打了回去。连续几次冲锋都被击退，死亡200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冲锋，改用火力封锁宋庄，等待援兵的到来。上午9点多，一连发现村东二三百米处的坟地里有敌人的电台天线和大炮，是敌人的通讯站和炮兵阵地，有不少敌人正在挖工事，架炮。经我军重机枪、迫击炮的一顿猛射，只一会儿，坟地上的敌人就全部报销了。

正在附近"扫荡"及各据点的日伪军，得知宋庄发生激烈战斗，就分从东、北、西三面赶来，包围了宋庄。到上午10点多钟，蜂拥而来的敌人有一千七八百人。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我军仍然是可以突围的。但突围后，部队就在大白天暴露在碉堡林立、公路如网、大兵尾随的野外，失去了村落的依托，是十分不利的。为此，决定暂不突围，利用宋庄的坚固工事和地道，狠狠打击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挫其锐气，争取主动，待到天黑再行突围。由于敌人是陆续投入战斗，轮番展开进攻，先是攻1连阵地，后是攻2连阵地，都被一一打退。后来敌人调整了部署，在统一指挥下向我军1、2连阵地同时进攻，先是集中各种火炮和重机枪定点射击，然后在曲射炮火和机关枪掩护下发起大规模的集团冲锋。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我军指战员越战越勇，高喊着"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的口号，顽强地抗击敌人。有几个战士被墙土埋住了，钻出来摇摇头接着打。特等射手们弹无虚发，班长李清斋7枪打死了7个敌人。副连长庚治国发现村西面庙台上敌人一挺轻机枪不停地向我扫射，他抓住敌射手和弹药手换梭子运子弹的机会，两枪就把两个敌人全撂倒。战士们严格地遵守着"三不打"的命令：敌人不到150米以内不打，不是成群的敌人不打手榴弹，不发动集团冲锋不打机关枪。沉着应战，发挥近战的威力。到下午两点左右，已打死敌人800多人。

下午3点多，天气闷热起来，高大的杨树，在战火中摇弋着，杨树的叶子已长到巴掌那么大，绿油油地在阳光下闪亮。战士们无暇欣赏这初夏的风光。敌人已将进攻的重点转到南宋庄。警备旅那个连和晋深极大队打得非常顽强。村边围墙被一段一段地摧毁，直至在视野中消灭，围墙被摧毁，还有院落可以依托，他们退到院落里利用房屋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又打垮了敌人三次冲锋。4点左右，敌人迂回到村西边冲进村里，警备旅那个连突到北宋庄，晋深极大队向南突出包围。南宋庄失守，敌人对我军的包围圈缩小了，2连从西面抽调部队，加强了北宋庄南面的防御。

战斗进行了9个小时，北宋庄村边的工事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下，大部被摧毁。不少战士被掀起的尘土埋上，从里面爬出来顾不上拍打尘土又投入战斗。我方弹药越来越少，敌人还在不断增援，总兵力已有2500多人。使用的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数十门，掷弹筒几十人，轻重机枪百余挺，还有瓦斯筒等。摆在面前的将是更加激烈的战斗，扭转形势和主动权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敌人想凭借南宋庄一带攻克北宋庄。我军指战员深知，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

太阳在西边的天际，注视着这场恶战。时近下午7点左右，敌人经过调整，发动了全天以来最猛烈的进攻。炮声隆隆，大地颤抖，弹片横飞，枪声哒哒，机枪向外喷吐着火舌，子弹像泼水一样凶狠地扑向目标。整个北宋庄里烟雾弥漫。2连的前沿阵地被敌人猛烈的炮火炸塌了，战士们撤到村边房屋工事里。敌人在村西施放了毒气，借着村西南角苇塘的掩护，从被炸开的缺口冲进村里，有十多个敌人带着一挺机枪爬上了屋顶。2连副连长庚治国带一部分人冲上去，先对着房上的敌人甩手榴弹，然后上房拼刺刀，逐屋进行争夺，硬是把敌人打了出去。在另一处阵地，1连的争夺战也异常激烈。战士们坚守着房屋工事，敌人不再敢挺身直冲，就匍匐前进，三次上来都被打退。敌人在这边阵地也放了毒气，乘势冲上来的敌人，再次被打垮，敌人死伤惨重，东洋武士道精神注进了他们的灵与肉，就是不服输。有一股敌人冲进东街口，1连连长带着两个班的预备队和一挺机关枪赶来，把敌人打了出去。连续三次，敌人终没得逞。指战员们在"再坚持半个小时就是我们的天下了"的口号鼓舞下，越战越勇。因为炎热和干渴，许多战士的嘴唇裂开了道道血口。许多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给隐蔽的伤员端水送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县、区武装和民兵，尤其是女民兵更不示弱，从始至终同主力部队并肩作战。而伤亡惨重的敌人已成强弩之末，又饿又渴的敌人到村边井台推水车弄水喝，都被打退。水没喝上还白搭上十几条性命。为了在天黑前有所建树，敌人还在从各处调兵。深泽据点的敌人几乎倾巢出动。但锐气大减，一个小队长看到伤亡惨重的情况，失去了再次冲锋的信心和勇气，迟疑不前，以至被他们的上级枪毙。其余的也都在指挥刀的威逼下冲锋，但一到长官看不到的地方，就把子弹埋在土里往回跑。更有的在下级军官的默许下。干脆把子弹埋在道沟里，以免再次冲锋。

在天黑前，我军共打退敌人40次进攻。

灰蒙蒙的天色转为漆黑，夜幕像一把大伞笼罩着神秘的大地。左叶和贺明召集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县区领导，讨论布置突围。决定兵分三路分别从宋庄北面、东北面、西南面突围。约定突围后的第一个集合点为西内堡，第二个集合点为东内堡，最后的集合点是定县的赵庄。突围的时间定在零点40分。战士们一边观察敌情，边抓紧准备突围工作。将伤员抬进地道，留下医护人员及药品和足够的供养，封闭道口，做好伪装。敌人还在盲目地打炮。并围着村子点起了篝火。零点40分，突围的时间到了，我军指战员和民兵群众按照预定方向开始突围，当

精疲力竭的敌人还在围着篝火打盹的时候，我军已经突围出去，这时敌人才发觉。伤亡惨重的敌人，以为突围的不过是小股部队，大批主力仍被包围在村庄里。第二天天一亮，敌人就对宋庄发起了进攻，按正规战法，先是一阵炮轰，然后进行大规模的集团冲锋。从保定增援来的800多名敌人也赶来参战，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宋庄猛扑，主力则从村东向西夹攻，打了半天，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那情景，恰应了一部电影的一句台词：太君！我们打误会了！气急败坏的敌人，放火烧了村中的房子。在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中，敌人拉着一车车尸体撤走了。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1200余人，其中打死日军600多人，伤300余人，打死打伤伪军200余人。我军阵亡32人，伤41人。

宋庄战斗，对周围的敌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影响极为深远。距宋庄不远的定县子位炮楼日军的一个小队参加了宋庄包围战，因打了败仗竟有几个士兵互相埋怨指责而火并。还有一部分从南洋战场调回来不久的日军，参加了这次战斗后叹气说："从来没有打过这样苦的仗，一个村庄的争夺战，皇军竟损失了这么多人，真不值得。"还有一个日军的中队长，带着他的部队参加了攻打宋庄，战斗停止后，只剩下了28个人，他和他手下的7个士兵，由于精神上的刺激，内心的恐惧，绝望地望着东方，默念着那个"天照大神"即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矮个的裕仁膜拜后自杀身亡。

宋庄战斗至此告一段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选自《中共虎将与名战》）

史迪威来华

背景介绍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自美国飞抵重庆就职。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作为美国大使馆随员来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美国。他先后历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团营长、参谋长，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等职，对中国的国情较为了解。中国战区成立之际，史迪威时任美军第三军团司令。应蒋介石请求，考虑到史迪威的良好条件，美国政府遂派史迪威来华任职。史迪威来华，身兼之职：①美军驻华军事代事，②在缅中英美军司令官，③对租借物资管理人，④滇缅公路监督人，⑤在华美军空军指挥官，⑥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中五个职务，是蒋介石无法干涉的。史迪威来华后，蒋介石打算通过史迪威获得更多的美援，以装备国民党军队，但史迪威却主张动员中国的力量抗击日本，反对蒋介石对内制造摩擦、对日消极避战，并想直接指挥中国的武装力量。这样，围绕着史迪威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问题、武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问题、抽调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用于抗日战场等问题，蒋介石与史迪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到1944年，两人矛盾日趋白热化。蒋介石甚至扬言，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将不要美援。美国政府为战后控制中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决定在战后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于是改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国，被任命为美军第十军军长。

材料：

- 中国战区参谋长的产生
- 史迪威事件始末

材料一　中国战区参谋长的产生

蒋委员长接受中国战区统师后，即电宋子文请罗斯福指定一亲信之高级将领，为中国战区联军统帅部之参谋长，以便着手于该参谋部之组织；电中提及，参谋长不必定须谙熟东方旧情，只要有品学而热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将为合宜。

在委员长此电抵达美方以前，美军部亦正拟选派高级将领来华襄助作战，惟其任务，主张尚未一致。陆长史汀生认为其任务宜在"作战"(Operation)，参谋长马歇尔认为其任务仅在"使命"(mission)。前者以统兵杀敌为主，后者以接洽策划居先。然参陆两部皆认为中国战区情况甚恶，随时有被敌迫和之可能。缅甸地界中英，为中国当时惟一海上国际通路，而中英之间，又方因塔尔萨轮船所载之中国租借物资，被英占夺之故，关系不良，故必须有一坚毅有为之将领，始能廓清中英间之歧见，处理滇缅路中之难题与控制中国租借物资之供应。至于人选，则史迪威少将首被考虑，然因其在华时，官阶较低，虑为中国所轻，乃改拟段澜(Drum，Hugh A.)中将。段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马歇尔同隶援欧远征军潘兴(Purshing，John J. 1860－1948)大将麾下，曾充第一军军长，并曾充潘兴之参谋长，与马歇尔不甚相得，但其资历才能，则为史汀生陆长所属意。1942年1月2日，段澜奉召前来华府，与史汀生、马歇尔分别晤谈。段澜主张自缅甸攻泰、越，占河内及海防，打开通华运输路线，建立强大在华空军，史汀生赞成之；而马歇尔则告以美国尚无大批军事援华之准备，亦不能即为打开通华运输线之努力，目下对华政策，只在训练、装备华军，维持中国作战(Keep China in the war)。段澜以此政策属于消极，不肯接受，马歇尔遂改荐史迪威，时1月14日，距蒋委员长请荐参谋长之电已十日。

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生，1904年西点军校步兵科毕业，以少尉派往菲律宾第二步兵团服务，1906年调充母校任法文、西班牙文语言教官，1911年由美返菲过中国，驻十三日，亲见辛亥革命之动乱。1917年调往法国，在潘兴大将远征军情报处服务，在St. Michael第一军组织中，识马歇尔（马时为第一军副参谋长），亦遇史汀生。1919年至1922年，派充北京美军语言教官，取华字史迪威为名，亲见五四运动前后之中国情形。1923年至1924年在Fort Bennings步兵军校深造，再于1925年入Fort Leathworth指挥参谋学校，训练一年，与艾森豪同级，毕业时艾森豪名列第一，迪威平平。1926至1928年充天津第十五步兵队大队长，亲见五卅运动及国民革命军北伐情形。马歇尔时任该大队执行长，相处甚得。1929年马歇尔主持Fort Bennings军校，招迪威使任作战科教练主任，因与其直接上官不相能，故马去后，即改充San Diago第九团预备队主任，方郁郁不得志，而适奉派充驻华大使馆武官，亲见日本分离华北及芦沟桥事变前后情形。1939年返国时，马歇尔方超擢为军部参谋总长，乃升迪威为准将，使任Fort Sam Houseton第二师第二旅长。1940年充第七师司令官。珍珠港事起时，年五十九，官少将师长。其人长于训练与作战，而性情粗暴，虽前后在华十年，识华文能华语，深入中国各省内地，而对中国民族文化、时代精神、人物估计，皆乏真正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历史，及国共分合之内在情形，亦皆茫无所知。珍珠港事变起后，迪威奉召来华府，段澜谢绝新命时，迪威正因其原定之法属非洲司令职务（即Grmnast计划）搁浅，方待另遣，马歇尔乃以长训练与战术，及谙熟中国语文为由，于1月14日，荐之于史汀生，史汀生当晚9时约见，议论契洽，许其为担任赴华使命最适当之人选。

史迪威选定后，美陆次麦克莱即于1月15日函告宋子文，透露美军代表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安排。又谓鉴于缅甸战区中英美军队之复杂，美军代表必须在缅区具有执行三国军务之权力，乃能应付艰巨。宋将麦氏原函电呈蒋夫人面告委员长；并于1月19日走访美陆长史汀生，史汀生提出说帖一件，宋摘译中文，径电委员长报告，略曰：

“今日史汀生约谈，………关于介绍中国战区参谋长事，美陆长曾向英国提一说帖，其内容分（子）原则、（丑）目的、（寅）实施计划各点：

（子）、原则：

1. 英美均应深切了解，非与蒋委员长彻底合作，无裨战局。

2. 无论自军事上政治上观察，英美俱应尽力充实中国之武力。

3. 目前最大问题，为中国与英美间运输上之困难与心理上之隔阂。

（丑）、目的：

1. 完成中英美间切实联络之办法与其工具。

2. 保卫滇缅路及缅甸安全。

3. 改良滇缅路运输管理。

4. 扩展陆空军据点，充实技术援助。

5. 增强中国抗战力量。

6. 规定中国战区与魏菲尔战区（按即南太平洋战区）切实联络办法。

（寅）、实施计划：

1. 商请委员长同意美军代表具有下列职权：

A. 办理一切在华美国军援事宜。

B. 在蒋委员长统辖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之一部分中国军队。

此项军队如在缅甸参加作战，其作战计划，应受英帅魏菲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仍由该美军官指挥。

C. 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一切国际军事会议。

D. 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之运输事宜。

2. 如中国赞成寅项各款（ABCD四款），则美军部拟办理下列各事：

A. 增加华南、缅甸区域之空军力量，及委员长交给美军官指挥之中国军队之全部军械装备。

B. 在英国同意下，设立兵站，供应中国在缅甸或英美方面之陆空军，并供给专门器材及军队，以维持仰光港口货运与设备，及协助维持滇缅公路。

C. 为便利上述计划之实行，必须取得英国之合作与允诺，而英国之合作与允诺，则以委员长全部接受寅项各款为前提。

史汀生又面告，寅项所称之美国高级军官，即可兼充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此参谋长已拟推荐史迪威中将充任。”

此电为其后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之根据，为史迪威派遣之前提，但与盟邦共同作战之精神，与委员长请荐参谋长之原意，皆有出入。就委员长请荐原意言，中国所请荐者，为中国战区之联合参谋长；而美方所派者，乃美军之驻华代表。参谋长听命于中国统帅，军代表听命于美军部。参谋长只有运筹策划之职务，军代表则予以执行军务之大权。而在军代表兼任参谋长之后，遇中国统帅意见与美军部当局意见不同时，应受何方之命令，显生问题！

就盟邦共同作战之精神言，联合国宣言宣布之后（是年1月1日），盟邦之间，有各尽资源各尽人力作战到底之互助义务。此种受援，并无条件。今照美军部要求，则中国能否受到寅类2项甲乙丙各则之援助，须视中国曾否接受寅款1项ABCD（均见前）之条件，则二十六国联合宣言签署之谓何？中国依据租借法案，得到申请租借之物资，交由中国接收处理，在珍珠港事变前，业已开始。美国

允以军械装备中国三十师军队，在麦格鲁德美代表任内，亦已商妥待办，今乃于共同作战约束宣言之后，租借物资反由美军代表监督管制(supervise and control)，军队装备反限于交给指挥华军之美国将领，于法何据？于理奚通？美军部殆亦自觉此种附条件之要求，殊乖情理，故史汀生谈话中，迭以英国要求为言，实则英方果有此种要求，则30年中，吾人在英美抗战文献中，未得参证！

委员长得子文皓电(19)报告后，似已看美军代表兼任战区参谋长之办法，将生两姑为妇之困难，故即养日(22)电饬子文，须将战区参谋长之权限地位，先向美方明白厘定，始议其他。委员长之意，在华之美军代表，须受中国战区参谋长之指挥，而中国战区参谋长须受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然宋子文漾日复电，则谓美军代表既兼任战区参谋长，当然均受中国统帅命令。既未将委员长之指示，转给美方，又即于29日与史汀生交换函件，尽允美方之要求，造成委员长与美军部间，关于史迪威职权地位不同之解释。

宋史交换函件签定后(1月29日)，美军部发表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四)滇缅通路监督人，(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摘自《史迪威事件》梁敬錞商务印书馆)

材料二　史迪威事件始末

史迪威来华后，在重庆设立了中、印、缅区美军指挥部。当时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的局势十分危机，英国政府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军事同盟，要求蒋介石出兵缅甸，把日军牵制于缅甸北部，阻止日军由新加坡、仰光沿海进攻印度，蒋介石也希望保持仰光出海口和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外援运输线，于是先派出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共约三个军为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但是英国政府要求蒋介石军队入缅是为了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并不是为了保存仰光出海口，所以不愿意蒋介石军队过早地大批入缅。中英双方矛盾重重，不能协同作战。正在这时，史迪威来到缅甸腊戍，他协调中、英矛盾，指挥蒋介石拨给他的第五军和第六军在仁安羌地区解了英国军队之围，救出英缅军七千余人，并掩护他们向北撤退到曼德勒(缅甸中部)，谁知英军置中国军队于不顾，自己却仓皇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印度跳跑了。

不久，曼德勒被敌占领，史迪威、罗卓英急令各部队撤向伊洛瓦底江西岸，然后再向印度北部英伐尔撤退，中途史迪威与罗卓英两人脱离大军，只身撤往印度，蒋介石这时为了保存实力，直接命令杜聿明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杜聿明遵照蒋令率部向国境撤退。那知道各部队所经之处，多是丛山峻岭，地形复杂，从野人山中、印、缅交界地带，沿途森林蔽天，蚊虫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根本没有道路可走，正值雨季部队行军尤为艰难，官兵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后来几经辗转虽然也到了印度，但原来约有十万人的远征军，由于作战伤亡和撤退损失，这时只剩下四万人左右了，改编为驻印军。

一九四二年六月，史迪威由印度返回重庆。史迪威为了掌握入印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向蒋介石提出整顿中国军队的计划。一方面要求让他赴印度拉姆伽(加尔各答西北)设立并主持一个训练中心，由美国空运武器，由中国内地(昆明)空运新兵，并从美国调来大批美国军官，重新训练补充和装备中国在印、缅的部队。对此蒋介石不以为然，只说参谋长应常在重庆，遇事可以随时商量，印度训练工作可让顾鲁白(Gruber)代理。另一方面他又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撤换国民党某些高中级军官，改由美国军官直接指挥，并先后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史迪威想以此来实现他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并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除答应对个别军官进行“撤查”外，对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特别是坚决反对撤换他的高中级军官。蒋介石说史迪威是他的参谋长，在军事上只居于中介联络地位，入印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行政权必须由蒋介石的军官来负责，坚持对他军队的控制权。这样，调来的三百余名军官只好改作联络官、教官或管理人员，史迪威对此很恼火，蒋史矛盾日趋尖锐。

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也是不满意的，这个问题的矛盾首先在美国空军调运问题上暴露出来。缅甸失守后，中东局势也由于德军的进攻而随之紧张，美英联合参谋委员会“不经预告”就把原来支援中国战区的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助英作战，削减了对中国战区的空运吨数和作战力量，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利益”，质问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调派美军打通滇缅交通线；保证每月空运五千吨援华物资；并要求免除史迪威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否则中国就要与日本讲和了。蒋介石的要挟，迫使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说明“美国及其同盟国均确信中国为共同作战之重要分子”，美国空军第十队之重轰炸机调赴埃及助战，乃一临时措施，一俟保卫交通线之空中力量充实之后，该项飞机当即调回，仍交空军第十队应用。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答应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连接滇缅交通线，(打通中印公路的北缅战役一直拖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开始，历时四个多月，中印公路打通了，中国士兵却付出了死伤四万多人的代价)；增加空运援华物资，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罗斯福的缓解并没有消

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特别使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批评了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失职、混乱”，并主张把援华物资的一部分用来装备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史迪威早在二十年代就在中国工作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经常出现的混乱应直接负责”，他甚至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纠纷“只有除掉蒋介石”。他主张援华物资用在对日战场上，因此，他要把租借法的援华物资也分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某些地方部队。他主张团结抗日，认为“没有理由应当让蒋介石把一支庞大的力量放在北方不动，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憎恨。”因此，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史迪威就以参谋长名义正式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军”，即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调出来打日本。史迪威认为拨一部分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军队，使其深入华北日军侧翼，可以直接威胁平汉路和和张家口地区，减轻平汉路日军进逼的压力。史迪威的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是美国政府不同意撤换史迪威。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首先从河南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六月长沙失守，七月衡阳危急，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溃败，中国局势日益恶化。美国政府担心国民党军队完全崩溃和投降，影响美国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七月七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十八人，于七月二十二日和八月七日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美国政府当时首先关心的是挽救蒋介石军队的失败，稳定局势，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和根据地的情况，以便必要时指挥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来抗击日军的深入。

对于罗斯福的“紧急建议”蒋介石虽不同意，又不敢公开反对。因此，一方面他于七月八日复电罗斯福，表示“原则赞成”；另一方面又电去美游说 的孔祥熙宣传“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全国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并向罗斯福提出“共产党部队能否参加，须视该部队能否遵守中央政府的军令，此当另待规划，不在此时决定”，坚持他的限共、反共政策。八月八日，衡阳失守，局势日趋恶化，在此紧急时刻，罗斯福于八月二十三日再次致电蒋介石，坚决要他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一切军队，并强调指出：“交由史迪威将军统率的军队，不应有限制，凡用以保卫中国和攻击日本的军队，均应由他指挥。当敌人压迫我们，可能造成灾难时，拒绝任何一个能杀日本人之助者，是不合理的。”罗斯福的电报，表明了美蒋矛盾性质的实质，也反映了美国当时远东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至于共产党问题，等打败日本以后再慢慢收拾。九月十八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对于蒋介石不积极支援缅北战役，抽调远征军回国以及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提出严厉指责，并说蒋介石要对由此引起的一切灾难性后果“承担个人责任”。

罗斯福的指责，逼使蒋介石不得不摊牌了。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以备忘录形式送赫尔利电转罗斯福，说明不能委派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要求将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如再委以重任，必致内部发生纠纷，中美军事合作，亦只有趋于失败之一途”。马歇尔在中间虽也作过一些斡旋，蒋介石却毫不让步，认为“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甚至扬言不要美国援助，自己“独立干”。双方矛盾已无法调和，这时，赫尔利以“总统支持史迪威则将失去蒋，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为由，建议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美国政府为战后牢牢控制中国，并进而夺取对整个亚洲的支配权，不能因支持史迪威“失去蒋介石”，因此，只好让步。

十月十九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并将中缅印战区分为两部分，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区由苏尔登指挥，并建议以魏德迈为中国战区蒋介石的参谋长。随后，赫尔利又接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

十月二十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国，不久被任命为美军第十军军长。史迪威是忠实执行美国政府这一时期的亚洲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将领，他的调换表明了美国政府已经重视调整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决心在战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摘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背景介绍

1942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方面在1941年年底就已组建了赴缅远征军，但因英军阻挠，部队赴缅工作时断时续，难以全面展开。直到日军占领仰光，英军力不能支、节节败退之时，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

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正式组成，罗卓英、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长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下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97师，10万余人。即赴缅作战。由于英军只是想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其撤退，所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失败的危机。从3月中旬到4月，中国军队先后在同古（亦作东瓜）、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作战，多次重创日军，解救了被围的英军。但是由于英军不能配合作战，中国军队在指挥上又发生分歧，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自4月26日自动放弃棠吉后，便遭到日军的追击和合围，遭致惨败。4月30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开始撤退，一部分退往印度，大部分退往云南。在撤退途中，由于给养困难、道路险恶、疾病传染，官兵死亡累累。6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遂告解体。

材料：

· 同古战斗

· 二〇〇师的遭遇

材料一　同古战斗

我当时明了敌情及敌人整个战斗计划后，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师团（虽认为敌第十八师团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尚未料到敌在仰光登陆之第五十六师团），就下决心照蒋介石指示，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我即亲赴同古，指导第二〇〇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集中。史迪威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在前方积极准备同古会战。史迪威在后方与英方交涉，调度部队集中，预定五日至七日开始向敌军攻击。

三月二十日起，同古序战开始。敌自前日受我伏击后，行动极为谨慎。先头以步骑联合约五六百人，向我军正面搜索前进。当其发现我军在鄂克春有既设前进阵地，随即展开一联队附山炮四门，向我攻击。

二十一日，敌增炮二门，共为六门，向我整日攻击，敌机并更番轰炸同古，我军勇猛还击。敌伤亡三百余人，攻击顿挫。我亦伤亡一百四十余人，但阵地屹然未动。

二十二日，敌再向我鄂克春阵地进攻未逞，一部企图迂回，亦被击退。全日炮战激烈，入夜沉静。

二十三日，敌增至两联队（第一一二及第一四三联队），炮十二门，以战车、装甲车掩护向我鄂克春阵地攻击，炮火猛烈；敌机二十余架这一天就投弹六次。我以步骑配合向敌侧反击，结果毁敌战车、装甲车各二辆，汽车七辆，敌向南窜逃。下午八九时，敌再向我攻击，阵地被突破一部，彻夜对战。

二十四日，敌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一部敌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由同古以西向同古以北飞机场迂回。同古机场北部由我工兵团警戒，正在破坏铁路，团长李树正仓皇失措，向后撤退；仅第二〇〇师第五九八团的一营与敌激战，午后五时，放弃机场退守同古。是晚，戴师长调整部署，将鄂克春、坦塔宾前进阵地放弃，集结该师主力保卫同古。

二十五日拂晓，敌步炮空联合三面围攻同古，我军沉着坚守，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三十余架更番轰炸同古，一般建筑多被炸毁。但我军利用阵地，伤亡甚微。入晚我各部队不断以小部队袭敌，有断续小战斗。

二十六日，发现敌占同古机场后，敌第五十五师团以工兵及骑兵守备，另以一部挺进至南阳车站，占领阵地。

这一天，敌以三个联队（第一一二、第一四三、第一四四）围攻同古，主力指向同古西北角攻击。该处我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阵地被突破，我军遂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继续抵抗。是日，敌我争夺战甚烈，双方伤亡较大。

二十七日，敌主力继续进攻同古，因敌我短兵相接，敌人炮火失效，我官兵沉着固守，敌伤亡较重。我第二〇〇师第五九九团伤亡亦大。午后敌一部向北推进，与我新编第二十二师在克永冈附近发生遭遇战，双方彻夜对峙。

二十八日，敌人在同古以北要点构筑阵地，企图以一部对叶带西（叶达西）方面取守势，阻我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击；集中主力先消灭我第二〇〇师，并放射糜烂性毒气。敌我反复冲杀，我伤亡虽重，但士气旺盛。迄晚，城内阵地仍未动摇。敌并化装成英缅军及缅甸土人驱牛车暗带械弹，企图混入同古城内，里应外合，均经我第二〇〇师查出消灭。至晚清理战场，计虏获迫击炮七门、步枪百余枝、机枪六挺及防毒面具等甚多。

是夜十一时，戴师长坐镇桥东司令部，被由同古东南迂回的敌军越过色当河东岸来袭，与第五九九团第三营特务连发生混战，激战至二十九日拂晓后，即与城内部队通讯中断；同古城内我守军第二〇〇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桥东战斗激烈，立即派第五九八团的一部对敌东西夹攻。午后，已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并与第五九九团第三营取得联系，逐渐恢复掌握。

同日（二十八日），我叶达西集中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及炮兵战车各一部（只有轻战车，炮战车尚在腊戍待运），为了解救第二〇〇师，向南猛攻，至午后，攻占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战车并将敌炮兵阵地摧毁，获山炮一门及弹药文件甚多。但南阳车站坚固建筑物中的敌人，仍顽强抵抗，迄未肃清。

二十九日，我新编第二十二师向南阳车站继续攻击，敌军增援，以步炮联合反攻，敌我战斗竟日，均无进展。同日，我游击司令黄翔，令补充第二团的一部由南阳车站以西勃固山脉森林内迂回至同古附近，有一连曾一度进入

永克冈机场。这一天，同古西、南、北之敌，被我军攻击牵制，对同古攻击减轻，仅有炮战。大桥以东之敌，仍对戴师攻击甚烈，似有断我同古后路、包围歼灭我第二〇〇师的企图。

在这期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全部情况是这样的：

1. 三月十四日，由仰光登陆的日军后续部队约一师团(以后证明为第五十六师团)，行动尚未判明。在泰国境内的第十八师团，既未向景东方面进攻，即有经毛淡棉入缅的可能(以后证明其主力加入中路战斗)。

2. 东路景东、毛奇方面：我第六军在景东、毛奇方面无大小战斗；景迈方面之敌，正向景东抢修公路。

3. 西路普罗美方面：英军正面仅有小接触。三月二十九日，英军应史迪威的要求(这是合理的)，在普罗美南向少数日寇攻击。英装甲部队进入庞得后，即被敌军在斯维当截断后路，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4. 英空军于二十一日被敌机完全毁灭。美空军志愿队虽经协定自二十七日起协同我新编第二十二师攻敌，但直至三十日从未出现。

除以上情况外，我第五军第九十六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需一周以后始能集中(以后实际到四月十五日才集中完毕)，而第六十六军何时集中，尚难预料。第二〇〇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十二日，补给中断，加以日寇顽强坚守既得据点，我军攻击亦非一举可以夺取(根据昆仑关作战经验)。在此形势下，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登陆之敌势必参加同古战斗，坐使第二〇〇师被敌歼灭。如此，则我远征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有全军覆没之虞。因此，我决心令第二〇〇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当时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其实是想个人出风头)，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我，并派他的参谋窦尔登监督我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我以这个问题关系远征军存亡，并未受他的威胁，另令新编第二十二师于三十日向南阳车站之敌佯攻，牵制敌人，令第二〇〇师于二十九日夜经同古以东突围，主力撤出同古后，即将大桥破坏。

第二〇〇师从同古撤退，可以说是有计划的主动的撤退。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三十日拂晓，我大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军继续前进，才发现同古是一座空城。我第二〇〇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归队(当时伙食担一度走错路失去联络，以后亦全部归队)。

同古战斗，第二〇〇师是完成了任务的，战术战斗都比较成功。我远征军既不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那么予敌以一定打击之后放弃同古，保持战力，选择另一有利时机，再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这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遗憾的是，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要镇，既不能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戌长驱直入，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是英方另有阴谋，故意耽误运输。我统帅部一切依赖英方，咎由自取，而不该把一切责任委之于前方部队长的。

(摘自《杜聿明回忆录》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二〇〇师的遭遇

敌第五十六师团并不因我军占领棠吉而停止北犯，他们经罗列姆，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到达腊戌附近。二十九日敌陷腊戌，继续北犯。五月三日中缅边境重镇畹町失守，远征军退路遂被切断。

第五军奉命向八莫、密支那撤退。第二〇〇师奉命放弃棠古，向罗列姆前进，到达该地后没有发现敌情。参谋团命令第二〇〇师从罗列姆东进归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指挥，但戴安澜坚持执行杜聿明命令向北前进，归还第五军建制。五月五日，敌从畹町进至云南境内的惠通桥。五月八日，八莫和密支那先后失守，第五军向八莫、密支那撤退计划完全失败。杜聿明率领军部、直属队、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部向印度前进，越过野人山。第九十六师余韶部自选路线向国境转进，罗卓英、史迪威率领第六十六军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向印度列多前进。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率领两个师从腊戌撤退回国。

第二OO师从罗列姆归国，就要向北通过三条公路线、两条河流。在不见太阳的原始森林中行军和露营，终日在密林中钻来钻去，越钻越深。对我们来说，大部队白天行军得到了有利的对空掩蔽条件。敌机虽终日在我们头顶飞行侦察，却没有发现目标。有一天，我们行军到达南盘江，这是腊戌通曼德勒到仰光的一条大河，宽达千余尺，水势湍急，很难徒涉。渡河口一只船都没有，也没有桥梁。幸而河岸上竹林很多，当即命令各团伐竹编竹排，作为渡河工具。只费一天时间，部队全部渡了河，过了第一个大关。但前面还有三条公路，就是腊戌到曼德勒公路、细胞到摩谷公路、南坎到八莫公路。最后还要渡过瑞丽江。

我们研究决定，每当过公路的时候，部队白天指定休息地点作准备，到了夜间再行军。事先派军官化装缅甸老百姓，侦察通过地点及道路，派部队占领阵地互相掩护，在十字路口互派联络兵，以免迷失方向。就这样，我们顺利通过了曼腊公路。现在又过了第二个难关。

五月十八日，当我们通过细胞到摩谷公路的时候，遇着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大队兵力，我们预先在公路上占领埋伏阵地，以第六〇〇团为前卫。当前卫营通过时，敌人开始向我攻击。是夜，第六〇〇团据守阵地，与敌激战。戴安澜指挥第五九九团柳树人部，向左翼包围敌人。因夜间在密林中进行数小时战斗，敌我双方均陷入了混战。戴师长在混战中负重伤，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和第六〇〇团副团长刘杰阵亡，遗体都没有找到。半夜，决定部队撤回到原来准备出发的地点。拂晓前，在第五九八团的掩护下，部队脱离了敌人，到达指定地点集合。这时第五九九团、第六〇〇团伤亡很大，只剩下一营的战斗力。

戴师长伤势很重，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我们用担架抬回师部指挥所，在山顶上一间茅棚里，召开团营长会议。会上决定，如果戴师长不幸牺牲，就由我指挥部队，带领回国。这时，大家都很难过，一言不发；副师长高吉人尤为难过，因为他俩是最亲密的战友。十九日，部队在原地休息，决定另选过公路地点，改由第五九八团担任前卫，戴师长用担架抬着跟第五九九团团部走。我派副团长陈辅汉为便衣队队长，选勇敢善战的军官为队员，在郎东二十华里处侦察过公路的地点，准备十九日夜继续前进。第五九八团按照通过曼腊公路的办法，派部队占领公路两侧高地，掩护部队通过。按第五九八团、师部、师直属队、第六〇〇团、第五九九团的顺序通过公路。从晚九时开始，一夜间全师安全通过，这时全部官兵满面笑容，特别是戴师长显得格外高兴。缅甸已入雨季，终日行军，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医药非常困难，连药棉都没有。戴师长终日躺在担架上，雨淋日晒，又没有药可换，伤口已经化脓。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七时，戴师长在缅北芳邦村光荣殉国，全体官兵都感到非常悲恸。

这时，我们同军部已经失去联络，参谋长周之再到五九八团来，要我到师部去代理师长职务，指挥部队继续前进。我说，师长职务应由副师长高吉人代理师长，我俩都有责任帮助高吉人把部队带领回国。遂决定由高吉人代理，不久他召开营长会议，宣布就职，同时命令工兵营赶制棺材，夜间将戴师长遗体入殓。并决定即在芳邦附近渡瑞丽江，沿江西岸前进。第五九八团继续任前卫。瑞丽江江面不宽，水势不急，并找到四个木排，每次可渡一营人左右。二十八日，部队全部渡江，没有发现敌情。二十九日，因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不能继续抬走，又不能留在缅甸，乃决定火化。我们将戴师长的棺材遗体放在原木上火化后，捡出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跟第五九八团团部前进。六月二日，部队通过南坎到八莫的公路，这是突围中的最后一关，并未发现敌情。六月十七日，部队到达腾冲县附近。六月十八日渡怒江。六月二十五日，全师到达保山县漕涧集中待命。

突围战中，给养困难，路途艰险，还经常在雨水中行军和露营，官兵百分之九十患了疟疾，第五九八团第八连有一天竟有八名战士死亡。出国时全师官兵有一万人左右，回国后只剩四千六百人。

今天，回忆到许多战友为民族生存而英勇殉国，缅怀先烈，不胜悼念。

（摘自《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浙赣战役

背景介绍

1942年5月15日，侵华日军发起浙赣战役。是日，为夺取浙赣铁路运输线，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下令由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指挥第十三军的十五师团、二十二师团、七十师团、一一六师团、原田混成旅团、第十一军的河野混成旅团、华北方面军的三十二师团和小薗江混旅团，从杭州一线沿富春江、浙赣铁路西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东部防区发起了攻势。5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又奉命指挥三十四师团、三师团及今井、井平两个支队，加上三四千伪军自南昌一线由西向东向第三战区西部防区发起了攻势，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三十二集团军驻淳安，防守钱塘江北岸地区；以第十集团军驻金华，防守钱塘江南岸地区；以二十五集团军驻缙云，防守浙南地区；另外，第九战区还抽调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军、七十四军防守衢州。第三战区预定在浙赣路西段持久抵抗，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进行逐次抵抗后，在衢州一带与日军决战。但是，数倍于日军的国民党军临战怯敌，不敢正面迎战，节节败退。日军于5月28日占领金华、兰溪，6月6日占领衢州。顾祝同奉蒋介石命令，放弃原定衢州决战的计划，以保存实力。7月1日，东路日军攻占玉山、上饶、丽水后，与西路日军会合攻占了横峰，打通了浙赣路。7月11日，日军又攻占了温州，及中国对外的海上通道。7月下旬，日军因兵力不足，停止进攻，在彻底破坏机场、铁路，抢运占领区的物资后，放弃了金华、兰溪等14个城市以外的占领地区。8月30日，浙赣战役遂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衢州机场被彻底破坏，损失极为严重。

材料：

· 激战金华衢州

材料　激战金华衢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开

始了战时合作。利用距日本最近的中国第三战区浙江省内的机场，对日本本土实施远程轰炸，是中、美两国政府对日共同作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大本营对此感到极大威胁。在"四·一八"东京大轰炸后的第三天，日本大本营下令在华日军第十三军，立即停止原定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广德、宁国进行的军事行动，改而准备进行"浙赣作战"。四月二十二日，日本参谋总长命令第十三军"迅速转入摧毁（浙江）机场群"，彻底破坏浙赣铁路的作战部署。从四月下旬开始，日军从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抽调部分兵力和第十三军汇合组成作战部队，共计十四万人，由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指挥，分别在余杭、绍兴地区、杭州西南地区和萧山、富阳一带紧急集中，至五月中旬全部部署完毕。

针对日军的活动，第三战区进行了紧急部署：以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驻淳安，指挥钱塘江北岸的部队；以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驻金华，指挥钱塘江南岸及金华守军；以李觉的第二十五集团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重庆军委会还从第九战区抽调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四军配置于衢州附近，以确保浙赣间机场的安全。第三战区预定在"浙赣路西段持久抵抗，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袭扰敌后、迟滞牵制敌人"，"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

五月十五日拂晓，日军向金华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势，浙赣战役由此开始。

浙东日军的主要作战目的，在攻占衢州等地，破坏军用机场。要达到此目的，则首先需要击溃在金华、兰溪一带的中国守军。日军第一线兵力共五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余杭至奉化附近的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带，从北、东等方向，全力向金华方面压来。其具体进攻路线是：第七十师团沿奉新公路攻击，企图会合第二十二师团，在嵊县和新昌附近，一举歼灭中国暂编第九军；第二十二师团从东关附近，沿曹娥江南下，经三界、嵊县向长乐方向进犯；河野旅团和小兰江旅团从绍兴向诸暨东南进逼；第十五师团从萧山附近，渡过浦阳江南下，向诸暨西面迫近；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则从富阳地区出动，向新登方向猛扑。

在敌人大规模进攻面前，中国军队一方面逐次抵抗，一方面向敌后转移兵力。五月十五日，中国暂编第九军避开日军攻势，主力向长乐方面集结，一部分兵力向天台山转移，使日军捕捉、消灭暂编第九军的企图落空，而"未能获得预期战果。"

日军为了配合金华方面的攻势，在闽浙海面也发起进攻，企图在沿海地区登陆。二十日，敌舰艇、汽艇各两艘，小船二十只，载海军陆战队百余名、伪军二百余名，驰往闽江口附近，在日机掩护下，于川石岛登陆。中国守军在长门附近与敌激战，毙日军六十余人。同日，另一部日军约百余人，乘汽艇驰至平潭海面，企图登陆，被中国守军击退。

日军迫向金华，给中国军队以极大威胁。第三战区为保卫金华，在安华街和长乐附近，紧急加固原有阵地，在日军重兵进逼下，二十一日义乌失陷，日军插入金华东北。在金华以北的新登方面，中国第一九二师与敌第一一六师团在方家井、三溪口一带遭遇，激战五昼夜，向敌后转移。五月十八日，新登、桐庐相继失陷。二十三日，建德失守。至此金华以北屏障尽失。

金华以南，战局也十分不利。五月二十二日，永康失守，二十三日，日军进至桐琴、武义、李顺一线。敌人此时已形成合力围歼中国守军态势，企图在金（华）兰（溪）地区实施决战，一举歼灭中国守军主力。

为免遭日军围歼，中国守军主力尽行转移，这使金华陷于敌人进攻面前。二十五日，第三战区命令新编第三十师"在永金公路以北，侧击由永康犯金华之敌"；暂编第三十五师"在东永公路以东，截断敌交通补给线，尾击进犯金华之敌"，然而为时已晚。

二十七日，七千日军兵临金华城下，迅速发起攻击。担负守卫的第八十六军第七十九师和第一〇〇军第六十三师奋力抵抗。28日，敌突入金华核心阵地，中国守军"迭经反攻，得而复失核心阵地数次"，敌施放毒气，并配以二十七架飞机狂轰滥炸，中国守军阵地大半被毁。当晚，守城官兵从城内向北山突围，在撤退途中，又与日军发生激战，于二十九日冲出重围，转移到大盘山。同日金华、兰溪被日军占领。是役，"我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多人。"敌人损失亦大，"触雷死伤者不断出现"，五月二十八日，师团长酒井直次郎中将被地雷炸成重伤，旋毙命。

金、兰陷敌后，衢州成为日军主要进攻目标。衢州是浙赣线上的重镇，筑有大型军用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对衢州久存必占之心，发动浙赣作战主要目的即在摧毁衢州等地机场。

日军占领金、兰后，分兵两路，迅速进至衢江北岸和衢州以东铁路两侧。中国军队为阻止敌军进犯。在衢州附近集结兵力：以第三十军部署在寿昌以西的大同镇；第二十六军部署在衢州以西的江山、常山之间；第四十师部署在铁路正面；第四十九军部署在衢州以西的招贤镇；由第八十六军固守衢州城。

就在中国军队集结之际，赣东敌第十一军为策应衢州作战，于五月三十一日，以第三十四、第三师团及今井、井平两个支队，加上伪军三、四千人，约四万兵力，由阿南惟畿指挥，自南昌抢渡抚河向东进犯，六月三日已进至同源、李家渡、进贤一线，与自金、兰出动的日军，形成东西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

第三战区认为，衢州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六月三日向第十集团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下达"攻势转移命令"，要求

各部队当天到达指定位置，准备第二天(四日)与敌决战。

但是，蒋介石的一纸命令，改变了作战部署。他认为，日军从缅北攻入云南，形势比浙江前线更为严重，美空军志愿队又无法调往浙东助战，所以"金衢之得失，已不关今日战局之成败矣。"六月三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一元江亥密电"，指示第三战区应避免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顾祝同乃以第八十六军一部防守衢州，其他主力部队撤向浙赣路两侧山地转移，俟日军行动时，实行"分段截击"。

六月三日拂晓，日军以大量炮火配合，向衢州发起猛烈进攻。傍晚，敌第三十二师团和第二十二师团"突破(中国军队)纵深约十公里的阵地线，"并以飞机轮番轰炸，第七十六师外围阵地三小时内中弹二千余发，第十六师官兵死伤惨重，衢州东部中国守军阵地全被摧毁。

四日，由于前夜忽降暴雨，各河流水猛涨，日军进攻受阻。河野师团虽进抵乌溪江岸，但由于铁路桥已被我炸毁，加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尽管作出极大努力"，仍滞留岸边，无法渡江。

五日，敌全力进攻衢州南方中国军队阵地，并迫近衢州机场。敌机六架，炮八门，同时对城内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凭藉市内坚固的街垒，昼夜抗击，死伤惨重。

同日，守城的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奉第三战区命令，留第四十六团继续守卫衢州，其他部队共两千人，由城东南向外突围。六日晨，突围的部队在白沙至官戴附近，遭日军袭击，伤亡甚重，当到达衢州南溪口街与第二十六军会合时，只剩千余人。

六日上午，日军攻占了衢州机场，并占领了城西南面的航空学校。攻城日军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先后占领了衢州城的南门、北门、中南门、东北门。由于中国守军的抵抗，日军未能突入城内。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张宪文)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42年11月12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55人出席。在会上，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张厉生分别作报告，总结了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项工作。会议通过了《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党务改进案》等议案，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对共产党仍采取"宽大政策"，只要共产党"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割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当"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将司法院的司法部改隶行政院。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要集中建国意志，举国一致真诚团结，不应再有政见异同，要以三民主义这一唯一真理统一全国。会议于27日闭幕。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认为该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是对我党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对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个总结；它对我党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

材料：

- 蒋总裁在全会开幕时训词(节录)
- 会议经过

材料一　蒋总裁在全会开幕时训词(节录)

各位同志：

今天是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开幕，适当总理诞辰，各位与会同志回溯总理当年领导革命的光荣历史，瞻念今后抗战建国的前途，一定有很多感想。尤其是今天全会举行的时候，正是英美各国宣布废除在我国特权及其相关权益的时候，我们总理最后一句的遗嘱就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至今得以实现，大家一定感觉兴奋，因而更要体念到各自责任之加重。因此，本人趁今天全会开幕的机会，对于本会今后的责任和努力的方向提出几点简单的意见，贡献于各位同志。

自从一八四二年中英订立南京条约到现在，刚好一百年。这一百年之中，我们中国可以说，受尽了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的耻辱和痛苦。此其间，我们总理领导革命，创立兴中会，到现在也有四十八年了。这四十八年来，国家民族的前途有了本党的领导，全国同胞受着三民主义的感召，从事于革命建国的奋斗，经过最近五年的血战，才能洗雪百年的耻辱，恢复国家民族的平等自由。这真是一个最大的成功，也是本党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篇。各位同志也许觉得这是本党责任之所在，虽然有了这种成就，也不足为奇。但本人常常想到，一件事要成功是很困难的，而失败却是很容易。尤其是我们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得以成功，各位现在也许不觉得如何难能可贵，但是我们后一代的国民和同志，回想本党现在领导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经过的痛苦和艰难，其认识一定比我们现在深刻得多。这都是我们总理创导革命以来，积五十年来无数先烈同志的热血头颅，不断牺牲奋斗所得的结果，所

以我们对于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格外要加以珍重，加以爱护。更要认清本党担负了革命的责任，要在这个抗战时期来贯澈〔澈〕，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到底得而不再复失，那就要看我们继续奋斗的程度如何。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比过去更要加紧，更要努力，然后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否则，国际形势变化无常，如果我们因循懈怠，不自努力，则现在已经废除了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也许仍要加到我们国家民族的颈上。所以我们一般领导同志同胞的中央委员，今后必须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特别奋勉，特别刻苦，来保待已有的成绩，发扬过去的光荣，这是本席对于此次全会所要贡献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这次全会所负的责任与应有的工作精神，是各位同志所应该特别认识的。我们今后要怎样才能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达到我们建国的目的，可以说就是要从今天开始。所以这次全会是本党继往开来的一次全会，所负的责任格外重大。因此各位同志不可不特别奋发，敬慎将事，要将我们健全本党，建设中国的一切方针计划，都要由此次全会作一个全盘的决定，尤其对于今后抗战革命与积极建国的精神，必须由这次全会树立一个楷模，然后由本会领导全党同志，发动全国同胞，来实现我们党的决议。如此，才能完成此次会议的任务。过去我们每次举行中央全体会议的时候，大家的看法总以为与上次会议应有不同，应该有新的建议、新的方案提出讨论决议，才算尽到了会议的能事。因而忽略了本党工作的联贯性，忽略了过去会议所决议的方案与计划及其实施的经过与成效，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我们这次全会，必须一反以前之所为，必须检讨过去，正视现实，崇尚实际，贯以笃行。因此，在会议之时，首先要将九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案及其实施的情况与所得的效果，作一番彻底的检讨，以为继续努力的依据，期能作切实有效的改进。从上次九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十一个月了，在这十一个月中间，我们执行党的决议与工作计划的情形怎样?进度几多?如果实际检查起来，真是觉得惭愧万分。我们过去历次全会之所以缺少成就，缺少效果，就是因为忘却了从前大家集思广益，经过审慎研讨所定的决议，不知道检讨，不注重实行，只顾到目前，只知道定新计划，以致会议的效果不能见诸实际，要由我们的党来领导军事和政治，使我们的党能够在社会中间发生力量，树立信仰。这样，才能表现我们党的成绩和实力。我们今天遭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过五年多的血战，已有昭然的事实，足资证明，任何人也不能反对，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今天凡是稍有爱国良知的国民，实际上都在遵从我们国父指示的途径而前进，只要我们对于一般民众，如有亲切的领导，我相信无论那一个人都愿意加入本党，为实行本党的主义来牺牲奋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力量，一般民众几乎不知道以入党为光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今后要洗雪这个耻辱。要健全我们党的组织，首先就要健全基层党务，要使党的力量能够真正深入于社会，使每一个党员都能真正为党为主义来牺牲奋斗，尽到他自己的职责。这一点更希望各位同志在全会期中，大家要聚精会神，检讨研究，决定方案，督促实行，庶几能使本党精神为之一振，气象丕然一新，以完成本党今后时代的使命。

（摘自《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会议》记录）

材料二　会议经过

自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九中全会后，国际情势日趋好转，我国抗战任务益臻重要，为检讨地去工作，适应内外环境之需要，以确定工作新方针起见，爰经中央第二一一常会决定，于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各委员到会者共计一百五十五人，并有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及宣传处长二十余同志列席参加。会期原定为十四日，嗣后延长两日，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闭幕。除预备会、审查会及开幕、闭幕式外，共举行大会十四次；其中九次大会为听取中央及各省市党政报告，并特定时间举行党政工作总检讨及质询。热烈和谐，充分表现民主精神。全会提案共八十二件，计关于党务者十八件，政治二十七件，经济二十五件，教育九件，军事三件。全会为检讨历届大会宣言及决议之实施状况，并特设特种审查委员会。关于议事方法，并经改善，除重要议案专案审查讨论外，一律交由各组审查委员〔会〕并案审查，除拟具综合决议案提出大会讨论者外，其余则附具审查意见汇交常会办理。兹将大会逐日经过择要列述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幕典礼，由总裁主席并致训词，略以全会开幕于总理诞辰纪念日，并值英美对我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时，实为继往开来之会议，希望提高革命精神造成新风气，在会议中应侧重检讨过去一切政纲、政策及宣言、决议之实施，循名责实，力求进步。来毕，休息十分钟，举行预备会议，仍由总裁主席。当通过主席团人选及大会日期。，并决定组织各组审查委员会，其人选由主席团决定报告大会。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主席团与各组召集人在中央党部开谈话会，交换意见。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一次大会，由于委员右任主席。，首由主席团报告，为检讨历届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之实施状况，特设特种审查委员，由各组召集人组织之。并报告各组审查委员会人选。继即由居委员正作党务报告。词毕，各委员就组织事项提出质询，由朱部长家骅即席答复。正午十二时休息。

下午三时接开大会，由叶委员楚伧主席。当由各委员先后就宣传、训练、海外党务及党史事项提出质询，经各部会首长分别即席答复。至六时二十分钟散会。

十一月十五日为星期日，未举行大会。

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二次大会，由总裁主席。首由孔委员祥熙作政治报告。在报告当中，英国议会访华团团员卫德波、劳森、泰弗亚、艾尔文等偕英大使薛穆等到会参观，当招待在场旁听。十一时许，孔委员报告完毕，宣告休息。乃由顾大使维钧介绍访华团各团员与各委员相见，当由总裁致欢迎词，略谓此次英议员访华团诸君，合则为代表英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空前之访问恳亲团，分则可谓英国三大政党代表，深盼此举成为我中国国民党与英国三大政党间联络的机会，此不待有裨同盟国为争取自由与民主精神之共同奋斗，且亦可促进战后中英两国之友好合作云。嗣由各团员分别致答词，并与各委员握谈甚欢。旋大会仍继续进行，当由各委员提出关于内政方面之质询，由周部长即席答复。直至零时四十分始行散会。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由孙委员科主席。当由宋部长子文、顾大使维钧、邵大使力子分别报告国际情势。继则由各委员质询关于外交、财政事项。至六时散会。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三次大会，孔委员祥熙主席。首由贺委员耀组报告关于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嗣由各委员就管制物价问题发表意见。十二时散会。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各委员及各省政府主席续就物价问题发表意见，甚为热烈，当由主席宣告所有意见均交经济组审议。六时散会。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四次大会，邹委员鲁主席。由何委员应钦作军事报告。十二时散会。是日下午各组举行审查会。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举行第五次大会，居委员正主席。首由张委员厉生代表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报告；次由王委员宠惠报告行政三联制与党政工作考核三十年度成绩总检讨。当经主席团决定上开两次报告特设特种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并推吴委员敬恒等七委员为委员。嗣各委员并就报告事项提出质询，当由张王两委员即席分别答复。十二时散会。是日下午各组分别举行审查会。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举行第六次大会，陈委员果夫主席。首由秘书长报告：经主席团决定，于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举行党政工作检讨，次听取各省市党务政治报告，计先后由黄委员季陆报告四川省党务，张委员群报告四川省政治；吴委员挹峰报告浙江省党务，黄委员绍竑报告浙江省政治；李委员品仙报告安徽省党务政治。至十二时二十分始行散会。是日下午各组举行审查会。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举行第七次大会，由李委员文范主席。继续听取各省党务政治报告，计先后由陈委员肇英报告福建省党务，刘委员建绪报告福建省政治；朱委员绍良报告甘肃省党务，谷委员正伦报告甘肃省政治；李汉魂同志报告广东省党务政治。

是日下午第八次大会，举行党务工作总检讨，总裁亲自主席。当由各委员就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提高革命精神及有关党政各题，分别□□〔检讨〕，提供意见。最后由总裁归纳各委员意见，并指示。

十一月二十二日为星期日，原应休息，各组审查委员会其有审议未完之案件者，仍分别召开审查会。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举行第九次大会，总裁主席。秘书长报告，经主席团决定，大会延期两天。继由黄委员旭初报告广西省党务政治；陈委员诚报告湖北省政治。至十二时三十分散会。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冯委员玉祥主席。继续听取各省党政报告，先后由薛委员岳报告湖南省党务政治；熊斌同志报告陕西省党务政治；刘真如同志报告河南省党务；同志报告河北省党务。末由主席宣告：全体起立，对敌伪奸党势力下奋斗被害诸同志默哀致敬。五时四十分散会。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举行第十次大会，孙委员科主席。首由主席团报告：关于总裁指示全会应注意事项及对全会议案之补充指示，据政治组审查委员会提出研究结果，经决定交常务委员会办理。继由傅启学同志报告云贵州省党务；赵澍同志报告南省党务；冷曝东同志报告西康省党务；杨公达同志报告重庆市党务；×××同志报告江苏省及上海市党务。迄十二时休息。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叶委员楚伧主席。熊在渭同志报告江西省党务。至此各地党政报告已告完毕，即开始讨论议案。计通过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六时散会。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十一次大会，由居委员正主席。讨论决议案六件，其重要者计有：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案；策进役政宏裕兵源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田赋征实征购且兼顾民力，以培国本案等。十二时散会。

是日下午三时举行第十二次大会，总裁主席。此次大会系举行政治工作总检讨，由各委员就政治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分别检讨，并提供意见。发言者极为热烈，当由总裁提出对于各地党政报告及党政工作总检讨之意见，并加以说明。至六时十五分散会。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十三次大会，孔委员祥熙主席。讨论案件共六件，其重要者计有：三十二年度党务工作方针案；各级教育应以军事化为中心目标添办建设所必需之专门学校，关注意边疆与侨民教育案；确定义务劳动制度，颁布义务劳动法案，及总裁交议之调整省县机构，确定权责范围，简化业务程序，以增进行政效率等案。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由戴委员传贤主席。继续讨论提案，其重要者计有：增订劳工政策纲要等案。六时散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第十四次大会，上午由陈委员

果夫主席。讨论要案十五件，计有：党务改进案；关于国家总动员工作之检讨与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对于政治报告决议案；对于党务报告决议案；及发展农业金融业务，完成农村经济组织，以达成经济管制，并奠立本党经济基础案；对于行政三联制实施成绩之总检讨及党政工作考察报告之决议案。此外并分别通过对于财政、经济、交通、教育、农林、粮食各部及水利委员会工作报告之审查意见各案。至十二时三十分钟休息。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总裁主席。首讨论议案，计通过：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案；关于以粮盐为标准实施限价案；全体会议宣言案；特种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次则改选常务委员，用记名投票法，选出陈果夫、何应钦、孔祥熙、张厉生、白崇禧、宋子文、邹鲁、叶楚伧、丁惟汾、冯玉祥、李文范、陈济棠、吴忠信、潘公展、邓家彦等十五委员为常务委员。选举毕，总裁特训示对于此次全会之感想，及对于中央与地方负党政责任各同志之期望，词毕，旋即举行闭幕式，由总裁领导行礼，由于委员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全会乃于庄严肃穆中圆满结束。

（摘自《中央日报》1942）

历史内幕

新"木马计"传奇
——"汤团"打入伪军167天纪实

两军对阵，兵不厌诈。

公元前十二世纪，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走王后海伦。希腊各部落公推亚加米农为首领，远征特洛伊，围攻九年不下。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赛献计，把一批精兵藏在一匹硕大的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不知是计，把木马拖进城内。入夜，伏兵跳出，打开城门，希腊兵一拥而入，终于攻下特洛伊城。

"木马计"，使奥德赛成为军史上以诈取胜的鼻祖。

引人入胜的传说一代一代相传。三千多年后，在长江与黄海孕育的江海平原上，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整团兵力诈入敌巢167天，完成任务后又破腹而出，演出了一幕新的"木马计"。它比古代的传说更加惊险曲折，扣人心弦。

一、定奇策

1942年年底，"政令不出南京城"的大汉奸汪精卫，秉承日本侵略军的旨意，以"清乡委员长"的名义，颁发了《民国三十二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限令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自1943年4月1日起，对我苏中四分区（今南通市的如东、南通、启东、海门）进行"清乡"。随后，日伪调动一万五千余军警宪特麇集南通，妄图在六个月内彻底伪化我苏中四分区，进而摧毁我党领导的整个苏中乃至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日军的惯用伎俩是操纵汉奸，以华制华。此番"清乡"，日军的马前卒是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和伪"特工总部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他们为献媚于日本人，都急于显露一手，秘密派出说客，利用旧关系，诱劝我根据地内的地方武装参加"和运"。

有关张、姜策反的情况，送到了苏中四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地委书记姬鹏飞对司令员陶勇说："张、姜这一手很毒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选一支可靠的队伍诈降，打他个措手不及？"

几天后。黄花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在听取姬鹏飞、陶勇的汇报。

陶勇侃侃而谈："这一行动的预期目的：一是控制通海地区沿江门户；二是相机获取日伪'清乡'情报；三是利用日伪矛盾，做好分化瓦解工作。"

……

"谈谈团干部的情况吧，"陈毅说，"他们是行动成败的关键。"

陶勇说："两个团合起来后，拟任命汤景延为团长，沈鼎立为副团长，另派顾复生为政委。部队以'汤团'简称，代替原来的番号。"接着，陶勇把三位主要干部的情况逐一作了介绍。

汤景延，如皋人，通海自卫团团长。抗战初期，他曾参加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杂牌军，当过营长、少校团副，结识了不少后来投敌伪的军官。1940年，新四军开辟黄桥根据地后，汤毅然投奔新四军，1942年加入共产党。他对党忠心耿耿，性格豪爽，能说会道，机智灵活，足以应对狡诈的敌人。

顾复生，上海青浦人，1924年加入共产党，具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他外貌文质彬彬，实则柔中有刚，坚定、沉着，作风正派，深得汤、沈的敬重。

沈鼎立，崇明人，崇明警卫团副团长。抗战军兴，他和其兄沈鼎法毁家纾难，投笔从戎，与茅珵等拉起一支抗日队伍，父亲因此而遭伪军杀害。他长期从事军事工作，

性格沉静，处事机敏，带兵作战富有经验。

听了陶的介绍，陈毅满意地说："这几个同志选得不错。"停了停，又问："他们个人有些什么想法？"

"汤、沈开始有些顾虑，不愿背当奸的恶名；通过谈话后，表示置个人荣辱于不顾。"陶如实汇报。

"好！"陈毅风趣地说："让我们放出一批孙猴子，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大闹一场！"

二、钻敌腹

3月底，汤景延身着团龙花长袍，外加黑缎马褂，头戴礼帽，足登皮鞋，亲往南通城与姜颂平秘密会谈。

寒暄过后，姜不放心地问："据我所知，新四军待你不薄，你怎么想脱离他们呢？"

汤"坦然"相告："站长有所不知，通海自卫团原来是利用新四军'三三制'保存下来的一支地方武装。如今'清乡'在即，抗战前途渺茫，不得不另谋出路。"

"对，对！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本人参加'和运'，安全和前途全仗站长保证。"

"这个你尽管放心。"

汤诡秘地笑了笑："我这见面礼，不是金条大洋。谅站长不会不收。"卖了个关子后，汤接着说："你们知道，我与崇明警卫团茅珵一向搞不来，我为了自己生存，早就对其部下进行笼络。我准备把茅珵抓起来，把他的部队拉过来一起参加'和运'，你看好不好？"

姜一听，喜出望外，连声说好。

一切准备就绪，"汤团"在15日开始了"反叛"行动。

凌晨，浓雾笼罩的海门县桃源、震蒙两乡交界处，突然响起了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半小时后，汤景延打电话向姜颂平报告："沈鼎立带崇明警卫团一部前来集结，被茅珵和沈鼎法轧出苗头，他们带一个连追上来，双方发生战斗。茅等现在逃向西北方向，我们正在追击中。"姜连连吩咐："不要让他们跑了。"

天黑之后，沉睡中的姜灶港一带又响起密集的枪声。汤景延下令枪毙了几个在押待决的地痞流氓，然后，又一次拨通了姜颂平的电话："我们在姜灶港追上了茅珵带的一个连，经过激战，毙伤10余人，缴获一部分枪械；可惜让茅珵、沈鼎法逃走了。"

姜听说未抓到茅珵，不免失望，但想到汤终于拉出了部队，他比张北生手上多了一张牌，又暗自得意起来，握住话筒，对汤勉慰有加："汤团长，你为'清乡'立了头功，可喜可贺呀。"

"汤团"竖起"和运"旗帜后，苏中第四军分区假戏真做，发出了"讨逆"布告，号召军民打击"叛变投敌"的汤景延部队。日伪头目则指使伪报唱"对台戏"，编出"欢迎汤沈团长反正"的特刊，吹嘘这是"清乡"必胜的征兆。

三、破封锁

穿上伪军服后，"汤团"换上了"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团部移驻茅镇，部队分驻茅镇、姜灶港、张芝山一带。这样，"汤团"实际控制的地区从过去的（南）通、海（门）公路以北一带向南扩展到长江边。但由于姜对"汤团"此次"投诚"抱有戒心，江边的几个港口仍不准"汤团"染指。

决不能让敌人扼我咽喉。

4月下旬的一天，汤景延根据与顾复生密商的计划，带着一堆礼品，驱车送到南通城姜颂平宅上。

汤说："我今天来，并不是向站长伸手要钱，只是恳请站长允许我自己挣点钱。我想开个商行，在港口做点生意。"见姜不吭声，汤又说："如今是特工治天下，只要站长肯让我借用你这块金字招牌，就算合股，具体的事并不用站长操心。赚了与你分成；亏了，算我的。"

当时，汪伪政府正在苏、浙、皖和上海、南京两市实行《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时条例》，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但是，私下里日伪部队兼营商业甚至贩卖军用品以牟取暴利的现象，乃司空见惯。姜正苦于不能捞一把，送上门的财岂有不要之理；可他又怕出事，想了想，问："你想搞些什么业务呢？"

见姜松了口，汤说："我想主要经营粮食、猪羊、禽类、八鲜、蔬菜等过载业务，决不会做惹事的生意，你尽管放心。"汤与顾已商量过，经营过载业务，成交量大，进出商人频繁，不仅便于我偷梁换柱，夹运军火、药品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而且，也便于我方人员混杂在商人中进出港口与"汤团"团部。

回到茅镇，汤景延紧锣密鼓，挂起了"协记公行"的招牌，自任总经理，聘顾复生为帐房先生、党员陆飞鹫等为协理，并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了分行，分别委派可靠的人当分行经理。

分行中，青龙港地处交通要冲，商业较发达，但港口日伪机关密布，敌人耳目甚多，因此，该行在生意之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日伪情报。牛洪港地处偏僻，过去群众基础好，所以，该行以生意为掩护，侧重承担我地下运输和人员来往任务。两港之间的宋季港，则见机行事，以分散日伪注意力。

开业不久，汤景延即着人给姜颂平送去一笔现款。姜笑眯眯地收下，说："带个信给汤团长，生意上若遇到麻烦事，直接给我打电话。"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伪煞费苦心经营的封锁线，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汤团"捅开了一个大豁口。

四、挫张逆

5月，张北生和日早小林师团长把“汤团”划归为直接管辖指挥。

伪军伪警大小头目见小林师团长如此垂青“汤团”对汤景延也刮目相看，纷纷前来巴结。汤对有点身份的，以换帖的办法，结为兄弟；对那些只有一二十条枪的，则收为徒弟，发出委令，划出防区，收编到“汤团”名下，以扩大自己的外围力量。

与此同时，老奸巨猾的张北生只做了一件事：下令以“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取代“外勤警卫团”番号，委汤景延为教导大队长。一连几天，再无下文。

一天，张北生派人送来了一纸命令：着教导大队5月20日集中到茅镇验枪，听候点编。

验枪是缴枪的惯用手法，一声口令“枪放下！向后转！开步走！”整团整营的武器就被人缴去。失掉武器的士兵，只能束手就缚。张北生想出要“汤团”验枪的主意后，颇为得意。他早已作好打算：如果汤景延不敢来，就是心中有鬼，马上以抗命的罪名，武装缴枪。

公园里，全团官兵在副团长沈鼎立指挥下，秩序井然，列队“欢迎”伪军官。一见这阵势，平日在公署里居于人下的几个伪军官好生高兴。他们按程序逐连“点验”后，又发表了一通例行训话，对“汤团”的合作表示满意，对交点的人员和武器笃信不疑。他们根本不知道，一部分精良武器早被打了埋伏。

“点验”结束，“汤团”干部、战士都松了一口气。

哪知，老谋深算的张北生早已设下另一个圈套。21日，保安处陈科长按张事先的部署，诡称刚刚接到“清乡公署”命令，限“汤团”22日必须赶到南通城集训。

五、脱圈套

“汤团”一进入南通城，即失去行动自由。部队奉命驻进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日、伪军驻扎四周，把个“汤团”铁桶也似箍在里头。沈鼎立试了几次，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为了溶化“汤团”，张北生颁布了三条训令：一是军官与士兵分开训练；二是不准带武器，一律徒手受训；三是军训教官由“清乡公署”派人担任。

再说通海地区自“汤团”调离以后，游击队突然活跃起来，三天内就摧垮了各乡的伪政权，撬掉了门牌，烧毁了户口册，还到据点里打开了日本人的一所洋行，缴获伪币六万元，短枪两支，打得日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特工，此时全成了惊弓之鸟、缩头乌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向姜颂平告状：“汤团”是特工的部队，为什么让“清乡公署”改编，拉到南通去？弄得我们工作都无法进行。这些话犹如火上烧油，姜颂平越想越气，越想越恨。汤景延掌握了这些情报后，乘机从中挑动，对姜说：“张北生有什么能力领导我们？”站长在苏州没替我们争一争，可不能再丢下我们不管。”回过头来，汤又对张说：“部队归主任领导，我是求之不得。别看姜颂平至今还缠着我，我不会听他的。”姜、张听了汤的“表白”，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张为了压住姜，笼住汤，对“汤团”的刁难有所收敛，戒备渐趋放松。但张北生、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对“汤团”的争夺也进入白炽化状态。7月底，在姜的煽动下，李士群在苏州再次“召见”汤景延，委汤为（汪伪）中央调查部少将专员，并指令姜每月津贴“汤团”伪币数万元。

张北生见姜颂平、李士群重新插手“汤团”，心中十分不快，但他不露声色，悄悄在背后谋划将汤等军官调出“汤团”，以便由他彻底控制这支部队。阴谋，很快为汤景延获悉。汤在姜和张之间挑拨揭发，使张北生夺兵权的阴谋未出笼，就这样流产了。

（摘自《大江南北》93年1期）

六、配合反“清乡”

8月20日，“汤团”接到日军驻南通指挥官安藤和张北生的命令：结束集训；归日军山本大队长节制；配合日军驻防刘桥、石港、季家灶、骑岸镇、金西、金沙、金余、东社、三余各据点。

下达这道命令，张北生是绞了脑汁的。他的用心是来一个一箭双雕：一是借联防之名，分割监视“汤团”部队。整个防线长达百里，大半据点都驻有日军。“汤团”团部驻扎的金沙镇据点，除四周驻防的伪特工站、伪水警队、伪保安队、伪教导一大队外，西北角还有日宪兵队的一个碉堡。而团部只允许配带一个直属队（两个排）。二是把“汤团”调离原驻防地区，送到交火地带，如果新四军有军事行动，首先受损失的是“汤团”。

于是，汤景延一面向上级报告了面临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一面和沈鼎立研究并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由沈以巡视防务的名义，随时掌握基层动态；每三点设一联络网，确保部队分而不散。二是对各处联防的日军表面上采取合作态度，以解除其疑心。三是对军警宪特大小头目，由汤出面巩固旧关系，发展新关系。四是由了解实情的党员干部出面，以保住团体实力的名认，对战士秘密传达下乡时的行动要领：响枪开路，避免交火，吃饭站队慢慢拖。

一天下半夜，驻三余镇据点的日军得到密报：偷袭伪区公所的三余游击队，正隐蔽在某乱坟场休整。于是，日军通知“汤团”二中队立即出发，前往完剿。日军头目汲取以往的教训，一再告诫：“悄悄的，不许打枪。”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地下党员、排长刘剑华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再不报个信，后果不堪设想。"忽然，前方不远处窜出一条狗，他灵机一动，咋呼一声："新四军，快趴下！"话音未落，已"啪啪"打出两枪。日军头目从后边赶上问："为什么的开枪？"

"报告太君，发现新四军。"

日军头目吓了一跳，连忙蹲下，仔细察看，待看到一条狗窜进了芦苇丛时，气得大骂："你的混蛋！"

清脆的枪声，早已惊动了游击队，等到日军带着二中队围住那块乱坟场后，连游击队人影也未看到。日军头目命令二中队站队，一连扇了刘剑华十多个耳光。刘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为游击队脱险而庆幸。

在抗日军民的顽强反击和"汤团"的密切配合下，日伪的"清乡"已成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在伪"清乡"人员中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清乡无把握，生死不可卜。大家捞一票，赶快出苏北。"面对失败，日伪互相攻讦，推卸责任。内讧中，李士群于9月9日被汪伪"显赫"头目周佛海和日本上海宪兵司令部特工科长冈村等毒死，整个汪特奉令停止一切活动，听候改编。南通城内如临大敌，日军架起机枪，把所有特工，连同姜颂平等赶到公园扣押起来，以防止"叛乱"。

七、回"娘家"

9月25日，顾复生返回金沙镇，向汤、沈传达了上级的决定：日伪"清乡"败局已定，为了再给其沉重一击，命"汤团"27日夜全线暴动，返回根据地。

29日上午，按照事先的计划，汤景延的徒弟、驻守金余的第五中队队长周显才兴冲冲地跑到金沙，当着特工的面，对汤说："我明天结婚，特来请师娘和沈副大队长的太太去喝喜酒。"

汤虎着脸说："外面都是新四军，出了纰漏怎么办？"

难得周中队长一番好意，老汤为什么不肯赏脸呢？"特工也在一旁对说。

晚上，汤景延在团部摆酒宴客。伪特工组长翟光耀一请即到。日本宪兵则屡邀不至。酒酣饭饱，汤又请客人搓麻将，抽大烟，说："太太们都出去了，我落个清静，今晚痛痛快快玩一玩。"

9点钟光景，宪兵队突然打电话给汤："外面狗咬得厉害，要注意。"汤说："太君放心，我这里没事，要不要派人给太君增防。"

"不要！"鬼子一口拒绝了。

10点左右，镇外突然响起几声枪响。宪兵队又来电话："外面情况紧张，不可大意。"

"这是新四军骚扰。我马上加强防务。"汤放下话筒，转头问翟光耀："你们防守的碉堡，有没有把握？"

翟说："把握不大。"

汤随即派人带20名战士赶去增防。那些特工平日只知鱼肉人民，今晚有情况，见有人来替他们站岗打仗，真是求之不得，乐得丢下枪去睡觉。于是，"汤团"增防的战士分别占据碉堡上下，待时而动。

12时到了。汤景延突然把烟具一摔，指着翟光耀的鼻子骂道："你的死期到了！"

翟以为汤醉了，连声说："老汤，别误会，别误会。"

"误会？老子是新四军，今天要抓你！"

翟见状不妙，慌忙摸枪。说时迟，那时快，汤的警卫抢先一枪将翟击毙。

日本宪兵队听到枪声，打电话问汤怎么回事。汤沉着回答："卫兵手枪走火。"

这时，团部内外，碉堡上下，到处短兵相接，当场杀死六名特工，缴获30余支步枪、一挺机枪。随后，在南通警卫团接应、掩护下，"汤团"团部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

与此同时，其它点上的"汤团"部队，也在我方接应下，顺利地撤出，并摧毁了石港、季家灶伪区公所，平毁了金余碉堡。

"汤团"以600余众，打入伪军内部，度过了不平常的167个日日夜夜，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

（徐速，选自《大江南北》93年1期）

港岛大营救
——1942年底受命行动回忆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连贯同志从东江游击区派来了一个平时和我熟悉的工作人员跟我接头，交给我们三个任务：一、侦察英军投降前埋藏弹药和轻武器的地点，确定后在附近树立标志，绘出地图，让东江纵队晚间派人去发掘出来，秘密运送到游击区。二、设法在黑市尽量收购各种西药（特别是外科用药）和通讯器材，秘密运输到东江游击区。三、要把留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从敌人的魔爪下抢救出来，护送到东江游击区，让其中大部分人取道粤北回到大后方，继续坚持进步文化工作和民主运动。

我们抓紧时机，把进步文化人分批组织起来，在我党的地下组织和东江纵队的掩护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撤退。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把撤退的人员尽量分散，化整为零。走陆路的，有的经荃湾、青山、元朗一线进入宝安；有的经沙田、大浦、粉岭一线进入深圳。那时香港粮食奇缺，居民每人每天只能配给4两（旧秤一斤的1/4，新秤一斤的1/3弱）发霉的陈米。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天一入黑，强盗明火执仗到处抢劫，报警的锣声和警笛声彻夜不断。因此，日本侵略军也急于要疏散人口，减轻负担，居

民领取“归乡证”并没有多大困难。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归乡，日本侵略军也无法逐个审查他们的身份。不过，假如是众所周知的著名文化人，例如邹韬奋、茅盾、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范长江等同志，走这条路说不定也会出问题。日本人虽然认不出人来，但汉奸们的“嗅觉”倒是相当灵敏的。况且，从陆路走，全程达100华里以上，又没有交通工具可以代步，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恐怕经不起这样的长途跋涉。较为安全稳妥的办法是从水路走：从香港乘坐渔船，经过长洲岛，一直开到我游击队控制下的大鹏湾、葵涌一带或海陆丰沿海地区，然后舍舟登陆，步行到游击区根据地。另一条途径是坐渔船到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澳门，在澳门“休整”几天，再转到非沦陷区台山、斗门一带去。当时葡萄牙是中立国，日本人在澳门虽然没有领事馆，豢养了一些汉奸特务作为鹰犬耳目，但是还不好直接出面抓人。我们在澳门的秘密机关就设在日本领事馆附近。有时候，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反而是最安全的。

香港沦陷后没有多久，首先由范长江同志率领一批新闻界进步人士，直接由香港仔渔民区乘船偷渡至澳门，再由澳门转乘小木船至广东台山县的都斛港。夏衍同志和司徒慧敏、金山等电影戏剧界进步人士，很快也跟着从这条路线撤出来了。其他准备从水路撤离香港的“旅客”，我们一般都给他们安排在上环干诺道中的大中华酒店住宿。这家酒店的设备并不很讲究，但有六层楼，房间很多，前后门都可以出入。它是一位爱国的美国华侨开办的。这位美国华侨的弟弟是老地下党员，工作人员有的也是地下党员或是曾受我党影响的爱国者。看守这家酒店的没有“皇军”官兵和特工人员，只有几个印度巡捕，广东人管他们叫“摩罗差”，上海人管他们叫“红头阿三”。这些印度巡捕原来都是港英政府的警察，他们被“皇军”“接管”过去以后，并不那么死心塌地地效忠“天皇陛下”。酒店的工作人员一天到晚请他们喝酒吃肉，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然后拍拍他们的肩膀，开几句玩笑说：“阿差，阿差，你多多做好人。”他们就乐呵呵地只眼开、只眼闭，任由“旅客”自由出入了。渔船停泊在离开酒店只有几十米远的码头，“旅客”尽可以从容不迫地整顿好行装，然后上船。渔船上的船员绝大多数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旅客”上了船，他们就在黑夜的掩护下扬帆出海，可以保险万无一失。

从陆路撤退的同志，一部分集中深水埗福华街尾的临时交通站，那个地点距离日军占领港九后设立的战俘集中营不远。一天上午，守卫这个战俘营的一个日本哨兵，突然跑到临时交通站来，用刺刀撬开房门，查问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干什么。幸亏这些同志中有一位是能说日本话的，就镇静地回答他，说是响应“皇军”的号召，大家一起住在这里等候交通工具疏散回乡。那个哨兵看见每个人都背着包袱，确实是准备回乡的样子，点点头，不再说什么，转身下楼走了。经过这一场虚惊，大家提防到日军会进一步来追查，万一他们把这些隔离开来，逐个审问，说不定就会引起一些麻烦，因此决定把这个临时交通站转移到窝打老道。窝打老道是九龙塘的高级住宅，住户多数是比较富有的人家，当然不象福华街那样引人注目。这个新的交通站，直到营救任务结束为止，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的事故。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旅港的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多达二三百人，连同家属和随从人员，人数在千人以上。值得我们自慰的是，除女作家肖红因长期患肺病医治无效，加以在爱情和婚姻上遭遇到波折，精神深受刺激，于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外，其余全部人员都安全脱险，回到祖国的怀抱，没有损失一个人，也没有出过什么大乱子，我党地下党党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是尽了很大努力的。至于国民党方面在港的反动文人政客，有的自动投敌，充当汉奸；有的被俘后变节“落水”；也有死在日本哨兵的刺刀和枪口之下的。对一些政治上比较倾向于中立的国民党人员，包括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例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港特派员陈策将军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妻子上官德贤等，我党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把他们抢救出来，护送到国民党军队占领下的地区去。此外，还有一些英军官兵从战俘集中营里逃出来，也都由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掩护脱险，把他们护送到当时驻在桂林的英军服务团去。

注：①日军进攻香港时，陈策被困在港，后乘坐英军鱼雷快艇突围，途中为日本军舰炮轰击中，陈身负重伤，经我东江纵队救援至游击区，转送韶关治疗，始获脱险。

（黄秋耘，《党史纵横》95年9期）

武装营救刘志坚

1942年是冀南地区抗日斗争最艰苦的一年。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坐着飞机亲自督战，调集鲁、冀的日伪军万余人对冀南地区——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枣南县进行了三次大扫荡。在每次拉网式的大扫荡中，日伪军到处杀人放火、挖界沟、修碉堡、增据点、抓劳工，摧残抗日军民。日伪军在540平方里的枣南县土地上出动兵力达13000多人。经日伪军三次摧毁性的大扫荡，枣南县的一些区由游击根据地变为隐蔽根据地。面对抗日斗争困难局面，针对斗争形势，冀南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度过今冬明春就是胜利”的斗争口号。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敌人扫荡尚未全部收兵的险恶环境下，被派到冀南六分区的枣南县去传达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并布置对敌斗争工作的。但由于意外，刘志坚同志

遇险负伤，八路军七旅二十团的指战员于是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的武装营救……

1942年10月16日，刘志坚带领行署和区党委的几名干部，在一支小部队护送下，来到了枣南县沙河西的杨兴村。当晚，刘志坚同志和张策同志睡在一条炕上。次日天刚亮，大营镇据点和恩察镇据点的日伪军联合行动，突然包围了杨兴村，敌我双方在村内展开激战，枪声响成一片。在混战中，刘志坚主任迅速跨上马带大家向外冲，日伪军则紧缩包围圈，对刘志坚紧追射击。刘志坚从弹雨中刚刚冲出村外，突然右腿被敌弹击断，顿时伤口血流不止，人昏马翻，倒进道沟里。后来，刘志坚被伪军抬上一辆大车，经恩察镇顺公路往南，送到了日军大据点——大营镇日军据点“红部”。

正在行军途中的七旅二十团的指战员们听到刘志坚主任挂重彩遭险的不幸消息后，又惊又急。据旅部下达的“不惜任何代价，立即追击营救刘主任”的命令，楚大明副团长作了几句战斗动员，放下背包，带领上好刺刀的四、六连战士顺公路跑步向南追击，一直追到大营镇前，日军已押着大车进了墙厚壕深、壁垒森严的据点。战士们红着眼睛要往里冲，楚副团长冷静考虑后，想到就是把两个连搭上也不能达到目的——救出刘主任，无奈，只好转移待令，另想妥善营救的办法。

刘、邓首长对刘志坚主任非常关心，命令正在枣南集中的十九、二十团：一定要把刘志坚同志抢出来，抢不出活的，也要抢出死的！

怎样从虎口里将刘志坚安全地营救出来呢？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以十九、二十、二十一团强行攻下设防坚固、日军战斗力强的大营据点，但当时我军没有重武器，如强攻必然伤亡很大，特别是能否安全救出刘主任实在没把握，还不是最佳方案；第二个方案是，通过做敌伪工作，搞到敌人向枣强城里押送刘志坚的准确情报，途中武装劫救。大家认为第二个方案好，便决定采用，并马上昼夜紧张准备劫救工作。

枣南县黄符村人赵千同志正在大营敌工站工作，他接到必须迅速搞到日军押送刘主任北行（线路是大营——枣强——衡水——德州——天津——北平）的准确情报的任务后，心情非常紧张，一是怕弄不到，一是怕搞不准确，但又必须千方百计地搞到。日军从刘志坚骑马突围这一点分析，知道他是“八路的，大大的干部”，但却弄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德州日军混成旅团长电令大营镇的日军中队长樱井对刘志坚要严加看押，并予治疗伤腿。平时，赵千找翻译大古较随便，此时，大古不但不出据点，邀请他喝酒也不到场了。赵千非常焦急，昼夜难眠。后来赵千通过警备队长史炳环从大古口中得悉要北送刘志坚的情报，为了印证情报的准确性，又让“两面村长”郑其芳从警察所长处作了了解，证实消息准确无误，这才报告了营救的部队。部队首长令赵千当向导，参加伏击部队的活动。此时，赵千心情仍很紧张，担心敌人不按时北送或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择路另走，后果不堪设想。

楚副团长接到情报后，心情异常激动，对四、六连的战士又作了动员：“押送刘主任的日伪军共100多人，我们一定要把刘主任抢出来！并要特别注意刘主任的安全。四连的任务是抢救刘主任，六连的任务是歼敌和掩护四连撤退……”战士们听后士气很高，决心一定抢回刘主任。

10月18日夜，楚副团长带着两个连到达大营至枣强公路旁的南官庄。他和连干部察看了地形，将主力埋伏在公路两侧，以便从左右奇袭敌人，并派侦察员到南边的一个村边上观察敌人的行动。天亮后，手里摆动白手巾的侦察员回来说，敌人已出动了，果真等上了。

过了一会儿，从南边村子里沿着公路走过来几个扛枪的皇协军，是敌人的尖兵。隔不远，一队皇协军走过来了，中间有几辆大车，车上拉着一个穿便衣的人，便是刘志坚同志。车后面跟着一队日本兵，走在前面的日本兵打着一面旗，约有七八十人。把敌尖兵让过，当日伪军大部进入我伏击圈时，楚副团长一声令下：“打！”刹时两个连的机枪、步枪、掷弹筒齐向敌人开火，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丢盔弃枪，哇哇怪叫，混滚乱爬。战士们象猛虎下山般冲向敌群，六连拦头，四连一、三排断后，和哇哇怪叫的鬼子拼起了刺刀，展开了血战。纪志明同志带着二排战士冲向牛车，要抢车上的刘主任。这时日军的机枪拼命地封锁牛车，火力严密，子弹乱飞，二排战士们冲上去又退下来，难以接近牛车，又重新组织力量冲锋。纪志明带领战士们在机枪掩护下，红着眼睛又冲了上去，跟押车的日军拼起了刺刀，刹时杀得日军滚的滚，爬的爬，日军倒在车旁20多个。在敌我激战的空隙中，纪志明和四班几个战士冲上牛车，没顾得和刘主任说一句话，背起刘主任就跑。日军一看到刘志坚被劫下车，歪把子机枪急向纪志明扫射过来，幸好他背着刘主任跌倒在路沟里，敌人的子弹没碰着他们一根毫毛。战士们用刺刀、手榴弹抗击着反扑的敌人，掩护着纪志明背着刘主任安全地脱离了虎口！

这次武装营救刘主任的战斗，战士们象猛虎上山，打得神速、勇猛，只用了十几分钟，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掷弹筒两个，步枪70支，子弹2000余发。

七旅党委给纪志明同志记了大功，并传令嘉奖了参加营救的指战员。随后，又派部队护送刘志坚同志到冀南三分区邱县城北的李村治伤养伤。

（《选自《纵横》88年6期，作者：蔡维才）

骇人听闻的江山冤狱

一九四二年的浙江省江山县，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特大冤狱，被牵连入狱者竟达一百多人，其中有近十名妇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元旦后不久，杭州少女柳莲芳和她的表姐杨韵琴，以及杨兄的友人郑德立共三人，从杭州出发，准备去南平访问柳莲芳的哥哥。他们每到一处，都遭到当地军警的故意刁难，为此不得不白送了许多钱财才得以放行。行到江山，身上所带盘缠已经所剩无几。三个人在一起经过一番商量，决定由郑德立将随身所带变卖后买了一张车票，独自先去南平，准备向柳兄借到钱后，再回来接柳莲芳姐妹。

柳莲芳姐妹年轻貌美，她们在江山县江郎旅馆逗留时，不意为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某情报员所探知。此人以检问为由，多次进入二女所居房内肆意调戏，但二女绝不为之所动。这位情报员恼羞成怒，便诬称二女为杭州特务机关所派遣，并突然袭击将其拘捕严刑拷问。杨韵琴虽然被毒打得遍体鳞伤，仍然矢口否认，坚不招供。柳莲芳却受不了如此折磨，被迫伪造事实，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根据柳的交代，情报员进一步知道其兄柳承先在南平开设茧行，为当地著名巨商。同时了解到郑德立先行筹款，估计现已到了南平柳承先处。于是，情报室组长陈自耕带了一些部下，迳赴南平将郑德立等人逮捕。柳承先在此之前接到郑德立的报告后，立即委托友人韩国祥和钱仰缪，携款专程去江山。但当韩、钱二人到了江山，柳莲芳姐妹早已锒铛入狱。情报部得知韩、钱二人来到江山，立即予以逮捕，以同党罪名投入狱中。早先钱仰缪曾向南平《东南日报》社承包该社早铜铸模一副，因被捕而无法交货。报社方面急于应用，便派了两名职员赶到江山，准备设法保释。但钱仰缪未获保释，报社的这两名职员却因此被情报部拘禁。就这样，由于种种牵连而被辗转拘禁者，竟达一百多人。

这一百多个所谓嫌疑犯，有江山县财政科长，粮食管理主任，行政干部训练所主任，县政府秘书，江山卫生院长，衢州卫生院长，其他多为商人和普通老百姓。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在酷刑和利诱面前，被迫含冤招供，于是一个个地戴上了汉奸特务的帽子。情报部在侦查和审讯过程中，趁机非法侵吞了他们的私人财物，多达五、六百万元。情报部主任姚则崇则利诱威逼、软硬兼施，将柳莲芳收为内室。其它情报人员上行下效，在侦讯过程中见略有姿色的少妇少女便任意奸污。江山县一时间乌云翻滚，乌烟瘴气。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听到有关消息，颇为气愤。他电请第二十五集团军应恤民艰，宽予保释，遭到拒绝。监察委员会第一监察团委员何汉文准备去江山检查此案的有关卷宗，亦被拒绝。事情传到重庆一些要人那里，便向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询问，要求查明真相。李觉实在无法推诿了，只得亲自查检案情。但由于有关案卷都附有本人被迫写的自白书，并且无人提出反诉，所以一时也无从深究。这么重大的冤狱，为什么那么多的被害人包括家属都不提出上诉呢？这是由于情报部人员知道此事他们做得太绝，人心肯定不服，所以早已多次向嫌疑犯进行威吓。说如果敢于上诉，将立即处以死刑，所以被害人及其家属敢怒而不敢言。

《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政员。在该报两名派往江山设法保释钱仰缪而被逮捕监禁后，他立即着手调查，结果是这二人绝无犯罪嫌疑。于是，胡健中电请国民党政府要人陈果夫设法营救，并请彻查。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也都受托私下分别进行探询，查得这是情报部某些人为财色所迷而造成的重大冤狱。他们又将此事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主持正义。于是，蒋介石下令派蓝衣社要人连茂亲赴浙江江山彻查，又令蓝衣社头目戴笠从旁协理。

连茂到达江山的那天，被害人家属跪拜道旁，泣求昭雪。喊冤之声，响彻数里。情报部主任姚则崇起初还妄图阻止连茂插手其中，但当连茂出示蒋介石的手谕后，姚则崇无可奈何，只得捧出一大堆案卷，供连茂一一详审。连茂查阅案卷，发现每个嫌疑犯的自白书，都称自己是私探军情的间谍，但具体犯罪事实却含混其辞，令人捉摸不定。

连茂首先提审原江山县政府行政干部训练所主任侯寄远，侯早在上海供职期间便知道连茂为人清廉刚正，便历述过去供词全系严刑逼打所致，并非实情。还说其他被害人也属冤屈。连茂又仔细审阅了全部案卷，详细讯问了在押嫌疑犯，又派人到各地进行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从而得出了此案全系冤狱的结论。除情报部人员垂涎女色，贪财枉法，遂肆意罗织大狱，尚有某些人趁机报复私仇等因素。经过反复审理，最后秉公判决，宣布案犯全部无罪，如数释放。

事后不久，戴笠来到江山，知道此案已经判决。他担心情报部从此名誉扫地，某些人很可能在以后某个时刻设法旧案重翻，以挽回面子。为了稳妥起见，他又招回已经释放的数十名嫌疑犯，重新审理，并命军法官及浙江缉私处处长赵世端在旁陪审。再审结果，进一步证明这些嫌疑犯毫无半点嫌疑，均系被诬，于是再一次宣布无罪释放。与此同时，戴笠公开宣布，将情报部科长魏哲秋、情报室组长陈自耕，以及一名科员、一名情报员枪决，轰动一时的江山冤狱这才告一段落。

（摘自曾炎主编《民国官场秘闻》）

孔祥熙与美金公债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向美国借到一笔五亿美金的巨款。孔祥熙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三亿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一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一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

美金公债于一九四二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当时，官价汇率是法币二十元合美金一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人数寥寥。不久，人们知道了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而且黑市汇率已达法币一百元合美元一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一九四三年春天，销售数量达到五千万美金。看到这一局面，孔祥熙灵机一动，某一天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孔祥熙对郭景琨说，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景琨当然照章办理。当时，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顾翊群，国库局长吕威等都不知其情，质问郭景琨，当告知是孔的面喻时，也就无话了。

不久，社会上便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明分剩余公债，社会舆论哗然。当时，重庆正开国民参政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正远在美国参加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把傅斯年等叫去谈话，表示对这一问题的关切，要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不过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傅斯年便心领神会了。蒋介石在找傅斯年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鸿钧奉命后，找了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帐。稽核回来后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说剩下的美金公债五千元也几乎售完，买主都是一些用了别名地址不清的人，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两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明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员。另有专分国库局一笔，但据业务局长郭景琨和国库局长吕威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孔祥熙本人同意的。

无论是停售、明分、犒赏等都说是孔祥熙面谕的，档案中查遍都无孔祥熙签字的片纸只字。俞鸿钧只好如此向蒋介石复命。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在银行职员明分公债一事上做文章，并对郭景琨提出弹劾，将郭景琨移送法院扣押法办，但对用各种别名套购一事就根本没有触及。

孔祥熙从美国回来后，有人很为孔担心，可他本人若无其事，并常与郭景琨的辩护律师研究怎样为郭开脱。过了几个月，郭景琨被宣布无罪释放。郭放出来后，孔祥熙为郭在范庄设宴，为他压惊，拉郭坐上席，频频说：“KK（郭景琨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下来，主角和爪牙都逍遥法外。作为郭景琨律师的端木恺，原来是一无所有，现在则排场阔绰，象个富有的财翁。

孔祥熙的私分美金公债一案，虽然轰动一时，究办呼声也极高，但终于还是平息下来，不了了之了。那个小小的业务局长郭景琨，虽然坐了几个月的牢，但终于做上了宋霭龄家里的座上客，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奥妙。

（摘自曾炎主编《民国官场秘闻》）

历 史 考 证

左权牺牲的时间为什么有两种记载

关于左权牺牲的时间，历史上有两种记载。一种记载是 1942 年 5 月 25 日，另一种记载是 1942 年 6 月 2 日，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据王政柱（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司令部作战科长，离休前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说，左权是 1942 年 5 月 25 日在反日军 5 月大扫荡作战中牺牲的。左权牺牲后，日本抢先发表了这一消息。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彭德怀决定，将时间推迟一个星期。1942 年 6 月 10 日，朱德、彭德怀经周恩来转蒋介石、徐永昌的电报中，写的是“本月二日，……不幸我左副参谋长于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谨此电呈，并希鉴察”。当时报纸发表的消息，写的也是 6 月 2 日。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蒋介石“胞兄”郑发之谜

1942 年 8 月下旬，离中秋节没有多少天，华中补训处驻重庆办事处的大门，走进一位身材魁梧的高大老人，

八字胡，身穿一件缀有补钉的灰布夹衫。

“找哪一位？”

门卫趋前问了一句，谁知那人双眼一瞪，门卫被精芒目光所慑，仔细一看，一股凉气打脊梁直冒，吓得全身一震，立即举手敬礼！坐在办公室的职员们，透过窗户都瞧见了，其中一人禁不住高呼一声：“立正！”

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站了起来，高大老人略显一楞，终于头一扬，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并沉声说“找姚处长！”

“报告委员长！”喊口令的职员毕恭毕敬地说：“处长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委员长请屋里坐。”

在高大老人进入处长室之后，职员们惊惶的脸色并未减退，进而悄声细语地议论起来，所有的人做梦也未料到，日理万机的蒋委员长，竟然莅临了这所不起眼的小小单位，有人怀疑说：“既然是委员长，何以未带一名侍从，这太反常了。”

“这就是微服出巡呀！”

其实，办事处处长姚廷芳，并未外出，只是刚刚进入厕所；及至便毕，闻报蒋委员长在房间，脸色大变，急忙奔入房中，竟然怔住了。

姚廷芳为了华中补训事，不止一次晋见过蒋委员长。乍眼一看，这高大老人的确和委员长神似，但开腔就露了底。盘诘之下，姚廷芳更是满头雾水，难以置信。

此人自称郑绍发，来自河南许昌县，日军攻陷河南，他便只身逃来重庆，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来找郑三发子。

“谁是郑三发子？”

“我弟弟。”

“你弟弟又是谁？”

郑绍发微微一停，方一字一句念出：“蒋—介—石。”

不信吗？郑绍发的模样、神情，和蒋委员长难分轩轾。兹事体大，姚廷芳立即拿起电话筒，摇给中美招待所，找到仍在重庆的华中补训处长郜子举，一五一十，据实呈报。郜子举叮嘱姚廷芳，千万不可声张，暂时留住郑绍发，听候处理。

郑绍发何以找到姚廷芳？也有个原因，姚廷芳是重庆河南同乡会总干事，理事长正是郜子举

郜子举几乎不相信有这种事，但听姚廷芳的语气，又不能不信，当即找到两位有身份的同乡，他们是军委会参议李肖庭、国民参政会参政蔡芷生。3人决定，命姚廷芳护送郑绍发到大阳沟河南同乡会，亲自了解实情。

根据郑绍发的陈述，清光绪10年（公元1844年），蒋介石出生在河南许昌南前郑村。许昌县衙门有位蒋师爷，绍兴人，在当地雇了一名女仆，女仆带着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蒋介石本人，当时四、五岁，乳名郑三发子。不久，县官卸任，蒋师爷随同到开封，刚巧妻子去世，生活乏人照料，便将女仆填房，也带到开封，成为眷属；随后带回浙江，落籍奉化溪口镇，继承祖业“玉泰盐铺”。这位师爷的姓名叫蒋肇聪，女仆即是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

从郑绍发的细述，显然在王采玉进入蒋家之前，嫁给郑村姓郑的丈夫，先后生了郑绍发与郑三发子，至于何以仅带幼子帮佣，也许有其他原因，但已无关蒋介石个人的身世。

郜子举等商议决定，把这件事转告最了解蒋介石身世的戴传贤。戴传贤也接见了郑绍发，劝说无效，后来把他交给了杀人魔王戴笠。郑绍发不但未见到他所谓的“亲弟弟”，反而被关进贵州集中营。

以上这件事，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广为流传，众交相告，以致无人不知当时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不认他这位来自河南的“亲哥哥”。抗战胜利之后，郑绍发居然又在河南出现，绝口不提这档子事，人们也就渐渐淡忘。一直到1963年，由唐人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了一部小说《金陵春梦》，又引起人们研究的热潮。由于《金陵春梦》写得十分生动，所载全部都是蒋介石一生，以致影响深远，海峡两岸及香港，几乎无人不相信其真实性，犹如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人们宁可信演义而不信历史。

《金陵春梦》系署名唐人所著，本人名宋庆渝，其与宋氏家族有无关系，无从查考。全书共8集，1965年出版，最后一部在北京付梓，为1980年。出版之初，立时风靡大陆和香江；台湾也有不少人珍藏，耳语相传。然而，在大陆及香港，这件事一直引起广泛讨论，这又分文革之前与文革之后。

首先是费彝民在《金陵春梦》第一集的序文中，肯定了“郑三发子”的真实性。随后唐人的儿子唐小三于1980年《新闻战线》第六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金陵春梦·爸爸·我》，详述他父亲在搜集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无疑地，其作用有二：(一)每件事都千真万确。(二)加强小说的宣传效果。

唐小三在这篇文章中说：

“为了写《金陵春梦》，爸爸研究有关蒋介石的各式各样出版物，堆积如小丘，光是书籍逾600本之多，为了查一个字或一个年份，他可以连熬几个通宵。”

不可否认，唐人写作过程的严肃认真，以及追本溯源的精神，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它毕竟是小说，而且撰写的动机，以及所谓的“惊人发现”，也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

我们来看看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的文章中，是怎样引发该书创作动机的。他说：

“1949年的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落叶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其中有5页是记载抗战时期，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30年，已记不起这5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

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才找到这薄薄的5页纸。”

唐人在文章中继续指出：他拿出来仔细看了一遍，开始并不相信这位侍卫官所写的经过。后来根据蒋的家谱，浙江的地方志、风俗习惯和蒋的传记，逐一对照，同时再对照蒋的发迹史和各阶段的表现，才“深信”这位侍卫官所述属真，并动笔写第一集“郑三发子”。

笔者确信，在唐人所查核“堆积如小丘”的资料中，不可能找到有关“郑三发子”的蛛丝马迹，除非其中包括文革之后有关“郑三发子”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第一个证实郑绍发确有其人的是黄彤光。

黄彤光的文章是《我所经历蒋特3个集中营的内幕》，搜入中共《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他的文章与那位侍卫官的内容大致相同，黄并明确地说：“我在贵州集中营见到那个郑老头子。”

黄彤文写出：

“郑老头是蒋介石的亲哥哥，他在1949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郑老头排行老大，蒋介石排行老三……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

随后，在河南文献中，也记载了张仲鲁的一篇《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内容与郑绍发前往重庆，向部子举陈述的一般无二。事隔不久，由李延朗撰述的《关于蒋介石家世点滴见闻》，不但将郑绍发找寻弟弟的故事，追溯到抗战之前，并怀疑蒋介石，既不姓蒋，也不姓郑，而可能姓周。

李延朗的文章说：

“郑绍发在抗战前，即请人写了一封信，亲自带着，欲前往南京见蒋介石，但车到浦口，被宪兵搜查盘问出来，认为他是犯了神经病，将他驱了回去。抗战后他又到重庆，住在复兴关李家花园，被在河南办过党务的李宗黄知道了，深恐特务加害于他，也怕他在外面招摇，引人注意，便介绍他到河南同乡会。当时河南军人部子举也住同乡会，部认为蒋不会认这个哥哥，劝他回去，给他路费，但郑老头坚决要见蒋介石，不肯回去。看老头言行举止，十分持重，对一般生人也不肯多谈，更不轻易暴露身份，而在部问他身世缘由时，又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便，决不像是疯癫乱语，尤其仔细观察他的面貌，就更相信他与蒋介石确系一母所生的骨肉同胞了。”

紧接着，李延朗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又有了新发现，在一篇题为《15年前的蒋介石》的文章中，有“原名周泰，后改名介石”等语，认定蒋介石可能姓周。李延朗并举证蒋介石每年回溪口为母亲扫墓，从不到自己父亲的墓地表示孝心。他说：“也许蒋介石自知蒋姓并非亲父，而对亲父亲祖又无法相认。”

就在《金陵春梦》最后一部出版的同时——1980年，河南文献又根据河南三名政协委员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的口述，完成了《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使得这个故事又产生了新的凭证。

郭海长当时任省政协委员，他说：

“郑绍发在重庆住河南同乡会，与姚廷芳往来（现在美国），姚和其他人出主意，叫他往林森路蒋的官邸求见……多次不果。以后去的多了，门卫才把郑绍发求见报告蒋，蒋批交了一张5000元支票给郑绍发，郑坚持不要，说他是为骨肉团聚而来。后来，戴笠出面解释劝慰，说明蒋不能认他的苦衷……。以后，蒋叫戴派专人招待并监视郑，吃住都在中美合作所。那时有人常在磁器口、沙坪坝一带见到郑。他只可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坐茶馆、吃小馆都有人付钱，就是不准与其他人接触。同时，每月由中央银行给郑绍发家中寄钱。日本投降后，郑绍发回到开封，1946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开封市姚廷芳家里，见一个人去见姚廷芳，他走后，姚说他就是郑绍发。看长相、身架很象蒋介石。1953年因霜灾我到许昌地区慰问时，听地委赵天锡同志说，郑绍发当时仍健在。他家是中农，解放后他怕受株连，矢口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承认到过重庆、南京找过蒋介石。”

郑州市政协委员谢梅村说：

“为了了解郑绍发与蒋介石的关系，1946年春，找到开封鼓楼街南茂旅社访问到开封开会的许昌专员吴协唐。吴说，他曾奉命按月给郑绍发家两三百斤麦子，当时郑就住开封慈悲巷4号，省主席刘茂恩也按月送给郑生活费。要是郑与蒋介石没有关系，没有上级的命令，刘茂恩这个省主席以及我这个许昌专员，是不会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送粮送钱”的浙江文献中，发表一连串文章，异口同声地否认了郑绍发与蒋介石的手足关系。目前他们仍居大陆。你也许未料到，邓小平上台后，居然允许蒋介石的老干部，为蒋介石这段存疑已久的悬案，进行平反的辩白。

（摘自《蒋氏家族秘史》华南出版社）

风云人物

左 权

左　权(1906—1942)　原名左纪权。湖南醴陵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1924年2月，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当年转入黄埔军官学校，为第一期学员。1925年2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6月奉调回国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他调任该军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搞肃反扩大化，被诬为托派，受到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调到红军学校任教。1933年12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一军团为前导部队。他指挥部队策应红军主力在安顺场胜利渡过大渡河。1936年11月21日和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进行著名的山城堡战斗，歼敌一个多旅，毙伤俘敌一万五千余名。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副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了许多著名战役。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大举增兵，实行"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5月，日军纠集三万余兵力，分五路奔袭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25日上午，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突围，被炮弹击中，以身殉国。朱德赋诗说："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为纪念左权，1942年山西辽县改称左权县。左权文武全才，军事著述颇多，主要有《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邓小平说，左权是善于从经验中抽取原则，发现规律，指导实践的"最优秀将领"。

材料　太行浩气存千古
——左权将军殉国

"冲出山口就是胜利"

5月25日上午10时，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面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日军采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并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速度，以防止八路军乘隙突围。各部分散部署的敌军指挥官为协同策应，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进行突然急袭。光冈明指挥的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红头飞机，侦察、搜索、投弹、扫射、围着总部转移的高山深沟轮番俯冲。日军已对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挖拉铺东峪一线摆下了"铁环合围"阵。

左权从敌机反复投弹、扫射中判断，敌人合围的决心已不同寻常，飞机跟追扭着不放。这时，在千米之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左权从枪炮声中判断，知道日军正在作向心攻击，这是他们具有极大的兵力优势的征兆。

在离高家坡不远的一块洼地里，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王政柱和北方局的领导在开会。在左权的提议下，很快就确定了分路突围的行动方针。

日军发现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快速地收缩包围圈，大队炮、四一式山炮、九四式山炮、重掷弹筒从各个不同的方位，密集炮击突围的队伍。日军小型飞机也追着人群投弹、扫射、刚整理好的队伍又混乱了。左权以宏亮的声音高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不要光看到天上的敌人，更要注意地面的敌人，快冲啊！"

左权回过头来，见彭总还没走，立即奔过来，让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另外两个作战参谋，跟彭总一块转移，并招呼唐万成带着一个警卫排掩护。左权对彭德怀说："副总司令，你的转移路线由王科长负责，立即就走。"

彭总见漫山遍野的突围人员尚未突出去，后勤的骡马被射杀不少，物资扔得到处都是，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震得四处奔跑。他体谅着左权指挥突围的困难。

左权见彭总依然不动，严肃地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

"个人突围，时间还早。"彭德怀准备去指挥部队突围。

左权急切地说："你的安全牵及到八路军的荣誉，日军摆的是铁环合围阵，再晚一点突围可就困难了！"

左权严肃地命令道："唐万成，你应该知道怎样去爱护彭总了，快把他扶上马背！"

忠勇的唐万成也不管彭总愿意不愿意，丢一个眼色，警卫战士们一拥而上，将彭总扶上马背。

彭德怀竟有点不知所措地望着左权："你！"

左权一挥手说："赶快向西北方向突围，那边有特务团接应！"

彭总骑在一匹高大的东洋马上,望着还在突围的总部机关的同志们,他就这么离开大家吗?牲口也好像理解主人的心理,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这个目标太危险,炮弹、子弹在周围震响。左权以斩钉截铁的声音命令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

唐万成一挥手,战士们把彭总骑坐抬的抬,推的推。彭总被感动了,说:"你们不要推了!"他挥起马鞭,冒着日军的炮火,向西北方疾驰而去。彭总的警卫员王传和喊着警卫班的战士,唐万成带着警卫排的30几个人,跟着彭总持枪飞奔。

左权目送彭总突围之后,急忙奔向司令部直属队,一边走,一边招呼奔跑的人们跟上队伍。

午后2时,大队人马转移到十字岭高家坡山腰间,这里是敌人枪弹射不到的死角,左权派出了警戒,组织小休整。

太阳偏西,左权组织队伍继续突围,日军的炮口对准了十字岭东阳坡上的突围人员,敌机也在头上盘旋,天上、地下,已织成了一张火网。左权登上一块高地,从容地指挥继续突围,不断以嘶哑的声音高喊着:"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快冲啊!"完成联络特务团任务的作战参谋夏纳,从后面赶上来,也高喊着:"同志们,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大家不要慌,赶快冲!"有左权指挥突围,人们的情绪立即稳定下来,突围速度加快了。

突然,一发炮弹在左权的身边爆炸,他机警地回过头来,向大家高喊一声:"快卧倒!"第二发罪恶的炮弹与空气磨擦发出的怪叫声,接踵而至,左权中弹了,他仰面倒了下去。

跟在左权后面突围的党校学员李锡周、穆明德、李克林等奔了过来。李克林发现左权的遗体,两人忙俯下身去,只见左权倒在山路旁边。他的头部左额、胸部、腿部都中了弹片。左权穿着胸前有两个口袋、袖子有扣子的灰色斜纹布夏装,腰上捆着皮带,脚上扎着绑腿,穿着布鞋,……。李克林噙着泪水,从左权的身上取下左轮枪。大家为失去八路军这位有才识的高级将领而悲恸。为了保护好左权的遗体,穆明德捡了一个草黄色的背包,把背包打开,覆盖在左权的身上。然后将遗体安放在一堆灌木丛中,再在灌木丛上面盖满了青枝绿叶……。

举国同仇挽太行

穆明德、李锡周、李克林等突出重围,在清漳河泽城以北的南山村找到了作战科长王政柱,将左权的左轮枪交给了他,所有在场的人伤心得哭成一团。王政柱将枪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背过身去,仰望着窗外,一动也不动。

蠢笨的日军在报上大吹大擂在十字岭消灭了一二九师师部,他们不知道合击的是八路军总指挥部。为了迷惑敌人,6月15日《解放日报》(华北版)复刊。夏纳在修改一二九师师部发来的一则6月2日的战报中,公布了左权副参谋长在奋勇指挥作战中,不幸中弹牺牲的消息。稿子写好后,经彭总审阅同意,就以新华社的电讯消息发出去了。

左权殉国的电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莫不震悼。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留驻延安各将领,手持电稿,默然志哀良久。

朱德总司令将左权的夫人刘志兰从中央研究院接来延安,挥泪写了《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这首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总司令将这首诗赠给刘志兰以志哀思,并嘱她"节哀"。刘志兰笔蘸血泪,写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这篇文章,其中说:

"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当得到你的牺牲的通知时,陷我于绝望的悲痛中,痛哭、悲泣,释不去郁结的悲哀。吞噬着我的心,滴下血来。'我不是在梦中吗?'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而天空是澄清的,太阳辉耀着,这是绝对不可能挽回的事实。我不忍设想原来精神盛旺、身体健康的你,怎样遍体伤弹地辗转于血泊中,也不敢想象你在断绝最后的呼吸和思想时,想到未完的事业和亲爱的人时,怎样痛切地感到对生之留恋,我痛悔不在你的身旁,分担你的痛苦,这是永远的恨事了。

……

"你爱着北北,你希望她知道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搏斗。你愿她健康、可爱,这些她都能做到,悲惨的是你永远离开我们,她幼小的心灵中怎能体会到失去爸爸的悲哀呢?失掉你是我和她的最深切的不幸,这不幸永远不能弥补的你很放心我的抚育。今后在任何情况下,有党及同志们的帮助,我一定要抚养她长大成人,继续你的遗志,亦使她时刻记忆着爸爸是血战捐躯的抗日英雄。

"由于你的牺牲,更加深我民族的仇恨和斗争的决心,日本法西斯不仅奴役我的国家,且残杀了我亲爱的人。对于革命,我贡献了自己一切的,也贡献了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为了永恒地纪念你,我将努力将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学习你、继续你的遗志

奋斗。在任何困难之下，咬着牙齿度过去。有点失望和动摇都不配做你的妻子。

“愤恨填膺，血泪合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今后悠长的岁月中，想到你将是我最大的安慰。

“亲爱的，永别了，祝你安息！”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6月24日公布《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决定说，“左权同志为我党优秀军事家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尽瘁一生，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不朽功绩。为表彰忠烈，以慰英灵，太行区党政军民已进行筹备，并定于7月7日举行追悼大会。”决定号召八路军全体将士“应学习左权同志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9月18日，辽县党、政、军5000余人在县政府所在地西黄漳，举行辽县改名左权县的命名典礼大会。在此之前，辽县干部和各界群众要求县政府转呈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左权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了辽县人民的请求，辽县从此以左权县出现在新的版图上，引起了中国以至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注目。

左权将军纪念塔和陵墓，背依太行，面临清漳河。陵墓建在上下有台阶相连的3个台地的最上层。第一层台地的中间建有一个荷花池、第二层台地的中部建有左权将军纪念塔，左权墓在第三层。墓是用青石筑成的，呈长方形。墓碑上刻有“左权将军墓”5个大字，墓底雕有镰刀、斧头、齿轮、步枪等图案。

彭德怀副总司令员亲自撰写和手书了《左权同志碑志》，镌刻在左权将军纪念塔的左侧。碑志说：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追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1942年5月25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10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彭德怀谨撰并书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双十节

时阴云低迷，群山含悲。

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号召华北军民，迎接“扫荡”，多杀敌人。他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战斗在华北各地的八路军步兵、骑兵、工兵、炮兵、游击队战士，指挥员、机关干部，作家、画家、诗人、演员、宣传员，民兵、儿童团员，姑娘、嫂子、大娘……，他们都会唱一支山西民歌——《左权将军之歌》。悲痛和仇恨、赞颂与思念蕴含在深沉优美的曲调里。

生命是一首奇异的乐曲，当他和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会奏出永恒的旋律，得到无穷无尽的延续与应和！

（《左权传》王孝柏、刘元生）

赵尚志

赵尚志（1908～1942）　辽宁朝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回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军委书记，负责组织和联络各抗日武装部队的工作。1932年夏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参谋长。同年11月部队改编为红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任政治部主任。同师长张甲洲率部积极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初江北独立师失败。同年10月领导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1934年6月游击队扩编成立哈东支队，任司令员。1935年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军长。1936年1月被选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8月部队统一编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同年9月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年冬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团结北满各反日武装，转战于松花江两岸，远征黑嫩平原，骁勇善战，威震北满，成为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1941年在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挫折时，仍率小分队坚持抗日斗争。1942年2月12日在指挥攻打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所时身负重伤被俘，拒绝医治，壮烈牺牲。1947年珠河县农工代表大会决定将该县改名为尚志县，以志纪念。

材料　赵尚志血染梧桐河

1940年下半年，随着抗联各部队不断遭到重大挫折和形势的不断恶化，各省委和抗联各部的领导人都迫切需要到一起研究抗联面临的重大问题。于是，便陆续过界，准备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赵尚志也来到了苏联，做好参加这次会议的准备。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消息：中共吉东党组织认为他在第2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的错误言论，因而决定取销他参加此次会议的资格。同时还通知他：你已经不再是第2路军的副总指挥

了！

党籍没了，职务也没了。这样接踵而来的打击如果放到一般人身上，恐怕早就招架不住了，但我们这位东北硬汉却没有被打倒，他那坚定无比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听到上述通知后，他把袖子一甩说：不让开会，我就回东北！我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上！

1941年10月，赵尚志率领由姜立新等4人组成的一支小分队由苏联回来了。他们来到汤原北部山区，在姜把头趟子房里（东北地区的山里一种由狩猎和收山货的人修建的简易房）住下来后，便立即开始四处活动，准备继续发展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当时日伪活动十分猖獗，天也开始冷了下来，很少有人进山活动，所以他们在最初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一个新队员也没发展起来。直到12月23日，才有一个名叫王永孝的小皮货商人成为他们这支小分队的第一个新队员。

鉴于这种情况，赵尚志决定派3名战士回到苏联去向上级汇报情况，自己带姜立新和王永孝二人以姜把头趟子房为据点，继续开展活动。

然而，就在赵尚志刚刚回到姜把头趟子房不久，敌人就得到了如下情报：

“12月下旬，在鹤立县梧桐河西北约百华里的东山沟王永江、冯界德的趟子房有赵尚志等5名出现。”

赵尚志在“失踪”一年多以后的重新出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极大注意和恐慌。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与警察署长田井久二，立即派出了一支由警察署长带领的25人的讨伐队，携带无线电台进山讨伐，可是他们一连在山里搜了7天，却连赵尚志的影子都没见到。于是，田井和东城二人决定改变策略。

田井说：“赵尚志能够得到中国人的绝对支持，所以即使我们用一个师团的兵力也不一定能把他抓住，因此像这样的讨伐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应该采取派遣经过伪装的侦察和谍报人员进山，秘密地潜入赵尚志的队伍里去，设法把他引诱到警察的活动范围内，见机使他负伤，然后再将其加以逮捕。”

田井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尔后，他们把这个计划报到了伪鹤立县警务科，又经其将这一计划报到了伪三江警务厅和保安分室。待这一计划得到批准后，一个名叫刘德山的特务便带着事成之后必有重赏的美梦进山了。

刘德山，球河县一面坡人，24岁。曾任梧桐河金矿警备队小队长，因枪法特好而得外号“刘炮”。

刘炮进山后不久，就在姜把头趟子房“偶然”遇上了赵尚志等人。赵尚志对刘炮的突然出现颇感意外，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断定这个刘炮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应该立即枪毙掉他。可不知怎么那么凑巧，跟随赵尚志的姜立新与刘炮是老相识。这使赵尚志就把脑袋里那根弦松了下来，而且同意吸收刘炮入队。

刘炮入队后表现很积极，不断向赵尚志提供各种“情报”，使赵尚志开始对他信任起来。不久，另一个名叫张锡蔚的特务也以刘炮朋友的身份打了进来。紧接着刘、张二人便开始按田井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把赵尚志引向梧桐河方向。

2月8日下午，刘炮对赵尚志说：“梧洞河警察分驻所的警备力量不足，现在正是袭击他们的好机会。”

对刘炮的这一“妙计”，赵尚志并没有马上表态，但到了晚上，他终于做出决定：12日拂晓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

2月9日，赵尚志带人从姜把头趟子房出发了。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对张锡蔚查讯情况的报告》，记载了他们在此后几天的活动情况：

2月9日，午前6点起床。早饭后，8点出发。途中休息一会。午后8点到达收山货的柴把头小屋，并在柴把头小屋住下。当夜，张锡蔚从12点到1点站了一次岗。

2月10日，午前6点起床。早饭后，为商议袭击梧桐河，所以11点才出发。在出发之前，赵尚志对其部下说：这次梧洞河要是成功的话，我们就乘马去苏联，若是这次袭击梧桐河失败的话，我们就都到姜把头小屋集合。途中休息了二三回。

2月12日，午夜12时到达梧桐河北方2000米的一个独立的农小房后，刘德山对赵尚志说：“现在有必要到梧桐河去调查一下。赵尚志也认为有必要派熟悉部落情况的人去。于是就派张锡蔚。张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同意了。

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赵尚志他们来到了距伪警察分驻所不远的吕家菜园子。这时，走在赵尚志前面的刘炮一看机会已到，便对赵尚志说：“先到菜园子屋里暖和暖和，我去撒泡尿。说完就转身往回走，当他来到了赵尚志的身后的时候，便立即举枪向其射击。

由于没有防备，加上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赵尚志被击中倒地。但赵尚志毕竟是赵尚志，就在刘炮准备向王永孝开枪的时候，赵尚志的枪也响也！刘炮头、腹各中一枪，当即倒地气绝身亡。

从后面赶上来的姜立新赶忙将倒在血泊中的赵尚志背进了菜园子的小窝棚里。赵尚志自知身负重伤，难以继续行动，便命令姜立新迅速带着装有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文件包转移去苏联。

张锡蔚一进伪警察分驻所的大门就大叫：“刘炮和赵尚志打起来了！”里边的人一听赵尚志已经来了，顿时慌乱起来。伪警备队长穴泽武夫带着12名警察和警备队员组成的“讨伐队”，在张的带领下赶往到吕家菜园子。接下来的事，日本人作了如下记载：

讨伐队因积雪尺余，行动不便，遂于距赵部房舍400米附近潜伏下来，监视赵部动静。在潜伏中，很快被匪团

发觉，于是散开应战。为了切断赵匪的去路，派分驻所所长以下5名迂回后身，战斗经历15分钟，匪部枪声熄灭。

当敌人心有余悸地摸进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动静的窝棚里时，赵尚志和王永孝都已处于昏迷状态。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赵尚志的印鉴和几张任命状，以及三八式步枪两支、子弹230发，美制一号橹子一支，日制91式手榴弹10枚，还有一套半日本军服。

敌人用爬犁将赵尚志和王永孝拉到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后不久，赵尚志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了姓刘的手里。"敌人见赵尚志伤势严重（子弹从右后腰部打进，从小腹与胯间穿出），为了能得到抗联的机密，便对其进行了突击审问。据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枪杀赵尚志向伪治安部的报告中记载：

赵尚志受伤后约活了8个小时左右。当审讯时，赵尚志对审讯他的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说完闭口不语，狠狠瞪着审讯他的人，对重伤下的痛苦不出一声，其最后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全勇《黑白关东》）

吕正操

吕正操（1905—　　），辽宁省海城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次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53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第116师参谋处长，647团、691团团长。1936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区委员、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柯棣华

柯棣华（D. S. Kotnis，1910—1942）孟买人。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医生。

1936年医学院毕业。学生时代，因积极参加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曾为英国殖民当局拘留并被迫转学。1937年底，印度国民大会决定派遣医疗队援华抗日，柯棣华毅然报名参加，于1938年9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次年1月赴延安。先后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服务，任八路军军医外科主治医生。在延安，曾参与治疗周恩来同志的臂伤。1940年6月，转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年9月中旬，交通破击战（以后称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打响。这时，他虽身患绦虫病，但和巴苏华坚决要求到前线。被分别派到三分区和四分区工作。不久，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外科教员，接着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在他领导下，医院工作迅速改观。来医院参观的一位英国教授感慨地写道："在如此之艰难环境中能创造出第一流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因为绦虫病引起的癫痫病，病情日趋严重，每次发作，昏厥的时间也渐延长。聂荣臻司令员非常关心和焦虑，提出让他易地治疗。他一再重复斯大林讲过的大力士安泰的故事，借以说明他不能离开前线。他已经将自己和我们抗日军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了。1942年7月7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病逝。

1943年春天，边区军民在白求恩墓左侧，为柯棣华修建了陵墓。中国人民为了纪念他，1976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兴建了柯棣华大夫纪念馆。夫人郭庆兰，有一子，名印华。

材料：

材料　"远道来华援助抗日"
——记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

1938年9月1日，"拉吉普塔纳"号轮船缓缓离开印度孟买德，载着柯棣华等五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向遥远的中国驶来。

9月17日，柯棣华一行抵达广州，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及广州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在离开广州的欢送宴上，宋庆龄告诉医疗队成员说："到武汉后，可以同那里的中共领导人联系。"

9月29日，医疗队一行途经长沙抵达武汉。董必武、叶剑英代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四川饭店宴请了印

度援华医疗队一行，史沫特莱等作翻译。凯丰、叶剑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医疗队致欢迎词，并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宴会的气氛极为热烈，大家用英语唱《红旗》，用法语唱《马赛曲》，用俄语唱《空军之歌》，用中文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过黄河》，用德语唱《国际歌》。医疗队成员之一巴苏华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真正的国际性聚会，我们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充满这样激情的聚会。语言和肤色的不同，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心的贴近和建立亲密的感情。这与我们所经历的和国民党官员相处时的气氛，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啊！"

宴会之后，第二天，大夫们又被邀请到八路军办事处访问，并尝到了普通的"八分钱伙食"。那完全是官兵平等的民主生活，他们禁不住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10月7日，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队员们颇受鼓舞。在谈到他们去八路军工作的愿望时，周恩来从国共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建议印度医疗队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奔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

印度医疗队先后在武汉、宜昌、重庆工作近半年，1939年1月22日离开成都重庆，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

柯棣华等人经过月余到达延安，受到了当地2000多名干部群众的夹道欢迎。3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里亲切接见了柯棣华和医疗队所有成员。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并谈，寻问了有关国大党、印度共产党、甘地和尼赫鲁的许多问题。他说，中印两国人民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有许多共同点，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民族独立。毛泽东请他们一起吃了便饭。柯棣华发现桌上有一碟辣椒面放着以便随时加在菜上。毛泽东以特有的幽默说，印度和中国可以团结起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两国人都爱吃辣椒；辣，是革命性的一种表现嘛。柯棣华禁不住开怀大笑。此后，柯棣华在延安的不同场合，又多次目睹过这位伟大人物的风采。

从1939年2月12日至11月4日，印度医疗队在延安度过了将近9个月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柯棣华在延安拐峁医院担任外科军医期间，上午查病房，给伤病员医疗；中午，利用窑洞光线好的机会，给伤员做外科手术；下午去门诊室，为战士和乡亲们看病；晚上，经常参加中国同志的学习讨论会。工作极为繁忙。7月10日傍晚时分，周恩来在延河边意外地从马上摔下来，右臂粉碎性骨折，当夜10时，柯棣华在拐峁闻讯后，连夜赶到杨家岭，对周副主席进行紧急治疗。此后，柯棣华每隔几天就去杨家岭，看望他的伤势，为他换药包扎，当柯棣华看到他忍着右臂的剧痛，坚持用左手练习毛笔字时，禁不住暗自钦佩周的顽强意志和惊人毅力。

柯棣华在延安工作期间，多次请求去抗战前线工作。当朱德将军请他们去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晋东南武乡附近的王家峪时，柯棣华等人终于如愿以偿。1939年12月21日柯棣华同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到达王家峪。

当他们被引领到一个大土房子时，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大脑门，脸上布满皱纹，饱经风霜，厚嘴唇，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柯棣华还正以为他是总司令的衣着蹩脚的勤务兵呢，进了屋子，才发现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朱德本人。

朱德首先表示热烈欢迎柯棣华等大夫们的到来，然后谈到游击战对殖民地人民的价值——这是战胜帝国主义优势武装力量，取得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柯棣华极为叹服中国人的游击战术。朱德留给大夫们的印象是诚恳、热情和耐心，举止象慈父般的沉着持重。后来，柯棣华多次见到朱总司令，从未见到他对自己的最下级士兵发过火，不耐烦或言词粗鲁。

12月24日，八路军总部召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追悼会。柯棣华一行应邀出席了大会。朱总司令在会上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并指出，白求恩大夫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我们要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便对不起白求恩和一切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朱总司令朴实无华的话语，深深扣动了柯棣华的心弦。

白求恩大夫有一句名言："医生不能坐等伤员，而必须到伤员中去！"在晋东南工作期间，柯棣华为及时有效地做好伤员抢救工作，象白求恩那样坚决要求把医疗队设在前线。经过多次要求，柯棣华等人被批准组织了一支流动医疗队，在前线奋战了一个月。在张店反"扫荡"战斗中，柯棣华把救护所设在火线前沿，一颗炮弹落在附近，炸毁了救护所的墙角，同志们担心柯棣华的安全，劝他离开前线，他却摇头说："如果我们的救护所离敌人很远，对我来说是安全的，对不怕流血牺牲的伤员来说，不知要增加多么大的痛苦，是多么的不安全！"

在晋东南战斗了一个月后，柯棣华于1940年3月底，和巴苏华一起前往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在这里，柯棣华更深切地体会到白求恩的伟大和当地军民对这位加拿大医生的诚挚感情。6月21日，白求恩陵墓在唐县城南关落成。聂荣臻司令员特邀柯棣华代表印度医疗队，参加陵墓的揭幕仪式。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上，柯棣华默默地将写有"印度援华医疗队敬挽"的花圈，奉献到白求恩墓前，决心用实际行动学习这位异国长者和同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9月，八路军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晋察冀的南线和北线发生激烈战斗。在此期间，柯棣华在三分区前线工作了13天，医治800多名伤员，为其中的585人做了外科手术。有一

次他甚至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

1940 年 10 月，毛泽东给柯棣华和巴苏华发来一份简短电报，要他们立即取道延安回印安。俩人都不愿离开正需要他们的中国，于是，巴苏华到了延安八路军医院，柯棣华继续留在晋察冀。他先被任命为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外科教员，不久又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柯棣华上任之初，就领导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如领导干部轮流查病房，医护人员每周召开一次工作汇报会，伤病员实行班排编制等，使医院工作迅速得到改善。他还采纳群众建议，在医院组织了若干战地救护组，以适应战时需要，并亲自担任一个救护组的负责人。一位英籍教授参观了白求恩医院后，称赞道："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能创造这第一流的成就，这才是第一流的医学家！"柯棣华由于工作出色，1942 年 7 月 7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 年，柯棣华与中国姑娘郭庆兰产生了纯真的爱情。在聂荣臻同志亲自过问和关怀下。同年 11 月 25 日他们结成伴侣。婚后一年。柯棣华与郭庆兰爱情的结晶——一个男孩问世了。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印华。柯棣华非常爱他们的孩子，但他更爱他的职业，他的事业。

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超负荷工作，柯棣华的癫痫病突发，因抢救无效，于 1942 年 12 月 9 日溘然长逝，时年 32 岁。

柯棣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哀悼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写下了"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挽词。朱德也非常关心郭庆兰母子的生活，派人把郭庆兰母子接回延安。解放后，郭庆兰在大连工作，任大连市儿童保健所所长。如今她已年逾古稀，离休在家，安度晚年。

（王静，《党史博览》93 年 2 期）

宋子文

宋子文，原藉广东海南岛文昌县，1893 年 1 月 27 日出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后考进美国哈佛大学，1915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7 年宋学成归国，到盛宣怀子盛泽丞为总经理的汉冶萍公司任秘书。不久，因与盛宣怀之女盛谨如产生爱慕之情，遭盛宣怀干涉，由上海调往汉阳任总公司会计处科长。但到汉阳后即辞职离去，转任华义银行总经理，并开始显露出才华。1923 年 2 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宋辞去总经理职南下广州，任孙的英文秘书，不久升任税务局局长。1924 年 8 月和胡汉民、廖仲恺、孙科、林云陔等同任新组建的中央银行董事，并亲自出任行长。1924 年底孙中山北上，宋随行。孙中山病逝时，宋和孔祥熙、戴季陶、吴稚晖、汪精卫等人同在《总理遗嘱》上签字。1925 年 7 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宋任商务厅长。9 月 20 日改任财政厅长，两天后又继邓泽如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接管国民政府财经大权。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党部商民部部长。6 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7 年 3 月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又兼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宁汉分裂、蒋汪合流的过程中异常活跃。

1928 年 1 月起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防会议、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委员。同年 10 月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 年 3 月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30 年 1 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一支直接受制于宋子文的武装，抗战开始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 年 11 月国民党四大召开，续任中央执行委员。1932 年 1 月，国民政府再次改组，宋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并一度代理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其时，曾在财权问题上和蒋介石发生矛盾。1933 年 4 月，孔祥熙继宋出任中央银行总裁。5 月，宋出访欧美，谈判"棉麦贷款"。10 月，孔祥熙又继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35 年 4 月又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 月，国民党召开五大，宋继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爆发后，12 月 20 日、22 日两次飞西安，与蒋介石见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抗战期间，1940 年夏天，宋曾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美国会见罗斯福总统，为抗战争取美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宋出任外交部长，1942 年 6 月同美国签订了《中美租借协定》。1944 年 1 月由蒋介石授予一等景星勋章。12 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 年 4 月作为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5 月，国民党召开六大，宋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6 月从美国赶回重庆，出任行政院长。继而与蒋经国一起飞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条约》。1946 年 6 月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47 年 3 月 1 日，宋的行政院长职务改由蒋介石兼任，5 月，其"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职亦被免去。9 月 20 日，宋调任广东省府主席、广州绥靖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1948 年 8 月国民党当局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又兼任广州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当时，宋家在上海的庞大金融机构带头套购外汇，囤积居

奇，并向广州方面转移资金、物资，使得蒋经国在上海的经济管制陷于瘫痪。

1949年初，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亦于这年1月将广东省主席职交薛岳，绥靖主任职交余汉谋，而后带着支票、巨款、黄金跑到香港，声称："本人从政二十余年，已当休息。"大陆解放后，宋子文因与蒋介石互有恩怨，未去台湾，而去了美国纽约。赴美后，常出入于纽约等地的社交界，过着豪华的生活。1959年和1963年曾两次回台湾探亲。1971年4月26日突然发病故去。蒋介石送了一块挽额。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罗卓英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别字慈卫，陆军上将。1896年3月1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白侯乡渔洋坪村。幼年过嗣乃叔，遂迁居大埔县湖寮乡岭下村。养父业农，故罗自幼耕读并作。他七岁入乡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该县官学，次年入大埔中学。

罗卓英从小喜欢读诗词和古文，在大埔中学读书时，与颇负声望的原韩山师范文史教员饶爱荃过从甚密。在饶的熏陶下，尤其喜欢研读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等书藉。中学毕业后，曾短期任教。1918年，北上投考保定军校，名落孙山，乃留该地广东老乡开办的鸿文公寓中，继续攻读，并拟"素眉生"的笔名投稿北报刊，以稿酬佐生计。次年考上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在该校中与陈诚结成莫逆之交，因而他后来成为陈诚派系的主要骨干和智囊人物。

1920年，保定军校因 时局动乱而停课，罗卓英只得回乡，在大埔中学任教，翌年受聘为湖山官学校长。是年秋，军校复课，罗北上返校。1922年6月毕业回到广州，先后在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在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办湖山中学。在该校，他提倡文武合一教育，实施军事管理，对体育、国文、修身、史地及自然科学，尤为注重。1923年，罗卓英曾受邹鲁推荐，任潮梅军少校参谋，但旋即辞职。1925年，东征军回师广州，进行大改编，罗卓英才正式参军，并参加了讨伐刘、杨之役。第二次东征时，任第一师炮兵连连长，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随后率部队由河婆入揭阳、黄岗，升炮兵副营长，参加了1926年10月歼灭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1927年，陈诚升第二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即归其麾下，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1928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但不久即为何应钦裁撤。是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任命陈诚为副师长，罗随之任参谋长。1929年春，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三十三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

1931年5月，第十一师与第十四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8月13、14两日，在空坑受到农民自卫队和项英一部的猛烈袭击，损失不小。罗卓英恼羞成怒，于18日在寨下一带包围了几个小山头，乘东南风起纵火烧山，把从山上逃出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枪杀。

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他首行将被红军歼灭的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列部吞并。接着，乘与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一起开往吉安之机，突然包围郭部，将其缴械后收编。1932年秋，川军张英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包围，第十一、十四两师以增援之机，重施故伎，将其吞并，然后把自己部队的干部调进该师，作为骨干，进行改编。罗卓英因"整军经武，屡建殊勋"，提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此后，陈诚升第三路总指挥兼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则代陈诚指挥该军。

1937年8月11日，罗卓英率第十八军的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八四个师驰援上海的抗日部队。8月15日，罗部第九十八师赶到上海，其余各师亦陆续赶到，被派为左翼军，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8月23日凌晨，日军在小川沙、狮子林、炮台湾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猛烈进犯，其中又以罗店、嘉定方向作为重点，企图切断京沪线，包围上海的国民党野战部队；8月25日，日军又从吴淞镇、蕰藻浜、张华浜开始登陆，重点仍是指向罗店。由于该地濒临长江口，离大场、闸北不远，日舰的炮火可以直接命中陆上的目标，又有制空权，便于海陆空协同作战。日军集中重兵，对这一带猛攻，其中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罗军全部到达上海时，罗店已经失陷。罗卓英即令第十一师将其夺回。其后一个多月里，罗指挥部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白天，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夺取阵地；夜晚，罗部将阵地夺回，战斗非常艰苦和激烈，官兵伤亡惨重。在这次战役中，罗卓英先后升为第十六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由薛岳代），罗为副司令。9月6日，罗部奉命负责防守金家宅、罗店西南、南北的周宅、曹庄至朝王庙、双龙墩、沈家桥、浏河等地，与日军开展阵地战，大量歼灭日军，从而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长江右岸，包围上海的计划。11月5日，日军从设防空虚的曹泾镇、金丝娘桥一带登陆，攻陷松江，上海防线动摇，守军不得不全线撤退。13日，罗部向吴县、福山一线转移。15日，与日军激战于常熟、福山、兴隆桥，击沉日舰四艘。19日，向锡（无锡）、澄（江阴）线撤退。此时

正值冬寒，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气低落。第十九集团军退到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开始了游击战时期。

1942年4月2日，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任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归史迪威和英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4月5日，罗与蒋介石乘飞机到达腊戌与史迪威部署平满纳会战，打算将日军引到该线的有利地带歼灭。计划定下后，正准备施行，但英军决定撤往印度，已全部集中西线，原有防地均放弃。罗部接替防务，进行了皮尤河前哨战、同古战斗和斯瓦逐次抵抗战斗，掩护了英军的撤退。4月18日，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史、罗只得放弃平满纳会战，退守瓦城，重新计划瓦城会战，准备在瓦城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但他们未重视把守通往腊戌的要道东枝等地，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日军来攻瓦城。

然而，日军却不采取正面强攻的战略，而是迂回出击，派一部佯攻瓦城，一部袭击东枝。占领东枝后，得悉罗部集兵瓦城，便以机械化部队急攻腊戌。当史、罗获悉腊戌危急时，已赴援不及。28日，腊戌失陷。瓦城处于被包围之中，史、罗这才如梦方醒。30日，急令各部向伊洛瓦底江后撤，急援莫八、密支那，试图先固后方，再图进取。可是一切已为时太晚，日军占腊戌后，继续沿东线急进，5月3日，占领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飞兵莫八全速抢占密支那。5月8日，密支那失守。9日，腾冲亦沦敌手。至此，十万入缅军的归路被切断。5月1日，史、罗下令放弃瓦城，开始了悲惨的大撤退。全军被迫丢掉车辆辎重，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一部分于8月初回到滇西。杜聿明带领第二十二师等部经野人山，于8月初到印度。杜聿明随后返国，第二十二师只得留在印度。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及新三十八师则经巴曼克、曼坎、荷马林、泰南进入印度。入缅军十万人损失五万余，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撤退途中。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得不到治疗，而壮烈牺牲。

1943年5月，罗出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即调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与驻华美军合作，首用轮带式教育法，训练反攻部队”。他还兼任军委会督训总处主任，将大批的美式装备武装陈诚的嫡系部队，使第十八军、五十四军的素质大为增强。次年11月中旬，陈诚接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立即派罗卓英充任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其后，罗设干训团于重庆大坪，指挥选拔、训练国民党后备骨干的工作。据《粤秀文垒》记述，罗卓英在编练工作中注重培养知识青年德、智、体、群全面发展，规定衡量的标准是“革命的信心，革命的热情，革命的勇气，革命的操守，革命的纪律”，并提出“任务中研究，乐观中奋斗，累积中成就”的口号。1945年5月，罗卓英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8月底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提升陆军上将。

罗卓英到东北后，协助陈诚整顿军队，裁并机关，控制金融等。然而，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军队反击，从而打破了他们的幻想。1948年2月，陈诚在一片责骂声中离职，罗也随之南下，任东南军政副长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改编整训败逃的国民党军队。不久，长官公署撤销，罗卓英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等职。旋即自请退为预备役着闲。1961年11月6日，罗卓英因糖尿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授予他“忠贞为国，殊堪旌扬”的旌忠状。

罗卓英平生爱读书和作诗文，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年月，也不废吟作，已出版的主要有《抗战言论集》、《从政言论集》、《赣行吟草》、《呼江吸海楼诗集》等。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戴安澜

戴安澜，陆军中将。1904年11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风和村，取名衍功。祖父戴昌淦，是前清贡生，以文章精美著名于乡里，耕读传家，不慕仕途，后因病早逝。父亲戴礼明，在乡务农。母亲汪氏，以贤淑见称于亲友，生下六个子女，戴安澜排行第三。

戴安澜六岁那年，进塾馆读书，取学名炳阳。1918年，“桐城派”晚清著名作家周绍封先生，应聘到风和村设馆教学，戴安澜投读于周先生门下。他攻读奋勉，才气过人，周先生常常称赞说：“此子秉赋优异，后必有成。”1922年9月，他考进陶行知、姚文采分担任校长、副校长的南京安徽公学，学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一年以后，辍学回乡。一面自学，一面当塾师。

1924年3月，戴安澜从在广东粤军第四师任团长的叔祖父戴端甫给家乡的信中，获悉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便和本家乡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广州，参加第一期招生考试。他成绩优良，但因身体瘦弱而未被录取；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了二等兵，更名为安澜，自号海鸥。年底，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次年7月，升入学生队，正式成为第三期学生。在校期间，他直接受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熏陶，受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受到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先后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乱的战斗和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1926年1月，戴安澜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排长，后擢升为连长。1927年1月5日，与家乡姑娘王氏结为伉俪，后来，为她取名荷馨。1928年5月，随北伐军攻打济南，并参加当地驻军第一师对制造“济南惨案”日军的反击战。不久奉命南调，参加国民党军围剿江西工农红军。次年，任中央军校少校区队

长。1930年，调任国民革命军教导第二师迫击炮连连长，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的陇海路之役，在作战中右臂负伤。因功相继晋升为营长、中校副团长。第二年又调任第四师补充团团长。1932年7月，蒋介石纠集三十余万人的部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率部由蚌埠经寿县正阳关进入皖西地区，在霍邱、金家寨、阜阳等地，“围剿”工农红军。1933年1月，第四师扩编为第十七军，他调任该军第二十五师一四五团团长。

1938年3月，戴安澜奉命率领第七十三旅，从华北战场转入第五抗日战区。

3月15日，他率部参加鲁南台儿庄会战，随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在向城、洪山镇一线担负阻击北面之敌的任务。该旅根据战役的统一部署，苦撑数日，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台儿庄之敌后撤。接着，他指挥所部与进犯中艾山的日军，血战四昼夜，致使敌人猛扑数十次都没有得逞。由于他身体魁梧，被敌人误认为是俄籍军官，电台广播曾说：“中国军队中有一俄籍军官，指挥有度。”战后，他获得了国民政府颁授的华胄荣誉奖章，被擢升为八十九师副师长，并兼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是年夏天，日军集中五个多师团的兵力，大举进攻武汉。戴安澜又率部进入瑞昌一带，投入保卫武汉的外围战。8月上旬，日军主力第九师团，从九江乘船西进，由海、空军配合，在瑞昌县东北之港口登陆。他扬长避短，把日军引向山区，使敌人的海军无用武之地，并充分利用山区有利的隐蔽条件，对付日军空军和炮兵的袭击，阻滞敌人于瑞昌至阳新一带。虽然日军第九师团素以凶狠顽强著称，然而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戴部的痛击，损失惨重。从九江推进到武县近郊的过程中，曾先后补充兵员达九次之多。

因戴安澜在武汉会战中，阻击日军西犯有功，于12月21日，汤恩伯为他补报记大功一次。

1939年1月，在湖南湘潭，戴安澜接替杜聿明，升任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这个师是由1936年创建的战车营发展起来的机械化部队，为第五军的基本部队，装备精良，官兵训练有素。他在宣誓就职时表示：“尽竭全力，练成劲旅，为国驰驱，歼彼倭寇”。接着，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撰写了《自讼》一书，以鞭策自己发扬成绩，再接再励，夺取新的胜利。

不久，第二〇〇师移防广西全州。他的夫人王荷馨和孩子们，从柳州沙塘镇搬到全州师部。这一天，当汽车开到师部大门口的时候，长子覆东便跳下车，兴冲冲地往里跑。“立正，敬礼”随着两声口令，站岗的卫兵向小覆东行军礼。戴安澜来到大门口，和蔼地向卫兵班长说：“以后，我的家属，我的孩子到师部来，不要喊立正，行军礼。”后来，他又对卫兵排的班长、排长和卫士们说：“今后，对我的孩子不要喊‘少爷’、‘小姐’，直喊他们的名字就可以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早在这年初，国民党军内就有派部队出国远征抗日的传说。这时，戴安澜对人说：“如果远征异域，始偿男儿志愿！”10月，贵阳《中央日报》记者卜少夫采访他，请他谈谈对于出国作战的感想，他高兴地说：“假如将来有这样的命令，那我很荣幸。因为最高当局能将这样重大的责任派交我和我的部队，我会很兴奋。同时，也有一种履冰临渊的戒慎恐惧的心情，因为这一项工作的关系和影响太大了！”从此以后，他的心情更加急切，日夜盼望出国远征命令的到来。

12月16日，蒋介石命令第五军开赴缅甸，协同英军抗击日军。接到命令后，戴安澜立即向部属作远征动员，勉励官兵英勇杀敌，扬威国外，为国争光。第二天，他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率部西进。蒋介石因与美、英政府之间一些矛盾未得解决，在赴缅的军事部署上踌躇不定。当戴部行至保山附近，即接命令，“暂时毋庸入缅。”于是留驻板桥整训待命。

1942年3月1日夜，戴安澜接到驻缅英国盟军的电话通知，要他速赴缅甸腊戌，接受蒋介石召见。第二天黎明，他赶到腊戌，蒋介石命令他当天将一个团开到腊戌，其余各团进驻平满纳、东瓜(也译称同古)。这天，该部官兵高唱戴安澜作词的战歌《战场行》，以“不愿做亡国奴”，“誓死奋斗”的英雄气概，风驰电掣般地开进了缅境。

第二〇〇师胜利抵达腊戌、东瓜。这时，后续部队仍在国境内。蒋介石在召见戴安澜的时候，问他孤军深入是否可以坚守。他坚定地回答：“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

3月6日，戴安澜在东瓜会晤英军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共商防务交接事宜。8日，日军占领仰光，接着以第五十五、第三十三、第十八师团，分中、西、东三路向北推进，企图在雨季到来之前会师曼德勒，占领缅甸大部国土。为阻止日军继续北进，戴安澜派遣第五军摩托化骑兵团和第二〇〇师五九八团步兵第一连，由骑兵团副团长黄先宪指挥，进入皮尤河一线担任警戒任务，掩护英军撤退。3月19日向曼德勒进攻的日军中路军第五十五师团，派出二百多人的搜索队，骑着摩托车，向皮尤河袭来。埋伏在公路两侧的第二〇〇师官兵迅即引爆，炸坏大桥，消灭桥上敌人，阻拦敌人的后续车辆和部队，同时用步枪机枪一起射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狼狈逃窜，戴部取得了皮尤河前哨战的胜利。

戴安澜的伤口，因为没有药物、没有药棉而无法治疗。他疼痛难忍，然而却保持着坚定的胜利信念，坚持指挥部队突围。在弥留之际，他还念及国事，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何时能返回祖国，询问双方交战的情况，还

用手指着地图，示意部队在茅邦渡河，沿河西岸前进，并勉励部属努力杀敌，为国立功。

5月26日，第二〇〇师到达茅邦。戴安澜的伤口，因得不到治疗，又遭受雨淋日晒，严重溃烂。他预感到生时有限，又庆幸全师生还，于是嘱咐部属帮助他整理一下衣冠，扶起他向北湿望。他嘴里喃喃地说："反攻，反攻，祖国万岁！……"下午五时四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地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八岁。

6月17日，第二〇〇师到达云南腾冲，戴安澜的遗骸随部队回到了祖国。他的灵柩，先后经过云南昆明、贵州安顺和贵阳、广西柳州和桂林，最后运到全州厝葬。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全州隆重举行全国性的追悼戴安澜大会，一万多人参加，全国各地派代表前往致奠。中共领导人撰写挽诗、挽词、挽联，哀挽戴安澜以身殉国。

蒋介石特派军事委员会西南(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为代表，在追悼大会上致祭。李济深在悼词中说："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批准戴安澜由陆军少将追晋为陆军中将；12月31日颁布命令，批准他的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时入祀省、县忠烈祠。

美国政府为了奖励戴安澜作为盟国友军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10月29日，以总统罗斯福的名义，向他颁授了懋绩勋章，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的交往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文艺界朋友有着亲密的交往，对文艺工作的许多根本问题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丁玲等人发起了陕北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毛泽东还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又说："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最后，他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去，鼓励战士。文艺协会应该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丁玲从保安到陇东时，毛泽东把他填的《临江仙》词用电报拍给了丁玲。这首词的内容是："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40年秋，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看了张金奎表演的钻地圈、火圈、刀圈及地滚刀等杂技武术节目后，在一片掌声中走到张金奎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演的很好。"表示要找几个学生跟他学艺，还亲切地说道："你教他们，一不能打，二不能保守，这是革命工作，我们坐机关写文章是革命，你演杂技也是革命。"他指着张金奎，对身旁的马列学院领导同志说："他的工作费体力，要营养好，每月给他补助二十斤白面，三斤肉，大灶随便吃。"这两桩事情，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深切关怀。

1937年秋，延安工人俱乐部成立。毛泽东称赞俱乐部演出的戏"是工人阶级的文艺"。1938年4月"鲁艺"成立时，毛泽东给该校师生作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为了熟悉和了解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他经常观摩文艺演出。仅从1938年3月到1939年冬，鲁艺的晚会演出就有一百六十多场，其中反映抗日战争主题的达五十余种，这些种类繁多的剧目剧种，毛泽东差不多都看过，有的剧他还要反复看多次。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来到延安，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冼星海兴奋地从诗人光未然那儿弄到歌词，仅用了五、六天时间，就谱写了曲子，举行"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毛主席看后兴奋地赞许说："百听不厌！"。

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团回延安演出了那些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求雨》等剧之后，毛泽东即给剧团负责人写信说："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毛泽东在看了话剧《带枪的人》之后，向"鲁艺"的师生们说：文艺虽然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并不等于文艺。生活，只有当它灌注了作家的思想、感情、想象、幻想等主观

因素，并集中而形象地体现出来之后，才能成为文艺。而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已不同于原来的生活，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而实际生活中的列宁一定比戏剧里的列宁丰富得多”。

为了汇集文学艺术家的集体智慧，毛泽东还一个个地邀请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到杨家岭他的住地交谈。如萧军向他谈了“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内容包括立场、态度、给谁看，为什么人，如何搜集材料，学习等问题)，艾青向他谈了“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文艺和政治，作家的立场和态度，写作的对象和内容，文学的语言，作家的团结和文艺工作的领导诸问题)等等。他们都在和毛泽东交谈之前，整理了论文，送他审阅，他看了艾青的长篇论文后，回信表示：“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并用马把艾青从外地接到王家坪，对论文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艾青作了修改，发表在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萧军的文章发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和他们座谈之后，毛泽东又给艾青、罗烽等人写信，说：“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他邀作家们面谈，只是专门致志地听取意见，很少打断他们的话。如萧军谈到“作家深入生活如下海——生活底海——取珠，珍珠要取到手，还要不为海水淹死才好”时，毛主席只是轻轻地点头，用铅笔写几句。

文艺座谈会开罢之后，毛主席继续与作家们交谈，听取反映。大家要求主席把讲稿发表，但他还是反复斟酌、修改，经过一年半之后，在鲁迅逝世纪念日，才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公开发表，因此，这个《讲话》是文艺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毛泽东与延安文艺界》一文，作者：雷云峰)

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军民为了粉碎日、伪、顽的封锁和包围，战胜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周恩来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和同志们一起参加劳动，学习纺线。周恩来尽管右臂受过伤，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全套纺线本领，并纺出了头等线。周恩来的模范行动，鼓舞了同志们的劳动热情，一时在中央机关掀起了纺线热潮。为了总结交流经验，周恩来建议在机关干部中进行一次纺线比赛。这天，评判委员会一声令下，比赛便在热烈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全场几十架纺车齐鸣，周恩来沉着应战，动作协调，一条条均匀的线被抽了出来，上到线穗上，又一会，一个象小白萝卜一样的线穗被摘了下来，评比结果，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他兴奋地说：“劳动是一件愉快的事，同困难做斗争，真是其乐无穷啊！”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记下这笔帐

1942年年底，日寇在晋西北一带残酷扫荡，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老百姓背井离乡，逃往别处，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实在带不走的东西，就埋在地下。一天，刘少奇经过急行军，黄昏时来到了宿营地。却发现村子里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更搞不到一点粮食。大家又饿又累，决定分头去找。

一个同志在山后茅厕附近的地面上，发现有些浮土。跺一跺脚，声音有点不同。于是找来几位同志，一起动手挖起来，果然挖出几个大南瓜，另外还找到一点小米。

同志们考虑到刘少奇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便商量准许把南瓜熬成糊糊，分给大家吃，把小米熬点稀饭给刘少奇吃。这些话被刘少奇听到了，他立即说：“不要单独给我煮稀饭，把南瓜、小米合煮成一大锅粥大家吃。”

他看了看南瓜和小米，对当地负责同志说：“看样子，这个村子都是贫苦的农民，生活很苦，他们可能还要指靠这些东西过冬的。我们一定要记下这笔帐，在这次扫荡过后，向老乡做个交代，照数偿还他们。”

按照刘少奇的嘱咐，南瓜和小米合在一起，煮了一锅稀糊糊。当同志们把一搪瓷缸子稀糊糊送给他时，他却不肯先吃，说：“先尽战士们吃。他们很辛苦，还要准备继续战斗呢！我们顿把不吃，没大关系。”直到大家都吃起来，他才端起搪瓷缸子。

(选自《刘少奇佳话三百篇》作者：刘学琦)

敌寇凶残赛过虎狼

新华社晋察冀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电　平定敌人最近在护城河建造石桥，迫令各“爱护村”每户出修桥费二百五十元，每村出直径3尺高2丈之大树4棵，并锹铲等用具。当地民众得此消息后，都将树锯成木板，敌寇无法，乃用武力掩护到游击区附近砍倒大树拉回。桥修成后，不许人民通行，据称：要举行踏桥典礼，强迫当地找出三代不同的三对青年妇女踏桥，踏桥后，并砍掉一对妇女的头算作祭礼。平定阳泉某铸铁大炉开工时，敌寇将11岁男孩与8、9岁女孩作为祭炉牲品，炉中燃着熊熊的烈火，两个孩子全身被绣缎缠起，涂以胶泥掷入炉中活活烧死。平定敌人最近在游击区抢去许多妇女，不分老幼，装进袋中，实行“投彩”。彩票5元一张，诱使伪军汉奸及老

百姓去买彩票，凭号取"彩"，领回去作老婆。井陉亦有类似情形，用苇席将捉到的妇女卷起出卖。有一伪军，以300元买一妻，不意从席筒拉出来的，原来是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遂抱头大哭。

柯棣华与郭庆兰
——战火中结成的异国伉俪

柯棣华，印度援华抗日医生，著名国际主义战士，他有一位中国妻子名叫郭庆兰。

郭庆兰原籍山西汾阳县，现已年逾古稀，离休前曾任大连市儿童保健所所长。

前不久，我们去信大连，恳请郭庆兰老人为家乡党史部门提供一些她个人的简历及回忆材料。时间不长，我们就收到了郭庆兰老人的回信及简历等材料。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内容详细地谈到了她当年与柯棣华结为伉俪的前前后后，其情之真之切，使我们不忍释手，现将有关内容略加整理，编撰成文，奉献给广读者。

1940年6月，抗日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那时，郭庆兰正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护理教员。

一天，在军区为白求恩大夫逝世一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柯棣华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参加了纪念会。这时，柯棣华和巴苏华刚由后方到达边区不久。柯棣华身躯高大结实，两眼炯炯有神，鼻梁微微高耸，皮肤略显黝黑，说话彬彬有礼，举止沉稳庄重，初次见面即给郭庆兰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过了几天，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师生们为欢迎柯棣华、巴苏华到校工作举行大会。会上，柯棣华用他那还不十分熟悉的中国话，讲了他们从大后方来边区的经过，讲了自己对参加中国革命的认识，一字一顿，一直讲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柯棣华加大了声音说："我要说的是——我决不辜负你们的希望，也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象他那样，献身于你们的和我们的，也是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

当时只有24岁的郭庆兰同大家一起热烈地鼓掌，她被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青年火一样炽热和真诚的心感动了。

之后，柯棣华开始在这个学校工作。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柯棣华除了完成学校分配给他的外科教学任务外，还每天坚持去病房查房，随时了解和掌握伤病员的病况；检查和询问护理人员对每个病员的护理工作。一天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尽管如此，他还要利用晚饭时的一点间隙时间，与学校的同志们一道席地而坐，边吃饭边交谈，话题有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有印度孟买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语言是那样幽默风趣，态度又是那样和蔼可亲。很快地，郭庆兰与柯棣华之间因国籍和语言造成的距离感逐渐消失了。

不久，柯棣华担任了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一天，郭庆兰带着护理班的学员到医院实习，只见病房里原有的大炕全部变成了小炕，并在每个病员炕头挂上了一个用白布缝制的药袋子，上面分别写着病员的姓名、年龄、服药时间等。过去的一间大手术室，也被白布帐隔开，分成了3间，手术室的地面也经过铺砌，并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处理。郭庆兰一打听，才知道这都是柯棣华亲自安排搞的。这不禁又使郭庆兰对柯棣华产生了几份由衷的敬佩之情。

郭庆兰过去曾想，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考虑恋爱、结婚。但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柯棣华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使郭庆兰感到是那样的亲切；柯棣华的冷暖，时时刻刻系挂在郭庆兰的心上。一种少女所特有的情感常常在郭庆兰的心中油然而生。

1941年秋天，在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郭庆兰唯恐柯棣华抵挡不住中国北方的阵阵寒风，便把自己精心织就的唯一的一件毛衣送给了他。柯棣华对这位戴眼镜的中国姑娘感激不尽。

一次，反扫荡胜利了，他们随部队返医院驻地。路上，天黑了，部队在路边一个老百姓农忙时节用来临时喂养牲畜的简易棚里宿营。郭庆兰和柯棣华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她)们背靠着背坐在一起，热流传遍了全身，使郭庆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就在这天夜里，与他(她)们在一起工作的李德奇大夫的爱人突然临产了，眼看送医院是来不及了，大家经过商量，决定先找一付担架，将孕妇抬到附近村子的老乡家里去接生。李德奇大夫抢着要去，柯棣华连忙说："你不行，老乡一定听不懂你说的广东话，我说的是北方话，还是我去合适。"就这样，柯棣华摸黑走了三四里路，在一个村子里找来了两个年轻人和一付担架。当大家将孕妇抬到老乡家后，柯棣华连口气也顾不上喘，就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白衬衣脱了下来，撕成几块，然后在火炉上烤烤算是消毒，亲自为孕妇接生。当一个男孩带着洪亮的啼哭声平安降生后，柯棣华风趣地说："噢，又添了一个小八路。"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经过革命战争烽火的考验，更由于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有共同的追求，柯棣华与郭庆兰这对异国青年之间产生了纯真的爱情。在聂荣臻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1941年11月25日，柯棣华与郭庆兰终于结成了伴侣，新房设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一间当地老乡的屋子里。洞房之夜，柯棣华紧紧地将郭庆兰抱在怀里，激动地说："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战，完成印度人民交给的任务，我就不回印度了，要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和中国人民在一起……"郭庆兰听着柯棣华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由地流

下了激动和喜悦的泪水。

1942年8月23日，柯棣华与郭庆兰爱情的结晶——一个男孩问世了。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印华。柯棣华非常爱他们的孩子，但他更爱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对郭庆兰说："咱们俩来个竞赛，看谁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可真是一场革命的竞赛。在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柯棣华不顾潜在的癫痫病的多次发作，救护了成百上千的伤病员，并且主持了400多例外科手术，还亲自编写外科手术讲义。1942年7月7日，在中国人民发起抗日战争5周年的时候，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加上超负荷工作，柯棣华的癫痫发作得更厉害了。但他却一再拒绝党中央要他回印度或去香港治疗的安排，依然顽强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1942年12月8日，他正在编写《外科总论》讲义，当写到第177页，突然他手中的笔在纸上划了长长的一道——病情又一次发作。经过医务人员一夜的紧张抢救，仍没有奏效。就这样，柯棣华不幸于次日凌晨以身殉职。

柯棣华的突然逝世，对结婚刚一年多的郭庆兰是一个晴天霹雳。她抱着不足4个月的幼儿，肝肠寸断，痛哭失声，向柯棣华遗体告别。

1943年初春，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郭庆兰母子在学校管理员王成龙和护理员史翠芝的陪同下，由6名交通员护送，来到延安……

（石东川，《党史文汇》92年3期）

鲜为人知的马石山十勇士

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大家都已熟知。但就在同一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里还出现了另一桩八路军战士舍身救群众的壮举，却鲜为人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日子里，重提这一段历史，把十位无名英雄的感人事迹告诉广大读者，是很有意义的。

1942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11月下旬起，日本侵略军由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部署，对我胶东根据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拉网扫荡"。近二万日军从莱阳、栖霞、福山、海阳、牟平等地一起出动，白天密集平推，无处不搜，"连天上的飞鸟也要打三枪"；夜晚漫山遍野燃起火堆，每条要道、山口都拉起铁蒺藜，挂上铜铃铛，岗哨密布，把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团团围在网内。

被围的人群，大多数是老幼妇孺。他们手无寸铁，在敌人的枪口下，一个个成了釜底游鱼，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只好拖儿带女，互相搀扶着，向暂时还没有枪声的马石山退去。只几天功夫，山头周围已聚集起好几千人。眼望着山下那密布的岗哨，有人绝望地长叹：看来咱们是死路一条了。

就在大家六神无主，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西边忽然传来了轻声喊叫："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随着喊声，十个八路军战士迎面走来。幕色中依稀看得出，他们头上戴着钢盔，身穿黄绿色棉军衣，腿上打着绑腿，肩扛三八大盖枪（有个高个子战士还扛着一挺机关枪），看这样子，人们一下子就能断定：这准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只见一个战士抬腿登上山岩，挥动胳膊高声喊道："乡亲们，别害怕！等天黑了，我们带大家一起突围！"

人群兴奋起来。十个从天而降的战士，使大家心头燃起了生的希望。但是，欣喜中又夹杂着忧虑：靠这十个战士，能把几千乡亲救出去吗？

一位老大娘拉着两个孩子走近来，把他们交到班长手里："领着这么多人突围，会连累你们的。你们自己走吧。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绝不能让他们落到鬼子手里。你们把他俩带走吧。……"

两个孩子哭起来。扛机枪的高个子战士抢上一步说："班长，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只要我有一口气，豁上命也要把他们带出去！"另一个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攥着手里的刺刀向乡亲们表白："开路的任务交给我，坚决把大家都带出去，生死和大家在一起！"

这扛机枪的高个子名叫赵亭茂，和班长王殿元一样都是老兵了。早在1940年春天他就参加过由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并在那次战斗后当上了机枪手，后来又参加了打击大汉奸赵保原的五个月反投降作战，立了功，与王殿元双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小战士名叫王文礼，虚岁刚十九，却已有了四年兵龄。他三岁时饿死了娘，随爹讨饭度日。1937年冬家乡举起抗日红旗，父子俩一起参了军，后来成立十三团，父子俩又一起编到七连。儿子在六班当战士，父亲在连里当司务长。小文礼进步很快，刚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八路军战士了。

夜幕笼罩了马石山。山下燃起一处处火堆，寒风不时送来一阵阵烟味和枪声。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日军明天就要"收网"了，一场大屠杀在所难免。今晚无论如何要带着群众突围出去！王殿元和战士们研究好了突围方案后，便按计划分头行动。他自己去前面探路，赵亭茂、王文礼等则分头把群众带到一条小山沟里，作突围前的准备。

午夜时分，四周的火堆还在燃烧，枪声却已沉寂下来。折腾了一天的日伪军又困又乏。突围的时机到了！十名战士已把大约一两千乡亲集中到西北面一条山沟里。王殿元让赵亭茂照看好那两个孩子，他自己率领李贵等三名战士分别登上沟两侧的山脊，向不远处山包上的两个火堆摸去。乡亲们分成两队，一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面顺着沟两侧向前移动。

快到沟口了，只见火堆旁几个黑影一闪，只几秒钟工

夫，看火堆的哨兵已被班长他们干掉，两堆火也先后被扑灭。正在移动的人群，轻轻发出一声欢呼，然后就像开了闸的渠水，一下子涌出沟口，刹那间便消失在黑暗中。

敌人一时没有发现这个口子，一批又一批乡亲顺利地从这里突出了包围圈。他们互相搀扶着，拼命地向前飞奔，飞奔……

然而，十名战士却在沟边止住了脚步。赵亭茂闪在路边，把两个孩子又交回给照料过他们的老大娘。班长搂住孩子亲了亲，急促地说了句："快跟奶奶跑吧！"便又带领9名战友回头向马石山奔去。

途中，他们迎面遇上黑压压一群人，一问，是海阳县八区的，约有一百多人，带队的是一个姓赵的村农救会长。王殿元向赵会长详细询问了山上群众分布的情况，然后把9名战士分成三个组，两个组继续收罗散在各处的乡亲，组织他们尽快到"突破口"处突围，他自己则率领两名战士，引导海阳八区这一批人再找一条近路突出去。

黑暗中辨不清方向，王殿元只觉得顺着一条小山沟走出没多远，便又来到一个沟口。这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前面不远处火堆越烧越小，正是敌人哨兵戒备最懈怠的时候，王殿元叫大家先等一会儿，他带着战士去开路。很快"路"打通了，又一批群众在王班长和赵会长的组织下，像脱网的鱼儿悄悄游出沟底，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但是王殿元和战友又一次止住了脚步。"

赵会长诧异地问："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还不快走？"

王殿元回答："被围在里面的人还很多，不救出他们，我们的任务就不算完成！"

"可是，天快亮了，要是鬼子一发现……"

王殿元没有答话，只坚定地说了声"走！"便又带着战士顺来路走回去。

东方刚刚发白，最让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敌人的流动哨发现了第一个"突破口"，立刻鸣枪示警，不一会儿，一伙日本兵吼叫着向这边扑过来。陆续突围的群众乱了营，惊叫着，哭喊着往回涌。

枪声成了一种特殊的命令。正在几个地方收拢群众的十个战士迅速赶到响枪地点。王殿元那结实精干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慌乱的人群中。他命令大老赵用机枪吸引敌人火力，自己率领李贵、王文礼等几名战士转身跑下小土埠，直冲着沟口的敌人扑过来。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就在小土埠下展开。由于距离太近而且能见度很差，双方都没有射击。只见一团团黑色的人影搅在一起，不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和兵器撞击的声音。小土埠上和沟里的乡亲们都惊呆了，一时竟忘记了逃生。大老赵急了，大喊一声："乡亲们，还不快跑！"惊慌的人群这才向沟外拼命奔跑。

过了一会儿，王殿元带着战士回来了。日本兵已经被他们杀退，我方也牺牲了一名战士，王殿元、王文礼等好几个人都挂了花。乡亲们撕下衣襟要给战士们包扎，王殿元说："不能再耽误了，趁天没大亮，赶快跑！"

还没等王殿元和战友们歇口气，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从树后面跑过来，哭着对赵亭茂说："同志啊！俺全家都没出来，西南面那条沟里还有不少人哩！"王殿元一听怔住了。他问明情况，抬头看了看越来越亮的天空，果断对小女孩说："不要哭，小妹妹，我们一定想法把你全家救出来！"说着，他带领战士们一溜小跑朝着小女孩手指的方向走去。

等王殿元和八名战友找到马石山西南侧山沟里的那批老乡时，天已经大亮了。山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日伪军，四处不时响起零星的枪炮声。乡亲们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八路军战士，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一个矮墩墩的战士喊道："乡亲们，不能在这儿等死，快跟我们冲出去！"从绝望中省悟过来的群众，此刻也都抱定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紧紧跟在战士们后面向沟口外面走。

走出山沟，绕过一个小山包，人群突然和一小队全副武装的敌军遭遇。王殿元大喊一声："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9名战士举起亮闪闪的刺刀，像猛虎一样扑入敌群。敌人一时被这突然情况惊呆了，当他们手忙脚乱地对付这九个从天而降的八路军时，后面的老乡们乘机冲出了重围。

马石山周围枪声越来越密，敌人倾巢出动，开始合围"收网"。几架飞机绕着主峰一带低空盘旋。王殿元和战友们在最后一次掩护群众突围时，又有3人牺牲。为了吸引敌人，剩下的6个人且战且退，登上了马石山主峰峰顶。

整整一个上午，他们依托一道石墙和几处天然岩石顽强地坚守着，先后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进攻。最后，王殿元和五位战士全部殉难。山顶上的石墙内外、平顶松旁，静卧着他们的遗体。在牺牲前，他们与四面攻山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石块成了他们最后投向敌人的武器。地上到处散落着枪枝零件和被砸坏的枪托、枪管。班长王殿元和机枪手赵亭茂及战士李贵是在敌人冲上来的最后关头，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被围困的数千群众大都遇救了，而偶然路过这里的十位八路军战士却长眠在了马石山上。他们甚至没能给人们留下一份完整的名单。当地群众给他们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十勇士。

（王济生，《人物》95年5期）

鸡蛋坨也有五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由于各种媒介的广泛传播，几乎尽人

皆知，而在距狼牙山200余里的涞水县鸡蛋蛇，也曾有过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五壮士，至今却鲜为人知。

1942年12月27日深夜，驻在曹坝岗的我晋察冀军区十一分区七团团部，接到内线紧急情报：日寇从宛平、怀来、房山等县据点，纠集三千多鬼子兵和伪军，由大队长小松率领，向我平西根据地进犯。敌人从宛平县杜家庄出发，沿庄里、罗古台正向曹坝岗逼进。敌人的企图是想一口吃掉我七团，进而窜越东大岭，打开通往福山口的大门，消灭驻在福山口的我军分区司令部、平西地委、专署和县委机关。我七团团长陈坊仁、政委李水清和参谋长吕展，立即研究部署战斗，决定由二连先守住曹坝岗西北面的制高点——鸡蛋坨，掩护团部撤退到南面的佛洞塔山口，以守住东大岭通往福山口的大门，并通知附近群众立即坚壁转移。

驻在紫石村的二连全体指战员，奉命集合到曹坝岗，接受战斗任务。连长张玉魁、指导员李文举和副指导员王恩眷，带领全连战士立即趁黑夜奔向鸡蛋坨。当二连赶到山脚下时，他们隐约发现敌人也在河滩里正朝鸡蛋坨方向蠕动，连长立即命令机枪手枪先开火。顷刻间，敌人倒下一大片。少时，敌人又从北面斜坡向鸡蛋坨爬来。这时，我部战士趁敌人退缩之机，抢先登上了鸡蛋素山顶，占据了制高点。按原部署，一排长勾成来带领部队占据左侧一号山头；三排由一排副排长李连山带领，占据右面三号山头；连部居中在二号山头指挥，二排跟着连部行动，作为预备队。

天将拂晓，一排就发现鬼子和伪军已爬到半山腰，他们立即开火射击，将敌人打下山去，并抢修工事，准备打退敌人的再次冲锋。逃下山去的敌人发现山上我军的阵地部署，就用八二迫击炮向山顶猛轰，霎时，鸡蛋坨上土石飞扬，硝烟弥漫，我军战士有的光荣牺牲了。迫击炮一停，鬼子发起了冲锋。连长当即命令炮手用上次战斗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八二迫击炮向敌群开炮，可惜，仅有的三发炮弹只有一发爆炸了。这时敌人已接近我阵地，一排的战士从左侧向敌人投出一排手榴弹，守卫在右面三号山头的三排战士也同时向敌人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敌人又一次向山下退去。就这样，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山坡上、沟坎边到处都躺满了敌人的尸体。

中午时分，连部接到团里的命令："边打边撤"，连长、指导员和副指导员研究决定，留下李连山带八班战士和一挺轻机枪，共18个人，坚守鸡蛋坨阵地，完成掩护任务后再乘机撤出战斗归队。

李连山是新从八班长提升为一排副排长的，他和八班战士感情深厚，相互了解。他坚定而又愉快地接受了连部的命令，随即带领战士检查弹药，抢修工事，准备同敌人展开一场更加激烈的生死搏斗。

中午过后，敌人又开始疯狂地向山上冲锋，鬼子队长利用督战队端着刺刀，强逼鬼子兵蜂拥而上，前面的被打倒，后面的又冲上来。李连山沉着指挥八班战士，用一排排手榴弹向敌人砸去，枪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打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地又一次退下山去。此时，我方部队正通过东大岭向蓬头方向转移。李连山和战士们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后面佛洞塔山梁向我方阵地迂回包抄过来，前面是一个穿皮袄的汉奸带路。我机枪手又是一阵扫射，将敌人打了下去。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机枪子弹打完了。这时要撤还来得及，李连山见一部份群众还没转移完，如果这时撤下去，敌人就会尾追我部，从而使阻击战前功尽弃。于是，他果断决定：死守阵地，让部队和群众争取更多的时间转移，誓死完成阻击任务。他命令机枪手刘班长带机枪归队，向连首长报告阵地的情况和死守的决心。

机枪一停，敌人又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抢占了后面的佛洞塔山头，形成对孤守在鸡蛋坨上的八班战士的夹击。这时，八班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用完了，退路已被切断。战士们在副排长李连山的沉着指挥下，拆掉工事，用石头向敌人砸去。在敌人的枪弹声中，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最后，阵地上仅剩下李连山等五个人了，最小的王文兴刚刚18岁。在敌众我寡、弹药用完的情况下，敌人终于冲上了鸡蛋坨，我五位勇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越来越多，李连山边和敌人搏斗，边鼓励战士们和敌人拼，誓死不当俘虏，不行了就跳崖。但李连山还未及跳崖就中弹牺牲了。其余四名战士刘荣奎、宋聚奎、邢贵满、王文兴，遵从副排长的遗志，分别和敌人撕打、扭抱着跳下或滚下了70多米高的绝壁，全部壮烈牺牲。这一空前惨烈的场面，是在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掩埋烈士遗体时才发现的。

1943年1月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副司令员萧克发出通令，嘉奖五位烈士："副排长李连山及战士四人，宁死不当俘虏，英勇顽强，精神可佩，特通令嘉奖。"（见《晋察冀日报》1943年6月7日）

如今的鸡蛋坨在涞水县野山坡风景旅游区内，北京每天还有开往野山坡的专列，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这一史实。在绵延的太行山脉，又多了一处对当代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文治虎，《炎黄春秋》95年8期）

周佛海一桩秘而不宣的丑闻

1942年4月11日下午，在沦陷的上海十三层楼（今锦江饭店）内，发生了一桩桃色丑闻，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汪伪政府的大汉奸周佛海！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引人注目的花边新闻。然而涉及

到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汉奸大头目，谁家报纸敢登?哪个记者敢写？于是这条丑闻便被他封锁了。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星移斗转，一些当时在报界的学长，以及知道这件事的老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吐露了这"局中戏"，发生在50多年前的这桩丑闻，终于慢慢地又显露出来……

先从小玲红说起

小玲红是上海黄金大戏院唱青衣花旦的京剧演员，本名吴棣芳。她人长得漂亮，扮相美，但唱、做都不到功夫，所以只能唱唱开场戏。

1936年马连良率"扶风社"班子来上海演出，轰动一时。有一天，马先生约了几个朋友去黄金大戏院"观摩"，正赶上小玲红的戏，看了她的扮相和舞台上活泼可爱的形象，说了句："是块'好料子'。"

马连良的这句话七转八弯传到了小玲红的耳朵里，喜得她眉开眼笑。她托人情进见了马连良，还磕了三个头，口口声声尊称："师父。"自打这以后，小玲红遇见朋友或小姐妹，自报家门第一句便是："我的业师马连良先生。"至于她究竟是不是马先生的徒弟，姑且不去理论，不过小玲红在马先生居沪期间，确是受过不少指点教益，在艺技术也有所长进。马连良在上海演出合同期满后，即将率"扶风社"返回北平，小玲红闻讯，在马先生面前哭哭啼啼，表示愿随"扶风社"一同去平。但马夫人陈慧琏女士坚决反对，此事便告吹了。

小玲红去北平的心愿虽然未能实现，但由于她打着"马连良徒弟"的招牌，加上她在舞台上的花腔花调，打飞眼、玩噱头，也赢得了不少彩声。

小玲红的名字在上海滩上"飞"起来了。

幽会在吴四宝家中

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身兼数职，因为兼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所以时常住在上海。

周佛海是个好色之徒。早几年，他曾瞒着自己的老婆杨淑慧，暗地里与南京舞女陈曼秋鬼混。到上海以后，他一眼又看中了风流坤伶小玲红。但是如何才能弄到手呢?

有道是：屠夫须帮手，骗子有屏风。这个帮手就是上海滩上杀人不眨眼的大流氓吴四宝，那时他正担任76号特工总部的警卫总队长，常护卫周佛海去看小玲红的戏。周的一脸色相焉能逃脱这个流氓的眼睛。

吴四宝回到家中就把周佛海迷上了小玲红的事说给老婆佘爱珍听。这佘爱珍也是个出了名的女流氓，就帮衬着男人去干那献媚取宠的买卖。先是佘用甜言蜜语搭牢了小玲红，认了小姐妹；接着，吴四宝便有意在周佛海面前放出空气，说小玲红是自己老婆的小姐妹，常来常往，十分亲密。

这时周佛海也顾及不了自己是"政府大员"的身份了，在吴四宝面前吐露出自己爱慕小玲红的一片痴心，弦外之音就是要四宝出面"拉纤"。

吴四宝回去与家主婆佘爱珍一合计，想出一条妙计，终于把周佛海和小玲红引到家中来，安然度过一次幽会。

这件事，周佛海记在自己的日记里，不过隐去了情意缠绵的细节。他写道："1941年5月4日，星期日。……晚赴吴云甫家，约前两晚演戏之小玲红便饭，幽娴静淑，不似在台上之活泼妖憨也。"

从此以后，周佛海与小玲红来往频繁，打得火热，起初在吴四宝家中，后来在李士群家或福履理路卢英的"楚园"，密约幽会，欢度良宵。

艳情暴露之后

周佛海与小玲红的风流韵事隐隐约约地传进了杨淑慧的耳中。

杨淑慧注意了周佛海的行动，果然证实了外界关于周佛海与小玲红关系的传言。这如何叫她忍下这口气?便去质问周佛海。周先是一惊，随即嘻嘻哈哈地遮掩过去。

当然这事遮掩不过去，杨淑慧只要一见了周佛海的面，就喋喋不休，追查没完，弄得周佛海彻夜不眠，头疼脑胀。后来周佛海承认了这件事，答应不再往来，但杨淑慧一定要他写字立据，否则决不轻饶。

为了平息事态，周佛海请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出面调解。恰好第二天是陈的夫人李丽庄的生日，于是陈公博便借此机会与岑德广一起，驱车愚园路周佛海家，以邀请周氏夫妇去吃寿面为由，顺便批评了周的不是，并要周佛海当着他们的面公开认错。杨淑慧有了面子，见乖就收，吵闹的事也就平息下来了。

可是没过多久，周佛海又去幽会小玲红，直气得杨淑慧大骂山门。这一次周佛海也动了肝火，大发雷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杨淑慧一气之下走出家门，不告而别。

再过几天杨淑慧的子女就要从日本回来了，周佛海不愿意子女们知道家中的纠纷，就赶忙派人四处探听，直到深更半夜，才得到报告，说是夫人在老太太处。周佛海乘车去岳母家，好言相劝，这才把杨淑慧又接回愚园路家中。

第二天，周佛海乘飞机去了南京。似乎此去也是向杨淑慧表明心迹：他将与小玲红断绝关系。当时周佛海还写下了一首诗：

相见无端别亦奇，
申江风月总迷离；
从今洗刷历年错，

誓志专心理国机。

设圈套小玲红受辱

杨淑慧吵闹了几个月，静下来之后，感到这样吵下去也无味了，而且对周佛海的声誉也不好，周要是坍了台，与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把一腔怒火集中到小玲红身上，一定要想法子出出她的丑！

自从艳情暴露后，小玲红听说杨淑慧缠着周佛海大吵大闹，自己终日也是胆颤心惊，再也不敢抛头露面。待到第二年开春，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了，耐不住寂寞，又去咖啡馆、书场、舞厅走动。这一来便给她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

某晚，小玲红跟着几个小姐妹跑到西藏路的“米高梅”舞厅去白相。刚坐定，只见迎面走过来一个仪态俊俏的男青年，同行的姐妹阿芳向小玲红介绍这就是小白云。小白云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电影奶油小生演员。此人轻浮下流，专门在女人圈子里下功夫，后来卷入拆白党之流。这时，他已被杨淑慧用40万元（伪中储币）买通，要他勾引小玲红。

小玲红一听这就是小白云，不知为何竟“哎呀”一声，那脸庞上顿时现出了一片红晕。

一曲终了，阿芳拉着小白云走过来，然后把他向众姐妹逐个介绍了一番。小白云微笑着说：“小玲红的芳名早就听说过，不过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容，今日有幸相逢，果然是一位天仙。幸会，幸会！”

乐曲声响起，小白云立起，十分有礼貌地请小玲红跳舞。

小玲红嫣然一笑，落落大方地随着小白云下池了。

打这次结识以后，小白云对小玲红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勾引，甚至骗说要娶她为妻，发誓许愿，白头到老。小玲红自从失身于周佛海，虽万般悔恨，但也无可奈何。好在如今周不再来纠缠了，可是又感到自己孤苦零仃，飘泊无定，年纪也不小了，该物色一个好人物，相伴终身。就在这个时候，小白云突然出现在她的身旁，不知道为什么，她一见了面，就打心眼里喜欢上了。

没过多久，小玲红就被小白云得上了手，二人开始同居。

大约是在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小白云约小玲红在锦江饭店幽会。待小玲红入浴之时，小白云轻拨电话，密告杨淑慧。杨迅即带了一名老妈子乘车赶到锦江饭店，按照小白云密告的房间号码，破门而入，命老妈子从床上拖下小玲红。

小玲红羞愧哀求，穿上毛巾睡衣，颤抖不已。这时小白云早已一溜烟跑了。

杨淑慧大骂小玲红“不要面孔！”“臭婊子！”骂不过瘾，走上去劈脸打了小玲红两个耳光，并命老妈子用痰筒里的脏水浇她。

饭店管事和茶房上前劝解，请周太太息怒，同时暗示小玲红快快跑开。

小玲红双手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走了。

第二天，周佛海知道了这个情况，他又气又恼。他这一天（1942年4月12日）的日记只写了八个字：“心乱意烦，不欲作人。”

第二天一清早，周佛海驱车去机场，欲飞南京，但大雨滂沱，不能飞行。他在候机室沉思良久，实在不愿在上海再停留片刻，立即决定改乘火车去南京。

回到南京，周佛海独自散步在西流湾家中的花园内，看着盛开的樱花，不禁涌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自言自语地：“害人害己，夫复何言？”

过了两天，孙曜东从上海赶到南京周公馆，向周报告说，小玲红受辱后，决定向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建议周赶紧妥为处理。

孙曜东字镇芳，原是上海中国实业银行的职员，上海沦陷后，投靠周佛海，任伪财政部驻沪专员兼上海复兴银行总经理，是周的心腹、控制上海金融界的联络员。他的建议当然很重要，但周却未置可否。

悄悄离沪无踪影

这一次周佛海在南京住了很长时间，就小玲红的事与杨淑慧“谈判”，他答应今后誓与小玲红断绝往来，但提出一点要求：要杨氏当面向她道歉。起初，杨淑慧说死也不愿意，经不住再三商谈、恳求，加上有陈公博、岑德广等人从旁相劝，也就答应了下来。这样，5月中旬周偕杨一同赴沪。

当然，小玲红那边也要做工作。周佛海要孙曜东向小玲红传话：锦江饭店受辱一事，夫人杨淑慧不是，愿意向她当面道歉，并赔偿一笔损失费（这一点杨淑慧不知道）。

孙曜东向小玲红传过话后，见她象木头人似地毫无反映，就说：“这个面子也够大的了，别再胡思乱想了。你能斗过人家吗？你起诉，哪家法院敢受理？凭良心说，周先生对你一直都是爱护的，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呀！算了，就认命吧！”

小玲红“哇”的一声哭了。

这一年初秋的一天，周佛海派车把小玲红接到愚园路公馆。小客厅里杨淑慧当面向她表示歉意：“姐姐脾气坏，一时失去理智，叫妹妹受委屈了。”说着抽泣起来，掏出手绢擦眼泪。

小玲红浑身颤抖不已，苍白的脸颊上滚动着泪珠……

周佛海在一边打着哈哈：“好了，好了，都别伤心了，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就拜个姐妹吧！哈哈哈哈……”

过了两天，杨淑慧约小玲红来玩，并拉着她一同去母亲家，拜老太太为干妈。

但是小玲红受的刺激太深，她实在不愿意再在上海滩生活下去了，她悄悄地走了。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之，不知所终。

（夏侯叙五）

“花边新闻”闯大祸

1942年12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召集该部社论委员会开会，讨论次年元旦《中美新约》（全称《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中英新约》（全称《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公布后报纸的宣传工作。陶希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参加社论委员会，也应邀到会。委员们讨论一番之后，拟订了宣传工作大纲。散会前，陶希圣以侍从室要员的身份对委员们叮嘱再三：“元旦之前，这消息还是要保持秘密。”“为什么要保持秘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可发表新闻，请注意。”

哪知隔了一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即刊出了一条“花边新闻”，把“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将于明年元旦在重庆、华府（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公布”的消息发表了。张道藩和陶希圣清晨看到报纸，都为之大惊。

原来中美、中英代表谈判并签订新约时，相约次年1月1日在三国首都同时公布，此前应严守秘密。国民党《中央日报》抢先在战时首都重庆发表这条新闻，违反了三国代表的约定。由于《中央日报》的泄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的公布日期不得不从预定的1943年1月1日延至1月11日。不用说，这是一件有损于国民党政府颜面的事情。《中央日报》社因为这一泄密事件，而被下令改组。采访“取消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的《中央日报》社记者卜少夫，几乎下狱。

（程　骏）

汤恩伯表演“铡美案”

1942年，皖北临泉鲁苏豫皖边区总部办公厅人事科长胡协，正在朱寿同家打牌，他的勤务兵寻来，说汤司令找他。胡协马上丢下牌去见汤，想不到汤恩伯没问一句话就叫卫士把他带到军法处关起来，还戴上镣铐。原来，胡协的妻子在河南镇平一个小学教书，和同校的一个男教师相好，胡协察知后，坚决要和他离婚，而他妻子不同意。后来，他妻子写信给汤司令，告胡协遗弃发妻。汤由河南叶县三十一军总部来临泉总部途经漯河停留的那天晚上，看了一本《铡美案》，也许是受到剧情的感染吧，到临泉后一看胡协妻子的信，就不问青红皂白把胡协关了起来。参谋长李铣将胡协夫妻感情破裂原因向他说明后，汤恩伯自知处理不妥，但事情并不就此完结，在枪毙周口专区八县联防司令张某那天，竟把胡协一道绑到刑场，在对张某执行枪决后，才把胡协释放。

（唐志摘自《联合时报》）

孔家兄妹弄文凭

孔祥熙有四个儿女。两个儿子在国外留过学，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沪江大学读过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当时国人在谈论孔氏家族豪富的同时，也论及到其文化知识的“富有”。殊不知，孔家兄妹中起码有两人，毕业文凭来的并不是那么正道。

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大儿子。1939年秋，他在任香港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期间，因私设电台被香港警方查出。案子报到蒋介石处，重庆方面要孔令侃亲自去说清楚。孔令侃怕受蒋介石的训斥，就托辞去了美国。孔令侃这次去美国，什么公开任务也没有，对外宣称是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还专门登报作了说明。其实他到美国后，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做生意上。他把孔家在美国的一部分资金产业集中起来，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雇用了许多美国律师替他经营投资。在此期间，孔令侃利用国民党在美的影响，勾结美国的一些大厂商合伙做军火贸易，大发战争横财。同时，为了弄到一张哈佛大学经济硕士的文凭，孔令侃将香港中央信托局的一个名叫吴方智的年轻职员调到美国，让其以孔令侃的名字在哈佛大学注册缴费，入校学习。孔令侃仍继续做他的军火买卖。对于这种既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获得丰厚的资助，今后还可得到提升的美差，吴方智是求之不得的，因此，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上课用心听讲，认真记笔记，下课跑书店、跑图书馆，撰写论文，参加考试，极为勤奋，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任务，为孔令侃拿到了一张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毕业文凭。

回国以后，孔令侃在人前人后俨然以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身份自居。吴方智由于为孔令侃出了大力，升任为上海中央信托局物资处副经理。以后一些知道内情的人私下称孔令侃为“假硕士”，称吴方智为“地下硕士”。

孔二小姐即孔祥熙的小女孔令俊，是孔家兄弟中最小也是最骄横的一个，平时仗着父母对她的宠护，为所欲为。她见两个哥哥都有外国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姐姐也是上海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就在母亲面前撒娇，要求进学

校读书，拿张大学毕业文凭。宋蔼龄让她吵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她的要求。不过她心里明白，象小女这样的性情，让她在学校里静下心来读书是难以做到的，但拿张大学毕业文凭，却并非难事。1942年初，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名叫武道的美国教授来重庆讲学，宋蔼龄派人把他接到家中设宴款待。宴后，宋提出要武道为小女弄张圣约翰大学毕业文凭之事，这个美国教授一口答应，并独出心裁想出了个万全之计。她要宋蔼龄就近在重庆找几个教师，聘请他们为圣约翰大学教授，在重庆专门教她的女儿，课程不减，学制可缩短些，读满一定的学分就算毕业。宋蔼龄按照武道的建议，在孔祥熙的部下中挑选了几个有博士衔的留学生，为她女儿上课，其中还有武道。每次讲课，说是一小时，其实讲了10几分钟，孔二小组就听不进去了，找茬跟老师发脾气。怎么办呢？老师就陪着她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二小姐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文凭就到手了。

（孙　文）

流行风

电影《塞上风云》

《塞上风云》——剧本写于“八·一三”战争期间，但未能拍成电影，到武汉后，作者将它改成舞台剧，在汉口演出时颇为轰动。到重庆后，应电影界同志要求，作者又将话剧改编成电影，由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黎莉莉、陈天国、周峰、舒绣文等主演。1940年1月开拍，1941年完成。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直到1942年2月才得放映。

《塞上风云》是抗战时期第一部描写塞外生活、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影片。1940年1月，由导演应云卫率领摄制组30余人去塞北拍摄外景。离重庆时，郭沫若赠诗二首送别，以“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之句勉励。摄制组途经延安时受到延安文艺界热烈欢迎，并得到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他们在剧本所描写的伊克昭盟地区生活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于同年10月19日返回重庆。在欢迎摄制组凯旋归来的大会上，三厅厅长郭沫若又赋诗称赞他们“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

《塞上风云》的故事曲折动人。它描写蒙族青年迪鲁瓦（周峰饰）爱上蒙族少女金花（黎莉莉饰），由于他的粗暴使金花倾心于汉族青年丁世雄（陈天国饰），于是引起嫉妒。潜伏在蒙古地区的日本特务长（周伯勋饰），在“七·七”事变后开始活动，将机关设在公爷府内，他假扮喇嘛济克扬，到处造谣生事。他利用迪鲁瓦的不满挑拨蒙汉两族关系，制造纠纷。但特务长的阴谋被金花的哥哥郎桑（王珏饰）发觉。于是郎桑被特务长派爪牙绑架，关进保安队。而郎桑被绑架一事又为服役于公爷府中迪鲁瓦的妹妹罗尔吉娜（舒锈文饰）得知。她一方面将情报传递出来，一方面又争取保安队反正。迪鲁瓦明白了真相，同丁世雄言归于好。最后，蒙汉两族人民团结战斗，先救出郎桑，后攻打公爷府，里应外合，击毙了日本特务长，在与敌人搏斗中，金花负伤而死。

电影《博爱》

《博爱》（张善琨、徐欣夫导演），则是有着明显政治倾向的反动影片；影片由一个深谙修身处世之道、荣获“博爱”字匾的老翁作贯串线，通过来访的11名客人各叙自己一个故事，宣扬了“人类之爱”、“同情之爱”、“儿童之爱”、“父母之爱”、“兄弟之爱”、“乡里之爱”、“互助之爱”、“朋友之爱”、“夫妻之爱”、“团体之爱”、“天伦之爱”，构成了一部“爱”的集锦。在反对侵略的抗日战争时代，拍摄宣扬资产阶级“博爱”理想的影片，实际上是附合或支持了“日支提携”、“中日亲善”的反动思想。

电影《万世流芳》

《万世流芳》（张善琨为制作总指挥，卜万苍、朱石麟、马徐维邦导演）。影片表现林则徐焚烧鸦片，引起中英鸦片战争，强调广东民众组织“平英团”、反抗英军侵略的斗争。“满映”演员李香兰扮演剧中卖糖唱歌的姑娘。影片利用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打着所谓“清算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的幌子，歪曲林则徐的形象和鸦片战争的历史，企图达到反英、美的目的。然而却唤起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

小说《伙伴们》

作者于逢、巩易，主要内容：

以抗战初期珠江三角洲涌尾村为背景，描写土匪雷公汉与伙伴们传奇式的生活经历。雷公汉因不堪地主虐待，与公鸡满等人劫富济贫，被当地百姓称为“大贼”。后由于叛徒出卖，他们被反动军警袭击，雷公汉从此心灰意懒。日寇入侵广州，他目睹敌人酷虐暴行，遂与伙伴们组织“八乡人民抗日游击队”，出入敌占区，袭击伪军，处决汉奸，截住奸商粮船，分施各地难民，从此威名大震。后在一次夜袭金沙墟的战斗中，雷公汉壮烈牺牲，八乡人民为他树碑纪念，他的伙伴们又组织起抗日武装队伍活跃于八乡四周。作品通过雷公汉从土匪成长为抗日英雄的一生，反映农民的觉醒和农村抗日力量的壮大。故事曲折生动，但写雷公汉的成长仅停留在自发斗争阶段，情节叙述有些地方过于冗长。

小说《山洪》

作者吴组缃，主要内容：

以抗战初期皖南山村鸭嘴涝为背景，描写青年农民章三官投入抗战的曲折故事。章三官质朴、粗犷、倔强，他不满于称王称霸的保长借抽壮丁营私舞弊、欺诈百姓，但又害怕被抽壮丁。日寇逼近家乡时，村里开展各项战备工作，他在皖南游击队政委的开导下，认识到爱国就是爱家，便与秦官等人参加了皖南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投入到神圣的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作品通过章三官的转变过程的细致描绘，表现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和奋起，揭露了国民党政权趁国难之际搜刮民财的罪行和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的丑态。作品前半部写皖南民风习俗和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细致逼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后半部写皖南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显得贫乏无力。

小说《边陲线上》

作者骆宾基，主要内容：

以“九·一八”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写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故事。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强是个纯洁的热血青年，在抗日洪流的冲击下他无法苟安，冲破家庭的阻拦投奔抗日救国军。在部队里，目睹上层军官腐败堕落，广大士兵饥寒交迫，内心十分苦闷。而当年的老同学，大都失去抗日热情，心萌退志，并劝他回乡奔丧，再设法去日本留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强终于留下来坚持抵抗日军，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中使这支濒于瓦解的抗日武装队伍有了转机。最后他跟着队伍与朝鲜红党会合。作品揭示了严重的威胁来自抗日营垒内部的危机，并通过刘强的经历昭示人们应勇于进击，战胜内外恶势力，走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写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环境气氛真切细腻，惟形象不够清晰，题材缺乏提炼，是作者早期的代表作。

诗《朱德歌》

在那些年头，
哭声哽住口；
在那些年头，
铁链锁住手；
在那些年头，
灾难压低了头。
忽然，大星星亮啦，
把我们的哭声止住。

在那些年头，
孩子没有奶；
在那些年头，
灯里没有油；
在那些年头，
锅里没有粥。
忽然，他伸出手来，
他的声音把我们招呼。

我们起来跟他走，
放下忧来抛下愁。
大星星照在前面，
我们抬起低下的头。
千年的土地要翻身，
万里的长途要到头。
他啊，朱德同志，
他是我们战斗的领袖。

我们起来跟他走，
勇敢前进不停留。
人民的希望担在肩，
战斗的武器拿在手。
井冈山上举红旗，
北上抗日成铁流！
前进，同志们，
跟随我们战斗的领袖。

我们起来跟他走，
刺刀开辟我们的路。

跨过风雪千万里，
跨过黑夜穿浓雾，
跨过不开花的荒凉道
跨过战友们的尸首。
前进，同志们，
伟大的胜利在前边等候！

（贺敬之）

歌曲《秋收》

割啊，割啊，大家努力地割啊，
不分你与我，人民要合作。
大家努力地割啊，稻子堆成了山，
今年好收获；
收获好，粮食丰，抗战胜利快得多。
大家努力打吔懂，不怕太阳晒得痛，
只怕大家肚皮空。
人多手快又分工，稻子一会儿满了桶。
一桶一桶送前线，弟兄饱了好冲锋。
背的背啊，挑的挑啊，把稻子送到那山腰，
嘿呃，嘿呃，
这儿不留一根草，这儿不落一粒稻，
鬼子，你来吧！
把你们饿死在荒郊！

历史档案

鲁迅艺术学院

“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建的一所培养抗战需要的艺术干部及新时代艺术人才的艺术院校。

1938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建议设立一所专门培养艺术干部的学校，为了纪念中国革命文化的先驱者鲁迅，即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

党中央派遣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负责筹备。这时，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以及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等，陆续来到延安，逐渐聚集了一批有一定造诣的艺术人才。这样，经过近十个月的筹备，1938年10月1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北门外的窑洞里诞生了。

沙可夫为院长，许一新任政治处主任。“鲁艺”分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系，分别由陈岛、何士德、莫璞、刘保罗任系主任。

由于“鲁艺”是一所艺术院校，因此，创作实践的活动就成为学习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鲁艺”的发展和创作实践从它成立到抗战胜利，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8年10月——1939年底。

这一时期的学生多来自内地的演剧队的青年队员。这些学生文化水准比较高，同时又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因而，“鲁艺”一成立，音乐、美术、戏剧、文学四系的教员和学生深入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创作出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音乐系油印出版了七、八种音乐作品，有民歌小调、救亡歌曲，有自己创作的抗战合唱，也有对外国革命歌曲的介绍。其中，歌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至今还有很大影响的《生产运动大合唱》也产生于这个时期。

美术系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举办了多次美术作品展览会，出版了木刻壁报及纪念鲁迅的木刻集。

戏剧系的活动更是有声有色。他们创作了《大丹河》、《流寇队长》、《团圆》及《弟兄们拉起手来》、《人命贩子》、《矿山》、《一心堂》等多幕剧和独幕剧，并组织部分同学去延安各机关、学校演出。由于这些剧目反映现实，服务于抗战，故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更好地满足延安群众精神文化上的需要，“鲁艺”抽调了部分第一届毕业生，并吸收了一些当时各机关、学校业务水平较好的业余演员，组织了“实验剧团”。由王震之任团长，接连不断地排演新剧。

文学系的同学也在当时延安和解放区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作品。

在这期间“鲁艺”除教学、演出外，还两次组织教职员下乡工作，从群众的生活中吸取创作的养料，把他们的作品拿到群众中去检验。

1938年上半年，由于晋察冀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党中央决定从延安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抽调部分教员、学生到晋察冀去办学校，沙可夫带领了“鲁艺”半数的干部在那里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

沙可夫走后，周扬接任院长。“鲁艺”由北门外搬到了

桥儿沟，以一座天主教堂及几十间石窑洞和瓦房为基础，另外又扩建了一些土窑，这里便成了抗战时期"鲁艺"长治久安之处了。

第二时期：1939 年底——1941 年底。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阻断延安与内地的联系，投奔"鲁艺"的青年学生不象前一时期那么踊跃了。加上这一时期形势的险恶，"鲁艺"深入农村、部队活动减少了，自己的创作也少了。这时出现了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上演了一些外国名剧。

第三时期：1942 年——1945 年 9 月。

1942 年 2 月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它对"鲁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亲自去"鲁艺"，提出"小鲁艺"要到"大鲁艺"中去，先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养料。

毛泽东讲话后，"鲁艺"发动全体师生，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长处，创作出了一整套包括花鼓、秧歌等各种形式的节目。由于这套节目用的是当时群众喜闻见的表现手法，内容又与实际结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秧歌剧最受欢迎。"鲁艺"的秧歌队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1944 年春，以王大化编剧、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为标志，"鲁艺"改革了过去流传于陕甘宁的老秧歌剧，集"鲁艺"音乐、美术、戏剧、文学各路英杰，创作出了新时代的新秧歌剧。

1944 年底，"鲁艺"的秧歌队以"鲁艺工作团"为名，去绥德分区劳军，并为当地群众演出。由于演出队在演出过程中对陕北民间生活和民间艺术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们回来后，通过艺术加工；又创作了《夫妻识字》、《栽树》等节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鲁艺"，带来了晋察冀的新民间传说《白毛女》后，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经过"鲁艺"全体同志的再创作，使《白毛女》一剧达到了新秧歌剧的顶峰，并由此提出了"新型歌剧"的命名。

《白毛女》一剧在延安上演后不久，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为了开辟新区，"鲁艺"组织华北、东北二个文工团，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以后在那里成立了东北鲁迅文学院。

当时除了延安的"鲁艺"外，党为了在新四军中培养一批革命的文艺干部，在刘少奇的亲自创导下，1940 年 11 月中旬，在苏北盐城的贫儿院成立了"鲁艺华中分院"。刘少奇出任院长，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系及一个普通训练班和一个少年队，并成立了实验剧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鲁艺华中分院"创作演出了《皖南一家》、《重庆交响乐》、《惊弓之鸟》、《扬子江风暴》、《反投降》等剧。1941 年 6 月，由于敌伪对盐阜区大扫荡，学院被迫撤离。以后由于敌人不断扫荡，"鲁艺华中分院"只得分散组成江淮鲁工团和黄河鲁工团，下部队到地方为群众服务，"鲁艺华中分院"由此无形解散。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重庆

总统阁下：阁下提议，中国战区，及部份印度支那与泰国等盟军作战地区，现有作战之盟军部队，及将来可能进入之盟军部队，由本人出任最高统帅；本人认为，对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人民、及对中国，均负有严重之责任。如就本人之能力与军事知识，本人实不能担此重大责任。然而，阁下协调英荷政府，作此提案，本人只有毅然承担。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战区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此等部队之有效协调，实超过一切，至为需要。阁下之倡议与努力，使此一目标统一，而在可以达到范围之内。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祉效命。此等国家，现已将国内资源，各个前线交通与作战部队相联系。中国人民，全力支持此一团结。为符阁下提议，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至于俄国代表问题，留待此一参谋本部成立开始作业之后，再予考虑。至所提与驻印英军统帅，及南太平洋战区统帅间，联络官文交换一节，殆中国战区指挥及总部参谋一旦成立，即可实现。对于各方发展，深盼阁下表示观点与揭示。

（选自《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
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

史迪威致蒋介石备忘录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重庆

委员长阁下：

一、关于委员长所要之两架运输机，虽然，对于所有权之转移，仍有一技术问题，然真正之焦点，乃如何使用，对战争最为有利。在此情形之下，作为总统之代表，本人愿负责陈述，只要认为对战争之执行，最为有效，委员长可以使用此等飞机。

二、为难免将来之误会，对本人之地位，愿在此作一陈述，本人所奉指示地位颇为复杂：

1. 中国任何军事会议，本人为美国代表。此乃指本人依据所奉指示，提出与维持美国之政策，在类此之任何会议上，本人其他地位，概不生效。

2. 本人为中印缅战区美军统帅，故所负责任，非只限于中国战区。由于印缅非中国战区范围之内，本人必须与

在该区之英方合作(当然、在中国战区,委员长为最高统帅,自当指挥在此区作战之一切部队)。

3. 本人负责监管租借物资事宜,决定所有权转移之时间地点。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员长即控制物资之处理。本人负责确使美援租借装备之使用,只能用于有效进行战争。在此等事务上,本人乃以总统之代表行事,依法彼(总统)有权在运送之前任何时间,取销租借物资。

4. 本人为委员长之联合参谋长,当盟国部队与中国部队合作,在中国战区作战之时,即执行职务。作为参谋长,本人之任务为计划、组织、训练与作战,并不扩张包括获取物资。本人遵照委员长指示,准备计划;批准之后,付诸有关单位执行。

5. 当然,作为美军军官,本人尚有一基本立场,即宣誓维护美国利益。

6. 在上述限制之内,本人惟一之目标,乃有效执行战争,此亦吾人共同之目标。

美国陆军中将指挥官 史迪威

(选自《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

党务改进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健全党的组织

一、凡本党党员,应一律参加区分部及小组会议,党部并应切实执行缺席之处分。

二 区分部、区党部之活动不得公开,其组织应力谋与现行自治组织相配合,并应以教育机构如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或经济机构如合作社,或自治机构如乡、镇、保公所,为活动场所。

三、县党部之内容应力求充实,工作人员数量、素质、待遇以及事业经费等,均应谋合理之改进。

四、中央与省及县之组织,应力谋灵活运用,不独上下级之意见当力求沟通,即上下级之工作人员,亦应时作有计划之更调。

五、民主集权制原为本党组织之基本原则,今后各级党部应速完成选举,成立执监委员会。

六、党的革命精神必须充分发扬,以后征求党员,无论其人从事何种职业,应以选择富有爱国热忱及创造自动勇敢牺牲之精神者为标准。

七、党的意志务须贯彻,其有违背党的纪律者,无论何人必须依法处分。

八、同志之间应绝对亲爱精诚,一致团结,不论服务党部、团部、军队、政府或社会,莫不共同负有发展党的力量之责任。其有不明此义,妄分彼此,故造纠纷者,中央应予以适当之处分。

九、省党部主任委员应以专任为原则,省党部并应慎选少数健全之县党部集中力量,推行主义以为示范。其书记长以最优秀之同志充任,并得兼任县长。

十、地方党务工作同志成绩优良而志愿从政者,省县负政治责任之同志应尽量引用。

(二)改进党的宣传

一、中央应即责令中央政治学校加强本党理论研究部门,以培养理论建设人才。

二、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应即积极进行本党基本理论编纂工作,上次全会所通过之"征求及奖励三民主义著述案",亦应积极进行,以激励国人对于本党主义之研究兴趣。

三、三民主义宣传工作应求普遍通俗,尤须确实到达县以下之各层。

四、国际宣传工作亦应加强,并应由中央遴选深明党义、通晓国际情形之同志,分赴各同盟国任宣传工作。

五、本党所发行之报纸刊物,地域分配或有未当,内部管理或未尽善,应即谋合理之调查。

六、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应定为统一管理党内出版事业之机构,其他党内类似组织,应一律裁并,一般出版事业管理重要原则,亦应由该会负责拟订。

七、目前本党宣传经费为数过少,亟应增加,省、市、县宣传经费尤应尽量增加。

(三)培养党的干部

一、对于凡曾任及现任本党中下级干部之同志,中央应即举行普查,以后并应经常调查,务使各人之经历、学识、能力、品行有一较为确实之认识。其进行办法,由常务委员会从速决定施行。

二、中央对于上项优良同志,应依其能力及兴趣,或令从政,或令从事经济、教育事业,或令仍任党务工作,应作有计划之选拔。

三、党员总考核办法,务须认真举行。其特别优良同志应依其能力兴趣,按照实际工作机会,或列为预备干部,或即选拔为干部。

四、各级干部考核,尤应详订妥善办法,认真执行。

五、凡对党工作特别努力之党员及干部同志,或于艰苦工作有特殊建树,或于党义研究有特殊表现,除依规定予以适当之选拔外,中央应每年公布各人姓名予以表扬,

其特点并予以纪录，留为荣誉纪念。

（四）确定本党中心工作

一、实现总理实业计划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本党全体党员今后一致奋斗努力迈进之工作目标。

二、建设农村为目前本党当务之急，应从政治及经济建设入手。党部当即发动同志深入农村，组训民众，尤应争先从事劳动服务、社会服务，其具体工作如社会教育、合作社以及医疗救济等事业，应因地因时制宜，分别明确规定。

三、国家总动员为抗敌期间最重要工作，本党党员应即领导全体国民竭力推动，尤应以身作则，争先服兵役。

四、沦陷区内以及异党活动猖獗之地方，各级党部应加强组织及宣传工作。

（选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198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波兰、印度、加拿大和荷兰等二十六国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即“二十六国公约”）。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止，法国、墨西哥和菲律宾等二十一国陆续表示赞同这一宣言。这一宣言后称《联合国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一）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二）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同日　日寇在华北开始推行“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

同日　国民党政府根据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专卖制度提案改食盐为专卖。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敌国人民处理条例》及《敌产处理条例》。

同日　《反侵略》半月刊复刊。

同日　日军进犯长沙，四日退出。

1月5日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

同日　北岳区召开首次合作社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关—北岳区合作社联合会。

1月9日　邹韬奋在东江纵队帮助下，从香港到达解放区。

1月20日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开幕，历时月余，刘少奇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1月21日　日本首相东条声明愿与中国单独“媾和”。蒋介石密令广西当局与潜入桂林的日本特务黑田谈判。

1月28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晋察冀边区财政收支统一处理办法》。其中，对“统一累进税”、没收汉奸财产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减租减息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二）承认大多数地主是要求抗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应交租交息；（三）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因此目前不是削弱而是鼓励。

1月29日　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接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函，说明史迪威来华之任务：一监督美国援华特资之拨配与使用；二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拨交之中国军队；三参加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并担任蒋介石参谋长；四、控制在中国境内之滇缅公路。

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同日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物资局成立，何浩若任局长。

同日　国民党财政部公布《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同日　日本在上海设立“敌国俘虏收容所”，共计收容英美籍俘虏一千五百人。

2月2日　英国给国民党政府贷款五千英磅。美国给国民党政府贷款五亿美元。

2月3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第五十次会议决议通过，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十四日，经济部物资局奉令公告实行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并依照该办法之规定，分别制定重庆市最高市价与重庆市、江北县、及巴县登记存纱办法。

2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

政策决定的指示》。

2月8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历史上看，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听任党八股发展下去，是会害党害国的。

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

2月11日　据新德里路透电：全印学生联合会决定于二月十五日举行"中国日"。

2月12日　东北抗联将领赵尚志被日特杀害。

同日　据《新华日报》讯，国民党政府运输统制局全国公路运输总局，近奉令改称为运务总处。

2月13日　重庆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一百零四人，联合发起组织之重庆记者联谊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讨论会章通过提案，并选举执行、监察干部二十二人。

2月15日　美国派遣史迪威为美军驻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同日　北岳区抗援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发表了宣言及告敌占区同胞书，于二十一日闭幕。

2月16日　《新华日报》发起慰问苏联红军签字运动。各界争先签名，到二十三日，签名者总数达到三千人。

2月17日　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包森在三户山战头中牺牲。

2月18日　以谢觉哉为社长的《边区群众报》创刊。

2月20日　晋冀鲁豫边区决定精兵简政具体办法。

同日　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保甲筹备委员会"。

2月21日　据《新华日报》讯，国民党政府政务院改订统销物品中之桐油、猪鬃、茶叶运购办法。

2月23日　《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字。国民党第五军开始进驻缅甸，不久，第六军也开入缅甸。

2月27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非常时期国内电报价目表，国内电报加价，定自三月一日起施行。

2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3月3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动全边区二百万人民开展春耕运动。

3月4日　美国史迪威到达重庆。

3月5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领导机关—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

3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移民实施办法》。

3月11日　史迪威到缅甸，十三日会见英军驻缅司令亚历山大。

3月15日　蒋介石派卫立煌任缅甸远征军总司令。

3月1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3月17日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召开工厂厂长会议，讨论关于工厂领导一元化、供销统一、经济核算及全面工资制等问题。

3月22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技术干部会，毛泽东、朱德亲自到会作指示。

3月25日　日本商工省指定向伪满迁移三十四个工厂。

3月29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剥夺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力。

3月30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筹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柯仲平任筹备会主任。

4月2日　《解放日报》举行座谈会，根据整顿三风方针进行检查，毛泽东亲临指示。

同日　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券。

4月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决定》，指定了十八个学习文件(后增加为二十二个文件)。接着，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领导机关—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为副主任。

4月5日　华北文联机关刊物《华北文化》月刊创刊。

4月9日　中共晋冀鲁豫边委作出机关整风的决定。

4月17日　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五届会员大会，参加单位二百一十个，决议请政府拨美金一亿发展工业。

4月23日　阎锡山赴吉县安平村与日伪代表举行投降谈判。

同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率部六千人降日。

4月27日　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在交河县陈庄战斗中英勇牺牲。

同日　《新华日报》载：在晋冀鲁豫《新华日报》华北版最高发行量曾超过五万份，现因日伪封锁，发行量为两万份；《晋察冀日报》发行量曾超过一万份，现为五千份。

同日　皖中成立鄂皖赣区党委。

5月5日　伪满开拓总局公布，第一期开拓计划期间，共移入日本开拓民十万七千人。

5月8日　缅甸密支那沦入日军之手，国民党一部分军队撤回中国。

5月9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在太行山出版《战场》周报。

4月1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规定边区技术人员待遇标准。

同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第二期有奖储蓄券一亿元。

4月13日　八路军两个连在距无极城八里的小吕伏击日军加道大队长率领的日伪军，获胜。

同日　黑龙江省白城子市居民一千三百余名和附近七个村的一千二百余名农民，前往伪满县公署，要求开放粮仓，配给民食。

同日　皖中行政公署成立。

同日　国民党琼崖警备司令王毅屠杀中平、南茂、加略等地苗胞千余。

5月　由于日伪军的"扫荡"，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全太行区的面积由一九四零年的十万零六百六十二平方里下降到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平方里。全解放区的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八路军、新四军由一九四零年的近五十万人减少到三十多万。

6月4日　国民党政府特派孔祥熙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

6月6日　衢州陷落。

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同日　《解放日报》学习副刊第七期重译刊载了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文。

同日　日军侵占东乡。

6月9日　八路军在冀中反"扫荡"中，歼灭日冀勃特区"扫荡"司令官坂本旅团长所率之部队及援军，击毙坂本旅团长。

6月12日　日伪对冀南进行的"铁壁合围""扫荡"，被粉碎。

同日　日军占领上饶、贵溪。

6月19日　《新华日报》载，陕甘宁边区奖励移民垦荒，规定优待办法。

6月22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行《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领》。

6月23日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宣言打倒法西斯，建立日本人民政府。

6月27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一九四二年同盟胜利公债，自七月一日发行，定额为法币十亿元。

6月29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规定：凡违反或妨害国家总动员之法令或业务者都要根据该条例惩罚之；此类案件"由军法审判之机关审判，呈电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核准执行"。

同日　史迪威受任为驻印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副长官。

7月1日　各解放区县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军队也开始整风。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

7月6日　晋西北各界开始选举临参会议员。

7月7日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

7月10日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改定外汇牌价，法币二十元折合美金一元。

7月11日　《新华日报》报导，广东东江一带走私风仍炽，偷运钨砂等资敌。

7月21日　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第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7月24日　八路军在遵化西南赵店子战斗中，消灭日军之巡视工作团。

7月25日　贺龙、林伯渠向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县级以上干部密电，重申禁止法币流通。

7月27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三届参政员名单，中国共产党人有毛泽东、林祖涵、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

8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救灾总会，拨十万元急赈延川水灾灾民。

8月5日　重庆对公务员工停止供应蓝布。

8月8日　食盐专卖暂行条例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

8月9日　新四军一师攻入南通市北之石港。

8月12日　《新华日报》报导，重庆棉布等日用品价格暴涨，旬日间涨百分之五十。

8月13日　中共浙东地区委员会成立，谭启龙为书记。

8月15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向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

同日　华北日本士兵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三十日闭幕，通过纲领和会章，成立反战同盟统一机构。

8月17日　上海市伪社会局开始征集旧金属。二十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废金属收受所。

8月23日　中国航空公司增辟渝兰线，两周一次。

8月24日　延安大水，公私财产损失在二千万元以上。

8月29日　滕代远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同日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

同日　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等到迪化，威胁、利诱盛世才进行反共。

8月31日　陈毅在亭子港新四军军部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由邓小平、刘伯承、李雪峰、李大章、蔡树藩五人组成，邓小平为书记。

领导太行、冀南、太岳、晋豫(中条)四个区党委。

同日　陕甘宁边区成立贸易委员会。

同日　上海中央、交通两行在日伪压力下宣布改组复业。

9月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整财会议,讨论边区经济和财政问题。

9月7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说明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

9月16日　福建南平《南方日报》被四十余名暴徒捣毁。

同日　国民党在四川省开始田赋征实征购。

9月17日　盛世才在新疆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百六十余人。

9月18日　东北抗日救国会、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路军发布《告东北人民书》。

同日　《解放日报》载:定边成立纺织公司。

9月20日　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延安开会,松本一夫任联合会会长。

9月29日　《新华日报》报导:华北敌后根据地大力施行精兵简政。

9月30日　朱理治被免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职务。

10月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黄亚光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代理行长。

10月10日　刘少奇在太行北方局党校作《中国革命的战争与策略问题》的报告。

10月16日　《新华日报》载,陕甘宁边区各县实行精兵简政。

10月19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着重检讨边区党的历史,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陕北党中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对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以及党内闹独立性等错误,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内一元化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十二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10月21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条区与太岳区合并,薄一波为区党委书记。

10月22日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三十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加强管制物价方案。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董必武被选为驻会委员。

10月26日　日伪在各地设立"勤劳奉公局",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捕捉劳工。

10月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减息条例》;选出续范亭、武新宇为行署正副主任,林枫、刘少白为参议会正副议长。

11月9日　日本驻沪陆海军最高司令发出布告,全部冻结"敌侨"不动产。

11月12日　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中全会。

11月23日　《解放日报》总编杨松在延安病逝。

11月27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说:"耕地租赁契约订缴纳实物或改缴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租,增后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地主在这种法令的保护和鼓励下,便采用各种方式来增加租额。

11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同日　二十九个国家反法西斯青年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世界青年协会"。

11月　淮北新四军粉碎日伪军六千余人的围攻。日伪军出动五万人,再次进攻苏北解放区,被新四军击溃。

12月1日　北岳区八路军出动成百个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举行为时一周的打击敌伪政权的政治攻势,逮捕伪政府工作人员六千余人。

12月5日　国民党政府国家总动员会召集各部长及该会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管制物价方案。

12月9日　印度柯棣华大夫在河北唐县逝世。

同日　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讲话。《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一文是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它阐明了领导各解放区进行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息运动,是党的一项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大决策。

12月17日　国民党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实施限价办法。所有物价,统以十一月三十日为准,在明年一月十五日实行。

12月19日　日军"扫荡"大别山南麓国民党军,连陷商城、光山、潢川、麻城、罗田、英山、广济、黄梅、桐城、潜山、太湖、宿松等鄂豫皖广大地区。

军　事

1月3日　美国宣布:反轴心国之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及西南太平洋区之统帅部已组成。魏菲尔上将(印度英军总司令)任西南太平洋区陆海空军总司令;勃勒特少将(美空军总司令)为副总司令;哈特上将(美亚洲舰队总司令)统帅该区全部海军;潘纳尔上将(英远东总司令)任参谋总长。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由蒋介石担任。五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之职。

1月4日　日伪对晋西北区进行大"扫荡",使用兵

力一万三千多人，采取“铁壁合围”及“梳篦扫荡”，并以“三光”政策摧残解放区。八路军一二O师、新四军、地方游击队以灵活的战术，经过八十四天，大小二百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同日　蒋介石电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1月　山东八路军举行战役出击，在群众的配合下，采用了集中火力、突破一处、急行奔袭的战术，获得了极大的战果，拔除日伪军据点十余处。

2月2日　史迪威奉命调中国战区参谋长。

2月14日　日军在定县油房镇施放鼠疫。

4月1日　日伪军四万六千北由长城，南由北宁，东由滦河，西由运河同时侵入冀东丰润、玉田、蓟县地区，实行“清剿”和“扫荡”，占领村庄千余座。八路军主力转移，冀东根据地之平原地带成为游击区。

同日　史迪威返回重庆，会见蒋介石，叙述三月十九日至月底在缅甸的军事失利，抱怨在缅的国民党军队不服从他的节制。

4月29日　日军三万、伪军数万开始反复“扫荡”冀南区，一个半月中建成一千多个据点、九千余里公路和九千余里的封锁沟，实行“铁壁合围”“驻屯清剿”。八路军主力转移外线。

4月30日　八路军一二O师经八十四天大小二百余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对晋西北的大“扫荡”。

4月　湘黔边界之凤凰县苗族人民举行“跳仙会起义”，反对国民党暴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大军疯狂镇压，起义者转入深山。

5月1日　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集中三个师团，二个旅团共五万兵力，伪军十万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在这次“五一扫荡”中，日伪军在八千个村庄、六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密布一千五百个据点，在一万里网状公路上，经常有七百辆汽车巡逻。冈村宁次亲自乘坐飞机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实行“三光”政策，反复“扫荡”，企图在两个月内，消灭八路军主力。他们杀害和抓走五万多群众，使广大平原地区呈现出“无村不带孝，到处有哭声”的悲惨景象。八路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消灭坂本旅团长以下八千余人。

同日　伪满在民间大规模收缴金属品，充作军需。

5月3日　侵入缅甸的日军攻入云南省西部之畹町，继陷怒江流域的芒市、遮放、盈江、腾冲、龙陵等地。

5月4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布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

5月12日　日军调集六师团、四个旅团七万余人，发动了浙赣战役。

5月14日　日军分别沿富春江、浙赣路、曹娥江三路南下，配合从江西南昌东犯之日军，进犯浙赣线。

5月17日　岢岚日军一千四百余人于十四日侵入兴县，奔袭晋绥边区领导机关，被一二〇师包围在兴县东南田家会村附近，经七昼夜的肉搏，日军大部被歼。

同日　日军在浙赣战役中，自十四日起到本日止，连陷新登、桐庐、建往、诸暨、义乌、浦江、新昌、永康、武义、汤溪、龙游等地。

5月27日　日军陷抚州。

5月28日　金华兰溪陷落。

6月2日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战斗中，与日军激战于山西辽县麻田村附近，壮烈牺牲。

6月4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为司令，徐向前为副司令、关向应、林枫为正、副政委。

6月7日　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对大青山地区展开秋季大“扫荡”，实行分区“清剿”，以三道阵线向绥远中心区进犯，围攻大青山区。根据地军民经过四十六天的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

8月初　浙赣战线日军开始缩短防线，至九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江地区，撤至新登、桐庐、建德、兰溪、汤溪、金华、义乌、东阳、嵊县、奉化之线。

8月1日　日军四万六千攻入冀东区。此部日军在冀东抓捕民工十万，大肆挖沟、筑路，建立据点，屯驻重兵，反复“清剿”，并沿长城一线实行集家并村，将居民逐入“人圈”，制造了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长达七百余里，宽达八十余里的“无人区”。

11月1日　日军五万人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下，“扫荡”鲁中，本日败退。在反“扫荡”中，八路军二十八勇士在博山县东部的马鞍山上坚持血战两昼夜，弹药用尽，壮烈殉国。

外　交

1月16日　英政府宣布调驻华大使卡尔使苏，另派薛穆爵士继任驻华大使。

1月29日　东条在日本议会宣称：“今后帝国对重庆之方策，如其仍继续抗战，则彻底粉碎之；同时热烈期待其反省，使其完全抛弃对美之依存性”。

2月9日　蒋介石飞印度，多次与尼赫鲁会谈。十八日在加尔各答晤甘地。蒋与印当局商洽了中印运输问题。

2月24日　驻英大使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

4月1日　中英成立《中印航空协定》。

6月2日　由美国国务卿赫尔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长宋子文在华盛顿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10月5日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

12月21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指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

经　济

1月18日　据《新华日报》载，陕甘宁边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前有政府公营的纺织工厂四个，职工六百三十七人；机关经营的纺织工厂十五个，职工一千二百三十六人；纺织合作社十六个，职工四百六十八人；群众经营纺织工厂三十个，职工二百二十七人；农村手工业纺织副业，沿河八县民间有抛梭机五千零四十九部，有熟练纺织妇女十四万五千人。总计共有纺织生产单位六十五个(连六月份后开工的六个共七十一个)；职工二千五百六十八人(农村纺织副业生产者不在内)；纺织工具共六千零九十部；年产毛二万零四百八十四斤，纱八万一千九百七十八斤，绸子八十八匹，布六万一千二百八十匹，毛毯六千四百四十二床。

1月26日　《新华日报》载，陕北在经济建设上，一九四一年开荒二十三万八千一百零七亩，修水利二百九十八点五五亩。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增加牛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三头，羊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只，驴八千五百九十四头。一九四〇年有树三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七株(直属县除外)。到一九四一年建手工工厂和生产合作社约百个，其中纺织厂四十一个，纸厂十二个。有商店四百余家。边区拨款四十五万元，修筑路一千八百五十一公里；新修路九百六十七公里，拟修四百四十五公里，社营运输队十七个；公营造车厂九处。

2月1日　川康兴业公司成立会在渝举行。行政院长张群为官股董事长。

3月9日　重庆布类平价开始实行。

3月9日　上海黑市米每石涨至三百元。

3月24日　孔祥熙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民党政府决定发行一九四二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万万美元。同时，在短期内将发行一九四二年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万万元。

3月31日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下令：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即日开办，由四行联合办事处、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汇局发行。

4月1日　国民党政府火柴专卖公司成立，陈光甫任董事长。

4月25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同日　国民党政府物资局宣布平价布停止配售。

5月15日　松花江丰满发电站举行发电仪式。

5月1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贸易局归银行直接领导。

文　教

1月15日　《文艺杂志》在桂林创刊。

1月27日　据《新华日报》载，晋西北二十一县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有高小二十八所，学生八百九十人，初小一千七百六十一所，学生七万四千零六十九人，女生共占六千七百五十五人，一年半中培养教师二千一百六十三人。

2月8日　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教育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学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社、中国测绘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学会、中国图书馆协会、中华体育协会、民生教育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等十三个单位，联合举行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开幕，九日闭幕。到会各团体会员二百余人。大会发表宣言，通过提案，并推举张益续任办事处主任。

同日　中国教育学会举行会员大会，改选理事。选举张伯苓、常道直、张益、程其保、郑通和、许恪士、黄炎培等十五人为理事，顾树森等五人为后补理事。

5月2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二十三日结束。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八十余人。会议讨论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五月二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读者对象、工作和学习等五个问题，与会者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当时文艺工作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

5月21日　陕甘宁边区文委会开展文化运动并拨款援助自港归国的文化界人士。

25日　据《新华日报》所载《苏北教育文化掠影》一文报道，苏北出版的报纸有《江淮日报》、《抗敌报》、《东南晨报》、《人民报》、《火线报》、《胜利报》、《战斗报》、《如西导报》、《前线报》、《七七报》、《老伯报》等二十四种；杂志有《江淮文化》、《实践》、《敌后文化》、《苏北记者》、《江淮杂志》、《新文艺》、《江淮文艺》、《文艺周刊》、《新诗歌》、

《江海文化》等。

2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必须提高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质量；并决定委派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专门翻译、校阅经典著作。

5月3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

6月1日　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成立。

8月9日　由朱德、凯丰、李富春、邓发、贺龙、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李鼎铭、柳湜、谭政、叶剑英、胡耀邦、冯文彬等十九人发起国民体育运动。

9月13日　晋察冀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协会。

10月8日　夏衍编《法西斯细菌》由中华剧业社在重庆公演。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3年

导　言

一九四三年三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趁第三国际解散之际，国民党叫嚣解散共产党；六月，又调集军队，准备“闪击”延安。对此，中共进行了坚决回击，同时，国统区中间势力和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进行了指责，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第三次反共高潮没来得及发动就被打退了。

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开展了审干运动。但负责审干运动的康生，进行了“抢救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十二月，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

日军为了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地区的威胁，并夺取停泊在宜昌江面上的中国船舶，在鄂西地区发动了局部进攻。中国第六战区驻防部队在空军支持下进行了抵抗，但未能抵挡住日军进攻，使日军顺利达到了战役的目的。

经过近两年谈判，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由戴笠任主任。这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情报所为收集对日作战情报局设立的机构。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在重庆渣滓洞设有庞大集中营，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1946年3月撤销。

八月二十八日，常德战役爆发。日军计划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摧毁第二战区根据地，牵制中国转移到云南的兵力，策应日本南洋作战。在常德保卫战中，常德守军第七十军五十七师激战十五昼夜，六千人壮烈殉国。十二月，日军完成战役目的后开始全线总退却，中国军队反攻常德，战事告一段落。

十月七日，在八路军反“扫荡”斗争中，爆发了甄家庄战斗。日军妄图合击八路军晋西北领导机关和主力，我军制订了沿途伏击、分段围歼的作战计划，将敌军围困在甄家庄东南山头上。经过激烈战斗，敌军仅百余人逃跑。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训词中强调全党要多注意战后建国工作，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会议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推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 **“抢救运动”**
- **大生产运动**
- **1943年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 **甄家庄歼灭战**
- **宜昌战役**
- **中美合作所成立**
- **常德战役**
-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背景介绍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这是国民党再一次阴谋挑起内战、坚持独裁反共的宣言书，也是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提议共产国际自行解散。共产国际决定自行解散，是为了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更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以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自引解散是他藉以反对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和机会。于是，他指示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托派、特务张涤非，在6月12日假冒“民众文化团体”的名义，召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电文”，叫嚷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把这个消息广为散布，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报刊狂叫：中国绝无产生共产党之条件，“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蒋介石集团在大造反共舆论的同时，加紧进行反共军事部署。6月18日，胡宗南在陕西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6月底，蒋介石下令把国民党驻守黄河的两个军调来，会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包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集结在边区周围多达四、五十万人，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7月7日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7月10日胡宗南指挥其部分军队向关中军分区进行试探性进犯，从而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坚决的回击。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驻守延安的八路军五个旅都开往前线，还派军事干部到各军分区农村去组织自卫军、游击队和民兵等，准备歼灭进犯的的蒋军。7月9日，延安召开三万人的群众大会，要求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并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通电。各解放区军民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声援边区。

为了制止和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资料，系统地揭露和批驳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社论；范文澜发表了《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发表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的愚民哲学》等文章；还刊登了《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帐》、《三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表》等资料。这些文章和资料有理有据，在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使蒋介石集团在国内外舆论中陷于孤立的地位。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不仅激起了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国统区中间势力和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广大进步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怒与抗议，宋庆龄呼吁中国在国外的朋友，要求对国民党的封锁采取干涉。在国际上，苏联报刊发表塔斯社记者的《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日、反共分裂的行为，赞扬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注意。由于英美此时极需要利用中国抗战拖住日本，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蒋介石也感到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势必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因此，不得不命令胡宗南暂停进攻边区的军事行动。1943年9月间，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虽然继续反共，但又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阴谋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迫停

止。

材料：

·朱老总一电退胡军

材料　朱老总一电退胡军

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胡宗南于6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6月下旬，胡返回西安时，第三十八集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1942年以来，甘肃南部出现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等自发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口号，得到汉、回、藏群众的拥护、支持，影响逐步扩大，到1943年5月，武装力量达5万余，活动区域达20余县，震动兰州。朱绍良、胡宗南乃令第三十八集团军于6月5日起进行镇压。原期速战速决，在10日内弭平，但到6月底仍未奏功（延至7月中旬才暂告平息）。蒋介石遂令胡宗南抽调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攻占囊形地带。为免过早暴露，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

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通过密台迅报延安。

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我出席。

会上，胡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5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事情。不久，刘大军报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选自《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作者：熊向晖）

"抢救运动"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三年四月，党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确定在整风运动后期，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身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大搞逼供信，利用职权，将审查干部工作，扭转了方向，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反特运动，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将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调延安学习的年仅十九岁的地下党员张克勤看管审讯，原因是张的父亲在兰州被捕自首。经六昼夜车轮战，张胡说甘肃党是打着共产党旗号进行特务活动的"红旗党"。康生援引此例，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一九四三年四月初，经康生批准，保安机关一夜间捉了二百多"嫌疑分子"。之后，便在延安各地，开控诉大会，让张克勤"典型引路"，号召青年"坦

白""自新"。这样,坦白运动便扩大到一般机关、学校,审查干部由专门机关负责转入公开的群众运动。在逼供诱骗之下,当时坦白的有四百多人。七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提出逼供信是错误路线,但康生坚持而不改。

一九四三年七月,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高峰。形势紧张。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此,坦白运动便发展为"抢救运动"。整个边区机关、学校,,开始了"全线突击","日夜抢救",一时特务如麻,人人自危。

党中央发现了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立即纠正。经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提议,党中央批评了康生。八月十五日,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等九条方针,十月又重申内部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进行甄别工作,逐渐平反冤假错案。

在中央社会部部署与派员督促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先后开展了"抢救运动",情况大体与延安相似。

材料:

- 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
- 延安整风经历记
- 毛主席纠正康生的错误
- 审干纪实
- 抗大的"审干"运动
- 李维汉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抢救"运动
- 延安整风运动中河南党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经过及严重后果

材料一　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

整风运动之初

著名的延安整风开始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但毛泽东由于事情太多,只挂了个名,并未具体管;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管。这是康生求之不得的局面。

康生由于善于看风转舵,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上了中央社会部部长,因而掌握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的部分权力。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康生)做。"康生提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当时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因而也是帮助他工作的人员之一,并分工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和审干。

开始时,毛泽东还比较关注,他的想法是通过学习、讨论,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就算达到了目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在同我的接触中曾说过:"不对(指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者),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就行了。"

1942年1、2月,中央各机关开始了整风学习。我有一次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我又问过中央机关整风学习的目的,他还是讲: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可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进来了,味道有点变了。不仅对错误路线是谁,提出要追究责任,而且对其它一些问题也追究责任。

1942年夏季,康生提出了"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这是一个十分阴险的谋略——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实,也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而这一谬论的出笼,是从这样一件事情引出的:

康生在苏联时,本来是紧紧追随王明的,他们在党内下发文件都是用"王康"的名义(特别是对我国东北地下党发文件是用这个名义)。1937年底,康生回国以后,看到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了王明,便摇身一变,把自己标榜为"反王明的英雄",并极力靠拢毛泽东。用曹轶欧(康生的老婆)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以后就制造出他们在苏联受王明排斥的神话。康生主持整风以后,就想乘机把王明搞下去,却又不敢妄动,便从统战部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柯庆施下手。柯庆施夫妇被反复批斗,柯庆施的爱人被逼自杀了,柯仍不能被放过。有一天,中央机关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庆施,这样的斗争会名之曰"抢救失足者"。这次斗争会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柯庆施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群众"就是不依不饶,大家都腹内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场。康生和毛主席、刘少奇就住在会场——中央办公厅上面不远处的一排窑洞,康生听到中央办公厅人声鼎沸,深夜不绝,他来了,他来到大会上讲了话,意思是:抢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允许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态度如何。他要了这样一个把戏,会散了。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场,我给他收了场。"他的几个"必然转入"也就在此时出笼了。

审查"七大"代表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1942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续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

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1944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

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坦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销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他,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打通西部通往苏联的道路,他一到甘肃,便携款逃跑了。

此外,还有几个有类似问题的人。

以上说明在错纵复杂的斗争中,与敌特的斗争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象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我到保安处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15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弼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于是1943年1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一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后通过我去执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4月的一天,康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200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裂、手一摆,嘴里"嗯嗯"着,然后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芒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于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里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4月份,蒋介石把他部署在晋西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陕西韩城、宜川、大荔一线,并声言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因为中共不听话"。后来知道蒋介石这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逃离抗日前线,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风。但当时中央分析:蒋介石这一动作,可能是同日本媾和的一个步骤,便紧张起来。边区人民也群情激奋,到处集会,声讨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坚决保卫边区的决心,还把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请到大会主席台上,让他看看边区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借口"为了整顿后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于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后还在扩大。

大约5月份,我又领命到绥德收拾那里的烂摊子。

绥德的故事

绥德地处黄河西岸,绥德的宋家川与山西的军渡隔河相望,绥德的商人就从这里往返于秦晋之间,他们的货源在山西的柳林镇,而该镇确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经常从商人的嘴里探听河西的虚实。但这些商人都是爱国的。从不对日本人说实话,倒是把山西的实际情况不断告诉我方。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山西的日本侵略军构成了对绥德的直接威胁,于是绥德也和延安同时捕人,命令当然都源于康生。这一行动,伤害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同时因为打击面迅速扩大,人人自危,不可终日。李鼎铭从亲友那里了解到他自己家乡的情况,很有意见,便向林老(林伯渠,当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任副主席)反映。这也就是派我去绥德的原因。

绥德地区的行动是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

自主持搞的，捕的人都关在专署，审又审不出个名堂，骑虎难下，他们也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呼吁求援。大约 5 月底，我带了布鲁等七八人去绥德。

我们到绥德后，首先停止乱捕人，接着抓紧审问在押的人，弄清没有问题的，立即释放。其中有一个唐海，是马列学院的优秀学员，我教过他，也认识他，我把他找来一问，他便痛哭流涕，说他什么错误也没有，唯一的错误是同一个女青年接过吻。此等案情，当然立即释放。

工作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一个姓陈的同志说我："我的天啊！你逼着鬼上树，一天审的案子比过去一个月都多，一个月比两三年做的事情都多。"这样突击了一个月，绥德、米脂、清涧都安定下来，李鼎铭收到亲戚的信，表示满意，又向林老说了，讲了我的好话。

那时，徐向前是军委成员，又是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他很稳重，我们都尊敬他，重大问题都是徐向前、习仲勋、袁任远和我一起研究，得到徐向前很大帮助。

这时，绥德师范的女学生田家凤和另一男青年（姓李）还在延安到处做典型报告，其实都是假的，是逼出来的。我们有些同志确实喜欢用诱骗和折磨肉体来逼供。

整顿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就在绥德警备区召开了群众大会，作了总结。

林老将我在绥德工作的情况向西北局作了汇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将我的书面汇报作为典型经验上报中央并介绍到边区各地。尽管自己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领导上还是肯定了我对稳定局面、安定人心所做的努力。

七八月间，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气氛已缓和，上级要我回延安汇报工作，我把家属留在绥德，打算汇报之后还返回绥德。

回到延安，林老要我到边区政府做了工作报告，李鼎铭副主席出席。

工作汇报完了，高岗、康生、任弼时找我秘密谈话，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件特务案。

关中抓特务

任弼时他们同我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对×××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情报里老有他，这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这里要提一下，军委二局真是我们的无名英雄，他们对敌人的密码破译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到敌人的各种密电。上述敌特情报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3 年 11 月我到了关中，那时关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已经是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了。如：说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爱人是"特务"，妻弟也是"特务"，文本人虽说还不是特务，但因"特务"在他身边，自然不能信任。专员兼保安分处处长汪锋是"特务"，几个书记、副书记也靠边了。连关中秦腔剧团的团长，因同×××关系密切，也被当成"特务"。只剩下副书记段德章和张德生可以商量事。

为了摸清问题，我到关中并未声张，但很快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

第一件是：×××已调离关中一年多了，敌人的情报中还有"×××给情报"的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竟会有此情报？

第二件是：我到关中，在转角（地名）停了一下，和一个脚夫聊过几句话，马上就从国民党的密电中截收到"贺龙到关中，穿黄呢子衣服"云云，国民党着实紧张了一下。我一看，穿黄呢子衣服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把我当成贺龙了。可见国民党的情报并不那么准确。

经过调查分析之后，把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此人名杨洪超，家在边区境内的马兰，家庭人口较多，他本人住在国统区的职田镇，都是双方的边沿地区，来往频繁。杨洪超是布鲁收买了给我们做情报的。他的叔叔是我们的交通，布鲁又让他的叔叔监视他，但是他为国民党做假情报的事却不知晓。

淳耀县保安科长贺生高手下有在职田镇的人，摸清了杨洪超的住处，一天晚上，由保安分处干部王天民带六七个武装，半夜越过边界，到杨洪超的家，破门而入，两口子睡得正香，武装人员把女人带到一边，警告她不许出声，不许孩子哭，让杨洪超赶紧穿上衣服跟着走。一家人全都吓傻了，只有哆嗦的份了。事情办得很利索，狗都没有叫一声。他们经过敌人的岗楼时，可以听到岗楼上的说话声，也没有被惊动。

我在马兰附近的正营等候，把杨洪超押到张德生的办公室，我们二人审问。审问之前，先来个下马威，把镣铐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后关头"。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问：你给国民党的情报是哪里来的？

答：我编的。

问：为什么要编假情报？

答：为了挣钱、骗钱（国民党特务机关按情报的价值付钱，这是×××被扯上的根本原因——笔者注）。

问：你给假情报，人家就不查？

答：他怎么查吗？我说的都是边区的事。

问：都什么人给了你情报？一个一个说！

答：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知道谁的名字就写谁。

问：文年生的老婆你知道吗？

答：她是咱地方上的山东人，谁不知道？

……

对他的交代一时不敢完全相信，可是很快从敌方得到了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如丧考妣，说他们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情报专员；西安派了个师级干部专程到职田镇

查处此事，并给上司报告说："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而且此后，确实再也没有收到国民党方面有关边区的情报。

关中大批干部受冤枉，怎么收场？于是开了大会，让杨洪超讲话，因为他捏造假情报，害了多少人，意思是说干部受冤枉，事出有因。

在关中两个月，基本搞清了问题，于1944年1月回到延安。

毛主席过问

我从绥德回到延安，尚未去关中之前，康生召集过一次审干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和他发生了冲突。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北、晋东南、西北地区较高级的干部，在会上要制订要重证据，几条审讯口供的原则。而这时毛主席已经讲了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以往做保卫工作的经验，在会上发言说："审问时不能用刑。"而康生说："用刑是可行的。"我说："不能欺骗诱供，不能利用病情或心理不正常时逼供，套取供词，要让犯人说真话。"而康生反驳我说："照你的说法就没法审问了。"我说："用材料嘛！"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审问?!"我说："弄出那么多假的怎么办?"他说："我们逼供而不信，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完了再甄别嘛！"而且威胁说，"如果你认为谁没有问题，那你就对此人签字具保，负责证明他没问题。"这就是一大笔糊涂帐的根源。在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只好不再作声。

当时延安的审查对象分在三个地方，认为问题较严重的，关在保安处和社会部；其次的集中在行政学院。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在枣园后沟)关着100多人，行政学院主要是陕北的当地干部。西北局反复证明陕北的干部都是一起干革命过来的，都了解，没有问题，但康生仍坚持县以上干部都要审查，因为"可能是汉奸、是托派"。以至于所有的机关单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是当时的人都经历过的。

康生的主意：坦白交代了的戴红花、吃白面。在社会部受审查的张克勤，是个20来岁的青年，他根据一本侦探小说，瞎编了自己的"特务"故事，咬了许多人，被作为典型到处作报告，于是假口供更加普遍了。再加上边区生活苦，监狱更差，承认了可以必善一下生活，也促使假坦白增多。当然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当时仅因他的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的)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也就最多。

假口供百出，康生得意忘形，同时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行政学院受审查的陕北干部不满情绪最高，反映到边区政府，反映到西北局，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后受到了震动，觉得错了，问题不小。于是1943年底到1944年初之间，毛主席亲自到行政学院向被审查者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脱帽鞠躬、赔礼道歉。随之又到中央党校等多处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扭转了大面上的形势。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篇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名话是假的，就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有10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下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10句错了改10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AB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而且审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姆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

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后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于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人陪绑。罪名是“顽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导，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慄。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

1944年7月，在押犯人大部分甄别释放之后，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

有没有特务

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我们也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难，我们搞国民党的情报容易，这是真的。国民党给我们派特务，我们也给国民党派特务，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这也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1942年，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为的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兰，国民党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在马兰附近。此人考虑到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分败露，将灾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向布鲁坦白。原来他是在汉中参加了戴笠的特务训练班，该班46人，都是西北的青年，毕业后全部派到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打入我机关。此人交代了全体46人的姓名，经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布鲁回到延安，研究了对策，找了一两个谈话，交代的和吴南山坦白的一致。这就是“戴案”（或称“汉中训练班案”），查清了，并未捕押一人。

康生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到毛主席面前去夸口，毛主席问他究竟是谁搞的？康生才不得不承认是布鲁破获的。毛主席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这是康生自己说的，他当然不会轻易说这种丢脸的事，而是另有目的的。

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康生却借口“整顿后方，清理阵营”，搞得人人自危，不战自乱，人心涣散，无疑帮了敌人的大忙。我心里老有一个问题：“康生究竟是什么人？！”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算匆匆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团负责人之一，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后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骂了一顿。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央再三督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以便给边区干部和群众做个交代，同时这也是“七大”的准备工作之一。康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夜不成寐，食不甘味。但他总是能找到出路——他让保安处写这个总结，而且要一部分一部分送给他。40多页的报告写好了，报告人应该是周兴，可是康生说这样的报告周兴不能做，要由他亲自出马。他在报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许多私货，诸如：“许多人生了病不就医，不治疗；又有些人抱着敌人的坦克睡觉而不自知，那么，旁人大吼一声，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对呀？！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

会后，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选自《中华英烈》89年4期，作者：师哲）

材料二 延安整风亲历记

延安整风运动，从准备时期算起，是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告一段落。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整风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但是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风学习，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到1943年10月。通常所说的1942年整风运动，就是指在全党干部中开展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整顿三风的目的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统一全党，指导中国的革命，为达此目的必须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客观实际，坐地莫斯科，吃着面包，背诵马列主义词句和第三国际（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指示来瞎指挥。说什么“要打阵地战”呀，“抗日战争主要依靠国民党”呀，“要一切经过统一战”

呀，……等等。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方针政策都要经第三国际批准，这种一直在第三国际领导下和斯大林指示下工作的经验，就容易接受王明的"左"的教条主义。周恩来在1941年8、9月间在重庆南方局向我们传达《增强党性的决定》时说："王明是打着第三国际指示的招牌，拿着斯大林指示的招牌回国的。当时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威望很高，因此，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开始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很难察觉，认为他是贯彻执行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一定是正确的。只有坚决贯彻执行，谈不上抵制了。我自己也是这样理解的，我当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王明教条主义'左'倾路线，如果一开始军队就坚决抵制，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就不可能有这样大。因此，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深知党内斗争的周恩来，又是政治局常委，在普遍整风开展前，已有所察觉，就主动作检讨了。这种认为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经验主义，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和斯诺谈话时曾说过：长征途中把电台密码丢了，与第三国际失掉了联系，这样也好，由我们独立自主地决定问题，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说："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

但在1942年2、3月间，青委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西北局的《西北风》等墙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3月下旬，王震到中央研究院看了墙上王实味的文章说："前方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一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李言《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为达到他所预想的政治目的，不得不亲自出马解决这横下里刮出来的这股"王实味风"。3月3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不从正确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毛泽东在"七大"时还回忆这一段时期他自己的看法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切实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整顿三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确的方法，一种是不正确的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方法。以正确的方法来整顿三风，三风必正。用不正确的方法整顿三风，不仅不能整顿三风，相反地，会做三股阴风的俘虏。"这种"好好整风"从4月7日起，在中央研究院开始了。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在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会上阐述了《四三决定》的精神，严肃地批评了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毛泽东的秘书也给王实味写信说，《野百合花》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这种错误的立场。"于是从5月27日到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关于"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开展了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康生为副。6日总学委会决定"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中央党校则于6月22日至7月4日举行考试，谢绝会客，开始了"关门整风"。

延安整风运动，由于康生成了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掌握了整风运动的实际大权，他那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顺风驶舵，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好在乱中夺权的政客手腕，制造了以潘芳、宗铮、王里、成全、于炳然所谓"反党五人集团"的冤假错案，向整风审干作典型示范，扰乱了延安整风运动。我们从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的讲话，看他是怎样制造这"反党五人集团"冤假错案的。康生讲话说："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问题也出来了。……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那时考虑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于炳然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斗了于，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个迂回。"

"群众没有觉悟怎么斗？我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开了五天会，不讲成、王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领导问题。把陈伯达骂得狗血淋头。……到了第五天他们夫妇（指潘芳、宗铮）两口子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到下午，骂什么问题？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王实味的人性论骂出来了？……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了托派分子帽子。"可

是 1945 年毛泽东说潘芳夫妇的问题是"黑夜里白刃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

中央党校在关门整风中，推行了康生这一套诱供逼供来欺骗群众，陷害好人的手法，挫伤了一些同志，尤其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干部。

1942 年 5 月 25 日，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总结第一个月的学习，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康生作报告，他说："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因此教育方面，老干部应着重在思想方法，新干部要着重在党在建设。"（延安整风运动纪事 139 页）中央党校在"关门整风"时是沿着康生的布置进行的。1942 年 7 月以后，中央党校开始批判李国 华的错误思想意识问题。李国华是工农老干部，他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说"为了一举成名，他要火烧大礼堂"。由于批判李国华发动大家敢于大胆提出批评意见了，于是开展了批判吴奚如的斗争。吴是文化人，曾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过少将衔的政治工作干部，本来连同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都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其中有许多进步文化人和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由于吴奚如是知识分子，又是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这就是康生所指出的"要着重在党的建设"，于是捕风捉影，大做文章，有的人在批判大会上大声疾呼，声振屋瓦地说"根据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条，我们与吴奚如的矛盾转化了，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通过对吴奚如的斗争，连续开展了对萧军、郭晓棠、魏泽同等知识分子干部的批斗。

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共产党员，赤手空拳，要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顽强的斗争，只能如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教导的，要社会化、职业化、做什么，象什么。才能隐蔽下来的。因此，我们初到延安，在生活作风上与解放区的生活作风是大不相同的。解放区的同志对我们看不顺眼，是可以理解的。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又有特务政策，党中央为了纯洁组织，审干时对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作为重点对象，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应当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绝不能以宗派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地下党员，主观地认为他们是特务，或是有问题的人；更不应该从主观想象出发，搞逼、供、讯，搞什么抢救运动，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搞什么"分析特务"。

1943 年 7 月国民党制造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中 16 个师，7 日关中防军受到胡宗南部炮击，7 月 11 日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运动的通知》中说："利用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机会，继续抓紧反奸细斗争。……号召他们在此紧迫时机，赶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即将以革命时期严厉办法处理之。……抓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和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动员结合起来，……"于是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展起来了。7 月 15 日康生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抢救失足者"的动员大会上，将他在中央社会部属下西北公学的一个 19 岁青年学生张克勤，被他逼供、诱供所得的材料，作为坦白交代的样板，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长，逼着张克勤在大会上大骂自己，坦白悔改。于是康生煞有介事地问大家，"你们信不信？我可以在中央机关抓出个特务排、一个特务连，一个特务营！"当时延安中央机关包括伙马勤务员，不到 5000 人，康生说可以抓出一个特务营来，果真如此，那么中央机关怎样工作呢?共产党又怎么是掌握真理的呢?于是中央党校由前任校长和现任副校长、教育长遵照康生的样板亲自搞车轮战，对一个毫无党内斗争经验和反特斗争知识的 25 岁青年魏泽同（武汉大学生）进行逼供。1985 年 7 月，我参加鄂西党史座谈会时，魏泽同告诉我在延安整风中中央党校对他进行车轮战逼供、诱供的情况，副校长还威胁地说，"你不要想滑过去，你的问题我天天向毛主席汇报的。"（实际上是向康生汇报。1988 年 1 月，刘英同志到长沙时我和她谈到延安中央党校关门整风问题，她告诉我，她在延安枣园与康生住隔壁，经常看到党校副校长去康生的窑洞。）这样逼出了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后，就以之作炮弹，把一些同志先肯定为"失足者"，然后来抢救他。开抢救大会，上级指控下级，下级揭发上级。记得中央党校开第一次抢救大会是在晚上，在大坪里搭起一个台子，党校副校长主持大会，他说：特务分子坦白是好的，"有一个宽大一个，有一千宽一千，有一万宽大一万。"不坦白的，"有一个杀一个，有一千杀一千，有一万杀一万。"当时延安县城党政军民不到两万人，如果杀了一万，又有什么力量保卫边区呢?这种对自己没有信心，夸大敌人力量的十足主观主义指导思想，来开展什么"抢救运动"，闹得人心惶惶，又怎能巩固内部，团结力量来消灭敌人呢?！无怪乎西安的国民党人为王实味、吴奚如等人开追悼会以推波助澜，尽量扩大我们的错误了。这次大会在副校长动员后，就有人上台检举豫西区党委书记王世杰有问题，就把他揪上台批斗，王对其诬陷严辞驳斥，又号召预先安排好的人上台指控，王坚不承认，副校长叫人当场把王世杰捆起来了。又抢救豫西区党委宣传部长郭晓棠，指名他领导过的干部上台揭发，郭一一据理驳斥，副校长大喝一声捆起来，又把郭晓棠捆起来了。我们站在台下的党校一部分学员感到杀气腾腾，不寒而慄后来知道当时对校部认为有问题的人，派人暗中监视，观其神色，向支部汇报，作为批斗的根据。这样诬陷罗织搞出河南豫西区党委，湖北鄂西特委，四川省委是"红旗

党”，从而怀疑国民党统治区其它省的党组织也是“红旗党”。而被所谓“红旗党”领导的下级组织和党员，即令无任何材料，它从分析出发，认为既然在“红旗党”领导下工作，执行了“红旗党”的那一套，就自然是有问题的人了。逼、供、信成风，分析特务成风，致使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屏被逼自缢。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人心惶惶，真假莫辨。幸喜张闻天看到康生将这些诱供、逼供出来的“坦白”材料汇集为《防奸经验》的小册子时，引起了注意，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于是任弼时、张闻天等亲自参加“抢救”大会，看到和听到了逼、供、信的实际情况，分析出这些所谓“坦白交代”的问题，大多是社会关系复杂的问题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问题，不是特务问题。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批评康生说：“你们过去认为没有特务，现在又是特务如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片面性。”于是，中央作出停止开“抢救”大会的决定。原定开10次“抢救”大会只开了3次就中止了。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他还接见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回到延安的部分同志，亲切地一一握手，对关门整风审干中受到损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并举手敬礼。由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承担了责任，又根据中共中央“九条方针”的决定，在整风后期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才排除了康生之流的干扰，使许多同志恢复了名誉。通过整风的实践，才使我们真正认识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之严重。通过整风，全党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

（选自《中华英烈》89年2期，作者：杨第甫）

材料三　毛主席纠正康生的错误

延安整风运动也出了问题。

毛主席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的目的主要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可康生作为整风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却把这次整风扩大到搞过“左”的所谓到处抓汉奸、特务、叛徒等群众性的运动。一时间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有那么一个晚上竟抓了成千成百的“特务”。

当时我也参加抓人了，但是被迫的，态度不积极。心里总是琢磨延安怎么会有这么多特务。积极的是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些人。康生说到那里他们就执行到那里。凡是从上海、河南、重庆、西安、甘肃、武汉、北京等地来延安的进步青年、学生、工人等，都有日伪汉奸和国民党特务的“嫌疑”。他们大搞逼供信，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审查、隔离、吊打……

我们三局二处的一个姓段的处长被康生指派为负责我们三局的整风运动。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对康生说的唯命是从。他在康生的授意下在我们的三局大搞抓人和逼供信，弄得一个无线电材料厂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成了日伪的“汉奸”和国民党的“特务”。如认为上海地下党介绍来的技术骨干力量的党员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认为从河南、河北抗日区来的是日伪汉奸；认为从山西来的工人是闫锡山派来的搞情报刺探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从山西来的铁路工人叫李贵浜，他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刺探”遭了严重的吊打；我们的副厂长孙俊仁是上海地下党派来的技术和管理骨干，因为不承认是国民党特务被关了半年之久；还有原一机部部长周键南同志也被关了一年之久。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下午。中央党校门前大操场上召开千人大会，四周都架有机枪。参加大会的是中央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我当时负责开发电机供全场的照明和扩音。

大会由康生的谢富治主持。他们俩人看着上千人的会场静得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象是很满意悄悄说了几句什么。而后康生喊道：

“把人押上来！”

被押上来的是三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他们分别是四川、甘肃、河南三省的地下党的省委书记。他们被强制地跪在台前。

台下的人都象心里揣着个兔子一样嘣嘣嘣地跳个不停。但谁敢说什么呀？只有全神贯注地瞅着台上。而且，表情上绝不能有一丝一毫儿对台上跪着的人同情怜悯的态度。如果那样，一旦被怀疑或指控与台上的“罪人”有什么瓜葛，那可是要自找麻烦到时后悔也来不及呢。

台上三位地下省委书记被如此五花大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四川重庆、河南曲山、甘肃天水等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被叛徒出卖了，并且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所以，康生、谢富治利用整风领导小组的名义，将这三位地下省委书记提来曝光。利用这个下午突然召开这大规模的审判大会。

这件事毛主席事先并不知道。

康生和谢富治在台上很是盛气凌人。

康生嘴里叼着山西的“五台山”牌香烟，看了一眼手表，严厉地说：“你们三个人坦白什么时候加入‘托派’的？只给你们十五分钟。不说就枪毙你们。”

台下的人都捏了一把汗。

我生怕发电机出了毛病两眼又不得不停地照看着机器。如果这时出了毛病，那岂不是有意和“托派”站在同一立场上吗？

不知毛主席从哪儿得知了康生擅自召开这个大会的消息，他和朱德总司令乘坐一辆苏联送的黑色轿车赶来。

毛主席和朱德下车后很快走上台。人们把目光都移在这两位伟人身上。

毛主席先没搭理康生和谢富治就操着急躁的湖南口音对持枪的警戒人员说："快解开，快解开。"

警戒人员立即从命。

三位省委书记肯定以为这是一场梦不知说啥才好。毛主席又和气地对他们三位说："起来，快起来。"

三位省委书记起来都用带泪而又十分感激的目光看着毛主席。毛主席这才把脸转向神情暗淡、面无血色的康生和谢富治，严厉地批评道："谁叫你们这样干的?!"

也许发电机也和长出了一口气的人们一样心情轻松了起来，响声居然比刚才高了许多。我赶紧去调发电机的电压。

毛主席从这件事中大受启示。他以真正伟大的气魄和真正对革命事业对人负责的精神，向全党及时发出指示：要各单位各地区纠正整风中的错误，要给那些被审查错了的同志平反！

所以，延安整风运动才没有发生更大的失误；才在中国革命史上记下了那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革命春秋》92 年 4 期，作者：贾逢春）

材料四　审干纪实

1943 年，我担任延安纬华毛织厂厂长时，延安审查干部开始了。外来的新干部大多在被审查之列。被审查的干部按情节不同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般的，在所属机关受审查；第二类是牵涉面比较大的，集中到一处受审查；第三类是问题严重的，由中央保卫部门或边区政府保安处拘留审查。

当年三、四月间的一个晚上，我被保安处逮捕。关进作为禁闭室的窑洞之前向我宣布了三条纪律：一是我的编号是"3"，以后即以此称呼，不叫姓名；二是同住人不准互问姓名、工作单位；三是不准互问案情。窑洞里已关了 5 人，都躺在铺有麦杆之类的地面上。见我进去，大家挤了挤，给我让出了一个铺位。

我那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是不知祸从何来；二是离家时说是去建设厅办事，通夜不归，家里人不知我出了什么事；三是我明天还有许多要办的事没有向别人作过交代。我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家里把被褥、换洗衣服、洗脸用具送来了，知道家里人已知我的去向，我的心情比较安定了。令我纳闷的是，同窑 6 人我是最后进去的，为什么把我编为 3 号？可能是原来的 3 号走了，我是补缺的吧。从此我对"3"这个数字有种不愉快的感觉。

禁闭室规定每天早饭后开锁放风，被关的人可以在各自的窑门口晒晒太阳，走动走动。解大便，倒尿罐也在这个时候。放风可以使被关的人了解点外情。几天之后，我对这里的情况有了些了解。犯人有两种：少数是钉了脚镣的，大多数不带刑具。我还发现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赵一峰，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也关进来了，赵一峰还被钉了脚镣。

在窑洞里，大家无事可作，就轻声东拉西扯起来。听口音我们这 6 个人可能都是不同省籍。年轻的 4 号可能是江苏人，他对中外文学都懂得一点，大家爱听他讲故事。山西口音的 1 号老哼山西梆子，而且总是那几句："大妞妞、二妞妞，二妞妞上街买香油，一交跌倒在大门外，不知道什么东西把她来绊。"2 号可能是河北人，他经常哼几句京调："可恨吕子秋为官不正，上得堂来一言不问，责打我四十板所为何来？"他们是在发泄胸中闷气，大家心照不宣。

1943 年七、八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有一天我们被集中到广场上听已定案的特务——田家三姐妹的坦白示范。这三个小姑娘也真有点才华，背起稿子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表起情来，悲欢啼笑样样逼真，搞了半天，让我们晒足了太阳才收场。她们的表演效果，从我们同窑的几个人来看，似乎作用不大。后来听说这是一桩错案。

接着在边区大礼堂开大会，我们排队被押送到会。台上挂"抢救失足者大会"的横幅；墙上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上台讲话的，有的是妻子揭发丈夫；有的是朋友规劝朋友；有的是自己坦白交代；也有的临时报名表态。最后，西北局书记高岗上台讲了话。他说，有些人的特务组织、破坏活动，我们都掌握了，但他就是不坦白，如果再顽固下去，就把他拉出去枪毙。

抢救运动对我没有能起抢救作用，反而给我背上了一个精神包袱。

我在拘留中，审讯的次数不多。每次审讯问的事主要是两要：一条是我本人的政治历史；一条是和赵一峰的关系。对第一条，我讲了我从一个爱国者到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并提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其中有和我同到延安的民大同学、现在保安处工作的李钊（即李修身）等。对第二条，我说明我和赵一峰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是到建设厅工作才认识他的，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工作认真的人，不知道他有其他什么问题。后来对我的审讯，第一条不大提了，对第二条还是在追，我回答的还是那一些。

这期间，我曾被带到在延河边上搭的一个席棚内观看"赵一峰特务集团的罪行展览"。展览内容有漫画，有图表，有具体文字说明。我看了之后不由不信，心想赵一峰可能是国民党派来的高级特务，手法高明，平时不易察觉出来。

回到禁闭室后，带我去看展览会的人要我写观后感想。我检查了自己在政治上幼稚，受了赵一峰的蒙蔽；还把工业局平日召开的会议、布置的工作，都作为伪装下的

特务活动来揭发。

此时，禁闭室内一般案情不再禁谈，还动员互相规劝坦白交代。我规劝了同室的、和赵一峰同案的董文礼，他坚决否认和赵一峰有什么政治关系。我对他说，我亲眼见过他们的罪行展览。他愤然地说，你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不真实的。我竟因此打了他一个耳光。我的这种行为，固然有看了“罪行展览”的影响，但也不无出自私心的、想表白一下自己的动机。这种行为表现了我那时的思想品质的一个侧面。事后愧悔莫及。历史的痕迹是不能用任何办法消除掉的。

全国解放后，我得知当年赵一峰等同志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那个“罪行展览”是主观臆造、无中生有的东西。这更加重了我的内疚，苦于无法解脱。“文化大革命”清队阶段，赵一峰等同志所在单位又来向我调查他们的历史问题。机会来了！我向调查人讲清当年情况，声明我在延安保安处的检讨和揭发都是错误的，必须撤销。调查人对此很不满意，向军代表作了反映。军代表找我谈话时，我坚持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我至今遗憾的是，赵一峰同志逝世了，我未能在他生前当面赔礼道歉。

话再讲回来。抢救运动后两个月左右，被拘留审查的干部大部分不再禁闭了。保安处把这些人组成了干部训练队，等待作结论和分配工作。各人的结论有早有晚，早的就早分配出去了。记得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哈尔滨接受去南满搬迁工厂的任务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召见了我，在谈话中我向他汇报了在延安受审查这段经历，他说他和王震同志南下时，曾在保安处调用了一批干部，这些同志都很好，作战英勇，有的在战争中光荣牺牲。

我在干训队，奉命搞生产自给，办起了一个被命名为“新生”的毛织厂，生产的毛线和毛毯很受市场欢迎。我对“新生”这个厂名很不满意。什么“新生”?我们是被审查的干部，审查完毕，没有问题恢复工作，又不是犯了错误的人改过自新。

1954年8月，我被分配去东北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10月初才离开延安。临行前，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党校讲话的传达。毛主席具体分析了这次审干的成绩和错误。他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表示道歉，风趣地说，我向你们敬礼，你们要还礼，你们不还礼，我的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听了传达之后，思想通了，愉快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选自《旧事琐谈》，作者：李正光）

材料五　抗大的“审干”运动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发出《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各大队、支部深入动员，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展开。

经过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我们对学员的情况大体上有个谱。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运动开始后，强调首先学好《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澄清模糊认识，打消顾虑，提高自觉性。在此基础上，转入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交代历史问题，书写自传。各单位对重点审查对象，进行了摸底排队。应当说，这段时间里，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可是，从10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负责人黄志勇，是个搞逼供信的专家。他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抓什么“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10月下旬，我去延安，和林彪、张宗逊主持练兵。练兵时，毛主席还来看过。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共有496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373人，占75%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12月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1944年7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选自《历史的回顾》，作者：徐向前）

材料六 李维汉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抢救"运动

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都是由边区政府系统总学习委员会领导的。总学委的负责人是林伯渠、谢觉哉、我是总学委委员，主持日常工作，实际负主要责任。我个人参加领导这一运动走了一段"之"字路："谨慎——急躁——谨慎"。

1. 比较谨慎。从1943年4月中全面铺开审干至2月22日坦白大会，我是比较谨慎的，步骤也比较稳妥，未发生大的偏差。

2. 逐渐急躁。1943年5月中，康生亲自召开以各单位审干核心小组成员为主的干部大会，令张克勤以"坦白典型"面目，作"坦白"动员报告。此后，康生令张克勤到处作报告，以"感召失足者坦白"。在这种气氛中，边府大礼堂也召开了坦白大会，"逼、供、信"开始抬头。7月15日康生进一步加大压力，作了"抢救失足者"的煽动性报告。在此以前，7月1日毛泽东已经写信给康生，明确提出"除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即审干的九条方针），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康生对抗毛泽东的指示。由于康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使他的报告带上了极大的权威性。此后，延安各机关出现了"抢救"高潮。

边区政府系统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开始，在十多天中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要他现身说法，劝说别人"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这时，"逼、供、信"已十分明显和突出。我开始有所怀疑，有所警惕，但还没有决心停止。第三次，控告。这次是我当主席，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我一看形势不对只好立即宣布把那个人逮捕送到保安处。但台下仍高喊"捆起来！捆起来！"这样一来，我清醒了，决定再也不开"抢救"大会了。

3. 复归谨慎。那时，康生等在中央机关许多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高等法院追王怀安是四川"红旗党"派来的。适值周恩来回延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事这回事。所以我们就没有追下去。

1943年8月18日，中央鉴于"抢救"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和恶果，正式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甄别所有案子。边区政府机关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帅孟奇任主任，周杨、王子宜参加。帅孟寄严格掌握政策，甄别工作做得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令人满意。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从1943年12月开始，到1944年4、5月甄别工作基本结束，有少数人的政治性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无从查证，拖到1945年初仍然做不出否定或者肯定结论，经逐级请示，最后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这样，受过"抢救"的人就全部甄别解放了。

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一、一定要注意防奸除奸，延安有特务，现在也还有特务，混进来的，变过去的；二、一定要保持领导班子的纯洁，防止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窃取领导权；三、一定要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避免迷信和盲从，正确地执行肃反政策。

（摘自《党史资料征采通讯》1986年第3期《回忆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一文，作者李维汉）

材料七 延安整风运动中河南党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经过及严重后果

河南地下党当年在延安参加整风的主要有两部分同志：一部分是1940年4月，河南省委根据中央通知，派刘子久、王志杰、张维桢、危拱之等十二位同志作为七大代表赴延安，因七大延期召开，除刘子久、张维桢奉命回河南工作外，其余代表全部留延安学习；一部分是1941年2月，党中央根据截获敌人的一个破坏河南地下党的情报，决定把河南"主要是豫西、豫中、豫西南、豫南地区"区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别撤退到延安、豫鄂边和豫皖苏根据地，当时的中组部长陈云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并指定王志杰、危拱之具体负责执行。根据中央指示，河南一百余名区级以上的干部，除少数撤退到鄂豫边和豫皖苏根据地外，其余先后于1941年和1942年撤到了延安。

1942年初，中央决定在延安恢复河南省委，王志杰任省委书记，郭晓棠任宣传部长，危拱之任组织部长，苗化铭任秘书长，原省委书记张维桢调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2月1日和2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和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张维桢、邵文杰等直接听取了报告，其他同志听了传达报告。从此，在延安的河南同志正式开始了整风学习。

1942年冬，延安整风开始转入审查干部阶段。审干开始，康生在西北公学搞试点，采用逼供信，车轮战的手法，把甘肃省一个青年党员张克勤打成了所谓"红旗党"分子，迫使张编造口供，承认甘肃地下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

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随即以“抢救失足者”为名，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把河南等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打成了“内奸”、“特务”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旗党”大冤案。

1943年2月，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从马栏被调回延安中组部隔离审查。负责审查的人员对杜说：“河南省委王志杰、郭晓棠、张维桢，危拱之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你家属是从敌占区来的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硬逼着杜承认“是特务，是叛徒。”因杜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也没有被捕过，交待不出来，他们就拿一条麻绳放到杜的面前，威逼说：“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在此情况下，杜被迫承认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根据是家乡杞县沦陷被日本人占领，来延安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承认后，又让杜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

1943年3月，中央通知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5月，留在关中工作的同志也奉命回到延安，分别在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招待所、行政学院等单位接受审查。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利用逼供信得来的材料，公开点了杜征远的名，胡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

8月，“抢救运动”进入高潮。在康生亲自指挥下，不少单位大搞车轮战、假枪毙、打人、吊人、逼供信等违法乱纪行为。在中央党校召开的一次坦白大会上，康生坐阵指挥，要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会议开始，首先把郭晓棠揪上台。郭晓棠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也不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继而，把王志杰揪到台上，并限令五分钟答复。王志杰实事求是，大声宣布说：“我是北方局派到河南去的，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我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大会主席当即制止了王志杰讲话，宣布开除王志杰、郭晓棠的党籍，把王志杰、郭晓棠捆起来，押到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隔离审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志杰才恢复党籍，被派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直到1950年才恢复，1956年才分配适当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中央党校受审查的原省委书记张维桢，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洛宁地委书记邵文杰，在中央组织部和中组部招待所受审查的省委秘书长苗化铭，省委组织科长赵天锡，在行政学院受审查的省委宣传科长蔡迈轮等，都先后受到了假枪毙、车轮战、疲劳战、逼供信的摧残。

总之，在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中，河南的地下党员和与河南地下党有关系的同志，统统都被当成“红旗党”挨整，从省委书记、部长到一般党员干部，以至从河南来的党外干部，家属和十三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结果，河南地下党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被整成了“特务”、“叛徒”、“敌探”、“奸细”等。这就是所谓河南党是“红旗党”的由来。

正当康生迫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把水搅得越来越混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针对“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严肃地批判和否定；逼供信的作法。从1943年12月开始，中央又发出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要求对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经过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同时强调在审干反特中，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根据中央指示，各部门于12月底开始进行甄别工作。这时，把一批认为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到了桥儿沟，组织了一个特别班。河南地下党的蔡迈轮、苏振华、王景琦、杨战韬、姜玲等都被送进了这个班。经过甄别，河南地下党的同志，绝大多数都作了无问题的结论，少数同志的问题被暂时挂了起来，以后也逐步得到了解决，并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他们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证明，康生把河南党组织诬陷为“红旗党”是完全错误的。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抢救运动”的影响，这个问题又被重新翻腾出来，使许多同志再一次遭到诬陷和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郭晓棠在河南首当其冲，以“叛徒”、“特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上被点名批判，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含冤逝世。杜征远、许遇之等，也因被康生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点过名，再一次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摘自《河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一文，作者张文杰）

大生产运动

背景介绍

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上华北地区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1941年和1942年，解放区的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极度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又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党中央领导解放区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了实现这个总方针，党中央根据解放区处于长期游击战争和农村环境的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具体方针。这就是：(一)根据农村人力、物力分散的特点，在生产和供给上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二)根据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军民需要，提出大生产运动必须采取以发展农业为主的方针。(三)在发展农业生产中，规定在农民自愿互利原则下，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四)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的方针，使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所发展，军民生活都得到改善。(五)军队和机关必须进行生产，实行生产自给的方针。上述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力更生"。

在党的上述方针政策指导下，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边区的军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把大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亲自在杨家岭开荒种地。周恩来尽管手臂负过伤，还带头学习纺线，他和任弼时还参加过中直机关的纺线竞赛，以优异成绩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除了给部队勘察土地，规定任务，督促检查外，还亲自开荒种地。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的部队有"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凤川等地的屯田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姿态，开赴荆棘丛生、渺无人迹的南泥湾，实行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他们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除了开垦旱田、水田，发展畜牧业以外，还创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造纸厂，有了自己的盐井、炭窑、磨坊、油坊、骡马店。1942年，粮食就自给了一部分，蔬菜、肉、油及鞋袜全部自给。1943年，做到了粮食全部自给。1944年，做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不仅有积余(做到"耕二余一")，而且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粮食。经过全旅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共开荒耕种了三十五万亩土地，打了一千多孔窑洞，建起六百多间平房，置了一万多件家具和农具。昔日野狼成群的荒原，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边区的机关、学校也达到了绝大部分自给。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产了六千石细粮。

边区的广大农民也热烈响应党中央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极投入垦荒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延安县、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等许多先进单位和大批劳动英雄。由于边区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1941年到1943年，共开荒二百万亩。

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也有颇大发展。到1942年，边区的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近四千人，年产土布十万匹，并能自己炼铁、炼油，修造小型机器，配置军需品，制造硝酸、盐酸、硫酸和陶器等。到1943年，边区军民已克服了经济困难，渡过又难关，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境地。

敌后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于1942年开始，至1943年便发展成为普遍的运动。各解放区军民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在频繁的战斗环境里，不仅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游击区和敌后之敌后，也开展了生产运动。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利用一切闲散土地开荒耕种，并创造了许多既便于进行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如民兵联防警戒敌人，提出了"不让敌人抢去一头牛"的口号，而农民则抢种抢收，提出"不荒一亩地"的保证。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不仅要进行自给性生产，还要用武装掩护群众的生产，甚至抢种敌人堡垒下的土地。此外，根据地还进行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六个地区，就扩大耕地面积六百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太行区能自给三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其他地区一般也能自给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实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通过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战胜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物质困难，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人民负担逐年减轻，军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大大巩固了解放区，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大生产运动，又增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造就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材料：

- 六十八位老英雄
- 杨朝臣一把锄头开荒
- 大生产运动中"二流子"的改造工作

材料一　六十八位老英雄

本报讯　××村的山沟里，那里有六十八个年老的、残废了的抗日军人，他们在精兵政策的号召下，现在都集拢在这个"老人队"里了。他们的腿虽然已经被鬼子打坏，但是他们还有手，这手还可以制造抗日的物质力量，他们就利用它来编制筐篓，每天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他们面前就可陈列着两个精巧的筐子了。其中也有做挂面的，也有磨豆腐的，也有开铺子的，手足俱全的"老人"们，每天

一清早就起来，带着斧头上山砍柴去。他们自己烧木炭，编草荐，还要生产更多的东西，把它卖出去，改善自己的伙食。“老人”们的脸上虽然刻画了重重的皱纹，但是他们从来是不服“老”的，有一位老同志在整编的时候，听说要把他编到“老年队”去，他的脸都气青了，他发恨地说：“好小子！谁说我老，就来拚拚赛跑吧，看谁个掉队？！”他说八路军是他的家庭和学校，他死也不肯离开它。当指导员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了精兵简政和抗日的道理之后，他们想通了，他们拭去横流在面部的热泪，轻轻地从身上卸下他们亲手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来的三八式步枪，……现在他们时常背着柴火到市镇上去出售，他们哼着健康的调子，他们说：“昨天参加队伍，赴汤蹈火，为的是抗日；今天离开队伍，减少消费，增加生产，也为的是抗日。”有一天，当他们背柴的队伍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恰巧给团长看见了说：“这些生产岂不太笨重吗？你们是对于抗战有功劳的老英雄。……”并谓“还是做些轻便的工作吧！”团上就从别项开支上拨出了一万元的经费，这样，他们就有了生产资金了。从编队到现在虽只有一个多月，在教育、娱乐、生活方面，还有待更多的改进，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和各营弟兄共同的努力，他们的生活已逐渐走上正规了。

（载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材料二　杨朝臣一把锄头开荒 去年收粮十三石　今年买牛驴扩大生产

安塞一区讯　本区各乡近发动劳动英雄选举，由人民选出去岁积极生产者十五名。而其中当以四乡之杨朝臣为最好。按杨朝臣同志过去系某部队之伙夫，因病退伍，后即迁居本区四乡之小桥沟。他在去年由区政府拨给土地，自己用公家所发的六十元退伍费购买一把锄头（八元），藉此生产。去年共开荒十三垧半，且与别人伙种两垧地，全年收获谷糜共十三石五斗，并收得小麻子六担五斗，菜三十袋，干草二千余斤。他仅仅依凭一把锄头，获得了这样丰满的收获。今年，他已另作打算：把二石五斗粮粜出后，买了一头耕牛；用四斗粮换了一条小毛驴；用一石粮换了一头肥猪；此外，并购得日用品及农具。杨朝臣不仅是一个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且是一位积极拥军者。他说：“我是干过军队的，公家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因此便要积极生产，帮助军队打日本。再呢，我是一九三一年入党的老党员，应该给群众做模范。”区委的同志以本年边区两大任务告杨朝臣，询其在生产方面有何计划？他回答说：“不怕，我保证响应，去年秋季开荒，我已经开了五垧地，拾了七十多袋粪，今年当比去年生产增多！”杨朝臣为什么会获得这样惊人的成绩呢？据记者调查：（一）他注意施肥，去年十三垧地共上粪一百二十多袋；（二）别人只锄两遍草，而他锄三遍甚至四遍；（三）别人掏地四五寸深，他掏一尺深，且把土打碎；（四）鸡叫即起床吃饭，然后携带饭罐上山，天黑才回家；（五）一年到头都在劳作；春夏忙于耕作，农闲仍作副业。

（载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

材料三　大生产运动中“二流子”的改造工作

改造了“二流子”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大成果。烟鬼、赌徒、小偷、土娼以及不劳而食、不务正业、有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飘风浪荡、宣扬迷信、挑拨是非、偷糜盗谷、偷驴盗马等行为的人，边区群众把他们称之谓“二流子”。当时这种人在边区有相当的数量。边区政府认为如能改造好他们，发动他们参加生产，将是一支不小的劳动大军。为了严格区分“二流子”的界限，边区政府制定了判定的标准，首先看他是否有正当职业和对生产的态度；其次，看他们生活是否腐化，养不养家以及做不做违反法令的事。具体标准：(1)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2)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3)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如有不良嗜好，但不靠违禁品为生活；参与赌博介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有不良嗜好或“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据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有人口不到3000，而“二流子”将近500，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的人口为3000左右，“二流子”有1629人，占5%。这表明了边区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前“二流子”之多。如果以延安县“二流子”占人口的比例来推算全边区，则整个边区140余万人口中就有“二流子”7万人左右。为了尽快改造好“二流子”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终于使他们得到转变，有的甚至成为劳动英雄。

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得最早的是延安县和华池县。1937年延安县就采取各种方法动员了299名“二流子”参加开荒发展生产，第二年即使578人变成了劳动者。从此，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造“二流子”的工作。但是，对“二流子”改造只是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出来，还没有发动全边区群众重视改造“二流子”。直至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后，才使边区改造“二流子”工作提到日程，并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便成了边区的普通群众运动。

当时，党和边区政府对“二流子”的改造所采取的方法是：

①发动群众评价“二流子”，待确认后再由政府进行逐一登记，并给顽固者挂上“二流子”牌（身上带白布条）；改造好者除名去牌；②干部分工负责，进行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区乡干部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地区及职权

范围内"二流子"的改造；③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实行全社会教育监督。这样，便形成了改造"二流子"的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广大群众积极协助政府做好"二流子"的转变工作。政府各部门也加强联系、指导，综合施治。经济部门给"二流子"分别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说服教育，文化教育部门施以科学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教育，文艺部门还编排了许多改造"二流子"转变的剧目，促进其改造；④区别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即"对症下药"。对于那些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治安，违反政府法令的"二流子"，则采取一些强制和半强制的办法，同时还采取了让"二流子"寻保人做为改造的辅助措施，使"二流子"自觉接受保人的批评、教育，也使保人有权利和义务管理他们；边区政府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组成农业、手工业、纺织等生产小组，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⑤完善各项法令，专设改造机构等。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努力，改造"二流子"的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延安县的 1692 名"二流子"，到 1941 年减少了 72%。到 1943 年初，全边区 9544 名"二流子"在一年内就改造了 5587 名。"二流子"刘生海在一年内就改造成劳动英雄，并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受到大家的推崇。他兴奋地说："想不到曾是'二流子'的我，也会有今天，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地对待我，以后更要好好劳动。"边区"二流子"的改造，促进了生产运动。

（选自《党史博采》94 年 7 期，作者：成国银）

1943 年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背景介绍

经历过 1941、1942 年的困难时期后，1943 年，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地得以恢复和发展。尽管日伪军反复采取"跃进蚕食"，"军事清乡"等手段，也扭转不了失败的命运。我军继续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的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了抗战初期的记录。到 1943 年底，我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 47 万，民兵 200 余万，解放区数目已达 15 个，人口达 8600 万。鬼子的"扫荡"和"清乡"彻底破产了。

材料：

- 苏中反"清乡"斗争
- 鬼子"清乡"的破产
- 为民除害—打死土匪刘黑七
- 反"编保甲"的斗争
- 哑巴吃黄莲
- 日本军官战地观战团覆灭记
- 战斗在华南敌后的东江纵队
- 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麻雀战"

材料一　苏中反"清乡"斗争

1943 年春，日伪决定将"清乡"重点置于对它威胁较大的苏中抗日根据地，以苏中的第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作为第一期"清乡实验区"。他们计划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军事清乡"，为期两个月；第二步"政治清乡"，为期四个月。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寇抽调有"清乡"经验的第 61 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作为"清乡的机动兵力；选调坚决反共的伪军担任"清乡区"的封锁和据点守备的任务；调集大批"清乡"警察、特工和伪行政人员，随军担任"清乡"任务；并搜罗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作为"清乡队"的爪牙，共约一万五千人。

4 月 1 日，日伪对通、如、海、启地区开始发动"军事清乡"。敌采取"梳篦"、"拉网"战术，分几十路向我各中心区合击，并在"清乡区"边沿赶筑了绵亘二百余公里的封锁篱笆，派兵扼守，妄图限制我军机动，进而消灭我军。当敌伪开始"清乡"时，我大部主力即向敌后方和交通线进击，先后打进唐家闸，袭击聚星镇、平毁古坝等据点，并在公路上不断伏击敌人，随即转到封锁线外继续攻打敌人。留在"清乡区"内的精干主力和地方武装，则在敌伪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清乡队"，并发动群众，迅速组织起了以党员、民兵为骨干的锄奸组、狙击队，广泛开展杀敌锄奸活动，使汉奸敌特陷入群众游击战争中寸步难行，处处遭到歼击。

敌伪经两个月"军事清乡"之后，即部署"政治清乡"，妄图 6 月强化启东，7 月强化海门，8 月强化南通，9 月强化如皋。6 月初，敌伪调集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于启（东）海（门）地区编查保甲，并四处寻找地主士绅、旧乡保人员，组织"编查委员会"，企图通过他们达到所谓"和平编查保甲"的目的。我即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发动群众掀起反对编保甲的斗争。一批"清乡"人员被我镇压，不少地主士绅经我进行教育，又慑于群众的威力，一般不敢出头，致使敌之"和平编查保甲"的阴谋又遭失败。随后敌就采取"武装编查"和"强化编查"，在启东一个区内就集中六百余名武装，配合保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编查，并四处"兜剿"我武装人员。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我军除动员人民迅速向封锁圈外转移疏散外，只留下老年人应付敌伪；还以小股武装在敌伪据点附近和"清乡"人员必经的道路上进行袭击，使其不能顺利进行编查；并在各阶层人民中进行民族气节教育，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基

本上制止了地方士绅的通敌行为。当敌伪集中力量在启东海门地区编查保甲时，我主力一部于7月初进到南通地区，开展大规模破袭战，袭击据点，破坏封锁篱笆，仅一夜之间，我军民就烧毁封锁篱笆二百余里。在我积极斗争下，迫使集中启海地区的敌人匆匆回援。当敌人回缓后，我启海地区军民又趁机开始反保甲、反伪化的斗争，摧毁了保甲组织。这样，敌伪分区分期进行"政治清乡"的计划也被打乱了。8月以后，敌伪改取"机动清乡"，一面寻歼我军，一面强编保甲，更加暴露了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而我军民几个月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又促使伪军、伪人员发生了普遍动摇。针对此种情况，我军民自8月15日起，对整个"清乡区"的敌伪发动了一次全面政治攻势，敌伪"清乡"人员和伪乡保甲长前来投诚的日益增多。9月6日至18日，我又发动了全面的军事攻势，敌慑于我军民浩大的声势，龟缩据点，不敢出动。9月底，南通境内的金沙、三余、石港等十几个据点中的全部伪军举行了反正，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事攻势，使敌伪的"机动清乡"也告破产，整个"清乡"的伪化工作陷于停顿。

日伪六个月"清乡"计划遭到失败后，乃"延期清乡"三个月，以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我为避敌锋芒，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确定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军事活动，加强秘密的合法的斗争。为配合中心区斗争，我主力在边区和敌伪据点附近分散游击，侍机积极打击敌人，并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回旋余地。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斗争，我第四分区军民再次粉碎了敌伪的"延期清乡"计划，保持了有生力量，坚持了原有阵地。我苏中四分区的党政军民，在九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镇压"清乡"人员计二千四百余人，并争取了一千七百余名伪军、伪人员向我投诚。而我军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县、区、乡三级党政干部牺牲和被捕者即达二百余名，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更加巨大。

苏中反"清乡"斗争，严重挫败了日伪的"清乡"计划，而我军民则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斗争经验，为彻底粉碎敌伪的"清乡"奠定了基础。

（选自《抗日战争事件人物》）

材料二　鬼子"清乡"的破产

斗争仅仅只开了个头，更激烈、更残酷、更复杂的争夺战，还在后头。据说，敌人的"清乡"是分为三个步骤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叫做"安民时期"；第二步是"政治清乡"，叫做"训民时期"；第三步是经济文化齐来，叫做"新民时期"。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敌人用"梳篦"、"剔抉"等战术，向四乡扫过几遍后，密密麻麻安了些据点，自以为军事计划已经实现，从六月份开始了"政治清乡"。每天出动大批的特工人员，利用伪组织，一个村一个村编保甲，清查户口，挂门牌，发"良民证"。他们的口号是"保甲编成，清乡完成"。于是，反保甲制度，又成了一场最尖锐的斗争。

这时，启西区的局面不好，需要主力支援。我们得到消息后，连夜率领二连赶去。路经庙桥镇附近，月光下，只见每家每户都紧闭大门，门上全挂着个牌牌。王澄同志说："看看门牌上，到底是什么名堂！"

我应了一声，两个人向一个大门走去。借着月光，瞅了又瞅，只见一块木牌上写着：户主姓名、年龄、男儿口、女儿口……

"这鬼办法，又能整住我们不成！"王澄同志愤愤地说。

也许话音和脚步惊动了院里人，大门轻轻开了，一个老人探出头，瞅了半天，认出了我们是新四军，既不让进家去，也不说句亲近的话，只是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出几块钱挂上这门牌，再不要跑反了！"说完慢慢地把大门掩上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心里沉甸甸的。更严重的问题是，面对这种局势，区委的部分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消极退缩思想。他们不在困难的区域领导群众斗争，全部退缩到号称"打不破的铁皮乡（正诗乡）"去了。针对这种情形，县委在正诗乡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严肃地批判消极退守思想，调整了干部，指派团总支书记陶采神同志下放到区任区委书记。会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正诗乡，所以能成为"打不破的铁破皮乡"，并不是真有一层"铁皮"，而是这里的党和群众团结一心，不畏敌，不气馁，英勇斗争的结果。敌人的据点——圩角镇就近在咫尺，"清乡"特工也三番五次来，天天叫嚷着编保甲，可是，正由于正诗乡党政军民勇于斗争，使敌人编不成保甲，挂不上门牌。会议中，新任的区委书记陶采神同志说：

"正诗乡能够成为'打不破的铁破乡'，别的乡为什么不可以呢？问题是在创造条件，一句话：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摆在眼前的事实，活生生的榜样，教育了大家，使一些一度失去前进方向的同志，头脑清醒过来。

会后，我们立即又分头出动，到处介绍正诗乡的斗争经验，并根据地委指示，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伪区以上的保甲工作人员。行动队争先出动，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先后把北新镇、麒麟镇等地的伪保甲指导员、保甲训练班全部搞掉。启西区在陶采神同志领导下，仅仅经过十天的工作，七月三日一声号令，全区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门牌剥下，焚烧得一块不留。

这时，跳到"清乡区"以外的我军，也在各地积极配合行动，七月初，发动了八十万群众参加的一个规模空前的

破击战，把由南坎到天生港敌人设置的二百余里长的竹篱笆，在同一个晚上，烧得精光。我军主力一部，还积极地向通西、通中、南通地区挺进作战……

敌人的"政治清乡"遭此重大挫败以后，并不甘心，又采取"强化"编保甲。办法是，集中五六百兵力，包围住一个保，编成以后，再编另一个保。当时的海中区，是敌人称为"红祸最重、受毒最深"的区，因此"强化"编保甲的头一个目标，便是海中区。县委得到情报后。连夜进行部署，我们和"腾腾腾书记"陈清同志，先后赶到了海中区同仁乡。

第二天，敌人果然出动了。一大早，就以突然袭击，包围了同仁乡的一个埭。伪乡长徐沛在他的"皇军"保护下，带着一群乡丁，鸣锣呼叫，要全埭的人去开会。埭里的民兵和青年人，早已按计划转移了，等留下的百十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稀稀拉拉走进会场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伪乡长一看来的这些人，鼻了都气歪了，恶恨恨地骂道："你们这里是寡妇埭？男人都死光啦？"

一位老人，慢吞吞地答道："这几年，青年人死是死了些，还说不上死光！"

"那么人呢？都到哪去啦？"伪长问。

"老百姓各人有各人的生计，"老人说，"大家又不知今天开会，出门去啦！下次'皇军'要来，早通知一声就好啦！"

伪乡长干鼓肚皮，说不出话来。便挨个去问妇女们，家里几口人，叫什么，多大岁数。妇女们都按事先编排好的，报名道姓。有真的，也有假的。甚至连死了多年的人的姓名，也报了出来。伪乡长突然从人群里拉出一个孩子，喝道："你说，姓什么？家里几口人？"

大家一看，不由得捏了把汗。这孩子是村干部黄志高的儿子，还不满十岁，他要吐了实话，那可糟啦！谁知，这孩子十分机灵。面不改色，不加思考，开口就说：

"我叫陈小毛，家有四口人，爸爸是做小生意的，上青龙港去啦！"

"呸！胡说！"伪乡长吼叫着："不讲实话，枪毙了你！"

"我是叫陈小毛，谁给你胡说哩！"孩子眼皮也不扑闪地说："你不信，等我爸爸回来问！"

伪乡长找不出破绽，放开孩子，又去问一些妇女和老人。老人们有的装聋作哑，有的打迷阵；妇女们有的说东，有的道西。闹腾到天快黑，民兵和区队在村外乒乒乒乒打了阵枪，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新四军来了！"大伙便一哄而散。伪乡长和"皇军"，也就夹起尾巴溜走了。

晚上，我们回到埭上，又是一番景象，人们拿着伪乡长发给的门牌，吆喝着："烧！快烧勾魂牌！"孩子们到处唱着：

门牌是亡人牌，户口簿是阎王簿，
册子上了名，将来跑不成。
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
哪个写我名，等死不如拚。
谁要编保甲，人人都可杀。

过了几天，敌人又来了。群众得到情况，早已跑光了。一个老人很有趣地对我们说："铁将军把门，灶王爷看家，鬼子编保甲，请他编菩萨！"说得大家哈哈直笑。

保甲编不成，敌人扬言烧房子，并把六百多敌伪军分散开，安上十三个临时据点。我们研究了斗争形势，认为一股劲硬斗群众损失大，又施出一计，组织了几个上年岁的人，去找伪乡长说："你们不能只给老百姓苦吃，门牌都是新四军撕的。你们有枪来编保甲，他们有枪来撕门牌，这叫老百姓有啥办法？"

斗争继续下去。有明争，有暗斗。，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他们虽然放火烧了些房屋，抓了些人去，可是，十二八天过去了，敌人在海中区没编起一个真正的保甲。伪乡长徐沛的脚踝骨也被民兵打断了，这条走狗躺在据点里，天天挨鬼子的骂。

敌人在"政治清乡"的同时，还有所谓"经济清乡"和"文化清乡"。但他们的"军事清乡"、"政治清乡"没有实效，也就乱了步子。在经济、文化的战线上，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们四分区，盛产粮、棉、鱼、盐。敌人为了掠夺这些物资，一方面公开的下乡来抢，另一方面又实行经济封锁，广设税卡，加捐加税。我们就发动广大的群众，反掠夺，抗捐税。当时，我们的海东区二揉镇，曾经是一个热闹的集镇，又是个水陆码头。为了对付敌人来收税和设据点，和群众商量后，把全部的房屋拆掉，并在离镇几里以外的十字路口，开辟了一个临时市集。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新开的市场，只见民兵在四面放哨，商贩就地出摊，买的买，卖的卖，熙熙攘攘，生意十分兴隆。海货、文具、花布、皮鞋等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敌人一出动，远处的"情况标"——长竹竿上扎个草把——就一竿竿倒下来。赶集的人看到这标竿一倒，便快快地收拾起挑子，按规定的路线转移了。等敌人到来，这儿已经又变成了一个空场。这个市场，群众起了个名字，叫做"朝天镇"。

王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赞不绝口地说："好好好，没有深山密林，没有湖泊港湾，可是有人的山，人的海，我们总有办法。这个'朝天镇'是一大新创造！"海东区区委书记梅永熙同志向我们说："我们不光有'朝天镇'，还有'游击课堂'哩！"我们问他："什么叫做'游击课堂'？"他解释说：为了对付敌人的"文化清乡"，不读敌人发的课本，许多学校也都把课堂搬到野外来了。他说着指指远处一个农妇："喏！那就是我们'游击课堂'的老师！"

我顺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妇女穿一件茄花色土布衣裤，头发拢在帽子里，一手提一只篮子，拿一根竹竿，一手拉着个八九岁的女孩，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等她向我们打招呼，才认出：她是去年冬季实行"精兵简政"

时，从分区机关下来的一位女同志。她挎着的篮里，有课本，有作业本。

"今天还上课?"我问了一句："据点里的敌人出动了。"

"他们出动他们，我们上我们的课!"她笑着，自豪地回答。然后，很熟练地把竹竿插在地上，又往竿梢上挂了一块红布，远远看来，象是一面小红旗。她告诉我们说：她的学生看见这个标帜，会从四面八方跑来的。

果然，不多一会儿，三十多个男孩子女娃娃，跳跳蹦蹦，从四面八方奔来了。又是笑，又是唱，使这个空旷旷的田野，顿时热闹起来。女教员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坐下来，掏出课本温课，响起了一片读书声。

看到这番情景，我们感到莫大的鼓舞，越发觉得敌人的"清乡"实在不能把我们怎么着。

三

斗争的浪头一个比一个高。我们胜利地渡过了三个月。

八月初，地委在如东县苴镇召开了会议，总结了三个月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新的任务。于是，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捉黄狗"(伪军)、"打鬼子运动"。黄仓镇鬼子的一个小队正集合，曹长被打死了。许多据点受到了袭击，闹得汉奸头子张北生躲在南通城里悲哀地说："我是落泪清乡啊!"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就有可能改变反"清乡"初期以镇压为主的政策。民主政府颁布了"自新条例"、"记红黑点条例"，广泛深入地开展对伪军和伪政权工作人员的政治攻势。许多据点里的伪军纷纷动摇，主动地和我们拉关系，找出路。海中区区长蒋拔同志，向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叫张泽清的同志在富安镇收公粮，正过秤，来了个伪军中队长。张泽清同志向他说："这是给四老爷(指新四军)收的公粮，你客气点!"那伪军中队长忙说："是，是，我知道老兄给四老爷办事，特来拜托保护的……"另外，我们还听说这样一件事：民主政府颁布"自新条例"以后，一天，一个叫陈廷刚的伪"清乡"人员，向我们的行动队自首来了；他刚办理好自新手续，伪情报主任突然出现了；他两个人你吓唬我，我吓唬你，末了知道走的同一条路，相互说："咱们走在同一座桥上，谁也别挤谁，一块走吧!"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反"清乡"的力量，围困敌伪据点，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夜，全县来了一次总动员。一声号令下，各乡的民兵全出动了，有拿枪的，有拿刀的，也有拿钩镰、锄头的，有男也有女，有老也有小，人们呼叫着"打倒东洋鬼子!""打倒汉奸!"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拥向伪军盘据的海复镇、富安镇、曹家镇、二摞镇、中央镇、日新河、聚阳镇……这声势，那气魄，正象一个老汉对我们说的："不得了，不得了，简直象跌翻了罐里的赤豆，遍地滚啊!"

逼近敌人据点时，民兵们打枪扔手榴弹，没枪没弹的燃放鞭炮，有的还把鞭炮放在空煤油箱里点燃，那响声就好象机关枪。没有鞭炮的敲锣，打铜盆，人山人海，包围着据点呼叫："德国败，日本快，不投降，见阎王!"这呼声，似乎能把天吼垮，地震塌；这呼声和江河的怒潮汇成了一片!

这个总动员、大示威，把全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伪军、伪"清乡"人员变成了过街的老鼠，跑到哪里，哪里喊打。一些小据点被围困得没米、没柴、没菜蔬，最后不得不自动撤退。从几个大据点里传出消息：鬼子兵夜晚抱头大哭，还说一个据点里有两个鬼子绝望自杀了。"九一八"之夜，我们又一次来了个全县动员。破公路，砍电线，围据点，最后把敌人各据点间的联系切断，使他们点不成线，线连不起点。我们则从被分割封锁的局面中，又彼此连结起来。此后，敌人又搞所谓"强化清乡"、"高度清乡"的新花样(又称"流血清乡)，也不能挽救其既成的败局了。

(洪澈，《星火燎原》之七)

材料三　为民除害——打死土匪刘黑七

这天拂晓，老乡和战士们都还没有起床，我便带着几个连长，悄悄地换上便衣，离开驻地。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鲁南根据地虽已改变"东西十余里，南北一线牵"的困难局面，但汉奸惯匪刘黑七依然盘踞在费县一带，烧杀抢掠，摧残群众抗日活动，严重地影响着根据地的建设。军区首长决心歼灭刘黑七，恢复鲁南原有局面。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三团。我们几个人就是去侦察刘匪的巢穴——鄠子庄周围的地形和内部设防情况的。这是对付一个异常狡猾的敌人，因此行动必须绝对秘密，即便微小的征 候也不能暴露。

刘黑七，是惯匪刘桂棠的别名。他在鲁南土生土长，十几岁上就开始拦路抢人，聚众烧杀，逐渐成为一股庞大的匪帮。人们根据他面色如炭的长相，在匪伙中又排行第七，给他起了个"黑七"的诨号，他也恬不知耻地在江湖上沿用起来。这伙匪徒，二十多年来，流窜华北各省，干尽了坏事。单说抗日战争前洗劫鲁南寺彦村，一次就杀害了七百多人。在黑暗的旧社会，官、匪本来就是狼狈为奸，所以不论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刘匪始终逍遥法外。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投降日寇，充当日寇进攻山东的马前卒。一九三九年，他又重新和国民党顽固派挂上了钩，蒋介石给了他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以后，他再度投降日寇，挂上了伪"和平建国军"十军第三师

师长的头衔。刘黑七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两方面领军饷，他的部队也都有黄、灰两种颜色的军装。既官既匪，亦伪亦顽。我军曾几次讨伐，只因没有全歼，刘匪就更加疯狂起来，时常吹嘘：“八路军是强龙，也难降我这地头蛇嘛！”我们一路谨慎小心，待快到鄄子庄时，先找了个山村潜伏起来，直到黄昏才又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具，继续上路。

我们十点多钟，赶到鄄子庄外，分头钻进离围砦不远的坟园，利用树林接近围砦。一进树林，树上的栖鸟被惊醒了，小鸟扑拉着翅膀，吱吱喳喳地叫着飞散。好在围砦上的敌人没有在意，我们静待了片刻，才又继续接近围砦，察看外壕。

不想，在察看围墙时，一个同志不小心把沟沿上的石头踩响了，惊动了墙上的岗哨。哨兵连声大喊：“什么人？”我们趴在沟沿上，一动也不动。敌人已有警觉，监视得更严密了。我们本来想捉个“舌头”，现在看来已不可能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有些埋怨那个弄出响声的同志。

就这样回去？任务没有完成。每个人心里都象油煎似的，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围砦西北的一座军事术语上通常说的“独立家屋”，引起了我们这伙人的兴趣。据观察：是两间小屋，还有围墙环绕，茅草门楼下大门紧闭，不象无人居住的闲房，也不象驻有敌人。我低声和大家商议之后，决心在这里试试“运气”。

我们跳墙进去，叩弹了几下房门，轻轻喊道：“老乡！”屋里没有答应，有的同志又失望了。但我还是没有死心，又继续叩门。等了好久，“吱呀”一声，房门居然开了。一位满嘴胡须的老大爷半披着大袄，上牙打着下牙，瑟瑟抖抖地走了出来。为了不暴露我军意图，我们没有向他直言，只是客气地说：“老大爷，麻烦您一下，给我们带几里路。”他看我们手里掂着驳壳枪，突然惊惶万状地跪下去，磕着头说：“老总，俺家里早没年轻人啦……”我们连忙把他扶起来，又耐心地向他作了些解释。老大爷用怀疑的眼光把我们打量了一番，最后才把手里的宽布带子朝腰上一扎，无可奈何地领我们走了出去。

一路上，老大爷看我们对他和气，惊惧早去了几分，但他还摸不清我们是干什么的，不免对我们抱着戒心。问他贵姓，他始终支支吾吾地不敢说；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他还是一口咬定：“年轻人早闯了关东，只剩下老两口子和两个小孙子！”天色大明，离开敌区已远，我们正式向他讲明，我们是八路军！老大爷才安下心来。

很快我们和老大爷便混熟了。他虽然没说姓名，但还是把家里的情况讲了不少。原来，他的儿子和媳妇根本没去什么关东，是逃离刘黑七统治地区，到一家亲戚家藏起来了。说起逃跑这事，老大爷两眼含泪地讲道：“同志，在刘黑七脚底下，日子没法过呀！年轻人男的要抽走，女的受糟蹋。”大爷接着往下给我们讲了许多刘匪的罪恶事实。我们听得眼都红了。老大爷叹了口气又说：“鄄子庄周围，象俺家骨肉分离的有的是，这日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才到头呢！”

老大爷还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围砦里边的敌人设防情况。首长们很快确定了战斗方案，具体分配了各连队的任务，干部、战士立即动员起来，指挥员研究任务，爆破员包炸药，突击班绑梯子，连炊事班也按照惯例为战斗前改善伙食而忙碌起来。为麻痹刘匪，我们还派出少数民兵先到鄄子庄周围袭扰。刘匪对我们的民兵不大理睬，这对我们的行动是极为有利的。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十三日夜晚动手了。但万想不到，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十二日夜里，我们请来供给情报资料的老大爷突然失踪了！我听说这个消息，赶快寻找，到底没见他的影子。这的确是件大事，假如走漏了风声，多日来的准备工作就前功尽弃了！我们连忙把这一情况汇报给首长。首长们十分镇静。鲁南军区王麓水政委说：“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我看这是由于刘匪的狡猾、凶狠，老大爷还存有顾虑，刘匪横行二十余年，也没有人把他治了，老人家当然会考虑，如果我们这次仍不能全歼刘匪，灾难就会落到他的头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军区首长决定按原计划奔袭敌人，并指示我们细致严密的注意刘匪的一切动静，如有变化，立即汇报。

首长虽这样讲，但我作为团参谋长，具体掌握这些工作，战前出了这样大的漏洞，心中真是不安。

十三日下午，部队出发了，急行军直奔鄄子庄，月亮刚从东山露面，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带。趁战前空隙，我派了几个侦察员又到那座“独立家屋”去。老实说，我并不企图寻找那位老大爷。老人家肯定是藏起来了。我只是想查明一下老大爷回来以后的行动。万不料侦察员们离房门老远，虚掩的门一下敞开了，老大爷步履矫健地向他们迎上来。高兴地说着：“你们这些烧高香也请不到的队伍，到底是来了！”接着，他向我们诉说了他的苦衷。正如王政委所判断的，老大爷确实怕我们打不下鄄子庄，惹起祸事。但回来后，他又盼着我们早点来打，并把两个心爱的小孙子送到外庄，自己坐地屋里等着八路军。

听说老大爷把孙子送到外庄了，我们一个口快的小鬼插嘴说：“老大爷，您往外送孙子没走露风声？”老大爷眨眨眼睛，有点发急似地说：“同志！咱鲁南山里的老百姓心里向谁，你还不知道吗？”同志们没再问下去，老大爷才慢慢放了心。他见漫山遍野是队伍，喜不自禁地对我说：“您打开围子，认不得路，我跟着去指点指点吧！”我们再三谢辞他，怕有危险，老人家到底还是跟着我们。

突击队开始向上运动，老大爷在道旁捋着胡须看着一个个虎彪彪的小伙子往前跑，脸上闪现着笑容。没等敌人的火力展开，突击队一举突破围砦，敌人退缩到里面的小围子去了。爆破员们又连续炸倒了小围子西北和东北

两角的炮楼，部队立即楔入炮楼的隙口，展开了巷战。在近两小时的巷战过程中，老大爷始终跟着我们，指点路线，阐述每一处地形、地物的特点，简直成了我军的眼睛。有了他，虽然是夜间战斗，但什么也看得清，了得见！他几次要亲自到前面去当向导，都被我们拉住了。

黎明前，战斗呈现胶着状态，看来是刘匪的亲信在负隅顽抗。一直在我身边的老大爷，又显得心情不安起来。他一会问人："能打下吧？同志们不会撤吧？"一会又问："刘黑七会不会跑掉？"我安慰老大爷说："放心吧，鄄子庄周围我们已撒下了天罗地网，刘黑七跑不了！"这时，在外围担负包围任务的四连忽然派人前来报告："爆破不久，在庄外东南方向的四连阵地前，发现了几个逃窜的敌人。我们立即组织人追击。先打死了两个，另外两个拚命的向山上逃。通信员郝荣贵急了，举枪又把其中的一个矮胖子打死了，剩下的一个当了俘虏。据俘虏讲，打死的矮胖子就是刘黑七。我们怕上敌人的当，用门板把尸首抬了来，准备找老乡来认一认。"老大爷听了，高兴得象小孩子过年一样，嚷着说："快快，走！我去认。刘黑七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他！"说着，拉住我就往外跑。

我们没走多远，就听得人们在咋呼着："刘黑七被打死了！刘黑七被打死了！"原来，被我军解放出来的一群刘匪的"肉票"，这时早帮我们鉴别出来。郝荣贵打死的，正是横行数十年的惯匪刘黑七。顽抗的残匪，听见呼声也无心恋战，全部缴枪投降了。

天亮后的鄄子街上还烟火弥漫，到处是敌人的破衣服、烂武器和死尸。俘虏群正在集中，里面夹杂着不少被抢劫来的女人哭哭啼啼。刘黑七的死尸旁边，始终是围着一大圈人，纷纷议论："看他头大身长，腿短脚小的样子，怪不得说他是乌鱼精托生呢！"

打死刘黑七的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传出了数十里地。不到晌午，敲锣打鼓的群众队伍漫山遍野地来了。他们抬着猪、羊来慰劳为民除害的八路军。受刘匪毒害最深的寺彦村，更联合周围的庄村赶做起一顶"万民伞"送给我们，红红的大伞上飘舞着许许多多的绸条，每个绸条上写着一个农民的名字，作为感谢八路军的纪念。群众坚决要求，把刘黑七的尸体抬去游行，我们劝也劝不住。老大爷对我讲："答应大伙儿的要求吧！乡亲们亲眼看见刘黑七的尸首，心就落实了！"寺彦的群众抬起刘匪的尸体要走，又赶来许多群众把他们拦住。有人指着尸体大骂，有人向尸体唾口水，还有人拣起石头狠狠地向刘黑七的尸体砸去……

（林毅，《星火燎原》之七）

材料四　反"编保甲"的斗争

掌握基层政权力量控制群众，敌人是有一套经验的。在他们所谓"政治清乡"中，"编保甲"是个基本工作。他们接受了国民党关于十年内战中五次"围剿"的反动经验，想以保甲力量，摧毁新四军在四分区建立起的政权机构，使四分区彻底伪化。

他们首先委聘当地士绅为"编查委员"，组织编查委员会。但许多士绅拒绝当"编查委员"。他们不得已就用钱收买，少则 二千，多至六万，但"编查委员会"还是流产。最后，他们不得不亲自出马，用武装编保甲了。

针对着敌人的阴谋，党组织了反"编保甲"的斗争。当时，对士绅是强调要他们明哲保身，对群众是讲清敌人编保甲后的恶毒后果，发动群众撕门户牌、烧壮丁册、不讲真话等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编好户口册子，儿子送给鬼子 。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

群众深知敌人的阴谋，斗争起来是非常坚决的。西亭镇解放乡的斗争，就是个很出色的例子。

解放乡紧靠着西亭镇，镇上早已有了伪区公所，汉奸一出门就到了这个乡，所以敌人决定先从那里开始编保甲。

第一次，伪区公所的人员带了大批伪军到解放乡来，解放乡的群众见他们老远的来，立即扶老携幼，跑个干净。汉奸们到那里，一个人也没找到，只好垂头气地回到镇上。

第二次，他们狡猾地在四更天就悄悄地把解放乡各个村子包围起来。天亮以后，把群众赶到一块空地上。

敌伪的区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官员，西亭区区长也是。他姓周，因为鸦片烟抽得太多，人就象个骷髅一样。他见人已被围住，就弄来一张长凳，爬上去演说了：

"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们！保甲制度，早在前蒋总裁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就已实行。如今我们奉汪总裁之命，在大日本皇军协助下，前来'清乡'，救各位出水火之难。……咳咳，中国人犹如一盘散沙，不推行保甲制度，不能团结一致，即难奏'清乡'之效。保甲编好后，大家可以守望相助……"

这鸦片鬼叽哩咕噜地说个没完，可是没有一个人在听他的，妇女们故意把手里的婴儿弄得哇哇哭，大一点的孩子不断在嚷着要吃饭，会场里乱哄哄的。虽然伪军在一边大声吆喝，叫安静下来，可是始终不见效。

鸦片鬼本来也没有多少力气，见会场上这副样子，就草草地把演讲结束。他指指旁边一个秃头，说："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乡长邢正才。"

邢秃子是个破落地主，在西亭镇上贩鸦片烟，打仗前溜到上海去的，这次跟在敌伪屁股后面回来了。

秃子见区长从长凳上走下来，知道下面就是自己的事了。他站起来向大家扫了一眼，想说什么、忽然又愁眉

苦脸地对鸦片鬼轻轻地说道："这么多人从哪里下手好呢？"

鸦片鬼漫不经心地说："按住址次序编嘛？"

秃子在自己的秃头上抓了两下，硬着头皮踏上长凳，对大家先露出个笑脸，说道："兄弟担任你们乡长，只因兄弟在外乡多年，这次随皇军回来，还靠大家帮忙，大家维持。本乡现名解放乡，这不好，因为这是个'匪名'，以兄弟之见，今后我们还改用老名'仁义乡'。"

这时，鸦片鬼大约烟瘾上来，有点不耐烦。就向秃子说："快编。"

秃子忙说好好，就转了话头："现在，兄弟就来编第一保。住在东边夹车路以东的人，请到前面来。"

好久好久，谁也没动一动。

鸦片鬼勃然大怒，拔出手枪，发疯似地喊："混蛋，敢抗拒命令吗？"

秃子一见有撑腰的了，也就摆起一副凶相，从长凳上跳下来，也不再"兄弟兄弟"的了，他伸手抓住一个四十上下的农民，问："你是不是路东的？"

那农民不吭声。

人群里忽然闪出一个人来，点头哈腰地谄笑着说："是的，是的，他是住在路东的，他姓陈，叫……"

这个人叫陈守本，也是个地主，他怀着对劳动人民本能的敌意，正想说出那农民的名字，忽然他瞅见群众愤怒的目光正集中在他身上，他只好住了嘴。那农民此时接嘴说："叫陈金龙。"其实他根本不是这名字，他一生只取过一个名字——陈阿发。

陈守本对大家的目光有点怕，也没敢再答腔。这时，秃子又开口问："几岁了？"

"四十二。"

"做什么交易？"

"什么交易也不做。"

"那指靠什么过日子？"

指什么？指两只手一块泥！"

人群里发出了一些笑声，伪军又吆喝起来，秃子急忙再问下去："几个儿子？"

"一个"

"几岁？在干什么？"

"十五岁，在城里学手艺。"

其实，谁都知道：阿发叔不止一个儿子，而是两个；也不是十五岁，而是都过了廿岁；更不是在城里学手艺，而是在民兵中队里和同志们一起打日本。

秃子不知道，就对书记说："编在第一保第四甲第一户。"

就这样，一直编到中午，才勉勉强强把一个保编好。鸦片鬼已支撑不住了，急着要回去，对秃子说："快指定个保长。"

秃子一听忙对大家说："今天上午，我们先编第一保。大家选个保长吧。"说是选，其实压根儿在骗人，秃子没等大家接嘴，又说："我看就由陈守本当吧。"

陈守本当然是求之不得，但群众这时哄起来了，大家纷纷喊："我们不要他当！我们不要他当！我们要教书的吴先生来当！"

吴先生叫吴浩然，是我们党派在那里的同志。事前，上级是有安排的，叫尽可能把保甲长掌握到我们手里。因此，反"清乡"前，吴浩然同志就进了学校当教员，来掩护自己的身分

鸦片鬼的烟瘾已完全发作了，他急着要回去，秃头一个人也不敢留在这里，就草草地宣布："好，就叫教书先生来做。"

伪军一走，新上任的"保长"跳上长凳，说道："喂，老乡们，多蒙大家看得起我，我就来做'保长'。现在我就执行'保长'的职权。我命令立即把陈守本抓起来！"

陈守本象遇到个晴天霹雳，目瞪口呆。

"老乡们，昨天夜里给汉奸带路的，就是他。今天他又在这里破坏。"吴浩然继续说，"快抓起来，送到民主政府去办。"

"好哇！"全场轰动了起来。陈守本象一只小鸡似的被大家抓了起来。

反编保甲斗争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在启东一个县境内，敌人张贴上的门户牌，群众一夜之间就把它全部撕掉了。在边区，伪乡长们造的户口册，都让民兵搞出来全烧掉了。

敌人编保甲的武装，又常受到我小股部队的袭击。保甲始终编不起来。敌人有个保甲指导员写信给"清乡"的总特工头子张北生说："保甲工作，实在困难，请张主任原谅！"甚至连张北生自己也说："保甲工作就马虎一点吧！"

（选自《新四军故事集》）

材料五　哑巴吃黄莲

四分区的重要的路口上，敌人都筑起了望台。每个台上，备有竹竿三以，麻绳三根，响锣一面，符号三个——同日　□○三种。如果发现新四军或民兵经过，台上人就打起锣来，并按发现我们的人数，分别竖起一根、二根或三根竹竿，当作标记。同时，要立即派人向敌人报告。报告时言语不通，就用符号表示：同日　表示我们来了十个人以下；□表示是二十个人左右；○表示来了三十个人以上。因为这样的台太多了，伪军应付不过来，他们只好在保甲中摊派人来分班了望。

开始的时候，太阳出山起了望，到午夜时分就结束。后来敌军连连吃败仗，心里害怕民兵和新四军在深更半夜里摸进来，要他们的狗命，所以强迫着民夫，夜以继日

地站在台上了望。

敌军时常出来查岗，查岗时民夫必须恭恭敬敬地立正、行礼，如不行礼或稍有点不恭敬，就要被拳打脚踢。若是有人在睡觉，那更会被一顿毒打，甚至有被打死的。因此群众都恨之入骨。

敌军还恐怕民夫有通新四军或民兵的，他们有时打扮成民兵的样子，向了望台走来。

敌军这种笨拙的把戏，早被我们察觉了。民兵干部就发动民夫将计就计粉碎他们的阴阴谋。

有一天，探得了消息，晚上敌军又要化装外出，民夫们就准备了好几根又粗又重的木棍，单等他们来到。

半夜里，有两个穿新四军服装的人，向了望台走来。民夫们伏在暗处，等这两人走近了，呼地一下，两面涌上来，紧紧地将他抱住按在地上。拉到灯光下一看，不是鬼子还有谁！

于是他们不等敌人分辩，就用布条把他们嘴巴塞住，用准备好的大木棍，没命地死揍。一面派一个民夫敲起锣来，拿了一个同日　的符号，去报告镇上的敌人。

镇上的敌人还夸奖了几句，说是："忠心大大的。"随着就向了望台走来。

等他们来到了望台，那两个化装的敌人，已经被揍得半死半活。拿大棍的民夫，见镇上的敌人来了，还上前说道："新四军的，我们的打！"

敌人再也不敢耍这套把戏了。

（选自《新四军故事集》）

材料六　日本军官战地观战团覆灭记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在同蒲和白晋两铁路线上，调兵遣将，集结重兵，并在各前沿据点，屯积粮秣、弹药和作战物资，准备对我晋东南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于9月20日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区立即进行空舍清野、破大路、埋地雷，组织教育群众和民兵自卫队准备反"扫荡"；对城关和交口转移出来的难民要分散安置，妥善隐藏，不能让敌人抓回去搞"维持"。军区还规定了各主力部队转各外线敌占区，积极打击敌留守部队的任务，并要求部队不能过早离开根据地，要在敌人开始行动后，与敌人保持一定距离，若即若离，边打边退，到有利时机，迅速脱离敌人，转到外线去；县区武装要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打击敌人，掩护群众和县区机关干部，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敌人奔袭搜捕；民兵干部带领民兵打游击，保护群众转移隐蔽。

9月25日，陈赓司令员在赴延安之前把我叫到军区司令部，要我汇报11个月来对沁源日军围困战的情况，以便到延安后向中央军委汇报。我向陈司令员着重汇报了对敌三十六师团格木联队斋藤大队的战斗情况，特别强调了在主力部队带领和援助下，县区基干队、民兵轮战队的作用，以及沁源人民宁死不屈、英勇斗争和迫使敌人再次换防的情况。

陈司令员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我们对沁源敌人的激烈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真正使敌人陷入了汪洋大海。现在，敌人又调集了约3万人的兵力，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组织指挥，以驻临汾的六十九师团长清水中将为前敌指挥官，太原第一军团参谋长为督战，敌现已到达平遥，，将于10月1日开始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此次'扫荡'的目的，是要用所谓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以全面实施和彻底实现其'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日军此种'扫荡'是对沁源人民不'维持'敌人的报复行动，手段会是很残酷的，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扫荡'即将开始，你赶快回去吧。"

赶回驻地后，我向部队传达了陈赓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大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敌人这次对太岳根据地进行的"铁磙扫荡"，是想把我军压到黄河北岸一举全歼，以创造模范剿共实验区，为其他地区剿共示范。其战斗编成与兵力部署，是以同蒲、白晋两线的六十九师团、六十二师团和三十七师团十几个日军大队，还有伪剿共第一师、第二师和地方伪军共约3万人。除留两个大队及伪剿共二师位于临汾和高平为总预备队以外，其余全部底消灭它！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万万不能错过，万万不能打击溃战，必须打歼灭战。一次能消灭这么多日本军官，能顶上消灭他们的5万日本兵。尤其是在敌占区里边打这样的歼灭战，这将是抗日战争史上最光辉的战绩，也是震撼敌人大本营的一颗重磅炸弹，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将会成为一次突出的模范战例。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大家要来个杀敌立功的竞赛。

指战员们听说要消灭的都是日本军官，还有不少日本将军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一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纷纷表决心说："这是一个很难得到的机会，拼死也要完全消灭敌人。"

10月22日夜，部队秘密转进到临汾东北，洪洞东南，临屯公路西段的韩略村（敌据点）西南地区，封锁消息，隐蔽起来，积极准备战斗。在我同蒲路情报站和当地党、政府和民兵协助下，王近山亲自带领团营连干部于23日化装侦察了地形，现场制定了伏击方案，具体分配了各营连的伏击地点和战斗任务。返回住地后，接到刘桂衡科长送来的同蒲情报站的鸡毛信。信中说："在临汾城里的日军'战地观战团'已编好车队，3辆小吉普车，10辆大篷卡车，没有派部队掩护，只有军官学校的学员带有步机枪，24日早晨出发，沿临屯公路向我根据地开进。"王近山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要部队在午夜前吃饱饭，12

点准时出发，轻装进入伏击地区。各营连于24日凌晨2时进入伏击地区后，各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占领了阵地，伪装好自己，装上子弹，揭开手榴弹的拉火盖，悄然无声地等待敌人。

上午8时，只见曲亭方向的临屯公路上尘土飞扬，敌"观战团"的车队开来了。敌人满以为"铁磙扫荡"胜利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成为他们占领了的天下，在他们经营了六七年的"统治"区内的据点之间行进，可以畅行无阻，遂大模大样，毫无戒备地开进来了。

8时20分，插着"太阳旗"的车队进入我伏击圈。三辆小吉普车在前，十辆大篷卡车紧跟在后，车速也相当快。打蛇先打头。我三营九连按计划首先跳上公路，挡住敌人去路，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对准小吉普车突然开火，猛烈扫射。敌驾驶员倒下去了，小汽车不能动了，受了伤的敌酋服部直臣，慌忙跳下汽车，大喊大叫，妄图组织力量冲开前进道路。此时，我二营六连已在敌人车队后尾堵住敌人的退路。同时两侧伏击部队，杀声震天，一齐冲杀过来。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投入敌人的车队，轻机枪、步枪和掷弹筒不停地投向敌人。敌人已失去指挥能力和集团抵抗能力，一个个乱躲乱窜，有的钻在车底下，有的趴在公路旁、无组织地各自抵抗。手榴弹投到敌人汽车底下和车厢里边，敌人的汽车开始起火爆炸。敌军官手枪子弹已打完，我战士冲到敌人面前，敌举战刀向我扑过来，我战士眼明手快，先打一枪，再刺一刀，结束了一些敌人军官的性命。敌学员举步枪与我格斗，被我捅死不少。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日军军官受了伤还不肯放下武器，真有那么一股"武士道"精神，至死不投降。带队的服部直臣看到同伴死伤累累，血流遍地，逃生无望，遂带头举刀破腹自杀。其余敌人看到指挥官已自杀，也纷纷举刀自杀。

此次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除两个学员钻在公路下的狼窝洞里漏网外，其余180余人，全部被我击毙。此役缴获手枪60余支，步枪60余支，轻机枪3挺，战刀百余把，烧毁汽车13辆，10时，我部队撤离战场。战后谍报报告，被我打死少将军官9人，大、中、少佐军官99人，学员60名，汽车司机15名。

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被歼灭后，冈村宁次非常震惊、气愤，疑有内奸，严令搜查，派飞机到韩略附近各村滥炸了一通，并调兵包围洗劫各村，敌占区的人民惨遭杀戮。冈村宁次愤怒之下将清水师团长撤职查办，将韩略据点的日军小队长砍了头，伪冀宁道（驻临汾）道尹也被罢了官。冈村宁次亲手策划的"扫荡"计划，不得不提前20余天结束。

歼灭敌"军官战地观战团"的重大胜利，投入第一线作战。具体部署是用两个大队置于同蒲线东侧（霍山西麓），成纵队南北展开于七八十华里的地段内，构成西侧封锁阻击线，协同腹地"扫荡"部队南进；用3个大队置于白晋线西侧之古县、松交、良马一线成纵队南北展开于八九十华里的地段内，构成东侧封锁阻击线，协同腹地"扫荡"部队南进。封锁部队均提前展开。用9个大队各成三层横队（梯队），各梯队距离10至15华里，展开于同蒲线上的介休和白晋线上的南关镇之间，构成"铁磙"，每天或隔天滚进二三十华里。两侧封锁部队的推进与腹地"扫荡"部队同步。第一梯队以日军为主，配属特工队、便衣队，主要任务是捕捉合击我主力部队，一旦与我主力接火，侧翼封锁部队即奔进合击；第二梯队以日伪军混合编成，胁迫大量民夫，组织成抉剔掳掠后送队和俘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实行抉剔清剿，劫掠财物，后运敌区；第三梯队又以日军为主，主要任务是继续清剿，捕捉我小部队和零散人员，掩护二梯队侧后，扩大抉剔战果。这就是所谓的"箕形阵势三层铁磙式新战法"。敌人用此新战法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摧毁根据地，全面实现"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用心十分恶毒。

1943年10月1日，敌人开始自北而南"滚进"。10月3日，我洪赵支队一部向外线灵石方向转移时，在王陶西南地区，遭来自介休敌人的合击，激战半个小时，毙敌10余人，循小径跳出合击点，4日，洪赵支队主力在圪宜头遭敌合击，我伤亡80余人，损失机步枪50余支，入夜分散突围。同日，我三十八团主力在北平镇西北地区阻击"滚进"之敌时，遭来自霍县敌人合击，我奋战至夜，杀伤敌人50余人，我伤亡10余人，入夜转 移到灵空山地区。5日，我五十九团在渡口伏击由古县南下之敌，毙伤敌30余人。7日，由南庄向外线转移时，在药王垴遭屯留吾元和张店敌之封锁部队合击，激战半日，毙敌30余人，我伤亡70余人，入夜跳出合击点。11日，我二十五团主力一部，在安泽艾蒿与"滚进"之敌接触，遭来自安泽敌人合击，激战半日，毙伤敌60余人，我伤亡4人；入夜转到兴唐寺，又遭敌西侧封锁部队合击，我有部分损失，后跳出合击点。在敌"滚进"扫荡过程中，困守沁源之敌趁势四出搜掳，遭到我坚持内线斗争的游击小部队和飞行兵不断杀伤，敌无一次成功。

敌人的"腹地扫荡"部队于10月17日"滚进"到临屯公路两侧时，我军区接到临汾谍报站的报告，说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华北各地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已到达临汾，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来"战地观战"，学习冈村宁次的杰作——"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报告陈赓司令员。陈赓当机立断，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王近山（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带领十六团秘密转进到临屯公路西端设伏，一定要完全彻底歼灭这个"观战团"，不能让他跑掉一个，并指示要速战、速决、速离。

王近山是一员负伤多次的猛将，打仗总是猛扑、猛冲、猛打、狠杀。他带的十六团是陈赓将军培养出来的一支能打仗的部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中善于打近战、夜战和伏击战的一个团。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将军率领三八六旅驰骋于豫北和晋南平原，在响堂铺和香城固歼灭过日本侵略军。这支部队同日本兵几次交锋，摸透了日本兵的脾气：我越勇猛，敌越稀松；我越猛冲，敌越害怕。

王近山带领十六团是在敌人开始向岳南"扫荡"前，于10月18日夜转移到外线临汾东南冈头村隐蔽的。他接到陈赓司令员的十万火急电令后，立即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他说，日本"军官战地观战团"共有180多人，大多数是将校级军官，三分之一是军官学校的学员，也算尉级军官，我们要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彻（内容不连）

受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专电表扬，临汾谍报站受到了特别嘉奖。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3日发表了题为《临屯公路上韩略村伏击战，我毙敌旅团长以下全部"军官观战团"，造成在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范例》的专题通讯，报道了我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于1943年10月24日，在山西洪洞县韩略村，歼灭以服部直臣少将为首的侵华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180余人的消息。

冈村宁次策划的"铁磙扫荡新战法"，满以为组织得天衣无缝，一定可以达到消灭共军，摧毁太岳根据地，完成"实验"计划的目的。但没料到太岳全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到处有茂密的森林，丛生的荆棘，天然崖底，人凿洞穴。我军民熟悉地形，敌有难以到达之处，我无难以飞越之地，太岳根据地并不是敌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块平展的"磨盘"，可以任"铁磙"碾压，其实，就是敌人筑起铜墙铁壁，也休想阻止我们的自由行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国土。

（选自《纵横》88年1期，作者：李懋之）

材料七 战斗在华南敌后的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广东东江地区的主力部队。它的前身是东莞、惠阳、宝安、增城等地下党组织建立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0月13日，党中央指示，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同志即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的负责人研究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随即派曾生同志等到惠阳发动群众。12月2日在叶挺将军的家乡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曾山，政委周伯明，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郑晋（郑天保）。在这前后，东莞中心县委按照省委部署，由王作尧、阮海天和黄木芬等同志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建立了抗日武装，随后于1939年初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总支书记黄高阳。两支队伍共200余人。

这两支队伍积极打击敌人，先后收复了淡水镇、葵涌、沙鱼涌和宝安县城南头等失地。在淡水镇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身上。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东江人民抗日部队，而且把自己的儿女送回东江，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党中央对这支人民武装非常重视和关怀，从延安等地抽调梁鸿钧、李松（李振亚）、卢伟良等红军骨干加强领导。

1940年3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逆流到了广东。广东国民党顽军纠集3000余人，向曾、王部队进犯。曾、王部东移海丰、陆丰和惠东地区。6月初，由廖承志同志从香港转来党中央书记处5月8日指示，要部队回到东宝惠地区坚持抗日。8月，部队重返东宝惠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9月，中共东江特委在宝安县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会议由林平（尹林平）主持，传达党中央"五·八"指示，总结部队东移海丰、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且决定把原来的"新编大队"和"直辖第二大队"的国民党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在组织上摆脱与国民党的关系。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曾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邬强任副大队长，卢伟良任政训员（政委）；王作尧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周伯明任副大队长，蔡国梁任政训员（政委）。曾、王两部分别进入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和宝安的阳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是东江纵队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40年11月，第三大队在黄潭村打退日军200多人的进攻，毙伤敌数十名，这是部队返回敌后的第一仗，影响很大。1941年6月在民兵的配合下，在大岭山中心区的百花洞沉重打击东莞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600余人的奔袭，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50余人。广州日军首脑哀叹："这是进占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第五大队在宝安县粉碎了敌人先后出动1000余人的"扫荡"，毙伤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70余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在与日伪军斗争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军多次进犯。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第三、第五大队立即派出部队挺进香港、九龙地区，成立港九大队。为开展海上游击战争，还先后建立海上中

队和护航大队。

日军占领香港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廖承志领导下，深入港九市区，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抢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英、美、印度等国际友人近一百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1942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到达宝安县阳台山根据地的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总结三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对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和加强部队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这时，部队已发展到1500余人，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

自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广东的顽军勾结日、伪军大规模向我解放区猖狂进犯，妄图消灭我军。加上1942年严重灾荒，我解放区军民处境十分困难，但是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三个月消灭我军的计划宣告破产。从1943年起，我们主动袭击敌人，拔除了广九铁路和宝（安）太（平）、莞（城）太（平）沿线敌人的一批据点；护航大队夜袭大亚湾马鞭岛，全歼伪海军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第四中队；独立第二中队在东江北岸的罗浮山区开辟抗日游击区，向增城、从化、番禺方向发展，活动到广州市近郊；主力大队首次爆破攻击，炸毁宝（安）太（平）公路线上福永炮楼，全歼伪警中队，缴获机枪6挺，步枪40支等，争取了伪军一个营和两个连分别起义、投诚。

1943年11月中旬，日伪出动9000余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我宝安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而且收复大片失地，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敌人惊呼“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是治安之癌。”这一年中，共歼日、伪、顽军1000余人，我军发展到七个大队，打开了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

1943年12月2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副参谋长梁鸿钧，共8500人。

东江纵队成立后，号召全军开展杀敌、扩军竞赛，仅广九铁路以西部队，就歼敌20多个连，迫使伪军一个营和一个暂编团投诚；港九大队不断袭击敌人的岗哨、巡逻队和海上敌船，炸毁启德机场的油库、飞机和破坏九龙第四号火车铁桥，在市区大量散发传单，使日军陷于惶惶不安的困境；护航大队和大亚湾独立中队在海上袭击敌船，俘获日军武装运输船，缴获大批重要物资，并向稔平半岛出击，打垮伪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为扩大游击区，纵队派出一支部队挺进增城、博罗、从化、番禺边区及广州外围，袭击广州郊区罗岗等敌人据点，解放了广州近郊龙眼洞，消灭伪军一个连。游击队还活动到广州市的白云山，威胁广州的敌人。这时，我军已成为东江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先后抽调一批干部到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工作。

1944年2月、5月，1945年1月，东江纵队先后救护了美第十四航空队克尔中尉、勒夫哥中尉、拉弗累尔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艾利斯上士、依根中尉和美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他们离开我军归队时，都留下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由于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斗争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提高，引起了盟军的重视。1944年10月，美军派欧戴义到东江来，要求我们同他们合作建立情报站，以利盟国空军对日作战，并预作将来在华南登陆反攻的准备。经请示党中央批准，我军特设联络处专司此事。

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宝安县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的7月25日指示，作出部队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全面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我东江纵队立即派出部队向粤北挺进，一度解放清远县城。1945年初，纵队又派出两个支队挺进东江北岸，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派出两个支队挺进北江；组建第六、第七支队挺进惠东、海丰、陆丰地区。同年8月，集中主力1000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五岭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全军先后成立9个支队，6个独立大队，并成立江南、江北、粤北和东进4个指挥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江纵队向敌人进行激烈战斗和政治攻势，解放东江两岸、沿海地区和粤北等地的城镇60余处。

经过八年抗战，先后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惠东行政督导处、博罗县人民政府、海丰县民主政府以及江北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约6万余平方里，人口450万以上，部队发展到11000余人，民兵12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以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100余人，俘虏、投诚约3500余人；反击顽军作战300余次。共缴获各种武器6500余件，火炮25门。东江纵队指战员阵亡2500余人。

日本投降后，东江纵队在原地坚持了将近一年的艰苦斗争。1946年6月底，东江纵队主力2583人胜利北撤到山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参加了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留下的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以后发展为粤赣湘纵队。1949年9月，两广纵队随四野南下，和粤赣湘纵队汇合，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并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贡献。

（选自《大江南北》89年6期，作者：巴宁）

材料八　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麻雀战”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曲阳县尖地角村只有十七户人家，他们组成民兵游击小组，凭借山丘密林和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机智灵活地开展“麻雀战”，打击敌人，粉碎敌人“扫荡”。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一千七百多名日军进山“扫荡”，占领了距离尖地角村不远的立台、武家湾、范家庄，敌人采取“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尖地角村的民兵决心采取“麻雀战”，打击敌人。当晚，他们进到武家湾至范家庄之间地区，突然向敌人射击，敌人误认为被我主力部队包围，两个村的敌人即互相对射。民兵游击小组立即返回尖地角村，敌人越打越激烈，整整打了一夜，后来方知上当。为防备敌人对周围村庄进行报复，我村干部即动员组织群众疏散转移。同时，发动民兵在尖地角、口头两个村的路口上、街上、井台、门口以及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埋上了地雷，在敌人可能挪动的东西上挂上了地雷。十七日早晨，民兵隐蔽在村西小山上，一百二十多名敌人成散兵队形，直奔尖地角村。等敌人进入雷区时，民兵即向敌人进行齐射，敌人一阵慌乱，踏响了地雷，死伤五十八名。敌人为了挽回败局，令瓜子沟和鸡蛋沟之敌包围我民兵，由于民兵熟悉地形，行动迅速，顺着村沟转移到寺沟东岭上。在岭上，观察发现二百米远的对面沟里，有一群日军正朝在佐村运动。民兵突然向敌人射击，击毙敌人十八名，敌人被迫拖着死尸向东石门逃窜。

二十日拂晓，进行搜索的一小股敌人与我民兵遭遇，我民兵动作迅速，先敌开火，击毙敌军三人，尔后立即转移，敌人找不到民兵的踪迹，不得不撤出中佐、口头等村庄，向范家庄方向撤退。我民兵又沿着山坡进行尾追，从鸡冠山追到计堵石，尔后又急速赶到抗尔沟，占领有利地形。当敌人走到沟底时，民兵突然向敌人射击，打死日军指挥官和翻译各一人。敌人即向民兵进行攻击，等敌人爬到山顶时，民兵早已隐匿得无影无踪。日军找不到目标，便盲目射击，最后被迫撤回。在反“扫荡”中，尖地角村民兵作战二十七次，打死打伤日伪军二百余名，缴获步枪三支、电话机三部、牲畜四十七头以及其它战利品。他们和周围各村民兵一起，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山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中共党史导读》）

甄家庄歼灭战

背景介绍

1943年初，晋西北根据地开展“挤敌人”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军的“蚕食”政策。敌遂于1943年9月初，抽调第五十九旅团和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开始了分区域的连续“扫荡”，企图袭击我领导机关，吸引我主力部队回师根据地。9月下旬，敌从南北两面向我兴县、保德地区进攻。北面有独立第三混成旅团所属原野、田村两个大队分两路攻击我岢岚、保德地区；南面有第五十九旅团85大队分两路合击兴县，妄图摧毁我晋绥军区领导机关。

9月26日，敌兵分两路奔袭兴县，27日晚于兴县会合。这时我军区领导机关已转移到兴县西南15公里之小善村。敌扑空后，28北犯瓦塘，29日进占裴泉川口，10月2日南犯黑峪口，并向我河西盘塘河防阵地射击。在遭我河西河防炮兵还击后，敌退至兴县以西15公里之赵泉川口。我晋绥军区指挥部经分析，认为进犯兴县地区之第85大队，战斗力虽较强，但在1942年田家会战斗中，曾遭我歼灭性打击，补充新兵较多，战斗力已不如前；这次出犯已近一月，日夜遭我袭扰，人困马乏，深入我根据地内孤立无援；而我军主力部队就在邻近可以迅速集结。据此，我军区指挥部决定集中五个团和一个营的优势兵力，发挥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作用，坚决消灭敌第85大队。同时，考虑到敌军武器装备占优势，不可能一举歼灭，故作了沿途伏击、分段围歼的周密部署。

10月5清晨，敌由赵家川口沿山梁向小善村方向撤退。当敌进至小善村畔附近时，突然遭到我军猛烈阻击，敌企图强攻我1280高地，战至中午，敌机五架也前来参战。我坚守1280高地的战士，冒着敌军陆空火力的攻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迫使他们不得不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但即被我第26、27、30团等部包围。下午，我特务团赶到，并迅速投入战斗。兴县民兵及广大群众也奔赴周围山头，参战助威。陷于重围的日军恐慌万分，在求援电中说：“第85大队在小善村畔附近，被10,000多八路军包围了”。是夜，我军几次袭击敌人，敌人死守阵地，不敢出击。为了进一步分段围歼日军，我军连夜在大善村至康宁镇之间17公里的大道上，沿途设伏，并在各要道路口埋设地雷。

6日21时，敌向康宁镇方向突围，沿途不断遭我伏击部队的袭击，地雷时时爆炸，敌军一片混乱。7日晨，敌

收容溃散队伍，经康宁镇继续南逃，被我21团阻于花子村，我17团亦赶来参战，对敌形成夹击，敌突围未成，只得在花子村固守。7日下午，敌在飞机掩护下，转道向东突围，我21团节节阻击，第17团平行追击，终于在甄家庄把敌咬住。敌占领甄家庄东南山头固守，我军迅速将敌团团包围，并派特务团到甄家庄东之郑家岔，向东打敌援兵，向西堵敌去路。8日，敌数度向西突围，均被我击退。9日、10日，该敌困守在甄家庄山头，依靠飞机空投食物充饥，孤立无援，士气低落。敌在我军不断围攻下伤亡惨重，一再急电求援，然援兵始终未到。10日下午，敌在山上烧毁尸体和伤兵，伤兵被烧得狂呼惨叫。21时敌拼命向东突围，沿途遭我游击队伏击，窜至郑家岔时，又遭我严阵以待的特务团迎面阻击，敌集中兵力连续发动五次冲锋，均被击退。此时，我第26团和刚刚调来参战的第29团，接替了第17团和21团的防务，与特务团配合，猛烈夹击敌人，日军大部被歼。残敌乘黑夜向西侧高山树林四散逃窜，我军分途搜索追击，又歼敌一部。此战除漏网残敌百余人零星逃回王狮据点外，共歼灭日军七百余人，伪军一百余人。

甄家庄大捷后，日军又纠集千余人马，于10月中旬分南北两路再次向我兴县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晋绥军区领导决定首先打击北路进犯之敌，命令特务团即日赶到兴县城东15公里的阳会崖、明道沟之间设伏。10月16日上午，敌田村大队前梯队进入我伏击圈，我即展开猛烈攻击。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战斗动作勇猛神速，我在全歼敌前梯队后即主动撤出战斗。敌被我痛击后立即回窜，合击兴县的企图即告失败。

甄家庄、阳会崖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晋西北，吓得进犯保德之敌也于10月24日全部撤退。在9、10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我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三百余次，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取得了歼敌一千三百余人的战绩。

材料：

· 痛歼顽敌　雪耻复仇甄家庄

材料　痛歼敌顽　雪耻复仇甄家庄

甄家庄是晋西高原上一个不大的村落，位于黑查山的西麓。全村有人家不足200户，近1000口人。经过敌人的多次扫荡，这里的房屋多残缺不全地散落于各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街道穿过全村，村子四周是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山岭谷地。山岭之上，长些稀疏的树木和杂草，散布着坟地、小丘，地形复杂，便于与敌周旋打伏击战。

1943年9月8日，日军85大队被我120师的5个团包围在甄家庄的山岭之间，怎样以较小的代价吃掉它呢？作为战争的指挥员，周士第将军放眼各阵地，苦苦地思索着。"敌人在甄家庄的高地上拼命地加修工事，强攻显然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对我军不利，最好的办法是把敌人调出甄家庄，在运动中予以消灭。"

战场选择在哪里？甄家庄以东是敌人控制的岚（县）离（石）公路，在这条公路上常有日军频繁调动，距甄家庄最近的是敌奇坚岭据点，王狮据点也在东面。因此，周士第判断，敌人极有可能往东突围。周士第命令，军区特务团火速赶到甄家庄东面的郑家岔，36团埋伏在东北面的阳放里和碾坞里，严密封锁消息。为了诱敌上钩，迫敌就范，周士第又令各分区部队和武工队主动向敌据点和交通线出击，破击敌公路，袭扰敌人据点，促使各据点的敌人自顾不暇，无力增援，为使敌85大队向东突围，进入我伏击圈，我包围敌人的21团、17团、26团官兵不断向敌人发动攻击，同时在甄家庄南、北、西三面的大小山头上佯作积极加修工事，虚张声势，逼敌向东逃跑。

被我军团团围住的敌85大队在拼命抵抗，战斗进行了3天3夜，困守在甄家庄高山上的敌人，缺粮断水，陆上的补充早已不可能，几天来，只有偶尔飞来的敌机空投一点点粮食，显然敌人在作垂死挣扎。

我军有人民群众这个强大的后盾，在敌人扫荡、抢劫之下的人民群众尽管生活也十分困难，但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宁可自已节衣缩食，吃糠咽菜，仍然千方百计找到粮食，日夜忙着为部队磨面、蒸馒头，运往前线。甄家庄所在的兴县四区的群众挑着馍馍紧紧跟着追击部队，跑了一天，翻越了8个山头，直到战士们追上了敌人，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馍馍。他们才高高兴兴地回去。在甄家庄，男女老幼都忙个不停，伤员每到一处，群众便纷纷送水、送鸡蛋，给伤员喂饭、喂水，亲如一家。兴县二区和三区的民兵，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由于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部队士气愈战愈旺，愈战愈强，战士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坚决把敌人消灭在甄家庄！"

等待伏击的部队有些不耐烦了。一个长脸战士说："鬼子怕是不会来了。"旁边一个高个战士接过话说："别急，还不到时候，周副司令员的计划不会错，日本鬼子比起来，嫩得很哩！"果然经过三天三夜的围困，敌人已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其他据点的敌人由于我武工队和民兵的积极袭扰，不敢前来增援。

9月的黄土高原，一般是晴郎干燥的，但10日傍晚却突然下起雨雪来，气温骤然降至零度以下。平日干爽可行的山间小路，变得异常泥泞。这给长途奔袭，机动作战无疑带来了困难。对缺衣少食的日军85大队来说，是雪上加霜，也给他们转移提供了一个契机。10日夜里10时左右，日军利用夜色和雨雪，顺着山沟向东突围，走上了周士第为其"安排"的道路。

遇上这样的天气，对我军来说要咬住敌人，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周士第传令各部："加强注意力，观察敌人行踪，伏击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军令一个接一个传下去，战士们抖擞精神，埋伏在郑家岔的特务团的战士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当敌人的主力五六百人完全进入我伏击圈之后，2连、4连战士拉响了地雷，6连、7连则从两侧用手榴弹投向敌群。

敌人作梦也没想到风雨之中我们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一霎那，郑家岔的山沟里，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敌人被打得丢盔卸甲，鬼哭狼嚎，死伤遍地。一部分侥幸活下来的敌人，见中了埋伏，不顾死活地吼叫着，向我方阵地冲来，梦想杀出一条血路。周士第见状，十分高兴地说："来得好，打！"战士们哪肯放过他们，在每一寸土地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9连战士王治国，手榴弹打完了，随手抓过身旁的迫击炮弹，冒着生命危险，把迫击炮弹当手榴弹使用，炸得敌人人仰马翻。10连战士的手榴弹、子弹打完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用刺刀顽强地阻止敌人前进，日军连续五次攻击，都未能奏效。

一会儿，我追击部队3个团赶到了，附近的游击队和民兵赶到了，把敌人层层包围起来。

此刻，日军85大队的铃木大佐泪流满面："多年的支那战争，皇军这个战神日渐垮台，自己是何等的幼稚，一腔热血造就了数不清的罪恶，双手都沾满了支那人的血。"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不大的照片，照片上一位美丽的东洋少妇和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在对他笑，那样纯，那样真。他微闭双眼，对天长叹："美智子、佳子，只有来生再见了！在支那，我死后也会成为人人喊打的野鬼。"

接着，他朝着岛国的方向，跪在山坡上，抽出战刀，立在胸前。这一举动，令他的士兵肃然。其实，这场战斗的结局，他们十分清楚，那位黄埔熔炉中炼出的钢铁军人——周士第，已为他们挖好了坟墓，对他们来说，剖腹无疑是效忠天皇和帝国的最好形式。

甄家庄的山岭之间，漫山遍野都是喊杀声，日寇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同浑身着火的野牛，横冲直撞，最后被一个个消灭在山沟内。

11日拂晓，3架"吊丧"的敌机前来寻找被围的鬼子，他们在甄家庄附近的上空盘旋了很久，既看不到地面上的联络信号，也无"皇军"的影子，便扫兴而归。由于日寇85大队的被歼，日军独立第3混战旅团成为孤军，急忙龟缩回据点。日寇原定两个月"扫荡"计划只进行了40天，就被周士第将军率领的八路军健儿完全粉碎了，扭转了我军在西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巩固了晋绥根据地这座屏障和咽喉要道。

（选自《中共虎将与名战》）

宜昌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三年4月9日至5月间，宜昌战役爆发。日军为了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地区的威胁、并夺取停泊在宜昌江面上的中国船舶，在鄂西地区发起了局部进攻。当时，中国第六战区所属第二十九集团军固守安乡至公安之线，第十集团军固守公安至枝江之线，江防军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等。在日军进攻面前，中国驻防部队在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持下，进行了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进攻，使日军顺利达到了战役的目的。4月9日至15日，日军攻占华容。5月5日又向洞庭湖北岸进攻。8日占领南县和安乡，13日攻占公安。19日始围攻宜昌和宜都间的中国军队。22日从宜都渡过长江。23日攻至长阳附近，并占领了海洋关及其西北地区。24日在宜昌西岸发起进攻。25日攻入偏岩、津洋口间。27日将停泊在宜昌江面的大小轮船约2万吨全部抢劫，驶往沙市。31日，日军在达到夺船目的后北撤。6月10日，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撤往江北，从而结束了这次战役。因战事发生在鄂西地区，故又称"鄂西战役"。

材料：

- 鄂西会战经过
- 石牌柳林战斗

材料一　鄂西会战经过

日军侵占宜昌后，北面受我汉水上游之截击，南面亦受我沔(阳)监(利)地区之牵制，尤其经我进攻宜昌之役，使敌深感长江不足以为固，于一九四三年二月间，先行"扫荡"我沔监地区，以图减少尔后渡江之困难。旋即于三月间渡江进犯，经我反击，将敌击退于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亘宜昌、天宝山、盐池庙、转斗湾之线，成犬牙交错形势，我即停止攻击。

四月下旬，敌企图击破我鄂西野战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攫取我洞庭谷仓，并撤破我重庆门户，抽集其精锐部队七个师团，总兵力约十万人，分别集中于华容、藕池口、弥陀寺、宜昌附近地区。同时，于汉口、当阳集结飞机百余架，由其十一军军长横山勇指挥，向我疯狂进犯。

此时，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于三月间调往云南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由孙连仲代理)。陈在滇获悉日军西犯，乃于五月又飞回恩施指挥作战：以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固守安乡亘公安之线既设阵地；以王敬久第十集团军固守公安亘枝江之线

既设阵地；以吴奇伟江防军固守宜都亘石牌要塞之阵地；以周岩第二十六集团军之七十五军和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之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固守三游洞（西陵峡东口）亘转斗湾间既设阵地，令各部队以坚强之抵抗，不断消耗敌人，并将敌诱至渔洋关亘石牌要塞间，然后转为攻势，压迫敌人于大江西岸而聚歼之。

五月五日，果然不出我方所料，日军主力由华容、藕池口向我洞庭湖北岸进攻。我第七十三军依照预定计划，逐次打击敌人。至七日晚，敌进抵南县、安乡附近，我军与敌血战一昼夜，只因地形不良，防守困难，向后转移。八日南县、安乡沦于敌手。九日，我军在三仙湖、红庙予敌以打击后，逐次向洞庭湖南岸撤退。至此，敌求我主力决战企图完全扑空。向津市进犯之敌，迭次对我进行试探性攻击，我军未动。旋敌以第四十师团及第三十四师团各一部留置洞庭湖北岸，其第三师团主力及独立第十七旅团西移，十二日，集结于津市东北地区的独立第十七旅团向大堰垱、新安攻击，被我阻止。第六十八师团向暖水街攻击。同时弥陀寺敌第十三师团一部三千余，亦向斑竹垱、新江口攻击。十三日一时许，敌第十三师团主力，复由洋溪、枝江间强渡长江，我防守公安之第八十七军四面受敌，势将陷于孤立，乃放弃公安西移，逸出敌之包围圈。从洋溪、枝江间渡江之敌第十三师团，被我第九十四军主力及第八十六军之六十七师阻击于茶园寺附近；迄十五日，敌我在大堰垱、暖水街、刘家场、茶园寺亘枝江西侧之线激战。

五月十六、十七两日，敌第五十八师团约五千人向西猛扑，我第十集团军连日与敌激战，双方伤亡均重。敌又不断增援猛攻，我被迫向西转进。此时，澧县以北之敌第三师团向西北方移动，宜昌西岸及古老背附近之敌，亦逐渐增加，似有向我江防军攻击之企图。我第七十九、第七十四等军于石门以北地区。第十集团军在清江以南地区对敌展开持久战，江防军则确保石牌要塞。二十一日晨，茶园寺方面之敌等十三师团攻陷王家畈后，以约三千人北向，与枝江之敌第五十八师团之一部，夹击我第八十六军之六十七师，是晚由聂家河、庙滩附近强渡洋溪河（即汉阳河），同时敌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宜都北红花套附近强渡，经我第八十六军第十三师猛击阻止。二十二日，我第八十七军一部在渔洋关附近，与敌第十三师团竟日激战，卒以众寡悬殊，渔洋关失守，我军退守川心店、龙潭坪之线。敌第三十九师团在强烈炮火及飞机掩护下，四千余人由红花套附近渡江，向我第十三师之大小宋山及长岭岗阵地进攻，经我反击予以重创。迄晚，第八十六军守枇杷树、磨市、鄢家沱、仙人桥之线，翌日与敌在该线激战后，转移至马鞍山（长阳南）、板桥铺之线，左翼仍在乌龟山未动。二十四日，敌集中第三十九、第三师团主力，向长阳第八十六军猛攻，激战至午后，阵地被敌突破。我第八十六军右翼即调整态势，扼守长阳西北、清江北岸亘凤凰山之线。此时第三十二军之第一三九师一部已抵津洋口、都镇湾间，适敌由聂家河西犯与由渔洋关方面向清江南岸之敌会合后，在沿市口、都镇湾间强渡，被我击退。

日军第三、第三十九两师团主力，于五月二十四日在宜昌西岸继续向我第十八军第十八师阵地猛攻，经予痛击阻止。至二十五日，敌以空军掩护，全线向我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经我南北夹击，敌军伤亡甚大。当时，敌于清江西岸及攻击石牌之部队，总兵力约六万人，敌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施、巴东之企图。在此关键时刻，我重庆统帅部当即严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确指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为聚歼日军之唯一良机。我军各级指挥官奉令后，均抱定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依地形之有利，与敌决战。如守备石牌第一线之十一师师长胡琏，当战斗激烈时，陈诚司令长官打电话问他："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英勇气概，可见一斑。

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围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当敌进入我之圈内，以炽烈火网将其聚歼。因此，八斗方、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等地屡次进犯之敌，多无生还。

二十六、二十七两日，江防军方面激战最烈，第十一师团长尹宗岳、张涤瑕等亲至前线指挥战斗；第五师在馒头嘴，十八师、十三师在轿顶山、石门垭、笔尖峰阵地正面与敌激战，全体官兵斗志奋发，先后毙敌三四千人。二十七日晚，江防军防守稻草坪、高家堰、易家坝、石牌之线。第十集团军之九十四军主力亦转移于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之右翼。由偏岩窜木桥溪之敌，被我消灭甚多。迄二十八日晚，正面之敌，经我猛攻，加以我空军不断轰炸，敌增援困难。此时，我出击部队第一一八师和第一八五师由五峰、资丘攻克渔洋关；敌第三、第十三师团之后方被我截断，陷入我包围之中。于是我正面各军，于三十日起，乘机出击，全面反攻。此时，江防军出面之敌乃集中其步、炮、空之全力，分向曹家畈及石牌要塞进攻，并由天柱山向木桥溪方面迂回。

迄六月三日，江防军正面进展顺利，已完全恢复战前态势。

而我第七十四军及第二十九集团军亦先后克复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进迫公安及磨盘洲之线。敌第四十师团约千余及伪军第十一师约三千余人，分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宜都及磨市被围之敌，几经激战，伤亡奇重，磨市之敌大部被歼。五日，我克磨市，残敌据磨市东南陶家坡附近高地顽抗。此时宜都城郊之敌，因我追击部队已迫近城郊及其渡河材料被炸，须另觅渡河点，复因磨市之敌求援，乃行反噬，遂于六日冒险向我第七十九军一

九四师及九十八师正面突围，第一九四师因后续部队未到，独当敌之主攻，众寡不敌，遂被突破。待暂编第六师驰至，敌已窜至肖石岩、聂家河附近。同时松滋之敌亦向洋溪、枝江回窜，攻我第一一八师之侧背，该师兵力仅四营，被迫退至余家桥附近。七日，磨市东南地区残敌，借飞机掩护并施放毒气，乃突出重围，与聂家河之敌会合，怆惶东窜。是晚，我暂编第六师夜袭敌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其师团长赤鹿理失踪。又六日至八日间，敌为策应宜都之敌突围，先后增至三千余，借空军之掩护，在街河市、西斋、宝塔寺附近地区，与我第七十四军激战三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我并击落敌机一架。

八日，我第一二一师克复宜都，我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于六月九日克复枝江城，残敌向东逃窜。十一日，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九师克刘家场；暂编第六师克洋溪，入夜占松滋。十二日，第七十九军一九四师先后克磨盘洲、新江口。十七日，第七十四军克车家嘴、申津渡等地，第一九四师克斑竹土当、米积台。尔后我军继续挺进江岸，收复陡湖堤，对困守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之敌包围攻击。战斗至此，我军已完全恢复五月五日以前之原态势。鄂西会战，至此结束。

（宋瑞河）

材料二　石牌柳林战斗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六日，占领湖北境内长江岸之日军，由枝江西董市、白马、古老背（均在长江北岸），趁长江江面晨雾，渡江侵犯百里洲、宜都与红花套各地。我各江防部队，严阵以待，趁其半渡，以猛烈炮火奇袭其渡江船艇，仅上述这三个守地，即毙伤敌约三百多人，击沉敌炮艇、汽船数艘。

我于一九四一年八月，部队出川回防鄂西时，即由师参谋处调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任第三营营长。我师担任由宜昌西岸大桥边至长洋、宜都的防守任务，我营防守红花套。

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敌人又开始活动，沿江分五路同时抢渡，重点在江陵与提头寺。在枝城对岸郎溪之敌约一个联队在河道弯曲突出部，先后抢渡过江，于七日向西北分股突破汉洋河，侵占聂家河、潘家湾后，越过清江，直趋长阳我宜都守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除留一个营继续防守江防外，全团（欠一营）迅速回师，向长阳渡河之敌截击尾追，我团（欠一营）由石牌向长阳前进，扼守清江。我营将红花套江防任务，移交友军后，迅速转移至吴家坪。三月八日，敌绕过长阳，在长阳西十华里津洋口，渡过清江，分两路，一路向石牌进犯，在沈家嘴与我团第一营接触，这一带，地形险要，悬岩山谷较多，我团扼守要隘，凭险与敌作战，敌前进困难，战斗呈胶着状。一路进犯资丘之敌，被我从野三关赶来之友军第十一师一个营，在资丘附近截击，被我军毙伤敌十余人，敌四百余人击溃。九日，我营由吴家坪向柳林前进，拟增援石牌我团主力作战，适与敌在柳林峡谷遭遇，情况突然紧急，我命令前卫连（第七连）迅速前进，抢占谷地左侧高地，阻敌前进；命令第八连进至谷口处正面堵击敌人，第九连由小路上山，占领制高点，火力封销谷口，阻击后续之敌，机枪连及迫炮排迅速进入阵地，向阵地前沿猛烈射击。因敌我双方均在山谷内，只有前进，不容后退，敌顽强战斗，战况激烈，多次向第七连阵地冲突，抢夺高地，均被我第七连击退。战斗至傍晚，才稍沉寂。深夜敌一股窜至我侧面，被我警戒驱逐。由于我抢先占领谷中左侧高地，取得优势地形，瞰制敌之进出，敌多次争夺未得逞，我估计明（十）日必有更激烈之争夺战，为加强第七连高地火力，配属重机枪一个排（两挺）；从第九连抽一个排，绕至柳林西北，挠袭敌侧后。因为我营是脱离团主力独立作战，无补给，必须注意节约弹药，并派通信班长间道前往石牌与团联系，各连排在天亮前即布署完毕。

十日晨七时许，敌机飞临石牌、长阳及我阵地上空侦察。十时许，敌机数架飞临我阵地上空投弹轰炸，并低飞扫射，我营受到一定伤亡。近中午敌人集中力量，向我第七连阵前多次冲锋，均被我打退，在我阵地前横尸十余具。我为增强战斗，稳住军心，派副营长带一个排增援第七连作战。下午战斗更为激烈，敌集中小炮轰击，飞机不断低飞轰炸扫射，副营长受重伤，第七连排长一死一伤，情势更紧。此时副团长易智（军校七期）带来一个迫炮排，一个步话班，一个弹药班。我和副团长会商后，由他指挥全营战斗。我带迫炮排亲自去第七连协助指挥，用迫炮轰击阵前凹地潜伏之敌。敌人溃退，情势好转。但此时谷地正面第八连阵地，被敌突破后退，连长受伤。我向第七连连长交代后，带着原支援第七连的一个步兵排前去支援。在途中，敌机在离我三四十公尺处投弹爆炸，我头部前额被破片擦伤，门牙碰掉一颗，我感到第八连情况紧急，必须亲去，乃裹伤继续前进。第八连连长欧阳伦，他下鄂被弹片击伤，但他仍在继续指挥战斗。我要他下去，他看见我也受伤，坚持不下去。欧阳伦，广东人，军校十四期，平时寡言少语，关心士兵如子弟，执行命令很认真，训练要求严格，多次被评为优秀连。敌人疯狂向他连阵地冲击，他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冲出阵前，与敌展开白刃战，他受伤对士气有影响，阵地被突破。他包扎后复返第一线，士气又大振，夺回阵地，毙敌十余人，副团长闻听第八连阵地被突破，连长又受伤，也赶来了。我们商议后，以第九连长率两个排，向敌侧翼冲击，以解第八连之危。敌不支后退，第八连乘势冲杀至下午六时，战斗转弱。我和副团长向第八连长交代后，沿阵地至第七连视察，嘱他们加强工事，补充弹药，干粮，充足饮水，轮流就地休息，准备明日再战。我们回营指挥所时，接团部通报：石牌当面之

敌,在我团阻击下,逐渐向沈家嘴后退,有向西北溃逃渡江之势,要我营捕捉战机,乘势歼灭残敌。我通知各连准备夜间战斗。晚十时许,敌突向我阵地发起夜袭,知敌将利用夜暗佯攻,以图脱离接触逃跑。我营乘机全线出击,分小股尾追,至大桥边与团主力会合。调整布署后,继续追击至江岸三华里处,敌布阵抵抗。同时宜昌敌炮兵,向我后方盲目发射,以助敌渡江,天亮我军追至江边收复原阵地。

此役,我营从三月七日起至十日,历经四天的战斗。前三天与敌一个大队独立作战,全营官兵以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气概,与顽敌展开搏斗,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无一临阵逃跑,不听命令者。最后一天,敌机疯狂轰炸,拚死冲突,但我营官兵,仍沉着英勇奋战,裹创再战,愈战愈勇。此役我营共负伤二十八人,阵亡十三人,毙伤敌七八十人。十三日,我团开长阳鱼坪整休。

摘自《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美合作所成立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三年 5月,经过近2年的谈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中方参谋长李崇诗,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组和1个总办公室、1个总工程处。这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情报所为收集对日作战情报而与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联系并提出意向的。1942年春,美海军情报所正式派遣梅乐斯到重庆与戴笠进行谈判,到1943年4月在重庆磁器口签订合同。其内容共10项,主要有: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问题;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美方人员在华享受外交人员待遇,并帮助军统局训练特务部队。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有庞大集中营。在福建建阳设有东南办事处,下辖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年情报站,并先后在安徽雄村、临泉,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坝,贵州息烽,江西修水,福建漳州、建瓯,浙江瑞安,广东梅县等地,开办训练班,培训特务,逮捕和残害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根据规定,中美合作所在抗战结束后即应结束,但至1946年3月才宣布撤销。

材料:

· 戴笠与中美合作所

材料 戴笠与中美合作所

戴笠和帝国主义的勾结,最初是与英帝有往来,以后才与美帝发生关系。抗战发生后,军统的电讯处在研译日本空军的密码通讯方面,掌握了一些规律,对于当时日本空军每次空袭重庆之前,侦察机发回日空军基地的电报和轰炸目标的指示积累了许多经验,由于空军在飞行时所使用的密电码较为简单,容易研译出来。每遇空袭,军统便把日机出动情况和可能轰炸的目标,预先通知重庆防空司令部,都有相当准确性。因此引起了英国驻在重庆的特务们的注意,便希望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而把这一套东西剽窃过去。军统也想通过与英帝合作的关系,偷学到它的一些东西。约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曾以当时航空委员会工作队的名义,由电讯处大特务倪耐冰率领了专门侦收研译这方面工作的特务人员如胡鸿业等十多人先后在香港、印度工作过一段时期。一九四一年并在重庆小龙坎附近红槽坊成立了一个中英技术合作所,由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主任,英帝派了一个副主任。因为双方各有打算,彼此想偷学对方一点东西,加上戴笠还希望英国人在无线电器材方面能无代价或低价供给军统。但是这些希望都落了空,戴笠经常背地里骂英国人是"吝啬鬼",答应给他的东西迟迟不肯运来。他便希望能与美国人合作,曾多次指示军统美国站长、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在美国多方联系接洽。最初美帝一些特务机关对此并不重视,直到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军统电讯处研译密电的技术室,侦译到日本空军有在太平洋方面进行轰炸的准备情况后,戴笠想以此讨好美帝,引起它的注意,便决定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美国站长萧勃,由萧勃告诉了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便急忙转知美帝一些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据说美国一些将军们听了捧腹大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并感到中国人是在破坏美日关系,因为日本这时在军火方面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两国间的关系很好。以后军统又陆续获得这方面有关情况,经萧勃转告郭德权,郭自己也有点怀疑,便不敢正式通知美方,而只和与他私交较好的一些美帝军官们谈谈。而他们也当作神话一样听听,毫不在意。结果日空军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来栖三郎赴美商谈途中、美帝全无防范的情况下,偷袭珍珠港成功。这时美帝一些平日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才想起郭德权事前通知他们的消息是可靠的,便去找郭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以后晓得是军统方面得到的,这时美帝对外活动的情报机关,美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才找萧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这时戴笠真是高兴极了,便在他公馆里大宴宾客,招待迪帕斯。他并连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也赞成他早日与美帝发生联系。不久,萧勃便陪同美帝海军方面特务头子梅乐斯海军中校来到重庆,与戴笠进行商谈,

决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地点选定在军统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后面鍾家山,并立即动手兴建房屋。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建了大小近五百幢平房;强占附近一带民房、田地达三十里左右的范围,连一条从磁器口经小歌乐山到歌乐山的道路都被改道走杨公桥。

一九四二年夏天,梅乐斯率领了三十多名美国特务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以后,又陆续来了八十余名。最初进行的工作,只限于双方交换有关对日寇的密电码的侦收研译。由于双方各有一个打算,美国希望很快地能掌握军统几年所积累下来的对日本空军密码研译的技术经验,而戴笠则希望美帝能把专门研择密码的一个叫"黑室"的组织和一套研译密电码的科学设备搬一部份到重庆来,而又不打算把自己懂得的一些东西让美帝了解。结果搞了近一年,彼此在这一方面都达不到目的。美帝所能提供的,只是一批无线电制造器材。戴笠也不肯把真正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人员派到中美所,只提供一些研译出来的材料。但双方却看出了对方可利用之处还多,彼此不肯就此散伙。美帝特务看出了戴笠特务系统在中国蒋管区内的特权,以及种种为所欲为的作法,知道通过这一关系,便更可进一步把美国特务势力伸到中国来,便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武器弹药、气象器材、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来协助军统,把密码研究扩大到情报交换。戴笠多年来老是羡慕蒋政府各个部门几乎都与美帝勾结,一听美帝愿意扩大合作范围,立即表示竭诚欢迎。在双方试为进行时,彼此都感到满意,决定正式签订合同。

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发行人鲁斯前来重庆,主持这次合同的签订。戴笠看到美帝这样慎重其事,便请求蒋介石派大员前去主持,蒋便指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中国方面的代表。但是当正式签字那天,宋子文临时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分身,由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代表主持。地点在重庆磁器口军统缫丝厂办事处大礼堂。出席签订合同仪式的有中美所兼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美方主任秘书史密斯,及中美所中方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和中美所各组组长(均为军统特务)、副组长(美国特务)暨军统头子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和军统各处处长、各室主任等共七十余人。由鲁斯、胡世泽在合同上签字后,即由双方主任秘书以本国语言宣读一次。当晚戴笠即设盛宴招待这些美国的特务头子。

在这次合同中,还提到有关中美所的组织与人事安排应由双方同意,以及双方工作人员待遇由各自负责,美方人员在华应享有外交人员待遇等等方面问题。从整个文字上看来。好象是相互尊重各自主权,也找不到不平等的语句。所以戴笠对此极感高兴,认为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合作。而在实际执行时的情况就不是那样了。如明明规定是研究与交换情报,实际上却是军统单方面向美方提供情报。因为军统与汉奸们既有勾结,在沦陷地区又有些组织和无线电台,对日军在华情况的材料搜集比美帝不仅方便而且有相当基础。这方面材料,美帝方面过去得到很少。有关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等情况,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情报处和武官们同样也不及军统搜集得多。所以几年来一直是单方面提供,若稍有出入和不够详细的地方,美方的备忘录马上来了,便得立刻进行复查和补充。在人事方面,条约上也说明各单位负责人基本上由军统选派,美方只派一个副的和几个技术方面人员。实际上这些副的往往比正的负责人职权大得多。特别是条约上规定的,"双方选派的负责人应事先征求对方同意,如在工作期间,一方对另方工作人员感到不满时,可请求调换,彼此不得拒绝",实际上美方来到重庆的人员,经梅乐斯决定后,戴笠便得同意,而戴笠要调派或更换一个单位主管人员,却得向梅乐斯征求同意,几年间军统没有要求美方调换过一个人。美方参谋长贝乐利相当跋扈专横,军统派出的负责人主任秘书潘其武(军统所派的参谋长李崇诗兼该所东南办事处处长,长期在福建建阳,实际上由潘负责)经常受他的气,而不敢表示不满。但军统选派的总务组长,往往因对美特们生活照料稍不周到,美方便提出要求更换,几年间一共换过三人。戴笠把在军统办事务最有经验的郭斌、杨隆祜、罗杰,都调去试了一下,结果都不能使美特们满意。至于中美所物资的处理更是全权操在美国人手中,兼主任戴笠连一圈电话线都不能作主,必须美方交给军统的东西才能由戴笠支配。美特们看中了军统用作囚禁中共和民主人士等的白公馆,要拿去当宿舍,戴笠便赶紧让出来。美方有新建的大饭厅,专门供美特享用,所有的招待人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胜利大厦、留法比瑞同学会餐厅等处罗致来的。在同一个办公室内,美方人员是喝牛奶、咖啡,办公时还来一次午茶;军统特务连负责的组长们都分不到一杯。这就是戴笠所认为很满意的平等待遇。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122辑

常德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常德战役爆发。是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了进攻湖南常德和安徽广德的战役计划,其目的是:消灭中国军的主力,摧毁中国第二战区的根据地,牵制中国可能转用到云南去的兵力,以策应日军在南洋的作战。9月30日起,日军出动4个师团的兵力发起进攻,10月30日攻占广德。11月2日发动对常

德的进攻。24日，日军主力逐渐接近常德，中国军队积极应战，两军在德山进行激烈的拉锯战。12月2日德山沦陷，3日常德为日军攻占。在常德保卫战中，常德守军第七十军第五十七师英勇作战，激战15昼夜，弹尽粮绝，全师8529人中，仅有321人突围而出，其余均壮烈殉国。4日，中国军队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抵达战场，开始反攻常德外围。8日克复德山，进攻常德。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也配合中国军队进行作战。10日，日军在完成战役目的后开始全线总退却。战事就此告一阶段。因战事主要发生在湖南北部，故又称"湘北战役"。

材料：

- 常德外围战
- 六千壮士血染常德

材料一　常德外围战

11月2日，日军第3、13、68、116等4个师团主力及其佐佐木、古贺、户田、炳田、宫胁等支队，在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以步兵38个大队，山野炮104门，从下午5时开始，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分12路向宜都至华容之间的广阔正面展开猛烈进攻。守军第一线部队是第10集团军的第79军和第29集团军的第44军。在日军的全线攻击下，守军也以步兵39个营在滨湖沿线及西面山地约180公里的正面既设阵地抵抗。2日、3日两天，守军均在第一线与日军对战。但3日南县失守。4日公安失守。5日，守军逐步开始向第二线阵地撤退，至6日晚第一线阵地已全部放弃。

在序战中，日军未以全部兵力进行攻击，主要是利用优势炮火摧毁守军防线。守军也未将主力放在第一线，只用一部分兵力给以阻挡，减慢日军进攻速度，以利调兵遣将，部署下一步的战略。这样，经过4天的抵抗之后，第10集团军逐渐退至聂家河、棉马城、煖水街、王家厂一线阵地，第29集团军退至永镇河至安乡一线阵地。以后，日军的主要攻击力量放在煖水街、王家厂方面。因此，下面几个阶段的战斗就集中在洞庭湖西面的山岳地区，尤其是石门、慈利等地。

煖水街位于湖北清江至湖南澧水之间的山岳地带边缘，如果日军要进攻常德的话，必须首先占领该地，这样才能掩护其右翼侧后安全，否则，守军就可以将重兵集结于此，对日军侧后进行猛烈袭击，切断日军退路。

防守煖水街要地的是第10集团军。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将45个步兵营防守在以煖水街为中心的南北地区，在这大约90公里宽的广正面内，凭借阵地抵抗日军。进攻煖水街方面的日军主力，是第3、13两个师团和佐佐木等3年支队。日军以23个步兵大队，山野炮五六十门，于11月6、7日两天向第10集团军阵地连续猛攻。在6、7日的两天时间内，战斗集中在煖水街、乾溪滩、马踏溪等地进行，在守军的抵抗下，日军未能突破防线。7日下午4点，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给王敬久发来指示："查煖水街、乾溪滩、马踏溪间三角地带，为战区战略要地，得失关系至巨，该集团军所属官兵，如能在该地固守3日，着重奖赏，仰即激励各部，务须达成任务为要"。王敬久随即命令暂编第六师固守暖水街，另派有力部队确保乾溪滩、马踏溪要点，并抽调第194师位于马踏溪附近准备机动。王敬久刚把部署调整完毕，8日早晨，孙连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着第10集团军王敬久即刻集中主力，击破煖水街方面突进之敌，并将部署及实施情形具报。"孙连仲接到这个命令后，改变原来迟缓日军速度，主力待机歼敌的计划，即刻命令第29集团军向王家厂方面日军进攻，配合第10集团军反攻；同时命令第10集团军除"固守煖水街部队，坚持至最后一人外"，其在马踏溪附近部队应各向日军侧后竭力攻击；并另令第26、33两集团军分别向宜昌、当阳日军攻击，策应第10集团军的反攻作战。

第10集团军权辖有两军5师，按照孙连仲的要求，能够在煖水街一线重地坚守3天就已经需要作很大的努力了，根本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11日9日，王敬久在反击之前，其第66军已有一部被日军包围，第185师阵地被古贺支队突破；其第79军在马踏溪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此时，王敬久得知澧县、津市正面和石门以北地区都已发现日军，于是只得放弃反攻计划。10日，原守煖水街核心阵地的第79军暂编第9师，受到日军围攻，经过苦战，始突出重围。11日，孙连仲命令第10集团军主力向西面山地渔洋关方向撤退。12日，日军突破暖水街南北地区阵地后，继续派兵一部，将守军压迫和封锁在渔洋关、子良坪以西山地，并留置7000余人对王敬久部队进行正面牵制，主力大队人马则集中南下。

14日早晨，日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下继续全力猛攻，第73军很快陷入混乱，军部与各师之间联系中断。上午8时左右，日军第3师团一部直扑第77师指挥所，师部特务连立即与日军展开肉搏，后经该师直属机关部队参战，并进行拼死格斗，师部才免遭毁灭。中午时分，日军由易家渡渡过澧水，完成四面合围，第73军陷入危境。下午3点，日军第3师团第116联队攻入石门城北郊第73军军部指挥所，军长汪之斌率部撤退时，命令暂编第5师继续坚守石门阵地。此时，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接到孙连仲的电话，命令第73军南渡澧水突围。但第73军已被四面包围，无法南渡澧水。军长汪之斌命暂5师留下掩护，军主力向西突逃。留下守城的暂5师师长彭士量，率部与日军勇猛拼杀，从14日夜晚到15日黄昏，激战一天一夜，该师从师长到士兵几乎全部阵亡，仅有小部分强渡

澧水成功。第15师、77师向西突围时,亦未能摆脱日军的围攻,经一天一晚战斗,除军师部部分人员逃出重围外,大部分也已阵亡。据军令部长徐永昌战后总结,第73军在石门11月12日至15日的战斗中,损失了80%的兵力。

从19日开始,慈利附近的日军以5个联队的兵力,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向第74军主力正面展开猛烈攻击。20日,日军攻击点达到高潮。第74军在慈利附近与日军一共激战了5天,到22日时,伤亡已经十分惨重,且右翼部队被日军分割包围。为了避免第73军的同样下场,王耀武命令该军向漆家河西南方向撤退。至此,慈利附近除太阳山、太浮山两据点仍为第162、150两师防守外,其于各要点均为日军控制。

石门、慈利的溃败,使日军主力能够顺利地由东向西攻击常德。日军在进攻石门、慈利的同时,第3师团曾派一小股部队南渡澧水直扑陬市、桃源。21日,日军编队飞机16架于桃源上空轰炸扫射之后,空投伞兵60余名,与地面部队配合进攻,桃源很快为日军占领。第150师师部设在陬市附近,师长许国璋亲率该师一部向西北抵抗第3师团,结果被日军击伤后自杀身亡,陬市被日军占领。日军第68师团也在这时进攻汉寿。到23日前后,日军第13师团等部由西向东,第68师团由东向西,第3师团由南向北,第116师团由北向南四面围攻常德,常德已成为瓮中之鳖。

(摘自《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六千壮士血染常德

二十四日晨,日军全线猛攻,常德四郊硝烟压城,战火纷飞。中午,城南中国军队的岩凸阵地经过敌我五易其手后陷落,中方退至陡码头再战。在常德东北方的七里桥,在城西的落路口,战况之激烈毫不逊色于城南。战至夜间,城南告急。在篆码头及南站的日军,白天曾企图由南站强渡沅江攻城,被击退,后在黑幕掩护下再次强渡,中国守军一排决死抵抗,直至全体牺牲。日军渡过沅江后,一部由东南城角水星楼间攀登城垣,一部冲入城内沅清街附近。

为了堵住这个城防缺口,第五十七师立即调整兵力前往驰救,分路合击水星楼日军。经过激烈拼杀,日军被挤出城外。日军溃逃途中,守军又伏兵袭击,歼敌数百人。

二十五日拂晓,遭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动用飞机对常德城进行狂轰滥炸,并投放燃烧弹。顿时烟焰蔽天,民宅荡然。在轰炸后,日军从东、西、北三门附近地区全面进攻。七里桥方面,双方在桥南侧反复拉锯。西门外,双方在船码头激战。此时,中国守军炮弹已经耗尽,火力大减。日军则乘机发挥火力优势,猛轰猛攻,逐步逼近城垣。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师长余程万命令部队"由北门、小西门转入城西内调整,东、北两门转入城内作战。"并于二十六日凌晨对城内部队作了部署,重新配置了东门城垣、北门至大西门、上、下南门城垣的守备队,还部署了城内消防事宜。同时,城内的师部,也筑起了石头防线,迎接最后的决战。

二十六日拂晓,东门外日军再度发起攻势,北门日军也乘守军换防之际,向贾家巷猛攻。守卫贾家巷的中国军队一连官兵,为守住阵地全部与阵地同亡。贾家巷的失陷,使日军获得了可作进攻掩护的城外街市房屋,从而可一步步向城垣逼进。城西日军原拟强渡护城河攻入城内,但屡为我大西门守军击退,在久攻未能过河的情况下,乃转攻城西北的鼎新电灯公司。同时,还从公司西北的渔父中学附近,向守军侧击,用平射炮猛轰守军防御碉堡,致中国守军一排全体阵亡,常德西方正面阵地失守。日军乘势逼近大西门。

至此时,第五十七师参战的八千三百一十五名官兵,仅剩五百余名,弹药消耗已过大半,形势已很危急。但是,中国守军仍坚持战斗。师长余程万命令"自即刻起,所有排、连、营、团长,一律不得变更位置。"同时,分发了刚从地下掘出的三千发子弹。虽然杯水车薪,却也可聊补不足。此外,还将师直属队和输送兵、担架兵编入一线部队作战,并从炮兵团抽出三百人加入步兵战斗,准备决战。

二十七日拂晓,日军再次全线出击,东门外的日军先后三次冲入城内,均被守军逐出城外。在北门外,日军先后五次扑进城垣,也被守军击退。在大小西门,日军久攻不克,竟大量施放毒气,但城垣守兵不顾生死,坚守阵地,使日军三次爬城均未得逞。入夜,日军的枪炮声逐渐稀疏下来。连日激战、积尸满街的常德城,被反常的静谧所笼罩。余程万令"第一线部队严密戒视。"同时,电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告之常德城陷落势不可免,请求战区外线策应和空军支援,并迅速设法空投粮食、弹药,以济急需。

二十八日晨,常德城在隆隆不绝的炮声中迎来了开战以来最危急的一天。日军二十余架飞机轮番狂轰滥炸,城内火海一片,家屋、碉堡皆成灰烬。日军步兵展开猛烈攻击。东门外,日军藉炮火的支援,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推进至城内海月庵附近,中国军队组织剩余兵员,以手榴弹、大刀、长矛,与日军进行搏斗,将日军逐出东门。日军发现小股部队突击不易见效,遂改变战术,调集炮火集中猛轰一点。在这种毁灭性的炮击后,步兵跟进,再次冲进东门,中国军队被迫退守永安商会、万花洞间的街巷。日军攻入东门后,分成两路推进:一路沿南城墙直趋水星楼;一路分成若干小股,由民房废墟四处出击,进行渗透。

东门告失,师代参谋长皮宣猷即赶赴城东,将城东南角划一新的防线,指挥部队封锁该线,并命令部队利用民房的断墙残壁分点固守,狙击日军的小股渗透。

日军为了扩大战果,策应东门战斗,在北门、小西门、

大西门三处发动进攻。在北门，日军首先施放毒气，继以五路向城内猛攻。中国守军一个营与敌短兵相接，经过七、八次肉搏，所剩下能冲锋的兵员不足一个班。为此，守军退至天主堂、玛瑙巷、体育场的巷战工事。在大小西门，日军也发动数次冲锋，但均被守军击退。

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经过几天的激战，伤亡非常严重。各级指挥官伤亡达百分之九十五，重武器被毁达百分之九十，所有后勤兵员全部参加了一线作战，且已大部牺牲。日军曾向城内空投劝降书。但是，守军未予理采。

二十九日拂晓，东门外日军由突破的缺口入城，沿着城墙推进，中国军队则利用墙堆瓦砾进行抵抗。虽然自二十七日以来，中国守军基本上已经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但这种"散兵"防守却也令日军头痛。日军一面对城中心地带进行猛烈炮击，一面以汽油浇民房，点火焚烧，常德成了"火城"。这种火攻对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守军既要作战，又要扑火，严重分散了战斗力。在日军的攻击和火焰的吞噬下，中国军队东门工事全部被毁，守军全体为国捐躯。在北门，日军从拂晓即开始向天主堂、体育场的守军攻击。南门方面，日军围攻水星楼，久攻未克，竟残酷地将水星楼击毁，楼内守军全部牺牲。

中国军队已被压迫在城中心的狭小范围内，在这严重关头，第五十七师作出了最后的准备。余程万师长电告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三十日晨，日军飞机轰炸第五十七师中央银行师部，并投掷燃烧弹。日军步兵从东、北、西门分别向大小高山巷、局北街、中山南路、体育场推进。各处守军士兵全部战死在自己的散兵作战位置上。入夜，日军继续火攻常德城核心地区。火海一片，映红了茫茫苍穹。

十二月一日，日机继续轰炸中央银行，同时放弃了每烧一片进攻一片的火攻法，改为将平射炮全部移到东、西、北三面主要战线上，炮击在街道上抵抗的守军。中国军队遂撤至街道两侧民房，继续战斗，日军为消除守军抵抗的依托，又用炮火将临街的民房夷为平地。此时，守军东、南、北门的阵地已全部失守，仅剩下兴街口经中山南路和大西门一隅城区。

此时，奉命增援常德的中国第十军于三十日占领了德山。入夜，先头部队进抵常德南站。但却因无法渡过沅江，而未能入城与第五十七师会合，致常德守军仍以残兵余将与日军死战。

二日，日军攻陷常德城中的兴街口，守军阵地仅剩下方圆数百米的区域，常德已无法再守。

三日凌晨，余程万率领余部渡江突围，向德山方向移动，以图与增援友军会合。常德城内，仍留少量部队由第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指挥，继续在城内抵抗，掩护突围。柴意新率少量官兵作决死之战，与敌肉搏十余次，全部牺牲。常德城陷落。

（摘自《抗战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三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56人出席。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分别在会上作了党务、政治、军事报告。蒋介石在训词中强调全党要多注意战后的建国工作，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政实施的总报告，决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会议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五院正副院长由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会议推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孙科、于右任、戴传贤、居正分任立法、监察、考试、司法院院长。会议作出了《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案》，指责中国共产党不遵守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表示仍能以"宽大容忍之态度"，"实为开导"，"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幡然自反"。会议所发表的宣言，称目前亟应积极致力之要务，共有如下3条：加强抗战力量，以争取最后胜利；促进民权政治，以完成建国之使命；实行实业计划，以改进人民之生活。

材料：

- 开幕词
- 快讯

材料一　开幕词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今天本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再过几天就是"九一八"第十二周年纪念了，而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也已过了两个月了。这六年多以来，我们全国的同胞同志，前仆后继，牺牲奋斗，可以说受尽了一切艰难痛苦，尤其是沦陷区——特别是东北——的同胞，颠沛流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过着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痛苦和耻辱，我们全国同胞都应该时刻在念，永志不忘。而我们中央自从"九一八"以来，含垢忍羞，饱受耻辱。我们各同志更应知此次全会对党、对国、对总理与先烈，以及对全国军民同胞，更是负有重大的责任，我

们更应该困心衡虑，共同努力，以保障我们抗战六年来全国军民牺牲奋斗所得的结果，完成我们总理组党以来所遗留给我们未竟的使命。在这次全会期间，各位同志务必要深切追念我们过去身受的痛苦与耻辱，省察我们自身所负的责任，针对抗战的局势，决定政治、党务、经济等各种方针，以达成这次全会的任务。

这六年多以来，我们全国同胞、同志所以不惜牺牲，不辞痛苦，从事艰苦抗战者，唯一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于抗战胜利之后，能够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现在最后胜利业已在望，而今后如何建立起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应该是这次全会各位同志所集思广益，切实研讨的主题。我可以告诉各位，由于这六年来全国军民同志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民族生命的危机确已渡过，国家基础亦已稳定。当然，我们以后要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还需要经过更大的牺牲和努力，然而我们现在已经临到胜利的前夕了，所以各位同志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将来抗战结束之后，立刻可以付诸实施。反之，如果我们在这抗战时期不将建国的方案预先决定，一旦战事结束，诸事均无准备，不仅工作无法推进，而且因为建国的失败，连我们抗战胜利的收获都要随之丧失无余。所以这一次全会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对于今后战事、党务、政治、经济发展的途径，以及三民主义的建设，如何实行，都应该充分研讨，作一个具体明确的决定，以为战后努力的标准。

先说抗战全局和国际形势。今日国际形势固然是很可乐观，但是亦不可过于乐观。至于最近抗战的局势，尤其是太平洋形势的演进，我可以断言，我们最后胜利的时期，快则就在这一年之内，迟则或要在一年之后。这句话再明白一些说，就是根据同盟国今日的作战方略与决心，先在太平洋上击溃倭寇，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消灭倭寇，这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所以尚有说明的必要。我个人以为，这个倭寇失败时间迟早的问题，他的关键完全在倭寇的本身，这就是要看倭寇今后战略如何而定。如果他对于我们同盟国的战略，不能配合其作战的条件，那他的战略就犯了错误；如果他的战略一经错误，则崩溃随之，不必要到一年，甚至于在这半年以内就可以使他失败。否则他的战略如果没有错失，那作战时间就要延长到一年以后，亦未可知。总之，战争结束的时间，无论一年以内或延长到一年以后，而这个时期是很容易过去的。在这个时期之中，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加倍努力，使各种事业，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事业不能进步充实，建设工作没有切实的准备，那抗战就是得到胜利，敌寇虽然是被我们打败，而我们自己最后仍旧是要受到失败的危险。这就是古语所说的“虽胜犹败”，那我们真是作了抗战的罪人了。所以我们要在此时期格外勤劳奋勉，一面加强抗战力量，一面积极准备建国的工作，这是此次全会最重要的任务。

建国的工作千头万绪，事项很多，但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先确立我们的政治建设，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实行宪政，完成建国，本来是本党国民革命努力的最大目标，亦是本党五十年来一贯的宗旨。所以此次全会对于国民大会应如何召集，以及宪法的制定与颁布应如何进行各问题，必须根据国家实际环境与需要，作成一个确切的决议。

第二，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那时候本党所处的地位以及本党对于国家的责任如何，也是此次全会所应详细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决定一个方针，使一般党员有所遵循，使一般民众更能了解。关于这个问题，本席个人的意见，认为宪政实施以后，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尽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但是本党为革命建国的政党，在历史和道义上负有巩固民国基础，保障主义实行的责任，这个特殊的任务是革命历史所遗留，而为本党同志所不容诿卸。因之在宪政实施以后，本党退处于平民的地位，但本党同志更是要继续我们过去一贯的努力，贯彻我们实现三民主义，保育中华民国的使命。换言之，本党与一般政党，其地位相同，而其任务则比之其他政党特别重大。因为本党负责有革命历史的使命，不能不肩负特殊的义务。所以如何能使本党完成这个使命，而使国民的基础可以永远巩固，这一点是我们本党责任所在，各位同志万不能忽略，而且要加以特别的研讨。

第三，是关于经济问题，也是此次全会应该注重研讨问题。现在一般同志对于我们经济情形十分关心，认为前途不无忧虑，这是当然的。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经济的困难虽然还在加重，但要知道我们时至今日，经济的危机实已过去，这是我负政治、经济责任的当局可以负责保证，而决不是随便空谈的。尤其要知道，经济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经济的形势必然随着国际战事的胜利而进展的。因此，以后只要我们比过去更刻苦节俭，努力奋斗，那么，我们军事的情形一天天的接近胜利，我们经济上的形势也必一天天的发展。而且今日已经有许多地方足以证明我们的经济前途是可以特别乐观的。我现在只举出两件事来说明：第一是今年全国各地丰收，军粮民食皆不虞欠缺，而且棉花的收成甚佳，尤其是四川种棉的成绩比往年要增加几倍，依照最近岁收情形看来，我们全体军民的衣食，至少可以继续供给到三十四年夏季，无虞匮乏。但是惟一的条件，就是还要我们全体军民格外节俭，这“节俭”二字，是我们民生根本问题，务须特别注意。第二是我们盟邦美国为援助我们战时经济的困难，要使我们通货收缩，币值提高，生产增多，物价平定，所以已决定

在去年五万万美金借款之中，提出了二万万美元数量的黄金来供给我国整理币制、平定物价之用。因此，大家对于通货膨胀的一个问题，是不必要再有顾虑了。然而我们经济危机虽已过去，但是经济的困难还是一天天加重。我对于现在经济形势可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现在的经济并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决没有危险"。所以我们无论对经济，对军事，此时万不可以国际形势好转，而过存奢望，过于乐观，万事全要自力更生，这一点要请各位同志深切注意。

举此二端现实的事实，就可以保证我们抗战在今后二年之内经济的危机确是减少了。我常说：我们中国并不是没有物资，问题只在我们有了物资，如何发挥它的功效。换言之，就是看我们是否能尽其应有的努力来运用得法。如果我们能运用得法，一面实行节约，一面增进生产，实行战时法令，则战时经济就没有问题。不过我们讲到经济，决不能只看到战时经济，只注意如何维护现状，渡过难关，我们此时就要准备战后经济的建设，实行总理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这就要确定两个主要的目标：①要促成中国工业化，②要提高人民生活。为实现这两大目标，我们一方面要自立更生，刻苦努力，同时一方面也要与国际经济相配合，与世界友邦密切合作，这就是要利用外资与技术来完成我们的建设。所以此次全会对于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以及对外贸易等各种方针，也要有一个妥善的决定。

以上是本席个人对于今后战事、政治、宪法、党务、经济各方面简单的意见，希望全会同志在此次会议期中，集思广益，从长讨论。我们这一次全体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建国的准备会议，大家要殚精竭虑，尽量贡献。目前我们抗战虽已有必胜的把握，然而胜利的获得，还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的努力和准备更大的牺牲。如果我们今日不能积极努力，甚至因循怠忽，以为可以苟安一时，那我们建国的前途必然会遭到意外的挫折。所以要知道我们抗战在这个时候真是最困难的时候，希望各位同志要认识建国的工作比抗战事业更为艰巨，问题也更为复杂，乘此集合一堂的机会，共同一致切实研究党务应如何努力，政治应如何充实，军事应如何加强，经济应如何发展，民生应如何增进，求得一个具体而正确的方案，来领导全国同志同胞共同一致努力建设，求其彻底实现。这样才能洗雪我们民族从甲午年以来所受的耻辱，也才能奠定我们实行主义的基础，完成我们此次全会的使命。

（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11日）

材料二 快讯

中央社讯：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六日上午九时开幕，到蒋总裁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一百五十四人，列席各院、部、会首长，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监察，中央团部各处室主任等，济济一堂，远地中央委员亦多抵渝参加，将缜密研讨建国工作。全会开幕典礼，系与国父纪念周合并举行，总裁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即席致训词，首谓：世界大战，我联合国已操胜算，中国抗战最后胜利之期日益接近。此次中央全会宜多注意于战后建国工作之研讨。总裁继就建国工作有所指示，尤注重于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二端。政治建设应以促进宪政之实施为目标；经济建设应一面自力更生，一面与国际合作，实现国父之实业计划，提高人民之生活程度。希望全会同志缜密讨论，有所决定。旋即礼成。休息十五分钟后，举行预备会议，仍由总裁主席。推选居正、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戴传贤、邹鲁、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叶楚伧、顾孟馀等十一委员组织主席团。又通过组织审查委员会及各组召集人名单，计党务组召集人丁惟汾、朱家骅、潘公展；政治组召集人张群、张厉生、王世杰；军事组召集人何应钦、程潜、陈济棠；经济组召集人徐堪、贺耀组、沈鸿烈；教育组召集人白崇禧、程天放、王伯群。十时三十分散会。

下午三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于委员右任主席。全体首为林故主席及死难军民默哀三分钟。继推戴传贤，孔祥熙、孙科、叶楚伧、王宠惠、何应钦、吴铁城、狄膺、潘公展、梁寒操、洪兰友等十一委员为宣言起草委员，由戴传贤、吴铁城两委员召集。随即听取党务报告，由中央常务委员居正报告，分述组织、训练、宣传、海外党务、人事、财务及青年团团务概况，并检讨上次全会关于党务各决议案实施进度。其次军事报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何应钦报告，对陆军建军整军，兵役补充，教育训练，经理卫生及空军、海军、后方勤务部门近况及我军作战概况，近期重要战役经过，盟军各战场近态，阐述甚为详尽。结论谓：综上所述，可见敌我形势与前大不相同，现在优胜我握，敌处劣势，而敌情内幕：①社会不安，②政治动摇，③资源缺乏，④战场辽阔，兵力脆弱，⑤士气颓丧，业已达于极点，而其粮食不足，船舶缺乏，尤为致命之所在；加之盟国空军有随时轰炸倭土趋向，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至法西斯意大利进退狼狈，纳粹德国日趋没落，亦为举世共见，毋庸赘述。反观盟国实力与日俱增，吾国抗战六年，越战越强，民心激亢，士气旺盛，最后胜利指日可期。语云：进百里者半九，仍当一本过去精神，淬励奋发，努力前进，以竟全功云。报告毕，全场热烈鼓掌。六时十五分散会。明日上午将举行第二次大会，听取政治报告。

（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7日）

历史内幕

周恩来在胡宗南举办的舞会上

招待酒会于1943年7月10日下午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参加。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讲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走了两步，他忽然停住，让我稍等，他转身返回里院。不一会他出来，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车到小雁塔。胡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敬礼，陪周进会场，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挥手致意。胡陪周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坐。王向作陪者下令："坐下！"

周同胡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

王超凡致欢迎词。在临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谈话。

隔一会，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转向这些夫人说，我们就谈点别的。他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她们不感尴尬，反而笑逐颜开。

周继续和胡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

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长官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周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陪周走向他的专车，对周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的左侧。车启动，胡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招手。

（节选自熊向晖著《地下二十年与周恩来》）

邢仁甫叛徒集团覆灭记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冯冠奎，枪杀了正在新海县(现黄骅市)大赵村主持召开军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的我军区副司令员、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等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

惨案发生后，冀鲁边区党委一面将情况上报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并着手处理遇害烈士后事；一面通令全区缉捕冯冠奎。此后，经多方调查查明，这次惨案的幕后指挥者竟是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于是，一场逮捕邢仁甫叛徒集团的斗争开始了。

邢仁甫带着他的亲信和一支警卫部队驻在新海县的一个海岛——望子岛上。案发后，他一面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一面给一些部队的领导干部写策反信，妄图拉走部队，叛变投敌。区党委与此针锋相对，立即派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应扬到海边，拉回那里的部队，并通知全区党组织和部队，没有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签署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调动部队和财物。同时，向全区抗日军民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区同胞书》，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布告，揭露邢仁甫的罪行。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认清了邢仁甫的真面目，纷纷和他划清界限。区党委迅速稳定了边区形势，使邢仁甫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7月下旬，邢仁甫感到大势已去，便决定投靠日军。他向日军谎称自己有4000人马，日本人要到岛上清点人数。可邢仁甫既拉不动部队，又没有那么多人。他知道谎言一破，投靠日本人也不会有好结果，于是跑到天津，企图通过他小老婆的义母韩重仪(天津救济院院长)投靠国民党。韩重仪帮助邢仁甫打通了关节，邢便跑到洛阳投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

就在邢仁甫四处联系投敌之时，区党委派人到望子岛上向干部战士说明了邢仁甫的叛变真相。100多名干部战士都回到了边区，岛上只剩下了邢的死党冯冠奎、杨铮侯(冀鲁边第三军分区司令)、陈二虎(军区海上特务团长)、潘特(军区后勤部长)、邢朝兴(邢仁甫的秘书)、刘永生(邢仁甫的智囊人物)等几十人。眼见已近冬天，海岸就要封冻，而邢仁甫又无音讯，这帮人知道凶多吉少，便四散而逃。冯冠奎先是逃到盐山县赵毛陶据点，后又投靠盐山县伪军头目张海青。张海青与冯冠奎有前仇，就"赏"他一杯毒酒，冯便魂归西天了。陈二虎、杨铮侯、邢朝兴等逃到无棣县城去投靠顽军张子良。不料刚进城门，门后突然飞出无数子弹，这帮人当场被打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是因为陈二虎被我军收编前，曾把张子良派去游说的一个亲信杀了，张子良借机算了旧帐。

等邢仁甫拿着蒋鼎文给他的"冀察战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和"津浦北段策反专员"的委任状，兴冲冲从洛阳赶回望子岛时，岛上早已人烟皆无了。无奈，邢仁甫只好孤身一人逃到天津。

邢仁甫到天津后，住在河北调伟路秦吉里30号，开始了彻底反党反人民的活动。1943年末，他先后将冀鲁边区党政军力量等秘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蒋鼎文，得到了蒋的嘉奖。1944年初，他又为日寇手拟"剿灭共匪计划"，妄图借日寇力量破坏我冀鲁边区党组织。这期间，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统天津站津南流动小组长，专门搜集津南、渤海一带我党我军情报，对我进行破坏。1945年11月，又被任命为军统特务一级中校组长。1948年1月，他充任国民党河北省三专署保安副司令、代理专员，并公开对我根据地进行武装进攻，犯下了累累罪行。

再说我冀鲁边区与清河区于1944年1月合并为渤海区以后，区党委和渤海行署公安局仍继续缉捕邢仁甫。1954年初，当得知邢仁甫逃到天津的情报后，渤海行署公安局与冀中八分区公安局取得联系，请求促查邢仁甫的下落。八分区分安局经研究决定派人打入邢的内部，寻找机会将其抓获或除掉，讨还血债。公安局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泊镇公安局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颜树炳，令他严密监视邢仁甫的动向，随时掌握情况，可能时立即将其逮捕。

颜树炳是河北省交河县人，牙科医生。当时在天津渤海大楼下以开"大陆牙科诊所"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接受任务后，他利用开诊所的有利条件，广泛搜集情报，多方探听邢仁甫的具体下落。1945年9月，颜树炳认识了律师周大奎和他在天津国民党部队任上尉军官的儿子周平志，通过周平志认识了邢仁甫。找到邢仁甫的下落后，颜树炳立即将情况报告了八分区在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和泊镇公安局。

自从认识了邢仁甫后，颜树炳密切注意邢仁甫的行止，多方了解他的情况，很快了解到邢仁甫为人奸诈狠毒，且唯利是图、贪财如命、嗜赌成性的特点。于是，颜树炳决定投其所好，达到接近并取得邢仁甫信任的目的。主意一定，颜树炳就经常找邢打牌赌博，并故意输牌以取得邢的欢心。经过较长时间接触，邢果然很喜欢颜，有时还专请颜到家里打牌。时间一长，颜便被邢当成知已，这就更便利了对邢仁甫的监视。

1946年春，邢仁甫开始让颜树炳替他做买卖。有一次，邢仁甫给他开了津南敌占区的通行证，让他去泊镇一带贩卖纸张。颜树炳借机到泊镇公安局汇报请示工作。当时公安局一股股长李璞向他交待了任务，要他不惜一切盯住邢仁甫，坚决不让邢跑掉。颜树炳回到天津后，把纸线连本带利都给了邢仁甫，邢见钱眼开，更加信任颜树炳。

颜树炳既要经营门诊部，又要监视邢仁甫，有许多不

便。1947年5、6月间，颜树炳向党组织请求让他的胞弟颜毅和他一同工作，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

颜树炳的请求被批准后，他利用打牌的机会对邢仁甫说："我弟弟失业没事干，到你司令部混碗饭吃行吗？"邢仁甫答应了。这样，颜毅便顺利地到了邢仁甫的司令部办事处。可是没过几天，邢仁甫又让颜毅下连队。为了便于监视邢仁甫，颜毅故意拖延时间，坚持不下去。几天后，邢仁甫对他说："你留在办事处，得搞出点名堂来，要不我也不好说。我看你先搞点共产党情报，就好办了。"颜毅把这一情况向颜树炳和冀中八分区公安局在天津的领导穆兴汉作了汇报，穆兴汉决定让颜毅到解放区去一趟，也顺便到泊头市公安局汇报工作。回到邢仁甫的司令部，颜毅对邢仁甫说："我想到老家去一趟，看那里有什么情况。"邢仁甫爽快地应允了，又说："你最好也去一下东光，那里有共产党的兵工厂，到那里搞清楚地理、画个地图，让飞机去轰炸。"临走，邢仁甫又让颜毅顺便给他贩卖纸。就这样，颜毅到了泊头市公安局，把监视邢仁甫的情况作了汇报。领导指示他："回去告诉你哥哥，要想方设法盯紧邢仁甫，一刻也不要放松。"最后说到邢仁甫要他搞点情报时，领导指示："回去就说一到泊头就被抓住了，没办法搞情报。"颜毅回到天津，将一行情况转告了颜树炳。第二天，向邢仁甫汇报，一见面颜毅就抱怨说："邢司令，我可不去共产党解放区了，一到泊头就给抓住了，还差点没了命！"说着就把卖纸的钱拿出来，邢仁甫一看赚钱不少，心里高兴，也不叫颜毅下连队了。

过了一段时间，邢仁甫让颜树炳给他办个合作社，为他的部队经营日用品，兼卖通讯器材，并处理他的部队抢来的物品。这个合作社实际上是邢仁甫个人的摇钱树。颜树炳积极为他谋划，又是找房子，又是筹款，并自己当了经理，合作社开张后，为邢仁甫赚了不少钱。有一次，颜树炳和邢仁甫的父亲到内蒙做了一笔买卖，颜树炳把赚的一大笔钱给了邢家父子。从此，邢仁甫对颜树炳更加信任。

由于处在蒋统区，邢仁甫又防范严密，颜树炳始终找不到抓捕邢仁甫的机会，心里很着急。到1948年，蒋统区日见萧条，邢仁甫合作社的买卖也不好做了。这年10月的一天，正打牌时，颜树炳对邢仁甫说："合作社赚不到钱，诊所也耽误了，我这经理不想干了。"邢仁甫不依，说："别着急，等22号我到岐口（现属黄骅市，当时这里有我渤海区的兵工厂等）去捞一把。"听了他的话，颜树炳觉得几年来终于找到了一次抓捕邢仁甫的机会。回到家，他马上让颜毅把这一情报送到我解放区，特别嘱咐要解放军届时设法抓住邢仁甫。10月22日，当邢仁甫带着他的爪牙一到岐口，早已严阵以待的解放军，一阵猛冲猛打，将邢匪杀伤大部，只有邢仁甫和十几个人逃回天津。这次虽然没有抓住邢仁甫，但也削弱了他的势力。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天津市。邢仁甫如丧家之犬，准备逃跑。颜树炳兄弟俩决定紧紧咬住邢仁甫，绝不让他跑掉。16日，邢仁甫来到颜树炳的诊所，向颜树炳要衣服、钱、通行证，妄图伪装逃跑。颜树炳一面答应给他找东西，有意拖延时间；一面让颜毅找组织采取措施。由于颜树炳、颜毅是和穆兴汉单线联系，天津又刚解放，秩序不稳，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穆兴汉，两人十分着急。傍黑，邢仁甫要走，颜树炳乘机问："你想到哪儿去？"邢仁甫说："去北平，到那找到傅作义就好办了。"颜树炳借机拖延时间，说："路太远，说什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啊。"邢仁甫吃了饭执意要走，兄弟俩见留不住，只好任他去，两人在后面跟踪。因为天黑，邢仁甫又不走正路，跟了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两人紧急商议，决定让颜毅继续寻找穆兴汉，颜树炳再想其他办法。颜毅走了时间不长，邢仁甫派人到颜树炳家来取忘掉的一个小包，颜树炳问来人："邢司令在哪儿？"那人说："在河北关上国民小学的老乡家。"颜树炳听了，真是喜出望外。17日晨，颜毅终于找到了穆兴汉，颜树炳把邢仁甫逃跑的情况，立即向穆兴汉作了汇报。然后，他们又及时把情况报告了军管会三处二科科长江枫，江枫决定，由颜树炳带路，立即赶往河北关上小学，抓住了邢仁甫。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邢仁甫落网后，先在我天津市公安局关押了一年多，1950年4月转到渤海行署公安局，6月2日又转到山东省公安厅。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判处邢仁甫死刑，命令德州专署宣判执行。9月17日，邢仁甫被押解到盐山县城东北角执行枪决。

邢仁甫归案前后，从望子岛逃跑的潘特和刘永生，也先后被我抓获归案。潘特逃到北京，化装成小贩在前门卖烟，1950年的一天，恰巧被肖华认出，被我逮捕枪决。刘永生隐姓埋名逃到广西，也被我查获押回边区枪毙。至此，邢仁甫及其死党无一漏网。邢仁甫叛徒集团彻底覆灭。

（选自《纵横》90年4期，作者：陈景明）

黄骅惨案始末

1943年6月30日下午近7时许，河北省新海县大赵村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中。

一阵枪声，副司令员倒在血泊之中，幸存者证实，凶手就是旅部手枪队长冯冠奎等人

村东南角的一个大院的东厢房里，正在开冀鲁边军区司令部侦察通信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是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三分区司令部参谋迟

林兆刚发言，突然，门"呀"的一声被推开了，随着一声报告，走进一个人来，原来是一分区司令部参谋周云峰，他站在门边向黄骅副司令员敬了一个礼，问道："邢司令岛上有信来吗？"

黄骅说："有，上午刚送来的，他说你没有去山东学习，要回来。"

"我刚到狼坨子就病倒了，一直躺在炕上，病好了学习期也过了，邢司令让我回来工作"。

"那好吧，你先去管理股休息，我们这里正在开会。"

黄骅说完，示意迟林兆接着汇报，但周云峰并未离开，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和屋内几个熟人打着招呼，当他看到院内闪动的几个黑影时，突然抬高嗓门说："这天也真是……"随着他的话音，门边闪出几个穿蓑衣的人，黄骅此时已感觉情况有异，正要掏枪，但已经来不及了，罪恶的枪声响了，黄骅同志倒下了，接着四五个匪徒用短枪向屋里猛射，与会人员因来不及反抗都被打倒在血泊之中。为首的匪徒见阴谋得逞，走过去踢了黄骅一脚，挥舞着手枪说：

"走！"

匪徒们刚要走出院门，正遇上10分钟前被黄骅派去找煤油灯的警卫员小李子和范为民，他们听到枪声急忙往回赶，在大门口与匪徒们发生了混战，范为民扔出一颗日本造手榴弹，当场炸死了一名匪徒，其余的见势不妙，边打边向村外跑去。

警卫战士顾不得追捕逃跑的匪徒，赶快跑进会议室，一幅惨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坐在正中的副司令员黄骅已经牺牲了，同时遇难的，还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彪、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董兴根。司令部机关干部和警卫连也闻讯赶来，身负重伤的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林兆，他们断断续续地说：

"快！抓住冯冠奎！"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十秒钟。警卫连立即派出两个排向凶手逃跑的方向追去，但是，由于天已擦黑，又在下雨，未能抓获凶手，只是从青纱帐留下的血迹判断，有几个凶手被警卫连的机枪打伤。

临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发出通缉令，旅长兼司令员邢仁甫指示：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

黄骅副司令员遇难，是抗战以来我军高级领导第二起遭内奸行刺的严重事件，立即引起了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黎玉、肖华在接到黄骅遇难电报的当天，即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做了报告，并根据中央和总部的回电，通知边区党委，这不是一次一般的暗杀事件，要求边区党委和军区加紧缉拿凶手，尽快破案。

探路的内奸周云峰很快就被逮捕，但是冯冠奎却杳无踪迹，于是，一张张通缉令发往冀鲁边区各地——

各专员、县长、各级武装：

冯逆冠奎于六月三十日晚七时许率十余人叛变，刺死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凶残万状……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

签署人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以及边区党政军领导周贯五、刘贤权、张永逊、张耀增、王连芳等7人。许多人看到，司令员邢仁甫得知黄骅遇难的噩耗，悲痛万分，对冯冠奎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为烈士报仇。

但是，军区机关和熟悉情况的一些同志却在冷眼观察着邢司令员，谁不知道冯冠奎本来就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逃到新海县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 当时许多同志都不同意收留他。但邢仁甫说："抗战不分先后嘛！要允许别人进步。"不仅把他收留下来，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对于冯冠奎目无领导、屡犯军纪的严重问题，很多同志都多次向邢仁甫作过反映，但都被邢仁甫压了下来，可以说，冯冠奎是邢仁甫最宠信的干部、最得力的臂膀，他去谋杀黄骅副司令，邢司令难道……人们不敢想下去了。

只要抓到了冯冠奎，一切就全清楚了。虽然暂时还没抓到，但人们相信他是跑不了的。因为在冀鲁边区，谁都认识冯冠奎，赫赫有名的土匪，军区司令部的手枪队长。况且他又爱出风头。冀鲁边区撒下了天罗地网。

一一五师首长收到一份急电，邢仁甫拉人叛变，清河军区副政委受命赶赴垦区

十几天过去了，凶手仍未抓获，案件的侦破没有新的进展。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的首长急切地盼望着冀鲁边区电台的消息。

突然，与冀鲁边区相邻的清河军区电台发来了急电。译电员刚刚译了两行，不禁大吃一惊，他揉了揉眼睛，对几个关键性的字码重新作了核对，没错！他镇静下来，以最快的速度译完了这份急电，立即送到了师首长手中。

电报是教导六旅独立团团长冯鼎平发来的。他报告这样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将冯鼎平找到望子岛上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你回去后拉上部队，准备跟我一块走，如果干部中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并透露了投奔国民党或者日本人的打算。

冯鼎平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回到驻地垦区。他先把一营营长王之斌、一营政委刘仁桂、二营营长刘虎臣等同志找来，说了邢仁甫的打算，当即遭到大家的坚决反对。刘虎臣手按着枪把说："叫我们叛变，那是作梦！"这时，正好副团长贾乾瑞、政治处主任辛易之、党总支书记潘大可走

进屋里，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冯鼎平终于恍然醒悟，决定向一一五师首长和山东分局揭发邢仁甫拉他叛变的罪行，由于冀鲁边区电台都控制在邢仁甫手中，为防泄密，于是由政委姚昌洲赶赴相邻的清河军区。由清河军区电台向一一五师首长转报这一紧急情况。同时对部队中邢仁甫的亲信进行了监视，冯鼎平则按团党委决定上望子岛向邢仁甫“表忠心”。

情况来得太突然了，罗荣桓、黎玉、肖华等领导者当机立断，电令清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其人携带一部电台赶赴独立团驻地，一方面稳定部队情绪，一方面设法稳住邢仁甫，同时配合冀鲁边区党委继续抓紧破案工作。刘其人根据师领导指示，迅速赶往独立团驻地。半路上，遇到了独立团第二次派往清河军区报信的冯鼎平。

原来，冯鼎平去望子岛了解到邢仁甫已决心投敌，并约好由日寇派船去岛上接应。刘其人马上拟了电报，向一一五师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到达独立团驻地以后，刘其人又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由冯鼎平介绍了邢仁甫密谋投敌的内幕，刘其人主任作了四条指示：第一是要保密，不要让叛徒们有所察觉；第二，把张河的两条船沉掉作河障，并派人把守，防止敌人里应外合；第三，电台继续与望子岛上联系；第四，迅速对部队进行教育，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坚守党的纪律和军队纪律，坚决服从一一五师首长的指挥。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但是，直到此时，冀鲁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还不知道邢仁甫叛变的消息和一一五师领导的指示，派谁去通报情况、取得联系呢？

一只小船从垦区悄悄启程，船上的人负有重大使命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十分危险的使命。送信者不但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还要穿过日伪的层层封锁；这个情报又是那样的令人震惊，所以送情报的人必须得到边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的绝对信任。几经研究，一个个人选都被否定了。最后，刘其人主任和独立团的领导们亲自送一只小船从垦区启程。

船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她睁着一双警惕的秀眼，随时准备着应付不测，并不时催促船夫加快速度。

她叫朱凝，是清河党校的负责人，也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爱人，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最终战胜众多候选人，夺得出征权。本来，她正在垦区养病，但是，当组织上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她时，她立即置生死于度外，踏上了行程。

小船沿着海边经过沾化、无棣等县，穿过层层封锁线，终于安全地抵达边区党委和政府所在地——新海县邢家王文村，把情报和一一五师领导的指示传达给冀鲁边区党委领导。

至此，邢仁甫图谋投敌叛变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他和黄骅惨案有没有关系呢？保卫部门又了解到，杀人凶手冯冠奎带其同伙逃至海堡一带，曾发泄对邢仁甫的不满：“邢司令让我打死黄骅，说事成之后给我银子，给我官做，老子挨了一枪，他也不管了……”

综合几方面情况分析，制造惨案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正是邢仁甫，他在黄骅惨案之后的眼泪和讲话，只不过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一个旧军官、却又拒绝思想改造，在冀鲁军区内部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

邢仁甫是盐山县人，曾在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当过通信排长、参谋，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活动能力也比较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津南党组织在盐山旧县镇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当时，津南工委书记是赵缚，而在盐山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马振华和邱玉栋。但是，“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却是周砚波、军事委员长是邢仁甫，这主要是从扩大统一战线、扩大“救国会”和“救国军”的影响来安排的。同时，也考虑到邢仁甫搞过军事。

在抗战的烽火中，邢仁甫领导部队打过一些胜仗，为党、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本质不好，他把入党看做“入股”，把带兵看成“草头王”，所以，他处处限制和排挤救国军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却把很多地痞流氓、旧军官拉入部队，委以重任，不久，就在救国军内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

随着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救国军名称几经变化，1941年，被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邢仁甫被任命为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他的个人权欲和帮派活动也逐渐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在肖华、符竹庭从冀鲁边区调离，杨靖远、马振华相继牺牲以后，邢仁甫就把教导六旅和冀鲁边军区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一五师领导和山东分局对邢仁甫的错误有所察觉，为了加强领导，于1941年6月，调黄骅同志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

黄骅对邢仁甫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邢仁甫专权投敌的障碍，邢仁甫决心杀害黄骅作为投敌的见面礼

黄骅是湖北阳新县人，他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教导师第三团政委，红军大学干部团政委，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过晋西南游击队队长，晋西南特委军事部长、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晋东独立支队副支队长，率领部队屡战屡胜，是一个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也是一个忠于党的事业、坚持原则的优秀党员。

黄骅一到教导六旅，就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在齐

庄、杨庄伏击战斗中，他指挥十六团和新海县大队，消灭日军70余人、伪军400余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小炮4门，500余枪支，子弹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如果不是邢仁甫专横跋扈，擅令撤退，是完全能够取得全歼敌人的胜利的。在多次战斗中，黄骅成为教导六旅最有威望的指挥员。

黄骅同志对邢仁甫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军事上消极避战的错误曾多次进行过苦口婆心的规劝和严肃的批评。两庄伏击战后，就对他作了批评帮助，邢仁甫表面上接受，骨子里却怀恨在心。从1942年下半年以后，他先后组织了三次对黄骅的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加强了对我沦陷区的掠夺和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华北进一步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制造其所谓以"囚笼"为基础的"治安区"，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暂时的黑暗面前，邢仁甫吓破了胆，错误的认为，共产党、八路军不行了，因此，他一面消极避战，保全性命，一面加紧策划投降日寇的阴谋。为了保命，他不顾周贯五、王卓如、黄骅等同志的一再劝阻和批评，用一个冬春时间，在新海县的一个荒岛——望子岛上修建了所谓"后方基地"，并运进去大批食物，带着老婆和警卫部队躲进了安乐窝。

鉴于这种情况，一一五师领导和山东分局决定再调邢仁甫入党校学习，由黄骅接任旅长和军区司令员，但邢仁甫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赖着不走。同时，加快了投敌叛变的步伐。一一五师领导和山东分局对此预料不足，调离邢仁甫的决心不大，一拖再拖，这就给了邢仁甫以可乘之机。

部队包围了邢仁甫的驻地，但是内奸鸣枪报警，邢仁甫逃跑了……

在查清邢仁甫的罪行之后，边区党委在王卓如的主持下开会，大家根据朱凝同志传达的一一五师领导关于"不要操之过急，尽可能避免刀戈相见，否则斗争公开，容易被敌人利用，引起混乱，妨碍大局"的指示，决定以开会为由把邢仁甫诱出望子岛，实行拘捕。此时，邢仁甫还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准备再多拉拢和蒙骗一些干部和部队投敌，所以，接到边区党委开会的通知后，邢仁甫就乘船离开了望子岛。靠岸后，驻在毕家王文村。当晚，军区派特务团副政委赵德修带两个连从毕家王文正面进村，逮捕邢仁甫；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带领新海县大队围剿驻在山后村的邢仁甫的死党——边区后勤部长潘部长潘特和无棣县长邢朝兴，并包抄邢仁甫的后路。但是，当我特务团接近毕家王文村时，隐藏在特务团的内奸、四连连长王爱芝突然"砰、砰、砰"朝天连开三枪，整个行动计划立即被暴露、破坏，部队遂跑步散开包围了毕家王文村。但是，狡猾的邢仁甫，一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穿，光着脚就跑出村庄钻进了高粱地，拼命向海边跑。在一个交叉路口，正遇上一侦察员骑驴回村，邢仁甫欺骗说："快下来！有情况！"侦察员不知道邢仁甫叛变，跳下毛驴给邢仁甫骑，自己拔枪进行掩护，遂使他侥幸逃脱了部队的追捕。

邢仁甫逃到海上以后，继续施展他卑鄙恶毒的伎俩，他给各县干部写了许多亲笔信，并大量散发传单，造谣污蔑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宣传部长李启华是托派，压制地方干部等等，并肆意挑拨边区党委领导之间、边区党委与各地委、县委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革命队伍。

斗争，已经公开了！为了揭露邢仁甫的叛徒面目。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边区党委也接连发出一些公告、布告。7月20日，邢仁甫的亲信孙长江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反戈一击，揭露了邢仁甫从谋害黄骅同志到叛变投敌的全部过程，还把邢仁甫先后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交了出来。邢仁甫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事已如此，宜派人暗杀王卓如、李启华，就可挽回危局……想法把部队拉出来……"

边区党委一边向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公布这些材料，一边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区同胞书》，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弄清了事实真相。

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在叛徒伏刑的时候，人们在烈士墓前告慰烈士，人民胜利了！

此时的邢仁甫，伪装已全部被揭穿，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只好带着老婆宋魁玲和亲信刘永生逃至天津，由于没能按以前向日军保证的拉出4000人的部队，他不敢直接投靠日本主子，便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挂上了钩，被委任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不久，日寇也委任他为沧县以南"六县剿共司令"。日寇投降后，邢仁甫又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天津站一级中校组长，由于他死心塌地反共，国民党又封给他一个河北省第二专署保安司令兼专员的头衔。

但是，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最先是冯冠奎因多次反水、反复无常，被日伪所杀。不久，陈二虎投靠张子良被张杀死。制造黄骅惨案的刽子手们最终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1945年杨铮侯、邢朝兴被我军捕获，经审讯执行枪决，邢仁甫、刘永生、杨铁珊是在解放以后被抓获的。人民政府经过审讯，认定证据确凿。

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给德州专署的158号法字令：

经本府决定处该犯邢仁甫死刑，特押解你处，希依据材料、罪状，召开代表性会议，审判执行，并将执行情形及群众反映报告本府。

津南人民奔走相告，喜泪交流；刑场上，人山人海，争

看叛徒伏刑。

在黄骅烈士墓前，人们献上一束束鲜花，一枝枝松柏，以告慰烈士。

（选自《纵横》89年5期，
作者：李寿禄、刘爱民、范凌，范凌　执笔）

宋子文同邱吉尔的争辩

1943年，美英等国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会议，讨论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作战问题。中国作为二次大战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参战国也派宋子文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罗斯福、邱吉尔等人并不把中国代表放在眼里，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不通知宋子文。只是他们认为什么时候需要宋子文参加，才把他叫去，譬如"邀请"宋子文共进午餐，利用这个时间向他透露一些问题。对此，宋子文感到屈辱和不满。中国作为盟国，且是主要成员，理应平等地参加会议，然而美英却如此漠视中国的平等权利。宋子文曾为此提出抗议，但美英两国敷衍搪塞。

魁北克会议后，发表了"魁北克宣言"，可宋子文对罗（斯福）、邱（吉尔）在会议期间商谈的全部计划并不了解，他们只告诉宋子文，美英将转入对日作战，并实施对中国的有效援助。

此时的蒋介石还在重庆坐等盟国出兵，等待中、美、英三国联合进攻在缅甸的日军，因为这个计划是三国在重庆商定好的。可等来等去，美英除了采取对香港和越南海防的日军基地进行一般性轰炸外，没有其它动静。

1943年9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此时美英该履行诺言了吧，但他们又借口集中精力于欧洲战场和美国无法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军用物资，单方面取消了原来商定的三国共同进攻在缅甸的日军的计划。当宋子文在后来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议上向邱吉尔提出这个问题时，邱却装聋作哑，说什么他这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计划。气得宋子文大发脾气，与邱吉尔唇枪舌剑。除此而外，邱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也使宋子文极为愤慨。邱吉尔让中国人不浪费精力进军"独立"的西藏。宋子文反驳说，中国在西藏边境驻有很多士兵，是守而不是进攻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是中国的，而不是什么独立国家。邱吉尔自知理亏，又吞吞吐吐说中国对这个偏僻荒凉"国家"有宗主权，而英国对之不感兴趣。宋子文反驳说，如果西藏不那么偏僻荒凉，说不定英国早就对它感兴趣了。

宋子文在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上与邱吉尔激烈争辩使在场的人吃惊，因为宋子文在外交场合还未发过这么大的火气。会后，宋子文冷静下来，出于礼貌，向邱吉尔进行了解释，说如果自己的讲话有些鲁莽，那是因为事关国家存亡，是他的英语不够纯熟所致。邱吉尔也解释说，他恨自己不能说好中国话，如果他处在宋子文的地位，也会如此争论，当然要为中国说话。

宋子文虽然对邱吉尔进行了解释，但是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时，宋子文又激动起来，他再次提出三国联合进军收复缅甸问题，并且希望美英两国立即对侵入中国的日军发动空中攻势。然而美英，特别是英国除了强调欧洲战事外，还说丛林作战如何困难。澳大利亚外长支持宋子文的意见，说丛林战并非不可进行，在瓜达卡纳尔，日本人比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为疟疾和痢疾所困扰。可是宋子文和澳外长的意见仍被会议主持者搪塞过去。宋子文在会下气愤地说："美国人和英国人作为政治家，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

宋子文一方面继续说服美英进攻在缅甸的日军，一方面把美英赖帐的事电告蒋介石。蒋气得大骂美英"出尔反尔"、"欺人太甚"，他说邱吉尔是"狡猾的狐狸"。

美英单方面撤销三国联合反攻驻缅甸日军的计划，激怒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但眼下是有求于美英，所以蒋介石心里的火只好向国内僚属们发泄。宋子文因为是在国外直接同美英打交道，得罪他们不得，只好强压怒火，同美英周旋。

当宋子文从罗斯福处了解到中国将被列入四强，蒋介石作为四强之一的领袖将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这多少弥补了蒋宋因魁北克会议和美英单方面取消反攻缅甸日军计划引起的不快。

（连若雪）

1943——中原蝗灾录

1943年的夏秋之交，一场罕见的飞蝗之灾，突然间降临在中原大地上，河南豫北、豫西等地区辽阔无垠的绿油油的秋禾，被蝗虫吞食净尽，秋收绝望，酿成蝗灾，这就是河南民谣所说的"水、旱、蝗、汤（指汤恩伯部抗日节节败退）"四灾中的蝗灾。如今，老人们每每忆及当年情景，仍历历如在目前。

说起那年的飞蝗之灾，其来势之猛，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刹那间，象一阵大风似的沙沙作响、嗡嗡有声的飞驰而来了。好似一片黄云，顿时使天空为之色变。大人、孩童纷纷伫立院中、村头、田野，仰望天空，惊诧着、议论着、叹嘘着。当蝗虫低空飞临时，象大风吹顶，呼呼有声，人们只要举起扫帚、竹竿向空中随意挥打一下，便能打掉十数只甚至几十只，其密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这股巨大的飞蝗群，也不知从何方而来。只听说从黄泛区飞越黄河，侵袭到豫北，至太行山麓的林县、安阳，又

飞袭到黄河南的叶县、舞阳、郾城等地，纵横飞翔，动向莫测。凡飞蝗所经过的原野，禾苗尽被吃光，连树叶也没有幸免。更有甚者，麦场上放的草苫子、席子以及草帽，也都被咬烂了。且看那树上落满了的飞蝗，将树的枝桠也都压弯。村里村外遍地皆是，墙壁上、屋顶上、窗户上也都爬满了飞蝗，连灶房内的锅台上也比比皆是，人们不敢掀起锅盖做饭，因一掀锅盖，蝗虫便会盲目的往锅里钻，使人发呕。更为奇怪的是，正在觅食的鸡子，竟也不啄食蝗虫子。当时忧心忡忡的老人们回忆说，那年的飞蝗有几个特点，一是它们聚群飞翔，且飞行方向一致，行动也统一，要往哪里飞，都往那里飞，要落在哪里，都落在那里，要爬行大都爬行，好象有组织的军人一样，你说怪不?!二是飞蝗个头比一般蝗虫大，身长5至10公分，全身土黄色。6足2翅，其前2翅及大腿内侧有细黑纹，这是别于一般蝗虫的。蝗虫起飞后两大腿收拢着，且紧抱在体两侧，成为流线型，这就能减少它的飞行阻力，所以飞的快。三是争食劲头足，边吃边屙，显得消化能力特强，故而每侵食一块地的禾苗，不消几小时，便会剩下光秃秃的禾杆了。四是随时随地产卵，在谷子地产卵最多。蝗卵经过五至七天的日晒，就变为蝗蝻了，十天之后就又会飞翔了。有位老人说，每在中午时分，雌蝗就纷纷落地上，一个个把腹部插入土壤里，那里产卵的。经挖掘卵穴察看，见每个卵穴都有30至50粒卵子，足见其繁殖力之强了。卵子呈玉米棒形，深黄色，人们称之为"蚂蚱蛋"。卵子变化成蝗蝻后，便能蠕动成群，因蝗蝻喜聚堆，故随后又发生了蝗蝻群，形成黑色团块，用脚踏上，可踩死许多，但脚一离开，它们很快就又聚集在一块了。别小看那些小小的蝗蝻群，它们滚成蛋后，竟有爬墙越沟的本领，仔细观察蝗蝻群的动静，则可发现它们在爬行的时候，遇到陡崖土沟难以前进时，只见前面的一停顿，后面的即爬了上来，聚的多了，便会一团一团的往下滚下去再前进。三五天后蝗蝻即变为黄色，即会飞行也能吃嫩草及禾苗了。

这些罕见的情景，当时使一些老太婆们大为吃惊，她们疑神疑鬼的说，这是什么"神虫"、"蚂蚱爷"等等，都跪在地上磕头，祈求老天保祐。哪知，这些人磕头祈天的举动，并没有感动上帝，对飞蝗来说，丝毫未能遏止，尽是白费神了。只有扑打是个好办法。当时的保甲长们，规定每户每天必须完成交蝗虫若干斤的任务。有的县乡规定，每交一斤蝗虫，奖小米若干，在荒年的日子里，小米成了"金豆豆"，谁个不鼓劲去扑打呢?老少齐出动，村里村外人声鼎沸，一片扑打飞蝗之声，昼夜不停。人们想了不少有效的扑打方法：有的挥起树枝、扫帚，在空中乱舞、乱抖，将飞蝗打落在地，扫起来装进布袋布，用力摔死；有的用一条大床单，中间留口，口下缝一布袋，前面穿一横杆，两人拉着顺麦垅跑动，使飞蝗跌入袋内。有的敲锣打鼓，惊动飞蝗，不让其下落，来配合扑打；如此一夜之间，有的竟能扑打150斤左右。还有人更巧妙，他们利用沟沟洼洼，把四壁铲陡铲平铲光，索性用扫帚把蝗虫往沟内扫，聚集多了，就用石磙在上面碾轧，来回数遍，把蝗虫碾死，而后覆土，再扫，再碾，如此多次，堆聚死蝗竟能盈尺。事后必须用土掩埋，以防腐烂发臭。由于扑打的蝗虫太多了，保甲长们无法处置也就索性不收了。

飞蝗过去之后，人们又掀起了灭蝗蝻的高潮，因为蝗蝻在十天半月之后又会造成蝗灾。据有关史料记载说，当时的林县六区的百姓，男女老少齐动手，手持尖刀、铁头，遍布在田野上剜卵穴，37天就剜地3万多亩，剜出蝗虫卵6万多斤，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

这年的秋收大大减产了，只收获些芝麻、红薯，事后人们就大种荞麦，以补荒歉。

(王锡朋)

陈诚在云南"遇刺"

故世前在台湾担任第三届"副总统"、国民党中央第九届副总裁的陈诚(字辞修)，抗日战争后期曾去过云南，居留了8个多月。他和身居三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有过一段暧昧的交往，亲自导演了一场"司令长官遇刺"的喜剧。

陈诚来滇，出于蒋介石的决策。为了筹划滇西战场的全面反攻，并配合英军反攻缅甸，1943年2月12日，陈诚奉令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统率由五十三军赵锡庆部和五十四军黄维部组成的远征军第一路，以及上年由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部队。同年2月23日，又把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官黄琪翔，任命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统辖驻守滇西的十一集团军宋希濂部、二十集团军霍揆彰部，以及五十三、五十四军。这就是说，陈诚已经成为云南西部和驻印中国部队的统帅了。

2月下旬，陈诚到达昆明。龙云和他认识，那还是抗战前夕到南京开会时的事。只知道他来头不小，为人又很专横。然而，陈诚对龙云却很谦恭。每次戎服相见，都毫不含糊地敬军礼，开口龙主任，闭口龙主任，就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一般认为，陈诚对龙云之所以谦逊有礼，完全是尊敬"委员长"的缘故，龙云不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官么!

一次，陈诚借西郊潘家湾昆明广播电台的礼堂，召集所部少校以上的军官讲话。宋希濂、霍揆彰、黄维以及刚被任命为第一路远征军副司令官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等，好几位将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台上谈到某某军该注意什么的时候，对总司令、军长们都直呼其名。"上下有别"的态度十分鲜明。

陈诚对龙云毕恭毕敬。龙云感受十分深刻，见面时，总亲热地唤陈诚"辞修"，也常对身边的幕僚们讲："人说陈辞修飞扬跋扈，我看不见得嘛。他懂礼节，挺不错的。"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最初设在滇西楚雄，不久逐步西进，一度驻扎弥渡。不过，陈诚最初留在昆明的时间较多。和中央军有关将领的会议，和负责武器弹药等军需供应的美军将校的磋商，大都在昆明进行。龙云的为人、作风，甚至家庭琐事，他也更进一步地有所了解了。

一转眼就到了6月，天气逐渐热起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陈诚带着一名卫士，乘坐黑色轿车，动身前往30多公里外的安宁温泉，想调剂下生活，散散心。

距离目的地还有四五公里的时候，汽车必须爬一个山坡。轿车行近坡前，从后面传来急促的喇叭声，催促前车让路。轿车司机从未遇到过这样放肆的人，因而不理不睬，换了排档，驶上山坡。没有多久，一辆美军军用吉普驶近前来，依然不停地按响喇叭。。

坡路很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即使要让也让不开。可是，吉普车却像恶作剧般地，一直跟在后面，喇叭声也一直不断。

轿车终于爬上坡头。正在这时，车后发出几声枪响。轿车的左后轮泄了气，车身向后侧倾斜，不能照常行驶了。

吉普超过了轿车，停了下来。一个身穿美军军服的中年汉子从吉普上跳下，后面跟了个身着中式对襟短上衣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骂骂咧咧，走近轿车，要把司机拖出来揍。

卫士从中年汉子颊上留有条明显刀疤的特征，认清了那是龙云的第三个儿子龙纯曾。他报告陈诚说：是"龙三公子"！

陈诚想了一想，推开车门下车，怒目瞪视着疤脸汉子。此人果然是龙纯曾，看到对手气度不凡，领口佩戴的黄色领章又和龙云完全一样，一下子倒愣住了。他的随行认得陈诚，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龙纯曾毕竟有点机智，短暂的惊诧过去后，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返身跳上吉普，调转车头，和随从一道，飞快地向来路溜走了。

陈诚早已听说过龙纯曾不听约束，在昆明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打狗看主面"，为了照顾到和龙云间的关系，他默无一言，只是吩咐司机赶快换胎。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收场。

龙云一向严于教子。他有三个成年的儿子，两个恪遵父训，致力于各自的事业。唯独老三桀骜不驯，吊儿郎当。早前，龙云有意识地把他留在故乡昭通，让很有魄力的妹妹龙志桢予以管教。1935年8月，妹妹不幸病亡。龙云才把他唤到昆明，要他读书，将来投考军校，仍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子继父业，当军人。

龙三根本不想上学，在昆明东游西荡，爱上了滇戏。最初和滇戏艺人们来往，学唱老生。后来又爱上京戏，向名伶学习谭派艺术，乐此不疲。

龙云为老三的不求上进感到恼火，多次训诫他悬崖勒马，要务正业。他表面连声称是，但阳奉阴违，事后依然故我。龙云公务繁忙，在家里又经常看不到他，毫无办法。

"卢沟桥事变"后三个月，云南组织第六十军，出省抗日。1938年10月下旬，滇军在鲁南台儿庄英勇作战，重创敌军的同时部队也减员过多。次年3月，龙云在滇编成新兵团，出省补充六十军。出省前夕，特意把龙纯曾唤来，谆谆告诫，阐明国势危急，正是男儿报国的时候。要他随团出征。勉励他到抗日前线，一来杀敌报国，二来实地学习，立功立业。龙三依旧唯唯诺诺，只想赶快溜走。然而，龙云决心已定，严令不许离开，等待出发。

在父亲逼迫下，龙纯曾挂上少校领章，以团附名义，和新兵团一道出省。每当经过一些大城市的时候，他都强邀团长看京戏。团长不敢违拗三公子的意志，只得奉陪。等到到达前线交兵，按龙云的原定期限已经超过了半个多月。

六十军军长卢汉，看到龙纯曾随团到来，也认为他"浪子回头"，同样勉励他留下，表示可以很快提拔他当个团长。龙纯曾假意说他老子要他速去速回，拒绝留在前线。回到昆明后，反而禀告父亲，卢汉让他仍旧返家。交兵耽延了一段时间，龙云感到诧异。不久从随同前往交兵的朱参谋口中，得知龙纯曾一路看戏、并拒绝留在前线的事，于是勃然大怒，命令朱参谋立即通知护卫营，把龙三逮来枪毙，治他贻误战机的大罪。朱参谋不敢照令行事，倒先去通知了龙纯曾，龙纯曾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对老子毕竟惧怕几分。当下慌忙溜到城郊的小公馆中，躲了起来。直到年底，还是大哥龙纯武讲了情，才回家向老父磕头认错，龙云也才不再追究，只告诫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942年底，龙纯曾除了京戏外，又爱上了吉普车。这种帆布篷的小车，是驻滇美军带进来的。他神通广大，居然弄到了一辆，很快学会了驾车。从此，除了组织票房，客串演出京戏外，没有事的时候，成天驾驶吉普，城里城外，开快车兜风。他特别欢喜超别人的车，不管什么人的车在前面，他都按响喇叭要别人让路。从未有人敢得罪"龙三公子"！

这天，龙纯曾无事可做，驾车到温泉闯荡，碰巧跟上了司令长官的轿车。他按照老习惯，要轿车让路。于是，发生了上面谈过的事。在归途中，随从说出对方是陈诚后，他皱了皱眉头，反责怪随从不早些告诉他！

当晚8点多，龙云正和夫人顾映秋，在家闲话家常，重庆突然打来长途电话，指名要龙主任亲自来接。

电话是"军委会"打来的。说是陈长官白天在温泉遇

刺，询问凶手逮到了没有？

龙云大惊失色，立即命公馆副官打电话到安宁县政府查询，但电话打不通。接着又拨长官部留守处，值日参谋回答：陈长官上午到温泉，现在还没有回来！

把重庆问话和留守处回话两相参证，遇刺的消息不像是以讹传讹。高级将军碰到刺客，作为行营、绥署双重主任的龙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龙云更多关心的是陈诚的生命，因而立即派出两名副官，连夜到安宁去调查真相。

副官们回来的时候，已是次日上午11点多。他们报告说，温泉昨天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只不过伤兵闹事打架，但很快就平息了。再打电话到留守处，答复仍是那两句"陈长官到温泉，还没有回来！"

此后几天，陈诚依旧消息杳然。龙云忧心忡忡，认为此事如果外传，势必影响军心民心，不利于抗战。但不便兴师动众，四外查询陈诚遇刺的真相，只能派出几个亲信副官，叮嘱他们守口如瓶，暗中查访。

奇怪的是，重庆也没有再来追究破案。龙云自然也不会去电请示该怎么办。他如坠五里雾中，坐卧不安，为这件非常突兀的事感到纳闷，那五六天，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又一个星期日到来了。张副官中午报告龙云，上一天，在美军负责后勤的史密斯少校的周末晚会上，陈诚终于露面，谈笑风生，根本不像刚遇过刺的样子。龙云这才放下心事，打算找陈诚询问一下真相，可是没有找到人。晚会之后，陈诚就离开昆明，回到弥渡的长官司令部去了（事后许久，当"遇刺"一事成为公开的秘密之后，有人认为，"军委会"的电话是陈诚的布置，意在吓唬龙云一下。是耶非耶？未便虚拟）。

龙纯曾在温泉途中打爆了陈诚的车胎，事后并未受到深究。这件事，首先使当时在场的那个帮闲，趾高气扬。此人在兄弟伙间大事吹嘘，说龙三公子了不起，敢于要堂堂上将让路，还打坏他的轿车后轮，对方却不敢"开腔"！这一来，在偏僻坡头发生的事终于露了馅。张副官听到后，一五一十向龙云作了报告。

龙云气得咬牙切齿，即刻派人把护卫营长唤来，命令他马上带一排弟兄，去逮不肖之子。然而，得人通风报信的龙三，又重施故技，撇下义务募捐戏不唱，躲得无影无踪了。

1943年10月，陈诚从滇西回到昆明，特在南屏街口新闻银行三楼大厅，开一次盛大的"音乐晚会"（舞会当年的通称）。特别吩咐，给龙主任送一张请帖。

龙云是位禁舞论者，早在30年代后期，就下过禁舞令。后来有了来昆美军，跳舞逐渐风行。虽说大势所趋，禁不了了，但他对友邦的舞会邀请，很少参加。云南上层官员的晚会，则从来不敢请他。

舞会当晚，还不到8点，中外来宾几乎全部到齐，可就不见龙主任的踪影。

当晚的来宾中，有不少外国军官。老美严格遵守时间，到8点整陈诚估计龙云不会来了，于是宣布开场。

刚跳过两只曲子，龙云身着戎装，上到三楼。陈诚看到他来，马上高声发出口令："立正，敬礼！"还亲自迎向前去，举手致礼。

龙云非常高兴，要求陈诚和客人们继续玩，他坐一会就走。陈诚只得把他央请到舞池边的沙发上坐下。坐了没有10分钟，感到无聊，乘陈诚和外国来宾应酬之际，悄没声儿地站起身来，步下楼梯，走了。

此后，陈、龙两位还单独会见过几次。龙云没有问他初夏时"遇刺"的真相，陈诚也从未提起旧事。官场如戏场，是"心照不宣"，抑或"难得糊涂"，局外人无从理解。

当年军内传说，陈诚出任司令长官，曾有过增建第二路远征军的打算。又说，他从前线回到昆明，是因生了病。看来，他确实是告了病假。

同年11月23日，重庆传来电令，陈诚的职务，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代理。至于第二路，始终没有建成。

从此，陈诚在云南就销声匿迹了。

（万揆一）

历史考证

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

近几年来，一些党史讲义和书刊把审干运动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把"抢救运动"当作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延安整风运动，确切地说，是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当时，党中央非常明确地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作为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这三项内容清楚地说明了延安整风运动属于党内斗争，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原则是非之争，绝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斗争。

审干运动，实际上就是反特务斗争。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之后，有关部门破获了一些重要特务案件。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决定对全党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作一次审查。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审干指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并且极其明确地指出："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要"分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它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党中央是把审干和整风作了严格区分的。整风是解决半条心的问题，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干是解决两条心的问题，即解决敌我矛盾。

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不仅内容不同，而且采取的方针和方法也完全不同。整风运动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明确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审干运动，是解决敌我矛盾，党中央在《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这次审查干部，"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这个方针，被称为审干运动的"九条方针"。可见，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都各有自己的方针，并且两种方针有着质的区别。审干运动和整风运动不是从属关系。如果审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之外，再规定审干的"九条方针"了。因此，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运动，审干运动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其间进行的另一种运动。

至于所谓的"抢救运动"，那只是在审干运动第二阶段中出现的严重偏差。虽然"抢救运动"确实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但其错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归于延安整风运动。

(摘自《争鸣》1986年第3期《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一文，作者夏宏根)

王稼祥是指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是王稼祥为纪念我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而撰写的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在这篇论著中，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作了科学的阐述。

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为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论述，对当时国内"反共分子"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的"反动论调，作了有力的驳斥。

第二，把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紧紧地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他详尽地论述了我党二十二年斗争历程和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之后，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

第三，论述了中国共产主义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成长有着同样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过程是"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革命经验相结合，便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在中国也是如此，除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环境比革命前俄国更加复杂外，其发展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他认为，"任何一个革命理论，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都是在外部内部的斗争中形成起来壮大起来。"他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例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造自己的理论和政党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第一国际中反对巴枯宁、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勃朗基主义，反对拉沙尔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列宁与斯大林创造布尔什维主义与联共党，是在反孟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同样，"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主义是在反对与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斗争过程中，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我党自己的

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特别令人钦佩的是，王稼祥论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把它看作静止的东西，而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他们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这一提法。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摘自《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作者戴惠珍)

中国共产党党旗由来初探

中国共产党党旗是怎样产生的？其含义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先后查阅了有关党史资料，并请教了有关部门，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①党从1921年7月成立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组织解散，在此期间，尚未制作自己统一的党旗。②当时少数地区的工农武装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所使用的党旗，其样式是根据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旗而定的。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用自己党旗的代表大会是1945年党的"七大"。

其根据是：

第一、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早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年使用的党旗、党徽与俄(共)布尔什维克的党旗、党徽完全相同。

第二、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使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所承担的任务来看，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主要是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当时还未充分认识农民阶级的地位与作用，因此，还不可能在党旗上用镰刀代表农民阶级，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党旗，只能学共产国际，使用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旗。

第四、根据中央档案馆1987年8月13日提供的资料表明：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党旗的样式："决定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由此证实，中国共产党从"一大"至"六大"均无正式党旗，第一次使用自己党旗的代表大会是党的"七大"。

第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到1943年才决定党旗的样式，是因为当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相信各党完全可以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同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组织，也正是到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全面解决自己的问题，作出了包括党旗样式在内的一系列决定。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弄明白：如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党旗样式规定：左上角有斧头镰刀，而我们从"七大"主席台照片上见到的党旗上是锤子镰刀，那么，斧头代表什么？又是怎么从斧头演变为锤子呢？

又如，既然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提到党旗样式的问题，并作出规定，那么1945年党的"七大"上为什么没有将此重大问题写入《党章》？这些问题尚需继续探讨。

(摘自《党史信息》报第46期)

蒋介石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争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并于12月1日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指出：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扩张领土之意；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

应该承认，宣言无论在内容和文字上都严正地谴责了日本侵略者，伸张了正义，因而受到了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但是有关归还中国领土的提法，却令人有几分蹊跷："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包括不包括香港和九龙呢？从逻辑内容上理解，应该包括，因为香港和九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应该归还；但从文字表述上看，以没有明确列举，似乎又不在归还之列。造成这种"两可"的理解，是不是宣言起草者的疏忽大意或不精于言词表达呢？绝对不是。由三国首脑各自率领的本国代表团，包括了很多著名将军顾问和专家，不可能如此疏忽大意或不精于言词表达，何况三国首脑也都是工于心计和言词的人物。那么，宣言为什么不明确列举香港和九龙如同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那样归还中国呢？如果单从宣言本身来看，是找不到答案的。原来，宣言之所以如此表述，隐含了一段秘而不宣、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这

就是在开罗会议上，有关香港的归属问题，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中英争吵”，争吵的双方是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调解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现根据有关资料和某些当事人的回忆，将争吵的经过和前因后果概述如下。

1943 年 6 月，除中国正面战场的印缅战场外，盟军在各个战场都开始转入反攻，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部署盟军的全面攻势及讨论战后问题已成为盟国面临的紧迫问题。罗斯福因而建议召集美中英苏四大盟国元首开会讨论。但由于日本没有和苏联交战，斯大林认为“中国和苏联没有共同的敌人”，拒绝同中国人坐在同一桌旁，公开参加对日作战的讨论；同时英国也反对中国插手欧洲问题，经过磋商，遂决定先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开会讨论远东问题，然后再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开会讨论欧洲及其他问题。

1943 年 11 月 12 日，赫尔利来华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1 月 9 日罗斯福在回电中也希望蒋介石于 11 月 22 日到达开罗。蒋介石接到邀请后，即忙于会议的准备工作。11 月 14 日，蒋介石拟就了开罗会议的中方提案。关于香港和九龙问题，由于在 1943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中英新约谈判中，中国不仅没有收回香港，而且没有能废除九龙的租借权，蒋介石认为中英新约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失败，公开表示遗憾，而且此后一直没有忘记争取香港归还中国，并希望美国主持公道，劝说英国改变立场。宋美龄在 1942 年 11 月开始对美国长达半年的访问和这期间宋子文的美国之行，都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达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罗斯福表示，战后香港“主权应属于中国，但可划为自由港”。但英国拒不让步。蒋介石深知英国狡猾，为了避免与英国闹翻，在开罗会议的中方提案中，对香港、九龙、西藏等问题，以不与英国人争执为由，决定如英国不谈，就作为悬案暂时搁置。

1943 年 11 月 18 日，蒋介石夫妇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公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主任林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驻美大使馆武官朱世明以及陆军参谋杜建时等随从人员 20 多人，离开重庆前往开罗。他们于 11 月 21 日抵达开罗，丘吉尔首相随后到达，11 月 22 日上午罗斯福亦到开罗。

1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代号为“六分仪”的会议在“美娜饭店”准时举行。三位巨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过去，他们的大名常被对方提到，他们的行动和言论常被对方所关注和研究，但他们之间从没有见过面。握手问好之后，简单的会晤结束，各国首脑分头准备明天的正式会议。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并未与罗斯福、丘吉尔详细讨论战后问题。只在 11 月 23 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就战后问题作了一次比较详尽的讨论。其内容大致涉及十个方面：一、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二、关于战后的日本天皇地位问题；三、关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问题；四、关于日本以实物作为赔偿问题；五、关于领土问题；六、关于军事合作问题；七、关于朝鲜、印度支那和泰国问题，八、关于美国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九、关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问题；十、关于中国要求参加美英联合参谋团会议或成立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问题。其中第五项领土问题，中美双方同意，东北四省及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对琉球群岛，蒋介石提出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他认为这可使美国安心，以免将来发生争执时处于孤立地位。对于香港，罗斯福提议由中国先行收回，然后即宣布与九龙合成为全世界的自由港。蒋介石深以为然，希望美国从中疏通，使中国至少能收回九龙。但后来为丘吉尔断然拒绝。

蒋介石与罗斯福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双方对谈话中所涉及和各项内容都不负有义务。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不同意罗斯福坚持把中国作为大国和把蒋介石作为伟大领袖的观点，对把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也不肯轻诺，要求改为必须由日本放弃，对香港九龙、西藏就更不愿放弃。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并“具体提到新加坡和香港”。事实上，丘吉尔自始就认为中国并不是战时必不可缺的伙伴。在开罗会议上英国所提的会议日程竟不讨论中国地位和中国提案，更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这使蒋介石的开罗之行较之预想的大为逊色，蒋介石对英国甚为不满。

11 月 26 日，会议已接近尾声，三个大国元首把有关日本投降的最后声明的条文起草任务交给了他们的顾问。一致决定，在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又将被铲除，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将归还本国，或恢复为原来的国家。此时此刻，蒋介石憋着一股怒气怨气，认为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好时机。蒋立即提出：“香港这块土地应归还中国”。丘吉尔马上站起来进行抗议，怒气冲冲地进行辩解，并不断地吸烟，从烟斗到雪茄，一支接一支，试图说服罗斯福。他说：“香港是日本人从英国人手里夺去的，理应归还英国。英国是香港的合法占有者，是依据上世纪与当时的中国合法政府签订的条约行事的。”蒋介石反驳说：“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它被用武力歪曲了，是无效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它们，保留行使主权的行动，包括诉诸武力。只要决定了，香港就会回到中国的怀抱。”

中英两国元首在会议结束前突然爆发的这场关于香港归属问题的激烈争吵，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尴尬，他既不能表示同意蒋介石的观点而惹恼丘吉尔，又不便表示赞成丘吉尔的意见而开罪蒋介石，这位美国总统象马歇尔将军一样，内心是偏袒蒋介石的。但作为调解人，他当时只好一方面劝说丘吉尔，谓此事尚可磋商；另一方面要

求蒋介石珍惜已达成的协议，对蒋说，当务之急是如何打败希特勒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的日军，战争结束后，还有时间讨论香港问题。罗斯福的中心意思，仍然是香港应归还中国，但有个条件，应在那里建立自由港，允许各国人民在那里自由经商，只是没有明说罢了。中英之间的这场争吵，在罗斯福的调解下，在开罗会议上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此宣言对香港的归属问题也就避而不谈了。

（王天庆）

风云人物

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　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2年赴武昌读书，先入省一中，继进中华大学补习。1915年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英语班学习四年。五四时期，与恽代英等学生领袖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是年秋后，与董必武创办了武汉中学，同时执教于高师附小和湖北女师。

1920年10月，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接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活动机关。他在小组内主要负责党团的组织工作。五四时期的刊物《武汉星期评论》后期由武汉小组领导，他常为该刊物撰写文章。1921年7月，和董必武一起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为武汉区委负责人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出席了中共三大。1924年9月，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从事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四大后为发展革命大好形势，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的领导。1926年7月在武昌秘密举办北伐训练班，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胜利进军。9月初，北伐军包围武昌时，在城内领导对敌斗争，给北伐军攻城创造了条件。1926年底，中共中央改武汉区委为中共湖北省委，他担任组织部长，中共五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遵照党的指示，离开武汉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指导了星子、瑞昌等地的暴动。1928年春，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不久，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仍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以后任中共中央驻顺直（今河北）省委代表，奔走于沪、津、京之间。1930年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虽曾被捕入狱，但经始终忠贞不屈，出狱后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1933年，他奉中央之命，赴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他不顾一切危险筹备粮食，保证红军的供应。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他根据中央指示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底，以中央分局特派员身份在福建召开第一次闽西南党政军代表会，统一了闽西南党政军领导。

1935年8月，陈潭秋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9年夏，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共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央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新疆数年中，他化名徐杰，同毛泽民、林基路等，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领导党员和各族人民的先进分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改变新疆贫穷落后面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国内外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新疆的局势也日趋险恶。不久，伪装进步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撕下假面具，投入蒋介石怀抱。陈潭秋本着党的政策和革命原则同盛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整风学习，特别是加强革命气节教育，鼓舞斗志，坚定信心。1942年9月，盛世才炮制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并于17日逮捕了他和毛泽民等同志。在狱中，敌人使尽了一切酷刑和威逼利诱手段，但他始终不屈。1943年9月27日，惨遭敌人秘密杀害。他壮烈牺牲后，由于音讯阻隔，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周士第

周士第（1900—1979）　广东省乐会（今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第73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25师师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科长、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晋北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宋美龄

宋美龄，原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1897年出生于上海，系宋子文胞妹。1907年夏，和二姐宋庆龄一起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上学，1912年被乔治亚洲威士理学院破格录取为正式少年大学生。第二年秋转入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次修哲学，后来获该院文学博士。（成为蒋介石夫人后，美国又有十四所高等院校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1917年毕业后回国，担任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和美英华妇女联席会委员。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自此成为蒋最为信赖的政治助手。

1931年，宋美龄当选立法委员。1936年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同时还以妇女运动领袖和慈善家面貌出现，担任许多社会福利团体和妇女团体的领导职务。1942年2月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商谈中印合作问题。同年11月，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和不少地区发表讲演，呼吁美国各界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3年11月，陪同蒋介石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讨论协商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对日作战规划的开罗会议。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举行，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11月28日再次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去美国鼓动援蒋集团，以便获得美援，维持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但劳而无功，一事无成。于1950年1月懊丧回台，担任“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会长和“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长”。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连任中央评议委员和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在台湾，她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依然如旧，尤其是在蒋介石故世前的几年间，经常代表年老体衰的丈夫四出活动和接见外国来访要员。1974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曾颁给她代表国民党最高荣誉的“中山奖章”。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去后，宋美龄于当年9月去美“治病”。第二年蒋介石故世一周年时，曾回台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又赴美寓居。1986年回台出席纪念蒋介石诞辰一百周年仪式，随后留居台湾。宋美龄业余爱好国画，早年留美归国后曾请过画师传教。晚年在台湾出版过画册，蒋介石特意为之作序。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委员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余程万

余程万，别号石坚，广东台山人。17岁毕业于广东番禺师范学校，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21岁时毕业于广东铁路专科学校。1924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一段时期内官职升得很快。大陆时期黄埔学生中官阶升得最高的胡宗南，是1927年下半年才当上少将副师长的，而余程万早在1926年6月已是上校阶级的团党代表，11月已是广东海政局少将政治部主任了。1928年余程万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1931年12月改任南京警卫军少将教官。第二年又转入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1934年2月毕业。在黄埔系中，象他这样读完军校各级课程、具有完整军校学历的将领并不多见，但是黄埔军校、陆军大学特别班、高级将官研究院的学历并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什么福音，他以后的官职与黄埔前三期同学比起来相差甚远。余成为将官后的升迁之慢，在黄埔系中实不多见。这一来是因他自恃清高为人所忌，二来是蒋介石主要靠提拔亲近心腹把持要害职务，不大重视学历。李良荣于将官研究院毕业后，初任第49师第289团团长，1936年4月升任副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程万随部参加抗战。1940年7月任第57师师长。1943年冬，日寇抽调6个师团和4个伪军师共16万人，发动常德会战。中国方面由孙连仲的第6战区、薛岳的第9战区共21万大军迎击进犯日军。因常德是日寇的主攻目标，故第74军第57师守卫常德之战战况最为激烈，激战十六昼夜后，57师只剩下余程万师长以下300余官兵，步枪几十枝。余程万在给孙连仲拍了一个“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刻大街小巷敌我混战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的告别电报后下令由团长柴意新指挥余部牵制日寇，自己乘一只小船渡过沅江。因之受到军法制裁。1944年7月余程万重获起用，出任第74军副军长。1946年6月该军改为整编74师时任副师长。1947年11月调任粤东师管区司令，1948年4月再调为整编第26师师长。不久该师改为第26军，随即任军长。时26军共有3个师另3个

补充团约4万人驻扎云南。1949年12月9日云南卢汉将军发表起义通电，同时扣留从重庆赶来压卢汉反共的张群和大批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要员，余程万和驻云南的另一国民党嫡系将领第8军军长李弥一起被扣押。其后，第26军由副军长彭佐熙代理军长，联合第8军进攻昆明，逼卢汉放人。余程万、李弥在应允出城策动部属起义后被放出昆明。但余、李获释后竟率部攻城，受挫后退往开远。这时刚从成都逃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命令余程万督率第26军三者选一：反攻昆明；确保蒙自机场；空运海南岛。余程万选择了第二方案，把部队开到蒙自机场。第8军则撤到建水。12月27日余程万飞台北，但很快又受命重回云南蒙自并被宣布兼任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然到任不到10天，第8军军长李弥也受命赶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绥署主任，要26军立即空运海南，将蒙自防务交第8军。1950年1月11日起先空运部队家眷，15日起运宪兵队，并准备自16日起用大批这国用飞机和民航客机运送第26军的大部队。但这一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15日晚9时，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蒙自机场，后续部队三个军亦迅速赶来。第8、26军决定分途突围。1950年1月13日余程万乘飞机飞往海南岛。此时，其绥署主任职已交李弥，第26军军长一职也为彭佐熙接替。1月19日，他经营执掌过的第26军残部两个团到达边境地区，只剩下1100人之众，经佛海、南桥逃入越南。（后被法国当局缴械后送富国岛，1953年5月返回台湾。）他在海南深感处境不妙，败军之将回到台湾，等待的只能是军法审判。性命难保，何谈前途？于是在一天晚上悄悄上了机帆船前往香港，以后即寓居该地。

1955年8月27日晚，黑社会绑架余程万年青的夫人，余程万出面抢救，被黑社会杀手开枪打死。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委员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林　森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1867年3月16日（清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商人家庭。三岁时随父誊炳移居福州，六岁开始读书。1877年入美国教会办的培元学校读书，1881年入鹤龄英华书院读书，1884年学业结束后离开福州，赴台北电报局工作。

1895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林返归大陆。1898年复去台湾，一度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翌年春仍回福州。

1902年，林考入上海江海关工作。因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的影响，他与林述庆等组织了福建学生会，被选为主席。不久，学生会同闽籍留日进步学生林文、方声洞等建立了联系，进而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主张。1905年同盟会成立，林森与学生会会员均入会。

1909年，林森由上海调九江关任职员，曾与吴铁城等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宣传革命，还着手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和进行联络新军的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即与上海的陈子范、湖北的詹大悲建立联系，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便立即策动九江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于10月23日宣布独立。随后成立九江军政府，马为都督，林任民政长，吴任总参议官。他们曾联系海筹等海军舰艇起义，并共同商定了统一江西和援鄂、援皖等决策。

同年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先后在沪、汉、宁开会，林为江西代表，曾参加上海、南京会议，同其他代表一起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林森是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会议，被选为议长。2月上旬开始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不久清帝退位，袁世凯假意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被迫向参院提出辞呈，荐袁自代，但要求把首都设在南京，袁必须服从《临时约法》并到南京就职。参院很快选袁继任临时大总统，4月又在袁的要挟之下决定将临时政府和参院迁往北京。在迁都问题上，参院内有过激烈的斗争，林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反对北迁，因而辞职。是年秋，林回福建设立国民党支部。

袁世凯为加强独裁统治，1913年3月指使其爪牙暗杀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林又作为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参议院会议，被举为参议院全院委员长。而对袁世凯的种种反动行径，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少数国民党议员南下参加起义，多数人（特别是所谓法律派）仍继续委曲求全地呆在国会中，林也是呆在国会中的一个。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国会进一步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10月选袁为正式总统。而袁世凯实行专制的野心仍不满足，11月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缔国民党议员，随之国会也停止活动。林事先取得了出国护照，随即东渡日本。

林在日本东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4年春转赴美国旧金山，任民国维持会会长。该会是国民党美州总支部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为起兵讨袁而设立的筹饷机关。民国维持会曾派员巡游美洲各埠开展工作，林亲往古巴进行募捐。同年冬美洲总支部改选干部，林当选为支部长。在他任职的三年间，该总支部在阻止袁世凯借款、召开全美国民党恳亲大会，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显著，被孙誉为“领袖支部”。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10月，许崇智回师入闽。11月，林森接任福建省长。1923年2月，许率军回粤，福建为北洋政府控制，林被迫辞职。同月，陈退走惠州，孙中山返广州就大元帅职。7月，林被任

命为大本营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11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纠集同伙，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党籍案"、"俄人包尔丁(鲍罗廷)顾问解雇案"、"中央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决议。参加这次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林森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又被推举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从而背叛孙中山，走上了反共反苏反革命的道路。1926年1月，西山会议派的一些成员受到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处分(林受到警告处分)。但他们不承认广州大会，同年3月仍继续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林再次当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在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林森是该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到11月底特委会无形解体。特委会成立前，蒋介石本已下野，1928年初重新上台，随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林任"国府"委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林任副院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林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他是陵墓建筑的主持人和迎榇专使之一。

1931年2月下旬，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扣，3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由林森任立法院长。事前他已出国考察，院长职务由邵元冲暂代。4月，邓泽如等四监委弹劾蒋介石，林列名四监委之内(当时他尚在国外)。5月，一些国民党政客与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非常会议，同蒋分庭抗礼，由于林和粤方几个要人关系较密，粤方曾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10月林从国外回来，这时宁粤双方正在和谈，他采取超然态度。"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粤方乘机倒蒋，12月，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林被推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粤联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选林森为"国府"主席。林于1932年元旦就职。

林森任主席不久，发生"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国民政府"暂迁洛阳。同年3月，蒋介石东山再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又迁往重庆，林于11月入川。1943年5月因车祸受伤卧病，到8月1日死去。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胡宗南

胡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浙江孝丰人，蒋介石的"小老乡"，黄埔第一期生，"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他深受蒋介石的宠爱，是黄埔系第一个进衔陆军上将和战区司令长官的人。抗战后升任西安绥靖主任，拥兵五十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人称"西北王"。

1896年4月4日，胡宗南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埔朱家塘楼的旧宅内。在他生下时，父亲胡镜清受族兄俊清的邀请，到孝丰鹤鹿溪定居，先经营药材生意，后在县内清丈田亩，办理田产买卖，以庄书为业。胡宗南七岁时，胡镜清在孝丰续娶吴氏夫人为妻，方才把胡宗南带到孝丰县长住，遂占籍湖州孝丰。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蒋介石以两个教导团的基础，扩编成第一军的教导师，胡宗南改任教导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团长就是共产党员胡公冕。胡宗南当时虽为国民党干了一些坏事，但国共两党仍没公开分裂，胡公冕和胡宗南是结拜兄弟，私人感情颇深。北伐军到达株州以后，蒋介石选调胡公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胡公冕极力推荐胡宗南直接由营长晋升为教导师第二团团长。所以，胡宗南常说："公冕先生是有恩于我的。"

在此期间，戴笠还不能完全取信于蒋介石，只好巴结胡宗南，在胡团部任中尉副官。其实，也是挂名副官，他整天跑上头，巴结蒋介石。胡宗南与戴已结拜成弟兄，并不限制其行动。相反他再三向蒋介石推荐戴笠，戴笠方慢慢地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戴笠也常说："琴斋是有恩于我的。"

1926年秋天，教导师在江西南昌一带与孙传芳部队作战，恶战十余天，惨遭溃败，师长王柏龄受撤职处分。胡宗南却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他率领教导二团，奉命从正面攻打南昌城郊的牛行车站。牛行，是南昌的大门，孙传芳派军长李彦春率领两万余人死守。车站四周，筑有牢固的碉堡、堑壕和各种防御工事。站外，是一片田野，平坦坦无所遮拦。胡宗南第一次指挥部队硬攻，先是一个营一个营的上，接着采取全团集体冲锋，攻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惨重，败阵而归。新任师长刘峙，见胡宗南败退下来，只说："攻打不下来？"

"是的。但我不服气，他们不过占着有利地势……"

"打仗，靠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占地利，你不能占天时？……"

"你是说采用火攻?"胡宗南脑子一下子开窍了。

第二次攻击时,胡宗南用一个营的兵力运送柴草、汽油、辣子,堆放在牛行车站西南方向,浇有汽油的柴草上边撒了大量辣椒及生水,点燃后,浓烟一下子笼罩了牛行车站。守军受不了烟熏和辣椒刺激,跳出工事四处乱窜。胡宗南指挥轻重机枪扫射,接着指挥部队攻占了车站。一个团打败了孙传芳一个精锐师,俘虏了军长李彦春和他手下官兵八千余人,深得蒋介石的赞赏。

南昌攻下后,教导师改为第一师,隶属东路军序列,与第二师、第二十二师一同东出浙江。第一师随东路军进入浙江后,先克富阳,再克杭州,收复了浙江省。1927年3月20日,东路军克复上海,24日克复南京。5月,蒋介石为表彰胡宗南的功绩,晋升他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人。

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职后,继续进行北伐。胡宗南协助刘峙的第一师由浙江至滁州,奉令攻打蚌埠。这时,直鲁军使用苏联的铁甲车作掩护作战。在蚌埠至滁州铁路沿线上,往来轰炸扫射,第一师顽强作战,日夜向北攻击,但每天前进不了几公里,部队伤亡惨重。胡宗南一心想让第一师打出威风来,就想了一个绝招:在炮火掩护下,用铁锹、十字镐卸去铁轨,终于使铁甲站瘫痪,第一师顺利北上,几天后即攻占了蚌埠。因他指挥作战有方,升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不久,蒋介石对部队进行整编,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改为第一师第二旅,他改任旅长。

中原大战,第一师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冯、阎部作战。第一师师长刘峙任总指挥,由副师长徐庭瑶代理师长。胡宗南找到蒋介石,表示如果不让他当师长,他就辞职不干。作战中徐庭瑶负伤,蒋介石即委派胡宗南代理第一师师长,徐庭瑶伤愈后,调任第四师师长。

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师长后,奉命率领第一师官兵,沿着陇海线迎击孙良诚部队。

孙良诚部系冯玉祥的主力部队。孙本人剽悍善战,接连在陇海铁路两侧,忽隐忽现、忽南忽北地向蒋介石的部队反击。加上孙得到晋军杨效欧的援助,使用的是汤姆艳,使得蒋军伤透了脑筋。胡宗南一心想让第一师"出名",指挥三个旅拼命厮杀。孙良诚部队出现在围庄,他进攻围庄;出现在曹集,他指挥部队血战曹集,咬住孙部不放。

孙部不愿意和胡宗南的第一师纠缠,听说胡宗南的第一师来了;就收兵撤退。卫立煌的第十师听说孙良诚见到胡的部队就撤,就冒充胡宗南的第一师,一面冲锋,一边大喊:"孙良诚的部队听着,我们是胡宗南的第一师!"

国民党其他师团碰到孙良诚的部队,也大声喊叫:"我们是第一师——胡宗南的部队……"

孙良诚也感到奇怪,抱怨说:"他胡宗南有多少部队,怎么打着打着,都是他老胡的部队。"

真假第一师的故事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高兴地说:"还是我的第一师能打仗。"

11月战争结束,胡宗南以作战有功正式任第一师中将师长。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的脑袋是长在蒋介石的肩膀上的。蒋叫他"安内",进攻陕甘宁边区,他就去打共产党的部队;蒋叫他抗日,他就领兵抗日。

"七·七事变"后,日寇于1937年8月13日又突然向上海发动了大举进攻。胡宗南奉令率部到上海杨行、蕴藻浜、纪家桥一带阻击日寇对上海的进犯。由于这一线地势平坦,胡部仓促上阵,又没有坚固的工事,而日军又是陆海空联合作战,飞机大炮凶猛得很,参战的两个师死伤大半,只好开到昆山附近进行休整补充,胡宗南第一军兵力补充完毕,再开蕴藻浜、刘行、大场之线作战,仍被击溃。后来退至苏州河南岸,一个师几乎打光,连师政治部主任沈上达也被日寇打死。当日寇从金山卫登陆时,胡部被迫撤出上海,开回陕西凤翔附近整补。胡宗南惊叹:"上海一仗,我们一军被打惨了。"

经过六个月的整补,军力才渐充实。此时,胡宗南已升任第十七集团军军团长,奉命于1938年5月下旬,开赴豫东兰封地区对日抗战。

正当李宗仁率军在台儿庄对日作战之时,日军为了切断徐州附近中国军队的后方铁路运输线,派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侵占兰封及附近一些据点。蒋介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急调胡宗南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个军)赶到开封附近,伙同宋希濂部、俞济时部、黄杰部围歼土肥原师团。胡宗南在这一仗中,亲自指挥部下攻打兰封外围,扫清通往城内的道路,因为黄杰部队阻击不力,最后让土肥原部突围跑掉。胡宗南与黄杰本人私交不错,两部会合后,胡不好批评黄杰,只连叫:"可惜!可惜!"

1938年9月,日寇以海空军掩护陆军,沿长江两岸进犯鄂东一带,武汉会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为了阻止中原日军南下,胡宗南率部开往信阳,击退了日寇西进的部队,占领了信阳市。后留第二三二团团长马载文领兵固守信阳,大部队开回陕西。日军大举进攻时,马临阵脱逃,信阳沦陷。同年10月,武汉沦陷。

胡宗南部撤回陕西后,部队分驻西安附近,军团部驻守西安。

1940年初,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胡宗南部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蚕食、侵占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个县的地盘,并公开喊出了"消灭边区"的口号。卫立煌想作个"和事佬",专门把胡宗南和朱德同志请到洛阳,劝说胡宗南和八路军谈判,改善国共关系。胡宗南不听,当即把这事报告了蒋介石。

而且就在这时,胡宗南还配合陕西省保安处与甘肃

驻军，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强征民工，指挥构筑了一条纵横三个省、长达七百余里的碉堡、工事层叠的封锁线，抓获了大批投奔延安的有识之士、爱国学生和热血青年，困禁于西安和天水等处的法西斯监狱——青年劳动营里。

1942年初，胡宗南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驻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朱绍良，挂虚职，驻在兰州。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号称三十四万余众，均归胡宗南指挥。难怪人们惊呼："抗战，养肥了胡宗南。"

胡宗南在华山小病大养的时候，日寇土肥原部集中了五六个主力师团，附一个装甲旅，总兵力约十二万人，突然向中原发动了进攻。守卫中原的蒋鼎文部和汤恩伯部，共有五十万大军，即数倍于日寇，但不到半个月，土肥原部连克郑州、偃师、洛阳、渑池，先头部队到达陕西，潼关告急！风陵渡危险！西安震动！胡宗南害怕老巢被端掉了，慌忙下山，亲自到华阴指挥。选调自已的精锐部队第三十四集团军和第一军，阻击日寇于陕州虢略镇和豫西等地。几个师团分别在灵宝和时家山一带打了几次小规模的胜仗，日寇土肥原部就主动溃退了。对此，胡宗南大肆宣传战绩，吹嘘他自己的部队，挽救了豫西和中原的危局，并对参战的营长以上指挥官记功晋级，传令嘉奖、请勋。胡宗南本人也因此更受到蒋介石的重视。7月，蒋改派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晋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授给胜利勋章一枚。不久，胡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除自己亲自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抢摘胜利果实外，还命令李文率领第三十四集团军，假道山西，向河北省的石家庄、北平和天津进军，妄图抢占华北地盘。后因阎锡山刁难和形势发展，第三军罗历戎部占据了石家庄，李文开驻北平，天津无法插足。

此时的胡宗南，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王"：拥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三个集团军以及甘肃一个警备总司令部的兵力，合计四十余万。其势力遍及于西北诸省，即要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又要巩固自己这一"独立王国"中的统治权，因此，他建立了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以对付他的"内外敌人"。他设有两座公开的监狱：一座是西安青年劳动营（又叫西安集中营），关押大批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和投奔延安的爱国学生和爱国青年。这座监狱到了抗战后期，还在天水市设了分狱。另外一座叫西北特种拘留所——这是一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监狱，专门拘禁，残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爱国知名人士。还有一座内部监狱，名叫长官部侍勤队，监禁有政治问题的中高级将领和重要人物犯。他主持开办了四所学校，即：西安的"黄埔"——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兰州的西北干部训练团；莘华山的游击干部训练学校。他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铁血团"主要成员是他的主要干将如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他们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弟兄。胡规定"铁血团"的任务平时考察军官思想言行，起核心领导作用；在战时执行督战任务，使所属官兵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无条件效忠卖命。他坐镇西安，却派出了大批的特使和大使，如驻重庆的办事处主任曹仲侯，驻宝鸡的"宝鸡王"胡世承，驻兰州的"第八补给司令部"，驻上海的"西北贸易公司"等。蒋介石也非常信任这位"西北王"，甚至把自己第二个儿子蒋纬国，送到胡宗南身边安排、培养。到了抗战后期，他的疆土东到河南，西至新疆，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外，都是这位"西北王"的地盘。他强征兵役，横征苛捐杂税，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和联保连坐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抗，采取种种法西斯统治和坚壁清野措施，弄得西北人民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以大义对摩擦
——彭雪枫促放韩德勤

1943年2月中旬，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向淮安以东的车桥、安丰、曹甸地区进行"扫荡"。"驻守"这一带的韩德勤部第89军、新编独立第6旅、保安第7旅1万余人，略事抵抗之后，仓惶退入抗日根据地苏家嘴一带，并立即得到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的多方照应。韩部官兵深受感动，韩本人也亲笔写信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表示感谢。

但是，3月上旬蒋介石开始筹划新的反共摩擦。他密令韩德勤率部西进，以配合由安徽灵壁向东进攻的王仲廉第81军，东西夹击位于洪泽湖畔的新四军第4师。韩

德勤接到密令后，不敢怠慢，随即率领所部开始了以怨报德的卑鄙行动。

得到情报的陈毅代军长，命令彭雪枫师长再“教训”韩德勤一顿，同时抽调罗炳辉第2师、黄克诚第3师各1个旅，予以配合。

接到命令后，彭雪枫制定了远途奔袭、南北夹攻、分割聚歼的作战方针，率部于3月17日冒雨夜袭进至山子头、莫塘圩的韩德勤部，当场击毙保安第7旅旅长王光夏、独立第6旅旅长朱仲昆，生擒韩德勤及其官兵1000余人。

新四军行动神速，歼灭了韩德勤部后，蒋介石还木然未觉。彭雪枫在山子头缴获了蒋介石发给韩德勤的密电，得知蒋曾命韩于3月18日占领新四军第4师司令部所在地半城。彭雪枫灵机一动，决定耍一耍蒋介石。他用缴获的“韩总部”的电台，向蒋介石致电告“捷，报称韩部已进占“彭师匪部。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刻复电慰勉，不久，蒋介石从王仲廉处获悉韩德勤被俘的真相，只得暗暗叫苦。他急派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探访中共代表团，表示对已失去联系的韩总部和“上将副长官”韩德勤本人的命运“极为关切。”

此时，彭雪枫心里明白：作为军事作战的山子头战役是结束了，但作为对付俘虏韩德勤的政治作战则刚刚开始。他请示过军部后，便准备与韩德勤直接交锋。

春寒料峭，韩德勤被押解到新四军第4师师部时，冷得直打哆嗦。彭雪枫师长立即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他披上，并招呼他坐下。可是，他却摆开“韩主席”的架子，以攻为守，大声咋呼：“我不坐。你们新四军乘人之危，不讲道义，我韩某哪些对不住你们？一定把我的部队缴械，我要向蒋委员长控诉！”

听罢韩德勤的咋呼，彭雪枫以审慎的眼光打量韩德勤一阵，然后沉稳地反问道：“谁不讲道义？谁对不住谁，你心里自然很清楚。”接着，彭雪枫将几张电报纸丢在韩德勤面前，平心静气地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念给你听了！”

韩德勤捡起那几张电报纸，瞧了几眼，顿时目瞪口呆，面如死灰，直往外冒冷汗。

韩德勤的“威风”被彭雪枫打掉后，彭雪枫又列举了新四军这几年孤军作战，忍辱负重，坚持抗日的业绩，同时历数了韩德勤破坏协议，制造内部摩擦的劣迹，他正气凛然地指出：“新四军总是以大局为重，从不愿轻启事端，扩大事态。即以这次山子头事件为例，也是你韩德勤与王仲廉勾结于前，新四军迫不得已自卫于后。”

这时，韩德勤理屈词穷，低下了头，被迫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彭雪枫见此情形，笑了笑，既幽默又严肃地说：“我想，‘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你该知道吧！比起古人来，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够宽广了。你韩德勤也不是第一次被俘。现在，再放你回去。你要记住，为了团结抗日，我们不念旧恶。不过，你还要积极反共的话，我想，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是吗？”

“是，是，是。”韩德勤捣蒜般点头道：“共产党、新四军真是宽大为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旧恶，以礼相待。兄弟回去，一定广为宣传，只要对团结抗日有利，兄弟愿全力以赴……”

4月1日，陈毅军长、彭雪枫师长等为韩德勤设宴饯行。宴后，韩德勤披着彭雪枫师长的大衣，带着200多人枪、1部电台，离开半城，进驻彭师长给他指定的一小块“领地”。此后，再也没同新四军闹摩擦。

（黄栋法，《党史纵横》）

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撰文《纪念白求恩》，称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几乎在这篇光辉论著问世的同时，一位具有同样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医生，从欧洲来到中国，出入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足迹遍布华中、山东、东北和京津等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奥地利医生罗生特。

远涉重洋来到中国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加里西亚梭堡。罗生特自幼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异，深得师生们的好评。1923年考入著名的维也那大学攻读医学，1927年毕业，次年即获得妇科、泌尿科综合医学博士，并投身于反法西斯运动。1938年夏被捕入狱，关押在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号9615。

在被关押了一年多以后，罗生特被纳粹分子驱逐出境。

罗生特出国前有许多国家可供选择，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洲，那里不仅有他的朋友，而且生活条件优越。但他最终选择了中国。

罗生特在读大学时，就对中国有所了解，知道中国有过北伐战争，听到过孙中山的名字，听说过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赞叹“这样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可战胜的”。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十分同情，因此，离开集中营后，他毅然决定：“到中国去！”

1939年，罗生特带着必备的医疗器械，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个诊所，登门求医者络绎

不绝，收入颇丰。同时，他也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种种暴行，深感自己并没有真正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一次，他从一位在新四军中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由于敌后斗争残酷，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医药奇缺，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于是，他便决心投奔新四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1年春，罗生特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化装成德国传教士，巧妙地通过日军封锁线，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亲切地会见了罗生特，并在新四军军部为罗生特举行了欢迎大会。

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陈毅军长根据罗生特的意愿，安排他在新四军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工作。他不仅在苏北地区为军民医伤治病，还经常奔走于驻淮南、淮北的各部队之间抢救伤病员。有好几次，敌机的"嗡嗡"声已清晰可辨，枪炮声在附近响成一片，罗生特谢绝了同志们的一再催促，平静地把手术做完，最后一个撤离。他对工作极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各种医疗、规章制度的要求十分严格，无论是诊断和书写病历，还是查房和手术，都一丝不苟。手术中，他绣花一样把每一针缝得又匀又平。他常说："一个医生，要有鹰一样锐利的眼睛，音乐家的耳朵，以精确的观察去认识病人，辨别病情；要有一双灵巧的手，手术时才能缩短时间，尽量减少病者的痛苦；还要有戏剧家的嘴巴，用动人美妙的语言给病人以精神上安慰。"一次，军部机关一名战士因骑自行车不小心脚踝外皮擦破，两天后整个左脚红仲起来，全身发热。军部医生怀疑是破伤风，决定施行手术，将脚锯掉。刚要动手术，罗生特巡诊回来了。他认真替病人作了检查，发现不是破伤风，而是炎症，当即采取了治疗措施，很快控制了病情，一个月后病人完全康复了。这位战士感动地说："是罗生特给了我一条腿。"

罗生特患有心脏病和严重的夜盲症，在纳粹集中营中留下的伤疾，也时常复发，但为了抢救伤病员，总是不顾病痛，忘我地坚持工作。一次，罗生特带领医护人员到离前线不远的一个村抢救伤员。他一连做了几十例手术，下手术台后，腰酸背痛，头晕眼花。这时，他听说一位指挥员在前线负了重伤，便翻身上马立即赶去，到目的地时，由于过度疲劳，心前区发生心绞痛。为了抢救伤员，他不顾个人安危，强忍着绞痛争分夺妙地诊治，终于使这位指挥员转危为安。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使罗生特身体日见消瘦。为此，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对他的看病时间、人数及工作范围作了限制，希望他注意休息。但他怎么也闲不住，一有空就到各部队为指战员查体。他说："医生不能坐在家里，要去发现病人，解救痛苦。这样，才能叫做医生。"罗生特以他忘我的工作精神，高超的医术和火一样的热情，赢得了新四军指战员的爱戴，人们称他是"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中共之特别党员

在新四军中，党组织在政治上给罗生特热情的关怀和帮助。刘少奇经常和罗生特促膝谈心，向他介绍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陈毅和罗生特更是亲密无间。两人经常一起用法语交谈，一起结伴散步、游泳，一起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经常在苏北平原上回荡。

经过艰苦斗争的磨炼，罗生特在政治上日渐成熟。他对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新四军的反动行径十分愤慨，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敬佩。他常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真伟大，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新四军这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一定能成功，我们一起战斗，消灭法西斯"。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处处以一个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忘我献身的革命精神投入中国的抗日战争。当年在罗生特身边工作的一位老战士说："罗生特把中国军队视为自己的家，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祖国，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同胞。他不怕艰苦、忘记疲劳，甚至不顾自己的病痛。在完成一件工作后的片刻休息中，他总是象孩子一样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初，党组织根据罗生特的殷切要求和一贯表现，经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介绍，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他是外国人，将他列为中共特别党员。

罗荣桓的保健医生

罗生特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在敌后战争环境下保证了罗荣桓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完成了党中央对他的重托。

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荣桓同志，由于工作劳累，患了血尿症，遂于1943年4月21日抵达皖东北天长县西花塘新四军第四师驻地。22日，罗生特奉命前来为罗荣桓治病。罗生特为罗政委做了细致的检查诊断，初步诊断为右侧肾肿瘤。罗生特对症下药，采取输尿管注药，并辅助其他疗法，经过一个月的积极治疗，和悉心护理，基本上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且很快好转，罗荣桓的脸上恢复了红润，于6月20日，离开新四军返回山东。

同年9月，罗荣桓肾病复发，血尿不止。山东军区急电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陈毅通过四师

师长彭雪枫征求罗生特的意见。罗生特说："请师长同志转告陈毅军长，给罗司令员去电报，就说我非常愿意到山东去为他检查治病。"这样，罗生特和蔡和、李光、李磊、夏汀、方政等一行8人，在部队护送下由淮北大马庄启程赴山东。

9月下旬，罗生特等医疗组一行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安全抵达山东。当天，罗生特顾不上休息，立即为罗荣桓检查、化验、并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

为了进一步确诊罗司令员的病情，以便采取更有力的治疗措施，罗生特不分昼夜翻阅资料，并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详细询问司令员的身体情况，同她一起讨论症状和护理方法，向她提出观察病情，收集尿样的详细要求。林月琴后来回忆说："罗大夫很会体会我这个做妻子的心理，他对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样的细致入微。他是一个高明的大夫，他对病人的治疗，不仅是病人本身，而且涉及病人身边的人。罗生特对罗荣桓的治疗是有功的。如果没有罗生特这位泌尿专家的精心治疗，罗荣桓同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急令罗荣桓率山东主力挺进东北。罗生特随罗荣桓离开山东。

此后，罗生特一直跟随罗荣桓左右精心照料，使他得以坚持正常工作，直到1949年罗生特准备回国离开北京去上海为止。

群众的救命"菩萨"

罗生特不仅热情为部队指战员医伤治病，而且对老百姓也有求必应，有时是自己找上门去为群众查体治病。

1944年秋，罗生特应邀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庆祝大会。会议期间，一位村干部气喘吁吁跑来找他，说："罗大夫，我们村有个妇女难产，你快去救救她吧！"罗生特象接到命令一样，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产妇家中。这时，产妇已呈严重休克状态，胎儿心声都已听不见了，床上找不到任何干净的东西来助产。罗生特当机立断，一面吩咐家人烧开水，一面叫人到村里找来白酒消毒，并将自己刚刚在会上领到的奖品——一条白毛巾垫在产妇的身下，迅速将死胎引出，挽救了产妇的生命。之后，罗生特又几次出诊，直到产妇脱险为止。

莒南县王家坊前村王金方的妻子，患病一年多，瘦得皮包骨头，出门走路要扶着墙，罗生特看到这种情况，主动上前询问病情，要她到医疗所检查治疗。王金方的妻子因手中无钱没有去。过了一些日子，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丈夫在外支前，乡亲们看她不行了，急忙为她准备后事。罗生特外出诊病回来听说后，立即跑去为她诊治，挽救了她的生命。这名妇女活到83岁，直到1986年才去世。

当时，《大众日报》有则消息报道说："山东军区卫生部附属所半年来平均每天给十几个老百姓治病，国际友人罗大夫很和蔼地给老百姓开刀……解除了无数群众的痛苦……"

罗生特在莒南县生活、工作了两年多，住过几十个村庄，足迹遍布莒南大地，和莒南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意。回忆过去，至今在罗生特居住时间较长的王家坊前、大坊前、陈家老窝、崖上等村，60多岁的老人都赞不绝口地说："别看罗大夫是外国人，但给老百姓查病治病，不怕麻烦，不怕脏，待人有求必应。""罗大夫，好人，好求，贴着俺的心。"

成绩斐然的卫生部长

罗生特是一位战争年代在我军工作时间最长、任职最高的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我军优秀的卫生干部。他具有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到新四军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原新四军军部卫生机构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摧残，医务人员极为缺乏。罗生特向陈毅军长提出了开办一所卫生学校的建议。陈毅十分赞同，不久即建立了华中卫生学校。学校开学后，罗生特定期到学校讲课，传授医学知识和技能。在他的帮助下，新四军很快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医务人员。他还在莒南县壮岗镇的陈家老窝亲自设计、组织施工，为山东军区建造了一所上百间房屋的战时医院，并在这所医院里为重伤病员、病人医治，被群众称为"罗生特医院"。

除了办班讲课外，罗生特还十分重视在医疗实践中提高医护人员的业务素质。每次查房他都要耐心地进行临床教学，每次手术他都是根据不同情况手把手地传授技术。他还利用战斗间隙指导战地救治实习，如止血、固定、扩创、缝合、包扎、护送、人工呼吸等。1942年，他还和其他同志各显神通，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医疗手术友谊赛，推动了全军卫生系统学习医疗技术的热潮。

为了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他要求卫生干部和医护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因陋就简自制医疗器具，如用竹子制造医用镊子，用木头制造简易手术床，请铁匠铺订做人工流产用的刮匙等。

罗生特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四平战役中，一纵队是主力部队，战斗开始前，他及时召开了全纵队的医疗工作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认真细致地部署战场救护工作。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不顾万毅政委的劝阻，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救护伤员，到各野战医院了解伤员收治情况，逐个检查重伤员的处理，并连续几天在手术台上忘我地工作。

罗生特非常注意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他任一纵队卫生部长时，后方医院有一院长因犯错误被撤职。罗生特认为该院长工作有成绩，是医疗卫

生工作紧缺的人才，而且该院长犯错误事出有因，应给以改正的机会。他向纵队领导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该院长恢复职务后，工作得非常出色。

罗生特对工作有部署、有检查。很注重抓落实。1946年初，在佳木斯医院，他发现病员铺草太少，被褥单薄，没有火盆，药品奇缺，便找到医院负责人，建议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克服困难。同时，他找到有关领导反映情况，提出解决办法，直到亲眼看到领导签批给2000床棉被及一宗药品后，才放心地离开。

粗衣似老乡 厉食等士卒

罗生特在我根据地与八路军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精神，受到大家的普遍赞扬。当时，部队的吃饭穿衣都十分困难，为照顾他的生活习惯，领导指示对他特别照顾：每月300元北海币生活费，和军区首长穿同样的军装。罗生特听后急忙找到军区首长，恳切地说："我也是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给我这么多生活费会脱离群众的。"

军区首长向他解释说："你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时间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罗生特争辩说，"如果为了享受，我就留在上海了，不会来新四军和山东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每月的生活费减少到一百块钱，实际上连这些标准也吃不上。军区首长让罗生特吃小灶，但由于物资缺乏，小灶也没什么好吃的，有时买点猪肉、豆瓣酱，再放点辣椒一炒，就是一周的菜了。罗生特吃不了山东的煎饼，便照顾他吃小米干饭。条件最苦时，他同战士一样，喝白开水，抽普通烟。由于工作疲劳，加上生活艰苦，罗生特魁梧的身躯慢慢地消瘦了，但他却经常把省下来的生活费买成营养品送给伤员，有时就让警卫员到集上买好吃的，把医疗组的几个同志找来聚餐，大家一起热闹一番。

罗荣桓考虑到罗生特经常外出救治伤员，决定将缴获日本的一辆摩托车配给他，但罗生特从来没骑过，成了卫生部的公用车。给他的马，他也只有在出诊时骑，行军时，他总是把伤病员扶上这匹马。

壮志难酬遗恨终天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罗生特万分欢欣，他想，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战争结束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也是一桩极不容易的事。我的祖国已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可以回奥地利去，动员我的老师、同学及好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他也想同分别十余年的亲人欢聚一堂。

党中央批准了罗生特回国的请求。刘少奇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罗荣桓政委及林月琴同志亲自到天津车站 为他送行，叮嘱再三，依依惜别。

1949年11月，罗生特带着战斗的风尘，带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热烈祝愿，由上海启程，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罗生特回国后，我国有关部门一直设法同他联系。但是，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未能如愿。后来，他的妹妹辗转寄来一封信，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50年代初期西方普遍敌视新中国的政治气候下，罗生特在奥地利找不到工作，欲重返中国又未能获准。罗生特壮志难酬，贫病交加，含恨去世，时年48岁。

巍巍罗生特，赤诚爱中国；中国同行们深为罗生特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几乎将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罗生特同志！

为了纪念这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题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姬鹏飞题词："治病救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题词："罗生特精神永存。"山东省决定于1992年上半年出版《罗生特在中国》一书，同时于9月召开罗生特诞辰89周年纪念会；临沂行署决定将莒南县人民医院改为"罗生特国际和平医院"，以教育和激励青年一代，学习和发扬罗生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和发展世界和平友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自《党史博采》93年7期，作者：朱孟明）

冀南区战时经济的治理整顿

及时平抑市场物价

战争时期，冀南区党委和行署针对当时私有经济为主要成份，不法商人、资本家钻价格的空子，在物价上兴风作浪的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和取缔欺行霸市、轰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本区内的物价稳定。一是建立冀南银行，抵制伪钞流通。当时伪钞在根据地流通是冲击冀南区市场物价的一大弊端。1939年2月，冀南行署在反"扫荡"的指示信中，特别强调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严禁伪钞流通。不过五个月，筹建了冀南银行，在根据地发行了冀南票，有力地抵制了伪钞流通。二是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平抑粮食价格。1943年冀南发生了空前的大灾荒，加上日伪在经济上大肆抢掠，冀南区的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不法商贩趁机搞鬼。4月10日，行署发出布告，在允许粮食可

以自由买卖的同时，明令卖者必须按照工商管理局规定的手续进行交易，不得囤积居奇，高抬粮价；不得资敌，违者以走私论处。行署还在全区组织精壮劳力在武装保护下从丰收区运回粮食，平价卖给贫苦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广平县运回粮食40万公斤投放市场，在平抑粮价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1948年10月，华北、华东两解放区货币等值流通，这时华东区一些商人云集冀南一带抢购棉花，引起棉花"大战"，使棉价暴涨57%。冀南区按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及时制止了这场"大战"。1949年初由于外地物价波动，导致冀南的物价严重不稳。冀南行署于1月23日发出制止投机抢购，平稳物价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做到：1.加强纪律，反对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国营、公营商店在同一市场收购与出售要步调一致，密切配合，不许以不同价格去互相竞争，尤其不许到敌区去竞争。2.在经营上，要抛出粮食，平抑物价。贸易公司除对合作社及确无粮吃的贫苦市民与小生产者给以较低于市价的粮食供应外、再拿出大批粮食在邯郸、大名、魏县、成磁等物价波动突出地区的重要市场随市价出售。3.加强行政管理，杜绝投机抢购、囤积居奇等违法现象。第三专署还在各县检查市场，到2月上旬，使得物价下降并趋于稳定。冀南行署为进一步从根本上调控市场物价，在3月22日又发出三点指示：①在物价波动时，必须依照前紧急指示精神予以适当管制，并要对大批商贩的抢购，实行禁止；②在较大城市，要组织行会，根据利于物资交流、顺乎发展规律、有利生产的原则，挂牌价格，公布执行；③对不履行报告及不遵守行业会议规定者，酌情予以处分。各专、县都认真贯彻了上述指示，使物价一直比较稳定。

战争年代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冀南区领导尚且能密切关注市场物价，制定有力措施，保持了物价的稳定。而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领导更应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抓好市场物价管理，切实把物价工作搞好。

适时关闭机关经营

为了打破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战胜连年的大灾荒，减轻人民负担，冀南区党政军群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3月，冀南区党委对机关、部队的生产经营做出具体规定，要求通过大生产解决各自的一部分粮食、棉衣需要。冀南军区还对部队生产经营提出了更高地要求。机关、部队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垦荒和租种了大量的土地，还办起了一批小工厂、小作坊和经营商店。如广平县县大队就在县城办起酒厂、澡池等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绝大多数机关和部队是遵守纪律、遵守经济法规的。但由于缺乏经营知识，以及极少数人从中投机取巧，机关、部队生产经营也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现象。1946年4月，冀南行署为防微杜渐，对机关生产商店、公营商店作出规定：1.向政府登记；2.防止统购统销，破坏自由贸易；3.照章纳税；4.完全以调剂物资为目的，不做日常营业之商店。各机关、部队对所经营的企业，均按照这四条进行了清理整顿，普遍向政府登记、照章纳税，坚决纠正了以权力之便搞统购统销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错误倾向。

进入1948年，冀南全区已基本无战事，农村土改已基本完成，我党成为公开的执政党，各级人民政府已成为拥有重大权力的行政机关。在这种形势下，再继续搞机关、部队的生产经营势必会出现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官倒官卖，势必会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审时度势，于是年2月11日果断发布取消全边区机关生产的命令。冀南各地认真执行这一命令，迅速停止了机关的生产经营，既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又消除了可能产生的腐蚀作用。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强调清理整顿各类公司，查处各种官倒等。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经验，痛下决心，坚定果断地进行清理整顿与查处，铲除产生腐败的温床。

反复倡导艰苦奋斗

从1938年8月，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相继建立之后，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做到了经常讲、反复讲、具体抓、认真抓，在各级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以艰苦为荣，勤俭为乐，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良好风气。

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坚决听从党的号召，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实行节约。党政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小米，部队每天每天节约一至二两小米，尽最大努力减轻人民负担。那时，县长吃野菜饿得走不动，干部吃谷糠造成便秘，还依然坚持革命，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各级干部与人民患难与共，相依为命，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仅凭这一点，人民群众就坚信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能胜利。直到现在还在呼唤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呼唤着"老八路作风"，这多么值得今日干部深思啊！

在解放战争中，冀南作为解放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艰巨的支前任务。1946年7月，区党委、行署、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开展节食、节支、杜绝浪费。行署机关在仅有微薄津贴收入的情况下主动捐款支前。行署主任孟夫唐带头捐款5000元（冀南币。下同），带动行署机关捐献出18.3万元，加上其它机关、部队、学校的捐款，共捐献支前资金80多万元。此后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又多次作出过节约支前的指示。在各级干部节约支前的模范行动影响下，冀南区为支前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时，干部有点

钱自己舍不得花,用于搞支前;而今,有些干部攀比消费,挥霍公款,相比之下这些干部不觉得惭愧吗?

严肃财政经济法纪

冀南区领导深知,在战争年代活动高度分散的情况下,要治理和整顿好经济工作,仅靠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经济的手段还不够,还必须有法律的、纪律的、制度的管理手段与之配合,才能管得严、卡得住、堵得死。为此,冀南区根据上级有关指示做出了有关法纪、制度的规定。首先统一全区财政经济和有关供给标准,不得各自为政。行署还曾颁布过地方粮食收支的制度,规定村粮开支一定经区批准,村粮征收一定经县批准,村粮每公亩不得超过半市斤;二是严格执行财政预决算、审计、会计和供给制度,彻底进行财政清理;三是严禁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不得沾群众便宜;四是及时查处经济犯罪案件,从严进行惩处。1939年11月15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召开冀南、直南、鲁西北三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曾明令凡贪污500元冀南币以上者要处以死刑。冀南区各地都认真进行了贯彻执行。广平县也认真开展了反贪污斗争。抗日县政府一位秘书因贪污公款,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北盐池村两名村干部任意勒索群众,大搞贪污腐化,罪行十分严重被处以死刑。其它一些地、县也都严格执行了财经法纪。1947年3月,第二专署规定,干部到村工作随庄户吃饭,必须按制度交钱、粮,否则以贪污论处。当时执法严明,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干部中公私分明,廉洁清正蔚然成风。现在,在干部队伍中贪污受贿,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史鉴今,执法执纪不严,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选自《党史博采》90年2期,作者:阎峰青)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特区
——皖江汤家沟贸易区追记

一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汤家沟镇,与芜湖隔江对峙。这个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竟然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经济贸易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用经济手段迫使芜湖的敌人不敢对它有所动作。重温这段历史,会使我们感到:这里蕴藏着一种哲理,展示着一种风采,当年的汤家沟贸易区,不就类似今日的"经济特区"吗?

二

1942年的华中敌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日寇为了巩固他的"后方",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1943年春,敌人以数千兵力,大举对皖江根据地进行了"扫荡",使素称富饶的皖江经济上遇到了很大困难,财源枯竭,部队供应紧张,对军部及其它兄弟部队的经济援助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敌人的封锁是严格的:沿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周围,除在津浦、淮南两条铁路沿线建立了许多据点之外,沿江的襄安、黄姑闸、无为县城、三官殿、盛家桥等地,也都加派了守军,建立了据点,南京的汪伪政权还颁布了针对我根据地的所谓《物资移动及搬出搬入取缔办法》,除规定军火物资作为绝对禁止"移动"的物品外,对一些生活用品也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如规定民众自购的物品数量:棉布为三码,香烟为百支,火柴为五小盒,盐只准一斤。企图用这种"囚笼"办法把我根据地的军民困死。

三

开展贸易,用贸易来打破敌的封锁,用贸易来拓宽财经渠道,这是皖江人民在当时的一种选择。为此,皖江行署建立了财政经济处,由原新四军军部供给部的副部长叶进明担任处长。同时,成立了皖中货物管理总局,不久,易名为贸易管理总局,任命曾在"江抗"总办事处担任过财经处长的蔡辉为局长。为选择一个理想的贸易地区,财经处和总局的同志都把目光的焦点集中到无为县的汤家沟镇。

汤家沟离长江主航道十余华里,横跨在一条夹江的中间,从镇的两头都可乘船,直通长江。向东步行30华里,就是芜湖的对江二坝,处于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日军入侵之后,原有的货物流通渠道被破坏,一些客商携带货物从芜湖过江,经汤家沟,运到大别山国统区进行贸易,形成了一条商业通道。虽然如此,但由于未加很好地开发利用,因此1942年以前,汤家沟仍然像其它战时农村集市一样,显得十分萧条。

总局在镇上帝国主义留下的卐字会里,建立了办事机构,筹集资金,开设了"集成号"商行,作为总局的经济实体,对外开展贸易活动,总局局长蔡辉兼任商行总经理。为便于开展对社会各界的联系,聘请了爱国民主人士沈益民担任经理。就这样,这个以"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为宗旨的,集贸易与管理于一身的特殊机构,就矗立在这个过去不曾被人注意的汤家沟镇。

四

中日战争进入到1943年,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日益暴露出其侵华战争的致命弱点——物资匮乏,尤以作为

战略资源的粮食更趋紧张。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主动。凭借着皖江地区丰富的粮食资源，汤家沟的“集成号”成立之初，就把统制粮食的进出口贸易作为自己的经营重点。将通过公粮征集所得的粮食，以及在农民中收购的粮食，控制起来，除满足军队需要外，主要用于和敌占区的商人进行“易货贸易”，用粮食换取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日用品等，以克服敌人对根据地封锁所带来的困难。

当时，京、沪、芜一带的商人除与根据地进行贸易外，还有不少客商以食盐、日用工业用品与地处皖西的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贸易，获利丰厚。我们从中得到启发，将从敌战区换回的食盐、工业日用品，拿出一部份多余的，运到大别山国统区去进行贸易，换回大麻、山货、茶叶、烟草，然后又用这些物资扩大与敌占区的贸易。利用汤家沟地理上优势，将敌占区与国统区连接起来，进行双边贸易，以搞活我们的经济。

一着领先，全局皆活。汤家沟这个昔日荒凉的小镇，由于贸易的发展，日渐成为皖江地区粮食的集散中心，沟通敌占区与国统区贸易的枢纽。利润和贸易带来的税收，成倍或数十倍地增长，一度困扰着皖江地区的财经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出汤沟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但皖江抗日根据地自 1943 年汤家沟开埠以后，支援军部的金额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态势。据现有资料，1942 年为 749100 元，1943 年则增长为 1917800 元，两年款项合计折成大米为 11761 担；而 1944 年支援军部的款项，折成大米竟多达 83130 担，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七倍还多。汤家沟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一斑。

五

汤家沟走上了辉煌。总局为了扩大贸易，继“集成号”以后，又办起了“利民盐行”，专门从事盐业贸易。接着又以“集成号”为龙头，吸收民间资金，兴办了合作社性质的“裕民号”、“正大号”两座商号，作为“集成号”的补充，在业务上，统一受“集成号”的领导，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贸集团。在根据地内的县、区、乡镇，都相应地办起“集成号”分号，以及合作社性质的商业网点，围绕着汤家沟“集成号”这个中心，将整个根据地的经贸活动联成了一个整体。

对各地来根据地经商的客商，一律采取保护政策，规定：凡来根据地经商的，只需缴纳一次货物过境税，民主政府保障他们的合法收入。总局还组建了一支 60 多人的武装护商队，以保护来根据地经商的商人及货物的安全。在当时敌占区和国统区关卡林立、军匪不分的情况下，汤家沟采取的这些措施深得客商的欢迎。商人们奔走相告，纷纷来汤家沟或取道汤家沟进行经商，一时商贸云集，内外贸易十分红火。

为方便各地商人的汇兑存贷业务，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大江银行”还特地在汤家沟设立分行，兴办了“永丰钱庄”在巢湖区的湖东魏家坝之间办起了汇兑业务，解除了商人随身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为适应日益增多的客商需要，“集成号”又在镇上办起了“仁和旅舍”和“舒六饭店”，热情周到地为过往客商服务。乡村群众和各种工匠也纷纷来镇上摆摊设点，或开设各种作坊，其中仅粮行就有十几家之多，汤家沟俨然成了皖江地区与日寇进行经济战的指挥中心，人口也由原来的三四百人猛增到二千多人。

六

把贸易扩大到敌占区去。“集成号”的总经理蔡辉原在苏南区党委任沙洲县县长时，结识了这个县十二圩港船帮首领杨老九。以后，杨来芜湖，组织了江苏省旅芜民船同业公会，自任会长，改名叫杨大炎，拥有一大批民船，成为芜湖水上运输的一个巨头。蔡辉凭借着以往关系，主动与杨进行联系。协议联合搞运输。派总局干部周金祥到杨大炎处作联络员，为汤家沟的经贸运输牵线搭桥。以后又进一步通过杨大炎的关系，在芜湖成立了一个“交通运输行”，对外从事运输业务，对内则是根据地的一个联络站，接待我方来往于芜湖的工作和采购人员。

上海“海记公司”经理周云海，专营食盐、棉布业务。我们曾以二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二百斤大米换一匹龙头细布的条件，与他达成了 200 担食盐、500 匹棉布的交易。以后，又通过他的关系与上海煤业资本家潘以三合资办成“大成公司”，作为“集成号”在上海的代理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成公司”改名为“长江公司”，成了苏皖边区政府在上海的经贸活动中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七

1944 年初夏，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芜湖江面的一艘船上，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贸易谈判。对方是曾经当过日本人芜湖维持会长的汪子东，现在是日本人设在芜湖的“总力社芜湖分社”的社长，专门从事日军军粮的筹集工作。陪同前来的是芜湖民船运输业巨头杨大炎。我方参加谈判的是贸易总局局长兼“集成号”总经理蔡辉。

“总力社”是日本人推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的一个机构，侧重于经济方面。汪子东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一个亲信，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的买办，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生意，是芜湖商界的知名人物。日本人把“总力社”的任务交给他，说明对他的信任。为了完成军粮筹集任务，日本人还派了南京“总力社”的经济顾问楠木来芜湖任“总力分社”的高级顾问，长期住芜湖督办。根据这一情况，我方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加紧了

对粮食的统制，把粮食的流向尽可能地向京、沪商人倾斜，杜绝与芜湖“总力分社”的粮食贸易；还通过江边部队加紧对芜湖的粮食封锁，致使汪子东的军粮筹集任务不能完成。驻芜日军的首脑机构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向汪子东施加压力，使他焦虑不安。他知道杨大炎的运输船只经常往返于新四军地区，便央求杨大炎沟通与我的联系，要求与我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经双方约定，由汪子东秘密来汤家沟进行这次贸易谈判。

汪子东迫于压力，急于交差，有求于我。这是我们提高“易货贸易”价码的一个极好时机。因此，我方提出的交换物资，就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食盐、布匹和日用百货，而将敌人的统制物资和军需用品作为交换条件。谈判的结果，对方以30%的梯恩梯(T. N. T)军用炸药、雷管、机枪、收发报机等军火物资30%的钢材、五金、工具、机床等统制物资，40%的食盐、布匹、药品、杂货等一般物资与我进行易货贸易。

这是一次十分有利于我方的交易，它的成交，说明日伪对我的经济封锁宣告破产。

八

1944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几个态度庄重的“商人”，在汤家沟的仁和旅舍临河的一间客房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认真的会谈。其中两个中年汉子，操着流利的日语，谈得特别认真。原来，这是经汪子东安排、经我方区党委同意，日本驻芜湖高级顾问楠木对汤家沟的一次访问。同他进行会谈的是皖江区党委城市工委书记、七师敌工部部长段洛夫。

段洛夫曾留学日本，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具有长期做对敌工作的经验，这次是经区党委批准专程来汤家沟进行会谈。

据有关情报称：楠木对侵华战争有一种厌倦情绪。他这次要求来汤家沟，也是这种情绪的一种表现。

段洛夫紧紧抓住这一时机，与他进行了恳切的交谈，促使楠木由厌战转到反战，进而促使其与我合作，共谋早日结束这场罪恶战争的途径。

这次谈判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通过楠木打通与南京日伪金融机关的关系，将我们收集到的大量伪币、法币，运到南京购买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的日元、美钞，也可以从这里兑换到。1945年元旦，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贸易总局的王渔、朱萍等五名干部被日军俘虏，后来通过楠木出面保释出来。

九

汤家沟的日渐繁荣，对京、沪、芜敌占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里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与敌占区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944年冬季开始，这些地区的一些商人、资本家，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来到汤家沟，有的来经商，有的来投资办厂，还有不少爱国青年来根据地参加工作。财经处建设科科长倪则耕，日夜忙于接待。曾与我有合作关系的上海资本家潘以三，在汤家沟办起了肥皂厂，在巢无山区办起了煤厂。上海万利电器行经理郑有荣，于1944年底携带全家来汤家沟筹办电池厂。与“集成号”有经济联系的，仅上海一地就有“通江公司”、“上海物资公司”、“安源公司等。“外资”的大量输入，各种企业、工厂的建立，使汤家沟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一个以粮食贸易为中心的工贸金融服务功能齐全的经济贸易区日臻完善。许多当年在这里战斗过的老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亲切地称：汤家沟是皖江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特区”。

十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汤家沟当然还不具备现代特区的社会功能，但在当时，这里在发展财经贸易上，在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的策略上，在许多方面，确实有一些新的创举：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民族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在军事上实行的是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政策，在政治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济上同样需要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或者说统一战线的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创造条件。在汤家沟的皖中贸易总局根据这一思想，果断地在敌人统治区的前沿地区——汤家沟开辟商埠，以推动与敌占区贸易的发展。采取了对境内外的商人一律加以保护的政策，鼓励他们经商办企业，保障他们的合法收入。后来由单纯地与敌占区进行贸易，扩大到与敌占区、国统区的双边贸易；由单纯地与商人进行贸易，扩大到与敌人贸易机关进行有利于我的贸易；不仅允许敌占区的资本家、地主到根据地来开展贸易，而且还和资本家合作，到敌占区兴办企业赚钱牟利搞活我们的经济。实践证明，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皖江根据地的经济繁荣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皖江抗日根据地地处大江两岸，有着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这里素称鱼米之乡。近代芜湖米市的形成，即以这里盛产的籼米为基础。总局的同志认识到，在进行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斗争中，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住农产品，特别是大米，就掌握了主动权。汤家沟作为皖江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充分地发挥了这一优势，实际上代替了芜湖的米市。敌人也不得不用大量的工业品，甚至是军火、军工器材的极高代价，来换取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敌人眼看着汤家沟繁荣发展而不敢有所动作，生怕断了自己的“粮道”。日军在这方面的失败，较之在战场上更加明显和深刻。

（选自《大江南北》94年3期，作者：王广汉）

（选自《党史博采》90年9期，作者：张桓）

苦肉计

安国至定县的公路间，有个东亭镇。抗日战争时期安有敌军一个大据点，除日军外，还驻有一个伪警备中队，一个警察分局，一个新民会特务队，共计六百余人，配有轻重机枪十余挺，六零炮四门。敌人自恃人多武器好，甚为高傲，声称八路军正规部队也奈何不了他们。1943年9月，七分区军政领导计划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里的警备队、警察分局、特务队消灭掉，给日军一点颜色看看。

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人员名叫刘洪轩，是东亭伪警备队九中队第一小队队长。他手下还有程实等几个地下人员。组织决定，行动那天晚上，让刘洪轩他们派人把部队接入据点内，争取不发一枪完成任务；袭击据点后，除刘洪轩继续潜伏在敌营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出。

组织上的决定，刘洪轩绝对服从。怎样才能使自己隐蔽下来呢？10月20日，日军带着警备队、特务队和警察分局的人外出抢粮，拂晓前包围了一个村庄，警备队担任了村西边的进攻任务，当包围圈紧缩到距村边一千米左右时，日军小队长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此时，作为代行中队长职务的刘洪轩以侦察地形为名，带领程实向村前摸去。他二人向前行进了二百多米，刘洪轩便乘天黑让程实在他腿上开枪，造成遭"敌"击伤的假象。尽管刘洪轩已经说明这是"苦肉计"，程实还是不忍心下手，这时刘洪轩非常严肃地说："程实同志，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利益，开枪吧！"程实把牙一咬，"咣"地一枪，朝刘洪轩的左腿打去，立时鲜血流淌。然后，他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向对面和日军、警备队等方向打了几枪。程实鸣枪后，边喊边往回跑："八路把刘队长打伤了，快来抢救啊！"日军、警备队、特务队听到枪声和喊声，一齐向村中打起枪炮来。

日军小队长利用信鸽向定县报告："警备队九中队一小队长刘洪轩，与共军作战左腿负伤，速派担架接回治疗。"

刘洪轩接到定县养伤后，小队的工作由程实负责，10月26日晚，我方部队按计划来到东亭镇。23时，打入敌人内部的张强在岗楼上发出信号，程实到东亭镇东南角寨墙上接应部队。他们沿着墙根悄悄来到寨门。此时，张强已将寨门打开。队伍按原定分工，分别袭击了警备队、警察分局和新民会特务队。没放一枪，就干净彻底地把这些伪军、汉奸全部俘获。

这年的12月1日，刘洪轩在医院接到一项命令："查定县警备队第三大队九中队第一小队长刘洪轩，因协助大日本皇军作战有功，经松井部队长和定县警备队联队长丁瑞达批准，晋升刘洪轩为中尉小队长。"刘洪轩看后轻轻一笑，向护士说了声："中午饭弄点酒，庆贺荣升。"

女侠娘娘

这天，太阳还没爬起身，保安团团长储八便亲自出马，带领两排士兵，将城里的男女老少吆喝到了城南门口。南门的城堡高有十几丈，下边是险陡的护城河，一座木桥正对南北。白天，来往行人必经此桥，每到傍晚，城门关闭，桥板便用钢丝绳高高吊起。前年八月中秋，新四军攻城，战士们夜间浮水过河。当时这里一场激战，我们牺牲一百多人为代价，攻克城堡，解放了县城，杀得日伪军狼狈而逃。就是储八也被一粒子弹打穿耳壳，险乎一命呜呼去见阎王。新四军北上了，储八这个伪团长摇身一变，戴起大帽花，随中央军"收复"了失地。此人出身于西乡的大土豪家庭，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苏北闹红十四军时，他爹与何坤军长决一死战，结果丧命于老虎庄。到了鬼子手下，他为虎作伥，为解仇恨，残杀了上千革命群众。他本名储忠，乡亲们恨他入骨，都称他为龟老八。不过，他因在家中兄弟排行是老八，再加之牵强附会以示效忠党国，除尽八路军新四军的决心，也自称起储八爷来了。

今天，他好不得意！从头顶分开的飞机式头发，梳得油光整齐，黄呢制服烫得平平整整，脚下一双乌黑马靴，闪闪发亮，戴着白手套的手，一只按着腰间马刀，一只指东划西。他不时看看手表，因为七时整，要恭请省剿共督察专员登台讲话；正好借此机会，显耀一下自己"剿匪"功绩，抬高他团长的声威。为了构思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他考虑了整整一天一夜，昨天下午他接省里指示，亲自枪杀了我新四军攻城大队长于仁同志，并割下于仁的头颅，准备临场示众。晚上，还不放心，专门到守城哨兵那里巡视，观察了人头，并部署了此日的行动计划。

却说，这时他看看城门口已有了上百号群众，又迎接了从龟壳小汽车里走出的督察专员，于是，将大盖帽往眉头一压，拉了拉风纪扣，走上临时搭的门板讲台，拖长嗓子嚷道："父老兄弟姐妹们：新四军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再也回不来了。尔今，这里是党国的天下。你们中间有些人迷走歧路，支持过新四军，或讲过过头话，这些，本团长都既往不咎，一律宽待。我们这里是剿共模范区，现在无论何人必须听从保安团命令，三日内务必交出隐藏的新四军伤病员，以及共党地下人员；否则，对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他耀武扬威讲了一通。头一侧，见督察员在吹胡子瞪眼睛，连忙掉转话头，"下面，恭请督察专员训话！"

督察专员披着风披，架着金丝眼镜，登上讲台，清咳了几声，慢条斯理地讲道："诸位，刚才储团长已讲了不少。我还要提醒大家一句。我和共产党交战多年，得此一条教训：剿共必须先治匪首……"他边吹边讲了抓获于仁

同志的经过。讲着讲着，想到于仁牺牲前坚贞不屈，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场面，陡然间，恼羞成怒，对着散散落落的人群，高声叱责道：“今后谁再想闹共产、通新四军，就抬起头，看看这个匪首的头！”

说罢，他一挥手，城堡上一个血污的人头用绳子放下来，吊在城门上。

当下，群众一阵哄动。眼尖的人一看，都不禁诧异起来，胆大的还指指点点，小声笑起来。督察专员不知怎么回事，转身一睃，眼睛越睁越大，半晌才拉了一下站在身旁的储八，悄悄地说：“妈的出事了！人头怎么被换掉？”

储八不看则罢，一看浑身筛糠般抖动起来。原来，那是个龇着金门牙，秃顶稀发的人头。这哪里是什么于仁，竟是保安团团副，一个专门枪杀新四军战俘的杀人魔王！

督察专员用眼恶狠狠地瞪了一下储八，忙命令城堡上的哨兵将人头拉上；然后气怒交加地指着场上群众吼道：“你们有什么可笑？再笑，统统给我抓起来！我们与新四军势不两立，他们不管有多大本领，都逃脱不了我们的掌心！现在训话到此结束！”

就这样，由储八一手策划的训话仪式，狼狈收了场。回到城里，督察专员在县府找来储八，训斥道：“你个大草包！上了共党奸细的当，还蒙在鼓里，再不彻底清查，明天掉脑袋的怕就是你储八了！”储八吓得面如土色，抖抖索索地回报说：“刚才我查问了，听说是新四军的一个女奸细搞的。”督察专员一听，更是火上加油，拍着桌子骂道：“限你24小时内查出，将那个女奸细绑来交我！否则……”储八知道这个“否则”后面的厉害，吓得连连称是，退了出去。

他们讲的“女奸细”是谁？其实，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新四军家属李嫂。李嫂今年二十七八岁，身强体壮。她公爹和生父都丧命于储八刀下。为了报仇雪恨，她送自己的丈夫参加了新四军。部队北撤前，当地民兵队长交给她一个秘密任务：经常将上级领导的指示，送交我地下联络员。她原来在城里帮过三四年佣，人熟地熟，所以很快混进了城。这天晚上，她神不知鬼不觉避过岗哨，去城楼看望在保安团当伙夫的叔公，想探听于仁同志关押的地点。谁知叔公说于仁已牺牲，人头还藏在保安团副孙伯成的屋里，准备翌日悬挂示众。她一听，想到英勇善战的于仁，暗暗流下眼泪，并立即借帮叔公洗衣服的机会，想最后去看于仁同志一下。说来真巧，她悄悄走到孙伯成屋里，孙伯成已醉为烂泥，抱着个酒瓶子呼呼熟睡。这时李嫂新仇旧恨一并而起，从墙旮旯里寻到把大菜刀，嚓嚓两声，把孙伯成砍了。当她告诉叔公时，叔公生怕大祸连累自己，连忙设了计，将孙伯成尸体藏到大沙发下，擦尽血迹，然后人头换人头，由他带着于仁的头颅，趁着茫茫大雾，用长毛竹从东南角滑下了城墙，潜水逃走了。

这一切干得干净利落，连守城的哨兵也无从知道。李嫂虽是女流之辈，却是个比汉子还机智胆大的人。她送走叔公，便奔向了联络站。所以哨兵向储八回报时，讲述了“女奸细”，只是从脚印辨出，根本不知何许人也，再加之老伙夫突然失踪，此事也就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话分两头。却说当晚李嫂听联络员讲，“剿共”督察专员一早要去南门城口训话，她一不做二不休，翌日清晨，便隐蔽在督察专员下榻的烟花楼旅店边。那家伙前脚出门，她后脚便乘虚而入。这烟花楼的被盖原先是包给她浆洗的，所以帐房先生认得她，问道：“李嫂，你穿得这么标致，如今走运啦？”她抖抖身上的花旗袍，笑道：“改嫁了。男人死了，嫁给了东门一家阔少。今天，他有了一根金条，想巴结一个省里的什么大员呢。”

帐房先生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子，他叹口气，悄悄地说：“天变了。四老爹一走，什么乌烟瘴气都来了。住在这里的大官，房间是203室。你有什么细软，暂时放我这里，待他回来，再转交。”他见李嫂吱吱唔唔，忽地又打了主意，“唷，你不相信我，我替你开了锁，你直接放在房内，留个便条怎么样？”李嫂灵机一动，说了声：“这就谢谢老伯了。”

于是，她随帐房先生进了房，从怀里掏出个手绢包包，放在督察专员的枕下，随后说：“老伯，这是走私的勾当，要是大官查问起来，你可装个糊涂，如果随便吐出一句，生命交关啊！”

老头子是个马虎人，听到这句话，也有点心寒，连忙锁好门，连说：“快走！快走！”

却说督察专员在县里开了一天“清剿”布防会议，带着警卫回到旅店已是半夜时分。他躺在床上吸着闷烟，一支接一支，抽到第三支时，没火柴了。

他忽地想到枕下有打火机，哪知一摸，却摸出个手绢包包。打开一看，竟是一粒子弹，还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专员先生：劝你别痴心妄想了，新四军走了，马上还要回来。你再在这里逗留胡搞，明天姑奶奶就送你见阎王！”他一看，联想到城门口换人头的事。找帐房先生一问，说没有人进来过。他忙关起门，连连惊呼：“糟啦！糟啦！传说这里20年前出过什么女侠娘娘，莫非又显灵了！”

他望着子弹，心想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为了保住小命，第二天一早，他就乘车逃往镇江去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几天后，东街出现了标语，西街警察局牌子被砸，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人们为了思念新四军，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及地下党，都把这位不知姓名的新四军家属神化为“女侠娘娘”。连有些不是李嫂干的事，都统统说在女侠娘娘身上，而且越传越神。

储八见督察专员突然不告而走，又听四处议论女侠娘娘，更是惶惶不安。他到处设卡设哨，暗里派便衣盯梢，结果女侠娘娘的人影没见到，自己的侄子却被人用铅丝

勒死，扔进一个厕所里。

他恐慌到极点，只好与刚上任的县长商议。这个县太爷是个相信迷信的人，劝慰他说："你花了八担力气，也抓不到一个什么女共党，看来，怕真是有女侠娘娘。如果她能飞檐走壁，咱们也怕是逃不了啦！"

储八半信半疑说："新四军攻心战厉害，奸民们趁机造谣，说不定到处闹女侠娘娘，还是奸细们搞的。让我再内紧外松侦察几天。"

几天过后，储八傍晚回到家里，他老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祸临头了，我看真有女侠娘娘！"

她领储八走到后院厨房里，案桌上一把匕首插在白纸上，上面写道："女侠娘娘到此，储八再执迷不悟，当心脑袋！"

储八立即查问了岗哨及手下人，都说未见有人来过，他倒抽了口气，不得不相信老婆的话了。不过，他也暗暗庆幸起来：这女侠娘娘一传开，倒是神助我也！督察专员回去，肯定不会再追究那天城门口换人头的事；要追究，我何不顺水推舟，也诌起女侠娘娘来。

他为了扩大影响，又和县长商议了一阵，决定在八月初八这天，公祭女侠娘娘。

说来可笑，那天晌午，城隍庙里鼓乐喧天，香烟缭绕，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正午时刻，县长捧着"女侠娘娘灵位"的木牌，供奉在高高的桌台上。

储八也换了长袍马褂，领着几个遗老遗少正二八经地上祭。他将红顶瓜皮帽端正，嘴里振振有词："女侠娘娘圣体万岁，万万岁！"接着，祷告道："娘娘在天，小的在地。请娘娘慧眼识别：新四军乃邪道歪种，保安团为国为民。祈请娘娘保佑我！"

随后供上整鸡、整鸭、猪头、羊肚。县太爷率全体官员、保安团连排长以上军官，一齐下跪拜祭。

他们哪里想到，这看热闹的人群中，有我地下党员，李嫂也在其中。这时，李嫂心头乐滋滋地想：我一个人能有多大能量？还不都是地下党和一心向往新四军的群众，吓得敌人心颤肉跳，打破了他们"清剿"的行动计划，杀了他们的威风。

这时，西边响起了震天的爆竹声。李嫂大叫一声："女侠娘娘来了！"这一叫非同小可，立时四处呼应，惊得附近看管俘虏拘留所哨兵都抱头鼠窜。几个地下党同志趁机闯了进去，将关押的同志营救出来。

储八听到勤务兵的报告，方知上了当，正欲命令打手追缉时，李嫂趁着一片混乱，拔出手枪，"砰"的一下，结束了储八的狗命。随后李嫂翻过墙头，当她急匆匆跳下时，万万没想到城隍庙后的河水太深，一个跟头栽下去被乱草缠住，再也没爬上来。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就这样默默地为地下工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不过，这一来，大家都将她看成真是女侠娘娘了。县太爷惊叹不已，连夜张贴了安民告示，并言明自己对女侠娘娘的一片忠心。地下党也趁机加强活动起来，从此，这个"清剿"模范区成了我们的半个天下。

连老百姓的牌儿经中都唱道："女侠娘娘，心明眼亮，专杀恶魔，保护善良，和四老爹一模一样……"

地下党为了缅怀李嫂，他们也到城隍庙，公然对着"女侠娘娘"奠祭英灵。这事流传了几年，直到第二次解放，大多数群众才解了谜，将李嫂的遗骨安葬到烈士陵园里。据说，1950年，陈毅市长还从上海写了封信来，题赠道："当今女侠，留芳人间。不是天神，胜似天神！"

（选自《大江南北》91年1期，作者：徐烈础）

"一枝梅"智擒伪区长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将"清乡"的重点转移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江淮平原的抗日反"清乡"斗争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新四军苏中四分区领导下的南通县委组建的一支短枪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短枪队出没于敌人心脏，接连进行了40多次战斗，除霸灭害，神出鬼没，震慑了敌人，振奋了人民。化名"一支梅"的短枪队长的战斗故事，在当地已成为传奇，流传至今。

继"一枝梅"奇袭天生港之后，五月中旬的一天，"一支梅"又接到县委通知：尽快除掉四甲坝汉奸伪区长朱崇汉。

"一枝梅"对朱崇汉的罪行和狡猾早有所闻。四甲坝是南通的大集镇，伪区政府所在地，商业繁华、交通发达，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朱崇汉到此当伪区长后，亲自带领日伪军下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这一带老百姓一提到朱崇汉，牙都咬得格叭响。短枪队员早已摩拳擦掌，准备除害。

"一枝梅"接到任务后，已定下不能硬拿，只能智擒的作战方案。

回到驻地，"一枝梅"哼着小曲，踱着方步，盘算着行动方案。队员们熟悉队长的心思，自动聚拢来，献计献策，方案很快定下来。当晚，"一枝梅"向余中区区委书记倪少山同志联系，定下了作战方案，并得到了支持，用区中队配合行动。

暗 探 行 踪

第二天上午，太阳当头。"一枝梅"独自身穿绸长衫，头戴礼帽，脚着雪白的双线袜子和皮底直贡呢黑鞋，手中还握块丝光方帕，一副富人派头。"一枝梅"专拣四甲坝的大店、名店逛。酒楼、茶馆逛遍，已是下午，没有找到朱崇汉的踪迹。他心中暗暗着急，决定到朱崇汉为讨日军欢心

而新开的“慰安院”去看看。“慰安院”是专供日军、地方要人寻欢作乐的场所，没点身份的人别想入内。“一枝梅”心一横，抬脚跨入大院，眼光在厅堂和各房间里扫视了一圈：里面盘杯狼藉，鬼子、妓女们混作一团，却不见朱崇汉。“干什么？”几个鬼子见生人进来，警觉地问。“一枝梅”含笑点点头，缓缓退了出去。

“朱崇汉，你这只狐狸，白天无处觅，可晚上你总要找个窝躺下的。”“一枝梅”调整了行动方案，朝镇上的照相馆走去。

照相馆老板是短枪队的情报员。“一枝梅”昨天已作了布置，要摸清这只老狐狸的窠在哪里？

照相馆老板从另一个情报员那里得知明天晚上一家老板要请朱崇汉赴宴。朱崇汉这家伙喝酒后，一般是到“老同泰”酒坊过夜的。

得了这一重要情报，“一枝梅”急着赶回去，可是天色已晚，集镇上的栅栏门已关闭，出不去。“一枝梅”心急火燎地和老板到街上兜了一圈。当走到西街口时，看见栅栏门里边一个伪军坐在板凳上，跷着二郎腿，步枪靠在身边，吱吱嘎嘎地拉着京胡，哼哼呀呀地唱着小曲。“一枝梅”想从这个伪军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就上前几步捧了一句：“老总，拉得一手好胡琴啊！”伪军一听高兴了，眼睛瞄着“一枝梅”，说“你会唱，来一段吧。”“一枝梅”爽快地应道：“我唱一段‘坐宫’吧。”伪军摇头晃脑地拉了一段过门儿，“一支梅”即唱起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伪军以为遇到知音，大为得意，拉得越发起劲。老板趁机喝彩：“一唱一拉，都是好手。”接着指指“一枝梅”说：“老总，我亲戚因家中有人生急病，今晚要出去一下。”伪军正在兴头上，说：“再唱一段走。”“一枝梅”放开嗓门又唱一段“空城计”。伪军这才打开栅栏门，客客气气地放“一枝梅”出去了西岗哨。

酒 坊 设 伏

第二天晚上，九点已过，“一枝梅”带领九名队员来到四甲坝。夜色朦胧，四野一片寂静，敌碉堡象个黑魔窥视着短枪队员，还不时射出一道道手电筒光。短枪队员谨慎而又敏捷地穿过麦田，避开电光，贴着民宅摸到“老同泰”酒坊后门左侧数十米处。他们四顾无人，轻轻地搬开鹿砦，把铁丝网剪开一个大口子，鱼贯地钻了进去；留下两个队员在外接应。

一会儿，到了“老同泰”酒坊门口，按计划分成两个小组，“一枝梅”带着小秦和小王去叫门打酒。店堂伙计不耐烦地说：

“天太晚了，明天来吧！”

“能等明天，今天就不来了，快开门！”“一枝梅”加重了语气。

伙计一听，来头不小，不敢怠慢，忙将店门打开。短枪队员一拥而进，用枪顶着伙计：“不许吭声，快关上门。”伙计关了门。短枪队员飞速冲进后院，到几间房里一搜，朱崇汉不在。莫不是这家伙今晚又换了地方？要真是这样，错过良机，以后就费手脚了，大家有点急。

“一枝梅”把酒店老板和伙计集中到一间屋里，耐心地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会牵连你们的。汉奸人人可杀，难道留着他害自己人？我们是找朱崇汉，他今晚来住宿吗？”老板只是发抖，不敢回答。其他几个伙计都说不知道。短枪队员只好将老板分开单独盘问，还是没结果。“一枝梅”正在暗暗焦急，忽见旁边小房门口，有个人影闪了一下，他立即赶去一看，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枝梅”上前查问，才知道她是老板的女儿。经过耐心说服，晓以抗日的道理，她才轻轻吐了一句：“区长说了，今晚要来住的，但不知来不来。”

这一问“一枝梅”心里有了底，决心坐等。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到半夜时分，还不见朱崇汉的踪影。短枪队员不禁又急起来，莫非这家伙心虚，临时又变卦？正在这时，街上一阵咯吱咯吱的皮鞋声由远而近。短枪队员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屏住呼吸，凝神细听。街上脚步杂沓，估计有一二十人。响声到门前戛然而止。

“瓮 中 捉 鳖

“开门哪！”粗嗓声割破了沉寂的夜。

“一枝梅”朝门一指，伙计会意连忙开门。门一开，只见一个圆胖的家伙进了门，他就是朱崇汉。他转身对门外的人说：“好啦，你们回去吧。”只有一个塌鼻梁的保甲指导员跟在朱崇汉后面进了店门。

朱崇汉做梦也没有想到屋里埋伏着新四军。他酒气熏天，打着哈欠，挺着肚皮，一摇一晃朝后院走去，打开一间房门进去了。“一枝梅”与一短枪队员紧跟在后，趁朱崇汉还未点灯时，敏捷地跟着闪进屋内。朱崇汉懒洋洋地把驳壳枪卸下，“一枝梅”悄悄地接了过去。塌鼻梁取下枪随手挂在床头上，短枪队员立即拿了过去。朱崇汉擦亮火柴点好灯，转过身来时，一声轻喝“不要动”，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他们。朱崇汉一惊，飞快地从腰间掏出一件乌黑闪亮的东西。“一枝梅”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向上一托。朱崇汉手腕一转，把东西扔到了窗外。

朱崇汉知道今天碰到了新四军短枪队，浑身发抖，他哀求说：“我是区分所办事员啊，没有做什么坏事，饶我一命吧，以后再也不给日本人办事了。”

这时，另一个短枪队员从窗外拣回那件东西。原来是一个新牛皮夹子，里面装着朱崇汉的身份证。“一枝梅”冷笑一声说：“朱区长是四甲坝的大名人，谁人不知，何必冒充办事员！识相的老实点，跟我们走！”

朱崇汉一听要带他走，吓得往地上一趴，死赖着不肯起来。"一枝梅"他们立即用绳子把他反捆结实，嘴里塞上毛巾。塌鼻梁也同样被捆绑好。

月亮升高了。短枪队员们抓住这两个家伙的肩膀，连拖带拽向外带，悄悄地从酒坊的后门撤出。余中区队正在那里接应短枪队员们。

第二天，四甲坝轰动起来，群众兴高采烈地说："好啦，新四军来了天兵天将，神不知鬼不觉把朱崇汉这个狗杂种活捉了！""谁敢当汉奸，朱崇汉就是他的下场！"

"一枝梅"和他的队员们又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了。

（选自《大江南北》90年2期，作者：杨勇伟）

"李向阳"的原型郭兴

在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50年代起人们就传诵着一位英雄的名字——《平原游击队》的主人公李向阳，但其生活原型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威振敌胆的著名战斗英雄，在抗日战争中神出鬼没袭击日伪军、惩除汉奸恶霸的河南辉县武工队长郭兴（离休前任北疆军区司令员）。如今，这位传奇人物虽已年纪六十有六，依然显得英气勃勃，不失风采，难怪当年太行五分区皮定均司令一眼就认准了他！

奉命组织武工队

1942年初的某一天，太行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路过辉北县，看到县公安队长郭兴人虽长得小却挺神气，就拍拍他的后脑勺说："小鬼，你是哪里人啊？"

"辉县的。"郭兴立正答道。

"哦，我正要到你们那里去，你愿意跟我回去吗？"

"不去，我还在这儿打日本呢！"

"到你家那里，你人熟地熟，打日本不更有利吗？"

一听说打日本，小郭兴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一年前八路军的一支队伍路过郭兴他们村时，他背着父母去当兵，部队首长看他那1.5米的小个儿，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16岁的小伙子，执意不收他。部队出发时，他就跟在后边走，首长发现他后劝他回去，他点了点头，可一转眼，又钻进了队伍里。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到了辉北县，首长就把他交给了县政府。从此，他便成了公安局长的通讯员。不久，公安局要组织公安队，因郭兴上过4年学，局长就让这小知识分子去登记。当地有种说法：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前来登记的人寥寥无几，郭兴就挨门挨户去说服、动员，终于组织起一支十几人的公安队。公安局长看他是块材料，就让他当了公安队长，但郭兴依然做着他的八路梦。此时此刻，郭兴若真的随皮司令回去，或许还能当上八路呢！

第二天，郭兴跟着皮司令一行冒着严寒，走了百余里，赶到了林县。皮司令说："小郭，你回去组织个武工队吧？"

"什么叫武工队？"他不解地问。

"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抗日。"

"人呢？"

皮司令说："你自去组织。我再另派3个人给你，帮你组织。"

"枪呢？"

皮司令风趣地说："哪有枪？我们八路军的枪吗：哈哈！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那一支枪也没有，咋行？"郭兴歪着头，看着皮司令："把你的枪给我吧？"皮司令还真的给了他一支短枪和两发半子弹（实际是3发，但1发可能打不响），又把通讯员的枪也拿来给了郭兴。

这四个人、两支枪、两发半子弹，竟使小郭兴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要比起他组织公安队那会儿，不知要好多少倍！皮司令看着郭兴，拍拍身边的凳子说："小郭，你回去后，一是要在一年内组织起一支不超过50人的队伍（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标）；二是一年内消灭100个伪军、5个日本兵，缴获100支步枪、两挺机枪。"

"这么重的任务啊？"郭兴脱口而出。

"当兵嘛，就是要勇挑重担啊！"

听到当兵二字，郭兴浑身像触电一样，看了看身上的军装，然后向皮司令深深地鞠了一躬，手一挥，和队友们出发了。

借　枪

历史赋予英雄重任往往是在危难之秋。郭兴组织武工队之时，正是国民党军队配合日军进行"清乡"，掀起反共高潮之日。在逆境中，郭兴和3个队友冒着生命危险，到穷苦人家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每到一家都是缸满、地净、柴成堆，在他们的感召下，穷苦弟兄们纷纷加入武工队。队员有了，困难也接踵而至。能让大家赤手空拳跟敌人干吗？为了枪，郭兴常常夜不能寐。经过与同志们反复研究，他们决定到当地大地主贾金潭家"借枪"。

贾金潭家墙高院大，门口站着家丁，郭兴与队友们如何才能进得贾家大门呢？忽然，郭兴脚一跺，手一拍："嗨！有了。"

第二天，郭兴化装成学生，以贾府少爷同学的名义进了贾府。乘仆人去通知主人的机会，郭兴迅速观察地形，以找出自己的退路。贾宅二层楼房，雕梁画栋，建筑结构十分严谨，如果不走大门，只有从楼上跳到地主家的侧院

……没容他多想，仆人已站在眼前，并告之老爷暂不见客。郭兴自以为穿着很讲究，没想到仆人还是把他安排到了长工房。

夜里，郭兴听着长工们在酣睡，自己却不敢入眠。他看着长工屋已经腐朽不堪的木格子窗户，。一堆的铁锹、锄头，倘出意外还能应付一阵子。就这样，他似睡非睡地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

翌日快吃午饭时，郭兴见贾金潭还没有接待他的意思，就拿出阔学生的派头向仆人告辞。贾金潭一听他要走，才把他叫去。只见客厅内一位胖胖的白胡子老头，身着闪闪发亮的绸衫坐在正面，郭兴上前施礼。

"什么事呀?"

郭兴同他寒暄一阵后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抗日，我已经不上学了。今天是八路军让我来借枪哩!"

老地主一听，紧蹙着眉头说："我——家没有枪。"

"你有家兵，怎么没有枪?要是不肯借，就跟我走一趟吧!"郭兴的枪已对准了老地主。

贾金潭一看动真格的了，马上变换口气说："别，别。等几天我一定设法弄几支枪，给你们送去。"

"几支?"郭兴用锐利的目光逼着他。

"3支。"

初战告捷。郭兴给老地主安排了送枪地点，并警告他说："抗日是当务之急，如果逾期不送，以汉奸论处!"老地主无可奈何地连连点头。

智杀日本兵

不知不觉，郭兴回到家乡已8个多月，武工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到40余人，消灭的伪军已有100多人，并缴获步枪110多支，机枪两挺，但消灭5个日军的任务尚未完成。为此，他茶饭无味，睡觉不香。

当地日本兵一行动就是百十人，还有伪军陪同，三五人一伙的很少见到，一时令人无从下手。郭兴横下一条心："要进城，杀他几个!"然而困难很多：化装成老百姓，枪带不进去；化装成伪军，经不起城门口站岗的盘问，恐怕进不了城就接上火了；化装成日本人倒是最好的途径，可必须尽快学会些日军用语。分区领导听了他的汇报，立即同意。

当时，太行分区内有几个被俘的日方翻译，经教育后开始为我军工作，他们便成了郭兴的老师。郭兴起早贪黑地学习，虚心向翻译请教，两个月就熟练地掌握了简单的日常军事用语，这使郭兴如虎添翼。

在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开始行动。郭兴化装成日军小队长，骑着高头大马，和几个队友威风凛凛地出发了。他们顺利地通过了西关城门，大模大样地进了城。城里的日本兵一看郭兴是小队长的打扮，便忙敬礼，却冷不防遭到了郭兴他们的袭击。从西关到东关仅20分钟，武工队就把整个县城搞得人仰马翻。等日本人醒过劲儿来时，武工队员早已无影无踪了。从此，日军一听到武工队就胆颤心惊，郭兴的名字也在豫北平原传开了。

有趣的是，那次袭击过后，队员们谁也说不清打死打伤多少日本兵。郭兴说："我们宁可少算不能多算。"回忆结果是：日军死4伤3，伪军死伤不算。当向皮司令汇报后，皮司令拍拍郭兴的肩膀笑着说："不对!你们打死日军是3个，伤的是4个。"

"我们大家回忆了半天，才算出的数，你怎么知道不对?"郭兴惊疑地问。

"地下党组织汇报的。"皮司令指着郭兴满意地说："小郭!你们干得好!你们这也算圆满完成任务了。"郭兴激动得唰地一下立正，给皮司令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针锋相对

1943年，分区领导指示郭兴：要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化整为零，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端据点，炸碉堡，除汉奸，抓舌头，取情报，在敌人心脏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把敌占区搞得地覆天翻。敌人为了报复，惊恐地注视着他们的行踪，并把屠刀伸向郭兴的家人。

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整个大地像被一块黑色的幕布遮盖得严严实实。辉县高庄南边的金章村，万籁俱静。

突然，几声狗吠传来，郭兴的父母更比别家多了几分忧恐。郭兴的父亲稍向郭母交待几句，跳墙走了。刹那间，郭家的门被日军砸开，房子被点燃了，顿时火光冲天。郭兴的母亲及两个不满10岁的弟弟，被日本兵抓走了。

在狱中，郭兴的母亲受尽了伪军种种酷刑，但她断然拒绝敌人要她劝儿子写降书的要求。为了从精神上折磨她，丧心病狂的伪军头目把郭兴的两个弟弟吊在梁上毒打，儿子的呼号声深深刺痛着母亲的心。她咬咬嘴唇，双目怒视痛骂敌人："汉奸!走狗!卖国贼……"敌人无奈，就把这遍体鳞伤的母子3人投进牢里，时不时的提审毒打。

得知这一切，血气方刚的武工队员们义愤填膺。他们挥舞着拳头，吼着要去砸开牢门："队长，快下命令吧!那也是我们的母亲和兄弟啊!"郭兴深情地望着战友："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可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强攻……"

一天夜里，武工队员们把伪军头目的家属捉了20多口，押解到辉北县抗日政府公安局，对他们当中罪大恶极者给予了惩罚，并让伪队长的侄子回去送信，警告其不得对武工队的家属胡作非为。果然，敌人再也不敢随意残害

郭兴的家人了。

双方相互押着人质，对峙了一个多月，敌人着急了。伪县长关朝鲜找郭兴的堂兄给他送信，信中称："下边人对你的母亲、弟弟不好，我是不知道的，请你原谅。我已教训过下属，并将你家人安排在西会馆，望你尽快下山。如能下山，我担保你任县保安团长。"郭兴看完信后，当即回敬一信说："你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真乃民族败类！"伪县长并不甘心，又令其女儿利用曾与郭兴是同学关系给郭兴写信说："我父让你当保安团长，你若能下山，我愿与你结婚。若不信，我可先与你结婚，尔后再下山……"郭兴越看越气，痛骂其无耻。关家父女仍未死心，再次让郭兴的堂兄去送信，并带去了贵重的礼物和美女的照片。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敌人见诱降不成，便改换招数。一日夜里，天阴沉沉的，敌人认为郭兴不会出动，突然出兵把他住的村子围得水泄不通。一阵疯狂的搜捕后，才知武工队已获知情报转移了，扑了空的敌人顿时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当郭兴得知被逼给敌人带路的竟是自己那位曾 3 次来送信的堂兄时，当天就把他捉住处决了。

火烧敌粮仓

1942 年，河南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许多地方颗粒不收，成千上万的百姓逃荒要饭，在死亡线上挣扎。翌年，年成好转，人们却眼巴巴地望着血汗换来的粮食，装进了敌人的仓库。

在武工队员们摩拳擦掌之际，盼到了上级"不让敌人动用一粒粮食"的指示。他们决定烧掉敌粮仓。没有汽油，队员们就分头到杂货铺买煤油……

那天，一辆马车载着麦秸和伪装成 6 个"皇军"的武工队员，直奔敌仓库。门口站岗的伪军不让进，车上的"皇军小队长"边骂"八格呀噜"边从车上跳下来，给了伪军一记耳光，其他的"皇军"顺手用刺刀将伪军扎翻在地，冲进仓库。

库房门口，有几个苦力在干活，"小队长"叽哩哇啦一阵，"翻译"说："太君让你们集合！"苦力们赶快排成一队。"小队长"又叽哩哇啦一阵，"翻译"指着旁边的房子道："太君说，让你们进去信息。"把苦力们关进房后，武工队员们便闯进仓库，把手榴弹插在麻袋中间，将浇上煤油的麦秸遍布粮袋周围。蓦然间，粮库上空火焰升腾，浓烟滚滚。

当他们听着"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欢呼着向外跑时，迎面跑来了救火的真日本兵。"日本人都向火海冲着救火，我们不能这么外逃。"郭兴怕敌人怀疑，忙指示队友分散撤退，自己也跳墙进了一户人家。

这家的老人眼看跳进来一位皇军，不由一怔。郭兴知道老百姓对武工队一往情深，赶忙说明自己是武工队员，请求与那老人换衣服。那老人把衣服脱给郭兴后，穿着裤头忙往外跑。"这么冷的天，咋会穿裤头往外跑？"郭兴一把将他拉回堂屋，抬眼一看，墙上挂的正是伪军大队长秦守英的照片！真悬哪！原来那老头子是秦守英的父亲，急于脱身去给日本人报信儿。郭兴毫不迟疑，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这就是《平原游击队》电影中李向阳打死的那个给敌人送信的地主老头儿。

挺身而出

1943 年夏天，国内形式十分严峻。国民党搞所谓的"曲线救国"，投敌军队数不胜数。他们与日军狼狈为奸，拼命扫荡我太行山区，血洗村庄已司空见惯。郭兴的武工队此时为保存实力，暂蔽山中，敌人严密封锁山林，使武工队困难到了极点。三伏盛夏，林中郁闷，酷热，蚊叮虫咬，队员们三天未见一粒粮食，只是煮点毛桃充饥，有的胃病发作吐酸水，有的拉肚子，有的发高烧，个个像旱地里的苗。19 岁的郭兴队长百感交集，他怎能看着队员们这样承受煎熬？

一天深夜，郭兴带两个队员去找地下党关系，在林中摸索时拔掉了敌人的两个暗哨，后半夜到了石门店村。天蒙蒙亮，他们正欲返回，却发现该村已被敌人包围，只好分别躲藏起来。

敌人把 100 多个老乡赶到场院上，用机枪进行威逼。乡亲们怒目相对，一言不发。日军先把武工队员张锁的父亲从人群中拉出来，毒打一顿，并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膛说："你的知道的，八路、粮食、武工队哪里的有？""你们这些狗杂种。"张大伯怒不可遏地说，"啥我都知道，可半点也不会告诉你们！"敌人恼羞成怒，一刀刺死了张大伯。

郭兴在场院边的草堆中，目睹张大伯倒在血泊中，肝肠欲断，心如刀绞。这时，一日酋指着机枪说："不说，统统地死啦死啦的！"乡亲们依然怒目相对，一片沉寂。眼看日酋要给机枪手下命令，郭兴一跃而出，高喝一声："不要动他们！"他朝太行山的"老爷顶"上一指："你们要的都在上面，我带你们去。"在场的群众都惊呆了。

"你是八路的？"日酋瞪着眼问。"我是放牛的。"郭兴原以为在场的敌人必有认识他的，跳出来不死即伤，为了群众是豁出去了。此时，他反倒松了口气。一老乡也附和说："他整天在山上放牛，啥都知道。"

"你的知道，说谎，死啦死啦的！"郭兴轻蔑地看着那个说话的日酋，颇不以为然。

郭兴领着日军顺"老爷梯"往上爬。1 米来宽的老爷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且怪石嶙峋。走到"八只眼"，郭兴面对这块生有八个洞的大石头，对敌人说："喂——大家要小心，'八只眼'到了。上'八只眼'脚步要踩准，上去后，要抓住拐弯的大石头，不然会掉下去！"本来就心惊胆颤的日军一听，更是望而生畏。郭兴先上去后，

蹲在90°转弯的石头上。翻译跟着往上爬，刚扒住转弯的石头，郭兴一脚把他送回了“老家”。由于山弯弯度大，紧跟翻译的那个日本兵根本不知前边的翻译送了命，仍继续糊里糊涂地往上爬，郭兴照例给他一掌。不料，他的钢盔和枪，碰在山崖上“叮叮咣咣”一阵乱响，刹时间，“老爷梯”上嗷嗷乱叫，趴在“八只眼”上的日本兵急忙下退，郭兴乘机又一脚踢下山去一个，随手搬起一块石头，顺“八只眼”向下一滚，然后拔腿就跑。

郭兴机智地脱险了，日本兵却撂下了几条命。

地雷炸机车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与越南驻军联成一线，发动了大陆交通战。由于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日军很快就打通了平汉路，河南人民陷入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为配合大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武工队必须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断绝敌人的物资来源。为此，郭兴召集全体队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有的说炸机车，有的说炸铁路，有的说炸桥梁，可当时只有手榴弹和地雷，连炸药都没有。讨论了一个下午也未拿出个方案。

“不管怎么说，我得先到铁路边和东站看看去！”郭兴边说边穿上伪警察的衣服。到了潞王坟车站，见一个工人正在检修一列货车，郭兴便试探着问：“师傅，你现在检查，啥时候开车呢？那师傅看看在不远处站岗的伪军，答了声：“明儿早发车。”郭兴又追问：“干啥用去？”那师傅不耐烦地回答：“给日军运货呗！”两个站岗的伪军看郭兴是警察，竟也未多心。

当晚10点多钟，郭兴带3个队员、3颗地雷，乘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潞王坟车站前进。他安排两个队员在站外警戒，自己和老搭挡申秀林爬过铁丝网。一看货车还在，申秀林拉拉郭兴的衣裳角说：“队长，让我去吧！”

“不！你在这儿掩护我，我下午已经瞧了一圈儿了。”郭兴拿着两个地雷，看到车站两头灯光下两个伪军都背风朝南站着跺脚，有一个正好瞧得见郭兴。郭兴借一大树作掩护，略一思索，就绕过站旁的树丛，到了站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门口。他装作站台工作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过站台，跳到机车旁边的道轨边。

郭兴闪在两节车厢之间看看没什么动静，迅速把两颗地雷放到车轮旁边的一块空地方，将雷上的线拉出来拴在轮子上，货车一动雷就会响，即使炸坏个轮子也得修半天。他刚离开货车，猛听见伪军远远地问：“干什么的？”

“车上的。”郭兴镇定地回答，伪军却信以为真。

郭兴他们离开货车2里许，担心伪军发现地雷，于是就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看动静。一个多小时后仍无声无息，他们正在焦急时，忽然传来了“呜——呜——”的汽笛声，接着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巨响，敌人机车被炸毁了。

（选自《纵横》91年6期，作者：马月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由来

1943年秋，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宣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延安的《解放日报》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题发表社论，驳斥了蒋介石的无耻谰言。音乐工作者火星读了这篇社论，立即以社论标题为题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道歌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人民群众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关系，加之节秦坚定有力，旋律流畅，深受群众喜爱，很快从延安传遍了整个解放区，传遍了全中国。

（摘自《党史博采》89年7期，左宝供稿）

汪伪强行推销汪精卫像章的丑事

汪伪政府为了宣扬汪精卫“提倡和平，反共建国”的“丰功伟绩”，设计制作了汪精卫肖像纪念章。肖像下端印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为了便于推销，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批文，规定每枚不得超过法币2角。伪行政院宣传部还专门成立了“汪主席肖像纪念章总销处”。

像章总销处送交2万枚给伪南京市教育局长杨九鸣，要求推销。伪教育局按学生数额分发像章给各中小学，校方每枚可得手续费2分。然学生都以把卖国贼像章挂在胸前为耻，以种种理由拒绝购买。如砂踯巷小学学生以价格昂贵为由拒绝购买。中学生们则讽刺说：“汪主席只值2毛钱。”有的小学为完成任务用诳骗手段推销像章，跟学生讲须交2角钱买校徽，无校徽不许进校门；待学生缴费后所发都是汪精卫像章。汉口路等小学甚至对拒购像章的学生实行体罚。这些，引起家长普遍不满。一部分校长联合赴伪教育局呈述难以销售情形，要求减价至每枚1角。《南京新报》刊登一则新闻《学生家长要求汪主席像章减价》，文章称：“各贫贱学生家长以学费尚且无力担负，此项纪念章每枚二角殊感无力购买，拟联呈高市长要求减价。”伪教育局长在此压力下，呈报伪南京市长高冠吾，高又呈文伪行政院宣传部，伪宣传部像章总销处派员到伪市教育局，只答应减价至每枚1.5角，要伪教育局召开校长谈话会做工作，像章虽减价至1.5角，仍很难推销。全市中小学连骗带压只推销了4千多枚。伪教育局眼看无法完成任务，只得再层层呈文上报至汪精卫，婉言说明“此等情形不但学生会认为学校藉汪主席之名敛财，且易引起青年轻视汪主席之观念。”伪行政院这才不得不下令制止强卖。

（黄慧英）

一场伪“伪币”闹剧

1943 年的一天，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忽然宣称其 10 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伪币在市场上流通，该行不予承认。一时市场混乱，人心惶惶，人们在金钱交接中，查有所谓伪币，即予拒收，谁手中留有此项伪币，用不出去，只好自认破财，无理可诉。

被宣布为“伪币”的票面为 10 元的储备券，正面纹样以蓝色为主，其印刷质量和所谓非伪币的储备券纤毫不差，谁也查不出有半点伪造的痕迹。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的一个小点有些斜，票面上的红色号码字，在一排阿拉伯数码字的前面，有一字母“B”，末尾有字母“S”，就是说凡号码为“B”字头“S”尾的 10 元票面的储备券就是伪币。

其实此项所谓伪币，与不被认做伪币的储备券，出自同一娘胎；哪有作伪的会在票面上印出统一的编号，让人易于识别呢？当然，受坑害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这时，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这批所谓伪币，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日本印刷的，只因海运途中，船被美机炸沉，后由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捞起，再交由当时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抛到市面上，大发横财的。

事发以后，日本军方对李士群大为恼火。后来，据说李在日军赐宴中被毒毙，一些前往苏州与李遗体告别的汉奸们，归来后伸伸舌头说：“李的尸体严重失水，耳朵干薄像块纸片”云云。李士群的死因到底与此有否联系，至今未明。

（惠　龄）

黄绍竑的一次“精神讲话”

1943 年秋，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巡视浙西抗日前沿的政治军事的高岭堡垒——天目山。那年，我在山中的浙西临中高中部读书。校中绝大多数师生是从敌占区杭嘉湖一带逃亡出来的。我们以庙宇作课堂，以密林作屏障，吃的是杂粮竹笋，住的是竹棚茅房，生活虽极艰苦，救国意志顽强。一天，学校出了布告，通知全校师生要服装整齐（当时，学生都穿发给的灰布军装），精神要饱满，准备欢迎黄主席来校作“精神讲话”。

第二天一早，全校师生集中在大庙前的空地上。我们心想，这位三星上将来时必须是全副戎装，身佩勋章，昂首阔步，目光炯炯的威武神态，真是难得看到的大人物了。同学们挺胸肃立，鸦雀无声地等待着。这时，忽听到体育老师的哨子高声一响，并喊了个立正。方校长已陪着黄主席来了。我们斜着眼偷看着，但总看不到那位雄赳赳的抗日将军。等到一上竹架讲台，校长高声介绍后，才知道将军穿的却是一身普通公务员装，个子挺魁梧，而神色却很温和，只带了一个勤务兵。黄主席一开口就笑嘻嘻地解释道：“贵校要我来作‘精神讲话’，我看对同学们不很适合，改个名词叫‘精神鼓励’吧！他们都是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冒险从沦陷区逃到自由区来求学，这就了不起呀！”接着他纵谈抢救陷区青年与战地办校问题。他一再赞扬我们爱国心重，说：“你们虽然一副文质彬彬的素质，但你们充满一腔豪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有所成，立志报国。”并说这是“超人青年智勇双全的特性”。他还谐趣地比喻：“你们是高山青年老虎，老虎被困饿了是要吃人的。日寇敢爬上山来，就把它吃个精光（满场师生情绪活跃）。所以我们要抢救陷区的青年老虎，增强抗日力量。”黄绍竑谈到战地办校时，他说：“学生成绩的好坏，与学校物质条件有关。我看贵校物质条件既差又不差，学校聘来不少名师嘛。所谓物质条件，不单指课堂膳堂，图书仪器之类，连校长教师也属于物质，不过他们是活的物质，是人嘛，一种高等动物的物质（满场师生大笑起来）。名师的脑筋和教育方法好，就代替了部分图书仪器。”黄绍竑的讲话因谈笑风生，轻松随意，其中有些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师生听了，也毫不介意。最后，黄绍竑讲到浙西现有几个师的广西兵。他说：“广西兵是怕水不怕山的，天目山虽高，广西兵是爬山虎，行军作战，如履平地。我已下了死命令，如果敌人进攻天目山，一定要不惜牺牲守住天目山。否则，不要来见我。广西兵英勇善战的传统不能丢失，我们要保卫天目山，保卫青年学生安全地、专心地在这里读书，造就出大批人才来。”他还念了自作《贺新凉》词中的句子：“岭上千松行列壮，似生成，执戟资多士。”他这次巡视天目山，显得自信乐观。

黄绍竑是保定军校早期毕业生，是军队中的儒将，他的诗词韬略，在当时是有名的。

（江　东）

“应老板”的几桩趣事

所谓“应老板”，即是我国电影戏剧界赫赫有名的应云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戏剧界，40 岁出头的应云卫就以戏剧界的一员老将而闻名遐迩。影剧界的大多数人在论及应云卫对影剧界的贡献时，都由衷地冠以“中国电影戏剧运动的著名组织者和开拓者”，“我国艺坛上优秀的戏剧电影导演”等桂冠。由于应云卫是在三四十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影剧艺术家和经纪人，所以他既有艺术的良知，又难免有一些旧的作风。这里讲几件趣事：

从"买办"走向"团长"

应云卫祖籍浙江慈溪，1904 年出生于上海，走出学校大门后所干的第一桩工作是在上海的一家洋行里作买办。20 年代初，当电影戏剧这门新兴的艺术刚刚在古老的中国大地萌芽的时候，他就毅然舍弃已经拥有的优裕生活，而投身于这广阔的艺术领域。在初期的话剧运动中，应云卫也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演员，靠其艺术的灵感男扮女装地演了《风骚撒旦》而且一炮打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应云卫"的大名也开始为观众所熟悉和喜欢。这以后不久，他就开始由演员转向导演。"现实剧社"、"电通公司"、"明星二厂"、"上海业余剧社"……等早期上海最为著名的影剧团体，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1933 年导演的戏剧《怒吼吧，中国！》的创纪录演出，1934 年导演的《桃李劫》和 1936 年导演的《生死同心》等影片在当时都产生了轰动效应。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云卫即以其热血之躯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以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四分队总队长的身份，率领该队全体队员沿沪宁线一面撤退，一面作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这当中，他们于战火之中排演了《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蜚声中外的名剧，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应云卫等人辗转抵达重庆，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电影戏剧生涯。

应云卫拥有相当丰富的经营、组织能力，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卓有成效的交际才能，而所有这些，在当时陪都的电影戏剧界中是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的。因此，在陪都电影戏剧界，提起"老应"、"应老板"来，同行们没有一个人不竖起大拇指，说他能干的。所以到了 1941 年夏，阳翰笙奉周恩来之命筹组"中华剧艺社"时，在考虑该社负责人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位交际面广、组织能力强，又善于应付、敢于斗争的"应老板"，而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和对进步文艺有着赤胆忠心的应云卫，也就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的职位和高薪，拿着阳翰笙给他的 3000 元筹办费，毅然决然地担起了筹组"中华剧艺社"的重任。时值"皖南事变"不久，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整个重庆，国民党的新闻戏剧检查更是严丝合缝。但应云卫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更没有屈服和退却，而是凭着他在电影戏剧界的崇高威望，凭着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套对付恶势力的"绝招"，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压力，很快便通过了审查，办理了登记，这年 10 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间艺术团体面目出现的"中华剧艺社"便正式宣告成立，并以后方唯一大剧团的姿态，肩负起了领导、推动国统区戏剧运动向进步方向发展的重担。从此之后，应云卫除了"老应"、"应老板"的头冠以外，又多了一个"应团长"的称号，在艺术追求上完成了买办——演员——导演——团长(戏剧运动领导人)的历史过程。

经久耐用的"万应膏"

在抗战时期的陪都电影戏剧圈里，别人拉不上的关系，应老板能一帆风顺地拉上；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汽车司机的喇叭，他能够很快地弄来作舞台效果；各式各样的审查老爷，会被他一阵吃喝玩乐、东搅西缠之后，痛痛快快地把剧本通过。……总之，无论多么复杂的关系，他都可以利用；多么严肃的场合，他都可以进入。用"随机应变，八面玲珑"这八个字，完全可以概括出他那丰富的斗争手腕和超常的组织应变能力。

在这些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应云卫自有一副与之相周旋的"万应膏"，这就是"满脸笑容拍肩膀"。它是应云卫用得最久、最广而又自认为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的一个习惯。在一般情况下，无论大小公私事情，他都以十足的"江湖义气"，满脸笑容地拍拍你的肩膀，然后双手一拱，从而将这些事情圆满解决。譬如说遇到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因某种原因想放下工作不干了，他一定会找到这个工作人员，友善地拍拍此人的肩膀，然后满脸笑容地说："老弟，我老应混了这么多年，绝不会对不起朋友的，帮帮我的忙，怎么样？老弟！"左一个老弟，右一个老弟，与满脸的诚恳和友善相衬托，使人很难拒绝他的请求。这样，不想干的工作也只有继续干下去了，并且为了不辜负"老板"的期望，干得还要比先前更为努力和认真。再譬如遇到一个架子很大的女演员因故发脾气不演戏了，别人毫无办法，他却可以很快地将这个女演员重新推上舞台："小妹妹，看我老大哥的面子，算了，大人不记小人过。改天我请客、赔礼，怎么样？"好一个"怎么样"，近似求饶而实则坚定、自信，这位"小妹妹"在"老大哥"面前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正是凭着这一副"万应膏"，《天国春秋》才得以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中心陪都上演时，在剧中保留抨击国民党制造反共内战的"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这一台词；也正是凭着这一付"万应膏"，在排演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时，应云卫才得以请来当时陪都影剧界最著声望的"明星"金山、白杨、顾而已、施超、孙坚白、张瑞芳等任演员，陈鲤庭任导演，刘雪庵配曲，中华交响乐团为伴奏，从而组成当时中国影剧界的坚强阵容。

订戏院、抢演员、请导演、找灯光师、过检查关……所有这一切，应云卫都是凭着他的这一付"满脸笑容拍肩膀"的"万应膏"而得以成功的。

"两强"相遇时的取胜之道

在应云卫的电影戏剧生涯中，"满脸笑容拍肩膀"这一付"万应膏"，虽然为他解决了不少问题，应付了许多场面，但也不是对任何问题都行之有效的。每当"拍肩膀"这一绝招不能奏效时，或者是碰到的对手也和他自己一样，顽强得难以应付的时候，我们的"应老板"就会使出他的第二"绝招"，那就是突然的捶胸跺足，呼天抢地起来，使

得对方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而事情本身，也就于此窘境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1943年秋，中华剧艺社拟将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名著《复活》搬上舞台，为了演好该剧，他们延请了当时陪都影剧界著名导演之一的陈鲤庭执导该剧。当该剧在国泰大戏院上演的第一天，剧院里的观众已满满一堂，开幕的时间也即将到来，但这时在后台却发生着导演陈鲤庭与演出者应云卫之间的激烈的争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由于排演时间的仓促，使得该剧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以致到开幕的时候，道具不齐，布景未干，服装、效果都未弄好，因此，导演陈鲤庭认为：布景、服装、道具、音乐等不仅距离要求太远，而且十分之六七都不具备，为了艺术的完整，也为了自已的声誉，戏，今天决不能演。而作为中华剧艺社社长的应云卫，则站在演出者的立场上，认为票已卖了，观众也来了，票款也用了，为了事实，也为了剧团的信用，无论如何，戏，要准时开演。两个人中，一方是以"愚"出了名的陈鲤庭，另一方则是以："厉害"著称的应云卫，双方为了各自的追求和利益，为了《复活》的演与不演，各执一端，进行着激烈的争执，而且越谈越僵，"拙讷"的陈鲤庭在嘴皮上哪是"厉害"的应云卫的对手，因此，他最后不得不对全体工作者沉痛地说："我不能在短期内将戏排好，无以对观众，无以对工作者，而演出又不能延期。好的，现在已经不需要导演了，导演的地位已经等于零，我向观众宣告，否认这个戏是我导演的。……"一边说着一边抢起锣就向前台跑去。应云卫见陈鲤庭使出杀手锏，也赶紧使自已的"绝招"。只见他赶紧趋前两步，一把将陈鲤庭拖了回来，还不待对方回过神，他突然地象发疯一样地捶胸跺足起来，并"咚"的一声跪在陈鲤庭面前，高声地叫着："你是祖宗，我是孙子，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是大艺术家、大导演，我不懂艺术，我是王八蛋，我是众人的孙。"接着，又用求饶似的口气对陈说："……鲤庭，我们是十几年的弟兄了，我是你老大哥，你饶了我吧！……"一面叫着，还一面劈劈拍拍地打着自已的耳光，并不断地向陈鲤庭磕头，简直象死去活来一般。陈鲤庭在这种情形下，面对自已的"老大哥"，显得目瞪口呆，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说不出半句话来，只得一甩手夺门而出。而应云卫自已呢，则由演员们抬到一张凳子上，也是不说一句，一动不动，像晕过去一样。就在这种沉痛、刺激的气氛下，《复活》则在前台慢慢地拉开了帷幕。

向夏衍"逼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斗在香港的大批文化工作者相继回到内地，夏衍也于1942年4月辗转抵达陪都重庆，这时的应云卫正忙于筹备是年雾季艺术节戏剧公演事宜，于是就盯住夏衍要剧本。他先是带着夏衍在中华剧艺社转了一圈，然后指着破破烂烂的宿舍和汇集在中华剧艺社的陈白尘、赵慧深、贺孟斧等人说："在重庆，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生活。"然后话锋一转，便扯到了剧本问题上："《屈原》演出成功了，松了一口气，但现在还是剧本荒，你来了，第一件事是向你'订货'，今年雾季的开场戏全靠你了"。夏衍因为初来乍到，既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更需要用相当的时间来了解这个新环境中的各种新情况，所以对应云卫的请求，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给予肯定答复，而只是"姑漫应之"。没想到应云卫听了夏衍的回答合，却相当高兴，只见他，又习惯性地拍了拍夏衍的肩膀，然后双拳一拱，说出了这样八个字："好，够交情，一言为定"。

在素有"火炉"之称的山城重庆，尽管才是初夏，但其热浪则是一日高过一日，这对第一次到重庆的夏衍来说，无疑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增加了相当的困难。所以，尽管他答应了应云卫为中华剧艺社写个剧本的要求，但在此高温下，却很难动笔，这样，对应云卫的许诺也就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而应云卫则不管这些，他仍是急如星火地催着夏衍，以致于他一见到夏衍，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一个劲地要剧本"救命"，夏衍到东，他跟到东，夏衍到西，也追到西，把个夏衍逼得"走投无路"，就好象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夏衍因为天气太热，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入睡的良方：他打开房门，把席子铺在门口的地板上睡觉，在阵阵江风的吹拂下，夏衍终于艰难地睡着了。到了半夜，突然被一阵"啊哟"、"啊哟"的叫声弄醒，接着便感到有一个黑影压在自已身上，他赶紧打开灯一看，原来是应云卫又来"逼债"了。只见这时的"应老板"："满面愁容，连口讲了几句'对不起'之后说：半夜三更来打搅你，实在不应该，可是，今晚又和陈白尘再三研究，还得请你帮忙，你答允写的本子，一定要在八月内交货。没有剧本，不排戏，谁肯借钱给我，你是'快手'，无论如何得在八月内赶出一剧本来。"一面急切地说着，一面不断地揩着汗，看到应云卫满身汗水的情景，想到应云卫为了话剧事业而辞去优裕职务的牺牲精神，夏衍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毫不迟疑地对应云卫说："一定写，按期交稿。"听到夏衍的肯定答复，应云卫立即转忧为喜，露出满脸的笑容高兴地说："好，这一下子我就放心了。中艺有的是演员，最近又从香港回来了一批，你放手写，角色多，服装布景多，你都不要管，一切由我负责。"边说边从地上站起来，然后紧紧地握着夏衍的手说："这儿太热，我给你到北碚去找一个安静地方，但千万千万，一定要尽快写好。"不久，应云卫果然在北碚给夏衍找了一间被夏衍称为"世外桃园"的小屋，并在一家小饭馆里给夏衍预订了每天的中、晚餐。在此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夏衍充分发挥了他"快手"的本领，一挥而就，很快便写成了一个以反映"科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为主旨的剧本，这就是同年10月份在国泰大戏院上演的有名的《法西斯细菌》。

（唐润明）

流行风

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

《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由吴印咸、徐肖冰摄影，钱筱璋编辑。影片全面地纪录了八路军120师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的情景。其中有：南泥湾一片荒芜、荆棘丛生的过去，359旅向南泥湾进军、搭草棚挖窑洞、吃野菜啃野果、开荒种地、养猪放羊、纺线织布、练兵习武，以及经过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硕的果实，出现了新的面貌……。毛泽东同志为影片写的"自已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和题词时的情景都被保留在该片中。

《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于1943年2月4日在延安直政大礼堂举行了首映式，朱德、贺龙及延安各界人士出席观看，一致赞扬这部影片为"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为人民电影的历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影片在延安和边区各地放映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小说《风砂之恋》

作者碧野，主要内容：

写抗战初期知识青年的流亡生活。1941年，洛阳城里一群青年成立一支抗日救亡的话剧队。女演员林晶美貌出众，为人高傲而又爱虚荣，受到周围许多青年男子的喜爱和崇拜，但不轻易让人染指。后因沉缅于物物质享受，落入了商会主席、银行经理等人的圈套，而逐渐堕落。她也曾想摆脱精神折磨的痛苦到乡下做小学教师，以求过一段宁静的生活。但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又终于使她回到城里成为公司里的"花瓶"，最后失去了生活方向。小说还写生长于农村的姑娘苏红，她积极投入救亡事业，却受人歧视，被剧团开除。但她艰苦学习，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最后与爱国青年赵力达奔赴太行山前线。作品通过两个女主人公所走的不同道路，旨在揭示"在陇海线弥温的风砂中"的青年，一种是眼睛"被风砂打瞎"而"迷失了道路"，徬徨而堕落"；另一种是"那奋斗的一群勇敢地踏上了征途，投奔到大风砂的地方去"，作品对林晶的堕落生涯批判不力，写苏红的转变过于粗略。

小说《淘金记》

作者沙汀，主要内容：

写四川边远北冬镇上开发筲箕背金矿的故事。筲箕背矿山原是何寡母坟山，何家为保住"风水"，坚决不让开矿。开金矿的帮会头子林幺长子和土豪白酱丹为争夺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他们背着何家动手挖金。何借哥老会势力以制止对方动手，但白酱丹联络联保主任并借政府法令迫使何寡母就范。何将所受损失转嫁到农民身上。最后，合伙者去搞囤粮勾当，金矿暂停开采。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反面人物：白酱丹奸刁歹毒、诡计多端；林幺长子鄙俗骄横、凶悍无赖；何寡母精明悭吝、残忍刻薄。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反映了国统区农村中地主豪绅、反动政权、帮派势力之间弱肉强食、勾心斗角，他们借抗日为名发国难财，给广大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作品刻画各类人物，形神毕肖；情节跌宕多姿，异峰突起，引人入胜；借四川方言描绘出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风俗画，亦极为成功。笔墨风趣，讽刺人物含蓄蕴藉，技巧相当圆熟。

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

小说以江南一带小县城为背景，描写了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广阔的生活画面。作品以惠利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为发展航运事业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为主线，展开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王伯申为开设轮船公司打算动用积善堂的存款，遭到地主阶级顽固派赵守义的极力反对，他勾结其他地主，挑动农民袭击王伯申的轮船，致使农田被冲，农家孩子丧命，最后王伯申表示让步，与赵守义言归于好，轮船终于通航。作品生动地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与封建势力相妥协，农村封建地主势力的根深蒂固，农民遭到压榨和迫害等情况；它通过社会风习、世态人情的生活描绘，真实地再现了时代的风貌。描写人物心理委婉曲折，并借助自然环境烘托人物性格；布局摇曳多姿，结构错综变化，文字简洁、曲雅，具有民族传统特色。

诗《睡眠——记一个朋友的谈话》

蟋蟀的啼叫，
使我常常醒来，
想不到睡眠，
竟变得这样的胆怯。
想起战斗的日子，
睡眠
象锅巴草，
一着地就生了根；
象熟透的山葡萄，
可以随手掇得。
有时睡在尖棱刺背的石块上；
有时睡在星星产卵的污水旁；
有时睡眠在积满落叶的地界沟里，
蜥蜴在身子底下乱窜……
而且不远的地方
炮声响着，
可以感到地的颤动，
分明有一部分战斗还没结束；
但不管怎样，
怀里抱着枪，
睡得同样的甜蜜。
过河来，
有暖和的床，
有薰梦的花香，
但我却老是睡不着。
而且身边没有枪，
象母亲失去了婴儿，
感到空虚而又怅惘。
所以我要马上回去。
鱼，不能离开水，
人，不能离开战斗。

（苏金伞）

诗《坚壁》

狗强盗，
你要问我么：
“枪、弹药，
埋在哪儿？”
来，我告诉你：
“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

（田间）

歌曲《抗战的烈火》

我们是抗战的烈火，燃烧着钢铁的胸膛；
我们是无名的突击队，我们的战线在后方。
生产竞赛，培养力量！
军民合作，团结一堂。
千万股热烈的血汗，汇成了浩荡的长江；
千万支粗壮的臂膀，锤炼成自由的光芒。
谁敢自私，谁在徬徨，
谁愿卖国，谁敢投降！
我们是抗战的烈火，燃烧着钢铁的胸膛；
我们是无名的突击队，我们的战线在后方。

历史档案

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情况统计表

	开荒		种植谷物	产量
	1939	1941	1941	
部队	25136亩	14794亩	830000亩	90000余石
机关学校	11340余亩			11300余石

陕甘宁边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统计表

年份	社数	社员人数	股金数	销贷额数	红利
1937	130	3500	57847	555525	140218
1941	155	4800	69483	693071	211189

陕甘宁边区纺织工业的发展统计表

（1938、1943年）

类别	1938年		1943年	
	个数	年产布匹	个数	年产布匹
公营纺织厂	1	125	23	32968
纺织生产合作社	1	400	38	6000
私营纺织厂	5	1260	50	12000

注：1943年产布匹比1938年增加274.2%，接近自给程度。到1945年，边区的纺织工业设备已达到年产布150000匹。

陕甘宁边区开荒植棉和牲畜发展统计表

年份	开荒亩数	植棉亩数	牲畜		
			牛	驴	羊
1939	1002774	3767	150892	124935	1171366
1940	698989	15177	193238	235054	1723037
1941	290087	39078	242914	227001	1724203
1942	281423	94405			
合计	2273273				

罗斯福致马歇尔函——告诫史迪威不能以严厉语气对待蒋介石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华盛顿

马歇尔将军阁下：

谢谢你给我阅读史迪威二月九（七）日，关于安诺德和萨摩微尔（中国）之行的信。本人曾详予细读。本人认为：史迪威对付蒋委员长所采用的方法，乃是一项极其错误的方法。他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不能期望他采行我们所用的方法。史迪威说委员长很愤懑，难以对付，不断增加要求等等，自然说得不错。但是，他说到要用更严厉的语气，那他就错了。

吾人须知，委员长艰苦奋斗，而成为四万万人承认的领袖——从各种不同团体领袖之中，有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在全国各地，群起争霸，而他能达成某种统一，得来实在匪易。吾人达此目的，为时曾费两世纪之久；而他却在极短时间之内，能在整个中国完成。

此外，委员长必须维持自己最高地位。在些情形下，

你我都会采取同样作法。彼为行政首长，亦为三军统帅。对如此人物，吾人焉能出以严厉语气对付；或以对付摩洛哥酋长之方式，要挟彼许以承诺。

另一事乃史迪威对一九四三年在华之空军行动，竟只字不提。他现在只想到缅甸之事，乃在中国正在训练部队之事。

虽然，本人对缅甸作战期望至大，但本人仍深信在一九四三年，陈纳德之空军作战之战略价值，应予加强。本人至盼推动。

本人认为，阁下当可看到，所给予史迪威与陈纳德之指示，对于吾人空军计划如此清楚，对于吾人之意愿，实不应有任何误解。

陈纳德得其所需之一份物资，此至为必须。本人相信他每月应得四千吨以上。非得此数量，则不能使其部队继续作战……。

在印度与在中国机场之兴建与改善，应尽全力为之。

本人认为目前正在途中之轰炸机，将在陈纳德指挥之下。更重要者，在华加强空军之政策既经决定，则得到史迪威之批准，陈纳德对其作战与战术，应有完全之控制。

虽然，本人深信史迪威与委员长之关系已经改善，但是对陈纳德以恰当方式与中国讨论空军作战，实不应加以任何阻止。

吾人对华关系至为重要，希阁下告诉史迪威与陈纳德，彼等乃吾人在华之多重代表。配合彼等之军事任务，彼等可能证明为吾人在华最佳之"大使"；本人希望彼等如此。

至要者，本人有赖阁下，陈纳德得有机会，能尽其所能。

本人认为，在卡港或此间之参谋计划，对于加强在华空军击沉中国沿海日本船只，摧毁日军飞机，及空袭日本城市，以销耗日本实力，都未曾给予足够之强调。

罗斯福

（选自《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

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希望两国互为善邻，尊重其自主独立，并紧密协作，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大东亚，以贡献于全世界的和平，并以坚定不移的决心，铲除对此造成障碍的一切祸根，签订协定如下：

第一条　日本国及中华民国，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各方面采取互助敦睦的措施。

第二条　日本国及中华民国，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作，尽力援助。

第三条　日本国及中华民国，应以互惠为基础，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第四条　为实施本条约所必要的细节，应由两国主管官员协商决定之。

第五条　自本条约实施之日起，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即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连同其一切附属文书一并失效。

第六条　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之。

作为以上的证据，下列签名人各奉本国政府正式的委任，在本条约上签字盖印。

本条约签订于南京，以日文和汉文各作成二份。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

谷正之（印）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汪光铭（印）

（选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驰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选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暨换文在华盛顿签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美国与中国——为欲重视两国人民间素来之友好关系，并以平等与主权国家之资格表示共同志愿，使彼此所承认，规定人类关系之高尚原则得以发扬光大，决定订立条约，以谋调整两国间有关事项，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驻美国特命全仅大使魏道明。

美国大总统特派国务卿赫尔。

两全权代表，各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善，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现行中国与美国间之条约与协定，凡授权美国政府或其代表实行管辖在中国领土内美国人民之一切条款，兹特撤销作废。美国人民在中国领土内，应依照国际公法之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国政府之管辖。

第二条　美国政府认为，1901年9月7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议定书应行取销，并同意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美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终止。

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管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国政府于接收使馆界行政与管理时，应拟定办法担任并履行使馆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在北平使馆界内，已划与美国政府之土地，其上建有属于美国政府之房屋，中国政府允许美国政府为公务上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

第三条　美国政府认为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国政府并同意凡关于上述租界给予美国政府之权利，应予终止。

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上述租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予中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国政府于接收上述租界行政与管理时，应拟定办法担任并履行上述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第四条　为免除美国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之权利发生任何问题，尤为免除各条约及协定之各条款，因本约第一条规定废止而可能发生之问题起见，双方同意上述现有之权利，不得取销作废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追究。但依照法律手续提出证据，证明此权利系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之手段所取得者，不在此限，同时相互了解此项权利取得时所根据之官厅手续，如日后有任何变更之处，该项权利不得因之作废，双方并同意此项权利应受中国关于征收捐税、征用土地及有关国防各项法令之约束，非经中国政府之明白许可，并不得移转于第三国政府或人民（包括公司与社团）。

双方并同意，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人民或政府持有之不动产永租契或其他证据，如欲另行换发新所有权状时，中国官厅当不征收任何费用，此项新所有权状，应充分保障上述租契或其他证据之持有人与其合法之继承人及受让人，并不得减损其原来权益。包括转让权在内。

双方并同意，中国官厅不得向美国人民或政府要求缴纳涉及本约发生效力以前有关土地移转之任何费用。

第五条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早予以旅行居住及经商之权利，中国政府同意对于美国人民在中国领土内，予以相同之权利，两国政府在各该国管辖所及之领土内，尽力给予对方国人民关于各项法律手续、司法事件之处理及各种捐税之征收与其有关事项，不低于所给予本国人民之待遇。

第六条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互同意，彼此领事官经对方给予执行职务证书后，得在对方国双方同意之口岸地方与城市驻扎。两国之领事官，在其领事区内应有与其本国人民会晤、通讯以及指示之权，倘其本国人民在其领事区内被拘留、逮捕、监禁或听候审判时，应立即通知该领事官，该领事官于通知主管厅后得探视此等人民。总之，两国之领事官应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之权利、特权与豁免。

双方并同意，对方人民在此国领土内者，有随时与其领事官通讯之权，对方人民在此国之领土内被拘留、逮捕、监禁或听候审判者，其与领事官之通讯，地方官厅应予传递。

第七条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互同意，经一方之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此项条约，将以现代国际程序与中国政府及美国政府近年来与他国政府所缔结之近代条约中，所表现之国际公法原则与国际惯例为根据。

前项广泛条约未经订立以前，倘日后遇有涉及中国领土内美国人民（包括公司与社团）或政府权利之任何问题发生，要不在本约范围内或不在中国政府与美国间现行而未经本约废止或与本约不相抵触之条约、专约及协定之范围内者，应由两国政府代表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第八条　本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本约

批准书应于华盛顿迅速互换。

本约于中华民国 32 年 1 月 11 日，即西历 1943 年 1 月 11 日，在华盛顿签字盖印，中文及英文各两份，中文英文有同等之效力。

考代尔·赫尔

魏道明

（选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1957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一月十五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决定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五日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每年春节前后慰问驻军。二十五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以后，中共中央将此定为制度，每年春节前后一个月为"双拥运动月"。

同日　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公布。

同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限价（"全面价格"）、专卖和统购统销政策。限价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各地原有之价格为标准，对于粮食、盐、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物品做到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

一月十五日　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会议，讨论和颁布《边区施政纲领》，制定了各种基本法令。选出成仿吾为参议会议长，于力为副议长，杨耕田、阎力宣、李楚离、安志成、郭飞天为参议员；王斐然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皑风、王斐然为边区行政委员，组成边区政府，宋劭文任主任委员、胡仁奎任副主任委员。

一月十七日　冀南军民改变地形，积极兴筑村庄堡垒。

一月十八日　国民党山东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副师长于怀安，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于春霖，苏北国民党游击纵队一支队司令吕其赓率部投日。

一月二十一日　北平发生抢米暴动。

一月二十四日　晋西北行署通令：厉行减租交租，防止非法夺地，保护租佃权益。

一月二十六日　新华社鲁中电：《大众日报》四年来在战斗中牺牲了通讯部长郁永言、管委会副主任丁桂等二十余人。

二月一日　延安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

同日　日伪军警在承德县进行大逮捕。

二月七日　八路军在晋西北八分区围攻沙石庄之日军。

二月十二日　罗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同日　日军向苏中区"扫荡"。

同日　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投日。

二月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放农贷两千万元。

二月十五日　江北潜山、沙洋日军二万余渡过长江，直入洞庭湖北，连陷华容、石首、南县、安乡、沣县、津市、汉寿、新州。同时，江陵日军也渡过长江，进陷太平、公安、松滋、枝江、五峰、长阳，五月二十九日，前锋直达石牌要塞及渔洋关

同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新闻记者法》，遭到全国新闻界的反对。

二月十六日　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举办春耕贷款六百万元。

二月二十一日　日军侵占广州湾。

二月二十二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财经会议，决定冀钞本币，实行战略分区管理。

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

二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召开渝区党政军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并做工作报告。

三月一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机关报《反战》改为《同胞新闻》。

三月四日　淮北新四军攻入淮阴城。

三月六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简政实施纲要》。

三月八日　山西阳泉饥民暴动，捣毁阳泉敌粮库。

三月九日　新四军公布拥政爱民公约。

三月十日　中共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陈云、刘少奇、凯丰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同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声言两年内解决内政问题，消灭敌后军民。

同日　国民党军李仙洲部入鲁，十五日，与日军配合，围攻峄县八路军。

三月十二日　日本首相东条访问南京，与汪伪会谈

"战时合作"。

三月十三日　志丹县实行精简，县府六科并为三科一处，裁员三分之一。

三月十八日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整风学习中写了《我的修养要则》。

三月十九日　刘少奇从延安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张云逸等，介绍华北反"扫荡"斗争的经验。

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增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决定成立宣传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理工作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秦邦宪、凯丰组成，胡乔木任秘书。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兼秘书）组成。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兼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同日　八路军总政治部记者团前线记者雷烨，于河北平山遇敌，在英勇抗击中牺牲。

三月　贵州省三都、水龙、都匀等地的水、苗、布依各族人民举行万余人起义，号召"消灭贪官享太平"。广西大瑶山瑶民举行起义，攻打金秀，捣毁"设治局"。

三月　中共中央派陈云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兼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和政治部主任。

四月一日　太行边区简政，裁减人员八千余人。

四月三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运动。

同日　延安市户口重新登记。

四月四日　日军在晋西北包围东沟，抓走三十多个青年活动分子。八分区八路军六支队一个队袭入岔口，打开地牢，救出被捕群众。

四月七日　日本派汉奸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做"劝降大使"，赴渝进行和谈。离沪前，日军参谋长小林少将嘱其转告蒋介石：日本"对重庆早晚必将化敌为友"，望蒋早日回头，共同反共。

四月十日　延安审干运动在各机关学校普遍展开。

同日　蒋介石要求罗斯福任命陈纳德指挥地面部队和空军，免去史迪威职务。

四月十五日　汉奸吴开先由南京飞抵重庆，受到国民党要人朱家骅、潘公展等百余人迎接，蒋介石接见，奉为"上宾"。陈果夫谓：此次吴或有和平计划携来。

四月十六日　晋西北军区政治部规定五月为拥军爱民月。

同日　滨海区逃亡地主纷纷返回根据地。

四月十九日　延安中直、军直机关已开地八百亩，织毛衣七百件。

同日　苏中新四军粉碎敌伪"清乡"。

同日　晋察冀民兵袭入保定西关。

四月二十日　任邱军政民开展反击"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同日　日军两万集中"扫荡"鲁西清河地区，国民党军李仙洲部万余人与之配合。八路军奋起反击，一周之内，歼日伪军各一部，将其击退。

同日　日本东条内阁局部改组，重光葵代谷正之为外相，安藤纪三郎任内相，东条兼陆相、文相。

四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在中央中央南方局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四月二十三日　日军二万分路进犯太南，解放区军民猛烈抗击。

四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在豫北率部投敌。

四月二十五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准予宋任穷、刘建章辞职；任命孟夫唐为冀南行署主任，王任重为副主任，刘季兴为秘书长。

四月　新疆柯克托海（富蕴县）人民起义军攻占克河，向阜康、奇台、孚远、乾德、昌吉等县进攻，各地哈族人民纷起响应。

五月一日　美国派遣海军情报部长梅乐斯来华，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合作，在重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戴笠为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它在各地设立各种训练班，训练与装备国民党特务、警察。

五月二日　冀中区群众团体召开各团体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冀中区抗联会，并选出杨新为主任委员。

五月六日　新华社晋察冀电：《晋察冀画报》创造铅皮制版印刷法，并创造了轻便的平版印刷机。

五月十二日　阜平县五大湾民兵队长李勇，领导其中队在本村附近布置地雷阵，并用"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杀伤日军。

同日　华盛顿会议（代号为"三叉戟"）召开，十四日结束。史迪威和陈纳德均参加。会上决定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有权从印度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中优先取得一半以上，史迪威仍保持分配权。

五月十四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孙殿英在豫北联名通电，叛国投敌。庞率部投日后，就任伪军委会委员、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随庞投敌之国民党将官有新五军副军长杨世贤、暂三师师长杨克友、暂四师师长王廷

英、第四挺进纵队司令侯如庸等。

五月十五日　太行山八路军粉碎日、伪军三万余人的合击。

五月十九日　晋西北行署决定发放青贷二百六十万元。六月十三日增发四百万元。

六月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着重阐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并指出，在审查干部中，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六月十一日　淮北新四军助民灭蝗。

六月十二日　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托派、汉奸张涤非等九人，假冒"民从团体"名义，开了十几分钟会后，发表通电，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交出政权军队"，"取消边区"。

六月十四日　太原铁路工厂工人千余罢工。

六月十五日　鄂豫边新四军攻入安陆。

六月十八日　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第九十军和暂编第二十五师，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以上人员。决定把驻守河防的第一军调往邠州、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加上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共六十万军队，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六月二十日　关中分区八路军以两万个工帮助群众春耕。南泥湾部队以两万个工，助民春耕。

六月二十五日　新四军攻克云梦诚。

六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由渝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七月四日　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于本日至六日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抗议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

七月五日　冀鲁豫八路军攻围鲁西朝城伪军三十一师文大可部，作战三日，歼其两旅。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一文。批判一切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用心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想。

同日　国民党禁止《新华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七"宣言，当夜派军队将报馆包围。

七月七日　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发表《告日本士兵书》，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日本人民政府。

同日　中共冀东地委改为中共冀热边特委；冀东十三专署改为冀热边行署。李运昌任特委书记，李楚离、周文彬、李子光、李中权、朱其文等为委员。李运昌任行署主任，朱其主任副主任。

同日　国民党军队开始炮击关中分区。

七月九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接受"皖南事变"的教训，要"准备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

七月上旬　国民党军分别在淳化、耀县、潼关、中部、洛川等地设置了兵站基地，负责十个军的供应任务。洛川、宜川、韩城等地分别建立起野战医院、伤兵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等。

七月十一日　晋察冀北岳区推行民主政治，举行第二次县选。

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以《质问国民党》为题，给《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彻底揭露国民党勾结日寇进行内战的阴谋，并警告国民党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反动军队，纠正一切错误。

七月十五日　中共北方分局作出《关于三年来平西工作总结的决定》。

七月十五日　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干扰了审干工作的正常进行。

七月十六日　周恩来一行一百五十余人由重庆抵达延安。

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的文章。

七月二十八日　冀东八路军挺进热河，冀热边行署成立。

八月一日　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病逝。

八月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会，欢迎周恩来、邓颖超等由重庆返回延安。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谓：毛泽东的意见是贯穿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八月三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推进食盐运输，发放盐贷千万元。

八月六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便利盐运，取消食盐出口费，重申收盐手续为随到随收。

八月十四日　海南岛白沙县两千多黎苗各族群众，举行反蒋起义。

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九条工作方针。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反

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

八月十六日　周恩来写了一个题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分析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实质，论述了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策略和组织活动。

八月十八日　晋冀鲁豫八路军讨伐庞炳勋、孙殿英，一举击溃其两万余人，击伤其新五军副军长刘月亭，解放漳河以南全部地区。

八月十九日　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八月二十日　冀热边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成立，杨大章任专员。

八月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国民党政府查封《中国农村》、《文学月报》、《西南儿童》、《妇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十种杂志。国民党将“抗日政府”、“争取民主”等二十一个名词规定为“谬误名词”，一律禁止；将“国共合作”等五十三个名词规定为“谬误名词应改正者”。又：忌讳“解放”二字，改“妇女解放”一语为“妇女复兴”。

八月二十四日　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发布关于合并北岳、冀中两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决定。

八月二十五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

八月　陕甘宁晋绥组成联防司令部，一二〇师部分主力由贺龙率领调往陕甘宁边区，吕正操率冀中第三纵队，到晋西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九月一日　《解放日报》揭露国民党摧残进步新闻事业情况称：“在一九三七年，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全国有报馆一千零三十一家。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报馆获得核准者仅余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九四二年）一年，国统区报章杂志被封闭者达五百种之多”，被禁售之书籍达一千四百余种。

同日　《解放日报》报道，过去一年中，国民党统治区报纸刊物被封闭者达五百种之多，并载专文《国民党反动派十年来摧残新闻事业的罪行》。

九月三日　意大利与美英签订无条件投降停战书。八日，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九月六日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十三日结束。蒋介石在十三日的闭幕会上作关于反共问题的指示，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九月九日　晋西北发动“斗米斤麦”运动，节约的粮食用以招待过往抗日军人。

九月十日　晋绥分局召集党的群众工作会议。十一月十日结束。

同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

九月十一日　上海遭受台风袭击。

九月十三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孔祥熙、叶楚伧、覃振、朱家骅、刘尚清为国民政府委员；并通过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孔祥熙为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长，叶楚伧为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刘尚清为副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长，朱家骅为副院长，旋即完闭幕。

九月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二十七日结束。何应钦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污蔑共产党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驳斥了何应钦的训谤，并宣布退场。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决议》。

九月十九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活动的一笔总帐》一文，揭露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反动面目。

九月二十五日　赞皇人民群众反抗敌寇抢粮勒款。

九月二十七日　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

同日　日寇在冀南临清大石桥、武城渡口驿等处将运河掘口，在鸡泽县将滏阳河掘口、并破坏漳河堤，至使洪水泛滥，冀南三十余县遭受严重水灾。

同日　国民党查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

九月三十日　中共延（安）属地委发布《关于党报通讯工作指示》。

同日　苏北士绅响应捐田征军运动。

同日　日本举行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决定：（一）缩小“应该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二）“乘机迅速设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由日本“指挥”，汪精卫进行工作。

十月一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

同日　新四军苏南部队侧击敌后，收复宣城、郎溪、广德诸城。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十月四日　苏北敌占区民众星夜向新四军送缴公粮。

十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

同日　日军在华中大肆抢粮。

十月十一日　延安中央党校烧炭队烧成木炭十七万斤。

十月十二日　浙东余姚等县军民配合，夺回粮食数十万斤。

十月十三日　太行襄垣民兵粉碎日伪九路进攻。

十月十八日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并制定了《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

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月二十日　中央总学委发布《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十月二十三日　太岳区八路军一二九师在临(汾)屯(留)公路的韩村伏击日军"军官观战团"一百八十多人，除三人逃脱外，全部被歼。

十月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取缔剧本一览表》，开列不准出版或上演的剧本共一百一十六种。

十一月二十四日　日军在山西进行抢粮。

十一月二十四日　台湾火烧岛东发生七级地震。

十月二十六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办了生产展览会。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演。

十月二十八日　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十二月一日结束。会议讨论对日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作出战胜德国希特勒的决策，通过消灭德国武装力量的各项计划，就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缔结了《德黑兰总协定》；达成了关于保障战后持久和平的协议。

十二月一日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公布。

同日　德黑兰会议公报及宣言发表。

十二月二日　广东东江游击纵队通电全国，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正式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曾生、王作尧为纵队正、副司令员。

十二月十一日　皖中临江地区减租减息二十五万担，受益农民每人增收六斗七升。

军　事

一月四日　北岳山区反"吞食"战役结束。全役历时三个月。

一月九日　冀南民兵九千人出动破击，毁敌公路沟墙七千余里。

二月二十一日　日军侵占广州湾。

三月十一日　美陆长史汀生宣布：在中国成立第十四航空队，由陈纳德少将指挥，唯所有中缅印之一切部队仍受史迪威节制。

三月二十三日　宜昌日军四路西犯。

三月二十八日　滇甸边界日军又向中国边界进攻。

五月二十日　苏北新四军开始在淮海区(淮阴以北)举行夏季攻势，三个月中连克五十一个据点，解放拥有二十八万人口的地区。

五月二十二日　太行山区八路军与地方武装内外夹攻，粉碎日军三万人的"扫荡"。

五月二十六日　北岳平西粉碎二万日军"扫荡"。

六月六日　国民党将河防大军调至陕甘宁边区周围，由胡宗南统一指挥。

六月十八日　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七月九日　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制止进攻边区。

七月二十一日　日军在八路军困扰下，撤出岔口和芝兰。

七月二十二日　鄂东新四军粉碎日军二千人的"扫荡"。

九月三日　八路军攻入河南林县。

九月十五日　日军第三、第五十九两个旅团三千多人合击兴县、保德地区晋西北领导机关。贺龙率领一二〇师围日军八百余人于甄家庄，激战七昼夜毙敌八百多人。

十六日　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调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共同进攻日军，并要蒋介石把美援助的武器，拨一些给共产党。

同日　北岳区秋冬季反"扫荡"战役开始。

同日　日伪使用四万多兵力，并动员一切汉奸特务组织，对晋察冀北岳区开始实行"毁灭扫荡"。此役历时三个月。

十月一日　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二万多人，用所谓"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区进行大"扫荡"。历时五十天。

十月二十九日　日军再度向鄂南国民党军进攻，连陷洞庭湖西之南县、安乡、沣县、津市、临津、石门、慈利、汉寿、德山，十二月三日侵入常德、桃源。

十一月三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兼蒋介石的空军参谋长陈纳德指挥。

十一月十一日　晋西北反"扫荡"中，收复保德、岢岚。

十一月十三日　北岳区灵寿游击队广泛发动地雷战歼敌。

十一月十六日　鲁西八路军讨伐孙良诚，全歼其司令部机关，俘敌千余。

十一月十七日　日军万余窜犯北沂区，鲁中展开反“扫荡”战。

十一月十八日　山东军民展开破袭沭河沿线，平毁敌新修的封锁沟。

十一月十九日　晋冀鲁豫太岳区军民粉碎日、伪军两万多人历时五十多天的大“扫荡”，挫败了敌人采用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十二月十一日　冀鲁豫军民奋战两月，粉碎敌伪六次进攻。

十二月十四日　浙东余姚地区军民三千，大举破路，二小时内破敌公路桥梁二十余里。

十二月十五日　晋察冀北岳区军民胜利粉碎了日、伪军毁灭性大“扫荡”。

同日　冀南八路军粉碎日军五万五千人的“分区清剿”。全役历时半月。

十一月十八日　胶东军民展开反抢粮大斗争，夺回被敌抢去之粮二十余万斤。

十一月二十四日　林县、左权等地军民奋勇击退抢粮之敌。

十一月三十一日　晋察冀军民奋战两月，粉碎日军“扫荡”。

外　交

一月九日　日、汪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

一月十一日　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二十三日结束。会议主要议程之一是讨论打破日本对中国封锁需采取的军事行动问题，达成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收复缅甸作战计划的代号）。该计划于二月六日被蒋介石批准。

一月十五日　国民党政府特任傅秉常为驻苏大使。

二月二日　国民党政府批准《中美新约》

五月二十一日　中美签订《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规定：“凡美国海陆军人员，如或在中国触犯刑事罪款，应由该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单独裁判”。

八月一日　日本大本营发布对蒋介石假降谈话。

八月二十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代号为“四分仪”会议）。国民党政府派其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会后发表宣言，要加强对日作战。

九月十七日　据日《木户日记》记载，九月中，东条向天皇报告，重庆方面已要求汪精卫斡旋中、日议和。

十月十六日　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英国的勋爵）抵渝会见蒋介石。蒋通过萨姆维尔告知蒙巴顿，要求撤换史迪威，因蒙巴顿不同意而作罢。

十月二十日　中比签订平等互惠新约。

十月三十日　日本与汪伪政权在南京签订《日汪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即“中日同盟协定”）。

同日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此系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所发表的四项宣言之一。宣言指出，同盟国家将继续作战，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提出建立保障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

十一月二十二日　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开罗会议（代号为“六分仪”会议），二十六日结束。会议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霸王”计划）等问题。

十二月十日　中挪签订平等互惠条约。

经　济

一月一日川康公路正式通车。

一月十五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放春耕贷款三百万元，帮助农户发展生产。

二月十七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所得税法》和《非常时期过份制得税法》。

三月一日　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一元相当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一元两角五分，相当于晋西北农民银行币五元。

六月五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公债三十亿元。

八月一日　国民党政府接收滇越铁路，交由川滇铁路公司兼管。

九月二十日　苏北台北、阜东两县实行减租交租。

九月二十七日　日军将运河掘口，使冀南三十余县严重水灾。

十月二十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统购土棉实施方法。

十二月七日　上海煤球价格，每担涨至三百元。

文　教

一月五日　延安科学界纪念牛顿三百年生辰。

三月十五日　《东方杂志》复刊。

三月二十五日《华北文化》革新号出版。

六月十六日　延安《解放日报》印刷工人用国产毛边纸代替舶来品薄型纸制作纸版试验成功。

九月一日　《解放日报》揭露国民党摧残进步新闻事业情况，1942年一年，国统区报章杂志被封闭者达500种之多，被禁书籍近1400余种。

九月二十七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等杂志被国民党查封。

十月一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太行版。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4年

导 言

一九四四年春，八路军、新四军为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扩大解放区，积极开展了军事攻势，展开了局部反攻。在全年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2万余人，解放了二十多座县城，扩大了解放区，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4月，日军为了挽救困在南洋群岛的孤军，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打通平汉、粤汉铁路，打通"大陆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河南战场汤恩伯不战而逃，日军38天占领河南全省，打通了平汉路。衡阳孤军坚持40多天后，外无援兵而陷落。10月，日军围攻桂林，中国守军弃城而逃。12月16日，日军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任务。国民党损兵六七十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多万同胞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5月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谈判实行民主政治问题。9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又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但受国民党阻挠，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没有结果。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致训词，指出抗战接近最后胜利阶段，大会应积极研议今后努力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务报告》、《关于政治报告》、《关于军事报告》。

5月初，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展开对滇缅公路的战斗。在这之前，中国驻印军已打响了反攻战役。在中国驻印军副总司令郑洞国和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指挥下，滇西缅北联合反攻取得节节胜利，歼灭日军两个师团大部和另两个师团部分。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英美盟军、中国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全部打通了中印公路。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于5月在杨家岭召开。这次会议历时十一个月，其间开过八次全体会议，主要讨论了筹备召开"七大"的问题，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9月，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征捐骏马，当地人民在9月、10月发动武装起义。1945年1月，起义部队组成民族军，9月新疆北部三区全部解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名义参加。推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会议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标志着中间势力在抗战后期已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 ●1944 年人民军队的局部反攻战
- ●359 旅南征北战
-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
- ●豫湘桂战役
- ●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
-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 ●缅北滇西大反攻

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背景介绍

自 1943 年起，美军开始了对日军的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以积极的行动开展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的新阶段。战后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不满于蒋介石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益加强的反动统治，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界群众的支持。

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19 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演。他认为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早该实施宪政，实行民主，但国民党至今还没实行民主。当前各地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我们共产党人一向主张以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以争取抗战胜利。国民党如果有实施宪政的诚意，我们希望能以公平合理的精神“政治解决”国共关系。5 月 2 日、17 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两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因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反动统治，对我方提出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停止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等项，根本置之不理，谈判成为僵局。1944 年 9 月 15 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10 月 10 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讲演，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种种罪恶，进一步阐术这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步骤。这一建议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更加危机四伏。

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于 11 月 7 日飞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只要对抗战和民主的前途有利，并不拒绝“斡旋”。11 月 10 日，双方达成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解决国共关系、建立联合政府的诚意，委派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渝，准备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然而蒋介石断然拒绝五点协议，并提出三点反建议。这三点反建议不仅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妄图掠夺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的胜利果实。鉴于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周恩来决然返回延安，谈判陷于停顿。1945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演讲，公开表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严拒建立民主联合政府。3 月 2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指出蒋介石的公开演说不是主张民主，而是以御用国会伪装民主，他的独裁思想丝毫未改，必须公开揭穿。

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仅是中国解放区九千万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国沦陷区人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共同要求，就是国民党内亦有数量众多的爱国人士对此主张抱有同感。由于国民党的深闭固拒，谈判终无结果。

材料：

- 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

材料　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国内所有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

（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并应拟定及颁布一民主政策，就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事项之改革方案予以规定。军事委员会亦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之。

（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

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取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并给予人民以向政府诉愿之权利，以及住宅不受侵犯之权利。联合政府并应采取政策，俾前所规定之'免除恐惧之自由'及'免除匮乏之自由'得以有效实施。

（四）一切抗日武力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合，应公平分配与各该武力。

（五）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摘自《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册第318页）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背景介绍

六届七中全会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延安杨家岭号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秦邦宪、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等人。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全会的主要内容，讨论和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讨论关于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六届七中全会，先后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

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主席团，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问题等，分别成立四个委员会进行起草。

六月五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为了加强城市工作，全会还通过了《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确定由十四人组成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

十一月九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与赫尔利谈判的问题。

十二月七日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的两次会议，周恩来两次报告了去重庆谈判的情况。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了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举行了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四月二十日举行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主席团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大会日程。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为召集人，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七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交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党的历史的若干问题，对历次右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内容、根源作了详细分析。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材料：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

材料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44年5月在延安召开。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召开了四次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即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的问题决议》。

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本人直接指导下经过几次起草，经过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经过多人和多次的修改，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的。1941年9月和1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许多犯错误的同志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成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委托王稼祥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的高级干部也还没有集中学习党的历史、回顾和检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所以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够完整，从而在认识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也反映在《结论草案》中。例如，它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

是正确的，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这个《结论草案》，原来准备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来，随着中央内部整风的开始，《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的先后编出，和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从而感到《结论草案》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充实以至修正，这样，它没有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而被搁置起来。但是，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都仍然保存在后来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和七届一中全会修正通过的《决议》中。

经过整风运动和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为了肃清“左”倾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党中央重新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

在 1944 年 3 月 5 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讲话，针对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他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六条意见，得到会议的赞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毛泽东 4 月 12 日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 5 月 20 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先后所作的报告(这两次报告后来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中，传达了政治局的结论。这些结论成为起草《决议》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

1944 年 5 月 10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是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当时在延安中央领导人如陈云等，虽未列名于这个委员会，但《决议》的起草过程中，经常到会参加讨论，提出过不少的意见，1945 年春，成立了由在延安的党的主要高级干部参加的讨论《决议》草案的一系列小组，各小组组长如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人，也都参加过委员会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的认真的讨论。所有讨论中提出的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作了很好的说明，1945 年 4 月 21 日，他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

党的高级干部经过六年的学习、酝酿、讨论，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或更深刻的认识。有些问题，则直到七中全会上认识才最后明确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政治路线是“新的‘左’倾路线”，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正是在对这些重大问题上统一了思想，才顺利地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主要文件之一。《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主要是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

《决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的结论。它充分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第二，《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成功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为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

(选自《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

1944 年人民军队的局部反攻战

背景介绍

一九四四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从华北、华中敌后战场抽调一部主力转入南方正面战场。我军为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扩大解放区，积极开展了军事攻势，开始了局部反攻。

晋绥我军，在晋西北，春、夏间共“挤掉”敌据点五十八处。八月发动攻势，攻克和迫退敌据点四十八处，收复村庄四百四十多个。在大青山根据地基本恢复到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局面。

晋察冀我军，在北岳区，围困涞源县城，一度袭入定襄、满城等县城，袭击了保定、石家庄、清风店等火车站，收复据点数十，开辟了察南蔚县、广灵、浑源等县边沿区和平绥路两侧的部分新区。在冀中，攻克肃宁县城和据点二十五处，并攻入任邱、河间、武强、献县等县城，开辟了

津南地区。在冀东,开辟了通州以南地区,打通了与冀中的联系。

晋冀豫我军,在太行区,收复榆社、林县两县城,摧毁了邢(台)沙(河)段三道封锁线,扩大了新(乡)辉(县)地区。在太岳区,出击了济源垣曲地区之敌,控制了济源西南一带黄河渡口。扩大了中条山西的闻喜、夏县地区。反击了阎锡山的进攻,收复了浮山北区。九、十月,太行、太岳部队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豫西,开辟了嵩山、箕山和洛阳以西的新安、渑池、洛宁地区,建立了偃师、巩县、伊川、登村、临汝等县政权。

冀鲁豫我军,收复清丰县城和寿张等据点五十余处,恢复昆(山)张(秋)地区,打开东平、汶上局面。在湖西地区收复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广大地区。对盘踞鱼台、沛县的苏北国民党军冯子固部反击,开辟了砀县、沛县、铜山间地区。鲁西南各游击区连成一片后,一部进入水东,开辟了民权、杞县、太康、睢县、淮阳等豫东地区。

山东我军,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了春、夏、秋、冬四次战役攻势。春委,鲁中、滨海发起讨伐吴化文伪军战役,攻克据点四十余处,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联系。夏季,鲁南部队消灭伪军荣子恒第二师,解放了崮口山区。鲁中部队攻克沂水县城,鲁中与滨海连成一片。渤海部队拔除据点二十余处,攻克利津县城。秋季,胶东部队解放了文登、荣城县城,全区连成一片。渤海部队攻克临邑、乐陵、南皮三县城,并解放沾化、青城两县大部地区。冬季,滨海部队攻克莒县,鲁南部队逼近临城、滕县、泗水、邳县等城附近,胶东部队收复栖霞。一年间山东我军共收复县城九座。

华中我军,春、夏季进行了反"清乡"作战。攻克和迫退敌据点五十九处。苏北部队攻克据点五十余处,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一片。淮北部队攻克据点五十余处,解放了泗县北部地区。苏南部队攻克据点二十六处,解放了溧(阳)南地区。淮南、皖江、浙东部队,粉碎了日军扫荡和蚕食。反"清乡"斗争结束后,接着向外扩展。七月,五师一部向豫南挺进。八月,四师进入豫皖边。十二月,苏中一师一部渡江南进,在苏浙边长兴地区与江南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打开了苏南、浙西局面,控制了天目山。

一九四四年我军共收复县城二十余座,克敌据点两千五百多个,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

材料:

- "观察家"们的观感
- 火炮传奇

材料一 "观察家"们的观感

尽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已经七年了,抗击着百分之五十六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便于他们施行其反动的、可耻的勾当,却对我党我军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并肆意造谣、诽谤,企图欺骗、蒙蔽国内外广大人民,担造不公正的社会舆论。

一九四四年秋,一个外国记者参观团由延安出发前来晋绥第八军分区参观。他们是,美籍记者福尔曼、爱泼斯坦和美军军医卡斯堡少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个姓张的,作为顾问也随同前来。当然他们这次来敌后参观是抱着不同目的的,他们对中国人民在敌后坚持抗战也有着各种态度和看法。不过,只要他们亲眼看看敌后军民抗战的壮举,事实可能多少改变其中一些人的固有观点。如果他们能把所看到的事实,哪怕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客观地、真实地报道给世界人民,有助于国际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我们也是欢迎的。

当时,第八军分区是处于日寇四面包围封锁之中。由于坚决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军事思想,第八军分区已把日寇插入心脏的几个据点——岔口、芝兰、宁化等"挤"掉了,小股日寇也不敢猖狂活动。但是敌人较大规模的"扫荡",一年还有几次,敌人在边缘地区的活动,仍很频繁。所以我们的斗争和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八分区司令部驻在交城山区关头村的一座经过日寇焚烧后由部队修补起来的古庙里。我们就在这里接待参观团。参观团的人员到后,带着一种惊魂未定的神色观看着古庙被枪炮弹和烈火摧残过的痕迹。据说他们在通过离(石)岚(县)公路封锁线时,途中看见日寇的炮楼和封锁沟,看见许多山头、路口、沟岔有我们放哨的民兵和荷枪携弹的秋收农民,他们便显得有些心神不宁;进入我布雷区后又看到东一块松土,西一块木牌,还有石灰撒成的圆圈,简直吓得不敢落脚。国民党那个姓张的顾问更是惴惴不安,使劲用手帕擦着鼻子尖上冒出的汗珠,也顾不上发表什么议论了。

我们向他们介绍了第八军分区的情况:军民在党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如何团结一致,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如何搞"劳武结合";如何围困并"挤"掉了日军的许多据点;如何派遣武工队插入敌人心脏——晋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威逼太汾路和同蒲路,破击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以及如何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等。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有的摇晃着头,有的把肩膀一耸,有的带听不听、带理不理地坐在那里,忽而皱起眉头,忽而翘动鼻子,或

者哈哈大笑起来。这倒不完全由于这些自称为"公正的观察家"们的见闻不广，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以自己固有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缘故。那位姓张的顾问，总是喜欢表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时用拐弯抹角、藏头露尾的口吻，尽量贬低我们的一切，和为国民党反动派降日、反共进行诡辩，好象他们和国民党的大人先生们逃到大后方避难，比我们拼死拼活地在敌后坚持抗战还要光彩似的。

第八军分区的战地医院（卫生所）是设在深山丛林中的土窑洞和草棚里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药品也万分缺乏，别说贵重药材，就是一般的磺胺都没有。"观察家"们看了这些，很不以为然。那位少校军医卡斯堡十分惊讶，他把双手一摊，喊叫起来："我的上帝，这能算医院吗？"我们的医务人员坚定地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在敌后的医院，我们就用它来收容、医治我们的伤病员。"并且告诉他们：由于日寇严密封锁，国民党政府断绝供给，我们才有今天的困难；但是我们用缴获敌人的医药、器械，用自己的双手，用草药，用土法，用医务人员的赤胆忠心，用全体官兵坚持抗战的顽强意志克服了当前的一切困难。卡斯堡听了默不作声。那个姓张的顾问，原想为大后方的国民党老爷们进行诡辩，后来也只好闭口不言。

大概他们以为我们真的有个象样的兵工厂，再三要求去参观，特别是福尔曼。实际上这个兵工厂，只不过是一个制造地雷、手榴弹和修理枪械的小型工厂而已，既缺原料，又少机器，主要是靠职工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自已熬硝、翻砂、配药，尽量利用废物完成生产任务的。"观察家"们当然看不上眼。从他们轻藐的表情上看来，仿佛在说：就凭这样低劣的武器装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对付一个军国主义强国——日本，那还能行吗？福尔曼以少有的热情对我们说："我们美国的军火事业空前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乐意购买和使用这种第一流的现代火器。贵方如果能得到这种奇妙的火器，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当然，贵我两国政府之间……"我们工厂的工作人员诙谐地对他说："我们并不想到福尔曼先生所说的美国军火工厂订货，我们有自己的货源，那就是依靠这些低劣的武器，用指战员非凡的勇敢精神消灭敌人，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只要敌人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现代火器，我们也就会有！

我们又带领他们去参观俘虏看管所。这里面看管着我二支队最近从忻（县）静（乐）公路利润村据点活捉来的八个日本兵。福尔曼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很怀疑，他认为这是把以前的俘虏拉来摆样子的。虽然经过对俘虏的逐个询问，福尔曼仍是半信半疑。

"观察家"们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单凭口头介绍和一般参观，是难以使他们信服的，只有带他们到前线，请他们实地看看八路军是如何战斗才好。这时，我军秋季攻势正在猛烈开展，而"观察家"们也提出了到晋中平原作战地区参观的要求。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带着参观团从关头起程，沿着吕梁山中的崎岖小道，向汾阳边山进发。穿过幽静的山谷，踏着落叶覆盖的密林小路前进。大约走了五十华里，太阳已经偏西，前面不远就是代家庄。两个侦察员跑来报告：隔山十五华里处发现四百多日本兵，已进占千年里、吴家庄一带，企图不明。根据敌我情况判断，敌人目前不可能是再来代家庄一带进行"扫荡"，也不会是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很大可能是经代家庄西南方向，去横尖镇或离岚公路以东或以西地区进行"扫荡"。只要我们很好地封锁消息，严密警戒，并取得群众的协助，敌人不易发现我们的行动。于是仍按原计划到代家庄宿营。

这天晚上，无论是侦察、警戒、构筑工事，一切都是很紧张的。这一切，"观察家"们都看在眼里，一个个沉默寡言，坐卧不安，偶尔在炕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敢脱，稍微有点响动，就"呼"的爬起来东张西望，问长问短。我们一再给他们壮胆，也是枉然。

东方发白时，鬼子果然经代家庄西南方向朝西走了。一场虚惊过后，小房子里又活跃起来。卡斯堡少校在胸前画着十字，福尔曼拿出带来的"威士忌"拉我们干杯，爱泼斯坦一面饮酒，一面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那个姓张的顾问也狂饮起来，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

九月十五日下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向阳镇。这儿离汾阳城约二十多华里，距赵庄约四五华里，距协和堡约十余华里。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据点炮楼上的日本旗和敌人哨兵步枪上闪闪发光的刺刀。

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活动在汾阳边山一带的我六支队一部配合游击队、民兵袭击了汾阳飞机场和火车站。第二天晚上——九月十六日，我参战部队又分头袭击汾阳城附近敌人的发电厂和火柴公司。与此同时，我警戒部队数次击退大营盘和协和堡援敌，乘胜袭击了大营盘以及汾阳南关和东关。

这两个晚上，"观察家"们都登上坡头村的堡墙观看了夜战的情景。只见汾阳上空硝烟弥漫，烈火映天，枪炮声和手榴弹声响个不停。虽然秋夜寒气逼人，"观察家"们却迟迟不肯离去。兴奋之余，他们又以惋惜的口吻提出："怎么没有俘虏和缴获呢？"看来他们对我军在敌后如何坚持抗战，如何取得战斗胜利，仍未信服。

第三天晚上，我们决定攻打协和堡，这也是秋季攻势计划中要打的一个据点。协和堡是汾阳城的一个外围据点，常驻的日军、伪军加上伪区公所人员，共二百人左右。它控制着从汾阳边山通往汾阳城的几条道路和山沟的沟口，据点有一丈多高的堡墙，明墙暗堡，分布四方，枪眼炮眼，层层密布，堡门紧闭，吊桥高悬，强攻硬打，自然困难很多。根据据点周围群众基础良好，据点内又有我们的内线关系，因此，决定采取奇袭手段。

夜深了，协和堡周围一片寂静。十二时整，三颗红色信号弹飞上了夜空，战斗开始了，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了起来……战士们高度地发扬了坚决勇敢和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仅仅一个多小时，便把协和堡的敌军全部歼灭了。

“怎么，战斗已经结束了?”

“你们没有飞机、大炮，怎么能够这样迅速打下据点、消灭敌人呢?”

“观察家”们用惊疑的口吻这样发问着。象这样巧夺智取的战斗，他们当然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告诉他们，离天明还有好几个小时，大家先睡个好觉，天明再看俘虏和战利品吧。

翌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六支队的战士们、游击队员们和民兵们扛着缴来的三八大盖、歪把机枪，押解着俘虏，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向阳镇走来。汾阳城郊、裕家沟、上下池家庄和协和堡一带的乡亲们，也都赶来慰劳子弟兵。老大娘提着鸡蛋，小娃娃抱着西瓜，年轻的妇女拿着新做的军鞋，小伙子们赶猪牵羊，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朝这儿走来。阳光是那样灿烂，人们的欢呼声震荡着山谷，惊飞了崖壁上的鸽群。这种军民同苦苦，共患难，相依为命，情同骨肉的情景怎能使人们不激动呢!战士们挑选了一些战利品——日本旗、军官服、肩章、领章、护身符、子弹盒、饭包、糖果、罐头和烟酒送给“观察家”们。我们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把日本军官用的战刀和一支手枪当作纪念。就在欢呼协和堡战斗胜利的时候，“观察家”们还又一次看到我军如何英勇迅速地击退由汾阳城日军旅团部派出来企图对我军实行报复追击的日军。

“观察家”们对我党我军虽然有许多一成不变的看法，但是，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们也只得承认八路军确立在敌后坚持抗战，并且很能打胜仗。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怎能看到这样的军队、这样的人民呢!“观察家”们一面忙着请六支队的指战员们在送给他们的缴获的日本旗上题字，一面东奔西跑地拍照，不时还拿着本子在记着什么。卡斯堡少校时而跑到绷带所看看，时而钻到俘虏群里询问……

当翻译同志告诉他们，我们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时，“观察家”们也都高举右臂同我们一起欢呼。只有那个姓张的顾问，灰溜溜地站在一旁，无精打采，假装着似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

红日已经上升到半空，“观察家”们仍然在人群中穿来走去。他们几乎忘记了饥渴，经我们再三催促，才兴致勃勃地欢呼着离去。

“西安某些高级人士说，中共已六年不抗战了，美国政府必须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中共。这一次，我看到了八路军英勇作战。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到过欧洲和非洲的许多战场，象他们这样军民合作打敌人的情景，从来没见过……”“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延安和军区领导人所说的一切，都证实是千真万确。我一定把这个事实报道给全世界”这是福尔曼、爱泼斯坦后来所发表的观感。

（罗贵波）

材料二　火炮传奇
——新四军抗战轶事

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日本造九二步兵炮。面对这庞然大物，知情者无不为新四军和抗战民众的勇敢、智慧而自豪。

夺　炮

1944年3月29日上午，日本侵略军南浦旅团小林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带了由几匹大洋马拖着的一门九二步兵炮，从浙皖边境扫荡归来，正向浙北长兴县杭村狮子口方向折回据点。驻扎在附近的新四军十六旅“老虎”团(即四十八团)得知，团长刘别生一面电告旅部王必成司令，一面部署主力营火速抄小道赶往杭村，抢占有利地形。其中，三营沿山脚直插杭村正南，在广(德)宜(兴)公路旁的山坡竹林中埋伏，堵住敌人归路；一营迂回至杭村东南，抢占牛头山山头阵地，从侧面配合，形成两面夹攻之势。

各部队分头行动。三营战士们刚到阵地，敌人已在眼前了。三营长徐超一声喊：“打!”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哇哇乱叫。这时，一营长曾旦生也已带着部队抢占了牛头山高地，命令部队猛烈扫射，整个山坳里烟雾弥漫，杀声震天。

但敌人很快清醒过来，重新组织兵力，抢占了杭村西南的小山包和一些坟墩，负隅顽抗。

这时，旅部王司令也赶到了牛头山前线指挥所。他猫着腰，跑到迫击炮排排长戴文辉旁的阵地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阵营。突然，他将大手在山石上一拍，对戴排长高兴地说：“你瞧!鬼子那门九二步兵炮，看见吗?”戴排长接过望远镜一看，只见敌人正在移动那门炮，准备向我军阵地炮击，他也激动地大叫：“大炮!大炮!”戴排长多么希望将这门大炮夺过来武装自己的炮兵。这时王司令命令道：“准你用三发炮弹，打!”戴排长迅速目测好距离，只听得“轰”地一声，第一发炮弹不偏不倚落在那门九二炮的附近爆炸，紧接着又发出了第二发炮弹。王司令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连说：“打得好!打得好!”原来这两发炮弹的炸点都避开了九二炮炮身，却轰倒了拖炮的马群，使那门炮歪着身子陷进了路边的水沟里。王司令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抽出驳壳枪，大声命令：“出击!”顿时冲锋号响彻

山谷，喊杀声威震长空，指点员个个犹如猛虎下山，杀向敌群。不消10分钟，鬼子、伪军在我部的奋力拚杀下尸横遍地，残兵败将丢下了那门九二炮，狼狈地往门塘口方向逃窜。这门步炮遂落入新四军手中。驻南京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茨闻知气得暴跳如雷，连夜调兵遣将，限期找回大炮。

护　炮

我新四军部队为避敌锋芒，决定转移。可这门大炮怎么办，它体积大、份量重，加上部队要爬山过岭，是无论如何不能随队带走的。后来只好把它分解开来，转移到浙皖苏三省交界的白岘岭。

鬼子并不死心，紧紧跟踪，扬言要同我军决战，梦想在战场上夺回这门大炮。后来听说大炮已经埋藏了，就改变策略，用洋镐、铁锹漫山遍野地在树林、山沟、坟包里东刨西挖，把方圆四五十里的山区闹翻了天，可连个炮影子也找不到。鬼子队长小林气急败坏，把那些汉奸、便衣打得一个个鼻青脸肿，对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查不到大炮下落，就统统的死啦死啦！”又在各村道口贴出告示：“凡报告大炮下落者，皇军赏法币20万。”一连过了3天，无人通风报信，恼得小林手足无措。

新四军老虎团与鬼子在山里捉了几天迷藏后，又将拆散的大炮转到罗界这地方，交给驻扎在这里的团部被服厂厂长吕道明。吕厂长当即找了一些骨干商量对策。大家想了好久，就是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掩藏地方。最后还是罗界村民兵队长陆翔忠的父亲出了个好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有个内线金保长带着陆翔忠去找小林队长。半路上，碰巧遇到了下乡抢掠、找炮的日军少佐。金保长赶忙迎了上去：“禀、禀报太君，要找……找的大炮有着落了，就……就在罗界村西的大山上。”少佐一听，眼睛一亮，死死盯着金保长：“你的欺骗，死啦死啦的！”

“没……没半句谎……谎话。”金保长又指着陆翔忠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是……是他发现后告诉我的。”

那少佐从马上跳下来，走到陆翔忠面前，一把抓住他胸前衣襟，“呼”地拔出佩在腰间的战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狼嚎似地叫道：“你的，亲眼看见的？”

陆翔忠镇定地回答：“大炮我没看见，但我看见地上有炮轮子的印子。”

“在哪儿？”

陆翔忠扭头指了指一个山坳，说：“就在那里，不远，最多6里路。”少佐这才咧嘴笑了，向所带的部队一挥手：“走，你的前面的带路！”

陆翔忠指的这条路，其实何止6里，足足10里有余。这条路还又窄又滑，少佐不得不从马上爬下来步行。待他们上了山走到一个洞口时，鬼子和伪军已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时，带路的陆翔忠突然装模作样地惊叫起来：“你们看，这不是炮轮子的印子吗？”一个鬼子上前一看，果然在洞口的泥草地上有着清晰的九二步兵炮的轮辙，一直通向洞内。这下，气喘吁吁的日伪军顿时象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少佐立时从地上跳起来喊道：“统统给我进洞的搜！”

鬼子伪军呼呼啦啦就往洞里钻。起初，借着洞口的一点亮光，可以辨路，但越往里走就越黑，而且越来越宽大，几十个人进去仍显得挺空旷，还不时有蝙蝠飞进飞出。伪军和鬼子吓得脊梁骨都凉嗖嗖的。少佐命令伪军点上松明火把，强迫他们继续往里搜。这洞也确实奇怪，大洞套小洞，小洞穿大洞，简直象一座迷宫。过了二三个小时，直到太阳快落山，还是一无所得，急得少佐心慌意乱起来。这时身边的翻译献了一条“妙计”：“少佐，皇军损失大炮，看来必在此洞无疑，但少佐已不便久留，还是叫人把守着，回去带专用工具来，继续仔细寻找。”少佐已想尽快离开山洞，就顺水推舟，命令两个小队的伪军留在洞口看守，又让翻译拍了几张大炮轮撤的照片，就带着大队人马返回据点去了。

就在两个小队的伪军在洞口骂爹骂娘、埋锅烧饭、安排住宿时，不远的茗峰山顶罗界村的民兵和新四军吕厂长等正沉浸在一片欢庆声中。原来，他们为了迷惑敌人，兵分两路，一路去村西山岔石洞口印上大炮轮辙，引旅敌人；一路便把3只装有炮架、炮轮、炮栓、瞄准镜的大木板箱子，从群众家里连夜抬上茗峰，分散埋入地洞；还有一只崭新棺材，里面装着大炮筒子，也被埋进了峰顶一个名叫“刘秀脚印”的大坑。

鬼子在山洞里以及附近山村折腾了20多天，结束还是一场空，鬼子司令部无法下台，就将那个丢炮的鬼子中队长小林枪毙了事。

用　炮

1944年8月23日，十六旅集中了老虎团和四十六团、独立二团，在长（兴）宜（兴）一带60余里的战线上对日伪军发起了战役攻势。为配合战斗，十六旅的军工科同志取回了九二步兵炮配件，检修装配好后，用来装备部队；还土法上马，翻修了几发炮弹。

战斗开始了，由老虎团主攻长兴县城的外围据点。深夜11点，全线开始进攻。一、二营分路直扑各个敌伪据点，三营为预备队。

二营进攻白埠据点。先是开展政治攻势，派俘虏向碉堡里的伪军喊话。伪军中没有动静。团长刘别生命令把大炮推出来。炮手挥舞一面小旗高喊：“预备——”炮楼上伪营长闻听连声叫道：“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一营主攻合溪镇。深夜11时，一营冲进镇内，迅速解决了伪营部和伪区公所，接着又包围了两个连。这里的战斗非常激烈，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1时，连克街西街南两个碉堡。3时许，街北大碉堡的敌人还在拚命顽抗。那座碉堡又高又大，而附近几十米的地形又很平坦，战士们很难接近。

就在这时，那门九二步兵炮来到了。营长果断地下令："发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把那炮楼的顶炸上了天。战士们乘势发起了冲锋。

由于九二步兵炮先声夺人，经一昼夜激战，新四军连克13个据点，摧毁敌堡60余座，收复国土1500余平方里，解放了6万余居民，获得了近年来江南区我军最大一次胜利，受到军部电令嘉奖。

（泉冬，《党史纵横》94年9期）

359旅南征北战

背景介绍

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扩大我党我军在南方对日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在延安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派八路军一二O师第359旅主力由陕甘宁边区南下湘粤边，打通与东江抗日游击纵队的联系，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0月31日，359旅主力第1梯队奉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认)，下辖四个大队，共有指战员四千余人，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随即整装待发。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另有两个干部团共九百余人一起随军南下。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开始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部队从陕北东渡黄河，越过同浦路，进入太岳解放区，然后又由太岳区南渡黄河，越过陇海路，插向鄂豫边。沿途远征的将士们饱尝行军之苦，迭经浴血奋战，冲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和国民党顽军的不断阻击，才得以长驱南进。翌年1月27日，南征部队转战抵达鄂豫边之大悟山，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并在大悟山获得短期休整。2月14日，南下支队遵照中央同年1月6日给鄂豫皖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和2月初鄂豫皖区党委会议的决定，在该区第四军分区第40、41团的配合下，从大别山出发继续南征；原随军南下之两个干部团，则奉命留在鄂豫皖区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师做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月19至23日，南下支队与第40、41团一起，冲破日军的阻拦，分批从鄂东黄岗的下巴河信蕲春的田家镇渡过长江，进入鄂南的鄂城、大冶、阳新地区。

南下支队渡江前后，共歼阻敌和尾追之敌二百余人，并迅速摆脱了江边日军的尾追。随后，部队又粉碎了日寇对鄂城、大冶地区的报复"扫荡"。接着，为了打开鄂南的局面，以寻机继续南进，部队直插湘鄂边之大幕山区。1945年3月上旬，南下支队在第40、41团的配合下，先后攻占大幕山和邻近的金塘、大源等地，给妄图阻挠我军南进的国民党顽军以有力的打击，前后共歼顽军三百余人。与此同时，南下支队还打垮了通山日军的进攻，歼敌百余人；配合地方党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使整个鄂南很快出现了一派抗日的大好形势。3月下旬，部队为了争取在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建立一个小型后方，以作必要的人员和给养补充后再求南进，遂由鄂南向湘东进军，并乘隙夺取了平江城。但在部队进占平江后，由于屡遭国民党顽军王陵基部重点围攻，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南下支队于4月初获毛泽东电示后，决定改取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足点，然后逐步向南发展的计划，并改番号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将原辖四个大队扩编为五个支队。按照上述计划，部队于4月15日撤离平江向湘北岳阳、临湘地区前进，旅又向东转至鄂南通山、崇阳地区，从而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开始了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的新的斗争。

同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临时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由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任行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员。同时。为扩大影响，还建立了1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南下支队在第40、41团的配合下，先后转战于赣北、湘北和鄂南地区，为开辟湘鄂赣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由于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击和攻占日伪据点，并在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力争取伪军反正，对国民党顽军则严守自卫原则，因而不但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而且使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逐渐在敌占区站住了脚跟，并迅速地扩大了解放区。至同年7月，终于在湘鄂赣边区胜利地开辟了一块南北长二百六十余里，东西宽三百六十余里，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江南新解放区。

1945年7月7日，南下支队在完成了创建湘鄂赣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后，遵照中共中央同年6月24日指示，以主力取道敌占区沿湘赣边界继续南进，留下第3支队协同新四军鄂南部队继续执行发展湘边的计划，就地坚持抗日斗争。8月5日，南下支队主力从湘潭、衡山间渡过湘江，10月在衡山南湾地区获悉日本即将投降，部队旋即按照中共中央11月指示，一面积极投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面作应付内战的准备。8月28日，部队在冲破日、伪、顽军的阻挠后，进抵粤北南雄、始兴地区，与前来迎接的东江纵队一部会合。此后，南下支队主力本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与东江纵队合力开辟湘粤边根据地，但因受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处境极其艰难。为

顾全大局，于翌日毅然挥师北返，并将行动计划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11月初，南下支队主力经长途跋涉回到鄂豫皖解放区，再度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并依中共中央指示撤销了南下支队的编号，加入了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序列。

当南下支队还在湘鄂赣边为创建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时候，359旅第2梯队曾奉命于1945年6月18日由陕甘宁边区出发南下，拟同南下支队会合后一起行动。但当该部进至河南新安地区时，因闻日寇已宣布投降，旋即奉命折赴东北，以致没有实现上述会师计划。后来，该部加入了东北我军的战斗序列。

材料：

- 南下支队誓师
- 南下支队巧渡长江
- 突破八百里秦岭
-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材料一　南下支队誓师

十一月一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那是陕北初冬的一个清晨，延河结着薄冰，被朝霞映得晶莹闪亮；宝塔山在淡淡晓色中，显得更加雄伟。在抗日将士出征的日子里，革命堡垒延安，显得分外庄严，令人倍觉亲切。

这一天，部队很早就从延安四郊向离城约三、四里的东关飞机场开发。南下支队的誓师阅兵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指战员们现在用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胜利果实，把自己武装起来了。干部、战士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挂着新的子弹袋，背着新被子和新毛毯。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队队高头大马，排列在队伍后里，更显得威武雄壮。

飞机场的北面正中，早已搭起一座高高的主席台。台的上端，高悬着“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的大幅横额，左右挂着两幅特大标语：“中国人民的军队胜利万岁”、“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主席台正前方的旗杆上，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各路队伍聚集在广场上，嘹亮的歌声，伴和着高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红旗和鲜花，把整个广场点缀得分外壮观。

九点四十分，军乐声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由王震同志陪同，健步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上掌声骤起，一片欢腾。

南下支队第二大队长陈冬尧同志庄严宣布大会开始。

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进行曲。接受检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会场的东边朝着主席台前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地从主席台前走过，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并表示他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完成党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

阅兵式后，毛泽东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他讲得言简意赅。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就是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面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象“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的，他衷心地祝贺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在大会上，朱德、任弼时、叶剑英、贺龙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都先后讲了话。最后，王震同志走向前台，举起右手，带领全体南征指战员向党中央庄严宣誓：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华南人民。我们每个人都要坚决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大会在万众一心的口号声中结束：“打到南方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选自《忆南征》，王首道）

材料二　南下支队巧渡长江

渡江前夕，指战员们都集结在新侨附近的江边，大小船只则潜伏在芦苇丛中。大家都急切地等待着启航的命令。就在这时，从九江方向飞来了两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下盘旋，投下几颗照明弹，把整个江面和两岸照得如同白昼。不一会，敌机又胡乱投下几颗炸弹，有的落在江心，掀起一、两丈高的水柱。部队听到飞机轰鸣，早已疏散荫蔽起来。敌机没有发现我军踪迹，很快就飞走了。战士们从地上一跃而起，拍了拍满身尘土，小声小趣说：“这鬼子飞机脾气忒怪。我们刚刚上船，他就飞来送行；我们还没动身，他倒先飞走啦！”

时针指着二十点，王震同志发出了启航的命令，同时通知各部队：“敌人如不开枪，我一概不准射击。”转瞬，只见百多只大小船只一齐掉头向南，战士们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船工们使劲摇动船桨，江水在船底发出哗哗的响声。这一带江面大约有两、三里宽，每只船摆渡一次约需二十多分钟。指战员们心里都异常焦急，一些南方战士都去帮着划桨。所有的人都睁大两眼，警惕地注视着江面上的动静。

蓦然，从下游隐隐传来一阵马达声，渐渐由远而近。有的战士小声惊呼："敌机又来了！"各船指挥员命令大家保持镇定。仔细观察，原来不是飞机，而是敌人的巡逻艇。开始只发现一艘，随后发现共有三艘。渡船这时正在江心。大家心里都在暗自嘀咕：在这时候和这样的地方遇上敌人，该是多么糟糕啊！有的北方战士，由于缺乏水上作战经验，神色不免有些惊慌，担心在水上难以施展自己的本领。多数指战员这时都很沉着。他们眼睛盯着敌艇，枪口对着敌人，只要一声令下，就立即投入战斗。

敌艇越来越近了，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战士都按着扳机，屏住呼吸，瞪大两眼看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半晌，敌艇上影影绰绰地有人上前厉声发问：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鱼的"船工们镇定地回答。

"打鱼？哪来这么多船？"

"刚下过大雨，正好打鱼哪！"船工们确实大多是打鱼出身，雨后也正是他们捞鱼的好机会。过去他们在江心碰到敌艇非止一次，每次都是这样回答。敌艇上发话的声音沉默了。过了一阵，才又粗声恶气地说：

"哼！你们要有不轨行为，可得小心脑壳啊！"

"是咯——"船工们拉长声调回答，声音里掩饰不住笑意。

敌艇又停了一会，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也就不再问话。接着开足马力，耀武扬威地向西疾驶而去。顿时，我全体指战员都如释重负，一下驱散了紧张不安的情绪。

夜色渐渐深沉。满载着我指战员的最后一条船终于渡过了大江。战士们一边交付船费，一边向船工们表示感谢，连声称赞他们机智沉着地应付敌人。

这天晚上，我第一大队也在新桥以东十余里的亚口渡同时渡江。他们事先得知长江对岸有一个日伪军的外围据点，由一个班的日寇和数十名伪军驻守。在该据点西南五里，还有一个日伪军的大据点，地名叫黄山口。一大队要在亚口渡渡江，必须先派一支精干部队将此外围据点拔除，才能保证全大队渡江无虞。从昨天起，大队长陈外欧和政委李铨同志就分头进行思想动员，侦察地形、敌情，最后定出了一个镇密的渡江计划。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们才同主力部队同时启航南渡。警卫连迅速占领了北岸的滩头阵地，掩护大队安全渡江。紧接着，由二、三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组成的前卫营，首批鱼贯登船。他们破浪前进，顺利抵达南岸，直到距敌外围据点二、三百米时，才被敌哨兵发现。前卫营按照预定方案，在轻、重机枪掩护下，飞快越过敌据点外壕，以奇袭方式，让少数战士在据点正面佯攻，大部分战士则分两路从右侧攻进据点。据点里的日伪军，在一片激烈的爆炸声中从睡梦中惊醒，丢下几具尸体，迳向黄山口方向仓皇逃命。敌外围据点，很快被我前卫营占领。第一大队于深夜三时，安全渡过了长江天险。

二月二十四日拂晓，我南下支队全部踏上了长江南岸。战友们胜利地会合在一起，都忍不住欢呼雀跃，互相祝贺：

"好啊，天堑长江，到底被我们跨过来了！"

"原想在江上和敌人比试个高低，尝尝当海军的滋味，不料敌人不肯露头，咱们还是干自己的本行——当个陆军算啦！"

"哼！鬼子和遭殃军想用最后这道关卡消灭咱们，这一下可真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呀！"

早晨，王震同志穿着他那件破皮衣，轻快地走在队伍中间，他虽然脸上露着倦容，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他一边迈着大步，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说得很对：长江自古被称作天险，敌人以为凭着这道天险就能阻挡我们，消灭我们，他们的阴谋到底破产了。我们渡过了南征途中的这道最大的、也是最后的障碍，敌人就再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继续南进了。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啦！"战士们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司令部参谋肖林达同志高兴地说："司令员，我们应该打个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报喜。"

王震同志笑着点头说："对，快向延安发报！"

报务员迅速打开发报机，向延安报告了我军胜利渡过长江的喜讯。不久，我们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

庆贺你们安全南渡长江，并预祝你们胜利前进！

（选自《忆南征》，作者：王首道）

材料三　突破八百里秦岭

陕南八百里秦岭山脉，到处是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沟壑，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加上这里被国民党统治多年，地主和官府煎逼交迫，许多地方的群众，已逃走一空。部队当时最突出的困难是没有粮食，时常一、两天找不到东西裹腹。偶然在山地里找到一点包谷、高粱、土豆等，简直成了救急的好东西，同志们用它来充饥，然后在地里给老乡留下光洋。青嫩的苞谷刚刚吐出红缨，指战员们连穗子一起吃了，高粱连杆子也一齐下咽，土豆、红薯还只有拇指大也吃了。还有山上没有成熟的野果、野柿、苦涩麻口，但也硬往下咽。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王震同志依然注意部队的纪律教育。他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大布告，贴在路旁一棵大树上，使每个走过的同志都能看见：

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王震

王震同志常说："越是环境艰苦，就越是要发扬我军爱护群众的优良传统。"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有一天战士们买到一些米，他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顿米饭，自己只

在伙房吃了几块锅巴。

部队在日夜行进中，地上有敌人围追堵截，天上有敌机狂轰滥炸，六、七月盛夏，山区气候多变，忽冷忽热，经常冒雨疾行，就地露宿，同志们个个都已是衣衫褴褛。道路泥泞，战士们又没有鞋穿，一双赤脚在泥水里泡烂了，山路上的石头又象刀样地割脚，许多战士脚底划破一道道口子，走起来有如钻心似地疼痛难忍。特别是长期没有盐吃，战士们都面色发黄，浑身无力，还要翻山越岭，涉水渡河，有时一天数战，部队处于极度疲惫之中。王震同志经常鼓励同志们战胜艰险，克敌制胜。他对大家说："要打漂亮仗，打胜仗，不单在指挥上、战术上和勇气上要压倒敌人，而且要在克服困难、艰苦行军上同敌人比赛，胜过敌人。"在秦岭的日日夜夜，他拄着根棍子，穿着一双破草鞋，迈着坚实的步子，率领部队顽强地前进。那时，战士们常常看见他走在行进的队伍前面，一边走一边凝神深思，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部队司令员肩负的重担和承受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每个干部和战士。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他没有时间好好理发和刮胡子，头发长得老长，脸上又生满络腮胡子，同志们看见他都说："现在真是王胡子了！"他摸着胡子，点头笑着说："我下了决心，等打回延安，见了毛主席，再刮胡子！"

部队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团结同志，热爱战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全旅同志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提高了胜利信心，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从汉口来到中原军区的女战士汪卓敏同志，虽然身体很差，也参加了突围。她在队伍中却象奇迹似地变得越来越坚韧结实。在陕南战斗的夜行军中，山陡路滑，又没有树木，一步石级有两三尺高，一不小心就会葬身万丈深沟。她浑身充满胆气，有树攀树，没树就用手指挖进泥巴和石缝里爬上去，多高的山也爬过来了。十九岁的女战士杨平，是湖北京山县人，十四岁参加新四军，分配在电台工作。在漫川关突围时，生平第一次碰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心里发慌，她狠下决心："一定要拚命前进，紧跟着队伍，不掉队，不当俘虏。"她跟着司令部东冲西突。有一天走的全是没人走过的路，她咬紧牙关，翻山越岭，穿林涉涧，天擦黑了，才突出重围。她一路上没鞋穿，山路走烂了脚，生吃包谷拉稀浑身无力，她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拚到延安，见见毛主席，死了也高兴。"她就这样顽强地拖，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坚持工作，胜利地随军回到了延安。

八月十五日，我军在华阳地区打退了敌人的两路追兵，采取迅速行动，连续几天翻越几百里无人烟的荒山丛林，到达川陕公路上的五里庙。十九日夜，我前面部队已通过公路，这时敌人也奉命向五里庙开进，其先头部队发觉我后卫部队尚未通过，马上埋伏于公路两侧。少顷，我后卫开过，敌突然发起袭击，将我重机枪夺去，形势十分危急。我留在公路两面山梁上的警戒部队，立即用火力封锁了敌军道路，截断了敌人增援，我后卫也用刺刀同敌人展开肉博。战士葛庆增脚掌腐烂化脓，走路都很艰难，他以最大的革命英雄气概，勇猛地冲入敌群，夺回了机枪。敌不敢久战，仓惶溃逃。我军胜利通过了川陕公路，趁敌人还来不及调兵控制渭河和布防陇海铁路时，急行军北渡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抵赤沙镇。

敌人妄想凭借川陕公路、渭河和陇海铁路围歼我军的阴谋破产了。我军终于把八百里秦岭踩在脚下，来到渭水平原。战士们一路上以野菜、野果充饥，个个都肚胀拉稀，沿路都可见稀屎。大家开玩笑说："这下可好了，行军不用路标，后面的部队看着稀屎走，一准没错！"王震同志风趣地笑着说："敌人是属狗的，老是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不放，这回可让他们好好地闻一闻我们的屎臭！"

三五九旅的艰苦斗争，吸引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打乱了敌人围歼我中原突围部队的计划，使我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乘虚于七月三十一日越过荆西公路，与刘庚、龚德芳等同志率领的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于洛南之留先坪，得以活跃于鄂豫陕边。

柯仲平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

李郑大军进鄂陕，
王震将军入秦川。
南北形成磨两扇，
磨死老狗胡宗南。

（选自《忆南征》，作者：王首道）

材料四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去岁湖南沦陷　日寇肆虐横行
皆因抵抗不力　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　消灭万恶敌人
实行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　军队地方士绅
不分阶级党派　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　展开民族斗争
独裁贻误国事　专制违反民心
唯有迅速改革　方能耳目一新
实行三民主义　恢复中山精神
建立联合政府　制止一党横行
取缔贪官污吏　扶持好人正绅
厉行减租减息　改善社会民生
取消苛捐杂税　买卖务求公平
反对强迫兵役　欢迎志愿从军
保障人权财权　维持社会安宁
严惩汉奸特务　悔过可以宽容

中国有共产党　华北有八路军
满布大江南北　则有新四大军
广东广西一带　抗日起义纷纷
德寇正在瓦解　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英美中法　保障战后和平
世界进行很快　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　一致义愤填胸
起来保乡卫国　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　敢于阻扰军容
自当痛击不贷　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恺切布告　仰各一体遵循

司　令　王　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

背景介绍

1944年秋，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因不堪忍受盛世才、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残暴统治，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斗争，并在三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因这场革命发生在上述三个地区，故称为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革命运动影响和支持下，在苏联的帮助下，在新疆各族进步分子的组织和带领下爆发的。这场革命斗争前后坚持达五年之久，在曲折中前进，在胜利中发展。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为新疆各族人民争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了西北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挫败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苏反共基地的阴谋，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为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8月，毛泽东在致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关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信中指出："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对三区革命的性质和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材料：

-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
-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大事记要

材料一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10月，包围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兵临莫斯科城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紧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一贯搞政治投机的新疆军阀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1942年8月彻底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下令逮捕了应邀前来新疆工作的全体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秘密杀害了中共优秀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逮捕和杀害了大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进步分子和无辜群众，使新疆特务横行、冤狱遍地。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族人民生活在极度恐怖的环境之中。

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后，还中断了新疆与苏联的边境贸易，新疆的传统出口商品如牲畜、皮毛、肠衣等无法运出，各族人民需要的生活、生产用品货源枯竭，如茶叶、布匹、火柴、糖、纸张、铁皮等。加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法币大量流入新疆，新疆省政府加速印发省币，以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4年伊犁的物价比1943年平均上涨七倍半，而盛世才和国民党政府对各族人民的横征暴敛与日俱增，各族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人被迫越境去苏联，一些人则铤而走险。新疆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新疆和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在盛世才伪装进步时期，苏联曾多次出兵帮助其巩固政权，推行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较为进步的政策。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后，撕毁了和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迫使苏联撤走在新疆的所有顾问、专家、教官、地质考察团和驻哈密的红八团。这既严重损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也损害了正在与德国法西斯作战的苏联的利益。加之美帝国主义势力积极染指新疆，更引起苏联对二次大战后自身安全和战略格局的关注。因此，对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新疆当局的斗争，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在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均设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在苏联学习的新疆进步青年和被迫逃苏的人员，作为回新疆后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还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出版了以动员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新疆，在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

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新疆少数民族中一些受过中国共产党人教育和影响的进步青年，一些曾经在苏联

学习过的知识分子以及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各方面人士，先后在伊犁、塔城、阿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地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解放组织”、“阿山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等秘密组织。它们成为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机构和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的桥梁。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为三区革命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

1944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变化。国际上，苏联红军不仅把德国法西斯军队全部赶出苏联国境，而且解放了东欧一些国家，并于9月进入德国本土作战；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上节节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对日本侵略军的局部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国民党战场上，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兵折将，丢失大片国土，激起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改革的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勇气和决心。

早在1939年，盛世才曾下令收缴牧民们用作生产和自卫工具的枪支，遭到牧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清枪”和“反清枪”的斗争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阿山地区曾引起规模不等、持续不断的武装反抗。1943年，新疆省政府又下令强迫各族人民捐献10000匹军马，谓之“献马运动”。这一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山广大贫苦牧民身上。一时民怨沸腾、群情激愤，使本已激化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清枪”和“献马”成了三区革命的导火索，革命如上弦之箭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选自《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材料二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大事记要

一、伊宁暴动

1944年4月9日　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伊宁县城(今伊宁市)成立，艾力汗·吐烈任主席。

这个组织的建立不是偶然的。是在当地出现了一批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在苏联学习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进步分子，并在他们的推动下，经过长期酝酿，联合了当时受盛世才、国民党的迫害，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政治势力组织起来的。

10月　“阿山革命临时政府”在青河县布尔根河成立。乌斯满·斯拉木为政府首脑，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为政府副首脑兼军事总指挥，拉提甫·穆斯塔帕、热马赞·勃力木、毛拉斯拉木·司马义也夫等10人为委员。同时，将阿山游击队整编成9个大队。

11月4日　“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要兵力已调往巩哈县一带，守城的1500多名军警又分散在伊犁专区警察局、艾林巴克、飞机场、鬼王庙、司令部、实业公司等地的情况，一面在城内秘密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到巩哈县乌拉斯台要求巩哈游击队立即进攻伊宁，以便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伊宁。

11月5日　伊宁街头到处出现“打倒压迫人民的政府”、“穆斯林联合起来，驱除汉人、东北人出新疆”、“革命胜利万岁”等内容的标语和传单。伊犁专区警察局急电新疆省军政当局称：“伊宁暴动即将爆发，为暴动而准备的枪械已送入市内。”

11月7—10日　7日凌晨，巩哈游击队开始攻打伊宁，城内少数民族群众纷纷响应。在数天激战中，先后攻占六大政策街、苏丹库克、西沙河子等地，并控制了西沙河子大桥，占领女子中学高楼，用火力封锁了专员公署和通往专区警察局、实业公司等处的重要路口，击毙了刘秉德。曹日灵一面急令十九团第一营坚守专员公署、专区警察局、实业公司各处，一面急调在巩哈县的十九团第二营回援，同时急电驻精河、登务斯口的二十一团增援伊宁。

11月10—12日　10日拂晓，巩哈游击队会同城内军事指挥部向伊宁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游击队兵分二路，重点攻打守军司令部、专区警察局和实业公司。色益提率领的游击队在群众配合下，激战2小时，攻占了守军司令部。因色益提身受重伤，游击队改由马那甫汗等率领，激战到12日，又攻占了伊宁县政府、县警察局和专员公署。与此同时，艾尼率领的另一路游击队在群众配合下，经过激战于12日攻占专区警察局和实业公司，共歼国民党军1个营的兵力。驻守在第二仓库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少数民族士兵400多人起义。至此，伊宁城区全被游击队占领。

曹日灵率领守军残部、官兵眷属、从巩哈县回援的部队以及各地逃来的官吏、汉族群众共3000多人，撤至城郊的飞机场及艾林巴克、鬼王庙两处高地，固守待援。只有高炜在下令枪杀了专区警察局内在押的部分各族群众之后率少数人渡过伊犁河逃往宁西县。

11月12日　“伊宁解放组织”在维(维吾尔)哈(哈萨克)柯(柯尔克孜)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为“临时政府”——编者注)，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推选艾力汗·吐烈、阿奇木伯克·霍加、阿不都肉甫·马合苏木等16人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推举艾力汗·吐烈为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为政府副主席、阿不都肉甫·马合苏

木为政府秘书长。大会决定着手组建"临时政府"下属各机构和出版"临时政府"机关报，把军事指挥部改为"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部，阿列克山德洛夫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各地作战的所有武装力量。

1945年4月24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毛泽东4月24日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武力镇压事件，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即指新疆三区革命——引者注），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关怀和支持。

二、和平谈判

7月29日　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新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暴力统治》的报道，指出：新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当局暴力统治的事件，从去年3月起迄今未停。国民党当局派遣了数万大军前往增援镇压，但新疆少数民族反抗者的队伍日益壮大。去年11月，反抗者一举攻占了新疆北部重镇——伊宁。接着，又相继控制了伊犁和塔城地区。目前，反抗者的势力正在朝着迪化方向发展。

8月13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代表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所附各项协定。在该条约所附换文中，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政府则表示："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9月14日　国民政府召开党政军联席会研究新疆问题。白崇禧在会上指出：现在"匪军"陷乌苏，进逼迪化，南疆蒲犁失守，拜城失陷。北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为"匪"所占。通甘肃道上之七角井"匪"迹出没其间，迪化不陷亦成孤立。全疆危在旦夕，是诚可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墨迹未干，而情况逆转如此，出人意料之外。

10月17日　三区谈判代表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三人，在刘泽荣陪同下到新大楼与张治中见面，邓文仪、彭昭贤、王曾善、屈武会见时在座。

张治中首先作了以恢复兄弟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为主旨的讲话，接着说明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介绍三区谈判代表系伊犁暴动人民代表之原情，最后征询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三人对和平解决问题的意见。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三人表示：因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尚未取得苏联政府的承认，所以苏联政府介绍我们为伊犁暴动人民代表，希望能先得到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具体意见和方案。

1946年1月2日　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与张治中在《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放武装冲突之条款》上签字。

3月12日　张治中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新疆问题解决方案》的专门报告。指出：新疆和内地各省不同，中央应只统管国防、外交、币制、交通与司法，其他一切尽可以帮助和扶植当地少数民族自办，逐渐使他们能够自己治理自己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报告同时强调新疆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新疆的各族人民永远是中国的人民。

6月18日　国民政府发布政令，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任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汉·沙赫德拉任副主席。但1947年后，因国民党方面与三区方面在很多问题上分歧加深，联合政府破裂。

三、解放新疆

1949年7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布向大西北进军令，从而开始挺进大西北。

同日　苏联得知美国正在策动西北五马① 撤入新疆，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的消息后，向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提出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对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联络，再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

8月17日　中共代表邓力群正式会见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和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按照刘少奇的指示，说明他此行的任务是和这里的领导取得联系，把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请三区方面给予帮助。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和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表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复杂和艰苦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各族人民，并派人来联系，感到兴奋，将提供一切材料，安排各方面负责人向邓力群汇报情况。

8月18日　毛泽东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发出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方面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8月27日　前往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阿合

---

①　西北五马：指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继援。

买提江·哈斯木等一行乘苏联飞机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撞山，不幸全部遇难。后另由赛福鼎·艾则孜等出席新政协会议。

8月31日——9月1日　陶峙岳分别邀集包尔汉·沙赫德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和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新疆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表示无条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实现局部和平。

9月28日　毛泽东、朱德对陶峙岳、包尔汉·沙赫德拉25日及26日起义通电予以复电。

10月20日　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先头部队一战车团进驻新疆省会迪化，受到各族人民倾城欢迎。

11月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率一兵团指挥部人员由酒泉飞抵迪化。

11月12日　伊宁举行三区革命五周年纪念大会。

王震在包尔汉·沙赫德拉等人的陪同下，从迪化飞抵伊宁出席大会，邓力群、赛福鼎·艾则孜也参加了大会。

王震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向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各族人民和民族军全体指战员，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驻疆全体人民解放军的亲切慰问，对三区革命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号召三区各族人民和民族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新疆而奋斗。邓力群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新疆人民和三区人民的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实现的。同样，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全国人民的解放，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全国人民、全疆人民获得了今天的胜利。"

12月17日　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员，赛福鼎·艾则孜任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参谋长，曾震五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曾涤、阿不都热依木江·哈山诺夫任政治部副主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沙赫德拉，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

四、三区新生

从1949年12月起，人民解放军在三区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下，陆续进驻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赛福鼎·艾则孜，等一批新疆三区革命的领导骨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在新疆发展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建设新新疆的骨干力量，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新疆省人民政府主持下，三区的币制、金融、贸易、交通、邮电等陆续与全省统一。1950年1月20日，三区的武装力量——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1950年6月3日，三区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改组为新疆人民民主同盟，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疆各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

从1950年3月起，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开始对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署及所属各县政权进行调整和充实，并陆续进行建党工作。4月28日，中共伊犁地方委员会成立。7月1日，中共伊犁区党委成立。7月24日，中共塔城地方委员会成立。10月28日，中共阿山地方委员会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伊、塔、阿三区从1951年8月到1952年11月进行了减租反霸运动，从1952年11月到1953年底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在牧区进行了必要的社会改革，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1954年11月27日，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管辖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后为方便进行庆祝活动，州庆改为9月1日）。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包括三区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开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紧接着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此，新疆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选自《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豫湘桂战役

背景介绍

豫湘桂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豫湘桂国民党战场发动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也是抗战八年中，在国民党战场上继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后，规模最大的战役。此役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至十二月初，历时八个月。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受到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打击，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它为挽救其灭亡，一方面继续对解放区战场进行"扫荡"，对国民党继续进行诱降，以便巩固其占领区和迫蒋投降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华北和华中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并企图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建立与东南亚的陆上联系，救援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中国的航空基地，以利其太平洋战场的作战。

豫湘桂战役，日本大本营称之为"一号作战。"一九四四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了《一号作战纲要》，命令"中国派遣军于一九四四年暮春由华北开始进攻，夏季

由武汉及广东地区开始进攻，击败敌军，特别是中央军。先后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要地和湘桂、粤汉两条铁路沿线各要冲。……南方军为了策应中国派遣军的作战，由缅甸及印度支那进行局部作战。"命令还强调要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因为"在桂林、遂川等地活动的美国空军飞机约达一百六十架。已经证实为：遂川有三十五架，衡阳有二十五架，零陵有二十五架，桂林有五十五架。在四川省发现有B29基地，由此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北九州和满洲的鞍山钢厂。"因此，摧毁上述航空基地作为这个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同年2月1日，日本大本营陆军又下达了《一号作战计划保密要领》，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南方军总司令官以及关东军总司令官必须遵循一号作战计划的保密要领，严加保密。

一九四四年4月18日，日本以五、六万兵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四个师团加上第五航空军的一部分)从豫东中牟渡过黄泛区，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沿陇海路向西直犯郑州，一路横越平汉路犯密县，一路在平汉路东侧向南进攻尉氏、洧川、鄢陵等地。22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郑州陷落。

日军占领郑州后，一路沿平汉路南下，一路沿陇海路西上。南下的日军，5月1日夺取了河南中部的重镇许昌；同时，原在信阳的日军也沿平汉路北犯，5月9日，南北两路日军在驻马店会师。至此，河南境内平汉路便全部为日军占领。沿陇海西进的日军，指向洛阳；同时，山西垣曲之日军，渡黄河侵犯渑池，沿陇海路东犯，而孟津之日军，也从北面拊洛阳之背，形成三面包围洛阳的形势。5月25日，日军开始总攻，当天洛阳就被日军占领。总计前后不过月余，河南战役便以国民党军队的完全溃败而告结束。国民党丢失城市三十八座，损失兵员二十多万。

河南战役后，日军从5月底开始，又发动了湖南战役。日本大本营关于湘桂作战的《指导作战大纲》要求"一九四四年6月间以第十一军(七至八个师团主力)由武汉地区，7、8月间以第二十三军(两个师团主力)由广东地区分别开始作战，击败敌军，特别是第九、第六战区的敌军主力，攻占桂柳及柳州附近，然后扫荡湘桂、粤汉两条铁路沿线之残敌，占领并确保该地。"还要求尽快对遂川及南雄附近之机场群进行毁灭性作战。

一九四四年5月底，日军调集十万兵力，由洞庭湖两侧地区，开始向湖南进攻。在这次进攻以前，日军进行了许多准备。但是湖南战场上的国民党将领陈诚、薛岳等忙着以数千万巨款，建筑豪华的俱乐部和舞厅，而对日军的进攻，则不作积极准备。他们幻想日军会像前三次的长沙战役一样，也将自动撤退。

5月27日，日军主力在岳阳以南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30日，日军渡过汨罗江继续南侵，粤汉线两侧的湘阴、平江、沅江、浏阳、益阳、宁乡等县，先后失陷。日军复绕道出长沙之南，占领湘潭、株州，形成了对长沙的包围。6月17日日军开始总攻长沙，19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走。

长沙陷落后，日军继续南下，先后占领醴陵、攸县，逼近衡阳。衡阳为粤汉、湘桂铁路的联结点，又是东南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站，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控制了衡阳，就可以割断东南与西南的联系。6月24日，日军进抵衡阳城近郊，但并未即刻攻打衡阳，而是迂回西侵永丰，东陷茶陵，南占耒阳，等包围形势完成后，始于7月4日开始总攻。国民党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降，8月7日衡阳失陷。

日军占领衡阳后，准备沿湘桂西犯广西。这时，还在远离前线的桂林国民党守军，却实行"焦土抗战"。国民党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阚维雍、许阳高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大部分私自截留，他们是准备桂林失守而发国难财的。他们趁桂林疏散留户壮丁都跑光之机，下级官兵每晚四出，到民房去倒笼翻箱、搜寻财物，把居民留在桂林的财物抢得精光。"第一百七十师副师长巢威见韦云淞时问他，何以敌人未来，桂林已变成一片焦土，韦无言可答。桂林市城内外除丽泽门外留下一些完整的房屋外，其余全部烧光。"

9月初，日军再自衡阳出动，沿湘桂铁路向西南进犯，很快占领祁阳、零陵、东安、全县等地。为配合桂北的攻势，9月9日，日军又从广东三水、四合西犯，很快地占领了怀集、信都、梧州等地。同时，从雷州半岛北犯之日军，于9月28日渡过浔江占领平南。至此，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桂林。此时，美国军界人士强烈要求中国军队"立即阻敌前进"，指出"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使盟国对日反攻遭到几十倍的困难。"合众社重庆一九四四年10月6日电称："日人乘盟国有事于欧洲，开始对中国剩下的几个缺口作最后的突破。在四十几天的战斗中，日军席卷华北河南大平原三百哩缺口。河南战事告一段落后，日军一大部分即由华中的洞庭湖向南推进，占领许多城市，包括长沙、衡阳、零陵，现在正在叩桂林古城的大门。此时美空军丧失了重要的基地，如衡阳、零陵机场；此二机场都在日军到达之前予以炸毁的。桂林城外的机场，亦已彻底破坏。"

日军经过一个月休整后，于10月27日对桂林发动进攻。国民党守军不堪一击，11月10日桂林失陷，第二天柳州又失陷。日军从柳州南犯，与越南北上之日军会攻南宁，24日南宁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跑，12月10日两股日军在南宁会合。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已告完成。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后"兴高采烈，东京广播公司称：'东京与新加坡间的直达快车，计程五千公里，车行一百二十五小时可以到达。'"

日军为扩大战果，又以极少的兵力追击逃入贵州的

国民党军队。其先头部队经上下司入黔到黑石关者仅两股，每股三百余，其后续部队仅二千五百人，但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日军一直追到独山，距贵阳仅一百二十公里，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重庆政府准备流亡西昌。”12月1日，重庆《扫荡报》大呼“情势已紧迫之至”，要求美军“迅速在太平洋作新的登陆”，还要求苏联“开辟新的北方战场”。日军追到独山后，已达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于是又对蒋介石重新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于12月中旬自贵州撤退，并把在衡阳俘获的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一批将领放回重庆，进行诱降。可是同一个《扫荡报》，此时便大吹牛皮，说国军“可能夺回广西中部的柳州，从而节断此新完成的陆上交通线。”

与豫湘桂战役同时，广东、浙江之日军也不断发动进攻，侵占了一些中小城市。10月间，东南沿海仅存的唯一港口——福州又沦入敌手。

豫湘桂战役大溃退，使国民党损失了兵力五、六十万，放弃了豫、湘、桂、闽、粤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四个省会和郑州、许昌、宝庆(邵阳)、柳州、温州等一百四十六个中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平汉路郑州至信阳段、湘桂路全线及黔桂路南段都被日军占去，六千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材料：

- “一号作战”
- 河南战场
- 衡阳失陷
- 桂柳失守

材料一 “一号作战”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利，形势急转直下。为了改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态势，加强岛屿防守，大本营原准备将第3师团派往澳大利亚北部、第13师团派往太平洋中部塞班岛、关岛、提尼安岛方面，以阻止同盟国的反攻和确保海运畅通。但在第3、第13师团参加常德战役期间，其预定派往防守地区已被美国攻占。此时，已经拥有远程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掌握着太平洋海域的制海制空权，日本军队的海运受到了严重威胁。正如1944年5月《广西日报》指出的那样：美国海军“恢复和发展得那样快，到现在竟以威胁日本所有海上交通线，将使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变成一个拦腰被截断的长气球。敌人最爱称他人的交通线为‘输血管’。这比喻现在反成了对于他自己的讽刺。对于他那浮肿的大帝国，动脉的硬化或截断将是死症。”面对这种威胁，日军“挽救上述绝症将是一个重要任务。如果日本不能再‘歼灭’一次美国海军而保证海上霸权，则她唯有尽可能替她新割接上去的肢体另找输血管——打通陆上交通线。”日本为了挽救危局，大本营曾于1943年下半年考虑过收缩防地，建立“绝对防卫圈”的计划，并期望于1944年之内实现。大本营所要建立的“绝对防卫圈”是指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南洋西部——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群岛——缅甸等在内的一个防卫圈。它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其核心是中国和日本本土。在同盟国已经控制海上交通的情况下，日本要联结这个“防卫圈”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日本本土铁路线出发，经过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再由广西、云南与越南、缅甸铁路相连。这条铁路线，日本称之为大陆交通线。当时，联贯这条交通线的主要障碍是中国境内的平汉、湘桂两条铁路线，这两条铁路有数十万中国军队防守着。

1944年初，美国打算以中国桂林、柳州作为B－29远程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的基地，这使日本感到非常恐惧。1944年1月15日，同盟社发出如下报道：“新型的超级重型轰炸机B－29较之现有的各种轰炸机远为巨大，性能也极为优越，1944年春将用于第一线。在攻击日本本土时，首先对其国内重要工业区，各种军事设施等要害目标进行连续轰炸，以削弱日本陆海空三方面的抵抗力。美国军事专家们认为美空军可对日本本土发动集中攻击的基地，首先是中国基地。为此，将组成特别空军。”同盟社的这一报道，无异于对日本的通牒。如果B－29机真要从中国西南地区机场起飞，它将不仅使日本的所谓“绝对防卫圈”破产，而且对其所谓“本土防卫”也将给予致命打击。

基于上述海空两个方面的威胁，大本营自1943年下半年美军开始反攻以来，就一直在考虑对中国方面要采取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以挽救日趋不利的局势。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初的形势变化，更使大本营感到局势严重，因而决定在1944年春夏开始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并将这次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日军“一号作战”想要达到4个方面的目的：第一，攻占桂林、柳州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空袭日本国土；第二，占领并确保桂林、柳州地域，防止同盟军从印度、缅甸和云南向华南方面采取攻势；第三，修复中国境内铁路，并经法属越南，与南洋日军占领地区沟通陆路交通；第四，利用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机会，运动政治谋略手段，策应中国政府投降。大本营“一号作战”计划的重点，开始是放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上的，后因感到中美空军对日军威胁太大，将重点改为摧毁中美空军基地。战役发动前夕，大本营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对中国派遣军说：“鉴于目前战局的形势，来自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必将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因此，制止驻华美空军的频繁活动，实为当务之急，希望坚决以摧毁敌空军基地作为重

点。至于打通粤汉线的作战，在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停止。”服部并进一步强调说：“桂林是摧毁敌机场的最重要目标，必须下决心一举攻下长沙、衡阳、桂林。歼灭残敌则应在摧毁空军基地之后进行。”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预定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实行河南作战，打通平汉铁路；第二步，实施湖南作战，攻占长衡，打通粤汉铁路中段；第三步，在湘南、广东和越南驻屯军协助下，三方面配合，打通湘桂铁路后，再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其平汉铁路作战，称为“虎号作战”，湘桂作战称为“特号作战”。

中国派遣军早就希望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以迫使重庆政权屈服，但一直未能得到大本营的批准。在常德战役期间，派遣军总部接到制定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的命令后，畑俊六与其幕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拿出了作战方案，并提出要先打通粤汉铁路，再打通平汉铁路。1943年12月7日，派遣军将作战方案上报大本营，要求大本营在12日以前对其拟定的作战要点进行答复，以便准备作战。大本营8日复电派遣军说：此次作战，对日军战争全局影响极大，不能轻易指示。并且声明，如此重要的作战大纲，不能用电文传递。1944年1月24日，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奉命飞往东京领取作战命令和被审核的作战大纲。在审定后的“一号作战”大纲中，大本营不同意先行实施粤汉路作战，而将平汉线作战放在第一步。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日军自侵华以来对中国战场发动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按照这个计划，其实际作战距离将为1500公里，相当于一次远征；其参加此次作战的兵力，平汉作战将投入148000人，湘桂作战将投入362000人，共计51万人。另外配备军马10万匹，大炮1500门，坦克800辆，还有空军、海军与之进行配合。日军这次规模宏大的野战行动，是日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其规模与兵力相当于1942年仅有计划而无行动的“五号作战”（即所谓“重庆攻略战”）。为了隐蔽这次规模巨大的远征作战企图，大本营特别强调行动保密，并指示各军，必须尽量密匿在中国大陆上的积极作战意图，如果随着作战准备的进行中国方面有所察觉，则应故意伪装进攻重庆，以欺骗对方。

（摘自《中华民国抗战史》吉林出版社）

材料二　河南战场

4月17日夜，中牟一带月黑风轻。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兵分左右两翼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扑来。午夜时分，中牟西南方响起了激烈的机枪扫射声，日军酝酿已久的战役打响了。

18日拂晓，正面之日军增至三千余人，携炮二十余门，在飞机掩护下，向在这一带担任河防任务的中国军队暂编第二十七师之第一、第三两团阵地猛攻。该师成立未久，装备低劣，武器堪用者不足三分之一。虽然河边的抵抗进行了八个小时，阵地终被突破，数千名日军强行渡过了黄河。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由正面进攻，也抵达河对岸。正午，日军在中牟南部整顿部队，工兵架起了轻便桥梁，大队人马源源不断地开过了黄河。

中国军队试图在日军渡河后立足未稳之机展开反攻，除电令暂编第二十七师守住已有阵地外，暂编第十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驻新郑地区的新编第二十九师之第八十六团也北上迎敌。其迫击炮和手榴弹的威力给日军以较大的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没能改变战场局势。

中牟方面的日军刚刚站住脚跟，邙山头方向又响起了连天的爆炸声。19日拂晓，敌先以炮兵向邙山头守军预备第十一师的阵地进行猛烈轰击，后又以步骑兵两千余在飞机和毒气攻击的掩护下猛扑。次日拂晓，日军六千多人（以第一一〇、第六十二两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为骨干）又在数十门大炮和四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展开了全面的攻击，连陷要地多处。

突破中国守军的河防阵地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占密县一带的山地，以摧毁中国军队再次发动攻势的支撑点，并为以后对汤恩伯军发动进攻作好准备。4月18日至20日，约八千名在中牟渡河的日军分兵两路，一部三千余向南，主力五千余携炮二十多门向西南方向追去。20日，日军一部进抵和尚桥一带，切断了新郑和许昌间的交通。21日拂晓，与另一股日军会师，开始进犯新郑。中国守军第一二五团与之激战三个小时，阵亡连长以上军官九人。至正午前后，日军将新郑完全占领。

在此之前，日军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刚一渡过黄河，就于18日派出了由三百人组成的先遣挺进队进攻郑州。该队夜间急行军，于19日黎明到达郑州火车站附近，直到用绳梯攀登城墙时才为守军发现。由于来得突然，守城部队几乎没有抵抗就纷纷从城墙上后撤，日军占领了郑州城的一部分。随后，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郑州挺进队的主力也赶至郑州城下，守城的中国第八十五军向郑州西方逃去。20日下午，连接平汉和陇海两大铁路线的重镇郑州，就这样轻易丢失了。

接着，尉氏、郑县、洧川、长葛、广武泛区、荥阳等地也相继失陷。为适应河南战场的新形势，4月22日汤恩伯将所辖兵力分为南北两兵团。南兵团以李仙洲为指挥官，统辖部队以第十二、第二十九军为主力；北兵团以王仲谦为指挥官，指挥第十三、第八十五军。又划分了阵地，准备“以有力之钳形态势包围由中牟及邙山头两方面之敌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而歼灭之。”日军则仍按其攻占密县的既定计划，调集主力实施攻击。22至23日，

由中牟渡河之敌万余名，在大炮配合下进至密县境内。由邙山头渡河之一部日军四、五千名，也赶来会合。23日晨，约千名中国军队曾由密县西南地区反攻，但为日军炮火打退。夜间，密县县城失陷。

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占领黄河南岸平汉线上的一些重要据点后，其预期的打通平汉线的第一期会战已经完成。

4月24日，日军第十二军各部已全部集中在密县、新郑等地。自25日起，各路日军继续南侵。战车第三师团及独立战车第二联队渡过黄河后，也来会同作战。次日，约六、七千人到达许昌外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许昌附近的各据点展开猛攻。至29日，日军逐渐增至万余名，战车及汽车达一百五十多辆。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从不同方位实施包围，切断了许昌守军的退路。30日清晨，敌首先自西门、北门发起冲锋。守卫许昌的，是中国军队新编第二十九师的三个团和补充团，共约二千人。他们凭借城墙、碉堡、掩体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下午，日机十二架飞临许昌上空，对守军进行了猛烈轰炸，炮兵也集中向西门外和城墙西南角轰击。城内多处起火，工事大部被毁，战斗达白热化程度。敌决死队以西南角为突破口首先站住了脚跟。几番猛冲之后，日军十余辆坦克撞开了许昌南关，随即对四周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轰击。西门等处也相继告失，城内展开了白刃战。5月1日拂晓，守军停止了抵抗，向东北方向退去，至于庄附近与日军相遇，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阵亡，是役该师以劣势兵力守城，损失惨重，团长以下军官伤亡在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作为河南平原中心、水陆交通枢纽的许昌城又陷入敌手。

4月30日，蒋介石曾电令"汤(恩伯)兵团对窜犯许昌之敌应予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因此，汤恩伯在命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守备许昌的同时，又命令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指挥下的两个军约一万人，急速向襄城、禹县方面北上，攻击南下的日军侧面。但日军于30日攻击许昌的同时，也向进至颍桥镇一带的中国机动部队发起了攻击，并于是日夜间占领了颍桥镇。中国军队以第二十、第九十一师为主力，又对这一带阵地发动猛烈反攻，但日军兵力有步骑七、八千，炮二十余门，汽车两百余辆和坦克二十五辆，火力十分凶猛。至5月2日，这两师部队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阵地尽被突破、第二十师官兵伤亡逾半。许昌既陷，机动部队又遭沉重打击，汤恩伯的这个侧击计划便告破灭。

5月2日，汤恩伯根据蒋介石5月1日"着汤兵团除监视密县之敌外，应集中全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军、暂十五军、第七十八军等)使用于禹县附近之敌决战"的电报，将河南战场上的军队部署作了较大的调整，第十二军集结于郏县、宝丰地区；第七十八军推进襄县；第八十九军集结在漯河郾城一带(以上为南兵团)。北兵团之第十三军主力集中在白沙等地区；第八十五军将登封、临汝阵地的守备任务交第九军接替后集结登封；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

按日军原来的作战计划，是在攻占郾城后实行大迂回以包围歼灭第一战区内的主力部队，但由于中国军队部署的改变及北上进兵在战略上将不利于日军，日军改变了郾城迂回的设想，而决定在攻下许昌后"立即向右迂回"，特别注重包围歼灭中国方面较为精锐的第十三军。在主力部队以许昌为轴向右迂回的同时，日军第十二军又派第二十七和第三十七师团的部分兵力继续南移，向郾城行动，以期打通平汉线。5月5日，日军由东关进城，突破中国守军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的防线，将郾城完全占领。

7日，日军由郾城继续沿平汉线南下，一路进展顺利，没再遇到中国军队的狙击。

在此之前，武汉方面的日军第十一军按中国派遣军的计划，于5月1日派出了宫下兵团(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宫下少将指挥的混成步兵七个大队)由信阳附近北上，与南下的华北方面军相呼应。9日上午，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与北进的宫下兵团在确山会师，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计划至此完成。

(摘自《抗日战争史》文史出版社)

材料三 衡阳失陷

第10军自7月16日退守第二线后，一直到7月底，日军每晚都发动重点进攻。经过一个月余的战斗，第10军伤亡十分惨重。军部直属队已伤亡三分之二，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仅剩有400余人，各部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数个营长、连长。如在五桂岭争夺战中，第3师第8团半天之内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阵亡。当时受伤官兵很多，因无医药治疗，不少轻伤官兵均自动重返火线，即使伤不轻且还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愿意留在阵地中，他们都想用战斗来麻木自己，宁愿战死，也不愿象那些口中还能讲话而浑身则长满了蛆的伤兵那样活着。

由于守城时间较长，官兵伤亡惨重，重武器大部被毁，弹药无法补充，因此，第10军面临的困难十分严重。8月1日，方先觉给蒋介石拍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申述第10军的困难。电报说："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侵中与敌奋斗，均能视死如归，克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

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资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多,即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横山勇,经过近 10 天的准备之后,于 8 月 1 日身佩"天照皇大神宫"的神符;从长沙飞到衡阳机场,亲自指挥第 68、116、40、58、13 等师团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总围攻。8 月 4 日清晨,日军 5 个师团各种火炮 100 多门,炮弹 4 万余发,在横山勇的统一号令下,向衡阳西南阵地倾泻。横山勇准备要在 1 天之内拿下衡阳。第 10 军西南约 4500 米的正面阵地,当时已被硝烟弹雨所笼罩。日军的火炮大多已推进到守军阵地前面,对着守军掩体、工事、残堡、断壁进行直接射击。守军因无炮弹,大炮多已埋藏,无法对日军进行还击,只能任凭日军狂轰乱炸。在日军强大炮火下,许多阵地上的士兵被炮火埋葬了,没有死的从土堆里爬出来,继续用手榴弹和刺刀反击日军的进攻。由于预 10 师伤亡将尽,防守第一线的任务基本上都已由第 3 师顶替。第 3 师第 8 团在五桂岭北部,第 9 团在天马山附近,第 7 团在杨林庙附近,预 10 师残余官兵在岳屏山附近等阵地上均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8 月 5 日,日军继续以强大的炮火掩护步兵冲锋。守军阵地全毁,据守在阵地上的官兵不眠不休,不饮不食,与日军进行最后搏斗。五桂岭、天马山、岳屏山争夺激烈,第 7 团团长鞠震寰、第 9 团团长肖圭田均已负伤,守军伤亡大增。当晚,日军已攻占第 10 军第二线主阵地的大部分,各团团长均在亲自督战,守军士兵均在顽强拼杀,终于阻止了日军的深入。

6 日早晨,城北蒸水南岸第 190 师阵地演武坪被日军攻破,守军全亡,该师师长容有略请方先觉派军部特务营反攻。特务营在演武坪附近中了日军埋伏,这支第 10 军当时唯一能四面出击的有力部队被日军杀伤一半,反攻失败。日军从演武坪打开缺口,继续向市中心突进。当天上午,日军继续发起全面攻击,守军阵地多夷为平地,战斗兵员所剩无几。方先觉当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军部幕僚和杂兵分派到市区各巷战工事准备巷战,一是将暂 54 师守湘江的 1 个营抽出来补充第一线,江防工事另由该师师部幕僚及杂兵接替。这样又加强了西南及城区的抵抗力。中午时分,第 3 师第 8 团迫击炮连连长刘和生,发现市民医院附近阵地上有一日军指挥官正指挥士兵冲锋,他当即将仅有的 8 发炮弹一起打了出去,日军凶悍的第 57 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被炸中腹部而亡。

8 月 7 日拂晓,暂 54 师 1 营士兵加入战斗,在各阵地上继续抵抗日军。日军由演武坪继续突入百余人,向军部前进。在此形势下,方先觉与四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效]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此时,守军仍在五桂岭北部、岳屏山、天马山等地与日军进行拉锯战,西南阵地仍然稳定。但到下午时,第 3 师第 9 团天马山阵地上却树起了白旗。8 月 8 日凌晨 3 时,日军占领军部指挥所,方先觉等投降,衡阳失守。

8 日拂晓,城区西南仍在第 10 军手里,有一些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官兵仍然在进行抵抗。下午,中美空军运输机投下无数弹药和食品,被解除了武装的第 10 军广大下级官兵眼睁睁地看着后方民众送给他们的慰问品成了日军的战利品,让日军美美地享受去了,心里真不是滋味!9、10 日两天,中美空军发现衡阳失守后,整整轰炸了两天,第 10 军有近千名伤病患者被自己的炮火埋葬。此至,衡阳保卫战全部结束。

衡阳保卫战从 6 月 23 日开始,到 8 月 8 日结束,历时 47 天。衡阳保卫战虽然以方先觉投降的不光彩结局而宣告结束,但它比之第 4 军保卫长沙的情形毕竟要显得英勇多了。参加守城官兵 17600 余人,死伤 15000 余人(其中阵亡 7600 余人)。据日方自己公布,日军在此次战役中死伤 19380 余人,其中高中级将领阵亡 390 人,负伤者 520 人。

(摘自《近代中国》第 42 期)

材料四　桂柳失守

10 月 28 日,日军同时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攻击。30 日,先是日军便衣队出现于桂林以北地区,随后千余日军对桂林火车站发动了攻击。次日,日军开始攻击北极路一带,并试探攻击屏风山、猫儿洞等一些孤立据点。又分兵一路进抵西郊一带,其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自 11 月 2 日起,桂林城四郊均遭袭击,战况渐烈,核心战斗逐渐展开。守军对各处进攻之敌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进攻城南开阔地时,日军曾因触地雷伤亡甚重。自 3 日起便利用耕牛在前面开路,以触发守军预设之地雷。由于日军炮兵部队暂时尚未到达,守军的大炮相对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配合步兵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4 日,屏风山、猫儿山据点同时陷落,守军两排人除受伤者外全部殉国。德智中学以西山地的一个据点最后被日军占领时,守军一连只生还八人。

6至7日，敌集兵力二千猛攻四郊，重点是攻击东郊。在毒气的配合进攻下，七星岩等各处高地又告失守，守军大部牺牲。岩洞据点遭到日军火焰喷射器的攻击，攻守双方伤亡均重。桂林城核心的战斗已达白热化。城市四周聚集的日军达二万多人。城北平头山守军不敌日军炽盛的机枪、平射炮火力，全部牺牲。8日起，陆续到达的日军重炮部队开始投入攻击。十分钟的集中轰击后，桂林城内一片火海，守军阵地浓烟冲天。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守军冒死狙击，打退了各路进攻之敌。但是，城东南中正桥以北的沿河一线阵地为炮火所毁，中正桥头堡及各个独立堡垒先后为日军占领。日军也有惨重的损失，进攻中正桥的两个分队日军全被击毙。象鼻山上的炮兵部队也对正在渡河的日军进行猛烈的炮击，日军人亡船翻，水为之赤。

韦云淞一面令预备队堵击由中正桥冲入城内的日军，一面又悬重赏要求夺回桥头堡和沿河一线阵地。第一三一师因伤亡过重未能夺回，于是又令第一七〇师冲锋。该师以上等兵和班长为主力编成突击队，用火箭筒、战防炮、手榴弹等展开恶战，终将桥头堡阵地夺回。

但是，其他守军阵地步步缩小，兵员也伤亡过重，形势越发不利。8日，日军第四十师团一部向伏波山高地进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了山顶，最终排除了妨碍渡河的火力点，大队日军夜间渡过了桂江。是日夜间，城四周要地多为日军所占，敌军从东北方沿山脚各处潜伏前进，冲进桂林中心市里。桂林城稍呈长方形，遭到日军的拦腰一击后，南北守军到处乱跑。多数人死于乱枪当中，一些人成了俘虏。各阵地相继失陷。至9日，仅存的一些守备部队眼看大势已去，遂决定突围。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自杀。突围中，第一七〇师副师长亲率特务连攻击前方高地，面部两处受伤，昏后被俘。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中将是个跛子，行动不便，在随韦云淞突围时掉了队，途中阵亡。及至11日，古城桂林彻底沦陷。

还是在桂林总攻击的前夕，日军第十一军鉴于入桂以来未遇多少激烈的抵抗，又得知了柳州城防薄弱的消息，命第三、第十三等主力师团径直往柳州扑去。两师团果然未遇什么阻拦就于11月初到达了柳州的平地。随又分兵一股于柳州西南方渡过了柳江，堵住了柳州一带中国守军西撤的退路。柳州虽然是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战前指定由第二十七集团军守备，但军无斗志。9日，日军从柳江两岸夹击柳州守军，从柳州东南方的象县方面又赶来了千余日军投入攻击。柳州遭到四面围攻。守军第二十六军于10日下午接到张发奎的电话指示："应避免无所谓牺牲，"遂集结起来，向西突围，而留在城内的守军则大多牺牲。11日，柳州为日军所占。这样，广西境内的两座主要城市几乎同时告失。

由广东西攻及雷州半岛北上的日军，沿涂几乎未遇到过中国部队的抵抗。只是到10月下旬，中国军队才在桂平一带展开反攻。第四战区集中数师兵力，在大炮和美军飞机的掩护下对日军发动攻击。日军一路进展顺利，突遇反击，颇感意外，随即组织抵抗，双方死伤均重。

此后，日军往各处攻城掠地，兵锋所指，中国军队无力抵抗，只得向桂西方向退去。日军占领柳州一带后，第二十三军分兵一支指向南宁。24日，南宁机场及南宁城为日军占领。28日，在越南的日军第二十一军也乘中方溃败之机，派兵分路北上，进入中国境内后，击溃了中国地方部队的防守，主力奔往南宁。12月10日，由越南北上的日军，同自南宁南下的第二十三军的部队在绥渌会师。日军期望已久的大陆交通线至此打通。

（摘自《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张宪文编）

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四四年5月20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以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153人出席。蒋介石致训词，指出抗战接近最后胜利阶段，大会应积极研议今后努力方针。居正、王宠惠、何应钦、宋子文、端木恺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外交、物价管制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务报告》、《关于政治报告》、《关于军事报告》以及《确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之关系案》、《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改进出版检查制度案》、《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确定宪政基础案》、《收复沦陷地区政治设施之准备案》等议案。会议宣言提出5项任务：(1)加强战斗，贯彻胜利；(2)巩固经济，稳定物价；(3)提高行政效率，贯彻战时法令；(4)推行地方自治，健全民意机关；(5)厉行法治，保障民权，尊重舆论，宣达民意。会议批准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辞职，推举陈果夫继任。

材料：

· 中央社报道会议经过
· 全体会议宣言

材料一　中央社报道会议经过

中央社讯：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本月20日至26日举行，到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蒋总裁等一百五十三人。时际抗战接近最后胜利阶段，大会因应当前时势，研议今后努力方针，对于加强战斗，贯彻胜利，以争取世界永久之和平；巩固经济，稳

定物价，以保障国民生活；提高行政效率，贯彻战时法令，以实施国家总动员；加紧推行自治，健全民意机关，以立宪政之基础；厉行法治，保障民权，尊重舆论，宣达民意，以慰国民之愿望；咸有具体周密之决议。如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改进出版检查制度案，加强推行地方自治案，确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之关系案等，关系均甚重大。又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恳请辞职，经改选陈委员果夫继任。本次大会，各次全体会议及审查会，讨论甚为热烈周详，恒至深夜始散。各委员咸本自反自强之义，检讨党政军近年各项设施之成果与缺点，质询甚为坦率真诚，力求改善进步之道。

蒋总裁除亲临主持开幕、闭幕典礼及总理纪念周外，复每次参加会议，听取报告，并参加讨论。凡此均为本次全会之特色。

总裁开幕词

开幕典礼系于20日上午八时举行，蒋总裁主席，并致开幕词，指示革命环境历史，全会任务及同志责任。要点如次：〔略〕

全词历三十五分钟始毕，全场掌声热烈。礼成后，旋即召开预备会议，仍由蒋总裁主席。讨论议事规章及大会会期。票选主席团，由监察委员何思源、邓青阳、王子壮、谭道源监选；结果戴传贤、孙科、居正、邹鲁、冯玉祥、孔祥熙、李文范、叶楚伧、何应钦、陈立夫、潘公展等十一委员当选为主席团。十时四十分散会。

第一次大会

21日上午八时，举行第一次大会，冯委员玉祥主席。全体首向全国抗战阵亡将士及国内外死难同胞默哀致敬。次秘书长吴铁城报告文件及主席团决定各组审查委员会名单，并经推定党务组召集人丁惟汾、潘公展、叶秀峰；政治组召集人陈仪、甘乃光、李宗黄；军事组召集人程潜、陈济棠、杨杰；经济组召集人熊式辉、薛笃弼、赵棣华；教育组召集人朱家骅、王伯群、张道藩。又决定推戴传贤、孙科、叶楚伧、王世杰、程天放、狄膺、潘公展、梁寒操、洪兰友、陈布雷、罗家伦等十一委员为宣言起草委员；戴传贤、孙科、叶楚伧为召集人。大会随即听取党务报告，由中央常务委员居正报告，分述组织、训练、宣传、海外等工作概况。各委员旋就党务提出质询，经由各部会长分别答复。十二时散会。下午分组审查提案。

第二次大会

22日上午八时，举行总理纪念周，蒋总裁主席并致词，指示革命奋斗艰苦及前途之光明，勉励同志对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乐观情势，应有根本认识，加强革命信心，发扬革命精神。

九时举行第二次大会，居委员正主席。听取政治报告，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报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施政概况。各委员旋纷纷提出质询。十二时十分散会。下午分组审查提案。

第三次大会

23日上午八时第三次大会，邹委员鲁主席。继续政治质询，各委员发言更为热烈，对国计民生、医院卫生、行政效率、公教人员生活及吏治纪纲，均有宝贵意见陈述。各询问案因时间关系，改由主管长官书面答复。休息十分钟后，听取军事报告，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分述整军、建军、经理、卫生、军需、军械、兵工、兵役、教育、训练、工程及陆海空军作战概况，敌军态势，兵力配备，重要战役经过滇西战役、中原战役、缅北战役及同盟国战略及各战场近况，甚为详尽。各委员于听取之后，益为兴奋，咸信同盟国必能于短期内击溃德日轴心，而吾国最后胜利即将来临。十二时十分散会。下午分组审查提案。

第四次大会

24日上下午举行第四次大会，分由李委员文范、叶委员楚伧主席。各委员有就军事报告提出关于兵役及士兵生活等质询，经何总长分别答复。次听取外交部长宋子文外交报告及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秘书长端木恺物价管制报告。有关质询，亦经分别答复。再后依次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之省施政概况报告，均甚详尽。各委员对各省年来役政、粮政、征工等之成绩，年来推行新县制自治之进步，甚表欣慰。六时散会。晚召开分组审查会。

第五次大会

25日上下午举行第五次大会，分由孔祥熙、何应钦主席。首先通过全会慰勉前方全体将士、沦陷区同胞、海外侨胞，全国人民及慰问抗战将士家属及遗族电。旋即讨论提案，通过政治类十六案、经济类十一案、党务类三案、军事类二案、教育类一案。其重要者为：①加强推行地方自治案。②确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之关系案。③改善出版检查制度案。④请政府切实救济归侨侨眷、侨校侨生案。⑤为敌寇内侵，中原战区扩大，请政府特拨专款，交战地青年招训会，收容训练战区学生案。⑥为战后各工厂需要器

材，应由政府予以法价外汇之利便，预行订购，以固工业而期复员案。⑦西北各省土木工程建设，均应早为核定计划及预算，以便乘时兴作案。⑧拟请中央拨款修筑农田水利干渠及主要建筑物案。⑨拟请确认开发甘肃、河南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加速经营完成案。⑩拟请部分〔实〕征日用必需品，配给公务员，以资救济案。⑪树立工业的国策，并救济工业当前之困难，并发挥其应有之效能案。此外通过对于政治、军事、教育、党务报告之决议文四件。五时十分散会。

第六次大会

26 日上午举行第六次大会，孙委员科主席。通过讨论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此案前经一度提交大会讨论，以关系重大，爰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依据各委员发表意见，数度开会研讨，制成修正案，拟交今日大会讨论。经一小时半之缜密周详讨论，修正通过；并决议稳定经济管制物资，亟应特设一强有力之机构，俾得集中事权，统一指挥，交中央常会迅即决定办法施行。又通过对于财政、经济、交通、农林、水利、粮食、地政各部门工作报告之决议文及大会宣言。

最后以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恳请辞职，由大会改选陈委员果夫继任。十时半散会。

十一时举行闭幕典礼，蒋总裁主席，并宣读大会宣言，随即礼成。至各重要报告及决议案要点，当于日内陆续发表。

（摘自重庆《中央日报》1944 年 5 月 27 日）

材料二　全体会议宣言

溯自十一中全会迄今历时 8 月。在此期间，我中国抗战始则有常德会战之胜利，与滇西之激战；最近则有中原之苦斗，与强渡怒江之成功。我远征军与英美盟军密切配合，向缅甸战场之敌人奋勇作战。全世界战局，在太平洋上，则美国积极展开其攻势；在欧洲，则苏联与英美加紧夹击纳粹，收获重大之战果。同时此八个月间，我联合国之共同合作，益见加强，英、美、苏、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明示我联合国消灭侵略、永奠和平之共同决心；而开罗会议之声明，更复将对敌作战之具体目标昭宣于世界，我中国对于整个战局成败利钝所负之任务，乃弥见其重大。十一中全会曾郑重宣示，“必人人立志作最后决战更大之牺牲，方克确保最后胜利之获得”。此次全会集会于抗战即满七年之时，因应当前之事势，研议吾人努力之方针，咸认为一切力量均应为达成军事胜利而贡献，一切设施均应集中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而检讨得失，自反自强，尤应以坦率真诚，与国人相共勉。吾人今日不应讳言艰难，应有勇气以克服艰难，更不应忽视缺点，而当切实改善其缺点。我中国抗战在各联合国中准备最为薄弱，时期最为悠久，而全国军民忍艰茹苦，决心弥坚。惟此艰忍不拔之精神，乃为胜利成功之保障，允宜加以培护，加以发扬。爰就检讨内外局势与军政设施之结果，揭橥要旨，摅其忠悃，剀切以陈。

其一，关于加强战斗，贯彻胜利，以争取世界永久之和平者。我中国抗战目的，为捍卫我国家之生存，亦为维护世界正义与奠立永久和平。今我联合国彻底消灭侵略之战争，既已具同一之目标，为协同一致之进行，而吾人所一贯期望于战争未结束前建立国际和平机构之组织，以保障世界之安全者，其原则亦已为四国宣言所确认，实足与吾人以莫大之兴奋。诚以今日之世界，安危治乱，密切相关，无分地域。“九一八”星星之火，终于蔓延而成为举世共罹之浩劫，是知此次战事非彻底摧毁侵略之祸首，不足以弭战祸之再起；非国际有公正永久而有实力之机构，不足以保障人类集体之安全。此次惨痛之教训，已使举世爱好和平人士一致觉悟此理，而作共同之奋斗。则吾人为实现此一崇高之理想，自当不辞任何牺牲。综观今日反侵略战争，已无东西战场、先后轻重之分，而太平洋战场及东南亚战场，更与我中国战场成败与共。故寇日本之残暴侵略，最初向我中国发其端，最终亦必在我中国大陆上自食其溃败之果。我中国对敌作战，以劣势之装备，作持久之苦斗，在单独作战之时，既已突破种种艰难，为世界伸张正义之权威，在共同作战之今日，更当勇往直前，毅然担当联合国一员一切应负之义务。敌寇今后之挣扎，势将竭尽其前所未有之凶残，吾人惟有从最激烈之战斗中发挥我最坚强之毅力，乃可求得最后之成功。同时深信与我共同作战之盟邦，必能察知中国战局已入重要之时期，对我陆、空军力作战必须之装备，与巩固战时经济所最缺乏之物资，与以更多量而迅速之补助。我全国军民同胞应知九仞之功，待此一篑，务当以见危授命之决心，作恶战苦斗之准备；将士则奋勇牺牲，有进无退；民众则协同军队，踊跃效命，前线应厉兵秣马，充实战力；后方应输财输力，加强动员；自军队而推及人民，由政府以至于社会，事事皆当为战争而贡献，人人皆当为决战而努力。

其二，关于巩固经济，稳定物价，以保障国民生活者。我国以工业落后之国家，临此空前未有之长期抗战，七载撑持所以能历久不疲者，全赖我国民有忍艰耐苦，坚韧不拔之优良德性。然而战时愈久，消耗日增，补充非易，加以管制技术素无经验，通力合作未臻密切，遂使供求失其均衡，物价继续上涨。国民生活固受影响，而战士之艰辛与一般依薪给为生者，处境之困苦，尤堪怀念。本会议检讨现状，深觉巩固经济，稳定物价，实为当前之急务。吾人今日首宜改善前线官兵与公教人员之生活，并安定一般国民之生计，而根本之图，厥在贯彻国家总动员法令与切实

执行此次全会所决议关于物价之紧要措施。政府应具最大之决心，排除困难，力求实效，一面改进征实，控制物价，以统筹供应；一面宜奖励储蓄，管理金融，厉行节约，以平衡度支。尤应不惜财力，补助生产，便利运输。对于日用必需品之价格，应竭尽一切可能，使其稳定。而工业经济，更应予以有效之补助，俾战时得以维持，战后得以扩展。其有假名工业，而以囤积牟利者，应严予取缔，使物资与金融不致交受其敝，而正当工业获得保障。如此分途并进，然后经济基础克臻稳固，人民生活得以最低限度之保障，裨益战时，必非浅鲜。

其三，关于提高行政效率，贯彻战时法令，以实施国家总动员者。战时政治设施，事项繁复，远过平时，而国家之要求于国民者，亦益见其繁重。故战时政治之特质，为处事之迅速与确实，为政令之普遍有效的执行。此皆须有极高之行政效率，乃克迅赴事功。我国幅员广阔，交通迟滞，人民习于散漫，安于故常，一切生活行动，均不能比拟于已臻现代化之国家。军兴以来，对于战时服务，间有若干区域、若干事项，以领导得人，确有显著进步，而一般战时政令，按其事实尚未能切实下达，彻底执行。诚宜刷新风习，振作精神，简化程序，分明权责，自中央以至于省、县各级机关，均须努力提高其行政效率，务使事无壅滞，令无稽留，人无旷废，时无虚耗，以振厉奋发之精神，整齐严肃之步骤，公正不偏之态度，率导全国国民，一致贡献其能力，以实行国家总动员，庶几由民力之集中而造成国力之增进。抗战之胜利，实基于此，建国之成功，亦有赖于此。

其四，关于加紧推行自治，健全民意机关，以立宪政之基础者。自十一中全会决议战事结束后一年以内制颁宪法，开始宪政之治，群情奋发，期待至殷。本会议认为，民主政治之实行，为国民革命一贯祈求之鹄的，而宪法基础之奠立，则有赖于基层自治之健全。政府对于实施新县制，及县以下各级基层组织，年来督策进行，不遗余力，综计乡、镇民代表会已成立者已逾一万一千处，保民大会已成立者将达三十万处，亟宜循此程序，加紧推行。尤当勤加考核，稽其实绩，一面更宜秉既定之方针，限期完成各级正式民意机关之设置，健全其组织；并酌量扩大其职权，俾能辅助政治建设之进行。总之，推行应求其普遍，而基础必求其确实。此则更有赖于国内明达，以推诚置信之精神，为国家策长治久安之大计也。

其五，关于厉行法治，保障民权，尊重舆论，宣达民意，以慰国民之愿望者。抗战军兴以来，战区同胞之颠沛流离，全国军民之忍坚茹苦，其为国牺牲，亦即深且久矣。然而军事殷繁，督察难周，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种服务人员之玩忽职务，而受意外之损害者，或因逾越职权之措施，而遭法外之苛扰者。本会议以为，国家当此战时，有权要求人民负担其法令所课之一切义务，但必须贯彻法治精神，决不容有违法失职之举，以损害人民之权益，加重人民之负担；更不容豪强有力之徒逃避其对国家应有之义务。故对于行政诉讼与诉愿之案件，必须迅速处理，而各级法院之检察官，亦应严格执行其保障人权之职责。对于公正舆论，能自负其言论责任者，应与尊重，俾能抉发明弊，宣达民意，以为政府整肃吏治，解除民困之助。此又本会议所愿为国人明告者也。

上述五端，为本会议所欲揭以告全国之同胞同志者，其他事项具见决议。回溯七年抗战，吾人所经历之险阻艰难，何可胜计！然而历次之艰难，无不为吾人之勇气与毅力所克服，抑且每克服一度艰难，抗战前途必有一次之进展，整个政权必有一次之更新，而全国之信心亦随之而增强。由此可信，吾人能作坚苦之奋斗，则艰难适为成功之母。今后胜利愈近，艰危愈增，最大之阻挠挫折，均在吾人预算之中，吾人惟徵诸往绩，益固自信，秉坚定之意志，矢牺牲之决心，以应付任何之艰危，而竟我抗战建国之全功。本会议盱衡现势，检讨过去，瞻望方来，既深自反自励之怀，弥懔履薄临深之戒。愿布赤诚，相与黾勉。矢忠矢信，共赴事功。所愿全国同胞、吾党同志，同德同心，再接再励，为抗战先烈成未竟之志业，为国家民族立不朽之根基。谨此宣言，惟共鉴之。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背景介绍

一九四四年9月9日至21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最早是1939年10月于重庆由国民宪政会中各中间党派和部分民主人士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共有三党三派参加，即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以及无党派人士。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等文件，并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由张澜任主席。1944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便于扩大组织，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改名。会议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社会等6个方面共计46款。选举张澜等3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梁漱溟、张君劢、潘光旦等8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从此，民盟摆脱了青年党的控制，各地盟员迅速发展并建立了许多地方

组织，并在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宪政方面起了重大作用。1947年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曾被迫宣布解散，1948年在香港重建。1949年赴解放区参加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材料：

·第三大党

材料　第三大党

抗战后期，民主政团同盟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参加了民盟，盟内无党派关系的盟员大大超过有党派关系的盟员。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特别是盟内无党派盟员强烈要求将民盟由党派联盟改变为民主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一九四四年9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张澜、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潘光旦、朱蕴山等参加了会议，对民主政团同盟改组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

会议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六个方面，共四十六条，具体体现了民主同盟对于民主制度的主张。会议选举了张澜、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潘光旦、罗隆基、李璜、沈钧儒、张申府、漱溟、陈启天、张东荪、鲜特生、曾昭抡、朱蕴山、周鲸文、曾琦、张云川、周新民、黄炎培、吴晗、杨叔明、黄艮庸、丘哲、韩兆鹗、林可玑、郭则沉、刘东岩、张志和、余家菊、郑振文、潘大逵等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等十三人为中央常委。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经过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三党三派的联盟，改组为有党派与无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独立的民主政党。

改组后的民主同盟，在组织上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等地，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总支部和支部。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10月，全国盟员已有三千人。早在1943年，民主政团同盟就在昆明正式成立支部，1944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省支部，推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为委员，罗隆基为主任委员。到1945年底，云南全省有盟员二百余人。1944年11月，民盟四川省支部在成都正式成立，李璜、马哲民、李相符、杨伯恺、张志和、田一平、沈志远等为委员，李璜为主任委员。全省盟员约二千人，其中成都市约占一半。1944年10月，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开始筹备重庆市支部，1945年9月民盟重庆市支部正式成立，何公敢、史良、陶行知、刘清扬、罗涵先等为委员，何公敢为主委。全市盟员330人。1944年10月，民盟召开广东省代表大会，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推李章达为代理主任，李伯球为组织部长，盟员多为教育界人士。1944年11月，叶笃义等去北平筹建华北总支部，1945春，民盟华北总支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张东荪、周鲸文、叶笃义、张云川、曾琦、林可玑为委员，张东荪为主任委员。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杜斌丞、王菊人、杨盟轩、成柏人、李敷仁等为委员，杜斌丞为主委。西北总支部筹委会领导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约有盟员150人，多为地方人士。1945春，梁漱溟等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工作，随后成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梁漱溟、陈此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莫乃群等为委员，梁漠漱为负责人。中国民主同盟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它的组织，发展到它的力量所及的一切地方。

在迅速发展和巩固组织的同时，民盟的宣传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主周刊》，民盟重庆市支部创办《民主星期刊》，民盟广东省支部创办《曙光》，千家驹等人在昭平创办《广西日报》，梁漱溟又创办了《民宪》东南版。这些刊物，积极鼓吹民主宪政，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有的刊物如《民主周刊》，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曾有过广大的读者，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基本含义，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否定，如果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独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就失去存在的根据。抗战时期，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主张驱逐日寇出中国，倡导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赞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们的民主运动，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斗争，目标基本一致，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抗战时期民主同专制的斗争中，他们自然要更多地批评没有合作诚意、不放弃反共立场的国民党，而同共产党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整体而言，始终站在"超然独立"的中间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在抗战后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以很大的热情，去造成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以左右或主宰政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确定对于抗战最后阶段以及战后如何建国的路线。两个中国之命运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中国民主同盟自1945年以来，也不断地发表宣言、谈话、告国人书，招待新闻记者，宣布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

1945年4月，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在《中华论坛》和《民宪》上，连续发表文章。说"国共两党都在本年4、5月两月中，各自召集了他们全党代表大会，宣示他们的政纲政策……，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第三党的地位，对于这个局势的发展，不止是取静观的态度，更当有积极的表示。"他的《欢迎民主战士共同奋斗》一文，指出"我们民主主义者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即是：在对日战争极艰苦的接近胜利的后一阶段中，我们要使一党专政的统治，走上全民的民主宪政之政轨，结束半封建的军事官僚主义的政治，让中国各阶层的人民，同于民主联合的方式之下，发动抗战的力量，奠定民主统一的基础"。而"为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有坚实的民主的政治组织作为推动的力量之一"，"为民主奋斗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提出"民主同盟的旗帜"，"它应当结合一切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民主同盟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它应该在各社会阶层中，各职业团体中，获得大量忠实的同盟者和信从者"，同"其他任何民主抗日的党派社团以至社会人士，……协和相处，……在民主的联合基础之上，进行共同的工作"。民盟"必须竭尽全力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吸引大量的民主的力量，来共同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罗隆基，在同一时期明确指出，"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正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党"。他论证第三大党的重要性说，"中国第三个大党当前有两个很大的作用，第一，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第二，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假使反对内战的人民真有了组织，真有了政团为之领导，他们拒绝供给从事内战者的财力与人力，内战自然打不起来。假使有一个第三大党，它真能代表民意，它在两大政党间有了倚轻倚重的平衡力量，于是谁是内战的发难者，谁就成了民意的公敌，自然内战不至轻易发生，这就是第三大政党的缓冲作用"。"假使今日有个第三大党产生，这政党以实现民主为他唯一的目标，他一定能够吸收许多无党无派的人士，成为一个促进民主的新力量。""有了一个纯粹以民主主义为信仰，以实现中国民主为目标的政团，他们团结一切小党派及无党派的进步人士，这必能使中国的民主提早实现。这又是第三个大政团的效用。"罗隆基断言，"当前是中国复兴的最大机会，亦是中国复兴的唯一机会，同时亦是中国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除了有第三个有力的政党产生，政党休战与政党合作"，将是"极难实现的理想"，"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问题才有解决的途径"。所以他的结论和口号是，"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

1945年2月26日发表于成都《新中国日报》、4月25日转发于《民宪》第二卷第一期的《说明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抗战后期民盟的第三大党立场。这篇文章说："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正民主政治。内以求国家之统一，外以得国际盟帮之平等"。"目前对于国共两党的态度，是极其公开明白的。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与之合作。国民党能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藉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与之合作"。民主同盟"始终是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是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应尽忠于国家，而彻底取消军队内任何党的组织，全国任何方面再不许有党军与私人武力。政治民主化的目的，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政治，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期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的新民主国家，走上安全繁荣之路。"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战最后时期，热心于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热心于战后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仅必然要很快破灭，就连他们自己，也将随着斗争的发展，迅速地向两极分化。

（摘自《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王金铻
吉林文史出版社）

缅北滇西大反攻

背景介绍·

1944年1月初，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已全部抵达大龙河两岸，新编第二十二师先头部队也到达新平洋地区。此时，从雷多修筑的中印公路也通至新平洋。1943年12月28日，驻印军命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翼，新编第二十二师一部为右翼，分别向大白家（Tapaiga）、大洛（Toro）进攻。驻印军于1月31日、2月1日占领大白家和大洛，兵锋直指孟关(Mainkwan)。

18日，中国军队以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路纵队，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路纵队，向缅北门户孟关攻击前进。日军在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信一亲自指挥下，利用大奈河一带河川沼泽，以密集炮火封锁道路和渡口。中国新编第二十二师以一部兵力置于孟关正面，同时另派出一部兵力，绕过原始森林，向孟关南面迂回攻击，先后占领了拉征卡、马高等日军据点，将大奈河北岸日军肃清。

中国军队又乘胜追击，正面进攻与迂回侧击相结合，

于29日攻下坚布山隘口沙杜渣(Shaduzend),突破了日军固守的坚布山天险,把战线推进到孟拱河谷。

7月11日,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会合,打通了从加迈、经孟拱、到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这为驻印军攻克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取得缅北反攻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决定对密支那日军发动全面攻击。7月7日下午,双方再次展开激战,战斗异常激烈。13日,中国军队在优势空、炮火力支持下,再次发动攻击,连战三天,日军固守市区,拼死顽抗。31日,中国军队已占领市区过半。此时,新三十师第九十团空运到达,第五十师第一四九团也在攻克孟拱后急驰密支那,8月2日,第五十师派出敢死队潜入敌阵后方,将日军通讯设备完全切断。翌日下午完全攻克密支那。敌守军第一一四联队长丸山大佐,勒令受伤士兵自杀,自己率残兵300余,乘竹筏渡江,向八莫逃去。

密支那攻坚战,毙敌790人,伤1180人;驻印军官兵阵亡972人,伤3184人;美军阵亡272人,伤955人。

中国军队攻克密支那,"缅北各要点,遂而全入我军掌握。"至此,反攻缅北的作战任务已完成一半。

中国远征军反攻滇缅公路的战斗于一九四四年5月11日开始。为策应中国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兵团,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河,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十一兵团军为防守兵团,负责防守怒江东岸。为了策应第二十兵团军的攻击,又以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七十六师、第八十八师各派一个加强团实行渡江攻击。从5月11日至5月16日,各部队先后在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枝花、栗柴坝、双虹桥等地渡河成功。6月初,以第二十兵团军配属预备第二师为右集团军,攻击腾冲;以第十一集团军(欠预备第二师)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至6月底,右集团军的预备第二师进抵腾冲城郊的西北地区,第三十六师进抵腾冲城郊的东南地区,第五十三军也进抵腾冲附近。7月初,攻迫腾冲城垣。日军凭坚固工事顽抗,中国远征军伤亡较大,攻击进展迟缓,至9月14日才完全攻克腾冲,守敌全部被歼。左集团军的右翼部队于6月、8月、10月三次围攻龙陵,至11月3日攻克龙陵,向芒市前进。左翼部队在6月攻占平戛、象达后,向芒市前进。8月围攻芒市,日军凭强固工事顽抗,攻击进展迟缓。伤亡甚大。至11月20日攻克芒市。12月1日。克遮放,1945年1月20日克畹町,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于畹町附近的芒友正式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数以千计的载重汽车,装载着大批物资通过中印公路运往抗日前线。

材料:

- 收复国土二万四千平方里
- 芒友会师

材料一 收复国土二万四千平方里

中华健儿的英勇,给祖国争来光荣。在滇西的美军、包括安装汽油管道的美国工程人员,都对我军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只要看到是中国军人,就翘起大拇指叫:"顶好!顶好!"凡是我国军人出差在路上走,只要举手示意,美军车辆就会停车欢迎搭乘。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一再表示,只要卫立煌有公务去重庆,他愿派他自己的专机前来接送。美军联络部队经常派人送来世界各国报道滇西我军打击日军的报章杂志,供卫参阅。

卫从亲身经验中知道,愈是胜利在望,愈要提高警惕。他不断察问前线情况,发现日军在滇西部队里使用一种化学燃烧毯,只要把尸体放在上面,再点燃这种毯子,就可将尸体烧成骨灰。早先我军常常看到有来不及烧的日军尸体缺少一条手臂,后来又有大批尸体缺少大姆指。这原来是日军在大败之时,焚烧尸体已顾不上,只斩下一条胳膊或是一只大姆指,燃点灰带回三岛,做点自我安慰也就算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可以看出日军那时的惨状。

左集团军的左翼部队,自8月上旬进攻芒市,日寇凭借他们的工事顽抗。卫得知后,立令钟彬第七十一军、黄杰第六军,以其攻克龙陵的余勇赶往芒市增援。决不让日军稍有喘息之机。两军赶到后,迅即投入了战斗。

11月20日,我军攻克芒市。捷报刚到,卫便要秘书处用他的名义向前线部队发嘉奖电。

这时有个插曲:警卫团一个排长带着几名战士去乡间买猪肉改善伙食,这个排长脾气坏,带去的兵又都是河南、安徽人,与地方上语言不通,为一件小事越说越僵,最后还和地方上的自卫队动了武。经县政府和我团部派人去调解,我方的人都回来了,地方上也不提追究责任的事。卫知道这是得力于龙云主席,要不,我们打伤了地方上的自卫队,又不占理,县政府怎么能放人?他决定对这个排长要警告一下,并约束我们部队,再不许发生类似事件;同时,马上派人去感谢地方,向人家陪礼道歉。

24日,我军攻克孟戛。

30日,我驻印军一部绕过八莫,沿南坎公路向前推进,其余部队继续猛攻八莫。

12月初,中国远征军攻克日军全部战略要点,接下便是追歼后撤的日军。卫调整了部队,前线部队由黄杰统一指挥。日军也自知末日快到,采取且招架、且撤退的战术。经过集合,其残余部队尚有:第二师团的十六联队、第

二十九联队，第三十三师团的第一一九联队。卫知道日军是在死里逃生，也正是我军彻底消灭他们的好时刻。现在卫手中机动的部队多了，可以充分发挥步兵的力量去结束这一战役。他迅速下令调拨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三军、第二军(欠)、第五十四军、第二〇〇师分南北两路追击，以泰山压顶之势，紧追不舍。

由于上次向地方陪礼道歉，双方关系搞得很好，一天，地方自卫队抓到一名大个子日军班长，特地送给我军，好作为活口，搞点军情。后经查明，这个日军班长受过高等教育，原是高中教师，看到日军失败，乘着黑夜混乱，离开大队，躲进丛林。因为肚子饿了，到村中偷食，掉进地方武装设下的陷井，把他抓住。此人能说几句中国话，自称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并说以前当兵是为父亲干，现在要为母亲为中国人干了。他还是个劈刺三段，自愿教我兵士学劈刺。经过一个时期试验，的确教的不错。后来和我军战士们同吃同住，几乎不把他当日本兵看待了。

12月11日，攻克遮放，全歼守敌。

卫正考虑下一步作战计划，重庆军委会发来电报，说陆军大学应届毕业将官班，要求到保山实地参观，学习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和攻克腾冲、松山的经验。卫复电表示欢迎。这期毕业班都是各战区的中将和上将衔的将领。不久，他们即分乘两架专机到了保山。在他们参观了怒江的强渡点，以及腾冲、松山的战场后。对卫的指挥一致赞扬。尤其是当强渡怒江初步得手后，已渡过江的部队面临高黎贡山的仰攻态势，背江攻坚，正犯兵家大忌，但卫能抓紧战机，用十天时间，完全改变原战略方案，使两个集团军全部渡过怒江，取得了辉煌战果。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对中国远征军的成就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没有一个人有相反的意见，或提出有争议的问题。

12月15日，我驻印军攻克八莫。

黄杰自升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后，工作积极，斗志顽强。驻印军刚攻克八莫，他就开始猛攻畹町。畹町地区为石质大山，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12月20日，黄杰转发长官部命令，加派第五十三军从龙川江西岸迂回到畹町以南，第六军从西北攻畹町，第二军向畹町东南攻击。日军拚死抵抗，同时有由缅甸丛林小道潜来的增援部队第四十一师团一部参战，战斗十分激烈。美军联络部队联络官和中外记者都一致认为，这是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

1945年1月5日，中国远征军攻克畹町以南的九谷，17日，收复畹町的老街。日军残部疯狂抵抗。19日，又收复畹町的新街。20日，卫接黄杰报告：我军攻克畹町，全歼日守军。

其间，1月16日，日军曾反攻九谷。这是困兽之斗。我军先头部队奉命向后撤，等待后续主力。现在已不再需要和他们拚搏，可以以巧取胜了。

1月19日，中国远征军准备就绪，分兵两路，重新猛攻九谷。

20日，中国远征军在攻克畹町的同时又拿下了猛卯。猛卯也是重镇之一，与缅甸接壤。至此，我滇西失地完全光复。据当地群众说，猛卯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最后的目的地。

在畹町，卫曾去第八军军部听取汇报和观看战利品。军长何绍周和副军长李弥说，在我军打扫战场时，日军伤员有真有假，有的躲在汽车底下，突然向我清扫战场的官兵扫射，激起我官兵极大愤怒，因此现在几乎没有活口。而在堆集如山的战利品中，日军的战刀、太阳旗、手枪和千名妇女每人一针缝的“千人护身符”，对同去参观的美军联络部队官兵最有吸引力。卫着李弥从中挑出一些送给盟军，请他们带回美国，让美国人民分享我们胜利的光荣。同时也选了一把大战刀和一面太阳旗，赠送给窦恩。

1月23日，第五十三军第一三〇师与驻印军之新一军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系。

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畹町与芒友之间的南坎会师。日军丛林部队第五十六师团第四十六师团一部均被歼灭，日军精华第十八师团全军覆没，第四十七师团(欠)被全歼，第二(欠)、第三十三师团(欠)溃不成军，残部不足百人逃入缅甸丛林。中国远征军胜利了！约略统计，我军共收复国土2400千平方里。

捷报传到卫立煌的办公室，他以手加额，面带微笑。他感谢中华健儿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胜利！他为作战牺牲的好男儿们默哀致敬！并迅即致电前线，嘉奖全体将士！

(摘自《卫立煌将军》卫道然　安徽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芒友会师

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奉命将所属部队编为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由孙立人和廖耀湘分任军长。这时，史迪威已被调回美国，索尔登(SuLtan)中将担任了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及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东南亚战区北缅地区战斗司令。10月初雨季刚过，驻印军开始向八莫发起攻击。

八莫是日军侵略中国滇西的重要据点，是伊洛瓦底江域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大城，此地得失，关系打通中印公路、收复北缅及滇西的安危。

中国新一军以新三十八师为进攻八莫第一线兵团，新三十师为第二线兵团，分途推进；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则越过伊洛瓦底江，沿途歼灭敌人，于11月7日至12日连续攻下瑞古、西曼及大曼，并以一部向八莫进击，以策应新一军对八莫的攻击。

新三十八师自10月下旬开始南进，29日攻下八莫

外围日军据点庙提，将太平江北岸敌军完全消灭。然后攀登崇山峻岭，从太平江铁索桥抢险渡江，抵达布兰丹。11月3日，孙立人以一部实施佯攻，牵制敌军；另以一部转向八莫南面的曼西前进，以切断日军退路；同时以两团兵力向莫马克发起攻击。在美空军协同下，激战十天，先后攻下莫马克、曼西，一举摧毁敌外围据点，层层包围了八莫。

此时，日军困守城垣，垂死挣扎。驻印军以陆、空、炮、战车联合攻击，对敌据点逐个消灭。驻印军与敌激战1月，逐渐缩紧包围圈。12月14日，新三十八师攻下八莫城北监狱、宪兵营和旧炮台，乘胜对敌形成钳形包围；在城南友军的有力配合下，15日，胜利攻克八莫城。日军城防司令原好三大佐以下绝大部分官兵被消灭，仅有六十余人泅水向南坎溃逃。

南坎(NamhKan)位于瑞丽河南岸，西距八莫114公里，东北距我云南边镇畹町63公里，南至腊戌(Lashio)216公里，有公路与滇缅公路连结，日军在此屯重兵，储粮弹，构筑半永久工事，形成了坚固的阵地。南坎成为日军阻止驻印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会师及阻碍打通中印公路的又一个重要据点。

当新三十八师围攻八莫之际，为争取战略主动，第二线兵团新三十师也绕道南下，对南坎发动了攻击。11月中旬，占领了八莫至南坎公路各隘口，切断八莫日军退路，继而肃清了南坎西北日军外围阵地。12月18日，驻印军击溃日军右翼增援部队山崎支队。与此同时，新三十师一部绕敌左翼，实施迂回包抄，于27日攻下南坎劳文机场。30日，将八莫至南坎公路西北一线敌军肃清，控制了南坎外围。

1945年1月初，新三十师将主力向敌防守薄弱的南坎西南方向迂回。14日，历经艰险，进入南坎西南高山上的原始森林，乘日军主力尚集中在瑞丽河东岸及西侧山地，南坎日军被中国正面部队吸住之际，15日发起突击，一举攻下南坎。随后实行南北夹击，歼灭了瑞丽河东岸和两侧山地日军，只有少数残敌向芒友(Mongyu)溃逃。此次战斗，毙敌官兵1780人，俘12人，缴获火炮12门、卡车12辆。

驻印军攻克南坎后，中印公路日军据点只剩芒友了。芒友据南坎——腊戌——畹町交通要冲，是中印公路的转口和滇缅公路的咽喉。

1月16日，中国驻印军向芒友发起攻击，一路击溃敌军抵抗，占领了色兰、曼伟因、苗西等芒友外围据点。21日，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和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一六师一部在苗西取得联络，中国驻印军在离开国境三年后第一次在中缅边境和来自祖国的军队会合。

此时，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已占领了从南坎至腊戌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芒友外围天然屏障全被中国军队控制。驻印军击溃日军三次反扑，乘胜攻下丹巴山，到达了南皮河西岸，驻印军又以一部向南巴卡附近潜进，以切断芒友敌军退路，23日突然出现在蒙罗，对日军据点发起攻击。芒友敌军利用南皮河及附近高地负隅顽抗，我驻印军从三面发起猛攻，于27日攻克芒友，歼敌250名，获大炮5门，轻重机枪百余，卡车5辆，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遂于中国远征军第九师、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摘自《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内幕

“这里不知处决了多少共产党人！”
——军统息烽集中营黑幕

提起军统特务机关的息烽集中营，令人谈虎色变，毛骨悚然！它是蒋介石实行特务统治的第一号天牢，也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活地狱。在黑暗的年月里，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和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在那里忍受着长期的折磨，甚至惨遭毒手。即幸而不死得到自由的，也多数被摧残成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残废者了。

笔者曾经在那里度过一段长期的苦难生活(从1941到1946年)，幸而不死，同时又一度参加过他们的工作。回忆自己的所历、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如同昨日。

庄园式的大魔窟

息烽集中营(以下简称息营)设在贵州省的息烽县。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有一个山窝，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凹平，集中营本部就被包围在重峦迭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不经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在未到阳朗坝之先，远从迂曲的山坡望去，隐约看得到几十座高低不一的碉堡，好似一群大小宝塔站立着，那便是息营的所在地了。将到阳朗坝时，有几重城垣式的围

墙，随着山坡的斜度逶迤起伏。在围墙之中，几十栋密集交错的瓦房和几座碉堡式的高楼即是息营的本部。息营面积约有 4 平方华里，东西短而南北长，里面有山有湖（名为明心湖），还有几十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点缀于其间。据说这里原来是本地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军统就原有基础加以扩建改造，所以房子的结构形式不一，新旧都有。息营的内部组成相当复杂，除了本部几个行政单位的办公处之外，还划分为几部分。男监区分为忠、孝、仁、爱、信、和、平 7 个大斋房；女监为义斋，原与男监毗连，后来另建，就与男监隔绝了；特监之部，是一些单座独立的平房；工厂单位很多，最大者为印刷所与排字间；警卫队部分，所占面积亦大；还有可容几千人的大礼堂，以及大小教室、大操场、球场、合作社、菜圃等处，就中尤以监牢部分范围最宽，经常可住几千人之多，但仍时有人满之患，所以又屡加扩建。

在息烽县城里，还有一个庞大的特务训练机关，即军统与美国特务组织合作举办的息烽训练班。它与息营虽然性质不同，却是一个姊妹组织，所以息烽是一个曲型的特务区。

军统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一方面因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据说还由于“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这个特务区域是经过周密部署的，从息烽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全体教官、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的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尤其自张学良、杨虎城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先后囚禁于此，因此警戒更为森严。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而且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他们的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以身试法”。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这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线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特务重地，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上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营内电灯设备只限于办公处所及交通要道，在牢房那边则黑暗阴森，完全是另一世界。每一牢房门口，只挂着一盏若明若灭的鬼火灯，室内黑漆一团，伸手都不见掌，除非月光有时从窗隙里射进来一线光明。照他们的规定，在未吹休息号之前，每夜都有轮值警卫来逐房按簿呼号点名（只准喊囚犯号码），倒便桶，一应手续清楚之后，重复加锁；及休息号一响，便不许大家谈话了。这时候，真是一灯如豆，万籁无声，多少人沉在忧思苦忆之中。可是，当犯人们规定休息之际，却是特务们特别紧张活动之时。他们为了防范意外，为了注意犯人们的言论动态，不止是来往逡巡，还往往有人秘密潜伏在每个牢房门口或窗前，暗中偷听室内的谈话，记录汇报。有的时候，甚至连息营主任也亲自出马来干这种勾当。凡初次入狱的人根本不知道此中厉害，以为夜阑人静，可以和同窗难友谈谈心事和案情，或大骂反动派，发泄一顿牢骚，结果这些都会成为特务们掌握的最好材料，从而受到严酷的刑讯，有的竟至一夕之谈，即种下杀身之祸。

令人心惊胆颤的“大学”生活

由于息营的庞大和内部的复杂，军统局是十分重视这个机关的。对于该营的负责人选择非常严格，如非戴笠的心腹亲信不可能派来，即使是一般干部也是挑选对军统最忠实的分子。

息营的地位在其他集中营之上，军统内部称之曰“大学”，此外的集中营则称为“中学”或“小学”（如重庆白公馆为“中学”，重庆望龙门的看守所为“小学”）。其所以称息营为“大学”，有两层意思：第一，息营规模确比其他的集中营为大；第二，从集中营的等级来看，它是最高的一级。凡是各处集中营选送来息的在押人员，一般都称为“升大学”，至于“留学”则是处死的代名词。来到“息大”的人，不是随时有“留学”的可能，便是被蒋介石或戴笠批下长期禁闭的人。据我了解，里面关了 10 年以上尚无自由希望的人不在少数，至于比较轻一点儿的案情，事实上早已在“小学”阶段或“中学”阶段解决了。因此，从其他集中营转送来息营的人，自己心中有数，也作了随时“留学”的思想准备。

息营杀人往往是夜里执行，所以凡是夜里被提审的人都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威胁。因此，每个人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胆怕被提审。如果某一个房间夜里有被提审的人出去，在被提审人未回来之前，同室者都在紧张的心情下等待着。人回来了，大家便起来道喜，问长问短，感到格外亲切；假如久无消息，一听到夜半枪声，则大众心惊胆颤之余，一阵喧哗议论之后，就只有悲愤交集，凄然无语了。为了发泄人们的愤怒和悲哀，有心人编出了许多追悼的诗歌，并以秘密方式辗转相传全监，特务们虽然听

到，也无可奈何。

由于在这里尚有许多未作结论的案子，集中营当然要继续清理。依照息营的组织，主任是兼任法官的，他当然也有审理之权，但多数则由军统直接派人来处理，主任协助。军统派人来审案，每年一次或几次，法官一人或几人不等，时间长短不一，清理之后即将案卷带回重庆，签呈戴笠裁决。戴笠本人每年也要来视察一次或几次，重要的案子多由他自己即时处决，特别案件则呈蒋介石核准。因此，每当军统法官来监清理案件之时，就必然引起全监人心惶惶。尤其当戴笠将来未到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更为紧张。因为那时内外警卫加严，整个监牢如临大敌，连窗外都不准张望。往往戴笠一到，即有不经审讯立即处死的人，这更使人人自危，相互谈话也多作身后家信之托。这种紧张情绪，一直要到法官或戴笠离去以后，才得慢慢冷静下来。

据说在抗战之前及抗战初期，戴笠杀人，尤其是杀中共党员，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后来因为其滥杀太多，不特激起外面的攻击，而且也引起CC派的告状。这当然主要是为争宠争功而起，可是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下令人犯非经蒋批准，不得执行死刑。可是事实上绝不如此，戴笠这个魔王仍然是随时以各种方式秘密杀人，至于随意逮捕就更不消说了。据军统的高级人士传出，好些人遭逮捕连蒋介石都莫名其妙，可见戴笠的跋扈横行到了如何地步。

尤其令人恐怖的时间，是每年4月1日以前的一段。因为军统的前身特务处成立之日是“四·一”，这在军统是一个相当隆重的日子。戴笠在“四·一”前后，一方面释放一批可以释放的人，同时也要处决一些认为该杀的人，以作庆祝行动。这种杀或放的决定手续，照例在三月下旬即须由司法科分别拟定，而最后由戴笠裁决。所以在“四·一”之前，司法科即忙于审讯与结案，凡军统下属所有集中营都派有法官前往清理。息营是军统的“大学”，当然更为紧张。

人间地狱里的三阶段

每个在押人来到这活地狱以后，他的命运一般有三个过程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被解到息营之后，首先即进行检查、登记、编囚犯号数、打入监牢，并交代以后只许用号码代号，不准讲出自己的真名姓等。随即开始过大约1个月的单独禁闭生活，既无人可谈话，别人也不敢对他说话，同时也不准散步。每天除闷在房里看规定的书如《总理遗 教》、《总裁言论》之外，就只有吃饭、睡觉、拉尿而已。可是特务警卫则是随时观察的，在他们高兴时也可能与你攀谈一下，然而这种机会并不太多。经过他们一 定的“考核”，认为没有什么异状之后，才能调到大房去过集体生活。

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时间长短虽不一定，但一般在3个月左右，还要得到一个“考核结论”。这个阶段的生活，每个大房最少住10人以上或数十人不等，每室有一个由上面指定的室长，有轮流处理室内清洁的值日，吃饭时还担负分菜的任务。室长表面上是管理室内的秩序和生活，实际则是执行上面指示来监视全室犯人的言行。他对于室内情况、个别人的动态都有反映报告之责，如发生问题他须负连带责任。还规定了一套室长报告制度，有时个别执行，有时集体汇报，有时口头，有时用文字，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室长，就是特务的耳目爪牙，事实上他本身也是特务。因为军统中犯有错误的人员，有些也拘禁在此，他们为立功而不惜为虎作伥，往往黑心害理，捏造是非来谎报邀功，所以一般人对于室长的畏惧，较之旧式牢狱的“龙头”尤有过之。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布置一个至几个特务耳目在监内。例如为了要了解某个人的情况，在长期侦讯得不到什么或苦打也不能成招的时候，就派特务伪装犯人安排与某人同住，伪造身份，谎报历史，争取与某人接近谈心，佯为同情，阴为刺探。在得到真情之后，或为代出主意，如当事人以为来者是善意好人，乐与周旋，则必误堕奸计，以致愈陷愈深，往往身遭毒手，犹在梦中。狱方对于这些派遣特务，随时以审讯为由提出谈话，以便了解情况，所以也无人怀疑，直到问题解决之后才将这些人调出。这种手法，即令是他们的基干室长，也蒙在鼓里。狱方经常利用个别谈话，鼓励相互揭发，以防止室内有攻守同盟的活动，也是一种很毒辣的手段。

第三阶段：转入集体生活一定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问题，通过“考核”，则照例参加生产劳动。至于分配到哪一部门，主要由个人的条件来决定。如老年有病不能劳动者，则留在房里阅读规定的书，如前述“遗教言行”之类。有写作能力的人准许从事写作，要用纸笔，必须报告核准，用完之后立即缴还。狱方照例每周要实行大检查一次，有时还实行突击检查。如果发现什么违禁物品，或秘密活动，则看情况轻重，分别处分，重则上镣铐打入重禁闭室去。在有太阳的天气，每天可放风一次，时间约15分钟。在这短短时间内，可以集体在院子里散步或晒衣物，值日的人则清理马桶，但武装的便衣警卫是在一旁监视着的，流动的武装卫兵有时也参加警戒。

一般说来，半年以后，即通过两次“考核”以后，凡是没有犯过监规或少犯监规的，同时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就有可能得到优待。所谓优待，主要是调动到较好的斋房去，同时扩大一点自由范围而已，这部分人大都集中在忠斋。这是一座新建的平房，共有监室10间，地点在一个小山之下，四围有树，旁有运动场，院子很大，可以自由种菜栽花。每室最多住4人，中间陈设大书桌及小凳，为人们读书写字之用，纸笔也不受限制。当然，秘密

的通讯是绝对禁止的，一切须通过警卫之手。忠斋白天开放，可以随意在院内活动，夜间锁门、室内不许点灯以及伙食给养情况等大致与各斋相同。但有存款的人，可以随时请求添菜，并准许使用菜刀之类的利器，这一点儿权利也算是特殊的。能够调到忠斋的人为数不多，在我被禁闭的4年期间，一共不过四五十人。

搞情报是特务的专业工作，他们除了上述的各种手法之外，还有一种很毒辣的措施，即奖励告密。在各个监房里，都设有专用报告箱，是为投收告密小报告用的。他们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派有高级人员负责审核(由秘书室主任秘书负责)密报，报告箱的开闭亦由审核人亲自动手。这类报告固然可以报告本人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揭发别人，即使狱方人员有问题一样可以报告检举。为了方便，可给各人纸笔使用，必要时还可调出室外来写，进一步更可请求对负责人当面报告。报告人只要提出，虽警卫亦不敢阻挠，如报告确有价值还给以物质或其他奖励。由于这种小报告，有不少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那些特务们对此也非常害怕。因为，绝大多数人痛恨特务爪牙，为了保卫自己，反抗迫害，就团结起来一致行为，利用这种小报告作武器进行战斗，于是在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好人与坏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与摩擦。斗争的结果，两者阵线分明，谁是好人，谁是坏蛋，更为清楚，特务们愈加孤立，不敢乱造是非来诬害别人了。

初到息营，经常听人指说，某某是“二进宫”，某某是“白头公”，久后才明白这是牢中术语的含义。所谓“二进宫”者，乃幸而得到自由，出去后又因泄漏了息营的秘密被人揭发，重又被捕的人；“白头公”则是指重大的政治嫌疑犯，因无确证，既不能杀，又不能放的人。营内的一切是绝对秘密的，泄漏消息者轻则拘禁，重可死刑，这条不明文的法律不管对军统内或军统外的犯人，都是一律适用的。当每一个人得到释放之日，第一个手续就是填写一张绝对保守秘密的具结。上面写得明白：释放之后，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准泄漏营内的任何秘密，包括自己被逮捕的经过在内，如果违犯自甘接受最严厉的惩处。写了之后，还须印上指模画押，最后由主管者郑重宣布。然而不管是什么天条，要求一个遭受长期蹂躏的有灵魂的人永远保持觉默是不行的。所以，“二进宫”的囚犯还是每年不断地有。有些情况严重的，“二进宫”不久就受到最残酷的刑讯。息营里的白头公也不在少数，有些已关禁10年以上，从来不审不问。例如：吴佩孚一个秘书王某，湖北人，吴死之后仍在狱中；两个刺宋子文的嫌疑犯，关的地点转移了四五处，也从不审问；邓演达先生的秘书文某，与邓先后被捕，但邓死多年，仍不释放；有个中共党员韩某，是“九·一八”之前在北平被捕的，也关了10多年。

谈到逮捕，也有不少骇人听闻之事，而最惨毒的莫过于连锁逮捕，一人有罪，不止是究及妻孥，亲属亦所不免。在狱中有一些是夫妻父子同狱许久，但彼此各不知道；有的系同时逮捕来，一方已被屠杀，另一方还莫名其妙，而且对其家属亲眷依然拘禁不放。

一人被逮捕以后，往往在侦讯过程中又任意扩大逮捕。军统采用种种特务手法，得到一点似是而非的捏造情报，即将其周围人物不问青红皂白一网打尽。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够办得到，不管在天南地北，不惜用出最无耻的威胁诱骗将人捕获，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律手续。捕到之后，即隔绝禁闭，被押禁者虽同在一处，仍各不相知。有时为了对质对证，大家一见惊心，竟不知谁先谁后被捕和问题如何发生。即使真相大白，证明确无关系，理应释放，他们也抱着宁可错捕千百人，不随便放走一个的主张，使之遭受长期禁闭。

至于刑讯的残酷惨毒，更是一言难尽。一般体刑毒打，固属家常便饭，水火交攻(用开水烫、铁火烧)亦时有所闻。从镣铐到毒棒，我本人都曾尝过滋味，此外所见毒刑尚有灌辣椒水、钻刺指甲和上电刑等。灌过辣椒水的人，大都眼鼻同时红肿，一身辣痛，呕吐不止，往往造成吐血或神经失常。受过钻指甲的人，则更为痛苦；在用刑时，全身捆在架子上，将双掌合十紧缚，用锥子从指尖钻下，随钻随问，虽血流如注，仍不罢手。晕绝之后，又用冷水喷醒，再次用刑。凡受过这种毒刑的人，指甲全脱，不易再生。在息营犯人中，最少有10人以上是没有指甲的。至于上电刑时固然惨痛发狂，几天之后亦仍然神经麻木，不能饮食。以上这些毒刑，不止是对一般政治犯滥用，即便对他们自己的在押高级人员也绝不例外。

执行杀人，基本上是由第二组的爪牙们干的。这般如狼似虎的刽子手不止是以杀人为职业，而且以杀人为娱乐。息营杀人，多在夜里执行，地点多在监后山上和马路两旁的山坡，很少集体执行。如一次需处决多人，也分在几处以各种方法处决，很少集中一地，即使同属一案，其处死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他们对于死刑的执行，事前绝对保密，事后则随便谈论，如何杀法，也说得有声有色。我从他们那里听到，杀人方法大致经常采用三种，即枪决、棒杀、活埋，而以枪决者为多。枪决又有“快板”与“慢板”之别。所谓快板，即一枪击中要害解决，往往使死者事前不知，生前没有死的恐怖。如佯为释放，警卫与之同行，且走且谈，遂乘机以手枪一击，死者应声倒地。这种杀法，多系对军统自己的被禁人员行之。慢板处决是最残酷的。有一次屠杀男女青年6人，其中除一女张露萍是中共党员外，其他5人都是军统电台的下级人员，据说是有背叛团体、泄露秘密的嫌疑，实际除了一人告密外，并无其他证据，关了4年也没作结论。这几位青年都相当倔强，在禁闭期间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们都由当特务而恨特务，对管理当局经常有抗拒行为，所以更引起军统的仇恨。枪决的地点是在息营仓库附近，据说将他们架到之后，连镣铐都没

有取下，即令他们一排跪下，但张露萍不肯在敌人面前屈膝，一再高呼"打倒国民党"和"共产党万岁"。6个刽子手分别射击，先从张臀部射起，再及四肢，张在痛苦中一连中了6弹才告断气。对其他几人，也是采取同一手法，并且是以陪斩方式来逐一解决的。

被凌辱的女犯

女监的原来所在地，与男监系一墙之隔，过去因在放风散步时，曾经发生过隔墙讲话传递消息之事，为此，息营主任周养浩特选定他的办公室后面山坡上，平地另建，仍取名义斋，但管理员则由女的担任，男警卫只负临时提调之责。

监内女囚最多时可达百人，成份至为复杂：从工厂的女工到官僚的太太小姐以及女特务，色色全有，此外还有一些参加革命的女战士，都混合住在一起。她们之中，有人是和丈夫一道被捕，或在以后捕来的，但除非有特殊原因不准见面。如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为了儿子生病，几次报告要求会面商谈，都受到斥责；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和岳丈等同时捕来，周的母亲因生病常请会面省视，由于戴笠与周佛海勾搭上了，就予以特别照顾，准其家属亲眷合住一处；又如四川国民党省执委改组派孙某夫妇，也是同时被捕的，前后关了5年之久，都不许通一点消息，一直到释放之日，才得重逢；再如军统高层人士王某与妻子同时入狱，可是王某已被枪决，其家属仍扣押不放。女监的人数不多，而且还有老弱，但所担负的劳动却不轻松。全监的布鞋每年需要千双以上，基本都是由她们供给，所以她们每天要忙于搓麻绳、做鞋底鞋帮和绱鞋子。集中营犯人穿的清一色的牢衣也由女犯缝制，在息营缝纫部成立之后，缝补旧牢衣仍归她们做，数量也不在少。对于她们的"思想感化"，虽然要求不及男犯之高，但也决不放弃或放松。对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规定每天要看指定的书，并且同样要求她们写读书笔记或日记，按时交上面批阅。所以，她们一边拿针线，一边还要拿笔。此外还时常被找去作个别谈话，接受特务们的说教。从肉体到精神，她们也是长期在苦难中遭受折磨。

在被囚禁的女犯中还有一类人与众不同，如邹志英、萧明、夏文秀都是被戴笠蹂躏抛弃又予以长期禁闭的。军统训练班女生邹志英系杭州人，是戴笠多年的情妇。邹同戴笠姘上之后，以为戴对她是有感情的，后来发觉不过是拿她来当玩物，于是在伤心失望之余，忍无可忍，跑到军统局去闹。戴认为与自己的威信有关，便下令将其逮捕，先拘在重庆集中营，后因邹受刺激过度以致精神失常，又将好转送息营，长期禁闭。司法科以事关戴的私生活，不敢过问，只有照办。邹到息营之后，更为气愤，在监中将戴的丑恶、笑话传播全监。息营主任周养浩怕闹得不可收拾，即将情况向戴反映，戴当然不敢释放，即暗示周给以优待。于是在营内建一小屋，四周栽植花木，将邹迁居其内，以示戴笠关怀之意。可是邹仍喜怒无常，逢人即骂戴笠无耻，不止周养浩不敢和她谈话，戴笠本人到息营视察，也不敢与其见面。邹前后被关了几年，一直到戴笠死后才得恢复自由。至于萧明、夏文秀，原系因嫌疑被捕，开始也禁闭在白公馆。一次她俩在外面洗衣，恰逢戴笠视察看到，记上姓名之后，当夜即用滑竿双双抬到歌乐山上戴笠的小公馆去，一住7天未回。为了掩饰耳目，以后即将其转解息营，长期禁闭，司法科也同样不敢过问。她们到息营之后，与邹志英同禁义斋几年之久，也和邹同样，一直到戴笠死后才恢复自由。

戴笠的心腹、息营主任周养浩，也因女监在他支配之下，大权在握，为所欲为，迭从女犯开刀，造成许多罪恶。例如被押的女共产党员张露萍，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演员。周养浩对她垂涎已久，屡以个别谈话为由，向其进攻，但周虽用尽心机，也无法达到目的，只有怀恨在心。当时我已在押，同样爱好艺术，曾为息营晚会编过《女谍》一剧本，由张来担任女主角，由是相互熟识。我从张处曾听到周养浩对女囚的种种侮辱，亦激于义愤向外泄露，被周发觉，大为震怒，于是对我们两人实行报复。他以破坏监规为理由，召集全监男女犯人于大礼堂，宣布我们两人罪状，将我杖打100下，打得我血肉横飞，最后还将我镣禁，罚吃盐水饭1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罚吃盐水饭半个月。

再如当时有一女犯名周大全，湖北沙市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学生，风度很好，擅长京剧。周养浩在进攻张露萍失败之后，同样以个别谈话方式，调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进行威胁利诱。周大全初不为动，周养浩最后竟不顾一切，将其强奸。事后周还表示，保证为其争取自由，但以嫁彼作妾为条件。周妻毛氏乃军统局秘书主任毛人凤的侄女，不久即发觉此事，但周不肯承认。毛氏为了侦查这件事，经常入营走动，事有凑巧，一次竟被她双双捉获了。这样一来，就引起了醋海生波，全监传遍，毛氏还控诉到了毛人凤和戴笠那里。那曾料到，周养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周大全后来也恢复自由，正式成了周养浩的如夫人，可见周在戴笠眼中的位置重要。

息烽"修养人"

周养浩想以息营作为政治与经济资本大搞其"改革计划"，他为囚犯创造了个代名词，称之曰："修养人"。凡在息营的犯人，都换上了修养人的称号，而且还有等级的区别，从类型上、从条件上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

"一般修养人"：除了住在忠斋的人以外，都属于此类。大致包括一些普通政治犯和纪律犯，绝大多数都是军

统以外的人。如不满现状，发表不满言论，有反蒋活动，有反抗命令行为的人等。

"优待修养人"：这一类型的人数并不多。被调到忠斋的囚犯，都属于这一类，但也有个别不通过这种过程的。其选调的条件，根据他们的说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在入监以后，没有犯过监规或很少触犯监规，而且通过考核鉴定的；二、过去的政治地位比较高的；三、文化水平很高的；四、在"修养"期间，有特别好的表现的。此外则为上级特批的照顾对象，但主要条件仍是前三条，第一条尤为主要。因为在这个小王国里，息营的负责人有权决定一切，所以有些人虽经上级批下优待，如果周养浩等认为有问题，仍可以改变待遇或暂时改变待遇。

"自由修养人"：这是一个特定名词，是指可从监房内调出外面做事的犯人。这种被提调的人犯，不限于优待修养人之类，只要他们需要，可以从任何斋房调用，包括义斋女监在内。当然还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如张学良、杨虎城的随从副官，并没有在优待之列，但同样被定为自由修养人。这一类人在生活待遇上，较之忠斋又提高一步，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到营外附近的地方走动。我就曾经作过自由修养人，到过阳朗坝多次，与我同时被定作自由修养人的还有中共党员宋绮云、刘丕光等多人。

"特别优待修养人"：这种类型，为数不多。其所以被称之为特别者，其一因其案情与一般不同，其二因其生活待遇也与一般人有别。而从其住区来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住在集中营之内的，一种是住在集中营之外的。

说起后一种，可以举马寅初先生为例。马寅初先生在抗战中期因发表一些金融问题的言论被扣押，先拘禁在重庆，后来又转送息营。为表示优待，马即住在距息营百步外的一间小屋，其生活情况较忠斋优待室为好，但不及自由修养人，行动完全限制，且不准与外面接触。我们相距虽近在咫尺，并没有会面。可是他很幸运，禁闭不久，即恢复了自由。

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军统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张将军不能接见任何人。张将军偶尔去过贵阳，那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准的。在张将军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也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张将军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一肚子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至于杨将军夫妇两人的随从人员，则一律关在息营本部。

关于住在营内的特别优待修养人，其生活情况各有不同，但活动范围则大致相似，可以举出几人为例。

自称是蒋介石胞兄的郑绍发：这个传奇性的人物，从面相上看，酷似蒋介石。他自1941年从河南跑到重庆来找蒋介石，不但没有见着，反而被扣，先拘禁在重庆的白公馆，曾与我同住过。以后为保守秘密，又转送息营。据军统的人说，这完全是戴笠的布置，蒋介石并不知道。但实情如何，我们也无从明了。当局为照顾郑的一切，除衣食住优待外，初次即为其寄200元回家，以后每月还代他寄几十元。从这点看，可能系出于蒋介石的指示。郑自到息营，自住一小屋，被准许在营内一部分地区走动，但一不许与人接谈，二不许走近一般监房。他受这种限制，当然还是为了保密起见，但以后就去向不明了。

大汉奸周佛海的一家：包括周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母等一共6人。在这些人捕来时，除周母、周的岳母及妹子关在义斋外，其岳父住忠斋优待，妹夫则在平斋。后来因为周佛海与戴笠有进一步勾结，才另在营内建一小房子使全家同住。并每月发给生活费，准其自由起伙，但活动范围仍受限制，大致与郑绍发相同。

戴笠的情妇邹志英：关于邹的情况，前已述及。她虽失掉身体自由，但仍有对外通信的自由，同时还有发牢骚的自由，即使主管者亦不敢干涉。至邹的生活情况，与自由修养人类似，但不参加工作而已。

"外籍修养人"：在押的外国囚犯，数字在10人以上，国籍不一。计有白俄6人，听说都是流浪贵族，有军人也有神父，被捕原因不明，在押时间已相当长；捷克斯洛伐克1人，名叫米罗斯，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思想颇进步，被捕原因可能与共产党的工作有关；日本籍两人，听说是间谍嫌疑。西班牙1人，是个中西混血儿，通几种外国语，也能讲中国话，原来在汉口当买办经营猪鬃生意，系在抗战中期被捕的。这些人，除了那位西班牙人被安排在教务年工作外，其余的都关在一般禁闭室，生活情况与一般修养人无异。

除此以外，还有若干华侨，以云南及广东两省的为多，系从越南及缅甸回来的，其中有个别的是军统在海外的人员。

（选自《纵横》94年4、5期，作者：李任夫）

福尔曼的红区之行

1944年6月14日，延安城里人山人海，彩旗飘扬，这里正在举行有4万多人参加的庆祝联合国日大会。在大会主席台上，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外国人正在慷

概陈词：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作为一个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朋友，我希望能促进中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他那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听众。他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1898—1978)。

福尔曼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从小酷爱艺术，1922年至1925年间，他先后就读于芝加歌美术学院和密沃基莱顿美术学院。192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从1930年福尔曼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来到中国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他曾三次到世界著名的神秘高原——西藏采访，并于1935年出版了《被禁止通行的西藏》一书。在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下，1937年夏天，福尔曼第一次来到陕北，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的中国红军，并会晤了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这都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

抗战爆发后，福尔曼一直没有访问红区的机会。当他1940年作为《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又一次来到中国时，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发生逆转，国民党已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以50万大军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访问中共所辖区域。因此，别说是进入红区采访，就是从舆论和新闻媒体渠道，也难以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正如福尔曼所说，"我们不仅没有一个人了解封锁线内的真象，而且在我们的报道中，不能提及一句有关共产党的话，除非引用蒋总司令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在他们指责共产党时所惯用的语言，如'武装割据'、'袭击国军'、'阻挠抗战'等等。"

直到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西安时，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士恺还对福尔曼说，"过去6年中，共产党没有和日本打过一次仗"，"而且，目前希望他们打日本人也只能是奢望。因此，你们会看到，你们所称的'封锁'并不是针对共产党的，而是针对日本人的。因为日本人或许会从不抵抗的共产党地区长驱直入，袭击西安和中国的后门。"

福尔曼当然不会相信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上述攻击之词。他福尔曼也有疑问：这些共产党人真的象政府当局所描绘的那么坏吗？他们真的在背信弃义地袭击中央政府军吗？他们真的拒绝抗日？……要客观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基于亲身观察和无可置辩的事实。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使福尔曼渴望了解中国西北内部的真相。1943年11月，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各国记者纷纷响应，但没有结果。直到1944年春，福尔曼等人要求去红区采访的事情才有转机。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军已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的辉煌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多次重挫日军，并在中国战区组织了盟国协同作战的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危局，发动了打通南北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军节节败退。美国对蒋介石强烈不满，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数十万大军，增援缅北、滇西和豫湘桂作战，并提出国民党必须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严重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否认存在对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封锁。福尔曼等趁此良机，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访问延安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几乎所有世界各地驻重庆的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答应记者们的要求。1944年4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正式表示可组团访延。但是为了阻挠记者们的顺利采访，国民党当局提出，要将外国记者访问团扩大为中外记者访问团，并要以国民党官方人员为领导，以监视整个采访活动，又规定采访路线是先访问西安和晋西阎锡山防区，然后才可进入陕北。此外，记者们所发新闻均须经访问团领导批准。结果在重庆组成了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包括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领导2人和国民党中宣部派来的4人。6名外国记者有：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夏南汗神甫和普金科。这样，福尔曼等人总算获得了进入红区的"通行证"。

然而记者团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5月才始得成行。5月17日，一架大型道格拉斯DC_3包机把福尔曼一行径直从重庆送到宝鸡。然后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福尔曼度过了饶有兴趣的4天。他随记者团参观访问了工厂、学校、集中营。访问中，成群的国民党特务扮成人力车夫和便衣，寸步不离地跟着记者们的屁股后面。访问集中营时，西安当局特意安排几个"觉悟"了的，被共产党"迫害"过的男女青年，向福尔曼等"诉说"边区的"黑暗"，以及他们是如何逃出陕北的。富有经验的福尔曼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认为他们是在说谎，因为"只有那些肯定能讲出由当局制造的谎言的人，才能在记者面前露面，其他人都被小心地留在幕后。"5月21日，记者团乘汽车离开西安东行，经临潼、合阳、韩城、在宜川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吉县，抵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防区。5月31日，福尔曼一行离吉县到大宁，从平渡关西渡黄河，从"后门"进入陕甘宁边区。费了如此多的周折，福尔曼才真正踏上红区的土地，开始了他为时5个多月的红区之行。

二

福尔曼一行参观红军的第一站是南泥湾。这本不在计划之内的。但是当6月1日，福尔曼他们一进入红区时，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凉水镇迎接他们的就是八路军第359旅旅长王震，同行的还有陈家康、徐克立夫妇。他们带头牲口、车辆从延安翻山越岭而来，已经走了两天两夜，但却精神饱满。在他们骑马西行途中，王震指着眼前一块块种满小麦、黍子、棉花和玉米的绕在陡峭山坡上的梯田，给他们叙述了有关南泥湾开荒的故事。这是记者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引起了福尔曼等人的极大兴趣。他们临时决定绕道去南泥湾看一看。

快到南泥湾时，记者们从正在田间劳动的士兵旁边走过。只见他们一面挥着镐、锄头和铁锹，一面哼着歌。步枪、机枪、掷弹筒和迫击炮，按军队习惯整齐地架在一边。福尔曼观察到，几乎所有这些武器都是由日本制造，再由他们从战斗中缴获过来的。它们在默默地证明，这些人自始至终都是军人，而不是农民。当晚，记者团还参加了当地的群众集会。第二天，福尔曼等还参观了359旅719团团部和718营。在这里，福尔曼看到了一支自给自足的军队，他们认为这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营养最好、训练严格和纪律严明的军队，。接着记者团还参观了359旅的医院。这对福尔曼来说，是一次心情沉重的的经历。因为他看到，虽然医生和护士给伤病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治疗他们的药物却很少，或根本没有。"药房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行西药瓶子，上面贴着拉丁文标签，但所有的瓶子都是空的。外科器械都是用废钢铁制造的，大多数是用日本炸弹片制的。"王震冲着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大发脾气：

"国民党蓄意残忍地封锁我们，扣留运送给我们医院的药品，这些药品是外国朋友在海外捐赠给我们医院，为抗击共同敌人的战士们用的。扣留这些物资是对天犯罪！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神仙菩萨，他们一定会知道，一定会被这可耻已极的惨景所震惊！"

周恩来那足智多谋、言辞犀利的秘书陈家康，这时也赞同王震的话："我谴责国民党，他们故意扣留、然后没收了四卡车英国红十字会捐赠的药品。那批药品在运往边区的途中被卡在西安，根本不允许运出西安城！"这场风波最后在夏南汗神甫的调解下才平息下来。

记者团在南泥湾逗留了4天，于6月9日才到了预期访问重点地区——延安。这也是福尔曼红区之行的主要活动地区。他们到达的当天下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设宴为他们洗尘。第二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欢迎记者团全体成员，晚上还举行了富有延安特色的音乐会。在中西古今各种乐器合奏的舞会上，福尔曼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

6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他首先致辞欢迎记者团的到来。在致辞中，毛泽东首先说明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毛泽东还着重谈了有关第二战场开辟的问题，他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在谈到国共关系时，他声明中共"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接着毛泽东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的开辟、中共的希望及其今后工作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他谈到，中国既需要民主，也需要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这些重要新闻，福尔曼都尽快地向国外一些报社发出快讯，但遗感的是，这些电讯都被国民党当局检扣了。

6月13日以后，福尔曼随着记者团陆续参观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如被服厂、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医科大学，国际和平医院，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处，访问了有关机关及个人。6月22日，叶剑英于王家坪向记者们介绍了中共抗战的一般情况，分析了敌后战场的敌情、伪情、友情和我情。同一天，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与记者们的座谈中，畅谈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6月24日，延安文化界吴玉章、周扬等数十人，在边区银行大楼与记者团举行文艺座谈会，谈论陕甘宁边区的新文艺，会后延安文化界联合公演了秧歌。

为了更好地了解延安的社会状况，福尔曼走访了许多新式的"小人物"，如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铁匠英雄李之华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那些已经从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人，更是给福尔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普通劳动百姓的成长过程中，福尔曼看到了，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这是那些提议国民党封锁的人绝对没有料到的结果。

尽管记者团领导坚决反对，福尔曼等人还是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单独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祖涵、聂荣臻、陈毅等党政军领导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有关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及文教政策的大量信息。这是随团参观访问所不得曾得到的收获。

毛泽东主席答应了福尔曼的单独采访要求，用专车把福尔曼接到他的住处。在昏暗的烛光里，毛泽东回答了福尔曼所提出的问题，并向福尔曼分析介绍了中苏两国共产主义的不同点。他告诉福尔曼说："我们不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而奋斗。我们更乐意把我们目

前所做的一切看作是为林肯在你们南北战争中为之而奋战的目标：解放奴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几百万处在封建主义桎梏下的奴隶。”经济上的减租减息政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三三制的民主政府形式等方面都与苏俄体系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已不再是苏俄定义的共产党人了。”当福尔漫问他为什么不改变名称时，毛泽东坚决地说：“不，我们不能，也决不会改变名称，也不需要这样做。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和实践，不是他的名称！”

福尔曼与朱德就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国共摩擦和战后中国的前途等问题作了多次交谈。朱德说：“就共产党而言，这场战争不过是漫长的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的斗争的继续。”朱德告诉福尔曼，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战后中国应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福尔曼从聂荣臻生动的叙中，了解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人民战争的起源、问题和发展。但是更为详细的有关华北地区广泛的人民战争的故事，却是由两位参加作战的普通农民给福尔曼补充讲述的。福尔曼完全被这些故事迷住了，他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天接一天，差不多整整两个星期，都坐在那儿听讲，他仿佛置身于地雷战、地道战和水上游击战之中。

在一个多月的参观考察中，福尔曼等外国进步记者，对于边区所发生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因为他们的所见所闻，与国民党报刊所宣传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

一个多月的延安之行虽然收获颇丰，但福尔曼还不满足于此，8 月 20 日，他与记者团中的斯坦因、爱泼斯坦、武道、普金科等人采取更为大胆的举动，冒着生命危险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太原附近的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参观访问。

当他们通过敌马坊据点的封锁线时，正值八路军和当地老百姓刚攻克此地。福尔曼等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作战现场，询问了敌伪俘虏。前线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抗敌的事迹给福尔曼等印象颇深。在第八军分区司令部附近，福尔曼又看到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村子”。村里的每条道路、每条小路都布满地雷，连村里的大街上都布有地雷，而村民们却若无其事地走动，好象全然不在意脚下的危险。他不由地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为了实地观察八路军是如何抗击日军，9 月 15、16 日深夜，福尔曼等人与不期而遇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卡斯堡少校一起爬上离汾阳约 10 里的山顶，观看八路军奇袭汾阳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飞机场和火柴公司的战斗。只见夜幕下，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杀声震地。经过三天激烈战斗，八路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 日早上，福尔曼目睹了一个动人的场面。攻打汾阳的勇士们都背着各种各样的战利品——步枪、机枪、战刀、钢盔、电话机、战旗、毯子、大衣，还有一袋袋大米和盐，一盒盒的香烟和火柴，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回来了。只见村民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提着一篮篮水果，一捆捆蔬菜、南瓜、核桃和鸡，其中，一人还拖着一只极不情愿的山羊，来慰问八路军。所有的人都兴高彩烈，互相开着玩笑，好象刚从恶梦中醒来。这个场面也感染着福尔曼，他决定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9 月 21 日，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举行的祝捷大会上，福尔曼又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

祝捷会议后，福尔曼等又转到山西静乐附近前线，实地观看我军民怎样围困和炸毁娄烦镇的日军碉堡，接着又在临县、三交镇地区实地观看民兵英雄们怎样爆破日寇的封锁线。

三十多天在抗日前线的所见所闻，使福尔曼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了：八路军在作战，人民在作战，军民互相配合，互相支持。这就有力地驳斥国民党有关八路军的种种谰言和毁谤。

10 月 2 日，福尔曼等西渡黄河，离开晋绥抗日根据地转返延安。10 月下旬，福尔曼等相继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完成了他一生中富有意义的一次采访活动——红区之行。

福尔曼等人此次访问红区能得以成行，这本身就是抗战后期中国局势变化的重大事件，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正如爱泼斯坦所说，记者团的到来，“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象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福尔曼等人通过自己的观察，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教等方面的情况，并报道给全世界想要了解中国西北红区真相的人们，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毁谤的谰言，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

1945 年，福尔曼红区归来后不久，就把他所了解的事实付诸于文字，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又名《北行漫记》）。后来他又选编出版了在访问中所拍的照片集《西行漫影》。《北行漫记》堪称《西行漫记》的姐妹篇，成为西方记者报道中国革命的又一佳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福尔曼还撰写了《正在变革的中

国》和《在亚洲犯的错误》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曾来中国"旧地重游"。1978 年福尔曼不幸去世。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朋友，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福尔曼为忠实报道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业绩所作的一切。

（选自《党史博采》94 年 8 期，作者：巫云仙）

面前是新中国一角的曙光
——1944 年夏中外记者团延安纪行

艰难成行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敌后解放区军民的抗敌斗争，深深地吸引着驻华外国记者。

1944 年 2 月，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再次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

对外国记者的访延要求，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多次表示欢迎。

而国民党却深怕外国记者的访问冲破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拒绝。但是访问延安的要求主要出自美国和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普遍支持，国民党政府也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的一再进逼下，蒋介石只得表示同意，声称"邀请外国记者赴延安与陕北参观一事，也为本人早已计及之计划。"但他私下又发布侍秘第 17158 号代电，责令有关部门加以抵制。军令部、中宣部、外交部、军委办公厅遂拟定《外籍记者请发采访审核办法》，严格规定审核手续。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也拟定《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在估计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的重点问题之后，制定了对外国记者进行控制，施加影响的具体措施：外事局所派的引导人员，"应在中统局或军统局人员中选用"；外国记者在延安逗留时间不能少于三个月，并以此作为批准访问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采访日程上，增加参观西安青年劳动营以及绥远、宁夏等国民党统治区，务使外国记者的印象"不集中共党区域"等等。此外，国民党中宣部对赴延的外国记者也作了精心的选择，以控制外国记者中政治倾向的平衡，并规定了记者团统一行动，不准个别活动的纪律。为装璜民主的门面，国民党政府除指派中央社和官方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外，也让个别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结果在重庆组成了共计 21 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包括：

国民党官方领队 2 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宣部的邓友德；

外国记者 6 人：冈瑟·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哈里逊·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科马克·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N·普金科（塔斯社）；

中国记者 9 人：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鹗（《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

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 4 人：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

自由采访

1944 年 5 月 17 日记者团从重庆出发后，先按国民党政府的安排访问了西安及山西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难坡。5 月 31 日，自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土地。次日清晨，八路军 359 旅旅长王震亲率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陈家康和《新华日报》记者徐克立夫妇及警卫人员前往记者团住宿的村庄凉水崖迎接，并陪同他们参观固临、延长及南泥湾。在南泥湾，记者团参观 359 旅的步兵团、炮兵团、伤兵医院和干休所及八路军开垦南泥湾的实况。这些参观使记者们震动很大。他们亲眼看到人民军队有着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吃的穿的是自己生产的成果。而在伤兵医院的见闻，更使记者们震惊：药房架子上是空的，仅有的几个瓶子里装的尽是自己配制的中草药丸子；医生手中的几副听诊器都残缺不全，用橡皮膏补了又补；病房里则传出一片痛苦的呻吟。医护人员诉说了胸中的愤慨，揭露了国民党对边区惨无人道的封锁。王震旅长呼吁记者们公开事实真相，给八路军以人道主义的声援。外籍记者爱泼斯坦和普金科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重庆政府运送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国记者也表示一定将此情况反映出去，而那些一路上兴风作浪的国民党记者无颜再挑衅闹事。

6 月 9 日，记者团进入延安，下榻南门外的边区政府交际处。作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客人，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记者们抵延的当天晚上，叶剑英以十八集军团参谋长名义设宴为其洗尘，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参加。第二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贺龙、徐向前等出席作陪。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德致欢迎词，他指出："这次记者团来延，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他请各

位记者在参观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予以指导，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感到很愉快。"他抨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认为"在同盟国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认为这次外国记者的访问，"把一座封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他表示："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对于中国国内的团结，表示热忱的希望，"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沿途参观的情形之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讲话之后举行了音乐晚会，以《同盟国进行曲》开始，接着演奏了各种民歌，最后以《黄河大合唱》结束。会场充满了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12 日下午 4 时，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接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长达三小时。席间，毛泽东首先致辞，他对记者团来延表示欢迎，对第二战场的开辟表示祝贺。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此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毛泽东还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各党派和人民的不民主制度。随后，毛泽东逐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出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也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在同记者的交谈中，毛泽东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他说："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级。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当斯坦因问他"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时，毛泽东答，"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同记者团一起观看京剧《古城会》等节目。周恩来从接见、宴会到晚会一直作陪、料理一切事务。秦邦宪参加翻译工作。

6 月 22 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向中外记者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报告。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况起见，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介绍。"因为对于作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的情况"国民党中央"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他概括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整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他接着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至 1944 年 4 月前抗战七年来的基本情况，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业绩，指出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在报告的最后，叶剑英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搞摩擦以致攻击，包围、封锁等种种破坏抗战的行径；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来。"

6 月 24 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般情况后，丁玲、吴伯箫等几位作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记者问："在延安发表文章要经过什么手续？"丁玲说："初听这话，我很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箫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做他的朋友，在今年(1944 年)3 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吴伯箫严肃地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艾青作了抗议性的发言。他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鄜县被保安队捉回了。艾青愤慨地说："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要逃呢？"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也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文化工作情况的报告。

6 月 25 日，朱德和叶剑英应斯坦因和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各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英国各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够担负的任务等。

6月27日至7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待了中外记者团。时值边府主席林伯渠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李维汉秘书长主持了接待工作。为了使中外记者能够更自由地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语言上的方便，接待是分别进行的，方法是首先由记者书面提出问题，然后由有关部门按问题作情况介绍，并发给书面材料，同时回答记者的提问。

第一次接待是综合介绍。首先由李维汉秘书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并当场发给记者书面材料《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回答了记者临时提出的问题。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作《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他说：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作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抗战；第二，团结。在抗战中间，边区政府一贯坚持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讲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同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是否有权的问题进行座谈。通过座谈，他们说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以后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外记者介绍边区的情况。主要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介绍边区的民主政治，即选举制度和选举方式；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介绍行政机构，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介绍财政收支、税收、人民负担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度等问题；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介绍劳动政策和合作政策；教育厅厅长柳湜介绍教育制度和施教方针；贸易局经理叶季壮和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介绍边区的贸易活动和边币的发行、银行的金融等问题。

与听取情况介绍交替进行，记者团参观了延安市容及附近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工厂、光华农场、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洛杉矶托儿所、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观看了多次文艺演出，并参加为庆祝联合国国旗日在文化沟举行的四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了解。

7月12日，记者团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返回重庆。8月中旬，外籍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和国民党中宣部张湖生离开延安，赴边区的绥德等地参观访问。8月22日，由袁任远专员、杨和亭副专员主持，绥德士绅安之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哲卿、王德安、丁子文、张敬斋、王文卿等和他们进行座谈。有记者问过去的一个国民党员，他是否是国民党。他答：过去是，现在没有关系，对国民党印象不好。问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对国民党的看法，他答：国民党不民主，政策不转变，前途暗淡。问另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对原驻扎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部队的看法，他答：天天找八路军摩擦，暗杀八路军公务人员等。

8月30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三人，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通过敌马坊驻点封锁线时，适值八路军进攻该地，遂参观了作战现场，并采访敌伪俘虏。9月中旬，爱泼斯坦等进入晋西北军区第八分区，参观分区医院和兵工厂等，实地观察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军战略据点汾阳的战斗。10月下旬，外国记者由晋西北回到延安后不久就相继离延返渝。中国记者和外籍记者夏南汗在延停留一个月零二天，在边区42天，其余外籍记者在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则逗留了近五个月。

公布真相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访问，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英美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延之后一个月，美军司令部即派观察组常驻延安，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军事合作。

在参观延安和晋西北时，许多外国记者就已表明自己的观点。爱泼斯坦指出：“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现在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语言都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已封锁不住了。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电影，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情况也被如实地报道出去。1944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后不到20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即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是日《纽约时报》也发表根据驻延记者报道写成的《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广播中，广播了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刊登的由驻延记者发出

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生产自给，在中国军队中给养最好；八路军办的医院效率很高，能克服各种困难，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八路军很难从外面得到药品，在共产党领导地区，已经广泛地实行了民主等。

记者们返回重庆后，写下了更多的介绍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许多中国记者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的《延安一月》一书，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见闻和感受。这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

美国记者福尔曼写的《中国边区的报告》(一译《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人抗战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所拍的1000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做插图，又有15个敌后游击根据地的珍贵地图和速写，该书大部分描写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的状况。史沫特莱在美国《新共和周刊》上撰文，对此书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

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著文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试着自己的眼睛。"他在《英国新闻时事报》上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他们是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的。1946年，斯坦因又在美国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他访延的目的可想而知。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的讲话中直言不讳：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亲眼看见日本俘虏，吃过日本的纸烟和罐头。在其为重庆《大美晚报》(英文)撰写的《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从八个方面介绍了他在边区的所见所闻：1、老百姓生活进步；2、土地革命已停止；3、医药设备不够用；4、人民都有选举权；5、适应抗战的学校；6、强烈的抗战意志；7、言论出版自由；8、我看见了战斗。由于武道被认为是倾向国民党的，他的讲话和报道引起重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日报上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此后，他又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大型报刊写了20多篇出色的报道。1945年他到美国之后，经过两年奋斗，又出版了一本反映中国革命的巨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以后他又和夫人邱茉莉离开美国来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加入了中国国籍。几十年来，他一直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执行编辑、总编辑，并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认为，延安之行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访延情景时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袁武振，梁月兰，《党史纵横》)

朱绍良迫使盛世才离新疆

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量薄弱。特别是西北边陲的新疆省，在"土皇帝"盛世才的统治下，国民党政府的势力很难插足该省。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先后设法控制了四川和云南等省，但对新疆省仍是一筹莫展。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火蔓延南洋各地，并威胁我国西南地区。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并进犯云南，我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只剩下西北新疆一条国际通道了。国民党政府希望利用此通道来运输物资，进行持久抗战。

但当时新疆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加之盛世才闭关统治新疆，杜绝一切外来势力渗入，就很难进入。当时没有铁路，飞机航线又长，只有一条公路。军队开进新疆，骑兵要8～10天，步兵需50天左右，而且沿途很多地方是风沙漫天，人烟稀少，对补充给养、运输辎重带来困难。古人曾用"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来形容漫漫西北行旅之难。

1944年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入和控制新疆问题。当时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上将，正统辖甘、宁、青、新四省的军政。而其它几位得力的上将都一时抽不出来，如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陈诚、李宗仁、薛岳、顾祝同等人当时都各有专职。只有朱驻地靠近新疆，并管辖该地区工作，便于调动军队。蒋考虑朱去新疆比较合适，便要朱来渝商讨去新之事。

朱绍良是蒋介石所信任的高级指挥官之一。第八战区在兰州开始建立时，司令长官原由蒋自己兼任，朱任副长官，后来蒋把正职让朱担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先后有傅作义、胡宗南、郭寄峤、陶峙岳等人)。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被张、杨扣留，朱绍良、陈诚、蒋鼎文等也在西安被扣，朱于是有了一段与蒋"患难与共"经历。当时蒋还把侧室姚氏安置在兰州居住，托朱照应，其次子纬国派在西北胡宗南军中工作，也托朱、胡照应。这一切都说明蒋与朱

关系是较密切的。所以朱绍良去新疆，蒋很是放心。

朱奉召由兰州飞渝，随即去蒋处参加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以下几件事：一是决定由朱绍良飞迪化（今乌鲁木齐），传达中央命令调盛世才来渝任农林部长；二是派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陶峙岳去新疆兼全疆警备司令；三是派吴忠信担任新疆省主席（后来张治中于1946年兼任新疆省主席）；四是研究调动部队赴新。

朱绍良在大部队未进入新疆前先去迪化，虽然有些冒险，但他自恃在西北坐镇数年，有一定威望，估计盛世才不敢对之轻举妄动。因此朱接受委派，飞往迪化。

朱绍良先由重庆回到兰州，部署、调动赴新部队，包括骑兵部队和少量步兵部队。1944年秋，朱绍良乘专机飞往迪化。他只带一些随从参谋和机要人员，其中有上校机要科长朱沛循和副官刘某，还有参谋人员。当天上午起飞，下午到达迪化。

盛世才接到朱的电报后，就预感到朱一定是来谈新疆由重庆中央领导问题。盛早在机场迎候。在朱下机时，他上前行了军礼，并表示："欢迎朱长官莅临新疆……"盛世才的态度非常恭敬，并用车送朱绍良一行到宾馆休息，当晚举行盛宴为朱洗尘。

次日，盛世才前来谒见朱绍良，朱问了最近新疆情况，随后便向盛传达了重庆中央的命令，望他速赴重庆就任农林部长。当时盛听了之后唯唯诺诺，何时交代，何时去重庆就职均无明确表示。朱要他考虑好决定离新日期即来汇报。朱生怕他抱有幻想，或有什么顾虑，就一再言明利害，特别说到中央已作出决定，下达了命令，部队在来新途中，并先由陶峙岳来新接受军权。同时一再表示，保证他去重庆后身家安全。朱希望他不要贻误这个时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并希望盛为国家民族着想，也为他自己身家前途着想，朱还劝他速离新疆为妙，说当地人民对之很有意见，要盛快定行期。当时盛一再表示感谢朱的关节、指示，答应研究后向朱报告行期。

朱绍良等待盛答复的几天中，迪化的空气似乎有些沉闷和紧张。盛世才统治新疆多年，为人险诈多变，手段毒辣，他对任何人都是不买帐的，动辄翻脸无情，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所以这时的静悄悄，好似战场上大战发生前的沉寂，反而令人担心。

在国民党军中，朱绍良是所谓"福将"，数十年戎马生涯，当上了二级上将，成为西北大区的军政长官。西安事变被扣和"八·一三"在上海指挥作战，都为时短暂，很快化险为夷。这一次，他依然很镇静，照常安然睡觉休息，从表面上看丝毫没有紧张不安的情况。可是随从人员颇为紧张，特别是刘副官不敢大意，在茫茫的长夜里，他一直握枪以待，注意各处声响动静，可以说这几天刘一直处于一级戒备状态。上校机要科长朱沛循也不离朱的左右，随时准备遇有紧急情况电告重庆，并不断与兰州司令部取得联系。

在形势逼迫之下，盛世才这几天也是紧张的。他召开心腹会议，权衡利害。考虑后果，终于为了保全其身家性命和资财，决定接受重庆中央的命令，并出军政权，即日赴渝就职。盛世才自知他在新疆积怨太多，不离开新疆人们是不会放过他的，他终于决定向朱报告服从中央命令，离新赴渝。

后来张治中曾说："恶魔盛世才被迫不得不离开新疆。"

恶魔被撵走了，新疆各族人民额首称庆。

随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陶峙岳到新疆接管军权。这时国民党政府驻新部队为数很少，总共只有几个营的兵力。1944年11月以后又赶调骑兵第五军及第四十六师开赴新疆。

吴忠信赴新疆后，于1944年10月接管新疆省政务。不久伊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发生暴动事件，朱绍良从迪化发出电报向蒋介石告急："伊宁武装暴动，事态严重，前途不测，职只有一死殉国，……"当时驻新部队数量很少，不足应付，而所调部队一时尚不能到达。蒋介石接朱电报后甚为焦灼，决定急派政治部长张治中飞新安定人心，并考察情况，带回供研究对策用。

1946年3月西北第八战区撤销，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任命张治中为主任并兼任新疆省主席，原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调任重庆军委会代理参谋总长，原参谋总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这样张治中就再去新疆。张到新疆后即积极处理伊宁事件，同时还做了很多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和发展边疆建设的事，诸如释放政治犯，归还被盛世才没收的人民财产，免除捐税等。

在新疆的接管工作大体完成后，陶峙岳回重庆向政府作了汇报。1946年春，陶曾到上清寺原第八战区重庆办事处谒见朱绍良长官（这时朱已就任军事委员会代参谋总长），当时我和朱沛循科长一同接待了他，并在会客室相陪叙谈，等待朱绍良的接见（朱绍良来渝上任不久，每日来拜会和谒见的军政人员甚多）。

（李承勋）

中将程泽润被杀

程泽润是抗战时期继韩复榘、刘湘、鄷悌等人之后又一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但他们的情况又各有不同，程之被处决内幕情节颇为曲折离奇。笔者时任兵役署视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今将这一史事的始末追述如次。

税警团虐待壮丁，惨不忍闻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以及国民兵组训等项工作，署内分设征补司、役政司、国民兵司、视察室和秘书室等承办机构。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程泽润毕业于早期的陆军大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四川军阀刘湘等人，曾派程回四川活动。程又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主要幕僚长之一，他们之间关系颇为深切。

当时征兵工作弊端很多，各地强拉壮丁和买卖壮丁等事件极是普遍，最突出的是各县、区、乡，特别是保甲长买卖壮丁和欺压群众的事件最多。另外有些部队拉丁、拉伕和吃缺贪污等现象也极为严重，据兵役署视察室统计，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两年中，全国就有2000多件兵役违法事件，而实际上还不止此数。

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这种部队不受军政部管辖，官兵的薪饷、服装等由财政部解决，其兵员补充也是独立行事。税警团强拉壮丁、扣留行人，用以补充新兵的情况是很严重的。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时，临时驻扎在市区内一处大院子里。这个连的“新兵”大多是从川东沿途各县强拉和乱抓来的，其中有农民、行商小贩，有的已是中老年人。这些被抓来的“新兵”，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一路上受尽了打骂虐待。

连队带兵的排长在大院子里动辄打骂“新兵”，“新兵”被罚站、罚跪是常事，有时甚至被捆起来抽打。这些被辱打的“新兵”苦苦地哀求，哭声，打骂声，求饶声，交杂地时时传于院外，惨不忍闻。

五十寿辰被传见，厄运到来

1944年夏的一天，正巧戴安国路过此处，听到院内传出的斥打声和哭泣声，他停下来向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在打骂“新兵”，样子非常凶横；“新兵”则跪于地上，其中还有年约半百的老年人，情状悲惨。他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戴安国是戴季陶（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儿子，他与纬国象弟兄一般亲近，经常在一起随便交谈。安国把所见所闻告诉纬国，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蒋介石听说此事，决定去看看究竟，并要纬国随车前往。

当时抗战前方已很吃紧，同时人民对打内战颇有怨言，故蒋介石的心情确实不太好。蒋与何应钦的关系日益趋向低潮，他们虽是留日同学，但从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有关兵役工作是军政部兵役署之事，何当时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对此事重视起来。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很快便到达那个驻扎“新兵”的大院门口，他们一进门就看到院内乱七八糟的，一个军官正在斥骂“新兵”，见蒋到来才停止处罚“新兵”。蒋见状后一气之下吩咐随从人员去叫兵役署长立即到来。

碰巧这天是程泽润署长五十寿辰之期，正在新建的公馆大楼里庆寿。那天贺客盈门，非常热闹。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属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济济一堂。正当席间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副官进来报告：“委员长召见程署长，请速往。”程不知为何事相召，今天庆寿，觉得很扫兴，但他又不能不去，便赶紧稳住宾客，请稍等。程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竟是厄运到来，从此身陷囹圄，走向死亡之路。

顶撞蒋介石，被囚军法部

兵役署长程泽润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驱车来到驻军大院子时，见蒋气呼呼地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劈面就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程到院里就知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他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是兵役署管辖范围。”蒋一听非常生气，说道：“兵役署不管征兵工作，谁管！”蒋在训斥程的同时，举起手杖来打程，并连声说：“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这一来把程泽润打懵了，财政部的税警部队也确实不归他管辖，他今天过五十大寿，竟在此受此屈辱，因而也有些气恼，竟脱口而出：“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有国法处理。……”蒋听到程的反驳，也愣了一下。蒋自掌握军权以后，发脾气时从来没有人敢于当面顶撞他的，除了西安事变他被扣之时。所以今天程敢于如此，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只好说：“好，不打你。”他接着说：“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岂料这一下反而使事情弄成僵局，因为当时蒋的话如同“圣旨”一般，他说的部属就得服从照办。这样程泽润就必须老是站在那里看着。

正当蒋要离开时，钱大钧（当时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他听说蒋视察驻军，也驱车来到这里）便赶忙向蒋请示：“他（指程泽润）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简称军法部）报到，等待处理。”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便随即驱车走了。接着何应钦部长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程这时只好带着懊恼不安的心情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报到，实际上是接受看押，听候处理。程泽润中将突然遭此打击，当时情景悲凉：满堂宾客尚未散，妻女盼归心焦切，将军只身投囹圄，戎

马生涯从此绝。

多方营救终不赦，刑前暂归见爱妻

程泽润向军法部报到后，该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业务，对这种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用军法处理。鹿感到程顶撞蒋倒是件麻烦事，他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照顾，其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也可以同其他在押的将领交谈。程也知道各方正在营救他，于是安下心来等待。

此事很快为四川各高级将领知悉，他们多方进行营救，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并请冯玉祥将军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不久，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何是贵州人，这次调任陆总，实际上是遭蒋排挤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知何为程解围，不同意调程前往，于是程仍被囚禁于军法部，而且开释无望。

鹿钟麟看各方营救无效，他想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和该部意见签呈送蒋。签呈大意：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从宽处理。军法部送上签呈后，不久蒋发下手谕，批示要军法部"立即处决"。军法部接到蒋的批示后，感到很为难，认为处决程有些过分，但又不敢违抗蒋的命令。怎么办？没有办法想。最后军法部决定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相会团聚。但军法部决定保密，暂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

程被暂释回到家中，与爱妻和女儿会见时热泪盈眶，悲喜交集。程的夫人当时约40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名珠。为了培养其女成才，一度曾请视察室罗永权（当时罗任少校视察，广东人，曾在香港读书，后毕业于军校）教授其女英语，由此可见程的儿女心也是很重的。程与家人团聚约10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读手谕中将绝望，临刑唯求保整尸

程泽润中将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使军法部左右为难。鹿是冯玉祥旧部，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是一位做事稳重，为人正直善良的长者。其时他对程很想挽救，但又无法救之。最后军法部决定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

行刑地点在重庆南岸，时间1944年秋天。在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待家属，可以代为转达。程问监刑官：他为什么要受处决，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监刑官听了一愣，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批示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一面把蒋的批示手谕取出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了，他知道蒋既然这样做，再说也无用，但他的心仍是不服的。戎马数十年，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这是他最痛心的。他在感到绝望之后，不想再说什么了，他等待着行刑。监刑官一再催问交待的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要求保住整尸。监刑官接受其请求，立即下令行刑。

枪声过后，一个魁梧的身躯终于倒下了，一位执掌全国兵役大权的风云人物，竟作了枪下之鬼。真是：中将生命如草芥，戎马半生终遭劫。

程被处决后，其家属前来领尸埋葬，爱妻、娇女痛哭不止，这使多雾的山城，增添了几分悲凉。程死后，全家人很长时间处于悲哀之中，后听说程的夫人回到老家江苏，曾在沪经商。

（李承勋）

八莫前线观战记

1992年，抗日战争中中国赴印缅远征军出国五十周年之际，居住美国的刘放吾将军（当年孙立人将军所部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接受美国总统布什和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祝贺，褒扬他在缅甸仁安羌，以劣势兵力击溃包围英军的日军，解救英军7000余人及外籍记者、传教士500余人。笔者现就当年作为《武汉日报》随军记者，采访八莫前线所见，回忆如下。

1944年，担任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任务的中国驻印军，在收复缅北重镇密支那后，于10月中旬展开冬季攻势，南下进攻上缅甸的门户——八莫。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指挥的所辖新三十八师是这次战役的主攻部队，笔者随军采访，出发前夕，孙立人问我："我们明天就开始行动，你怎样打算？"我回答："愿做殿军，随部队前进。"

新三十八师从密支那出发。师长李鸿率领师主力迂回南下，向八莫进军。这个师的一一三团推进到太平江正面，占领了庙堤，肃清北岸日军，巩固滩头阵地，太平江在我军火力封锁中。

太平江是八莫外围由东而西最后一条大河，蜿蜒曲折，在八莫东北与伊洛瓦底江汇流入海。日军凭藉太平江、伊洛瓦底江和公路构成的三角地带，构筑坚固阵地，顽抗死守，妄图阻止我军南下。

明月如镜，夜更深沉。哨兵隐约在江面上游发现目标，有一艘敌船顺流而下。江面波涛汹涌，船身随流速越漂越快，接近北岸公路渡口。说时迟，那时快，我军轻机枪

瞄准目标打了一个弹匣，接着，轻重机枪从北岸伸出五条火舌，舔着那条船上每一角落，船上“皇军”都成了太平江的游魂，密集火网把船送到南岸桥头沙滩上，倾斜躺着。

炮战之后，入晚又趋沉寂。第一营原道一营长接到赵狄团长命令，要每连挑选两名精于游泳的搜索兵，限半小时集合，准备渡江侦察敌情。各连连长立即动员，没等到连长挑选，战士们争先恐后报名，超过原额。结果只好用抽签办法，决定段仲权、曾祥进、王大富、陈德、廖林银、邓善清等为搜索兵。营部没有灯火，掩蔽部一片漆黑。原营长把地图放在军毯里，用手电筒在地图上指出敌人动态，传达团部选定庙堤为强渡口，并向这个尖兵组下达泅渡侦察任务，郑重吩咐：“你们要机警谨慎，完成任务。”

太平江水深且寒，水流湍急。这支部队两年前就受过严格的丛林战训练，官兵都会爬山游水。这支搜索兵的任务要在不打枪的前提下渡江侦察敌人主力位置。明月当空，大家在岸边芦草丛里，脱下衣服鞋袜，用油布扎成“救生圈”套在腰上，慢慢爬入寒彻肌骨的江水里，只露出头在水面上，头上钢盔象一块浮木，静静地向下游游去，混过敌人哨兵，通过敌阵，在700米外的下游南岸沙滩上登陆。他们利用一座断桥作掩体，清点人数，一个不少，解开油布，穿好衣服，分两组进行横正面搜索。敌人哨兵在公路上往返巡逻，搜索兵不能前进，只好折回到东北方的村庄附近，听到敌人说话声音，证明是敌军前进阵地，也不能惊动。他们便以村外树梢挂着的一个渔网为目标，转向西南方芦苇里继续搜索。11点钟，这支奇兵完成了3小时初步搜索工作，慢慢地找着敌人主力位置，破坏铁丝网，越过鹿砦，进入交通壕，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突然听到掩体内鼾声大作。王大富——这个绰号叫“小傻瓜”的小伙子，只身摸进掩体里，发现五个敌人正在梦乡，指挥刀和衣服零乱地放在地上，判断这里是敌人前哨指挥所，摸摸桌上的电话机，试试很重，不便带走。五分钟后，“小傻瓜”不声不响地离开掩体。走出交通壕，如此这般报告领队段仲权。同伴问他所见敌情是否可靠，这一问话可恼了“小傻瓜”。“你们在这里等我，千万不要打枪！”“小傻瓜”说着，转身再进入掩体，拿了一个东洋鱼罐头回来，笑道：“英国牛肉罐头给养吃腻了，换换口味。”

天亮前，领队段仲权首先渡江回营，报告敌情，留下五名战士循原路在沙滩上集合，蹲在桥下，望着那急流的江水。有人建议：“我们不妨去拖一拖昨晚被打坏的那条船，看看能不能用呀？”他们沿着沙滩向下游运动，那条破船仍然躺在200米前方的江边，几具敌尸躺在沙滩上，龇牙咧嘴，另有几具被江水泡肿了的尸体躺在船里。船身被枪弹打得没有一寸完整的铁皮。

拂晓。北岸我军大炮怒吼了！密集炮弹落在敌主阵地上，鬼子们从梦中惊醒，狼狈万状。平射炮疯狂地向留在南岸上我军搜索兵打过来，勇士们来不及扎油布，紧急散开，泅过太平江，回到营部，带回敌情和战利品向营长报告：“我们胜利完成任务！”后来，赵团长根据这支“蛙人部队”侦察到的敌情，看出敌阵左侧破绽，便率领一一三团安然地渡过太平江，向八莫前进。

继拂晓炮战后，下午，我军发动空中攻势，对太平江南岸敌主阵地施行“面”的轰炸。美国第十航空队B－47型战斗轰炸机结队飞临太平江南岸上空，周而复始盘旋。美国空军联络官坐在庙堤高地白塔石级上，手持地图和无线电话机，根据我军昨夜侦察到的敌情，用密码指示轰炸目标。笔者和一群官兵也站在北塔上观战。俯首南望，那直泻奔流的太平江和对岸绿林，尽入眼帘。我们兴奋地观看这场戏剧性的战争场面。B－47型机群由每小时400英里航速渐渐降低，飞过我们的头上。自由而又威慑地翱翔在敌阵上空，发出轰鸣啸声。炸弹一颗接连一颗落向敌阵，爆炸声响彻云霄，紧接着一股黑烟冲出树梢，冲向天空。俄顷，对岸几里宽广正面被火焰和浓烟吞没了。美国空军联络官紧张地指挥着。他随着弹着点连说：“OK！OK！”当第三架飞机投下的炸弹在敌阵爆炸时，站在我身旁的“小傻瓜”王大富手舞足蹈，跳着直嚷：“对头啦！那颗炸得最准，那就是我昨晚摸哨的地方！”投弹完毕。机群又在敌阵上空低飞，作地毯式扫射，烟幕弹连串落下。扫射结束，盟机返航。喜气洋洋的美国战友伸起大拇指，操着流行在印缅战区的华语向我们祝捷：“顶好！”

在美机轰炸太平江南岸敌阵后，笔者再去地面部队第一线采访。八莫正面我军正作总攻击部署，原道一营长也是纷忙中的一员。第二天，我策马往访时，因为哨兵不认识我这个陌生人，不肯透露营部位置，只好牵着战马在山林里绕了许多，才寻到营部，卫兵相告：“营长去侦察地形了。”我便请师政治部张指导员打电话去第一连，介绍我去第一线左翼阵地看看。阎连长婉言答复：“现在前方很紧张，最好不必来。昨天，美国记者要来，我也谢绝了。”

张指导员便陪我去第二连访问渡江摸哨的两名搜索兵。陈连长特地把王大富和曾祥进喊来和我谈话。“小傻瓜”王大富只有18岁，天真活泼，口快话多，表现了四川人的特色。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前夜那幕动人的英勇故事。

传令兵说，原营长打电话来，约我去营部。我到营部首先向原中校表示：“假使军事情况许可的话，我很希望去第一线走一趟。”他同意了。原营长和我戴上钢盔，携带望远镜和指北针，走出营部，沿着公路到达太平江北岸渡口附近重机枪阵地。这里地势开阔，房屋林立，对岸的地形、地物一一在望。中央阵地地形平坦，江面宽阔，敌我各据工事，隔江对峙。我们沿着散布在江岸上的交通壕，徐徐向左翼阵地走去，当我们到达轻机枪阵地时，正是晚餐时间，傅排长嘴里含着饭，引导我们参观这一带工事，介绍对岸敌情。他说，一小时前，这里有情况，打死一名敌军官。我走到战壕左端，伸出头面向滚滚的江水，只见几只

鹭鸶悠闲地飞翔在宁静的江面上觅食；回首北望，发现隐蔽在大树下哨兵的雄姿，荷枪实弹，警觉地监视着200米对岸的敌人。

那天，炮兵预定在下午5时开始对敌射击，我们连忙在5时前赶到左翼高地我军前进阵地，观察对岸敌人动静。从中央阵地到左翼原有捷径，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便转回绕过正面，通过新开的小路，行进在高出人头的藤葛中，爬完一座300米高度小山，进入居高临下屏障的庙堤——控制太平江南岸之敌的左翼主阵地。官兵都在主阵地内吃晚饭。重机枪衔着弹带枪口朝向太平江南岸敌阵。原营长领着我跃出战壕，屏息地爬过工事外三角地带，在那最紧张的瞬间，我们越过对岸敌人"视界"，爬到高地下面突出滩头。原营长和我各据一棵小树做掩体。太平江水直泻奔流，残阳西坠。当我正准备打开望远镜，原营长急忙摇头。以手指向对岸敌人，低声说："当心！敌人机枪阵地离我们只有120公尺，这里是敌我距离最近的地方。"我慢慢转换方向，对岸草屋外一棵树上悬着的渔网，隐约可见，那便是前夜这个营搜索兵摸哨的地方。

我们又经过人生难得的瞬间紧张气氛，再越过敌人"视界"，安全回到阵地。

轰隆一吱唔！计时针正指向5点，我军重炮怒吼了。对岸敌阵爆发出剧烈的爆炸声。

在指挥所里，许连长坚留晚餐。炮弹啸声掠头而过。

临别时，我向原营长"预订"点战利品。他自信地回答："打到八莫，至少送你一面漂亮的日本军旗。"我向他握手告别："八—莫—见"！

一个月后，我军攻下八莫。孙立人将军又对我说："我们还要向南进军，目标——腊戍！"

（戴广德）

历史考证

《甲申三百年祭》与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二三月间，郭沫若写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起义的历史教训。重庆《新华日报》选择三百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3月19日刊出，连载4天，毛泽东在延安读了这篇文章后，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盛赞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决定把它列为整风文献，供党内学习。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人给郭沫若带来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当天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在延安的一些朋友致函表示感谢。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复信，其中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对党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在苏北解放区参加过整风的老干部，回忆起当年情景时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了检查对照，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并从中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

（纪实，《党史博采》93年12期）

日军对蒋经国的逼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蒋氏父子直接的逼降、诱降就我所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9年至1941年，先后派飞机轰炸蒋氏故里浙江奉化溪口达13次，炸死蒋介石的发妻、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炸毁蒋介石的心爱的别墅文昌阁，溪口人民死难百余人，毁屋数百间。第二次是1943年11月25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第三科科长迁政信大佐，偕汪精卫的代表、日伪军政部长萧叔宣飞往溪口，给蒋介石母亲王采玉扫墓，进行诱降。

第三次是1944年12月，日本传讯给蒋经国，以暴毛福梅之尸相威胁，逼蒋经国求父言和。其中第三次为史籍所未载，外人所不知。最近笔者访晤当时任蒋介石掌印官的奉化周村人周启仪先生，才了解了此事的详细情况，现录之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1944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几个主要战场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被动挨打，处境困难，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于该年4月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进攻，这就是所谓豫、湘、桂战役。短短八、九个月，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国民党丢失了大批土地和许多重要城市，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重庆震动。日本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蒋经国实行了一次政治进攻。其时溪口沦陷，蒋氏祖墓落入敌手，日军以将毛福梅暴尸相要挟，逼蒋经国求父言和。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在1939年12月12日的日机首次轰炸中遇难，当时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担任专员，闻讯驰归奔丧，哀痛万状，于悲愤中手书“以血洗血”，刻石立碑，誓报杀母之仇。由于兵慌马乱，军务倥偬，无心大办葬礼，遗体未曾入土，暂厝于蒋氏家庵摩诃殿。蒋经国接到日军威胁，如晴天霹雳、惊慌莫名。他对生母有深厚感情，毛氏养他含辛茹苦，出国后为他担惊受怕，母子相聚不久，又遭横祸死亡，养育之恩、爱子之情未报，怎忍母亲再受暴尸之辱？这时的蒋经国感情还比较脆弱，一时战胜了理智，向乃父发出了“求和”的建议，而且在未获答复之前，就冒冒失失地跑到蒋介石办公室面陈己见。蒋介石虽然在豫、湘、桂战役中又遭了一次大失败，但他从整个的战局中，已感到日本侵略者败象已露，岂肯在于己有利的形势下屈膝求和？他接到蒋经国的求和建议，十分恼恨儿子目光短浅，感情脆弱。正在震怒的蒋介石一听说儿子来见，脸色铁青，开门出来，蒋经国刚走上楼梯，就被他飞起一脚，踢得滚下楼去。蒋介石回到室内，余怒未息，提笔连续写了“国耻家耻，唯儿为耻”的字条。写完，有的撕碎丢进字纸篓，有的揉成一团丢在墙角或地上。在蒋介石官邸任掌印官的周启仪，亲眼看到蒋经国被踢情景和蒋介石书写的字条。他说：那天，我去送文件，走到蒋介石办公室门口，正要喊报告，见蒋满面怒容开门出来，蒋经国刚踏上楼梯，父子尚未对话，就被一脚踢下楼去。滚下三格楼梯，蒋经国抓住了扶栏，才没有再往下滚。过了一会儿，我送文件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退出时，脚下踩着一物，低头一看，见是纸团。那时我年轻好奇，就边退边踢，一直踢出门外，拾起一看，就是“国耻家耻，唯儿为耻”八个字，是责备蒋经国的。此事我亲眼所见，印象十分深刻。

周启仪还看到蒋介石给机要室写来的一纸手令，命严厉处分蒋经国，主要内容也是八个字：“擅离职守，严加惩办。”当时机要室主任是毛庆祥，与蒋经国友好，暂时压下手令，请出他的父亲毛颖甫为蒋经国说情。毛颖甫原是溪口太仓盐酒店的老板，与蒋家开设的玉泰盐铺是世交，蒋介石以父执事之，对他十分尊重，当时在重庆挂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毛颖甫对蒋介石说：今天是12月21日，明天就是冬至。俗说话，冬至大如年，要讲个吉利，千万不可动气伤人。经国的事，既然已经教训过了，严惩就免了罢。况且这样做，张扬出去，对经国前程也不利啊！蒋介石见毛颖甫说情，特别是听了对儿子前程不利等语，猛然醒悟，就顺水推舟，说：我听您的话，不过您也要教训教训经国，叫他头脑清爽点。

以后，蒋经国未受处分，机要室也始终保密，因此，这件事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王舜祁）

美国首任特使赫尔利使华揭秘

牛仔特使　万里来华

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重庆。罗斯福给他的任务，一是协调史迪威与蒋介石日益加剧的矛盾，二是调处国共两党问题。

赫尔利出生于美国俄克拉马州印地安地区的一个小镇上，作过牛仔和矿工，锻炼出了雄健的体魄。后考入华盛顿大学，获法学博士，操律师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投笔从戎，以战功卓著升任中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升任少将，并转任美国驻新西兰大使。他是罗斯福的得力干将之一，多次为其出使四方，1944年正值多事之秋，遂被罗斯福委任为驻华代表。

对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赫尔利早已有所耳闻。史迪威能征善战，富有正义感，只是作风粗鲁一些。1942年，史奉命来华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和蒋介石的参谋长。不久他就发现，国军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必须予以彻底改组，重新训练，对杂牌军也应一视同仁，迅速提高其战斗力。他还认为，中共军队是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援华物资要分给他们，使这批战争物资真正用来打击日军。为此，蒋介石曾对人愤愤地说：“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是被任命来指挥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当下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另派高明。

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赫尔利又碰上了一件棘手的事情。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一份“哀的美敦书”式的电报，要求蒋放权给史迪威，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

史迪威接到电报，急欲送蒋介石一阅，马上驱车至避暑胜地黄山见蒋，正好遇上也在那里的赫尔利。

“不行，不行！”赫尔利看完电报，劝阻道：“诸事只可徐商，万万不可强逼。”

史迪威冷冷地回答说：“我无权搁置总统的电文。”

赫尔利见事情无可挽回，叹息道：“任何一国领袖都难以容忍如此侮辱。现在有好戏看了！”

进入会客室，大家寒暄几句，史迪威把罗斯福电报拿在手中，对蒋说：“这是罗斯福总统给您的电报。”说着，把电报交给翻译。

赫尔利见状，恐过分伤了蒋的面子，站起来说：：“电报已附有译文，委员长可以自阅。”

蒋介石接过电报，看了几行，不禁勃然作色，重重地将电报摔在桌上，低声道：“我懂了！”接着坐下来，愤怒地喘着粗气，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这时，赫尔利出来打圆场，说："事情需要考虑，先回去吧！"他后来又对秘书说："我们作了一件不应当做的事，把事情搞复杂了。史迪威硬得很，本来问题就不容易解决，现在火上加油，就更不易解决了。华盛顿把蒋介石看得太简单，把解决中国的问题看得太容易，才做出这样的领事。"

显然，他在史蒋矛盾中，明显偏向于蒋介石一方。

此次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声泪俱下地叙述了史迪威的所作所为，最后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得不到美国人一分钱的援助，也要"豁出去了"，一定要把史迪威赶回去。

赫尔利获知此事，一连几天，辗转难以成眠，考虑着他这个调解人究竟如何表态。他认为，相对而言，调回一个史迪威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失去蒋介石乃至中国，在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前途上，麻烦就多了。因此，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中如此写道："就我所知，再也没有象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现在是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了，如果再支持史，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

这封电报飞越太平洋，传到了白宫罗斯福手中，而且，产生了作用。罗斯福忍痛撤回了爱将史迪威，另派魏德迈接替了他。

为这事，蒋介石对赫尔利感激不尽，后来在罗斯福面前称他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出人意料　飞往延安

赫尔利在协调史蒋矛盾告一段落后，即插手国共谈判。这是他的两大任务之一。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有过多次谈判。其时，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溃败，政治上独裁腐败，经济上凋敝不堪。相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频频出击敌人，战果累累。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认为，为了共同对日和维护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应当赶快敦促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也决定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赫尔利来华时，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正驻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随即搬到了赫尔利下榻的军政部招待所。一般每隔三五日，赫尔利分别约请双方代表会谈一次。

一次，赫尔利心血来潮，突然决定亲自去延安，与毛泽东直接晤谈。延安方面事先一无所知。

那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包瑞德上校，象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重庆来的信使班机。正好周恩来也来了。

轰鸣的飞机刚刚停稳，从舱门口钻出一个外国老军人，看那模样，不象一般信使，周恩来和包瑞德不禁一愣："那是谁？"

"天哪，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先认了出来，马上叫了起来。

"噢，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边说，边回头走了。

一会儿，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一辆旧卡车来了，后面跟着匆忙召集起来的一队士兵，举行了一次临时安排的仪仗检阅。赫尔利对自己的延安之行，十分兴奋，当场表演了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与赫尔利举行了两次会谈。赫尔利谈及来延安的意图，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他说，他不是空手来的，还带来了一份有五点内容的协议草案，请中共先在上面签字，待回重庆后，再让国民党签字。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中共经过研究，认为赫尔利的草案基本可行，只稍为作了几处修改，便由毛泽东亲笔签了字，充分地表示了中共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五点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委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等。

赫尔利签字前，曾谨慎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是否还留在新的联合政府里？是不是还让蒋介石当领袖？"

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他说："OK，我完全同意五点协议草案。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正当的。"

赫尔利的内心深处，当然另有筹划。从他当时的一些言论分析，他认为这份草案相对而言，更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只要蒋介石还保持原来的地位，一切都大有可为。再退一步讲，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必须让共产党参加政府，政令统一，然后才能军令统一，稍作政治上的让步又有何妨呢！

可是，赫尔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手操办的这份草案，竟被蒋介石一棍子打入冷宫，彻底否定，反而抛出了一份有三点内容的反建议。

在重庆谈判中出足风头

就在"三点"与"五点"争执不下之际，赫尔利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驻华大命，以接替辞职的高斯大使。在整个重庆社交界，他被称为"将军大使"，比较起简单的"将军"一词来，那是更胜一筹了。

赫尔利是善于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蒋介石否定他与中共达成的协议草案，使他耿耿于怀，但美国既然一门心思扶持蒋介石，那就得以蒋介石为轴心，围着他转，三点不如五点，但蒋介石要三点，那就三点吧！于是，他又竭

尽全力推销起"三点"来了。

赫尔利在华时间不长，但在重庆谈判中，却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出足了风头，为许多民国洋客所不及。

当蒋介石一连三通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赫尔利自告奋勇，愿意赴延安，陪同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飞赴延安，"接驾"的飞机，正是赫尔利那架草绿色三引擎的专机。临行前，赫尔利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说："我现在到延安去很感愉快，我将陪同毛氏和他的随员来渝。我们曾不断作一年以上的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清除内争的可能性。在这一争论上冲突的因素很多，但我们始终能够得到双方的尊重和信赖……"。

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人们引颈企盼毛泽东的到来。

8月28日下午3时许，重庆九龙坡机场人头攒动，记者们抢占着最佳位置，等待着赫尔利专机的到来。很快，专机从云层钻出，降落。舱门开处，周恩来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接着毛泽东、赫尔利和张治中依次出来。记者和欢迎人群蜂涌而上，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

赫尔利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表现自己了，他迎着记者的镜头，顾盼自如，谈笑风生，一头红发在夕阳下熠熠生辉，漂亮的八字银须，优雅地抖动着，6英尺2英寸的高大身材，在人群中显得出类拔萃。仿佛是置身于摄影棚中的超级巨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而立，乐呵呵地说："这儿成了好莱坞！"这一镜头，第二天就见诸各大报刊。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国共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诚如毛泽东所说的，不过只是一份"纸上的东西"而已。赫尔利未直接参与谈判，但对于会谈情况，知之甚详，并不断电告华盛顿。在谈判告一段落时，赫尔利即返美述职。

其时，罗斯福总统已不幸逝世。这对赫尔利来说。不仅有怅然若失之感，更简直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没有谁会象罗斯福那样支持他的，包括新任总统杜鲁门。而且，他也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已陷入失败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务院和驻华的一些职业外交家，采取了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态度，使他的一些错误政策难以顺利实行。就在他拜会杜鲁门总统后不到2小时，一份辞职报告送到了白宫。

1963年，赫尔利病逝于美国。

（邢建榕）

风云人物

彭雪枫

彭雪枫（1907—1944），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卓越军事指挥之一。原名修道。河南镇平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18年秋，考入镇平县模范高等小学。1921年，离开家乡，在伯父资助下，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22年，通过在冯玉祥部任书记官的族叔彭禹庭的帮助，进入设在北京的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读书；1924年，因族叔停止资助而陷入困难。1925年，进入北京育德中学学习，后被推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五卅运动时，开始参加革命工作；6月，经唐从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926年秋，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同年10月，在汇文中学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汇文中学党支部书记。1927年3月，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参加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失败后，辗转往来于天津、开封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9月，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但因经济困难未能入学；不久，考入开封训政学院专修班学习，后又重返天津。1929年5月赴烟台，在刘珍年的二十一师做兵运工作；半年后，便被当局戴上"不稳分子"的帽子赶出部队。同年底，又以小学国文教员的身份，在山东福山县做农运工作；但仅二十多天，又被当地土豪劣绅赶走。之后，到上海，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

1930年5月，中央军委派彭雪枫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三大队政委。6月，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三军团第八军，彭雪枫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委。7月，率部参加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的战斗。之后，任红八军第八师政委、第二师政委等职。1931年，率部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8月，第二师师长郭炳生企图带第五团叛变投敌。他得知此事后，立即带着十五名战士，追上第五团，揭露郭炳生的叛变阴谋，并把五团带回，保全了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红星奖章。1933年，他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第六师师长，红军大学政委等职。1934年6月，任江西军区政委。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率部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8月，在江西抚州八角亭战斗中光荣负伤。

1934年10月，彭雪枫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改任军事指挥员，历任由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第一梯队司令

员，红三军团等五师师长、第十三团（缩编后的建制）团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攻占娄山关和第二次占领遵义的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率部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后，入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1936年10月，彭雪枫作为中共代表被派到山西太原，做统战工作，积极争取山西军阀阎锡山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彭雪枫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除从事统战工作外，还在临汾创办办事处学兵队，培养训练了五百多名青年干部，送往抗日前线。当时，他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局书记等职。

1938年春，彭雪枫被调往河南确山竹沟镇，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后又兼任新四军驻河南竹沟留守处主任。11月，他奉命将竹沟镇留守处的部队和中共豫东特委吴芝圃率领的农民自卫军第三支队，整编成新四军游击支队，深入敌后，在豫、皖、苏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彭雪枫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仅一年时间，该部就从一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确山惨案，残杀抗日受伤的新国军官兵、家属和当地群众二百多人。彭雪枫写了《关于竹沟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

1939年11月，新四军游击队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仍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不仅负责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工作，而且还亲自创办了著名的抗日报纸——《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1940年8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及新二旅南下，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两军会师后，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下辖直属队、四旅、五旅、六旅及保安司令部，共一万七千余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陈毅、刘少奇等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后政委一职由邓子恢接任）。后来，他又率部从豫皖苏边区挺进到津浦路东的淮北地区，进行敌后抗战，建立和巩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这时，他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

1944年夏，为了收复失地、解放沦陷区人民，彭雪枫奉命率新四军第四师一部，挺进津浦路西杀敌。9月11日，他指挥第四师第二十五团、三十二团和骑兵团，在河南夏邑城南八里庄消灭顽军、伪军和土匪三位一体的李光明支队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张 思 德

张思德（1916－1944）四川仪陇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33年，在乡里任少先队副队长。不久参加红军，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中军校短暂学习后，到连队任班长。后参加长征，二次过草地，三次负伤。1937年入关中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即残废医院）治疗和休养。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到云阳八路军留守处警卫连任副班长。1940年，任中央警卫营通讯班班长。1942年机构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当了战士而毫无怨言。1943年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警卫员。1944年，中央机关组织部分人员到离延安七十多里的安塞县石峡峪开荒种地。被选为生产副队长。农闲期间带领部分同志到庙河沟山里挖窑烧炭。劳动时，他总是走在最前面。9月5日，被雨水浸蚀的窑顶倒塌，他以身殉职。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送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材料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

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五岁入私塾，1910年进福州工程学校，1912年进上海南洋大学附属小学，一年后，越级进入南洋中学。1919年在南洋大学学了一年电机工程，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1921年毕业。先在沪申纺织厂、上海棉纱交易所任英文秘书，后又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中学教英语。1922年任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会的编辑部主任。

1926年10月，任《生活周刊》主编，将这份专谈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的刊物变成为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论坛，增设《信箱》一栏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经此改革，刊物销路大增。1930年10月，《生活周刊》社又附设了书籍杂志供应部，1932年7月，该部扩大为生活书店，三十年代末，该书店在各大城市有五十五家分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强烈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11月，发起募捐运动，支持东北的抗日斗争。1932年，《生活周刊》声望达到顶点，销售为十五万五千份。1933年1月，在《东方杂志》第30卷第一号上发表《梦想的中国》，首先用"邹韬奋"署名，并且此名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久，任该同盟执行委员。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封闭。1933年7月，被迫离开上海，流亡到伦敦，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1934年游历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美国。1935年8月回上海。先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经济星期刊》，继续呼吁抗日救国。1936年1月，参加了文化界救国会，5月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7月，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陶行知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呼吁书，要求停止内战，各党派联合抗日，成立民族统一战线。11月22日，因宣传抗日救国，与沈钧儒、沙千里等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同年11月，离上海绕道香港、广西至武汉，与何香凝、郭沫若等人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应国民党政府之聘为"国民党参政员"，通过主办刊物《抗战》，鼓舞民众抗战热情。

1941年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被迫去香港，创办《华商报》，并恢复了《大众生活》，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1月到东江游击区，后隐居梅县。11月，辗转从上海至苏北解放区。1943年，因患耳癌，潜回上海治疗。1944年1月，带病写作《患难余生记》。7月24日病逝于上海。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其遗嘱中的申请，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毛泽东在他逝世时称赞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25年至1937年间的著作，于1949年由胡愈之编辑，名为《韬奋文集》，在上海出版。三卷本《韬奋文集》，于195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杰出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05年入嘉定高等小学堂，后升入嘉定中学堂，因参加反抗旧教育制度的学潮，受学校当局迫害。1910年赴成都上学。1911年夏，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离开四川，考入天津军医学校。年底，东渡日本留学学医，以期对国家有所贡献。在日期间，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当1915年5月日本政府强令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愤然归国，并打算投笔从戎，由于袁世凯帝制自为，使他失望遂复去日本。这时，郭沫若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18年开始创作新诗。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出版第一部有影响的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

1924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以后，经香港潜至上海，因遭到蒋介石通缉，流亡日本。

在日期间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代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综合研究甲骨文，《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系统探索青铜器铭文和纹绘，对文字、史实、年代的考订，贡献很大。旅日期间，还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

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抗战爆发后回到中国。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战文艺、宣传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所著《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歌颂了人民群众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人民的抗日斗志。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当时被定为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的文件。所著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对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

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解放后，继续进行文化创作，发表了《蔡文姬》等历史剧作。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春秋、战国之交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见解，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他长期担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对发展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才华横溢，是继鲁迅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

他生平著作很多，现有《沫若文集》行世。

汤恩伯

汤恩伯，原名克勤，陆军上将。1899年9月20日出生在浙江省武义县岭下村。1927年投效蒋介石，历戎近三十年，由一个参谋军官迭次递升为陆军副总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战后期，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各当一面，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三巨头之一，并自封为“中原王”。

汤恩伯祖上历代为农，其父亲汤德彩是一个憨直农民。汤恩伯出生后，父母对子满怀希望，盼其长大成人后能勤俭持家，为汤家光宗耀祖，故起名克勤。他在武义上完小学后，于1916年考入金华省立七中，后又转学到私立杭州体专，于1920年毕业。在返乡途经一朋友家中时，得知该友父亲因与人诉讼而受害，汤出于义愤，在法庭中投卵击中法官逃遁。为躲避县政府通缉，汤遂投奔浙军陈仪师中当了一名排长。不久，浙军很快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打败，汤恩伯的初次军事生涯便随着浙军失败而结束。从此，便浪迹于杭州一带，改为名汤恩伯。正当他职业无着，处境维艰之际，其同乡富商童乐勋在浙江甲种蚕业学校毕业，欲出资寻一人结伴东渡扶桑求学。汤恩伯得悉这一消息，便以同乡名义登门造访，毛遂自荐。童见汤体格粗壮，且系武义同乡，当即欣然应允。

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童东渡日本。开始，学习日语，希望能进士官学校。但是，当时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学习，需有军阀官僚保荐之类证件。汤未为士官学校接纳，遂于1922年3月改入明治大学法科攻读政治经济学。不久，童乐勋回国，分手时馈赠资予汤。汤以此在东京本乡区追分町开了一家“追分楼饮食店”，一边上学，一边经营饮食店，维持学费与生计。汤从小就有广交朋友之嗜好，现有了场所，便与当地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广相结纳，很快门庭若市，一度生意兴隆。但由于交际广泛，开销日益增大，又自好慷慨，对好友多予赊欠方便，时未经久，便入不敷出，经济日感拮据。加之志不在商，不得已于1924年闭店退学，返回上海另谋出路。

1938年3月，日军以其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矶谷师团、小米内旅团近六万兵力，向鲁南之临沂、峄县进犯，企图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时汤恩伯之二十军团编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序列，与孙连仲之第二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徐州外围阻击进犯的日军。李宗仁当时意欲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所采用的“池沼战术”，准备在台儿庄附近微山湖畔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汤恩伯部负责侧击敌军，孙连仲部负责在台儿庄阻击敌军，俟汤部侧击得手，然后两部协同将敌军压入微山湖而消灭之。汤恩伯带领所部，在郯县、郯城和兰陵镇一带广大地区，伺机侧击敌军。3月下旬，在台儿庄附近西北地区与敌军发生遭遇战，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四天，双方伤亡惨重。后在敌以飞机配合炮兵轰击并增兵猛攻下，汤部渐感招架不住，乃请求李宗仁派部增援。李即令孙连仲部之第二十七师和黄松樵附第三十师的一个团，从台儿庄右翼绕道敌后实施侧击。但因汤恩伯平时自恃蒋介石的嫡系，骄傲自大，瞧不起杂牌队伍，在作战上又一意孤行，引起孙部不满。所以，黄松樵虽奉命驰援，却迟迟不动，后所部绕了一个圈子，未投入战斗又悄悄返回原阵地，遂使汤部被敌击败，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3月24日，日军主力已进逼台儿庄城下，守军与敌人在城内外展开殊死战斗。汤恩伯部在郯城以西、向城以东的胡王山、禹王山一带，与敌军互相延翼包围，成为胶着状态，拖住了部分敌军，使其不能全力攻城，终于配合守城之孙连仲部击溃进攻台儿庄之敌，取得了歼敌万余的胜利。4月7日拂晓，进攻台儿庄之敌向峄县撤退，汤恩伯奉命率部与孙连仲部追击敌人。9日，李宗仁命令各部队对撤守峄县之敌展开攻击。汤率部由东向西，配合孙连仲部由南向北，形成半

包围攻击之势。他以第五十二军由东向西,第八十五军由东南向西北,并采取"精兵夜袭"战法,一夜之间攻占九山,将日军歼灭。随后汤部相继移师邳县以北等地区组织阵地防御,给当时已增兵反击的板垣师团以很大杀伤,但汤部也遭很大伤亡。5 月上旬,奉命将防务交友军接替后,开到徐州待命。未出几日,日军以强有力的兵力分两路向徐州外围宿县及黄口进攻,两地相继失守,徐州处于被包围之中。李宗仁见整个作战部署被打乱,遂下令全部撤退。5 月 24 日,汤恩伯率部撤至归德地区,随即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率下,负责归德地区作战任务。不久,他又改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张自忠及其他部队保卫郑州以南铁路沿线地区。

武汉会战开始后,汤恩伯部在大别山组织防御,阻止了南下日军越过大别山,南北夹击,攻占武汉的企图。后由于敌军从东西两面逼近,武汉弃守,汤恩伯带领所部撤至湖北随县、枣阳地区。1939 年 5 月初,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分由钟祥、章山间及应山、信阳两个方向,向随枣一带发动进攻。汤恩伯侦悉日军进攻企图后,即指挥所部在随枣公路两侧布防,构筑袋形阵地,诱敌深入,以期一鼓而歼之。因其计划欠周,被敌窥破,虽给敌人一定杀伤,但使敌仍得以从容撤退,丧失了全歼进犯之敌的良机。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率领所部进入河南,设总部于叶县,负责冀豫边作战任务。1940 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将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的吕大寨。自后的几年间,他未指挥部队向日军发射一炮一弹,未消灭日军一兵一卒,而是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他打着蓄积兵力,准备对日大反攻的幌子,将手伸至河南全省及四省边区,抓兵、征粮、要饷。时未经久,即拥有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三十一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的第十二军、刘昌义的暂十五军、顾锡九的暂九军、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的第九十七军,及骑二军。除了上述正规军外,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在汛东汜北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收买四省边区的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个纵队,每个纵队多者三千人,少者三四百人。其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当时鲁苏豫皖四省在日占区和蒋管区的流氓、地痞、地主武装,无不被他收罗在内。由此,汤的势力急剧膨胀,发展到最高峰时号称为"大军"四十万之众。汤手下的沈克、张轸等人,说汤的这些措施是"狗吃牛屎——好多",于抗战毫无裨益,并劝汤将兵"宁精勿多"。汤却对亲信张雪中说:"沈公侠、张翼三实在有些不象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们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见其小而不见其大。试问照他们的意思来办,我需要的兵源从何处来,有朝一日要向新四军大举进攻之时,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伸入到腹地。"

1941 年冬,蒋鼎文继卫立煌之后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蒋下车伊始,便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以命令行事。汤非但不就范,反而分庭抗礼。蒋鼎文为孤立汤恩伯,在洛阳首先抓住一批北方部队和四川杂牌军的头目庞炳勋、孙桐萱、高树勋、李家钰等,还大批训练军事人员,保举谢辅之、刘韶仿、胡宗翰等为军长。汤恩伯亦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与蒋鼎文唱对台戏,在叶县大办招待所,延揽华北及四省边区的军阀、政客、党棍、学阀、团阀等等,待为上宾,馈赠厚礼,以博得普遍好感与拥戴。1943 年夏,他保荐其嫡系亲信张雪中做了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将蒋鼎文门下的军阀、官僚、政客等渐渐地拉到了叶县方面。他还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凡重要职务,均交给黄埔生。对下属所容纳不了的黄埔生,亦往往摇出"伯乐慧识千里马"的姿态,想方设法将他们向外推荐。因汤恩伯称霸中原,不但引起陈诚等人的嫉视,就连他的好友戴笠也深为汤之狂妄而不安。1944 年春,戴笠曾到界首、叶县盘桓半月,汤陪同其往曹操出生地亳县,并说打算为曹操在亳州或许昌建立一座永久性纪念塔,以表达其崇拜之心。戴笠通过半个月对汤观察了解,认为汤之野心太大。戴返回洛阳后对军统一些骨干分子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

日军为了打通从北平到东南亚的大陆动脉,乘汤恩伯、蒋鼎文争权之机,于 1944 年 4 月,日军华北驻屯军冈村宁茨实行大规模的"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中原战役是这次大战的第一阶段。日军以郑州、洛阳为攻击重点,其兵力约有五、六个师团,附一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 12 万人。汤恩伯和蒋鼎文此时拥有部队计 50 万人,四倍于日军;且中原已两年多无战事,军队得以两年整训。但是自日军发起进攻起,汤部一触即溃,致使日军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当日军形成对嵩山山麓的封锁态势时,汤部更是闻风丧胆,溃不成军,争先往嵩山里钻。汤部对山区人民却凶狠至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下的地方武装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便以"地方自治"、"宁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群众,袭击汤部。汤军此时已成惊弓之鸟,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至或挡住了去路,竟至在一声吆喝之下,便相继缴械逃命。其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王虽侥幸逃脱,但其指挥的部队因此失控,官兵各自逃命,全军溃散。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地方武装包围缴械,指挥部电台丢失,汤本人化装伙伕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马励武率部从临汝以南突围,通过叶

洛公路向大营集结，第十三军石觉部也从临汝东北突围向大营集结，进占临汝县城。当时，日军仅派了六、七辆坦克用照明灯搜探和一部兵力截击石、马两部。石、马虽各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握，且都配有反坦克炮，但由于畏敌如虎，不但不敢使用，反而互相惊扰，慌乱不堪，行李弹药遗弃遍地，连一个山炮营及电台也都丢失。整个中原战役从头到尾未及半月，汤部即以全军溃败而告结束。

汤恩伯在中原的大溃败，使蒋介石气得两眼发赤，暴跳如雷地骂了好几天后，只得将汤恩伯调往重庆面训，改派陈诚接任第一战区长官。在陕西商县清油河镇召开的中原战役检讨会上，陈诚对汤大加指责，说中原大败的主要原因起于汤的“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党政代表团的方策、马乘风、鲁涤平等人写请愿控诉书，在会上控诉汤恩伯的十大罪状。同时，“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军统特务刘培初亦上书，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四不和”的许多具体事实。在陈诚的胁迫下，汤恩伯只好当众检讨认罪。会后，他又大发牢骚说：“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整到他自己头上。”

这年9月，汤恩伯赴海路经西安时，胡宗南在其公馆设宴，为汤及其亲信万建藩、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刚、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等人饯行。胡在宴会上首先说此次聚会的目的，“是为汤先生到重庆饯别，同时借此机会检讨这次中原会战的失败教训。汤先生报告一下，大家都可提供意见。”胡宗南说完此番话，汤不知胡用意何在，沉默许久，然后抱头大哭，接着吱吱唔唔，含糊其词地说：“中原战争失败之责全由我负，蒋长官（指蒋鼎文）虽然拉了我的后腿，我不怪他，怪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报告，我不知从何说起。”就此将话题一转，议论到国内问题说：“我说战败的责任一切都归我负，我只说到一方面。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计划。这次到重庆怎能去见委员长呢？”汤说罢又是一阵眼泪，于是宴会遂不欢而散。12月，汤就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1945年2月，他被何应钦任命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下辖十四个美械师。同年5月，他奉命率领所部进入广西，与张发奎合力收复了桂林。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外传》解放军出版社）

章伯钧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10月初一）出生于安徽桐城。父章扬清，薄有田产。章伯钧七岁丧父，其母变卖田产供他上学。

章伯钧幼年入私塾，继入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了恽代英等任教员，思想倾向进步，一年后即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章伯钧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当时许世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由上海启程，与朱德、孙炳文等同轮前往柏林。

章伯钧到德国后，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三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邓演达到柏林，章伯钧结识了他。邓的政治主张，对章后来有一定的影响。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到达广州。当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7月改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广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被任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

同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清党”“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28年，章伯钧从香港到上海，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不同意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表示要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小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1931年8月17日，国民党特务将邓演达逮捕，随即予以杀害。章伯钧和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工作。

1933年9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到香港，随后去福州，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他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在这时不得不宣布解散。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福建人民政府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 年春，章伯钧从香港流亡到日本。

1937 年 7 月 10 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但为蒋介石所拒绝，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电邀海外爱国人士回国，共赴国难，章伯钧随即回到南京，参与抗日活动。由于国民党歧视和排挤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设立的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参加。

1938 年 3 月 1 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章伯钧说：“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同年 6 月，他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他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将它的政策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1939 年 9 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掀起了宪政运动，章伯钧与张君劢、左舜生联名提案，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全国政治上彻底开放，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以增加抗战力量。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引起“非常激烈的辩论”，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反对。11 月下旬，章伯钧与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成立宪政政府。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 1941 年 3 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其后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也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1945 年 1 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中华论坛》杂志，章伯钧任主编。他积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议。他驳斥了蒋介石指摘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是“分赃”的说法。他说：“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7 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得到恢复。为了促进国共团结，他和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等参政员于 7 月 1 日一同赴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 日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9 月 15 日，他发表时局谈话，指出：解放区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他还指出，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

1946 年 1 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在出席会议的民盟和无党派代表中，他同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被认为是能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四名左派人士。5 月，章由重庆到上海。12 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他说：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

1947 年 1 月 31 日，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面临的任务是争取实现人民民主，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 1930 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政府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于 1947 年 10 月 27 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 月 6 日，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和沈钧儒反对解散民盟，相继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1948 年 1 月 5 日至 18 日，他们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发表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不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政府威胁劫持下的总辞职和解散总部以及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的声明。会议通过宣言和政治报告两个文件，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且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捩点。这次会议决定沈钧儒和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1949 年 2 月，章伯钧由哈尔滨到达北平。6 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办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 月下旬，章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长。

1969 年 5 月 17 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卫 立 煌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二级陆军上将。他从孙中

山先生的一个卫兵，发迹为国民党"五虎将"之一，曾任第一、二战区司令和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职。在抗日战争中，朱德总司令称颂他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他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几次被蒋罢官又起用。1955年，他回到北京，毛泽东同志赞誉他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卫立煌生于1897年2月16日。安徽省合肥城东郊卫杨村人。父亲卫正球是本县石塘桥镇的田赋官，因收入低微，无钱在官场中应酬，被挤掉了饭碗。1905年，合肥地方瘟疫流行，卫立煌的父亲和二哥二嫂相继病故，一家先后抬出三副棺材，家中一贫如洗，母亲宋氏哭瞎了眼睛。尽管家境衰败，卫母还是求人说情，让三儿子立煌上了几年私塾。1912年初，卫立煌大哥立炯，经同学范鸿仙推荐，被新任安徽都督柏文蔚任命为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年方十五岁的卫立煌得知大哥的消息后，立即剪去辫子，跑到和县，恳求参加军事训练。因他年少且营养不良，又患有皮肤病，大哥便先尽力给他增加营养，医治疾病，使他健壮起来，并着意教他新文化知识和基本军事知识。

这一年的7月12日，江西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总司令。卫立煌随大哥立炯参加了坚守和州的战斗。和州失守后，他随大哥回到家乡合肥卫杨村。当时卫杨村有个姓卫的"地头蛇"，自恃学得了一些武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乡邻们都远而避之。一天早晨，"地头蛇"逛到卫立煌家，拍着桌子，叫喊着要吃要喝。这时卫立煌从外面锻炼身体回来，一见"地头蛇"这种作威作福的样子，顿时怒火满腔，一个箭步冲上去，劈手一掌击在"地头蛇"的后脑勺上，把他打了个大趔趄。"地头蛇"见是卫立煌，哪肯干休，左手一把揪住卫的衣领，右手向卫的脸上打去。卫顺势双手扣住"地头蛇"的左手，后退半步躲过"地头蛇"的一掌，乘势将他的左手连折带拧，弄得这个家伙的手腕、手臂连同肩膀的骨骼都几乎脱节，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卫立煌跟着又弯腰后退使劲一拽，"地头蛇"失去重心，一跤摔在地上。"地头蛇"爬起来，拖着一条抬不起来的胳膊，逃之夭夭，从此再也没在村中露面。卫立煌一招打跑了"地头蛇"，为卫杨村除了一害，村里为此热闹了好几天。人们都惊异，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伢子，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们哪里知道，卫立煌用的是从军事学习班学来的擒拿术，与柔道相近，往往能以弱胜强。

1914年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这里他受到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卫立煌为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于7月初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由平汉线南端东进，向河口镇、黄安城进发，策应由豫南下之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卫认为这道命令有违兵法，要求先期攻击河口镇，待机向黄安前进，复电请示照准。8月上旬，卫部向河口镇进发。适逢红军向黄安转移，卫部遂占河口镇。随即他又率部向黄安进击，当日黄昏，被红军包围于黄安之冯寿地区。入夜，他命令各部队加紧收缩于两翼防线，并将指挥部官兵全部投入战斗。同时在战斗最紧张阶段，他亲率武器粮良的特务连拼死抵抗，才免于被活捉。

国民党军自黄安、新渠、七里坪战役后，各纵队皆怯于再遭失利，而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前。蒋介石用重赏的办法，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但重赏未见"勇夫"。9月上旬，卫立煌奉命策应行进受阻的陈继承部。他亲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前锋到达汤家汇附近，遭红军防守部队的英勇抵抗，卫部感到处境危险，即与在南城的友军连成一片，并及时补充给养，占据制高点。不久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遂率部尾随，乘虚占领了金家寨。当蒋介石接到卫占领金家寨的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蒋除给卫巨额金钱的奖励之外，还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农历正月初一，风和日丽，卫立煌带着他第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第九军军长郭寄峤，从临汾总部来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总部为卫的到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朱总司令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热烈欢迎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卫立煌司令、李默庵军长和郭寄峤军长，你们领导着抗日的"中央军"、晋绥军，在忻口歼灭了三四万敌人，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今后更好地合作，抗战到底。卫立煌也致答词说：这次抗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以前我们国内自己人打自己人，费了不少物资，伤亡了不少人，那些消耗和伤亡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流血牺牲才是有价值的。同时，在抗战中可以把旧的、坏的东西消耗掉，创造新的好的，把旧中国建造成新中国。他还说："八路军是真诚抗日的，是复兴民族最精锐的部队。"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总部移往霍县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

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土不让。日军未能从正面突破，乃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向韩信岭阵地猛攻，并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当即命令守军全线反击，展开更加猛烈的战斗。27日，卫

立煌打电话给阎锡山，要他乘日军离开太原向韩信岭进犯之机，迅速夺回太原。阎接电后，大声高叫："好，好！不过东面敌人挡不住咋办？"卫说："先夺太原，放弃临汾，也是上策。"晋军开始行动后，因汉奸通敌，暴露了行动企图，日军急将其第一〇九师团全力回撤，反攻太原的意图未能实现。

韩信岭坚守了十天，卫见战略目的已达到，遂令其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但当他率指挥部渡汾河与主力会合时，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机炸毁，去路被日军堵住，只好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防地向东转进。在石楼、白儿岭等地，他与指挥部几遭日军围歼，幸亏八路军派部队顽强顶住日军的攻击，才使他脱离险境，转移至山西西部的永和县。4月，他假道延安，经西安到达中条山脉的恒曲县，与主力会合。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卫立煌被再度起用。蒋把他召到重庆，亲自接见，恢复了他的上将军衔，任命他拦替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腾冲攻占后，卫令右集团军就地作短暂休整，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四军主力调整南下，参加围歼左翼顽敌。他亲自到第八军指挥所，指挥左集团军围攻松山。他认为松山地处惠通桥以西的丛山中和腾冲与龙陵之间，日军占据此点，分隔了左、右集团军的协同联系，只有拿下它，才能扫除继续西进的障碍。因而自7月以来，他就以第七十一军之第二十八师担任围攻，继之以第八军攻击，但均未成功。此时，他亲临前线，指挥第八军和第七十一军主力，采取坑道作业，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和加强炮击的战术，终于于10月中旬打下松山。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仅剩几十名重伤号和二十几名军妓，敌第一一三联队全部被歼。

攻克松山后，全盘棋都活了，左、右两集团军联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卫立煌立刻命两集团军乘胜西进，于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克芒市，1945年1月占畹町，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友。至此，日军全部被歼，残部不过百人逃入缅甸丛林，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卫立煌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的最高奖赏。

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他对此职不满，称病就医。6月，他和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韩权华女士举行了婚礼。

1946年11月，他和韩权华带着两名秘书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考察军事。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卫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

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众被俘。被围困年余的长春守军闻知，军心顿散，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余者跟着投降，长春宣告解放。此时，蒋介石依然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廖耀湘兵团加速向锦州前进。10月下旬，廖兵团被歼于黑山、打虎山、新民地区。

廖兵团被歼，沈阳岌岌可危。当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30日，蒋才派飞机把他接走。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后，闲居在北平的住所内。12月中旬，他包了一架美国民航飞机前往广州，打算寄居香港。当日下午，下榻于广州的爱群酒店，被特务发现，接回南京，软禁于南京卫立煌家中。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的名字列在第13位。这下倒帮了卫的大忙，特务的监视有些松动。一天特务拆阅了卫立煌一封寄自江北杨州高旻的信，高叫："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呢！"之后叫女仆送给卫。卫心中明白，这是江北的朋友借当和尚名义劝他去解放区。

卫立煌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以逃走为上策。除夕这一天，监视卫宅的特务都溜回家过年去了。卫立煌身着大棉袍，头戴瓜皮帽，一撮留了三十年的胡须也剃掉了，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两块风膏药，于凌晨四时，带了几个随从乘车直奔上海，一周后到了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十分激动，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就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的中共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

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卫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他十分高兴，于3月15日秘密到达广州。卫氏夫妇到达广州后，中共中央华南局副书记林李明同志和统战部饶彰风部长代表中央前来欢迎并致欢迎词。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呼吁在台军政友人认清形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尽力。3月17日，毛主席给他发了欢迎电："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到北京后，即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陈毅还特地解释了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也列入其中的缘故。

卫立煌回来后，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值得卫立煌自豪的是，1955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

的重要讲话时，指出："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文中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议论社会上有热爱和漫骂共产党两类不同人物时，把卫立煌作为正面例子提出来的。1957年4月16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卫出席了酒会，并与伏罗希洛夫讲了话。伏罗希洛夫笑着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合作了两次。"毛主席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宴会以后，卫立煌受到许多友人的称羡，记者也趋前探问卫对毛主席说"国共第三次合作"一语时的心情。卫立煌回答说，他坚信祖国统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祖国大陆与台湾虽然隔着海峡，但隔不住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觉悟也决不会因隔着海峡而停滞不变。历史是公正的，总是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多大的误会都能得到谅解和消除。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紧挨着林伯渠、陈赓等人的灵位。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毛泽东初一拜早年

1944年正月初一早晨，延安枣园毛主席窑洞的灯光很早就亮了。这天，毛主席起得特别早，天没亮就穿好了衣服。正在值班的警卫班长曹复兴见毛主席要出门，忙问他要到哪儿去，毛主席回答："给老乡拜年去！"

小曹听了，非常激动。连日来，毛主席真忙啊，整天伏在办公桌上不是批阅文件，就是写文章，常常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有几次，警卫战士劝主席稍微休息一下，去窑洞后边的大树林里散散步，到中央大礼堂看看延安京剧院的演出，都被他谢绝了。可是今天，毛主席在百忙中，却破例起大早给群众去拜年！想到领袖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强烈的责任感使小曹不得不劝阻说："主席，老乡们都还没起床，不要这么早出去吧。"毛主席听了回过头来笑了笑说："拜年就要拜早年嘛！"说着，他便跨出屋门，沿小路朝村里走去。见此情景，小曹急忙跟了上去。

来到乡政府，乡干部们还没起床。听说毛主席这么早来拜年，一个个激动万分，忙起身开门，把主席迎进屋。毛主席坐在小板凳上，和蔼地同干部们拉起话来，询问去年的收成怎么样，群众分的粮食够不够吃……一连串温和而亲切的话语，犹如冰封解冻的溶溶春水，点点滴滴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谈着谈着，不觉朝霞映进门窗，忽听屋外锣鼓声、人们嘈杂声连成一片。小曹出门一看，才知道，毛主席凌晨给人民群众拜年的消息，早已象春风一样，吹遍了延安的千家万户。人们奔走相告，仨一群、俩一伙前来迎接毛主席，街口路边到处站着群众。毛主席走出屋来，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并不时地鼓掌，领袖的掌声同延安人民群众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和欢笑声汇合在一起……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毛主席起大早给延安人民群众拜年的情景，至今还流传在很多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间，就象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李志强《党史博采》）

辣子，我要辣子
——毛泽东在吃辣子时引出的一桩趣事

毛泽东吃辣椒往往是整根地吃，不要切碎，不要油炒，把整根的尖辣椒放在锅里烤一烤，湖南话叫干炕一下，就放到嘴里嚼。

有一天，毛泽东靠在床上批阅文件，一个新来的卫士进来请他吃饭。毛泽东怕他不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就问："辣子拿来了吗？"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这位东北籍的卫士把辣子听成是蜡烛，忙朝厨房跑，就把蜡烛拿到了手。心想大白天的要蜡烛干什么，便问："主席，蜡烛点着吗？"

毛泽东只顾批他的文件，头也不抬地说："点着？你们东北吃辣子还点着？乱弹琴。去，拿锅上炕一炕，要整根的炕，不要切。"

卫士愣了半晌，拿着蜡烛往外走。走到门口，还是忍不住回转身，小心翼翼地再次问道："主席，我……还不明白，怎么拿锅上炕？"

"不要放油，干炕就行。"

"可是……锅要放在火上吗？"

"不放火上怎么炕？蠢嘛！"毛泽东抬起头，显出有点

烦。

“可是，炕化了怎么办？”卫士欲走不能，欲留不敢，不知所措。

这时，毛泽东忽然笑了。他已经发现那支蜡烛，越笑声越大，越笑越开心。小卫士不知所以然，只好陪着笑，越笑越难堪，越笑越狼狈。

“辣子，我要辣子。”毛泽东用手比画，作一个吃到嘴里的辣状说：“吃的辣椒。”

小卫士听懂了，这次可真笑出了泪。

（选自《毛泽东的幽默》，作者，陈祥明，夏天然，邵华礼）

领袖将军情谊长

彭雪枫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伟大领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彭雪枫与毛泽东有着非凡的交往，建立了极深的友谊。

1930 年 12 月，正当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全力指挥红军反第一次“围剿”作战时，一封伪造的署名毛泽东写给他的秘书古柏的离间信，也转到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手里。彭德怀洞察其奸，立即召集军团前委紧急会议，揭露这起阴谋。红六师政委彭雪枫参加了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宣言。24 日，在小布召开的军团干部会上，彭雪枫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第二天，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又在小布召开。毛泽东为大会撰写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使彭雪枫耳目一新。从此，他把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作为自己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毛泽东指挥下，红一军团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彭雪枫率部所打的一系列胜仗，使毛泽东从全军盛传的“红军将里誉二彭”的美称中对彭雪枫更加熟悉，更为赞赏。1934 年 1 月，彭雪枫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荣获大会主席毛泽东颁发的“红星奖章”。

长征开始，彭雪枫任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一梯队（代号红星）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毛泽东就被编在负责军事指挥的“红星”司令部第三队，受到了彭雪枫及其梯队的很好卫护。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统率下，红军两渡赤水，再战遵义。然而此时万丈矗立、峰峰如剑的娄山关，却再次横在面前，阻挡了红军的去路。已改任红十三团团长的彭雪枫，率部充任中央军委预备队，受军委直接指挥。1935 年 2 月 25 日，红十三团到桐梓的当天，军团长彭德怀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命令：“十三团务必于今日天黑以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毛泽东在娄山关前亲自点将，使彭雪枫心情振奋，大受鼓舞。他以气吞山河的英勇气概，率领十三团疾速南下，后经昼夜反复恶战，终于如期拿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娄山关》这首毛泽东的豪迈词章，就是这次战斗和他们战斗友谊的千古绝唱。

1936 年 9 月，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彭雪枫等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赶至兰州，圆满地完成联络于学忠的光荣任务。然后，他返抵西安，又同叶剑英一起继续做着张学良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10 月下旬，他又奉毛泽东电召回到保安，接受赴晋作联络阎锡山的工作任务。毛泽东再三叮嘱说：“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这一赠言给彭雪枫指出了做好统战工作和待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以致使他铭记终生，力行不忘。几年以后，他还以此特意赠给他的革命伴侣林颖。

1938 年 1 月，彭雪枫肩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使命，来到了豫南竹沟。他审时度势，很快就形成了中原抗战的战略构想。3 月 1 日，他把这个构想电告毛泽东：“以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通、南、巴这一地域作为大后方的绝对必要。”毛泽东接电后相当赞赏。并从全国的战略高度首先肯定彭雪枫对此“观察甚当”，但认为将来“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彭雪枫努力和认真实施了毛泽东的决策。9 月底，在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准备后，彭雪枫毅然率部东进，开创了豫皖苏边抗战新局面。豫皖苏边新区的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不仅使党中央和毛泽东更为明显地看到了中原敌后发展的光辉前景，而且也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因而对彭雪枫更加倚重和信赖了。12 月 24 日，彭雪枫于豫东鹿邑向毛泽东等中央军事领导报告了游击支队东进情况和 1939 年新年过后的东进计划后，毛泽东便电复予以肯定，说：“你在豫皖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

1939 年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和豫皖苏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胜利的开端。辽阔的豫皖苏平原上，千百万人民群众到处传颂着：“共产党、新四军、彭雪枫！”12 月 5 日，《拂晓报》出版百期纪念，欣逢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恰由延安寄来。这是这年夏季支队政治部锄奸科长许昌因公赴延时彭雪枫托他给毛泽东带去几期《拂晓报》，并请毛泽东题词和指示边区工作的结果。接到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彭雪枫兴奋异常，令《拂晓报》临摹头版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是：“坚持游击战争”。贺信是：“《拂晓报》看到了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同年底，中原局和中共中央便确定了“淮北之苏皖地

区”为华中的“主要发展方向”，该区所有党所领导的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

1940年春夏，豫皖苏边区已达鼎盛时期。这时，奉命前来参加边区建设的党政军干部又带来了毛泽东给彭雪枫的亲笔指示信，使边区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的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毛泽东在信的开头说：“雪枫同志：一年来，豫皖苏地区迅速得到发展，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你们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特向你和全区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1944年8月，彭雪枫率部西征，一路所向披靡。不料在豫皖苏边基本收复之际，9月11日晨，夏邑八里庄一战，彭雪枫竟为流弹所中，壮烈殉国。毛泽东获悉彭雪枫在抗日前线的英勇牺牲，是同日午后张震、吴芝圃于夏邑前线电告军部并由军部转告的。次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便电示军部安慰、鼓励四师前方将士，并嘱听从张震参谋长指挥作战。13日，在命令张爱萍任四师师长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询问彭雪枫牺牲详情，并要军部电告。

1945年2月7日，陕北延安寒风呼啸，淮北大地银装素裹。毛泽东亲临杨家岭中央礼堂参加了彭雪枫的追悼会，他和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共送挽联：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冯文纲，《炎黄春秋》）

赔西瓜钱

一天，上级把梁山战斗抓回的6个日本俘虏，交给了八路军某连负责看管。在辗转战斗中，带着几个哇喇哇喇不懂中国话的日本兵，确是个累赘，麻烦不说，还担心出什么漏子。

怕出事情，偏偏事情发生了。

一次在转移途中，路经群众的西瓜地。当时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大伙儿虽然又累、又渴、又饿，可谁也不动群众的西瓜，战士们都自觉地履行着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

可八路军的纪律对抢掠成性的日本兵没用的。当他们一看到满地滚瓜溜圆的大西瓜，就如同天使给他们带来礼物一样惊喜、垂涎、狂欢。于是，不顾战士们的阻拦，跑到西瓜地，用脚把西瓜踢掉，抱起一个捶开，就边走边大口大口地吞起来。

押送俘虏的战士们看着日本俘虏少皮没脸，贪吃馋嘴的没出息劲儿，真是又气又恼，又好笑。可西瓜既然踢掉已经吃啦，喝斥他们一顿也就罢了，对这些日本俘虏，也只能这样做了。至于赔偿，连里也确实没考虑，想着俘虏吃个西瓜，又不是我们战士违犯群众纪律，何必那么认真呢！

没想到这件事被细心的罗荣桓政委发现了。

一天，趁战斗间歇，他来到了385团10连，对连长、指导员说：“俘虏吃了群众的西瓜，你们得想法儿赔偿！群众纪律，我们可不敢马虎哟！”

罗政委走后，连里把这件事交给了副指导员办理。刘副指导员按市价算了帐，带了钱，找老乡赔礼送钱去了。

几经周折，刘副指导员好不容易找到了种瓜的老大爷。老大爷听了事情的原委后很是感动，说：“日本俘虏吃两个西瓜，你们部队也搁住这么认真，首长还专门再给你们交代交代，真是太那个了！”

老大爷说啥也不收钱，这可难坏了刘副指导员。因为赔礼送钱，他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怎么能不让老大爷收下钱就算完事呢！于是，两个人就在那儿推让起来。

最后，老大爷看实在是拗不过，还是将钱收下了。老人家抹着眼泪，连声赞叹：“好兵！好兵！天底下的好兵啊！”

（选自《九大元帅珍闻轶事》）

日本反战英雄松野觉

1944年3月4日，在我军华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区的车桥战斗中，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苏中支部盟员松野觉英勇牺牲了。

据《解放日报》在同年3月25日《日人反战同盟的光荣》一文的报道：“当敌人被迫缩入最后一个堡垒之后，我随军的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一部分同志，即冒着炮火进到碉堡旁边，进行喊话争取工作。惟敌毫不醒悟。此时松野觉同志即向身旁一战士手中取得步枪，隐身窗下射击，接连毙敌二人，正继续瞄准射击时，忽脑部中弹，当即英勇牺牲”，年仅26岁。

在他牺牲不久，《解放日报》接连发表了两篇题目均为《悼松野觉同志》的纪念文章。其中一篇是抗战期间从日本化装来中国领导在华日人参加我国抗日战争的日共中央代表、当时担任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冈野进撰写的，对他的英勇献身给予高度评价：“他虽然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而流了血，他的血虽然是染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但是他代表着广大的日本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精神，他是日本人民群众的真正英雄。”

松野觉出生在日本广岛县一个劳苦人民的家庭，读小学时父亲病卧不起，他边读书边卖报纸、卖面包以维持一家生活。小学毕业后，进了广岛县陆军运输部，当了船

船机器工人,以他的血汗养活他的母亲和弟妹。1940年被强迫入伍来中国参加侵华战争。1941年12月9日,在苏中如皋丰利镇附近的战斗中,当了新四军的俘虏,并和松田一块参加新四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他在新四军不到三个月时间,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消除了头脑里的民族偏见,清除了那种当了俘虏等于毁灭了自己的观念,并且了解了此次战争的实质和自己应负的任务。

由于"他亲自体验过被剥削的痛苦,所以当他一看见真理,他就从不放松每次工作的机会"。从他参加新四军到他牺牲时的2年3个月的战斗历程中,他表现了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当新四军中的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久保因病住医院时,他考虑到久保不会讲中国话,就主动到医院看护他。他在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时被选为宣传委员。为了赶印宣传品,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单独跑到离阵地很远的印刷所去,帮助并督促印刷工人及时印出各种宣传资料;他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和知识,"写了很多宣传品,内容非常生动、通俗,因此最受日本士兵欢迎,发生了不少的影响。"

在宣传工作上,他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击中敌人的要害,"曾创造了火线上喊话的奇迹"。1944年2月新四军攻打赵家舍,为了拖住附近泾口的敌人,使其无法增援赵家舍之敌,于是派出部队向泾口敌人进行警戒。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密切和警戒部队合作。12日晚上,在离泾口敌人的碉堡50米远的一条小河边上,架起了喊话筒,由松野觉向敌人喊话。喊话时和敌人的小队长辩论了两个钟头,敌人老羞成怒,三次扬言要开枪打死他,但都被他说得无言以对,放下枪口。下面是喊话时的一段对答:

"喂,战友们,请不要打枪了,我代表反战同盟来和你们讲话。"

"你是什么人?"敌碉堡里的声音。

"我是日本广岛人,3年前在独立13旅团52大队2中队当上等兵,我叫松野觉。"

敌碉堡里没有声音,他接着讲下去:

"战友们,战争7年,你们的家庭除了负担繁重的捐税外,得到了什么?"

"混蛋!"敌碉堡军官咆哮着!

"你忘记了天皇么?忘记了日本么?"

"没有忘记。"他慢吞吞地回答:"那是由我国全体人民创造的开国纪念日,我正为了这个光荣日本,才反对军阀的亡国战争,才来劝你们停止战争。"

"你完全没有大和魂的精神。"

"因为战争,因为连剃头洗澡,连妇女的月经带都要税。无力负担的人便受到残酷的污辱,这算大和魂吗?"

碉堡里沉默一阵后,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有无线电","国内的事情我们都很明白,你们是第三国际指使的走狗。"

松野觉带笑的说:"你们真蒙在鼓里",'共产'国际在去年五月就自动解散了,你们别受军阀的骗了。"

碉堡里的日军辩不过,转移视线,说:

"松野觉,我们这里的有糖、有酒、有纸烟,你回来吧。"松野觉失声的笑了。碉堡的声音:

"你忘记了,你出国时人民欢送你的情景吗?"

"我没有忘记,在欢送群中暗暗哭泣的人。"松野觉针锋相对的回答,引起敌堡里传来唧唧声和叹息声。可碉堡的军官却又咆哮起来:

"混蛋的东西!""打他两枪!"

"不要打枪,我是代表日本工农阶级的利益,来和你们讲话的,为什么要打我呢?"

"日本没有阶级,只有天皇和国民。"

"日本是有阶级的,你们不看见国内一小部分人不做工,有好吃好穿,大部分人成天劳动,还穿不暖,吃不饱吗?"

碉堡里辩论起来,松野觉进而劝说:

"战友们,停止战争吧,你们在战争中的消耗,都是你们父母兄弟的血汗。你们在战场上挨饿受苦,军阀和财阀们在国内天天享乐……。"

碉堡里鸦鹊无声。松野觉唱起《战争是痛苦的》歌曲,唱毕,碉堡里传来一阵鼓掌声和笑声。这时赵家舍点燃大火,告诉警戒部队已完成任务,可以回宿营地了。松野觉向碉堡的日军告别:

"战友们辛苦了。你们请休息吧。"他拿走喊话筒,把事先写好的标语牌:"战友诸君,昨晚辛苦你们。祝诸君健康地回国"插在喊话的地言,然后扬长而去。

这次喊话,拖住了泾口的日军,保证新四军某支队攻打赵家舍的胜利,并俘虏了30多个日本士兵。这次喊话,对泾口碉堡的日军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来有个被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士兵还问道:"那次在泾口喊话的松野觉呢?我们都希望能看看他。"并说:"他讲得很好,小队长和军曹提出的反驳,都被他解释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一个叫水谷明的还说:"他那次喊话以后,泾口的某小队弟兄的情绪就变了,喊话后那个小队长被撤换了,弟兄们都哭。"

(黄义祥,《历史大观园》)

美国飞行员敌后脱险记

1984年6月11日,应邀在美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切会见了三位美国朋友。当张爱萍将军郑重地打开一本影集展示在他们眼前时,三位美国朋友先是惊异,接着便指着照片上的

人，激动地喊道："这是我！""这是我！"其中一位叫赛伏爱的美国朋友兴奋地问道："真了不起，40年了，这些照片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黄海上空坠下"空中堡垒"

1944年夏季，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方向变化。战斗在中国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海岛争夺战。为了配合前线的攻势，在中国大后方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断派飞机飞越黄海，轰炸日本本土，藉以摧毁日军的军事工业基地，瓦解其士气。

8月20日夜晚，天下着潆潆细雨，靠近盐阜抗日根据地的黄海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马达轰鸣声，一架飞机摇晃着机翼，喷吐着浓烟，向盐阜根据地飞来。当飞机飞到建阳县（今建湖县）境内时，一个个黑影从机舱中跳出，不一会，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个降落伞，在夜空中随风飘荡。飞机呼啸着继续下坠，在临近地面时，从机舱中跳出一个黑影，随后，失去控制的飞机撞倒几棵粗壮的桑树和一架风车，一头栽进建阳县二区辛家桥（今建湖县建阳乡）的一块稻田里。飞机油箱内的汽油爆炸燃烧，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

这是一架美制B29型轰炸机。由于它续航距离长，携带的炸弹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空军的王牌轰炸机，被人们称为"空中堡垒"。这次，它从中国的大后方起飞，轰炸日本的九州岛时受重伤，在返航途中坠毁。

最先得到飞机坠落消息的建阳乡民兵模范班的民兵，在乡干部带领下，火速赶到现场，扑灭大火。乡干部从飞机残飞的标志上认出是一架美军的飞机。

飞机坠落的地点是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区，距湖垛镇日军据点仅几公里，日军只要个把小时就可以赶到。为了保护这架飞机，新四军盐阜独立团二营六连连长王海萍、指导员郭典文率领全连战士不顾泥泞路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沿横塘河布置了警戒。此时，湖垛镇的日军也得到了消息，70多名日军和40多名伪军倾巢出动，在中队长近藤的指挥下，向飞机扑来。日伪军害怕中埋伏，不敢走大路，就从小路和田埂绕道而行，在前面搜索的伪军更是走走停停，这样，当他们接近坠机现场时，已是21日的大天亮了。上午9时，争夺飞机的战斗终于打响了。日伪军的火力猛烈地向六连前沿阵地射击。六连80多名战士英勇抗击，一次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中午时分，附近几个乡的游击队、民兵和群众纷纷赶来参战，将日伪军包围起来。六连战士士气大振，越战越勇。孤力无援的日伪军见势不妙，狼狈逃窜，缩回湖垛镇据点。

鉴于这架美机已严重毁坏，战斗结束后，六连指战员们将飞机上的武器、弹药和所有能抗拆下的机件全部带走，主动撤离了现场。

营救美军飞行员

就在飞机坠落的这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建阳二区万丰乡钟庄农民，正要熄灯睡觉，忽然听到天空传来隆隆的响声，便紧张地从家里跑出来观察动静。只见一架巨大的飞机呼啸着飞过，接着天空中出现了几团白花花的东西，这几团"白云"飘然落地后就不见了。农民们也并不在意，各自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清早，一个老汉拎着灯笼到村头草堆去抱草烧早饭。当他从草堆上拿下两捆稻草 时，突然从草堆里钻出两个人来。老汉大吃一惊，掉头就跑，边跑边喊："来人啦，来人啦！"庄上的群众闻讯赶来，只见这两个蓝眼睛，高鼻子，身着草绿色的军装；他们呗哩咕噜地说了一通话，可是谁也听不懂。其中的一个人着急地用手指指天，又指指地，从口贷里掏出一面小旗子。人群中一个识字的上前拿过旗子，见上面并排印着中国、美国的国旗，还有一排中文大字"新爱的中国朋友：我是来华与日作战的美国人！"大家这才明白他俩是美国飞行员，便上前帮助他们抖掉身上的草屑，将他们迎进庄上休息。

同一天早上，近湖乡的民兵中队长刘江荣带着30多个民兵执行任务归来，在周家舍的草堆边也发现一个外国人，身边还放着白色的降落伞。刘江荣上前盘查，可是听不懂他的话，只好用手势打起哑语来。这位外国人用手指指天空，意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刘江荣指指不远处日军据点的太阳旗，意思是"你认为日本人怎样？"他连连摇头，还伸出小拇掉，表示蔑视的意思。刘江荣又伸手作出"八"字状，指指北方，表示自己是跟八路军一样的人。外国人这才点点头。刘江荣考虑到此地离敌据点很近，便叫几个民兵护送他到东郑庄的二区区政府。正好区里有一个干部会讲英语，经过询问，才知道这位外国人是美国B29型轰炸机的少校领航员，叫赛伏爱。他们驾驶的飞机上共有12人，在轰炸日本返航途中，飞机负伤，决定弃机跳伞。前两批跳伞是七人，第三批跳伞是四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通过交谈，还了解到赛伏爱28岁，是美国芝加哥人。几个月前，他从印度调到中国，在第十四航空队服役，曾参加河南战役保卫洛阳的空战，还到东北执行过轰炸任务。赛伏爱说：原先我们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每次飞过这里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早知道这里是新四军驻地，我们就放心了。赛伏爱为了感谢刘江荣的救命之恩，将手上的金壳手表脱下送给他。刘江荣表示，你是我们共同对日作战的盟邦战友，救你是我应尽的义务，你的财物我不能接受。赛伏爱十分感动，还希望区干部帮助

查找营救其他11名同事。建阳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盐阜行署和新四军三师师部，一方面通知全县民兵和群众帮助寻找。很快，钟庄群众营救两个美国飞行员的消息报到县政府；在高作村，群众也发现了两个美国飞行员。他们分别是：奥勃朗上尉、罗茨中尉、斯太尔美克中尉、勃朗台治少尉。这四位美国飞行员分别由当地民兵护送到建阳县政府所在地，与先期到达的赛伏爱少校见了面。后经我情报部门了解证实，前两批跳伞的7人分别落在黄河和敌占区内，均遭到不幸。

根据地的"奇遇"

美军飞行员在盐阜根据地迫降的消息，很快上报到中共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三师师部。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区党委书记兼三师师长黄克诚请副师长张爱萍、师参谋长洪学智负责接待工作。23日上午7时，盐阜独立团派出部队，专程护送赛伏爱一行五人前往三师师部。除了斯太尔美克中尉脚部挫伤，由担架抬着外，其他四人骑着马前往。中午，到达阜宁县东沟镇，镇上的群众闻讯赶来欢迎，镇商会还送来香烟和水果慰劳他们。这可把几位美国飞行员乐坏了，飞机出事时，这些基督教徒本以为升入"天国"，谁知却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自由民主的"天堂"，真是一场料想不到的奇遇。赛伏爱激动地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

下午，美国飞行员到达了三师师部的驻地——阜宁县益林镇南窑村。洪学智、吴法宪等亲自带领部队和群众出村欢迎。尽管当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可指战员们尽最大的努力，使美国飞行员生活得好一些。他们将村头的一座大庙打扫得干干净净，隔成卧室、会客室、餐厅、浴室等，还在墙上挂上世界地图和欢迎盟军战友的标语。当地群众也纷纷送来鸡、鸭等慰劳营养品。

8月25日，在华日本人解放联盟苏北支部的负责人松田等，也带着慰问品慰劳美国飞行员，操着日语和不太熟练的汉语向美国朋友问好。赛伏爱等人看到新四军的部队里还有反战的日本人，十分惊奇，便详细地询问他们在中国的感受。赛伏爱还问松田："美军轰炸日本，你们有什么看法？"松田说："你们轰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表明日本法西斯崩溃的日子不远了。"在笑谈中，美、日两国朋友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27日中午，新四军三师师部举行宴会，招待赛伏爱等美军飞行员。张爱萍、洪学智、盐阜行署主任曹获秋等人出席作陪。张爱萍代表苏北根据地军民对赛伏爱等盟军战友表示慰问和欢迎，赞颂了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赛伏爱在宴会上说：我们这次得到了民主政府和新四军的全力营救，化险为夷。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的政府也会感谢你们的。当奥勃朗上尉听洪学智参谋长说飞机的所有武器、文件和机件都保护下来时，激动地说：是新四军战士用生命保守了盟军的军事秘密，我们愿将飞机上的6挺机枪和一门炮送给新四军。席间，中美两国战友频频举杯，预祝反法西斯战争早日取得胜利。

下午，新四军三师师部举行了有300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苏美英四国国旗。当张爱萍等人陪同赛伏爱等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洪学智介绍了五位美国飞行员的简历，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他们赠送了缴获的日本军刀作为纪念品。他说：我们的抗日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全世界都有我们反法西斯的战友。赛伏爱也在会上讲了话，谈了飞机失事的经过，对新四军的营救表感谢。会后，举行了中美战友的联欢会，三师八旅的文工团表演了节目，美国飞行员也表演了降落伞使用的方法。爱好摄影的张爱萍副师长及时地摄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8月30日，赛伏爱等五位美国飞行员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中国战友，在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新四军军部，而后辗转回到大后方。

苏北根据地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得到了大后方和美国舆论的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署名文章，热情称颂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指出："被迫降落在解放区的美国飞行员们，对于中国游击队的机智表示很深的感激和敬佩。"

（张衡，吴雪晴《大江南北》95，6期）

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大后方十万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早在1944年8月间就接到蒋介石手谕，要利用美援装备，组建12个师的青年军，发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踊跃报名。

然而，这场颇有声势的"从军运动"，却事与愿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演出了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当时，作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城，奉命发动报名，他首先要求中央党部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积极报名，以资号召，但是搞了几个月，几乎没有一个人报名。吴铁城很难堪，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报名抽签"，中者从军。规定了凡是年在36岁以下的，都要报名。这样，引起了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笔者当时在中央党史会工作，刚好36岁，党史会及龄者16人。主任委员张继召集会议，会上并没有一个人报名。会后在主管人事的周永成策划下，把一张开会签到纸作为"志愿"报

名名单呈报了上去，当时的《中央日报》对此作了宣传报道。于是，会议参加者一致否认，在中央党史会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发动大家联名向"总裁"申明没有志愿报名，开会签名单不能作报名依据。不仅中央党史会，其他各单位青年党务工作人员也群起反对，中央组织部闹得也很凶。吴铁城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又想出了要蒋介石亲自到会训话，以达到动员青年党务工作人员报名的目的。

1945年3月19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中央纪念周，我是搞速记工作的，参加中央纪念周记录是常事，并不在意。奇怪的是，这天纪念周和往常大不一样，中央纪念周参加者原是党政军高级官员，而这一次排队依次入场的都是青年，更出乎意料的是不让我担任记录，还通知我和其他的9人（党史会、组织部各5人）站在第一排的位置上，这是不寻常的。

蒋介石亲自主持这次纪念周，在行礼如仪，读"总理遗嘱"后，蒋开始训话。他脸色严肃，讲了1小时之久，讲到最后，声色俱厉地要大家回去报名从军。

纪念周结束，蒋介石站着不动，没有离开。重庆国民政府礼堂本来很小，后面的人不知道蒋没有退席，一哄而散，争相离开会场。蒋介石见此情景厉声斥责：不许乱跑。我们10人被指定站在原地不动，有一些元老如吴铁城、张继、陈果夫等也都在场。蒋介石开始对我们10人训话，讲了5分钟，最后说："你们自己不去从军，还煽动别人，这是破坏从军运动，今天我以总裁名义对你们军法从事。"会场上肃静无声，显得十分紧张。突然，有人高喊："总裁，我有话要说……"，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大叫："宪兵带下去。"原来，党史会同人中有两人只因反对抽签做法讲了公道话，也叫来"听训"。其中一位是年已40的许处长，另一位则是年过花甲，曾跟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姜老先生，就是刚才高叫有话要说的那一位。于是他也被列入"破坏从军"罪的名单。陈果夫、吴铁城看到这情况，扶着蒋介石出去上车，我们被带到了国民政府一间屋子里。

吴铁城原意是想对青年党务工作人员训一顿，杀鸡儆猴，把10个人拎出来做做样子，想不到弄得假戏真做，蒋介石竟然要"军法从事"。消息传出，整个中央党部人心惶惶。同情我们的，不断把消息传到小屋子里来，一会说，形势紧张，你们要被送去陆军监狱；一会又说问题不大。还有人来告诉我们看见吴铁城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到中央党部，吴铁城送何出门，连声说"拜托拜托"，何成浚说"交给我办好了"。我们听后心情仍然忐忑不安，因为"破坏从军"这顶帽子，毕竟不是儿戏啊！

天快黑时，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两路口桂花园，车停后只见许多人围了上来，他们都是中央党部所属各单位的青年，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同情，特地赶来慰问我们。桂花园是军法执行总监部的总监办公室，在两路口北面山坡下，古老的两进厅房，显得阴森森的。我们被带进去时，昏暗中看见何成浚立在办公室门口，望着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好象是办公室的屋子里。尚未坐定，就叫我们到楼下吃饭，5个人一桌倒有4个菜，我们奇怪了，难道这象牢房的囚饭吗？事情也许不是那么严重。

第二天下午，10人被带去见总监，大家又忧又喜，忧的是可能要提审了，喜的是总监亲自传见，也许问题要解决了。出去时，大家有意要我走在前面，大家都知道何成浚认识我。以前党史会要何成浚写辛亥革命回忆录，是他口述我记录整理的。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我分明记得他家里办公桌上有一尊金光灿灿的佛像，还有一个小香炉，这怕是他"执行军法"的忏悔吧！

我们被带到办公室，见室内布置很简单，一张办公桌和几张凳子，何成浚坐在办公桌边，要我坐在他旁边。一开始就对大家说：总裁总是这样的，你们是党员，不曾从军，既不是军人，怎么送到我这里来呢？既然来了就当住旅馆吧。又说：从军也没有什么不好，多点经历嘛。那次谈得很多，将近一个小时，还提到有位师长叫余程万，在长沙战役打了败仗，委员长几次下令枪毙他，我没有杀他。现在，委员长不是又叫他上前线戴罪立功吗？他笑笑伸一个小指头，你们这点点真是小事。听到这里，我们才如释重负。临走时，他交代副官说，允许别人前来探望。他还吩咐副官把秘书办公室腾出给我们住，安排好伙食等等。这倒有点真象住旅馆了。

第五天，副官进来点了3个人的名，说是总监叫去他那里。3个人都是党史会的，除姜、许两人外，我也在内。一到办公室，见张继正坐在那里，后来知道张继是来领回姜、许两人的。我也在被领人员之列，恐怕这与我曾与何相识不无关系。

事情至此还没有了结，还得向蒋介石交差，接着，中央党部呈报蒋介石说：8个人已"志愿"要求从军，案子已经结束。于是，我们8人被指定于4月12日到了驻江津的青年军202师606团，象征性地过了20天的军旅生活。

（居正修）

孔祥熙昆明讲演碰壁记

1944年春，孔祥熙来到昆明，他向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曾任国民党青年部部长）表示，要到西南联大讲演。陈雪屏鉴于孔在知识界尤其大学生中声名狼藉，以安全为由，婉劝其打消此念。西南联大校方也加以劝阻。经过磋商，决定任孔讲演，但地点改在云南大学，以避联大学生之锋。孔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孔祥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硬要对昆明学生作一次

讲演(据联大同学王世堂说,是为了挽回倒孔运动中丢失的面子,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中《一场遭遇战》一文),其结果当然是自讨没趣。记得那一天的讲演是在云大志公堂举行。大厅前部是译员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主要为联大应届毕业学生),后面是云大学生,最后是联大学生。讲台上有一名美军在安设连通麦克风的电线。会场由译员训练班主任黄仁霖指挥。当孔祥熙身着宽袍大褂而来时,群众中即发出了"好胖呀"的议论。会议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持,蒋怕学生反感,致词时不提孔的官衔和赫赫经历,只说:"孔庸之先生创办铭贤学院(孔培植金融嫡系的财经学校)卓著成效,对我国教育贡献很大。我们欢迎教育家孔先生来讲演。"孔在讲演中首先吹嘘了他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并打开纸折扇,念了据称是孙先生给他题的诗。然后谈到抗战时期当然是艰苦的,大家要忍受艰苦,并说:"要多吃杂粮,象白薯这种杂粮我吃过,就很好吃嘛!"群众对孔府(尤其孔二小姐)的骄奢淫佚锦衣玉食早就极为反感,一听此话,火冒三丈,不约而同地"嘘嘘"起来,并叫喊:"那你们为什么不吃?"孔祥熙装聋作痴,继续说:"现在抗战时期,人人都在吃苦,哪一个不苦?"于是听众哗然,有的人大嚷:"你就不受苦!"秩序跟着大乱起来。孔祥熙也真有"忍"字功夫,仍旧充耳不闻。不过随后有个端茶送水的随员对他附耳唧咕了几句,后来他也就草草收场了。他说完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走上讲台转圆道:"感谢孔先生的讲演,可是今天由于会场太小,而想瞻仰孔先生丰采聆听孔先生说论的人很多,以致对会场秩序有些影响,很遗憾。"云云,敷衍了他一下,让他下了台阶。

可是孔祥熙真是"宰相肚里可撑船",第二天竟拿出了一大笔钱(对他来说,不啻九牛一毛,而且肯定是在公家报销了)买了很多猪肉给昆明各大学学生打"牙祭",每人半斤。"3月不知肉味"的同学们笑说:"来呀。快来吃孔祥熙的肉!"

(傅举晋)

武汉大学学生冷待白崇禧

1944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携随员赴川西视察军训。"小诸葛"成都公干完毕,又游过峨嵋山,在道经乐山时,忽然兴起要检阅当地驻军。驻扎于此者,原来是第三十二补训处,处长是何应钦的外甥韩文源。

这一天清晨,阅兵场四周戒备森严。韩文源刚接任乐山警备司令不久,于是他调度宪兵前来受阅,排场更显威风。白氏训话完毕,紧接着应约赶到设于乐山的武汉大学演讲。韩文源自然是殷勤奉陪,竟然将宪兵也带到武大来戒备。

白崇禧来到武大时,王星拱校长因远居郊外,尚未赶到,就由教务长朱光潜等人在会议室先行招待茶叙。此时大礼堂里已挤满了急欲一睹白将军风采的学生们。忽然有同学来报:"王校长被门口的宪兵推倒在地了。"原来,王星拱乘坐人力车赶到校门时,守门宪兵不理会车夫申述,勒令停车。车夫未听,宪兵竟大动肝火,举手打人,车夫躲避不及,一撒手连人带车翻了跟斗。大礼堂的学生闻讯,群情激愤。一面派人慰问校长,并与宪兵交涉,一面商讨追究办法。学生们齐声高呼"驱逐韩文源!""要韩文源当面赔罪!""不许宪兵停留校内!"朱光潜教务长赶来劝解也被轰走。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王星拱亲自赶来,向众表示:"刚才的事情,我一定负责追究,不叫武大丢人。大家镇静下来,听白部长讲演。"这才众怒稍息。

接着白崇禧由韩文源陪同,走向讲台。白尚未讲完,只见台下听众渐渐散去。他声色俱厉地说道:"今天你们学生的举动太不成话,宪兵是奉行他的职守……"顿时台下喧声大作,有人责问:"难道打翻校长的车,也是奉行职守吗?""学校范围也是宪兵奉行职守的地方吗?"白崇禧听后,不禁面色发青,愤然说道:"老实说,有许多地方请我讲演都请不到,你们能听我讲还要闹吗?"台下又是一阵哈哈。白氏勃然大怒:"好!你们应该明白,政府解散个把学校不算一回事!学风坏到如此……"同时他又转身向台上的教授们说:"今后希望院长主任要对学生严加管束。"此时台下的嗤笑声又起。白氏忘记了自己是军训部长,说这话实有越权之嫌。这时忽然有位操湖南口音的学生,跑到台前大声喊道:"报告白部长,韩文源部下作恶实非一日,常有殴打学生、教授和教授太太的事情发生。今日之事绝非仅有。"语音刚落,一时掌声骂声不绝于耳,韩文源尴尬得无地自容。

白崇禧被这位同学弄得目瞪口呆,而台下"驱逐韩文源"的喊声震耳欲聋。正当白崇禧下不了台的时候,站在台旁的军事教官灵机一动,鼓动全身之力,高喊一声"立正",大出全场意外。白崇禧不愧是小诸葛,于是随机应变,立即敬了一个礼,悻悻地退出会场。

(彦甫)

国民党军队的八十一名上将

民国时期,孙中山设过元帅和大元帅,但不是军衔而是职务。国民党政府正式对高级将领授衔,始于1935年。最高是上将。上将又有特级、一级、二级及中将加上将衔之分。

经过几次授衔,至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共有上将81人,其中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8人,二级上

将21人，中将官位或末任官位而有上将职阶的51人。特级上将当然是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其他80名上将，按职务大体可分为五类。

一、军事委员会各部及其他中央军事机构主官12人：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级），副参谋总长程潜（一级），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次长秦德纯，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

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

陆军大学代校长陈仪；

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键。

二、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22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一级），副司令长官杨爱源；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刘建绪、黄绍竑、唐式遵；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副司令长官夏威；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一级），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孙震；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王缵绪；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副司令长官蒋光鼐；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傅作义、马鸿逵；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

三、其他军事单位主官12人；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

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重庆防空司令贺耀祖；

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

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孔繁蔚；

广西军管区司令黄旭初；

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

四、军事参议官员26人：

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一级）、唐生智（一级）、万福麟、熊式辉；军事委员会参议官李烈钧、张之江、朱绥光、李福林、刘骥、熊克武、赵恒惕、但懋辛、陈铭枢、李杜、张凤翙；

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琛，副院长于学忠、张钫；参议徐源泉、王树常、高维岳、刘翼飞、郭汝栋、石敬亭、金汉鼎、周濂。

五、没有职务的8人：

陈济棠（一级）、张学良（一级）、刘镇华、盛世才、杨杰、刘兴、方本仁、蒋鼎文。

在80名上将中，没有军事指挥权的多达34人。一些真正掌握兵权的指挥官，军衔反而并不很高。例如，当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即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汤恩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及刘戡、杜聿明、李延年、王耀武等集团军总司令，军衔都只是中将。这既是因为，按照各国军队惯例，军衔的高低与资历关系很大；更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是由各个派系组成，蒋介石需要用军衔来笼络和安抚非嫡系的将领。那些没有指挥实权的上将，大多是东北军、西北军、粤军等头面人物。

（萧曼夫）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讲

1944年12月30日，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传到重庆，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郭沫若赞同，又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会议程序定了下来。

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大会主席宋庆龄宣布开会，戏剧家洪深任司仪，行礼如仪，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致开幕词。法国参赞叶里赛夫，作为生前友好报告罗曼罗兰生平。接着就是郭沫若演讲。

郭沫若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湘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听众很快就发现郭就是骂的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

那个何应钦呢，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

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老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讲演了。"

（韦木）

流行风

电影《春江遗恨》

《春江遗恨》完成于1944年11月。编剧、主要导演、摄影师都是日本人。稻垣浩执导。"华影"的岳枫参加导演工作；演员日中各一部分。影片写太平军旅帅沈翼周在英、美支持清军攻打太平军的事实面前，相信了日本武士高杉晋作等人的话，视英、美是共同的敌人，并决定与高桥等日本人携起手来，一起反对英、美。

《春江遗恨》被称为"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象征"，露骨地宣传了"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将一个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大加美化，描写成一个所谓"热爱着东亚""热爱着中国"的救世主；并无耻地歪曲了太平军的历史。《春江遗恨》是一部典型的宣传"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影片，是敌人及其合作者所制作的最反动的一部电影。

小说《潮》

作者田涛，主要内容：

抗战初期国统区一群流亡知识青年在救亡道路上坎坷曲折的经历。北平大学胡珈航辗转南下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冀察游击宣传队"，他们满怀抗日热情，办刊物，演话剧，还下乡调查访问；后又转入战地服务团到达西安，途中遇到敌机轰炸，又流亡到洛阳，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奔赴前线。他们一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一面相互关怀鼓励，克服战时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困苦。最后，因寻找不到正确的抗战道路，他们各自寻找自己的道路。故事穿插了胡珈航与山鹰姑娘恋爱的悲剧，借以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沉缅于个人爱情的错误；通过游击队司令蹂躏山鹰姑娘的描写，揭露国民党黑暗势力对青年的迫害。但作者在批判和揭露中对现实生活的本质挖掘不深，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格寄予过多的同情。

小说《火葬》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

写抗战时期北方文城县人民抗敌斗争的故事。国军便衣队副队长丁一山是文城维持会长王举人女儿梦莲的未婚夫，一次在奉命侦察文城敌军时被土豪、王举人秘书刘二狗派人杀害。刘二狗乘机多次逼娶梦莲，均遭拒绝。梦莲得知丁一山被害后，悲痛欲绝，决心投向抗日军队，协助石队长递送日军消息。日寇进入文城后，大肆掳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石队长为挽救文城人民和为丁一山报仇，潜入王举人家，通过田麻子获得日军情报。在城内外部队配合下与日军激战，在撤退时火烧王举人，刘二狗房屋，城内外一片火光，百姓蜂起投入战斗，炸毁敌人军火库，而石队长在杀敌锄奸斗争中不幸受伤，光荣牺牲。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日寇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热情歌颂抗日战士和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作者说写《火葬》的目的在"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弱那么正好是自取灭亡"，是作者被抗日的烽火和血肉激怒下写成的一部抗战小说。由于材料大多出自虚构，加以作者生活经验不足，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

小说《洋铁桶的故事》

作者柯蓝，主要内容：

以抗日战争时期晋东南地区沁源县为背景，描写民兵英雄吴贵组织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故事。主人公吴贵，出身贫苦，性子暴躁，外号"洋铁桶"。1938年日寇占领沁源，他流落他乡。一年后，八路军进驻县城，建立民兵武装，他立即回乡要求参军。因他有一手好枪法，被任命当民兵小队长。在配合八路军抗日锄奸中，两次受伤。在战斗中不怕困难挫折，机智灵活，英勇善战。他还善于团结群众，帮助他人解决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困难，争取伪军反正，使自己的队伍由小到大，并开辟了何家寨子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被任命为八路军某支队的司令员。在杏花山一带，他大摆地雷阵，杀敌肃奸，解放了沁源县四周大片乡村，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组织了敌后武工队，使日寇占领的沁源县城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在斗争中，民兵队伍越战越强，"洋铁桶"的威名远扬。作品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书采用章回体形式，故事生动，语言简练明快，但人物性格不够丰满。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采用章回体描写英雄传奇的作品。

小说《一个人的烦恼》

作者严文井，主要内容：

以抗日战争初期为背景，着力塑造一个软弱、虚浮而还未定向的知识青年的形象。主人公刘明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家道中落，从此生活无着。寄食使他感到耻辱，无聊的生活使他感到厌烦，就到前线部队去搞宣传。然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又使他不满意。他看不惯浑浑噩噩的生活，更恨那些蝇营狗苟的把戏。结果又从前线退下来。刘明热情而富于幻想，然而缺少坚毅和勇气，更缺乏执着的信念和追求，因而难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小说通过刘明的经历和命运的描写，表现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中多余人的形象。作品情节单纯，线索清晰，故事跌宕有致，结构灵活多变。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朴素委婉。

诗《无题》

不要踏着露水——
因为有过人夜哭。……
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

歌曲《心头恨》

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人心也生根；
不把敌人赶出境，海水洗不清这心头恨，
海水洗不清这心头恨。
十冬腊月喝凉水，
一点一滴记在心；
官不抵抗民抵抗，
受辱的百姓是火炼的心。
打死一个算一个，
打死两个不亏本；
一个当十十当百，
要活命的一起向前进，
要活命的一起向前进！

历史档案

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
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
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
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
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的19个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在敌人后方建立了许多战略基地，即抗日根据地，全国共有19个。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共拥有土地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

陕甘宁边区　原为1931年以后在陕北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原陕甘宁苏维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辖23个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相接的各一部分地区，面积约1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同时成立八路军留守处，年底改为陕甘宁留守兵团，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领导全国抗战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我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的总后方。

晋绥根据地　位于山西西部和绥远东南部。全区分晋西北和大青山两部分。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O师主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进入晋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晋西北根据地。1938年8月，由一二O师派出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眛率领下，进入绥远省，逐步建立绥南、绥中和绥西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合称晋绥抗日根据地，又称晋绥边区。1941年2月，晋绥行政公署成立，续范亭任主任，武新宇任副主任。1942年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根据地包括山西省、绥远省各一部，东起同蒲路、平绥路，西至黄河，南迄汾离公路，北达包头、百灵庙、陶林一线，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下辖46个县，人口320余万。是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党中央联系的唯一通道。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相接的各一部分。1937年10月，一一五师一部在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向察南、冀西挺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1938年1月10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1月10日，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选举聂荣臻、宋劭文等为负责人。边区西起同蒲路，南达正太、德石路，北至张家口、多伦、绵州，东临渤海，辖有北岳、冀中、冀热辽三个战略区，108个县。面积3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千5百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同时，冀东人民于7月间举行了规模浩大的起义。10月，主力退回平西，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李运昌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1940年6月，在平西整训的部队重返冀东，成立冀东军分区和专员公署。1942年后，冀东我军又开辟了察北、热南、辽西的大片地区，将冀察热根据地改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辽边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边行政公署主任，朱其文任副主任。1944年9月，成立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同时成立冀热辽行政公署，张明远任主任，李耕涛任副主任。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包括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相接的各一部分。全区分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进入晋东南敌后，开辟以太行山和太岳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进入晋冀豫区，参加根据地的创建。1938年4月下旬，成立晋冀豫军区。1940年春，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同时成立三个军区。太行军区由一二九师师部兼；太岳军区由三八六旅兼，陈赓任司令员，王新亭任政委；冀南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形成了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南达黄河，北接晋察冀边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则住在太行区。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包括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相接的各一部分。1939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率主力一部进入鲁西南、冀南和豫北，将地方各抗日武装统一组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进入冀鲁豫边区，统一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第二纵队政委，崔田民任军区政委，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辖三个军分区。根据地东接山东抗日根据地。南至陇海路，西面和北面与晋冀豫根据地相接。1944年5月与冀南军区合并，仍称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宠坤、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辖11个军分区和一个水东区形成一个独立的战略区。

山东抗日根据地　包括山东大部，河北、江苏两省各一部分。1938年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发动

徂徕山、冀鲁边、鲁西北、黑铁山、天福山等一系列人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十几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底，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起义部队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罗荣桓率领下，于 1939 年进入山东，与山东纵队一起，巩固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2 月，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朱瑞任书记（后罗荣桓、黎玉任副书记）1940 年 8 月，选举产生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黎玉任主任。1945 年 8 月改称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郭于任副主席。根据地东临黄海，西至津浦路，北达天津南部，南迄陇海路，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辖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渤海五个区，96 个县，人口 1350 万。

苏北抗日根据地　位于江苏北部。1940 年 5 月，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八月，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分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黄克诚率领下从皖东北地区东进苏北的淮海、盐阜地区。10 月，在白驹镇与新四军会师，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1941 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1942 年底，盐阜、淮海两区合并，成立中共苏北区党委和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金明任区党委副书记。下辖两个行政公署和 18 个县，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南迄盐城、宝应一线，北达陇海路。面积 6 千平方公里，人口 500 多万。

苏南抗日根据地　包括江苏南部及安徽东部一小部分。1938 年夏，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陈鼎丞等率领下挺进江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于 1939 年 11 月成立江南指挥部，成立苏皖区党委，领导苏皖、苏南、苏北工作。1941 年“皖南事变”后，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改编为新国军第六师。以后又成立苏南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邓仲铭任副书记。1943 年 3 月，成立苏南行政公署，江渭清任主任，邓仲铭任副主任。1945 年初，成立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栗裕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金明任区党委副书记，朱克靖任行政公署主任。下辖 4 个专员公署、15 个县。

淮北抗日根据地　位于安徽东北部及江苏西北部。1938 年 10 月，新四军游击队在彭雪枫率领下挺进豫东，会同当地抗日武装开辟豫皖苏根据地，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1939 年 5 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南进支队南下苏皖边区，与东进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一起开辟东北根据地。1940 年 6 月，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与第六支队会师，由两军一部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斗争。1941 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8 月成立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及行政公署。刘子久任边区党委书记，刘瑞龙任行政公署主任，刘玉柱任副主任。11 月，成立淮北军区，彭雪枫兼司令员。根据地位于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铁路两侧的豫皖苏三省交界地区，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苏中抗日根据地　位于江苏中部。1939 年春，新四军挺进纵队渡江北上。1940 年 6 月下旬，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后，组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0 月 10 日，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11 月召开苏北临时参议会，选举韩国钧任名誉议长，黄逸峰任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任副议长。“皖南事变”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同时成立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刘炎任中共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全区约 5 千平方公里，人口 510 万。

淮南抗日根据地　包括安徽东部及江苏西部。1938 年秋，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1939 年 5 月，成立江北指挥部。7 月，组成第五支队，在江北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于津浦线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皖东根据地。1940 年 4 月分别成立津浦路东、路西两个省发和联防办事处。1941 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同时成立淮南区党委，谭震林任党委书记。1943 年 2 月成立淮南军区，罗炳辉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委。并成立抗日民主政权——淮南行政公署，方毅任主任。根据地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运河以西、淮南铁路以东苏皖两省边界，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 200 万。1942 年后，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这里，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皖中抗日根据地　位于安徽中部。1938 年 11 月，新四军一部从皖南抵达江北无为地区，与当地抗日武装一起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开辟皖中根据地。1940 年春，新四军第三支队一部进入皖中，编为第三支队挺进团。1941 年“皖南事变”后，陆续收容皖南突围部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委。1942 年 4 月，成立中共皖鄂赣区党委，何伟任书记，李奇新任副主记。同年 7 月成立皖中行政公署，吕惠生任主任。1943 年 2 月，成立中共皖中区党委，曾希至兼任书记。下辖皖江、沿江、和含三个专署、16 个县。包括安徽滁河以南、大别山以东，江苏省的江浦、溧水以西、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

浙东抗日根据地　位于浙江东部。1942 年夏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兼政委。接着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连柏生任主任，下辖 4 个专员公署，14 个县。根据地位于浙江东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濒东海，南迄车阳、宁波公路一线，西跨浙赣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东岸，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00 万。

东江抗日根据地　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特委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

义，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惠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940年9月，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年秋，建立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两个抗日根据地，合称东江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游击总队改编为东江纵队，下辖7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广东东部的淡水河、澳淡公路以西，西江下游以东，珠江以北，东江下游两岸的广大地区，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以上。

琼崖抗日根据地　位于海南省的东北部。1939年2月日寇入侵海南岛后，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和海南岛人民组织了抗日武装，后改称琼崖纵队，开辟了琼崖根据地。1941年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琼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为主席。1944年春，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在8个县中建立了民主政权，并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改为抗日民主公署。

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1944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组成南下支队，开辟敌后根据地。1945年5月进至湖南平江后，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湘鄂赣军区，并成立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军区副政委，聂洪钧任行政公署主任。根据地南北130多公里，东西180多公里，辖14个县。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　位于湖北东部和中部、河南南部及安徽西部。1938年10月日冠占领武汉后，鄂豫边区各地党组织纷纷领导群众起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1月，新四军一部挺进豫鄂边，会同当地抗日武装，开辟豫鄂边根据地。同年6月，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939年11月，组成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东、鄂中的工作，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1940年9月，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根据地建设逐渐展开。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许子威任主任。边区扩大到17个县的范围，建立了12个县级政权。以后根据地又逐渐向鄂豫皖边区扩展。1944年10月，鄂豫皖边区改称鄂豫皖湘赣边区，同时成立鄂豫皖湘赣军区，由第五师兼。

河南抗日根据地　1944年7月，党中央决定从晋冀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区抽调精干部队挺进豫西，开辟河南根据地。从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先后由皮定钧、徐子荣率领的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和王树声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进入豫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1945年2月成立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建立了三个专区、20个县、300万人口的河南抗日根据地。

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

（此案事于1944年6月5日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

原文如下：

1943年6月5日，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

（甲）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该按中央核定之限额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问题，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致给与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济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之内的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之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可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内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暨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均不得发行钞票。现已发行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协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

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选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于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1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行改组，原治安总督兼绥靖司令齐燮元下台，由杜锡钧代理，增加徐良为常务委员。

1月15日　日共野坂参三领导的"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通过《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的提案，决定建立"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1月23日　太行八路军攻入中和煤矿。

1月31日　日军在华中抢掠豆麦。

2月2日　日军在绥西抢粮，归绥一县被抢三十余万石。

同日　伪满粮荒严重，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2月3日　中共西北局党校等秧歌队赴柳林区农村表演。

2月4日　《解放日报》载福建大旱。

2月7日　冀鲁豫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在山东莘县病逝。

2月8日　《解放日报》载，广东饥荒严重，数十万人民即将饿死。

同日　淮南路东各地成立拥军委员会。

2月9日　山东日照进行减租减息。

2月10日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总支部成立，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出席会议。

2月12日　淮北解放区《拂晓报》召开第一次工农兵通讯员座谈会。

2月13日　孔祥熙就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

2月18日　苏中东台各区民众组织伴工队开荒。

2月23日　祝绍周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主席。

2月25日　山东政委会机关生产，开荒六十亩，运盐两万斤。

3月1日　山东渤海军民粉碎两万余敌"扫荡"。

同日　重庆《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昆明囤积货物，足供全省军民五年之用。

同日　陈立夫颁布对出国教授思想行动统治条例。

同日　《国民党政府委员会规程》公布。

3月3日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六大"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研究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探讨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六大"规定的策略方针和一些政策作了分析。

3月10日　新疆库车、新源一带发生七点三级地震。

3月11日　蒋介石在渝发表演说，重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的滥调，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反动方针。

3月12日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的讲演，指出实行宪政三个先决条件（一）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开放党禁，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三）实行地方自治，承认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3月14日　于学忠被国民党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3月15日　八路军罗荣桓部，开始在鲁中讨伐伪军吴化文部。

3月18日　皖中无为等县进行各种换工，改造荒滩变成水田。

3月27日　晋察冀三个月反"扫荡"中，八路军主力与民兵共同作战达四千余次。

3月31日　晋西北八路军破袭岚离公路。

同日　鲁西南粉碎日军四次"扫荡"。

4月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今年征粮十六万石，比去年减少两万石。

4月8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惩治盗匪条例》，规定"聚众出没山泽，抗拒官兵者为盗匪"。

4月11日　湖南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他》一文揭露湘政黑暗，被国民党下令停刊。

4月12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会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人民力量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解答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过程中提

出的重要问题。

4月14日　延安市蒙胞及各界代表纪念成吉思汗。

4月28日　延安市卫生委员会决定在各区建立卫生合作制度，并提倡中西结合。

同日　《解放日报》载，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迅速，目前有大工厂七十七家，工业品已能半自给。

同日　《新华日报》载，广西临桂、宜北、恭城、融县等上月中旬遭受雹灾，其中临桂灾情尤为严重，冰雹最大的重二十八斤。

4月30日　苏中四分区军民粉碎敌伪"清乡"计划。

同日　日军设来粮统制会，抢夺华中粮食。

下旬　中共中央派林伯渠赴渝同国民党谈判。

5月1日　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开幕，二十五日闭幕，出席代表二百零三人。会议确定边区工业建设的任务和方向；规定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原则以及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针。

同日　日军占领许昌。

5月2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会谈实施民主政治及整军等问题。

5月13日　日本在上海设"经济保安处"，直接掠夺沪上物资。

5月17日　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由西安飞抵重庆，继续谈判。

5月20日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工业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及未来的发展前途，鼓励职工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

同日　晋察冀边区政府宋劭文报告称，拨工互助遍及游击区。

5月22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努力学习工业化的技术和知识。

5月26日　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结束，组织部长朱家骅辞职，陈立夫继任。

6月4日　中共中央决定宋任穷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6月5日　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沦陷城市的党组织，争取千百万群众，准备配合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

同日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交王世杰、张治中。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保障人民自由，实行地方自治等。王世杰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问题解决之提示案》交林伯渠，内容为八路军改编为十个师，集中使用，其余限期取消。

6月7日　上海工人从今日起至13日连续举行六次罢工。

6月10日　晋西北沂县、静宁军民粉碎敌千余人的"扫荡"。

同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二十一人抵达延安，翌日，朱德总司令接见参观团，11日参观《解放日报》、《新华社》及中央印刷厂。

6月12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

6月13日　桂林市六十多家盐号联名请求国民党政府改善盐运，取消限制。

6月14日　延安四万军民举行大会，宣布保卫大西北，并通电蒋介石，要求撤退包围边区部队，取消反共内战政策，给人民民主自由，发动人民抵抗日寇进攻。

6月15日　李济深、柳亚子等组织长老团，向桂林的富商大贾募捐劳军。

6月16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联合发布《保卫西北训令》。

同日　李济深在桂林发表广播演说，呼吁铲除失败主义，加强民主，组织民众，实行抗战。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令孔祥熙为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特命全权代表。

6月18日　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正式成立，李济深任会长，李宗仁、欧阳予倩、陈劭先等二十七人为工作委员会。

同日　长沙沦陷。

6月20日　张澜等在成都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的十项主张，要求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目前征兵、征实、征税中的各种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关于民主改革的主张。

6月21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书刊审查规则》。

6月22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及中共七年战绩。指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四点五，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敌后创建了包括一亿人口的十五个根据地，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南、淮北、皖中、鄂豫皖、浙东、广东、琼崖。

同日　上海爆发数千名电车司机的罢工，罢工坚持一周之久。

同日　鄂豫皖解放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开幕，29日闭幕。会议选举郑位三、陈少敏、涂云府为临参会正副议长。

6月26日　缅北中、英军攻占孟拱。

6月28日　林伯渠在重庆发表谈话称：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无不可以商讨。

6月30日　盐阜边缘区群众反伪化斗争胜利，至今半年内解放居民五十万。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同日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晋西北支部成立。

同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修正公布《中国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

7月3日　冀东古北口与丰滦迁山区八路军痛击"扫荡"之敌。

同日　英国援华基金已达一百余万镑。

同日　日机轰炸衡阳市。

7月7日　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决议》。

同日　昆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三千名师生联合集会，一致要求改革政治。著名教授闻一多号召青年为反对国民党的腐朽黑暗统治"再来闹一次"。

7月8日　重庆文化界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二十人联名致电广西各界，响应"保卫东南"，力主采用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抗战到底。

7月12日　雁北应县八路军粉碎日军六路"扫荡"。

同日　盐池靳体元创办元华工厂。

7月13日　南京学生捣毁汪伪烟馆。

7月中旬　华中战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连续出击，攻克了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石庄、新生港、张横港及长江中的永安洲。

7月17日　新华社报导，湖北黄安等九县农救筹委会均办有油印报。

同日　日本陆军部宣布：梅津美治郎为陆军参谋总长，上田乙三为关东军司令。

7月18日　美国援助中国租借物资已有二亿一千万元。

同日　日本东条英机辞首相，20日小矶、米内联合组阁。

7月21日　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之随县、应山等县农民数万举行起义，组成农民救国军，在"反对不抗日的军队"，"反对军队派勒壮丁"等口号下，向国民党二十八师发动攻击并将其歼灭。

7月22日　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派遣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抵达延安。

7月24日　邹韬奋病逝于上海。

7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进军河南。并令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建立豫东根据地。

同日　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第四师向津浦路西挺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彭雪枫率该师主力于8月15日誓师出发。

7月25日　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资助民间改良纺车。

8月10日　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就国共谈判问题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

8月11日　阎锡山部六十一军，勾结日寇，进攻八路军。

8月21日　国民党财政部专卖事业管理局川康区专卖局正式成立。

同日　美、英、苏三国代表为组织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在华盛顿之顿巴敦橡树园开始会谈。

8月27日　延安市北区成立中西医研究会。

8月29日　国民党政府令，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督办公署撤销。任命吴忠信任新疆政府主席，未到任前由朱绍良暂代。

同日　广东国民党军队进攻东江游击队。

8月3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关于在陕甘宁边区加紧经济建设，争取工业品完全自给》的指示。

9月1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率部挺进华南建立根据地。

同日　《新华日报》载，山西汾城、临汾等十七县蝗灾严重，田陇积蝗四、五寸，秋禾食尽。

同日　日陆军省任命冈部直三郎继冈村宁次为华北日军司令官。

9月2日　新疆尼勒克境内的哈、维等族人民发动反献马的武装起义。10月8日占领尼勒克县城，全歼当地反动军警并向喀什河以南进攻。

9月3日　滨南军民一万五千，破袭临郯公路。

9月　5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参政员164人，中心议题是促进宪政与经济建设。

同日　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石峡峪烧炭遇险牺牲，8日中央警卫团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同日　日本最高战争会议决定对重庆政治工作的重点是制造和谈机会，迫使重庆停止作战。

9月8日　沪电车公司全体职工罢工。

9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并正式提出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及联合统帅部。

9月16日　冀中发生水灾。

9月19日　太行各分区展开反"扫荡"战。

同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决议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除原有成份外还吸收了个别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

10月20日　日伪军警在齐齐哈尔铁路局逮捕中共地下抗日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

10月23日　日军侵陷梧州。

10月24日　八路军袭入汾阳，焚毁敌机场车站及电灯公司。

同日　重庆各界各民主党派代表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胡子婴等五百人集会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日　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

同日　四川云阳、巴县等地摊派杂捐达六百余种。

10月28日　从雷州半岛北犯之敌渡浔江占领平南。

同日　新疆喀什南发生七级地震。

同日　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家属，追认邹韬奋为中共党员，骨灰安放延安。

10月30日　鄂中洪湖新四军截获日本军火船。

10月1日　由宋庆龄等人发起的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在重庆举行。

同日　三边深入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定边梁圈等村群众纷纷烧毁神像。

同日　东江纵队配合民兵，连续出击广州市郊。

10月2日　阜宁以东沿海地区，收复通洋港等地。

同日　晋西北六分区展开地雷战，打退日军"扫荡"。

同日　中外记者团外籍记者离晋西北返回延安。

10月4日　皖南铜陵地区，新四军击溃二千日伪"扫荡"

10月5日　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决定增设分支机构深入农村。

10月6日　胶东八路军迄今解放国土两万方里，进逼威海卫、烟台。

10月7日　成都学生二千人集会，响应中共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和统帅部。

同日　成都各界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10月10日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大会上作了"如何解决"的讲演，指出挽救目前时局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召开国民会议，改组国民党政府及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中共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同日　昆明各界发表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10月13日　晋东北八路军毁敌第一线据点，晋东北与冀西已连成一片。

同日　刘茂恩被国民党任命为河南省府主席。

10月14日　太行区磁县、武安等县飞蝗已全部或大部肃清，各县灭蝗约计五百三十万斤。

同日　蒋介石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同日　蒋介石建议帕资、魏德迈、顾律三名美籍将领中选一人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10月15日　延安《边区群众报》出版《农村通讯》。

10月18日　驻重庆外国记者致电蒋介石，反对扣压新闻电讯。

10月23日　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0月24日　《解放日报》载，国统区田赋征实较1943年增加半倍。

同日　衡阳日军主力南下，与钦州湾北进日军夹击南宁。

10月28日　《解放日报》载，河南旱、蝗灾严重，灾区蔓延42县。

11月1日　八路军南下支队召开出征誓师大会，10日从延安正式出发。

11月5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省参议员选举条例》。

11月7日　伊宁市爆发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包围和占领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和警察局、控制了伊宁市区。

同日　宁夏人口复查完竣、计全省七十二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其中男三十九万四千五百四十九人，女三十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五人。

11月8日　苏浙国民党军六个团进犯新四军苏南解放区，遭到反击，败退。

11月10日　汉奸汪精卫病死于名古屋。陈公博代理南京伪政府主席。

11月11日　成都万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中共号召，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高呼"反对特务统治"、"取消一党专政"，抗议特务暴行。

同日　周恩来与赫尔利由延安飞重庆，与国民党商谈联合政府问题。

11月12日　新疆三区(临时)革命政府在伊宁成立。

11月16日　晋察冀机关部队种地六万亩，收获粮食一万五千石、副业七个月收入一千八百余万。

同日　国民党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局，翁文灏兼任局长，美国纳尔逊为副局长。

1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一)宋子文、周钟岳为国民政府委员。(二)周钟岳为考试院副院长。(三)陈立夫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王世杰为宣传部长，梁寒操为海外部长。(四)张历生为内政部长。(五)陈诚为军政部长。(六)俞鸿钧为财政部长。(七)朱家骅为教育部长。

11月22日　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与美国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武装，并由蒋介石委派一名美国人指挥，然后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党行政院政务会议。

同日　定边盐业区回民清真寺落成。

11月23日　朱家骅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

11月2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各区公平合理征收公粮，移难民植棉、运盐、纺织等收入免征。

12月2日　日军进攻贵州，占领独山。

12月3日　曲子成立伊斯兰小学。

12月4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延安召开。

同日　宋子文代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同日　皖北水灾，百万饥民流离失所。

12月6日　冀东八路军两次袭进唐山，炸中日本领事馆。

12月9日　陈诚宣布，准备在美国援助下，训练三十个师。

12月11日　日方派投降之国民党将领方先觉到重庆，进行诱降活动。

12月16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生产局组织法"。

12月22日　苏北军民奋战一周，粉碎两万敌伪的"扫荡"。

12月26日　重庆六工业团体发表对时局主张，期望政府实施宪政、厉行民治，呼吁全国团结一致，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同日　延安市民欢渡圣诞节。

12月27日　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12月28日　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四点意见：(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三)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军　事

1月2日　冀东八路军攻入卢龙城。

1月8日　缅北国民党军渡大龙河，22日渡布河，30日克服泰大洛。

2月10日　晋冀鲁豫八路军刘伯承部解放朝城，继克沙河、武乡、太各等。

2月15日　冀南粉碎敌寇"扫荡"，击溃敌伪一万五千人。

2月17日　冀中白洋淀地区，八路军抗击敌"扫荡"。

2月23日　冀东丰润地区八路军击退二千日军"扫荡"。

3月5日　新四军主力在车桥镇西周庄、受河、芦家滩一线与日伪军激战，至6日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百余里一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3月8日　缅北中美军会师瓦拉本。

3月9日　淮南新四军袭击南京近郊。

同日　易县八路军毁敌电灯厂。

3月13日　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进入涟水。

3月15日　八路军攻入昌黎。

4月17日　日军调集五、六万兵力，对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发动进攻。

4月20日　江苏沭北民众不堪敌伪压迫，爆发武装抗日起义。

4月22日　郑州失陷。

4月23日　新四军彭雪枫师在运河至津浦路三百里外线出击，解放十余万同胞，攻克敌据点十六处。

5月5日　鲁中讨伐吴化文战役胜利结束，收复沂鲁山区。

5月8日　八路军总部命令太行、太岳军区开展豫北游击战争。

5月9日　史迪威指挥缅甸美军占领密支那飞机场。

同日　日军侵占驻马店。

5月12日　新四军黄克诚师攻克扬口等重镇。

5月23日　冀东八路军挺进辽宁，在绥中击溃伪满军。

5月25日　日军攻占洛阳。

5月27日　日军进攻湘北，主力由岳阳南犯。

5月30日　日军渡过汨罗江南侵，粤汉路两侧湘阴、平江、沅江、浏阳、益阳、宁乡等县先后失陷。

8月7日　美军观察组第二批到达延安。

8月8日　衡阳陷落。国民党守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投敌。

8月15日　日伪军万余人"扫荡"鲁中，八路军在沂水进行反击。

8月17日　东江纵队出击广九路，攻入平湖等车站。

同日　陈诚奉命继任第一战区司令官。

10月10日　日军陷衡阳。

10月12日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英勇牺牲。

10月8日　福州沦陷。

10月11日　柳州失陷。

10月20日　豫北八路军解放国土九千方里，完全控制济垣公路两侧。

同日　太岳军民奋战10日，击退六千敌人的"扫荡"。

10月20日　日伪军六万人，分路进犯冀中解放区。

10月　29日　苏南新四军迫近南京城。

同日　中印缅战区统帅史迪威奉召返美，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索尔登继任驻印华军总指挥。

10月30日　冀热辽军民迎击两万日伪军"扫荡"。

10月31日　八路军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组成，以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八人为委员、王首道为书记，同时中央正式授名为八路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王震，副司令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副参谋长苏鳌、邹华兆，政治部主任刘型、副主任李立，辖六个大队，全军五千人。

11月10日　桂林失陷。

11月11日　柳河失陷。

11月17日　胶东八路军攻抵威海卫城。

11月18日　冀鲁豫八路军克复濮阳县城，收复国土一万平方华里。

11月19日　滨海八路军光复莒县、城内伪军反正。

11月20日　日调冈村宁次继畑俊六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11月21日　胶东八路军迎击四千敌寇"扫荡"。

11月22日　太行八路军围攻窜犯根据地腹地之敌，外线部队袭击正太、白晋、同蒲各车站。八路军一部攻入井陉煤矿。

11月22日　南宁、武鸣沦陷

外　交

3月14日　中、加在渥太华签订平等条约。

5月2日　中英贷款协定和供应协定签订。

5月31日　中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一)加强美十四航空队，使输送补给的总吨位增到每月一亿吨；(二)为B29飞机储存在成都的汽油、零件和飞机都交十四航空队，用于平汉线；(三)加强中国空军；(四)拨交国民党军八千发火箭发射筒。

6月20日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渝，翌日至24日与蒋介石会谈。

7月7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帅中国国共军队之权。

8月1日　中墨友好条约签订。

8月10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通知国民党政府派赫尔利为其私人代表来华。

8月12日　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魏道明、商震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出席代表，毛邦初、刘田甫为专门委员。

8月19日　美总统罗斯福宣布：派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及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来华，协商军事、经济等问题。他们于9月6日抵达重庆。

10月10日　赫尔利、史迪威与宋子文、何应钦会晤。

10月19日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增加萨尔温江中国的兵力，加强攻势，否则蒋要承担责任。同时要求授于史迪威不受限制的指挥中国所有军队之权力。

10月7日　中、英、美三国橡树园会议结束，9日发表联合声明，决定组织新国联。

10月31日　美驻华大使高思辞职。

同日　魏德迈抵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统率部参谋长。

11月7日　赫尔利飞抵延安。翌日，同毛泽东举行会谈，达成五点协议。(一)中国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中国所有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宣布新三民主义政策；(三)联合政府拥护孙中山主义，建立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行各项改革；(四)联合政府及联合军委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军队应遵守执行其命令；(五)承认各党派团体合法地位。

11月30日　赫尔利代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

文　教

1月3日　昆明《朝报晚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1月13日　《解放日报》载，桂林《野草》《戏剧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3月19日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分期发表。

3月23日　据《新华日报》报导，应爱因斯坦邀请，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去美国讲学。

4月1日　《新华日报》太岳版在山西沁源创刊。

同日　《青年文艺》在重庆创刊。

5月3日　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张申府、曹禺、张静庐等五十多人出席，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

5月4日　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

5月24日　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指示延大应为抗战及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校长周扬报告延大开学意义和今后方针。

5月28日　陕甘宁边区《延川报》创刊。

5月30日　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发表《我们在实施宪政前的要求》一文，主张立即实行民主。

5月30日　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共有五个分册。

6月3日　《新华日报》指导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概况。小学数量由一九三七年的三百二十所发展到一九四一年即为一千一百九十八所，学生由五千六百人发展为四万零三百六十六人。

6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发展情况，基本上是从无到有，办起了识字组一千九百七十三个；夜校五百四十五所；半日校三百九十三所；冬校六百五十九所；民教馆二十五处；阅览室四处；图书馆五处；剧团十个。受教育人数四万多人，使边区减少文盲百分之五，提高了人民对抗战的认识。

6月9日　苏北解放区新闻界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出版《苏北通讯》

6月12日　《新华日报》公布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概况。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一年间，建立了中等学校七所，有教职员一百零九人，学生一千三百七十四人。学校性质有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两类。

12月3日　曲子成立伊斯兰小学。

经　济

2月15日　国民党立法院决定邮电加价。23日正式发布命令，3月1日开始实行。

3月6日　《新华日报》社论：《稳定粮价》一文，揭露四川自本年1月至3月初两个月粮价上涨百分之一百三十，随着粮价上涨，其他物价也飞涨。

3月17日　《新华日报》指出从3月6日至15日不到十天每一石米涨价一千元以上。

5月24日　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业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五团体举行集会，八十多位工商界代表出席会议，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保障人权。

8月3日　华安、天府、宝源、全济、东林、建川、江合、三才生、燧川、兴国等煤矿联合声明，自国民党政府煤焦限价公布实施后，各矿支出巨增，入不敷出，相继停工减产，呼吁救济，请求调整限价。

8月7日　陕甘宁边区发布命令：机关部队广种苜蓿。

同日　晋绥行署决定减征公粮万四千石。

10月11日　国民党经济部统计：截至本年6月底止，已登记之公、民营工厂共四千三百四十六家。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5年

导　言

一九四五年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一直战败的历史终于在本年打上了休止符。

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党的“七大”在全党范围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以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等1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四月二十五日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中国与美英苏法为发起邀请国，5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六月二十五日，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大会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实施宪政，扩充军队，履行国际宣言，实行三民主义。大会通过《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与《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强调与“中共斗争，无法妥协；大会还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作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全会动员国民党全党力量，抢夺胜利果实。

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伪军实施广泛进攻。八路军立即实行全面大反攻，解放大片沦陷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国5月战败后，日本败局已定，仍负隅顽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美国在八月六日和九日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死伤惨重。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七十万关东军很快战败。日本军事力量土崩瓦解，已无法挽回败局。遂于十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十五日，天皇裕仁以“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九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被日军占踞五十年之久的台湾也终于回归祖国版图。

八月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举行谈判。为尽量争取和平，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商讨战后两党关系问题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蒋介石为拖延时间部署内战，不得已玩弄“和平”阴谋，根本没有解决问题诚意，但为了保住和平面孔，在中共作出重大让步情况下，双方于十月十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在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集结重兵向上党和邯郸两地向晋冀鲁豫解放军发动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这两次进攻，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在解放区击退敌人进攻同时，国统区民主运动也高涨起来。十二月一日，昆明学生罢课并上街游行，国民党特务投掷手榴弹，炸死师生四人。在各界人民压力下，蒋介石让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自请处分”了事。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国共产党七大
- ●爷台山反击战
- ●战略大反攻
- ●重庆谈判
- ●上党战役
- ●邯郸战役
- ●“一二·一”运动
- ●中国加入联合国
- ●中国国民党六大
-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共产党“七大”

背景介绍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两个中国之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日趋尖锐。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盛况空前的代表大会。

“七大”的议事日程有四项：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共举行了22次全体会议，还有代表团及各代表小组会议。

4月24日，大会印发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并就这一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八年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斗争的经验，科学地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指出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而斗争。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提出了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十项具体政策。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4月25日，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首先，报告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和发展过程，指出了敌后解放区战场的伟大作用和战绩。其次，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我党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的原则区别，指出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路线，解放区战场是中国抗战的重心。最后，报告根据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任务，提出了今后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特别提出了逐步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略任务。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要修改党章，接着就党章的总纲、党员的义务与权利、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党的基础知识、奖励与处分、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诸问题作了说明。在关于党章的总纲的说明中，刘少奇解释了以下四个问题：一、关于党的性质问题。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他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关于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集团的两面性，指出无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必须分清敌我，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率领同盟者为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我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

此外，陈云、叶剑英、陈毅等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其他的代表也都在不同的会上发表了意见。

大会代表认真地讨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所作的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分别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新党章，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

大会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44名中央委员和廖承志、王稼祥、黄克诚等33名候补中央委员，

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发表了演说，称赞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成功。

“七大”闭幕后，6月19日召开了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选举下列人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甫、彭德怀。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来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在历史转变的关头，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材料：

- 七大的光芒
- 七大开幕（诗歌）

材料一　七大的光芒

1945年4月23日下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

走进杨家岭中央礼堂，首先看到两面红艳艳的党旗，高悬在主席台上，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大幅像挂在红旗的正中间。主席台的陈设，朴素庄严，只有几张条桌和十来把木椅。台下横列着几十排长长的木制条椅，那便是代表的席位了。后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惹人注意的是主席台顶端的横联，红底镶着黄字：“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

看了这条横联真叫人百感交集。走了不少曲折的道路，终于使我们懂得：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地向前发展；而党的正确的路线又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探索出来的结论，是党与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揭幕。会上，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开幕式举行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接着，大会听取了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经过小组和大会讨论，最后大会批准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批准了新的党章，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始终洋溢着非常民主、非常团结、非常融洽的气氛。大会的每个报告、决议文件，不仅事前均经中央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经过全体代表，各代表团小组、代表团会议详尽地讨论，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大会主席团尽一切可能让每个代表均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那些因故不能到会的同志，也要请他们用书面发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记得关向应同志当时在中央医院养病，不能参加会议，毛泽东同志就要贺龙同志常常去看他，将会议进行的情况不断告诉向应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样，就使大会的每个决议和报告更臻于完善、丰富、生动、正确。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也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才进行正式选举。经过这样严肃、慎重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是完全能够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而为全党所一致拥戴的最坚强、最有力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由于大会高度地发扬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在小组讨论中，人人各抒己见，个个畅所欲言，有坦率诚恳的建议与批评，也有发自由衷的自我批评，更多的是以亲身的经历生动地证实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各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也有争论，但是一旦是非辨明之后，又能很快地统一了认识。对待问题是一切从全党出发，从全局出发，坚持原则，修正错误，充满了对党负责的精神。

为了指导会议的进行，在小组讨论期间，毛泽东同志经常参加各小组的会议。他到小组，非常注意听取同志们的发言，从中吸取经验，发现问题，有时也作一些启发诱导，让大家更深一步地去思考。他讲问题时总是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夹着一些具有风趣的比喻。所以，每当毛泽东同志去哪里参加会议，哪里的会场上总是非常活跃。记得在小组酝酿提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有个小组对于要不要考虑“山头”的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应该取消“山头”，有的同志主张还需要照顾“山头”。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在场，他听完两方面的意见以后，讲了一下他的看法。大意是：我们要反对、要消灭的只是“山头主义”的错误倾向；我们之所以要反对它、消灭它，是因为它是妨害我们党的团结与统一；至于“山头”，它是中国革命具体历史条件形成的，在革命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他还表示；这仅仅是他自己的一点意见，至于这样做好不好？请大家再考虑一下。后来别的小组内也

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在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为这件事专门讲了一次话：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现出的这种非常团结的气氛，来源于伟大的整风运动，我们当时把它叫做整风精神。在整风精神的感召下，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党的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有的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参加七大了，还有的人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团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表现出的，正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开出整风运动之花，结成"七大"之果。

（摘自杨秀山：《七大的光芒》）

材料二 七大开幕

陈 毅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一九四五年四月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陈毅）

爷台山反击战

背景介绍

1945年7月21日至8月9日，国民党军队趁抗战即将胜利之机，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爷台山发动大举进攻。我爷台山守军给予敌人重大杀伤后撤离。增援部队赶到后与敌人展开反击战，8月9日收复爷台山。敌人偷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失败了。

材料：

- 爷台山反击战
- 我军固守爷台山阵地
- 爷台山战事扩大

材料一 爷台山反击战

一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们新四旅十六团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分区的甘泉、富县一带。我当时是这个团的团长。这时正值糜谷扬花的季节，漫山遍野，碧波千顷。指战员们望着亲手栽种的即将丰收的庄稼，心中好不喜悦。

一天中午，在地里锄草的战士们吃罢午饭，各人拣个荫凉地方休息去了。营、团干部们趁午休时间从地里回到团部研究秋收问题。大家正谈得起劲，机要员突然走进窑沿，把一份电报递到我的手中。这是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转发军委的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我望着电文，只觉得浑身血管在急剧地膨胀。原来七月二十一日拂晓，国民党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我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阵地袭击，我驻关中七七一团六个连进行了英勇自卫，战斗至二十三日，阵地屹立未动，敌即以预备第三师投入战斗，至二十七日晚，我因予敌以重大杀伤，且众寡悬殊，即主动撤出爷台山。军委命令我们即刻增援关中，具体任务到马栏受领……。我尽量压抑着心头的怒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志们，同志们义愤激昂，大骂蒋介石：

"真卑鄙！抗战八年来，他搞磨擦，闹反共，一直没有断过；现在眼看抗战胜利已成定局，他又乘机向边区动起武来。真是岂有此理！"

全团迅速地集结起来。军号声、哨子声响不绝耳。战马重新备上了鞍辔，抖动着鬃毛，仰头嘶叫……战士们有的还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显然他们是刚刚丢下锄头便拿起武器跑来的。他们一个个神情严峻，怒气冲冲。

快到九点了，应该出发了。我只对战士们简单讲了几句话："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打日本侵略军，又不让我们进行和平生产，现在他们已经把血手伸进了边区的大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是我们最光荣的任务。从这里到马栏是三天的路程，我们一定要两天赶到，任务紧急，我不多讲了。出发！"

黑夜吞没了村庄、田野，天空繁星点点，长长的行军行列，向关中分区的马栏疾进……

二

部队昼夜兼程，只一天半的时间就赶到了马栏。

到马栏的第二天，前线指挥部的司令员和政委，亲自来到旅部，和我们的旅首长，召集了干部会议，向我们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边区周围，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等为借口，肆意制造磨擦，并且经常在我关中分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对于这些事件，我们为了团结抗日，一忍再忍。可是反动派狼子野心，这次又调集大军，侵占我爷台山阵地和周围的四十一个村庄。他们的目的是：夺取我关中分区，箝制陕甘宁，以挑起罪恶的内战。

首长们分析了敌我形势后，特别强调地指出：为了在这次反顽斗争中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必须继续严格地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反

击开始后，要求在我们的境内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但我们也绝不越过边界一步。

我军决定选择爷台山为战斗的主要突击方向，兵力部署是：新四旅五个营配属警一旅三团为主攻部队。三五八旅为助攻部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一带的机动位置，准备打击反攻的敌人。教导一、二旅集结于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严密监视东西两面的敌人，保障我军后方的安全。

制定作战计划的那天下午，王旅长把班长和党小组长以上的干部集合起来，讲了关于攻打爷台山的战术问题。他挥动拳头对大家说："打国民党这号敌人，就是要猛、要狠、要准！攻击的时候，不能象茶壶倒开水，老半天倒那么一点点，要象提着一满桶水猛向热锅里倒的那样架势。手榴弹一响，你的刺刀就得朝敌人的肚皮上捅……"首长这样一讲，同志们活跃极了，一个个骄傲地挺着胸脯，仿佛只要一声命令，纵使爷台山是虎穴龙潭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

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细致而紧张地进行着：指挥员们反复察看了地形，各部队夜间战斗的演习活动也紧张地开展起来……

关中分区的广大群众踊跃投入了这次保卫边区、反击顽固派的斗争。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主动为作战部队作向导，为部队烧水做饭，准备担架抢救伤员，而且还组织了许多游击小组和爆破小组四出活动，配合部队守卫边防，不断地袭击国民党军队。这一切，大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

三

八月八日夜十点整，我军向爷台山守敌逼近。

夜，黑洞洞的，雨簌簌地下着，山沟泥泞难走。战士们用被单把枪裹起来，尽管不断有人摔跤，然而部队情绪很高。大家心里明白，这样的雨夜正是奇袭敌人的绝好机会。

十一点多钟，一连摸进了爷台山敌人的前哨阵地——胡家嘴。敌人哨兵毫无准备，被我尖兵班的两个战士猛扑过去，刺刀在眼前一晃就缴了械。十二点光景，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攻击开始了。这时一间棚屋里灯还亮着，几个国民党军官正在打麻将。几十把刺刀分头逼近了敌人的胸前，一枪未发，这个前哨阵地及其守军一个排就这样给搞掉了。

一营营长任英魁带着二、三连绕过前哨阵地，从沟里向上爬，直插到爷台山主阵地上。乘敌人没有发觉，二连战士们迅速、机警地占领了距主碉一百多米的独立屋，准备在这里发起攻击。

守备爷台山的是胡宗南所属暂编五十九师的第三团第三营和配属的第二营的加强连——第四连。这个第四连，是国民党军里固守阵地有名的"常胜军"，最近才从临洮、岷县一带镇压"民变"回来，因屠杀人民有功，师部给了每人四万元伪币的奖金。这次他们自动要求守备爷台山主碉，团部又奖给他们每人一万元。这个连的官兵的徽章里侧都印有"党卫"二字，意在仿效希特勒的"党卫军"效忠于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雨停了，东方渐渐发白，四面山头上兄弟部队向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时，守备主碉的敌党卫第四连一股，突然蜂拥出来，想夺回独立屋，企图把我们压到沟里去，以减去对主碉正面的威胁。二连在连长刘光荣同志的指挥下，时而在屋内与敌人作战，时而冲到屋外和敌人搏斗。敌人主碉里的机枪不停地射击着，二连的伤亡越来越大。连长刘光荣同志壮烈牺牲了，排长范文生同志继续率领战士们坚守独立屋。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锁，后面的弹药补充不上来，战士们从牺牲的同志身上，从敌人的死尸上，拣起手榴弹和子弹继续打击敌人。上午九时，全歼敌人一个排。

与此同时，设伏在南线的三营正和敌进行着一场有趣的斗争。他们剪断了爷台山守敌和驻方里镇敌人师部之间的电话线，把线接到我们的机子上。三营营长杨兴国同志摇通了爷台山敌人指挥所的电话，只听耳机里嚷叫："你是师部吗？我是山上，共军攻击猛烈，那些人简直不怕死，再不派援兵，阵地就要丢了……"杨兴国同志冒充敌师部人员说："老兄，沉着点，沉着点，现在正给你们调援兵，明天才能赶到，师长命令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明天……""喀"的一声，对方甩掉送话器走了。杨兴国同志又挂通了敌师部的电话："师部吗？我是山上，阵地没有问题。……是的，共军伤亡很大。奖励？不必了，不必了。"

东西两翼的敌人阵地很快全部被我各兄弟部队攻占。但是，爷台山主阵地上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一营的伤亡越来越大，我们通知一营打算把二营四连增援上去，通信员回来说："一营的同志们打得很顽强，他们决心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不消灭敌人决不下火线。任营长叫我转告首长，这次是在家门口打仗，死也要拿下爷台山阵地。"

上午十时许，我们的山炮向爷台山开始轰击，硝烟弥漫着爷台山的制高点，密集的机枪子弹也向敌人阵地飞去。兄弟部队三五八旅八团二营六连由副营长率领也投入了战斗。王旅长在这个时候向我们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此时，任英魁同志重新组织了全营的兵力和火器，带领战士们向主阵地连续冲击。敌主阵地是敌人营指挥所，工事构筑在居高临下的断崖峭壁上，分三层，由敌党卫第四连和一个重机枪连把守着，然而强烈的复仇情绪促使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冲到崖壁下，便搭起人梯往上爬，沿着一层一层的工事，与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阵

地上黑烟滚滚，刺刀闪闪发光，战士们越打越勇。就在这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我们的战士们一层一层地攻了上去。战斗到十一时全歼了爷台山上的守敌五个整连和一个营部，我收复了爷台山及其附近四十一个村子。胜利的红旗高高插在爷台山上。

四

爷台山战事结束后的第三天，一个美军"调解组"自西安前来进行所谓"现场调查"。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寻找指责我军，为国民党开脱内战罪行的。集团军首长命我陪同他们到阵地上去实地看看。爷台山上的证据的确遍地皆是，我随手指着那些装美国子弹、炮弹的箱子，并拣起有 U.S.A.字样的弹片和美造子弹壳交给他们，说："请看，这都是贵国援助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国民党就是依靠你们援助的军火才进攻我们边区、发动内战的。"那几个美国人张口结舌，窘态毕露。接着他们又故作镇静地在战壕内外巡视了一圈，结果当然什么合他们心意的"证据"也没得着，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爷台山反击战胜利后第六天——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天下午，我们在爷台山上追悼牺牲的烈士们，接着又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当地群众给部队送来了大批的慰劳品。就在这个时候，我团原来驻扎的康庄的那位老支部书记——我们都叫他袁老支书，也赶着几十头毛驴，从二百里路外，把我们部队出发时来不及集中和带走的武器、衣物统统送来了，说部队打顽固派要用，还送来了许多新鲜的猪肉。群众这种深情厚谊，深深感动了每一个同志。

天空明朗朗的，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祖国的锦绣山河，照耀着人们激动的面孔，会场上的口号声雷动：

"庆祝抗战胜利！"

"庆祝爷台山反击战胜利！"

"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实现国内和平！"

……………

有几个战士，当时就编了一段顺口溜：爷台山，高又高，顽固军背地放枪把内战挑；边区军民同奋起，缴他的枪，夺他的炮，老蒋封的孝子党卫军，一个也没跑掉；蒋介石，胡宗南，不抗战，专捣蛋，再向边区来进攻，请你记住爷台山！

（程悦长，《星火燎原》之七）

材料二　我军固守爷台山阵地

新华社关中分区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电　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国民党暂五十九师部队攻击我关中爷台山防地数次，均未获逞。本日继续攻击，该地仍在我军固守中。进犯部队，似有等待其他方面大举再犯之势。后续各师正纷纷自西安，乾县，兴平，向淳化方面前进。

材料三　爷台山战事扩大

新华社延安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电　关中息：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三十六军之暂五十九师外，增加了一个师。据我侦察员报告：增加上来的是从河南前线调来之十六军部队。据三十六军逃来我方之士兵说：他们有许多新式武器，是美国送来的，其中有一种叫火箭炮，你们要注意。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战略大反攻

背景介绍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宣告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从此，日本法西斯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化，预示着中国抗日战争到了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实行战略大反攻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1945年4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正当中共"七大"召开之时，1945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遵照毛泽东在大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发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对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和加强了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把日寇压缩到了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有效地收紧了致敌于死命的包围圈。与此同时，各解放区还积极开展了扩军练兵、生产运动和各项建设。这一切，为解放区军民进一步展开全面大反攻，发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

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红军分兵三路向中国东北挺进，给盘踞在东北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苏联对日作战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的进程。至此，解放区军民对日寇举行全面大反攻的时机终于完全成熟了。

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中国的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占领被我军包围和可能占领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同日，八路军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了战略大反攻的第一道命令，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日伪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否则予以坚决消灭 。11月，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出六道进军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令贺龙等领导的晋绥解放区部队、聂荣臻等领导的晋察冀解放区部队、冀热辽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令山西解放区各部队在贺龙指挥下，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令所有铁道沿线及交通要道两侧的解放区部队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军民即紧急行动，集结力量，对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

在聂荣臻指挥下，晋察冀解放区部队以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等城市为主攻方向，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北宁路南段的广大地区进军。同时派遣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于8月11日至9月3日间，收复了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28座城市，解放了察哈尔省和河北省、辽宁省各一部，并包围了北平、天津和保定。

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派太行军区一部分主力向同蒲路南段东侧地区和平汉路石家庄至邯郸段西侧地区出击，另一部分组成道清支队，向道清路新乡至博爱段进攻；太岳军区部队向同蒲路南段和黄河北岸进攻；冀鲁豫军区部队除以一部配合山东部队进攻济南以外，另组成中、南、北三路大军，向平汉路邯郸至新乡段东侧和陇海路开封至徐州地区展开进攻。从8月11日至9月20日，晋冀鲁豫区共收复县城59座，解决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晋绥解放区部队从南、北两线进行反攻。北线的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部队向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进攻，以攻占归绥为中心；南线的吕梁军区部队以攻占太原为中心，在同蒲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两侧展开。同时，解放区其他部队也向当地日伪据点展开进攻。至9月上旬，我军解放了绥远和山西的大片地区。

在罗荣桓指挥下，山东解放区部队，兵分五路大举反攻。以鲁中部队组成的第一路大军向胶济路西段、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进攻，向济南城郊逼近；以滨海部队组成的第二路大军，分别向胶济路东段和陇海路东段进攻，配合胶东部队和新四军进攻青岛、连云港；以胶东部队组成的第三路大军，向胶济路东段和沿海各城市进攻；以渤海部队组成的第四路大军，向胶济路西段及津浦路济南至沧洲段进攻；以鲁南部队组成的第五路大军，向津浦路徐州至兖洲段沿线进攻。经过五路大军一个多月的协同作战，解放了山东108个县中的100个县，切断了胶济、津浦、陇海等铁路交通线，使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处在我解放区的包围之中。

在陈毅等指挥下，华中解放区部队从江南和江北驻地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路、沪杭路等地区进攻，解放了县城32座，重要市镇四百多个，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东北，冀热辽等部队沿北宁路和海上向东北进军，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特别是抽调山东、华中的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东北的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地区。

在华南，东江纵队组成的几路大军向东江沿江、沿海和广九路、潮汕路进攻；琼崖纵队也从五指山区转入外线进行反攻，克复了大批市镇和据点，扩大了解放区。

从8月9日到9月2日，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59座、据点747处，歼灭日伪军57962人，使各解放区基本上联成一片。到10月上旬，解放区军民在大反攻作战中共收复城市二百余座，毙伤俘日伪军二十三万余人，解放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千八百七十余万，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日寇在人民抗日力量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彻底胜利而结束。

材料：

-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 延安总部命令（第一号）
- 百万雄师出动消灭日寇
- 各解放区全面大反攻
- 痛歼敌伪下阜宁
- 奸伪的末日
- 狂欢之夜
- 延安狂欢夜

材料一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毛泽东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材料二　延安总部命令（第一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二十四时）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我解放区所在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在缴械后，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总司令　朱德

材料三　百万雄师出动消灭日寇

新华社延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五时电　延安总部消息：据前方报告：我华北，华中，华南百万雄师，于接到朱总司令命令后，先后整装出动，向所有城镇和交通要道两则大举进攻。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等部，更分头向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迅速进军，配合红军及外蒙军队作战，该线已前进三十里至八十里不等。各地民兵亦持各式武器随军行动，攻城、袭敌、破路。万里云烟，一片杀喊。中华男儿正以坚决战斗动作，最后解决日本帝国主义。

材料四　各解放区全面大反攻

各解放区军民在接到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后，立即进行紧急动员，迅速集中队伍，组成反攻大军，向日伪发出通牒，并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大反攻。

晋察冀解放区：8月10日，冀晋军区部队分别向同蒲路北段东侧、平汉路石家庄以北路段西侧及大同以北、丰镇、集宁、商都地区发展进攻，攻夺大同、集宁、商都等城；冀察军区部队向张家口、多伦及北平附近地区发展进攻，包围北平，攻夺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冀中军区部队向平汉路石家庄到北平段东侧以及向天津附近地区发展进攻，攻夺天津、塘沽、石家庄、保定；冀热辽军区部队向北宁路唐山至山海关段发展进攻，攻夺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并向辽宁、吉林挺进。

晋绥解放区：8月11日，分南北两线反攻，北线指挥部指挥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部队向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发动进攻，攻夺归绥；南线指挥部指挥吕梁军区部队向同蒲路北段西侧和汾（阳）离（石）公路两侧地区发展进攻，攻夺太原，晋绥解放区其他部队，则相互配合，攻击当面日伪据点。同时，在黄河西岸属一二〇师部队也渡河东进，参加晋西北地区的反攻。

晋冀鲁豫解放区：8月14日，太行军区主力部队分别向同蒲路南段东侧地区和平汉路石家庄至邯郸段西侧地区推进，另一主力部队组成道清支队向新乡至博爱段铁路沿线发动进攻；太岳军区部队向同蒲路南段和黄河北岸发动进攻；冀南军区部队向平汉路邯郸至石家庄西侧地区发动进攻；冀鲁豫军区部队向平汉路邯郸至新乡段东侧及陇海路开封至徐州间地区发动进攻，相机攻占开封、新乡、安阳、邯郸，并配合山东新路部队进攻济南。

山东解放区：8月17日，鲁中部队向胶济路西段和津浦路兖州至济南段发动进攻，向济南近郊逼近；胶东部

队向胶济路东段及龙口、蓬莱、威海卫、烟台、青岛等沿海城镇发动进攻，收复胶东北全部地区；滨海部队北向胶济路东段，南向陇海路东段发动进攻，配合胶东部队的新四军进攻青岛、连云港；渤海部队向胶济路西段及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发动进攻；鲁南部队向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及徐州东北地区发动进攻。

华中解放区：新四军各部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路等地区举行大反攻。江南部队（包括苏浙军区、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就地向四周发动进攻，直逼南京、上海，江北部队（包括苏中军区、第二师兼淮南军区、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之日伪军展开反攻，迫令其投降，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

华南解放区：东江、琼崖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也举行大反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地。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进军，收复失地并收缴日伪武装。

东北抗日联军在中苏境边外营地，召开了反攻誓师大会，于8月中旬至9月初，配合苏联红军的进军，打回东北，与进入东北的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会合后，迅速解放了东北广大城乡。

日本法西斯军事力量，在苏联红军及美英盟国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五　痛歼敌伪下阜宁
——记阜宁战役

24日夜晚，黄克诚抬起手腕，时针正指向12点，黄克诚一声令下，洪学智从腰中拔出信号枪，“呯，呯，呯！”就是三枪。三颗红色的信号弹，犹如三只美丽的红灯笼高高地挂在高空。随后，炮弹声、手榴弹爆炸声、机枪声伴随着战士们的喊杀声，此起彼伏，伪军阵地上一片火海。

激战至25日中午，张云天、李雪三的第8旅攻克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全歼守敌；刘震、金明的第10旅攻克小顾庄、大顾庄，击毙伪军团长朱涛，逼进城关。驻守掌庄的伪军300余人，在我第8旅的攻击下，见势不妙，知道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便放下武器投降了。

阜宁城内的敌人，见我军拔除了城周围的据点，顿时慌了手脚。就在我军围攻上述据点时，伪军第5军军长王清翰亲率主力两个团，1千余人，在军官的威逼之下，于25日中午，从城北冲击，向我军反扑，分三路向大顾庄、小顾庄驰援。由于我军早有准备，当其进至小顾庄以南地区时，我22团就给敌人来了个迎头痛击。本来敌人在噼噼啪啪响了一夜的枪声中就成了惊弓之鸟，一遇到我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便仓皇回窜，急忙退回城去。新四军22团的指战员们在团长王良太的率领下，从小顾庄一路追杀过来。由于敌人在我军的打击之下只顾逃命，没有人注意后面是谁，我新四军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22团第1营的一个排，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尾随在溃退的敌人后面，进了阜宁城，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跟在后面的竟是我新四军的部队。我军进了阜宁城后即占领了城北门的四座炮楼。接着我军第22团第3营11连，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趁势突入阜宁城东北角，打开缺口。

战斗进入巷战阶段。我军在加固刚刚占领的工事，敌人则固守在城中坚固的工事中猛烈地向我军阵地射击，双方相距不过几十米，处于紧张地对峙状态。

就在这时，一个新四军战士突然惊叫起来：“师长来了！”大家一看，果然，黄克诚在团长的陪同下，弯腰走进了工事。此时，战士们的心情很复杂，既有担心，又感到高兴。担心的是，这里是前沿阵地，敌人随时都可能向这里开枪，高兴的是，师长亲自来到前线指挥战斗，胜利更有保证。

黄克诚俯下身子，仔细地观察敌情。突然，敌人的机枪扫过来一梭子弹。一个机枪手眼明手快，一个箭步跳地去，扑到了师长的身上。他急切地说：“师长，这里危险，你快下去。”

黄克诚推开这位战士，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动情地说：“你不是同样危险吗？今天我们观察敌人的工事，是为了把作战计划制订的周密一此，进攻时好减少我们同志们的危险呀！”

战士们听到师长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的消息迅速传开，全体指战员被师长的行动所感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指战员们决心在下步的战斗中勇猛杀敌，为人民再立新功。

下午3点，黄克诚师长发出了总攻的命令。新四军第8旅、第10旅集中主要兵力，在炮兵的配合下，发起了强有力的总攻。炮声隆隆，军号阵阵，战士们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战士们的斗志旺盛极了。几年来，我军总是被敌人“扫荡”，总是打一些运动战、游击战，今天，我们也打攻坚战了，要攻克敌人占领的城市了，怎不令人振奋！

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凭借坚固的工事继续顽抗。有的地方，新四军战士把云梯搭上了城墙，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敌人见状，不断地向下投掷手榴弹。战士们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爬上去。有的地方，新四军战士攻了上去，敌人拼死反扑，双方多次拉锯。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新四军攻占了伪军第43师司令部驻地同丰和宅,控制了阜宁城中心地区,敌人仅据守在天主教堂、大浦第四个围寨中。这时,已经是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了。城内的枪声还没有停止,困守在围寨中的敌人仍负隅顽抗,他们妄想借着夜色拖延时间,等待救兵。

“必须打破敌人的幻想!”黄克诚又下达了坚决歼灭敌人的命令。新四军集中炮火猛烈地向天主教堂内的敌人进行轰击,战士们紧随炮火前进,激战一夜,第二天凌晨,拿下了这个据点。阜宁东大街的守敌一个营见大势已去,打起了白旗,在营长带领下全营向新四军投降。

阜宁城内之敌,除小部在伪5军军长王清翰、43师师长孙建言率领下,乘夜暗突围南窜外,其余被我全歼,阜宁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逃窜之敌狼狈窜至沟安墩附近时,又遇到我预伏部队,遭到猛烈打击,激战3个小时,被我毙伤150余人,在新四军勇猛追击下,逃往盐城。致此,阜宁战役胜利结束。

苏北人民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3师的驻地锣鼓喧天,慰劳队络绎不绝,庆祝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第一次攻占敌人有坚固工事的城市。

在这次历时三天的作战中,我军共毙伤伪军339人,俘伪副师长以下2073人,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切断了联结苏北与苏中的南通至赣榆的公路,给伪军孙良诚部以沉重打击,扩大了苏北根据地。阜宁战役的胜利,主要是我军先打外围据点之孤立分散之敌,后打集中较强之敌,并抓住出援之敌遭我打击回窜阜宁之机,立即跟踪追击,一举攻入城内。同时配合以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敌军大部投降,从而避免了强攻,减少了伤亡。在这次战役中,新四军部队得到了锻炼,并为我军以后的攻坚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选自《百战图》,作者:张惠民)

材料六　奸伪的末日

在三交镇的村头上,面对着湫水,平地修起一座烈士塔,里边塑着战士的泥像,四壁遍是烈士的名字和传记,当中有些是敌人占领三交期间,死在临县伪县长刘逆忠厚手里的。

刘忠厚这个土生土长的坏蛋,曾经倚仗着阎锡山的旧势力欺压人,后来便投到敌人脚下,怂恿敌人占了三交,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了临县的伪县长。几年以来,他明里暗里,杀死七百多人,抢走十几万银洋的东西,烧了一万七千多间房子,还抢走无数的粮食……他满以为敌人是座靠山,可以倚仗一辈子,做梦也没有想到靠山会倒了。他逃到离石,在阎伪合流的反动势力庇护下,依旧逍遥自在,还等阎锡山委他新官做。可是,我们打开离石以后,他仍然落到人民的手里。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号,就在三交的烈士塔前,他被绑到有一万六七千人的人民法庭前。往日,他戴着礼帽,架着黑眼镜,耀武扬威地吓人。可是今天,他的头发胡须乱蓬蓬的,脸色苍白,早吓得不象人样。满场的人见到他,触起多年的伤痛,谁不咬牙切齿地痛恨他!

看哪,一个年轻人抢上台,吼起来了:“我的叔父叫薛指方,是咱们县政府的建设科长,不想到专署开会的当儿,叫敌人半路抓去。就是刘忠厚认出他来,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百般地拷打,逼问他真情!可是,我叔父是个有血性的好汉子,怎么也不屈服,最后给拉到坟地上杀了!……要不是刘忠厚这个灰孙,我叔父哪会死得这么惨!……”说着说着,年轻人嚎啕大哭起来。全场的人一阵怒吼,纷纷紧握着拳头。一个老汉爬上台,气得声音发抖,诉说刘忠厚怎样敲诈他的白洋,一个老婆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挤到台前,连连地说:“我也要讲!我也要讲!”台上的人劝她别急,她却哭起来说:“都是他毙死我的孩子,怎么能不叫我讲!”

这个哭诉,那个痛骂,刘忠厚的罪恶堆得就象山一样高。……

他曾经唆使敌人,在霍家湾的山洞里烧死二百多人!

他曾经指使敌人和伪警备队,把坪头的老百姓赶到悬崖上,一边揪头,一边揪脚,笑哈哈地摇来摇去,一撒手摔到崖底下,摔了一个又一个,还侧着耳朵听声音!

一个叫小脚桂花的大破鞋,和他勾结一起,在三交镇上放官赌,害得一个被迫来出差的民夫输得家业精神,吊死在小脚桂花的大门口,死尸的头上就是一块“乐赛天堂”的横匾!

还有!还有!他又是万国和平道德会的会长,教人每天念经,还故意编出四句麻醉人的诗句说:“进步不及退步好,有名不及无名高,好马当头多出力,好汉出名祸先招!”

他的罪恶,一时数也数不清。……在人民的法庭上,他的头垂到胸前,一句话都不能辩驳。但听见四处人叫:“吃啥还啥,拿小刀刀剐了他!”或者是:“把这个坏鬼给埋在烈士塔前面,留着上半截,让大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但是结果,人民却给了他最宽大的裁判——一颗子弹。

千万人都吐了口怨气,挺着腰站起来了。有人还喜欢得直流泪。迎着风,烈士塔顶上所塑的战士,好象正吹着前进的号角。

(选自1945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作者:杨朔)

材料七　狂欢之夜
——延安市人民庆祝日寇投降举行火炬游行速写

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忍受牺牲，坚持了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昨日上午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市轰动，万众欢腾，街上张灯结彩，国旗飘扬，名处黑板报上都用大字报道消息。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从各处发出；霎时，鼓乐喧天，无数火炬照亮山岭河畔。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扎起火炬，参加游行。当实验工厂、联政宣传队、大众剧院、延大、完小等十余个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时，市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苏联红军胜利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声震山谷。斯大林元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火炬中高高举起，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大团结。在蜂拥来去的人群中，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荣誉军人被群众拥戴着，他十分感动而吃力地说："八年啦！我们的血没有白流……"他是参加有名的平型关大战而光荣负伤的，今天他是亲眼看见胜利了！一个卖瓜果的小商贩欢喜得跳起来，把篮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庆祝的人群潮水一样地继续涌来，秧歌队越跳越大，完全卷成一片人海了。人们高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欢欣鼓舞，达于极点。美军观察组闻讯后亦乘汽车随秧歌队致庆，街道行人纷纷议论，人们都一致称赞说："苏联才宣战两天，日本就要求投降，可见红军力量在全世界是伟大无比了！""当然，八路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是决定的因素！"

昨晚，全市灯光彻底不灭，中国人民在极度狂欢中，没有忘记摆在前面的紧急任务，把在华敌伪军全部解除武装，把八年人民艰苦抗战的胜利果实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海併）

材料八　延安狂欢夜

已经吹过熄灯号了。
人们大半都已就寝。
我还守着一盏残灯。
山沟里死一般地寂静。
忽然山上山下
人声异常嘈杂。
又听锣鼓喧天。
有人甚至敲着铜盆，
有的用力吹着喇叭。
整个延安起了骚动。
男女老少涌出窑洞。
延河两岸山岗，
野火漫天通红。（扫帚，草褥都拿来烧了！）
人似潮水流向街头。
旗帜招展在星空。
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
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
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
你给他钱——无论如何不要。
叫喊中间一声特别响亮：
"日本要求无条件投降！"
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
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
人们想起八年来的痛苦，牺牲，
才换得今天的狂欢，兴奋。
回想八年长期艰苦抗战，
为何反攻阶段能这样短？
——这就因有苏联参战，
就因举起了这只铁拳！
这只铁拳刚一挥动，
日本立即低头——作九十度的鞠躬……
你想，这只铁拳多硬呵！
这只铁拳多重呵！
于是人们从心底深处高呼：
苏联红军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
人们又从心底深处喊出：
八路军新四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同志万岁！
延安今夜谁还愿意睡觉？
宝塔山，清凉山都笑了。
快乐的歌声唱遍了通宵。
朴素的鼓音也不显得单调了。
今天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歌唱了，
都笑了。
全地球的山河木石都歌唱了，都笑了……
我从人海中浮出，回到窑洞，
对着拧得亮些的一盏青灯：
但愿这快乐的歌声长响，

这天真的笑容永远保存。
从地面上铲除一切反动分子！
制止一切侵略的战争！
同志们，再接再厉地努力！
前面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
彻底烧毁一切“战争威胁的温床”，
人类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走向幸福，进步，文明，
走向自由，民主，和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子夜后于文化沟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萧三）

重庆谈判

背景介绍

抗战结束后，国内形势出现新变化。一方面是人民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独立，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急欲抢夺胜利果实，垄断受降权，内战危险极为严重。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发出三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擅自行动”；命令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蒋介石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抢占地盘。美军也积极配合，企图通过国民党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美蒋勾结，蒋日伪合流，疯狂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丑剧。

在时局剧变的历史关头，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挫败了反动派的内战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阴谋的坚决揭露和斗争，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尚未完成，因此蒋介石于1945年8月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建国大计”，企图通过谈判诱骗和压迫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洞悉蒋介石的阴谋，但鉴于战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要求休养生息；又估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谈判后可能进行某些政策上的变革，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中共代表团飞往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使整个山城为之沸腾，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谈判历时43天。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在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借口下，一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二要取消民主政权。为促使谈判取得进展，共产党代表一方面严正驳斥和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同时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在军队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在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愿将自己领导的120多万军队按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长江以北。虽然中共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蒋介石毫无诚意，在谈判的同时不断发动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企图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蒋介石的进攻均被解放区军民击溃，这促进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的签定。

重庆谈判的成功，是人民力量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经过会内与会外、政治的斗争与军事的斗争，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表示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次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揭露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材料：

-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 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 山城沸腾了，——毛泽东抵达重庆
- 为了光明的中国
- 重庆的43个日夜
-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 毛泽东一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亦乐乎
- 恢宏洒脱：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交往录
- 重庆谈判前后的毛泽东

材料一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地结束了！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

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顿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要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立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无束的普遍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材料二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人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

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材料三　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意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

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中，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种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存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之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现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现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级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唯县级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极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　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新华日报》）

材料四　山城沸腾了！
——毛泽东抵达重庆

3点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终于冲破重庆上空浓浓的云雾，带着自身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地降落在警戒森严的九龙坡机场跑道上。

候机室大门打开了。跑在最前面的是几十名中外摄影记者，他们或胸挂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刹时便围着机身排开了半圆的阵势。半圆中密密麻麻地站着美军宪兵和国民党宪兵，他们一面维持秩序，喊叫着要人们尽量远离舷梯，一面横冲直撞，没有忘记为自己占据一个距离机舱最近的位置。

舱门无声息地打开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毛泽东。他朝周围的群山打量了一眼，似乎要在这一瞥中熟悉重庆的山山水水。然后他取下头上戴着的考克礼帽，朝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那有力的挥动，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相信，他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紧随着毛泽东走出机舱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政治部长张治中。

张治中把站在舷梯侧旁的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与他握手。

周至柔毫无表情地说："蒋主席已经预备好了黄山和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

"非常感谢！"毛泽东淡淡地一笑，继续向欢迎他的人群走去。

赫尔利却紧紧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既然记者先生们老用镜头对着我们，那就让他们拍个痛快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的镜头"。他又顺势将周恩来的胳膊也挽住。

摄影记者欣喜若狂，"辟辟啪啪"地一阵拍摄，镁光灯闪个不停。大约拍了二十多分钟，记者们方才停下来，赫尔利感到很满意，抚着他的小胡子朝毛泽东点头说："简直是好莱坞！"

《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从人群中挤到了毛泽东的身旁。他是湖南人，和毛泽东亲切握手后，又用一口地道的湘潭家乡话互致问候。

“他是谁呀？和毛先生这样熟？”其他的人真有几分妒嫉了。

“啊，张表老，你好！”毛泽东不知在什么时候发现了人群里的张澜先生，大概是张澜那绺漂亮的银须太引人注目了。

“润之先生，你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张澜显然为毛泽东在众多的人中认出了他而万分高兴。

毛泽东拉住张澜的手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啊！

周恩来从毛泽东身边绕过来，也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

中外记者们却不那么彬彬有礼，他们蜂拥到毛泽东身边，又是递名片，又是提问题，还有的远远就把手伸过去，急着要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派的代表如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等人则被挡在人墙之外，根本无法接近毛泽东。他们一个个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处境最为难堪的是沈钧儒，他年纪大，身体小，体力差，夹在人缝里无法动弹，但又不甘心受此窝囊气，口里不停地喊着：“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正在一旁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握手问候的周恩来，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敏捷地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高地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

果然，一下子把记者吸引过来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能和各党各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品”，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讲话。

毛泽东简短的书面讲话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外国记者们读毕这份油印的书面讲话，飞身跳上汽车，一溜烟赶进城里抢发新闻去了。

机场外面停着好几辆高级轿车。周至柔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来到轿车前，周至柔指着一辆崭新的篷车说：“这是蒋主席特别拨给毛先生使用的。”

“很感谢！”毛泽东礼貌地回了一句，脚步却偏偏绕过这辆篷车，而朝着侧旁那辆标有“美大使馆”字样的篷车走去。

跟在后面的赫尔利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赶紧上前，敏捷地为毛泽东拉开后座车门。当周恩来和张治中尾随毛泽东也坐了进来之后，他才拉开前座车门，坐在了司机侧旁的位置。

汽车慢慢地启动了。

（选自《黑雾红尘》作者：陈景彪、彭锦华）

材料五　为了光明的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团结、民主自由、休养生息、建设国家。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不计个人风险，身系天下安危，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的四十三天中，他的诚意，他的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朴实、诚恳、谦逊的态度，博古通今的文化修养，受到重庆的国内外朋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重庆机场赠“礼品”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延安机场阳光灿烂。一架草绿色的军用飞机静静地等候着它的客人。机场周围早已站满了延安的百姓和机关干部，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无人不在默默地为即将身临险境的领袖祝愿。十一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陪同他们去重庆的赫尔利、张治中登上专机。在飞机舱门口，毛泽东挥动着深灰盔式帽，脸上露出亲切镇定的微笑，留下一个日后为全世界所熟悉的历史性镜头。

三个小时之后，毛泽东一行飞抵多雾的山城，降落在九龙坡机场。等候在机场欢迎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还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代表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毛泽东第一个走下飞机，立刻被一群中外记者包围，周恩来快步上前拿出早在延安就已准备好的“礼品”——毛泽东对中外记者的书面谈话。应该说，这“礼品”不仅是给中外新闻记者的，也是给山城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毛泽东说：““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先生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先生来了”、“毛泽东到了重庆”，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的头等新闻。人们热烈争论的毛泽东会不会来的

问题结束了，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攻讦也彻底破产了。

办公“桂园”广交友

“桂园”是张治中的公馆，位于市区上清寺，与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相距不远。为了方便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办公、会客，张治中去延安前就通知夫人洪希原腾出了“桂园”。

毛泽东到重庆后，晚上住红岩村，白天在“桂园”会见国民党党政军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妇女界、青年界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说：“毛泽东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这次以古喻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的谈话，使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办公和会客之外，毛泽东还经常外出参加各种宴会、集会活动。九月一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举行鸡尾酒会。会议由协会正副会长孙科、邵力子主持，政、军、文化、新闻、戏剧等界三百多人出席，由于毛泽东的出现，这次酒会，实际上成为一次欢迎毛泽东的大会。

覃振与毛泽东相见时，紧握着手，久久说不出话来，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冯玉祥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来，让我们为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语毕已泪湿双颊。

会场外，山城市民站在�细雨中，“几千双眼睛望着中苏友协的大门”，有的还挤进了会场。据当时出席这次酒会并亲睹了这一切情景的候外庐回忆说，毛泽东与会总共一小时左右，在会场内外众多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中间，真正是万众瞩目的领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会场上，陈诚和陈立夫没有人理，尴尬极了。蒋介石不能容忍这样的场面出现在他的权力中心所在地，第二天他把邵力子找去大骂了一顿。

三进“特园”拜“神交”

“特园”是鲜特生的公馆，位于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因为民主人士常常聚会此处，被董老（必武）誉为“民主之家”。

当时，张澜正住在这里。毛泽东与张澜素未谋面，但知他过去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今日领导民主同盟，非常敬佩。张澜在“五四”时期就听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介绍过毛泽东的情况，今日见毛泽东为了制止内战，来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之“大智、大勇、大仁”，也是十分敬佩的。当他们在九龙坡机场第一次见面时，就不约而同的互称：“神交已久”。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首次前往“特园”拜会张澜。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早年是张澜的学生）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好友的问候。在张澜卧室里，他们促膝长谈，坦率地交换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张澜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摆鸿门宴，他从不讲信义。这次邀请你来谈判，也讲“民主”，是演的假戏啊！毛泽东风趣地回答说：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有价值了。接着毛泽东还向张澜详细解释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张澜说：“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九月二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等出席作陪。毛泽东二进“特园”，高兴地对主人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宴毕，“特园”主人鲜特生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当即挥毫写下了四个刚劲的大字：“光明在望”。

九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特园”同张澜会晤，详细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说明国民党以所谓“政令军令之统一”，不承认解放区，限制人民军队，致使谈判陷于僵局。国民党还借此谈判时机，在美国的帮助下大量运兵各地，准备内战，张澜听后对毛泽东说：“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张澜向毛泽东建议，由他给国共双方领袖写一封公开信，把一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连连称赞张澜“老成谋国”。三日后，张澜给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见报。

山城和词《沁园春》

早在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时，柳亚子与毛泽东即为至交。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说：“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抵达重庆的第三天，毛泽东在“桂园”宴请故旧，老友重逢，柳亚子兴奋地流出了热泪，并即席赋诗《赠毛润之老友》：“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中山卡尔双

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毛泽东的诗才尽人皆知，旧作颇丰。但八年抗日战争，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写了。九月三日，周谷城在“桂园”问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毛泽东：“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回答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为了回答柳亚子的赠诗，十月七日，毛泽东将他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词《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这首气魄雄浑的词，先是在山城转抄，后又在报上公开发表，山城轰动了。一时间，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大和而特和。

柳亚子的和词写道：“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拔剑难平块垒高。”

郭沫若的和词写道：“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凋。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黄齐生的和词写道：“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

“桃园”之中访右派

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同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接触外，毛泽东还数度出其不意的造访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顽固反共的右派人物。当时，有些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反共分子，早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就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活动。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毛泽东对戴委陶是很了解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写过许多文章批判戴。九月三日下午，原定去“桃园”拜访于右任的毛泽东，突然踅入同处“桃园”中的戴府。戴季陶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王炳南回忆说：“戴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边声，好象无地自容似的。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二人狭路相逢。蒋问主席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这次拜访后，据张治中回忆说：戴季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戴季陶还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他在邀请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九月十三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

陈立夫，国民党反共头面人物之一，C·C系的头子。对于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他极力反对，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对这样一个人物，毛泽东仍不放弃接触。王炳南回忆说：“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的。……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敏的议论，陈立夫手忙脚乱，窘迫无以措词。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红岩村里办外交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向国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利用在重庆谈判的时机，会见和拜访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朋友：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苏联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顾德伦，以及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史奈特、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等。

为了感谢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进行援助的国际友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九月八日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英国援华会、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词，诚挚地感谢各国朋友八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许多援助，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给予帮助。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一些来访的外国朋友。九月十四日，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九月十九日，是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在返回延安的前夕，则是美国朋友韩丁和坦纳鲍姆。毛泽东向他们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工业、农业生产，工人、农民生活，以及劳工组织等情况。毛泽东同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友好交谈，成为他们“终生不忘的一次会见。”

在此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次恐怕是在红岩村会见三位美国的青年士兵了。他们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总部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他们一踏上中国就听说过“北方中国”的情况，现在得知毛泽东到了重庆，他们渴望见到这位“北方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非常理解这三位美国年轻士兵，九月十六日，在红岩村约见了他们。毛泽东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同时也向他们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在会见时，毛泽

东看见他们带来了照相机，就主动提出："你们是不是要照相？现在太阳未下山，赶快拍吧！"在红岩村办事处楼房西侧的一丛青蕉树前，毛泽东、三位美国士兵及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光彩等拍了一张合影。这是一个珍贵的历史镜头，至今还挂在红岩村纪念馆里。一九七六年海曼和贝尔率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到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参观时，看到了这张三十二年前的照片，他们高兴的叫了起来，热泪盈眶。

红岩村的会见，给三位美国士兵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回忆。爱德华·贝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是我见到的最客气的人，……对我们极为坦率，对我们的访问表示高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快。"他还说毛泽东"个性不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霍华德·海曼在毛泽东逝世后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

返回延安赞文白

国共两党谈判基本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返回延安。十月八日，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送别晚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到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五百多人。毛泽东在张治中致词后说："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主人张文白先生设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他还说："在东西方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得到到会的五百多人的热烈掌声。

十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陈诚、张治中的陪同下，从蒋介石官邸乘小汽车直奔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机场同欢送他的各界人士一一握手道别，还特别和几位在"桂园"服务的宪兵握了手，并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当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飞抵延安。等候在延安机场的两万多干部和群众，热烈欢呼毛泽东平安胜利归来。

蒋介石确有利用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机，将毛泽东长期软禁在重庆的阴谋计划。当时在重庆的冯雪峰最早获得这一情报，及时报告了中共南方局。其实，去重庆那样的地方同蒋介石那样的人进行谈判，毛泽东早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他在去重庆前夕召开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过，如果谈不好，就不签字，准备坐班房，准备被软禁。

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解放区，上党战役使蒋介石损兵折将，山城内外暗地流传：国民党特务要对毛泽东下毒手！当时，许多同志、朋友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有一次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客人时，有人递上一张小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毛泽东要走了，但他返回延安途中的安全，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精明、细心的周恩来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当他得知张治中将在《双十协定》签字后去兰州时，就向张治中提出，希望他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去兰州。张治中欣然答允。这件事，张的孩子张素初在四十年后著文披露：最近笔者听纽约的一家华文报纸的董事长说，他当时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当时的确看到要谋杀毛泽东的电报，后来因为有张治中陪同，不能下手，毛才幸免于难。

在张治中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十八集团军在杨家岭举行盛大宴会，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杨尚昆等亲到机场为他送别。毛泽东与张治中同坐一辆汽车。在前往机场的途中，毛泽东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极其紧张、繁忙。周恩来怕他劳累病倒，请来一位有经验的老医生。医生给毛泽东作了全面检查而后说："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脑子用的太多了，这次设法使毛主席的脑子在夜间能够停下来。"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同志们想了许多办法而无一条奏效，因为无人能替代他的工作，也确有许多需要他深思的问题！

回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重庆谈判情况和研究时局问题。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八十多万军队准备向各解放区进攻。第二天（十月十二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并转区党委电，对《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十月十七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长篇报告，论述重庆谈判后的形势。据事后统计，毛泽东在一月之中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百七十多份文电稿，有时一日多达十五份。

他终于病倒了，植物神经失调。十一月中旬，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派黄树刚、李冰二位医生为毛泽东诊治。在他们的坚持下，毛泽东离开王家坪，迁到延安城东柳树店即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疗养。

（选自《中华英烈》86年5期作者：高风）

材料六　重庆的43个日夜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期间，恩来同志除协助毛主席进行谈判斗争和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外，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健康、生活等各方面，都是无微不至地周密安排，精心照料，充分表现了恩来同志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和爱戴。毛主席开始曾在蒋介石的住地林园住了两晚，恩来同志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总是不离毛主席的左右，直接领导警卫工作，严密守卫。后来毛主席迁至红岩办事处二楼居住，恩来同志就搬到毛主席住房的对面。为了保持安静，在毛主席休息时，恩来同志在室内只穿袜子走路。他还特别叮嘱我们在三楼搞机要工作的同志，要绝对保持安静，我们那时都赤着脚走路。

10月8日这天，发生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乘车外出，途中遭到枪杀的事件。这天晚上，恩来同志正陪同毛主席出席张治中先生举行的晚会。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沉着冷静，当即悄然离开会场，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进行质问，要他彻查此事，并要张镇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主席。散会后，毛主席坐在张镇的车上，安全回到红岩。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主席决定返回延安。蒋介石要用他的专机送毛主席，恩来同志很为此事担心。恰好张治中先生透露蒋介石要他11日乘机去兰州，恩来同志立即机智地提出，请张治中先生亲自护送毛主席回延安后，再去兰州，张表示同意。11日毛主席在张治中先生的陪同下，乘机平安回到延安。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都在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在那43个日日夜夜里，恩来同志机警、妥善、周密地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都为毛主席站岗放哨，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

毛主席回延安后，恩来同志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协议。当时蒋介石一面利用这些决议，进行“和平”欺骗，一面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这一天，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士。恩来同志得悉此事后，立即赶到会场，痛斥了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并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士。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还策划了反苏反共游行，捣毁我《新华日报》营业部，甚至极端卑鄙地给恩来同志寄夹以手枪子弹的恐吓信。恩来同志都及时提出抗议，把事实真相向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公布，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我们在重庆期间，环境是非常险恶的。周围特务密布，人员进出都要受到严密监视，各种活动都受到限制甚至破坏，有时他们还用查户口等名义进入住地侦察情况。但我们在有丰富反特斗争经验的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的办法，同特务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我们还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统战关系，用伪装、秘密邮寄、直接送递等办法，向各方面散发大量的宣传品，甚至还把宣传品送到亲日派反动头子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戴笠的手里。

在对敌斗争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党的机要工作不遭到敌人的破坏。恩来同志对此一直十分重视。他亲自指导我们采取种种措施，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敌人的破坏。为了应付突然袭击，除少数必用的密码外，机要电报阅后立即销毁，不保存任何文件，规定工作人员外出需二人同行等，很好地保卫了党的机密。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恩来同志经常对全体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我们立场坚定，随时准备被捕、坐牢，以至以革命作出牺牲。虽然国民党封闭了我们的合法电台，但是，我们的秘密电台一直保持了畅通无阻，红色电波不分日夜地冲破重重云雾飞向延安，延安也不断给我们传来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我们经过几次交涉，国民党仍不许我们架设电台，要我们把电报送给国民党军政部电台代发，妄图破译我们的密码。但是我们给他们代发的是没有内容光有码子的“无字天书”，而毛主席的指示仍然及时地通过秘密电台发到延安，发到全国。

在重庆时，不仅斗争尖锐复杂，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日寇飞机频繁轰炸，红岩办事处的曾家岩50号都曾落过炸弹。我们住房十分困难，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恩来同志就索性坐在防空洞门口办公、写文章，搭个席篷子作为接待中外人士的会客室。在这里，应该感谢红岩的主人饶国模先生，她给我们地方盖房子，让出许多房屋给我们使用，给我们种菜的园地。因为经费困难，只好经常吃炒榨菜和自己种的牛皮菜。恩来同志还亲自领导办事处人员学习整风文件，讲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他白天在曾家岩对外会客、开会，晚上回到红岩还要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情况，处理电报，审改《新华日报》的社论和文章。每当重庆山城夜深人静的时候，恩来同志的窗户还放射出闪闪的灯光。常常是当他办完事情时，太阳已经在对面山头升起。

（节选自童小鹏《追思周总理在发展统一战线方面的丰功伟绩》）

材料七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叶子龙递上电报稿：“主席，日本投降了！”

□毛泽东接过电话："哦，投降了，好啊，抗战八年，胜利了！"

延安枣园美，晨曦的枣园更美。

八九月是丰收的季节，一树沉甸甸的大红枣儿，在曙光照耀下，红翠招人喜爱，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粗壮高耸的槐树掩映下，黄澄澄的大鸭梨压弯了枝梢，红了嘴的桃子朝人微笑。一株株杏树，郁郁葱葱，树繁叶茂。毛泽东办公室的窗户几乎全被树荫遮盖着，整个枣园生机盎然。当成熟的水果一下来，毛泽东叫卫士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让警卫员、勤务员们拣好的吃，他自己却很少吃。

高个儿青年人齐吉树，端起一个大木盆，装了满满一盆该洗的衣服，有毛泽东的，江青的，也有他自己的，边洗边挂在院里的绳子上，晾晒起来。

这是1945年8月15日清晨。秘书叶子龙手里拿着一封电报，大步走过来："齐吉树，方席起床了没有？"

"还没起床呢，快天亮才睡。我已沏上茶了，主席正睡着呢，先别去打扰。"

"你去把主席叫醒吧，有重要电报。"

"我才不去呢，刚睡多一会儿呀就叫。"齐吉树嘴里说着，手里不停地洗衣服。

"嗨，有重要事儿。"叶子龙挥舞着手中的电报说："日本投降啦！"这声音如同一声春雷，激动人心！

"啊，日本投降了！"齐吉树站起身，跳起来。哗啦，院子里的几个年轻人都围拢过来。欣喜地又蹦又跳，又说又笑。

"真的，日本电台广播了，日本天皇下了投降书。你们看，这是电报稿。"叶子龙拿着电报，兴奋地说，"给毛主席送去。"

叶子龙、齐吉树一同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这时，毛泽东刚刚睡醒了，正躺着看报纸呢。

齐吉树走到主席身边，小声说："主席，叶秘书来了。"

叶子龙连忙递上电报稿："主席，日本投降了。"

毛泽东接过电报看："哦，投降了，好啊，抗战8年，胜利了！"

"叶子龙，你叫朱老总、少奇、任弼时来。"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

朱德总司令先来了，毛泽东给他看电报。

"日本投降，当前仗怎么打法？"朱德微笑着问毛泽东。

"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战争。"毛泽东与朱总谈形势，齐吉树侍立一旁，执行伺候毛泽东的任务。

毛泽东的办公室在窑洞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五屉桌，一把旧圈椅，两把没有弹簧的土沙发，一个茶几和两个书架。他们就坐在沙发上促膝交谈。

毛泽东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妄想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阴谋发动内战，用武力消灭我党的人民革命力量。我们就要强大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有鉴于此，战争不能停止，能夺下大城市就夺，夺不下大城市，打中小城市。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2日，毛泽东与朱德拟定了电报，继续扩大解放区人民的武装力量，朱总司令发出了要各地敌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的命令。几天之内，山西、河北节节胜利，相继解放了几十座城市。

这天晚上，延安一片灯火，锣鼓喧天。

毛泽东踱步梨树林，他的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里，灯火一直照耀到凌晨。

毛泽东忙着开了一天的会，不顾饥饿，夜里3点多钟，喝了一杯牛奶，又继续开会。

齐吉树忙活完了会议室的茶水，便站在窑洞的高处，遥望着延河两岸的灯火，心潮起伏遐想联翩，抗日8年的胜利，多么不容易啊！在毛泽东巨臂指挥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亲眼目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付出多少心血！

□蒋介石九天之内，三次来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齐吉树问江青：毛主席去重庆穿什么？戴什么？

延安的天是晴朗的天，延安人民正尽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大快人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同志，昼夜在枣园小礼堂开会，商谈抗战胜利后的局势。齐吉树和警卫们就更忙了。齐吉树肩负招待任务，供茶、供烟和饮食，进出小礼堂。毛泽东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就在枣园小礼堂作出了决定，根据形势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为争取成立联合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45年8月15日这天，正在延安人民欢庆抗日胜利的时刻，突然从雾都重庆飞来了电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已识破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用意，第一封电报没有理他。紧接着在九天之内，三次来电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

延安人民聚会、写信，为了确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不同意赴重庆谈判。假若去了，被扣下或杀头怎么办？人们忧心忡忡。

在枣园小礼堂，中央书记处一连开了几天会，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

这些天，延安的枣园与往日大有不同了，茂密的梨树

林中，增添了毛泽东踱步的脚印。他们经过周密思考和研究，做出了决策：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毛泽东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出乎意料的蒋介石派张治中随行。8月27日，一架美式飞机飞抵延安。

毛泽东赴重庆，身边需要一位勤务员，当时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有孙振、秦昌怀和齐吉树。齐吉树身体魁梧，性格憨实，做事干练，经过几次筛选，决定让齐吉树陪同毛主席同机赴重庆，护理日常生活。齐吉树在主席身边几年，情况最了解。李克农对齐吉树说："重庆与延安不一样，那里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特务多。主席的吃、喝你要照顾好。"

"是，我一定做到！"齐吉树立正回答。

这时，齐吉树与毛泽东的家庭特护李若准备10月份结婚。还有秦昌怀他们，两对一块结，组织上已经批准了。8月28日飞重庆，10月能否回延安就很难说了。是提前结婚还是推迟婚礼，就由这两对青年人去考虑了。

一日，江青对齐吉树说："你去重庆的任务已定，去，婚事怎么办？"

"我与李若商量好了，推迟婚期，去重庆，一定把主席的生活照顾好，你就放心吧。"

秦昌怀留在延安，也要推迟婚期，等主席谈判胜利归来，再与齐吉树他们一块办喜事儿，到时还请毛主席参加婚礼呢。

毛主席和齐吉树身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洗得褪了色。如果到了重庆就显得太土气了。

齐吉树问江青："主席穿什么？戴什么？"

江青说："两套外衣，两套衬衣，已通知北平三人小组了，近日就能送来。"

给齐吉树发了一身粗布蓝衣。他高兴地笑着说："等从重庆回来，我可有结婚礼服了。"

"重庆那地方不同延安，穿戴讲究。衣服洗了，得熨烫平整。齐吉树，你会熨衣服吗？"江青问。

"不会。我们都是衣服晾个半湿不干的时候叠起来，一摩挲就平了。"

"呵呵呵！"江青笑了，说："那样不行，你带个熨斗走，学学熨衣服，到那里没这个不行。"

齐吉树找到苏联在延安的医务专家阿拉夫，借到了电熨斗。又同江青一起去那里给毛泽东借了顶礼帽。

齐吉树拿来电熨斗不知怎么使，脱下自己的上衣学熨，烫来熨去还是不平整。江青走过来说："干烫不行，衣服多半干或干衣服喷点水，垫上块拧干了的湿毛巾，不然衣服会烫坏的。"她说着又做了示范给齐吉树看，把着手教给他，一会儿工夫就学会了。不过，熨衣服在陕北是用不上的，只有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才有用场。

毛泽东在陕北一直过着与战士同样的生活，穿布鞋着粗棉布衣服，齐吉树最了解他的家底，找不出一套象样的衣服，连双皮鞋都没有。师哲托叶剑英买来一双黑色皮鞋，北平送来套蓝灰布中山服。江青准备了两套衬衣衬裤。齐吉树又问："除了这些，还带什么不？"

"再带点书，挑他最爱看的。"

"主席的书那么多，带哪本呀？"

齐吉树和江青一起选了几本马列的书和古代散文，还特别告诉带上陈寿著《三国志》，和司马迁著《史记》，再加上一些文件，装了满满一箱子。毛泽东看了看满意地说："书是很沉的，就先带这些吧，需要的在重庆也许能买到。"

一切生活用品准备停当，齐吉树陪伴毛泽东整装待发。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你这顶帽子戴着不合适。"

□毛泽东回答："稍微小一点，我知道。"

1945年8月28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毛泽东起得格外早。他步出窑洞，遥望空中，天空特别晴朗，在宽绰宁静的枣园里踱步，宝塔山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更雄伟壮丽。

事先有约，这天8时许，在枣园小礼堂集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周副主席是头一天从重庆坐飞机来的，提前到了。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说："人到齐了吧？"

"到齐了，出发吧。"周恩来微笑着说。

10时半，毛泽东巍然屹立在机场，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

临上飞机前，周恩来微笑着对毛泽东说："你这顶帽子戴着不合适。"

"稍微小一点，我知道。"

"小，也太薄，不隔凉。重庆酷热，一晒就透，受不了的。"周恩来随即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说："你戴上我这个帽子试试。"

毛泽东把他的帽子摘下，给周恩来，周不要，毛泽东顺手戴在齐吉树头上。又戴上周恩来的帽子，挺合适。毛、周二人呵呵地笑了。

毛泽东朝周恩来说："我戴上，你怎么办？"

"重庆是我的一个家，去了还搞不到个帽子。"周恩来微笑着说："主席，人到齐了，上飞机吧。"

毛泽东与送行的首长一一握手、告别。又客气地让赫尔利先上飞机，又让张治中。主席步上舷梯，齐吉树紧跟其后，后边依次上飞机的是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

毛泽东走近机舱口时，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他停住脚步，回过头去望着上万的送行人，慢慢地摘下那顶盔式帽，庄重而轻缓地举起来，高高举过头项，有力地挥动着，满怀胜利的信心，向欢送的广大军民告别，专机由西向

东，冲上延安晴朗的碧空。俯看延安大地，欢送人群，招手示意，恋恋不舍离去。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飞机在延安上空稳稳地转过一圈后，便直向西南，重庆方向飞去。

这是一架赫尔利的专用飞机，不太豪华，但舱内设备还不错。分软座硬座，中舱有一隔音室，室内有软卧。

张治中与赫尔利齐声请毛泽东主席进卧室。毛泽东礼貌相让：赫先生，张先生请。他二人都不去，坐在软座上。

齐吉树陪伴毛泽东进入卧室，把携带的东西放好。说："主席，您躺一会吧！"

"坐吧，坐着得看书。"毛泽东看书，齐吉树看到机舱最后有个空座儿，他便走过去坐下。

不一会儿工夫，毛泽东叫："小齐，小齐。"

齐吉树连忙走过去，毛泽东在床上坐着，"主席，你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让齐吉树也坐在床上，说："齐吉树，这回到重庆去，你害怕不害怕？"

"不害怕，有主席呢，怕什么！"

"对，不害怕就对了。"毛泽东亲切地与齐吉树交谈起来，"这次去重庆谈判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谈判达成协议，胜利返回延安；另一个，被蒋介石扣起来，坐牢，杀头。你怕不怕？"

"不怕！"齐吉树20来岁，正血气方刚。

"你不怕，我不怕，人民都不怕。"毛泽东笑了笑又说："第一个可能大。你知道吗？我们有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1亿多人民支持我们，一定能回来的。"

□蒋介石先出一言："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起锅灶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锅灶干什么？"

时针指向下午3时45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素以"东方雾都"著称的重庆，这天却是难得的晴天。正是重庆炎热季节。正午一过，欢迎毛泽东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欢迎队伍中有各界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方面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谭平山，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

毛泽东稳步走下专机后，把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这个消息立即被中外记者报道给全国全世界。

下午4时许，毛泽东坐上汽车后问张治中："我住什么地方？"

张治中急忙回答："委员长专嘱，请您下榻在条件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那里房间大，住着舒适，设备齐全。"

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们不住这个招待所。"

心情愉快的张治中，立时尴尬起来。少顷，他试探着问："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条件稍差些，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住。"毛泽东干脆地回答。

汽车疾驶林园，毛泽东下榻后，勤务员齐吉树连忙问："主席，先洗个澡吧，一会儿好用饭。"

先不忙洗。齐吉树，你把今天重庆的报纸找来我看。"毛泽东先看新华日报《号外》，报道了重庆市广大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向《新华日报》馆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到达重庆的无限喜悦。登了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这封信，毛泽东用铅笔做了标记。

毛泽东看完报纸以后，才去洗澡。

当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同前往蒋介石在山洞林园的官邸赴宴，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应邀作陪。

这是毛泽东、蒋介石相隔19年后的第一次晤面。晤面时，二人在门口合影留念。合影后，蒋介石先出一言："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锅灶了。"

毛泽东当即幽默回答："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锅灶干什么！"

蒋介石无言以对。众宾入宴就坐。

齐吉树是北方人，他初次到重庆，对那里的生活很不习惯，不过他年轻，有些困难也能抗过去。

初到重庆的毛泽东，对气候、环境还比较适应，唯一不适应的就是吃不惯西餐。头一天到渝，就在蒋介石的招待晚宴上，吃的全是最好的黄油、牛奶、面包、果酱、牛排等。毛泽东吃罢后没说什么，齐吉树对警卫员私下说，这种饭吃不饱，远不如小米干饭、棒碴粥实惠。

8月29日早餐，仍然是西点。毛泽东吃完后就把齐吉树叫到屋里去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一天到晚都是面包、面包，我不习惯。你去和他们说，换成中餐。"

齐吉树和陈龙、龙飞虎商量，让龙飞虎去交涉。龙飞虎对餐厅管理人员说："毛先生不习惯吃西餐，请改成中餐。"

人家推说：不能随便改，改了要受批评。

"中国人吃中国饭准批评？"齐吉树生气地说，"一定

是没有会做中国饭的大师傅了，纯系推辞。"他们一连提出三次，才改成吃中餐。

毛泽东吃完饭又问齐吉树："你看中餐怎么样？"

"好吃。"齐吉树笑了。

□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们三位先到外面呆一会儿，我毛泽东不会出事的。"

□"哦，蒋介石就这样？"齐吉树说。

在山洞林园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国民党的宪兵、卫兵林立，把守非常严密。

毛泽东身边只有龙飞虎和陈龙两名警卫，每人身挎两支手枪。齐吉树只有一支手枪，别在腰间。重庆方面知道这三人有枪，让他们登记。枪支号码，子弹多少，要他们把枪和子弹都交出来。三人一商量，说："想让我们空手赤拳吗，坚决不交！"齐吉树拿起登记表撕了个粉碎，扔进字纸篓。

重庆的夜幕来临，华灯初上，林园死一般的寂静。

夜8时许，毛泽东像往日一样，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报，齐吉树他们三个人坐在旁边。这时，突然闯进来三个人，齐吉树和两个警卫噌地站起身警觉起来。来人冷冰冰地说："你们三个出去，让毛先生留在这里。"

反映敏捷的陈龙三人唰地握住枪把，瞋目以视，静以待变。虽一言未发，保卫战似乎开始了。正在僵持不下时，毛泽东说道："你们三个就先到门外呆一会儿吧，我毛泽东不会出事的。"

齐吉树三人立于门外一侧。不一会儿，蒋介石身穿军衣，在七八名荷枪实弹的保镖簇拥下，威风凛凛地来了，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立刻把前庭及门道里的电灯唰唰都关了，周围顿时一片黑暗，只有毛泽东的房间里透出一点点光亮。

龙飞虎小声对齐吉树说："蒋介石，刚进去的是蒋介石，这可能是礼节性的拜访。"

"哦，蒋介石就这样儿。"齐吉树惊奇地说。

约摸半个小时，保镖出来先开灯，随后蒋介石匆匆离去，卫兵前护后拥。

齐吉树三个神情紧张地回到屋里，毛泽东坐在沙发椅上看报，一见他们就禁不住地笑了，说："这就是所谓的拜访，不必大惊小怪。"稍停片刻又说："看怪不怪，这里是国民党统战区、首都、大后方，他们那么多人，那么多军队，我带了你们三个人，他们就害怕了，心虚啊。可笑。"

"做贼的都心虚。"齐吉树随便说了一句，逗得人们都笑了。

毛泽东对他们仨亲切地说："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谈判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都很费精力，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斗争。对方提出"没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批驳：抗战8年，内战是没有断的，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列举诸多事实。蒋介石和他的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也无言以辩。看来他们对谈判也无任何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没提出来，只是敷衍应付，其用意是使谈判不得结果，把毛泽东拖在重庆。

毛泽东早有准备，颇有诚意地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的方案：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有平等合法地位。蒋介石死活不愿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顽固地拒绝解放区民主政权，实施"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来取消人民军队和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斗争十分激烈，拖到9月20日，致使谈判完全停顿下来。

谈判桌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搏斗紧密相联的。蒋介石秘密大举向解放区进犯，9月中旬，我军击退逼近张家口的蒋军。为了有力地配合谈判斗争，毛泽东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粉碎蒋介石、阎锡山向我进犯的"上党战役"计划。在战争进行中，毛泽东发出许多指示，通过红岩上空电波，飞过重重云雾，传到延安，传到各解放区。上党战场上，歼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3万5千余人，紧接着又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蒋军7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重庆谈判的斗争。

蒋介石诬称我方谈判"没有诚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撕下调解人的假面具，指责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使谈判又停滞不前，他便放风要"返国述职"，谈判陷于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指示拟写国共会谈纪要稿，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则问题公布出来，把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交由即将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去讨论解决。最后，以会谈纪要草稿为基础作了些修改，双方于10月10日签字。这 就是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

历时43天谈判，告一段落。

□齐吉树说："蒋介石杀人了，他们胆敢把我们入狱吗？"

□毛泽东说："坐牢，我们有看书的机会了。"

浓雾笼罩山城，山城细雨绵绵。压抑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签订协议的前几天，柳亚子拜访毛泽东。柳是毛泽东在广州工作时期的老朋友，他一见到老朋友就兴奋地流出了热泪，促膝畅谈后，即兴赋诗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张天大勇民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毛泽东应柳亚子先生的索求，亦把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手书赠与。柳亚子获宝书，喜不自胜。

傍晚，由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驱车送柳亚子回寓所。那天有人请毛泽东在戏院看《三岔口》和《十三妹》，周恩来陪同看戏，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是陈龙。

送柳亚子的汽车是办事处的，司机是雇用的，在回曾

家岩途中，车速很快。路旁横躺竖卧有一群背粮食的国民党士兵，他们走累了，在这里休息。不料汽车将一士兵的脚压伤，士兵急喊汽车不停，旋即开枪，击中后座上的李少石，急送医院，因流血过多，不幸遇难。车开进库房，司机逃遁。此事即刻告知周恩来。周恩来为避免惊动毛泽东，悄然离开剧场，离开时说："主席，我有点事先走一步，你继续看戏吧。"周恩来又嘱咐陈龙："没有我的命令，一定不能离开主席。"

周恩来、王若飞立召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要他立即查清此事，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要张震自己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周恩来神态异常严峻。

张震一个立正，说："是！"

同时，办事处派车去城里把正在逛街的齐吉树找回来。齐吉树一上车，见座位上有血迹，不知出了什么事。回到红岩，见到毛主席，方知原委。他年轻气盛，狠狠地说："蒋介石杀人了，他们胆敢把我们入狱吗？"

毛泽东坦然地说："坐牢，我们有看书的机会了。"

为了澄清事实，周恩来亲赴肇事地点巡访，证实这是一次意外的事故，并将真实情况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共产党敢于公开事实，颇受各界人士钦佩。

□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毛主席是你接来的，回去你送不送？"

□张治中诚恳地回答："我应该接，应该送！"

10月10日下午6时，在桂园举行了《双十协定》签字仪式，11日毛泽东就要返回延安。

在这个时候，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周恩来得知张治中打算于《双十协定》签订后去兰州的消息，立即抓住时机，对张治中说："毛主席是你接来的，回去你送不送？"

张治中诚恳地说："我应该接，应该送。不过，我去兰州乘的飞机一般，毛主席坐什么飞机呢？"他陷入沉思。经过协商，决定坐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周恩来满意地朝张治中说："劳你的大驾了。"

那天晚上，毛泽东住在张公馆。齐吉树得到通知，次日清晨，由红岩去九龙坡机场。他整理好行装，一宿没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

10月11日上午9时半，毛泽东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重庆各界代表几百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毛泽东在机场很高兴地见到齐吉树："我的东西没落下吧？"

"没落下，全带来了。"

"好，咱们坐飞机回延安了，你高兴吗？"

"高兴，一夜没睡着觉。"

毛泽东在机场对中外人士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周恩来说："人来齐了没有？"王若飞说："齐了。"

"上飞机吧。"周恩来招手示意。由张治中先生陪同，毛泽东登上专机。

上了飞机，齐吉树大喜。飞机很大，中舱两张床铺。听说是蒋介石一张，宋美龄一张。毛泽东坐下，齐吉树坐在对面床上。放好了东西，齐吉树想去外边坐。毛泽东挥手让他不要去了。并说："40多天，你辛苦了，回到延安放你几天假休息。这次没白来，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这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有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晴空万里，飞机飞行4个小时，下午1时半，抵达延安上空。毛泽东站起来，透过机窗眺望着隐约可见的宝塔山……

（刘鹦林，《党史博采》）

材料八　毛泽东一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亦乐乎

为毛泽东而设的晚宴是在热情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宴会厅内的十几台大吊扇一齐开动起来，阵阵凉风送爽，宾主开始宴饮。几十个漂亮女招待身穿全套白制服，有的在一旁悉心侍候，有的紧张地跑来跑去，忙着上菜。

貌美的宋美龄女士坐在赫尔利和毛泽东之间，手捧着高脚酒杯，面带矜持的笑容，心里却忐忑不安。今晚宴席上的菜是按照她划的菜谱制作的，她不知道是否合客人的口味，各种冷菜的搭配能不能赢得客人的好感？也许，应该多弄几个有辣椒的菜，据说毛泽东的爱吃辣椒的，他有一句名言：不会吃辣椒的人，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她正这样想着，麦克风的吱吱响打断了她的沉思。她的丈夫、今晚宴会的主人蒋介石站起身来发表讲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在这么多尊贵的来宾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终于坐到一起来了。政府方面高度评价毛先生莅渝和谈的崇高举动，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毛先生和中共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说罢，蒋介石带头鼓起掌来。

掌声久久不息，良久乃止。

接着是毛泽东站起身来致答谢词，他的谢词很简单，感谢蒋委员长和夫人以及各位来宾的盛情。

蒋介石表现出作为宴会主人的热情，他举着酒杯来到毛泽东身边，满脸带笑地说："欢迎你，毛先生。"

毛泽东同样举起酒杯，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委员长。"

蒋介石听见毛泽东称他“委员长”,很是高兴,又举起酒杯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泽东也很得体地回了礼。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似乎不适应这样一种彬彬有礼的气氛,或许他觉得国共两党既然存在尖锐的矛盾,甚至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就用不着如此温文尔雅,应该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表露出来。他看了赫尔利一眼,赫尔利似乎能够容忍这种不协调的气氛,他在和一旁的宋美龄说笑。

魏德迈以军人的果敢来到毛泽东面前,劈头便问:“请问毛泽东,你知道伯奇事件么?”

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是三天前发生的事。美国陆军上尉约翰·伯奇和一名国民党军官带领一个由多名美国军人和国民党人员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徐州附近侵入解放区。当地解放军得到可靠情报,知道这个小组是戴笠指挥的情报小组。对这种间谍活动,解放军是有权采取任何措施的。但当地解放军出于对美国军官的考虑,只是阻挡他们的行动,并未拘捕他们。但是,伯奇不仅不认错,反而辱骂解放军是“土匪”。旁边的国民党军官自知理亏,劝伯奇停止挑衅时,伯奇却狂妄地宣称:“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样对待美国人。他们杀不杀我,我满不在乎。如果他们杀我,他们可就完蛋了,因为美国会用原子弹来惩罚他们。”当地解放军见伯奇竟然执迷不悟,仍然要往解放区侵犯,便当即扣押了情报小组的人员,并处决了气焰嚣张的伯奇。这就是所谓的“伯奇事件”。魏德迈在这样一个场合下提出这件事,居心何在呢?

毛泽东瞥了一眼气势汹汹的魏德迈,心平气和地说:“知道。我已读过当地解放区送来的调查报告。”

“那好,我以驻华美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名义,要求你现在就伯奇事件向我们作出解释。”魏德迈仍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

“如果这个美军军官死于误会,那么我愿意代表共产党军队向你表示谦意。”毛泽东冷冷笑道,“可是,尊敬的司令官先生,调查报告表明,伯奇事件并不是一场误会。”

魏德迈对毛泽东的毫不示弱非常恼羞成怒,大叫道:“是的,不是误会,美军和共军之间从来就不存在误会。正因为如此,我要向你提出警告,今后如再发生蓄意袭击美方工作人员的事件,一切后果概由你们负责。”

“我们当然知道应该负什么责。对于你来说,恐怕尤其需要有言在先,”毛泽东显得很轻松,谈笑风生,“今天先送你十六个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魏德迈被毛泽东的话窘得满脸通红,正要发作,蒋介石上前来扶住魏德迈坐下,笑嘻嘻地望着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既往不咎好啦,只要今后我们能好好合作,不还是朋友吗?大家都轻松点,别那么认真嘛!”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

宋美龄女士趁机插话:“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大家伴随站美妙的音乐跳个舞吧!”

于是,音乐声四起,宾主跳起了高雅的华尔兹舞。

宴会散去,由于蒋介石的再三挽留,毛泽东便在山洞林园歇息了。

(选自《黑雾红尘》作者:陈景彪、彭锦华)

材料九　恢宏洒脱: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交往录

1945年,重庆。

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谈判,举世瞩目。在谈判桌外,毛泽东广为交往,恢宏洒脱,以伟大的胸怀和天才,赢得了世人的赞颂。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

到重庆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便亲自登门拜访了神交已久的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

张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等作东招待。毛泽东一进特园,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宴会开始,张澜以特制的麦子酒向毛泽东举杯说:“会须一饮三百杯!”诗思敏捷的毛泽东征引陶靖节的《饮酒》诗,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宾主频频举杯,相互致意。席间,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增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话五四运动的往事。推心置腹,亲切无拘,谈得十分融洽。

毛泽东的老朋友柳亚子兴奋地流出了热泪。促膝畅谈后,他当即赋诗一首赠给毛泽东:“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张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后来,毛泽东应柳亚子的索求,把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他。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称:“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段在重庆诗词相赠的友谊,被人们传为佳话。

毛泽东在会见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等文化界人士

时，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周谷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毛泽东："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向大家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会见时，郭沫若因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毛泽东讲话，并注视着他的手势。他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见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泽东。

没有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

毛泽东在会见民社党领袖时说："张君励先生赠给我一封公开信，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

毛泽东在会见一批"小民革"(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时，兴致很高，开怀畅谈，从史册籍到《红楼梦》、《西游记》，旁征博引，以古寓今，切中时弊，针砭时政，使与会者受到很大教益。

毛泽东很念旧，对于昔日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不论当时是大学教授还是穷苦潦倒的赋闲在家，他都亲自去拜访看望。有一位当时贫病交加，生活愁苦，住在一面山坡上。毛泽东去看望他，当走进低矮潮湿的小屋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泽东，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泽东便同他位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要作为朋友来对待

除了广泛地会见有关人士外，毛泽东还在一些场合与广大群众相见。一次是在参加中苏友协宴会时，与在街头的上千名市民见了面。

那天细雨蒙蒙，重庆黄家垭口一带的街上，几千市民几乎把交通阻塞，人们在期等着一睹毛泽东的风彩。当毛泽东出现在"友协"门口时，群众齐声鼓掌，并发自内心的喊出："欢迎，欢迎！"一位十五六的小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泽东的手，立刻跳跃着回到她妈妈的身边，骄傲地说："妈，我握过手了"。

另一次是去中央大学访友时，消息霎时传遍全校，数百名学生聚集在校园的路两旁，热烈鼓掌，并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对此，毛泽东也很有感触，后来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了，可见人心向背呀！"

毛泽东、周恩来还会见了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向他们阐明了我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中共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坐在一起畅谈国家大事，这在历史上可能是一个开端。

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在重庆期间，他不仅会见左派，还要会见右派。对此，开始大家感到意外，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找他们谈也是在做工作，甚至是一种特殊的斗争。

有一次，毛泽东拜访陈立夫。一见面，他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时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他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边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杠枪上山了。"

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既巧妙地批评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又向陈立夫介绍了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告诫国民党不要重蹈覆辙。面对毛泽东的坦荡胸怀和机锋议论，陈立夫窘迫无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和"智囊"，国民革命时即大肆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他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去看他。面对毛泽东的拜访，他诚惶诚恐，诺诺连声，简直无地自容。毛泽东从戴宅出来，正好碰见蒋介石，当蒋听说毛泽东去看了戴季陶时，也猛然一怔，接着又陪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戴季陶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敬重和热切期望，他要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及其一行，并在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

三个美国兵把他们积存的115美元赠给了毛泽东

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三位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很想见到毛泽东。他们敲开曾家岩50号的大门，受到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的接待。不久他们再次拜访时，为了表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表示对毛泽东的敬意，特地将配给他们的几包美国香烟包装成盒带来，在烟盒里放了一张纸条，上写“祝毛先生好！”“祝国共会谈圆满成功！”“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和平繁荣的前途！署名“三个美国兵”。周恩来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用英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几天后，龚澎转告三位美国士兵，毛泽东很愿意会见他们，并约请他们在一起吃晚饭。

9月16日，三位美国兵如约到了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毛泽东看到客人汗流满面，立即把手中的扇子送给他们。合影后，毛泽东和客人进行了坦率诚挚的交谈，向他们阐明了中共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国内的情况，表示了对一些美国朋友的问候。随后在亲密无间、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共进晚餐。席间，三位美国兵将他们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泽东，以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援。周恩来马上询问：“这些钱，都是谁的捐款？”当三位朋友说明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深表感谢！临别时，毛泽东赠给他们一套(十二幅)版画，作为留念。

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设宴招待了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对中国的援助；会见了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的驻华大使和韩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阐明了中共的国内外政策。

毛泽东在重庆的社交活动异常广泛而频繁，上面记述的只是其活动的片断。通过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打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了解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向和政治主张。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和各种不同的社交场合，与人交往和社交礼仪，做到严肃而富于风趣，灵活而不失原则，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

(摘自《党史博览》93年5期，作者：盛平瀚)

材料十　重庆谈判前后的毛泽东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主席则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在这一时期，我们不仅让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而且允许美国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延安和各主要解放区设立联络组并到各地视察，执行调解任务。至于他们没有能够解决任务问题，最后只好收兵回营，承认完全失败，那可不能怪我们。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同蒋介石会晤。

这时，斯大林莫明其妙地插了一手(也许他的主观意图是执行雅尔塔会议的协议)，他通过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主席正在为这封电报生气的时候，斯大林紧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主席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最后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经过几天的准备，毛主席由王若飞陪同去重庆，周恩来、博古在重庆等候。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主席。

赫尔利是个粗鲁而不识事体的家伙。他第一次来到延安时，住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一天上午，毛主席专程去拜访他，他趾高气扬，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共应该把自己的军队全部交出来，归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编制、统一指挥。这样做，就可以得到美国供给的大炮、机关枪、飞机等等装备，否则就没有出路，而且美国人要骂你们的。毛主席冷静地回答说：“大使先生，你们美国有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牛油、面包，那都是你们的，你们自己享受好了。你们美国人吃饱了要骂人，那也是你们的自由，尽管骂好了，可以天天骂。而我们有小米子加步枪，属于我们自己享受。井水不犯河水，各归一途。”此外，还有许多挖苦的话，够赫尔利受的了。

这次，他来接毛主席，当毛主席和代表团成员登上飞机后，他最后登机，站到机舱门口，两手抓住门边，身子往后一仰，大声怪叫起来，好似野兽获得了猎物。他的举动引起了在场欢送毛主席的干部们的强烈不满，纷纷质问同来送行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包瑞德说：赫尔利是个粗鲁无知的莽汉，他是放羊娃出身，野性未改。

毛主席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

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等等。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主席归来。

毛主席在重庆历时月余，"双十协定"拟就，仍由张治中陪同返回延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的干部有4000余人，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因为这时中央机关干部基本上都离开延安去了前方。我上前迎接毛主席，并请他给大家讲话。主席的讲话很简短，大意是说：这次到重庆同蒋委员长会谈，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日内就要发表一个文件，叫"双十协定"。这是初步的收获，但还有许多没有谈到，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以后应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总之，打开了局面。毛主席讲完了又转向我说："你请张先生讲话。"我走向张治中先生，请他给大家讲话。张治中讲话如下："我把毛主席迎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机场上，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热烈欢呼。之后，毛主席回到枣园住处，张治中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同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的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没有休息几天，便开始过问工作。首先他要了解前方各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哪些地方同国民党军队发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对付的等等；其次，他听说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去了东北，有点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最后听到高岗也离开延安去了东北，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私下对我说："西北这么大的地方，该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为什么要往东北跑？把自己的事情丢下不管，都要进大城市，只想过好的生活，不想吃苦，这算什么态度?!"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大报告。他的话简洁明了，深入浅出，使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大大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志。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嵋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谁施肥。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选自《中华英烈》1989年6期，作者：师哲）

上党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所部三个师及二个挺进纵队共一万七千余人，从临汾、浮山、翼城向上党地区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进攻。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以太岳、太行、冀南军区三个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共三万一千人，采取以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再攻打长治，诱阎锡山部出击，相机歼敌于运动中的方针。九月十日，太行纵队首先向屯留发起攻击。十二日，太行纵队攻克屯留。随后，冀南、太岳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相继攻克潞城、长子、壶关，使长治守军陷于孤立。从二十日起，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从东、西、南三面合围长治。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八个师共二万三千余人，从太原出动，南下增援长治。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并佯攻长治，主力则秘密迎歼援军。十月二日将从太原来的敌军合围于虎亭以南老爷岭附近，并从左右两翼发起猛烈攻击，北面则虚留退路，诱其突围。十月五日夜，彭部在老爷岭阵地失守后，向北突围。晋冀鲁豫军区迂回部队先机抢占了虎亭以北的制高点，截断了该部退路，主力沿虎亭、屯留间公路两侧实施追击，至六日，除少部分国民党军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长治守军待援无望，于八日向西突围，企图逃回浮山、翼城。晋冀鲁豫军区除以围城部队猛烈攻击外，又以太岳纵队跟踪追击，于十二日将突围国民党军歼灭于沁河以东将军岭、桃川地区，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此役，歼灭国民党军十三个师共三万五千余人，缴获山炮二十四门、机枪二千余挺、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材料：

- 针锋相对——记上党大捷
- 挥师上党
- "不许蒋介石来摘桃子"

材料一　针锋相对
——记上党大捷

晋东南长治一带，古称上党。这个地区东控太行，西据太岳，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的一块根据地。日寇一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就伸了进来。

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阎锡

山的三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等三个师和两个挺进纵队共一万七千余人，先后侵占了长子、长治、屯留、壶关、潞城、襄垣等城。襄垣、潞城，早由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长治和其它诸城，亦正被我军围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现在胜利了，就挥动大刀向我们杀来，企图消灭劳苦功高的敌后抗日军民，独吞胜利果实。

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对我解放区大肆摧残。平汉路沿线的许多地方被抢劫一空，大批村庄被焚毁，无数革命群众被枪杀。尤其恶毒的是：阎锡山还在各地组织了维持会、还乡团、特务队，从事暗杀和破坏活动。他们到处捕捉我地方干部、军烈属、伤员、民兵、自卫队员，施以火烧、剥皮、活埋、刀铡、枭首等法西斯暴行。人民流离失所，哭声震天，解放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我们正处于忍无可忍的时候，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从延安回来了，并在潞城以西黄碾村，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刘、邓首长首先谈了全国的战局，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面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一面积极调兵遣将向我解放区进攻，准备挑起全面内战。刘、邓首长还告诉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挽救内战危机，毛主席已亲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反动派是欺软怕硬的，同他们讲和平，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毛主席指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幻想，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就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果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我们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消灭它。刘伯承师长说：现在阎锡山一刀子已插入上党，企图分割我太行太岳两区；同时敌人又令胡宗南迅速打通同蒲路，与阎锡山南北通气。然后再沿正太路东进，企图控制华北，消灭解放区。因此，我们决定组织上党战役。刘师长强调指出：上党战役关系全国的战局，关系着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我们必须坚决打好这一仗，给敌人迎头一棒，让它尝尝人民的铁拳头。

会议确定，先攻打长治外围各县，吸引敌人出长治，将其消灭于途中，然后攻长治。

攻克长子

我们三八六旅的任务是攻打长子。我和旅政委张祖谅同志研究后，决定以七七二团先攻占长子北关，而后在北门登城；沁水县独立团佯攻东门，箝制敌人；二十团、三十八团首先占领西关，而后从西门发起攻击。

九月十三日，七七二团首先向城外北高庙发起猛攻。这是一座形如龟头的孤陡小山，站在山顶能看清城内来往的行人，炮火也可由此越城射到大街上。敌人拚死命防守。我七七二团连攻四次未能拿下，可把干部和战士都气坏了。这个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享有"夜老虎团"称号的部队，当即改变了攻击方向，拿出他们"夜摸"的本领，在第三天夜晚，以一个排，从敌人梦想不到的背后摸上北高庙。有的敌人还在梦中就当了俘虏。

占领北高庙，砍断了龟头，砸烂了长子的屏障。七七二团立刻攻击北门。守城敌人慌乱了，集中全力应付北门。这就有力地支援了主攻部队二十团和三十八团的战斗活动。

长子城墙高约八米多，城门外有石碉，城角有砖碉，城角外有低碉，每个低碉附近还设有三个以上的暗碉，可在不同水平线上进行直射与侧射；沿城有一道三米多宽、两米多深的抗城壕，积水过腰；壕外有一米多高的铁丝网，主要地段设有地雷，交通要道设有拒马。这些设施是日军留下的，经阎锡山加修改造，更加坚固了。

当时我们弹药很少：一门山炮仅二十发炮弹，一挺重机枪才一千发子弹，火力保障只能坚持十分钟。我们只有这"一瓢水"，必须在这"十分钟"内一次突破。因此这个要求成了战斗 的动员口号。各部队当即根据这个要求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准备。十八日黄昏十九点整，两发绿色信号弹划过天空，攻城开始了。山炮集中火力打开缺口，战士们冒着炮火，冲过开阔地，爬过铁丝网，从跳板上冲过护城壕，把云梯架上城墙。恰恰是"十分钟"，突击部队登上了城头。紧接着，七七二团、三十八团和士敏县独立团，也相继攻入城内。

城里的敌人组织了数次反击，都被我们打垮。二十团迅速占领钟鼓楼制高点，控制全城，支援各团巷战。他们不走大街，沿着房屋挖洞前进，很快拿下了县政府，活捉阎军二纵队司令白映瞻，打死敌官兵五百多。子夜，战斗结束时，兄弟部队也先后拿下壶关、潞城、屯留、襄垣，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

围城打援

长治被围得水泄不通。三八六旅已占领长治的北关村，正修筑交通沟，荫蔽接近城墙。忽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路滑土软，登城准备不得不暂停。我们都很着急。正在这时，军区来电说：阎军援兵两万多人，在其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指挥下，从沁县出发，日夜兼程南进，企图解长治之围。阎锡山在给困守长治的十三军军长史泽波的电报中说："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即到，共军即败。"

情况变化，形势紧张。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敌人八个师的援兵，如果继续攻城是不利的。在这刻不容缓的关头，刘、邓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分东西两部，沿白晋线北上迎敌，先歼灭援兵，然后再攻占长

治。

战士们从泥泞的工事中爬出来，穿着被雨水淋湿的衣服，悄悄地向北出发了。秋夜的北风吹在湿衣上，寒气刺骨，但大家听说要打更大的仗，个个摩拳擦掌，早已忘记寒冷了。

十月三日，我旅赶到了屯留以北的余吾镇，七七二团当即控制了东梓，二十团占据了从岳地到余吾一带的公路，士敏县独立团进抵草滩。前面就是由四条山梁组成的居高临下的老爷山，它与白晋路东磨盘垴相呼应，是长治以北唯一险要地带。我们拟在这里阻敌南进，不料敌先头部队四十七师先我占领山顶，控制了山顶上的一座古庙，并在山上构筑工事，企图扼守，稳步向长治推进。我们从东西两面多次攻击未下。十月四日夜间，二十团以突然的迂回动作，占领了东侧两个山梁，切断敌四十七师与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控制了山上的水源。敌人饮水断绝，陷于孤立，两天后，仍放弃阵地北逃。我各团急追，逃敌被歼一部，老爷山被我全部占领。我旅指挥所随即移到老爷山。这时，磨盘垴方向炮声隆隆，太行部队正在与敌人酣战。敌人大部队仍沿着公路向南运动。突然间，我们发现东边一股敌人向北移动。奇怪，敌人大队向南，而小队向北，耍什么花招?很快，我们识破了敌人的把戏，原来是要逃跑，是佯南而突北。三天来彭毓斌狠挨了几拳，不想跟着史泽波送命于上党。事不宜迟，我们立刻把情况报告给纵队首长。

不多时，陈赓司令员来到老爷山上，亲自观察了一阵，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确定开始退却了。于是他马上要二十团沿公路左侧北进，插入敌后，追上敌人。陈司令员急速又严厉地命令着："要赶到敌人前头，迫使敌人停滞在虎亭以南地区，以便围歼。"

我率二十团立刻出发了，后面部队由张祖谅同志指挥。黄昏，敌人沿公路逃，我们爬山路追，人不歇脚，马不停蹄。"追！追！追上就是胜利！"战士们都懂得这个道理。突然，前面一条河挡住去路，水流湍急，两岸陡悬。楚大明团长领先涉水而过，战士们也随后紧跟过去了。又走了四十多里，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这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找来老乡一问，方知有一百多骑马的敌人已逃过漳河。敌人指挥部溜掉了。我们听到这话心里很急，赶快布置部队进入阵地，控制河口，切断公路。

十月七日天刚明，只见小山前公路两侧的洼地上，敌二十三军与八十三军聚扰了两三万人。他们好象大雨来临前的一群群蚂蚁，在道路上不顾首尾，东跑西窜。敌人发现我们之后，开始炮击，炮弹雨点般落到我们阵地上，步兵也在浓烟烈火中向我发起冲锋。二十团的英雄们，一次又一次地抵住了敌人，并组织一个连、一个连的反冲击，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由早晨到中午，由中午到下午，当敌人的第八次集团冲锋被打垮后，内部混乱起来，把大炮推到河里，再也不向前冲了。二十团固守阵地，赢得了时间。傍晚，太行、冀南和我太岳各路大军，分别从左右及后面围拢上来，把敌人紧装在口袋里。与此同时，河东一营部队和头戴钢盔，手端刺刀，急急来援的阎锡山省防军，也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肉搏战，迫使敌人不得前进一步。就这样，两万多敌人，除彭毓斌和少数随员侥幸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歼灭。

追歼逃敌

土落村战斗一结束，军区首长就决定将沁水县独立团升级为三八六旅的第二十一团。该团在这次大战中，的确锻炼出来了。这时长治守敌史泽波部弃城西逃，刘、邓首长即令太岳部队追击该敌，我旅和三十八团也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立即出发，用最快速度，沿吾元、张店一线向西挺进到马壁镇，在东西峪一带截住敌人，坚决、彻底消灭它！

从地图上看，土落村到东西峪约二百余里，并不算远，但一路全是大小山峰，半天爬不出一个山岭。走了两天两夜，赶到东西峪附近，敌人已经过去了。部队实在太累太饿，但来不及停下做饭，决定一个班一个班分配在老乡家，弄点现成饭吃。

我一边吃东西，一边深思。战役没打响之前，刘、邓首长就再三指出上党战役关系全局，如果我们在这紧要关头，行动迟滞一小时，让已入网的敌人逃脱，不但正在逃命的史泽波喜欢，连坐在重庆谈判桌上的蒋介石也会喜欢。那时，蒋介石还摆着自恃武力的架子，把经过谈判初步达成的协议，搁置起来，不肯签字，梦想阎锡山能替他挣个面子，眼巴巴地望着押在上党地区的这笔赌注。

部队立即出发。二十一团走山梁，二十团和三十八团走山谷，七七二团单独沿张店、将军岭、马壁一线，绕大弯子先插过去，以防敌人万一漏网。又走了一段路，前面侦察部队报告：佛庙岭、将军岭一带发现敌人的队伍。好了，我放下了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自言自语起来："史泽波呀史泽波！可把你抓到手了。"

敌人从长治过横水到东西峪这四天中，到处遇到我民兵、游击队的袭击，加之太行部队一个团的尾追，弄得它进退两难，简直象乌龟爬沙，走走停停。战士们听说前面就是敌人，劲头来了，走得更快了。当晚，我们布置了战斗任务：必须于明天（十一日）在桃川一带彻底消灭敌人。

东方大亮，我们站在桃川山头上。昨天夜里，七七二团早就在将军岭同敌人打响了，这时，二十团、二十一团、三十八团也从佛庙岭加入战斗。太行部队也尾随而来，包围圈越来越小。激战到下午三时，敌人被压缩在桃川村，于是，我们发起了总攻。六时，战斗结束，史泽波的一万人马，除少数溜掉外，全部被歼。我俘敌官兵五千余人，史泽

波本人也被我旅活捉。七七二团还追到马壁村西边，将逃敌先头一个团吃掉大半。追歼史泽波部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上党战役，是一次干净、彻底、战果辉煌的歼灭战，历时三十余天，共歼敌十九军、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等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余人(占阎锡山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以下将官二十七人。彭毓斌逃回沁县后，自知坐在重庆谈判桌上的蒋介石不会饶恕他，自杀了。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主力三万一千余人外，尚有民兵五万余人。这是主力军与民兵大结合的一战。这一战，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企图迅速占领全华北的野心，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日程，给自恃武力的蒋介石，泼了一桶冷水。当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消息传来：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了。这当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我们党和反动派积极斗争的结果。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也许，正由于上党战役的胜利，才使蒋介石暂时"舒服"和"老实"了一些。

(刘忠，《星火燎原》之七)

材料二　挥师上党

在李达围攻襄垣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等军区首长经过共同商议，于8月29日向延安报告：

(甲)阎匪一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重兵歼灭不可。

(乙)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之八千人，共约三万一千人，进行上党战役。

(丙)估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以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太岳主力转向同蒲线。

……

刘少奇是吃完晚饭后收到电报的。他独自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去找朱德：

"老总，刘、邓来电报了，您看一看。"

"好快哟！"朱德边说边接过电报，看着看着，眉间就锁紧了。抬起头看看刘少奇一脸的焦虑之色，好半天才说：

"润之在重庆的情况不晓得怎么样，我看还是发个电报问问他的意见。蒋介石是个大流氓，逼急了，他啥子事情都做得出来。"

刘少奇点了点头。

9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三人赶到刚刚被李达收复的襄垣，住进了县署二堂东边的的寅畏堂，中央的电报也跟着到了。紧接着，刚刚成立的冀南、太岳纵队的先头部队也赶到了。

中央的电报引用了毛泽东回电的原文：

"上党战役一定要打。打得越好，我在这里越安全。"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召开了各纵队旅长以上首长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作了上党战役前的动员和部署。会议确定先打长治外围各县城，把敌军主力引出长治，于城外歼灭之。具体的作战布置是：以太行纵队的主力首攻屯留；以太岳纵队和冀南纵队的主力集结于长治至屯留的几个敌必经之地。随时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敌；另以太岳纵队一部监视长子，冀南纵队一部监视潞城，太行纵队两个团围困壶关。

刘伯承强调说："这一仗，是我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的转变。攻坚、登城，我们没有好经验，加之弹药又缺，所以我要求大家组织战斗要老老实实，千万不可蛮干、硬拼。要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胜利！"

邓小平立即补充道："刘司令员是要大家在指挥作战时特别讲究战术。但是，情况危急时，该拼命还是要拼命，因为我们这一仗不光是保卫华北解放区，更重要的是支援和保卫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请大家务必向基层指挥员和战士们讲清楚，上党战役必须打好！"

9月10日下午8点，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上党攻坚战打响了。

守备屯留城的阎军挺进第六纵队一千余人，凭借城墙及日伪遗留下来的坚固堡垒工事顽强抵抗。李达的部队进展困难。

入夜，李达调来十七师的炮兵协助攻城，轰塌了一截城墙，但阎军以严密火力封锁，李达考虑刘邓的总体作战构想是围城打援，故未组织强有力的突破。

9月11日清晨，长治的援军出动了，总数约六千人，沿着长治至襄垣的公路浩浩荡荡地开进。按照刘邓对设伏的部署，是先堵住援军的两头，"扎住口袋，再从中间插刀子"。也许是看到敌人太多了，埋伏在长治城外负责扎口袋的决死队一旅的一个名叫时贵平的连长太紧张了，枪突然走火，暴露了刘邓的整个作战意图。刚刚将头钻进伏击圈的敌军立刻转身溜进了长治城。刘伯承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决一旅马上撤回，同时又命令路西的冀南纵队也撤回一些部队，并要求示形于敌。

邓小平在旁边听了，笑着问道：

"司令员，你这一手在兵法上叫做啥子名堂？"

刘伯承见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打算，笑道：

"兵法说'不得遵常'，我们就偏偏来他一个'遵常'。不过，这个计策三七年在平定七亘村已经对日本人用过一回了，不晓得这一回还灵不灵。"

"依我看，要想灵，还得加上一条计，长治外围的四个城一起攻，让史泽波以为我们确实把设伏的部队抽去攻城去了，这样，他就会放心大胆地出城增援。"邓小平提示道。

"对！就这么办。"

当天夜里，撤回来的打援部队又悄悄地回到了原来的设伏地点。

增援屯留部队果断舍弃尾巴，返回长治城内，史泽波不由得叫了一声“好险”。

中午，派出的探子回来报告：

“八路军的部队已经撤走啦。”

史泽波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立即命令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的守军加紧防范八路军攻城。

9月12日凌晨，监视潞城、长子、壶关的部队向守军发起了佯攻。鞭炮在铁皮洋桶内啪啪直响，喊杀声响成了一片。守城的阎军慌了，都以为是设伏的八路军来攻城了，急忙向史泽波告急。

告急电报接二连三地送来，史泽波看了两份，一拍桌子，对睡眼惺松的副军长周波说：

“你守城，我去增援屯留！”

说完，就命令前一天半路返回的部队立即跟随自己出发。

“刘伯承用兵真是灵活，一计不成，马上变计，而且行动好快！”

史泽波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夹在队伍的中间走，边走边琢磨起自己的对手刘伯承来。有关刘伯承的事情一件一件在他的脑子里回想起来……

认识刘伯承是在1943年夏季，那个时候，自己刚刚升任暂编三十七师师长，与一二九师联手吃掉了日军一个大队……

第一次听说刘伯承是什么时候?对了，是抗战开始的那一年冬天，当时自己还当团长，有一天，卫立煌副司令长官到师部训话，提到了刘伯承，并且极力夸赞他用兵灵活，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是因为什么事来着?对了，说的是他在平定县的什么地方重叠设伏的事儿，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同一敌人……。

“哎呀，不好!”想到这里，史泽波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朝车窗外大喊：

“停止前进，赶快返回长治!”

眼看就要上钩的鱼儿又溜了，刘伯承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因为八年前的那场战斗造成的，怔怔地站在那里出了一会神，邓小平走过来对他说：

“史泽波不敢出援就算了，我们干脆利用他这种心理，先集中力量砍掉他的四只脚再说。”

“只有这样了。”刘伯承仍然闷闷不乐。

刘、邓的作战部署一变，李达的太行纵队当天就拿下了屯留城，并于次日乘胜进攻壶关。潞城、长子的攻坚战也于13日凌晨全面展开。

担负攻打长子任务的是太岳纵队的三八六旅和决一旅三十八团。城内守军是阎军挺进第二纵队和该县两个保安大队，共计二千一百余人，指挥官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白映瞻。

战斗打响后，攻城部队在三八六旅旅长刘忠的统一指挥下，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展开攻击。经过五小时的激战，二十团首先攻下西关，但因城北北高庙守军的火力可以超过城墙，射到城内大街上，随后跟进的三十八团未能向纵深进展。

进攻北高庙的是“夜老虎”七七二团。因守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七七二团的四次正面攻击都未能奏效。双方相持到第三天晚上，七七二团的一个排趁夜色摸到北高庙背后的城墙边上，佯称是城内的增援部队，一路顺利地上了北高庙。经过短时激战，七七二团拿下了北高庙，攻占了北关。

……

17日夜，冀南纵队攻克潞城。

18日夜，太岳纵队占领长子。

18日夜，太行纵队拿下壶关。

至此，长治外围五城全部被刘邓收复。

太行、太岳、冀南三支大军围攻长治。

这三个纵队以及正在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作战的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一部就是二野的前身。

正当上面的战斗紧张进行之时，重庆国共两党的代表团正在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双方都懂，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蒋介石把毛泽东“凉”在一边不管了，声称是身体欠佳，好几天都没有露面。

毛泽东幽默地对周恩来说：“请中央转告刘邓，蒋先生得的是个怪病，我们把他进攻上党的部队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然后，就可以来和我谈判了。”

长治已成为一座孤城。蒋介石急了，一改以往对阎锡山彬彬有礼的态度，给其发去了一份极不客气的电报，严令阎锡山必须把上党地区夺回来，配合北渡黄河的胡宗南部，迅速打通同蒲路，以便大军北上占领华北。

阎锡山看完电报，鼻子里哼了声：“老子山西的事情，还用得着他蒋中正管?”

说完，便下令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省防军，外加两个炮兵团共八个师的兵力，火速驰援长治。

临行前，阎锡山在地图上找到太原至长治的公路，指着屯留西北的一个叫“关上”的地方对彭毓斌说：

“这一带地形险要，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冲，我估计刘伯承会在这一带拦截你们，务必特别小心!”

“先生请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彭毓斌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神情坚定地出发了。在他看来，共产党用兵一向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自己一下子带去两万多人，谅他刘伯承也没有那么硬的牙齿。

9月27日，围攻长治的部队经过几天的激战，扫清了城外的据点，开始对守敌发动强攻。

这时候，延安通过无线电侦察到了阎锡山增援长治的行动，立即给刘邓发来了“十万火急”电报。刘邓大吃一惊，随即探明敌援军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沁县，离长治只剩下三天的行程了。如果长治的敌军在两天之内解决不了，后果就不堪设想。刘、邓二人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立即忍痛改变了攻城的决心，决定调整部署，变攻城为打援。

在向各纵队首长介绍完敌情之后，刘伯承命令：

以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决死队第一旅及石（志本）于（一川）支队继续佯攻长治城，吸引来敌向长治增援。

以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军二支队（缺三十团）、第四支队及十七师一部为打援之右翼队；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及太行第三支队为打援之左翼队；布置在关上一带，占据老爷岭、磨盘脑、五狼山等险要地势钳击援敌。

另以太行三十团为独立支队，由北尾击南援之敌。

刘邓的这一决定是在还不十分清楚敌人究竟来了多少的情况下作出的。邓小平对陈赓等人说：

“阎锡山把我们逼到河沟坎上了，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和他拼命！”

9月30日，刘邓的网下好了，满想在关上捕一条大鱼，殊知彭毓斌到达关上迤北二十里的褫亭之后，便命令部队离开公路，跨过漳河，避开关上的险恶地形向南挺进。此时幸好刘邓带着前线指挥所赶到，立即把所有的参谋都派出去，通知部队改在褫亭至屯留的公路两侧钳击敌军。

10月2日，两军主力相遇，经过激战，南援之敌被合围于关上之五狼山、老爷岭、磨盘脑一带高地，据险顽抗。4日，太岳纵队切断了老爷岭守军与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占领了北山水源。继而冀南纵队也赶到增援，彭毓斌见势不妙，向南虚晃一枪，赶紧往北回撤。刘邓二人要就是他这样，紧绷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6日佛晓，太岳纵队二十团赶到土落村以南堵死了彭毓斌的退路。当日傍晚，太行、太岳、冀南纵队三面包围了敌军，7日全部解决。歼敌两万人，创建军18年来历史最高纪录。

阎锡山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两万援军会消失得那么快，那么邪门儿。整整八个师呀，就那么几天就完了。刘伯承不就是一个师长吗，他究竟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神通……。看来长治是保不住了，让十九军撤罢。

阎锡山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10月8日夜，史泽波趁着大雨，悄悄弃城西逃。然而为时已晚，刘邓已在北面腾出手来。10月，太行纵队的两个团赶到沁水县的香沟，吃掉了史泽波的尾巴，并将其死死拖住。太岳纵队的一个团也迂回到桃川，堵住了史泽波的逃路。接着，太岳另外三个团也于11日早晨赶到，将敌夺缩于桃川一带。12日下午3时发起总攻，只用了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俘史泽波以下九千余人。

历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终于结束了。这是毛泽东回到延安杨家坪的第三天。

（选自汪涛：《威震神州——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材料三　“不许蒋介石来摘桃子”——记上党大捷

夺城打援，攻取长治外围五城

9月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当时我军面临的局势是，阎军占领的上党地区六城，其兵力部署是以长治为中心，以重兵把守，其余五城则各以千余人守备，兵力较分散，但工事防御及火力配备较强。而我军长期进行游击战，武器装备落后，枪支弹药奇缺，更缺少城市攻坚战的兵团作战经验。因此，我军决定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夺城打援，即集中优势兵力，先分别夺取长治以外各城，同时诱使长治之敌主力出城增援，从而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出援主力。

我军首先打响了攻克屯留城之战。担负屯留攻坚战的是太行纵队，同时太岳纵队和冀南纵队则集结于长治至屯留的几个敌必经之地，随时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敌，其余部队分别监视、包围了长子、壶关等城。在敌军方面，守备屯留城的是阎军挺进第6纵队，约千余人，他们依傍城墙及堡垒工事，以较强的火力压制着我军的进攻，战斗较为激烈。这期间，长治之敌曾出动6000余人，于11日、12日两次试图向屯留增援，但终因害怕被歼，加上我个别打援部队过早暴露，敌援军与我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至12日，我即攻克屯留，全歼守敌，与此同时，我决定乘胜攻取长子并吸引长治之敌出援以消灭之。

长子位于长治西南五十华里处。这座城不大，但工事坚固：城墙高两丈五尺；沿城有一道三米多宽二米多深的护城濠，濠内积水过腰；城门外碉堡林立，可在不同的水平线上进行直射与侧射；城墙外还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防备森严，不易攻击。城内守敌是阎军挺进第二纵队和该县两个保安大队，共计2100余人。而我军刚从游击战为主转到攻坚战，缺乏经验，弹药又少，一门山炮只有20发炮弹，一挺重机枪才有1000多发子弹，要攻打这样的坚固城堡显然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陈赓太岳纵队的386旅担负了攻打长子的任务，为了加强攻击力量，陈赓还将决1旅38团配属该旅指挥。在战前军事准备会上陈赓指出：“攻坚、登城，我们部队没有好经验，组织战斗要老老实实，千万不可疏忽、蛮干！”

"弹药尽量满足你们,但不会太多,主要依靠手榴弹,要特别讲究战术,以短促的密集炮火,掩护部队一举登城……"。会后,386旅旅长刘忠、政委张祖谅召集团以上干部,认真研究了敌我态势,做出了具体部署:772团先攻占长子北关,而后在北门登城;沁水县独立团佯攻东门,箝制敌人;20团、38团首先占领西关,而后从西门发起攻击。

9月13日1时许,长子攻坚战打响了。城西的战斗打得比较顺。20团经过5小时的战斗攻下了西关。接着38团也进逼城下。但北面的772团则打得异常艰苦,他们团进攻北高庙,是一座孤陡的小山,筑有坚固的城堡,它是长子守敌的重要屏障,站在小山顶能俯瞰全城,山顶的炮火可越过城墙直射到城内大街上。守敌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顽抗,772团的四次攻击都未奏效。经过周密勘察,772团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以自己擅长夜战的优势、利用北高庙靠城门的南面工事简单、守备薄弱的缺陷,于夜间发起攻势。在长子攻坚战的第三个夜晚,这个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享有"夜老虎团"称号的部队,以一个排的兵力,趁夜色正浓之际,从敌人意想不到的南面摸上了北高庙,经过短时激战,我军占领了北高庙,砸烂了长子的屏障,攻占了北关。至此,各部队都已先后转入了攻城准备。

我攻城部队组织了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等,制做了跳板、云梯等登城器材,并在西关、北关实行坑道作业,挖好了通往城墙的坑道,在墙根填塞了大量炸药。经过严密的准备,18日19时,我对长子城发起总攻。随着两发绿色信号弹划过天空,一声巨响,西门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山炮、迫击炮、重机枪集中火力压制敌人,战士冒着炮火,冲过开阔地,爬地铁丝网,从跳板上冲过护城濠,把梯子架上城墙,仅仅10分钟,突击部队就登上城头。紧接着,772团、38团,士敏独立团也相继攻入城内,向纵深发展,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20团在击退敌人数次反扑后,夺取了城内制高点——钟鼓楼,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各团的巷战。战至19日凌晨2时,战斗全部结束,除南高庙守敌一个保安大队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计毙伤敌300多人,生俘1500多人,活捉阎军挺进第2纵队司令白映瞻。

从屯留之战始,我每攻一城的时候,都以其它主力集结在机动位置,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敌,从而实现围城打援之意图。但自长子之战后,长治之敌再也没敢出援,我军不能实现打援意图。因此,刘邓便暂时放弃了原来的方案,转而采取分兵加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孤立长治的方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19日,太行纵队攻克壶关。至此,长治外围各城: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全被我攻克,共歼敌7000余人,长治之敌已完全孤立,成为无足之蟹。我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

围城打援,关键要冲围歼援敌

9月20日,我军开始合围长治,上党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城高濠深,工事坚固,守敌阎锡山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所辖的三个师、约一万余人。据此,刘邓决定首先扫清外围据点,在攻打外围和城关的战斗中,尽量求得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总攻长治城。外围战斗进行得很顺利,部队很快扫清了各据点。

正当部队积极准备总攻之时,连绵不断的秋雨却越下越大,地形和道路对攻城部队非常不利。连续三个晚上的攻击都未见效。攻城部队的干部战士心急如焚,而这时又传来了两个不利的消息,更加重了人们的焦虑心情。一个消息是"阎锡山83军三个师约7000人于9月27日到达沁县城,其先头部队四个团,于9月28日12时已进抵新店(沁州东南35里),有继续南下援长治被围之敌的迹象";另一个消息是毛主席在重庆进行的谈判,由于蒋介石加紧对解放区的进攻而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情况非常紧急。怎么办?如果继续攻城,并能够迅速解决战斗的话,那末明天迎击援兵还来得及;而如果一旦攻城不下,敌人援兵又抵近城外,则整个战局中我军就会被动。在此刻不容缓的关头,刘邓首长当即改变了攻城的部署,即变攻城为围城打援。刘邓命令以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决死队第一旅全部及石(志本)于(一川)支队为攻城部队,继续佯攻长治城,吸引83军向长治增援;以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第2支队(缺30团)、第4支队及17师为打援之后右翼纵队;以陈赓指挥386旅及太行第三支队为打援之左翼纵队,钳击援敌;以30团为独立支队,由北尾击南援之敌,堵住它的退路;准备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并同时歼灭可能由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敌人。各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星夜北进,大家的信念是一致的:"坚决消灭阎军"、支援毛主席重庆谈判"。

阎军援兵沿白晋公路长驱南下,9月30日行至瑘亭镇后,忽然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瑘亭至屯留向南挺进。于是刘邓立即更变部署,改在瑘屯公路两侧钳击敌援军,而以17师和独立支队尾击援敌。10月2日,我主力预期遭遇敌援军于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之线,我军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两翼迂回,同时尾敌前进部队向南展开攻击,将敌人合围于老爷岭、磨盘脑地区。敌人扼守在磨盘山、五塆山和老爷山等制高点,企图利用险要地形与我军决战。这三座鼎足对峙的山峰,就是上党战役的主要战场之一,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冲。

10月4日,我各路大军向敌援军发起猛攻。由于敌占据有利地形且火力较强,经数昼夜激战,我虽歼灭一部

分敌人，但仍未能攻上老爷山。太岳部队 20 团急中生智，于夜间从东侧迂回过去，突然占领了两个小山梁，切断了山上守敌和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占领了北山水源。至此，我军由强攻改为围困。白天阻敌下山，晚上主动出击。敌人被围山头，缺粮断水，打了两天，伤亡过半，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这时我已判明援敌是阎锡山的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 23 军、83 军、省防军等共八个师、附炮兵两个团，共两万余人，兵力与我相当。为加强我军优势，刘邓首长又令从一万围城部队中，调动冀南纵队北上打援，并且命令他们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增加敌人的动摇；同时为了避免敌人困兽犹斗的行动，决心采取围三留一的战法，在北面敞开一个口子，给敌人虚留生路，部署在运动中分割包围歼灭敌人。10 月 5 日，老爷岭的敌人不得不放弃老爷岭，向北逃窜。老爷岭立即被我太岳部队占领。与此同时，太行部队在磨盘脑和五坳山也挫败了敌人。彭毓斌见势不妙，决定放弃增援长治计划。为了迷惑我军，他命令大队佯作南进，辎重后勤和指挥机关却向沁县方向北逃。但我刘邓首长很快识破了敌人的企图，当即命令太岳部队追上并赶在敌人前头，切断敌人退路，迫使敌人停滞在璆亭以南地区，以便围歼。10 月 5 日黄昏开始，太岳部队 20 团冒雨爬山抄小路急进，于当夜 10 时左右赶到土落村南截住了敌人，他们立即占据有利地形，修筑工事，控制河口，切断公路，6 日拂晓，集结在阵地前的两万多逃敌借助密集的炮火发起了连续冲锋，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恶战，但 20 团的英雄们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敌军的集团冲击一连八次都未成功。20 团牢牢地固守着阵地，为大部队赢得了时间。6 日傍晚，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分别从左、右和后方围拢上去，将敌装进“口袋”。随后，各部队同时出击，经过激战，两万多敌人除少数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炮兵司令胡三余、46 师师长郭溶、49 师师长张宏，66 师师长李佩膺等数十名高级军官就擒。

追歼逃敌，史泽波于桃川就擒

困守长治，渴望援军解围的史泽波，初闻阎军两万援兵南下消息的时候，曾向部属转发过阎锡山从太原发来的所谓“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的电令，想借此稳定军心，也给自己壮胆，史泽波曾组织“敢死队”拼命突围达 17 次之多。当援军被我军歼灭后，长治之敌成了惊弓之鸟，完全丧失了坚守的信心。为了保存实力，阎锡山又急令史泽波趁我军主力尚未南返之时，赶快撤离长治向西突围，企图横穿我太岳区逃回浮山、翼城。10 月 8 日黄昏，史泽波趁着大雨浓雾，偷偷弃城向西逃窜。然而，敌人的这一步棋，早在刘邓意料之中。为全歼长治之敌，在敌刚刚弃城西逃之际，我军即在打援部队中组成了两支精干部队对其平行追击。这便开始了上党战役的第三阶段，追歼逃敌。

太行纵队的两个团不顾疲劳一路尾追，于 10 月 10 日在沁水县的香沟率先追上了敌人的后卫部队，激战一小时后，俘敌 700 余人，把敌人的尾巴吃掉。然后追到大庙庄地带，咬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又在大庙庄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与此同时，远在襄垣的太岳纵队亦接到命令，要他们赶到东峪，西峪一带截住敌人。太岳部队随即从土落村出发，用最快的速度，沿吾元、张店急进。当他们赶到东、西峪时，不料敌人已经过去了，于是部队又兵分三路：21 团走梁山、20 团和 38 团走山谷、772 团单独沿张店、将军岭、马壁一线绕大弯子插过去。终于在沁水县的桃川附近堵住了敌的逃路。10 月 10 日，772 团和敌人在将军岭打响，太岳部队其余三个团也于 11 日拂晓在佛庙岭投入战斗。此时，在大庙庄和敌人激战的太行纵队也尾随而至，敌人被包围、压缩在桃川一带。

10 月 12 日下午 3 时，我军发起总攻，只用 3 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敌军除少数先头部队逃跑外，大部被歼，连史泽波在内的近万名官兵都当了俘虏。至此，历时 30 余天，共歼敌 13 个师、3.5 万余人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除沁县外，晋东南地区全部解放。

战后，我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将军接见了史泽波军长，向其交待了党的俘虏政策，并问他“你认为你们这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

败军之将史泽波感慨道：“抗战八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和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占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陈赓将军回答说“你讲对了！《水浒传》上说梁山泊好汉们‘替天行道’，我们也是‘替天行道’，我们的‘天’，就是人民。我们依靠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也依靠人民打败了你们。历史证明，与人民作对，必然要失败！希望你今后能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做些贡献”。这些话深深触动了史泽波的心，我党的俘虏政策也给了他生的希望，后来他领衔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高级将领发通电揭露了蒋阎挑起内战的罪行。

上党大捷，迫蒋签约《双十协定》

我军在上党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给蒋介石发烧的头脑泼了一桶冷水。这一战，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企图迅速占领全华北的野心，也打乱了国民党内战的日程，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 10 月 10 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主席对这次战役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太行

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选自《百战图》，作者：郭若冰）

邯郸战役

背景介绍

亦称平汉战役。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边仲部三个军约四万人，从新乡沿平汉路北进，并以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部随后跟进，企图侵占邯郸，打通平汉路，抢先进入平津，进而夺取东北。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集中三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六万人余人，将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地区予以歼灭。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进占漳河沿岸的丰乐镇、岳镇等桥头阵地掩护架桥，遭阻击后，主力北渡漳河，沿平汉路东侧分两路交替掩护前进。晋冀鲁豫军区令先期到达的第一纵队实施运动防御，坚决阻止敌人进入邯郸。二十四日，国民党军突破崔曲、夹提之间阵地，进至高庄、南泊子一线。解放军后续部队在邯郸东南地区对敌形成三面包围态势。随后胡宗南部第十六军与孙连仲部第三十二军，分别从石家庄和安阳两个方向进行增援。刘伯承、邓小平及时增调太行军区一部阻击石家庄南下援敌，同时，以太行、冀鲁豫军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安阳周围牵制安阳北犯的援敌。二十八日黄昏发起总攻。战至三十日，先后攻克村镇二十余处，歼敌一部，并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后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马头镇起义。随后，晋冀鲁豫军区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主力先敌移至漳河北岸截击。当日下午，解放军展开猛烈进攻。次日夜，突入敌军指挥部。战至十一月二日，除少数逃敌外全部就歼，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二万余人。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四万余人（其中有一万余人起义），对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解放军各部队向东北展开起到重要作用。

材料：

- 决战邯郸
- 高权勋弃暗投明
- "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 蒋介石梦断邯郸

材料一　决战邯郸

一

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就把眼睛盯到平汉线上了。

刘伯承刚刚下达完对史泽波残部发动总攻的命令，正在和邓小平、张际春商议如何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的主力依次改为第一、二、三、四纵队的问题，通信科长谈华捧着一份电报匆匆走了进来，叫了一声："司令员，中央来了新的指示。"

刘伯承看完电报，签了字，递给邓小平说："主席一回延安，我们就别想轻松罗。"

"是教我们赶快到平汉方向去吧？"邓小平边问边接过了电报。

敌人以主力沿平汉线北上，他们早就预料到了，并且得到了冀鲁豫军区报告来的详细敌情。刚刚他们商量的问题，就是为了进一步集中主力，准备在平汉线上再打一场大仗，与中央的意见不谋而合了。

刘伯承在地图前琢磨了一会儿，等张际春和李达看完了电报，开口道：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既然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指示，我看就赶快行动吧。一是告诉冀鲁豫和中心区，立即组织力量按照中央的意见阻挠敌军的行动，二是尽快把四个纵队正式成立并充实起来。除陈赓他们留下打扫战场，尔后转向同蒲线作战外，其他三个纵队立即向邯郸至磁县之间的铁路两旁集中。我的初步想法是把战场放在那里的沙漠地带……"

李达、张际春又补充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史称邯郸战役的大政方针就这么定了。然后，他们就坐着刚刚缴获的汽车经潞城、黎城回到了涉县赤岸村。

一路上，刘伯承的作战方案在颠簸中成熟了。

二

10月14日，马法五、高树勋带着三个军四万余人，从新乡出发，他们决定分兵两路，加速前进，直插邯郸以北。等刘伯承的部队赶过来，就已经成了马后炮了。

新八军和三十军的两个师在左，为左路军，由高树勋指挥。十一战区长官部、四十军、三十军的一个师在右，为右路军，由马法五率领。两路大军齐头并进。

10月19日，刘邓的前线指挥所进到了邯郸西南约四十里的峰峰。他们决定以一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平汉路以东，以二纵、三纵和太行军区部队在平汉路以西，

必要时进入路东，先采取节节抵抗，诱敌到滏阳河河套沙漠地带，然后加以围困。再以小股袭扰的办法，耗散与疲备敌军，待我的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后，再相机发动总攻。

10 月 20 日，敌人的先头部队开始渡漳河了，刘伯承几乎还是一个光杆司令，手头上只有不到两千人的地方部队可供调遣。三个主力纵队一个都没有赶到。

刘伯承和邓小平坐在作战室里，两双眼睛盯着地图。作战参谋不断地向他们报告敌军的渡河情况和先头部队的进展情况，他们一句话都不说。该发的命令，李达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就只有等。不是等回音儿，而是等人到。那怕先到了个旅也好。马法五、高树勋也真够狡猾的，只要发现前后左右骚扰他们的不是正规部队，就只派一个连，最多一个营去对付，大部队照样渡河，照样赶路。

整整一天一夜，把刘伯承和邓小平急坏了。

糟糕的是陈赓部由于参加上党战役，未能及时赶到同蒲路沿线，阻截胡宗南部北上，致使胡宗南部先头部队十六军顺利进占石家庄，该部北上可与北平之敌汇合，增加对东北的威胁，南下可以攻邯郸，与马法五、高树勋夹击刘邓。两相比较，毛泽东最急的还是怕十六军南下。

10 月 21 日，马法五、高树勋和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站在漳河南岸，看着部队安然无事地过了河，不由得哑然失笑。他们原以为刘伯承会在漳河北岸趁他们半渡而击之，因此，在前一天的晚上，他们就命令部队做好了强渡漳河的准备，没想到却打了一记空拳。

当天晚上，马法五、高树勋这对西北军的老兄弟喝了几杯老酒，一致认为刘伯承现在还没有动作，可能是知难而退了，便欣然而睡。

然而，就在他们做着黄粱美梦的时候，刘伯承突然抽走了他们的枕头。

最先赶到的是杨得志、苏振华率领的的一纵，他们是 21 日晚上 10 点到达临漳的，第一旅又马不停蹄赶到了离敌先头部队只有几里远的东南方村。这时候，他们接到了刘伯承的最新命令，令第一旅连夜奔袭漳河北岸的岳镇，其余各部立即在屯庄、崔曲、夹堤、小堤一线迤南构筑纵深防御阵地，节节抵抗，逐步把敌人引向平汉路以东的沙漠地带。

邯郸战役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正式打响了。

三

双方一接触，战斗就非常激烈。敌人三个军凭借优势装备，采用集团滚进战术，以压倒的兵力火力优势逼得杨得志立不住脚。李达在电话里向杨得志下了死命令：必须把敌人堵在邯郸以南地区。

一旅的官兵真是好样的。马法五的四十军也颇为了得。双方战到 10 月 23 日拂晓，四十军进至秦家营、商城、高本营一线，离邯郸只剩下二十余里。三十军随后跟进至横城，新八军进至左良、马头镇之线。

一旅的官兵打退了一〇六师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一直坚持到 24 日黄昏。李振清两天一夜没有前进一步，气得疯了，亲自跑到前沿阵地看了看，命令所有炮火集中指向一旅抵抗最顽强地方猛烈轰击。炮击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一旅夹堤至雀曲之间的一处阵地终于被敌突破了。一〇六师迅速进占南泊村、高庄一线。

10 月 25 日，一纵、二纵、三纵分别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完成了对敌人的钳形合围，太行军区一部也赶到了磁县以西，准备相机切断敌军退路并防止已进至安阳的敌三十二军可能的北援。

在听完了李达的汇报之后，刘伯承高兴地说：

“现在的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牛角尖儿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现在该是把老鼠盘软的时候了。”

10 月 28 日晚 12 点，刘邓下令对敌右路军发起总攻。29 日，一纵突入雀曲，歼一〇六师一个团；二纵突入阎家浅，歼敌三十九师一个团，接着又乘胜追击逃敌。30 日，高树勋在李达的劝说和鼓励下，终于宣布起义。

马法五完全没有想到高树勋会突然来这么一手，顿时慌了，急忙命令部队逐次南撤。刘伯承立即命令一纵、三纵主力，连夜隐蔽赶到漳河北岸堵敌退路并以西冀阻敌往东、西突围。二纵由北往南压，迫敌脱离先前构筑的阵地。然后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同时将太行军区一部布置的漳河南岸，阻击三十二军北上增援。

三十军、四十军的四个师中，有三个是美械师。他们发现被刘邓大军围困后，反而镇定下来，凭借优势火力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惨烈。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三十二军一个师扑到了漳河南岸，向太行独立支队发起了猛烈进攻。

邓小平在分析了战况后说：“和敌人硬拼我们要吃亏，要设法迅速打开局面，绝不能让三十二军再加进来。”

经邓小平提醒，刘伯承立即决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战术，决定集中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王的长官部，打烂敌人的指挥系统。

一纵、二纵得令后，立即组织强大力量，从东西南边向位于前旗杆樟的马法五的长官部突击。经过一天一夜前赴后继的英勇激战，一纵三旅二团警卫连首先突入长官部，生俘了马法五及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

11 月 2 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军委：

“邯郸战役，除约三千敌军逃过漳河南岸外，其余全部歼灭，另三十二军过漳河北岸一个团，我正进攻中。

二、我各部伤亡约八千左右，正集结休整。

三、今后如十六军不南援；我拟扩张战果，于 10 日后，向安阳以南发展，求得控平汉更长一段”。

毛泽东扑哧一笑，对朱德、刘少奇等人说：

“蒋委员长想在邯郸做一个美滋滋的黄粱梦，我们的刘邓就是不给他枕头，你说气人不气人？”

（选自《风云七十年》）

材料二 高树勋弃暗投明

10月28日晚，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均聚集在峰峰的作战室里。21点，仿佛其中有一个人把电钮按了一下似的，总攻发起了。

1纵队从崔曲村东和村西北同时发起攻击；2纵队对阎家浅敌39师一个团进行攻击；而陈锡联指挥的3纵、17师等南集团，积极钳制敌30军，隔断其与新8军的联系。但对高树勋的新8军则围而不打，打而不痛。

为什么偏偏对高部手下留情呢？原来刘邓首长指挥的平汉战役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面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点，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一面加紧对高树勋将军的争取工作。

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多年来经常受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排挤、歧视，与蒋介石有矛盾。高部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此次沿平汉线向北进攻，蒋介石为削弱杂牌而驱使其作内战先锋，高树勋极为不满，从新乡北进之前，即派人与我联系，表示不愿意内战。

因为某种机缘，共产党人王定南成了高树勋的座上客，实际上是我党在高部的地下工作者。平汉战役中高树勋的起义，王定南起了很大作用。

10月28日清晨，平汉战役总攻发起的同一天，王定南同志从高部回来向刘邓首长报告说：高很愿意同我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主要是高夫人现在还在徐州，高为夫人的安全担忧。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出现此紧急情况，马上引起了刘邓首长的重视。

刘邓首长向来重视争取敌军的工作。他们经常谈到要打退反动派的进攻。一方面要在军事上挫败敌人；另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反内战的统战工作，尤其是要利用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和嫡系的矛盾，和平民主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选拔了不少干部做这方面的工作。刘邓首长还亲自处理有关的重要问题，在上党战役紧张的作战中，刘邓首长就多次啊听了王定南同志汇报。平汉战役开始后，邓小平政委又多次布置此项工作。由于有了以往的工作基础，在新形势下又出现了好的动向，邓政委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巧妙地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邓政委对王定南同志说：

“高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刘司令员接着补充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不断，反受其害。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

王定南要回高树勋长官部时，邓政委再次强调说：

“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10月29日，捷报频频传来。我1纵突入崔曲，敌40军106师一个团被歼，2纵已突入阎家浅，敌39师亦被我歼灭一个团，各处残敌向南北左良逃窜时又被我截歼一部，我军乘胜向北左良及其以东地区之敌展开攻击。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对高的对义起了促进作用，当夜高树勋终于决定：““我立即起义，走革命道路”。

刘邓首长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立即派李达参谋长连夜通过火线看望高树勋，对起义问题作最后的商榷。

李达将军身着便服在王定南等同志的陪同下，步行通过3纵占领的阎家浅，进入高树勋的指挥部。

李达参谋长此次代表刘、邓首长看望高树勋，更加坚定了高马上起义的决心。因为李达同志原是老西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所以和高树勋一见面，谈得很融洽。他们谈了对40军、30军应抱的态度，又谈了1931年董振堂、赵博生二位西北军将领不满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江西“剿共”前线举行闻名全国的宁都起义的意义。他还谈起了西北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变了政治方向，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受到全国民众欢迎和支持的情景。

李达将军鼓励他说：“高先生如果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高树勋将军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一席话，异常兴奋和激动，当即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义！”

党中央毛主席对高率部起义很重视，高度赞扬了这一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起义行动，并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来热诚的贺电：

“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干，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选自《百战图》，作者：郭若冰）

材料三 “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各旅的同志简要地汇报了各自的情况后，我说：“一

旅撤出了崔曲，仗打得很苦，也打得很好，同志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不能让敌人再前进一步。大家还记得中央的指示吗？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要呀！一旦敌人突进邯郸，刘、邓首长的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一纵将无法交代。办法只有一个：明天拂晓前把崔曲夺回来！管它什么李铁头、李钢头，都要把他砸烂！”

我提出夺取崔曲的兵力部署和打法后，苏振华政委说：“今天的会议就是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一纵必须完成刘、邓首长的战略意图。现在兄弟部队正从山西往这里赶。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只许胜，不许败！”

“对！”我接着说，“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崔曲是个大村，当时有二三百户人家。李铁头的两个团住在这里，他的师部和其他部队都很靠拢的屯积在附近，显然是怕被我们分割截断而各个击破。针对这些情况，纵队决定一旅七团从崔曲的西北角，三旅十六团从东北角以合围的形式夺回崔曲。调三旅二十团插在崔曲与李铁头师部中间，一方面准备打援，一方面准备堵死敌人的逃路。我们不但要夺回崔曲，还要在这里歼灭他的有生力量。我对二十团团长王大顺和参谋长慕斌同志说：“你们虽然不直接攻崔曲，但任务也很重。这一带是沙土地，很难构筑工事。你们一个团，夜间在方圆几十里的广阔地面上防守和阻击，困难不少呀！”王大顺同志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请司令员放心。”

纵队几位负责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崔曲方面。崔曲虽不是城，但周围有土圈子。这里群众的住房几乎全是平顶，平时房顶上可以晒粮食，搭个梯子就能攀上攀下，战时便成了天然的堡垒。村子四周的平顶房，则起着类似城墙上碉堡的作用。不首先占领这些天然堡垒，即使攻入街道狭窄、房屋密集的村内，也不能将敌人赶出去，反而会陷入敌人居高临下的火网，伤亡会更大。我们当时由于重武器少，还不太会用炸药，所以，夺这些天然堡垒，一是靠梯子，二是靠手榴弹。攻击部队决定分别以两个营的兵力并肩猛攻，也就是以两个箭头插向突破点。主攻部队的前面组织了二百人的投弹队。投弹手们除腰系肩挎，每人还提一个装满手榴弹的柳条篮子。梯子队紧紧跟随，最后边是全团集中起来的火力队。这种配备表示了主攻部队不怕一切牺牲，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前赴后继夺取胜利的决心。

夜幕刚刚降下，我们发出了攻击命令。在火力队的掩护下，投弹队和梯子队首先投入了战斗。敌人是有准备的，但他们没有估计到我们会这样快地组织反击，更没有料到我们会组织二百人的投弹队，直奔他们村前沿的“房顶阵地”。这二百人的投弹队简直可以说等于几十门大炮。他们拼命投掷，梯子队的同志奋力冒死攀登，只三个小时，村头前沿“房顶阵地”上的敌人全部被赶了下去。后继部队乘机突入村内。这时，实际上进行着的立体式的三层战斗：一层是对“房顶阵地”的攻击，这算“空中格斗”；一层是依托门窗逐屋抢占，这算“中间争夺”；一层是敌我将房屋的墙壁炸毁，力争控制街道，这算是“地面战斗”。小小的崔曲敌我混杂在了一起，一片火海，战斗异常残酷。午夜时分，我们得到了李铁头命令崔曲守敌突围的情报。二十团在王大顺同志带领下，在广阔的田野上堵、截、顶、围，硬把李铁头打了回去。这时，崔曲及四周的小路，基本上已被尸体和炮火打断的树木堵塞了。李铁头见大势已去，孤注一掷，只身带着一个多连的队伍，利用夜间乘隙逃窜。

夺回崔曲，我们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纵队一面向刘、邓首长报告，一面要各旅迅速整顿队伍，准备再战。这一仗下来，各部队牺牲的同志都很多，仅三旅十六团伤亡人数就超过了三百。战争中的牺牲是难免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常见的，但面对各部队报来的伤亡人数，内心总是沉甸甸的。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当时只有三十一岁的二十团团长王大顺，和该团参谋长、知识分子出身的慕斌同志也光荣牺牲的消息，泪水便有些止不住了……

材料四　蒋介石梦断邯郸

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领新8军及河北民军共万余人于马头镇起义。同时电话通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说明他要率新8军与共产党的军队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主张和平民主，并要求马也脱离国民党，站在人民一边。马法五接到电话后，如晴天霹雳，惊慌失措。高将军的这一行动，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参加平汉战役的我军指战员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于是，战役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天下午，刘邓司令部接到南集团陈锡联的报告：“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一些村庄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邓政委接到报告，刘司令员马上说：

“敌人要乱，我们要争取主动”。

刘司令员立即走到地图前，提出了歼敌计划：“以1纵、3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军退路，以2纵从正北面向南压，待敌人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32军。”

夜深了，但枪声、炮声、喊杀声却愈响愈激烈。敌30军鲁崇义部的67师退到西王福至冢王之线占领掩护阵

地后，其主力马法五部随即于31日拂晓前，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向南突围。当敌脱离主阵地后，杨得志的1纵从东南，陈锡联的3纵从西面，分多路向突围之敌实施扇击。2纵及冀南军区部队在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下向北向南跟踪追击，而杨勇、张廷发部则前出漳河南北进行兜击。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部万余人，窜至前后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被我包围，据守村落顽抗。

这时，被我隔在洞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32军，为解马法五之围，以主力向我伸入漳河南岸的独立支队阵地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指战员们为确保全歼马法五部而顽强坚守着阵地，将敌阻于漳河以南。

在峰峰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

邓小平政委分析了战况之后说："要迅速打开局面。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绝不能让敌32军加上来"。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司令员接着说："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要集中第1和第2两上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

部队经过周密侦察得知马法五的长官部在前旗杆樟。

黄昏时分我军对马的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

1纵主力从东，2纵主力一部从北猛攻前旗杆樟；3纵主力从西，2纵主力从北进攻东西玉槽。敌人拼死顽抗，我军指战员则英勇向前，战况激烈异常，整个战场一片火海。我党我军的许多优秀战士、干部，流尽自己最后一滴热血，但勇士们前仆后继，越战越勇，战至11月1日夜，我军突入马法五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东西南北各路人马，奋起围追堵截溃逃之敌。

此时，敌人的队形已混乱不堪，互相践踏，争相逃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战到11月2日午前，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全部被歼。敌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1纵3旅2团警卫连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第40军副军长刘世荣，长官部参谋长宋肯堂。

石家庄和安阳出援的敌军在我狙击下，听到马法五被全歼，也闻风撤退了。

至此，历时10余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马法五以下两万三千余人被歼。邯郸战役的胜利，对迫使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有力地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也进一步促成晋冀鲁豫我军从打游击战为主到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而发展成一支能够打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

这次蒋介石派了两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三个军零一个纵队，在其他各路进犯军配合下，沿战略要线平汉线大举进攻，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到达邯郸，反而遭到两个军全军覆没，一个军零一个纵队举行战场起义的致命打击。蒋介石的邯郸梦就这样破灭了。

（选自《百战图》，作者：郭若冰）

"一二·一"运动

背景介绍

1945年冬，国民党违背《双十协定》，在美国支持下继续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反对美蒋发动内战的口号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内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请费孝通、钱端升等几位赞成和平、民主、团结的教授讲演。晚会开始，国民党派大批军警进行搔扰，在会场四周鸣枪打炮恐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26日，国民党中央社伪造所谓"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以掩盖其法西斯行径。中共云南省工委因势利导，决定全市30余所大中学校3万余名学生联合罢课，并成立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28日，发出《昆明学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制造内战告全国同胞书》，提出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等四项主张。呼吁全国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互相援助，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总罢课后，罢课联合委员会先后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讲演，散发传单，张贴壁报，演活报剧，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云南国民党当局决定对学生下毒手，指令军警特务于12月1日攻打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处，殴打罢课学生，并投掷手榴弹。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4人惨遭杀害。10余人受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学生纷纷抗议和示威游行，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声援，郭沫若、沈钧儒和宋庆龄、柳亚子、许广平等著名人士分别参加了重庆和上海群众为昆明死难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并任主祭人，愤怒地控诉反动派的罪行，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一二·一"运动以血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真内战的凶恶面目，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提高了政治觉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了悲壮的一页。

材料：

- "一二·一"运动
- 谁是"一二·一"惨案的主凶

材料一 “一二·一”运动

1945 年 11 月 5 日，针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得到国统区广大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1945 年 11 月 19 日，重庆文化界、工商界等代表 500 余人举行了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工人、学生、商人等用罢工、罢课、罢市等行动来制止内战。这一号召迅速获得各大城市人民的响应。成都、昆明等地也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内战宣传活动，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了揭露蒋介石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真面目，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党组织决定领导同学开展对时局的讨论。在联大的倡议下，云南大学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决定于 11 月 25 日晚，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时事晚会。

时事晚会举行那天，到会的有联大和其他各校学生、青年职工和教授等 6000 余人。当晚会正在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用步枪、机关枪和小钢炮发射的枪弹、炮弹，在会场上空飞啸而过，对与会群众进行恐吓。但群众不畏强暴，晚会继续进行。最后，大会通过反内战宣言。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把开枪恫吓说成“围剿土匪”，更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愤慨。为了抗议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昆明 30 多所大中学校 3 万学生自 26 日起相继罢课。11 月 28 日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同时提出惩凶、赔偿等八项要求，并提出四项政治要求：(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在党的领导下，各校组织了大批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附近农村开展宣传活动。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反动派采取了野蛮镇压手段。12 月 1 日，大批国民党军人和特务暴徒围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及联大师院。他们用木棍、刺刀、石块毒打学生和教师，并投掷手榴弹。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等被炸死。是日，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南菁中学等校都遭到特务攻打。在大街上，特务到处打人捕人。据事后统计，当日被反动派屠杀殉难者 4 人。伤 13 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罢委会于 12 月 2 日在联大图书馆举行四烈士入殓仪式，有万余人参加。从 12 月 4 日起，在联大图书馆设四烈士灵堂举行公祭，每天从早到晚人们川流不息前来吊祭，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职员、军官、士兵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从 4 日至 24 日，参加公祭的达 15 万人(相当于当时昆明全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昆明的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一二·一”运动，党领导的民主工人同盟发动大批工人去联大吊祭、捐款，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充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昆明四烈士的鲜血不仅震动了昆明各界人士，也激怒了全国人民，纷纷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昆明师生的血腥暴行。12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昆明惨案》的社论，指出：“昆明惨案，是当前全国政局的一个缩影。”“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个部分。”

12 月 9 日，延安各界青年隆重举行纪念“一二·九”10 周年大会，会上向“一二·一”死难烈士致哀。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昆明师生被国民党拿着武器的特务杀死了 4 人，受伤的 13 人，这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暴的大惨案，我们应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提出控诉。”他勉励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精神，完成他们所未完成的任务。他说：“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

12 月 9 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昆明被害师生大会，有 3000 多人参加，会上，郭沫若、沈钧儒等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野蛮屠杀昆明爱国师生的滔天罪行。大会并要求公开审判祸首。同日，成都各界 5000 余人召开追悼会，并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12 月 12 日，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举行了追悼会，要求严惩祸首。1946 年 1 月 13 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等 1 万多人公祭昆明死难烈士。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组成。宋庆龄送了写着“为民前驱”的横联。会上有学生、教授、工人、职员代表讲话，愤怒控诉国民党的暴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1945 年 12 月中旬，我党云南省工委分析了运动的形势，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认为罢课应适可而止。不久，中共南方局也指示，运动在政治上已获重大战果，必须复课。联大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经过罢联和“民青”组织的讨论，决定复课。由罢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五项复课条件：(一)保障人身自由；(二)取消非法禁令；(三)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之消息言论；(四)负责死伤善后费用及赔偿公私损失；(五)查办杀人主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基本上接受了复课条件。12 月 25 日，罢联发表了《复课宣言》，宣布于 27 日忍痛复课。同时声明：“为了完成死者的遗志，我们——全昆明 3 万同学愿意继续为民主为争自由而奋斗到底！”

"一二·一"运动是抗战胜利后，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阶段掀起的群众性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在党的领导下，"一二·一"运动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了党的正确主张和政策，提出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战斗口号。这样，广大人民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动实质开始有所认识。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群众，推动了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一二·一"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孤立了反动派，推动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谁是"一二·一"惨案的主凶

"一二·一"运动过去45周年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惨案的主凶究竟是谁，似乎还是一个历史悬案。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大中学生义愤填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严惩杀害四烈士的凶手，提出主谋凶犯就是国民党云南党政军当局的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当时社会各界莫不同情和声援学生，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西南联大教授会发表声明抗议，还拟具了《告诉状》对杀人主谋提出公诉。

国民党当局为掩盖事实真相，百般进行抵赖。先是通过官方宣传机器中央社和报纸捏造消息，说学生与军人"因误会而发生殴斗致流血"；接着又一手导演了"公审"及"惩凶"丑剧，收买歹徒编造口供嫁祸于人，还煞有介事地从监狱中提出两名死囚予以处决，想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又由蒋介石贼喊捉贼发电通缉所谓背后策划者"共党分子"姜凯归案。后来被迫玩弄"舍车保帅"的把戏，宣布将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议处"。大概是因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凶相毕露疯狂叫嚣："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开枪的自由。"但当时由于缺少确凿证据，真正的主犯和杀人凶手则逃之夭夭。事件还未了结，李宗黄已官运亨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经历几十年漫长岁月，在人民掌握政权的今天，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1945年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作为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民政厅长代省政府主席，上午八时在五华山向卢汉举行了交接仪式后，急匆匆赶到华山路国民党省党部，向在那里集合待命的党徒特务撑腰打气说："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等就是不怕事，也趁机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这伙党徒特务随即和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暴徒汇合，携带刺刀、铁条、棍棒、手榴弹，气势汹汹分头到联大、云大等校肆意行凶。一场残酷屠杀革命师生的惨案发生了。李宗黄以为这样可以"一箭双雕"，既镇压了群众，又可嫁祸于卢汉使之难以下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过去李宗黄没有逃脱群众雪亮的眼睛，今天更是证据确凿，这个在当天直接指挥暴徒血腥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终于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早在1927年曾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到云南清党反共，制造了屠杀革命学生梁元斌的血案，被云南人民撵走。抗战胜利前后，其主子为发动内战解除后顾之忧，加强对云南的控制，蒋介石打着"滇人治滇"的幌子，又选中了李宗黄，先后在重庆、西昌五次召见他并委以重任，阴谋策划"回滇主政"：用武力把省主席龙云赶下台；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拔掉昆明这个"民主保垒"。李宗黄在云南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办事。事实是铁证如山，"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至此已昭然若揭了。

（选自《党史月刊》92年1期，作者：张鲁音）

中国加入联合国

背景介绍

一九四五年初，世界反法西战争已进入最后的阶段，同盟国的胜利已成为必然。四月二十五日，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由顾维钧、王宠惠、胡适、董必武等十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中国与美、英、苏、法四国为发起邀请国。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首席代表宋子文同美、英、苏三国首席代表团同任会议主席。六月二十五日，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宪章规定联合国设立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理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及秘书处六个主要机构。除大会外，安全理事会是最主要的机构，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次日举行签字仪式并宣告会议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宪章上第一个签字。十月二十四日，《联合国宪章》经中、美、英、苏、法和其他二十四个签字国批准正式生效。

材料：

· 从预备会议到正式会议

材料　从预备会议到正式会议

四个发起国每天早晨要在贝尔蒙特饭店的顶楼集会，就一些问题达成谅解，以便四大国在大会上可以表现得俨如一体。只要四大国能够保持一致，他们就能很好地掌握住全体大会。其他问题则由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关

于大会该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在组织委员会引起了争论。美国代表力争使用英语作为正式语言，但法国代表则切望使用法语，即使不用作唯一官方语言，也应作为第二官方语言。最后，英国人出来支持法国的要求。俄国人希望选用俄语。魏道明则希望包括汉语。

当然，我们在会上的总方针，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同美国代表团紧密合作并支持美国人的立场。同时在与魏道明讨论关于大会主席问题时，我也明确指出还是要把我们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事有凑巧，我们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和美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需要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国际上，我们可以信赖这个国家。魏甚至说，我们有很多事要依赖美国。因此，只要问题不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美国。我说，一般说来，这样说是不错的。不过，有些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有困难的，面对美国则未必如此。比如说，美国对苏联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不行"。而我们则不能。我们当然不能对俄国人提出的每个要求都让步，但是我们用"不行"的方式必须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经不起不必要地惹恼俄国人。他也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要归功于罗斯福的坚决主张，是他通过科德尔·赫尔在莫斯科争得来的，当时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才得以参加会议。那时甚至英国也反对我们。当然，当罗斯福采取坚定立场时，邱吉尔是不会过份反对罗斯福的。另一方面，英国也同样不愿得罪莫斯科。因此我们的地位是比较微妙的。我们必须时刻记取这一点。宋深以我言为然。

关于会议主席问题，美苏两国仍然争持不下。我离开华盛顿以后，他们为了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又举行几次会议。4月23日，莫洛托夫终于来到华盛顿。人们以为他权力较大，看来可以达到一项谅解。殊不知他的态度比他的副手葛罗米柯更强硬。那天他在会上一再地说，他不能同意美国提出的只设一个主席的提案，因为苏联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甚至向宋子文表示，他还希望中国能成为主席之一。他又补充说，对苏联来说，这不是仅仅关系到他的国家威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原则问题。当晚又开了一次会，莫洛托夫也出席了，但这次会议并未取得任何结果。此时由于许多代表团有的已经起程去旧金山，有的正在准备出发，因此只能把问题留待旧金山会议去解决。

4月25日，四大国的首席代表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蒋登和宋子文齐集旧金山。那天早晨，他们四位在费尔蒙特饭店顶楼斯退丁纽斯的住处举行了首次聚会。每位部长都有助手陪同。参加的人总共约十五位，其中包括詹姆斯·邓恩，阿尔杰·希斯，贾德干和葛罗米柯。莫洛托夫频频发言，语调从容，而态度则很坚定。整个会议好象是美国国务卿同莫洛托夫间的一场决斗。关于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莫洛托夫坚决要求立即通过。他对会议主席问题，也同样持僵硬态度。他强烈表示，苏联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当斯退丁纽斯指出，大会主席要对会议有效率地进行负有重大责任时，莫洛托夫反驳说，并不要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承担这种责任。他坚决主张他所谓的平等原则，他说到这里时，转头看宋。斯退丁纽斯接着也征询宋是否有意见要发表。宋说，他的意见已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说完，再没有其他可说的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华盛顿发表的意见是，设一个主席有利于提高会议的效率。)

接着又讨论正式语言的问题。法国代表团的秘书长曾对此问题发表过意见，并且表示坚决要求把法语和英语同时用作正式语言。艾登和莫洛托夫都赞同此项提议。前者是因为法国坚决要求；后者则说，使用法语对全体代表都比较方便。当征求宋子文的意见时，他说单就效率观点而言，他认为增加一种正式语言，将不必要地拖长会议时间。(在会议开始前，斯退丁纽斯曾要求我们不要支持法国的提案，因为那将使会议工作过分复杂化。)艾登和莫洛托夫最后同意放弃法语作为正式语言，只要法国同意开会效率的说法。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问题使主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莫洛托夫的立场是，这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取得会员资格，至于主席问题，则不仅涉及大会的主席，也涉及各种委员会的主席问题，都需要解决好。他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正式会员国，它们有资格担任一个或更多的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争论僵持不下，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最后决定把这些问题提交指导委员会去研究。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仅有四大国的首席代表，还有其它代表团的成员。它实际上是大会最大的正式指导机构。斯退丁纽斯虽然指望在四大国之间解决这一问题，但最后也只好接受艾登的建议，把整个问题提交指导委员会去处理；莫洛托夫最后也同意这是唯一的办法。苏俄代表的态度和强硬立场，使得斯退丁纽斯既苦恼，又惊讶，以致不能再说些什么，只好问问秘书长对会议有什么建议没有。四外长会议就这样无结果而散。

为了再一次试图达成某种协议，另外又安排了一次所谓的"副手会议"；这个会议于当天中午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的邓恩和帕斯沃尔斯基、苏俄大使葛罗米柯、杰布、胡霖和我。葛罗米柯坚决要求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明确任命为专门委员会官员；否则他将拒绝接受整个委员会的任命名单。关于评议其他代表提出的提案问题，他要考虑需要什么样的机构。他说此事有待于同他的同僚们商量，这需要时间。因此他建议六点半再复会。大家都同意了。

那天下午，大会举行了开幕式，但那只是例行仪式。斯退丁纽斯以临时主席身份主持了会议。他要求代表们

为大会成功起立静默一分钟。加里福尼亚州州长和杜鲁门也作了发言。在傍晚举行的副手会议上，葛罗米柯寸步不让。邓恩只得宣布，继续讨论大会有什么进展，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整个悬案提交指导委员会处理。所以这次会也是一事无成。事后杰布对我说，俄国人的立场真是倔强又荒谬。他认为俄国人根本不懂什么叫谈判。他对此很生气。

当天晚上，莫洛托夫在苏俄驻旧金山领事馆举行晚宴，与宴的宾客约有三十人。其中有一位是墨西哥驻苏大使，他说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他和我谈的话很有风趣。他说，俄国人不懂得色彩有浓淡，情调有强弱。在俄语里根本没有"圆通"这个字眼。在俄国人眼里，事物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再没有什么介于其间。在宴会过程中，莫洛托夫又向宋提出了主席问题，暗示要求中国支持他。宋只是笑了笑，回避直接回答。他向宋祝酒时说，他一直希望见到宋，尽管只是在美国相见。不过他希望不久能在莫斯科重叙。他显然是指宋即将首途的苏京之行。此时此地萦回于莫洛托夫心头的必然是举行中苏会谈，以便把雅尔塔会上对满洲的决定付诸实施。当时，宋、胡世泽和我自己都认为苏俄代表们，特别是莫洛托夫，显然都愿和中国更友好。我们不禁猜测这是为什么。我说可能是苏俄人看到美国人不象罗斯福在世时那样对他们通融，因此想连络中国，以便对付美国。宋认为不见得是那样。我说另一个理由是，苏俄打算实现它建立缓冲地带的政策，以便在战后可以集中全力从事内部建设。我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希望在大会主席问题，以及接纳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争取我们投赞成票。

关于大会主席问题的争论进行得既炽热又紧张。艾登的折中建议是设四个主席，由四个发起国外长担任，轮流主持大会，并推定斯退丁纽斯为四强外长会议及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全权处理大会事务。但此方案似乎没有赢得斯退丁纽斯的赞同，莫洛托夫也不满意。莫洛托夫提议就四个主席方案投票表决，而不受艾登建议的条件限制。可是艾登却坚持说，他的建议是由两个部份组成的，这两个部份是不可分割的。会场上争论得非常激烈，莫洛托夫有时站起来说话，有时不顾别人正在发言，坐着就插话把别人的话题打断。斯退丁纽斯说，为了维护四个发起国的团结，他已经做得超越了上级的指示，因此他要求把问题付诸表决。他向大会公开吐露，罗斯福总统去世前两天曾指示他，美国只能支持一个主席方案；而且就在当天早晨，杜鲁门总统也打电话给他，要他坚持这一指示。这时，法国的皮杜尔插进来要求暂时不付表决，而要进一步努力寻求四大国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午饭时间早已过去，而僵局却变得越来越无法收拾，斯退丁纽斯和艾登两人越来越激动，莫洛托夫则依然既僵硬、又冷酷无情。主席身旁围着七、八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国会议员、两个助理国卿、大会的代理秘书长，还有一个俄语译员。他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不断地和这个打招呼，和那个打手势，或附耳私语。气氛极度紧张。斯退丁纽斯还不时地弯身去同艾登说些什么。接着有人递给斯退丁纽斯一个纸条。他很快看完小条就宣布休会五分钟。这时人们都站起来走向门厅，许多人赶紧去盥洗室。斯退丁纽斯把宋子文和我一把拉住，一面还寻找艾登。史末资将军这时也参加进来。斯退丁纽斯由于兴奋过度，无意中使用一些粗俗的语言。他说，俄国人已经取得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仍然贪得无厌。他说我们大家必须行动起来维护他的立场。他得到指示是坚持只能有一位大会主席。最低限度他自己必须成为各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并能全权处理大会事务。我建议他把莫洛托夫也请来，在会下对他进行说服。斯退丁纽斯同意这样办，并立即派人去请。莫洛托夫这才参加到我们当中来。

此时刘锴把我叫出会场并告诉我，王宠惠以及其他几位代表对宋已经拟就的讲演稿强烈不满。他们都坚决主张必须作几处改动后方可发表，否则他们要电告重庆声明与此无关。我回到王宠惠那里，只见他怒气冲冲。我又把其他几位代表请来。来了八位，他们主张修改讲稿。除了某些辞句上的改动外，最重要的变动是要删去两段，即有关国际联盟的失败，以及该组织致力于建立集体安全等问题。我随即去找宋，促使他接受建议，修改讲稿。他似乎有些不悦，他只同意作些措辞上的更动，文件内容则不能作更多的修改。他说，他将对大家认为有问题的两段讲话负责。这时已是三时二十分。他命令刘锴把原稿发送出去。但我还是希望演讲后再发表，以使稿件同实际讲话没有出入。我随了驱车同往会议大厅，在那里向他谆谆劝告，终于使他接受了五、六处改动，把大家的要求都包括进去了。讲稿经过修正后公布，小小的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

主席问题终于在4月27日获得解决。那天四外长先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地点仍在斯退丁纽斯的住处。参议员范登堡和康纳利也与会。斯退丁纽斯把我和贾德干也请去列席。莫洛托夫似乎急于要达成协议，他接受了艾登方案的前三点：即会议设四个主席，轮流主持会议。斯退丁纽斯担四外长会议主席。但是执行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也要由四个外长轮流主持。不过在四外长授权之下，斯退丁纽斯将担任这些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具体事务。我的印象是莫洛托夫是找体面的出路，下台阶。但是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坚决反对他的方案，于是辩论又从新炽热起来。斯退丁纽斯请宋发表意见。宋说，两个委员会设四人主席而掌握会议又只限于具体事务，不太灵便。莫洛托夫一听此话显得吃了一惊，两眼变得冷酷无情。他粗率地发问道，为什么不行。斯退丁纽斯和艾登都反对"具体"这个字眼；斯退丁纽斯说，"具体事务"也可能包括为代表们调度汽

车的工作等等。斯退丁纽斯态度坚决，他最后宣布，美国不能接受，并说，他们唯一可行的就是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执行委员会讨论得更热烈。美国人似乎再也不能忍耐了。坐在斯退丁纽斯后面的两位参议员范登堡和康纳利不断地压低了嗓门说“表决！表决！”苏联代表团离他们不远，也能听见。最后，只好把问题付诸表决，结果苏联以失败告终。中国当然是投票赞同美国。接着就休会，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十分了。

按照最后协议，全会主席职位实际是要轮流担任的。因为是按照字母次序轮流的，所以第一轮主席就落到中国头上。我向宋建议，把全会第一轮主席让给斯退丁纽斯，这样可以使他在美国公众面前好说话，因为四主席轮流制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宋有些犹豫不决，因为首次会议仅是听取各国代表团团长的致词，没有其他的事情。但是结果还是斯退丁纽斯主持了全体大会，宋被安排主持第二次会议，再往后就按字母次序轮流。

4月28日，四外长集会研究邀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入会的问题，但无结果。那天的会议上午由宋主持，下午由莫洛托夫主持。

晚间，我在饭店门厅内遇见了宋。他说，他刚才在斯退丁纽斯那里听说，南美各国代表希望通过一项邀请阿根廷参加联合国的建议，并把此事与邀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的态度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们是四大国之一。宋说，这在道义上说是不对的，因为斯退丁纽斯在墨西哥会议上曾保证支持阿根廷。他征求我的意见。

次日，所谓的分配小组开了一次会。分配小组的职能是为各种委员会配置官员，在给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委员会官员职位的问题上，邓恩是比较屈从的。杰布曾有两次提到，艾登仅授权他可以同意委任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任一个委员会的报告员；但他自己却愿意给予乌克兰一个主席职位。至于白俄罗斯，会议很快就一致同意委任她为报告员。接着，葛罗米柯就竭力为乌克兰争取主席职位。邓恩说，如果乌克兰取得主席职位，他就要力争为阿根廷也取得一个同样的职位。至于反对给予这两个共和国任何职位的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取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葛罗米柯反对阿根廷，甚至不许提阿根廷这个国名，他认为阿根廷是法西斯政府当政，长期以来它一直在帮助联合国的敌人。邓恩说，看来是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了，唯一办法就是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我提议让两个主席职位空着，以便其它的十个委员会可以开始工作。英美的代表都表示赞同，但是葛罗米柯坚决要求立即给乌克兰一个主席职位，他心目中想要的是强制行动委员会的主席。邓恩说，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不能给。(显然是已经内定给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了。)他提议给托管委员会主席，我则提议给法律问题委员会主席。后来，决定给国际法院委员会主席职位，但遭到了拒绝。我觉得，实际上这三个主席职位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使葛罗米柯满意，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取得一个主席的职位，不管是哪一个。但是邓恩的僵硬态度使他坚持非得为乌克兰争取到强制行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不可。这一来，会议再度失败，大家只能把整个问题送回到四外长会议去解决。

散会时，葛罗米柯暗示希望和我谈一谈。我当即表示乐意。他又问魏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约定在下午四点到他的旅馆找他。我又表示说，早晨的会议本来可以是完全成功的。他立即回答说，如果由我提议在讨论的三个委员会以外，给乌克兰另一个委员会主席职位，只要邓恩同意，他也可以同意。他既然许下了这样的诺言，我就回去把任命名单草案重新研究了一番。我断定原定给予秘鲁的主席职位只要为秘鲁另找一个，就可以很容易地转给乌克兰。于是我就去看邓恩。他告诉我，波斯沃尔斯基一直在同俄国人接触，但俄国方面态度仍然很僵。他说，美国人想坚持他们来的主张，给予乌克兰的主席职位只能在已经考虑过的三个委员会中任择其一，别的不能考虑。他将坚持这一立场。不过，他倒可以同意把秘鲁的主席职位改到另一个委员会。第二天上午，邓恩告诉我，苏俄代表已经接受原定给秘鲁的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我又建议把原定给卢森堡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职位改给秘鲁，而不安排卢森堡，他也同意。第二天上午开会时，杰布对取消卢森堡的主席职位一事颇感踌躇，邓恩和我则一致认为没有问题，因为卢森堡已经定为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这样，这一方案就被全体通过。贝克先生则改任报告员。至此，协议终于圆满达成。

(摘自《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

中国国民党六大

背景介绍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发动全党，准备内战，反共反人民，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尽管会上没有公开讲要消灭共产党，但是在他们演说、报告和文件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反共思想。在《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写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量解决。”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战的旗帜，领导全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从来就不存在“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事，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国民党当局这样说，无非

为了随时把这八个字的罪名强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大会的特别报告中还说什么：与中共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全党，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即创造斗争条件与环境，故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这里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准备发动内战的本质。蒋介石在六大闭幕后的两天，就调派十个师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向苏浙地区进攻，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避免内战，一再退让。直到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之时，才进行反击，将其打跨。到了 7 月，国民党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这一切都表明，国民党六大的路线是：准备内战，消灭共产党，坚持专制统治，把中国引向黑暗。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也侈谈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宣布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准备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大会上通过的《政纲政策》中也提到："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以及学术研究之自由。"还通过了一些决议：《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国实施原则》、《劳工政策纲领》。

材料：

- 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
- 对于外交报告决议案
- 选举总裁案

材料一　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

本大会听取政治报告以后，特就七年来政府之措施作缜密忠实之检讨，详考其得失，深究其利弊，撮举过去显著之政绩，以珍重吾人历史的使命，并促使吾人更认识所负任务之艰巨，同时更切求其缺陷之所在，期于严正之认识中，力谋今后彻底之改进。爰根据本党主席与政纲政策之范畴，分别胪述于下：

就民族主义言之，本党领导全国对日抗战八年以来，我国由单独作战进而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循坚定不移之国策，内而喋血奋战，求彻底之胜利；外而昭宣主义，谋世界之和平迄于今兹，意德两国已相继投降，侵略之阵线已摧，日寇之败覆不远。更因此悠久之奋斗，获友邦尊重我自由平等之具体表示，于三十二年一月有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之订立。其他各友邦亦先后与我签订友好条约，一以平等为原则。百年来我国所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至此乃告解除，总理遗嘱所期许于我全党同志者，并已有一部份之实现。此实革命进程中最辉煌之成绩，亦本党民族主义最伟大之成功。惟于国内边疆各族之融合联系工作，尚鲜致力，对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与自治能力之增进，更未能尽扶植之功。是民族主义中"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待"之两重意义，尚未能同时贯彻，有待于今后之继续努力，以期彻底实现自由统一之中华民国。

就民权主义言之，政府对于新县制之实施，及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年来督策进行，虽多致力，但课其实效，是地方自治仍未能完成，人民四权训练，尤未能依据遗教切实推行。此固受战时环境之影响，而数年来自治工作之未遵循总理手订之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认真办理，允为症结之所在。在此积极准备宪政之时，地方自治之基本未能确实建立，人民犹未能具备民权主义宪政之条件，实为训政时期中无可讳言之缺陷。抑尤有进者，县为自治之单位，在推行自治工作中，当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使之不仅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此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条举阐述至为详明。而现行自治法令，未能注意使县兼为基层经济单位，诚应及时加以充实。要之，本党历史的任务厥为建立三民主义之共和国，故凡所以促进地方自治，增设民意机关，力求宪政基础之奠定者，皆当力行不懈，以彻底实现总理所主张之民权政治。

就民生主义言之，自临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政府虽尚能依据实施，但言绩效，则与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相悬尚远。溯自北伐完成，本党执政已十七年于兹，而民生主义所诏示之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两基本原则，迄未完全实现；尤以抗战以来，政府关于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之政策，既不能相互配合，更未能贯彻发展国家资本及限制私人资本之主张，将令社会财富日趋于畸形之集中，亟应严切注意，力挽颓风，以扫除民生主义之障碍。其次在抗战期中，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遭自二十三年公布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布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见诸实施，此次总报告亦略未述及。此国家制定有关民生之大法诚应迅予切实执行，不容再事延缓。

此外更就一般之行政言之，则关于行政效率之提高，尚鲜显著之进步。当此战时，政治设施事项繁复远过平时，必须有极高之行政效率，然而一切政令始能为普遍有效之执行，收迅速确实之效果。而按诸实际之行政现状，则事多壅滞，令多稽留，人有旷废，时有虚耗。推其原因，则机关法令程序之未臻简化，人事制度之未能确立，贪官污吏之未能肃清，在在均足以阻滞事功，影响整个政治之进展。今后惟有严肃纲纪，认真考成，务使人有奖惩，事有考核，以增进行政之绩效。同时更须有计划的培养政治人才，以充实各级行政干部，一面力求人与事之配合，一面发挥新陈代谢之作用。此皆为革新政治之要务，固所望于今后倍加致力者也。

（摘自《国民党代表大会资料》）

材料二　对于外交报告决议案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德国全面崩溃，欧洲战事结束之时，同人于此盟国之伟大胜利，不胜欢欣祝贺，仅以吾国至友罗斯福总统不及见此日为遗憾。唯西方之敌人，虽经克服，而东方之敌人日本，尚未受其应受之膺惩。我许多省份，尚在寇骑蹂躏之下，无数同胞，尚呻吟于日寇之压迫，若干邻邦，亦尚未解放。我盟邦尚有艰巨之任务，需要共同之努力，吾国人更应加强斗志、不惜牺牲，早日驱除敌寇，予侵略者以彻底之打击。

大会听取七年来之外交报告，深幸本党于总裁直接指示之下，能妥定国策，始终信赖联合国家，并相信正义必能战胜一切，坚贞不移，遂以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且于艰苦血战之中，竟能实现总理之遗嘱与各友邦改缔平等互惠新约，关于开罗会议获得收复失地之保证，差堪告慰我革命与抗战中勇敢牺牲之先烈。盖吾国对外无领土野心，吾国之所希求者，惟本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与国外华侨之得受平等待遇。此种合理愿望，兹已为友邦之所共认矣。

我中、美、英、苏、法五大盟邦，经此长期并肩之抗战，情感融洽，如足如手。今后自当永久保持此种患难之友谊，共同负担战后建设之使命。我国与苏联疆土相连境界之长，世无伦比，交接自更频繁，今后自当彼此以最大之诚挚，缔结永久之友好关系。中、美、英、苏、法及其他盟邦之精诚团结，实为世界和平之础石。吾人于期望盟邦合作之中，尤盼我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今后深切了解自身之责任，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一言一行，均须时刻不忘以加强盟邦团结为一贯之目标。世界和平之组织，已于旧金山会议见其端倪，吾国将不吝一切之努力，以助成集体安全永久和平之确立。

抑我国内部之团结与民主宪政之实施，不独为本党数十年奋斗之目标，亦为吾盟邦之所关怀。国民政府为表示实行宪政之决心起见，早由主席宣布于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本大会又已正式加以通过。国民大会将包含本党及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代表人物，俾能反映全国人民之意志。

总之，同人之所确信，即中国必须忠实遵循三民主义，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方足以与联合国家共荷艰巨，巩固国际之和平，造成繁荣之世界。

材料三　选举总裁案

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主席团提：依据修订本党总章第五章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本大会应选举总裁，行使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兹经主席团一致决议，仍提请选举蒋介石中正同志为本党总裁，并请吴敬恒同志说明案旨趣，敬候公决。主席致词，并宣告用起立方法推选。

决议：全场一致起立通过。

附：（一）吴委员敬恒对于选举总裁案说明原文

主席、各位先生：

总裁的添设，始于二十七年汉口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其时主席团命敬恒报告他的选举的仪式，可以述说一遍，以备从前少数同志没有与会的，作一个参考。

我们总章把总理一章永远保留，此是我国纪念最恭敬的习惯，就是把总理二字，以后何人不许承用。如古代唐太宗做过尚书令，从此唐代就不补尚书令，亦致敬的一式。总理一章永远保留，即是此意，并非把那一章问题的职权亦不行使。自总理逝世后，有十余年没有想法补救，到了抗战以后，外人皆注目吾党，始觉那群龙无首的现象，不便他人了解，因此想法设立总裁，代行总理一章的职权之法。果然自设了总裁，而总裁与各国周旋，便利至多。因外人对于一国大权所属，十分注意，如美国总统有大权，故注意美国皆集于罗斯福总统；英为内阁制，注意英国大权者，皆集于邱吉尔首相；苏为共产国，其大权在人民委员会的斯大林委员长，在总统卡列宁为略。我国自总理建国，虽初有各窃据的扰乱，然大权渐集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其执权的代表人为总裁，故皆注意于代表人的蒋总裁，不曰美、英、苏、中，即曰罗、邱、斯、蒋，即可以知所注意者为四国。而便利实多，不惟总理一章的职权，亦有不可不行使的场合。

其时既设总裁，就共注意到谁可担当此任。不惟以前一二十年，一切军政之设施，皆今总裁所辛苦擘划，即从前总理在遗墨中论到总裁的行能，皆比较同一最好同志为优长，隐隐有将来有继承之话，即外人在抗战前后，知中国有人最注目者为总裁。所以其时临全代表的公意，非请今总裁担任总裁的一职不可，而当时今总裁不许再有总理章作“吾党以某为总裁”之语，必规定“总裁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所以自临全大会以来的总章，即用“总裁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代行总理章总理职权”，今改代行为执行，尤较确定。

选举有各式，如有竞选人者，当用票选，无竞选人者皆用推选。吾党对于选任国府主席及院长等，皆只用推选，而总裁一职尤隆重，必用推选之式，以昭隆重及简捷。故当时各代表一致主张，即由当时主席宣向全场曰：今选蒋中正同志担任第一任总裁，赞成者起立。于是全场起立拍掌亘数分钟，欢呼致贺，作为通过。

（摘自《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编》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本无条件投降

背景介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仍要求保留天皇作为日本元首。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日，蒋介石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令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管。洽降地点为玉山，又因玉山机场雨后跑道损坏，临时改在湖南芷江进行。

蒋介石赋予何应钦下更任务：(一)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二)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批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三)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四)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等。这就排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二十日，何应钦率领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等三十余受降人员，乘两架美式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及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汤恩伯等人，也先后抵达芷江。

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及参谋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国雄等，遵照中国战区方面规定的时间，由盟军战斗机群掩护到达芷江。

二十七日，到南京受降的国民政府前进指挥所主任、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当面向冈村宁次交待：“在任何情形下贵军设法维持交通安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香港等重要都市，务请注意！”这是公开要求日军为其守卫战略要点，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收复失地。

何应钦为统一指示各战区长官抢占战略要点，办理受降事务，先后飞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各地面授受降机宜。九月八日，亦由芷江飞抵南京。

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向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军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战区代表徐永昌参加了受降签字仪式。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应邀参观的有外宾及中方高级官员、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担任警卫的官兵近千人。

八时五十一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受降官四人入场，他们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是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中国派遣军航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三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七人。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受降仪式历时约二十分钟。

材料：

· 日本投降
· 日本投降了
· 中国战区受降

材料一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美国得知日本拒波茨坦公告于门外，于八月六日，把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又于九日，投第二颗原子弹与日本长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负隅顽抗，使日本三十万人口丧生。美国原子弹对日本的轰炸，恫吓了日本的统治集团。日本国内主和派认为不能再战了。但以陆相阿南为首的主战派，仍叫嚣要将原子弹破坏之惨状作最小的宣传，企图欺骗日本人民，尤其是士兵，以免影响再战。

八月七日，中国宋子文等人第二次访问苏联(第一次是在同年六月)。他们与斯大林继续举行会谈，协商中苏缔结同盟条约及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国等问题。

八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正式对日宣战。同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式接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并发表声明，声明自八月九日起，苏联将认为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同日，莫洛托夫接见驻苏联的英、美、中三国大使，通知他们，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三国大使对苏联的声明表示欢迎。

八月九日零晨，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三路进攻“满洲国”、南库页岛与北部朝鲜。苏联远东军一百七十万人，大炮二千六百余门，坦克五千五百余辆，飞机三千余架，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进攻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关东军全线溃退。苏联军队在中国军队的配合下，迅速解放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和东北大片土地。

苏联军队切列米索夫中将率第十六集团军攻入南库页岛。格洛奇少将率部攻占千岛群岛。奇斯佳科夫上将率

第二十五集团军攻占朝鲜北部。

中国战区除积极配合苏联等盟军作战外，还展开全线大反攻，消灭日本侵略者。

八月九日，日本天皇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问题。出席会议的首相铃木、外相东乡、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相米内、军令部长丰田付武、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以东乡、平沼、米内为一派，主张接受公告，无条件投降；以阿南、梅津、丰田为一派，反对无条件投降，主张顽抗到底。会场上，两派争论激烈。阿南提出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接受公告：1.盟军不在日本登陆。2.在国外的日军不采取无条件投降形式，而作为自动撤军或复员处理。3.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理战犯。4.保留日本天皇制。会议僵持到下午一点钟不决而散。

九日下午二时，首相铃木召开内阁会议，继续讨论是否无条件投降问题。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附带条件，根本不可能，主张无条件投降。少数顽固分子，仍坚持自见。会议进行到晚八时，仍无结果而散。

日本首相铃木鉴于各种意见均已充分发表而又是不出结论，时间又不容拖延，乃决定奏请天皇圣断。当晚十一时三十分，日本天皇在防空洞内召开御前会议，两派意见仍争认不休。铃木请天皇表示意见，以圣断作为会议的决定。日本天皇认为：我国现状与列国情势，如再继续战争，不仅日本趋于灭亡，世界人类，将更陷于不幸，故此惟有忍受一切，结束战争。铃木回到内阁会议上宣布圣断，并以政府的名义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

八月十日，日本外相东乡将投降决定电告日本驻瑞士、瑞典两中立国公使，请两国政府转告英美苏中四国政府。同日中午，瑞士驻美公使葛拉斯理将日本投降正式照会送交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照会大意是：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含任何要求有损于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望关于此事的明白表示迅速获致。同日，中国政府收到日本上述投降电文。

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经过密切协商后，于八月十二日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盟国复照送交瑞士驻美代办葛拉斯理转达给日本政府，复文如下："代办阁下：八月十日之照会奉悉。兹复者：美国大总统已嘱鄙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由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条款，然有下列一点，附以一项谅解曰：上项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吾人所采立场如下：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师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利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宣言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事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发号施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时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俾能迅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所规定之目的达到为止。贝尔纳斯（签字）国务卿。"

但是日本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阿南及梅津等仍在作垂死前的挣扎。在日本政府发出投降照会的同一天，陆相阿南却发布了"告全军将士"训示，叫嚣"苏联终于入寇皇国，不论明文如何粉饰，其侵略与称霸大东亚之野心昭然若揭。事已于此，夫复何言，只有毅然决然将护持神洲之圣战战斗到底。"同日晚，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下达继续作战令，提出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的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击破苏联军队，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

十二日，梅津美治郎电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不要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

冈村宁茨也对所属派遣军下达训示：本官决心率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日本南方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也叫嚣：虽战至一兵一卒，亦将向敌决死迈进。

由于日本军阀头目们负隅顽抗，各地的侵略战争未止。又由于日本内部斗争仍很激烈，对盟国的投降复文迟迟未发出。

十四日，日本大本营仍在继续发布作战命令。

同日，同盟国再次通谍日本政府，令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本天皇再次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御前会议。在会议上，主战派表示：与其在此不安定的情形下，结束战争，毋宁于九死中求一生机，继续战争，此外别无良策。最后天皇说：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心没有变，并起草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晚，顽固到底的陆相阿南剖腹自杀。

十四日晚七时，美国国务卿以照会一件交瑞士驻美代办葛拉斯理，请转日本政府，指示日本正式投降。盟军为接受投降，已派麦克阿瑟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部之最高统帅，他将正式投降之时间、地点及其它细节通知日本政府。

十四日晚，日本政府复文由瑞士驻美代办交给美国

政府，其文大意如下：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事项规定，天皇业已颁布勅令；二、天皇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须条件。天皇准备对日所有海陆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颁发盟军统帅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种命令。

同时，日本政府根据天皇的意见，在十四日晚起草了一篇投降诏书，由天皇广播。

十五日二时，日本投降诏书已由情报局完成录音。

十五日四时，日本近卫师团千余人，冲入首相官邸、皇室、搜索天皇的投降诏书录音，未得。又冲入铃木、平沼等私人住宅，仍未达目的。后经日本东部军区司令官劝说，近卫师团千余人才撤走。

八月十五日，日本广播天皇投降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日，铃木内阁辞职。

十七日，日本组成以东久迩为首的内阁。

伟大的抗日战争以正义战胜邪恶、以公理战胜强权、以各国人民的胜利、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惨败而载入史册。

（摘自《抗日战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日本投降了

8 月 7 日各报都登满了新型炸弹的报道，这种炸弹据说是美、英、加共同发明的。说它的体积只有四千磅巨型炸弹的十分之一，而威力却比它大十倍。

8 月 7 日晚，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谈到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及杜鲁门、邱吉尔和史汀生关于这种炸弹的起源和发展的联合声明。

两天后，关于俄国对日宣战和俄军分四路进军越过中国东北边境的大量报道出现了。那时透露出了早在 6 月中旬，日本政府曾请求莫斯科出面调停。就象某些报所报道那样，我心中也在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受到原子弹的影响，把对日参战的日期从预定的 8 月 15 日提前到 8 月 8 日。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回答。但当时一般认为（我的想法也如此）日本就要投降，事实上，只不过是几天的事情了。

从 8 月 5 日以来，集中在短短的几天里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充满重大意义的，当时给我以难忘的印象。这些事虽然并非出人意料，但来得太突然了。虽说大家都希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能使日本恢复理智并加速其投降，但是看起来日本的乞降还是使得伦敦、华盛顿和重庆的官署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应付日本投降后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在重庆。甚至连总司令蒙巴顿勋爵（我想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也为之大吃一惊。他正要回到缅甸去，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蒙巴顿勋爵说在他动身的前夕，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刚开始他和首相的晤谈，那时有一个电话打来向首相报告，说是从日本广播听到日本请降的消息。官方的正式文件虽尚未收到，但是这个消息显然打乱了蒙巴顿正要向首相汇报的计划。蒙巴顿现在不得不考虑另一套问题，包括他的部下的最后复员。

8 月 13 日全日人人处处都是等候东京对四强在上星期六发出的照会的答复。但没有讯息。次晨，8 月 14 日，谣传日本接受了最后通牒，但同时也有否认的说法。有消息说，纽约、旧金山、芝加哥都为尚未完全证实的胜利举行了庆祝。

在萨沃伊饭店的招待会上，几位新大臣、首相、美国驻欧洲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斯塔克、纳逊勋爵、迪亚兹大使，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大使，为了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而向我致贺。据说，麦克阿瑟将军已在日本登陆去接受投降。不过我还是小心从事，说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正式消息。事实上在午后一时我给英国外交部的贾德干爵士打了电话。他也说关于日本的答复，除了报纸的报道外，没有需要转给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消息。英国广播公司下午九点的广播没有提到日本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首相官邸发出一项通告，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照常工作。一俟收到日本投降的官方消息，首相办公室将发出正式公告。

次晨的报纸对耽延的原因作了两条解释：第一，日本内阁在接受四强的最后通牒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第二，高级政府官员和天皇本人准备在接受最后通牒之前实行集体剖腹。

8 月 15 日，我参加了新首相艾德里及其夫人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招待会。大多数对远东关心的大使和新政府成员都出席了。上院领袖埃杰顿勋爵向我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问我拿什么东西来给中国的解除武装后的敌军吃。我说可以放心，长江流域各省的农产品很丰饶。我对首相说，他决定将议会的开幕日由 8 月 8 日推迟到 8 月 15 日，正逢对日作战胜利日，一定是得到了灵感。这样就使国王能用很有力的话开始演说“六年对日战争胜利结束”。艾德里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巧合，并且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他已于昨晚十时三十分收到了日本答复的全文，不过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尚有待证实。到十一时三十分得到了证实，于是便在午夜发布了公告。

14 日，我由于整天紧张，甚感疲乏，就先睡了，没有等候最后的确实信息。8 月 15 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我的管家给我端来早餐时，向我祝贺日本的投降。他说，夜间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并在凌晨三时便被群众欢呼和大炮轰鸣声所惊醒。兴奋之余，我立即吩咐悬挂中国国旗。我在日记里写道，我长期盼望、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摘自《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

材料三　中国战区受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经过共同磋商后，达成了受降地区的划分协议：中国的东北地区及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北地区由苏联军队接受日本投降；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南和日本、菲律宾由美国军人受降，同时占领日本，并组织同盟军共同管制日本的机构；东南亚地区由英国军队受降，其中印度尼西亚地区由荷兰军队受降；中国战区（东北地区除外），包括台湾、澎湖地区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由中国受降。本来香港也应归中国战区受，后因英国政府反对而改由英国受降。

八月十五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介石）电告南京侵华日军指挥官冈村宁茨，指示他六项投降原则。内容有：一、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立即通电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战区何应钦有命令。等等。

八月十九日，冈村宁茨复电：遵照中国战区指令，八月二十一日派遣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及随行人员，至湖南省芷江机场。并告知日本飞机尾部系以布条为记号。

中国战区收到冈村宁茨回电后，蒋介石旋即召见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面示一切投降工作，并赋予何应钦下列任务：一、处理中国战区全部敌军投降事宜；二、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三、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导官发布一切命令；四、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等等。

八月二十日午后，何应钦率领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等三十余受降人员，到重庆九龙坡飞机场，分乘两架美军运输机，飞往湖南省芷江。同时，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等，也从昆明乘飞机直飞芷江。此外，中国战区各地区受降主官汤恩伯等，以及中、外记者，亦纷纷云集芷江。芷江本是一个不出名的地方，由于中国战区洽降在那里举行，就成为中、外瞩目的地方了。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中美空中混合团的三架战斗机分别由中国的周天民、林泽光和美国的葛兰芬等人驾驶，由湖南省芷江出发，飞往常德上空，给日本洽降使节的飞机导航。十一时日机在周天民机群的导航下到达芷江。

这一天的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无数彩牒矗立在街头要道，从机场到中国陆军总部驻地戒备森严。芷江军民一早就聚集街头，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的可耻下场。

当周天民的飞机在机道着陆的时候，在场的人们欢欣鼓舞。接着日本洽降使今井武夫座机降落，其它几架飞机亦依将降落。当今井武夫座机的机门被打开后，经中国官员的同意，今井武夫及其随员：参谋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国雄、翻译木村振男暨飞行员少佐杜原喜八、准尉久保善辅、小八重正里、雇员中川正治走下飞机，肃立在舷梯旁边，待查阅名单、证件及检查行李后，中外记者纷纷摄影，然后他们被送到住所。

二十一日午后三时，中国战区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城内万寿宫接见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的代表今井武夫。在接见厅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苏、英四国国旗。厅正面放一张长桌，长桌上铺着白布。居中坐着肖毅肃，左右坐着冷欣、柏诺德等。对面放着一张长桌，准备给今井武夫等人坐的。其它两旁还坐有中美军官和中外记者百余人。当今井武夫等四人进入大厅后，首先向肖毅肃行鞠躬礼，然后入坐。厅内庄严肃穆，肖毅肃首先自我介绍：我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国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今天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国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来接见你们。接着，他又介绍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和在中国的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并说，他们是陪同我接见的。肖毅肃要今井武夫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交出身份证明书。今井武夫回答说：我是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派来晋见中国最高统帅的代表，任务是在中国战区投降书签订前与贵部联络。我是中国派遣军今井副总参谋长，并无特别身份证，只有冈村宁茨大将授命来接洽的命令，已随身带来。同时，今井武夫还介绍了他的随员桥本、前川参谋。肖毅肃又说：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给冈村宁茨的电令中，要你随带驻中国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表册，想你已带来。今井武夫答道：中国派遣军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的日军，关于台湾、越南因不属本军指挥，故不十分明湜。今井武夫呈出在华兵力配备图，并说：详细情况及其它它所需表册，等回南京后再给你们。接着，肖毅肃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要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茨。一号备忘录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国总司令何应钦指示日本投降应行准备事项。主要内容：一、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任命何应钦接受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辅助部队的投降。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应自接受备忘录之时起，立即执行何应钦之一切规定，在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军也同此规定，并应由冈村宁茨负责指挥该项日军的投降。三、冈村宁茨接受此备忘录后，应立即命令在中国战区的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四、在中国战区内，同盟国的被俘人员，应立即恢复自由，充分提供衣服、住所及医药。五、将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由冷欣担任主任。六、在中国战区的正式受降地点、时间另定。等等。此外，将在南京设立机场，并且空运军队前

往南京、上海、北平，办理接收工作。至上，历史性的历时两小时的洽降式遂告结束。中外记者纷纷拍照，还拍了纪念影片。

八月二十六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十七个受降区，并指令受降主官：

1. 北越区：中国战区以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越南在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土桥勇逸。受降地点在河内。

2. 广州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接受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广州。

3. 汕头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七战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曲江潮汕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汕头。

4. 长衡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司令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长衡地区。该区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坂西一良。受降地点在长沙。

5. 江西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九战区薛岳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江西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笠原幸雄。受降地点在南昌。

6. 浙江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三战区顾问祝同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松井太久郎。受降地点在杭州。

7. 沪宁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上海、南京地区。日军在上海的投降代表为松井太久郎，受降地点在南京。

在南京附近的日军，由侵华日军十川次郎为代表向中国部队投降。受降地点在南京。

8. 湘北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六战区孙蔚如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武汉、沙市、宜昌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冈部直三郎。受降地点在汉口。

9. 徐蚌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徐州、海州、蚌埠、安庆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十川次郎。受降地点在徐州。

10. 平津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根本博。受降地点在北平。

11. 山西省：中国战区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山西省。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澄清徕四郎。受降地点在太原。

12. 洛阳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郑州、开封、新乡。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鹰森孝。受降地点在郑州。

13. 郾城襄樊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五战区长官刘峙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郾城、襄阳、樊城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鹰森孝。受降地点在郾城。

14. 山东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长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山东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细川忠康。受降地点在济南。

15. 热察绥三省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根本博。受降地点在归绥。

16. 香港地区：盟军受降主官为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该区日本投降代表是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香港。

17. 台湾地区：中国战区以陈仪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台湾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安藤利吉。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内举行。

当时，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口扎起了用柏枝做成的彩坊，上面高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闪闪发光的金字。从大门口往里行不远，又是一座用柏枝扎起的彩坊，上书“和平永奠”四个闪闪发光的金字。再往里行，便是广场，在广场中间的道路两旁，以十步为间隔，分别竖起五十二个联合国家的国旗。当时据说，这些国旗，将分赠给各国使馆保存，留作纪念。通过旗林，便到礼堂。礼堂门口又是一座“胜利和平”的彩坊。礼堂的廊柱全部用红白兰三色彩布包了起来，礼堂中间用嫩绿的矮绸屏三面围起签字用的上下两条条桌，四周楼厢也用红白兰三色绸布装饰。礼堂内正中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孙中山先生遗像对面是中、美、英、苏四国领导人的肖像。

礼堂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前设一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他们的后面站立十二名士兵。受降席与投降席之四周，以白绸围起来。受降席的左侧为中国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军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受理的人员总计约一千人(又一说加参受降人数是四百零五人)。

中国战区参加受降的官员是中国陆军司令部司令何应钦、空军上校张廷孟、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肖毅肃等。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是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日军投降代表一律身穿日军便服，光头。日本翻译木村辰男，立于冈村宁茨的后面。

中国战区参加受降的官员与日军投降代表的座位，见下列座次表：(略)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整个过程原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上午八时卅分以前，各中、外来宾均在规定的休

息室内休息。

(二)上午八时卅五分,中国参观人员入会场依席坐定。

(三)上午八时四十分,同盟国参观人员入会场依席次会定。

(四)上午八时四十三分,中、外新闻摄影记者准备会场外的照像。

(五)上午八时四十五分,日本投降代表乘车由中国王武上校引导,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下车,并引下日军投降代表休息室。

(六)上午八时五十分,中、外新闻记者入会场,各依席次坐定。

(七)上午八时五十一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官入会场,各依席次坐定。

(八)上午八时五十二分,由中国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会场,先到规定位置立定,向何应钦一鞠躬,何命坐后,王俊即退入参观席。

(九)上午八时五十三分,何应钦宣布可以照相五分钟。

(十)上午八时五十八分,何应钦令冈村宁茨呈出证明文件,何应钦检视后将该文件留下。

(十一)上午九时正,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付冈村宁茨阅读并签字盖章。这时,中、外记者一律准予照相,冈村宁茨在投降书上签字,送呈何应钦。

(十二)何应钦在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后,以一份交付冈村宁茨。

(十三)何应钦命令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命令受领证交付冈付宁茨,由冈村宁茨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后,将受领证送呈何应钦。

(十四)何应钦宣布日本投降代表退席,仍由王俊引导投降代表等退至规定位置,向何应钦一鞠躬后,再导出会场。这时准许记者摄影。

(十五)何应钦广播。

(十六)何应钦等受降人员退席。

(十七)其它人员按顺序退席。

上午九时零四分,当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按照程序进行到第十项时,何应欠命令冈村宁茨送呈证明文件,冈村宁茨令小林浅三郎将证明文件送呈何应钦,何应钦将日本降书两份,令肖毅肃转交冈村宁茨,冈村宁茨在投降书上分别签字盖章。中、外记者纷纷将此签字情形摄入镜头。然后,日方小林浅三郎将降书呈何应钦,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受降一方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盖章。至此,历时十分钟的中国战区一百多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何应钦令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茨等退席。

九月九日的南京,街头巷尾,人们欢欣鼓舞,兴高彩烈,整个南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摘自《抗战纪实》齐鲁书社)

历史内幕

抗战后期美国曾寻求与中共合作

众所周知,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曾顽固执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从而将中国人民推向内战的深渊。但是,人们一般不知道在抗战后期,美国还曾一度积极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

谢伟思首先提出,美国应派代表到共产党地区

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致函美国国务院,详细阐述了他在华考察一年来的情况,并建议美国政府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抗战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他批评了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谢伟思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通过这些部队控制的土地,可以得以进入内蒙古、满州和日军的华北基地的通道。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会使他们的阵地战略重要性提高……最近来自山西的艰苦战斗在继续进行的报道,显示出共产党军队仍然是一支使日军生畏的军队,以至激起日军进行周期的'扫荡'……日军在山西的活动和在那里遇到的困难,与其他大多数国民党与日军作战的按兵不动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谢传思是较早发现国共关系危机的美国官员之一。他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逐步壮大和国民党的不抗日并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国存在着爆发内战的严重危险。为此,他提醒美国政府要"现实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考虑美国"给国民党大量军援,是否对中国有利,或者对美国自己有利",并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这些军援不可能有效地用于对日作战,而是可能用于内战,以便用武力强行统一全国。"

谢伟思第一次正式提出,要求"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使美国得不

到有关共产党地区情况的消息；“我们得到的情况都是已经过时的几年前的东西，而且不论从范围和可靠性来说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美国不仅要派代表到共产党地区去，而且要他们在那里进行详细考察，即“不要求他们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而是要求他们应该有充分时间去熟悉情况，并亲自进行逐日观察”，以便弄清下面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是怎样信守不渝地实践了他们的统一战线诺言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的结构如何？政府‘共产主义化’如何？ 它是否显示了任何民主主义特征或可能？它是否赢得人民的一般支持？它和国民党中国的政府的情况对比如何？ 共产党怎样处理人民的这类事项的，即在征税、征粮、服兵役和强制劳动等方面，和国民党地区比较如何？共产党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如何？他们对盟国事业可能有什么价值？为了继续抗战，他们怎样处理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和经济资源开发等问题？怎样进行对敌贸易？ 游击区人民的动员和觉醒是否已经达到支持一场真正的游击战所需要的程度？”谢伟思一口气列了十几个问题，显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深入了解它的迫切愿望。他在报告中提示，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奠定正确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若“没有诸如此类的知识”，则“很难评价互相矛盾的报道，并作出经得起深思熟虑的判断。”

遗憾的是，谢伟思的报告没有为美国政府所重视，而且被美国国务院官员斥责为“荒廖可笑”和“散布诽谤”。

戴维斯建议，美国应尽快制订一种新的对华政策

继谢伟思报告之后，另一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戴维斯也在1943年3月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除中共军队及美国训练和指挥的驻印军外，国民党中国军队皆士气低落，官长贪污，保存实力，无意抗日。他还认为，要获得日本军队在华北等地活动的情报，美国最好派一军官小组驻在中共控制区。6月24日，戴维斯又提出报告，阐述美国派军事代表团去延安考察的必要性。报告称赞中共行政忠实，公平选举，经济自由，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国民党政府引用私人及贪污皆为常事；国共两党如均无外援，国民政府将会被推翻。因此，他建议美国尽快制定一种积极的对华政策，以免使自己卷入中国的内争而不能自拔。他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戴维斯的报告也未能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直至七八月份，国共磨擦严重影响了中国抗战，影响了盟军对日作战计划，甚至将影响战后远东的政治局势时，美国才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问题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看到，美国政府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力量，当然，这时也还谈不上与中共的合作问题。

史迪威计划遭到否决之后，戴维斯进而提出同中共合作问题

1943年8月底，史迪威在重庆曾同国民党将领邓宝珊、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和戴维斯等就同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合作问题进行商谈，并提出一项计划，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联合采取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施他们可能想逆长江发动新攻势或威胁长沙。9月6日，史迪威给蒋介石写信，正式建议，调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共同进攻日军，并要蒋介石把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拨一部分给共产党的军队。信中说：“我建议采纳这项计划，建议给西北地区的军队以充足的给养使之发挥作用……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项计划也不会损失军队，给养的损失也很少，它利用了否则便闲着没用的部队，它可以搞清在西北的（共产党）军队的可靠程度。如果我们不行动，日本鬼子就将行动起来。”但是，史迪威的计划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美国政府对史迪威的计划也未给予支持。随后，戴维斯再次指出，国民党显然几乎没有能力或不愿去担负盟国指派给它的任务；而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进步的中国政权则要靠华盛顿去支持史迪威的改革计划。他还给美国政府写信，指出，假使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改变现状，华盛顿必须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造就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例如，我们应当打定主意，避免在战争结束时处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和堕落的日本傀儡互相勾结以反对获得苏联同情的民主大联合这种地位。”戴维斯的建议仍未能为罗斯福和美国政府的接受。在罗斯福看来，对蒋介石的支持仍然是他对华政策的象征和实质，蒋的胜利仍然是保证中国在将来成为大国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他不愿采取与中共合作的任何实际行动。

由于苏联的原因，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并采用两项措施

美国之所以在1943年八九月份以后对中共问题表示关注，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原因。

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曾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苏联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援助，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1941年中期起，苏联由于全力以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无暇顾及东方问题，因而一直对中国的抗战及国共关系问题保持缄默态度。当蒋介石和盛世才采取措施驱逐苏联在新疆的势力，使双方关系走向恶化时，苏联也进行了妥协退让，而没有公开对抗。然而，蒋介石得寸进尺，在1943年夏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思图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从而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7月14日，苏

联驻华使馆参赞拜会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艾奇逊，指责国民党政府军向共产党的前哨站和阵地开火，企图迫使共产党接受它的条件。他指出，国民党政府在这个时候进攻共产党是不适宜的，因为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从而影响国际关系。8月11日，苏联武官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对国共关系的担心，并希望了解美国的态度。与此同时，苏联著名记者、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不力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攻。

苏联的态度特别是罗果夫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和蒋介石的共同忧虑。他们担心苏联在战后对中共的支持会影响美蒋在中国以及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尤其会影响罗斯福设计的战后计划。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政府除继续坚持"使中国成为大国"，即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既定政策外，又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促进国共合作，二是促进中苏和解，即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的和解。

关于国共合作，蒋介石在1943年9月所做的要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讲话是其重要成果之一。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又同蒋介石亲自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设法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必须在战争进行时期，就同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联合政府。"开罗会议后，这种有美国共进一步合作的谈判正式开始。

关于中苏和解，罗斯福在1943年下半年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首先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做工作，以取得他们的谅解。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四国宣言》的发表，是其初步成果。12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又多次同斯大林商谈，希望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为争取苏联的支持，罗斯福甚至暗示可以用中国的领土权益做为交换条件。同时，罗斯福又劝告蒋介石不要听信苏联和日本已经同意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政权而发起一场进攻的说法，并劝说蒋介石在战争时期停止在外蒙古——新疆边界上同莫斯科发生冲突。

罗斯福决定采纳戴维斯的建议，并多次向蒋提出理由

美国政府在采取上述两项措施后又逐步提出直接同中国共产党联络，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途径。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力陈尽快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必要性。报告说："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活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州的活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州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报告还指出，蒋介石"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所以，"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这一次，戴维斯的报告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注意，并决定采纳。2月9日，罗斯福通过史迪威转告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军立刻向西北派遣代表团，其理由是华北和东北是日军主要聚结地区，美军非常需要那里的情报。但他的建议被蒋介石婉转拒绝。3月份，罗斯福再次向蒋介石明确提出派遣美军代表去延安的要求。这次他增加了一条理由，即可以了解中苏在新疆发生冲突的形势。蒋介石仍不予理睬。直到6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代表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重提此案，蒋介石才被迫让步，同意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军观察组。

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罗斯福曾有过多种考虑

罗斯福曾说，美国决定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首先是要搜集华北、以至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情报。随着战争的发展，美国空军在共产党地区上空作战和美国在沿海，如山东等靠近共产党地区的地点登陆的前景越来越近，需要军事情报的愿望更加迫切。而且，由于共产党越来越成为对日抗战的重要力量和因素，看看他们能在中国抗战中起什么作用的想法也变得强烈起来。1944年开始以来。美国不断获得消息，说共产党军队在山东、河北、山西、苏北等地积极展开对日军的游击战，而且共产党已牢固地立足于华北，该地区是最后击败日军的关键地区；除满州以外，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大部分以及日本人的工业设施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总之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和作用的强大，是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考虑到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不力。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就对他手创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即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当时他问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中国的局势是严重的，如果日军再来一次象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1944年1月初，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要美国经济援助的请求，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或者同意充分承担中国军队在缅甸对日作战的任务。罗斯福写道："根据已经得到的效果看来，给中国一笔货款……是说不出理由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货款，而且从中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货款也是不妥当的。"随后，

罗斯福曾有过另外找人取代蒋介石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没有实现，但罗期福以及美国政府中的主要决策人物也已经认为蒋介石的中国无论现在或是将来，都不再可能成为“大国”。这一看法又为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所证实。4至6月份，日军从华北长驱直入华南地区，蒋介石国民党的百万军队闻风而逃，一触即溃。当时许多美国观察家都预言国民党就要垮台。罗期福和史迪威在1943年12月的论断就要实现。既然蒋介石国民党不能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尤其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美国就不得不寻求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以美国的友好姿态，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合作，以防止其倒向苏联一边。由于罗斯福认为，妨碍中国统一的最大因素可能来自苏联的干预或共产党的胜利，所以，他就力求拉拢这两方面的力量。他企图以美国同意苏联在满州享有特权为条件，以换取俄国不卷入中国政治的笼统保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就可能不得不与国民党妥协。罗斯福就是带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决定并派遣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以谋求同中共的联系及合作。

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寻求与中共的联系及合作，是1944年上半年美国确立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上半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由军事上的援蒋发展为军事、政治上的全力扶蒋。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虽然仍以扶蒋为主，但却逐步有了联共的内容。尽管美国谋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基础是很脆弱的，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的友好态度和与中共友好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说明美国确实在一度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在谋求同中共合作。否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在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后正式做出与美英等国合作的战略决策。仅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罗斯福总统没有把他的这一政策明确地形诸文字，但行动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以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为开端，美国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和实际交往，是美国谋求与中共合作政策的最好说明。

当斯诺询问美国能否同时支持两个政府时，罗斯福的回答是肯定的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几天后，美国总统高级幕僚霍普金斯就根据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报告，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称赞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实行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可以同中共建立友好关系。信中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以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尽管罗斯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扶蒋政策，但在一段时期内，主要是1944年间，他却认为，扶蒋与联共是可以统一的。其基础：一是对日作战；二是美苏合作。直到1945年3月，当斯诺询问罗斯福：“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吧？”斯诺指的是美国能否同时支持国共两党政府。罗斯福回答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他还表示，以后还要继续进行这样的合作，直到两党政府“凑在一起为止”。

但是，美国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发表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讲话，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正式确立。从此以后，美国统治集团就走上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对立的立场。

（刘德喜，摘自《党史文汇》93年9期）

陈毅、罗荣桓的一次秘密会见

1945年10上旬，解放不到一个月的临沂城，人民欢欣鼓舞，到处充满着新生的喜悦。这时候，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正和华中新四军军长陈毅，举行一次秘密会见，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罗荣桓和陈毅的感情很深。早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彼此已认识，互相敬佩。后来陈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当政治部主任，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在几次反对蒋介石“围剿”的战争中，结下战斗的友谊，成了亲密战友。红军长征，陈毅留在闽赣边区，艰苦卓绝奋斗了三年，罗荣桓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抗战中期，陈毅任华中新四军军长，罗荣桓是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政委，彼此隔着一条陇海铁路，但电报来往，情报相通，互相配合作战。1943年陈毅得知罗荣桓患了严重的肾病，曾经邀请他到苏北治病，如今分别两年的老战友在临沂重逢，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两位战友感情深切，性格却截然不同。罗荣桓欣赏陈毅性情豪放，刚直不阿，敢说敢干，肝胆照人。陈毅佩服罗荣桓善于思考，勇于创造，谦虚谨慎，沉默寡言。然而他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目光远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能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一个个的胜利……

一个月前，罗荣桓接到中央电报，林彪从延安出发，准备来山东工作。不几天又收到电报，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已折往东北，陈毅即将来山东

主持华东局的工作。罗荣桓考虑山东战略地位，既是新四军的后方，又是连接华中和华北的枢纽，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调兵遣将当中，处处为继任者着想。这时候，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北上，罗荣桓已经派人做好接待工作，准备粮食蔬菜，动员群众腾出房子，打扫宿营地，沿途设茶水站……为了让新来的部队象回到老家，让新来的领导人顺利工作，一切作了妥善的安排。

9月中旬，陈毅参加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离开延安返苏北，走到冀鲁豫地方，奉命转来山东。10月上旬，陈毅到达临沂城，为了保密，他和罗荣桓会见，不是在盛大的欢迎会上，而是预定在一间宽大的平房里。

那天上午，罗荣桓派参谋处一位负责人，代表他出城迎接陈军长。陈毅一行人员和护送的骑兵进入临沂，没等进入为他们安排的住处，陈毅跳下坐骑，心急火燎地赶到罗荣桓寓所。罗荣桓半卧在床上看文件，等着阔别多年的老战友，听到院里响起脚步声，看见警卫员跑进屋说客人来了，喜悦使他忘了病疼，翻身下床走到门口。陈毅跨进门槛，握着罗荣桓的手，兴奋地喊着：

“罗司令员！你好啊！”

“陈军长一路辛苦了！”罗荣桓满面春风，回敬了一句。

“身苦命不苦，嗨哈哈……”陈毅爽朗大笑，关心地问：“罗荣桓同志，听说你近来病又重了，还是躺在床上谈吧！”

“不用，”罗荣桓挺直腰板，“你看，我不是挺好吗？”

“你别装强，你的病情我很清楚，”陈毅说，“还是上床吧！”

“你听谁胡扯的？”罗荣桓站着不动。

“我是消息灵通人士嘛，哈哈……”陈毅开了个玩笑，“在延安就知道，一路上也听说，刚才你的部下还说哩！”

警卫员给两位首长倒完茶，走出门去。“请坐，喝茶”罗荣桓请客人坐下。

陈毅喝着茶，问道：

“罗大鼻子还在这里吗？”

“罗生特大夫还在。多亏他呀，不然我早见马克思去了。”

马克思不会收你的，你的担子更重了，什么时候去东北？”

“等着你来啊！交待完了就走。”

“你带走多少人马？”陈毅问，又打哈哈说：“可不要连根拔呀！”

哪能啊！”罗荣桓被他逗笑了。“遵照中央的指示，派遣七个主力师，一个警备旅，一个教导团，一个挺进纵队和4000干部，分三批从海陆两路出发。渡海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辽东，陆路的部队也出山海关了。”

“嘿！你把主力师都派走了，给我留下多少虾兵蟹将呀？”陈毅风趣地问。

“给你留下40个团，20多万部队，不少吧？”罗荣桓认真地说，“鲁中的第四师，鲁南的第八师，军区特务团，新编第五师，都是能征惯战的老部队。还有十个警备旅和各分区基干团、战斗经验差一些，也是好兵好将啊！许世友、王建安、陈士榘、王麓水、孙继先，这几名战将都给你留下了，还不满意呀？”

“好，好，好！“陈毅高兴地叫好，“我知道你老兄不搞本位主义！”

两位将军轻松地谈着国家大事。一向严肃的罗司令员，在谈笑风生的陈军长影响下，不断发出乐呵呵的笑声，两人谈得十分开心。

院外传来一阵开饭的军号声。警卫员端来午饭，摆在桌子上。四菜一汤，一盆大米饭，外加一碟炒辣椒，还有一瓶酒。

勤务员端来一盆洗脸水，请首长盥洗吃饭。罗荣桓站起来，陈毅坐着不动，问道：

“你的婆娘娃娃呢？请他们一起来吃嘛！”

“孩子有保姆带着，林月琴不知忙啥去了！”罗荣桓说：“你跑了一路，早饿了吧？快洗洗脸，咱们先吃吧！”

“女主人不在，客人怎好先吃，等等吧！”

正说着，林月琴匆匆忙忙跨进门，高兴地说道：

“陈军长你来啦！老罗这几天一直在念叨你呀！”

陈毅站起来，握着她的手，说道：

“林月琴同志，你好！两年多不见，你瘦了，也更漂亮啦！”

“陈军长说笑了，我都快成老太婆了，还漂亮呢！”林月琴笑问：“张茜同志好吗？她没有和你去延安？”

“我去延安开党代会，怎好带婆娘呀？”陈毅说，“我走的时候，张茜在留在军部，身体不错。”

“快洗洗，吃饭吧！”林月琴催着，“菜凉了不好吃。”

陈毅过去洗把脸，擦完手，望桌上的菜肴，又打哈哈地说：

“林月琴同志，你搞啥名堂？大摆家宴？”

“欢迎陈军长，叫伙房加菜。”林朋琴指着菜碗，“鱼香肉丝，麻婆豆腐，怪味鸡，豆瓣鲫鱼——这鱼是沂河里的活鱼，可惜没有四川豆瓣酱，只好用豆酱加辣椒代替。”

陈毅问：“你这里有四川厨师？”

林月琴说：“没有。是我照着葫芦画瓢，学你们做的，你这个行家，可别见笑呀！”

“难为你啦！”陈毅笑着，“我快淌口水啦，还见笑哩！哈哈……

“老罗顿顿离不开辣椒，”林月琴指着桌上的辣椒，“知道你这个四川人，跟湖南人一样受吃辣，给炒了一大碟。”

“好啊！”陈毅喊着，“家乡风味菜，加上一碟辣子。我

可要饱餐一顿啦！”

林月琴拿起酒瓶，为客人斟酒，说：

“这是本地特产，兰陵美酒。老罗腰病不能喝酒，陈军长多喝两杯”。

“兰陵美酒郁金香。”陈毅念了一句李白的诗，即兴地凑上一句，“蜀乡风味伴佳酿。哈哈……喝酒，喝酒！罗司令员不能喝，夫人代劳。”

“我不会喝，陪你半杯”，林月琴说。

“月琴，给我来一杯，给陈军长洗尘嘛！”罗荣醒端起杯子讨酒。

“罗生特大夫不准你喝酒。”林月琴说。

“罗大鼻子不在，你就给他开一次戒，下不为例，下不为例！”陈毅说。

林月琴给丈夫到了一杯酒，三人碰杯，边吃边谈，好不热闹。陈毅三杯下肚，妙语趣话连篇，逗得罗荣桓夫妇哈哈大笑。

“这是啥子汤呀？”陈毅舀了一匙汤喝着问，“味道好鲜美啊！”

林月琴介绍说：“这汤是临沂的小吃，用鸡汤熬麦仁，本地人叫‘傻’，这名字挺怪。”

陈毅连喝了几匙，说道：“这汤做得可不傻，是聪明人创造出来的。”

酒足饭饱，离开饭桌喝茶。罗荣桓兴致勃勃，还想和他谈正事。陈毅怕他吃不消，起身告辞，说道：

“休息，休息，晚上再谈。”

林月琴怕丈夫太累了，顺水推舟道：

“陈军长一路上辛苦，今日一大早赶来，该去睡会午觉，歇息。”

晚上，罗荣桓到陈毅住处，两位将军谈了大半宿。

中共“七大”会议，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没有去延安开会，急着知道会议的具体情况。陈毅详细介绍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三个报告①，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过程，谈到一些同志的发言，末了，陈毅兴奋地说道：

“这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对今后中国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话题转到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和平谈判。陈毅告诉罗荣桓，当时有些同志不放心，怕蒋介石唱《鸿门宴》，劝毛主席不要去。毛主席叫大家放心，他说蒋介石虽然是个大流氓，但这次邀他到重庆，不会动他一根毫毛。中国现在列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蒋介石要当中国的领袖，还想收买人心，不得不考虑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如果不去谈，蒋介石就抓着理，说是共产党不要和平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中国抗战刚胜利，中国人民不愿再打仗，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我们要的是真和平，诚心诚意和他谈，蒋介石再耍花招、搞阴谋，全国百姓就明白，谁要和平？谁要内战？

“蒋介石搞的是反革命的两手，”罗荣桓说，“整个形势看来，内战很难避免！”

“我在路上跑了二十多天，零零碎碎看了一些电报，”陈毅说，“毛主席去重庆一个多月了，和谈情况近来怎样？”

“国共双方代表，正在讨论一份和平协议，我方作了不少让步，最近可能签字，”罗荣桓说，“即使协定签字了，蒋介石也不会真正执行。”

“是的，蒋介石有美国撑腰，牛皮得很！”陈毅同意罗桓的看法。

两位久经沙场的战将，讨论当前的军事斗争。罗荣桓把蒋介石命令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和李延年，率领四路大军入侵华北解放区的详细情况向陈毅一一介绍完，又谈到美国军舰帮助国民党运兵：

“一个月来，美国舰队不断把蒋军从上海运到天津。有消息说，美舰还在越南和缅甸，准备把国民党的远征军运到东北。近来美国军舰天天在在渤海游弋，空军在天上侦察，看来是想阻挠我军到东北去。9月29日，三艘美国军舰进到烟台港外，一位海军少将坐小艇到烟台，声言要清理美国人在烟台的财产，还要求让美国士兵，到烟台对面的崆峒岛上消遣……”

“消遣个鬼！”陈毅插上话，“还不是想摸我们的底，想占我们的地方！”

“10月4日，那位少将又送来公函，要我军撤离烟台，向他们移交行政权。”

“讹诈！耍流氓！”陈毅气愤地喊了起来，“坚决把他顶回去！”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告诉许世友，叫他寸步不让，作好战斗准备。”

“对头！他们敢爬上岸，狠狠地敲他一顿！”

接着，罗司令员向陈军长谈津浦前线的形势，研究如何打击李延年大军向山东进犯，一直谈到深夜。

以后几天，两位将军具体研究眼前的工作，讨论中共山东分局改组成华东局的问题，商谈新四军和山东军区领志机关合并的干部配备，进一步部署堵击徐州蒋军北上的作战方案。

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和平协定”。消息公布，举国欢腾！山东军民也很高兴。两位将国心中有数，他们告诫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有丝毫和平幻想，切勿放松战斗准备。

---

① 三个报告：指《论联合政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论解放区战场》。

10 月 15 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打击和阻止，作战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

陈毅看完电报，马上准备到津浦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交代完工作，也准备动身去东北。林月琴在收拾行装时候，从马褡子里翻出一床褥子，上面是一张完整的老虎皮。罗荣桓看见，和妻子商量道：

"月琴，冬天快到了，陈军长行李单薄，把这床老虎皮褥子送他吧？"

"好啊！"林琴慷慨地说，"我正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太重，两个马褡也装不下。把这老虎皮褥子送给陈军长御寒，也是替我轻了装。快叫警卫员给陈军长送去。"

话音刚落，陈毅跨进门来，问道：

"送给我什么好东西呀？"

"送你一只大老虎，"林月琴摊开褥子，"东西不错吧？"

"嘿！黄斑吊额东北虎！"陈毅抚摸着皮毛赞赏道："还是冬天的皮子呢！"

"山东天气冷，屋里没有取暖设备，"林月琴说。"陈军长留下铺床吧！"

"东北冰天雪地，零下五十度，比山东冷多了！"陈毅推辞道，"罗司令员身体不好，还是带去用吧！"

"东北城市里有暖气，乡下有火墙热炕。"罗荣桓过来帮腔，"你留下更有用。"

"留下吧！留下吧！"林月琴边说边喊来警卫员，"把这床褥子卷起来，送到陈军长那里去。"

"莫急，莫急！"陈毅双手抱拳，向林月琴作揖，"谢谢夫人了！"又皱着眉头说道，"这一下子，我可要睡在老虎身上了。"

瞧他那般模样，逗得罗荣桓夫妇哈哈大笑。

当天晚上，陈毅军长和黎玉政委，率领野战指挥部，奔赴津浦前线，指挥山东和华中的部队作战。10 月 18 日发起津浦战役，解放了邹县、滕县和大汶口，控制了临城到枣村的支线，堵击李延年进犯山东。

（白刃《罗荣桓元帅纪事》）

中共中央曾计划迁"都"承德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

1945 年 9 月，党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兵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六两个连和团的机关的一部分干部近 300 人，另一是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校抽调一个连。这个连 100 多人，都是干部，还配备了一部电台（台长、报务员、机要员、摇机员共 6 人都配齐了）。中央军委任命吴烈为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李富春同志到冀察热辽地区的承德进行准备工作。

1945 年 10 月 1 日上午，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副部长在枣园接见了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同志。朱总司令讲了话："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希望你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10 月 2 日拂晓，宝塔山下，一支整齐的队伍出发了。

吴烈、李逸民率领着先行中央警备团以最快的速度行进，他们经清涧过绥德到达碛口，然后东渡黄河去三交，过临县到达兴县，并在兴县休整了一日。这一段路由于他们是在老解放区行军，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款待，因此，行进速度比较快。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新解放区，这里的敌情和地形他们都不熟悉，有的县城里还驻有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敌人还在主要的道路上设了据点，铁路沿线也设有封锁区，这给部队的在行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了避敌赶路，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走大路，在晋西北的山路上穿行。他们经岢岚、五寨、神池，到达了离同浦路不远的前寨村附近，隐蔽待机。

为了顺利穿过同浦路，吴烈和李逸民商量，决定在夜里穿越同浦路。同时规定凡能发生声响的东西一定要包装好，不能出声，每个人的左臂上，要系上白毛巾，做夜间识别的标志。

夜色里，吴烈和李逸民率领着部队，悄悄地神速地出发了。只见一个个小白点首尾相连地向前蠕动着。眼看就要到达同浦路，突然传来一个命令："跑步前进！"于是，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前急跑，两条闪着寒光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在战士们的脚下很快闪过。

"继续跑步前进！"吴烈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因为在这同浦路的东面，还有几十里宽的敌战区。于是，战士们又是一阵急行军。拂晓前，进入了山区。

夜晚，吴烈接到中央发来的急电，命令他们："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承德。"

看完电报后，吴烈对李逸民说："看来情况有变化，我们还要加快行军的速度。"

李逸民说："党中央发电报给我们，可能有新情况，就

按你的意见办，抓紧时间，赶往承德。”

于是，他们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一个晚上和一个大半天走了160里，于第二天下午到达了广武镇附近，接着翻过一座大山，出雁门关经浑源、阳原县到天镇，然后由天镇坐火车到了张家口。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同志的热情接待。并给他们补充了给养和物资，还批给了他们一些蒙疆票子（当时这一带都使用这种伪满票子）作路费。接着，他们随罗瑞卿同志乘火车到达怀来在怀来休整一日，第二天清晨，他们便由怀来经延庆、四海、汤河口、鞍匠营、滦河，顺利到达了承德。

到承德后，吴烈他们才知道党中央让他们“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承德”的原因。原来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向东北运送他们占领交通要道和城市，妄图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反动军队。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我军十分不利，内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不再迁移承德了。中央还决定，李富春同志到东北西满中央分局任书记。同时电令吴烈，中央警备团就地隶属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司令员、政委程子华同志指挥，将电台和工作人员交给中央分局。

这样，承德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作为中央所在地的机会。

（摘自《党史博采》94年7期）

断送宋子文政治生命的黄金风潮案

1942年1月，当美、英、荷军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取得了歼敌10万余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美国政府看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巨大作用，在1942年向重庆国民政府主动提供了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国战时财政。国民政府用其中的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约合市两568.7万两。加上孔祥熙早先购存美国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中国政府在美国存放了约600万两的黄金。

1944年，盟军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制空权，原存放美国又转运印度加尔各答的黄金开始空运回国。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9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这项存款因每日牌价不同，导致投机之风猖獗。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3月29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20000元提为35000元。这时，各银行已过下班时间，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并不担心出什么漏子。但是，座中有人泄漏了消息，于是，当晚，各银行、公司、企业、机关互相串通，加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银行间互相流通用的本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此事被新闻界揭露，轰动全重庆，当局被迫宣布核查，揪出了几个小角色：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因泄漏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亦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家存款购入黄金50两。财政部总属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

但是，上述被判刑的只是小鱼，大鱼们纷纷脱网而出。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3300两，可他身为杜月笙的徒弟，俞鸿钧的亲信秘书，不予追究。钟谔是中央信托局局长，该局舞弊最严重，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可当局认为，把他揪出来，有损政府形象，结果“从缓处理”。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购入黄金更多，事发后舆论攻击激烈，他就把总经理杨管北留下顶罪，自己乘军用飞机避往安徽屯溪，当时，屯溪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管辖，因受日军包围，早就与重庆断绝了交通，杜月笙乘坐的飞机竟有战斗机护航，可谓神通广大。

由于此次黄金风潮，担任行政院长十几年的孔祥熙被迫辞职，原先在1933年10月被孔排挤下去的宋子文复出。宋以此次黄金风潮中投机严重，下令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2195553两，国库得捐献820468.8两。当时大户得到消息，早将黄金取走，被迫捐献者多是中小储户，很多人连本钱都没有收回，纷纷破产。对于这种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的行径，舆论给予强烈的抨击。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停止黄金储蓄，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举国欢庆的气氛中，黄金储蓄和期货买卖的骗局被淡忘了，这一骗局的主角宋子文，在上海举行的民意测验中，竟当选“国内十大政治明星”第一名，远远领先于居第八、九名的毛泽东、周恩来。此时的宋子文，握有黄金900余万两，外汇10亿多美金，并且有望与美国达成20亿美元的贷款协定，人望之重，在国民党内一时难有几人与之相比。

但是，蒋介石在《孔庸之先生事略》中却写道：“然当其（指孔祥熙）辞职以后，国家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怎么回事？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价值达100亿美元以上；又将实际为1∶25的法币对伪中储券比价改为1∶250。捞取了不少于100亿

美元的不义之财。大量回笼了货币，遏制了抗战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进而使物价骤跌，以至信用紧缩，工商业生产萎缩。宋子文于是组织黄金价格评定委员会，逐日公布买卖价格，指定中国银行在重庆买卖黄金。到1946年2月28日止，共买入68.5万余两，卖出22万余两。这一政策实施得非常成功，制止了物价下跌的趋势，工商业生产逐步得以恢复。

然而，物价调动以后，又呈现了急速上涨的势头。社会游资因投资环境恶劣，纷纷转入流通领域，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逐渐形成了投机风潮。美国顾问杨格向宋子文建议，向社会大量抛售黄金现货，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宋子文看到上次黄金政策很成功，欣然同意再次实施。1946年3月4日，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出售黄金。

中行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是抛售黄金的实际主持者。他们选择了三家金号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和杨庆和发记作为抛售黄金的代理人，以两种方式向市面抛售黄金：一是明配，每天上午10点，由业务局公布牌价，上述五家金号、银楼申请当日购进的黄金数量，由央行配，下午收市后，各配售金号、银楼将价款上交国库；二是暗售，当时市场抢购黄金之甚炽，明配的黄金总是不敷需求，于是有黑市的产生，中行就按最高黑市价格委托上述几家金号、银楼向市场抛售出大量金条，以压制黑市。当时五家金号、银楼的总资本为6770万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停售为止，共售出黄金850万两，以1946年3月每两平均156万计算，值132600亿元，以如此之小的本钱，做如此之大的生意，简直是骇人听闻。

詹莲生是上海金业同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他是抛售黄金的主办者，其余四家的配售、暗售额均由他决定，并由他经领。每天中行决定牌价后，林凤苞、杨安仁就用专线电话通知詹，詹就这样操纵了市价，上下其手，不知赚进了多少。詹莲生还捞到另一项大油水，即改铸金条，当时中行库存金条都是400两一块，市面上出售的是10两一条，贝祖诒就以每条3分的火耗委托詹莲生改铸。据詹自己后来承认，每天可得240两火耗，总共得了8.6万两之多。不过他又说，赚头大，应酬也大，所以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想必是分给有关当权者不少好处。詹在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悬的一年中，总共经销450万两黄金，除了火耗，还有3分的利润，又得了13.5万两左右，有人说他总共得了10万条，即100万两黄金，未免失之夸张，不过赚进巨额黑钱是可以想见的。不何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有如此神通呢？

原来，同丰余的后台老板是徐补荪，徐是上海金业中的真正老大，杜月笙是他师傅，为避人耳目，由詹莲生出面主持。詹莲生和贝祖诒是苏州同乡，又是亲戚，贝祖诒家原先做颜料生意，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财，詹莲生就是当时贝家的经纪人。贝祖诒哥哥贝润荪是宋子文老朋友，早就引见贝祖诒与宋相识。贝祖诒后来留学美国，与宋子文是同学。贝祖诒精通国际汇兑，当时美国人说中国只有半个国际汇兑专家，指的就是他。宋子文对他很信任，做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任命他为纽约、香港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当了行政院长后，又任命他为中央银行总裁。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任职中国银行时的亲信，贝升了官，他们也把持了中央银行的要害部门业务局。就这样，徐、杜、詹、宋、贝、林、杨结成了一张网，在黄金抛售中翻云覆雨，直接引发了黄金风潮。

本来，自1946年3月开始抛售黄金后，直到10月，价格波动颇小，自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支撑，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抢购黄金以自保，以致黄金销售价格迅速上涨，黄金售价上升，诱使五家金号、银楼售出更多的黄金，于是黄金库存日渐减少，外间听说消息，赶紧抢购，黄金价格于是又升，形成了恶性循环。

到了1月中，上海中央银行国库库存金块终于售罄，宋子文命令用运输机将重庆库存的厂条也运来抛售，市面见渝条出现，知道国库黄金已临枯竭，更加疯狂地抢购，价格攀升到533万元，宋、贝见形势不好，于2月8日下令停止暗售。暗售一停止，黑市无人压制，直窜而上，竟达1000万元之巨，即使如此之高的价格，仍比物价涨幅小，所以，黄金市场出现只有买方，没有卖方的局面。

当时，黄金抛售只是在上海一处进行，其它各地只有牌价，买金人在当地中央银行交款登记，随时到上海领货。本来，各地牌价比上海只略高，宣布停止暗售后，各地牌价比上海高出200万元左右，于是，各地投机者纷纷赴沪，加入抢购的洪流。广州、重庆、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到上海的飞机常常被包占，以致机票价格也同黄金一起飞升。

各大公司、大企业不光停止生产，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搞黄金投机，而且还向四行大量贷款，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四行贷出此类“生产贷款”650亿元，其中1946年12月一个月中就贷出560亿元，各行对这些贷款的用途未作核查，以致无论抛出多少黄金，市场购买力仍保持旺盛势头。

军队也加入了抢购狂潮。各部队长官纷纷将军饷运往上海，抢购黄金，甚至已到徐州运钞专列也掉头南下。各部为争取交通工具，暗赌明争，竟至交火，更有将所总部士兵派往上海参加抢购的。各抛售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殴斗吵骂之声不绝于耳，简直成了疯狂世界。

在抢购黄金的带动下，市面上又兴起抢购美钞外汇狂潮，仅1947年2月初的十一二天里，美元价格就涨了一倍半。美元抢购与黄金抢购交相促进，使美元、黄金库存急速减少，到1947年2月中，黄金只剩下230余万两

了，美元则濒于枯竭。蒋介石闻讯大怒，中央银行被迫于2月15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

抛售黄金导致如此结局，在国民党内引发了倒宋运动：张群为首的政学系因其成员张嘉璈曾被宋子文从中央银行中排挤出去，要报一箭之仇，更想借此机会占据久已向往的行政院宝座；C·C系在财政金融上，先遭孔祥熙打击，又被宋子文排斥，急欲利用此机改变局面；孔祥熙一派被宋子文赶下台，想卷土重来，自然不遗余力；连一向以“养老院”闻名的监察院，也想乘宋已成众矢之的之机，踏上一脚，显示自己并非无所事事，以便把一些原先只停留在纸面上的监察权拿过来。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禁止黄金及黄金制品在市场买卖，禁止黄金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冻结黄金价格，并决定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等组织调查团，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调查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郑介民主持的调查很快有了结果，但蒋介石对军人向来袒护，在前线激战的时刻更不愿触动他们，以免激起变故，结果，军人无一人受处罚。

宣铁吾发动军警，在上海挨家挨护搜查，大户当然没事，许多中小户本来是想避免通货膨胀损失的，结果被被收充公，有些人还被抓去坐牢。短短10余天中，“经济监察团”就收获黄金20多万两，美金120多万元，还有价值300多亿元的棉纱。

何汉文等四监委对詹莲生和同丰余进行调查，发现同丰余做如此大的买卖，连帐本都没有，平常到中央银行领收黄金，并不按规定用现金缴款，而用支票；到国库领金，没有填写有关票据；董事会名单中还有两个假名不知何人；2月8日最后一次抛售黄金时，同丰余承购540条之多，上交价款中有一张25亿元的票据，并未兑现，又没有换成转帐声请书以便日后兑取。四监委再向上海社会局查核，发现同丰余居然未经注册，询问该局为何不加查封，该局表示，贝祖诒已打过招呼，要他们不要管。于是四监委又门贝祖诒，为何选择一个未经立案的非法金号抛售黄金，贝表示，詹是金业公会主席，熟悉情况，信用好，其它的金号背景复杂，不可靠。

四监委决定把突破口选择在詹莲生身上。开始，詹大谈其与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对高达20余万两的火耗和销售利润直言不讳，对黄金交易的内幕也当趣事来讲，直到何汉文把笔录交给他要他签字，他才有些慌张，对何说，他讲的话都是私人谈话，随便讲的，不当之处，还请何委员多包涵。

当天晚上，杜月笙即派他的徒弟、立法委员王新衡请何吃饭。王是立法委员，又是军统少将特务，他对何汉文说，詹莲生太可恶，当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不必太认真，反正今天讯问的只有你一个，不妨把笔录改改，叫詹莲生拿出两百根条子来打点打点，大家都很方便，并说他的话就是杜月笙的意思。何婉言推诿。以杜月笙往日的威风，随便示意一下，何汉文就会照办。可这时杜的势力大不如前了，四监委看透了杜月笙的虚弱本质，决定对詹莲生等人继续调查，不久，将黄金风潮案中的舞弊情形送交上海地方法院。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法院判詹莲生12年徒刑、判林凤苞、杨安仁7年徒刑。

监察院将詹莲生、杨凤苞、杨安仁三人绳之以法，博得了舆论界齐声喝彩，人们称何汉文等人为“铁面御史”。不久，监察院数十名监委，由何汉文领衔，又提出了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并将宋、贝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勾结商界人士以牟取暴利的调查报告全文公布。立法院院长孙科看到这份报告，大为兴奋，因为他觊觎行政院长宝座已久。于是，他召集了立法院临时会，召来宋子文、贝祖诒进行质询，立法委员根据监委们的调查报告，展开了尖锐抨击。宋本来中文就不如英文流畅，此时理亏，更加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恼羞成怒，中途就退席。贝祖诒见形势不妙，就把责任往宋子文、林凤苞、杨安仁身上推，说自己上承宋的裁决，下由林、杨执行，对于舞弊情形并不知情，并抖出了许多内幕。

监察院、立法院虽然掌握了宋子文失职的材料，又有舆论支持，可是并不知道如何处置，只好去问蒋介石。蒋批示道：“事到如今，有何办法！”众监委、立委见蒋有意保护宋过关，只得悻悻而退。

宋子文有老蒋保护，如果此时能立上一功，也许还能保住院长宝座，可是，祸不单行，他手上的王牌即美国20亿美元贷款又出现了问题。这笔贷款是抗战末期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向时任中国驻美采购团团长的宋子文承诺的。当时，美军正在西太平洋逐岛逐岛地艰难推进，伤亡很大，美国防部预计，对日战争必将持续一长段时间，这样，中国战场就具有牵制200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价值。没想到，原子弹和苏军出兵东北使日本迅速投降，中国战场的价值一落千丈。同时，美国国内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从“民主廉洁”变成了腐败专制，形成一股强大的要求国民党变革的舆论潮流，孔祥熙、宋子文这种以裙带关系取得要职的人尤其被视为变革的对象。中美20亿美元贷款谈判就此陷入了僵局。本来，蒋以宋代孔，重要原因就是宋的形象颇得美国人的好感，有望取得此笔贷款，现在宋在美国人眼里也失去了光彩，索性罢了宋子文，也只好对舆论有个交代。

1947年3月，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呈。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神形憔悴的宋子文裹着大衣，缩着脖子，登上了前往广州的飞机。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内兄过去

对"党国"的贡献，特别是西安事变中的救命之恩，派他去当广东省主席。可是，死老虎人人要打，监察院又调查了他贪污外汇和侵吞美军剩余物资的事实，再次提出弹劾。宋子文虽然不甘示弱地撑了一段时间，终究觉得无趣，不久，黯然赴美。

蒋介石在台湾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时，把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列为一个主要原因，以致孔祥熙死时，亲撰哀思录，而宋子文死时，不提一字。

（张生）

陈公博日本亡命记

仓皇赴日

1945年8月24日晚上，当时隶属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顾问部"汪伪政权的经济顾问助理小川哲雄中尉，奉命去日本驻南京"大使"的官邸，接受司令部的命令：

(1)陪同"陈主席"一行去日本；

(2)路线是先到青岛，然后等待机会赴日；

(3)一行人所需经费储备卷1亿元(折合当时日币1800万元)汇往横滨正金银行；

(4)明天(25日)清晨出发。

25日凌晨，小川赶往颐和路的"主席公馆"，陈公博夫妇、"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实业部长"陈君慧、"安徽省长"林柏生、"经理总监"何炳贤和秘书莫国康在等他。由日军司令部参谋小笠原送行，分乘两辆车，从陈公馆出发，一路转了几个弯，到达明故宫机场。

他们乘的是运输机，机舱内只有一个座位，给陈公博坐，其余人都坐在临时铺的油毛毡上面。飞机越过长江后，小川命令向东海方向飞去，然后问陈公博，是否直飞日本去岛取县的米子市。陈说："全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飞了几个小时，飞机勉强降落在乱糟糟的米子机场跑道上。

暂栖米子

机场上没有人，小川把他们留下来，自已往东北方向的松树林走去，走出松林看见一辆卡车。小川请司机帮忙开到市政府，司机同意后小川才回去叫他们来乘车，陈公博夫妇坐在司机旁边，其余人站在后面。

在路上，小川打电话给米子市长斋藤干城。斋藤曾担任过日本陆军第五师长军医部长和关东军军医部长，因此对这一批不速之客还算关心。他亲自出门迎接连声说："欢迎你们光临。"在将他们领进市长办公室后又说："一路辛苦，这里是日本了，请坐。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效劳。"市政府的女职员端来3大盘白米饭团和胡萝卜，大家用手抓着吃，这在当时已是不容易得到的食物了。

斋藤派兵役课长仓敷恒和课员东中勋来照顾他们，派了一辆消防车给他们用。小川觉得很狼狈，陈公博也啼笑皆非，只好让他们夫妇坐在司机旁边，其他人象消防队员一样挂在消防车的左右。车子开到海军俱乐部，分好房间后，林柏生伸伸懒腰说："啊，终于到日本了。"

晚饭的菜大多是鱼，但他们不敢吃生鱼片，只吃些炸煮的食物。当天晚上，小川和周隆庠、东中商量第二天怎么安排。谈到经费时，小川从口袋里掏出100万元汪伪政权的储备券。东中说："这在日本不能用，100万只是一堆废纸。"斋藤派人向银行借了两万元日币，作陈公博一行的生活费用。

穿西装的男人和穿中国服装的女人乘消防车经过米子市内。仓敷几经周折找到一部烧木炭的老式汽车，又在郊外浅津温泉的望湖楼找到新的住地。为了避人耳目，仓敷要这批人装扮成日本人模样，女的穿裙裤，男的穿日军军服。当这一行人化装好乘车到望湖楼时，老板中岛夫妇出来迎接，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是汪伪政权的要人。

8月27日，小川去岛取县政府与特高课长和内务部长见面，请求给予照顾。但他们的态度很冷淡，因为这不是他们份内的事，另外此事还不能让盟军知道。小川只好准备去东京再想想办法。小川在临走之前，告诉陈公博他要去东京。陈公博说他要正式向日本政府致意，于是拿起手笔分别给首相东久迩、陆军大臣下村定和外务大臣重光葵写了信。信中写道："为使战后处理顺利，我离开南京来打扰贵国，请多多关照，但不能给贵国政府增加麻烦。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请不要客气地告诉我。"

8月29日，小川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中站了30多个小时来到东京，东京已是遍地瓦砾。他的新桥车站睡了一夜，就匆匆赶往陆军省。他的副官室填写姓名和官阶，求见南军大臣。胖胖的副官满不在乎地看看他，又看看陈公博的信，就进去通报，一会儿回来说："大臣和次官正在开重要会议，不能会客，信我负责转呈。"副官又自言语地说："麦克阿瑟已到厚木机场。"把信交给副官后，小川又去陆军省的其他几个部门，都没人理他。他垂头丧气地离开陆军省，走下台阶，忽然想到应该去外务省看看。

小川走进外务省大门，向靠近门口的一人说明来意。这人请小川等一下，立即打了几个电话，一会儿对小川说："田尻次官要见你。"说完就把小川带进田尻的办公室。

移居京都

田尻请小川坐下后说："辛苦了，要请你到京都去，实行东山工作计划。"所谓"东山工作计划"是外务省对陈公博一行人在日本活动的安排。此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每人在日期间用化名；派人带他们去京都居住；以18：1的比例兑换他们汇来的储备券。前几天，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已就陈公博来日之事向外务省作了汇报。

外务省派了两个职员去米子迎接陈公博一行。9月1日，这一行人告别望湖楼去京都。本来京都政府安排他们住在京都饭店，陈公博不肯住，就改住在一所私人花园里，因为房子少，一部分人仍住在京都饭店。

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日本政府向盟军投降仪式。陈公博要搬家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住。经京都当局联系，让他们迁到附近的金阁寺和对文庄。陈公博夫妇、周隆庠和莫国康住进金阁寺，其他人搬进对文庄。金阁寺又名鹿苑寺，是500多年前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建造的，陈公博住在最里面的长乐亭，其余3人住在寺内的书院里。外务省派专人教陈公博夫妇日语，另有人照料生活。陈公博每天的活动是读书、散步、学日语和打麻将。每天早晨由在日本留过学的周隆庠翻译报纸的要点给陈公博听，陈有兴趣的文章就全文译出，陈公博每天黄昏出来散步，晚上打麻将。

被迫回国

8月29日，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向日本驻南京"大使"提出要求引渡陈公博回国。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登出消息说陈公博已经开枪自杀不治身死。9月3日，重庆中央社发出电讯："陈公博自杀为虚构，实亡命日本。"9月8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发出备忘录，正式要求冈村转告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人逮捕，押往南京。

9月25日，外力省管理局第二部部长大野胜己以东山工作计划负责人的身份来金阁寺。他与陈公博见面后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陪同当翻译的周隆庠打岔说："这么热，辛苦了，京都的夏天真是……。"这时大野才抬起头说："让你们很不自由。"然后又默不语。拖了很久，陈公博开口说："大野先生你想说什么，我大致已经知道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你放心吧。"大野这才告诉他何应钦备忘录的内容。陈公博望着天花板，眼睛瞪得大大地说："我要回去，回中国。"陈公博要求大野代他给何应钦打电报，派一架飞机来接他，以便自首。

10月1日晚上，陈公博一行在夜幕中离开金阁寺去九州。10月3日下午3时左右，他们乘空军C—47专机，飞抵南京的大校场机场，一下飞机就全部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移往苏州狮子口监狱。1946年4月5日，陈公博被江办省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其余人也很快相继被判了刑。

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没有随机返回，陈公博把她交给小川照顾，但李励庄还是想回国。1945年11月27日，她以博多乘"明优丸"号船回国。船驶到长江口吴淞炮口附近，一艘小汽艇开来，李励庄被几个士兵带下船乘汽艇而去。

（陈仲丹）

伪上海中央市场被接收后的风波

敌伪时期的上海市中央市场，是块令人垂涎三尺的宝地。抗战胜利后，上海首任市长钱大钧一上台，就看中了这块肥肉，想据为己有。当时，下山摘桃子的官员尚未在上海立住脚跟，各接收单位还未划分好势力范围。于是你分这一堆，我分那一块，闹烘烘你争我夺，趁混乱浑水摸鱼。钱大钧抢在头里找到蒋介石，说市府员工生活太苦，要设法增加一点额外收入。蒋介石答应自行筹划。于是乎，伪中央市场便由市府接收了。

这件事行政院本来并不知道，市府在接受后补个手续，向行政院提出了呈文。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知道后大发雷霆，说未经行政院准许就擅自接收，违反了有关法令，不承认。上海市府则辩解说，这件事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只不过手续上不完备，没有先通过行政院，接收是没有问题的。行政院说，即使蒋介石允许自行筹措地方经费，也并没的指定接收伪中央市场。你来我往，双方争得不亦乐乎。

上海市政府接收了中央市场后，随即将其物资全部变卖了。据市府宣布的，共卖了法币四十二亿元。但据清查团的密查，为二百亿元。又据法院消息，财产变卖所得应为法币六百亿元，与市府所宣布的相差甚远。

这样一来，形势显得颇为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出来说话，他下了手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要处理局调查市府接收伪中央市场是否合法，接收的办法是否妥当，限时查竣呈报。

行政院的态度十分强硬，说上海市府根本无权接收并处理中央市场的物资。既已出卖，就应该立即将全部款项转给敌伪产业处理局，以便解交国库。与此同时，行政院不断地催处理局解款。处理局只好奉令催市府解款。上海市政府起初置之不理，后来又推出社会局，说社会局接收伪中央市场于法并无不合。处理局要社会局交出财产帐簿和原始清册，社会局如何才能交得出？于是一方面是一拖再拖，另一方面是一等再等，双方僵持着。

市府不再说是蒋介石答应过的了，而是说变卖物产是市政会议通过了的，却拿不出证据出来。又说这是一次有关方面参加的业务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没有书面记录。似乎认为接收处理是大家的意思，不能追究一二人的责任。关于处理和将款项移作他用经谁批准过，处理时是否登报标卖，是否请审计部和处理部派员参加，这些问题，市府也都难以回答，于是索性不予回答了。

市府方面的态度是：接收处理之事已经办了，说不给办只是空话。钱么，已经花完了，要拿点出来也不可能。我就是这个样子，你拿我也不会有什么办法。据市府后来宣布：钱大钧市长任内用去三十亿零三千余万元，吴国桢市长任内用去十二亿零四千余万元，三十一亿作了员工米代金，其余作了党员补助费。这样算来，伪中央市场物资变卖的数目，至少也得七十余亿，大大超过原先宣布的四十二亿元。可是清查团连苍蝇都不敢拍。岂敢打这只老虎？审计部派陆荣光查这笔帐，一查便没有个完。于是参议会又派了五位代表参加清查团，他们知道此事难办，便一推了事，说是无从着手。等到审计部把帐目审核完毕，清查团的几位参议员也都溜之大吉了。

后来，案子又转到了法院。据法院所掌握的情况，伪中央市场变卖的资产达六百亿元。仅糖精一项，便有三千箱。但市府对此坚不认帐，采取十分强硬的态度。处理局仍然坚持向市府索取原始清册和财产帐簿，但他们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伪中央市场的物资是一笔永远搞不清楚的糊涂帐。

（摘自曾炎主编《民国官场秘闻》）

历史考证

1944—1945年美国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与扶蒋反共对华政策之争

赫尔利在华任职虽为时仅一年零两个月，但适值二次大战结束前后，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折时期。作为一个共和党政客，赫尔利在华期间成了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势力扶蒋反共对华政策的代表人物。在他任大使的一年时间里，美国越益明显地转向扶蒋反共。

赫尔利于1944年9月来华前，他于8月18日从白宫得到的训令是："一、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二、增进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保持密切的联系。"赫尔利抵达重庆不久史迪威被召回，高思大使辞职，赫尔利于11月7日担任驻华大使后，罗斯福对华政策有了发展。通过罗斯福支持赫尔利和撤回史迪威将军这一行动，罗斯福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扶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华政策。而赫尔利在担任大使几个月后坚信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应是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并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这都说明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进一步形成。这也就是赫尔利到任三个多月后，在1944年12月24日从重庆打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说的："在全部谈判中，据我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中国军队。"赫尔利说"这是对我的使命的简略概括。"

罗斯福在1944年5月17日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表示他对蒋介石政府有可能垮下去的担心。罗斯福要哈里曼回到莫斯科"对斯大林说，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人，因此不应让他的政府垮下去"。"总统希望斯大林在设法解决蒋和中共之间的问题时要耐心点儿"。

赫尔利认为苏联同意并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据是他在1944年8月去中国途中在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及1945年4月他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赫尔利追述说，斯大林表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时曾说，"请将苏联和中共区分开，因为他们不同"。"俄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俄国不希望中国分裂，成立两个政府。俄国希望和中国保持更密切、和谐的关系。"赫尔利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能控制住中共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斯大林已经同意或将要同意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可以说，俄国公开承担责任将改变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总的看，赫尔利对华政策思想就是：美国应坚决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施加美国和苏联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承认并接受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并交出军队，以一个政党身份参加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也就是说，由美国帮助蒋介石实现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

与赫尔利的扶蒋反共对华政策相对立的主张来自美国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人。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蒋介石身边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的人。蒋介石无能，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

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蒋介石是被他本国人民迫得无法才起来的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他自己的国家”。

美军观察组谢伟思、卢登、戴维斯、埃默森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目标有不同认识，但是他们都看到并承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谢伟思认为，共产党充满自豪感、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他认为“共产党军队存在是因为人民同意，支持和全心和他们一起战斗。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一致的。”“在这样巨大的人民基础上，共产党不可能被消灭。国民党企图用武力这样作就意味着对民主的全面否定。这将加强共产党人和人民的联系：共产党的胜利将不可避免。”

一个月后，戴维斯得出同样结论说：“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的”。

谢伟思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是不干涉中国内政，他认为美国不应出面干涉、偏袒中国内部国共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他认为美国战时和战后是对中国，而不是对中国国民党承担义务。蒋介石不等于中国。谢伟思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将来也不会消失，他主张美国不能放弃中国。

谢伟思等人是按照美国国家利益行事的。他和他的同事戴维斯、卢登、埃默森、乔治·艾奇逊等人与赫尔利在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上是一致的，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怎样才是最好地保持美国在华利益及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上的分歧。

当罗斯福不顾马歇尔的意见，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将史迪威将军撤职召回后，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终于发展为一次尖锐的意见冲突。

赫尔利与魏德迈于1945年2月19日一起回国磋商。使馆代办艾奇逊、谢伟思等政治官员都认为国务院过去一直就没有从赫尔利那里得到对中国形势的完整的、客观的报告，他们认为此刻有责任向国务院就中国的形势作一次紧急、详尽的全面报告阐明使馆官员的分析与意见。报告主要起草人谢伟思，以代办乔治·艾奇逊名义在2月28日发往国务院。使馆全体政治官员乔治·艾奇逊、谢伟思等共五人在电报上签了字。

这份全面谈中国形势的电报指出蒋介石希望和苏联解决问题，他不愿与中共妥协，不想和中共解决问题。中共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只支持蒋介石。报告点出，只要继续赫尔利对华政策，这个形势会继续，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中国内部冲突的爆发将要加快。报告认为美国应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报告设想可以向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政府，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将中共军队编入中央政府军队，执行联合作战计划；由美国军官指挥。报告认为这些办法“是走向最后完全统一的初步行动”。报告认为，“我们援助中共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这将对中国内部统一产生压力。通过这些中国内部力量我们将发挥最强大的影响，从而推动蒋对统一作出需要作出的妥协来”。报告认为，“通过这一政策一我们认为它现实地承认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能得到所有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合作，使中共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将他们推到俄国人的怀抱中去……并为中国将来向全面民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基础”。

这份电报到达后，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因为它的建议与国务院以往文件所阐述的要保持对华政策的灵活性是一致的。这份电报成了赫尔利在华盛顿期间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一场争论的焦点。赫尔利和国务院谁也没有说服对方。不过情况表明罗斯福再一次支持了赫尔利的只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主张。据赫尔利本人讲，“总统支持我的立场并且说这是与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相一致的”。

对赫尔利这次回国磋商，国务院在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只说了一句话：“赫尔利将军强烈反对以上行动方针建议，美国政策仍然是只向被承认的中国国民政府提供军事物资与财政援助”。这次内部争论，及罗斯福总统在这次政策争论中决定继续支持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主张，对战后美国政府进一步执行扶蒋反共对华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次政策争论后，美国政府内公开主张实行灵活、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的人遭到了一次决定性打击，再难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产生影响。赫尔利感到自己一派占了上风，便急切地于4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发表的声明中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并为蒋介石准备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捧场。这样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就公开暴露了出来。它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在二次大战后期走上了公开扶蒋反共的道路。罗斯福总统在战争后期已从原来支持国共联合，共同抗日的立场后退到支持蒋介石独裁统治，而蒋顽固反共的政策拖着美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杜鲁门任内公开站在国民党一边，介入了中国的内战。对此，罗斯福总统是负有他的历史责任的。

（摘自《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期《幻想与现实一美国对华政策1945—1952》一文，作者霍世亮）

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抗日战争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从而与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构成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多半是以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为根据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现由如下：

一、1944年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未能形成全国战场的战略进攻，1944年，中国解放区战场转入了局部反攻，各解放区军民总计作战两万多次，毙伤俘敌伪三十二万人，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人，收复国土三十二万平方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战争不仅有解放区战场，还有国民党战场。就是解放区战场展开局部进攻的同时，国民党战场正面临着第二次大的溃退。从1944年4月到12月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分，共沦陷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使六千多万人民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奴役，由上述可知，1944年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未能形成整个抗日战场的反攻局面，因而，1944年也就没有进入所谓的反攻阶段。

二、对日本侵略者的大反攻是在日本政府决定投降后进行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击溃关东军，同日，美国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和11日朱德向解放区军队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到10月10日，我军共毙伤俘敌伪军二十三万多人，收复国土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同时，蒋介石也于8月11日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支持下，也迅速向敌占区前进，抢占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线。然而，在中国军队全面反攻之前，8月9日，日本政府已决定投降，并于8月10日发出了投降通知，可知，中国军队的反攻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决定投降之后，也就不可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一个阶段。

综上所述，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而是在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在外部力量的支援下，急速转入胜利。

（摘自《安徽史学》1988年4期，作者程乃胜）

是谁建议调十万大军进军东北的

抗战胜利后，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保卫人民的抗战果实，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派出10万大军和几万名干部进入东北。这一重大措施奠定了中共立足东北的基础。这一重要建议是由黄克诚提出的。事情的经过是：1945年9月13日，黄克诚在华中局驻地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八路军已有少数部队出关，即请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致电中央，建议速派大部队出关，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但饶不同意发此电，黄遂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建议至少派5～10万部队出关，部队主要从山东抽调，然后从华中抽调相当部队进入山东。该建议很快就被中央采纳。后来有人问及此事，黄克诚回答说：“中央当时已决定派部队到东北去，但派10万人这样多的部队，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干时摘自《大江南北》1992年第6期）

蒋介石何时得悉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4日到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和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并邀邱吉尔参加签字。这个文件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的2或3个月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国基地”；“设立中苏合办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等。雅尔塔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

苏、美、英三国对中国方面严格封锁消息。斯大林和罗斯福商定，等到双方认为时机成熟，并且在斯大林向美国发出通知后，再由罗斯福把协定内容通知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却在美苏决定正式通知中国以前，逐步得悉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蒋介石是如何获知这一情报的呢？

关于苏联对日作战问题，美苏间的秘密交易早就开始了。1944年10月11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曾接连向蒋介石密报：美国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表示要以获得旅顺港为参战条件之一，美英则不予反对。当时战争重心即将东移，中苏关系未见好转，蒋美关系也正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将给予中国何种影响，蒋介石是深为忧虑的。会议刚开始，他就让宋子文于1945年2月5日致电顾维钧，要他设法弄清会议结果。

雅尔塔会议公报和宣言对远东问题只字未提，与会人员也一再声称会议只讨论了欧洲问题，这在当时是极不正常的。蒋介石为此极费猜测，他在2月8日和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料，其果与英俄协议以牺牲我乎？”“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充人疑惧。”蒋介石根本就不相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中国问题，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竭力打听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情况。2月19日，蒋托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信给罗斯福，表示想要知道雅尔塔会议有关远东的任何决定。

2月21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把参与制定雅尔塔

协定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他透露的一点会议有关远东的情报报告了蒋介石。根据傅秉常和顾维钧得来的情报，蒋断定苏联要求恢复旅顺港和东北其他特权确其事，而且美苏还在对自己隐瞒着什么。他预感到情况已经不妙，不由得慨叹“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这时，顾维钧也在英国积极活动着。2月20日和23日，他两次拜访参加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想要了解美苏两国在会上做了些什么，在哪些方面影响中国的利益。艾登对这一问题吞吞吐吐，不过却说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把美国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和怎样提供船只的问题。这无异于表明会议并非没有涉及远东问题。3月初，顾维钧回到重庆，把这些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美英遮遮掩掩的做法大为疑惑，命顾维钧赶快到英国进一步探听会议实情。

宋子文这时表示愿意赴美，担负同样的任务。3月6日，宋致电已回到华盛顿的赫尔利，希望能立即赴美，与罗斯福讨论“国际和经济问题”。美国很清楚，宋子文此行与雅尔塔协定有关，而美国这时并不打算与中国讨论这一问题。罗斯福让赫尔利于3月9日复电，拒绝了宋的赴美要求，理由是旧金山会议召开在即，时间仓促，而且若在会前接见中国代表，容易引起其他与会国误解。10日，宋又急电美国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再次提出赴美要求，以便征求罗斯福关于“我们与苏联及中共关系”等方面的意见。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中国急于知道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的情况。

面对中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罗斯福感到有必要预先试探一下中国的反应。3月12日，罗斯福在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时透露，斯大林曾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三点要求，即维持外蒙现状；对南满铁路实行委托管理，其所有权属中国；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个不冻港，例如旅顺或其附近海港。罗斯福对已达成协议一事绝口不提，而且他透露的情况也与事实出入甚大。但罗斯福毕竟向中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雅尔塔会议确实讨论了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在不久以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说雅尔塔会议与远东没有任何干系。

3月15日，蒋介石接到了魏道明的报告，“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他断定关于苏联对日作战问题美苏已达成协议，中国利益被出卖，感到“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1945年蚀月初，顾维钧、宋子文等将赴美国参加旧金山会议，行前，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向罗斯福转告中国的态度：任何把旅顺或大连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宋、顾在华盛顿曾分别向霍普斯、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探询消息，他们对宋、顾均施以敷衍之策。

事情却通过赫尔利有了转机，2月底，他带着蒋介石给罗斯福的信回到华盛顿后，就向国务院和罗斯福本人打听雅尔塔会议是否达成了关于中国的协定，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但赫尔利却并不相信，3月间，他终于说服了罗斯福，得以查阅了雅尔塔会议记录，并将雅尔塔协定的签字副本抄写了一份。4月22日赫尔利返回重庆住所。随后。他向蒋介石表示，他知道雅尔塔会议和苏联对日作战问题的所有情况，但必须奉命严守秘密，请蒋容他以后相告。赫尔利无疑是在暗示，雅尔塔会议已就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达成协议。5月10日，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把协定内容通知中国。可是杜鲁门却于5月12日电令赫尔利：目前不宜把任何消息告诉中国政府。因为这时美苏关系渐趋紧张，美国决策层内部就如何履行雅尔塔协定正展开一场争论。

5月22日，固执而好斗的赫尔利却以私人名义，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让蒋“速为准备”。至此，蒋介石终于明确知道了已达成雅尔塔协定这一事实，并全面了解了其内容，然而这却是非正式的。蒋介石立即指示宋子文，要他设法促使杜鲁门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须坚持其一贯的远东政策，即保证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外国在中国领土内不能再享有任何特权。蒋介石希望能拉住美国来抗衡苏联，更幻想美国能改变态度，放弃雅尔塔协定，或修正其条款。

可是杜鲁门决定如实履行雅尔塔协定。5月底，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就此达成进一步谅解。双方还商定：宋子文应在7月1日前抵达莫斯科，届时由苏联直接向宋子文提出雅尔塔协定。与此同时，由赫尔利在重庆把协定转告蒋介石。直到这时，杜鲁门和斯大林仍不打算把协定预先通知中国。6月初，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向杜鲁门进言，力主在宋子文离开美国前告诉他实情。杜鲁门同意了。

6月9日，杜鲁门在华盛顿向宋子文出示了雅尔塔协定和将让赫尔利转交蒋介石的备忘录——载有斯大林5月底的承诺和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这是美国官方第一次把协定内容告诉中国，然而仍是非正式的。宋子文当即对协定条文提出异议，并要求美国给予解释。可杜鲁门却一再声称，坚决支持罗斯福签字的协定。会谈后，杜鲁门把出示给宋子文的备忘录拍发给赫尔利，命他于6月15日转交蒋介石，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斯大林。

苏联为了争取主动和避免美国过多地介入中苏交涉，于6月12日，由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把题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先决条件》的备忘录面交蒋介石。该备忘录只载有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苏联参战条件，却把维持外蒙现状明确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这是苏联首次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当时，蒋介石与彼得罗夫发生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在旅顺港问题上，蒋介石反对使用“租借地”的名称。

6月15日，赫尔利也把题为《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

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的备忘录交给蒋介石，这样，美苏最终履行完了把雅尔塔协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的手续，不过这也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对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同苏联一起把雅尔塔协定强加在中国头上感到极度懊丧和痛心。同时他还怀疑，“这个备忘录未必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全部内容”。据当时在场的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回忆，蒋介石“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沉默了一分钟……过后他只说：他太失望了”。

（阎文浜）

陈绍宽为何被免去海军总司令职务

民国海军元老、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上将陈绍宽，在1945年12月下旬，突然被蒋介石免职、强行挤出海军。这一突发事件，一时成为国内舆论议论的热点，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陈绍宽（福建闽侯人）1908年毕业于南洋水师学堂，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他四十多年的海军生涯，先后担任过海军见习官、二副、大副、航海长、艇长、副舰长、舰长等职，后因战绩显赫，曾一度调任海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升任第二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署长等职。在国民党海军将领中，其资历、指挥作战能力、实战经验以及海军理论，均无人可以比拟。其间，又曾几度出访欧美等国考察海军，并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陈绍宽辖制的闽系海军舰队，官兵人数多，训练好，舰艇装备先进，火力强，成为中国最大的一支海军武装，其总兵力占全国海军的2/3以上。

30年代初，陈绍宽统率闽系海军一马当先，在平息几路军阀的作战中，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深得蒋介石的倚重。不久，就被蒋介石亲自提拔为海军部上将部长，授一级上将军衔。1938年，蒋介石又亲自提名陈绍宽出任海军总司令。抗战中，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损失惨重，几乎消耗殆尽，陈本人也历尽艰难，到抗战胜利时，总算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保存了一点海军力量和海军骨干队伍。就在这时，陈绍宽突然被蒋介石剥夺兵权。挤出海军其原因何在？这事得从30年代的海军电雷学校说起。

1931年，陈绍宽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计划，打算先造60万吨的军舰，再建胶州、象山、大鹏等军港。但计划上报蒋介石后，如石沉大海，蒋介石既不同意，也不表示反对，就这样拖着。对此，陈绍宽大惑不解。实际上，蒋介石对闽系海军早有戒心，以蒋介石的为人和一贯作法，对非嫡系是极少予以重用的，此时重用陈绍宽仅仅是暂时利用而已。故蒋介石一面在暗中压制陈绍宽闽系海军的发展，一面又在着手培植嫡系海军，这就是电雷学校，其代表人物为欧阳格。

欧阳格是江西人，不属闽系，但曾在闽系海军中服务，不久就因违犯纪律被开除。后被蒋介石送到美国海军参谋学校学习。回国后，陈绍宽执拗不肯录用。以后，欧阳格与陈绍宽积怨日深，以至怀恨在心，成为政敌。蒋介石在海军中没有嫡系，正想在海军中物色一稍有资历但又与闽系有矛盾的人物，欧阳格正好是恰当的人选。

1932年，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开始筹办海军电雷学校。对此，欧阳格格外地卖力。他在镇江市西郊征用了一片民房和土地，在蒋介石亲自过问下，开办了电雷学校。开学后，欧阳格自然被蒋介石任命为校长。学校设有学生队和学兵队，均从高中毕业生和黄埔军校中招收。军官则由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中选拔而来，教职员多数从与闽系对立的广东海军的黄埔海校和东北海军的青岛海校调来，少数从闽系的“叛逆者”中抽调。该校可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

电雷学校成立后，陈绍宽对蒋介石将该校划属军政部管辖非常不满，作为报复，陈强令不许该校师生穿海军服。于是，军政部亲自出面干预，电雷学校学生才没有扒下海军服，但水兵帽上的“中华民国海军”字样却被抹去，而被迫改为“电雷学校”四字。

一次，电雷学校所属的一艘军舰在长江上与外舰接触，因礼仪问题发生矛盾。为此，外舰一直闹到海军总司令部和外交部，以后又闹到行政院。陈绍宽极为震怒，认为电雷学校丢了中国海军的脸，要求取消该校建制。对此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结果，行政院下令电雷学校今后不准再穿海军服，军舰上不许升海军旗。欧阳格不敢违抗，但却悄悄去见了蒋介石，并进行多方活动。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欧阳格得以下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押。欧阳格在南京得知何应钦等人准备派兵西征讨伐张学良，如一出兵，蒋介石命将不保。于是，他连夜潜回已迁至江阴的电雷学校，实行全校总动员，打开军火仓库，把武器全部发给学生，实行戒严，以防闽系海军趁机吃掉电雷学校。

以后，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与蒋介石及其嫡系电雷系，争斗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抗战打响后，蒋介石决定在江阴沉船阻塞航道，以阻止日军溯江西上。1937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召开会议，有人提出将闽系统辖的“海筹”、“海容”等超龄服役的老舰沉入江中，作为阻塞线。陈绍宽立即反驳说，这是有意削弱闽系海军。紧接着又毫不客气地提出，属于军政部统辖的几艘老舰也要下沉，否则就不执行命令。蒋介石无奈，只好同意一起下沉。

江阴海空作战中，陈绍宽的部下陈季良率领舰队在阻塞线一侧实施掩护作战。江阴要塞的江防归欧阳格的电雷学校管辖，于是，处处给闽系海军制造麻烦，连陈季

良乘艇上岸也要受到干涉，搞得闽系的人毫无行动自由。陈季良在指挥作战中，被日机炸伤，陈绍宽命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接替指挥，陈季良退下治疗。欧阳格见状，却打电话给蒋介石，诬告陈季良临阵逃脱。蒋介石大怒，立即下令将陈季良就地枪决。陈绍宽得知也火冒三丈，打算面见蒋介石拼死力争。后因一德国顾问向蒋介石谈了江阴海空作战的情形，陈季良才得以幸免。

江阴江面的作战十分激烈，闽系海军的主力巡洋舰“宁海”、“平海”号等被日机炸沉，元气大伤。欧阳格在江边高地上目睹了全部经过，极为得意地说：“没想到，陈某人的海军也有今天。”

闽系海军与欧阳格的电雷系屡屡发生矛盾纠纷，这一切，自然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对此，将介石极为不悦，所以对陈绍宽的闽系海军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并时时注意物色新的海军领导人选，陈绍宽与蒋介石的矛盾也逐步加深。

抗战中，马当失守。过了一个多月，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追查海军的责任。文件送到海军总司令部，陈绍宽一肚子气正没处发，顿时大发雷霆：“陆军未战先溃，反倒来追究海军，真是岂有此理！”并亲笔回复。秘书见措词过于强硬，认为军委会的命令可能是蒋介石交办的，这样呈复，结局总是不妙。陈绍宽怒不可遏地说：“不准更动一字！”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又有一次，海军总司令部把拟就的一份有关江防的建议，有关技术部门转来转转去，转到了军政部。军政部又批转回海军总司令部办理。陈绍宽手捧海军自己拟的计划，不平地说：“好你个军政部！如有人向我们蒋委员长建议，说只要坐在板凳上扇扇扇子也能打下敌人的飞机，委员长也会相信的。”这话又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何应钦任军政部长时，执掌着军费调拨审批大权，他秉承蒋介石旨意，对海军处处加以刁难限制。抗战中，海军的顶头上司正好是何应钦。海军紧急请示，要求拨发制造水雷的炸药，而在汉口的仓库就储备有大量炸药，可何应钦稳坐重庆，迟迟不予批准，以致一再贻误战机。

1939年，海军总司令部迁到了重庆，陈绍宽派人到军政部调拨粮草，以解决几百号人的吃穿，不想久等不见回音，大家只得饿肚子。这时，前线海军官兵因物价波动，军心不稳，电告重庆陈绍宽急速解决，以免影响作战。陈绍宽知道找军政部也是白搭。身为海军总司令的陈绍宽，既不肯低头，又不肯去贿赂，只好自行解决。

陈绍宽遇到不顺心之事常常顶撞上司，弄得何应钦等人多次下不了台。一次，陈出席军政部召开的会议，在讨论海军事务时，陈提出了经费、粮草、装备等问题，在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解决时，马上挟着公文包拂袖退场。弄得何应钦大丢面子。后来陈诚任军政部长，对海军处处掣肘。抗战后期，日军进逼湘西，海军在湘西的水雷厂急待内迁。海军向军政部紧急请领内迁费，马上就被驳回不准。以后又几次报告，几次打回。海军学校勉强开学后，陈绍宽指示要迁往重庆，陈诚却命令不许迁重庆，要立即迁回原处。陈绍宽置之不理。结果学校虽然迁了，但没得到一分钱。

随着矛盾的增多和尖锐化，陈诚对海军的打击也变本加厉了。海军总司令部报告请示派出驻外国武官人选和海军留学生，军政部一概不予批准。一次，蒋介石应英国政府邀请派一军事考察团出国，指令陈诚内定人选。各部门各军兵种名单已呈送蒋介石过目敲定，唯独没有海军的人。直到临行前，忽然有人提出怎么还缺少海军，军政部这才通知了海军总司令部。

抗战后期，蒋介石开始削弱陈绍宽的海军兵权。蒋介石为了铲除闽系海军这一个山头，统一海军，亲自下令成立“海军整建委员会”，对海军进行“整顿”，其矛头直指陈绍宽及其闽系将领。

抗战胜利后，陈绍宽代表海军同陆、空军首脑何应钦、张廷孟等人，专程从重庆飞赴南京，在中央军校接受了日本军队的投降。但对日海军的受降工作，蒋介石却越过陈绍宽，亲自命令海军参谋长曾以鼎中将全权负责，陈无权过问。陈绍宽不甘示弱，急调亲信前往厦门以及沿江一带接收日军舰船。在接收中，几乎与所在战区的陆军发生武装冲突。

正在这时，杀进来一个戴笠。戴在蒋介石的默许下，使用特工手腕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拉上了关系，请其在蒋介石面前说说话。美国海军情报部负责人梅乐斯上校访华时，居然能撇开海军首脑陈绍宽等人不见，专与戴笠的军统往来，甚至甩开海军接待人员，偕戴笠一行到西安旅游去了。个把月后，才回到重庆。梅乐斯在蒋介石面前大肆吹捧戴笠，是“中国难得的军事人才”。后因飞机失事身亡，戴笠终未能攫取海军大权。

1945年9月，蒋介石开始对陈绍宽下手。首先，他命令陈诚在军政部之下设立一个海军处，以闽系中分化出来的人周宪章任处长，专门负责审批海军总司令部的公文，掌管海军的一切事务。海军总司令立即被架空。接着，陈诚又趁陈绍宽不在国内，将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改为陆军，原有海军官兵全部遣散。陈绍宽回国后极为震惊，他知道大势已去，亦奈何不得。更有甚者，美国海军顾问团来华访问，陈绍宽打算设宴欢迎，陈诚居然从中作梗，唆使美海军人员拒不出席陈的宴会。陈绍宽负气拒不执行军委会指示“长治”舰开往渤海湾堵截八路军的命令。为此，蒋介石当面严斥了陈绍宽。

1945年12月，蒋介石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把军政部海军处扩大为海军署，陈诚任署长；同时，派武装人员强行接管海军总司令部。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宪章率领一连陆军部队突然包围了位于南京挹江门内的海

军总司令部，四周制高点上立即架起了机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入了海总大门，将海军警卫连强行缴械，又武装召集海总官兵训话，将、校、尉级军官全部隔离软禁，各港口及江海上航行的军舰艇只一律熄火停驶，接受监视。

这时，陈绍宽也接受了军政部的命令，但周宪章等人不敢对他动手。陈绍宽愤愤无语，他在随从的陪同和士兵的监视下，搬到了城门外的一家小旅馆暂住，在寂寞和寒风中度过了 1946 年元旦，不几天，陈绍宽又接到了移交的命令。在稍事准备后，迈着沉重的双腿，步行到原海总交接了工作。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为"还都"之事到了南京，并打算与陈绍宽晤面。蒋派人去找了陈，告知了用意。陈得知后，立即不告而别，当天就乘了火车南下，经上海转赴福建老家去了。

四个月之后，海军总司令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又重新成立，陈诚任总司令，桂永清任副总司令。

抗战期间蒋介石住过峨眉山吗

很多人游峨眉山，往往一到洪椿坪就向峨眉山文管所的同志打听起蒋介石抗战时住在哪里。我带着这个疑问，专门查阅了有关史料，走访了一些高僧老农。

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奉行保存实力、对外不抵抗政策，而对内又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又亲自跑到四川，笼络地方实力派。当时蒋介石对川军不太放心，用什么方法来笼络这批人呢？他采取了办学的方式。选中了峨眉山这块风水宝地，办了个"峨眉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以川军将领刘湘为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学员是来自川、滇、黔校级以上的军政人员。1935 年 8 月 4 日在报国寺正式开学。先后共办了两期，同年 9 月 21 日结束，受训人员约 4000 人，蒋介石对其作训词和讲话 11 次。当时的报国寺内外戒备森严，据说约有一个师的兵力担任警卫，附近农户每户只发一个通行证，其他人不得随意入内。

蒋介石在办军训团中，上了二次金顶，其中一次由张群陪同，还携宋美龄去过新开寺避暑。报国寺和尚梁春回忆道："我当年就在接引殿，提前几日就接到通知，说'委员长'要途经此地歇脚，要准备欢迎议式，因此在山门外还扯了些'艰苦卓绝，劳苦功高'之类的标语。"蒋介石下滑杆时，戴着墨镜，身穿黑绸衫，手拿文明棍。

至于蒋介石在办团期间住在哪里，是旅游者较关心的，据峨眉山佛教协会老会长说："大多住在红株山，因为那里安全幽静；有时还住在报国寺的七佛殿，过去叫咏翠楼，当时的方丈果玲与蒋介石很有交往，蒋曾写有一首'峨眉山下一师生……'的诗赠给他。"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有一篇文章指出："八年来……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实际上，峨眉山是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山区。其实蒋介石在峨眉山住的时间并不长，至于大家所说的常住洪椿坪，那是没有根据的，只是到过那里。

（汤明嘉）

风云人物

李少石

李少石（1906—1945）广东省新会县人。1925 年考入岭南大学。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声援上海工人斗争的六二三游行。后与廖梦醒等在岭南大学发动工人罢工，被校方开除。其后在海员工会任职。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奉调到上海、香港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0 年在香港组建中共地下交通站，是年与廖梦醒结婚。1932 年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4 年 2 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坚贞不屈，从上海被解往南京。1937 年经周恩来交涉，获释出狱，前往华南沦陷区工作。1943 年夏奉调抵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编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1945 年 10 月 8 日送柳亚子回沙平坝住宅，返回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枪击而逝。毛泽东曾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材料：

· 李少石遇难记

材料　李少石遇难记

1945 年 10 月 8 日下午 5 时许，山城重庆，朔风呼号，烟雾缭绕。一辆黑色小车从沙坪坝开出，向城内方向疾驰。

车子经过红岩嘴新华日报仓库时，路边的人大声叫

喊："司机，开慢一点！"但是，司机不以为然，仍以原速行进。车上坐着一位的30岁的中年男子，他身材魁梧，浓眉粗眼，他轻声地叫道："小熊，慢点，注意安全！"司机解释道："车子回去还有他用呢！"说着，仍以高速直奔。

不久，车子到了下土湾时，颠簸了一下，路旁发出了"哎哟！哎哟！"的惨叫声。中年男子惊叫道："不好，车子撞到人了，快停车！"可是，司机似乎没听见，仍加大油门，车子风驰电掣般的行进。

"砰"！一声枪响，中年男子倒下去了。司机急刹车，紧张地问："李秘书，你怎样了？"倒下去的人已不能回答，鲜红的血从胸部流出来，沾满了衣裳，滴在车厢里。司机匆忙把被击伤的人，送往重庆市市民医院。

中弹者叫李少石，义名李振，字默农，广东番禺县人。1906年6月7日出生，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岭南大学，当时系中共党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女婿。他平时喜欢旧体诗，尤其爱读柳亚子的诗词，尊称柳亚子为"诗翁"。8日下午3时许，柳亚子来访，因车子另有他用，未及倾谈，便急送柳返寓所。柳亚子爱其才华，遂挟其登车。在车中，少石携柳亚子所撰《巴山集》一卷，"狂吟朗诵以为乐，声浪震惊遐迩，有天风海涛之慨。"既抵沙坪坝，与柳亚子握手而别，车复入城，讵料半途中，竟遭此惨祸。

李少石被送到医院后，因伤重要害，流血过多，尚来不及输血，便于7时45分溘然长逝。8时许，其夫人廖梦醒带着女儿李湄赶来，看到丈夫已经逝世，痛苦万分，她们守护在遗体旁失声痛哭。其时，周恩来正在军委会参加张治中欢宴毛泽东的晚会，闻讯立即赶到医院，见此惨状，顿时泪如雨下。他悲切地说："20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此难。"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落泪。

9日上午，孙夫人、邵力子夫妇、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夫妇、茅盾夫妇、张西曼、刘清扬等陆续到市民医院吊唁。渝市各报记者及在渝外籍记者十余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下午4时40分，重庆市法院检查官于凤坡、市民医院外科主任冯约医师，会同宪兵司令部、警察总局、卫戍司令部等各机关代表进行验尸，该项工作于5时40分完毕。验尸报告上说：李少石外部左侧肩胛间部，在第七胸椎左2厘米处，有外伤一处，直径约1厘料，呈焦色。内部沿肩胛第七第八两肋骨折断，入口大小，内部直径3厘米。在左侧中腋线又有一伤口，第五第六两肋骨折断，胸椎有于血块入直径约有10厘米。由于血块中取出弹片大小共四块。横隔膜部有三个创口。左肺上叶后部外侧有伤口一处，直径约1厘米。左肺上叶有伤口三处，在后部外侧，直径各约1厘米。取出的弹片最大的不过米粒一样大小。验尸后勘验该车中弹处，发现车后工具箱部份，子弹穿过座后的钢质弹簧，致使破裂成数碎片，故穿出靠垫处有数小孔，经判定，确是步枪弹所射击。

案发后，重庆市宪兵司令张镇于8日深夜便急电该部警卫处长卫持平、卫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立即开展侦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也派员到出事现场勘察。很快案情真相大白：10月6日，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中尉排长胡关台率武装班长6名，新兵30名，携带中正式步枪6支，每支配子弹4发，来重庆领取棉军服240套后，8日下午经朝天门民生路上清寺向壁山前进，下午5时许，行抵红岩嘴六号门前附近，即在马路左侧休息。其时，弹药一等兵吴应堂蹲伏路旁小便，适有熊国华（又名熊维屏）驾驶的国字10357号汽车疾驰而过，上于车速太快，偏离公路，将正在公路左侧小便的吴应堂撞倒，左臂部压伤甚重，并撞伤上方。肇祸后，该车继续向城内疾驰。下士班长田开福当即鸣枪制止，讵料这一枪竟击中该车，并穿过后垫击中李少石，致使李重伤至死。案情查明后，宪兵司令部连夜将伤兵员吴应堂送市民医院医治，并立即派第三团少校团副刘燃赶赴小龙坎松鹤楼将肇事者田开福拘捕。同时，又派员去逮捕肇事司机，但熊国华已逃跑，于是，迅即发出了追捕令。

9日晚，李少石入殓以后，灵柩即移到市民医院的太平间。门外台阶左右两边，摆满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单位和个人送的花圈。新华日报和营业部同人送的花圈，写着"哀我同志"四个字，也摆在阶下。10日，从清早起，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马寅初、阳翰笙、张友渔、韩幽桐，林维中等社会名流不断前来悼唁。11时，孙夫人宋庆龄，在伍智梅的陪同下到来了，她面色悲戚，亲至灵前三鞠躬，然后将带来的鲜花一束摆在棺上。临走时，她殷殷垂问廖梦醒，劝其节哀，保重身体。这时，廖梦醒强忍哀痛，频频点头，对孙夫人的殷切关怀表示谢意。

11日下午1时，在市民医院举行公祭仪式后，即移灵，由市民医院出发。前往执绋的有孙夫人、周恩来、陈树人、柳亚子、郭沫若、矛盾夫妇、曹靖华、鹿地亘、张友渔、韩幽桐、霍金斯、张明、徐冰、潘梓年等约40人。下午3时15分，灵柩到达小龙坎墓园，即举行安葬典礼。廖梦醒及女儿李湄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周恩来在墓前发表了讲话，他说，十多年来，李少石同志为革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逝世，对革命事来是重大的损失。他期望生者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寄托哀思。话毕，他沉重地和廖梦醒握了手，表示诚挚的慰问。葬礼后，死者的亲友们及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踏上了归途。

李少石逝世后，柳亚子老泪纵横，痛不欲生。他含泪写"诗翁行——哭番禺李少石"一诗，抒发了他的心境。其中有句云："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何不幸而蹈王茂私之覆辙也！"又云："假令少石不嗜余诗，余必不挟少石登车，即少石必不死；少石之死，死于余亦死

于余之诗，诗翁诗翁，遂成语谶，作诗翁行以哭之。”悲育之情，跃然纸上。毛泽东在离渝返延安前，也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高度评价了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

（摘自《历史大观园》89 年 5 期，作者：蒙光励）

任弼时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二南，学名培国。湖南湘阴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七岁入明德小学，九岁插班考入序贤学校，十二岁进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长郡中学等学校。年轻的任弼时立志救国救民，曾想走"工业救国"道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长沙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20 年暑假，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8 月，同肖劲光等人，由俄罗期研究会介绍，来到上海，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和刘少奇、罗亦农等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帮助《劳动界》和《华俄通讯社》作抄写、校对的工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被批准入团，成为第一批团员。半年后，和刘少奇、肖劲光等六人离开上海经长崎、海参威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即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应邀参加。1922 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 月，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 年秋，由莫斯科回国，先在上海大学教俄文，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 年 1 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后代理张太雷任团中央书记。在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1926 年至 1927 年，领导团中央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并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 年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9 年，曾主持党的江苏省委工作，年底，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此间，曾两次被捕，遭敌人严刑烤打，但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钢铁意志。后被营救出狱。1931 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 3 月，与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一度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很快从革命实践中认识了这种错误，指出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的正确性，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了斗争。1933 年 5 月任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1934 年 7 月，红六军团成立，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后率部西征，经过艰苦征战，1934 年 10 月下旬，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和军区团政委。其间，红三军奉中央命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他兼任红二军团政委。1935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扑向湘鄂川黔根据地。任弼时率部于 11 月 18 日奋力突围，开始长征。1936 年 6 月底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这时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奉命编为红二方面军，他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朱德、贺龙等一道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按党中央部署完成了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指挥部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后随部东渡黄河奔赴华北前线。1938 年秋，被派往莫斯科，负责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为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解，清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0 年 3 月回国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的常务工作。1943 年 3 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秘书长，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指挥和领导了全国解放战争并进行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1949 年被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领导召开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因病情严重，去莫斯科治疗。当病情稍有好转，立即动身回国，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1950 年 10 月 27 日，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高树勋

高树勋(1898—1972)字建候。河北盐山人。原国民党将领，起义有功人员。1915 年在北洋新军中当兵，后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 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师长，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十七师师长，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处长、新八军军长，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高树勋及其所部长期遭受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排挤、

歧视，和蒋介石嫡系的矛盾日益尖锐。1930年蒋、冯、阎混战，冯、阎战败，上峰第五路总指挥孙连仲投蒋。高树勋部第二十六路军十七师被调到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在第二、三次“围剿”中，均遭惨败，二十六路军被缩编为一个师，高被撤职查办。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军长。1939年春，驻防鲁北。冀鲁边区的八路军采取了争取高部抗日的方针。当他部抵达冀鲁边区时，中共组织地方召开欢迎他北上抗日的大会。肖华对他进行了拜访。这些，逐渐使之改变了对八路军的看法，主动要求互通情报，互相联络。不久，率部撤离边区，越津浦路西去。1940年11月，在濮阳扣押并处决了投敌叛变的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之后，被任命为三十九集团总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四万五千人，沿平汉线向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进犯。刘伯承、邓小平在组织指挥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反击的同时，积极进行争取其起义的工作，终于使其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于10月30日在邯郸以南的马头镇起义。11月2日，毛泽东、朱德在贺电中赞扬了他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起义队伍编为民主建国军，他任总司令。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称之为“高树勋运动”。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副省长等职。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周保中

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原名奚李元，字绍璜。白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7年入滇军当兵，后任排长、连长。192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先后在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营长、团长、副师长。参加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28年底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校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春任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参谋长，争取了部分武装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4年2月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任主任兼中共党委书记。

1935年春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任军长兼党委书记。1936年2月部队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仍任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中共吉林省委执行部主席、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团结东北各抗日武装，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定不移，整训部队，继续坚持战斗。

1945年8月率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5年未参加授军衔，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4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

材料　宁安来了个了不起的周蛮子

生活在“天下第一关”外的东北人把驻在长城另一边的同胞们统称为“关里人”，为了区别那些操着各种各样口音的“关里人”，东北人给他们起了一些不太好听的名字：例如管山东人叫“山东棒子”、管河南人叫“侉子”。大概是由于他们不容易听懂和无法区分黄河以南各省同胞们所讲的地方话，所以便笼而统之地称其为“蛮子”。

这些在百姓间流传甚广的“土话”固然是不太文雅的，但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太在意，因为这无非就象关里人管东北人叫“东北虎”或者是象小学生们互相起的“外号”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善意的调侃，对他们之间的团结友爱似乎并无大碍。

在日寇的铁蹄蹂躏白山黑水的年代里，就有许许多多的“蛮子”毅然出关，和“东北虎”们一起抗击日寇。下面要说的周保中便是他们中的一个。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时家贫，只读一年初中便辍学了。15岁时(1917年)与同伴杨茂才到昆明闯世界，后在一同乡帮助下入云南陆军第1师教导营当学兵。8个月后学兵期满，入靖国第8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

在战争中，周保中因在作战中表现勇敢而被提升为排长，成了一名军官。但不久他却因看不惯上层军官们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无意在军中干下去了，不顾一切返回乡里。

回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军，并于1921年春被选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7期工兵科学习。1925年他见到了中共两广区军委书记张伯简(张也是云南白族人)，从此使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从张伯简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看后思想豁然开朗。他向张伯简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张伯简非常

高兴，当即写信给著名军事家杨杰，介绍周保中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去工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周保中在这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官职也不断上升，由营长而上校团长而少将副师长。

1927年周保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他继续留在第6军中工作，并准备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此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军事。

1931年9月，周保中回到了国内并来到了民族危机最深的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保中到了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打进救国军内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保中想出了一个充满危险、但却是十分简便易行的办法——先让他们把自己抓去。

周保中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实现了。

1932年5月，救国军的士兵在宁安花脸沟将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因他口音太重，那帮东北土生土长的士兵们听不懂，便怀疑他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起来要杀了他。后经周保中费了好大劲向他们解释说要见他们的领导人，才使这些士兵放下了已经举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报告了上去。当时，左路军的领导人们正在开会，听说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便停了下来，开始审问。

审问一开始，周保中便向这些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然后对他们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来的。"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这可问到周保中的强项上来了，他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先对他们讲了当前的世界形势、中国的形势、东北的形势，然后讲到了他们最关心的他们这支队伍所面临的形势及应该采取的救国方略。

周保中说："你们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势于我们十分不利。"

"那你说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听周保中出口不凡，左路总指挥张振邦便客气地问道。

"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通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周保中接着说道，"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们自卫军的战士虽然抗日的士气很高，但纪律却不够严。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扰骚老百姓的事还不少，你们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说你们的吗?"

"怎么说的?"

"老百姓说你们的话很多，这里我不用多说。你们只要听一听这两句顺口溜就行了。一句是'平鸡王，吃鸭鹅，打日本子别找我'；再一句是'骑马没鞍子找床被，没有老婆挨家睡'。不用我说，你们会也知道，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那就得整顿军纪，改善与群众的关系，还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让群众与军队共同抗日。还应该看到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它抗日队伍团结一致去打日本人。"

"那你看南京中央政府什么时候才能出关抗日呢?"

"依我看了，大家对南京政府用不着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抗日了，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对'国联调查团'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周保中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自卫军的那些头头们给震住了。他们相信他不是一个日本特务，而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于是，他们顿时满脸赔笑，一边连连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边急忙让人给他松绑、请坐、敬烟、上茶……

当中共满洲省委得知周保中被救国军抓起来后，马上指示绥宁中心县委，告诉他们说："中央派来省委负责同志周保中，但中途被捕在绥芬河左路总指挥部，须设法救出。"绥宁中心县委接到这一指示后，经研究确定由李延禄同志前往接洽。

李延禄一到救国军左路总指挥部后，张振邦告诉他说："这个周保中讲起话来像朝鲜人似的，所以我们原来以为他是日本探子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南方人，又是专来抗日的。我看这个人挺有水平。所以我打算把他留在咱们左路总指挥的宣传部里工作，给我当个宣传部长。如果他要是不愿在我这里工作，那我想请他代我写一份抗日宣言之后再走。"

李延禄一见问题已经解决，便回去了。然后又把周保中到救国军的后的情况向中共满洲省委做了汇报。

中共满洲省委从李延禄的报告中，知道周保中已经顺利地打入了救国军内部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紧接着又指示李延禄，要他利用与王德林之间的特殊关系，把周保中同志推荐给王德林。

周保中来到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后，很快就扭转了它原来的宣传方向，把反共宣传变成了实行统一战线，彻底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将领的不满。他们虽然钦佩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也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的那一套!"不久便找个借口将宣传部给解散了。

王德林听李延禄说周保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

想把他收为己用。所以在左路总指挥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林之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

这个总参议本来应该是在总司令身边出谋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觉得光是这样呆在上面，对在救国军中开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去给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

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后，很快就在一系列战斗中，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最典型的就是在1932年10月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时的表现了。

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周保中亲率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拨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地把被打烂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12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对那样一帮人来说，周保中这种颇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举动无疑是可以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的。声望一高，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周保中则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开始着手建立秘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同志在1933年11月24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200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恋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子"。笔者认为，这绝不是他的笔下误，而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比较少造成的"以讹传讹"。这也就是说，当时周保中主要是根据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独立开展工作的，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和其它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站出来，在反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节选自全勇《黑白关东》)

郑洞国

郑洞国，字桂庭。陆军中将。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第九十八军军长、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驻印军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以及东北行辕副主任等职务。于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向解放军投诚，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郑洞国，于1903年出生在湖南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十余间，田三十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四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定琼粗通文墨，为人刚正，极重传统礼教。郑洞国从七岁起不在父亲启蒙下读《伦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转入石门中学附属小学。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五·四运动"爆发了。郑洞国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同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了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即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业，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从石门中学毕业后，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于1923年夏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成异，深受老师喜爱。

1924年春，郑洞国听说广东革命政府要创办军官学校，正在招收学生，便不顾老师和家人的一再劝阻，偕同学、同乡数人，毅然前往广州应试。他们赶到广州时，不巧黄埔学校招生报名期已过。幸赖有湖南同乡黄鳌，为防一次考不中，先后报了两个名。经黄同意，郑洞国顶冒其的名字参加考虑，结果被录取。

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郑洞国恰巧与黄鳌同分在第二队，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笑话：出操点名时，队长叫到

黄鳌的名字，两人同时应声而答，引得同学大笑。此事对郑压力甚大，不久他向队长如实汇报了事情经过，请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但校方表示谅解，并将他的名字更正过来，从此郑洞国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军校里，郑洞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革命理论，扩大了政治视野。湖南籍同学王尔琢、黄鳌、贺声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与郑洞国过从甚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

1924年10月，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郑洞国所在的排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警卫任务。同年11月，广东革命政府又几次挫败了敌援军强渡运河的企图。入夜，日军被迫以主力东移，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当夜，第五战区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二集团军及第二十军团第一一〇师接替第五十二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二十军团主力第五十二军、八十五两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二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第五十二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二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二十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我军作战的日军第五师团突以坂本支队四千余人绕道面前往增援。第二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其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二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泽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兵至徐州战场，中国军队相继从前线撤至邳县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二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二十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徐州失陷前，中国军队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主力十余个师赖此桥撤出了战场。

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二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人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二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其间，郑洞国调离第二师，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高参。同年9月，任第九十八军军长，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8年底，国民政府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十一军组建(后番号改为第五军)。该军军长徐庭瑶、副军长杜聿明以郑洞国处事稳重，善于练兵打仗，特请调他任该军荣誉第一师师长。不久，杜升任军长，郑调升副军长兼荣一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一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经过近一年努力，荣一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桂断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两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以第十二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上旬，第五军(辖荣一师、第二〇〇师、第二十二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一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以后日军由南宁源源派出援兵，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持下，指挥部队先后攻敌了罗塘、441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敌旅团长中村正雄亦为该师郑庭笈团炮火击毙。中国军队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是役，敌军第十二旅团基本被全歼；同时毙敌旅团长以下四千余人，缴获轻重武器无数，造成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攻坚歼灭战的空前胜利。

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升任新编十一军军长(后番号改为第八军)，不久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守后，该军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沿长江一线的防务近两年之久，几次击退日军的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为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郑洞国亲自率军由江陵东南渡江出击，一路歼敌甚众，并按作战计划切断了沙(洋)宜(昌)公路和敌后方水上交通。后因宜昌未能攻下，才奉命主动撤回原防。

在作战闲暇，郑洞国注意加强部队的爱国爱民教育，同时举办培训班轮训各级干部，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使第八军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纪律亦比较严明的一支部队。

1943年秋，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作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故他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我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

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军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见的困难，于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7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取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号称“丛林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大部。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我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三十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奉命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六军奉调回国，第一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滇西远征军会师于我国边境城市畹町，中印公路全线打通，此后，新一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戌、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

1945年6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郑洞国由缅甸回国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部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郑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郑以自己性情愚掘，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陈　仪

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后改公洽，自号退素。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军政界重要人物。曾任浙江、福建省主席和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等要职。1948年底，为避免江浙一带遭受战火，劝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率部起义，迎接解放。不料被汤出卖，解职遭囚。1950年6月18日，被枪杀于台湾松山。

1883年5月3日，陈仪出生在浙江绍兴。父亲陈炳镛，字静斋，经常外出务商。母亲王氏，叔父陈荪阶是个前清秀才。他从小好学，涉足经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别爱读《史记》，好论前人的得失成败。后来，他和哥哥陈威一起，跟随任教的叔父陈荪阶，在杭州蒋广昌学校从读。但他母亲希望儿子学商，不久即被召回，送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学师期满，征得母亲同意，再次去杭州求学，进了求是书院。

1902年，十九岁的陈仪考上官费留学生。与同乡邵明之等结伴东渡日本。起初进成城中学，为入士官学校作准备。后因该校毕业的中国学生不能直接入士官学校，便转到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一年后，相继进入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这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倡导革命。他加入了光复会，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百里、蔡锷等结识，特别与当时在仙台学医的鲁迅先生交往较多。1904年，他与鲁迅等四人在东京合影留念。后来，他们尽管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两人时有书信往来，或登门晤谈，交往持续三十年之久。鲁迅曾赠他《唐宋传奇集》，他也赠鲁迅《歌德的书信和日记》袖珍二卷本。他的书橱里一直陈列着《鲁迅全集》，有空闲就拿出来翻阅。鲁迅逝世时，他电告蒋介石，提议举行隆重的国葬，但蒋未允。

1907年，陈仪从日本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省都督蒋百器领导该省响应。他被蒋邀请为助手担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处理后勤后备等事宜。次年，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的第六师师长朱瑞班师回浙，密谋取代蒋百器，先把陈仪迫走。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攻击陈仪后备供应不力。他一怒之下，即弃职而去。不久，蒋百器困孤立辞职，朱瑞便取得了都督地位。

1914年，北京军政府改组。陈仪应召赴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6年，蔡锷设计离京，赴滇组织反对袁世凯窃国。陈仪被袁派往天津追赶。至津与章宗祥、蒋百里等商议，以“追不到”为由向袁作了汇报。不久，他也离职。

1917年，陈仪携带妻子沈蕙和六岁的女儿陈文瑛(侄女)再次东渡日本，进陆军大学深造，为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1920年，回国定居上海，经营实业。他与友人合资在江苏东台兴办裕华发垦殖公司。同时经商，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银庄。当时，有个清末状元张謇也在苏北办实业(盐垦)，因自然火害及市场情况变化，经营发生困难，需另筹巨额资金。他受张之委托，于1922年前往日本

借款。这次，他娶了日本女子古月好子，回国后改名为陈月芳。

"福建事变"后，陈仪被蒋介石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后改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独揽福建军政大权八年之久。

当时，省府从委员到科员都有一定的编制和薪俸额，不能随意增加。省主席每月有特别费几万元，不经国库，由蒋介石的侍从室发给。陈仪每月可领取特别费三万元，聘请了一批顾问、参议、咨议等编制以外人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三名顾问：一个是要了择一，福州人，和陈仪一同留学日本，被时人称为"日本通"。一个是沈铭训，绍兴人，陈仪的内堂弟，先留日后留德，人们以"智囊"或"理论权威"相称，国民党省党部说其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是徐学禹，留学德国学电机，掌握财政、建设两厅。

在组合省府幕僚的基础上，陈仪在福州创办训练所，自兼所长，大力训练县政人员，革新人事制度。他规定：凡县政府的科长、科员，以有区长、区员，都由受过训的人员充任。经过训练的人员，分发到各级机关去工作，机关的首长只能绝对服从，安排在所指定的岗位上，不许有丝毫变动。只有指挥工作的权力，没有任免调迁的权力。训练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县政人员训练系统，设有区员班、区长班、科员班、科长班、财政班、建教班。以后又扩有兵役、图书馆、卫生院长、银行、文书等班。二是警保人员训练系统，按职务分班次，训练县保安队长、警察局长、巡官、巡长等。训练期三个月或半年不等，学习内容除业务课外，主要是三民主义理论、总裁(蒋介石)言论和陈主席(陈仪)言论等。受训人员包括现职的非现职的，都把进训练班作为升官发财的必过之"关"。他们说："吃苦三个月，做官得终身"；"熬得三月苦，就有快活日子过"。这种人事制度，曾得到国民党党中央的嘉奖，并作出了一套训练管理的决定，成为"全民性"的制度。

福建本是缺粮省，一向依赖洋米进口。这时，由于海口封锁，洋米运进困难，粮源一天比一天吃紧，军粮任务尤为繁重。陈仪为此大伤脑筋。有人向他反映军队购粮骚扰之事，他立即痛哭失声地说："既要军人卖命而又没有饭吃，我怎能忍心严办！"不久，他令贸易公司组设粮食部，统筹采购供应，由省政府直接经营粮食。

1938年春末，福建省府从福州迁到永安，人口突增，军、政、学、民的粮食供给愈成问题。洋米进不来，邻省不肯接济，粮食价格日益上升。陈仪便决定推行粮食"公沽"政策，以渡难关。当时，省府有关业务部门对此提出了许多困难。他说："政治上要完全有把握后才着手去办的事是永远不会有的"。并从各方面分析了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和条件，指出："民生主义中有'粮食设局公沽'的主张，奉行三民主义就应忠实执行总理遗教"；"收购余粮的最好办法是设立公仓，由公仓代地主收租，就可掌握全部粮食"；"贸易公司粮食部购办军粮已有相当经验，改为公沽总局，业务可算有初步基础"。他强调说："这是新政，新政必须有新人。"

1940年底，陈仪在省府成立公沽局总管处。全省余粮一律由所在各县设置县公沽局统购，禁止粮食自由流通。机关、学校和城市居民食粮计口供应。他确定先从有余粮的四十个县开始，除大城市外，只供应军粮和公教人员的粮食，对居民暂不供应。各县县长兼任县粮食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各县公沽局副经理由省训团抽调集训。但随着"公沽"政策的逐步推行，祸害日益蔓延。未建立公沽局的县，大米不让出境，重重限制，层层剥削。有的县发展成为市场上各种垄断，如，国民党县党部垄断鱼市场，三青团垄断猪肉供应等等。有的新县长到任后，看到鱼、肉生意已给党、团把持，就另行垄断花生油的买卖。老百姓讥嘲他们："党团鱼肉百姓，县长从中揩油。"还有人借喻孔子在陈蔡绝粮的故事，讽刺陈仪说："陈仪在闽，闽人在陈。"

1945年10月，陈仪衔蒋介石之命，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部司令。

早在一年前，陈仪就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进行收归台湾的准备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根据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条款，着手进行收复失地的调查研究和设计。他利用在福建任职期间，熟悉台湾情况的有利条件，广泛收集有关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资料和日本统治台湾的法令规章，加以分析研究，拟订接管计划，准备接管人员。同时，以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身份，在该团设置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就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一百二十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训练四个月。期满仍回机关工作，听候召唤。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他主张"应有特殊的组织，以应付特殊的环境"，极力推行"行政长官制"。并就台湾情形提出三条建议：一是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交、农"四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二是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三是无需在台湾扎驻重兵。这些意见，颇得蒋介石的嘉许。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依照波茨坦三国宣言的规定，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9月中旬，陈仪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四十余人与美方柏格上校及其所属四十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其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等作实地调查，并通知有关单位造报人事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事宜。不久，美方军舰护送国民党第七十军抵达台湾。

10月24日，陈仪乘飞机抵达台北。他一下飞机，就向中外欢迎人员发表主台的施政方针讲话，说：我们来台

湾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希望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建设新台湾……。在前往官邸途中，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

25日上午，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陈仪宣读受降书后，即命安藤利吉签字，开始全面接管台湾。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这天，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武装取缔私烟摊贩、枪杀群众的罪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他们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见面陈仪。可是，又遭到便衣卫士阻止，一人被枪杀。随即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武装人员，在公署四周严密布岗，驱赶群众。台湾同胞忍无可忍，在全省各地相继举行起义，反抗暴行。

3月4日，陈仪为了缓和局势，接见了台湾省人民请愿团体，听取了他们提出的恤死抚伤、依法惩凶、取消专卖制度、给台湾同胞重要职位的要求。当晚，他与同僚商谈这些要求时说："我认为可行的，已电告蒋先生。""从事问题都好商量，只要这次事件没有其他政治背景就好办了。"第二天，他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答应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台湾现行的行政长官制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将由民选。同时，急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派部队到台湾进行镇压。

陈仪广播讲话后，台湾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缓和，台湾人民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统治。3月7日，他拒绝了台湾各阶层人民组织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下令解散这个委员会。

这年夏，人民解放军的刘邓大军渡过了黄河，直插大别山。当时，报纸宣传说有十万人，很难扑灭。而白崇禧则夸口说，刘邓军队不过三万，不足惧。陈仪说："三万人、十万人的看法，都是从皮相上看问题。从前北伐不过十万人，竟打跨了北方数十万军队，全在人心向背……蒋介石已失尽民心了，他有什么办法，光靠无纪律的军队，能够消灭刘邓？"他表示："不出洋，不再做官，即令共军到了上海，也决不逃生，深信共产党不会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假使我有祸国殃民的事实，也不希望共产党宽恕。"

1948年春，陈仪被蒋介石电邀到南京，以浙江省主席之职相属。他以体力衰弱不胜繁剧相辞，并向蒋建议起用壮年。而蒋则以"浙江情况复杂，形势日紧，需要老成"之由，一再相劝，他只好勉承新命。同时，经蒋批准，调任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6月底，陈仪赴杭就职。他深知地方豪绅权势大，派系根深蒂固，抱定不得罪人的态度处理省务。他对省府秘书长、人事科长说："地方派复杂，积习很深，不好办事，我们抱定廉洁奉公，不加重百姓负担，宁可随时卸职，也不能加深人民灾难。你们就督促各科室，平时要有准备，随时可以办理移交。"

7月初，陈仪单独接见《东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这次回浙是倦鸟归林，新陈代谢，应该是退休的年龄了，还要我们这批老朽出来干嘛？无如蒋先生坚决要我重作冯妇，我不得不来。我自问平素还能注意我看一点新书，总感到看形势比人要强。物极必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如今实在是非变不可的时候了。""我们绍兴人惯说'且看'，等着瞧，好吗？"

2月21日晚，陈仪乘车抵上海，途中就被特务跟踪上了。

第二天上午，军统特务毛森突然单独来到陈仪多伦路私宅。刚好，他外出探望亲友。23日上午，毛森又带领三十多个特务来到陈仪公寓所，一进门就出示蒋介石的电令，即将卫士、副官缴械，扣押起来。这时，陈仪急急地暗示女儿设法通知好友，并轻轻地说："革命总会有流血的。"24日，他被押上囚车时，回头对家人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遗憾的是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我相信，我去后亲戚故旧是会照应你们的，你们好好生活。"事后，毛森到处告诉人说："我替张佑民（张超）出了一口气！"

27日，陈仪被押往衢州，看管在东门开明坊一号张雪中司令部。起初，他可以同上海的家属通电话、书信。在给女儿陈文瑛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他订了几份报纸和杂志，经常看鲁迅、茅盾的作品及中国的历史著作。

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接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他与执行官蒋鼎文积有旧隙，看了蒋一眼，说了声"好吧"，便嘱咐随身的厨师，准备热水沐浴，从容不迫地揽镜整容，更换衣服，系好领带。随后，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和一瓶酒。他拂袖而起，说："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他将两臂一摔，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到了马场町刑场，陈仪安祥地下了车，回头对执刑人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边走边说道："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被杀害时，享年六十七岁。他的遗体由其五弟陈公亮火葬，骨灰安葬在台北，墓碑上写着"陈公退素之墓"六个字。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解放军出版社）

陈果夫

陈果夫，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911年4月毕业于浙江陆军小学（在此以前曾两次小学毕业，一次中学毕业）。1911年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校期间开始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武昌起义时，赶去参加武汉保卫战，在蛇山推大炮时肺血管破裂，留下一生没有治愈的肺

病。年底，在上海其叔叔陈其美处结识蒋介石。陈其美被人暗杀后，陈果夫离开上海回家乡养病。1918 年 5 月再次离开家乡去上海，在晋安钱庄任助理信房，工作之余自己也做些生意，逐渐富裕起来。1920 年秋，孙中山要求上海的革命党人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筹措经费救济革命先烈遗族。蒋介石遂让陈果夫出任上海交易所第 54 号经纪人(即经理)，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交易。陈精于此道，经营有方，所赚的钱除供养家眷、资助弟弟陈立夫上学及自己享用外，还有一部分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和用于救济革命遗族，因此在国民党内获得了"理财专家"称号。1921 年 10 月，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去浙江奉化溪口镇代奠蒋母葬。

1924 年黄埔军校创办之初，陈在沪代办学校所需物资，同时主持上海地区的招生工作。随后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5 月 15 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手炮制了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整理党务案》。为实施反共方案，蒋介石即命陈果夫出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兼代理组织部长，具体执行《整理党务案》。陈到任后，进行党员登记和发放党证，从上到下改组、重建国民党的各级组织，驱逐共产党人。其间，还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1927 年 4 月 2 日，他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附议清党反共。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负责清党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宁汉对立期间，任南京方面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又组织中央俱乐部，联合亲蒋势力，组成 CC 系的最早核心组织，逐渐排挤、压制国民党内其它势力。与此同时，陈开始掌握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着力发展由他弟弟陈立夫控制的特务组织"中央调查统计局"。CC 系和中统组织在国民党反共人民的活动中一直是一支核心力量。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一直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陈果夫为其在政治上发展，1926 年还曾创办国民党党政训练所，自己任所长。第二年发展为中央政治学校，他又先后出任总务主任、校务委员、代理教育长。1927 年秋宁汉合流后，陈果夫兼任农民部委员。1928 年 10 月 8 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任命为监察院副院长。1929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和弟弟陈立夫一起列名中央执行委员，以后一直连任到六大。三大以后，陈果夫再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1931 年底广州非常会议事件结束，蒋介石、汪精卫再度合作，中央组织部撤销，又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陈果夫随之把组织大权交给原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弟弟陈立夫。1932 年出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 年改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1936 年，向何应钦建议给蒋介石献机祝寿。1938 年 4 月出任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1939 年出任委员会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主管国民党高层人事，权限极大。1945 年再次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农民银行董事长，1946 年又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1948 年，因国民党败局已定，于 12 月 6 日由上海乘"中兴轮"赴台湾台中市。

赴台后，国民党实施改造计划，陈果夫改任中央评议委员，1950 年 10 月出任中央银行理事。当时以陈诚、蒋经国为代表的实力派认为一批旧日的国政要员应该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负责，陈果夫亦在被清算之列。政治上的失势使他的肺结核迅速恶化，于 1951 年 8 月 25 日下午病故。

陈果夫业余爱好文艺、医学。1928 年 12 月曾出版《果夫小说集》。1945 年 5 月出版了《歌曲集》。对中医也有研究，出版有《自己治病简法》和《谈医药》等书。他一生中写的理论文章、专著、杂文、科普作品、电影剧本、文艺小说、中医研究与养身之道的文章等，后由台湾国民党当局汇编为《陈果夫先生遗著》出版，共 10 集，有教育文艺、政治经济、礼俗、生活回忆、医药卫生、杂著六大部分，190 万字。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委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珍闻轶事

《沁园春》轰动重庆

毛泽东到重庆才四天，就发生了一件令山城人民交口称赞而令国民党政府惊恐不安的事，这就是毛泽东与柳亚子的相见。

柳亚子是孙中山时期的革命老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毛泽东在广州工作时期，和他是老朋友，加上两人都喜好作诗，较之一般朋友又亲密了许多。

这一天，柳亚子兴冲冲地来桂园探望毛泽东。一见面就无所顾忌地大声说："润之先生，你是越来越容光焕发了。"

毛泽东笑说："哦，老朋友，延河的水可没有嘉陵江的

水甜啊，精神焕发的应该是你，我只有满身黄土啊！”

柳亚子苦涩地摇摇头：“我是披着一身愁雾，焉能不老啊！”

毛泽东呵呵一笑：“抗战已经胜利，应该是雾散日出了。”

柳亚子真诚地说：“润之先生，要驱散山城的雾，恐怕还得你来做太阳。”

毛泽东一摆手：“不，不是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全国四万万人民，他们是太阳，只有他们才能驱散中国大地上的雾，只有他们才能让阳光普照大地。”

柳亚子拍拍手，连连称道：“说得好，说得好。——对了，润之先生，最近有雅兴作诗么？”

“太忙了，寻不到灵感。”毛泽东有些遗憾地说，“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供拜读么？”

柳亚子兴奋起来：“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过柳亚子抄写工整的诗作，凝神吟颂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混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我哪里有什么‘弥天大勇’，没有人民的支持，恐怕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到这里来呀！我也不是‘霖雨’，《国际歌》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象你老先生，不是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奋斗吗？我们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千万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已。”

柳亚子脸显敬佩之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润之先生无论如何得赐我一首诗，以纪念这次有意义的相见。”

毛泽东摇摇头说：“新作我是一时拿不出来的，我把旧作抄录一首送你可好？”

柳亚子连连点头：“行，行”。

于是，在宽大的会客卓上，雪白的宣纸铺开了，毛泽东微微凝神，将气运到手腕，随着毛笔的挥洒，一首词便跃然纸上。

“哦，润之先生，先不看你的大作如何，单这潇洒飘逸的草书便让我倾倒了。”柳亚子拿起条幅仔细地端详着，欣赏着。

“俗语道，拳要打，字要写。我是几十年如一日，博取百家之长，练就了这一手字，但还欠火候，其中真味未能得到。”毛泽东显然对自己的一手字还挺满意，因此说了许多关于书法的话。

柳亚子这边已在逐字逐句地鉴赏毛泽东送给他的旧作了。但见写道：

沁园春　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气派，好气派啊！”柳亚子万分激动，“这种宽阔胸怀，远大抱负的词句，只有润之先生才能写得出来。”

“这首词是 1936 年填写的，那时我是中年气盛，聊抒胸怀罢了。”毛泽东解释说。

柳亚子捧着毛泽东的《沁园春》词，爱不释手：“我要珍藏它，以作永久之纪念。”

假如到此为止，那也罢了。谁知柳亚子得了此词之后，得意之际，邀来亲朋好友一齐鉴赏，于是一时间，《沁园春》词竟在重庆传抄开来，大有令重庆纸贵之趋势。后来，重庆的《新民晚报》干脆将它全文发表，这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凡有井处，无不在谈毛词。

蒋介石也通过报纸读到了这首词，他不相信这是毛泽东填的词，尽管他不会填词，但凭着直觉，他品味到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好词，该词借古说今，意境不俗。他找来了谋士陈布雷，这是一位替蒋介石起草文稿的文人，他对中国诗词的了解当然比蒋介石多得多。蒋介石问：“布雷先生，你看毛泽东这道《沁园春》词是他作的吗？”

尽管蒋介石希望陈布雷说出“不是”二字，但是陈布雷是一个忠实于主人的文人，他觉得不能对蒋介石撒谎，于是他说：“是的。”

回答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又问：“布雷先生，你觉得这首词写得如何？”

“气度非凡，真有气吞山河如虎之感，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啊！”

“难道就没有不尽人意之处，譬如说音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找出一点差错，以平衡自己妒嫉的心理。

“嗯，我细细看了看，没有什么毛病，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嘛，因为是诗词，也只能这样说了。据我所知，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是非常精通的，填词作诗，算不得什么难事。”

“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蒋介石突然又评价起毛泽东的词来，眼睛死盯着陈布雷，似乎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这人嘛，倒是有。”陈布雷小心答道。

“那好，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

蒋介石一声令下，御用文人们忙碌起来，官方控制的报纸纷纷登出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

党人。

毛泽东见了重庆报纸大大小小的攻击辱骂文章，笑对周恩来说："看来要称王称霸的还是蒋公介石啊！不然，我的一首小词，怎么就触怒了他，引得他万炮齐发呢？他不就是怕中国共产党参政，打破他的一党专制的统治么？"

（选自《黑雾红尘》，作者：陈景彪、彭锦华）

蒋介石曾想软禁毛泽东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进行了几次交手之后，自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结束后"放虎归山"。于是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软禁毛泽东，但又怕此举失信于天下，正在举棋不定之际，他接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冯玉祥将军等人分别打来的电话。于、冯等人说：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于和谈有碍。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蒋介石听着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只得故作镇静地说："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请两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后来，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又考虑到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伪装还不宜过早地撕破，只得打消了软禁毛泽东的念头。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毛泽东、蒋介石互相赠礼

毛泽东一到重庆，就从气势上压倒了蒋介石。当天晚上，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他的林园官邸作客，两人对面而坐，侃侃而谈。在讲到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终于打垮了日本人的时候，蒋介石站起身，从靠墙的壁柜里面取出一把金灿灿的带鞘宝剑说：

"这是我们在安徽太湖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身上缴获的日本天皇御赐的宝剑。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今天又走到了一起，把它送给你作个纪念。"

毛泽东知道蒋介石是在夸耀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劳，坦然接过来，笑了笑说：

"你晓得，我们这些年老是在日本人的肚子里面打滚，连饭都吃不饱，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样吧，我把早年填的一首歪词录下来送给你，权当回赠，你看如何？"

蒋介石连声称好，急忙吩咐人取来纸墨笔砚。毛泽东稍一思索，便龙飞凤舞地挥毫写起来：——

沁园春　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蒋介石虽然不懂词格，但他却被毛泽东词中那股豪气所震撼了。次日，他特意嘱咐陈布雷，一定要找人填一首可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媲美的词来，然后把两首词一起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四天过去了，陈布雷沮丧地向蒋介石报告说，重庆城内能请到的大文人都请到了，大家爬到歌乐山顶寻了三天灵感，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

蒋介石听了，不由得长叹一声。

此后的一段日子，毛泽东以其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使整个山城都为之倾倒。连在重庆的两个美国兵也被他迷住了，把自己的洋烟精心地包装起来送给他，并执意要与他照一张像，说是要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地球那边心爱的女朋友。

（汪涛：《威震神州》）

毛润之三顾特园

"特园"，座落在重庆上清寺西南角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始建于1931年，占地约二三亩，布局典雅，结构严谨，居室宽敞，错落有致，庭院幽静。俯瞰嘉陵江，波光鳞影，给人一种超尘脱俗的感觉。因为园主名鲜英，字特生，故名其宅为特园。

在革命岁月，特园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上层人士的活动场所，各界代表人物经常在此共商国事。一时间，特园群贤毕至，英才荟萃，"民主之家"（董必武语）的美誉不胫而走。1944年民盟就是在此酝酿成立的，总部便设在特园，许多重要活动常在这里举行。中共许多领导人物也都是特园的嘉宾，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叶剑英、王若飞等在此多次下榻。毛泽东更与特园有着不解之缘。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3次光顾特园，同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共商大计。

（一）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第三天，他便亲临特园访问。此时的特园，四处生辉，满园皆喜。张澜、鲜英及其家人，都一起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迎延安贵宾的到来。毛主席慈祥和蔼的容颜，平易近人的问话，使人们的紧张情绪顿消。

鉴于毗邻特园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巢穴，为了安全，经过细心的周恩来的安排，晤谈的地点，也不在大客厅，而选在僻静的张澜的卧室内。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好友的问候。气氛十分融洽。

虽然张澜理解毛泽东的重庆之行，但心里仍有所不安："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是谈判嘛，你们可以象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鲜英更是直言道出了自己担心润之先生安全的心衷。这时周恩来因事告退，卧室内只剩下毛泽东和两位老人，彼此倾吐心曲，更显得心心相印。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有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领悟的到其中的意思："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成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啊！"

接着，毛泽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六项紧急措施。张澜听后连连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显然，毛泽东极为理解这位爱国老人的胸怀，于是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新貌、人民福利，以及生产、教育等等，向张澜作了详细介绍。张澜捻着银髯，神驰于解放区的新天地里。

（二）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鲜英等出席作陪。毛泽东一进特园，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回到家里来了。"一句话，说得满园生色。在客厅，毛泽东勉励大家："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以后共同创建民主之国，生活在民主之国。"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和毛泽东无拘无束地谈"五四"运动的往事，谈职业教育，谈健身之道。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

作为特园的主人，鲜英给毛泽东献上了具有四种传统风味的枣儿酒。毛泽东喝罢非常赞赏。张澜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思维敏捷的毛泽东当即征引陶渊明的《饮酒》诗，举杯答道："且共欢此饮！"

宴中，鲜英的女儿手捧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笔走龙蛇，以"光明在望"4个大字相赠。这4个力透纸背的大字，启迪着在座诸公：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三）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又翩然来到特园看望张澜。

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已大体有了眉目。而属于关键性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尚待继续磋商。实际上，蒋介石政府不断地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国的援助下大量运兵，准备发动全面内战。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张澜推心置腹地说："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即吴玉章）在北川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对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毛泽东连连点头。接着，张澜提醒毛泽东："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帐。"毛泽东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张澜感到义所当为，遂主动表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又欣然采纳，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不久，张澜的公开信就在重庆和成都的报纸上刊出。

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激烈斗争，签订了《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后来，每当张澜谈及毛泽东三顾特园之事，总是深情地说："我一生经过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政党。"

（王振富《党史文汇》95年4期）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伟大战略决策。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开赴东北，开创东北地区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警卫团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也新编成一个干部团，准备出发到东北战场上。

1945年10月1日，在延安枣园大厅里，刘少奇为这些奔赴东北的战士们送行。他说了几句简短的开场话后，向大家提出"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同时把他的右手自下而上缓慢地抬起来。接着又问道："恩格斯是干什么的

叫?“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他把右手挥向空中说:“他们,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按照马克思学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最后才能解放,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同时是自己解放自己!”“你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你们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新解放区的旗帜!”

刘少奇又继续说:“你们到了东北,要靠什么呢?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紧紧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只要你们永远牢牢地记着,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刘少奇的讲话使大家热血沸腾,第二天一早,战士们就怀着必胜的信心出发了。

(选自《刘少奇佳话三百篇》,作者:刘学琦)

党的“七大”曾准备过八次

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七大会期很长,从194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

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就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此后战事连绵;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转移到中央苏区;及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日渐安定。

第二次提出召开七大是抗战开始以后,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这次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这一年4月14日,任弼时同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但从这时起,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再一次研究召开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这是在刚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会议决定一切准备工作在“五一”前完成,初步议定“五一”开会。这是准备工作讨论的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以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

又一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3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这时整风运动早已全面展开,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七大。这一年的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改定在年底举行,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斯间启程来延”。随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在5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正式大会前的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决定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胡乔木谈党的七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

陈毅送表

194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深秋的鲁南阳光灿烂,十几匹战马拖着一串长长的烟尘驰到我们跟前,这是新四军军长陈毅由延安风尘仆仆来鲁南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当时,我担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主任。

陈毅司令员到任不久,即组织进行了鲁南津浦线战役、淮北朝阳集战役和苏中战役,连战皆捷。1946年11月陈毅司令员又亲自筹划了宿北战役的初步作战计划,很快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陈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当即决定,在12月15日晚对敌发起总攻。当时,敌六十九师沿宿(迁)新(安)公路进攻新安镇,敌第十一师沿宿(迁)沭(阳)公路进攻沭阳。两路敌军的间隙越

来越大，翼侧暴露造成了为我分割围歼的有利态势。陈司令员抓住战机，命令我通知第一纵队，在发起总攻时插入敌后，切断敌六十九师向宿迁的归路，准备配合第二纵队、第九纵队、第七师和第八师等部分割围歼该敌于烽山、晓店子、人和圩地区；又着我随同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赴八师指挥部，具体组织指挥协调第一纵队和八师的行动，并及时了解战斗发展情况，同指挥部取得密切联系。临走时，我习惯地撸了撸棉衣的袖口，一瞧手腕，才想起手表已经在一次行军中丢失了。陈司令员看了我一眼，说："王德同志，怎么搞的，把手表都弄丢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敬了个礼，就腾身上马，向八师奔去。

敌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是蒋介石的亲信。战前，蒋介石把自己心爱的怀表送给了戴之奇，以资鼓励。谁知总攻一开始，敌六十九师就陷入全师覆没的困境。18日12时，我参战部队全歼该敌21000余人，师长戴之奇被击毙，副师长少伟被生俘，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运动歼灭战。在清点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蒋介石送给戴之奇的那块怀表，第二纵队首长把怀表送交给了陈司令员。

战役结束后，我回到指挥部。陈司令员乐呵呵地叫警卫员取来一块怀表，把它托在掌心里瞧了瞧，然后递给了我，说："这表可是有点意思呢！权且借给你使用吧！"我细细一瞧，表壳是用透明的玻璃钢制作的，里面的机件小巧玲珑，闪闪发光，表针还在滴答滴答地转动着。陈司令员意味深长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倒是很守信用的，连表都替我们送来了。你可要给他打个收条呀！"陈司令员一番风趣的话，说得我们哄堂大笑。从此，这块怀表伴随着我经历了许多次战役战斗，每当看到它我总忘不了陈司令员对部下的关怀之情。直到全国解放，我有了新表，才把这块很有纪念意义的怀表交还给了组织。

（选自《纵横》87年6期，作者：王德）

第一批被授予军衔的人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为使中苏双方军事上相互配合，协调行动，苏方要求中共方面派人去沈阳联络。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位同志。考虑到苏军有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以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以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和莫春和以上校军衔。这6位同志成为我军第一批被授予军衔的人。

（摘自《中国老年报》）

三件难事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来到了沈阳。当他见到了冯仲云时，曾经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

了解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彭真同志讲的的确是一句大实话。他所说的这三件事，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艰苦的事"，而且就是在我们整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数得上的。英勇无比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用自己超人的智慧和钢铁般的坚强办好了这三件最艰苦的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迎来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全勇：《黑白关东》）

绝密资料证实侵华日军确在中国丢弃200万发毒气弹

1992年2月，在讨论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联合国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中国代表说："日军在中国国内丢弃了200万发毒气弹。"最近，日本共同社发现的日本陆军绝密资料证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发现的资料名为《陆军造兵厂历史》(1932～1939)和《陆军兵器厂历史》(1941)，其中记载日军在1932～1939年和1941年这9年间共生产毒气弹200万发。实际上，缺少史料记载的1940年和1942～1944年，日军也一直在生产毒气弹，因此实际的生产量要远远超过200万发。这些毒气弹绝大部分被运到了中国。目前，日本政府尚不承认日军在中国使用过毒气。共同社认为，这个新发现的事实将会给日中间正在协商的处理毒气弹的问题产生影响。

（摘自《参考消息》1993年7月13日）

毛字是一个反手，蒋字是将字头上一棵草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在渝的文艺界名流邀请毛泽东作一次演讲。在休息时，有人关切地问："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从容回答："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他发出一阵豪爽的笑。"那毛字呢？"不等那人问完，毛泽东

就接着说:"我的'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很明显: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发反掌。"后来有人根据他这番话编了条谜语:"似手非手,胳膊外扭,甘露滴三滴,四季幸福有,太阳正出山,霞光万年久。"

(选自《毛泽东的幽默》,作者:陈祥明　夏天然　邵华礼)

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国军民击毙的日军将领有多少

抗日战争期间,究竟有多少日军高级将领死于中国境内?《走向神社的哀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书比较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下简略介绍被中国军民击毙的28名少将以上日军军官。

浅野嘉一(陆军少将)　日本德岛县人。1936年晋升陆军少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碇泊场监。1937年11月初被中国军队击伤,11月14日死亡。

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　日本福冈县人。1933年12月任参谋本部航空兵本部部长。1936年8月,晋升陆航中将。1933年9月4日,在中国湖北孝感地区上空被中国空军击中座机当即毙命。

渡久雄(陆军中将)　日本东京市人。1938年1月晋升中将。7月任第11师团师团长。1939年1月2日,率部"讨伐"抗日联军,在密山地区被中国抗日武装当场击毙。

田路朝一(陆军中将)　日本兵库县人。1937年晋升陆军少将。1938年7月任华中派遣军第13军第15师团步兵团团长。1939年6月17日,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沼田德重(陆军中将)　日本茨城人。1939年3月晋升陆军中将,同时擢任华北方面军第12军第114师团师团长。同年7月发起鲁西作战,战斗中被八路军击伤。8月12日,伤势恶化,死于济南。

阿部规秀(陆军中将)　日本青森县人。1939年6月,任华北方面军第2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率部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秋冬季大"扫荡",11月7日,被八路军设伏聚歼于黄土岭,因战伤流血过多毙命。

中村正雄(陆军中将)　日本石川县人。1939年3月晋升陆军少将。任第5师团步兵第21旅团旅团长。1939年12月25日,在南宁昆仑关地区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秋山静太郎(陆军少将)　日本冈山县人。1936年晋升陆军少将。1940年1月在山东诸王庄与中国军队作战中弹,因伤势恶化身亡。

木谷资俊(陆军中将)　日本广岛人。1938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任野战重炮兵第2旅团旅团长。1940年3月20日,在山西省南部"扫荡"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水川伊夫(陆军中将)　日本皇族子弟。1939年任蒙疆驻屯军绥西警备司令官。1940年2月,与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在五原展开激战。3月22日,在战败溃逃途中被击毙。

吉川贞佐(陆军少将)　1939年秋,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1940年5月17日,在河南开封市被中共党员吴凤翔设计刺杀毙命。

前田治(陆军中将)　日本兵库县人。1939年3月晋升陆军中将。任第35师团师团长。1940年5月,在山西晋城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中头部、胸部,医治无效死亡。

藤堂高英(陆军中将)　日本三重县人。1938年7月晋升陆军少将。任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兼任江西省九江市警备司令官。1940年5月1日,在日军发起宜昌作战中,遭中国军队伏击,当场毙命。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大冢彪雄(陆军中将)　日本千叶县人。1939年晋升陆军少将。任华北派遣军第1军经理部部长。1940年7月,在对晋东地区"扫荡"中被中国军队击伤,8月5日死于北平日军医院。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　日本千叶县人。1939年晋升陆军少将。任第35师团第35步兵团团长。1940年10月,在华北方面军进行的报复性"扫荡"中被八路军击伤。11月28日毙命。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大角岑生(海军大将)　日本爱知县人。1931年4月晋升海军大将。同年12月任海军省大臣。1941年2月5日,在乘机由广州飞往海南岛途中,座机被中国地面部队击落而毙命。

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　日本三重县人。1939年11月晋升海军少将。1941年1月被任命为驻南京汪伪政府军事顾问。2月5日,在陪同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飞赴海南岛途中,因座机被中国军队击落而毙命。死后追晋海军中将。

大津和郎(陆军中将)　日本山形县人。1938年7月晋升陆军少将。1940年7月被任命为镇海要塞司令官。1941年8月10日,在率部"扫荡"作战中被中国抗日武装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山县业一(陆军中将)　日本奈良县人。1940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调任中国派遣军第13军第116师团步兵第119旅团旅团长。1941年12月25日,在与中国军队作战中被击毙。死后追恶陆军中将。

酒井直次(陆军中将)　日本东京市人。1941年3月晋升陆军中将。8月任第15师团师团长。1942年5月28日,在浙赣战役中,被中国军队埋设的地雷炸死。

冢田攻(陆军大将)　日本茨城人。1938年晋升陆军中将。1942年6月任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同年12月18日，在乘机飞经安徽省太湖县上空时，被中国高炮部队击中座机，当即毙命。死后追晋陆军大将。是抗日战争期间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陆军最高将领。

下川义忠(陆军中将)　日本东京人。1940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1944年2月，任中国派遣军第10野战补充队队长。在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中，被击毙于湖北省应城县境内。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横山武彦(陆军中将)　日本广岛县人。1943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任中国派遣军第13军第70师团第62旅团旅团长。1944年5月，在日军发动长衡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木村子代太(陆军中将)　日本佐贺县人。1942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同时擢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69师团步兵第59旅团旅团长。1944年4月率部在日军发起的"河南会战"中，踏响地雷被炸身亡。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森玉德光(陆航中将)　日本兵库县人。1943年6月任白城子教导飞行团团长。1944年3月晋升陆航少将。7月25日，在东北边境空战中毙命。死后追晋陆航中将。

志摩源吉(陆军中将)　日本长野县人。1943年3月晋升陆军少将。1944年3月，调任中国派遣军第11军第68师团步兵第57旅团旅团长。8月6日，在进攻湖南衡阳的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穿头部当场毙命。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山县正乡(海军大将)　日本山口县人。1942年晋升海军中将。1943年11月任联合舰队第4南遣舰队长官。1945年3月7日，因座机被美国空军拦击，迫降于浙江省椒江地区，被中国地方武装击中，爆炸起火毙命。死后追晋海军大将。

吉川资(陆军少将)　日本山口县人。1945年1月调任中国派遣军直辖第59师团步兵第53旅团旅团长。5月7日率部在鲁中地区"扫荡"时被八路军设伏击毙。

另外，还有36名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大佐，死后被追晋少将。

(选自《人物》，孙阿冰)

"一骂成名天下知"的王昆仑

"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这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赞扬王昆仑在国民党"六大"上公开揭露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的名句。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主持下在重庆复兴关中央干校大礼堂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面对着蒋介石政府的日益反动腐败，一些"有良心的国民党人"(毛泽东语)如冯玉祥等，纷纷起来发言与质询，抨击当局的反动政策。新疆代表弹劾农林部长盛世才在新疆期间犯下的罪行。到5月10日王昆仑发言时，更把会议的紧张、激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王昆仑是江苏无锡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投身于火烧赵家楼的壮举。20年代初，他南下上海，三次面见孙中山，加入中国国民党，投身大革命，成为国民党内崭露头角的青年党员，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立法委员。但"四·一二"事变后，他看到国民党日益反动腐败，幡然醒悟。于1933年毅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利用他的有利地位与社会关系，以民主派的身分，在国民党上层进行合法斗争。1945年5月10日是国民党"六大"的第六天，会议由邹鲁主持，王昆仑着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雄姿英发，分外引人注目。他起立要求发言，在得到会议主席同意后，他便以响亮的声音，侃侃而谈起来。

他质问道：抗战已经八年，前方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出去打日本？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军作战，有无周密计划？

他继续说：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衡阳兵败被日军俘虏，现被日方有意放回，只身回到重庆，招摇过市，据说负有特殊使命，现道路传言，报章揭载，我希望最高当局明白答复，以释群疑。……

王昆仑这一条条尖锐、有力的质询，重若金石，掷地有声，说出了一切正义人士的共同心声，在会场内激起了巨大反响。

蒋介石这天本没有到会，当他得知王昆仑的发言后，立即于11时50分快散会时赶到会场，迫不及待地破口大骂，他先骂新疆代表，为盛世才辩护；接着就大骂起王昆仑来。他说："方军长功在党国，造福湖南，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全体抗战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象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却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吗？!"这一骂就骂了一个钟头还余怒未息。蒋介石在上面这一骂，众走卒就在下面跟着起哄，狂喊乱叫："拉出去，枪决他！""枪毙！枪毙！"

王昆仑昂然起立，收拾好文件，整了整衣服，从容退出会场，表示他无言的抗议。

王昆仑义正词严的发言与蒋介石强词夺理的谩骂很快传遍了重庆与全国。各界正义人士都声援王昆仑而谴责蒋介石。他们指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对最高当局提出质询，是民主国家、民主政党政治生活中的常轨，也是作为代表的正当权利。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党只有一个人说

了算，还要大会代表干什么？这个代表大会不如不开算了，那就不是民主宪政而是法西斯独裁！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索性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说："如果你这种骂人的习惯不改正，听不进一点逆耳之言，恐怕国民党的'六大'将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亡党亡国之祸就在不远！"一向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为了争权夺利，这时也乘机出来为王昆仑"鸣不平"，白崇禧正式表示广西全体代表要一致投票选举王昆仑继续当中央委员。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的嫡系陈诚十分着急，他去找陈布雷，要陈向蒋介石进言，劝蒋把事情缓和一下，不要闹得不可收拾。而于右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捋着长髯，戏赞王昆仑"一骂成名天下知"。

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厚着脸皮出来收拾这混乱局面。他在5月14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除了"为党努力，为党牺牲，互相规劝，互相勉励"之类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外，承认他那天谩骂王昆仑是"言语失态"，请同志们"不要在意"，企图轻描淡写地了此一桩公案。但历史是无情的，国民党的"六大"果然成了他们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经盛鸿，摘自《历史大观园》）

写给抗日名将的挽联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爱国军队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反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强盗，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狠狠打击侵略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将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气壮山河。缅怀抗日阵亡将领的英雄业绩，国家领袖人物、军队高级领导人、社会贤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写下挽联，呈献在烈士灵前，寄托民族的哀思。

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人民是永远怀念的。北京民族文化宫前有条佟麟阁路，白塔寺东侧有条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保卫卢沟桥牺牲的佟、赵两将军。佟麟阁于1937年7月28日牺牲在北平南苑大红门战场。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年仅46岁。同日在大红门牺牲的还有赵登禹将军，他是遭敌人伏击而身亡的，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赵登禹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最先为国捐躯的将军。冯玉祥发表了悼诗《吊佟赵》，并敬献挽联：

报国敢云天职尽，

立身当与古人争。

既是对部将佟、赵两将军竭尽爱国军人天职的肯定，也是在勉励生者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彻底打败侵略者。

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了郝梦龄等人为国牺牲的精神。他指出："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中国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这里说的饶国华将军，是受命率军在安徽广德十字铺组织反攻时，被日寇包围，拒不投降，写下绝命书后，于1937年12月1日举枪自戕，以死报国。时任第七战区一四五师中将师长。蒋介石为重庆公祭饶国华撰写的挽联是：

虏骑正披猖，闻鼓鼙而思良将；

上都资捍卫，冒锋镝以建奇勋。

上联写日寇气焰嚣张，战鼓激荡沙场，渴望良将之心情；下联则赞扬饶将军捍卫首都的功劳，肯定了他挥戈广德，建立奇功的壮举。

1938年山东台儿庄战役，围歼了日寇板垣、矶谷两个机构化师团大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震惊中外。在台儿庄战场上牺牲的抗日将领有王铭章将军，时任第一二二师师长。在滕县火车站电灯厂附近与敌军遭遇，身中数弹，临终，他挣扎着厉声对随从说："你们去吧，继续和敌人拼命。中华民族万岁！"李宗仁闻知后指出："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王铭章灵柩于1938年5月9日运抵武汉，各界迎灵设祭。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名义联合敬献的挽联是：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名字含在筑路先锋之意的范筑先将军，1938年11月牺牲在鲁西北聊城战场上，时任山东第六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聊城县长。范将军岁在花甲，仍每战必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带头冲锋杀敌。他在聊城东门壮烈殉国后，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董必武、吴玉章联合敬献的挽联是：

三友见精神：松体通，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高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

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卫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共纾国难绍遗风。

朱德的挽联是：

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元，惟其忠勇；

吾辈尚存，誓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

董、吴的挽联赞扬范筑先将军有松、竹、梅三友的风格与正气，能在国家危难时保持晚节。而且他家一门忠义，次子在济南抗战中殉国，其余一子三女都参加了抗日队伍。范将军的爱国精神使顽者廉洁，懦者自立，去共同解除国难，继承发扬其爱国精神。朱德的挽联强调范将军的忠诚勇敢，发出了"还我河山"的钢铁誓言。

曾率部在卢沟桥英勇还击日寇的张自忠将军，1940年5月在湖北枣宜会战中阵亡。时任兵团总指挥兼集团军总司令，年39岁。周恩来特撰写了《追念张荩上将》一

文，毛泽东题挽词："尽忠报国"。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张自忠将军大会。大会上的挽联有：

一杯之奠，岂止泪洒同情；

万众之心，实欲驱除暴日。

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

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

山西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也是艰苦卓绝的。1941 年，担任陆军第十二师师长的寸性奇将军在水谷朵高地负重伤，不愿被俘受辱，用手枪短剑自戕，壮烈殉国。在同一战场举枪自戕的还有唐淮源师长。

蒋介石为这两位将领敬献挽联：

百战殊勋著河上，

双忠大节壮中原。

龙云敬赠的挽联是：

国士古无双，溯频年迹迈长征，气壮山河，六诏笃生双国士；

将军志不二，有此日开会追悼，各垂竹帛，千秋同仰二将军。

龙云称赞二将军，如此杰出人材历史上难找，云南（古称六诏）却诞生了他二人。寸、唐两将军必定名垂史典。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1942 年 5 月 24 日，在率部掩护总部机关转移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噩耗传出后，延安各界同声哀悼。朱德总司令献挽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死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出生在安徽乡下养鸭为生的贫寒人家，曾在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安徽公学读书。1942 年 5 月 26 日不幸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时年 38 岁。英年谢世，国人痛悼。

毛泽东特写挽诗祭他："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联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张治中的挽联是：

国外播雄威，万里尸归魂壮烈；

军中草露布，千秋言在气清刚。

千秋言在，指戴将军常以岳飞、文天祥的精神激励部属官兵，他谱写战歌《战场行》让战士高唱。

威震敌胆，活跃在冀中平原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其母殉国后，他在追悼大会上，号召全体军民，化悲痛为力量，为所有受难者报仇。1944 年 2 月 7 日，马本斋因患急性肺炎病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送了挽联，朱德的挽联是：

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

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944 年 9 月 11 日，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率领部队在河南邑县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 37 岁。1945 年 2 月，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敬献的挽联是：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重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准。

陈毅赋诗云：

吾党匡天下，得君一俊才；

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

（吴海发　《炎黄春秋》95 年 8 期）

驾机送周恩来返回延安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从延安到达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由于此次"重庆谈判"代表了抗战胜利后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故使全国一片欢腾。嗣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留驻重庆。

当时，我是国民党航委会直属的专机大队（对外称"空军空运第一大队"）的飞行员。大队长衣复恩是蒋介石"美龄号"专机的驾驶员，他规定我们每日到队部集中待命（早晚都要点名）。凡是在家的飞行员，都必须到队部值班室等待看任务公布牌，以便随时做好飞行准备。

任务公布牌上写的是：飞机机种号码，飞行员姓名、飞行目的地，起飞时间等。至于接送谁则是保密的，向来不公布。何时返回基地须等上级电示或事先由大队长面示。

1946 年 3 月中的一天，我出差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正等待返回成都凤凰山基地的命令，突然接到大队部电报："明天任务，重庆至延安，八点起飞。"当晚我反复想：明天送谁去延安呢？我并没有去过延安，大队长为何不派熟悉延安航线的人去呢？

翌晨 7 点整，我到航行室看天气报告："延安，晴，能见度 3000 公尺。"然后就去检查飞机，一切正常。7 点 30 分，机场值班员对我说："衣复恩大队长来电，命你在西安着陆，董明德副司令有指示。"

7 点 45 分，白市驿机场上空层云密布，下起了毛毛雨。在我旁边 30 米外有一架 C—47 飞机，围了许多欢送的人，还奏起了军乐。原来是送朱绍良（上将）去新疆的。

我正看得出神，有几个手上提着提包或箱子的人向我的飞机走来，有磅秤前站住了。过秤员按名单大声叫着

名字："周恩来——"只见周先生轻步从容地站到磅秤上，一手还提着一只小箱子。记录重量后，过秤员又叫第二个名字。

我听到"周恩来"的名字先是一怔，心想，周恩来曾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张治中），而机场工作人员为什么对他这样没有礼貌呢？再看看旁边的朱绍良专机欢送人群的热闹情景，和我这架周恩来专机的冷清场面，心中不平之感油然而生。我愤慨地向机械员大喊一声："准备起飞！"

我登上飞机，随即叫机械员招呼大家坐好。飞机开始滑行，飞离跑道。云层中模糊一片，能见度很差，我当机立断加大油门爬到了云幕之上。我回头看看舱内，总共5个大人和一个小姑娘。小姑娘看上去有10岁左右，穿一件黑色长袍，短发，刘海下露出一对聪明机灵的大眼睛，正向我闪着天真而陌生的目光。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又回头看周先生，只见他正以专注的神情阅读一大叠《新华日报》，一边看，一边用红铅笔在报上画杠杠。我再看其余的人，都神情自若，若有所思。上午，就是在沉默中过去的。

两小时以后，飞机通过米仓山和大巴山之间的万源城，进入了陕西地界。这时天气逐渐晴朗起来，左边是汉中盆地，前面是雄伟的秦岭山脉，那太白山峰和首阳山峰，出现在正前方。我驾驶飞机爬高绕过山峰后，开始收油门下降，10分钟后在雾气朦胧中看见了西安机场。我迅速对准跑道进行着陆。

停机后，我立刻跑下飞机去见董明德副司令。董开头就问："周恩来来了吗？"我说："周先生在飞机里。"董说："请他们下来吃饭。下午你去延安，今天一定要赶回来。"

我立刻跑上飞机对周先生说："董副司令请各位下去吃饭。"周说："我们到了延安再吃饭，请代我谢谢董副司令。"我再三邀请，无一人下机。

我只好回复董副司令，董未作答复。

我心中感到不安。心想董副司令是我去美国时的副领队，于是就大胆地说："周先生在飞机里饿着不吃饭不行，我是否可以送几碗面条去？"董沉思了一会儿说："可以。"

我立即叫做了6碗面条送到飞机上去。开始他们谢绝了。我说："时间还来得及，要是不吃饭，我也飞不动了。"看我坚决站着不走，最后周先生说："既然送来了，就吃了吧。"大家才默默地吃了饭。

饭后，继续飞行。天空已完全晴朗，老远就看见下面前方有条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回头看小姑娘正在对我笑，像要说什么，看意思是想到前舱来玩，又怕不许。我将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后，走过去对周恩来说："周先生，您好！"他随即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辛苦你了！"我说："我没去过延安，能否请你到前面来给我指导指导。"周恩来说："这条航线的地标我还知道一些，叫我给你领航吗？"说着笑了起来，顺手牵着小姑娘来到前舱，并给我介绍说："这是叶挺将军的孩子，叫扬眉，很聪明。"我请周恩来坐在右边椅子上，小姑娘就站在我们中间，不时踮起脚向外看。

我顺手将航行地图交给周恩来。只见他透过风挡，不时地看窗外地标，反复对照地图后对我说："现在就跟着这条河飞，到前面再看到一条河，那就是延水，然后再找宝塔山，山上的宝塔，在很远距离就能看见的，飞到宝塔山也就到延安了"我就按地标飞行。空闲中，周恩来问了我姓名，何时从家乡跑出来等等。

不久就隐约看到了宝塔山。飞到宝塔山的上空后，就找到了延安城和延安机场。机场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四周是丘陵地带，看上去广阔空旷，也没有什么房子和汽车等设备，似乎显得很静寂。我先低飞盘旋一周以了解机场情况，在徐徐转弯中，突然看到从四面八方涌出人流直奔草坪来，再仔细看，人们都清一色穿着灰军服，头戴红五星帽，跳跃奔跑着如波涛澎湃地汇集拢来。

我渐收油门徐徐降落。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像潮水般地涌过来，我看清楚人们大多背着长枪和大刀。这雄伟的场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红军队伍啊！

飞机停稳后，人群将飞机团团围住。周恩来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下飞机。他在匆忙中给我介绍了龙飞虎、王部长等等，并再三要我休息一会儿再走。我因军命在身，只好婉言谢绝，并申明必须返回西安的原因。最后周恩来说："你辛苦了，感谢你送我们回来，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我向周恩来敬礼告别后，就登机飞返西安了。周恩来先生那平易近人和宽怀博大的气度，以及延安机场的热烈壮观场面，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选自《纵横》91年3期，作者：赵新）

擒获日本国际特务吉野广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1944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德战场上苏军开展了胜利反攻，英美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腹背受敌，灭亡在即。远东的日军不仅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败北，在中国战场上也完全处于守势，每年冬季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日军亡我之心不死，在即将灭亡之时，又挖空心思采取阴险恶毒的手段来破坏我军，以图达到鲸吞我国的罪恶目的。

1945年刚过春节的一天早晨，我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突然被急促的报告声喊醒。警卫员对我说："董政委（即段君毅同志，抗战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政委。为便于开展工作，曾改姓董）有急事找你，让你马上去。"我急忙起床去见董政委。原来有人向他报告，范县西关商

人孙少勋从济南接来一位日本人。据孙说，此人在济南曾多次帮他买过奇缺商品，此次来根据地是收购皮货，回去加工的。但大家就当前的形势分析认为，此人极大的可能是日本特务。现在发动世界大战的德、日、意法西斯节节惨败，即将灭亡，此时的日本人怎能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做生意呢?所以决定派我马上带几个骑兵去范县西关，设法把这个日本人带来，弄清其真实身份。任务的艰巨和紧迫，使我立即从节日的轻松状态，转入了紧张工作。

我们的驻地颜村铺距城10余里，我带领4名骑兵半小时就赶到了。找到孙少勋的家后，径直走了进去。到屋内后，看见一个身穿青绣长袍、外罩深蓝色毛哔叽大褂的中年人，他面色粽红，中等个子，正从床上下来，看到我们进屋，非常惊诧地看着我们。我心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要找的日本人。随即问道:“孙少勋在家吗?”他以生硬的汉语回答:“在家。”后又慢吞吞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日本人，来这里收购皮货的。”他一面请我们坐下，一面请我们吸烟，一切都显得沉着老练。这时孙少勋进屋，他主动自我介绍后又指着日本人说:“这位是日本商人，名叫吉野广，在济南同我做过多次生意，还帮我买过许多难买的军用品。今后咱们军队需要的东西我都能买到，就是最难买的黄色炸药，这位日本朋友也能帮忙。这次他跟我来是收购皮货，回去加工。”我说:“好啊!这位日本朋友穿的这么阔气，是做大买卖的，和扫荡时来的日本人穿的不一样。”孙听了此话有些不自在，吉野广却面不改色，两眼一直注视着我。为消除他们的疑虑，我又同他们谈了些生意方面的事情。十分钟后我亮牌了，对他们说:“我们首长听说吉野广来此做生意，很想了解与济南的通商情况，特派我前来请吉野广先生。”日本人对此愕然无语，我猜他心里清楚，拒绝不仅无用，反而意味着心中有鬼，只能乖乖地跟我走。孙少勋看到我带4名骑兵前来，不宜拒绝，于是就对吉野广说:“该去。”这样，未费吹灰之力，吉野广就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返回驻地的途中，我开始考虑如何安置这个日本人。他不同于俘虏，但又没掌握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证，思之再三，觉得以表面上的客人实际上的嫌疑犯来对待较妥。这样能进能退，比较主动。所以，抵达驻地后我做了如下处理:一、让他享受俘虏待遇，吃小灶;二、派一名警卫员日夜跟随他，名为照顾其生活，实则监视其行动;三、让保卫科内勤干事陪他用餐，借机向他了解各种情况，为将来的审讯作准备;四、夜间由警卫连在门前放哨，防止他逃路。

但是日本人来此地的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揭破其假面具，弄清其真相?我决定从以下几方面收集材料:从孙少勋等商人中了解他在济南和途中的情况，从中发现疑点和问题;从内勤干事陪他吃饭时收集的材料中发现问题;从警卫员处了解他的行动是否有异常现象。遗憾的是，一周来从各方面收集的材料中未发现任何破绽，对吉野广的审讯也就迟迟不能进行。这一切表明，吉野广是个相当老练和狡猾的特务，在到此之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未留下任何漏洞，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

眨眼到了元宵节。晚上，政治部召开办公会议，在办公会将结束时，警卫员气喘嘘嘘地跑来报告说:“日本人跑了!”我大吃一惊，瞬即奔出门外。不料天上下起了毛毛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使我心急如焚。凭借着军人在各种环境下经受的锻炼，我才深一步浅一脚的摸到了出事地点。哨兵报告说:“警卫员回班取衣服时，日本人要上厕所，可他去后好久未回，我到厕所一看，才发现他跑了。”我立即去厕所划着火柴察看，从留下的脚印观察，他朝东北的阳谷方向逃跑了。在这漆黑的雨夜，他很容易隐蔽起来，难以捉到。但在下雨路滑不易行走的情况下，他又不熟悉道路，不可能走得很远，只能在根据地内，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当务之急是搞好天明后的搜索工作，尽早捉住他，绝不能让他跑向阳谷或郓城。

我迅即摸索到董政委的住处向他报告。他听说日本人逃跑了很着急，急忙去找曾思玉司令员。我向曾司令员详细报告了日本人的逃跑情况及分析意见，曾司令员听后生气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防止他跑向阳谷或郓城。你马上和侦察股长研究一下，天亮后立即在阳谷和郓城方向各派出三名骑兵，对主要道路进行巡查，再派出10名侦察员，在阳谷和郓城的接敌区把主要道路监视起来。同时，还要在东北、东南方向的20里路以内组织得力人员进行搜查。”董政委接着补充说:“我马上通知专署，告诉他们这个情况，让专署立即通知范县，通报各村，发现日本马上给分区送来。只要发动群众，事情就好办了。”这时曾司令也平静下来了，他把手中的电筒放到我手里说:“给，快去办”。这只电筒是配给首长夜间看地图用的，全分区只有这一只。我接过电筒，深深感受到肩负的重任。

有了手电筒的照明，很快就找到了侦察股长邱克难，当即同他研究布置了向阳谷、郓城派出骑兵、侦察员的搜捕任务。对东北、东南方向20里内的搜索，决定由我和内勤干事各带3名骑兵进行搜捕。布置完任务返回住所时，已是后半夜了，但我怎么也睡不着，想日本人逃跑的路线、想他逃路成功后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越想越感到搜捕任务的急迫。

天微明我就带着3名骑兵对东北方向进行搜索。路上碰到人，就告知他们颜村铺驻军跑了个日本人，身穿漂亮的深蓝色大褂，讲生硬的中国话，请男女老幼都帮助我们捉拿日本人。

刚进卓耿王村，就遇到一位匆匆急走的小伙子，我们对他说:“颜村铺驻军跑了一个日本人。”他马上抢着说:“听说烟铺捉了个日本人，我正要去看，咱们一起走吧!”我听后高兴极了，当即说:“好，请带路。”我们很快就到了

烟铺。小伙子推开了虚掩的门，只见屋里面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日本人的。大家见八路军进屋，都悄然无声地注视着我们。我环视了一周，看到靠窗的床上躺卧着吉野广。几乎同进，他也看到了我，立刻从床上翻滚下来，像捣蒜似地跪在我面前叩头哭喊："请长官饶命……"我把他交给骑兵看管后，立即找到了捉拿日本人的高士环、王静江、胡化乾三人，向他们了解捉拿特务经过。他们说：我们昨晚研究村上的工作到深夜，突然门被撞开，跌跌撞撞走进一个人来，气喘嘘嘘，光着一只冻得发红的脚，进门就跪下磕头，断续不清地说，请给他一只鞋。我们看他穿着阔气，慌慌张张，又不怎么会说中国话，就怀疑他是偷跑的外国人。询问后，他自称是日本人，是来范县做生意被八路军误捕的，请我们帮助他去阳谷。当他看到我们卷烟的一套设备后，马上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把送到阳谷城，烟丝要多少给多少。"为了稳住他，我们答应送他去阳谷，让他先上床休息，待天明吃过早饭就起程。他当然想不到我们要送他去的地方，正是他几小时前离开的颜村铺八路军驻地。没想到你们来得这样快。我听了他们的叙述，被根据地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帮助军队的精神深深感动，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押回吉野广，我立即去董政委处报告，当我告诉他已捉回吉野广时，在里屋的曾司令员听到后马上跑出来说："太好了！"并立即喊警卫员告知一股长，部队决定不转移了。原来首长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只有捉回吉野广才避免了部队转移的麻烦。直到这时，我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审讯中，吉野广对其逃跑找了种种借口，为掩盖其特务活动玩弄了不少花招，妄想以商人的面目蒙混过去。还煞有介事地说："只要我给济南日本商社写封信，10 天内就可寄 100 万元赎我回去。"但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他自称收购皮货，却不知皮货的分类和等级。对逃跑更不能自圆其说。最后不得不交等其特务罪行。原来他来此地目的是破坏我军最锐利的进攻武器。日军在侦察中得知我军之所以能连连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军使用了 92 式步兵炮(此炮建国后已交军事博物馆收藏)。该炮是 1941 年春我军在郓城的潘溪渡战斗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该炮能平射，可直接摧毁敌人的碉堡等防御工事，使其丧失防守能力。但当时只缴获了三发炮弹；不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后经我修械所岳胜所长的悉心研究，已能自己制造炮弹了。开始是三天造一发，后经改进，一天能造三发。因此，敌人吃尽了这种炮弹的苦头，于是就采用特务手段，来破坏这种炮弹的生产。敌特头子们经过现三研究，认为只有潜入我根据地内，才能取得成功。他们决定派人化装成商人来根据地做买卖，通过为我军代买黄色炸药这一军用品时，在炸药上作手脚，企图借此炸药破坏炮弹生产，其用心何其毒也！

问他能否完成这一任务时，吉野广说道："特务头子所以挑选我来执行这一任务，是因 1938 年我曾赴西班牙、埃塞俄比亚执行收集情报，分化敌方力量的任务，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此次接受任务后，我也深知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因此，来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精心的安排，使孙少勋完全相信我是纯粹的商人，不存疑心。所以，我觉得能完成任务，被管押后，也认为可以跑掉，未料到根据地的老百姓不爱钱，又被捉了回来。"现在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中国人的厉害了。

费时 10 余天，终于揭露了吉野广是日本特务的真实面目。我们将此案上报军区后，军区立即让我们把日本特务和有关材料速送军区。显然，军区对日本特务活动的新动向，是非常警惕和注意的。

(选自《纵横》95 年 3 期，作者：申健生，原在抗战时期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锄奸保卫科工作。)

蒋经国会见斯大林

1945 年 6 月 15 日。这一天蒋介石心情特别沉重。上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会见蒋，告之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多日的谣传终于变成了现实。站在闷热、令人烦躁的办公室里，蒋介石陷入了沉思，他仿佛看到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得意微笑，罗斯福屈而迎合的目光，还有丘吉尔先生高傲的贵族神态……

"去，告诉一下布雷，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蒋转身命令身旁的侍卫。

6 时，陈布雷带着一身的疲劳来到蒋的办公室。陈向以言辞敏锐、善解人意，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三天前，当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前来会蒋时，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布雷，你知道吗？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蒋介石说道："蒋公言之有理"，布雷小声地对答。"苏俄实属可恶，美国也不够朋友……"蒋边说边把一个条约抄写本递给陈布雷。

寂静，只有蒋介石来回走动的声音。"……蒙古之现状须予维持，恢复 1904 年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东北的利益……"条约抄本字字如针，句句似锤。"太卑鄙了！"一向斯文的陈布雷看罢也不免骂了起来。"蒋公，我们不能轻而易举地答应他们的要求，得寸进尺啊！"布雷激动地说道。"我已经考虑过了对策，让人给子文拍急电……让他拜晤杜鲁门后回国。"蒋缓缓地说道。忽然，他话锋一转，"我想接受苏联的要求，派一个代表团去谈判。"然后又小声地同陈谈论了一会。

6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立即拜见了蒋介石，就中苏会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杜鲁门对中苏谈判持中立态度，我们只好通过自己努力

了……”“子文，我想让你带领中国代表团同苏联进行谈判，不知你认为如何？”宋子文深知此行凶多吉少，弄不好还会落个卖国罪名，但碍于蒋介石的面子，只好答应。

6月25日，国民政府宣布中华民国赴苏谈判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兼团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还有外交部长胡世泽，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陆军中将蒋经国，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等。在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蒋经国，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更主要的是他传奇的经历和独特的性格。蒋介石这次派蒋经国赴苏谈判，有他的谋略，一是表示对苏联的亲近，二是蒋经国留苏12年之久，通晓俄文，便于观察、分析苏联领导人的意图。还有一点就是想锻炼一下蒋经国的外交才能。

6月30日，中国代表团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专机飞往莫斯科，苏联驻华代办司高礎、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等到机场送行。

6月30日，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三小时，同苏联代表团举行了15分钟的会晤，双方交换了代表团名单。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彼得洛夫、洛索夫斯基。祝酒时，斯大林说：“希望我们合作得愉快！”

7月2日，在莫斯科，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谈判一开始，斯大林绘声绘声地讲述苏联在抗击德国法西斯中的战绩，并描述跟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的愉快情形，接着话题一转，对宋子文说：“宋先生，阁下此次前来，想必已得到全权签约的指示……你知道，雅尔塔协定关系到你们对日作战的形势，出于你们自己国家的前途，想必不会反对吧！”宋子文答道：“雅尔塔协定有关损害我国主权的内容，是你们同美国单方面签署的，因而中国有不承认之权……尽管如此，中国为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我国政府愿作出一定的牺牲……”宋子文的话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房间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你看过这个东西吗？”斯大林边说边把一张纸扔到宋子文面前，声色俱厉地说：“你可以讨论问题，但必须在我和罗斯福签署的这份文件基础上来讨论……你们来这里谈判的目的是为了缔约，如若不然，谈判就到此为止吧！”说完斯大林起身欲走。“对于阁下这种态度，深表遗憾！”宋子文愤慨地说。双方不欢而散。

鉴于中苏会谈陷入僵局，7月2日晚，蒋介石致电蒋经国，令他以个人身份单独会见斯大林，商谈外蒙问题。此次蒋经国赴苏谈判，国内外舆论界特别关注。和蒋介石一样，蒋经国有着一种干练、泼辣的作风，但“比其父更有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加之血气方刚，确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7月4日，蒋经国拜晤了斯大林，两人谈话一开始就陷入激烈的辩论和争吵中。

斯大林：“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们独立？”

蒋经国：“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的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土地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土地割让出来，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抗政府，那么我们就无法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归并你们。”

斯大林：“倘使你们的国家有这个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斯大林同志，请你别忘记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是我们军队的抗战拖住了日军的北上……”

“你们？支持我们？”斯大林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那是在莫洛托夫等人的努力下，《苏日中立条约》的结果……”斯大林一边说一边眨动着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我们并不怀疑这点”，蒋经国打断了斯大林的讲话，“如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可以随时被撕毁——因为魔鬼是从来不讲信用的。”蒋经国的话刺中了斯大林的灼痛处。他好像听到了自己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高兴地对着苏联人民的讲话，“我们得救了……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胜利”。但随之又想起纳粹部队进攻苏联的炮声、坦克履带的轧轧声、飞机肆虐的轰炸声、数以万计的苏联伤兵的呻吟、咒骂声……而这一切是在他那令人激动的讲话几天之后发生的……

回忆太痛苦了，更痛苦的是竟有人敢揭自己的老底。一向在谈判桌上沉着、老练的斯大林大动肝火，他以坚不可摧的意志说出了下面这句话：“你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再同我辩论！”

两人不欢而散。这次会谈，斯大林“粗暴、蛮横”的形象在蒋经国大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迹。60年代，蒋经国在台湾时。每想及此事，总不免心中感到愤慨！

7月5日，蒋经国会同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停止谈判，但为蒋介石所拒绝。7月6日，蒋介石致电中国代表团，在外蒙问题、大连、旅顺港使用问题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对此蒋经国私下里甚为不满。会谈以中国做出让步为结局。从斯大林处争取来的，只是苏联在旅顺建立军港时，不用蒋介石所忌讳的“租借”一词，斯大林为了表示对蒋介石损失的“补偿”，许诺签约后，苏联在处理跟中共及国民党关系时，只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庄传伟　盛在启）

汪伪群奸被囚琐闻

日本投降后，汪伪巨奸一个个丧魂落魄，如坐针毡。他们最注意的便是重庆对汪伪官员如何处置。当时，国民

政府曾发布命令，要求汪伪各级负责人坚守岗位，等候接收。由于没有说明以后的处理情况，汪伪汉奸们更是惶惶不安。汪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佺立即到周佛海家里打探消息。周佛海早已输诚重庆，他很有把握地说：重庆不会亏待我们。只要他(指戴笠)在，我们就不会有问题。

1945年9月26日，袁愈佺刚起床，来了几个声称是先遣军的人，说何应钦总司令有事要请他，车子已备好。上车后，车子却开到了夫子庙的宪兵司令部。岑德广、李圣五等人已先他而至了，几名汉奸相对苦笑，知道是被诱捕了。

监禁第一夜，汉奸们刚躺下，臭虫便象蚂蚁一样纷纷钻出来，爬得枕头上、被子上到处都是，简直无法入睡。以后几天，他们实在被咬得受不了，晚上便集体抓臭虫，白天再倒头睡觉。

被囚的最初几天，周佛海给的"定心丸"还起作用，汉奸们都已认为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也有人十分紧张，汪伪的"国府委员"溥侗就感到大难临头，几不欲生。溥侗是溥仪的堂兄，擅长京剧表演和书画诗词，和汪精卫有些诗词方面的交往，并无深交，年愈古稀，不久就被释放了。另外几个瘾君子，监狱里不能吸食鸦片，烟瘾一犯，便鬼哭狼嚎。

南京国民政府对汉奸们的家属都未采取什么行动，任其自由活动。这样，家属们送来不少食品和日用品，有了"外援"，汉奸们的日子还算好过。

一个星期之后，袁愈佺等人被用大卡车送到宁海路25号。这里原是汪伪特务机关关押共产党人和重庆国民党人的地方，是一个专用监狱，楼上、楼下都有监房。梅思平、岭德广、胡毓坤、汪翰章、袁愈佺五人关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其他人与他们一概隔绝。这里的条件比夫子庙宪兵学校要好得多，床是铁制的双人床。开始几天管得比较严，整天被锁在房间里，外面的消息一点都不通，每天只能外出活动很短一段时间，与家里的联系也中断了。白天监房的门不上锁，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也可以到一个大院子里去散步。他们互相见了面，总是会心地一笑，仿佛了出狱之日已不长了，心里暗暗称道周佛海说话算数。

宁海路25号的隔壁住着原汪伪实业部工业司司长王家骏一家。从他的房子里可以看到被囚的汉奸们的一举一动。他家的窗台，就成了汉奸们和家属见面、联系的地方，汉奸在囚室打手势，告诉家属需要什么，想吃什么。监里每个汉奸的家属轮流送饭，汉奸们一直吃得不错。

1945年10月间，陈公博从日本被解回南京，与袁愈佺等五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这里老鼠非常猖獗，白天也会窜进监房，当袁愈佺和胡毓坤各持拖鞋围攻老鼠时，陈公博总是缩在床上不敢下地，他自己说生平最怕老鼠。但是他被枪毙时，中外报纸都说他镇静自如，这就令人不解了。

牢房里几个人，都是汪伪政权的旧同事，有许多事情一起参与其中，现在关在一起，自然有好些话要说。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每个人如何参加汪伪政权。陈公博谈起了他屡次劝阻汪精卫组织政权不成，终于被陈璧君拖下水的情形。他拿出两首诗给别人看，一首是在离开东京都时给日本同僚的告别词，其中有"一笑飞回作楚囚"之句。另一首是飞机抵达南京上空的感触，诗云：

猎猎西风冷北门，钟山东望又黄昏。

只期国土酬知己，万劫归来不顾身。

袁愈佺说，他参加汪伪政权与顾宝衡有关。顾是他在日本的老同学，后在中央银行工作，袁在交通银行任职，两人关系较密切。顾由梅思平介绍参加汪伪政府后，又拉袁去参加。袁去见了一次汪精卫，之后就参加了汪伪政府的活动。

汉奸们在监狱里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报纸，从报纸上的舆论来看，他们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妙，因而将来各人命运如何，便成为一个最经常的话题。这六名汉奸多数是第一次从显贵到囚徒，因此，有的人表现得愤怒，有的人则灰心丧气，也有人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1945年10月底，国民党军统局负责审判汉奸的人陆续来到监狱，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起初他们十分紧张，审判官也显得一本正经。一般每晚单独提审一二个人。这时牢房没有往日轻松的气氛，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事情。过了不久，他们发现情况有好转。那些审讯官也不如开始时那么严厉，审讯时十分轻松，东一句西一句，问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给汉奸们一些纸，叫每个人自己在牢房里写自传和自白书。有一次袁愈佺被提审，到了法官的房间里，发现那位操苏北口音的法官竟坐在椅子上，双脚泡在水里，屋里一片水蒸气，还夹杂着难闻的味道。前后不到5分钟，那晚对袁的审讯就算完结了。袁回监房将这个滑稽的场面告诉其他人，他们也说有同样的经历。

在宁海路25号，汉奸们写下了一份份材料，调查也在不断进行。他们仍抱有幻幻想，也不紧张，始终认定周佛海是会保他们的。

1946年初春，陈公博等被解往苏州，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不久，南京高等法院成立，汉奸们又被转移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候审判。

南京老虎桥监狱是一座旧式的监狱，年久失修，四周的白墙经日晒雨淋已经变成灰色，不少地方已经剥落。牢房较特别，从一个门进去，有一个较长的过道，两旁各是一长排的小房间。每四个人住一间，小监房门并不上锁，大门紧闭，门外有人站岗。在过道内犯人可以自由活动。生活条件比宁海路差得多。第一天吃饭，每人发给一铅盒黄糙米做成的饭，上面加一小撮咸菜。汉奸们到了这里，

才第一次明白牢饭是怎么回事。晚上，由于没床，只得挤着睡在地板上，他们第一次真正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两三天后，袁愈佺的妻子花钱买通了典狱长，又花钱找医生开证明，说袁身体不好，这样每天允许送一次食品。

南京特别法庭一成立就开庭审判梅思平。判处他死刑，上诉后很快就被驳回。他是在老虎桥监狱的小院内被枪毙的。行刑那天上午，看守忽然将所有小牢门的门拴上，又叫梅思平出来提审。袁愈佺从小窗望去，只见梅穿上新长衫、新缎鞋，走过袁的牢门口低声说了"保重"二字，大约过了一刻钟，就听见枪声响了。不久，林柏生、丁默邨也相继被枪毙。

国民政府审判汉奸虽然很热闹，但判刑的轻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罪而定，而是看塞"条子"(黄金)的多少。有许多人是明显的重罪轻判。

为了使汉奸们能够减轻刑罚，他们的家属们四处活动，用钱打通各种关节。当时《惩治汉奸条例》虽然明文规定汉奸财产除留下一部份用以维持家属生活外，全部没收，但实际上没收财产时很少通过正常的手续，财产大部分落入私人的腰包，家里私藏的一些金银财宝，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那些宪兵、法官，用以笼络他们。袁愈佺的家属为了使他能减轻刑罚，多次设筵请客，只要打听到稍微有些名堂的人，即送钱送物，家中几乎弄到一贫如洗的地步。

1946年夏季，蒋介石终于下令军统局将周佛海送交法庭审讯。9月从重庆解来南京，最后被判为无期徒刑。周在老虎桥监狱跟袁愈佺等是邻居。

这时的老虎桥，已人满为患，不得不另造了两排新房，每人住一单间。袁愈佺在新盖的一人一间的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小铁床，一个马桶，一只小凳子，可以看书写字。门上的锁一般不上，可以自由走动。后来跟狱卒们混熟了，他们帮汉奸们从外面带烟、带酒甚至带鸦片进牢来。只要肯花钱，要吃要喝并不难。和家属见面是一月一次，家人把袁愈佺的胡琴也带进来，每天晚上，也住的"忠"字号监狱，还时不时琴声悠扬。

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审判持续了一年多，实际情况非常糟糕，有人常常自称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负责伪和平军的任援道，既没有被关押，也没有被判刑，逍遥法外。以后袁愈佺在香港碰到他，问他为什么如此逍遥，是不是因为与戴笠有关系。他笑着说：因为我脚底有油，滑得比你们快，你们相信周佛海，倒了霉。当时汪伪的各省省长大都被枪毙了，只有曾任安徽省长的高冠吾，因与重庆有关系，没被处死；另一个是河南省长鲍文樾，不但未被审判，反而被保护起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周佛海，先是被判死刑，因为周妻求到蒋介石的门下，后又被判无期徒刑，明显是重罪轻判。

(摘自《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冯玉祥珍藏的毛泽东名片的来历

冯玉祥生前一直珍藏着毛泽东给他的一张名片。现这张名片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这张名片的呢？这就得从冯玉祥和毛泽东重庆相逢谈起。

1945年8月，蒋介石接受政学系的献计，三次电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建国及民主进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冯玉祥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由衷地表示欢迎。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中共党员频繁接触。1926年，他访问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30年代初开始，冯研读了许多马列著作，深深赞同共产党的救国救民纲领。1933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八年抗战期间，冯玉祥始终不渝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他翘首企盼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冯玉祥鉴于环境，抱病不便前往，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到重庆后风尘未洗，立即去看望这位为抗日奔走呼号、为民主劳碌奔波的老将军。冯玉祥对毛、周、王仰慕已久，对于他们的登门拜望尤为感动，决定回拜他们。30日下午，他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等的临时住所——重庆桂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公馆，不意毛、周、王三人因事外出，但特地给冯玉祥留下各自的名片。毛泽东的名片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的。冯玉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背后分别写上"卅日下午四时住在张部长"(在毛的名片上写的是'治部长')公馆，并把这三张名片贴在当天的日记页中，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纪念。

9月1日，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集会，庆祝《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八周年。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孙科、覃理鸣、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妇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了出席，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等也参加了集会。宋庆龄身穿一身洁白的衣服，满面春色，当场致词。冯玉祥也受大家的欢迎讲了话，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共产党的友谊。会议气氛十分友好亲切，许多旧友重逢，感慨万千。

当晚，冯玉祥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成家赴宴。宴席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作东，宴请毛、周、王等，由冯玉祥和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畅谈起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后来，周恩

来又说到汉奸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溥仪他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讨论题目后,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三十四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指1917年讨伐张勋和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接着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列了出来。冯心情舒畅地说:"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散席后,冯随毛、周、王一起回到寓所。天黑路滑,不想毛泽东他们坐的那辆车掉到道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随员、司机都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他们着急的样子,冯笑着说:"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拉到自己的车上,一直把他们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康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了。

那一天冯玉祥夜不能眠。几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使他深切感到了中共对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诚意。于是,他乘兴连夜吟诗一首:

今天真快乐,
今天真欢欣。
楼上楼下人满座,
"干杯"、"干杯"不断声。
邵力子、孙哲生、郭沫若、覃理鸣,
彼得罗夫也来到,
还有天上飞来的毛先生。
我指中苏大旗开口道:
"这是总理三大政策之实行"。
覃理鸣不禁落下泪,
我的心中欢快苦乐一起临。
难道我们罪还没有受个够?
难道我们不能团结象一个人?
向着光明世界迈大步,
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与和平。
几十年来不喝酒,
今天破戒喝几巡。
愿中苏永远友好,
愿人类永不要再有战争。

(陈晓清)

张学良与蒋介石互"赠"礼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蒋软禁。抗战胜利后,张想:当年因"兵谏"蒋抗日而被囚禁,现在日本投降了,蒋该放自己了吧。但是蒋介石丝毫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张学良以为可能是蒋介石忘了这件事,便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托人把当年在欧洲考察时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给他的一块手表转赠给蒋介石,暗示蒋介石看一下时间,10年去了,你为何还不释放我?数日后,张学良彻底失望了,因为蒋介石托人把当年美国总统送他的钓鱼竿回赠给张学良,暗示,手表我已收到,也看过了,不过我没有忘记时间,现在还早着呢,军政方面没有你张学良的事,你还是去钓鱼打发时光吧。就这样,张学良一直被囚禁了半个多世纪。

(唐志摘自《海峡两岸》1993年第7期　作者廖武)

流行风

电影《气壮山河》、《血溅樱花》

《气壮山河》与《血溅樱花》是何非光编导的影片。前者描写青年军远征缅甸,进行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完成于1944年4月。后者叙述中日两对空军夫妇,在中日战争中不同的遭遇,将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作了强烈对照,暴露了侵略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深重灾难,称颂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崇高精神"。影片完成于1945年2月。

电影《警魂歌》

《警魂歌》是部歌颂国民党警察统治的反动影片。作者李士珍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剧本经蒋介石看后,手谕"中制"拍摄。它写一个中央警校毕业的新警察,推翻情杀说,侦破一起敌特谋杀案的故事。表现了新旧警察的矛盾,美化了国民党警察制度。影片由汤晓丹导演,完成后到1945年12月在重庆首映。

电影《还我故乡》

《还我故乡》——是这时期所拍四部影片中较好的一部,它坚持了抗战电影路线,艺术上也有着新的发展。由史东山编导,吴蔚云任摄影,陶金、钱千里、张翼、赵抒音等主演,影片描写华北某小县城沦陷后,居民纷纷逃往乡村。日军警卫队长神尾,伪装"日中亲善",发布繁荣城市公告,命伪县长招躲在乡间的绅士们回来。当地财主王相庭(陶金饰)因县城有其房产,又经伪县长拉拢,便不顾儿子王道元的劝告,而回县城当上了伪商会会长。不久,城内果然"繁荣"起来,贩卖敌货的商店林立,烟馆、赌场到处都有。这时,敌人也暴露出强占商店、腐化青年和勒索财物的凶恶面貌,使老百姓深受其苦。王相庭代表商界向神尾交涉,但毫无结果,反遭日军侮辱。在现实教育下,王相庭思想有了转变,派人送信乡间,请求游击队和抗日政权来解救城里居民,赶走日本侵略者。抗日县长接信后,就派人进城,并偷运大批枪支弹药,以武装爱国工人和市民,最后游击队来到,里应外合全歼敌人,而王相庭,为掩护游击队长和抗日的儿子,同来袭击的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搏斗,力尽而死。

小说《火》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第一部以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为背景,描绘了上海各阶层人民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品以刘波的活动为线索,通过描写女青年冯文淑到伤兵医院、青年救国团等地的活动,表现了爱国青年冲破反动家庭阻挠,积极投入救亡活动的情景和伤员们的爱国牺牲精神,歌颂了国民党部队中的一些官兵在上海市民爱国热情推动下,自发进行抗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第二部描写冯文淑等青年随战地服务团在大别山附近的活动情况,着重表现战地服务团内部各类青年们不同的思想性格以及他们渴望献身于祖国神圣抗战事业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和失败主义政策。第三部以1941年大后方昆明为背景,着重描写一个年已五十二岁的基督徒田惠世的形象。田惠世一心想以宗教来拯救人类的痛苦,但他的爱人类的心肠和抽象宣传抗战的文章在黑暗的现实面前都行不通。作品通过田惠世等人的思想苦闷,反映了国统区中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火》又称《抗战三部曲》,由于作者思想和生活的局限,在描写国统区爱国进步青年活动中未能表现党的影响,在写他们与工农关系时,片面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有所不足。

小说《困兽记》

作者沙汀,主要内容:

以1940年国统区某乡镇为背景,写一群知识分子在穷困和苦闷中挣扎奋斗而又无法自拔的生活情景。小说写一群小学教师因见前线回来的旧友章桐而重新焕发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当他们准备暑期演剧活动时却遭到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挠而归于失败。作品着重塑造了章桐、牛祚、田畴等三个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刚从晋南前线回来的章桐,满怀抗日热情回乡组织乡村戏剧活动,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工作,但他的行动立即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而加以审问和恐吓,因而得不到周围教师的支持。最后他决定到抗日前线延安。热情而又脆弱的田畴,由于婚后多子、贫穷,加以第三者的插入,使他失去了家庭幸福和生活理想,变得随遇而安,麻木不仁。埋头于乡村教育事业的牛祚,是一个头脑清醒、纯朴坚韧的老教师,他以韧性的战斗精神,正视黑暗的现实,给章桐等人以积极的影响。作品通过这三个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揭露了国统区政治的黑暗,并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问题。全篇虽有光明前景的暗示,但苦闷低沉的色调过于浓重,令人有重压之感。

歌曲《游击队员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丛林里,到处都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弟兄打起仗来真英勇,
哪怕敌人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踪和影。
让敌人乱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
敌人战线愈延长,我们的队伍愈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愈打愈坚强,日本的强盗一定走向灭亡,
看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

时　　间：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
地　　点：延安。
出席代表：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
党员人数：一百二十一万人。
通过事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章。

主席团：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林伯渠　彭德怀
康　生　陈　云　陈　毅　贺　龙　徐向前　高　岗
张闻天　彭　真　任弼时

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大会秘书长：任弼时
副秘书长：李富春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彭　真　林　彪　刘伯承　陈　毅　李富春　高　岗
林　枫　叶剑英　林伯渠　贺　龙　罗贵波　周士悌
聂荣臻　刘澜涛　薄一波　王从吾　朱　瑞　黄春圃
张鼎丞　刘　晓　陈铁铮　陈　光
主　任：彭　真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　彪
董必武　陈　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　高　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　生　彭　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　龙　陈　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陈绍禹　秦邦宪

候补中央委员：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　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　晓　谭　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　裕　王　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云　泽（乌兰夫）
赵振声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延安举行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党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　云
康　生　高　岗　彭　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
中央秘书长：任弼时
副秘书长：李富春

1.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　毅
聂荣臻　贺　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　彪　叶剑英
主　　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参谋长：彭德怀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程子华

2.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会议的十一人。

会议决定递补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

3.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六月九日，在北京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补选陈云为中央记书处书记。

4.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

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并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

王从吾　王维舟　吴溉之　李士英　帅孟奇　徐立清
马明方　高克林　高　扬　张鼎丞　董必武　刘锡五
刘澜涛　钱　瑛　谭　政

候补委员：

王维纲　王　翰　朱　明　李景膺　梁国斌　龚子荣

书　　记：董必武

副 书 记：刘澜涛　谭　政　王从吾　钱　瑛
　　　　　刘锡五

5.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北京召开七届五中全会。会议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6.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会议决定递补候补中央委员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变更情况

姓　名	始任职	在职时间	去　职
陈独秀	党的一大	1921 年 7 月至 1927 年 8 月	“八七”会议
瞿秋白	“八七”会议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 7 月	党的六大
向忠发	党的六大	1928 年 7 月至 1931 年 6 月	被　捕
秦邦宪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	1931 年 9 月至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
张闻天	遵义会议	1935 年 1 月至 1943 年 3 月	中共中央会议
毛泽东	中共中央会议	1943 年 3 月至 1976 年 9 月	病　逝

1945 年八路军战斗序列表

总　司　令　朱　德
副 总 司 令　彭德怀
总 参 谋 长　叶剑英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晋察冀军区

司令员
政　委　聂荣臻
副司令员　肖　克
副 政 委　程子华
　　　　　刘澜涛

冀晋军区

司 令 员　赵尔陆
政　　委　王　平
副司令员　孙　毅
　二分区司令员　曾　美
　　　政　委　张连奎
　三分区司令员　李　湘
　　　政　委　黄文明
　四分区司令员　马　龙
　　　政　委　丁莱夫
　五分区司令员　陈仿仁
　　　政　委　马天水

冀察军区

司令员　郭天民
政　委　刘道生
　一分区司令员　肖永棠
　　　政　委　杨士杰
　十一分区司令员　肖文玖
　　　政　委　杨鹏堂
　十二分区司令员　詹大南
　　　政　委　段苏权
　十三分区司令员　何孔彬
　　　政　委　吴　光

冀中军区

司令员　杨成武

政　委　林　铁
副司令　沙　克
副政委　李志民
六分区司令员　王先臣
政　委　邓可远
七分区司令员　于权申
政　委　张发春
八分区司令员　贾士珍
政　委　周　彪
九分区司令员　黄寿发
政　委　陈　鹏
十分区司令员　刘秉彦
政　委　旷伏兆

冀热辽军区

司令员兼政委　李远昌
副司令员　詹才芳
十四分区司令员　舒　行
政　委　李子光
十五分区司令员　赵文进
政　委　杨文翰
十六分区司令员　曾克林
政　委　徐　志
十七分区司令员　李雪瑞
政　委　李　文
十八分区司令员　赵文进
政　委　焦　土

冀绥军区

司令员　贺　龙
政　委　李井泉
副司令员　周士第
　　　　张宗逊
吕梁军区
司令员　张宗逊
政　委　罗贵波
副政委　解学恭
雁北军区
司令员　吕正操
政　委　高克林
副司令员　许光达
绥蒙军区
司令员　姚　喆
政　委　张达志
三五八旅旅长　黄新廷
政委　余秋里
独立旅　旅长　高士一
政委　朱辉照
骑兵旅　旅长　康建民
政委　朱子珍
一分区司令员　陶仁兴
二分区司令员　许光达
政　委　王　德
三分区司令员　杨嘉瑞
政　委　白　坚
四分区司令员　杨秀山
政　委　刘文珍
六分区司令员　孙超群
八分区司令员　王长江

晋冀鲁豫军区

司令员　刘伯承
政　委　邓小平
副司令员　滕代远
副政委　薄一波
太行纵队
司令员　陈锡联
一旅旅长　李成芳
政委　刘有光
二旅旅长　刘　忠
政委　张祖谅
河防支队司令员　韩　钧
政　委　刘聚奎
太岳纵队
司令员　陈　赓
三支队司令员　郑国仲
政　委　秦传厚
四支队司令员　马仲汉
政　委　赵兰田
五支队司令员　秦基伟
政　委　卢仁杰
六支队司令员　曾绍山
政　委　吴格成
太行军区
司令员　李　达
政　委　李雪峰
副司令员　王树声
副政委　黄　镇
一分区司令员　王近芳

政　委　郭　峰
二分区司令员　张国传
政　委　梁明德
三分区司令员　鲁瑞林
政　委　王一伦
四分区司令员　石志本
政　委　于一川
五分区司令员　韦　杰
政　委　陶鲁笳
六分区司令员　胡　震
政　委　何正文
七分区司令员　张延发
政　委　高　扬
八分区司令员　黄新友
政　委　刘　毅

太岳军区

司令员　谢富治
政　委　王鹤峰
一分区司令员　顾大川
政　委　薛　迅
二分区司令员　刘　忠
三分区司令员　刘金轩
政　委　刘尚志
四分区司令员　陈　赓
五分区司令员　孙定国
政　委　柴泽民

冀鲁豫军区

司令员　宋任穷
政　委　黄　敬
副司令员　王宏坤
杨　勇
一分区司令员　刘志远
政　委　邓子有
二分区司令员　杜义德
政　委　姚克裕
三分区司令员　高厚良
政　委　王幼平
四分区司令员　雷绍康
政　委　乔晓光
五分区司令员　牟海秀
政　委　陈登坤
六分区司令员　周发田
政　委　童启祥
七分区司令员　赵健民

政　委　许孟侠
八分区司令员　曾思玉
政　委　段君毅
九分区司令员　张国华
十分区司令员　赵基梅
政　委　刘　星
十一分区司令员　王秉璋
政　委　潘复生
水东分区司令员　余克勤
政　委　袁　振

山东军区

司令员、政委　罗荣桓
副政委　黎　玉

鲁中军区

司令员　王建安
政　委　罗舜初
一分区司令员　廖容标
政　委　林乎加
二分区司令员　吴瑞林
政　委　王一平
三分区司令员　封振武
政　委　董　琰
四分区司令员　孙维先
政　委　霍士廉
五分区司令员　陈　奇
政　委　李伯秋

鲁南军区

司令员　张光中
政　委　王麓水
副司令员　万春圃
一分区司令员　王吉文
政　委　杨士法
二分区司令员　贾耀祥
政　委　张　雄
三分区司令员　胡大荣
政　委　李　青
运河支队支队长　胡大勋
政　委　郑　平

滨海军区

司令员　陈士榘
政　委　唐　亮
副司令员　万　毅
一分区司令员　梁兴初

政　委　刘西元
二分区司令员　罗华生
政　委　谷　牧
三分区司令员　赵　杰
政　委　田海山
滨海支队支队长　万　毅
政　委　王维平

胶东军区

司令员　许世友
政　委　林　浩
副司令员　吴克华
副司令员　袁仲贤
一分区司令员　刘　涌
政　委　梁缉卿
二分区司令员　孙瑞夫
政　委　刘浩天
三分区司令员　陈华堂
政　委　吕明仁
四分区司令员　贾若瑜
政　委　廖海光
中海军分区司令员　聂凤智
政　委　刘仲华

渤海军区

司令员　杨国夫
政　委　景晓村
副司令员　龙书金
副司令员　袁也烈
一分区司令员　傅继泽
政　委　陈　德
二分区司令员　龙书金(兼)
政　委　曾旭清
三分区司令员　刘贤权
政　委　李广文
四分区司令员　王光祥
政　委　徐斌洲
五分区司令员　赵寄舟
政　委　岳拙元
六分区司令员　许云轩
政　委　李曼村
独立第一旅旅长　王　道
独立第二旅旅长　莫正民
独立第三旅旅长　张希贤
独立第四旅旅长　韩寿臣

陕甘宁留守兵团

政　委　高　岗
副司令员　徐向前
副司令员　王世泰
副政委　谭　政
三八五旅旅长　王维舟
警一旅旅　长　高绵纯
政　委　张德生
警三旅旅　长　贺晋年
副旅长　吴岱峰
新四旅旅　长　张贤约
政　委　徐立清
教导旅旅长　罗元发
政　委　饶正锡

1945 年 7 月新四军战斗序列表

代军长　陈　毅
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饶漱石
副军长　张云逸
参谋长　赖传珠

苏浙军区

司令员　粟　裕　　政治委员　谭震林(未到任)
副司令员　叶　飞　　参谋长　刘先胜
政治部主任　钟期光
第一纵队　司令员　王必成
政　委　江渭清
第二纵队　司令员　何克希
政　委　谭启龙
副司令员　张翼翔
第三纵队　司令员　陶　勇
政　委　阮英平
第四纵队　司令员　廖政国
政　委　韦一平
第一分区　司令员　钟国楚
政　委　陈　光
第二分区　司令员　梅嘉生
政　委　陈立平

苏中军区

司令员　管文蔚　　政治委员　陈丕显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张藩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姬鹏飞
教导旅旅长　刘飞
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　黄逸峰
　　政委　陈时夫
第三军分区　司令员　陈玉生
　　政委　李干辉
第四军分区　司令员　卢胜
　　政委　姬鹏飞(兼)
第五军分区　司令员　韦永义
　　政委
第六军分区　司令员　包厚昌
　　政委　钱敏

第二师兼淮南军区

师长　罗炳辉　　政治委员　谭震林
参谋长　韩振纪　　政治部主任　肖望东
副参谋长　詹化田　　政治部副主任　余立金
第四旅　旅长　梁从学
　　副旅长　朱绍清
　　副政委　高志荣
第五旅　旅长　成钧
　　政委　赵启民
第六旅兼路西军分区　旅长　陈庆先
　　政委　黄岩
路东军分区　司令员　罗占云
　　政委　李世农

第三师兼苏北军区

师长兼政委　黄克诚　　参谋长　洪学智
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
第七旅　旅长　彭明治
　　副旅长　胡炳云
　　政委　郭成柱
第八旅兼盐阜军分区　旅长　张天云
　　政委　李雪三
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　旅长　刘震
　　政委　金明
独立旅　旅长　覃健

第四师兼淮北军区

师长　张爱萍　　政治委员　邓子恢
副师长　韦国清　　参谋长　张震
政治部主任　吴芝圃
第九旅　旅长　滕海清
　　政委　康志强
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　张震球
　　副司令员　饶子健
第十一旅兼第二军分区　旅长　张震(兼)
　　副旅长　姚运良
　　政委　赖毅
第三军分区　司令员　赵汇川
　　政委　张太生

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

师长兼政委　李先念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任质斌
参谋长　文建武　　政治部副主任　张树才
第十三旅　旅长　周志坚
　　政委　周志刚
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　吴诚忠
　　政委　周季芳
第二军分区　司令员　王海山
　　政委　文敏生
第三军分区　司令员　贺炳炎
　　政委　廖汉生
第四军分区　司令员　韩东山
　　政委　夏忠武
第五军分区　司令员　吴世安
　　政委　郑绍文
第六军分区　司令员　陈刚
　　政委　方正平
豫中军分区　司令员　陈先瑞
　　政委　栗在山
鄂皖军分区　司令员兼政委　黄世德

第七师兼皖江军区

师长　谭希林　　政治委员　曾希圣
参谋长　孙仲德　　政治部主任　王集成
副参谋长　林维先
第十九旅　旅长　林维先(兼)
　　政委　黄火星

含和支队兼含和军分区　支队长　孙仲德(兼)
皖南支队兼皖南军分区　支队长　梁金华
　　　　　　　　　　　政　委　黄耀南

1945 年华南抗日游击队战斗序列表

广东游击队东江纵队(1943 年 12 月成立)司 令 员 曾　生
政　　委　林　平(也有叫尹林平)
副司令员　王作尧
兼参谋长
副参谋长　梁鸿钧
政治部主任　杨康华
广东游击队珠江纵队(1944 年 12 月成立)
司 令 员　林锵云
政　　委　梁　嘉
副司令员　谢　彬
参 谋 长　周伯鸣
政治部主任　刘向东
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1944 年春成立)
司令员兼政委　冯白驹
副 司 令 员　庄　田
参　谋　长　李振亚
政治部主任　王业喜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1945 年 7 月成立)
纵队负责人　林美南　谢育才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1944 年 11 月成立)
司 令 员　梁鸿钧　　政　　委　罗范群
副司令员　谢立全　　政治部主任　刘田夫
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1944 年 11 月成立,1945 年 5 月改称南路人民解放军)
司令员兼政委　周　楠
参　谋　长　李筱峰
政治部主任　温焯会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兵力逐渐增长统计

部队／兵力／年别	八路军(人)	新四军(人)	华南抗日游击队(人)	合计(人)
1937	8000	12000		92000
1938	156700	25000		181700
1939	27000	50000		320000
1940	400000	100000		50000
1941	305000	135000		440000
1942	340000	110960		450960
1943	339000	125892	4500	469692
1944	507000	251393	20730	779743
1945	1028893	268581	20820	1318294

注:一、各解放区民兵统计:
　　1944 年　1685384 人
　　1945 年　2687698 人
二、本表所列数字均以每年年底准,抗战开始时,红军总数 32000 人日本投降时,我军总数为 1270000 人。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战绩表

(1937 年 9 月—1945 年 10 月)

作战总数		125165 次		
敌伪兵力损失	数目／敌伪军／项别	敌军	伪军	合计
	毙伤	520463 人	490130 人	110593 人
	俘虏	6213 人	512933 人	519146 人
	投诚	746 人	183632 人	134378 人
	合计	527422 人	1186695 人	1714117 人

主要缴获	各种炮	1952门
	机　枪	11895挺
	长短枪	682831支
	汽车、摩托车	347辆
	马　匹	30448匹
击毁	飞　机	57架
	坦　克	69辆
	汽车、摩托车	6080辆
	装甲车	164辆
	机　车	301辆
攻克击	县　城	364座
	据　点	12690个
解放	人　口	125500000人
	土　地	1048000平方公里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抗击敌伪军兵力统计

（1937年7月～1945年3月）

年别	全部侵华敌军（人）	我抗击敌军兵力（人）	占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比	我抗击伪军兵力（人）	占全部伪军的百分比
1937	50000				
1938	680000	400000	58.8%	78000	100%
1939	860000	540000	62%	145000	100%
1940	800000	470000	58%	225000	100%
1941	610000	460000	75%	343000	100%
1942	550000	332000	63%	555000	100%
1943	600000	350000	58%	735000	90%
1944	730000	468000	64%	782000	95%
1945	1088500	758700	69%	955782	95%

注：一、我军于1937年9月出师华兹，因那时敌军主要是对付国民党军。故未作抗击比例统计。

二、全部侵华敌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个地区的敌军。

三、我抗击的伪军包播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地区的伪军。

日本停战诏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发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家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挥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御名　御玺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各国务大臣副署

（原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收（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及在对日作战中彼此使用，以迄日本无条投降为止；又为两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利益，对于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之目的，表示坚定不移之合作之志愿，并根据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共同宣言，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签字之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国际组织宪章所宣布之原则，决定鉴订本条约，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斗争中，彼此互相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第二条　缔约国担任不久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第三条　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

缔约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事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该作战之缔约国一切军事及其他之援助与支持。

本条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

第四条　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五条　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和作。

第六条　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八条　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

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倘缔约国任何一方不于期满前一年通知愿予废止，则本条约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得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本条约之效力。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34年8月14日即1945年8月14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持两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王世杰（签各）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莫洛托夫（签名）

（选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于重庆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见青天白日了。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须知我们战胜的涵义，决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胜仗的一点上。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著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他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

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同胞们！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的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我说这一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布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著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做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选自《先总统蒋公正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编）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6日　蒋介石与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商谈同中共继续谈判的方针，决定由赫尔利偕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进行两党商谈，以表"诚意"。

1月8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本月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选任陈庆云为海外部长、魏怀为国府委员。

1月8日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府向蒋介石呈递国书。晚上，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赫尔利。

1月18日　贵州省政府改组。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谭克敏、杨公达、傅启学、谢耿民分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长，李寰为秘书长；原任主席吴鼎昌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长谭克敏、周诒春、欧元怀、叶纪元及秘书长郑道儒均免职。

1月18日　意外相加斯巴莱在国务会议上宣布，以前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所订关于意国支持日本在华政策的一切条约都归无效；并希望驻华大使将能解决一切争论，恢复意中两国的传统友谊。次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宣布废除与日本政府的同盟关系。

1月19日　英援华委员会主席费雷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对中国人民的英勇与牺牲表示钦敬，并相信统民主与自由之中国必能对世界之文明贡献其智能。

1月31日　王世杰与周恩来在重庆谈判。王世杰主张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政府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但不接受结束一党政治。周恩来表示不赞成成立整编委员会，主张改组军委会，坚持结束一党统

治。

2月10日　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赫尔利与周恩来在重庆继续谈判。周恩来提议在召集党派会议前，改善环境，先实现放人等四项主张。赫尔利提议发表共同声明，周恩来拒之。

2月20日　国民政府举行国府委员会议，居正、刘哲、胡毅生、钮永建、叶楚伧、冯玉祥、宋子文、覃振、李文范、邹鲁、李烈钧、魏怀、孙科、于右任出席，蒋介石主持并报告国府一年来公布施行之法律命令及重要施政情况。会后，各委员就当前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2月23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社会部长谷正纲作社会行政报告，称今年之中心工作是组训和普遍健全民众团体，倡导改进社会救济事业，充实合作业务，切实管制人力与推行义务劳动，策划收复地区一切社会设施等5项。

3月1日　宪政实施协进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长蒋介石出席并发表演说，重申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

3月5日　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由美国政府出面邀请40个国家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商订国际组织宪章。此后又邀请黎巴嫩与叙利亚两国。共计有42个国家被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

3月29日　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

4月22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通饬全国各地所有机关部队学校，以及社会工商各业，水陆空交通通讯各方面，均应于5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实行"夏时制"一律将时间提早一小时，盟邦驻在中国之各机关亦同样适用。

4月26日　国民政府令《惩冶盗匪条例》施行期间自期满之日起展限一年。

5月11日　国民党六全大会举行第七次大会，翁文灏作经济报告，说明抗战八年来政府对于经济建设之措施；并论国营事业的发展，1944年国营事业产品达172亿元；继论民营事业状况，谓民营事业之痛苦，为运输困难、资金缺乏与器材补充不易等项，为此政府由国家银行给予贷款，自1938年迄今，贷款总额超出民间所出之资本。

5月22日　蒋介石在重庆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谓中共意在消灭国民党，非使中共服从军令政令，决难与谋。

5月31日　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议：(一)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二)选任翁文灏为国民政府委员，于右任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旋即闭幕。

6月26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谈宋子文赴苏商订中苏条约事；并宣示我国对于此事之严正立场。

6月28日　蒋介石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外国记者并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抗战，其在军事方面之最终目标，系欲使日本全面溃败而向盟方作无条件投降；对于盟军与中国之合作情形，甚表满意；对旧金山会议的成就表示欣慰。

6月29日　国民政府令公布：《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及《省参议员选举条例》，均写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

6月30日　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当晚晤斯大林，商谈中苏条约问题。

7月25日　国民政府特任命俞鸿钧兼中央银行总裁，原任孔祥熙免职；宋子文兼领四联总处副主席，原任孔祥熙免职。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在柏林发表。《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苏联对日本宣战后，也于8月8日在公告上签字。

8月9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对日宣战表示佩慰。并称："余深信已陷绝境而仍顽强抵抗之日本，必因贵国压倒势力之加入，迅速完全崩溃，而东亚之永久和平必能早日奠定也。"

8月11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到蒋介石、吴稚晖、居正、于右任、孙科、叶楚伧、戴季陶、邹鲁、丁惟汾、张继、林云陔、邵力子、程潜、陈诚、陈其采、陈布雷、吴铁城、程天放、陈立夫等，讨论日本请求投降问题。

8月14日　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分别由王世杰、莫洛托夫代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附件。

8月15日　同盟国经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裕仁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宣告无条件投降，于是中、美、英、苏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同时，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　国民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菲律宾，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19日，徐永昌率领之中国代表团抵达马尼拉。

8月24日　国民政府隆重举行《联合国宪章批准

书》签署典礼，蒋介石亲莅签署批准书，王世杰副署。

8月29日　蒋介石为国民党谈判代表规定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8月31日　国民政府颁行《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综理一切；在长春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并将东北三省重划为九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同日，又颁行《台湾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

9月2日　日本投降书签字。上午9时，盟军受降典礼在东京湾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首先由麦克阿瑟致词。接着，日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裕仁及日本政府，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先后签署了投降书。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后，美国、中国、联合王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九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代表为徐永昌上将。全部典礼约30分钟即告完毕。

9月17日　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张群、吴国桢出席作陪。宴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及赫尔利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赫尔利提出国共双方军队以4∶1的比例进行缩编。

10月10日　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0月28日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谭平山主持，到会的有全国18个省市的代表和会员。大会制定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总章》，《通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等文件，选举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等为中央常务干事。

11月3日　国民政府对东北同胞发表布告，表示将努力安定地方秩序，建立政治制度，扶植经济活力，治标治本，并顾兼等。

11月9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商讨制止冲突、挽救危局办法，建议政府提前召开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共同讨论国家大计，集中各方意见，合理解决国事。

1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决议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

12月1日　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和民政厅长李宗黄派军警特务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罢课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师院女生潘琰，师院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4人，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

12月11日　蒋介石飞抵北平，巡视与慰问北方同胞；并布置进攻热河解放区及冀热辽边区作战，企图切断东北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使东北解放区陷于孤立。

12月12日　国民政府特派沈鸿烈前往冀、热、察、平津、青各省市考察接收事宜；派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前往东北各省，帮同行营办理有关盟旗事宜。

12月16日　蒋介石在北平太和殿召集北平市大中学生18000余人训话，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恢复民族伦理；(二)要研读《中国之命运》；(三)要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下亲爱团结。同日，蒋介石在东交民巷美军操场检阅在平美海军陆战队，对美军协同国军接受敌伪投降，备加赞扬。并授勋有功美军官兵。

外　交

1月9日　法驻华大使贝志高、比利时统华德尔福向蒋介石呈递国书，贝志高并将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将军所赠"荣光大勋章"献予蒋介石。

1月17日　国民政府调任原驻土耳其公使邹尚友为驻阿富汗公使。

2月6日　法驻华大使馆文化联络官桂博离渝返法；行前曾与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商定中法交换教授、留学生及文化交流工作：(一)中国派遣500名学生赴法留学，法国派50名学生来华留学；(二)中法互派5名教授讲学，来华之法教授讲授物理、化学及法文，中国赴法教授讲授汉学及中文；(三)文化交流工作由中法科学合作会沟通。

3月19日　国民政府特任董霖为驻荷兰国大使，原任金问泗免职；著金问泗专任驻比利时国大使，仍暂兼驻挪威国大使暨驻捷克斯洛伐克国大使，并兼代驻波兰国公使；任梁龙为驻瑞士国公使，原任胡世泽免职，任吴泽湘为驻智利国公使，原任张彭春免职；任胡庶华为国立湖南大学校长。

3月21日　豫西鄂北会战开始。日军集结第三十九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第六十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并骑兵第四旅团等部共7万人，战车百余辆，于是日分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西峡口进犯；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及南阳、老河口守军奋起抵抗。

4月5日　宋子文兼外交部长与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在重庆签订《中瑞关于取消瑞典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

特权条约》。

5月5日　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团向旧金山会议提交《关于顿巴敦建议案之若干联合修正案》(即《四国修正案》)。此项修正案经会议讨论后获得通过。

5月8日　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蒋介石呈递国书。彼得罗夫致颂词，表示愿尽力发展及巩固中苏间善邻关系。蒋介石致答词，对抗战期间苏联所予我国极大之援助表示感谢。

5月12日　蒋介石为庆祝欧战胜利结束，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盟邦使节及各国驻华武官，并邀各院部会首长作陪，共700余人出席。席间，蒋介石致词赞扬英苏美功绩，并深信在不久之将来日本定必遭逢与希特勒德国相同之命运。

5月20日　蒋介石欢宴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使馆官员，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吴铁城、吴鼎昌、王世杰、邵力子、吴忠信、钱大钧等出席作陪。

5月25日　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为互换《中比条约》批准本全权代表。

5月29日　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在伦敦签订《关于荷兰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事件条约》。

6月1日　中国政府与比利时政府于1943年10月20日签订之《中比新约》，业经双方批准，是日在重庆互换批准约本，该约于互换后立即生效。

6月12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反对苏联租借旅顺、大连及外蒙古独立。

7月4日　蒋介石特电杜鲁门祝贺美国国庆。国民外交协会及中美文化协会等团体亦致电杜鲁门祝贺。重庆美使馆举行招待会，国民政府官员及各国使节应邀参加。重庆市广播电台播送特别节目，各影剧院放映有纪念意义的中美两国影片表示祝贺。

7月7日　法国朝野名流及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中法协会于是日在巴黎成立，其宗旨是增进中法邦交，沟通两国文化，赫礼欧任会长，郎之万、伯希和、穆岱任副会长。

7月10日　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易斯兰将军向蒋介石呈递国书，并代表墨西哥政府赠送阿芝特克雄鹰勋章一枚。

8月1日　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到部视事。下午，对外籍记者谈我国外交政策，略谓：中国将尽其所有力量以求联合国机构早日成立，并且得到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并将继续以全力与英美法合作。关于对日政策，中国并不采取复仇态度，但凡为维护公道及保障安全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必须完全求其实现。

8月18日　中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分别由吴国桢、戴立堂代表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中法两国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专约规定将广州湾租借地完全交还中国，规定签字后立即生效。

8月25日　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分别批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并于27日全文公布。

8月27日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晤斯大林，请发表一尊重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声明。斯氏允诺，并谓东北尚无中共游击部队，望国民政府不久即派军至东北接管。

8月30日　国民政府特派驻墨西哥国大使冯执正为互换《中国墨西哥友好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派兼驻多米尼加国公使李迪俊为互换《中国多米尼加友好条约附加条款》批准约本全权代表。

9月11日　五国外长会议在伦敦召开，中国外长王世杰、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英外相贝文、苏外长莫洛托夫、法外长皮杜尔均到会。贝文任主席，会期定两周，讨论国际形势，并起草对前轴心国之和约。会议程序与波茨坦会议大致相同，每日晨间由各国代表自行集议，下午五国外长会商。10月2日，会议无结果而散，亦未发表公报。

10月17日　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一)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应作苏军的战利；(二)伪满洲国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三)日本和伪满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中、苏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等要求。

10月18日　蒋介石在重庆与苏大使彼得罗夫商谈国民党军登陆大连问题，并愿借苏船运兵，请其报告斯大林。

10月24日　美、英、苏、中、法五大国和其他24个国家都将《联合国宪章批准书》交存美国政府，《联合国宪章》从是日起开始生效。联合国组织正式成立。

10月25日　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遣返日人联合会议，决定使用中国的秦皇岛、上海、青岛、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连云港、雷州、三亚、汕头及越南的海防等港口，遣返日俘日侨。

11月19日　外交部答复苏联大使的照会，提出接收东北应重新拟订具体办法，经双方同意后实行。

11月26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表示接受苏方的建议，立刻派代表前往长春，恢复谈判。

12月5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荷新约》在重庆互换批准约本。

军　事

1月2日　国民政府兵役部长鹿钟麟为改革役政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四大方针：(一)实行三平原则；(二)澄清兵役积弊；(三)改善新兵生活；(四)切实优待征属；以及三点要求：(一)对士兵以父兄之待子弟，严禁虐待；(二)饷物及时发放，不得克扣；(三)实惠征属，违则军

法严惩。

1月5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在东京向大本营提出中国派遣军今后作战之指导方案，并说明进攻四川计划。

1月15日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三十师及新三十八师一团在空军、炮兵和战车火力支援下，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是日突入南坎，后续部队陆续突入市区，经激烈巷战，至午全部占领南坎，日军残部向腊戍方向溃逃。此役毙日军1780人，俘获12人，缴获机枪15挺，步枪560支，火炮12门。

1月27日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克复南坎后乘胜猛攻，16日以新三十八师主力沿芒友公路进击、新三十理由主力围歼老龙山地区之敌，经10余日激战，遂于是日全部攻占芒友。

1月28日　中、美两军在滇西畹町举行会师典礼，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出席并检阅各部队。

3月8日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及新三十师一团分三路向缅北重镇腊戍日军进击，经约50余日之激烈战斗，于是日冲入市区，并将日军歼灭，完全克复腊戍。

3月15日　驻大同日军派兵200余名至灵邱县城，将城内伪军200余名全部缴械。伪军自感不安，灵邱城南波头、东张庄等据点伪军45名，于17、18两日向八路军投诚。

3月30日　中国驻印军第六军第五十师一部在缅北乔梅与英印军会师。至此，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胜利结束。缅北滇西作战，自1943年12月至是月底，为时一年余，中国军队共俘获及击毙日军25120人，中国军队阵亡31443人，负伤35948人。

4月1日　蒋介石以守南阳的黄樵松师长、守老河口的汪匣锋师长率所部官兵坚守名城，迭挫敌气，战果丰硕，是日传令嘉奖。

4月8日　日军攻占老河口。3月26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进至老河口、光化附近。次日，猛攻老河口，占领了老河口机场，随后得到日军第一一五师团增援，于是日攻占老河口。

4月9日　湘西会战开始。日军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的交通，以第二十军指挥第一一六、第四十七、第三十四、第六十八师团等部，于是日由益阳、邵阳、安东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中国陆军王耀武第四方面军部队奋起抵抗。

6月6日　为解除桂越边境威协，我国军队攻入越边占领重庆府，日残敌向高平方向退去。同日，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第四六六团攻占广西明江（今属宁明县）。

6月7日　湘西会战结束。第四、第三方面军及第十集团军，在中美空军全力支援下，于是日将日军所进占湘西地区全部收复，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是役日军遭沉重打击，伤亡达2.4万余人。

7月2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颁发反攻广州计划，其方针为“以打通广州海口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并牵制越北之日军，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

7月24日　第一五六师第四六六团协同地方团队再攻凭祥，日军续向镇南关撤退，我军跟踪追击，于是日克复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并将军驱出国境之外。

7月31日　蒋介石、宋子文在重庆与魏德迈会谈，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即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军占领华北各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军队能够控制之前，扼守战略要地。

8月21日　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收复湘南东安，同时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追击队亦收复零陵。此时日本已宣布投降，战斗遂告终止。

8月25日　中国陆军总部发布《各部队分向各地受降地区重要城市挺进的命令》，并制定大规模军队调运计划。此计划是运用海空以及内河和铁路运输力量，在美国海军第七、十三舰队以及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将远在内地之四川、云南、滇缅边境的26个中央军（其中13个美械军计39个美械师）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执行受降任务。

9月1日　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

9月23日　英太平洋舰队司令福拉塞到渝晤蒋介石。次日，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亦到渝晤蒋介石。

10月16日　国民政府改组原“昆明防守司令部”，组成“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首先调其所属十三军、五十二军转运东北。

11月11日　复员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张治中、张群、顾祝同、阎锡山、刘峙、孙蔚如、卢汉、汤恩伯等军委各部会长官及行营战区长官等出席。蒋介石到会致训词。何应钦报告中国陆军总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并对今后整军工作有所指示。

12月10日　国民政府特派俞鸿钧为议订中苏关于苏国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之财政事项协定全权代表。旋俞鸿钧与苏大使彼得罗夫签订财政协定，允东北苏军发行红军票，将来由中国兑换收回，其损失归日本赔偿。

经　济

1 月 13 日　中国国际经济协会在重庆举行讲演会，孙科作《我国战后之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讲演，略称：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原则是迅速求和工业化，因此不能完全采用英美和苏联的经济制度，应建立自己的三民主义经济建设制度。

1 月 16 日　财政部长愈鸿钧就大户献金办法对采访记者谈，此次政府为改善士兵待遇，发起全国大户献金运动，全国献金数目以达到国币 200 亿元为目标，由本年 1 月开始收集，3 月底办竣。

1 月 23 日　行政院召开临时会议，通过调整税制简化机构办法：(一)取消茶叶、竹木、皮毛、磁陶、纸箔、麦粉、水泥、火酒、饮料品统税；(二)全部取消棉药、夏布、植物油、药材等战时消耗税；(三)停办盐、卷烟、火柴专卖，改行征税；(四)裁撤缉私署、海关监督、海关内地卡和公债劝募委员会等。

2 月 1 日　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于上月 31 日撤销，从是日起中央筹募公债由财政部公债司办理，地方筹募公债由省市财政厅局负责。

2 月 5 日　美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在华盛顿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借物资运输方案》，计划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在租借法案下指拨 15000 辆卡车在中国使用，并完成由加尔各答经由缅甸到中国的油管。

2 月 11 日　经济部专利主管部分负责人对记者谈，自 1928 年 1 月至 1944 年 12 月底止，全中呈请专利 1188 件，经审查准予专利者计 434 件。1944 年全年申请专利者凡 247 件，审查准予专利者共 94 件。

2 月 20 日　国民政府决定加强金融管制办法：(一)废止沦陷区内移银行办法；(二)各商业银行绝对不准在任何地方增设分支机构；(三)加强对商业银行、钱庄之检查与监督，凡不遵守法令者决予严格处分或勒令停业。

2 月 22 日　中国合作事业协进会召开会员大会，决议创办《合作日报》，并建议中央确立合作经济制度及从速设立中央合作金库。

3 月 1 日　中国人事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资本 3000 万元，其中一半系四行及中央信托局投资，王晓籁任总经理。

3 月 9 日　行政院举行临时会议，检讨本年度各机关工作计划及本年度国家总预算，并决定裁撤国家总动员会议、战时货运管理局、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等 30 余个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同日，行政院决定自即日起盐税每斤增 50 元。

3 月 23 日　全国工业协会税制研究小组在重庆开会，吴羹梅、章乃器、潘序伦等出席，讨论简化利得税问题，并向政府提出建议书，要求税额规定应当合理，要分别行商坐商和工商业的不同，由各业将应纳税额分配各单位。

3 月 28 日　财政部宣布：自 3 月 29 日起，出售黄金价格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折价，改为每两 3.5 万元。

4 月 6 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会议，通过陈博生、钱公来等 16 人所提黄金提价消息透漏案，请政府彻查。原案谓此次黄金提价命令系至 28 日下午 5 时以后送达各银行，而 28 日下午出售之数量竟达 3 万余两之巨，显有舞弊之情事，建议政府彻查严惩。

4 月 7 日　财政部就提价前夕黄金存款舞弊事发表公告，拟具三项处理办法：一、请政府派员彻查 3 月 28 日黄金存款；二、本部会同四联总处派员彻查经办人员舞弊情形；三、凡于 3 月 28 日以转帐申请书抵充现款及以一本票或一支票化名多户分存之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一律无效。

5 月 1 日　农林部向各省农业主管机关传达《1945 年度各省棉花增产实施计划大纲》，指令本年拟于后方陕、川、豫、鄂、湘、赣、黔、桂、滇、康、甘、宁、闽、新、晋 16 省继续扩充棉田面积 158 万亩，预计最低限度增产皮棉 49.51 万市担，并于云南省扩大推广木棉 10 万市亩。

6 月 11 日　粮食部长徐堪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粮政，称 1944 年度征粮，最后定案数额为谷麦 6424 万市石，截至上月底止，据各省表报到部者，实收到 5500 余万市石，约占总额的 84%强；并称 1944 年度全国军粮需要量约当全部征粮定额的三分之二。

6 月 16 日　中央银行设立外汇审核委员会，办理原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工作，主任委员会由该行总裁孔祥熙兼任。

8 月 22 日　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就收复区工矿事业之处理问题发表声明，谓收复各区工矿事业，已由中央银行规定办法，分区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监督接收。

8 月 26 日　重庆市百货粮价相继跌落。是日开盘价市黄金均 88000 元。美钞价竟日盘旋于 1200 至 1300 元之间。桐油批发价虽再跌至每百市斤 3 万元，然零售价每市仍为 600 至 700 元。菜油零售价每市斤为 500 元。百货零售价近日已开始跌落。粮价亦跌，尤以杂粮价格跌落甚巨。

9 月 11 日　重庆中国兴业公司设有炼铁、炼钢、机械、窑泥等部，规模宏大，原有 4000 工人近因胜利后战时生产局停止购货，生产不振，现只剩下 2000 多工人，是日资方宣布炼铁厂停办，致使 400 多工人失业。窑泥厂亦决定于月底停工，到时又将有 500 多工人失业。

9 月 18 日　伪中央储备银行至是日发行伪中央储备券 40900 亿元，而现仅存黄金 50.3 万两、白银 300 余万两。如依沪市金价 4 万元折算，其存金约合法币 200 亿

元,因而伪币与法币的比率是200∶1。

9月20日　1944年度田赋征实征借,至是日止已征得57368387石,占总赋额十分之九弱。其中已征足者有福建、河南、绥远、宁夏4省。四川省已征得96%,重庆市已征得66%。陕、湘、、鄂3省赋棉共征得32256担,占总赋额的61%。

9月27日　财政部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和《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准以200元换取法币1元。其他伪钞收换将陆续规定办法。

9月29日　财政部通电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准予战前盟国有各地原设之外商银行先行复业,一面依照定章补办注册。

10月1日　农业推广委员会及陪都农场互助会等23个团体,在重庆合作大会堂举行联谊会。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到会发表谈话称:战后我国仍以工业建设计划来从事以农立国。过去我国虽以农立国自称,然1938年海贸易记录入超8亿元,其中粮食一项即占二分之一,沿海一带皆赖洋米补国米之不足,故今后提倡农业一事甚为迫切。

10月12日　宋子文在上海中央银行召集沪军政首长暨工商界领袖举行重要会议,除听取各军政首长报告接收收复区敌伪机构及物资之详情外,并商讨沪工厂复业及交通恢复等问题。

10月13日　宋子文在上海对各接收人员指示接收工作,其要点为:一、业已接收者,须由接收机关将接收所得之物资即速加以整理;二、尚未接收者应迅速前往接收;三、整理后之各企业应迅速恢复生产。

10月29日　上海中央银行公布《收换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办法》,定于11月1日开始收换,第一个月先兑千元以上之券,每人每次最高额国币5万元。

11月1日　财政部派陈果夫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原任孔祥熙免职;李叔明为总经理,原任顾翊群免职。是日,陈果夫、李叔明到重庆中国农行视事。

11月6日　翁文灏接见工业界代表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商谈有关工业诸问题。翁氏表示,前此工业界对挽救当前工业危机、协调劳资纠纷、接收敌伪厂矿及今后工业建设诸建设,已山行政院会议提出讨论,短期内可有具体决定。至工业界于5日上呈蒋介石之各项意见,蒋介石亦已交由行政院商讨办理。

11月12日　东北银行在沈阳成立,叶季壮任总经理。该行属辽宁省民主政府,在东北各地共设18个分行,发行东北地方法币1元券、5元券、10元券3种,与伪满币比价为1∶10,通过东北全境。

11月21日　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长江三峡开发合约》。旋资源委员会组织"三峡水力发电计划研究委员会",主持三峡开发事宜。

11月22日　财政部规定法币1元合伪联银券5元,是日起实特并定期收换。

11月27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取消战时生产局与战时运输管理局,并通过设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案。

12月20日　财政部驻东北财政金融特派员陈公亮在请求接收东北财政金融办法的签呈中透露东北流通券印制情况:1元券1亿元,5元及10元券各2亿元,50元券5亿元,100元券100亿元。伪满币暂准与流通券等价使用。

12月21日　交通部与泛美航空公司订立合同,合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从管理及监督、财务、经营、驾驶员、领航员、无线电报员、机械员训练等,全被美国控制。

12月22日　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开业,东北流通券发行。东北流通券与伪满币同值使用,与法币比值为13元∶1元。

12月25日　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举行座谈会,讨论工业界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主张确定会议职权;国共双方停止冲突;解决政治纠纷;稳定经济,挽救当前危机。

12月31日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立,隶行政院经济部,为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机构。资本60%为官股,40%为商股。在上海设总公司,天津、青岛、沈阳设分公司。统一接收日本在中国的棉、毛、麻、绢纺织、针织、印染及纺织机械等工厂。

文　教

1月10日　教育部为鼓励外籍学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政治等学科,特在英国、美国和印度各大学设立中国文化奖学金,每校5名,每名每年奖学金1500元美金。

1月30日　教育部英美奖学研究生、实习生考试揭晓,计录取留英研究生65名,实习生69名,留美研究生61名,共计195名,其中理工医农名额约占96%。

2月17日　朱家骅在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教育概况,略称:当前教育目标在于安定中求改进,维持现有事业,以求战后之发展,将尽最大努力务求各级学校员生活之安定。朱并对大学、中学、小学等各级教育作了逐项说明,提出扩充设备、减少课程及考试注重个性等方面的设想。

3月1日　教育部召开留渝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顾琇、梅贻琦等4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并决议:一、专科以上学校不得由省设立;二、关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分

布原则；三、修订公费生办法；四、本年暑假招生的四项办法。次日下午结束。

3月11日　中国地质学会第21届年会在重庆举行，李四光、孙越崎等200余会员出席。该会理事长李春昱致开会词，略称：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已有20余年之历史。本会会员总数不过500余人，人才之缺乏，为今日地质界一个严重问题。会上选举李四光为下届理事长，尹赞勋为书记。

3月30日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召开第二届第三次大会，会期两日，朱家骅、吴维晖、陈立夫、陈大齐、张道藩、竺可桢、傅斯年、茅以升、吴有训等出席。会议决定1944年度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给奖人选，计给予一等奖金万元者1名、二等奖金3万元者17名、三等奖金1.5万元者46名。

4月12日　中国文化事业协进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该会由林紫贵发起，主旨为加强文化界之互相合作，共策文化事业之发展。

4月25日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师范教育会议，各师范学院院长、教育专家参加，朱家骅主持，会期二日，讨论和研究增拨经费，实行师范学校教职员奖进办法，增设师范学校及改革战后师范教育制度等问题。

4月30日　教育部决定，学生公费自是月份起调整，重庆区按公务员生活补助费每月发给1750元，昆明区2000元。成都区与重庆区同。其他各地按当地公务员补助费四分之一发给。

5月9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该会成立7周年年会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邵力子、郭沫若、老舍、胡风、巴金、曹禺等百余人出席，通过要求保证作家身体自由、写作自由等提案。

6月3日　中美文化协会等7团体举行花会欢送心理学家郭任远博士赴美讲学，邵力子、张道藩、藩公展等百余人与会。

6月9日　中央大学在重庆举行30周年校庆纪念会，到该校校友及在校师生3000余人。校长顾毓琇致词勉励师生共同努力，并希望社会人士密切合作。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和杭立武、教授会、校友会及同学代表分别致词，并举行隆重之致送张士一教授服务该校30周年纪念品仪式。

6月14日　文协昆明分会及昆明各大学共15个团体，在至公堂联合举行"诗人节"晚会，1000多人与会。徐梦龄主持并致词，论述我国大诗人屈原的宇宙观世界观。姜亮夫、闻一多、尚钺、田汉、楚图南等先后演讲，以新的观点对屈原其及所开辟的道路作出评价；最后进行诗歌朗诵表演。

6月24日　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高等科、语文科学生共292人毕业，是日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致训词，称：中国必须于此次战后20年中，遵照三民主义之原则，致力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之建设，使之具备现代化国家之基础，乃能求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

8月6日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后，于是日返渝。据丁氏谈称，苏联科学成就极大，有数种研究已超过各国之研究成果。

8月27日　是日为教师节，教育部公布全国优良教师名单，计专科以上学校1000余人，中等学校400余人，均分别发给奖状奖金。同日，重庆举行教师节纪念大会，并在孔庙祭孔。

9月3日　重庆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吴藻溪、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进中国各方面力量联合建国和中国人民的民主幸福，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并于是日成立筹备会。

9月5日　昆明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迅速根绝内战危机，国共的谈判必须公开，在人民监督下，实现团结，实施民主改革；召开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征粮征兵；惩办战争罪犯等主张。

9月20日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到各大学校长、独立学校院长、各省市教育厅局长、中等学校校长、教育专家等200余人。会议主题为：(一)内迁学校之复员问题；(二)收复区及光复区教育之整理问题；(三)西南西北继续发展教育问题；(四)战时失学青年补习教育问题。会期5日。

10月6日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决定分设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10个委员会，聘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别担任各该委员会委员，以便积极开展文化运动。

10月17日　重庆中华自然科学社第19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到社员110余人。会议通过提案：要求政府拨款，提倡科学研究；在各大城市成立科学博物馆，以普及科学，奖励各团体和私人研究。会议一致声讨汉奸科学人员。18日闭会。

10月21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联谊晚会，到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傅彬然、赵家壁、常任侠、胡风、冯雪峰、华林等五六十人。周恩来应邀讲延安文艺活动情形。

10月23日　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主持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沈称：古物、图书、文献等幸获安全，但日军先后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残破铜灯亭91件，又由历史博物馆运走铜炮3尊、铁炮1369尊。此外，先后搬走及撕毁图书1万余册。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6年

导　言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根据《双十协定》规定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围绕国民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激烈争辩，最后达成五项协议。由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的政协决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专制。

三月一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修改原则，从而违背和推翻了政协决议所定的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原则。表明国民党继续在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和中央集权制度。

国民党推行武力接收东北政策，其军队在占领锦州、沈阳后，沿中长路北进，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以南以运动防御战歼灭敌人1个多师，随后开始了四平保卫战。五月，由于国民党继续增兵，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

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把一切收拾停当以后，认为时机已到，派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中央为保存有生力量，牵制敌军，命中原解放军立即突围，中原解放区在歼灭敌军五万余人后胜利突围，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各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中国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于七月在昆明先后遭到暗杀，是为"李闻血案"。四天之内两位著名民主人士遭暗杀，国民党恐怖活动达到顶点，遭到国内舆论的一致谴责。

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同时，向苏皖解放区也发动了大举进攻。苏中战役开始。华中解放军采取运动防御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首创大量歼敌记录。

十一月四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署，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署。《商约》在平等幌子下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经济侵略，被称为"新二十一条"，比历次卖国条约都卖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蒋介石公然违背政协决议，擅自决定于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单方包办的"制宪国大"正式开幕，通过了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都不承认国民大会及通过的这部宪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驻北平美军胡作非为，强奸女大学生沈崇，激起广大人民愤慨。从北平开始，一场全国性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发展开来，持续三个月之久，是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政治协商会议
- 四平保卫战
- 中原突围
- 苏中战役
-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 李闻血案
- 《中美商约》签订
- 制宪国大
- 沈崇事件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介绍

简称“旧政协”。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人数原经国共与各方人士商定，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等四方各推派九名代表参加。后因民盟中的右翼集团青年党，在国民党支持下出来发难，要在民盟九个名额中占五个，如不同意，就另起炉灶。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避免中间派分裂，主动让出两个名额，并迫使国民党也让出一个，另增加两个，满足青年党要五个名额的要求，民盟仍占原定九个。这样代表总数增至三十八名：国民党八名（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名（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民主同盟九名（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青年党五名（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德）；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九名（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即缪云台、李烛尘）。这次会议是由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以及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孤立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有效的斗争，使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是有利于人民的。国民党对此毫无诚意。二月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了校场口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捣毁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报》的营业部和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等事件。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作出了推翻政协协议的决定。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对蒋介石破坏政协协议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教育群众逐步认清国民党的真面目。

材料：

- 政治协商会议
- 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材料一　政治协商会议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早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就密令其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过去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本》，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和军舰帮助下，加紧运兵，并对解放区的一些地方发动军事进攻。在《双十协定》公布后，10月13日，蒋介石又对其部下颁发“剿匪”密令，要他们遵照《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努力进剿”。接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我们在谈判期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作了必要的准备，我军于10月中旬到11月初，连续在三个战场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 平绥路 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在8月底至9月中旬，侵占我察南、绥东各县，9月中旬，进至张家口外围的柴沟堡，被我军击退。10月中旬，傅作义又集中主力10万人，由丰镇、集宁全线出动，企图一举攻占张家口。我军经半月奋战（10月20日至11月5日），击退了敌之进攻，并逐次收复侵占的丰镇、集宁、卓资山以及毕克齐、和林等地，粉碎了傅作义部进攻张家口的计划。

2. 上党地区 国民党军阎锡山部13个师，9月初和9月底，先后分两路向我上党地区（即山西长治地区）进犯。我军奋起应战。至10月中旬，我军先后歼灭侵入襄垣、屯留、潞城等地的阎军共3.5万余人，俘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高级将领多人，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

3.平汉路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所属部队，从9月中旬开始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10月中旬更集结20万兵力，沿平汉线北上。10月23日，其先头三个军侵占磁县和磁县的马头镇，向邯郸进攻。我军展开反击，将敌包围。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起义。31日，其余两个军的官兵数万人被迫放下武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高级将领被俘。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7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豫北、冀南解放区的进攻。

在我军自卫反击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也高涨起来。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广大人民通过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罪恶行为，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意图和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在内战危险日益紧迫的情况下，各界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呼吁制止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屠杀举行反内战罢课的学生，死师生4人，伤数十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相继举行反内战大示威和集会，声援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

由于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这是主要原因)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全面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时间来布置内战兵力。美帝国主义这时鉴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得人心，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十分腐败，在军事上又有严重困难，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未必对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有利，于是美国改变了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由公开援蒋反共改为以"中立"和"调停"国共纠纷的面目出现，以便更好地在暗中帮助国民党在中国扩大它的统治势力。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为此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头衔来华，说是要充当"调停"人。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美国政府并表示在最短期内撤退驻华美军。

在以上这些条件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了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以便继续欺骗人民和争取部署内战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对于美蒋的和平阴谋洞若观火。但是，为了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愿望，同时也为了在谈判中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和教育人民，1945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由延安到达重庆。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到达上海，22日到达重庆。

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遂于12月27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双方代表就此于1946年1月5日取得一致意见。1月7日，由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代表三方开始了停战谈判，至1月1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停战协定。国民党、共产党双方于同日下达了停战令。停战令规定双方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立刻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考虑到停战令到达下级部队的时间先后不一，双方于发布停战令时还商定了一个实行停战的时限，即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不分何地，一律实行。

根据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北平。军调部三方委员名单是：共产党叶剑英，国民党郑介民，美国罗勃逊。军调部三方人员于1月13日先后到达北平，14日开始工作。同时商讨军队整编问题及有关军事问题的军事三人小组(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也于1月14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对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和美国的假调处，坚决进行了揭露和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我方在军事上居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并收到了教育人民的效果。

在停战令发布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0日在重庆开幕。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有共产党代表7人，国民党代表8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9人，共38人。他们是：

共产党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

国民党　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民主同盟　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罗隆基、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章伯钧

青年党　曾琦、陈启天、杨叔明、余家菊、常燕生

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政之)、钱永铭(新之)、缪嘉铭(云台)、李烛尘、郭沫若

政协代表名额原来初步协商结果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四个方面各9人，共36人。在政协开幕前，蒋介石唆使青年党在民盟内部闹分裂，在民盟9个代表名额中，青年党提出要占5个名额，如果民盟不同意，青年党就要以单独单位参加，而且要有与民盟同等数量的政协代表。后来协商结果，青年党以单独单位参加，名额5人，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国民党让出1个名额，共产党让出2个名额，总数则由36人增至38人。

政协代表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右派即反动派，国民党和青年党属于

右派势力，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中间势力也可以说是改良派，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势力。民社党这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但实际上属于右派势力。无党派的代表以中间派居多数，有左派，也有右派。左中右三种势力，政治主张各不相同。左派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右派坚持法西斯独裁。中间势力主张改良，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旧民主主义。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对于中间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我们在策略上同意其中的某些东西，用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这时，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争取中间派。

在政协全体会议和分组会里。都充满了复杂和尖锐的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的代表仍然搬出“你先交出军队，我再给你民主”的公式，只是讲法有些变化，叫做“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再“政治民主化”。并由其追随者青年党代表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军队国家化案，说什么要使内战不发生，必须军队国家化。青年党代表陈启天在会上的说明尤其明显，他说：“促进民主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

在这个问题上，中间派抱有幻想，他们主张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有的更幻想由中间集团来代表“国家”，接受双方交出的军队，实现“和平”。这种幻想，反映了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

中国共产党揭露了反动派所鼓吹的“军队国家化”的口号，指出它的实质就是企图把人民军队化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必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就是要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将人民军队化于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中，因为没有人民的军队，也就没有人民的民主。

关于政权问题，会议对制宪原则、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国民党提出了该党一手包办的“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公布，内容完全是反民主的)和该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1936年产生的代表，当时的选举是极不民主的，除选举产生的代表外，还有许多名额是国民党指定的代表和所谓当然代表)，企图通过这种反动的国民大会通过这种反动的宪法，使国民党的法西斯“训政”过渡到国民党的法西斯“宪政。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提案，主张重新制订民主的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并按新法进行自由普选而产生国民大会，制订民主的宪法和组织正式的民主联合政府。中间派也反对国民党的提案，但他们所主张的，基本上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改组政府问题，即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问题。国民党仍坚持其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提案内容只是同意就原有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增加少数非国民党人士担任委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斗争也很激烈。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重庆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组织政协各界协进会，每日晚上在“沧白堂”举行集会，请政协代表讲演政协会议进行的情况，并听取各界代表的意见。重庆、上海、昆明等地文化界和工商界团体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向政协提交意见书，或发表文章和通电，要求切实实施停战协定，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1月25日，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学生1万多人举行大游行，并进城到政协开会的地方向会议提出严格执行停战协定、实行四项诺言、国民大会代表必须合理产生、政协会议没有成功以前不许闭会等七项主张，并散发宣言，高呼口号，高唱民主歌曲，其规模和景象是重庆多年来没有的。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会内的激烈斗争，加上会外群众斗争的配合和促进，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会。政协决议虽然远不是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基本上对人民有利。因为它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否定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否定了封建买办法西斯的“训政”法统，而有利于保障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是在通过了人民所希望的决议之后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是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而结束的。通过这次会议，争取了中间势力，扩大了党领导的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政协五项协议公布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为实现政协决议、维持和平局面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切实准备的。在政协五项协议公布以后，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在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可以拿政协决议作武器同蒋介石作斗争。

蒋介石表面上承认了政协决议，实际上却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继续进行内战部署，准备发动内战。蒋介石签订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当作他配合剿共军事的“政略”。还在下达停战令的前三天即1月7日，蒋介石就密令他的军队“星夜前进”，“占领有利地点”。1月12日，又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并具体指示在热河方面要占领承德。一方面下公开的停战令，一方面下秘密的作战令；一方面虚假地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一方面向人民军队实行进攻，这就是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政策。事实上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内战始终没有停止，是一种“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美蒋的预定计划是“关外先打，然后把战火引向关内”。马歇尔“调停”的最后结果是全面内战的爆发。

在政协会议上，蒋介石抛出了他的"四项诺言"(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等)，但实际上仍然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还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沧白堂是重庆各界人士"政协协进会"开会的地方，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欧打与会者，绑架记者，特务们大喊"打倒各党派"，"打倒民主"等口号。1月26日，又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在政协闭幕以后，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校场口事件"，指使特务流氓冒充群众，捣乱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的会场，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等人，许多与会群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月20日，国民党又指挥流氓地痞闯入北平军调部捣乱，并向我方人员无理取闹。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报》(民盟中央机关报)报馆。此后数日，国民党在其他大城市连续制造了同样的反苏反共游行。

本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五项协议的分布，曾经给全国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特别是国统区人民以很大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对实现政协决议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但人民中有不少人因此产生一种善良的愿望，认为不需要再进行严重的斗争，中国就会实现和平，中国人民就会有自由和民主。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愿望仅仅是一种幻想。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后，我们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牢牢掌握住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各解放区积极开展了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为自卫战争作好了准备。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我党即顺利地展开了自卫战争。

对政协决议，蒋介石随即翻脸不认帐，并亲自出面将其撕毁。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修改和撕毁政协决议，说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该会的决议，集中破坏了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推翻了所定修改宪草的各项民主原则。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一、总则

中国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新阶段应即开始，为此特邀集各抗日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兹经一致同意：

(甲)确认国内各民族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

(乙)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丙)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人民权利

(甲)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

(乙)承认男女平等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丙)现行法令有与上述两项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丁)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的机关，有拘捕并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戊)所有侵害人民权利的一切特务机构应即解散。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汉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

(已)立即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电等检查制度。

(庚)一切政府机关及军政人员，凡有侵犯上述人民自由之行为者应予处罚。

三、中央机构

在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过渡期：

(甲)必须立即扩大现有的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

(乙)各党派无党派民主分子，应广泛参加组织政府的一切部门，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丙)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丁)政府所发布的一切命令，应经由会议通过及主管机关签字。

(戊)改组后的政府施政方针，应以本纲领为根据。

四、国民大会

(甲)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实行选举。

(乙)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的联

合的国民政府。

五、地方自治

（甲）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

（乙）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

（丙）全国各地凡已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为合法，并定期实行普选。

（丁）未能立刻完成普选的省区，省政府应由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地方性的临时的民主政府。

（戊）收复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应与当地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临时的民主联合的省、市、县政府，再筹备经过自由普选产生正式的省、市、县政府。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

六、军事改革

（甲）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关，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

（乙）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均为国军，公平合理的分期整编全国军队，缩减军额至最低限度，划定军区，厉行平等待遇，确定公正的人事、征补、供给与后勤制度。

（丙）根据军队属于人民之武力的原则，以民主精神教育军队，并以军民关系为军队奖惩之第一个标准，以彻底纠正军队属于任何个人或派系之现象。

（丁）裁兵后，地方治安主要的由地方保安队及不脱离生产之人民自卫队维持之。

（戊）确定今后国家军事预算不得超过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

（巳）一切伪军，无论已否加委，均应拟具妥慎办法，定期解散。

（庚）在华日军尚未缴械者，应限期缴械，并限期遣送回日。

七、复员善后

（甲）政府应迅速确定切实有效之善后复员计划，保证退伍官兵得到职业，妥善照顾残废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与遗族之生活。

（乙）对收复区难民之救济，疫疠之扑灭，币价物价之稳定，敌产逆产之合理处理，接收人员侵占贪污之严格制裁，敌寇破坏公私财产损失之调查，附逆汉奸之检查与审判，善后救济总署运华物资之合理分配等，政府应定切实计划，迅谋实施，并依靠广大人民团体之帮助与监督，以促其成。

（丙）切实帮助义民难民还乡，给予交通上之便利和优待。

（丁）在交通上应迅速修复铁路公路及车辆船只，全国交通事业通应脱离军事管理，完完全全为和平事业服务。

（戊）切实执行停止兵役差役、停免田赋一年之法令，一切变相之征兵征赋行为，均应严禁。

八、财政经济改革

（甲）确立预算决算制度，并平衡收支，取消苛杂，改革税制，收缩通货，稳定币制，国家支出之最大部分，应保证用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

（乙）为促进中国工业化，定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吸收对发展经建有关之各方面代表人士参加，决定经建方针，规定计划，废止现行统制政策，实行经济民主与企业自由，确立国营与民营之种类，取消国营工业之特殊待遇，扶助民间工业，给予大量贷款，轻税及购买原料与运销之便利，但中国经济应走上公营私营合作经营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反对国内官僚资本，并防止外国独占资本之操纵国民生计，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投机垄断，逃税走私，私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动。

（丙）实行农业改革，扶助农民组织，推行全国减租，适当的保护佃权并保证交租。严禁高利盘剥，国家银行应扩大农贷数量，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供给农具、耕牛及种子，发展合作事业，开垦荒地，建设水利。

（丁）实行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

九、文化教育改革

（甲）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

（乙）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

（丙）普及城乡小学教育，扶助民办学校，推广社会教育，有计划的消灭文盲，提倡卫生，改造中等教育，加强职业训练，扩充师范教育，并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

（丁）在中央与地方预算中，充分增加文化教育经费，并由国家补助民办学校及一切文化教育团体，奖励科学研究、艺术活动及出版事业。

（戊）保障教职员及科学工作者生活，并救济贫苦学生与失学青年。

（巳）改组国家宣传机关及一切国营之报纸、通讯社、

广播及戏剧电影事业，为全国人民服务，不为少数人所垄断统治。

十、国际和平及保侨

（甲）为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彻底肃清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残余，并制止未来侵略起见，遵守大西洋宪章、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及波茨坦四国宣言，努力国际合作，与美、苏、英、法及一切民主国家敦睦邦交，遵守条约信义，务使中国不成为产生或扩大国际冲突的因素。

（乙）在不妨碍民主独立的条件下，极力发展中外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并保护外国人民在华合法利益及生命财产之安全。

（丙）通过对日本管制机构，严惩一切日本战争罪犯，镇压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鼓励日本人民民主运动之发展，以防止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残余势力之再起。

（丁）外交部及驻外使节，应积极保护华侨利益，解除华侨痛苦，给华侨回国以往返之便利。华侨回国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应予以生活上之帮助。

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四平保卫战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六年初，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后，蒋介石以"接收主权"为名向东北大量增兵，抢占战略要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政治委员彭真，先后组织十四个师（旅）于四平以南地区进行防御，阻止国民党军向北满进攻。四月上旬，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及第七十一军由开源、法库北犯四平。民主联军第一、二、三师及第七纵队等部，在昌图以北，四平以南地区实施运动防御，歼敌新一军千余人。十六日，又歼第七十一军四千余人；随后，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民主联军扼守的四平外围阵地发起进攻，遭到顽强抵抗以后，战局形成对峙阶段，双方均在等待援军。五月上旬，民主联军三纵队主力和保安三旅由南满北上，三五九旅由洽尔滨南下，增援四平作战。国民党军新编第六军和第五十二、第七十一军各一部北调增援，遂使四平周围之敌增至十个师。十五日，国民党军再度向守城民主联军发起进攻，守城部队正面前沿阵地失守。十八日夜，民主联军在统一计划下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十九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此役，东北民主联军以八千人之伤亡，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向北满解放区的大举进攻。

材料：

·浴血奋战四平城

材料　浴血奋战四平城

一、抢占东北，蒋介石欲夺四平
针锋相对，我联军严阵以待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是贯通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通的枢纽，是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战略要地。城东北山丘绵延，城西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同时，它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所有这些，使四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由于日军的迅速投降，四平未经战斗即获解放，随即成立了民主自治政府，建立了自卫武装。可是时隔不久，国民党委派的接收大员刘翰东便以所谓合法身份，抢占了四平，使刚刚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解脱出来的四平人民，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

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控制四平这一重要城市，打击和阻滞敌人的疯狂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于3月18日，一举攻克四平，全歼窃取四平匪伪武装4000余人，活捉了刘翰东，为我军在四平地区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蒋介石对四平这一东北战略要地更是异常重视。他认为：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早在3月22日，新编第1军侵占铁岭后，蒋介石就限令该部抢在东北停战协定即将生效之前，于4月2日前占领四平。当他获悉苏军将于4月末全部撤出东北时，就迫不急待地于4月1日在国民党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全会上，声称要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并疯狂叫嚣：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随即电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要其迅速率部向北推进，尽快拿下四平、长春。

我军重新解放四平后，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长、哈两市及中长全线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要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长路，坚持控制四平地区，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3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向东北局彭真同志指明了保卫四平的意图。而此时我东北民主联军的大部分主力部队还在抚顺和本溪地区作战。3月18日解放四平，第二天敌新1军就由沈阳气势汹汹地向四平扑来，情况对我十分不利。根据这种形势，"东总"决定：以钟伟率领的华中3师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进行阻击，掩护我山东1、3师、7纵、华中3师7、8旅主力、独立旅共6个师（旅），迅速向四平

地区集结，准备参加保卫四平的战斗。

二、损兵折将，蒋军抛尸四平 浴血奋战，四平巍然挺立

4 月 18 日，一个阴雨蒙蒙的早晨，四平城被一阵猛烈的炮火轰鸣声唤醒，迎来了血雨腥风的一天，杜聿明同时展开了他新 1 军的全部兵力，以 50 师向四平的东南，30 师沿铁路由南向北，新 38 师由西向东，分三路穷凶极恶地向四平城杀来。

此时，我军为了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主力已全部撤到城外，城内只有保安第 1 旅第 1 团和万毅纵队的第 26 团两个团的兵力，由保 1 旅旅长马兴仁同志指挥。马兴仁根据情况，以四平城为中心，组织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坚守外围，即由折马背（四平东南）高地，向西经天主教堂以南 6 华里一线，再向西经新立屯、前后玻林子、海丰屯，再转向北沿四平城西郊边缘到三道林子高地，控制有利地形，迫使敌过早地投入战斗，打乱其进攻部署，阻止敌人前进，使我得以争取时间和夺取战场上的主动；第二道防线，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防线，准备在四平城边沿一带坚守；第三步，打巷战，死守四平。

凌晨 8 时，敌 50 师、30 师在四平南面对新立屯、玻林子、海丰屯及铁路东侧一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飞机、大炮、坦克一起开火，硝烟弥漫，尤如黑云压顶，覆盖数华里。我阵地上的所有工事堑壕大部分被打平。3 小时后，敌人开始冲锋，由快到慢地冲到我军阵地前沿，刚要齐声呐喊冲上阵地，便被我阵地上各由钢板构筑的堡垒之间的自动交叉火力一阵猛烈袭击，打得抱头鼠窜，战士们又拉响了预先埋设好的飞机炸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战场上一片火海。整整一天，敌人发动了几次攻击，结果只是在我军阵地上留下了 200 多具尸体，别无所获。

次日上午 8 时，敌人又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由于第一天的教训，敌人将进攻的队形疏散开来，在炮火掩护下，提心吊胆地慢慢靠近我阵地。敌人依仗着其人多势众，武器装备优良，对我四平西南边沿地区的防线突出部、前后玻林子、海丰屯一线阵地，以及防线的要害处——铁路东侧我 56 团与西侧保 1 团的结合部猛攻，我防守部队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应战，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见进攻不成，便狗急跳墙，组成"敢死队"，曾几次突入我军阵地，但均被我以小分队的英勇反击打退。战至黄昏，敌人又以弃尸 200 多具无任何进展而告失败。但我防守阵地的部队经过两天的艰苦战斗后，伤亡也较大，部队十分疲劳。就在这时，四平城内突然升起几颗信号弹，而且信号弹的位置都是我守城部队的重要阵地和城内的主要军事目标所在地。马仁兴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原来是城内的敌特分子趁火打劫，蠢蠢欲动，企图与攻城之敌里应外合。

到了第三天，情况变得更加紧张，保 1 旅参谋处长王玉峰赶到杨木林子，找到老 7 旅旅部，见到王东保副旅长，向他请求支援。当即，王东保派出 21 团 3 营进入四平，接替了保 1 团 1 营的防御。然而第三天的战斗更加激烈，7 旅 21 团 3 营的伤亡较大，眼看阵地要失守，鉴于这种情况，王东保决定整个 21 团全部进入四平城，与 56 团、保 1 团共同抗击敌人的进攻。

敌人连续 3 天碰了硬钉子，伤亡惨重，东西战场无一得逞。战前，曾扬言要在"3 天内"打下四平，庆祝胜利的新 1 军，此时，早已是伤痕累累，士气低落，威风扫地。恼羞成怒的郑洞国，为了挽回面子，决心孤注一掷，企盼着能出现"奇迹"。从 4 月 20 日起，他除了命令新 50 师和新 30 师继续向铁路西侧前后玻林子和铁路东侧的鸭湖泡方向攻击外，又把预备队新 38 师投入了战斗。利用夜暗，秘密地沿海丰屯西侧，绕到四平西北的三道林子西侧我 1 团 2 营 7 连阵地发动了进攻，企图与正面进攻的部队配合，形成对我南北夹击之势。

三道林子位于四平西北，距四平城约 2 华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臂形高地，总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是四平西北面的制高点，也是关系到四平生死存亡的要地，一旦失守，四平将遭到敌人的全面包围，而且敌人可以居高临下，就近切断我后方补给线，造成对我极为不利的局势。因此，争夺三道林子及北山高地就成了能否守住四平的关键。

上午 8 时，敌 38 师 1 个营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炮火猛烈的程度，不亚于头 3 天的势头。战斗打响不久，敌人就攻占了我 2 营 7 连的一部分阵地，并继续向我纵深发展。我 2 营 5 连迅速赶来支援，在 7 连的配合下，经多次反击，才制止住了敌人的进攻。4 月 22 日，敌人又以 2 个营的兵力，再次向三道林子北山我军阵地发起攻击。仅一天，敌人就连续 4 次进攻，但都在我 7 连的顽强抗击下遭到失败。此时，"东总"已经发现敌人改变了主要攻击的方向，马上命令马仁兴从城内防守部队中陆续抽调力量增强三道林子北山方向的防守。

敌人因屡攻四平不克，伤亡惨重，气急败坏，随即调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实施了频繁的轰击，到 4 月 25 日，我三道林子工事全部被敌摧毁，我防守部队不得不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正在这危急时刻，尤如神兵从天而降，杨国夫率领的 7 师在刚参加了解放长春的战斗后，奉"东总"之命令，乘胜挥师南下，赶到四平，自下而上，从敌人的侧背后打了上去，给敌人来了个前后夹击、措手不及，大部被歼在阵地上。25 日一天，仅三道林子及北山敌人就死伤了 300 余人。至此，敌人的士气大挫，再也不敢冒然发动进攻了。

三、九牛二虎，只得空城一座 保存力量，联军撤出四平

4月27日，郑洞国下令停止四平的进攻行动后，硝烟弥漫、铁火横飞的四平前线，忽然变得平静起来。

5月15日，在平静了半月之久的四平前线，再次扬起硝烟。杜聿明将其拼凑起来的10个整师的兵力，分成三路：中路（新1军）继续沿中长路直扑四平；新6军向四平西面急进，迂回四平，进而占领西丰和四（平）梅（河口）路上的平岗车站，然后推进到哈福车站，再进攻塔子山和三道林子，堵截和封闭我军向北的退路，待拿下四平后；继续向长春攻击；71军则向八面城、郑家屯方向进攻，逼近我"东总"所在地——梨树。此时，敌新1军军长孙立人已回到东北，这位留美学生，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任新38师师长，曾率部在彦南阳解英军之围立过功，因此，在新1军刚到东北不久，应英皇之请，到伦敦受勋，孙立人借此机会，擅自到美国走了一趟，回来后，由于有美英做后台，趾高气扬，原想借攻打四平、长春的机会出出风头，没想到杜聿明将任务交给了新6军，对此他极为不满，公开违抗命令，令杜聿明十分恼火。

拂晓，国民党军队以疯狂的炮火，向我民主联军西南和东面的阵地开始进行狂轰滥炸，然后采用人海战术，整营、整团地进行冲锋。在獾子洞阵地前，一块不到2、3平方公里的阵地，竟以2个团的兵力轮番攻击10次之多，但均被我击退。敌人见如此攻击不成，随即改用坦克冲锋，步兵跟在坦克的后面前进，同时用炮火轰击我纵深阵地，这才突破了我前沿部分阵地。

然而，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和战斗的关键则是3纵与敌新6军的战斗。虽然3纵全体将士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造成不小的伤亡，但由于战前没有充分估计到敌新6军美式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的机械化运输的优势，敌人以小部队和3纵在阵地上厮杀纠缠，而大部队则使用600辆汽车装运，强行通过，沿途遇到道路翻浆，就铺上钢板前进。等到我军发觉，用炮火追击时，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新6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了3纵的防线，进入四平右侧，而且很快就占领了西丰、平岗车站，然后又很快地进占哈福车站，利用他们优势装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直扑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阵地。

塔子山在哈福车站附近，距离四平20余里，是附近群山的最高山峰，也是四平防御左端最后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上，可以俯瞰四平东北的我军全部阵地，是扼守四平的咽喉。因此，该阵地的得失，将关系到整个四平城防的安危。"东总"为增强东线防守部队的力量，紧急将30旅东调。

5月18日，廖耀湘指挥着新6军，在炮火的掩护下，集中兵力，由东、南、西三面向我塔子山阵地汹涛恶水般地反复冲击。我守军华中3师7旅19团不顾重大伤亡，与敌英勇拼搏，反复争夺，但终因进攻之敌兵力、火力太强，我军伤亡过大，无力继续增援。当日下午，塔子山阵地被敌占领。

塔子山阵地的失守，造成了强大之敌向我左侧迂回，欲完全封闭我市内守军退路的重大威胁，战局对我十分不利。我如继续坚守，必将使我军陷于极其被动和危险的境地，况且我民主联军各部队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均伤亡较大，亦无足够力量确保四平。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摆脱被动和不利的局面，18日夜，"东总"果断决定：主动放弃四平，四平前线全部撤退，实行战略转移。经中央批准，全线部队于5月18日午夜至第二天凌晨秘密地撤离四平。而这时，杜聿明却仍蒙在鼓里。19日，敌人又动用了大量飞机、大炮向四平市内狂轰滥炸了半天之后，见我军阵地上没有任何反应，才胆颤心惊、小心翼翼地进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四平城，但留给他们的却是一座空城。至此，轰动中外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选自《百战图》，作者：马丰文）

中原突围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实行蚕食，进攻达千余次，占领县城、村镇一千余处，将中原军区部队五万余人分割包围，逼至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中国共产党为避免内战爆发，先后多次同国民党举行谈判，并表示可以将中原军区部队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国民党却一意孤行，六月下旬，包围中原军区部队的国民党军增至十个师，约三十万人，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拟发起总攻。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敌总攻前夕分路突围。六月二十五日，首先以第一旅示形于敌，佯装军区主力由白雀园地区向东移动，吸引敌人注意力。主力于二十六日黄昏，隐蔽地向平汉铁路转移。二十九日晚，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十三旅、十五旅一个团、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右路突围军，从敌人守备薄弱的平汉铁路柳林至李家寨间打开突破口，穿过平汉路，向西北方向疾进。七月一日，中原军区副司令王树声率第二、第三旅和第十五旅二个团组成的左路突围军，经与堵截之敌激战一昼夜以后，在广水以南越过平汉铁路，向西挺进。国民党军刘峙急调四个整编师追堵右路军，以二个整编师追击左路军。西安胡宗南集团同时以八个旅的兵力增加陕

南守备，堵截解放军入陕通道。中原军区各突围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及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堵。右路军于七月八日顺利渡过唐河、白河，并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渡过丹江，随后分路前进：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李先念、郑位三率第十三旅及第十五旅一部，于二十八日抵达陕南，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游击队根据地。左路军从安居渡过府河，进入武当山，创建了鄂西游击根据地。第一旅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于七月下旬，突过津浦铁路进入苏皖解放区。河南、江汉两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分别转至豫陕和鄂东地区进行分散活动。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的序幕。此役，歼敌五千余人，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牵制了国民党军三十多个师（旅）的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行动。

材料：

· 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

· 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亲历记

· 中原突围记

材料一　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

蒋介石调重兵大举攻中原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不断向我中原之豫皖、豫西、水西等解放区蚕食进攻。从1月10日至6月25日，敌对我中原解放区进攻千余次，占我县城两座，村镇1100多个，我中原野战军被围困在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内。敌军在完成了一切进攻准备后，就彻底撕下了“和平”的面纱，于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我中原野战军，30日发起总攻，并限令总攻发起后48小时内歼灭我军。敌共投入30万人的兵力（包括部分地方团队）由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其部署是：第41军位于许昌、确山、明港一线；第47军位于罗山、光山地区；第48军位于商城南北地区；第72军位于新县，红安及其以南地区；第18军位于黄冈、孝感、汉川地区；第66军位于信阳、广水、花园、应山地区；第75军位于安阳、京山地区；第76军位于锺详南北地区；第10军位于南阳、襄阳、谷城地区；第69军位于桐柏、枣阳地区；第15军位于泌阳南北地区。为防我军突围，敌人又在纵深作了堵击的部署，重点防我向东面，北面两个方向突围，对我向东南和西北方向突围也作了堵击部署。真可谓：四面围攻铁臂拢，欲置我军于绝境。

中原军巧运筹慎择突围案

国民党反动派除在军事上对中原我军实行包围和蚕食外，还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为克服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我中原军区决定就地复员老弱1万余人；一部分干部先后化装转往其它解放区；同时部队自己动手种菜、捕鱼、挖野菜等，从而渡过了困难，使部队更加精干。

面对数倍优势之敌的四面围攻，如何跳出重围？中原我军决心在敌进攻的同时，以少数兵力向东行动，迷惑与钳制敌人，主力向西突围。其具体部署：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率第2纵队为北路突围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越平汉路，经桐柏山区，直下陕南，再视情由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突向陕甘宁边区，其中第15旅（欠第45团）先掩护南路突围 部队越过平汉路，待进至唐河县南祁仪镇时再归还建制；第1纵队（欠第1旅）为南路突围部队，向西突围，越过平汉路，转向豫西；第1旅于主力突围前后向东行动，吸引敌人，主力突围后再行突围，突围方向自定（第1旅经研究决定突向苏皖解放区）；鄂东军区和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突围后分散坚持原地斗争；江汉军区部队，除留少数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进至汉水以西地区活动。

出敌不意示形于东实向西

在敌重兵包围之下，要想以较少损失顺利地突出重围，关键在于行动突然，出敌意外。为此，我军采取了以下隐蔽企图的措施：敌人判断东面是我突围可能性最大的方向，我即因势利导，以第1旅在东面的白雀园方向上佯动，部队繁忙地加修工事，从敌人开始行动的前几天起，白天我声势浩大地向东开进，晚上将一部分部队西调，第二天再声势浩大的东开，造成大量兵力向该地区集结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军调部执行小组内的我方代表，不断揭露国民党方面违约调动军队，企图围歼我军的阴谋，并继续与之谈判，使美蒋方面代表摸不到我准备突围的底；为使我之行动避开驻宣化店第32执行小组中美蒋代表的耳目，在我开始行动的6月27日夜间，“邀请”其观看文艺节目，我军区机关和驻宣化店部队秘密离开，鄂东军区部队进驻宣化店伪装主力，维持原活动规律。28日，执行小组美蒋代表提出要会见李先念司令员，他们认为，如果李先念仍在宣化店，就说明我军没有采取突围行动；反之，就说明我军的确准备突围了。当时中原军区司令部电话回答：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其实，我们的李先念司令员已率领主力部队和中原军区机关向西接近平汉路运动。29日上午，美方代表白鲁德中校又提出：“要向李将军送药，向李将军表示慰问”。当时，留在宣化店中原司令部迷惑敌人的是张体学同志所部，当美方代表求见李先念同志时，李司令员已离开宣化店30里了。为了进一步给敌造成错觉，李司令员接张

体学同志电报后，果断地作出了接待白鲁德中校的决定，李司令员跨上战马，风驰电掣返回宣化店，引导美方代表堕入五里云雾之中。29日下午，为答谢美方代表对李先念同志的"关心"，我方为美蒋代表摆下了丰盛的筵席，供他们开怀畅饮，打牌取乐，夜间下起了蒙蒙细雨，群山隐没在云雾之中。张体学同志来到国际招待所第32执行小组，由我方代表陪同，找到美蒋代表说："很遗憾，国民党军队撕毁《停战协定》，向我们进攻，我们突围了"。满身酒气的美蒋代表如梦初醒，气急败坏，无可奈何……。

北路突围破封锁会师陕南

6月27日，乌云笼罩大地，黄昏时，我军陆续到距宣化店三里多远的地方集合，尔后我北路突围部队以换防为掩护，离开宣化店地区，隐蔽地向平汉路前进。从宣化店至平汉路行程百余华里，部队经过两天的开进，29日下午到达了平汉路东侧20华里的长冲，由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文建武和任质斌等同志率领的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以及13旅、15旅和45团、军区警卫团都集结在这里，狭长的长冲蜷伏在大别山西麓的尽头，连绵的山峦、葱郁的丛林，成为掩护部队的天然屏障。部队在此进行战斗动员。李先念司令员举起望远镜向西眺望，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层层迭迭。近处封锁铁路的何家店与柳林车站的敌军据点，一个个碉堡呈现眼前，平汉铁路从信阳至广水段，是国民党66军防守，有185旅一个辎重营驻守柳林车站和何家店，共二、三百人的兵力。"嘀，蒋介石以为他的30万兵力在我们周围构筑了万里长城，偏偏在这里有个缺口。"李先念司令员放下望远镜说道，嘴角上露出了几丝笑纹。为了迅速通过平汉路，他确定兵分两路，南路由王震同志率领从信阳以南，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破；北路由李先念司令员率领，从柳林车站与何家店之间突破。李司令员掏出怀表，叫在场的指挥员对了对表，尔后叮嘱道："今天晚上10点钟以前，你们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战术，拿下何家店与柳林车站，掩护中原局和军区领导机关、部队突围，突得过去，就是胜利；突不过去，就是惨败！"紧接着又说："你们今晚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只能胜利，不准失败！"第13旅第37团以强袭手段，一营攻打何家店，采取"土坦克"攻坚的办法，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碉堡，二营攻打柳林车站，当我军摸进敌人的营房时，敌人睡得象死猪一样，缴了他们的械都不知道，还在说梦话呢。柳林车站和何家店的攻占，打开了突破口，主力部队迅速越过平汉路，向西北方向急进。我越过平汉路以后，部队已有18个小时没有进熟食了，李司令命令部队沿途找树林隐蔽休息，找村庄做饭。部队停下不久，我侦察电台截获一份情报，敌人已进宣化店，张体学所部已巧妙地离开，跳出了重围。而此时蒋介石南京总部正在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要他万万火急地督促进攻我中原部队的各路兵马，严格搜查，扬言要"活捉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陈少敏"等。当时，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同志正在路边的一间小茅棚里吃饭，译电员把以上消息告诉以上诸首长，首长们笑得连筷子夹的黄瓜片都掉在地上了。

7月3日，敌第41军主力和第10军一部，分别从信阳西南地区和枣阳向天河口对进，企图于随县以北之房山、高城，天河口间合击北路我军，但当北路我军于6日进至枣阳东北鹿头镇时，东西追击之敌才到达信阳以南之西双河一带，敌追堵计划遂告破产。7月7日，敌重新部署对我北路突围的追堵；以第15、第41军于9日进抵苍台、协同第10军夹击我军，但我一昼夜急行军180里，抢先过了苍台。地面陆军追堵不成，敌人又借助空军。敌派来12架飞机，封锁唐河、白河、迫我背水作战，但敌人的阴谋又一次遭到惨败，我于7、8两日抢渡了唐河和白河。

敌人几次企图围堵截击我军的计划落空，蒋介石恼羞成怒，把第15军军长武廷麟撤了职。并令41、47、15、10军分别于南阳、镇平、内乡以南及丹江沿岸的淅川一带堵击我军。我北路突围部队渡过白河后，因敌追堵日急，为加快行进速度，决定分为两支，李先念率第13旅、第15旅、第45团掩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为一支，王震率第359旅、干部旅为一支，并肩向淅川方向前进。12日，李先念所率部队进至内乡以南师家岗地区。击溃土顽别廷芳民团，乘势于13日以38团包围马蹬铺，以警卫团包围淅川城，掩护主力迅速渡过丹江，摆脱敌人。丹江，本来不宽，水也不深，平时卷起裤腿就可徒涉过去，可这几天来，由于山洪暴发，变得象条小黄河了，奔腾的江水一浪接一浪翻滚咆哮，巨浪击打着江边的岩石，激起几尺高的浪花，江边找不到一个老百姓，更见不到一只船，经过10多个小时雨夜行军的干部战士，浑身湿透，望着滚滚的江水，不由的倒抽口气……。李司令员走到江边，叫参谋人员打开地图，一定要找出一条可以渡得过去的路线来。"过不去，飞也要飞过去！"随后李司令员把随从参谋简佐国同志叫来说："你把警卫队会水的战士都带上，一定要探出一条全部人马可以徒涉过去的路线来！"经东寻西找，最后在一位70多岁老大爷的指点下，在离淅川城西3华里处选定了渡江点。部队开始渡江，3架国民党飞机沿江面轰炸扫射，飞机飞得很低，连机身上国民党的党徽和阿拉伯数字都看的见。但我部队仍于14日全部渡过丹江，进抵梅家铺一带。此时，王震所率部队已进抵荆紫关附近地区。荆紫关位于豫陕交界，是入陕的门户，地形十分险要，具有重要军事价值。胡宗南集团第1军一部于11日即进到此地区布防。14日当王震率部抵达荆紫关、鲍鱼岭地区时，遭敌强力堵击，追敌亦尾随而止，形势十

分危急，王震同志当机立断，以2个团钳制正面敌人，其余部队由荆紫关南向西突进，经两天一夜激战，粉碎了敌人的追堵夹击，突出重围向山阳、柞水方向前进。15日，敌以第41、第47军各一个师尾追李先念所率部队，并以第41军一个师堵我北上；以第10军主力，第15军一部于勋县西北地区防我西进；以第10、第15军各一部于白桑关、李官桥一线防我南渡，企图将我合围于白桑关附近地区。我军以神速的行动，在敌合围形成之前，从白桑关附近插了出去，敌计划再次落空。17日，李先念所率部队到达南化塘时，遭敌第1军所部的强力堵击，盘踞在南化塘之敌为国民党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第1军第1师。该敌企图配合尾追的两个师和其它方向将要赶到的数个师，围歼我军于南化塘一带山谷。这里四面是奇险的高山。山上多岩石、灌木、丛林、荆棘、茅草。部队到达这里时，正是白茫茫的早晨，什么也看不清，先头部队打响后，隔了一会儿，白雾渐渐散开，抬头一望，前面的每一座山顶，所有的垭口、道路险处，都有敌人构筑的工事——土堡、盖沟，一个个都张开着黑沉沉的射击孔，部队已闯入了虎穴。两翼都有敌人的重兵，后面又有紧紧尾追的敌人——情况万分危急，李先念，郑位三等首长都到了前沿阵地，经研究决定：从正面突破，杀开一条血路！李先念同志很激动地说："打！老虎要拦武松的路，武松手里还拿着一条打虎的棒呐！"攻击命令下达后，37团从正面主攻，39团从南面掩护，38团从37团的右翼进攻，45团断后，从上午10时起，连续组织了5、6次冲锋，也只能攻到山腰，战斗一直打到下午，眼看左右的敌人和后面的敌人快拢上来，情况十分严重，李司令员说："叫夏世厚来！"夏团长满身大汗地跑来了……。"你迅速组织你们团的队伍，拿下玉皇山山顶敌人的主阵地，杀开一条血路！……"夏团长立即返回团指挥所，重新组织进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战斗英雄、特等射手们，每个人的腰里都插上了3—4颗手榴弹，冲锋号一吹响，喊声、杀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震得山鸣谷应，37团抢占了玉皇山顶，38团、39团、45团都顶住了数倍优势之敌的进攻，由于我军控制了玉皇山山顶及两旁的山头阵地，中间形成了一条突围的巷道，将近黄昏，天下起了毛毛雨，部队冒雨沿着杀开的血路继续前进。沿途均是崇山峻岭，弯延曲折的羊肠小道。7月20日，李司令员所率部队在赵家川再次遭敌堵击，我前卫当即抢占并坚守赵家川东北之前坡岭，敌20师师长赵锡田为保命保官，立功受赏，亲自督阵，集中全部兵力，轮番向上攻击，战斗从中午起进行了16个小时，敌人先后发起17次冲锋，均被我打垮。20日晚，部队从前坡岭东南三里的小沟全部通过。敌妄图在东赵川围歼我军的幻想又一次破灭了。

继赵家川战斗后，部队到达漫川关附近时，又遭敌胡宗南一个师的攻击，我当即以第37团向敌右翼突击经2小时激战，将该敌击溃，掩护主力转向北进。7月28日，部队与陕南游击队会合，从6月27日离开宣化店，到达陕南止，共1个月又1天，行程3千余里，粉碎了敌前堵后追，左右包围，历尽了人间的艰险。

王震所率部队到达镇安、柞水地区后，略事整顿，则继续向北行动，沿途冲破敌多次堵击，在陕甘宁边区部队接应下，于8月31日到达陕北。

南路苦战渡汉水转战鄂西

南路突围部队由泼皮河地区出发，荫蔽西进，抵达大悟以南杨平口时，遭敌第66军第185师堵击，遂绕至王家店附近通过平汉路，又遭敌第75军第6师及第185师堵击，第18军一部也从武汉地区赶来，并出动装甲车、飞机助战，我当即展开第2、第3旅各一部向敌攻击，以掩护主力越过平汉路，经一昼夜激战，南路突围部队于7月1日全部通过，尔后向西挺进。7月3日，敌在部署对我北路突围部队追堵的同时，以第69军主力、第18、第75军各一部，向枣阳以南之吴家店、大洪山地区追堵我南路突围部队，但当我南路突围部队进至大洪山时，追击之敌还远在广水、应山和玠水沿岸，敌追堵计划破产。

南路我突围部队原计划越平汉路后转至豫西，因敌情有变，部队进至寿山附近时，奉命西渡汉水。掩护南路突围部队的第2纵队第15旅（欠第45团），亦因敌情严重，不易归建，仍随南路突围部队行动。7月11日，南路突围部队进至汉水东岸，由流水沟地区抢渡汉水。当我先头部队渡过汉水进至倒口附近时，遭敌第75军第16师的堵击，我立即展开与敌激战，东岸部队继续组织强渡。当尾追之敌第75军第6师赶到时，我主力已大部渡到汉水西岸。未及渡河的第3旅第8团、第6团大部，警卫团一部共3000余人，由闵学胜率领按原挺进豫西的计划，转道北上，经枣阳、新野等地进入伏牛山。

南路突围部队主力渡过汉水后，在孔家湾地区突破敌第16师的堵击，经李家坡、报信坡等地继续向前突进。7月中旬，奉命在鄂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皮旅历险穿津浦进入苏皖

我第1旅在旅长皮定钧率领下，完成了在东线吸引和阻击敌人的任务后，首先向西南方向行进约30里，尔后迅速转头秘密进入白雀园东南10多里的刘家冲隐蔽下来，并严密封锁消息，6月29日，突然从敌间隙插出去绕小界岭越过潢（川）麻（城）公路，沿大别山脊向东南方向疾进，甩掉了追击的敌人，在松子关击破土顽的阻堵，夺路进入皖西。7月4日，抵达大别山中心区之吴家店，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进。10日，第1旅到达霍山县西南之

大化坪，先在青枫岭击破敌安徽省挺进纵队1个团的阻击，又在磨子潭粉碎敌第48军1个团沿淠河阻我前进的企图，此时第1旅得知敌第48军主力在舒城，当即转头向北，进至大别山出口毛坦厂。为了快速通过皖中平原，第1旅在行军部署上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并肩前进，各级主官在先头行进，及时掌握处理情况，并组织了精干的便衣侦察队，在各行军纵队前作为触角，经充分准备，于13日夜走出大别山。由于行动迅速，出敌不意，15日拂晓，越过六(安)合(肥)公路，在地方党派人接应带路情况下，部队不怕疲劳，连续行军，17日拂晓在下塘附近顺利通过淮南路，当敌第138师赶来时，我已全部通过。18日黄昏，我到达池河镇地区，进行突过津浦路的准备，此时得知敌军由明光(现嘉山县)出动，准备中途截击我军。皮定钧旅长当机立断，部队转向南，由张八岭附近过路，在我大部队越过铁路时，敌装甲列车赶来，敌第138师亦由明光等地赶到，经激烈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部队全部通过津浦路，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第1旅在皮定钧旅长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经24昼夜，1000余里的长途行军和21次大小战斗，挫败了敌之封锁、追击、堵击及包围，有力地侧应了向西突围的主力部队的行动。

河南、江汉、鄂东军区部队各自突重围。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北路突围部队越过平汉路后，奉命随主力跟进，7月下旬进抵内乡以北桑坪一带，后转至芦城、灵宝、洛南地区分散活动。江汉军区部队于7月1日，由桑树店出发，7月7日由流水沟渡过汉水，乘敌守备空虚，相继解放宜城、南漳、保康、竹山县城，对主力的突围行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后与南路突围部队会合。鄂东军区部队，为配合主力突围，于东线积极展开活动，主力突围后，由于敌重兵“清剿”，遂分散突围。7月20日左右，先后到达皖西太湖县之玉珠畈地区会合。尔后又转向鄂东分散活动。

中原突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所进行的一次突破国民党重点围攻的战略转移行动。此次战役牵制了敌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30多个师(旅)30万人的兵力，有利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部队，为做好反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起到了极大的战略作用，同时，中原我军也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选自《百战图》，作者：朱荣榜)

材料二　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亲历记

在张家湾一切安排停当，借老乡的东西也归还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1946年6月，我背上背包，挎上两条米袋，跟随部队踏上威名远扬的“新四军五师突围”的征途，去迎接更艰巨的考验。张家湾的父老乡亲，战友和亲人，再见！

过平汉铁路

被围在宣化店附近的新四军五师，由周副主席多次向“三人小组”呼吁“移兵苏皖就食”，这也表明我新四军的动向，就是要向苏皖老根据地转移。从地图上看我们五师离苏皖根据地最近，敌人也估计我五师目前的处境只有向苏皖突围的可能。因此国民党重兵堵截，也布置在苏皖一带，打算在我五师突围时，就可不费吹灰之力一口吃掉。为此，我五师针锋相对，突围分兵两路，一路由皮定钧同志率部向苏皖方向突围，一路由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部向鄂豫方向突围，我们十三旅及所属文工队，是随李先念、王震部队行动的。这是主力部队，皮定钧部队担任掩护。

那是在6月间的一个夜晚，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阵阵蛙声在田野中回荡。大地在沉睡，多么恬静啊！可是张家湾却很不平静，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人，大家屏着气，静悄悄地等待出发的命令。口令轻轻地传来：“向后传；跟上！”队伍行动了，突围开始了！

我们这一群革命青年，虽然一年的部队生活有了一些锻炼，但是背上背包和两条米袋感到沉甸甸的，加上不习惯走夜路，更不会走田埂，高一步低一步的跨步没有把握。这时老同志在背包上搭上一块白毛巾，叫我看着毛巾，这样就不会跨错步。果然，在比较平坦的大路上，我看着白毛巾，比较顺利地跟上了队伍。但一过小田埂我习惯地低头看。越看越看不见，越没把握，结果不时的摔在稻田里，弄得满身泥浆一声湿。有一次，猛的一脚跨到稻田里，鞋子给烂泥拔掉了，怎么也摸不着，急死人了，队伍也走远了，我怕跟不上队伍掉队，只好光着脚走。走不多远脚痛得不行，脚上磨了泡。这时战友提醒说：“行军是走远路，那能不穿鞋”。立即把我拉到旁边帮助我换上鞋，拉着我的手，大步赶上了队伍。

为了防止暴露目标，我们规定夜间行军，白天休息睡觉。第二天，队长方西同志通知说：“今晚要过平汉铁路了，要准备战斗。要跟上队伍，不要掉队；要把鞋子加上绑带捆定好，以防被烂泥拔掉；要把会发声响的碗和茶杯固定好，途中要发扬互相友爱，争取顺利通过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是国民党重兵封锁的一条战略要道，铁路附近早已筑起岗楼，探照灯不停地在照射，各种武器的射击点都对准了铁路，我军要通过是十分困难的。经过摸清敌情，我军分散成若干小队，利用敌人的空隙，巧妙地越过了平汉铁路，大队人马向鄂西方向突围了。这时敌人察觉我军去向，立即调兵遣将，疯狂地进行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将我一师主力部队包围在河南

平原，致使我军四面受敌，遭到重大伤亡。

这时组织上又决定精简队伍，动员能化妆离队的迅速离队，以保证队伍的战斗力。不几天，敌情愈来愈严重，战斗十分频繁，供给也愈来愈困难。仅在河南平原，我五师就和敌人迂回、拉锯、转战了三个月之久。我军又处在离开根据地的不利情况下，弹药和粮食均无法得到补给，伤病员也无后方给予治疗和护理。这时，我们留下的文工队员有时当卫生兵，为伤员包扎伤口，喂饭送水。有一次，在河南邓县附近，我部队正过唐河一座桥时，敌机俯冲下来开枪扫射，顿时大批的伤员必须及时抢救。轻伤员由战友们搀扶着转移到隐蔽的地方，重伤员由战友们抬着送到一座大庙里进行包扎，我被分配在大庙里护理重伤员，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敌人的子弹射穿了战友的身体，看到血肉模糊的创伤，看到鲜血渗透的衣物，我的牙齿咬紧了，我的喉咙哽住了。我领悟了敌人的残暴，产生了一股力量，抢救伤员杀敌报仇。这时抬来一个伤员，嘴里鲜血直流，原来敌人的子弹从他的下巴穿过去打掉了舌头，他不能说话更不能吃食和喝水，但从他的手势中我知道他要喝水吃东西，我端来一碗水，拿了一只馍，他张开嘴，我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大窟窿，我的心疼起来，手也抖起来，眼睛不忍看。正想转脸，伤员渴望生命的眼光提醒了我，对！要让他活着。我平静地一滴一滴向他喉咙滴着水，我将馍捏得象花生米一般大小，用筷子一粒粒戳进他的喉咙。就这样一碗水一只馍喂下去了，我看着战士的脸上渐渐泛出红光，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过丹江

丹江地处陕西、河南、湖北交界处，长而宽的丹江把陕西和湖北、河南分开了。要进入陕西，必须过丹江，丹江水流湍急，水深齐胸，无法行船，只能淌水而过。可是丹江两岸的渡口早被胡宗南重兵把守，封锁了丹江。为此我五师到达丹江以东后，全部隐蔽在江边的芦苇丛中，有的蹲在泥水中。飞机不停地在头顶上盘旋，找寻目标，搜索我部队的去向，可我们就隐蔽在芦苇丛中正在轻装。上级要求每个同志只能带必须的衣物，其他的一切都埋在芦苇丛中。我只留了一条被单、一套军装、一只梳子和一面小镜子，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他都埋掉了。天渐渐地暗下来了，飞机的吼叫声停止了，我们钻出芦苇丛，聚集在路边山脚下。这时，方西队长轻声地说："今晚要过丹江了！没有船，只能淌过去。同志们要注意，因为水流很急，手上不能拿东西，东西只能顶在头上，最好身上也不要带东西，因为水很深会加重阻力。我们全体队员集中在一块，大家手挽手，抱成一团，谁也不能松手，否则就会被水冲走的。现在我们的文工队只剩下十多个男同志和四个女同志了，每个女同志由两个男同志保护，全队都围在驮幕布的骡子周围，因为骡子在水中比较稳，可以抓住骡子的鬃毛和尾巴。另外，注意方向，看着对岸的灯光。无论如何要朝着灯光方向淌……。队长话说完了，我们各自找到互相的对象，开始淌水过河。河水冰凉刺骨，令人全身打寒颤，加上紧张的心情，抖得无法控制。水深已经齐胸了，这时人会自然的漂浮起来，水又流得非常急，这时我的脚却一脚一脚地踏在互助我的男同志李立青同志的脚上，可是他没说一声疼，也没有把脚避开，帮助我向前踏着。江水越流越急了，他已经难于自顾了。可是，组织的委托装在他的胸中，他没有松手，却更紧地挽住我的胳臂在激流中搏斗着，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支持着我们朝前踏。这时我理解了"同志"这两个字的伟大含意和"战友"这两个字的份量。我们文工队的同志们围着骡子形成一个整体，似腾云架雾、半漂半立的踏在江水中。急流无情的丹江还是毫不费力的带走了我们亲密的战友，师部"七七报社"的记者刘真同志他是复旦大学的学生，1945年和我们先后到达根据地的革命青年，他个子矮小，戴着近视眼镜，操着一口广东话，我们非常喜欢他，都亲切地称他"小广东"，我们和他在一起总被他逗得乐呵呵的笑个没完。他！我们可爱的"小广东"，就在这时被滚滚的江水冲离了我们，他翻滚着、挣扎着、呼喊着，被丹江吞没了。我们焦急的喊"小广东"、"小广东"，只见滚滚江水，却不见刘真的踪影。

我们抑制着悲痛的心情，擦干脸上泪珠，踏过丹江。上岸后，我们才看清在对岸所谓的："灯光"原来是前卫战士为我们烧的一大堆柴火，可见江宽的程度。由于江上水宽流急又凉，要前进一步是多么地艰难，所以我们在江中踏了一个多钟头。上岸后脚不听使唤了，全身好象麻木了。看到火真想马上扑过去烤个痛快，可是我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小鬼，别靠近，站得远点，让身上的冰融了再靠近，否则皮肤会被衣服一道扒下来的。"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政委。政委接着说："怎么样？吃得消吗？"我说："没问题，"政委说："过了丹江，就进了陕南秦岭山脉，秦岭山高林深是打游击的好地方，进了秦岭我们就有靠山。在平原上是四面楚歌难于胜敌，"叫花子"打狗。只要有了靠山，就能打败三面来的狗"。听了政委的话，我的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政委接着说："进入秦岭，离陕北延安也愈来愈近了，离党中央也愈来愈近了。小鬼，坚持到延安去见毛主席"。我兴奋地回答："对！坚持到延安去见毛主席"。

秦岭的游击生活

过了荆紫关进入秦岭山脉，秦岭山脉延伸800里，高拔险峻，荒无人迹。经过胡宗南的浩劫，更成了一片无人区了。胡宗南采取的办法比日本鬼子更毒辣，他将山区分散的人家统统赶走，强令集中住进大寨，然后将门窗屋顶

拆除，将灶头炊具捣毁，使我军住不得，也烧煮不得。粮食早已掩埋或转移，造成我军生存上的极大困难。这时，我们基本上露宿在树丛野地。我们利用树枝将被单四角牵住，就架成一个四面透风的帐逢挡住露水，下面垫上树枝野草睡得可香甜哩。没有炊具，我们找来坛坛罐罐，用三块砖头架起来，就能烧水煮食，手掌当碗，手指当筷吃得可利索哩。有时也不太顺利，瓦罐烧着烧着"嘣"的一声，爆裂成两片，煮得半生不熟的食品落到柴灰里，我们顾不上灰不灰刨出来就吃，吃得满脸象化了妆的花脸，互相看着笑得直不起腰来，有时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那我们就回到原始时代，睡雪地吃生食。九、十月间的秦岭已经大雪纷飞，有的地方已经积雪到膝，上山艰难下山更艰难。有时脚跨进雪里，不料是跨进一个洞穴，连人都陷进去了。所以下山时我们往往都是坐在雪地上，任其顺山而滑下，又快又省力。有时山太陡，滑得太快，人到山下已经滚成一个大雪球。这段时间，我过丹江时带过来的小镜子可派了大用场，成为爬山行军途中掇雪吃的工具，一面小镜子一掇雪正好一口，又方便又快还不影响行军。

我军部队在秦岭真是处在风雪交加、无衣无食、渺无人烟的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由于食生的，又受冻着凉，普遍的肠胃犯病和拉肚子。有一次因为拉肚子，我掉队了，赶队伍的力气也没有了，坐在地上真想哭。政委过来看见了，"小鬼，生病了？"我摇了摇头眼泪成串的滚下来。政委说："喂，喂，不要哭，战士还哭鼻子？"这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丹娘在法西斯的刺刀下昂首挺胸毫不畏惧的英雄形象。"对！"这点小病算什么！不哭！"我止住了眼泪从地上站起来。政委见我站起来了，高兴地双手扶在我的肩上连连称："好样的！好样的"。突然政委好象想起什么，回头对警卫员说："把干粮拿来。"警卫员从挎包里拿出一只小口袋递给政委。政委接过对我说："小鬼！今天请你吃好东西。"我感激地连声说："不要，不要，政委留着吃"。政委把小口袋往我怀里一塞和警卫员走远了。我想在秦岭吃几天生的玉米，那时玉米刚结得手指那么大小，我们连杆带叶都吃下去，土豆刚结得钮扣般大，我们也刨出来吃了。这时我手里拿着好吃的馋得口水直流。我打开口袋一看：咳！是炒熟了的野核桃，顿时一阵香味扑鼻，我抓一把放在嘴里，其味之美是世界上少有的。只有熬过艰难岁月的人，才能体会它的深刻价值。

在秦岭每天都是跟山打交道，我们也利用山和胡宗南捉迷藏。今天他们在山顶，我们下到山脚，一上一下相隔八十里，正好是二天的行程。就这样，明知对方的行踪，就是无法照面，有时我们隐蔽在幽深峡谷的丛林中，敌人传口令都听得清楚，我们也避免和敌交锋。因为我军已失去战斗力，子弹早已打光了，背的都是吓敌助威的空枪。我们就靠两只脚和敌人进行比赛，每天和胡宗南转山头。几个月上下来回仅爬山都够呛了，再背空枪已经感到力不胜任了。此时，上级通知把枪栓卸下来埋在地里，把枪杆砸碎摔掉。枪是战士的生命，离开武器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是办不到的，而今要亲手去砸碎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武器，更是难下手啊！有的战士听到命令抱着枪放声痛哭，象母亲与孩子生离死别；有的边哭边喊："我死也要和枪死在一道"，但是无奈，缺吃少穿的游击生活已经耗尽了体力，为了保全自己，坚持游击斗争，在首长的劝说下，战士们忍痛砸了枪，减轻了负担。就靠一双脚，一双革命的脚，来无踪去无影，弄得胡宗南昏头转向找不到我们的去向。

论山高，我说秦岭的山最高。上山四十里，下山四十里，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蜿蜒八百里。山！山！仰脸是山，抬脚是山。此时能爬上山头就是胜利。但许多战友坐在山脚下，仰望着高山滚出热泪，摇头叹息："爬不上去了"。对别的战友说："你们前进吧，别管我。"是的，几个月的游击生活，没有粮食下肚，只有野菜野果来充饥，铁打的钢铸的也熬不了啊。这时传来消息说："李先念师长，郑位三政委和陈少敏部长要杀骡子给战士们吃，那怕让战士们每人喝上一碗鲜汤，也能增强体力爬上山去。"听到这消息全军指战员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消息带来了阶级情同志爱，直象喝了"仙"汤一样，全军振奋。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能这样做"。有的说："确保首长的健康，才能率领我们去战斗。"有的说："首长上了年纪，陈少敏同志还是一双缠过的小脚，他们都要离开牲口爬山，我们怎么不能爬山！"经过战士们的一番议论，首长还是坚持杀了骡子，给战士们增添了营养。其实，这不仅仅是对身体的营养，而是任何价值也无法估量的精神营养和思想营养。从此，我五师战士增强了战胜困难、战胜胡宗南的巨大力量。在胡宗南的重兵包围中，在秦岭深山里，天当被、地当床，我们生活下来了。

有一天，我们由高山上下到山脚，要过一条河川。川中水深至膝，必须踏水过河才能爬上另一座山继续前进。不巧我"例假"，当我走到河边，战友们都卷起裤腿踏水过河了。我站在河旁有时呆住，有时来回走着，怎么办？忽然听到政委的声音"小鬼"，怎么还不过河啊？！我难堪地低下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好……我……"政委好象理解了，回头对警卫员张大个说："来来，小张发扬友爱背她过河。"小张没二话背上我踏过河去。过了河正向山上爬，这时突然发生了情况，胡宗南在对面山头向我开枪射击，第一梭子弹在头呼啸而过，没有射中，狡猾的敌人把枪口放低又一梭子弹从膝下穿过，我的裤腿打了一个洞没有伤着腿，真幸运！我迅速地拐过一个山峰，避开敌人的射击，靠着山峰，嘴里喘着大气，紧张的心情还没有平息。这时政委走过来拍着我的肩头说："小鬼，革命可不简单啊！要当一个革命战士就更不简单喽！"政委接着问："你入党的预备期到了吗？"我说："要到 47 年 5 月"。政委说："你

经过这几个月突围的考验，可以提前转正。”我听到政委对我突围中的表现给予肯定，我的心里暖烘烘的高兴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早已忘光了。

（选自《党史月刊》95 年 3 期，作者：丹敏）

材料三　中原突围记

在停战的日子里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两党宣布了停战令。

乍听，这是一个好消息，人们以为它会带来和平。然而，就在停战令公布的那天，国民党军队即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次日，夺取了我息县县城。14 日，又攻占了我光山县县城。15 日，又向我定远店进犯。接连十几天，共以十几个师的兵力，分途向我大洪山、白兆山和四望山等地区连续不断地进攻。

那时，我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工作。情况报告一个接一个地送到参谋处，使我们的心都快气炸了。

原来，所谓“停战”、“和谈”，都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缓兵之计。他们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企图拿“停战”、“和谈”做幌子，来达到“假和平，真备战”的目的。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就保存实力，妄想在抗日胜利后独占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所以日寇投降后就对我各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鄂豫解放区地处长江中游、武汉外围，敌人进攻时首当其冲。我党为了集中力量，反对内战，曾命令我新四军五师撤出了鄂皖边、鄂南和石（首）公（安）华（容）等解放区。但是，国民党得寸进尺，反而进一步进占了我襄（河）西、襄南、鄂中、鄂东等解放区。

日寇投降后，我党中央为了加强中原战略区的斗争，决定王震同志率八路军南下支队（即三五九旅）由湘、粤北返，王树声同志率豫西军区部队南下，在桐柏地区与新四军五师会师，组成了中原局与中原军区。

停战命令公布后，我为严格执行停战命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立即率领六万余主力部队，由桐柏山区转移到鄂豫交界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礼山（今大悟）、经扶（今新县）、光山地区。不料，国民党反动派竟调集了 11 个军 26 个师，30 余万人的正规部队，构筑起 6 千余座碉堡，将我重重包围。

在被围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高喊“和平”，表面上装腔作势地要遵守停战协定，执行停战命令；实际上却向我军驻区不断地蚕食进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曾派第九执行小组于 1 月 23 日、28 日先后奔赴罗山、应山视察调处。国民党反动派虽被迫与我签订了“罗山协议”、“应山协议”，答应制止国民党军队不得继续向我进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一天也没有执行过协议。

到 4 月底，国民党军队向我中原部队的大小进攻，竟达七百余次之多，并在驻马店、花园、潢川、商城等地设立了指挥所。据确息，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在五月四日至九日向我中原部队展开全面出击，妄想歼灭我中原部队，然后向我华北、华东、西北、东北等其它解放区大举进攻。

中原内战的局势，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就在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同志，5 月 1 日，在重庆公开揭露了反动派的这一罪恶阴谋；4 日，奉党中央之命，由重庆飞抵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再次揭露了反动派的罪恶阴谋；5 日，由南京飞汉口；6 日，即偕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方代表白鲁德与国民党的代表徐永昌（王天鸣代行）以及随员、随行中外记者共 40 余人，由汉口启程来大别山区视察；8 日，抵达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宣化店。

当晚，军区首长召集我们机关和各单位来的代表一起开了个欢迎会。会上，周恩来副主席给大家讲了话。一开始，他就如同谈家常一样地说：“我既是客人，又是主人。”这话使人听来多么亲切、温暖。接着他又说：“你们在这里艰苦奋斗，处境非常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都很关心。”大家听了这话，又联想到党中央不久前曾派董必武同志，携带着各解放区和国统区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下党募集的救济款 3 万万元与一批黄金白银，来宣化店向中原军民进行慰问的情景，都很感动。欢迎会之后，周副主席还给我们分析了形势，介绍了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并且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有两手，一手文的，一手武的。文的、武的都是一个目的：消灭人民力量。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周副主席的指示，鼓舞了我们全体同志的斗志。

而后，周副主席与美蒋代表回到汉口，于 5 月 10 日，又在汉口的杨森花园，签订了“汉口协议”，规定双方指挥官必须制止一切冲突，停止一切违犯停战命令的部队调动和建筑碉堡工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增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以监督“汉口协议”的执行。

其实，这都是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骗人的手段。在这以后，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进一步对我进行军事围困，继续派遣特务到我区进行造谣、放毒、暗杀，加紧实行经济封锁，严禁食盐、粮食、布匹、医药进入我境内，用高价收买我区粮食输出。正当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六万余人的部队，聚集在一个方圆不及二百华里的山区，天天喝稀饭、吃野菜，缺吃、少穿，困难极了。

时至 6 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在他的美国主子的支持帮助下，经过 5 个多月的调兵遣将，以为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他们就以中原地区为起点，开始向我全国各解放区大规模地进攻了。

突破重围

在反动派看来，以其30万之众，操美制精良武器，于方圆200余华里之内，攻我中原6万之师，简直易如反掌。于是密令其部队从6月26日起开始行动，务于7月1日向我发起总攻，限“48小时全歼”我军。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突围，摆脱这种困境，保存有生力量才是上策。大战来临前的一天下午，李先念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来到我们作战室里，走近标着敌情的图前，仔细察阅。看了一会，指着地图说：“看，南面是长江天险，西边是桐柏山区，两下都是国民党的后方，只有北、东两面是我华北、华东解放区，自然敌人要在这两面布置重兵啦。”经过一番讨论，首长们确定了事先研究的方案，并具体作了部署：先由皮定均同志率领一纵一旅向东佯动，掩护大部队向西突围，尔后转入华东解放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率二纵之十三旅和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北路之一支，王震副司令员率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北路的另一支，两支部队平行向西突围，经桐柏山区直下陕南；王树声副司令员率一纵的二、三旅包括二纵十五旅之四十三、四十四团为南路，西越平汉铁路后，进入鄂西北；河南军区部队于掩护北路突围后转入豫西地区；江汉军区部队除留少数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转入襄河以西地区；鄂东军区部队于掩护主力突围后留原地坚持斗争。最后李司令员强调指出：“最要紧的是出敌不意。”

敌人从6月26日起开始行动，我们的部队也从6月26日起开始行动。

我是随中原局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一起行动的。所见所闻，主要是北路突围部队的情况。

6月27日，乌云笼罩着大地。快黄昏了，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荫蔽地由河东移到河西，陆续到了距宣化店三里多路远的地方集合。当地的人民群众纷纷跑来观看，不少人在议论：“奇怪！为什么他们在这里驻了几个月，突然之间就要走了？”特别是那些生长在老根据地的老头子、老婆婆，纷纷走拢来，贴着我们干部、战士的耳朵问：“同志，你们真的是要走吗？”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答复他们说：“是换防。”

这时，张体学同志率领鄂东军区的部队已到宣化店“接防”。中原军区司令部的门口，仍挂着司令部的牌子，照样地站着门卫。宣化店的街上，仍是人来人往，部队照样地出操唱歌。领导机关已经离开了，竟使那些住在河西国际招待所里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洋人”们和国民党的特务，完全蒙在鼓里。后来他们大概是发现了什么，竟于28日提出要见李司令员，借以试探虚实。为了迷惑敌人，正在西进途中的李司令员接到我方代表发来的电报后，即刻带了几个警卫战士，飞马赶回宣化店，接见了他们。

从宣化店至平汉路，行程百余华里。我们经过2天荫蔽的行军，于1946年6月29日下午，到达了平汉铁路东侧二十华里的长冲。由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文建武和任质斌等同志率领的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以及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和军区警卫团都集结在这里。

狭长的长冲蜷伏在大别山西麓的尽头。连绵的山峦，葱郁的丛林，成为掩护部队的天然屏障，交通要道和山口都布置了岗哨。我们的队伍分别集合起来，由各级干部进行战斗动员。干部们立即清理文件，进行轻装，战士们检查武器弹药……。

早在前两天，军区司令部就派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同志率领三十七团靠近了平汉铁路边，监视铁路线上的敌人，侦察突围的路线，选好突围点。这时，李司令员与二纵文建武司令员等，到达了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周副司令员，倾听了他们的汇报。接着，李司令员亲自到靠铁路不远的仙石岩去观察。陡峭的仙石岩，高踞在群山之上，银亮的铁轨在脚下蜿蜒伸展。李先念同志举起望远镜向西眺望，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层层迭迭。近处，封锁铁路的何家店与柳林车站的敌军据点，一个一个的碉堡呈现眼前。平汉铁路从信阳至广水段，是国民党六十六军防守的，有一八五旅的一个辎重营驻守柳林车站和何家店，共二三百人兵力。经过观察，并没有发现增兵的迹象。

“喃，蒋介石以为他的30万兵力在我们周围构筑了万里长城，偏偏在这里有个缺口。”李先念同志放下望远镜，向文建武和周志坚同志说道，嘴角上露出了几丝笑纹。

李先念同志观察后回到山下，和文建武、周志坚、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同志仔细研究突围作战计划。为了迅速通过平汉线，确定我军兵分两路：南路由王震同志率领从信阳以南、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破；北路由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从柳林车站与何家店之间突破。

李司令员掏出怀表叫在场的几个指挥员对了对表，叮嘱道：“今天晚上十点钟以前，你们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战术，拿下何家店与柳林车站，掩护中原局和军区领导机关部队突围。突得过去，就是胜利；突不过去，就是惨败！”紧接着又说：“你们今晚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只能胜利，不准失败！”

“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夏世厚同志严肃地回答。

在苍茫的暮色里，我们的部队沿着峡谷继续向西行进。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天漆黑，路又滑，很不好走，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了。这可急人啦！倘若天明以前，我们的部队抢不过平汉路，那就有极大的危险。反正是在深山密林里行军，高山挡住了敌人的视线，不会暴露目标，军区首长立即下了一道命令：凡是不好走的地方，有悬崖深壑的地方，都点燃

一堆堆的柴火或插上一支支点燃的蜡烛。一下子，几里路长的蜿蜒曲折的柴堆火和烛火，如象一条镶了无数珍珠的彩带，照亮了崎岖的山路，部队行军的速度加快了。

九点多钟，机关部队到了扇子山脚下，距平汉路只有七八里地了。突然从前面传下来一道命令："不准吸烟，不准点火，不准大声喊叫！"于是，堆火、蜡烛没有了，火光全灭了。掉队的人不敢喊，不敢叫，一个一个的紧跟着。赶不上了，便学猫叫，雀子叫，前前后后进行联络。跌倒了，爬起来又往前赶。

继续往前走，到了戴家庙，快出山口了。遥望着黑沉沉的远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排排、一簇簇的灯火。显然，前面就是平汉路了。前面又传下来一道命令："原地休息，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咳嗽！"

忽然，从何家店方向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步枪声。接着，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也响了。原来掩护我们突围的三十七团，九点多钟就接近了敌人。一营攻打何家店，他们采取十年内战时期"土坦克"攻坚的办法，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碉堡，消灭了一些敌人。二营攻打柳林车站，当他们摸进了敌人的营房时，敌人睡得象死猪一样，缴了他们的械都不知道，还在说梦话呢。

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混战，何家店与柳林车站的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可是铁路沿线驻的都是六十六军的正规战斗部队，近处远处的敌人听到枪声，急忙从南北两方增援来了，战斗更加激烈。三十七团一营迅速占领何家店左右高地，向平汉路的南方堵击；二营迅速占领柳林车站左右高地，向平汉路的北方堵击；三营封锁黄庄，迫使敌人不能前进。

由于我三十七团英勇顽强的抵抗，前面一批战斗部队已经从缺口中冲过去了，接着就是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跟随前进。在雨夜里，同志们出了山口，过急流，穿竹林，翻越泥泞的平汉路基，还冒着枪林弹雨越过一段开阔地，最后经白云寨进到甘家冲，脱离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天亮时，我们登上了铁路西通往中华山的高山。遥远东方的天边，一片金黄色的朝霞，捧出一轮红日。许多人经过一夜的奔跑劳累，滚得浑身都是泥。相见之后，大家都高兴得尽情的欢呼、拥抱："嗬，你过来了！""嗬，你也过来了！"

（邹作盛，《星火燎原》之七）

苏中战役

背景介绍

亦称"七战七捷"。1946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五个整编师约12万人，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东野战军主力19个团3万，粟裕、谭震林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连续进行了宣（家堡）泰（兴）攻坚战、（皋）南（通）战斗，海安运动防御战，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邵伯防御战等七次战斗。

7月13日至8月3日为战役第一阶段。战役发起前，华中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如皋、海安地区待机，当判明敌人将于7月15日发起进攻时，即以15个团的兵力先发制敌。13日夜，第一、第六师和第七纵队按预定部署对分散守备的宣家堡、泰兴之敌发起攻击，战至15日拂晓，歼灭整编八十三师二个团及一个山炮营共3千余人。宣泰战斗后，因敌第四十九师由南通、白蒲进攻如皋，华中野战军遂以主力迅速东进，直插如皋。18日晨，将该师两个旅包围于鬼头街、杨花桥地区，经两日激战，歼敌1万余人。接着，华中野战军主力转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7月30日，国民党军以6个旅的兵力分别由如皋、姜堰合击海安，企图与华中野战军主力决战。野战军为保障主力休整，以第七纵队两个团在海安以西、以南地区，实行运动防御，因敌兵力集中，不易各个击破，遂于8月3日主动放弃海安。在华中野战军主力休整期间，华中军区特务团和第五旅先后调到苏中，使野战军作战部队增至23个团。

8月10日至27日为战役的第二阶段。国民党军占领海安后，即分兵"清剿"泰州、海安、李堡以南一线。华中野战军乘机攻击暴露而薄弱的李堡守军第一〇五旅。8月10日夜，华中野战军发起攻击。战至11日晨，将其刚接防的国民党军新七旅旅部及1个团全歼。随后，在李堡附近杨家庄又歼灭了刚换防下来的第一〇五旅一个团。当日17时，又在洋蛮河，歼灭了前来李堡接防的新七旅另一部。至此，前后仅20小时战斗，歼灭国民党军1个半旅。李堡战斗后，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加强点线防守，企图迅速巩固占领区，以继续北犯。华中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打开南下泰州、泰兴、如皋、南通地区作战道路，以第一军分区部队佯攻黄桥、第九军分区部队围攻南通，以主力第一、第六师和第五旅、特务团约3万人，对丁堰、林梓守军发起攻击。战斗于8月21日夜间打响，战至22日上午，分别攻克丁堰、林梓，歼敌5千余人。丁堰、林梓战斗后，国民党军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位于如皋附近，判断解放军将攻如皋，急调黄桥守军第九十九旅东进如皋，并令扬州守军第二十五师北进邵伯，企图沿运河北进，以配合淮北的国民党军夹击淮阴。华中野战军以一部坚守邵伯，以另一部佯攻海安，而集中主力第一、第六师和第五旅由丁堰、林梓西进，拟围攻泰州，在运动中歼灭回援之敌，并准备在如（皋）黄（桥）公路上与增援如皋的第九十九旅打遭遇战。25日晨，第九十九旅在如皋的第

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西出接应下开始东进。当日午，野战军主力到达如(皋)黄(桥)公路，与东西对进的敌军遭遇，迅速将敌包围于加力和分界地区。26日先歼灭被围于分界的弱敌第九十九旅。27日转兵将被围于加力的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1个团歼灭，并乘胜攻占黄桥，歼击第一六〇旅五个连。此战共歼敌两个半旅。8月23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由扬州北进，对邵伯、乔墅、丁沟发动连续猛攻。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下，击退了敌军数次进攻。26日黄昏，野战军主力在如黄公路战斗中获胜，敌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遂退返扬州。至此，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连续作战45天，歼敌6个旅及2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万3千余人，为苏皖解放区工作转入战时体制争取了时间，获得了内线歼敌的宝贵经验。

材料：

- 回忆苏中战役
- 七战皆输
- 首战宣泰
- 奇袭李堡
- 如(皋)黄(桥)路大捷

材料一　回忆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是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中原我军突围后，位于我国解放区东南前哨，与蒋管区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的苏中根据地，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7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区的汤恩伯(以后为李默庵接替)，指挥五个整编师共15个旅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奋起迎战，举行了苏中战役。从7月13日至8月27，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敌5万余人。这七次战斗是：7月13日至15的宣家堡、泰兴战斗；7月18日至21日的如(皋)南战斗；7月30日至8月3日的海安战斗；8月10日至11日的李堡战斗；8月21日至22日的丁堰、林梓战斗；8月23日至26日的邵伯战斗；8月23日至27日的如(皋)黄(桥)路战斗。这次战役，既沉重地打击了进攻的敌人，掩护了华中解放区完成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全面准备，又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

首战宣泰

作战地区选定之后，就是选择打击目标和确定反击时机了。

蒋军即将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7月10日，我们已确悉蒋军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第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的第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埝，得手后，这几路敌人将会攻海安。整编第二十五师的另外两个旅在扬州待机。如我初战失利，他们可能沿运河线北犯邵伯、高邮。蒋军还有两个整编师(第二十一师和第六十五师)在江南沿岸当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这时，我军究竟是等待当面的敌人向我发起进攻后再打，还是先机制敌，进攻敌人的出发地为有利？我们考虑：

第一，敌军四路人马向我分进合击，他们在各个进攻出发地的时候，彼此间隔还比较大，越接近如皋和海安就越靠拢，相互策应越便捷，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就很难将他们分割、包围，歼灭其一路，就会在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临战，甚至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可以打乱其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

第二，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准备在短期内连续作战，第一次战斗要为后来的作战创造条件。这一地区在停战期间，不断遭到敌人的蚕食，战场已比较狭窄，先在适当地区打一仗，歼敌一部，可以为后来的作战开拓战场。

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否！5月下半月，敌军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长春、永吉，6月，敌人又集中30万大军对我中原第五师发动了围攻，已经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予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敌人的几个进攻出发地，我们作了如下的分析和比较：

泰州之敌，离我海安较近，踞我侧背，对我威胁较大。但泰州是中等城市，难以迅速攻克。若围攻其前出据点，求歼援敌，这一带地形又不利，从泰州直到海安，是水网地区，河川纵横如棋盘，有些地方没有桥梁，难以通行，南面是较宽的运粮河，大兵团很难行动，而且每个村庄都有水圩子，易守难攻。打这一路如不能速决，南通、靖江方向的敌人将乘虚而入，占我如皋、海安。

东南方向的南通、白蒲一路，距离较远，如我远出寻歼该敌，泰州、泰兴、靖江的敌人必然会三路并进，可能很

快突破我阻击阵地，威胁我海安、如皋。

只有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最为有利。宣家堡是停战令生效后敌人违反停战协议侵占的，泰兴城是停战协议即将生效时被敌人强占的，反击这两点我在政治上更为有理。而且，敌人占据不久，民心不顺，情况不熟，虽然临时赶修了一些工事，但远非南通、泰州可比，实际上是临时驻止之敌。打掉了这一路，西北路泰州之敌和东南路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这一路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三师的前出部队，只有两个团，比较孤立、分散，利于我同时分别歼灭。

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军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

7 月 10 日我们定下决心，集中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于宣、泰地区，只用第一军分区的部队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蒲北犯之敌和由泰州东犯之敌。宣家堡、泰兴两地各驻敌军一个团，我们各用一个师(两个旅六个团)的兵力去打，形成了我们跟敌人是六比一的优势，而且这两个师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第七纵队(四个团)，是新由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的纵队，士气很高，求战心切，我们将其使用于次要方向，攻击佴家庄之敌。

战斗进程基本上和预期的一致，我军做到了出敌不意。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也莫测我军虚实。李默庵急令已开抵白蒲准备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 14 日缩回平潮，以保南通。至 15 日，一绥区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送给我军两天时间。而十五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敌人只剩下一个营部率少量残部负隅抵抗。各阻援部队都打击了援敌。鉴我军已获得转移兵力的主动权，宣泰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但留下第六师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城内少数残敌，给敌人以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以作为下一次战斗的钓饵。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

这是苏中战役的首战，也是华中我军在解放战争迎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我们的作战对象是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经过整编的美械化蒋军。对于这样的敌人能否战而胜之、攻而歼之，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未经实践证明的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关注。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我们在清查了战果之后，一一作了汇报。

再胜如南

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指示我军在南线须准备连续作战。对于连续作战，我们是有准备的。在宣泰战斗的进程中，我们就分析了敌人可能的动向。筹划着下一步转用兵力的方向。此时，敌人虽遭到我军之打击，但他恃其兵力雄厚，又估计我军经宣泰一仗伤亡必大，便急调江南沿岸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的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的主力；同时又令第四十九师星夜疾进，企图乘虚夺我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

这时候，我军有两个作战方向可供选择：

一个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转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攻占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缺点是要强行一百几十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将减弱战斗力。但优点是明显的，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的意料。此时，敌人以为我主力在西边，第四十九师将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我军来一个长途奔袭，创造歼敌于运动中之良机，将陷敌于被动混乱的境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军必须打得、饿得、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而这正是我军的特长。

我们决心采取第二方案，选敌第四十九师为歼击目标。7 月 15 日晚，即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指；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确实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我第一军分区部队连日英勇阻击，为主力的长途东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主力在连续两昼夜激战之后，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表现了高度英勇顽强的气概，一路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夜过黄桥，群众以烧饼和西瓜争相慰劳。在群众的封锁、掩护下，敌人还蒙在鼓里。

16 日上午，敌第四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北犯。17 日，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之鬼头街、田肚里；左路到达如皋以南

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我东移之主力则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

7月18日晚战斗发起，敌人果然仓惶失措。我第一师一部与第七纵队南北配合，攻击如皋东南鬼头街一带的敌第四十九师师部和第二十六旅，19日，除了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率几个人逃入宋家桥外，全部被歼。第六师主力和第七纵队一部经19、20日两夜的攻击，也歼灭了杨花桥、宋家桥之敌第七十九旅大部。

如南战斗共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1万余人，达到了预期的歼敌目的。由于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10天，相当疲劳，而且敌人第二梯队的兵力又已陆续北调，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为保持主动，如南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主动撤离如皋城，准备再战。

三战海安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敌人被我歼灭了两个半旅。但他还有第二梯队，立即又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埝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通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也在此交汇。敌人以为只要占领了海安，则从泰州经由姜埝、海安、李堡直达海边的封锁线就可形成，苏中南部的占领区就可巩固，长江下游的通道就可确保。同时敌人还判断，海安战略地位重要，我军势在必争，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我决战，一举消灭我主力，进而配合其北线的行动，解决苏北问题。

在此形势下，我军的决策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当时我认为，中央早已明确指示我们，一切要作长期打算，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中央要求我们不轻易放弃要地，中央更要求我们保持有生力量，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现在敌人以六个旅的优势兵力集中在狭小正面向我海安进攻，如我固守海安，在海安与敌人决战，正中敌人的毒计。因为敌人有强大的第二梯队，我军与之决战，势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战胜了，敌人仍可继续调集兵力，保持其进攻的态势；战斗如不顺利，势必仍要撤出来，那就被动了。如我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和消耗敌人，并赢得时间，保证主力部队休整，然后撤出海安，给予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使敌人重新骄傲起来，就将造成有利于我歼敌的战机。

但是，当时还处在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所掌握。有的同志认为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军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为什么不敢在海安同敌人决战？打了两个胜仗还要放弃海安，前两仗岂不是白打了！我远离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不敢单独决定，就日夜兼程从海安赶赴淮安，从海安到淮安约三百里路程，须经东台穿过水网地区，我开始骑摩托车，以后乘了一段黄包车(人力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够搞到的交通工具全部用上了，一天一夜赶到了淮安。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议，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对于同志们的疑虑，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工作外，主要靠打胜仗的实践来解决。华中分局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得到了同意。

这时，我们的部署是：第一师、第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第七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

海安运动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4天多，伤亡仅二百余人，杀伤敌军三千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新纪录。仅7月31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军消耗了炮弹万余发。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奇袭李堡

我军撤出海安后，敌军第六十五师、第一〇五旅、第七旅争先拥进海安。由于敌军进入我解放区后已处于瞎子、聋子的状况，加上敌军官纷纷报捷、极度夸张地吹嘘“战果”，其一绥区竟未发觉我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已经转移，得出我军的伤亡数字竟达“二、三万人”，因而宣告“苏北共军大势已去”。

敌人侵占了海安，认为他们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调整部署，把原来驻在如皋城的陆空联络组撤回常州，守备部队准备分散“清剿”其后方。据此，我们估计敌人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李堡、角斜，完成其东西封锁线，然后再北攻东台。骄兵轻进，必然有隙可乘。我们把主力集结在海安东北，无论敌人向北、向东，我军都可随机出击。我们发动民兵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同时，加强侦察情报工作，掌握敌人动向。

这时，我在苏中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作用。人员、物资很快得到补给，伤员很快得到治疗，加上大批解放战士和缴获的补充，每个连队都比战前充实，武器也加强了。特别是民兵群众封锁消息、查缉敌探之严，更是难得。华中野战军机关及第一师、第六师三万人集结休

整两星期之久，驻地距海安近者仅一、二十里，在那里出操上课，开会唱歌，本地出身的侦察员庄庄有熟人，天天上公路，敌人却毫无所知。

8月6日，敌第六十五师及第一〇五旅果然由海安东进，连占西场、丁家所，将继续东犯。我立即于7日晨电报华中分局、军部和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

次日即获军委复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预备队或箝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华中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在报告新四军军部后，决定将淮南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调来。这些指示和决定，增强了我们歼敌的信心和决心。

敌人果然进一步暴露了"骄兵"的弱点，7日占李堡，8日占角斜。我们又密悉李默庵决定调其整编第六十五师于9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第二十五师和九十九旅的防务，10日又令新七旅从海安东开接替第一〇五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敌军频繁的调动，给了我军以趁其运动或立足未稳加以歼灭的大好时机。我们当机立断，决心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

战斗于8月10日20时发起。我第一师乘敌人混乱之际，猛扑李堡，奋勇攻击。此时的李堡，正有敌人的两个旅部各率一个团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我军一击，建制大乱。至11日晨，我军完全攻占李堡，中午又克蒋庄、杨庄，全歼守敌。由于我攻势突然迅猛，敌人正在交接的两支部队都很混乱：交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刚才拆除，接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双方都无法向海安告急。11日晨，敌新七旅旅长仍按原计划带领一个团由海安踽踽东行，我军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第六师与第七纵队，立即利用高粱、玉米地作好伏击布置，第七纵队一部断敌退路，会同第六师一部出击，在运动中将该敌全部歼灭，其中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之战，前后20个小时，歼敌1个半旅共九千余人，又赢得了一个胜利。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

李堡战斗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蒋军经过我连续四次打击，已被歼灭三万余人，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除非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来增援，再难向我全面进攻。敌人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堰、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清剿"和海、如、泰(州)之间的防御，以求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我两淮。

我军经过连续作战，抓紧休整和补充解放战士，加上打胜仗的鼓舞，士气高昂，越战越强。李堡战斗我军伤亡很少，而华中军区增调来的生力军第五旅和军区特务团也已于李堡战斗时到达，我军兵力增强，敌我态势已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8月13日，中央军委发来指示："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当时，可以设想两个作战方案，一个方案是从正面进攻海安和如皋，另一方案是避开正面，攻其侧翼或后方，吸引敌人来援，寻歼敌人于运动中。

此时获悉蒋介石正筹备于25日在庐山开会，我们初拟进攻南通市，吸引如皋、海安之敌南下增援，歼灭他一、二个旅，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我军影响。8月19日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后，次日毛泽东同志亲拟电报指示："同意你们南下作战，但不必强攻城市"，"在攻占通如线后，敌人也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的可能。在敌人不敢增援的情况下，可以西进如(皋)黄(桥)公路，相机进占黄桥，来调动或逼退海安之敌，在运动中歼灭之。"我们当即以黄桥为进攻方向，缩小进攻正面，不攻白蒲，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估计那时敌人必将调兵回援，我则于运动中歼灭之。

8月20日晚上，谭震林同志和我率主力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向南开进，插入敌人侧后。这"敌后"实际上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老马熟路，军民都习以为常。16个团三万多人夜行军，连家犬惊吠之声也难听见，敌人当然更无从知晓。

8月21日夜11时半，丁堰、林梓战斗打响。又是一次出敌不意的攻击，进展甚快。22日上午，丁堰敌交警第十一总队被我第一师围歼大部。我第六师围攻林梓，全歼守敌。东陈之敌在我第五旅围攻下，大部逃入如皋，东陈亦被我攻占。

不出军委所料，各据点里的敌人都未敢出援。

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五个大队及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缴获甚多(其中有一批敌人拟用以残害根据地军民的各种刑具)，打开了西进的门户。这是苏中战役的第五个战斗。

攻黄救邵，七战七捷

当我军在丁、林歼敌，打开西进门户的时候，由宿县地区东进的敌人已占领我睢宁，正准备向我淮阴进犯。扬州之敌第二十五师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也全部于8月25日开始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我着眼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定以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十纵队(三个团)及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主力部队按原订计划，来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

我们除以第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箝制性进攻外，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继续此次大踏步机动作战的行动，于8月23日夜间向敌人封锁圈的中心挺进。

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步险棋。这个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封锁圈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我们竟用三万作战部队插进去，定将大出敌人的意料。

由于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越通榆公路西进，敌一绥区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8月24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第九十九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25日，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这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已南下到如皋的第一八七旅，加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和第九十九旅的一个营，急急向西南增援第九十九旅，该敌又被我第一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当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守，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这样，战局就可能变得不利于我军。西面运河线上邵伯、乔墅一线战斗十分激烈。乔墅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我主力若在如黄路拖延时日，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起剧变。

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即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九十九旅两个团先行歼灭。8月26日，我们将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十个团的兵力，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九十九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三个团。26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8月23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丁沟、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虽然训练不多，弹药不足，但指挥员顽强灵活，动员工作做得深入，士气旺盛。他们依托工事和水面英勇抗击敌人。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各团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第二十五师猛攻了4天，我军工事大部坍毁，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虽然乔墅被突破，但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两千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26日黄昏时候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遂胜利结束。这是第六次作战。

27日上午，我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15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五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尤多。我第五旅衣服为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兰色不同。而与当时蒋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蒋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欢呼跳跃，随即成了俘虏。第五旅继而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一六〇旅五个连缴械投诚。

如黄路战斗，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表明我们在指挥艺术和作战方法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在“攻黄救邵”的过程中，我军发挥了多种作战形式的威力，以部分兵力顽强阻击，坚守阵地，给主力以行动自由，阵地守备与野战围歼互相协同配合，达到了坚守阵地和寻歼敌军的双重效果。解放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但是，并不排除以其他作战形式为必要辅助。在战争初期，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或者创造有利战机，在某些方面需要打些运动防御战，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不同的作战阶段，以至在不同的战役中注意作战形式的适时转换，互相配合，有主有从，相辅相成，是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方面。

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但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侦察任务。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军委起草的给各大区的电报，指出苏中战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8月26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8月27日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即灵活又勇敢，故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选自《中华英烈》86年4期，作者：粟裕）

材料二　七战皆输
——随同国民党李默庵部进犯解放区的回忆

在抗日战争末期，我做过蒋军第卅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的参谋长；当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大举向苏北解放区进攻时，我担任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先后进驻如皋、东台、盐城，协助李默庵指挥蒋军。

1946年6月间，蒋介石正式命令撤销徐州第卅二集

团军总司令部，调李默庵到无锡接替汤恩伯的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去无锡的前一两天，我同李默庵一起应约到徐州绥靖公署去看新任公署主任薛岳。半个钟头的密谈后，薛拿出一封用牛皮纸大信壳装好的密封文件，在桌上朵了两朵，肩膀耸了两耸，向李默庵和我说："这是我们绥署根据国防部意图拟的一个作战计划，是绝密的，面交李司令官。你们在徐州暂不要打开看，请到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开拆，要绝对保守秘密。"又补充说："同共产党打仗一切军事行动要做到绝对秘密。共产党很厉害，情报很灵活。你们到那边去，特别要注意机密。"说完后，就把密件亲手交给李默庵。这个计划大意是提出进犯苏北解放区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攻占东台、兴化、高邮以南地区，第二步进出盐城、阜宁、淮阴，与由宿迁、涟水方向进犯的蒋军会合。进犯开始时间预定在1946年6月15日。李默庵在常州司令部拿出这个计划研究了一番，并与来司令部见面的各师长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计划大体上是可用的。当时各级司令部各级指挥官对自己部队还有一定的自信心，因为刚抗战胜利，对解放军的力量还没有领教过，甚至是狂妄自大的，如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就常对人说："我的部队没有问题，一个团就可同解放军干一下。"

李默庵在常州组成新的司令部后，便敲起锣鼓，积极做进犯准备工作。此时驻泰县、口岸、宣家堡、泰兴一带的是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驻仪征、扬州、仙女庙一带的是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驻南通观音山、天生港、平潮、白蒲一带的是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李天霞与黄伯韬都先后到常州来晋见新任上司，王铁汉因防务重要不能离开，没有来常州。李默庵和我曾坐一架小飞机到南通去过两三次。在此之前，李曾和伪国防部联络过，准备增调整编第廿一师和交通警察一两个总队接替南通城防，以便把整编第四十九师抽调出来向如皋方面进犯，另外还准备调整编第六十五师到苏北来作战。李默庵和我除往返南通、常州外，还匆忙着跑到南京国防部，见过陈诚、林蔚，并与刘为章研究作战计划，把薛岳原来所定的计划稍微变动了一些。主要是先集中力量把黄桥、如皋、海安、李堡攻占下，与扬州、泰县取齐，把这些地区的交通、通讯、补给搞好后再向北行动。

李默庵准备按预定计划于1946年7月15日正式向解放军进犯。但部队由于运输关系，不能按时调集，故实际不可能准时发起进攻。

7月13日下午3时左右，李默庵在常州司令部突然接到本天霞打来的电话，说解放军正向泰兴城和宣家堡两地进逼，可能先发制人。接到电话后，李默庵未予重视，只是告诉司令部作战处加强联系，注意情况。黄昏时，又接到电话，说解放军已向泰兴城进攻。李默庵问守泰兴城的部队怎么样，李天霞回答说，守泰兴的第五十六团、守宣家堡的第五十七团战斗力都较强，五十六团团长刘光宇打仗有办法。李默庵于是指示这方面情况请李天霞斟酌处理。半夜，接到报告，说解放军攻城益急，并已有一部攻进了泰兴城。这时李默庵渐渐有点紧张，李天霞来电话报告情况时再也不那么轻松。李默庵要李天霞想办法赶紧派部队从泰州出发解宣家堡、泰兴之围，李天霞答应这样办，但时已夜深，部队无法行动，准备等天明出发。结果就在当夜，解放军解放了泰兴城，把守城的蒋军大部歼灭，只有团长刘光宇带着团直属部队和少数残余部队占据城西北角的一所大庙进行顽抗。由于天已大明，解放军消灭该部的目的已达到，遂又主动撤出泰兴。第二天上午李天霞打来电话却夸说解放军已被打退，泰兴城守住了，并大吹大擂地说刘光宇守城有办法。这次战役是李默庵到任后遇到的第一次打击。

解放军进攻泰兴城的时候，李默庵调集进攻黄桥的整编第六十五师还没有赶到，恰值准备运往徐州一带的整编第六十九师戴之奇所辖的第九十九旅（旅长朱志席）由铁道运输路过无锡。国防部打电话通知李默庵，打算命令该旅在无锡下车，由江阴渡江尽先占据黄桥。于是，第九十九旅首先侵占了黄桥，时间大约在七月十五日前后。不久，整编第六十五师六部也到达靖江、黄桥一带。李默庵认为对军事行动已有很大方便，于是便开始向如皋、海安发动进攻。

如皋、海安战役首先发生接触是在如皋东南丁埝、东陈附近，整编第四十九师的第廿六旅首先与解放军发生遭遇战。战斗大约是7月17日开始的。据当时了解，蒋军整编第四十九师分两个纵队沿着南通、如皋公路前进。左纵队是整编第七十九旅（旅长文礼）沿公路西侧前进，右纵队是王铁汉亲率师直属部队和整编第廿六旅沿公路前进。右纵队进到丁埝附近，就遇到抵抗，左纵队进到杨花桥附近也遇到抵抗。17日打了几个钟头没有什么进展。18日继续进攻。李默庵并与南京空军司令部联络，要求派出空军到如皋助虐。第廿六旅在18日早上由丁埝前进不多远就遭反击，不仅不能前进，反被迫在丁埝西面一带村庄就地转为防御。是日夜间，继续受解放军猛攻，伤亡很大，占据的村庄，有的被迫放弃。19日拂晓，该旅阵地又被突破。王铁汉看到这种情况，就想把全师收缩靠拢，命令左纵队第七十九旅向右靠。快天黑时，第廿六旅阵地全部被突破，损失很大，已等于被全歼。七十九旅旅长文礼在电话中叫苦，李默庵要他努力撑住，并注意联系。就这样，第七十九旅又苦打了一夜。到21日下午一点钟，第一〇五旅先头第三一五团由南通赶到战场，增加了新的兵力，22日，该旅主力完全赶到形势才得以扭转。同时，交通警察第七第十一两个总队（每个总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赶到林梓附近的姐儿桥。第六十五师进到贺家坝向杨花桥进攻。蒋军战场兵力逐渐加强，黄桥、南通两方面

兵力接近会师。解放军在23日拂晓放弃对第七十九旅的打击，开始向如皋以北主动撤离。第七十九旅和第一〇五旅便乘机向如皋城进攻，大约在23日下午第七十九旅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如皋城。

蒋军虽侵占了如皋城，但对解放军主力的去向不明确。李默庵估计解放军经过如皋城南地区的战斗，力量已不大，所以一面巩固后方，一面继续向海安进犯。解放军并不打算固守海安，只是以一部分兵力利用海安城堡牵制阻击而已。经过两天时间，8月3日，第六十五师侵占了海安，第一〇五旅侵占了李堡。

李默庵侵占如皋、海安、李堡后，力图巩固，要把后方交通线搞好，储积一些粮弹，同时要把占领地区肃清，所以打算在角斜、李堡、海安、姜埝、泰县一线，布置一些兵力，把这条线以及迤南地区巩固起来，为尔后进攻作准备。同时也认为解放军已向北撤退，一时不会有什么大的积极行动。8月6日，李默庵作了兵力调整。

8月10日19九时，新编第七旅第十九团刚接替李堡防务，警戒还没有派好，工事也没有作好，部队位置也没分布好，突然间发现强大解放军分路向李堡包围。该团团长介景和即向杨家庄第一〇五旅刘旅长告警。刘旅长指示说："如果能固守李堡村庄即竭力守以待天明。否则即向杨家庄第三一四团靠拢，连接三一四团阵地构筑工事，共同防守"。介景和接到指示后，认为夜间转移部队难以掌握，同时他对解放军作战缺乏经验，所以决心固守李堡。半夜23时起，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向李堡发起进攻，经过两三个钟头战斗，该团阵地被突破，至11日拂晓前六时许，全部被歼。随后杨家庄第一〇五旅第三一四团亦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到11日下午两点钟，该团被迫向西南突围，旅长刘玉山率残部逃回如皋城。8月11日4时，新编第七旅黄伯先率廿一团由海安出发向李堡增援，以第一营为前卫，其余按旅部、团部第二营第三营顺序前进。5时，到达立发桥就听到前面有炮声。7时，先头部队即与解放军发生战斗。此时黄伯先还误认为第一〇五旅向海安前进途中与解放军发生遭遇战，故企图夹击解放军，继续急进。12时前卫营到达西场附近被解放军迎头阻击，原来解放军早就在这里设伏等待。随后左侧亦发现解放军，即以第二营向左侧展开进攻，第三营向前靠拢。此时黄伯先与各方面均失去联系，到16时已感到陷于重围，前进不能，后退无路。第七第九两连向西突围，均被解放军打回。17时，解放军发动猛烈总攻，不到一个钟头，第廿一团被全歼。仅旅长黄伯先率残部几百人向南渡过一条小河脱离包围圈，经柴湾方向逃回海安。在这次战役中，新编第七旅的六千多人除旅长黄伯先、十九团团长介景和等高级官员率少数人逃脱外，大部被消灭了。

李堡一战，出乎李默庵意料以外，感到不好交代。大约他在常州司令部向国防部汇报了战况，把战斗失败责任，全部归在新编第七旅身上。但要想惩办新七旅旅长，牵连人事关系较大，毫无处理，又不能立威，乃决定撤办第十九团团长。李堡战役后由于兵力消耗，不敢再事分散，就放弃李堡角斜一带建立整齐线的打算，转以如皋、海安为据点，进行巩固工作。

李堡战役后不到10天，丁埝、林梓又发生战斗。8月21日21时，驻守丁埝的交通警察第七总队和驻守林梓的交通警察第十一总队均先后遭到解放军的突然袭击。交警第十一总队凭借工事进行抵抗。打到第二天下午5点钟，阵地全被突破，部队被解放军打乱，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只得零星向南逃跑。丁埝第七总队也抗拒了一夜，到第二天十点多钟，亦被打垮，只有一个大队（约三百多人）逃往东陈，和驻守东陈的一个大队并在一起。接着又遭解放军猛打，败逃如皋。丁埝、林梓战役和李堡战役一样，均出乎蒋军意料之外，被打垮的两个交警总队，原先自信火力强，又有较强固的工事，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李默庵对这支特种部队也很放心。交警总队被攻击时，我曾与第七总队总队长（忘其名）通电话，他满不在乎，说不要紧，可能打两个钟头就没事了。我也只是当作一般情况报告常州司令部。以后战况转急，电话不通，无线电呼叫也不灵，只好看着他们挨打。

丁埝、林梓战役后，李默庵感到南通、如皋的交通线被打断，如皋城已形成三面被围态势，害怕解放军进攻，便要我转告王铁汉加强如皋城防工事。同时于23日令驻黄桥的整编第九十九旅由黄桥东开增强如皋防守力量。旅长朱志席怕在行进途中受解放军袭击，要求如皋方面派出部队接应。李默庵答应了这个要求，让该旅推迟到廿五日出发，同时命王铁汉统一指挥由海安派出的第六十五师第一八七旅全部、第七十九旅的一个团，和九十九旅留驻如皋一个营，分三路接应。李默庵以为这样布置十分稳妥。8月25日上午，第九十九旅甫离黄桥不远，就遭到解放军突然从道路两侧进攻。此时我在如皋，李默庵要我和第九十九旅电台取得联络。我记得从八点多钟起与朱志席联络，就知道他的部队已与解放军接触。以后每隔几十分钟联络一次，情况一次比一次紧张。到下午两点多钟，朱志席在电话中有气无力地拉长着声音说："哎哟！没有办法呀！"以后再也联络不上了。事后据报，该旅全部被歼，旅长被俘。如皋方面部队，虽分三路接应，但互相未取联系，连通信也没有组织好，行动消极迟缓。原来他们以为只是出来接应一下，没有预计到会发生什么大的情况。王铁汉原没有准备随部队出发，后来得知第九十九旅的危急情况。又收到李默庵要他亲自指挥部队的口头命令（由我转告），才匆忙带第一〇五旅一个团和几个参谋出发，时间已到九点多钟。如皋距黄桥约六十华里，道路被破坏，不好走，王铁汉12时到达距离第九十九旅十多华里的谢家甸附近，前线传来的枪炮声已可听到。正在这时

他们突然受解放军猛烈袭击，不仅不能继续西进执行支援任务，而且泥菩萨下水，自身难保。开始我还同王铁汉能通话，不久联络也告中断，我只好在如皋干着急。李默庵在常州也急得跳脚，不断打电话要我告诉王铁汉放胆前进，不要迟疑，可是我无法将他的指示转达。结果王铁汉所带的接应部队，也被解放军打援部队搅得稀乱，溃成若干小股，只逃出来一部分。王铁汉本人一度被解放军抓住，乘夜间混乱才化装逃脱。他于25日半夜以后逃到如皋城附近，曾慌忙同我通了一次电话。当第九十九旅被围攻之时，常州司令部曾急调驻扬州的整编第廿五师一个旅，想以汽车输送增援。但援军未到，第九十九旅已先被歼。这次如皋黄桥路上的战役，李默庵可谓智穷计尽。

在李默庵受命对苏北解放区进犯中，人民解放军作战完全是根据毛主席军事思想，重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从本质上看，解放军是七战七捷，蒋军是七战七败。至于这七战七捷，加强了人民战争的信心，提高了战争艺术，其意义就更加深远了。

（选自《中华英烈》86年4期，作者：原蒋军李默庵部办公室主任罗觉元）

材料三　首战宣泰

泰兴为长江沿岸的一个县城，位于苏中解放区的南端，有七米高的城墙，外有30米宽的护城河，工事比较坚固，驻扎着敌整编83师19旅57团，宣家堡为泰兴以北的一个小集镇，镇南、西、北三面环水，街中有大河横贯，四周有土圩和高楼，驻扎着敌人19旅的57团及旅属山炮营。这整编83师原番号为第100军，是蒋军嫡系部队，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战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缅甸作过战，战斗力较强，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曾吹嘘：“如果共军能打下宣家堡，那么他们就可以倒扛着枪，一弹不发进南京了。”敌人的这一弱点正显示了我军的可击之外。粟裕司令员在启发参战部队的负责同志时说：“敌人四路而来，拉开架子要和我们拼消耗，我们恕不奉陪，专打它一路。敌人12万人马进攻我们3万多人，是四打一，我们这样一来，还它个六打一！这是初战，必须打好。”

为了确保首战的胜利，我华中野战军，集中了2个师，1个纵队和1个军分区共2万5千余人，由第1师、第6师分别围歼宣家堡，泰兴之敌，第7纵队负责打击泰州，姜堰增援之敌，第1军分区的部队监视和阻击可能支援的白蒲之敌。

7月13日拂晓，第1师从如皋城出发，向宣家堡方向开进。一路上群众敲锣打鼓，端茶送水，夹道欢送。有的老大爷熬好绿豆稀粥，用碗盛上，端到战士们的面前，有的老大娘把煮好的鸡蛋一个劲地往战士口袋里塞。乡亲们一再嘱咐，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多捉俘虏多缴枪。战士人们在人民群众的热情鼓励下，斗志更加高昂，决心坚决彻底消灭敌人。来报答解放区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殷切希望。

经过120余里的急行军，1师各旅团都秘密到达了攻击出发地，隐蔽待命，并迅速完成了战前准备。

当晚9点，宣家堡方向的战斗打响了。激烈的枪炮声象炸了锅似地响起来，爆炸的火光一闪一闪，不时传来一阵阵山呼海啸般的喊杀声，接着又象退潮似地落了下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艰难。

在1师3旅8团的阵地上，这天晚上月明如昼，能见度很好。敌人象是故意显示他们美式装备的力量似的，什么火器都用上了，从土木工事密密层层的枪眼里发射的机枪火力，又密又急，象泼水一样，一刻不停地向外倾泻，各种口径的炮，甚至连山炮也用上了。炮弹和机枪火力一道，在前沿上腾起了一堵火墙，拴住了我们的攻击部队，部队已经发起了二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战士们都恼红了眼，这时有个绰号叫“小钢炮”的连长，提着驳壳枪，跳到陶勇副师长面前嚷道“副师长，你批准，我带突击队，硬拼也要拼上去。”但陶勇同志认真分析失利原因，原来宣家堡守敌已由一个营增到一个团，8团仍按原定打一个营的作战方案，显然是兵力不够。于是立即命令8团“停止攻击，重新部署，集中兵力，明晚再干！”

第二天晚上，陶付师长决定改变了打法，8团仍从东面攻击，9团1营攻击南面，而以7团在西北面担任主攻。战斗开始，敌人仍在东面扭住8团，以为主攻方向在8团，而西北方向，由于河沟环流，地势起伏，又是敌人的侧后方，所以敌人只设置了两道铁丝网，这是敌人的薄弱点。当东、南两个方向的部队同时发起攻击后，敌人只顾应付东面，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军的主要矛头会指向西北方向。只见7团阵地排炮怒吼，敌阵地上硝烟弥漫，碎石纷飞。2营4连担任突击队的勇士们，隐蔽地接近了敌人前沿阵地，待炮火一延伸，就以勇猛果敢的动作，挑开鹿岩，砍断铁丝网，向敌人的阵地冲击，倾刻间占领了外围工事，但后续部队被敌人地堡里的轻重机枪火力封锁了道路，前进受阻。

这时，4连战士刘正刚，迅速从侧翼迂回接近敌堡，双手抓住敌人正在发射的轻机枪管，不顾灼痛，使劲摇晃，破坏其射效，接着另一名战士冲上去，向里投入手榴弹，消灭地堡内的敌人，另外几座地堡同时也被爆破组炸毁。部队乘机发起冲击，一阵手榴弹打过去，冲上敌人的阵地，去交通壕里与敌人展开了搏斗，突破了前沿阵地。

敌人见我军从西北角突破了前沿阵地，慌了手脚，急忙调动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疯狂地反扑，企图夺回阵地。战士们英勇顽强以围墙和房屋为依托，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格斗，敌人队形密集就用排

子手榴弹打，进至眼前就用刺刀拼。6连连长赵勇左腿和右膀两处负伤，仍然指挥全连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道。

与此同时，各部队也都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于15日3时发起总攻，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宣家堡四周几百米的地段内，完全形成火龙，敌人的暗堡，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飞上了天空。战士们呐喊着、射击着，从不同方向一齐扑向敌人，扑向宣家堡的中心，一举攻入镇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与敌人争夺每一段交通壕，每一个地堡，每一间房屋，每一堵墙……。在我三面猛攻下，守敌乱成一团，纷纷向西南方向突围逃命。一师各部遂即追赶堵截，将敌全歼于运动之中。

当启明星高高挂在天空时，令人兴奋的消息终于传来。宣家堡守敌，国民党的嫡系第83师第19旅第56团及山炮营被我军彻底歼灭。生俘敌少将团长钟雄飞以下3千2百余人。

泰兴方面是以6师第16旅48团主攻南门，另两个团在泰兴东南的张家桥，大生桥地区，阻击可能由靖江、天星桥来援之敌。以第18旅52团突击小西门，一部在大西门助攻，以53团突击北门，一部由东门佯攻，以第54团位于七星庙阻击可能由口岸东援之敌。

13日晚21时，进攻泰兴的战斗打响了。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十分惊慌。战至14日晨，6师就扫清了外围，逼近城垣。城内的敌人依靠城墙进行顽抗，大炮，机枪从城头上向我们猛烈地轰击、扫射。

傍晚时分，泰兴城显得异常平静。17时30分，我军炮兵突然开火。一排排怒吼着的炮弹倾泄到敌人阵地上。此时，敌人发现我炮兵向前推进，就用机枪火力疯狂地射击，并连续投掷手榴弹，其中有两名炮手中弹牺牲。同志们高喊着："坚决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复仇"的口号，以更准确更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首先摧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接着集中火力炮击城墙，打开缺口，扫清了步兵前进的障碍。18时，第48团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怒火燃烧着战士们的心，个个磨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过城墙。1连以勇猛迅速的动作强渡护城河，仅用20分钟就打开并占领了突破口。1机连班长、战斗英雄胡宗林同志带病参战，用重机枪掩护步兵冲击，并随突击班登上城垣，击退反击之敌，掩护连营向敌纵深发展进攻。该团3营几乎同时突破城墙，迅速向敌纵深穿插。团二梯队第2营由突破口进城，向东门攻击前进，以割裂敌人的战斗部署。

夜幕降临了，枪炮声震憾着泰兴，硝烟笼罩着全城，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我第16旅48团进展顺利，但18旅进攻受挫，被阻于护城河外。师部立即令第48团向纵深猛烈发展，策应第18旅攻城，令第18旅继续组织攻城。这时，该旅52团认真总结两次攻城失利的经验教训，重新确定了新的攻城方案，并组织了突击队。经过紧张的准备，部队在当夜10时左右第3次发动攻击。首先用迫击炮送炸药包轰击城墙城楼，然后架在高房上的六挺重机枪一并开火，只见城墙上火光闪闪，碎石飞扬，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嗷嗷哀叫。高大坚固的城垣，被打开五米宽的缺口。架桥组在火力掩护下，跳入河中迅速架起人桥，架梯组从人桥上跑步通过护城河直扑城墙，当六个梯子刚搭到城墙上，52团于大毛参谋长就亲自指挥突击队开始登城，只见突击队在"豹子头"徐长元队长的带领下就像离弦之箭，沿着梯子跃上城头，顿时城墙上腾起六条蛟龙。忽然，城垛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只见"豹子头"徐长元端着机枪一阵横扫，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接着，全团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城内。这时53团也乘机突破北门，并向城中发展。15日凌晨4时，16旅47团入城参战，经过激烈战斗，至15日下午，泰兴之敌一个团基本被我歼灭，只剩下团部一、二百名残敌退守庆云寺负隅顽抗。华野首长果断决定：6师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残敌，造成敌人错觉，使其误认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主力则立即挥师东进，另选歼敌战机。宣泰战斗遂告胜利结束。

宣家堡、泰兴战斗在不到60小时的时间内，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6团全部，第57团大部及旅属山炮营全部，共约3千余人，缴获山炮十余门，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大批美械装备。取得了苏中首战胜利，挫折了敌人骄狂的气焰，使我军军威大振，提高了解放区军民自卫作战的信心。

（选自《百战图》，作者：杨设平）

材料四　奇袭李堡

我军撤出海安后，敌军第65师、第105旅，新7旅争先拥进海安，由于敌军进入我解放区后已处于瞎子，聋子的状况，加上敌军官纷纷报捷，极度夸张地吹嘘"战果"，国民党第一绥区司令部竟未发现我主力第1师，第6师已经转移，却得出我军伤亡人员二、三万人的"报捷"向上邀功，并狂妄宣称"苏北共军大势已去"，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实现，各守备部队即行分兵"清剿"以巩固其占领地区。

敌军占领海安后，又大肆分兵，占姜堰、西场、丁家所、李堡一带……，并在西起扬州，东止海边，3百里的地段上，摆开了一条长蛇阵。这样战线一拉开，就造成了有利于我歼敌的势态。长蛇阵的东端就是李堡，这个镇子南北无靠，翼侧暴露，孤零零放着105旅旅部及314团。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华中野战军首长当机立断，决心以第1师攻歼李堡、角斜之敌第105旅主力，以第6师第16旅攻歼丁家所敌第105旅一部，第18旅位于西场南北地

区,配合在贲家巷东南地区的第7纵队合力歼击海安东进之敌新七旅,并阻击如皋可能出援之敌。

8月10日,利用李堡敌人与海安敌人开始调防,交换之际,我1师从驻地三仓河悄悄地向李堡进发,准备以突袭的手段,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一路上避开大路走小径,急行军50余里,傍晚到了李堡外围。

时近午夜,星斗满天,1师对李堡守敌突然发起攻击。只见同志们的左臂上扎着一条白毛巾,宛如脱离了弓弦的利箭,快步如飞地向敌人冲去。

3旅的7团、8团、9团及1旅3团,从李堡的北、西、南三面对守敌展开了进攻,1旅的1团、2团向李堡东侧的蒋家庄、杨家庄的敌人发起了进攻。1旅3团到达李堡东侧迂回到位于角斜方向敌军事前哨时,敌人还未发现。突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全部活捉,逼敌供出口令,令其带路,我军乘机杀入敌阵。整个李堡的四周都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响声酷似那年三十晚午夜的爆竹声,十分激烈、震耳。敌人4次组织猛列反扑,均被击溃,伤亡惨重,被迫退回李堡。第3团继续穷追猛打,于11日拂晓突入李堡西头,冲进旅部。此时,3旅一部也突入李堡内,与敌展开近战搏斗,敌在我军多路围攻下,弃尸遍地,仓惶逃至杨家庄,蒋家庄。

杨家庄的守敌为105旅314团。1师第1团、第2团对杨家庄、蒋家庄连续两次攻击均未得手,11日上午,李堡被我军攻破,杨家庄守敌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3时,第1团发起第3次攻击,第3团在北面策应。14时许杨家庄之敌2千余人和西南方向突围,我截击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密集的火力打击敌人。敌仅第105旅旅长率百余人漏网,其余被全歼。

我6师受领任务后,迅速向作战地区开进。以第18旅第54团一个营扼守陆家尖,担任正面阻击,以两个营和第52团埋伏在陆家尖以西,公路以北,与公路以南的串场河构成袋形阵地;以第53团为预备队,配置于西场东北,顾家庄以东地区。部队全部隐蔽在民房和青纱帐内,对外封锁消息。并向广大战士作动员,要藏好,要冷静,待敌人钻进口袋里再打。至此,一切准备完毕,只等敌人进袋了。

由于我军在各个地区的攻势迅猛,敌人顿时乱作一团,通信联络瘫痪,海安的敌人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11时上午9时,敌新7旅旅长率第21团按预定计划,大摇大摆地向李堡开进,中午就进入了我军伏击阵地,第54团当即迎头痛击,第7纵队第57团抢占立发桥断其退路。敌遭我突然打击,混乱异常。此时,第52团和第54团两个营猛烈出击,一举将敌包围并分割成数段,使其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17时,第6师及第7纵队对敌发起最后攻击,仅半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全歼敌第21团。敌旅长黄伯光率残部3百余人乘隙渡河向柴湾方向突围逃脱。

李堡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在海安与我军决战和完成东西封锁线,巩固占领区的企图。这一仗前后仅30小时,总计歼灭国民党军新7旅全部,第105旅旅部及第314团,俘虏第105旅旅长金亚安,新7旅副旅长田云从以下5千余人,毙伤3千余人,我军伤亡9百余人。

(选自《百战图》,作者:杨设平)

材料五　如(皋)黄(桥)路大捷

为了粉碎敌对邵伯的进攻,并着眼于歼灭其有生力量,华中野战军除了以第10纵队等部坚守邵伯外,于丁、林作战结束当天(8月23日)晚上,即以主力第1师、第6师和第5旅,特务团等部,越(南)通(赣)榆路西进,准备攻击黄桥、泰州,直接策应邵伯方向的防御作战。同时,以第7纵队钳制海安、姜堰地区之敌。

第1绥区司令李默庵既未发现,也未料到我军主力西进,而错误判断我军将乘势攻取如皋,急令黄桥地区的第99旅向如皋增援。

24日,我截获敌这一行动情报后,华野首长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决心在如黄路与敌第99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歼敌于运动中。

6师在行军途中受领了与敌打遭遇战任务后,采取了边行军,边布置,完成了战斗准备,其部署:第16旅在左,第18旅在右,沿如黄公路及其以南地区,秘密迅速地向黄桥开进,第16旅以第46团为前卫团,一旦与敌人遭遇,即拖住敌人,掩护全师展开,第47团,第48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并由侧后攻击敌人,第18旅则将敌迎头截住,主力迅速向敌两翼展开,拦腰攻击,边割边歼。

25日上午,16旅前卫团46团利用青纱帐,秘密迅速运动到卢家村时,发现敌人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沿公路向东开进,先头部队已越过分界。该团即以前卫营由卢家村向分界攻击前进,以拖住敌人,掩护主力展开,团部率主力沿蒋家庄,张家厂头猛插钱家庄,断敌后路。18旅前卫团第52团在分界以东,与敌99旅相遇,他们迅速抢先占据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先敌开火,先敌冲击,使敌人措手不及,遭到迎头痛击。但由于敌人是以临战队形部署的,这种部署称"铜头、铁尾、烂肚肠",即首尾比较翼侧为强,所以迎头堵击战斗打得很艰苦,部队伤亡较大,敌除稍向后缩以外,未呈紊乱状态。这时6师即采取堵头,击尾战术。16旅46团与18旅52团,两个团南北对击,拦腰突击,取得了很好效果,打得敌人建制混乱,动摇畏缩,被迫向大小界沟,东西分界退缩。与此同时,16旅47团、48团主力以青纱帐作掩护,沿水网地跑步10余里,迅速经东宫庄与南刘家堡插至敌后,占领小二房庆、北刘家堡,从北面和西北方向对敌实施包围。接着6师又以第

16旅第46团、47团、48团各一个营的兵力，由分界以西向东攻击。以第18旅第54团及第52团一部由大小杨庄，马家仓往北攻击，以53团由大小界沟以北向南攻击。南面为一条大河，阻住敌人的退路。敌为逃避被歼的命运，不顾伤亡，连续向16旅反冲击，以图突围，遭到第46团第3营有力反击。该营8连机枪手陈瑞林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歼敌二百余人，战后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激战至当日19时，由于兵力、火力不集中，各路协调不密切，只将敌人压缩于东分界、杨家岔、沈家港、荡里、大小界沟之狭长地区。这时敌企图转入防御，固守待援。

在这种状态下，华野首长立即调整了部署，采取断敌后路，割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方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并从1师调1旅（三个团）加强分界地区，加之6师6个团和野司特务团。一共是10个团，而敌99旅在分界地区只有2个团，这样就形成了五打一的绝对优势。野司首长称这叫雷公打豆腐，先打掉南面，再集中力量消灭北边。

雷公打豆腐，豆腐当然就经不住打了。26日，集中在分界地区10个团的兵力，于午后1时整发起总攻。正当全体指战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说来凑巧，正在这时，一片乌云铺天盖地而来。顿时下起倾盆大雨，使敌人的飞机不能临空，为我军解除了空中之忧。敌人失去了空中支援，士气倍加沮丧，而我们部队如虎添翼，斗志更加高昂，士气更加旺盛，英勇顽强。战斗一开始第48团就迅速突破了敌人防御，15分钟左右即攻占了敌核心阵地，敌山炮营原地未动即被俘获。47团已从中间突破，46团从西南突破。瞬息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当时，许多敌人还在睡觉，有的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提着裤子就跑，有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就举起了双手，乖乖地缴械投降了。第52团利用青纱帐隐蔽接敌，以迅速的动作突入分界，指战员们端着刺刀冲上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刹时间敌我形成胶着状态，只听得战士们的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和敌人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敌人一个个的应着战士们的杀声倒下，田野里，大路上横七竖八地倒着敌人的尸体，指战员们越战越勇，有的负伤仍然坚持与敌人拼搏。该团一营副营长鲁国成，这个当年威慑日军的刺杀能手，虽然不久前在杨花桥战斗中左手负伤尚未痊愈，但他仍然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向敌人，一连刺死4个敌人，这时他累得浑身冒虚汗，又有两个敌人从他身后扑了上来，他霍地转身向一个大个子敌人猛刺一刀，不料却被另一个敌人同时刺中了右胸，鲜血涌出，鲁国成圆瞪双眼，咬紧牙关，忍痛拔出刺刀又向另一个敌人刺去。在他刺倒第六个敌人时，已经精疲力竭，又上来两个敌人向他连刺两刀，我们这位刺杀英雄倒在了血泊中……战士们高呼“为副营长报仇！”经过激烈拼杀，沿公路向东西逃窜的敌人大部被我歼灭。

在分界被突破之际，有近千名敌人夺路南逃，紧靠如黄公路南侧，有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河流，南逃的敌人越桥逃命，正好进入1师1旅布下的口袋阵地中。第3团参谋长黄竟同志即率第2营迎头拦击，第1营向敌队形之腰部和尾部出击。各分队勇猛分割穿插。在倾盆大雨中作战，眼睛都睁不开，双方混战在一起。第3团5连1排排长，战斗英雄殷国泰带着一个通迅员冲到一个大水塘边，见水塘里有一百多个敌人在那里。殷国强临危不惧，端着一支汤姆枪命令敌人放下武器。混乱中的敌人被这突然的喊声吓呆了，不知面前有多少解放军，只好乖乖放下武器，殷排长命令他们卸下枪栓，每五根枪捆在一起，他俩俘虏敌人一百多名，缴获电台一部，还有几挺机枪。敌人在我猛烈打击下，完全被打懵了。东边枪响向南跑，南边枪响向东跑，包围圈越缩越小，我军越打越猛。顽抗的枪下毙命，缴枪的宽大处理，敌人很快被瓦解了。此时53团、54团也分别攻入了荡里和杨家岱，下午2点战斗胜利结束。

由如皋守敌第187旅，第79旅的1个团和第99旅的1营分三路向西接应黄桥的第99旅。在25日上午到达加力、谢家甸一线被华野1师3旅截住，当时在最前面的3旅7团1营，敌人不明虚实想闯过去，到处攻击前进，一直打到我营部门口，机枪子弹打得战士们头也抬不起来。当时的情况比较乱，部队还未到齐，幸亏第5旅来得快，及时插至如皋以西葛家庄，十里墩，阮家庄，邱庄一带，切断了敌回如皋的退路，并准备阻击如皋继续出援之敌。5旅第13团插入谢家甸东北姚庄，向敌逼近，并于当晚与第1师共同完成对谢家甸之敌的包围，第14团插入谢家甸以北，协助1师攻击被围之敌；第15团进至十里墩一线阻击如皋出援之敌，并作为旅之预备队。当晚1师3旅发起攻击，歼敌1个营。第5旅经过一夜的努力，全部完成了对敌的包围。

8月27日上午10时，如皋守敌获悉派出的接应部队被围，又出动了一个团前来增援。敌人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在十里墩一线向第15团第2营阵地发起冲击。尽管敌人气焰嚣张，但第2营的指战员为围而不战早就憋着一股劲正愁无处发泄。他们等到敌人进到阵地前沿三、四十米左右时，全营一齐开火，以短促火力迎头痛击，第1营也随着投入了第2营阵地的战斗。经过30分钟的激战，第15团将窜入阵地的敌军一个营大部歼灭，残敌于当天中午仓惶退回如皋。

这时，谢家甸被围之敌更加慌张，当即以营为单位分头向如皋方向突围。第14团迅速插入到敌人突围的主要方向上，在十里墩西南公路两侧构筑阵地阻击突围之敌。谢家甸突围之敌离开了原来固守的村庄后，遭到了6师第18旅的追击和包抄，队形混乱，垂死挣扎。

敌第187旅的一个前卫营沿着公路向如皋方向突

围，恰好被插至如皋西南的第5旅第14团截住。第5旅部队穿的是黄色军装，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的黄绿色军装相似，当第14团向敌前卫营迅猛出击时，敌人还误认为是如皋的援兵赶到，顿时欢呼跳跃，却万万没有想到在兴高采烈中都当了我们的俘虏。后面的敌人明白前卫营上当后，丧心病狂，准备孤注一掷，以3个多团的兵力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向第14团阵地强行突围。

敌人在督战队和军官的威逼下，如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向第14团阵地前沿猛扑，妄图夺路逃命。第14团指战员虽然用猛烈火力予敌大量杀伤，但仍有部分阵地被敌突破。这时，第14团一面继续稳定阵地，一面组织部队由两侧对突围之敌进行全面出击，直至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打乱敌人的队形，并歼灭部分突围之敌。与此同时，第13团迅速出击，迫使溃敌绕道向第15团阵地方向逃窜。第15团一面应付敌援兵的攻击，一面将逃窜之敌堵住。就这样全部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将突围之敌分割于谢家甸东北野外的庄稼地里。

将敌分割后，我军力求歼敌于野外，就在此刻，掩护突围的敌机不断地俯冲扫射，对出击部队威胁很大。第13团从俘虏中迅速弄清了与敌机联系的对空联络信号，大家马上把洗脸的白毛巾扎在胳膊上，并用两幅红色和黄色的布条交叉举起来。敌机飞得很低，看到联络信号和第5旅部队的黄军装，误以为是自己人，立即停止对地面扫射。第13团4连抓住时机，出其不意，用步机枪集中火力对空射击，当即击落敌机一架。其余的纷纷逃走。

为了尽快歼灭谢家甸野外被各个包围的敌人，趁其立足未稳，一股作气，发起猛烈攻击。负隅顽抗被击毙在水里成了“死鬼”，其余的也都在水沟里成了落汤鸡，当了俘虏。这时第14团第6连在打捞河沟里武器时，发现芦苇里一顶草帽下面有动静，大家跑过去一看，露出水面一个黑脑袋又钻向另一处，一下子引起了战士们的兴趣，大家两边拦截，终于从水里拖出一个身佩左轮手枪的“大胖子”。一审问，原来是敌第187旅少将旅长梁采林。

战至8月27日17时苏中战役的最后一仗——分界。加力战斗，宣告胜利结束。此战斗共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我伤亡三千五百余人。

（选自《百战图》，作者：杨设平）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占领安东、通化、辑安等地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继续实现“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于十二月集中其主力向临江地区进犯，同时加强松花江南岸各要点的守备。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扭转东北局面。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军以六个师的兵力，由辉南、通化、柳河、宽甸等四个方向对临江实施进攻。坚持在临江地区的南满部队，以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方针，歼敌有生力量。十八日，以第四纵队深入敌后，直插本溪、抚顺之间和宽甸以东地区，实施外线作战，分散国民党军的进攻力量。经十余日转战，先后攻克据点二十余处，歼敌三千余人，威逼沈阳，迫使敌人从前线抽调两个师回援。第三纵队于次年一月四日开始向通化、辑安一线反击，先后歼敌各一部，余敌窜回通化。同时，在北满的解放军主力，为策应和支援南满作战，冒着零下四十度严寒，于一月五日，第一次南渡松花江，先后在其塔木、焦家岭、城子街等地，歼敌各一部，迫使敌人调回准备进攻南满的三个师北援。十九日，北满部队主力撤回江北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第一次进犯临江的计划被粉碎。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敌兵分三路再次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当中路敌第一九五师进至通化以北地区，处于孤立突出的位置时，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一部迅速出击，歼敌一部。随后，乘胜转移兵力于三源浦，又歼敌一部。接着，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宽甸、辑安一线出击，歼敌一部，并进占桓仁县城，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队作战。至此，国民党军第二次进犯临江地区又被粉碎。

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再次集中五个师的兵力，分数路对临江、长白山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十八日，敌暂编第二十一师一部兵力进至通沟、鹿尾林地区，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实施迂回包围，歼敌一个团，并向大北岔地区急进，将中路进攻之敌包围，战至二十二日，在第四纵队一部配合下，歼敌第九十一师、第二师各一部。并先后收复金川、辉南、柳河、辑安等城。同时，第四纵队一部由桓仁以南再次向抚顺、本溪挺进，突破层层封锁，转战沈安铁路线两侧，拖住敌人，策应了正面部队作战。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二月二十一日，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以十二个师的兵力，再次渡过松花江。二十三日，第六纵队以奔袭手段歼灭城子街守敌一个团。二十七日，第六纵队与独立第二师围攻德惠，第一、第二纵队及独立第一、第三师在德惠、九台间打援。国民党军为解德惠之围，从南满、西满及长春地区急调十二个团的兵力北援。至此，国民党军第三次进犯临江地区遂告失败。北满部队于三月二日撤回江北，增援德惠之敌新编第一、第七十一军，乘机继续北犯，其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已进至松花江北岸。北满部队乘敌分散，于三月八日三下江南对敌进行反击。先后在靠山屯、郭家屯围歼敌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敌人仓惶从热河、南满抽调第五十四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北

援。因敌兵力集中，不易分割，北满部队遂于三月十六日第三次回师江北。

三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又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第四次进犯临江。南满解放军以一部兵力抗击两翼敌人，集中主力歼其较弱的中路。四月一日，第四纵队以一部将中路之敌诱至三源浦西南红石砬子地区。隐蔽于三源浦地区的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一部，于三日拂晓对敌发起猛烈攻击，经十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副师长以下七千五百余人。中路敌被歼后，左、右两路纷纷撤退。至此，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四次进犯又被粉碎。

此役历时三个半月，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四次进犯临江，共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镇十一座，巩固了南满根据地。

材料：

· 扭转东北战局的关键性战役

材料　扭转东北战局的关键性战役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临江位于长白山南麓，是鸭绿江畔的一座小县城。地处偏僻山沟，山地荒芜，人口稀少，物资奇缺。但在1946年的冬天，却挤满了我南满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正面是气势汹汹的敌人，背后是长白山山脉的原始森林，侧翼是隔江相望的朝鲜。或撤或留，放弃南满还是坚持南满，已经到了最后决定南满命运的关键时刻。

这时，敌军正向临江地区猛扑过来，情况日益危急。在这乌云密布，形势十分艰险的情况下，为了统一南满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确定正确的斗争方针，1946年12月10日在七道江召开部队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就南满的形势及作战方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到北满去？如果坚持南满，是集中兵力，积极防御，还是分散兵力消极防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在去留攸关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作战问题更难确定。12月13日晚，陈云同志冒着大风雪连夜赶来七道江，在耐心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后，精辟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权衡了"去""留"的利弊，高度地估价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战略意义。他指出：南满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持南满，可与北满成犄角之势，牵制敌人的大批部队，使其不能集中力量进攻北满。相反，如果放弃南满，不仅失去了这个有利的态势，而且我军的损失也不一定比留在南满少。陈云同志把去和留的问题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追过来，还要打仗，又要损失几千人。早晚有一天，我们还会打回南满去。在这些战斗中，以前在南满撤下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1万多人。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况且敌人在南满的兵力也不足，我们坚持南满斗争完全是可能的。陈云同志的精辟论断，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纪正了党内存在的错误观点，最后确定了坚决坚持南满，保卫长白山，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宽桓凤赛、沈四梅地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会议还决定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外线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术思想及东北局的指示，以第3纵队在正面防御，第4纵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集中打仗，分散作群众工作，变敌人后方为战场，前后紧密配合，消耗与消灭敌人。

七道江会议作出的关于坚持南满的决定，是以陈云、肖劲光为首的南满分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决定，是从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东北战场上最艰难的时期及时作出的正确而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挽救了南满的危局，极大地坚定了南满党政军民的革命斗志，大大地鼓舞了胜利信心。"生在辽南、战斗在辽南，胜利在辽南"的战斗口号，成为广大干部、战士坚持斗争的决心和行动。四保临江战役，就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展开的。

一保临江，首战告捷

1946年12月17日开始，国民党集中6个师的兵力对我临江地区发动了首次进犯。以第60军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各一部。从辉南、金川向蒙江（今靖宇）地区进犯；以新编第1军新编第30师、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从三源浦、柳河、山城镇以东地区企图迂回八道江；第52军第195师从通化地区向八道江、临江方向进攻，其第2师除留第6团守备宽甸外，主力攻占辑安，并沿鸭绿江西岸向临江方向进攻；第71军91师配合第2师攻占辑安后，准备进占六道门、杉松窝，经三道阳岔迂回八道江，尔后向临江方向发展进攻。

我军当时坚持临江地区的部队，仅有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师），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2师）和辽东军区独立第2师。南满军区（辽东军区改为南满军区）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只有采取勇敢的进攻才是胜利之道"的指示，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4纵队（欠第36团）深入敌后，开辟新的战场，破坏交通，拔据点，断粮草，调动敌人，配合内线作战。

第3纵队配属第4纵队第36团，在敌人进攻的正面蒙江、临江、长白，抚松地区实施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寻求

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

与此同时，为策应和支援南满我军作战，北满我军集中第 1、2、6 纵队共 12 个师的兵力，于 1947 年 1 月 5 日，南渡松花江，展开巨大攻势，使敌人首尾难顾，不得不放弃了对临江的进攻。

一保临江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天寒地冻，风雪弥漫，许多战士连棉鞋、大衣、被子都没有，很多同志穿着夹鞋在深雪中行军，鞋袜和脚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大多数同志没有棉衣、帽子和手套，冻伤多于枪伤，小荒沟战斗，一仗就冻伤 400 多人。吃的是冻得硬梆梆的苞米饼子，渴了也只能抓把积雪吃。但广大干部战士斗志昂扬英勇奋战。部队行军作战 19 昼夜，作战 43 次，战胜了严寒与优势的敌人，歼敌 5000 余人。

一保临江告捷，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士气，保卫了长白山根据地，使南满斗争由敌进我退变为敌我拉锯的形势。

二保临江，战果辉煌

敌人首次进犯临江失败以后，更感受到南北两面夹击和后方不安全的严重威胁，急于首先解决南满问题。第一次进犯临江计划被我粉碎后不到 10 天，又调整部署，集中美械化装备的 4 个多师的兵力，在赵公武的指挥下，于 1 月 30 日，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以主力经高丽营子迂回八道江，尔后进攻临江。

南满军区领导在详细分析敌人的态势后认为：敌 195 师孤军深入，侧后完全暴露，增援兵力不大，暂 21 师增援可能性小，第 2 师和新 22 师增援需要 3—5 天时间。为打破敌人进攻，力争全歼该敌并围打通化、柳河来援之敌，决心抓住时机，集中第 3 纵队全部歼灭 195 师于高丽营子地区，突击点选在敌人的侧后，同时切断敌人退路。各部队 2 月 2 日到达集结位置，5 日拂晓向敌发动攻击。那时天气奇冷，大雪没膝。既开不动汽车又骑不了战马，军区肖劲光司令员踏着厚厚的积雪到第 3 纵队指挥所，并和纵队指挥员一起到高丽营子 地区勘察地形，选择战场，亲临一线指挥战斗。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战士们虽然爬冰卧雪，忍受饥寒，但是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打退敌人进攻。

为配合第 3 纵队作战，第 4 纵队 10 师积极向通化压缩，使国民党军第 2 师、22 师不能北援，保证了我第 3 纵队各部的背后安全，有力地配合了高丽营子、三源浦歼灭国民党军的作战。

二保临江历时 9 昼夜，歼灭敌自称为“常胜军”、惯于长驱直入的 195 师大部，新 6 军 207 师第 3 团（缺 1 个营）及保安团队一部共 5170 余人，粉碎了敌人第二次进攻临江的计划，控制了通化、柳河之间地区，开辟和扩大了我右侧翼机动作战地域，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再次保卫和巩固了长白山根据地。

三保临江，战局好转

2 月份东北大地景象，真是银装素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茫茫大地，一片雪原，只有冒着缕缕青烟的地方，能望到稀稀疏疏的村庄，呈现着一片的寂静。部队构筑的工事，蜿蜒地环绕着一座座高地，群众拖着爬犁，顶着木桶给部队送水送饭。各部队正在进行着各项战斗准备工作，总结上次作战经验，掀起学习战斗英雄王永太的热潮，学习军区关于“瓦解敌人，宽待俘虏，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正处在战斗前夜的军民密切配合，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

两战两胜，南满情况已在发生变化。敌人连打败仗，迭遭歼灭性打击，大量部队被钳制担任守备，机动作战兵力有限，兵力更加不足，新兵增多，士气低落，战斗力降低，官兵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力，屡出差错，相互埋怨。杜聿明见我军越来越强，急于拼凑东北现有所能机动的兵力，乘我北满一下江南暂告结束之际；亲自指挥，准备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

南满我军经过两次保卫临江胜利作战，连打胜仗，补充装备了自己，开辟了通化南北两侧战场，群众觉悟提高，兵员、粮源、弹药供给有了改善，增强了胜利信心，战斗力获得了锻炼提高，士气高涨。肖劲光司令员和肖华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亲自看望了部队，视察了阵地，部队战斗情绪非常旺盛，战士们喜悦地说，老将军亲自指挥，我们又要打大胜仗了。

2 月 13 日，杜聿明亲自出马，指挥 5 个师分四路向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敌第 71 军 91 师由四平经梅河口、山城镇进至杨木桥子、大北岔一带，迂回大荒沟，企图向我八道江实施主要进攻；敌 52 军第 2 师至高丽营子、大龙爪沟门一带，协同 91 师进攻八道江；新 6 军第 22 师占领热闹亍，企图经六道沟门，向八道江、临江迂回，以保障进攻集团右翼安全。第 60 军暂编 21 师主力到达通沟；195 师残部仍守通化并相机配合行动。敌东北长官部指挥所设于通化。

南满军区根据中央军委 2 月 10 日关于集中两个纵队（4—5 个师）在一起作战有利的指示，认真地分析了当前敌人态势，认为：正面敌 91 师、2 师战斗力强、兵力多，纵深有 195 师及新 22 师可随时增援。但敌人侧翼暴露，我侧翼有机动作战地区。因此决定，先打敌侧翼的暂编 21 师，争取打胜；然后再打敌 91 师主力，先拦腰切断再打其侧后，乘胜向柳河、金川发展。第三步视北满主力作战情况，再扩大战果，向通化、兴京、桓仁间发展进攻，以围城打援办法，求得在松花江结冻前，积极歼灭敌人，收

复几个城市，拖住敌人，改善南满局面。遂令 3 纵 7 师、9 师执行围歼任务。我 7 师、9 师受领任务后，以神速准确的行动进入预定阵地，将 60 军暂编 21 师 2 团及山炮营全部包围。18 日凌晨 3 时，我 7 师、9 师对大通沟、鹿尾林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敌军被压缩于庆岭、黑瞎子堡狭小地域。9 时，全歼敌 21 师 2 团和山炮营全部，生俘其团长王子宏以下 13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6 门、山炮 4 门、其它武器弹药一批。

大通沟地区之国民党军暂 21 师 2 团被歼后，我 7 师、9 师迅速转兵南进，会同 8 师围歼进占大北岔、德兴屯地区之 91 师 272 团及师直属工兵营。21 日拂晓向敌展开猛烈攻击，战至黄昏全歼该敌，毙其团长余子培、俘其副团长李璞、刘博昌。在此次战斗中，我第 3 纵队著名战斗英雄李安仁不幸光荣牺牲。

22 日晚，我 3 纵各师又乘胜向高丽营子地区之敌第 91 师主力及第 2 师第 4 团展开进攻，战至 23 日晚，该敌在 195 师及新编第 22 师各一部策应下，乘夜暗南逃，被我 8 师 22 团和 9 师 25 团急速追击，歼灭敌人一部。我第 8 师 22 团 4 连在长春屯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敌少将副师长何世雄化装逃跑，我 2 班长周恒农同志紧紧追上，将其击毙，又带领全班边打边喊话。俘敌 120 余名，全班记大功一次，每人记特等功一次。军区授予周恒农同志“无敌英雄”光荣称号。

在正面作战的同时，第 4 纵队第 11 师于 2 月 16 日由桓仁以南沙尖子再次向抚顺、本溪间挺进。采取长距离奔袭，速攻速离，速战速决，忽东忽西的战法，转战于敌后的广大地区，日夜艰苦奋战。该部曾 1 日打过敌人数次重重封锁合围，3 天不得 1 餐，8 昼夜不合眼，进出于安沈线两侧打击敌人，于 21 日全歼敌 207 师 1 个加强营 1000 余人，接着又连战 8 昼夜，行程 250 公里，突破敌第 14、第 207、第 25 师合击，拖住了敌人，策应了正面主力作战。军区为嘉奖第 11 师两次深入敌后作战，给该师敌后作战的全体指战员每人记功一次。

为配合南满我军作战，我北满部队于 2 月 22 日越过松花江，向吉长地区之间国民党军发动更为强大的攻势，即“二下江南”作战开始。国民党军北线告急，便由南满调新 6 军第 22 师一部和 71 军 87 师、88 师，协同新 1 军由长春分三路北援。为诱敌深入，我北满部队于 3 月 3 日转回江北，伺机歼敌。

至此，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计划被我粉碎。南满敌人暂时转入守势，企图巩固通（化）桓（仁）线和吉（林）梅（河口）线，防我攻势的发展。

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拖住敌人，有力地配合北满我军作战，南满军区 2 月 27 日决定，实行第二步作战计划，以第 3 纵队由孤山子、南高丽营子、三源浦地区向北出击，以奔袭行动扩大战果，收复柳河、辉南。

敌人在损兵折将，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之际，见我军北满部队突然全部北撤，嚣张骄横的气焰再度掀起，错误地估计了我军的力量。杜聿明由长春飞到德惠亲临指挥，扬言要与我军决战松花江西岸，“10 日以内，保证攻占哈尔滨。”敌人第 71 军 87 师、88 师和新 6 军 22 师 65 团，协同新 1 军进至松花江南岸，左右两翼先头突击于松花江以北之五家站、五棵树地区。当敌得意忘形大叫“分路突击、势如破竹”的时候，我北满部队 3 月 7 日急转三下江南，8 日越过松花江，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展开猛烈攻击。至 12 日，歼灭敌人第 71 军特务团、工兵营，运输营和 88 师全部、87 师一部，包围了辑安，震动了长春。于是，敌新 6 军 22 师、71 军 91 师由梅河口、营盘北调长春、四平。南满敌军暂取守势。

南满军区决定，乘敌主力集结长春对南满暂取守势之际，为配合北满作战，发展南满有利局面，便于将来的作战，实行第三步作战计划，以通化、桓仁为目标展开进攻。3 月 16 日第 11 师攻克桓仁，3 月 20 日第 10 师和第 8 师围攻通化，经 3 天激战尚未攻克。此时，我第 3 纵队主力在旺清歼灭敌第 2 师增援的 1 个团。

以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北满部队三下江南已告结束，转回江北。敌人由各地向南满调集兵力。为保持部队元气，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准备再战，遂放弃攻通化计划，进行新的部署。

这一阶段作战，自 1947 年 2 月 13 日起至 3 月 23 日，经 38 天的作战，歼敌 1.439 万人，粉碎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计划，收复金川、辉南、柳河、桓仁、辑安等五城及据点数十个，使南满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战役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资上为粉碎国民党第四次进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保临江，冬去春来

三保临江的胜利，使敌人逐渐陷入被动，我军开始扬眉吐气了。战争改变了形势，部队更加团结了，士气更加高涨。当时正值过年前后，虽然物资上很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但广大干部战士精神上是乐观的，战无不胜的。过年了，大家聚在一起，畅谈战斗的胜利，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心情十分激动。

3、4 月间，大地回春，松花江即将解冻，南满最艰苦的隆冬季节过去了，形势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国民党军三次进犯临江地区被粉碎后，杜聿明不仅致电南京，还亲派郑洞国赶南京去见蒋介石，要求增加两个军，至少要把冀东 53 军归回东北建制。蒋介石、白崇禧回答的却是“各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无兵可调。”虽然如此，杜聿明仍不死心，趁我北满主力回渡松花江之际，又拼凑 7 个师的兵力（十几个师的番号），第四次进攻临江。敌 207 师、

14师的41团和25师的75团由清河城子、双山子、宽甸向桓仁进攻；新22师及2师的6团由新宾向通化进攻；刚从热河调来的89师和54师的162团由旺清、新宾向三源浦攻击；暂20师由梅河口、海龙一线南犯。这样，敌人摆开了一个宽大的正面，于3月28日开始，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攻。

战争帷幕即将拉开。从敌我力量对比看，形势仍很严重。我军只有4个主力师(其它2个去敌后)，每个师平均仅有6000人。部队连续作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于是，又产生了怎么打的问题。为彻底粉碎敌人进犯，陈云同志在临江主持召开了分局、军直干部会议。会议分析讨论了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了坚持南满的方针——坚决地打，准备付出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代价，打胜这一仗，把敌人牵制在南满。陈云同志指示，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第四次保卫临江作战，我军指挥员思想统一，任务明确，信心十足，也积累了一定的对敌作战经验；广大战士斗志高昂，英勇顽强，决心坚决打败敌人的进攻。各部队都先敌展开，先敌占领阵地，先敌进攻。集中7、8、9共3个师，打红石砬子的敌主攻部队89师。在兵力部署上，采取以7师一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以8师一部控制歪头砬子阵地；8师主力与10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敌89师；9师一部控制柳河，主力控制弯口镇阻击暂20师，保证正面部队作战。

4月3日6时，敌中路集团第89师等部已进入我预设口袋阵地。我遂乘敌立足未稳，疏忽麻痹、没有展开之际，以第7、第10师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已成混乱状态，全线向红石砬子山溃退，我3个炮兵团一起向敌进行拦阻射击，敌在雪地溃不成军，四处奔跑，乱作一团，汽车、大炮、骡马、大车挤满了道路。我军各部队实行紧缩包围，展开围歼战和政治攻势。战士们向敌人喊话："蒋军官兵们！缴枪吧！交枪不杀，优待你们。"许多解放战士也纷纷喊话："我们是从195师和91师解放过来的，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也过来吧！"敌人在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大批蒋军官兵放下武器，从山坡、山沟涌向俘虏群，按着我军的指挥，互相召唤着"到三源浦集合"、"在三源浦开饭"。敌战斗机低空盘旋，无可奈何，掉头而去。至下午4时经10小时的战斗，将敌第13军89师和54师162团全部歼灭，俘敌副师长张孝堂，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秦古杰以下8200余人。敌89师师长万宅仁换上便衣落荒而逃。敌副师长张孝堂说："你们真行，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几分钟的功夫，就把我们的部队打得稀烂……"。

（选自《百战图》，作者：邓超）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六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有三百名中执、监委，候补中执、监委参加的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旨在统一党内认识和行动方针，以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书。

由于会议打着研讨如何"革新政治"、"改革党务"的旗号，所以会上也有一部分委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例如："澄清吏治以维国本"，主张严惩贪污；"实行选举权、罢免权以期完成民主集权制度"，主张从基层组织至最高党部负责人，都由选举产生，不得采用圈定的办法；"切实执行地方预算严禁额外摊派以轻人民负担"，主张与民休养生息，等等。监察院长于右任慷慨陈辞，要蒋介石充分检讨，希望国民党能出现一点革新的气象。但是，掌握实权的蒋介石等人根本不予理睬。

蒋介石等人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从根本上来说，蒋介石是反对政协协议的，只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才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带头发难，反对政协协议。

会上，张继等强调："凡恃军队为政争工具者，应使彻底改编并取消割据。"郝任夫等提出的《请坚持主张在宪政实施以前必须先使军队国家化俾求实现真正民主之政体案》中，硬把军队国家化作为宪政实施之前提条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全体会议宣言重申："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条件。"这清楚表明，国民党企图吞并中共的军队，实现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方针，破坏了政协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

六届二中全会实际上全面地推翻了国民党所同意的政协协议，对此马歇尔也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论："尽管中执会结束时宣布它已完全批准了政协决议，但有迹象表明，此种批准受到许多保留条件的阻挠，而国民党内顽固分子则竭力破坏政协纲领。"

材料：

- 开幕词
-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

材料一　开幕词

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举行本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各位同志在抗战胜利之后，第一次聚首一堂，本席更觉得无上的快慰。

全体会议的任务，是要检讨过去的工作，分析当前的局势，以决定今后努力的方针。而我们这一次全会举行在抗战胜利结束以后、复员尚未完成、建设正待开始之时，又正在我们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的前夕，所以这一次会议的任务，更见重要。我相信各位在会议期中，一定能对各方面作详尽的检讨，以求得精确的结论。现在我先就个人的感想与希望，扼要的向各位陈述。

这次全会距离我们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一中全会的闭幕已有九个月了。代表大会赋与本届中央的使命，计有五项：(1)争取抗战胜利；(2)促进国际合作；(3)贯彻民族主义；(4)完成民主宪政；(5)提高人民生活。对于这五项使命，中央无时不兢兢业业，以求其实现。一中全会闭会以后三个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八年余艰苦抗战，获得胜利而结束。同时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机构的促成，盟国永久邦交的敦睦，与互助合作的增进，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对于扶助边疆民族自治，以贯彻民族主义，亦根据总理遗教而有具体的决定。可以说前三项使命，均已陆续达成，所留下来的两大任务，就是实施民主宪政与提高人民生活。这两件大事都是本党革命奋斗的终极目标，有赖于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策进。但是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又是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得不到切实的解决，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我们在抗战之初，本以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为目标，因此在抗战结束以后，我考虑整个国家当前的局势，和全体人民迫切的需要，就决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一方面排除万难，收拾战局，恢复秩序，加速进行复员的工作，使人民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更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两大要求，号召全国一致协力，以促其成功。其具体意见，关于政治民主化者，则为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社会贤达与各党领袖分子的参加政府，人民自由的保障，政党合法地位的承认。关于军队国家化者，则为全国军队统属于国家，在我国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务使全国军队皆受国家的编组，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我们这一个决策，我曾详晰说明于去年九月三日胜利日之演词，各位同志想必已经洞察无遗了。

我们以贫弱的国家进行了八年余长期的抗战，而且在抗战中间还存在着变乱分裂的危机，与扰攘纷争的因素。所以我们要由战时渡到平时，要进行复员建设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难与阻力特别繁多。这些困难与阻力，我始终认为唯有以最大的忍耐来克服，以大公至诚的精神来消除，也要秉着我们历届决议“政治问题用政治解决”的方针来处理。因为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救国与建国，抗战结束以后，建国的成败为国家存亡之所关，而建设之先决条件为统一与和平。抗战八年余之久，残破牺牲，不可数计，人民流离痛苦，渴望还乡乐业，所以人民最迫切的需求，也在于和平与安定。我们在抗战结束以后种种扰攘纷争的现象不堪追溯，但是我们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志意，因种种的疑难阻碍而没有实现，我们和平建设的政策，由于全国未能达到精诚团结与真正统一，而无法顺利进行，则是我们认为必须解决的困难，也是革命建国的本党无可旁贷的责任。

由于上述局势的分析，各位同志就可以明了我们这九个月中间一贯以政治方法解决纷争，以商谈方式停止军事冲突，以及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我们为了要实践召开国民大会及早实施宪政的宏愿，为了爱惜战后国力、民力的凋残，为了促成国内进一步的团结，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一方面邀集各党派人士与无党派之社会贤达举行了三星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军队国家化及政治民主化问题，与各方面相协议。会议的结果计有五项：(1)扩大政府组织；(2)和平建国纲领；(3)军事问题；(4)国民大会问题；(5)宪法草案的审议。在这些协议之中，最主要的精神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获得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与遵奉，而我们政府在协商会议之时，更是推诚相与，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不惜变通总理关于建国程序的遗教，以求得和平建国的机会。这是本党为国为民的一番苦心，各位同志所必须深切了解的。

上面所述的各项协议、宪法草案正在审议之中，而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由军事三人小组商定了“军队整编与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只待如期实施。我们期望各方面都能真诚一致为国为民，使国家走上和平建设统一民主的大道。我觉得只要国内和平统一有了保障，国家能有长治久安的基础，我们都应该以全心全力促其有成。古人有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本党员要首先推诚置信，我相信必能以一片精诚感动其他党派，而造成坚强的互信，以利建国大业的进行。

我还要向各位同志申述的，抗战建国同时并进本是我们既定的国策，而及早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更是我们一贯的夙愿。我常说：“我国实施宪政以后，必须使各政党在民意之前以和平方法作公开的政治竞争，乃为符合于民主的精神。”现在这一个过渡阶段，正是我们与各党派相互观摩，相互砥砺，以开创民主规模的时期。我们就要作实施宪政以后的准备，我们要与各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但是我们本党还负有捍卫主义，保障民国的特殊义务。我们本党的地位较之抗战结束以前已稍有不同，而在宪政实施以前，我们在法理上与事实上还不能诿卸我们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因此，这次全会应该就今后本党努力的方向作一番深切的检讨。我以为下列诸点应该特别注重：

第一，要转移我们党员工作的方向，鼓励我们同志各自发挥其个性能力之所长，往文化事业、经济事业与地方自治工作上去努力。在这些岗位上促进国家建设的进步，也正可以锻炼我们自身的进步。

第二，要使每一个党员都能认识为民前锋、为民服务，是革命党员最大的天职，不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必须随时随地先之劳之，领导民众，从事建设事业；同时要尽量解除民众的痛苦，增进民众的利益。惟有这样，才能教育我们同胞成为建国的基干，才可以加深民众对于本党主义的信仰。

第三，要唤起我们党员爱护本党革命的历史，坚定其贯彻主义的信心。本党五十年革命奋斗的往绩，每一度的成功，无不是得力于自我牺牲的决心和日新又新的精神。现在我们面对着伟大的建国时期，更须发扬光大我们先烈的伟业，积极迈进，以竟全功。

第四，要明了现在是本党从根本上整理刷新的大好时机，我们一方面要作一个普通的政党，一方面要保持中华革命党时代的精神，来加强本党的组织。因之机构必须紧缩，纪律更须谨严，步骤必须齐一，工作更须振奋。

上面这几点是重要的原则，至于如何改正已往的缺点，如何达成健全本党的目的，如何使本党能适应当前的新环境，而尽到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天职，希望各位同志聚精会神地加以讨论。总之，我们临此千载一时的建国良机，必须振奋惕厉，自爱自强，以期不愧为总理的信徒，而达到我们保持胜利成果，完成国民革命的神圣使命。

（摘自《国民党教学参考资料》人大出版社）

材料二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会听取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报告，并审查张委员继、杨委员森、郝委员任夫、苗委员培成等所提有关各案，为综合之决议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和平建国为举国一致之蕲求，尤为本党继承总理遗志，实现三民主义应完成之历史使命。爰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冀以政治方式消除一切纠纷，保障和平统一，完成建国之大业。故在协商进程中，凡属国家民族利益所在，本党均不惜以最大之容忍为多方之退让，委曲求全，俾底于成。其所协议诸端，本党秉为国民之夙愿，自当竭诚信守，努力实践。惟是体察当前之情势与立国永久之大计，关于下列各点，特别致殷切恳挚之愿望：

一、国民政府既须改组，容纳各党派分子参加，各党派均应一本忠诚，为国军之和平统一、民主建设而共同努力。尤其属望中国共产党切实依照协议，在其所占区域内首须停止一切暴行，实行民主，容许人民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及各党派公开活动，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

二、军队国家化乃和平建国之先决条件，此次军事小组所订之“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家之基本方案”，中国共产党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俾全国秩序得以恢复，人民痛苦得以苏解，“军队国家化”之障碍，得以首先扫除。

三、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早为全国所遵奉，已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共认，而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权能分职，五权分立，尤为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本党五十年来领导革命，悉为实现此最进步之政治制度，以建立国家而奋斗，绝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正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庶宪政之良规得以永久奠定。

总之，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以和平建国为目的，则于各项协议之实施进程中，凡有足为和平建国之阻碍者，胥必力为排除，乃能措国家于盘石之安，而跻人民于康乐之境。本党矢以贞恒，勉尽职责，并愿各党各派共体时艰，相与开诚协力以赴。

（摘自《代表大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闻血案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特务于七月十一日晚，在昆明用无声手枪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李公仆治丧委员会。七月十五日，李公朴追悼会在云南大学举行。闻一多在会上，面对特务愤怒声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滔天罪行，谴责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件”。他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象李公朴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民盟云南支部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的途中，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当场殒命。其长子闻立鹤为救护闻一多也连中数枪，身受重伤。闻一多遇害前已经得知特务的黑名单的下一个名字便是他，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为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李公朴、闻一多为民主而牺牲的精神，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

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李、闻惨案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的李公朴、闻一多，是“反民主和平有计划之阴谋”，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应予彻底废除；(二)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三)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惩办。同时，民盟中央发表书面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七月二十二日，民盟政协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李公朴、闻一多“始终站在本同盟立场，从事民主运动，其主张不外于要求民主、和平，其行动不出乎作言论、号召，在不犯法之范围内，而遭摧残至此”，这说明中国今天是无法无天的黑暗政治世界，民主人士的生命在今天没有了丝毫的保障。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派出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推派之人员同赴昆明，调查惨案真相。国民党政府拒绝民盟的正义要求。八月三日，民盟总部秘书长梁漱溟、副秘书长周新民赴昆明调查，梁、周抵昆后，即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他们克服了许多障碍和困难，进行深入调查，于九月三十日发表了《李闻案报告书》，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闻的罪行。

材料：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前后

材料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前后

民主同盟的云南省支部，是昆明地区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民盟中执委、云南省支部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是昆明地区民主爱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和杰出的战士。六月间，他们筹划成立了“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发起万人签名运动以制止内战的爆发。对此，国民党当局，一面通过种种手段，散布李公朴“谋暴动”，闻一多“组织暗杀团”，民主同盟要“夺取政权”等谣言，制造舆论；一面密令昆明警备部、宪兵十三团等部，“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并将李、闻列入暗杀名单第一、二名。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李、闻和民盟云南省支部其他负责人潘光旦、楚图南、冯素陶、费孝通、潘大逵共七人，于六月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日，先后举行三次招待会，分别招待党政军各机关负责人、社会贤达、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新闻界，声明民盟所持“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主旨不变，强调“民盟只从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但是，民盟的这些解释，并未能避免国民党特务对其领导人的血腥屠杀。

七月十一日晚九时四十分，李公朴夫妇外出返家途中，在南屏街公共汽车站等车时，即有三名着黄军便服者，立于其周围。上车后，此三人一坐李身旁，一坐李夫人身旁，一坐李对面。车行至青云街口，李公朴夫妇下车，该三人亦随同下车。李行至学院坡叉路处，突遭无声手枪射击，当即扑倒路旁泥泞之中，李夫人呼救，适有青年学生多人路过该处，亲见凶手将其手枪递交另一特务后逃跑。经学生追捕阻挡，方将该凶手追获，送警察三分局，其余行凶特务则均逃匿。李公朴由云大学生及市民抬至云大医院，经开刀检查，子弹系从左后腰射入，经右前腹穿出，腹腔和胃里大量积血，并由口中吐出。李于清醒时自言自语：“我早有准备了”，并痛骂当局“卑鄙、无耻”。次晨五时二十分，李公朴伤情恶生，经抢救无效逝世。

李公朴被暗杀的消息，使社会各界极为震动。各校学生纷纷前往吊唁。民盟云南省支部分别致函国民党昆明警备部和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强烈要求缉拿凶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于七月十三日给李夫人张曼筠女士拍发了唁电，称赞李公朴“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其牺牲“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以后，随即又图谋杀害闻一多。早在六月初，昆明警备部要员就在一次会议上声称：“象闻一多这样的人，下手也不好，不下手也不好。”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于杀害闻一多，已在策划中。李公朴遇害后，有一个怪女人，年约四十来岁，在干瘪的身躯上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旗袍，下摆直拖到脚面上。她左手拿一本《圣经》，用右手的长指甲划着《圣经》上的一些段落，装疯卖傻，数次到闻一多家中窥探和纠缠，并说：“闻一多，还不快忏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命在旦夕了。”闻闭门不理，怪女人丢下恐吓信，声言三天之内，让闻一多父子都死。

七月十五日一早，即有友人前来警告闻一多，云：闻已被列入暗杀名单，嘱其少出外开会。闻微笑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下午一时，闻一多出席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的会议，慷慨陈词：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散会后，由学生护送回家，休息片刻，又去府甬道十四号出席民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约五时散会，由其子闻立鹤伴送回寓。父子二人边走边看报，至联大教职员宿舍旁，忽见两名着短装的暴徒迎面而立，跟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枪声，从前后四方射来。闻一多首先中弹倒地，头中三枪，胸部及其它部位亦中多弹，于送医院途中，即停止呼吸；其子闻立鹤胸中三枪，肺部被打穿，右腿被二颗子弹

打断。后经对凶手所乘军用吉普车号码、车轮胎遗留的痕迹和现场捡获的弹壳、弹头等情况综合判断，这一暗杀事件，乃警备总司令部指使特务所为。

闻一多遭暗杀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唁电中愤怒表示："当权者对付民主人士，其卑劣残酷，至于此极，殊堪痛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在唁电中，称赞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一群青年在吊唁闻一多的誓言中说："无数的青年被您的死唤醒了""国家一天不民主，不独立，不和平，我们无数的青年一天不会停止奋斗的"。后来，民盟总部在《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中严正指出："李闻案，无待申论是政治性暗杀案。""我们今天所要作的，绝不在枪毙几个大小特务，为李闻二先生抵命；乃在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政治上的罪恶，而取消特务机关。""对方，大而言之，是一个党；小而言之，是一个机关。"当时正在中国调解国共争端的马歇尔向美国政府报告说："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著名的自由主义分子在昆明被身份不明的人（后来据透露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暗杀了，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正在国内其他地方恐吓民主同盟重要的盟员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他认为，这是"某些国民党官员""压制对国民政府公开的批评"。

国民党特务在五天之内，用残暴的手段，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人士。这是对中间派反战运动的公开镇压。它表明，国民党当局，决心把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美商约》签订

背景介绍

1946年11月4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署名，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主要内容有：一、美国国民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享有"居住、旅行及经商"的自由，包括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的自由。在这一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活动中，有"取得保有或租借及占用适当的房屋，并租赁适当之土地，选用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二、美国商品在中国所交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方面，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三、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以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表面上标榜"根据互惠的关系和互不歧视对方的原则"，中国也可以在美国享受类似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可是，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根本无力去美国投资经商，更没有船舶和军舰可以去美国各口岸、内河航行。实际上美国在中国享受了片面的最惠国特权。正是在这"互助友好"、"双方平等"幌子下，美国全面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权。它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不平等条约，比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和1939年的《日汪协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中国近百年来与外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最残酷、最具有奴役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因而被称之为"新二十一条"。从此，美国的独占资本和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国统区的经济生活。

继《中美商约》以后，美蒋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美航空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中美海军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协定》即《中美双边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等，把《中美商约》进一步扩大和具体化。通过这些条约，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各个角落，从地上到天空，从陆上到海洋，从工商业到农业，到处都布满了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网。美国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独占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控制了中国的农业、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

材料：

- "新二十一条"

材料 "新二十一条"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和发动内战的过程，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逐步变为美国独占殖民地的过程。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十月间，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的"援助"，先后与美帝国主义订立了许多协定。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八月的"转让剩余物资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允诺以全部航空权作为交换品的一部分。五月间，美蒋订立密约，美国取得在中国内地各省及东北、台湾进行军事性的空中摄影权。八月十三日，蒋介石与美国陈纳德空运公司签订合同，允许该公司在中国经营空运事业。九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又与美国控制的菲律宾签订了上海、马尼拉飞机降落权的协定。这样，美帝国主义就不断取得了在中国的领土和领空权。九月十九日，在美国代表提议下，于上海举行的"联合救济总署"远东区委员会会议，又通过了《载运联总物资至长江四口岸（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案》；同时，国民党政府准许美国轮船自琉球驶入及停泊

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及高雄两重要港口。美帝国主义因此又取得了在中国的内河及沿海航行权。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坚持独裁，扩大内战，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和援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同美国于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这是一个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条约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中美商约》的签订，有一个酝酿过程。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政府开始与美国进行秘密谈判，条约的底本是美国提出的。经过十个月的谈判，终于签订了长达两万字的卖国条约。在条约上签字的国民党政府方面是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美国政府方面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这个条约，共三十条，六十八款，主要内容是：第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的权利，其经营的范围包括"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等。为此可以在中国购置、保有、建筑和租赁土地、房屋与产业。美国的"法人及其团体"在经济权利上，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这就是说，中国的领土完全向美国开放。第二，美国商品在中国"之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这表明中国不能有关税自主权，美国货可以自由出入中国。第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可以沿途卸货载货；不管从何港口出发，也不管到何港口，都不得课过境税，待遇应与中国船舶一样。美国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之自由"。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中国还得予以"友好之待遇及协助"。根据条约，中国的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也都为美帝国主义所操纵，中国完全丧失了航路、海港、陆道的自主权。

《中美商约》正式公布以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日报》和《中央社》极力宣传，声称新商约的签订，是一件值得"重视"和"欣慰"的事，是"符合平等互惠原则的"。并要以此为"中国战后与其他国家签订协定的蓝本。"这完全是不以丧权辱国为耻，而以卖国为荣的欺人之谈，《中美商约》实际上是独惠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中美商约》不是"互惠"，也没有平等。条约第二条第一款与第二款规定，缔约国此方之国民，应许其进入缔约国彼方之领土；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应许其不受干涉从事并经营依法组成之法律规章所不禁止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从事于其专为所在国国民所保留之各种职业。而同条第四款则规定："本约中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缔约任何一方制定有关入境移民法规之权利，……"。又说：中国人及中国人之后裔进入美国，得按照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制定的美国入境移民律第三节之各项规定。这就是说，美国人进入中国，可以到中国领土的全境从事商务、制造、……等事业，中国政府不应干涉；而中国人进入美国，则仍应受美国《移民律》的限制。可见，就在形式上亦不存在平等。

第二、《中美商约》不是"互惠"，是"惠而不互"。条约的第五条规定"倘缔约此方将来以关于其领土内矿产资源之探勘及开发之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之国民、法人或团体时，则此项权利，亦应依照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施行之有关法律规章，给予缔约彼方之国民、法人或团体。"从字面上看，双方均可立于"互惠"原则，享受同等待遇。但是从条约所能发生的实际效果去考察，却是"惠而不互"。美国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美国商人可以根据条约前来中国采矿、办厂，赚取高额利润，这对于美国确实是最惠。可是，这种条款对于中国则是有名无实，无惠可言。因为中国的工商业落后，加以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经抗日战争时期的管制与战后压抑之后，救死已唯恐不及，那还有余力跑到美国去开矿，设厂？只有少数官僚买办为了他们资金的安全，才可逃到美国聊以点缀。因此，名义上是"互惠"，实际则是"惠而不互"。正如当时中国一金融家所说："《中美商约》是让一富翁与一穷汉做经济竞争，平等与否，不言而喻。"

第三、《中美商约》不是"互惠"，是"惠人害己"。任何国家在与外国建立正常的平等互惠的商务关系时，都要采取适当的保护关税和有保留的互惠政策，以保护扶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极为落后的中国，更加需要实行适当的保护关税政策和有保留的互惠政策，以防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入，屏障本国日陷破产的民族工商业。但是，在《中美商约》中两国政府相约不以关税或其他手段限制对方商品进口和从事各种商务活动，其结果必然是美国商品更加畅通无阻地倾销中国，独占我国市场，获取超额利润，而中国仅有的一些民族工商业必将迅速破产倒闭，加快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进程。

第四、《中美商约》不是"互惠"，是对国家主权的大拍卖。《中美商约》在双方"平等"、"互惠"烟幕的掩盖下，将中国的领土全境向美国开放，使中国完全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沿海及内河的航行权等种种权力。美国人在中国可以享受各种特许的优惠待遇，这样，蒋介石就把中国的主权从水上到陆上全面拍卖给美帝国主义了。它比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和一九三九年的《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十一条》主要是给予日本在山东及满蒙的特殊权利；《日汪密约》也不过扩大到华北、内蒙、上海的经济特权以及沿海和扬子江

的水运。而《中美商约》则远远超过了这些范围，它包括了"中国领土全境"。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曾公开无耻地承认：这个条约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英国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当时就客观地评价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从未见过的最野蛮的经济侵略"。《中美商约》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是"新二十一条"。

但是，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美元，坚持内战，继《中美商约》以后，又和美国政府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十二月，订立了出卖全部中国领空权的《中美航空协定》；一九四七年一月，订立了承认美国海军盘踞青岛的《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七月，订立了出卖铁路主权的《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十月，中美参加订立了便利美国在中国倾销军火和掠夺物资的《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同月，还订立了美军继续留驻中国的美蒋秘密协定和规定美国派员"监督"援蒋基金和物资使用的《中美救济协定》；十一月，订立了加强美国对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十二月，订立了由美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中美海军协定》；一九四八年七月，订立了允许美国取得各项经济特权的《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即《中美双边协定》；八月，又订立了让美国控制农村经济的《中美农业协定》。这些协定是《中美商约》的扩大和具体化。

在上述《中美商约》等不平等条约和协定的保护下，美帝国主义对华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也达到了独占的阶段，而且具有空前的规模。据统计，战后美国在华投资约占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通过与四大家族的勾结，采取由美商直接开办公司经营；或与四大家族合办商业公司，以及由四大家族自己开设的公司充当美国公司分销处等形式，取得了在中国倾销商品的独占专卖权。一九四六年，美货在中国进口货总额中已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二。除公开的商品倾销外，美国还利用其所攫取的特权，勾结中国官僚资本和国民党军官大肆走私。据国民党官方公布，在一九四七年一年内，仅被查获没收的走私货物，即达法币一百一十三亿元，实际上这只是私货总额的一小部分。另据香港当局公布，单由香港走私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货物，每日只少五万吨，多达十余万吨。

由于美货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上美货充斥。据调查，上海的大公司如永安公司，美国商品竟占全部商品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从机器设备、汽车、飞机和钢铁成品，到小的缝衣针、玻璃腰带、梳子、刮脸刀甚至连吃的花旗桔子、花生米、口香糖、奶粉等无不是从美国运来的。在中国的广大城市和农村市场上，形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畸形状态。由于美货价格一般均较国产品低三至五倍，有的竟达十余倍。中国民族工商业因此被排挤得无立足之地，据当时各地报纸与电讯不完全统计，国民党统治区二十个大小城市，自一九四六年入秋以来，到旧历年底，工厂、商店倒闭者已达两万七千多家。同时，中国人民的血汗也被美国资本家吸吮殆尽。

战后，通过《中美商约》等不平等条约及协定的签订，美帝国主义势力深深侵入中国，不仅取得在华的种种经济特权，而且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太上皇"。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已变成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摘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

制宪国大

背景介绍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蒋记国民大会，在南京正式开场。前后出席所谓"国大"的代表共一千六百余人，国民党占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席位。参加"国大"的除了国民党代表外，只有无耻的青年党、民社党分子及一小撮所谓的"社会贤达"。过去曾和汪精卫有密切联系的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在政协期间，已从民主同盟中分化出去成为右翼。到1946年3月，在美蒋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收买下，正式叛离了民盟，成为亿万人民辱骂的"狮子狗"。民社党（即国社党）则直到"国大"前夕，尚混在民盟内起着内奸的作用。到"国大"开幕后的11月23日，该党党魁张君劢终于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下，提出了该党参加"国大"的名单，宣布投靠蒋介石，被人称为"张君卖"。在"国大"开幕前夕，青年党发言人在上海发表谈话说："青年党是否参加国大，以民主同盟的态度为转移。"民社党发言人也表态说："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将与民主同盟取一致行动。"青年党、民社党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想拉拢民盟和他们一起参加"国大"，民主同盟坚决拒绝参加"国大"。青年党、民社党自食其言，先后参加"国大"。参加"国大"的所谓"社会贤达"是无党派中分化出去的右翼分子，其中有王云五、傅斯年、胡霖之流少数无耻之徒。多数则跟着共产党走。国内外当时的舆论界认为，所谓"国大"是个大骗局，参加与否，是对一切党派和个人的政治考验，凡参加的就被叫做"落水"和"坠入妓院的火坑"。一家外国报纸这样评论道："国民党企图以'国大'为国民党统治粉饰，怀有此项故弄玄虚企图之人，咸信或至少希望他国系易于欺瞒者。此项伪装将无济于事，其骗局亦极明显。"

材料：

- 中华民国宪法
- 难产的国民大会

材料一 中华民国宪法

真正的宪政，首先要有一部民主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的实质是人民无权，独夫集权。但表现形式呈现着极复杂的状况。它以五五宪草为基础，又使用了1946年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的若干词句和形式。

《中华民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罗列了一些民主的词句，如：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人身、居住与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集会、结社等自由，有生存、工作、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应考服公职权等。但同一部宪法中其他条文就否定了上述规定。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4项政权，是人民权利中的最高层次、最关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在宪法第三章中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本身就不能代表全国国民。即使如此，宪法犹明文规定国民大会暂不行使完整的4项政权。仅行使：(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而"关于创制复决两权，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全国半数县市行使过创制、复决两权，要待何年何月？终蒋家王朝也没有实现。人民始终处于无权地位。对各项其他自由权利，亦加以限制。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各项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人民能不能得到写在纸上的自由权利，不在宪法本身，而在政府。宪法公布不久，国民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6条，禁止聚众游行及越级请愿，从而否定了宪法上对人民的许诺。还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和《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对人民履行基本权利的行动严加管制，逮捕、监禁、屠杀等暴行可在戡乱名义下合法化。宪法实施的前3天，即1947年12月22日，立法院通过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于宪法实施的同一日公布实施。它使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以及普通司法机关的提审权，被剥夺殆尽。国民党统治区是特务横行的世界，逮捕、监禁、杀害人民，根本不需依法，不需经过司法机关(姑且不谈司法机关并不保护人民)。宪法实施之后，就发生1948年4月21日特务绑架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王孝和事件。根本大法上规定的人民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以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从形式上看，宪法规定的中央政治体制，为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这是政协协议的原则。为了拉拢青年党和民社党，提交国民大会的宪草名为政协宪草，故在形式上不能不维持政协通过的原案。蒋介石本意是实行总统制，但在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之后，致词中假惺惺地说："五权宪法的中央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总统制，行使政权的人民，如果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对于治权不能有适当控制，则总统权力过分集中，必致形成极权政治，这种政治，不合于现在时代，而且有害于中国，有害于中华民族。""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人民，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要完全信赖行使治权的人来尊重政权，这究竟是一种冒险的尝试"，所以"我认为五五宪草在今天是不适用的"，"今天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宪法草案，我是赞成的，拥护的"。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但不同时为行政首脑。其一、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为行政院。总统缔约、宣战、媾和、宣布戒严、大赦、发布紧急命令，须经行政院会议议决，立法院通过或追认；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副署；任命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须立法院同意；任命司法、考试两院院长、副院长、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须监察院同意。总统的权力，多数不能独立行使，要受制约，与立法、行政等院共同运用。其二、是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有责任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立法委员开会时，有权向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立法院对行政院的重要政策不赞同，可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行政院对立法院决议的有关各案可称请复议，出席之立法委员2/3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但细心观察，又可看出，《宪法》给总统独裁留下了充分的活动余地。"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这项规定巩固了蒋介石的军事大权。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规定中，给总统以很大的"核可"权。如："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总统不同意，行政院便不能提出复议。反过来，总统对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有异议，即可支持甚至指使行政院提出复议意见。总统对行政院移请立法院复议环节的控制，使行政院必然首先对总统负责，受总统指挥，充当总统的执行机关。立法院长孙科在宪法报告中如实地说："根据条文意义来讲，行政院长是有条件的对立法院负责，还不能称责任内阁制。""在我们现在的草案规定没有不信任的投票"，"同时行政院仍受总统指挥，也可以说这个制度是一种修正的总统制"。另外，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或对立法

院负责。这就便于蒋介石这位军权在握的总统大权独揽。

（摘自《现代中国政府》吉林文史出版社）

材料二　难产的国民大会

南京国民政府在大规模内战爆发、国民经济凋零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的、民主的外衣，争取美援，继续进行内战，急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先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召开国民大会；后因各省选举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复由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会议决，推迟一年，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中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和进行，始经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延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召开；后又由一九四五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改在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则商定，于同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召开和宪草之修改，有以下几点主要精神：第一，国民大会的召开，应由各方协商决定。《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第一次国民大会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之"。第二，国民大会召开前，应先改组政府。《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规定："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宪草修正案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由协商会议五方面每方面推五人"，组成"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协商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参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汇综整理，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如有必要时得将修正案提出协商会议协商"。

由于国民党挑动全面内战，践踏政协决议，使原政协协议中关于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的约定已无法实现。七月三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竟单方面作出决定，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声称："断不因任何阻碍而延迟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程序，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大会，必定如期召集。"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占领北方重镇张家口。南京国民政府更加趾高气扬，遂于当日正式发出命令：国民大会改定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党这种由一党决定国民大会开会日期的做法，遭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共代表团于七月七日，就此提出书面抗议，并郑重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十月十四日，民盟主席张澜在接见记者时指出，只有在"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完成宪草"的基础上，才能召开国大。他说："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

国民党当局为了给一党决定召开的国大，增加"民主"的色彩，竟不惜利用人们对于停止内战的希望，以要挟的手段，强迫中共方面提交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蒋介石在十月十日的演说中声言，"在宣布停止冲突时，中共应提出其参加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以表示其对政府合作的诚意"。十六日，蒋复于声明中强调"下停止军事冲突令"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对此，中共方面则驳以："停战系一事，提出国大名单又系一事"。"政府不应以提交国大名单作为停战之条件"。中共遂拒绝提交出席国大之名单。

蒋介石在国民大会召开前，还故作姿态，宣称将"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之代表名额"，并将国民大会的开会日期从十一月十二日再延期三日。中共与民盟，始终坚持原则，拒不派代表出席国大。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人，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了国大。青年党于国大召开前夕，提交了代表名单，其代表陆续向大会报到。当时还留在民盟队伍里的民社党，则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于会议期间，决定参加国大，并提交了出席名单。后来，民主同盟经中常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民主社会党违反政协，参加'国大'，于本盟政治主张显有出入"，"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有民主社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本应为二千零五十名，因中共、民盟等方面代表拒绝出席，部分代表因故缺席，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一千三百八十一名，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民党员，并为十年前"选举"的旧代表。会议期间，军人代表一律戎装。蒋介石、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吴铁城、陈果夫、李璜、左舜生等四十八人为大会主席团，洪兰友为大会秘书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称此次会议为"中国进入民主宪政时期的开端"，会议将"制定一部完善可行的宪法，奠立民主法制的始基"。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国民大会的开幕，"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于十一月十六日声明：这一"国大"，"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平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接着，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遂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返回延安。民盟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声明，拒绝参加"国大"，表示："只有超然置身事外的途径，以求良心之所安"。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向国民大会提交了"宪法草

案"。

为了给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装扮门面，他竟然煞有介事地说："今天国民政府将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以后，可以说政府已经将国家的责任交给全国人民了。从今天起，全国人民就要开始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经过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国民大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即宣告闭幕。会议决定，《中华民国宪法》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河南人民出版社）

沈崇事件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十九岁女生沈崇，在去看电影途经东单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操场施行强奸。此消息首先由上海《联合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刘时平发至上海，遂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国民党当局对这一事件，首先是封锁。北平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发出紧急通知，勒令该地各报刊不得转发此项消息；并威胁被害人"不准声张"。封锁不成，又竭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在新闻中提出："沈崇似非良家女子"，"美军是否与沈女士相识，须加调查"。美联社更诬称："少女引彼等狎游，并曾言定夜度资。"当各校已燃遍抗议美军暴行怒火的时候，又由北大校长胡适出面宣称："此事系一法律问题，惟余以为对美军抗议以罢课游行为手段，似属不智。"

面对美军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北平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广大群众，愤怒进行了揭露和声讨。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沙滩大操场的墙壁上，就贴满了抗议的标语和壁报；二十七日，这类标语和壁报蔓延到其它各建筑物的墙壁上。当晚，北大进步学生召开各系级、各社团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告美国人民书》等事项，并作出决议："1.严惩暴徒其主管长官，在北平由中美联合法庭公开审判；2.驻华美军当局公开道歉，并保证撤退前不得再有任何非法事件发生；3.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三十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万人游行，到驻有美军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门前示威，并高唱《抗议美军进行曲》，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回去"等口号。同日，北大许德珩、沈从文、闻家驷、朱光潜等四十八名教授联名致书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吾等忝为某女士之教师，闻悉此暴行，尤深悲愤"；强烈要求美方，"对于犯罪之士兵，迅绳以法"，"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

一个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爱国运动，迅速由北平波及全国各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上海交通大学等二十多校学生数万人，高举"保卫中国独立自主"的巨大横幅，举行示威游行，并组成上海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同日，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三十余所大中学校万余学生示威游行；二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六所大学五千余人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并向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四日，开封河南大学等大中学校二万余人示威；六日，重庆六十三校约一万五千名学生集会游行，并向重庆行辕递送请愿书；六日，昆明三万余学生举行抗议罢课。学生抗暴运动还在武汉、广州、杭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展开。

材料：

· 抗议美军暴行

材料　抗议美军暴行

沈崇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极力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加以压制和破坏。起初，他们企图封锁消息，当天晚上，北平市警察局就以"有污友邦"为名，向各报社发出禁登此项消息的命令。当沈崇被美国兵强奸的消息由一家民营的亚光通讯社发出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立即散布谣言，歪曲事实真相。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美军是否与沈女士相识，须加调查"。与犯罪美兵散布的"系于街上遇该女向其招呼并言如肯出美金五元即可陪赴旅馆"的谎言和"美联社"播发的"少女引彼等狎游，并曾言定夜度资"的恶意中伤，互相呼应，为罪犯开脱罪责。与此同时，还采取种种手段，对沈崇及其亲属施加压力，企图使受害者忍辱吞声，把事件压制下去。当群众的愤怒情绪益发高涨，事态已无法掩盖，并有迅速扩大之势时，国民党当局一方面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提出一个就事论事的备忘录，要求惩凶、赔款、道歉及保证今后不发生同类事件，企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另一方面，又有意把这次污辱民族尊严的重大事件，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纯系法律问题，不顾人民的抗议，竟将主犯皮尔逊交美国海军当局单方面处理。并宣称只要通过美方的军法审判即可解决（实际上，同年八月，美国海军部宣布，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也把美军暴行说成是"纯系法律问题"，他说："惟余以为对美军抗议以罢课游行似属不智"，"影响学业"，"至于撤退美军，却是美国政治的事，希望学生们不要存此种联想"。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

集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耻伎俩，不但没能压制住沈崇事件的发展，反而更加激发了群众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开会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美军竟于古都北平对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女生施以暴行事件，已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当前乘势引导和发动一场抗暴斗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蒋介石政府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已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决定在各校放手发动群众，发起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

沈崇被美军奸污的消息传出后，首当其冲的北大学生，怀着无比的沉痛和愤怒，最先作出强烈的反响。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大沙滩大操场的墙壁上即贴满了报导美军暴行的剪报和抗议美军暴行、誓雪耻辱的标语及壁报。很多学生还发出呼吁，要求采取行动。但这时的北大，由于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的阻挠破坏，全校性的学生会一直没能成立起来。党组织决定由进步力量较强的历史系学生会出面，召集各系级代表会议，讨论抗暴行动，成立领导机构。二十七日晚，代表会议在沙滩北楼礼堂召开。会议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严惩暴徒及其主管长官，在北平公开审判”、“驻华美军当局公开道歉，并保证撤退前不得再有任何非法事件发生”、“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等十五项决议和《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告美国人民书》，成立了领导全校同学行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并决定罢课抗议。这一决定立即得到平津各院校学生和主持正义的教授的支持，清华、中法及燕京等院校也决定罢课响应。二十九日，当北大“抗暴筹备会”决定当晚召开各系级代表大会，研究正式成立“抗暴会”和行动计划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前来破坏捣乱，“抗暴筹备会”立即通告会议暂缓。暴徒们便自己开起会来。他们在喧嚣声中，成立了所谓“正义联合会”，通过了所谓“决议”，叫嚷什么“信任政府合理解决此案”、“决不采取罢课游行手段”等。在此期间，暴徒们还捣毁“抗暴筹备会”办公室内全部办公用具和印好的文件、标语，最后，又到大操场撕毁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和壁报，然后呼啸而去。国民党当局在北京大学演出的这幕丑剧，不但没能阻止抗暴斗争，而且使得许多中间群众觉悟起来，一些大学教授也起来支持学生的行动。群众要求游行示威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党组织因势利导，当机立断，在十二月三十日组织和领导了震动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示威。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一时，按照事先的联系，清华、燕京、辅仁、中法、朝阳、师院等院校学生万余人，都先后来到北大操场集合，地下党员、民青队成员积极参加纠察队、宣传队、联络队工作，经过周密的组织，以清华大学为先导、北京大学为后卫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着“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横幅向北平市中心进发。宣传队沿途写了“要求美军撤退”、“惩办凶手”、“反对卖国独裁”等中英文标语；向群众散发《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国同胞书》等传单；队伍中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下午两点多钟，游行队伍来到“军事调处执行部”门前，学生们用英语高呼“美军从中国滚出去！”等口号，并在门外的墙上、路上、树上贴满了标语和漫画。面对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驻有美军的“军调部”如临大敌，前后门关得紧紧的，美方人员都躲在屋内不敢出外，连午饭也不敢回家吃，只好在办公室里啃面包。当游行队伍来到沈崇同学受辱的地点——东单操场时，游行群众的愤怒情绪更为高涨，很多同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口号声和“抗议美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古都上空。队伍在继续西行的途中，还派出代表到北平行辕请愿。沿途的群众，对学生充满激情的演讲、朗诵，给以热情的支持。北平学生游行后，成立了“北平市学生团体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出版了刊物，加强了对中学和社会各阶层的宣传工作，使抗暴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上海局决定，通过学委领导各校地下党组织，发动广大学生，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举行全市学生抗暴联合大游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上海交通、复旦、暨南、同济等二十七所大专院校学生一万五千多人，在黄浦江边的外滩公园汇合，下午二时，游行队伍高举着“保卫中国独立自由”的巨大横幅，向南京路前进。游行群众高呼“中国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军不走，暴行不止！”“兽军滚出中国去！”“为臧大咬子报仇！为沈崇同学雪耻！”等口号，用“打倒列强”的曲调高唱着：“美国洋兵，美国洋兵——滚出去！滚出去！”的歌曲。队伍行经新新、大新、永安等公司时，沿街张贴“抵制美货”的标语。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主持正义人们的热烈支持。马寅初教授随着中华工商学校队伍参加了游行，市民们热烈地为同学募捐宣传经费。

美军奸污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激怒了整个中华民族，震动了全国每一个角落。就连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被反动政治压抑得死气沉沉的南京城，也怒吼起来了。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音专、剧专、东方语专、药专等专科以上院校学生，冲破反动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立即撤退美军委员会”。一月二日、三日，连续两天举行了共有八、九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国民政府”时，一些学生把反动政府门楼上庆祝元旦扎的“普天同庆”四个大字，改为“普天同悲”。并派出代表向政府请愿，递交了《上国府主席书》，要求美军立即撤回去。队伍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派代表递交了抗议书，并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面表示了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立刻撤退美军。

北平美军暴行及内地学生界抗暴运动的消息传到台

湾后，引起了遭受民族压迫最深的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以台湾大学为中心，迅速地组织了“台湾省学生界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一月九日晨，台湾大学、延平大学、台湾师院、法商学院、建国中学等各校学生及一部分公务员、店伙工人共万人，突破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威吓阻挠，在台北公园集会，热烈响应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义举。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爱国学生群情激愤，《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响彻台湾岛上空。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这次抗暴斗争曾采取多种形式加以破坏，企图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但正如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社论《愤怒之火不可扑灭》所指出的：“假若把中国人民今天的爱国运动化作烈火，那么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侵略行为和中国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卖国行为就是燃料。燃料没有烧光，愤怒之火也就不可扑灭。”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无法阻止运动的迅猛发展。规模巨大的抗暴运动，唤醒了广大人民进行争取中国独立民主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政府。通过这次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得到了锻炼和壮大。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为把更多的学生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自《中国现代大事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党中央曾设想从延安迁往淮阴

1946年春末，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以及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慎重而机密地筹办着迎候党中央机关从红都延安南迁淮阴的工作。尽管最终没有实现而成了我党历史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但在这里作一点介绍，让人们了解当时党中央的决策经过及淮阴所处的重要地位，却是大有裨益的。

这个“插曲”，得从酝酿建立联合政府说起——

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共“七大”确定的政治方针，它代表了全国4.5亿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促成联合政府的尽快建立，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从1月10日至31日，召开了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以“改组政府、和平建国”为“中枢神经”的五项“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谋求国内和平，不遗余力地争取早日实施“政协协议”。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商议：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国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虑南迁，这样有利于共议国事。因此，在2月1日，党中央就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提出了“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新观点。

当时，淮阴大地政通人和，百废正兴。广大劳动人民，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从地处淮、沭、泗、沂诸水系下游，素来被称之为“洪水走廊”的现实出发，抓住了兴淮必先治水的根本关键，经过一个冬春艰苦奋斗，昔日被日本侵略者、伪军和土顽所破坏的主要河道水系，已基本上得到了初步治理，增强了抗洪、排涝的能力，为农业的增产奠定了基础。古运河、洪泽湖、六塘河、盐河恢复了通航，修复和扩建了以清江为中心的公路交通。因而，并肩雄踞于淮河下游、运河两岸的淮安和淮阴，商业振兴、市场繁荣、文教事业空前发展，不仅成了华中地区最早呈现蓬勃生机、商旅云涌的两大商业都市，而且成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且不说这里兴建了各种行业的公司和几家航运公司，就以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文教事业而言，兴办了各类大专院校十几所，共有大学和中专学生近3万名。新闻出版事业也纷纷崛起，发行报刊杂志30多种。文艺社团亦陆续组建起来。这样，淮阴被誉为全华中民主建设的楷模，成了党中央准备南迁的最佳基地。

1946年2月2日，即党中央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 的新阶段”的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就说：华中（苏皖边区）我们应保留，如改组了政府，党中央可以迁到那儿去。那儿离国都南京近一些。3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交谈时，张治中说：我这是第三次到延安，延安给我的印象很好。如今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后，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你也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当然要到南京去的，我还准备在国民联合政府里作个委员哩。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安（或清江浦），那儿，同南京只一江之隔，开会就到南京去，来回跑。那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向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说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将迁到苏皖边区去。当党中央这

一重大决策传到了两淮地区以后，苏皖边区政府就派专人赴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为党中央机关选择驻地；华中分局迅速将他们的一些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环境优美而僻静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居住。这一切，在当时对老百姓来说是暂时保密的，但在各党派主要官员的心中都很清楚。就连当年追随蒋介石、参加伪国大的民主社会党头目、政协联络秘书蒋匀田，在他所著《中国近代史转换点》一书中，讲到1946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从红都延安南迁淮阴"时，也这样写道："从这一点说，也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对于组成联合政府之渴望，盼同民盟联成对国民党制衡的力量，以消除一党专政，而趋向民主，亦确属实情。"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露出了穷兵黩武的凶相，彻底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不断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5月3日，他指派美制飞机几次在我华中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我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反共言论。这样，党中央就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中央机关从红都延安南迁淮阴的决策。驻两淮党政军领导机关，亦终止了为迎候党中央迁淮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此，淮阴人民和全体驻军，立即转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紧急备战状态。

（选自《党史博采》90年2期，作者：卢再彬）

三名和谈代表"失踪"之谜

秦岭南麓有个宁陕县，西万公路穿行其间。在公路104里程碑西北侧150米处，有三株相互掩扶着的核桃树。树下没有墓碑，没有坟茔，却长眠着三位忠诚的战士。直到1984年12月3日，有关部门查清事实真相，找见这三位烈士遗骨，才揭开了近40年的一件历史奇冤的谜底。

蒋介石又设下和谈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党与其针锋相对，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为了掩盖国人耳目，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我党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出发，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去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终于签订了《会谈纪要》，并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不久，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于1946年6月底，以30万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军6万抗日有功将士，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务于7月1日前48小时内将我军全部歼灭。我中原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于6月26日晚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中原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北路突围主力，冲破敌5道防线，长驱2000里，胜利抵达陕南，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并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见重兵围剿堵击失败，又继续搞和平欺骗，派军调部第32、第9谈判小组尾随中原解放军相继入陕。第32小组7月15日至老河口用飞机投掷第2号函"请李先念将军 于18日于淅川晤面"。当天下午，第9、第32小组又联合拟成第3号函，由9小组三方代表乘飞机散发。第32小组7月20日经商南至龙驹寨，雇老百姓向李先念部送了8封信，并用飞机在东自湘河西至口头坪以及竹林关以南地区撒了第4号函："务请将军派代表以一切可能方法于7月24日24小时以内来龙驹寨与32小组取得联络。""如24小时仍不能与贵司令所派之代表取得联络，则9及32小组即于25日赴西安"，并邀李先念派代表至西安谈判，"以此为和平最后一次之尝试。"

为再次表示我军和谈诚意，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王震将军所部在攻下镇安县城后，8月6日电告李先念和党中央，确定派原第9执行小组我方代表、上校参谋、突围时任干部旅旅长的张文津以及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中原军区干部、毛泽东主席侄子毛楚雄三人为和谈代表，8月7日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携带第9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公开去西安谈判。

三位和谈代表突然"失踪"

张文津一行经过两三天山地行军，来到宁陕县的江口镇。这里山大沟深，是南下安汉、北去长安的必经之地，国民党派重兵把守着。

敌胡宗南部61师181团团长岑运应接到我方代表事前的通知，率队到魁星楼列队鼓掌迎接。当地群众也簇拥到欢迎的人群里，他们议论着：共产党到西安和国民党谈话呀，这下就不打仗了，和平了。但是，反动派的本性是与人民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的。敌第四连连长李清润把张文津一行"欢迎"到团部后，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刚才假惺惺的欢迎掌声立即变成了敌少校新闻主任韩清雅的审问声：

"你们谁是和谈代表？"

"我！张文津怒目而视，"这里有旗帜、证件、符号，请过目。"

"你们为贵军何部所派？"

"李先念将军所部所派!"吴祖贻出示了通行证。

韩清雅进一步逼问道:"谁请你们去西安谈判?"

张文津笑道:"刚才你们不是在欢迎'和谈代表'吗?怎么——"

韩清雅理屈词穷:"我方邀请有何证据?"

毛楚雄将飞机撒下的邀请谈判的公函掷向韩清雅:"这——恐怕你们也拣到了吧!"

韩清雅无言以对,改口道:"我们再请示上级!为保护你们的安全,不准擅自行动。"

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从此失踪了。

对此突发事件,我党我军极为关注。中原突围部队于8月14日报告中央:"张文津等三人已于7日由镇安之杨泗庙以九小组人员公开去西安,请设法营救。"8月29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对张文津等蒋方无理扣押事,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将军与北平执行部叶剑英委员均已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在这一重大事件面前,胡宗南却一面矢口否认有扣押和谈代表事,一面电令岑运应将张文津等于8月10日晚"就地秘密处决"。自古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张文津等三人肩负和平使命却无辜被害。这是一桩和谈代表集体被杀的严重事件!

烈士的遗骨在哪里

张文津的爱人洪学敬是知道这一事件最早的家属。当时,她分娩不久,被组织从武汉接到南京梅园新村,从《新华日报》上看到我和谈代表被扣的消息,就去找董必武同志。董老安慰说:组织正在交涉。并以沉痛的心情说:"这是个血的教训!"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大姐安慰学敬要保重身体。要她好好抚养孩子。

笔者1985年到韶山,在毛主席故居纪念馆里,见毛家6烈士中毛楚雄名下只写着1946年去西安谈判途中被敌杀害。"楚雄小时是外婆养大的,婆孙情深。1950年楚雄的母亲周文楠定居东北后,打算把外婆接到东北去。她路过北京,与毛主席谈到楚雄牺牲的事,毛主席说:"你告诉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我们看到在毛家屋场斜对面山林里,毛主席父母坟园下边有一孤墓,竖着外婆周陈轩的墓碑。她仍然在韶山冲,仍然在等着走时才19岁的外孙楚雄。

吴祖贻同爱人薄芸湘1941年早春在鄂豫边京山结婚,中原突围,芸湘到东北,祖贻去陕南。分别时夫妇望着笑着,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说,默默思念着重逢。1946年冬薄芸湘在绥化参加土改回到哈尔滨,突然听到祖贻失踪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东北局向中原局发电询问,她也亲自找王首道、伍修权打听,给同时突围到陕南的陈少敏大姐写信,回答都是"下落不明"。她寄"失踪"一希望:"祖贻没有死","他不会死的,他不会就这样离开我的"。孟姜女千里寻夫成为历史佳话,薄芸湘寻夫38年,从东北到西北,又从西北到中南,再到西北,何至万里!人们尊称她为当代的孟姜女。1986年笔者在她家作客,见她齐耳短发无一根黑丝,仍孑然一人。

十年动乱中,听说毛主席的侄子、毛家六烈士最小的毛楚雄被敌杀害于商洛山中,商洛有的群众组织和公安部门地、县结合组成一支"史无前例"的专案组,将此作为"特大案件"进行侦破。上自中央下至秦岭南北各地,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侦察破案工作。但是,在那个扭曲的时代里,这一"特大案件"也被扭曲了:王震将军交待不清毛楚雄究竟被敌杀害于何时何地,烈士吴祖贻却成了跟国民党逃台的叛徒。忠贞不渝的薄芸湘竟被作为叛徒家属受到质问:"你为什么说不清他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牺牲的?为什么没有找到遗骨?"

青草茵茵慰忠魂

商洛的"特大案件"专案组已因"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但它留下了真的假的大量的资料;薄芸湘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深深地触动了她心底的悲痛,她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难道还不能为烈士讨个公道,为家属讨个清白吗!1984年9月,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她再次与党史部门联系。她要亲自进行调查,了此千古一冤。她根据三烈士"被捕于镇安,被杀于蓝田"的线索,从北京出发,直奔西北的蓝田县。知情者说:"中原突围时,蓝田县的反动派是杀了我们不少的同志,但从未发现杀害我方和谈代表"。10月6日,她们又根据原在重庆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工作的吴生敏同志生前提供的情况:曾发现在四川的国民党军官中有一个胡宗南部的团长执行密令,杀害了我方姓张的等三位谈判代表。商洛公安处的同志曾顺蔓摸瓜,将线索扩大到成都,后因无中央公安部的介绍而中断。薄芸湘等带着吴祖贻烈士生前好友、原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度国光同志特地写的一封介绍信到四川。在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大力支持下,查阅了大量案卷,终于在成都军事法庭700个案卷中最后提出的20份案卷里,查到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判决书:反革命罪犯韩清雅,男,现年40岁,河北深县人,该犯1946年在伪61师181团少校团指挥员职内,在陕西宁陕县参与秘密害我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的和谈代表张文津等三人。在受训人员审查表中还记载了韩清雅1951年的供词和181团营长邹孝珊的证明。

这一重大发现得到湖北、陕西省委领导的重视，湖北鄂豫边革命史编辑部、陕西商洛地委党史研究室与宁陕县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2月2日至3日在东江口镇查清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被害的经过，并在三棵大核桃树下挖出烈士的遗骨，用白布素裹，造墓立碑，安埋在江口学校房后山林坡跟。李先念主席看到调查报告后，写了《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一文，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17期发表，终于使这一沉冤大白于天下。1985年初秋笔者途经江口镇，见三烈士合葬墓绿树掩映，青草茵茵，坟茔上尚留着人们祭奠时不少花圈痕迹，便折一把青枝，裹几朵山花，放在碑前，以寄哀思。

（赵凌云，《党史文苑》）

“诉苦运动”是怎么产生的

1946年2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3纵队第7师第20团第3营任教导员。

辽东军区第3纵队是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以冀热辽部队和鲁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为骨干扩编的队伍。武器装备虽好，但兵员成份复杂，既有一些入伍不久的新兵，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组建后，随即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战役。在从四平撤退到辽东辉南、柳河一带集结的过程中，经过连续20多个昼夜的行军、作战和抢修工事，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

我来到三营后，就参加了打国民党精锐部队新六军的沙岭子战斗。战斗中我发现：该营战斗力较差，个别士兵不敢冲锋；且由于战斗艰苦，条件恶劣，又出现了少数士兵“开小差”现象；连排干部普遍反映“兵难带，仗难打”，有的干部三天两头找我要求调走。如何从政治工作上去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当时各级领导面临的严重问题。我想尽了办法，做稳定部队的工作。行军时不骑马，帮助老炊事员挑担子；连、排干部也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战士。这样虽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人，感情也越来越接近，但我心里仍然没有底。以后的战斗将会更加残酷，这样的部队能经得住考验吗？

到了6月，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因此，有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当时，关内在大打，很明显，关外的“和平”只能是暂时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教育整顿部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可是用什么办法教育部队呢？

正在这时，师召开了建师以来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全师政工干部都参加。会议头两天师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总结。后师政委李伯秋到会作报告，讲的是“论阶级教育问题”，阐述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已由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与代表剥削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变了，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心也应当转变为阶级教育。这个报告说理透彻，指导性很强，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感到很解渴，几个月来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我们营与会的几名干部讨论得十分热烈，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组织教育。可是，一讨论到搞教育的具体方法，大家就卡壳了，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大家感到阶级教育问题“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上没解决”。

回到营里，我开始考虑如何落实师里要求。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三营的复杂情况，使我感到应该马上搞阶级教育。我召集连干会议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教育内容就这样定下了。可是，教育如何搞法，大家还是想不出办法来。正在这时，师宣传科发下来一套学习讨论题，都是针对部队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来的，我们逐题议论，有一个题目是“谁养活谁？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大家感到这个题目好，抓住了“根本”。全营（第8连在外）就在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当时叫作“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一个新生事物：“诉苦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场应运而生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

“谁养活谁”的辩论一展开，空前热烈，众说不一。说“穷养富”者有之，说“富养穷”者有之，说“穷富互养，谁也离不开谁”者也有之，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争就是两三天。渐渐地，分为两条阵线：一部分人认为穷人养活富人，讲了不少道理；另一部分人认为“富人养活穷人”。有个战士竟举出了自己闯关东生活无着，天冷了，冻僵在一个地主家门外，被地主救活了，就留在他家干活吃饭的事例。因为那时人们还不会从经济关系上认识问题，于是形成了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会场上僵持着，长时间“冷场”，间或出现“你们没理了，投降吧”的起哄声，但没有对立情绪。虽然不断“冷场”，但战士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因为他们也急着寻求真理。

就在这“冷场”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一天，一个朝鲜族老大娘找我说：“教导员，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机枪连的同志想家都想得抱头大哭，饭都不吃了！”我很吃惊，马上想去机枪连看看。恰好机枪连指导员刘子政来了。他两眼红红的，情绪激动地说：“我们连今天开会时出了个新情况，二班副班长任纪贞发言时，他从算经济帐讲起，他父亲给地主放了200只羊，每年繁殖的羊羔就收入300多元，但地主只给30元。老人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生病还得干活，累得吐了血，临死前求地主家借点高粱面做点糊糊喝，地主婆不但不给，还张口辱骂。”讲到这里，就诉说不下去了。他失声痛哭，引发了全连官

兵的悲痛,许多同志也一边哭一边控诉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进而责备自己湖涂,受了这么多苦还说财主是好人,说"富人养活穷人。"还有的捶胸顿足,骂自己忘了本,想开小差……等等。全连悲声冲天,如洪峰泻口。刘子政含泪汇报,触发了我的悲痛感情,同时不由得兴奋和激动起来:"诉苦"是个好办法!我们营的根本问题可以解决了!我们没有再多研究,就召集各连干部来开会,大家齐说"太好了!"接着,让任纪贞到各连诉苦。连"诉苦"这个词,都是在会上有人随意提出来的。第9连指导员赵绪珍从中受到了启发,用驻地老佃户张大爷穿了14年的一件破棉袄和安口镇黄区长的一床破被子等事例,对连队进行两个阶级、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发动大家"挖苦根"。诉苦教育,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官兵的觉悟,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

1947年1月,敌人向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我们营的干部战士表现得很勇敢,战斗力也明显增强。这次战斗中,我营九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入敌阵,猛打猛冲,俘敌10余人,成为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纵队刘西元副政委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房天静回答说:"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过去虽然受苦但认不清敌人。连队开展了诉苦教育,才提高了觉悟的事汇报了。首长听了很高兴,认为是件新鲜事,就派人到三营进行调查了解。于是,"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首长和机关的注意。师、团机关帮助九连总结了诉苦教育的经验,把他们的做法概括为:"吐苦水","挖苦根","查忘本","下决心",并向全团推广。纵队政治部认为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派人同师、团一起研究和充实九连的经验,又向全纵队作了介绍。辽东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第3纵队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陈云指出,这是部队教育的方向,要把诉苦教育和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在全区推广。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高度评价了诉苦教育。认为"这在部队教育工作上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虽然还是开始,但这确实是部队教育的革命,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教育部队的思想,……是部队教育的群众路线问题和部队教育的方向。"(罗荣桓:《部队教育的方向》)并向全军区推广。随着这一做法不断发展完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在1947年9月28日,就东北部队进行土改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这一经验,亲自修改,转发全军,从而促进了全军诉苦运动的全面开展。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全军各部队在土地改革政策教育中,普遍开展了诉苦运动,并结合整党的要求进行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活动。

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西北野战军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部队进行"诉苦"、"三查"运动的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工作七十年史》第3卷,第175页)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区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深刻阐明了"诉苦"、"三查"运动的伟大意义,并首次将其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说,诉苦教育是"憋"出来的,也是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中开出的"奇花异果"。它的诞生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群众自我教育,启发基本觉悟,形成的力量是无穷的。

(摘自《军事历史》94年6期,作者:小冯)

陈璧君受审记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广东,陈璧君惊慌失措,她找褚民谊商量后事,褚还故作镇静。次日,陈公博又从南京打电话给褚民谊,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运动"已完成,应自行解散,他才感到大事不妙。15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诏无条件投降。褚民谊和陈璧君此时已陷入绝望之中。

8月20日,自称是军统局驻粤负责人的郑介民突然出现在褚民谊的住宅,他除表明身份外,还向褚民谊谈了国民党军队开抵广东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第二天,郑介民又登门拜访,谈的是关于褚民谊个人的前景问题,称他的问题需要到重庆去才能解决。第三天,郑介民又赴褚宅,取出重庆来电,交褚过目,电文如下:

"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电报上附有密码,看不出伪造之迹,褚民谊对此深信不疑。郑介民还说,他得到重庆方面的另一电文,知专机后天即可到达,望他转告陈璧君早日作好准备。

此时的陈璧君一直处于焦燥不安之中,她从褚民谊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如重庆方面能派专机来接,当即首途。他俩还准备刚上市的洋桃两筐,一筐由褚民谊送给吴稚晖,一筐由陈璧君送给蒋夫人宋美龄。

过了三天,郑介民才来通知,说飞机业已抵穗,希望立即动身。陈璧君、褚民谊及随员于是日下午3时,齐集

于原伪省长官邸，准备出发。

郑介民调来十余辆汽车，宣布每辆汽车只能乘坐2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陈璧君心中有疑，但没想到坏处去。车行后，陈璧君发现汽车未向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却朝珠江方向疾驶，就问陪送人员何故，陪送人员托词说，来的是水上飞机，所以要至珠江上船过渡。

车行珠江大桥边，有两艘小汽艇在码头停候，一艘已载满军统人员。陈璧君等相继上船后，郑介民向她表示，他有事留穗，不能去重庆，并介绍另一名军统负责人相见。说完，他就乘汽车走了。

汽艇启行后，那个军统负责人就宣布：在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如有，必须交出。5分钟后，他又取出一份电报，宣读道："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褚民谊此时已知中了郑介民设置的圈套，但他沉默无声，而脾气暴烈的陈璧君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拍桌大吼道："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自己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坚持要船开回原处，送她回家。军统人员见她发怒，也向她解释，说是奉命办理，请她原谅。褚民谊深知再闹也没有用了，婉言劝她，要她暂时忍耐一下，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经众人劝说，陈璧君虽不再坚持开回原处，但一路上仍大吵大闹，军统人员对她也毫无办法。

汽艇开到市桥，军统人员又要他们改乘小船。这时，事情已经更明显了。陈璧君怒冲冲地说："我决不下小船去再听你们的摆布。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军统人员见状提起手枪，从四面环视着她，形势很紧张，但陈璧君毫不畏缩，还象平常一样，瞪着眼睛说："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

褚民谊知道这样闹下去没有好处，就劝她说，如果重庆方面存心要为难的话，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些人是奉命办事，与他们争吵，也不会有什么用。陈璧君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才勉强下了小船。小船开了一会，到了李辅群住宅。李宅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屋，已被军统接管，作为临时看守所，有十余个士兵手提卡宾枪守卫。

陈璧君一行，被关在二楼，指定2人合住一房。陈与女佣住在一起，褚民谊另住两间。看守人员告诉他们：除不准下楼外，可以自由行动，如需饮食用品，可通知他们办理。每人床上蚊帐、毛毯、凉席等也一应齐全。生活安排尚可以，但他们心里都不安，惟以下棋、看书来消磨时光。

10月12日，看守通知他们重回广州。出门后，每一人被送上一辆汽车，两面有武装士兵夹持，已完全是押解的形式。汽车一直开到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住宅，在那里，每人住一间房，待遇很坏，已远不如市桥，但看守人员的态度尚好。

在广州被幽禁了半个月后，一个姓徐的军统代表告诉她，不日将送往南京解决，陈璧君当即说："我有受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监的耐性。"那人一再解释："将来一定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付司法审判的，请暂时委曲一下，为时也不会太久了。"

11月初，军统人员先把各人身边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钢笔等全部收缴，再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把陈璧君等押往南京。此时，陈璧君正式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羁禁南京

沪宁地区的汪伪汉奸，大多被羁禁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在上海，先关在军统的楚园与南市看守所，后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在南京，则由宁海路25号而改送老虎桥监狱。

陈璧君被羁禁在宁海路25号。

宁海路25号，位于南京城北住宅区，原是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的住宅。汪伪时，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南京站。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统接收，改为看守所。

宁海路看守所内分前后院，前院较大，后院较小，陈璧君、褚民谊是这里的第一批"客人"。首任看守长是原任汪伪行政院庶务科科长的徐文祺。当陈璧君等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徐文祺临场监视，一个与陈璧君同时被关进看守所的汪伪汉奸见到他，以为他也被押解来了，用惋惜的口吻对他说："老徐，你怎么倒先来了？"徐文祺听了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得说："我们不谈这些。"

陈璧君等刚关进宁海路25号时，受到看守所的优待。一日三餐，都由外面的酒家负责供应，下午还供有茶点。他们住的房间也不上锁，行动很自由。但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陆续被捕的伪内政部长梅思平、伪蒙藏委员长岑德广、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李讴一等；在日本被押回的陈公博、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等陆续解到后，待遇就逐渐降低，除陈公博一人独处一个房间外，伪部长级的二三个人住一间房，次长与司长级的七八个住一间房。伙食也变得很差，一度曾用黑面粉制成面疙瘩作囚粮，汉奸们称为"原子弹"。房门也加锁，而且终日不开放。但是，由于陈璧君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症，且体胖，看守所破例同意她的要求，让其子女陪伴，并由她选择二三人与她同禁。陈璧君又提出在她居住的二楼，除将进出的楼梯口大门锁住外，其他各个房间不上锁，也得到看守所的批准。但看守所要她出面约束各人，无事不得走出自己的居室，有事可揿铃叫看守。陈璧君在自己的囚房里，以静坐休息为多，即使每天半小时放风，也不参加。

苏州公审

当陈璧君等汉奸被羁禁在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时,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先后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条和《惩治汉奸条例》16条,对汉奸的量刑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犯有下列罪行的汉奸将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图谋反抗本国者;(二)图谋扰乱治安者;(三)招募军队或其他军用人工役夫者;(四)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军用品,或制造军械弹药之原料者;(五)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谷米、麦、面、杂粮或其他可充食之物品者;(六)供给金钱资产者;(七)泄漏、传递、侦察或盗窃有关军事、政治、经济之消息、文书、图书或物品者;(八)充任向导或其他有关军事之职役者;(九)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者;(十)扰乱金融者;(十一)破坏交通、通讯或军事上之工事或封锁者;(十二)于饮食水品中投放毒物者;(十三)煽惑军人、公务员或人民逃叛通敌者。关于汉奸财产,《条例》规定,,对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没收其财产,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1946年2月的一个午夜,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被拘汉奸一律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的决定,陈璧君等人从南京被移解到苏州看守所。

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起诉陈璧君,内容为:

"……被告陈璧君,系已故汪逆兆铭之妻,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日战争发生后,随同汪逆前往重庆。民国27年秋间,汪逆勾结日酋近卫文麿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被告与汪逆潜离重庆,先至河内,派陈逆公博至香港发表艳电,响应近卫主张之和平三原则,旋与汪逆由河内至香港转往上海,至29年一月间,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公然反抗中央。其时汪逆任主席,被告任伪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观于其但用"明"(指汪逆兆铭)"崖"(指被告)密电字样,为与各方面通信暗号,是其与汪逆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煊赫,至为明显。即至汪逆已死,陈逆公博继任伪主席时,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机构,惨害地下工作同志,使我数千年文化之古国,沦于倭夷而不知耻,卖国求荣,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璧君。因她平素傲岸,人们都想看她被审讯时的狼狈状,因此未等开庭,庭内已座无虚席。陈璧君此时虽说是个阶下囚,但她总以为自己资格老,是国民党内的有功之臣,因此出庭时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架着一副细边的眼镜,态度仍很骄蹇。在法庭上,她时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所作所为,时而讥嘲法官,甚至大闹法庭,破口大骂蒋介石。说也奇怪,当她骂完这些话后,旁听席上竟发出一片笑声,响起一阵掌声,这笑声和掌声,反映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然而陈璧君还以为这是人们对她的同情,因此她在接下去的发言中,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卖国行径,而且还厚颜无耻地为汪精卫辩护:"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日本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受?"对此,听众嗤之以鼻,报以嘘声。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对此,陈璧君表示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因为她明白"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此外她还强硬地表示没有坐牢的耐性,而有受死的勇气。

陈璧君虽不想上诉,但她的女儿汪文恂认为法院判得太重,仍聘请律师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5月21日,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刑事二庭作出两份判决:第一,核准江苏高等法院4月22日所作的判决。第二,驳回汪文恂的声请,理由是"违背法律上之程式","从程序上予以驳回。"

陈璧君被判决后,关在狮子口监狱内执行。在她被判决后不久,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先后在狱中刑场被执行死刑,不免使她有兔死狐悲之伤感。6月3日,陈公博首先被枪决。临刑前,他换了身干净衣服,取了一把小茶壶,双手捧着,面容严肃地向陈璧君的囚房走去。他对陈璧君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纪念吧!"当陈公博伸手向她握别时,陈璧君纵声痛哭!两个多月后,褚民谊也在狱中被枪决,刑前,陈璧君也向他哭别。至此,陈璧君才真切地体会到末日降临的滋味。这时,她心脏病发作,一夜中曾昏绝三次。

被囚终身

1949年初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狼狈南逃,它对关在狱中的汪伪汉奸作出一项特殊的决定:除已执行死刑者外,凡被处无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释放!判处无期徒刑的,则继续羁禁。

4月27日,苏州解放,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禁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后,陈璧君又从苏州移押上海提篮

桥监狱。

陈璧君刚入提篮桥监狱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对过去的罪行根本就不予承认，认为仅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在监狱中的管教干部对她进行热情的挽救和教育，使她这个以傲岸出名的人，认识上有了些变化。她在狱中用半通不通的句子写道：

“我初到此处监狱之时，自己一些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中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读《解放日报》后，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其后另一朋友，更送我许多进步的书籍、小说、杂志、活叶文选，更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后，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对于以错误见解所做成之点，明若掌上现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时，重复工作之道路、途径，亦得深刻认识，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之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5年7月，她在一份自白中又说：“我少子来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地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一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后，身体很虚弱，心脏病、高血压严重，头痛、头晕、腰痛、失眠等症加剧，监狱及时对她进行医治，病重时送入监狱医院治疗，1959年3月，陈璧君病情十分严重，再次送入医院，但因病魔缠身多年，心力衰竭，缠绵三个月后，死于监狱医院。由于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房亲戚收殓火化，骨灰送抵广州。次年，由其在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晓非）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1946年6月3日，星期一，黎明之前的零点12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在官邸里，一面与属员商谈公事，一面在等待着上面的指示。正在这时，机要处送来了刚刚收到的蒋介石侍从室的通知：

“京特复第一二九号秘密迅速执行！”

谢冠生阅罢通知，立即从座椅上霍然而起，拨通电话，通知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于当日上午将关押在苏州监狱中的“第一二九号”迅速、秘密执行处决。接着，他又派其机要秘书携带司法行政部的执行令、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书以及谢冠生的一封亲笔信，连夜赶往苏州，面呈江苏高院院长。

位处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接讯后，立即紧张地忙碌开了。

这天要被执行处决的，就是汪伪降日叛国集团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城中一个官绅家庭。青年时在其父陈志美影响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1年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不久就脱党，去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到广州，加入中国国民党，投入汪精卫门下，很快飞黄腾达，成为汪派的核心成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陈公博先随汪精卫反蒋，组织“改组派”；后随着蒋、汪合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抗战军兴，陈调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随之下水，在汪伪汉奸政府中先后充任立法院长、上海市长等重要伪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头号汉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伪政府乱成一团。为逃避国家惩罚，陈公博于8月25日携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及大汉奸林柏生、陈君慧、周隆痒、何炳贤共7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飞机从南京逃到日本亡命；历时一个多月。终因国内掀起严惩汉奸的热潮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10月3日陈公博一行被送回南京，立即被捕。

陈公博先被关押在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旋又转移至宁海路25号的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过他的“楚囚”生活。每日下午倒便桶，陈公博与众囚犯挤在一道，感到有失面子，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日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项要求获得批准。陈公博又感到看守所饭菜太差，难以下咽，要求改善，他说：“到绑赴刑场枪毙时，肥肥胖胖象个样子。”此项要求却没有获准。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陈公博没有被提审过，只是每日伏案书写《八年来的回忆》，长达30000字，竭力为自己与汪伪集团辨护。在这期间，军统局长戴笠曾亲来探视，与陈公博密谈了两小时之久。戴笠许诺将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使陈公博一度似乎看到了生机而喜形于色。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不断高涨，戴笠又于1946年3月坠机身亡，陈公博的幻想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1946年3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三人被押送到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4月5

日下午，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判陈公博。首席检察官韩焘宣读了起诉书，洋洋万言，列出了陈公博的十大罪状，主要是：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在检察官读完起诉书后，陈公博当庭逐条进行了辩护。他竟然指责起诉书"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并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然后他宣读自己的《八年来的回忆》，历时2小时之久。

但是，不管陈公博怎样巧言诡辩，最终逃不脱历史的惩罚。1946年4月26日下午4点，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判决书："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陈公博知道这是蒋介石定了的事，申请复判无济于事，因此表示不再上诉。但陈妻李励庄还不死心，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果然，到了5月14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到6月1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6月3日上午6点30分左右，谢冠生的机要秘书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赶到了苏州，踏进了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室，送来了对陈公博立即执行死刑的各种文书。院长立即通知监狱典狱长迅速安排临时法庭，布置刑场、警备等等事宜。

几名法警来到牢房提人，陈公博一见这阵势立即就明白：死神已经降临。他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陈璧君的羁囚之处，送给她留作纪念，并向陈璧君鞠躬告别说："我先随汪先生去了。"陈璧君失声大哭。

陈公博来到刑场前，先写遗书。一封给家属，一封给蒋介石。但给蒋信只写了一半，陈公博突然决定不写了。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书。

约在上午8点半钟，陈公博来到监狱刑场旁刚设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京特复第一二九号，……爰依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答："我给蒋主席的一封信，只写了三分之一。"

"可否在一小时内续成？"

"现在嘛，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

"你们可以调查。"

"你有什么要求？"

"茶杯一只，系兆铭兄（指汪精卫）所赠；一等旭日大绶章一枚，系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均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询问完毕，陈公博起身向刑场正中走去。他回头对执行枪决的法警央求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了一下士林布衣衫，然后向左转，朝北立正，说："好，请吧！"法警举起盒子枪，对准陈的后脑打去。枪声响过，陈公博立时俯倒在地，混身痉挛，一股脏血从右眼流出，几分钟后，气绝身亡。

这时是上午8时40分。

时当6月，天气炎热，陈公博毙命后仅一天，尸体即已发臭。当即由陈在苏州的一位亲戚将陈尸体送往苏州殡仪馆匆匆入殓。后移葬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未敢树立。

这就是大汉奸陈公博的下场。

（纪盛鸿）

马歇尔调处中国内战的失败

当代美国的名人中，乔治·马歇尔也许算得上是少数几个世人瞻目的人物之一了。在烽火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以驰骋疆场、纵横捭阖的雄姿，风云一时。他得到的嘉奖不计其数，享有的荣誉很难有人与其媲美。英国首相邱吉尔赞誉他是"胜利的组织者"，杜鲁门总统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人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人"。可是，一些传记作家在为马歇尔的卓著成绩喝彩时，则不免为他调处战后中国内战的失败而悲叹；常胜将军也有过一次失败的记录。

中校第一次到中国

1880年岁梢，马歇尔降生于尤尼恩敦的一个富有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家焦炭熔炉公司的董事长。童年的马歇尔实在不招人喜爱。学校成绩不佳，致招来"小懒汉"外加"癞皮狗"的诨号。16岁那年，他进了弗吉尼亚军校，踏入了他将终生为伍的军人生涯的门槛。摸打滚爬的军营般生活和缺乏自由的军事纪律，慢慢的使马歇尔换了人样。一年级结业时，他当上了伍长，两年之后，升为军校生总队长。操练场日子的流逝，使他的指挥才能初展露芽。军校毕业后，马歇尔应召到纽约参加授职考试被录取。1902年2月，接受美国陆军少尉军衔。不久便被派驻菲律宾群岛的美军基地。

新婚才两个月的马歇尔不得不告别期待已久的缠绵之情，撇下娇妻让她在娘家弹琴遣日，而自己动身去海外

服役。两年的海外服役，除了在脸上添了几条纹路，没有给马歇尔带来什么变化。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4岁的马歇尔已经当了12年的军官，换了14处驻地，尽管倍受各处上司的青睐，但仍不过是一个区区中尉而已。1916年他才被提为上尉，跟随第一步兵师出征法国，抗击德军，并成为该师临时中校衔参谋。在一次演习中，马歇尔引起了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人称"黑桃杰克"(按即扑克牌中的黑桃J，西俗认为黑桃杰克精明强干、睿智练达)的约翰·潘兴将军的注意，从而被调入总参谋部任职，晋升临时上校军衔。战争结束后，临时军衔被取消，马歇尔由他的正式军衔上尉提到少校。1921年8月，潘兴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成为他的首席助手，升任中校。1923年，潘兴任职期满，马歇尔的晋升似乎已经到了顶端。但是，雄心勃勃的马歇尔还想继续在军阶上攀爬。他感到必须进入野战部队以便充实资历。于是突然冒出了申请前往中国美军基地的念头，并获得了批准。

1924年7月初，马歇尔带着妻子莉莉和岳母，搭乘美军运输船从纽约启程赴中国，前往驻守天津的第十五兵团报到。该团团长刚奉召回国，马歇尔受权主持团内军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统领一团人马。只是在这时，他对军旅生涯所抱的种种幻想，才在指挥中变成了现实。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谋一职而言，马歇尔似乎才真正站入了指挥官的角色。在他的训导下，原性病患者占居各团之首的第十五兵团，很快就以"步兵轻骑"驰名驻华各美军营地。虽然马歇尔只是充当了几个月的代理团长，新团长到任后又屈居团副，但作为一个成绩斐然的指挥官，马歇尔感到满足。

3年光阴一逝而过。马歇尔在华任职期满了。1926年底，他携带妻子、岳母返回美国，接受陆军军官学院教官的任命。中校马歇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全然没有为他的军涯发迹提供任何资本。马歇尔回国后10多年里始终没有挤入将军的行列便是证明。不过，短短3年的中国之行，却使马歇尔与中国结下了难解之缘。

今非昔比的受命使华

马歇尔恐怕不会预料他会再次与亚洲的这个大国发生关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弭之际，马歇尔身负重命，以65岁的高龄重游旧地。不过，今非昔比，当年一个不起眼的中校，如今已成为威震世界的五星级上将了。

在回国后的漫长岁月里，马歇尔渐渐被视为美国一流军人引人注目，但却忧忧不得志。他先后当过美国陆军最大的军事学校本宁堡兵校副校长、穆尔特里堡陆军师师长、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师师长，但却还滞留在中校军衔上。1936年8月24日，当马歇尔正式领受准将军衔时，他已55岁。尽管在1938年夏，马歇尔以低于他人的准将军衔，出人意料地擢升陆军部副部长、副参谋长，但在军政要员荟萃的首都华盛顿，马歇尔常为自己在官场和社交场合的准将军衔不够堂皇而尴尬。法定退役的年龄为64岁。按和平时期晋升的节奏，要在退役前登上少将军阶，对马歇尔来说并不乐观。

炮火给马歇尔带来了好运，战争向他展现了用武之地。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作为盟国随即卷入战争。就在这一天，马歇尔在陆军部举手宣誓，领受正式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临时上将军衔，就任陆军参谋长职。马歇尔从此如鱼得水，春风得意了。他负责主持联合参谋总部的工作，不仅成了白宫杜鲁门总统决策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而且还周旋于盟国首领戴高乐、邱吉尔之间。1943年秋，同盟国首脑们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马歇尔担任盟军最高司令，负责指挥欧洲登陆战役(代号"霸王行动")。1944年12月，马歇尔升任五星上将，登上了美国军界的最高阶。战争结束时，他已满身载誉，蜚声全球了。

马歇尔想到了功成身退。1945年8月20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写了辞职信，并推荐艾森豪威尔继任参谋长。杜鲁门同意了，不过请他留任到11月新参谋长到任后再卸职。恰恰在等待移交之时，一项新的任命改变了马歇尔的命运，他未能按原打算，回到他的多多纳庄园去莳花种菜。

东线的中国战场还揪着美国人的心。苏联已出兵对日宣战，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美国政府深知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杜鲁门肚里打着小九九，他不愿看到由于国共的火并而失落美国对于中国、乃至对于亚洲的控制权。而偏偏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执意反共。此人多嘴饶舌，既惹中共讨嫌，又失国民党欢心。杜鲁门不得不更换算盘珠。他想到了马歇尔。

也许，马歇尔非常自信。他精于斡旋，娴于词令，常筹运自如于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阵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不止一次地解开了被认为是解不开的冤家，甚至最势不两立的对头们也接受了他的劝解，化干戈为玉帛。似乎毛泽东、蒋介石也不在话下。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带着杜鲁门调处中国的指令，乘坐飞机到达上海。19年前的中校，现在穿着将军的制服，要执行一项与当年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的艰巨任务。然而，这次马歇尔却大大跌了一跤。

一枝四叶首蓿的凋零

马歇尔动身前，好友斯塔克海军上将的夫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牧场上采到一枝四叶首蓿。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开紫色的蝶形花。这位海军上将把它送给了东行的马歇尔，祝他吉星高照。

马歇尔一到中国，便投入紧张的调处工作。1945年12月21日他由上海到达南京，当晚就会见了蒋介石与宋美龄。23日，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面谈。时下的中国，抗日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火苗已四处冒窜。虽然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燃起了一丝和平之兴，但东北的枪炮声连绵不断，国共两党的磨擦和军队的交战时在发生。形势还相当险恶。

马歇尔果然身手不凡。他的斡旋曾几次化险为夷。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一度因国民党执意抢占赤峰、多伦两个战略要地而陷于僵局。马歇尔亲自前去劝说蒋介石，蒋才同意"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使停战协定如期签署。同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虽在重庆谈判后即进行筹备，却因国共双方的龃龉几有泡汤之虞。马歇尔出面调解的结果，虽在原则问题上未能达到一致，但毕竟促成了政协的召开，签定了协议。在他的协助下，整军协议、东北停战协定的签署，一次次向华盛顿传去捷报。马歇尔及时地、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向杜鲁门汇报调处进展情况。他的报告不经过远东司，直接由副国务卿艾奇逊转给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还专门派了一个小组常驻国务院负责马歇尔与五角大楼之间的联系。开始，马歇尔的调处功绩受到普遍肯定。毛泽东在1946年2月9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马歇尔为他的马到成功自鸣得意。他给留在华盛顿的斯塔克上将写了一张便条，感谢他和夫人送的苜蓿显灵，保佑了他的调处使命顺利进展。然而，马歇尔高兴的太早了。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10天前，他到了延安，访问了毛泽东。虽然他也感到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裂痕，国共矛盾的调处前程难卜，但谈判席上的一份份协议，使他已有足够的成绩向杜鲁门报喜了。不料，风云突变。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践踏政协协议的议案，原计划签定的国共和约告吹。马歇尔前脚刚到华盛顿，后脚就追来了中国发出的危急电报。手下的军官们建议他不要再回中国，以免对调处失败负责。但不肯认输的马歇尔给重庆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将偕同夫人凯瑟琳照原计划返回。

4月18日马歇尔返回中国时，国共双方的军队在东北已打得难解难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为东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丧失东北有罪的蒋介石深知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从日寇投降之日起，便以"接收"为由，在美国军舰、飞机的援助下，将国民党军队整军整师地从上海、广东、昆明等地调输东北，军队数目之大远远超出停战协定规定的5个军的数目。4月下旬开始，局部内战已在东北挑开序幕。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违约进驻长春，蒋介石乘坐马歇尔专机亲临沈阳坐镇指挥。马歇尔返回中国后的调处主要集中在东北休战上。他一方面继续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运兵到东北，另一方面也歇力劝蒋停战，缓和冲突。由于马歇尔的劝说，东北休战于6月7日实现。但休战期间的国共谈判至这个月底还是破裂了。马歇尔仍不死心。他曾八上庐山牯岭，就停止内战问题对蒋介石进行劝解。无奈终究没能扭转内战的局势。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受到马歇尔与美国政府的以政治途径解决中国问题的压力，但美元加武器的大量美援又怂恿着他们以内战实现独裁的决心。7月12日，国民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陷入大规模的内战。8月10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停失败。翌年1月8日，马歇尔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驻华生涯，卷起铺盖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

马歇尔带到中国来的四叶苜蓿没有显灵。随着内战枪炮四起，苜蓿也零落成泥了。

败运在劫难逃

诚然，马歇尔调处中国的失败并未影响他的地位。辱命回国后，他又担任过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然而，辱命的中国之行毕竟是马歇尔终生的遗憾。美国《时代》杂志社的约翰·比尔说："马歇尔一生事事成功，唯有中国之行是一次失败，他对此耿耿于怀。"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朋友杜勒斯说：调处中国的失败，"是他（指马歇尔）从未预计到的，并且也是很难忘掉的。每一想到他本人作为总参谋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辉煌成就时，这一失败使他不断感到痛苦。"

马歇尔调处中国为什么失败？根本原因是由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其附庸，成为一个形式独立实质受美国左右的殖民地。由于畏惧世界民主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美国政府一方面竭力扶植发动内战已成既定方针的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也声称支持中国的和平民主，想通过谈判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马歇尔作为这种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的执行者，实际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处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因此，调处的失败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援蒋的飞机大炮与和平的橄榄枝在效用上互相抵消了。

从马歇尔个人来说，他的调处工作当然不能一笔抹煞。在他回国述职之前，尽管他的反共立场始终如一，但态度上"一般是公正的"。调处的实绩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而在述职返华以后，面对内战已成事实的形势，马歇尔则实际推行了援蒋内战为主，促蒋停战为次的政策。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愤慨和怒斥。虽然马歇尔还在继续奔忙说项，不放弃调处的中间人角色，但在

事实上他的调处只在帮助国民党政府。

除了帮助海运、空运国民党军队外，马歇尔使华期间有案可查的援助包括：美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人数多达2,000余人，直接提供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军队25个师，供给国民党飞机1,000余架，炮7,000余门。约略统计，从1946年2月至6月，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援助合计达13.3亿美元。

马歇尔本人也有明显的偏向。他曾疏导蒋介石说，延安只不过是一座小城市，从军事观点来看，其影响微不足道。不值得国民党军队费力气去攻打，以免浪费政府的财力。他可真算得上国民党政府的高级谋士了。马歇尔结束在华使命，在美国见到民社党首领张君劢时说，他在中国时，周恩来曾给他看过一份共产党军队缴获国民党军队武器的清单，上面列有大量美式武器。马歇尔对张君劢说："如果这一情况不予制止，美国援华还有什么好处，那就等于美国间接援助了共产党。"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将马歇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由此看来，调处中国的失败就不是马歇尔的无能了。如果说，战争的机遇使马歇尔的成就登峰造极，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马歇尔本人的立场则使他的调处失败成为必然。

（齐卫平）

历 史 考 证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战役

长期以来，党史界对1946年底至1947年初，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是否是一个统一的战役，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一组织实施的一个战役的两个主要方向；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是当时民主联军南、北满部队，在南、北满分别组织实施的两个独立的战役，只是在战略行动上有所配合。我们认为前一种看法是符合客观史实的。理由有以下三点：

1.战役是在统一的作战方针、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南满根据地的进攻，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制定了坚决打破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企图，以确保南满根据地的作战方针，把保卫南满根据地当作东北我军的中心任务。在战役即将开始前，民主联军总部重新作了北满、南满和西满部队在战役上进行积极配合的部署。在历时三个半月之久的战役过程中，东北民主联军自始至终地贯彻了这一统一的战役方针和计划。北满和东、西满部队，都直接为完成保卫南满根据地这一中心任务，从不同方向和以不同方式牵制和消耗了敌人，在战役上有力地配合南满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四次重兵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在南满牢牢地站稳了脚。

2.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部队紧密协同的战法。这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丧师失地。经过这样几次反复，民主联军疲惫和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将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企图彻底粉碎。如果民主联军当时不是在战役上进行统一指挥，适时组织南、北满部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则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对临江地区的四次进攻，保住并扩大南满根据地是难以做到的。

3.加强了南满的领导力量，有效地进行战役的统一指挥。战役在南满形势处于空前艰难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战役开始前，即电请中央军委批准派陈云担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以加强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的领导。陈云、肖劲光到达南满之后，坚定地贯彻了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方针，保证了南、北满两个作战方向的紧密配合和战役的统一指挥。

综上所述，北满部队三下江南作战和南满部队四保临江作战，都是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组织的、直接以粉碎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方针，确保南满根据地为目的的统一的战役。

（摘自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通讯》总39期'作者柳金铭）

"解放军"名称始于何时

我国最早出现"解放军"这个名称，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的时期。

延安总部在1945年8月11日发布的第4号反攻命令中使用了"山西解放军"的称号。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发表总部的第2号至第7号命令中也使用了"各解放军"的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和表明我党和谈的诚意，中央决定继续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中止

一些地区的部队曾用过的"解放军"的称号。军事最高指挥机关仍然沿用"延安总部"之称。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全面内战。为反击蒋军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各战略区组编野战军。同年9月间,我军开始使用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共同签发了组成"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的命令。同时,人民解放军总部成立。1947年7月底开始,各地部队相继正式改称"人民解放军"。

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的时间内(从1946年更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任务。中央军委根据会议精神,于11月1日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选自《党史博采》89年8期,作者:韩玉春)

二次大战后向日本索赔考

日本八年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据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不完全统计,中国死伤军民1040万,公私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日本战败后,理应对中国赔偿。国民党起初也曾积极索赔,可迁台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赔款要求。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索取日本赔偿的问题。1943年11月4日,中国驻苏联使馆转来苏联瓦尔加教授所著《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赔偿损害问题》,蒋介石遂令参事室研究。1944年2月14日,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研究后认为,苏联所拟"赔偿责任以及赔偿办法,除先尽物质损害赔偿,然后再赔偿身体损害一点外,均有利于我国。因之同样可适用于日本"。1944年3月19日,参事室外交组黄正铭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指出日本除对我军费赔偿外,还应以四种方式对我予以经济赔偿。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充实内战实力,对赔偿一事十分关切。9月13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和美苏两国外长换文,表达了中方对赔偿问题的看法。10月和11月,蒋介石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约集行政院及内政、经济、外交各部代表,两度会商研讨索取赔偿的具体办法。在11月3日的讨论中,朱绍阳等人要求日本还应赔偿战费,而王宠惠则力主实物赔偿,认为赔款是旧观念。王提出的其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赔款并非以战胜国的战费为据,而是以德国的赔偿能力为据;现在如对日本要求赔偿战费,则战费数字过大,日本必无力赔偿。同时各国分别提出战费数字,争论势不可免,争论之后必定绝无结果。上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也以赔款为主,但没有切实执行,因此英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用德国的工业潜力来抵偿赔款,办法就是拆除德国的工厂和每年以一定的实物赔偿。波茨坦公告第十一款也规定了日本以实物赔偿。11月13日,外交部又约请12个部的代表研讨,最后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原则之办法》,规定:1.日本对我赔偿以实物为主;2.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受损害最巨,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应有优先权,如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占日本赔偿总额之过半;3.凡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公私财产,悉数归属中国政府,以作赔偿之一部;4.日本境内宜充赔偿之各种实物,应交中国以作赔偿之一部,这些实物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5.日本每年应将若干原料和产品,在规定年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作赔偿之一部。1945年11月29日起,由行政院主持办理索赔案。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名赔偿委员会,改隶行政院,主任翁文灏。

索赔成功与否,并非中国一厢情愿,它还取决于其他盟国的态度。为处理战后的日本问题,1945年12月27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以下委员会:(1)远东委员会。它由中、美、苏、英、法、菲、加、澳、纽、印度等国代表组成,总部设华盛顿。中国派出的代表为李惟果、马则民等,由驻美大使顾维钧兼任代表团团长。(2)盟国对日委员会。总部设东京,主席由驻日盟军总部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担任,另外由中、苏、英各出一位代表。朱世明和商震先后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该组织主要协助最高司令部执行投降条款和对日实行占领和管制。由于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由最高司令作出决议,唯有他履行盟国在日本的执行权",因此,负责制定对日政策的远东委员会实际上所起作用非常有限。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情况下,美国的态度更是举足轻重。

战后,蒋介石奉行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为求得美国援助大量的内战经费,在赔偿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即使美国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只能忍气吞声。不过,当时最关心的是如何分配日本的残余舰艇,以增添内战资本。早在1945年10月1日,中国就向盟国提出,"日本海军设备、航空工业生产设备,拟由我方接受,作为抵偿损失之一部",并令驻美大使魏道明多次与美洽商。经反复交涉,最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平均分配。自1947年6月24日起,四国代表在东京分四次抽签。前三次抽签,中方共分得驱逐舰、护卫舰、运输舰24艘。前二批抽得的16艘开抵上海港,由海军少将方莹接受,第三批8艘开抵青岛,第四批开抵台湾左营港,由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黄绪虞接受。所分舰只全系小型,总吨位不足5万吨。

根据国际惯例和美国的要求,国民政府将在华接收的日本产业作为赔偿我国损失之一部。1946年6月13

日，通过了《接受国内日本产业赔偿我国损失记帐办法》，规定战利品、伪组织的财产不在赔偿之列。由于国民政府在东北只接收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1/5，统计结果，日本在华资产可供赔偿者约3.5亿美元。

在日本赔偿的核心问题即实物赔偿上，各国意见不一。美国起初主张处理从严。1945年12月19日，美国赔偿专员鲍莱在考察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后提出报告，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1926－1930年的水准，其余工厂均尽速拆充赔偿。苏联提出所有日本在国外财产的处理，不在远东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否则拒绝参加赔偿会议。此议遭到其他国家反对，后美与苏妥协，终以苏联在东北等地移去的器材不列入赔偿。将日本工业限制在何种水平，以及赔偿分配的办法，是远东委员会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中国方面主张日本工业应限制在从事侵略前的水平，拆迁的工厂设备，中国不应少于50%。鉴于运输能力不足，希望中方所分工厂五年内由日方代管，或在日本利用当地人力，由中国经营。根据国际惯例，赔偿问题的整个解决要在对日和约中解决，当时战胜国又急于用日本工业来复兴本国工业，于是，1946年初，远东委员会通过了临时拆迁方案，将盟军总部管制下的日本工厂先作部分拆迁。1946年5月和8月，根据划定的十二项工业范围，公布了可作赔偿的工厂名单。并规定拆迁工厂总数和30%作先期赔偿。盟军总部成立了赔偿执行处，哈里逊任处长。日本方面成立了赔偿厅，厅长山口。中国派出恽震等5人组成赔偿小组赴日调查。碍于远东委员会办事迟缓，自1946年9月起，中国方面一再要求美国单独行动，执行先期拆赔。1947年2月14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准许在先拆充赔偿的30%中，中国取得15%，英国、荷兰、菲律宾各取5%。到3月底，远东委员会讨论尚无结果，于是，美国遂径行对盟军总部颁发指令，实施该方案。这样，中方共运回工厂设备三批。第一批是机床工具类，共7686部，重52034吨，第二批是试验设备类，1690具，重735吨，第三批是机电设备和剩余设备类，其中电器设备有1.5万千瓦蒸汽发电机一套，450千瓦柴油发电机等，重661吨，炼钢平炉、各种马达839具，重19166吨。第三批于1949年5月运台湾基隆。

应该说，美国最初对国民政府索取赔偿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例如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分配各国摊赔额时，决定中国占30%，美国甚至表示，愿将自己所获的6%也给予中国。美国如此慷慨热心，其目的在于扶蒋反共，帮助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并以此抵御苏联在东方的影响。可是到了1947年下半年，美国目睹国民党在内战中惨败，对国民党已不寄予太大的希望。这时美苏矛盾日益显露，1947年美国通过了马歇尔计划，拟通过援助希腊等国以抵御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在东方，美国开始考虑日本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索取日本赔偿已不热心。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明确表示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防御今后远东方面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随后，美国就放弃了鲍莱计划，置远东委员会方案于不顾，同意了美国陆军部长斯揣克(strike)的方案，即认为日本战争能力已被消除，其余工业应予保存。盟军总部便干扰、拖延并最终于1949年5月中止了拆迁工作。这样，国民政府只获得先期允诺分给中国15%中的极小部分，成了象征性的偿付。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顾一切地扶持日本，坚决主张各盟国放弃赔款要求，以与日本缔结和约。此举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菲律宾、法国、印尼分别坚持80亿、20亿、40亿美元的赔偿。这时国民党置身孤岛，态度更趋软弱。1950年12月19日，由顾维钧向美国提出，“如他国坚持赔款而能得之，我亦不能完全放弃”。美国远东顾问杜勒斯出访菲律宾、法国等国，一面施加压力，提出赔款是不现实的，一面又以答应美援堵住菲律宾等国强烈的赔偿要求。1951年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同年5月邀请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这令蒋介石忐忑不安，6月1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中国对于日本不采取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以种种直接间接办法求取对日和约之及早观成”。台湾行政院第一〇三次会议研究认为，英、印度业已承认大陆政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已向美国表示不应由台湾与日签订和约，台湾能否与日订约。“实系于美国及日本的态度，我如坚决要求赔偿，既难望美国之支持，自亦非日本所愿，势增加我参加和约之困难。”于是决定“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在美国一手导演下，拒绝中方参加，于1951年8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通过了片面的《对日和约》。条约第十四条承认，日本“应对它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给以赔偿”。但接着又说，“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能够全部赔偿这些损害和痛苦”，有关国家可以直接和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可以给以必要的劳务赔偿。这实际上取消了日本的赔偿。8月15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和约草案拒绝战胜国中国参加，“并取消了日本的赔款，这是违反国际协定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对自己未能参加和约草案的签订也表示了抗议，但对和约取消赔偿一事却只字不提。

1951年9月后，有日本方面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双边和约的传闻，美国为反对新中国，迫使日本与台湾订约。蒋介石为摆脱困境，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勾结日本共同反共，便不惜放弃赔偿，讨好日本，以与日订约。1952年2月19日，台湾“外长”叶公超直言不讳地说，“中日是不是共同反共，确立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则不论全面媾和也好，单独媾和也罢，和约吃些亏亦是不足议论的”。

1952年2月20日，日本代表到台湾会谈。谈判中，台湾方面试探可否根据旧金山和约精神，取得日本的劳

务赔偿，但日本代表稍加反对，台湾方面就放弃了索赔的要求。结果，"中日和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竟写明，"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台湾国民党当局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连台湾学者都哀叹，血战八年的中国，在日方的坚持下，所争得的只不过是"自动放弃"的极度"宽大精神"罢了。国民党为了一党和集团的私利，竟弃民族利益和尊严于不顾，而连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等国在和约后都表示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事实上日本事后也先后向上述国家付了共约10.12亿美元的赔款。相形之下，岂不令人愤慨！

其实，赔偿的意义已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具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那末，日本是否会铭记台湾此举的"恩德"呢？日本代表河田当时在谈判中就说，以日人在华"巨额资产作为贵国之赔偿，已属难能"，"今以善良人民私有财产皆悉数充作赔偿，在国际惯例上，尚属创举"。言下之意，非但毫不表示感谢，反而认为放弃索赔要求，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孟国祥）

抗联名将李兆麟死于谁手

关于抗联名将李兆麟的被害，外界明了真相的不多。现将笔者当年了解的事实介绍于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兆麟出任松花江省副省长。当年12月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李兆麟出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那时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期间，李兆麟在各种公开场合，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制造重庆校场口事件，迫害民主人士等劣迹。李的言论，引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头子毛人凤的密切注意。

1946年2月3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通化县人民，张灯结彩，欢庆东北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原敌伪通化支会宣传部长孙耕晓，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勾结已被苏军缴械的日本关东军第一二五坦克师团参谋长滕田宝彦，网罗了一批日军军官，组织了一支约3000人左右的暂编东北边区部队，制造了一起"二·三通化暴动"。这次暴动迅即被中共通化省委和通化支队扑灭了。"保密局"毛人凤以此为借口，诬指此次暴动系李兆麟主使，设计谋杀李兆麟。派人在中苏友好协会门前埋伏。结果，特务把李钧误为李兆麟，致使李钧遭到残杀。

首次行动失败，毛人凤再次密令哈尔滨市警察局长余秀豪负责谋杀李兆麟，余为广东人，曾任浙江警官学校国际警察教官。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集会，李兆麟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破坏和谈蓄意挑动内战的行径。当晚回到家里，李兆麟患了感冒，第二天（3月9日）在家休息。这天下午四时，有人送信给李兆麟，原来是国民党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邀约李兆麟到他寓所谈话。一会儿一辆汽车来至李宅迎接李兆麟。开至中苏友好协会附近，汽车突然抛锚，李兆麟的警卫员下车帮助修车。李兆麟下了车，步行去水道街9号（与中苏友好协会相距100米左右）杨绰庵的寓所。一进门，就碰上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她便是余秀豪秘密安置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以监视李兆麟行踪的"保密局"女特务）。李兆麟对她也十分熟悉，随即脱下大衣，交给孙格龄，便进入会客厅，与杨绰庵市长见面谈话。交谈中，孙格龄送进了一杯茶。李边喝茶，边聊天，不久即感到腹部剧痛，他脸色苍白，满头虚汗，随即瞳孔放大，倒在地上，中毒而亡。

李兆麟被安葬在哈尔滨道里一座公园里，公园被命名为"兆麟公园"。

章微寒

风　云　人　物

王　若　飞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革命家。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蔡和森等组织"少年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久，参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工作。1923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协助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担任中央江苏省委常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苏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928年6月，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后被派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代表。1931年7月回国，到内蒙古开展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和乌兰夫一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动各族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绥远包头被捕入狱(1936年初，他被转到太原监狱)。他在狱中度过了五年零七个月，始终坚贞不屈。

1937年夏，在党的营救下出狱，回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后，历任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4年后曾三次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1945年8月28日，陪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返回延安，他协助周恩来继续同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他是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工作，不幸在山西省黑茶山飞机失事，与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一起遇难。

材料　绥远监狱中的“大共产党”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王若飞被押送到归绥市牛桥“第一模范监狱”。这一天，监狱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王若飞在几个警卒“护卫”下，唱着《国际歌》走过来。他的歌声震撼着所有牢房，犯人们争相从囚窗窥望他的背影，向看守打听他的姓名。一位老看守悄悄地对犯人说：“唱《国际歌》的人，就是那个大共产党，这人胆子可大啦，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共产党如何好，国民党如何坏，骂蒋介石是个大卖国贼。这可是条好汉子。”“这个大共产党听说叫黄敬斋。”从此，犯人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黄敬斋的名字。

这所监狱，有四个“号”，名叫“改”、“过”、“迁”、“善”。押来的犯人，该送哪个“号”，是以案情轻重作决定的。案情严重的多囚在“改”字号。王若飞也被囚在“改”字号，这不仅是反动政府认为他案情严重，主要因为他是个“大共产党”，知道党内的情况多。

王若飞的才华和胆量，受到傅作义的赏识。傅作义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真了不起。”他叹息地说：“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傅作义曾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作了一次长谈，表示只要他答应出狱后，在绥远作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了傅作义提出的条件，他要求傅作义按照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否则，宁愿老死囚笼或死于断头台，也不愿出来。

傅作义对王若飞的态度绝望了，便将他交绥远高等法院。法院多次开庭，王若飞则借机大谈马克思主义，公开揭露反动政府无辜屠杀人民的罪行，吓得法官张惶失措，宣布休庭。每次敌人都以材料准备不足来掩饰审讯的失败。

高等法院接受了前几次审讯失败的教训，拼命收集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材料”，加以分析丑化。等到他们认为准备充分以后，又开庭审讯了。

法庭上布置森严，军警站立两旁，伪高等法院院长和一个姓靳的法官穿着法衣端坐在审判台上，旁边坐着陪审、录事等人。法官对面摆着一张白色木椅，王若飞一进来，就被指定坐在白木椅上。

法官劈头问王若飞，参加共产党后有什么犯罪活动？王若飞反问法官：“什么叫犯罪?”“犯罪，就是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什么民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制订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工具，是它们忠顺的奴仆而已！”

伪法官把案头文件翻来复去，找不出反驳王若飞的话。最后只好强词夺理地说：

“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

“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贪赃枉法罪行的‘罪’！如果你们是英雄好汉，如果你们还有一丝一毫的天理良心，咱们就到大庭广众中去，让群众评一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你这样目无法纪，我们不让你到街上去煽惑群众！”

“原来你们的法律是见不得人的。”

……

王若飞以有力的论证，驳得法官张口结舌，期期艾艾地讲不下去了，只好宣布退庭。

经过上次“审讯”之后，伪法院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开庭。王若飞曾多次催促。拖了八个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法院才勉强答应开庭。这一次，王若飞针对反动派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是受俄国指使的；中国人讲外国人的主义是卖国等谰言，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一切被压迫阶级和民族求解放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适合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哪里有阶级压迫，有反抗，哪里就必然要产生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这是客观真理，法官先生连这个普通

中国人都明了的道理也不懂，不觉得脸红吗？

至于谈到卖国，在中国却大有人在，这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就是头号卖国贼。接着，他列举了国民党蒋介石从“九一八”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以后大量的卖国罪行，吓得伪法官慌忙站起来喊叫：“停住，停住！不准再往下讲！你这样侮辱党国领袖，咆哮公堂，就是犯罪！退庭！”

王若飞以他丰富的科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批驳了伪法官的谬论，夺得了法庭上的主动权。此后一年多，绥远高等法院没敢开庭审判。

冬天到了，塞外天气逐渐寒冷起来，气温经常在零下二十几度。牢房里不生火，晚上睡冷炕，许多难友冻出病来。王若飞为了和严寒作斗争，每天早晨用冷水擦身，还自编了一套“体操”，每天早晚坚持着锻炼，直到满头大汗为止。

因为长期囚在斗室里，不见阳光，王若飞得了关节炎。按照监狱规定，患有关节炎的病人，准许出来晒太阳。王若飞就利用这个机会，联系难友，宣传革命者的品德和情操。

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难友，带着敬意问王若飞：“黄先生，听说你的官司很严重，你怎么总是乐呵呵地，一点也不发愁？”王若飞回答：’我干的事不是发愁的事。能否熬出牢门，愁并不解决问题，把自己愁坏了，就是出去也成了废物，那有什么用?！”

一个中年难友说：“我真佩服，你为什么胆量那么大？不怕吃眼前亏吗？”“我胆大，是因为我做的事光明正大。我给千万人办事，千万只眼睛都盯着我。我要向敌人屈服了，人们就会抛弃我。为了保全一个人的生命，背叛了千万人的事业，遭到千万人的唾弃，那活着有什么意义？”

一个年纪大一些的难友说：“我有一件事弄不懂，你在敌人法庭上，骂国民党，骂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也不怕，真是条好汉子；可是在牢里，还天天练操，十分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为什么呢？”“这很简单，我不怕死，是因为敌人要损害我们的真理，爱护身体，是因为有了强壮的身体，才能保护真理，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我无自己的东西。

王若飞的话，拨亮了难友们的眼睛，过去一些对生活前途没有信心、愁眉苦脸的人都振作起来了，表示一定要想法活下去、斗争下去。

王若飞很注重对周围难友的教育工作。每天早晨一轮红日升起的时候，王若飞照例出来晒太阳，他带上一本《孟子》、《论语》出来，和难友们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借机宣传革命道理。他引用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话，说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然后，又结合社会发展史，讲述了劳动创造世界和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各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难友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位青年难友说：“历史上改朝换代，一代完了，又来一代，老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象这样下去，那就没有尽头啦！”

王若飞说：“有！那个头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尽力干活，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世界上就再不会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事了。”

一位年近五十岁的难友说：’老人常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生来穷命，怎么也富不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穷命、富命总不能都一样吧！”

王若飞想到迷信天命、鬼神是农牧民愚昧无知的反映。这个思想不解决，中国革命搞不起来，监狱斗争也开展不了。于是，他从所谓“天命”、“鬼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一直讲到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宣传、鼓吹迷信的目的，证明鬼神是没有的。他说，我们只听说有鬼神，但鬼神是个什么样子，有谁见过？还讲了现实生活中有人弄神装鬼，骗人钱财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巫婆，天天在一棵大树底下扶乩，口称天神下凡，能消灾降福，要人献钱献粮。有一天来了一群青年，要试试她到底有没有神通。巫婆开始作法了，她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口吐白沫，大叫：“天神下降了，来了！你们都来迎接啊！”正在这时，突然一个青年跑来大喊：“狼来了，赶紧跑啊！”那群青年，一哄而散，转身躲进隐蔽处观看。只见那巫婆吓得脸色刷白，也没有顾得及把请来的神送走，扔下东西逃走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懂得鬼神原来是没有的。

又有人问：“黄先生，你勇敢、热情、真诚，很多人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但不晓得你闹革命对你自己有何好处？说穷人闹翻身，还容易懂，可象你黄先生有学问、有能力，还革什么命？”

王若飞沉思一下，认为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些受压迫的人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误解。这个隔阂不解除，必然妨碍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于是，他认真而诚恳地说：“蒙古谚语说的好，别拿黄羊当耕畜，别拿外甥儿当儿子。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外，大多数人同劳苦大众一样，也是受反动阶级的压迫的，他们也要革命。革命，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至于我个人，除了党的利益，没有我个人的利益。我的利益就在党的利益之中。我们党有了我个人，就会增加一分力量，没有我，党的事业照样前进！共产主义事业就象东方升起的太阳，必然要赶走黑暗，大放光明。”

王若飞讲完后，难友们都兴奋地说：“黄先生，我们完全相信你的话。我们也就早听说了傅作义要放你出去，给你官做，可是你拒绝了。从你说的话，做的事来看，我们完全相信共产党是为国为民的。”

王若飞的话，实际上是对难友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

共产主义教育，在他们心灵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入夏以后，囚室内装满屎尿的便桶，发出冲鼻的臭味，臭气之外，还有臭虫和跳蚤，咬得人全身起疙瘩，痛痒难熬。比臭虫、跳蚤更可恶的是那个满脸横肉的徐看守长，对待难友特别凶狠，经常毒打难友，还打死过几个人。

王若飞看到这种情形，每逢晒太阳或听"训"的时候，便向难友了解，为何不敢起来斗争。难友们的思想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家庭有接济，条件较好或刑期快满的，他们大半不敢闹；一种是刑期长，没人接济，或疾病严重，生命垂危的人，他们愿意斗争。王若飞分析了这些情况，决定依靠后一种人，团结前一种人，在斗争步骤上，首先集中火力，反对非法打死人的凶手，先杀杀敌人的威风，并鼓励难友把事情闹大，让社会上了解监狱里的黑幕，争取社会同情，给监狱当局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敢非法整人。斗争方式是发动难友给亲友写信，不识字的人由别的难友帮助写，采取各种办法，把信带出去，不让看守把信卡住。王若飞还给省政府写了封揭发信。

监狱里出现的反抗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难友亲属纷纷前来探望，责问监狱当局。有的人告到省政府，要求改善狱中生活。舆论的压力，使典狱长坐立不安了，他到牢房去征求意见，说他是佛教徒，要救苦救难，普济众生，大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难友们根据王若飞的建议，要求与监狱当局进行说理，并提出五项要求：反对吃霉饭毒死人；反对看守长打死人；反对冬天冻死人；反对臭虫咬死人；反对臭气熏死人。典狱长连声回答：饭食要改善，卫生工作要做好，不能打死人，冬天改成火炕、生火……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鼓励难友继续斗争，王若飞仿效陶行知编的《锄头舞歌》的歌谱，写了《监狱怒吼歌》：

伸出拳头去斗争呀！
斗争就可得自由呀！
咿呀嗨，呀呼嗨，
斗争就可得自由呀！
呀呼嗨，咿呀嗨。

监狱当局认定王若飞是他们推行监狱黑暗统治的绊脚石，是挑动"犯人"反对监狱斗争的罪魁祸首，典狱长韩渐逵接连派去"犯人"刘宝全、马福监视王若飞。然而，这两个人到了王若飞囚室后却都起了变化，他们不但不向监狱当局密告王若飞，还帮他宣传推翻反动统治的主张，甚至对共产主义也开始有些信仰了。监狱对这两个人大失所望，要他们立即搬出王若飞牢房，又派去一名姓张的在旧军队当过排长的"抢劫犯"。这个人平素高傲自大，对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和人说话三句不投机，就亮出拳头，连那些看守也得怕他三分。监狱当局认为，这是个桀骜不驯的人，黄敬斋即使是个熔炉，也熔化不了这块顽石。

张排长住进了王若飞牢房。仅几天，他就表现出对王若飞非常尊敬。监狱当局梦想的好戏，不但没有出现，而且脾气高傲暴躁的张排长渐渐变得谦虚和气了。典狱长不得不发出惊叹：连顽石也熔化了，真可怕！

一天开早饭时，难友们从一锅稀粥中捞出了两只煮烂的老鼠，大家都气得两眼冒火。这时，王若飞站出来，向难友们说："我们都是活着的人，都应该享受人的权利。我们不是猪，为什么吃的饭比猪还不如？"全体难友一致抗议监狱当局把活人当猪喂，提出改善伙食、吃一碗干净饭的要求。监狱当局不但不答应，反而指责说：你们是"犯人"，吃坏饭是罪有应得，谁叫你们"犯罪"！全体"犯人"情绪激昂，政治犯便乘机积极开展活动，酝酿马上发动绝食斗争。

王若飞向要求开展绝食斗争的难友说："绝食斗争是狱中合法斗争的最高形式，大家必须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绝不动摇，坚持到底，才能胜利；要严防敌人钻空子，寻机破坏。"王若飞还与乔明甫等商量确定了绝食斗争三项要求：一、改善伙食；二、去掉脚镣；三、阅读书报。

政治犯根据王若飞的意见，秘密地成立了绝食斗争领导委员会，负责研究敌情，部署落实任务，出面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领导委员会下设纠察、宣传、互助三个小组。纠察组负责侦察敌人的破坏活动，检查督促自己的行动；宣传组负责揭露监狱的黑幕，联系普通犯和争取狱卒的同情与支持；互助组负责对参加绝食斗争同志进行防止发病和有病时的急救护理工作。在王若飞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下，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一九三六年农历八月初十晨，全体政治犯开始了绝食斗争。

狱卒们打开各牢房铁锁大门，催促政治犯吃饭。政治犯都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典狱长王秉麟跑到狱房，拉下狭长的驴脸，声嘶力竭地吆喝："赶快吃饭，不吃饭就是违法！"开始没有人理他，他从这个号喊到那个号，惹怒了政治犯，大家一齐责问他："什么叫违法？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行吗？请问典狱长大人，饿肚子不吃饭犯了什么法？""你们简直是造反，简直是造反！""不吃饭怎么叫造反！"王秉麟见势不妙走了。

监狱当局求救于王若飞，要他出来劝说政治犯吃饭。王若飞说："应该马上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待遇，否则你们就要对政治犯的绝食后果负完全责任。"同时他利用一切机会，跑来看望难友，告诉他们要静卧，少起动，免得消耗体力。他还到普通犯人中去说明政治犯的绝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难友们的待遇，要求大家全力支持。

绝食斗争到了第三天，年纪小、个子大的武先列昏晕过去了，敌人将他抬到病房，要伙房做了鸡蛋挂面汤，催武先列吃，以为只要有人开始吃东西，就可以分化破坏绝食斗争。武先列清醒过来，拒绝吃东西，吵闹着要马上搬

回监房去。王右飞闻讯赶来，倒了一杯开水给武先列，摸着他的额角，鼓励他咬紧牙，坚持下去，一定能胜利。武先列坚定地表示："我撑得住，饿死也不屈服。"王若飞随后来到监房，把武先列的决心告诉了难友。这就更加坚定了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绝食斗争到了第五天，躺在炕上的政治犯已经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了，人人面容消瘦，心如火焚，但大家用眼色相互鼓励着：一定要坚持下去！普通犯过来探望的越来越多。他们不理睬看守们的干涉，帮助倒便桶、送水，给政治犯中身体虚弱的难友喂水。监狱当局对此更加惶恐不安，耽心要是普通犯参加绝食斗争，局势将更难收拾。王秉麟又一次找到王若飞，要他帮助劝政治犯复食。

王若飞说："政治犯提的三个条件，你究竟怎样答复？"王秉麟连声表示同意，一切照办。王若飞说：那好，你就当面去答复难友们吧，王秉麟不得已来到"莠"字监，一条条地背诵：改善伙食，除掉脚镣，阅读书报，都同意。至此，经过五天五夜的绝食斗争完全胜利了。

复食后的第一次早餐，是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沁州黄"米饭，又香又甜。普通犯盛满小米饭，边吃边说："这碗饭可是很多人拿生命换来的啊！没有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我们哪能吃到这样的米饭？"一位老年难友说："我入狱十多年，还没有吃过一顿干净饭，看起来，不斗不行啊！"王若飞蹲在人群里，抓住机会，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他说：这次斗争的胜利，主要是靠政治犯的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同时，由于我们提出的改善伙食，除掉脚镣，阅读书报的条件，反映了全体难友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得到了普通犯的支持。这就说明，我们革命者，要关心群众，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必然拥护和支持；只要群众齐心，敢于斗争，敌人就成了软骨头，斗争就能取得胜利。他的话，讲到了难友的心坎上，增强了他们今后斗争信心，又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大家听了都点头称赞。

（节选自陈志凌、贺扬《王若飞传》）

李先念

李先念（1909— ）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1926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本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曾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1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师、军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为建立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5年3月参加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长征，6月率领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攻克四川省西部的懋功，同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会师。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在甘肃渡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西路军因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遭到失败，1937年3月，他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进入新疆，年底返回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敌后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和中共边区党委书记，建立了拥有一千余万人口的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3、4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的新四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强烈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并率部自卫反击，成为正确进行反顽斗争的范例。

日本投降后，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领导了反对蒋介石围攻中原解放区的自卫战争。由于围攻的敌军占绝对优势，他带领集中在湖北宣化店地区的主力部队突围，转移到湖北、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蒋介石的兵力，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东的作战。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渡黄河南下后，他率部恢复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重新组织，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原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在湖北等地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对社会主义财政经济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于1967年2月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结果受到错误的批判。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争取国民经济取得新进展。1975年，他是邓小平的合作者，在邓再次受到打击后，他也被迫退出了政府工作。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参加领导了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长期以来，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发展同各国人民、政府和政党的友好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当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从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起当选为历届政治局委员，1977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副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材料　中原突围中的李先念

提起47年前的中原突围，人们自然想起一位功勋卓著、名扬四海的名字——李先念。当时，他面对敌军重重围困，毅然勇敢地接受挑战，指挥中原军区部队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使敌人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化为泡影。

审时度势，周密部署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自认其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已经就绪，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余万大军将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压缩围困在方圆不到100公里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妄图一举"围歼"。身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面对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的严峻形势，毫不畏惧，沉着冷静，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与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及时作出了中原突围的决定，并对突围的方向、时机作了全面的分析和部署。

6月20日，李先念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详细阐述了中原军区部队面临强敌四面包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战略转移的具体方案：(一)主力向西突围，尔后直逼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经伏牛山，越陇海路，渡黄河到太岳区。万一不成，即在伏牛山、秦岭打游击，必要时转甘南创造根据地，或到陕甘宁会师。同时，亦准备渡襄河进到武当山创造根据地，或者进川再转甘南地区。(二)鄂东、鄂中两 军区部队(约万人)留当地打游击。万一立足不住，鄂东部队向皖东突围，鄂中部队转入武当山打游击，以待情况之变化。6月21日，鉴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日益加剧，形势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李先念又致电中央，提议在本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和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主席对李先念的这一决定，甚为赞赏，即于6月23日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原局，指出："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党中央、毛主席这一复电，充分表明了对李先念的高度信任。

接到中央复电后，李先念即与中原局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突围的具体部署。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其余在东西北方向行动，分路突围，相互策应。他和郑位三、王震、陈少敏、任质斌等一起，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第451团、第359旅和干部旅为北路；王树声、刘子久、刘昌敦、张才千等率第1纵队第2、第3旅和纵直机关为南路，向西突围。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还决定留下第1纵队第1旅和鄂东独立第2旅在原地坚持，使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再自行选择突围方向。

为了抢在敌人发动总攻之前出其不意地突出重围，当天，李先念向鄂东第2旅旅长关诚忠、政委张体学和副政委熊作芳交待任务，强调一定要守住佛塔山，把好南大门，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掩护任务。他还指示张体学带一支精干部队，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警备任务，演一场"空城计"，掩护中原首脑机关和军区警卫部队隐蔽撤离宣化店。第二天，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根据李先念的指示，命令第1旅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率部原地抗击，向东佯动，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强调要用一切办法栓住敌人，使敌人在3天内找不到我主力的行动方向，待主力越过平汉路后，再视情况自行突围。当日晚，南路军即隐蔽集结，向西南方向移动，计划突过平汉路后，进入豫西地区，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突围前夕，李先念还派中原解放区行署副主席刘子厚赶往安陆桑树店，向江汉军区司令员罗厚福、政委文敏生传达中原局、中原军区关于突围的指示，要他们留少数武装在原地坚持，主力即抢渡襄河，向武当山挺进，相机入川。他还电示河南军区司令员黄林，要他们策应北路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掩护主力西进。与此同时，电示第2纵队第15旅长王海山、政委陈先瑞率部赶到汪洋店西南阳平口地区，接应和掩护南路军西越平汉路，然后于唐河以南的祁仪镇，归还第2纵队建制。

李先念在突围前的一系列指示、决定和巧妙安排，充分显示了他面对强敌，临危不乱、处险不惊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运筹帷幄、娴熟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驾驭全局、审时度势的雄才大略。

亲率主力，杀出重围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悍然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从而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李先念按照原定计划，与其他领导一起，亲率北路军主力和中原首脑机关隐蔽地向西移动。为了迷惑敌人，出敌不意地突出重围，他在宣化店亲自部署和导演了一场"空城计"。当天晚上，在兵临城下，且城内安插有敌人"眼睛"的情况下，李先念从容不迫地在张体学陪同下，漫步街头，镇定自若地率领中原军区机关和警卫部队悄悄地撤离了宣化店。而敌人却仍蒙在鼓里，做着"一举围剿共军"的美梦。

李先念率北路军主力隐蔽撤离宣化店后，与王震等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挺进，于29日晚分别从柳林、李家寨过平汉铁路，冲破了敌苦心经营达半年之久的

钢铁封锁线。尔后，长驱直入，飞兵疾进，抢在敌人之前跨过天河口一线，把敌军远远地甩在后面。继而抢渡唐、白河，穿越豫西南平原，突破敌丹江防线，血战南化圹，与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展开激战，终于在敌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直指陕南。北路军进入陕南后，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先后在东赵川、梁家坟等地击溃敌多次堵击，于8月初与巩德芳领导的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

在胜利突围的过程中，李先念坚决维护了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放弃“回陕甘宁边区”的原定计划，作出了“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执行外线牵敌”的新抉择，体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他在突围战役后期进入陕南地区后，即于7月23日在白鲁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于24日将部队分为7股，分散开展活动。8月初，当北路军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后，他又及时将两部合并，按地域初步划分为3个军分区，亲手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当黄林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与闵学胜率领的南路军一部会合后，他又根据中央指示，将两部合并，组成第四分区。9月中下旬，第15旅入陕归建，又成立了第五分区。接着召开边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大会，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创立。

李先念亲率北路军突围，历时38天，行程2000里，突破敌5道大的防线，冲破敌10次有计划的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进入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驾驭全局，指挥若定

李先念在艰难的突围途中，不仅亲率北路军主力斩关夺隘，冲破敌一道道防线，还站在驾驭全局的高度，时刻关怀和指挥着其他各路突围部队，给他们通报敌情，明确方向，坚定信心，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杀出重围，夺取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

河南军区部队掩护北路军越过平汉路后，李先念当即电令其尾随北路军北翼西进，使河南军区部队免受尾追之敌夹击。当河南军区部队进至豫陕边时，他又以中原局名义电告黄林，可在镇平、内乡、卢氏、洛南展开游击战争。

江汉军区部队根据李先念在突围前的指示，先后从驻地出发，向襄西挺进，由于方向明确，指挥果断，进展神速，抢在敌布防之前，于7月5日就进至襄河东岸，当晚顺利渡过襄河。该部抢渡襄河后，连攻宜城、南漳、保康数县。李先念以中原局名义致电祝贺并予以表彰。当江汉军区部队解放竹山县城后，又及时电示他们：“自取道路立刻进川，到城口、万源及通南边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并指出：“你们的任务是去川北，若部队疲劳，可在竹山、竹溪边区作短时间休息，待一纵队到达，派一部立即经镇坪、巴山探路向城口前进。”当江汉军区部队数次派小部队到大巴山口子侦察前进，未能入川时，李先念又鼓励他们“在川鄂陕边立住脚跟，建立根据地。”

南路军自泼陂河驻地出发后，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动迟缓，延误了一天，于7月1日下午才突过平汉铁路，进入安陆、应山地区，在赵家棚稍加休整，继续西进。然而，这时敌已部署3个整编师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歼灭我军于天河口、高城地区。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先念于7月3日及时向南路军通报敌情，指出：“敌人拟于厉山至天河口一线合击我军，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江汉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区。”7月9日，李先念再次电示南路军，指出：现敌已组成3个追击队，每个队约3个团，估计今日以后枣阳方面敌情一度严重。要求第1纵队迅速渡襄河，进入武当山。李先念的两次电示，更加坚定了南路军西渡襄河、向武当山进军的决心，从而避敌锋芒，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南路军和第15旅主力强渡襄河后，在石花街地区破敌阻截，于7月下旬进入武当山区。李先念根据中央新的战略决策，又及时电示南路军：“在鄂西北创造游击根据地”，执行在外线牵敌的战略任务。当南路军进入鄂西北地区后，碰到许多困难，建议“东渡襄河回大洪山活动”时，李先念当即电复：“襄河不易渡过，部队疲劳，就是回到襄东原地区，敌必调更大的兵力进攻，孤立突出，处境将愈困难。”要求他们“立即分散川鄂陕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后来，由于敌情严重，南路军西进受阻，李先念又电令江汉军区部队立即东返，接应南路军。直至8月下旬，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西南胜利会师，开始了共同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在东面担负掩护主力西进任务的第1纵队第1旅和鄂东独立第2旅根据李先念突围前的指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即挥师东进。一部进入苏皖解放区，一部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突围途中的李先念，十分关怀这两支劲旅的命运。当第1旅到达吴家店休整时，他即以中原局名义向新四军军部并中央通报第1旅情况，指出：“该部数日来未与你们联系上，请令电台注意联络，并告东边情况。”在中央和李先念的关怀下，第1纵队第1旅于7月20日冲过津浦路，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保存了近5000人的力量。鄂东独立第2旅在完成“坚守佛塔山”、“演好空城计”的掩护任务后，根据李先念突围前的指示，亦分路向东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各团于7月17日在安微岳西、太湖边的冶溪河胜利会合，除伤亡约100人，非战斗减员约500人外，主力基本完整无损。后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东第2旅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李先念又及时指示成立中共鄂皖地委，统一领导与指挥大别山的游击战争。当独立旅处境极端困难时，他又及时电示张体学：立即派人去路西，寻找当地零散部队，坚持斗争，增强信心，坚定意志，百分之百地完成中央赋予的光

荣任务，坚持与创造大别山根据地。

李先念在亲率北路军主力向西突围，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对指挥其他各路部队突围，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和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原突围战役是一次胜利的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特别是解放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以“惊人之举”破灭了蒋介石妄图制造的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3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各解放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正如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李先念、郑位三的电报中指出的：“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

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充分显示了李先念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与强敌作战的指挥才能。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也是他戎马生涯中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和军事艺术杰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李先念在中原突围中的成功实践和建树的历史功勋，充分显示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万古流芳！

（摘自《军事历史》94年1期，作者：曾焕雄）

李　兆　麟

李兆麟(1910～1946)辽宁辽阳人。原名李超兰，化名张寿彧。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到中共满州省委军委工作，先后赴海伦、珠河等地帮助组建抗日游击队。1933年10月任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1934年6月游击队扩编成立哈东支队，任政治委员。1935年1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第一团政治委员。1936年2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同时被推选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委员。1939年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任总指挥。参与指挥攻打宾州、五常等战斗。率部消灭当地伪森林警察大队，创建松花江下游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争。先后攻克讷河、克山等县城。当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挫折时，与周保中等组织整训部队，继续坚持战斗，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政治副旅长、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善于宣传鼓动，曾创作《露营之歌》，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领导人之一。1945年8月率东北抗日联军余部配合解放东北，任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书记。后任滨江省(今并入黑龙江省)副省长等职。1946年3月9日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材料一　李兆麟遇害真相

日本投降后，李兆麟立即带领抗联干部经牡丹江到达哈尔滨，建立东北抗联办事处，并于1945年10月1日就任新成立的滨江省副省长和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同时，他还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松江省工会委员和北满分局委员。

1945年12月底，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哈尔滨。中共从大局出发，决定李兆麟辞去副省长一职。但他作为中共和人民的代表，一刻也没有停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他也因而成为敌人暗杀的目标。

1945年12月8日，敌人曾错将长相与他相似的《哈尔滨日报》社的李钧杀死于中苏友好协会门前。

这本是一个十分凶险的信号，但李兆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1946年3月9日上午，李从省委回友协，半路上汽车坏了。他让司机和警卫员留下修车，并告诉秘书于凯说，他要到水道街9号去一下，车修好后去接他。但当警卫员和司机等人在大约一小时后，来到那座三层公寓式楼房去接他的时候，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尽管后来省、市委的领导同志带着苏联红军包围了整座楼房，但还是漏过了一间“空房”。直到第二天，我打入警察局当督察长的马亮同志才带人砸开那间房子的房门，在里面发现了“脸朝下伏在血泊里”、“脊背上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的李兆麟将军的遗体。在场的几位党的领导决定，把将军的遗体送往铁路医院缝合、整容。

3月24日，李兆麟将军的追悼会在哈尔滨举行。

追悼会开得很隆重也很紧张：中苏友协院内高挂着“民族魂”三字条幅，将军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画有金边和金色花纹的白色棺木内。由于事先得到有人要破坏追悼会的消息，苏军和民主联军都做好了应变准备。苏军派出了大批部队，从中苏友协到墓地，每20米设一双人岗。道里公园周围的楼房上在前一天就架起了重机枪。

在马亮的指挥下，灵车在哀乐声中缓缓行进，途经哈尔滨日报社、中央大街，最后进入道里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公园里挤满了前来参加追悼会的群众。

关于李兆麟将军的死因，当时还没有弄清楚。国民党方面放出风来说，这是一起桃色事件。直到解放后，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这是一起由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谋杀事件。当进，特务通过国民党市政府工作人员孙格玲，打电话约李到水源街9号会面，说有要事相告。李本准备带警卫人员一起去赴约，但正赶上车坏了，遂自己单独去了。

李来到那间房子里后，孙格玲给他倒了杯事先准备好的毒水，见李喝下后，便摔下手中的水杯，这时躲在壁柜里的两个特务猛地冲出对他下了毒手。只可惜一代英雄就这样倒下去了！

现在，安葬李兆麟遗体的哈尔滨兆麟公园是这座冰城每年一次的冰灯节的中心景点，美丽的冰灯每年都要将那座刻有"民族英雄李兆麟之墓"的纪念碑照得通明瓦亮；在他的家乡——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县城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雕象，孩子们时常会指着他这位"骑在大马上的将军"问起有关他的故事。

（节选自全勇：《黑白关东》）

材料二　兆麟和我们的孩子

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之一李兆麟同志牺牲已经几十年了。几十年来，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就象过电影一样，我又想起了他在小兴安岭的身影，想起了他在完达山脉长途跋涉的足迹。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次，他曾经亲手将自己的亲生骨肉舍弃……

事情是从一九四〇年冬开始的。那是个隆冬季节，北风呼号，滴水成冰，我和兆麟的第一个孩子就诞生在这冰天雪地里。时机是那么不巧，环境是那么艰苦。当时，兆麟远离我们，我随着抗联第三路军的老弱病伤员单独行动。这一行，只有二十多人，还被日本鬼子的讨伐队当成三路军总指挥部紧追不舍，一直追了半年多。在那白雪茫茫，一望无际的山林里，粮食异常困难，我一滴奶水也没有，孩子只能靠雪水熬的粮食糊糊充饥，吃下去常常胀肚，身体非常羸弱。然而，最要命的是孩子动不动就哭。哭声一起，同志们就处于戒备状态，耽心哭声暴露了目标。我为此更是不安，可我找到带队的领导，提出别连累同志们，把孩子……，领导一口回绝了。

终于坚持到四一年五月，冰消雪化的时节了。孩子已经半岁多，会坐着了。宿营的时候，他坐在火堆旁，两眼不住地东瞧西看，嘴里依依呀呀地，好象和树上的山雀子说话。看着儿子一天一个样，我心里高兴，同志们也这个抱过来，那个抢过去，喜欢得不得了。我在想，兆麟看见他会多么高兴啊！

可是，我千思万盼的兆麟来到的时候，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儿子并没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就连平时爱说爱笑的活泼劲也没了。他常常默默地看着儿子，脸却显得那么严肃。我心里真替孩子委屈，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活下来，见到爸爸却连张笑脸都没看见。

环境还是那么严峻。为了躲避敌人，保存实力，我们不得不无休止地行军、宿营。粮食仍然极端困难。蚊虫、小咬、瞎蠓子也随着天气转暖猖狂起来。孩子跟着大家一起挨饿、挨叮，他毕竟太小了，饿了要哭，被虫子叮了也要哭，哭得使人揪心。兆麟的脸色随着哭声越来越严肃，我看出来了，心里急得像猫抓。抛弃儿子吧，这已不是半年前刚生他那时候了，实在下不了手。送给老乡抚养吧，这一带早叫鬼子扫荡一空，基本群众都随部队行动，再没什么人家了。真愁人啊！

一天宿营，我把孩子安顿在火堆旁就忙别的去了。开始他还懂事地坐着，大概实在饿了，又放声哭起来。我听见哭声就连忙跑过去，没容我近身，兆麟已一把抄起饿得打恍的孩子，大步往几百米外的树林子走去。我明白兆麟要做什么了，他为了这支队伍，决定了儿子的归宿。严酷的环境使兆麟必须为大家的安危着想，他不能再对自己的儿子犹豫了！可孩子到底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血啊，我仿佛觉得四周满是儿子的哭声，又仿佛看见儿子被蚊虫咬得满地爬滚，我难过得心像给挖去了一样，真想不顾一切地追上去把儿子抢回来。但是我一动也没动，只觉得泪如泉涌。同志们也都楞在那儿，难过地沉默着，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我。

这种场面，谁的心能不被打动？就是铁打的心肠也要熔化啊！随部队行动的老百姓陈大爷实在不忍，偷偷地跑出去找，到底把孩子抱回来了。为了不影响整体，组织同意我带着孩子同陈大爷及其他几个行动不便的同志离队行动了。

事情过去了，可兆麟大义无私的行为和品质却在我脑中深深地留下了。一九四一年底，我们同抗联队伍一起来到苏联。我因下肢瘫痪，立即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年五月，我出院后，同我的邻居、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将军谈话时，无意中，他指着一个孩童的照片说："伯文的孩子要是活着，也有这么大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孩子进入苏联后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兆麟怕影响我恢复健康，一直没告诉我，他知道我会无比心疼的。

是的，我们的孩子没能活下来，我伤过心。可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后代，兆麟他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

（选自《纵横》83年2期，作者：金伯文）

皮定均

皮定均（1914—1976）安徽省金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营政委、营长、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一支队司令员、中原军区一纵队第一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曾率部掩护中原人民解放军主力突围，孤军作战，击退国民党军的追击堵截，为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作出了贡献。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二十四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历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部队副司令员、兰州部队司令员、福州部队司令员、中共福州部队委员会第一书记。曾当选为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在视察工作时因飞机失事殉职。

关向应

关向应(1902—1946)原名关致祥。辽宁金县人。满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

幼时，家境贫寒，十岁进私塾。一年后，入蒙学堂(普通学校前身)，历四年。毕业后，于1918年考入普兰店公学堂，寄宿学校。1902年4月，离家到大连求学，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商业科，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加之城市生活使他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激发了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在思想上开始接受新思潮，积极参加双十节游行，参加反对日本教员殴打学生的罢课活动。

1923年3月，从商业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做工。后到泰东日报社做印刷工人。同年冬，受共产党人陈为人、李振瀛的教育和引导，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离开大连到上海，一面在上海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一面受组织派遣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年底，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归国，留上海沪东区，做共青团工作，年底，调山东任团省委第一任书记。1927年5月，参加在汉口举行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后在河南省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

1928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30年，参加中国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长江局工作。1931年在上海工联工作时，被捕入狱，后经党多方面营救出狱，不久即赴香港。

1932年1月，受党派遣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央分局领导工作，担任中共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1934年7月，湘鄂西分局决定建立黔东根据地，并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后在黔东根据地基础上，恢复和创建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是年10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后，任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中共中央命令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他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任职期间，曾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作过坚决斗争。1936年冬任红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开辟了晋绥根据地，成为晋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终于劳瘁致病回延安休养。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病中仍不忘党的工作，在长达五年的患病期间，始终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1946年7月21日逝世。

肖劲光

肖劲光(1903—1989)，湖南省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6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7军团政治委员，红3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2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范长江

范长江(1909—1970)四川省内江县人。1927年，在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学兵营。后随该营去南昌，并入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到北平半工半读，后当《大公报》记者。1936年到西安采访，第一次向全国报导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前线采访。1938年3月，发起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同年10月，脱离《大公报》后，在桂林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担任社长兼采访部主任。1939年5

月，在重庆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与邹韬奋等在香港创办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香港沦陷后，辗转桂林、武汉、上海等地，1942年转入苏北解放区，先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0年10月23日逝世。著有《陕北纪行》、《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是美洲爱国华侨领袖。他从1880年出国到1949年归国，在美国生活了近七十年，“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开平县滘堤洲一个破产的家民家庭。他四岁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童年时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后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

1880年，十二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希望，随同乡亲经香港乘轮船去美国。船票龙洋五十二元，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得来的。他刚踏上旧金山码头，就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此后，他在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帮厨，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月工资仅得十二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先后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他激于种族义愤，加入洪门致公堂，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即吃饭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居异国，无可奈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了格斗武术，所以遇上这类流氓，他就挺身而出，把对手打翻在地，抛到街上。有一次，因把一美国流氓打伤致死，被捕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捐营救，囚禁了十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说开了。

1894年春，司徒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子，随军舰到过南北美及欧洲各地，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各阶层人物。1898年春，因“美西战争”爆发，司徒辞职不干，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猪肉，走街串巷。

早在1894年冬，司徒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涣散，作用不大，经同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商议后，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总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司徒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四十四年之久，一直到1938年他七十岁时才退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活动，“安良大厦”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二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曾经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到北美大陆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司徒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的组织能力也颇为赞许，并曾给予指导。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十五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经司徒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了出去，才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司徒“为人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他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从本世纪初到五十年代，司徒除担任安良堂总理外，还几度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在美国华侨社会，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他都过问，深为广大侨胞所拥戴。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约。致公堂和安良堂一贯同清朝驻外官员、保皇党相对立；其后则同国民党反动派相对立，用司徒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如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到美国进行欺骗华侨的宣传活动，华侨在一次宴会上，就对他镇压广州公社、屠杀华侨子弟的罪行，严加责问，搞得他狼狈不堪，中途逃席。再如1943年，国民党CC分子肖吉珊赴美“募捐”骗钱，当他出席“七七”纪念大会时，就遭到致公堂的反对，开始是嘘声，继而是喊打，国民党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陶行知等人赴美宣传抗日，由于得到司徒美堂的关照和保护，使蒋帮特务无法捣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力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1年冬，司徒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回国。途

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司徒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他因跛足而手执木杖，步行二百多里进入我东江游击区，然后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蒋介石对司徒颇为重视，到访必迎，出则搀扶，还叫吴铁城拉司徒参加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作诱饵。司徒断然拒绝，并于次年经印度飞返美国。

1945 年初，司徒及致公堂其他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大家认为另起炉灶建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同年 3 月 12 日，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决定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这是美洲的致公党，同后来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致公党还只是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

1946 年 4 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钱、出力，这次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们回国前夕，曾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家族也正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司徒在记者招待会上沉痛地说：“数月居沪，曾亲睹国内实际情形，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10 月 23 日，司徒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后，周恩来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这几次会晤，对司徒教育很大。

1946 年 11 月，国民党伪国大开场前夕，由于国民党军队已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更加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放在眼里，只给五洲洪门伪国大代表一席和特别费美金三千元。司徒表示不接受。蒋介石、陈立夫又指使江征卿、杜月笙等进行“劝驾”。他们向司徒恐吓说：“蒋为人翻面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会吃亏。”司徒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面“调解”，并邀请司徒到南京美国大使馆吃饭，声称是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这位“半个美国人”的老华侨。宴会上，当司徒雷登大肆吹嘘所谓美国对华援助时，司徒美堂当场严正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掀起中国内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不是什么“援助”。结果不欢而散。司徒美堂拒当伪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美，他自己也于 1947 年 7 月乘船去香港。

这时，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他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因此留港期间，闭门谢客。

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是个很大的鼓舞。他于 8 月 12 日在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不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这是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公开发表政见。当时香港各报都作为要闻刊出。

1949 年 8 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毅然离开居留了将近七十年的美国，于 9 月 4 日到达北平。9 月 21 日，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

从 1949 年 9 月到 1955 年 5 月，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介绍侨乡的土地改革，扩大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1955 年 5 月 8 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李 公 朴

李公朴，江苏常州人，1902 年 11 月 26 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生。家境穷困，父亲给人家当仆人。李公朴小时候只念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他的三兄李公愚在镇江合兴盛五洋商店做店员，他也跟随做学徒去了。学徒生活又苦又忙，但他总是挤出时间读一些新书报，借以增长自己的文化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公朴满师不久，他与许多青年店员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并揭发他的店老板贩卖日货的罪行，终于被解雇了。他失业后，幸得三哥的支持，于 1920 年秋季插

班进入镇江润州中学念书。毕业后，1921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高中学习，但也只念了一年余，又因参加反对学校校医虐待学生的学潮被开除。

1922年李公朴转学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高中毕业后，1924年升入沪江大学。因为他很穷，只能一面读书，一面在图书馆工作，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学生的罢课游行，代表沪江大学学生任上海学联的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就在这时，他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通过这场斗争，他看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政府原来是一丘之貉。反帝爱国的激情，使他无法继续在课堂里呆下去，1926年初，他毅然抛开学业，到广东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随军经过福建、浙江，1927年初他又回到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公朴愤然离开了部队。他曾一度组织一个全球通讯社，搞新闻工作，因为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干不下去了。1928年，美国雷德大学(Reed College)给中国学生设奖学金，吸收中国学生入学，培育青年会干事。李公朴通过青年会应征入选。8月到美国，进了雷德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来维持生活。美国的"民主政治"对李公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他也看到，"其政府之大权与政策，实际上仍操在资本地主阶级的掌握之中"。他一方面希望"中国的政治，不要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另一方面，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认为当时"政治方面究竟已上了轨道，南北究竟已算统一，……再过数年，社会现象自会逐渐进步，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种种想法，反映了当时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和幻想。1930年夏，李公朴在雷德大学毕业后，乘坐一艘货船离开波特兰德(Portland)，靠在船上做工补偿船费，到纽约和欧洲进行了一次社会考察，到冬天才回到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开始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起初他对国民党的抗日宣传还有些相信，一度办起一个环球通讯社，自任社长，后来看到他们破坏"一·二八"抗战，暗杀著名爱国人士邓演达等人，镇压爱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等一系列事实，就对国民党失望了。他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1932年初，李公朴和邹韬奋、杜重远、戈公振等，在上海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出版。12月，李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创办了《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其目的，在于辅助新闻教育之不及，而予社会大众以求得知识之机会"。经常来图书馆借书的，多数是学徒、店员、职工等自修青年。这个图书馆还设立了读书指导部，指导大家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于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申报》的读书问答栏中公开给予回答。通过这些回答，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当时负责回答问题的，主要有艾思奇、廖庶谦、夏征农等人。1933年2月，在流通图书馆阅览室，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6月，创办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8月，又增设补习学校分校。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李公朴被选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的救亡群众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他参与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的起草，提出救国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的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

李公朴对鲁迅很崇敬。这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十分悲痛。22日举行葬仪时，他参加了送葬的群众队伍。

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李公朴。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之狱。12月4日，他们被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到了苏州，大家推李公朴向押送的人致"临别词"，说明当前国难的严重性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使那些押送的人大受感动。

"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团结一致，宣传"七个人是一个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十大罪状"，向七人提起公诉，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他们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进行了劝降活动。5月，由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等，要七人写悔过书，进反省院后出狱；但被他们断然拒绝了。接着，蒋介石又以请七人去庐山"晤谈"为诱饵，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又被拒绝了。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人进行了两次正式开庭审理。在法庭上，他们严正地逐条驳回了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和企图强加的罪名，驳得审判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10月武汉沦陷，李公朴撤退到重庆，后与夫人张曼筠经成都转赴延安。11月24日到达延安，在这里，他们见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负责人，对边区的行政、生产、民众运动、教育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建议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从事抗战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的建议得到党的赞助，抗战建国教学团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的十几名青年组成。1939年6月，李公朴率领他们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一带去活动。每到一个地方，就举办短期艺术训练队或短训班，培

训抗日宣传人才。蒋介石知道后，密电河北游击总司令部鹿钟麟，嘱他对抗战建国教学团的活动"严予查禁"。后来又密令国民党在敌后的反共将领朱怀冰，要他抓到李就地枪决。但在八路军的保护下，蒋介石的阴谋落了空。

1940 年李公朴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出版，如实地反映了他目睹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

同年 12 月，李公朴夫妇由解放区回到重庆。正反复考虑下一步去向时，皖南事变发生。他对当时的形势和工作环境进行分析后，决定把全家搬到昆明。在这里，他以青年会为活动基地，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宣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1942 年底创办了北门书屋。1944 年昆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把北门书屋扩大改组为北门出版社，在张光年、赵沨等人帮助下，邀请闻一多等组成编委会，出版进步书刊。10 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立即参加，并被推选为支部执行委员。从此，李公朴和闻一多经常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遭到国民党的仇视。1945 年春，特务头子刘健群找到李公朴，自称是蒋介石派来的，希望李到重庆去，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断然拒绝了。

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2 月 10 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大会，庆祝会议成功。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是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头被打破，伤口宽两公分多。住进医院后，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

5 月，李公朴回到昆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威胁，仍积极投入民主运动。6 月以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接近完成，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公朴说："为了爱国，我们得随时准备死。"6 月下旬，昆明各界人民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们就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要搞暴动"，"搞暗杀"，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于 26 日、28 日、29 日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却加紧了对他们的暗害活动。7 月初，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李公朴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他没有畏惧，仍然天天为和平奔走。

11 日晚 10 时许，李公朴在昆明街上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至 12 日清晨逝世。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郑介民

郑介民，字耀全，号杰夫，一级陆军上将。自追随蒋介石以后，长期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以及开展国际军事情报联络活动。在国共和谈期间，继任军统局局长。不久，改任国防部保密局长。次年 12 月 5 日，升任国防部次长。曾著有《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等书，获得一枚积学勋章，被国民党内的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

郑介民是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人，于 1897 年 9 月 11 日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里。曾祖宪邦，祖令寿。父兰馥，清县学生员，重侠义，喜周人之急。母邢氏，家庭妇女。有兄弟四个，大弟庭炜；二弟庭烽，累升陆军中将，曾任陆军预训司令，死后被追晋二级陆军上将；三弟庭烘。郑介民三十二岁那年，在武汉进行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八个子女。长子心平，曾在美国旧金山大学习电机；次子心本，曾在美国米苏里川大学攻读数学；三子心雄，曾在东海大学习政治。长女素心，次女冰心，三女美心，四女慧心，五女愉心。

郑介民原名庭炳，幼年丧父。十七岁时，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了孙中山新组织的琼崖民军陈继虞部，任书记。后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乃更名介民，亡走马来西亚，经营小贸维生，兼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表示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

1924 年，郑介民闻知黄埔军官学校创办的消息，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到广州，投考黄埔第一期，结果没有被录取。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暂住在同乡邢森洲家里，等了一个多月还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城成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时，郑介民被录取了。他勤学苦练，一有空就读书，很少出去玩。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这期间，郑介民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与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共活动。在东征途中，还与黄珍吾等组织琼崖改造同志会，攻击崖籍共产党员。

1932 年 3 月，蒋介石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被选为社干事会干事。4 月 1 日，该社成立特务处，郑介民被蒋介石指定为副处长。他既不甘心居于戴笠这个黄埔六期同学之下，也知道戴笠这个人不易共事，心里

很不痛快,却又不敢向蒋介石提出来。当时,他在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便很少到特务处去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找出路。戴笠每次离开南京请其主持特务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等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与戴发生摩擦。这期间,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荐自己去干别的工作。康泽也先后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泽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了。"后来,郑介民知道蒋介石不会调动自己的工作,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渐渐安下心来。戴笠也很了解郑介民的心理,脾气虽然暴躁,动辄骂人,但从来没有当面骂过他,表面上两人始终客客气气地相处了十多年。

"七·七事变"后,军统局成立。蒋介石决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当时,郑介民已调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只兼任军统局主任秘书。他对这个职务不大感兴趣,又常推说事忙而不去办公。

但是,郑介民的老婆却生怕丢掉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他所乘的汽车、汽油都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均从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也由军统局包下来了。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为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缉私得来的东西,向军统大特务"进贡"时,也有他的一份。代理主任秘书的毛人凤就找这个窍门,每当戴笠离开重庆,要找郑介民主持军统纪念周,便打电话给他的老婆。第二天,郑介民必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不久,蒋介石请求美国帮助成立一支突击部队。郑介民对此很感兴趣,托人向蒋说情,希望派自己去担任这项任务。但蒋介石认为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美械装备的突击部队。

这时,郑介民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不足;又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仍然热心于想做一个"儒将"。他向来治学不倦,尽管公务丛胜,坚持日必读书。凡中外史地、哲学及兵家书籍,均喜批览,尤其好读《资治通鉴》。能强记,喜思考,探索事理,平时沉默寡言,参加会议,则常引古今中外以成其说。有空还从事写作。

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后,郑介民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业务。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中高级军官。郑介民便请求带职去受训。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9月,郑介民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当时,陆军大学设在贵州遵义。有的高级军官带职去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自己则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郑介民却与众不同,学习非常认真,还从事写作。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或第二厅去找资料,作为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见别的将领常回去,便写信骂他不想家,还怀疑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心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次年1月5日,国共经过商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随后,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执行部由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

郑介民长期从事特务活动,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利用和平谈判的机会,对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接连找戴笠商谈了两三天。戴笠认为蒋介石挑选郑介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介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区布置特务工作屡遭失败的局面挽转过来。因此,便向军统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当时,有人反对派这样一个公开特务身分的人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戴笠听了破口大骂:"这些人没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郑介民从北平到达重庆时,军统局正准备迁往南京。他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强调说,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还在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的国民党代表后三个月,戴笠就在抢劫抗战胜利果实的飞行途中摔死了。他即继任军统局局长,由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当国民党的报纸发表这则新闻时,郑介民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到重庆查究是谁发出来的,并对沈醉等人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4月初,他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

这年10月1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已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保密局设在南京马台街22号。经国防部核定,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一千多人减为三百三十五人,外勤人员减为六千零二十三人,电讯部门人员保留了一千人,总共比军统局少了近两万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一开始,郑介民的老婆就着手收拾行李准备到台湾去,但他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

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其实不等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俱。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可是没有人要。

次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被解放军包围在北平的傅作义立即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改编。正当双方协商办法之际，郑介民奉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一面传达蒋介石对傅作义信赖、敬重之意，要傅率部突围；一面发给傅部师长以上军官每人一封蒋介石签名的信，表面上要各级军官都听傅作义的指挥，暗地里却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师以军官秘密谈话。但却未能阻止傅作义的和平起义。

郑介民抵达美国不久，广州被解放了。他在美国秘密列席了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力陈苏联侵略无止境，世界安危息息相关，"门罗主义"决难幸存。在这个会上作出了三条决定：一是决定军援台湾，不独现在，即将来更多的军援，均交蒋总统统一支配。二是桂系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的军援，根本不加以考虑。三是马上拨十八艘军舰协防海南和台湾。这些决定经杜鲁门同意后，郑介民于11月中旬回到香港。可是，看着美援的到来，仍是渺茫无期，日子一直拖下去。后来才知道，这个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被国务卿(即艾奇逊)反对掉了。

郑介民从香港到台湾不久，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嗣迁"总统府战略顾问"。1954年，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晋升二级陆军上将，但身体渐渐衰弱多病。

次年夏，郑介民突患心脏病，先后前往美国、西德就医。在西德治病期间，他曾对西德将领说：苏俄认定美、法非其敌手，所恐者为西德，故在东德部署三十万原子大军，而西德仅有二次大战时装备之兵力二十万。倘苏俄一旦发动攻击，则二十万日尔曼民族之健壮子弟，势必尽遭歼灭，如不能改善装备，不如解散之。西德将领为之所动。

郑介民自认为对苏联和中共问题素有研究。到台湾后，仍然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苏联国情与中共情报，曾著有《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还经常在有关会议上提出专题报告和撰写专题文章，到阳明革命实践研究院讲学，所讲主题是"苏俄研究"他认为中苏是"一体"的，要击垮中苏最重要的是"必先从情报和后勤上击垮他们，因为在韩战的经验看起来，匪帮如果战事发生后，一个月以上没有苏俄的救济，便不能继续打仗"。1959年11月，他以苏中关系和中共人事的更动为内容，在"中常会"上作了"研判"报告。12月，又写了《共产党反右倾运动之最近动向》等专文。不久，在国际问题研究会上，发表了"本年度苏俄对西方外交谋略之经过与倡议全面裁军之阴谋以及其对欧亚的两大目标"的报告。临死的前一星期，奉召前往日月潭时，还向蒋介石报告近年以来中共内部情形与中苏关系状况。为此，蒋介石在这一"中央"会议上，特别表扬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

这年12月11日，郑介民从日月潭返回台北后，心脏病复发卒于家中，终年六十二岁。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周恩来妙用省略号

国共两党南京谈判时，有一次，没几个回合，周恩来就把国民党方面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了。他们恼羞成怒，竟破口骂人，声嘶力竭地叫嚣什么同共产党论战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听罢淡淡地一笑，随即慢条斯理地说道："对……牛弹琴"！

妙哉斯言！一个省略号的运用就强有力地维护了我们党崇高的尊严，并且达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艺术效果。在场的人们无不为周恩来敏捷的才思和娴熟的表达艺术拍案叫绝。

(摘自《工人日报》)

周恩来两哭张学良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张学良朝夕相处，渡过了八天八夜难忘的时光，结下了珍贵而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早已超出了个人的范畴。

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对这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忠实朋友念念不忘，时时刻刻关注着他的遭遇和命运，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怀念，曾两次垂泪顾怀张学良。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会间，与张学良素有深厚关系的王卓然谈到"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的钓鱼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语勾起四座痛。在会上的人们心情十分难过，周恩来严肃的脸上闪过一种悲凉思友的泪光。历史记下了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难忘时刻。

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曾多次讲张学良、杨虎城是千古功臣。在北京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又一次讲话，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怀念之情。会上，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情难自克，在给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会场气氛一下子显得十分沉重，周恩来也禁不住潸然落泪。他强忍悲情，对与会的人们说道：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此乃周恩来第二次哭张学良。

的确，周恩来的眼泪代表着党和人民对这两位对民族生存和解放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功臣的尊敬和怀念。

（选自《革命春秋》92年2期，作者：陈显涪）

让降落伞

1946年1月29日，周恩来同志带着部分随行人员由延安飞往重庆，赶回去参加1月31日旧政协的闭幕会议。但由于中途气候恶劣，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继续起飞。

这是一架双引擎的军用飞机，舱内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可坐十三四人，每个座位都备有一个降落伞包。起飞不久，飞临秦岭上空，突然遇到一股强烈的冷气团，只见飞机一沉，向下掉去，不一会功夫，飞机就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这样飞机的重量加大了，便沉甸甸地越坠越快，不一会连机下山峰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时，机长只好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一是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减轻飞机重量，延缓下坠速度；二是要大家背好伞，随时准备跳伞。于是，大家便纷纷紧张地开始备伞。周恩来从容地备好伞后，又帮助别的同志背伞。这时舱内突然响起了女孩的哭声，这是叶挺将军十一岁的女儿叶杨眉，这次随机去重庆迎接她爸爸出狱。原来，不巧她的座位上没有伞包，她不知如何是好，急哭了。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立即从摇晃不定的飞机上几步跨到杨眉面前，迅速解下自己的伞包，以最敏捷的动作替她背上，并鼓励说："小杨眉不要哭，你要象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声音是那样的镇定和慈祥。

后来，飞机终于脱险了。但在危急时刻周恩来同志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崇高精神，却永远留在同机的同志们的心目中。

（《一次难忘的航行》，载1977.1.9《光明日报》）

陈毅用兵的传说

1946年夏初，陈毅军长带领新四军驻扎在鲁南苍山县一带。当时国民党一支坦克部队驻在峰县，妄想消灭新四军。可是这些愚蠢的"乌龟"根本摸不着新四军真实情况，不敢轻举妄动。陈毅呢？一心想得到敌人的坦克，可一时又下不得手。

一天晚上，陈毅军长在跟算命先生拉呱儿。陈军长问"先生你能说说这个地方的气象吗？"算命瞎子不知道眼前站着的就是陈毅军长，听问就笑笑说："新四军同志，这打仗的事咱不懂，要问这气象嘛，咱还略知一、二呢。"于是算命先生娓娓道来："这地方的天气怪着呢，春天老刮东南风，一连刮三天准下雨；秋天风向不定；冬天常刮西北风，越刮越冷，一直刮到腊月准有大雪。我是半路瞎，现今什么也看不见了。年轻时我常看天气：江蛛子过河，乌龙打坝，不用三天有雨下。也常看地脉：水缸穿裙，蚂蚁搬家、长虫过路、哈蟆咬牙，不用三天，大雨哗哗。"陈毅军长听得津津有味，一边用日记本记，一边问："先生这'江蛛子过河'、'乌龙打坝'，还有'水缸穿裙'都是啥意思？"算命先生神秘莫测地笑笑说："江蛛子过河就是天河里有一团团黑云；乌龙打坝呢，就是天河里游着一条条乌龙似的云彩；这水缸穿裙嘛，就是水缸外面湿了一截，就象水裙子"。陈毅军长高兴地把腿一拍，说："先生，这太好了！"算命先生被陈军长这一叫搞得莫明其妙，张大嘴巴茫然地"看"着陈军长。陈军长接着继续问道："先生，这地方庄稼收成怎样呀？"瞎子半天才回过神来。只见他一声长叹道："唉，这地方全是黑粘土，没有肥力。一下雨，那泥粘得走路就拔不出脚来。这鬼地方老百姓都种麻，这麻还是远近有名的哩"。陈军长听到此，再次高兴地说："太妙了！老先生，谢谢你了。"

算命瞎子更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志，你这是……"

打这天起，陈毅军长常看天象和地脉。有一天中午，陈军长正趴在山间小路上看蚂蚁搬家，看得入神，连警卫员小刘走到身后都没有发觉。小刘说："军长，该用餐了。"陈军长却说："小刘，快来看，蚂蚁搬家了，看样子快要下雨了，刚才我还看到水缸穿裙哩。"小刘说："有雨它就下，无雨它就罢，有什么大不了的。"陈军长道："你哪晓得，这是天助我也。"说完连忙朝军部跑去了，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做了重要部署。

第二天，驻峰县县城的国民党坦克部队突然收到一份军事情报，说陈毅军长带领一支新四军到了离峰县县城20里的磨盘山。于是敌人如狼似虎直扑磨盘山。可敌人刚冲到半山腰，突然一阵机枪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

当敌人第二次冲到山头的时候，连个新四军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只见山头上飘着一面小旗，旗上写着："陈毅在兰陵敬候"。敌人正在犹豫不决，突然东边山上又响起了枪声。敌人急忙掉头又往东山上追。

原来磨盘山上只有两个化装成老百姓的新四军，当敌人第二次从南面冲上山时，他们早就从北面溜了。就这样，新四军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把敌人从这个山头引到那个山头，一直引到了兰陵。敌人找不到陈毅，又不甘心回去，就在兰陵驻扎下来。第二天，敌人又接到一份情报，说陈毅到苍山了。敌坦克部队立即追到苍山，还是见不到陈毅的影子。可是敌人发现了新四军用过的灶里余火未灭，旁边还丢下了不少锅碗瓢勺，敌人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猜想新四军不会走太远，个个嗷嗷乱叫。轰轰隆隆地开着坦克向山里追去。说来也巧，敌坦克部队开进山里不久就下起雨来，那雨越下越大，敌人个个淋得象落汤鸡，看看四周全是大山，中间是一条通向山里的泥路，泥路两旁是长满南麻的黑粘土。

敌人找不到新四军，满腹狐疑，正要下令全线速退。突然杀声震天，新四军从四面包抄下来，堵住坦克车的退路。敌人这才知道中计了，大呼上当。十几辆"乌龟"拼命往回逃，谁知一下雨，那路上的粘泥象鳔一样粘住了车链子。坦克车吃力地开动着，象乌龟一样慢慢地爬行。此时，新四军的先锋部队每人抱了一捆南麻向坦克冲去，把南麻填到坦克的链子里，那些坦克都给卡住了，再也开不动了。新四军战士爬上坦克车，用手榴弹砸着乌龟盖大喊："缴枪不杀！"敌人一个个从坦克里爬出来，乖乖地投降了。

（选自《湖南党史月刊》，作者：郭健）

李先念智斗美蒋代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无视人民意愿，蓄意发动内战，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调集了11个军20个师30万余众，向我中原解放区疯狂进攻。

1946年6月，中原军区在李先念司令员的指挥下，完成了牵制敌人10个月的战略任务，奉命于敌发起总攻的前夕（7月1日），在6月26日实施战略突围。突围前，我军行动保持高度机密，仍与平时一样，坚持生产、练兵，直至突围前3个小时，我军才以野外野习的名义开始行动，中原局、中原机关亦迅速地撤离了宣化店地区，鄂东军区独二旅秘密接防。宣化店一切工作犹如平常一样，监督执行《汉口协议》的三十二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继续同美蒋代表谈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围歼"我军的阴谋。当晚，我方还特意安排三方代表在宣化店礼堂看戏。狡猾的蒋方代表对我军"演习"嗅到了异味，为控我方虚实，突然向我方提出备忘录称："据了解，共军集结，准备突围。"我方代表当即退还了备忘录，但美方代表白罗素中校仍不甘休，又提出要会见李先念将军。当时，李司令员已率突围部队离开宣化店30里了。我代表一面回告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一面立即将此事电告李司令员。为了继续迷惑敌人，保证我军突围的秘密性和突然性，李司令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果敢决定接见白罗素中校，并催马扬鞭连夜赶回宣化店。

27日上午，白罗素中校又向我方代表表示："要向李将军送药，向李将军慰问。"我方代表答复："先念同志非常感谢，欢迎白罗素中校立即前来。"在白罗素中校及随员来到中原军区司令部时，操场上的战士正在出操和练习唱歌，司令部里干部们正忙于学习、办公，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丝毫没有异常迹象。当他们进到李司令员的住室，李司令员从床上坐起来表示欢迎。白罗素说："啊，李将军，听说贵体欠佳，我们深为挂念。这是美国最新药品，盼将军早日康复！"李司令员对其"友好关心"，表示谢意，与之寒暄一番。28日下午，为答谢白罗素对李司令员的"关心"，我方又特意在竹竿河畔的国际招待所准备了丰盛的筵席，席间双方频频举杯。

美蒋代表已坚信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我军胜券在握，正暗自得意。

29日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将军将最后一份备忘录送交给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内称：政府军大规模围歼中原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已爆发，我方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李先念将军已离开宣化店，请贵小组于29日上午11时撤离宣化店……

这当头一棒使美蒋代表如梦初醒，惊呼共军狡猾，但又无可奈何。遂急忙向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发电。北平方面不知所措，直到下午3时半仍无明确指示，美方代表只得下令拆毁电台，会同蒋方代表，悻悻地乘吉普车离开宣化店向汉口驶去。

（选自《纵横》1988年2期，作者：刘小兵）

罗世文烈士的遗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这是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烈士牺牲前写给党组织的遗信。那么，这封遗信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就的，又是如何带出狱中并保留至今的呢？

罗世文烈士，四川威远县人，1925年入党，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参加过长征。1937年由延安派回四川，担任川康特委书记，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

处主任。在1940年3月发生的成都"抢米事件"中，罗世文与车耀先一同被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白公馆、贵州息烽等处。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中央曾多次与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均被拒绝。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再次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特别提出释放罗世文、车耀先。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一面慌称二人早已病逝于狱中，一面又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于1946年8月初，将二人押送到军统局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关进男牢楼八室，并停止放风。

楼八室，渣滓洞看守所俗称"死囚室"，意即专门关押行将处决的政治犯。特务们又故意放出话来，说是要将他们两人解往南京，但罗世文和车耀先从种种迹象上判断，敌人很快就将对他们下毒手了。

8月18日这天上午，罗世文同志设法找来小半截铅笔和一张巴掌大的旧俄文书页，趁看守不注意时，蹲在牢房墙角，写下了这封短短的遗信。写完后，他将信小心地塞进自己一双不穿的旧皮鞋的鞋底。不一会儿，关在楼六室的孙壶东听特务讲要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南京，又见特务看守长侯子川拿着两张飞机票到处"展示"，于是趁放风时悄悄来到楼八室门口，告诉了罗世文和车耀先这一消息。

罗世文冷静地对孙壶东说："这是敌人设下的骗局，你不要相信！"

"恐怕不会吧？刚才我还见看守长拿着两张飞机票呢。"

罗世文冷冷一笑："你瞧，真是送我们到南京，还用得着来这么多全副武装的特务吗？"

听罗世文这么说，孙壶东这才注意到渣滓洞看守所内外已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特务，心情一下变得十分沉重起来。罗世文安慰他说："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这双皮鞋拿去留作纪念吧！"

说完，罗世文从铺边拿出这双皮鞋，交给了孙壶东。

孙壶东拿着皮鞋回到楼六室后，将罗世文的话告诉了囚禁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共产党员韩子栋。

韩子栋是一位从1935年起就长期坐牢的老党员。他从孙壶东手中接过这双旧皮鞋，仔细地端详起来。他明白，罗世文和车耀先面临牺牲的时刻，不可能仅单纯地送一双旧皮鞋给孙壶东，一定有更重要的意义。

忽然，韩子栋觉得皮鞋的鞋底有些异样，急忙用力鞋将底扯开，啊，原来鞋底塞有一张不大的旧俄文书页，上面写着几句话。韩子栋警惕地站在牢门边望了望，然后摊开纸，仔细地看起来。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世文

八月十八 正午

韩子栋捧着纸条，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知道，这是罗世文同志抓紧自己生命的最后时间，向党组织写下的临终遗言啊！

中午刚过，武装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了楼八室，各牢房的难友纷纷把手伸出风门口，与他们紧紧握手告别。

在渣滓洞看守所地坝，罗世文回过头来，面对拥挤在各牢房门口的人们，高声朗诵起来：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走到围墙边，铁门打开了。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突然站定，再次回过头来高举双手，向战友们告别。人们含着热泪，目送他俩走出看守所大门，走向停在外面的汽车……

汽车来到集中营松林坡戴笠祠停车场，特务们枪杀了罗世文和车耀先，并用汽油焚烧了他们的遗体。

罗世文、车耀先两烈士牺牲后，罗世文的遗信被韩子栋、孙壶东细心地保存下来。

1948年，孙壶东被释放出狱，他将这封信藏在自己穿着的鞋底里带出了看守所，以后交给了党组织，使这封珍贵的遗信能够保存至今。

1956年，周恩来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时，适逢修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之墓。他应有关方面的请求，亲笔写下了"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的墓碑，表达了对烈士的缅怀之情。

（选自《纵横》90年1期，作者：戚雷）

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校

1946年3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在吉林省通化市诞生。它是在人民解放军航空总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号"三·一"部队。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这是一所以培养飞行员、机务人员为主的综合性航空技术学校，当时共有630余人，有各式飞机40多架。

组成这所航校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延安的常乾坤、王弼、刘凤、魏坚、吴恺等30余人；来自新疆航空队的方子翼、严啰、吕黎平等29人；来自山东抗大一分校的林虎、张积慧、朝明阳、何培元、张宪志等105人；来自新四军的杨扶真、范晖、刘发科等100余人；来自东北民主联军的姚峻、马文等20余人；还有汪伪和国民党起义

人员蔡云翔、刘善本等100余人，以及部分国外友人等。

从1946年6月开飞到1949年12月13日停止办学，历时三年零九个月，培养出四期机务人员，三期飞行人员，两期场站人员，一期领航员、气象人员、通讯人员、仪表人员、参谋人员。他们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土防空中大显身手，出现了数十名英雄、功臣、模范人物。其中有著名的战斗英雄王海、张积慧等人。

（选自《党史文苑》）

从蒋军士兵到"王克勤运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指出"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藉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瓦解敌人，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我们希望全解放区的部队，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地推行这个运动。"

这个王克勤是谁？"王克勤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解放战争时期，王克勤同志在我军内外颇有影响，他所开创的"三大互助运动"，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瓦解敌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一些原因，今天广大青年对于王克勤同志及其英雄事迹却不甚了解，一些书藉的介绍也有不确之处。因此，笔者近来在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察看遗迹、遗物，访问知情人士的基础上，写成此文，以作为对烈士的再介绍，对其功绩的再褒扬。

两度被俘

王克勤，安徽阜阳县人，生于一九二〇年。其家共有三口人，耕种少量土地，过着贫苦的生活。

一九四一年，王家大难临头，二十一岁的王克勤被抓到国民党三十军七十九团八连去当兵，他受尽压迫虐待，熬过了五个悲惨的年头。

他先是被派到鄂北去打新四军，被我军俘虏。起初，他很害怕，担心新四军会杀他。但出乎他的意外，新四军待他很好，派好几个人同他谈话，留他吃了几顿饱饭，临走时还送了他一点东西。就这样，王克勤被放回去了。回到连里，弟兄们都来向他打听新四军的情况，他把新四军对他的好处和在新四军中的所见所闻讲了一遍。后来连长知道了把他叫去痛骂了一顿。

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暗地调动大军向解放区进犯。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挑起了邯郸战役，王克勤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十月，双方在邯郸附近交战，离开战还有三个小时，王克勤所在部队的师长就吓跑了，一些官兵也吓得浑身发抖，王克勤却因为心里有底，所以满不在乎。当他正在地里挖花生吃时，解放军冲了过来，他就自动把机枪交给了他们。

王克勤第二次被俘了。这次，当他看到解放军连"中央军"的伤兵也抬回去治疗时，感动得几乎流了泪，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军。他说："自从上次被俘回去后，我曾多次想开小差，但是又想，开小差回了家，或者走在半路上被'中央军'捉去，还是要当兵，而且是当新兵，倒不如在解放军好好干，打死了也是光荣的……。

王克勤获得新生后，被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纵五十二团一连一排。经过人民军队的生活，特别是诉苦运动，使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他说：这时我才真正了解了"中央军"是给恶霸们干的，解放军才是为了老百姓。他决心勇敢地作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奋斗到底"。大杨湖战役中，他被提升为副班长，不久升为班长，很快由一名蒋军士兵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战士，一九四六年九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模范班长

王克勤当了班长后，虚心地学习干部和老班长们的带兵经验，对班里同志帮思想、传技术、教战术，使他所在的机枪班变成了模范班。

刚刚入伍的新战士白志学有些想家，情绪不高，下了操就去睡觉，王克勤便不厌其烦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白志学生了病，王克勤就热心地照顾他，主动地代他写家信；又让他的老乡杜双建找他谈心。白志学深受感动，后来他成为战斗英雄。有时王克勤为了帮助别人，连饭也顾不上吃。

军事训练中，了解王克勤的人，都知道他在教练上有一套。他不光是讲理论，叫战士们听些空名词，而是"边教边比划"。比如机枪，先学拆卸机枪的五大部，第一天看看，第二天学瞄准和排除故障，最后两天再演习利用地形挖工事和敌火下运动，只五天就学会了。不到一个月，全班同志对转盘机枪、歪把机枪，熟得蒙着眼睛都能迅速地卸开、装好、射击，而且连投弹、挖工事和利用地形地物全都学会了。王克勤曾深有感触地说："在国民党部队里训练两年的士兵，比不上我们一个月的新战士。"他的这种"边教边比划"的训练方法，《解放日报》还曾向全军推广过。

提起实际战斗，王克勤更是十分英勇，仅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翌年十月，他一人就歼敌二百三十二名，俘敌十四名，缴获步枪八支，九次荣立战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

由于王克勤作出了成绩，特别是他后来创造了团结互助运动，在战斗中得到了真正的考验，使他成了闻名全军的英雄，升任为副排长、代理排长。当时，提出了"向英雄王克勤学习"，"向英雄王克勤致敬"的口号，冀鲁豫前线某部，还创作了六场歌剧《王克勤》，在前线部队巡回演出，宣传他的事迹。

创造"三大互助运动"

王克勤的最大贡献，就是在练兵、行军、作战各项工作中创造了"三大互助（思想互助、生活互助、技术互助）运动"。他根据革命斗争的实践和自己成长的经验，提出了"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口号，其主要经验和作法是：

（一）开展思想互助。他不仅象亲兄弟一样关心战士，而且号召同志们互相做思想工作。班里补来新战士，他运用诉苦运动的经验，组织全班同志互相介绍经历，以自己所受反动统治的痛苦和到人民军队后的进步过程启发大家觉悟。在他的诱导下，老战士讲我军的光荣传统；新战士介绍党的土改政策和土改后农村的新面貌；解放战士诉说蒋管区的黑暗统治以及在蒋匪军中受压迫的情形，提高全班同志的阶级觉悟，使之彼此了解，更加团结。

（二）进行生活互助。王克勤创造性的根据行军、作战和训练的需要，结合每个同志的觉悟程度、技术水平、作战经验和体质条件，采取领导确定和自愿结合的方法，把全班组成几个互助组，三至四个人一组，生活上利于互相关照；行军练兵时便于互助互学；战斗时能互相鼓励和支援，也便于班长组织指挥。

（三）组织技术互助。平时，他抓紧时间组织大家练技术、教战术；接受作战任务后，再三嘱咐大家反复研究打法，周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战斗中技术好的同志对差的同志边打边教，使大家能正确利用地形地物，并根据敌人的攻防特点，及时改变战术。

在"革命靠互助"的口号下，有效地把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亲密地结合起来。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但打起仗来经验不多；旧军队出身的战士，具有一定的战斗技术和作战经验，但他们受过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我军心有疑虑。"三大互助运动"正好使这两种战士结合起来，互助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是我军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是我军政治工作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当时，从一九四六年七至十二月的五个月中，仅放下武器和举行起义的蒋军就有十多万人，如何改造解放战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王克勤开创的"三大互助运动"，在这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解决了人民解放军建军事业的这一课题，对我军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鉴于王克勤同志的英雄事迹，人民解放军六纵党委和首长，决定授予他"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和"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作出了全纵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决定。其后，"王克勤运动"也在整个晋冀鲁豫部队开展起来，其主要内容是"互助友爱、勇敢与提高技术相结合"，主要形式则是"三大互助运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六日《解放日报》报道说："冀鲁豫前线屡次大捷，部队中开展的'王克勤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勇献身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开始了鲁西南战役。

在定陶战斗中，王克勤连奉命担任了北门攻坚突击连任务。这时，王克勤中暑得了急病，几日来饭食少进，但他坚决要求参战，在全连动员大会上，他代表全排请缨，争当突击队。

七月十日黄昏，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王克勤带领突击队实施突击，他第一个跳过鹿砦，躲过封锁线，爬上了云梯。正当快要登上城墙，突击即将成功之时，王克勤突然遭到敌复活火力点射，腰部负伤，掉进沟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没有忘记指挥，咬紧牙关高声喊道："各班机枪掩护好，不管哪个，谁上得快谁上……赶快上……"

救护所里，王克勤由于流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经两针强心剂后，他苏醒过来，对身旁的人说："我革命到底了，……请转告毛主席，我临死到头也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再告诉团里的同志，……要团结……要互助……好好打……"

王克勤牺牲了，他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二十七岁。

七月十八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亲自撰文，"以极悲痛的心情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继续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一直到歼灭全部进犯军！"王克勤生前所在班、排，也被命名为"王克勤班"、"王克勤排"。

（选自《纵横》83年1期，作者：邢志强）

斯特朗的中国情结

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联。她先后六次访问中国，并在1958年9月第六次来华后定居中国。每当中国革命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她都及时赶到中国，凭着记者特有的锐敏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用饱蘸感情的笔调出色地报道了中国

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从而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斯特朗于 1885 年 11 月 24 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1908 年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她积极投身于社会进步活动，担任西雅图教育委员会委员，竭力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斯特朗 1921 年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十年的时光。她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而振奋，热情讴歌了苏联人民从事建设的真实情况。她帮助苏联创办并主编了英文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为美国乃至世界了解苏联作出了贡献。她先后到过西班牙、中国、波兰、墨西哥、朝鲜等许多国家，报道了这些国家的革命。

1925 年，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国共合作的新政府，广东省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国民党左翼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斯特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广州新政府的。在香港和广州，她亲眼目睹了省港大罢工的伟大壮举，并采访了正在为廖仲恺先生举办丧事的何香凝女士。当她来到廖宅时，何香凝女士正在这里召集妇女集会。廖夫人演讲道："在世界上，妇女毕竟比男人更重要；假若有一天，全世界的男人突然间都遭到杀害，妇女体内还有遗留的腹子，从而又产生出一个新世界；如果所有的妇女都遭到杀害；那个整个地救上的生灵就会永远停止延续了。"斯特朗被何香凝的话深深地震撼了。多少年后，她还常向人们提起这段话。中国革命先驱者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前仆后继的精神唤起了斯特朗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和人民的自由与幸福而奋斗的信念。

1927 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到了中国。当时的中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撕下伪装，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斯特朗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血腥的一幕，她悲痛不已，十分愤慨。

斯特朗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到武汉访问那里的国民政府，并亲自参加了郑州军事会议，武汉"革命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向军阀投降，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卑鄙行径激起了斯特朗的极大愤慨。她想到另一个天地去寻找去探究中国希望之所在。她只身深入湖南湘潭等地区，调查那里的农民运动，目睹了地主官僚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血腥镇压，也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湖南迸发出"中国工农中兴起崭新力量的威力"。她是第一个赞叹中国农民革命行动的外国女记者。

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斯特朗只好中断这次访问，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穿越中国西北大沙漠返回苏联。

斯特朗根据这两次中国之行所了解的情况，写成了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中国人》，这部书记录着 1925 年省港大罢工和 1927 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她用大量生动的事实向全世界披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叛变，和对工农运动的镇压，并热情赞扬工农运动犹如星星之火，将来势必燎燃成革命的大火。她在书的最后写道："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而不是北方和南方的将军，也不是上海富有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武汉的怯懦的政客——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她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农是新世界的创造者。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发行。这是从中国土地上最早闪现出的星光，对于她为之写作的读者来说，中国宛若"月亮的背面"，是她把它照亮了，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光明未来的中国。1965 年 11 月 24 日，在斯特朗的 80 寿辰之时，《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中国再版了。这一天，她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出席庆贺她的生日午宴，此刻把这本书送到她手里，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日礼物啊！

1937 年，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时的中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同仇敌忾，共同御敌。斯特朗风尘仆仆赶到中国的抗日战场。1938 年初，她来到山西省五台山区的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亲眼目睹了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英勇事迹，听到了许多国共合作共抗入侵之敌的动人故事。在这里，她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袖，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去夺取胜利，看到了一支新型部队是如何"得到了一向痛恨丘八老爷的农民的全力支持。"

这次访问，斯特朗写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抗战的事实，并认定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0 年，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由于希特勒封锁欧洲的交通线，斯特朗不能取道苏联返回美国，就乘飞机从阿拉木图飞往重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了反共高潮，并蓄意发动了"皖南事迹"。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同敌人浴血奋战。在重庆，她会见了当时八路军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周恩来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详细向她介绍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利益破坏抗日的罪行，并将一份 26 页的材料和一些补充文件给了斯特朗，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委托斯特朗在国际舞台上揭露国民党的这些阴谋活动。周恩来对她说："在没有得到我的通知之前，请先不要发表这些材料，等接到我的通知之后，再向全世界公布。"这足以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对斯特朗的信任。"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就通知在香港的廖承志，将此消息告诉了斯

特朗。斯特朗在旧金山接到一封信，信中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的情况公开发表了。"同时还附来一个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新四军，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定。于是，斯特朗用周恩来给她的第一手材料，撰写文章，首次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准确及时地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使世界人民重新了解了中国，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赢得了舆论支持。

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访问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内战，使人民继续忍受战乱的煎熬。斯特朗访遍了整个解放区，她先到北平，进而访问延安和各解放区。她先飞延安，然后到张家口、邯郸附近的武汉地区刘伯承司令部；又到东北哈尔滨、齐齐哈尔，再返回延安，先后用了一年多时间。

斯特朗在延安逗留了六个月，她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革命领袖，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了解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就在这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同志同她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谈话，毛泽东第一次向她阐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经常回忆起那次谈话的情景："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整个下午直到日落，远处的群山历历在望。

"他穿的是普通的深蓝色棉布服，但比别人的要整洁些，保护得要好些。他的态度安详而和蔼；他的话含义非常丰富，他的脸常常笑逐颜开，显出明朗的神色，但是他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我尽力之所及回答关于美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关于发生美、苏战争的危险的问题，从而开始了现在收录在'毛选'第四卷内的那次谈话。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这个比喻，这是用诗意的方式来阐述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瓦解。他说，所有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来可怕，但正在历史的风景中消失。他列举了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希特勒，蒋介石，甚至原子弹……。这些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持久的。从根本上说，一切力量都属于人民。'最终，不是炸弹毁灭人民；而是人民毁灭炸弹'。"

在这次谈话中一个小花絮更令这位女记者难以忘怀，在谈话中，不太懂英文的毛泽东竟及时纠正了"纸老虎"的错误译法。

在延安的半年生活，对斯特朗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对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了深深地眷恋，被中国共产党领袖及领导下的人民所吸引，也就在这时，她产生了长期留在中国的念头。即使到了晚年，她还常常怀念在延安时的生活。"我们在延安的窑洞里……那里既没有富贵荣华的享受；也没有安适逸乐的生活；可是，那里却有勇于进取、深思熟虑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民。在那里，我的心扉也给敞开了。"她多次想长久地留在延安。但残酷的斗争，记者的崇高职责提醒她，目前必须离开延安，把这里的情况及时地告诉世界，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国，了解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挑起了战乱。在胡宗南部队压境、炮火纷纷的前夜，斯特朗离开了延安。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窑洞里为她饯行。毛泽东说，"你必须离开这里，否则你会走不了。"你不能去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但你已经得到了关于我们的全部材料，你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等到我们再同世界联系的时候，你可以回来！斯特朗问战争胜利的时间，毛泽东回答："这大约需要两年。"毛泽东特别告诉斯特朗，他不认为有必要让她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去。他认为，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些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所以我不应在莫斯科浪费时间，而应直接回到美国。

在上海交涉回美国期间，她的关于此次解放区纪行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黎明》问世了，并首次在世界上传播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伟大真理。她还预告了中国"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一个充满阳光与幸福的中国即将到来。她在上海期间，根据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写了一篇《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并在纽约的一份《美亚》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是外国人第一次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别的友好作家，注重描述中共领袖们的成就，而斯特朗则侧重于从理论上论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

1958年9月，斯特朗在72岁的古稀之年，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了。她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北京，感慨万千。她说："1948年的9月我开始动身回到中国来，并且以为可能永远回来了。但是，我却走了十年才走到！"

原来，斯特朗正准备来中国时，1949年2月14日，她被苏联当局逮捕了。五天后，又以"间谍"的罪名从苏联经波兰驱逐出境。直到1955年2月，苏联才宣布撤消对斯特朗是"间谍"的指控。三年后，斯特朗才获得美国的出境签证。

斯特朗离开了洛杉矶自己的家，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去实现自己的夙愿，为全世界人民写作。当她见到第一位访问她的中国记者时，便说：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十年来我一直希望来中国……。而今天我重来思念着的中国时，我又看到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看到了他们所创造的举世无双的惊人奇迹。"

她说："最使我高兴的是当年的延安精神，那亲密的同志关系，那永远向上的革命朝气……不仅至今还保持着，而且更加发扬光大了。"

斯特朗在北京安家落户了。斯特朗在中国定居的十二年中，她一直从事写作，编辑出版了《中国通讯》，每期一万多册，并用六种文字发往世界各国。她初来中国时，

还扶着拐杖，不久就扔掉了拐杖，能硬朗地走路了。她走遍了全国各地，访问了各行各业的人。第一批去西藏访问的女记者中，就有斯特朗。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心她，尽量让她过得愉快幸福。每年她的生日，都同她欢聚一堂，为她举杯祝寿。1969年，斯特朗再次会见了周总理。这年国庆节，她在天安门上最后一次会见了毛主席。

1970年3月29日，她因心脏病而溘然长辞，终年84岁。

近半个世纪来，斯特朗与中国人民同舟同济，肝胆相照。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她的伟大功绩，永远怀念她。

邓颖超同志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这是毛泽东主席在斯特朗墓前献上的花圈上的挽词。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她的无比崇敬。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将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选自《党史博采》94年6期，作者：姜爱凤、孟宪菊）

蒋介石首次到台湾

蒋介石第一次到台湾，为1946年10月。有关这一史实，国内一些史书尚未见记载。现根据时在台湾的原国民党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的回忆，并查阅民国时期有关资料，将这一史实略记于下。

（一）

1946年10月21日，戒备森严的台北松山机场。

以陈仪为首的大批驻台党政军要员和各国记者们，云集在机场跑道警戒线外，频频翘首仰望天际。

不多时，"美龄号"专机和"追云号"侍从机出现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后，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曾于一年前率主力部队收复台湾的国民党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中将，独自一人走到刚刚停稳的"美龄号"专机前。

舱门打开后，蒋介石探头走出飞机。他着深色中山装，头戴礼帽，臂上挂着一根手杖。身后紧跟着穿旗袍的宋美龄。蒋介石这次到台湾，主要是进行视察并参加光复一周年的庆典。

陈颐鼎趋前一步，两腿一靠，行了个军礼："报告校长，学生陈颐鼎代表全军将士欢迎校长亲临台湾视察。""校长"是蒋介石平生爱听的称呼。

蒋介石站在舷梯上，摆出一副笑脸说："好，好，你们辛苦了！"然后脱下帽子，向十几米外的人群挥了挥。他忽然看到机场上遍地停放着缴获的日本飞机，便问："这里有多少飞机？"

"有100多架，其中有的已不能使用。"

蒋介石眉头微微一皱："怎么还不处理啊？"

陈颐鼎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校长，正在处理之中。"

蒋介石"嗯、嗯"地点着头，然后由陈颐鼎和侍从人员扶着走下飞机舷梯，与前来迎接的陈仪等要员们一一见面。

在军乐声中，蒋氏夫妇检阅了由第七十军官兵组成的仪仗队。

随同蒋介石来台的有，国务秘书沈昌焕、曹圣芬，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

蒋氏此次赴台，正值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之际。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这是国民党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是日，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下令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所谓"国民大会"。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带着虚幻的"胜利"喜悦，想乘"国民大会"召开前的空隙来台轻松轻松。这也许是他在三年后带着残兵败将溃退台湾前最轻松的日子。

蒋介石、宋美龄抵台后，下榻在台北郊外16公里处的草山风景区内(即今阳明山。因为蒋介石非常崇尚明代王阳明"心明便是天理"的反求内心修养的理论，1949年逃到台湾后，便将他住过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这里群山四合，风光明媚，是台湾北部的风景名胜。日本人曾在这里盖了许多别墅。由于蒋介石的到来，所有的别墅都被腾空，仅供蒋氏夫妇和随行人员居住。草山四周由第七十军严加警卫。

22日上午，蒋氏夫妇在草山别墅没有外出。早餐后，蒋介石埋头批阅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工作报告书，迄午未完。

下午，蒋介石身着五星上将军服，在陈颐鼎陪同下来到第七十军军部，召见了该军团以上全体军官。他坐在靠椅上，手持花名册。军官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个个紧张严肃，挺着腰板。陈颐鼎捧着名单，报到谁的名字，谁就站起来，由蒋介石对着名册逐一过目。点完名，蒋介石训话。大意是：台湾沦丧了50年，你们奉命来此，不辱重任，光复了这片土地，堪属嘉奖。中正特向第七十军全体将士表示慰勉。他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说：你们都是带兵的长官，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除了会打仗外，还要多读点书，多研究研究历史。

蒋介石在台期间，尽管重要场合均由陈仪陪同，但有事却很少找陈仪商量。一方面由于陈仪年纪较大，办事不利索；更重要的，在于陈仪不属蒋介石的嫡系，其虽身任

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实际上只是个光杆司令。驻台国民党主力第七十军4个师和5个辎重团，悉由蒋介石嫡系，黄埔三期生陈颐鼎中将直接掌握。而陈仪对蒋介石有意无意地冷淡自己亦有感觉，所以与蒋也是貌合神离，很少恭维。

（二）

22日晚上近10点钟，在台北家中的陈颐鼎正准备上床睡觉，忽然接到俞济时打来的电话："陈军长，你马上到草山来，老先生找你。"

陈颐鼎立即披挂整齐，驱车直奔草山。到达蒋介石别墅时，已快夜里11点钟了。陈颐鼎在俞济时的陪同下跨进屋，只见蒋介石身穿长袍，正坐在沙发上，看上去情绪蛮好。陈颐鼎两腿一靠，没等报告，蒋便先开口说："啊，你来啦。我明天想到日月潭去看看，怎么个走法啊？"陈颐鼎回答："路很远，在台中的山里，可不好走。"

蒋介石说："我决定明天就去，怎么个走法，你同俞济时去具体安排。"陈颐鼎刚要转身，蒋又叫住他："这次行动，不要惊动太多的人。"他想了一下又说："沿途也不要派军队，免得引起麻烦。"

陈颐鼎和俞济时连夜研究，决定先乘飞机到台中市，然后改换汽车去日月潭。他们当时最大的担忧是，台中至日月潭的路况较差（曾遭美机多次轰炸），还要经过许多山谷桥梁，再加上台湾刚收复一年，谁知在山里会出现什么情况。但老头子又不许沿途派军队，这使他俩颇伤脑筋。最后商量的结果，决定将第七十军的部队换上便衣，潜伏于蒋介石经过的公路两侧，担任警戒。这样既不让蒋介石看到，又保证了他的安全。研究毕，陈颐鼎立即进行部署。一个通宵下来，他已是呵欠连天。

23日上午9时55分，蒋介石、宋美龄在陈仪、陈颐鼎等人陪同下，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于11时10分抵达台中市。在台中吃了中饭，稍事休息后，便乘上早已备好的汽车，三、四个小时后，安全到达日月潭。这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陈颐鼎才松了口气。

第二天早餐后，蒋介石、宋美龄乘游艇入湖游览。日月潭中有一小岛，将湖分为日潭和月潭。四周青山环绕，潭水澄碧，山光树影倒映水中，美不胜收。置身于这"台湾八景"中之绝胜，蒋氏夫妇游兴颇高，赞不绝口地对随行人员说："这里的天然风姿，实在不亚于杭州的西湖。"

离艇登岸，蒋介石偕宋美龄巡视了被称为"全岛动力之神经枢纽"的日月潭第一发电所。这发电所工程之大，在陈颐鼎来说还是头一次看到。据说该所正常发电时，足可供台湾全岛使用。蒋介石对发电所的工程之巨和工作情况颇为满意，特命陈仪拨台币10万元（合当时国币350万元），交该所总经理刘晋钰转发给全体员工，以示嘉许。

巡视毕，总经理刘晋钰一再请求蒋介石和宋美龄题字留念。蒋介石兴致蛮高，慨然应允，挥毫写了"大观"二字。中文不如洋文且不惯写毛笔字的宋美龄很是为难，一再问蒋介石："写什么呀？写什么呀？"蒋介石不以为然地说："你随便写两个字就行了嘛！"宋美龄手拿毛笔想了会儿，一笔一划写下了"巨工"二字。总经理接字后，一再致谢，感恩不尽。

中午即在日月潭行馆午餐。餐后，有高山族姑娘16人至行馆，专门为蒋氏夫妇表演高山族传统番舞。表演结束后，宋美龄从一姑娘手中接过表演所用石杵，学着摆弄了几下，然后手执石杵，与16位姑娘合影。

下午2时左右，蒋介石、宋美龄离开日月潭。车行途中，遇一大香蕉园，蒋命停车。然后步入园中，兴致勃勃地与宋美龄采摘香蕉，迷而忘返。侍从提醒蒋此地不宜久留。于是蒋氏夫妇乃携带采摘的25斤香蕉，登车返回台中，并于下午5时50分乘"美龄"号专机返抵台北。

（三）

10月25日上午，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

会议开始前，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特意乘吉普车在台北全市绕了一圈，意在使台北民众"得一睹风采"，然后驶抵会场，出席大会。

纪念大会于上午10时20分正式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台湾各界代表2000余人。大会由陈仪主持，一切行礼如仪后，即由蒋介石致长篇训词。所谓"训词"，实际是早已备好的讲稿，不知出于谁的手笔，写得倒也冠冕堂皇。

大会结束后，蒋介石入休息室小憩片刻，然后偕宋美龄步出阳台，接受所谓"千万市民的欢呼。"此时的蒋介石，得意洋洋，不时地挥动着手中的礼帽。

在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台湾各报日文版一律停刊，"藉利国文之迅速推进"。台湾全省运动大会、全省美术展览会及工矿产品展览会，也在同日揭幕，以增添喜庆气氛。

（四）

25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市东门町第七十军军部（现改建为"中正纪念堂"），分别会见了驻台美军舰队司令和英军舰队司令，蒋氏夫妇还分别同他们合了影。许多外国记者提出要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合影留念，蒋氏夫妇亦乐于借此提高自己在国际间的形象，大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记者们还纷纷向陈颐鼎将军索要纪念品，陈颐鼎便挑了一些缴获的日军战利品相赠，其中光是日军指挥

刀就送出去十几把。以后要求见蒋的人实在太多，蒋亦感厌烦，干脆避而不见，概由陈颐鼎接待。陈也无非是寒暄寒暄，赠些纪念品了事。

蒋介石原定 10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 分乘机离台。这天上午 8 时，得南京方面天气预报，说南京风沙过大，飞机不宜降落。故只好改期。

国民党《中央日报》26 日电讯称：蒋介石夫妇这天上午“在草山行宫度过半日悠静之周末生活。正午 12 时，率侍从人员在台北市上购物……”

下午，蒋介石、宋美龄在陈仪、陈颐鼎等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基隆市视察，于下午 4 时 10 分到达第七十军七十五师驻守的基隆要塞司令部，听取要塞指挥官的汇报，并巡视炮台建筑。在基隆逗留时，基隆市市长亲将一基隆全景模型赠予蒋氏夫妇。蒋颇感兴趣，对宋美龄说：“这模型蛮好，雕塑得很清楚。”宋美龄对着模型谛视良久，然后将其中一只小船轻轻取出，仔细观其构造，连连夸赞。

至晚 7 时，蒋氏夫妇才回到台北，并返抵草山别墅。

1946 年 10 月 27 日，蒋介石、宋美龄等结束了在台湾为期一周的视察，于当日上午 11 时 15 分乘专机离台。陈仪、陈颐鼎等驻台党政军要员均往机场送行。

在蒋介石离开台湾后仅 4 个月，台湾全岛即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暴政的“二·二八”起义。此时国民党第七十军已奉命回到大陆。蒋介石立即从内战前线抽调第二十一军前去进行残酷镇压。这次镇压，持续达一个多月。

（刘卫）

华北十四巨奸押解南京小记

1946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人民的压力，在华北抓了一批汉奸。但法院公开审理的都是些三流小汉奸，大汉奸一个未见解送法院。对此，社会上传说纷纭，说巨奸迟迟不送法院，是因为办理人员受贿，企图藉词释放。北平当局为应付舆论，一方面枪毙了两个“受贿”者，另一方面匆忙宣布押解王荫泰等 14 个巨奸到南京受审。5 月 26 日晨 5 时，当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的王荫泰等汉奸象往常一样检查血压时，才知道即将被解往南京，他们立刻慌作一团，有的匆忙给家人写“遗书”，有的急急打点自己的行李。汪时璟、余晋和平时软禁在汪的家中，也临时提到了监狱，集合出发。王荫泰被编为第一号，与江亢虎铐在一起，共分七对。群奸被押出监狱时服饰各异，表情狼狈，构成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兹录群像于后：

王荫泰，58 岁，山西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娶了一个德国太太。曾当过律师，充过法官，有三寸不烂之舌。“七·七”事变后，他做了 8 年伪官，做过伪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伪实业总署督办等等。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新民会长。他为敌招募劳工，供敌情报，搜刮民食，发行伪币，包庇赌场，甘做敌人统治中国的鹰犬，罪大恶极，被列为平字汉奸第一号。从监狱起解时，王荫泰似乎很害羞，尽量低着头。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他最初不肯回答，后来很狡猾地说：“我的事华北都知道，无何感想。”“相信政府的裁处也会公平的。”在监狱门口临近开车的时候，他对记者苦笑说：“别矣北平，恐怕我不能回来了。”囚车过灯市口，他的德国太太和三个女儿杂在唾骂汉奸的人群中望着他落泪。

齐燮元，62 岁，河北宁河县人。在这批巨奸中，他算是资格最老的军阀了。“七·七”事变前，这位“自影津门”的将军就与日本特务机关眉来眼去。事变后，他与王克敏等组织伪临时政府，任常委兼治安部总长，其后历任伪军事首长，先后成立 11 个集团军分驻华北各地，扰乱华北，破坏抗战。当记者问他起解的感想时，他暴躁了，手拍着胸傲气凌人地说：“我没有对不起老百姓的地方，这次我一定听国家法律制裁。”“从未做坏事，蒋主席也说我资格老。”随后又象安慰又象解嘲地对和他铐在一起的伪北京市长刘玉书说：“市长也没有对不起人民的事。”押解兵对他很客气，他用训话的口气告诉押解兵他跟吴大帅时的“光荣历史”，厚脸皮上不时浮出些强笑。

殷汝耕，57 岁。早在 1935 年 11 月，他便乘日本企图侵略华北，公然窃取冀东 22 县，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曾接受日本指挥，出卖柳江煤矿，设立冀东银行，包庇日鲜浪人输运白银出口。后又应汪精卫的邀请，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是个老牌汉奸。当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只笑笑：“没什么话讲，没什么话讲。”他强作镇静，但不时脱帽，用手帕擦去冷汗。他显得苍老，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气劲。

汪时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财务总署督办，是这群行列里穿着最漂亮、最阔绰的人物，与衣着陈旧的周作人形成对比，围观的人说：“作汉奸也还是长财政的（意为干财政最吃香。）”在飞机场检查时，发现他手提包里的东西最齐全，除各种补药、用品外，还有一密裹的小包，里面放着一卷自白书。他的身份很神秘，当局对他一直很客气，并没有把他关进监狱，而是把他软禁在自己家中，直到起解前 25 分钟，才用小汽车把他押解到狱。记者问他话的时候，他装聋作哑，老由余晋和作翻译，余用手放嘴上对准汪的耳朵：“这位先生问你还有什么说话？”他笑了：“没有什么，谢谢你，只是惭愧，应当，应当。”

余晋和，58 岁，曾历任伪北京市长、伪华北政委会委员、伪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等职。他对记者说：“在北平我没有对不起民众的事。”“国家惩治汉奸、肃正纲纪是对的，但对我们几个人，似乎还要考虑。”在囚车上他四处张

望，他看见事变前许多自己部属(他事变前曾任北平警察局长)又回到北平，有的做了押解官，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和一位旧相识谈了几句话，眼眶有些潮湿了。

江亢虎，64岁。193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不久即在汪精卫怂恿下参加了"和平建国运动"，历任伪考试院副院长、院长，伪国府委员等职。江亢虎在离开监狱时，老态龙钟，面色苍白，好象非常害怕。他对记者的发问默不作声，但可以看出他内心有抑止不住的恐惧感。

周作人，这位知堂老人在北平沦陷后，忽然耐不住苦雨斋的寂寞，热心做起伪官了。他曾任伪北大校长、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他光着头，神态颓唐。记者问他时，他说："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说话声音很低，苦笑着。被捕前，他在苦雨斋中向记者辩解说："我做官做校长，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在押解南京的这批华北巨奸中，他最瘦，行李也最简单，一个不足10斤的小包，里面有两本书，一本是他自己写的《谈龙集》，一本是《朱子》。登机后周以文人姿态不时吟诵，并亲书七绝一首以示押解官。诗云："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或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

潘毓桂，64岁。"七·七"事变后，他负责主持北平维持会，藉口维持治安，引导敌军进驻市内，并焚烧民间所藏孙中山等的书籍，以后任伪天津市长，完全听从敌人指挥。押解时，他面色发青，手提包裹，除糕点外都是补药。对记者的发问，他没有答复。

邹泉荪，44岁，山东福山人，是沦陷期伪华北商会联合会及北平商会的会长，操纵金融、物价，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胜利后，他拿着数年搜刮来的钱财到处送礼，拉关系。他对记者说："我相信我还会很自然，因为……"他张着镶满金牙的嘴大声笑着，似乎满不在乎。

刘玉书，做过伪北平市长、华北政委会委员，64岁，四川遂宁人。从陆军监狱到南苑机场的路上，他在载有14人的大卡车上乱嚷嚷。他答复记者的询问："我没有话讲，所犯的罪行也不容自己申辩，我的一切，北平的老百姓会代我说话的。"此时，一位记者问他："你拿混合面让北平人吃，还记得吗？"他红了脸，不吱声了。

唐仰杜，57岁，山东邹县人。当过伪山东省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等职，在群奸中堪称"羊群之驴"。他还想活，不嫌羞愧地拿他自己的儿女做护身盾牌："我大儿为抗战死在昆明，二儿为抗战死在重庆。至于自己呢，老朽了，死去了没有什么，早就准备着了，没开始捉我们的时候，我就自愿到行营自首了，请政府公平处断吧。"

陈曾栻，63岁，河北青县人。当过伪河北省长，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兼农务总署督办，到飞机场后，他说："快完了，还坐一回飞机。"汪时璟狠狠瞪了他一下，似乎说真晦气。

文元模、王谟是这批押解南京的华北汉奸中3个文化汉奸之二，另一个是周作人。他俩都做过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文元模原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他说自己是个穷教书匠，这次去南京，带的款子很寒酸。王谟原是研究地质的，曾出版过颇有名的世界地理书籍。这次衣衫不整，形极狼狈。

(周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座次之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1945年7月中、美、苏、英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设立的。考虑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已于1945年10月24日对德国的戈林、赫斯等22名战犯开庭审判，为跟纽伦堡法庭相区别，东京法庭特冠以"远东"二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庭，就设在以前日本所谓的"军部"，昔日策划侵略战争的大本营，今日作了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庭长室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除庭长之外，还有中、英、美、加、苏、法、新、荷、印、菲等10国的法官。作为"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也派出了曾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42岁法官梅汝璈先生。他深知自己是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的，责任重大。因此，在他法庭上凡事都据理力争，依法行事。

法庭开庭前，11国法官齐集东京，只有一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为此，梅汝璈一到东京便蓄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须知那10位法官也都是本国法学权威。到齐之后，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次排列顺序。庭长，业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勃法官担任。庭长当然居中座，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这成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热烈讨论。的确，坐在庭长的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虽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强，梅汝璈该说点什么呢？"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汝璈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中国法官接着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所应当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

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中国法官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梅汝璈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庭长韦勃笑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回答说："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座，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纵使我被置末座亦心安理得，并可以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代。一旦你们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来替换我呀。"他的回答引得法官们大笑。

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召集法官们表决，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但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已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排定。于是大家纷纷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口才雄辩而措辞精当，法律界佩服的就是具备这种气质的人。

1946年5月3日，历史记下了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法庭内一声高喊："静！"全体肃然。庭长韦勃率10国法官刚一露面，法庭内又一声高喊"全体起立！"在摄影机、照相机的灯光照射下，10国法官依次登上审判台，梅汝璈为中国争得了法官的第二把高背座椅，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了地位和荣誉。

（赵洪宝）

民国年间的洪门政党

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清洪帮内部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人继续依附于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另一部分帮会人士（主要是洪门人士）力图组织起政治上独立的政党，走资产阶级的"中间道路"；还有一部分洪门人士在走"中间道路"失败后，归附了革命。现介绍洪门政党中的两个政党。

中国民生共进党

1945年底，洪门九龙山的红旗老五兼五圣山智松堂执堂的樊崧甫筹组一个以洪门为基础的政党，涉足当时的民主运动。次年1月拟订了一个计划，将组建中的党定名为"中国民生共进党"。为免蒋介石的干涉，樊崧甫声称该党依附国民党。接着开展了建党活动，首先在陕西建立省支部，取名"汉威社"，汇集陕西洪门各山，由武胜山山主张子翔为社长，社下分小组，分驻各县。不久，又成立"清洪帮调整委员会"，调整清洪帮所有法师及山主系统。规定开山收徒，必先呈报，经考试核准许，方可入党。陕西省支部为建立经济基础，组织了"同德运输股份公司"。到6月初，西北和华北的山西、绥远、河南、河北先后建立了省支部。为统一北方地区的组党活动，樊崧甫联合上述各省代表，在西安召开"中国民生共进党"筹备大会，组织了"西北执行部"。

蒋介石对樊崧甫的建党活动也不是孰视无睹的，他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转告樊，他要派人参加。可是樊崧甫名为依附国民党，实则想搞独立的政党，他婉拒了蒋的要求。蒋碰了钉子后，改变了策略，任命樊崧甫为"军风纪视察团"主任，移驻河南郑州。用调虎离山计将樊调开后，蒋又令刘峙、胡宗南将民生共进党（筹委会）强行取消，严禁其活动。

樊崧甫发觉中计时，为时已晚，他气愤地跑到上海，继续开展建党活动。9月，他联络国内外洪门领袖贾振、俞作民、司徒美堂等，筹备将全国洪门改组为"中国民生共进党"，发表筹备宣言与政治纲领。指出中国民生共进党是集清、洪、汉、礼、白各帮及回教徒为一体的组织，是为生存演进，促进民生建设而立。其宗旨秉承唯中哲学、三纲五常八德之祖训，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以建民国，以臻大同。政治纲领主张"平等主义"；经济纲领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排除剥削为原则；教育主张机会均等，学用一致；武备只求维持生存，反对外争内斗。

蒋介石为彻底遏制樊崧甫等人的建党活动，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指使军统特务头子徐亮和杜月笙、向海潜等人，将全国清洪帮组织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排斥樊崧甫等人。而此时，洪门五圣山内部也发生"党社之争"。五圣山智松堂堂主向海潜不敢得罪蒋介石，他从杜月笙那里得知蒋只同意帮会组"社"，不同意组"党"后，反对樊崧甫组"党"。向海潜仿效杜月笙的"恒社"组织了一个"上海市协社"，在军统的监督下活动。樊崧甫等人筹组"中国民生共进党"的计划遂成泡影。

中国洪门民治党

1946年春，司徒美堂、赵昱等海外洪门领袖回国，在上海发起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准备以海外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结合国内洪门组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洪门政党，在中国实现一个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政府。为此，司徒美堂一面发动全球洪门代表回国组党，一面要求国内洪

门人士咸摒私见，全体参加。这一洪门恳亲大会的规模较大，代表包括了国内外的清洪帮首领。

司徒美堂等人的活动，早为蒋介石的中统特务组织所注意，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决定将计就计，派大批特务混入洪门内部，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使其为国民党所用。

1946年7月14日，洪门恳亲大会预备会议在上海贵州路湖社大礼堂举行。到会代表及上海市各洪门团体共约1000人，会议进行过程中，中统按原定计划部署了力量，以多数表决形式，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对中统的操纵与控制表示坚决反对，怎奈人少势弱，无济于事。大会还决定成立民治党"中央委员会"的各机构。

"民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司徒美堂，副主席赵昱、朱家兆，下设宣传部、组织部、生产部、社会运动部、训练部、设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考核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及秘书处。不久，该党机构发生变动，主席制取消，由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三人担任执行委员，各工作委员会一律取消，只设秘书、组织、联络、宣传等处部，大多由依附于国民党的国内清洪帮分子担任。

洪门恳亲大会宣布"中国洪门民治党"于8月1日正式成立，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时局之五项主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反对独裁，主张多党制的民主政治。这些主张反映该党虽受中统控制，但仍有"中间势力"的政治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暂时允许其保持"中间党派"的面目以装潢门面。

洪门民治党成立后，积极展开活动。在上海设立"洪声电台"，出版《民治周刊》。但是其内部很快发生分裂，国内一些清洪帮分子不满司徒美堂等海外洪门领袖主持该党，他们在上海组织"洪门民治建国会"与之抗衡。在香港的陈其尤及其致公党明确表示不愿与民治党合作。在内外交困中，司徒美堂派赵昱、张书城、杨天孚、朱金石与樊崧甫的"中国民生共进党"和林东海的"中国自由党"组织"中间党联盟"；另一方面又派赵昱等赴港澳及南洋一带活动，建立民治党的海外基础，并准备将民治党总部从上海迁往香港，力图摆脱中统控制，从事独立自主的民主运动。

然而，"中间党联盟"立即遭到国民党舆论工具的攻击，其活动也受到限制。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其一手控制下的国民代表大会。司徒美堂曾到南京活动，希望分配给该党100名国大代表，以实现其议会民主的政治理想。南京政府没有答应，仅给司徒美堂本人一个名额（华侨代表），并以特别活动费3000元相拉拢。在中统支持的党内其他势力也竭力攻击司徒美堂的政治主张，派往港澳、南洋建立组织的赵昱，在中统支持下更是积极培植个人势力，企图取司徒美堂而代之。

1947年初，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四五月间，中共代表团从蒋管区撤退，民主人士纷纷去港。对民治党心灰意冷的司徒美堂也感到非走不可。7月间，他叫其子司徒健庭执笔，起草了一个《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上海各报上，宣布和民治党脱离关系，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

在途经香港停留期间，司徒美堂与李济深、蔡廷锴、陈其瑗、陈其尤以及中共华南分局的连贯交往甚多，这使他对国内形势与前途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在政治上走"中间路线"，此路不通。于是，他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投身于中共领导的反蒋民主运动。

此后，民治党成为中统控制下的联络海外华人的政治组织。大陆解放后，该党重要分子前往美国和台港澳，继续在华侨中发展势力。

（文若婴）

流行风

歌曲《好地方》

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哟，
万担谷子装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
织青布做衣裳，
年年不会闹饥荒。
山那边哟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哟，
没人为你做牛羊，
老百姓呀管村庄，
讲民主爱地方，
大家快活喜洋洋。

小说《风萧萧》

作者徐之于，主要内容：

以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为背景，写中、美、日三国之间间谍活动的故事。1940年上海成为孤岛后，青年哲学家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美军间谍头目史蒂芬夫妇成为朋友，并又结识了白频、梅瀛子和海伦三个女子，对她们都发生好感。太平洋战争爆发，徐出于爱国热忱参加了美国对日本的间谍活动，成为梅瀛子的助手，在窃取日本情报中与重庆政府间谍白蘋发生误会，徐被白蘋开枪致伤。经过一番波折，三人才消除了误会。后白蘋在一次暗杀活动中遭日军女间谍宫间美子伏击致死。梅瀛子用尽心机毒死宫间美子，为白蘋复仇。徐和梅因身份暴露，将离上海去内地。临行时，徐发现海伦与自己恋情绵绵，但为了民族抗日战争，在秋风萧萧的黄昏，满怀离愁别绪向上海告别。作品中的三个女子都是富有才情的绝代佳人，而风度翩翩的哲学家陷于三个佳人中情意荡漾，但又对女色保持远距离的玩赏态度，反映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恋爱观。小说在写四角恋爱过程中，精心编织爱情与谋杀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作品发表后在当时颇有影响。

小说《吕梁英雄传》

作者马峰、西戎，主要内容：

以吕梁山支脉桦林山下康家寨为背景，写边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故事，显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1942年，日寇“扫荡”康家寨，村主任康顺风勾结恶霸康锡雪，组织维持会，鱼肉人民。八路军武工队员武得民和自卫队雷石柱带领民兵袭击康家寨的日寇警备队，清算康顺风的罪行，成立了新政权。在与敌人进行多次反“扫荡”斗争中，武工队与敌人开展各种灵活巧妙的战术。他们深入据点，组织地下民兵，里应外合，声东击西，打地道战，摆地雷阵，搞“变工爆炸”；深入虎穴捉日寇，围困日伪据点，使敌人断粮断水。他们又开展宣传活动，瓦解伪军，粉碎了“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和“强化治安”，挤得敌占区日益缩小，从而创造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小说着力塑造武得民、雷石柱等一群英勇善战的战斗英雄形象，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富有传奇色彩，语言通俗易懂，是最早出现的表现新的人民英雄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小说《幻灭》

作者王以仁，主要内容：

写旧社会一个知识青年理想和爱情破灭的悲剧。主人公少敏在中学时代父母相继病故，他痛不欲生，上吊自尽，幸被姑母救下。毕业后在乡间小学任教，与同学议论国事，感叹政府的腐败，民众的贫苦，教育的落后，虽立志改革，但空有理想而无行动。在爱情生活中，他同时与三个少女相处产生了苦恼：自幼相爱的表姐松姑被许给杜家，与她情丝不断而又无以表白；对由人作主定婚的玉佩的深情，深表同情；聪颖活泼的梦蕙向他表示感情，使他心荡神摇。长期的精神折磨致使他忧郁成疾，最后，为摆脱爱的纠葛，终于离开三个少女凄然出走。作品着力刻画少敏在人生理想和爱情生活的双重幻灭中的苦闷心理和动摇性格，反映了“五四”落潮后某些知识分子的彷徨和孤独。作品感伤气氛浓重，色调低沉灰暗，缺乏振奋向上的力量。

小说《古屋》

作者王西彦，主要内容：

写抗战初期一个地主庄园败落的故事。在一座阴森、荒凉的古屋里，主人公孔尚宪父辈世代为官，他曾进过京师大学，青年时挥金如土，放荡任性。年过四十后，正值国土沦丧、人民受难之时，他却奉行“快乐主义”，弄字画，玩古碑，自许清高，大谈其超脱一切的人生哲学。他外表文雅、慈祥，而秉性残忍，企图以封建礼教来维护大家庭的尊严。可他的儿子却是一个只知挥霍的浪荡公子，长媳因不满嫁给哑巴作妻而被逼得发疯致死，侄媳目睹孔尚宪迫害长媳暴行而远走高飞。这座古屋“好象粉饰着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着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作品对孔尚宪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给以无情的揭露，并通过孙家与邻居那个热心于抗战事业的爱国女性洪翰真的对照，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处于民族灾难深重之时旧知识分子应走什么道路？全篇色调阴沉、灰暗，与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和性格取得和谐一致。

小说《寒夜》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

写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重庆的一个知识分子小家庭的悲剧。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是大学毕业生，年轻时都有过美好的理想，并为此奋斗过。抗战爆发后，

他们连同母亲和孩子来到重庆。汪在一家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当一名小职员，曾在银行任职，名为行员，实是经理的"花瓶"。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微薄的收入难以糊口，靠着曾树生屈辱的经济来源补助家用。汪文宣在公司不断受到歧视和压迫，加上精神上的刺激，贫病交加。树生则为了摆脱无法忍受的生活煎熬和与婆婆的矛盾，在银行经理的胁迫下同往兰州。正值抗战胜利之际，汪文宣病重吐血致死。待到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时，旧居已换了新主，婆婆和孩子也不知所往。作品以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关系展开情节，通过一对知识分子饱尝忧患和苦难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一幅冷酷的现实生活图景，控诉了那个为金钱和权势所控制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作者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下层人民的真诚同情，曾激起了当时读者的强烈共鸣。作品刻画性格精细，善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环境气氛描写富有浓重的时代气息，是作者后期在艺术上最成熟的代表作。

小说《四世同堂》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

小说以日寇侵华为背景，以北平西城小羊圈胡同里一系列家庭变故为线索，真切地反映了在国破家亡的严重历史关头市民性格被改造的历程。作品着力描写北平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在成了亡国奴后，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有的豁出命来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北平，投身抗日洪流，有的沦为无耻的汉奸。而多数的市民，因无法逃离北平，不得不经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种种磨难。他们惶惑、偷生，忍饥受辱。作者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祁老者、祁瑞宣、钱默吟、李四爷、小崔、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一群职业不同、品质性格各异的众多市民形象。作品热情颂扬爱国者的英雄行为，无情地鞭笞汉奸特务的丑恶灵魂，愤怒控诉日寇统治的血腥罪行。全书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风格沉郁浑厚，笔力雄健而又细致入微，语言通俗，又含幽默风趣色彩，旧北平风土人情的描写增添了作品的地方色彩，。是作者四十年代的一部力作。

小说《京华烟云》

作者林语堂，主要内容：

全书分《道家的女儿》、《庭园的悲剧》和《秋之歌》三卷。故事以 1900 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到 1938 年元旦抗战初起为背景，以居住于北京东城的姚、曾两个富贵之家四十年来的变迁为线索，描写在历次政治风云中以曾文朴为代表的旧人物的沉沦和以陈三、黛云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心人物姚木兰从小受老庄思想影响，与丈夫共同过着闲适风雅的隐居生涯。后在"五四"、"五卅"的动荡时代里思想发生变化。"三・一八"惨案中她的大女儿惨遭屠杀；"七・七"全民抗战爆发，她目睹了日寇的种种罪行，又见陈三等青年走上前线，终于毅然送子参军，自己也由一个贵妇人变为国难中流亡的村妇。作者企图写出在国难时期中各类知识分子的动向，表现旧中国的衰老和新中国的萌芽，在描写二十年代北京风土人情中不乏精彩之笔。但主要人物特别是妇女形象，极力模仿《红楼梦》中的女郎，犹如穿着现代服装的古代仕女，虽有不少政治背景和事件的穿插，但未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主流。

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作者赵树理，主要内容：

小说以张铁锁的悲惨遭遇和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为线索，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翻身史，表现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重大主题。年轻农民张铁锁在以李如珍为代表的地主豪绅敲榨勒索下流落太原当手工业工人，其时结识了共产党员小常。1936 年红军东征，铁锁回到李家庄。抗战爆发后，小常发展铁锁参加了"牺盟会"，李家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展开复杂的斗争。1939 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李如珍某团血洗李家庄，并投降日寇，铁锁等人组织了游击队，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后参加八路军。通过武装斗争的胜利，李家庄农民惩处了恶霸汉奸李如珍，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抗战胜利后李家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作品相当真实地概括了晋东南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重大政治事件，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艰苦曲折的过程，刻画了张铁锁、冷元、白狗、二妞等贫苦农民的形象，揭露了李如珍等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宏大得体，在运用民族形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送行》

你走了
背一肩行李
那么沉重
就如背着历史的命运

留在我小屋里的
是一支箫
一支旧笔
那是，你说
作为同住一年的纪念的
你走了
从此，它们
将是我的好伴侣
用那支萧
吹出愤怒和低语
用那支笔
写下血泪和控诉

你走了
面对着远方升起的太阳
把黑影丢在后边
于是
留在你后边的我
就更多一分幽暗

你走了
好好地赶上路
别担心你的小兄弟身体弱
还捱得住冻饿
抵得住风霜
我会在寒冬里熬过去的！

你走了
旅途上该记住
这儿的伙伴们的脸
和那些受着重重损害的灵魂
记住他们
会使你心头更加温暖
你走了
临行，你这么说：
“不久，我会再来的”
说完，你就昂然地
举起步子
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
你，是会再来的

哪一天才会回来呢？
哦，是的
你是背着春天前的寒冷而去的
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天
当大地开遍了鲜花
你才踏着壮健的步子
和笑，和歌声
一起重回到这儿来？

你走了
让我们再见在欢欣里
紧握粗糙的大手
把肩膀摇得发疼
同时喊出
“回来了，到底回来了！”
于是再共同
开始过幸福的日子…

（袁鹰）

历史档案

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兹有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并由马歇尔将军充任顾问所组成之军事小组会议，经受权宣布：双方已就《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获致协议。

本军事小组会议，现在根据方案拟具详细实施之办法，并将责成北平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向各军传达必要之命令，并监督其实施。

为减少整编期中之种种困难起见，上述各项办法，规定于十八个月内逐步实施完成。

本方案之目的，在于减少军费支出，俾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确立造成足以保卫国家安全之精炼国军之基础，并包括若干办法，保障人民权利不受军队干涉。

本方案之各项条款全文如下：

第一条　统帅权

第一节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经由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行使其统帅权，本协定所提及之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军长，各补给区主任，均应经由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向最高统帅呈送报告。

第二节　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遇必须撤免中共所领导单位之任何一司令官，或有地位之任一共产党军官时，最高统帅应指派政府内资深之共产党代表所提名之军官以补其缺。

第二条　职责与权限

第一节　陆军之主要职责，在战时为保卫国家，在平时则为训练军队，陆军可用以镇压国内骚乱，惟须受下节之限制。

第二节　当国内发生骚乱，经该地省主席向国府委员会确证当地局势已非地方警察及保安部队所能应付时，国民政府主席以最高统帅之资格，经由国府委员会之同意，可以使用陆军，以恢复秩序。

第三条　编组

第一节　陆军包括由三个师所组成之各军，各该军配置直属部队之人数，不得超过其总兵力百分之十五，至十二个月终了，全国陆军应为一零八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一万四千人，在此数内，由中共部队编成者计十八个师。

第二节　全国将划为八个补给区，区设主任一人，向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负责，在各该区内担任以下职责：

（一）办理驻扎各该区内军队之补给营舍及薪饷事宜；

（二）办理由各该区内被裁并各单位所收聚之武器及装备之贮存修理及分发事宜；

（三）处理供应各该区内之编余官兵，并处理供应还乡及其他目的之过境编余官兵；

（四）处理供应并初步训练在各该区内接收用以补充各部队之新兵；

（五）补给在该区内之军事学校。

各补给区主任对于驻扎其区内之军队，并无指挥权与管辖权，尤不得干涉或借任何方式影响民政民事。

各军军长应派其个人代表驻于其部队所在地之补给机关内，以保证其所辖部队之需要获得完全而迅速之补给。

各区每两个月应举行会议一次，由区主任任主席，该区内各军军长及师长或其指派之代表，均须参加，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亦应派遣代表参加，以传达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之指示，所有补给情形及有关事项，均应提出讨论。

第四条　复员

第一节　本协定公布后十二个月内，政府应将九十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中共应将十八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复员应立即开始，并大致每月裁撤总复员人数十二分之一。

本协定公布后三个星期内，政府应拟具所保留九十师之表册、及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在同期内，中共应拟具其部队之详细表册，说明其性质、兵力、武器、旅以上司令官之姓名，及各单位之驻地，此项报告，并须包括所拟保留十八师之表册，及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上项文件表册，均应送交军事小组。

本协定公布后六星期内，中共应向军事小组送交所拟复员各部队单位之全部表册，政府亦应送交同样表册。

军事小组一俟接到上列各项表册文件，应即制成实施计划送双方批准，经批准后，上项文件表册及实施计划，即由该组呈报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

第二节　复员各部队之武器及装备，可用以补充所保留之各部队，对于此类转移之详细报告，应由军事调处执行部呈报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此项剩余物资，依据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之指示贮存之。

第三节　为避免因复员而引致之普遍困难及不法情势，政府及中共应于初期各自供应其编余人员之补给，并处理其运输及就业之诸项问题，政府应尽速接办以上事宜之统一管理。

第四节 在上述十二个月之时期完毕后之六个月内，政府军应更缩编为五十师，中共军应更缩编为十师，合计六十师，编为二十军。

第五条　统编及配置

第一节　在本协定公布后之十二个月内，应编成四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包括政府军一个军，中共军一个军，每军三师。各该集团军编成之次序如下：于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个月各编成一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之参谋人员，政府与中共军官应约各占半数。

第二节　在十二个月终了时，各军之配置应如下述：

东北——五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各军军长由政府军官充任，中共军一个军（三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共计六个军。

西北——五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

军官充任军长——共计五个军。

华北——三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四个集团军各包含政府军一个军,及中共军一个军(每军三师),内中两个集团军总司令,由政府军官充任,两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中共军官充任——共计十一军。

华中——九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中共军一个军(三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共计十个军。

华南(包括台湾)——四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四个军。

第三节　在十二个月以后之六个月内,上节所述之四个集团军,应更改编为独立之六个军,内中四个军各包括政府军一个师,中共军两个师,两个军各包括政府军两个师,中共军一个师,以后集团军即应取消。

第四节　在次六个月即第十八个月终了时,各军之配置应如次述:

东北——一个军包括政府军两个师,中共军一个师,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四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五个军;

西北——三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三个军;

华北——三个军每个军包括政府军一个师,中共军两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一个军包括政府军两个师,中共军一个师,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两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六个军;

华中——一个军包括政府军一个师,中共军两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三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四个军;

华南(包括台湾)——两个军(每军三师)全部属政府军,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共计两个军。

第六条　保安部队

第一节　各省应有权维持一与其人口比例相当之保安部队,但其数额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当省内普通警察显然无法应付局势时,该省主席即有权使用此项保安部队,以镇压骚乱。

第二节　保安部队之武装,应以手枪、步枪及自动步枪为限。

第七条　特别规定

第一节　军事调处执行部

根据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三人会议所签协定而设立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应为本协定之执行机关。

第二节　统一之制服

整编后之中国军队,应采用显著而划一之制服,以供中华民国陆军官兵之着用。

第三节　人事制度

树立妥善之人事制度,凡陆军军官之姓名、阶级及执掌,均应载入统一之名册内,不得以政治关系而有歧视。

第四节　特殊武力

本协定生效后,政府及任何政党或派系组织,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独立性之武力。

第五节　伪军及非正规军

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或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第八条第一节所述之实施计划内应规定执行本节之具体办法并限期完成之。

第八条　一般规定

第一节　本协定经蒋委员长及中共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军事小组应即拟具关于执行本协定所载各种条款之详细计划,包括各种进度表、规章、及具体步骤,呈送核夺。

第二节　双方谅解并同意:上述详细计划须规定复员应于最早日期开始,补给区之组织,应逐渐成立,军队之统一编组之详细程序,应根据第五条所规定之办法实施。

双方同时谅解并同意:在最初之过渡期内,政府及中共均应负责维持其军队之良好秩序与补给,并保证各该军队对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发颁之命令,立即绝对遵行。

政府代表　张治中

中共代表　周恩来

顾问　马歇尔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于重庆

(原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华日报》)

双十协定公布前后国民党布置向解放区进攻的几个秘密文电

(一)国民党第一战区发布的清剿嵩山伏牛山各地区奸区计划

(1945年9月18日)

一、查本战区部队之兵力均已向东向北挺进,对后方

交通之维护及嵩山伏牛山各地区之清剿，亟待确定。为求彻底迅速确定起见，特按国军及地方部队之现态势，划分为七个清剿区，分区施行。

二、基于上述，特规定各清剿区之指挥官及范围、兵力如下：

甲、第一清剿区之指挥官，以二十八师师长王应尊出任，其范围为新安、渑池、陕县三县全境，清剿兵力以二十八师并附第十挺进纵队及地方团队担任。

乙、第二清剿区以卢洛抗敌自卫军指挥官王希仲出任，其指挥范围为洛宁全境，清剿兵力为卢洛抗敌自卫军全部并附地方团队担任。

丙、第三清剿区以第九挺进纵队司令徐×生兼任指挥官，其范围为宜阳全境，清剿兵力以第九挺进纵队并附地方兵团担任。

丁、第四清剿区以暂六六师师长刘子奇兼任指挥官，其范围为宜阳、嵩县、伊川三县全境，清剿兵力以六六师并附第四挺进纵队及地方团队担任。

戊、第五清剿区以九十军军长严明兼任指挥官，其范围为洛阳、孟津、偃师三县全境，清剿兵力以九十军并附王遂庆团及地方团队担任。

己、第六清剿区以第四九师师长李守正兼任指挥官，其范围为巩县、汜水、荥阳三县全境，清剿兵力以四九师附地方兵团担任。

庚、第七清剿区以第十五军军长武廷麟兼任指挥官，其范围为密县、登封、郏县全境及本战区辖区内之临汝县境，清剿兵力以第十五军附地方团队担任。

三、为求指挥统一，各清剿区指挥官于清剿期间，统归裴(昌会)副长官指挥。

四、凡接近黄河之清剿区，应确实控制各渡口，接近山区，应确实控制各要点，以阻奸军流窜。

五、清剿区指挥部均不另设机构。

六、各清剿部队特须注意军纪，如有违反，严厉处分，决不姑息。(下略)

(新华社延安 1945 年 11 月 7 日电)

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闭会时的致词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来，经过二十余天热烈的讨论，已经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今天宣告闭会了。本人以职务羁身，不能每次都来和诸位交换意见，甚觉抱歉！回顾这二十余天中间，诸位会员无论在分组会商或全体大会，都能开诚布公，大家本著互尊互信，互助合作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寻觅各种问题合理的解决，使本会议始终在祥和协调空气之中，获得园满的成就，尤为本会议最可宝贵的收获。本人虔诚希望这种公忠坦白的精神，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大家不争意气，不重私见，只是一心为著国家，为著人民，而共同协力；则本会议的一切决定，必可顺利执行；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显光明。这是今天闭会之顷，本人十分愉快的感想，应该特别提出来向诸位表示感慰。

原来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造成独立、自由、统一的民主国家，尤其要团结奋斗，来达成和平建国的目的。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对外是在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是在打倒封建割据的势力。以往推翻帝制，扫荡军阀，和此次八年抗战，兢兢业业，坚苦奋斗，惟一的目的，无非是求独立，求统一，先除去民主的障碍，以促成民主制度的实现。到现在，扫除革命障碍，奠立民主基础的工作，已经初步成功，我们当前惟一重要的问题，只是如何确保统一，如何建立民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必须有确实的统一，才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这样的假民主，永远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而且永远要为民主政治的障碍。因此，我们为了实现真民主，真统一起见，和平、团结两个条件，实在是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需要。国父临终遗嘱："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个人和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始终是服膺这个崇高遗训，除了对于割据的军阀和侵略的日本，不得不用武力对抗之外，其他对于国内一切问题，不论遭遇任何严重形势，总是抱定忍让为国的决心，不惜委曲求全，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纵使不得已而有军事冲突，也只是被动的防卫，决不采取主动的行动。这因为我们认定我们的国力、民力，只可从安定中求保养，再禁不起任何战祸的摧残，所以每在危机一发之间，都能化乖戾为祥和，并且任何龃龉的意见，也都能融和一致，恢复到和平、团结。已往这种经过事例，尤其是抗战以来八年间的事实，国人皆所共和，毋待赘述，这就是我们今日所主张的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精神所在。而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一本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而进行，所以各种议案，都是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的说一句，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须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希望我们大家要把这四大原则，永远奉为我们的信条，永远照著这个信条，共同遵守，共同努力，才可以安慰为革命抗战而牺牲的军民先烈，才不致辜负全

国人民的期望。

本会议开会之日，政府即颁布全国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并公布了一月五日所协议的辨法，同时公布了命令内容的全部，与其附属规定的四项条款，以示一致遵行的决心。本会议开会的第二天，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并向会议详细报告，因此本会议就能够专心致志，来研究关于和平建国与促进宪政的各种方案。本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方案，本人虽然不能每次出席参加，但是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和研究，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本人认为各案之中，要算和平建国纲领为各种方案的基本之中心，因为此案从甲、总则，乙、人民权利，丙、政治，丁、军事，戊、外交，己、经济及财政，庚、教育及文化，辛、善后救济，壬、侨务等九章的各条规定，均属异常完备，确合时代要求，充满了统一性，充满了民主性，实在是渡到宪政时期最适宜的纲领。我们有了这个纲领，由中央以至全国各地方的政府，由各党派与社会领导人士，以至全国各地的同胞，都有了共同遵守的准则。尤其参加本会议的各党、各派，对于这个纲领，既是大家共同商讨，共同议定，而且就要参加政府，来共同执行。我们对全国同胞，必须守信义，负责任，自身先从事实行动方面，有切实遵行的表现，并且必须贯彻其全国性，使能普遍的实现。我以为有两件事，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和郑重声明。

第一，本纲领既经规定“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所有现行若干战时法令，于此原则有抵触的，中央当然要修正废止，同时我相信中共军队驻在地之内，自必同样遵守这个纲领，解除现有的一切限制。至于在教育、文化方面，又规定了“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这一条对于我国教育、文化的发展，与求学青年良好环境的养成，更是十分重要。今后自由的保障，全国无论任何地方，当然只有合于本纲领的一种法令，不应再有任何岐异和特殊的辨法。那么，今后各个政党活动，以至对政治的竞争，尽可依照国家统一法令应有的合法权利和手续，公开组织，公开进行，决不应该再有使用武装暴动，或者在各地秘密组织的行为，否则即是丧失政党的本质，破坏了民主的精神，不但违反了本纲领，而且阻挠了宪政进程。我们如果要不愧为民主国家的政党，必须革除自民元以来所有政党过去一切不良的现象，才有建立现代国家的希望。

第二，本纲领丁项军事一章，对于军队国家化的宗旨与规定极为切实，另外还有一个经过军事组协商而更详细的军事方案，我想我们既然迫切需要和平与统一，则纲领的军事部分，实为巩固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政府对于军队整编问题，早经有所决定，已在著手实施；旬前军政部林次长并已向本会议详细报告，将来还要按照纲领与方案的规定，继续推进。至于中共方面的军队整编，自然也要依照纲领与方案切实整编。本来军政、军令的统一，为立国必须的基本条件，这不仅全国饱经痛苦的同胞所一致要求，也是各党派所一再声明，认为不可否认的原则。现在协商会议已有结果，纲领、方案均经商定，我们当前最为急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全国所有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地区，都能听命于政府，一律受政府的指挥，以达到纲领所定军令、政令和军制统一的标准。这一点，我敢确信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决没有例外的。惟有这样确实做到，才能符合建国的要求，才能安慰人民的渴望；否则不仅大家参加政府没有意义，而且和平团结也将没有基础，反而增加了国家的危机，与政府内部的纠纷，这当然不是国家、民族所需求，也决非各位会员和各政党忠诚谋国的本意。

上面所说的两点，确是本纲领能否全面贯彻的试金石，果能彻底做到，则全国各地秩序，立刻可以安定，复员工作亦可以顺利完成，而本纲领其他的各章、各条，亦无一不可迎刃而解，完满实施，这是本会同仁无可推诿的职责。今天我以最恳挚的悃忱，特别提起大家的注意。同时我个人誓必忠实信守这个纲领，更必督责我们各级军政人员，恪切遵守，既使有时难免无心错误，或者督查不周，只要大家说明指出，无论我本人，或是我的部属，都无不诚恳接受，切实改正。我常常说：“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不可只顾个人自由，而侵犯别人的自由；崇尚民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不可专责别人守法，而自己则处处置身于法外。”我这几句话，实在是鉴于我国社会对于自由与民主观念的模糊，和法制与守法意识的薄弱，认为社会没有安宁，便是国家没有基础，人民不重法制，必使种种罪恶，借民主、自由之名义而行。因之，我上面几句话，实在是沉痛的呼吁。尤其近年以来，社会上和教育界所表现的这种病态，更是深刻而显著，长此不加改进，我们中国将无法自立于现代国家之林，诸位会员想必也有同感。现在我们政治协商会议商订了和平建国纲领，这一个纲领，是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和平、统一的法治国家为目的，我们大家为求发挥本会议的实效，开创建国的规模，必须先从我们自身，负起转移风气的责任，树立守法、行法精神，以做全国人民的楷模，那才可以完成我们对历史、对时代的使命。

最后，我要趁今天会议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时候，将我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简单的向各位申述。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现在抗战胜利，这三十五年之中，所有革命战役，无役不从，艰难困苦，无所不经，自省革命志愿与应尽的革命义务，幸无陨越，对于国家和人民，亦已尽了我一分

子的天职，略可自慰。今天虽不能说国民革命已经完全成功，但是铲除革命障碍的工作，确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可是我们国家当此元气凋伤之后，国运前途的危难，和建国事业的艰巨，只有比战前乃至战时更加严重，实在不胜临渊履冰之惧。幸而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订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前途大责；今后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这一个重大的责任，要交托给各位同人和全国同胞来共同担负。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功。同时要求各位同人，为国家、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们在抗战时期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诚团结，来担负今后建国的重任，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转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节录）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

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为欲借适应两国人民精神、文化、经济、及商务愿望之条款所规定，足以增进彼此领土间友好往还之办法，以加强两国间悠久幸存之和好联系及友谊结合，爰决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此各派全权代表如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博士，中华民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博士；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特派：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博士，美利坚合众国签约全权代表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先生；双方全权代表，各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善，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一）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应常保友好，久敦睦谊。

（二）缔约此方之政府，应有派遣正式外交代表至缔约彼方之政府之权利。此等外交代表，应受接待，并应在该缔约彼方领土内，本相互之原则，享受通常承认之国际法原则所给予之权利、优待及豁免。

第二条

（一）缔约此方之国民，应许其进入缔约彼方之领土，并许其在该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于享受居住及旅行之权利时，缔约此方之国民，在缔约彼方领土内，应遵照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施行之有关法律规章（倘有此项法律规章时），但不应受不合理之干涉，并除其本国主管官厅所发给之（甲）有效护照，或（乙）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外，应无须申请或携带任何旅行文件。

（二）缔约此方之国民，在缔约彼方领土全境内，应许其不受干涉，从事并经营依法组成之官厅所施行之法律规章所不禁止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从事于非专为所在国国民所保留之各种职业；为居住、商务、制造、加工、职业、科学、教育、宗教、慈善及丧葬之目的，而取得保有建造或租赁及占用适当之房屋，并租赁适当之土地；选用代理人或员工，而不问其国籍；从事为享受任何此项权利及优待所偶需或必需之任何事项；并与该缔约彼方国民，在同样条约之下，依照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施行之有关法律规章（倘有此项法律规章时），行使上述一切权利及优待。

（三）缔约双方之国民，于享受本条第一及第二两款所规定之权利及优待时，其所享受之待遇，无论如何，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之待遇。

（四）本约中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有关入境移民之现行法规，或缔约任何一方制订有关入境移民法规之权利。但本款之规定，不得阻止缔约此方之国民进入、旅行与居住于缔约彼方之领土，以经营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之贸易，或从事于任何有关之商务事业，其所享受之待遇，应与现在或将来任何第三国国民进入、旅行或居住于该领土，以经营该缔约彼方与该第三国间之贸易，或从事于与该贸易有关之商务事业所享受之待遇，同样优厚。且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二月五日，为限制入境移民而划分若干地带之美国入境移民律第三节之各项规定，亦不得解释为阻止中国人及中国人之后裔进入美国。

第三十条

（一）本约应予批准，批准书应在南京尽速互换。

（二）本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并自该日起在五年期限内继续有效。

（三）除在上述五年期限届满前一年，缔约此方之政府，以期限届满废止本约之意旨，通知缔约彼方之政府外，本约于上述限期届满后，应继续有效，至缔约任何一方，通知废止本约之意旨之日后一年为止。为此双方全权

代表,爰于本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本约用中文及英文各缮两份,中文本及英文本同样作准。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十一月四日,订于南京。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　王世杰(签名)
外交部条约司司长　王化成(签名)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国全权大使　司徒雷登(签名)
驻天津总领事　施麦斯(签名)

议定书

下开全权代表,于本日签定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时,特议定本议定书各项规定之效力,应视为与其已列入该约约文时相等。

(一)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视为并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施行对其领土内之外国人登记事项,加以合理规定之法规之权利。缔约双方了解,缔约此方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规定之身份证,应在缔约该方领土全境内有效,关于此项身份证之规定,其所给予缔约彼方国民之待遇,不得低于其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国之待遇。

(二)甲,除本约中另行给予之权利,不得加以妨碍外,第二条第二款仅指缔约双方之国民,以其个人身份所享受之权利及优待,并不得解释为包括该项国民与缔约彼方之国民在同样条件之下组织法人或团体之权利;乙,第二条第二款所用之"依法组成之官厅所施行之法律规章所不禁止"字样,应解释为指对本国国民与缔约彼方国民,一律适用之该项禁止性之法律规章而言。

(三)第三条所称矿业资源之"探勘及开发"之权利,应解释为经营矿业业务及工作之权利,与缔约此方之国民、法人或团体,在现在或将来在缔约彼方领土内,从事矿业工作之该缔约彼方之法人或团体中之利益所有权有别。

(四)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对于本约其他规定中关于地产或其他不动产所给予之权利或优待,有所限制。

(五)甲,第九条所用"未经许可"字样,应解释为指在任何特定情形下,未经工业品、文学或艺术作品之所有人所许可者;乙,第九条第一句及第二句中"以民事诉讼予以有效救济"之规定,不得解释为排除依法组成之官厅现在或将来所施行之法律规章所规定之民事诉讼以外之救济;丙,缔约此方之法律规章,对其国民、法人或团体,如不给予禁止翻译之保护时,则第九条第三句之规定,不得解释为缔约此方对缔约彼方之国民、法人或团体,须给予禁止翻译之保护。

(六)除现在另行享受或将来享受之权利,不得加以妨碍外,第十八条第二款所用"种植"字样,不得解释为给予缔约此方之国民、法人或团体在缔约彼方领土内从事农业之任何权利。

(七)第十九条第三款所用"国际金融交易"字样,应解释为包括纸币及政府证券之输入或输出。缔约双方了解,缔约双方保留采取或施行关于此项输入或输出之措施之权利;但此项措施,对缔约彼方之国民、法人及团体,不得有所歧视,以致违背该条之规定。

(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末句,不得解释为适用于邮政。

(九)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所用"金银"字样,应解释为包括金银条块及硬币在内。

(十)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所规定之美利坚合众国及其领地或属地或巴拿马运河区间现在或将来所互相给予,或美利坚合众国及其领地或属地或巴拿马运河区对古巴共和国或菲律宾共和国所给予之优惠,无论何时,如给予任何他国,应同样给予中华民国。

王世杰(签名)
王化成(签名)
司徒雷登(签名)
施麦斯(签名)

(录自一九四八年《中华年鉴》上册)

蒋介石的密令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待天字第七十号密令
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本年一月之剿匪军事,全由我各级将领指挥有方,官兵忠勇奋发,为主义牺牲,为革命奋斗,多能达成艰巨任务,奠定统一基础,既足以安慰国家及阵亡将士之灵,亦足以湔雪我党国无穷之耻。惟念将士死伤之惨,以及冰天雪地之苦,不仅为之梦魂不安,兹将本年重要战役之关系与各地区经过之得失,为我将士略述之:

自四平街一役,奠定收复东北之基础,集宁血战,启导察绥全局之胜利,安东、承德与张垣之收复,重奠国防之锁钥。鄂北李匪之溃灭,豫北滑、濮之血战、苏北、鲁北、豫北、晋南及冀东各地奸匪之鏖败,以及平古、平绥、胶济、临枣与同蒲南段诸线之打通,使华北动荡不安之局势,渐告安定。此均足以配合政略之方针,达成国防大部之目的。迭闻战讯,衷心快慰。尤以暂编第三十八师之保卫大同苦战,二月第九十七军(系地方部队编成现为整编五十二师,调湖南休整)之固守临城为时十月,与冀省保

安纵队保守保定勇毅坚定，确保重镇，使敌匪为之丧胆，大局转危为安，军事反败为胜，更堪嘉尚。惟研究历次大小战役，检讨得失、对于攻守战术尚有下列缺点，亟需注意改正，特向各将领指示如下：

(一)各部队与部队间，各指挥官与指挥官间，联络仍不确实，合作亦未密切，今后对于联络及协同动作更应特别注意。须知此次剿匪平乱，乃我国革命成败最后之关头，国军上下，无论事业历史与生命都是整个的，就是荣则同荣，辱则同辱，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如果革命失败，共匪猖獗则我全部官兵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且将何以慰我阵亡官兵在天之灵？故必须全军一心，同仇敌忾，对于友军之危急，应全力救援，切不可观望不前，贻误战机，致被匪各个击破，同归于尽。如鲁西第三师之覆败，赵师长之被俘，为我国军莫大之耻辱。

(二)对于防止匪方专以袭击各级司令部及其专射我各级指挥官之战术，迭经予以明确指示，并规定各师旅长之指挥位置与各级指挥部所在地如何保守机密与机动，皆已分行在案详切申诫，何止再三？然各将领仍未能确实奉行。九月，晋南第一旅黄旅长之被俘，东北第二十五师之失败及李师长之被俘，与此次整编六十九师在苏北之失败，戴师长之自杀殉节，此固为我革命精神与气节之发扬，临难不苟，死得其所，理所当然；而以一人一时之疏失，以致整个战局竟受莫大之影响，言念及此，不仅悲痛难忘，而且后悔无及，能不为之深切警惕耶？

(三)各部队应对庐山剿匪训练(按：创办于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剿匪"后)中之六项基本战术，即：一、搜索，二、联络，三、侦探，四、警戒，五、掩护，六、射击，作为剿匪战术之基本课目，尤须各连排与班长等下级干部人员对此均有深切之认识，注意灵活之运用，以防奸匪不意之袭击，而免受无谓损失。即如第九九旅长朱志席在苏北黄桥之覆灭，乃因忽视上述原则所致。今后各部队如有短期训练之机会，即应以团为单位召集下级干部，对此六种专技应实事求是训练演习，以资熟练，勿再蹈以往覆辙。

(四)凡我军收复之据点，余曾规定，于占领后三小时内构筑防守工事，不再让敌匪反击所攻陷。无奈我各部队仍未能照此规定实施。据鲁西战役中我军已占领之据点有遭敌人之反攻而多失陷者，甚至旅长、团长因之阵亡孤立，八八师一一九旅刘旅长广信在鲁西之被俘，即由此失。嗣后各级指挥官对于构筑工事之时间、方法、技术与形状等，均需经不断检点，切实研究，并按照规定办理，严防敌匪之惯技，使之勿得再逞。

(五)各部队对于通讯、交通、运输、车辆等重要工具，尤其是联合勤务机构及其部队均未能妥加保管，注意维护，致使军队行动迟缓，贻误时机，莫此为甚。今后高级指挥官更应亲自督察，经常检点，以免腐化与无谓之损坏。

以上各项均系一年以来历次战役中所获得的主要教训，各将领务须切实反省，遵照改进，勿蹈覆辙。至明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以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以恢复全国往来交通线，使治安××××。各战区及绥靖区主管长官，宜各就所辖地区积极准备完成各个所负之任务，尤其应准备山地战与机动战以对奸匪之游击战。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关重要。我军进占各匪区之后，必须督导我各级军兵，协助各级地方政府，注重民众组训，整理保甲，加强人民之自卫力量，以安定地方秩序，恢复各种生产。对于处理土地纠纷，尤应注重实行绥靖区减租法规，务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政治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励行，切毋忽视。古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当此国民大会圆满告成，宪法制定之际，国内国外对我国家政府与国军之视听为之一变，匪军精神上固无论，其军事与政治各方面皆受最大致命之打击，我国军剿匪工作至此已达九仞一篑之时，只要我将领在今后一年期内，淬励精诚，奋发努力，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则滔天大祸敉平于一旦，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乃可告慰我总理与革命阵亡将士诸先烈在天之灵，我官兵之丰功伟绩，且将永垂于国民革命光辉灿烂之史页。望各勉励！

(蒋中正)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一月一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元旦献词》，提出一九四六年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力争迅速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使中国走上真正民主团结强盛的道路。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元旦《告全国军民书》，谓停止内战必须首先恢复交通；实现和平民主必须首先军令政令统一。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意见：(一)立即停

止各地冲突;(二)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三)取消言论检查机关,尊重集会言论者自由;(四)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

一月二日　上海四大公用事业、四大银行、四大面粉厂和一百二十家丝厂,中国纺织公司所属二十多个工厂及五十家民营纺织厂十七万工人,为要求有工作,有饭吃而举行大罢工。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决议:沦陷期间各省区所有各年田赋,一律免予追缴。

一月三日　国共代表举行第三次正式谈判,中共方面表示:(一)同意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但必须解除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二)同意国民党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三人商谈解决停战、受降等问题。(三)主张军事考查团由政治协商会议推请各界人士组织之。

一月四日　国民党军侵占朝阳。

同日　国民党军联合伪军"清剿"余姚等地。

一月五日　国共谈判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获得一致意见。

同日　重庆三十家出版业要求废止《出版法》,并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消收复区检审办法,取消一切非法的检扣、寄递、限制等。

一月六日　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公布政协会议会员名单:(一)中国国民党: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励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三)中国青年党:曾琦、陈启天、杨永凌、余家菊、常乃德。(四)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无派: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一月七日　新四军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

同日　曲阜解放。

同日　周恩来、张群、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成立,举行首次会议,商讨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和遣送日俘等具体办法。

同日　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在停战令下达前,抢占战略要点。

一月十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三十一日闭幕。参加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三十八人。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布: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周恩来发表讲话,谓:"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同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发出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

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中共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蒋介石也向国民党政府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

同日　国民党军抢占热河之凌源,十二日侵占冀东之丰润,十三日侵占热河之平泉、建平和绥远之陶林、林格尔;十四日侵占绥远集宁,冀东之玉田,晋北之浑源,晋南之襄陵、浮山,豫北之孟县,豫南之光山,十五日侵占晋北之左云、苏北之肖县等十八座县城。

一月十一日　蒋介石军队抢占中原解放区息县县城。

同日　黑龙江牡丹江南发生七点三级地震。

一月十二日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进协会组成,从本日到二十七日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从第四次起在沧白堂举行,屡遭国民党特务的阻止和破坏,与会者被打伤多人,是为"沧白堂事件"。

同日　美国取消对中国解放区贸易管制。

一月十三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森等一行十五人,由重庆飞北平。十四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

同日　上海市万余学生集会追悼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致书政协会议,提出立即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政府四项诺言,惩办屠杀学生的凶手。

一月十四日　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

一月十五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一号新闻公告,即派飞机赴各地散发停战命令,停战小组即可派往各冲突地点。

同日　国民党军进入沈阳。

一月十六日　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十项《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同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斥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我热河、绥远、冀东、冀南、豫北、豫南、苏北等解放区,"坚决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刻从十三日下午十二时以后所侵占的任何地方撤退。"

同日　中国煤矿工程师张莘夫由抚顺至沈阳途中之李石寨车站被预谋者杀害。

一月十九日　同盟国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特别通告,由中、美、苏、英等十一国组成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一月二十一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二号公告,命令各地立即停火,双方军队从冲突地区各撤退至少六十华里,并采取步骤恢复十三日晚十二时以前状况。

一月二十二日　廖承志获释出狱。

同日　上海沪东区六十二家工厂六千余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救济失业工人,准

许工人组织工会等六项要求。

一月二十三日　英商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电厂职工二千八百余人，因反对公司擅自开除工人及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举行罢工。

同日　上海市永安、新新等八大百货公司全体职工万余人，为要求加薪，举行怠工。

一月二十五日　重庆八院校及中学学生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并到国民党政府和政治协商会议处请愿。

同日　上海市商会、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等八个团体召开"保全航权紧急会议"，抗议英船插英旗行驶我国领水。

同日　中国妇女联谊会发表对当前政治意见书，提出停止内战，人民有基本自由权利，要求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上与男子一律平等。

一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警宪特务非法搜查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黄炎培和张申府二氏的住宅。

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布大生产运动指示。同日，山东民主政府发布和平建设指示，指出今后政府的工作中心是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发展教育等。

同日　太行行署颁布干部晋级制度。

一月二十八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被迫作出决定：取消收复区新闻检查办法；废止收复区报纸，通信社等管理办法；废除集会演说办法等反民主法令。

同日　上海沪东区二十余个棉纺厂，派代表百余人，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工厂复工，保障工人生活，并给予救济。

一月二十九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一千余吨，首批运抵解放区(青岛)。

一月三十一日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十次大会后闭幕。共通过五项决议，即：(一)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二)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三)和平建国纲领。(四)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

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同日　《新华日报》载，中国劳动协会，提出对当前政治的要求和主张。主要有，召开国民大会，彻底消除内战，解决土地问题，修改工会法，工人有罢工、游行、请愿的权利，工人有工作的权利、有成立工会的自由，所对包工、包身制度，要求保护童工、女工，改善工人待遇等二十三条。

同日　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出版。

二月二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美国代表雷克抵山东临沂，会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陈表示："有话说当面，背后无文章"。执行停战，决无问题，但须公平。

二月三日　延安两万余人举行庆祝和平、民主大会。朱德讲话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

同日　辽宁省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敌伪残余，在东北通化策动万人武装暴动。当即被东北民主联军扑灭。

二月四日　晋察冀边区政委会主任宋劭文在张家口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的群众大会上宣布：边区政府今年贷款四十万万元扶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以发展和繁荣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

二月五日　新华分社在重庆成立。

同日　重庆文化界召开座谈会，周恩来报告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及其意义。

二月六日　东北抚顺市五万群众举行大会，坚决表示要肃清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的日、伪残余势力，以建设人民的新东北。

二月九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九号公告，通知所有部队，一律遵守停战令，维持一月十三日午夜位置。

二月十日　重庆二十余人民团体一万多人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国民党当局派特务五、六百人捣毁会场，并打伤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许多人失踪或被捕，制造了"较场口"惨案。

二月十一日　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次讨论共产党军队改组问题。

同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第十号公告：迅速恢复华北、华中之交通事宜。

二月十二日　贺龙抵张垣。

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东北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中共对东北问题之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

同日　重庆人权保障委员会筹备会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靠自己力量保障人权。

同日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要求军事调处执行部制止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对东江纵队之进攻。

同日　广州市社会局非法禁售、禁印《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等刊物。

二月十四日　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会议程序及国大问题。孙科、王宠惠、王世杰、劭力子、陈布雷、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何思敬等二十四人到会。决定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五方面成立协商小组。确定分组起草(1)国民大会，(2)中央政制，(3)地方制度，(4)人民权利及义务，(5)选举制度，(6)基本国策。

同日　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举行正式会谈，讨论国共两军整编问题。

二月十五日　中共发言人宣布对东北九省四点政

策:(一)在东北九省之一切中央政府机关,自委员长行营起均应改组。(二)一切民主的组织均应予以承认,(三)现存一切地方民主政府均应予以承认,(四)开入东北九省国军之实力应予限制。

同日　上海戏剧界曹禺、夏衍、丁玲等五百余人纪念戏剧节,并发表宣言,要求减轻戏剧电影界捐税负担。

二月十六日　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

二月十七日　昆明各界一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抗议重庆当局制造"二·一〇"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祸首。

二月十八日　国民党新六军侵占法库、大虎山、新民等地。

同日　天津粮价高涨,批发价:稻米每斤二百八十元,白面每斤二百元,玉米每斤一百六十元;零售价:稻米每斤三百零九元,次小米每斤一百二十元、面粉每斤二百六十八元。

二月十九日　晋察冀财经会议提出,培养农工业技术人材,提高对技术干部待遇。

二月二十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命令,停征公盐代金。

同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整理地方财政,各区增加经建文教经费。

同日　北平国民党特务,以"河北难民返乡请愿团"的名义,纠集暴徒千余人,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定,殴打中共办事人员。

同日　杭州米价暴涨,售价每石一万六千元,至二十四日,每石二万五千至三万一千元。黑市每石五万元左右。

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米价突涨,白粳米每石二万六千元,广州中米批发价每百斤二万八千五百元,零售价每百斤超过三万元。

同日　上海电讯工人五千余人要求改善待遇,遭当局拒绝,全体怠工。

二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反动派挑动重庆沙磁区各校学生万余人举行反共、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营业部,打伤九人。在此后数日内又在上海、成都、北平、昆明、南京及其他大中城市制造了同一性质的反动游行。

二月二十三日　阎锡山军赵承绶部三千余人侵占山西沁县城。

同日　国民党交通部电讯员工二十万人,为要求国民党当局统一待遇,改善工人生活,举行全国性罢工。

二月二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财经、供给会议,朱德、林伯渠等出席并讲话,号召干部群众,安心生产,建立边区永久的革命家务。

同日　杭州发生了五万人参加的"打米店"风潮。被打米店达二百家。

二月二十五日　军事三人小组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二月二十六日　北平《解放》报(三日刊)遭北平国民党当局武装禁售。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任贝祖诒为中央银行总裁。

二月二十八日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接见北平军调部平汉执行小组美代表柯尔,谓:"我们对于三人小组委员会一切命令是忠实执行的,停战命令是一个最基本的命令,双方尤应信守勿谕。但国民党内少数主战阴谋分子,想制造冲突,继续挑动内战,致使障碍丛生。"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施和平建设,电令全边区行署以下各级政府整理战时财政。并电令从即日起解除抗战勤务令。

三月一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十七日闭幕。蒋介石致开会词,谓:"关于政治民主化者,则为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关于军队国家化者,则为全国军队统属于国家",高唱"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全会通过了军事复员,善后救济、交通问题、政治报告、经济复员、地方行政、边疆问题等多项决议。

同日　国民党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在通辽枪杀中共党员二十九人。

同日　中国法西斯分子在西安煽惑二千余学生,举行反苏、反共、反民主游行,并在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门前挑衅捣乱。

同日　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秦风报》和《工商日报》。

同日　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为履行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发布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

三月三日　湖南善后建设协进会招待记者,报告湖南灾情:岳阳、衡阳一带农民吃青菜、树叶、草根,每天饿死很多人,由长沙到衡阳二十里以内看不见人家。衡阳在抗战前有房子三千二百七十幢,现在仅有五幢,原有工厂七十多个,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八日《解放日报》载:湖南近有四百万人面临饿死的危险。仅衡阳一地,三个月来即死亡九万人。

同日　北平市社会局发出通,勒令未经核准之新闻报纸、杂志及通讯社停止发行发稿。

三月四日　政协军事三人小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及北平执行部叶剑英等飞抵延安,五日,离延安飞汉口。

同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获释,恢复自由。叶在狱中作有《囚歌》一诗。

三月五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日,中共中央接受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日　重庆李家沱中国毛纺织厂罢工，厂方招请暴徒及武装士兵强制工人复工，造成惨案，打死三人，打伤二十余人，捕去二十余人。

三月九日　李兆麟在哈尔滨遭国民党杀害。

同日　美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麦克鲁任团长，全团官兵七百五十人。

三月十日　察哈尔省各专区、县复员委员会成立，积极办理复员事项。察省首批复员者万余军人。

三月十一日　察北多伦展开清算运动。

同日　美国特使马歇尔离华返美述职。四月十八日，从美国再到中国。

三月十二日　中国解放区战犯调委会晋绥分会公布战犯名单。

三月十三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关于严惩汉奸等案，通过决议办法五项。

三月十四日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答复记者关于整军方案具体实施经过称：截至现在，本区已复员七万五千余人。

三月十五日　内蒙实业公司成立。

同日　上海太古码头工人为生活所迫全体罢工。

三月十六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四项决议：主张由国民党制定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定省宪，通过"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

三月十七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青岛飞南京途中因飞机焚毁毙命。

三月十八日　周恩来在重庆招待中外记者，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谓"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

同日　晋冀鲁豫边区一届二次参议会在邯郸召开，二十九日闭幕。邢肇棠、晁哲甫、聂真、刘伯承、邓小平、杨秀锋、薄一波等四百三十二人出席大会。会议检查了政府工作，修订了政策法令，通过了各项提案，决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等。并选举薄一波同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

三月十九日　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都发表了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社论。《解放日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决议的决议"。《新华日报》指出：二中全会各项重要决议，"从根本上从实质上从基本精神上完全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

三月二十日　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四月三日闭幕。参加会议的参政员由国民党当局直接指定。国民党员在参政员中占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中共参政员拒绝参加。到会者一百九十二人，仅占参政员总数二百九十二人的三分之二。

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国民党破坏政协会议决议，民盟不愿冒然参加政府。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政协决议，阴谋维持一党专政。

三月二十三日　重庆大渡口第三兵工厂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全体罢工，遭国民党镇压。

三月二十五日　雪枫大学正式成立。

同日　《解放日报》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从本年度财政预算中减少军政费三十五万万元，追加复员经费（包括安置荣退军人、经济建设补助、文化教育等项费用）七万万元。

三月二十六日　热河省委颁发指示，全力开展减租运动。

三月二十七日　东北停战协议成立。

同日　上海电机丝织业三百八十余家工人约万余名，要求增加工资，实行怠工。

三月二十八日　南通人民示威游行反对内战，欢迎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四位民主人士被投江，四十余人被捕。造成"南通惨案"。

同日　唐山开滦矿矿务局林西、唐家庄两矿工人近二万人，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罢工。

同日　国民党政府派张治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

四月一日　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谓："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

四月二日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开幕，二十七日闭幕。朱德、谢觉哉、徐特立等人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宗教界以及后补议员共一百三十九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边区三年建设计划》等有关政治、财经、文教等多项重要议案。选出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选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及政府委员。

四月三日　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北平滕代远公馆，《解放》报（三日刊）和新华分社亦遭非法搜查，捕《解放》报总编、副总编等三十九人。后经抗议释放。

四月六日　国民党谷正纲在沪组织沪市"劳资评断委员会"。称："各业工人，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而实行罢工、怠工"。

四月七日　在二日达成的调处广东"东江问题协议"公布。

四月八日　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十三人及美国飞行员四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遇难，飞机坠毁于山

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

四月九日　蒋介石秘密接见美国记者，表示他已决心消灭共产党，说："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万耀煌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施行《新公司法》。规定"外资在华设立之企业，可不在本国营业，总经理没有国籍限制，外国公司经许可后其权利与中国公司相同"等。

四月十日　绥东蒙民召集度领会议。

四月十一日　胶东昌潍平原反奸诉苦，摧毁千余村敌伪统治，三十四万人组织起来。

四月十三日　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中共对东北将取严正自卫立场的声明。

四月十四日　开滦两万矿工罢工，坚持增资要求。

四月十五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鲁西南菏泽地区达成治理黄河协议。

同日　蒋介石在渝举行茶会招待政协综合小组代表。蒋介石宣布原定五月五日召开之国民大会延期召开，待各项政治问题获得解决后，另定召开日期。

同日　国民党宣布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代替陈诚任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代表。

四月二十五日　陕甘宁边区邮管局成立。

同日　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领袖、律师王任，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

四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无条件停战为讨论与解决目前东北问题的先决条件。

同日　美舰七艘载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山海关已开到国民党军一个师。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

同日　延安两千余职工举行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同日　周恩来就国民党密令"围歼"我中原军区李先念部事，在渝会晤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同时电告马歇尔。

同日　美军驻华司令部正式成立。其任务明确规定：(一)协助训练中国军队；(二)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侨日俘；(三)协助中国军运；(四)处理美军剩余财产；(五)其他任务如标志坟墓及搜寻找战时失踪人员。由美军吉伦上将及迈达克中将负责。官兵共四千五百八十一人。

同日　无锡丝纺、面粉、印刷等六十余单位三万多工人罢工，反对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压迫。

五月二日　广州米价猛涨，每百斤十万元。

同日　张群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兼代主任。

五月三日　苏联军队自中国东北撤退完毕，大连除外。

同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秘书长齐燕铭、王炳南、《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及随员四十五人由重庆飞抵南京。

同日　国民党军侵占本溪。

同日　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国民党多次摧残，被迫停刊。

同日　蒋介石在南京招待美国赈灾特使前美国总统胡佛。

五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五月十日　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关于中原军事冲突问题在汉口达成协议。同时电令北平军调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转令长江以北各有关部队实施。

同日　苏皖民主政府发表公告，明令没收淮北盐区日本人和汉奸经理之产业。

五月十二日　哈尔滨市成立记者学会。

同日　国民党六十八军一部、四十一军一部纠合伪军张岚峰部及各地保安团队两万余人"清剿"豫东解放区。八路军经一个月的反"清剿"，粉碎敌人的计划。

五月十三日　美军第七舰队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计十三艘开到青岛。

五月十四日　国民党政府任吴国桢为上海市市长。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会议决定，开放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埠。

十五日　国民党中常会、国防会议分别通过，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王云五为经济部长、俞大维为交通部长、彭学沛为宣传部长。

五月二十二日　东北民主联军自动撤离长春。

同日　国民党政府将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改隶行政院，任钱昌照为主任委员。

五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自南京赴沈阳策划东北内战。二十五日，蒋函马歇尔，提出中共承认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恢复交通为东北和谈的先决条件。二十六日，蒋召集驻沈阳附近国民党军营以上军官五百四十余名训话，要他们"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以尽本身之"天职"，为其内战计划而效忠。三十日，蒋偕白崇禧、杜聿明等到达长春，召集军事会议，布置内战。

五月二十八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汤恩伯为南京卫戍司令。

五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查封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同时查禁北平七十七家通讯社、报纸和杂志社。

同日　美登陆艇八艘在青岛移交国民党政府。

五月三十日　海州近万灾民举行索粮示威。

同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裁撤军委会及所

属各部和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案。六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为国防部次长；刘斐、郭炽、范汉杰为参谋次长；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黄镇球为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薛岳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六月一日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市开始试行“警员警管区制”，与《特种户口登记办法》。

六月二日　邯郸民主政府发还敌占民田。

同日　新疆“伊宁事件”的“十一项和平条款”在乌鲁木齐签字，六日，三项附文签字，二十五日，伊宁事件协定全文公布。本月新疆政府进行改组，张治中任主席，阿哈买提任副主席，七月一日，新疆联合政府正式成立。

六月三日　汉奸陈公博被南京高等法院依法处死。

六月四日　上海棉布商全体罢市，反对中纺公司垄断掠夺。

六月七日　国民党军以十个团的兵力向苏皖解放区进攻，侵占来安县城。

同日　同生船行之“海临号”、“罗丰八号”及烟市“龙日号”客商船在烟台海面遭国民党“永翔”军舰炮击，三百余名乘客横遭劫掠。

同日　蒋介石急电国民党军政机关驻渝办事处主任朱绍良，“责成民生轮船公司”停止一切商货客运，全力启运“川粮”送往内战前线。

六月八日　山东军区部队发起攻势，至十日，先后解放了胶济线上的张店、周村、胶县，津浦线上的泰安、枣庄等地。同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德州。总共歼灭伪军一万五千余人。

六月十三日　陈毅在临沂会见中共南京代表团参谋郝鼎及美驻青岛海军代表赖尔生，抗议美军海运国民党军第四、五十三军至青岛。

同日　河南省镇平、内乡、淅川、邓县、鲁山等地大面积遭受雹灾。雹粒大者如拳，历二小时，民房庄稼俱受危害。

六月十四日　川北通江等县数千农民暴动。

同日　美国国务卿贝纳斯向美参议院提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二十六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执行会议以十五对二票通过。其中规定：以剩余军备移交国民党军队，并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国民党军队。

同日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通称为“油管租借法案信用贷款协定”）。规定把战时对华租借法案里所签订而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仍未交付的民用设备与物资让予中国。根据这一协定，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价值五千一百七十万美元的军用品。

六月十六日　汉口轮船业联合通电国民党政府，反对丧权辱国的开放内河航权政策。

六月十七日　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交中共代表周恩来一件关于提议赋予美代表马歇尔以仲裁权之备忘录。周恩来复函予以反驳。

同日　哈尔滨五万市民举行保卫和平民主大会，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反对美国军事援蒋。

六月十八日　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被周恩来拒绝。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宋子文为委员长、翁文灏为副委员长，王云五、俞大维、周治春、俞鸿钧、谷正纲、徐堪、蒋廷黻为当然委员，另专门委员五人。

六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全部美军”。

同日　国民党政府派宋子文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五万群众集会游行反对内战，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驻华美军立即撤退”“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援助”。并选派上海工、学、商等各界人民团体代表马叙伦、阎宝航、林汉达、盛丕华、张絅伯、雷洁琼、包达三、陈震中等十余人赴南京请愿。当晚，当请愿代表行至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国民党特务凶殴，马叙伦、阎宝航等多人受伤，此即“下关惨案”。

六月二十四日　热河围场、滦平等县群众联合清算伪逆。

七月一日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发表声明。谓：“共产党员全体战地司令员：在任何地点，如果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即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

同日　中共华东局发布迎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动员令。

同日　山东八路军解放大汶口。

同日　热河省昭乌达盟临时政委会成立。

同日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决定即日起开始田赋征实。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也决定本年度开始实施田赋征实、征购。

同日　国民党“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

七月三日　察省推进民族自治，划察锡两盟为自治区。

同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第一九七次会议，蒋介石、戴季陶、邹鲁、白崇禧、孙科、陈果夫等三十余人参加，决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

七月四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国民党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举行会谈，讨论苏北及整军问题。国民党方面主张中共军政完全退出苏北。中共代表则表示撤军可考虑，但党政决不撤退。中共对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单方决定召开国大日期提出谴责，并主张整军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并商谈。国民党方面代表则以仅受命解决整军问题为藉口拒绝中共意见。六日，中共代表重申由政协综合小组决定国大问题，并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精神由各党决定召开之日期。国民党代表加以反对。整军问题国民党方面坚持要按照蒋介石所提出的主张进行，中共代表坚决反对。

七月十一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同日　中共党员马明芳等一百二十九人在新疆获释后安全抵达延安。

七月十七日　周恩来在南京对目前时局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从局部向全面发展，大规模内战在四个战场（中原战场、山东战场、苏北战场和晋南三角地区）上进行。二是政治暗杀，昆明两次政治暗杀完全是有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

七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驻英特使郑天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吴南如等一行乘机飞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同日　中共中央委员、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在延安病逝。时年四十二岁。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决定今年征"借"粮额六百四十八万市石。

七月二十二日　宋庆龄发表声明，谴责蒋美反动派狼狈为奸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立即成立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停止军用物资运华。

七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九十九军侵占渔沟、朝阳集等地。苏皖新四军于二十六日进行反击，将侵占渔沟之敌九十二师歼灭，副师长沈盛楷以下官兵三千余人放下武器。

七月二十五日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病逝世。

同日　华中军区谭震林副政委率军部特务团到马坝。

同日　冀南八路军解放鲁西高唐县城。

同日　苏皖士绅倡献地运动。

七月二十六日　延安各界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并追悼闻一多、李公朴、李兆麟等烈士。

七月二十九日　驻津美国陆战队一百四十余人配合蒋军联合进攻冀东解放区之香河县安平镇附近八路军，制造"安平镇事件"。

七月三十日　美国对外清理委员会宣布已核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对华信用贷款，以作中国购买美国剩余财产之用。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贷期三十年，如需要时，此项贷款或可增至二亿美元。

同日　昆明国民党宣布禁止四十六种报刊发行。

八月一日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新闻局在庐山召开全国宣传会议，八日结束，蒋介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宣部，各行辕、各绥靖公署、各军师的高级"政工人员"等六十余人。

同日　陈果夫在沪组广播公司。

同日　上海《大公报》报道，英国决定赠送国民党政府军舰十二艘，巡洋舰一、驱逐舰一、潜艇二、鱼雷快艇八。

八月二日　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八架，轰炸延安，投弹十一枚，发射子弹万余发，历时二十分钟。

同日　苏皖南线新四军撤离海安镇。

同日　重庆工厂倒闭的已有一三七家，百余大公司行号申请歇业。

八月十一日　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

同日　王云五承认，接收厂矿多陷停顿。

八月十三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三文告）。坚持如期召开国大。

八月十四日　晋冀鲁豫解放区太岳部队，开始反击进犯霍县以东地区之阎伪六十九师。十六日，攻克洪洞城，十八日，克赵城，二十三日克霍县城，二十五日及二十八日解放灵石、汾西，至九月一日，战斗胜利结束。共解放县城五座，煤矿一座，村镇据点五十二个。

八月十六日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公布《新兵役法草案》。实行全国普遍征兵。

八月十七日　美国陆军部次长彼特森及美国对外清算委员会委员麦凯布偕随员一行二十八人飞华抵上海，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借款及让与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问题。

八月十八日　美国特使马歇尔在牯岭电周恩来，称政府刻拟扩大基础，共产党是否将提出名单，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同日，周恩来自南京复电马歇尔，重申因国民党政府尚未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关于改组政府的条件，故无意提出名单。

九月三日　周恩来在沪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所以敢于发动残酷的内战，其主要原因之一，即为曾获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如停止此项援助，并将军队自中国撤退，则和平立可实现。"

同日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承认前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变卖接收敌伪物资三十一亿元，他本人变卖接收敌

伪物资十一亿元。吴供认，此曾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九月四日　《群众》周刊社，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并被劫去杂志七百余本。五日，上海警察奉命撕毁市场上《群众》。十三日，《群众》被迫停刊。自政协会议以来，国民党政府已在西安、北平、天津、广州、昆明等地，非法查封进步报刊达二百六十五家之多。

九月五日　国民党军傅作义主力部队十余团在飞机与猛烈炮火掩护下，侵占绥东解放区卓资山。十四日侵占集宁，继续向丰镇进犯。

九月六日　"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成立"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

九月七日　国民党官僚金融四行二局在上海开办证券交易所，杜月笙任理事长。

九月十日　刘伯承访被俘国民党军整三师（原第十军）师长赵锡田，赵表示：今日被迫打内战，进攻解放区，真是不幸。

九月十二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到达郑州内战前线指挥部。次日，陈召集顾祝同、胡宗南、刘峙、刘汝明、刘茂恩等举行军事会议，重新布置对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并在此间确任顾祝同为郑州行辕主任，刘峙他调。十五日，陈偕杜聿明到达北平，当晚，召集李宗仁、孙连仲、王鸿韶、宋肯堂等举行军事会议，布置长城内外内战。十六日，陈偕杜聿明由平到沈阳。十七日，陈自沈返平。十八日，陈在平铁狮子胡同长官部召集中校以上蒋军官训话。十九日陈偕随员到达归绥，召集傅作义等军政要人会议。同日，陈到太原，与阎锡山密议。

九月二十二日　中共代表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坚持召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以迅速停止内战。

同日　美国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为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发起"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该运动在美全国三十五个主要城市中同时举行，参加者共达四十五万人，至二十八日结束。

九月二十三日　上海十三个人民团体决定从本日起，在中国举行美军撤退中国运动周，推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十人为筹备人。

九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中央社报道，国民党北平行辕负责人谈侵占解放区后的土地问题，其原则为："凡经斗争清算之土地，原业主保有产权。"其土地可由现使用人以"佃户身份"使用，税租由地主和佃户分担，但佃户对业主的地租须按"土地还原"办法实行。

九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分别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会谈，表示希望三人、五人两会议同时召开。马、司准备解决纠纷的新方案，邀周恩来返南京商谈。

九月二十八日　东北解放区邮电管理总局成立。

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蒂尔，回答了其所提出的有关中国时局的几个问题。毛泽东说："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他指出："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与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同日　中共南京代表团函告国民党内政部长张励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十月一日　周恩来在上海发表谈话，谓："在进攻张垣的炮火中，召开国大，中共绝不参加。"

同日　民盟政协代表沈钧儒，黄炎培等九人，致函蒋介石，反对召开一党国大。

十月十日　蒋介石通令全国恢复征兵制度。同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新兵役法。

同日　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会议，决议：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任期届满，兹因国民大会召开在即，经决议蒋介石任期延至宪法施实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职之日止。

十月十六日　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八项办法。

同日　国民党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二〇七次会议，通过：(1)绥靖区施政纲领，(2)核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3)任谷正伦为粮食局长，(4)任徐堪为国民政府主计长，(5)任郭寄峤为甘肃省主席。

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郑重声明，指出：蒋介石本月十六日宣布的八项条件，乃系"蒋介石为了再一次朦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乃故意装出和平姿态"。

十月二十五日　美蒋"行总空运大队"宣告正式成立。该队由联总供应运输机十二架，经费二百万美元，航线包括沪、穗、浔、汉、桂、衡、柳七处。

十月二十八日　《解放日报》报道：各解放区农业大丰收，陕甘宁边区除个别区受灾欠收外一般超过去年，有的地区超过一倍；晋冀鲁豫边区丰收为十年来所未有，仅太岳一区秋粮即增产二百万石，太行、太岳等地副业山货也同获丰收；晋察冀解放区收夏麦八百余万石，冀中平原秋收皆为十足年成，并修筑水渠五五七条，使百余万亩旱地变为水田，开长八十余里新河二十道，增加水田四百万亩；苏皖解放区挖河九十七条，使二百万亩良田受益，另外山东、东北等各解放区也都喜获丰收。

十一月一日　国民党统治区邮电、火车运费即日起加价，邮费增加五倍，电报费增加十倍。京沪、沪杭两铁路客运费增加百分之五十，货运增加百分之八十。

同日　国民党"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陈果夫任理事长，谷正纲、霍宝树等任常务理事。

十一月三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国大代表名单共二百一十九名。

十一月四日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共三十条，其主要内容是将全中国领土向美国商人开放。

十一月十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民盟代表张君劢、罗隆基，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无党派代表莫德惠等在南京举行非正式综合商谈。

同日　重庆和平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渝分会、民主建国会渝分会等二十一个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蒋记"国大"。

十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到会各方干部千余人。彭德怀在会上讲话，号召全边区三十万壮年男子、和三十万壮年妇女都紧急动员起来，人人学会战斗，实现全民皆兵来保卫边区。

同日　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陈诚、马歇尔举行非正式会议，就停战问题进行商谈。中共坚持停战令须由双方联合颁布和关内国民党军应恢复一月十三日以前的军事位置等二点。

同日　蒋介石宣布：延期三日召开国民大会。

十一月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战时工作特成立边区总动员委员会。同日，边区政府发布第七十二号命令，令各县改组领导机构，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一月十五日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十二月二十五日闭幕。出席代表共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后增至一千六百人)，其中国民党代表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余是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

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驻京代表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对蒋记"国大"的召开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同日　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在香港发表声明，对蒋介石集团强迫劳协排斥解放区工会、强迫劳协公开反共、强迫个人参加"国大"等无理要求提出严正抗议。

十一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立法院法制、外交、经济、财政、军事五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五十余人，最后以三十四票之多数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民主社会党提交国民党政府参加"国大"名单四十名。同日，经国民党政府明令照准。

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盟总部在南京招待记者，称："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民盟拒绝参加。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国际职工联合会执委朱学范在香港遭蒋特刺伤。

同日　民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南京招待记者，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民盟始终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民盟拥护政协。第二，民盟反对内战。"国民党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提交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拉加第亚备忘录一件，抗议联总援助蒋政府发动内战。内称："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开始至今抵达中国之全部一二八二〇八九吨救济物资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运至国民党地区，只有不及百分之二运至中国解放区。"要求联总"公平分配"，"直接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合作。"

十一月三十日　上海摊贩数千人赴市参议会请愿，抗议禁止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营业，遭国民党军警镇压，群众七人死亡，多人受伤。

同日　北平米价涨至每斤七百六十元，上海米价涨至每斤六百元。

十二月一日　上海全市摊贩五千余人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暴行，黄浦警察分局、国民党军、宪兵、警察全部出动，进行镇压，摊贩十余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二百二十一人被捕。

十二月二日　国际和平医院公谊服务会医疗队一行六人由该会驻华主任李为林陪同自郑州飞延安，携带药品、器材、书籍等三吨半，十日正式参加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该队队长为英籍内科医生叶彼得大夫，队员有纽西兰籍外科医生葛扎复大夫、加拿大籍化验技师戴杰恪先生、英籍 X 光技师许岩礼先生、英籍护士许岩小姐等。

同日　天津摊贩全体罢市，抗议国民党当局驱逐摊贩的命令。

同日　国民党中央银行在美国定制票面二千元新钞，千余箱已由美国纽约运到上海。

十二月三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以"自由勋章"授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副司令郑洞国、参谋长赵家骧、军长孙立人、赵公武、石觉等。

同日　中国轮船业济运联营处在沪成立，杜月笙、钱新之等二十七人为理事，该处由国营招商局、三北公司、中兴公司、民生公司、大通公司、益祥公司等七十七家公、私轮船公司合组，其业务以空船租赁方式，营运行总水运大队船舶。

十二月四日　周恩来自延安致函马歇尔。称："为符合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本党主张，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两党仍可重开谈判。"

十二月十六日　全国各报驻南京记者百余人，为反对国民党当局新闻邮电加价及限制电话使用，向国民党

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请愿。后又齐赴“国大”会场，为“国大”代表殴打《和平日报》记者向主席团请愿。

十二月十七日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属天津一、二、三机器厂、造纸厂、电工器材厂、化学工厂、汽车工厂、炼钢厂等八大厂工人联合罢工，抗议国民党当局减发工资，罢工斗争坚持一周之久。

十二月十八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坚持其扶蒋，制造中国内战的政策。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非法“国大”，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蒋记伪宪。

同日　《解放日报》报道，蒙奸李守信被蒋介石任命为热河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并由阜新赴开鲁“主持绥靖，宣抚盟旗”。

同日　美钞续涨。上海美钞(元)涨达七千三，较“国大”召开前又高出百分之七十，较八月十五日“调整”外汇时的三千三百五高出一倍，南京美钞涨达六千八；天津美钞涨达六千四百六。同日，各地黄金亦高涨，南京每两三十九万九千元，上海每两三十六万九千元，天津每两三十九万三千元，汉口每两三十八万二千元。

十二月二十三日　民主同盟在沪举行中常会十一次会议，决议开除破坏政协、违反盟约、参加蒋记“国大”的民主社会党出盟。与此同时，电请坚持民主、力拒参加“国大”的张东荪来沪参加民盟领导会议，张氏二十七日抵沪。

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事件，引起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运动。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万以上学生，相继举行抗议罢课和游行示威。

同日　上海《大公报》报导，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十二月二十六日　《解放日报》刊登内蒙古自治联合会主席云泽的声明。抗议蒋介石擅自召开非法“国大”，指出，内蒙二百万人民未选派代表参加，此类伪“国大”不能代表内蒙人民的意志与解决内蒙人民问题。

同日　开滦煤矿公司数千工人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工人中征兵实行罢工。

十二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政府破坏黄河复堤工程协议。

十二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谈话，严厉抨击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指出：“杜鲁门总统这个声明，是企图蒙蔽国内外舆论，继续执行其反动的对华政策，继续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不管杜鲁门怎样辩解，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和参与者了”。周说：“我们对蒋介石政府的伪宪法，也只有和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和曹锟的贿选宪法同等看待，人民是决不会承认他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由蒋介石签署的布宪命令：(1)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定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2)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准备程序。

同日　民主同盟对国民党政府公布伪宪法发表声明：(1)伪“国大”是违背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而召集的一种制宪会议。(2)此次宪法所依据的宪草乃国民党片面提出的草案，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均非政协宪草。(3)此次“国大”除制定所谓的宪法外，又曾通过所谓的行宪办法十条，此种规定显系假制宪行宪之名，为长期内战永久分裂作准备。

军　事

一月七日　国民党军以承德为目标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二月十五日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军事复员会议，十九日结束。

二月十六日　国民党六十四军进攻琼崖解放区。广东华南纵队予以反击，歼灭国民党军两千人。

三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军侵占辽阳、抚顺。

四月二日　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一部侵占海城，新六军二十二师侵占鞍山。

四月八日　东北民主联军歼灭自昌图北犯四平街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官兵一千三百余人，俘敌四百余名。

四月十八日　东北民主联军自伪军姜鹏飞手中解放长春。

五月四日　中原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以三十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

五月十六日　国民党破坏汉口协议，分六路向中原解放区平汉路两侧进攻。

五月十七日　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北平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北平市长熊斌，行营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同日，白崇禧自北平赴沈阳布置东北内战，二十日偕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赴四平前线督战，进攻公主岭东北民主联军。

五月三十日　蒋介石由长春飞平。当晚在平召见李宗仁、孙连仲、陈继承、北平副市长张伯谨，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平津市党部主委吴铸人、邵华等。

六月一日，又分别召见了北平市长熊斌、北平警备副司令胡伯翰，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等人，对北平党、政、治安以及对付学生运动等作了布置。

五月三十一日　东北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海城起义。

六月二十一日　蒋介石被迫宣布东北停战令延期八天。

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罗炳辉病逝，享年四十九岁。

六月二十五日　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协定，就六月六日以前之事实状态，双方军队停止移动，再根据东北停战协定订具体办法。

六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军刘峙、程潜以三十万军队自信阳、罗山、光山、商城、黄安等地分四路进攻中原解放区之中心地区宣化店。中原部队分路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北路的一支；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为北路另一支；王树声率第一纵队二、三两旅以及第二纵队十五旅为南路。至七月底，八路军主力分别到达豫西、陕南、鄂西、淮南等预定地区。

七月十二日　国民党集结十二个军约十五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围攻苏皖解放区。

七月十七日　蒋介石电令国民党军队，务于荆紫关以南地区将李先念部包围歼灭。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中，蒋军形成五个包围圈，但均被中原军区八路军一一突破。

八月七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牯岭发表谈话，声称："苏北问题只有三种办法：(一)中共完全退出苏北；(二)国府迁都(国民党认为苏皖解放区威胁南京)。(三)再不然就是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八月十日　晋冀鲁豫八路军为配合中原、华东八路军作战，分两路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线出击，至十三日攻克砀山、兰封及黄口、李庄、杨集等车站十余处，控制铁路三百余里。并争取虞城地区蒋嘉宾部起义。八路军一部并乘胜南下，十四日攻克杞县，十六日又克通许，至二十二日战役结束。

八月二十七日　苏皖新四军反击侵犯加力市的国民党军六十五师一八七旅、七十九旅、四十九旅(各一部)，该军全部被歼。同时歼灭侵犯海(安)泰(州)线上白米镇一带国民党军一部。

同日　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分路进犯冀东解放区。至九月三日进犯冀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已达十万余人。

九月八日　荷泽、定陶战役结束，晋冀鲁豫解放军俘敌一万二千二百余人。

九月十四日　蒋介石到河南新乡，部署向冀鲁豫解放区鲁西南地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并令陈诚、顾祝同、范汉杰赴前线指挥。

九月十五日　周恩来向美特使马歇尔提交备忘录一件，指斥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政府实行内战。

同日　国民党军李延年指挥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八师、第七师等四个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猛攻淮阴城，激战五日，被新四军歼灭五千余人，飞机被击落两架，十九日新四军主动撤出淮阴，二十一日，撤离淮安。

九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十月十一日　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侵入强垣。

同日　国民党政府发出命令：国民大会改定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

同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由南京到北平。接连数日与傅作义、郑介民等军政官员商谈内战事宜。十七日，陈在北平狂叫，要在"三、五月内"击败共军。十九日，陈召集熊式辉、杜聿明、顾祝同、李宗仁、王耀武等人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和布置华北的大规模内战。

十月十三日　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率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及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官兵共五千余人在横山一带举行起义。

十一月十一日　鲁南枣庄、台儿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五十九师、七十七师等部猛犯台儿庄以北、峄县以南、津浦支线的竹罗、圈沟等地。新四军奋起反击，一天之内歼灭进犯军三千余人。

十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九十四军、五十三军共十个团再度猛犯易县，至十七日，晋察冀部队在涞(水)易(县)间的狭长地带歼灭国民党军二千五百余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　苏北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六十七师、八十三师等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北犯盐城地区。新四军在粟裕的指挥下，二十七日进行反击，经十五天激战，击溃敌军，此为盐城保卫战。

十二月十九日　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从十四日起，经过五昼夜在宿迁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戴之奇师。

十二月三十日　蒋介石发布待天字第七十号密令，指示其部下："至三十六年度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是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长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

同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以四个旅兵力自关中西北、西南、东北三方面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马栏市。

外　交

一月五日　国民政府通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二月九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照会中、苏两国，反对由中、苏两国协议管制东北之工业为战利品，并重申对

华门户开放政策。

二月十六日　《中加借款条约》在南京签字。加拿大货款中国六千万加拿大元。

二月二十八日　《中法关于越南的协定》,《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有关特权条约》,在南京签字。

三月十四日　国民政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棉花贷款合约》,即中美棉麦协定。

三月二十二日　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递交国民政府关于三月六日照会复文。称苏军已在陆续撤退中,并声明至迟在四月底撤完。

五月三日　蒋介石在南京招待美国赈灾特使美国前总统胡佛。

五月二十日　国民政府与丹麦签订新约,废除丹麦在华治外法权。

五月二十三日　英国派史蒂文森继任驻华大使。

六月三日　国民政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向美国购买修理铁道器材的贷款合约。

六月十四日　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定《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

六月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大使。

七月十一日　美国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七月十六日　国民政府与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向美购买发电机贷款八百八十万美金合约。

七月十七日　国民政府任命郑天锡为驻英国特使。免顾维钧驻英特使职。

七月十八日　美国特使马歇尔、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由南京飞到庐山会见蒋介石。

八月十七日　美陆军部次长彼特森及美国对外清算委员会委员麦凯布偕随员一行二十八人飞华抵上海,与国民政府商谈借款及让与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问题。

九月二日　国民政府与菲律宾政府签订上海马尼拉间的飞机降落协定。

九月十六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告英国香港总督杨慕琦,国民政府将派官员进入九龙城。十七日,广东宝安县府恢复在九龙城设治。

九月十八日　英文《新闻通讯》报道,蒋介石为换取美八亿余元剩余资,与美国签署密约,规定:美军舰在三十年内可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依此协定,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出入使用。

九月二十日　联总远东委员会在沪举行会议,中、苏、美、英等九国代表参加。美代表吉尔伯特力克在会中提出:"联总中国分署应与中国政府订约,由海船载联总物资至长江四口岸",英国代表附议。苏联和中国代表表示反对,指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主张,但此提案仍以六比二的多数赞成票而通过。

十月八日　北平国民党当局与侵华美军当局签订"中美警宪联合勤务协定书",协定共分七条,其中规定组织"中美警宪联络室",平警察局与美海军陆战队宪兵队各派专人常驻负责联络,并设巡查组、调查组、检查组,任何一方发现事故均通知联络室办理。同日"联络室"即宣告正式成立。十六日中美合组的"巡查队"即在平市开始行动。其性质,北平警局负责人称:以后美军肇事依"议定书"规定,"须由美警宪处理,本局仅有旁听权而已。"本月初蒋美还成立一所谓"中美商务仲裁会",在此之前还有"美军事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的订立,都规定美人犯罪交美当局"裁判",这实际是变相的"领事裁判权"。

十一月四日　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共三十条,其主要内容是将全中国领土向美国商人开放。

十二月十八日　美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坚持扶蒋,制造中国内战。

十二月二十日　《中美空中运输协定》在南京由王世杰、司徒雷登正式签字生效。有效期四年。

经　济

一月五日　晋冀鲁豫边区贸易总公司在邯郸成立。原太行运输公司,扩充为边区运输总公司,直属贸易总公司。

一月八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发放贷款十五亿元,以发展农业为主,发展全区工商业。

二月二十五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将官价外汇汇率予以废止。确定外汇美金降价为二千零二十元。

三月七日　中小工联在重庆正式成立,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由中小民族资本家和手工业主组成的工业团体。

三月八日　国民党行政院为恢复交通整理重要港口,成立中美"工程计划团",委任铁路专家侯家源为团长,桥梁专家茅以升为副团长,聘请美国人杜德为总工程师。

三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参政会第九次会议上说,本年度财政预算全部支出 22549 万元,其中军费 10250 万元,占全部支出 44%。

三月三十一日　华中银行在高宝等地设外汇交易所。

四月九日　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新公司法》。

五月十七日　解放区第一家民营银行——晋冀鲁豫边区瑞华银行在邯郸成立,股金四万一千万元。胡竹轩为

董事长。

五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与台湾公署合办的托拉斯——台湾糖业公司成立。

六月八日　财政部长俞鸿钧在立法院报告中称：本年一至五月，支出一万五千亿元，收入仅二千五百亿元。其它完全靠发行纸币。

六月十九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宣布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使购户损失一千七百亿元。

七月十五日　国民党政府命令：(1)本年度田赋仍须继续征实征借。(2)各省田赋，前于上年九月三日，明令分别先后豁免一年的办法酌予变更，所有应于三十五年度免赋之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福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九省，及重庆市一律改分两年平均豁免，本年度先予免征半数，其余半数俟明年度再行豁免。

八月二日　重庆工厂倒闭一百三十七家，百余大公司行号申请歇业。

九月二十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证券交易税条例”，规定：(一)各种有价证券在万元以下者，现货交易按万分之五征收，交易期在七日以内按万分之十五征收，过七日按万分之二十征收。(二)政府发行的公债凡履行交易七日以内按万分之五征收(除现货交易税外)，过七日者，按万分之十征收。同时宣布废止交易所交易税条例。

十月四日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电令各省市开始按新税率征收营业税。规定税率按营业总收入额计算者仍按百分之一五课征，按资本额计算者按百分之四课征。

十月十七日　重庆《新华日报》载，国民党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内战开支，向英、美大批订印钞票。由英载来未发行钞票五千二百箱，票面为千元一张，已运到上海。

十一月十七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进出口贸易修正办法》。规定入口外汇由中央银行经营办理并签发许可证，在国民党政府经委会下设立“输入管理委员会”。同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宣布《进出口贸易修正办法》“即日实行”。输入管理委员会由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为主任委员，十八日在中央银行正式办公。

十二月九日　《解放日报》报道，蒋记“国大”开会期间京沪黄金美钞猛涨，南京：黄金由“国大”开会前的二十四万二涨到三十一万，美钞由四千二百涨到五千一百。上海：黄金由二十四万六千二涨至三十万零六百，美钞由四千三百涨至五千，港币也由九百五十涨至一千。

十二月十三日　美钞黄金再涨。各地美元与法币比值为：上海六千五，南京五千七，重庆五千五百八，北平五千八，青岛五千五，广州七千六百元。各地黄金每两市价已超过三十四万元。

文　教

1月10日　晋冀鲁豫新华大学改名北方大学，范文澜任校长。

1月11日　叶浅予、张光宇、华君武等二十余人，联名发出《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复会宣言》，提出自一月十日起恢复《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之组织，会址暂设重庆。

2月2日　晋绥出版《人民时代》、《人民画报》。

2月8日　重庆举行“延安生活艺术”展览。

3月6日　中国医科大学在张家口成立。

4月9日　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伦苓为校长。

4月24日　晋冀鲁豫文联成立。

5月1日　华中少年出版社在淮阴成立。

5月4日　傅斯年抵北平代理北大校长。

6月3日　《群众》周刊由渝迁沪出版。

6月26日　《李有才板话》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

7月1日　《绥蒙日报》在集宁创刊。

7月20日　热河综合杂志《热潮》创刊。

7月25日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病逝世。

9月1日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

9月　沈阳故宫博物院创立。

10月1日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

本年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7年

导 言

1947年2月，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南北夹击进犯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领导下，发动莱芜战役。主动放弃临沂，将北线南下之敌全部围歼于莱芜地区，歼敌六万余人，活捉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国民党全面进攻的计划宣告失败，被迫转向重点进攻。

国民党在接收台湾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2月28日，为抗议国民党武装缉私人员的暴行，台北人民举行了示威，遭到镇压后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赴台湾进行血腥镇压，杀害三万多人，残暴地镇压了起义。

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军又发动了重点进攻，目标是山东和延安。3月，西北野战军迎击胡宗南军队，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来犯之敌。西北野战军在完成掩护中央转移的狙击战后，19日主动撤离延安。随后，在陕北一带诱敌深入，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歼敌，获得三战三捷。

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称"最近三个月来的演变，证明了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表示要迅速解决中共，以"消除统一障碍"。全会一再声称要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局面，还政于民，但又决心将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4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正式宣布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表面上吸收了"社会贤达"和各个小党的成员参加政府，实际上国家的最高权力仍然控制在国民党中央，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依然未变。

5月，上海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逐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统区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使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华东解放军于5月在鲁中发动孟良崮战役，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使国民党进攻山东计划严重受挫。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内线向外线作战。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行中央突破，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安下了楔子。

7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基本原则为：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国民党挑起内战后，加紧对国统区人民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7月18日公布《动员勘乱时期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据此，国民党政府可以随意搜刮、掠压民众及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剥夺人民民主权利。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口号。

11月6日，晋察冀解放军解放石家庄，首开攻占大城市先例，并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起一片。

中共中央于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12月会议，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中的"左"倾现象，并研究了纠正措施，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千里挺进大别山
- ●莱芜战役
- ●孟良崮战役
- ●全国土地会议
-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 ●延安保卫战与陕北三战三捷
- ●清风店战役
- ●石家庄战役
-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 ●十二月会议
- ●台湾"二·二八"起义
-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 ●国民政府改组
-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公布

千里挺进大别山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将主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役后挥师东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刘邓野战军兵分三路，先敌越过陇海路，以连续急行军向大别山挺进。蒋介石错误判断人民解放军是北渡不成而被迫"南窜"，遂以二十个旅分路尾追，另以四个旅在平汉路侧击，企图歼灭解放军于黄泛区。刘邓野战军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顽强奋进，于八月十七日越过宽达三十多里的黄泛区。接着，又渡过涡河、沙河、洪河，甩掉国民党军的尾追计划。敌人恍然大悟，急令一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沿平汉路南下，到汝河布防，企图阻拦刘邓野战军。刘邓野战军炸毁埋藏了重装备继续前进，二十三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在敌人狂轰扫射下，于汝河上架起浮桥。当夜，主力开始渡河，并突破敌人河防阵地，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胜利地闯过了险关。八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立即组织部队实施战略展开。此时，国民党军二十多个旅已先后渡过淮河，摆出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刘邓野战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集中一部兵力，于九月间连续出击商城、光山地区守军，将国民党军机动兵力大部吸引到大别山北麓，保障了进入豫东南、皖西、鄂皖、鄂东地区部队的迅速展开和建党、建政工作的进行。至九月三十日，先后解放县城二十三座，并在十七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依托山区安置了后方，胜利完成了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八月强渡黄河，往返于潼关与洛阳间连续作战，随后向陕南、豫西展开，攻克县城十九座；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八月挺进鲁西南，与敌周旋，九月进军豫皖苏，随后又破击陇海路商丘至郝砦段，先后攻克县城二十四座。至此，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在中原形成"品"字阵势，逼近长江，直接对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造成很大威胁，迫使国民党从战略上转入防御。

材料：

- ·刘邓大军穿越黄泛区
- ·大别山的故事
- ·全军战士缝棉衣
- ·刘伯承、邓小平将军飞渡黄河

材料一　刘邓大军穿越黄泛区

蒋介石从空军司令部获悉，黄河上游的洪峰已经下来了，脑子里飞快地转了几个圈，又打起黄河的主意。他的第一步计划是先派飞机去炸黄河大堤，吓唬刘邓将大军撤往黄河以北。如果不行，再采取第二步行动，引黄河水进入陇海路北的废黄河，将刘邓大军淹死在鲁西南地区。

正如蒋介石亲自给刘汝明下命令所讲的那样：无毒不丈夫，他这一手可真够毒的。连一向镇定若垣的刘伯承也沉不住气了，亲自驱车到黄河边观察水势，并指挥部队日夜加堵黄河大堤。

邓小平坐在指挥部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还是咚咚直跳。

大雨下个不停，刘伯承终于感到光靠加堵黄河大提不是个办法，又连夜冒雨赶了回来，邓小平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情况，知道白天被蒋军飞机炸开的一个缺口堵了起

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道：

"龟儿子蒋介石来这一手儿，真是人天共愤，我们一定要通过新华社来揭露他的反动嘴脸！"

"那你就赶快写个稿子罢，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东西。如果全国的民众都起来反对，他就要考虑考虑后果了。相信他也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李达道："我觉得稿子要写，部队也要准备行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

邓小平："要想安全，只有过黄河，蒋介石要的就是我们如此，那办不到，开弓没有回头箭。"

刘伯承想了想道："我们可以以十一纵和地方武装在黄河各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准备北渡的假象，使蒋介石上一个大当。"

邓小平道："如有必要，让他们真的过黄河也不要紧，反正我们没有计划要他们南下。"

刘伯承："我看就这样。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及随军地方干部，立即结束休整，作好南下的准备，邓政委的意见呢？"

邓小平猛地丢下烟蒂："与其在这里担惊受怕，不如说走就走。犹豫不决乃是兵家之大忌！"

8月7日夜，刘邓先斩后奏，未等中央的回电就率领大军出发了。第一纵队并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二、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三路大军，向着大别山衔枚疾进。

8月9日，毛泽东复电刘邓：

"决心完全正确。"

当晚，毛泽东接到二局报告：敌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五、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五十七、第七、第四十八等八个整编师兵力分别由菏泽、衮口、嘉祥、洛宁等地向刘邓大军合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躺上床怎么也睡不着。次日，他致电刘邓：

"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11日，刘邓大军从民权至商邱间和虞城地区越过了陇海路。蒋介石闻报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顾祝同：

"你们不是报告说刘匪已经北渡黄河了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顾祝同答："共军北渡黄河确有其事，而且为数不少。依卑职判断：南下陇海路的匪部，可能是因北渡不成而南窜。"

蒋介石搁下电话，心里想：空军报告说，炸沉了刘伯承的一百多条船，看来刘伯承的十几万大军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确实不大可能，加之连续作战逾月，短期内也难以再战，只好往南逃窜了。随即，他便命令：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至沙河布防；以罗广文集团、张淦集团共十二个旅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集团八个旅为第二梯队跟踪追击刘邓；另以四个旅位于平汉路许昌、漯河等地，以两个整编师及一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相机侧击。

"一定要把刘伯承匪部围歼于黄泛区内！"

8月15日，刘邓大军到了黄泛区的边缘。豫皖苏军区派来的向导说，黄泛区宽达二十公里，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各部队便停住了脚步。刘伯承赶到前面，举起望远镜一看，果然灰茫茫的一望无际。

怎么办？

走！

在16日召开的各纵队首长的会议上，邓小平最后说：

"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们要学会算大帐。"

8月17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扔掉了吉普车，各纵队的首长把自己的战马交给了炮兵，大家手挽着手，踏进了没膝深的污泥……

刘伯承的鞋子掉了，脚割出了血；

邓小平陷进污泥，弄得卫士们手忙脚乱，反而呛了几口污水。

炮兵们忍痛丢掉了自己的心肝宝贝——美制榴弹炮。

这一夜，刘邓大军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

18日，大军直趋沙河。蚌埠的第四十六师还没有赶到，地方团队望风而逃。

蒋介石接到空军的报告，差点晕了过去。宋美龄赶忙把他扶住，不识时务地问道：

"你不是说，刘伯承已经不堪一击了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蒋介石的嘴唇抖了抖，好半天才蹦出一句：

"我被刘瞎子骗啦。"

说完，他甩手出了官邸。

蒋介石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

在沙河南岸休息了一天，掩埋和炸毁了所有的重炮和车辆，刘邓大军又向南疾进了。

8月23日，第六纵队进抵淮河，第二、第三纵队也渡过了汝河，分路继续前进。当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敌整第八十五师在蒋介石"杀头"令的督促下，已先一步赶到汝河南岸，占领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了刘邓的去路。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

大白天，六纵十八旅的勇士们利用仅能找到的几口

木船，冒着天空敌机的轰炸和对岸强敌的密集扫射，在湍急的汝河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浮桥。

敌人从东西南三面，疯狂地向十八旅所控制的唯一桥头堡大雷庄反扑。旅长肖永银提着手枪在电话里对纵队首长说：

“十八旅就算全打光了，也一定要把这个命根子守住！”

说完，电话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入夜，敌人为了防止我大部队夜间渡河，在从油房店到汝南埠连绵几十里的河岸边放起了大火，前线指挥所的首长们闹不清敌人到底来了多少，一张张脸变得铁青，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刘邓和李达赶到了。

邓小平好象根本没有听见身旁敌人的炮弹的爆声，从容不迫地叫李达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说：

“敌人是想拖住我野战军的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边的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站在一旁沉思的刘伯承提高了嗓子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到了大别山就是胜利。”

最后，刘邓又对接防大雷庄桥头堡的十六旅旅长尤太忠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并强调说：

“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晚上，等大军全部过河后才能南撤。”

尤太忠为了让刘邓尽快离开危险之地，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回答一个“是”字。

刘伯承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又道：

“你不要什么都说是，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尤太忠想了想道：“把十八旅的后卫营留给我作预备队。”

“好吧！”刘伯承伸出大手与尤太忠握别，走出十几步，又转身回来叮嘱：

“集合地点记住了吗？彭店！彭店！淮河边上结集！”

尤太忠的鼻子一酸，使劲地点了点头，把手举在帽檐，望着刘邓一高一矮的身影向南走去。

彭店！彭店！

每一个指战员甚至随队的民工，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个地名。

千军万马冒着敌人炮火，滚滚南流。

“主席，主席，刘邓到达大别山，陈赓过了陇海路！”

周恩来满面喜色，大步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手里拿着电报。尽管是忧心若焚地等待望眼欲穿的事，毛泽东还是微微怔了一下：

“哦，好快呀！”脸上露出了亢奋之色。

飞快地看完电报，毛泽东走到墙上的地图前审视了一会儿，慢慢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猛地吐出：

“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刘邓大军真勇敢，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六七万，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我们又挺进大别山。艰苦行军二十多天，血战汝河胜利渡淮踏上大别山。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努力学会山地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能打胜仗。同志们大家来比赛呀！看谁是战斗英雄工作模范。毛主席领导如明灯，刘邓首长亲自指挥就是指南，同志们挺胸勇敢往前干，解放全国胜利曙光在眼前。

这是一首战士们自编歌曲，洋溢着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的胜利喜悦，经过野战军宣传部整理后，很快在大别山流行开来。

（节选自《千里大跃进》，载《威震神州——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材料二　大别山的故事
——夜宿屋檐下

半个月来，为了实现毛主席战略跃进的伟大计划，我们刘、邓大军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之下，且战且走，日夜不停地向着大别山前进。连续的行军、战斗，把部队拖得疲惫已极，许多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这天深夜，我们终于到达大别山北麓的一个村庄。一听说准备宿营，同志们十分高兴。张中拍着肩上的干粮袋说：“这里边装的还是冀鲁豫老家的白面呢，待会儿，做一锅又香又辣的疙瘩汤，让你们喝个痛快！”

全班人来到村东头一家门前。大门虚掩着，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院子很小，只有一排三间东房，西墙下用稻草搭了一座小棚。院当中堆着一些豆秸和苞米棒子；屋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

班长轻轻地敲着屋门，喊道：“老乡！老乡！开门哪！”

屋里没有人答话。又叫了一阵，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该不是没有人吧？不，明明门是从里边关住的。同志们等得发急，就在当院坐下来休息。

副班长又走上去，对着门缝大声喊道：“老乡！老乡！开门哪。我们是解放军，借你的屋子住住，明天就走啦。”

过了好几分钟，屋里才响起一阵咳嗽声，接着，传出一位老大娘嘶哑的声音：“老总，我家就我这个老婆子，要啥没啥，到别处去住吧！”

班长赶忙搭腔说：“大娘，我们是解放军，什么也不

要，借住一宿，明天就走了。”

解释并没有发生作用。任凭说什么，老大娘就是不答理。

刚解放过来不久的老杨气急地说：“干脆一脚踢开算了，这老乡真顽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又忘了？”副班长马上严肃地问他。

同志们一言不发，眼巴巴地望着两位班长，等着他们拿主意。

停了一刻，班长说：“算了吧，这儿是新区，老乡不了解我们。老大娘不愿意开门，我看草棚里能睡三个人，孙明忠、老杨、张中你们三个到那里去住，其余同志就睡在屋檐下吧！”

“好！”同志们都非常赞成班长的决定，立刻动手安排自己的睡处。

我们三人进了小草棚，老杨气呼呼地冲着张中说：“张中，不吹了吧，你的疙瘩汤呢？”

我小声地劝他：“睡吧，没时间了，还吃什么疙瘩汤。”

我们打开背包，铺在草上，和衣钻进被子里，很快便迷迷糊糊地入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一会，忽然听得班长在喊：“要下雨了，快起来帮老乡把豆秸、苞米收拾一下。”我们急忙爬起身，把被子一卷就动手了。

雷声隆隆，大风呼啸。闪电不时划破黑暗的天空，把院子照得雪亮。人多手快，不一会儿就把豆秸和苞米拾掇到草棚里去了。刚收拾完毕，瓢泼似的大雨就下了起来。草棚太小，豆秸和苞米还有不少露在外面，塞不进去。班长便叫我把班里那块盖电线的油布搭在上面。把一切安排好，全班同志都抱着背包，顺墙根站在房檐下。

雨，一阵比一阵大；风，一阵比一阵急。不大一会儿，全班个个都象水人一样。虽然是八月天气，却冷得同志们直打哆嗦。

时间好象过了很久，我实在太疲乏了，站在那里昏昏沉沉地将要入睡。张中忽然在我腰里捅了一下，低声说：“你听！”

我猛然惊醒过来，只听见屋里有很轻的脚步声。声音慢慢靠近，在门后停下了。同志们屏息注视着黑暗中的屋门，看那里将要出现什么。但是停了一阵，脚步声窸窣地又远了。

风雨交加，门环被风吹得叮当作响。雨点打在门上，也发出砰砰的响声。忽然，哗啦一声，屋门打开了。

借着雷电的闪光，只见一位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大娘当门站立。她大声叫着：“好人们哪，……快……快进家来吧！”她的声音压倒隆隆的雷鸣和呼啸的风声。

同志们一时反倒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阵，方才进到屋里。从我们身上滴下的雨水，很快便打湿了屋里的地面。老大娘望望这个，看看那个，感慨万千地说：“昨天那些没天良的中央军还从这里过，一进门楼上楼下全翻遍了。一只大花狗也让他们一刺刀戳死了。见了我的水缸，他们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还要这个干吗？’噔的一声就给砸了个稀烂……可你们都是多好的人哪！我在窗口什么都看见了啊！……”说着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班长安慰她老人家说：“老大娘，别听蒋匪军那些谣言，解放军就是咱人民的队伍，也是你老人家的队伍啊。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咱们才会有好日子过。……”

老大娘用惊奇、迷惘、困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班长。班长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入了她的心底。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但是很快，从她那昏花的老眼里，又涌出一滴滴的泪水。

忽然，她用手背拭去脸上的泪痕，朝屋角的草囤喊道：“小牛，你也快出来吧，都是些好人哪！”

随着她的喊声，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从草囤里冒了出来，全身上下沾满了谷糠。同志们都憋不住笑了。

小伙子开口便说：“娘，你怎么只顾说，人家衣服全湿透了，还不拌点面汤给大哥们喝喝，暖暖心。”

班长连忙阻挡说：“大娘，不用你费心，我们带的有干粮。”张中也急忙拍着他那早已淋湿的干粮袋说：“你看，大娘，这不是吗？”老大娘却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从灶后的草堆里，提出一个小罐，从中舀出几碗白面，做起疙瘩汤来。

不一会，锅子里的水开了，又香又辣的疙瘩汤很快做好了。老大娘顺手端一碗给坐在灶前的老杨同志。老杨又是激动，又是惭愧地说：“大……大……大娘……”同志们看着他那种神气，想起了昨晚副班长问他的那句话，不由地笑了起来。

外边的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子里暖融融的。虽然我们一夜未曾好好休息，但疲劳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孙明忠《星火燎原》之九）

材料三　全军战士缝棉衣

大别山区霪雨连绵，太阳难得露脸，一到十月，天气就一天天冷了。夜晚在山野里行军，寒风呼呼地吹来，越发使人感到身上的破旧单衣格外不经风。要在往年，崭新的棉军服早就发下来了；可是现在，执行中央打到外线去，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指示，已打到长江下游北岸，远离实施补给的后方一千多里，在这里，我们没有被服工厂，没有固定住地，又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打仗，从哪儿去弄十多万套棉衣啊！

正在这时，野司接到了毛主席的一份急电，问我们冬装是否已有着落，如果没有，中央准备让晋冀鲁豫十纵队护送棉衣到大别山来。消息一下传遍了野司机关，同志们说：“中央和毛主席真关心我们，远在西北高原，连我们的

棉衣都想到了。”

可是，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几位首长研究后，却让机要科复电中央和毛主席说：全军棉衣已在设法解决。大家一时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过了两天，刘司令员指示我们给各纵队发电报，叫各部队就地购买材料，自行缝制棉衣。邓政委并嘱咐道：“全军动手缝棉衣，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要各部队的领导同志，一定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工作。”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深深感到刘、邓首长爱惜老解放区人力、物力，这样决定实在太正确了。

于是，各部队的采买人员立即四出活动。他们几乎跑遍了大别山的各个村镇。从商店里买，动员群众卖，不管质量、花色，只要能用的都要。这样，全军的棉衣材料才勉强凑够了数。

买来的大批材料，有土布，有花布，也有纱布、孝布；有板棉、毛毯，也有羊毛、籽花……宽窄粗细，五花八门。质量好坏都没有关系，只是五颜六色叫人不免作难。染吧，没有染坊和那么许多的颜料；不染吧，红花绿叶，怎能穿得出去？

我和任参谋领到了半匹白布。听同志们说草灰可以染，我俩就在房东家的锅灶里掏了满满一大筐。雪白的布浸进了灰水里，果然成了灰色，可是一投水，几乎又成原样。我们想再用烟灰试染。跑到灶房一瞧，比我们手快的人早就把锅底烟囱都清扫光了。跑了十多家，弄得我们象包公一样满脸乌黑，好容易才刮到了一碗锅底灰。这次算没有白费功夫，染得很有成效。

这期间，行军时队伍煞是好看。有的同志把布晾在背包上；有的同志用根竹竿把布挑着；还有的把布拴在马鞍上。休息下来，遍地铺的是布。许多人围在一起，这个说：“嘿！这布染得不错，跟染坊染的也差不许多！”那个说：“哟！伙计，你怎么把布染成个癞痢头了呢，灰一块白一块的！”围看的人，哈哈大笑，热闹得很。

布染好后，便发下针呀，线呀，扣子呀，等等零星东西。支部聘请了几位当地妇女，教大家缝衣的基本技术。但是，对我们这些扛枪杆子的人说来，一根针拿到手上，比那七斤半的步枪好象重许多倍。什么絮棉花、钉荷包、锁扣眼、上口袋，处处都是难关。每当我们做活的时候，当地群众便围上来看。嫂子大娘们都自动出来帮助，任凭她们再热心，也无法使我们一下子变成“巧妇”。尤其是开领口，许多同志硬是“不得其门”，不是开大了，就是开小了。还有个别人把领口开到了脊背上，不得不再找一块布补上。因此便有人编了快板说：“当兵好当衣难裁，棉衣好做领难开。”

一天，刘司令员来检查我们缝棉衣的情形。他看了我们几个人的手工后，非常内行地指点说：“棉花要絮匀压平，翻时要小心对正，免得疙疙瘩瘩，歪歪扭扭。锁扣眼要用倒线，缝口袋要用勾针……”

旁边的一位同志说：“就是领口难开，大小把握不住”。司令员伸手从窗台上拿过一个洋磁碗，扣在领口的位置，说：“照碗口大小画个圈，按圈裁出来，不正和脖子差不多么？”

满屋子的人都为司令员这种“简易裁领法”赞不绝口。有同志说：“司令员，怎么缝衣服你也内行呀！”司令员打趣地说：“我在家当过三年裁缝哩。”接着他又郑重地说道：“做棉衣这件事是关系着我党我军声誉的大事。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一定要有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以烂为荣，不是光荣。同志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才行。”

从安徽太湖起，直到湖北的洗马畈，断断续续地缝了一个多星期，我的棉衣缝起了。手指被扎得到处是针眼，可一看到自己亲手缝的棉衣，想着刘司令员的话，就高兴得忘记痛了。

十一月，山区天气更塞冷了。刘、邓首长和其他几位首长还没穿上棉衣。军政处杨处长要管理科长进城去请几个裁缝来做。这事传到了首长们的耳朵里，被首长们拒绝了。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说：“同志们可以自己做，我们也不例外。”

几天后，首长们也穿上了他们自己缝制的棉衣。虽然刘司令员的棉衣略嫌瘦了些，但穿在身上却平整笔挺，更显得精神抖擞。

落雪前，全军在连续行军、连续作战的情况，终于都穿上了自缝的棉衣，指战员们更加满怀信心地坚持着大别山的斗争。师政委李震同志当时曾写了一首《棉衣歌》，歌颂我全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的精神：“此事古今无从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渡，全在万众是一心。”

（王长安，《星火燎原》之九）

材料四　刘伯承、邓小平将军飞渡黄河

将军飞渡永无俦，
天险黄河一夜收。
四十万军经一击，
摧枯拉朽到莱州。
防守徒夸有天险，
持支危局仗滔滔。
欢呼飞将从天降，
顿使顽奴命运消。

一九四七年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钱来苏）

莱芜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共三十一万余人，采取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的部署，妄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其南线以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新安镇、城头一线，分三路向临沂进攻；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的三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博山、明水（今章丘）一线，分两路南下莱芜、新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采取避敌锋芒，主动放弃临沂的作战方针，以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以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兖州以西运河上架桥，佯作决战态势，迷惑敌人。以主力五个纵队兼程隐蔽北进，以两个纵队从胶东、渤海迅速南下，求歼李仙洲集团。二月十五日，南线国民党军占领临沂。蒋介石严令北线李仙洲集团迅速南下，实施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利用在解放区内作战的有利条件，于二月十八日到达莱芜地区，形成战役合围态势。二月二十日发起全线攻击。第八、第九纵队在和庄地区，以伏击手段全歼由博山开往莱芜的敌第七十七师。其余各纵队经两日激战，将李仙洲指挥的第七十三军主力和第四十六军全部包围于莱芜城。二十三日晨，李仙洲率两个军向外突围，华东野战军在莱芜与吐丝口镇之间布成袋形伏击阵地，诱敌北退。同时，第二纵队在蒙阴西北地区，堵击突围敌人向西南逃窜。是日午，当敌突围部队刚刚脱离莱芜城，第四纵队遂抢占莱芜城，断敌退路。此时，第一、第七纵队由西向东，第四、第八纵队由东向北，发起猛烈攻击。战至下午五时，李仙洲集团大部被歼，李被生俘。华东野战军乘胜攻占胶济线西段及两侧十余座城镇，歼敌第七十三军军部及第三十七师残部，并俘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此役，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歼敌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余人之战果，使渤海、鲁中、胶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材料：

- 莱芜告捷
- 紧钳四万余蒋军

材料一　莱芜告捷

围歼李仙洲集团是莱芜战役的最紧张最精彩部分。此阶段可分为三个方面：伏歼第77师，包围李仙洲于莱芜地区，歼灭突围之敌。

伏歼第77师

2月20日拂晓前，我第8纵队（欠第24师）、第9纵队及鲁中警备5团进至和庄、不动村两侧地区，进行了伏击战的周密准备。和庄位于博山城南30里、莱芜城东北60多里的地方，周围山高谷深，博（山）莱（芜）公路由此穿过。上午10时，由博山南下的第77师全部进入我预伏地区。我预伏在大英章峪的鲁中警备第5团（归第8纵队指挥）迅速占领该关，并向青石关出击，断敌退路；11时，第8、第9纵队迅猛发起攻击，将敌分割包围，歼敌一部。黄昏时，敌被迫收缩于和庄、不动村窄小地区进行防御。20时许，我集中优势兵力向不动村、和庄发起攻击。战至二十一日拂晓，全歼该敌，击毙敌师长田君健，首战告捷。从博山南下援救第77师之敌特务旅，进至青石关，亦被我击溃，歼其一部。

20日下午，李仙洲得知第77师被围后，曾令第139师北上接应，因发现我军已逼近莱芜城，未敢行动。同时为避免遭我各个歼灭，当晚令第46军由颜庄星夜北撤莱芜，收缩兵力。我即令第4、第7纵队插至莱芜、颜庄之间，断敌退路。

第77师被歼后，不仅大大增加了李仙洲的恐慌心理，而且我可以将第8、第9纵队转用于攻克莱芜之敌的作战。

包围李仙洲

我在攻歼第77师的同时，主力亦于20日晚全部展开，并在全线发起攻击。第1纵队经彻夜战斗，攻占了莱芜城西、北各要点；第6纵队一部亦于当晚突入了口镇；第10纵队占领了锦阳关，歼灭附近各点之敌大部，切断了敌向明水北撤逃路，控制了阻止南下援敌的阵地。21日拂晓后，莱芜之敌在空炮火力掩护下，反复与我争夺城北矿山，小洼等要点，终为我击退。我第4、第7纵队未能如期切断颜庄之敌退路，使敌第46军于21日下午退至莱芜南吴家岭地区。华野决心趁敌两个军尚未完全靠拢之机，予以分割围歼。遂决定以第1、第8纵队攻击莱芜城；以第2、第4和第7纵队攻击吴家岭，并定于22日晚发起攻击。但22日上午，敌第46军即退入莱芜城与73军会合，并再次占领了城效之埠村、矿山、南白龙等要点。敌两个军集中于莱芜城，我判断其有固守或向北突围的两种可能，乃决心改以第1、第7纵队及第2纵队（正在开进途中）组成西突击兵团；第4、第8纵队组成东突击兵团；以第6纵队两个师继续攻歼吐丝口镇之敌，以第18师位于吐丝口镇以南之山头店、崔家庄一线布防，堵击北窜之敌。至此，李仙洲集团已陷于我重重包围之中。

对于敌军的下一步行动，我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莱芜城，二是向口镇方向突围。我第 6 纵队几次强攻未克的口镇，这时却成了莱芜被围之敌向北突围的希望。华野领导考虑，如敌固守莱芜城，两个军虽已会合在一起，抵抗能力增强，但城小兵多，挤成一团，我可首先集中炮火予以大量杀伤，尔后再集中兵力攻歼。如敌突围，则对我更为有利，便于我于运动中消灭之。华野当即作出了适应两种打法的部署：如敌固守，即于 23 日晚发起总攻；如敌突围，我则于运动中将其歼灭，并相应具体区分了任务。

聚歼突围之敌

在我军严密包围下，猬集莱芜城内的李仙洲守逃两难，束手无策。是固守待援，还是向北突围，争论不休，李仙洲也举棋不定。王耀武明知已中我军之计，但无可奈何。他原来想要李仙洲据城固守，但又看到李军已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危急万分。如遭歼灭，将使济南和胶济线受极大威胁。因此不如索性孤注一掷，冒险突围。他指望李仙洲如能突围至明水及其以南地区，则不仅可解口镇之围，而且可东援淄博，向西加强济南防卫，于是即令李仙洲率部经口镇向明水方向突围，并要求新编第 36 师坚决守住口镇，作为北撤依托。李仙洲召集部下研究，他认为敌前突围不利，主张固守待援；少将高参王为霖等则认为固守失败，责任难逃，主张突围。最后，通过了突围主张。决定 23 日晨 6 时行动。与此同时，王耀武派其副参谋长罗辛理携信去南京当局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和突围决定，蒋介石只好同意王耀武的突围撤退计划，并派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自驾机指挥大批作战飞机轰炸、扫射我军，掩护李仙洲集团突围。

这时，对于我军来说，在战役指挥上的注意重心是如何达成全歼。孙子兵法中曾有“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用兵法则。我着重处理了网开一面与四面包围的关系。第一，如何纵敌出莱芜城。敌人放弃莱芜城，这对我们是最好的了，正便于我军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攻城需时费事，代价也会大些。为此，实行了围三缺一，网开一面的办法。开始时我还曾令下面阻击部队略向后缩，以诱敌主力出城，并令攻城部队不要截击敌后尾部队，一定要等待敌后卫部队完全脱离阵地后再去占城，否则，敌军主力见势不妙可能又会缩回城里。第二，当敌军全部突围进至我设伏地域时，又依据时机、地形、军心等诸多因素，不实行网开一面，而实行四面包围。为此，我曾严令北面攻打口镇的部队，一定要尽快予以占领，把口子卡死，坚决堵阻敌人北逃，并令南面已经占领莱芜的部队坚决守城并积极向北进击，防敌回窜夺城固守。这样，敌军就势必在无阵地依托下，两头受堵，北进不动，南退不得，在我东西两大突击集团的猛烈夹击下陷入绝境。

据此，华野首长在莱芜、口镇之间布成南北长 30 公里、东西宽 10 余里的口袋形阵地，决定待敌突围部队后卫脱离后，围攻全歼敌军。

23 日清晨，敌于莱芜城东关集结，准备突围。此时，第 46 军军长韩练成接受我敌工干部秘密劝告，放弃指挥，脱离其部队，敌因等候韩练成不至，迟至 8 时才出发。敌第 73 军在左，第 46 军在右，李总部及全部辎重车辆居中，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沿莱芜至口镇的两条公路上并列向北突围。10 时许，敌第 73 军先头进至高家洼地区，与我第 1 纵队前哨接战，企图攻占侧翼阵地，其后卫仍扼守矿山；第 46 军先头进至芹村地区，与我第 6 纵队前哨接战，欲夺取右侧阵地掩护主力北突，其后卫仍控制莱芜。

23 日 12 时许，敌后卫部队全部脱离莱芜、矿山（莱芜城北）阵地，我军不失时机地迅速予以占领，断敌归路。攻打口镇的部队虽仍强攻未下，但以主力一部坚决卡死了敌军北撤的咽喉要道。与此同时，我预伏在东西两翼的强大突击集团迅即对行进中的敌军发起全线总攻。5 万多敌军被包围在芹村、高家洼（均莱芜至口镇之间）东西仅三、四公里、南北仅一、二公里的狭小地域，人马车辆辎重挤成一团。13 时，我向突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先头之敌进至山头店、崔家庄以南地区，遭我第 6 纵队之第 18 师顽强阻击，敌将后续部队前调，全力攻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终未得逞。

此时我军在兵力上有 4 倍于敌的绝对优势，而且先敌展开，士气十分高昂，以此优势聚歼动摇混乱、孤立无援之敌，是完全有把握实现全歼、速决的。我军将敌人紧紧围死，并使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当敌军被我压缩至更小的一块地域时，它的战斗范围更小了，敌群密集，我军火力发挥出更大威力，一发炮弹就杀伤它很多人，甚至一颗子弹也杀伤它两三个人。在我火力杀伤和部队多路插入猛冲猛打下，敌军指挥失灵，建制混乱，溃不成军，迅速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能力。至下午 5 时，战场上枪声沉寂。

李仙洲部约 6 万人，除第 73 军军长韩浚率 1000 余人从我阵地空隙小洼窜入口镇外，其余全部被歼，李仙洲负伤被我生俘。韩浚窜入口镇后，于 21 时会同该镇残敌共 5000 余人向博山方向逃窜，逃至青石关、和庄地区，被我第 9 纵队全歼，韩浚亦被俘。

莱芜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在敌人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加深了敌人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战后，敌徐州“绥靖公署”即被撤销，薛岳被免职，由顾祝同率陆军总部移驻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署所辖部队。战役结束当天，蒋介石亲飞济南，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王耀武则在给整编第 83 师师长李天

霞的信中悲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选自《百战图》、作者：黄彬）

材料二　紧钳四万余蒋军

歼敌五万余众之莱芜歼灭战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紧钳蒋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总部暨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于我包围之中，经三昼夜激战，予该两军主力以惨重杀伤，迫使蒋军丧失斗志，仓惶突围溃窜，奠定二十三日我各路大军一举聚歼蒋军四万余众之胜利基础。战斗第一夜（二十日），"广州"部队向莱芜城东、西、北及西南等地挺进，当夜除城西北的矿山高地外，其余外围据点全部为我肃清，李仙洲总部与七十三军即陷入包围。二十一日晨，城内蒋军二千余在九架飞机掩护下，分路向西关、北关我军阵地猛犯，我一大队一连在敌三面交叉火力网下，与千余敌人反复肉搏，坚守阵地，予敌惨重杀伤。南关我某大队三连的一个排、六连一个班，深入吴家岭（城南十里）附近阻击自颜庄北犯之四十六军。西关小曹村（城西四里）战斗中，我七大队三营攀上二人深的壕沟，在村内与敌展开逐屋争夺战，战士们在战斗中互相鼓励为人民立功。马春田一气摔出四十多个手榴弹。八连战士沙纪有两眼挂彩失明，仍坚持不退，把枪交到连副手里，握好榴弹准备与敌决战。全营先后共击退敌人猛冲达四次之多。入夜，我主动放过由颜庄北退之四十六军全部，让它由南门进入莱芜城。至此蒋军遂全部被压缩成一团。二十二日，蒋军增强城西北兵力，企图强夺我军阵地以确保其突围道路的安全。我扼守城西北高地的二大队八连一个排及机炮连一个排，坚守山头阵地，反复打垮敌人八次冲锋，自晨至暮，阵地屹立未动。当夜，我六大队与敌激战于矿山脚下，同时我一支队也伸展至莱城北十五里之南白龙，向七十三军的一九三师猛攻，蒋军伤亡惨重，其侧翼掩护兵力无法向北伸展。战斗至最后一天（二十三日）清晨七时半，在飞机十余架轮番扫射轰炸下，李仙洲亲率其七十三军（缺七十七师）、四十六军分四路沿莱（芜）吐（丝口）公路及左右大路向吐丝口方向仓惶突围。下午二时许，敌左路七十三军之先头部队刚越过小官庄（莱芜北十七里）时，我三支队自小官庄一线拦腰杀出，直捣南白龙，敌被切为数段，狼奔豕突，纷纷四散逃窜。此时，我各路大军紧缩包围，勇猛冲击，万千蒋军挥帽缴枪投降，不到两小时，此蒋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所亲自统率之四万余蒋军。即告全部覆灭。

（选自《大众日报》1947年3月5日）

孟良崮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集中了二十四个师共六十个旅的兵力，以精锐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五军为骨干，编成三个兵团，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下，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曾多次定下歼敌的决心，均因国民党军各攻击部队密集靠拢，行动谨慎而未能实现。五月上旬，华东野战军重新调整部署，将主力后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隐蔽待机。顾祝同即令三个兵团向博山、沂水一线疾速开进。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不待第二、第三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骨干，在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掩护下，于五月十一日，自垛庄、桃墟地区北犯，进逼坦埠。以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北犯沂水，策应第七十四师作战。以整编第六十五师担任蒙阴防御。华东野战军判明第七十四师进攻态势较为突出，决心以五个纵队担任主攻，四个纵队担任阻援，拟围歼第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山区。五月十三日晚，整编第七十四师在第八十三、第二十五师掩护下，攻占杨家寨、佛山、马牧池等地后，华东野战军担任两翼迂回穿插的第一、第八纵队，从第七十四师两翼寻隙向其纵深楔进，并攻占天马山、界牌、桃花山、磊山等要点，首先占领孟良崮东南山地，割断了第七十四师与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的联系。同时，担任正面围攻的第四、第九纵队先后夺占黄鹿寨、马牧池、佛山一线，第六纵队由铜石山西南地区向北急进，于十五日拂晓攻占垛庄，截断了第七十四师的退路。第八纵队又同时攻占万泉山，与第一、第六纵队打通了联系。至此，华东野战军已将第七十四师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封闭了合围口。第七十四师被围后，蒋介石等一面令该师固守阵地，一面令新泰之整编第十一师、蒙阴之整编第六十五师、桃墟之整编第二十五师、青蛇寺之整编第八十三师及汤头与河阳间之第七军和整编第八十四师等部，迅速向第七十四师靠拢，妄图以十个整编师夹击华东野战军，实现其同解放军决战的计划。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在这紧急情况下，一面指挥阻援部队坚决抗击援敌，一面调整主力部署，加速歼灭第七十四师。十五日下午一时，华野指挥部向被围的第七十四师发起总攻。战至十六日上午，主攻部队先后攻占雕窝、芦山，将该师残部七千余人压缩于孟良崮与六〇〇高地之间凹部。攻击部队乘胜突击，激战至十六日黄昏，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七十四师全部被歼，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与此同时，担任阻援任务的四个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各路敌军展开了顽强阻击，有力地保证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孟良崮战役共歼敌三万二千余人，震惊了

国民党军内部，坚定了解放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胜利信心，有力配合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为此，中共中央曾致电祝贺。

材料：

- 孟良崮战役勇歼"王牌军"
-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 瓮中捉鳖
- 鲁中吟

材料一　孟良崮战役勇歼"王牌"军

在蒋介石的嫡系中，有一支号称"王牌"军的部队——整编第74师。该师系蒋介石外甥经营的浙江保安团扩编而成，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南京警卫，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居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据说，其装备是一色的美国式，部队又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在南京曾接受过马歇尔的检阅，受到美国佬的夸奖。国民党重点进攻开始以来，蒋介石特地把第74师从南京调到山东战场。由于它在与解放军作战时屡打头阵，多次受到蒋介石、陈诚的嘉奖，曾被授予过"国军模范"的称号。国民党李延年吹嘘说："只要有十个74师，我们就可以统一全中国"。王耀武也说："中国军队中只有74师能战"。74师自己更是骄气十足，自诩为攻无不克的"金刚钻"。师长张灵甫说："有74师就有国民党"。他依仗着美国人给的武器装备和老蒋的撑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正当它在华东战场跃跃欲试，准备大显一番身手时，无情的历史却作了这样的记载：1947年5月13日至16日，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统率的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第74师合围在山东省孟良崮地区，经3天激战，第74师全军覆没，"王牌"军师长张灵甫被人民解放军当场击毙……

一、完成战役包围

实现把敌人"挖"出来打，首要的一着是要迅速完成对敌第74师的战役合围。

5月13日晚，我担任两翼迂回穿插部队的第1、第8纵，在各以一部向正面之敌攻击、吸引敌人的同时，以主力寻隙向敌纵深楔进。当夜，第1纵队第3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迫近蒙阴，构成了对敌整编第65师的坚强阻击阵地，该纵主力攻占黄斗顶山、尧山，歼敌整编第25师一部(敌大部逃回桃墟)，同时沿阵地间隙南进，于14日上午攻占天马山、蛤蟆崮、界牌等要点，割裂了敌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25师的联系，并占领285、330高地及大山场，切断了敌由垛庄向北的急造军路。

第8纵队发起进攻后，将当面依汶庄及其以南地区之敌整编第83师一部击退，并于仁寿庄歼敌搜索营，14日上午进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割裂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83师联系，一部攻占孟良崮东南之横山、老猫窝。第4、第9纵队，亦于13日夜向当面之敌攻击，攻占黄鹿寨、佛山及马牧池、隋家店一线。第6纵队则从鲁南之白彦地区兼程向东北急进，以断敌退路。14日晨到达垛庄西南20余公里之观上、白埠地区。

至此，我军对敌第74师的包围态势已大体形成。15日拂晓，我第6纵队在第1纵队协同下攻占了垛庄，第8纵队则攻占了万泉山，三个纵队打通了联系，最后封闭了合围口；并构成了阻击第25、第28师的强有力的对外正面坚强防线。

二、张灵甫失算

敌74师师长张灵甫，系蒋介石的亲信，此人凶恶好战，有实战指挥经验。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张灵甫曾带着74师在淮南及淮阴、涟水、沭阳、临沂与我军作战。其部队不仅装备好，且老兵多，经验丰富，在敌军中素以"善攻"著称。但在孟良崮战役中，他却连连失算，步步被动。

5月13日，74师在前沿据点遭我攻击时，张灵甫还认为仅系我一部兵力施行反击，故仍准备按原计划于14日攻占坦埠。后因马牧池失守，乃准备于拂晓后等待情况之变化再定行止。至当日10时，得知我军已迂回到他们的翼侧占领天马山、磊石山等要点，并继续向垛庄、万泉山前进，始判明我军有围歼其全师之意图，乃立即部署向垛庄方向撤退。撤退中发觉垛庄已为我所占，只得退缩到孟良崮、芦山地区，并不得不把美式重炮和许多现代装备丢在山下，因而丧失了它现代化的"优势"。

在我军以往的战役中，一般只要对敌人达成了战役合围，胜利就算基本有把握了。但是，这次战场态势特殊。我军5个纵队包围着敌第74师，敌军却有10个整编师(军)包围着我军。第74师为敌"五大主力"之首，其战斗力不可低估，且该部所退守的孟良崮及其周围山地对其十分有利。孟良崮系鲁中群山之一，东西长约20余公里，东端为610高地，西端为520高地，东南为芦山，向北则岗峦起伏，连绵数十里，直抵汶水，南岸。地形复杂，山峰陡峭。主峰海拔在500米以上，岩石累累土质坚硬，易守难攻，因此，攻占垛庄后，陈毅和粟裕虽松了一口气，但鹿死谁手，尚待决战。粟裕立即带领少数参谋、机要人员，将指挥所向前推移，进入山沟，以便密切观察和指挥战事。

果如其然，当敌整编第74师被我合围后，蒋介石等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又处在有利地形，且左右援军均较靠近，是同我军决战的好机会。因此，一面令坚守阵地，吸住我军主力，一面令新泰之整编第83师、蒙阴之整编第65

师、桃墟之整编第25师、青驼寺之整编第83师、河阳与汤头间之第7军及整编第48师等部，迅速向整编第74师靠拢；并急令莱芜第5军南下，调鲁南整编第64师及整编第20师之133旅向垛庄、青驼寺前进，调整编第9师自大汶口向蒙阴前进。妄图以10个整编师(军)的兵力内外夹击我军决战，并解整编第74师之围。张灵甫虽然已感到吃饭、饮水无法解决，难以持久，但也认为自己建制尚完整，并居于战线的中央，会得到友邻增援。因此，一面请求空军空投粮弹，一面调整部署，妄图固守待援。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蒋军各路援兵，一齐向孟良崮方向急进。

三、激战孟良崮

华野鉴于敌人已调动了10个整编师的兵力向孟良崮增援，而且多数距孟良崮仅一至两天路程，情况十分紧急，当即命令阻援部队坚决阻住援敌，主攻集团加速猛攻，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援敌赶到前彻底歼灭整编第74师，决不让敌人跑掉一个。各部立即传达这一决心，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部队虽饥饿疲劳，但士气甚旺，纷纷请战。陈毅当即发出了"歼灭74师，活捉张灵甫"的响亮口号。广大指战员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督战。一场解放战争以来最为激烈，壮观的阵地攻坚战，在孟良崮地区展开了。

15日13日，我于调整部署后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敌第74师和第83师一部麇集于孟良崮、芦山及附近山地，依托巨石，居高临下，不断对我发起反冲击。我军为了争夺每一个山头、高地，要从下向上仰攻。每克一点，往往经过数次、十数次的冲锋，反复争夺，直到刺刀见红。其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逐次粉碎敌人的顽抗，缩小了包围圈。张灵甫在我军强大攻势的重压下，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先向南，又向西，后向东寻隙冲击，试图突击重围，均被我军击退，并遭到惨重杀伤。15日晚，敌军已被压缩于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狭窄山区。

此时，我第一线作战部队建制已较紊乱，但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仍继续向敌猛烈冲击。敌所占阵地均为岩石山地，草木极少水源奇缺，无法构筑工事，人员、马匹、辎重密集于各山头、山谷，完全暴露于我军炽盛火力之下，空投的粮弹也多落于其阵地以外，饿无食，渴无水，军心动摇。我抓紧时机，集中强大炮火猛烈轰击。山上弹片碎石齐飞，敌军人马混成一团，互相践踏，战斗队形完全混乱。我各路部队乘机突入敌阵地，以白刃格斗消灭顽抗之敌，激战通宵未停。

16日上午我军再次发起攻击，首先集中强大的炮兵火力，向敌军密集的山头、高地猛烈轰击。在浓烟和火光中，敌人的血肉与岩石碎片齐飞，形成一片混乱，我步兵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冲击，越战越勇，指战员不待上级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战斗进入尾声阶段。此时，张灵甫率7000余残敌龟缩于孟良崮、六00高地及其中间凹地，隐蔽地进行整顿。由于天阴云低，我军又挤满山头，有些部队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打扫战场时竟误敌为我，未予搜索，即上报敌已全歼，并准备各自押俘后撤休息。野指核算俘虏人数时，发现与敌原有人数相差甚大，且我电台亦发现孟良崮地区仍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部隐匿。即令部队反复清查，始发觉敌尚未歼灭。部队在严密搜索中发现敌隐藏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已开始集结。于是我即令第4、第8、第9纵队立即出动兜剿。各部队不顾疲劳，复又投入战斗，16日下午5时全部肃清残敌。至此，我们的战役意图得到完全实现。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嫡系中的嫡系、整编第74师，悉数就歼，"王牌军"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我们取得了战役全胜。当粟裕打电话报告陈毅司令员时，陈总在电话中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们祝酒致贺！

四、出色的阻援作战

在我攻击集团围歼整编第74师的同时，阻援部队对援敌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阻援战斗则是艰苦的阵地防御战，我军利用既设野战工事进行了顽强的阻击，象一座座坚固的堤坝，挡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各路援敌虽在蒋介石，顾祝同再三严令下拚力前进，但其第5军因受我第10纵队牵制，刚由莱芜南下；整编第11师受我第3纵队正面抗击和翼侧攻击，被抑留于蒙阴以北；整编第65、第25师在我第1、第6纵队各一部顽强阻击下，16日傍晚始占界牌，前进不过3、5公里；第7军、整编第83师遭我第2纵队及第8纵队一部阻击，至16日晚始占孙祖、桃花山等地，前进亦不及10公里；整编第48师受我第7纵队袭击，不敢轻动；整编第20、第64师则受我鲁南地方武装牵制，未能及时进达青驼寺。敌第25师、第83师虽逼近我军包围圈，与第74师相距仅5公里左右，并对我形成炮兵火力交叉，但仍无济于事。16日上午8时，蒋介石还抱侥幸心理，向各路增援部队亲下手令称："山东共匪主力今已向我军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必以纵匪害国贻误战机论罪，决不宽容。"但到同日下午，汤恩伯已感到大势已去，发电报给所属各部称：张灵甫师"孤军苦战，处境艰危"，各部务须击破共军包围，"救胞泽于危困"，"不得见死不救"。但无论是蒋介石的严令，还是汤恩伯的乞求，在我阻援部队顽强抗击下，都无法挽救张灵甫全师被歼的命运。

这次战役，实现了"全部干净、彻底歼灭第 74 师的"计划，共计歼敌 3.2 万余人，有力地粉碎了敌统帅部"鲁中决战"的计划，严重挫败了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蒋军内部，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战役结束后，敌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第 25 师师长黄百韬、第 83 师师长李天霞等也受到处分。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选自《百战图》，作者：黄彬）

材料二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5 月 13 日黄昏，战斗开始。我赶到老鼠峪子，督促二师、独立师前进。我一纵部队开进时，敌整七十四师也正在向孟良崮开进、收缩。由于两军过于靠近，我亲眼看到山地敌军的运动。敌人在山岗，我军在山坡，我知道他们是敌军，敌军却以为我军是友邻整二十五师，不吆喝口令，不打枪。这时晨雾未散，视线不清。这时机是稍纵即逝的，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如果犹豫了，部队停下来，敌人就会发觉是"共军"，火力一压，处境就十分危险。这时候，谭启龙副政委从第二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第二师师长刘飞报告，他把第六团一个营带了进来，其余部队到重山山口，遭到官庄敌人阻击，加上空中和地面炮火的阻击，进来不得。"这个节骨眼上，部队怎么能停下来呢？我下了一道死命令："不理敌人，继续前进！"以后，刘飞同志向我报告："把整二十五师的阻击部队打垮了！第四团、第五团和独立师都带进来了！"同时，一师攻占塔山、尧山，至此，我一纵完成穿插分割任务，切断了敌整七十四师与整二十五师的联系，打退了敌整六十五师的进攻。5 月 14 日 2 时，独立师攻占天马山、界牌。天明，从报话机中侦听到敌整七十四师各部都在行动。估计该敌可能想恢复与整二十五师的联系，还可能迅速撤向孟良崮。上午 9 时，野战军指挥部指示，要我纵独立师和第二师不顾牺牲，猛攻孟良崮。我下令：除一个团宽正面阻击敌整二十五师外，其他五个团全力攻击。当时，敌整七十四师已后撤，我第八、第九纵队不可能赶到，而第六纵队也要第二天才能赶到，一定要攻占孟良崮才能阻住敌人。因此，我又命令第一师除留一个次要团守备黄斗顶山一线阵地外，其余两个团和三师攻击前进。下午 3 时，从报话机中侦听到敌整七十四师率三个旅已到达孟良崮，因此已不是以一个纵队所能完成的攻击任务。我随即发电报建议：敌已占孟良崮，且我大量部队已攻占界牌及垛庄并向西前进，情况已起变化，宜采取围攻。野战军指挥部电示我纵暂停对孟良崮的攻击。

5 月 14 日整天战斗火炽。塔山、尧山被敌重战，又复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不时告急。蒋介石得战报后，亲自指挥作战。敌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狂妄地提出：他坚守孟良崮，以它为"磨心"，拖住我军，四面围攻，企图"碾"碎我一纵。于是，蒋介石严令敌整二十五师、整六十五师、整八十三师和第五军等部，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我纵各阵地均遭受敌军迭次进攻，血战竟日，整天笼罩在烟火里……

5 月 15 日拂晓，独立师第一团和第二师第六团夺回三三〇高地和二八五高地，重占围攻孟良崮的有利阵地。我各友邻部队亦进逼孟良崮：第九纵队攻占孟良崮高地一处；第八纵队正围攻卢山；第六纵队已进抵垛庄；第四纵队前锋直逼五二〇高地。但敌各路部队在蒋介石严令下，不断向我军进逼，情况趋于紧急。敌整七十四师遭我各路大军压缩于孟良崮荒山后，在各路进援部队的呼应下，企图以五十八旅掩护向西南突围。我即令第一师第一团进抵北庄，第二师第四团进抵石王河集结，以截敌突围。张灵甫发觉我大部队抵达其周围，后路已为我军切断时，则改变为固守孟良崮及以西之六〇〇、五四〇、五二〇一带高地待援。

陈老总给我来电话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整七十四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十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军四周，先后打响。当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纵队把整七十四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巴望了，我们也就免得两边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

我把陈司令员的指示转达后，纵队的几位领导同志也都感到担子沉重，但也感到我纵两面作战，兵力不够。我掂量了一下陈毅同志讲话的份量，下决心说：

"从阻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一面挡住'百万大军'，一面取'上将首级'！我们一定要做到！"

谭启龙、何克希、张翼翔等同志都同意这样办。研究了具体部署后，我抓起电话，亲自向各师师长交代任务。我又把一师师长廖政国同志找来，我问他：

"我把主力部队都拿去攻击孟良崮了，只留给你从地方上刚升级的三团、九团，加上你师二团，扼守 60 多公里的阵地，挡住敌人两个整编师，保证主力拿下孟良崮。你看行么？"廖政国同志一声未吭，接受任务就走了。廖政国真是好同志，打仗从来不讲条件。他有勇有谋，一直带主力部队，而且政治立场非常坚定。"文革"初期，他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时，就和"四人帮"直接进行了斗争，后遭打击，不幸过早地去世了，真是可惜啊！

这时，战局越来越严峻。敌人遗尸满地，还是整群成团地向我阵地上涌，炮火没有间歇，部队不分队形，那才象敌人污蔑我军的所谓"羊群战术"、"人海战术"哩！中午，三山店、交界墩的我阻击部队伤亡殆尽，被敌人强占。下午 4 时，界牌又被敌人占领。随后，我天马山、复浮山、

蛤蟆崮全线告急，敌人已攻上天马山的山腰，接着部队与指挥所失去联系……

我手里已没有预备队，别的部队也赶调不及，怎么办？正在焦急万分，廖政国来了电话：已将敌人击退，天马山阵地稳住了。他说，在天马山危急之时，正有一支部队在山沟里向东急进，这是我第四纵队第二十八团的一个营。廖政国同志立即对该营营长说："我是一师师长，命令你们立即赶援天马山。"那营长说："我营奉令跑步赶去攻击孟良崮，任务紧急。"廖政国同志向烟火弥漫的天马山一指说："天马山阵地的得失，关系重大。如果敌人打通联系，全局皆输。我手里只剩下七八个警卫员，只有使用所有到达这个地区的部队。"那营长考虑了一下说："好，为了整体利益，我们执行你的命令。"这个营赶到天马山，和守军一起，终于将敌击退。这种情况也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出现！

这天晚上，已是10点多钟，陈老总与我通了电话。他说："敌整九师、整十一师已靠到蒙阴，第五军已到新泰，整六十四师已到青驼寺。如在明天(16日)拂晓前不能全歼整七十四师，则我军将陷入敌人包围。"陈老总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又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七十四师，我们就全盘皆活了！"陈老总授权我统一指挥第一、四、六、九纵队总攻孟良崮。他果断地说："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我承担了这个指挥任务。粟裕副司令员接过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组织好总攻？"我回答："需要两个钟头，下半夜1点可以实施总攻。"我告诉他：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四纵、六纵已接通电话，但第九纵队同我电话还没联系上，请总部通知它作好总攻准备。

5月16日1时，总攻开始，各纵队协同很好。2时，我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六团，独立师第一、三团与友邻第四纵队等部攻占五二〇、五四〇一线高地；第六团也配合出击，拂晓占领附近山头。

总攻开始以后，野战军首长几乎每隔五分钟就来一次电话。战斗空前激烈，情况变化多端，电话铃声也就不断响着……

敌整七十四师不断告急，西面敌整六十五师、整二十五师在蒋介石严令下拼死东援，我纵阵地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终于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5月16日拂晓，前线各路大军密集，哈气成云，同心协力，直取孟良崮。强大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像火山爆发。上午6时，敌整七十四师被我全歼，狂妄的中将师长张灵甫的尸体也抬下山头，山谷里响起一片欢呼声。红日当空，垛庄方向仍有一片枪声，真使我大惑不解，立即派人去第六纵队查询。第六纵队司令部的一位同志写了回条，颇见幽默。他写道："万枪齐鸣，山呼谷啸，并非敌骑进攻，而是我军战士胜利后略表狂欢之心情耳！"

敌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后，进犯鲁中的敌人全线溃退，吓得40余天不敢出战。蒋介石不怪自己无能，总是迁怒部下。战役结束后，敌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押到南京"军法会审"，敌整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也被撤职留任，"戴罪立功，以赎前愆"。

此战胜利，陈老总是非常高兴的，当时就口占一首七律：

孟良崮上鬼神号，
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点点星灿烂，
照明处处火如潮。
短兵肉搏争山顶，
炮击血飘湿战袍。
蒋贼主力今歼灭，
我军个个是英豪！

（选自《征战纪事》，作者：叶飞）

材料三　瓮中捉鳖

当我军对74师的包围态势基本形成时，汤恩伯有所察觉，急令张灵甫回师临蒙公路与左右翼结阵："陈毅转守为攻，会战将在我兵团所在地区展开，我兵团控制临蒙公路中段十分有利，进退自如。"张灵甫很不以为然，刚刚把共军分切开，怎么又要收缩呢？遇不到人家到处找，遇到了又要放，真是不可思议！他很自信地建议："陈毅仍然是老一套，想截住我突出部来打，我想将计就计，把他们吸过来，痛歼之。"

"嗯，是个好主意。"汤恩伯也怕陈粟以进为退，如74师退守临蒙，共军再次跑掉，岂不前功尽弃？也与"委座"半月之内歼灭陈粟主力的电令大相径庭。张灵甫既然愿意打头阵、当炮灰，何乐不为呢？他故意问道："这能行嘛？未免太辛苦74师了！"

张灵甫却坚定地说："为党国效忠，死而无怨。"

当我军进攻开始后，张灵甫这个骄横的家伙仍然满不在乎，面对同僚的忧虑担心，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不要大惊小怪，共军想一口吃掉74师，他们不但不敢做，恐怕想也未必敢想！"命令他的部队按原计划，14日进占坦埠。

14日上午10时，张灵甫得知我已攻占天马山、磊石山等要点，并正向垛庄、万泉山前进，这才如梦初醒，判明我军有围歼该师的可能。于是，命令部队放弃北进，立即向孟良崮、垛庄方向撤退，并拼力向我1纵反扑，企图打开返回垛庄的通路，沟通与整编25师的联系。由于有几十架飞机的空中支援，张灵甫暗自高兴地想：在这一带毫无隐蔽的石头山上，共军来不及构筑防御工事，与我王牌

74师拼火力，还不知谁消灭谁呢！

74师被包围后，老蒋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处于易守难攻的高地，临近有强大的增援兵力，正是与陈粟决战的好时机，便一面命令74师师长张灵甫坚决固守，一面急令新泰的11师、蒙阴的65师、桃墟的25师、青驼寺的83师、河阳的第7军和48师火速向74师靠拢，又急令莱芜的第5军南下，鲁南的64师和20师赶向垛庄和青驼寺，楼德的第9师赶向蒙阴增援，企图内外夹击，中心开花，与我决一死战。这样，虽然陈粟主力纵队包围了74师，但敌军却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了陈粟主力。汤恩伯也为张灵甫打气："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本日空军全力来助，……只要贵师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之极大之功绩。务希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成此伟大任务。"74师被围后，虽已感到吃饭饮水无法解决、难以持久，但也认为自己建制完整，并居于战线的中央，会得到友邻的增援，因此，一面请求空军空投粮弹，一面调整部署，妄图固守待援。

恶战在即，胜负难卜……

鉴于情况十分紧急，粟裕向各纵队司令员指出："敲掉74师这个轴心，敌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也就可以避免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如果拖下去，情况完全可能发生逆转。"因此，他当即命令各阻援部队坚决拖住援敌，主攻集团加速猛攻，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援敌赶到前彻底歼灭74师，决不让它跑掉一个。陈毅也对着叶飞、陶勇、王必成、王建安、许世友等几员虎将吼着嗓门喊道："蒋介石拼死和我们决战，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74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充一千；打掉两千，给你们补充两千，哪怕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再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番号。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现在是只有冲锋，后退就是死亡！"各部立即传达了陈粟首长的这一决心，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部队虽然饥渴疲劳，但士气不衰，纷纷请战。

15日13时，我于调整部署后发起总攻。为了便于密切观察和指挥作战，粟裕率领少数参谋、机要人员组成的前线指挥所，由坦埠西移，到艾山脚下的张林村附近的一个山洞指挥战斗。

总攻开始后，74师竭力顽抗，每一阵地都是你来我往，反复争夺。我军将士愈战愈勇，在炽盛火力下逐波冲锋，势如潮涌。而敌军所占阵地均为岩石山地，无法构筑工事，人员、马匹、辎重密集于各山头、山谷，完全暴露于我军火力之下，我军集中强大炮火猛烈轰击，一炮落地，弹片碎石齐飞，无形中杀伤力增大了好多倍，敌军人马乱成一团，互相践踏，战斗队形完全混乱。我各路部队乘机突入敌阵地，以白刃格斗消灭顽抗之敌。而这时的蒋介石"运输大队长"也当不好，张灵甫千呼万唤空投下来的粮弹十之八九落于我军阵地，敌军阵地官兵饿无食，渴无水，有的甚至饥渴难熬，昏厥在地，因此军心动摇。他们多想老天有眼，快降甘霖呀！但老天偏不成全，一场透雨非等到了全军覆没，连"张军座"也小命归西之后才骤然而至。

敌军力渐不支，拼命夺路突围，先向南，后向西，再向东，都在留下横七竖八、重叠成堆的尸体后狼狈地退回。敌人在反复突围中伤亡累累，国民党编写的张灵甫传记形容这天74师是"浴血肉博，陈尸满谷，战况惨烈，是日该师伤亡约8000人。"入晚，敌人龟缩于520高地至芦山一线狭小山地顽抗待援。此时，我一线作战部队也伤亡较大，但仍继续向敌人猛烈冲击。

5月16日黎明，华野对74师残部和张灵甫占据的最后一个山峰发起最后的冲击。粟裕调动炮兵部队以猛烈炮火对张灵甫据守的山头自下而上，实施"地毯式"轰炸，直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张灵甫此时方感到末日来临，对着报话机苦苦哀求："黄先生、李先生，赶快向我靠拢……"哀号声声，往日那种骄狂再也见不到一丝一毫了。

上午8时，老蒋预感大事不好，十万火急地给增援部队发出手令："如有萎靡犹豫，巡逡不前，或赴援不利者，定必以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汤恩伯也给所部发急电：要增援部队发扬"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说什么"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为，亦恩伯所不忍言也"。可惜，老蒋也好，汤恩伯也好，他们的手令、急电又奈我何？尽管增援74师的10个师(军)有意来援，最近的相距不过几公里，但都被粟裕部署的阻援部队牢牢箝制住，直到16日下午，各路援军始终未能跨越"雷池"一步。

下午2时，74师全线崩溃，师、旅、团、营全部失去通信联络。解放军抬着水桶上山，向隐蔽处喊话，躲在岩缝里、洞穴里的官兵，成帮结伙地拍着手出来要水喝，到处挥动白旗投降。

张灵甫设在孟良崮主峰的师指挥所已是四面楚歌。电台里清楚地响起张灵甫如泣般的哀鸣："南京，蒋先生，黄伯韬不援助我，7军不援助我，我已到了'尽忠报国'的时候了……"

6纵为报涟水一箭之仇，把养精蓄锐的预备队——纵队特务团拉了上来，投入最后决战。特务团如脱弦之箭冲上孟良崮，像猛虎扑食一样直插崮顶。张灵甫眼看死到临头，逼迫所有龟缩到崮顶的残兵败将，还有他的配有崭新快慢机的卫队，向我进行绝望地反扑。我特务团3连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冲杀到指挥所的山洞口，张灵甫的卫队长带着人刚从洞内露头，就被我杀伤20多人。随着子弹手榴弹的猛扫猛投，战士们占领了山洞，一颗汤姆枪子弹击中张灵甫的后脑，这个高大肥硕、曾经不可一世的家伙，不由自主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你们不要打了,我们师长都被你们打死了!"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粟裕发现各纵队所报歼敌数与74师编制相差甚大,即令各部队继续进行战场搜索,又发现约7000余敌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的山谷里。各部队不顾疲劳,又投入战斗,到5时全部扫清残敌。至此,共歼敌32000余人,74师全军覆没,我军首开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的纪录,战役意图全部得到实现!

枪声停了。然而,继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声响——霎时间乌云翻滚,惊雷震天,百年未遇的暴风雨降临了!雨水被满山还没有来得及凝固的滴滴热血染得殷红殷红,顺着山势咆哮而下,无数具体温尚未散尽的尸体被冲得塞满了沟壑山谷……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一改山东战局。毛主席来电祝贺:"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不久后,毛主席又对前去延安的陈毅说:"你们华野莱芜、孟良崮两役打得痛快淋漓。尤其是歼灭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意义极大。现在,山东的战局改观了,蒋介石的扁担,在山东和陕北是两头打塌,敌人在这两地已组织不起像样的攻势了。"

(选自《中共虎将与名战》)

材料四　鲁中吟——孟良崮战斗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点点星灿烂,照明处处火如潮,
短兵肉搏争山顶,炮击血飘湿战袍,
蒋贼主力今歼灭,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王牌也难逃,
蒋贼专横嗟命薄,美帝侵略徒空劳。
华东战场今转捩,沂蒙山区更固牢,
更喜急雨催麦熟,胜利日近乐陶陶。

(选自《陈毅诗词选集》)

全国土地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发动农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土地改革开始向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土改运动没有展开,同时没收和分配土地也不彻底。为了总结经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充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问题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内状况、农民组织及发扬民主问题,通过了《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

《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分土地,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都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乡村各级农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负责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的多余财产,分给贫民。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

《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完备的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纲领,为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供了指导方针,也为彻底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提供了法律依据。1948年底,老区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约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材料: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
-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见"历史档案")
-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
- 西柏坡土改风云
- "黑脊背"的人都上了红榜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十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改革,已有巨大的成绩及丰富的经验。今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

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材料二　中国土地法大纲(见“历史档案”)

材料三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纠正了“左”的偏向后顺利发展，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阶级关系，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到 1948 年 9 月，解放区已在大约 1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到 1949 年上半年，东北、华北、西北、山东和苏北等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业已全部完成，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翻身农民从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约 2.5 亿亩土地，约 1 亿农民分得了土地。中农也普遍获得了利益，分得土地的中农数，约占得地户总数的 10%；在分配没收财产方面，得益的中农户数约占得益总户数的 15%，占全部中农户数的 50%以上。

封建土地制度的消灭，彻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阶级关系。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广大贫雇农生活普遍上升而成为新中农，就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中农生活水平的贫农，其经济状况也较之土改前大为改善。在政治上，翻身农民扬眉吐气，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他们不但掌握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而且选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从而巩固了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其次，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解放被封建剥削制度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后，广大翻身农民获得了日夜盼望的土地，莫不欢天喜地，生产积极性倍增。另一方面，解放区各地党和人民政府，在土改后也迅速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农业生产上，奖励农民生产发家，提倡组织起来变工互助，大量发放农贷，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如华东、华北解放区，虽然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又不断遭受自然灾害，但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农业产量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有的地区很快赶上和超过战前水平。东北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两年中扩大耕地面积达 210 万公顷。1948 年每公顷产量达 1920 斤，较之 1947 年的 1500 斤，增产 1/4 以上。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手工业与副业生产也大大发展。如晋西北一带在抗战前根本没有手工纺织业，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中手工纺织业开始发展，土改后又有更大的发展，临县、保德一带已是村村织布，户户纺纱。随着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好转，广大农民积极缴纳公粮。东北解放区农民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共缴纳公粮达 450 万公斤；1948 年底起征的公粮，不过月余，即已完成 95%。这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获得胜利的强大经济基础。

第三，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千百万翻身农民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直接支援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据统计，华北解放区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华北全境解放，有近百万翻身农民参军。其中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到 1948 年春，即已动员了 36 万青壮年参军。东北解放区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共有 160 万人参军，其中绝大部分是翻身农民。广大翻身农民不但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兵源充足，而且大大提高了兵员的政治质量。1948 年和 1949 两年，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招收的新兵，政治质量都比较高。华北渤海区新兵中，党员和村干部占 14%；华东区新兵中，贫雇农和中农占 90%；太行区的新兵中，18 至 25 岁的青年占 70%。他们一到部队，很快就成了我军政治和军事骨干。另外，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国民党士兵被俘后，经过简单的诉苦教育，很快就能觉悟，掉转枪口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到 1948 年 9 月，我军即溶化了 80 万俘虏兵，使他们成了解放战士。以后溶化的俘虏更多。许多淮海战役初期被俘的解放战士，到战役后期即有立功升排长的。我军之所以能如此大量的争取俘虏兵，实行“即俘即补”的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得力于土地改革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支前的革命热情也空前高涨。据统计，山东解放区从 1946 年 7 月解放战争开始，到 1948 年 9 月济南战役，两年中支前民工达 580 万人；华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的劳力负担，全区平均每人每年约达 45 个工；冀中区从 1947 年青沧战役到平津战役结束，先后有 480 万民工支前，有的民工队随军出征，转战于冀东、察南，往返行程达万余里；安国民工队随军出征，英勇顽强，纪律良好，获得“钢铁民工团”的光荣称号。东北解放区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先后有 130 万民工，17.46 万多副担架，12.36 万多辆大车，46.7 万多匹马为前线服务。1949 年 4 月解放军大举南下时，冀鲁豫沿黄河的船工，破天荒以几千只木船架起一座可以通过载重汽车的浮桥，使大军得以迅速南进。1949 年 4 月 21 日我军强渡长江，当时沿江广大农民同渔民、船工一起，用成万只木船，支援渡江作战。一夜之间，万船齐发，把我

30万大军胜利渡过长江。

总之，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密切关系着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保卫了土改的成果，土改后翻身农民又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可以说，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正是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伟大成果的集中体现。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四　西柏坡土改风云

中央工委到西柏坡不久，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朱老总来了一封信：

朱、刘：

各电均收，处置很对。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们身体很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本月9日至11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弯、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毛泽东　　6月14日

信中说的“处置很对”，是指少奇他们到达阜平时，就发现土地改革搞得很早的晋察冀解放区，现在正以“复查”的名义，又搞起了比第一次还要激烈的大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贫农团乱打乱杀人……，对此，少奇和朱总已作了“处置”，并电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少奇在陕北时即患严重的胃病，由于工作繁忙，本来就瘦弱的身体，越来越消瘦了。毛主席叫他“休养一个月，病愈后再工作”，他哪能呢。为不使土改再出偏差，他决定下乡私访。

西柏坡到四乡去的道路，只能步行或骑马。卫士长李长有和少奇骑马下乡，刚转了一天，少奇就发了疟疾，连马也不能骑了。

虚弱的身体，加上疟疾的反复折磨，少奇面黄肌瘦，全身无力，但他还是坚持天天下乡。

刘少奇遵照中央的指示，通过两个多月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和土改试点县的经验总结，全面总结了中央《五四》指示发布以后土地改革的成绩和问题，研究了下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7月12日给中央写了《关于土地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7月27日，中央对少奇的报告作了批示，同意土地会议的进行方法。特别提出：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恶石沟沟口，小河边的打麦场上。场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场北头有个稍稍高出场面的土台子，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两条长凳子，作为主席台。场东边是个不太高的土岸，岸下是条小河沟，岸上排放着一溜小石块。场的四周长有几棵槐树和大叶杨，槐树还不大，大叶杨的枝干又很高，并不能遮住场上的阳光，于是，在场的上空搭起一个布棚，尽管没有会标，却也显得很气派。

布置会场的李长有觉着会场上空荡荡的，想请示一下，借些凳子来让与会者坐。正好，少奇和朱总一起来，李长有上前请示道：

“胡服同志，这场上是否再放些桌凳，要不，与会者在哪儿坐，在哪儿记呢！”

少奇坐在场边一块石头上，然后又拍了拍双膝，对长有说：

“可以以石作凳，以膝当桌嘛！”

7月17日上午，刘少奇站在土台上的那张条桌后面宣布会议开幕。旁边的另一张条桌后坐着两名记录员。

卫士给朱总借来一把木板椅，朱总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台下100多名代表，有的坐着大小不等的石块和小板凳，有的坐着高低不齐的木墩儿和草墩儿。他们是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吴玉章、徐特立、安子文、冯文彬、钱俊瑞、康克清、田家英、康生、陈伯达、谢觉哉、毛岸英、李雪峰……

会议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印发的主要参考文件有，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历次会议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若干文件。

会议开始阶段，集中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此时，每天少奇和土地会议主席团同志分别与晋冀鲁豫、晋察冀及远道来的代表进行座谈。

由于工作忙碌，少奇根本没接受毛主席让他休息一个月的劝告。会议上他一直抱个暖水袋，捂在肚子上和大家座谈讨论。一次，他坐在主席台上讲话，胃疼难忍，头上出了豆大的汗珠，与会者见状替他担心，劝他休息，他却微微一笑，继续坚持开会。

会议在汇报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了分析、讨论阶段。少奇针对存在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初步设想，并于8月14日报告了中央。他说：“两个月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的条件。”少奇预计要达到改造党政民组织和干部，真正树立民主作风，将要经历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必将有数十万党员及干部被群众抛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果断地指出：“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

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为此，少奇提出了几项建议，供主席团及会议讨论，同时上报了中央：

第一，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一切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完全忠实和正确的执行，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

第二，建立各级农会代表会，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全国农民总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政府公粮、预算、征兵、征夫计划等，经农民代表会通过后实行。经农民代表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官僚主义，树立雇贫农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地位。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

第三，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和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集会、自由等权力，监督、鉴定、选举与罢免自己的勤务员——各级干部，反对干部非法侵犯人民权力及压迫人民，并对过去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适当自我批评；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监督，尊重人民权力，服从群众的决定，为人民作长工。党员要严格遵守纪律。

第四，根据地党员是秘密的，有些地方群众要求党员公开，并要求由农会或贫农组介绍党员，此要求可以接受，无害处。巩固区的党员可以公开。

第五，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土改期间，必须劝告家属接受农民要求，不得反抗群众。他们除特许者外，不要在本县、本区工作。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侵犯人民权利，作假报告欺骗上级，封锁上级人员了解情况，威胁报复群众，破坏党群关系，隐瞒自己成份与历史或隐瞒其他党员的非法行为等，须受到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第六，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要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调查审讯，做出结论。“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和大刑逼供等行为。

第七，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及犯罪干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方针。

会议在集中讨论了土改中的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问题与民主问题后，又集中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主要是关于平分土地的问题。少奇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新华社8月2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大家就平分土地问题集中进行讨论。他说，过去我们的会议没有集中力量讨论政策，大家注意力所集中的是党内问题，注意党内问题，政策问题被忽视了，这是不大好的。讨论中，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少奇讲，平分土地“从理论上讲这是更好的，更彻底的消灭封建的办法。”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在9月13日结束。少奇作了最后总结。通过了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剥削制度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报告了中央。

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结束之后，与会者立即行动起来，奔向陕甘宁、冀热辽、晋冀鲁豫、东北、华北各个解放区，去进行那开天辟地的从未有过的“伟大工程”。工委书记刘少奇为掌握《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实施情况，他把中央工委机关里的大部人马，都抽调了出来，组成两个土改试点工作团。一个分赴平山县，由冯文彬任团长，并兼平山县委书记，试点村设在封城；一个分赴建屏县，钱俊瑞任团长，兼建屏县委书记，试点村为南庄、北庄和夹峪。这三个村都在西柏坡的周围，最远的四华里。

（选自《纵横》95年1期，作者：阎涛）

材料五　“黑脊背”的人都上了红榜
——崞县大牛堡成立农会速写

上弦月从栽着圪针的土墙上射进来，照着小小的院子，照着院子里的人群。这里正在开第一闾的中贫农会议，讨论重新成立农会的事情。

赤贫任来老汉说：“咱们好比是山上割回来的条子，这些时都熏好了，往起一编就是个簸箕，一成立农会就有个收揽了。说起成立农会，年时也成立农会，年时也成立过，咱也记上了名字，实数说，就晓不得农会是作甚的。那时人家叫咱记名咧，咱肚里思谋：记上吧？摸不见作甚，怕跟上受害；不记吧？又怕人家说你不随人家。后来想，管那狗日的咧，反正咱穷的要甚没甚，他爱怎就怎吧，就记上了。”众人接着说：“年时农会就是个那，咱就谁也闹不清是作甚的！”

钉鞋匠邸恒义说：“今年老马他们刚来时问我们说：‘你们村有农会没？’我说：‘有哩！’他们问说：‘有多少人？”我说：‘有一个。姓段，叫忠厚。’咱以前还当农会就是农会主任一个人的咧！”逗的满院子的人笑了。邸恒义说：“你们不要笑，以前就是翻不清楚。”有人追问说：“你这阵翻清了没？”邸恒义说：“你还考我咧！农会！农会！这到说就了，就是咱们‘黑脊背’的会琀！以前阎锡山手里，日本人手里有个村会，那是‘白脊背’的会，印把子在人家手里。这阵印把子要握在咱们‘黑脊背’手里，咱们大家当家管村事，不能由‘白脊背’作主。”

彭万富说：“农会是‘黑脊背’的会，可是年时‘白脊背’也进来了。就说地主邸明正，娶的大小老婆、住的高门楼大瓦房，可是年时人家也入了农会，记的是二等贫农，还分了东西，他要订成贫农，咱就该订个‘没农’了。”

人们紧接着吵开了。这个说：“年时没闹揪！今年可要

好好挑簸咧！不能让坏人混进来。"那个道："年时一算完帐，农会也散了，从今以后，可万万不能，农会散了，咱穷人们还当甚的个家？掌甚的个权？"

接着，便报告参加农会。

任来老汉说："年时人家叫咱记，咱还不想记，今年先把咱记上。"人们都报开名了。

"记上我，彭俊喜。"

"赵记灵！记上。"

"彭润年！"

"……"

在逃亡地主邸德胜的院子里，坐满了开会的人，当院月季花前边的凳子上，摆着三盏麻油灯，在四周房屋的玻璃窗户上，反映出无数盏灯光；人们乱纷纷的吵着，听不清的声音；雇贫农代表任天才，宣布了开会，人们才静下来。他说："成立农会就是咱们把人马团结好，和地主交兵打仗。各闾参加农会的人都报名了，咱们再审查一下，看还有那些人不够条件。

审查到二闾任现龙时，众人高声的说："根本不能要。"

"他以前是甚光景?！当承审员，从小享福；这阵人穷了心还没穷。"

他是"白脊背"，不是"黑脊背"，农会不要。

提出四闾海瑞的名字时，人群中马上喊道："不要，不要！"大家都知道他是玉石嘴，从小住钱铺，日本人在时当过伪助理员，能说会道尽溜舐地主老财。

灯影下，看不清是谁，大声说道："海瑞是溜地主的好把式，上次借粮时，他替地主说话；大家问存海家要下一石，他倒替地主说没啦了。"

"不要他！不要他！"

会议在热烈的进行，各闾难决定的人，一个一个的被提出来审查，不够条件的人，都被踢出去了。

八月九日，好天气。午后，街当中的南墙上，贴出了农会会员的大红榜。村子里特别显得热闹，满街的人，从东头到西头，到处是喜眉笑眼的人群。"黑脊背"的受苦人，为一种新的喜悦所鼓舞。看完榜的人，一伙又一伙的散走，来看榜的人，一群又一群的拥来。不识字的人，也挤在人群中，仰着头，眼盯着榜，让别人念给自己听，当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便满意的笑着走开了。

彭万富老汉，多皱的脸上，充满了无限的愉快，对人说："世事翻转啦！咱们这些'黑脊背'受苦人上了红榜啦！从前只有村会上派出款来，单单上才有咱的名字。"

几千年来被歧视的人，和泥土太阳交朋友的人，被"白脊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这会都挺着胸脯站立起来了。

各闾上了榜的会员，一群一伙的集聚到阴凉处，一面抽烟，一面酝酿选农会委员的事。

村西头"栖云观"庙院里，开起了大会，斜阳从耸高的松柏树间晒下来，庙院里充满了烟草气息；"黑脊背"的受苦人们以主人翁的资格，大胆的讲述自己的意见。在吵杂声中，东角上有人站起来说："这是咱们一家人的会，斗完地主后，也永久要成立，要替咱们'黑脊背'作主！"众人齐声说："这意见对！好意见！"西角上又有人立起来说："入了会就要和地主斗到底，不要半路上打拆了。也不要退前缩后！"

"……"

经过了热烈讨论以后，农会会员们选出了自己的十五个农会委员。

（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晋绥日报》，作者：马烽　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背景介绍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承认民族平等、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要求。同时，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表达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愿望。宣言所提出的八项基本政策和口号，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拥护，对正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人民，起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材料：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解放军口号

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解放军口号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政首长们：现在我们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六十七条。你们接到后，应即发给全军指挥员、战斗员，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同时，在你们所到之处，你们应当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的书写、张贴、印发、宣讲，

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

(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二)打倒背叛政协决议的蒋介石！

(三)打倒破坏停战协定的蒋介石！

(四)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

(五)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六)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

(七)打倒屠杀人民的蒋介石！

(八)打倒欺骗人民的蒋介石！

(九)打倒摧残人权的蒋介石！

(十)打倒横征暴敛的蒋介石！

(十一)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

(十二)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

(十三)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十四)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

(十五)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

(十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进犯军！

(十七)审判战争罪犯，赔偿人民损失！

(十八)解散特务机关，拿办杀人凶手！

(十九)打倒四大家族，没收官僚资本！

(二十)打倒贪官污吏！

(廿一)打倒土豪劣绅！

(廿二)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

(廿三)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廿四)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

(廿五)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廿六)取消苛捐杂税！

(廿七)保护民族工商业！

(廿八)改善职工生活！

(廿九)开仓济贫！

(三十)农民分土地，耕者有其田！

(卅一)平分土地，废除旧债！

(卅二)国民党士兵分田废债！

(卅三)人人有地种！(或：人人有田耕！)

(卅四)人人有饭吃！

(卅五)人人有衣穿！

(卅六)人人有屋住！

(卅七)人人有工作！

(卅八)人人有书读！

(卅九)男女平等！

(四十)民族平等！

(四一)宗教自由！

(四二)保护华侨！

(四三)保护外侨！

(四四)美军退出中国去！

(四五)否认卖国外交，废除中美商约！

(四六)不许日本侵略势力复活！

(四七)中美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四八)东方各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四九)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五十)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

(五一)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蒋介石代表贪官土劣！

(五二)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五三)穷人要翻身，加入解放军！

(五四)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五五)不拿人民一针一线！

(五六)爱护解放军伤兵，优待解放军家属！

(五七)解放区是全国人民的总后方！

(五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厉行生产节约，支援前线！

(五九)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

(六十)国民党党员们，脱离孙中山叛徒蒋介石！

(六一)蒋军官兵们，不要替贪官土劣打仗！

(六二)欢迎蒋军官兵加入解放军！

(六三)坏人悔过自新，准许将功赎罪！

(六四)蒋介石必亡，共产党必兴！

(六五)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六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六七)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延安保卫战与陕北三战三捷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集中三十四个旅共二十五万余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三月十三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以十五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发起全线攻击。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下，以西北野战部队教导旅等部担任阻击，依托有利地形，交替掩护，节节抗击。并以地方武装和民兵，采用地雷战、游击战和破坏道路桥梁等手段，阻敌前进。经激战六昼夜，胡宗南部受到重大杀伤，被迫放慢进攻速度。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于是先后完全转移。三月十九日，西北野战部队主动撤出延安。此役，共歼敌五千余人。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部队采取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首先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诱敌主力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追击，而将主力五个旅埋伏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布成一个袋形阵地。三月二十五日，敌被解放军所惑，以五个旅扑向安塞。当敌第三十一旅由拐峁出动北犯，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完全进入解放军伏击圈时，西北野战部队采用拦头断尾、两翼夹击的战法，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一个旅部及一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旅长李纪云被俘。

青化砭伏击战役后，国民党军集中了十一个旅由安塞、延安等地分三路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企图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部队利用有利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以"蘑菇"战术与敌反复周旋，使敌人屡屡扑空。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国民党军以八个旅的兵力，向蟠龙和青化砭西北方向急进，并令第一三五旅由子长县南下配合，企图围歼西北解放军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西北野战部队以两个旅钳制胡宗南部主力，并诱其奔向蟠龙西北；又以四个旅的兵力埋伏在羊马河地区，求歼孤军南下之第一三五旅。十四日晨，敌第一三五旅分两路沿子长、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十时许，该敌进入解放军伏击圈内。西北野战部队立即发起全线攻击，经过七个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四千七百余人，俘第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及团长成辉煌、陈简。

羊马河战役后，国民党军错误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绥德附近地区，遂以第一六七旅及地方保安团队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镇，将主力九个旅由蟠龙疾速开进绥德，并令榆林守军南下配合。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节节抗击，诱敌北上；集中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四旅及新编第四旅，四面合围蟠龙；另以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第三五九旅在清涧以西担负阻援。五月二日，敌九个旅抵进绥德。当晚，西北野战部队对蟠龙镇守军发起猛烈攻击，战至四日，全歼第一六七旅等部共六千七百余人，俘旅长李昆岗，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此役，连同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称为陕北三战三捷，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材料：

- 毛主席谈撤离延安
- 转战陕北
- 延安保卫战
- 毛泽东巧设"蘑菇"胡宗南三扑三空
- 三战三捷
-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 "我们是从人民来的"——周恩来转战陕北中的一些事迹
- 蟠龙一战之后（诗）

材料一　毛主席谈撤离延安

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从房里走出来。当他那魁梧的身材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的眼睛顿时明亮了。主席顺手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子上，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说："让你们久等了。"随即又幽默地说："你们看，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说着就爽朗地大笑起来。主席的胸襟是这样博大开阔，由不得我们也跟着笑了。

两位旅首长曾在党校学习过，听过主席讲课，想不到主席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们的名字。旅首长见过主席以后，又把我们介绍给他。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炯炯明亮的眼睛，亲切地端详着每一个同志。

就座以后，主席象待亲人一样请大家吸烟："两种烟随便吸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给咱们的呢！"说着又愉快地笑起来。主席的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使我原先的紧张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这时看清主席的身体很健康，穿着一身延安织造的粗呢制服，圆口布鞋，虽然工作那样劳累辛苦，脸上却没有倦容，神采奕奕，透着健康的红润。

主席点燃了一支烟，问旅首长部队在西华池打得怎么样，伤亡大不大？战士们情绪好不好？旅首长一一作了回答，并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了部队目前的情况。主席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轻声地插问一句。听到战士们打仗英勇顽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的决心很大时，主席连连赞许说："好！"然后又问大家："我们要撤出延安，战士们有些什么意见"?旅首长告诉主席：指战员们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战士们保证不让敌人进延安。主席听着听着，好象是看见了我们的心，接着就问："你们又有些什么想法呢?"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主席："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主席听了笑着说："你可以放枪呀，你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停了片刻，主席又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说到这里，主席又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里含着对敌人的鄙夷和蔑视。笑声感染着我们，大家也跟着欢畅地笑了。主席接下去说："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听到这里，我真感到有些惭愧，自己的眼光太短浅

了！只听主席继续说道："你们这些干部，首先要把问题想通，然后才能给战士把道理讲清楚。只要战士们认清了目前战争的形势，懂得了党的战略，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胜仗。"主席接着给我们仔细讲解了目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谈到从1946年7月以来敌人损兵折将的数目，被迫放弃"全面进攻"，不得不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又谈到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失败和危机，谈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会太远了。……主席的分析是那样精辟、透澈，说得又是那样通俗动听，时而插上句幽默的笑话，那样引人入胜，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很高的思想境界里。直到有人来请主席去接一个要紧的电话，大家才又回过味来。

主席接完电话回来，兴致还是那样高，问我们："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离延安呀！"大家齐声回答说："主席分析得很好"。主席又燃着一支烟，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你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望着主席，都愉快地笑了。主席接着说："不止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暂时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主席又举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许多生动事例，说明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历来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必然取得胜利。望着主席宽阔的前额，智慧的眼睛，聆受着他的亲切教导，我好象已经看见胜利的红旗在到处飘扬，心里感到十分兴奋。

（选自《解放军文艺》，1960年10月）

材料二　转战陕北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集中九十个旅，近七十万兵力，向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他们企图压迫我西北部队和党中央、毛主席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黄河加以封锁，再调兵遣将进攻华北，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十三日，延安上空连续响起了防空警报，几十架美制飞机轮番向延安袭来。霎时，引擎声、机枪声、爆炸声连成一片，整个延安都在燃烧。

当时，我正随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在离延安不远的永坪。得知这一消息，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直到在瓦窑堡汇合，亲眼见到毛主席安全无恙，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那几天的轰炸是蒋介石派他的嫡系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全面围攻，矛头直指延安。当时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是二十三万，可以说是一比十。能否抗击这样众多的军队，各个解放区的同志都很担心，纷纷来电劝毛主席、党中央离开陕北，离开延安。毛主席坚持主张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留在陕甘宁边区。毛主席说：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部署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并决定从十七日起陕甘宁边区各兵团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十八日前中共中央和各机关、学校撤离延安，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可是到三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多钟了，毛主席的窑洞里依然灯火通明，他和周副主席还在商量下一步如何诱敌深入、如何指挥陕北战争。就在这时，王震同志突然从黄河东岸率领一个纵队到了延安王家坪，劝主席赶快离开，毛主席却高兴地握着他的手问："最近身体怎样？还健康吧？"直到延安已是一座寂静的空城，毛主席才在众人的催劝下登上了汽车。后来，毛主席一行和我们在经过飞机场、桥儿沟、拐峁向青化砭前进时，沿途都可以听到延河南岸敌军的枪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他举杯狂欢，蒋介石也大肆吹嘘取得了如何如何"辉煌战绩"。殊不知毛主席虽然选择了东去的一条路，但是，不仅没有东渡黄河之意，甚至不打算避胡宗南而远走。我主力部队就在延安附近活动，毛主席就坐镇在离延安不远的地方，以逸待劳，"请君入瓮"。原来毛主席在撤离延安前就与彭德怀同志商量好，特别要我三五八旅大摇大摆地向安塞以北撤退，以小部兵力诱敌，而我主力则埋伏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即我军从延安撤出后的第六天，敌人果然中计，我在青化砭全歼敌三十一旅旅部并一个团共三千余人，还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环境和任务，党中央从王家坪经瓦窑堡到了清涧城北七十里的枣林沟，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党中央分为三委——由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工作委员会，包括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简称前委，留在陕甘宁边区继续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职权。由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迁到黄河以东，执行党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后委，随工委撤到晋西北。四月三十一日，进犯绥德地区的敌人占领了清涧县城。这天上午，毛主席让我把任弼时、陆定一、廖志高同志请来，谈了他早已考虑好的意见：中央机关留下的人员，按军事编制武装起来，组成四个大队，成立中央支队司令部，统一行动，统一指挥，轻装前进。毛主席说："任弼时同志任司令员，陆定一同志任政治委员，廖志

高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并指定我任参谋长。为了对外保密，毛主席改称李得胜，美髯公周恩来同志改称胡必成，任弼时同志改称史林，即湖南方言谐音"司令"。陆定一同志改称郑位即政委的谐音。从这以后，这支轻装的部队就形影不离地跟随在毛主席身边。部队司令部下属的四个大队分工是：一大队为直属队，二大队为电台、机要部门，三大队担任侦察、情报工作，四大队为新闻单位以及警卫团。说起来好象支队有多少人似的，其实统共只有几百人。既精干又便于同敌人周旋。

毛主席和党中央把陕北人民广播电台转移到了太行。但是，愚蠢的敌人以为它仍在陕北，并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已东渡黄河。而实际上，毛主席、党中央却一直坚持在陕北、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才离开。人民群众和毛主席心连心。要说在陕北许多群众都见到过毛主席，而且不少群众的家中都挂有毛主席的画像。毛主席所到之处，无论怎样保密，群众中总有些人能认出他来。但是陕甘宁广大的劳苦大众深深懂得是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们才真正翻了身。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就是豁出命，也要保住这个"最大的军事秘密"。当时在陕北的沟边路沿经常可以看到群众赶着小驴，驮着粮食，用手推车载着猪羊，用肩扛着军鞋……踊跃支前的热烈场面。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无私地支援着前线，保卫自己胜利的果实，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了毛主席啊！

四月十四日，我军又取得了羊马河战役的胜利，歼灭敌人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毛主席在四月十五日提出了著名的"蘑菇"战术。毛主席说："要把敌人磨得十分疲劳，让我们牵着鼻子打。到那时，胡宗南这只被拖瘦、拖疲、拖垮的牛，就不堪一击了。"此后，我军又在转战中取得不断胜利。五月攻占敌补给站蟠龙；接着出陇东，攻榆林；八月又在沙家店歼敌一个精锐师。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战场的解放军为保卫延安，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主动向敌军出击，华东、华北各解放区，连连告捷。

在陕北转战中，条件是十分艰苦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虽然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后，年年号召干部群众备荒，还取得了十年连续丰收，但是在胡宗南的进攻下，加上坚壁清野与连日转移，生活上增加了不少困难。毛主席和我们一样只吃杂粮、玉米、黑豆、即使是这样，毛主席仍然十分乐观，有时面前的菜吃完了，主席就风趣地说："哪个国家还有菜啊？"至于情况紧急常常吃不上饭，还要赶着行军，倒真成了家常便"饭"。记得八月十九日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来到白龙庙，这里离佳县敌人仅有二十多里，天又下着雨，部队已经连续七昼夜急行军，有的同志提议住一宿再走。毛主席不容置疑地说："可不能住下，雨夜近敌，容易遭到袭击。人困马乏，难以抗击哟！"部队冒着大雨离开了白龙庙。整整走了几个钟点，直到朱官寨才宿营，这时主席身上早被雨淋湿了。后来听说敌人果然在当晚占领了白龙庙。

第二天，毛主席返回葭芦河西，来到梁家岔，通知立即架电话。不一会儿电话架好了。毛主席高兴地说："这样快就架好了，很好！"抓起电话机与彭德怀同志通了话："我是毛泽东，可能的话，把各纵队负责同志都叫来……"当晚，即发生了被史家称为"标志着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彻底破产和西北野战军反攻开始"的沙家店战役。两种命运的决战迫在眉睫。早在七月下旬，毛主席、党中央就在榆林附近的小河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还有从其他解放区赶来的贺龙、陈赓以及已在小河的彭德怀、习仲勋等同志。以前，毛主席都是直呼我的名字，那天他突然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得叫你参谋长了。"见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主席接着说："前方来的同志都很辛苦，生活上要尽量想办法搞得好一点。能不能慰劳慰劳他们，就看你参谋长的本事罗！"说实在的，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由于战斗紧张，连毛主席也难免饥一顿，饱一顿，每到一地，常常是有什么吃什么。现在毛主席让我慰劳大家，我用什么去招待啊?!但想到他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这次又翻山越岭，跨越黄河而来，我真想搜尽天下的山珍海味，摆上几桌酒席，让我军的高级将领们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酒，舒舒服服地吃上几口菜，再美美地睡上一觉。然而……酒是见不到的。"宴会"开始了，将领们吃着我使出九牛二虎的劲儿拼出来的一道"陕北大菜"：鸡肉、猪肉烧土豆，啧啧称道。要说小河的"宴会厅"和"会议室"，现在就是掘地三尺也找不到它的踪影了，那不过是用临时从山上打来的柳枝搭成的遮荫小棚。一九四七年夏秋，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渡过黄河南进，转入外线作战，从此，我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进攻阶段。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渡黄河，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坚持留在陕北。这一事实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还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前夕，毛主席就曾高瞻远瞩地说：敌人占领延安的时间，少则一年，顶多两年。结果是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占领延安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不得不败北而去。我们给敌人的只是一座空城，而得到的却是时间、民心和伟大的战略转折。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夺取全国胜利，党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同志共二十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说："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美国主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他们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了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

我们敌人的赌注是彻底地输了。"毛主席最后坚定的一挥手说:"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和指挥,全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过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内线作战,解放军歼灭了敌军九十七个半旅一百一十二万余人。之后解放军在外线各个战场的作战,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号召。

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

有人问起我这一幕幕战斗的经历,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共产党的"共"字吗?就是廿加八,也就是二十八年啊。是的,从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诞生之日到全国解放之时整整二十八年啊!

(选自《中华英烈》86年5期,作者:叶子龙)

材料三　延安保卫战

3月12日,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序幕拉开了。他先用当时国民党空军五分之三的兵力对延安及其周围进行狂轰滥炸。3月13日,各路攻击部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14日拂晓,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一线展开12个旅,实施多路攻击,企图三天内占领延安。我防御兵团教导旅及警备7团,依托第1、2防御地带灵活机动,交替掩护,节节抗击,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口号鼓舞下,与敌顽强拼搏,使敌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延属分区独团和民兵游击队密切配合野战部队作战,以地雷战,游击战和破坏道路桥梁等手段,阻敌前进。我军顽强的抗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经三日激战,敌才突破我军第一线阵地,进至金盆湾,马坊、麻子街以南一线地区。

3月15日,彭德怀司令员鉴于一线防御兵团已经按计划完成预定的战役任务,于是将战役预备队展开,占领了甘泉、程家沟、大相寺一线的第三防御地带。我新4旅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警7团向甘泉西北地区转移。

3月16日,敌调整部署,再次发起进攻,但因惧怕遭我地雷战和夜袭,改变了战术,昼攻夜停,谨慎前进,黄昏前即停止进攻,露宿山头,避免与我夜战。天明后,以抢掠群众的耕牛踏雷开路,而后集团冲锋。我1纵及新4旅及时地研究了敌人的战术变化,除继续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外,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则,白天集中必要兵力固守敌主攻方向上的要点,控制要道,谷口,结合地雷战和游击战,灵活多变地打击敌人;夜间则使用掌握的预备队或机动次要方向上的兵力,对敌实行反冲击,杀伤敌人或夺回白天丢失的要点。就这样,我军一紧一松;使胡军从早到晚,推进不到二十里,而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

3月17日,董钊仍于第90师的53旅和61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又遭我教导旅一部阻击,双方逐山争夺,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杀伤蒋军400多人。使敌人只前进了20里,而后,我教导旅一部离开阵地,向北转移。

3月18日,董钊命令第1师和90师竭尽全力攻击。这天上午,90师的左纵队61旅旅长邓钟梅,亲自到前线督战,攻到狗梢岭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反击,将该旅正面的一个营打垮。此时董钊赶紧调动预备队增援,才稳定下来。下午,由于我党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已疏散完毕,给敌以重大杀伤之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彭德怀司令员下令各阻击部队按计划撤离,此后敌90师跟进到狗梢岭以西地区,其先头部队则到达离延安15里之地。因已近黄昏,不敢再进,于是90师师部就在杨家岭宿营。

19日,天刚蒙蒙亮,董钊的第1旅在飞机掩护下,向延安城内进犯,由于不知我军虚实,害怕遭到伏击,一路上提心吊胆,东张西望,一直挨至中午才将爪子伸进延安城。胡宗南为了向南京邀功请赏,大肆吹嘘胜利。其第1军军长董钊由延安拍回西安的第1封电报称:"我军经7昼夜之激战,第1旅终于3月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好家伙!何等辉煌的胜利!谁都知道,当时在陕北的解放军全数也不过2万多人,即使全部做了董钊的俘虏,数目还欠一半啊!不过,"胜利"总是令人兴奋的。蒋介石一接此报,着实高兴了一番,似乎在绝望中捞到了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个月前因莱芜战役惨败而自叹"命苦"的陈诚,此刻也象打了针强心剂,又吹嘘起什么"三个月之内可以击溃中共的主力"了。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更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一律在当天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燃放爆竹,庆祝"陕北大捷"。胡宗南为应付参观记者,在延安周围建了十座战俘营,抓来村民500多人,再从其部队抽调1500名"伶俐"士兵,来充当战俘。并把自己的武器白天送到"战绩陈列室"展览,晚上取回,以防夜间解放军袭击。

但是,肥皂泡是要吹破的,弄虚作假之事总不免露出马脚。当记者提问:"这些新式美械武器,共军是哪里弄来的?""嘿,昨天在那个战俘营我不是见过你了?怎么你又来这里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时,"表演者"因排练时都没有准备,故无法回答。好在胡对这些"演员"们都事先约法三章:"当你无法回答时,要挺立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一言不发。"这才没有大露真相却也滑稽之极。

(选自《百战图》,作者:苑辉)

材料四　毛泽东巧设"蘑菇"胡宗南三扑三空

一、一设计诱胡军北上安塞打伏击青化砭初次祝捷

早在我军撤出延安时，党中央认为，我军撤出延安，胡宗南不可一世，必然不顾士兵的疲劳，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同时，敌人进入延安立足未稳，也必然派出警戒部队，向东北方向的蟠龙一带伸展，以保延安外围。而青化砭是延榆公路的咽喉，是去蟠龙的必经之道，地形险要，便于我伏击敌人。3月17日晚，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同志又筹划一夜，决定用一支部队故意摆开阵势，佯装大兵团转移的样子，去迎合敌人的决战心理，把敌人的主力引往延安西北方向，而将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寻机歼敌。毛主席考虑，这样一来我军在青化砭一带集中优势兵力，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可以速战速决。3月18日拂晓，主席又把西北我1纵司令员张宗逊，2纵司令员王震等同志接到延安，一起研究了"青化砭"这着棋。当天，在研究西北作战大计的会议上，又详细讨论并决定了青化砭战斗的部署。一切安排停当之后，主席才从容地离开延安。

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他哪里知道这一切。3月24日，我1纵独1旅在王尚荣旅长指挥下，带领大队人员，漫山遍野地向安塞方向撤去。胡宗南一听到此消息，顿时按捺不住激动，立即派其"天下第1军"的董钊亲率5个旅，催马加鞭，猛追上来。

我独1旅且战且退，牵着董钊的5个旅一路上卷起滚滚烟尘，直往延安西北方向拉去。敌人完全被我人民解放军牵着鼻子走了。此刻我1纵主力，2纵，新4旅，教导旅则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隐蔽在青化砭一带，只等另一股敌人前来。

青化砭，三十里大川，公路绕溪而行，两旁都是陡峭的高山，山上长着密密丛丛的杂树。我军5个旅就埋伏在两边的山头上，象一把张开嘴的铁钳。

野心勃勃的胡宗南指挥其主力追赶我1纵独1旅的同时，下令李纪云率31旅(欠91团)由拐茆前出，经青化砭到蟠龙，搜索敌情，保障其主力翼侧安全。

我军在侦悉敌31旅将前出青化砭的情报后，彭总决心按既定决心以伏击手段歼灭该敌。具体部署是：以1纵(欠独1旅)由梁村地区进入阎家沟至林坪公路以西地区，主力配置在小寺沟以西高地，待我2纵切断敌退路后，由西向东猛烈攻击；2纵及教导旅，由阎罗寺，胡家河进至青化砭至房家桥公路以东地区，主力配置在寨子沟、窑子沟高地，待敌后卫通过房家桥后，首先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然后以3个旅由东向西猛烈攻击；新4旅由常家塔进至青化砭东北之赵家沟以南高地隐蔽，待2纵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攻击；独1旅把董钊牵到安塞后，迅速赶到青化砭西侧，为野战军的预备队，监视安塞方向敌军行动，保障我军主力翼侧安全。

3月24日拂晓，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彭总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进入指定地区。但敌人因补充粮食，未能前进。我军乃于次日拂晓前继续于原地设伏。

25日清晨，两架敌机飞临我设伏地区上空，盘旋数圈，向东飞去。由于我伪装严密，敌机没有发现什么。6时许，敌31旅由拐峁向青化砭开进。9时许，敌先头已进"袋口"房家桥，走在最前面的约20余名便衣侦察，沿公路左侧山地搜索前进，大队敌人成行军纵队，山炮，迫击炮，重机枪都捆在骡马背上，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10时许，敌先头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已通过房家桥，完全进入我伏击圈内。彭总一声令下，我新4旅及358旅猛扑而下，向房家桥、惠家砭方向出击，迅速封闭"袋口"，断敌退路。顿时，我将敌四面包围，敌31旅被扎扎实实地捆在一个口袋里，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我军东西夹击，南北堵截，猛烈的火力雨注般射向敌人，一时杀声震天。敌人很快乱了阵脚，首尾不能相顾，上下失去指挥，战斗序列顷刻瓦解。敌人躲无处躲，逃无处逃，只好等着挨打。真是干脆利索，仅仅1个多小时，就结束战斗。敌31旅被我军一网打尽，旅长李纪云连同他的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直至马夫，伙夫约3000人，被我军活捉的活捉，打死的打死，一个也没跑掉。枪械弹药，扔了一地，崭新的重机枪，美式发报机，都连着驮骡牵来了，敌旅长李纪云双手托着胸口只说了一句"我的心绪已乱"，直到押下战场，仍愣愣怔怔，好象做梦一般。

撤出延安仅仅6天，我军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这一仗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俘获的人员、马匹、弹药、物资又充实了我们的力量。敌主力5个旅，武装游行到安塞，扑了一空，听说31旅被歼，慌忙赶回救援，而我军已撤往几十里外休整去了。敌人徒劳往返，一无所获。

31旅被歼，使胡宗南就象当头挨了一棒，两眼直冒金花。对于这次惨败，他连声都不敢吭。而我方广播这个消息后，胡宗南更是恼羞万分，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之心更切。可是等着他的又是什么呢?

二、二设计敌主力"游行西北"中埋伏　羊马河又歼强敌

正当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宣传机器在南京，西安大肆"庆祝胜利"的时候，敌31旅被歼，振奋了我西北军民，给了胡宗南一记响亮的耳光。胡宗南恼羞成怒，赶紧把扑到安塞的5个旅拉回来，妄图在青化砭"歼灭"我军的主力，但是又扑了个空。自命不凡的"胡长官"虽然两头扑空，却仍不甘休。当他发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时，又气又恨，立即派他的两员大将董钊、刘戡统率11个旅，以144旅，24旅为右路；以董钊率1旅，167旅，78旅，53旅，61旅

为中路;以刘戡率 165 旅,123 旅,12 旅,135 旅为左路,分兵三路,气势汹汹地赶来。敌人为了接受 31 旅被歼的"教训",采用了蒋介石的所谓"方形战术",一出动就是八、九、十来个旅,摆开几十里方阵,漫山遍野一齐涌来。而我军主力,已转移至蟠龙西北隐蔽休整。为了迎合胡宗南急求决战的心理,彭总决定派新 4 旅的 2 个营和少部民兵,带头迫击炮和重机枪分成两路,一路经甘谷驿、延川,一路沿咸榆公路,在这两条大道上及其两侧山上,佯装大兵团行动,向清涧方向撤退,给胡宗南充当"向导"。胡匪军 7、8 万人,尾随着我军的两个营,东经延长,延川,北上清涧,来了个长途大游行。所到之处,因我群众坚壁清野,找不到一粒粮食,一路上只能啃干粮,睡野地,真是把肥的拖瘦了,瘦的拖垮了。并且不断受到我民兵游击队的袭扰打击。正象我总部发言人所说,敌人饿着肚子游行,本来就已经够苦,还要遭到消灭,那就更苦了。

到 3 月 31 日,敌军到达清涧后,发现自己追赶的原来只是一股小部队,才知上当,又赶紧折向西进,于 4 月 5 日再陷瓦窑堡。但仍见不到我军主力的影子,而且他们所带的干粮都吃光了,士兵拖病的也不少,剩下的都已精疲力竭。正当此时,我晋南陈谢兵团对敌展开了猛烈攻势,攻占候马,截断同蒲,横扫汾河南北,连克翼城,浮山、稷山、河津、新绛等城,直捣秦晋天险禹门渡,大有西渡黄河之势。

胡宗南在进犯扑空,晋南告急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北进计划,企图巩固占领区,抽兵援晋。遂以 135 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 6 日南窜。我为拖住敌人,不使其援晋,遂使一部分主力在永坪西北地区进行阻击,激战两昼夜,重创敌整编 36 师,杀伤敌 6 百余人。

胡宗南集团经永坪一仗,始知我主力其实尚未远离,于是再次来了兴头,企图歼灭我主力后,再抽兵援晋。为集中机动兵力,并解决其补给困难,胡宗南痛下决心,以驻清涧之 76 师的 72 团接替瓦窑堡防务,调 135 旅南下,以主力第 1、第 29 军向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接应。如我主力仍在蟠龙以北地区,则以 135 旅迅速向主力靠拢。以 10 个旅之众一举包围,歼灭我于该地区。

我西北野战军根据以上情况,决心"虎口夺食",以一部抵抗敌军主力,集中主力歼灭由瓦窑堡南撤之敌 135 旅。

4 月 12 日,敌 2 个整编军所率 9 个旅由青化砭,蟠龙地区向西北地区进犯,13 日敌主力继续前进,我 1 纵和新 4 旅一部在"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里"的命令下,采取运动防御,节节阻击,让敌缓慢前进。由于我阻击部队的顽强阻击,使敌误以为遇我主力,从其决战企图出发,坚决抓住不放。我阻击部队遂成功地将敌主力吸引于西,使敌 9 个旅于无用武之地。

4 月 14 日 8 时,敌 135 旅在其代旅长麦宗禹率领下分两路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逐山跃进。9 时许,其先头遭我新 4 旅猛烈堵击。敌仓惶应战,麦宗禹率 404 团赶忙抢占三郎岔以北高地,企图负隅顽抗,405 团见势不妙,夺路而逃,妄想与其主力第 29 军靠拢。该敌刚到我阵地前沿时,我埋伏已久的独 4 旅主力即向敌冲击。该旅 12 团绕到敌之北面以猛虎扑羊之动作突然出击,将敌压下沟去,并击溃敌一个营的反扑,俘敌百余人。14 团抢占有利地形,与新 4 旅协同,完全粉碎了该敌向 29 军靠拢的企图,迫敌退缩到三郎岔东北高地,仓卒转入防御,至此,敌 135 旅全部被我包围。

此时的麦宗禹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向西安绥署和刘戡军部打电报求援。胡宗南一听 135 旅被围,又打起了如意算盘,即令 135 旅就地构造工事,拼命死守,拖住我军,同时电令董钊和刘戡迅速向 135 旅靠拢,企图包围我军而歼灭之。

但是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又岂能得逞。我阻击部队为配合主力歼敌,进行了顽强阻击。敌 9 个旅完全被我阻止,与其被围之敌仅数里之隔,竟不能救援。

我攻击部队决心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各部队主动协同,积极机动,迅速将两股敌人隔开。敌 405 团在我强大兵力四面围攻下,战至 11 时,建制混乱,丧失指挥,我乘势猛扑,一举攻克该敌,歼敌大部,残敌向西溃逃。尔后,我部队稍加整理,继续围攻敌 404 团,14 时许,我各部向敌发起总攻,激战到 16 时,全歼该敌。至此,战役结束,共歼敌 4700 余名,敌代旅长麦宗禹、团长成耀煌、陈简均被我活捉。

我军再战羊马河、又获全胜。新华社社论指出:"135 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上下坡路。""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二三个月内,蒋军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攻势"。"今后事变的发展,将证明这个估计。"

三、三设计　绥德城巧妙周旋乘空虚　战蟠龙再获大捷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 100 华里的一个市镇,四面群山环绕,延榆公路贯穿其间,交通方便,是延安外围的屏障。

敌追赶我军的整编第 1,第 29 军 9 旅之众在无人无粮地区南北奔波,被磨得相当疲劳,由于我边区人民坚壁清野,敌人无粮可取,不得不回窜蟠龙地区就粮。而此时,我主力正隐蔽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休整备战。

就在敌人不知我军去向,百般无赖之时,胡宗南的空中侦察机发现:在绥德、米脂以东黄河渡口集中有大批船只,我军多路小部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蒋介石根据这个情况认为,"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方向集结,并已开始东渡黄河。"因此即令胡宗南主力迅速北进,采取宽大

正面扫荡驱逐之态势，并以榆林邓宝珊部南下，妄图南北夹击歼灭我军主力于佳县，吴堡地区或迫我东渡黄河。

1947年4月15日，毛主席提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针对有的同志提出北打榆林，南出关中的主张，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因此"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1个半月左右)，目的在使其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并指示"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讲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我西北野战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针对胡宗南的企图，为进一步造成敌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条件，决心利用敌人错觉，以一部兵力诱敌主力北上绥德，乘其回援不及之时，我集中野战军主力攻占蟠龙，打掉敌前进补给基地，夺取其补给物资造成敌后方供应的困难，同时锻炼我军攻坚作战能力，如胜利，影响必大。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经过周密策划后，决心以359旅一部及每个旅抽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第4团，第6团及晋绥西渡之独5旅，节节抗击，实施佯动，诱敌主力北进，并在黄河沿岸布置渡河假象，迷惑敌人；以独1旅35团及警7团组成南进支队，奔袭延安以南之公路，扫清临真，南泥湾地区之敌地方武装，以活动于关中分区之警1旅等部向咸榆公路洛川，耀县段出击，牵制敌人，359旅主力配置在永坪东北，监视和阻止绥德、清涧可能增援之敌；教导旅于青化砭以北地区阻击南面可能增援之敌，并扫清青化砭外围之敌地方武装；集中1纵(欠35团)2纵(欠359旅)及新4旅共4个旅的兵力歼灭蟠龙守敌，攻取蟠龙。

4月28日，我各部准备完毕。首先由"教导旅"仓卒向北"转移"，随后"大军"向绥德"撤退"，沿途丢弃一此符号，衣物，扔下几页残缺不全的"转移……东渡"之类的"文件"，沿着"大军撤退"的几条山路，还留下一些模糊可辨的痕迹，给敌人指示路标。

敌人果然上当，在我359旅，独5旅的"向导"下，愚蠢的敌人又把我方这一行动当作大兵团向北"败退"，于是，除留下167旅守蟠龙外，倾巢而出，9个半旅冒着倾盆大雨，一字摆开，在一眼望不尽的黄土高原上，象洪水一样，向北漫去。5月2日，董钊和刘戡"兴高采烈"地进了绥德城，敌经劳师远涉，已疲惫不堪，粮食补给不上，只得靠空投少量熟食充饥。

而此时，我军主力已从四面八方运动到蟠龙镇周围，把蟠龙箍得象铁桶一样，水泄不通。4月30日，我军完成了对蟠龙守敌四面合围的攻击部署。以1纵从蟠龙西北进行攻击，2纵从蟠龙东南进行攻击，新4旅从蟠龙东北及北面进行攻击。

5月2日，就在董钊、刘戡进到绥德城时，我军当晚即对蟠龙守敌发起攻击，守敌依托坚固工事顽抗，经反复争夺，至4日16时，蟠龙制高点集王峁主阵地被我攻克，使敌整个防御趋于瓦解。4日黄昏，我各攻击部队居高临下，以四面八方向蟠龙街区攻击，成瓮中捉鳖之势，至24时，被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所谓最精锐的整编旅——167旅6700余人被我军歼灭，曾当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被称为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167旅旅长李昆岗，连同他的副旅长涂健、参谋长柳届春，团长肖伯廉等一起作了俘虏。我军还缴获了敌六门山炮，一千多匹骡马，四万多套军衣，一万二千多袋白面等大量物资。

我军攻下蟠龙后，被阻在青化砭以北的敌48旅1个团，84旅的1个团，吓得连夜夹起尾巴，冒雨逃窜。北线的董钊、刘戡在我军攻下蟠龙这一天，才在空投粮食的接济下，仓惶率部南下，等到其9日赶到蟠龙，已经是雨后送伞了，只好披起黑纱，呜呼哀哉地超度亡魂了。

此时住在延安边区银行里的胡宗南，知道了蟠龙李昆岗失败的实况后，象发了疯的狂人一样，在办公室里背着手不停地转圈圈，怒气冲冲，破口大骂。初占延安时那种得意忘形的傲气，一变而为愧愤焦急无可宣泄的一股闷气。

有诗云：

胡蛮胡蛮不中用，
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
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
九个半旅象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
不上不下半空中。

这首打油诗，正是当时胡匪军那副狼狈相的真实写照。

(选自《百战图》，作者：苑辉)

材料五　三战三捷

(一)

青化砭，三十里大川，公路两边都是高山，正象张开一条口袋。只是青化砭有个土寨子，要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得让出寨子。但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攻击时的困难；不让出来，又不能全歼敌人。指挥员们计议了好久，没有两全之策。后来我们新四旅七七一团发动干部战士讨论，才想出办法：拆北墙留南墙。因为敌人由南边来，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又减少了我军攻击时的障碍。这个

巧妙的主意立刻被采纳了。

三月二十四日拂晓，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进入指定地区。我一纵队把敌人牵到安塞后，又掉头向东，赶到青化砭参加战斗。刚刚布置妥当，就得到情报，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自延安分兵北犯，已进至拐茆、刘家沟。按路程计算，过午就到这里。但是等了一天，敌人却没有来。许多人沉不住气，纷纷从阵地上探头张望，有的说，敌人的主力已被我一纵队牵到安塞，不会到这里来了。有的说，恐怕走漏了风声，敌人折回去了。天黑，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在拐茆补给粮食，宿营了。

在山头上趴了一天，又冷又饿，手脚都有些发麻。战士们求战心切，稍作歇息，夜半又去原地设伏。天明，果然来了两架敌机，在头顶盘旋两圈飞走了。情报一个接着一个，敌人出动了，敌人进沟了。将近十点钟，敌先头部队闯进了伏击圈，一个个鬼头鬼脑，还朝半山腰扫了一阵机枪，进行火力侦察。战士们一动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目标，大模大样地朝前走。我军一万多人，就集结在这一带，吃饭睡觉，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说明我军具有高度的纪律性、组织性。由于有广大群众掩护，封锁消息，传送情报，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敌人得不到群众支持，完全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二纵就在尾部打响了，我们新四旅设伏地点是常家塔，正捏住敌人的脖子。张贤约旅长一声命令："出击！"冲锋号声直入云霄，顿时枪炮齐鸣，杀声四起，红旗一展，四面高山陡地活了，战士们跃出工事，犹如天兵天将，凌空而降，漫山遍野，只见刺刀寒光闪闪。一纵、教导旅自两侧合击，分割穿插，把敌人斩成数截。山高沟深，敌人躲无处躲，逃无处逃，只好等着挨打。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仅仅一个多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敌三十一旅旅部率一个团近三千人全部被歼。枪械弹药，扔了一地。崭新的重机枪，美式发报机，都连着驮骡牵来了。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也被清查出来，他双手抚着胸口只说了一句话："我的心绪已乱！"直到押下战场，仍是怔怔忡忡，好象做梦似的。

撤出延安仅仅六天，我军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这一仗大大打击了敌人嚣张的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俘获的人员、马匹、弹药、物资，又充实了我们的力量。敌主力五个旅，武装游行到安塞，扑了一空，听说三十一旅被歼，慌忙赶回救援，而我军已撤往几十里外休整了。敌人徒劳往返，一无所获。

青化砭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敌人为之惊慌错愕，就连我们自己，当初也没料到会这样顺利。其实，胜利的结局是毛主席早已安排好了的。为着迎合敌人寻我主力决战的心理，在撤出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指示我军一部，公开向安塞方向转移，以调动敌人主力到西北方向，我军主力则荫蔽在延安东北一带寻找战机。主席估计，敌人在延安立足未稳，必然会派出警戒部队，向延安东北方向的蟠龙一带伸展，以便确保外围。青化砭是去蟠龙的必经之路，地形险要，便于我军用兵。就一般规律说，敌人会把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用来对付我军主力，战斗力较弱的放出警戒。而我军则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以逸待劳，一鼓歼灭之。

（二）

青化砭战斗以后，敌人接受分兵被歼的教训，蒋记国防部就新制定了一个所谓"方形战术"，一出动就是八、九个旅，漫山遍野，一下子摆开几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以为这一来，就不会暴露弱点，被我"各个击破"。但是，由于我军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敌人终于又在羊马河受到一次比青化砭更沉重的打击，一个美械装备的整旅被我完全歼灭。

羊马河战斗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青化砭战斗刚一结束，我军主力便转移荫蔽休整，养精蓄锐。只派出小部队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之疲劳饿饭，暴露弱点，出现过失，便于我们歼灭。果然，当敌人发现我军主力就在延安东北时，立即以董钊、刘戡两个军共八九个旅，马不停蹄，紧紧追来。我军主力按兵不动，只由新四旅七七一团两个营带着迫击炮和重机枪，遍布满山，佯装大兵团行动，一路牵敌向东北方向，经延长、延川、清涧至瓦窑堡，又来一次长途大游行。敌人尾随，所到之处，因群众坚壁清野，找不到一粒粮食，一路上只能啃干粮，睡野地。干粮吃完，还得挨饿，并且不断受到我民兵游击队的袭扰打击。正象我总部发言人所说，敌人饿着肚子游行，本来已经够苦，还要遭到消灭，那就更苦。看来反动派的命是苦定了。而我军有广大群众支援掩护，机动灵活，使敌人到处扑空。

敌人到瓦窑堡，见不到我军的影子，粮食也吃完了。于是留整编一三五旅守备瓦市，主力南下集结于蟠龙、青化砭一线，进行补给。四月六日，我军于蟠龙附近的永坪地区，打击从瓦窑堡南退的敌整编二十九军，予敌重大杀伤。敌人发现我军就在背后，马上又掉头北上。对于敌人这一阶段的行动，毛主席作了极其精确的估计："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因此主席指示我军继续在现地区同敌人周旋，然后寻机歼灭它。

根据这个指示，一纵队便乘机诱敌。敌人果然产生错觉，误认牵制部队即为我军主力，于是又一窝蜂赶来。而

敌一三五旅则从瓦窑堡南下接应，企图与其主力会合。我指挥机关发现这是个“可乘之隙”，立刻命令主力部队坚决截击歼敌。我们新四旅连夜出发，行至郭家砭附近，恰遇敌主力北上，便配合一纵勇猛抗击。敌人见打得坚决，人马众多，越发断定是我主力，决战之心愈切。一纵继续牵着敌人向西游行，我们新四旅则留延榆公路西侧，准备截击敌一三五旅。同时二纵和教导旅也在公路东侧荫蔽集结，完成夹击的态势。

十三日等了一天，敌人却未出发。旅指挥部决定派一个营，由十六团副团长宋绍连带领，到安家嘴山上监视敌人。半夜里，通信员送来紧急情报：敌一三五旅已离瓦窑堡西进，应即准备接战。通信员没找到旅部，就把信交给宋绍连同志。宋绍连同志平时作战勇猛坚决，指挥机动灵活，一见情况紧迫，随令通信员赶往旅部送信，自己马上带领全营，迅速抢占了制高点。这时敌一三五旅前卫已到山下。当通信员赶到旅指挥所的时候，天色已朦胧欲曙，我们打开手电筒，看了信，张旅长和黄政委马上命令七七一团向南出击。同时以十六团二营抗击敌主力回援。

战斗十分激烈，我军集中优势火力，层层排除敌人的抵抗。二纵队和教导旅由东往西攻，新四旅由西往东压，将敌包围于羊马河附近。阵地上，炮弹开花，硝烟滚滚。敌人见势不好，连忙给胡宗南打电报请命。胡宗南这才发现我军主力，又打开了如意算盘，一边令一三五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紧紧吸住；一边令董钊、刘戡急速回转同我军决战。然而董钊、刘戡已被我一纵紧紧抓住，要回来已不可能了。只有后卫部队一个旅，跟一三五旅隔着一道山，可是又被我十六团二营坚决顶住。敌人无可奈何地乱打了一阵炮，不能前进一步。而敌一三五旅还在白日作梦，要想延挺时间，等待主力接应，因此就把逃跑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军以压倒的优势，猛打猛冲，犹如虎入羊群。战斗近六个钟头，歼敌一个整旅，共四千余人，敌代旅长麦宗禹也被活捉。缴获大量加拿大冲锋枪，美式重机枪、化学炮等装备。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善于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善于制造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隙”，在运动中捕捉战机，歼灭敌人，所以，敌一三五旅尽管有九旅之众作为接应，仍然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三）

我军撤离延安还不到一个月，就歼灭了敌人近两个旅，缴获的武器弹药，充实了我军的装备；俘虏的士兵，经过教育，也大部分参加了我军，部队的实力大大加强。敌人连打败仗，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加上疲劳缺粮，生病、开小差的很多。毛主席正确地估计了敌人的情况，因此指示我军，继续采用“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使之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并攻击敌人的薄弱部分，断其补给，使其饿饭。这样，下一次战役就是以攻打蟠龙最为有利。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九十里，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敌人每次大游行之后，都要回到这里补给。打下蟠龙，就断了敌人的衣食。这时我军经过两次歼敌的锻炼，炮火大大加强，具备有一定的攻坚力量。蟠龙原有敌整编一六七旅把守，周围还有几个旅来往活动，要打，就必须把敌主力调开，使其孤立无援。所以，能不能调动敌人就成了攻打蟠龙的关键问题。根据毛主席的判断，当时敌人正急于赶我向北，因此三五九旅便“投其所好”，积极出击，诱敌沿咸榆公路北上。同时又遵照主席指示，组成南进支队，到延安以南破坏交通，断敌粮运。我军主力则荫蔽集结于瓦窑堡到清涧大路以南，等敌人一到绥德，就在蟠龙打响。敌人再想回援，至少需要六七天，胜利就有绝对把握了。

敌人发现三五九旅，果然尾追上来。头一天，我们新四旅便接到命令，要给敌人让路，于是部队荫蔽在山沟里不动。

四月二十六日，天刚放亮，敌九个旅张牙舞爪，前面机枪开路，蜂拥而来。这时发生一件意外事故，敌人搜索到对面山梁的时候，突然抓住部队转移时给我们运粮的几个老乡。这不能不让人捏了一把冷汗，部队就在山下这道沟里，万一老乡说出实情，整个计划都要落空了。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敌人把老乡们捆了起来，一阵毒打，放倒在地上乱踢，拉起来又问。战士们又急又恨，都暗暗地使劲：“好老乡，千万别说啊！”不是干部阻拦，有的战士简直就要跳上去跟敌人拼。过了一会，只见有个老乡朝东北方向指了指，似乎是说我军去向。敌人才把人丢开，放心大胆地去了。

直到过午，敌人九个旅全部过去。当夜，我军进入蟠龙周围，严密地封锁了消息。

蟠龙附近已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十几里内的村子，腥臭难闻。虽是春耕季节，地里见不到一个人。进一个村子，满地都是牛羊皮、鸡毛、骨头、麦子、衣服。窑洞无门无窗，连桌椅都被敌军当柴烧了。

我们拣了几个破烂窑洞住下，找不到粮食，侦察连就把敌人喂牲口撒在地上的麦子扫起来煮着吃，还拾了个牛头熬汤。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侦察，加上被敌人抓去挖工事的老乡跑回来提供的材料，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敌人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置的情况，并按顺序把敌工事标为五个阵地。其中的五号阵地是主要支撑点，其火力配备还不十分清楚。为了弄清确实情况，我们想抓个俘虏。有人主张化装成老百姓，混进去服劳役，趁机会下手。可是又觉得周围掩体密如繁星，出来未必容易。又是战士们想出了办法。他们放哨时看见山沟有几户人家，敌军常出来捉

鸡，如果先埋伏在窑洞里，准能捉到。次日清晨，果然照这办法捉来两个俘虏。经过审问，和老乡提供的情况大致相同。这样，整个蟠龙的防御体系我们都了如指掌了。

四月三十日，我担任攻击蟠龙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一纵在西南，二纵独四旅在东南，新四旅在东北，完成四面包围。守敌仍未曾察觉，真是又聋又瞎，恰象装在闷葫芦里。一切准备就绪，定五月一日拂晓打响，哪知头天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由于山洪暴发，遍地泥泞，部队难于运动，只得推迟一天，就在北上之敌侵占绥德的时候，开始攻击。

五月二日，云收雨止，又起了西北风。拂晓，信号弹从指挥所升起来了，我各路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夺取了十几处前沿阵地。我东线兵团突破鹿砦、铁丝网，以对壕作业迅速逼近敌阵，直捣蟠龙。敌人仓卒应战，也不知我军来了多少，山炮、迫击炮、化学炮，只管没头没脑乱轰。说也好笑，这时候国民党电台也赶上了热闹，吹嘘其侵占绥德的所谓"胜利"，并信口胡说已将我军赶过黄河。这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以后他们再也没提蟠龙守军的下落。

战斗进展极其顺利。次日即将遍布群山的三十多个碉堡外壕大部占领。敌机两架飞来助战，被我军击落一架，另一架慌忙逃走，再不敢来了。我新四旅七七一团和独四旅借着炮火掩护，扫除了前沿阵地密布的地雷，接近敌人五号阵地。敌人依仗纵深工事，和猛烈的炮火配合，进行顽抗，攻击难以奏效。我军重新调整兵力，发起猛攻。七七一团一个排冒着密集的炮火，逼近五号阵地前沿，迅速挖好单人掩体，紧紧贴在那里，分批轮流向敌阵地投掷手榴弹，给敌人重大杀伤和消耗。最后敌人不支，慌忙开来一连人换防。我军乘机发起攻击，夺取了五号阵地。接着又攻下了三号阵地。至此，敌人全线动摇。可是，当我们攻击敌营部和山炮阵地的时候，炮弹已经打完。二纵队王震司令员得到消息，急令通信员骑上快马，把仅有的几颗炮弹给我们送来。我们就用这几颗炮弹掩护步兵，摧毁了敌山炮阵地。

四日黄昏，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镇内之敌猛攻。敌人狼狈向沟里逃窜。战士们如滚滚洪流向前冲去。夜半，敌人的精锐部队，自命为"新生力量"的整编一六七旅就被我全部歼灭。毙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山跑六门，军衣四万多套，面粉一万二千余袋，骡马千余匹。我西北解放军从战场上取得这样丰裕的物资补充，还是第一次。

在这同时，我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阻援，歼敌保警队一部。四日驻青化砭之敌整编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各一个团附坦克二辆，图解蟠龙之围，被我阻于青化砭北十里处。五日晚该敌才得知蟠龙守敌被歼的消息，连夜冒雨南逃，被我一直追到拐峁。南进支队也在这以后不久，攻克延安以南的门户金盆湾。我三五九旅则紧紧拖住敌人北上主力，就在打下蟠龙的当天，侵占绥德之敌得知后方告急，仓惶南下。等敌人游行到蟠龙，我军主力已到安塞地区休整了七天。

撤出延安仅仅四十多天，我军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打击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并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妄想。此后，敌人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更不好过了。

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在西北战场上，尽管敌军骄横一时，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是经我一拖再拖，一磨再磨，敌人丧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终于越打越孤立，越打越弱，越打越少，陷入绝境。仅仅过了一年多，光荣的革命圣地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敌人在损失兵员近十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落了一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

（程悦长：《记延安三战三捷》，《星火燎原》之九）

材料六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表面看来，中央机关的处境非常艰险。前面是自榆林南下的敌人节节进逼。后边又有刘戡七旅追兵。两路敌人将近十万人马，齐头向我们压来。这一次敌人又企图把我们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我们不理会这些，仍照预定路线继续行进。当部队到达井儿坪的时候，骑兵侦察报告，敌刘戡距我六十里，已经宿营。接着又有情报说，北路敌人已到了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于是部队未肯久停，继续赶路。

连日急行军，主席不吃不睡，因此异常疲劳。刚一上马，就晃了一下。主席忙又跳下，大步走去。我们看出主席是在极力抑制困倦，忙支好担架。主席笑道："怎么，又让我上担架么？我说："主席太累了，同志们都愿意抬呀。"主席边走边说：大家也都很累呀！你们愿意抬，我可不愿意坐！长征时也准备了担架，一路上都是抬病号和伤员。坐担架可不是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听主席这么说，我们都禁不住笑了。

白天行军，太阳象帖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胸前背后都象水洗过了。我们心里更紧张，时刻担心着首长的健康。看行军方向，是奔葭县。有人就揣测着，是不是会过黄河。有人又提议应该劝主席和首长们先过河，摆脱敌人，在河东指挥作战，不是一样吗？

离米脂二十里，部队便离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里。半天光景，到了一个集镇，叫乌龙铺。

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作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集会，人来人往，买东卖西，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敌人还没来过

这里，老百姓安谧如常。一见这种情况，主席立刻告诉群运组的同志，集中起来，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

行军队伍通过热闹的集镇，惊动了人们。有人认出队伍前头那个高大的人，就是毛主席。

整个陕北正处在战火中。在艰难的日子里，毛主席仍在陕北，和大家同甘共苦，他那安静的笑容，镇定的神态，立刻给每个人带来了信心和力量。人们拥了上来，队伍完全卷入热情的人流中，几乎挪不动脚。群运组的同志立刻趁机展开宣传。

过了乌龙铺，又向东走。傍晚忽然下起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白花花的大雨斜着从天下倒下来，水从头顶流到脚跟，每人身上都象有无数股喷泉。雨大风狂，推着人走，哪还睁得开眼。队伍无法行进，只好进了村子。

这里是曹庄。找到个破窑洞，主席连忙召集开会，研究行动路线。衣服上的水流了一地。

这时，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已睡下。几株老槐树，成了临时避雨的地方，大家都往一块挤。有人望着屋里跳跃的灯光说："黄河就在前面，这回准要过河了。"立刻有七八张嘴反对道："主席说过，不打败敌人，决不过黄河！"果然，不一会儿，任弼时同志冒着风雨跑来了，说："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按原路线前进。"从首长的神情，我们已预感到大战迫在眉睫。哪里料到，就在同一时刻，我们英勇善战的西北野战军已自四面八方，向沙家店一带运动集结，正对敌三十六师压缩包围。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消息传来，刘戡部自乌龙铺又出动了。任弼时同志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吧！敌人这么积极，我们也起身吧！

雨势凶猛，人们靠着闪电的光亮，辨认着路径。闪电一停，黑暗立刻把人紧紧捆住，迈不开腿。耳边只听见轰隆隆的震响，大水挟着巨石，由山头冲刷下来。人们互相传告着："小心！"可是，喊声连自己都很难听清。

黎明时，雨才住了。部队来到葭芦河边。山上山下，到处是白花花的水，简直成了水的世界。葭芦河突然比往常宽了许多，把路挡住了。

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使我们为首长的完全担心。河的两侧是很高的大山，中间是湍急的水流。按时间算来，后面敌人离我们顶多有三十里。地形这样不利，光这一点警卫部队，能不能坚持到首长们安全转移呢？可是看看主席，正和首长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开会，有说有笑。忽地，后边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刻工夫，大炮也轰轰响成一片，原来是野战军的一部已在侧击敌人。只见主席从容地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办！任弼时同志立刻命令出发。

部队临时改变了方向，突然由东向西北方向行进。西北面是高峰陡壁，山路崎岖，下边还有羊肠小道，上边但见云雾缭绕，甚至连小路都找不到了。主席下了马，招呼说：上山吧！大踏步走到前头去了。汪东兴同志特别告诉后边的警卫部队，把转移时路上的痕迹去掉。主席说：没有问题，就是在这里竖块牌子，注明毛泽东向西北山上转移，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听主席这样说，大家都笑了。周副主席含笑对汪东兴同志说："有备无患，还是去吧，让敌人多找一会儿也不错！"

走到半山，山下又响了几枪，周副主席停住脚步问道："怎么回事？"主席也站住了，把草帽拿在手里，慢悠悠地说：是敌人来了吗？他找了块石头坐下，又说：好吧，我们等它，看看是个什么鬼样子。后边有人前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弄清了，主席站起来说："没有事，咱们再走！

爬到接近峰顶的一个山包上，回首东望，雨后初晴，翠峰如洗，太阳象个火球，从紫雾里滚了出来，葭芦河水不过是一线细流。遥看黄河，在崇山峻岭间，泛光浮采，显得特别柔顺，没有那种啸叫暴跳的野劲，披着阳光，格外秀美，使人心旷神怡！多少天来的紧张劳累，立时消散。大家被这美妙的景色吸引住了，都站着向下眺望。

这时候，刘戡率领着队伍闯到葭芦河畔，找不到我中央机关的踪迹，便认为我们从葭县过了黄河。于是在河边上，架起大炮，朝葭县城猛轰。葭县恰在这座山的对面，炮弹开花，阵阵硝烟，在山顶上，看得一清二楚。到现在，我们更加了解主席判断准确，是由于熟悉敌人情况，充分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的缘故。身背着五六万敌人，经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和紧张的白天，冒着盛暑骄阳，排除艰难困苦，翻山涉水，栉风沐雨，长途跋涉，终于把敌人引到指定的地方。如今任务完成了。主席微笑地站在顶峰，用全副身心，欣赏着气象万千的祖国大地。

就在山顶上，有个不大的村子，叫白龙庙。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周副主席觉得主席过于疲劳，打算在这里宿营。周副主席说："这地势对我们有利，司令部可以驻在这里。"主席也说：对，就在这里驻下，把警卫部队布置好，敌人要上山，还可以打它三个多钟头，到那时再走不迟。

天黑时，敌人在葭县以西一带，点起了大火，烈焰冲天。山上看得真切，好象近在咫尺。汪东兴同志忙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周副主席出来看了看说："把警戒部队布置好，不要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劳了！"谁知主席在屋里听到了，大声地说：汪东兴啊！不要担心，现在不是他们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了！

后半夜下起了大雨，山下的敌人，被水冲得呜呜呀呀乱吼乱叫。又是打枪又是打跑，给自己壮胆。我们却一夜好睡。

清晨，雨下得更猛，整座山，白茫茫的，象挂了瀑布。我们下山的时候，简直是被水推着走，脚也站不住。马是不能骑了，主席就跟我们挽着手走。

下到沟里，往北，到了葭芦河上游。大水淹没了河床，也不知有多宽。先头部队找到一处最窄的河面动手架桥。

那里跨河有两座巨石，正好做桥基。只是水势湍急，看了叫人头晕。

主席走到河旁，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并且拿起一根树枝，插到河里测验流速。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早忙着去指挥架桥了。

突然，白龙庙方向枪炮齐响，轰隆隆的爆炸声，就象在我们头顶。我们的警戒部队和敌人接了火，眼看这里就要变成战场了！主席回身望望山头，神态自若地在岸边来回踱着。架桥的战士们都脱光了衣服，拚着全力，把绳索、木杆往对岸扔，想搭起个架子，好铺木板，河宽水急，有些木杆落在河心，叫水冲走了。情况这样紧急，桥一时又搭不起来，汪东兴同志忙来请示主席，要设法先护送主席过河。主席摇摇头说：不，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

不一会儿，按照主席的吩咐，机要人员伏在未加鞍子的马上，顺着水势泅过河去。

战斗更加猛烈，架桥工程进展仍很缓慢。机关人马全汇集在河滩上，偏偏敌机也冒雨也动了。主席全不在意，回身对参谋人员说：把电报拿给我看！随即坐在一块湿漉漉的青石上，聚精会神地翻看电报。一时电台也架起来了，河滩上响起"的的嗒嗒"的声音。

浮桥剩下最后一截，老乡们终于又拉来许多门板和木料，协助我们一一横放在绳索上，浮桥架起了，主席这才站起，走在前面，大踏步过了浮桥。其他首长也一一过去。

中央机关夜以继日地行进，战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到的。还是在行军的路上，我们就已听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消息，当时毛主席就和我们说过：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就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而在这个时候，我华东野战军也转入外线作战，出师鲁西南，彻底粉碎了敌人在华东战场上的重点进攻，并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作战。大反攻的形势，正在开始形成！

电话铃"嘀铃铃"响起来。

电话就放在外窑的木桌上。主席大步走到跟前，拿起电话就说："是呀，我是毛泽东！"

守在窑前的人，都是又惊又喜！"我是毛泽东！"那声音沉着而坚定，饱含着力量和信念。自从敌人侵占延安以来，主席一直是使用代号，今天才第一次用真名字。这说明，形势大大改观，我们已爬到山顶，敌人走下坡路了！当彭德怀司令员报告了敌三十六师被围的情况时，主席又大声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窑洞里，首长们紧张地开着会，饭也顾不得吃。墙上挂满了地图，炕上，桌上，也都铺满了地图。主席和周副主席守着电话机，不曾离开一步，随时听取敌情变化的报告，发出作战的指示。随后又往作战地图上作着标记。因为随身带的蜡烛已经点完了，屋里只点了一盏棉油灯，灯光幽暗，还照不到几尺远，所以查看地图非常困难。但主席全不在意，一直忙到深夜。

电话铃一阵阵响着。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是通夜未睡。作战参谋拿着资料出出进进，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上去探听消息。作战参谋只笑嘻嘻地摆手。我们不放他走。主席听见了，忙放下电话，走出窑洞，神采焕发地说：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原来，清晨的炮声是由常高山传来的。当敌三十六师前卫部队一二三旅向乌龙铺一带进犯时，钟松发觉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于是，慌忙命令一二三旅回援。一二三旅回头进入常高山一带，又被我埋伏在这里的两个旅团团包围。我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阻击在葭县一带。钟松恐慌万状，急着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的把钟松大骂了一顿，叫他"固守待援"，刘戡因为"援榆不力"，早已受过申斥，这一次，胡宗南又令他星夜驰援钟松，刘戡遭到我军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迟迟疑疑，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火了，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正式的战斗还没打响，敌人就乱作一团了！

这只是沙家店战役的序曲。热闹的场面还在后头。得到主席的指示，我们飞奔下山。这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四野静寂无声，只有风吹茅草沙沙作响。大家怀着难耐的心情，捱到黄昏，仍没有听见战斗的讯号。这是怎么回事？

一时来人换我们回去吃饭。只见主席仍对着话筒，跟前线指挥部通话。听说主席整天没有离开电话机，前线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及时传到这里。主席甚至也问到战士们工事挖的怎样。我们进去报告没有听见炮声，主席移开话筒笑道：不要着急，还不到时间呢！这就快了！

果然，一语未了，西南方向轰隆一阵巨响，无数巨炮，一齐怒吼，霎时间，天崩地裂，震得窑顶唰唰落土。主席和首长们，都站了起来，走出窑洞。山上了望的人，一路飞跑，兴奋地叫道："打响罗！打响罗！"人们从四面发出欢呼。主席微笑着说：好！这回看胡宗南怎么交代！

捷报不断传来，一会是，敌人全部落网，一会是正在清查钟松……从黄昏到天黑，仅仅两个小时，就歼灭了整编三十六师六千余人，活捉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胜利，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的到来了！仅几天以前，敌人还凶焰万丈，妄想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沙家店一战，敌人就象雪崩似的垮了下去，完全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冲没了。

主席和首长们工作了一个整夜，天微明时，刚擦了把脸，运送伤员的队伍，就从沙家店战场下来了。主席立刻

指示机关人员全体总动员，组织临时救护站，烧开水，煮稀饭；医生们一齐出动，给伤员换药，裹伤。机关里的牲口，也都拉去运送伤员。周副主席还亲自出来检查督促。

当人们正为着伟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却又走在了时间的前面，考虑着下一步继续歼灭敌人的问题。只见他片刻不得消停，忙着查看地图，发出指示，仔细地部署着，周密地计划着、思考着。主席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废寝忘食了。经我们一再提醒，才稍进了些饮食，又匆匆赶到野司驻地后东原村去开会。彭德怀司令员和首长们远远地迎了出来。主席说："打得好啊！首长们喧笑着，抢着和毛主席握手。都说："主席瘦了！"主席笑吟吟地说，瘦了走路方便！有个旅长说："主席啊，你们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真担心呢！主席说：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八月二十三日，陈赓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沙家店的胜利，在全国各个战场发生了连锁反应。胡宗南的机动兵力，由于被我们拖在北线，后方空虚，使陈赓兵团得以顺利渡河，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面威胁洛阳，牵制了河南的敌人，支援了刘邓大军南下；西面直逼潼关，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眼看难保了。胡宗南慌了！十万火急地命令刘戡南下。刘戡却龟缩在米脂东北的山沟沟里，缺吃少喝，不敢妄动。加上秋雨连绵，眼看天气转寒，个个叫苦。他接到命令，只得冒死南逃。强大的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发扬艰苦奋斗、不避艰险、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对向南溃逃的刘戡部展开了猛烈的追击。大军顺咸榆公路南下，准备赶到敌人前面，堵击敌人。

大反攻的高潮来了！

（闫长林，《星火燎原》之八）

材料七 "我们是从人民来的"
——周恩来在转战陕北中的一些事迹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安排对陕甘宁边区和红都延安的进攻。他集中了陕西、青海、甘肃、宁夏三十四个旅总共二十三万人马，从南、西、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向边区的南大门宜川、洛川一线集结。他把国民党军的五分之三的空军调到西安，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不断轰炸延安。十三日，六个师十三个旅共八万人开始向延安进攻。他要消灭中共中央，至少也想把中共在西北的主力消灭，把中共中央赶到黄河东岸。这样，他就可以把从抗战时期就一直不打日本帝国主义而专用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抽出来投入其他战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是不离开陕甘宁边区，从容以待。

在延安，杨家岭已听见炮声了，宝塔山已看到硝烟了。周恩来还在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协助毛泽东部署全国战局，指挥西北战场，并进行撤退前的大量准备工作，要使胡宗南在进入延安后只得到一座空城，没有人，没有粮，……周恩来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

敌人已经接近七里铺了，周恩来还到枣园、清凉山等地检查群众的疏散转移和各机关的坚壁清野情况。直到十八日晚八时许，延安的老乡们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撤走完了，周恩来才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走出总部的窑洞，发出命令："准备汽车，马上出发。"

延水不平静地流去。汽车顺着延河沿咸阳到榆林的公路向东北奔驶，但并不是要渡过黄河。周恩来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尽管我们在西北的兵力只有两万多人，面对的是十倍于自己的装备精良的敌人，但是必须战胜敌人，也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他们全局在胸，胜券在握，用兵如神，指挥若定，决定采取"蘑菇"战术拖垮敌人；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中共中央决定分开行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指挥全国各个战线的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领导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工作机构。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以高度的机动灵活，与敌人在陕北高原上周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打三个大胜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共歼灭敌人一万四千多，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信心，奠定了西北战场胜利的基础。

在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电报，是发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知陈毅、粟裕的。电报说："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这就是说，一个新的战争局面将要开始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将要揭开，史诗般的刘邓大军南下已经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擘画之中。

关于派解放大军南下这一奇策深算，周恩来是早在考虑中的。远在一年以前，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势不可免，和平实已无望之时，周恩来在南京致电中共中央，就提到如果我们派"强兵"南下，"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里，说到了兵力——要强大，说到了去向——打到长江北岸，说到了效果——南京、上海大乱。

这一奇策，显然中央也在考虑中，这从周恩来的另一份电报中可以看出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后，和谈已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召开所谓"国大"而我们争取民盟的大部不参加"国大"，根据这一政治形势，周恩来主张当时还不宜派军南下，他在南京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到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不同了。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面目已为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受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一百一十二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在一百万人以上。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所谓"重点进攻"又使其主力深深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其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异常空虚。

是时候了。

六月三十日，在中央前委的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中外震惊。人民扬眉吐气。蒋介石手忙脚乱。他派十五个旅随后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五个旅堵截，皖西有三个旅防堵。但如许兵力怎么挡得住南下大军?国民党在湖北自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四十六师外，只有四十八师的一个旅和七十四师的三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三个旅。周恩来亲自写了中央军委给刘、邓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越陇海铁路而南，过涡河、黄泛区、颍水、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直到大别山区，长江以北，如同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心腹地区南京和武汉之间。同时，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在洛阳、陕县南渡黄河，进入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地区；派陈毅、粟裕率部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广袤的中原大地、江淮河汉之间展开。

这时候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结束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笼罩在陕北高原上空的乌云开始消退。

整个战局改观了。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大反攻时期。

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取得三个月休战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但是战争是你挑起的，何时停止就由不得你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叫唤：经济力量仅能维持六个月。这算什么！等着吧，经济政治的总崩溃还在后头呢！

人们开始露出笑容，完全相信共产党必胜，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

一年以前，美国的马歇尔在中国调处国共冲突。马歇尔不理解，为什么面对如此众多的而且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中共却敢于迎战？这个问题，周恩来在离开南京前三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同他会见时，回答了他。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正是基于对人民的深切了解和信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透彻掌握，并且完全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胡宗南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决定留在陕北打"蘑菇"战。尽管兵力悬殊，两万对二十万，而且对方上有空军，但是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再加上陕北高原的千山万壑、塬野梢林，地形对人民的军队也是十分有利的。地利人和，全属于我。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及陆定一、胡乔木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十二个县，在三十七个村庄生活过，处处受到人民的支援和保护。当时敌人是"齐头又并进，走山不走川，白天大游行，晚上大集中"，十万大军排成方阵，铺开几十里宽的正面，横竖"扫荡"，要消灭中共中央机关，但是在人民的保护下，就是近在咫尺，他们也发现不了中央机关这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始终处于情况不明、指挥盲目之中。正如毛泽东所说，敌人没有群众，进了边区，他们看不到我们，只有乱闯。

中央机关在王家湾住了五十多天，附近的村子里有个敌人暗藏的奸细。老百姓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向他严密地封锁了消息。敌刘戡部队来了，他出去迎接，敌人问他中央机关到那里去了，他连中央机关曾在王家湾住过也不知道。结果敌人把他打一顿，用绳子捆起来送回去。

在转战中，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一次，中央机关转移时由于偶然疏忽，敌人进村后搜查到了写给李得胜、胡必成的信封。但是老百姓坚决不吐真情，敌人还是不知道住在这里的就是中央机关，李得胜、胡必成就是毛泽东、周恩来。

一次，中央机关在行军中，刘戡率几万国民党军队就在后边不远跟着进军，但是就连中央机关的一丝情况他也得不到。

沙家店北面集结着我军四万主力部队和大批支前民工，国民党军队就在附近，但是他们对我们竟连一点风声也探不到。

在峰峦起伏的陕北群山里，在人民的海洋中，我们同国民党军队象捉迷藏一样，我打他，得心应手；他打我，找不到主力。有时候，彼此相距几里路，我们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彼此只隔一条小山沟，我们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中央机关所到之处，老百姓看到这支队伍电线多、驮骡多、背盒子枪的多，猜测到是高级领导来了；很多老乡还认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可大家都是心里明白，绝不向其他人传说。敌人拷打群众，逼问中央机关的踪迹。群众的回答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老百姓的《信天游》唱道：

"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

老百姓连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连人民。"

在人民的保护下，虽然敌人重兵搜索，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安如磐石，在陕北的小小窑洞里，指挥着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蟠龙大捷后，周恩来来到了在真武洞召开的祝捷大会上。他向群众宣布，也是向全国宣布：党中央、毛主席没有离开陕北。陕北人民的回音是：有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领导，胜利就有保证。然而最根本的保证是人民。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新中国将在人民的革命中诞生。在当时的陕甘宁根据地，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婆姨和娃娃。我们不但把生产的担子挑在肩上，而且还设立侦察警戒站，站岗放哨，盘查坏人。妇女们深更半夜还在麻油灯下做军鞋，支援子弟兵。青壮年几乎都上了前方，支援或者参加战争。一个农民壮劳力，用担子挑两发迫击炮弹，从后方运到前线要走好几天。轰、轰两炮，完了。——胜利得来不易呀！

周恩来说：依靠人民，争取胜利。在转战陕北中，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威力。

周恩来向群众说，你们要做好坚壁清野，准备转移，不让敌人夺到一粒粮食，饿死他，困死他。胡宗南部队打进陕甘宁边区后，吃、穿、用什么也得不到，每天要用十架飞机运粮食才够他十万人吃，还没有算弹药补给的运输。胡宗南军队所到之处，不但找不到一个人、一粒粮，而且连一口锅、一只碗也寻不到，只好在石板底下架起火来烙饼子、炒马料，经常是爬山梁、睡野地、啃干粮，有时什么也吃不上，饿得头晕脸肿，拖得精疲力竭，还不断遭到民兵和游击队的袭击，苦不堪言。

人民全力支持共产党夺取战争的胜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处处关怀为战争作出极大的贡献和牺牲的人民。周恩来每到一地，都要和群众接近，谈谈情况，作些调查研究。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时，总惦记着群众。中央机关在王家湾时，数万敌人扑来，我军主力远在陇东，跟前只有四个连的警卫部队，情况紧急。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安排群众转移，直到群众到了安全地带，然后自己才和警卫部队转移。在佳县，周恩来告知县委，对于过不了黄河的老百姓要组织他们向北撤，绝不能让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失。在神泉堡时，正值秋收季节，他动员中央机关的全体干部和战士帮助人民秋收，说：这里的人民生活艰苦，现在又遭霜冻，困难就更大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帮老乡搞好秋收秋种，这是我们拥政爱民的一个具体行动。中央机关住在朱官寨时，干部、战士帮助老百姓种的冬小麦就有四百多亩。在杨家沟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看到群众由于经过半年多战乱，体质减弱，患病的多，就要中央机关的医护人员对有病的老乡实行免费治疗。一路行来，有多少害病的群众得到他们的医治，有多少穷苦人得到救济啊！

周恩来在转战途中，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人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在石湾镇时，粮草来不及疏散，为了不致落入敌人手中，当地干部主张烧掉。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能，粮草是人民的血汗，连一根草也不能烧。"他冷静地告诉当地干部："化整为零，把粮草分散给群众来坚壁。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周恩来还对学生特别关注。在他去晋西北安排后方委员会的工作完毕返回陕北中央机关途中，路过石湾镇时，还特地去看了当地的小学校。他说："就是打仗，我们也要操心孩子的上学。战争中，边区的学校师生也积极支援前线。蟠龙战役后，第二保育小学挑选了五十多名大一点的学生到野战医院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热情表扬了他们，说："给娃娃们也应该记上一功啊！"

陕北本来是土地贫瘠人民穷困的地方，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来到后，特别是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但是现在，战争影响了生产，加上蒋胡军的洗劫，有些地方的人民生活就靠黑豆、糠秕和树皮充饥。有的地方老乡原来吃的是小米和黑豆稀饭，现在只能吃到米糠、秕谷和瓜菜合在一起加一点黑豆熬成的糠菜糊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个月，也一样吃这种糠菜糊糊，把边区政府送给中央机关的小米送往前方。

中央机关在转战陕北中，干部和战士的生活都十分困苦。有时吃整麦、整黑豆、高粱。能吃到小米就算是改善了生活。有时搞些绿豆就算是改善生活。即便如此，当住在杨家沟时，经周恩来提议，党中央还号召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人民，共计节约了黑豆七十石、小米三十石，分给了驻地的人民和邻近村庄的烈军属。

当然，这样的事例虽然众多，所及还毕竟有限，而战争造成的饥荒却是普遍的，广泛弥漫于陕北大地上。因此，周恩来一面指出要搞好生产自救，一面为中央写了一个给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并转太岳区党委的电报：

"陕甘宁边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作战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饥饿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五万石(三百斤一石的)细粮，方能渡过难关。想太岳现已获有汾河下游广大新区，主力又向河南作战，筹拨此数似有可能，望太岳区党委即与晋绥贺、李电商拨运粮食地区与路线，并须由洪、赵先拨一部，赶运吕梁，运输方面也须太岳负责帮助。"(贺，贺龙。李，李井泉。洪，洪洞县。赵，赵城镇。)

晋冀鲁豫解放区特别是太岳区接到电报后，立即给了陕甘宁、晋绥地区以大力支援。

今天，历史的这一页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但是，历史的昭示却还历历在目。以上这一切，说明了人民的力量，说明了人心的向背是决定一切的，说明了胜利来源于共产党、解放军同人民的亲密关系。

在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佳县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做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总结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这一年的解放战争。他说：去年一年的自卫战争，证明了一个道理——蒋必败，我必胜！为什么我们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

(选自《中华英烈》86 年 1 期，作者：力平)

材料八　蟠龙一战之后

我们在这里放心睡觉，
你们在那里赶路赛跑。

我们吃着你们的洋白面，
你们喝不到一口稀米汤。

我们准备开祝捷大会，
你们准备到延安吵嘴。

我们活捉了李昆岗，
你们丢掉了"常胜将"。

我们又增加了五千，
你们又减少了一万。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

(选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作者：黄既)

清风店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旬，国民党为了挽救东北危局，从华北地区抽调四个师兵力出关作战。晋察冀野战军乘敌华北兵力空虚之机，以主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共十一个旅围攻徐水，以吸引南北两面敌人增援，将其歼灭于徐水以北地区。十月十一日夜，第三纵队主力首先破击了徐水至固城段铁路，拔除了沿线敌人据点。第二纵队主力则包围了徐水，十三日黄昏对徐水城发起攻击，次日拂晓先后攻占南、北两关，逼进城垣。国民党军为解除徐水之围，急调五个师的兵力，沿固城、容城两个方向齐头并进，南下增援。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继续围攻徐水，诱敌深入，集中主力歼灭由固城向徐水增援之敌。十五日晚，解放军从两翼对敌人实施迂回分割，由于敌人重兵猬集，经一夜攻击，进展甚微，双方在徐水、容城、固城间形成对峙局面。国民党军令石家庄守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部北进，企图南北夹击解放军于徐水、固城之间。十七日，晋察冀野战军改变部署，以第四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各一部共六个旅，日夜兼程疾进南下，以求歼敌第三军主力于方顺桥以南地区。敌第三军在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及地方武装部队打击下前进迟缓，十八日到达定县清风店附近。十九日黄昏，攻击部队以徒步日行二百余里的强行军速度，先后逼进清风店附近，完成了对敌第三军的合围任务。二十日拂晓，攻击部队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第四纵队从东、北两面，第三纵队从西面，独立第八旅等部从南面，对敌实施逐步压缩。战至二十二日凌晨，野战军集中所有炮兵进行火力急袭，敌前沿工事被摧毁，火力被压制，各部队从四面八方突入村内展开巷战。经猛插分割，将敌围歼。是日十一时，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及第六十六团。同时，解放军阻援部队在保定以北顽强阻击了两昼夜，连续击退国民党军整团整师的集团进攻。此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七千余人，其中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第七师师长李用章以下一万一千余人，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记录。

材料：

- 清风店生擒罗立戎
- 新生的时刻
- 清风店战役(诗)

材料一　清风店生擒罗立戎

我们是午后离开东西马庄驻地的。深秋十月的华北

平原，庄稼大都收过，空旷无际。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和村头地边偶然出现的牵牛花，给肃肃的田野增添了新的生机。

离开驻地不多一会，大路旁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作战参谋余震同志纵马赶上来问："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会？"我看了看并马而行的杨成武和耿飚同志，说："怎么样？休息一下吧。"还没等他们二位答话，忽听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同时，有人大声喊着：

"首长停一下，首长停一下！有重要的事情报告！"

我们三人翻身下马，站在路旁。

来者是野司的通信员。只见他满脸汗水，上衣都湿透了。他向我们敬了个军礼，接着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

电报是野司留在东西马庄的电台收到的。电文极简单，大意是：密悉，罗立戎率第三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滹沱河，向新乐开进。

战争中情况突变是经常的。罗立戎出石家庄我们也有所料，但情况变化得这样快，却是我没有完全料到的。二十几个字的电文，将牵动千军万马，真可以说是字字千钧。

"罗立戎是冲我们来的。"这是我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反应。

"整个战局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我想。

我提议："尽快抓住罗立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确实难得！"

杨成武、耿飚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提议。他俩几乎是同声说："打！坚决地打！"

这一仗打好了，就可以扭转长期以来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

决心一定，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战场的选择。在哪里打掉罗立戎呢？

在保定以北打，是敌人所求，绝对不行。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但又决不能离保定太近。因为敌人不仅在保定有一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耿飚同志伏在地图上，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罗立戎当时的驻地），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立戎的三军距清风店地区只九十多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地区最近者一百五十里，最远者达二百五十里以上，且正在继续西进。如果战场北移，我们的行程可以缩短，罗立戎的行程会加大，但是，那样便离保定太近，不行；南移，我军的路程将更远，也不行。所以，能不能打上和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立戎的前边，到达清风店。"兵贵神速"，时间就是胜利！

大家忙着指挥所的前移，杨成武仍坐在蜡烛下审阅野司的作战动员令。

我很喜欢这个开门见山，气势磅礴，火药味浓，鼓动性强，似乎千军万马就在眼前的动员令。其中象"为了打大胜仗，必须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进，发挥我军的传统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丝毫不顾虑，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必须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怕夜行军、急行军，不管吃不上饭，没水喝，不顾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特殊作用。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号召打大胜仗，比赛为人民立功！"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字，今日读来仍感到热浪扑面，催人发奋。

黎明时分，我们来到大路上。只见几路大军全是跑步向南，向南，向南！象汹涌的波涛奔腾向前。一些干部背包上摞着从战士身上"抢来的"背包，肩上扛着从战士们手中"夺来的"枪支，一边跑一边用极简明的语言为战士们鼓劲："提前赶到清风店，坚决活捉罗立戎！""为我军增光，为人民立功，同志们，加油呀！"有位同志见我们纵马过来，高声地喊："闪一闪，闪一闪，让首长们过去，让首长们过去！"参谋同志告诉我，这是二纵队四旅（旅长肖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的部队。

四旅是我们的主力旅。他们原来的任务是攻打徐水，后来又转移到徐水东北的容城一线打援。离现在的地区比我们几乎远一倍，可是他们赶上来了。我下马问一位干部："你们走了多长时间？"他把冒着热气的帽子抓在手里，擦了擦满脸的汗水，说："从赶到徐水围城到移防打援，到南下清风店——"他停下来，大概是在算帐。"噢，八个昼夜了。"

"八个昼夜！"我重复了一句。

那位干部大概认为我为他们的体力担心。他把帽子戴好，笑着说："八个昼夜不光行军，还打了好几仗。打仗总有空隙可以打盹的。"

"怎么样，还能坚持吗？"我问。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却说："首长们讲了，胜利就在我们的大腿上！"说罢，行了一个举手礼又前进了。

部队很快赶到了保（定）南解放区。用战士们的话来说，"进到解放区，出气都觉得痛快！"

地方党、政府和解放区的人民，在短短的时间里为部队准备的一切，是我们没有完全想到的。

大路上每隔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里分别装的是开水、带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糖的玉米面粥。为了保温，有些大缸的外面包上了厚厚的棉被。想得多周到呀！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当地老乡爱吃的玉米饼子。乡亲们把带着黄腾腾"锅巴"的玉米饼子，送到战士们的手里还是热乎乎的哩。这是人民的心哪！守候在路两旁的大部分是妇女同志。她们提着篮子，端着簸

箕，里边不仅有馒头、大饼、烧鸡、鸡蛋和大红枣、黄柿子，还有军鞋、毛巾、慰问袋和撕成绑带那么宽的新布条。有些鸡蛋是染红了的。老大娘一边往战士们的口袋、挎包里塞，一边念叨着："这是俺儿媳妇'坐月子'用的。带上吃吧！多杀顽固军保俺过好日子。"看到有的战士的鞋子破了，用绳子绑在脚上，大嫂们一拥而上，争着给战士换新鞋。有的战士脚跑肿了，新鞋穿不上，他们便把战士的脚拦在怀里，轻轻地挑泡、挤水，然后一层层地包上布条。战士含着热泪继续前进，她们追上去，把新鞋挂到战士脖子上，疼爱地说："拆布的工夫脚要先见水，湿透了再拆，要不，会疼呀！这新鞋等脚消了肿，再穿，不要紧，里边有垫子，软和的！"姑娘们把绣了花的慰问袋送到战士手里，说："里边有吃的有用的，还有信。"有些大胆的姑娘问战士："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我们的战士红着脸，跑了。有的老大爷把烧鸡撕成碎条，紧跟着脚步不停的战士，一边往战士的嘴里送，一边嘱咐着："孩子，吃吧，打起仗来就没有工夫了。记住，千万小心，躲着点枪子呀，那东西不长眼。"随部队行动的担架队多半是男青年，也有不少英姿飒爽的姑娘。担架上铺着厚厚的被褥，有的是全新的，有的被子四角上还缀着花生、栗子、枣，显然原来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的。担架队员们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少人还带着武器。一看便知道是些有经验的民兵。战争年代的担架队员，不仅要在炮火中抢救和运送伤员，还要当向导，修工事，运粮草，捕捉和看管俘虏。他们的血汗是和战士们流在一起的。

我们在途中遇到了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支前指挥部的吴树声同志。他热情地向我们汇报了支前指挥部的工作情况。他说："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让我转告野司首长，冀中两千万人民决心做到，前线要什么，我们有什么，部队有什么要求，我们保证做到！"他们是说到做到的。据战后统计，在短促的时间里，冀中人民组成的民工队伍达十万人，担架一万一千副，牲口九千六百头，大车三千四百辆。战区一带数以万计的民兵，很好地保护了军用电线，保证了指挥联络的畅通。可见，人民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战局的发展可以说完全不出我们的预料。我军全部赶到方顺桥以南并全线展开后，罗立戎全军被阻止在清风店周围的高家佐，东、西南合，大、小瓦房等地。这时，这位三军军长才发现，挡在他面前的不是他很不以为然的民兵，而是我军的主力。他向他的直接上司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报告，请求援兵。但是孙司令官却坚持我军主力仍在保北一线。他的根据是：一天多之前那里的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曾攻进了徐水城关，只是由于他孙连仲"指挥若定"，我军才"被迫"收缩"溃退"。如今，那里我军的攻击没有减弱，战斗依然十分紧张。难怪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要对他的下属大吼：共军连辆汽车都没有，他们靠什么在二十多个小时内从保北赶到保南的清风店？他们会飞吗？他们是"神行太保"吗？大吼之后当然还有安抚：放心北进吧！

我军的战役合围已经形成。罗立戎不但不能北进，东、西两面的活动余地也不大了，即使他敢违令南返，唐河的渡口也已经被我们封锁了。

清风店战役是十月二十日打响的。由于我们急促赶来，对敌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得不很详细，没有在战役合围的同时，在战术上分割敌人，未能很快地各个歼灭。

二十一日，我们采取分割战术，把敌人切成若干小块，集中兵力，将罗立戎及其主力第七师所在的西南合的外围扫清，打破了他的"梅花形"防御体系。这一天战斗非常紧张、激烈。在逐村逐街的争夺中，许多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斗中曾来了十几架敌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高射武器，有恃无恐地低空扫射、轰炸，疯狂得很。我们用轻重机枪组成对空火力网，击伤一架，打落一架，对部队鼓舞很大。敌机不敢低飞了。不少空投的弹药和食品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我军曾一度突击罗立戎所在的西南合村，但未能成功。

罗立戎被围困在西南合，但他并没有死心。他等待着南来的援兵，更期望着保北的友军。他觉得，只要自己坚持住，"南北夹击"我军的局面也许会出现的。我们不能说罗立戎的打算完全是幻想，但是世界上脱离现实、一厢情愿能办成的事是极少的。

二十一日一天的激战，大概使孙连仲清醒了一些。据说他曾坐飞机到了保北上空，亲自指挥那里的战斗。如果在那里取胜，即使造不成"南北夹击"的局面，起码可以帮助罗立戎突围。因为他在保北的部队有上百辆大汽车，如果能摆脱我军，几个小时便可以赶到清风店地区。孙连仲很清楚，靠清风店以南石家庄的力量来解救罗立戎是不可能的。因为石家庄只有刘英的三十二师及一些杂牌部队，他们是不敢出来的。

这样，我们在保北打阻击的部队压力更重了，战斗更苦了，责任也更大了。野司随时将我们这边的战况通报他们，要求他们也将那边的战况、特别是困难报告野司。陈正湘、李志民同志的报告很及时，但是没有一次提到困难。来电都很简单：围住罗立戎对我们鼓舞极大，祝全胜！战士们提出的口号是："打下去，熬下去，阻住敌人就是胜利！"这个"熬"字使我们看到了保北战斗的残酷程度和干部战士坚韧不拔的决心。杨成武同志说："那边的同志们打苦了。"耿飚同志说："我们这里要快，要争分夺秒！"

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野司连夜决定集中五个旅的优势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罗立戎指挥所所在地西南合总攻。另派少量部队准备阻击保定方向可能出援的敌人。

二十一日夜，应该说是二十二日凌晨了，我们向西南合发起了总攻。

罗立戎很清楚，这是决定他的命运的时刻。他把步兵、工兵、炮兵、通信兵，大汽车、小汽车、弹药车、军需车都集结在马家大院的四周。兵力是够多的了，但这么多部队集中在仅四百多户人家的西南合村，要想构成什么防线是不可能的了。天亮后，敌机成批地赶来为罗立戎打气，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了。短兵相接，人民战士从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中迸发出来的智慧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有位叫李德胜的指导员，一人抱着十公斤的地雷冲到西南合的一所院子里。这里有敌人的重兵和弹药车，他拉响地雷，连投出十几个手榴弹，引爆了弹药车。院内七间房子在天崩地裂的轰鸣声中全部倒塌，他却安然无恙。共产党员高老二就靠着血染的刺刀和一身虎胆，率领六位战士解决了敌人全部美械化的一个连。战士邢树其只身杀上房顶，冲锋枪直扫敌指挥所。十点钟左右，我们全部占领了罗立戎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合。

各部队都在清点俘虏，但是没有找到罗立戎。这位军长哪里去了？我们相信他是不会死的，我们更相信他是逃不掉的。果然，没过多久，独八旅徐德超旅长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向野司报告："罗立戎捉住了，活的，在我们这里！"

独八旅当时在唐河边上的南合庄一带，罗立戎怎么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原来罗立戎见大势已去，在混战中带三百余人从西南合往东南逃窜，到了南合庄被独八旅的同志捉住了。罗立戎换了衣服，隐瞒了身份，我们的战士也不认识这位将军。但战士们凭着经验，还是把他放到"俘虏官"的队列，送到八旅旅部。

当时，全军上下都在寻找罗立戎。徐德超同志从战场回到旅部，一进联络科的大门，便看见一个相当熟悉的面孔，"这人怎么有点象罗立戎呢？"徐德超想。但是他没有贸然发问。他把联络科的一位干部叫到一旁，问："那些俘虏的身份都搞清了吗？有没有大家伙？"联络科的干部告诉徐德超，有些人的身份问过了，但还没有核实。徐德超指了指那个象罗立戎的人，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联络科的同志顺着徐德超指的方向看了看，说："还没问到他哩！"也就在这时，那人的目光也向徐德超望来。徐德超一步赶到那人面前，问："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人抬头望着徐德超，尴尬地站起来，苦笑着说："这，这，这不是徐代表吗？啊，遇见老熟人了。"

这是罗立戎。他和徐德超也可以算是"老熟人"吧。去年（一九四六年），由我党和国民党、美国代表组成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德超同志作为这个"执行部"石门（即石家庄）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住在石家庄。他的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的代表罗立戎。那时候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军长衣冠楚楚，气宇轩昂，跟着他的美国朋友，气派得很。有一次他以东道主的身份，请美国人和徐德超同志看戏。搞不清是事先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三方代表到达剧场后，罗立戎问演什么戏，随从回答是《战濮阳》。罗立戎马上煞有介事地说："和平时期怎么老唱武戏呢？改，改一出文戏。"将军有令，戏目自然是改了。徐德超同志后来诙谐地对我说："罗立戎为了作样子给我们看，只准剧团在台上唱文戏，可他自己在台下一个劲地演武戏，还老演主角呢！"如今，这位将军成了俘虏，又换了装，徐德超同志没能马上认出他来，也是不奇怪的。

清风店战役歼敌二万余人。生俘三军正副军长等将校级军官十名。战役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召开了有三千多名干部和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会议由王平同志主持。聂司令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战役胜利的意义。说："这次歼灭战打得很干脆，从军长至马夫没有一个逃跑掉。李文（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亲率十六军、九十四军和九十五师等部的增援救不了他们，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也救不了他们！"聂司令员号召我们"更多的消灭敌人"，"配合全国大反攻"！

（选自《横戈马上》，作者：杨得志）

材料二　新生的时刻

一、他已经得到了新生，却难忘过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国民党军政特赦人员名单，罗历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掉下了眼泪。

不久，已到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了他们，为了让他们愉快地度过新年，周总理按照北方的习惯，用饺子招待他们。罗历戎旁边坐着一位高个子的解放军军官，他觉得面熟，但又记不起来在那里见过，他端详着，沉思着……。周总理也许看出了他的心思，就指着那位军官说："他是罗瑞卿，是你们四川同乡，你们二罗已经在清风店见过面罗！"

罗历戎恍然大悟，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真对不起，在清风店我没听你们的话，给你们造成困难……"

罗瑞卿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你不愿意让守石家庄的余部放下武器，我们不是照样把石家庄解放了吗？那时候你对国民党政权还有幻想，今天认识了，说明你改造得不错嘛！今后好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吧！"

罗历戎除了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来。十三年前，他作为战俘坐在罗瑞卿等人面前，今天却同桌欢度新年，他激动，感到自己真正得到了解放，认识到自己已经新生；他感到幸运，没有最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炮灰；他也感到后悔，当年没有听聂荣臻等人的劝告，让石家庄的余部放下武器。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清风店战役的激战、失败、被俘、宽大，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脑际。

二、他亲自率部北援是自告奋勇，实际有自己的小算盘

罗历戎的防地是石家庄，他是率第三军主力增防保定，途经清风店，被晋察冀解放军歼灭的。增援保定是蒋介石的决定，但罗历戎亲自率部前往，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请求。蒋介石决定是出于华北战场的需要，而罗历戎自请率部，则有他的小算盘。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时华北的形势是严重的，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石家庄已处于解放区的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随时都有被解放的可能。一九四七年秋，解放军又有进攻保定，切断平保线，孤立北平之势，蒋介石不断找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等商讨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对付解放军秋季攻势的办法，但总是一筹莫展，气得连连骂娘。

蒋介石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于十月上旬召集了华北军事会议，进一步商讨防务。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等四十余人。会上，蒋介石声嘶力竭地要"各军注意部队的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抱着有我无敌之决心，达到统一建国之目的。"并对秋季作战作了详细的布置。

罗历戎和他的顶头上司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照例在会上慷慨陈词一番，表示要"誓死效忠党国"，这也算给蒋介石一点心头安慰。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时部下的表态和决心能值多少价钱，所以第二天下午，又单独把罗历戎、李文找到圆恩寺他的官邸，细细布置一番。就在这次开"小灶"中，蒋介石决定抽调第三军一个师和另外一个团，从石家庄增防保定，同时又命令必须固守石家庄。

石家庄能否固守，只有罗历戎心中最明白，因为几次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都是丢盔弃甲，石家庄外围据点已经丢尽，一座孤城，补给只能靠空运，士气更无从谈起。如果把主力一撤，所谓固守，只能是欺人之谈。因此当蒋介石问由谁率部增防时，罗历戎就："自告奋勇"站起来，表示他可以率部队前往。

三、正当他洋洋得意的时候，意外的消息使他面无血色

固守部队只留下第三军一个师，加上军直属的部分机炮连队，由师长刘英指挥。

北上的官兵谁都明白，再也不会回到石家庄了，所以心照不宣地带走所有的行装和家眷，因而也就给队伍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石家庄离保定三百六十余华里，都是解放区，但罗历戎已得到情报，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为了万无一失，罗又对部队行动采取了保密措施，而且临行还发出"第三军调防河间"的假消息。

这支增防部队如惊弓之鸟，走走停停，除了遇到人民游击队和民兵稀疏的阻击外，三天内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还有一天多路程，就可以进入安全地区了，罗历戎开始放下心来。

孙连仲和李文十分关心第三军主力的安全，派出的侦察机来回低空飞行，发来的都是"没有发现共军"的好消息。

其实，早在罗历戎出发前几天，我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李文集团军总部和罗历戎的军部得到了他们的全部行动计划，并且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保定以南结集。

四天了，罗部已经疲惫不堪，队伍拖得很长很长，孩子的哭声，婆姨们的抱怨声，军官们的训斥声，构成了一支特殊的行军交响曲，他们进入了爬行速度。

国民党的侦察机继续在低空盘旋，……

"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距你们不远，即作战斗准备。"敌侦察机终于发现了我军的动向，并立即向罗历戎部投下通信袋。

这时已经是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时三十分，罗历戎正洋洋得意地行进在清风店附近，接到报告，顿时脸无血色。

难道共军从地下钻出来的吗？罗历戎还未镇定下来，又接到一架飞机上投下的通信袋，上面写着："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部很近，请即作战斗准备。"

来者不善，犹如晴天霹雳，罗历戎开始慌神了。

四、他紧急求援声音未落，全军已经覆没

当罗部构筑工事还未完毕，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枪声越来越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开始了。

孙连仲连忙派空军支援，一批批弹药、饼干投到罗部阵地……

李文迅速派出一个团兵力南下接应，但遭到解放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人员一批批死亡，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战斗很快进入胶着状态，空运物资已无法飞投，罗历戎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封封紧急求援的电报发向孙连仲和李文手中。

十九团已经损失……，某某营失利……副官不断向罗历戎报告着不幸的消息。

李文派出一批批增援部队都被消灭了，保定本身防守已经捉襟见肘，再也无法派出增援部队，在罗历戎连连电报催促下，才拼凑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但又一次遭到阻击。

罗历戎已收到李文几封援兵即南下的电报，但望眼欲穿，直到二十日晚还不见一兵一卒的到来。

解放军轮番不停的进攻，使罗部无法喘息，伤亡越来越重，他开始绝望地向上方请求突围，但没有被批准。

"援兵已由保定派出,约在本晚十二时分乘汽车南来,计二十一日拂晓可到。"罗历戎又一次收到李文的电报,他如打了一针强心剂,连忙传达给各部,要他们死守。

但他又一次落空了。二十一日上午六时,还不见援兵的踪影,此时已经几乎弹尽粮绝的部队已无心再战,纷纷放下武器。虽然个别村落还有稀落的枪声,但已无济于事。

又一架满载弹药、饼干的国民党运输机来到上空,看到罗部已龟缩到一个小村庄,火光时隐时现,不久,就一片寂静,知道罗部已经被歼,哀鸣着掉头往回飞去。

当飞行员向孙连仲报告战场目击情况时,孙连仲颓丧地躺在沙发上,只说了一句:"好了,你回去休息吧!"

战俘一队队被押了下来,但却没有发现罗历戎,他到哪里去了呢?

五、他等着发落,但得到了宽大

解放军清查俘虏的工作正在进行,已经到二十二日上午,还没有发现罗历戎,难到逃跑了,据国民党官兵说,他没有走。

他不是没有走,只是没有跑掉。在大势所趋,全军主力快覆灭时,他钻进了第七师师部,和师长李有章一起带着几个人企图突围,刚走不远,士兵都溜光了,李有章腿部中弹,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冲了上来,他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只是他穿着士兵服装,解放军战士把他当一般俘虏押到一个大院去了。

北方的十月天气已经微寒,战俘们集中在一个个院里,都在晒着太阳,等待着解放军对他们的安排。罗历戎穿着士兵大衣,也混在其中,他暗暗地向上帝祷告,不要让解放军认出来。突然,一块土疙瘩落在身边,他吓了一跳,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一个解放军战士端着枪已经站在他面前。

"你是罗历戎军长吧!"战士问。

"你怎么知道的?"罗历戎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你的部下认识你,你看这个!"解放军战士指着地上的土块说。罗历戎知道已无法否认,只好说:"是的"。

"这下完了!"他想。

罗历戎被带到另一个院子。

"你受惊了!罗军长。"一个解放军军官迎着他和蔼地说。罗历戎不敢相信,在他面前的却是打过交道的熟人吕正操。内战之前,吕正操是军调三人小组共方负责人,罗作为当地驻军负责人接待过他。

"你饿了吧?"又一声和蔼的问话,吕正操让警卫员端来又热又香的鸡蛋面条。罗历戎的确已经几餐没有好好吃饭了,真是又困又饿,但此时,他是无心品尝鸡蛋挂面的香味的。他想着另一件事。

在石家庄周围被解放军攻下,石家庄成为一座孤城时,罗历戎曾怀着对共产党仇恨的心理,在第三军军部杀害了四十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今天,自己作了俘虏,共产党会怎样处理呢?他不敢想下去了。

杨成武也来到这里,对这位战将,罗历戎早已慕名,敬佩不已。这时,杨成武和气地和罗历戎聊起家常来,同时叫他不要害怕,解放军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是宽大的,并告诉说聂荣臻要接见他。

"我也想见见老师!"罗历戎喃喃地说。罗历戎是黄埔学生,那时聂荣臻在黄埔当教官,他没有忘记老师的才能,只是追求目标不一样,他和老师成了敌对双方。今天当了俘虏,罗历戎非常想从这位晋察冀最高指挥官那里得到怎样处理自己的底细。

他跟着杨成武来到聂劳臻的指挥部,三张拼起来的方桌周围坐满了人,聂荣臻坐在一张围椅上,许多摄影记者已经打开了镜头。

他心头犹如十五桶水,七上八下,但还是装出一副军人的风度。他等待着老师的训斥,等待着这位最高指挥官对自己的发落。

"请坐吧!"聂荣臻亲切地说,"你是四川人,我们还是老乡呢!"一席家常话,顿时解除了罗历戎心里的疙瘩。

"你不要害怕,以前走错了路,以后好好改造就是了,解放军说话算数,优待俘虏,不象你们国民党,抓住俘虏就杀。"聂荣臻说。罗历戎终于放心了。

最后,聂荣臻又严肃地对他说:"我们还希望你立功,你是军长,能否下命令让石家庄的刘英放下武器?"

"我办不到。"罗历戎回答得很干脆,"因为我已被俘,下面是不会听我的。"他说的也许是实话,因为守石家庄的刘英是一个充满对共产党仇恨的人,他决不会轻易自动放下武器。但罗历戎不愿发这道无用的命令也是真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带的部队全部覆没已经对不起蒋介石,怎么还能帮助共产党去劝降呢?

罗历戎终于没有发出让刘英放下武器的命令,解放军也没有强求,因为几十年为蒋介石效劳的军长,要花几分钟转变他的立场是不可能的,后悔药让罗历戎以后自己吃吧。实际上石家庄的刘英已成为瓮中之鳖,十几天后,我军就解放了这座华北重镇。

六、他只激动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对我太好了!"

后悔药罗历戎终于吞下了,那是经过十几年改造之后。一九六一年春节前,罗历戎当着周总理的面对罗瑞卿说出了自己的悔恨之言。

时间又过去二十多年,罗历戎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他被安排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住在某招待所参加政协大会。杨成武同志专程到他的房间看望他,并送他一本自己撰写的《忆长征》回忆录,扉页上写着:"送给罗历戎同志留念",落款签着"杨成武"三个大字。罗成戎激动地说

了一句："共产党对我太好了！"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他想了许多许多……

（选自《纵横》84年2期作者：黄国平）

材料三　清风店战役

南合村中晚日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选自《老一辈革命家诗词选》，作者：朱德）

石家庄战役

背景介绍

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守敌军心动摇、兵力薄弱，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乘机对石家庄进行攻坚战。战役部署：以第三、第四纵队分别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对石家庄之敌实施主要突击，以四个独立旅自西北和东南实施辅助突击，又以第二纵队及地方武装进至定县以南、新乐以东、沙河以北地区集结，阻击由保定南下增援之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拂晓，解放军各突击部队进入预定位置，首先对石家庄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战斗，攻占了飞机场和外围据点，并完成了突破外市沟防线的准备。八日黄昏，解放军对外市沟之敌发起总攻，第三纵队由西南方向突破，第四纵队由东北方向突破。激战至九日，外市沟防线除少数据点外，均被攻占。十日黄昏，各部队对内市沟防线开始了总攻，内外爆破同时并举，从被炸塌的壕沟缺口冲入内市沟。十一日，各部队突入石家庄市区，进入市街战斗，激战一昼夜，次日晨逼至敌核心工事阵地。第三纵队从南面和西面，第四纵队从东面和东北面，冀晋军区从西北面向敌发起总攻，十一时左右全歼守敌，俘敌第三十二师师长兼石家庄警备司令刘英。随后，解放军乘胜攻占石家庄以南孤立据点元氏城。至此，石家庄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先例。

材料：

- 举兵燕赵硝烟起　石门攻坚磅礴气
- 神话变成了笑话

材料一　举兵燕赵硝烟起　石门攻坚磅礴气

总攻定在11月6日零时。

这是11月5日深夜11点多了，离总攻不到一个小时，前线指挥的杨得志又一次接到了聂荣臻的电话，大战在即，聂总仍是那么亲切、从容。

"情况怎么样？敌人的部署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刘英以正太饭店为核心，将嫡系第4、95、96的三个步兵团和炮营、辎重营、骑兵营、特务连部署在内市沟和核心工事，驻守外市沟和周围据点的都是杂牌军、保安队和还乡团。"

"不过，你们不要为此而掉以轻心，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哟。"

杨得志挺了挺胸："请聂总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我相信你们。战斗打响后，要力求快速推进，指挥不能急躁。你们几个人打仗都习惯往前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杨得志精神抖擞。

放下电话，聂荣臻来到院子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远方漆黑一片。他望着石家庄的方向，分秒计算，等待零时——那新的一天的降临！

带兵数载，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然而此时，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初冬的风无声而有力。天是黑的，地是黑的，唯一能看见的星星也很小很小。石家庄仿佛落进了夜的最深处，且裹着尸衣，死亡般沉寂。

石家庄又称石门，30几年前还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因其枢纽般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了起来。如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先后经营下，已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军事重镇。特别是罗历戎接手之后，大兴土木，苦心经营，把一个方圆60里的城市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第一道防线外市沟，周长60里，深7米宽6米。沟外沿有鹿寨、铁丝网和布雷区，沟内沿有高碉、伏地堡1000多个，并设有电网，电网后又是环形铁路，铁甲车不断巡逻。第二道防线内市沟，周长36里，深宽各5米。沟内有尖木桩，沟外有铁丝网、挂雷和鹿寨。沟沿有比外市沟更加稠密而坚固的工事。第三道防线是核心工事，以市区的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等坚固的建筑物组成。此外，从市内到效区，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国民党曾断言："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

而此刻，这一切都仿佛火山口上的一块石头，只待时辰一到，将灰飞烟灭。

最深切感到灭顶之灾的，莫过于国民党32师师长、

如今的石家庄最高警备长官刘英了。自从共军要攻打石门的消息传来，他很少睡过连续两个小时的觉，油光的圆脸膛此时憔悴万分，眼里网着密密的血丝。两天前，蒋介石亲自打来了电报：

"刘英司令弟勋鉴：石门乃华北重镇，交通咽喉，务希严令所部……团结苦斗，固守石门……共军若敢进攻石门，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

刘英简直受宠若惊，总裁称他为弟！但他旋即心惊肉跳：是不是——蒋介石拿他当佛脚来抱了？可见……他不敢想下去，颓然瘫坐在床上。这是他的作战办公室，他已几天吃睡在这里了。

援兵，鬼影也没见一个。该布置的他都布置了，如今仿佛只有等待了，他如一只跑不了的兔子，等待最后的挣扎与死亡。

零时！"轰——"60里方圆的石家庄在同一时刻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刘英"腾"地从床上弹起，趿着鞋奔到窗口。

石家庄四周：千百门火炮齐发，撕裂着一切、照耀着一切；千百条弹迹如千百条吐火的赤练蛇，在天空中交织飞舞。大地一阵比一阵剧烈地颤栗、扭动，发出痛苦的嘶鸣和欢快的喊叫。

第3纵从西南，第4纵从东北，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四面配四组炮群，首先攻占四效，尔后突破外市沟、内市沟，一齐向中心进攻，展开巷战，猛插核心工事！

如出水蛟龙，如下山猛虎，初冬天气，战士们大都脱光了膀子，排山倒海般冲向石门。天是红的，地是红的，人是红的，以血洗浴苍天的壮观！

捷报频传。拂晓，扫清了外围据点。黄昏，逼近外市沟。8日，向内市沟推进。10日，刘英接到核心工事的报告：一夜之间，共军从眼皮底下钻了出来，上千米的开阔地呀。

聂荣臻分分秒秒关注着战斗的进程。当他接到内市沟已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的报告时，真正舒心地笑了。他幽默地说："刘英这只小鳖虫，大石桥的硬壳壳也保不住他喽！"

刘英退到了大石桥里。兵败如山倒，岂止是兵败如山倒？他的兵们成批成伙地逃跑，督战队的大洋刀已削了上百颗脑袋，但仍阻止不住逃跑的洪流，他只好派人去追、去找。英勇机智的晋察冀野战军4纵的一个连战士，却趁着这个机会，装作被收容回来的敌兵，摸了刘英的老巢，在床底下把他拽了出来。

刘英只好写出命令士兵投降的一封信。

胜利了！仅用了六天六夜！1947年11月12日11时，鲜红的战旗插上了石家庄市最高建筑——正太饭店的楼顶，它迎风而展，与艳阳同辉。

石家庄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欢乐之中。有人高高举起了枪，向天空扣动扳机，向这座新生的人民城市致敬，向为这座城市而牺牲的烈士们致哀。许多人泪流满面。

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聂荣臻同志转全体指战员：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两万余人之大胜利！……"

朱德总司令在冀中河间发来贺电。"聂劳臻同志转全体指战员：仅经一周作战，占领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选自《中共虎将与名战》）

材料二　神话变成了笑话

新华社晋察冀前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电　本社记者杨朔报道突破石家庄蒋匪核心工事的一角称：石家庄蒋匪最后最坚的防线——所谓"核心工事"，修在市中心，以火车站、大石桥及正太饭店等坚固建筑做主体，周围遍挖壕沟、枪眼、伏地堡、暗堡、高碉、星罗棋布，多是钢骨水泥修成，里面配着轻重机枪，外面围着电网，层层迭迭，交织成严密的火网。匪徒们以为有险可守，就编出"不可攻破"的神话。八日，匪师长刘英还壮着胆子向全市广播说："我们应利用既设之强固工事，以逸待劳，消灭敌于阵地前。"但解放军用兵神速，三日内连夺里外两道市沟，杀得敌人失魂落魄，残兵败将从四面八方逃进"核心工事"，却正好变成瓮中之鼋，更易捕捉。

十一日黄昏，我各路雄兵象铁钳一样，把匪师长刘英所率残部紧紧围住，集中炮火猛烈轰击，电闪雷鸣，威力惊人。敌用一列铁甲车在车站前之铁道上往来，以枪炮掩护步兵向我反扑，我集中机枪迎头射击，铁甲列车怆惶逃走，撇下步兵到处乱钻，火车里、仓库里、地堡里都成了逃命的去处。我某部九班长蒋焕成领着五人，飞步越过铁路，迫近一地堡，吓得里边乱叫："俺们不打了！"就从地堡内丢出一大堆枪。

这时，敌又一铁甲车仍来往行驶，挡住我军进攻道路，我战士即架起火箭炮，反坦克炮，连打九发，车上的敌人震昏了，不等清醒，战士们就一拥而上，敌人高举双后，纷纷跳下车来作了俘虏。此时，我军已涌过铁道，直扑车站。时近半夜，某部六连副连长张银占领着几十人，又直奔水塔，塔上虽设有轻重机枪，建筑十分牢固，但清风店一战早使敌人闻风丧胆，士气颓丧。工事再坚，无非是缺乏生命的空壳。一排手榴弹摔过去，一个冲锋就将该塔占领了。只听西南还有枪声，我军六连紧奔过去，敌人却早跑得无影了。在星光下一看，黑黝黝的一大片，内有几十辆汽车，四辆坦克，两门加农炮，战士们就照数点收了。天明，我各路大军带着反攻的锐气，迅速地夺得各主要阵地，匪师长刘英已就擒。残敌挤到正太饭店楼上，终于在

正午被我一网打尽。而"核心工事不可攻破"的神话，就变成笑话了。

（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背景介绍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由分散的斗争向着全国性的联合行动发展。五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紧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爱国运动采取血腥镇压的所谓"紧急处置"。五月二十日，华北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形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当日北平各校学生七千多人在北大集合后即开始了游行。同日，京沪苏杭地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伙食费及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国民党反动军警在游行队伍经过的珠江路口摆开阵势，严阵以待，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并用水龙头冲击学生，用木棍皮鞭痛打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更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学生运动继续扩大。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提出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的指示。随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斗争遍及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材料：

- 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 南京"五·二〇"血案目击记
- 武汉"六·一"惨案挽联

材料一　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去看电影，被美国兵架到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同学得知这个消息后，极端愤怒，长期郁积在人们心头的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怒涛，迅速从北大扩展到北平全城，扩展到全中国。

事件发生后，北平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攻势。从抗议美军暴行开始，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要求美军从中国滚出去。通过抗暴斗争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孤立了敌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12月30日午后，由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校学生汇集成的一支万人队伍，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东单广场，也就是沈崇受侮辱的地方，立即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大会，"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撤出中国！"等口号声，响彻了广场的上空。

从北平开始的"抗暴"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了。1947年元旦，即国民党公布伪宪法的那天，上海全市学生一万多人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大示威。在南京，由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发起，于1月2日和3日，组织了两次示威游行。此外，天津、武汉、重庆、杭州、苏州、无锡、开封、青岛、广州、福州、桂林、成都、昆明、台北等数十个大中城市，都相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初，各地参加罢课和示威游行的，仅学生就有50万人。

1947年5月，广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又掀起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在我党领导下，反内战示威运动迅速扩展到蒋管区其他大中城市。

5月上旬，北平学生举行五四纪念周活动，激发了广大学生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觉悟。5月15日，北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代表会，决定罢课3天，要求增加公费，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

蒋介石政府面对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极为恐慌。5月18日，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血腥的镇压措施。但是这并没有吓倒广大的青年学生，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颁布的第二天，即5月19日，上海7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不顾反动政府的威胁，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时，上海学生愤怒地喊出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向炮口要饭吃！"

在南京，5月20日，即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同学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国民党武装军警宪特用水龙、木棍、铁棒、皮鞭等凶器冲击和毒打游行群众，并进行逮捕。据事后统计，在这次事件中，被打的学生在500人以上，重伤20多人，轻伤90多人，被捕20多人。这就是反动派在南京制造的"五二〇血案"。

同日，在北平，由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校学生组

成的一支 1.5 万多人的队伍，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天津南开、北洋两大学的学生和唐山工学院（在唐山）的学生，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都遭到特务的殴打，许多同学受伤或被捕。

蒋介石政府的血腥镇压，不但没有能制止学生的正义斗争，反而使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全国。自 5 月下旬以后，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广州、福州、南昌、桂林等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广大学生，相继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要求生存，要求和平，要求自由，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面对汹涌彭湃的反饥饭反内战运动，反动派到处加紧了镇压，迫害学生和各阶层人民。6 月 1 日前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杭州、贵阳、昆明、重庆等城市，进行全国范围的大逮捕，被捕者达 2000 多人，并且在武汉制造了“六一惨案”。是日凌晨 3 时，数千军警特务包围了武汉大学，武大师生从睡梦中惊醒，许多学生当即被捕，军警并开枪射击，有 3 个同学被当场打死。这一惨案，又一次震动了全国。

反饥饭、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从 5 月开始持续到 6 月。在这次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反动政府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逮捕的学生和市民在 1.3 万人以上，造成的伤亡在 400 人以上。

对这次学生运动，新华社 1947 年 5 月 23 日发表时评指出，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广泛”。如以蒋介石的师傅陈英士和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英士大学和中正大学，过去从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这一次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第二是勇敢”。蒋介石不准学生罢课，学生就偏偏罢课；蒋介石不准学生游行示威，学生就偏偏扩大游行示威；蒋介石命令军警宪特殴打学生，学生就夺过他们手里的水龙，冲破他们的包围。一切蒋介石所故意装得庄严神圣的东西，都被群众当作狗屎一样抛得远远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掀起，是蒋介石反动统治危机表面化的重要标志。这次运动的巨大规模和广大学生的英雄气概，为以往学生运动所少见，在中国现代史上只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这次运动相比较，这就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都没有象这次运动中的群众提出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象这次运动中的群众显示了如此强大的威力。5 月至 6 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蒋管区 60 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这次运动使蒋介石反动派完全陷于孤立，它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促进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南京“五·二〇”血案目击记

1947 年 5 月 20 日，与平津两地同一天，南京也爆发了一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挽救教育危机”为中心内容的学生运动。京、沪、苏、杭地区 16 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 6000 余人举行示威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酿成流血惨剧，全国震惊。其时笔者为《南京晚报》记者，自始至终在冲突现场采访，亲眼看见许多真切而又感人的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有责任把这段史料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和煦。记者几经周折来到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所在的成贤街。往日此地阒静无哗，今天却岗哨林立，身穿崭新草绿色警服，头戴白色钢盔的特种警察，盘据路口检查过往行人。装有报警器的“飞行堡垒”（当年的一种新型装甲车）伫候在旁，蠢蠢欲动。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全被封锁。

可是跨进中大校门，另是一番景象。学生们成群结队（包括昨天才由沪、苏、杭三地赶来的上海复旦、交大、暨南、杭州之江、艺专和苏州社教学院等校学生）正兴冲冲地走向操场集合。他们有的手持三角标语小旗，上面写着“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吃饭！”，有的两人扛着一幅巨型漫画，上面骷髅白骨成堆，旁边以一只只破饭碗衬托，象征内战炮火已经使得千百万人流离失所，陷入了饥饿与死亡的深渊，看了撼人心肺！

上午 8 时，航空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廖少仪突然上台宣布，学校被军警包围了，连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不例外，他们来不了了！但游行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整队出发，先去营救两校同学，再会师前往。

于是，学生们手挽手，肩并肩，四个人一排组成一路纵队，从后门鱼贯而出。为首的扛着红布横幔，上面一行擘窠大字，赫然醒目：“京沪苏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大游行”，后面紧跟着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一路上，学生们手上挥动小旗，嘴里不断高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力量！”还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那首著名的“打倒列强”的旧谱换上新词，高唱着：“烧饼油条，烧饼油条！天天涨、天天涨！都是为了内战，都是为了内战！所以涨，所以涨！”声震寰宇。过往行人从四面八方闻声而至，簇拥围观。学生们趁机向人群散发传单、讲演、唱快板，演出街头活报剧。

队伍行经保泰街南京警察厅门前，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如临大敌，一个个手扣扳机，刺刀出鞘，虎视眈眈地将枪口对准学生。但学生们不屑一顾，照常高呼：“打倒韩文

焕！”、“砸烂阎王殿！”还把红绿标语糊满一墙。警察们见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刚到鼓楼广场，前面传来了金大同学突围而出的喜讯。片刻，金大和金女大的队伍果然来了！两只队伍一声会合，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雀跃欢呼，激动得眼泪直淌。会师后阵容更加壮大，总计有6000多人。于是，循中山北路继续前进，直奔国民参政会，打算向蒋介石面递请愿书(当时参政会正在召开四届三次会议，蒋本人定于当天上午出席作《施政报告》)。

途经“青年部”时，铁门紧闭，学生们看见挂在门口那块“中国国民党青年部”的大牌子，立刻用粉笔将“国”字改为“刮”字，把“青年”二字改作“特务”两字。平日这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衙门，陡然一下变成了“中国刮民党特务部”，大家见了一阵轰笑，一边高呼口号：“打倒特务头子陈雪屏！”“把陈雪屏送上法庭！”有几个学生还翻过围墙，把铁门上的重锁砸开，大家一涌而入，直冲到楼上部长办公室，找陈雪屏算帐，可惜陈早已逃之夭夭，同学们扑了个空。

队伍来到中山北路与广州路，珠江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时，眼前景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几百名警察，已组成一堵人墙，横梗街心，挡住去路。学生当场推派代表10人，找警察交涉。学生代表对警察头目说：“现在政府讲民主，请愿游行是宪法允许的。你们为什么不让通过？”对方答道：“新办法中规定，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他指的是5月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学生代表据理驳斥，指出这个《办法》是节外生枝，与宪法根本抵触的法西斯临时条款，他们不承认。警方百般狡辩，始终不肯让步，口口声声说：“警察只知道服从，执行上峰命令，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行！”代表们转身向全体同学传达了交涉无效的消息后，顿时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大家齐声吼道：“冲过去，冲过去！我们一齐冲过去！”随即便紧扣膀臂，跑步向前冲，边跑边以歌声和口号声助威鼓动。

一场警察和学生双方短兵相接的搏斗开始了。刹那间，警察们把预藏在怀中的皮鞭、铁棍、碎砖、石块拿出来当武器，朝学生们乱抽，乱打，乱砸；路旁的消防车，开足马力，用哗哗的水柱，向学生们横扫直射，一时水花四溅、马路变成了泽国；石块、铁棍满天飞舞；喊声、哭声响成一片。可怜赤手空拳的学生们招架不住，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中大女学生赵之巽，被十来个警察包围，一顿拳打脚踢，当场倒在血泊中。这还不足，预伏在附近的囚车，呼啸而出，警察们发了疯似的，见人就抓。许多女学生躲进路旁商店里，也被揪着长辫子架上了车。路人惊惶失措，东奔西窜；两旁商店纷纷关门上板；三轮车，马车，人力车，大小汽车统统被迫停驶；一时秩序大乱，交通完全中断。在不足两小时的冲突中，据事后统计，有104名学生受伤，其中19人伤势严重，被捕的则不计其数。

此时此刻，唯有一辆满载外国记者的中型吉普，跟随游行队伍缓缓而行。我见机赶紧跳上车去，才得免遭毒手。国民党当局当然不敢开罪洋大人的！所以高鼻子蓝眼睛们，能从容不迫地拍下一幅幅珍贵而又精彩的瞬间。把这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军警屠戮爱国学生的暴行，曝光于世。

警察们的手段，尽管如此卑劣、毒辣、可是并没有吓倒学生。被冲散的学生，迅即重振队伍，抖擞精神，继续勇往直前。歌声比先前唱得更嘹亮，口号喊得比先前更响彻。路人被学生们的勇气和胆识所感动，不由自主地连连拍掌喝彩，向游行队伍行注目礼，警察吆喝驱赶，随散随聚，无济于事。

可是，当游行队伍折向“国府路”(今长江路)，离参政会只有一箭之遥时，迎面却出现了一支骑着蒙古大马的宪兵队。他们背着冲锋枪一字儿排开，堵住街心。现在倘若再冒险向前冲撞，势必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学生代表当机立断，叫大家就地休息，一面由代表前去参政会求援。

这时已过晌午，五月天气闷热欲雨，学生们汗流浃背，又空着肚皮，在灼烫的沥青路面上席地而坐。附近好心的居民们，纷纷送来开水、烧饼、馒头充饥，并用药水替负伤同学敷伤。一位老太婆边扎绷带边对记者说：“这班娃儿到底犯了什么罪！作了什么孽！被打成这个样子！老天你也睁开眼睛瞧瞧呀！”说也奇怪，这时远处雷声隆隆，霎时，乌云满天，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对面看不见人。“风暴来了，风暴来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叫起来：“这真是天怒人怨唷！”

学生代表在参政会会见了秘书长邵力子和许德珩参政员，哭诉着请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救救孩子！邵、许两人马上把卫戍司令张耀明找来，要他查明肇事原因，严惩祸首，妥善处理，维护宪法尊严。张先佯装不知，继则一味推诿，允许调查。他还猫哭耗子假慈悲，劝学生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改道而行，解散回校，别再惹事生非了！代表们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指出惹事生非的不是我们学生，而是你们军警！声称游行队伍非得到参政会，面见蒋介石递交请愿书不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否则就静坐示威，哪怕一天，两天……把马路坐穿也在所不惜！双方一直僵持到下午4点钟左右，张耀明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事后方知这是张耀明他们预设的圈套，有意磨蹭时间，让蒋介石溜之乎也。

午间，蒋介石正在黄埔路官邸宴请部分参政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与蒋同席，谈及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幕，建议将警察厅长撤换。谁知蒋听了气得面孔铁青，双手颤抖，恶狠狠地说：“这些学生都是受共产党欺骗，不把共产党从学校赶出去，这学校是没法办下去！”(此乃我事后采访吴女士所知)

不过，学生们的血并没有白流，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第二天，梁希、潘菽、胡小石等民主教授便到校慰问学生，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接着民盟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相继到中大等学校演讲，高度赞扬学生运动，对学生们的要求和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民盟总部还捐款慰问学生。5 月 30 日，立法院经孙科院长同意，特别召开临时大会，商讨处理学潮办法。当天，除行政院长张群因事外出外，内政部长张厉生，教育部长朱家骅、新闻局长董显光都列席。学联代表李明杠（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学生）在会上报告了“五·二〇”游行经过及被镇压详情，并向政府提出抗议与要求。立委张西曼，谭惕吾等慷慨陈词，严厉谴责了政府的高压政策。张西曼一语中的地揭示了这次学潮的本质。他说：“学潮政治性不可否认，要求和平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当心！玩火者必自焚！”

连日来，通过学生坚持不懈的斗争，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舆论不断施加压力，立法院专门组织了九人委员会从中斡旋。国民党政府终于被迫同意释放被捕学生；负担受伤同学医疗费用；自 8 月份起，将大学公费生副食费增至 8 万万元法币；同时把南京警察厅长韩文焕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长，遗缺改由黄珍吾接充。

紧接着“五·二〇”之后，全国 60 多个大中城市纷纷作出响应，相继掀起了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的新高潮。单纯的学运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之中，加速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进程。

（选自《纵横》95 年 1 期，作者：李传权）

材料三　武汉“六·一”惨案挽联

1947 年“五·二〇”学潮后，国民党政府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制订出《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严厉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以及一切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当局可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

此间，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钧、邓启东，韩德培、肖文灿等人联合在《观察》杂志发表了《我们对学潮的意见》，就《临时办法》提出了异议。《意见》还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清除豪门资本”、“党团退出学校”等一些大胆要求。

6 月 1 日凌晨，数百名武装军警分头包围了武大第 18 栋教授住宅和男女学生宿舍。哲学系教授金克木、历史系教授梁园东、机械系教授刘梦庵、外文系教授廖朗山、女教授朱君允和 14 名学生、1 名工友被捕。学生们闻讯赶来营救，双方发生争夺。军警首先开枪，政治系一年级学生陈如丰（来自收复不久的台湾）、土木系一年级学生王志德、历史系一年级学生黄鸣冈当即中弹身亡，还有 19 名学生和职员受伤。

惨案发生后，上海、北平学生曾先后罢课和公祭，以示声援。6 月 22 日，由武大学生、“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联合组成的“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于该校体育馆为三位殉难者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摆满了花圈和挽联，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武大“六一”殉难烈士：

？

！

育杰中学全体同学

此联出自于该校任职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手笔。

灵堂前的一副挽联：

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

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还有一联写道：

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骗，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

只准混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薄海同悲。

珞珈山十名小贩联名送来一联：

你们大学生尚能捕杀；

我等小百姓何堪生存。

医师肖克强夫妇的挽联触目惊心：

我兢兢业业，才能治好一个痨病鬼；

他气势汹汹，一杀就是三位年轻人。

无辜遭受囹圄之苦的廖朗山教授满怀悲愤送来挽联：

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

黎明未启，蓦然觉醒竟捐生。

湖北省参议会参议员刘劲的挽联，义正词严：

武力对学生，我来执言徒饮泣；

群情争民主，谁能扼杀逆潮流。

远在南京的武大校友联名送来一联：

哀法制，哭民主，文章无用，还是要坚强振作，奋力争生。

囚教授，杀学生，枪杆横行，说什么爱护学府，奖掖文教。

当时报载一副挽联：

四亿同胞，试看三滩血迹，天呀，这是什么世界？

最高学府，弄成一片屠杀，妈的，讲那啥子民权！

（选自《纵横》95 年 3 期，作者：刘作忠）

十二月会议

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转入战略反攻后，国内形势朝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革命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为了总结战争的经验，加强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1947年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和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一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报告总结了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一年多来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成为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报告阐述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认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出，党在土改中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并规定在土改中必须注意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二是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为了坚决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报告还提出了整党问题，认为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决定性环节。

报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报告提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这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报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报告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并且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胜利的。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及目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致认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并且针对党内外提出的组织中央政府的要求指出：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成为解放战争的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制定的基础。十二月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材料：

· 十二月会议

材料　十二月会议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保证中国革命运动沿着夺取全国胜利的轨道健全发展，于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参加者除了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负责人。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所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和他在1946年4月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并对革命战争转入进攻以后，党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做了纲领性的说明。

（一）关于形势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从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并形成全面的战略进攻的时期开始的。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二）关于军事问题。

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一年多来的新鲜经验，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高度概括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就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

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十大军事原则"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军以来,毛泽东所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指导思想。"十大军事原则"不仅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而且对人民军队的基本作战方式和方法、主要目标、战斗作风、战斗保障以及有关战争诸方面的矛盾关系等,都作了科学的阐述和总结。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对于研究解放战争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点,对于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全部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明确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详细地阐明了在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实现这三大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关于"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报告明确指出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报告回顾了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历史,特别是总结和肯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发布"五四指示"到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站在农民方面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坚定立场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报告针对当时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向,强调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掌握的两条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同时,报告对坚持这两条基本原则所必须执行的各项具体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报告还就当时正在开展的解决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的整党运动作了说明,强调搞好整党对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重大意义。关于"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报告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官僚资本"的发生、发展和它的性质、特点,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20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消灭官僚资产阶级,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之一,是彻底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经济纲领之一。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报告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不同地位和性质,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而且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反动的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因此他们"是可以参加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并且,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期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是"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对于存在着反动政治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要在政治上予以揭露和打击,肃清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决不能把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混同起来。报告强调指出,必须避免过去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那种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的职工运动的指导方针,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等。这些从经济上打击民族资本主义的错误做法,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背道而驰的。与新民主

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相适应，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主要地将是三个部分："(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份；(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成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关于统一战线。

报告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会议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作出了如下重要决定：(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倾向以及为纠正错误倾向而亟需解决的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由毛泽东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这次会议为党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台湾"二·二八"起义

背景介绍

1947年2月27日晚，国民党专买局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万里红酒店附近，抢走了一个叫林迈江寡妇的六千元现款及几十条香烟，并打伤了她。群众愤愤不平，包围了缉私员，缉私员开枪当场击毙群众一人。于是上千名群众涌向台北市警察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但得不到结果，群众彻夜不散。28日晨，群众在延平路演说，揭露昨晚的流血事件，警察上前干涉，双方发生冲突，随后群众又涌向了省专卖局，中午集合至数千人，一齐赴长官公署，请求惩凶和撤消专卖局，并高呼"打倒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台湾当局对群众要求置之不理，遂使群情激愤，冲入公署大门。守卫军警开枪，顿时打死三十多名群众，伤者无数，更加激起了公愤。于是，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愤怒的群众夺取了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台北人民的正义斗争。3月2日，台北市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建国中学等校学生五千余在中山堂举行大会，决议组织学生军。"台湾民主联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吧，高举着民主的旗帜，团结牺牲，继续前进，奋斗到底"。经过几天的斗争，整个台北市，除长官公署、警备司令部以外，其余各机关均为起义者占领、接管。台北人民在起义过程中组成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重用台省人材"，"专卖局废止"，"贸易局改为商政机构，废除营私行为"，"根据建国大纲即行县市长民选"等九项要求。

台北市的二二八起义，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起义当晚，在基隆市和台北县，3月1日在台中市、新竹市、新竹县、彰化市，3月3日在高雄市、高雄县、台东县，3月4日在花莲县等地都发生了起义，其中尤以台中市的声势最为浩大，由谢雪红领导的起义者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武装其中包括高山族人民。至此，武装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台湾岛。3月2日，台湾地方当局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蒋介石一边放出"中央以宽大政策合理解决台省事件"的烟幕，一边则被迫抽调参加内战驻扎在江苏境内的第二十一军，去台湾镇压。3月8日，国民党军在基隆、高雄登陆，然后杀向台湾各地。这种镇压，持续了一个多月，百姓遭殃。据台湾旅宁沪七团体4月1日给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呈文中说：国民党"使用武力，以清乡为名，无辜民众横被枪杀，将尸首抛入海中，或抛弃田野者，为数在五万人以上。"

材料：

- 台湾"二·二八"

材料　台湾"二·二八"

1947年1月9日，台湾人民为了响应祖国大陆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曾公开在台北市举行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人民一万多人参加的反美反蒋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的台湾各界人民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这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振奋了台湾人民反抗美蒋反动派的斗志，成为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的先声。2月初，台北、台中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反美反蒋传单，国民党台湾当局极为恐慌，到处逮捕进步人士。2月25日，花莲港一位公共汽车司机，在遭受国民党官员毒打之后，气愤异常，将满载国民党中央军的汽车驶入海中，同归于

尽。所有这些表明台湾人民的革命风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在台北延平北路，发生了国民党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香烟摊贩林迈江的暴行，引起了市民的公愤。接着，缉私员傅学通开枪击毙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群众怒不可遏，立即拥向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毫无结果。这一震动台湾的“缉私血案”，成了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的导火线。

第二天，即 2 月 28 日上午，台北市民举行罢市、罢工，并结队游行表示抗议，群众高呼“卖香烟的都在送命，我们台湾人还得活吗?”游行群众将专卖局台北分局捣毁。上午十一时左右，群众推派代表五人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及撤销专卖局等五项要求。国民党台湾当局一面敷衍拖延，一面布置大屠杀。下午一时，群众再次向长官公署请愿时，国民党卫兵竟向徒手请愿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伤三人。至此，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奋起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武装起义，支援台北人民的正义斗争，起义风暴迅速席卷整个台湾。

3 月 1 日清晨，台北国民党军警开始实行恐怖镇压，枪声四起，台北市民和国民党驻军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当天下午，包围国民党铁路管理委员会的群众，又被警察大队开枪打死十八人，伤四十余人。这就更加激起全省人民的反抗怒潮。斗争的烈火，北起基隆，南至高雄，东到台北、花莲港，中经台中各地，在台湾全省猛烈地燃烧起来。

在台北地区：2 月 28 日晚，基隆开始起义；3 月 3 日，基隆港码头工人袭击军用仓库。3 月 1 日，桃园起义，阻击装载开往台北镇压起义。3 月 2 日，新竹起义，袭击警察派出所，并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及机关多处。

在台南地区：3 月 2 日，台南市人民起义，袭击了市内各处警察派出所；三日，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决议支持台北人民的正义斗争，并要求改革政治，民选市长、县长。四日，武装人民示威游行，并组成人民军。台湾籍警察二百余人起义，参加人民军作战，袭击宪兵队及军械库，缴获很多武器，占领了市内军政机关，并将俘获的国民党军官兵七百余人集中看管起来。在高雄，3 月 1、2 两日，武装起义声势浩大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和要塞部队都缩在要塞中不敢外出。3 月 5 日，高雄市人民成立武装总指挥部，全面进攻反动军警。高雄市人民还打开监狱，释放了囚犯。3 月 4 日，屏东人民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占领市政府。5 日，屏东附近高山族人民参加起义，袭击宪兵队和飞机场。

在台东地区：3 月 4 日，花莲港人民起义，攻占了宪警机关。同日，台东的青年学生和高山族武装青年，夺取了当地军政机关。

在台中地区：这一地区的起义在全省广泛的起义中，具有重大意义。3 月 1 日，台中市人民开始起义，进攻警察局和驻军粮库，并将敌军全部缴械，起义人民控制了台中市，并派出代表北上参加台北起义。2 日，召开台中市民大会，宣告成立人民政府和作战部，组成了人民军。三日，人民军和前来救援的国民党激战六小时，打败国民党军，激获大批枪枝弹药，俘虏敌官兵三百多人。人民军进攻并解放了彰化和嘉义。解放嘉义的战斗最为激烈，人民军三千多人进攻国民党驻军，国民党军队被迫撤出市区，逃至机场，为人民军包围。因人民军缺少重武器，未能加以歼灭。台中地区的其他县如员林、虎尾等地也相继举行武装起义。

在武装起义中，台湾各地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参加接收国民党军政机关。高雄市的高山族人民还把在日本统治时期藏起来的武器弹药，拿出来支援人民军，大大鼓舞了起义军的斗争。

整个台湾省除澎湖因受国民党海军镇压，未能武装起义外，二二八武装起义的烽火燃遍全省，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大半瓦解，起义人民在绝大部分地区一度取得了胜利。

在起义风暴席卷整个台湾的严重形势下，台湾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等人考虑到当时驻台的国民党军队数量不足，无力进行镇压，便使用缓兵之计：一方面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答复人民的要求，由陈仪于 3 月 2 日出面向全省广播，表示对过去“不加追究”，释放被捕者，“恤死抚伤，依法惩凶”，设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商议处理善后的办法；同时，在组织成立“处理委员会”时，尽量扩大成员，通过网罗台北市参议员、参政员及伪国大代表、陈仪亲信等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办法，逐步篡夺“处理委员会”的领导权，把起义引向妥协的道路，并在与“处理委员会”进行所谓“和平”谈判中，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另一方面急电南京国民党政府，火速派重兵到台湾进行镇压。

蒋介石接到陈仪求援急电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中连遭挫折，闽、浙、苏等省又无兵可调，只好将驻在宁沪线上的二十一军调赴台湾进行镇压。并任命国防部长白崇禧为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的专使。限令二十一军 3 月 8 日以前必须赶到台湾。

当时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部和所属一四六师四三六团、四三八团驻江苏昆山和上海一带，所属一四五师驻苏北盐城、东台一带。二十一军接到蒋介石令其开赴台湾的命令以后，紧急行动，3 月 5 日，一四六师的四三八团先行在吴淞军用码头上船、四三六团随后在另一码头登船向台湾开发。两个团先后于 3 月 8 日上午和下午抵达基隆港。一四五师则是从江苏连云港乘船，于 3 月 [illegible]达高雄港。一四六师两个团 3 月 8 日在美帝国主义的军舰、飞机的护送下于基隆港登陆后，立即从台北开始在台

湾全省进行恐怖的大逮捕和血腥的大屠杀。美帝国主义直接参与和指挥了这次血洗台湾的罪恶行动。在台湾人民武装起义初期曾经一再呼吁“和平”、表示“让步”的陈仪，这时露出狰狞面目，公开下令解散他派人参加并一再作为谈判对象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说它是“非法团体”。与此同时，对起义领袖、工人、学生、地方开明士绅以及统治阶级中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行大逮捕。凡被捕者，有的不加讯问立即枪决；有的割掉耳朵之扣再用刺刀刺死；有的被装入麻袋投入海中；有的被活埋或活活打死；有的被集体用机枪扫射，然后投入海中。从 3 月八日到十三日，台湾各地枪声不断，尸体遍野，血流成渠，浮尸满河，整个台湾暗无天日，至 3 月 8 日，起义完全失败。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同胞被杀害者在一万人以上，仅在南部高雄一地就枪杀了二千七百多人。大屠杀开始后，美帝国主义驻华大使馆军事参赞曾由上海飞往台湾指挥屠杀起义群众。事后对陈仪的屠杀手段极为“称赞”。

台湾人民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武装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二二八起义继承和发扬了台湾人民革命的光荣传统，严重地打击和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兵力，直接配合了祖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台湾人民的 2 月革命斗争，1947 年 3 月 20 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表达了祖国人民对台湾同最真挚的同情。

（摘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背景介绍

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后，又于 1947 年 3 月 15 日，在南京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出席开幕式的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后补中央执、监委员共二百五十四人，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及三青团各支团干事长一百余人列席了会议。会期原定七天，后延长三天至 24 日闭幕。会议的主题是研讨如何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做好行宪的各项准备。

全会一再声明要结束一党训政的局面，还政于民，并表示国民党要降为普通政党的地位，和各党派平等相处，从速扩大政府基础。可是就在全会通过的《现阶段的党务方针决议案》中却反复强调：“今日党派虽多，舍本党而外，实更无任何一党担负起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责任。”“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不操于任何一党入手，而实操于本党入手。”如此等等，根本不想和其他政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实际上，这时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之中已威信扫地，连吴铁城在《党务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党失掉了实际政治中心的作用，”国民党员也“不看重他”。

蒋介石在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开会词》中，离开了会议主题，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无理指责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与否认《中华民国宪法》的行动，并颠倒黑白说：中共“在山东不断进攻青岛与济南”，“在晋南陕北发动凶猛的攻势”，声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化而不加制止”。表示要迅速解决中共，以“消除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3 月 19 日，胡宗南侵占延安，六届三中全会特发长电祝贺。张继等人又临时动议：请对共产党问题重新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施行。

国民党的反共解决不了它的实际困难。全会讨论经济问题时，承认“今日之经济，已面临严重之危机”，“物价波荡，生产停滞，经济秩序，失其正常，失业者日见增加，有业者生活不给。”由于国统区经济的严重恶化，致使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倒台。

材料：

- 会议经过
- 会议宣言

材料一　会议经过

自二中全会迄今，时已一载，中因复员还都，未能依照规定日期开会。嗣以国民大会制宪已告完成，行宪之期在迩，中央常务委员会鉴于结束训政，促进宪政，有重行研讨决定各种方案必要，经第五十二次常会决议，定本年 3 月 15 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决议推定常务委员组织提案委员会，邀集在京委员及党团干部，分别对于党务、政治、经济、宪政四端研拟提案。

全会于 3 月 15 日在国民大会堂如期开幕。到中央执监委员、候补中央执监委员共二百五十四人；各省市主任委员及青年团各支团干事长列席者一百余人。会期原定七天，嗣经延长三天，至二十四日闭幕。除预备会一次及开幕式、闭幕式外，共举行会议十次。收到提案九十八件，其中关于党务者二十八件，政治者二十六件，经济者三十三件，军事者八件，外交者三件，均分交各组审查委员会审查，拟具意见，提出大会讨论。对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类，根据书面及口头报告，详加检讨，再交各组审查委员会起草各项决议案。所有会议经过情形，择要纪

述如后：

3月15日上午九时，在总理陵园举行开幕典礼，总裁主席，并致开幕词，分析当前局势，说明全会任务，指示党务改进方针。词毕礼成。十时半在国民大会堂开预备会议，仍由总裁主席。吴秘书长报告出席委员一百三十七人，列席委员一百十七人，已足法定人数。旋即开会通过议事规则，组织审查委员会及会期等案。并选举主席团，结果：孙科、于右任、陈果夫、居正、白崇禧、陈诚、戴传贤、邹鲁、陈立夫、朱家骅、丁惟汾十一委员当选为主席团。十一时散会。

16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委员二百三十八人，孙委员科主席。首全体起义为革命先烈及死难军民同志默哀致敬。次推定孙委员科等九人为宣言起草委员。并由王委员世杰作外交报告。十二时散会。

17日上午九时在国民大会堂举行总理纪念周，总裁主席，勉同志亲爱精诚，互相合作，注重党德，完成革命建国使命。礼毕休息，接开第二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六十七人，居委员正主席。决定各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并由陈委员诚作军事报告。十二时散会。

18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三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六十九人，于委员右任主席。进行外交检讨，谷正鼎等十二委员发表意见。并决定致电嘉奖黄河堵口合龙员工。十二时散会。

19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四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六十二人，邹委员鲁主席。进行军事检讨，赖琏等十二委员发表意见，并由陈委员诚对军事检讨意见分别加以答复。十二时十分散会。

20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五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六十三人，戴委员传贤主席。首由吴秘书长铁城作党务报告，旋进行党务检讨，萧铮等六委员发表意见。嗣讨论临时动议，通过电慰进驻延安国军，宣慰越南被难侨胞，恢复中韩贸易等案。十二时十五分散会。

21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六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六十五人，朱委员家骅主席。继续检讨党务，崔振华等八委员发表意见后，党务检讨至此完毕。复进行经济检讨，程中行等三委员发表意见。十二时散会。

21日下午三时举行第七次会议，到委员二百五十七人，总裁主席，并报告一年来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情形。休息后由委员果夫主席。讨论提案，通过展期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常务委员改选办法二案。下午六时三刻散会。

22日上午九时举行第八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八十二人，陈委员诚主席。继续经济检讨，王正廷等七委员发表意见。经济检讨完毕，进行政治检讨，刘文岛等两委员发表意见。十二时休息。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孙委员科主席。首由吴委员铁城、雷委员震报告商谈扩大政府基础经过，次由黄宇人等六委员发表意见。旋讨论临时动议，计有改善东北特殊制度，撤查台湾行政长官，延长会期等案。下午六时四十分散会。

23日上午九时举行第九次会议，到委员二百七十三人，居委员正主席。讨论提案，十二时休息。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由朱委员家骅主席。先后通过重要案件：①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财产案。②宪政实施准备案。③现阶段党务方针案。④农民运动实施纲要。⑤工人运动实施纲要。⑥确定本党经费制度。⑦彻底改革党务案。⑧党团关系案。⑨对于党务报告决议案。⑩对于外并报告决议案。下午五时五十分散会。

24日上午九时举行总理纪念周，总裁主席，致训词，指示同志必须践履笃实，深入农工群众，重新建立党的基础。十时开第十次会议。到委员二百八十三人，仍由总裁主席。首由主席团报告：①国民政府委员人选，请由总裁提常会决定；②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人选由总裁提常会决定；③褒邺死难同志案，交常会核办；均经大会通过。次进行讨论提案，通过重要案件：①国民政府增设副主席。②中委担任五院院长者为当然常务委员。十二时休息。

下午三时继续开会，由于委员右任主席。首为投票改选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由监察委员会狄秘书长膺报告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改选结果。嗣进行讨论事项，通过要案四件：①经济改革方案。②政治改革方安。③刷新政治风气，限制公务员兼职案。④全体会议宣言。下午六时散会。休息十分钟，继续举行闭幕礼，总裁主席。于委员右任宣读全体会议宣言。总裁致闭幕词，略谓：全会各项决议与宣言所揭示诸端，务必切实实行，以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下午七时礼毕，全会圆满闭幕。

（摘自《民国日报》1947年3月）

材料二　会议宣言

本党此次全体会议，为胜利还都后第一次集会，距上次集会为时适满一年。此一年间，中国政治上最大之成就，厥为国民大会之召集与中华民国宪法之颁行。国父倡导革命建立民国之目的，与本党北伐成功以来一贯努力之主张，经过千迴百折而终于实现。本会议举行于颁宪届3月之时，一方面欣幸于宪政实施之用期，建国素愿之克遂；同时省察吾国当前之现状，战后之疮痍未苏，复兴之进行多阻，和平统一备受破坏，胜利成果无由发扬，民生困苦，社会阢陧，经济动荡，人心散漫，则又深慨国运之多艰，益感革命责任之重大。窃以国父所昭示吾人奋斗之准则，为救国、救人、救世之大仁，为明是非、别利害、识时

势、知彼己之大智，为有主义、有目的、有智识之大勇。故天下为公为本党之襟怀，为民服务为本党之天职，与时俱进为本党之特性，而义之所在贯彻始终，更为本党所由突破艰危、善尽责任之根本。吾人在抗战剧烈之时期，已早作归政全民之准备，过去此一年间，为使爱国有志之人士同负促成宪政之职责，更复迭次表示愿与举国贤达相互提挈，宏济艰难。今者扩大政府基础之成议，已在实施，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开始结束之时。由兹以至行宪之过渡期间，中国之政治已不复为一党负责之政治，本党所处之地位及其对于政府之关系，自不同于往时。然而本党救国救民之精诚，实行主义保卫民国之责任，则义应积极继承而决不有丝毫之诿卸。本会议此次集会，对于如何刷新本党，充实本党，俾能适应新时代之责任，已作详尽之计议。兹愿就检讨国内外形势之结果，因应当前国家民族重大迫切之需要，列举今后所应努力之要务，摅其忠悃，简要陈述于国人之前。

其一，完成宪政准备，确立建国规模。本党五十年来一贯奋斗之目的，即在扫除民治之障碍，造成实行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迄今二十年，建国工作虽迭遭重大之障碍，而经过八年之神圣抗战，国父之三民主义卒为全国共同接受，奉为立国之最高指导原则，以建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鹄的既归一致，国是于焉确定，此实为国家民族之大幸。兹距国民大会决议实施宪法之时期，仅有 9 月，一切准备程序，亟待与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诚矢信，共促完成。常〔当〕此行宪在迩之时，对于行宪法规之制订，人民自由权利之确保，旧有法规之检讨与修正，中央地方制度之确立，以及各级选举之顺利推行，均为树立宪政规模之根本。本会议对于宪政实施之准备，另有专案决议。远鉴民国初年肇始不慎之覆辙，深念国家长治久安之重要，更认为地方自治基层工作之推进，全体选民对于国家责任观念之养成，以及地方发展与国家统一相辅相成至理之确认，尤为我改组完成后之政府所宜特别注意之要计。本党同志，一方面必当与各政党开诚合作，相互提携，同时更应深入民间，负起宣传宪政与唤起民众之责任，务期我全体同胞能真正发挥其民权，以奠立宪政开始良好之规模。

其二，消除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抗战胜利以还，其最为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与经济建设之障碍者，无过于共产党之武力扰乱。国民政府政治解决之方针，实本于国父大仁大勇之精神，期以一贯精诚相感召，冀达和平统一之目的，稍纾劫后人民之痛苦。顾去年一年之间，政府三次颁布停止冲突之命令，更复不断进行军事调处与商谈。而共产党迷信武力，背弃信义，于政府屡次忍让之际，在其割据区域内，竟实行全体总动员，最后又拒绝政府所下现地停战之命令，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要求取消国民大会所通过之宪法，更乘国军遵令停战之时，发动全面军事攻势，致使政府政治解决之方针无法实现。吾人认为和平统一方针，应予拥护，而国家基础与人民安全，亦必须有坚强之保障。久经征战之将士，为救国救民而牺牲奋斗，其劳苦实为吾人所钦崇，其目的惟在促起共产党之觉悟。但使共产党觉悟于祖国之不可背叛，人民之不可欺骗，武力之不可终恃，翻然变计，诚意悔祸，放弃武力迷梦，停止破坏工作，由非法的武装集团变为合法的普通政党，从事合法的政治活动，则吾人深信当共产党以事实表示使国家的统一、民主与建设获得确实有效保障之日，即为全国人民与共产党和平共处之时。

（摘自《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宣言汇编》
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政府改组

背景介绍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摆脱难以克服的严重危机，骗取人民的信任，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急忙上演所谓“还政于民”的“改组”政府的把戏。为此，1947 年 3 月 15 日至 24 日，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等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宣言提出今后的“要务”就是组成所谓“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过渡政府”。3 月 30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等所谓“行宪法规”。4 月 17 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4 月 18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行政院长张群，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二十八名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占十七人：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还有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键、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四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民主社会党三人：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社会贤达”四人：莫德惠、陈辉德、五云五、鲍尔汉。4 月 23 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并公布施政纲领。蒋记“改组”政府成立的当时，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大肆宣扬“多党政府”已经成立，“国民党已实现还政于民之诺言”。宣称“改组”后的政府是吸收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自由主义分子”参加的所谓“自由主义政府”。

这个所谓“自由主义的政府”一登场就表现了法西斯的疯狂性，1947 年 5 月，国民党统治区京、沪、平、津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学生们为了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和改善师生越来越低下的生活，举行了请愿和游行，这本来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最

基本的自由。可是,"改组"后刚一个月的"国民政府",就对学生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并于 5 月 18 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接着在各地又指使军警特务殴打、逮捕甚至屠杀爱国学生,并在蒋记政府所在地南京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二〇血案。这就赤裸裸地暴露出蒋记政府的法西斯本质,同时也表现出它的日暮途穷的极端虚弱性。

由于"改组"后的蒋记政府,继续坚持反革命内战,强制推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这就使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不但没能减轻和摆脱,反而进一步加重和深化。在军事上,国民党军在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遭到节节失败以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 6 月底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从此,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则由进攻转入防御,战争开始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军事上的严重失败,促进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危机的恶性发展,使国民党政府难以招架,穷于应付。

材料:

· 1947 年政府改组

材料　1947 政府改组

制宪国民大会开过之后,1947 年 3 月,国民党开六届三中全会,宣言"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开始结束之时"。制宪国民大会之后,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作变动,任期到行宪国大选出的总统就职时止。1947 年 4 月 17 日,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选任孙科等 28 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17 日由国民政府明令正式公布修正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8 日公布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及五院院长人选。23 日,国民政府委员会正式成立,举行首次国务会议。24 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各部、会首长人选。同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撤销。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仍在国民党的操纵之下。1946 年 3 月 16 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4 月 1 日,国民党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修正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改组的同时,中政会也正式恢复起来。1947 年 4 月 17 日,国民党中常会选派张静江、李石曾、阎锡山等 25 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为秘书长。蒋介石为中政会委员长。4 月 28 日,中政会正式恢复,举行第一次会议。中政会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门机构,其地位在政府之上,有权决定大政方针和重要人事任免。1946 年 5 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政治委员会掌理政纲、政策之实施计划,重要政治问题之处理方针及重要干部及决定等事宜。"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具有"行宪以前,行政院院长入选,国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时,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一语,表示出对其他党一点"尊重"。总之,由国民党驾御政府的原则基本没有变。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号称"多党政府"、"联合政府"。在组织构成上与以往的国民政府不同,它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士,而有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的所谓"社会贤达"参加。国民政府委员共 28 人,其中国民党 17 人,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共 11 人。五院院长为国民党人,"无党派"的王云五当上行政院副院长。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人士担任若干部长和行政院政务委员。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试行行政院负责制。国民政府委员会由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组成。其会议称国务会议,讨论、决议:(一)立法原则;(二)施政方针;(三)军政大计;(四)财政计划及预算;(五)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任免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任用;(六)院与院间不能解决的事项;(七)主席交议事项;(八)委员 3 人以上连署提出的建议事项。政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之主席。其对国民政府委员会决议认为执行有困难,可提交复议,复议时 3/5 以上委员坚持原议,即应予以执行。行政院根据国务会议的决定,负行政的"全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主席权力削弱。国民政府主席仍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主席有权在遇到特殊紧急情况时先予处理,事后请国务会议追认,如国务会议拒绝追认,主席得请其复议,按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复议条款规定处理;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主席署名,关系院长副署。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由训政达到宪政之过渡期间"的政府。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行宪",主持大选。另一个任务是"扩大分裂",三党"共同负责与共产党作战"。它丝毫未改变专制独裁政体。不仅因国民党在其中操纵一切,而且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社会贤达"王云五之流也不能代表中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1947 年改组的国民政府,在"行宪"国民大会闭幕,总统府产生之后撤销。

(摘自《现代中国政府》吉林文史出版社)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出台

背景介绍

1947年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励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于次日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蒋介石在这个方案中一面硬说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胁制民众，大量扩充其叛国之武力"，"欲以武力颠覆国家"，实行"全面之叛乱"，一面标榜国民党对中共"始终秉持政治解决之方针，不惜委曲求全，多方容忍"，但因"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必须"以全力铲除"共产党，要"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加紧戡乱"。他还假意表示国民党"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的目的，是要把挑起内战的罪名强加给共产党，而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捍卫者"。7月5日是，行政院长张群在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声称要"以戡乱求统一，以苦干谋复兴。"7月7日，蒋介石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进一步强调所谓"戡乱建国"的必要，扬言要"一致奋起，肃清匪患。"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共"波澜。不仅国民党高级官吏，民社党和青党的政客也纷纷附和。各省、市、县党部，参议会纷纷通电拥护，并召开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游行示威。随后，蒋介石在南京黄博路官邸召见了李宗仁、陈诚、白崇禧、汤恩伯、程潜以及各军、师长、省主席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布置"戡乱"。

为了贯彻"戡乱建国"的反共决策，国民党一方面下令"通缉"毛泽东，撤销政协及其秘书处，取消共产党国大代表、国府委员保留名额，开除共产党参政员；另一方面又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征实征借实施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节约消费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令，以实现其所谓"戡乱建国"的目的。

在实行全国"总动员"的同时，蒋介石着手进行"党团合并"。此时，国民党与三青团的摩擦已日趋严重。国民党为了集中统一，希望把青年分子拉入党内。郑洞国说："今日剿共，党团力量未能配合军事行动"，戴季陶哀叹：党内"倘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则吾人将死无葬身之所"，杨虎提出了"复兴本党"，实现"精神齐一"和"工作协调"的口号。蒋介石于7月9日对三青团发出了"党与团统一组织"的指令，认为这是国民党"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措置"。而三青团提出必须以"现在党部之负责首长都应先行引咎辞职"为"党团合并"的先决条件，公开向蒋介石提出挑战。

材料：

·戡乱动员

材料　戡乱动员

当国共全面军事冲突进入第二个年头时，国统区经济形势正趋险恶，"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各地物资交流全面隔绝，影响物价不断高涨，逼使政府通货陷于恶性膨胀之境"，以至社会人心为之"浮动"。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又搞得南京国民政府焦头烂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则节节失利，如果说，1946年下半年的战局"尚勉能获致胜利"，那么，到1947年上半年，战局已"日形危迫"。蒋介石急切渴望打通津浦全路，使南京和北平连为一气，构成连接不断之一道政府权力线的战略企图完全落空了。在关外，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5月，发动夏季攻势，与国民党军恶战四平城之后，虽然不久即撤围北走，可是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仍惊恐不已地向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报告："未来之危险，将甚于前者"。6月3日，鲁西之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国民党统治的中原腹地暴露在解放军兵锋之下。

鉴于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1947年6月19日，蒋介石问计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答曰："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恐怕已经来到了。"并担保说："这样一个新的计划将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地赢得众多的同情。"在得到美国方面的授意和支持后，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毛泽东。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的讲话，他说："现在真是本党千钧一发，存亡绝续的关头，我们为什么还不把握这个时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来改造党挽救当前的危机呢？"眼下"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方式是明令讨伐共匪，……另一种方式是不下讨伐令而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加强剿匪军事的力量。"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并修正蒋介石交议的"如期实现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以国府中令的方式颁布："盛行全国总动员令，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立即切实执行。"7月7日，蒋介石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重弹要共产党"不拥兵割据"(即交出军队和根据地)，"像英美各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以和平合法的政党来争取选民"的老调，指责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公开叛乱"，"破坏交通，破坏工矿，而且到处破坏奄奄一息的农村"，要求"举国一致"，"抱定决心戡平叛乱"。

参谋总长陈诚于同一天发表告《全国官兵书》说："革命现已濒临严重的关头，"命令全体国民党军人应"为民前驱"，"及早肃清"共军。7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同时宣布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国府委员保留名额以及开除中共参议员。

《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共十八条，主要内容为：第一命令授权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征集人力，以补充内战军队之不足。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二，命令授权政府可以任意征发一切物力财力以补充内战经费之须求。规定"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均应依法惩处"。第三，命令授权政府可以采取一切行动残酷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规定"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秤及社会秩序之行为"，以及"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均应依法惩处"。第四，命令授权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任何反共反人民法令。规定"为达成戡乱之目的，行政院得依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又根据此项纲要于 1947 年下半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计有：《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粮食流通管理办法》、《全国花纱布管理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理办法》、《厉行消费节约办法纲要》，以及《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等，并于 11 月间通令成立由各级"民意机关"议长主持的省市"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以持续地、最大限度地搜刮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内战。

与此同时，为迅速完成"戡乱"之目的，蒋介石作出了党团合并的决定。蒋既为国民党总裁，又兼三青团团长，可是国民党和三青团长期以来却各成体系，相互矛盾，勾心斗角，甚至为竞选"国大代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为之大声疾呼："现大敌当前，可大胆地说，倘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则吾人将死无葬身之所。"但，党与团如何合并？有三种意见：第一，"团并入党"；第二，"团认为党不行，欲由团来代党"，至少"倘要团并入党，则先决条件为现在党部负责首长等都应先行引咎辞职，另行改组不可"；第三，团要取代党"恐不能办到，而党要吞团亦为不合之事"。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只好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先指着国民党员的鼻子说："现在我们的党真像一个大家庭，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本党现在确已到了这种危险地步，不但纪律荡然，而且已是精神丧失，长此以往，即使没有共产党来破坏我们，我们自己也要消灭。"接着又指着三青团员的鼻子说："本团过去在心理和精神上已经犯了两个是使革命根本失败的错误，""第一错误是今年团的中心工作方案所拟的是在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竞选……为什么要使我们纯洁的青年变成官僚政客？""第二个错误是主张与本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然后再向全体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发出警告，现在大家"只图得过且过，粉饰太平，这样下去，党与团整个革命的生命未有不被消灭的"！我们的"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社会上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武力之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在蒋介石的干预下，三青团和国民党分别于 9 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了二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确定了团并入党的原则，并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规定三青团本届中央干事和监察委员一律转为国民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而候补三青团本届中央干事和监察委员则转为国民党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省市县依此办法参照执行，勉强地完成了党团合并的任务。

蒋介石以为发布了"戡乱"总动员令，又进行了党团合并，可以大大加速"戡乱"进程，并夸下海口：半年至多一年内定可"戡平共匪"。可是，他的同僚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孙科于沪地答记者问时，却很不乐观地表示："总动员令颁发后，民众对于战事结束之迟缓作种种猜测，但我人需明证者，对于战事估计，未可尽如人意……惟结束确期除上帝知晓外，无人可作有把握猜想。"。

（摘自《南京政府覆亡》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胡宗南为什么老打败仗？
——熊向晖深入"胡"穴十二年

一、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1949年11月5日，一位刚刚留美归来的年轻人被周总理邀进中南海勤政殿。殿内已坐着好几位客人，有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都是不久前国民党当局委派的和谈代表，是国民党政界、军界的显赫人物。周总理便招呼大家："诸位请入席吧。今天，我邀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大家坐定后，周总理指指那青年，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你们一定猜不到：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泽东主席就先看到了。"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周恩来的这番话不啻在席间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客人们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长刘斐说："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

那青年究竟何许人也？怎么令周恩来如此器重呢？

原来，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熊向晖——一个被毛泽东称为"能抵几个师"的中共地下党员。

熊向晖于1937年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蒋介石嫡系部队——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军中，逐步取得胡的信任，长期担任他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为中共中央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熊向晖和另外两名地下特工申健、陈忠经被誉为中共秘密战线的"后三杰"(前三杰为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毛泽东主席曾称赞熊向晖的地下情报工作是中共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熊向晖从事特工工作长达12年，其间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二、周恩来下的闲棋冷子

熊向晖191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庭长。熊家有八个孩子，均受过良好的教育。熊向晖的排行老五，少时聪颖机敏、博闻强记，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17岁那年，熊向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熊向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接受上级党的指示：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于是，熊向晖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不久，胡宗南在武昌分三批接见了服务团人员。正是这次接见，胡宗南"慧眼"识英雄。

1938年5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学习。从学校学习期满，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及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即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喜欢说大话，又爱出风头，经常给主办的军校和所属部队作"精彩讲话"。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小精悍、满篇豪言壮语，胡宗南拿着它去演讲，常觉得豪气冲天，因此，胡对熊向晖越加赏识了。

在胡宗南选才之前，中共领导人也早已开始选才，选择熊向晖到胡宗南身边去，正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周恩来布下的一着闲棋。

胡宗南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军官，深得蒋介石器重。抗战爆发后，胡宗南倾向抗日，但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他会不会反共呢？周恩来决定选派一名秘密党员到胡宗南身边去，如果胡宗南积极抗日，他可助胡一臂之力；如果胡宗南反共，他则成为中共埋伏在胡宗南心脏内的一枚炸弹。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加紧反共，胡宗南紧随其后。熊向晖的生活揭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

三、熊向晖打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蒋介石在相继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均遭到共产党人有力的回击后，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一时间，国内反共气焰甚嚣尘上，陕甘宁边区陷于困难时期，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等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于是，胡宗南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为避免过早暴露，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7月9日发起进攻。

胡宗南只顾调兵遣将，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胡宗南对所属部队下达的文件也都由熊向晖起草。不用说，熊向晖将所

有内容一概记下，然后，迅速通过秘密战线，将它送到毛泽东、周恩来手中。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阐明民族团结大义，并同时造成国际影响。胡宗南不得不请示蒋介石。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于是，胡宗南的部队奉命撤回。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真正掀起来便草草收场了。

四、延安保卫战：熊向晖一人能抵几个师

1947年3月10日，是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的时间，蒋介石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和莫洛托夫在会上将重提中国问题。蒋介石为了争取美苏的支持，急于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密令胡宗南攻打延安，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要在3月10日那天发起进攻。由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还未撤离，蒋介石下令，进攻延安的日期推迟三天，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解放军主力。蒋介石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大有一口将我陕甘宁边区吞掉的气焰。

3月7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从南京飞回西安。晚上，瞅准机会，熊向晖化装来到秘密线上的联系人王石坚家，将所获的重要情报一一告诉了王石坚，王石坚当即报告给延安。

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1军及整29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布置任务。

在会上，熊向晖同时获悉：为严防我解放军伏击、夜袭，胡宗南军将携七天干粮，拂晓进军。夜暮露营，采取“蛇蜕皮”、“方阵式”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联，走山不走川，遇小股解放军即行歼灭，遇大股解放军则先绕道然后吸引到延安附近围歼。另外，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标志等也作了规定。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美国最新探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人员，连日侦测解放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机关在兴县。

紧急形势下，熊向晖通过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把情报巧妙地送给了党中央。

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由于有了这份情报，党中央迅速作了多方准备。解放军在给予国民党军队重大杀伤后，于3月19日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1947年7月，熊向晖乘船赴美留学。南京解放后，熊向晖取道香港，顺利地回到了祖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

（选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

莱芜战役中韩练成“只身逃脱”之谜

1947年2月，国民党军7个师近6万人在华东战场的莱芜战役中全军覆没。一时间朝野震动，中外惊骇。陈毅在评价这次战役时说：“这次莱芜战役是中国内战史上的空前创举，在改变中国政治局势及促进反攻时机迅速到来上，起了相当决定的作用。”而国民党人士则认为：“这是国共交战以来首次吃的大败仗，我们住在南京的人士对战争的前途再没有乐观的论调了，悲观的气氛日浓。”

参加这次大战的国民党四十六军中将军长韩练成，对导致我军胜利和国民党军失败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这期间的浓烈的传奇事迹，至今尚鲜为人知。

一、党中央发来密电。华东局派魏文伯等人前往敌四十六军联络，韩练成暗示：“你们派来的干部小了一点，另派人来。”

1946年初冬的一天，在山东临沂的中共华东局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大意是说：据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同志称，国民党四十六军已从海南岛海运青岛，该军军长有起义之可能，望速派人以×××名义与该军长取得联系。

当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去中央汇报，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正率领主力与国民党军鏖战于苏北，留在临沂的华东局副书记黎玉、常委张云逸、舒同等人，对这份“绝密”电报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事关重大，尽管对该军长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仍须迅速派人前往联系。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贯一，是华东局国军工作部第一副部长，他也参加了研究。据他当时获得的情报，敌四十六军是广西部队，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中的一张“王牌”，素有“钢军”之称，全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蒋介石将其调来山东参加内战，对华东我军将构成很大威胁。该军军长也可能是广西人。既然党中央介绍来这一重要关系，必须立即派出得力人员前往，与他取得秘密联系。

当时虽然先后派了联络部的科长陈子谷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去和韩练成联系过，但韩心里仍嫌魏文伯职位偏低，因为按国民党的惯例，参谋长、秘书长等都是幕僚，不是主官，没有决策权，说话是不算数的。

韩练成向魏文伯明确提出：希望你们的舒同主任于1947年的元月2日至6日期间，前来四十六军军部，我有要事与他面商。

二、华东局常委们拿不定主意，发电报向在前方的陈毅请示。陈毅回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料舒同潜入

敌营后，却被“软禁”了四天之久。

根据陈毅的指示，舒同带领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科长杨斯德于1947年1月6日黄昏到达兰底镇敌四十六军军部。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韩练成此时去了青岛。

韩练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终于，韩练成从青岛返回。他向舒同解释说：“我去青岛，名义上是检阅刚从海南岛调来的新十九师，实际上是去观察上司和特务机关有什么动向。派别人去不行，只有我自己去，才能从他们的言谈、辞色间判断出他们有否察觉出我和贵方的秘密往来。”

韩练成介绍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经过，反复说明他对共产党、对华东局和陈毅同志寄予厚望。

韩练成1908年2月出生在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家庭贫苦，给地主放过羊，当过店铺学徒。父母贫病交加，家中时常断炊。他未读过小学，只上了几年私塾。迫于生计，才于1925年入西北军当兵。在近二十年间，他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升至集团军参谋长。1942年，韩在桂系的十六集团军任参谋长，奉命调到重庆，入国防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被蒋介石选中，调入蒋的侍从室任中将参谋。

身入要津，韩练成有机会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在策划的投降日本的阴谋活动，以及与汪精卫卖国集团的秘密勾结。这一切是多么骇人听闻，触目惊心！

于是，他通过密友周士观的安排，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周恩来。韩向周谈了自己的思想、经历后说：“据现在各种迹象，抗战胜利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是蒋介石注定要做的事，请贵党早作准备。”

韩练成还希望能投靠人民，投靠中国共产党。但周恩来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勉励他继续留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

以后，韩练成又和王若飞秘密见面多次。

舒同在敌营先后住了6天，顺利完成了陈毅交给的“入虎穴，得虎子”的艰巨任务，于1月11日安全地离开韩的军部返回华东局。

三、四十六军军部新近来了韩军长的两位故旧，很快当上了“高级谍报员”，专门收集共军的情报，而事实恰恰相反……

陈毅得到舒同的报告后，非常高兴，指示选派得力干部前往韩练成处充任联络人员。经研究，确定派杨斯德和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科长解魁两人前往。杨化名李一明，解魁化名为刘质彬。

1947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徐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鲁南会战”的计划，决定集中31万大军，分南、北两线夹击山东我军主力。南线集中8个整编师(相当军)、25个旅(师)，作为主要突击集团，以陇海路为依托，分三路北犯，直指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以四十六军、七十三军、十二军为辅助突击集团，以胶济路为依托，由淄川、博山、明水经莱芜、新泰、蒙阴一线南下。两路大军南北对进，钳击临沂，妄图将陈、粟大军消灭于沂蒙山区。

四十六军奉命于1月15日从高密开始西进，向淄博方向移动。

韩练成遂将此绝密情报通过杨斯德、解魁转告了华东局。

敌北线的3个军在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的指挥下，迅速南下。

1月31日，王耀武、李仙洲到达博山。翌日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当晚，韩练成就向杨斯德谈了会议情况。为了将这一最新战略情报送回华东局，杨斯德派解魁于当晚出发赶回解放区。

四、一位统率几万精兵的将军，竟把本军及上峰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了“敌人”，竟和“敌人”串通一气来对付自己的部队和上司、友军，这该不是“天方夜谭”吧？

韩部拖拖扯扯，走走停停。途中，我鲁中军区地方武装和民兵顽强进行阻击，又破坏了公路，更使韩有了“借口”。直至2月8日，四十六军才进占新泰，比李仙洲规定的时间晚了两天。战争年代，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对于我方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两天呀！

但韩练成在进占新泰后却按兵不动，等待观望。他见去解放区送情报的刘质彬(解魁)迟迟未归，心中非常焦急，又向杨斯德谈了以下几点：

一、这次会战关系整个大局，建议陈司令员一心一意掌握鲁南大会战，不必顾虑北线。如你们打北线，请告我，以便我进行配合。你们打北线，请先打七十三军和十二军。如无力量顾及北线，亦请告我，便于我设法应付。

二、最近李仙洲的行动有两种可能，故我有两个建议。一种可能是攻占蒙阴，并可能要我们四十六军去攻占。这样，贵方可在新泰、蒙阴地区打击和消灭七十三军。第二种可能是我军和七十三军齐头并进。这样，我将部队往后拖，让七十三军孤立突出，便于你们围歼。

三、为便于及时联络，建议陈司令员派一部电台，距我二三十里处。我军如有调动或其他情况，均可及时电告。联络人员还可以继续派来我部。

四、如贵方将七十三军全部消灭，仅剩我这个军时，请陈司令员派一名负责干部前来，具体研究我军出去的办法。

五、你们还有什么要求？能否派人前来联络？

经杨与陈毅联系磋商后，杨回答了上述各问题，韩又向杨斯德讲了战局的最新发展和他本人的想法：

第一，上峰已命令四十六军向蒙阴进攻。是用全军兵力还是动用一个师，暂未定。何时开始进攻，亦未下达最

后命令。

第二，假如要四十六军全部出动，我一定设法拖至18日到达蒙阴，以便贵方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如果只令我军的一个师进攻，我准备叫它抵达常路（地名）后，即滞留以观动静，尔后再决定前进或后退。

第三，请陈司令员告知贵方是否决心保卫蒙阴县城，以及军事机关、重要物资的所在地，以免发生误会，造成贵方不必要的损失。

第四，如贵方决心保卫蒙阴城，应马上大量制造宣传品，在四十六军前进路上张贴、散发。宣传品的内容，最好是欢迎贵军各个番号的主力部队前来保卫蒙阴，同时广泛散布各种各样不利于国军的消息。我即可以借此吓唬李仙洲说："共军主力云集蒙阴，我军前进困难。"迫使他下令撤退。这样蒙阴就可确保，贵方军民亦不致遭受无谓之损失。

第五，我军未开进前，首先向开进路上打几发空炮，目的是通知贵方，我军即将开进。如贵方决心阻止我军前进，可在高地上放一把火，看到此信号后，我即下令停止前进或迟缓前进。

第六，请陈司令员和鲁中军区王司令员通知部队和民兵，最好不要摸我军的岗哨，以免引起误会，影响大的问题的解决。

这些内情都如实报告给了陈毅。

五、国共双方两位素未谋面的将军，通过两名神出鬼没的联络人员，演出了战争史上一幕罕见的"双簧"。

雪后初霁，沂蒙山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蔚为壮观。

陈毅率华野精干的指挥机构，于2月14日进抵蒙阴县城。

莱芜战役于2月20日打响。

遵照陈毅的指示，韩的部队故意行动迟缓。

2月20日晚上10点半，华野一纵、四纵、七纵、八纵（一个师）等部对据守莱芜的李仙洲总部和七十三军发起总攻。在此以前，即当天下午，八纵的另两个师和九纵将从博山南下归还七十三军建制的一个师（七十七师），包围于莱芜城东北的和庄地区，激战至21日拂晓，将该师全歼，击毙少将师长田君健。陈毅随即令九纵和八纵两个师迅捷南下围歼莱芜城之敌。李仙洲总部和七十三军顿时成了瓮中之鳖。

李仙洲眼巴巴地望着韩练成率四十六军赶来莱芜城解救自己，可是韩练成带着我方联络干部杨斯德和解魁，率领他的部队慢慢吞吞地向莱芜方向移动，直至21日下午4时还只到达南治一带。

韩练成到了李仙洲总部后，杨斯德以韩的"秘书"身份，和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的随从副官称兄道弟，从中得知该军之七十七师已被我全歼，我军已于晚攻入莱芜城东关，北边的吐丝口镇正在激战之中。

李仙洲布置突围方案，由于韩的坚持，突围时间被推迟了一天。

这一天对于我军来说，是多么宝贵呀！就在这一天，华野六纵卡断了敌军北撤的咽喉吐丝口镇，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如果敌提早于22日突围，我军尚未攻占吐丝口镇，那么，莱芜战役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23日拂晓，猬集在莱芜城内的国民党军各部均按命令到达指定的集合地点，准备发起突围战斗。李仙洲四下张望，却不见韩练成的身影。

总不能丢下一个军长就走呀！但派出去的人都回来说遍寻不见。李仙洲气得直骂娘！

韩练成究竟到哪里去了？

原来，四十六军在向城内收缩时，遭到我军的重大杀伤，部队陷入极度混乱。杨斯德问韩练成战场起义行不行？韩说："手下三个师长，一个叫海竸强，是白崇禧的外甥；一个叫甘成城，是李宗仁的外甥；一个叫巢威，和军统关系密切，这三个人都不大听我指挥。我只能掌握一个特务营，我不能像高树勋那样起义。"于是杨斯德劝韩离开部队，放弃指挥，并保证韩的生命安全。韩表示同意。杨斯德和解魁将韩练成和一个卫士排带到莱芜城内的两个地堡内，隐蔽了起来，敌军哪能找得到呢！

李仙洲带着他的总部和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共约5万余人，在向北撤退途中，钻进了我军预设的"口袋"，全军覆没。李仙洲、韩浚等19名将领被我军生俘。

直到这时，李仙洲仍百思不得其解：韩练成究竟到哪里去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973年，周总理会见了特赦后的李仙洲时，李奇怪地问："当年莱芜战役中我率几万官兵苦苦冲击，仍无法逃出重围。却怎让韩练成只身逃出了？"周总理朗声大笑："韩同志就在北京嘛，你可以找他谈谈。"李一听"同志"二字，方幡然醒悟。

（《大江南北》94年6期）

回忆刘伯承脱险

1947年5月1日新华社发表《全力准备大反攻》，接着5月4日党中央令刘邓部队休整一月后，过黄河挺进到鲁西南地区。6月30日，刘邓率领4个纵队从山东的临濮集以北到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强渡黄河后，歼灭国民党军4个师部9个半旅，计6万人，鲁西南战役7月28日胜利结束。而在7月23日党中央、毛主席即电令刘邓部队，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的行程，直出大别山。刘邓8月1日开会下令，8月2日各纵队开始集结，8月7日出动。8月31日邓小平在河南光山县北向店以庄严洪亮的声音宣告我军已到大别山了。

写文章，讲故事，几张纸，几小时就可道出千百件的故事来。真要把12万人的部队，在强大敌人面前，无炮弹、无医院、无后方支持，以千里跃进的姿态，挺进到大别山，没有胆大包天的韬略，心细如发的踏实作风，是不可能的。

当年，我们几个人都是刘邓司令部的参谋，参谋就是参与谋划，对军事工作，作战计划提出建议。从当时战局和敌我形势分析，我们参谋人员对此行顾虑重重。难道刘邓就没有一点顾虑吗？请看8月3日刘邓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说些什么：桂军两个师开到开封，黄河如三、五天决口，我手无炮弹，又无医院，我被迫在战略上已处于极端困难，我将作一时期宽大机动，甚至可能到豫西山区或桐柏山（意思是我很难通过敌区进到大别山）。这表明刘邓在鲁西南取得大胜后，就有这种想法。

11月27日，李先念副司令员到了大别山。这天我们行军经陂皮河住在傅家洼，李先念当天就在这里与刘邓见面的。大家高兴地说：现在可以不要地图了（因先念对此地最熟悉）。他们立即商量刘邓分开，司令部也分成前后两个司令部。但此事不向下传达。当时国民党军十一师老是向我们进攻，飞机白天也跟着我们转。指挥部的参谋们已感到情况不妙！李达一再督促，将带不动的手榴弹、子弹以及其他东西就地埋藏，把骡马赶上山去。指挥部官多兵少，为了轻装，一减再减。到了12月9日指挥部刚到周家墩，遇到钱信忠带7个卫生所刚到大别山，还没展开工作，就赶快分散到三分区。分区是临时抽的干部刚组建起来，地点还没固定，人去多了也是累赘，只好叫钱信忠跟着他们打游击。人减少了，又得重新编组，分人，分马。12月10日指挥部由周家墩动身到王家湾宿营时，李达参谋长才正式找我谈，开头就说："今天指挥部要按前天编组分成前后两个指挥部，我与小平、先念为前指向南走。刘师长和张际春副政委率直属队为后指向北走，到哪里刘师长知道，王文桢参谋也知道。掩护你们的是杨勇、苏振华的一纵队，他们已布置了第二旅随你们行动，具体跟着护卫你们的是副旅长吴忠带的那个团。刘的安全，你要负责。你手上有警卫班，还有警卫连的一个排跟你们，随时准备战斗，要随时准备分散行动。你们带的电台太多，没有重要的事，不要发报。情况你知道。"我当即用当地群众的语言，讲了几句不满的话：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的是我们到了罗礼经光（指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个县），最后快到"剥皮"（指陂皮河）的时候了。李达几夜未睡觉，显得很疲倦，以严肃而温和的声音耐心对我说："你在说些什么？"我意识到他早知道群众说我们要出大别山。我一时心里很难受，尽量压低声音说："我确实不了解情况……"李达也没有责备我，只是说："情况都在柴君武（成文）那里，有事多与他们商量着办。今后，我们前指更困难，邓政委说了我们不带情报台。一切情报全靠后方指挥部提供。"

李达继续说：从今天起，后方指挥部包括野司直属队、中原局、野政，后勤可以说无人，数电台的人包括二局最多。接着又说：你们行军宿营，都在杨、苏部队的中间，每天到哪里，师长会告诉你的。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关于保密，他要我们按毛主席说的"慎之又慎"去做。

真正分开成为两个刘邓指挥部是在12月11日。指挥部由王家湾经宣化店、定远镇，这时刘邓还在一块行动，到了苏家河西北之崔家畈才正式按照名单有组织自然而然地分开成两个刘邓指挥部了。我们直属队的组织纪律，跟战斗部队一样的严，真正能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

12月12日，邓小平的前方指挥部朝南走了，刘伯承的后方指挥部朝北向苏家河走。

12月13日我们行军至离苏家河15里之殷家棚时，接到吴忠副旅长送来一张宿营图。我先把指挥部住的位置标起来，直属队住的位置全记下来，尽管有的区队住不下也不能变。吴忠住的团部及各营部的位置，各营分布的位置，把我们包围得紧紧的。刘伯承看完后说了一句："照图行事。"我们直属队虽大，可指挥部人最少，除作战、情报、机要、通信各司其职外，其余参谋全是通力合作。王文桢参谋动作最快，他两头忙，帮助标图。在原来宿营图上，我们又按习惯规定了紧急集合点，用复写纸写好后，立即分给正在军政处等候取宿营位置图的各区队通信员。通知刚发下，刘师长说：通知各部，立即出发，向我们预定宿营地长夜行军。

我们有了这份宿营图，又有队伍护卫，倒也放心，浩浩荡荡，一路谈笑风生。在夜行军的路上，已遇到好几个敌人，插在我们队伍中间。由于他们讲的番号与我们六纵队一样，双方毫无察觉，可刘伯承怀疑地问了一句，六纵队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都说是掉队的。于是他也没有再问。

12月14日，天刚亮，我们直属队就各自分头进入自己的宿营地。指挥部是在指定的何小砦。这地方选得太好了，村小人少树木多，四面环水，只有西边有道木桥。刘伯承一到村里，警卫员康理还没给他找好房间，他一下马就躺在稻草里睡着了。直属各区队向指挥部的电话很快架通了，首先是二局政委杨志宏报告说：这一带住有敌人，我们已抓到好几个了。接着野政也在电话中说他们那里有敌人。有零星的枪声。这时张涛副科长带一个老大爷来对我说："你们怎么住在这里？这里周围都是敌人。"我当即报告刘伯承师长说周围有敌人，刘师长要亲自问老乡。我说："我已问过了。"他仍直奔军政处亲自找老大爷谈："老大爷，你怎么知道这一带住的是中央军？"老头说："你们的部队不带锯子、斧头，宿营时不锯树。李先念部队在这一带活动时，我从来未见过他们部队把老百姓的树锯

了，用树把村子围成一个圆圈。”刘又问：“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同你们差不多，全是黄的，比你们整齐。”我着急了，也帮老头说：“我们部队从不锯树围城自卫。”刘说：“杨勇的工兵部队就带有锯子斧头，他们在平原作战，有时候也锯树围城。”我们促刘师长上马，他不走，叫王文祯去找吴忠。

王背着军用皮包，内装有刘邓发布命令用的关防和刘邓的印章，并带着两名通信员，直奔吴忠驻地团部，结果冒入了敌人团部。王参谋很机警地转身就跑，接着一串枪声，打伤了一名通信员，真玄！要不是王参谋腿快，刘邓的关防大印就送给了敌人了。

王还未回司令部，我们周围就枪声不断，接着重机枪也响了起来。康理立即扶刘上马。刘给我一个很笨的指南针说：“180 度。”到了砦外，刘下马问：“张际春在哪里？李雪峰在哪里？二局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知不知道到紧急集合点？”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他特别问道：“中原局是谁去的？”我答是管队列的张涛去的。正在这时，找吴忠的王文祯已回到司令部说：“吴忠的团部已住上敌人的团部了，他们马上送报告给我们，我们尚未能收到。”王文祯正在说着，北面机枪声、大炮声更加激烈起来了，不知有多少敌人来围剿我们。杨、苏纵队两个旅与敌人激战，我们快马加鞭地赶到集合点。政治部及直属各区队，都比我们先到集合点，中原局后到。刘伯承到集合点时，看到直属队各位领导，又看到抓到的俘虏，一排排地坐在地下，刘下马便问俘虏：“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答的番号确实与我们昨晚发现的六纵队的番号一样。刘很幽默地说：“昨晚我们是在你们道上行军，今天请你们在我们的道上行走好吗？”

当我们正准备向南行动时，北面的枪炮声、轰炸声更加激烈。不知杨、苏他们是否知道刘伯承及后指已经脱险了？这时刘伯承提出叫张际春、李雪峰同他一道行动，我们没有同意。刘伯承虽是我们队伍中的最高指挥员，但在战斗编组中，他仍是一个编队的成员。况且李达早有言在先，不要几个首长集中在一起走，一起住。大的战略战役行动我们得听刘伯承的，战术上的战斗行动，他得听我们的。他很遵守纪律，也未重提。

国民党军的统帅部，肯定知道了今天发现了刘邓的指挥部，不然怎么会派出这么多飞机不断在我们头上盘旋?!可是厚厚的浓雾笼罩着大地。从地下望天空，从高空望地下，漫天雾幕护卫着刘伯承，护卫着野直，即使飞机降到 100 米的高度也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自己也看不见前后的队伍。刘伯承悠闲地骑在马上，像朗诵诗那样拉长声音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接着问：“你们看过《西游记》吗？这位作者的思想确有他绝妙之处。写唐僧到西天取经遇到绝境时，总是以雾迷星月，好雾，好雾，混混漫空蔽九霄，使唐僧没被妖魔夺走。今天又是弥漫大雾，真是老天显圣帮助我们化险为夷。”刘伯承把这故事一讲，驱走了我们连续几天与国民党军周旋所带来的疲劳，个个在天降的浓雾中，眉笑颜开。

可走不到 10 里，刘即下马问我：“邓政委在哪里？”天呀！他明明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架电台，怎么知道邓的位置？这不禁使人回忆起 1942 年 5 月反扫荡中，邓小平到太岳去检查布置党政工作并指挥陈赓部队进行反扫荡，在通过日军封锁线时，刘师长一夜未睡，不是到作战值班室，就是到机要室等陈赓、王新亭的来电，以了解邓的安危。在抗日战争中，他常用政治委员制来教育我们。他说：“军队中的政委是党的代表”、“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又说：“如果离开共产党，个人就寸步难行，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谈问题、做事不要离开政治。革命是有路线的，没有党的领导和政委的带路，你们本领再大最后也会走到歪路上去的。”这些话，他在一二九师到第二野战军这段时间经常讲，干部们都背熟了。

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原来的行动方向是 360 度，现在是 180 度，过一会儿又是 270 度或 90 度，但很快又回到 360 度。东变西变，总算脱离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十八旅的包围圈。在大雪纷飞的深夜里，终于胜利地到了谢四。这已是 12 月 15 日了。到谢四时我们未进村，暂时休息在潘山。潘山地面的山山水水，被大雪铺成银色的海洋，把我们指挥部和纵队一团一团的人群，照得清清楚楚。在风雪交加中大家都不时跺着脚，等着出发。在杂乱的喧嚷声中，我突然发现刘伯承不见了。参谋们说亲眼看见是吴忠拖走了。我正急着要去找，不一会儿，见刘又回到后指，并对我们几个处长和野政几个部长说：“不要太高兴了，邓政委比我们更困难。我们要保证供给他们情报。今后我们快与华东野战军靠在一起了，我们要开辟淮西区，把豫皖苏区、鄂豫皖区连成一片，困难不少，决战还在后面。后方指挥部的安全主要靠自卫，杨、苏纵队的任务更加繁重，不能再动用他们来护卫自己。刘伯承在讲这些话时，不仅对邓政委和下属的杨、苏纵队充满了关注之情，同时也流露出对战局前景充满信心。

这次保卫刘伯承脱险，一纵队各旅都打得很艰苦。我们指挥部的人员虽未直接参战，但工作是出色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圆满完成任务之后的欣慰和喜悦。

（选自《纵横》91 年 3 期，作者：杨国宇（原刘邓大军司令部军政处长））

总路嘴的枪声

1947 年 10 月 13 日，大别山腹地的总路嘴被一声枪响震撼了。屈指 40 余载过去，这沉沉的枪声依然萦绕在

刘邓大军老战士的心间……

那天清晨，天阴阴的，二纵五旅后勤处长黄开群正带着人在总路嘴附近组织后勤补给，忽然接到通知，邓小平政委让他去镇上汇报群众纪律问题。

黄开群心里打着鼓来到邓小平的住处。

“黄开群，你来啦。坐。”

黄开群见邓小平脸上没有笑意，哪里敢坐。

“你们五旅有个教导队，他们住哪里？”

“镇子里。”

“那里一个活土匪！”邓小平拍了桌子，“你去街上看看，到处是稻草，这个群众纪律象什么样子？！”

黄开群知道刘邓抓纪律一贯动真格的。在冀鲁豫时，曾专门签署过一个命令：凡违犯群众纪律者，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营以上干部交上一级机关法办。这在各野战军中是出了名的。今天听邓小平严厉的口气，八成又要动用“铁腕”了。

“他们还抢了人家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

“抢？……抢什么东西？”

黄开群不知所指。

“抢人家的牛，几十条牛。你回去和你们旅长讲，这件事必须查处！”

黄开群一拍脑袋，终于明白了。

“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打小保队缴获的，是小保队抢的老百姓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怎么还呢？不知主人是谁。”

“带上一个部队赶起牛，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这样做有困难吗？”

“没有。只是……听说有的牛已经杀吃了”

“乱弹琴！”

邓小平拿起一支香烟，还没点燃，又把火柴扔掉了。

“吃掉的牛要折成钱，如数还给人家，一分也不能少！不要说一条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拿，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

黄开群敬了个礼，准备告辞。

“你回来。”

邓小平又叫住他。

“前个月我们在小姜湾开的整顿纪律会议，部队有没有传达？”

“传达了。”

“你给我复述一下内容。”

“小姜湾会议上，刘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在大别山肯定站不住脚。’还有，邓政委您讲的：‘部队纪律松懈，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张际春政委还专门宣布：‘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群众纪律，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点燃香烟：

“好，记得就好。我们初到大别山，面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敌人重兵围剿；二是生活艰苦，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多打胜仗的同时，用严明的纪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我们就完成不了战略反攻的伟大任务。你回去后，除了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必须告诉部队，再发生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

当天上午，野司、野政派出纪律检查组，由保卫科长张之轩负责，去总路嘴检查群众纪律。

临近中午时分，张之轩回来汇报，发现的问题已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6两黄金。

邓小平整理了一下军装，说：“我既听汇报，也要到街上去看一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已经扫得干干净净，偶有几片枯叶被秋风吹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我军又驻了进来，当地的老百姓两头跑反，见队伍就逃，至今仍没有几户回来。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在说什么，手指着不远处的店铺。

邓小平想和他们随便谈谈，刚欲上前，见那两个人慌乱地收回手指，担起柴，脸色鄙夷地匆匆离去了。

邓小平有些跷蹊，顺着刚才那两人的手指方向望去。

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夹着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拐出店铺，扬长而去，给邓小平一个背影。

邓小平追了几步，站下来，对张之轩说：“这象什么部队？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清楚，回到邓小平的住处，见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等在那里。

“搞清楚了？”邓小平问。

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拿？这是抢！”邓小平摔掉香烟，“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的。”

“哦……”刘伯承揉着他那唯一健全的眼睛，叹了口气，“灯下黑哟。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李达，张际春同志，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李达脸色铁青，双拳攥得嘎嘎作响：“既然问题发生

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是错了嘛。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见是空的，只好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前来参加！"

张之轩说了声"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要说？

张之轩点点头："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

刘伯承又问："他是哪个连的？"、"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拧着，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作战也很勇敢。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邓政委常说，人民是一切的母亲，军队是穿军衣的人民子弟。他怎么能忘记这个根本呢?！……"

沉默了许久，刘伯承继续说："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当然，我们也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是我军的建军宗旨，也是我们每个军人执行党的政策最起码的和必须做到的事情。做为党员干部更应该起带头作用，当骨干，不然就是骷髅！你对他讲，我刘伯承说了，处决他，绝不是对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军战略反攻能否胜利，革命能否成功的大事！希望他能理解到这一点：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邓小平一只手拧着额头，一只手掐着香烟，始终没有说话。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浓重的烟雾迷漫在整个房间里，使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切肤般的痛苦正咀嚼着他的心。

……

禁闭室里。

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是首长们让炊事员专门为赵桂良做的，盛得满满的，却已没了端来时的热气。

赵桂良呆呆地望着那碗面，一动不动。颌骨上的枪疤紫亮亮的，那是日本人留给他的，如今这光荣的弹痕却成了这座残缺雕像上的历史印记。

"吃些吧。……"

张之轩劝着，又一次把碗端到他的面前。

赵桂良摇摇头，蓄在眼里的泪"叭"地落在碗中，溶化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张之轩问。

赵桂良依然摇头，焦干的嘴唇蠕动着："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还是这几句？你难道……？再考虑考虑，时间不多了，你真的没有别的话说？哪怕、哪怕后事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张之轩有些动感情了。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

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对无言。

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我……我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老母亲。我……我对不起她呀！……如果说要求，我只有一个——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不是！……"

张之轩点着头，抑制不住了，赶忙掏出手帕……。

门外传来哨兵和一个人的吵声。

张之轩打开门，见是三连的战士牛原平，还没开口，牛原平已经冲进房间，扑到赵桂良的怀里。

"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让我……"

牛原平孩子般地哭着。

赵桂良一下了变成头雄狮，猛地推开牛原平，咆哮起来："出去！……我现在还没死，还可以命令你，马上给我回连队！"

"我不走！"牛原平抹了把泪，象个犟脖子的牛犊。"反正我想好了要替你去死。不管你再凶，反正我要当着首长的面，把话说个清楚！"

"你敢！"

"敢！反正我什么都不怕了！"

牛原平拉住张之轩的衣襟："首长，你知道吗?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用的。他拿花布，是给我做棉衣的，他说我小，禁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给连里出门板报的，拿的粉条……。

"牛原平！！！"

赵桂良大喝一声，几乎冲上来要堵牛原平的嘴。

"赵桂良同志，请你不要这样。"

张之轩阻住赵桂良，把牛原平拉到门外，"你说吧，那粉条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见刘伯承司令员最近瘦得厉害，又听说他爱吃粉条，就想弄些来送给他……"

牛原平呜呜地哭着。

哭声撕裂着张之轩的心。他当保卫科长好多年了，光执行押送国民党高级战俘的任务就有好多次，可眼前的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智、情感，情感、理智，在他的内心中反复搏斗。牛原平的一番话又掀起他胸臆间的感情大潮，他横了横心，决定去找邓小平做个汇报。

……

"张之轩同志，你要晓得，我的心情何尝与你不一样

呢？……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司令员，他已经很沉痛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

听完汇报、向来刚毅的邓小平眼睛也潮湿了。他望着窗外，给张之轩讲了一段《孙武斩吴妃》的故事——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读了孙武的十三篇兵法，召见孙武问道：“这些兵法可以用女人来小试一下吗？”

孙武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吴王唤出180名宫女分为两队，用最宠爱的妃子充任左右队长。孙武要她们看清进退方向，明确宣布了法纪，但三令五申，女人们仍嘻嘻哈哈，不遵号令。孙武当即竖起铁钺，将左右队长推出斩首。从此法令森严，进退有序，无人敢违号令。

……

邓小平收回远望的目光，深嘘了口气：“古为今鉴，我们决不能象吴王那样，只爱兵法条文，而不用其实啊！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名连长实行纪律，那么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

张之轩默默地点点头，问道：“那么，对他个人提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做为战场牺牲告诉他的家人。因为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三国时，孔明挥泪斩马谡。而我们硬是把眼泪水往肚里吞啊！”邓小平又开始抽烟了。“张之轩同志，执行吧。在这件事上，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已经逼迫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十万大军的命运。”

……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弯前的平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

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鸦雀无声。

组织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

语调是沉痛的。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曾经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奔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大声疾呼：“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样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件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

张际春副政委的一双手被颤微微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了：“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员，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了他呀！……我、我求你啦，留下他，留下他，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吧，首长！求你啦……”

老妈妈卟通一声跪倒下来。

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擦去老人脸上的泪。面对群众的赤诚，这位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被眼前真实的、慈母般的红军妈妈感动了，他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邓首长。

……

邓小平的房间里，静极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望着张际春，三个人五只眼相互对视，久久没有说话……

沉默。沉默。沉默。

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启口都要使上千钧之力。

沉默。依然是沉默。

直到最后，还是个子最小的邓小平先开了口：“……那位老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是理解的。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邓小平把目光交给刘伯承。

刘伯承的眼睛慢慢合拢，沉重地点了一下山一样的头颅……。

张际春走了。

邓小平轻声地说：“司令员，我陪你到外面走走？……”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拉住邓小平的手，向屋外走去。

邓小平感到，刘伯承的手，象冰。

……

缓缓的山坡上，缓缓地走着刘伯承和邓小平。

一路无语。

谁也无法知道，此时此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在想什么？

也许，那拿在邓小平手中而忘记抽的香烟所冒出的缕缕轻烟，能给人们一些提示？——

轻烟中，夜的黄河如同白昼，炮火烧红了汹涌的河水，一艘艘木船在狂澜弹雨中竞渡；

轻烟中，黄泛区蒸腾着暑气，无数路将士并肩跋涉在滚滚的泥淖之中；

轻烟中，沙河、汝河、淮河咆哮着，一个个战士中弹落水，更多的战士如同潮水扑向枪弹；

……

也许，他们想得更多，更远。

但是，他们依旧一路无语。

……

总路嘴的枪声，响了。

刘伯承的手颤抖了一下，声音突然苍老了许多，对着

空旷的山野凄然痛呼：

“我刘伯承老而不死！……我为什么要吃粉条啊?!……”

邓小平吃惊地望着刘伯承，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他清楚，此时此刻，任何劝慰都无法安抚这位爱兵如子的统帅，只好自语般地默默说道：“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泪水苍然落下。

邓小平又说：“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否则，我们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

刘伯承还是点点头，——任泪水横流。

邓小平手夹着香烟，忘记了抽，烟灰结了很长很长：“如果，赵桂良的死能够唤起十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使人们赢得群众的支持，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这也是他为此做的贡献与牺牲。”

烟头烧到了邓小平的手指，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

警卫团三连的牛原平和战士们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五寸的白木棺材，埋葬了他们的副连长。

……

1984 年的秋天，离了休，已经 60 多岁的张之轩老人自费走遍大别山来到总路嘴。

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都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位为了严肃军纪而被处决的副连长。说起这件事他们依旧为他难过，依旧怀念着他……

张之轩来到赵桂良的坟前，小心翼翼地除去坟上的杂草，用颤抖的手挖起一坨如斗的坟帽，轻轻安放在曾经是自己的战友的坟头。

“安息吧，我的同志……”

张之轩脱帽肃立，和着泪水说了一声。

……

（王玉彬;《党史博览》93 年 1 期）

周佛海免死内幕

周佛海是汪伪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不仅是伪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而且身任财政部长并兼伪税警总团长，与各部伪军也有着密切联系，既掌握财权，又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而且又主持汪伪特务组织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统为使周佛海为其所用，于 1941 年 5 月，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及岳父等人，分别从湖南沅陵及湘潭等地，送往贵阳息峰集中营，作为人质。周佛海由于母亲被扣，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由进攻转为防御，预感日本必将战败，前途不妙，为预留后路，便于 1942 年 11 月底，暗中派遣潜伏在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任处长的军统情报人员程克祥赴重庆，向戴笠及蒋介石转达其“听命中央”之意”。周佛海在 1 月 12 日的日记中说：“31 年冬，派程克祥赴渝，托其请戴雨农查明(母亲关在何处)并为照顾。程回沪始悉系戴所为，但谓一切生活均甚优遇。并谓：‘周母即余母，请周放心’，心始稍安。”从此，周与重庆国民党军统建立了秘密联系，他在 1 月 5 日的日记中记有：“回忆与戴雨农关系之经过。自民国 22 年 2 月电台叫通后，即电讯往来。33 年冬，与周作民共派朱文雄赴渝。朱于 34 年 3 月返沪，谓雨农偕杜月笙将于 5 月间至第三战区，约予与作民前往，商配合反攻及保全上海计划。允之，与作民设法商借口实，以作欺瞒敌寇之烟幕。其口实则为劝中央与敌讲和。正进行中，雨农忽来电讯，余之地位重要，行动恐极不便，可派亲信前往。乃于 6 月底派黄埔一期生刘明夏前往。乃中途因军事发生，道路阻塞而折回。”

1943 年 4 月下旬，周佛海再派军统情报人员彭寿往重庆，令其见蒋介石时，可请当局保全实力，预备战事结束后对付共产党。这当然正是国民党当局所希望的。1944 年 4 月 1 日，彭寿由重庆返抵南京。行前，戴笠特地为周母等人照了一张合影，让彭寿带交。不久周母患肺炎，戴笠立即电告周佛海，说明在尽力医治中。1945 年 3 月，周母忽患冲心性脚气病，且有肾炎并发症，面色苍白、浮肿、呼吸促迫，脉搏微弱。26 日戴笠立即将病况电告周佛海，并称已送往贵阳省立医院，用美国最新最贵之药医治。此后，病况时好时坏。4 月 11 日戴笠再电告周佛海，谓其母病有转机，且有痊愈之望。但 6 月 25 日，病情恶化，不治而死。戴笠立即电告，并亲临料理后事，将其母暂厝于贵阳城郊之红花地。戴笠如此热心、周到，使周佛海无限感激和信赖，以致唯命是听。

8 月 10 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2 日，周佛海即被重庆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保安队及十二军等全部伪军，维持京沪治安。周佛海奉令，全力效命，从而保证了国民党当局完成对上海、南京及杭州一带地区的接收。戴笠是在 9 月中旬面晤周佛海的。周在 1 月 5 日的日记中就此事记述说：“胜利后，9 月中旬某晚，杜月笙忽来谓，雨农顷已到沪，约余往谈。见面极为愉快。……此后几每日必来谈，如不来，必通一电话。盖此时中央军到沪者极少，危疑震撼，雨农如此，盖安慰与监视兼而有之也。”

9 月 25 日，国民党当局在确保对上海的控制后，即令周佛海移交一切。9 月 30 日，戴笠以蒋介石召见为名，将周佛海送往重庆软禁。周佛海是在戴笠的陪同下，偕丁默邨、马骥良、罗君强及杨惺华等人飞往重庆的。旋，其妻杨淑慧、次子周幼海及女佣文蕴等亦被送往重庆。关于此

事经过，日记中有详细记述。1月3日记有：

"前年9月中旬电呈蒋先生，请求赴渝报到，或赴筑（即贵阳——笔者）庐墓（其母葬于贵阳——笔者）。戴雨农回渝复为请示，奉谕赴筑暂隐。雨农回沪转告，当与淑慧料理一切。30日，雨农陪同赴渝，定于次日换小机飞筑。抵渝后始悉，蒋先生晚电沪，嘱余等仍秘密来渝，故筑行中止。暂寓渝郊磁器口杨家山雨农家。时蒋先生在西康，雨（农）于1日飞往晋谒，余托其带呈一缄。不意胃痛大作。雨农晚间飞回，余已痛不能言，渠谓蒋先生闻余到渝甚喜，渠明日飞沪，可否接淑慧来渝？当时痛甚，复思淑慧，固首肯之。雨农于2日飞沪，余同日入四一医院（即军统医院——笔者）……4日，淑慧率幼海、文蕴及骥良夫人来渝……雨农嘱人为淑慧于后山松林坡之白公馆布置寓处，招待极为周到。"

10月23日，周佛海病愈出院，入住白公馆。"此屋位于山腰，后有松林，右有高峰，左有瀑布，前可远眺，风景不恶，招待及警卫人员亦甚恭谨，每饭六菜一汤，较其办公人员为优，亦颇安之。但不久即知，来信均被检阅，去信多被扣留，即幼儿亦不能入城，其表面理由为余行踪须极端秘密，以免外间注意，实质软禁也。"（1月4日记）

1946年1月间，戴笠由上海返重庆时，曾到白公馆访晤周佛海，并一同午餐，共谈5小时之久　戴笠说："蒋先生对余事至相当时期必有办法，预计恐至9、10月。后复一度回渝，勾留约三周，余两缄约见，均未前来，咸疑其态度骤变，心殊不安，但生活仍旧优待。3月中旬忽阅报，谓其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主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1月5日日记）

周佛海受审判刑后，外间曾有传说，如戴笠不死，其决不会有此结果。周佛海对此深表怀疑。他说："其实真相如何，殊难臆测。以其在沪严密调查余之产业，在渝暗中禁止通信，以及第二次返渝避不见面推之，殆使人难于捉摸矣。"（1月5日日记）

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内幕经过

1946年9月16日下午时45分，国民党当局用中央航空公司38号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马骥良、罗君强、杨惺华等由重庆押至南京。1月24日的日记记有：

"去年至9月15日，军统局人员始来通知余等赴京，明日包专机启飞。但仍谓：非送法院，因渝郊军统局区撤消，交市府或行营，余等不能留此。且余等前曾要求政府还都后，将余等移驻江南乡间，故现在南京附近乡下布置处所，将此间之管理员及厨子、勤务全部带去，如送法院何必携带人员等语。察其布置又似所言非虚。究竟军统局在渝人员真不知情，或知之而故作假言，至今仍不明白。余等遂于16日晨7时，离此幽禁之寓居矣。"

但是，当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机场附近满布岗哨，严防发生意外，事先备有小汽车两辆，机门前有10名武装警察，分站两排，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在场的只有南京和上海记者3人。周佛海身着派力司深灰色长衫，最后走出机舱。他站在机舱口呆了一会，低下头来，神情十分沮朝。下机后，一头钻进汽车，和丁默邨并排坐着。汽车一直驰向宁海路19号军统看守所。23日，移押于老虎桥看守所忠字监。

他在1月24日的日记中继续写有：

"10时启飞，别矣重庆。1时至武昌，略停。4时左右至明故宫飞机场下机，一切情形自此均明朗化矣。武装兵士多人来接，有一人与余同车，貌甚严肃，一语不发。车向城北驰去，不知拟赴何处，车经山西路口广场，目视西流湾故宅，庭树依然，惟已易主，不禁慨然。车入新住宅区转入宁海路，始知形势恶化。盖阅报知军统局之看守所在此，公博、思平等前亦羁押于此也。"

9月20日，最高法院开始对周佛海进行侦讯，前后侦讯6次之多。10月21日，对周进行第一次公开审判。11月2日，进行第二次公审。11月7日上午1时15分，由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周佛海自恃"协助"抗战和维持上海治安有功，对判决不服，乃向最高法院抗告。经最高法院驳回抗告，并核准原判决。1947年1月25日，周妻杨淑慧呈请最高法院再审。27日，经审判长、推事郑礼谔商议裁定，决定再审之声请驳回。但杨淑慧仍一再向最高法院抗告，并要求缓期执行死刑。

杨淑慧敢于如此，果何所恃？原来，戴笠曾一再向周佛海保证说，已得蒋介石之批准，保证对其身家性命必彻底保护。1月20日日记有：

"前年赴渝报到，朋侪均为耽（担）忧。盖以戴雨农太可怕，恐所言无信义，但余仍信之。戴到沪即谓，主座派渠负责对余加以保护，渠对余身家性命必彻底保护，将来必以事实证明，决不作无有义之事。后渠返渝与钱大钧同到沪时，并约钱与余见面。钱谓：彼亦亲阅主座训示，余事由雨农负责。盖戴亦恐余见疑，故以钱见证之。余于33年9月间，曾缄蒋伯诚、吴绍澍，表示不求中央谅解，决心于中央反攻，盟军登陆时，率部内应，以一死上报主座，或于事机成熟前为敌人破获，死于敌手。苟能为主座所杀所囚，尚属大幸。后绍澍赴渝出席代表大会，曾晋谒主座，并以余缄呈阅。34年秋，雨农未到沪之前，绍澍先到沪，将此经过见告。并谓：主座阅余信，反复再四，几欲流泪，当拟给余一信，绍澍谓恐被敌人发觉，不必由主座缄余，乃书一缄与蒋伯诚，谓某事已详告绍澍兄矣。伯诚将此缄见示。绍澍谓，主座嘱其转告余加紧努力，中央必保护余之安全。雨农、绍澍并非一派，雨农到沪前，余即闻绍澍之言，故对雨农所言各节，深信不疑也。"

1月21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

“雨农不愿别人预闻余事，而欲一手独揽。……雨农只谓：时机一到，主座必有办法。并谓必在去年（指1946年——笔者）秋间。办法如何，渠既未明言，余亦未便深问。”

“后侄儿丕基进城（指重庆——笔者）晤许孝炎。许谓：二中全会时，中委40余人晋谒总裁，陈述意见中，有严办汉奸一项。总裁表示应办，但自动提出余，谓早已自首，应该另外一种看法。当时许亦在场，亲耳听见，因此得知主座之真意。但究竟如何办法，各方均无消息也。”

当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即各方奔走，向周佛海的朋友，时居国民党中枢地位的陈立夫、陈布雷、陈方、许孝炎、顾祝同等人托情，请向蒋介石进言，予以特赦。而他们也正在为周佛海设法。1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即以周佛海于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不无微功，请蒋介石将其缓刑或减刑。27日，当抗告被驳回后，杨淑慧曾赴监狱探视。“淑慧谓：曾访立夫，因病未见，由其沈秘书代见。后沈秘书电告淑慧谓，当晚立夫有签呈上主座，嘱其安心等语。”28日，即得可靠消息：

“晨起，忽接慧女（指周慧海——笔者）秘密送来一信，谓昨日下午，毛人凤派周镐约淑慧4时见面，适淑不在寓，慧女四处打寻，至内政部始遇着。访毛时无他语，只谓有好消息相告，至内容可于明晨访方，渠可详告等语。慧女谓：今晨陪淑慧访陈后再来通知。得此一信，紧张情绪稍觉松弛。念东芷汀（即陈方——笔者）现系文官处政务局长，岂有特赦或减刑之希望欤？下午，淑慧偕慧女及淑女（即周淑海——笔者）来，……淑慧谓：今晨访芷汀，谈甚久。芷汀谓，因不知淑慧地址，故托毛代约。渠奉布雷之命，嘱淑慧上一呈文，请求主座特赦，由布雷代呈。并谓，布雷本在沪，见报载最高法院对余案维持原判，极为焦急，赶回布置营救。渠本胆小，不多言，现当不顾一切向主委〔座〕力求等语。”

1月29日下午，杨淑慧往监狱探视，谓：“昨下午，陈芷汀电告，昨晨布雷谒主座陈余事。主座谓，何以至今始说，嘱布雷等负责设法救济。布雷等因与立夫等商，仍由司法方面救济，嘱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芷汀嘱淑慧带律师晤洪商办法。”闻此消息，周佛海马上想到，虽可免一死，但仍无恢复自由之可能。他说：“此次既仍由司法解决，而不用政治上的特赦，则一死虽因主座表示爱护能获免，而必以无期徒刑之身坐牢，自由之期渺茫难测。”

2月3日　周佛海看到一份小型报纸《评论日报》所载有关一周来他的事件之动向，称政府曾暗示各报馆，对周案不宜作刺激人心之记载，并说明最高当局系他曾任其个人秘书，赏周人才，又因周反正甚早，不无微功，故拟赦减等语。深恐“报纸泄露后引起反对之反响，致影响最高当局庇护之心，或增加其困难，反为忧虑不已”。

2月7日，周在日记中记有周幼海到监狱探视时称：“幼儿来探。幼儿晤陈芷汀。据云，国府有文致司法院，表示可免余一死，嘱其核办。芷汀并访谢冠生，商谈将来即由最高法院直接改判无期徒刑。”

但是，12日最高法院仍然继续将杨淑慧的抗告驳回，维持原判。这使杨淑慧异常焦急不安。当晚，洪兰友即约见杨淑慧及周幼海。2月13日，周幼海至监狱，向周佛海报告经过时说“据云：洪兰友昨晚约淑慧及渠（指周幼海——笔者）晤谈，云最高法院院长夏勤电话称，该院对淑慧已予驳回，并谓居院长已由锡回京，兰友遂赶往见居先生。居并召夏勤、谢冠生同来商谈。居表示用政治方法解决〔决〕，由司法院签呈国府，请予减刑。兰友遂往布雷处报告，布雷并约立夫来商，三人复往见居先生谈商，居仍表示负责签呈。”

3月12日的日记称：

“盖余病时，大约2月20日左右，淑慧来告，文官长吴鼎昌于司法院签呈之外，复中一签呈，已呈主座，大约三、四日必可批下发表。但届时并无动静。幼儿复往询芷汀，并来称：芷汀云，主座将文官处签呈亲笔修改，且所改较原呈于余更好，发交文官处，令誊正再呈布雷与芷汀，再就主座所改者加以补充，已再呈上，不日可批等语。……但届时仍未批下，淑慧曾一度访芷汀，据云，大约等待较好时机。且云，布雷离京（兄死，2月26日回籍葬兄——笔者）已将余事托张岳军照料，岳军慨然承受，情亦可感。但迄今三周，杳无消息，故昨日晚淑复访芷汀询问也。”

话虽如此，但周佛海由于呈文尚未批下，总觉得生死未卜，因而内心极感不安。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有：

“昨幼儿谓，晤芷汀时，芷（汀）云：余如执行，渠当偿命，但亦盼早日明朗化。不知呈文何以尚未批下。布雷忙于为（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作文，尚未向主座请示？余不致执行，就普通常理视之，当为事实。但因未明令颁上，衷心仍然不安。（林）柏生执行时，系故意传说有人参观，将各房门关闭，而对柏生云，有人接见，乃一出竟不返矣！余目睹此情，故每次相传参观闭门时，明知就理性说不致有问题，而下意识中每次辄疑（莫）非余之执行令到耶？真所谓命在旦夕，待死狱中矣。”

蒋介石于3月26日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次日，各报刊登。但时周佛海正在病中。4月13日，他回忆此事时写道：

“3月27日晨未起时，看守人员送来淑慧一信，因眼病不能视，但见字句整齐，似七字一句者，因念恐系淑（慧）另抄一段佛经送余念诵。后请（马）骥良阅之，下截乃：‘陈天鸥顷来谓，减刑令明日可发表，仍乞暂守秘密。’上截乃天鸥所书国府对宣传部训令，大意即：‘周佛海案既由政府明令减刑，各报不宜作反对言论，以重政府威信。’乃昨晚所书者。余误认为次晨发表，乃不么看守主任

竟来道喜，谓国府明令已见报端，忠舍同仁欢声四起。”

周佛海的减刑命令，经蒋介石两次亲笔修改，周佛海为此感激涕零。他在4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前闻文官处所拟余减刑命令，主座曾亲笔修改两次。当时以为前段必余痛责，后段乃系原恕，不知主座所改前段或后段。淑慧谓，芷汀告渠，所改者较原告为佳，谅系后段。今见明令毫无责备之词，而主座所改者何字何句，均能体会而心识之，读此，对于主座曲为矜全之苦心，能不感激涕零耶。”蒋介石对周佛海“曲为矜全”，真是煞费苦心。

（蔡德全）

上海滩官商斗法记

上海的米商，向来神通广大魔法无边。在改革币制限价期内，米商们就跟经济督导员蒋经国过不去，造成了严重的粮荒。蒋经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1947年10月和市长吴国桢、购储会杨绰庵商量，决定召集米商筹运米粮来上海。由中央银行把中纺的两万匹布以限价卖给米商，允许米商以黑市到各产米区换米运上海供应。这一决定，正中米商下怀，米业公司理事长万墨林一口答应。于是米商们把两万匹布的栈单分了脏，然后一拖再拖，一直拖到限价开放，还未将以布易米的帐目交出。蒋经国此时已经悄悄地离开上海，米商们眼看已没有查根问底的对头，便有心赖掉这笔帐，说换来的米已卖出了，要求政府赶快将两万匹布兑现。这时，社会局吴开先跳了出来。坚决不答应兑现，并要求追求“以布易米”的详细帐目。

吴开先找万墨林追究原因，万墨林起初做贼心虚，避而不见，天天陪着太太看京戏，后来看躲不过去，才派两个米业公司的常务理事去支吾搪塞一通。吴开先大发雷霆，向米商出了二个题目：一、把全部帐目呈社会局审查；二、用布换来的米抽了十分之二，由民食调配会照二十元限价收购，作为户口米，并且不兑现中纺布栈单。这两个难题倒使米商们伤透了脑筋，当初拿了栈单，以为笃定可以拿到布，所以先垫了一笔资金，还为分赃不均闹过意见。现在布匹拿不到，帐还要查，还要拿出二千六百担米来揩屁股，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况且，他们根本没有这本帐。现在米价三百元一担，这二十元一担收购去岂非叫米商吃了大亏，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拖”。

米商们想拖，吴开先则越盯越紧，米商们被拖得精疲力尽、眼看拖不下去，万墨林突然灵机一动，要想跳开吴开先，直接由吴国桢市长出面解决。他们造了一本帐册送吴国桢处，这是一本只有米商们才清楚的糊涂帐。然而，吴国桢把这本帐交民调会审查时，竟核准了。这下米商们太高兴了。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吴开先对米商们“跳浜”并不高兴，他对记者们说：“我吴开先在上海耽了三十年，还怕区区米商。”他见吴国桢，报告了“以布易米”的内幕，吴市长于是也不高兴了，因为米商们竟敢在他面前打过门，于是立即在帐本上批了一句：“交社会局复查。”这几个字判了米商们死刑，吴开先得意扬扬地说：“米商们是孙行者翻斛斗，翻来翻去，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米商们也想不到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吴开先的手里来了。

吴开先要米商们难看，以“以布易米”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苏浙区监委行署也派了调查专员，去调查其中内幕，万墨林这个历来精灵的人也不免轧扁了头。万墨林越想越气，一方面应付调查专员，一方面要求米商们放野火，说是要对社会局提出行政诉愿。吴开先既稳操胜券，也不怕米商们放野火，他在社会局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以布易米”案。

这真是一场“官商斗法”的精采演出，也充分暴露了上海官与商之间的矛盾。其实，依照万墨林所报的“总帐”，尚余米一千多担，即使要米商拿出二千六百担米，所要贴的，也不过是一千五百担光景，也许加上花帐的数字，米商所贴实在有限，万墨林太黑心，社会局又是黑吃黑，于是你争我斗，两雄相争，结果自然是必有一伤！

（摘自曾炎主编《民国官场秘闻》）

傅斯年炮打宋子文

抗战胜利前后，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因其倒行逆施的经济政策，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黄金风潮迭起、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舆论大哗。傅斯年也在这时发表了《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长达3000余字的时评一文，载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专文刊出，立即轰动全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当时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上，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更扩大了它的影响。

傅斯年在这篇评论中，除历数宋子文经济政策一年多来病国蠹民的恶果外，并对宋子文的为人作风，作了极为尖刻的讽刺挖苦，文中写道：

“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指宋子文）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是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是决不登大雅之堂的。”

宋子文所交接的“外国朋友”是些什么人，连美国人都不屑一顾，可见其一副“西崽”嘴脸，岂止“不登大雅之堂”而已！

傅斯年在文中说：“至于他的态度，举两件一轻一重

的事为例：他大可不必请客，既请客，偏无话可说，最客气的待遇是向你前面夹菜，所谓喂客，非请客也。”又说：“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官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

傅斯年指某家之某人，既隐其姓名，自是见不得人的，但从“全座骇然”来看，疑即某大员或某汉奸之妻女？身为“总率百揆”的宋子文，在大庭广众之间，毫不检点，其生活和道德，于此可见一斑了。

傅斯年在文中大声疾呼，像宋子文这种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在全国舆论声讨中，特别是傅斯年的重炮猛烈轰击，终于把宋子文赶下了台。

（宣博熹）

历史考证

三青团为何被国民党合并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宣布了他关于“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的意见后，不久就在同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实施。至此，成立达9年，人数逾百万，相当活跃的三青团宣告了它命运的结束。在一年前庐山召开的三青团二全大会期间，它似还颇为兴旺，甚至积极筹备党、团分家，欲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自成一独立政党。但时隔不久，却被国民党合并。无疑，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原因。现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藏的档案资料，就这一问题作些介绍。

三青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自成立伊始，它就与其他的一般政治组织团体不同而备受蒋介石的青睐和重视。在它的组织酝酿过程中，曾有人认为：没有必要独立组团，在国民党内设一青年部即可，或者让团的组织仅与俱乐部相类似。但是，这些意见都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他对三青团十分推重，称它为国民党的“新血轮”、“新血液”。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三青团的组织发展相当迅速，很快就由1938年的5万余人发展到1946年的130万人，且还有继续扩张之势。

三青团的主要领导成员也大都由蒋的嫡系心腹组成，团的重要干部除了由CC分子和黄埔系担任外，蒋经国系也是团内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在蒋介石的鼓励和支持下，大有把三青团作为蒋经国培养政治势力和声望的基地。因此，蒋氏父子对三青团都寄予厚望。

在组织性质上，三青团也具有浓厚的私人政治集团色彩，三青团奉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根据团章规定，该团设团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即蒋介石担任，总揽团务并决定一切；而团员则必须“服从团长命令”。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是蒋的有力帮手，同共产党积极争取青年，大搞特务活动，支持内战是其主要活动内容（虽然在抗战期间也不排除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为什么竟被蒋介石坚决地予以取消呢？

至1947年，国民党军队因在战场上遭到严重失败，而逐渐丧失了最初在发动内战时的军事优势。当时经济已呈崩溃之势，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日趋恶化。在总结这些原因时，蒋介石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国民党已经是太颓唐、太消沉了，根本提不起气来。他在1947年6月30日中央联席会议上严词训责了一些党员：“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他坦率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长处，并说如果国民党再不振作，积极刷新，那么就不可能将共产党打败而终归失败。而就国民党现在的内部情况来说，大多数党员对于党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甚至对同志的斗争比对共产党的斗争还要激烈”。蒋介石特别提议，要“改革党务”，统一意志。其具体办法就是要将三青团合并于国民党，不容许让国民党与三青团以两个形式出现和存在。

蒋介石的批评，已经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它在许多地方正如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互相摩擦，互相攻击。”虽然三青团的领导骨干分子均由蒋介石的嫡系CC派、黄埔系和蒋经国系组成，但他们的内部斗争却十分激烈。CC的优势和工作重点主要在国民党内，当时即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三青团的实际大权却在黄埔系手中。因此CC分子就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降低三青团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把党团关系说成是三青团从属于国民党，如陈果夫在给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青干班讲演时，就强调三青团是根据国民党的党章规定设立的，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团员仅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陈果夫的讲话，在绝大部分学员和黄埔系分子中引起强烈的不满。

因此，当时任三青团组织处长，黄埔系复兴社骨干分子就常常针对陈的讲话，突出攻击CC把持党务，强调三

青团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他们对蒋介石的话进行引申发挥，认为三青团既作为国民党的“新血轮”、“新血液”，实际上也就是国民党的未来希望，承担着组织领导全国青年的重任，有着自己特定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思想鼓励下，各地三青团组织也积极地与当地国民党基层组织争权势、划范围，摩擦事件也时有发生。

1944年，蒋经国取代康泽，初步掌握三青团的实际权力后，上述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由于蒋经国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三青团的政治势力得到加强，甚至有独立组党之议，即三青团组成新党，与国民党轮流执政，蒋介石兼跨两党领袖，蒋经国亲自领导。这种议论终于在三青团二全大会上被公开提了出来。这一提议实际上对CC分子极为不利，如果得以通过，那么他们掌握的党权就要从此失坠。因此，陈立夫专程赶往庐山，向蒋介石进谏。CC系反对三青团另组新党的理由简单而实际，既然蒋介石一身而兼两党领袖，当两党互相指责攻击时，他将何以自处？CC的意见终于说服蒋介石取消了三青团组党的提议。

不仅CC与黄埔系、蒋经国系之间存在矛盾，黄埔系与蒋经国系也积怨甚深。自从蒋经国取代了康泽的青干校教育长这一拥有实权的职位后，康泽就以消极的态度进行抵制。实际上，蒋经国除了他从江西带来了那班人马外，对三青团基层干部组织的使用和控制根本谈不上得心应手。自三青团二全大会独立组党计划失败，蒋经国的勃勃雄心遭到挫折而怠于问事，团的工作也就此日趋散漫、松懈。三青团为争地位，争势力范围，同各地各级国民党基层组织产生种种矛盾，也招致国民党内部不少人士的诟病。

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三青团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各种政治竞选工作。由于蒋经国将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而无暇过问三青团事，三青团的一部分干部遂利用其组织力量和一些政客互相结纳，操纵团员参加竞选，捞取选票，谋取权势。另一方面则与CC过不去。例如国民党六全大会期间，在选举中央委员这个问题上，CC为了帮助蒋介石控制选举工作，联合五届中委和代表300人上书蒋介石，自你他们一向服从领袖，关于六届中委的选举，愿将他们选举权奉献给蒋。而三青团的代表则针对这一情况联名上书，表示反对。认为选举权不能互相接受。三青团的上书无疑会使蒋介石感到不快，CC也乘机攻击，痛陈党团对立之危害，强调日后行宪，势必有其它党加入竞争，而国民党再分散力量，后果堪虞。因此，在1947年7月9日三青团成立九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对三青团这些干部进行了严词训责，指责他们：让青年团参加竞选，“方向绝不正确，思想绝对错误，如果坦白地说，则无异利用青年来做工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加上CC派对三青团的一再攻击，终于促使蒋介石下了合并三青团的最后决心。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并没有给蒋经国的地位造成任何影响。相反，根据党团合并的有关规定，三青团的中央委员也全部被承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经国也就此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国民党中央机构，从而完成了子承父业的一个重大步骤。

（张庆军）

风云人物

聂荣臻

聂荣臻（1899年——1992年） 四川江津人。我国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早年读私塾，辛亥革命后入新式学校，小学毕业后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了解十月革命的情况，接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新思潮。五四期间参加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怀着变革现状实业救国的思想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1月到达法国，先后在巴黎、马赛等地的工厂工作和学习。1921年10月到比利时，次年暑期考入比利时沙洛凡劳动大学。在这期间他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和国内的《向导》等革命刊物，思想认识发生了新的转变。1922年8月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回到巴黎，负责旅欧共青团的工作。国共合作后，1924年1月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长。1924年9月离法赴苏，10月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2月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8月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内军事干部力量的决定回国。9月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前敌委员会军委书记、十一军党代表。11月任广东军委书记、省委常委，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到1931年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12

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赣州战役后，调红一军团任政治委员，参加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到达陕北后参加组织红军的东征和西征。

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参加了党的洛川会议，赞成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山地抗日游击战的方针。1937年9月同林彪一起指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千余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10月率一一五师一部深入敌后开创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华北敌后创建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1939年秋末组织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击毙敌“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抗战中击毙最高级别的日军军官。1940年率部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组织发动的百团大战，次年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1年到1942年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扫荡”。1943年8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0月先后组织了上党和邯郸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指挥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4月发动了正太、清沧、保北战役，三战三捷，使华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2月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攻克战略要地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5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年底参加指挥了华北和东北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平津战役。1949年2月先后任平津卫戍司令，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4月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同国民党代表团的和平谈判。9月接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5年到1966年分管全国科技工作。1956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规划委员会常组书记，兼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主任。任职期间，组织研制成功了中、远程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对国防现代化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六十年代初期排除“左”倾错误干扰，主持制定了有利于科研发展的《科学十四条》等条例，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倡导召开了广州会议，为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7年初和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一起代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愿同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义正辞严的“二月抗争”。从195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的第七至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一届一中全会、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至1980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有《聂荣臻回忆录》等。

刘胡兰

刘胡兰(1932—1947)　原名刘富兰。山西文水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40年上学读书，1941年学校停办后，参加抗日活动，如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抗日干部，惩办汉奸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妇女训练班学习。回村后，担任村代理妇联秘书。不久，被正式选为村妇联秘书。1946年初夏，任区妇联干事，积极参加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1947年1月，阎锡山大举进攻解放区。党组织决定要刘胡兰向老解放区转移，可是，她却坚决要求留在困难的岗位上，坚持当地斗争。1月12日，阎匪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引诱威胁，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阎匪军计穷，又将同时被捕的六个农民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泽东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材料　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

新华社晋绥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电　文水县云周西村十七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上月十二日被阎军逮捕，当众审讯。阎军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是”。又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今后是否还给共产党办事?”“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至此，阎军便抬出铡刀，在她面前铡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杨柱子等人，又对她说：“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这位青年女英雄坚决回答：“那是办不到的事!”阎军又说：“你真的愿意死?”“死有什么可怕!”刚毅的刘胡兰，从容地躺在切草刀下大声说：“要杀由你吧，我再活十七岁也是这个样子。”她慷慨就义了。全村父老怀着血海般的深恨，为痛悼这位人民女英雄，决定立碑永远纪念。

材料 “为刘胡兰报仇！”

作为一个随军记者，我目击过多少敌人整师整团的覆没，然而，我从来没见过象文水守敌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当时我军指战员高呼“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奋不顾身严惩敌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四七年元月，我吕梁和太岳部队向采取“水漫平川”战术、疯狂残害人民的阎锡山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斗连续进行了十七昼夜，终于在汾阳、孝义一线歼敌万余。随即象秋风扫落叶一样追歼逃敌，独二旅和独四旅并肩向文水县城挺进。

独四旅是晋中平川的子弟兵，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有着浓烈的感情。但是眼前的一切，却被敌人糟蹋得面目全非。白皑皑的雪地染着殷红的血迹，田野里增添许多新坟；埋葬和凭吊亲人的老乡们来来往往，哭声一阵接着一阵，村村有燃烧着的房屋，有全家被害而无人掩埋的尸体，……触目惊心的故乡，象千针万刺扎进晋中子弟兵的胸膛。没有言笑，没有胜利后的欢腾，人人瞪着被怒火烧红了的眼睛，默默地迈着复仇的脚步，向文水疾进！

当部队经过最熟悉的云周西村的时候，乡亲们冒着鹅毛大雪，在村口把我们围住。老人哭号，小伙子流着泪，控诉阎军的滔天罪行。他们急求道：

“为咱的胡兰子他们报仇啊！”

胡兰子，有人知道就是刘胡兰，十五岁的共产党员，妇救会的小秘书。敌人能把这个孩子怎么样呢？人们惊愕地问道：

“她怎么了？”

“该死的勾子军，把她和六个乡亲活活的铡死了！”

“什么时候？”

“一月十二日。”

“在哪儿？”

“观音庙前边！”

不用招呼，不用命令，部队和乡亲们拥进观音庙前的广场。北风呼啸着，大雪飞飘着，广场上仍然阴森、沉寂。杀害刘胡兰等同志的铡刀横在面前，刀口已经卷刃，刀座上凝满了紫黑色的血迹。垫刀的高粱杆零零乱乱堆在地上，虽然蒙上一层白雪，但雪融之处，仍可见到血迹斑斑。所有这一切，无情地向我们证实了：那个不管风里雨里各村奔走的妇女干部，那个不分昼夜筹备军鞋的支前骨干，那个经常严肃而又有点稚气地给部队演唱歌曲的小妹妹，真的遭到了敌人的毒手。……

刘胡兰同志的母亲知道我们进了村，也来到广场上。她面色苍白，眼皮浮肿，站在我们面前讲述烈士们就义的经过。她极力忍住悲痛，一字一泪地说：

“我家胡兰子，还有那几个乡亲，死得惨……可也死得有骨气……”

接着，充满仇恨和血泪的语言，象决堤的河水奔泻出来。在我们眼前立刻出现一个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伟大形象：就在这阴森的观音庙前，就在这血腥的铡刀旁边，她向亲们告别，把平时喜欢拿在手里玩的万金油盒交给了母亲。她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挺着胸，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也就是我一个，别的不告诉你们。说吧，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你要是不说，也和那六个一样，铡死！”“怕死的，就不算共产党！”说罢，她“登登登”向铡刀走去……

我一边记着刘妈妈的控诉，一边流着眼泪。泪水滴湿了笔记本，手里的笔简直象刺刀那么沉重。我不是在写，而是在刻，深深地刻下这仇和恨。战士们垂着头，有的在擦泪，有的在啜泣，靠在肩头上的刺刀，在风雪中随着他们的身子不停地抖动。人被仇恨窒息了，心被仇恨烧焦了，就连树枝和房檐上的雪仿佛也被这仇恨的气氛所融化，滴下了痛心的泪水。

刘妈妈说到最后，用颤抖的手指着染满她女儿鲜血的铡刀，喊着：“同志们，为胡兰子他们报仇啊！”她支持不住了，踉跄几步，几乎跌倒。所有在场的人从沉痛中激奋起来。几个战士急忙从行列中跑出来扶住了她。内中有个战士，膀宽腰圆，身材高大，面庞黑里透红，他正是我前几天访问过的机枪手王银才。他在汾孝战役中一个人俘虏了十三个敌人，缴获四挺美造轻重两用机枪。他是文水人，共产党员，真不愧为刘胡兰的乡亲和同志。只是这位钢铁汉子，满脸泪水，在铡刀旁边，捧起一块渗透鲜血的泥土，用手巾包好，揣进怀里。然后拉着老人家的手，宣誓般地说：“刘妈妈，请不要过分伤心，我们把胡兰子为人民流的鲜血保存起来，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为胡兰子报仇！”

这句话象导火索一样，使连日来积压在内心的怒火迸发出来，广场上顿时枪刺高举：“为刘胡兰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淹没了风雪的咆哮，滚雷般地从云周西村上空，越过巍峨的吕梁山，向四面八方震荡，似乎在向整个曾被敌人蹂躏的晋中平川宣誓，在向全体晋中乡亲们宣誓，在向所有死难的英灵宣誓。

为刘胡兰报仇的突击队组成了，

为刘胡兰报仇的爆破班组成了，

为刘胡兰报仇的进军开始了！

部队没喘一口气，当晚就赶到了文水县城；也没有站一站脚，立即拔除了城关外围的所有据点。次日拂晓，透过乳白色的晨雾，我看到战士们伏在雪地上，严峻地望着灰秃秃的城墙。大家都知道，此刻在城墙上射击的敌人，

正是杀害刘胡兰等同志的阎军二一五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战士们紧握手中枪，用力蹬着地，随时准备冲进敌群，杀个痛快。

二月二日，下午一点钟，旅部终于发出了严惩敌人的总攻信号，接着山炮和其它轻重火器一齐吼叫起来。顿时城墙上下浓烟滚滚，火光闪闪，大地在颤抖。爆破手陈英趁机抱起炸药包，向城门飞奔。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他抬腿踢开；雨点似的子弹向他扫来，他不眨眼地趴在雪地上匍匐前进。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烟尘腾起，砖瓦横飞，高大而又坚厚的城门敞开一个缺口。陈英从烟尘中站起来，满脸硝烟，高举着拳头，转身向后边喊道：“同志们，前进，为胡兰子报仇！”

为胡兰子报仇，杀！”真是一呼百应，响亮的口号压倒了激烈的枪炮声。千百名战士汇成强不可挡的巨流，怀着为烈士报仇的急切心情，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城门。一个个敌人倒在我们脚下，一个个碉堡在我们眼前飞上天空，仇恨的怒火烧尽了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

部队向前发展。冲在最前面的几名战士，又碰到一道城门，因为冲得过猛，第二道城门还没有炸开。战士们急得跺脚，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用力推，但那高大的铁门巍然不动。在这紧急的关头，陈英抱起另一个炸药包在后边大喊：“先下来，看我炸他个狗日的！”可是，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了退路，也使后边的陈英不能靠近城门。

忽然，机枪手王银才飞快冲出来。他挺身端枪，毫不荫蔽地向敌人还击，于是敌人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他这里，打得四周雪块纷飞。王银才见敌人上了当，就对陈英喊道：“上，爆破城门！”陈英乘机炸开第二道城门，急不可待的战士们一拥而入，震耳的杀声在城里响了起来。

我随后跟进，看到王银才晕倒在冲锋道路上。我上前把他扶起，他睁开眼睛叫喊：“我不下去，我要斩尽这群连个孩子也不放过的野兽！”可能是用力过猛，说完他又昏迷过去。这时我才发觉他头部负伤，鲜血滴在他前胸微微鼓起的衣袋上。衣袋里面有鼓舞他战斗、给他以力量的、被刘胡兰烈士鲜血渗透的泥土……

我把王银才交给卫生队之后，就跟随部队跑上城墙。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着，大街上几乎到处都有我们战士跃进的身影，到处都有惊慌溃乱的敌人。随着一声又一声“为胡兰子报仇”的口号，溃散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地倒下，最后，尚未就歼的敌人都逃往北门，在瓮城圈里蛆似的乱挤乱撞，准备夺门逃命。忽然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响了起来，跑在前头的几个敌兵应声而倒；敌人唯一的生路被掐断了。“好机枪！”许多人大声喝彩。我回头一看愣住了，原来王银才又跟着后续部队爬上了城墙。他头上刚刚包扎住的伤口仍在渗着鲜血，身子微微摇晃，但他咬着牙齿，圆瞪着眼睛，单腿跪在城墙上不住扣动扳机。子弹带着他满腔仇恨，瓢泼似的撒向北门，……

枪声沉寂了，战斗结束了，我看了看表，才知道这场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五分钟，多么短暂的一瞬呀！

雪花还在片片飘舞着，硝烟慢慢扩散，文水县城逐渐寂静下来。我定神眺望，只见街头巷尾满布敌人尸体；二一五团的指挥所上面飘着投降的白旗；三三两两的战士横眉冷对着群群俘虏兵。这一切，使我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不错，我们没有什么优异的武器，但是我们有忠于党、忠于先烈们的革命意志。就凭这种意志，我们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严惩了恶贯满盈的二一五团。

此刻，王银才也许和我的心情一样吧，只见他放下机枪，掏出那渗透烈士鲜血的土块，含着泪低沉地说：

“胡兰子，你要能来看一眼该多好啊！”

（赵戈）

叶　飞

叶飞（1914—），原名叶启亨。福建省南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旅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杨　勇

杨勇（1912—1983），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3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5师14团政治处主任，第4师10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第4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343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3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5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陶 勇

陶勇(1912—1967年)，原名张道庸。安徽省霍邱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军游击队排长、副连长、连长、中共鄂豫皖边区分局保卫队队长，红4军12师35团连长，第10师28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苏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华东党校大队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2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 再 道

陈再道 (1909—1993年)，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师3团排长、连长，11师12团营长，11师11团团长、师长，红4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2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彭 泽 民

字锦泉，号镛希，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十月初三)出生于广东四会。父亲彭明翰，在佛山靠糊纸盒为生，家庭十分贫苦。彭泽民幼年入塾受教，继续七年，并曾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后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1902年被迫离乡前往南洋马来亚谋生。起初在吉隆坡郊区当塾师，后在一个锡矿场任文书。

彭泽民到吉隆坡后，常去兴中会在吉隆坡创设的“中和讲堂”听讲，受到革命思想启蒙，倾向革命。1906年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立，有会员十余人，彭泽民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书记。因英国殖民当局监视甚严，不能公开活动，同盟会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利用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为机关。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亚亚雪兰峨邦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策划广州起义，鼓泽民积极动员华侨捐款，鼓励华侨回国参加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晚和罗成，就是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主后，吉隆坡当局认为青年益赛会为暗杀机关，下令停止活动。辛亥革命后，吉隆坡同盟会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青年益赛会得以恢复，会员增至数千人，彭泽民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四年。1915年9月，彭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雪兰峨副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华侨中为中华革命党筹集讨袁军饷，并组织华侨讨逆军，入广东东江参加讨伐龙济光。

彭泽民初到南洋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急需橡胶，殖民当局招垦橡胶园，彭领到橡胶园一处，并得到锡矿场工人的帮助，建木屋数间，全家悉心以赴经营橡胶园，生活有所改善。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彭泽民参与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工作，发起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益群日报》受到侨胞欢迎，畅销南洋各地。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实现国共合作，彭泽民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因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随后，他被芙蓉总支部推选为代表，参加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起来反对。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曾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

7月底，彭泽民到达南昌。8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推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号召革命同志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8月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彭随部队南下。当时气候酷热，加上敌人的不断袭击，行军十分艰苦。他与共产党人一道，不畏艰难险阻，在行军途中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为战士看病，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毅力。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后，他在彭湃的帮助下，取道陆丰到汕头，乘渔船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二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由于彭泽民坚持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的爱国革命立场，1928年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他共同发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路过香港时，与彭一起商讨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脱党分子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鼓泽民列名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彭在香港组织了南方干事会，负责会务工作。但不久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失败。1933年冬，彭泽民到福州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久，彭认为不可能成功，即离闽回港。

彭泽民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生活异常艰苦，但他操守不移。为了维持生活，他经友人介绍向香港名医陈伯坛学习中医六年，随后在香港挂牌行医。他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经常赠医赠药，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1月1日，彭泽民和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对日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官僚独裁统治。《纲领》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恢复大革命时期联俄、联共政策。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7年1月3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成，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实现人民民主，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4月，国民党为了和缓人民对其一党专政的强烈不满，宣布"改组政府"。彭和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郭冠杰、李伯球等发表《对改组政府的意见》，指出："国民党临到政治完全破产，人心尽去的今日，竟来一套'改组政府'，以图挽救危机，"完全"违反人民的要求，徒增人民的痛苦"。这时，彭泽民被推为设在香港的民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他连续发表文章和宣言，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摧残民主运动的反动行径。

1948年5月，彭泽民代表农工民主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这时，他已是香港的名医，生活优裕，但他不顾一切，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离港，于12月26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曾赋七绝一首："廿年空有还乡梦，此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表现了无比兴奋的心情。

1949年2月，彭泽民到达北平，9月，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他继续用自己的精湛医术替人民看病，为社会主义服务。1951年他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10月18日，他在北京逝世，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深切哀悼。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翁文灏

翁文灏，字咏霓，1889年6月29日生于浙江鄞县一个殷实之家。14岁考中秀才，以后对西学渐感兴趣，于1906年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学校"读书，主读法文和数学。1908年远涉重洋到比利时，进入罗文大学，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被授予理学博士。次年

春回国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夺魁后，被分配到农商部地质科当签事。不久，他与地质科科长丁文江一起，在北京大学的协助下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地质研究班(所)，两年就培养出20余名研究生，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后直到1931年，他在地质科学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如他考察1920年5月甘肃大地震后写的《甘肃地震》等一系列地震学论著，以及他创立的东亚燕山运动学说等，均是中外瞩目的重大成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翁经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国民政府秘书的钱昌照引荐，以有关国防设计的原料制造专家身份，于同年年底会见了蒋介石，从此为后来侪身政界埋下了线索。次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蒋自任委员长，一度想让翁担任秘书长。翁虽力辞未就，但对蒋亦不免怀有知遇之感。1935年10月，翁终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时称"学者从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1月，翁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并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并于同年经蒋介石"钦点"而成为国民党员。翁接任新职后，主持了各地工厂迁川，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工作，还主持了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翁文灏勉为开创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经济建设而尽力，他的学者身份和清廉名声，也为政府中贪污中饱的丑行起着"遮羞"作用。1944年11月，翁又被任命为战时生产局局长。就在这一年，他的次子在对日空战中牺牲，使他深为伤感。翌年抗战胜利前夕，他又成了挂名不作事的行政院副院长，同年国民党六大给他戴上了"中委"的桂冠。

抗战胜利后，翁萌辞职专事科学研究之想，未完全获准，仍保留行政院副院长之衔，直到1947年4月张群接掌行政院时方得去职。然而这次去职并不意味他已认清历史前进的大势。1947年7月，他在名为动员"勘乱"实为发布内战动员令的"国务会议"上，作为国府委员又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次年初，以他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石油公司，一手包办向美国订购了2000余万美元的军用石油，以充内战之需，此举他亦难辞其咎。1948年6月翁又担任行政院长，任内，曾发布"勘乱"广播讲话，跌入内战战犯深渊。11月他在亲眼目睹内战惨败和他主政时"金圆券"对人民造成的祸害后，内心灰暗之余，辞去了行政院长之职。1949年2月，翁再次出山，充当了代总统李宗仁的总统府秘书长，本意是想为国共和谈达成协议尽一分力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南京解放前夕，翁黯然潜赴香港，数日后飞广州，最后辞去国民党各项公职。嗣后，他曾托邵力子转圜，意欲回到大陆。但杨杰将军在香港为军统暗杀后，他不寒而栗，遂飞赴法国。然其回国之心未变，1951年1月初，他在谢绝美、法一些大学的邀请和台湾当局邀他赴台的"关心"后，冲破种种阻挠，毅然经香港回到广州。嗣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同时，还在地质学界和新中国对西北的勘察、开发和建设方面广为献策。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在北京病逝，终年82年。在所立遗嘱中，他追述一生之曲折，顾念在台之昔日同僚，对祖国的统一怀着殷殷的期望。

董显光

董显光，西名惠灵顿，1887年11月9日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农户家庭，幼时读过私塾。因其家乡地近东南沿海，其父母笃信外来之基督教，所以董一段时期在苏州的教会学校读过书，以后他先后就读于上海的英华书院和清心中学学校。1905年在上海中外会审案件时发生了中方官员遭到美国法官殴打的事件，学界发起抗议运动，董亦愤而离校转民办中学，续读一年进入宁波龙津中学堂教书，此时他得与蒋介石结识。翌年董又赴上海入商务印书馆任职。

1909年1月，在筹措到一笔旅费后，董赴美留学，进入密苏里派克学院。第二年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13年毕业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未及毕业，因母病重即于1913年春经日本回国。在由横滨至上海的轮船上，得遇卸任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董即时采访，并将报道寄给纽约的一家报纸。(这篇报道发表后，他一时小有名气。)董抵达上海后，经孙中山介绍在英文日报《中国共和报》任编辑，对这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该报予以激烈抨击并揭露事实真相。此后数年董还先后在北京英文报《北京时报》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做记者和编辑工作。1925年，又倾其积蓄在天津办《庸报》，自兼发行、主笔、编辑、记者数职。

1926年北伐军抵长沙时，董显光采访了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1927年南京发生"四·一二"清共事变时，《庸报》曾载文为蒋辩护。1929年夏，董受聘到上海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此后他主持此报五年有余。其间，《大陆报》虽然编采阵容强大，但由于官方原因，对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类的重大新闻却不能及时准确地加以报道。1934年，董经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第二年即辞去《大陆报》职务，不久经端纳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委以主持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董显光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宣传的军事委员会第五部次长。不久，因该部业务转入党务系统，又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8年底董抵达重庆后，设立了国际宣传处，在海外还组成了众

多的办事处，随时发布新闻。他工作勤谨，作风和平，还亲自主持通讯刊物《中国在战斗》，报道中国抗战情况。当时，在渝中外记者多次要求访问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的抗战情况，但直到1043年10月，董才奉命解禁，先后组织两批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然而，对记者们相继如实发回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情况的通讯报道，他又时时感到棘手。抗战期间，董曾三次出国，均为重要新闻官员。1942年2月，他陪同蒋介石访问印度。翌年11月，蒋出席开罗会议，他又是随员之一。抗战后期，他还在重庆办了一所不大的新闻学院，聘请外籍教授主持。

1947年5月，董显光在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局长。由于新闻局对外国记者的电讯实行严格检查，董颇受中外舆论诘难。1948年12月，他辞去新闻局局长职，于次年初偕其妻赵荫芳迁台北，担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北《中央日报》董事长。此后一段时间，他以蒋介石的半官方代表身份，频繁来往于台湾和欧、美、日之间，进行游说。从1952年起，他又先后出任台湾的驻日和驻美"大使"。1958年7月改任台湾"总统府"顾问。1971年，董显光病逝于美国，一生著述有《中国和世界报刊》、自传和为蒋介石撰写的传记等。

（摘自《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孙　科

孙科，字哲生，孙中山之子，1891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第二年，父亲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到澳门设立中西医局，孙科遂随母亲卢慕贞从香山迁居澳门。1895年秋，又和祖母（杨氏）、母亲和妹妹一起离开澳门，经香港前往檀香山伯父孙德章处。8岁时从师黄瑞祥，通学四书五经。12岁时到教会创办的圣安东尼学校学习。1906年毕业于相当于中学的圣路易学院，之后任过一段时间的《大同日报》编辑。1911年又去美国加里福利亚大学学习。

民国成立后，孙科匆匆赶回国内。不久，带着两个妹妹再去美国留学，经过檀香山时，经伯父孙德章介绍，和陈英淑结婚。1912年8月重入加州大学。191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此时，国会非常会议第四次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科于是赶回国内出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5月，在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逼迫下，孙中山辞职离广州去上海，孙科留在广州担任英文《广州时报》副主编（该报是国民党在南方的唯一重要舆论机关报），此外还任广州治河督办等职。1920年11月孙中山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又撤销军政府改任非常大总统。孙科当上广州市长，在进行市政建设的同时，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工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又参加了国民党党纲、党章、宣言等的起草工作。1925年初因父亲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于2月2日赶到北京。2月24日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四人一起面请孙中山留下遗嘱。3月11日中午，孙中山在经孙科等四人讨论、由汪精卫执笔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接着吴稚晖、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张继、宋子文、戴恩赛等人和孙科一起在遗嘱上签名为证。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逝世，4月2日停灵北京西山碧云寺，葬礼结束，由孔祥熙在北京暂时护灵，孙科回到广州。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孙科兼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在国民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连任此职。

1926年7月北伐开始。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党最高权力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议定迁都武汉。12月初，孙科和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鲍罗廷等人赴武汉组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取代原有的国民党党政军领导机构。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在南昌挑起迁都之争，为建立反动政权作准备。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支召开，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孙科为国民政府五人常委之一，此外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随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但时隔不久，汪精卫也发动七·一五反共政变，宁汉逐步合流，孙科作为武汉方面代表与南京方面进行了谈判。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宁汉合组国民政府，孙科一度出任中央特别会议委员、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胡汉民、孙科等受到冷落，大为不满，相继出国考察。6月张作霖和奉军退出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垮台。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回国不久的孙科出任国民政府委员、铁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1931年5月，因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非法囚禁，广州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事件发生，孙科遂与汪精卫、胡汉民及追随者一起南下广州，就任非常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民党各派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逐步趋于一致。11月13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孙科当上中央执行委员，随即又当上行政院长。但未及多久，蒋介石、汪精卫实现合作，国民政府政局变动，他不得不于1932年1月25日被迫辞职。6月，出任立法院长。任内的一个重要工作是起草"五五宪法"草本。

抗日战争开始，孙科为中苏外交、争取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了"制宪国大"。随后，蒋介石为进行所谓的"行

宪”，于1947年4月改组政府，孙科得以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官衔。1948年3月，孙科竞选副总统败于李宗仁之手，改任立法院长。1948年11月翁文灏内阁垮台后又出任行政院长。国民党部队主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损失殆尽就发生在他任职期间。随后，为反对李宗仁代总统与中国共产党会谈，以及对军事上的失败自感无法交待，孙科于1949年3月辞职。下台后，经香港去法国、美国定居。

1965年10月，孙科夫妇结束国外生活，迁台湾定居。年底，蒋介石任命他为“总统府资政”。1966年6月出任“考试院长”。1967年8月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1969年3月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科又当上中央评议委员和中央评议会主席团第一主席。1973年9月13日病故。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邓小平怒开“十杀令”

由于部队的高度分散，给上级的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仅邓小平在一次视察部队时就碰到好几起。

一天，邓小平来到光山县南的张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见他象个当官儿的，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说：

“长官，求你给我作主呀。”说着，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邓小平急忙扶起老汉问：“啥子事？”

老汉讲了原委。原来，小保队清乡时抢走了他的一头牛，解放军赶跑了小保队，把牛也牵走了。他去要了几次，解放军一个大个子班长横眉竖眼地说：

“我们的纪律是‘一切缴获要归公’，要讲道理，你去跟我们的连长讲吧。”

连长在哪里？老汉不知道。他只看见了一张牛皮。

邓小平让随行的司务长拿出仅有的二十块银元赔给了老汉，自己饿着肚子走了一天路。

一路上，不断地有人告状：

有强睡人家的内房的；有吃了饭打一个白条子的；有没收富裕农民的财产的；有掰包谷的，有摘苹果梨儿的；甚至还有睡地主老财小老婆的……

邓小平怒气冲冲地回到王大湾，刚要进村，却一脚踩到一泡稀屎上，滑了跤。这一下，他的气更大了，回去就起草了一份命令：

部队所到之处必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习俗，树立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

一、挖厕所与吃饭同等重要；

二、随意采摘群众瓜果及其他食物者严惩；

三、强购群众物品者严惩；

四、强占群众住房者严惩；

五、抢劫财物者枪毙；

六、吃白食者枪毙；

七、奸污妇女（含明娼暗娼）及强住群众内房者枪毙；

八、强拉民夫者枪毙。

九、此令由各级政治主管亲自监督执行。同级违纪报请上一级执行。

十、徇私枉法者与违纪者同罪。

这一命令，被参谋干事们私下里称作“十杀令”。对下面打电话总是说：喂，你们纵队（或旅）执行“十杀令”的情况怎样？

下面回答说：“谁不知道邓政委说到做到的脾气，哪个还敢马虎呀？”

邓小平听了，心里不由得好笑。

（节选自《千里大跃进》，载《威震神州——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邓小平旧居喜添新联

四川省广安县城北5公里处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旧居，原只悬挂作家马识途的一副对联。近来，又喜添一副长达500字的新联。该联是四川省楹联学会会员刘利创作的，用4块云南红松木精雕细刻而成。对联悬挂在门楹左右，红底白字，鲜艳夺目，气势恢宏。

上联：小事宏观，大事微观，成事纵横观，败事主客观，牢树英雄宇宙观。卓与壮哉！深谋善断，手理万机，争朝夕，筹议唯勤。忆往昔峥嵘岁月，旅法留苏，备尝艰险话长征，桂岭打狼，中原逐鹿，淮海缚龙，巴川捉鳖。为解放鸿基，屡建殊勋。抗群魔枉重灾，竟落得抄家削籍，愁抱初衷勿悔；耿耿兮，积愤萦怀，笃竹马列志弥坚。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不减英雄本色。九州思治。回挽狂澜，净扫红羊甘受命。昭雪顺民情，错冤假案全甄，洗余污，消余悸，废墟拨乱，弘扬务实精神。无那鼙鼓乍喧，仰赖才通韬略，赫赫军功震瘴陲，还我金瓯。推贤荐智，古崇舜让尧禅；夺位

抢班，近斥江欺林篡。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举世尊称当代伟人。堂堂仪貌，秩秩德音，岱岳登峰天下小；

下联：平时剑气，战时勇气，穷时傲骨气，达时豪迈气，素怀俊彦凌霄气。多且好也！灼见真知，身兼数任，辨是非，指挥若定。看今朝锦绣河山，翔鸾集凤，犹记忧欢国永固，农渔包产，厂矿扩权，税盈同课，党政分工。对共和绪业，常抒构想。统一国，存两制，已会签复港收澳，喜传夙愿将酬；拳拳者，至诚置腹，早合台澎心更切。廿纪嘉猷，双番增值，倍钦俊彦襟灵。亿户脱贫，振兴华夏，紧催赤骥欲腾骧。律科孚众望，残陋陈规尽破；开自锢，启自封，肃弊纠偏，控占攻尖领域。漫谓特区刚辟，敬蒙斗盖研桑，频频捷报拓琼岛，琢斯玉璞。革故鼎新，外引欧资美技；择优蕴粹，内联私贾公商，裕庶强邦，晖荣百族，环球盛赞亚洲奇迹，奕奕神功，皇皇正道，乾坤转斗泰阶平。

（摘自《党史博采》94年4期，作者：袁亦梦）

贺司令员赐见廖昂

新华社西北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电　西北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将军二十日赐见清涧战斗放下武器的蒋军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会面时，廖垂手鞠躬，局促不安。贺龙将军与之握手。谈到这次作战的失败原因，廖叹息："是由于战略错误，长官(指胡宗南)指挥无能，孤军深入，下了一着死棋，摆开了挨打架式。"并谓："十年来，我们(指蒋方)的军队没有一点长进，反而一天天腐化堕落，这次守清涧，我一个师长连一个营长也指挥不动。"贺龙将军当即指出："那不是单纯战略错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蒋介石反人民的政略根本错误，战略怎么会正确？士兵都是抓来绑来的，谁愿意为四大家族卖命？再说你们当军官的，不过是蒋介石的奴隶，在胡宗南操纵下，没有职权以内的权能和自由。"廖俯首望着鞋尖，搓动双手，连称"是的，是的，贺司令说得很深刻。"话题转入解放军战略战术的成果，廖逐渐恢复常态，申述其观感："第一，贵军战士多了，我们(指蒋军，下同)训练的士兵补充了贵军；第二，贵军武器好了，我们配备的武器装备了贵军；第三，贵军不但善于运动战，而且更善于攻坚战阵地战。一句话，贵军是一天天发展壮大了。"贺将军肯定地说："山城堡一战，结束了第一次内战(按：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廖昂率二三二旅追击北上抗日红军，被贺龙将军全歼于陇东环县山城堡，廖昂仅以身免。不久，双十二事变，国共停战)。不久将会有第二次山城堡到来，就要彻底消灭蒋介石，结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内战。"廖不胜感慨地说："想不到在北伐时代轰轰烈烈去革军阀的命了，现在人民又轰轰烈烈的来革我们(指蒋家匪帮)的命了。贺龙将军义正词严地说："主要的还是蒋介石背叛了人民，出卖了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比反动军阀袁世凯更有过之，自己吞食自己所培植的恶果。到了解放区，请放心，生命是得到绝对的安全保障。到后方去学习一个时期，工作或回家由你自愿。"廖频频称是，鞠躬告退。

刘胡兰式的烈士尹灵芝

尹灵芝出生在离县城三十余里的赵家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是当地出名的抗日英雄。灵芝从小受到革命熏陶，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十三岁任儿童团长，十四岁任妇救会主任，十六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她带领妇女儿童送情报、做军鞋、站岗放哨、火线送饭，受到党组织的表彰。一九四六年冬反奸清算刚开始，敌人疯狂反扑，尹灵芝的父亲村农会主席尹尔恭，以及村长等党员骨干被敌杀害，村公安员投敌叛变。尹灵芝挺身而出，坚持率领群众清算汉奸，镇压恶霸地主，在斗争中重新建起赵家垴党支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地富纠集"复仇队"，勾引匪军袭击赵家垴村，尹灵芝为了保护公粮，掩护乡亲们转移，不幸被捕。敌人梦想从她口中知道我地下党的名单和坚壁粮食的地点，他们用尽酷刑整整折磨了她十五个昼夜，但铁做的刑具可以用坏，而党的好女儿尹灵芝始终没有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品质。十一月三日陷入穷途末路的阎匪军终于对尹灵芝下了毒手，他们在阎匪老巢宗艾镇瑞祥寺院内设下杀人刑场并架着一口铡刀。尹灵芝昂首屹立，当众斥敌，面对杀人铡刀毫不畏惧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喊声唤起了民众，喊声吓破了敌胆。残无人道的敌人用罪恶的铡刀将英雄从脚到头铡为三截。

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十六岁的女共产党尹灵芝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追认尹灵芝为刘胡兰式的革命烈士，并在寿阳县城北坪修建了尹灵芝烈士纪念馆。

（选自《中华英烈》86年5期）

西瓜兄弟

记者随军路过濉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间流传着西瓜的故事。当地有李姓西瓜兄弟两人，每年每人种亩把好西瓜，这方圆一二十里地内，也只有他们兄弟俩种西瓜，因此大家就叫他们做"西瓜兄弟"。西瓜老大的地在村东大路边上，西瓜老二的地在村西南小路边上，今年虽然雨水多，可是他们的瓜地高，西瓜还是长得又大又甜。

瓜刚熟的时候，村东走过了一队蒋匪保安团，那些饿狼一看见老大的瓜，顿时你抢我夺的，不一会，一亩多地西瓜就一个也不剩了，地里只留下一片踩烂的瓜藤瓜叶与吃剩的瓜皮瓜子。

在蒋匪过去二十天后，村里忽然来了八路军，巧的是这回八路军从村西南西瓜老二的瓜地边过。"我这瓜地完了！"西瓜老二想："我这命也不要啦，我就躺在瓜地里，看他八路军摘我的瓜吧。"西瓜老二灰心丧气地往西瓜棚底下一坐，看着八路军过来。谁知道队伍有多少呢？往北看不见尾。"这西瓜长得好呀！"领头的一个兵说。"还有三白瓜哇！""这瓜一个怕有三十斤。""吃上两个才解渴呢。"路过的兵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赞叹不置。一听见说西瓜两个字，西瓜老二的心就痛得象刀扎；但是他却奇怪，这些人说说就完啦，连脚都不停，一股劲往前走。西瓜老二起身往西边一看，南已看不见队伍的头，北还不见队伍的尾，很是纳闷地说："这八路军就是怪呀！"说着就站起来，提着一把刀，从地里抱起一个大西瓜，往路边一放，刺刺地切开了。"吃瓜呀，弟兄们！"西瓜老二向八路军叫，但都没有人答应他。"走路渴啦，来吃块瓜！"西瓜老二又向另外一些兵士叫着，但回答都是："谢谢你，老乡！俺不吃。"这一下西瓜老二可急了，大声嚷起来："看你们八路军！把瓜切开了怎的不吃呀？"这时有个十六岁的小司号员向他问："老乡！你这西瓜多少钱一个？""不要钱，随便吃吧。"西瓜老二边说，边拿起瓜往小司号员跟前送，小司号员连说："俺不吃，俺不吃！"脚不停地就朝前走了。西瓜老二捧着瓜，直楞楞的在西瓜地边站着。队伍还是肩并肩地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新华社中原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电）

（选自《军事报道文选》作者：王匡）

射击英雄魏来国

有人说："魏来国有一双老鹰式的眼，看的远，打的准。"但是魏来国摇摇手，他说：他当战士时，有一个同志平时瞄准很好，到战场上就是打不到敌人，好技术还要有好勇气才能配得上，勇气就是觉悟，有了阶级觉悟，什么事业不能完成呢？

每次战役，魏来国的战绩一五一十是不够数的。四月份蒙阴西南白马关阻击战，他以一百三十六枪打死九十二个敌人。魏来国在打枪时，要有两个人帮他拿子弹，记数目；三百米、四百米，只要敌人在魏来国眼睛里，是很难逃脱的。要是敌人军官走在前面，那么，先倒下去的一定是军官。战士们说："咱们魏来国连只许胜利，不许失败，连长一支步枪，就好比一挺机关枪。"魏来国连真是一个机枪连，每个战士也都是射击的好手，蒙山阻击战中，蒋军整旅整团的猛攻都给打下去了，全连打死了五百多敌人。魏来国对他连里的战士们的战斗信心是很满意的，他时常给战士们说："我们打仗要不顽强，什么敌人都要顽强，如果我们顽强，那么敌人都成了尿泡呢。"

但是，魏来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凶神。一九四二年以前，他还是一个受人剥削的小泥水匠。战士们说："我们连长真是好脾气，他性情温和，说话还红脸呢。"可是，在敌人面前，他棕黑色的面孔上，瞪着一双深凹的圆眼睛，就是一只高大的猛虎啊。

蒙山阻击战中，魏来国的右手负伤了。他每时每刻都挂念着手指，进医院打开绷带时，医生说："你的手指应该割了！"魏来国可发急了："那怎么能割呢？"魏来国赶忙把手缩到怀里，"你已经打死三百六十多个敌人，还不该割吗！""这不都是打的敌人吗！"魏来国一副惊奇的眼睛看着医生，医生笑了，周围的人也全都笑起来了。

当魏来国手指能活动时，魏来国的心思来了，他想运动中杀敌的数目还没够数，还有在群英会上定下向师团首长保证每人杀敌二名的计划未完成，战士们不是说等着我回去教他们射击技术吗？魏来国有些苦闷起来了，他就想立刻到连队里去。

魏来国每天还在考虑，当连长更应该学会指挥艺术，郭继胜连长的指挥方法，什么时候能学的周全呢？虽然，从胶东英成县来的家书，父亲告诉他家乡有成千成万的人向他贺喜，也没有打消他这个念头。

魏来国今年才二十三岁，是一个年青的忠实于人民事业的射击英雄。更大的英雄事迹，等他来创造。

（载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大众日报》作者：戴邦）

中共中央机关是怎样选择西柏坡的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并于 3 月 18 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共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东渡黄河，到晋西北等地去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一天，刘少奇问聂荣臻："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聂荣臻说："白毛女传说出生在平山，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朱总司令仔细地从地图上看了平山的地理位置后说："要选一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刘少奇接着说："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聂荣臻说："平山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那里从抗战开始即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靠石家庄，西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较为合适。"5 月，朱总司令派他

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刘旺臣，由聂荣臻司令员派的一位同志陪同，从平山县沿滹沱河逐村进行勘察后，一致看中了西柏坡。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依山傍水，正处于山区与平原的接合部，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而且只有七八十户人家，隐蔽性较好。于是，他们绘制了一张地图，向刘少奇、朱德作了汇报，得到了两位首长的一致同意。不久，刘少奇、朱德即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

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前委来到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杨尚昆、邓颖超率领的中共中央后委和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委胜利会合了。至此，前委、后委、工委的"三套马车"时期宣告结束。5月26日，毛泽东也由阜平花山来到西柏坡。这样，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都齐集于西柏坡，大家有一股说不出的愉悦。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们选择的这个西柏坡，真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西柏坡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西柏坡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驻地，一直到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机关迁入北平为止。

（选自《党史博采》92年7期，作者：赵万钧）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的由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但其当时的名称并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是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

南昌起义后，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在革命战争中"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的口号，但没有规定新的革命军队的统一称号，因而各地起义军的名称很不一致。秋收起义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琼崖起义的农民武装称为"人民革命军"，黄麻起义的农民武装称为"农民自卫军"。此外，起义武装还有"农军"、"共产军"、"工农讨逆军"、"农民革命团"、"土地革命军"等多种名称。同年10月底，中共中央提出："以后工人武装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武装改称农民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用工农的红旗。"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这样，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各地起义部队相继更名为"工农革命军"，基本上统一了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称谓。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中国"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一决议，指示各割据区域的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红军。自此，各地的工农革命军陆续改称为"红军"。1931年之后，又称之为"中国工农红军"。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实现全国抗战，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发表宣言，决定"取消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分布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仍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44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指示，决定派八路军一部挺进豫西，"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以解放被日伪军统治下的河南人民"。这是我军最高统帅部文电中首次使用"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8月11日，朱德在发布反攻的第4号命令中，也使用了"山西解放军"的名称。同年8月15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将我军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19日，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同意。8月20日，党中央电示华中局，将京沪杭三角地区部队和上海起义军一律改称为"人民解放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及表明我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共中央决定我军继续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并中止一些地区的部队使用"人民解放军"的名称。1946年6月底，蒋介石公然发动全面内战，9月，我军一些地区的部队开始使用人民解放军的名称。

从1947年初开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中开始普遍地使用"人民解放军"的称呼。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与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签发了组成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的命令。同时，人民解放军总部成立。3月24日，新华社以报道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谈话的方式，第一次公开了"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称。从1947年7月底开始，各地部队相继改称"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改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内蒙古人民自治军也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这是全军性改称"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标志。到1948年初，我军全部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名称便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摘自《党史文汇》94年11期，作者：王晋林）

蒋介石自认当总统失败

1947年，马歇尔对蒋介石完全绝望，返回美国，退出

调处，使蒋感到靠山顿失，双脚踏空。而中共在全国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先后击毙张灵甫、刘戡，解放石家庄、四平街，活捉赵承绶、梁培璜、刘英等。仅下半年就歼敌 75 万，解放城市 1.3 万余座。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腾，反迫害、反饥饿的大游行遍及各大城市，社会人心极度混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寝食不安，电召张治中由兰州往西安面谈，征询张对时局的意见。

张治中就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社会各方面形势作了分析，指出："现处八年抗战及内乱之后，国家元气大丧，人民痛苦不堪，内内外外都在走下坡路，实在太严重了！内战无论如何不能继续下去！"

蒋问："你看采取什么对策好？"

张答："首先放弃戡乱，停止内战，然后改善中苏关系，促进中共问题的解决，这需要用旋乾转坤之力，挽回颓势。"

蒋说："旋乾转坤谈何容易！从 4 月到现在，是最黑暗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大总统，这是最大的失败！最好我还是不当总统。至于停战，现在绝不是时候。我们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就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

张说："美国人现在存心不良，想利用日本控制中国，牵制苏联，我们应该在外交上实行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避免一面倒向美国。又内政应加刷新，用人不要三朝四朝元老，没有新面孔，没有新人。"

蒋说："马歇尔完全持一种反蒋倒蒋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简直下命令一样，我们今后联苏也用不着对美有顾虑，不怕他们吃醋！至于新人，你想想看，认为哪些人可以当部长的，谁来我都不怕，只要不是共产党！"

张说："您既同意可以联苏，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谈谈？"

蒋答："可以试试看。总之，最好还是我不做总统，将来总有一个机会让我这样做，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摘自《民国春秋》）

宋美龄在遗族学校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所有重大的活动几乎都与宋美龄的名字密切相关。

这所学校原是在北伐战争胜利以后，1928 年 11 月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创办的，专门收容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先烈的后代。校址设于中山陵园范围内。校长是宋庆龄先生，那时，蒋介石在宋庆龄校长不在国内的时候，就让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及青年会的史襄哉、张效良等管理学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而实际领导人是宋美龄，仍由励志社的副总干事管理学校。宋美龄经常到学校来，对遗族学校的情况相当熟悉。她常常亲自驾驶一辆黑色豪华轿车独自来校，由于来校次数频繁，她的汽车能被学生一眼辨认出来，清楚地记得汽车"00—4628"号的牌照。她的汽车前窗右下角，贴有一张"002 号"的特别通行证，证上印有首都卫戍司令部的关防。

1947 年秋的一天下午，宋美龄和一位个子很高、剪着短发的女人来到学校，汽车就停在我们身旁。她们下车和我们说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宋美龄。同学们都一下子从草地上站起来，不知所措。黎主任从他的办公室窗里看见了这一切，便慌忙快步来到校园，毕恭毕敬向宋美龄致礼，然后向我们介绍。宋装束雅致，抹着口红，双耳垂上挂着圆球形的精美的金耳坠，显示出她的高贵。她对我们很亲切。有人让我们喊她"蒋妈妈"，但我们仍按当时社会上对她的习惯称呼，称为蒋夫人。

学校的牛奶场，饲养了近百头良种奶牛。牛奶房的饲养条件很好，每头牛都装设有自动饮水器，牛的粪便可以用高压水清除，挤出的奶有专门的设备进行消毒。这些奶除大部分销售外，按宋美龄规定，遗族学校学生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每人必须饮一磅牛奶，作为学生生活中的一项制度。每当这时，便由训育处的职员负责，安排全校学生到餐厅各人的位子上坐下，饮一磅热牛奶。有时，宋美龄还驾车到校亲自看望学生的饮奶情况，了解牛奶的浓度，新鲜程度和够不够甜。

宋美龄对学生的伙食很关心，亲自参与制定学生的食谱，注重学生一日三餐食物的营养。她按照一个中学生每天所需要的热量标准，来确定食谱。她认为用猪脚爪和大豆放在一起煨汤，营养价值高，又经济便宜，指示总务处多给学生做类似的菜吃。在一次午餐时，她来到了餐厅。正在吃午饭的师生都起立致意，她用双手示意大家坐下继续用餐，自己也坐到一张餐桌的教师座位上，和大家共餐。学校餐厅里，每一张大方桌，规定坐 6 名学生，学生分坐在桌子的三方，另一方留给 1 名教师坐，共 7 人一桌，但教师一般不来用餐。为了讲究卫生，用餐时，规定每人用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吃饭，另一双用来夹菜入碗，不准直接送入口中。早餐经常是稀饭、馒头，有几样江南腌制的小菜和煮黄豆。中餐和晚餐，平日都是 4 菜 1 汤，量和质都比其他公费学校的伙食好。就餐时禁止说话，餐厅里很安静。宋美龄也不例外，一声不吭，和学生一样按章办。据说，这条严格的规定，就是宋美龄从美国的教会学校里学来的。

1948 年初春，有一次宋美龄来到学校，发现一些学生气色很不好，有的学生有明显的病态，便决定让全校学生进行身体检查。学校用汽车把学生送到南京长乐路上的一家医院作健康检查，查出有疾病的几个同学，都被安

置在学校医院里住院，给予特殊的护理和治疗。

记得194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室内篮球场打球，忘记了已到晚自习的时间。忽地掠来一道强烈的汽车灯光，我们才发现因贪玩而忘记上晚自习了，便抱起各人的衣服往教室跑去。不料，在教室的走廊里遇上宋美龄，我们原已满头大汗，这一下又吓出一身冷汗，都惊呆了。万没有想到这么晚她还会独自驾车来校视察我们的晚自习。我们硬着头皮准备挨训，可是她却轻声地要我们穿好衣服，擦干汗。我们羞惭地向她行礼以后，轻轻走进教室。

宋美龄到校视察时，不像有些大人物前呼后拥，有一大群随从人员陪同。她在学生面前，态度端庄和蔼，没有发过脾气，不当着学生的面指责教职员。

这年冬天，学校还派出了一支运动员队伍，参加在南京举行的运动会，取得不少优秀成绩。宋美龄对此很高兴，赠送参加运动会的学生每人一支派克钢笔，说：赠笔给大家，就是祝大家今后在比赛中"必"胜的意思。大家听到她这样的解释，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最初有些同学接触宋美龄时，天真地仰着头，张着嘴看着她。她教他们平时应该闭着嘴唇，说这样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教养、文明和礼貌，并能帮助自己培养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只要被她发现，便及时加以教育指正。

对学生的装束，衣着式样、色调、宋美龄都亲自参与审定。有人风趣地说：遗族学校的学生出来，倒像是"贵族学校"的啦！

以往，宋庆龄曾把友人赠送给她的礼物，转赠给遗族学校的学生。1948年宋美龄过生日时，她派专人把很多礼物用汽车拉到学校，让全体同学分享。学校也叫厨师做出寿面、寿桃和很多菜，给我们这些平时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同学加餐，如同过节一样。

回忆宋美龄和遗族学校学生一年多的接触，感慨万千。时光流逝40载，如今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我作为当年亲身感受过她关心抚育的一名国民革命烈士的子弟，特向她致意，希望她来南京再看看年当年的遗族学校。

（贺儒雄）

中山陵哭陵事件

1947年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这天上午，四百多名国民党的大大小小将军在南京中山陵，举行了哭陵仪式，这件事轰动了南京市，也震动了南京政府。

这么多的国民党将官去中山陵孙中山陵园哭陵，并非偶然。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方面军全部撤消，不久又撤消了集团军。蒋介石根据美国魏德迈将军整编军队的建议，准备通过整编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非嫡系军队。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是要兵不要官。军官作为编余便大大地多了出来。那些被编余的军官。除了打仗一无所长，整编以后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虽然成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经过训练的军官安置到农林、交通、邮电和警界，但危机并没有过去。

当时有个叫张清泉的编余军官，在警校受训结业，好几个月没有分配到工作，吃尽当光，连回家乡探望老母亲的路费也没有。他的妻子年仅二十几岁，被迫劝丈夫卖掉自己，用卖身钱来维持生计，张清泉只好把老婆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一消息在警校传开后，学员们莫不悲愤填膺，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在中央训练团内也发生了两起事，将官班的奚译，原是华侨，青年时代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变卖家产，将几十万两白银捐献给孙中山作革命活动经费，孙中山对他的义举极为赞赏。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奚回国在总统府工作，以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官至某集团军中将参谋长。由于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这次也作为编余人员。他家住南京，生活无着，妻子见家贫如洗，就在4月间的一天投江自杀了。这件事在军官中也引起极大的反响。还有一个陆军少将陈天民，抗战中立过大功，这次被编余后，家中五个孩子无法维持生活，他自己又患肺病，无钱治病，终于被迫服安眠药自杀。死后，家属竟无以为殓，尸体在家中放了四天，后来，还是将官班的同学们帮助草草埋葬的。

编余军官们的种种悲惨命运，增长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学员们也经常收到一些鼓动反蒋的匿名信，大家心中都憋着一股气，看后往往群情激愤、痛哭流涕。于是有人建议：与其在背后啼啼哭泣，不如到中山陵去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们想用哭陵的方式，作为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一次公开示威。这样，就产生了5月5日中山陵上的哭陵。

哭陵推举国民党陆军中将黄鹤为指挥，四百多人在中山陵上举行哭陵仪式。还读了《檄文》，黄鹤说："我们这些编余的将军，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政府把我们一脚踢开，断绝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一口棺材落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谒陵，而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妻儿老小。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乃至三哭。"这番话悲悲壮壮，引起了游客们的同情。陈天民的妻子带了五个孩子也来了，黄鹤向大家介绍了陈天民的事，说："这是陈天民的太太，陈天民被迫自杀，家属没有饭吃，我们的家属将来也要落到这样的地步。"大家都十分悲切，顿时嚎啕大哭起来，游客中的妇女也纷纷为之

掉泪。散会时，新闻记者闻讯赶来采访，国民党特务也来刺探情况，还打听是谁发起的，但问不出什么所以然。

这件事，南京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蒋介石也知道了，但由于众怒难犯，难以下毒手，只好不了了之。

（摘自鲁炎主编《民国官场秘闻》）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被囚记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可称得上蒋介石手下红得发紫的人物，在当时的南京谁不畏让他7分。但谁敢相信就是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竟被小小的南京市太平桥派出所关进拘留所，还受尽了难以形容的屈辱。

1947年盛夏，我以南京人报记者身份，冒暑去首都警察厅采访。完全出于偶然，在该厅布告栏内，看到一份有头无尾的奇特布告，扼要大书对南京市东区警察局及所辖太平桥派出所20余名警官、警长和警士着即开除、撤职或警告等不同程度处分，但他们所犯何事，只字未提。我度过多年记者生涯，看到这张布告很自然想到新闻信息到了，必须快速跟踪捕捉，这布告的幕后，必是一条特号字的社会新闻。

我从警察厅的张秘书谈话的线索中，探索到警察局督察长的办公室，又从被开除的警士摸索到留职警告处分的警长，从他们各种不同的说白中，我开始了解到全部真相。

号称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市，这年热得出奇。总司令家中那时还没有空调，小小电扇也不能解热。可是他掌有轿车、敞篷车，驾着敞篷车兜兜风，这倒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官员家属顶时髦的玩意儿，驾敞篷车兜风，其凉爽有胜于今日的空调，更可以摆摆威风，显显阔气。

总司令这天晚上，卸下威武的戎装，换着一身洁白纺绸中式裤褂，穿一双时髦绣缎凉鞋，活像个英俊倜傥的影剧小生打扮。挎着华丽的夫人，叫弱冠年华的大公子开着敞篷吉普，循中山路、大行宫，至玄武湖一带作流线型兜风纳凉。

小车在绿荫宽广的大道上飞驰，迎面凉风习习，总司令一家陶醉于人间天堂之中。讵料乐极生悲，归途由珠江路转太平桥路口时，由于车行超速，转弯滑碰在太平桥路口的警察岗亭上，人车虽未受伤，岗亭玻璃却被撞碎。一时街上纳凉的老百姓蜂拥围观，值班警察一时也来了三、五个。

国民党首都的警察，见官就怕，见老百姓就敲是出了名的。他们一见肇事者是一位穿高档凉衫的阔老，身边又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娇娘，便自作聪明认为财神爷到了，必有油水可揩。一面派警察回派出所报告，抓到3个有钱的肇事者，准备关进拘留所；一面将肇事者和车辆一并带所“公事公办”。

在总司令看来，他胸有成竹。他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暴露身份，有失体面，为了尽快摆脱窘境立即去派出所说明，必然不了了之。因此就跟警察向太平桥派出所走去。

但事实上，总司令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总司令一行3人，前脚刚踏进门，被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几名警察如狼似虎、连推带拉地送进拘留所关了起来。这也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要吃核桃肉，必用重锤敲，先给一个狠狠的下马威，腰包必掏得快、掏得多。

总司令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几分钟之间，由天堂进入了地狱。这儿拉屎撒尿在一室，蓬头垢面的囚犯鼠眼圆睁对着他3位，臭气熏天、污秽不堪。

更使总司令难堪的是，这拘留所原有的十几名老囚犯小偷、扒手，打手、流氓，一见这3位阔老板关进来，照例要执行新囚对老囚的一份孝敬。如是一轰而上，有的伸手向总司令要钱，有的伸手要烟。总司令毫无思想准备，也根本不懂这些新囚对老囚孝敬的规矩，更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是新囚，在来不及掏钱敬烟的刹那，这些老囚们就骂不绝口，甚至动手推打，痰涕吐了总司令一身，公子则求饶不止，夫人也被他们拉拉扯扯。

周至柔贵为空军总司令，见过中外各式各样的大市面，今日竟挨到这突如其来的“轰炸”，碰上这样难堪的场面，自叹“虎落平壤被犬欺”，惊得呆若木鸡。

可是，总司令毕竟是耍威风的老手，在急中生出妙计，心想此时不亮相，更待何时，就大吼一声：“来人呀，快去报告你们的所长，我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你们这样乱来，小心你们的脑袋……”

这连吼3次的命令型的叫声，果然在这小小的派出所起了震动作用，警察和所长才知闯了大祸，立即打开牢门，将总司令请了出来，作躬，打揖，千言万语赔礼道歉，抹掉总司令身上污痰鼻涕，恭恭敬敬地送总司令登车而去。

当天深夜，警察厅黄珍吾厅长接到总司令的电话申诉，严令必须惩办这些胡作非为的警官、警察……

我采访到这条特大新闻，碍在总司令的情面，拖到44年后的今天，才公诸于读者诸君面前。

（翟林椿）

流 行 风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朱今明摄影,白杨、陶金、舒绣文主演。

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真实。上集写: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白杨饰)在夜校读书认识了教师张忠良(陶金饰),不久,忠良与素芬结婚,一年后生一儿子取名"抗生"。"八·一三"抗战爆发,忠良参加救护队,奉命撤离上海,素芬和婆婆、孩子回家乡农村居住。在抗战开始的三年,一家人都历尽战乱之苦。素芬不堪忍受日冠统治,又携婆婆孩子逃回上海,过着辛酸的日子。与此同时,张忠良逃出日寇魔掌,辗转来到重庆。在浪迹街头、生活无着下,他便去找战前认识、现成为著名交际花的王丽珍(舒绣文饰),王丽珍接纳了他,并为他在其干爸庞浩公(周伯勋饰)开设的大兴贸易公司谋得一职。在王丽珍别有用心地拉拢和腐蚀下,张忠良对公司的种种恶习适应起来,且还做了王丽珍的俘虏。与此同时,素芬在上海的一个残破的晒台楼中,在狂风暴雨之夜,经受着苦难的煎熬,盼望着天亮。

下集写:张忠良与王丽珍同居后,做了庞浩公的私人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为追慕虚荣的市侩。张忠良回到上海后,住在王丽珍表姐何文艳(上官云珠饰)家里,何的丈夫温经理因附逆被关进牢里,张忠良又与何文艳相勾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时,素芬久等丈夫不归,生活困苦到断炊地步,只好让儿子街头卖报,自己受雇温公馆作女佣,不久,王丽珍也来到上海。温公馆举行国庆盛宴。在宾客云集的大厅中,送饮料的女佣素芬,竟碰见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张忠良,震惊之下,手中杯盘落地,四座哗然。素芬万分痛苦,在混乱中逃出温家,又遇宵禁被阻街头,王丽珍逼张忠良与素芬离婚。张母在得知实情后遂携儿媳和孙子来温家教训忠良,诉说了素芬八年所受的苦、所尽的孝,劝诫儿子不能抛弃她。但在王丽珍的淫威之下,张忠良又不敢表态。素芬受尽侮辱后,在绝望中偷跑出来,投江自杀!

电影《黑夜到天明》

《黑夜到天明》完成于1947年4月,写一个毕业于工程系的大学生,在战后回家参加"乡村建设",从事筑路工作。当建设计划遭到当地一个当过汉奸的富绅破坏时,得到一个国民党特务及其两个同伴的协助,战胜了富绅,完成了工程。影片不顾当时农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现实,为国民党的所谓"乡村建设"大加吹捧,并将其特务分子颂为爱国救民的英雄。

电影《天字第一号》

故事发生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国民党在一个汉奸身边安插了好几个特务,他的内侄、仆人和太太都是。这个汉奸的情报被窃、几次搜捕失利,原来都是他家中人所为。剧中还穿插了一个三角恋爱的纠葛:他的太太爱上了他的内侄,他的内侄又爱上了他的女儿。最后,汉奸的太太为成全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在危急时刻把他们送出城去,然后枪杀了汉奸丈夫,她自己也中弹身亡。这位太太原来就是国民党特务"天字第一号"。蒋介石一直实行血腥的特务统治,残害了无数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但在这些影片中,罪恶累累的法西斯特务分子竟成了"地下工作者"或"民族英雄",这是违背生活实际的。影片艺术处理也粗劣杂乱。但在反动影评的大力吹捧下,《天字第一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个时期内,各大小公司竞相拍摄这类影片,多达几十部。

电影《遥远的爱》

《遥远的爱》——吴蔚云、朱今明摄影,赵丹、秦怡主演,它写一个大学教授肖元熙(赵丹饰)与爱人决裂后,决定将女佣余珍(秦怡饰)"改造"成自己"理想"的爱人。他到处演讲,高唱"男女平等"、"妇女独立",实际上视妻子如私产和玩物。余珍正是接受了他的"妇女独立"论,并在时代感召下,走上了抗战的道路,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后,肖元熙去汉口当上了委员,要余珍母子也去汉口。余珍途中遇敌机轰炸,幼子惨死,她悲痛之余,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汉口时,夫妻相逢,肖元熙见余珍一身

戎装，心中不悦，余珍对肖元熙的腐朽生活也很反感。最后两人决裂，余珍又随战地服务团去前线工作。后来，桂林失守，在逃难途中肖元熙找到余珍，要求恢复旧好，余珍表示胜利后再说。肖元熙凄然地目送余珍奔赴前方。

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作者曾说过，他是有感于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作风而写的。影片正是通过肖元熙和余珍这两个艺术形象，反映了抗战时期两种不同的人物及其生活，批判了逃避时代、苟安偷生的弱者，歌颂了献身抗日战争的斗士，表达了作者追求进步，鼓舞人们投身时代洪流的愿望。因此，故事内容虽表现的是抗战时期的生活，但它在解放战争时期，仍具有现实意义。

电影《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1947年1月完成，11月在上海公映。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杨霁明摄影，张瑞芳、王人路等主演。

影片的主要情节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松花江畔的一个小镇，镇上大车店孙女(张瑞芳饰)的父亲当场被马队踏死，母亲在江边洗衣时被日军调戏坠江，祖父悲愤病倒。青年(孙女的表哥，王人路饰)被敌人抓去服役，途中被大汉所救，回到了车店。一天，借宿车店的大汉，于深夜袭击炸毁了日本军营。日军强迫村民为之修建碉堡，祖父、青年也被抓去做工；孙女送饭时碰上日军伍长，他欲行非礼时，表哥赶回相救，在搏斗中击毙了伍长。祖、孙三人只得弃家外逃，途中祖父中弹身亡，两个青年人遵奉老人遗愿结为夫妇，相依为命。后逃至日军占领的一个煤矿，青年当了矿工。"七·七"事变后，日军强迫工人增产支前，以致发生了塌矿事故，数十名工人惨死坑道，引起了工人和家属们的反抗暴动，而日寇进行残酷镇压，无数工人家属倒死血泊中。青年和孙女幸得逃出矿场，在雪野枯林里，追兵将至的危险时刻，大汉率领的义勇军突然出现，截歼了敌人，救了他俩。最后，两人也加入到抗日义勇军的行列。

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胜利前后》)——联华影艺社的第一部出品，也是战后摄制的最早的进步电影之一。由史东山编导，韩仲良摄影，白杨、陶金主演，影片于1947年2月公映，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和进步舆论的一致推崇。

影片的故事内容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爱国青年纷纷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家在江西寄居上海姨母家读大学的江玲玉(白杨饰)，不顾姨父、姨母和表哥(高正饰)劝阻，毅然参加救亡演剧队，他们沿京沪线进行抗日宣传。后江玲玉同本队音乐家高礼彬(陶金饰)相爱。他们随演剧队辗转各地，坚持了战地服务。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重庆。玲玉与礼彬在庆祝日本投降的胜利声中举行了婚礼。后又回到上海，寄住于姨母家。这时玲玉的表哥周家荣靠接收大发胜利财，已是声势显赫人物。后玲玉夫妇得老友夏之原(石羽饰)帮助，租得一间阁楼住，经朋友介绍，礼彬在小学教书，玲玉在报馆当记者。不久，礼彬得了肺病，玲玉怀孕。在一个大雨的晚上，玲玉下班回家，要写一篇揭发表哥"劫收"罪行的文章，不幸昏倒街头。礼彬久等妻子不归，便和朋友四处去找，这时由大后方回到上海的演剧队同志也来帮助寻找，最后，大家在医院里见到玲玉时，影片结束，意味深长。

电影《假凤虚凰》

《假凤虚凰》(原名《鸳鸯蝴蝶》)——桑弧编剧、黄佐临导演，许琦摄影、黄绍芬摄影指导。1947年5月完成。影片故事是：大丰企业公司总经理张一卿(严肃饰)，投机失败、负债累累，便委托时代理发馆三号理发师杨小毛(石挥饰)代他向一登报征婚的"华侨富翁女儿"范如华(李丽华饰)求婚，以达骗取巨款之目的。范如华实际是一个有孩子的寡妇，丈夫死后生活无着，又贪图享受，便想以"征婚"办法找一个财貌双全的丈夫。在许多应征者照片中，她选择了英俊的"总经理"杨小毛，于是相约面谈一切。届时，杨小毛拖了同事七号理发师(叶明饰)冒充其秘书同往，范如华也约同学陈园芳(路珊饰)协助，见面后，两人都戴着一幅伪面具，互相吹牛、欺骗，彼此又提心吊胆，当场引出不少笑话，但总算顺利订婚了。由于两人都负债需钱，将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愿意立刻结婚。但在结婚的那天早晨，彼此发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相互嘲骂，由情人变成了冤家。范如华经此打击后，又选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头子周友棠(高笑鸥饰)，可是终因嫌他人老而未成。最后，范如华也参加理发馆工作，并和杨小毛结为眷属，七号理发师与陈园芳也成为美满夫妻。

小说《村野恋人》

作者王西彦，主要内容：

写抗战时代农村青年的爱情悲剧。在贫困的凤尾山坳里，当金兰和庚虎这一对青年正在热恋时，金兰的哥哥金豹和庚虎的妹妹虎妹也在偷偷相爱。然而，亲属的歧

视，迷信的旧俗和保甲长的权势，都在阻碍着年轻人的幸福。不久，日寇飞机狂炸山村，在惊惶和骚乱中庚虎突然失踪，被敌人抓去当了民夫，金兰和庚虎的奶奶悲痛欲绝。金豹与虎妹经过与世俗观念的斗争终于结婚，金兰一直照顾着庚虎的奶奶，拒不出嫁，一心等着心上人归来，金豹一人挑起了两家农活的重担，虎妹与金兰亲如姐妹。被敌人抓去的庚虎一直思念着金兰，当他企图从苦役里逃跑时，不幸被敌人枪杀，而他灵魂却永远萦念着一个美丽的恋人。作品通过爱情悲剧的描写，控诉了日寇的暴行，赞颂追求自由幸福的青年一代和他们身上淳朴美好的心灵。

小说《结婚》

作者师陀，主要内容：

故事以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前后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为背景，写一个中学教员胡去恶的堕落。他童年极其不幸，在上中学和大学时，又得不到父亲的支持。在上海做中学教师时，幸亏林佩芳的爱护和关注。自从林佩芳跟他父亲到乡下后，他急于赚些钱，希望能早日与她建立小家庭。为此，他借了高利贷做投机生意，果然赚了一笔钱。但与他相处的是一群狐朋狗友，他开始堕落了，并抛弃了林佩芳，去追求富家小姐田国秀，结果人财两空，还欠下一笔债。他向钱亨借了一万元，委托他用这笔钱投资生利，钱欺骗了他，分文要不回。他托付田国宝的两份教科书稿子，竟被田拿去盗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杀死了钱亨，自己随后也被警方打死。小说描绘了大都市的畸型生活，揭露了上流社会人物如行尸走肉，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作品以极其犀利的笔法，对胡去恶等人物进行辛辣的讽刺；结构上把书信和叙述巧妙地加以结合，别具一格。

小说《引力》

作者李广田，主要内容：

写一个女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一段曲折的生活经历。主人公梦华和丈夫孟坚同在中学教书，抗战的炮火破坏了她的家庭的安宁生活。丈夫跑到大后方，她为照料孩子留在济南。济南沦陷后，她不向侵略者屈服，反对奴化教育，勇敢地保护爱国学生。南京汪伪政府成立的消息传来，使她看清了敌人的阴谋和汉奸们的无耻。敌伪的黑暗统治使她无法忍受，她决心带儿子逃出沦陷区去大后方。一路上她目睹国统区到处是贫困和疾病，奴役和榨取。待她到达成都，而丈夫因办了进步刊物《引力》而被迫秘密转移。在留给她的信中，要她走向光明的新天地中去。作品通过孟、梦的流亡生活经历，揭露了日寇在华的暴行和国统区的黑暗、腐败，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对自由和光明的追求。题目"引力"，含义双关，一指梦华走向丈夫所在的自由区是一股"引力"，又暗示梦华所到的那个自由之地的解放区是广大爱国者最大的"引力"。由于小说依据作者自身流亡生活经历写成，有很强的生活实感；结尾点出题意，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小说《长夜》

作者姚雪垠，主要内容：

小说以 1924 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部山区为背景，以青年学生陶菊生被土匪绑票后的一段传奇式的经历为主线，描写李水沫等土匪队伍的绿林生活，揭示了贫苦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被迫为匪的原因，反映了农民中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作品塑造了李水沫、薛正礼、赵狮子、刘老义等几个不同人物形象，写出了他们在杀人放火土匪生涯中嫉恶如仇的豪爽品性。陶菊生在土匪队伍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遭遇后，认识到李水沫等人都是一些野心家，成不了事业，口头上"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实际上无助于穷人翻身，最后去广州寻找大哥闹革命。这是一部以绿林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大量运用群众口语和土匪暗语，在题材与写法上颇有特色。

小说《故乡》

作者艾芜，主要内容：

以抗日战争初期南方某山城为背景，通过大学生徐峻廷回乡二十多天的经历，揭露国统区政治的腐败和土豪劣绅盘剥农民的罪恶，展现了农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徐峻廷满怀抗日热情回到故乡，所接触的却是一系列腐败情景：教育局长借办报结党营私，校长贪污抗日捐款，商会内部勾心斗角，当官的只知玩乐而士兵却受冻挨饿。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失望，他终于离开故乡。小说还描写了印刷工人雷志恒回乡鼓动农民捣毁银行、冲出县政府，虽然斗争暂时失败，但被压迫农民的心头却怀着对抗日红军的希望和憧憬。作品广阔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画面，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揭露相当有力，但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批判不够。全书五十余万字，主线清晰，但日常生活细节描写过于冗长，情节发展欠紧凑。

小说《还乡记》

作者沙汀，主要内容：

以抗战时期四川偏僻山村淋漓沟为背景，展现了国统区农村中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画面。三十年来，这里的贫苦农民饱受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走投无路，勤劳、善良的农民冯大生被迫去当壮丁，目睹了军队内部种种腐败景象，于是逃回家乡，而妻子却被保安队副徐烂狗霸占。他要与徐拚命，还到乡里去告官都落了空。在事实的教育下，冯大生组织农民与恶霸地主展开坚决斗争；后又在山神庙大会上撕去保长的伪装，终于被捕坐牢。冯大生的被捕激起了村民极大愤怒，他们与保长、恶霸展开坚决的斗争。小说通过冯大生由个人反抗走向集体斗争的思想变化，概括了广大农民被逼走上反抗道路的经历，揭露了国民党基层政权依靠保甲制度，勾结土匪帮会势力，借抗战为名鱼肉人民的罪恶。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实感和乡土特色；在斗争中刻画主人公性格的发展，真实可信。它虽未指出农民反抗斗争的形势，但基调高昂明朗，是一部真切地反映四十年代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

小说《围城》

作者钱钟书，主要内容：

小说以从外国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等为中心人物，描写了抗日爆发后一群知识分子在情场、名利场上的争斗、角逐，揭露了他们远离时代斗争洪流，内心贫乏、空虚与卑琐，是一幅旧中国病态知识分子的画卷。它集中描写了较为正直、热情而又平庸、荒唐的方鸿渐在生活道路上四处碰壁的坎坷经历。其他人物如道貌岸然而老奸巨滑的文化政客高松年；集学者、商人、官僚于一身的李梅亭；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陆子萧；外形木讷而内心卑劣的假博士韩学愈；结党自固、寡廉鲜耻的汪处厚等，他们以留学欧美自夸，以学者教授欺世盗名，蝇营狗苟，丑恶鄙俗。作品通过这群“两足无毛动物”劣根性的描绘，说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在中国的破产，旧社会已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题目“围城”暗示人生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尽管城外人想冲进去，城里人却想逃出来，但终于逃不出来，于是倾轧、煎熬、潦倒。作者用严峻的现实主义手法把各类知识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语言含蓄、幽默，譬喻精辟，富于哲理，被喻为新《儒林外史》。

小说《虾球传》

作者黄谷柳，主要内容：

小说通过流浪儿虾球在香港、国统区和游击区等地曲折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广东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反抗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黑暗，预示了人民必将胜利、反动统治阶级必将崩溃的历史趋势。全书共三部。第一部《春风秋雨》，描绘殖民地香港的腐朽黑暗、阴森可怖的社会景象。第二部《白云珠海》，揭示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广州是一个魔鬼当道、人民遭殃的罪恶世界。第三部《山高水远》，展现了党领导的华南解放区如水如荼的革命景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还描绘了无恶不作的大流氓鳄鱼头，大发国难财的马专员，地头蛇张果老等人的各种丑恶面目。故事曲折紧张，情节波澜起伏，富有传奇性。在结构上采用传统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手法，语言通俗流畅，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的优秀作品。

诗《死》

是这样的死支持了你最初的意志
是这样的死建筑了一个辉煌的人格
当你被逮捕了
当你被幽囚了
当你遭受严刑的审问了
生命已经再不是值得保卫的
生命是你底最后的武器
生命保证勇者底洁白与纯真
生命保证坚贞的灵魂的胜利
一个“叛徒”底信念是一直反叛到底
但永不反叛任何一次辉煌的火
同志，你死得亮丽
你死了
你底希望活着
你底梦想活着
在我们底行程里
你底生命底彩色闪耀着
这大海
这风暴的夜
这灯塔呵……
兄弟们记得的——
航过这一串黑色的日子
在阳光含笑的国土上

要浮起你金钢的雕像

（冀污）

电影《天堂春梦》

《天堂春梦》——描写战后由重庆回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剧。由徐昌霖编剧，汤晓丹导演，石凤岐摄影，石羽、路明、兰马、上官云朱等主演，1947年3月“中电”二厂出品。

影片非常真实、朴素地反映了胜利后上海的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的痛苦。丁建华（石羽饰）是个为抗战效过力的正直的工程师，胜利后对生活充满和平、幸福的幻想。可是当和其妻漱兰（路明饰）由重庆回到上海后，却遭到失业，生活无着，以致无奈出卖自己亲手设计的家宅图样和亲生儿子，最后一家流落街头。而卖身投靠的汉奸龚某（兰马饰），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依然作威作福，欺压人民。丁家房产的易主，龚某赶走了建华一家，并按丁设计的图样建成豪华的住宅……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真实。

电影《还乡日记》

《还乡日记》——“中电”一厂摄制，张骏祥编导，吴蔚云摄影，白杨、耿震主演。这部影片是张骏祥“根据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找房子的痛苦经验”创作的。它通过戏剧工作者老赵（耿震饰）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找房子的曲折过程以及汉奸老裴、老洪的发迹与他们之间的争斗，辛辣地嘲讽了“惨胜”后国民党反动派“劫收”的丑恶现实。所谓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却尽饱私囊，不仅“劫收”别人的房产，还“劫收”别人的老婆，而汉奸也可以设法变成“地下工作者”，逃脱惩罚。可是，真正对抗战作过牺牲、贡献的人，却过着比战时更为困苦的生活，连个栖身之地都不可得。影片对这一现实的揭露是真实而深刻的，很受当时舆论界的赞扬。

《还乡日记》基本上采用了圆形结构的形式，老赵、小于找房子的过程，构成影片主要情节，他们找了一圈房子，最后又回到开始借住的八层楼公寓屋顶小屋。这本身就构成了喜剧的体裁，颇有讽刺的意味。其笑料噱头的穿插，大体是合理的。多有助于思想内容的表现。如找朋友时，赵、于拖着行李，从一楼爬到八楼，都没有找到，正不知怎么办时，忽闻天花板上有人发问，抬头一望，朋友从楼顶探出头来，相认之后放下一个梯子请他们上去。在这个阁楼斗室中，没有任何坐位，小于累了往床上一靠，没想到正压着一个蒙头大睡的女演员，把她吓了一跳。在这间阁楼里，原来住着好几个人，他们利用早晚不同的上班时间，轮流用床睡觉，每张床可睡两人。老赵想洗个脸，朋友便将绳系水桶从窗口放下去，并吹一声口哨，下面两个赶快过去接桶打水，然后将水提上来用。这些情节都富于夸张性和幽默感。影片的节奏明快，取景真实，有几场戏是在上海马路上实地拍摄，较好地展示了真实的生活环境。由于“中电”当局的删改，使影片的结局成为老洪与老裴都被当作骗子抓了起来，这就起了掩饰国民党“劫收”丑行的作用，从而削弱了影片的思想意义。

歌曲《荣归曲》

江山没有改，人心还在，
听这一片欢呼，这万声喝彩！
可怜我们苦守了八年，方得这大地春回！
只是天哪！
怎么胜利倒成了灾！
我也是个规矩的孩子，
却被胜利抛在长街，
为着养活我的娘，
我不得不能午腰来卖，
我得用满脸的欢笑，
掩藏满肚子的悲哀！
你们的爸爸都回来了，
我的爸爸怎么不见回来？
怎么不见回来？

历史档案

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9月13日通过）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巳）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设物、

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盗、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12页。）

蒋介石宣布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声明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今日国府委员会之改组，乃我国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此次改组，使各政党及社会贤达得以参加全国最高之政治决策机构。改组以后国府委员之分配如下：

国民党　十二席
民社党　四席
青年党　四席
社会贤达　四席
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五席

目前五院院长尚系国民党员，是以国民党共占十七席。其他政党党员或社会贤达出任院长之时，则国民党所占之席次自将减少。国府委员名额原定为四十名，国民党员之席次原定为二十名现仅发表二十九名，如将余额十一名补足，则国民党员之席次，成为四十席中之十七席，尚不足全额之半数也。

此次改组政府，民社党与青年党之人选由两党自行推定。社会贤达之参加人选，则征得其本人之同意。

各政党参加立法、监察两院以后，继之以国府委员会之扩大范围，今已完成多党之政府矣。再进一步，行政院改组完成时，在新任院长之下，各部会首长亦将由各政党及社会贤达分别担任。

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以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府委员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其职权，执行国民大会之决议，而完成本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之准备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我国之政局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乃借美国之调解，以劝导中共参加政府而将其军队编入国家之军队。

第二阶段始于国民大会之召开。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之参加国大共同制定宪法，足征全国人士对于政府实施宪政之努力，无不热心赞助。

值兹世局不断演进之时，我国需要和平与建设，日益迫切；是以国家之统一，务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民主与宪政，自不能因等待中共而无期拖延。倘中共放弃其以武力夺取政权之行动，能为国家之团结统一而合作，则该党仍有参加政府从事建国工作之机会，为解除我同胞之痛苦计，诚盼中共最后仍能改变其叛乱之态度也。

（转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

一、凡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如向政府有所请求，应向当地主管机关呈请。主管机关不能解决时，应候主管机关向其上级机关呈请核办，不得越级请愿。

二、凡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请愿时，应派代表向主管机关陈述意见，其代表人数以十人为限，不得聚众胁迫，违者应依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予以解散。

三、各学校学生如有罢课或其他扰乱公安情事，各该管教育行政机关应采取必要之措置或予以解散。

四、各地人民团体如有罢业罢工或其他扰乱公安情事，各该管行政机关应采取必要之措置或予以解散。

五、凡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不遵守以上之各条之规定，致妨害公共秩序，阻碍交通，妨碍公务，毁损公私财物或伤害他人身体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为有效之制止。其触犯刑法者，并送由司法机关处理。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转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五册）

国民政府政治纲领全文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

国民政府为实现宪政，推进民主；自政治协商会议以来，即决定改组政府，延揽中国国民党以外各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经一年余之不断努力，兹已询谋佥同，可即完成改组之程序。关于改组后政府之施政方针，亦经与各方详加商讨，并经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国民党常会分别通过，参加商讨之社会贤达，亦

表赞同。此项施政方针将为改组后国民政府所共同遵守。兹特公告其内容如下：

第一、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之准绳，由参加之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负责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

第二、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之原则为各党派合作之基础，在此共同认识之下，力谋政治上之进步与国家之安定。

第三、为促进世界和平，拥护联合国宪章起见，中国外交政策应对各友邦一律平等亲善，无所偏倚。

第四、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只须中共愿意和平，铁路交通完全恢复，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谋取国内之和平统一。

第五、根据宪法规定之精神，提前试行行政院负责制。行政院应依国府委员会之决策，负执行之全责，以符合于有权有责之原则。立法院之职权，应同样尊重。行政当局，遇有提案，应出席立法院说明，以保行政与立法之联系。

第六、行宪以前行政院院长之人选，国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时，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

第七、对于各省行政，应本军民分治与因地制宜之原则，在法制上与人事上，均作彻底之检讨与改革，使各省政府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第八、凡因训政需要而须设立法制与机关，在国民政府改组后，应予废止或裁撤。

第九、彻底整理税制及财政简化稽征手续，减少赋税种类及附加税，以减轻人民之负责。

第十、严格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之逮捕与干涉，其因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紧急危难而必须予以限制者，其法律应由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之。

第十一、今后所有举办之外债，应指定专为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及生产建设之用。

第十二、各省市县之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尽量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各省地方政府亦应本惟才惟贤之旨，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转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

下文是7月19日中央通讯社英文部所发表的：

本月18日　国务会议通过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

第一条　本纲要依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如期实现宪政案，及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制定之（按国家总动员法1942年3月29日公布，同年5月5日实行）。

第二条　实施宪政及各项有关宪政之选举，均应依照规定积极进行。

第三条　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之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四条　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或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五条　各业劳资应密切配合：如有争议，应依法调解及仲裁。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六条　为安定民生，政府对日用品之交易价格，各业薪俸工资，及流通资金运用金融业务，均得加以限制管理。

第七条　为维持安定秩序，政府对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

第八条　对收复匪区应由各主管机关巩固治安，维持秩序；必要时施行贷款，免征赋税；并办理各项社会救济及医药救护工作。

第九条　对匪区来归人民，应由各主管机关妥为救助与安置。

第十条　对粮食、燃料、纺织、冶炼及有特别需要之工矿制造事业，各主管机关均应特别指导辅助。其所需资金如有短缺，应由国家银行予以贷款，使能积极推进，以裕供应。必要时得由政府对其成品加以管理。

第十一条　凡未被匪乱之区，均应刷新地方政治，确保社会安宁；并就目前急需之生产运输及农田水利工程，择要建设，以便民生。

第十二条　增加合理税收，限制非必要支出，以适应戡乱之迫切需要。

第十三条　制定节约消费及增进效率办法，政府各机关与人民一致遵行。

第十四条　人民之基本权利，均应切实尊重，妥为保障。除因动员戡乱所必需之各种法令必须切实施行外，任何法外侵扰行为均应严行防止。

第十五条　关于本纲要实施须另定详细规定者，由行政院各主管部会厘订办法，送行政院核定，分别以命令公布施行。

第十六条　违反本纲要第三条至第五条，或依据各该条所定办法应行制裁或限制之行为者，依妨害国家总

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处之。公务员于执行本纲要赋与之职权时，如有违反或失职之行为者，应依法严行惩处。

第十七条　除本纲要已有规定者外，为达成戡乱目的，政院得依总动员法之规定，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

第十八条　本纲要经国务会议通过公布施行。

（转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党团联席会议宣言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三日）

本党自总理领导国民革命以来，所担负的是中国历史的使命，每逢国家民族有重大历史使命付给本党的时候，本党必有一次新的检讨，新的团结，形成新的阵容，以担负这新的使命。

总理在民国纪元前，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结果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结果是推翻袁世凯帝制，重建共和。十三年改组中国国民党，结果是扫荡军阀，完成北伐统一的大业。二十七年本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重大决策，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产生，更光荣的达到八年艰苦抗战的胜利。现在，历史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戡乱建国的重大责任付与本党，于是本党有此次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这种措施，是秉承总理过去改进革命组织的经验，团结同志，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巩固革命的基础，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发扬党的革命精神，以共赴此非常艰巨的事物，而达成后期革命的任务。

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昭示我们，本党推翻专制，缔造民国，扫除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完成抗战胜利等项重大史实，对于民族民权两主义，是显然的重大成就。历年来建立各级民意机关，与最近颁布宪法，结束训政，更足以表示本党一贯努力，不断前进，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而戡乱与总动员，乃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和完整，这正是民族生存与世界和平的关键。至于民生主义的实现，原为本党革命的主要目的，解除民众生活的痛苦，是目前迫切的需要。以前关于民生的建设，本来成就较少，而八年的抗战，与战后的匪乱和破坏，更觉残损无余。所以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实应重新开始，而且刻不容缓。一切建设事业尤应首先尽其在我，本党愿以此为当前努力奋斗的目标。

我们认识目前革命环境的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认识我们革命的力量，实在比以前任何革命阶段为雄厚。以前我们薄弱的革命势力，尚能克服每一阶段的困难，此后只要我们自重而不自大，自反而不自馁，自信而不自满，定能由历史的成例，来保证我们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要了解不能自强不息的不是革命政党，经不起诬蔑，忍不住煎熬的，更不是革命党员。我们愿以党的团结和奋斗，促进党的新生；以党的新生，创造革命的动力；以革命的动力，达成政治经济的全面改革。

我们体会二千年前中国“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的古训，此后我们愿意拿事实来答复期望，拿行动来证明决心。

我们要不惜为保障民族生存而牺牲，为实行民主宪政而奋斗，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努力。

国家已向宪政时期迈进，但是保障中华民国维护中华民族的责任，是本党和本党同志义不容辞的。我们愿以此自勉互勉，更愿全国同胞，本着我们共同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一齐和我们提携，共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转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六十九辑）

国民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

（1947年10月28日）

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早为国人所注意。兹迭据各地负责治安机关先后报告，其最显著事实如该盟派骆宾基在东北策动之军事叛乱与西北之负责人策动孔从周等叛变并煽动5月学潮及上海工潮，皆暗与共党之军事行动相呼应。政府颁布动员戡乱命令后，该盟香港及马来亚之支部公开宣言反抗，显与共匪勾结一气。最近该盟重要分子李荫枫在川省招致匪徒，图谋暴动，以响应共匪李先念残部之窜扰。其它公然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皆罪证确凿。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证之共匪近来四处流窜，益形猖獗，而该盟分子亦无不到处活动，互为声援，如不应加遏制，后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职责所在，对此在匪区助长叛乱，在后方则为共匪声援之不法团体，不得不采取适当处置，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转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一条　本条例于戡乱时期适用之。

第二条　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之罪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通谋外国或其派遣之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处死刑。

预备或阴谋犯前二项之罪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三条　参加以前条犯罪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四条　依前二条之规定自首而免除其刑者，得令入感化教育处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期间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如认为有延长之必要者，得于法定期间之范围内酌量延长之。

第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将军队交付匪徒，或听其指挥训练者。

二、率队投降匪徒者。

三、将要塞军港军用场所建筑物军用船舰桥梁航空机铁道车辆军械弹药粮秣，及其他军需品电信器材，与一切供通讯转运之器物交付匪徒，或毁坏或致令不堪用者。

四、煽惑军人不执行职务或不守纪律或逃叛者。

五、以关于要塞军港军营用船舰航空机及其他军用场所建筑物或军事之秘密文书图表消息或物品，泄露或交付匪徒者。

六、为匪徒招募兵役工夫，或募集钱财者。

七、为匪徒之间谍者。

八、为匪徒供给贩卖或购办运输军用品，或制造军械弹药及其原料者。

九、为匪徒供给贩卖或购办军用被服食粮或其他供制造被服之材料与可充食粮之物品者。

十、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或扰乱金融者。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预备或阴谋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第一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六条　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条　犯惩治盗匪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八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除军人由军法审判处，非军人由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之。

前项特种刑事法庭之组织，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

第九条　依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之规定应处罚者，其审判适用前条之规定。

第十条　前二条案件之审理，得许辩护人员出庭辩护。

第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区域，由国民政府以命令定之。

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转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五册）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席卷全国，上海交通大学等二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四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并组成"上海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两千五百余人，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三十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亦示威游行。2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六个大学五千余人，举行示威。4日，广州中山大学等校学生举行抗暴集会活动，开封河南大学等大中学校两万余人举行示威。5日，重庆六十三校一万五千余人，武汉大中学校五千余人举行抗暴游行，要求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六日，昆明三万余学生举行罢课，抗议美军暴行。

1月6日　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在沪开幕。十日闭幕。通过民盟不承认伪"国大"及"宪法"，决不参加分裂之中央政府等十项决议。

同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常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1)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任期延长至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止。(2)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丁项参政员名额增加四十四名(原七十五名)，并通过增补名单。

1月7日　蒋介石特急电令浙江省政府，限1月终

收足民国三十五年未征起之田赋。

同日　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告工人职员书》，反对国民党"国大"制订的非法"宪法"。呼吁联合全国职工、学生、农民、民族资本家为中国人民翻身运动一道前进。

1月8日　周恩来就黄河堵口问题发表严重声明，指出："目前陇海东段内战正在异常紧张之际，蒋介石政府突于上月底严令郑州军事当局及开封黄河堵复局，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东淹黄河故道居民及两岸群众与解放区自卫部队。"呼吁国内外各界："紧急制止蒋介石政府这一狠毒的堵口放水行动。"

10日　延安各界召开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与政协周年纪念大会。

11日　华东野战部队解放鲁南峄县县城。

同日　东北政委会决定黑龙江省、嫩江省组联合省政府。

12日　国民党阎锡山军队突袭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六个农民，均为阎匪杀害。

16日　国民党政府让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告中共驻南京谈判联络代表王炳南：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携"和平方案"赴延安，商谈恢复和谈。十七日，王炳南称："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两条件，即第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1月13日双方军事位置；第二、取消伪宪，重新制定宪法。"

19日　中央社报道，美海军上将柯克宣布，由美国人控制的国民党青岛海军训练团，已经练出学生二千余人，美政府将运来的训练器材物资价值法币一百五十亿元，及舰艇二十六艘，移交与国民党政府。

同日　蒋介石召见民社党张君劢、伍宪子和青年党左舜生、曾琦，商议和谈及政府改组问题。

20日　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声明，称："(一)政府愿意派员赴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二)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三)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仍愿根据三人会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四)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拒绝中共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规定"一一·四"为国耻纪念日。命令到达之日起各地下半旗三日。(十一月四日即"中美商约"签订日)

24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宴请延安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号召部队群众，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婚嫁丧葬事宜不要铺张。

2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蒋方提出所谓"和平方案"四条全系骗局。

27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太行区党委发布"一九四七年经济工作指示"。晋察冀边区政委会发布一九四七年大生产运动指示六条，规定：(1)劳武结合，抓紧并保卫生产；(2)组织互助合作，作到地尽其利；(3)调剂耕畜，修河治水；(4)发展纺织手工业、熬盐、造纸、火柴等副业；(5)贯彻"生产第一民办公助"的农村合作社方针，组织群众农业与手工业作坊生产；(6)党政军及各机关团体一律进行生产，贯彻公私兼顾方针。

28日　新华社报道，冀中中心地区土地改革截止1月已大体完成。据高阳、肃宁、辛集、胜芳等三十七个县市统计，完成土地改革的村庄已达六千二百八十七处，占全部村庄的百分之八十三强。据固安、饶阳、河间、建国等十七个县的统计，已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九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经过土地改革，大城全县已无赤贫；安平全县已有二千七百六十户贫农上升为中农，九十六户雇农变为自耕农。同时，冀中人民为保田保家，两个月内已有四万余翻身农民参加八路军。

29日　美驻华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将此决定分别通知蒋介石和中共南京办事处王炳南。

同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指责中央所提两个条件，"无异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大会皆受制于共党"，公然关闭了政治解决的大门。

30日　《群众》在香港创刊。

同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协定。

2月2日　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日发表宣言提出确保国家独立自主与全国工农结成联合力量，进行共同斗争等主张。

3日　平津学生团体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成立。通过三项决议，(一)要求美军全部退出中国；(二)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三)立即停止内战。

同日　天津发生美军枪杀工人刘恩宝惨案。

同日　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延安。6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

4日　延安《解放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允许美国在台湾高雄设军港，在台中西屯设飞机场及飞机修理厂。

同日　美蒋商事公断会成立。

2月5日　重庆国民党特务袭击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宣传队，殴伤学生十七人。8日，学生宣传队复遭蒋特镇压，被殴伤三十三人之多。是为重庆“二·五”“二·八”惨案。

2月6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中共、国民党各方，美政府将于3月5日前协助中共负责人员“撤回至合理而可至”之地，及执行小组中之政府人员“撤回至原来地区”。并“协助”中共与军调部有关在京、沪、渝工作的一百五十人“撤退”。并称：任何人于3月5日后仍然留驻现地，“概应自行负责”。

2月8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在第三次全委会上作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与当前任务》的报告。

2月1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修正土地条例，取消原定以现耕为基础的承购原则，征购土地应按人口分给无地少地者。

同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金价、物价飞涨及经济混乱问题。决定设立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十三日，蒋再次召集政府要员开会，商讨平定金潮办法。

2月13日　晋察冀野战部队解放清河、徐水两车站。

同日　国民党立法院举行会议，修正通过中央银行立法原则草案，及中国、交通、农民等三行条例立法原则草案。

2月26日　杨尚昆谈话，反对联总以救济物资助蒋内战，要求二亿元物资全部拨交解放区。

同日　国民党召开北平绥靖会议，3月2日结束。李宗仁主持，谷正纲及冀热平津国民党军政要员七十余人参加。

2月27日　重庆国民党当局函达中共驻渝代表吴玉章，限令中共在渝人员及其眷属于三月五日前一律撤离重庆，并限“于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三时起停止一切活动，分别集合于中共人员原住之曾家岩二十三号及化龙桥新村七十六号两处”，而且查封《新华日报》，没收电台等器材。二十八日，南京、上海国民党当局又分别函达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上海办事处，限令中共两地人员在3月五日前全部撤退。二十八日，周恩来通电蒋介石应负最后破裂责任。

2月28日　台湾人民举行“二二八”起义。二十七日，台湾国民党专卖局制造了“缉私血案”。二十八日，台北人民游行示威，并包围警察局，遭国民党军警镇压，死伤数千人，引起了全台湾人民的愤怒，至三月八日，起义群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城市。十一日蒋介石派白崇禧、吴铁城、朱绍良等赴台湾进行武装镇压，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到台湾即宣布四项处理原则，对起义者实行屠杀，台湾同胞被杀三万余人。起义遂告失败。

3月1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改组立法院和监察院。新任立法院五十名委员，其中国民党十七人，青年党十三人、民社党十二人、无党派的八人。同时任命了监察院的二十五名新委员，其中国民党九人、青年党六人、民社党七人、无党派三人。国民参政会也增加了四十四名新参政员，其中国民党十一人、青年党十一人、民社党十一人、无党派的十一人。这就是所谓“扩大政府基础”。

同日　重庆国民党当局搜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行知小学亦被迫停课。2日，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因刊载此项消息，被重庆当局迫令停刊。

同日　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蒋介石暂兼行政院长，前任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同日，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前任总裁贝祖治辞职。

3月2日　北京各大学教授二百余人发表联合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最近大批拘捕市民群众的非法行为，并要求保证将来不再侵犯人民权利。

3月3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这一荒谬措施，表示他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3月4日　青岛国民党当局以“防止匪徒”“扰乱治安”为名，出动军警宪特四千六百余人、会同保甲长实行全城大搜捕，至五日晨被捕群众达五千四百二十四人。九日，青岛国民党当局再次派出军警五千人进行搜捕，至十六日，又有六千市民被捕。同时，天津亦有二千余人被捕。

3月7日　中共留驻京、沪工作人员董必武、华岗、潘梓年、王炳南、梅益、陈家康等七十四人，及留渝部分人员，安全抵达延安。八日，吴玉章等亦回到延安。

8日　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号召解放区军民“打垮蒋介石的进攻”、“争取全国的胜利”。

15日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场，二十四日结束，到会中委二百五十三人，蒋介石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外交、及反共措施等多项提案；决定撤销国防最高会议，设立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选出孙科、李宗仁、陈果夫、谷正纲、柳克述、于右任、张群、邹鲁、李文范、钱大钧、康泽、赖琏等十二人为本届中常委员。

同日　国民党政府在黄河花园口堵死口门合拢放水，黄河水全部流入故道，灌入解放区。

16日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

17日　青海达阳附近于十六时十九分四十一秒发生七点八级地震。

22日　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吴铁城、邵力

子、左舜生、李璜、蒋均田、李大明)在京商谈所谓政府改组问题,商拟共同纲领十四条,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之施政方针及地方政权等诸问题。

24日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言,全文共分五部分:一、完成宪政准备,确定建国规模;二、消灭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三、实行民生主义,稳定经济秩序;四、维护国际正气,致力国际和平;五、充实教育内容,培养建国元气。宣言诬蔑共产党是"政治民主与经济建设之障碍",声言"国民政府对此武装暴力集团之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

26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大汉奸周佛海免予死刑,减处无期徒刑,理由为"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云云。

30日　国民党立法院会议通过"立法和监察两委员会选举罢免法"和"行政院和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织法"。立法院内增设十七个委员会,取消最高法院改设民刑两庭,取消各地监察使;行政院设十四部即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教育部、司法行政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邮电部、劳动部、水利部、地政部、卫生部和资源、蒙藏、侨务委员会。

4月1日　国民党战略顾问委员会成立,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钟麟、杨杰、陈刘棠、陈绍宽、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等为委员。原设军事参议院于3月底撤销。

4月7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其组织及职权照旧。

4月15日　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同敌在目前地区再周旋一个月,"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

4月16日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新政府施政方针"。

4月17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政府改组名单,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名单。并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撤销中央调查统计局。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

同日　国民党政府文官处发表公告:宣布改组后新政府施政方针十二条。

4月18日　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改组"国民政府",并称: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已是"多党之政府"。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改组后名单:张群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仪、陈布雷(以上为国民党)、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以上为青年党)、伍宪子、胡海门、戢冀翘(以上为民社党)、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鲍尔汉(以上为社贤)等二十八人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五院长为当然委员。另据中央社报道,国民党政府发函加聘宋庆龄、胡汉民、刘哲、魏怀、陈其采、许崇智、陈树人、陈策、张钫、尧乐、迪鲁瓦、萧萱、李根源等十三人为政府顾问。

21日　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

22日　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行政院组织法》。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会议决定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任魏道明为省政府主席。

23日　国民党政府委员会宣告成立。国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施政方针、修正国府委员会会议规程、行政院长提议之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各部会首长人选等决议案。

5月1日　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在南京召开田粮会议,商讨田粮征实及管制粮价问题。会议通过军粮配拨案。

5月2日　杭州四万饥民捣毁米店三百多家,抢米万石。

5月5日　西北野战部队解放耀县。

同日　开封河南大学与青岛山东大学的教职员要求增加待遇,举行罢教。

同日　无锡、成都等地发生抢米风潮。

7日　南京郊区浦镇发生抢米事件。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及《中央信托局条例》。

9日　上海工人、学生八千余人包围国民党市政府;英法租界公共汽车与电车工人二千余名罢工游行;丝织工人一万五千余人游行示威,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冻结工资。10日,上海交通部电讯局及国际电台职工要求增加待遇亦举行罢工;百货公司职工数千人游行请愿。

同日　安徽省安庆发生万余饥民抢米事件。饥民捣毁银行,抢走现款和大米三千袋,并捣毁了银行经理的住宅。

10日　东北民主联军西满部队向长(春)洮(安)及四(平)洮(安)铁路线发起功势,至十四日连克哈拉海、兴隆镇、小双城堡等地。十五日解放双山县城。东满部队亦同时向沈(阳)海(龙)拉(法)吉(林)两线发动攻势。

11日　阎锡山在太原统制粮行,规定除军队外老百姓每人购粮不得超过五斤;并下令没有半年存粮的百姓不得在城内居住。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何应钦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派张群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副主席。

同日　国民党张垣绥靖主任兼察省主席傅作义飞太

原，策划晋省军事。

5月14日　国民党政府政务会议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府委员兼主席。决议沈阳、西安、汉口、广州四市改为院辖市。

同日　国民党行政院会议决定，自5月份起分五区调整公教人员待遇。

5月15日　清华大学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十七日开始罢课。

同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原兼理主席张治中免职。

5月17日　北京大学各院系代表召开联合会，决定自十九日起罢课三天，并提出六项要求：(一)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二)清算豪门资本，彻底挽救经济危机；(三)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四)停止征兵征实征购；(五)实现"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保障自由；(六)提高教育经费，提高教育界待遇，全国学生普遍享有公费待遇。

同日　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

同日　安徽合肥发生五万饥民抢米风潮。与此前后，芜湖周皋乡万余饥民组成抢米队，到处抢米；四川成都饥民展开"吃大户运动"。

18日　晋冀鲁豫所属太岳野战部队进攻山西宁乡。至二十五日攻克县城。

同日　北平发生国民党青年军殴打反内战、反饥饿学生事件。血案之后，北大、清华、燕大、师院、朝阳、北洋平津两部、唐山交大等院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华北区"五一八"血案后援会。

同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

19日　上海复旦、交通、同济、暨南等十五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五千余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同日，北大、燕大、中法、师院、朝阳、北洋平部、铁院均罢课。天津国立师专、河北省立工学院、水产专科亦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罢课。

20日　京、沪、苏、杭地区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示威大游行，向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提高教育经费，增加伙食费，反对内战等要求。当游行队伍行至珠江路时，遭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当场被打伤者五十余人，重伤三人，失踪者四十余人，是为南京"五二〇惨案"。

28日　平津北大、清华、燕京、师大、中法、艺专、南开、北洋等八院校五百八十五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内战政策。

同日　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执委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问题。陈嘉庚致电南京国民参政会，声援学生运动。

29日　新华社报道，南通城唐家闸等地纱厂二万工人为反对冻结生活指数，于本月上旬举行持续七天之大罢工，厂警也支持罢工。厂方被迫将工资由原四千九百四十七元增为一万五千元，取得罢工斗争胜利。

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指出："无论在军事战线上，或者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是第一条战线，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第二条战线。

6月1日　国民党武装军警和特务数千人，包围武汉大学，逮捕大批学生和五名教授。学生奋起前往营救，军警特务开枪射击，三人当场死亡，成批学生受伤，造成"六一惨案"。据统计，仅一、二两日，在沪、平、津、沈、渝、成都、开封、贵阳、福州、青岛等地即逮捕学生、教授、记者、公务人员达三千余人。

2日　昆明市三十六个大中学校学生二万余人，桂林广西大学学生数千人，纷纷举行反内战反饥饿集会及游行示威。

同日　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于五月二十日在南京举行，本日结束。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通过所谓呼吁和平方案，其要点为：(1)请政府再度声明继续贯彻"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之方针；(2)请中共迅派代表来京与政府双方无条件恢复和谈，本"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原则，积极研讨，迅速实行等。

5日　新疆发生北塔山事件。北塔山属中国新疆省管辖，外蒙古企图夺为己有，以一个营兵力不断侵犯，引起中蒙边境武装冲突，时打时停连续月余之久。

6月14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揭露蒋介石已派战犯冈村宁茨到徐州直接参加指挥作战。

15日　中央社报道，桂林西部沿河各县发生严重水灾，连日大雨，农作物荡然无存。仅武鸣一县即有灾民六万余名。

22日　冀省国民党当局决定本年继续田赋征实，规定按地亩等级征收小麦，9月底限期征齐。等级标准为：每亩百斤以上为一级征收麦七斤、征公粮二斤；六十斤以上为中级征麦五斤、征公粮一斤半；六十斤以下为三级征麦三斤，征公粮一斤。7月1日起开征。

同日　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竭力呼吁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说：如果"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对中国放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

6月30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加强剿共军事"，"集中党与团的力量""如期办理普选"等决议。撤销三民主义青年

团，实行党团合并。

7月3日　国民党政府分得日本赔偿的军舰八艘，开到上海。

同日　国民党政府御用的中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杜镛任理事长。

同日　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通过延长驻华美军治外法权期限的"法"，规定美军人员目前在华享有的特权延至美军完全"撤出"中国之日为止。

7月4日　国民党政府召开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其后，在各地召开了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

9日　国民党撤消政协名义及政协组织。

18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十八条，(即"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19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还通过"本年内继续征借征实物以充实军粮费"，"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府委员保留名额及除名中共现任参政员案"。

19日　国民党政府任俞飞鹏兼粮食部长。

21日　中共中央在陕西定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二十八日结束，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芳、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十八人，主要研究部署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和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会议决定西北战场解放军出击榆林，诱敌北上，寻机歼敌有生力量，以配合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

22日　徐州江苏教育学院学生四百余人，为要求改为国立大学，集体赴南京请愿，在徐州火车站被千余名军警特务包围殴打，七名学生受重伤，四十余名被逮捕，百余人失踪，造成"徐州血案"。

26日　上海《大公报》报道，沈阳民营工业各厂相继倒闭。计机械铁工厂光复后开工者四百六十家，本月中旬倒闭二百六十家；制革、纺织、印刷、肥皂等业倒闭二百八十家；半年之内共倒闭五百四十家。民营工业已入死途。

27日　国民党政府全国田粮会议在南京召开，三十日闭会，张群主持，白崇禧、陈诚、俞鸿钧、俞飞鹏及各省主席、参议长、田粮处长共百余人出席。会议决定征实征借办法，并规定本年度征实征借总计三千五百万担。

28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停止对中国解放区之救济。30日，华盛顿正式公布，宣称：凡中国境内北纬三十四度以北地区，一律停止救济物资之输送，直至国民党"撤消反共封锁"或"联总撤消目前的决定"时为止。

同日　民社党第一次全代会在上海召开，8月4日闭会。会议期间，该党内部就参加伪政府改组分赃不均发生严重纠纷，乃至分裂，以伍宪子为主席的所谓革新委员会另立组织。

29日　国民党军骑兵一个旅破坏黄河江苏大坝。复又以刘汝明部二旅之众侵占黄河沿岸临仆集。

同日　西藏郎县东南地区于二十一时四十三分发生七点八级地震。

30日　《中央日报》披露，在一年内孔、宋两大家族的杨子、孚中公司营私舞弊、盗窃外汇各在一亿美元。

7月31日　国民党南京高级法院宣判汉奸殷汝耕死刑。

8月15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自8月份起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追加武职官员8月至下年2月增支经费二千六百八十亿元，增发平津两地公教人员实物配集差额金；并通过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

同日　《中国(国民党政府)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协定》正式签字。

同日　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撤销，并入东北行辕，杜聿明、郑洞国升任东北行辕正副主任。马占山任松北绥靖主任。

8月16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进入佳县地区。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张镇为南京卫戍司令，免去汤恩伯原卫戍司令职。

17日　国民党政府掘开兰封境内贯台黄河大堤前鹅湾、辛庄两大缺口，宽达百余丈，使黄水灌入解放区。

同日　美国阴谋占领台湾，魏德迈在台湾进行"考察"后，向美国务院提出报告，说"有各种迹象表明，台湾人会接受美国的保护或联合国之托管"。

22日　国党政府发表声明，暂时停止开放大连，任何外轮驶往大连，必须先得中国政府之许可，任何外轮不得经营中国沿海贸易。

8月25日　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离华赴日本，临行发表了一篇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27日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政府及中央各机关纪念孔子诞辰大会。

28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全部渡过淮河。

同日　国民党全国经委会决议征收所谓建国特捐。课征办法规定：征课对象限自然人，征收客体为土地、房屋、现存款、外汇、公债、股票、黄金、外币、国人在外国之不动产、独资或合伙营业之财产净值、汽车、轮船、机器货物等，起征点为五十亿元。拒绝不捐者则加以制裁。

同日　南京十二家报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八十，遭资方拒绝而实行罢工。

8月29日　蒋介石调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

8月30日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

方针》的党内指示。规定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9月9日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三青团中央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十三日闭幕，蒋介石主持并致词。会议通过了《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之决策》，通过国民党党团合并、国民党改造纲领等草案，并决议明年5月召开七全大会。

1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闭幕。会议是从7月1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刘少奇、朱德、叶剑英、董必武、康生等在开幕式上先后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地代表共一百零七人：华东解放区有李林、张晔等二十六人，晋冀鲁豫解放区有李雪峰、王从吾等二十四人，晋察冀解放区有聂荣臻、刘秀峰等三十七人，东北解放区有赵德尊等六人，冀热辽解放区有胡锡奎等七人，陕甘宁解放区有李卓等六人，晋绥解放区有赵守攻一人。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在闭幕会上作了最后总结报告。

28日　新华社报道，豫西新解放区物价普遍跌落，尤以民生必需品粮、棉、盐等为最。灵宝、陕县小麦跌价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解放前盐每斤蒋币二千元，现陕县已跌一半，售冀钞八十元至一百元(冀钞每元合国民党法币十五元)。

9月30日　国民党政府之中国工业管理协会在南京成立，以翁文灏、吴洮洪、吴温初、沈怡、孙越崎等十五人为理事，以王云五、甘乃光、陈启天等五人为监事。

10月1日　北平燕大学生八百余人为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该校学生举行罢课。十一日，清华学生二千四百余名为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该校学生举行罢课。十二日，北大学生五千人亦为该校学生十余人遭非法逮捕举行罢课。

10月8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重新登记，并规定于本月十五日起限令一个半月内完成。

10月10日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八项基本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它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

16日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并发表“告农民书”。

10月17日　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通过《美国驻华武装部队由中国政府之同意而驻扎案》。

10月24日　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修正之出版法。该法共六章四十三条，其要点为：(一)禁登载事项：(1)意图颠复政府及危害中华民国者；(2)妨害邦交者；(3)意图损害公共利益及破坏社会秩序者；(4)妨害本国及友邦元首名义者；(5)妨害善良风俗者；(6)妨害他人名誉及信用者；(7)对正在公开诉讼事件加以辩论者；(8)对仍在诉讼中之事件加以批评者。(二)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规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件之纪事。(三)外人必须遵守本出版法一切法律发行出版品。(四)国外发行出版品凡有违反此法规定者，内政部得禁止进口。

10月26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明令公布接受《中国土地法大纲》为边区土地法，并立即施行。

10月28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中国民主同盟。11月6日民主同盟以张澜主席名义发表公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运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

10月29日　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秘密杀害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

10月30日　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决定提高煤价百分之四十。

11月12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

11月13日　朱德在河间听取两广纵队负责同志的汇报。

同日　蒋介石任命国防部长白崇禧具体负责“清剿”大别山中共刘、邓部队。

11月14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华南(广州)行辕主任、黄镇球为副主任。张发奎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陆志鸿为台湾大学校长。

同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国军现在战略，在华北、东北仅图控制北宁、平绥两铁路线，将集中兵力消灭华中、‘共匪’。”并称：“今冬消灭刘伯承部。”

11月19日　新华社报道，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正式成立，高芸生、杨少桥分任正副主任。现已建立七个专署，三十七个民主县政府。

11月20日　国民党政府派宋子文兼广东省军管区司令。

11月21日　朱德在河间听取张云逸汇报陈毅、粟裕部队情况、作战情况和渤海军事工业情况。

11月26日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及政治部。内蒙自治政府主席云泽同志任司令兼政治委员，前兴安军区及自治

政府之军事部均奉命取消，一切业务与工作均并入内蒙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及政治部。

29日　北平行辕公佈蒋介石对其侵占区人民实行的八条措施公告。规定所谓"收复区"的农地要"归还原业主所有"，佃农对地主交租以正产物的三分之一；农民必须参加当地保甲、参加自卫队、帮助检举共产党干部及其积极分子，对"知迷不悟"之共产党人要逮捕处置等等。

12月1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东北解放区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

同日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任总司令，节制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北平行辕所设保定、张垣两绥署宣布撤销。

同日　华北巨奸殷汝耕在南京伏法。

12月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合签署布告，坚决实行土地法大纲。

23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陶峙岳等举行西北清剿军事会议。同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南京访张治中。

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至二十八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芳、张德胜、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陈绍禹、谢觉哉、李维汉、李涛等十九人。会议讨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制定了党在夺取胜利前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和具体政策。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泽东同志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

同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开始行宪。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即日起生效。

同日　美海军陆战队伍长波拉德率士兵五名，在山东省即墨县王麟陶附近进攻人民解放军阵地，全部被俘。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训练结束程序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条例》及《五院组织法》。

12月26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全区土地会议闭幕。会议是10月2日开幕的，历时八十五天。到会的有县级、团级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薄一波致开幕词并总结报告，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豫皖苏各代表团汇报各该区土改情况。会议决定成立边区农会筹备会。制定《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

12月28日　平津清华、北京、燕京、中法、师院、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八大学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蒋教育部的《修正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规则》，要求立即将其取消，并呼吁全蒋管区大学生"共同起来争自治的权利，粉碎一切奴化青年的意图，为保卫学府，保卫人权而奋斗。"与此同时，12月26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亦为此举行罢课，一直坚持到月底。

12月30日　上海美英烟草公司颐中烟厂一万二千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开始举行"年关"大罢工。同日上海海关职员亦开始罢工并绝食。另有十二个工厂数千工人为要求发放等于两个月以上工资的年尝以改善待遇举行罢工。

军　事

1日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解放巨野城，同时，又在金乡城外歼灭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二十一旅大部。

1月2日　华东野战部队在鲁南发起峄(县)枣(庄)战役。激战十八天，至二十日，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五十二、五十九师各一部、第一快速纵队全部共四万九千余人。俘敌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解放邳县、峄县、枣庄、卞庄、向城、薛城等重要城镇一百二十余处，光复了自去年1月十三日停战令后被蒋军侵占的大部地区。

1月6日　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在吉林北部九台之其塔木等地，激战一周，解放了其塔木、石屯、伏龙泉等处据点。此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越过松花江南，所取得的胜利。

9日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于鲁西南反击自鲁台北犯之国民党军。经过两天一夜激战，将国民党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大部、七十师一四〇旅大部歼灭。俘一四〇旅旅长谢茂泉。

1月16日　冀鲁豫野战部队收复鲁西城武县城，盘踞该城伪军张岚峰部、徐永德部全部被歼。

1月17日　晋绥和太岳部队发起汾(阳)、孝(义)战役。击退阎锡山十个师各一部及两具纵队对汾阳、孝义解放区发动的进攻。

1月18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截止本月份，川康滇黔四省农民起义武装已达二十四万至三十二万人之多。蒋介石重庆行辕及西昌警备司令部急遣驻川康边的三个旅、驻云南的特七旅及七十九师等部会同各省保安团队前去"进剿"。

21日　晋察冀野战部队解放望都县城及王京车站。二十六日，解放新乐县。二十八日，解放定县城及车站。是为保南战役。

1月25日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由金乡一带南下，出击豫皖边地区，并解放丰县城。二十六日解放曹县、单县二城，三十日解放柘城，31日解放太康，2月1日收复鹿邑、杞县，2日收复亳县。随即又先后解放宁陵、睢县等

城。至2月9日共歼敌九千余人，并破击了陇海路商邱至民权段五十余里，有力地配合了鲁南反击战。

26日　蒋介石、陈诚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临沂。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英勇反击。博山、莱芜等地民兵十万余人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

2月2日　蒋介石自南京飞徐州，同陈诚、薛岳等布置鲁南大战。4日，蒋介石又自南京飞往郑州，主持召开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秘密会议。

2月5日　东北野战部队辽东民主联军反击进犯安东省临江地区之国民党军。

2月7日　华东野战部队于临沂东南之白塔埠地区歼灭国民党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及其所属两师，擒获叛军总司令郝鹏举。

同日　牡丹江军分区战斗英雄杨子荣等六人深入匪巢蛤蟆圹，一举捉获国民党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坐山雕”张东山及以下匪徒二十五名。

2月16日　国民党军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等部分四路向临江解放区发动第三次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即予反击，至二十三日击溃了各路进犯军。解放辑安、金川两城。

2月18日　国民党胡宗南部以十一个旅的兵力分五路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进攻。

同日　华东野战部队胶东部队解放掖县城，歼守敌第八军一六六师。

2月23日　莱芜战役胜利结束。二十日，华东野战部队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对侵犯莱芜以北地区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大战四天，全歼国民党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和十二军一个师共七师兵力六万余人。活捉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绥靖区副主任李仙洲、七十三军长韩浚等。解放莱芜、新泰、吐丝口等重要城镇数十处。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九台等地与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师激战八小时，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二十五日，收复农安，二十六日收复九台城，切断了吉长铁路，进逼长春。

2月24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到济南，召集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高级官员和军事专家举行军事会议。二十五日返回南京。

3月5日　西北野战部队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在合水之西华池歼敌军整二十七师四十八旅一部，解放合水、庆阳。

同日　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部正式移置徐州办公。参谋总长陈诚偕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三日由京到徐，连日主持军事会议，对军事部署做了调整。决定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于四日起撤消；郑州改设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由副总司令范汉杰任主任。

3月10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松花江南，靠山屯一带击溃国民党主力八十八师。十五、十六日继续歼沿长洮线北进增援之敌于农安地区。至此“三下江南”战役胜利结束。

11日　国民党飞机一架侵入延安上空狂轰滥炸，十三日，国民党飞机增至五十架次，轰炸延安历时达八小时之久。十四日，又继续轰炸延安。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伊通河畔之德惠，歼敌军七十一军一部。

3月13日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向延安进犯。

25日　西北野战军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激战二小时，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整团，活捉旅长李纪云。

4月3日　东北民主联军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

同日　胡宗南部侵占瓦窑堡。

4月4日　晋冀鲁豫太岳野战部队，发起晋西南战役。至5月6日战役结束，解放县城十九座及黄河重要渡口、据点多处，控制同蒲路南段四百余华里。

同日　苏中军区部队发起淮沭及李堡战役。7月，攻克李堡、栟茶，八日攻克高良涧。十八日至三十日占领胡集、汤涧、马屯等地。

4月6日　顾祝同指挥国民党军汤恩伯、王敬久、欧震部三个兵团共十三个整编师、三十四个旅，约二十五万五千余人，沿临沂、泰安之线进犯蒙阴、新泰地区。七日，华东野战部队与之激战至二十六日，解放泰安城，全歼国民党军七十二师师部及三个旅。

8日　冀热察解放区部队发动平定堡、独石口攻势，歼灭盘据该地之国民党第三总队及新编骑兵十一旅一部。

同日　晋察冀野战部队向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东段出击。至5月8日，先后解放栾城、正定、获鹿、井陉、盂县、定襄、平定、寿阳等八座县城，孤立了石家庄，控制了正太铁路三百多里，车站二十余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11日　冀中军区部队在保卫胜芳战斗中获胜。

同日　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部队解放著名煤矿六河沟及水冶、伦掌、鲁仙等重要据点。

14日　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全歼胡宗南部一三五旅。

19日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解放浚县、滑县、道口镇。

5月1日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豫北部队向汤阴进攻，全歼国民党第三纵队生俘纵队司令孙殿英、副司令刘月亭、参谋长邓甫暄等。

3日　晋冀鲁豫太岳野战部队攻占国民党山西空军基地运城机场。

4日　西北野战部队收复蟠龙镇歼守敌胡宗南精锐第一师一六七旅（一个团除外）。

13日　东北民主联军南线部队收复北山城子、黑山头、划市等重镇车站，控制铁路百余里。

16日　鲁南沂蒙山区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全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整七十四师全部三个旅及整八十三师一个团，毙七十四师正副师长张灵甫、蔡仁杰。

17日　冀东军区部队向北宁路北戴河以西发起自卫反击，激战至十八日先后解放昌黎、抚宁、迁安三县城及留守营、张家庄、后封台三车。

5月30日　蒋介石偕刘文章、俞济时等四十余人由京飞到沈阳策划战争。

31日　西北野战部队陕甘宁部队收复华池。

6月3日　东北民主联军追击由海龙、朝阳逃窜之敌。同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重要煤矿中心西安县城。

6月4日　太岳野战部队解放襄陵城、洪洞城。至此，太岳、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同日　在广西钟山县英家武装起义。

10日　东北民主联军南线部队解放安东市。

12日　晋察冀野战部队发起青(县)沧(县)战役，至十五日止，先后攻克沧县、青县、永清三县城及铁路沿线之兴济、唐官屯、陈官屯、马厂等车站及据点，使冀中区与山东渤海区连成一片。

13日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本溪城及宫原车站。

13日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四平战役，经十二昼夜浴血巷战，毙敌七十一军副参谋长以下万人，俘敌七十一军团长以下六千余人。

16日　西北野战部队解放环县城。

18日　热河军区部队解放重要铁路联结点叶柏寿，至此，完全控制叶(柏寿)赤(峰)全线，并截断锦(州)承(德)线。

25日　晋察冀野战部队冀中军区部队在保定以北地区发起攻势，至二十八日止，先后攻克徐水、易县、满城三县城，及固城、漕河、塘埔、刘洋店、田村铺车站和据点多处。

29日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收复封邱、延津、浚县、滑县等四城。

同日　徐炳昶在《大公报》上发表《试为政府借箸以筹》一文，向国民党献策，谓国民党最有利的局面是缩小军事区域，主动争取南北朝的局面。

30日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部队七个纵队，在鲁西南董口至临濮集一线三百余里的黄河正面上，击破防守敌，强渡黄河。

同日　热河军区部队克复锦承路上之朝阳城。同日，东北民主联军辽南部队再克大石桥。

7月1日　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胜利结束。自5月十三日开始在东北及热河、冀东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动进攻，历时五十天，共歼敌八万三千余人，收复县城四十二座，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东北以及冀察热辽各解放区的分割计划，并将其完全压缩在中长路及北宁路之狭长地带的少数据点上。

同日　热河军区部队攻克北票。同日，冀东军区部队攻克北戴河车站。

同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7月4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豫北部队攻克道清线上之博爱县城，五日收复沁阳县城，七日收复孟县城。十六日，收复武陟新城，十八日收复修武。

7月5日　西北野战军陕甘宁部队收复定池、安池、盐池三城。

7日　华东野战军攻克鲁南费县城。九日，攻克枣庄、峄县、兰陵、向城、卞庄等重要城镇，使北起费城、东至临沂、西迄津浦路纵横三百里之广大地区重获解放。

10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渡黄河南下部队收复定陶城。

11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12日去沈阳，19日，陈再次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12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部队在巨野、金乡间发起攻击，十四日收复嘉祥。

17日　华东野战军发动的南麻(沂源)临朐战役至三十日，已获胜。

8月1日　晋察冀野战部队解放定县、望都两县城。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在华东前线正式成立。曾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治委员。

4日　美国海军第七十一混合舰队由日本驶抵青岛。

同日　孙立人代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

6日　西北野战军陕甘宁部队于陕北榆林、捞山之间分三路向三岔湾、高家堡、横山坡地发起攻击。解放了榆林城外一切据点。

7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十四个旅开始向大别山挺进。11日过陇海路，十七日涉越黄泛区。

同日　蒋介石到延安命令胡宗南集团在保安、安塞地区进行"清剿"的十个半旅北上驰援榆林。

23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纵队渡过汝河。

同日　晋冀鲁豫野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在茅津渡以东及垣曲、泽源间强渡黄河，进军豫西。

24日　晋察冀解放区冀中军区部队解放正定县城。

9月1日　西北野战军在绥德以南之九里山地区截歼由绥德以北向延安撤退之胡宗南军一部。十四日至十六日在岔口地区又歼敌一部。

同日　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到职后，东北行辕

主要人事变动如下：郑洞国为行辕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楚溪春为总参议兼沈阳防守司令。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天津。

2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一部解放立煌县城（安徽西），歼灭国民党军四十六师及立煌保安队各一部。同日该军另一部又解放六安县城。四日，解放黄安县城。六日解放罗田、霍山两县城。

9月8日 蒋介石令其海军代司令桂永清"飞赴九江视察江防"。武汉国民党政府于五日下令组织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汉口"义勇警察总队"。

9日 华北军区杨德志、罗瑞卿野战兵团向雄县、霸县之国民党军猛攻，十四日解放雄县城。

同日 华中野战军部队解放淮阳城。

同日 陈毅、粟裕所部于山东葆泽以东沙土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七师约万余人。

14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州至义县地区发起秋季攻势。此役延续至11月五日结束，共歼敌六万九千余人。

16日 冀察热辽军区部队解放锦西外围据点杨仗子，歼灭国民党军暂二十二师及暂五十师各一部。

17日 刘伯承、邓小平部队收复光山、六安县城。

同日 陈赓、谢富治兵团解放陕县。

18日 东北民主联军和冀热辽部队于锦西西南地区，歼国民党九十三军之暂二十二师。22日又歼国民党四十九军之七十九师、一〇五师及军直全部。

同日 陈赓、谢富治兵团一部占领国民党运城机场，二十四日，又占领临汾机场。

同日 胶东野战军先后在平度城、凤凰山、掖县南水头沟、灵山、即墨北部及介店等地与国民党激战。

20日 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于鲁西南痛击各路增援国民党军，至二十五日，六天中共歼敌八千余人。计在曹县南土山集、大义集、火神台地区截击国民党军整十一师三个旅；在巨野西龙堌集地区截击整七十五师两个旅；在城武东张风集地区痛击整新五师。

23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各县（市）组织所谓民众自卫队，县（市）长兼任自卫队队长。规定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壮丁除依兵役法应免役者外，有两丁之户出一丁，五丁之户出二丁，超过五丁之户出三丁参加自卫队编组。

24日 晋察冀野战军一部解放子牙镇、青县城。

25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黄龙战役，攻占白水县城。10月4日攻占石堡，11日攻克韩城，二11日克宜川，共歼守敌七千余人。

26日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从徐州、开封间横越陇海铁路进入豫苏皖平原，至10月2日止，七天内，先后解放河南省之尉氏、通许、杞县、睢县、夏邑、柘城、沈丘、鄢陵、扶沟，安徽省之太和、亳县、涡阳、蒙城等二十四座县城，及龙山集、睢溪口、界首集、烈山煤矿等重镇数十处，歼敌五千余名。

10月1日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全面展开。北线民主联军向中长线长（春）沈（阳）段大举进军，经二十八小时战斗，解放了伊通、西丰、法库、犁树等四座县城及江密峰、八面城两重镇，以及叶赫车站、威远堡等重要据点多处。计歼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及一二〇师一个团全部，地方军一七七师全部等，共一万二千八百余人。

10月2日 西北野战军解放延川、延长两县城。

同日 华东野战军解放鲁西鄄城，歼敌整六十八师一一九旅。

同日 陈赓、谢富治兵团一部解放新安县城，歼灭国民党整十五师六十四旅。

3日 山东野战部队于胶东昌邑以南地区截击由东向西逃窜之国民党范汉杰部整六十四师、整九师及整四十五师二个旅等部。激战六昼夜，至九日，歼敌一万二千余名。

4日 山东野战部队解放掖县城。

同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军务局长俞济时等由南京飞到北平。召见李宗仁、孙连仲等，并举行军事会议，以应付国民党军在东北及华北的危急局势。八日，蒋介石仓促赴沈召开军事会议，对陈诚以"沈阳外围决战"面授机宜。

5日 冀鲁豫部队解放永年县城。毙敌第一纵队司令王泽民、第二纵队司令许铁英。

8日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南下部队开始在徐（州）郑（州）间的八百里广大平原上，清扫残敌。至12日，先后解放洧川、临泉、沈丘、通许、尉氏、扶沟、新蔡、鄢陵、阜阳、灵壁、泗县等十一座县城及朱仙镇。

21日 西北野战军解放宜川县城。

同日 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

22日 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在保定南清风店地区经三日激战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军和第七师。

23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解放周家口。

同日 热河军区部队解放朝阳城。

11月1日 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河南发起伏牛山东麓战役，二十六日结束。歼敌一万二千人，经此役豫鄂陕解放区扩展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路、西越丹江、东至平汉路的广大地区。

11月2日 冀热辽军区部队在义县以西九关台门附近歼灭企图驰援朝阳之国民党九十二军二十一师，俘该师师长郭惠苍。

11月3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部队解放胶东之招远县城。八日收复平度县城。二十一日，收复胶县城。二十

七日，攻克高密城。

4 日　东北民主联军骑兵部队于锦州东北之徐家店歼灭国民党军一七四师师部及两个团。

5 日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胜利吉束。东北民主联军为继续分裂歼敌，于 9 月 14 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秋季攻势。历时五十天，共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扩大解放区三万八千四百余平方公里，收复城市十五座，解放人民二百六十余万。此役将中长路农安至铁岭段、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完全破坏，使长春、吉林之敌完全孤立，东北敌人主力被迫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

11 月 26 日　蒋介石偕熊式辉、俞济时、李惟果、郑彦棻、蒋经国等由京飞平督导华北"剿匪"军事。二十八日，蒋在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华北"剿匪"总部。会后又留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再密谋"剿共"事宜。

27 日　国民党国防部"剿匪"军事九江（华中）指挥部正式成立，白崇禧由汉飞浔主持。该部辖区为苏、豫、鄂、湘、皖、赣等华中六省，作战地带为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

同日　白崇禧纠集三十三个旅，向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12 月 13 日　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三大主力合击平汉、陇海两路，至十六日歼敌两万余，攻克许昌等二十三城。

同日　山东野战部队解放莱阳县城，困踞该城之国民党军及保安团等共万余人全部被歼。

12 月 15 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冬季攻势。

12 月 26 日　华东野战军苏中军区部队在叶挺（盐城）伍祐地区围歼国民党军整五十一师、整四师九十旅约一万七千余众所谓"进剿纵队"，激战四昼夜，歼敌七千余人。

12 月 28 日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程潜、白崇禧、顾祝同等参加，决定将华中地区分成十六个绥靖区，任命潘文华为宜昌、沙市绥靖区司令，康泽为豫鄂川陕绥靖区司令。

29 日　东北民主联军一部解放工矿重镇北票城。

30 日　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对河北省南端之东明城国民党军发动总攻，仅经过一小时战斗，即将敌河北省十四专署及东明、濮阳、清丰、大名、南乐、广平等六个县政府及东明县保安团、专署特务营全部歼灭，活捉伪专员兼中将保安司令丁树本。

31 日　新华社发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告，经中央批准，东北民主联军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外　交

1 月 2 日　美国照会苏联，提出大连应即由中国管理，开放国际贸易，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交通。

1 月 6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召回驻华特使马歇尔。八日，马歇尔离华返美，临行发表了"离华声明"。

2 月 3 日　英国上议院辩论英国对华政策，工党议员林赛爵士在发言中斥责蒋介石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他建议英美两国对中国问题自由协商，防止中国的内战，并建议派代表到延安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

2 月 6 日　宋子文向司徒大使提出备忘录，要求美国在财政上加以援助。备忘录称："我深信只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美国支援，始能稳定此种经济局势而改善政治的前途"。"从政治上来看，这样的美援中要促使各少数党派中意志动摇分子加入政府，同时鼓励政府中的前进分子，力求迅速的改组。""在另一方面，这种贷款的性质可以避免直接作军事上援助的指责。"

2 月 10 日　国民党政府、阿根廷政府"友好条约"在阿京签字。

2 月 28 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驻印度大使。

4 月 19 日　国民党政府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长。

6 月 1 日　国民党政府承认匈牙利政府。

6 月 21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五亿美元贷款，"设法从速拨付"。

7 月 12 日　《中荷空运协定草案》在南京签字。

7 月 15 日　美蒋签订《中美售让船舶合约》，规定由美国政府将一批战时建造的船舰一百五十九艘售给国民党政府。

16 日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在南京宣布：政府已决定开放对日贸易，并决定于最近派遣商务代表团去日本。8 月 13 日，国民党政府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7 月 22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访华考察团"来华。

23 日　"中（国民党）英空运协定"及"中泰民航协定"在南京签字。

24 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 4 月 1 日签订的"中葡换文"，取消葡国在华领事裁判权。

8 月 14 日　美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要求重行开放大连，恢复中国在该城行政及予美国利益以平等待遇。

9 月 14 日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与驻美中国大使馆同时公布国民党政府致魏德迈一件备忘录，称：日本投降后，中国面临着"中国共产党问题"；通货膨胀"威胁着国家的经济生活"；"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完全停顿，内河船只

极为缺乏”;“急需复兴农村经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遣送日俘等各种问题。向美国乞求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帮助。

9 月 15 日　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批准对意大利和平条约,规定:意大利放弃 1901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签订之最后决定书及一切附件,意国同意取消天津租界租约并将租界之各种财产移交中国,同时放弃意国在上海、厦门等地租界所有权。

同日　加拿大政府宣布以一百五十架蚊式战斗飞机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

10 月 2 日　粤省主席宋子文与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第三次会谈“华南投资问题”,和发展广东矿藏问题,并已取得协议。

10 月 6 日　美国国会军事考察团由汉城飞到北平。考察团以美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柯尔为团长,先后在北平、青岛、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考察”,于 13 日离华。柯尔于 10 日及 11 日连在南京发表谈话,竭力鼓吹布立特援蒋灭华计划。

10 月 14 日　以霍尔为首的美国众议院贸易代表团由美飞抵上海。与国民党政府会商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并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商谈所谓“发展中美民航事业问题”。

12 月 6 日　中国(国民党)与荷兰空中运输协定在南京签字。

12 月 8 日　《中美海军协定》在南京签订。该《协定》规定:(1)美国以一百四十艘舰船交给国民党;(2)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海军机构,包括组织舰队、军港、基地、学校等;(3)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培养训练干部,包括控制监督;(4)国民党政府则供给美国以海军情报,并报告一切。

同日　《中美海军船舰转让协定》签订,规定美国以军备租借法项下舰船九十六艘让与中国,并不收费,原价为六千七百万元。

12 月 9 日　中央社公布所谓“中菲友好条约”,允许菲人在华享有“与第三国国民同样”出入、旅行、居住、集会、出版的权利,并规定菲有取得动产或不动产以及在华全境经营贸易等项自由。同时还特别规定,“菲律宾共和国现在或将来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或国民之优例”,不适合于中国。

12 月 18 日　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港口装运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步枪子弹一千五百多万发,和空军地面装备数百吨送给蒋介石,该港加拿大总工会所属海员与汽锅工人一致罢工拒绝工作。

19 日　美国国会通过一千八百万美元对国民党政府的“临时援助”。

经　济

1 月 1 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发指示,决定发放五万万元无息贷款,以解决农民缺乏耕畜农具籽种的困难。

1 月 8 日　延安《解放日报》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与联防军司令部关于《战时严禁‘法币’行使办法》。

1 月 16 日　国民党政府发行关金卷。票面五百元,值法币一万元和二百五十元值法币五千元两种。

同日　北平物价上涨,至十八日黄金每两由十万零三千涨至四十六万元,美钞每元由六千五百元涨到六千八百元,面粉每代由四万三千元涨至五万元,米每斤由八百七十元涨到九百元;天津黄金由四十二万元涨到四十三万元,美钞由六千元涨到六千八百元,米由七百四十元涨到七百七十元。洛阳近数日物价亦暴涨,劣米一石已由五万四千元涨至十四万七千元,小麦由三万元涨至八万八千元。

1 月 18 日　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和中纺公司等联合成立“上海纺织输出物种委员会”,并与上海丝织产销联营公司订立合同,垄断丝织品对外贸易。

1 月 30 日　国民党立法院召开会议,审查总预算,国民党政府主计长徐堪称:“预算中最主要者为国防军费,”“目前所列款数占全国总预算百分之三十六强(实际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整军方案不得实施,由此数恐仍难维持。”

2 月 1 日．国民党法币币值惨跌。上海美钞与法币比值为一比七千七百,较上月 16 日(新关金券发行日)六千五涨百分之十,黄金每两由三十七万涨至四十万零六千(涨百分之十);平、津、青、汉、穗、渝六地自上月十六日至今平均黄金由四十万涨到五十一万八千六百(涨百分之二十五),美钞由六千六百八址涨到八千零八十(涨百分之二十一)。

2 月 17 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施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并附:(1)《取缔黄金投机办法》,(2)《禁止外币流通办法》,(3)《管制金融业务办法》。本方案、办法即日施行。

3 月 4 日　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公布关于上海金潮调查报告,谓此次金潮宋子文、贝祖治等应负责任。

3 月 13 日　国民党行政院全国经委会举行会议,研究公教人员物资配售事宜。决定配售于本月十五日开始,核准每担煤售价八千五百元,油每斤一千九百元,米每担六万元。

3 月 27 日　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新钞票面两千元、五百元法币两种,一为绿色,一为蓝色,花纹与普通流行钞券相同。

4 月 1 日　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本年美金公债一亿元,及美金短期库券三亿元。七日在上海、南京成立了募

销委员会，八日，在上海成立美金库券公债基金监理委员会。

4月7日　中央社报道，国民党政府呈准施行《国营生产事业配售民营办法》，决定售予民营之生产事业的计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先将其售予民营），中国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天津及东北造纸厂，安庆、石微、天水三电厂，德孚颜料及拜耳药品及其他设备，青岛维新染料厂，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原有官股四成，面粉厂及食油厂与敌伪产业处理机关产权已清理者，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

13日　蒋介石在上海召集党政金融各界头目开会，策划对付物价上涨的问题。

6月4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赔款委员会发表抗战损失统计，其中直接损失为三百一十九亿美元。

6月5日　国民党政府四联总处决定创办中国农业产销公司，隶属中国农业银行。

6月12日　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明令轮船业即日始加价。其办法规定：客运费增加百分之九十，餐费照船票百分之五十增加，特快费增百分之二十。货运费小麦、米、面粉增百分之五十，盐、油等增百分之七十，杂品增百分之九十，木板、水泥整船者增百分之七十，零星者增百分之九十。

6月22日　东北国民党统治区开始发行五百元流通券。

同日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在沪正式成立，邹秉文任主委，童季龄任副主委。

8月10日　国民党行政院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及"进出口贸易办法"。

13日　国民党政府行院长张群发表关于"外人来华投资及技术合作"之声明。

同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8月18日　即国民党政府执行新外汇办法第一天，中央银行挂牌规定按市每元美金换国民党法币三万九千元（收为三万八千五百元、售出为三万九千五百元），原按官价则每元美金换法币一万二千元。

8月30日　国统区米价由每担四十七万元暴涨至每担五十四万元，此乃今年来第四次物价飞涨。

9月4日　国民党政府全国经委会会议通过《限期陈报国人在外存款条例》。

9月26日　国民党中央银行提高美汇基准价格三千五百元，提高后四万六千元法币兑换一元美金。

10月14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无许可证自备外汇到埠及起运货物处理办法》。同日还通过所谓调公教人员待遇过度办法，决定自本月起照现行待遇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11月23日　上海法币呈现"奇观式崩溃"，美钞开盘为法币十一万九千元，收盘时却暴涨十四万元兑一美元，较本年1月下旬已上涨达二十倍。

11月24日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属之华北钢铁公司正式成立。

11月28日　蒋、宋、孔、陈的四联总处，决定停止放款、汇兑。

12月2日　国民党行政院决定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四地设立"金融管理局"。二十三日，行政院会议通过《加强金融管制办法》。

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发行二万元、四万元及十万元大钞，即所谓一千元、二千元及五千元三种票面之大额新关金券。

12月11日　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报道，太行解放区各公私银行银号，集中全力支援各县、市农民、市民冬季生产渡荒。

同日　国民党统治区开始邮资加价，规定平信二千元，挂号五千元，电报电话价目均涨两倍。

12月12日　安庆商人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无限度增加营业税举行罢市。

12月15日　东北税务总局通告，贫雇农为生产在各地购买之牲畜一律免征牲畜交易费。

12月16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农民银行合并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并确定以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作为西北解放区之本位币。

文　教

1月30日　《群众》在香港创刊。

2月28日　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

3月12日　马寅初、沈体兰、孙起孟在上海发起成立"沪市教育界人权保障会"。

3月27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停刊。

5月15日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

5月24日　《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等罪名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6月2日　河北省通志馆成立。

6月19日　中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8月26日　顾毓琇任国民党政治大学校长，蒋介石为名誉校长。

10月21日　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

11月12日　《石门日报》出版。

12月16日　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在南京成立，司徒雷登任主席。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8年

导　言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一九四八年为“行宪年”。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治。蒋介石称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宪政的开始，强调“行宪”的重要性。由于总统不过是礼仪上的国家元首，蒋介石一开始表示不竞选总统，但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取消了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当选总统。副总统一职则争夺激烈，李宗仁击败孙科当选，五月二十二日，蒋、李分别就任总统、副总统，演出了蒋介石统治中国所追逐的最后一场闹剧。

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困难，南京国民政府于八月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但是，金圆券和法币一样，没有其他货物作准备，南京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长，通货膨胀加剧，金圆券很快贬值，仅九个月时间就成了废纸。

九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发动了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四十七万多人，全部解放东北。经过这次决战，国共兵力之对比已转变，解放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辽沈战役也是三大战役首先开始，首先胜利的战役。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发动济南战役，歼敌十万余人，活捉王耀武。济南解放，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解放军南下徐州创造了条件。济南战役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崩溃的开始。

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立刻发起淮海战役，这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战役。这次战役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双方共投入一百四十万兵力以上，历时66天，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歼敌五十五万多人，活捉徐州“剿总”总 司令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东北战事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同华北野战军发动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敌五十二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辽沈战役
- ●淮海战役
- ●平津战役
- ●济南战役
- ●行宪国大和总统选举
- ●发行金圆券

辽沈战役

背景介绍

辽沈战役是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战争第二年结束时，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东北解放区已拥有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95%的铁路线，广大地区联成一片。东北野战军经过扩充与休整，到1948年8月止，已拥有正规军约70万人，另有地方部队33万人，并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国民党军虽仍有55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的地区内。由于北宁铁路若干地段和营口为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国民党军通向关内的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不能满足需要，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全国5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优越条件。

1948年春，即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临近结束时，蒋介石曾考虑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但又顾虑这样将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迟疑未决。最后仍决定固守东北，以利于巩固华北，并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其具体部署是：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共10万人防守长春，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4个军14个师共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重点为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同关内的陆、海联系；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8个军24个师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确保沈阳，并支援长春、锦州。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东北国民党军有可能全部撤退的情况，1948年2月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截断蒋军由陆上撤退的通路，以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这是对全国战局最有利的一种方案。但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一段时间内强调南下北宁路作战很困难，主张先打长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并在中央的帮助和教育下，他才于7月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作出南下北宁路的作战部署。9月7日，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的电报明确指出，主攻方向应指向北宁路，"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开始发动，东北野战军分路奔袭北宁路。到10月1日，连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等城，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于9月30日飞抵北平，10月2日又飞沈阳。他同傅作义、卫立煌商议后，决定从华北、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派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西进援锦。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解放军预先设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经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的数十次冲击，成攻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这样就为解放军攻锦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进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全歼守敌范汉杰部10万余人。

就在攻克锦州的当天，蒋介石又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国民党守军向沈阳突围。被长期围困在长春并经人民军队大力争取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17日起义。接着，国民党军另一守军新七军官兵纷纷投诚。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也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10月18日，蒋介石又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三次飞赴沈阳，企图挽救即将全部被歼的东北余部。他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犯；命令徘徊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规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又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他任

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指挥这一总撤退行动。这时，中央中央军委同意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建议，决定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而将廖耀湘"西进兵团"诱至新立屯、黑山地区予以围歼。解放军一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坚决阻击、迟滞南进的廖兵团，一面令攻锦主力部队立即回师，隐蔽地向新立屯、黑山地区急进，从两侧包围敌人。黑山、大虎山阻击部队经过5天的浴血奋战，胜利地阻止了廖兵团的前进，解放军各部终于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天的猛烈进攻，至28日，全歼这个兵团的5个军共12个师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

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逃走。东北野战军乘胜分多路向沈阳、营口猛追疾进，于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加上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的胜利，从1948年7月到11月，全国共歼灭国民党军100万人。这时，国民党军队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增长到310万人，人民军队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占劣势的基本格局。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近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了全国战局中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它可以投入关内其它战场，以加速革命战争的胜利。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材料：

材料一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月）

毛泽东

一、九月七日的电报

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

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二、十月十日的电报

(一)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

(二)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三)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箝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就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材料二　英雄的十月

历史大进军

当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奔向北宁线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 11 月 2 日将要成为全东北人民完全获得解放的日子。当时我们所想的，是一场空前的决斗，是一场远离后方插到敌人的走廊去扭断敌人咽喉的决斗——彻底摧毁敌人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以便最后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

……

蒙古草原已经枯衰了，燕山余脉还是层层翠色。沿途斑剥的枣丛，茂密的梨园，攀绕墙头的葛藤，沿着村道拾粪的老汉，莫不给人以久别重逢的亲切感觉和异常的鼓舞。战士们在行进中遥望南方，忍不住敞开胸膛唱道：

“走一山，又一山，眼看就到山海关！”

塔山英雄们

“到锦州过过考，”这句话成了大练兵以后指战员们的求战豪语。而最严重的考验就在 10 月 8 号开始了。锦州守敌从五个半师突然增至七个半师，从锦西向北增援的九个师敌人，和锦州只隔半天路程，从沈阳倾巢而出的十二个精锐的美械师又把我们通往后方的铁路供应线切断了。这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东北决战”。我们的部队勇敢地迎接了这个考验。在炮火犁遍了的锦州城郊，每晚都可以看到塔山上空闪耀着虹彩缤纷的照明弹和信号弹，听到那里清晰的炮声。但是攻城部队还是毫无顾虑地日夜进行着一个空前规模的攻坚准备工作：夺取外围要点，改造四郊地形，在火网下完成一系列的环城通信网和地下交通干线，把总攻击的冲锋出发地一直推到城墙紧跟前。战士们始终坚信：“敌人援兵来不了，那里有兄弟部队！”

而在塔山的兄弟部队，和敌人面对面地只隔四百公尺。左面是海，右面是山，中间十来里宽的狭长地带无险可守，只能依托几处村落。敌人从海上，从山头，从天空日夜轰击着，每天总有五千发炮弹落到阵地上。村庄从地面毁灭了，工事毁而复修者达数十次，指战员的耳朵震聋流血。但是每个人仍然顽强坚持着。某师长指着脚下的焦土说：“我的阵地就在这里！”

日日夜夜，勇士们抗击着敌人六个师的轮回猛攻，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保证主力顺利攻入锦州！”地堡被轰塌了，转到壕沟里打；壕沟被轰平了，跳进弹坑打；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打；手榴弹打光了，用石头打；正面挡不住，就插到敌人中间去打。有的战士说：“我死了也要挡住敌人！”另外一个马上纠正他说：“死了还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要想办法活着打到底！”战士们最喜欢的一个办法，便是以反冲锋消灭敌人。冲到敌人屁股后面的机枪组长纪守法，只是带着一个小组，便把冲上来的敌人打死了六个，他们在敌人的夹击中，打的机枪步枪都坏了，他又把敌人手中的武器夺过来打，最后打的只剩下单人独枪，他一个人还是把人敌人打退了。在突出的海岸一角，独胆英雄们歼灭了十倍于已的敌人。在伤亡殆尽的上坎子阵地，最后击溃整营敌人的是四个重彩号。那怕

打到双手已经不能使用任何武器，勇士们仍然在血泊中继续作战——给战友们指点方向，反击敌人。两个打残废的战士，下火线时坚决不用旁人抬，打瞎了眼的把打断了腿的伙伴背上，断腿的便在他的背上指路。为了不减少阵地上的杀敌力量，他们宁肯忍受着肉体痛苦的折磨……。

"有口气，阵地丢不了！"这就是塔山部队的英雄的誓言。敌人在七昼夜发动了三次总攻，每天整团整营的集团冲锋不下十余次，一梯队垮了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了三梯队上。而人民战士依然在炮火中傲然挺立。荣膺"塔山守备英雄团"的部队，当场在火线上挂上"勇敢奖章"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人。他们打得敌人血水成流，在百来公尺宽的地段就扔下了好几百条死尸，纵然付出了七千伤亡，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最后只好连军官团也拿出来冲锋了：敌人用机枪在后面赶着，好容易把两个连的军官赶到我军阵地前沿几十公尺的地方，又被塔山英雄们按到火网底下，进不得，退不得，全部投降过来了。

"锦西阻击战是解放锦州的第一功！"攻击锦州的指挥员们异口同声说。就在塔山部队完成了阻击战的光辉战例的这一天，他们以三十一小时的惊人速度攻克锦州而轰动中外，把蒋家小王朝的"东北生命线"一举斩断了。

致命的一击

一周以来，锦州盆地日夜滚动着爆炸声和炮弹的啸声。强大的野战兵团从四面八方直逼城下。可是我站到高处，周围二十里以内简直看不到人。几十万大军云集的大战场是一片空虚。可是突然间，——10 月 14 号上午十一时，总攻击一声号令，天崩地裂一样的炮火和潮水一样的队伍，都一齐迸发涌现出来了。

我顺着闪电形的交通壕走向北山制高点，头顶正响着炮弹撕裂空气的千种怪啸，交通壕里，人吼马嘶，步兵炮和弹药车向前滚动，爆破手挤在嗖嗖前进的行列里欢呼着："赶快上，咱们的'大家伙头'发言了！"这是步兵专门给那些专门用美国十轮大卡车拉着的美国重炮起的绰号。我忽然想起在四平曾经听到过这样的笑声。去年夏天，上千辆的大车日夜跋涉半个月，可是运到四平前线的炮弹，只够攻城部队轰击十分钟。今春我再访四平前线，运送炮弹的已经是直通前线的火车和汽车了。我亲眼看着不下一千公尺长的敌人防线上的纵深地堡群，在七分钟内被解放军的炮火轰成一片焦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从我身边冲上前去的后续部队有人笑着说："可要立他一功了！"而此刻不是在四平而是在远离后方的敌人咽喉重镇锦州，我又听到了这样的笑声。

胜利的召唤使得初上战场的新兵也变成无畏的勇士。锦州人民永远忘不了爆炸英雄梁士英。在西城北角的巷战道路上，他单独冲到地堡跟前，把爆破筒塞进两挺重机枪正在向外射击的枪眼里。正要回身跑出爆破威力圈，敌人却把爆破筒推了出来。铁筒上的导火索已经吱吱冒烟，他一把抓过来又塞进地堡，用双手死死顶住不放。连长命令他赶快往回跑，他却干脆拒绝说："回去就完成不了任务了！"为了炸开前进道路，他慷慨地和地堡同归于尽。而在城外，突破的捷报一经传出，空虚的战场顿时黑压压的，也不知从那里冒出来这许多队伍：两路纵队，四路纵队，从北山公路上抢奔突破口的是好几个并肩滚滚前进的部队。飞机在头顶轰炸扫射，堵击的炮火落到身旁，而冲进城去的行列没有谁趴下隐蔽。机枪手刚刚栽倒，助手抢上去就捞过他的枪，一眼不看便继续前进。突破口挤不动了，后续部队干脆从小北门翻城而入，不把脚下的地雷放在眼里。"不管侧射，往里猛插！"退到车站的敌人正在车厢里疯狂堵击，先锋班已经用刺刀剁开铁丝网，钻到车厢底下去逼令敌人缴枪。横着三十几道铁轨和堆满了车皮等杂乱障碍物的二百公尺宽的调车场防线，突击连仅仅十五分钟就把它完全打通了。地堡群的敌人只顾封锁着正面，手榴弹却在后门的交通壕里猛炸起来。敌人紧忙夺路窜回楼房，突击队却从后窗迎头打来了。曾经在四平直捣敌人核心工事的第八连，就是这样地单独打了七里路的巷战，一路上连夺三座核心地堡群，从城墙冲到市中心都是一个先锋班抢在头里；一直冲到敌人兵团司令部的几十个人，又用沿途缴获的一色冲锋枪突然猛攻，完成了该师预定的巷战任务。

同时突破四城的四路大军，如同四把插进敌人心窝的楔子，不出五小时便全部会师，把全城守敌割裂成四大块。每路大军沿途又变成无数把尖刀，只管向两侧敌人的纵深迂回猛插。英雄们冲得这样快，以致闯进敌人的一个营指挥所以后，满屋守军还以为他们是"自己人"。骤然出现的勇士吓得敌人成百地跪下缴枪，可是谁也顾不上他们了——"不要人枪，迅速猛进！"他们别开生面地命令敌人说："枪放左边，人靠右边，顺着大街往外走！"交代一声又继续前进，打遍全城，把十万守敌搅成一锅粥。少数强固要点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不投降的都一个个地被歼灭干净。

从 15 日下午 6 时锦州最后解放的时刻起，东北蒋匪开始全局动摇了，无论是迟滞解放大军进军也好，收兵回巢加强华中防卫也好，蒋介石这些反动计划都随着锦州的解放而破灭。蒋介石之所以拚命嚷叫"南北夹击"，正是因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旦从锦州战场腾出这只要命的铁拳，无论捶到那里都是加倍沉重的了。

从胜利奔向胜利

在饶阳河边，厉家车站一线，经过了敌人四个美械师两天一夜的轰击，阵地上已经分辨不出那里是人挖的工

事，那里是炮火掀开的弹坑了。焦土翻过来还是焦土，劈裂的树根冒着火焰，硬挺在火海中的一个连队只剩一挺重机枪，而这个重机枪班唯一剩下来的射手史学义，头一天就被炮火轰断了右臂。独臂英雄记不清炮弹把他埋到土里多少次，只知道一苏醒便从土里挣扎出来，用仅有的一只左手射击冲上阵地的敌人。他用指导员遗留下来的匣子枪打，用阵地上被炮火炸断了木柄的手榴弹打，让一个新同志把美式机枪扛到跟前给他打。最后连紧握枪柄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又在几分钟内教会了新同志射击，自己在旁边一面装子弹，一面给他指示目标说：

"有个喘气的，敌人就上不来。廖耀湘这条大鱼落到网里再别想溜掉了！"

在这席卷北宁线的英雄的10月，还有什么命令比"抓住敌人"更鼓舞人呢？黑山部队在阵地上挡住了敌人两天两夜的猛攻，打得廖兵团连夜南逃。饶阳河部队在一夜间从北线插到饶阳河畔，拦头截住了敌人两天一夜的猛攻，打得廖兵团连夜向北转进，终于掉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里。

这是紧接着锦州大捷的又一个大会战。经过了空前大规模的攻坚战斗以后，主力部队的疲劳是可以想见的。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们倒头在战场上就睡着了，整夜的轰炸也未能侵扰甜梦。可是突然，辽西敌人继续西进的消息传到军中，战士们乐的直拍大腿说："廖耀湘这条'大鱼'，可'钓'出来啦！"从20号起，滚滚大军又连夜北渡大凌河，奔向指定的地点。脚板走得打满血泡了，战士们说："我爬也要跟上队伍！"脚脖子肿得瓦罐子粗，战士们说："跑断腿也不能放走敌人！"猛听得兄弟部队已经把敌人抓住，进军行列简直沸腾起来："决战的时候到啦！"担架上的彩号躺不住了，跛着脚的也把拐杖扔了；驮马跟不上队伍，射手就扛起重机枪走；小桥过不了四路纵队，淌水过；解绑带过河太耽误时间，穿着棉裤过！三下江南的英雄部队，四保临江的英雄部队，曾经在去冬并肩横扫辽河大平原的兄弟部队，都从四面八方潮涌上来了。方圆五十里的包围圈，走头无路的廖兵团，"架起炮猛揍啊！"步兵还未展开，炮兵已经开始试射了。指挥所却来电话说："不用打炮啦！敌人溃退啦！猛追啊！"队伍收不拢来，有多少上多少！到处都是敌人，那里敌人多就往那里打！重机枪刚架好又要前进，"干脆架在肩头打得啦！"——"猛追猛插，不让敌人喘息！"正是三年前廖兵团横冲直撞的地方，腾起了总清算的复仇怒火。敌人的后卫还要抵抗，躲在核心的兵团司令部却叫解放军截翻了。兵团司令廖耀湘爬上吉普车就往新六军军部开，半道上碰见李涛这位军长也是孤零零地迎面逃过来，他们搭上伙，又去找二十二师救命，谁知这个"虎威"部队的三个团早已分路"突围"到俘虏群里去了！插到敌人中间的一个部队，仅仅伤亡了一百多人，就活捉了二万五千个"王牌军"；另一个部队伤亡几十个人就抓了一万六千个活的。甚至在战地失掉联络的参谋人员，坐着空汽车也活捉了敌人一个骑兵旅。

全歼廖兵团的各路解放大军布满了辽西战场。总清算的暴风雨已经来临。所有部队立即分山铁道、公路向沈阳进军。

于是，道旁马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路标："向沈阳前进！"在墙上，门上，树干上，电线杆上，桥头堡垒上，一串串的部队代号底下写着："向沈阳前进！"在十轮大卡车拉着的美式榴弹炮上也写着："向沈阳挺进！"……直通沈阳的大道上，10月的英雄们展开了奔向胜利的赛跑。而跑在头里的"钢铁"部队，正是在10月1日首先登上义县城头的英雄，他们紧接着突破锦州西北角的激战之后，又以七昼夜的急行军纵横辽西战场，在廖兵团全军复没的当天，挥戈东向，终于在10月的最后一天，以四小时七十里的速度直捣沈阳西线，为东北人民的"11月2日"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节选自华山《英雄的十月》
新华社1948年11月22日电）

材料三　坚守塔山前沿阵地的日日夜夜

1948年9月12日，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了。

9月11日，我们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奉命以极其秘密神速的行动，离开鞍山，日夜兼程，通过北宁路，渡大凌河，南下兴城，攻占砬子山。15日，在砬子山一线集结待命。

10月5日下午6时多，部队正在开晚饭，突然接到师部电话：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向塔山开进；团长、政委立即到师部接受任务。部队由江雪山副团长集合出发，我和江民风政委骑马奔向师部驻地。

师机关已经走了，只有江燮元师长、潘守才政委和几个机关干部坐在油灯旁看地图。我们一到，师首长便向我们传达了东总司令及纵队和师首长的决心与部署。江师长说："现在时间很急，任务很重，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在拂晓前赶到塔山，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江师长指点着地图上用红铅笔圈好的塔山堡、铁路桥头堡、高家滩、打鱼山，说："其中塔山堡是重点，你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尽快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划分任务，并将兵力部署迅速报师。"师长讲完，潘政委说："你们团坚守塔山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毛主席指示，要东北部队坚决迅速打下锦州，关上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切断东北与华北敌人之间的联系，为全歼东北敌人于东北地区，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因此，塔山阻击战是歼灭锦州守敌，攻占锦州的关键。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明白，这次能不能守住塔山，关系到我军能不能顺利打下锦州，关系到能不能全歼东北蒋军，解放全东北的大问题。你们团过去在新开岭圈

歼战，辽阳攻坚战、老爷岭阻击战等战斗中都打得不错，师党委希望你们战胜各种困难，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我们向首长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决不让敌人通过塔山。

塔山，位于锦西和锦州之间，是敌人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要道，有直通锦州的铁路和公路，便于敌人行动；东临渤海，敌人进攻可以得到海军火力的支援；南面大小东山、影碑山等高地，敌人筑有坚固工事，居高临下，辖制我塔山一线阵地。担负塔山阻击任务的是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的第4、第11纵队及独立第4、第6师。根据师首长的部署，我们团在打鱼山、塔山堡、红旗营子地段组织防御，阻止敌人沿大小东山向塔山桥、塔山堡的进攻。

7日拂晓前，一营进入塔山堡，三营进入高家滩和铁路桥头堡，团警卫连二排进入打鱼山，二营为团预备队隐蔽在塔山堡背后小河沟边，团指挥所设在塔山堡北侧高地。各营连进入指定位置后，立即紧张地勘察地形，抢修工事，挖防空、防炮洞。

上午，我们带领全团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划分具体任务。12时，在塔山山头上，我向师首长汇报了全团兵力部署和对面蒋军的活动情况。首长听后告诉我们，从整个战役看，我军处于优势，但从当前蒋军数量和装备来看，我们处于劣势，因此，一定要准备打恶仗。

第二天，兵团程子华司令员在纵队胡奇副司令员陪同下，到塔山阵地视察。在听取我们的汇报后，程司令员说：“你们团防御正面从塔山至打鱼山几公里，距敌人很近，最近的只有几百米，敌人又是居高临下，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打防御战，对我很不利，现在锦（西芦岛）地区敌人已经集结11个师。我们要关门打狗，蒋介石是要拼命打开这个门的，你团的防御地段首当其冲，一定要坚决阻住敌人，确保主力拿下锦州。”我们按程司令员的指示，加紧做好战前的各项工作。

第三天上午，纵队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来到塔山前沿阵地。我们正和战士一块修工事，大家个个汗水湿透了衣服，满身都是泥土。莫政委问三连连长周丙义：“能不能守住阵地？”周连长回答：“能。有我们在，塔山阵地一寸也不能丢。”

吴司令员走到后山坡，遇上一位扛着木料的老大爷，就热情地向他打招呼：“老大爷，这是哪里搞来的木料呀？”“是我准备盖房子的木料。”吴司令员又问：“你老人家舍得吗？”“舍得，舍得”，老大爷边走边说，“你们为我们命都舍得，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10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便响起了“轰隆”“轰隆”声。敌人的炮弹呼啸着在离我们不远的阵地上爆炸了。敌人对我进行猛烈的炮火轰击，全团阵地上弥漫着炮火和硝烟。不一会，参谋便跑来报告：“警卫连二排防守的打鱼山主要山头阵地被敌人占领。”打仗刚开头，阵地就丢了，真丢人。我和政委急忙回到团指挥所，参谋报告：“警卫连连长第二次电话报告，敌人一个多营的兵力，趁暗海水落潮摸到阵地前沿。战斗一打响，两正副班长牺牲，排长和四个战士负伤，剩下人撤到第二个山头坚守。”

我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海水已开始涨潮，打鱼山成了孤岛。我让参谋告诉警卫连，要守住现有阵地，待黄昏后落潮时，配合主力部队实施反击。

天已大亮，敌人停在海上的“重庆”号巡洋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我团指挥所。从南面又飞来9架敌机，在塔山堡、高家滩上空泻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许多同志被震昏。接着，敌人的步兵便以集团队形往前冲。我阵地上的同志们从土坑里钻出来，待敌人冲到距前沿阵地三四十米时，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杀得敌人横七竖八，一片一片倒毙在我阵地前面。可是敌人的冲锋并没有停止，一梯队垮下去，二梯队冲上来，二梯队垮下去，三梯队、四梯队又上。塔山堡前沿阵地一、三连的结合部冲进两股敌人，和我们的战士滚打成一团，经过十几分钟激战，两股敌人全部被歼。

高家滩三营阵地上，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冲击。下午3时多，敌人一个山炮营转移到三营阵地右前方小窝棚，相距只有几百米，可以直射，对三营威胁很大。我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正忙着架炮，觉得应在这时敲掉它，便立即直接报告纵队指挥所。莫政委当即表态：“同意。”不到10分，我们的大炮怒吼了，敌人的山炮营完了蛋，战士们高兴得拍手叫好。

敌人约有3个师的兵力向我轮番进攻，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多，敌人伤亡惨重。我想，敌人可能会在黄昏时利用夜幕掩护收兵，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施反击。于是我和政委商定了反击的部署，马上报告师和纵队指挥所，同时命令部队做准备。师和纵队首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打法，并指示要掌握好时机，动作要快。

下午6时30分，太阳刚落山，海潮快退下去了。突然，敌人的大炮又向我阵地狂轰起来。但只听敌人打炮，不见敌人冲击。原来，敌人打炮是为了掩护步兵撤退。我立即发出实施反击信号。我们的大炮为掩护部队反击向敌人开了火，双方炮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大地。我各反击分队冲出掩体，杀向敌人。二营杨营长和于厚德教导员带领全营插到敌人背后，三营从正面出击，四面八方杀声震天，敌人乱了阵脚，丢盔弃甲，争相逃命。经过半小时的激战，俘虏敌官兵280多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一营组织的反击，给饮马河滩里的敌人以重大杀伤。警卫连二排配合兄弟部队收复了打鱼山阵地。入夜，苦战一天的部队吃了一顿饭，又冒着敌人的炮击，重修工事。

我将一天的战况向师和纵队指挥所作了汇报，纵队和师的首长表扬我们团第一天打得英勇顽强。为了迎接第二天的战斗，我和政委沿着交通壕来到塔山堡一营阵

地，向大家传达上级首长的表扬，鼓励大家用更大的胜利向党汇报。

翌日8时，敌第8师在暂编第62师和第151师配合下，向我塔山堡阵地实施猛烈突击。战斗一开始，先来一顿狂轰滥炸，我整个阵地成了一片火海。接着敌人以整团整团的兵力组成梯队，由军官带头冲锋，前面倒下去，后面冲上来。守在塔山堡村头的一连，与敌人拚杀伤亡过大，一股敌人趁机突了进来。在这危急之际，一营副营长鲍仁川，越过敌人火力封锁，进入村内，组织一连零星人员及文书、通信员等与敌抗争。情况紧急。我命令团预备队实施反击。二营营长、教导员身先士卒，冲进塔山堡，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三连连长周丙义在与敌人白刃格斗中，一连捅死七八个敌人，身负几处重伤，仍坚持战斗，终因精疲力尽，英勇牺牲。经过20多分钟的逐屋争夺搏斗，将突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阵地重回我手。

这一天，从早上到下午，连续厮杀不断，战斗远比第一天激烈。三营连续打退敌人7次冲锋，七连八班坚守桥头堡，全班9人，3人牺牲，6人负伤，仍顶住了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猖狂进攻，象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

全团在战斗中阵亡和重伤300多人。当晚，纵队首长从兄弟部队抽调360人补充给我们，保证了我团有足够力量进行第三天的恶战。

第三天早上，敌人4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进至饮马河南侧，不时以一个营或一个连的兵力进行小的进攻，同时，数百门大炮和十几架飞机轮番对我阵地实施轰击、轰炸。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纵深内部队调动频繁，各高地上有不少军官反复勘察地形。我感到敌人正在策划规模更大的进攻战。我们应做好充分准备，迎接一场更大的恶战。

正在这时，兵团程子华司令员来电话要我们汇报两天来的战斗情况，重点是敌人进攻的特点和我们的打法。并告诉我们，东总罗荣桓政委来电话表扬了我们团。刚通完电话，三营营长电话报告：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连续突击攻占了桥头堡。请示用营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夺回阵地。为了减少伤亡，我告诉三营营长做好准备，待黄昏后反击。

下午5时许，江师长来电话说，纵队首长指示，为加强塔山正面防御力量，确定将三营和警卫连的阵地，在黄昏时移交给兄弟部队。我一听急了，请求说："三营打了三天两夜，敌情、阵地都熟悉了。我们保证守住阵地，请师长给纵队首长说情，不要移交了。"师长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纵队首长对三营在战斗中顶住敌人几个师的轮番进攻很满意。现在首长既然定了，你们就好好做三营的工作，给同志讲清首长的意图。"最后，我还是提出夺回桥头堡阵地再移交，如果缺一块交出去，太丢人了。我们说过寸土不失，说话要算数。师长听后说，"好吧，就这样定了。"

放下电话，我通知三营抓紧时间做好反击和移交的准备，并将情况通报一、二营。天刚擦黑，三营用一个连，在炮火掩护下，战斗30多分钟就夺回了桥头堡。

移交阵地时，三营的同志挥泪与洒满战士鲜血的阵地告别。他们撤出阵地前将工事整修一新，擎出嵌有"守如泰山"4个大字的红旗对接防的同志说："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已被战士的鲜血染红，我们把它移交给老大哥，战士们要为烈士报仇啊！"

当夜，我团派侦察员到敌后三岔路口设伪活捉了敌第21师第63团副团长高录臻。据他称："为了拿下塔山阵地，蒋介石、卫立煌先来过葫芦岛，蒋介石先令第54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后换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卫立煌不放心又派他的副司令陈铁来；敌海军总司令桂永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海、空军参战。两天猛攻，寸步未进，蒋介石大骂其将领无用，今天派他的随身参军罗泽闿前来督战，并决定把两天没舍得用的独立第95师——所谓"没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拿出来，准备天大干。为此，特地将独第95师老师长、华北督战主任罗奇弄来，给他的老部下打气。罗奇一来，就狂妄地叫嚣："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他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重新掌握兵权，在部队中建立了庞大的督战组织，规定逐级监督，怯战者杀，并以50万金元券的代价收买了一大批反动骨干分子，组成了"宁死不退"的"敢死队"。

我们感到俘虏的口供非常重要，连夜将俘虏和口供材料送师指挥所，并立即用电话报告了纵队首长。

13日晨，敌人再以狂轰滥炸为前奏。轰击过后，敌独第95师、第8师、第151师、第157师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涌来。敌人利用黑夜运动，接近我塔山堡前沿阵地，天蒙蒙亮时，突然发起冲击，波浪式队形，一个营为一波，一个团为三波，第一波被打下去，第二波拥上，第二波被打退，第三波又到。那些戴大盖帽的军官，好象吃了"刀枪不入护身符"的红枪会头子，远远地跑在队伍前头，拼死卖命。他们把尸体垒作活动工事，向我阵地步步紧逼，进攻的凶猛程度是几天来所没见的。我们的部队很沉着，待敌人靠近第一道铁丝网时，才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混乱不堪，一片片倒下去了。敌人看冲不上，恼羞成怒，集中了所有的大炮、舰炮和10多架飞机，向我塔山阵地猛烈轰击、扫射。但是，由于短兵相接，飞机、大炮也无能为力。

夜幕降临，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阵地上一片沉寂。师指挥所来电，今天我军主力已扫清锦州外围，估计蒋介石为挽救其锦州守军被歼命运，可能再次集中兵力向塔山发起更大的进攻。为了迎接新的战斗，全团指战员顾不得休息，连夜突击抢修工事。

14日拂晓前，敌人借着薄雾接近我阵地前沿，5时发

起冲击，战斗一开始，敌人第151师为第一梯队，第8师为第二梯队，组织“敢死队”，以军官督战，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向我塔山堡阵地实施猛烈的集团冲击。这时敌军官已丧失了理智，连起码的战术和冲锋队形也不讲了，只是驱赶着士兵在大炮、飞机的支援下猛冲。战斗异常激烈，敌反复冲击数次，均被我以炮兵火力和短促火力击退。

10时，我攻锦州部队向敌发起总攻击。敌人鉴于锦州告急，于11时再次向塔山堡发起猛攻。我全团指战员在锦州胜利消息的鼓舞下，越战越勇，连续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以团预备队二营向敌实施猛烈的反冲击，予敌人以大量杀伤，并迫使敌一个排在塔山堡阵地前缴械投降。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稍事喘息后，敌独第95师于当夜趁着浓雾和小雨，向我塔山堡阵地前沿隐蔽接近。15日拂晓前，将我前沿部分障碍物破坏，一股敌人摸进我一营防御阵地第一道堑壕。当敌人向我二道堑壕爬进时，被我一连巡逻警戒哨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发觉，他们一面与敌人搏斗，一面高声大喊。这时，一连长刘景山、副排长王文礼等带领战士们赶上来，一阵猛打，将摸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敌人偷袭不成，即发起猛烈的集团冲击。敌人的步兵在炮火配合下，冲到第一道铁丝网边，我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敌人前面倒下去，后面扑上来，又倒下去，再扑上来。我一面组织火力抗击，一面以营、团第二梯队实施反冲击。激战持续了3个多小时，只见铁丝网上，堑壕外面，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敌“赵子龙师”约一个营在我有力打击和纵队炮兵群火力的前后夹击下，被迫投降。敌人虽投入了主力，但因士气颓丧，伤亡惨重，偷袭不成，强攻无效，在塔山阵地前弃尸6600余具，于12时全线溃退。

下午3时多，江师长来电话：锦州守敌全部被歼。胜利的消息传到阵地，人们欢呼，跳跃。激战6昼夜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达到了，敌“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计划，宣告破产。塔山阻击战为解放锦州、为辽沈战役的全胜，发挥了重大作用。1948年10月25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授予我们团“塔山英雄团”的称号。

（选自《军史资料》焦玉山原“英雄团”团长）

材料四　“攻坚老虎”在锦州

龙书金（《星火燎原》之十）

一列闷罐火车，由四平出发，经郑家屯，转头向南，日夜不停地疾驶在战火纷飞的辽西平原上。

路基经久失修，车身颠簸得十分厉害，象坐着马车，走在石子路上。欢声笑语充满了车厢。冥思中，身旁几个战士的谈话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真弄不明白，说的是‘练好兵，打长春’，为啥一股劲朝南开？”

“你呀，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这是一计！”

“什么计？”

“毛主席的锦囊妙计！来个大歼灭战！”

“打歼灭战！那谁不知道。究竟怎么个歼法？”

“那我怎么知道？”

战士们的话，正是我连日来反复思考的问题。自从去年夏、秋、冬三季攻势以后，国民党东北的几十万兵马，被我军分割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大圈圈里。这使蒋介石对东北战局焦灼不安。不管他安也罢，不安也罢，反正是锅里的肉，网里的鱼，跑不了了。毛主席指示首先把矛头指向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来它个关门打狗。这一出最后解决东北问题的好戏，早已打起了开场锣鼓，兄弟部队已经登台，我们六纵十七师就是星夜赶往锦州，配合他们一起演好这一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列车疾驶，我的心也急如火焚，深怕去晚了捞不着仗打。赶到离锦州东北不远的大兴庄时，已是十月初了。指战员们都急切地盼着打仗，特别是看到参战的二、三、七、八、九等纵队，经十来天战斗，已经肃清了锦州外围的敌人，更担心没有自己的份了。

赶忙经电台和总部联系，刘亚楼参谋长命令我师为攻城总预备队，归三纵队指挥。这就是说还可能有我们的份。

怀着一颗兴冲冲的心，当天就去见三纵首长要求具体任务。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我见到了韩先楚司令员。从他那熬红的双眼可以看出，兄弟部队在外围战斗中打得够艰苦的。韩司令员只寒暄了几句，就指着墙上的地图对我说：“敌‘剿总’锦州指挥所和兵团司令部之间的铁路局，是锦州的心脏。待一打开突破口，你们这只‘攻坚老虎’就要不顾一切地猛扑进去，把它掐住！”他的坚定语气和有力的手势，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使我充满对胜利的信心。领受这样的任务，我们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四平攻坚战中，我们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任务，获得了“攻坚老虎”的光荣称号。

十四日清晨，总攻前的炮击开始了。我炮兵纵队集中火力向城内各固定目标猛烈轰击，锦州城顿时陷于硝烟火海中，一座座碉堡被轰得粉碎。轰击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后，炮声刚落，急骤嘹亮的号声向攻城部队发出冲锋的命令。战士们哗地一声跃出交通壕，向突破口冲去。

这时我正站在韩司令员的指挥所里，看到三纵部队潮水般地向前涌去，兴奋地请示道：“突破口撕开了，首长，我回去叫部队去吧！”得到允许后，我一口气跑回师临时指挥所。参谋长劈头告诉我：因突破口太窄，部队过于拥挤，我四十九团团长赵浩然指挥部队机动地绕到小北门一带冲进去了。我想：好呀！赵浩然，真有两下子！赶紧

打电话通知五十、五十一团，让他们紧紧跟上。放下电话筒，我就带着警卫连和一台步谈机往东追去。赶到小北门时，只见两扇不大的城门敞开着，两旁土墙上挖了无数踏脚坑。看样子是突击营先爬过城墙，打开城门让后续部队闯进去的。这时，我猛一抬头，发觉太阳已经落到城西，附近除了我们几个伤员和敌人尸体外，已经没有了人影，只听见忽疏忽密的枪声不断从城内传来。因为摸不清情况，便在城门附近一个碉堡里安下了临时指挥所。

正急于知道部队的去向，耳机里忽然传来四十九团的呼叫。一联系，知道他们的突击部队三营，甩开了城北神社之敌，已逼近了铁道沿线。我兴奋地命令他们迅速通过铁道，向纵深插入，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这时，徐斌洲政委和李丕功副师长都赶了上来。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由李副师长到四十九团去具体指挥。

不多时，通四十九团的电话架好了，才得知他们进攻的详细情况：在我炮击之后，各兄弟兵团四处发起猛烈攻击，分散了驻守小北门一带敌人的兵力，三营便一举突破入城，继续朝前冲击，逼近了铁道。铁道南边的敌人，凭着几列车皮的掩护，在铁路局火力支援下，拚命阻止他们前进。天黑了，剖腹挖心的时候到了，团长赵浩然把尖刀任务交给了八连，并向全连战士说："上级把我们从老远的后方调来，就是要我们勇猛的穿插分割敌人，我们可不能给'攻坚老虎'的脸上抹黑。"八连副连长马绍先，是抗日时期的战斗英雄，激动地喊道："团长，请放心吧！插不到铁路南边就不回来见你！"说罢，手一挥，领着突击排忽啦一下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打得铁轨冒着火星，丁当直响。我军也以密集的火力掩护突击排前进。在敌人的流弹横飞中，有的战士倒下了，但更多的战士却钻进了车皮，越过铁轨，在月台上同敌人拚起刺刀。连主力也很快跟上去，消灭了一个连敌人的反扑。接着，乘胜向西南发展，一鼓作气，攻占十余座大楼，控制了铁道以南五百余米宽的走廊，为团主力打开了前进的通路。就在此次战斗结束后，他们连获得了"猛虎尖刀"的光荣称号。

在三营通过铁道的同时，包围神社的一营三连，在"全胜连"七连的配合下，一举拿下了忠灵塔。忠灵塔西侧，隔一道深沟和一道铁丝网，便是神社的核心工事。由于求胜心切，两连都没有很好组织，就竞先开始动作。哪知这里正是一颗硬钉子，部队磨缠了个把小时也没有突上去。七连长火了，亲自率领两个班，在全连火力掩护下，朝前冲去。刚冲到一堵土墙跟前，又被藏在铁丝网内的一群暗堡挡住了。凶恶的火舌贴着地皮舔过来，部队连一步也前进不得。七连长刚喊了声"崩掉它！"话音未落，爆破英雄刘万成挟着一根爆破筒，已经从侧面向上窜去。敌人机枪"嘎嘎嘎嘎"叫嚣着，一条条火舌飞向他的周围，火光弹雨中，他箭一般地扑向敌阵。谁知就在离铁丝网不远的地方，他忽然倒下了。连长正叫第二名爆破手上去时，刘万成霍地又从地上爬起，迅速地把爆破筒挂在了铁丝网上。好个刘万成，原来这是他向敌人施的一计。可是爆破筒冒了半天烟哑巴了。刘万成气得两眼冒火，摔掉棉衣，又从另一爆破员手中夺过一根爆破筒，光着膀子跑上去。敌人被他这个举动吓傻了眼，哪曾见过十月天气赤膊上阵的。就这样瞪着眼让刘万成送上了第二根爆破筒。等敌人刚清醒过来，两声巨响，铁丝网已被崩掉了一大片。趁着浓烟，刘万成和另一个爆破员又炸了几个地堡，打开了冲锋道路。

四十九团主力通过铁道后，迅速解决了铁路警察署的全部守敌，向铁路局发起攻击，铁路局，是一座钢骨水泥大楼；四周用沙包垒成一圈临时性的掩体工事，为铁路南面敌人的一个大支撑点。它的得失，直接影响着敌兵团司令部和"剿总"锦州指挥所的安危。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它阴森森、静悄悄地矗立着，象只蹲在三岔路口的大黑熊，挡住我们的前进道路。担任攻击的二营，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在机枪和六O炮的掩护下，以六连两个排由东北猛插到大楼西南，五连在东面监视，五十一团也恰在这时逼近楼西，形成了对大楼的包围。六连又组织了一个爆破组，摸黑赶回到北面，从窗口推进一包几十斤重的炸药，霎时，火光迸裂，响声震天，楼里的敌人吓得乱窜。二营乘机发起冲击，前后只用了三十分钟，便将守敌六百余人全部歼灭。

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总部，总部发来电报嘉奖各部队，并对我师作了鼓励：

"部队投入纵深，发展迅速。望发扬'攻坚老虎'的巷战威力，争取锦州战役全部胜利。"

总部的嘉奖传达下去之后，战士们炽烈的战斗情绪烧得更红更旺，部队以更大的劲头不断往前推进。二十四时，我们把师预备队五十团的一营也拿了上去。这支生力军早已按捺不住，象脱缰的马，离弦的箭，迅速向敌人纵深插去。只两个小时，就绕过铁路机关区的敌人，攻克了"剿总"锦州指挥所附近的纺纱厂和被服厂，迫使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急忙龟缩到锦州老城，躲了起来。

从地图上的许多红色箭头和上级通报的敌情判断，敌人经我猛烈穿插，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部署混乱，指挥失灵，互不照应。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决定五十团主力全部投入战斗，并命令各团全部展开，积极向溃乱之敌包围聚歼，以求迅速解决战斗。

一丝熹微的晨光，从地堡的枪眼里射了进来，天亮了，枪炮声也不似夜间那样清脆明晰。我刚想钻出碉堡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忽然，警卫员跑进来喊："首长，敌人黑压压的一片，象是包围上来了！"我心里一惊："敌人已被我们打得土崩瓦解，穷于应付，怎能在这里组织反扑呢？"急忙跑出碉堡一看，嗬！乌七八糟一大片，有的光着脑袋，

有的腿上哩哩啦啦拖着绑带，有的还提着抢来的花布包袱，一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地蜂拥而来，哪象个反扑的样子？我马上命令警卫连、通信班全部出动抓俘虏。他们哇哇喊着："抓俘虏去！抓俘虏去！"冲着敌人压过去。吓破了胆的敌人以为我们是预先埋伏的阻击部队，纷纷跪下缴枪。一点数，只有三百多个。

这些家伙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我五十团一营在直捣敌"剿总"指挥所的同时，二、三营即向东北角上铁路机关区的敌暂十八师攻击。七连战士王照山领受了营长要他给九连送炸药的任务，他高兴得扛起炸药就跑。到了九连阵地一看，只见地堡、碉堡里敌人火力象喷壶洒水似地向外喷，九连因为没有了炸药，战士们干瞪眼上不去。这时他也不管自己的任务只是送炸药，提高嗓门向九连战士们喊道："同志们，打个掩护，我去干掉它！"喊着，挟起二十多斤重的炸药包，跳跃着向一座大碉堡冲去，把碉堡炸开了一个大窟窿。王照山蹲在交通沟里，等着部队冲上来，谁知敌人组织了反击，数不清的敌人从他头上跳过去，不一会又跳回来。他后悔没有炸掉敌碉，又着急没有机会爬回阵地，只得耐着性子，趴在沟里。天色乍亮，他悄悄爬起来一看，离他五六米远就是敌人一座地堡，门正对着他，里面还在叽叽咕咕说话。他忽然发现一具敌人的尸体下面压着一颗手榴弹，抓起就甩进了地堡，趁着一阵烟雾冲到跟前，大喝一声："缴枪不杀！"敌人以为我大部队冲上来了，乖乖地把武器一支支扔了出来。就在敌人慌乱的一刹那，我们的部队冲了上去，歼灭守敌千余人。溃乱了的敌人，纷纷越城逃跑，跑到东大营的一大股，被五十团三营配合八纵队一部撵上去彻底解决了，另一小股就窜到我师指挥所来了。

四十九团在拔掉神社和铁路局两颗钉子以后，拂晓，迫使敌暂五十五师大部缴械投降。接着又配合兄弟兵团将敌八十八师歼灭无余。五十一团也于早晨六点三十分，与兄弟兵团并肩攻占了敌兵团司令部。至此，总部交给我师的任务，以歼敌三万六千六百余人的战果完成了。锦州之战也以歼敌十三万而告胜利结束。

当我和政委徐斌洲同志走出那阴暗的地堡时，太阳已升起老高。我们走上战士们爬过的土墙，望着锦州城内飘起的用烈士鲜血浸染的红旗，不禁激动地想道："东北的大门，已经被我们关死，剩下的该是狠狠地打狗了！"

材料五　黑山阻击战

"锦州、长春解放后，敌廖耀湘集团仍企图西进与锦西之敌会合，重占锦州或逃入关内。我十纵即应进至黑山、大虎山之线，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住敌人，待主力到达后，聚歼该敌。"

这是十月二十一日中午，我们收到的野司急电。短短的电文，把东北战场的形势，敌人的动向，我军的意图及给予我们十纵的任务，交代得清清楚楚。锦州解放后，蒋介石二次飞沈阳，错误地认为我军攻锦州伤亡巨大，"不经休整与补充则不能再战"，企图乘我休整部队时，再搞一个"南（锦西敌人向北攻击）北（廖耀湘兵团迅速西进）夹击"，重点锦州。当夜，部队火速整装，飞快地向黑山、大虎山进发。

二十三日，敌先头部队直逼我警戒阵地。上午九时，随着一阵猛烈的枪声，前哨战打响了。

一小时后，敌人两个营遭我军重大杀伤而溃退，我们当即电告野司，野司首长即时回电称：

"……务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任务更加明确了：死守三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我们把这一指示传达到所有阵地，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坚决守住阵地！""有人就有阵地！"特别是担任前哨警戒的八十二团七连，用击退敌人五次冲锋的具体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战斗决心。

深夜，二十八师侦察队送来一个"舌头"。这是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传令班长，衣袋里装满了送往各团的战斗命令。从文件和俘虏的口里了解到，敌人在我纵正面摆开了四个师，准备次日发动攻击。主力两个师摆在黑山正北。据此情况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可能指向黑山。果然，二十四日清晨六时，敌人炸弹成串，炮弹如注，遮头盖脑向我黑山阵地打来。根据炮击的情况看来，敌人避开我黑山阵地正面，将矛头指向东侧的高家屯，企图切断我阵地的右臂。我们注意到这毒辣的一着，又想到高家屯工事较弱，心里不禁有些沉重。我决定亲去二十八师看看。

走出纵队指挥所，只见阵地沉浸在一团浓黑色的烟雾中，高家屯炮声已停，激烈的枪声随之而起。敌人开始冲锋了！我急忙向二十八师指挥所奔去。刚走进碉堡，贺师长即迎上来说："司令员，敌人在高家屯干起来啦！第一次冲击就展开三个营。兵分三路，对一〇一高地攻势最猛。"话音刚落，只听得飞机轰鸣声和炮弹爆炸声绞成一团，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冲击的炮火准备。我对贺师长说："老贺，敌人避开我刀尖，却从翼侧攻我刀背，这一着确实毒辣啊！我们现在就把刀把转过来，让高家屯成为刺进敌人胸膛的利剑，反复刺进拔出，置它于死地，立刻把八十二团准备好。要是高家屯阵地丢了，迅速反击，趁敌立足未稳就夺回来！"贺师长回答："司令员放心吧，二十八师是经得起这场考验的。"

八时，敌人又以一个营向我西侧的大白台子阵地发起进攻。这是敌人为配合进攻高家屯，企图迷惑我军对其主攻方向的注意。敌人这一牵制行动没有动摇二十八师指挥员的决心，仍将强大预备队放在东侧。

敌人以最反动的"党化部队"——青年军二О七师第三旅进攻高家屯一线高地。我军据守石头山、九二高地的部队，在工事全被摧毁、伤亡很大的情况下，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击毙敌人二百余名。然而敌人仍以炮火节节轰击，以重兵蜂拥而上。十五时，石头山、九二高地相继失守。一О一高地成了我高家屯一线最后的一个制高点。十五时三十分，敌人又投入两个营，扑向一О一高地。于此同时，敌人又分三路攻我二十九师阵地，并企图以主力向西迂回。我们判断这是敌人配合主攻方向所作的箝制性进攻。因此，命令二十九师坚决阻击；三十师速派部队抢占阵地，阻敌向西迂回。至此，我纵全线投入了战斗。战斗的焦点仍集中在一О一高地。

一О一高地已是弹坑累累，碎石成堆，几乎所有的土木火力点都倒坍不能使用了。敌人又集中全部炮火施以最猛烈的轰击，掩护两个营向一О一高地冲杀上来。我四、六连余部和营部通信班共二十余人，就在这毫无依托的石头山上，利用弹坑跃进滚出，以密集的手榴弹，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冲锋。但敌人不顾死伤累累，仍以羊群般的队形，从三面合围上来。我阵地上只剩下五个战士，手榴弹已全部打光，立即投入白刃肉搏，终因人少力薄，阵地被敌人占领。

情况万分紧急！高家屯阵地失守，敌人必将直逼黑山城下，并进而突破我整个黑山阵地。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二十八师没有给敌人丝毫喘息的机会，命令所属十二门山炮，集中火力向占领一О一高地的敌人轰击；又指令八十二团一、三营，统由八十四团副团长蓝芹同志指挥，立即反击高家屯。

聚集在一О一高地的敌人，还未来得及重整部署，我军炮火即狂风骤雨般地压将下去，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抱头乱窜。趁此时机，八十二团一营猛扑一О一高地，三营分路攻击石头山和九二高地。

在冲锋路上，一连副连长倪恩善腰部和左腿负了伤，又被炮弹震昏过去，抬到营绑扎所包扎以后，他清醒过来，不顾伤痛又立即返回阵地，带领战士们冲上了一О一高地。这时，营长黄念怀已在炮声骤停之际，带着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的敌人正待反抗，一阵手榴弹立即落到他们头上，接着阵地上刺刀飞舞，杀声震天。激战半小时，全歼守敌，夺回高地。同时，石头山和九二高地也被我们夺取回来。

当夜，纵队指挥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总结一天的战斗，分析了敌人明天可能采取的动作和主要突击方向。大家一致认为：高家屯地势重要，敌人主力大部靠拢黑山东北地区，又经一整天炮击，阵地遍体鳞伤，明显地暴露出易攻难守的弱点。敌人为了争取时间西进，明天势必全力猛攻高家屯。根据这一判断，我们迅速调整了防御部署，确定二十八师连夜加强高家屯一线的工事。最后，我进一步强调纵队党委的决心说："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如果说今天我们挨的是千磅炸弹，明天就一定要挨万磅的。但不管压力多大，只要主力没有赶到，我们就一定坚决守住！"

二十五日拂晓，一阵天崩地裂的炮声，开始了更加激烈战斗的一天。正如我们的估计，高家屯阵地仍然是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敌人调集大部重炮群，集中向这一线轰击。阵地上已经不是一阵一阵的轰击声，一簇一簇的炮烟，而是一个持久不息的响雷，一团浓黑的腾腾翻滚的烟云。八时，炮声刚停，十架敌机随即飞临上空，轮番低空轰炸。接着，敌人以生力军新六军一六九师全部向我一О一高地、九二高地、下湾子，用成团兵力发起猛攻。他们以为经过一阵如此猛烈的炮击、轰炸以后，我军阵地上再不会有生物存在了。炮火一停，便蜂拥而上。哪里知道迎接他们的却是势如骤雨的成束手榴弹，密如火网的机枪火力。敌人一片接一片的倒毙在我军阵前。我们的战士在敌炮击时机灵地荫蔽在山后防空洞里，炮击刚停就闪电般的出现在敌人面前，就这样，在一小时内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

敌人恼羞成怒，使用了最毒辣、最卑鄙的手段。当我们坚守石头山一个排与敌人一个连白刃肉搏时，他们突然用猛烈的炮火进行轰击。结果，敌人的一个连全部成了"炮灰"，我们的一个排也全部伤亡，石头山就这样失守了。接着，敌人先后以四个营、两个营的兵力三次夹击我据守九二高地的八十二团五连阵地，激战中，敌人伤亡惨重，我英勇的战士们也全部壮烈牺牲。于是，更为激烈的战斗在一О一高地展开了。

十一时开始，敌一六九师倾全力进攻一О一高地。他们将进攻部队组成多梯队，每次以两个营以上的兵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发起波浪式的冲击。每次冲击受挫，即以大炮猛烈轰击，接着又以二梯队连续冲击。八十二团四、六连的战士们，在侯长禄营长沉着指挥下，杀得敌尸遍布山头，击退敌人进攻二十多次，坚持到下午二时。

突然，阵地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敌人在玩什么新花样？战士们向山下一看：只见那些"督战官"，手执"金元券"，连声吆喝："弟兄们！现在组织'敢死队'。参加者，每人奖励十万元！头一个冲上去加一番！"叫喊了半天，仍是一人未动。那些"督战官"，又叫道："每人再加五万！""加十万！"就这样吆吆喝喝，不知加到了多少万，总算勉强凑成了一支三百多名的"敢死队"。随着一阵炮击，"敢死队"拥上山来了。但他们刚到山腰，就遭到我炮火的严重杀伤。待冲到前沿，战士们投出一排手榴弹，高声喊道：

"国民党抓来的穷哥儿们，你们受骗了！你们在这里卖命送死，丢下妻儿老小谁管……"

战士们的话，提醒了那些受尽国民党压迫的国民党士兵。任凭"督战官"喊破了喉咙，"敢死队"变成了"怕死

队”,溃退下去了。

“金元券”没能挽救敌人的厄运,他们又使上了最后一着:由国民党党徒和尉以上军官组成一支“效忠党国先锋队”。这些出身流氓、恶棍和地主的顽固分子,现在成了廖耀湘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

一O一高地经过两整天的炮击,已被削去几尺,变成九九高地了。当敌人排成一字队形,组成五六道人网,前呼后拥冲上来时,阵地上只剩下不足一百个战士,子弹和手榴弹也不多了。营长侯长禄沉着命令特等射手们,首先将敌人的指挥官击毙,然后集中所有火力大量杀伤那群“无头之鸟”。由于敌众我寡,敌人终于冲上了阵地,于是肉搏开始。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侯长禄营长高呼:“刺刀见血,才是英雄!”“做无产阶级的硬骨头,人在阵地在!”带着战士们杀入敌阵,刺刀戳,枪托敲,有的战士几次负伤,仍用双手把敌人掐死;有些腿负重伤不能站立,就在敌人迫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反复冲杀了二十多分钟,战士们个个血溅满身,刺刀断刃,枪托打折。然而,到头来仍是“效忠党国先锋队”手打颤,脚乏力,在四连一个班的反击下,连滚带爬溃退下去了。

敌人仍不甘心,一面以猛烈炮火再次轰击我一O一高地,一面以占领石头山之敌攻进我黑山城北孙家屯,以占领下湾子之敌,迂回占领了我黑山城东的九四高地,对一O一高地形成了三面包围。八十二团军士教导队队长张国,机智果断地带领全队学员,趁敌立足未稳,夺回了九四高地;八十二团三营以白刃反击,驱出孙家屯之敌,进至十里岗子。我黑山城正面威胁虽然解除,但一O一高地终因弹尽人寡,于下午四时被敌攻占。

黑山门户又一次被敌人打开!我和政委迅速商讨后,认为一O一高地务必立即夺回,否则敌人很可能趁势直取黑山。我立即用电话告诉贺师长:“一定要在黄昏之前反击!现在虽然极度疲劳,伤亡较大,但敌人的疲劳、伤亡比我们更大更严重!晚上攻,敌人就喘过气来了,工事也修好了。现在就攻,攻到山头天就快黑,天黑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贺师长表示坚决夺回一O一高地。

我和政委都感到二十八师当前的处境非常困难:八十二团、八十四团已经血战了两天,伤亡很大;八十三团也在白台子与敌七十一军四个团鏖战了两日。虽然二十八师的指挥员没有提出困难,但现在又能抽出多大兵力来组成反击队伍呢?我们决定调八十九团二营由大边壕向高家屯增援。我要参谋迅速下达命令后,立即到黑山城北观察。

我来到城北炮兵阵地,二十八师晏福生政委告诉我:贺师长已去前边指挥反击去了。这时,可以看到增援高家屯的敌人从胡家窝棚直奔韩家窝棚而来。二十八师山炮营一阵急袭,把增援的敌人赶了回去。敌人的重炮群马上进行报复,炮弹在阵地前后爆炸了。晏政委忙对我说:“请司令员下去吧,我们一定把一O一高地夺回来!”我说:“你叫炮兵时刻注意胡家窝棚,敌人一伸头,就揍!”我又问炮兵三连韩连长:“会不会间接射击?”他说:“原理懂,没打过。咱们的炮是上刺刀的!”的确,我军的炮兵是和步兵一样英勇的,常常采用抵近射击;加上炮兵成立时间短,炮弹珍贵,很少进行实弹射击,也就缺乏间接射击的经验了。我说:“敌人进攻时成团成营的呆在那边山脚下,你们试打几发后再校正误差。咱们不会洋办法,土办法也行嘛!”韩连长向炮长们看了一眼说:“司令员批准我们打,我们一定把敌人报销掉!”

下午六时,八十二团全部和八十四团三营所有兵力,在贺师长亲自进行动员后,在全纵队炮火掩护下,分四路直扑高家屯。六时五十分,高家屯一线阵地全部收复。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这一天,廖耀湘兵团五个整师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遏止了。此时,由锦州兼程东进的我强大主力兵团,以雷霆万钧之势扑了过来。蒋军所谓“主力的主力”的廖耀湘兵团,陷入了狭长的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合围圈内,单等我们“瓮中捉鳖”了!

二十六日拂晓,野司首长拍来急电:

“东进主力已到达,敌已向东总溃退。望即协同主力动作,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野司首长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完成了!“人在阵地在”的决心实现了!二十六日四时,我纵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全线展开反击。十月的辽西平原上,到处响起了胜利追击的号声。指战员们忘却了疲劳、寒冷、伤痛、饥饿,哪里有枪声,就冲到哪里。在我大军四面猛打、猛冲之下,敌人犹如乱竿下的鸭群,惶惶然东窜西奔。遗弃的汽车、大炮、枪支、辎重,遍地都是。他们见到我们的战士就举手问道:“我们的枪往哪里缴啊?”仅仅两天,廖耀湘兵团就全军覆灭了。

枪声甫停,野司首长立即指挥各路大军直指沈阳、营口。我纵奉命到北镇休整待命。

在去北镇的路上,回望黑山阵地,各山头硝烟仍在徐徐飘散,被烈士鲜血染红了的一O一高地闪着光彩。我不禁默念着:再见吧,英雄的黑山人民,在胜利的红旗上,永远记载着你们的功绩和荣誉!安息吧,不朽的烈士,我们将坚决完成你们的遗志,把胜利的红旗插遍全中国!

(节选自梁兴初:《黑山阻击战》,《星火燎原》之十)

材料六　炮兵显神威

攻克锦州战役侧记

1948年9月,攻克锦州以北义县扫清锦州外围据点之后,我东北野战军主力把锦州城内的蒋军围得水泄不通。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军一旦攻克锦州,长春和沈阳之敌只有被歼的恶运。为解放锦州之危,他亲

自跑到东北坐阵指挥，急调华北、山东战场 7 个师，加上锦西原有 4 个师，从 10 月 10 日向我塔山阵地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阵地。廖耀湘第 9 兵团的 11 个师又 3 个骑兵旅，从沈阳增援锦州被阻击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蒋介石见援锦之敌西边受挫，东边受阻，命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如不能突围，就死守锦州，等待援兵。又令廖耀湘派飞机空运援兵，每批用十几架大型运输机，每次运一至两个团，以解锦州之围。

我军前线指挥部得到这一情报后，命令炮兵纵队控制机场，不准敌机降落，切断敌援兵之路。炮纵首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炮兵一团。团长黄登保接受任务后，便率领三营长李文源教导员赵林山和各连连长，到锦北帽儿山看了地形，选好了阵地。当时，我是九连指导员，和同志们一起进入阵地，连夜挖好了工事。站在帽儿山南侧，居高临下望去，锦州机场尽收眼底，正好在我炮火射程之内。我们营的炮，是日式 90 野战炮，是当时最好的武器。第二天，一批敌机盘旋飞到机场上空。战士们迎战心切，要求立即开火。营长李文源命令全营，等敌机着陆再打。敌机一架一架的刚着陆，我们全营火炮一齐开炮，顿时把机场炸得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击毁敌机 9 架，击伤敌机十几架。这时，营指挥所的电话铃中，传出了急促的命令：“不准敌机降落，要狠狠地打！”接到命令，我们马上换上空炸信管，做好了迎击下一批敌机的战斗准备。敌机只要一露面，进入火力范围之内，便马上开炮，打得敌机再不敢飞临锦州上空。

突然，营指挥所又传来：“范汉杰要乘飞机逃跑，汽车正向机场方向开去，把他的汽车打掉！”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有一辆美式吉普车向机场开来。营长一声令下，全营火炮一齐开火，范汉杰的小车吓得抱头鼠窜，到处乱转，跑回锦州。

帽儿山居高临下，封锁机场是有利地形，但不易隐蔽。敌人发现了我们的炮兵阵地。炮火不断地猛烈袭来。弹片横飞，浓烟四起，我们不断出现伤亡。但是，全营指战员始终顽强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10 月 14 日，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我们营的任务是摧毁城里的碉堡，为步兵夺取老城开辟道路。我们的火炮是六匹洋马牵引的，为了便于巷战，我们改用四匹洋马牵引。在进入锦州城西街的十字路口时，敌人从一个暗堡中射出猛烈的机枪弹雨，阻住了八连的去路，他们迅速将火炮对准敌暗堡直接射击，真象灶王爷上天——稳拿糖瓜，从这里开始，我们边打边前进，摧毁敌人暗堡，掩护步兵巷战。

经过 31 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锦州守敌近 10 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将官 36 名，解放了锦州。

战役结束后，炮纵副司令员匡裕民、政委邱剑戚。陪同前线指挥部领导视察了锦州机场，亲自看到我们击毁的 7 架飞机。在炮兵一师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授予我所在的炮兵三营一面绣有“锦北扬威，敌机群毁”八个大字的锦旗。至今，这面光辉的锦旗仍陈列在炮兵某部展览馆内，成为进行传统教育的行动教材。

（选自《党史纵横》92 年 3 期，作者：史新德）

材料七　解放长春

一九四八年年 初，在我军冬季攻势即将结束时，为迎接更大战役的到来，东北局、东北军区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第一前线指挥所（以后又叫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我任司令员，萧华同志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同志任副司令员（陈光同志不久调离），解方任参谋长，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长春外围战役已结束，郑洞国及其十万军队已被我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团团围住。六月，东北局向我们下达了“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打长春的总方针、总任务，将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的方针，改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的方针。六月十五至二十日，我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调整围城部队，全面部署围城工作。长春围困战役就这样拉开了战幕。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封锁区。我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十万敌军成了瓮中之鳖。

军事围困

“瓮中捉鳖”并非易事。此时驻守长春之敌约十万之众，其中西半部的新七军，是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云南滇系的六十军，虽到东北后屡屡受挫，士气不振，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东北的地主武装、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也决不会立地成佛。因此，我军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首先是以军事斗争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围城之初，敌人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后来，他们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大概以为固守孤城实在是坐以待毙的下策吧，于是就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有相当的规模。对于出扰之敌，我们的方针是：“如敌在一个师以下就原阵地迎击粉碎，如一个师以上，则诱敌深入，抓住敌人，使用机动部队歼灭之。”七月一日，围城指挥所在李家屯召开纵队、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的问题，特别发出指示，加强各结合部的封锁。还根据情报制定了打敌人向

西或向南突围的预定方案。七月三日夜，长春守敌以小部队向我独十师各团阵地出击，被我击溃。另一路敌军经丁家窝棚向我出击。但由于其尖兵班集体投诚，其他部队不战而退。四日凌晨，敌由火磨公司出动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独七师谭家营子阵地进犯，冲锋三次均被击退。六日拂晓，敌人用五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西南、正南和东南阵地出击。西南方向的孟家屯车站附近一仗最为激烈。这一带由于紧靠铁路线，估计敌人从此处突围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作了重点防守。围城之初，我曾经带着参谋人员到担任该地区封锁任务的独六师住过几天，利用夜间赴前线察看地形，与该师领导详细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独六师是一支老部队，战斗力比较强，加上做了周密的部署，部队警惕性高，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那天，敌人采取小部队多方佯动，寻找我侧翼与结合部，然后集中主力重点出击。由于六日拂晓大雾，敌人进到距我警戒线三四十米处才被发现。敌人在其据点炮火的掩护下，每次以四五十人为一队，轮番向我阵地进攻。当时，我军担任防御任务的一线部队虽只有一个班，但非常英勇。他们沉着应战，顽强还击，坚守阵地，直到主力赶到。双方激战至下午一时，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毙伤俘敌共一千余人。这是敌人最大的一次突围。此外，敌人还组织了几次中等的试探性突围，均被我打退。

八月十六日，围城指挥所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总部指示，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这时，我围城指挥所改称第一兵团。司令部向前压缩至距长春城二十里的四家子村。为了防止长春敌人突围，又调集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部署在双阳、伊通、公主岭一线以及梅河口至开原一线，把长春重重围住，从而也保证了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

九月，北宁线上的锦州之战打响了。我军进军的号角震撼了蒋家王朝，也使长春孤城中的敌人濒临绝境。为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东北各主力纵队均调集前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集通江口、开原前线。这时，围城一线部队只有独六、独七、独八、独九、独十师和后调来的独十一师，任务更加艰巨了。根据总部指示，为配合主力北宁线上作战，我围城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压缩部署，夺取一切能夺取的敌之外围据点，牵制迷惑长春守敌。如敌突围，坚决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继续固守，则选择突破口，构筑工事，为正式攻取长春作充分的准备，以待锦州战役结束后，主力回头打长春。为此，我围城各部队作了多种作战方案。不久又获悉，敌人估计我主要防守西南口中长路，于是将突破口选在长春以西大房身机场方向，企图以其最精锐的部队新三十八师作试探突围。掌握这一情况后。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又作了几个战斗方案，并交前线部队进行充分的研究讨论。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同意了我的意见。部队在几十里的区域内，分三个梯次部署展开。十月七、八两日，敌全副美装的三十八师向我独七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但经我数次各个击破，进展甚慢，气势渐挫。遭此迎头痛击后，长春守敌便缩了回去。突围计划遂成泡影。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经济封锁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面斗争。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最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实行经济封锁，是我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对于军队来说，历来是“兵马未至，粮草先行”。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把十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率十万敌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等待蒋家王朝的援济进行反击，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城内的守军绞尽了脑汁。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都被抢走，老百姓留的种粮也全被搜刮掉。许多房屋被拆得只剩四壁，房上的草被拉进城去喂马，木板木梁被拆去当柴烧。后来，我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部署，距敌越来越近。敌人外出抢粮、拆房，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逐渐逼得敌人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开始，敌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还安慰部下说：“没有关系，没柴烧拆房子，没粮吃有空投。”然而，现实是无情的。随着旷日持久的围困，前景日益暗淡，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遭我炮火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的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回窜；有的被迫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粮食都落到我们阵地或封锁区内了。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均成了我军的美味佳肴。郑洞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空投指挥所，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统一分配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规定大部分供给新七军。由于国民党军官兵饥饿难忍，谁抢到谁就私留分吃，加深了国民党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说：“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足见矛盾之尖锐。据当时美联社的一些“专家”分析，空投粮食要二十架飞机，每天飞行两次，才能供上长春的需要。可是，最多时每天十二架飞机，以后每天三四架，再以后每周三四架，阴天下雨无飞机，有的飞机还投不中目标。因此，空投只能是杯水车薪。

郑洞国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缺粮。"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加倍地搜刮长春城内五十万无辜居民。长春敌人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糠秕、豆粉等，都搜刮殆尽，"管制"起来，统一分配。

敌人为了减轻城内缺粮的压力，缓和矛盾，还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的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为此，我围城对敌斗争委员会专门设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的难民和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夏季，部队积极组织、帮助抢种荞麦、蔬菜，开展生产自救；秋季，积极帮助人民群众抢收粮食，保卫秋收。人民群众通过切身体验，深深痛恨国民党军，深深热爱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青壮年缉私、抓坏人，昼夜巡逻。这样，军民筑起铜墙铁壁，努力做到一粒粮，一根草都运不进长春城。敌人的阴谋失败了，饥饿降临到国民党军自己头上了。

政治攻势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长春成了一个孤岛，一座死城。敌人内外交困，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士气大跌，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展开了强大政治攻势，敌人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六月二十八日，根据围城总方针，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萧华同志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一、部队复杂，彼此间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二、断绝了陆上供援，孤点孤军，士气愈益低落；三、经过我地下党的工作和敌我双方的对垒接触，敌人对我军的政策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四、东北籍新兵多，归乡心切，盼望东北解放。会议指出，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部署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地的形式，瓦解敌军。

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在部队中迅速展开，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式。如阵地喊话。开始单纯用嘴喊，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后来，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这种办法既安全，效果又好。部队还创造了打宣传弹，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上；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这些办法效果都很好。

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敌人的军心，大量敌人逃出城来投诚。敌人为了抵制我军的政治攻势，不得不搞些反宣传。如组织"政工队"到阵地前沿骂阵，在部队实行"连坐法"等等。但这些终究抵挡不住正义的力量，逃亡投诚者与日俱增。开始，逃过来的人多是土匪杂牌部队的，正规军的较少，特别是新七军三十八师这个一贯妄自尊大的国民党军嫡系部队逃亡投诚的更少。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分析研究了敌三十八师的人员情况，针对该师多是关内人，思家心切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喊话，不喊让他们投降等带刺激性的口号，而喊"你们是怎样来当兵的"，"你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是为谁"，"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没有前途了"，"你们出来，我们一定发路费，放你回家"等内容。这样的喊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效果显著。敌三十八师中投诚的也日益增多。过来的士兵纷纷说："你们喊别的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一提家，我们就流泪。"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城内敌人纷纷投诚，由土匪杂牌军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携枪，由个别到整班整排地投诚。我们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城官兵接待站，在我们敌工部设立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有些合适的对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底，我们共接收投城官兵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其中，新七军三千七百余人，六十军三百余人，土匪杂牌军六千二百余人。

和平解放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部署，东北我军出敌不意，首先在锦州摆开了战场。我军主力六个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扫清了锦州外围，逼进锦州城。十月十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长春守敌因数次突围失败，自知突围已是飞蛾投火，即使有幸突出去，这支饿兵困军也必在半途被我层层截击歼灭，因而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十万余众。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要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

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延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这种形势也加速促成了六十军的起义。

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军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至此，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减少一些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的部下的苦心积虑。为了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郑"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二十一日晨四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二十一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诚。四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同志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儿，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最后一个敌据点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宜。"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作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上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萧华同志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选自《百战图》作者：肖劲光）

材料八　沈阳的黎明

十一月一日拂晓，我各路大军犹如股股激流，向着铁西区、和平区冲去，到处是草绿色的人流，军号嘀嗒，歌声起伏，眨眼工夫，沈阳市天翻地覆。

城里到处是高楼大院、横街竖巷，残敌四窜。工人、市民出来了，他们冒着流弹，主动为我军指路和报告情况。沈阳电缆厂内驻有敌人炮兵和骑兵大队，四门紧闭，未被发觉。一个护厂的老工人隔墙大喊："'八路'同志，这里有'货'！"在这位工友的指引下，我们一举全歼该敌。当我率师指挥所乘车前往中山广场时，在铁西俱乐部门前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白发苍苍，抱着个婴儿，脚下躺着一个血污模糊的少女。老人手指枪声激烈的市政广场说："打过去，孩子们，一个不留。"她老泪横流，悲愤已极。"老大娘，我们一定给你报仇！"战士们擦着眼泪，端着刺刀，从老人的身旁冲过去。

败兵无斗志。打到市内以后，敌人已经基本上失去抵抗能力。"缴枪不杀！""我们投降！"两种声音互相对应，此起彼伏。在集聚着敌人的大院里，旗杆上飘起了白旗；在敌人据守的大楼上，楼窗口伸出了白旗。市民们爬上大楼阳台，挤在门洞、窗口，拍手示意，为我军的胜利叫好。敌人的汽车、装甲车、坦克车纷纷自动开来，在口山路两侧整齐的排列着。驾驶员自我报名登记后，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等待我们调用。仓库、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待着我们接管。我们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敌人整团、整营的投降。为了加快这种"战斗"的进行，我们坐上敌人的轿车、吉普车、卡车奔驰着，纵然这样，兵力还是不够用，再加上敌人对投降的"仪式"很讲究，我们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九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在铁西区遇到六连一位班长带着八名战士接受一个坦克营投降。这九名同志是在部队向纵深发展中掉了队的。他们见一个大院里插上了白旗，院门虚掩着，门前还站着一个敌军官，就组织起来奔上前去。这军官看他们来了，忙向院内吆喝："开门！"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站队！"院里的敌人立即集合起来。刚好张主任赶到这里，他带着九名战士进了大院。这个军官发出"立正"的口令，跑到张主任跟前，举手敬礼："报告长官，本营实到人数八十四名，实有坦克八辆。请验收。坦克营营副王建业。"接着，毕恭毕敬地把一张名片送给张主任。张主任接过后，扫了一眼，问他营长为什么不出来。他说开小差了。接着，他又送来了一大包文件，一样一样放在张主任面前说："这是印章，这是花名册，这是坦克技术的材料……"

张主任问："坦克坏了没有？"

"没有，没有！贵军招降条件上说：不准破坏嘛，坏了不好交代。"看来，他对投降很有研究。

张主任走到俘虏前，简要地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又叫六班解放过来的战士给他们现身说法。这堂政治课，使俘虏们立即喊喊喳喳起来。他们象是忘却了自己的俘虏身份，有的低着头在袜头或衣缝里掏着什么，有的扬起胳膊抖索着一张色纸，叫喊起来："我们早知道了！"

这是我军散发的传单。记得一九四六年，敌人用飞机、大炮把大量传单撒在我们阵地上，说什么"党国枪好人多，装备好，吃得好"，叫我们放下武器，投归他们。可是

我们的战士只不过笑着拿它来卷烟、擦屁股罢了，但我们的传单却被国民党军官兵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这不由得使人发笑。

张主任说："不错！你们保存得很好。"

"长官过奖！过奖！"营副很高兴。他又问："什么时候叫回家，什么人能够回家！眷属怎样带？"

张主任一一作了解释。他咧着嘴满意地笑了。

八团团长宋文洪指挥部队拿下于洪机场后，又带领全团向城内发展，在铁西区没费多大力气，就解决了敌一装甲战车团，俘敌一部，缴获二十多辆装甲战车。他命令部队赶快往里打，接受敌人投降。为了靠前指挥，他同作战股长王培德和警卫员乘上一辆刚刚缴获的装甲战车，令驾驶员朝市中心开去。他们冲到中山广场，停下车来，正要下去观察情况，斜对面白楼上的敌人朝他们打了几枪。宋团长当即用手中的冲锋枪向白楼开火。跟上来的一营正准备发起攻击，白楼和另一侧的黄楼里的敌人都伸出了白旗。在战士们"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喊话声中，从这两座楼房里陆续出来几百名敌军官兵。同时，他们还解决了驻在另一座方形大楼里的"东北剿总空军司令部"。宋团长的身边只剩下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冯秀生、司令部一个参谋和纵队派来的记者于晓光等五人了。此时，来自马路湾的两名敌军官前来联系投诚。

"你们是哪部分的？你是干什么的？"宋团长问。

"我们是直辖总司令部高射炮团的。请长官前往。"

宋团长无部队可派，只好派宣传干事冯秀生等前往。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四百多敌人的投降，收缴了一排崭新的美造高射炮和三百多支美式卡宾枪、手枪。

在一片投降声中，敌沈阳第二守备队司令秦祥征、副司令王凤起和东北"剿总"高参邱立停，在南两孔桥以西找到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表示要率部起义。郝教导员率领二连，跟随他们到了守备队总部。秦祥征、王凤起说，他们有三个团，共八千人，都驻在附近一带，声称他们早已同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系了起义的事，要求我军按起义来对待他们。郝教导员没有答应，并令其带路，巡视了三个团的团部。八团命令这三个团立即放下武器，可是他们说不见到我前线司令，就不缴枪。半小时以后，我和纵队联络科长以及八团政委余琳见到了这两名敌守备司令。敌司令重述了他们的请求，副司令也随声附和着。

"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把部队带到城外，听候处理！"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是要求起义啊！我有三个团啊……"敌司令伸出三个指头，向我们讨价还价。

"先生们，现在只能算是你们投诚。"我严肃地说。

天色近晚，大批大批的俘虏在英雄的人民子弟兵的押解下，从大街小巷奔向集结的地方。

十一月二日，宜人的阳光普照着新生的沈阳。男女老幼怀着满腔热情，涌向街头。在马路湾的一个街口上，我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车夫，他望着满城红旗和毛主席画像，激动得老泪横流，扬着手，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这位老人，我不由得感叹：沈阳，你这古老的关东城堡，终于走完了漫长苦难的道路，迎来了黎明！

（选自《百战图》，作者：刘贤权）

材料九　蒋贼致长春守军手令落入我军手中

新华社长春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电蒋介石十五日命令郑洞国、曾泽生、李鸿撤出长春的手令，已由曾泽生将军交给解放军。手令称："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十月十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各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均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军纪制裁。中正删子（十五日子时）已来沈指挥。知照。中正手启，十月十五日巳时。"在今天的长春来看这个命令，确是一个大讽刺。长春是解放了，但是蒋介石下令撤退的人，一个也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蒋介石的命令十五日就由飞机投送长春，但是十六日就被曾泽生将军送给了解放军。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惊慌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殍，也已和饿殍差不多，而城外又被解放军四面包围着，插翅也飞不出去。事实并不是什么解放军被蒋匪军吸引于辽西方面，而是沈阳的蒋匪军主力被解放军吸引于辽西方面，因而蒋匪没有一兵一卒来接应长春蒋军的突围。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却还妄以"军纪制裁"去威胁他的部下。此间观察家说，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把"陷全般战局于不利"的罪名推给旁人。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这一回彻底破产了。曾泽生将军接到了蒋介石的手令，随即举行反蒋起义。紧接着郑洞国、李鸿两将军就率领全军缴械投诚。蒋介石的什么"军纪制裁"，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的局势下，稍为聪明一点的人就知道：究竟是学王耀武、范汉杰、张作相、卢浚泉那样做俘虏好些呢？还是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反对蒋介石好些？

材料十　中国最后专制王朝濒于覆没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电　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蒋介石政府，正在象一只破船一样地从历史上沉没。蒋介石虽已完全绝望，仍然决定要打到底。蒋介石所谓要打到底就是他不愿投降，宁愿将他现在还剩下的二百几十万军队打光。即令如此，人民解放军消灭全

部反动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战争第三年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已经丧失一百万军队，其中约有五十万是在十月分丧失的。约有四十万丧失于东北。十一月分的灾难不会比十月分轻。徐州战场的崩溃，数十万军队的复没，现正等待着国民党。而更重要的，则是丧失徐州等于丧失整个长江以北，等于丧失国民党军队的最后脊骨，因此，国民党正在努力挣扎。当蒋介石假装慷慨地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把武汉和徐州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的时候，他是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完了，打算把自己的嫡系撤退到长江以南去。但是他的计划已经来不及实现。南线和北线，蒋介石都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了。北线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诸点早已互相不能联结了。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点的联结亦时被破坏。南线也是如此，徐州、汉口、西安三大中心已经不成一条什么战线了。这只是三个据点及在这三个据点附近摆了三堆军队，当然不成什么战线了。长江以南，国民党的战线还没有建立，并且是建立不起来的了。对于这种形势，不但蒋介石的左右，而且连蒋介石自己在内，无不极度悲观。十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刊物"新闻天地"称：蒋介石由沈回平，闻锦州失守，极度悲痛，召开军事会议，谋求"死里求生"。其他消息称：辽西廖耀湘兵团全军复没后，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又连续吐血。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一方面是面对着徐州的危急情况，另一方面是面对着金圆券和限价崩溃后经济战线特别是粮食的危急情况。上海的米价一周内由每石八十金圆涨到一千八百金圆，南京的米荒使十日一天内一百家米店被抢。南京行政院长一职自翁文灏辞职后至今无人敢就。南京的要人们纷纷准备向两广及台湾逃难，并谈论着迁都广州的问题。李宗仁、何应饮、白崇禧之流正在活动着逼迫蒋介石"下野"。为了准备下一步，为了夺取"反蒋"的领导权，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被称为官方反派的特务分子"立法委员"刘不同，公开著文主张蒋介石出国并"恢复和平"。他们的目的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替反动派保留下一些力量。因此他们的活动，与人民反对反革命内战的斗争所遭遇者相反，并未受过禁止。但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接受他们的建议。蒋介石在八日发表演说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这就是说，你们要我下台，我是不想下台的。蒋介石安慰他的部下说："这次东北军事虽已失败，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这只是在说谎。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根本上已在崩溃，他的什么"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材料十一　辽沈战役中的蒋军上层

陈诚在东北大丢面子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调动其数百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疯狂进攻，谁知形势逆转，经过半年时间，反而丢掉一百多万军队。蒋军不得不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蒋介石集团内部本来就存在的矛盾也因之越来越尖锐。

这时，各方盛传参谋总长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这是陈诚在关内作战失败，想到东北出出风头挽回面子，感到愤愤不平。七月十二日，当陈诚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时，熊式辉即乘此接连七次向蒋上书辞职，蒋却一再复信抚慰，表示决不更动东北人事。

正当熊准备整军经武之际，不料蒋忽于八月初命令陈诚密赴沈阳，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并取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陈独揽党政军大权。蒋的这一举动，简直使熊伤透了心。他感慨地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给他再卖命……哎！"

八月七日，美国侵华矛头魏德迈在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当时给人的印象是：陈到东北是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今后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必将优先供给东北。但是，谁也不相信陈诚在东北会比熊式辉干得更有起色。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建设三民主义新东北"。他锐意整军，扩充军队，同时又重演其排除异己之故伎，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四平街守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多人，统由其心腹接替。好心人劝陈诚说："总长撤换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他们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竟大夸海口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匪，我明天就缴他的枪。"

十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十万人，曾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但在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前，他的气焰又嚣张起来，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军扫荡。计划还未实施，驻辽西公主屯的蒋军精锐部队之一——陈林达的新五军告急。陈的副参谋长赵家骧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的计划，陈看后，一面连称"很好、很好"，一面却犹豫不决：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总不下令执行。直到六日晚新五军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时，才匆匆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但是为时已晚，新五军刚开始行动，就遭到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在一夜之间消灭殆尽，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均被活捉。陈诚吓得手足无措，连夜向蒋介石告急。据说，陈诚当时把责任完全推到第九兵团司令官

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等将领不服从命令上。急得蒋介石八日亲飞沈阳，于当日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解新五军之围。廖、李当然不服气，挺身申辩，说他们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遂使蒋、陈尴尬异常。陈诚在僵局下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马上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蒋说完后离席，陈又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沈阳失守，我将以手枪自杀。"

蒋介石走后，已经吓破了胆的陈诚见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一直不停，情知难于稳坐东北，便叫老婆谭祥去南京走宋美龄的门子，说动蒋介石调他回南京。让谁去替死呢？蒋属意于卫立煌，便将卫由沪召来，让卫去东北"挽回大局"。卫表示不去，蒋又指使张群、顾祝同前往劝诱。谭祥为了挽救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早日成行，并说："东北只有卫先生才有办法。"卫夫人韩权华甚为不满，事后曾对我说："有权有利他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就叫人家去替死。"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即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托病悄然离开沈阳，飞回南京。国民党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对陈临阵脱逃都嗤之以鼻，一时成为笑谈。

不久，蒋介石又召我到南京去。我想去看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到陈公馆后，只见陈红光满面，根本不象有病的样子。陈为了平息东北人士之愤，于十六日奉蒋之命电邀东北将领和东北官绅会商，并为自己失败辩护。谁知东北人士根本不买他的帐，陈只得请假赴美治"病"，以避舆论指斥。四月间"国大"开会，一次白崇禧正作军事报告，忽然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到美国！"接着东北代表、山东代表纷纷要求惩办陈诚。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捣乱"，慌忙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矛盾重重的东北局面

蒋介石急于让卫立煌去东北顶替陈诚，不能不给卫以一定的权力。一月十七日，蒋明令派卫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把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卫；同时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又由关内增兵若干，补充装备。为了顾全陈诚的面子，名义上仍让陈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代行主任职权，二月十二日又令卫兼代主任。陈逃回南京时，还拉着郑洞国在蒋面前为他作证，仍说蒋军在东北失败不是他指挥失策，而是各将领不服从命令。

这时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一月六日解放辽阳县，九日打到沈阳南郊白塔堡附近，二十六日解放新立屯，二十九日解放沟帮子，三十日解放盘山县，二月十九日解放沈阳外围据点法库县和东北钢铁基地鞍山市。

卫立煌到东北后，军事上始终采取持重方针，他的策略是把部队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不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也不论守城部队如何告急，以至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他一概不为之动。蒋见卫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只留下一个军和一个师防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卫坚决反对，于二月二十三日派副主任兼副司令郑洞国赴牯岭向蒋申述意见。卫列述的理由是：人民解放军已占领锦州与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无法通过；蒋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相当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但蒋不同意卫的主张，仍向郑交代，要卫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锦路撤到锦州。郑于二十五日返沈复命。从此蒋、卫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郑返沈阳后，卫立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意见，主张不实行蒋的计划。其中尤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和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主张最力。经赵、罗二人赴南京向蒋再次申述意见后，蒋始同意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击，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到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卫的这一方案。

二月二十八日，人民解放军又解放开原；同时，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隆、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蒋军辽热交通，进攻锦州和山海关。卫为避免分散孤立的小据点被人民解放军吃掉，遂命郑洞国、赵家骧指挥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

三月九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永吉和电都小丰满，十三日解放四平街。冬季攻势至此告一段落，先后共歼蒋军十五万余人。东北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卫的计划是加紧将部队补充训练后，长期固守沈阳。

但是，蒋从主观愿望出发，始终不忘将沈阳蒋军主力撤至锦州的念头。三月三十一日晚，卫从沈阳飞南京向蒋汇报，翌日十一时蒋再度召卫谈话。蒋以沈阳、长春交通断绝，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为理由，一再要卫仅留少数部队防守沈阳、长春，将主力撤到锦州。卫坚决反对，认为部队不完成整训，不仅不能打到锦州，反有被消灭的危险。蒋不断唉声叹气，卫坚持分寸不让。僵持良久，卫才说："只要主力不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由我负责。"蒋顺水推舟说："好，好！只要你对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照你的意见暂不撤到锦州，不过一旦补充整训完成，还是要赶快

打通沈锦路。”卫答应了，次日即由补给司令刘耀汉陪同，拜会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请美国空军帮忙运输，巴原则上同意尽量协助。

卫回到沈阳后，为了实行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每天整军经武，加紧训练，加上美军顾问团大力支援，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蒋军士气又开始振作起来。五月初，蒋又令卫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至锦州。卫未完成整训计划，当然不肯同意，又派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蒋听完汇报后，依然坚持只留五十三军和二O七师防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炮兵、骑兵、战车、装甲车等特种兵团全部编为机动兵团，答应归廖统帅。廖一看成立机动兵团可以扩充个人权力，当即表示同意；但返沈阳向卫报告后，卫怕廖把主力拉走，表示坚决反对。于是卫、廖之间也发生矛盾。

蒋介石眼看东北将领上自总司令，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和各军军长都不同意他的方案，本想将东北大权给廖，但廖又受卫牵制无法执行他的命令。最后只得决定将一月间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至锦州，命令范汉杰准备打通沈锦路，把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将东北蒋军全权交范，这又造成卫、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经过几度争执，七月二十日卫赴南京见蒋。蒋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从此把卫立煌悬在一边。这样一来，搞得东北蒋军将领各怀鬼胎，各据部分实力，个个都得直接听命于蒋，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一直拖到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伟大的辽沈战役，蒋军仍未确定一个明确的军事方针和决策。

蒋介石亲自出马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首先从北宁路榆锦段发动攻势。蒋介石根据本没有预料人民解放军会采取这一决战性的战略，而且对解放军截断榆锦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开始也未注意。九月十六日，山东人民解放军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也向锦州外围义县进攻，打得蒋介石顾此失彼，晕头转向。蒋无计可施，只得暂时丢下东北不管，首先集中精神亲自指挥济南作战。但是，济南于二十四日解放，东北义县也已垂危。范汉杰在锦州连电乞援，蒋才于当天召卫立煌到南京开会，迫令卫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依旧拒绝接受蒋的这一命令。蒋如热锅蚂蚁，一面强令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一面下令空运部队向锦州增援，并派总参谋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他的命令，他自己则在南京坐待王耀武的下落。

二十六日，顾祝同、卫立煌飞抵沈阳。第二天开始向锦州空运部队，到二十八日，锦州机场即被解放军炮火封锁。顾祝同虽在沈阳一再召集东北将领开会，终未说动卫和东北将领执行蒋的计划，派兵解锦州之围。卫对顾赌咒发誓说：“出兵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廖耀湘这时主张将沈阳主力撤至营口。卫表示，顾如不愿照他的意见办，也可实行廖的方案。顾又急又气，与卫大吵，甚至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卫则极力忍耐，但坚持不下向辽西出兵的命令。顾眼看义县危在旦夕，卫又不肯出兵辽西，只得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南京向蒋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

蒋介石听了顾的汇报后怒不可遏，于九月三十日飞抵北平亲自指挥，当天午后在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说，“革命”发生困难是长期的，他预料八年后苏美必战，“其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蒋的讲话都觉得没希望了，连蒋自己都毫无信心，竟想靠美国人侥幸获胜，这仗还有什么打头！傅事后对我说：“这是我思想上对蒋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

以后一连几天，蒋一直与傅商讨从华北抽兵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三个军和一个独立师海运到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侯到任前由原驻葫芦岛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暂代。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赴沈阳，当天午后四时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后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和省府厅长以上人员会餐。餐毕，蒋对师长以上将领讲话，要求将领们“以杀身成仁的精神完成戡乱大业”，又说：“我这次来沈是为救你们出去，……现在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万一你们打不出去，那么来世再见。”

三日下午，蒋介石飞返北平。记得也是这天，我为徐州“剿总”作战计划来北平向蒋请示。两天后蒋批准了我所拟的作战计划，我即于四日返徐州。

五日，蒋飞天津，到塘沽新港视察后，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葫芦岛部署指挥。次日召集各将领开会打气，并交代在侯镜如未到以前，由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海军以二十四生的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当天又向锦州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七日，蒋乘“重庆”号返塘沽。在军舰上他大发神经，吃饭时用白手套到处乱摸，发现有灰尘便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直到吃完饭气仍不消，弄得以后谁也不敢陪他吃饭。蒋当天返平，次日又飞上海，据说是为了“私事”。

九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从各方面报告发现卫立煌、廖耀湘迟迟未照他的指示沿沈锦路向锦州前进，于是又匆匆到沈阳把卫、廖及东北将领痛骂一顿。至此，廖才以主力向新立屯、黑山攻击前进。蒋又令阙汉骞指挥葫芦岛部队在海、空军掩护下，以斗牛式战法向塔山附近解放

军阻击阵地正面强攻。从十日至十三日四天中，蒋军连续猛攻均遭失败，又派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亲往葫芦岛监督蒋军猛攻塔山。谁知人民解放竟越打越强，仅十四日一昼夜，蒋军先后九次突入塔山阵地均被击退，打得蒋军谈虎色变，再也不敢进攻。锦州解放后，蒋介石气得大骂蒋军将领无用，"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

十月十五日清晨，正当我在徐州准备上火车到商丘指挥所属部队向山东人民解放军发动攻击时，蒋介石忽从南京来电要我不要执行原定计划，并说马上派飞机接我到沈阳，搞得我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到沈阳后，蒋已先行到达，见面后告诉我："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锦西。同时给长春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十六日上午锦州情况不明，事实上前晚已被解放。蒋在证实范汉杰在锦州被消灭以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慌忙先飞锦西，然后乘汽车到葫芦岛，大骂阙汉骞"丧师辱国，该枪毙！"饭后又交代侯镜如指挥收复锦州，当天即飞返北平。蒋在北平先后派飞机几次传达他给卫立煌的"手谕"，一次仍是命令廖耀湘兵团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另一次是要卫设法援助郑洞国从长春突围。

这时，卫已接到郑洞国的多次电报，迭告曾泽生起义，第七军放下武器，郑退守长春银行大楼。当时我曾奉蒋之命给郑去电，说正设法援救他。其实，蒋除向我口头交代了一句之外，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援救"的办法。十八日郑回电略称："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效命。"

当晚郑的左右迭次来电："共军猛攻银行大楼，郑副司令有自杀企图。"此后电讯中断，情况不明。次日郑即由左右向人民解放军接洽，最后率残部放下武器。

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之谜

锦州、长春解放以后，蒋介石再次飞到沈阳，召集卫立煌、我和赵家骧等人开会。蒋在会上说："据空军连日侦察，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他们不会守锦州。"然后强要卫下令廖耀湘率主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部队收复锦州。卫因在多次会上受蒋责备默不发言，蒋一再追问："俊如兄意见如何？"卫让我和赵家骧讲讲。我推托不明情况，让赵先讲。赵摊开两张敌我态势图，分析敌我双方兵力说：敌在东北兵力约八十万，超过我两倍多，且敌无后顾之忧，我则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北分进，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其结论是："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一听赵的意见不符合他的愿望，立刻把胡子一吹，怒气冲冲地说："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蒋又问我："光亭的看法呢？"我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见我未迎合他的主张，虽然怏怏不乐，但也未作硬性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回北平。

这里需要补述的是，蒋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主持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讨论"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但我到沈阳时，尚不了解这一情况。

十八日晨，蒋介石来电要我同卫立煌一起到北平开会。我和卫在飞机上商定决不同意马上攻锦州，万一蒋要放弃东北的话，也只能从营口撤退，而不能照蒋的意志强攻锦州，致使东北蒋军全军覆没。当天午后二时，蒋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在东城圆恩寺蒋的行邸开会。会上，卫坚持集中兵力防守沈阳，而蒋则非收复锦州不可。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两种对立意见仍然无法统一。蒋问傅作义："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见没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两眼发红，从沙发上跳起来把卫大骂一顿，接着又举着拳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国军到锦州后再不向东北前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我一听这话，不觉恍然大悟：原来早在抗战胜利之初，蒋已决定在东北劫收只到锦州为止。这就揭穿了蒋坚持收复锦州之谜。联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到锦州后，蒋曾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以后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间，蒋才完全听从美国主子的命令，将劫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增加到七个军。现在蒋的反人民战争遭到全盘失败，促使他又回想起自己当时的"灵机"，认为确保锦州就是他的胜利。我由此判断蒋已决心放弃东北，但为顾全个人尊严、国际影响和国内政治压力，又绝不会明令放弃东北，而是希望由他的喽罗代他受过。这天我的腰腿疼痛，为了迎合蒋的心理，便在会上建议两个方案，其中之一是：以营口为后方，用一部守沈阳，主力由廖耀湘率部从南部进击大虎山、黑山，成功则进而收复沈阳，失利即逐次退向营口，蒋觉得这一方案大体符合他的意图，马上表示同意。但是卫仍闭口不言，傅也不置可否。一直拖到六点多钟，傅指着卫和我说："我约他们几位吃饭。"蒋说："好，好。你们吃了饭再来开会。"

饭后，我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卫说他们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蒋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去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十二时来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主任的事，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干脆说："我有病不能去。"罗给我戴高帽，说好话，一直谈到午夜二时，也没把我说动，最后竟用蒋的命令威胁我说："要是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我气呼呼地说："就是下命令我也不去！"罗见话不投机起身要走，我心里冒火，睡在床上也没有理他。

罗走后，我翻来复去不能合眼，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为了不让罗在蒋的面前告我的状，便在次早六点钟来到蒋的行邸，等蒋一起床就向他陈述我的意见。果然蒋在七点来钟便让罗来传我见他。蒋见面就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样？"我开门见山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赶快回徐州为好。"蒋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到锦州，一切都有办法。"我认为目前东北国军难以对敌攻击，蒋又是那句老话："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又问："罗参军意见怎样？"罗连声附和蒋的意见。我用秦王伐楚的故事把罗讽刺一通之后，接着说："罗参军既然认为目前国军可以与敌决战，那么就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更可收速战速决的效果。"罗听了不禁大吃一惊，连说："不能去，不能去。"这时我反问蒋说："校长认为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引《孙子兵法》说："如果只有六成把握，我们只会失败。"蒋沉默好久才说："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和美国顾问团讲好，只要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这是蒋坚持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收复锦州是为了继续取得大量美援。

我反复向蒋申述：目前收复锦州凶多吉少，甚至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蒋说："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你可以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我仍坚持让卫在东北，我回徐州，蒋断然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快去接卫的事。"我无可夺何地说："既然校长已下此决心，学生当然要服从命令。但希望对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一如旧例，仍由中央统一计划，并要优先补充兵员和充实装备。"蒋一听这话大发雷霆，挥着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学生不能？"我说："现在我们在东北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学生不是巧妇。"蒋又大发脾气，面红耳赤地骂："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说着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这时我想溜走，但慑于蒋的淫威不敢走；想留下来，又怕他硬要我到东北去，真是进退两难，如坐针毡。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定还是"等等再看"。等了一个多小时，蒋又下楼来了。他一改怒容为笑脸，走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我沉思一阵后，列举三条理由，说明"我还是快回徐州为好。"蒋听了我的意见未加可否，反而仍按他的思路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就以原名义调到东北，担任卫的副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就设在葫芦岛。"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已失去再推御的勇气，只得说："我认为徐州重要，校长既认为葫芦岛重要，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连说："葫芦岛重要。"接着交代我当天午后即回沈阳，向廖耀湘等下达攻击黑山、收复锦州的命令。显然，蒋介石是决心不要东北了，而我，已无法逃脱代蒋受过的命运。想到这里，不禁心慌意乱，难受已极。

这天午后，蒋在圆恩寺行邸再次召集傅、卫和我开会，宣布我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我心里有难言之苦，傅、卫也不愿多说，几个人都面面相觑。

东北蒋军的最后覆灭

十月二十日下午，我与卫立煌同机飞赴沈阳，在飞机上商定当晚召集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开会，传达蒋的命令。晚饭后，廖、刘、赵等来到，首先由我讲了蒋的口头命令要旨，接着让大家发表意见。廖、刘等人讲了讲东北军事现状之后，引起大家同声慨叹："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一致认为蒋的命令是失策，但这时谁也不愿承担东北蒋军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发发牢骚而已。

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的命令，我和卫则心里矛盾重重，都不能安枕休息。次日午后，我到葫芦岛召集阙汉骞等主要将领开会。大家听我传达了蒋攻击锦州的命令后，都互相窃视，面带难色。从随后会上发表的意见可以听出，各将领全无信心，我只得硬着头皮瞎吹一阵，给大家鼓气。

二十三日，东北蒋军开始发动攻击：廖耀湘兵团在辽西方面的部署，原拟以无线电联络，我到葫芦岛后，因无线电发生故障即与廖失去联系。事后得知，这天廖下令向黑山猛攻，受挫后以一部掩护，主力分三路向营口撤退。双方在黑山、大虎山间经过几天激烈争夺，至二十五日晚廖的司令部被人民解放军袭击，廖才电卫立煌请示。卫令廖向沈阳撤退。次日廖令四十九军掩护各军分头撤向沈阳，但人民解放军已到达台安、盘山等地，将廖兵团四面八方包围起来；沿途分段截击；黑山、大虎山正面也被冲垮，五个军共十二个师被截成数块，先遣队到台中的一个师起义，高级将领自顾逃命，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整个廖兵团在一夜间全部土崩瓦解，被歼殆尽。

最可笑的是，当廖兵团二十六日已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失去联络以后，蒋介石竟于二十七日清晨派专机从葫芦岛接我到北平，窘态毕露地说："廖兵团电讯已失，我想采纳罗参军意见，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部队运到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撤退。"我听了哭笑不得，强压怒火说："将葫芦岛部队海运营口至少要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内，廖兵团要是还存在的话他们自己就可以打出来，否则一两天就完了，何须再把葫芦岛部队运去送死！"蒋这时完全没有几天前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甚至对我表现言听计从，他问："你看怎么办好？"我想了想说："我看廖耀湘已靠不住了，现在不是往营口运兵，而是快把营

口现有兵力撤出来，沈阳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问题。"蒋连说："好，好。船，我马上叫桂永清去准备。"接着又吩咐我马上去沈阳见卫，布置沈阳防务。

午后我从北平起飞，路过葫芦岛降落，令锦西部队停止攻击并退回既设阵地，严防人民解放军反攻。傍晚飞抵沈阳，只见卫心绪缭乱，坐立不安，听说蒋要他布署沈阳防务之后，他苦笑说："以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手里什么也没有了，叫我如何守法？"最后只得按蒋的命令，派周福成指挥五十三军部署防守。

晚饭后，我和卫谈论廖兵团何以垮得这样快，这样惨。卫夫人韩权华也来了，她难过地说："为什么非这样把部队送掉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为蒋氏王朝行将覆灭而垂头丧气。

三十日，即我回葫芦岛的第二天上午，蒋又派了一架飞机到锦西机场，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到沈阳令周福成调整防务，再回葫芦岛。我当即乘飞机前往，未至沈阳上空，王叔铭就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光亭兄千万不能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再说。"不久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我想沈阳已经完了，葫芦岛、营口如不急行撤退，一旦受攻击想退就迟了，于是决定先到北平向蒋请示后再回葫芦岛。十二时后到达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披一件黑斗篷，满脸通红地朝机上走。我向他敬礼后，随他到空军作战室，报告"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尴尬异常，一句话没说。我接着汇报了赶快撤退营、芦部队的想法，请他早定大计。蒋听到这里，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

我回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同侯镜如等马上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等东北高级官员。

卫到葫芦岛后饮食无心，坐卧不宁，住了一个星期，即奉蒋命到北平居住。一周间，我和卫、赵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了。到十一月份蒋介石下令对卫撤职查办，果然把他自己失策的责任全部推到卫的身上。

十月二十七日，蒋答应我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部队，可是大约到三十一日晚才派来一艘登陆艇，而且直到十一月二日仍停在营口以外没有进港。这时营口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从营口撤逃的五十二军遭到猛烈攻击，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谎称："船已进港，正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三日晚才有一艘登陆艇和一艘小商船驶入港口。刘部共两万余人，结果连同动用营口民船也只装下一万五千人左右。有艘小火轮因载重过量岌岌可危，又被炮弹击中，官兵及船上人员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难以数计。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炮兵又误认是敌人，开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没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就这样一个军仅以一艘船撤逃几千人。

当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以后，我心里诚惶诚恐，生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打到锦西。这时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我一面急电蒋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在撤逃的几天里，葫芦岛蒋军都恐慌不安，后勤机关及行政人员恐慌尤甚，整天一群一群地拥挤在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所幸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发动攻击，才给蒋军留下一条逃命的生路。到十一月八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便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起飞逃北平。

我在北平住在东城弓弦胡同二号。九日清晨，北平下了一层薄薄的雪。这时，我脑子里充斥着唯心迷信念头，暗想：蒋氏王朝即将垂亡，连苍天都哭了，我也为之感到无限悲伤。百无聊奈，便乘车到北海公园，一直爬上白塔，一边惆怅地俯览中南海、景山、故宫的肃杀景色，一边在心里默祷："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选自《纵横》83年2期，由于宏根据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一文缩写）

材料十二　人生历程中的转折
——我在辽沈战役前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率中国驻印军由印度回国。不久被任命为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并参加了接收上海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初，当时在东北指挥蒋军向人民解放军进攻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不能视事，乃电请蒋介石任命我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三月初，我即赶往锦州指挥军事。从此，我就卷入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中。

老实说，当时我也感觉到发动这场内战是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之后，国家残破、经济凋敝。人民困不聊生。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在这个时候大打内战，无异是把国家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但是，在长期的反动思想毒害下，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学生，我不敢、也不愿违背蒋介石的意志。我认为，政治上的事情，终究要有"领袖"、"政府"去解决。作为军人，我需要的只是服从命令。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我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东北内战之初，杜聿明和我在军事上是乐观的。我们认为，东北解放军人数较少，装备亦低劣，在东北又尚未立足稳固，群众基础不如关内好。而蒋军则有美军的大力支持，且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又有新一军、新六军这样

的"王牌军"参战，只要果断地展开全面进攻，必能迅速地抢占整个东北。因此，我到锦州后，即按原定作战计划，在苏军撤走后，指挥几十万蒋军沿北宁路猛进，很快就占领了沈阳、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等重要城市。随后分兵以精锐之新六军、五十二军等部进攻沈阳外围重镇本溪，以作为拱卫沈阳之有力屏障。另由我亲任前敌总指挥，率精锐之新一军、七十一军等部沿中长路两侧向北大举进攻，相继攻占铁岭、开原、昌图、法库、四平，最后一直占领长春、永吉。本溪方面亦告克复。时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赶回东北，坐镇沈阳，指挥军事。

面对蒋军的猖狂进攻，人民解放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方面在东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迅速地在南满、北满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协调行动，互相策应。另一方面则不固守于一城一池，而是采取运动战的方式，对进犯之蒋军相机给予沉重打击。这样到了五月份，东北战局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蒋军表面上的节节"胜利"，其致命弱点暴露的日益明显。这就是蒋军因战线拉长，处处设防，加之在进攻中不断遭到解放军的重创，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造成机动兵力严重不足，军队士气低落。而解放军却愈战愈强，力量不断壮大，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东北蒋军转入战略守势。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解放军的积极反攻下，蒋军战局日蹙。在北满，蒋军完全孤立在长春和永吉两点上，而其主力则局限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一带。东北蒋军虽然反复挣扎，但是局势还是一天天地糟下去。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被迫将重病缠身的杜聿明调离东北。此后，东北蒋军几易主帅，都未能挽回失败的颓势。

一九四八年元月，卫立煌将军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后改任"剿匪"总司令，同时任命我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这时东北局势更加严重，北宁路已为解放军再次切断，解放军正集结大量兵力进攻辽南、辽西的蒋军。三月，解放军又再次攻克四平，歼灭精锐的七十一军一个整师。在四平战局吃紧时，为避免分散的蒋军被各个击破，卫立煌派我赶往长春，亲自指挥驻守永吉的六十军向长春撤退。到此时为止，蒋军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小城市了。鉴于这种情况，我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考虑到长春距主力太远，这里的蒋军大有被吃掉的危险，乃向蒋介石、卫立煌建议应主动放弃长春，将东北蒋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尽可能地支撑一下岌岌可危的战局。但蒋介石没有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很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长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等等。不久，我先后接到卫立煌、蒋介石的命令，要我立即由沈阳飞往长春，就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这时，我的一些朋友和身边的幕僚们都劝我不要接受这项危险的任命，我内心里的斗争也很激烈。很明显，这个时候去已陷于重围之中的长春，无疑是死路一条。但是，由于长期反动思想的毒害和旧意识的束缚，最后我还是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的信念来到长春。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光。

当时，在解放军重兵围困之下的长春，城内驻有新七军、六十军及兵团直属部队、地方游杂部队等计十万蒋军，另有居民近二十万人。除仅有的一个飞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极度缺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我到长春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其作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在军事上，我以中央大街为界，将长春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七军负责。除了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伪满时期留下的坚固工事和建筑物，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层层设防，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我特别命令新七军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控制西门外的飞机场，并着六十军派出一个师坚守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最令人头痛的是那些地方的游杂部队，其中多是地主武装，素来战斗力不足，骚扰百姓有余。我只好将其中素质好些的编成两个旅，使其参加市区防务，其余干脆一律逐出城外，任其自生自灭。

粮食是当时最为困难的问题。解放军的严密封锁，使陆上交通断绝，城内粮食来源皆赖空运（以后被迫改为空投），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城内几十万军民的需要。由于粮食严重匮乏，市场上投机倒把盛行，粮价一日数涨，搞的人心更加不安。对此，我一面严加整饬军队纪律，加强对粮食的集中管理和分配，取缔市场投机，甚至枪决了个别倒卖军粮的军官。一面试图向城外疏散一部分市民，以减轻城内压力，但是都没有取得多大效果。随着粮食问题的日益恶化，以及解放军加强对飞机场和城防的威胁，我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缓和局面，乃于五月初从新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的兵力，从六十军抽出一个师的兵力，组成一支突击部队，向飞机场西北方向出击，企图将解放军逐出火炮射程之外，以确保机场正常使用，并乘机向四郊搜寻粮食。但是战斗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部队虽然打出几里地，但粮食却颗粒未得。更糟的是，守备机场的新七军一个师，突然遭到解放军猛烈袭击，损失惨重。我看情况危急，急将出击部队迅速撤回，机场遂被解放军占领。这样，我的控制机场和搜寻粮食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此后，解放军进一步加紧了对长春的围困，由过去的远困改为近逼，双方火线距离，近处仅几百公尺，远处也不过千多公尺，不时发生零星炮战和小规模交火。此时城内守军及居民的处境更加困难了。粮食、燃料存量越来越少，许多人饿死、病死，有的街道尸首横陈，无人埋葬。城内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拆毁，树木、柏油路也遭砍伐、挖掘，虽一再明令制

止，亦无济于事。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现象。悲惨的状况，真是目不忍睹，一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我明白，这时除非出现奇迹，否则灭亡的命运已经不远了。但是我仍然强作镇静，拼命支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由于我的顽固，给长春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是我后来思之而痛悔不已的。

一九四八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十月初旬，我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集中两个师的兵力，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从长春市的西北角打出去十几里路，但是解放军阻击的非常顽强，我感到突围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又决定继续固守下去。几天之后，蒋介石下令要我们立即设法突围。我召集各军、师长开会，研究关于突围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体力甚弱，很难闯过解放军的层层阻击，倘勉强突围，必遭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不如坚守下去再说。我只得将会议结果电复给蒋介石。十月中旬，解放军攻克了联系关内与东北蒋军的咽喉城市锦州，全歼蒋军十余万人。这样，整个东北蒋军的陆上退路都被切断了。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再次严令我们必须立即突围，否则将以军法从事。我只得重新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宣读了蒋介石的命令。会上不再讨论能否突围，只研究如何突围的问题，最后决定于十七日拂晓开始行动，并作了突围的详细部署。当时新七军军长李鸿正患伤寒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那天的精神很紧张，到会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又借故匆匆离去。我虽有些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当晚，我思前想后，明知这次突围只是为了服从命令，其结果无非是让我们都战死在城郊。一种难以名状的绝望心情袭上心头，加之一天的疲倦，不觉昏然睡去。到了午夜时分，部下突然将我唤醒，报告说六十军的部队有变动，已经失去电话联系。我知道事情发生突变，立即命令新七军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并迅速向六十军方向派出警戒，同时将情况电告给卫立煌。十七日清晨，我派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去见曾泽生，曾写了一张便条要杨带给我，说明六十军已光荣起义和起义的原因，我将便条内容再次电告卫立煌。不久，蒋介石即派飞机前来轰炸。当空军向我联络时，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百姓遭殃，还是停止轰炸吧。"

十七日上午，我召集新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会上，大家都哭丧着脸，默无一言。末了，还是我的一位老部下邓士富师长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我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采纳他的意见宣布闭会，大家怏怏而散。晚上，我去新七军军部看望李鸿，他的病并不很重，却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其它将领也有意回避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才知道，他们已与解放军接洽投诚了）。副军长史说是我在印度作战时的部属，他力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还是坚决要回到兵团司令部去。

在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我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我想不通，为什么几十万装备精良的蒋军在人数、装备都占劣势的解放军面前，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败涂地。我也想不通，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何以落到如此下场，这些都怪谁呢？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我所维护的蒋家王朝是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更没有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尽管此时我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已彻底失去了信心，但在旧思想的影响下，仍顽固地准备挣扎到底，以保全自己的所谓军人的"气节"。我就是带着这种迷惘、绝望而顽固的心情回到了我的司令部所在地——中央银行。

十七日夜间，突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我还想劝他回来，他只是说："有人和你讲话。"就放下了听筒，接着一位陌生人对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我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办不到的。"十八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报告说："新七军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但是我还不愿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龙国钧只好失望而归。就在这天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放下了武器。到了此时，真是山穷水尽了，我将全部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并对他表示"来生再见"，随时准备牺牲。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附近，突然响起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十九日清晨，我的司令部也放下了武器。后来才知道，我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先已同解放军进行了秘密接洽，并有解放军的代表到了我的司令部。我的部下们为了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上挽救出来，想出来一个办法，要直属部队朝天放枪，表示"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要我跟着他们走。今日回想起来，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谢这些部属们，更不能不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放下武器以后，党和人民并没有追究我的过去，却给了我种种优厚待遇，这是我从未料到的，心中十分感动。以后，我亲眼目睹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认真地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特别是阅读了毛主席的一些著作，思想上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东北内战中蒋军的失败，以至于国民党政权在整个大陆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单纯军事上的失策。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国民党政

权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和黑暗。这个一贯与人民为敌，完全丧失了民心的反动统治，是注定要被推翻的。古人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永远是一个历史的真理！

（选自《纵横》84年2期，作者：郑洞国）

淮海战役

背景介绍

辽沈战役结束后，立即发起淮海战役。这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战役。

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参加这一战役的有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和两军区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共约60万人。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在徐州周围地区大量集结兵力，企图利用在徐州交会的津浦、陇海两铁路线及公路线密集，利于机动增援的方便，用重兵堵防的办法阻止解放军南下，以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挽回败局。在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杜从东北逃回后，11月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指挥下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和冯治安、李延年、刘汝明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等，总计兵力近80万人。其中大多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和精锐部队。

由于这一地区在敌我兵力的对比方面，国民党军仍占相对的优势，如何实现兵出江淮、夺取徐州、就地歼敌的计划，成为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员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进攻并歼灭淮阴、淮安和海州连云港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中央军委接受这一建议，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针对敌军重兵密集、便于机动的特点，要求以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从东面和北面威逼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10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在攻取郑州后即全军东进，与华东野战军紧密配合，孤立徐州。11月初，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胜利和中原战场变化的情况，并采纳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11月中旬，中央军委连连发电指示，决定在徐州附近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攻占徐州以南的宿县，控制徐州蚌埠线，断敌退路。中央军委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为了统筹这一战役的前线作战事宜，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动，从11月6日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以7个纵队在新安镇及其两侧地区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以8个纵队分南北两路对进牵制、阻击李弥兵团东援。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二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率三个半师2.3万人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造成解放军通过该部防区、切断敌退路的极有利态势。11日，解放军将黄百韬兵团5个军包围在新安镇碾庄圩地区，经过12天激烈战斗，于22日将它全部歼灭。黄百韬兵败自戕。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于11月15日攻克战略枢纽宿县，切断徐蚌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中央军委原计划攻打从徐州东援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但总前委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认为华东野战军在鏖战之后已相当疲劳，而从河南远道而来的黄维兵团，经长途跋涉，兵疲粮缺，孤军突出，利于攻歼，建议先打黄维兵团。中央军委接受总前委建议，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攻黄维兵团，于11月25日将它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蒋介石看到由徐州、蚌埠南北对进的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无法打通徐蚌线之后，决定放弃徐州。12月1日，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经永城、蒙城南下，企图先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一同南撤。华东野战军各部立即分路急追。12月4日，将杜聿明所部3个兵团合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6日，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只身化装逃脱。同日，集中力量对黄维兵团发起全面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于15日全歼黄维兵团10万余人，黄维被俘。

从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了稳住华北平津国民党军队不使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中原野战军集结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待命，华东野战军转入战地休整，同时对国民党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率部投降。这时杜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其官兵成排、成连甚至成营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但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仍拒绝投降。1949年初，当平津前线的人民军队完成对傅作义部的分割包围后，华东野战军于1月6日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经4天战斗，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潜逃。至此，淮海战役以大获全胜而结束。

在淮海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中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材料：

-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 黄百韬兵团被歼记
- 血战大王庄
- 十二兵团覆没记
- 淮海战场的"攻心战"
- "军需处长高文明"的真面目
- 杜聿明匪部最后覆没情景
- 权力倾轧：蒋崇在淮海战役中的争议
- "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材料一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

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邱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新兵团）。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

（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五十四师、三十二师很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该地区连原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故我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箝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

（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整八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箝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

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四）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材料二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9年1月20日）

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事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连国民党统帅部也未意料到，他的五大主力有两个被歼在一仗中。此次战役中，敌人兵力最多时有8个兵团。敌人估计我军不敢与他交手，仍以旧的眼光来看我们，以为我们打一打就要走。敌人犯了主观主义。此外，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有了重大变化，辽沈战役后，在全国范围内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已占绝对优势。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华野部队全部集中了，力量大大变化了；山东境内敌人基本肃清。敌我力量的变化给人民以很大鼓舞，使敌人内部非常动摇。再则，各个战场上的配合有很大作用。辽沈战役东北四五十万敌军在一个月中被消灭干净了。东北敌人不消灭，我们也没有下决心打这样大的仗。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前线部队有给养，伤员有人抬，使我们能连续持久作战两个多月。各兵团、各兵种协同作战，到会各位同志在前线机动灵活直接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艰苦英勇作战，也是胜利的因素。我们终于取得全战役的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的影响很大。首先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中央要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消灭敌人20个师到22个师，而我们却加倍地完成了任务。敌人在江北的防线被完全粉碎了，敌人在全国最主要战场的绝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了，关内敌人主要军事力量被打垮了。徐州战场上的敌人原有8个兵团，28个军，66个师，被我军歼灭了5个兵团全部，1个兵团大部，两个兵团各一部，共22个军55个师，占其总兵力81%，敌人只剩下19%的兵力，逃跑了。敌人现在守江防的只有30多个师，敌人的长江防线是可以打破的。

此次战役中，我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发挥了优势，而且取得了优势。我军在1947年转到外线作战的时候，在

政治上、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在数量上技术上还不是优势。只有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才能够打败敌人。而现在我们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了。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在政治上更获得了完全的优势。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乞求所谓"和平"，外国通讯社便说：要战要和完全操在共产党手中。这是战争胜利发展的结果。中央原来计划在淮海战役之后，休整两个月，再组织一个江淮战役，把江北残敌歼灭了再渡江。现在看来，江北没有仗打了，因为江北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我军过江以后，如果敌人把台湾、华南和西北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集中到京沪地区，则在京沪地区可能有一次决战。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更促进了敌人的分崩离析。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越打胜仗，给人民鼓舞越大，对敌人的打击也越大，我们的国际地位也越提高。敌人现在求和了，这是两年前敌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人员也在打主意留后路了。由于这样的变化，所以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这当然要依靠大家努力。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百韬被包围，他舍不得丢下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黄百韬，结果黄百韬未救了，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3个兵团。这里要说明几点：首先，当时华野除参加打黄维的3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3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同时，在徐州敌人逃跑前，徐州正南我军曾丢了几个阵地，山东兵团有两三个纵队转移到徐州南边来，因此，敌人向西南逃跑，很快被我军赶上。其次，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杜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帝国主义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供应，但被包围在永城东北地区时，攻不动，守不住，结果被全部歼灭。杜聿明只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打仗。再次，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10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作者：粟裕）

材料三　黄百韬兵团被歼记

伟大的淮海战役是以痛歼蒋军黄百韬兵团开始的。

11月6日，伟大的淮海战役打响了。

11月7日，徘徊在新安镇一带的黄百韬兵团，逃跑了。

"敌人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把他们消灭在哪里！"

战役发起之前，为了保持战役的突然性，我军夜行晓宿，只嫌夜间时间太短。现在，战役打响了，黄百韬兵团逃跑了，夜行晓宿改为昼夜兼程，紧紧追赶敌人。

华野九纵队二十七师，沿陇海路追击，八十一团是该师的先头部队，他们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一直追击在最前面。

八十一团的勇士们，一天一夜只吃了一顿饭，追击了130里。11月9日，当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在堰头镇一带截住了敌一五二师。接着又以锐不可挡的攻势，肃清了马场、徐墩等地的敌人。同时，七十九团也从堰头镇以西赶到，把一五二师压缩、包围在堰头镇。9日晚，向被包围在堰头镇的一五二师，发起总攻。经过不到4个小时的战斗，敌一五二师便被全歼了。部队又踏上了继续追击黄百韬兵团的征途。

黄百韬兵团原定的西逃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西逃碾庄。第二步，各军到达碾庄后，再向八义集、大许家撤退，向徐州靠拢。

我军的神速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黄百韬的如意算盘。在窑湾游渡运河的敌六十三军，一部刚渡过河去，就遭到我从苏北北上部队的痛歼；未及渡河的一五二师，又被我尾追部队全歼于堰头镇地区。该军军长陈章，渡河时即身负重伤，挣扎到西岸后，见走投无路，自杀身死。敌四十四军由海州、连云港西逃时，拖带着行政人员、逃亡地主等十万余众。11月8日，当敌二十五军准备渡河时，运河铁桥被这些乌合之众和他们的大车、小轿、箱笼、行李，堵了个水泄不通，整个铁桥又完全处在我堵截、追击部队的大炮射程之中。炮弹在运河铁桥上下周围不停地爆炸，二十五军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待他们拼死挤过桥时，被炸死、踩死和挤落水中淹死的，已经过半。敌一OO军在我军锐不可挡的攻势面前，害怕担任掩护落在最后被歼，8日便派其四十四师先行渡河。该师渡河之后，又未执行到碾庄集中的命令，径直逃向八义集，正碰上我南线北上的部队，又被包围歼灭。当黄百韬兵团逃到碾庄，只剩下六十四军和四十四军两个完整的军。此时，我各路大军纷纷追到，将他们团团包围。于是，黄百韬的西逃计划彻底破产了，只得在碾庄地区负隅顽抗，寄希望于他的难兄难弟前来解救。

我军包围碾庄以后，刘峙令李弥和邱清泉两兵团，火速为黄百韬解围。但在我强大阻击兵团顽强阻击下，李、邱两个兵团，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17日，我阻击兵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援敌，同时准备下一步围歼黄维兵团，主动调整了阻击阵地和兵力部署，以便给敌军致命的一击。果然，17日在碾庄外围的敌一OO军悉数就歼。18日，敌四十四军一五O师师长赵璧光率部投降；19日，该军阵地全被我突破，军长王泽与一六二师师长杨自立都在碾庄车站的交通沟里做了俘虏。同时，我第一次攻击碾庄的部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攻击方案。

一切准备就绪，指挥部下达了再次攻击碾庄的命令。19日黄昏，攻击开始了。我全线炮兵，同时开火了。我战车部队，也在碾庄西北方向参战了。战车怒吼，炮声隆隆，眨眼的工夫，碾庄及其周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大地在抖动。炮兵愈战愈勇，忘记了冬夜的寒冷，光着膀子操作。各突击连，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纷纷脱去棉衣、棉裤，全身涂满防寒的油脂，单等出击的命令。

……

济南第一团向纵深发展时，忽然发现在一些汽车后面，还稳藏着第二道围墙。敌人的"青年突击队"，依托着汽车、围墙和新修起的工事，拚命反扑过来。济南第一团的战士们，立刻和敌军展开白刃格斗，一辆一辆汽车，一个一个工事与敌反复争夺。

济南第一团连续打退了敌人五次反扑，敌人的反扑仍继续着。团长张慕韩正在电话里向师长肖镜海报告情况，听筒里忽然传来纵队聂凤智司令员坚定不移的声音："……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比敌人更猛、更凶，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敌人是挡不住的。你们打到哪里，一定要钉要哪里。你们快跟黄百韬见面了，必须拿出'铁锤子'作风，把当面这道围墙砸烂！要连续猛砸，不给敌人一分一秒的喘息时间！"

全团立即响起了"突破第二道围墙，活捉黄百韬"的怒吼声。战士们脱去了湿淋淋的棉衣，扯断了残破的裤管，端着涂满了敌人污血的刺刀，又一次向敌人猛扑过去。烟火中，到处刀光闪闪，到处响着战士们雄壮震天的喊杀声和敌人凄厉的惨叫声。敌人的疯狂反扑，终于被济南第一团和七十四团狠命的几锤子砸瘫了。战士们随即炸开围墙，象潮水般涌向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不久，守敌全部瓦解，九纵队和八纵队胜利会合了。黄百韬带着一伙残兵败将，逃到了大院上，继续指挥六十四军和二十五军残部，作最后的挣扎。

碾庄被攻克，敲响了黄百韬兵团彻底覆灭的丧钟。到11月22日，除了大院上、小院上的敌人还在顽抗之外，其他村庄的蒋军，被歼的被歼，投降的投降，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22日上午，我来到九纵队二十六师，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早晨，黄百韬赖以保驾的六十四军，在我锐不可挡的攻势面前，也开始动摇了。我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五连正准备向困守在小院上的敌一五九师发起最后的攻击，忽然发现一个敌人，手举白旗，摇摇晃晃向五连阵地走来。此人光着脑袋，边走边喊："请不要打枪，我是来接洽投诚的。"手里的白旗还不停地摇动着。

来到五连阵地，他向五连王连长先来了个立正，然后深深一鞠躬，自我介绍道："我叫冯柏成，是一五九师的副营长，奉师长锺世谦、副师长李振忠之命，前来接洽投诚事宜。"说着，把"求降书"双手递给王连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李副师长亲笔所写，望贵军笑纳。"

王连长接过来看了一遍，立即掏出钢笔，在"求降书"上批示道："准予投降。一、立即命令该师所属四七五团、四七七团全部放下武器；二、解放军保证放下武器的官兵生命安全，私人财物一律不加侵犯。"写完，又把"求降书"还给了冯柏成。

冯柏成看了王连长的"批示"，先是连连说道："这就好，这就好，只要你们不再打炮，其他方面我们一定照办不误！"接着，又为难地补充说："是否能劳贵军长官亲自走一趟，免得师长不相信我。"

能否到敌人那里去，王连长立刻报告了团里。团首长决定：王连长留下掌握部队，并做好受降和继续攻击两手准备；由张副连长随冯柏成到一五九师师部去，进一步说明我军的政策。

张副连长随同冯柏成，来到一五九师师部。往日耀武扬威的锺世谦，率师部全体官兵肃立迎接。锺世谦看了王连长的"批示"，连连说道："只要贵军停止炮击，什么都好说。"张副连长回答："停止炮击的条件是，你们必须立即投降。"

一个军官上下打量了一番张副连长那破旧的军装，用疑惑的口吻对锺世谦说："向他投降？我们不见他们的高级将领行吗？"

他的话刚说完，张副连长便理直气壮地接上去说："怎么，信不过吗？我是第九纵队二十七师七十七团五连副连长，受命来接受你们投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障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说话是算数的。"他又转向那位军官，补充说："如果你还想再较量一下，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不过，你当了俘虏之后，可不要后悔。"张副连长的话，把那个军官震住了，急忙躲到其他人的后面，其他人也都不满地看着他。

锺世谦见此情景，慌忙对他的参谋长谢丽天说："快！吹集合号，集合队伍！"

集合号响了。我军的炮击也停止了。锺世谦等人驯服地走出隐蔽部，带头把武器放在广场上，他的后面，紧跟着敌一五九师的全体官兵……

一五九师的投降，把黄百韬的最后一根支柱也抽掉了。天近黄昏，我正准备从二十六师指挥所到攻击大院上的部队去，突然有人喊道："大院上的敌人逃跑了！"转头看去，果然，敌人象决了堤的洪水，呼啦一下涌出了大院上。我军马上扑上去了，冲锋号声、喊杀声，似海啸雷鸣。师指挥所的人员和机关干部，未等首长下命令，便自动操起缴获的武器，呼喊着："活捉黄百韬！""不要叫黄百韬跑了！"向逃跑的敌人追去。一眨眼的工夫，追击的部队，堵截的部队，从四面八方，一齐涌向大院上。大院上四周，如同赶庙会一般，人山人海，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我围歼部队。约摸半小时以后，冲锋号声停止了，喊杀声停止了，枪声也停止了，各种颜色的信号弹又腾空而起。整个战场上，似礼花齐放，五彩缤纷。

这时，两匹战马飞奔而来。一位侦察员翻身下马，汗也没顾得擦，便递给我一张条子。借着信号弹的光亮一看，原来是团长的笔迹。"迅速查清黄百韬的下落。"可是费了整整一夜的工夫，我和两人侦察员，问遍了大院上所有的俘虏，寻遍了所有的工事和残存的房屋，仍未找到黄百韬的踪迹。事后才知道，他逃到小黄庄东北的旷野上，撕碎了蒋介石最后空降给他的"坚守待援"的亲笔信，开枪自杀了。

（摘自黎明：《淮海大战的第一炮——蒋军黄百韬兵团被歼记》）

材料四　血战大王庄

1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揭开了序幕。我军在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包围了敌黄百韬兵团，迫使徐州方面的国民党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急令华中"剿总"序列中的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由平（京）汉铁路豫南前线驰援徐州。

8日，黄维兵团由驻马店出发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于25日进至宿县南面的双堆集地区，落入我中原野战军的包围圈。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在徐州东面陇海铁路线上的大许家车站，担任阻击邱清泉兵团东援黄百韬兵团的任务。经11天激战，我纵队将邱清泉兵团主力第五军阻于大许家车站一带。11月22日，我军全歼黄百韬兵团。当晚，我纵队奉命迅速移师宿县双堆集以东地区，临时归入中原野战军作战序列，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我纵队到双堆集以东地区之日，正是黄维兵团被我中原野战军合围的第二天。

12月2日，纵队首长令我第二O师接替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防守的小马庄、周尹庄一线阵地，准备攻歼大王庄之敌。

大王庄位于双堆集的南面，全村只有三四十户人家。村东头有一个大约30米高的土堆，堆顶呈尖锥形，当地群众称它为尖谷堆或尖古堆，相传是古代遗留的烽火台。约5公里开外的西面，还有一个平谷堆，同尖谷堆相对峙。双堆集因这两个土堆而得名。

国民党军在村里和土堆上各修了一个环形阵地，既可独立作战，又可互相支援，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敌在大王庄屯集众多的兵力，以支撑尖谷堆的作战，同时又构成尖谷堆的外围屏障。尖谷堆是瞰制大王庄的制高点，又是双堆集敌军的最佳观测所，可以掩护和策应大王庄的作战。双堆集位于大王庄的北面，两村相距约一华里。黄维兵团司令部驻双堆集北面的马庄；第二快速纵队和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及第十五军军部驻双堆集的村内村外。黄维兵团是在开进途中转入防御的，因布阵仓促，东、北、西面的兵力众多，纵深较宽，而南面的兵力单薄，几乎没有纵深配置，仅大王庄尖古堆阵地才是唯一的屏障。所以，敌南面阵地一旦被我军攻破，黄维兵团司令部及他的重炮、战车和几百辆大汽车，便全部暴露在我军面前，我军可直捣黄维兵团的心脏。黄维、胡琏深知南面阵地的关系重大，便以最强的一个步兵团驻大王庄和尖谷堆。同时，还以快速纵队一部（辖1个战车营、1个榴炮营和××门化学迫击炮）和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及第十一师一部配置在这个阵地后面，以强大的火力和兵力支持大王庄守军作战。

我二O师进攻敌大王庄、尖谷堆阵地的部署是：以第五十八、六O团担任主攻，两团各以1个营分别从庄西面和西南面突击；另以第六O团1个营从庄南面突击。三个营齐头并进，互相策应。第一步夺取大王庄；第二步攻取尖谷堆。师以第五十九团为预备队。华北野战军特别纵队榴弹炮营、山炮团也以火力支援两团进攻。

我师受领任务时，敌已将大王庄修成有三道防线的阵地。第一道前沿阵地在主阵地前50米处，由独立的子母堡群组成，每个堡群驻有一个排的兵力。堡群虽然分散，但前后左右构成多层次、多方位的交叉火力网，使主阵地变得格外宽厚、坚固，且收缩余地大。第二道是主阵地，在村边的大堤埂上，由密集的暗堡、掩体、炮位、外壕和防御物等组成。堤埂又高又厚，经得起我山炮、步兵炮的抵近轰击。第三道在主阵地的背后，包括大王庄内的所有房舍。此时，全村的屋顶被揭开，屋顶的稻草成了柴禾和饲料，房梁门板拆去修了工事，房屋成了大地堡。且村内交通沟纵横交错，村庄成了整个阵地的内廓核心。大王庄由敌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第三十三团据守。该军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擅长防守。第三十三团建于北伐战争时期，曾被国民党国防部命名为"威武团"，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曾任过该团团长。该团全部美式装备，除机

枪、步枪和大小迫击炮外,还配有战防炮及火焰喷射器多具,为当时国民党军的步兵团所罕见。在这次东进途中,因"突破涡河"有功,全团班长竟同全师连长一道参加了军长杨伯焘召集的"作战研讨会",受到黄维的接见、颁奖,并一道会餐。此时,该团骄气正盛。

我师的前沿阵地与敌大王庄前沿阵地之间,是一片3华里左右的开阔地带。我部要通过这片开阔地进攻大王庄,必然会遭到双堆集敌重炮群的拦阻轰击,造成重大的伤亡。针对敌情和地形,我们采取"地平线下作业"的办法,抵近接敌。这是我军在淮海战役第二、三阶段普遍采用的战法。作业在夜间进行,各营、连沿自己进攻的路线挖掘多条交通壕,通过交通壕使自己的火力兵力在地平线下运动,把冲击出发阵地推进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我军的这种战法被黄维称为"要塞攻击法"。敌虽千方百计破坏,但未能阻遏我军的抵近作业。

后来,黄维、胡琏采取"蹂躏战术"对付我们。敌每天以一至三个步兵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火力,轮番袭击我土工作业部队,企图破坏我军"地平线下作业",推迟我军的攻击时间,以待援军。当时,国民党军装甲兵司令蒋纬国曾飞临双堆集上空,和敌战车营长谈话,为其战车营官兵打气。12月5日,敌"蹂躏战术"达到高潮。当天下午,大批敌机对我大王庄南面的作业区狂轰烂炸,平均每间隔50米即落有一颗重磅炸弹。顿时,遍地烟柱,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敌机轰炸刚过,敌重炮火又覆盖而来。在雷鸣般的炮声中,双堆集的敌战车倾巢出动,引着步兵潮水般涌进我作业区,企图以战车压垮、碾平交通壕或以步兵趁机抢占我交通壕。我师有丰富的阵地作战经验,对敌步、战、炮联合作战,采取灵活的战术。当敌机、炮兵轰击时,我们隐身战壕里,不暴露目标;当敌战车同步兵冲击时,我们躲开战车,专门打击后面的步兵。当我们与敌步兵厮杀时,敌战车就失去了作用。待消灭敌步兵后,我们再来对付敌战车。敌战车后面装有发动机,是个怕烧怕烫的部位。我们抓住这个致命弱点,点燃火把去烧它的屁股,迫使敌战车退回双堆集。黄维、胡琏的"蹂躏战术"失败了,我们的"地平线下战术"取得胜利。经过数天奋战,我师于9日前将交通壕修到敌大王庄的前沿阵地前,作好了攻击大王庄的准备。这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却在南京自吹他们的"蹂躏战术",使解放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2

9日,我师对敌大王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西面第五十八团第二营和西南面第六O团第三营,在我炮火和特制的"炸药炮"的掩护下,从最近冲击出发阵地向敌攻击。扫清敌前沿阵地子母堡群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敌主阵地。第六O团第三营第七连在突破口处遭到敌火焰喷射器的扫射。有的战士被烧死、毒死;有的战士冒着烈焰向敌扑去,吓得敌人抛下喷火器而逃。第七连英勇奋战,打开了突破口。第六O团第二营突击排在敌主阵地外壕处遭到敌炮火轰击,全部伤亡。这时,团命第三营突击连从一侧冲过来接应,才保障第二营攻入庄内。

我突击部队攻进庄内,搅得敌阵势大乱。我突击队员三人一群,五人一组,利用战壕、地堡、墙角,大胆穿插、包抄。待天黑下来后,有的战士混杂在敌群中进行恫吓,敌军混乱加剧。混乱中,我一小包炸药就能炸毁敌一个地堡,一梭子弹就能收拾一窝敌人,甚至一声吆喝也能抓到几个俘虏。敌第三十三团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大部被我歼灭。该团团长孙竹筠见大势已去,便逃上尖谷堆。当晚,我师占领大王庄,共毙、俘敌1300余人。

正当我师要攻击敌尖谷堆阵地时,敌双堆集重炮群对我实施火力袭击,我被迫缓攻尖谷堆。为避免大的伤亡,师命庄内部队转移到庄北面敌遗弃的工事区,把庄子腾出来,让敌炮弹在空地上爆炸。当晚,敌炮火袭击持续40分钟后,开始组织步兵反扑。由于夜里下了一场雪,旷野一片白色。敌人翻穿棉大衣,同雪地浑然一色,企图偷袭。黎明前,敌已快摸到我阵地前沿。对于敌人的反扑,我们早已料到。待敌人靠近我阵地前沿时,我即以短促而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了下去,守住了大王庄阵地。此时,师命第五十八、六O团撤下阵地休整,大王庄阵地由第五十九团接防。

第二天一早,我随突击部队撤出大王庄,回到团指挥所。此时,师政委邓少东打来电话,向我传达了陈毅司令员打来的电话指示。陈毅司令员对我们昨晚拿下大王庄,歼敌第三十三团表示赞许,并要我们好好总结战斗经验。同时指出,大王庄是个非常重要的阵地,敌人不会轻易放弃,一定还会来争夺,要求我们一定守住大王庄。我第二O师原为新四军第五旅。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时,曾多次直接指挥第五旅作战。1947年8月,新四军主力由鲁中转至外线作战,第五旅仍留在山东境内。因此,陈司令员在电话中仍称第二O师为五旅。总前委首长的指示,给我们鼓舞很大。

3

敌大王庄阵地丢失后,黄维、胡琏极为恼火。10日上午,双堆集敌人纠集了两三个团的兵力,并配属部分战车,准备第二次向大王庄反扑。10时左右,邓少东政委来电话,命我团增援第五十九团。并命我把尚未投入战斗的第一营和警卫连拨归第五十九团指挥,确保第五十九团守住大王庄。最后,他还告诉我,刘、邓首长已命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第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

这时,大王庄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敌第二次反扑开

始了。我第一营奉命进村后，营长钱锋派人捎信告诉我，敌已突进大王庄。据师指挥所传过来的情况通报讲，敌已从三面突破我前沿阵地，我部正在奋力反击。由于双堆集敌快速纵队的大队战车配属步兵，正从西面向大王庄南面后路包抄，我大王庄部队即将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此时，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六团已赶到大王庄西南，先头分队冲进庄内。但是，敌战车迅速冲到大王庄南面，把我庄内的部队同增援部队隔开，包围了大王庄。

第四十六团在庄外，依托交通壕，同敌战车和步兵展开厮杀。因庄内部队同师团指挥所失去联系，庄外部队只能从枪声的变化中推测战斗的情况。在这仅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庄，敌我双方共有 6 个团以上的兵力，在互相冲杀，反复争夺。每一间房屋，每一座地堡，每一条战壕，每一段墙壁，都成了争夺的目标。

下午四五点钟，第四十六团大部在庄外同敌战车和步兵形成对峙。庄内枪声由激烈变得缓和。后来，唯有村东南角枪声较紧，我华北野战军第六团第一连与中原野战军第四十六团的一个连队仍在同敌争夺，打退敌人一次次的进攻，控制着村东南角，使敌未能完全占领大王庄。战斗中，这两个连队互相支援，团结奋战，共同坚持到最后胜利。

傍晚，大王庄村外之敌逐步撤退后，师命我团夺回大王庄阵地。可是，团里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营、连能拉上去了。凑巧，第二营副营长赵学义把撤下来的 120 号人组成一个连队，由他担任连长。我带领这支队伍，趁夜幕进入大王庄。此时，敌人已退至双堆集，我重占大王庄。

战斗结束后，华东野战军一位副参谋长专程考察了大王庄战场，发现泥土中有很多炮弹片、子弹头，可见大王庄战斗的激烈程度。

4

大王庄战斗的胜利，震撼了敌全线部队。10 日深夜，敌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于小王庄向我纵队投诚。该师的投诚，使敌第十二兵团整个阵地体系破碎，尤其第十、第十八军残部陷于绝望之中。

我夺取大、小王庄后，敌尖谷堆阵地便孤立了。我纵队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奉命夺取它。

黄维、胡琏决心死守尖谷堆。杨伯焘将第十八军工兵营、特务营、炮兵营都用上了。因敌人施放毒气弹，我第六十一团第一次攻击受挫。

12 月 13 日晚，在强大的炮火轰击之后，我第六十一团第三营随即发起冲击，一举攻占尖谷堆。天明后，敌步兵在飞机、战车、炮兵配合下，再度疯狂反扑，并施放毒气，被我击退。

尖谷堆失守，使敌高级指挥官丧失了坚持战斗的信心。15 日夜，黄维率残部突围。但在 3 小时之内，便被我军全部歼灭。

（摘自《军史资料》89 年 3 期，作者：谢雪畴）

材料五、十二兵团覆没记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遭到解放军的坚决反击，其兵力消耗甚大，形势步步趋于恶化，因而，蒋军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最后，在继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蒋军被迫放弃全面防御而采取重点防御，企图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点，使解放军“啃不动”，以苟延残喘。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的措施之一，就是将现有部队加以调整编配，组成若干兵团，以准备即将来临的防御战。

兵团组建中的派系争斗

第十二兵团是在以上的决策下编成的。它主要由骨干部队第十八军及第十军、第十四军和第八十五军组成。

兵团组建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内派系重重，勾心斗角，致使主官任命和部队归属上几经周折。兵团编成前，各军都还是用整编师的番号。当时整编第十八军（等于兵团的组织）军长胡琏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该军下辖整编第十一师（即第十八师）和整编第三师（即第十军），另外整编第十师（即第十四军）也归胡琏指挥。以上述部队为主体编成十二兵团，理应由胡琏出任司令官。但是，因为整编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之下，人事派系矛盾颇为复杂。一方面是第十八军所属部队是华中有力部队之一，白对胡是拉拢的；另一方面白对陈诚势力和他的嫡系第十八军有成见，因而对胡琏也屡有攻击。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十分棘手，不得不另行打算，他叫林蔚向在上海养病的陈诚征询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人选的意见。陈诚举我出任。因为早自一九三二年，一直至一九四三年，我在陈诚的第十八军系统任过旅长、师长和军长，是陈系的骨干分子。但是，又因何应钦与陈诚之间的矛盾，何应钦向来对我不满；加之白、陈之间的矛盾，他们二人表示反对以我出任。可是，我又得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支持，因此仍然出任司令官，胡琏任副司令官。

我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后，积极组织建制。当时，整编第二十三军军长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良荣和我私交很好，他自告奋勇，愿调为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官，并把他的基本部队整编第二十八师编入第十二兵团。我们二人亲自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得命令发表。但几天之后，蒋介石又

调李良荣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其整编第二十八师被白崇禧紧紧扣住不放。于是，国防部又以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部（即第八十五军）编入第十二兵团，并由何应钦提出，以吴绍周出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任该整编师师长，得到了蒋介石的核准。既是如此，白崇禧仍另有打算，把八十五军编入了第三兵团，还把它派到广水、应山方面去了。由于我的力争和国防部的坚持，其间几经周折，白崇禧最终把这个军吐了出来。

第十二兵团司令部于九月下旬在汉口大体组织完成，二十六日，兵团部移至确山，其所属部队除第八十五军尚未归入兵团建制外，第十八、十、十四三个军均集结于确山、驻马店、遂平之间地区休整，准备行动。

盲目的行动

十月初，白崇禧到驻马店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他认为济南失守后，解放军势必南下，但对中原解放军将采取如何行动及其目前主力所在，没有提供可资依据的情报，只是盲目地说要以攻为守，策划以第十二兵团为主力向襄城、鲁山方面进犯解放区，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吸引在豫西方面，以牵制其东进津浦路与华东解放军会合。

十月中下旬，白崇禧令第十二兵团在第三兵团配合下，由驻马店附近地区出发，向泌阳、唐河、南阳间进行扫荡。但是该方面的解放军都转移了，兵团一无所获，不得已于十月底回师驻马店附近。

兵团刚刚到达驻马店附近，即奉命向徐州进发，并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兵团即于十一月八日由驻马店地区出发，遵照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因为部队有战车营、榴弹炮营等重武器和汽车营及大量胶轮大车，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以致部队行动迟缓，受到解放军的拦截和追蹑。十八日先头部队到达蒙城，和解放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摆在十二兵团面前的是，解放军主力部队已在当面，如我由蒙城正面渡河向宿县进攻，则面对北淝河、浍河的障碍，如解放军据以节节顽强阻击，并从涡阳方面对我左侧威胁，就会使我前进困难，陷于不利。因而当时曾拟利用涡河的掩护，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再向宿县进攻，如此或可出解放军之意外，前进可较为安全。这一意见，曾电国防部请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以击破当面解放军，迅速赶赴徐州。

十二兵团约于二十一日开始由蒙城附近分渡涡河，向据守北淝河的解放军展开全面攻击。是时，第八十五军刚刚由后方到来。经过激烈战斗，攻占板桥、鸟集，又渡过北淝河，经过竟日激战，国民党军主力渡过浍河，对浍河北岸的解放军阵地继续攻击，而逐渐突入解放军之袋形阵地。

双堆集陷入重围

战斗几日，仍胶着在上述之线，未获进展，解放军则不断反攻。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难以击破当面的解放军，即使攻击再有进展，解放军仍然是节节阻击，而我军则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特别是北淝河和涡河，成为我军背后的障碍和威胁。

此时，兵团后方联络已经全被遮断，如仍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我决心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以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并力由该方面进攻宿县，赶赴徐州。

二十五日，兵团部队开始撤退，但行动为解放军发觉，尾随猛烈攻击，使各军间出现混乱现象。

当时，国民党军已处于中原野战军的包围压迫之下，如就地防守，势将困毙，仍然只有乘解放军的包围阵地尚未巩固之时，向东转移之一途。我下令部队向东南方向攻击，企图各军交互掩护，以达到向东逃窜的目的。但是在浍河南岸担任掩护的第十四军部队战斗力脆弱，受到解放军的猛攻而溃退；致使该方面的解放军渡过浍河，向南直冲正在攻击前进中的第十军左翼侧，迫使第十军的攻击停顿下来。第八十五军的攻击部队也由于后续部队迟缓，以致被解放军截断联络，该军其余部队的攻击，也因之停顿。这时，国民党军的攻击已告失败，窜逃无望，只得把当时的战线稳定下来，加以调整，就地固守待援。

至此，解放军在双堆集地区对第十二兵团完成了四面包围。

各图自保

陷入重围后，兵团部设在双堆集的北端——马庄。直到这时，兵团部对于徐州地区的战况一直没有得到国防部及其他上级的指示，无线电通讯也始终没有和刘峙、杜聿明取得联络，只不过推断徐州在大战而已。至于双堆集战场，是秋收后毫无隐蔽的广阔平原，所占据的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老百姓早已跑光，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

二十八日，参谋总长顾祝同乘飞机来到阵地上空，视察了当时的敌我位置和战况，还和我通了电话，嘱我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顾还说将空投粮弹补给。

我遵照指示，尽一切可能督饬各军固守待援。在开始的几天中，每天都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

的火力，向解放军的阵地据点突击。当时的企图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借以振作士气和俘虏解放军人员以取得情报，并抢掠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另外，妄图用这种不断对有限目标的小规模突击和蹂躏办法，给解放军造成损害。但是，已被解放军打得害怕了的军、师长们，宁愿把兵力麇集于狭小地区之内，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因此，对于一些村庄，有的攻下后又把部队撤回，有的白天攻下，晚上又被解放军反攻夺走，以致形成拉锯战。

这样几天之后，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逐渐完成。并开始紧缩包围圈，依次选定国民党军防守脆弱部分，逐点蚕食。

作为蚕食和攻击的对象，先用近迫作业，迫近阵地，并用各种火炮于黄昏时实施攻击。其炮兵火力之集中和猛烈，使国民党军的野战工事基本上被摧毁，人员遭到很大的杀伤，然后在炸药包爆破之下，攻击部队一举发起突进，歼灭守军。由于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各级部队长对所属部队指挥困难，未能针对解放军的战法积极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灵活的战斗。而只是各图自保，互不策应，打不打到自己身上听天由命。如第十四军残部防守杨围子及其邻近的几个小村庄，就是这样。当解放军对杨围子进行蚕食攻击时，军长熊绶春要求兵团部给予增援，我曾指定第十军抽调一个营，归熊绶春指挥。始则该军军长以抽调不出部队多方推脱，继而被迫派出一个营到达杨围子，但并未积极投入战斗，而是在解放军突击时，不战而溃，逃回原处去了。结果熊绶春阵亡。

争抢空投

就这样，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用依次逐点蚕食攻击的战法，迫使第十二兵团残部仅保有双堆集狭小地区，以至无法挣扎下去。

当时，粮弹俱缺，大量伤员只能收容于地下壕坑；兼之日夜战斗，伤亡枕藉，每当空投补给时，一部分落于解放军驻地，而落于国民党军空投场附近地区者，各军自行抢收，甚至因抢收而互相开枪威吓。其幸由兵站分监部收集到的补给品，分配时侧又争多争少，吵闹不休，陷于一片紊乱，维持正常秩序已感万分困难。至于使用这样的部队去战斗，则其狼狈之状不问可知。加之先有廖运周率一一O师起义，继之黄子华率第二十三师投诚，特别是黄师投诚，使第十二兵团整个阵地体系破裂，残部日益陷于悲观绝望气氛。

蒋介石方寸已乱

到了十二月一日，徐州国民党军向永城方面突围时，国防部才第一次给第十二兵团通报徐州国民党军的战况，说是杜聿明大军南下和第十二兵团会师。嗣后，便每隔两三天由飞机空投一份杜聿明方面的敌我位置略图，借以知道杜聿明军的概略位置。国防部曾指示说，李延年兵团由蚌埠方面来援。以上消息，曾一时使十二兵团有了希望。但是，各种希望不过是昙花一现，旋即知道杜聿明大军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附近被解放军四面包围于狭小地区，陷于同样命运；而李延年兵团则在蚌埠西北之包集附近，受到解放军的阻击，寸步不前。

还在十月底，第十二兵团尚在唐河附近正奉命由该处开回驻马店时，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因其父病危和他自己牙病，请假赴汉口。兵团被围后，胡琏立即到南京请求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回前方。在他离南京之前，蒋介石曾对他说："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已叫联勤总部尽量空投补给，并正在抽调部队救你们，你们好好打下去。"并嘱胡琏好好帮助我安定军心，鼓励士气，坚持战斗。

自从胡琏来到双堆集以后，我和他所计议的就是如何持续固守下去，以免徐州方面受我们的影响而愈为不利。但是，情况一天天恶化，我有一次对胡说："如果你不回前方，而留在南京联络和催运空投补给，可能作用还大些。"可是胡还自信地说："被共军四面包围，已是家常便饭。我们现在只要打下去，共军还是一下吞不了我们的。"

当时的空投补给有减无增，为了要撑持下去，就必须催运补给。另外考虑到杜聿明集团被围，蒋介石不能不有新的决策，应该把第十二兵团的实际状况报告蒋介石。我把这些问题和胡琏商讨之后，决定派他到南京去。并嘱他留在南京不要回来。我以为第十二兵团残部大数已定，胡琏留在南京比在双堆集的作用要大些。特别是觉得"千兵易得，一将难求"，要使胡琏留在南京保全下来，为第十二兵团料理善后。可是胡琏到南京过了三四天，又乘飞机回到双堆集来了。胡琏转告蒋介石的指示："你们可以突围，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蒋并要胡琏立即回双堆集维持部队。我们对于蒋介石以上的指示，感到莫名其妙，以为蒋方寸已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

罪恶计划

面临这个局势，我们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会不可收拾，至少要空军有利的掩护，否则宁可坚持下去，打一天算一天，以免杜聿明立即跟着跨台。我把上述意见一面电报蒋介石，一面督饬部队继续坚持固守。但是，解放军逐点蚕食攻击，国民党军状况天天恶化。

大约十二月十日前，我要求蒋介石派空军用凝固汽油弹大规模轰炸，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造成火海，以掩护兵团残部突围。随即收到空投的蒋介石亲笔复信，信中

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同时又空投下关于空军使用毒瓦斯弹和毒气的说明书三百多份，其中详细说明甲弹（糜烂性毒瓦斯炸弹）和乙弹（窒息性毒瓦斯炸弹）的性能、使用防护和注意事项，并规定了空地日夜各种联络和地上各种标示办法。又规定把战场地区的日夜气象情况（晴、雨、风向、风速等等）按时报告空军总部。兵团部秘密拟定突围计划，并立即进行各种准备，以待空军确定开始轰炸的时间实施。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至于由各部队准备的，则只是规定其作某项准备而已。与此同时，空军还陆续空投下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约二、三十箱。

到了十三、四日，由于解放军继续攻占了双堆集东侧大土堆制高点阵地和双堆集北端野堡阵地，使得国民党军的残有阵地破碎不堪，被压缩到双堆集及其邻近几个村的弹丸之地。此时和解放军错杂对战，受到解放军四面轰击的制压，难以接收空投的补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解放军一发起全面攻击，国民党军势必立即悉数被歼。我和胡琏认为在双堆集已到了末日，必须立即突围逃命。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和空军总部，要求务必于十五日实施计划，一面命令各军秘密作好行动的准备。

彻底覆没

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阵地上空，与我通话。他说："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回答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于是召来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当面决定目标，分别突围。规定第一集合地为蚌埠之南，第二集合地为滁县。并规定各部队于黄昏后同时开始突围。可是，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便争先恐后的逃命，有的提前就开始行动，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激烈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其他部队的误会，各自乱跑，而为解放军立即发觉，层层截击。所谓突围，实际上是全线溃散！"

至此，计四个军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第十二兵团彻底覆没。至于高级将领，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等人逃跑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𠎀、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在人民的宽大下，走上了新生之路。

（选自《纵横》83 年 1 期，作者：黄维，原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材料六　淮海战场上的"攻心战"

早在杜聿明集团被围后，华野即在进行军事攻势的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12 月 7 日，中野、华野司令部联合向包围圈内的敌全体官兵发动劝降信，信中说道："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象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脱了。蒋介石叫你们突围逃跑，实际是要你们送死。现在你们的处境真是危险万分，比起当时的黄伯韬来还要更加孤立无援，你们真同掉在大海里一样，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8 日，华野领导再次写信给杜聿明等，劝他们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劝降信里这样写着："贵国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希望增援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奔逐北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乎？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伯韬遭受同一命运。……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本军特提出如下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

在华野全军转入战场休整后的第 2 天，也即 12 月 17 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原和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毛泽东在广播搞中给杜聿明等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那就是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与上述写劝降信、广播稿同时，华野前委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大力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火线劝降、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广大指战员在开展政治攻心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宣传形式和攻心方法。比如：

1. 喊话。这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种宣传形式，也就是用话筒或广播将劝降书信直接向包围圈内的敌军官兵播送。有时向敌军讲解胜利形势、俘虏政策、交待投诚办法；有时在风雪怒号的黑夜，向敌人播唱"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喊着："你们都是被抓的穷人，受冷挨饿为的什么？快过来吧！"每当此时，敌军阵地上便鸦雀无声，不一会儿，便会有不少人前来投诚。设诚过来的士兵李德胜说："我越听越难过，好几回都哭了。"还有这样一件极富讽刺意味的事：我军某部在阵地上装置了电力播音机，向敌人报告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劝他们早早投降，不要做无为的牺牲。这声音直达数里以外，匪首邱清泉慌忙将该处

守敌调走，换了他认为亲信的“敢死队”，但结果所谓“敢死队”也有二十多人投降了解放军。

2. 劝降。就是选择那些在敌军中有关系、有活动能力的战俘与投诚人员，有组织地进入敌军中活动，劝敌人缴械投降。

3. 宣传弹。就是用60炮、弹弓、弓箭等，将各种宣传、品传单等射向敌军阵地。

4. 宣传牌。我军在阵地前沿，竖立起了许多巨幅标语牌、宣传牌等，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如“死守突围都是死路，投降才是生路！”“放下武器一律优待”等等。

5. 送礼物。就是将各种食品、香烟等夹带宣传品，趁夜间放置到敌军前沿，天明后让敌人去取。在敌军粮食等物极为缺乏的情况下，这一招儿效果非常好。比如，我军某部把馒头和宣传品一起送给敌军士兵后，敌第70军第96师286团8连班长张付和把馒头和宣传品塞给他的排长欧光发，欧一边吃着，一边就带领两个班投降了解放军。

尽管敌军首脑机关采取欺骗、恐吓、镇压等各种手段，阻止其部下向我投诚，但每天都有几十甚至几百敌军，冲破敌人封锁，成班、成排前来向我军投诚。从12月16日至翌年1月5日的20天中，敌军相继来投诚者，就有14000余人，约等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平均每天有700人向我军投诚。我军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不但在数量上削弱了敌军，更重要的是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动摇了他们的军心，为我军尔后全歼当面之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由上不难看出，如果说枪林弹雨、金戈铁马的军事打击构成了淮海战役这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的“主旋律”的话，那么兵不血刃、攻心策反的政治攻势则是其必不可少的“和旋”，两者刚柔相济，相映成辉。

（选自《百战图》，作者：郭武君）

材料七 “军需处长高文明”的真面目——桂聿明最后的把戏

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了。成千成万的俘虏，象大堤崩溃了一样，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流过来，指挥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上都塞满了。他们一个个饿得张着嘴、瞪着眼在等饭吃；看见送饭的挑子一来，上去就抢。我们的人手有限，炊事员忙不过来，只好发粮食给他们自己烧饭吃。好在这些尘土满脸、精神颓丧的俘虏们，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一件东西：洗脸盆、去了衬子的美制钢盔、茶缸、熏黑了半截的铝水壶……全都变成了“小锅”。一时广漠的雪原上炊烟四起。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陈官庄东北十四五华里的小庄子上。庄上原有百十户人家，全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得房倒屋塌。管理部门在村头上找了一间独立家屋，作为我临时办公的地方。窄小的屋子当中，摆着一张半旧的小方桌，还有三条长凳。警卫员用高粱秸子升了一堆火，放上个水壶，把屋子烤得比较暖和了。

一个个的俘虏兵，吃饱了饭，解除了顾虑，变得有说有笑了。几个伤兵还跨进我的办公室，说道：我们吃饱饭了。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通通交给长官吧！”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大包小包的东西。摊开一看，有乌黑卷曲的条条，有带着毛根的块块，有蜡黄带黑的颗颗。这是些什么东西呢？俘虏们见我不认识，纷纷说：

“长官，这是马皮，这是驴皮，这，这是……人肉。伤兵兄弟腿上的肉。”

“我们没有饭吃，空投的全给当官的吃了，他们就让当兵的吃这些……”

听到这些话，令人寒颤，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心中直冒。我正在和俘虏谈话，电话铃响了。是卫生处长赵云宏同志打来的电话。他说又抓到了一个国民党的官儿，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估计至少是一个将官。我要他们马上送来。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门前的俘虏越集越多，还有难民和学生，形形色色，一眼望不到头。在包围圈中的许多学生的衣服全被国民党兵剥去了，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我们一时拿不出衣服给他们穿，便叫人燃起一堆堆高粱秸暂时取暖。一些受蒋军糟蹋过的女学生，捂着脸在那里呜呜咽咽地哭。这些学生，大部是被敌从徐州骗出来的，有的是受“正统”观念的毒害，跟着跑出来的。现在他们明白过来了。

这时我们俘虏收容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清查被俘的高级军官，刚才说的那个“将官”，怎么还没送来呢？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押送的人走来。他们见我责问，便指着被押送的俘虏说，他们怕飞机，路上走走趴趴，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叫：“进来！”那个自称“记者”的俘虏，喃喃地说：“有飞机，有飞机，先在外边躲一躲吧！”那军官慌得连眼前的门框有多高也没看见，一下冲进门来，他的头被门框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疼得他两手包着脑袋。

这人早已卸去了“将军”的“战袍”，穿着一身士兵棉服和破大衣，脸上和手上都弄得乌黑，很不自然地弯着腰，看起来象个老伙夫。

他立正，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个礼。我看他很狼狈，叫他坐下，然后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放到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去那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抽出一支递给我，又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他一旁的“记者”，大概被飞机吓昏了头，竟忘记了这是在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

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那个军官瞪了一眼，“记者”才恍然大悟，忙转过手把火送到我的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我马上敏感到，这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仔细一端详，发现那军官的鼻子底下有一些残余的胡髭，想是两撇“仁丹胡子”，只因刮得匆忙些，没打整干净。我正要问他们话，电话铃又响了。是民运科长李教清同志从俘管处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增加三个少将，都是自动坦白的。我告诉他说：“不管是什么将，自动坦白就很好，要保证宽待他们，给饭吃，好好向他们讲解我军的俘虏政策。”自然这番话，也是有意让屋子里的俘虏们听的。可是他们装得并不在意。

我坐下来，开始审问那个军官：

“你是哪个部分的？”

“十三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

“不对。”我断然地说。

“军需处长。”那个“记者”赶忙说。

“叫什么？”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先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一下！”我顺手递给他一本拍纸簿。

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袖筒托起，露出一段雪白的手臂，上面还箍着一只亮铮铮的手表。手表应该戴在手腕上，哪有箍在手臂上的呢？明白了，大概他怕这种高级手表会引起别人对他身分的怀疑。我打趣地向他说：“手表戴在手腕上才方便啊！”他尴尬地把表往手腕上拉拉，又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最后才掏到一支派克钢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啊！”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那个“记者”有点替他冒汗了，伸手要替他写。被我制止了。

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是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拿出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句，然后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不过，你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除了战犯以外，是一律宽待的。”他几乎把头埋到衣领里去了，一时难以看出他的表情。于是我对他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伯韬被打死，黄维兵团被消灭；黄维本人想混走，也还是被活捉了。……

他忽然一怔，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的。”

这时，有人把俘虏的一个京戏班子送来请示处理。那些男女演员，大概为了表明自己的身分，竟把五颜六色的戏装穿在身上。当他们从俘虏群中通过时，坐在两旁的俘虏竟高声大骂：“你们这些破烂货，前几天还给当官的演戏哩，飞机空投的东西都给你们吃了。现在不能给你们饭吃！”

演员们挨骂受辱，又说不给饭吃，脸色变得惨然了，纷纷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啊，被拖出来，回不去，只好唱点吃点！”原来这是郑州的京戏班子。当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被围时，刘峙为了骗取功劳，制造了“徐州大捷”的消息；国民党为了欺骗人民，又大加渲染，下令各城市游行祝捷，强迫组织慰问团去慰问。这个郑州的京戏班子一到徐州，杜聿明就弃城逃跑，他们被拖着一起到了陈官庄。当我把戏班子里的琴师叫进来问话的时候，竟使那个“军需处长”吓得不敢抬头，只顾去拨火堆里的高粱秸，搞得满屋青烟绕绕。直到派人把琴师送出去，并嘱咐好好照顾他们，一般的不能当俘虏看待时，“军需处长”这才抬起头来。我要他好好考虑一下，坦白交代，便从屋里走出来。

这时，门外更热闹了，不仅俘虏越来越多，而且新缴获的美国造十轮大卡车也一串一串地开过来，喇叭嘟嘟怪叫。支前民工大队也用毛驴、大青骡子、大车、独轮小车，装驮着胜利品从门前路过。那些受到特殊优待的京戏演员，吃饱饭后在庄后的休息处大拉大唱起来。看到俘虏太多，细细检查来不及，便叫校以上的俘虏站到一边去。一宣布，站起来一大片，有个矮个子，自动报名说他是少将军医处长，还拿出个十字章做证明。

这一群刚走，又有三四十个上校以上的俘虏被带过来。带领他们的是我们一个女同志。她一边走，一边讲解着我军的俘虏政策。

我回到屋里，继续审问那个“军需处长”。

他还没表示态度，敌机不知在什么地方丢了颗炸弹，满屋都震动了，门外一匹马吃惊地嘶叫。推门一看，许多车辆都在人们的招呼中停了下来。敌机发出怪叫，咕咕咕地乱扫射，这一下可把俘虏们触怒了，便大骂开了。

“‘他妈的’还在耍什么威风，你们要是在地上，也当俘虏了！”

那个“记者”见“高文明”脸色阴沉，对我说：“这个地方，恐怕不大方便吧！”我说：“你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我们跟你们打了几十年交道，你们的美国飞机有多大本事，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清楚。”

这位“军需处长”的衣服，简直象一个随身给养库，他一会儿从衣襟的夹层里掏出一袋牛肉干，一会儿又从大

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香烟，一会儿又从衣袖里面掏出东西来，活象一个魔术师。他看见水开了，撕开一袋牛肉干，慢吞吞地嚼起来。这时我面前的小方桌上，一边是那些被俘士兵交上的一包包的驴皮、马皮和人肉；另一边却是一袋一袋的美国咖喱牛肉干；这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生活的残酷对比。美帝国主义者用咖喱牛肉饲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却迫使他的喽罗去吃人。

我见这位"军需处长"饿了，便叫人搞来些小米饭，另外端来些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便狼吞虎咽起来，"军需处长"也略略吃了一点，又垂头抽起美国的骆驼牌香烟。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吃罢饭，便叫人带他到庄头上一所独立的小磨房去。他走出门把头深深埋在大衣领里，一瘸一瘸地从俘虏群中走过。

黄昏时分，看押俘虏的战士来说，那个"军需处长"在磨房里拿一块小石头把头砸破了。我走过去一看，他躺在地上，满脸是污血，以为他死了呢，让医务人员一看，伤口不大，只是额角敲破了，那血污象是自己涂的。他的这种企图是不问自明了。

我立即叫人从俘虏中找个司机，用刚缴来的一辆吉普车送他到卫生所去。但那个被俘的司机说什么也不干。他说他要替解放军开车，不再给国民党军官开车；还说，他的老婆曾遭到国民党军官的污辱。我们说，这不是给国民党开车，是给解放军开车。劝说了好久，车子才开走。

我们把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立即交代"高文明"是谁。这家伙这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浑身战抖着说："我交代，我我交代！他……他是……杜，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随即从大衣后襟的夹层里取出一个皮包，从皮包里取出一双象牙筷子。说这是"杜长官"四十"大寿"时一个军阀送给他的。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作证。原来，这个"军需处长"，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战犯杜聿明。

为再一次查证，我对照看了敌工部门送来的杜聿明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方方的脸上留着个八字胡；眼前的战犯，除了没有那八字胡，头上多扎了一圈纱布之外，相貌完全一样。

我又叫人把"军需处长"带来，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这个战犯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我们派人把他送到纵队部以后，听说，杜聿明在见到我们纵队的首长时还在说什么：过去他们在东北的失败，应归咎于陈诚、卫立煌的无能；而这次他们数十万人的淮海战场上覆没，则因蒋介石听信了刘峙的话，而没有采纳他的"忠谏"。好象他若在蒋介石的地位，国民党就不会得到这个惨败的结局。纵队首长平静地对他说："你又错了。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的本质，决定了你们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你本人的被俘，也决非偶然。"直到这时，他才无言可对。

（陈茂辉：《决战的尾声》，《星火燎原》之十）

材料八　杜聿明匪部最后覆没情景

新华社淮海前线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阎吾报道杜聿明匪部在解放军强大攻击下最后复没时的情景称：经过三天激战，十日黎明各路总攻的解放军指向杜匪"剿总"总部及匪第二兵团司令部驻地陈官庄一线，解放军攻到那里，一堆一堆的敌人就立刻大叫大喊起来："投降啦！缴枪啊！"解放军战士们冲入敌阵，匪军纷纷举手缴枪，没有缴枪的涌来涌去喊着："我们向那里缴枪啊？我们枪放到那里呀？"当解放军战士指定一个放枪的地方后，各式枪枝立刻就堆了起来。俘虏群如同泛滥的潮水，一眼望不到边地由解放军押着向东走去。当记者问起："你们是那一部分？"他们立刻报出了许多番号，有的则回答："提不得啦！我们一个人一个部分。"这些长久陷在饥饿里的敌军士兵，他们宁肯摔掉了自己的行李，但是还头顶着小黑锅和烟火熏黑了的钢盔等一个多月来用以烧饭的家伙。偶尔发现地上有一块解放军掉下来的干粮，立刻就有一群人拥上去争抢，以至打起来。在鲁楼河的南岸，成群成队饿瘦得走不动的马匹，解放军的战士随便从中拉一匹，立刻就有几十匹跟上来走了。几百辆缴获的汽车，在杜聿明临时筑的飞机场上由解放军战士押着，忙碌地搬运物资。从陈官庄至鲁集一线，到处停放着敌军士兵们用降落伞撑起用以挡风雪的棚子，大口径的榴弹炮和美式山炮，以及各种枪枝、弹药，夹杂在才缴获的坦克与装甲车之间，堆积如山。前来"空投"的蒋机还在匆忙地抛罐头、饼干和弹药。解放军的战士们嘲笑着说："你知道解放军在底下吗？"一个身背十二枝短枪的战士俏皮地说："不要丢了，我已拾不了啦！"

材料九　权术倾轧：蒋介石与白崇禧在淮海战役中的争斗

一箭双雕，蒋介石临时抱佛脚

1948年10月下旬，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蒋介石却仍幻想自己有扭转乾坤之力，亲自坐镇北平指挥辽沈作战，月底，当蒋介石从辽沈战役失败的痛苦中惊醒过来时，他才发现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已完成了对徐州进行包围攻击的部署。徐州是南京的门户，它的得失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心急之余，他立即电令在武汉的白崇禧到蚌埠去统一指挥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华中"剿总"，进行"徐蚌会战"。

白崇禧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驻守武汉。他对于统一指挥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的大权早已贪慕已久。早在任九江指挥所主任时，他就曾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但是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

1948年春，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亲自找蒋介石要求将黄淮平原划为一个战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因为从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至海滨，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3条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道网，调遣军队和指挥作战均必须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否则，将其划为两个战区，就有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意图也正是为了将统一的黄淮平原一分为二，使敌人各自为战，不能相顾。当然，李宗仁作此建议也有想趁机扩大桂系势力的目的，因为除了白崇禧之外，国民党军队内无第二人能担当此重任。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晓得将武汉、徐州划为两个战区的部署存有缺陷，但毕竟战事还未延伸到这里，因而感到危险不大。倒是李宗仁的用心使他提高了警惕。蒋介石迅即指令国防部另行设立徐州"剿总"，任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之兵权。蒋的这一任命一公布，国民党内便开始议论纷纷地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守；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但由于这是蒋介石的安排，谁也无可奈何。

但是，现在眼看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就要开始了，刘峙这只"猪"能担当得起指挥如此规模会战的重任吗？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觉得不妥当了，再不换人，徐州马上就会有丢掉的危险。于是他也开始向蒋提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之议。本来何是蒋的嫡系，但蒋疑忌何而信任陈诚，因此何又与白崇禧拉拢，他于10月23日派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到北平向蒋介石报告，郭临行前，总参谋长顾祝同还一再地叮嘱说："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白崇禧)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说："不要什么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马上给他发电，叫他立刻到蚌埠去指挥部署。"24日，何马上给白发电，告以统一指挥的决定。蒋介石这一次如此干脆利落，不过是敷衍白崇禧，表示对他很放心的一种姿态。其实，蒋介石对白崇禧怎么能够放得下心呢？他不过是想让白为自己卖力，想法保住南京的安全。同时也可借此将白崇禧在武汉的张淦兵团调来消耗消耗。

白崇禧在武汉接到何应钦的电令后，马上找副参谋长赵援，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和华中"剿总"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商量，觉得这是扩大自己权力的好机会。于是他决定先到南京去看看情况，并与何应钦等面商后再说。

出尔反尔，白崇禧战前拒命

10月29日下午，白崇禧带领华中"剿总"作战处长覃戈鸣等飞抵南京。一下飞机，覃戈鸣便开始为白崇禧搜集战况情报。30日，国防部特地为白崇禧召开了一次作战会报。会上，何应钦、顾祝同等都催促白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作战。同时作战会报也极力缩小徐州国民党军所处的劣势，诱导白崇禧前往。白崇禧在听完会报后当即表示可以将手下的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太和地区，并答应以第三兵团(即张淦兵团，辖第七、四十八军，均为桂军)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但是他没有表示马上要到徐州去，也没有表示拒绝。何、顾认为白是按他们所想的默然接受了。

第二天一大早，覃戈鸣便来到白崇禧的房间向白报告所搜集到的徐蚌会战的情报。白崇禧一边从覃手中接过国防部第三厅的"战报"和徐州"剿总"的"战斗序列表"，一边要他谈谈对昨天作战会报的看法。

覃戈鸣说："昨日之作战会报多有虚妄，以属下之愚见，总司令还是不去徐州为上策。"

覃戈鸣细致地分析说："第一，陈毅已以绝对优势兵力在鲁南、鲁西南展开了战略态势，随时可向我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我军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路和津浦路上摆成'死十字'架的态势，首尾不能相救，调整态势也来不及了，现在是打不得，退不得，守不得，在战略战术上败局已定。第二，徐州方面的指挥官的性格才能，我们知道很少……"

"嗯"，白一边翻阅着华东国民党战斗序列表，一边打断覃的话说："他们的军长、师长我多数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的性格就不好使用。"

"象邱清泉这样的将领就不一定听从指挥。"覃戈鸣接过话来说道。

"骄兵悍将，不听调遣，都是蒋介石养成的。方面军的命令指挥不动，非他的手令不行。"白崇禧发牢骚似地说。

"更重要的是，"覃戈鸣继续分析说："会战的战场就是南京的门户，会战不利，直接关系到南京的安危，罪责重大，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自投南京的圈套了。还有，在蚌埠来不及组织指挥机构。这样，我们既要在武汉指挥华中作战，又要在蚌埠指挥徐蚌会战，顾此失彼，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

白崇禧点头表示同意覃的看法，说："看来战局已无法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白手下的第十二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蚌埠是不能再去了。"

上午10点钟，国防部再次开会，白崇禧马上改变了前一天的态度，坚决不肯指挥徐州和华中"剿总"，并且认

为第三兵团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十二兵团序列，只同意第十二兵团参加会战。白的这一与前一天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国防部大为惊愕，一下子失去了主张。

会后，白崇禧与随从乘飞机不告而别，溜回武汉。当天晚上，何应钦打电话催劝白崇禧遵守蒋的电令到蚌埠去指挥。白答复说："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断然回绝了何的催劝。

此时白崇禧放弃统一指挥的大权当然不会偃旗息鼓。既然徐州死马难医，不能捞更多的指挥大权，那就要避战武汉，保存实力，让蒋介石自己在徐州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都精疲力尽，他们桂系就可从中得利。况且，美国方面已向李宗仁表示有换掉蒋介石的意思。白的希望就是蒋的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州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下台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这样桂系就不战而取天下了。

黔驴之计，蒋介石索白出血

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蒋介石自然是气愤不已，但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地看着白飞回武汉。同时也增加了他对徐蚌会战的疑虑：统一指挥的大权都不能诱惑一向贪权恋位的白崇禧前往，这说明白对此也没有把握，白对会战没有信心，那别人也就更不行了，看来徐蚌会战是未战而败局已定。但是，他不愿让白崇禧轻易地保存自己的实力。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碾庄地区将向徐州退缩的黄百韬兵团包围。中原野战军之一部也斩断了徐蚌间的铁路交通，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实施钳击，割裂了商邱刘汝明绥靖区和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至此，解放军完成了对徐州的更深一层的包围。

徐州被围，蒋介石迅即命令华中"剿总"所辖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调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

电令发出后，黄维兵团开始由确山、驻马店向东急进，但是张淦兵团却迟迟未见动静。蒋介石见状，要国防部急催。作战厅第二处处长曹永湘马上打电话给华中"剿总"作战处长覃戈鸣要兵，反复强调应集中兵力于主战场进行决战。谭戈鸣回答说，武汉也是关系大局的战略要点，若把张淦集团调走，刘邓大军进攻武汉，武汉先失守，南京也保不住。国防部没用，蒋介石于是直接给白崇禧打电话，向白解释战场上对张淦兵团的需要，白崇禧还是不松口。

事实上，张淦兵团乃是桂系的"王牌"，白崇禧的老本，他既然拒绝去蚌埠指挥，怎么能让它给蒋介石卖命呢！

临阵拆台，白崇禧阻兵东调

黄维兵团东移以后，像白崇禧所预料的那样，它马上便落入了中原野战军在淝河与浍河间早已布置好的巨大的口袋，被团团围住。

此时，蒋介石的手中已无可调之兵了。江南已没有一个完整而又有战斗力的军，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的几个军和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辖第二、二十、二十八军）。胡宗南的部队远水不解近渴，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调不动，蒋介石就只好调用宋希濂在湖南的第二、二十、二十八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

虽然这些部队不属于桂系，但白崇禧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去解围。因此，当宋希濂的部队准备东调时，他是重重阻拦，想办法折蒋介石的台。

第二十八军从鄂西抵达汉口后，白崇禧马上表示华中战事吃紧，不能调走，后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有着历史渊源，才勉强同意调走。紧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军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并命令运输司令部说："非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装运。"国防部见状，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拒不执行，以致形成了僵局。后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过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第二十军调走。

第二军是蒋的嫡系，全部美械准备，但与第二十、二十八军一样，都归华中"剿总"指挥。蒋调动第二军的电令是分别发电给白崇禧、宋希濂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的。白崇禧在接到电令后对覃戈鸣说："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他（指蒋介石）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的。"

覃戈鸣说："我们可以在情报上和运输止设置障碍，阻止他们装远。"

"即使他们一定要调走的话，叫它船运到城陵矶转浙赣路去。"白又指示说。

其实，城陵矶根本就没有靠岸的码头，浙赣路也没有到达城陵矶。同时，白崇禧还打电话给宋希濂的参谋长彭迈，故意夸大鄂西方面解放军的情况，并说："陈赓兵团有向襄樊进攻直下宜昌、沙市的可能，第二军调走了，宜昌、沙市方面恐怕有问题吧？"暗示他也想把第二军留住。经他这么一说，第二军从心理上都不愿东调了。

12月8日后，第二军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9、10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的亲信突然率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这样，南京一下子手忙脚乱起来，国防部电报频发，参谋长顾祝同也不断地亲自

给白打电话。但是一切手段都失灵了，白崇禧不受任何好话打动，就是不让第二军上船。

此时，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正受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眼看拥有第十八军王牌军的黄维兵团很快就要被吃掉，南京和徐州方面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白崇禧多方留难，令蒋介石十分气愤。他亲自拿起电话同白崇禧通话。

白就是不同意。蒋见白跟他扯皮，听不进他的劝解，态度越来越坏，骂白是“混帐东西”。白也强硬起来，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决不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毫无结果。而且白崇禧还命令已到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其他各部更不许开汉。这样一来，蒋介石就再也调不动白手下的部队了。

备战求和，白崇禧迫蒋下野

杜聿明带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在黄维兵团被歼后仓惶南逃，于12月3日在陈官庄一带被解放军团团围住，这一下使蒋介石荡尽了家产。白崇禧看到时机已到，马上开始了他的“备战求和”活动。他对覃戈鸣说：“蒋介石快完了，我们(指桂系)不能再为他陪葬，现在我们要180度地向左转，李济深或许可以做桥梁，我们可以试一试。”随后开始秘密地向共产党作试探性的联系。后来他发现李济深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又打算利用蒋介石与解放军顽抗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与美国勾结，等杜聿明部被歼，淮海战役结束后，逼迫蒋介石下野，运用“备战求和”、“求和备战”的两手策略，在中南割据一方，凭借以桂系为中心形成的第三种势力与共产党争天下。为此，他极力拉拢蒋的嫡系宋希濂部。

宋时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此时还拥有被白崇禧阻拦下的全部美械装备的王牌军第二军。12月24日，宋由南京飞回武汉的时候，白亲自登门邀请，将宋接到自己的住处，企图劝宋以黄埔生的名义领衔劝蒋介石下台。

宋希濂作为蒋的嫡系，又受蒋的重视，当然不会那样干了。他推辞说：“我是蒋先生的学生和属下，这样做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军纪上恐怕都说不过去。”

宋希濂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便马上收拾行李，带领随从立刻离开汉口回到沙市去了。

白崇禧见劝说宋希濂给蒋发电不成，便亲自出马，于12月25日电蒋“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12月30日白再电蒋，要求“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与此同时，湖北省参议会和河南省主席张轸在白的指使下，也电蒋要求他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寻取途径，恢复和谈。”意思是催蒋下野，劝蒋别再赖在台上阻碍“和谈”。一时间，国民党内倡言“和谈”的声音此起彼伏。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在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之后，对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杜聿明两个兵团发起总攻。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和白崇禧的逼迫下，于1月21日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桂系集团一时高歌猛进地开进南京“总统府”，然而，这也不过是一首加速蒋家王朝灭亡的挽歌。在随后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解放军的大举进攻和其内部派系的倾轧下土崩瓦解。国民党逃离大陆时，一向聪明自负的白崇禧被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职务诱惑着，跟着去了台湾。在台湾，白失去了和蒋介石对抗的资本，只能在闲居与蒋的监控中生存。1966年12月，白无疾而终。

(摘自《党史博览》95年1期，作者：刘贞晔)

材料十　“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淮海战役是以往战史上所少见的，它对于后方支援的要求，也是华东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

战役过程中，鲁、苏、豫、皖、冀五省，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动员的民工(包括在前线服务的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后方临时民工)共达225万余人。还有担架73900多副，小车41万多辆，大车3千多辆，挑子42400副，牲畜6300头，船只13630艘。依靠这些看来是非常落后的工具，共运送了粮食5.4亿多斤，弹药1460多万斤，以及无法统计的军需物资。广大人民不仅用手推、肩挑、背扛等办法把所生产的大批粮食、物资送到了前线，而且还前后选送了十余万子弟参加了解放军，派出了130多个民兵团看押俘虏，警卫物资，打扫战场，捕捉散兵，维持地方治安，把主力部队替换出来打仗和休整。这就是支前后勤工作给予战役胜利的有力保证，这就是广大人民对淮海战役的伟大贡献。

在整个支前过程中，数以万计的民工立了功，许多人被选为模范，大批积极分子锻炼成为干部；大批先进分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把伟大的革命理想和现实的支前任务联系起来，团结了广大支前民工，更响亮地喊着：“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这口号是完完全全地实现了。胶东一个姓潘的担架队员，从平度家乡出发时，带了一根当作拐杖的竹竿，每过一个地方，就在竹竿上刻一个地名。最后，在这支竹竿上，竟留下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72个城镇的名字。这是伟大的人民用艰苦卓绝的行动写下的名字，是千百万解放区人民用对革命战争全力以赴的精神写下的名字。

(选自《决战淮海》)

平津战役

背景介绍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还有部队50余万人，分布在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长达5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上，面临着被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形势。11月4日，蒋介石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议对策。这时淮海地区两军紧张对峙，蒋介石为加强长江防线，主张放弃平、津，要傅率部南撤。但傅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这时，蒋、傅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国民党军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的变化。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可以暂时箝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和组训新兵所需的时间。据此，傅作义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从11月中旬开始，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以加强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的防卫，保证西撤或南逃的通路。

针对平津国民党军的上述动向，为了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必须一方面稳住该集团，不使其逃跑；另一方面，使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出敌不意地将其分割包围，断其逃路。为此，中共中央军委除于10月底已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外，又于11月18日电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在21日或22日取捷经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同时，为了迷惑和稳住傅作义集团，又命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后又令华东野战军暂缓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部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约80万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约13万人，连同东北、华北军区地方部队，共约10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由林、罗、刘统一指挥。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平津战役提前在11月下旬发动。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相继行动，11月29日首先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到12月上旬，歼灭平绥线上傅作义部5个师，将其主力分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调动了津、唐的敌军进到北平地区，拖住了傅作义集团。12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先后到达平、津前线，到21日，以神速的行动完成了对平、津、塘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其南逃、西窜的道路，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12月22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作义部一部分主力。东线原计划首取塘沽，但因该地地形不利于部队运动和展开，后改变为集中兵力先攻天津。经过周密的准备和部署，人民解放军以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联合作战的方式，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华北第二大城市。17日，塘沽国民党守军乘船南逃。

天津解放后，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并为此向傅作义提出积极的建议。傅作义从1948年11月起，曾几次派人同解放军接触，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但实际上仍动摇于和战之间。天津解放后，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以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31日，在北平原国民党守军撤离市区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面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一面大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并深入傅作义的统帅部，准确掌握情况，及时向前线司令部报告，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材料：

-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 文章从西线做起
- 新保安之战
- "煮烂这锅山药蛋"——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
- 活捉陈长捷
- 天津失守被俘记
- 古都新生
- 沸腾了的北京城
  ——记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城式

材料一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

一、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

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十六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一〇四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四纵由西南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和十六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四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箝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三十五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三十五军，以一个纵队阻住一〇四军，两敌都被击退。

二、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五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三十五军之后)腾出四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五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九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四、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五、据我们估计，大约十二月十五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坊、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六、此项办法，大体上即是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线上作战时期用过的办法。

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八、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九、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十、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有可能的。

十一、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十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十三、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十四、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十五、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十六、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材料二　文章从西线做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中央军委通知，要我立即赶往平津战役指挥部工作。这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我组成中共平津战役总前线委员会。

我出发以前，曾经到西柏坡受领任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平津战役的全面形势，又十分正确地规定了我

军的任务和部署。我觉得，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毛泽东同志是从西线做起的。

那时候，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华北战场上的敌人，屡遭我军沉重打击之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大约还有六十余万人。他的主力部队有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五十二个师，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六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是煞费苦心的。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我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向绥远逃之夭夭。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待固守平津，还是从平津撤退的问题，蒋介石、傅作义和美帝国主义三者，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蒋介石是既想让傅作义固守华北，迟滞我大军南下，又想把华北兵力全部南撤，巩固江南防务，举棋不定；傅作义则脚踩两只船，想看看形势变化，平津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西逃绥远，不得已时就向南逃跑，但又摆出固守的架势，想捞取美援，扩充实力；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从援蒋武器中拿出一部分，直接供给傅系部队使用，好让傅作义固守平津，以维护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人的心理状态，认为傅作义虽有西逃、南窜两种可能性，但西逃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绥远是他的老窝。

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研究，决定从第二十兵团（原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毛泽东同志指示杨成武、李井泉主动撤围归绥，不使傅作义感到太紧张，随后又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以便掩护东北我军秘密入关。我们积极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决策，早在十二月上旬平津战役正式发起前，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开始，华北我军就在平绥线上作战了。所以说，毛泽东同志发起平津战役，文章是从西线做起的。因此，华北的同志有时也把平津战役称之为平津张战役。

由杨成武同志率领的二十兵团，以三个军的兵力进入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对张家口、宣化敌人的包围态势。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着很灵，傅作义果然着了急，立即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五军，驻守怀来的第一〇四军，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能够保住逃往绥远的通路。

这样，傅作义的大部分嫡系部队共约十万人，已被钳制在平绥线上，我军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部队入关的第一步计划。

这时候，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长途行军，分别经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陆续隐蔽入关，先后到达迁安、丰润、遵化、玉田、蓟县等地区集结。

东北我军主力一入关，傅作义又作了错误判断，他认为我军会直取北平，遂急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为打通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敌人从东、西两个方面，倾全力向沙岭子猛攻，然后向新保安方向撤退，企图缩回北平。

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同志一面令杨得志等同志率领第十九兵团（原第二兵团）主力，由易县经涿鹿迅速向宣化、下花园地区开进，以隔断怀来与宣化的联系；一面令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由蓟县经密云向怀来、南口急进，以隔断怀来与北平的联系。这一步，我军总的意图是将傅作义的西线兵力分割包围，既不让第三十五军缩回北平，也不能让北平的敌人接应第三十五军，然后，待机将他们分别歼灭。

经过激战，我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十二月八日，我第十九兵团将敌第三十五军严密包围在新保安，使其动弹不得。十二月九日、十日，第十三兵团先后歼灭了企图救援第三十五军的第十六军和第一〇四军。我二十兵团也多次击退了张家口敌人的突围。

第三十五军被我包围在新保安之后，前线指挥员都想早日动手消灭它。这个军是傅作义的所谓“王牌军”，是摩托化部队，运动速度比较快，战斗力比较强。它多次与我军交战，可以说是冤家对头，广大指战员恨之入骨，恨不得一口把它吃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同志指示暂缓攻击，两个星期内“围而不打”。因为东北入关的部队，正在进行战役展开，对于平、津、塘的敌人，尚未完全隔断、包围，如果先攻击新保安的敌人，不但会使张家口的敌人向西突围，还会使张家口以东的敌人决策逃跑。所以，不仅西线部队“围而不打”，对平、津、塘的敌人也“隔而不围”，以便在敌人难以觉察之中，完成整个平津战役部署。

毛泽东同志还指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两个星期时间内，淮海战场不作最后歼敌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守军的决心。中央又命令山东部队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从青岛方向逃跑。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华北军区所属的冀中、冀南等军区，动员部队和广大民兵，分别在平南、津南、沧县、德州等地区，迅速构筑起数道阻击阵地，以防敌人从陆地上逃跑。当然，从那时候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甚至不可能出现，防止万一罢了。

这样，我军就撒开了天罗地网，使平、津的敌人插翅

难逃。

在完成了对全线各点的敌人分隔之后，根据既定的部署，在西线先由第十九兵团，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开刀。

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我军向新保安发起总攻。第十九兵团的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尽管第三十五军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全歼了第三十五军一万九千多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军”，在新保安找到了自己的坟墓。

全歼新保安敌人之后，我第二十兵团三个军、北岳军区的部队、骑兵第三师和东北野战军的第四十一军，紧接着向张家口发起了攻击。

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敌第三十五军被歼之后，张家口的敌人有向绥远逃跑的可能。所以，我军在完成包围张家口之后，在周围四五十里内，构筑了三至四道阻击阵地。

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我军全歼新保安第三十五军之后，张家口的敌人惊恐万状，决心突破我军包围，妄图向绥远方向逃跑。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他们先朝西南方向佯攻，主力却偷偷地从西北方向突围，但很快被我军截断了去路。敌五万余众，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以北、名叫朝天洼的一道大沟里，步兵、骑兵、骡马、大车，乱成一团。第二天拂晓，敌人倾全力向西北方向冲击，由于遭到我军顽强堵击，突围企图落空。我军经一昼夜奋勇冲杀，全歼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〇五军全部、第一〇四军的一个师、两个骑兵旅和两个保安团共五万四千多人。只有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带领少数护卫侥幸逃往商都去了。

想当初，我军撤出张家口之时，蒋介石是何等的得意忘形，不可一世。那时候，我就曾经说过，我们撤出张家口，换取了自由和主动，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要回来的。仅仅事隔两年，我们就回来了，张家口终于又回到了人民之手。历史一再证明，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有无敌的力量。

我军在西线的胜利，彻底堵死了傅作义西逃的退路。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解放了唐山等地，使傅作义陷入了绝境，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

（选自《在平津战役中》，作者：聂荣臻）

材料三　新保安之战

1949 年 12 月 11 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平津敌已不能西逃，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继续稳住傅作义，不使其下逃跑的决心，“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看过毛主席的电报后，我们思想为之一新。我军所以“围而不打”，是为了不使整个平津之敌南逃。毛主席用兵如神，神就神在洞察全局，把握住敌统帅的心理状态，以高超的指挥艺术，有步骤地解决主要矛盾，抓住战役的关键部署战斗，达到克敌制胜。对新保安“围而不打”，目的只是为了拖住平津之敌，使蒋傅不好下决心迅速南撤。

新保安虽是个很小的城镇，面积仅一平方公里，但它位于长城外之沙城（现怀来）与下花园间的铁路线上，可以后卫北平，前镇张垣，素以平绥路上的“锁钥”著称。当时新保安城墙完好，表层青砖满砌，内部土层厚实，城高 12 米，顶宽 6 米，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十字街心有钟鼓楼，是全城的制高点。敌三十五军被围困后，抢修了许多防御工事。除在城墙上构筑碉堡外，又在城墙中部和下部构筑火力点，400 多辆汽车挤满了街道路口。敌以其主力第一〇一师守备城西部，第二六七师守备城东部。军部设在鼓楼附近。军长郭景云自知末日将临，但“王牌军”的反动气焰仍相当嚣张，他当众发誓，如果城被攻破，要与其营以上军官全部集体自焚。

三十五军是我们的老对手，战斗力较强。我们充分估计到攻城歼敌任务的艰巨性。罗瑞卿同志主要负责战地政治鼓动工作，我和耿飚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城准备上，组织部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战地练兵活动。

我军以 9 个旅（师）的优势兵力，将敌三十五军团团围住，在扫清外围的同时，积极修筑阵地工事，进行攻城准备。毛主席多次来电指示我们，要“围而不打”。还明确指出：你们作攻击准备是可以的，但暂时不要实行攻击，以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南逃之决心。我们就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罗瑞卿政委还亲自组织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述暂时“围而不打”，服从全局的重大战略意义。记得第四纵队召开党委会，我和罗瑞卿政委去参加了。在讲明毛主席战略意图之后，同志们提高了认识，心情更为振奋，克服了急躁情绪，在做好阵地工事开挖延伸和攻城准备的同时，对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时值严冬，同志们在野战工事中，生活是很艰苦的，不少同志手脚生了冻疮。平北地区群众生活虽然贫苦，但支前非常踊跃，他们送来了杂粮、萝卜、土豆等。同志们就做毛糕吃，喝萝卜汤。敌人被困，人多城小，补给困难，他们将城内群众食物搜劫一空。敌机空投给养，因城小又靠山，加上我军的对空射击，敌机难以降低空投高度，投下的大包红米、小包蛋黄粉，随着风向，多落在我军阵地上了。同志们拾到后风趣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们改善生活来了！”

14 日 13 时，我们发电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汇报：（一）我兵团全部正对新保安之敌进行土工作业，缩紧包围，一切准备工作拟于 16 日完成，待军委命令攻击。（二）

预定攻击部署:以第三纵队对城南及西南部实施攻击(重点是西门);第四纵队对城东关及东部实施攻击(重点是东门)。第八纵队对城西业部实施攻击(重点是西北角)。战斗中三、八纵队并肩攻击,各部队炮火亦互相支援。15日2时,毛主席即复电,表扬我们"攻击准备甚好"。

也就在我兵团积极准备攻打新保安的时候,毛主席日夜操劳。运筹帷幄,指挥我军,已基本上将傅作义之"长蛇阵"切成了三段:东段天津之敌两个军部11个师及塘沽、大沽之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中段北平之敌华北"剿总"及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西段张家口之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7个师。这样就完成了对平津张敌军的分割包围。

毛主席估计到在我兵团攻击新保安时,张家口守敌可能乘机突围西逃,为此命令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于17日由南口西开,加强对张家口的包围。19日,毛主席明确电告我们,待东北第四纵队与华北第三兵团完成对张家口的攻击部署后,我们即发起对新保安的攻击。接到毛主席这一电令,我们无比兴奋,从围住三十五军那天起,已经熬过了11个严寒的昼夜,对敌"王牌军"进攻的时刻终于盼到了。我兵团指挥所立即前移至离城1.5公里的地方,不用望远镜即可看到新保安了。我们考虑到,这是平津战役"各个击破"敌军的第一仗,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参战。21日14时开始,各纵队首先清除了各自进攻正面敌人之外围工事。

12月22日7时,开始攻城。临时配属我们指挥的东北四纵炮团、我兵团直属炮团和我四纵炮团及分队百余门火炮,对准新保安城东门一齐开火,三纵、八纵火炮亦同时展开轰击。一时间,枪炮声震撼大地,火光与烟雾笼罩了新保安整个上空,仅8分钟,就轰开了东门缺口。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突击队用炸药炸塌了护城河岸,他们首先把红旗插上了城墙突破口,率先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八纵六十八团副班长许学顺实施爆破成功后,突击队奋勇登城,也撕开了突破口。三纵七旅在南门爬梯登城后,即将敌一〇一师截为数段。四纵十一旅和十旅在突入城内后,迅猛扩展,仅用5个小时,就占领了敌核心工事钟鼓楼制高点,攻下了三十五军军部,生俘了敌少将副军长王雷震及所属官兵8000余人。并和三纵、八纵协同动作,逐屋与敌争夺,逐个地堡清扫敌军。战至下午,又歼敌一〇一师7000余人。还不到黄昏时分,新保安已被我们完全占领,敌军长郭景云在城北街半截巷指挥所中,当我军战士攻入院落时,他在屋内自杀了。我们迅速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当晚22时,毛主席复电: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立即将大部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我们立即认真传达贯彻了毛主席这一指示。

我和罗瑞卿、耿飚、潘自力等同志,是23日黎明进入新保安的。激战后的新保安,狭窄的街巷,横七竖八的汽车,翻了个的工事以及群众的房舍,仍然冒着滚滚浓烟。沟壑纵横,坑洼相连,枪炮车辆与物资弹药遍地皆是。那样的地形,400多辆大汽车挤在街巷,即使我们让他们开,短时间也开不出来的。有不少群众在工事里寻找他们自家的东西。他们说:"三十五军连我们的切菜板都抢来修工事。这些该死的家伙!"我的警卫员小段听到群众的叙述,怒不可遏,见着成群的俘虏,竟气愤地掏出枪来,被我制止了。

我们来到郭景云的指挥所,那座比较宽敞的四合院,当时也是杂乱无章,一片狼狈不堪的样子。门外堆着几个汽油桶,据说就是郭景云要在我军入城之后,他与营以上干部自焚用的,但是连他的副军长也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只有他自己自戕了。

新保安之战,共俘敌12485人,毙敌3000人,合计15485人,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这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个攻坚战,消灭了敌"王牌军"三十五军。是中央军委、毛主席正确指挥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

新保安之战,是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的胜利。东北野战军及时歼灭了西援之一〇四军和十六军,并支援一个炮兵团,这为我们打下新保安创造了重要条件。华北其他兄弟部队之参战,也都起了有力的配合、保障作用。

平北人民群众在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源源不断地运送大批给养,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与战斗生活的保证。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特别是牺牲负伤的同志,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关于攻打新保安的具体战斗经验,当时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了五点,大意是:一、攻城前外围越扫得彻底,对突破越有利。如十一旅在总攻前一天夺取了东关,直逼东门下,巩固了立足点,为22日总攻开辟了道路。二、突击队最好采用两个以上尖刀连,可以互相支援,互为依托。突进城后也易于巩固和发展。三、攻坚战斗前应强调土工作业,交通沟的编成实际上就是阵地编成。四、炮兵应构筑掩体式盖沟,并多做预备阵地及伪装,以抵御敌炮火杀伤,使我炮兵有安全感,不致影响射击的准确性。五、92步兵炮、平射炮和迫击炮最好配属到营,迫击炮营附到团,指挥最能及时。

记得毛主席在我兵团攻打新保安之前还指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新保安一战,敌"王牌军"被歼,蒋介石、傅作义及其僚属大为震惊,张家口守敌十一兵团闻风丧胆,敌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部于23日突围向绥远逃窜,被杨成武、李天焕率领的第三兵团,吴克华和莫文骅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还有北岳军区

部队、察蒙骑兵师等多路大军急起堵追，在张家口以北全歼该敌，张家口市遂宣告解放，彻底截断了傅作义西窜之路。

新保安、张家口敌军被歼后20天左右，天津这个华北的最大工业城市，也为我东北野战军攻克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与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等，都成了我军俘虏。

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相继解放，使北平成了"陆上孤岛"，被我东北、华北四个野战兵团百万大军团团围住。在我们积极完成攻城准备的同时，经我党努力争取，傅作义将军终于下决心接受了我方和谈条件，令守军开出城外接受改编。北平古城新生了，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了。

（选自杨得志《长城内外展旌旗》）

材料四　"煮烂这锅山药蛋"
——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

在我军形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之后，我们又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战地练兵。广大指战员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在新保安周围三十里地左右的防线上，挖交通壕，架铁丝网，根据新保安的地形特点，编排攻坚队伍，组成火力、爆破、梯子、登城等各种分队。有的连队秘密地把地道挖至敌人的城墙下面，把炸药装在棺材里，以提高爆破能力。那时候天气奇冷，朔风似刀，地下冻土在二三尺以上，指战员们顶寒风踏冰雪，在加紧土工作业的同时，时刻准备粉碎敌人的突围行动。由于部队多，包围圈紧缩，许多同志都吃住在空旷的田野里，下铺冻土，上盖寒天，风餐露宿，实在是艰苦。但是整个部队的情绪一直非常高。四纵队一张油印的战地小报上，曾登载过这样一首打油诗："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煮越软绵。同志们，别着急，山药蛋不熟不能吃；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大家只有一个希望：早日拿下新保安，早日歼灭三十五军！"

新保安之战，是平津战役"各个歼敌"的第一仗。兵团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参战，造成我与敌兵力对比为四比一强的绝对优势。不打则已，一打必胜。四纵队主攻城东南角；三纵和八纵（缺二十四旅）分别攻击西门和城西北角；八纵和二十四旅为兵团预备队，准备阻击敌人向东突围。待各纵队集中兵力、火力扫清外围之后，有重点地多路向新保安镇内突击，务求全歼守敌。

忍过了十一个漫长的严寒昼夜，进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我和罗瑞卿、耿飚等同志，由赵家山移到了离新保安大约只有三里左右的地方指挥。这里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新保安。罗瑞卿同志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我说："从我们北出紫荆关，一个多月了，毛主席指挥敌我一百多万人，到底把这顿'饭'做熟了。"有位参谋说："三十五军这锅山药蛋快煮烂了。"罗瑞卿一摆手，笑了："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宝殿哪！"

罗瑞卿同志的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十四点，兵团所属各纵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分别在二至三小时内即扫清了各自进攻正面上的敌外围工事。二十二日七时，天刚蒙蒙亮，各纵队同时对新保安发起了总攻。四纵十一旅和十旅仅五个小时便占领了敌核心工事钟阁楼，并围歼了三十五军军部，生俘了该军少将副军长王雷震，以及其他官兵八千余人。三纵和八纵也在发起总攻十小时内，全歼了三十五军主力师一〇一师及其他残部七千余人。到十七时，新保安被我们完全占领。十八时我们向毛主席发出了电报。二十二时毛主席复电：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立即将大部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休[illegible]天，准备行动。

我和罗瑞卿、耿飚、潘自力等同志，是二十三日黎明下山进入新保安的。激战后的新保安，狭窄的街巷，横七竖八的汽车，翻了几个个儿的工事以及群众的房舍依然冒着滚滚浓烟。沟壑纵横，坑洼相连；枪炮车辆，物资弹药遍地皆是。这样的地形，傅作义郭景云的四百辆"大道吉"，我们让他们开，他们也是开不出来的。毛主席"围而不打"的决策，在这里起到了比打还厉害的作用。不少群众在工事里寻找自家的东西。他们说："三十五军连我们的切菜板都抢来修了工事。这些该死的家伙！"我的警卫员小段，一个二十出头的大个子，见着成群的俘虏竟气愤地掏出枪来，被我制止了。

我们来到北街半截巷郭景云的指挥所。这座本来比较宽敞的四合院，当时也是杂乱无章，一片狼狈不堪的样子。门外堆有几个汽油桶。据说我军入城后，郭景云曾下令实行他营以上军官集体自焚的计划，但是连他的副军长也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只有他自己在我军战士攻进这座四合院时，自毙而亡。

我也算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上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三十五军，内心的激动却大不同于以往。我曾对罗瑞卿说："打掉三十五军，我有点十三年前渡过大渡河的感觉。"罗瑞卿笑了笑说：'那时候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他们！"我点点头，感叹地说："那时他们追我们总共才一年，可我们追三十五军，已经好多年了。"

（选自《横戈马上》，作者：杨得志）

材料五　活捉陈长捷

凿穿陈长捷的"外壳"

陈长捷为了固守天津，在日伪修建的城防设施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在城区周围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护城河两岸和沿河土墙内外，到处是明碉暗堡，沟结壕连，形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地带，象一层坚硬的外壳，把陈长捷的十三万人马裹在天津城里。

从一月三日起，我军扫除天津外围的战斗陆续展开。

我团三营从一月六日至十一日，对小西门外四座坟据点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浴血苦战。营长朱家礼不顾重病高烧四十度，同教导员苏章率领战士十几次、几十次地向敌人冲击、爆破、厮杀、争夺，部队从拂晓打到黄昏，又从黄昏战至拂晓，度过整整七个不眠之夜。七连连长孙文秀被子弹打穿了下颚，仍坚持率队冲锋。有的爆破手壮烈牺牲后，手里还紧紧握住爆破筒不放。在我军的英勇打击下，敌人固守的外围据点一个一个地被拔掉了，我攻城部队步步紧逼天津城下。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九时三十分开始，震天撼地的隆隆炮声整整持续了四十分钟，几百门不同口径的大炮，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号令下，不停息地怒吼咆哮，成千吨的炮弹铺天盖地地倾泻在敌军的阵地上。顿时，整个小西门敌军阵地被吞没在浓烟烈火之中，灰茫茫的尘烟遮天蔽日地翻滚在天津上空。一排排明碉暗堡冲天而起；密如蛛网似的战壕、掩壕、交通壕如同被碎尸万段的长蛇，蜷伏在敌军官兵的血泊之中；护城河岸陡峭的围墙，被炮火割开了巨大的豁口……

我军前线官兵沉浸在无比激奋之中，战士们跃出工事，挥拳举枪，欢呼："打得好！让敌人尝尝我们大炮的厉害吧！"

在发出冲击信号、炮火延伸的瞬间，我一师二团和二师四团已神速地突破了敌人小西门右侧地段的一线防御。

天津城墙上，突击队的红旗在炮火硝烟中奋展。

按照团的预定分工，我和参谋长黄汉基立刻率领一营跑步通过护城河，进入突破口。这时，担任突击任务的二团已经从小西门右侧打开了一个约三百米宽的缺口，遭到左侧三监狱、自来水厂两个制高点敌人的火力侧射和当面残存敌人的阻击。同时又发现，敌人从纵深调来四辆装甲车和一个多营的步兵向这里进行反扑，妄图恢复他们的第一线阵地，将突破口重新封闭。

为保证后续部队迅速向纵深发展，师前线指挥所命令我团从突破口顺着土墙东南，撕开敌人的堡垒地带，扩大突破口，沿环城路、西关外大街、五马路，杀开一条走廊。顺突破口向东至西关外大街、环城路路口，约有八百米左右距离，这里伏卧着敌人七十多个地堡和其他工事，有粤系林伟俦军的一个加强连防守。我们同一营营长蔡克德和教导员桑梦远研究决定，由三连顺土墙向东突击，捣毁敌人堡垒工事，命令一连、二连协同左邻二团，歼灭反冲击之敌，保障三连打掉敌人的地堡群。

三连从墙埂杀向东去。敌人象一群灰老鼠，冷不防从掩壕里爬出来，居高临下，向三连扑了过来。三连指导员刘自福率领着两个排，同这伙凶残的亡命之徒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格斗，硬是将敌人一个个拚死在土墙下。连长刘河率领爆破组，乘机突到敌人侧背，一鼓作气，炸毁了敌人三十多个地堡和掩体，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反扑，前进了四百多米，打到一座殡仪馆和寺庙附近。

在三连突击堡垒地带敌人时，一连、二连进到了环城路、光复里路口，同陈长捷从纵深派来的总预备队的两个多连的敌人打响了。二连冒着敌人的严密火力，越过环城路，插到了光复里东侧一线，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战士们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从东西两面，把四百多名敌人逼退到光复里东南侧不到四百米长的一段马路上。

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几百名俘虏正佝偻在一个小胡同里。原来，这就是陈长捷在一个星期前用散兵游勇、地痞赌棍和警察凑成的警备旅的一部分。这支队伍，真算是蒋介石的"典型国军"了，士兵们歪帽斜眼，脚上拖着散开的绑腿，腰间缠着花包袱；军官则一个个油头粉面，有的满口金牙，有的鼻梁上还架着墨镜。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苦战，到下午二时，我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凿穿了陈长捷的"外壳"，在敌人第一线堡垒地带，撕开了口子。

杀向敌军巢穴

撕开口子后，我团以破竹之势，由西向东迅猛挺进，连克敌西关外大街、五马路、清化寺街和同业里等地七个敌据点。部队穿街越巷、迂回穿插，横扫"惊弓之鸟"。下午七时，我一营一连、二连进到了天津旧城西马路和南马路之间的岔路口，粉碎了敌人在二线防御阵地的抵抗。

与此同时，全线各兄弟部队都完成了突破任务，进入了纵深战斗，左邻二团和四团已攻占了忠后街、西关大街和永明街，先头部队已进到旧城西马路附近，正向鼓楼大街、金汤桥方向发展。

兄弟部队的胜利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一连、二连在蔡营长、桑教导员的率领下，沿着南马路两侧，迅速攻击前进。敌人在楼上不断向我投弹、阻击。战士们且战且进，在敌人手榴弹落地未爆的瞬间，把它踢到安全距离以外，机枪手挺胸举枪，对据守高楼的敌人进行压制射击。我亲眼看到二连的一个战士用双肩支着机枪脚架，协助机枪射手向高楼上的敌人射击。当时，这个战

士头部负了伤，豆大的汗珠和着鲜血滴落在他的身上，但他仍然挺直身子，双手紧握枪架，顽强地用肉体支撑着正在"突突"发射的机枪，直到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

冒着左右两侧和楼上楼下敌人的绵密火网，部队在"火洞"里前进了八百多米，打到了南马路中段一幢灰色楼房的附近。前边不远就是鼓楼大街和南门外大街的路口，在这里，敌炮兵对我前进通道进行猛烈的拦阻，部队遭到伤亡。在一个房角，我同黄汉基参谋长向军部派来的侦察处长范鲁谈了一下情况。我们刚离开，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范鲁同志牺牲了。在前面十字路口上，敌碉堡内的两挺重机枪火力，象开了闸的水龙头，向我们倾泻过来，灰楼上的敌人，向我们拚命投掷炸药、手榴弹，伏卧在楼底的敌暗火力点，贴着路面向我们射击。部队被压制在马路两侧。

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多，为了及时打通南马路，实现打乱陈长捷指挥系统的计划，团前指简要分析决定，由三连从左侧凿开院墙，绕过灰楼，迂回到前边路口敌人火力点侧后，先把十字路口上敌人的碉堡打掉。

三连战士破墙而入，顺利地进到了指定位置。该连排长李忠同志率领爆破组，连续爆破，炸毁敌人三个地堡和一些掩体工事。在向路口敌人两个高大碉堡进行爆破时，李忠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机枪班长也身负重伤。正在紧急关头，团作战参计冯怀玉同志带着一辆坦克冲上来了。我立即命令坦克协同三连打掉路口敌人的碉堡。冯参谋手持大棒，在坦克后铁甲上"当当当"连敲数下，坦克便向目标径直冲去，只听"咣咣"几炮，路口上敌人的碉堡就被揭翻了。战士们对于用大棒敲打、指挥坦克作战的奇特方法和取得的胜利，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路口战斗得手后，我们集中兵力、火力对付据守灰楼之敌，并令二连从正面炸毁这座楼底的两个暗火力点，进而解决楼内的敌人。正当二连爆破组准备爆破时，忽听楼里隐约传来妇孺老幼的哭喊声。"不行，楼上有群众！"我们立即令二连停止爆破，改由火力压制楼上的敌人，掩护部队强行突破。

为了这次不寻常的冲击，我们把重机枪、火箭筒、小钢炮都搬到了附近楼房的平台和屋顶上，向对面咫尺之近的敌人展开了猛烈射击。顿时，枪弹、炮弹在街道两侧的墙壁上、门窗上和柏油路面上，爆开一团团火光，溅起一串串火花；楼上的瓦片、残砖、玻璃象冰雹一样乒乒乓乓地落在马路上；敌人的照明弹、燃烧弹发出炫目的火焰，把整个街道照得如同白昼。

勇士们在火网弹雨下，一往直前。

这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三位摄影师，双手举着机器，紧跟在二连队伍的后面。我们很担心他们的安全，劝他们站到稍后的地方去。他们当中一位年轻稍大、戴着近视眼镜的同志却吃惊地望着我们，手指着二连的战士说："他们不是比我们更危险吗？"

"同志！他们是战士，手里有武器！"桑教导员向他们解释。

"我们也是战士呀！我们手上拿的不也是打击敌人的武器吗？"说罢，便扭头向前跑去，继续拍照。

这几位摄影师的勇敢精神至今仍铭刻于我的脑海里。

在激烈的巷战中，市民们冒着丧身之危，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热烈欢迎。在我军迎着弹雨向敌人冲击时，躲在街道两侧屋内的群众，有的从半开的门缝里伸出手来，鼓掌致意；有的在窗口上，呼着"欢迎解放军"的口号。在我们冲击灰楼、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灰楼东北角一幢住有市民的二层楼上，突然挂出一幅"打倒蒋介石"、"拥护救星毛泽东"的标语。这条标语在战火中光辉夺目，激励着战士们奋身杀敌，勇猛向前。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死打硬拚，灰楼内四面受围的残敌，终于挂出了白旗，大批武器被投下楼来，四百多个敌军官兵举手下楼，当了俘虏。通往陈长捷司令部的道路终于被打开了。

战至当夜十二点，我团象一把利剑，深深地插入了敌人腹心。

陈长捷俯首就擒

一月十五日凌晨，灰茫茫的浓雾笼罩着正在酣战的天津市。经过一夜巷战，我团一营、二营分别攻占了罗斯福路、广兴街和建物街。五时许，进到了敌核心区的边沿。

这时，俘虏已成了部队的累赘，一营沿南马路、罗斯福路一道，收容敌散兵游勇一千多人；二营在建物街攻下一幢大楼，一"窝"俘敌近千人。因为无力看管，只好留下几个小组，把成千的俘虏暂时集中到几个死胡同里看起来。

我同黄汉基参谋长带领一营、二营的营连干部，登上了靠近中原公司一家澡塘的屋顶，向他们布置了战斗任务。确定一营由黄参谋长带领围歼中原公司守敌，我带二营攻打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这时，师政委黄玉琨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战斗发展很快，我东西对进的各路大军于金汤桥胜利会师后，正在席卷海河两岸的敌人；南边，我三师、一五一师和前线总预备队向南开区和海光寺方向挺进。纵队和师首长要求我团，尽快发起对敌警备司令部的进攻，一定要把陈长捷抓住。

我刚放下电话，忽然有四个工人模样的人来到指挥部，主动要求为我们攻打陈长捷司令部的部队带路。来人十分恳切地说："这里是租界，道路太杂，雾又这么大。"他们看我们有些迟疑，其中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立即从身上掏出一张地下党员身分证，说："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

……”我们以感激的心情，答应了这四位工人的要求。

在兄弟部队胜利消息的鼓舞下，部队忘却了一夜巷战的极度疲劳和饥饿，象猛虎似地向中原公司和敌警备司令部扑去。

四面楚歌的敌人，丧魂落魄，四处逃命。他们丢掉枪支，成群结队地向陈长捷的“核心区”狂跑……

“哒哒哒……”中原公司楼上的敌人向范荒而逃的士兵开枪。枪声里，传来士兵的惨叫声和咒骂声。“妈的，你们不打八路，倒向老子开枪！”骂声中，又响起了更为凶狠的机枪声。

目睹敌人的残暴行径，战士们怒不可遏。一营在工人同志的指引下，顶着敌人三面交叉火力，向中原公司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铁栅门，从侧后用爆破筒炸开窗口，迅速冲进楼去。接着，黄参谋长、蔡营长指挥三连从南侧破门而入，攻进了一楼大厅，并沿着大厅左右两边的楼梯向二层楼上的敌人发起攻击。敌人拚命用机枪、手榴弹封锁楼梯，我们的机枪手抱着轻机枪，边射击、边跑步冲上二层的梯台，压住了楼上敌人的机枪火力，几个战士一齐冲上了二楼……一营在黄参谋长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了逐层争夺。

在一营的有力配合下，二营五连连续爆破，首先攻占了多伦道的中原里大楼，打掉了防守敌警备司令部的西翼屏障。接着，全营分头从新华北路和山东路向敌警备司令部进行强攻。四连一部和五连从北面插到陈长捷特务营两个连据守的一座二层平楼。战士们避开敌人的封锁火力，从侧后接近了楼房，一阵手榴弹投出，乘着爆炸烟雾冲进楼去，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房间里，向敌人肉搏厮打，直至敌人放下武器投降。

在四连、五连进攻平楼的同时，六连突过多伦道，沿新华北路直捣敌警备司令部的北门。

六连副连长徐恒吉同志带领二排，首先冲入敌司令部大院的北门。这时，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作战，迅速消灭了敌人门卫两侧的机枪火力，把陈长捷指挥部的全部人马，堵在他的巢穴里。接着，六连一拥而入，冲进了院内东边的一幢二层房。战士们从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楼下，枪弹横飞，硝烟弥漫。敌人好似一群无头苍蝇，有的在楼道里狂呼乱叫。

在一楼陈长捷宽绰的指挥室里，还完整地挂着各种城防作战图表。三个多小时前，陈长捷还在这里召集天津市长杜建时和他的副司令、军长们开会，会商如何“挽回危局”，此时，桌上还摆着陈长捷签署的“早二时邀杜市长，林、刘军长等会商战局”的通知。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还挂有一张“一九四九年天津国军战况一览表”。这是用以逐日标记天津敌军战况的巨幅作战图，它标列的是一九四九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所谓战况，却仅仅记载了十四天。一月十五日，陈长捷的末日就降临了。

这时，六连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新战士王义凤、傅泽国同志，已经冲进了地下室，首先缴了躲在地下室的二十多个军官的枪。这伙被吓得魂不附体的随从官佐指着挂有一面军毯的地下室里间，向我军战士报告说：陈……在里头……”王义凤、傅泽国立刻用刺刀挑开门帘，冲了进去。

陈长捷正在用无线电同傅作义讲话，请求援救和“决策”，王义凤、傅泽国的两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脊梁，在“不准动”、“缴枪不杀”的喝令声中，陈长捷象触电似地猛然转过身来，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看着身前两位年轻战士手上寒光闪闪的刺刀。送话器从他手中滑落，豆粒般的冷汗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陈长捷和他的少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杨威，以及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督战的高级视察官程子践等七人，垂手立正，交出了自己的武器。随后，二营副营长朱绪清赶到了地下室，当即命令陈长捷向天津守军下达了“立即投降”的命令。

陈长捷、秋宗鼎等被押出阴森的地下室时，陈长捷警备司令部的一千多官兵，已作为我军俘虏被集中在院子里。

天津敌军首脑机关被我捣毁后，敌人的核心守备区马上丧失了有组织的抵抗。在短短两三个小时之内，敌人在海光寺、耀华中学、志达小学、大德隆纺织厂等重要据点，相继被攻克，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等人，亦被生俘。

正午，烟消雾散，阳光普照天津城。天津解放了。

（选自《平津战役》，作者，刘海清）

材料六　天津失守被俘记

一九四八年六月，我从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调任天津警备司令。主要任务是在三、四个月内改建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在津征抽壮丁组建警备旅。到了九月，济南失守，十一月初沈阳陷落，东北全境落入共产党手中。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南方解放军北上，还是东北解放军南下，联合华北解放军，都可形成对傅作义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守军的绝对优势，华北局势已经危如累卵。但当时我们自负“不弱”，还想以逸待劳，发挥“优势”，争取胜利，完全没想到灭灾就在眼前。

十一月六日，淮海会战开始，蒋介石为保淮海免蹈辽沈覆辙，想放弃天津，遂将华北交给他并不很信任的傅作义。傅作义趁此机会讨价还价，扩张自己的势力，取得了华北的各项大权。蒋介石为了进行笼络，还同意傅直接接受美援，并答应组成渤海舰队，以支援塘沽，保持出海口。傅作义见利忘危，表示要“依托美援保持津、沽”，独力支撑华北。我当时亦为傅系争得的利益高兴。

可惜，从这时开始，我们便步步失着。

头一个没想到——八十万神兵从天而降

确定坚踞平津，主力保持出海口的策略后，我曾向傅和义进言，最可顾虑的是东北解放军入关南下，弄不好就会形成关外关门打狗，关里瓮中捉鳖。但我们又估计，东北解放军大战后要休整部队、消化辽沈之役的战果，非半年之后不能再做大举。另外，此时隆冬严寒，不宜长途跋涉，按常规怎么也要等到明春化冻后再入关，而且部队不会超过五十万，所以，傅作义决定放弃张家口，把主力转移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近海方面来，准备明年夏季与东北解放军决战，万一战事不利，还可利用出海口向江南转移部队，保存实力。

可是，谁知淮海蒋军竟然那么快就开始失利，使平津得到南援完全无望，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更没想到东北解放军攻克沈阳不及半月便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长驱入关，而且人数竟然有八十多万。十二月二日夜，我和副司令秋宗鼎突然接到傅作义总部参谋长李世杰的电话，告曰："空军情报，解放军一大纵队——很大的，已到宝坻(县)，正向天津方向行动。傅传令叫你紧急布防。"

真是神兵天降！事前怎么一点儿情报也没有！我们是按照他们明年春天来做的部署，现在？……

我马上问："用什么部队布防？"因为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傅作义为解张家口之急，已将天津附近驻军抽调一空。我手里只有一个残师和强征街道居民新编的警备旅，这些兵连枪都还不会操！

"急抓吧！我从南口把六十二军用火车给你急运去。"参谋长给我了回答。看来，除了"镇定"之外，实在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第二个没想到——毛泽东挥兵张家口、新保安

本来蒋、傅已下定决心将平津主力东移。傅的总部准备迁到天津市图书馆，连通讯设备都已安装好了。张家口的傅系私家当(如小兵工厂和一些经济组织)和傅系军政眷属也开始向天津转移。下一步就准备将傅氏嫡系、新组编的三十五军及新三军、新四军移驻津、沽、唐地区。但是东北解放军来得太快，太出意料之外，傅的总部和三十五军都未及行动。

更出乎意料的是解放军直奔张家口、新保安而来，围三十五军而不打。这真是一着高棋。毛泽东大概早把这些军阀研究透了，深知非蒋氏嫡系的傅作义看得最重的不是平津的得失，而是他的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他在蒋介石面前的份量。三十五军已被全歼过一次，不能再损，傅作义一定会拚命解救三十五军。果然，他放弃了主力东移的计划，命令三十五军向西突围，又令新三军、新四军也推向怀来以西，连已部署停当的九十二军、六十二军也调到南口、怀来方向。为掩人耳目，糊弄蒋介石，傅自诩这是"稳步东移"、"权宜灵活"之计。

结果，新三军、新四军也和三十五军一样，均落入解放军环围之中，傅作义白白丧失了十多万"得力"部队，再无机动兵力了；塘沽、天津也被暴露出来，处于解放军的直接攻围之下。

第三个没想到——天津"固阵"被迅速突破

我接任天津警备司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天津的城防工事改建为设堡的强固阵地。对于这个任务，我完成得非常认真。一九四八年九月，蒋介石去沈阳、葫芦岛指挥辽沈会战时，两度过津、检查天津的城防。对于我到任后主持修建的隐密低碉堡群、工事及工事外大而深的壕沟及铁丝网组成的三线纵深没堡阵地，他点头表示首肯。直到解放军兵临城下，我仍认为，非经过很长时间筑起攻城工事，步步逼近，非付出极大代价，要攻破九十华里长的三线纵深设堡阵地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以强攻急袭摧毁之。我的困难只是兵力不足。最使人头痛的是从东北溃散入关的游勇，到处骚动扰乱，人数达五、六万，比我的作战部队还多，不但不可能收编，还得拨粮饷养活他们，派部队监视他们，否则对部队士气影响极大。这可能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谈吧。

凭恃着强固设堡阵地，我曾向官兵宣达："这样坚强的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总司令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涿州防守三个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现在在傅总司令的领导下，也必能坚持胜利！"这些话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和骄矜的情绪。不料十二月二十日，解放军同天津外围守军一接触，我的信心就去了一半。他们一夜就攻占了河北区一个保安团踞守的"灰堆"据点。在河东区，他们用一昼夜攻占了极为坚固的"东局子"营房据点，一个大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这人用笔写出解放军攻击、穿插、爆破的大略经过，结果使本来就疲软的八十五军闻之丧胆。

总算坚持了十天，到年底，天津外围守军被解放军全部扫荡干净。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解放军的攻围部署已告完毕，炮战更加激烈。我明白，大势已去，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了——等着解放军发起总攻。

最后关头仍不能同心同德

一月十一日，我接到解放军经由民妇转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谍，限十二日晚答复。通谍说：如不放下武器，解放军将于十三日全线攻城。我不敢怠慢，当日晚即约市长杜建时、副司令秋宗鼎、军长刘云翰、林伟俦会商。开始各怀鬼胎，十目相视，默然无语。我只好拿出通谍来，他们四人也都拿出通谍来，这才张口说话。既然都在会前收得通谍，大概都有所考虑，但刘是蒋介石嫡系，他

一言不发，杜、秋、林似有所欲言，但又慑于特务监视，吞吞吐吐不敢畅谈。

我知道几个人私下可能都有想法，林伟俦就常常问秋宗鼎："怎么办？怎么办？"却从不敢道出衷情。在这最后关头若能开诚相见，或许会找出新生之路。但是蒋军中特务太多了，搞得谁也不敢相信谁。蒋介石在各军和军事机关都设置了从"侍从室"直接派出的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军机，随时向蒋通报。派来天津的视察官叫程子践，作战中每晚向蒋汇报情况，我们同他来往都非常谨慎，他也从不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在他背后，还有捏着密码本的"报务员"在监视着。这种特务恐怖确实慑服了许多部队长。

出于这种心理，大家都只说愿意同解放军谈判，谁也不敢带头说"可以放下武器"。于是秋宗鼎起草复函，大意是：可以和谈，请解放军派负责人进城谈判，但放下武器有困难。函由杜建时找了两个回族参议员送出城去。

以上磋商复函经过，我立即禀报傅作义。李世杰回电，还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顽抗的必然结果——我当了俘虏

我本来可以不当俘虏。逃跑和起义这两条路都向我敞开着，但我却选择了顽抗到底的路。

还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发现东北解放军进逼平津后，傅作义即决定将平、津、沽分为北平防守区、天津防守区、塘沽防守区分区防守。蒋介石得知后，马上派副总参谋长李及兰和参军罗泽闿持其亲笔信来津。信是致平、津、沽军以上人员的，要我们保持团结，并要刘云翰、林伟俦两军长服从我指挥。同时传达蒋的口谕：津、沽两区兵单，应并为一区，可以放弃天津，以固守出海口为主。显然，蒋介石的信和口谕都是一个目的，稳住我，叫我听他的，保持出海口，以便我们打了败仗的时候能逃出去，保存实力。我集合刘、林两军长到杜建时处同李、罗商议，六人一致认为放弃天津，保住出海口的意旨是正确的，但津、沽间交通已被解放军截断，刘、林二人对率部突围面有难色，怕遭到廖耀湘在东北大凌河转进时全军覆没的命运。当时天津的"东局子"机场还在我们控制之下，城内跑马场又开辟了一个小机场，我如离开天津去塘沽完全可以卸责，也确实走得了。当夜几次电话请示傅作义，他都表示"待考虑考虑"，没有明确指示。这个不指示等于指示，叫我不要执行蒋介石的旨意，不要走。我当时一心要对傅负责，于是，为了避免陷北平于孤立，也为避免部队在转移中被消灭，我决定坚守天津，不率部突围，也不只身出逃。

之后，天津被围，我知道没戏了，从来孤守要塞，没有不终于陷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洽商"，即谈判放下武器。之所以犹作困兽之斗，实出军阀派系观念，认为平、津一体，要由傅作义统一解决，否则会影响华北"政治"。我一直瞩望傅作义会适时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希望我的坚守可以为他向解放军"要价"提供基础。当傅召邓宝珊到北平时，我以为他是想通过邓宝珊同解放军谈判。后来情况紧急以至接到解放军最后通谍时，李世杰所传傅的指示一直是："坚守就有办法"，我均理解为这是大有深意的命令，他已为我们筹划好一切了。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频来询问局势，我也反复向他们说要听傅主持，说邓宝珊到平说明傅已在同共军谈判，并慰之平、津一体，傅不会置津于不顾，还让他们派有关代表飞平向傅请愿，遗憾的是傅始终没有答复。

一月十一日，解放军发出最后通谍。

一月十三日拂晓，解放军发起进攻。

一月十四日，天津城防主阵地被突破。到夜里，巷战激烈。我们已抽不出可应付的部队，只好召集杜、刘、林作最后的会商。大家都认为打不下去了。决定各前线径自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说彻底点，就是投降。

十五日晨七时许，傅作义在无线电上听到解放军"突入天津市"的消息，向我急通无线电话。这是天津被围以来他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和我通话。我向他汇报了城破情况和我们夜里会商经过。傅作义终于口吐真言："可以接洽和平吧！"但这时，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和几个战士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了。我成了俘虏。

当俘虏以后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太倒霉了，要是早点去塘沽，要是单独宣布起义，……命运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呢？似乎一念之差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苦苦地想了几年，总算明白了：蒋军的失败是必然的，我个人的命运也包含在其中。无论逃脱、被俘还是起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人，我的事业是永远的失败了。假如我不能开始新的生活，那就只能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感谢解放军使我走上自新之路。

（选自《纵横》84年1期，根据陈长捷《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改写）

材料七　古都新生

在北平人民的记忆中，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三日是多么红火的一天。这一天，在北平举行了轰动世界的解放军入城式。

上午十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入城式正式开始。挂着红色指挥旗的指挥车，由永定门向前门开来；后面是四辆载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的大卡车；领袖像后面是整齐的军乐队，军号闪闪发光，号声震天动地；再后面是装甲车队、炮车队、骑兵方队、步兵方队。

北平的各界群众沸腾了。放眼望去，前门大街上，数不清的红旗、横幅，拥不断的人流、车队，真是旗的海，人

的海。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鞭炮声、歌声，汇成一曲胜利交响乐，在人们的耳边回荡。

"快看，快看，民主人士出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忙循声望去，只见几个穿长袍、戴眼镜的先生向人群走去。那是周建人、胡愈之、张奚若、钱伟长、费孝通、李广田、张东荪等知名人士。他们满面笑容，举着小旗，汇入欢迎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

坦克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一直开到前门楼下。这些美国制造的杀人武器，如今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的新装备。汽车牵引的大炮，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货。有些学生爬到坦克上，用粉笔写上："中国人民解放万岁！""对准蒋该死——开炮！"有的大炮筒上，骑了四五个小伙子，他们神气地摆着手，把人们扔上来的花环，套在炮筒上。

骑兵、步兵的方队经过前门楼下，我看到，我们军的队伍，高举着"打大仗、打硬仗、威震辽东"和"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秋毫无犯"等大旗，雄赳赳地走着。各师、团的干部，分别走在他们队伍的前列。远远地，我看见还有骑马的女同志，仔细一看，才看清楚她是一二一师后勤部政委、女红军战士吴朝祥，她也和男同志一样，威武地骑在马上，接受人民的检阅。

从永定门入城的队伍，经过前门向右拐，开进了东交民巷。这是有意安排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中国人民，东交民巷是他们的领地，中国人是不得随便进入的。今天，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坚不摧的英雄军队。

坦克冒着青烟，大炮高昂着炮口，骑兵、步兵挎着钢枪，由西向东行进。马达隆隆、马蹄得得，歌声阵阵，震得洋楼上的玻璃窗子瑟瑟作响。事后才知道，这些使领馆的人员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吓得紧闭大门，有的公使太太吓得躲进暗室，有的公使吓得不敢在东交民巷住了。

队伍开出东交民巷，绕过傅作义在东单临时开辟的停机场，经过东单牌楼、东四牌楼、北新桥到太平仓。部队与另一路从西直门入城的部队汇合，再折向南行，经长安街，转和平门，从广安门出城。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前面的队伍过了德胜门，后面的还在向前门走。北平的街道变成了人的河流，整个北平市成了歌的海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从黎明唱到午夜。

庄严的入城式宣告文化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在全国、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家外国通讯社当天发出的电稿是："中国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十分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

（选自：《解放北平前后》，作者：莫文骅）

材料八　沸腾了的北平城
——记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城式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解放北平的入城仪式。装甲部队、炮兵、坦克部队、骑兵、步兵，一路从南面永定门入城，另一路由西北面西直门入城，会合之后向南走，由西长安街转和平门，向西出广安门。这浩浩荡荡的行列，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钟，前头已经出了和平门，后头还在向永定门拥进。

这天，从早晨起，人民就一群群一队队地向前门广场拥去。九时半，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叶剑英将军，出现在前门箭楼上。这时候，前门广场上，人民的行列象海洋，各式各样、红的绿的、猎猎飘动的旗帜，就象翻腾的海浪。人们高举着自己热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象。工人、学生、职员、教授，各式各样的人都来了。人们向前拥，向前挤。结彩的火车头开进了东车站，载着好几千平汉铁路工人，从远远的长辛店赶得来。丰台的铁路员工也拥进了欢迎的行列。汽车厂、机械厂等等九个工厂的工人，摘去了帽子上带有国民党党徽的帽花，一个燕京同学说："我三点半天没亮就起来了。"

十时，四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远远地从北面，从前门那边，黑压压地一片人迎上前来，前面一面欢迎大旗迎风飘舞；从南面，人民军队的头一辆带队的装甲车，摇着一面红色指挥旗，朝着欢迎的人群开过来，随后是高悬毛主席、朱总司令肖象的四辆红色胜利卡车，满载着乐队，铜管乐器金光闪闪，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装甲车部队一条线似的接在后面。在珠市口一带，部队与欢迎的行列相遇了，欢迎的行列在左面，部队在右面，欢呼雷动。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光荣呀！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得到这样的光荣！人群拥上来了，他们跑进了解放军行列里面，一下拥抱在一起，队伍都不好向前走了。欢迎的群众在装甲车上写："你们来了，我们很快乐！""真光明呀！""同志们！加油呀！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呀！"……队伍陆续向前门广场前进。

十二时，人群里起了一片欢呼声，人民的英雄炮兵出现了，绿色道奇卡车牵引着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十五生的榴弹炮、日本式十五生的榴弹炮、巨大的加农炮，一辆接着一辆。这里面有从辽西、从沈阳缴获的整个美国装备的重炮团。看啊！人民是多么喜爱自己的武器！一门巨大的榴弹炮上面，骑着一个北平的小孩子，他骄傲地高举着手里的旗子笑着过去了。另外几门榴弹炮被人们写上了："瞄准蒋介石呀！""送给四大家族每人一颗呀！"十生的巨型的加农炮上，一个胸前挂了奖章的英雄炮手，和一个穿绿衣服的邮政工人抱在一起。随后驶过

的另一门大炮上站着五、六个女学生。还有一个商人站在炮座上招手高呼"解放军万岁!"箭楼上,检阅着这一英雄行列的将军们,庄严而亲切地注视着每一辆炮车,注视着人民的狂欢。箭楼下,庆祝解放联合会的扩音车,领导着唱起:"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的队伍来了"。数也数不尽的炮车,从欢呼的人们身边奔驰过去,两旁锣鼓喧天,人们扭起秧歌舞来,左面是清华,右面是燕京,他们唱呀、舞呀。有的化装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在人民部队强大威力的面前,显出种种狼狈的丑态。这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人民的爱与憎在这里明白地表现出来。

一时十分,突然谁发现了前门牌楼那边冒起了青烟,喊了声:"我们的坦克来了!"一阵坦克轰隆隆的声音传了过来。第一辆坦克从远而近,一个青年学生挥着两只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狂势地喊:"万岁!""万岁!"每辆坦克上飘着一面红旗。人群里激起一片欢呼,有的欢喜得流出泪来,也忘了擦手。戴着无沿皮帽子的坦克手,从坦克塔里露出上身,向人民招手、微笑、敬礼。坦克部队后面是摩托化警卫部队,卡车上一色绿的钢盔,雪亮的刺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得高兴,笑着喘了口气说:"这口气可喘过来了!"另外一位说:"我们老百姓有了这样强大的武装,任何反动派也不许他再欺负我们了。"

这时,一片"东方红,太阳升……"歌声响彻天际。远远好象一片麦浪波动,近来一看原来是戴着皮帽子的人民骑兵来到了。人们叫呀、鼓掌呀,把五彩的红旗都抛上天空。的哒的哒的马蹄踏着柏油马路,那样整齐雄壮,骑兵们手上的马刀闪着寒光。骑兵后面就是英雄的步兵。这时,作为前导的军乐队一出现,人民的欢腾达到顶点的时候到了。英雄的部队一支从永定门进城,一支从西直门进城,一个是被敌人称作"暴风雨式的军队",一个是"塔山英雄部队"。在 1946 年冬季,那天空似乎还黑暗的时代,他们在长白山下四保临江,并肩作战。这两支英雄部队从艰难到胜利,在这里得到人民的热爱、狂爱。战士们在千万只热爱的眼光下前进。一个胸前挂着六个奖章的战斗英雄,被人们热烈地围着、拉着。一个女学生跑上去摸摸那个光荣的毛泽东奖章。这时,欢迎的人们已经站了整整一天,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依恋地舍不得这些英雄。他们与行进的队伍汇合起来,高唱"我永远跟着你们前进",昂然通过一向为帝国主义禁地的东交民巷。

将近下午五时的时候,夕阳照进了广安门,在高大的城门前,无数人群欢送钢铁机械部队。在驶行一整日的战车上、坦克上、飘闪着无数的小红旗,战士们手上还捧着人民献给他们的一束束鲜花。这时虽然暮色苍茫,可是整个北平还到处充满愉快的欢声。北平真正沸腾了。

(新华社华北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电
作者,刘白羽)

济南战役

背景介绍

1948 年秋季攻势的一个重要战役是夺取济南。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自津浦路中段战役人民解放军攻克泰安、兖州后,济南已处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为了屏障徐州,隔断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箝制华东野战军使它不能全力南进,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的建议,决定以 10 万余人的重兵守备济南,加固防御工事,并以徐州 17 万人的强大兵团准备北援,力图确保济南。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的作战方略,华东野战军以 14 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 18 万人组成阻援、打援集团,9 月 16 日,对济南发起全线猛攻,经过 8 昼夜激烈的攻坚作战,于 24 日攻克济南,争取吴化文部 2 万人起义,合计共歼守敌 10.4 万余人。战役发起后,由徐州北援的国民党刘峙集团部队因惧怕被歼,行动缓慢,未敢北进。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民党军纷纷弃城逃窜,山东除青岛及南部少数据点外,全获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围歼敌军主力和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材料:

- 活捉王耀武
- 横扫孤军——回忆济南战役
-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 红旗插上济南城

材料一　活捉王耀武

新华社华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电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在胶济路北侧寿光县境内弥河上的张剑桥桥头,我寿光公安局盘查哨扣留了一个穿着黑色旧棉袍,用毛巾蒙着脸,躺在一辆大车上呻吟的"商人"。这就是从济南逃出来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

王耀武是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从济南化装弃城逃跑的;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汹涌攻入内城,炮弹连续爆炸在大明湖东北的北极阁——王耀武临时指挥所的周围。他绝望地向他的参谋长罗辛理(按:已被俘)说:"我走了,留在这里没有好处。事情是很明白的,你们也各自想办法

吧。”之后他就以“巡视阵地”作借口仓皇地走出北极阁，和他的四个卫士都换了预先准备好的便衣。他穿着对襟夹袄和黑色单裤，扛一个棉被卷，混在难民群里逃出了济南。起初，他雇一辆小车，自己装作一个有病的商人。腿上贴了张膏药，破旧呢帽低低地罩着眼睛。后来他又雇了两辆大车，另换衣服，索性假装重病，用手巾蒙上脸，盖上两床棉被，躺在大车上呻吟。他和他的四个卫士一起，就这样地沿着胶济铁路北侧的大路东行，企图混过解放区内地逃到青岛去。

二十八日晨，这两辆大车行至张剑桥头，被我公安局哨兵拦住盘查。王耀武和他的卫士都说自己是济南人，做买卖的。但他们的仓皇失措的神情和支吾和言语，瞒不住机敏负责的哨兵。哨兵就把他们带到公安局去分别审讯。盘问时王耀武在车上竭力辗转反侧，哼声越来越大。我公安局审讯干事走近车旁问他时，他伸出舌头表示病得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和常人一样的脉搏却说了真话。审讯干事除了他头上的毛巾和呢帽，露出额上一条黑白分明的军人特的有帽印。于是审讯干事厉声命令他下车。

在严格审问中，王耀武仍图抵赖。他自称名叫乔堃，是临清人，在济南开菜馆的。问他菜馆字号，他却答不上来，说是“忘记了，给大炮吓糊涂了”。王耀武把和他坐在一辆车上的卫士称做是他的“侄子”，但问他侄子是什么村人，侄子的父亲叫什么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想不清他是什么村……唔，可是不远，也是俺那地方人。他父亲名字是……他是个庄户人，我还不大清楚叫什么……唔，他叫乔堃。”“吓糊涂了”的王耀武，把他自己的假名牛头不对马嘴地又安到他的“侄子”的父亲头上了。

第二次提审时，王耀武面色苍白，左顾右盼地望着押解他的几个战士。他恳求提审员与他并肩走。到受审室，他畏缩地坐下来，时而叹息，时而向房子周围张望。审讯开始时，他连声问审讯股长：“请问，你是不是县长？”审讯股长命令他答话，他才无可如何地，缓慢地说：“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让我说实话吧。我就是王耀武。”他请求把他送到华东军区。

这个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伪山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王耀武，就这样作了人民的俘虏。“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一山东人民的响亮口号光辉地实现了。

材料二　横扫孤军
——回忆济南战役

决　策

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转到了第三个年头，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华东、中原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947年下半年以来，我华东野战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分为内线和外线作战。内线兵团（即东线兵团，又称山东兵团）转战在山东境内，先后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周（村）张（店）、昌（乐）潍（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攻占了周村、张店、潍县、兖州等重要城市，威逼济南。外线兵团（即西线兵团）也在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中，先后在鲁西南、豫皖苏边区和中原地区，取得了沙土集、洛阳、开封、睢杞等战役的胜利。山东解放区已同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了起来，华东解放区也与中原解放区连接了起来。睢杞、兖州战役后，内线兵团和外线兵团又胜利会师，军队更集中了，力量也更强大了。而国民党军的华东战场，却另是一番颓败景象。南面，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线上，由徐州“剿总”刘峙、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17万军队，皆处于猥集守备状态，像被牢牢地钉在了十字架上。北面，由王耀武率10万人据守的济南，同徐州的联系已被割断，犹如大海中一座被隔绝的孤岛，蓝天上一只断线的风筝。

面对这种战争态势。如何进行战略部署？中央军委在运筹着，华野首长在酝酿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在翘首企盼着。

8月10日，华野经过多次研究，向军委上报了几个方案：第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区作战，截断津浦铁路徐蚌段，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援；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

8月12日，军委复电，指示华野对攻打济南进行会商研究。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下步攻占济南的战略目标。

8月26日，军委又电示，要求9月15日以前完成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于9月15日左右向济南发起进攻。

遵照军委的指示，华野前委经过会商，明确提出：以攻济为主要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部署上，以足够兵力攻城，以主力打援。

合　围

9月9日及13日，攻城部队开始分别自济宁、汶上和泰安、莱芜地区行动。我师亦奉命从驻地出发，随大部队前进。

9月15日夜，我师到达圣佛站、学庄、三官庙间地区。

各部队渐渐迫近济南。东兵团渤海纵队已首占龙山镇、三官庙，主力到达城东郊。西兵团于15日扫清了肥城、平阴之敌后，于16日拂晓包围了长清，主力进至长清

东南的宋村、讲书院地区。

此时，王耀武判断我主攻方向在西面，惟恐飞机场的失守，急令晏子风率总预备队第十九旅和五十七旅向古城以西驰援。

9月16日深夜12时，按照预定时间，济南外围战正式全面展开了。

炮声轰鸣，杀声震天。这正是旧历八月十五的前夜，古老的济南城，在中秋明月的映照下，在炮火纵横的交织中，扑朔迷离，时隐时现，更加显得诡谲与神奇。

我东西兵团同时进行攻击。东兵团的任务是迅速肃清东郊及东南郊外围阵地，西兵团的任务是迅速抢占机场、控制商埠以西阵地。两路部队密切配合，像一把巨钳从东西两翼同时向敌人合围过来。

我师以二十三团全部包围歼击宋村、讲书院之敌，以二十一团位前后箭东、于庄、务滋，向王府庄、三六三高地插进并堵击讲书院逃窜之敌，二十四团一个营插至鳌大顶配合堵击逃敌，团主力进至大彦、皇姑井带向崮山之敌警戒，师率二十二团在东西洋河、宋村以南地区集结。

17日拂晓，我师全部向前推进到王府庄、张家庄、务滋、大彦、及东西洋河一带。又迅速攻下饿狼山及三六二高地，切断敌五十七旅退路，另以一个团向殷家庄、黄山庄、簸箕山地区插进。

经过两天激战，西兵团两广纵队和野司警卫团全歼长清守敌；十纵由西向东；攻占了飞机场西的匡李庄、杜家庙一带，并击退晏子风援敌；三纵由西南攻占了双庙屯、陡沟桥等地；鲁中南纵队由南向北，占领了南郊重镇仲宫及津浦线上的张夏、崮山等要点；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占了齐河，守敌弃城南逃。东兵团渤海纵队攻占了东郊重地郭店，包围了王舍人庄之敌；九纵一举攻占了王耀武自夸能坚守半个月的城东重要屏障茂岭山、砚池山两个主要据点。

这时，王耀武被打得晕头转向，心乱如麻，又认为我主攻方向在东面，急令西援立足未稳的晏子风率十九旅和五十七旅调头向东，投入东线作战。我军又乘胜攻克了窑头、甸柳庄等据点。渤海军区部队也占领了城北黄河沿岸的鹊山庄、洛口等地。

9月18日黄昏，我师和九师乘胜前进，对簸箕山、卧牛山、张家庄、王府庄一线展开攻击。

我师二十三团一营担任攻歼簸箕山之敌，另以二十一团一营攻米山，配合作战。簸箕山是济南西线守敌的一个重要阵地。山顶是蝌蚪式的围寨和高低不同的大小碉堡，周围一道铁丝网，半山坡是交通沟和地堡群，周围又是一道铁丝网和利用土坎挖成的陡壁与阻击沟，由八十四师派一个营重兵把守。晚11点，一营干部战士在营长张明带领下，群策群力，英勇顽强。在20分钟之内攻下了簸箕山。往前，离敌守备区主阵地腊山已经不远了。

至此，西兵团三纵队已夺取了琵琶山、玉皇山、簸箕山等地，并以猛烈的炮火炸毁了飞机场跑道，控制了飞机场，迫敌停止空运。敌七十四师仅空运7个连便被迫中断，后来的敌机刚飞到机场上空，看到机场里一片烟火，转身仓皇逃窜。十纵攻占了紧邻飞机场的杨家庄、大刘家庄、大饮马庄等以北地区，继续向纵深发展。鲁中南纵队继续前进，占领了津浦线的党家庄及其东北岳而庄。预备队第十三纵队也从东南攻占了石方峪、康而庄。

9月19日，在我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和我党地下工作的争取下，敌西守备区指挥官、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秘密同我交涉起义，至晚交涉完毕。吴化文率一五五旅、一六一旅、独立旅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撤出腊山等阵地。我师当晚向辛庄营房、西南卡子门挺进，前去接防。当二十三团一营抵辛庄营房后，发现敌系联勤监护营，便撤至东柳庄。三营进入西南卡子门后，发现不是八十四师，即撤返红庙。

至此，西线兵团已全部占领了飞机场，彻底堵死了敌空援之路，并控制了商埠以西地区。东线兵团九纵也已攻下城东南马家庄、燕翅山、平顶山一带阵地，前锋直副外城城下。我整个攻城集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清了济南外围的敌人，从四面完成了对济南的包围。

强　攻

我大军四面临城，又加上吴化文战场起义，对王耀武震动很大。他辗转反侧，惊魂稍定，急急致电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请求突围。而蒋介石严令死守待援。王耀武不得不慌忙调整部署，缩短战线，除留部分部队防守商埠外，将主力撤入城内企图固守。

9月20日黄昏，西兵团突然从南、西、北三面，同时向商埠发起了强攻。

顿时，炮声齐吼，火光冲天，烟雾一层一层地弥漫开来。在夕阳的映照下，犹如一片一片碧血在燃烧。眼看着，商埠城墙上敌人的工事被摧垮，横七竖八地坍塌下来。

三纵由商埠西面向横贯商埠东西的主要干线经二路和经三路迅猛向东推进。十纵由商埠北面向南方向突击。十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由商埠南面向东北方向猛攻。杀声如潮，吼声似涛，把古城济南震得瑟瑟发抖。

三纵以我师二十三团攻击西南卡子门，突破后全师沿三、四马路向东攻击前进；以九师二十团突击铁路工厂、二十五团突击北卡子门，突破后全师沿一、二马路向东攻击前进，配合我师肃清商埠一、二、三、四马路之敌。

商埠，工厂林立，商贾云集，是济南城西工商业集中的地区，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王耀武精心布置了重兵把守。大家心里都明白，能不能夺下商埠，至关重要。

我八师二十三团对西南卡子门的攻击正在激烈进行。

西南卡子门，敌人坚守着石砌的城墙，墙上有电网，墙外有 8 尺宽的深壕，壕外竖着梅花桩，桩外两道电网。部队难以通过。

二十三团安排英雄的"洛阳营"打头阵。干部战士为尽快给后续部队辅平道路，展开了火线军事民主，创造了以炸药爆破壕沟的新方法。首先集中二三门平射炮，对壕沟预定之突破点，作抵近集中射击，将土打松，形成斜坡；再以炸药爆破壕沟外沿，一直到壕沟形成斜坡，可以上下通行无阻为止。紧接着再爆破壕沟内沿，用适当长度的爆破杆子，由上而下连续爆破，一直炸到参跑上去为止。

山炮、曲射炮连续轰击着敌阵地前沿，掩护爆破。

炮弹嘘嘘而过，照得四处如同白昼，碎石残片不时从城墙上滑落下来。

轰！一声巨响，第一包炸药送上去了。

轰！又一声巨响，第二包炸药也送上去了。

勇士们连续送上了 9 包炸药，每包轻则 15 斤，重则 40 斤。干部战士自豪地称为"九声连环炮"。

前七包，壕外的电网和梅花桩被炸爆了，深而宽的壕沟也被炸成了斜坡。第八包，是炸壕里边石墙上的电网。墙与壕是结合着的。战士小于、小杨抬着梯子刚刚登上，班长许洪涛便扛着手雷窜上梯子。沟深墙高梯子短，副排长赶忙搭了一背许才爬上去。这时，突破口周围 50 公尺以内的敌人，都被先前的几包炸药震昏了。许洪涛安然放好手雷，电网随着巨响四分五裂，墙上炸穿了一个小缺口。为彻底扫清突击道路，王明德和杨从贵用最后一包大家伙炸开了石墙。

接着，一颗蓝色的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飞上天空。部队发起了突击。

4 分钟后，突破口又升起了一颗白色的信号弹，后续部队大批跟进。

与此同时，二十团攻下了铁路工厂，二十五团攻进了北卡子门。

9 月 21 日晨，我师沿三、四马路向东攻击前进，九师沿一、二马路向前深入。

我师进至敌省党部，立即将青年教导总队包围。狡猾的敌人一面交涉投降，一面向城内逃跑。我们督促部队迅速追击。

上午 9 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我和师长王吉文才开始吃早饭。忽然听说前面有座地堡封锁得很厉害，部队难以前进。王吉文闻此情况，立即对我说：'政委，我先过去看看。"说着扔下饭碗就走了。在离火线不到百米远的巷口里，他和二十一团的团、营干部站在一棵老槐树下，亲自布置火力，掩护战士们通过封锁线。突然，一颗炮弹飞来，王师长被击中左肺倒下了。他刚醒过来，就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不要打针啦，赶快去治疗那些战士，治好了他们还可以为人民服务！"稍停了一下，他倾听着外面的枪声，又关切地问："张团长呢？他没有负伤吗""显然是惦记着刚才和他站在一起的张敬宗团长。当参谋处抬来担架的时候，他稍带严厉地说："先抬战士！"随后用火热的眼睛盯住身边的同志说："记住我的话，好好地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去革命到底！"这些亲切的话语，感动得他周围的干部战士都纷纷地落下了眼泪。王师长被抬下战场的时候，纵队丁秋生政委亲自跑来看他。虽然他已呼吸困难，神志有些昏迷，但仍能从许多声音中听出是丁政委的声音。王师长竭力睁开眼睛，亲热地喊了声"政委，我没……"不多时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王师长牺牲了，年仅 32 岁。同志们难过地低下了头。王吉文是湖北黄安人，家境贫苦，自幼给地主放牛，终年挨饥忍饿，受尽了凌辱和酸楚。1929 年初，他被卷入苏维埃土地革命斗争的狂潮，9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 1 月，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 2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人民革命战争的考验，历任通讯员、通讯班长、宣传员、指导员、连长、副营长、教导员、营长、团长、分区司令员、副师长、师长等职，为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 18 年，先后负伤十余次。他英勇顽强，身先士卒，哪里最困难就出现在哪里。然而，就在这最需要他的节骨眼上，他却永远地倒下了。

"为王吉文师长报仇！"

"活捉王耀武！"

仇恨像烈火一样，在全师干部战士的心中燃烧。

晚 8 时，我二十三团分两路将敌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一七二团包围在敌二绥区司令部，二十五、二十七团也由二马路配合将敌二绥区司令部包围。此时，十纵、十三纵已由北、南路插至商埠与济南外城之间。

敌二绥区司令部位于二、三大马路与纬三路之间。周围近二里，尽是一片钢筋水泥的大洋楼，四周畅通着开阔的马路，四邻矗立着高大的建筑物。楼与楼之间纵横上下通连着，构成一片迂回曲折的院落地形，形成一个坚固的独立抵抗据点。楼墙外，分布着从地下伸出的乌龟似的大地堡，控制了四处街道。楼窗里，装置着用麻袋和面粉袋构成的枪眼。楼顶上，是用水泥修成的轻重火力掩体，并有三门山炮和若干轻重机枪。院子里的门口都修设了地堡，每栋楼都是可以独立作战的坚固堡垒。100 多个机枪火力巢，1000 多个步枪射击孔，构成了上中下三层火力网，可以紧密封锁每一条大街。在整个济南商埠里，俨然像一座大兵山。王耀武亲自让他的"模范部队"七十四师一七二团坚守在这里。

我以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一部攻打路南的一片洋楼，以二十五团、二十七团攻打路北的一片洋楼。

夜色中，我轻重炮火集中向敌楼猛轰，掩护部队突

击。

我二十三团"许昌连"首先从西南角炸开墙壁，突进楼房。敌人趁我立足未稳从上中下三层楼房拚命反扑。霎时间，一场立体化的决斗迅速展开。连长杨培山带着突击排，和敌人举刀肉搏起来。敌人从各个房间，从楼梯口，从楼的上层，从底层楼板下的地洞和地下室里，前后左右一齐向我射击反扑。并把桌子、椅子、沙发、成袋的洋面乃至成捆的档案文件都抛在走廊上，企图阻止我前进。还惨无人道地施放大量毒瓦斯，发射火焰喷射器，指望把我打退。杨连长和突击排则与敌巧妙周旋，利用每一个墙角、麻袋、墙壁，硬是打退了敌人的 4 次反扑，守住了突破口。

9 月 22 日拂晓，二十三团夺下西南一片洋楼。13 时，二十七团攻入山东银行。十纵也由东北和东南迫近。敌一七二团 600 余人被包围。

路南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钉子—— 王耀武的办公室了。被称为"九勇士"的我二十三团五连五班 9 个战士，手擎着 35 斤至 70 斤的炸药包，连爆 7 包，把楼房西段炸开一个丈余高的突破口，然后飞身冲进楼里，同敌人逐楼、逐层、逐梯、逐口地争夺起来。走投无路的蒋军只好一批一批地把枪扔出来，乖乖地举手投降。

战至黄昏，全歼 600 余守敌，商埠为我所占。九勇士与部队站在那高耸入云的大楼顶上，欢呼起来，跳跃起来，互相庆祝着胜利。

东兵团也扫清了城外地堡群，并全歼被围困在王舍人庄守敌，在城外展开近迫作用。

这时，上级传令，我三纵队就地在商埠休息。

奏　凯

商埠被我占领了，王耀武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但他认为，我军要完成攻城准备，却需要几天时间。于是，便下令再度调整部署，整修工事，加强城防，继续进行顽抗。

为了不让城内敌人获得喘息休整的机会，我攻城集团决定东、西兵团立即同时发起对外城的攻击。

9 月 22 日晚 8 时 30 分，我攻城部队以猛烈的炮火向外城发起轰击，各路纵队在炮火掩护下，齐向外城勇猛突击。

外城，是敌人的一条坚固防线。城墙内壁和外壁一律用石块砌成，高七八米，厚四五米至七八米不等。城门楼和城墙上都设有高堡，城墙中部设有射击孔，城脚下筑有地堡，自上而下分设着三层火力。城外挖有壕沟，宽五至七米，深三四米。同时，壕外几十米的民房大部已被敌人拆除、炸毁，壕外的广阔地带完全暴露于敌火力之下，使我无攻击依托。就在我各部向着突击地域跃进之时，敌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并使用了毒气弹和火焰喷射器。转眼间，毒气滚滚翻卷，火焰熊熊燃烧，整个前沿阵地迅速变成一片火海。

我众炮齐轰，群弹齐飞。炮声隆隆震响，火光闪闪耀眼。敌城防工事不断在炮声中倾倒下来。我各路部队冲过毒烟，穿过火海，杀上外城。东兵团九纵占领了永固门，向南突击。为九纵助攻的渤海纵队也突破外城防线，沿街向纵深发展。西兵团十纵一部突破永镇门攻入外城，另一部突破普利门。我三纵右翼助攻获得成功。十三纵队也由城西南角永绥门突破了外城。

我各部队突入外城后，与守敌展开巷战，激烈拚杀。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至 23 日下午，守敌大部被歼，我军全部攻占外城。

这时，王耀武仍然错误地判断，我军连连作战。已经疲劳，若要攻击内城。需经三五天准备方可。蒋介石眼看着形势不妙，一面督令徐州援兵迅速北进，并派空军向内城投送粮食弹药，向我军占领的市区狂轰滥炸；一面派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临济南上空，给王耀武鼓劲打气。此时此地的王耀武，心慌意乱，如坐针毡，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自知在劫难逃，又不甘束手就歼。于是又一次横下心来，决定以内城这仅剩的一道防线，同我军作最后的较量。

内城是济南守敌的最后一道核心阵地。城墙高 13 米，厚 10 至 12 米。明碉暗堡密布，除同外城一样设置三层火力外，在墙头相距 10 米修一子堡，30 米修一母堡，70 至 100 米修一炮台。在城东南角，矗立着一座气象台，站在那里可以俯瞰城内外，是全城的制高点。护城河宽五六米至二三十米不等。敌人堵住黑虎泉水，引入护城河，水深二至五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此办公，王耀武撤入市内就龟缩在这里指挥。

为乘胜迅速彻底地全歼济南守敌，我攻城集团要求部队发扬勇敢格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拿下敌人最后一个堡垒，并命令部队当晚紧接着攻打内城。

9 月 23 日晚 6 时，我全线对内城的攻击又开始了。

我集中全部炮火向内城城垣及敌防御工事猛烈轰击，各路部队涉过冰凉的护城河扑向内城 。

王耀武胆战心惊，盼援兵望眼欲穿。可是，他哪里知道，蒋总座虽然连连督令，也不管用。驻商邱、砀山的邱清泉兵团，深知迎面有华野布下的打援兵团严阵以待，截住去路，侧翼有中原野战军集结牵制，正畏途如虎，一步三顾，仅行至城武、曹县一带，离济南尚有数百公里之遥；而黄百韬兵团和李弥兵团，却以集结为幌子，迟迟不动。

王耀武狗急跳墙，铤而走险。沿着内城城墙发疯似地走来走去，严令部队凭借地形和火器优势，居高临下，疯狂反击。

我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密密交织，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号声、吼声、喊杀声，阵阵相连，此起彼伏，响成一

片。各路部队穿过滚滚的硝烟，竖起云梯，挂起竹杆，一波又一波地向城墙涌去。

我东线兵团九纵队对新东门至东南角段实施突击，渤海纵队自新东门以北实施攻击。我西线兵团第十三纵队攻打西南角坤顺门，三纵队进攻西门，十纵队继续扫清外城残敌。

我三纵受命攻西门后，即令我师二十二团主攻，二十一、二十四团及九师二十五团等为后续，另以九师一个团从干键门配合攻击。

然而，由于内城工事坚固，敌人封锁严密，我攻城部队全线受挫，阻在内城城下。一时间，天上的乌云遮住了月亮，地上的烟火弥漫了护城河两岸，气氛像死水一般沉寂，令人窒息难忍。尽管如此，我军仍锐气不减，奋勇向前，誓将敌人踏在脚下。

我二十二团一夜数次组织爆破，均未成功，爆破员大部分伤亡。

9月24日拂晓，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在东南角率先杀上城头，将红旗插上气象台。十三纵三十七师一〇九团也在西南角撕开了突破口。

我师二十四团从西南角迅速跟进，后续部队也源源涌进城内，投入巷战。

我师二十一团攻占正谊中学，生擒守敌800多。巷战中，五连连长、甲等战斗英雄赵学生英勇牺牲，战士们从他亲手打开的通道上愤慨前进。

我二十二团在兄弟部队打开西门后，沿城墙以东向北攻击，12时，占领了小西北门，将敌人压缩到西北角长约三里的城墙上。敌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亲自督战，命令所有士兵“只许死守，不许后退”！敌人依据三步一个的密集地堡群和深沟，顽固进行抵抗。经过激战，终于被我二十二团歼灭。在那长约三里宽约七公尺的战线上，狼藉着七八百具敌人的尸体。

我东西攻城大军沿城内大街，勇猛向前，势如破竹，守敌溃不成军，纷纷举手投降。攻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时，守敌利用坦克、装甲车及各种轻重武器作最后垂死挣扎，并用火焰喷射器烧毁附近民房，阻我前进。我军一举突破敌人的多层防御工事冲进省府大院，占领了王耀武撤入内城后负隅顽抗的指挥所。躲藏在地下室里负责战役总指挥的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举手被俘，悻悻地低下了头。

9月24日黄昏，济南完全被我占领。历时八天八夜的济南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选自《军事历史》）

材料三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948年9月下旬，山东腹地战云密布，“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攻城打援战役已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战士们鼙足了劲，单等一声号令。

9月9日至13日，我攻城部队西集团和东集团，分别自济宁、汶上及泰安、莱芜地区隐蔽地向济南开进。15日夜，各部队迫近城郊。东集团一部于行进间攻占了龙山镇、三官庙；西集团于16日拂晓以一部兵力包围了长清县城，主力进至长清东南之宋村、讲书院地区。此时，王耀武刚从南京归来，他根据长清以西以南发现我大部队行动的情报，判断我主攻方向在西面，即将其总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将第57旅由张夏、崮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增援西郊。

16日夜，战役发起，我对守敌全线展开攻击。激战到17日，我西集团之第10纵队攻占藤槐树屯、匡李庄、杜家庙；第3纵队攻占琵琶山、双庙屯、榧山桥；以上两纵队正分别向飞机场、腊山、党家庄等要点逼进；鲁中南纵队攻占仲宫、双山头、崔马庄；两广纵队及野司警卫团攻歼了长清之敌；齐河守敌弃城南逃，该城为我冀鲁豫军区部队占领。东集团之渤海纵队一部围攻王舍人庄之敌，主力迅速西插，攻占了卧牛山、祝店、辛店等地区；渤海军区部队攻占鹊山、洛口、守敌大部南逃；第9纵队一举攻克了敌人自吹能坚守半月的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要点，歼敌整编第73师一部，使敌大为震惊。此时，王耀武根据我军攻势发展情况，又判断我主攻方向在东，即一面慌忙将总预备队第19旅、第57旅东调，并将飞机场以西之第211旅调入市区，以加强防御；一面以第15旅及刚空运来济的整编第74师之第172团7个连，自七里河方向向我反击，并以一部增强燕翅山防御，妄图阻止我之攻势。我东集团在炮火支援下，依托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连续猛烈的反击，巩固了茂岭山、砚池山等阵地。当晚，王耀武见反击无效，恐战线过长，其部队有被我分割围歼的危险，乃放弃外围防御地带上若干孤立突出的据点，收缩兵力，缩短战线，以确保机场及基本防御地带。我乘敌收缩之机，迅速向敌外围主阵地纵深猛插，乘胜攻克了窑头、甸柳庄等地。

战役发起后，蒋介石也于17日下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第2、第13兵团由鲁西南北援，令第7兵团迅速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铁路向北作钳形攻击。当日，我获悉此情报后，即令攻城兵团加紧攻击，并令阻援、打援兵团迅速进入阵地，严密监视敌人。

18日，我攻城西集团之第10纵队攻占古城、常镇屯，歼敌一部，继续向大饮马庄方向发展；第3纵队攻占仁里庄、玉皇山、簸箕山等地，歼敌整编第84师一部，并以炮火控制了飞机场，迫敌停止了空运；鲁中南纵队占领党家庄、岳而庄；第13纵队也以一部北攻，占领了石方峪、康而庄。当晚，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我军强大压力和敌军工作干部敦促下，向我接洽起义。我为乘胜

扩大战果，继续向吴部逼近，并令其让出阵地；同时以兵团预备队第13纵队全部加入西集团作战。19日晚，吴化文率所部3个旅（第155、第161旅，独立旅）约二万人举行战场起义，撤离战场。我西集团乘势疾进，至20日拂晓，全部占领了商埠以西阵地，并歼灭一部未及撤逃之敌。至此，经四昼夜激战，扫清了外围，包围了济南市区。

扫清外围后，作为济南市重要组成部分——西区的商埠，成为攻夺外城前的主要障碍。此刻，我军的高速推进和吴化文部的战场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敌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意欲突围，但蒋介石令其死守待援，遂慌忙调整部署，除留一个营守千佛山，一个团守马鞍山外围孤点外，以整编第2师第211旅、青年教导总队、保安第8旅及整编第74师之第172团等部防守商埠，其余主力撤入城内。南线之敌3个兵团，亦在蒋介石督令下，正分别向商丘、徐州集结中。

中央军委根据战况的发展，及时指出：王耀武可能突围，应从各方面布置勿使漏网；打援兵团应即部署，歼击北援之敌。野战军前委遵照军委指示，即令攻城兵团迅速向商埠及城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敌突围。同时详细研究了徐州之敌北援情况，进一步调整作战方案，随时准备迎击援敌。华东军区也指示各级地方部队和民兵，在各地要道口加强岗哨，捕捉逃敌。

攻城兵团为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决定西集团于20日晚向商埠发起攻击，东集团各部则继续肃清城外残敌；积极进行攻城准备。20日18时，我西集团之第3、第10、第13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同时对商埠实施突击。经40分钟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即多路突破敌阵地，并肩向纵深发展。21日，第3纵队歼灭了据守国民党省党部之敌青年教导总队一部后，包围了绥靖区司令部守敌；向东迂回之第10纵队自商埠以北之无影山突入官扎营，歼敌一个团，继又楔入商埠东部；第13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分路向东猛插，歼灭了省立医院守敌一个团。至黄昏，我完全切断了商埠敌人的退路。22日，经激烈战斗，第3纵队歼灭了敌绥靖区司令部守敌；第10纵队全歼车站守敌装甲营及青年教导总队残部。至此，商埠守敌2万余人为我全歼。与此同时，东集团在炮火及坦克支援下，肃清了城外敌地堡群，并进行了攻城近迫作业。被渤海纵队一部包围于王舍人庄亡敌保安第6旅一部向西突围时，亦被我全歼。

我攻占商埠后，济南城外之敌全部肃清。此时，敌估计我需经三、四天准备才能攻城，故其除以一部兵力继续据守城外之千佛山、马鞍山及城西之齐鲁大学、城东北之花园庄外，以第77、第213旅和保安第6旅、特务旅之残部防守济南外城；以较完整的第15、第19、第57旅集中于内城，积极加修工事，准备顽抗，以待援兵。

我军因数日连续作战，有一定伤亡，又较疲劳，但由于各级加强了政治工作，运用了轮番使用兵力的原则，随时整顿了战斗组织，因此，仍保持了连续作战的能力。为不使敌人有喘息整顿的机会，攻城兵团决定立即攻取外城。具体部署是：东集团以第9纵队配属坦克4辆由永固门突击；渤海纵队由城东北方向助攻，另以一部兵力置于城东北郊，准备堵击可能突围之敌。西集团以第13纵队由城西南之永绥门突击，以一个师置于西南郊之山地，准备堵击可能突围之敌；第10纵队由普利门、永镇门突击；第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两广纵队担任机场警戒。

22日18时30分，各纵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勇猛突击，经一小时左右激战，先后攻入外城；第13纵队主力由三个突破口突入；第10纵队由两个突破口突入；第9纵队由四个突破口突入；渤海纵队两个团由第9纵队突破口入城，花园庄守敌动摇撤退，渤海纵队主力即由永靖门入城。各纵队攻入外城后即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23日，全歼守敌第213旅（欠马鞍山一个团）及保安第6旅残部；敌特务旅被我第10纵包围于外城西北角之电力公司及面粉公司待歼中；齐鲁大学守敌两千多人，在向内城回窜途中，被我第13纵歼灭。我占领外城大部，迫近内城。

攻占外城激战中，一些部队伤亡较大，有的四、五次合并战斗组织，为迅速攻击内城，部队边打边组织、边补充，加强政治工作，使部队越战越勇。此时敌判断我军连战疲惫，需经三至五日准备才能攻击内城，于是急将防守内城的三个旅和其它残部进行整顿，重新部署，加修巷战工事，集中炮火破坏我攻城准备。蒋介石也一再督令徐州各兵团迅速北援，并令空军对我占领的市区进行“区域轰炸”，投掷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大片房屋被毁。为迅速彻底消灭敌人，减轻人民损失，我攻城兵团决定立即于23日晚对内城发起总攻。部署是：东集团第9纵队向新东门至城东南角地段实施突击；渤海纵队主力自新东门以北实施突击，并以一部位于黄台车站、小清河两岸至黄河铁桥一带，防敌向东突围；该两纵队突破后向国民党省府发展进攻，消灭内城东半部守敌。西集团第13纵队除一部位于梁庄、青龙山、郎茂山、东西十六里河之线防敌向西南突围外，主力由城西南角坤顺门实施突击；第3纵队由西门突击；该两纵队突破后，也向国民党省府发展进攻，负责肃清内城西半部守敌。第10纵队继续围歼电力公司、面粉公司之敌，尔后转为预备队。为集中炮火支援攻城部队的战斗，东、西集团的山炮、野炮转移到外城内担任直接破坏射击；榴弹炮于城外占领发射阵地，行交叉压制射击，以压制敌纵深炮兵，消灭其有生力量。

23日18时，我以全部炮兵进行一小时火力准备后，各部队即发起冲击。王耀武督率其残部拼死抵抗，战况异常激烈。我第9纵队一部由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登上

城头，但因桥被打断，后续梯队上不去，血战一小时后，全部壮烈牺牲；第 13 纵队第 109 团两个营突破后，遭敌连续反击，经两小时激烈争夺后，除两个连突入城内，占据少数房屋与敌战斗外，大部伤亡，突破口被敌重占；第 3 纵队因所占阵地遭敌空、炮火力轰击起火，又受电力公司守敌侧射，对西门突击亦未奏效。在此紧急关头，攻城兵团首长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坚持既定决心，想一切办法重新组织突破，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否则，不仅部队要遭受更大损失，而且整个战役进程也要拖延下去。我各级指挥员以坚决迅速全歼守敌的决心，坚持战斗，重新调整部署，集中炮火和炸药于主要攻击方向。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立即深入前线，对部队进行深入有力的政治动员，总结经验教训，开展火线军事民主，反复研究突破口的具体情况，严密组织炮火、爆破、突击三者之间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动作。在紧张细致的准备之后，部队勇气倍增，再次发起突击。

24 日 2 时 25 分，第 9 纵队第 73 团经反复冲击，终于突破成功，占领了城东南角，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拂晓，该纵队主力与渤海纵队一部随即突入城内与敌巷战。第 13 纵队在第 109 团先入城的两个连的接应下，亦于拂晓突入城内与敌巷战。第 3 纵队再次突击未成，改由第 13 纵队方向入城向纵深发展。

我军突入内城后，按预定计划，东西对进，直插纵深，守敌节节顽抗，步步败退。王耀武见大势已去，即化装潜逃，残敌更加混乱，至黄昏，为我全歼。被围于电力公司、面粉公司之敌，在我突入内城后即缴械投降。据守马鞍山、千佛山之残敌，经我炮击和政治攻势后，分别于 25、26 日放下武器，济南遂告解放。

由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因察知我打援兵团严阵以待，顾虑重重，迟迟不进。24 日其第 2 兵团刚到成武、曹县地区，其第 7、第 13 兵团还在集结之中，济南即被我攻克，敌之增援计划遂告破灭。

济南大捷，歼敌 11 万余，活捉了王耀武，在此役声威下，荷泽 、临沂、烟台守敌，先后弃城逃窜，至使山东全境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

（选自《百战图》，作者：汪江淮、刘力学）

材料四　红旗插上济南城

解放济南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兄弟部队已经扫清外围，攻进外城。王耀武将大部主力龟缩进老城，还想凭借着坚固工事顽抗。

老城是济南敌人防御体系的核心，城高四丈多，宽有一丈二尺，一律是砖石筑成。敌人在城墙上、城角下修了无数钢骨水泥地堡。城头上，还挖了一道环城交通沟，以便随时运动部队。东南城角耸立着一座气象台，是全城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老城内外，象是守敌的眼睛。敌人的观察所就设在这里。我们连的任务就是挖掉敌人的“眼睛”，从这里突破老城。

二十三日黄昏，我们分散荫蔽地进入了冲锋出发地。这里，和敌人仅隔着一条护城河。通过一座小石桥，就是那段阴森森的城墙和高耸的气象台了。

六时十分，两颗绿色信号弹拖着长尾巴飘上天空。一排炮弹嘘嘘地叫着掠空而过。脚底下忽闪了一下，城头立时腾起一串火光。接着，一排，又是一排……。在这样近的距离看这样猛烈的炮击，我们还是第一次。尽管上级一再指示，要好好荫蔽，争取战前不伤亡一个人，可是谁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都偷偷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看着这幅壮丽的图景。

炮火整整急袭了一个多小时，才缓缓地向纵深伸去。这时，五班爆破员孙喜从我的身边一跃而起，挟起炸药包直奔城根。他的任务是扫清城下的附防工事，为炸城扫清道路。但是，这个任务已经用不着他来执行了。强烈的炮火把密密层层的铁丝网、鹿砦和梅花桩完全摧毁了。只有靠墙根一个大地堡有挺机枪还在射击。他一包炸药就把它解决了。

通向城墙的道路打开了。连长萧锡谦同志还没发出爆破的命令，第一爆破班（六班）班长孙高亭带领两个战士就扛起炸药，直奔城根了。眨眼功夫，三丈多高的竿子顶着六十多斤的炸药包，晃晃荡荡竖立起来，靠上了城墙。炸药包“嗤嗤”冒出火花，轰隆一声响了。借着火光，可以看见城墙上出现了一个缺口。

济南老城的第一个缺口打开了。连长弯腰瞅了瞅，喊道：“口子太小，还得炸！”于是开始了连续爆炸。王硕文组迅速地送上了第二包。这个第一次参加爆破的新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副班长孙景龙组又送上第三包。就在送第四包的时候，城上敌人忽然丢下大批手雷、炮弹，墙半腰射孔里的几挺机枪也同时封锁了小石桥。担任第四爆破的四班爆破员，不顾敌人火力封锁，抬着炸药竿冲进烟火之中。透过弥漫的烟雾，看到炸药竿顶着炸药包，摇摇晃晃竖立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紧紧盯住炸药包，暗暗地数着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六十，一分钟过去了，还不见爆炸。战前演习只需要八九秒钟，为什么？兴许是炸药包出了毛病，或是爆破手牺牲了，也许……

“指导员，我去！”一个人低声说了这么一句，爬起来就奔小桥跑过去。看那灵活矫健的背影，我认出是六班长孙高亭。

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他的班已经完成了前三包的任务，他已经来回奔跑了两趟，现在他又挺身而出，他的体力够么？

“快看，六班长爬上去啦！”忽然有人在喊。只见一个黑影正悬挂在爆破竿上，炸药包正“嗤嗤……”地冒出蓝

色的火花。转瞬间，那黑影顺着竿子滑了下去。我不禁高声急喊道："孙高亭，快跑！"事后才知道，在这一瞬间，这个英雄爆破员冒着密密层层的火网，冲过小桥以后，看见炸药包的拉火绳被打断了，只剩了几尺长的一段悬在半空里；三个爆破员只剩了一个，那同志两腿负了伤，却还在艰难地向炸药竿上爬。孙高亭抢上几步，一把抱下战友，一气爬上三丈多高的炸药竿，摸到绳头，猛力一拉，然后纵身下地，背起战友就往回跑。他刚冲过小桥，炸药包就震天动地地响了。

大概这包炸药的位置放得合适，爆炸的效果特别好，炸声响后，掀起的飞砖走石，成堆地落在河里，砰砰直响，城头撕开了三四米深的缺口。突击的进路打开了。

爆破的硝烟还没散开，三排梯子组的八个彪形大汉，已经抬起梯子飞过小桥。按照我们战前演习，不消两分钟梯子就可架好的，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震昏了的敌人，突然醒了过来，开始向爆破口展开了凶猛的反击。机步枪激烈地射击着，射击孔里、城头的堑壕里不停地飞出成批的手雷、炮弹、燃烧弹、照明弹，浓烟烈火一下子把梯子组吞噬了。尤其使人气愤的是：敌人投掷下的大量油质爆炸物，连续滚进护城河里，水面上燃起熊熊烈火。有的燃烧弹打着我阵地后面的民房。火光把突破口、唯一的进攻道路和小石桥，照得铮明雪亮，我们一举一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等我们的火力压住了敌人的侧射火力，梯子组八位同志已经全部伤亡在城下，四丈来高、三百多斤重的大梯子也被炸断了。

火光严重威胁着我们。由于兄弟部队协助，民房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可是河里的火势却不好对付。小桥左侧是一片死水，火苗在小河的弯曲部旋转。我们组织起人力，想以手榴弹把它扑灭，可是打过去的手榴弹，只能把火苗炸得时分时合，怎么也不能把它驱散。时间不容许我们再迟疑了。趁着火势减弱的功夫，一排梯子组又冲了上去。这时连长喊了声："二班跟我上！"带着二班跨过小桥。可是没等他们赶到，敌人丢下了成堆的手雷，梯子还没竖起来，人员伤亡过半，高大的梯子再也无力竖起来。接着梯子又被炸断，部队只好撤了下来。这样，三次突击都失利了。

将近三点的时候，第四次攻击开始了。第一排炮火刚刚在城头上炸开，连长就带起梯子组和突击班悄悄地穿过小桥，直奔城墙根。

我紧贴在地面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好！靠近城墙了；突击组的同志们散开了……随着他们的动作，我的心越来越紧。这时，我们的大炮如果有一丁点儿偏差，有一发炮弹落到城根底下，两个班就完了。但是，炮兵的射击竟是那么准确，发发炮弹都打在城头上。眼看着梯子组已经把梯子磕到城墙上了。炮火延伸的信号刚一升起，梯子晃动了一下，滋地一声，架好了。三排副任佳学蹭蹭两步爬上去，到头看了看，焦急地说："糟糕！还差一人多高够不着。"梯子组的同志们一听这话，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几个肩膀猛然一齐用力，把梯子向前一推，梯子底脚靠近了城墙，几乎直立起来，可还是够不到缺口。连长急了，喊了声："梯子不够高，也得突，快爬城……"他一把抓住二班长李永江："给我突！"

李永江膀大腰粗，打仗勇猛，大家都称他李二虎。这时听到连长一声令下，他两手一抓梯子，嗖嗖地爬了上去，二班的同志们紧跟上去。梯子陡直，加上这么多人手抓脚蹬，更加摇晃不已。梯子组的同志们就紧紧地抱住梯子。一个战士失脚滑了下来，正落在陈树芳的头上。小陈咬紧牙，猛力向上一挺，把他顶了上去。

李永江爬到梯子顶，抬头一看，离爆破豁口还有三尺多；伸手摸摸，墙壁溜滑，没个抓挠头。正在着急，小腿被什么东西一碰，一个脑袋钻上来了。那人在低声地喊："踏住我的脑袋，上！"原来是于洪铎。李永江踏着于洪铎的肩头，身子一挺，两手扒住了城头，纵身上去。由于用力过猛，扳掉一块砖头，"注意！砖头！"不知谁叫了一声。一阵轻微的骚动，梯子向左摆动一下。陈树芳连忙用肩膀抵住，砖头正砸在他的头上，额头上鲜血直流，糊住了两眼，可他仍然一声不吭，双手紧紧抱住梯子。突击班的同志们在连续登城，扒下、蹬下的砖头石块象暴雨一样落个不停。梯子组的同志始终稳住了梯子。等战斗下来一看，七八个同志已是个个鼻青眼肿，头破血流了。

敌人的动作也不慢，见我炮火一延伸，立刻从两则顺着堑壕向突破口扑过来。李永江来不及摘下枪来，伸手从胸前抽出一颗手榴弹，咬开盖子甩出去。趁敌人一愣神，他把背后的枪转到胸前，一扣板机打了个扇面，接着抢上几步，占领了气象台东北角的一段短墙。于洪铎踩着滕云祥的肩膀刚爬上来，正碰上从气象台北面屋里冒出一股敌人，为首的一个家伙手端着机枪正要扫射，于洪铎来不及摘枪，扎煞着两只空手，扑上去抓住敌人的枪管往旁里一推，喊一声："缴枪不杀！"就和敌人扭打起来。于洪铎是个小个子，摔不过那个膀大身粗的敌人。正在滚打，小滕爬上来了。他匆匆地向敌人开了一枪。虽然没有打中，那家伙却慌得撒了手，乖乖地把机枪缴了。

当我尾随着突击排爬上城头，这场激烈的搏斗已经接近尾声了。从气象台反击出来的三十多个敌兵，有的被打死，有的缴了枪，有的在后退时慌慌张张摔下城去。李永江他们由连长带领着，紧盯着几个残存的敌兵，向气象台院子冲去。我跟着走进了那个院子。

天已放亮了。从这个高高的气象台上向东望去，东方一片火红，太阳快出来了。气象台和四周的工事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同志们正匆忙地改造敌人的工事，迎击敌人的反冲锋。我扶着受伤的右腿，靠着墙边慢慢坐下来。这时，才想起那件要紧的事情。我喊了声通信员，向他作了

个手势。小宋矫健地攀上东北角的城墙，把那面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墙头上。晨风掠过城头，红旗呼喇一声展开了。初升的阳光扑到旗上，整个济南城头，顿时红光夺目。旗面上十个金色的大字："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闪耀在一片红光中。

（节选自彭超：《红旗插上济南城》，《星火燎原》选编之九）

行宪国大和总统选举

背景介绍

1946 年末，国民党的"制宪国大"之后，蒋介石为了挽救其政治经济危机，使其法西斯统治合法化，迫不及待地筹备召开"行宪国大"。于 1947 年 11 月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国民党中央还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筹办国大事宜，并于 11 月匆忙举行国大代表选举。1948 年 3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成为国民党在大陆上所谓"宪政"的最后记录。

"行宪国大"于 3 月 29 日正式开幕，出席"代表"一千六百七十九名。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标榜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宪政的开始"，并自称"蒋记"国民大会是"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还反复强调"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不应"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企图通过实施"宪政"呼应"戡乱"的不利形势。蒋介石、白崇禧等人在作政治、军事、财政等报告中，极力掩盖日益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尽管如此，国民党上下也发觉自己的危机处境。

"行宪国大"的召开，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从代表的产生到会议的进行都糟到了极点。国民党规定其"党员非经提名不得当选"。所谓提名就是由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圈定，这种圈定与 1947 年 3 月 21 日公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五百名以上选举人之签署，或由政党提名，得登记为候选人"的规定完全违背。故引起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一些民众普遍厌恶选举，纷纷弃选。而另外一些人，如"政治棍子"、"暴发富商"、军阀等便摇头摆尾地粉墨登场，或向上"走门子"、"拉关系"争取"圈定"，或凭借不同的后台势力，各显手段，大搞阴谋诡计，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欺诈、愚弄、诱惑、压榨。这样，国民党对选举完全失去控制，选举结果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愿望相反。不仅国民党中央所提名代表有许多落选，而且由于未经提名国民党党员有六百多人选上，结果挤掉了原来分配给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代表名额。对此，国民党中常会与选举指导委员会经多次争论，于 1948 年 1 月 30 日决定：未经提名而选上的国民党员代表，把代表名额让给被提名的党员和青年党、民社党，如若不执行，将给以党纪处分。从而引起当选的代表对国民党中央的极大愤慨，他们成立了"民选代表联谊会"，纷纷从各地来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中央提名落选代表也成立了"提名当选人联谊会"，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出席国大。两个联谊会还互相攻讦、指责。

接着，蒋介石自导自演，终于当上了总统。1948 年 4 月 4 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会上，蒋介石开始提出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文人；是学者专家；是国际知名人士；对国家有"贡献"的党外人士，影射应由胡适担任总统。并表示决不竞选总统，而愿意"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于是在 4 月 18 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样，"宪法"中对总统权力仅有的两条限制也被取消了，总统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了。4 月 19 日，"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介石获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总统，陪选人居正仅获二百六十九票。

材料：

·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

材料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十一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眼见故乡陷共，无不悲愤万状。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与办法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

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三月二十五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决无意思，决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须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即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辞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罢。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

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采。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尔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消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四月十九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二十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二十三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作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二十四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拥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拚。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二十四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做“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二十五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四月二十八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二十九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

"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漏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接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湜，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金圆券

背景介绍

1948年2月19日，上海商品价格直线上升，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上涨尤速。尽管市府当局对大米每石限价一百九十八万元，但黑市却仍达二百一十五万元。南京黑市米价每石二百五十万元，汉口亦二百三十万元。煤价飞涨，开滦煤以每吨一百零八万元出厂，到上海售价高达七百万元。

为挽救财政经济的困境，蒋介石使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特权，于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颁布《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金量为0.22217公分，分兑法币三百万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限于1948年11月20日以前无限制兑换金圆券。兑换期间，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暂准上列折合率流通使用。金圆券发行额为二十亿元。(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颁布《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币禁止在国内流通、买卖或持有。黄金每市两兑金圆券二百元，白银每市两兑三元，银币每元兑两元，美元每元兑四元。除中央银行外，所有其他银行不得收兑或保管黄金、白银或外币。(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颁布《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所有中国人（华侨除外）均应于1948年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外汇资产数量，并移存中央银行保管。(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价格，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在上海等都市实行仓库检查并登记其进出货品；自金圆券发行之日起，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

币制改革之初，在国民党采取的高压政策之下，上海等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多心存顾忌，忍痛将手中的金银、外币兑成金圆券。到1948年10月，南京政府共收兑黄金价值二亿美元，仅上海一地就达一亿七千万美元之钜。10月2日，上海方面首先发生了市民抢购物资风潮，10月下旬遍及全国各都市。11月9日，京沪发生了抢米风潮，至10日，南京全市"被抢米二千五百零五石，米店被抢者计二十二家。"自此，金圆券信誉大跌，民怨沸腾，社会骚动。

材料：

材料　金圆券的发行与破产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迅速崩溃的局面，它表现在军事上的节节失败，政治上的土崩瓦解，经济上的严重危机。而经济危机又集中地反映在恶性的通货膨

胀上面。

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为了进一步垄断全国的金融，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发行法币。蒋介石集团为了大发国难财，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为十四亿元，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法币发行额增加到五千多亿元，使通货不断膨胀。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币发行额猛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在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这是由于随着反革命内战的扩大，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民党政府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主要办法就是印刷钞票。而钞票无止境地大量发行，物价必然疯狂上涨，法币则急剧贬值。这时，法币已贬值到不及它自身纸张和印刷费的价值，法币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在法币信用破产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曾设想种种对策，以图挽救其寿命，但都毫无效果。一九四八年六月，国民党政府的国库收入仅及支出的百分之五，其中军费开支所占比重更大，仅东北的军费即占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这时，继张群之后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再度调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以及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的王云五，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要进行币制改革。王云五向翁文灏建议，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所存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其办法是以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根据这一建议，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实行金圆券方案，不久该方案未经立法院的通过，即以“总统命令”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发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实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一)自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基于上述规定，还制定四种办法同时公布：(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这些办法的要点是：第一，规定以金元为本位币，每元之法定含金量为〇.二二二一七克，以金银、外汇和有价证券作十足准备。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停止发行，所有以前发行的法币以三百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以三十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限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无限制兑换金圆券。第二，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应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兑换金圆券。其兑换率是：(1)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二百元，(2)白银每市两兑换金圆券三元，(3)银币每元兑换金圆券二元，(4)美国币券每元兑换金圆券四元，其他外国币券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换金圆券。违反规定逾期不兑换者，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第三，全国各地各种物价冻结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的水准上，各地各种物价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在垂死前所喧嚷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了加强和监督执行以上办法，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设若干管理区。八月二十一日，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此外在西北、西南地区也分别派了督导员，在各区强制推行。

金圆券发行时，国民党政府尽管大肆宣传金圆券是以金元为本位币。而实际上它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它和法币一样，都没有任何其他金属货币作准备，不过是一张纸兑换另一张纸而已。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统治区日益缩小，财政来源更加枯竭，从而财政赤字继续增长，通货更加恶性膨胀，金圆券的发行量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前，已经超出了二十亿元的限额。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十日，国民党政府首先被迫宣布取消“限价”。十一日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圆券发行总额将不以二十亿元为限，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这一修正办法颁布后，金圆券的发行便如决堤的洪水，漫无边际地泛滥起来。十一月底，金圆券发行量超过了三十亿元，十二月超过了八十亿元，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超过了一千九百亿元，四月超过了五万一千六百亿元，五月二十五日就达到了六十八万亿元。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人能用这种所谓金圆券向国民党政府银行兑换到一个金元。

由于金圆券信用的丧失，其币值迅速下降，以美钞和金圆券的比数来看，一九四八年九月是一比四，十月是一比十一点九九。而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则早已冲破了官价。八月二十三日，即金圆券发行后的第三天，天津美钞的黑市价格是每元换金圆券四元一角八分，二十四日又升到四元三角五分。重庆黄金黑市价格在九月二日每两超过官价二十五元。广州、汉口银元的黑市也在九月二日以后突破了官价。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超过了官价的五倍以上，国民党政府不得已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准许人

民持有黄金、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一律提高五倍。不久，金银、外币更加狂涨，金圆券更加猛跌。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上海市场金圆券一天之内就贬值百分之四十，每两黄金及每元美钞与金圆券的比价，达到一比七百五十万元及一比十四万八千元的新高峰，与一九四八年八月相比，已涨了三万七千倍以上。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又规定银元一元等于金圆券五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在六月十二日就宣布银元一元等于金圆券七亿五千元。二十一日，重庆银元的黑市，一元就等于金圆券二十五亿元。法币在金圆券发行的前夕，还只用六百万元换银元一元，比起金圆券的崩溃情形，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金圆券的发行是蒋介石对各阶层人民财产的再一次大洗劫。而当时的上海又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金银、外币和管制经济的中心。蒋介石仅在上海一地，截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就掠夺了黄金一百七十四万六千余两，白银九十六万余两，银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美钞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元，港币一千一百万元。这种残酷的掠夺就连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老婆也对人说："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走了。"对吴忠信的老婆尚且如此，对一般各阶层人民所遭受到的祸害就可想而知了。在蒋介石"引退"前后，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是三百九十万两，银元是七千万元，外汇是七千万美元，三项合计约值三亿美元。在蒋介石"引退"后，中央银行奉蒋介石的命令，陆续将约值二亿美元的金银外汇运往台湾和厦门。以上数目，尚不包括中央银行奉令运往华南其他城市及海外的国库财产。这一点连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内政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召开的联席会上所通过的一项决议中，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劫走国库现金的行动，加速了金圆券信用的崩溃。

由于金圆券的加速贬值，引起了物价飞速上涨。一九四八年九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八月高涨百分之七点四，到十一月高涨到十七倍半，十二月高涨到三十二倍半。一九四九年一月高涨到八十五倍，三月十九日高涨到二千九百倍。单就上海批发物价来说，到四月十五日竟高涨六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倍。这就充分地说明了物价上涨已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了的。同时，由于强制"限价"，一切交易均纷纷转入黑市，在黑市交易中，物价更是飞速暴涨。由于强制"限价"，物资逃匿和物资抢购的风潮交织在一起，有的地区，某些物资被抢购一空，迫使许多行业停止了贸易。有的工厂，再加上受到外汇管制的打击而被迫关闭，这在实际上是对民族工商业的变相没收。由于物价上涨和工商业的倒闭，使大量的失业者被抛在街头，乞丐队伍日增，造成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在金圆券日益破产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许多地方政府公开拒绝使用金圆券，并相继准备发行地方货币取而代之。四川省参议会已向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提出发行四川省钞票，不用金圆券的建议。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省都在计划发行地方券。广州市商会建议发行广州市库券。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声称：新省已得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的指示，计划发行银本位币。台湾、广东、四川、云南等省都已明令限制金圆券入境和限制汇兑。厦门实行了以一斤大米为交易单位的原始办法，从电灯费、自来水费、订报费一直到理发费、摆渡费，都以大米计算。理发费要付三斤到五斤大米，装电话费要付八十斤大米。

这样，金圆券在仅仅实行九个月的时间，就几乎等于废纸，甚至被拒绝使用，这在世界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货币了。金圆券的发行和破产，促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走向总崩溃，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政府规定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率，将金圆券收回作废。

（摘自《中国现代大事纪事本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历史内幕

廿年磨一剑
——国民党“王牌军”中的共产党师长廖运周

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

廖运周是安徽寿县人。他在中州大学读书时，受到远房亲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孙一中的影响，于1926年7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随即参加北伐，到了武汉。192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南昌起义中，廖运周是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参谋。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中途失散，廖运周于1927年11月和同团战友来到了上海。廖运周提心吊胆过了几天，才找到党的关系。后来，廖运周奉派到华北冯玉祥部队，在那里当上了上尉参谋。

1937年11月，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靖任秋奉派来到孙殿英部队做军运工作，担任副师长。一次，他俩在山西东阳关见了面。当时，廖运周因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联系，他向靖任秋报告了这一情况。靖任秋告诉他：没有暴露的党员要很好隐蔽，不准乱动，等以后接到党的指示再进行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廖运周参加了保卫正定及台儿庄等战役，由于作战勇敢，治军严格，被国民党视为一名优秀军官。1938年11月，廖运周升任国民党八十五军三三〇旅旅长。

二、汤恩伯的“考查”

1939年9月，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的弟弟吴绍文(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带着战地服务团到了一一〇师。这个宣传队里，有四个中共党员。这批年轻人，在军队里宣传抗日爱国，演戏，还办了小报《尖兵》。廖运周的堂弟廖宜民也在这个宣传队里，有时就把稿子送请廖运周修改。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报告了一一〇师的顶头上司——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汤恩伯一纸命令，御下了廖运周的兵权，调重庆中训团“学习”，实际是审查。后调到三十一集团军干训班当大队长。

三十一集团军干训班，又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独立大队。分校校长是胡宗南，干训班主任由汤恩伯亲自兼任。汤恩伯常到这里来视事，其中一个目的，是要亲自考察廖运周，看他到底是红是白。廖运周当然明白，他非常谨慎小心地对付汤恩伯，认真扮演着外白内红的角色。

汤恩伯接连几天注意观察廖运周的带兵训练过程。有一次还问廖对国民党部队腐败现象的看法。

廖运周想了想，直截了当地说：“相当糟！军师长吃空缺，养小老婆，和日本军队换东西，搞走私活动。任用私人，拉帮结派。……败坏三十一集团军的名声！”

汤恩伯又查了廖运周的人事关系，他除了有个堂弟在部队任一般军官外，没有安插过私人。汤恩伯终于得出结论：廖运周是一个忠于党国，作风正派，治军严格的好将才！疑虑全消，随即上报蒋介石，任命廖任周担任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少将师长。

三、国民党嫡系部队里的共产党地下党委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为了加强敌军工作，我军于1946年成立了国军工作部，任务是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建立秘密工作组织，取得情报，并在时机成熟时策动起义。晋冀鲁豫军区负责派遣工作的，就是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靖任秋。

一天，位于新乡郊区的廖师长公馆，忽然来了一位商人打扮的不速之客，此人就是华北局派来的廖师的联络员徐仁。徐仁拆开衣服夹缝，取出了一封靖任秋写给廖运周的亲笔信(廖是认得靖笔迹的)及一封刘伯承署名的公函给他。廖运周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

徐仁很快成了师部的上尉副官。

很快，邯郸局和晋冀鲁豫军区，派出了以刘浩为组长的一批精干敌工人员，陆续到了一一〇师。去一一〇师的一批地下党员，都得到了廖的周密妥善安排。

廖宜民是副官处主任，负责党内外全盘联系，协调临时发生的情况。

徐仁，任副官，和司令部的人混得很熟，连各种人事档案都可以随便翻阅。

刘杨担任联络副官。

张世瑞是情报参谋兼谍报队长，可以随便穿便衣在敌我双方活动。

杨振海是侦察连副连长，也是能带兵到处跑的人物。

金克则担任电台台长，掌握了全部机密报务。

随着人员的充实，上级指示：在一一〇师成立地下党

委，廖运周任书记，刘浩任副书记，徐仁、廖宜民都是党委委员。

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一一〇师，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四、"这局牌，只准输不准赢！"

1946年间，敌八十五军、四十军都驻在安阳。蒋介石派了一位高参驻在汤阴孙殿英部队里，有次此人到安阳一一〇师驻地视察。一天，蒋介石派飞机给这位高参送来了一份火漆封口的绝密文件，高参看过后，嘱咐廖运周，此件只能师长亲阅，看完立即送走。廖运周一看这么重要的密件，飞快想出个主意，把几个高级军官拉在一边，悄声说："今天让高参高兴高兴！打麻将，这局牌，只准输不准赢！输得越多越好，输的钱全算我的！"讨好长官，何乐而不为！大家满口答应。

廖运周把徐仁叫来，边看边抄，果然是绝密要件！

那是蒋介石1946年11月25日关于全年战事总结和1947年的部署。抄件迅速派人送到林县，转邯郸局又转到了延安。中央据此写成社论《画皮》，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揭露了蒋介石企图重点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气得骂娘。这一情报，真是冒着掉头的危险取得的呀！

五、邓政委指示：要在最有利的时机起义

地下党在一一〇师的活动开展得相当顺利，可斗争十分复杂。明明是一支国民党军队，却是共产党在掌握，管严了不像国民党，放松了又会危害人民，这个分寸真难把握呵！

处境复杂困难，加之全国战场我军节节胜利，使地下党的同志们出现了急躁情绪。

地下党委慎重研究后决定：派李俊成（党委副书记）回中野请示刘邓首长，下步该怎么办？接着，李俊成传达了邓小平政委的指示：同志们现在要细致准备，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作用的时候起义！

首要问题是牢牢地把带兵权抓在手里。廖运周陆续将不可靠的，或者和胡宗南、王仲廉、吴绍周等人关系密切的两个副师长和师参谋长，一一推荐出去升了官。这既迎合了胡、吴等人的心意，又满足了这些人的权、利欲，他们临走时都对廖运周感激不已。随后，廖运周又将几位平日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和吴绍周不满的中层军官，提为副师长和掌实权的团长，并在他们中间发展了两个党员。至于一一〇师的中低层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廖运周的老部下，对他是信仰、钦佩的。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一一〇师地下党组织，已基本上控制了这支部队。地下党的成员，也作了起义前的分工。

一切就绪，只等东风！东风何时吹来？

六、东风忽来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了。

11月22日，华野在徐州东面碾庄圩地区全歼了黄百韬的第七兵团。

11月25日，奉调前来参加淮海作战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我中原野战军团团围困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驻在小李庄，直接指挥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

这时，八十五军及所属一一〇师，已编入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序列。

11月26日，廖运周的一一〇师正巧和黄维的兵团部同驻在一个村子里。下午，黄维派人找廖运周到兵团部去，商议以四个机械化主力师全力脱围的计划。

廖运周心中象海潮一样翻腾，飞快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起义最有利的时机到了！

廖运周慷慨激昂地表态说："好，司令官的决策英明！请下命令让我师打头阵当开路先锋。趁敌立足未稳，突破他们的前沿不在话下！我立即回去准备。"黄维听了很满意。

地下党委研究了紧急行动方案：由杨振海穿过火线去报告首长，请求在十二兵团突围的通道前沿，闪出一个口子，等廖的一一〇师通过后，即组织火力堵击黄维的后续部队。

刘陈邓首长果断决定：同意廖师起义。稳妥安排，保证一一〇师起义成功。严密组织部队，阻击跟进的敌人，坚决粉碎黄维的突击行动！

根据首长指示精神，王司令员亲自给廖师画了一张进入我军阵地的路线图。

王司令员约定，起义官兵通过的道路两旁，将摆上高粱秆作为标记。一一〇师的官兵每人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以便识别。当两军接触时，向天空打三发枪榴弹作为联络信号。起义部队将从六纵十七旅和十六旅部队的阵地之间通过，集结地点是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王司令员要求起义时间尽量提前，最好是天亮前过完。

1948年11月27日拂晓时，浓雾笼罩着淮北平原，在这天然帐幕的掩护下，一一〇师由的5000余名官兵排成四路纵队，在解放军武英参谋的带领下顺利地通过了火线，通过了解放军阵地。一过前沿，部队就变成了六路纵队跑步前进，进入了安全地带。

一一〇师刚过完，我军闪开的口子立即封闭，对后续跟进的敌人猛烈开火！经过几小时激战，终于彻底粉碎了黄维精心策划的突围行动！

共产党员廖运周，在杀机四伏的敌营中，艰苦斗争十几年，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一〇师全体官兵受到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并

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嘉勉。

12月9日，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在廖运周的行动和去信劝降的影响下，率领全师万余官兵，向解放军投降。

12月15日，我强大的中原野战军，由华野配合，在总前委刘陈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全歼了黄维兵团，俘虏了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率部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进军行列。

1949年7月，廖运周接到通知，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邓小平政委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家属联系上了吗?"

廖运周感激地回答："已送到北京家里。"

1952年9月，廖运周进了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毕业时，刘伯承院长亲自给优秀学员发奖，廖运周上台领奖时，刘院长高兴地说："啊！你还是优秀学员啊！你在黄埔军校是学炮兵的，还是干本行吧，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啊！"

1954年12月，廖运周就任军委炮兵沈阳炮校校长、党委副书记。

1955年9月，廖运周被授予炮兵少将军衔。

(选自《革命春秋》)

邓小平同志妙语拟电报

1948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遵照毛主席"打到长江，站稳脚跟"的指示，率领大军向长江挺进。老作家康濯当时在军部负责文书工作，部队打到长江边的湘樊一带，决定拟一个电报向毛主席回复。接受任务后，康濯和一些"秀才"们作了许多文章，但在一起相讨时，觉得都不满意。正议论间，邓小平同志进来了。他听了大家的汇报后稍一沉吟，说："这个电报由我写算了。"接着，他便念出了电报的全文："毛主席：我们打到了长江，站稳了脚跟。"全文十五个字，言简意赅。大家无不佩服。

(选自《纵横》88年6期，作者：廖宗亮)

傅作义北平起义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冒着冰雪严寒，取道热河，夜行晓宿，隐蔽入关，和华北野战军同时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北夹击，出其不意地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下辖的北平、天津、察哈尔、河北、热河等地约60余万人包围起来，完成了中央军委关于对平津诸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以便从容不迫地各个歼敌。

华北傅作义集团12个军52个师，被我百万雄兵分割、限制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以平、津、张(家口)为中心的北宁、平绥铁路沿线地带，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策略，先在平张(北平至张家口)线上打起，然后从西向东逐一抓住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各点之敌，使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投降或起义两条道路可走。

自11月下旬始，我杨成武第20兵团，从集宁，丰镇出发，采取突然动作，攻克万全、怀安、柴沟堡等地，对张家口采取包围态势。很快歼灭了包括正规军第11兵团司令部，第105军军部及所属3个师，第104军的1师2旅在内的敌孙兰峰兵团；继之，人民解放军又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嫡系35军；并对天津之敌形成重兵包围之势。这一系列的歼灭战，不仅使北平的傅作义失去了第11兵团、35军等嫡系基本力量，无法西逃绥远 绥远的董其武兵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且东边的海路也被我军切断。北平实际上已成了一座孤城。

一、艰难策反——地下党以各种途径接近傅作义

北平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勇敢斗争。

1948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刘仁指示地下党：要大胆地通过各种关系去影响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做他们的策反工作。根据这一决策性指示，北平地下党迅即行动起来。他们审慎地先后联系过曾廷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等与傅作义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在策反傅作义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

曾廷毅是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和结义兄弟，但傅作义对他却不信任，工作难以进行。

当时刘厚同任华北"剿总"的少将高参，又是傅作义的师友。一次，傅作义对刘厚同说："刘老，您对日下形势怎么看呢?"刘厚同恳切地说："不能将文化古都毁在你傅作义的手里。城是守不住的，力量悬殊，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北平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光明的前途！"

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杜任之，与傅作义同乡，有过交往。通过其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与刘厚同、阎又文(是杜任之的学生，傅作义的贴身亲随)建立了联系。

地下党多方出动，正在从周围进行渗透，为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而不懈努力。

傅作义将军陷入了沉思。

二、倾向和谈——为了200万人民和千年古都的文物

傅作义坐困孤城，终日里深思苦虑，忧心如焚，常常彻夜不眠。幕僚们已和他谈及了与共产党讲和的问题。"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我们应该讲革命道德，不应讲封建道德，况且汤放桀，武伐纣，自古都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时，舍之用不着可惜。"

11月上旬，傅作义曾要王克俊、刘厚同草拟一个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求和的电报，进行试探。其中言及"不愿再打内战，今后决定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希望派南汉宸来北平谈判"。但通过地下党电台发出后，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为此，傅作义更感忐忑不安。

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逼近京郊，傅部"剿总"仓惶转移到中南海。傅作义在居仁堂召集嫡系师以上将领开会，大部分支持和谈。傅作义还邀集了在北平的一些学者名流，征询对时局的看法，结果徐悲鸿、马衡、叶浅予等争相陈言，热切希望他以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保护古都珍贵文物为重，尽量争取早日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三、特殊途径——华北"剿总"司令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

傅冬菊(后改名傅冬)，是傅作义的长女，长得清秀活泼，思想也进步。上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天津《大公报》做记者工作，乃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学委负责人之一王汉斌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的身边。傅冬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接受任务后，傅冬立即去找他的父亲，直言转达了共产党的意图。傅作义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请示了上级组织后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从此，傅冬就留在她父亲的身边。地下党给她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她父亲的动态。

由于对傅作义的运态了解的准确及时，中央在组织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的非常紧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毫无问题的情况下，掌握了用和谈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的主动权。同时，地下党可以及时地把党中央的要求告诉傅作义，避开军统特务的监视。因为谁也想不到"剿总"司令的女儿和共产党有联系。

北平地下党派出做策反傅作义工作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神秘的记者李炳泉。他通过堂兄李腾九来策反傅作义，最后直接见傅。李腾九是傅作义的少将联络处长，高级幕僚，追随傅作义多年，对他的思想和言行了解颇深。李炳泉做通了堂兄的工作，策反进入实质性阶段。

1948年12月12日左右，傅作义请李腾九找共产党联系。北平地下党决定派李炳泉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出面见傅作义。12月16日，傅作义派崔载之一行到达八里庄，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和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先后与崔载之进行了谈判。第一交谈判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但通过地下党的联系，傅作义终于跨出了和谈的第一步，这是策反的成效。

四、攻占天津——以武力促和平

虽然傅作义决心和谈，但他还在犹豫观望，存有侥幸，对自己的实力也估计过高，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不愿放下武器。

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杨得志兵团攻克新保安，歼灭傅作义王牌军35军，随后解放张家口，孙兰峰率部分人员逃回绥远。解放军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又挖掉了他的王牌军，赖以讨价的资本没有了，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傅作义的策反工作。

通过地下党的巧妙安排，进行双方的第二次谈判。到1月10日下午，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同时拟订了关于起义的各项条款，限定于1月14日午夜前由傅作义明确答复。但傅作义还在摇摆。于是，中央军委、平津前线司令部布置进攻天津，继续施加压力，断掉傅作义最后的幻想。1月14—15日，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做了俘虏。

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北平地下党的策动的双重作用下，傅作义将军终于做出了选择——与中共开和谈之门。

五、北平方式——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出城，和谈成功

邓宝珊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抗战期间结识傅作义，并与马占山一起结为异姓兄弟，关系甚密。邓宝珊到过延安数次，同中共领导比较熟悉。他一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要求国共合作。邓宝珊到北平后，很少与外界接触，接连几个晚上在中南海同傅作义作彻夜长谈，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审慎地研究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各种问题。为最后的谈判作准备。

1949年1月15日，在邓宝珊、周北峰的住地五里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代表中共方面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周北峰进行双方的第三次谈判。到16日下午，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根据双方商定的协议，成立了一个7人联合委员会(中共4人，傅方3人)，主任叶剑英，副主任傅的代表郭宗汾，委员为陶铸、徐冰、戎子和，焦实斋和周北峰。在一

次联合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宣布：根据协议，傅作义将军的部队立即开出城外，一个月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过渡时间内，北平各行政机关，企业、银行、仓库、邮电、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时维持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

六、古都新生——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个古老的名城翻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入城式。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除塘沽守敌5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

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将军激动得有些颤抖，竟发不出声来，只说了三个字："我有罪。"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嘛，宜生先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要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毛泽东和蔼、亲切而又风趣的话语使傅作义将军感到极大的鼓励和快慰，所有的疑团冰消云散了。

（节选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

民青两党立委争夺战

国民党在一九四八年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一个在美国和蒋介石操纵下召开的大会，其中不乏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政治黑幕。其中民青两党争夺立法委员名额便是一例。

国民大会的代表选举早在去年十一月就完成了，但国民大会仍然不能如期开幕。因为除了代表数不足外，主要原因是立法院的委员尚未产生。依照行宪法规，国民大会开幕后一星期，立法院即应开始工作。现在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政党迟迟未能提名，立法委员的选举就不得不推迟投票。自然，为符合行宪程序，国大也不能不延期了。

那么各立委候选人的政党为何迟迟不推出提名呢？因为行宪后立法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是行宪时期最高的立法机关，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可以用否决某一法案的方式，来迫使行政院长下台。这样重要的地位在各个政党中都引起极大的关注和野心，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之间为立法委员候选人的名额展开了争夺战。

行宪后的立法委员名额为七百七十三人，民社党提出要一百六十二名，而青年党则要二百五十名，竟超过了总额的四分之一。国民党自然不会答应，便派了雷震、洪兰友两人前往上海接洽，以民青两党在现任立委中只占约五分之一为由，将这次候选人的名额限在一百五十人以内。于是，民青两党，分别举行重要会议，商讨提名应减至什么程度。青年党陈启夫、左舜生、余家菊等均由南京赶到上海，最后决定提出一百二十名。民社党张君劢则电召在南京交涉的蒋匀田、徐传霖来沪商讨，决定原则上向青年党看齐，提出一百名。雷、洪两人返回南京，向吴铁城、陈立夫报告。次日邀请蒋匀田、余家菊在雷震私邸共进午餐，席间洽商。青年党允将名额减至一百人，民社党则坚持不肯让步。

民青两党所以要求十足名额，目的在于想争取在立法院会议席上有三分之一的否决权，有兴风作浪的余地。民青两党见国民党毫无变更的态度，又怕因小失大把事情弄僵，这才答应各减至七十五名，共计一百五十名，终于使名额的协商取得成功。

一个问题刚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民青两党的立委候选人的地区分配成了难题。讨论中发现有四十余处两党均提出名单，但有若干处两党均未提名，因此地区分配甚感困难。当日晚间，雷震宴请由沪抵京的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及该党其它人士，席间作了洽商但毫无结果。接着，孙科、吴铁城，陈立夫三人在孙科寓邸约集三党人士，再次商洽立委候选人地区分配问题。国民党提出：在全国八十余立委选区中，每区两党共占一名为原则，希望两党避免在同一区内均提候选人。而两党则认为应在两党所提区域内求得合理解决，因为提名的标准应根据该区党员的素质与数量。又称，若干选区的，并无两党党员，无法产生候选人。最后，由陈立夫、张厉生、张寿贤、戢翼翘、蒋匀田、王世宪、余家菊、刘东岩、夏涛声组成三党九人小组，进一步商洽，才决定有候选人六名的地区，民青两党可各提一名，五名之区域则根据各方面提名的困难斟酌处理。此决定也被国民党中常委接受，但在实际审查中却又发生了不少困难，如江苏省的名额中两党共占三分之一以上，影响了国民党的候选人名额分配，因此，国民党方面又邀集两党代表，把未决定分区的名单交还两党，要求民青两党再作让步。而民青两党则当即表示不予考虑。民社党张君劢表示："名额方面既已让步，地区分配不能再让步。"至此问题又陷入僵持状态。

立委选举经国务会议决定延期一月举行后，国民党再度开会讨论地区分配，并组成特别小组。特别小组提出了两个原则：即每省立委以民青两党共占五分之一为原则，最多不能超过四分之一以及地区名额产生冲突时国民党作退让的原则。至此，这一僵持半个多月的问题始得以解决。

其实，提名的争夺是一方面，实际的选举又是一方面。民青两党提出经国民党审查通过后公布的候选人名单，在国大代表选举中落选的很多，而国民党未经提名为

候选人而自由竞选者，却有很多当选的。国民党曾经作过许诺，保证候选人当选。为此也不得不作一定补救，作了若干规定，以免在党派之间出现更大的裂痕影响党派合作。但这一举动也引起激烈争论，虽然国民党为了信用已不宜再作更动，然而人心难平总有种种评议。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月底才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

（摘自《民国秘史》中南出版社）

孙科的倦勤内幕

自从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长以后，关于他辞职倦勤的消息便传开了。一九四八年九月某日，中央社发了一条没头没脑的消息，说院长孙科辞职之说，纯为无稽之谣言。中央社为什么煞有介事地来否认孙科的辞职呢？这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消息反而表明了派系林立的立法院内的确是有些新闻的。因此好奇者久而探之，终于了解了其中的内幕。

原来，在立法院第二届会议复会之初，当局者们认为。会议最好延期开始。这样，既可以使各地立委们在家陪着太太小姐赏月过中秋，又好使刚刚施行的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不会受到批评反对，以免有损威信。于是，孙科便如此这般地授意秘书处照办。但是偏偏这些自命为护法卫宪的立法委员们，坚决反对延期复会。故秘书处只好在八月底发出了一个通告：如期开会，请大家赶快报到。这样，会还没有开，孙科院长就吃了瘪，肚子里十分不痛快。

九月七日，立法院正式开会，在大会的第一天，孙科又吃了当头一闷棍！先是跟随孙科在立法院中几十年的老将，在立法院通过了程序委员会，并且列入了一连串突击式的提案，企图修改立法院的组织法和议事规则，以便于控制。他们的提案是：①每一立委仅得任两个委员会委员。②召集委员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之。③召集委员会议另设置主席。这三个提案当然深为孙科赏识，故在七号开会时，孙科在开幕词中乘机把陈顾远召集的程序委员会的提案大大地夸奖了一番，接着用一半请求一半命令的口吻，希望大会照原提案通过。可是，结果却大出孙科所望，所有的提案都被推翻了，一律遭到了否决。有个立委潘朝英涨红了脖子大叫："我们反对控制。"邹树文右手举着议事日程，用一种很是痛苦的声调说："我们花费了这么许多宝贵的时间，来讨论这些无聊的提案，真是冤枉！冤枉！"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些声音都深深地拍打在孙科的心头上。当天下午，秘书处就贴出了一张字条，孙院长身体不适，请假一周，赴沪休养，请大家另推主席。就这样，到处刮起孙科辞职的风来。

说起孙科赌气，这气是早就存在心里了。孙科竞选副总统，败在李宗仁的手下，心中本来就十分压抑。好在立法院有着好大的权力，不仅行政院长要向他低头，就连大总统也要看看他的脸色，让他三分，所以孙科的心里才稍有平静，但现在立法院派别林立：什么革新俱乐部、联合座谈会、民主自由社、北方立委联谊会、新政俱乐部、自由座谈会、参政员联谊会、同新华俱乐部等等，无法控制。开会第一天的失利，就显示出这院长不是好当的。

正当孙科告病离职之际，事有凑巧，副院长陈立夫恰好漫游欧美归来，于是顺理成章地坐上了主席的宝座。陈立夫第一次在会场上出现时，CC派全部人马劈劈拍拍地鼓了三分钟的掌，这种场面对坐在院长席的孙科当然是一种威胁。当时，平津南京上海各报上都大载孙科奢侈豪华的丑闻，说他一幢洋房花去五十万元，屋顶上有游泳池，还有跳舞厅等等。这些都是CC派的牛刀小试，这种局势命名孙科不能不感到寒心和懊恼。

孙科在上一次立法院集会时就曾称病赴沪，据说已经辞过二次职，到了立法院二次复会时，他又老病复发，请假到上海去了，偏偏中央社又企图为其遮遮盖盖，好穷根追底的记者们这才打听出一点底细来，敏感的社会舆论也终于嗅到政局中这种勾心斗角的派系之争。对孙科来说，这"辞职"或倦勤也实在是一种最基本的"自卫"办法。

（摘自《民国官场故事》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起对李宗仁的未遂暗杀

1948年11月。古老的六朝古都南京城已是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一天，在黄埔路的总统官邸里，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思索着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与自己的处境，思谋着摆脱困境的出路。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对侍从室的人员下了一道命令："快，传保密局毛人凤来见我。"

当毛人凤满头大汗，匆匆赶来时，蒋介石立即将他召进内室密谈。最后，蒋介石以极严厉的口吻，命令毛人凤尽快作好一切准备，等他一经决定，立即除掉李宗仁。

蒋介石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暗杀掉他的副总统李宗仁呢？

原来在1948年11月前后，国内外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对蒋介石不利：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早已失去进攻能力，处于守势被动挨打境地。1948年9月以来，解放军集中强大兵力，连续发动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攻坚打援，歼灭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长江以北几乎全入共产党之手，解放军眼看就要打过长江来。蒋介石一向恃为靠山的美国政府近来对蒋介石越来越厌烦失望，不仅不肯在军事与经济上再大量援蒋，而且主张以中途换马的方法来挽救国民党的危局，公开鼓吹让蒋

介石辞职，由李宗仁上台出面与中共和谈。特别令蒋介石气愤与仇恨的是，在国民党上层出现了反蒋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乘蒋介石危机四伏、穷途末路之时，串联各派力量，发声明，搞倡议，给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蒋介石下台。

蒋介石怒气冲冲，怨恨交加，不由想起了桂系集团与李宗仁几十年来一直与自己作对的种种事实。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接受了蒋介石关于暗杀李宗仁的命令后，立即积极而又十分机密地准备起来。

首先是物色暗杀执行人的人选，这必须是绝对忠于蒋介石而又擅长暗杀的高级特务。毛人凤开始准备让保密局主管暗杀等事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主持，后来蒋介石知道叶翔之是文人出身，一向主持内勤工作，就决定改调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来主持。沈是少将衔的大特务，跟随戴笠多年，富有行动经验。毛人凤打电报到云南，将沈醉紧急调来南京，作为暗杀李宗仁工作的主持人。

沈醉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在座的还有毛人凤。蒋异乎寻常地与沈醉谈了两个多小时。蒋的态度十分和蔼，先问了沈的工作情况与家庭情况，然后对沈讲了暗杀李宗仁的重要意义。他说：共产党是迟早可以打败的，而内部的捣乱则比共产党更难处理，因此决定采用暗杀李宗仁的办法，好使内部统一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蒋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国民党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一再向沈醉说明这次杀李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要沈绝对不能泄漏出去。蒋要求沈醉从速部署好，等他一决定行动时，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又举出中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等暗杀事件的英雄人物来鼓励沈醉。其意是要沈醉感奋，不惜牺牲生命完成暗杀李宗仁的任务。沈醉在辞出时坚决表示，为了不辜负蒋介石的期望，为杀李，任何牺牲都能办到。蒋介石听了十分高兴，握着沈醉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毛人凤又调来保密局两名擅长暗杀的行动专家秦景川与王汉文二人作沈的助手。秦景川一向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处决人犯的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汉文则是东北惯匪出身，从小干杀人越货勾当，能以手枪击落空中飞鸟。另外还配备了一些辅助人员。毛人凤指定由这几人成立"特别行动组"。

毛人凤与沈醉等人密商，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暗杀，一是防止李宗仁逃离南京。同时还研究对其他几位桂系首领如白崇禧等的处置办法，他们打算用刺杀李宗仁的办法刺杀白崇禧等人。毛人凤亲自给保密局经理处与人事处下令，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必须尽量予以满足。

当时李宗仁住在南京傅厚岗。特别行动组为侦察与监视李宗仁的行动，特地派了一名叫吴德厚的特务在由马路通向李宗仁住宅的转角处开设一个旧书摊子，作为秘密监视点。通过侦察，沈醉发现李宗仁的汽车每天进出转弯时速度就放慢，若在这时由预伏特务从两面同时射击，暗杀肯定有把握。沈醉将这里作为暗杀的地点。他与秦景川、王汉文每人都准备好两支手枪，弹头内都注入最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李宗仁身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另外，在吴德厚开的旧书摊上也秘密配备了一支手提机枪与几颗炸弹，以便到时配合暗杀行动。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逃离南京，到外地依靠桂系武装公开反蒋，特别行动组又派人在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进行监视。如发现李到飞机场乘飞机离南京，就由特别行动组立即报告毛人凤，通知空军，调用战斗机将李的座机击毁。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离南京到安徽的桂系部队中去，特别行动组又派人在铁路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子，摆设香烟摊，进行秘密监视。此外，在南京郊区汤山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派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毛人凤特地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以备在李宗仁坐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时使用。

到了1949年1月中旬，正是李宗仁对蒋介石进行逼宫的时候。这也是特别行动组最为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在进行最后的思索与抉择：是把李宗仁暗杀掉自己继续干下去，还是自己暂时退休交给李宗仁来代理。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在那一段时间中，毛人凤天天叮嘱沈醉与特别行动组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蒋介石一有命令就动手。毛人凤还怕李宗仁那几天躲在家里不出来，又令沈醉对李的住宅进行勘察，准备深入李宅进行暗杀。

由于形势的急速发展，使蒋介石终于没有敢对李宗仁下手。1949年1月20日，在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的前夕，毛人凤指示结束特别行动组的工作，由沈醉将秦景川、王汉文、吴德厚三人带到昆明去藏匿。

（摘自《民国刺杀要案》经盛鸿）

"军话台"风波

一、"军话台"建立来龙

军用电话专线台，又简称"军话台"，是抗战初期建立的。"八·一三"沪战起后，身为当时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除亲临淞沪前线视察外，一直坐镇南京，指挥这场战争。

长途电话，是蒋介石指挥战事主要工具之一，他打电

话，不假手于人，多半亲自叫接。

沪战刚起，战争极为激烈，一天夜晚，蒋介石要接苏州顾总司令祝同。接通时对方竟是朱总司令绍良。蒋氏质询长途台："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接朱总司令？""你讲没讲苏州？"长途台反问。一因叫接时，蒋漏报苏州，再因蒋的宁波官话，长途台的南京小姐把"顾"错听成"朱"。同时上级未做缜密的布置，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南京小姐，岂知被"顶撞"的竟是当时最高统帅蒋介石。

蒋氏这一气非同小可，把手中话筒扔向话机，因为用力过猛，话筒被摔成了两截。侍从施绍凯听到室内响声，忙推门进来，只见蒋躺在长藤椅上，一迭声地咆哮着："侍卫官请钱主任。"当钱大钧刚跨进门，委员长就气呼呼："你把樵峰叫来"（樵峰是当时交通部长俞飞鹏的号）。钱大钧感到很突然，暗忖发生什么事，把蒋气成这样。联想到俞是蒋的嫡亲表兄弟，自己又和樵峰多年袍泽，便凑进一步低声"报告"，意谓有什么事。蒋约略把电话事说了。末了，他还余怒未息："问问樵峰，他是怎么布置的？"钱唯唯退出。

钱大钧连打几处电话，都没找到俞樵峰，时间已近午夜，看来这件事未便耽误，立命随从副官小李备车，直趋北祖师庵双门楼俞公馆。

据副官小李述及钱、俞会见时情景：

我们刚踏进俞公馆，恰巧俞部长甫由苏州、无锡等地视察赶回。他见钱主任深夜过访，而且面显紧张。俞部长是素稔我们主任的，非遇重要事件，从不露形于色，是一位谈笑风生、诙谐风趣的人物。所以，俞部长一见面，急切问："慕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号），什么事？这么晚……""委员长对前线多用长途电话，亲自下令指挥，"钱答。"这个……"俞结结巴巴地应着。"你对下面是否作过安排部署？"钱进一步问。"唉，这倒没有。"俞把头摇了一下。因为他们是挚友，说话无须掩饰，钱大钧遂把所发生之事，备述了一遍。俞部长听后，低头沉思，这时，夜阑人静，万籁无声，似乎听到 300 多公里外淞沪之滨炮声隆隆，前线健儿前仆后继地浴血奋战凶暴的入侵者。俄顷，俞樵峰抬头凝视，说："是呀！贻误军情，谁能担当？"他把客人送出会客室外，继续说："明晨我到官邸。"钱慕尹一看手表，时针已指凌晨 1 点 55 分，便说："我看不必了，最主要还是先部署吧……"。

月明星稀，夜风阵阵。两位将军立在台阶上，钱瞥俞一眼，见他双眉紧锁，岔开话题说："做一付满贯（雀战中术语），和了不就翻本了吗？"钱大钧真不愧诙谐人物，一语双关，立把俞部长逗笑了。俞靠进一步，紧握钱的手，好一会，口中才迸出："谢谢。"

第二天一大早，俞飞鹏在部长室召见电政司帮办[illegible]凤山、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约略把蒋委员长打长途电话事说了，饬令马上采取办法。经研究决定建立"军用电话专线台"一座，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管。朱一成当即要求，指调在部工作的王正元等 3 人，到首都电话局一天 24 小时轮流值班，并把经镇江、无锡的苏州电路改为南京直达苏州。俞飞鹏遂将办理情况，电话告知钱大钧。钱加派侍从室陆大毕业的少校参谋周某到首都局协助王等工作。

因有专机、专人、专线之便，蒋在沪战 3 个月中，使用长途电话频繁，未发生任何贻误，蒋本人感到得心应手。后国都迁到重庆，军话台略加扩充。除原有"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专线外，又增加的专线有蒋夫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军令部部次长、行政院院长等约 10 户。

二、连战皆北话"军台"

1946 年 5 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很快撕毁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为适应内战需要，交通部令南京电信局，扩充军用电话专线台，分为"重要台"、"次要台"。"重要台"有：蒋总统，蒋夫人，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总参次长，陆、海、空、联勤 4 个总司令，总统府军务局长（原侍从室主任）约 20 户。"次要台"有：国防部各厅、局长，4 个总司令部所属各署署长，共约 60 余户。工作人员从 3 人增加到 10 人，一律用男性。话务科科长王正元兼充总统府上校电话监察官，受双重领导。"重要台"人员，由王报请总统府军务局备案。

这些军事部门的专线，是以迅速、准确来要求的。但是发话者渐渐既多且滥。到了 1947 年，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报纸不敢透露的真实消息，前线一个接一个失利情报，从电讯传到战争指挥中心。战争愈紧张，军话愈频繁。上面发布命令，下面讯问战情。在这关键时刻，军话台机线发生了捉襟见肘现象，特别是电路中断频繁。因为战区多半在北部和西部，南京对外联络的电路，除南京—上海的电路正常外，沿江安庆以上的殷家汇等地，三天两头断线。南路出南京城百里以外的句容、溧水等地始终是断断续续。最严重的是北路，南京通往徐州的线路有一对铜话实线，时有二路载波在滁县、张八岭、嘉山一带发生断线情事。虽配备有一个庞大抢修队伍，但修不胜修，随修随断。这条电路肩负徐州往北通往济南、青岛、北平等地；往西通往开封、郑州、洛阳、潼关以至西安等地。一遇断线，整个往北和往西北的电讯，概被阻断。

那时，除蒋介石本人不时叫发长话外，国防部每天发话到各战区，总长办公室包括总长和参谋次长，向战区最高指挥官下达命令或查询战况。第三厅（作战厅）以厅长副厅长或科处长，作战参谋分别发往各战区长途电话，查询战况。第二厅（情报厅）由科处长或情报参谋发往战区的情报参谋，搜集情报。联勤总部，用长途电话向战区后勤部门，查询补给和运输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其编制与

国防部大同小异。国防部下设“厅”，“陆总”下设署。它的第三署主管作战，第二署主管情报，每天照样发往各战区长途电话，搜集战报和情报。

当时由南京发往各地的军话，时有积压。甚至对正在激战的战区，常有整天发不出一通长途电话。无线电路因不能保密，规定不准使用。最高指挥中心的国防部认为前后方军讯阻断和首都的谣诼繁兴有关；若究查责任，南京“军话枢纽”，是不能辞其咎的。

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方节节失利，军心涣散，后方不稳，众叛亲离，加上工运、学运迭起，当局将电局特别是长途工作人员，视为重点怀疑对象。1948年上半年，军话重要台，就发生1名工作人员涉嫌失踪的事。南京《新民晚报》发表了这一消息，曾轰动一时。这一波未平，接着又发生“贻误戎机和泄漏军情”的轩然大波。1948年八九月间，交通部下达南京电信局第一道命令：“接国防×文咨称：该局对于军事通话，迭有稽延贻误，并有泄漏机密情事，仰迅饬查……”

紧接着又下达了第二道凌厉的命令：“……饬查在案，着即迅将贻误戎机、泄漏军情失职人员查明具报，以凭究办，切切勿误……”

从电信总局局长到首都的电信局长，莫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过，层层都在公事上批注：“饬该×长迅即查明具报勿延，”层层追到主管“军话枢纽”负责人的头上。

王正元召集有关负责人员商讨对策，台内一片叹息。大家深知公文上“究办”两字，就是“军法从事”的同义语。电信局长们都分别找“军话枢纽”负责人王正元谈话，命其认真查处，并授意说：把几个经常积压军话并在某些方面比较活跃的人物，查明上报。这样可以减轻责任。

要查凭证，最可靠的是“通话记录单”，军话台同有关主管人调齐一个月来的“军话记录单”。发现凡退号不能通话的，都在备注栏上注明：“线障”。再查“班长记录簿”上载明线障时间，但每天都有修复时间的记载。根据发话军方要求，一俟线路修复即予接通。但都到了下班后，备注栏上再加注“逾时退号”字样。遍查值机人员则全系“次要军话台”和部分“长途台”人员，与“重要台”无关。

既然国防部下了彻查命令，电信当局非要话务科查出一个水落石出不可，权衡得失，王正元首当其冲，岂是交出几个人所能济事。他想：交人，脱不了干系；不交，过不了关。上面催办如此急如星火，简直已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四、解铃还须系铃人

王正元昼夜苦思冥想，终于在急切中想出一条出路——走“上层路线”。他决定去找在抗战时期结识的一位良师益友蔡文治将军。

自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国共谈判破裂，“北平军调处”被撤销，原任该处参谋长的蔡文治中将由平回京。他一直留在“总参谋长办公室”，翊赞军务未派正式职务。

在“总参谋长”会客室，王正元会见了蔡氏。王把事件原委和自己的处境说了，提出请他援手的恳求，他听后，不加思索地说：“这件事，我知道是三厅发动的。虽说性质上是有违战时军律的事件，但解决也不难，‘解铃还须系铃人’嘛！”说完，顺手拿起身旁的电话，叫通第三厅许副厅长：“……我叫他来见你，请你和他谈谈……”挂上电话，取出便笺写道：“嘱王正元兄前来谒见，祈拨冗接谈……蔡文治。”

这一着果然奏效，代理三厅厅务的许××一见王正元就说：“蔡定公已对我说了……”，态度十分和蔼。他随命勤务兵把本厅几个处长、科长叫来，一一介绍。因王正元既是蔡定公(蔡文治的号)介绍嘱托来的，都有点刮目相看。就在王正元去国防部的第三天，经由交通部转来国防部第三厅派令一件。内称：“兹派王正元兼充本厅上校联络官，此令。代理厅长许××(三厅钤印)。”原来这时蔡文治已内定为国防部三厅厅长，这位代理厅长趁便卖一个顺水人情给这位未来的顶头上司。随着王正元的“荣升”，“军话台”风波便安然平息。

(王正元)

历史考证

辽沈战役中林彪为何对南下北宁线作战迟疑不决

驰名中外的辽沈战役，是对解放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在这个伟大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逐步确立并贯彻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方针，无疑对战役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如果没有主力挥师南下北宁线，就不会有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就不会造成"关门打狗"的战略态势，最终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境内加以各个歼灭的这一战略思想。可是，当时身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最初却不愿以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纠正了他的错误，才使战役得以顺利进行。那么，林彪对于南下北宁线作战迟疑不决的原因何在呢"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林彪决心打长春之敌，限制了他的作战视野。1948年2月初，正当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顺利发展之时，毛泽东分析东北国民党军今后有撤入关内与就地盘踞两种可能后指出："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57页)虽然他同时说究竟打何地之敌更好须依情况再定，但是他对林彪所谓的锦州方向无仗可打的判断提出了疑问，并强调东北野战军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重申："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门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同上书，第457～458页)显然，毛泽东已有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之意图。林彪接到毛泽东上述指示后，立即表示赞同。他说："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1948年2月10日林彪致中央军委的电报)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同上)可见此时林彪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月25日，林彪电告中央军委："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1948年2月25日10时林彪致中央军委的电报)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林彪于4月18日电告军委，称对作战的根本意见是打长春，并说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但均不甚适宜。毛泽东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一向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因此同意先打长春。但同时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易克服之困难。……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59页)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坚持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意图并未改变。5月24日，林彪派一部奔袭长春西郊，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作战在战术、技术上均存在不少问题后，方改攻城计划为先围而后攻，认为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然后攻城较有把握，便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吸引沈阳之敌北上增援长春，于野战中歼灭该敌，然后攻取长春。可是在卫立煌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下，沈阳之敌按兵不动，结果东北野战军主力被牵制在长春地区，与长春守敌形成僵持局面。这种不利局面使野战军首长感到，长此下去，既不利于东北战局的开展，更不能配合关内战场的攻势，万一沈阳之敌真的撤入锦州或撤入关内，东北野战军将来不及阻止。在此情况下，显然应当向南作战。可是，直到7月中旬，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作战方针后，林彪才最终认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打长春。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林彪决心打长春之敌，既延误了战机，又限制了他综观东北战场和全国战局的视野，是造成他南下北宁线作战迟疑不决的重要原因。

(二)过分忧虑南下北宁线作战之困难，也是林彪不愿南下的重要原因。林彪当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担心：

(1)担心傅作义部抽兵增援东北。北宁铁路东西联接国民党军东北与华北两大"剿总"集团，在这样极易遭到两大敌军集团东西对进夹击的地域作战，对于东北野战军来说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尤其是在北宁线中段锦、榆、唐地区作战，风险更大。因此林彪认为："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平、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1948年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军委的电报)他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各个击灭敌人。"(同上)并声称："凡五万人以下的守城部队，均有歼灭他的把握；十万人的守城部队，只要不受大的增援威胁，我们亦有歼灭他的相当把握。"(同上)正因为对傅部心存顾虑，林彪一再强调："杨成武部能于日内即出发西进则更好，否则，亦以愈早出发

为好。”“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还不能具体确定。”(1948 年 8 月 8 日 17 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军委的电报)针对林彪这种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由于华北解放军的积极行动，将给傅作义很大的压力，傅作义除已部署在唐山地区的 5 个师可以增援东北外，不可能再有多的兵力出关。并告诫林彪，不要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为东北野战军行动的前提。毛泽东指出：“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468 页)“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同上，第 471 页)希望林彪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不要依赖华北部队的配合。在毛泽东批评教育下，林彪才决定东北主力于 1948 年 9 月上旬开始南下作战。

(2)担心南下后会发生不利于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敌情变化。林彪一厢情愿地认为，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敌情将发生一系列的不利变化。1948 年 4 月 18 日，他在致军委的电文中这样分析到：“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495～496 页)从这段电文中不难看出，林彪过多地估计了北宁线作战的困难，这显然是他迟迟不愿南下作战的又一个原因。

(3)担心南下作战会使部队士气要受到影响。林彪当时认为南下作战部队士气至少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长途行军的劳累。主力由长春、四平地域南下北宁线至少要行军几百里，而且大部需徒步前进，因此受气候条件、道路等影响较大。当时东北地区正值雨季，雨水之大为 30 年来所未有，铁路、公路被冲毁者甚多，这些情况都给大军的长途跋涉增添不少困难。二是认为到北宁线那些小地区作战，部队的服装、弹药、军费等补给皆无法解决，尤其是军粮很难筹措。他说：“我军南下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接济。”(1948 年 7 月 20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军委的电报)三是顾虑部队东北籍战士不愿南下作战，更不愿入关作战，经长途跋涉加上粮食衣服等供应不足，必发生逃跑现象，影响部队士气。

(4)担心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彰武、新立屯是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后方补给线上的两个要点，距沈阳敌之重兵集团均很近。东北野战军南下后，这两地一旦被沈阳之敌占领，林彪寄予希望的“四平——彰武——阜新”补给线将不复存在。部队所需弹药、油料、粮食等一切补给必然遇到严重困难。这种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足以令林彪裹足不前。后来攻打锦州之时，当廖耀湘兵团占领彰武并炸毁彰武铁桥后，林彪极为惊恐，几乎动摇了攻打锦州的决心。这表明，对后方补给线安危的忧虑，也是林彪不愿南下作战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林彪对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某些顾虑虽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作为战役指挥员，特别是具有战略性质的战役兵团指挥员，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必须要有战略眼光，树立全局观念，否则仅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局部战场或单一作战方向上，就很难迅速定下正确的战役决心，其结果必然对战争全局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丧失宝贵的战机和战役主动权。同时，如果缺少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和压倒一切的勇气，欲顺利实现正确的战役决心和达到作战目的也是不可能的。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战场，作战毫无困难是不可能的。这时所需要的恰恰是指挥员的雄心胆略和高超智谋。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其战役战场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困难空前加大。时间上明显表现为敌情变化迅速，作战行动节奏加快，宝贵的战机转瞬即逝；空间上具有立体的特征，战场将呈现犬牙交错的局面，战线模糊不清；加上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作战手段和机动方式的运用，使战场破坏性增大，作战消耗严重，战役保障日益艰难。因此，现代作战指挥员，不仅要胸怀战争全局，要有远大而宽阔的作战视野，不失时机地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定下正确的战役决心，而且要坚定、沉着、果敢，善于从不利因素中发现和创造有利因素，最大程度地减小作战困难，直至取得战役胜利。战争实践必将证明，只有这样的指挥员，才能在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游行自如，坚定地到达胜利的彼岸。

(选自《军事历史》94 年 2 期，作者：王永林)

滹沱河的骄傲
——中共中央迁往平山县的缘由

1947 年 3 月，国民党集中数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矛头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扬言要摧毁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缉捕中共要人。我党中央召开了紧

急会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城。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分散。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和部分机关留在陕北，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指挥西北和全国的反蒋自卫战争。以刘少奇、朱德两位中央书记为首，有董必武老前辈等参加，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到河北省，进驻晋察冀解放区，领导华北地区的工作，进行土地改革。

1947年5月，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平山，在此安营扎寨。为了保密，对外的名称叫做“工校”。以刘少奇同志为校长，朱德同志为校董的这个“工校”，实际是中央机关。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首长住在西柏坡村；这是滹沱河北岸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庄，背山面水，形势天成。整个的“工校”机关各部门，围绕西柏坡，分散在10多个村庄。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陕北转移到华北，经过晋绥解放区，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终于同刘少奇、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汇合，五位中央书记和董老等人都住在西柏坡村，于是这里成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周恩来语）。西柏坡是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枸，平山县驻扎了中央和军委的庞大机关，可以称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大本营。平山县继承延安的事业，从物资保障方面担负起数千人的生活供应。

为什么离开延安之后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平山县呢？笔者是平山县岗南村人，距西柏坡只有9公里，很熟悉家乡的山山水水。我认为党中央所以选择了平山县，因为这里具备了许多优越条件。

地理环境险要

平山县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是山区与平原的衔接地段，全县大部分地区是崇山峻岭，西北部地势高，东南角地势低，中间有一些丘陵地带。这种地形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兵家要地，古代的中山国曾在此建都，留有名胜古迹。抗日战争8年时间，日本侵略军只能占领平山县城附近一小片地区，广大的乡村，始终是坚强的抗日根据地。

交通条件方便

平山县东面有京汉铁路，南面有正太铁路，两条铁路的交叉点石家庄，是华北的交通枢纽，平山县城距离石家庄市35公里，乘汽车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到达。从平山城向西，经过洪子店一直通往山西省太原市，有一条古老的大道，从回舍镇向南不远就是正太铁路的车站，所以交通方便。正因为有这种条件，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西柏坡接待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代表米高扬一行，接待过国民党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以私人资格参加的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以及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

经济力量雄厚

平山县面积16625平方里，人口大约有25万（根据抗日战争开始三年县政府工作报告的统计数），因大部分是山区，可耕地不多，全县共有水田大约12万亩，旱田25万亩，山坡地8万亩。自山西省发源的滹沱河进入河北省，由西向东，横贯平山全境，流域170多里，两岸农作物较丰富，盛产小麦、玉米、谷子、水稻和各种杂粮，年产量大约45万担，每担以250斤计算，折合1.135亿斤（那时候的秤十六两为一斤）。

经济作物有棉花、山货、果木、药材，根据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报告，山货中的花椒年产量40万斤，核桃30万斤，都向外出口。棉花除出口之外，每年还生活土布80万匹，果木和药材等年产值大约10万银元。

聂荣臻司令员率领部队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曾在平山县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称赞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即粮仓之意。传说苏联的粮食，主要由乌克兰生产，所以做此比喻。

由于经济力量雄厚，人民的政治觉悟高，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山县，在物力财力方面，对晋察冀边区做了重要贡献。1940年8月20日县长赵继昌在平山县第一届议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介绍过下列数字：

1. 粮食供应：3年来平山县共计上缴救国公粮16万5千担，全县25万人，男女老幼大人小孩平均，每口人负担六斗六升，折合老秤165斤（相当于现在的新秤264斤）。

2. 财政负担：三年上缴田赋16万多元，购买边区政府的公债14万多元，人民群众义务捐献现金12000多元。这时期的金融货币是以银元（每元含纯银七钱二分）或法币计算的（法币和银元原来可以互相兑换）。

3. 其他捐献：主要有军鞋7万余双，生铁30万斤，慰劳军队的猪羊约4千只，蔬菜21.3万余斤，其他零星物品价值65840元。

政治基础牢固

平山人民勤劳勇敢，善于克服困难。什么样的天灾人祸都不能压倒。历史上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个千秋名句，深印在平山知识青年的头脑中。

当然，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高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旧社会的平山县，政治上极端黑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治着善良的劳苦大众，穷人啼饥号寒，朱门骄奢淫逸，阶级分化，尖锐对立。193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7月间平山县霍宾台村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年底党员人数发展到50人，组建了中心支部。1932年夏天，已经有10多个支部或小组，党员约百人左右，中共第一届平山县委会应运而生。后来每年上一个台阶，土话叫做"芝麻开花节节高"。到1935年冬，支部和独立小组70多个，党员700余人，遭受过一次叛徒的大破坏，但很快便得到完全恢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7月6日的统计数字，共有党员779人，白区的地下党，一个县能拥有这样多的党员，确实是罕见的。同年秋天，八路军来到了平山县，共产党的组织，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1938年党员数达到2984人，支部256个，1939年党员数3694人；1940年12月31日，《党员和党组织的统计表》中全县有中共党员10447人；1944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字为13282人；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平山县的党员已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以上。

有了党组织，群众便有了主心骨，抗日战争一开始，平山县就掀起了参军参战的高潮。王震同志率领的359旅，派工作团到平山县扩军，同中共地下党的平山县委接上了关系，有两名县委委员，200名党员带头参加，登高一呼，群众热烈响应。1937年10月份，用1个月零3天的时间，动员了1500名青年入伍，工作团配备了军政领导干部，组成完整的"平山团"，编为359旅718团，进入八路军的主力行列。由于"平山团"的英勇善战，受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通令嘉奖，被誉为"八路军的模范部队之一"、"中华民族最忠实的后盾"、"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敌报》发表了社论，《学习平山团的光荣模范》。

除了组建平山团以外，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半年之内，平山县还向罗荣桓同志率领的115师送去1600多名青壮年，编入徐海东、黄克诚的344旅，曾国华支队和师教导队，接着又组建晋察冀边区第4军分区的武装七、八、九大队。

抗日战争8年中，平山全县参加八路军的正规作战部队总计1.2万人，另有民兵7万余人。民兵基本上不脱离生产，是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同时配合正规军作战，其战绩也是辉煌的。

1939年7月24日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敌报》刊登一则通讯，标题是《平山妇女在前线帮助军队打仗》，里面讲了6个小故事。《抗敌报》后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经常登载平山县的民兵斗争消息。例如1942年6月9日第一版发表的5月份平山民兵破交战，先后出动民兵9000人次，扒毁敌人的铁路，运回铁轨共221根，平填敌人挖的封锁沟36里，拆毁敌人的封锁墙15里，运回粮食5400斤。1943年7月15日第一版刊载《平山民兵五个月来毙、伤、俘敌伪333名》的消息。1943年11月12日第一版刊载了《平山民兵威慑敌胆一个月来毙、伤、俘敌伪五百余人》的事迹。

平山县的人民除了参加正规军作战和民兵参战之外，还担负繁重的战争勤务，抬担架、送伤兵，运输军粮马草、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根据统计数字，八年抗战中，男人出公差勤务2105万个劳动日，妇女出公差勤务2224万个劳动日。妇女的具体工作是做军衣、军被、军鞋、军袜，护理伤员。平山县下盘松村中共党员、村妇救会主任戎冠秀同志，是妇女的优秀代表。她做的军衣军鞋数量多、质量好，在护理伤员时做出了奇迹般的特殊贡献。受伤的战士感动地说："老大娘，你和我的亲娘一样，我就叫你亲娘吧"！1944年2月，她出席了全边区的群英会，聂荣臻司令员代表晋察冀军区，授予她"子弟兵母亲"的光荣称号。全国解放之后，戎冠秀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中央首长们接见，成为全国妇女的一面旗帜。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机关在平山住了3年半，第四分区的党、政、军机关住了整整8年。还有5团、特务团、35团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经常住平山县。成仿吾校长率领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四五千人，从1940年1月进住平山县元坊村一带，后来搬到滹沱河沿岸，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县。机关、部队、学校的大批人员居住，受到热烈欢迎。平山县的老百姓高兴地在自己院内腾出房屋来，多年和睦共处，军爱民，民拥军，双方成了一家人，建立起真正的鱼水般的浓厚感情。有些著名作家住在平山时，用《我和房东》为题，发表了作品，描绘了"一家人"的"水乳交融"。平山人崇拜共产党，热爱八路军，大家都认为："革命队伍住进咱家的房屋是无尚光荣"。

日本侵略者，对平山县的人民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调动大量的侵略军进行扫荡，实行"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数十起。根据中共平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小册子《侵华日军在平山大屠杀实录》一书记载："抗战八年间，日军在平山制造了数十起惨案，我14000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尸骨遍野，血流成河，还有976人被抓走下落不明，1049人受伤致残，另外因战祸造成的温疫流行，病灾致死3.4万多人，被烧毁民房15万多间，抢走牲畜8.7万多头，损失的粮食，财物难以计数"。

日军的屠杀，没有征服英雄的平山儿女，敌人的刺刀没有吓倒宁死不屈的人民，更激起了平山人民的深仇大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前仆后继，雄纠纠气昂昂，成群结队，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他们高唱着"我们的

太行山上"的歌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摘自《党史纵横》94 年 11 期，作者：曹慕尧）

谁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由 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不少人认为此名称是张奚若先生在 1949 年 6 月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但是任弼时同志明确认定将来的新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张奚若先生的意见早 1 年 5 个月。

1948 年 1 月 12 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说："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在谈到 1947 年冬伟大的学生运动时又说，蒋介石统治区以学生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生"看到了革命的发展，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

任弼时的讲话无论从内容和时间上，都可以说是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

（选自《纵横》91 年 1 期，作者：林雄辉）

陈布雷何以自杀

1948 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11 月 13 日，一个初冬的深夜，寒风凛冽。在南京湖南路一所豪华的住宅内，一盏幽暗的壁灯映照着一个纤弱瘦小的身影，只见他缓缓地拿起床头的药瓶，终于发狠心，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 160 多粒进口烈性安眠药。他身着长衫，脚穿布袜，嘴角向下弯曲着，似乎心中隐藏着某种说不出的苦衷，直挺挺地仰卧在冰冷的床上。这位自杀者，就是曾编过《天铎日报》、《商报》、《时事新报》并以鼓吹革命、积极反帝见称于世，后又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秘书长等要职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陈布雷。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自杀，就是他最后的选择。

陈布雷自杀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报社即以"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为题发布了消息，但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由于陈布雷生前性情孤僻而又自鸣清高，从不愿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加上在他死后，国民党当局又严密封锁消息，致使陈布雷的自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多少年来，很多人都想解开这一谜团，但由于立场、观点、观察的角度和运用材料等的不同，并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世人多从分析当时的局势入手，认为国民党每况愈下的统治和面临崩溃的局面，是陈布雷由绝望而自杀的根本原因。唐人先生在著名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写道："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自杀了。"石三友的《金陵野史》也说："1948 年，国民党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感到回天乏力。4 月末，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径自去中山陵向中山先生作最后的诀别，在座像前肃然长鞠躬。不久，他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陈布雷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是陈生前最后接见的一个人。据袁回忆说：陈布雷自杀的前一天，打电话叫他去，陈用低沉的语调反复说道，"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投在蒋介石手下，以致今天不能自拔。"陈布雷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政治，他对袁的一番话是考虑已久的，乃是他自杀前的精神状态。

笔者认为，从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看，也可看清陈之死因。陈布雷自 1927 年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长达 20 年之久。1935 年，蒋介石的御用机构——侍从室事权扩大，他出任第二处主任，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讲话、函电以及党、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整整 10 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却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雷先生"尊称，以示不同一般。1940 年，陈布雷 50 岁生日，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己"。"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人生观。从此，陈布雷在蒋介石的礼遇羁绊之下，便至死不悟。当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 20 多年的蒋介石已无法挽救危局时，他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殉国难"这条路。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党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了陈布雷自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杀是精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扰也增加了他的精神上的压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改组；6 月，陈布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精力去应

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院总院院长粟宗华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期失眠，精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来看，陈的自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年入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和贪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蒋介石撰写《三陈磨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杀的原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党内离心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杀身亡。"

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杀之谜。陈布雷与先后两位夫人一共养育了七子二女，所以家庭负担很重，最初靠笔耕及祖产为生。抗战以后，在重庆完全依赖官俸，而山城百物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因此生活十分俭朴、拮据。蒋介石在逢年过节时，对他虽有所馈赠，但为数有限。陈布雷经常穿的是旧衣服，戴的是一顶旧礼帽，只有逢到出席重大会议或典礼时，才换穿一身藏青哔叽中山装，算是他的礼服了。陈布雷自杀前后，正值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这种说法以前曾经广泛流行，现在赞同者甚少。

(摘自《历史之谜》人民日报出版社)

蒋经国"打虎下山"原因

1948年8月，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开展了一场旨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打老虎"运动。由于上海财阀和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僚集团的反对，时过70天，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便偃旗息鼓。作为"太子"的蒋经国面对这种局面，除了天天喝得酩酊大醉、狂哭狂笑之外，也别无它法。11月6日，他在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之后，便悄然离沪。

对"打虎"运动的失败，当时有人归咎于蒋经国，骂他是政治骗子；有人说只因"杨贵妃"(指宋美龄)插手，害了蒋经国。《大公报》载《打虎赞》云："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君记否？去岁金潮经调团，未呼捉虎事周旋，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或为老虎暗耽心，或为辛劳忧使君。世间到处狼与虎，狐掌难鸣力岂禁？"旧中国，政治腐败，官商勾结，丑态百出，靠一"太子"岂能力挽既倒！

(钟琦)

江亚轮沉没真相

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上海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发生了一起举世罕见的海难事件。上海招商局江亚轮在开往宁波的途中随着一声巨响迅即沉没，事后据宁波驻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调查统计，该轮载客达4000余人，生还仅900多，罹难者之众实为空前绝后。根据有关专家的现场勘查和幸存者的追忆，该轮显系触雷爆炸，但原委真相究竟如何，因缺乏确凿的佐证，成了久悬未决之谜。

1949年4月，上海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等在国际饭店宴请海军部长桂永清，以联络双方感情，消除彼此的隔阂。席间，桂永清道出了江亚轮沉没的真相。原来，当时上海海军奉命派水上轰炸机一架，携带500磅炸弹数枚前往海州执行任务，在返回上海高昌庙基地的途中，飞机经过吴淞口上空时，一枚炸弹脱钩落下，恰好落在江亚轮右侧船舷，引起爆炸，酿成一场举世罕见的海难。事后，海军方面对此讳莫如深，秘而不宣，不敢承担如此重大的失职责任，江亚轮沉没便成了不解之谜。最后只能由上海招商局代人受过，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枕石)

风云人物

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　湖南衡山(今衡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曾在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读书。1927年在武昌中山大学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8月参加鄂南通城、崇阳的农民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在毛泽东领导下进军井冈山。9月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团部参谋。三湾改编时任特务连党代表,1928年先后任九连、八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1929年任九支队党代表,在红四军党的九大会议上被选为前委委员。1930年1月任二纵队党代表,8月任红四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3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1934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1934年1月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8月任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他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建军路线,积极在部队基层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推动部队的民主改革,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达陕北后,又参加东征。1936年6月调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在洛川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率部队挺进晋东北抗日前线。1938年初,率一一五师主力回师晋西,开辟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率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山东敌后,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40年9月,一一五师编入山东各部队,组成六个教导旅,分布于冀鲁边、鲁西、湖西、苏鲁豫皖、鲁南等根据地。

1941年11月,率领党政军机关,采用敌进我退的翻边战术,巧妙果断地跳出合围圈,在沂蒙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经五十多天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伪"扫荡"。

1943年3月,山东军区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8月,任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率领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开赴东北,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领导部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进行艰苦的工作,创建东北根据地。1945年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任东北局副书记。1948年1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8月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1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参予指挥了辽沈、平津战役和其他重要战役。1946年6月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罗荣桓毕生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

材料　中流砥柱

刘亚楼一清早就来到罗荣桓的住处,把林彪发电报的事和电报内容告诉了罗荣桓。

罗荣桓刚刚起床,还没有洗脸,听完刘亚楼的话,顾不上洗脸吃饭,马上拉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

罗荣桓心情沉重,面色严峻,一言不发,两只手微微颤抖,深一脚浅一脚,匆匆地走着。他发怒了。他发怒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罗荣桓身负重任,当然要为林彪的轻率行动所激怒。是先打长春,还是南下作战,东北局、军委已经经过几个月的周密考虑。长春本来好打,没有打下,又拖了好几个月。后来,考虑到南下作战更为有利,毛主席对此也早有指示,尽管林彪顾虑这,顾虑那,东北局还是作出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决定,林彪也是同意了的。现在,作战计划也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林彪却又动摇了。

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对司令员林彪的工作,一向是支持的。但这次打锦州,是牵动全局的重大战役行动,大

军早已出动，兵临锦州城下，林彪却抛开军委批准的南下作战的决定，又要回过头去打长春，罗荣桓是坚决反对的。仅仅是因为敌人增援了四个师！再增援四个师又怎么样？毛主席早就指出要"置长、沈两敌于不顾"。

打下长春是不难的，但打下长春，锦州还是得打，那时，敌人无须东顾长春，涌到辽西的兵力会更多，我反处于被动。而且，如果敌人从北宁路，从海上狂跑，又怎样去"关门打狗"？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同为部队首长，对部队工作共同负责，如果是一般的指挥处置，也就罢了，对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决策的大问题，林彪不经商量，就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电报，也是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

罗荣桓从一九二七年被委派到鄂南组织秋收暴动、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起，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惊涛骇浪。他独立坚持山东的抗敌斗争，当过司令员，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已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之一。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不能容忍牵动全局的轻率举动。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斗争，要去拂一拂林彪的"逆鳞"。当然，方式方法还是要讲究的。

罗荣桓见到林彪，压住火气，冷静地、开门见山地问：

"'一〇一'给军委发电报，要考虑回师打长春吗？"

"是的。"林彪一向独断专行，不仅没有感到他的动摇有什么错，连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擅自一人作主也不觉得有什么过失，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人又增派了四个师海运葫芦岛。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有十万兵力。锦州城里敌人八个师，工事坚固，不是短时间拿得下来的。锦州一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这样我们就会陷于被动。不如回去打长春可靠一些。"

罗荣桓说：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么想？怎么向中央交代？"

"敌情变了……"

"敌情变化并不大。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

"谁动摇呀？敌情变了嘛！"

罗荣桓感到责任重大，不能让步，仍然采取劝说的口吻，严肃地说：

"司令员，你考虑了没有，这样会影响整个战局的！"

"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打下还是打锦州，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打长春较有把握，两个方案正在考虑中，请军委同时考虑指示嘛！"

"电报中强调打锦州困难，强调打长春有利，明显地想回师打长春，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林彪站起来踱着步，向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看法，"刘亚楼说："还是打锦州好。"

林彪想了一会儿，喊来秘书，叫他打电话给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回来报告说，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办？"参谋长问，看了看司令员和政委。

林彪没有吭声。罗荣桓回答说：

"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他不肯动笔，刘亚楼请罗荣桓主持起草电稿。经过一番讨论，写完电稿，林彪过目时把有检讨内容的字句删掉，作了一些改动，以林、罗、刘名义发出。

（选自《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作者：杨国庆、白刃）

董存瑞

董存瑞（1929—1948） 河北省怀来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历次战斗中，作战勇敢顽强，曾立过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荣获一枚毛泽东奖章和三枚勇敢奖章。

1948年5月26日，在解放热河隆化（今属河北省）的战斗中，为清除部队进攻的最后障碍，担任爆破敌人碉堡的突击任务。当冲到碉堡底部时，发现没有安放炸药包的位置，为保证战友的安全和部队按时发动总攻，毅然以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猛拉雷管，炸毁碉堡，壮烈牺牲。为此，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党委决定追认他为战斗英雄、模范党员。

材料　董存瑞舍身炸暗堡

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大批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我也在这时到了部队。一天，一个"老"兵把我从连部带回六班。一路上，他自我介绍："我叫刘祥，大家都叫我小鬼。其实我都十六岁了……。"

他的确是小，童音还没变呢！嘴里老是叨叨，象连珠炮似的，最爱说的是："咱六班在全连是没比的啦！班长更没说的，思想、战斗、工作、学习、团结互助、关心同志，样样都好。"我心想：看他把班长夸的，真有这么好吗？

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小伙子在擦枪，嘴里还哼着："黑个洞洞天上……出呀么出星星……"这小伙子年纪顶多不过十八岁，个儿不高，方脸蛋，一双大眼睛又明又亮。刘祥指着他给我介绍："这就是咱们班长，董存瑞。"这就是小鬼所夸的班长？我有些不太相信。小鬼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又尖声尖气地补充说：

"同志！你别看咱们班长年纪小，他可是咱六连数一

数二的好班长，还是立过几次大功的功臣哩！”

班长红起了脸，瞪了小刘祥一眼，忙说“少磨嘴皮子，说点正经的不行吗？”说着便热情地接待我，为我张罗这，张罗那，问长问短，还把全班最好的铺位让给我，真象个大人一样。

把铺位安置好了，他上下打量打量我，看我衣服成了破布条，两只鞋的前梁上都咧开了大嘴，便笑了笑，打开行李包，掏出一套半旧的军装和一双新鞋塞给我。他身上穿的也是补了又补的旧军服，虽然洗的干干净净，但也够破了。我不知向他说啥好，愣了半天，才说：

“你自己怎么不穿新的”

他笑着说：“我这不是挺好吗？”

“挺好？”我奇怪地想，但没有说出口来。

就这样，我成为董存瑞班的一个战士了。

这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刚刚结束，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都退守在几个孤立的据点内。部队从朝阳西进，准备攻打隆化。沿途见各处村庄都被国民党十三军燃杀抢掠，糟蹋得不象样啦！悲惨的景象象把火一样燎着战士们的心。

五月十三日，我们在隆化外围打完二沟后又回到头沟。正在一个院子里召开全营军人大会，忽然后面传来了阵阵哭声，原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找我们部队诉苦来了。她一边走一边哭诉着她一家三口被国民党十三军杀害的惨状。同志们听了都掉下眼泪。

教导员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要替老大娘报仇！替全热河的人民报仇！我们要替去年打隆化时牺牲的同志报仇！同志们，敌十三军军长夸下海口说：‘共军要能打下隆化，我把承德送给他！’同志们！我们能让敌人这样狂妄吗？”

全营的同志个个怒发冲冠。我向身边的董存瑞望望，只见他紧咬嘴唇，两眼直盯着那位老大娘，抓着枪的手因为过分用力，指甲都憋得乌青了。怒火在每个战士的心头爆发。全场响起了震天撼地的口号声：“坚决解放隆化！”“为牺牲的烈士报仇！”

第二天，董存瑞在他的枪托上贴上了这样几句话：

“天下穷人心连心，人民战士为人民。坚决讨还冤头债，誓把敌人消灭在隆化！”

正当六连接受攻打隆化的突击任务前，我调出了六班，到七班当班长去了。五月二十四日这天，风和日暖，同志们个个喜气洋洋，士气高昂。我们六连聚集在村旁一块长着几棵白杨树的大洼地里，召开隆重的“挂帅点将”大会。

复仇的怒火，杀敌立功的决心，激励着人们，每个战士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面“帅”旗”。班长们都跃跃欲试，想争先请求“挂帅”。

大会开始了。指导员的话音刚落，有人抢先喊了“报告！”听这清晰而脆亮的喊声，就知道是六班长董存瑞。接着，“报告”声响个不停。

台下顿时骚动起来。小鬼刘祥尖声说道：“我们班长立过大功，当‘爆破元帅’我第一个赞成！”

六班长是个好党员，有经验又有技术，他“挂帅”再合适也没有了。于是，我放弃了自己争着“挂帅”念头，马上表示：“我同意六班长‘挂帅’！”

“我也同意！”

“我没意见！”

“我有一点意见！”忽然从队伍前右角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原来是一班长。他严肃地说：“六班长是好样的。不过他昨天带领侦察组执行任务，不该扔手榴弹暴露了目标。当‘爆破元帅’，这样毛手毛脚可不行！”

董存瑞红着脸，没说什么。

“你……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存心找别扭吗？”小刘祥站起来愣声愣气地说，“咱班长昨天扔手榴弹是为了把敌人火力引到自己身边来，好让副班长他们安全回来呀！这难道还有错吗？”

“全怨我弄了个满锅腥！”另一个战士说明了真相。“昨天是我不留神弄出了响声，敌人朝我们打枪。班长忙从左边扔手榴弹，使敌人火力转移，掩护我和副班长安全回来。……”

董存瑞站起来说：“暴露目标的事，我也有责任。可我有决心有信心完成这次爆破任务，请同志们相信我。”

董存瑞是全团有名的爆破手，不止一次地出色完成了爆破任务，大家信任他。这时会场上异口同声地嚷：“同意六班长‘挂帅’！”接着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董存瑞挂了“爆破元帅”。战士们当即敲锣打鼓，热烈地把他拥上“点将台”。指导员授给了他“帅旗”，不一会儿，他胸前就挂满了红花。董存瑞站在台上，紧握着“帅旗”，发愣了。我看着他那掌旗的手微微有些抖动，那双大眼睛里闪着晶亮的泪花。看得出他的心情是太激动了。

“‘元帅’，你点将呀！”我着急地喊。

台上跟着都喊起来。

董存瑞点了点头。台下立刻鸦雀无声。一百来双眼睛都盯着董存瑞，小鬼刘祥还眨着眼指指自己的鼻子向他示意。董存瑞思忖了一会，不慌不忙地抽出一面红旗，摇晃了几下，突然指着我说：“点七班长郅顺义为‘突击大将’，杨德祥、王子元为‘副将’，共同组成突击组！”我听了顿时浑身发热，心里也突突地跳了起来。接着他又抽出一面旗子说：“点二排长为‘火力大将’，由二排两挺机枪和一排的一挺机枪组成火力组。”当他拿出“支援大将”那面红旗左右摇动时，一班长一直用祈求的神情瞅着他，但马上又把头低下了。正在这时，董存瑞喊道：“点一班长为‘支援大将’！”台下立时响起了“好啊！”的呼声和激烈的掌声。一班长走到台前接过红旗，拉着董存瑞的手，激动

地说："我保证作好支援工作，配合你完成任务！"董存瑞也说："好！咱们密切配合，共同立功！"

最后，董存瑞还点了八班长张万才和九班的李振德、六班的孙永德和他一起组成爆破组。

没有点上将的刘祥回到班里噘起了嘴。董存瑞耐心地对他解释说："爆破是重要，但冲锋也重要哇！把班里的老兵全点上，咱们上月补的新兵谁带呀？"

刘祥望了董存瑞一眼，没吱声。董存瑞又说："点将后，咱们班就剩下你一个老兵了，你可要在这次战斗中起模范作用啊！"

刘祥被说服了。他搂住六班长哭了："班长，我不该生你的气，你不会把这放在心里吧？我保证：你们爆破到哪，我们班就冲到哪，决不给你丢脸！"

二十五日，天还没亮，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正式攻打隆化的信号。

隆化是承德的屏障，四周围，敌人修了坑道、堑壕和橡树林般的美式碉堡群。它背靠苔山，左边是隆化中学；苔山的火力控制着整个隆化，隆化中学又是敌防守隆化的核心。不拔掉这两颗钉子，隆化是拿不下来的。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震天动地的炮弹，把苔山的炮火全给压住了。在硝烟弥漫、烈火滚滚中，苔山顶峰的塔尖我们用两发炮弹将炮楼打掉了，也给轰秃了，大家高兴极了。白副连长看了看手表，忙命令："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准备好！"

二排长当即指挥机枪掩护。"爆破元帅"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带领全组象燕子似的飞速前进。一班长和支援组带着炸药、手榴弹跟在后面。

六连的任务是从学校东北角突破隆化中学。爆破组的任务是干掉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四个炮楼和五个碉堡。

敌人的机枪嗒嗒嗒地疯狂扫射，严密地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还没接近第一炮楼，爆破组的孙永德倒下了；董存瑞轻声喊："老孙！"孙永德没有答话。在接近炮楼时，张万才又牺牲了。四个炮楼和五个碉堡，一个也没搞掉，就牺牲了几个同志，怎不使人着急呢！突然，董存瑞用异常低沉的嗓子对我说："老郅，沉住气！……"说完就见他一跃而起，轻捷地朝烟雾中冲去，第一个炮楼顺利解决了。爆破声刚停，一班长就运上了第二包炸药和二十多个手榴弹。火力组一个劲地向敌人射击。突击组给爆破组开辟了道路。在各组紧密的配合下，董存瑞和李振德又一气炸掉了敌人的三个炮楼和五个碉堡，隆化中学东北角终于被打开了！刘祥带着六班冲在最前面，突击组、爆破组和支援组也随着部队冲了上去。

正在这时，学校外侧旱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地喷出几条火舌。冲在前面的小刘祥倒下了。董存瑞不顾一切，冒着弹雨奔到刘祥身边，将他抢救下来。小刘的呼吸已非常吃力，但还可以清楚地听到他喃喃地说：

"班长——六班——冲上来啦！那是桥——形碉堡，你——你——"话没说完就停止了呼吸。他的眼睛盯着董存瑞。董存瑞紧紧抱着刘祥的尸体，瞪着那座桥形碉堡，子弹嗖嗖地朝他打过来，他一动也不动。

部队被猛烈的火力阻拦，抬不起头。这时，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都是胜利。我猛地跳到副连长跟前大喊：

"副连长，我上去！……"

正在这时，董存瑞也窜了过来。他鼓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指着桥形碉堡上正在狂叫的敌人的机枪，怒吼似地说："副连长，我去炸掉它！"又转向我："郅顺义，你掩护我……"

指导员说："不！另外派个组去！"

董存瑞惊愕地问："怎么？"

"你们已经一连爆破了几个碉堡，该歇会了。"指导员严肃地说。

"不行，绝对不行！"董存瑞急得几乎是喊了起来，"指导员，我是同志们选的'爆破元帅'，隆化没有解放，我的爆破任务就没有完成！"

董存瑞的决心使指导员改了主意。他和副连长合计了一下，忙过来握着董存瑞的手说："好，这次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一定要炸掉它，给大部队扫除前进的障碍！"

"首长，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董存瑞一面说着，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递给指导员："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的一次党费！"

指导员接过小包，连连说："不，不，这不是最后的党费。大家都等着你胜利来回！"

董存瑞扭头对我说："郅顺义，如果我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继续炸掉它！"

"我死也要跟着你完成任务！"我表示。

敌人的机枪一个劲地叫着。董存瑞弯腰抱上炸药包，边走边向指导员一再重复着："指导员，放心吧，我一定炸掉它！"

在火力组的掩护下，董存瑞、一班长和我互相配合着向桥形碉堡扑去。我打一阵手榴弹，董存瑞就向前跃进几步，再打一阵，再跃进几步。一班长就源源不断地把手榴弹送到我的手里 。

桥形碉堡的火力更加疯狂了，子弹象急雨似的嗤嗤地从我们耳边飞过。快接近碉堡时，董存瑞指着一个土堆对我说："你就在那儿掩护。"我爬到那儿，愤愤地甩了几个手榴弹，把敌人的鹿砦、丛刺炸得稀烂。董存瑞借这机会一下子扑到了桥跟前。敌人慌了，更加疯狂地朝董存瑞射击，子弹噗哧噗哧地打得他身边的尘土直冒烟。我接连不断地扔出手榴弹，尽量减轻敌人对他的威胁。

董存瑞离我不过五十多米。我清楚地看见他沉着地爬起来，几步窜到桥底下，抱着炸药向四周环视了一圈，看来是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放炸药。可是真急死人：桥离地

一人多高，两旁是光滑的墙壁，顶上是平平的桥板。炸药放在平地不顶事，放到高处又没地方搁。……董存瑞还在转着身子四下里打量着，大概想找个什么东西做支架。可是那里光秃秃的，不用说木棒，就连根高梁秆也没有啊！……

突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我回头望望，部队正象潮水一样从侧后方向我们奔来。

就在这时，桥形碉堡上的砖头一块一块地被推开了，立时出现了六个暗藏的枪眼！子弹象暴雨一样，哗哗地向冲锋的部队射去。

董存瑞不动了。他抬头看了看桥顶，又扭头向后面望了一眼，略略愣了一霎，突然身子向左一靠，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形碉堡，右手猛地一下拉开了导火索。

导火索滋滋地冒出了白烟！

我惊呆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纵身一跳就朝他跟前奔去。只听见董存瑞厉声对我喝道："卧下！卧下！"紧接着又听到他高声地喊道："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

忽然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一团火花冲上半空，我嗡的一声昏了过去。……

在冲杀声中我惊醒过来，眼前的桥形碉堡没有了。冲锋的同志们正从我的身边急奔而过。我的心象被乱刀扎一样难受，一股热血冲击着我的头脑。我猛地从一班长手中接过他给存瑞同志送来的炸药包，一气冲到学校围墙根，"轰"地就炸开了一个口子。院内的敌人向我扔出了手榴弹，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拾起来就往回扔。在一连串的爆炸声后，围墙附近就再没有声响了。接着，我们连和全团的同志们踏着英雄的血迹冲进了隆化中学。

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二十六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隆化解放了。我敬爱的战友董存瑞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为了解救苦难的人民，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至今，只要我一合眼，就仿佛还能看见他纯朴的相貌，和他那挺着胸脯、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着导火索的英雄形象；听到他那"黑个洞洞天上……出呀么出星星……"的歌声，以及"卧下！卧下！""同志们，冲啊！——"的宏亮声音。

存瑞同志，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鼓舞着我不断前进！你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永远鼓舞着全中国人民胜利前进！

（郅顺义，《星火燎原》之九）

粟 裕

粟 裕（1907——1984） 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湖南同县人。1926年，在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读书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马日事变"后，受到湖南反动当局的通缉，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的教导队，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学员班长。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进军广东潮汕失败后，跟随朱德、陈毅转战于粤闽赣湘边地区。大余整编后任连指导员。1928年1月参加了湘南起义。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1929年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军参谋长和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选遣队，他协助军团长寻淮洲率部转战闽、浙、赣、皖，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同年11月，到达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方志敏领导的部队会合，继续在赣东北和皖南地区坚持斗争。1935年1月，选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利，率部突围到达赣东北组成挺进师，任师长，挺进浙南。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发动和依靠群众，适时地实现了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在卫岗首战告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士气和民心。此后，进行了小丹阳、横山、官陡门、秣陵关等数十次战斗，与陈毅领导的战斗在茅山地区的第一支队相呼应，威震江南。1939年11月，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副指挥。1940年7月，坚决执行东进北上抗日的方针，率主力渡江北上，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同年10月，与陈毅一起，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军区党委书记。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多次的"扫荡"和"清乡"，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坚持和巩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底，率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浙军区党委书记，出色地指挥了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巩固发展和开创了苏南、浙东和浙西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7月，国民党以优势兵力进攻苏中解放区，和谭震林一起，指挥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歼敌六个半旅，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次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任副司令员，辅助陈毅，指挥了莱芜战役。5月，参加指挥孟良崮战役，歼灭了素称蒋家王朝"铁军"的整编七十四师，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国人

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和陈毅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中原，协同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1948年5月，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6月，指挥了豫东战役，在中原野战军协同下，攻克开封。9月，指挥了济南战役，歼敌十万余人，攻克济南，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在淮海战役中，作为总前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了对这一战役的组织和领导，并取得了伟大胜利。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参加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杭州、上海。南京、上海解放后，他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长、军管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4年至1958年任总参谋长。1958年以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协助叶剑英创建军事科学院，为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分管交通、邮电和港口建设。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为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任务，走遍了全国主要港口，尽心竭力，作出了贡献。1980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

刘亚楼

刘亚楼(1910～1965)　福建武平人。原名刘振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家庭贫农。小学毕业后曾当教员。1929年8月参加闽西游击队，任排长。同年12月入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任班长。1930年3月在闽西红十二军任连长。5月任营长兼政治委员。6月部队编入红四军三纵队，任第八支队政治委员。同年10月支队改团，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1931年9月第十二师合并于第十一师，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委员。1933年3月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6月部队缩编，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治委员。8月任师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率第二师担任前卫，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取得重大胜利。1935年7月改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到陕北后，11月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抗日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抗日战争初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2年11月起在苏联红军作战部队实习。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军委空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5年5月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通晓俄文，主要译著有《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等。

罗瑞卿

罗瑞卿(1906——1978)　四川南充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初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由中共中央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军大队长，纵队、师和军的政治委员。1931年在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身负重伤，仍然继续指挥作战。红军长征途中，任一军团保卫局长。

1936年起，历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副校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材。1938年，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对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1940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代表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参与解放平津等许多重要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对林彪的极"左"一套作了坚决斗争。因此遭到林彪的残酷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任

中央军委顾问，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再次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78年8月3日因病逝世。

许光达

许光达（1908——1969）　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1925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攻读炮兵科。同年冬，随黄埔第五期迁武汉，编入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炮兵科学习，并任炮兵科党支部宣传委员。

四一二政变以后，武汉分校学生改为中央独立师，随叶挺讨伐夏斗寅。他随军出征，参加纸坊之役。7月，被分配到张发奎的第四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不久，随部队移防九江。八一南昌起义时，他偕炮兵营的六十七名党员赴南昌参加起义，因铁路中断，十多天之后，在宁都赶上起义后卫二十五师，他被编入该师七十五团十一连当排长。后因身负重伤，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1月底，他抱着找党的决心到达上海。后到安徽寿县，在县委领导下从事兵运活动。1928年秋回到故乡长沙，次年在芜湖找到党组织，继续从事兵运活动。7月，到上海在周恩来主持举办的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11月，到洪湖根据地向鄂西特委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的指示。1930年春节红六军成立，他先后任该军委参谋长和二纵队政委。7月贺龙率领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他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1931年3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部队缩编为七、八师，他先后任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和该师参谋长。1932年6月赴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边学习边治伤。1939年1月回到延安。不久，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6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移晋东南，留下的部分根据中央决定组成第三分校，他留任三分校校长。1941年1月，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1942年春，任一二〇师独立二旅旅长兼晋西北军区二分区司令员。1945年9月，任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并同吕正操司令员一起负责北线指挥部。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他先后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代理参谋长、三纵队司令员，率部保卫晋绥解放区。1947年8月，率三纵队主力西渡黄河，接应和掩护正在转移的中共中央机关，并先后两次参加榆林战役。1948年2月，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他背部负伤，带伤指挥攻城部队，于3月初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宜川守敌，宜瓦战役取得了全胜。4月，为掩西北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向胡宗南后方挺进，攻敌之要塞宝鸡，以调动延安、洛川守敌于运动中将其歼灭，他奉命率三纵队继续围攻洛川，迷惑敌人。当延安守敌弃城南逃时，他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在洛川以南一直追了三天，取得重大胜利。1949年6月，一野所属各军分编为第一、第二兵团，他任第二兵团司令员。

1950年5月，他奉命筹建装甲兵，6月被任命为装甲兵司令员。开始了装甲兵这一现代化兵种的建设工作。1951年初，他亲自组织坦克部队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并亲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为部队的发展和院校建设作出了贡献。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9年6月3日因病逝世。

许世友

许世友（1906～1985）　湖北麻城人。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八岁入少林寺习武八年。后入吴佩孚部队当兵。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任连长，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红十一、红一军排长、连长、营长。1931年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和进攻战役作战中，多次任敢死队队长，屡挫强敌，七次负伤。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在陕西漫川关指挥第三十四团勇猛拼杀，为全军打开通路。1933年7月部队扩编，任红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参加反“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5月率部参加长征。同年冬奉命南下川康边作战。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后率部北上到达甘肃会师。同年底入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又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病逝。著有《我在红军十年》、《我在山东十六年》。

王 耀 武

王耀武，山东省泰安市上王庄人。于190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其父与长兄早逝，在精明能干的慈母培养之下成人，他九岁入本村私塾念书，拜张宝亭先生为师，读的是《四书》、《五经》。他满以为熬得十年寒窗苦，即可成为"人上人"，但是恰是到了第十个年头上，即他十九岁那年，家境败落，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当时已是民国初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读私塾的学生已经不被人们重视，因此他认为在本地已无出路，就投亲到天津，在天津租界里一家烟草公司找到工作，充当干杂活的工人。污浊的工作环境，沉重的体力劳动，工头的蛮横霸道都大大出乎这个年轻人的意料，使他第一次体察到人间的痛楚。他强忍着把工作干好，但到了后来，由于烟草叶子异味的熏呛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天津，南下上海。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到马玉山糖果公司当了店员。在这里，虽然工作条件比在天津好，但还不是他的志向所在。因为他看清了当时的中国完全是军人的天下，但却没有一支能够捍卫国家的军队。尤其他看到上海租界中外国巡捕的蛮横无理，无视中国人的起码权利，从而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军人的念头。为了投考军校，他深知单靠过去念私塾学得的一点知识是十分不够的，于是他在日间干好工作后，夜晚上夜校补习数理化知识，还经常阅读报章杂志。由于他勤奋好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24年冬季，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他向老乡李丙炎借了路费，并取得了店东的儿子的帮助相偕前往广州投考，这年11月正式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引起师长何应钦、团长钱大钧的注意，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这是他后来扶摇直上的发轫。

1928年春，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徐州郊区整训，不久即参加对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阀部队进攻，于5月1日抵达济南。日本帝国主义者庇护张宗昌，出兵干预。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蒋介石不敢对付日本侵略军，下令绕道北进。当北伐军奉命撤离济南时，王耀武有意留在城垣配合李延年团死守济南。他在《自述》里写道："我当时十分不愿退出，我曾向上级坚请向日寇反击未准，气愤满胸膛，忍痛退出济南。"

1928年的所谓"北伐"很快结束了，接着又返回徐州郊区休整。1930年3月，他被军长刘峙保荐为独立第二团中校团附，不久即开赴河南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战事绵延达半年之久，由于他屡树战功，同年9月，刘峙即提升他为独立三十二旅第一团上校团长。这个旅的旅长是刘峙的侄子刘夷，王耀武上任团长之前，刘峙特意召见他，作了一番交代："我希望你多多帮助刘夷，把他的部队整训得和第一师那样具有战斗力。"王耀武心会神领，答应照办，上任之后，他精心训练部队，与士兵同甘共苦，他的第一团在三十二旅成为训练有素的部队，使刘夷对他刮目相看，因而在刘峙那里为他说了不少的好话。

1933年10月，王耀武的补充一旅暂归俞济时指挥，参加浙、赣、闽、皖边区对红军的作战，曾积极参与阻击北上抗日的方志敏红十军团与红七军团。1934年11月，王耀武率部在皖南谭家桥与红十军进行遭遇战，激战竟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此战役中牺牲，红二师师长胡天陶被俘。经过这次战斗，迫使红十军不得不重返赣东北根据地。1935年1月，因叛徒出卖，方志敏被国民党第四十三旅俘获，同年7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方志敏虽然不是王耀武所俘，但蒋介石认为，方志敏的主力部队是被王耀武的部队击溃的。因此，在1936年8月，王耀武被升为第五十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从汉中调往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当时他的心情激动，精神振奋，认为军人为国捐躯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为了打击侵略者，下定了宁死沙场不丢失一寸土地的决心。当时第五十一师接受的作战任务是，坚守在吴淞口附近的罗店为中心的阵地，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打破日军从川沙登陆经罗店直趋嘉定，并切断京沪线的企图，因此罗店的得失关系整个战局。日军以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优势，向罗店发动数次猛攻，均被第五十一师官兵击退。王耀武还巧妙地运用夜战，派出小部队夜袭，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长英森，受到总部通报表扬，上海数家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等均报导了第五十一师战绩，还刊登了王耀武的照片。战后王耀武由少将升中将，同时将第五十一师与第五十八师合编成立第七十四军，以俞济时为军长。此后第七十四军成为国民党军的劲旅，王耀武成为该军的一员主将。

是年12月初，王耀武率第五十一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地抵抗六天，终于寡不抵众而撤退。在撤退时按照唐生智的命令，第五十一师撤往江北的浦口镇一带。王耀武为防止部队混乱，在最后面维持秩序，但到了江岸已经无船过江、正在非常紧急之时，军长俞济时派副官带一只小火轮来接，才得以脱险。第五十一师官兵渡江到达浦口时仅存四千余人，损失过半，不久即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兵员。1938年5月，王耀武率部参加河南兰封战役与日寇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三义寨附近。重创敌军。同年7月，参加江西之万岭会战，协同其他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寇四千余人，取得万岭战役的胜利。

战后王耀武升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兼五十一师师长。

1939 年 6 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王耀武，对他任第五十一师师长期间的战绩大加赞许，并提升他为第七十四军军长。后来王耀武在《自述》里写道："那时我非常感激蒋先生对我的爱护，伯乐识马，蒋公识人，我下决心把七十四军整训好，使之成为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的部队。"

这年 9 月，王耀武率第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在这之前，日军依靠优势兵力包围高安，原先守卫高安的三十二军与敌人激战后，被迫撤退。9 月 19 日高安陷于敌手。由于该城战略地位重要，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要运用以攻为守的战术给敌以重大打击，收复高安。"于是罗卓英调第七十四军投入战场。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首先切断敌人之退路，以五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经过三天激战，于 9 月 22 日收复高安城。这一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为夺取整个会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1 年 9 月至 12 月，王耀武率第七十四军两次参加长沙会战，均获得出色战绩。接着参加了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1943 年 4 月，在参加鄂西战役中，王耀武率第七十四军经石门向湘北之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役结束后，他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同年 11 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日军以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十六天，常德全城已变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在弹尽粮绝，全师官兵死伤超过四分之一的情况下一度退出县城，但王耀武亲率第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六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这一战对整个战局影响甚大，深得蒋介石的赞赏。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召见他，备加奖励。1944 年 1 月，他被蒋介石提升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一〇〇军。

1945 年 1 月，国民党军事当局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与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王耀武奉命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9 月初，在长沙、衡阳、岳阳、常德举行隆重的授降仪式，昔日在湘西会战的对手日军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这时作为战败国的降将，毕恭毕敬地将战刀高高举起，双手呈献给中国军队指挥官王耀武。

1946 年 1 月，蒋介石为了加强山东地区的反人民力量，先后派出第五十四军、四十六军、七十三军开至胶济路，将原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由济南调为徐州绥靖区公署副主任，公布王耀武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管辖范围东至青岛，西至东平，南至大汶口，北至德州，司令部设在济南。并以王耀武担任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凌驾于山东省政府主席与国民党省党部主委以上，总揽山东地区党政军大权。这年 11 月，王耀武兼任山东省主席。

1947 年夏季，解放军转入全部进攻。在山东战场上，王耀武所指挥的部队不敷调用，捉襟见肘，十分被动，因此不断地被解放军分割歼灭。1948 年 3 月，胶济路上的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城镇先后解放，王耀武指挥的整编三十六师，交警总队、保安队等约三万人被歼。4 月 27 日，潍县解放，整编四十五师被歼。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胶济线上的国民党部队被消灭八万多人。王耀武感到形势紧张，济南兵员不足，难以固守，即于 5 月 15 日飞往南京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将现有部队撤至兖州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部队联成一片，但蒋介石又不同意，坚持一定要固守济南。7 月，解放军又解放了兖州、济宁，整编十二师师长霍守义被俘。这时山东省除济南、青岛、临沂三个据点外，其余都被解放军占领。

是年 9 月 16 日，华东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由于大军压境，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两万余官兵于 9 月 19 日举行战场起义，致使火车站、飞机场，以及济南商埠区很快被解放军占领。王耀武重新调整部署，固守内城，顽抗了八昼夜，终于无法抵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济南市于 9 月 24 日全被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企图东去青岛。但到了寿光县境内被当地民兵查获。

王耀武被俘后不久就进了战犯管教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解放战争初期被登报点名的战犯，其中有杜聿明、宋希濂、陈长捷、廖耀湘等。他们过去都认识，现被迫放下武器，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谈起这几年的经历时，像一场恶梦一样。

王耀武认为这个战犯管教所，实际上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学文化、学政治，有计划地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书，还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懂得了许多新鲜道理。由于王耀武认真好学，他被大家推举为学习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不久，即 1959 年 12 月 4 日，王耀武等被首批特赦。特赦后，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政协委员，聘任为文史资料专员。1968 年 7 月 3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陈布雷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浙江慈溪人，1890 年 12 月 26 日出生。早年从塾师读书，1906 年就读

于杭州浙江高等学校，开始关心时事政治。1911 年毕业后，在上海戴季陶主编的《天铎报》作记者。1912 年到 1920 年断续在浙江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 年赴上海，一度在商务印书馆参加《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工作。数月后重操新闻旧业，担任《商报》主编。此后 6 年，他与潘公展等人合作，使这家原先只是上海商界喉舌的一般报纸，发展成以时事政治文章而在学生和知识界中声誉日隆的著名报纸。当时，《商报》积极支持广东革命势力，1925 年孙中山逝世时，陈布雷曾亲自撰写专文在该报发表以志悼念。他文思敏捷擅长写作，下笔千言，倚马可待。1926 年，陈和潘公展一起赴江西南昌报道国民革命军情况。当时，蒋介石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欣赏陈的文笔，遂邀陈留下为他起草政治文件和宣言。由此陈加入了国民党。

1927 年春，陈布雷在张人杰任职的浙江省政府任秘书长和省府委员，另兼教育厅长之职。15 日赴南京，进入由胡汉民、丁惟汾、陈果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宁汉分裂时再度回沪担任《时事新报》主编，时达两年，其间亦两度随蒋到北平，为蒋起草政府文件。

1930 年，陈先是任浙江省委员，后又在南京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次年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1934 年又兼任浙江省教育委员。不久，辞职赴赣，成为蒋介石的随从人员，在南昌行营任职。次年，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厅主任，任期达十余年之久。1936 年，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当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因参与最高机要，事务繁忙，遂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之职。1937 年 5 月因病去职，到杭州休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再度到蒋介石身边参与机要。1938 年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继续为蒋介石大量起草文件、讲话和文稿。1939 年最高国防委员会开始统理军政大事，张群、王宠惠先后担任该机构秘书长，而陈则一直担任副秘书长一职，负责实际工作。抗战期间陈写过一些宣传抗战的文章，并于 1941 年与周恩来等共同联名作为向进步人士郭沫若祝寿的发起人。此外，他虽然时常周旋于高官显宦之间，但生活上一向不事奢华，耻于敛财，实属难能可贵。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带来和平发展的机会，陈亦为抗战期间自己起草文告参与机要所费之心计似将有所补偿而稍感欣慰。然而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内战再次爆发。反人民之内战不得人心，国民党军队很快节节败北，广大人民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的批评日益加剧，陈布雷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才能被浪费，对前途对个人均感失去了信心。1948 年 11 月 12 日夜间，他在南京官邸留下遗书后服大量安眠药谢世。一月后灵柩安葬于杭州市郊。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程　潜

程潜，字颂云，一级陆军上将，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担任过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等高级职务。1949 年 8 月，同陈明仁一道在长沙率部起义。

程潜，1882 年 3 月 31 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长连冲。程家世代以耕读为业。程潜父亲程若凤，母亲钟氏，生子女五人，程潜最小。幼时，家贫，父母经常告诫程潜兄弟，应以耕读继承祖业，借读书振起家声。

程潜九岁时，家境稍宽，父母亲即送他入塾，从同宗前辈寿峰先生受业，习读《四书》、《五经》。程潜资质聪敏，学业日进。十五岁时，有次乘船赴长沙应考院试，同船应试学子张某见他年少，即出"浏水同舟，偶合营台列宿"上联，要他属对。程潜即时作对"青云得路，高折桂林一枝"。同舟之人，齐声赞美。1896 年 11 月，改从湘潭赵璧先生受业，攻读经史子文。赵先生搏学多文，程潜经赵详加指点，进步很快。一年后，赋诗作文，都援笔立就。程潜从赵先生受业期间，认识了赵家聘请的教师朱存性。朱工诗词，善言谈，与程潜友谊甚笃。程潜受其影响，习作五古诗，终至一生酷爱五古，留下数百篇诗词。其诗古朴苍劲，雄健豪迈，以诗叙史，气魄宏大，曾被章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

1898 年夏，程潜再次赴省应试，考取秀才。翌年春，进长沙城南书院。1900 年 2 月，考取岳麓书院正课生。

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不断入侵，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这时程潜认识了一位讲陆王之学而又留心时事的学者曹毅亭，得知"戊戌政变"的真相以及发生政变的原因，开始关心时事，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大势日就危亡，非有一种大变革，不足以振起人心；救亡之道，必须废科举而兴学堂，爱国之心与日俱增，渐萌投笔从戎之志。"庚子之乱"后，程潜再也不能坐视列强肆行侵略中国，毅然决定不再习举业应科试，断然结束十余年中国经学及文学的生涯，弃文从武，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投考湖南武备学堂。1903 年春，程潜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湖南武备学堂录取。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军人生涯。

湖南督军汤芗铭，依附袁世凯，血腥镇压革命党人，滥杀无辜，人称"汤屠夫"。袁世凯实行帝制，汤极力附和，率先通电，上表劝进，遥称臣，被袁世凯封为靖武将军。程潜出兵湖南，欲以湘西为根据地，西与黔合，南同桂联，北出宝庆，把汤芗铭驱逐出湘。3 月 25 日，程潜率兵攻克靖县，建立护国政权，召集旧部，很快编就了三旅部队。程潜见湘南人民反袁驱汤的呼声越来越高，遂同参谋长林修

梅商议，于4月26日在靖县召开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程潜被四十八县的代表推举为护国军湘军总司令。4月28日，程潜宣誓就职，宣布湖南独立，誓师讨袁。5月3日，率部从靖县开拔，沿邵潭公路急速向长沙方向进军。5月22日，抵达湘西南重镇邵阳。程潜认为一举恢复全湘的时机大体成熟，就亲往衡阳见已率兵入湘的广西都督陆荣廷，争取陆的支持。5月下旬，程潜得到陆荣廷接济的军械后，挥兵直下湘乡。6月6日，他在湘乡电报局无意间截获北京电讯，得知袁世凯于当天暴死。程潜急返军中，集合部属报告消息。10日，程驰赴宁乡，令第二旅旅长周伟率部开到宁乡道林一线，将汤芗铭部围困在长、潭之间。这时，汤芗铭居然将部队改编为所谓"护国湖南第一军"，委曾继梧为军长，与程军对抗。15日，程潜驻湘潭布防，捕获汤芗铭派到湘潭暗杀程潜的密探，接着又捕获汤派遣暗杀陆荣廷的四名凶手。程潜急乘船赴衡阳拜访陆荣廷，面陈迅速驱汤，安定湘粤的利害。陆即拨炮兵营和四个步兵营归程潜指挥。程潜决心一雪"二次革命"失败的耻辱，于6月30日发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的通电。次日，率部由宁乡道林进迫长沙，在道林附近同汤芗铭所部"模范团"遭遇，一经接触，汤部即全体倒戈。汤芗铭闻讯后，于7月4日黄昏仓惶乘船逃离长沙。7月6日，程潜率部进入长沙，全湘底定。讨袁驱汤之役，程潜一时颇负盛名，被授予中将衔。

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程潜为大本营军政部长，负责筹划北伐大计。5月，陈炯明兵占博罗，直逼石龙。5月20日，中山先生调集南北两路军队于石龙，任程潜为东江讨逆总指挥，东征讨伐陈炯明，准备平定两广，再图北伐。程潜竭尽精诚，协助中山先生，屡立军功，深受中山先生赞赏。是年冬，程潜在广州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自兼校长，培养军事人才。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程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会议。

9月，中山先生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程潜随从出征。11月12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请北上，程潜奉命经略湘鄂，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著名共产党员林伯渠任政治部主任，配合北伐军攻打江西，进图湘南。次年1月，军驻马坎。6月，滇军军阀杨希闵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勾结，同桂军军阀刘震寰率部五万余人叛变，企图占据广州。程潜率部回师广州，同其他军队组成革命联军进军讨伐，又一次平定了叛军。

中山先生去世后，程潜继续拥护著名的"三大政策"。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程潜等十六人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8年1月2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三十多个师，数十万大军，驻节郑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

2月初，日军调集四个精锐师团，再次大举进攻，企图直下新乡平原，再转攻曲沃、临汾，来势凶猛。程潜严令各部坚守阵地，挫其锐气，伺机歼敌。2月8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在飞机掩护下，向宝莲寺程部守军阵地猛攻。程潜指挥守军奋力抗击，激战数日。不料，右翼宋哲元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日军侵入濮阳、长垣，又急转西进封邱，与沿平汉线南犯的主力相呼应，夹击宋哲元部。宋又放弃新乡，向西节节退守。程潜布置的防线被破，因此十分恼恨宋哲元。但见宋哲元部渐陷困境，日军指日可渡黄河南下时，于是断然调派部队策应宋哲元，派骑兵北渡黄河，向道清线以南、平汉线以东地区攻击，重创敌军，结果既解了宋哲元的危，又迫使日军不敢贸然渡河南犯。

6月5日，第一战区司令部移至洛阳，程潜再次拟定《作战指导纲要》，调遣各军沿平汉路组成左、右地区兵团，准备乘日军沿平汉路南犯之际，在许昌、确山之间将敌包围歼灭。由于日军于次日攻陷开封，兰封会战遂告结束。

开封一失，郑州危急，蒋介石下令利用黄河伏汛期，在郑州北面花园口决堤，造成平汉线以东地区泛滥，以遏止敌军西进。6月12日，黄河决堤后，程潜指挥部队予以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等地，于11月17日又收复河北大名。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战区，程潜改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战场。

1939年5月13日，程潜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程潜在西安期间，同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常往来，掩护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1940年5月，程潜调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继李济深之后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后又一度代理参谋总长之职，直至抗战胜利。

程潜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常去看望他，坦诚交谈。1945年8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程潜亲往桂园拜访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回访程潜，俩人作了长时间叙谈。

1946年5月，程潜改任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9月，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程潜仍任主席。

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在部属、幕僚的劝说下，决定竞选副总统，千方百计筹集了一亿万法币竞选经费，赶写出《程朱理学的研究》，以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刊印成册，又洗肖像千余张连同著述题名盖章赠送他人。第一轮投票，六名副总统候

选人中，以程潜、李宗仁、孙科得票最多。蒋介石即在幕后操纵为孙科拉选票。在第四轮投票中，程潜愤而放弃竞选，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长官，总部设在武汉。武汉行辕随之撤消，程潜于是年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程潜在离开南京回湖南之前，就已预先谋划，向国防部请准在湘成立五个陆军师。他一回湖南就抓紧扩充军队，编训新兵，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扩充编组了两个军共五个国防师，又将保安部队扩编为三个旅共九个团，掌握了近十万部队。同时将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集于一身。

此时程潜同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日渐加深。蒋介石企图利用程潜牵制桂系，在程潜身边安插了一批亲信分掌兵权，进行监视。白崇禧拥重兵驻武汉，则常常对程潜施加压力。程潜在夹缝中间，处境很难，何去何从，顾虑重重，是和是战，举棋不定。到九、十月间，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济南、辽沈等战役的胜利。程潜及其左右一部分人思想开始动摇，都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湖南一隅绝难自保，必须找一条出路。

同年12月，白崇禧发起"和谈"攻势，逼蒋介石下野，并派人串通程潜，一致行动。3月1日深夜，程潜请族弟程星龄密商。程星龄曾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拘禁在台湾，后经陈仪、程潜等人保释。程星龄见程潜相问，劝他借接受白的倡议，坚持和平到底，同共产党合作，并告诉程潜，自己已同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程潜便委托程星龄全权代表自己同中共地下党联系。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在程潜部属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主和主战两派争执相当激烈。程潜已决意走和平道路，乃大声呵斥主战分子欲上山打游击"真是寻死"。23日，程潜电告孙科，"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几条"可以全部接受"，并将电文在当时湖南《中央日报》发表。接着下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以后又相继释放了一批监禁已久的"政治犯"。但此时，程潜思想仍有疑虑。原因是自己的名字列入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四十三名战争罪犯之中，担心共产党与其算老账，和谈后仍作战犯对待。3月，程潜去南京，遇到章士钊，章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对程潜的期望，说明共产党不仅会不咎既往，而且会给以优待。程潜这才消除了一些顾虑。

程潜考虑，和平起义，必须有适当的人为自己执掌兵权，才能应付将来的局面，乃密召程星龄商议。程星龄建议设法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从武汉调到湖南来。陈系程潜醴陵同乡，又是他举办的大本营讲武学校的学生，因1947年6月在四平街之战立了"大功"，反被蒋介石削职，由此对蒋产生了不满。程潜即派同桂系关系密切的刘斐去汉口活动，获得了白崇禧的同意。

2月，陈明仁率第一兵团到湖南。不久，程潜约陈明仁密谈，坦率告诉陈，自己准备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陈考虑再三，默许同程潜暗中联系，共谋和平，表面上仍以反共面貌出现。

4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于21日晚渡江，23日占领南京。李宗仁要程潜全力支撑，对广州作有效外围防卫。程潜即会见了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的代表，表示争取和平的态度。

2日，陈明仁通知程潜速回长沙。他见时机已到，便密返长沙，住进长沙音乐专科学校。待白崇禧发觉，程潜已到达长沙多时了。他一到长沙，随即同陈明仁会晤，接着秘密会见解放军代表团代表李明灏，表示一定按中共方面的决策行事。8月1日，程潜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接着又和陈明仁同解放军代表就起义的一些重大问题进一步达成协议。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程潜在同时发表的《告湖南民众书》中说："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最早且久，做过他的讲武学校校长，做过他的军政部长。他的革命事业，我是亲见的！他的革命理论，我是亲闻的……"程潜这一革命行动，受到全国人民赞扬。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程潜、陈明仁及全体将士发出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8月31日，程潜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邀请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9月9日晚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到车站迎接。9月21日，参加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建国以后，程潜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珍闻轶事

毛泽东巧唱"空城计"三则电讯退敌兵

1948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

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

急电，北平地下党发来急电：蒋介石、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

情况十分严重。

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 600 余里，保定以北的铁路基本为敌人所控制，而保定距石家庄只有 300 余里。如果进犯之敌借助机械化运输工具和空中优势，不顾一切地突进，少则两日，多则三日，便可到达石家庄；而我野战军主力尚在数百里之外的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南面也至少需要四日。

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西柏坡在其毗邻，万一有失，对整个战局极为不利。

正在指挥辽沈战役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军委其它领导紧急磋商，在军事上作了严密的部署，同时实施了一项异乎寻常的破敌措施：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三则电讯。

10 月 25 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第一则电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电讯只有一二百字，揭露了敌人的偷袭阴谋，号召解放区民兵动员起来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

异乎寻常的举措收到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敌突袭副总指挥刘化南看到这则消息后，哀叹道：我们自以为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发，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堂，登在报上，只怕此举是"有去路，无回路"。

这真是：兵马尚未动，已被吓破胆。

为了进一步动摇军心，瓦解其斗志，10 月 27 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第二则电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这则消息更详细地公布了蒋傅匪军的偷袭计划，并一反常规，连自己的军事部署公之于众。

电讯说："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和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既是对我军民的动员，又是对敌人的威慑。

反动派对人民的力量总是估计不足。蒋介石、傅作义满以为这次会打得解放军措手不及，万没想到，我地方武装是很顶用的。他们的先头部队刚去保定南下，就遭到我地方部队有力的阻击，两天才走了几十里，到了唐河北岸就不能继续前进了。成千上万的民兵战斗组更是到处袭击敌骑兵，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伤透脑筋。

敌人领教了解放区军民的厉害，方知新华社的消息并不是吓唬人。敌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几次向傅作义发电告急：解放区军民防守甚严，此举"请钧座考虑"。敌刘副总指挥更因惧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已经急于班师了。

但蒋介石、傅作义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在做石家庄的梦，继续调兵遣将，向前推进。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第三则电讯：《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篇评论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 208 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点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伤。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敌军，此时是惶惶不可终日。就在播发第三则电讯的当天，敌军发现我第二兵团的先头三纵队经过艰苦的强行军，出现在完县附近，仓惶下令回窜老巢北平。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介石、傅作义这次突袭阴谋，非但无补于垂危的战局，反而损兵折将。

这真是：偷袭石家庄，一枕黄粱梦。

（刘明钢，《历史大观园》89 年 6 期）

朱总司令住破房

1948 年冬季的一天午饭过后，冀中区党委招待所的司务长白金泉，正在屋里算伙食帐，忽听有个炊事员喊他："白同志，林同志找你！"白金泉赶忙放下手里的算盘和帐本，正想往外走，就见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已经来到他的面前。林铁对他说："今天有中央首长要来北善（即尧阳县北善村，是当时冀中区党委的驻地）视察，大约在晚饭前赶到。你抓紧时间安排好食宿，作好接待的准备工

作。"说完转身要走，白金泉马上追上去问道："林书记，住房和伙食怎么安排？"林铁说："伙食按标准，至于住房问题，反正咱们招待所就是那几户民房，坐汽车来的就安排在好一点的房子，被褥要新的。骑马来的安排在一般房子，被褥不一定要新的，但一定要干净。"

掌灯时分，区党委领导对接待的准备工作作了检查后，便在机关食堂门前迎候。林铁对白金泉说，"小白同志，咱们招待所的住房很分散，你去村口迎接，把客人们先直接送到住处，然后我们再去看望。"白金泉听后，立刻和区党委秘书一起去村头迎接。

他们到村头等候的时间不长，就见一辆黑色的卧车迎面开来。他们迎上前去，按林铁的指示，把这几位坐车来的客人安排在座落村子中间的一所较好的房子里。

过了一会，又有十几位骑马来的客人相继进了村，白金泉逐个作了安排之后，顺便向其中的一位客人问了一句："首长是不是都到齐了？"那人回答说："还有三位，马上就到。"白金泉一听还有三位，就急忙赶到村头。过了一袋烟的功夫，果然又有三位骑马的客人来了。白金泉就把他们引到剩下的最后一处较差的住房里。刚安排好，区党委的领导都来看望，而且都对着其中一位年长的首长敬礼。白金泉借着灯光仔细一看，才认出是朱德总司令，不由得心里敲起了小鼓，顿时紧张起来。心想，这可糟了，给朱老总安排了一间最差的住房，怎么办？他急忙凑到林铁跟前想作解释。还没等他开口，林铁却先说话了："小白同志，你怎么把老总安排在这最差劲的屋子里？"白金泉委屈地低声说："老总没坐汽车，是骑马来的。"林铁一听，才想起这是他的指示。接着对白金泉说："这不怪你，我有责任，快给老总换一下房子吧！"朱德同志一听说要给他换房子，忙说："换啥子房哟，在这屋里睡觉，比我们长征时在雪山、草地上过夜舒服多罗，我住这房子很满意，不必再换了！"区党委的领导和坐车来的几位同志都请求朱德同志换一下住房，可不管大家怎么说，朱老总硬是不换，白金泉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林铁，林铁知道他很为难，便宽慰地说："听老总的吧，不换就算了。"白金泉对朱德同志说："老总，房子不换就算了，我去把被褥换一下吧！"朱德同志看了一下被褥说："这不是满干净的吗，还换啥子哟！你们不要为这些小事婆婆妈妈的了，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咕咕叫了，还是先开饭吧！"

白金泉领着首长们来到食堂，分三桌坐下，每桌四个菜，两荤两素，主食是小米干饭。朱老总刚想吃，发现自己跟前有一只烧鸡，再一看别的桌上没有，立刻把白金泉叫过来问道："小同志，这是给谁吃的？"白金泉说："这是专门到集上给你买的！"朱老总笑着说："刚才安排房子你没作错，这回你可犯了个错误，你让我吃鸡，不就超过伙食标准了？给你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把鸡拿走，明天退给人家吧！"区党委的领导都过来帮白金泉解围，劝朱德同志把鸡吃了，他不但不吃，反而假装生气地说："你们这是有意让我搞特殊，犯错误，我不吃你们的饭罗！"说着，起身要走。林铁一见劝说无效，便对白金泉说："还是听老总的，把鸡拿走吧！"这样，朱德同志才大口大口地吃起了饭菜。吃的是那样香甜……

（任廷山，《党史博采》92年12期）

五大书记集体熬夜

五大书记是指中央"七大"时选出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由于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办公，为了配合毛泽东的工作，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转战陕北时起也改为夜间办公。1948年9月会议以后，五大书记会合了，原来习惯在白天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也改为夜间办公了，集体夜间办公，研究、部署、指挥三大战役。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他们便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几乎每次都工作一通宵。每天熬夜，习惯早睡早起的朱德可坚持不住了，总要打盹，当朱老总睡醒来总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毛泽东便为他开脱。任弼时血压高，工作一紧张，就容易头晕，连续熬夜也支撑不住，便在躺椅上稍稍休息一下。五大书记中，最先累垮的便是任弼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病倒了。而毛泽东是最经得起熬夜的了，在五大书记中也是最后离开人世。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粟裕"两让司令"

1945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华中军区、新四军第1、第2、第4师合并，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由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粟裕考虑到张鼎丞的威望高、工作经验丰富，就向中央发电请求改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电称："我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将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后来，军委采纳了他的意见。1948年5月，毛泽东主席对粟裕说，陈毅有新的任务，由他接替陈毅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听后再三要求让陈毅留在华东工作，毛泽东不同意，粟裕又提议保留陈毅在三野的职务、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遂令粟裕代理三野司令员兼政委。

（摘自《人物》92年3期，作者：刘琳）

叶剑英南新城历险记

1948年农历8月，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正驻获鹿县南新城村。当时任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也住在该村。那时，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只有北平、太原等地还在敌手。盘踞在北平的傅作义经常派出飞机增援太原守敌。那些由北平飞往太原的敌机大多都飞经南新城村上空。所以，那里的人们对飞机的出现并不感到多么惊奇和害怕。

一天，正在干活的老乡们听到从东北方向又传来隆隆的马达声。继而，人们发现几架飞机全是五个头的轰炸机。这几架飞机飞到南新城村偏南方上空时还佯装西行。突然，为首的一架一个右转弯，直扑南新城村上空而来。后边的几架尾随而至。还没等人们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一枚枚重型炸弹已从飞机腹内纷纷落下。倾刻间，爆炸声响成一片。村内硝烟弥漫、墙倒屋塌、大树折断、鸡飞狗跳，血肉横飞。人们惊恐不已，四处躲藏，很多人被炸死炸伤，人畜尸体随处可见。一片呼儿叫娘嚎啕声、呻吟声。许多战士、学员受伤遇难。军校的一个警卫排在一棵树旁值勤，不幸被一重型炸弹击中，全部牺牲。

国民党飞机轰炸该村时，叶剑英正在马家大院里办公。警卫员劝他立即隐蔽，马上转移到安全处。他站在屋檐下，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镇定自若，并严肃地说："我怎能随便离开这里呢！如果我离开，对广大学员、群众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又怎能谈得上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呢！"正当大家为他的安全焦急万分的时候，一枚重500磅的炸弹突然落入院内，一头扎进地里头，惊得大家不知所措。这时，叶剑英依然站在屋檐下一动没动。万幸的是，这枚炸弹是一颗"臭"弹，落下后没有爆炸，叶剑英才幸免于难。

（选自《党史博采》90年7期，作者：戎学增）

仁者无敌——徐向前教育改造俘虏的故事

1947年6月，徐向前同志抱病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从这时开始，他连续组织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一系列歼灭战。这期间，军区野战军主力分别随刘邓和陈赓、谢富治到外线作战，指挥所首长也仅剩下徐总一人，作战、训练的任务十分繁重，但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特别是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充分体现出他的政策水平和宽阔胸怀。

进行临汾战役时，临汾守敌最高指挥官是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在徐总指挥我军夺取临汾城垣的战斗期间，梁培璜曾给蒋介石和阎锡山发通电，声言"誓与临城共存亡"。并在作战期间，制造和施放毒气，实为战犯。对梁培璜的倒行逆施，我攻城军民恨入骨髓。战士们编快板说："战犯梁培璜，年纪五十五，又高又瘦黑皮肤，外强中干纸老虎，高鼻梁，日本胡，河南口音要记住……"1948年5月17日，我军克城后，在俘虏收容处和敌尸堆里都找不到这个战犯。徐总下令严密搜索，封锁河道路口，不让梁培璜跑掉。原来，梁在我总攻城垣时，从西门仓皇逃出，他来不及脱衣脱鞋，就泅渡汾河。上岸后，正碰上搜索部队，吓得一头钻进麦田里，不敢动不动，因天冷衣湿，胆颤心惊，缩成一团。见到我搜索部队，他举着双手呼喊："不要打，不要打，我缴枪投降！"并连连哀求："请把我带到贵军指挥部吧，我就是梁培璜。"我军战士说："就凭你河南口音，日本胡，我们就知道你是梁培璜啦。"

一般的说，我们做情报侦察工作的，不放弃任何审询重要战俘的机会，特别是在作战间隙中，急需为下一个战役准备各种情报资料。可是，临汾战役结束后，梁培璜还没有送到指挥所以前，徐总就指示参谋人员不要随便找梁培璜谈话，以免谈话不慎，增加这位敌方总指挥的思想负担。只是在徐总自己召见梁培璜时叫我们也参加，注意满足我们业务部门的需要。

记得徐总第一次审询梁培璜时，梁的精神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又装得有些傲慢。当他从徐总浓重的山西口音又夹杂一些四川、湖北方言的问话里，意识到出现在面前的即是战胜他的对方总指挥徐向前总指挥时，竟下意识地霍然站起来，回话语结，手指都有些颤抖了。

徐总和蔼地说："坐下谈嘛，可以随便些。"

梁培璜回答却是："是，是，是，我叫梁培璜。"

我们在场的参谋人员忍不住要发笑，徐总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们立刻明白了，他不愿使梁培璜感到屈辱、尴尬或受到奚落。

徐总问梁培璜："你以为临汾孤城能够守得住吗？"

梁培璜低着头，有些局促地回答："是的。临汾是卧牛城，易守难攻，历史上还没有人能攻破它。"

徐总指出："未见得吧？1936年工农红军东征，可以说已经占领了临汾，只是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才放弃临汾，回师陕北的。"

梁培璜辩解说："那时城防薄弱。这次我以为贵军没有重武器，真想不到你们的'土飞机'（指坑道作业爆破）是这样厉害。"

徐总笑了起来，说：'你梁培璜不也挖了许多坑道，来破坏我们的坑道作业吗？"接着，徐总真诚地告诉他："坑道你我双方都在挖，厉害的不是坑道——'土飞机'，是人

民，是人心向背，是我们战士的英勇顽强。国民党和阎百川（阎锡山）要打内战，脱离人民，我看，这才是本质。”

梁培璜又站起来，连声说：“是！是！是！”

徐总扬扬手叫梁培璜坐下，说：“随便些，你也不必过分紧张。要懂得这些道理，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

梁培璜坐定后，徐总问道：“关于放毒的事，你谈一下吧。毒气是怎么制造的？阎锡山给你下放毒命令没有？”

梁培璜矢口否认放过毒气。

徐总立刻严厉起来：“这样说，你就不诚实了，我不希望你这样做。你顽固守城，作为敌军将领，我们可以理解。但你施放毒气，而且是你亲自召见临汾师范的化学教员以后，制造出毒气和硫磺燃烧弹的。你知道吗，你已经违背了战争中不得使用毒气的国际公约。尽管你可以不承认，但我们可以根据确凿的证据，惩办战争中制造和施放毒气的罪犯。”

梁培璜语结了许久，才吞吞吐吐地说：“因为这件事太严重了！阎锡山是同意过临汾使用毒气的。”

徐总马上鼓励说：“有了这个认识就很好！”接着又问：“你越过汾河，打算往哪里逃呢？”

梁答：“我估计去太原的路都堵死了，我计划往西安跑。”

徐总说：“路那么远，又都要经过解放区，到处是天罗地网，逃不了喽。”接着又问：’我们这里伙食不大好，还吃得惯吗？”

梁答：“我吃的比看管我的解放军战士的伙食好，我真诚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政策。”

徐总说：“先不必说感激的话，要先把情绪稳定下来，休息几天，我们再找时间谈。”

敌工部的同志把梁培璜带回住所后，徐总问参谋处长梁军：“梁培璜的家属找到没有？”

梁处长回答：“据三十七旅报告，梁培璜的家属已经安顿好了。”

徐总指示：“叫王诚汉（三十七旅旅长）派人把梁的家属送来，叫他们住在一起吧，过些天再往后方送。”

梁培璜从徐总那里回到住所以后，就分别给儿子梁保骥和亲戚写信。给儿子的信开头说：“我已到达解放军后方休息，解放军多方优待，刻下平安，不必悬念。其他至亲方面，亦可便中略告。”给亲戚的信开头大同小异，只是后面嘱咐把家中病人送医院治疗，并说，“按人民政府规定：被俘军官之家属，愿回家的回家，路费不够的帮助，无家可归的，安分当老百姓，不能生活的救济。所以病人住院后，也可由院方向临汾市代请救济”。

后来，在决定送梁培璜等高级战俘到河北省永年县学习时，徐总还请梁培璜等人吃了一顿便饭，勉励他们到后方好好学习，改造世界观，指出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们去做，寄希望于他们的学习收获。在谈话中，徐总是那样的关心他们，一再嘱咐：思想改造是个痛苦的过程，要否定自己的旧东西，接受新鲜事物，并不那么容易，既要有迫切感，争分夺秒，但也不要急于求成，容许思想上有反复。徐总还要他们在去解放区的路上，考察一下民情，听听农民斗争地主的诉苦会，看看支援前线的民工们的精神面貌。并勉励他们经过学习和改造后，将功补过，为打倒蒋介石、阎锡山的罪恶统治贡献才智。

在临送梁培璜到永年县时，徐总特别指示敌工部一定要清理好梁培璜的私人财物，带够换洗的衣服，带一些生活费用，以便他到了永年学习时手头宽裕些。

梁培璜到永年后，学习进步不慢。1948 年 6 月 20 日，他联合一起学习的阎锡山部队被俘的高级将领（其中有少将师长徐其昌、少将副师长汤嘉谟、中将司令刘光斗、中将副军长张翼等十多人）联名向晋绥军（阎锡山的部队自称晋绥军）的老长官、老同僚、老部下与全体官兵发通电，指出“人民必胜，阎蒋必败”。通电最后一段说：

“我等身受人民培养，不知怀德报本，反而助阎为恶，桑梓父老，蹂躏备至，滔天之罪，擢发难数。解放之后，深知今是而昨非，抚今思昔，惶愧莫名。然旧日袍泽，仍在沉迷不醒，倘不早为之图，一日大军临城，覆巢之下，必无完卵，每一念及，不禁惘然。受本身之教训，略贡区区，望能回心向善，当机立断，相信人民解放军必然一本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我等可为前车之鉴，勿再观望以自General。大势所趋，言出肺腑，何去何从，善为择之，临颖神驰。恭候勋祺！”

此通电全文，发表在 1948 年 7 月 10 日中共华北局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当天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出。当时，十八兵团的部队正在晋中榆次、太谷、祁县、清源地区打仗，无法及时看到《人民日报》。兵团政治部从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里抄收到梁培璜等人的通电。徐总看了通电很高兴，连连夸奖梁培璜、刘光斗等人学习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并指示政治机关翻印通电，向阎军官兵广泛散发。

1948 年六七月，徐总指挥了晋中战役，歼灭阎军 10 万余人，活捉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赵承绶是阎锡山手下的三个上将之一，也是徐总中学时代的同学。他被送到兵团指挥部后，徐总立即召见他。当赵承绶进屋时，徐总挪动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以老友相见的口吻问道：“萃崖（赵承绶的字）呀，你还认识我吗？”

赵承绶把头微微抬起来，看着徐总回答：“怎么不认识呢，是子敬（徐向前的字）吧？”

徐总说：“老同学了，你的眼力还不错嘛！分手这么多年，你还很壮实嘛！”

赵承绶说：“说来惭愧，还说什么壮实！”

"哈,还满有点'英雄'气概啊,是不是准备为蒋介石、阎锡山自杀呢? 我可以成全你!"

赵承绶嗫嚅着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感到对不起你。"

徐总说:"你看你胡扯些什么呢? 晋中决战双方死伤几万人,难道是我们老同学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吗?"

对赵承绶这样一个曾经与我军顽抗的战俘,这样以旧友情疏导谈心,只有博大襟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办到。徐总接着说:"萃崖,你为阎锡山卖命打了这么多年仗,到现在还认不清蒋介石、阎锡山这些人吗? 还想为他们去殉葬吗?现在过来了,我们欢迎你。过来就好嘛,什么惭愧呀,或者恐惧呀,懊悔呀,等等,一齐抛掉,学些为人民做好事的新本领。要知道,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赵承绶半信半疑,说:"我能吗?"

徐总说:"怎么不能呢?第一,到了后方,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你学习进步了,就会影响你的旧部;第二,太原城里有你一定的社会基础,熟人多,朋友也不少,协助我们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选择自己应当走的道路。你看,史泽波、李佩膺不是都回去了吗,梁培璜、刘光斗、张冀、徐其昌在后方学得不错,很有成绩,还发了一份致晋绥军官兵的通电,我看写得不错,你看到了吗?"

赵承绶回答说:"我看过。"

徐帅问:"有啥感想呢?"

赵承绶说:"我罪过比他们大啊!"

"罪恶大,怕我们杀你,对吧?! 那么好,我放你回去。你把阎锡山的精锐部队都丢光了,阎锡山正等着借你的头来惩办败军,推卸他指挥无能之责,来为他的晋中惨败消气呢。你决定吧,愿意用你的头去试试二喜子(阎锡山的乳名)的刀,我马上成全你。"

赵承绶急急地说:"我请求,不要把我送回去。"

"你这个糊涂虫啊! 糊涂一辈子了,现在该醒醒了!"

徐总就是这样耐心而亲切地疏导,赵承绶渐渐显得轻松和愉快起来。徐总把话题一转,说道:"老同学了,给我提些意见吧,谈谈我在指挥上的缺点、疏漏。"

赵承绶说:"败军之将,要能看出你指挥上的缺点、疏漏,还能走到这一步!"

徐总说:"你这一步走得好,再不要惭愧了,应当高兴。早地来比晚过来好,如果你还在那边打仗,我们战士的子弹,可就认不清你赵萃崖是我的老同学了!"

徐总以故友之情与赵承绶谈话一个多小时,再三勉励他安下心来,好好学习。临送赵回住所时,还说:"我等着你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请你回太原前线,聘你给我当参谋,咱们一起打太原。"

赵承绶不负徐总所望,太原战役开始不久,他就以"争取阎军工作小组"组长的身份带着阎锡山部队一批起义和被俘的将领,其中包括梁培璜等人,从石家庄来到太原前线,在徐总和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的教诲和指导下,积极开展争取和瓦解守城阎军的工作。除争取到阎军的一些营、连单位起义和投降外,还争取到防守东山的阎军第八总队司令赵瑞率部起义。徐总和胡耀邦主任曾多次请赵瑞吃饭,征询打太原和瓦解敌军工作的具体意见。

准备总攻太原时,徐总又多次听取赵承绶等人的意见。有一次。赵承绶对徐总说:"阎锡山把太原比作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为腹,南北两机场是臂膀,西山矿区是腿和脚。兵家攻太原,历来都是从东山这个头顶上起步,李自成如此,日本人也如此,最后取太原。这叫从头顶攻身子的战术。但现在阎锡山的头长得太长了,往东伸出30多华里,都是坚固设防的要塞和集团工事群。如果再从头顶上往肚子里攻,势必费时费力,不如大胆采取割头战术,掐住脖子,即从小窑头、淖马、山头和牛驼寨四大要塞一齐下手,置四大要塞以东于不顾。要塞以东是史泽波、李佩膺所部'雪耻师'和'雪耻团'的防地,史李二人受过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教育,对形势有所认识,对前途不能不自重,势必防守不坚,可以不必顾及。如四大要塞到手,太原孤城也就是囊中之物了!"最后,赵承绶还说:"夺取四大要塞,伤亡必很大,就怕我的建议是个孬主意。"

徐总激动地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怎么是个坏主意呢?这说明,你为打太原是费了心力的。"徐总听取赵承绶的意见后,先夺四大要塞的决心更大了。结果,我军攻打四大要塞之时,史泽波率部逃回太原城内,李佩膺则率部向我投城。从而使我军比较顺利地攻下四大要塞,为夺取太原城打开了大门。

总攻太原城的前一天,赵承绶还遵照徐总的嘱咐,进入敌人防区前沿,到阎军一个团部,亲自打电话给阎锡山的"绥署"副主任、上将城防司令王靖国,劝王走北平傅作义将军的路,绝路求生,献城起义。王靖国拒绝了赵承绶转达的我军对他的最后争取,但王劝赵不要进城,防遭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特务头子、"绥署"副主任,为人凶狠残暴)杀害。4月24日我军总攻太原城垣,仅用4个小时即夺取该城,结束了解放华北全境的最后一仗。

山西解放后,赵承绶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他忘不了当初在晋中战场上,在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对他那样温暖和朋友般的帮助。

在徐总身上,真正体现了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谋私利、不报私仇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博大襟怀。徐总关心敌方被俘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并大胆相信他们,使用他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正是这样,当年的顽敌,象梁培璜、赵承绶等人,终于得到改造和进步,成为新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和工作。

(选自《纵横》91年1期,作者:乔希章,都爱国)

肖克两唱“空城计”
——记保卫石家庄之战

解放战争时期，肖克将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唱空城计”，取得了保卫石家庄之战的胜利。

5月：一唱“空城计”

1948年5月，刚刚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市，各项工作正在蓬勃展开，给了华北解放区极大的支援，石家庄顿时便成了当时华北的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国民党当局对此恨之入骨，总想把石家庄市从人民手中夺回去。

一天，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得报，敌人要偷袭石家庄。据悉，偷袭部队是傅作义的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共3万余人，分乘汽车、坦克、装甲车等从北平、保定一带出发，直奔石家庄而来。山西的阎锡山也派了一个军的兵力约1万余人，直奔石家庄，以策应傅作义部队的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分进合击，两面夹攻，来势迅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敌军倚仗其机械化的优势，沿着冀中平原迅速向前推进。眼看三五天内就有可能进至石家庄一带，情况十分危急。

石家庄守城部队除了一个新兵补充团之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而新兵补充团的战斗力又很弱。石家庄附近也没有主力部队可供调遣，距离该市最近的孙毅所部，也得三四天之后方能赶到，且也仅三四千人，显然不足以抵抗几万人的机械化部队。另一支在山西应县一带的部队如欲赶来石家庄参加守城战斗，至少也要10天时间。

石家庄几乎是一座空城！军区首长们紧急磋商，还是拿不出万全之策。被指定为保卫石家庄的总指挥肖克更是心急如焚。他从1926年参军以来，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谓身经百战，什么场面都见过，可指挥这种没有部队的战役还是第一次。肖克决定先向毛泽东报告一下。毛泽东是半个月前从延安转移到阜平县陈南庄的，他们同住一排房子，平时常在一起交谈。毛泽东得知肖克要去保卫石家庄后，问道：“有顾虑吗？”“有。”肖克简要汇报了一下情况，心情沉重地说：“石家庄是华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十几万人口的大城市，若丢在我的手里，不好向党交待。”“不能这么想。”毛泽东微笑着说：“石家庄是我们从敌人手里拿来的，如果丢了，以后我们再从敌人手里把它拿回来就是了。”肖克一听如释重负，激动地说：“主席，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保住石家庄，坚决做到不受损失。”

当天晚上，肖克一行乘卡车抵达石家庄。这时，市内已风声四起，人心惶惶。肖克立即召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布置守城战斗和疏散资材工作。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局、军区首长聂荣臻的指示，然后部署方案。他说：“我们的先人曾经演过空城计，不管是真是假，诸葛亮成功了。我们今天也要演一出空城计，动员大家把重要的物资和设备搬出去，把石家庄先变成一座空城。”接着他又说：“这只是从最坏处着想。诸葛亮守城，只几个老兵，几个侍童，如果这是真的，那太冒险了，我们今天不能这么干。先把东西搬走，是作最坏的打算，但我们守城战斗还要靠实力去打。现在，沿途的民兵、游击队已经动员起来了，他们打地雷战、地道战很有经验，可以阻滞敌人，争取时间，主力部队也正在昼夜兼程，很快就会赶到石家庄。所以，我们的空城计是积极的、稳妥的，也一定能够胜利。”说到激动处，肖克把军帽摘下来，用力往桌子上一摔，坚定地说：“此次战斗，我负总责。所有党政军民都要服从命令。现在我来分工。”

肖克先安排阻滞敌人的工作。他以军区副司令以及武装部长的名义，下令沿途各区县的民兵游击队立即开赴指定地点，命令冀中部队3天之内赶到石家庄，指示第六纵队火速南下。然后，开始物资疏散的准备工作。肖克把所有物资分成五等，要求依次搬迁，5天之内搬完。他反复强调，搬东西一定要按分等级后的规定搬。先搬重要的，如银行、兵工机器、弹药、粮食、被服等，至于办公用具则放在后面搬。”无论是谁，必须严格执行命令，违者依法论处。”

次日，天刚放亮，石家庄就开始喧闹起来，许多人赶着大车，推着小车，坐着汽车，在大街小巷紧张而有序地搬运东西。市民们见状便惊慌失措，于是谣言四起，全城一片慌乱。肖克便亲自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以稳定民心。这下市民们放心了：“守城的司令是肖克，肯定输不了！”可警卫人员却不放心肖克的安全，对此，肖克坦然一笑，说：“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连个警卫都没有，我还有你们警卫，怕什么?!”

肖克一方面注意安定民心，一方面指挥阻击敌人。傅作义的部队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这时，冀中的孙毅部赶到了，我军士气大振。北面的文年生、向仲华部兼程南下时，发现阎锡山的部队正在运动，就电告肖克，同时请示打还是不打。肖克立即回电：“敌人送来的运动战，立即迎击。”第六纵队得令，围攻了阎锡山的四十九师，活捉了中将师长张冀，并很快进至正定。

傅作义得知石家庄已有准备，策应部队四十九师被消灭，他的部队沿途被我阻击，进展缓慢，只得在唐河一带徘徊，望石家庄而兴叹。

肖克将军的第一个“空城计”成功了。

10月：二唱“空城计”

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军正在围攻太原。傅作义想

到了"围魏救赵"之计，便再次提出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倘能乘虚而入，直取石家庄，那将直接威胁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的安全，围攻太原的解放军势必出师援石，这样便可解太原之危。然而，傅作义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破产了，因为肖克将军再次导演了保卫石家庄的"空城计"。

这次偷袭的是九十四军、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等部队。敌人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及其他建筑物，把我华北解放区最早的工业、交通基地彻底毁坏，以缓和太原前线我解放军对阎锡山的围攻。1948年10月24日，敌军由涿县出发，尽管沿线铁路、公路均被我民兵破坏殆尽，但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沿着农用土路仍在向前推进。

肖克再次出任保卫石家庄的总指挥。他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方人多势众，我方人少，只有华北军校的一个教导团，战斗力虽强但人数太少，只有几千人，硬拚肯定要吃亏，因此只能智胜。他先在石家庄市建立了备战指挥部，分设经济、宣传、战争动员、武装治安等各部、市区各机关团体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全市军政人员和人民一道投入斗争。组织落实后，肖克同上次一样把物资分成五等，逐次疏散。在疏散期间，狠抓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内部的敌特分子。对那些散布谣言、抬高物价的不法分子进行有力打击。

石家庄市内又一次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备战工作。肖克迅速指挥地方部队和民兵在沿线阻击敌人，阻滞敌人的进攻速度。

与此同时，肖克又利用我军控制的敌人电台，开展谍报战，配合军事行动。早在1946年，我军打入敌军统特务内部的几名同志便已取得了敌人的信任。石家庄解放后，他们掌握了电台，敌人在平、津、保、太的活动部署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傅作义偷袭石家庄之前就曾来电，指示他们提供石家庄的军政设防情报。于是，肖克与军事指挥部门商定，由市公安局同志与电台人员一起研究后向敌人提供了假情报。电报说：石家庄不是空城，刚从大军区调来五个师，已在石家庄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新乐县的沙河一带，第二道正定北新安村车站一带，第三道是滹沱河，共计5万名解放军，另外还有近两万名民兵，准备在滹沱河与国军决一死战。

傅作义收到这绘声绘色的情报，将信疑疑，便按兵不动，先派一部分骑兵南下。从保定出发的骑兵部队，不久便在望都以南的唐河遭到我军的阻击。傅作义听说其先头轻骑遭受伏击，就确信我石家庄解放军已有准备，便迅速撤兵了。其实这支阻击部队并不是正规军，而是肖克指挥的沿线民兵和华北军校的一个教导团。

除此之外，毛泽东对敌人偷袭阴谋的公开揭露也对肖克第二次"空城计"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于1948年10月27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消息中还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意图，以及出发日期和盘托出，明确指出"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消息中还谈到"今年5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还指出，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怕敌人的偷袭。

10月30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述评分析了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背景内幕及其兵力部署，指出了其必然归宿；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傅作义闻讯大惊，急忙收兵，放弃了第二次偷袭石家庄的计划。

至此，肖克将军的第二次"空城计"又大功告成。

（摘自《党史纵横》95年4期，作者：潘银良）

十 人 桥

堰头镇（宿迁西北八十里）西一条大河湍急的流着，河岸上敌人的照明柴在熊熊燃烧。三丈多宽的水面上排列着十顶"钢盔"，中间夹着一座不整齐的木桥，桥上在迅速的通过着解放军进攻河东蒋匪的部队。

这是一条由人的身体支撑的大桥，是九纵"潍县团"二连三班的勇士们的创造。

潍县团经过近百里的长途追击，到达堰头镇近郊时，这条急流的大河，挡住了追路。被包围在堰头镇一带的是蒋匪黄伯韬兵团六十三军一五二师的部队，二连受命向堰头镇发起攻击。

在匪军拚命的射击封锁下，连长命令三班坚决完成架桥任务。带病参战的三班马班长受命后，立即率领战士潘福全、杨玉艾跳下急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用两架木梯架起一座不稳固的浮桥。但敌人的火力继续绵密的封锁着，在这紧急关头，一排第二排副范学福号召道："没有桥腿，我们当桥腿。""行！"一排的勇士们一致响应，并迅速跳下急流。战士潘福全、杨玉艾看见用臂膀抬桥太高了，就一腿跪在水里，一腿支桥。战士孙树赞一看梯子不平，就用双手把梯子抬平。范排长和战士宗协国立在水的最深处抬桥，一座人架的大桥成功了，他们便向岸边突击队员喊着："大胆过吧，同志们！过吧！我们保险！"

进攻部队一、二、三机枪连，迅速依次的通过着。有的战士滑倒在架桥同志的头上；他们就用力用头顶住，让他

爬起来。不知是谁踩住宗协国的脖子，他就硬挺着脖子，使那个战友安全通过。三连的战士鲁玉柴掉在河里，宗协国就告知范排副一个人抬着两个桥头，他去救起鲁玉柴。战士孙克潘一面抬桥，一面还用一只手不断拉着掉在水里的同志。十一月的寒流，浸冷他们的肉、骨，随着时间的延长，架桥勇士们的牙齿咯咯作响，桥身不住的颤抖着，桥板也渐渐低下来。共产党员宗协国便向大家动员："闭住嘴，咬紧牙，挺起腰来完成任务。"范排副也号召大家抖起精神来，叫全营通过！宗协国同志响亮地唱起他最爱唱的"野战军什么也不怕，艰苦和困难吓不倒咱……不怕水深来到腰，再深再大，抗得了……。"歌声鼓舞了全班的勇士，"打起精神坚决完成任务"的口号声不断的从水面上传来，当一连战士陈光华通过大桥时，发现和他一起升级的战士潘福全在水里撑桥，"怎么样？老潘！"潘福全立即辨别出小陈的声音，便回答道："使劲抬呀，咱们挑战竞赛。"

全营踏着三班人架的大桥胜利跨上对岸，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堰头镇的敌人。战后指战员都赞扬："三班的桥是通向胜利的桥！"(黎明)

（载第三野战军政治部1949年出版的《淮海大战》）

鸡毛信

从上村转下来一封信，插两根鸡毛，皮皮上写着："万万火急。"村长把信交给双虎，说："小青年团，快把这信送给游击队去。"双虎问："游击队在哪里？"村长悄悄说："到梢山刘家茆打问去，那里有人和你说。"双虎接过来，拿了拦羊铲，怀里揣了两个"窝窝"，一股劲去了。

从村子到梢山，三十里路，要过一条大川，走十五里长的沟，还要翻两架山。

双虎十六岁，看去也不过十四岁。个子低，心眼活，眨眼就有办法。他出了村子，便一边走，一边哼起小曲子来：

上好了刺刀拉开了栓，

梢林里好打游击战。

……

越唱越高兴，越走越有劲，不觉到了大川。这里离敌人的据点不到十里路。双虎向左右望了一下，又摸摸怀里的信，顺着一条水渠，一口气跑过去。刚要转进一条岔沟，忽听得有哈哈的笑声和咯咯的鸡叫声，从岔沟里传出来。双虎吃了一惊，心想："不好！怕是敌人。"赶忙用拦羊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鸡毛信放进去，用土埋起来，在上面拉了一堆屎。正在束裤带，四个蒋匪提着两只鸡，几个包袱，到了双虎面前。明晃晃的刺刀指着双虎，问："干啥的？"双虎不慌不忙地说："拦羊的。"蒋匪大喝道："妈的屁！拦羊的不赶羊，不是探消息就是送信的，手举起来。"走过来，把双虎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另一个就在草林林里，石头底下，遍地寻找，还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就说："球！把他带回连部去！"

双虎被带进据点，交到连部。匪军连长问了问，就不耐烦的对他的司务长说："去！送他到灶房去，先住几天。"双虎说："官长，我才十四咧，不能做……"连长摆一摆手："去！去！"就把他赶出来了。

司务长把双虎带到灶房里，扔给他一件破黄衣，要他套在身上，就走了。双虎坐在灶火跟前，想到那封鸡毛信，还没有到游击队手里，不知要误多少事，心里真着急。

第二天清早，伙夫叫他去担水，又给他一小筐豆芽子，说："把这洗一下。"双虎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回可以逃跑了，可是伙夫接着说："村里有水池子，可不准到村外去！"

双虎去担水，向村外边望了望，有哨兵站着岗。他慢慢的担了两担水，忽然想出了办法，就赶忙把水担放在池边，把豆芽子往池子里一倒，提着空筐筐往村外去了。站岗的问："干啥的？"双虎大模大样的说："你问干啥给连长拔青菜去！"哨兵再没问二句话，双虎一直向河湾去了。

到了河渠，双虎把筐筐一撂，黄衣服脱下来，急忙挖出鸡毛信，就一直往梢山跑去。

跑上山，双虎刚坐下休息，听得身后枪栓"哗啦"一响，接着有人喊："不准动！"双虎吓了一跳，心想："这一下坏啦！"可是回头一看，却是游击队上的杜狗娃，双虎高兴地跳起来，把手里的鸡毛信举起，说："快收鸡毛信。"(汤洛)

（载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晋绥日报》）

第一批人民币诞生记

1948年12月1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发行了第一套第一批人民币——伍拾元券、贰拾元券、壹拾元券三种票币，从此，新中国本位货币在神州大地诞生了。其中伍拾元券人民币第1号(Ⅰ Ⅱ Ⅲ——00000001)被直接发行票币的石雷科长收存。当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在石家庄花园饭店设了一桌便宴，以示热烈庆祝这一特大喜讯。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布新闻，全国人民欣喜雀跃，欢呼人民币的诞生。

筹备印制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迅速扩大。8月1日，主持财经工作的董必武提出筹建中央银行，接着前线部队也纷纷建议立即成立统一的银行。

于是董老又于10月2日正式向中央建议:"可用中国人民银行名称"印刷解放区通用钞票。不久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6人筹备处,调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科长石雷负责有关钞票的印制准备和发行工作。

1948年春,为加速人民币的印制,首先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王益久和深乃庸负责设计票版。起初设计的票币版式有毛泽东主席头像,呈请中央审阅时,毛泽东回电说: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头像印上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重新设计新版人民币时,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石雷又再次向行长南汉宸建议,在人民币上印上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南回答说:"我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曾就此事当面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又强调说:'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要遵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得在人民币上印我的像,也不准印天安门城楼票币中有我的像。'")于是在重新设计时,改为反映工农群众生产建设的图案。

在文字文面,南汉宸请董老为中国人民银行票币题字,董老很高兴地接受了请求,他在一整张纸上横竖写了楷书"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圆角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等字。写毕送往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制版印刷。为增加印钞力量,5月又请佳木斯的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一部分,考虑到防止意外,新印的人民币不切开,不加印号码签章。印好后,由大连经烟台运往石家庄印刷三厂加工成品。到11月底,新人民币印好了6马车。

提前发行

中央原定计划是在1949年1月1日元旦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行人民币,兑换旧币。鉴于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胜利在即,如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顺利进行,东北野战军进关,平津解放在即等,而新解放区货币繁多,比价不一,不仅影响野战军作战、商民往来,也影响市场稳定。为繁荣经济,支援战争,及早统一货币迫在眉睫。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鉴于当时市场上有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陕甘宁流通券、东北币、长城币、内蒙银行币等8种票子和6种比价,容易发生混乱和影响金融,委员们有的提出新人民币"要快点发,要在平津解放前发行,愈快愈好";有的说"市面需要统一和大额票子"。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在已刻不容缓,应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商各区,一面加速准备。

布告周知

华北人民政府根据政务会议精神,1948年12月1日发出了《关于发行新币的布告》。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的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新旧币比价规定如下:新币对冀币、北海币均为1∶100,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1元等于冀南银行钞票或北海银行钞票100元。新币对边币为1∶1000,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1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1000元。新币对西农币为1∶2000,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1元等于西北农业银行钞票2000元。上述规定,望我军民人等一体遵行。"

人民币是用棉花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不兑现的纸币,不规定含金量,而以税收、国家的商品、物资等为发行货币的后盾,使人民币与黄金脱钩,以保持人民币的稳定。人民币的符号是"¥",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不准携带出国。

发行盛况

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年新华社石家庄分社、石家庄日报记者夏景凡同志,兴致勃勃奉命走上街头写了通讯,题目是《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这篇报道刊登在当时《人民日报》上,现摘录几段,让读者感受一下当年发行人民币时的情景吧!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发行的新币,今天头一天和石家庄的人民见面,新币象征着全国胜利为期不远,大家都兴奋异常。"

"街上的布告栏、阅报栏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像看一个很大的胜利消息一样都露出一幅欣慰的表情。"

"街头巷尾的人们一见面就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带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

"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提款的都要求搭配一部分新币,人们有着一种先睹

为快的心情。一个提款的商人，当他拿到新币时，看了又看，最后把它包在手巾里往腰里一装，拍着口袋说：'看这多方便'。"

"这一天，分行显得异常热闹，要求看样的，先换样子的，提款要求搭配一部分的，营业员们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第一次拿到新币时，总是反复地凝视着。记者问他们有什么感想。一个穿工人装的指着刚拿到手的两张新币说：'我看不久就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国人民政府了。'"

夏景凡同志现已离休，正在忙于著书立说，他回忆说："当时中央对金融的管理工作是十分慎重的。银行每天投放多少货币，回笼多少，存多少流动资金以及物价行情，每天都造出详细表格。这表格当然是绝密的，它是指导经济工作的重要依据，当时城市经济工作经验不足，在石家庄市创造的经验，要向全国推广。"

历史意义

人民币的发行，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带着银行进城，带着人民币进城，从而加速了结束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的经济混乱局面，安定了人民生活，恢复了社会生产。二是中国人民银行有了国家货币的发行权，从此人民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发行货币。三是实行了全国货币大统一，建立了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在我国货币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党史博采》94年12期，作者：冯都）

棺材里的秘密
——摧毁军统保密局沈阳潜伏台纪实

1948年冬，沈阳刚刚解放。

一天深夜，沈阳特别市第一任公安局长何侠，收到一份刚送来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急件："何侠、历男同志：顷接我部政治保卫局一号临测台报告，今日下午1至5时共截获3份使用特殊频率的呼号，从本市发往北平、南京方面的密电。经破译，事关我入城部队番号和参加本市人民政府民主人士名单等重要情报，据悉，本市极可能潜伏有一庞大的敌特谍报组织，现派员协同工作，望早日破案为要！　汪金祥　1948年11月4日"。另附一敌特电稿："南京金镇边兄钧鉴，伸皓末人44号电悉，所令关于辽沈一战中叛降军官名单，经工作已初获成果，容待后告。惟刘台长城陷后下落不明，下步如何行动请上峰速示QSY。"

何侠睿智的目光落在电文末尾的代号上，片刻，迅速拨通了电话。

1

清晨，天刚放亮，路上行人稀少。治安处长马敬铮，这位身经百战的反间斗士，正急匆匆朝局里走去，昨夜局长的电话仍在脑际回荡，彻夜未眠地在思考智斗"猎物"的方案。

审讯室内，由武装战士押进一个刚从辽阳城防部队移交的军统保密局特务，此人肩宽背厚、满脸酒刺、一双金鱼眼，厚嘴唇还向下斜着，露出桀骜不驯的怪相。马处长命令道："把你的姓名、履历讲一遍！""我叫李冠群，辽阳人，是技术员。在保密局曾做过点事务工作。""你的职务是什么？""我已经说过了，是技术员，干点事务工作。"他拽了一下衣襟，又摸下头发，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上尉李冠群！""啊！"马处长这不高却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声音犹如一把利剑直刺特务的五脏六腑。李为了掩饰失态的神色："长官，我不明白……""你这个潜伏组长挺会做戏啊！"李冠群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这场戏还打算演下去吗？"特务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哭丧着脸："不，不，长官，我讲、我讲。我是保密局沈阳站电讯支台上尉组长，临遣散前被任命为潜伏1台台长，奉命在沈阳潜伏，待机而动。贵军入城后，风声太紧，我害怕查出就跑回老家辽阳。""你们电台设在哪？""我埋在城里小西关我岳父家，从贵军入城后，我从没敢使用过。""谁布置你的潜伏任务？""报告长官，是支台长刘殿庚。10月30日，他单独布置后发了活动经费。""一共布置了几个潜伏台？""我不清楚，都是刘殿庚亲自布置的。按保密局的规矩，我们是单线领导，不许有横的联系。领导我的是刘，可至今没见到他，可能逃往关里了。""找不到刘，你怎么和上司联系？""刘给了我与保密局北平支台的通报密码、呼号和频率，并规定了时间，如有紧急情况，找不到他就直接和北平或转南京总台电示。""电台代号？"QSB。"

押走特务，在其岳父家地窖里起出一部美式电台，但"刘台长"在哪呢儿？

2

5天过去了，侦察员们正为近日敌台又不断闪现电波鬼火，加紧追踪"刘台长"之时，突接电话报告："在北市场刚捕获一名军统特务，叫赵贵斌。经初审供出前几天在沈阳见过刘殿庚，刘曾约他一起进关未果，据知刘在沈有个独身的远方姑妈。"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马敬铮即令："速与各分局联系，对全市单身老太婆逐一进行排查，

扩大线索。同时对赵要继续深入审讯。"很快，接大东分局报告："刘殿庚极可能隐藏在我区草仓路 15 号单身的张王氏家中。"

大东区草仓路，没有路灯，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在一片低矮平房尽头，侦察员们迅速摸到 15 号。敲开房门，一白发老妇人眨着惺松睡眼惊讶地望着，大家一拥而进，室内无人。"你侄刘殿庚呢？""不对，我侄子叫刘去疾。他、他走好久了，大概是去同善堂那找白小姐了吧。"显然老妇人还不清楚刘的真实身份。侦察员们随即至沈河的同善堂助产职校，经看门人引领在大西街后胡同一小阁楼内，将军统保密局沈阳站支台长刘殿庚及潜伏 2 台台长白冰茹，从被窝里捕获。他们为了排遣恐惧与寂寞，不顾保密局特工秘令，经常在一起鬼混。当场还起出一部电台。

审讯中，刘极为顽固、狡猾、耍死狗，在大量罪证面前，才被迫交代。原来，沈阳解放前夕，该组织奉毛人凤电示部置潜伏，刘奉命分别部署 4 个潜伏台和 2 个预备台。除已破获的 1、2 台外，又逮捕了 3、4 台长，缴获电台 2 部。2 个预备台，由心腹中校组员赵贵斌藏匿在棺材里了。

3

特务赵贵斌妄图蒙混过关。马敬铮决定突然提审他。"你看蒋介石还能维持多久？""长不了，共，不，是贵军，势、势如破竹。"声音有些发颤，"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做，做人……""你是想在人间做人呢，还是想到坟墓里做人？""坟墓？什么坟？""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马敬铮猛地站起，走到赵跟前直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啊，棺材……""棺材里有电台！"随着一声电闪雷鸣，他扑通跪倒在地，哭泣着"我、我交待，沈阳解放前夕刘殿庚给我 200 元钱，要我买回棺材，将 2 部电台及电池器材都放里面，找地方埋起来。后因沈阳吃紧，慌乱中我花 50 元买口小棺材，装上东西，拉到保安寺寄存起来了。"

保安寺是个寄骨寺，位于长沼湖畔（即南湖，寺已拆除）。昔日庙宇辉煌，几经战乱只剩断壁残垣，破败不堪。马敬铮率侦察员走进停放棺材的侧殿内，6 间房杂乱排放着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数十口棺材。殿内阴气森森，笼罩着一片恐怖，按所知之特征，先后起开 5 口，皆无电台。此时，一阵阵难闻的尸体腐臭味熏得喘不过气。查到第 5 间一口小棺材时，马敬铮对其四周敲打一阵，又与同伴抬起掂掂，坚定地说："起开它！"棺盖打开，有一床捆得结实的破棉被，里面露出 2 部崭新的美式电台及特工器材。

棺材里的秘密被揭开后，又深挖出一个独立台，正当这个"万能报务员台长"、"17 岁"学生"的赵爽在阴暗角落里给南京"军统教父"毛人凤发报时，被当场捕获，敌台还在不断地呼叫着。至此，毛人凤亲自部署的保密局沈阳站的 4 个潜伏台、2 个预备台、1 个独立台(QSY)的所谓"一元二套三层制"潜伏计划被彻底摧毁。

（《党史纵横》95 年 10 期，作者：齐守成）

淮海战役中的毒气战

淮海战役是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决战。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曾不顾国际公法制约，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妄图以惨绝人寰的毒气战来挽救其垂死的命运。

1948 年 12 月 5 日，淮海前线总前委向参加总攻的各部队下达《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12 月 6 日下午 4 时 30 分，人民解放军向困守在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双堆集地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黄维兵团危在旦夕。

国民党狗急跳墙，决定使用毒气。因使用毒气是违犯国际公法的，将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所以整个放毒过程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黄维兵团 12 万部队中只有少数高级将领知道（兵团正副司令官黄维、胡琏、正副参谋长、第三处处长、各军军长），军以下军官皆蒙在鼓里。

12 月 10 日，国民党空军空投 300 多份详细说明书，说明甲弹（糜烂性毒瓦斯炸弹的代号）和乙弹（窒息性毒瓦斯弹的代号）的性能、使用、防护和注意事项，并规定了地空日夜各种联络和地面各种标示办法。油印的 300 多份详细说明书全部由黄维亲自保管（突围时全部焚毁）。与此同时，空军陆续空投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约二三十箱。每箱 12 颗。

十八军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兵团副司令胡琏单独召见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告诉他"南京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决定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歼灭解放军，计划用飞机在兵团阵地周围施放窒息性和糜烂性毒瓦斯。你回去秘密布置一下，把陆空联络布板信号准备齐全，围着我们的阵地标示出来，并研究我们自己的防护处置。一切尽快准备好。空军什么时候来，听候通知。"

12 月 12 日，杨伯涛接到兵团部通知，派军械官领取两百多颗毒瓦斯弹。军械官拆开一箱给杨伯涛看。说明书注明此毒瓦斯弹是催泪型和喷嚏性混合剂，有效持续时间约 5 分钟。每一颗都装置有发射器，其外形和构造类似日军掷弹筒，使用时对正目标，取与地面 45 度角，拉火发射，可射至 300 公尺左右的区域。军械官将毒气弹弹体装置在发射器上表演给杨伯涛及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观看。杨伯涛当即命令将大部分毒气弹发给一一八师，一部发给十一师，令其秘密保管使用。

12月12日黄昏，解放军的战壕挖到了尖谷堆制高点的脚下，一举发动攻势，潮水般的部队后浪推前浪地扑向尖谷堆，攻势凌厉，震破敌胆。国民党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守军此时飞蝗般地猛烈发射毒瓦斯弹。瞬间，解放军的冲锋部队消失了，战场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这种骇人的沉寂一直持续了很久。整整一夜，再也没有看见解放军发起冲锋。解放军部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双堆集西北，解放军压缩包围圈，攻进并占领了西马围子一带地域。国民党军企图夺回，先向阵地发射毒瓦斯弹，然后派步兵跟着冲锋。敌人本以为毒气弹的威力会让解放军失去抵抗力，会使冲锋畅通无阻，但却意外地受到解放军炽盛火力的猛烈射击，死伤惨重。毒气弹不起作用了。

吃一堑，长一智。据说刘伯承司令了解敌人使用毒气后，将防毒气的办法传授给了前线将士。战士们将防毒气的办法编成诗歌，广为宣传：

阵地准备石灰水，肥皂手巾带身边，
发现敌人放毒气，手巾纵横叠六道，
上面湿上石灰水，肥皂水用来更保险，
湿好蒙住口和鼻，毒气不能往里钻。
石灰肥皂不方便，手巾湿尿蒙口边，
要是一时来不及，就用湿土来蒙严；
麦苗绿草都能用，扭扭堵住口鼻间。
要是可能往高地跑，跑上高地也保险。
要是时间来得及，可用炸药炸弹来打散。
湿土也能埋住它，泼水也能把它消。
破鞋乱袜蒙住嘴，办法简单又方便。
咱们有的是办法，敌人放毒也枉然。

这张已经泛黄的战地油印传单，现今珍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

在淮海战役三阶段，国民党军队在陈官庄战场又一次使用毒气。敌人在陈官庄战场上使用毒气比在双堆集战场上使用毒气准备的更为周密。

1948年12月19日，舒适存偕空军总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飞至陈官庄，传达蒋介石“集中力量，在空军投甲种弹（即毒气弹）及轰炸掩护下，突破一方，实行突围”的命令。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应杜聿明的要求，空投草帽（即防毒面具）两千余套发至各军使用。杜聿明曾至青龙集，召集十三兵团师以上军官开会，鼓舞士气说：“总统很关心我们这些忠勇将士，为把我们救出去，特派空军总部董明德副署长来，用飞机掩护突围。空军在共军的上空，观察得清楚，并可以用飞机的火力压制共军。只要把陆空联络信号规定好，便可以顺利突围。各级将领要掌握好部队，准备行动。”

并规定陆空联络办法：

（一）突围作战开始，空军以B—24、B—25式轰炸机及P—51式驱逐机每日100架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沿部队前进路线，掩护两侧安全；

（二）步兵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后，即发出红色信号弹三枚，飞机获此讯号，立即投下毒气弹，随将机翼上下摇摆，表明投弹完毕。地面部队乘解放军双目暂时失明之际，一举突入并占领解放军阵地，然后地面部队发出绿色信号弹三枚……

敌在陈官庄战场曾多次使用掷弹筒发射毒气，进攻解放军阵地，企图突围，但大规模使用毒气，欲与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的战斗发生在1949年1月9日晨。

1月9日晨，解放军全力压缩包围圈，猛烈进攻敌人。敌人则以飞机20余架向解放军孟庄、鲁楼、纪胡同地段实施集中轰炸，并大量多次地使用毒气弹攻击，借以掩护杜聿明集团突围。敌一部分兵力在轰炸机及毒气弹的掩护下猛烈地拼命攻击，并占领了解放军左砦等几个阵地。敌企图巩固既得阵地，掩护其主力向西集结收缩，妄图从西面突围。解放军八纵阵地受敌攻击猛烈，此时，解放军则集中优势兵力于陈官庄西，组织南集团、北集团协力作战。八纵、九纵、渤海纵队密切配合。战士们戴上防毒面具〔附照片〕与敌作战，一举夺回阵地，并进一步压缩包围圈，于1月10日下午4时将敌全部歼灭，并击毙敌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俘虏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使用毒气也纯属枉然，只能引起人民的愤慨和世界舆论的谴责。

（徐巴金、胡文君，选自《革命春秋》）

敌机偷袭平山案大白
——反动“报国团”覆灭记

1948年8月，处于内陆性气候的平山县，显得格外燥热。当夜幕降临时，劳累一天的人们才慢慢地进入梦乡。

夜深了。方圆几十里内，一片漆黑，只有村外池塘里的青蛙偶尔呱呱地叫两声。此时，位于平山县西北80里、距郭苏镇6里的讲里村东北角天主教堂内的灯光还亮着。党中央首长们正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彻夜不眠地工作着。

突然，一阵螺旋推进器的嗡嗡声划破夜空的宁静，渐渐由远而近，转眼间，群星中已现出几点移动的航行灯。几架敌机成“人”字形编队飞临平山县上空，摇摆着机翼，猛地向地面俯冲下来，接着一串串重磅炸弹带着尖厉的啸声砸向黑暗笼罩着的工厂、村庄、机关、仓库……。

轰！轰！轰！随着炸弹的爆炸声，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四射，飞机的呼啸声、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喊声、鸡犬的叫

声混成一片，被仇恨烧红眼睛的解放军战士们，向着空中飞贼狠狠扣动了机枪板机……

党中央认为，这次敌机偷袭平山绝非偶然，必有人向敌人提供了情报。但是，敌人的情报从何而来呢？还未等侦察出结果，事隔一个月，敌人又以同样方式对石家庄和灵寿地区进行一次狂轰滥炸，目标仍是对准解放区的要害部位。经统计，两次轰炸，死伤群众160余人，炸毁民房700余间，损失严重。

这次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属下的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详细提供情况所致。

这年8月10日，“报国团”首犯雷震远和刁化仁，根据保定分团指导司铎吴雅阁的报告，又根据特务教徒米二海绘制的平山、郭苏镇、讲里村的机关、工厂、仓库的地形图，以代电密报“华北剿总司令部”及南京国民党“保密局总部”，致使国民党派出轰炸机对该地区进行轰炸。石家庄被轰炸是由“报国团”特务分子李洁真、杨东来提供的情报，并由他们在地面施放信号，指示目标而空袭得逞的。

1949年1月17日，北平城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驻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兵临城下的形势面前，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一些国民党政界头目已先后乘机南逃，军统保密局里更是乱了阵脚。

“公教青年报国团”总头目雷震远随国民党二层人物已先行飞往香港。中下层人员潜伏计划报到了南京保密局总部，还未等批下来，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国民党公开通讯联络彻底中断了。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国民党保密局共同成立的一个庞大的负有武装行动、情报、策反等反革命任务的特务组织。它直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以地区为单位，设立各级组织，分布于华北各地。利用天主教会深入广大的城镇农村，搜集情报，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反革命内战，破坏人民解放军，配合国民党阻扰人民革命。解放前夕，布置潜伏，阴谋在解放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其组织与活动方式，深得蒋介石的重视，是国民党在华北保持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之一。

“公教青年报国团”案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等省市；涉及到一些外国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个特务组织由130余人组成，其骨干分子就有65人。

自解放初到1953年，我公安保卫人员连续奋战几个年头，终于摧毁了这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对报国团成员，根据罪恶大小，分别不同情况，有的判处死刑、死缓，大部被判有期徒刑，或向政府登记后教育释放。

（选自《党史纵横》92年1期，作者：雷昀）

阎锡山在南京开书店

民国时期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只抓枪杆子的人，从来不知道宣传舆论的力量。但是，民国后期，在南京和上海发生了好几起倒阎的运动，这使阎锡山吃了很大的亏，他此时才感到报纸和杂志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决心抓一下社会舆论工作。

阎锡山有个很大的智囊团，经常为他出主意，此刻他们便提出了一个“锦囊妙计”，建议阎锡山在南京上海办一两种报纸，以便为阎在山西所推行的政策鼓吹，为阎锡山捧场。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国大召开以前，阎锡山按照智囊团的建议派人到上海，预备将孔祥熙所投资的《时事新报》买过来，再由阎锡山派人去主持。后来，由于双方的条件没有谈妥，终于没有办成。而山西省政府派驻南京的官员，也早想在南京办个报纸。但办报谈何容易，除了需要有钱，还要有人，没有相当精干的编辑人员和记者，办报还只是一个空想。况且，在当时的民国政府首都南京，登记一张新报纸非常之困难，所以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成。

阎锡山办报不成，他的智囊团们便又策划良策，建议阎锡山发动南京上海的记者及中外记者到山西去参观。阎一听此主意不错，马上采纳。果然，南京上海的中外记者纷纷组织访问团前往山西参观，阎锡山不惜工本，把记者们来山西的来回旅费和在山西参观的一切费用均包了，全部由山西省政府负责。各报记者访问山西以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纷纷地写些文章，赞扬阎锡山治理山西的政绩。无形中，为阎锡山做了许多很有用的宣传广告。

阎锡山为这件事的成功很高兴，于是再接再励又出了一个新花招：办书店。说起办书店，这完全由于那些捧场记者所写的文章而引起的。阎锡山办报不成，在北平办了一个正中通讯社，将那些记者的捧场文章收集起来，取名为《山西进步的方向》，在北平出版了。阎锡山又在南京，通过“现代化编译社”出版了一本《阎伯川先生与山西政治的客观记述》。阎锡山自己还写过两本书：《平民经济概述》与《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这两本书也出版了，而且大量印刷。

由于那些为山西政治和阎锡山本人歌功颂德的书籍的出版，产生了如何去推销的问题，有人读才起作用，智囊团就建议开个书店吧。阎锡山派人在上海南京到处物色地段，最后在南京太平路书店区顶了一幢门面很漂亮的书店，花去了大量金条，这家书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金，是阎锡山的山西政府所投资本，它的作用就是推销甚至发送那些为阎在山西的政策和他本人歌功颂德的出

版物。有人说，阎将那些书印得很多很多，使那些书就像白报纸一样不值钱了。一个长时期耍惯了枪杆子的人突然对于新闻文化事业注意起来，竟想办报纸，还真的经营起书店，这也算是一件新鲜事了。

阎锡山的这些新闻文化投资虽然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益，但作用还是有一点的。只是倒阎的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倒是使阎锡山感到有点不愉快。

（摘自《民国官场秘闻》曾炎主编）

重庆扒手集体自首记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重庆发生了一件怪事：二百多个扒手向警察局集体自首。

那是一个阴天的早晨，重庆警察局的早班警卫刚刚上班。警局旁边卖早市的油条摊也摆了出来，但是很少有人问津。在前些日子，这油条摊上的生意还是很兴旺的，可今天却有些两样，街上也很安静。突然，街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老的、小的、穿学生服的、便衣的，一群人拥到警局门口。守卫的警察一瞧这阵势，不由得紧张起来，端起枪，大喝一声："喂！你们干什么！"那些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见局长。""见局长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人丛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回答说："我们都是扒手。""我们要饭吃。"

"扒手！扒手见局长！"这两个警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眼前的这一大批人却是事实，这一大批人足足有两百多人，扒手向局长要饭吃，这简直是笑话，这两警察差点笑出声来。这时，那摆油条摊的老头和路上行人，都好奇的停下来，围拢来，想看个究竟。警察局里又走出好几个警察，端着枪，枪上上着刺刀。这批扒手又高声喊道："我们要见局长，我们要饭吃，我们是来请求坐牢的。"有的喊："进去呀！进去呀！管他啥子。"这时，局里出来一个带队的警官，喊着："不要闹，不要闹，你们有啥事情派代表同我进去。"扒手们迟疑了一下，终于推出六个代表、三个老的，三个年轻的，同警官进去了。

等在外面的扒手乱哄哄的，一些路人好奇地在打听，有人问："你们到警察局来，不怕坐牢？""坐牢，我们就是要坐牢，坐牢有饭吃。""你们难道没饭吃吗？""没饭吃，一个月总要饿上十天八天。""你们不是扒得到很多东西吗？""扒东西？如今扒东西都很难，有时候，三天二天扒不到东西，有时候，扒到的东西还不够吃两天的。甚至卖出去没有人要。至于想扒钱，更困难，大多数人不带钱。"卖油条的老头同情地说："唉，日子难，哪一行都是一样。"其它观看的人也不无感叹地走了。

扒手代表进局里后，见过了刑警科的一位科长，可是这科长作不了主，要请求局长。这也实为奇怪，照理说，扒手是犯法的、触犯了警章，所以扒手入监是应该的，不要说他们自己来自首，就是不来自首，警察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也要设法去逮住他们。可是，这次扒手集体自首，请求入监，却反而给了警察局一个大难题，警察局中的中级以上干部，都在为这难题发愁。

在局长室里聚集了一些警局的高级干部，刑警科长转述了这二百多个扒手要求入监的请求，说他们只希望在监狱中有饭吃。看起来，这是个最简单的要求，也是一种合理的处置；可是，在座的人都不作声，没有一个敢赞同。问题是什么呢？是经费，二百多人的伙食费用，向哪儿设法；而且看守所也容不下。最后，还是由一位中年的秘书打破了沉默，他建议把这批扒手解到地方法院去，请法院收容。

公文写了，印盖了，专差送到地方法院去，可是结果呢？法院把公文原封退了回来，理由是："人数太多，无法收容。"实际上法院对这许多人也的确供养不起。这下，又把警察局难倒了，说不准扒手自首也不妥当，犯法的人自己送上门来都不办，今后执法就难了。准吧！事实上办不到，在各机关预算都很紧张的当时，哪里去找这笔经费。就这样，一拖就是三个小时，外面的扒手已经不耐烦了，声音越来越大。"我们犯了法，自己来坐牢都不成，啥子道理？""怎么警察局连个回音都没有？"……

马路上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对这些扒手竟敢自投罗网，到警察局自首表示惊异。当他们知道了扒手的目的更是觉得难以理解。

扒手们仿佛忘记了自己不光彩的职业，像一班没有饭吃的人一样，向路人哭诉着自己过去罪恶的原因，诉说着今天自首的原因，博得不少路人的同情。

六个扒手代表这时从警局里出来了，脸上都是阴沉沉的，后面跟着几个中级警官。扒手们围上去，急切地打听："怎么样？怎么样？"一个身子较高的警官站了出来，站在门口的石阶上，对这群扒手们说："局长要我告诉大家，他是非常同情犯法的穷人的，同时局长也最肯原谅没奈何才犯法的人，所以今天局长说，对于大家愿意以最大的同情心，来宽恕各位，不再扣留各位到看守所去了，不过希望大家改过，不再作这种犯法的扒手。"

扒手们开始还安静地听答复，这时就按奈不住，一齐叫起来："不啊！不啊！我们要坐牢，我们要吃饭。"声音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这时，有个警官大声骂道："他妈的，还硬要坐牢！"一个警官发布命令："把他们赶走。"于是，上百个武装警察、聚集拢来，用武力把这些扒手赶走了。

被赶走的扒手群中，有人哀怨地叫着："我们要做好人，你们硬要我们做坏人，我们不要做扒手，你们却硬要我们做扒手。"在大批武装警察押送和驱散下，他们只得不情愿地离开了警察局，这扒手自首的故事也算有了一

个滑稽的结束。

（摘自《民国野史大观》江苏文艺）

上海舞潮案

旧中国盛行交际舞，如："华尔滋"、"探戈"、"伦巴"等。19世纪中叶海禁大开后，交际舞随着西方冒险家一并进入了中国的一些沿海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每逢庆典或休假，西方冒险家在狂饮滥赌之余，时有播乐跳舞之举。不过，当时还没有营业性的正式舞场。

本世纪初，上海外白渡桥北堍西商开设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首次举办"交际茶舞"。每逢周末及星期天的晚上，舞会至深夜方散。这种舞会，是西方冒险家的自娱活动，不对外售票。20年代初，上海西藏路汉口路转角上的一品香旅社（现农委招待所）也模仿举办"交际茶舞"，参加者多是一些"上流人士"。这是上海出现公开性交际舞场所的开始，但还不是营业性舞场。不过，跳舞的风气从此在上海流行起来。一时间，营业性舞场应运而生，相续出现。最早是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隔壁一家华人经营的巴黎饭店跳舞场，这家舞场以"黑猫"为标志，因而沪人多以"黑猫"呼之。接着"安乐宫"、"巴黎"、"大东"、"桃花宫"、"梵皇宫"、"老大华"、"月宫"、"立道"等先后开出。"理维"、"派利"、"沪西"、"盖利"等大饭店也纷纷内辟舞场以招引舞客。以伴舞为职业的舞女也出现了。1927年前后，上海的舞场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到了30年代，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日益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跳舞之风更盛，舞场也蜂拥而起，上海的舞场进入全盛时期。当时空调冷气还不普遍，每逢夏季天气酷热，舞场营业清淡，于是"黑猫"首先在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对面，开设花园舞场，以露天跳舞供人消夏。继之又有闽商王信和在该地毗邻处另建"圣爱娜"花园舞场（今上海钟表元件厂址）。附设"高尔夫"球场所，小桥流水，曲折迂回，饶有园林之胜，很快营业大盛，于是群起效仿。"宁波帮"商人陈占熊在原大华饭店的一部分开设"维也纳"花园舞场，粤商江某在原大华饭店大门处，改建"大都会"花园舞场。而大华饭店是当时最豪华的旅馆，蒋介石与宋美龄即在此举行婚礼。1932年因地产易主而改建市房，并开辟大华路（今奉贤路）：面向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部分空地建"维也纳"舞场，面对戈登路（今江宁路）一部分空地建"大都会"舞场。在这之前，尚有"辣斐"花园舞场（今复兴西路汾阳路口）。在这之后又有丽都花园（今市政协址）中的"丽都"与"新仙林"花园舞场，一时成了花园舞场的天下。抗战军兴，"黑猫"、"圣爱娜"地近郊区，先后歇业。而在市区租界繁荣繁华地段先后造起了一批场地宽敞、设备先进、布置豪华的高级舞场，如静安寺附近的"百乐门"（今红都电影院），建筑宏伟富丽。广告上有"堪称远东第一"的字样，事实上当时确也被公认为"远东最高乐府"。以弹簧地板和玻璃舞池而独步春申，尤其是舞女阵容坚强为其他舞场所不及。连"百乐门"这一名字，也有人专门著文赞赏。前些年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把"百乐门"作为上海舞场的代表。当时上海巨富、英商沙逊耗资百万建造的仙乐舞宫，将古典风格和现代气派融为一体。"仙乐"、"大都会"、"百乐门"、"丽都"，上海解放前一直被称为"四大舞场"。在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上海的舞场曾呈现一片畸形繁荣，除西区各大舞场外，中小型舞场也层出不穷，尤以繁华地带的西藏路上，由大世界往北就有"高峰"、"远乐"、"爵禄"、"逍遥"、"大新"、"国泰"、"米高梅"、"卡尔登"、"维也纳"等近10家之多，人称"舞场路"。当时的大小报刊上，充斥着舞场广告，如："维也纳花园舞厅，上海唯一高贵华丽的娱乐胜地。奉场星集茶，独步春申，四大名旦在场伴舞；所谓四大名旦者，并非梅尚荀程，而为本场最负盛名之舞星。"此时，还出现了一些三流和四流的舞场，称为"餐舞"，从中午12点一直可以跳到第二天凌晨4点。抗战胜利后，美国的官员、商人、士兵、以及国民党政府官员麇集上海，上海的舞场迅速膨胀，曾出现过风靡一时的露天舞池。据统计，上海解放前夕，大小舞场共有100多家。旧上海的舞场，有中外之分，高低之别，虹口一带国际间的几个总会、礼查西饭店、新礼查、派利饭店、华懋饭店、卡尔登、圣乔治、但尔濮登、大华饭店、邓脱摩，规模宏观，布置堂皇，都是外国舞场，光顾的全是富商巨族，只有大华、邓脱摩两家也有中国的中上阶级混迹其中。东亚、大东、新新、巴黎、爵禄、月容、远东、大中华、东华、安乐宫、桃花宫、广寒宫、嫦娥、大沪等舞池，则纯为中国人出入之处。此外，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新仙林、大都会，泰兴路的丽都，南京西路的仙乐，西藏中路的米高梅等舞场，算是"头排"的。延安东路的新大华、黄陂路的维纳司，南京西路的大沪等舞场，则是次一等的。其他如扬子、中央、伟达，以及大中饭店旅馆、大世界、大新、永安等游乐场附设的舞场，只能算末流了。上海舞场之多，在旧中国各大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

舞女是舞场中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最初的舞女多为外籍，如西人创办的新华舞场，舞女均为西洋人。"圣爱娜"有不少白俄小姐。日本人在四川北路开的不少舞场，所雇皆东洋舞女。"仙乐"开张伊始，不惜重金从纽约聘请红舞女葛蒙莉亚茜得。但中国舞女后来居上，到1936年，已占全部舞女（3000人）的9/10。来源为养家的贫家女子，失学失业的青年，也有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年龄多为16至20岁出头，30以上者甚少。舞女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中学生已属凤毛麟角。3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取缔妓院，海上花事阑珊，无路可走的娼妓纷纷改做舞

女，舞女人数大增，然名声大受影响。除了本地舞女，还从北平、济南、江浙等输入一些，不过输出的更多，主要去青岛、福建、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当时只有几家大饭店附设的餐舞厅没有舞女。舞客需自带舞伴。其余舞场皆用舞女，每家平均三、四十名至六、七十名不等。除红舞女外，舞女没有薪水，全赖舞票收入。舞票须和舞场老板拆账，红舞女可得七八成，老板二三成；次一级的四六开；最少的只能拿一半。拆账后，舞女大班还要从舞女收入中分去一二成。舞女进舞场伴舞须和老板订合同。合同期内，不管舞女个人生意如何清淡，收入如何微薄。每晚都得去舞场坐几个钟头的冷板凳，不可去别家舞场伴舞。20年代末，一个中等舞女月收入为150元至200元大洋，到30年代中期，能得到100元者已属幸运了。应该说，舞女的收入比许多职业高，但舞女每晚的衣着化妆和为了显示身分不得不花的黄包车费，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此外，舞女的家庭负担一般较重。所以许多舞女虽然在舞场时抽是白锡包、三炮台烟，回到家里则抽老刀牌。舞场里吃的是三明治火腿蛋，到家里则是油条泡饭。当然，红舞女另当别论。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大华舞场的陈雪莉，都因色艺俱佳而闻名于30年代的上海舞场。每天晚上，舞场周围坐了一圈舞女，但舞女大班总要留出一两个最好的位置，那是为红舞女准备的，她们照例要在舞客们婆娑起舞时才姗姗而来：她们的行头是最时髦的，特别容易识别，每天一换，一星期内决不会穿重复的，那些"挂头牌"的走红的舞女，以丰姿绰约秾秾合度、貌艳若斯，令那些公子哥儿们消魂荡魄。在旧上海，舞客称为"拖车"，舞女称为"龙头"，舞客邀舞女伴舞，称为"拖车配龙头"。舞女的收益，主要来自这些"拖车"的恩施。舞客邀请舞女，每每开香槟酒款待，香槟酒贵至10几元，舞女扣佣1.2元左右。有些"老拖车"为讨好舞女，设法直接塞钱给舞女。场内耳目多，不便直截了当地送，又不能在场外送，也不能托侍役转递，于是往往预先将纸币包在花手帕中，乘偕舞之际，乘机塞在舞女的手里。自然，少数舞女可能凭着色艺超人，依靠达官贵人的青睐，过着社会寄生虫的生活，而多数人随着年老色衰，不可避免地走了悲惨的道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著《日出》中所写，百乐门舞场的舞女陈白露，虽然一度红得发紫，终于走上自杀之路，就是当年舞女生涯的真实写照。1934年，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常到维也纳舞场鬼混，与一年轻美貌的舞女勾搭成奸，致使她怀孕。舞女多次向宋子良索讨一笔钱了事，宋子良不但不肯，反而要大亨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在老北门大街的中汇银行大楼约见这个舞女，谁知舞女一到，立即被四名彪形大汉架上汽车，送到吴淞口，扔入了滔滔长江，说是"种荷花"。后来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得知此案，亲自调查，还准备要法院逮捕肇事人犯，可是一个薄命舞女不值得大动干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1947年，处在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普遍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为了"整饬军纪"，"鼓舞士气"，便挖空心思地在舞女身上"开刀"。他们颁发布告和通令，限期国内的舞场全部停业，却不对舞女的生活职业作任何安排，实际上把这些人员其及赖以生存的家属推到了死亡线上。旧上海的这些舞女是由于生活逼迫，不得不以伴舞为生的。为了要吃饭、求生存，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禁令，安排职业，于是在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场的舞女2000人，在新仙林舞场集会。会后，她们结队请愿，举着数以千计的横幅标语，高呼着"向社会局要饭吃"的口号，浩浩荡荡前往市社会局。到了社会局，2000人齐集在广场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她们等了约半小时，还不见局长吴开先出来接见，请愿的舞女们胸中燃起了怒火，蜂拥而上，准备冲上楼去，在受到守卫的军警拦阻后，双方发生了争执，接着，就展开了搏斗。请愿的舞女以竹旗竿为武器，与手持警棍的警察互相撕打。警察有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啕大哭的。一部分赤手空拳、怒不可遏的舞女，冲上楼去，先砸坏桌椅，利用桌腿、凳脚为武器，勇敢地奔上奔下，把局长室、秘书室等办公室的办公桌、书柜、档案架、电话、电灯和门窗全部捣毁，撕碎公文纸片，并把蒋介石的挂像踩在脚下。楼上楼下足足战斗了半小时，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飞行堡垒"和大批警察赶到，把社会局团团围住，才告休战。当天晚上，被捕的舞女共有300余人。后来，由于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有力声援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将被捕的舞女全部释放。这便是震动全国的"上海舞潮案"。

（姜斌）

流行风

电影《小城之春》

《小城之春》——李天济编剧，李伟才摄影。故事发生在八年抗战结束的江南某小城一个破落的家庭里。影片共有五个人物：夫、妻、妹、仆、客。丈夫戴礼言（石羽饰）长期患有肺病，总觉得祖先留下的家业毁于他这一代，又无力收拾，感到渐愧，妻子周玉纹（韦伟饰）寂寞空帷里，生活空虚，精神抑郁，她对丈夫没有感情，只是在尽做妻子的义务；妹妹戴秀（张鸿眉饰）是一个念初中的学生，单纯、活泼，是这个家庭最有生气的力量；仆人老黄（崔超明饰），跟随戴家多年，忠心耿耿侍奉着主人。一天，青年医生章志忱（李纬饰）来作客；他是丈夫的老同学，又是妻子的初恋人。他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家寂寞平静的生活，掀起了夫、妻、客之间的感情波澜，发生了一场情与理的搏斗。最后，章志忱离开，丈夫走来与妻子并肩站在城头，一同目送朋友远去……

电影《国魂》

影片的名字是公司根据《正气歌》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两个字"国魂"选定的。由卜万苍导演，刘琼、袁美云主演，是一部历史古装片。影片表现了文天祥反抗侵略的爱国思想、临危不惧的民族气节和忠心赤胆地维护宋朝统治的正统观念。制作上认真严肃，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奠定了"永华"在电影界的地位。但是，1948年冬，正值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蒋家王朝面临崩溃的前夜，影片所宣扬的"久而不易"和"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恰好适应了国民党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作垂死挣扎的需要。所以，《国魂》上映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和赞许，并"饬属加印拷贝30份运至前线各地，以发挥先贤卫国精神，而振士气！"

电影《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继《国魂》后又一部历史古装片，完成和上映于1948年12月。剧本是作家姚克（字莘农）以其抗战时期的话剧《清宫怨》为兰本改写的。由朱石麟导演，舒适、周璇主演。影片取材清末戊戌变法事件，前后涉及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它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争夺政权的宫庭斗争形式，表现了"百日维新"前后的历史真实。

《清宫秘史》是一部符合历史真实的影片。它艺术地再现了"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政治斗争，有着积极的思想意义。导演朱石麟曾说，影片是以一个纯历史剧来处理的，企图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句话作为该戏的中心主旨。影片对于光绪、珍妃、慈禧等人物的刻划生动鲜明、富有个性。揭露慈禧的专横、残忍和昏庸入木三分；对于试图变法图强而又屈于慈禧淫威的光绪，寄以深切的同情；对于敢于对抗慈禧，坚持爱国思想的珍妃，给予热情的赞扬，影片的不足之外是对于光绪、珍妃进步性的过份肯定的描写和对义和团消极面的过份渲染。"文革"时期，戚本禹曾写文章诬蔑《清宫秘史》是"反动影片"，对作者姚克也进行诽谤。当时，身在香港的导演朱石麟读后，一气之下猝然死去。

电影《万家灯火》

《万家灯火》（原名《新合家欢》）——阳翰笙、沈浮编剧，沈浮导演，朱今明摄影，兰马、上官云珠主演。这是一部描写战后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影片。主人公胡智清（兰马饰）是上海伟达贸易公司的职员，他与经理钱剑如（齐衡饰）是同乡同学。他勤恳工作，希冀重用；妻子又兰（上官云珠饰）持家有方，不算高的月薪也能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后因农村破产，生活无计，母亲（吴茵饰）偕次子春生（沈扬饰）夫妇和孩子来到上海。由于人口增加，物价飞涨，使胡智清负担加重，生活拮据，难免引起婆媳之间的矛盾。胡智清因反对钱经理秘密经营美钞生意而被解雇，一直找不到工作。在生活逼迫下，又兰去求助钱剑如，而母亲则因钱剑如打伤春生找来问罪，为此婆媳俩又争吵起来。又兰负气出走并流产，婆母带春生一家也搬到侄女阿珍工厂宿舍去住。胡智清在公共汽车上碰巧拣到一个钱包，虽一时见财起意，但又遭良心谴责，终将钱包交还原主。不料他被失主诬为小偷痛遭殴打。好不容易在小赵（高飞饰，被解雇的同事）帮助下逃开又被汽车撞伤，在昏迷中送往医院。智清失踪后，妻子、母亲都不放心，两人返回故居探望，在相互理解中抱头痛哭。小赵、阿珍等帮助四处寻找，最后，智清从医院踉跄奔回，一家团聚，胡

智清觉悟。

电影《乌鸦与麻雀》

《乌鸦与麻雀》——郑君里导演，雷振华、苗振华摄影。写发生在上海一幢弄堂房子里的故事，刻划了一群市民形象。在这幢弄堂房子里，二楼住着伪国防部小官僚侯义伯(李天济饰)和他的姘妇余小英(黄宗英饰)，亭子间里住着中学教员华洁之(孙道临饰)及太太(上官云珠饰)、女儿，前客堂住着美货摊贩肖老板(赵丹饰)及其老婆(吴茵饰)和三个孩子，后客堂住着报馆校对孔有文(魏鹤龄饰)。这幢房子的主人本是孔有文，战后为侯义伯霸占。1948年冬，侯义伯感到形势危急，想把房子尽快顶出去，好再捞一把溜之大吉。这事引起同住此房的几户人家的不满和反对。可是，孔有文胆小怕事，不敢出面要回房子；华先生自持清高，不肯出面；绰号小广播的肖老板，自动打头阵又碰了钉子。于是，大家只好各自为谋，但都没有成功。现实的种种教训，侯义伯的无耻行为，终于逼得大家联合起来跟侯义伯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这群喊喊喳喳的"麻雀"，再也不怕压在头上的"黑乌鸦"了。当侯义伯要打电话找警察来抓人时，他却接到要他赶快撤退的南京电话，于是他带上余小英狼狈逃跑，南京政权已分崩离析。1948年除夕晚上，孔有文收回了自己的房产，大家高兴地集中在一起吃年夜饭，最后，孔有文将一副春联贴到大门上：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在鞭炮声中迎来了1949年元旦。

小说《山野》

作者　艾芜，主要内容：

小说通过抗日战争时期某山村"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着重描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展示了各阶层人物对待抗战的不同态度。正当日寇逼近吉丁村的前夕，大地主韦茂廷和乡绅徐德川企图投敌叛国；韦的女儿韦美珍和女婿徐会峰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张抗日，并想争取父亲抗战。他们与矿工韦长松、青年农民阿龙、阿岩等人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在自卫救国斗争中杀敌锄奸，表现得相当英勇。小说热情歌颂爱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愤怒地揭露了以村长韦茂廷为代表的妥协投降路线。作品人物众多，阵线分明，场面较大，是国统区抗战时期一幅生动的抗日史的缩影。故事在一日一夜中展开，构思缜密；以民族矛盾为主线，展示多种场面，布局有条不紊；主要人物形象性格鲜明，作品发表后曾受到文艺界的好评。

小说《种谷记》

作者柳青，主要内容：

以1947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写陕北王家沟群众在围绕变工队集体种谷，实行互助合作过程中所开展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富裕中农、行政主任王克俭，自私保守，抵制变工。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等挑拨王克俭与农民的关系，又利用伊盟事变进行反动宣传，破坏变工种谷。农会主任王加扶和劳动模范王存比，在上级领导下，团结群众，撤了王克俭的职，顺利地开展了集体种谷的生产活动。小说反映了在革命发展中我国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农村生产制度的某些变革，显示了边区人民与党和政府的血肉联系。作品成功地塑了王加扶、王克俭、王国雄等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生活气息比较浓郁，人物描写细腻逼真，群众场面写得尤为出色，运用方言土语比较纯熟。惟情节发展过于缓慢，描写过于冗长繁琐，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

小说《锻炼》

作者茅盾，主要内容：

"八·一三"战争开始到结束为背景，广泛地展开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各阶层的社会动态。抗战爆发后上海及其附近郊区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以各种行动参加、支持战争；在工厂，从工人群众到技术人员冒着敌机轰炸，紧张地进行迁厂活动，并与妥协动摇的资方开展尖锐的斗争；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各种抗日救亡斗争。作品还描述了国华机器厂经理严仲平在迁厂过程中的动摇；大学教授崔道生和青年罗求知在国民党反动派压力下的屈服。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中卖国投敌、迫害学生的反动政策，以及国民党部队内部的腐朽堕落。全篇无一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采用开放型的结构形式，将多条情节线索交错进行，庞大繁杂而又井然有序，从而展现了特定阶段的时代风云，描绘了众多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笔触摇曳多姿，色彩缤纷，在艺术构思上别具一格。

小说《愤怒的乡村》

作者鲁彦，主要内容：

描写农民葛生、华生兄弟俩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对人生所持的不同态度。华生自幼丧失父母，由哥嫂扶养成

人。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华生反击地主的侮辱,砸破了地主米店的货柜;葛生却忍辱赔偿道歉。秋天发生了旱灾、瘟疫,华生打了深井,并用西医科学治疗疾病。村里人祈雨求佛,乡保长等人却乘机捐款勒索、调戏妇女,华生一一与之对抗。为此,坏人离间华生和他的恋人菊香的关系,致使他们产生误会而分离。不久,乡村发生了动乱,华生团结穷兄弟们起来斗争,然而手无寸铁,最终被反动军队抓走。作品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农民苦难挣扎的生活状况,尖锐的阶级对立,以及农民逐渐觉醒的过程。作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采用对比手法,使葛生、华生兄弟形成鲜明对照;且从正面刻画了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的形象,颇有积极意义。

诗《闪电》

有乌云蔽天,你就出来发言;
有暴雨将来临,你先知道;
有海燕飞翔,你指点怒潮狂飙。

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
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
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

为此你就焦急,显得痛苦,
更令我们常常感到羞惭,
不能完全领会你的诗行。

你给我们揭示半壁天空,
我们所得的只是一阵惊愕,
虽然我们也常以为懂得很多。

雷霆暴风雨终将随之而来,
但我们常常都来不及思索,
在事后才对你的预言讴歌。

因此你感到责任更重,更急迫,
想在刹那间把千载的黑暗点破,
雨季到了,你必须讲得更多。

(杜运燮)

歌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地玛利亚,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地玛利亚。
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
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入云霞,
你的歌声迷了我,
我从山上滚下,
哎呀呀!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

勇敢的青年哈萨克,以文多达尔,
勇敢的青年哈萨克,以文多达尔。
今天晚上过河请到我的家,
喂饱你的马儿背上你的冬布拉,
等那月儿爬上来,
你我坐在树荫下,
哎呀呀!弹着琴儿永远歌唱吧!

历史档案

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是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样作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

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在戡乱过程中，许多人只知注意装备和对付共产党的方法——总之，只知注重有形的物质条件，毫不注重精神条件，特别是政治改革。“军事是政治底延长”，这是人人应该明了的常识。没有健全的政治，怎会有健全的军事？没有有生命有内容的政治，军事又怎能满意呢？国事发展到现在，应该可以使人痛切觉悟，欲求戡平共党祸乱，挽回目前军事上不利的形势，固然不可不从注意加强军队之有形的装备着手，而更重要的则是由军事力量所从出的政治改革着手。这是什么意思？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共产党在德国具有相当的势力。德国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呢？孙中山先生已经说过，德国首相俾斯麦毅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将共产党借以猖狂的题目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结果共产党在德国不复能有所作为。这证明了俾斯麦不愧为一手腕灵活的政治家。今日中国正遭逢太平天国之变以后最大的变乱。固然这一变乱有国际阴谋为之助长扩张，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归要根究底还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毛病太多。共产党的主要目的虽是夺取政权，但是在表面却利用这些社会毛病来号召人民。这就说明为什么戡平共产党是这么艰巨的事业。若是我们要戡平赤祸，我们必须效法俾斯麦对付德国共产党的办法：把题目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目前少数人这样享有一切特权，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一文钱也不肯出，没有一个人去当兵，却完全要穷苦的老百姓抽丁纳粮。这如何能使人心平气服？如何不令反对者有所借口？

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只有这样作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少数派的路线。如果我们走少数派的路线，那末尽管口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如果我们走多数派的路线，甚至口里不标榜革命，老百姓还是知道我们是革命的。假如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那末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区区共党匪徒，不足平也。

退一百步说，长江以南地区尚足可抵欧洲十余国，人口有二亿以上，出海便利，物资富饶，交通发达，较之北伐时代的凭借，其优厚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要悲观？根本毛病就在自身。如果吾人能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那末消灭共产党实绰有余力，而确实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最根本的关键是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绝对不能靠一纸公文命令。必须政府负责者先作几件大快人心之事，振奋沉闷已久之人心，以事实来证明大公无私和剿匪并非保卫特权阶级的利益，而确系为保卫领土之完整，为保卫人民自由与民主，为保卫我们的历史与文化。若是吾人能作到此点，形势必会为之一变。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转自《中美系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的两个报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月）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

仅为选举总统及副总统而召开的国民大会，很快地发展而具有了更基本的意义。1948 年蒋委员长所演做的隐退奉化的成功确立了他个人的权力，但争夺副总统的结果却否决了他的策略。副总统竞选无疑是大会最重要的发展。投票无做假的嫌疑这是毫无问题的。孙科代表国民党组织中全然反动的人选，假如他之当选当含有旧的政治政策，毫无忌惮地继续维护既得利益并打消任何重振党和政府的希望的意义，而这种重振是对希望最后战胜有活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必要的。不管他将来实际上的表现如何，李宗仁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及进步分子的象征和聚集的中心，这些人对于控制政府的人丧失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物和新而更有效的政策。李氏代表着要求有效率的政府而异于丧失信用的当权集团之缺乏成就。他的拥护者缺乏经验或组织，他们向国民党组织挑战而获得了胜利。李氏能否成为有活力的领导者使这些人结合而为有力量的反对派，以实现李氏竞选时的政纲，目前还不得而知。李氏的胜利对 CC 派是一严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没有能执行委托给他们的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并且，由于向委员长误报可能发生的情形而严重地损害了委员长的地位。反对派的批评多半是针对蒋委员长个人，说他企图取消民主程序。对他的许多批评，加诸于 CC 派则更为适当，但是对他的威望仍是有不利的影响的，由于他曾公开和剧烈地反对过现在他必须与之合作的人，故蒋委员长的处境倍加困难。他将如何使自己适应这种形势，现在仍不得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和过去一样——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如果他企图反对李氏并打击李氏，他会驱使李氏挺而走险，因为李氏已处处表明他意欲积极参与国事。在另一方面，委员长是个重视实际的人，也是一个政客。如果他推断以为李氏代表国民党中国的主要力量并且断定他不能够消灭李氏时，那么他会决意联合李氏，同时放弃自己以前势力的源泉。据报，他对李氏之当选非常愤怒。可能他现在真的是太老了，加

之，专权过久以致使他自己不能适应，或者他亦可能再度演出他自己仍然是中国的头号政客。一切是决定在于他自己。

国民党在最初是个革命的政党，它仍保留着强烈的革命的传统。该党仍以实现孙中山的主张为任务。香港和国外的国民党分离的各派系，采取了改革的口号和政策，而且在最近几个月来，甚至连国民党里较保守的各派的人也在以同样的语调谈论。此种对于变动的注意的起源为由于共产党人革命成功之压力。大会确认了蒋委员长的地位，但否决了他的反对改革的政策。按他目前的宪法地位，他能接受和实行，或者拒绝群众对改变之要求。

然而，李氏之当选也给予这个要求以合乎宪法的及法律上的地位，而可能这种情况会迫使蒋委员长在他的政府中容纳新的人才，并采取以社会变革为抵抗革命的政策。两个主要的失败的候选人，孙科和程潜，已开始组织他们的所谓改革组织，这一事实，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迄今仍无反应。像谣言所传说，除非他们有确实的理由相信李宗仁愿意和他们妥协，并且几乎是按照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容纳他们参加联合政府，他们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认识到孙科的当选，会有利于助长共产党的革命形势的继续滋长的。

另一个应予注意的一派是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现在已经确定于短期内消除蒋委员长的权力。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有时这样一个不相称的结合可能会很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所称的短期间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蒋委员长、CC派、黄埔系和李氏及与他合作的人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的恶化，继续着目前不幸的途径发展，李氏及与他合作的人似确可得到最后的成功，使李氏或出于自愿或出于需要而被迫与共产党成立谅解的可能性日益增长。我们必须要极端小心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应用于使蒋委员长接受目前的形势并支持比较开明的政策。

（司徒　1948年5月3日于南京）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的报告

我谨报告，在七月十六日晨，我晋谒蒋介石总统，向他提出我认为是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稍有希望的唯一忠告一事。他曾问我可有任何消息，我答称：我认为最重要的消息是共产党大会将于下月召开，这次大会议程中有组织联合政府的意图，还有大使馆从香港所收到的消息称，李济琛打算在最近的将来成立一西南地方政府，意欲建议与共产党相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广播谴责铁托和其他的人，公开地把他们自己投在克里姆林宫专政下的世界共产主义中。将上述发展与广播相联系起来，构成我拟提出的建议的背景。这建议就是由他来召集几个受到一般人尊敬的领袖，促使他们为了中国目前真正遇到的危机，放弃所有个人与政治异见，这个危机就是共产党得胜后、中国将丧失其国家独立。这已不再单纯地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党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民主与自由与受着莫斯科所控制的少数人专政两者间基本原则之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都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战，但是这种独立现在却又处于危险中。在这危机中，他和所有其他的人，应该把国家置于其他不重要的问题之上。我提出了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琛的名字。关于李济琛，我以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假使他不服从这个原则，他应被责为选择了俄国共产主义而放弃了国家的独立而受到谴责。我希望这样可以产生一个联合宣言，吁请所有需要自由国家的人来面对现实并支持这项事业。财政危机和经济困难也确实是很真实的，但它们比起基本的问题来还是较次要的。我们应首先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他应以巧妙准备好的宣传逼使其他的人就范。他说原则上他同意，他将再详细地考虑一番，他说他曾计划一个改组国民党的会议，我说我深知此事，但是我所更关心的只是这些特出领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且这一定要尽可能地使它非常动人以便使群众信服。

他随即问我美国方面的意见，我就告诉他杜威州长关于增加援华的声明已引起甚多之不利的社评和其他评论。我当时带有关于这问题的最近的美国新闻处新闻稿，当即交给他的秘书以供参考。我又说，虽然如此，但如能有我所主张的运动能表现活力，它一定会有助于缓和美国的感觉，以为这个政府已脆弱至不能对它做任何有用之援助。我告诉他美国所给予的最大帮助，既不是钱也不是军事上的意见，而是我们的理想的活的力量，许多中国人已有了这种理想，但它却被苏联的理想所迷误和代替。

他说美国人对李济琛的重要性，有估计太高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说：对他本人和他的左右不必过于重视。但是全国都是非常渴望和平，在这种一般的心情之下，任何运动表现有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取和平的希望者，可能获到比他预料中更热烈的拥护。所以，就我看来，无论他做什么应该尽快去做。他又说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形，最显著的印象还是徒然白费。我非常怀疑蒋总统是否有那种伟大的品质，可使他召集那些不完全顺从他的领袖，待他们如同志一般，请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求一致的意见和集体的决议。二十年来的习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即使他有与这种人合作的企图，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宽大诚恳，而做到开诚布公来交换意见。惟只有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方

可得到他们的信任，同时也可予群众以印象。任何联合发出的宣言都反映在这些限制而不能使人信服，他还想拉拢那些他所信任的人，但这样将使结果更糟。除了如此一个表现得非常诚恳和迫切的联合呼吁以外，别无他事可以动员已趋消极与绝望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政府最上层发生了新的和感人的事态。除我已做的以外，再进一步的催促就只是暗示给他较可能更多的美援，或是说服他放弃他自己的见解。但这两种情形都是违背他的本性的，所以其结果差不多可以确定地说是不幸的。因此似乎是应当许他自行其是而能在相当范围之内采纳旁人的建议，否则迟早总要有一运动，迫使他放弃他现有的地位。他似乎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不安的极端形式，不是军事力量和慈悲相结合起来的他所认为是从中国历史教训上所得出的方法所能扑灭的。倔强不移的决心和持久的勇气在以前抗日时期，很能适合于将普遍抗日意志付之具体实施，但是很可悲的，到现在他们却在某种真正意义上是变成了解决问题而所需迥然不同的精神的障碍。

（转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6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任命霍宝树为该院输出管理委员会主委，任命陈继承、宋肯堂、上官云相、邓宝珊、刘多荃为华北"剿匪"副总司令。

1月9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议案：(1)定北平为陪都；(2)公教人员待遇办法；(3)建国特捐改名为救济特捐；(4)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总预算，其收入总额定为五十八万亿元，支出总额定为五十六万亿元。

1月10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条例》。十五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晋冀鲁豫边区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

1月12日　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上讲《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1月13日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改正错订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及《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

2月1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

2月3日　毛泽东就土地法的实施问题，给刘少奇发一电报。指出，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应采取不同策略。

2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

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

2月22日　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着重地纠正了某些地区在这两项工作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

2月2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与边区参议员常驻委员在绥德召开扩大联席会议，三月一日结束。会议全面总结了边区人民一年来自卫战争的成绩，作了恢复边区建设迎接解放大西北的规划，并一致推举杨明轩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和性质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那些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和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也是统一战线中的分子，虽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对待他们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而不应当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

3月17日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华中区绥靖会议"，二十日结束。

3月23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从陕西吴堡县渡过黄河，二十五日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

3月29日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

4月3日　北大、清华、燕大、中法、师院、北洋、南开七大学举行联合反饥饿反压迫罢课，连续三天，抗议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华北学联"、非法逮捕学生、镇压学生集会游行等法西斯暴行。北大、清华两校教授、校工为支持七校学生亦于同日举行罢教、罢工。

4月10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山西进入河北阜平县境内。

4月19日　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总统。

4月29日　李宗仁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副总统。

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第五条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3日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籍"国大"代表谈话会上，号召国民党员要"自信(恢复信心)、自强(要知道自己有力量)、自反(要自己反省)"。

5月4日　上海一百五十余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在交大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

5月15日　国民党行政院提出总辞呈。

5月16日　孙科、陈立夫当选国民党立法院正副院长。

5月20日　蒋介石就总统职并发表演说，声称要"在短期内戡平叛乱"。

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

5月26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此以前，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西柏坡村。

6月1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命令，为保证土改完成后个人土地所有权特发放土地执照，宣布土地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犯。

7月29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的社论。

7月31日　中共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在河南宝丰举行团以上干部整党整军会议。陈毅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邓子恢作中原新区政策和财经工作报告，刘伯承作整军动员报告。

8月1日　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二十二日结束。

8月7日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历时十三天。

8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

8月22日　国民党飞机四架，昼夜三次滥炸石家庄市，投弹二十余枚，炸死居民二十六人，伤四十一人，炸毁民房一百三十余间。

9月8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十三日结束。

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9月26日　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为政府主席，薄一波为第一副主席，蓝公武为第二副主席，杨秀峰为第三副主席。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会议认为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又说，我们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1月8日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正式确定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者，判决坂垣征四郎及土肥原贤二为"九·一八"事件之主犯，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武滕章、广田弘毅、大岛浩、畑俊六、东条英机、木户幸一、南次郎、桥木欣五郎、大川周明、松井石根、平诏骐一郎、小矶国昭为侵华主要人员。

11月12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前满洲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首相及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前陆相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广田三原则倡议人前首相广田弘毅、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前东条内阁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及前东条内阁陆军省次官木村兵太郎等七人死刑；日本战犯荒木贞夫等十六人无期徒刑；日本战犯重光葵、东乡茂德等二人有期徒刑。

11月13日　中共华中工委、苏北军区、华中行政办事处联合发出"支援前线总动员令"，号召全体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争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12月29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任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1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

12月1日　第二届世界妇代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蔡畅率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参加。

12月20日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

12月23日　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名在巢鸭监狱处决。

12月27日　国民党反动政府盗运文物第一批、第二批离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到达台湾。

经　济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豫陕鄂新解放区民主政府废除苛捐杂税，物价普遍下降。南召、南阳地区解放前麦子每斗法币二十一万元，现每斗只合法币八万元；泌阳、

午阳地区棉花以每斤法币三万八千降到只合二万八千元;别的物价分别下降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2月5日　国统区米价每担涨至一百六十六万元,六日,一百八十万元,电灯、自来水、电话,和煤气等费亦均上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七日,中国及中央两航空公司各线票价上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2月5日　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向立法院报告,民国三十七年上半年国家总支出九十六万二千七百六十六亿余元,总收入五十八万三千四百零八亿余元,赤字达三十亿余元。

3月12　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拨价值四亿美元以上的资产,交中央银行作为法币准备金,以稳定币值。四亿美元之资产是:(1)中纺公司资产一部分,价值两亿美元;(2)招商局资产之一部分,价值一亿美元;(3)资委会资产一部分,价值五千万美元;(4)日本赔偿物资一部分,价值八千余万美元。

3月3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恢复与发展收复区经济,颁发保护工商业布告。

4月12日　国民党政府明令增加盐税税率,规定普通食盐每担三十五万元、土膏盐每担三十万元,渔业农业用盐每担十五万元、工业用盐免税。同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关税临时附加税征收条例,规定关税临时附加税按照关税税率百分之四十五征收。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在纽约设立美国保险分处。

6月14日　上海市电气、自来水、电力、电话等公用事业开始涨价,均涨百分之二十七至三十五。十五日,电车、汽车、轮渡等交通事业亦开始涨价。

15日　上海黑市美钞冲破二百万元大关而达二百一十万元,黄金每两亦涨至一亿一百万元。米价批发价格每担一千一百万元,较一九三六年每担十元上涨一百一十万倍;肥皂、香烟及其它商品十六日一天内均上涨百分之四十。

6月27日　自五月十七日开始召开的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闭幕。

7月3日　新华社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沈阳、北平、天津、青岛、南京、汉口、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大中城市的工业资本和社会游资大量南移香港、广州及上海,仅北京一地,六月份第二周涌入上海的游资每日即达一万亿元,四月十六、十七两日逃往广州的游资即达五、六千亿元。

7月18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美金券一万、二万五、五万及二十五万元等四种新大钞。

6月19日　中央社报道,盟军总部已准许中国国民党中国银行、中国航空公司、招商局、中央社等在日本营业。

7月27日　国民党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流通券二百万、五百万两种大钞。

8月2日　蒋介石明令公布实施"海关进口税则",同时取消"海关附加税"及"关税临时附加税"两种。新海关进口税则,加税货品约四百八十余项,减税货品约二百余项,无增减者一百五十余项。

8月6日　国统区火车开始加价,各线调整办法照战前客运平均基数标准自行决定,其倍数客价最低五十万倍,最高一百万倍,货运价最低一百二十五万倍、最高二百五十万倍。

8月14日　华北人民解放军十九、二十兵团发动察绥战役,至十月三十一日,先后攻克和收复集宁、凉城、陶林、武川、包头、固阳等地。

8月19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

8月19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令各地物价改算金圆券以十九日当地物价为准。财政部亦通令全国银行钱庄实行金融冻结停业二天(二十、二十一日)。

8月25日　蒋介石明令公布整理财政补充办法。

9月1日　国民党政府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在上海招待记者,宣布扬子电力公司、冀北电力公司、开滦煤矿公司、台湾糖业公司为首批美援拨款对象。拨款总额为四百四十万美元,其中开滦、台糖各得一百万美元,扬子、冀北各得一百二十万美元。

9月3日　华北解放区召开全区财政会议,历时十天,讨论了华北财务行政方针,制定新的农业税则、工商业税、烟酒等税收法令和会计规程、粮库制度及战勤问题等十余种税则和制度。

10月20日　华北、西北两大解放区的货币按固定比价互相通用。

10月31日　国民党行政院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及"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各项办法的"补充办法"。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取消"限价"政策。

11月2日　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出席立法院为经济改革失败召开的质询会,翁承认关于收支平衡、抑制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吸收外币外汇存款、制止资金避逃、稳定市场价格、增加生产、提高输出贸易、吸收侨汇等之目的及调整重要物品价格和国营事业价格、调整工资、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之目标已完全失败,并造成了"新通货的膨胀"。

11月7日　上海米价暴涨至每石五百元(指金圆券——下同),八日再涨至每石九百元,九日竟涨至每石一千八百元,与"限价"每石二十三元相比,以上涨七十七倍多。

11月18日　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决定于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新币。

11月27日　青岛国民党守军由上海运来炸药二万公斤，阴谋在撤退时破坏青岛海港、码头、水源、发电、中纺等重要市政建设和工厂设备。

12月1日　华北、华东、晋绥、陕甘宁四解放区联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币制。

12月23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中央银行即日起停止申请存款兑现，以平息经济改革所导致之金融市场混乱。上海三万市民挤兑黄金造成惨剧，死伤二十余人。

12月25日　华北人民政府公布《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

军　事

1月1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蒙古人民解放军。

1月7日　中共陕南军分区成立。

1月30日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康泽任司令官、郭勋祺任副司令官。

2月6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辽阳城。

2月19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鞍山、法库两城。

2月24日　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克重要据点汜水、径河、黄浦、王营、望直港等六处。

2月26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营口，该地国民党五十三军暂编五十八师全部万余人在师长王家善率领下起义。

、2月27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新开原全歼国民党军五十三军暂编三十师第一团及法库逃敌暂编六十二师残部。

3月1日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全部歼灭敌援军四个旅。

3月11日　华东野战军在胶济路西段解放张店市，全歼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一四一旅等部。12日，又解放周村市，全歼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等部。

3月13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街(市)。

3月19日　华东野战军苏北部队解放益林，全歼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一师一一三旅。

3月20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解放胶济线淄川城。

3月30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胶东部队解放威海卫。

4月3日　晋察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晋绥部队各一部攻克凉城。

4月21日　西北野战军解放陕西长武城和永乐镇。二十二日又克麟游、扶风与甘肃灵台三城。二十三日解放凤翔县城，二十四日解放岐山城，二十五日解放洛川县城。

4月22日　西北野战军解放延安。陕甘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于同日进驻延安城办公。

4月23日　冀察热辽解放区部队解放察北重镇多伦城。

5月2日　中原人民解放军一部及桐柏军区部队发动宛西(南阳古称宛城)攻势，截止2日，先后解放内乡、淅川、镇平、邓县四座县城及西峡口、西坪镇、石佛寺、荆紫关、禹王店、重阳店、侯集镇等重镇。

5月20日　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正式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

5月24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两个纵队攻长春大房身飞机场，歼灭国民党新七军暂编五十六师、六十一师及保安旅各一部。

6月3日　原国防部长白崇禧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兼华中"剿共"总司令。

6月21日　蒋介石飞往郑州、西安内战前线督战。二十五日，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

6月27日　华东野战军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和两广纵队联合发起睢杞战役，至七月六日歼敌区寿年兵团两个师六个旅和黄伯韬兵团一部。俘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7月1日　国民党华中"剿匪总部"在汉口成立，白崇禧任总司令。

7月21日　晋中战役胜利结束。

8月12日　杜聿明任国民党徐州"剿匪"副总司令。九月四日兼任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孙元良为副主任。

8月16日　傅作义在北平召开华北五省、两市"剿匪"军政会议，二十二日结束。主要讨论"'剿匪'戡乱变被动为主动"，"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等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冀、热、察、绥四省军政要员百余名。

9月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9月24日　华东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解放山东省会济南。

10月1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义县。

10月5日　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曲阜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九月会议决议，展开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学习运动，参加会议的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

邓子恢、张鼎丞等。

10月11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对淮海战役作了具体的部署。

10月15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歼敌十余万，俘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高级军官。

10月19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

10月22日　中原野战军一部解放郑州。

10月24日　中原野战军一部解放开封。

10月27日　国民党傅作义军偷袭石家庄，被击退。

11月1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全军整编命令：将野战部队编为野战军。

11月2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营口，歼灭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及周福成兵团。歼敌十四万九千余人。至此，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七万人。

11月4日　中原野战军解放南阳，收复泌阳。

11月5日　内蒙伊克昭盟准噶尔旗务委员会主任、保安师师长奇致中率部起义。

11月6日　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为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指挥华东十六个纵队，中原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军区以及华北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现名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动攻势。

11月9日　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攻克连云港。

11月12日　承德收复，热河全境解放。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

11月17日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林彪，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向关内开动。

11月22日　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全歼国民党黄伯韬兵团，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

11月29日　华北野战军一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至三十日，相继收复张家口外围西北、西南、正西、及正南的城镇多处，将张家口包围起来。

11月29日　国民党军黄维兵团之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在宿县西南之罗集举行起义。

12月1日　华东野战军解放徐州。

12月5日　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至二十一日止，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长达一千二百余里的战线上，将华北国民党军六十万人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孤点。

12月11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应先切断敌人的逃路，进行分割包围，然后再合围攻击，以求全歼敌军于华北。

12月26日　青岛国民党警备第五旅副旅长顾镇光率旅直属队及一个团全部，举行起义。

外　交

2月11日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国务院已正式建议以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华。

2月20日　苏联政府宣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延长两年。

3月10日　美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称"估计约值五亿美元现在太平洋诸岛上的剩余物资，已根据'就地运取'的原则售与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接收"。

5月3日　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公布四月三十日换文。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政府以"建议"方式所提出的各项援华条件。

6月19日　美众参两院联合委员会决定援华数额四亿美元。

7月3日　"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由王世杰与司徒雷登代表两国政府在南京签字。

8月15日　韩国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政府于十四日派出刘驭万为驻韩国大使衔外交代表。

8月17日　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访美国务卿马歇尔，催促美国加速接济军事供应品。同日，美国政府发表报告，称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七月中国获得美国物资价值三十七万四千三百五十一美元以上，包括弹药、炮弹、铁筒弹、火药线导火管、地雷及手榴弹等。

8月21日　国民党政学系首脑张群为策划与建立"中日韩三角反共同盟"到日本进行"访问"。张群在日本期间曾五次与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晤，二十五日，并与日本首相芦田密谈，要求"日本不独为其本身利益，而且应为整个东亚利益而努力。"

9月17日　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成立，顾问团包括海军顾问组、空军顾问组、陆军顾问组、联合勤务顾问组及联合参谋顾问处。并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始工作。

11月5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南京、浦口、江苏、安徽等地美军眷属即日撤退。

11月9日　蒋介石亲函杜鲁门要求美国直接指挥国民党军作战。

11月24日　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谒杜鲁门。呼请美国给予"更多与更快"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12月6日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打电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并保证团结美国人民力量，制止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12月17日　胡适与司徒雷登谈话，要求美国支持蒋介石。

12月22日　美国麦克阿瑟擅自释放十九名日本重要战犯，并宣布日本境内主要战犯之审判“业已结束”。

文　教

2月15日　中华全国戏剧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

3月1日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成立，周炳琳、钱昌照、吴景超、孙越琦、肖乾、潘公旦、刘大中等十一人为理事，邵力子、吴蕴初、童冠贤为监事。该会五月十五日出版《新路周刊》，发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一文，提出政治方面、外交方面、经济方面、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等三十二条政纲。企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另组一新党”，“寻求一条新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3月21日　中国技术协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4月12日　东北解放区吉林大学正式复校开学。

5月12日　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每日三次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向国内外广播。

6月15日　《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在石家庄创刊。两个解放区的新华社，合并为华北区新华社。

7月26日　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正式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八月二十四日在河北正定举行成立典礼。

8月8日　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文联联合召开华北文艺工作者会议，十九日闭幕。

8月20日　中原军区人民军政大学成立，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

9月29日　中共中原中央局发布《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

10月1日　东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张如心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人民政府团结与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并勉励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月20日　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49年

导　言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新年求和文告，妄图借和谈得以喘息，以便卷土重来。文告一发表即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毛泽东撰写《评战犯求和》，揭露蒋介石阴谋；同时，美国对蒋介石也表示失望，试图另找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第三次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命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执行七项"和平措施"，与中共八项条件相呼应，制造和平气氛。但是，由于蒋介石仍是幕后操纵者，仍掌握南京政府实权，七项措施遂成废纸。

三月五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指出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应由农村转向城市。七届二中全会是胜利前夜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促进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作了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重复，国民党统治即将灭亡之际，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了和平谈判。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讨论决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由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二十日发表声明拒绝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失败。

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展开了渡江战役。国民党长江防线土崩瓦解。四月二十二日，解放南京，至六月一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共消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人，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明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成为《共同纲领》的理论、政策基础。

为打破国民党的兰州决战计划，人民解放军在八月发动了兰州战役。兰州战役是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最后决战，共歼敌精锐千万余人，解放青海全境，彻底打垮了盘踞西北多年的马家军，打开了进军新疆的大门。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国旗、国歌和首都，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首都。第一届政协会议具有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性质。

十月一日，是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本日隆重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了基本胜利，中国历史时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歼灭踞守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了西南战役。在中央军委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历时一百六十多天，歼敌九十三万人，解放了最后的四省大部。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和平解放，蒋介石集团逃住台湾。行政院及内阁成员同日怆然抵台北办公，国民党政权全面退出大陆，一个时代结束了。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七届二中全会
- 国共北平和谈
- 渡江作战
- 太原战役
- 兰州战役
- 进军西南
-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 李宗仁的和平措施
- 国民政府迁台

七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经过伟大的战略决战，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将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主要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在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根据三大战役后的形势，毛泽东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有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战斗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实行和平改编；绥远方式，暂时保存国民党军队于局部地区，待条件成熟后再和平改编。由于革命的迅速胜利，各方面都需要大量干部，因此，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学校。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工作队。

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城市的工作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见史料)。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反对共同的敌人，建设新中国。

报告还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共产党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治方面，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应使这种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些，也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途径。为了加快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保证过渡时期的顺利进行，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警惕他们的糖衣炮弹。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真正成为合格的、为人民所信赖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地指出了党夺取政权后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适应这种转变，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材料：

-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后

材料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全国各族人民期待解放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其中乙项第十七条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 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 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 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

案;4. 批准军事计划;5. 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 决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项。"这次会议,实际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2月11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同志均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到达了西柏坡。二中全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在3月5日前已经筹备就绪。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会场设在一间长方形、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兴建的职工食堂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2人,加上工作人员共70人左右。

3月5日下午3时半,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首先,由周恩来同志报告了到会人数,宣布会议程序。接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题为"一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强调指出革命胜利后,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改善人民的生活。并及时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巨大的鼓舞。

会议共开了9天,其中大会开了8天。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轮流主持会议。会议期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发了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认为,自从七大以来,党中央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同志《关于时局的声明》;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个人突出,会议还作出了: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平列等重要规定。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廖承志、王稼祥、黄克诚等四人补为中央正式委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决定我党战略大转移的会议,是促进并迎接全国胜利到来的誓师动员会。会后,党中央准备迁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把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经石家庄和保定地区,25日胜利到达北平。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受到了各爱国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北平各界人民热烈欢迎。从此,党结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摘自林浓:《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材料二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它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余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下来。面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中央委员34人,邓颖超、王震、习仲勋等候补中央委员19人。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中国胜利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同时强调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意义。全会决议提出,为了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取得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以后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即"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全会号召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北平方式,即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全会号

召全党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有利于我军有利于人民的方式来解决战斗，取得胜利，并强调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全会着重讨论了在当时形势下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从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心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历史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并且是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全会同时指出，在这一新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做，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决议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全会提出了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并且规定了实现这个总任务的各项基本政策。决议指出，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工业占 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优先发展国营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错误。其次，我国国民经济还有 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类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错误。但是"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全会认为，应当逐步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其三，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民主革命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且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全会详尽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经济成份，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思想。全会估计到，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在中国的失败，它们还要千方百计地继续侵略活动，从事捣乱破坏，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仍将是非常尖锐的，这个斗争又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国内。面对这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全党必须学会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既要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又要和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全会要求全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鉴于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全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特别告诫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资产阶级的捧场所征服。为了保持谦虚谨慎，防止对个人

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还作出了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等重要规定。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就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总结了“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等十二条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促进了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并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了重要准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5日，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选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三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后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的重要报告中，说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战略决策的确定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标志着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结束和以城市领导乡村的开始。

为了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就要由西柏坡这个黎明前的“山村红都”迁往北平了。党中央机关搬家指挥部由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中央军委的领导组成，周恩来副主席为总指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照搬家指挥部的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开始忙着做进驻北平的准备工作。

为了使干部对形势和政策有正确的认识，对中央机关的干部进行了入城教育，进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及组织纪律性的教育。还组织了报告会，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特别传达了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和骄傲自满的几条重要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各单位都传达了入城初期的八条注意事项：（一）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入民家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和机密文件；（六）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大家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提高了对进城后应注意事项的认识。

鉴于历史经验，毛泽东主席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多次讲到要记取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教训。有一次，他给警卫人员讲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他说：“李闯王就是李自成，他领导农民起义，南征北战，好不容易才打进了北京城。可是，只做了18天皇帝，就又退出北京。因为李闯王进了北京以后，认为大功已经告成，应该享受了，叫人天天给他包饺子过年。后来吴三桂领兵打来了，李闯王没这个思想准备，抵挡不住，只好又退出了北京。因此，毛泽东主席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大家都表示进城以后一定要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又一次，毛泽东走进警卫班屋里，亲切地询问大家：“还有几天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你们进城工作准备好了没有？”又问：“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大家坚决表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要做好保密与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决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准备工作都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又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工作，都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毛泽东借生动的历史经验所讲的道理，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并为胜利进驻北平敲了警钟。

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移驻西柏坡时，主要是靠徒步行军的，这次进驻北平，条件已今非昔比了。为了保证中央机关转移行动顺利，杨尚昆主任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打电话，要他派汽车负责进行运送。3月21日，100多辆大卡车和11辆小汽车停在郭苏河滩里。

3月23日下午，春光明媚，阳光灿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乘坐小车，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告别了西柏坡，开始向北平进发。车队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前进。尽管因为忙于工作，没有休息好，但一路上中央首长精神抖擞，兴致勃勃。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出山区后奔驰在华北大平原上，经灵寿、行唐、曲阳，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到达唐县的淑闾村，在这里住

宿一夜。

3月24日上午，车队离开淑闾村，于中午抵达古城保定。保定是当时河北省委所在地，省委书纪林铁等领导同志迎接中央首长们到省委大院里休息。午饭后，林铁和其他省委领导汇报了保定解放几个月来省委的主要工作情况与体会。中央首长们听后都表示很满意，并作了指示。毛泽东说："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执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能认清形势，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同我们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解决多年来战争带来的创伤，为将来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打基础。"刘少奇说："你们也应该总结一下城市党的工作经验。在政权机关、在企业和事业单位、在街道等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这需要很好地总结一些经验。这方面的经验，对新解放的城市和地区来说，是很需要的。"周恩来接着说："资本家和保定地区上层的各界人士，对我们党的政策不一定认识得很清楚，这就需要靠我们做工作，多宣传中央公布的城市政策。对资本家要保护，要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使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长期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做出贡献。"朱德也指出："保定是河北的省会，是北平南大门的重镇，保定建设好了，将来对支援北平这个大城市，一定是贡献很大的。刚解放的城市，也要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进行破坏和捣乱。"中央首长乘汽车看了市容后，毛泽东回忆1920年到过保定的情景后深情地说："保定地区还是老样子，20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20年，保定一定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午3点半钟，汽车离开保定，继续向北行驶。经徐水县到达河北涿县，当晚宿住县委院内。当中央首长看了街道市容之后，毛泽东问："据说涿洲城很繁华，为什么城内冷冷清清？"县委书记回答说："国民党94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的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进城里来。"毛泽东说："现在为什么还不迁回来？"于是，县委遵照毛主席指示，很快便把商户都迁到了城内，使刚解放不久的县城秩序和集市贸易得以恢复正常。

叶剑英和滕代远等由北平来到涿县，向中央首长汇报了具体安排。听完汇报后，中央首长指出：党中央进入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要叶剑英参谋长、聂荣臻司令员和彭真书记计划好、安排好、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主管这次活动。

3月25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从涿县乘火车向北平进发，于早晨到达清华园火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到车站迎接。随后改乘小卧车前往颐和园，暂时在益寿堂里用餐休息。

下午3点半，中央首长乘小卧车从颐和园出发到达西苑机场。受到北平市党政军机关和各界人民群众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5时10分，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中央首长、乘敞蓬吉普车检阅了阵容严整的各兵种部队。

阅兵式完毕后，中央首长在叶剑英陪同下前往香山居住。在去香山的路上，毛泽东高兴地对警卫人员说：从现在起，就可以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还不是完全胜利，今天还不能开大的庆祝会，等全国都解放了，再开大的庆祝会，意义就更大了。随后住进香山西南名叫"双清别墅"的一个幽静别致的小院里。相传忽必烈在北京定都后，到西山捕捉金鹿，在梦中向金鹿射出两箭都射在地上，拔出箭后冒出两股泉水，故题名"梦感泉"。清朝乾隆皇帝游香山时看见梦感泉。喝了几口泉水又清又甜，于是亲笔御书"双清"二字。其他中央首长也在"双清别墅"周围院内居住，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分别驻在香山一带，对外称"劳动大学"。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同志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爱国民主人士代表，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陈叔通、许德珩等20多人出席了宴会，夜宴后柳亚子先生赋诗一首，诗云：

中国于今有列斯，万家欢忭我吟诗。
华拿陈迹休怀念，希墨元凶要荡夷。
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
伫看茶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这首诗反映了民主爱国人士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和赞颂毛泽东主席的心情。

此后，中共中央在香山领导进行了国共和谈和筹建新中国的斗争，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至5月才由香山搬进中南海。历史说明，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成绩非常出色，不仅没有象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而且定都北平，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更伟大的事业。

（选自《党史博采》89年12期，作者：王聚英、王二尧、邢庆洲）

国共北平和谈

背景介绍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基础。国民党为挽回败局，大放“和谈”空气，要求同中共重开谈判，以作缓兵之计。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国共双方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在北平正式谈判。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有周恩来（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和顾问屈武。在这以前，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并提出了保存国民党的宪法、宪政、国体、法统和军队等所谓和谈五项条件。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尖锐指出蒋介石所提的议和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宣布中国共产党为了减轻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但这次和谈必须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普遍拥护。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退居幕后指挥，代理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愿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二月十四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受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身份飞往北平，并于二十二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对和谈进行试探。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半个月的谈判，经过反复协商，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共同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共八条二十四款。为争取国民党政府签订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一再推迟了渡江作战的时间。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约定四月二十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黄绍竑、屈武携“协定”返南京复命。在幕后的蒋介石表示不能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和谈宣告破裂。当日晚，人民解放军即发起渡江战役。

材料　张治中的声明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内和谈空气日益高涨。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一行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赴北平，住六国饭店。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曾到溪口，很生气，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见他呢？”

张治中解释说：“第一，我是国民党员，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党员行动，总得让总裁知道吧；第二，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他可以遥控1个军乃至1个师的行动，我与你们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

周恩来听了觉得有理，气消了。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成立时，就进入黄埔，后任黄埔四期军官团团长。北伐时，他是蒋介石的副官处长，北伐军到武汉，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新成立的学兵团团长，以后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在军校任职10年，他曾五度出绾兵符，当过武汉行营主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战，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战，任第五军军长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任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不久前，他曾向蒋介石提出《对当前国事检讨和建议》，建议主动放弃戡乱主张，被蒋介石完全拒绝。

蒋介石说：“那还行！假使我们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就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

他还向蒋介石请示挽回颓势、扭转乾坤的方法。

蒋介石说：“扭转乾坤？哪有那么容易！从4月到现在，是最黑暗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总统。可我不当总统谁当总统？我在庐山就决定不当总统，希望胡适出来当选，可大家又不赞成我这样做，这是最大的失败。不过时局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国家的事，不是只看一时的现象，其中是有天意的。”

张治中这次到溪口，拿出准备参加和谈的草稿给蒋介石看。

草稿要求和谈开始前，双方就地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于驻在区域就地自行整编。还有好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

蒋介石看了之后对张治中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蒋介石、张治中和吴忠信3人，从蒋母墓庐的山径边走边谈。蒋表示：“愿意和平，终老是乡。”

张治中高兴地问：“总裁的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上发表否？”

蒋介石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南京后，马上把溪口之行写成新闻稿发表，并应邀在国民党立法院演说，慷慨激昂，博得了喝彩。张离南京赴北平那天，立法院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

张治中一行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宴请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参加的有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和秘书长齐燕铭；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和秘书长卢郁文。

2日至7日，双方代表个别谈话。

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北平分别会见6位代

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卢郁文。

“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毛泽东的言行使张治中放下心来，他根据南京和谈腹案和溪口蒋介石谈话指示要点，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问题和意见。

“关于战犯问题，蒋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愿意终老是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列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张治中提出可按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二三个月、四个月都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张治中还讲道，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进入富强和康乐的境地。

在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来北平之前，李宗仁偕甘介侯飞上海，确定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内有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这个代表团的组成显系摸底。22日，他们乘专机飞石家庄，商定国共正式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等问题，临别时带有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

7日夜11时，李宗仁致电毛泽东，重申谋和的决心。电报首先表示谋和诚意，其次是希望取消战犯条件，第三是要遵照孙中山遗嘱办事，即宪法、法统不必废除，政权不必接收，土改不必实行，官僚资本不必没收，反动军队不必改编，只要“国共合作”、“同守此义”，则其他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

毛泽东复电内容也是三点：第一点是强调八项原则。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第二点是“应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为标准。在此核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第三点是建议早日订立和平协定。

从上述电文中，看到双方针锋相对，相差甚远，但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人们还寄予希望，期待正式谈判的进展。

4月13日晚9时，国共双方正式谈判，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一排长桌放在大厅中间，两边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边后侧各有3张小条桌，是双方记录和列席人员的座位。

本来参加会前，国民党政府代表看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感到谈判严峻。如果从南京政府要求“划江而治”及“平等的和平”的条件看，相距十万八千里，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是“招降书”，也是“判决书”。国民党和谈代表感到事已如此，并且已到了北平，只好硬着头皮谈判，逐条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

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张治中分别发了言，各自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意见。

第二次会议，仍在勤政殿举行，这次会议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再三说明《国内和平协定》已吸收了各位大部分意见，是不可变动的定稿。4月20日前，如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马上渡江。

张治中作了较长的发言，其中说到：“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这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

张治中说道：“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孙中山总理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是总理去世24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惭愧与羞辱！我们今天有这个情绪。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

在觉得光荣……总之，从人类的思想潮流来说，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的责任，实在都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毛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看到国民党过去的错误的，尤其对于友党胸襟狭隘方面，所以才有今天放开胸襟，汇纳众流的表示。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敬意。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来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他对张治中先生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是熟知的，是非常尊敬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也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

对于张治中的感想，有一个驳难，周恩来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凭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是从远大的眼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的讲话十分得体，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以理服人。

和谈会议在10点20分结束，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后郑重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多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所以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大家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但是迟迟没有消息。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南京和平代表团几次电催，李宗仁、何应钦才在21日凌晨复电，完全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说它“是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该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曰人民解放军开进，二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

张治中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接到电报之后，粗略讨论，匆促抄一份给中共代表团。

这时已是21日上午9点了，当时太阳升腾，阳光普照，街头已叫喊“号外”：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一看报纸，解放军百万雄师20日夜在荻港、21日凌晨1时在江阴渡江成功，长江天堑已被突破，“划江而治”已成为泡影。

李宗仁既然反对蒋介石，逼蒋下野，并且致电表示接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为什么他又拒绝他派出代表团所签定的协议呢？特别是中共和他的朋友们劝说他们不要逃散，留在南京，可是他却偏偏逃到桂林，而且又到广州

自投罗网，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李宗仁要兵没有兵，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通，发号施令无人理，既不能和，又不能战，于是生气不干，一走了之。

他到桂林之后，蒋介石派人请他到广州继续执行代总统的职务，并亲笔写信说："我是国民党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因此，我决没有不支持你的道理。你到广州后，一切军政财权都归你掌握，我决不掣肘。"

在此之前，吴忠信曾找过李宗仁，说："现在蒋已很难应付下去了。我想劝蒋暂时退后一步，由你来代理总统，你赞成吗？"

李宗仁回答："在这严重的关头，我不孚众望，只有蒋总统才是中流砥柱。"

吴忠信说："我看现在只有你来，才能起缓冲作用。你如同意，我准备同蒋先生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绝不要向外人谈。"

李宗仁婉言拒绝了吴忠信的建议。

现在，李宗仁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深感为难，最后才表示："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他的心腹至交刘斐(1945年秋提出辞职，1948年秋方获批准离开南京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不久从北京来到广州，立刻会见李宗仁，并说："你这样作是替蒋介石负责，替他垫棺材底，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你自己都不应该。"

李宗仁无以回答，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刘斐。

刘看过信后，笑着说了一个故事："有个猴子蹲在树上，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后来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个桃子，再三诱惑，猴子看了桃子，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跳来跳去，徘徊瞻顾，经不起诱惑，终于下树取桃子，被捉猴的人一把捉住，套上了锁链。蒋信中说的一定把军、政、财大权交出，就等于那个桃子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他就是蒋的锁链，看你有什么作为?!

终于李宗仁被蒋介石的锁链锁住了。蒋介石则由后台转到前台，因而签订全面的和平协议已不可能。当时解放战争发展十分迅速，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全部解放，广州中央社连续造谣说张治中被共产党扣留，并对他进行攻击和诽谤。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北平的张治中发表声明："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北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留居北平已80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20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愧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要再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心而论，这8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24款就是实行这8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40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20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人民观感则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事变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

造时代，达成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几乎所有看了张治中将军声明的人，都认为它是一篇起义声明。

有的说：“这篇声明检查了过去，展望了将来，呼吁了国民党惩前毖后，和中共推诚合作。”

有的说：“张治中将军有政治家的风度，有革命的爱国的气魄。”

罗瑞卿看了张治中的声明，认为它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光明前途。他记得 1938 年 3 月，延安革命军民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13 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时，毛主席写了三副对联，其中一副是这样写的：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战线是和平战线的死对头。

这副对联很好，鲜明、透彻！用问答方式，生动巧妙地说明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的正确政策和它的基础，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毛泽东主席邀请张治中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时，张治中谦逊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从年初一做起。你的声明说：‘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它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欢迎。”

（选自《纵横》90 年 1 期，作者：张帆）

渡江战役

背景介绍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毁灭性打击，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剩下 100 多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不能组织系统的有效防御了。

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妄图用“和平攻势”作垂死的挣扎。对此，毛泽东在 1949 年元旦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对美蒋新的和平阴谋及其反动实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指出：这“不过是一个骗局”，是为了“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1 月 5 日，毛泽东为新华通讯社专门写了评论：《评战犯求和》。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实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即：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样，蒋介石的和谈阴谋被彻底揭穿了。蒋介石又在美帝导演下于 1 月 21 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引退”，充当幕后指挥，让李宗仁上台当代总统。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即假意表示承认以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蒋介石在幕后直接规定和谈的“限度”为“划江而治”，“即确保长江以南的若干省份的完整”；从而争取喘息时间，阻止或延缓我军向江南进军，实现其反扑革命势力的阴谋。

蒋介石在“引退”前的一个月，已对退居幕后指挥作了周密的部署，尤其作了人事上的部署。蒋介石的国防部，还制订并着手进行扩大军队的庞大计划。在两湖、两广、福建、江西、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设置 14 个“编练司令部”，妄想把在近三年反人民内战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军队全部恢复起来，把正规军重新扩充为 350 万到 500 万人。并已建立番号进行补充编练了 37 个军和两个师。同时，拟征壮丁 200 万，下令各编练司令部就地募兵，迅速补充。想在 3 至 6 个月内完成编练任务，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在长江苦心经营所谓，“从天空到水底的立体防线”，叫嚷：“共产党要过江，除非会水上跑步”。还集中残余陆军部队的大部，约 115 个师和海、空军主力，包括海军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约 130 余艘舰艇和 280 多架飞机，共 70 多万人的兵力，分布在宜昌至上海 1800 多公里的长江防线上。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率 40 个师约 25 万人，湖口以东由汤恩伯率 75 个师约 45 万人防守，企图阻挡我军渡江。

为了粉碎国民党假和平的阴谋，争取尽量缩短战争时间和减少战争的破坏，3 月 26 日，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从 4 月 1 日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国民党政府遂派以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于 4 月 1 日飞抵北平。双方代表谈判的结果，于 4 月 15 日拟定《国内和平协定》，中共代表团宣布，4 月 20 日为这个协定的最后签字日期。4 月 20 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骗

局终于被彻底揭穿和粉碎了。中共毛泽东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遂于4月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从而开始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

为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以及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共100多万大军实施渡江作战。并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五人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战斗。命令一下，全军立即行动，统一分为东、西、中三路大军。第三野战军的八、十兵团为东路军，担负上海以西的张黄港至南京西南的金河口的渡江；三野的七、九兵团为中路军，担负金河口至安庆东北的枞阳为渡口的渡江；第二野战军为西路军，担负枞阳至九江东的湖口为渡口的渡江作战。

4月21日凌晨，我百万大军在江北解放区人民的支援和江南人民游击队的策应下，利用成千上万只木帆船和大量的木排、竹筏横渡长江。中路军在裕溪口至枞阳镇之间发起进攻，一举将长江防线拦腰斩断，首先登上长江南岸。激战至23日，攻占芜湖、铜陵、南陵等地，主力向宣城方向疾进。西路军在贵池和马当间100公里正面渡江，以强大炮火摧毁敌人大部分前沿阵地，战士们高喊："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等口号冲上南岸；有的偷渡过江，待到敌人发现时，已与敌人碰面了。至23日，青阳、高垣、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全被我军攻下。东路军在江都东南的三江营至靖江以东的张黄港渡江。江阴两侧的敌军顽固抵抗并多次反扑，均被我军击退。22日，经我地下党长期工作的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宣布起义，活捉了江阴要塞司令，并掉转炮口射击国民党二十一军。国民党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分别向我登陆部队反扑，但经激战，不敌我军，纷纷向南溃逃。汤恩伯急令国民党五十四军向我军反扑，结果被我军消灭掉三个团，残部狼狈南逃。我军一举解放了镇江、丹阳、武进、无锡等地。23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东北面起义，加入我军。

当三路大军渡江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防线时，我东路军三十五军，对南京在北大门江浦、浦镇、浦口地区发起猛攻，威逼南京。23日，前线指挥部命令三十五军立刻正面渡江，攻取南京。渡江部队立即扎木筏、造木排，争先把红旗插上蒋介石的"总统府"。一支侦察小队划小舢板偷渡到南岸，把下关电厂工人支援的一只"京电号"渡轮开往江北，部队立即乘此渡轮驶向南岸，部队战士登岸后立即奔赴蒋介石的"总统府"，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插上我胜利的红旗，宣告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治的灭亡。

接着，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分路向南向东挺进，于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兵团。至4月下旬先后攻占浠水、黄梅、荆门、汉川等地，向长江北岸挺进。5月14日，四野的一部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16、17日解放了华中大城市武汉。二野为配合四野渡江作战，5月17日解放了九江，22日解放了南昌。

整个渡江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一个月左右的战斗中，先后解放了南京、杭州、武汉、南昌、上海等120余座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闽北、鄂东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共歼敌437000多人，为我军进军福建、中南、西南各省，解放全国大陆，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材料：

-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 强渡长江
- 南京完全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
- 江南人民的使者
- 百万雄师横渡
- 红旗插上南京城
- 解放上海之战
- 宜将剩勇追穷寇

材料一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

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材料二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二时电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材料三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江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一，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到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材料四　强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前线记者阎吾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安庆、芜湖间某地敌前强渡长江时的情景称：二十一日黄昏，江北某地解放军的阵地上空，突然升起银光四射的发光弹，顷刻，整个北岸阵地发出了震天动地的雷鸣，从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上，无数道火线飞向南岸，接着整个南岸国民党匪军的阵地就完全陷于一片火海中。炽烈的炮火映红了江面和天空。接着，从各个港口涌出了无数只大小船只。它们立即散布江面，象箭似地向南飞驰而去。北岸的江边，站满着当地的居民、民工和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大家都屏息凝视着火光掩映的江面。忽然，在南岸飞起了登陆的信号，枪炮声、杀喊声连续不断。北岸所有的人们立时迸发出一片欢呼："过去了！""过去了！"无数只船继续从各港口涌出来，加速向对岸驰去。对岸的解放军则开始不断发出前进的信号，和响起前后各部队间联络的号音。在宽阔的江面上，解放军的指挥灯不断闪耀着。渐渐枪炮声、喊杀声越来越远了。工兵们紧张地安排起许多码头，无数民工忙着把无数的弹药、器材、粮食、菜蔬送到船上，随着大军运过江去。这时，在大江南岸，布满着匆匆登岸的解放军，到处可以听到船工们和解放军战士们兴奋而亲热的告别声："同志们，再见了！""老乡们，辛苦了！南京再见！"

材料五　南京完全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

新华社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十五时电　国

民党二十二年反革命中心南京，已于二十三日午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受到学生和市民的热烈欢迎，男女学生们纷纷向解放军献花致敬。人民解放军已布告安民，城内秩序安定，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在发起渡江作战后三天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便攻占这一全中国第一个大城，这说明解放军威力的强大，国民党匪军一触即溃，已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材料六　江南人民的使者

中路解放军渡江前的一个夜里，警戒江岸的一个解放军侦察员，发现薄雾迷蒙的江面漂着一个黑色的东西，渐靠近岸来。侦察员跑向前去一看，原来是一捆芦苇，上面却紧紧地爬着一个人。侦察员用力把这人从水里拉起来。他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冻得只是发抖。他一上岸，就断断续续地说：

"你是解放军同志吗？"

当侦察员回答他正是解放军时，这人立即抓住他的手，深深地吐了口气说：

"可找到了！"

他从嘴里掏出一只手指粗的小瓶，揭去密密封着瓶口的腊，取出一个搓得紧紧的小纸卷来。纸上密密细细地写满了字和画着图，只有用扩大镜才能看清楚，这是一封江南人民请求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去的信，和一幅长江南岸的地图。

这个从江南漂来的勇士是一个江南人民游击队员，他受着江南千百万人民的托付，携带着信和地图过江来找解放军，当他达到江边时，国民党匪军在南岸布满了层层岗哨。他便乘着天黑溜到了江边。但江面早已封锁了。茫茫的江上哪里去找船只，江南千百万人民的托付使他忘了生死，他把小瓶含到嘴里，抱起一捆芦苇，纵身跳下了大江。江心风紧浪大，芦苇在滚滚的急流中不住打转，浪花时时淹没了他，寒冷的江水把他冻得发僵，但是江南人民的热望支持着他。他从天黑六点钟一直漂到午夜三点钟，整整和狂风恶浪搏斗了九个钟头，终于他到达了北岸，完成了使命。

这位勇敢的游击队员的英雄业迹把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都感动了。他们紧紧地围着他，给他生火取暖，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替他穿上，兴奋地听着他讲述江南人民对解放军的盼望和江南游击队艰苦斗争的故事。这位游击队员的到来，使云集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和南岸人民的心完全连在一起。（白艾）

（新华社1949年4月28日电）

材料七　百万雄师横渡

长江历来是用兵的险地，江面宽阔，水流滚滚，白浪滔滔。公元208年，曹操率兵二十多万，从今湖北江陵顺长江而下，进至赤壁，被孙权、刘备五万人击败，伤亡惨重，退回北方，之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自此长江就被历代兵家视为"天险"。

蒋介石与他的高级将领们认为："天险"再加上七十万大军和占绝对优势的美式飞机、大炮、兵舰，能够维系半壁江山。所以他们才敢于在4月20日把所有和平的诺言一笔勾销，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

4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示："谈判至十五日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1949年4月20日黄昏，我军事前隐藏在江堤后面的船只，一齐出动，翻坝入江，江北岸宁静的气氛刹时变得火热起来，上千条大小船只在江北边逐渐展开。

敌人发觉了我军的行动，炮弹飞过长江，轰隆隆地在江堤后面爆炸。我强大的炮兵立即进行了严厉的还击，炮战拉开了渡江大战的序幕。

20日晚20时，在水面上待命的大小船只，象离弦利箭直向江南射去。中路大军突击开始了。

在一百多公里正面上，第一梯队×、×、×、×军利用夜幕的掩护，或是秘密地，或是强行地进行航渡。一个小时后，先头部队占领了鲫鱼洲、紫沙洲、闻新洲等江心洲。大部队接着立即强渡长江。

夜幕中的百里江面上，数千只木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柱，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横扫之下，跌落下来，象一朵朵巨大的水花。从江北看去，每只船后挂着的红色小指示灯，如火光点点。整个渡江的场面宏伟壮观，激动人心。

至21日，中集团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峨桥等地，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进攻。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我中集团突破敌江防后，敌全线震动，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21日赶赴芜湖布置堵击，但已无济于事，敌人的江防已被我拦腰斩断。

当日晚，粟裕、张震指挥下的东集团分别在两处地段实行强渡，一处是张黄港至龙窝口镇之间，另一处是口

岸、三江营和京口之间，直接威胁南京和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面对的敌人是刘汝明的第8兵团，根据敌人的特点，刘伯承决定：第5兵团司令杨勇、政委苏振华指挥×、×、×、×军，在望江到大渡口之间突破；第3兵团司令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指挥×、×、×军在大渡口至乌沙闸之间突破；第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军在彭泽至马当之间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保证我军渡江部队的翼侧安全。

4月22日，西起湖口，东至江阴，千余里江面上，万船竞渡。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浩浩荡荡地开过长江。各兵团的后续梯队、炮兵部队、后勤保障人员，争相登船，大小船只来往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从西向东喧嚣的长江急流，被从北向南人流的喧嚣掩盖下去。

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犹如一道沙堤，在我解放军潮水拍打之下，迅速崩溃，千里江防毁于一旦。斗志不坚的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四散奔逃。

面对如此惨重的败局，蒋介石回天乏术，汤恩伯气急败坏，白崇禧按兵不动，其他国民党将领只好听天由命。

4月23日，叶飞、韦国清的10兵团已经切断了南京与上海的联系，陈士榘8兵团吴化文×军攻占了江北浦口，南京成了一座孤城。23日晚，我×军从浦口渡江，至24日凌晨3时，占领伪总统府，从此宣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结束了。

至23日，我已完成战役突破，东、中、西三个集团已展开于长江以南，并深入敌防御纵深30至70公里，夺取了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芜湖、铜陵等一大批城市和广大的地区，为下一步追歼逃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选自《百战图》，作者：李景）

材料八　红旗插上南京城

胜利渡长江

四月二十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的消息传到长江前线。毛主席在命令我中路大军横渡长江的同时，命令我们包围两浦的部队，直下两浦，威逼南京。

在此以前，为了给南京反动政府悔悟的机会，毛主席曾多次指示，不要攻占两浦，不要炮击南京。现在，和平的大门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死，我们只好发兵开炮了。按照军部的部署，我们师直插浦镇到江浦城之间的公路，切断两地守敌的联系，扫除扼守这一线各山头的敌人。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经过两天激战，我军全歼江浦守敌一个团。并先后占领了浦镇以西的大顶山、二顶山等制高点。两浦守敌，在我军猛不可挡的攻势之下，恐慌万状，于二十二日夜，仓促渡江南逃，缩回了南京。二十三日上午，我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敲开了从正面进攻南京的大门。

战斗开始以来，停泊在江心的七八艘敌舰，昼夜采取排炮急袭，特别当我军向江边逼近时，打得更凶。炮弹击响敷设在公路上的地雷，响声震天。公路上尘土弥漫，遮日盖天。洼地池塘里的鱼儿，被震死飘浮水上，白花花一层。看样子，反动派把它们看家的老本都兜出来了。我军冒着密集的炮火，一路飞跑，通过洼地水塘，一口气追打到长江边后，敌舰才收起它的“威风”，放起烟幕，向下游逃去。南京城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了。

踏上江堤，不用望远镜便清楚地看到了下关车站、轮渡码头。郁郁葱葱的紫金山、清凉山环抱着南京城，脚下奔腾的长江，正好卫护在山口城边，真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势。我长久地望着对岸，望着这个反革命大本营，使我回忆起刚参加红军的时候，手里举着梭镖，呼喊着这样的口号：“打到南京去！”那时，总觉得这个路程十分遥远，现在只要跨过这条大江，就是南京了！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欢乐和欣慰。

二十三日中午，在浦口火车站一座空房子里，军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军首长向大家宣布说：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已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敌人全线崩溃，我军正从左右两面向南京逼近。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军立刻从正面渡江，直取南京城！

历史的使命，光荣的任务，激荡着每个同志的心。大家喜形于色，彼此交换着眼神，好象在说：“同志，南京城里见！”可是，一谈到过江，同志们脸上又现出几分忧虑：哪里去搞渡船呢？按照整个渡江战役的安排，我们这一路没准备强渡长江的战船，现在沿江的大小船只，全部被敌人搜罗一空了。这时何克希政委用宏亮的声音说：“同志们，必须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扎筏、造木排，向对岸敌人夺船，各种手段齐下！哪个部队最先渡过长江，把红旗插上‘总统府’，给哪个部队请功！……

师与师、团与团相互展开了竞赛。谁都知道，攻占南京城，把红旗插上“总统府”，就是向全世界宣布：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蒋家王朝灭亡了！现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战士们兴奋地奔跑着，寻船，搜集木料，赶造木排。码头工人、铁路员工，热情地帮助我军，希望我们尽快地打进南京城。

傍晚时分，我从连队刚回到师指挥所，突然接到军部电话：要我们停止扎筏、造木排，立刻准备渡江。这消息令人兴奋和意外。一打听，原来兄弟师的一支侦察小队，划着小舢板偷渡过江，从下关码头搞回一只渡轮来。并且带回消息：南京敌人已经逃跑了。

当晚，我全军分批从浦口码头起渡。南岸许多被敌人掳过去的民船，也纷纷划过江来，迎接我军渡江。大江两岸，灯火辉煌，歌声阵阵。二十四日拂晓，我随师指挥所刚登上下关码头，消息接连从市区传来：

占领紫金山、红山！

占领“总统府”！

占领蒋介石的官邸，墙上还挂着淮海战役的形势图……

三天以前，敌人江防指挥部的要人，还借古喻今自我安慰，说什么“共军要过长江，必遭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结局”，事到今天，它们自己的结局，却远不如损兵长江的曹操了。蒋介石卷土重来的迷梦，彻底破灭。中国人民庄严的宣布：反革命王朝灭亡了！

敌人防守南京的卫戍部队——暂编第四师，弃城而逃。城里只剩下一些散兵、特务，埋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东窜西游。偶尔甩出一颗手榴弹，打上几声冷枪。这些垂死挣扎的匪徒，随着我军快速前进的脚步，消失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支柱美帝国主义，几天前，还有点跃跃欲试，把舰队摆在吴淞口，现在也收起它那副纸老虎的架式；南京城里，只有一个司徒雷登——美国驻中国反动政府的“大使”，还垂头丧气蹲在“使馆”里。这个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在中国做尽了坏事，也许还幻想什么，还想看看风头。他又看到了什么呢？他所看见的，是我军手中的美国武器，是南京人民欢迎我军入城的行列！

我们沿着中山马路，阔步前进。太阳高高地升起在紫金山上空。马路两旁，满是欢迎的人群。许多楼房的窗口，探出人头，露出笑脸。有人对我们挥手，有人仍出雪片似的花纸；许多工人、学生热情地跑上来，和我们握手，有的说：“你们是神兵，好象从天上飞来！”有的说：“天天盼，到底盼来了！”一队队有组织的学生队伍，打着校旗列队在新街口，高唱着他们早就学会的歌：“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渡过长江……”

王朝末日

四月二十四日，南京换了人间。红旗满城飘。几架美造的蒋机，在高空盘旋。凄凉的呜咽声，好象为灭亡的反动王朝哭丧。许多被反动军队遗弃的伤兵，拄着棍子、端着碗，沿街讨饭，打劫；许多“官府”里乱七八糟，楼梯下、墙拐角、厕所里，满是丢弃的金元券。国民党的党旗、国旗和蒋介石的画像，到处丢着，让人们踩来踏去。当我们乘车来到“总统府”门前一条街上，只见一面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在“总统府”门楼上。这儿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又是一个丑剧的舞台。蒋介石之流，为争名夺利，不知在这儿演过多少幕丑剧[illegible]们听说过，伪“国大”开会期间，有人因当不上“[illegible]大[illegible]”，抬着棺材在这门前游行、哭闹。

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总统府”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地上、走廊里碎纸乱飞，一片狼藉。走进最里头一幢房子，便看见了蒋介石的“宝座”。写字台的日历，翻开到“四月二十二日”。它好像摊开双手，对我们说：请看，这是反动王朝的末日！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建立起他的反革命政府，几乎一刻钟也没停止过反共反人民。二十二年来，他象念真经一样，念着：“共产党不灭，死不瞑目。”“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十年内战中，他坐镇南京，不顾民族的危亡，大量兴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八年抗战，他始终执行着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抗战胜利以后，他又靠着美国的飞机、大炮，进攻我解放区。“全面进攻”、“重点进攻”、“三个月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今天，他是到了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的地步，永远从这个“宝座”被踢开了。

这天晚上，军部接到情报：从南京城逃出的敌卫戍部队暂编第四师，逃到了城东的汤山一带。他们见大势已去，声言要和我军谈判。

谈判，这是反动派一贯玩弄的把戏。蒋介石不止一次耍这种手段。抗战胜利时，他的部队远在大后方，一时运兵不及，便假惺惺地和我们党举行和谈。待他们部署发动内战的部署就绪了，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兵进攻解放区。接着，我们党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团，也被迫撤回。战争打了两年多，国民党损兵几百万，眼看人民解放军要过长江了，蒋介石退到幕后，撑出个“代总统”李宗仁来，高叫“和谈”。他们最后又拒绝了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现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南京剩下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竟然也学着蒋介石的一套，“谈判”来了。

军首长把这次任务交给我，指示说：敌人要谈判，可以谈。但是条件只有一个，和平放下武器。我领受任务后，先派联络人员通知对方，第二天一早，乘车到了暂编第四师师部驻地。

两个军官迎出门外，一个自称是师长，一个自称副师长。他们毕恭毕敬，把我引进一个临时布置的客厅里，捧茶奉烟，十分殷勤。那位师长说：他们早已看清了大局，选择了道路，听说我军过江，就抱定决心，坚决不撤走，等候人民解放军过江。现在希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好一个“希望”！我压制住愤怒问：“你们既然早就看清大势已去，又有此希望，为什么不早派人向我军接洽？”

一句话问得他张口结舌，无言可对，这时副师长赶忙说：“贵军一过长江，我们就派人去联系，没联系上。”这更是一片谎话。我军进南京好几天了，南京城里人民欢声如雷，到处欢迎解放军，他们竟然会和我们联系不上！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说什么这支部队中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把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叫来，说她就是共产党

的地下工作人员。我询问她所谓"党组织"的情况。她说师部有总支,连里有支部。问她总支和支部的组织成员,她支支吾吾,拿出一份"党员名册"。

晚上,我回到南京城里,向军首长汇报了情况,在南京市委的配合下,经过调查了解,这个暂编第四师,是渡江以前被我打垮的一支部队扩编而成的。其成员大部是搜罗的警察、宪兵、流氓、散匪。"党员名册"完全是捏造的,企图打入我军内部,作长期的埋伏。他们这种拙劣的伎俩,实在令人可笑。

军党委决定:先把它调至土桥镇等地,然后争取它和平放下武器。这样不致影响南京市内的秩序。经过一番周折,这个师的阴谋被彻底揭穿,最后四个团全部被我军缴械。

在此同时,我军把潜伏在南京市区的溃兵、散匪大部肃清。仅我们一个师,就捉到三千多俘虏。缴枪一万多支。散匪的名目繁多,什么"局",什么"所",什么"支队"……象大树被砍倒后的树根,一一被挖出来了。

在蒋家王朝"国民大会堂"里,长期坚持在南京的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和我们欢聚在一起,举行了会师庆祝胜利大会。刘伯承司令员讲了话。他说:反革命二十二年的统治彻底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了!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要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宋献璋,选自《星火燎原》之十)

材料九　解放上海之战

原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同志在他的回忆录《淞沪攻坚战》中写道:

13日晚上,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担任主攻的二六○团和助攻的二五三团立即发起攻击。战士们锐不可当地向月浦前沿阵地冲去。这时,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所有的敌堡,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和冲锋枪疯狂地吼叫着。我们部队受到阻挡。清晨,在前沿阵地上,浓密的硝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几座中心敌堡仍然时断时续地在扫射着,战士们急得直咬牙,心中燃烧起复仇的火焰。……

在这个阵地中,敌人采取主堡与小堡相结合、暴露与荫蔽相结合的方式,以构成子母堡式的交叉火力网。主堡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一米多,外面再铺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因此抗力很强。主堡周围是小堡,用土草堆顶,或利用土堆、田埂筑成,比较低矮,远看象坟包,很不容易察觉。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散堡,不规则的分布在阵地各处,以补主堡火力的不足。……副防御设施也很强,由外朝里一般有四道障碍。……

事实确实如此。经过13日晚至14日拂晓对月浦、杨行的彻夜激战,不但正面攻击受阻,实行翼侧穿插亦不能得手。我军已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的要塞地域,由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到吴淞口距离六七十公里,要在一天之内攻克这一要塞地域到达吴淞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我就决定放弃于15日到达吴淞口的原定作战部署。决定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述,逐段、逐点攻击。并将战况和我的部署意见报告野司。粟裕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批准我的部署,并增派生力军及特种兵纵队归我指挥,担任攻取敌永久性要塞设防区域之任务。

我军对月浦、杨行、刘行设防地带改用近迫作业攻坚战述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军每天每次攻击可以前进二三公里,伤亡也减少了。

5月中旬,一直是阴雨连绵。我军的进攻缓慢地、但是有成效地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榴弹炮、山炮、步兵平射炮……掩护步兵前进。步兵则送炸药包,爆破碉堡工事,爬上敌堡摆手榴弹的,用长竹竿挑着集束手榴弹炸敌堡枪眼的……

"吃一堑,长一智。"吃了亏,就谨慎了,战役发展也就主动了。野司重新调整部署,决定提前从正面发起攻击。正面发起攻击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和过迟都不行。早了,增加攻击的困难;迟了,敌人要破坏城市。它只能在敌人准备撤退而又在搞破坏之前,就要抓准这一时机。

24日,九兵团从正面发起攻击,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二十三军由龙华攻入市区,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25日清晨,我兵团二十九军攻占孙宅、南北曹宅,潮水般地向宝山、吴淞口方向席卷。浦东地区的我三十一军也于25日攻克高桥。

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把他的司令部搬上兵舰,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也把他们的指挥所迁到吴淞口要塞炮台上,作逃跑准备。26日,我军攻克大场、江湾、吴淞及苏州河以北市区,歼敌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大部和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一部。汤恩伯仓惶率五十四军及十二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余部向海上舟山群岛方向逃跑,码头上敌作一团。2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二十一军及一二三军残部向我军投降。我军共歼敌153000余人。

美国军舰逃到公海上,无可奈何地看着上海人民欢庆解放!

(选自《征战纪事》作者:叶飞)

材料十　宜将剩勇追穷寇

兵败如山倒。与我军的节节胜利相对照,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极为混乱,溃逃的人、马、车在路上拥挤成一团,公路两旁到处可见被丢弃的弹药、物资、公文、衣物,成团成营的部队如同武装的土匪,掳掠、烧杀、奸淫,留下一路哭声、叫声、怒骂声和一家家空荡荡的店铺。汤恩伯集团分

成两股向东南和西南撤逃，企图调整兵力，在浙赣线重新构筑防御。

从4月24日开始，我军渡江作战进入追击围歼逃敌阶段，总前委要求各部队迅速歼灭敌人，不使敌人退到新地区组织防御。

第三野战军在粟裕、张震的统一指挥下，组织了八个军围追堵截南京、镇江逃敌。

×、×、×、×军由西向东，向广德、吴兴方向追击，切断南京、镇江地区逃敌向杭州和浙赣线的退路。

×、×军自北向南，沿太湖两岸，顺宜兴向吴兴追击，割裂南京、镇江逃敌与上海守敌的联系。

×、×军由金坛、溧阳尾追逃敌。

粟裕下决心要吃掉汤恩伯的七个军。

在第三野我军追击围歼敌人的主战场之外，粟裕还令×军夺占苏州，构成堵截溃逃之敌的第二道包围圈；令×军取道泾县、宁国，夺取杭州。

聂凤智带着军前进指挥所走在前面，军部也赶得很快，有些先行的部队竟也被军部抛在后面。4月27日，军部赶过几个部队，到达界牌，刚端起饭碗，北面枪声大作，哨兵和侦察员同溃逃的敌人接火了。警卫部队立即向敌人冲击，一门因炮车故障而掉队的先头部队的大炮刚赶到此地，立即向敌人开炮，没几下，战斗就解决了，俘虏了好几百人，可见敌人早已丧失了斗志。

×军追击甚急，结果走到了敌人的前面，没有经过较大的战斗。八天八夜的急行军之后，×军终于于4月28日下午2时，在吴兴的虹星桥和×军的先头胜利会师，封闭了汤恩伯七个军逃往杭州的去路，完成了总前委钳形合击的部署。

成钧指挥×军在解放繁昌之后，以每昼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在×军后跟进，23日晚追上敌20军后续部队，立即与敌激战。24日包围敌王牌部队20军。战至黄昏，消灭敌人大部，军长杨干才被击毙。此后，×军又向郎溪继续追击，27日占领郎溪。

我×、×军亦由西向东，经南陵、宣城向广德前进，与×军协同，阻住了敌人向浙赣线逃窜，将敌堵截在广德以北山区。

朱绍清指挥×军由北向南，展开平行追击，先头×团，在占领宁沪铁路上的戚墅堰时，击退强弩之末的汤恩伯王牌54军。接着，在副军长肖锋的率领下，翻山越岭，穷追猛打，经宜兴、长兴，于28日下午2时到达吴兴附近的虹星桥，与×军先头会师，截住了敌人东窜之路，扎紧了口袋。

陶勇指挥×军，在金坛截歼敌50军后续部队一部后，又立即令×师尾追敌51军主力，在溧阳歼敌五百余名。25日凌晨占领溧阳，后又在溧阳阻击敌人，歼俘敌九千余名，将敌压缩到溧阳、宜兴以南、广德以北地区。

刘飞的×军在京杭国道上拦截敌人，26日上午正准备向广德方向追击，发觉老河口一线有敌数万，×、×师立即出击，俘敌一万四千余名。

27日，胡炳云指挥×军解放了苏州，4月30日宣布韦国清为苏州市军管会主任，惠浴宇为市长兼市委书记。苏州的解放，有力地阻止了上海之敌对被围于郎、广之敌的增援。

4月28日，粟裕电示宋时轮、郭化若、叶飞、韦国清，令他们指挥9兵团×、×、×、×军，10兵团×、×、×军，从四面八方围歼郎(溪)广(德)山区之敌。

汤恩伯集团的第4、28、45、51、66、99军及20、88军残部，被我第三野战军东堵、南阻、北压，西南又是长江，无路可逃，拥挤在郎溪以东广德以北山区，狼奔豕突，建制混乱，指挥失灵，十万之众乱作一团。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29日上午，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

在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谭震林指挥7兵团×军加速向杭州挺进。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3日占领杭州，7日宣布谭震林任杭州军管会主任。

与第三野战军相比，第二野战军追击的正面宽，纵深大，在四百里宽的正面上，以徽州、上饶、贵溪为目标，在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下，三个兵团分为三个主攻方向，密切协同，独立作战，多路向南，展开了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千里大追击。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命令部队，对溃乱之敌要采用平行追击与跟踪追击相结合，猛追猛打，要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根据这一指示，各部队大胆穿插、迂回，以每天八、九十里，甚至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勇猛追击。

最先展开追击的是陈锡联、谢富治的第3兵团，该兵团以×军×师为前卫，向徽州疾进。

头两天，×师在师长李德生的率领下，冒雨穷追二百余里，解放了青阳、石埭、太平。接着又翻越上下四十里的大山——西善岭，如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徽州城郊。为了不让敌人再次逃掉，李德生令×团迂回七十里，插到徽州东面，切断徽杭公路，只用身边剩下的一个团——×团担任正面攻击。4月28日，徽州解放，逃离徽州之敌也被全歼。×师以两个团的兵力歼敌六千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徽州解放之后，×师继续追击，越淳安，过建德，又于5月6日强行军一百五十里，直扑金华，深夜解放了浙赣线上的重镇金华，消灭敌88军一千八百多人。

曾绍山军长指挥的×军翻过皖南山区，越过屯溪，5月6日占领龙游。在追击过程中，×军中有六名战士遇到了好几百敌人，战士们齐声大喝："缴枪不杀，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往哪里逃！"如惊弓之鸟的敌人完全被慑服住了，排起队来举手投降。

杨勇、苏振华指挥第5兵团为第二野战军中路，突破江防后，以尹先炳军长指挥的×军为前卫，一路追击，虽未遇到敌人的严重抵抗，但行军却也异常辛苦。

4月26日，×军×师×团一个班化装成敌人放开脚步在大道上猛追，赶上敌人时，他们态度自然地走进敌群，说是96军掉队的。待行走一段路程后，他们告诉敌人，自己是人民解放军，要敌人放下武器，并把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作了解释，当即就有九十余名敌人停止了继续逃跑，放下武器做了俘虏。

5月1日傍晚，×军×师进击婺源。2日3时占领婺源城，敌大部弃城南逃。逃敌在我×师的尾追之下，未跑多远，又遭到×师的迎头痛击，被打得落花流水。

杨勇、苏振华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南追击，于5月5日抵达浙赣线，占领玉山，6日解放衢州、江山，8日越过浙赣线，继续向南追歼李延年兵团。

陈赓的第4兵团位于追击大军的左路。4月23日，陈赓率少数参谋人员渡过长江，立即命令×、×、×军冒雨急向浙赣线挺进，千里跃进，直出上饶、弋阳地区。

5月3日，周希汉的×军解放弋阳。

5月4日，秦基伟的×军连克浙赣线上的横峰、上饶及其以南的广丰，×师又向南奔袭一百四十里，在铅山歼敌一部。

5月5日，李成芳的×军占领鹰潭、东乡，继又前出浙赣线南，7日解放金溪、临川。

第二野战军的三个兵团象三股决堤的江水，几天流遍皖南，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又把使人新生的甘泉灌溉到江西东北和浙江大部土地。

千里正面上，百万大军千里追击，歼敌数十万，解放苏南、皖南、浙东、闽北数十万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至5月7日，渡江战役追击阶段结束，下一步要集中力量同汤恩伯、白崇禧的最后主力决战了。

（选自《百战图》，作者：李景）

太原战役

背景介绍

一九四八年七月晋中战役后，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后改称第十八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该兵团及晋绥军区第七纵队（后改称第七军）、晋中军区等部共十七个旅八万余人，发起太原战役。太原为华北战略要冲。阎锡山集团驻守五个军部、十三个步兵师和三个暂编师约十万人，并具有各种不同口径的火炮六百余门。太原号称"攻不破的要塞区"。

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围战斗。十月二日，阎锡山集团以七个师兵力，分三路沿汾河向南进犯。当敌中路暂编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进至小店镇、南畔村等地，华野以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于五日分别包围了小店、南畔村之敌；第七纵队一部由清源东渡汾河，插入小店以北，切断小店之敌与太原的联系。华野以猛插分割，速战速决的战术，从南面和北面两个方向突破敌人防线，打开了守敌东山缺口，占领了武宿机场，战至十五日，全歼暂编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等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当敌注意力被吸引到太原城南而东山防线薄弱之际，华野将城南第七纵队秘密北调，十月十六日起，将攻击重点指向东山守敌，以第七、第十三、第十五纵队和第八纵队一部，在晋中军区部队配合下，向东山防线发起全线攻击。至十九日，先后攻占大北尖、石人梁、黑驮、牛驼寨等阵地，歼灭守敌一部，迫使罕山守敌一个团投降。国民党军集中主力第三十军和暂编第十总队，连续多次对牛驼寨进行猛烈反扑。经三日激战，该阵地大部被毁，解放军伤亡较大，遂于二十一日撤出牛驼寨。华北野战军再次调整部署，于十月二十六日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村等太原城四大要点展开全线攻击。至十一月十三日，各纵队先后占领了四大要点，歼灭守敌二万余人。在此期间，晋中军区部队攻占城北青龙镇、城南许坛和汾河两岸南北堰等据点，紧缩了太原城的包围圈。为稳住华北傅作义集团，防其南逃西撤，中共中央军委于十一月十六日发出缓攻太原的电令。太原前线解放军遂转入围城休整，采取长围久困，逐步削弱敌人和开展政治攻势相结合、待机歼敌的方针。至次年三月，瓦解敌守军一万二千余人。

战役第二阶段是攻城战斗。平津战役后，华北野战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原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与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进抵太原前线，会同久围太原的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原第七纵队），共约二十五万人，准备总攻太原。为统一指挥太原前线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徐向前任书记，并担任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月二十日晨，总攻太原外围战开始。第二十兵团和第七军一部，由城东北、城西北向北区守敌攻击；第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由城南、城西向南区和西区攻击；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主力，由城东向仓库区进攻，并配合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作战；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华北军区炮兵第三师由太原前线司令部直接指挥。各部队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各个歼灭敌人。战至二十二日，敌外围五个防区均被攻占，守敌十二个师及一个总队大部被歼灭，各部队已直逼城下。四月二十四日晨，解放军一千三百多门火炮和连续爆破将城墙打开了多道缺口。六时十五分，从东、南、西北三个方向发起攻城，第二十兵团首先突入城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也相继攻入。至此，各部队以多路向市中心猛插，九时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全歼太原国民党军，俘绥靖公署副主任孙

楚、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等，太原遂告解放。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二万四千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近四十年的统治。

材料：

- 东山战斗
-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 解放“碉堡城”

材料一　东山战斗

二十六日夜间，我军发起总攻，四大要点争夺战全面展开。

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十七个昼夜。敌我双方的主力部队，均先后投入战斗。我军投入战场的兵力有二十七个半团，占总兵力的五分之四以上；阎军除守备西山的两个师和一个工兵师，以及守备城南和城北的各一个师外，其余各师均全部或一部投入战斗。双方参战的各种火炮，达八百余门。

“困兽犹斗”，一点不假。守敌虽处在我军的严密包围和猛烈攻击下，但因受阎锡山的毒化教育甚深，有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作依托，战场上又有“执法队”严厉督战，故相当顽固，与我死打硬拼，寸土必争。我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攻坚破垒，不拿下东山誓不甘休。每占领一块阵地，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以上的突击；巩固一块阵地，要打退敌人五次、六次、七次以上的反扑。有些阵地，时而被我攻取，时而被敌夺回，反复拉锯。在牛驼寨，我西北七纵打得异常艰苦、顽强。总攻发起后，该纵以三旅担任主攻任务，十二旅为第二梯队，相继投入战斗。守敌两千余精锐部队，拼死顽抗，猛烈反扑，使我伤亡甚众，攻势受挫。后将警备二旅亦投入战场，至十一月二日，七纵控制了除庙碉以外的大部阵地。以后，以七旅攻击庙碉，与敌反复争夺，至十三日全歼守敌，终将庙碉攻克，全部占领牛驼寨。战斗中，我三旅八团、十二旅三十六团、七旅十九团和二十一团、警备二旅四团和六团，均付出了重大代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小窑头，我八纵七十一团经连续奋勇突击，攻占第十三、十四号阵地后，敌集中强大炮火猛烈轰击，并施放毒气弹，烧夷弹，掩护三个步兵团反扑。经七小时反复冲杀，七十一团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阵地；次日，十四号阵地复被我七十团夺回，但十三号阵地仍在敌手。又经过两天的反复冲杀。我十四号阵地再次失而复得；十三号阵地亦重新夺回，敌两个连全部就歼。在淖马，我十五纵发起攻击后，经一天激战，即打垮守敌，占领主阵地。敌“执法队”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八总队一团二营营长姜啸林等二十余人枪毙。接着，敌集中第四十师全部、八总队大部，向我阵地疯狂反扑，两天内反扑十九次之多，均被我杀退。部队乘胜反击，又夺占六个阵地，歼敌一部，我四十四旅政治委员李培信，不幸牺牲。在淖马炮碉争夺战中，四十三旅二一七团打得最为出色。十一月上旬，该团在摸清敌情、周密准备后，向淖马村西炮碉阵地猛攻，五个小时解决战斗，全歼守敌一个营和一个机炮连。次日，敌纠合三四个团的兵力反扑，发起十多次攻击，并一度突入我阵地。二一七团沉着应战，依托各支撑点，用纵横交叉火力夹击敌人，弹药用尽即以刺刀、铁镐、石头与敌格斗，最后在八纵、十三纵炮火支援下向敌反击，共毙伤俘敌一千五百名。战后，受到了兵团的通令表扬。在山头，我十三纵三十八旅担任主攻任务，三个团相继投入战斗，突击队多次发起冲锋，均未攻克，伤亡较大。后将三十七旅拿上来加入战斗，从三个方向发起总攻，至十日占领山头主阵地，十一日全部摧毁敌据点，结束战斗。

十一月十二日，东山战斗胜利结束，四大要点全被我占领，共歼敌一万余人，我军伤亡亦达八千五百人。

（选自《历史的回顾》，作者：徐向前）

材料二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根据中央推迟攻打太原的要求和阎敌加强内部控制的状况，我军在进一步横扫敌外围据点，加强军事围困的同时，着重瓦解敌前线官兵，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釜底抽薪的政治战役。目的在于揭露、粉碎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和野蛮控制手段，首先促成敌人营垒的悲观失望，动摇分化，减少对我的仇视对抗情绪；进而使之离散倒戈，由零星的逃亡、投诚，直至小股、中股、大股的归降起义。这场政治攻心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方法之灵活，成效之显著，在晋冀鲁豫军区和兵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我军的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是加强组织领导。政治攻势也象军事攻势一样，必须自上而下，形成坚强的领导中枢，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步调，防止各自为政，乱放“枪炮”，事倍功半。为加强领导，从十一月中旬起，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由王世英、胡耀邦同志负责。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在前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下，专司政治攻心战的组织指导工作。这一组织系统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政治攻心骨干，总结和推广各部队的经验，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严格遵行党的政策，检查和监督部队对俘虏政策、投诚起义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自下而上，建立严格的会议汇报制度，以便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交流经验，保证政治攻势的顺利发展。

其次是强调针对性。诸葛亮说过:"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他的"七擒七纵",就是典型的攻心战法。我军的历史经验证明,攻心战法的采用,一是要有军事上的有利形势。二是要有敌人营垒矛盾的加剧,三是要有正确的政策,四是要有强烈的针对性,才能收到明显效果。当时,前三项不成问题,太原孤城被困,岌岌可危,敌军内部矛盾增加,惊恐失望;我们对投诚起义人员也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关键问题就在于宣传的针对性,即能不能打到敌军的心坎上去。敌军内部包括各部分、各层次的人,心理状态五花八门,复杂得很。有顽抗到底的,有侥幸图存的,有悲观动摇的,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有厌战想家的,有怕投诚后被共产党杀头的,等等。一般说来,下层军官和士兵,多为受愚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离心倾向大些,不愿为阎锡山卖命,是我军瓦解工作的重点所在。兵团对敌斗争委员会和政治机关,强调抓住重点,有的放矢,开展攻心战。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号召阎军官兵离队返乡或投诚起义。例如,对抱有幻想和侥幸心理的人,说明天下大势:"阎匪快要完蛋,妄想多活几天,又吹美国出兵,又吹世界大战,欺骗你们官兵,替他苟延残喘。当今天下大势,民主力量占先,苏联东欧中国,力量强大无边,帝国主义势力,正如日落西山,美帝纸糊老虎,其实外强中干,本身困难重重,不敢发动大战……天下大势如此,再要糊涂完蛋。"对被抓去的新兵,鼓动他们回家平分土地:"晋中各县,土地平分,阎军官兵,家中照分,男女老少,每人一份,快逃回家,参加平分。"对外来的胡宗南第三十军,则指出:"胡宗南,恐慌在西安。蒋介石,准备逃台湾。太原城,很快被攻占。三十军,你们怎么办?"对前沿阵地的士兵,鼓励其拖枪来降:"放哨看地形,打柴看路线,知心朋友商量好,看准机会一起跑。白天过来用记号,黑夜过来高声叫,解放军大力掩护你,不怕误会跑不了,带上子弹和步枪,谁敢追赶打他娘!"这类宣传品,简明易懂,针对性强,不少敌军士兵,能背诵三种以上,可见影响之大。战役期间,我军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四十余种、五十多万份,起到瓦解敌军的有效作用。

瓦解敌军的方法因时因人制宜,灵活多样。包括阵前喊话、对话,利用被俘人员或起义投诚人员写信、喊话,发射宣传弹,释放俘虏,对反动分子阵前点名记帐等。旧军队里很重视老乡关系,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旧式武装的一个传统。同样的话,别人说了他不信,老乡说了他就信。当时,敌我双方多为山西人,新补充的兵员几乎都是晋中各县的。我们的瓦解敌军工作,就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阵前喊话、对话,先听对方的口音,弄清他们是哪里人氏,再派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向对方作宣传。双方阵地靠得很近,对话听得一清二楚。有的说来说去,竟然是亲戚、朋友、邻居,那就更热乎,更容易打动心弦,收到成效。

再次是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战场上的政治瓦解工作,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与军事打击相辅相成。我们当时的口号为"猛打加瓦解"。东山争夺战结束后,我东线、南线、北线部队乘势发展,又先后攻占了一批阵地。为断敌空援,十二月初,派十三纵一部渡过汾河,配合晋中部队作战,将敌新修的万柏林、三角村、王村、红沟子等处的机场控制。阎军为保持空中联系,于十二月中下旬发起疯狂反扑,攻击数十次,但均被我晋中部队击退,共毙伤敌二千五百余人,击毁坦克二辆。我军在各线不断巩固阵地,将太原城池紧紧封锁围困,一面发动政治攻势;一面不时出去,袭扰敌人,开展冷枪冷炮活动,零星杀敌。八纵二十三旅一个营,十七天内冷枪杀敌一百二十七人。这种军事围困、打击的胜利,使敌一夕数惊,士气沮丧,更利于我军进行瓦解工作。

这场攻心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夕,达半年之久。先后瓦解敌军一万二千四百余人,加上原先瓦解的人数,共约近三万人之众。同时,相当数量的敌军因受我军宣传的影响,太原攻城战斗打响后,不作抵抗即乖乖交枪,因而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

(选自《历史的回顾》,作者:徐向前)

材料三 解放"碉堡城"

1948年7月16日,太原阎锡山官邸,译电员还未把一份来自晋中前线的电报读完,便被阎锡山的叫骂声和杯子摔碎声打断。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不时地坐下,站起,在屋中来回地踱步。一向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土皇帝",如今接二连三地栽到了共产党手里,怎么能让他不生气呢?回想起两年之内运城、临汾、晋中的失败,他愤怒、迷惘:共产党到底是些什么军队?我阎锡山有哪点不如他们,是人员数量?是装备质量?……尤其是当他想到共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将是他的老巢太原时,他不由得又加进了几丝忧愁。

太原,是山西省首府,古称晋阳,它位于晋中盆地北部,濒汾河东岸,东、北、西三面都有高山拱卫,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太原城就好象搁在瓮底一样,是一个利守不利攻的城市。

太原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8年9月的太原,阎锡山已把它变成了一坐碉堡城,一座名符其实的碉堡城。站在东山顶上府首望去,城周围的每一个山岗、每一个凹地,都被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象坟墓一般的碉堡覆盖着。阎锡山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利用太原的地形构筑永久性城防工事。抗战胜利后,他又以留用技术人员为名,收编日寇

战俘3千多人为"军事顾问",加固和增修城防工事。他以太原为中心,在周围四、五十里的地区内,筑起了5千多座碉堡,有"好汉堡","梅花碉","人字碉","老虎堡","伏地碉","杀伤碉",……名目众多,从一层至五层不等有砖碉、石碉、钢筋混凝土碉、有品字形、倒品字形、园形、方形、菱形、半月形等,大多数碉堡内均存有粮、水和饮食、睡觉的设备。

一位美国记者看了这些碉堡后吃惊地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方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火网"。

阎锡山自己说:他武装起的"要塞城市",足可以抵当150万共军的进攻。阎锡山着实为他的城防工事自豪。每当有人提到太原的城防工事时,阎锡山的脸上立刻会露出自豪的神情,即使是在最沮丧的时候,只要一想起他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暗淡的眼神中,顿时也会放射出一丝光芒。

自从我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阎锡山就把保巢图存,作为其战略指导思想。他经常对下属说:抢粮、屯粮于手,巩固晋中,死保太原,熬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美军在中国登陆,便可趁机反攻,卷土重来,"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现在阎锡山已失晋中,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靠太原城外那些大大小小的碉堡了。

该啃块"骨头"了

晋中战役后徐向前总指挥曾风趣地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晋中我们吃了一大块肉,下一步该啃块骨头了。

在我方进行休整补充的同时,阎锡山也没闲着。为死守太原,他命令手下在太原城内疯狂地抓捕壮丁,先后又拼凑了几个师和两个纵队。蒋介石从西安空运来胡宗南的整编第30师,加上保安部队,太原守敌总兵力达到了12万多人。与此同时,城防工事也在不断地增多、加强。阎锡山疯狂地叫嚣:"我们的工事要随着地球转动而加强!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就要加强一天!把每一个主阵地都修成能够经得起一万发炮弹的永久工事"。

阎锡山是铁了心了。

太原城是非打不可了。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

根据这一情况,遵照军委指示,徐向前司令员对所掌握的敌、我各方面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于1948年9月28日确定:"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战役拟于10月18日开始。……进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道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并着重表明,作战方针的"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

徐向前也下决心要打了。

一个铁了心要死守,一个决心要打,一场激战即将在太原展开。

"太原足可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阎锡山说。

我只有8万部队。徐向前说。

一个兵多、工事坚固、负隅死守。一个兵少尚要攻坚。双方对垒究竟战局如何发展?当时许多人都为徐向前捏着把汗。

将计就计提前发起战役

1948年9月17日,为断敌空援太原,我13纵队用奇袭的战法,夺占了太原南郊的武宿机场,从而粉碎了胡宗南整编30师全部空运太原的计划。

我军控制武宿机场,断敌外援后,困守在太原孤城的阎军,处境日蹙。9月24日,山东省会济南的解放,震惊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官兵们更加惊慌,许多官兵都说:"济南守不住,太原更没望了!"阎锡山感到形势危急,想出了花招,进行垂死挣扎,便于10月1日从太原城派出9个师,分数路向南进犯。他企图以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来破坏我军的战役准备,消耗我攻城部队的力量,拖延时间;同时大肆抢粮抓丁,为长期硬抗作准备。

10月3日,敌一路进占太原城南的小店镇、南畔村、巩家堡;一路进犯狄村、南北王铭及西温庄地区;一路集结在小店以北,红寺地区。

阎锡山想先发制人,但此举对于善打运动战的我军来说,正合胃口。

根据这一情况,徐向前司令员和周士第副司令员决定:趁热打铁,将计就计,立即命令我军于10月5日提前发起太原战役。

10月4日夜,我13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突然将南犯南畔、南黑窑之敌暂45师两个团,73师一个团3千余人团团包围;116团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之退路。111团和109团、115团在5日拂晓前,相继逼近南黑窑、南畔的敌前沿阵地。敌暂45师是阎军的主力之一,尚未受过我严重打击,现突然遭我包围,惊慌万状。当日上午,敌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妄图突围,连续进行反扑均被我击退。敌人看突围不成,就转为顽抗待援。

为防敌逃跑,我军逐渐收紧包围圈。5日下午5点半,115团和109团首先向南畔村守敌发起进攻。

到10月6日晨,经一天两夜激战,被包围的敌人全部被歼,活捉敌44师师长李子法、45师师长郑继周等以下4千多人。

阎锡山又一次打错了算盘。

主动出击失败后,阎锡山便把太原城周划成6个防区,作垂死挣扎。他把主力放在东面,以对付我军攻击;在

汾河以西，只留下三个师防守。

东山地势险要，阎锡山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作为太原城的屏障。东山的大门叫石咀子，山口有四座"要塞"：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这四处要点位于东山主峰西侧，距城垣2至15公里，低于东山主峰200米，高于太原市区300米，可直瞰城垣、城北工业区和飞机场，形成北起牛驼寨，南至山头长达8公里的防线。这道防线屏障城东一面，是阎军在太原外围的主要支撑点。它以各由3至15个小山头和村落构成集团阵地，以几十个钢筋混凝土碉堡组成防御要塞，辅以野战工事、鹿砦、铁丝网、劈坡和暗道等，各点即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支援。

阎锡山吹嘘说："地势险要的东山防御线是寨中寨，堡中堡，足抵精兵十万"。

徐向前司令员说："从太原自然地理环境和敌人防御重点看，必须首先攻破太原以东的群山防御，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四大要点。"

双方把赌注都压到了东山。

历史上李自成和日本人都以首先攻占东山主峰而吃过不少苦头。

徐向前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置东山主峰于不顾，以主力插入，直接夺占四大要点。

作出这样的决策需要非凡的智慧和胆略。

根据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各纵从10月26日起，分别向四大要点发起突然攻击，9纵攻牛驼寨，8纵攻小窑头，15纵攻淖马，13纵攻山头村。

太原战役中最紧张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一位当年参加过东山争夺战的老人回忆说：那场仗双方打得可真够凶啊！残啊！……

11月11日，我13纵队经激战，全部摧毁并攻占了敌山头要点。到此，阎锡山多方吹嘘的太原城东四大要点全部被我攻占，太原城完全暴露在我军攻击之下。

攻心战见功

我军拿下东山"四大要塞"之后，在反复的争夺战中，打痛了敌人，打怕了敌人。我军乘胜前进，准备攻城。

1948年12月，正当部队准备攻城时，接到中央军委电示：暂停攻城。服从全国军事战略部署，缓取太原，稳住平、津敌人，不让它因太原解放而出海南逃。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胡耀邦等前线领导人接到指示后，立即命令攻城部队停止攻城，并决定向守城敌军开展政治攻势。

一场罕见的战斗开始了。

我军127团阵地对面几十米处，是阎军49师2团一部的阵地。一天晚上天黑后，1营3连宣传战士，拿起纸糊的话筒，对准前方敌人阵地开喊了：

"阎军弟兄们，不要再顽抗了，快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对方没人答话，宣传战士接着喊：

"你们知道你们在给谁打仗吗？不要再给阎锡山卖命了……东山你们都没守住，现在的阵地就更守不住了，快放下武器过来吧。"

"不是我们没守住，是我们不想守"。宣传战士不停的喊话，对方终于沉不住气了。

"不是你们不想守，是我们把你们打败了"。宣传战士一听对方回话了，马上接着说。

"谁说我们被打败了"。对方还想强辩。

"你们没败，怎么会退到这里来了"。这次说到了痛处，对方有一会没有答话。

"叭、叭……"突然从敌阵地上打过来一梭子子弹。

开始几天就这样，双方象小孩斗嘴似地，喊不过了就打，打完了继续喊。

日历已经翻到了1949年元月，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在我军阵地上，战士们开始忙碌着迎接1949年的新春佳节。他们把交通壕和居住的窑洞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各营连的窑洞门上和交通壕口都搭上了五彩牌楼、红对联、花标语，门板报，新年刊，战壕画，以及各连互送的贺年卡、挑战书等等，把一个敌我对阵、刀兵相见的阵地，打扮得披红挂绿，气象一新。

127团3连6班的战士们，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他们面向前边60米远的敌人阵地，布置了一个吸引人的场面：妆扮得五颜六色的战壕前沿上，挂起一盏华丽的灯笼，灯旁竖起一根竹棍，顶上插着两个胖的蒸馍。白馍下帖着一张绿色标语："欢迎阎军官兵过来！"

这一切和对面死气沉沉，灰不溜溜的敌军阵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好似一幅极富讽刺意味的漫画。

这一切布置好后，灯彩下，6班副班长张海玉又开始喊话了。

"老乡，你看这是什么？"他一开始就用老乡一词来套近乎。

这次敌人的哨兵是个娃娃兵，他似乎早已注意到了这边的一切。

"看见了，灯笼、馍馍"。一个尖细的童声立即答到。

"几个馍馍？"

"两个。你后边那些红红绿绿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迎接新年呀，兄弟，过来吃馍馍吧！"张海玉答到。

"不"！听来这个小哨兵嘴皮还硬。

这时正好营部通信员巩武成走过来，他听见对面小哨兵是榆次口音，就接上说："小鬼，过来吧，我们这边过大年尽吃好的"。

"我们这边也尽吃好的。"小哨兵执拗地说。

张海玉大笑着说："别骗人了，你们那边早就缺粮

了。”

小哨兵不服气地说：“我们有飞机天天给运大米洋面。”

巩武成说：“别骗自己了。你们的降落伞许多都飘到我们这边来了，里面全是红大米，小葱儿。”

小哨兵顿时哑口无言了。可他忽然改口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咱们是老乡，我是榆次郭村的”。两个人隔着阵地套上近乎了。

“你怎么当兵来的？”

“被阎锡山编常备兵抓出来的”。

“原来你在哪一部分？”

“亲训师工团担架排”

“老乡，你是怎么过去的？”小哨兵突然觉着有点不对劲。

“去年在介休被解放过来的。老乡，你也快过来吧，这边对咱们比那边好多了。”

这次小哨兵还没来得及答话，一个老兵突然说到：你们声音低些！……我们怕你们的地雷。”

张海玉一听有门，马上答到：“别怕，那是拉雷，不拉绳子不会响的。”

“我们空着手过去你们可不要开枪。”刚才说话的老兵压低声音说到。

“我们不开枪，你们最好把枪也带过来。”人过来还不算，还要再赚支枪。

接着，张海玉把过来的路线仔细地说了一遍。

“你们不要走，等着我们，我回去叫上几个老乡，都带上武器一起过去。”刚才说话的那个老兵压低声兴奋地说。

就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连共解放敌官兵210多人。

几十里长的前沿阵地上，每天晚上都有阎军官兵过来投诚，有许多是连、排长和手下一合计，带着全连全排成建制地过来了。攻心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军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工作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明了人心的背向。更使人感动的是，有的士兵刚来到我军阵地，连敌人的军装还未来得及脱掉，战斗就打响了，他们在老战士们言传身教的鼓舞下，马上就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勇敢无比，不少人当了战斗英雄。

千军万马　会攻太原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命令参加战役的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的炮兵第1师开赴太原前线。这样，攻打太原的兵力由一个兵团增加到3个兵团，外加上7纵队，晋中军区部队，总兵力达20万。我从绝对优势的兵力把太原围得水泄不通。

阎锡山看情形不妙，就借口拜见蒋介石，把随身的医生、厨子、理发匠、洋狗装上飞机，逃到南京去了。困在太原城内的王靖国（太原守备司令）、孙楚（绥靖公署副主任）、戴炳南（敌30军军长）等不识时务，仍然企图顽抗。我方多次要求和平解决太原的愿望，均遭他们拒绝。

1949年4月2日，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扫清了外围，兵临太原城垣。

4月24日5点30分，一颗一颗的红色信号弹，象流星一样划破了夜空。突然，1300门大炮齐鸣，千万条火箭飞向城垣。人们只听象狂风一样的怒吼，分不出枪声和炮声。天亮了，炮弹掀起的浓烟象浓雾一样弥漫了阵地，离城50米，连城墙都看不清楚。我炮兵破城射击、拦阻射击、压制射击同时进行，太原城象受到巨大的地震、城墙、碉堡一批批往下垮。敌人的大炮早成了哑巴，就是一枪一弹也打不出来。我方战士们完全不用隐蔽，他们直起身子看着弹着点，谈笑议论。

原计划从5点到9点，炮轰4个钟头，可是战士耐不住性子，7点钟，北面和南面的我军已开始登城了。东面的部队一看也着急了起来，突破口还没有爆破好，突击手们便爬了上去。第一名登上城的是突击手刘永昌，他爬到城墙上面，却找不到抓手的地方。他正犹豫，正巧上边埋着一个敌人的尸体，两只脚露在外面，他顺手抓住，一纵身跃了上去。他们配合后续部队，占领了突破口。这时，强大的解放军兵团，从南、北、东12个突破口中，象怒潮决堤般地冲进城去。

攻入城内的先头部队，神速勇猛。敌人集中火力，百般拦阻，他们巧妙地从房上屋内打开通道，越过敌人火力点，继续前进。敌人准备巷战用的坦克还没有发动，驾驶员还没有完全跳进驾驶室，就被解放军战士缴获了。驾着敌人的坦克前进，进城80分钟，红旗就插上了太原城内的钟鼓楼。

“碉堡城”毁灭了，太原城解放了。太原市和山西省人民象过大年一样，燃放爆竹，敲锣打鼓欢庆人民的伟大胜利。

（选自《百战图》，作者：刘峻桐）

兰州战役

背景介绍

扶郿战役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退守秦岭以南地区，马鸿逵部五万余人收缩在同心、靖远以北地区。马步芳部

所属陇东兵团两个军及骑兵军七万余人据守兰州、临洮地区。第一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起兰州战役。其部署:以第十九兵团主力为右路,经会宁、定西沿西(安)兰(州)公路直插兰州;以第二兵团为中路,经陇县、通渭西进,与十九兵团会歼兰州守军;第一兵团主力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由天水经渭河西进,沿陇西、会川、临洮直取西宁,切断马步芳主力往青海的退路;以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四军位于固源"、海源地区箝制马鸿逵部,使其不能出援兰州;以第十八兵团主力附第七军留置西安、宝鸡、天水一线,箝制胡宗南部,保障翼侧安全及后方交通。战役于八月十二日开始。第一野战军各兵团由陇东地区向兰州、西宁攻击前进,沿途粉碎马步芳多道防线,先后攻克陇西、会川、定西、榆中、临洮、临夏等十几座县城,至二十日,解放军中、右两路迅速进至兰州城郊。为防止守军西逃,翌日,攻城部队向沈家岭、营盘岭、马家山、狗娃山诸阵地发起攻击,因守敌筑城坚固,激战竟日,阵地未克,解放军伤亡很大。彭德怀司令员令暂停攻击,重新组织进攻。二十五日拂晓,再次对兰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先后攻占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马家山等南山主要阵地。守敌撤出兰州,退守黄河北岸。解放军抢先夺占黄河铁桥,切断守敌退路。至二十六日午,守敌除一部在逃向西宁途中溃散外,其余全部被歼,兰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第一兵团渡过黄河,相继攻占甘都、化隆、乐都等地,于九月五日进占西宁。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乘飞机逃往重庆。至此,国民党军马步芳部覆灭,青海于九月中旬全境解放。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四万余人,为全部解放西北五省奠定了基础。

材料:

- 浴血金城歼马匪
- 烽火兰州

材料一 浴血金城歼马匪

云雷天堑,金汤险地,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齐坛。瓯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间,且宴朱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这是金代临洮府(今甘肃省临洮县)词人邓千江的名篇《望海潮》。它描写了古代兰州的雄奇险峻,反映了当时战争的频繁惨烈。词中所说的"皋兰"就是今日的兰州。

兰州,古称"金城",凭其"金城汤池"之险而得名。汉始元六年置金城郡。隋开皇元年设兰州总管府,始有兰州之称。1666年,即康熙五年,甘肃巡府移至兰州,兰州始为省会。兰州原属皋兰县,1941年设兰州市。在它的周围,风光绮丽的甘肃牧场与西藏高原接壤,神奇漫长的河西走廊连接绿州片片的新疆,富饶的古凉州平原衔接着牛羊遍野的宁夏,黄土高原的陇东牵连着陕西的八百里秦川。它雄踞在祖国的大西北,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的枢纽。如今的兰州,南北古木参天、群峰迭障的两山将其拱卫其中,一片详和、美丽的景象。而只有滔滔的黄河,身披铜汁般的肤色,日夜不停地拍击着两岸赤色的石崖,发出浑厚、粗犷的声音,从市中心穿过,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诉说着一个雄壮悲烈的历史故事——

1949年8月25日凌晨,兰州城下,战云密布,大战在即。城内,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武装集团中唯一一支从未受过我军重创而相反曾占过我军便宜的、在西北敌军中亦是非常剽悍而战斗力较强的、且遗留有较深民族隔阂、封建迷信和浓厚的宗教观念的"马家军"——以回民为主的马步芳集团共五万多人,准备汇同宁夏马鸿逵的海固兵团(第128军、第11军)和胡宗南集团,妄图内外夹攻,一举歼灭我军于兰州城下。

城外,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军威震敌胆的战将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的强大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之第1、第2、第19兵团,决心坚决消灭敌人的主力,攻克兰州,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

雨后清晨的兰州城,空气异常的沉寂,大地平静得出奇,仿佛预示着这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决战,将是那样的悲壮激烈……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9年4月28日,毛主席把接替卧病的徐向前同志指挥总攻太原战役刚刚胜利结束的彭总风尘仆仆从前线招回北京,商讨了如何解决西北的问题。毛主席高瞻远瞩,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内革命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强调指出,要想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消灭胡、马主力。五月下旬,彭总回到西北前线,根据当时战场的具体情况,于7月10日首先发起了扶眉战役,取得了两昼夜歼敌四个军的胜利。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青(马步芳老巢是青海,故名青马)、宁(马鸿逵老巢是宁夏,故名宁马)二马见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也随即匆忙北撤。至此,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合作的联盟已被我粉碎,青、宁二马已被彻底孤立,歼灭其反动势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二、宜将胜勇追穷寇

初秋的陇东高原，天气变化无常。而此时此刻在青、宁二马的心中，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被歼，国民党反动集团更加寄希望于青、宁二马同我较量。此时，看到二马匪军仍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处于绝望之中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竟又过高地估计了二马的力量，妄图依靠二马扭转西北战局，于是积极策动二马与我决战于甘肃平凉地区。他们以为，平凉扼甘、宁之咽喉，为我进军西北必争之地。平凉一线深壑峭壁，关山险要，青、宁二马又有兰州、银川为后方，供应比较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供应十分困难。胡宗南若再乘机自秦岭配合杀来，必将陷我于首尾难顾的困境。他们还准备在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煽动民族矛盾，使我无法立足，从而把我军消灭于陇山之中。其梦之美，一至于斯！

而此时，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却身处于战退难决的窘境，切实地感到了我军的压力，毕竟头脑要稍为理智一些。他们想战又觉得难以抵挡我30万大军，深恐被我包围歼灭；想退，又怕失去甘、宁咽喉，形成我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与此同时，我各路大军长驱直入陇东，跟踪追击马匪，经过几场小的战斗，歼灭了青马一个整旅和宁马之一部五千余人，插入甘肃腹地，分割了青、宁二马。敌人失去了平凉地区这一有利的决战阵地，使兰州、银川直接暴露于我军的威胁之下，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

在我野司指挥所的作战地图上，进攻的箭头一致指向兰州。

在将作战计划报毛主席批准后，8月4日，彭总发布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确定我军的布署是：以2兵团的三个军和19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1兵团附×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夺占临夏，突破敌右翼，进入青海东南部，向其老巢西宁展开迂回攻势，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19兵团的×军的固原一带佯动，牵制宁马可能援兰兵团和靖远、景泰蒋系的两个军，使之不敢支援青马作战。以18兵团主力(欠一个军)以及第×军等三个军在天水、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集团。彭总“杀鸡用牛刀”，灵活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当年城头鏖战急

1949年8月12日，我各路大军奉彭总命令开始西进。一路上，时而狂风大作，时而烈日当空，炎热、缺水、风沙、暴雨、洪水、冰雹不断袭击，加上地广人稀，山大谷深，桥梁公路又遭敌人破坏，给大部队行军造成了不少困难。但这一切，都没能挡住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早日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兰州和西北各族人民，坚决消灭马步芳匪徒。

1949年8月25日凌晨，雨过天晴。兰州城内外，一片漆黑，点点繁星，在天空中闪闪发亮。习习微风吹来，使人感到阵阵凉爽。南山上下，静谧异常，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见。经过几夜的袭扰，敌人已经疲惫不堪，眼下可能正蜷缩着身子，做着黄梁美梦呢。他们何曾想到，在这静静的南山下，千万个战士杀敌复仇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6时30分，突然，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刹那间，整个大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条条火舌飞向敌人阵地。在炮火掩护下，我全线各个突击队，经过猛烈冲锋，在火光弹雨中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突击部队和爆破队协同动作，密切配合，且战且进，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我军一步又一步地向前推进着。

营盘岭，位于南山主峰皋兰山的中央，与敌人设在西边的沈家岭和东边的马架山阵地互相衔接，互为依托，是攻占兰州、全歼守敌的南大门。若攻占此山，就好比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担负主攻任务的×兵团×军×师×团如蛟龙出渊，直捣敌人前沿阵地，一场血战开始了。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破声响成一片，杀声震天。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用刺刀，甚至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我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主攻连×团7连最后只剩了12人，但他们硬是打垮了敌人连、营规模的八次反扑。当部队冲锋到营盘岭主阵地时，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凭借着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连续三次上前爆破的同志都牺牲了。运动到前沿的四个连队一时上不去，下不来，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眼看就要遭到重大伤亡。在这紧急关头，七连指导员曹德荣一下子抱起三个炸药包，大喊一声“跟我来！”首先冲了上去，两个战士应声跟上，快接近峭壁时，敌人射来密集的火力，一个战士牺牲了。曹德荣仍出两颗手榴弹，趁着浓烟升起的一刹那间，抱起沉重的炸药包，强忍着浑身巨痛，左翻右滚，终于和另一个战士靠近了峭崖。峭崖被削得如同墙壁，没有支架，无法发挥炸药的威力，曹德荣朝身后的战士交待了一声，便双手托起炸药包按在崖壁上，回头向那个战士喊道：“快拉火！”那个战士有些犹豫，曹德荣同志大声喊道：“我命令你拉火……”战士含泪拉开了火，翻身滚下山坡。一声巨响，峭崖破开了。董存瑞式的英雄曹德荣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战士们高呼着曹德荣的名字，冲入敌阵地。战斗激烈地进行着，下午1时，开始了夺取营盘岭制高点主阵地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坚固的一个集团工事的战斗。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我×师×团和×师×团从东西两面发起进攻，×团、×团也从纵深调上来参加战斗。各部队同时发

起进攻,14 时,三面红旗先后在敌阵地上竖起来了!但刚刚竖起来,旗杆就被敌机枪打断,红旗落了下来,又竖起,又落下,再竖起……。就这样,红旗反复起落了七次,每一次起落,都有不少战士英勇牺牲,到了第八次,已有十几面红旗在营盘岭敌主阵地上竖起来。营盘岭全部被我占领!我军伟大的英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胜利的道路。战后掩埋烈士的同志发现,曹德荣烈士的手指上缠满了手榴弹拉火环和拉火环线。彭德怀同志说:"有些同志为了完成爆破任务,身绑炸药,自身与碉堡同时粉碎。这种英雄壮举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谁命令他,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行为,这些英雄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这种英勇而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古师表!"

在营盘岭的西侧,沈家岭阵地上,战斗进行得亦是异常惨烈。在我×军攻占敌人主阵地之后,敌人立即拼命地连续组织反扑,而且随着敌预备队的增援,反扑次数更加频繁,兵力也由少到多。从连级规模到团级规模,一次、二次、三次……。一个个光着膀子,举着马刀,腰里插着一排手榴弹,嚎叫着"死了升天",似恶狼一样地一群跟着一群扑过来。我军一排手榴弹倾泻下去,一批敌人倒下去,又一批涌了上来。手榴弹打光了,子弹打光了,我英勇的战士从黄土中爬起来,把脸上的血水一抹,端起打弯的刺刀,瞪着血红的眼睛向敌人扑去!就在这总共不过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阵地上,敌我双方各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仗打得越来越艰苦,越来越残酷,整个阵地象拉锯似地反复进行争夺。我指战员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把反扑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在这场恶战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谱写了英勇悲壮的一曲。战后统计,敌被我毙伤三千八百余人,我军亦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达三千多人。兰州战役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三人,都是在总攻沈家岭战斗中牺牲的。这三个人是:×师×团团长王学礼,×师×团政委李锡贵,×师×团副团长马克忠。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下午六时,我军终于攻占了沈家岭!并于当晚十时攻占马家山。同时,敌古城岭、马架山、豆家山等相继被我占领。

敌人见城廓阵地一一失守,等待胡宗南和马鸿逵的支援已经没有希望,国民党政府派去的飞机也挽救不了眼前的败局,这才对坚守兰州失去了信心,他们深虑我军乘虚而入,剿其老巢,于是决定撤出兰州,退守黄河北岸。下午 16 时,城内敌指挥机关和直属部队开始向黄河以北转移,但其主力大都在阵地上,一时撤不下来,更怕我军发现其企图,于是推迟到当晚才秘密撤逃。当天夜晚,我×军×团在攻打狗娃山时,抓住敌人两个逃兵,从他们口中得知了这一情况。于是,他们一面报告,一面组织追击。这时,×团 3 营早已按照预定的路线快速地绕过敌人防区,沿公路直插铁桥。副团长申文范带领突击队(三营),乘敌人一片混乱之时,一口气冲到兰州西城门,迅速控制了西关城墙制高点,并立即组织 10 连、9 连和机枪连的全部火力,掩护 8 连向铁桥迅猛发起攻击。26 日凌晨一时许,敌满载弹药的几辆卡车被打燃,一时桥上烟火腾空,爆炸声巨响,敌人完全被吓懵了,摸不清我方到底有多少兵力。就在这一瞬间,我军抓住时机,乘势冲上桥头,全部控制了敌退逃的唯一通道。4 时许,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大批敌人从南山、东岗镇、华林山等处撤退下来。我军也从东、西、南三面压了下来,关门打狗,与敌展开了巷战,打得敌人仰马翻,尸体遍衔。早 6 时许,我军全部占领了城内各要点。此后敌已溃不成军,残敌逃至雁滩附近,仅有的一座浮桥已被河水冲断,只好纷纷乘马泅水过河,我军乘胜追歼,敌人部分被我歼灭或葬身鱼腹。26 日清晨,我第×军第×师一部越过黄河铁桥,消灭了白塔山上的守敌,占领了北岸的制高点,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兰州铁桥,至 26 日中午战斗全部结束,兰州宣告解放。马步芳父子丢下 2 万多伤亡的"家底"仓惶逃窜了。

1949 年 8 月 30 日,用 9 千名牺牲和负伤的我军指战员的鲜血换来的兰州城,战火的硝烟刚刚散尽,早晨的太阳温和的光芒迎接着胜利之师。经过战评和休整之后,我军健儿洗净了与马匪军拼杀沾满血污的军衣,缝补了千里追击战中磨破底的布鞋,擦试了武器,怀着胜利的喜悦,列好雄壮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举行了兰州解放入城式。

各族同胞兴高采烈地放着鞭炮,把五彩缤纷的鲜花撒在炮车上。一条条鲜艳夺目的标语上写着"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翻身了!""人民解放军万岁!"等。身遭马匪残酷压榨的兰州人民笑逐颜开,心花怒放,载歌载舞。一位七十五岁的回族老人胡锦云赋诗一首:

马到青海四十年,
人民苦死万万千
解放大军来征剿,
至时拔云见青天。

(选自《百战图》作者:姚党鼐)

材料二　烽火兰州

西进道上

还在太原前线时,我就接到调往四军工作的命令。四军的老底子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现在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正和兄弟部队并肩参加为解放大西北而进行的大兵团作战,我是在这个部队里长大的,熟人很多;所以真想立即动身前往就职。但等到太原战役结束后,临时又去参加了一段和平解放榆林的接管工作,再转头南下追

赶部队时，简直是有些望尘莫及了。

五月二十日，我军解放了西安。六月中旬，又粉碎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联合向西安的反扑。随着华北十八、十九两兵团全部到达关中，七月又取得了扶（风）郿（县）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歼灭了胡宗南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八座县城。更重要的是使西北战场起了根本变化，即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同时，由此分割开胡、马军联合作战的一切可能，使敌人在西北地区再举行战役进攻的主动能力已完全丧失。扶郿战后，胡宗南退守汉中，我军即乘胜向西追击马步芳与马鸿逵军。这二马当中，青海的马步芳最为狂妄，对胡宗南之惨败和蒋介石之垂危颇不甘心，俨然以“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为己任。在其前不久就任敌西北军政长官时曾大言宣称：“我要拿下西安，杀出潼关，砥定中原，占领全国，”时至今日，这位马长官的“凌云壮志”仍未罢休，陈兵于兰州城下，妄图阻拦我军。现在我军大举进攻的矛头正是指向青马，决心首先夺取兰州。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是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战略要地。如攻克兰州，就能促使整个大西北迅速解放。四军此时已编入第二兵团建制，现在向兰州附近集结，准备参加主攻兰州的战斗。

抱着急切赶队的心情，从榆林出发，第一次路经光复后的民主圣地——延安，也未及瞻仰，匆匆而过。赶至西安，贺龙司令员一见面就兴奋地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刚好赶上打西北战场的最后一仗，再晚一点，这台戏就没有你的份了。”接着他又指示我说：“打这最后一仗也是不能轻敌，马步芳的尾巴今天还翘得相当高，他觉得历史上红军吃过他的亏，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者’。现在他蹲在兰州，依靠着三面环山、中间夹黄河的天险，还有抗日时期修的‘国防工事’，准备和胡宗南、马鸿逵三家来个里应外合，想把我们一口吞掉呢。”

“原来马步芳还有这么大的胃口啊！”听了贺总的话，我不禁惊讶地嗤叹了一声。二兵团首长也向我介绍了当前的战役的部署说：“现在我军已经给敌人撒下一张大网：以五个军攻取兰州；以三个军由兰州南侧绕插西宁，去抄马步芳的老窝。另以三个军积极沿川陕公路南进，镇住胡宗南；以一个军对宁夏方向运动，牵住马鸿逵，这样，不管兰州的敌人或逃或战，都逃不脱被歼灭的命运了。”听了这一席话，更使我不能在西安停留。首长们接着向我谈了一些四军的情况，谈完，我即刻辞别首长们，又往西兼程赶路。

从西安出发，正巧四军供给部长王国瑞同志也要赶往前方，两人结伴而行，乘火车到了宝鸡，又换乘一辆美式吉普，一路上边走边谈，颇不寂寞。一谈起陕北，我们的话就没个完，从红色赤卫军一直谈到今天的主力兵团，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的眼前跳动。我向国瑞同志：“‘黑羊羔’现在干什么？”他乍一听有点愣住了，想了一下，才若有所悟地说：“王学礼呀？现在是个刮刮叫的团长哩！”

王学礼，是红二十七军一团少年先锋连的指导员，我们分别时他还是个十足的娃娃头。小小的个，长得圆墩墩的，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一哇声就登上地主家的石头窑洞顶。见了老乡，大叔大婶叫的不离嘴，手脚特别勤快，老乡们都喜爱他，有点好吃好喝也给他留着。亲热地叫他“黑羊羔”。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叫他的姓名了，都叫他“黑羊羔”。这几年长大成人，又当了团长，叫的人可能少些，因之王国瑞同志听了发愣，可是我多么想快快地见到他们啊！”

西兰公路上，塞满了支前的民工队和后勤部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真是车水马龙，欢声载道。路两旁一条条醒目的标语：“追追追，猛追马匪！不歇气，直捣兰州！”“打到天涯海角，彻底解放大西北！”不断映入眼帘，令人振奋。汽车进入甘肃境内，时见戴白帽、穿长袍的回民同胞，对我军拱手相迎，笑逐颜开。过去国民党曾向回胞进行反动宣传，说我军要“杀回灭教，共产共妻”，企图以此煽动回胞起来反对我军。但是，由于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不仅使长时期来的民族隔阂得以冰消雪解，而且所到之处，万民拥戴，箪食壶浆，争相迎送。正因为这样，我军才能在旬日之间，前进千余里，解放陇东、陇南三十余县，歼敌五万五千多名。于八月十九日，一鼓而直捣兰州城下。

一路上紧赶慢赶，到达我军指挥所，已是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比部队晚到三天。

沈家岭阵地

沈家岭，位于兰州西南六里许，是夹在五泉山和狗娃山之间的一道大山梁，面积百多亩，象个横置的葫芦，葫芦底朝外嘴向里，最高处修有钢筋水泥碉堡群，汽车可以沿着环山公路直通山顶。葫芦外面有环形的人工削壁三层，每层高约丈余。削壁外又有一丈多深的外壕，壕沿上都附有铁丝网、地雷等防御设施，为敌人防守兰州的三大主阵地之一。如我军拿下沈家岭，即可直插西关，卡住黄河铁桥，截断敌人的唯一退路；所以敌人称此阵地为“兰州锁钥”。

要进取兰州，当然得先将这把“锁”砸碎。就在我到达前线的当天，部队去砸“锁”了：以十一师两个团向敌进攻，攻了整整一天，结果没有攻下，部队还遭到相当大的伤亡。我来到指挥所时，虽然夜很深了，但军党委还正在开会，研究白天攻击受挫的原因。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听出，主要是部队里有严重的轻敌思想，自上而下不少人这样说：“扶郿战役一下吃掉胡宗南四五万，现在马步芳这几个兵算什么！”还有人说：“敌人在平凉、天水、六盘山那

样险要的地方，也不加防守，狼狈逃窜；现在他守兰州还不是装样子，保险一冲就垮。”由于这种思想作怪，以致战斗准备很不充分，因而受到这一血的教训。我在会上传达了贺总的指示，指出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任何松懈情绪和轻敌思想都是错误的。大家在检讨中也都明确了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拼命挣扎。特别象青马这样骄横专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历史上曾对人民欠下无数血债，目前仍然怀着不可一世的野心，必然更加疯狂。马步芳为了和我军在兰州决战，用了他赖以起家的八十二军踞守沈家岭，用他的儿子马继援坐镇兰州指挥。马继援曾提出“决心与兰州共存亡”的口号，并对守沈家岭的士兵下命令说：“有沈家岭就有兰州城，你们活着要守住阵地，死了要为回族争光。”还给每人发了三元白洋，以买其心，敌人处心之苦，不为不毒。

军党委会研究了这些情况，重新作出决定：要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反复侦察地形摸清道路，仔细地研究进攻战术，组织后勤人员保证物资弹药的运送；对主攻部队也作了调整，由三十一团主攻。野司、兵团这时也给了我们同样精神的指示，将总攻时间推迟至二十五日。彭德怀司令员派副参谋长到我军传达彭总的指示时，特别强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我们“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坚决歼灭青马，攻克兰州”的指示。

新的决定布置下去之后，部队紧张地行动起来，连我这刚上阵地的新手，也忙得个团团转。那天正在听各师准备工作的汇报，忽然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同志来了电话。我一拿起话筒，就听他一叠声地问：“喂，是军长吗？啥时到的？身体好吗？……”这“黑羊羔”还是那股火辣辣的劲，本来想打完仗再去看他，不想他先打来了电话。我说：“你提了一连串问题，叫人咋回答？”他大声地笑了：“政委（这是在红一团时的老称呼），真想去看你，实在顾不上，只好兰州城里见面。到城里你得请我吃西瓜呀！”“好啊，兰州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都’进了城，瓜果一定管你饱。”接着我问部队情绪怎样，他说：“上级的指示象把火，把战士们的心都烧红了，都争着要当尖刀，吵得我简直不知道给谁好。”我说：“你看谁合适就给谁嘛，只要你这个娃娃头不吵着当尖刀就行了。”他又大笑了：“谁都够条件，谁都有理由……”我心想：我们的部队就是有这股英雄劲。扶郿战役刚完，接着连续追击敌人一千四百多里，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已经够累了；到了兰州城下，又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在天雨泥泞中修筑工事，整天吃的囫囵豆子，包谷粒，山药蛋。可是他们好象根本不知道疲劳，一听说打仗，又是嗷嗷叫。这样的战士怎不叫人爱呢！我告诉王学礼，他们是主攻团，要特别珍惜部队这股劲，千万不能轻敌。最后特别叮咛他：要掌握住部队，注意荫蔽，不要枪一响就手痒痒，不管部队，自己拼命向上冲。他高兴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拿下沈家岭，把兰州的‘锁子’砸开，给你作个见面礼。”他的话也给了我十足的信心，在这样的英雄们面前，没有搬不倒的山。

二十五日，雨停了。天还不明，我站在军指挥所的山顶上，向北望去：远处，兰州城内还残存着两三灯火，半明不灭，就象马步芳的命运一样凄凉黯淡；近处，是黑黝黝两座山包——沈家岭和狗娃山。再过一会，我们就要在这里同敌人展开一场恶战，尚在迷梦中的敌人，绝不会知道今天就是他们生命归宿之日！

雨后的旷野上，一切都显得安谧而宁静，微风掠过，虽略有寒意，却使人更加振奋。我呼吸着从黄河上飘来的新鲜空气，等待着激战开始的时刻。

王学礼和他的战士们

拂晓，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高空，我军各阵地上同时万炮齐发。兰州城东、南、西三面的山顶上，霎时犹如天崩地裂一样。我们眼前的沈家岭，也一下完全被浓密的硝烟尘土所遮盖。不一时前沿报告：第一道堑壕一、二、三号碉堡已被我主攻部队占领，先头部队已向第二道堑壕逼近。但还没有等我军站稳脚跟，敌人就集中兵力反扑。三十一团的战士们，在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的密切配合下，迅速打退敌人第一次反扑，占领了第二道堑壕，并乘势向沈家岭的核心工事逼近。

敌人为了保住这把“锁”，不断从城里调来大批后备部队，整营整团的向我反扑。不分队形，也无法计算次数，只见漫山遍野的敌人大背着枪，光着膀子，提着明晃晃的马刀，象凶神恶煞一样的横冲直闯。在他们背后，敌军官也手举长刀，大呼大叫。甚至还有头缠白布、留着大胡子象阿訇打扮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也在后面督战。敌人的嚣张，更燃烧起我军的怒火，阵地上真是刀光血影、杀声冲天。不分干部战士，都奋不顾身地与敌展开搏斗。王学礼同志，一会跑前跑后指挥作战，一会端着刺刀和敌人拼杀；还要不时地向师里报告情况。敌人几次冲到他跟前，都被他带领机关人员赶了回去。经过多次打退敌人反扑之后，三十一团只剩下一百七十多人了，干部绝大部分伤亡，弹药也剩下极少。可是王学礼并没有请求支援，他把团直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把阵地上所有的弹药都收拢起来，投入战斗。他坚定地向同志们说：“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给上级出难题，叫上级替我们担心。只要大家勇敢顽强，注意节省弹药，我们就有把握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王学礼他们团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突击四连十九岁的司号员孙明中，在连排干部全数伤亡的情况下，他毫不迟疑地举起连长的驳壳枪，向全连只剩下的十多个战士高喊：“同志们，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冲啊！”他打着枪，吹着冲锋号，带头冲向敌阵，把反扑的敌人消灭

在阵地前；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他又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数次冲入被摧毁的敌碉内，背回七箱手榴弹、三箱八二迫击炮弹；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十几个人坚守住百多人的阵地。机二连三排的同志们，扛着重机枪向敌人核心阵地钻，突然迎面扑来五十多个敌人，来不及选择阵地，就地架起枪就扫，一连打退三次反扑，最后敌人集中三百多人冲向他们，这时，只剩下一挺机枪还能打响，排长张生禄亲自握着枪把打，张生禄负伤了，六班长白生文接着打，不一会白生文又负伤了，六班副金鼎山又接着打，打了一阵金鼎山又牺牲了，指导员赵占国又扑过去……。就这样，他们前仆后继，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反扑，始终坚守着阵地，等到增援部队上来。在攻击第二道堑壕时，敌人一挺重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压得从正面突击的同志们抬不起头，因火力点在暗处，我们的炮火很难摧毁；突击队的同志们正发愁，忽然从侧面跑出一个人来，一声不吭，端着雪亮的刺刀，一眨眼就冲到了这个暗碉跟前，用他的身体和刺刀一起，对准枪眼狠狠地刺了进去，敌人的重机枪哑了，突击队从正面顺利地飞卷敌阵；当时谁也不知这位英雄从哪里来，他叫什么名字，在第二天打扫战场时，才从他被烧焦的尸体上，找出烧剩下的半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胸章背面还留着：“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几个字。

……

英雄们的事迹是数不尽的，残酷的战斗愈战愈烈。尽管王学礼同志不叫困难，我们也考虑到他的处境，决定拿十师的三十团上去支援他们。同时组织军直所有干部和勤杂人员，为他们运送弹药。又命令二十八、二十九团向左翼的狗娃山展开猛攻，以减轻他们的压力。

三十团是扶郿战役中的英雄团，能攻能守，一上去可把王学礼高兴坏了，他一见武志升团长就高兴地喊：“老武哥，你们上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还有一百二十多人，你指挥吧，保证完成任务！”武团长看到他深陷的眼窝，消瘦的面颊，满脸灰尘被汗水冲成一道一道的，知道他还是老毛病，打起仗来几天几夜不睡觉，就劝他下去休息一会。他一听可急了：“老武哥，怎么你一上来就撵我下去，那可不成。”说着就拉上武志升同志亲自向他介绍敌情。

三十团增加上去以后，敌人虽然还连续组织了十多次反扑，但看出来已是强弩之末，气焰大不如前了。我军每打垮敌人一次冲锋，即乘胜出击，逐步向前发展。到了下午五时，沈家岭上敌人有生力量已被我消灭殆尽，再也无力反扑。

黄昏来临，最后的总攻开始了。敌我双方的炮火更加激烈。即将死亡的敌人，在督战队钢刀的威逼下，犹作困兽之斗。这时王学礼的双耳被炮弹震聋，眼睛也红丝丝的，但他还是精神百倍，提着驳壳枪，跳出战壕，用沙哑的嗓子喊着：“同志们，跟我来！”追向溃逃的敌人。

谁知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的子弹竟夺去了王学礼同志年轻的生命。这是多么痛心的消息啊！正在战斗着的同志们全都热泪盈眶，悲恸地喊着：“为王学礼同志报仇！”大家举起冲锋枪，举起手榴弹，狠狠地向敌人杀去！

王学礼同志，在这敌人成群跪倒缴枪投降的时候倒下了；在这兰州古城上刚刚飘起红旗的时候倒下了；一听到这个惊人的噩耗，真使人心痛如绞。霎时间，十五年前那个活蹦乱跳的红小鬼又出现在我脑子里；两天前那个在电话里约我吃西瓜的声音又响在我耳鼓里。

胜利，它的得来是多么的不易！走向胜利的每一步道路上，洒遍了多少同志的鲜血啊！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望着庄严雄伟的兰州城，我默默地悼诵着：安息吧，王学礼同志！安息吧，为解放兰州而牺牲的英雄们！

各族人民的欢笑

在我军攻占沈家岭的同时，六军也攻下营盘岭，六十五军攻下马家山，敌人所吹嘘的三大主阵地，至此全部崩溃。马步芳眼见自己所经营的兰州天险防线已被攻破，而胡宗南与马鸿逵亦顾不上出兵救他，守城的决心乃告动摇，诱歼我军的企图则更成为泡影。当夜即全线溃退，想过黄河铁桥逃往青海。我三军一发现敌人有动摇之势，即从七里河方向猛插西关，夺下北城门楼，控制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退路。逃不掉的敌人，仍然企图顽抗，与我军在市中心中华路一带展开激烈巷战。等我主攻南山的部队全部压来，六十三军也从城东插入市区，残敌才开始缴枪投降。敌人有些士兵双手高举着枪恐慌地说：“饶命，饶命，我是汉人！”我们的战士则向溃散的敌群大声喊道：“不管是回人汉人，只要缴枪，一律宽待。”

至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我三军越过黄河，占领了北岸的制高点——北塔山，解放兰州的战斗始告结束。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从此回到人民手中。

枪声一停，各族人民即敲锣打鼓拥向街头，向我军含笑致意，道问辛苦，过去常听说“八月兰州，瓜香满城”，确是名不虚传，老乡们拿出一筐一筐的西瓜、醉瓜、香瓜、白兰瓜、绿酿甜瓜，热情地招待我军，当战士们婉言谢绝时，乡亲们感动地说：“是专给你们留下的呀！”

各族同胞还拿着早已写好的红绿标语到处张贴，有的标语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天播了，地动了，西北人民翻身了！”有的人望着满街迎风招展的红旗，望着满街载歌载舞的秧歌队，情不自禁地喊道：“过年啦！过年啦！兰州人民见晴天啦！”这些标语，这些喊声，代表了西北高原上千百万人的心情！天高气爽；红旗飘扬；东风在呼叫，黄河在歌唱；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在尽情地欢笑！

（张达志，节选自《星火燎原》之十）

进军西南

背景介绍

亦称西南战役。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相继解放后，蒋介石决定加强川、陕边区重点防御，以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第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又沿大巴山、白龙江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以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第十四、第十五兵团与第十六兵团相配合，扼守川东门户；另以若干兵力分别配置于各战略要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配属第十八兵团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由刘伯承、贺龙、邓小平指挥，实施对西南诸省进军。第二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先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打的方针，作出战役部署：以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一部直插黔北、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云南的退路，尔后协同第三兵团作战；以第三兵团主力及湖北军区，采取钳形攻势围歼湘鄂川边界的宋希濂集团。此后，第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与第五兵团协同，聚歼川东和重庆地区之敌。完成任务后，与第十八兵团协同，歼灭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

十一月一日，解放军各部队在北起巴东、南起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川、黔国民党军发起多路进攻。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等部，首先从两翼突破了宋希濂集团，击溃了由大竹地区向川东增援的敌第十五兵团，先后攻占了秀山、恩施、彭水、酉阳、建始等城，直逼乌江东岸，于十九日在咸丰东北地区围敌第十四兵团。与此同时，第五兵团和第十军由湘西挺进贵州，沿线攻占铜仁、镇远、天柱等地，于十五日解放了贵阳、思南。至此，国民党军大西南防线被拦腰切断。胡宗南集团仓惶南撤，并将第十五兵团和第二十兵团布防于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妄图阻滞解放军进攻。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命令所属部队迅速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撤贵州、云南的退路。第三兵团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强渡乌江后，迅速向南川地区合击，二十四日攻占南川，至二十八日，将宋希濂集团主力第十五、第二十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攻占重庆外围据点，于三十日解放重庆。蒋介石及其政府逃往成都。此时，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由贵阳、思南迅速向南川宜宾、泸州方向迂回，沿途攻占毕节、叙永等地，至十二月十三日，相继解放自贡、泸州、宜宾等城。为实施对胡宗南集团的南北夹击，十二月三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十八兵团（中央军委于十一月下旬决定归二野指挥），急速南下川北，断敌逃往康、滇的退路。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第三、第五兵团轻装前进，击破敌人在涪江、沱江和泯江沿岸的防线，十二月十五日，又先后攻占简阳、仁寿、乐山、眉山、彭山等城。十九日，在峨眉西南的金口河生俘宋希濂。接着，攻占了蒲江、邛崃、大邑等城，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并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成都地区。此时，第十八兵团越过秦岭，日夜兼程向川北挺进，沿线攻占武都、汉中、巴中、仪陇、南江等地，至二十一日抵进绵阳。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全被包围在成都地区。十二月九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将军，分别在昆明、雅安起义；二十一日，川陕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在金堂起义；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率残部在贵州起义；二十四日，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残部在彭县起义；二十五日，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但敌第五兵团等部于二十四日下午。分两路向邛崃、大邑一线进行反攻，企图突围。解放军第三、第五兵团乘势进击，压缩包围圈。同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等部进抵广汉、简阳地区。二十六日晨，解放军发起全线进攻，敌第五兵团除少数逃往西昌外，大部被歼，俘敌五万余人。二十七日，敌第十八兵团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三十日，解放军进占成都。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七日，解放军第四兵团一部进行了西昌战役，全歼敌一万余人。西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约九十万余人，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及湘鄂陕等省五十余座县城。

材料：

- 横扫秦岭二百里
- “阴平道”上出奇兵
- 成都人民欢迎解放军
- 昆明保卫战

材料一　横扫秦岭二百里

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部队开到了秦岭脚下，情况突然变了，战斗要提前三小时，我们的任务是插进敌后攻占秦岭，切断川陕公路。

部队绕过敌右侧，爬深山越大岭，白天七十，黑夜六十，战士们着实疲劳。但是，情况又变得如此紧急，指挥部命令要我们在十二点钟以前冲上秦岭。

昨夜十二点钟前，部队从一百多里以外来到这里。正前面就是秦岭，四面是望不尽的深山，山顶上仅有的两条小路被敌人封锁着。所有的山头都有敌人在扼守。敌人把大树砍倒垒成象几丈高的悬崖，一层又一层。地雷是一片连一片。有一种叫不来名字的树一身刺，三、四丈高，一根

接一根，那么密，石头投上去都落不下来。从半山腰最少还要爬十五里，才能到山顶。

山顶有两个大据点，一个是汉王岭，一个是狗头寨，都是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秦岭主峰。夺取这两个据点可以控制秦岭。这个任务交给五四〇团六连和八连了。

干部们看完地形后，都感到沉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高大的山。现在却要在这上面打仗，时间又是这样短促。两个连在密林中开了个军人大会，把任务和困难向大家讲清楚。这样地形，要用平地攻碉堡的办法，根本是不行的。脚下是石头，头上是森林，人接人走，后边只能见前边人的脚后跟。这种自然条件，还要偷袭，不让敌人发觉。不过这也没有把战士们难住。大家都想了办法，怎样不咳嗽，脚步不响，每人带了点盐，咳嗽时，往嘴里放一点可制止住。能钻的树林，想办法钻进去，就这样向上一步一步的运动起来了。

岭上的胡宗南骑二旅三团和三十八军的五三〇团，还在狗头寨做梦，他们凭借着这个自然条件和埋藏的地雷，在山头上逍遥自在的打麻将、耍骨牌。他们断定"解放军长了翅膀也难飞上山来"。

六连二班长张成龙、战士周德才端着手提式冲锋枪走在最前边，后边跟的是全连的人和重机枪。一步一步接近了。当他们从敌人的哨兵跟前爬过时，触动了一下树枝，敌人哨兵喊了一声"谁"？他们立即卧倒在地上，敌人哨兵仔细看了一会没有动静，便不注意了。他们又爬起来，张成龙绕过了哨兵向左前方运动，爬在前沿，听到敌人喊叫"妈×，还不开饭！"他把头钻进草里，一步一步往前爬。他看见敌人在草房睡觉，脚伸在外边，这时后边的周德才也来了。他们就象老虎下山一样冲过去，一个敌人正从房子里出来，被突然缴枪的喊声，吓的瘫在门口了。接着，张成龙和他的手提式同时叫起来，敌人不知道解放军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下来的，没有顾得上拿枪、撤退跑到房后，张成龙赶到房后，追到房里。一个人就缴了三挺轻机枪。接着，后边的同志也赶上来。连续夺取了三个山头。

这时八连突袭汉王岭的战斗也开始了。八班班长刘家贵，手里提着冲锋式，本来计划全连绕过敌侧后方攻击的，突然被小炮班踏响了地雷，暴露了秘密。这时刘家贵想到，敌人听到响声一定出来，他立即喊："八班往上冲！"说着，一个人就先冲向前去了。这里敌人和狗头寨一样，树木砍倒当鹿砦，一连六、七层。刘家贵爬上去从树缝里钻过去，奔向敌人前沿，一个敌人正端着一支枪监视着这条路，刘家贵向敌人开了枪，没有打中。而敌人向他投来一个手榴弹。刘家贵滚在一个小沟里，手榴弹爆炸后，立即又冲上前去。但是，又被铁丝网堵住了。这是紧要关头，他又从铁丝网格子里爬过去，衣服和肉挂烂了，他全不理会。敌人的第二颗手榴弹又向他投来，刘家贵趁手榴弹还未爆炸，端着冲锋枪向敌人扫射，枪膛里没有了子弹，想换第二个梭子又来不及。面前的敌人端起枪向他瞄准。刘家贵把冲锋枪一扔一个箭步上去，就抓住那家伙的枪，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右侧飞过去。他大喊："快缴枪！"但这个顽固的家伙张嘴要喊。刘家贵用手捂住他的嘴，指头被咬住了。这时后边又来个敌人，刘家贵用力把这家伙摔倒在地上，夺过枪来，刚上来的那个敌人还没来得及拉枪栓，就被刘家贵一枪放倒了。其余敌人满山遍野逃窜起来，有的连自己的枪支、衣服也来不及拿，他们不知道解放军从哪里来往哪里打，西边是炮声，东边是枪声，后边连续不断的队伍又冲上来了。战士们象抓鸡一样到处抓俘虏。仅仅用了六个小时，秦岭就被我们占领了。这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钟的事。

天，渐渐黑了。一整天部队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休息一分钟。就在这高高的秦岭山上，战士们用被子搭成小帐篷，野外露营。但秦岭山上风大，小帐篷站不住，呼呼被风刮倒了；倒了再搭，搭起又倒，倒了又搭。战士们说：风婆子，咱们看谁顽强！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夜。

拂晓，部队又出发去追击溃退的敌人。五三八团向黄牛山冲去，五三九团向黄牛铺追击，打法是"截屹节"。敌人跑的快我们比他还快，绕弯过去就给当头一棒，从敌人的行军行列中插进去，一截几屹节，然后即吃掉。战士李天娃紧紧尾追五十来个逃敌，机枪小炮好几十，但他并不畏惧，只是一支三八式，就抓住了四十个敌人。敌骑二旅三团二连七班长伍江说："你们三个人，把我们一连人赶得七零八落！"川陕公路被截断了，秦岭右侧的敌三十八军，只得向东河桥以东深山败退。我们的部队，又继续向深山插去。当战士王子明插进一个沟坎子上边时，敌一七七师五三一团四连长正在欺骗他的士兵说："我们明天就到宝鸡吃白洋面去，"话未落地，王子明同志的枪已伸到他的面前了。

敌人被冲垮了。攻击战完全变成了追击战。从崖湾逃跑的敌五十五师妄想在桃树下喘一口气，敌师长曹维汉跑过来大喊："人家又来了，快跑呀！"顿时整个敌人溃不成军，在满山丛林里乱窜。山上老乡们也帮我们捉俘虏。北星山老乡郭虎把六个俘虏四支枪交给了我们收容站。沙巴山上二十四个敌人把枪交给了民工，自己跑了。

就这样，经过十二天的风雨和战斗，我军横扫秦岭二百里。胡宗南守秦岭的三十八军、三十六军、骑兵旅共五个师被追垮了，被消灭了。

（选自《向西北西南进军》，作者：张城垣）

材料二 "阴平道"上出奇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消息传来，更激励了战士们求战的热情，焦急地盼望上级早

日下达向西南进军的战斗命令。有些战士们还调皮地说："再晚些，敌人就要叫兄弟部队给包圆了，咱们连汤也喝不上了。"就连我们一些师、团的领导干部也都有些沉不住气呢！

十二月三日命令终于传下来了，六十二军作为兵团右翼，担任由陇南入川的任务。一八四师为军的右路，奉命由岷县向西固前进，开始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我带师前指随五五〇团先行。部队象钢铁洪流，一泻直下，昼夜急进。七日克西固，敌县长率自卫队二百多人起义。西固解放后，部队沿白龙江继续向南挺进，追歼向文县逃窜之敌。虽然敌人沿途不断破坏道路、桥梁，但是部队不顾疲劳、饥寒，向南疾进。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向南！快！快！追上敌人！

三千五百多米的岔岗岭是通往文县的一座天然屏障。山上古木参天，山路崎岖难行。时值寒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到处都是深及膝盖的积雪。一进山只见周围白茫茫的雪雾，分不清东南西北，一片昏暗。从山谷袭来的阵阵朔风，裹夹着冰雪迎面扑来，象无数把小刀扎在脸上，疼痛难忍。山路越走越窄，越来越陡，最后简直就没有路了，队伍只好一边攀登，一边开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辛劳。有些山岩陡坡如果不是拉着旁边的荆棵树枝，要想爬上去真比登天还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翻越岔岗岭就是赤手空拳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我们的战士们要负重几十斤，甚至还要带着沉重的炮队呢！战士们不顾疲劳和道路的艰险，奋力攀登着。先头团于十日翻过了岔岗岭雪山，向文县扑去。继先头团之后，师炮营也紧跟着上来了。记得在南进开始前，我曾亲自到炮营进行过动员。"不怕苦、不怕难，跟上步兵保支援。""保证跟上步兵兄弟，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战士们响亮的口号声和请战表决心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的确，全国胜利的形势和为人民立功的决心，给了战士们无穷无尽的力量，给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上，牲口就是光着身子牵着走也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说驮炮负重了。一些重武器、弹药、物资都要靠人背肩扛。全营所有的武器、弹药、物资器材加起来，每人至少要平均负重九十多斤。但是，战士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一些难行的地段上，他们把自己的被褥铺在地上，垫起一条小路，让牲口从上面通过。在牲口难以行走的地方，他们就把弹药、物资器材卸下来，把大炮拆开，人背肩扛。汗水湿透了每一个人的衣裳。

越过岔岗岭，先头部队于十一日在岩向头、滴儿坎一带追上了敌人，歼灭敌二四七师三七九团五百余人。十二日乘胜占领文县，伪县长率自卫队一百多人投降。文县解放后，迅速夺占碧口。碧口乃是川北要冲，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确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险。守敌是敌一四四师四三〇团等残部约一个团的兵力。文县解放的当日，我即派出以师侦察科长带领的骑兵侦察连迅速前出，向碧口方向实施侦察，希以最快的速度抢占碧口附近的铁索桥。不料铁索桥已被敌人破坏。据了解在白龙江上游还有一座小桥。我们即决定部队从上游过江，然后分路进击，攻占碧口。五五〇团团长李长春同志带一、二营沿江南岸轻装前进，先行抢占通碧口铁索桥之桥头堡，尔后向碧口镇实施攻击，掩护工兵迅速架桥，保障军主力通过；三营营长刘尚武同志带该营绕道向碧口镇前进。部队很快沿江而下，迅速通过小桥。过江后即分路急进。我随五五〇团主力沿江南岸直插碧口。沿江的道路崎岖难行，是一段异常艰难的险途。一侧是悬崖绝壁，一侧是滔滔急流，稍有不慎就有堕入滚滚咆哮的白龙江中的危险。部队以日行一百二十里的速度昼夜疾进，于十五日上午进抵碧口铁索桥。在碧口铁索桥附近与来抢占桥头堡之敌一个营遭遇。五五〇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攻，不到一个小时全歼该敌，俘敌三百余人。抢占了通碧口的铁索桥桥头堡，部队即向碧口镇前进。驻守在碧口镇的敌人早已是惊弓之鸟，弃阵而逃。碧口即告解放。

十五日继续向南追击，部队又连续突破大刀岭、青岩关、黄土梁等要隘，先后歼敌数百人。相传三国邓艾发兵西蜀，就是沿着这条阴平小道出奇制胜的。今日向西南的雄伟进军，又远非昔日的邓艾可比了。

在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四川境内的敌人早已是一触即溃，闻风丧胆了。十八日我军进占青川，守敌南逃。二十日拂晓追至南坝，守敌闻我军占领青川便仓惶逃窜，并将涪江南、北渡口的船只完全破坏，妄图阻止我军前进。二十日五五〇团偷渡涪江成功，解放了南坝。二十二日解放江油、中坝。部队迅速抢占了青莲场渡口，出敌不意，截歼敌后尾部队骑三旅二千余人。当日由剑阁方向溃逃之敌骑二旅、新六军等残部窜至江油河东岸。五五〇团立即渡过涪江，发起进攻。敌人疲于奔命，不敢应战，被我歼灭，俘敌六百余人。缴获战马五十余匹。二十五日我军占领绵阳，守敌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宣布起义。我军乘胜向什邡前进，在新市镇歼敌七十九军一四〇师四一九团，俘敌一千二百余人。从新市镇南逃的一四〇师师部及师直炮兵营等也被我全歼，俘敌师长以下六百余人，缴美造一〇七口径化学迫击炮六门。与此同时，刘、邓大军已挺进至简阳、南江、三台、青神、邛崃等地，完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从北线猛扑下来的我十八兵团部队，迅速占领成都会战的指定位置，完成了对成都的战役合围。由陕甘、重庆等地溃聚在成都周围的数十余万敌军，完全陷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

(选自《向西北西南进军》，作者：林彬)

材料三　成都人民欢迎解放军

太阳刚刚升起，薄云渐渐消失，鲜红的五星红旗，已高傲地飘扬在成都市上空。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起义士兵……各自乘着卡车、脚踏车(自行车)，以及徒步的人群，手执着欢迎的旗子，组成了一条欢腾的洪流，向北门奔驰，抢先欢迎解放军。

九时，部队入城。军乐声、欢迎和欢呼的口号声，此伏彼起。人们放着鞭炮，象过年一样喜悦，象办喜事一样高兴。被服厂的工人说：过去吃不饱，穿不暖，还受老板们的打骂，解放军一来，咱们可就解放了。成都中学的学生，组织了秧歌队，唱着，扭着，热烈欢迎解放军。解放军某部张科长和摄影员等，也都参加进去，军民共同欢庆解放。每当载有毛主席、朱总司令肖象的宣传卡车出现在人群跟前时，掌声如雷，“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身体健康……！”等口号声响彻云霄。广大青年学生高唱着“跟着共产党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曲，电影师从各个角度拍照这热烈欢腾庄严的场面。学生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兴奋的把手套脱下来翻过，要求解放军签字留念。他们懂得这一天的宝贵，是新生的开始。三育中学十四岁的学生陈大康，一直紧跟着载有毛主席肖象的宣传车，他说：“蒋介石完蛋了，人民才有了自由。也敢大胆唱东方红了。”洋车工人见了毛主席肖象对解放军同志说：“过去整年拉车，眼看把骨头都拉瘦了，吃不上一顿饱饭，这一下可好了，有饭吃啦！”乡下来的农民见了解放军，不知该说什么，只伸出两个大拇指，连声说：“好啊！好啊！”

解放军的卡车拉着榴弹炮从人群中通过时，人们目睹着这些从蒋胡军手中夺来的美式、日式、德式榴弹炮，欣喜万分。簸箕街的市民说：“这一炮就能把城墙打垮！”成都中学把“严惩战犯”的标语贴到大炮身上，把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解放军大炮上。

在高楼上的人们，着急地不能插翅飞下，只好招手致意。有个人抱着一个小孩，拿着一束鲜花，让小孩把鲜花献给解放军，立即被摄影师拍入了镜头。人群拥挤，直到深夜，都不肯散去……。

(选自《向西北西南进军》，作者：周敏明)

材料四　昆明保卫战

云南起义，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他不甘心失败，猖狂进行反扑。他提升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第八军和二十六军进攻昆明；任命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以继李弥，彭佐熙为二十六军军长以继余程万；为了激励士气，每军特发大洋10万元。

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八军为右翼，二十六军为左翼，残缺不全的宪兵5个团为预备队，向昆明进犯。蒋介石又派飞机轰炸昆明，以配合陆军的进攻。五华山光复楼东边中弹一枚，门窗均被炸毁；我的副官吴昌汉把我推进防空洞，他伏在洞口被弹片炸伤左胸；有一枚炸弹贯穿屋顶掉在民政厅的一把藤椅上，没有爆炸；还有几枚落在翠湖卢公馆附近，水花飞溅，状如倾盆大雨；华山东路平政街一带，中弹甚多，房屋被炸毁，居民死伤数百人。卢汉立即命令市长曾恕怀带人去抢救慰问，并决定将指挥机关搬到圆通山办公，誓死保卫昆明！

这个决心鼓舞着全市军民。虽然敌军两倍于我，但我军有全市人民的热烈支援。工人和青年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都自动组织义勇自卫队，要求发枪。参军极为踊跃，市民亦自发起来，参加修筑防御工事，组织救护、运输、肃奸队，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卢汉日夜坐镇在指挥司令部里，随时在电话中向军师长询问部队情况，时常找军需们了解粮弹的储备与供应，召集参谋人员谢崇文、佴晓清、杨济宽、杨剑秋等研究作战方案，对敌我态势进行详尽分析。又特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积极与边纵朱家璧进行联系，要求边纵攻击二十六军的侧后。当卢汉收到刘、邓大军的陈、宋兵团已奉命向云南全速挺进的消息时，大家都极为振奋，对保卫昆明更加充满信心。

12月16日下午，敌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与我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我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第八军之一部则迂回至金殿黑龙潭一带，侧击我守备部队。卢汉在积极组织反击的同时，又派扣留下的几架运输机去轰炸蒙自、沾益飞机场，破坏敌空中补给基地，并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入夜，敌军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似有要在次日发动总攻的模样。卢汉星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鉴于我九十三军防广兵单，配备薄弱，阵地拉得太宽，在敌人强大兵力的攻击下，势难持久，就召集谢崇文、佴晓清、杨继宽等参谋人员和我研究后，断然决定缩短防线，以城防工事为主阵地，在北教场、巫家坝一线的前方作为迟滞敌人行动的前进阵地。这样既可节约兵力，以逸待劳，发挥城防工事的作用，又可以控制有力的机动部队，作为支援重点方面的作战和出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不致造成挨打而无法还手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卢汉遵照刘邓首长的电示，加紧做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官兵起义。卢汉早在11日即发表二人为军政委员，12日又把余程万搬到他家新公馆里住，派李耀廷、张天如去作陪说服；让李弥转移到我家里住，由赵诚伯、李鸿谟作陪说服。二人都很愉快地接受了指示，当即发表起义广播，并多次

写信去敦促二十六军改变番号，参加起义。李弥还主动提出放他老婆先去向第八军做说服工作。我们虽然疑信参半，但仍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当晚，据他老婆返昆说，第八军官兵表示只要李弥能出去，一切均可照办。为减轻昆明的军事压力，保全地方元气，卢汉便决定放李弥出去，希望第八军实现起义的行动。岂料李弥一出去后，却主张不打昆明，把部队拉到他的家乡滇缅边境，以便取得美英支援。谁知曹天戈疑心他被卢汉收买，挟持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果然，18日拂晓，二十六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上午8点左右，敌人炮弹打到巫家坝机场内。我带卫队驰至机场。恰逢保六团退下来，我大声疾呼："不准退，不准退！"并当面下令该团团长李达人稳住战局。李慌忙地说："我、我在诱敌深入。""胡说，你这样搞，会影响全线的！"我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命令部队向前守住阵地，顶住打，冲上去！这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不为所动，继续反击，全团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正在这紧张时刻，余建勋的先头部队保五团赶到，于是两团官兵握成一个拳头，向敌人狠狠打去，一举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李焕文的保十团在杨方凹一带受敌猛攻，我只好命令作机动的赵振华率保十五团顶上去，终于打退了敌军。我将战况向卢汉报告，卢汉高兴地给保五团团长马荣凯和赵振华记功，并把李达人撤职查办。

到19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全线发动总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自晨至晚，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步兵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进行波浪式冲锋，声势凶猛。第八军的山炮部队放列在大树营前方，直接轰击东北城隅，大东门、圆通街及圆通山上均落有零星炮弹。我九十三军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予敌猛烈的集中射击。任敌反复冲杀，仍未越雷池一步。在夜幕降临之后，敌军组织敢死队，并欺骗士兵说，城内银行里的黄金白银很多，打进昆明，可以自由行动3天。敌又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妄想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摧毁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突入城内，抢掠财物，扩大战果。但由于我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集中自动火器，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一批敢死队员的疯狂猛扑。南线的柳坝、南窑一带，炮火连天。东线的第八军一部则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被我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形成拉锯。卢汉命令我和佴晓清、许义浚等分别到各阵地督战，给部队很大鼓舞。当夜，纺纱厂附近枪声激烈，我即率领卫队经东寺街去察看，见居民纷纷走上街头，迎到我们面前，毫无惧色。人们盯着我说："龙军长，不要怕，假使敌人窜进来，我们拿扁担也要把这些狗日的打出去！"人民的支援鼓舞着我和部队，人人争先，奋勇杀敌。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再衰三竭，直至停止猛攻，只得派小股兵力不断扰乱。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补，以迎接来日的决战。

还在头一天上午，巫家坝前沿送了一个自称投诚的班长到指挥司令部来，口口声声要见卢汉。我叫人仔细搜查他的身上，除了一封信外什么也没有。这是二十六军前线一个名叫罗伯刚的团长写来的信，信中表示该军为了营救余程万，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弹，也要血染滇池，在所不惜。卢汉当即叫人把送信人带去见余程万。这个班长见余程万后放声大哭，余程万也为之动容落泪。卢汉考虑到既然二十六军是以营救余程万为名而战，如果放余出去该军将无所借口，可以起到从心理上瓦解敌军的作用，从而避免兵祸，可保地方元气。即使万一不起作用，大不了如李弥一样，对我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何况余程万信誓旦旦，坚决起义，为人也没有李弥那么奸诈呢！因此，卢汉遂决定放出余程万，并由杨文清陪同，亲自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了当前的形势和解放大军已逼近云南的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均已被打垮，现在这一两个军又算得了什么？蒋的亲信都已逃到台湾，留你们在这里当替死鬼，对国家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就利害关系而言，我过去追随蒋介石，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也毫无顾忌地宣布起义，你们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余程万感激涕零，以手指天为誓，表示出去后一定要率全军起义，决不辜负卢主席和云南地方父老的这种厚爱。随后卢又嘱咐："你要把二十六军移驻宜良、开远一带。改变番号，通电起义，接受新职，待部署妥当后，望即返昆行使军政委员的职务。"12月20日上午，即由佴晓清派一参谋和吉普车一辆，送余程万出巫家坝。岂料这时炮火猛烈，二十六军的山炮部队正向我核心阵地前沿射击。步兵正向我五里多、吴井桥方向冲杀，企图突入塘子巷火车站。而第八军则重点攻击昙华寺、大树营地区，步兵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突击我崔公堤附近阵地，有的狡猾地利用连埂的村庄和工厂，企图突入市区，其炮火则不断向东城一带盲目射击，炸毁民房多处。中午忽报铁峰庵失守，敌军已登荷叶山、王帽山构筑工事。我们随即将军的预备队增援大小连山，战局十分危急，卢汉连续急电催余建勋军主力火速来援。

直到下午4点，在二十六军炮击的空隙里，余程万才爬上巫家坝附近的一个土堆上，手摇白旗，高声呼叫："我是余军长，你们不要打了！"叫了几声，对方步兵看清了余程万，遵命停止射击，把余程万迎了过去。果然，南线炮火遂趋沉寂。傍晚，二十六军的攻势已停。东北面的枪炮声却有增无减。

夜里，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饬令杨、苏兵团派出快速部队，用汽车运输，星夜驰援昆明，希与切取联系，密切配合，共歼敌军。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也从贵阳来电告知，快速部队业已派出，由牛司令员

率领兼程驰援昆明，约于23日即可到达曲靖。解放大军驰援昆明、指日可到的喜讯，瞬即传遍全军，一时士气大振，欢声雷动，连日的顾虑和忧虑为之一扫，战斗精神焕发，遂用猛烈的火力歼灭东北方向敢于来犯之敌。

真奇怪，21日清晨，不仅南线寂静无声，就连东北两面的枪炮也不响了！难道敌人已经知道解放大军不日将到昆明解围的确切消息了么？果然，敌人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的消息后，惊恐万状。谍报二十六军的攻城部队是在昨天黄昏奉命向南撤退，至宜良后余程万遂为新任军长彭佐熙所挟持。第八军是在当天黎明前知道二十六军已经撤退，陷于孤立境地，感到侧翼暴露，生怕被我围歼，也就纷纷撤退了。昆明城围遂告解除。

解放大军杨、苏兵团的快速部队于22日即到达曲靖，该部闻昆明城围已解，即南下追歼逃敌，并在陆良的天生关一举歼敌800余名，俘虏副师长一名，团长两名。

陈、宋兵团由南宁经百色奔袭千里，飞奔入滇。1950年1月15日，以神速的行动突然包围蒙自，出敌不意，奇袭机场，截断空逃路线，全歼敌军。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等，逃到元江为我解放大军所俘。笼罩在云岭上空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云南人民从此拨开雾瘴见朝阳，走上了幸福的道路。

（选自《纵横》88年2期，作者：龙泽汇）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背景介绍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同时，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先后转道到达北平。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的代表，在北平召开了新政协会议筹备会（见史料）。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等为副主任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建国的准备工作。为了阐明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前途，同时回击国内外敌人的造谣中伤，澄清人民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着重阐明了以下观点：关于国家的性质，文章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关于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文章认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只能联合，不能依靠，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文章认为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关于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文章认为应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

毛泽东在文章中描绘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蓝图，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基本纲领，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材料：

· 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

材料　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军事力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在我国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形势下，全国各人民团体迅速地壮大起来，并且走上了统一。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任务如何？这个国家里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如何？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这些问题，是当时全国人民所最关心的。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之际，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明确地论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必然性及其前途。他总结了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而到最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此，“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不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而现代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缘故。因为同样的缘故，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前途。毛泽东高度概括地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

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规定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至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也是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现在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仍然允许资产阶级存在。这是我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节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是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势必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辩证关系。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于反动派，则实行压迫，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对反动派，决不施仁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人最后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的。但是现在还不能。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鉴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到来，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强调指出，我们要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28年来，“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对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来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要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而绝不能就此止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为了迎接新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他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此外，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对新中国的对外基本政策也作了阐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和他的《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重要准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背景介绍

简称：“政协”或“新政协”。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平召开筹备会议。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平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六百六十二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林伯渠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报告》，谭平山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的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特点的报告》，各单位代表八十五人发了言。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还通过了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歌;制定五星红旗为国旗等四项决议。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材料:

-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
- 庄严的新政协会议
-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材料一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也有了新的高涨。3、4月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市的学生和教职员,为反迫害、反饥饿进行了罢课罢教、示威游行(这一运动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成都等十余城市)。各地工人也举行了返迫害、反饥饿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各地农民也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了广泛的有组织的斗争,很多地区甚至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在我党帮助下,也重新结合起来,拥护我党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解放战争初期,曾有些民主人士幻想走“第三条道路”。1947年10月,蒋介石反动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曾发表谈话说民主同盟是“国家之叛徒”、“人类之蝥贼”,又说:希望治安机关不能任其逃出国境”),同时加紧对一些民主党派的迫害,使他们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这就宣告了向国民党政府求和平、求合法、求改良的“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促使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幻想。1948年1月,沈钧儒、邓初民等民盟领导人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 ,并恢复活动。李济深、柳亚子等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反蒋势力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们都在香港发表宣言,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支持我党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由此可见,这时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全国各民主党派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日益成熟。为了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更广泛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城南庄为中共中央起草了1948年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起草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已经到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是4月23日离开城南庄的),逐条征求周恩来同志对“五一”口号的修改意见。

5月1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日报》第一版上颁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五一”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是我党统一战线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党中央的“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来信来电拥护我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延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同志,同意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来电说:“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并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毛泽东同志在8月1日给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人士复电:“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毛泽东同志在复电中强调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10月10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告同胞书,谴责南京蒋介石政府的独裁残暴统治和窃权卖国罪行。之后,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人物陆续进入解放区,与我党筹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五一”口号发表后,给5月初刚刚闭幕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国大”以致命一击,使蒋介石反动集团陷入彻底孤立,我党则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信任和拥护,使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有了更加巩固的政治基础。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机关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村,和以刘少奇、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摘自姜延玉、管春林:《中共中央在城南庄》)

材料二　庄严的新政协会议

1949年9月21晚7时,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即将举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的盛会。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

会场之内，玻璃灯、水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堂显得庄严瑰丽，光彩夺目。经过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一个多月的努力，把这座古老建筑，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悬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着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

出席会议的代表，6 点钟之后便陆续入场，6 点 40 分，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委会向到会代表报告：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来自 54 个单位或地区，共 634 人，来宾 300 人，还有友好国家的新闻记者数十人、并宣读筹委会提出的 89 名主席团成员名单和秘书长名单，得到全场热烈的掌声，获得一致通过。这个名单，除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各为七人之外，其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少数民族，多则 4 人，少则 1 人，都有代表。

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长达好几分钟。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大会日程和当日执行主席之后，时针正好指向 7 点。

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 54 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长达 5 分钟之久。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扼要地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和这次会议的任务之后讲道：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的讲话，声音洪亮清晰，令人精神振奋。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引起热烈的掌声。据有人统计，这个不太长的讲话，鼓掌高达 41 次之多，有的掌声长达 4 分钟。

9 月 22 日，政协会议第二天，主要议程是通过有关报告。

当通过文件时，代表们讨论热烈，全场一片掌声，表示通过，而唯有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座席上的代表，则一致起立，热烈鼓掌，显得整齐严肃。谭平山执行主席提出，凡通过文件，代表赞成者，均一律起立鼓掌，才算是通过。这一提议，立即为大家采纳。

最后是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中共起草提交给大会的。在通过时，得到全场最多的掌声，而毛泽东是最后一个站起来鼓掌的，许多民主人士觉得这显示了谦虚和不强加于人。

会间稍事休息，毛泽东、朱德与傅作义握手，亲切交谈。这时，农民代表、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过来，与毛泽东握手，她带着农民特有的淳朴对毛泽东说："我老早就认识你了。"说得那么亲切，毫无拘束和矫饰。毛泽东高兴地与她交谈起来。不知道的人，决不会以为他们一位是领袖，一位是农村妇女，还以为是故友重逢，亲朋相聚呢。

9 月 23 日，政治协商会议第 3 天，上午，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的图样。

负责此项工作的筹备会第六小组截至是日止，共计收到国旗提案 1920 件、图案 2992 幅。国徽提案 112 件、图案 900 件。国歌提案 632 件，歌词 694 首。这些稿件来源地区非常广泛，遍及全国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西安等大城市和近 20 个省，还有一些未解放的城市。还有的来自海外的美洲、北欧、马来亚和北朝鲜。作者包括工人、农民、作家、学生和教授。8 月 16 日至 20 日，设置"选阅室"，将收到的提案，包括图样，全部陈列，邀请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进行研究，收集各方面意见，从中选出国旗图案 38 幅，国徽图案 5 个，编印成册，发给每一个代表，以便充分发表意见，更好地做出选择。

9 月 26 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

下午，周恩来、林伯渠召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中 30 人开会。到会人中，70 岁以上者 20 余人，其余均在 60 岁以上，其中有司徒美堂、张元济，两位都是 83 岁，还有陈嘉庚、马叙伦、陈叔通等。会上，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否简称"中华民国"一点讨论甚久。老先生们多数主张简称"中华民国"四字，因为这四个字也是辛亥革命浴血奋战争来的；经过争论，最后大都不赞成沿用这个称呼，更不能在法律上做出规定，因为这个名称被蒋介石集团用了 28 年，今天新的政府成立，应推翻旧名，一新耳目。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元济先生，清朝光绪进士，已 83 岁，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亦是参加光绪皇帝时期的"戊戌维新"的老英雄了。他出席这次会议到北平第 3 天，就向筹备处提出，要参观中南海勤政殿。他参观后，抚今思昔，感慨颇多。他说："与这个勤政殿一别已 52 年了。"上一次来勤政殿，是"光绪皇帝"在勤政殿召见他，当时新政尚未开始，光绪帝头一天召见了康有为，第二天就召见了他。"新政"行了不久，发生了政变，康梁远去，而他被禁"天牢"。他说："想不到以衰老之年，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独立，解放了的新中国的诞生。""自己能够参加这个人民的协商会议，真是荣誉极了，高兴极了。"

说到老者，还有一位萨镇冰代表，生于 1858 年，时年 92 岁，曾任北洋海军副统领、广东水师提督、海军部副大臣、民国上将军，1917 年任海军总长、福建省长等职，不

久脱离政界居家。他在福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因年龄过高，路途遥远，无法出席政协会议，已文电筹委会。但从代表名额看来，很明显地可以知道，毛泽东主席主政开明，处处能够公平地容纳各党派以及各阶层的民主人士，愿进步和有用的人，都使用为国家人才，尽量罗用，此点我是对毛主席很赞佩的。国民党的官僚，大多日夜花天酒地，不顾人民死活，而人民解放军无时无刻不在艰苦奋斗中，生活方面更为节省，单就这种吃苦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注定了国民党崩溃的命运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全面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最年轻的学生代表晏福明，年仅21岁，最老的和最小的代表年龄相差71岁。

9月27日，人民政协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

"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报告最后审查情况。大多数人赞成五星红旗。红色是热烈的颜色，象征我国革命的性质，它又象一团熊熊烈火，如凤凰涅death，象征古老中国得新生。黄色既代表和平，又表明我们是黄种人。大五角星代表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它的四个小五角星是四个阶级的联盟，象征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五角星还代表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和5亿人口，这是我们共和国庄严伟大的标志。随着马叙伦的介绍和解释，代表们翻阅着已发到手中的38幅国旗样式图册和选出来的五星红旗。马叙伦话音刚落，代表们便全体起立，鼓掌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国的国旗。

下午，人们走进会场，怀仁堂主席台的两侧，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告诉人们，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了。

马叙伦继续报告说：多数人赞成共和国国都选在北京，因为北平作为中国的国都，已有700年的历史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平有5000年文化记录，文物集中，交通发达，确有大国首都的有利条件。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多年来中外皆知，是中华民族之声，目前尚未有可代替的。马报告之后，全体代表一致赞成，鼓掌通过。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道："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

周恩来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周恩来又说："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做决定。"

（摘自岚叟、李丁《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日夜夜》）

材料三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9月30日上午全体休会。下午，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主要议程是：

（一）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全体委员。选举结果是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陈毅等65人为政府委员。

（二）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通过建立"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三）大会举行闭幕式：

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简述了这次政协所制定的决议和通过的事项，"都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闭幕。49名着新式军装的军乐队员，演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天安门广场。出席政协会议全体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于下午6时，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

奠基典礼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仪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毛泽东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锹铲土奠基，表示对先烈们的崇敬。毛泽东撰写的这段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

民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摘自岚叟、李丁:《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日夜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向各国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当日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举行了陆海空三军阅兵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时期。

材料:

-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 开国大典阅兵式
- 终身难忘的时刻

材料一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

我必须把这篇通讯直接写给你们,才能够把这一次首都人民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一切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你们。说尽可能真实是容易的,要做到,可是很难。因为十月一日这一天是太伟大,太丰富了。甚至在今天,二十四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街上还是红红绿绿的跳舞队,秧歌队、游行队。二十四小时之后,依然满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从湖北来的老先生、老太太摇头赞叹,说昨天那一场大会是"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从上海来的老先生说:"啊,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见到了!"从华北来的人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只是连续地、低低地赞叹:"啊,好伟大呀!好伟大呀!"从华南来的人也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晓得陈毅市长。昨天,陈市长望着天安门前红旗的大海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这是确实的。昨天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完全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初诞生的新国家的气象和本质:伟大,庄严,团结,民主,尤其是领袖与人民的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亲爱,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学好。

广场是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的一个大十字。全场容量有的说是二十万,有的说是三十万人。新造的旗杆在广场内正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地点在旗杆以南。在开会以前向筹委会登记要参加庆祝大会的人数太多,筹委会怕广场不能容纳,再三限制下来的结果,光是从旗杆到中华门,即十字形垂直线的下半截,那一部门所登记的人数已经是二十万人。十字形的横臂那一部分,除了一条马路之外,御河内外以及马路外边全是队伍。军队还不算在内。因为军队是四个师,根本就不在广场里面。广场外面两边街道上还有没能入场的群众队伍。即便是经过了限制,广场果然还是容不下这么多人。群众要求带锣鼓音乐队也不能办到。因为如果是几十万人都在场上打起锣鼓、扭起秧歌来,大会也就无法开了。事实上到后来,群众自己的呼喊已经大大地补足了锣鼓的声音。

队伍从早上六七点钟就到了广场,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农民队伍是四五点钟就从乡下动身来到天安门,参加这个他们第一次能够参加的大会。远远望去,整个广场上红旗翻卷象红海奔腾。在红旗下面,一片片的是穿了各种颜色衣服的队伍。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浅蓝色,有的是浅黄,有的是灰色,清清楚楚好象是精工规划的花圃一样,丝毫不相混杂。广场前面,白玉桥两边搭起了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团的观礼台。再前面就是天安门,楼上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

红旗飘卷,队伍静候。正在这时,城楼上面主席台前忽然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山鸣谷应,四处都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于是广场上的欢呼声立刻翻江倒海地爆发与城楼上互相呼应。这时候,按照预定程序,主席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经过电流来操纵的。城楼上有一个电钮开关,按相反方向写好了"升""降"二字。主席把电钮拨向"升"字,我们的红旗就顺了旗杆自己向上飞升。主席看着旗子,说"升得好!"主席说出了我们千千万万翘首瞻仰旗子的人心里的话。我们的旗子从此是庄严而稳重地向上升了,它升得好!

接着礼炮惊天动地上震响起来。每一炮所发出的巨大震响,据说都是由五十四尊大炮同时发出来的。这五十四尊炮的数目据说是用以代表政协五十四个单位。五十四尊炮同时发出二十八响礼炮,那声音真是山摇地动,象征全国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团结力量。

掌握着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力量,主席向人民、向全世

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确定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整天想封锁中国、扼杀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将是个难题，会使它头痛又头痛。

转眼就是阅兵了。四个师的部队全在广场外面东边等候，总司令下令阅兵时，四位野战军的将领分列左右，站在总司令旁边。第一野战军是贺龙将军，第二野战军是刘伯承将军，第三野战军是陈毅将军，第四野战军是罗荣桓将军。阅兵令下，就由原来在广场东端站在指挥车上的聂荣臻将军引导，四个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由东而西，缓缓入场，一个接一个地从主席台下白玉桥边走过去，队伍的服装、颜色、队形、行动完全整齐一致。每一个方阵都象一个人一样行动。甚至于连马队里所有马的腿脚都是一出一进完全一致的。所有成排的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地前进，绝无任何参差，使一字显得没有丝毫歪曲。当阅兵进行的时候，整个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队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雄壮的乐声和整齐的步伐配合，在大地上动荡。正在这时，十四架飞机飞临上空，广场爆发了如雷的掌声。飞机里除了我们的空军外，还有诗人马凡陀。

当广场上的人民队伍分队出发时，已经开始黄昏。星星点点，灯笼火把接二连三地燃了起来，很快，整个广场在夜色中透明了，并且颤耀着红的星星，黄的星星，紫红的，大红的，金黄的，橙黄的，愈向夜，广场愈益象大地自身活了一样，遍地灯笼火把组成了星星的涌动海洋世界。广场的游行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出动。蓝色的拿着紫色灯笼的队伍，黄色的拿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灰色的拿着金红色火把的队伍，浅蓝的拿着深桃红灯笼的队伍，还有黑色的拿着黄色灯笼的队伍，蜿蜿蜒蜒，交互环绕，象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各按各的方向走出会场，丝毫也不发生混淆或者紊乱的状态。队伍行动时唱着歌，但更多的是唱口号而且时常是连续不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这使得广场不但是以颜色和光辉活跃着，同时它还在连续不断地发出巨吼！地面这时又从许多角落放起了无数五彩照明灯球，象整个开了灿烂的光明的花朵。

毛主席是一直和人民在一起的。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主席一直是站在城楼边上盯着眼睛望着下面的群众。他的脸上时而庄严，时而微笑，他的手几乎一直是高举着，向群众有力而迅速地摆动，时时刻刻听见他向着群众高呼，这是一种人民共同的呼声。他的半个身子时常是伸出栏杆外面去举手招呼群众。在这里完全看出主席是怎样全心全意地热爱人民，他的这些动作，完全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强烈的阶级的爱，使他自自然然就会这样随时不断满含着召唤地高呼，使他的手老是要举起来招呼人民，使他象母亲一样地向人民把身子伸出栏杆外面去，要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广场上川流不息的群众最初似乎没有看到城墙上自己的领袖在招呼他们，因为城楼上的灯光并不是很强的。他们一面呼着口号，一面走到面对城楼的时候，就要站住，更高地呼喊。当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主席就从播音器里面高呼：“同志们万岁！”并且时时用亲切的呼声和群众的呼喊相应合。很快，群众就发现了自己的领袖还在他们中间，并且用高呼和他们说着最亲切的言语，他们立刻就要求打破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而要一直朝北过白玉桥向天安门城楼走来，然后再由白玉桥上转出去。他们的要求成功了。于是一条条红色的火龙似的群众队伍都向主席走来，他们挤在桥上，拼命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主席从楼上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一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有人害怕主席会疲倦，但主席丝毫也不觉得，放了椅子在他背后，他也不肯坐下去。这时候，领袖和人民完全融合一致是具体显现出来，一种伟大的、严肃的、温柔的幸福之感贯穿着人们的全身。有人哭了。有人暗暗地赞叹不已，说：“怎么知道中国还有这一天呢！”

这时候，原来已经出了广场的许多人听到这样情形，又回来了。他们是很早就出了广场参加游行的。他们的队伍已经散了，但是又集合了走回广场来。是队伍，就自己在广场上重新摆起方阵，奏起军乐。是一般人民，就集合了走到桥上来大声喊口号，大声唱歌，尽情欢乐地跳跃、舞蹈。大会指挥在播音器上再三劝告他们回去休息，才逐渐地散去。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我不能不把这个伟大日子这样繁琐地报告你们。这是由于我无能的笔没有法子把象昨天，乃至于毛主席领导建立国家的这十天以来的历史时间恰如其分地向你们转述。但是我确信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具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来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

（载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大公报》杨刚）

材料二　开国大典阅兵式

1949年6月初，我在中南海受领第二十兵团布防平、津、塘、秦的任务时，听周恩来副主席谈了有关建国大计的内容。“七一”后几天，开国大典筹备工作就开始进行。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拟定

的开国大典包括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要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朱德总司令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我任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副主任。

阅兵准备工作，在喜庆的日子里进行。为了迎接举国欢庆的那一天，我们反复研究检查阅兵的每一步骤乃至每一细节。

1949年的10月1日，这个辉煌的划时代的日子来临了。开国大典将于下午3时正式开始。

为统一行动，我和唐延杰受命以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的名义，预先向受阅的海、陆、空代表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命令中规定了各部队入城路线、集结待阅地点、各指挥分所的现地位置，并重申了阅兵会议规定的注意事项。30日午夜，各部队开始入城集结。我的指挥位置设在天安门东侧的城墙根，以有线电话与各分指联系。

10月1日下午3时之前，天安门城楼上十分宁静，下午2时的中南海内，开始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宣布就职。并选举林柏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30万军民集聚于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的海洋。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时刻。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伯渠宣布开会。在国歌《义勇军是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人民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

伟大人民领袖的声音，也是四万万同胞的共同心声。其中包含了无数先烈们的夙愿。在此前一天，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碑文。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当那第一面国旗沿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国旗杆冉冉升起的时候，54门礼炮齐放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天地间。

升旗之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最后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阅兵司令员朱德戎装整肃，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致总指挥同车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检阅完毕便是分列式。此刻，是最幸福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人士都在注视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将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程，在短暂的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将要把整个人民军队的风貌，通过有限的行动反映出来。

分列式的第一序列，是代表年轻的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150多人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

紧接着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过来。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1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上，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

武装阵容，万众仰望。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祖国领空的保卫者。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3个骑兵团过后，紧接着便是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整个骑兵师共1900多匹战马，以6路纵队前进，各梯队军马的毛色与装具整齐划一，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检阅式和分列式共用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阅兵式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向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我们胜利了，这是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为了迎来这一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天天气并不是很晴朗的，日光不强，云影朦胧，然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又何曾有过如此光明辉煌的日子？入夜，火树银花，载歌载舞，首都北京的军民在尽情地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开国大典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莫能淡忘的壮观图景，也留下了军人的光荣，当然还有军人新的使命。这就是珍惜革命胜利果实，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选自《党史纵横》，作者：杨成武）

材料三　终身难忘的时刻

40年飞快地渡过了。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在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在个人的经历中，有些重大事件，却是终身难忘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那一天，我们承担了在现场转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的光荣任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目睹的种种情景，永远生动而深刻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回想艰苦的革命战争的年代，我们和许多战友一起，奔波、转战在深山峡谷之中，工作、生活在被敌人严密封锁的荒僻山村，而此时此刻，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获得伟大的胜利，新中国如同巨人般屹立在东方，我们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宽阔的广场和向两面伸展的东、西长安街，那里站满了欢呼着的30万群众，挥舞着无数鲜艳的红旗，恰似翻腾的红色海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战士，早已排列成整齐的方队，等待检阅。我们过去哪里见过如此宏伟、壮丽的场面！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抑制。

在中国人民的广播史上，这是第一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广播工作，并且由所有的地方电台联播。早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同志廖承志、李强、梅益、徐迈进、温济泽、左漠野、李伍等，就主持制订整个广播工作计划，并且分工领导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行政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编辑、记者胡若木、高文公、杨兆麟等一次次地采访了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了解情况，草拟和反复讨论、修改实况广播稿件。同时，播音员丁一岚、齐越也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参加讨论稿件，深入领会稿件的精神。播音是整个编采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而又处于直接和亿万听众交流思想感情的第一线，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准备工作。当时的技术装备是很简陋的。为了使整个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普通的扩音机是不能适应的，于是，由1940年创建人民广播时期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设计、制作了几部新型的扩音机，把9只喇叭装置在一起，分别设在广场的适当位置上，形成强大的音量，我们把它称之为"九头鸟"。这样，虽然解决了广场内部的音响问题，但是，朱德总司令将要从东长安街那边一路阅兵的音响还无法传送到设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再转播出去。工程师黄云拟订计划，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板上安装一只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小喇叭，另在记者和技术员的采访车上装备一部钢丝录音机，在演习的时候，尾随在检阅车之后，事前录下音来，精确计算了时间，在10月1日播放这一段录音。9月下旬，要向各地方电台发出联播的通知，9月30日要向全国听众和新华社、各报社发出预告。这项全新的节目应该取个什么名称呢。梅益、温济泽等同志在一起商量，想出了"实况广播"、这个业务用语，即把现场的真实情况和音响，通过广播的技术设备和播音员的解说，转播给全国听众。大家都认为这个新的词语相当恰当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意，后来一直沿用到今天。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了。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我们早早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播音工作的位置安排在城楼的西侧，我们都肃立在话筒前，觉得自己像是待命投入战斗的士兵。

俯瞰天安门广场，聚集着不断欢呼、歌唱的群众，城楼上下，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等待领导我们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战斗，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来临，等待着那个庄严、光荣的时刻。2时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长长的台阶上，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主持大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已经提前来到主席台，以他那一贯严谨、负责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

3时正，盛典开始，毛泽东主席以洪亮而又浓厚的湖南乡音庄重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句具有千钧威力的语言，宣告了那灾难深重的黑暗岁月的结束，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的历史

时期从此开始了。刚刚静下来凝神倾听的群众又欢腾起来了，齐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海潮般的声浪回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同时，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涛涛东海之滨，莽莽青藏高原，并且飞越疆界，远达海外。无数收音机和广播喇叭的周围，聚集着亿万人民，此时都在屏息静听，他们的心都向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丁一岚和齐越兴奋、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把眼前进行着的动人情景及时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我们想象得到，北京此时所发生的一切，也将强烈地激动着他们的心，他们会和我们一样，感到无比的欣喜。

在国庆节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1日，当主持庆典的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奏国歌，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毛主席在主席台上庄重地按动电钮，只见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徐徐升起，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的军乐队，同时奏起国歌。五星红旗伴随着激扬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飘扬在蔚蓝的天空。

丁一岚望着正在升起的鲜红的国旗，激动地对听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她升起。"并且介绍了当时广场上的情景："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各队带队指挥员行举手礼，在队列中间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肃然立正。"人民中国的第一面国旗，系着几亿中国人民的心啊！丁一岚的声音更加激昂了，她欢快地告诉听众："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表人，《义勇军进行曲》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而使人增长斗志和力量啊！在"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们要求抗日救国，举行游行大示威，大家臂膀挽着臂膀，在天安门前行进，当时面对着军警的镇压，激愤地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抗日战争暴发以后，千千万万青年又是高唱着这首战歌，以血肉之躯，结成钢铁的长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赢得了自由和解放。现在，中国人民又将踏着她那激昂、豪迈的旋律，在祖国大地上奋勇前进，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五星红旗啊！我们昂头仰望着你，充满喜悦和自豪。当我们在学生时代，看到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可是它却使我们感到屈辱和民族危亡的悲愤。它不能在我们东北三省和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中升起。学校里常常举行"国耻纪念日"，那时只能下半旗，我们在低垂着的国旗前，默默地低下头，隐忍着内心的耻辱和痛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太阳旗"猖狂地玷污着我们祖国的天空，我们多么渴望看到人民自己的国旗在天空中自由飘扬啊！今天，当我们昂首凝望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神圣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怎能不充满兴奋和自豪啊！我们凝视着她，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时候，54门礼炮齐发28响，天摇地动，声震环宇，它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人民的新中国将永远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的尊重。

紧接着，阅兵式开始了。朱德总司令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将军陪同，检阅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三军受阅部队后，回到广场，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以磅礴的气势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号召全军"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然后，各兵种进行分列式，陆续进入广场，走向主席台前。齐越以庄严、浑厚的声音向听众介绍行进着的各个兵种："现在，人民海军的队伍最先进入广场……他们走到主席台前，一致向主席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注目礼。"海军士兵们一律戴着白色的海军帽，脑后潇洒地飘动着黑色缎带，蓝白两色的海军服鲜明地映入人们的眼帘，每个战士左肩上背着三八步枪，他们那健康、绯红的面颊，整齐、有力的步伐，使观礼的人们感到特别喜悦和兴奋，纷纷向他们鼓掌致意，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海军队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接着是步兵队伍，战士们一个个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通过主席台前。听众们虽然看不到他们的英姿，但是听到了他们雄健的步伐声，军乐队演奏的铿锵有力的《解放军进行曲》和播音员的描述，如同身临其境。

齐越，一个兵种、一个兵种的向听众做着介绍，炮兵、装甲兵、坦克兵过来了，铁流滚滚，气势威严。率领坦克方队的第一辆车上，写着"功臣号"三个大字，那是解放军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了战功的一辆坦克。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气盖山河、压倒一切的轰鸣，它激励着所有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的心。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了敦促国民党将领投降书和广播讲话稿，由齐越和孟启予等同志广播，大批瓦解了被解放军包围的敌军。那段时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不断播出胜利的捷报。1948年9月24日晚上，当正常的播音刚刚结束的时候，编辑部向20公里以外的播音组打来了紧急电话，要延长时间，加播"号外"，向全国人民宣布在当天下午5点钟"解放济南，歼灭全部守敌"的胜利消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这第一份"号外"，由齐越和孟启予一连轮换播送了7遍。今天，当我们亲眼看到这一队又一队的英勇战士在广场上行进的时候，一年前播送捷报的情景，又生动地浮现在脑际，不由得在内心里呼喊着：光荣归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解

放军！正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获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骄健的骑兵队伍过来了，刹那间千军万马在天安门前行进，不同颜色的军马，分别组成许多个方队，在大地上绘出了壮丽、威武的图案，急风骤雨般的马蹄声通过广播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

正当骑兵队踏着《骑兵进行曲》的军乐声向西行进的时候，从东方天空传来震耳的轰鸣声，三架一队、三架一队涂着“八一”军徽的飞机，凌空而过，天上地下都如此壮观，人们真是目不暇接了。主席台上和全场观礼的人们，都热烈地鼓掌，向天空招手。人民自己的空军在蓝天翱翔，怎能不使人万分激动啊！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年代，人民军队是以“小米加步枪”和敌人陆空作战的，那时祖国的天空任凭敌机肆虐，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惨死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中。就在1948年的春天，也就是一年多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轰炸机曾经在我们党中央临时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一带盘旋、轰炸。他们还多次侦查、搜索，妄图炸毁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封锁真理的声音。因为我们没有高射炮，更没有空军，敌机竟然飞得比山头还低，猖狂地低空盘旋，扫射农村的房舍和人群。我们在山沟里躲避着，咬牙切齿地注视着敌机的去向。我们多么盼望有一天人民军队也能有自己的空军啊！

当飞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掠过的时候，我们自然地想起我们广播电台的亲密朋友刘善本。1945年，刘善本还是国民党空军一个大队的作战训练科飞行参谋。这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更不忍心驾驶飞机去残害自己的同胞，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一天，他偶然听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为了辨明形势，寻求真理，他坚持收听延安和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使他明辨了是非，认清了形势，憧憬着新的生活道路，暗暗下定了飞向延安的决心：“我要听从真理的召唤，坚决去延安。”1946年6月，经过谨慎、细致的准备，借着为国民党空运无线电器材的机会，冒着风险，驾机起义飞到了延安。他特地到延安电台所在地，会见了只听到过声音而没有见过面的亲密朋友，并且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国民党空军中的有识之士，脱离内战漩涡，投到人民方面来。他参加了人民空军的创建，成了人民空军最早的军官。此时此刻，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仰视着骄健的雄鹰，怀着亲切的心情想着：这里面一定有刘善本同志在驾机飞翔，他正充满自豪地接受党、政领导人和人民的检阅。

当分列式的最后一个方队走出广场以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的灯大放光明了，欢乐的群众队伍挥舞着彩色缤纷的鲜花和旗帜、浩浩荡荡，欢呼着通过天安门。人们走过主席台前，都跳跃着，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城楼上的指挥者再三催促：“同志们不要停留，继续前进！”狂欢的人群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忽然，正阳门外哔哔啪啪地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焰火飞向夜空，闪烁着艳丽的火花，许多白色的小降落伞在空中摇曳。直到晚上9时20分，庆典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同志在主席台上向停留在广场中的群众和值勤的同志们说：

“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

至此，我们也宣布了实况广播的结束。

孰料这时候却又出现了最热烈的新高潮，广场后部的群众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欢呼着拥向金水桥边，像彩色的巨浪翻滚而来。他们要亲眼看看人们敬仰的许多领导者的丰姿。人们满腔热情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高地挥动着臂膀，有些人兴奋地向空中抛着帽子。毛泽东同志和几位领导人一起来到城楼边墙两侧，微笑着向群众亲切招手。毛泽东同志呼喊着：“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城楼下的群众欢呼声更高昂了，城楼上下，互相呼应，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领袖热爱人民的真诚感情，在人们的心中汹涌、沸腾。遗憾的是，我们的转播已经结束了，没能及时地将这动人的现场实况介绍给全国听众。

（选自《中华英烈》1989年1期，作者：丁一岚、齐越、杨兆麟）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背景介绍

到1948年底，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无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遭到了彻底失败。美国和桂系的倒蒋活动也日益明显。

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11月9日，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遭到杜鲁门的婉言拒绝。11月底，宋美龄亲赴美国活动，先后访晤马歇尔与杜鲁门，要求美国支持蒋介石，亦一无所获。而此时司徒雷登则在中国公开进行倒蒋活动。

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蒋介石所处的逆境，企图逼蒋下台，实现桂系的一统天下。12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度电蒋，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平。李宗

仁、蒋介侯也随即提出五项和谈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同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亦先后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主张。当时，白崇禧及其桂系在武汉地区拥兵三十万，李、白言和，蒋介石势难再战。

12 月 31 日晚，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孙科等党政要员四十余人齐集官邸，征询对其下野的意见，大多数人发言表示同意蒋介石去职。蒋介石遂于 1949 年元旦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却提出了“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等谈判条件，并假意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其核心仍然是要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统治权。

蒋介石表面上表示接受谈判并下野，可背后仍进行顽抗。1 月 1 日，他分别致电白崇禧和张轸，表示他个人的进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希望白崇禧“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1 月 3 日，蒋介石又亲访李宗仁，要求李、白以大局为重。接着，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人商谈和议问题。9 日，张群还先后飞抵汉口、长沙，分别与白崇禧、程潜会谈，传达蒋介石“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的意见。

1 月 21 日，蒋介石被迫发表“引退”文告，宣称：鉴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当天下午，蒋介石悄悄离开南京飞抵杭州，次日飞回溪口。

材料：

- “求和”
- 由“副”到“代”

材料一“求和”

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在辉煌耀眼的彩灯下，映出的是个个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谈笑，惟闻杯盘盏碟之声。在座的党国要人们，十分清楚局势的严重，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的晚餐”了。

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起面孔，似乎十分恼火。

张群开始念文告。蒋介石一纸皇皇文告，洋洋数千言，旨在“求和”，但蒋介石对和平提出了五项先决条件，归结起来就是要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才能同中共重开和谈。至于他的“总统”职位，文告中没有“辞职”的意思，甚至连“引退”都没有说明，只是最后有所暗示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全文，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李宗仁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这时 CC 派的骨干分子谷正纲、张道藩等人语带悲声，反对发表这个总统有下野表示的文告，但也有人表示同意发表。人们的争论使蒋介石冒起火来，他愤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这“某一派系”，无疑指的是李、白为首的桂系。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的求和文告发表了。同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团拜”仪式。礼成后，蒋介石把李宗仁叫到礼堂后面休息室去谈话。蒋对李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字)也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蒋介石“走开以前”要“布置”什么呢？当然有许多事待布置，但迟迟不引退，一再观望，也别有所待。起码要等待中共方面对他元旦求和文告的反应。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新华社发表了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揭露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反革命实力。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役结束，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被全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被击毙，只有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逃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五十五万五千精锐部队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已被解放，京畿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就在一月十日这一天，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命令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

一月十二日，蒋介石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在武岭临溪南端的小洋房架设天线，布设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蒋经国对乡里亲朋士绅则说：父亲过几天要回来进家谱。

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蒋介石视这八项条件为要他无

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再无恋栈的可能。

一月十六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

一月十八日，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他最宠信的三名将领之一的汤恩伯(其他二人为陈诚、胡宗南)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从上述人事安排上看，蒋介石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大陆不能存身时，退路只有逃亡海岛。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二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众人之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或失声痛哭。CC少壮分子谷正纲忽含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他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就往门外走。

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销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办去！”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地慢慢走了。大家也黯地离开了总统官邸。

离开中常委会，蒋介石驱车先奔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黯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后四时十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蒋介石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蒋介石都抱有重新出山的信心，今日他心中清楚，再难有还都“登极”之日了。

待李宗仁带领一班文武大员赶到机场送行时，蒋介石已悄然飞去了。

(摘自《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由“副”到“代”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响，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他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作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

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做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提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他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一月五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看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我大为吃惊，因美大使馆的情报远比我灵通。傅氏言之凿凿，使我十分诧异。

一月八日蒋先生又派张群约黄绍竑自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引退的事。蒋先生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白崇禧得悉蒋先生决定引退，由我出来与中共谋和，遂包一专机，请黄绍竑飞港邀请李济深入京，作国共之间的调人。李任潮反蒋历史深长，而与我辈私交殊笃，亦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来京助我，则第三方面人士将不会受中共利用。不过这全是白崇禧个人的看法，并未与我商议。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再者，当时新闻界讹传，说我也急于要蒋先生下野，尤为荒谬的揣测之辞，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想作蒋先生的继承人，还在竭力设法摆脱之中呢。

当这项消息已传遍国内外之时，中共终于在一月十四日对蒋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条答复。这八条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这种答复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会感到惊奇。不过蒋先生还在观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蒋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显然还在希望美国的态度会悬崖勒马，重订援华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传出之后，仍一再观望，迟迟不作决定。但是他表面却故意显示出，有人“逼宫”，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态，其实他是别有所待。孰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冷淡。蒋夫人在美的活动也处处碰壁，使他绝望。再者，此时各地民意机关和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都急于谋和，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几和谈能早日实现。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蒋先生下最后决心的便是共军的长驱直入。至三十八年一月中旬，共军已席卷江北。北岸我方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中共大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局势发展至此，正如张治中所说：“即死硬如ＣＣ分子，亦深信蒋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趋势。”蒋先生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让我出面来和缓这一紧张的局面。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李宗仁的和平攻势

背景介绍

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上台后，继续开展“和平”新攻势，作出种种“和平”姿态。1月22日，在他发表的就任代总统文告中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宣称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谈”代表，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与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派邵力子、甘介侯先后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民主人士，请他们襄助和谈。24日，李宗仁为促进“和平”实现，饬令行政院长孙科实行“七大和平措施”：(1)将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 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章杂志；(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赶快决定谈判地点，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并称“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2月1日，李宗仁亲飞上海，打算由甘介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等人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北平试探和平。

对于李宗仁一次又一次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采取了宽容与争取的态度，一方面又坚持原则不让步。1月25日，中共表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28日，中共发言人又指出南京政府“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其重整战备，要南京政府切实按照中共提出的八条去做，首先要逮捕蒋介石等战争罪犯，“因为只要战犯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中共还拒绝以彭昭贤、甘介侯作为谈判代表，并认为李宗仁处处受到蒋介石的牵制，而且谈判无诚意。

李宗仁及其桂系主和，其目的也无非是想乘机赶蒋下台，平息国内舆论，使人民解放军停止军事进攻，依靠美国的支持，达到“隔江而治”。但蒋介石“引退”后仍控制着权力，因此，李宗仁采取了各种方法来逼迫蒋介石出国。他请求美国协助他以阻止蒋介石“干涉政府和军队的事务”，并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财”移交给他。他曾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表示蒋介石如不停止干预，他将“决心引退，以谢国人”，并指使吴铁城、张治中等人赴溪口劝蒋出洋。另外，李宗仁又利用立法院、监察院对他的支持，向孙科施加压力，迫使孙科于2月28日将行政院迁回南京，并于3月8日辞职。

材料：

· 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材料　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向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

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御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　子感京秘印

在此同时，我又特派甘介侯以我私人代表资格，去上海联络当地一批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希望他们也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人。一月三十一日，我又亲率邵力子去沪，一一登门拜访。

我另外又邀请陈光甫也加入此行列，偕同飞平，但为陈氏所婉拒。光甫与我为老友，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一九二八年当蒋先生主持南京中央时，曾一度邀请陈氏入阁，陈氏婉却之下，我曾劝他接受。陈氏当时微笑向我说："等到有一天您荣任国家元首时，如有差遣，我一定不辞犬马！"此次在上海我重提前约，加以邀请。陈说现在时移势异，今非昔比，他实在难践前诺了。

我自沪还京不久，前派"人民代表团"在与共方领袖协谈之后，亦自平返京。刘仲华告我，共方领袖有意与我合作，但是先决条件。第一、他们要我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第二，要帮同中共解决蒋帮的残军余党。中共此项要求是显然在离间我和蒋的关系。至于我和美国的关系，我那里并未收到一分美援。纵使美国政府对我政府提出经援，此项美援亦与往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绝不为接受美援而丧权辱国。我固针对共方建议也提出五条对策，嘱刘携往上海，俾由第二批飞平洽谈的代表携平面致共方诸领袖。我所拟的五条要义如下：

一、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

五、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我的第二个代表团终于二月十四日专机飞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主持下的行政院突然自南京撤往广州。孙氏此举的目的，是显然与我故意为难。

（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败逃台湾

背景介绍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崩溃，南京被解放，已经宣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蒋介石一面到杭州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坚决作战，同时作最后撤退台湾的准备，蒋介石向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表示："台湾在短期内即将成为中国反共之新的政治希望"。经过半年的抵抗，国民党残留在西北、西南、华南、东南等地的军队除少数逃台湾外，全部被歼灭，国民政府先后展转于广州、重庆、成都等地。1949年4月下旬，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在军事上组织残余力量继续作战，企图保住华南；在政治上"力谋彻底革新"宣告与共产党作战到底，并通过"战时施政纲要"，与此同时，将重要物资和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仅1949年4月份，就从上海抢运出去一千五百只船的物资，运到台湾的黄金下一万余两，白银三亿多两，银元几百万元，其它物资无法计价。5月18日，台湾省简化入境申请手续，一些机构和人员陆续进入台湾。6月30日，何应钦内阁辞职，6月13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并兼国防部长，23日阎锡山发布施政方针，但丝毫无补于国民党奄奄一息的命运。蒋介石于6月24日再次到台北，并

决定在草山设置“总裁办公室”。

为了激励西南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反共士气，9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往重庆，实际上国民政府仍在广州办公。当南下解放军东路于10月中旬接近广州时，12日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5日在重庆正式办公。但国民政府在重庆仅“立足”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又于11月29日迁设成都。迁到成都还不到十天，蒋介石与行政院于12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继续与解放军顽抗。12月8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12月9日正式办公。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由重庆飞逃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台北正式办公。

材料：

- 黯然离开大陆

材料　黯然离开大陆

为了挽救日益颓败的局势，蒋介石于八月六日又飞到南朝鲜，在镇海与李承晚会晤。兜售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蒋介石说，季里诺和李承晚两位总统，“都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痛心疾首”的。但由于这时美国尚不积极出面组织，蒋介石的这个“反共国家联盟”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仅以发表一个公报收场。

外交的困局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务。八月十七日，蒋介石视为台湾“手足”的福建省被解放军砍了去。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再行赴粤，部署“广州的保卫战”，告诫部下，这是“决定党国最后成败的一战”。

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带领蒋经国由广州飞抵重庆，为“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而奔波。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发表讲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这次来重庆，又住进抗战时曾住过的山洞陵园。负责保卫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来了就别走了，长期住在重庆，利用西南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

蒋介石看完众将领的上书后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

蒋介石这次到重庆住了二十八天，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但好些人都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宋希濂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

蒋介石这次来重庆，还命毛人凤将杨虎城父子用尖刀刺杀于“中美合作所”，报“西安事变”兵谏之宿仇。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两个八、九岁的女孩，实为惨绝人寰的暴行。

这时蒋介石在重庆风闻云南省主席卢汉动摇，与中共时有暗中来往，在反共与起义间举棋不定。川、滇毗邻，唇齿关系，云南局势欠安，妄谈防守西南。于是，蒋介石电邀卢汉到重庆会晤。卢汉托病，不敢成行。蒋再派专人促驾。卢汉这时对共产党半信半疑，又感到自己实力不足，勉为其难，冒险到重庆见蒋。蒋对卢“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卢始接受回滇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整肃方案。

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从重庆返台途中，要顺便访问昆明，再给卢汉打气，坚其反共意志。蒋经国说：“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

事实上战况是：桂林开始撤退，贵阳解放，解放军前锋已接近彭水。宋希濂部已撤到乌江西岸。在川陕的几十万“国军”，南逃的道路已被截断。蒋介石的“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如今变成了解放军以四川为中心的包围战。

国民党的桂、滇、康等省的军队，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未指望其能“安危相依，同舟共济”。能抗抵解放军入川者，仅胡宗南、宋希濂两黄埔系门生所率领的二、三十万兵马。十一月十五日，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给宋希濂的亲笔信，经过两天的跋山涉水，于十七日来到乌江边与宋希濂会晤。蒋介石信中要求宋希濂：“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

宋希濂纵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即使阻解放军于乌江，岂能挽救全国之败局。宋希濂只能率部且战且退，速度颇快，十一月二十三日，就退到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南川。

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重庆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见“财政部开始大乱”，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解放军炮声，从广州迁来重庆的国民政府即日迁成都，却不见国府最高负责人李代总统随行。原来李宗仁早在十一月十三日，即蒋介石来重庆的头一天，为逃避蒋介石逼他“让位”，而逃离重庆，遂即“赴美国治疗胃疾”。蒋介石说：“德邻（李宗仁）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

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中午，蒋介石在山洞陵园召集军政头目开会，布置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到晚十时，蒋介石住所陵园后面，“已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人乘车开出山洞陵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的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蒋介石不得已乃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蒋介石当夜就睡在“美龄号”专机里。

十一月三十日天明，“美龄号”起飞之际，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了。

蒋介石于十一月三十日自重庆逃到成都，住在中央军校内。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蒋军败退的情形，用“势如山倒”形容，已嫌不足，例如富顺县长仅接到解放军一个恐吓电话，居然一哄而散，军政完全解体。蒋介石在成都实际已无军事可指挥，只是督促破坏成都的重要工厂和建筑。

十二月十日，成都市内秩序已经大乱，时有枪声，形势已濒临绝境。这时，宣布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此际，侍卫人员发现，蒋介石驻节的中央军官学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侍卫人员认为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从后门逃走。

蒋介石则明白地说：“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

于是，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人走出军校大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四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从飞机上往下望去，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二十二年间，虽说蒋介石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但他始终是左右政治局势的中心人物，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就在他飞离大陆的时刻，一个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摘自《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宋平）

历史内幕

卢汉昆明起义

1949年4月20日李宗仁拒绝和谈签字，随后解放大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正向华南、西南进军之际，8月15日，黄绍竑、龙云、刘建绪等44人，在香港招待记者，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在过去25年统治中的反三民主义、反革命的行径，主张拥护共产党。紧接着，原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对香港记者宣布“云南起义”。

“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爆炸性新闻，被香港各报大加渲染公诸于众。这条消息震惊了撤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更震惊了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和“下野”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

面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政权，各派系间的矛盾再次升级，而焦点集中到了云南。李宗仁、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以武力改组云南政府，即令桂系部队入滇镇慑。卢汉坐卧不安，忧心忡忡说：“老主席（指龙云）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

其实，最为此事心急如焚的是蒋介石。

8月24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匆匆飞抵重庆，一下飞机便称：“今日重庆将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卢汉给中共中央写“决心书”

卢汉得到中共中央要他派代表直接到北平与解放军总部商谈起义事宜的信息后，为人选问题大伤脑筋。他经过反复琢磨，最后认为请宋一痕去最合适。

宋一痕在昆明香港之间穿梭往返，传递消息。到了1949年中期，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卢汉再次叫宋一痕回昆，欲授其特殊使命。宋一痕见到卢汉便说：“现在大势所趋，蒋介石败局已定，是为云南人作出光明选择的时候了。”卢汉说：“此事我考虑多时了，有关起义的事我已跟云南的老部下商议过，大家都愿走这条路。有关起义时间，起义后的安排等，得要有人去联系，你已到香港两年多了，没人注意你，以前你参加过中共组织，我想只有你的关系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了”。宋一痕同意作卢汉的代表。卢汉接着又说：“我和我的部下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起义后不知能否得到谅解？”宋一

痕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劝慰卢汉。卢汉为表示自己决心起义，当即让他的三夫人钟耀琼执笔，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决心书，卢汉亲自签名盖章后，交给了宋一痕，要宋一痕亲手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晚上宋一痕由陈公宪秘密驱车送到家中。为了保密起见，卢汉的决心书由宋一痕的岳母精心缝在了宋一痕的西装马甲内。

宋一痕飞到香港，又由华南局护送到了北京，之前，他的三妹宋萍也到了香港，并由中共党组织安排，连同民主人士欧阳予倩夫妇一块送往解放区去了。

宋一痕到达北京后，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李克农、李维汉等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他。宋一痕还拜会了张冲同志和萌伯赞、李印泉等民主人士。宋一痕在北京住了个把月，周总理再次接见了他，并对卢汉起义做了指示：1. 欢迎；2. 既往不咎；3. 现在还不是时候。关于联系方案，周恩来副主席说，还是通过华南局派人联系。

从此，中共华南局通过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由宋一痕作为中间人与卢汉取得联系。

病急乱投医，卢汉找到了假共产党

就在卢汉授意宋一痕赴京的那段时间里（1949 年 7 月间），卢汉因迫切想找到共产党，派人四方觅寻，结果导演了一场“弄假成真”的闹戏。

早些时候，龙云曾向卢汉表过态：“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联络的事由我负责。”等到南京解放、广州解放，长沙起义，卢汉一直等待龙云与华南局接上关系，指望昆明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自己商议有关起义问题，但毫无结果。于是卢汉决定自己找，他先后派杨维骏、龚自知、张公达等到香港、广州去找，均没切实结果。

一天，卢汉见到安恩溥说：“龙泽汇他们找着中共华南局派来云南工作的张铿了。据吴少默与张谈过两次话，说此人是共产党不假。”

张铿的出现是在 6 月中旬。当时，《平民日报》、《正义报》登载了“昆明桃源小学雷震宇突然被绑架，下落不明”的消息。不久，报上又说：“据本市治安当局称，雷震宇被捕，系调查组获悉他和张铿等人，大肆招收匪徒，图谋危害治安，已一并解局讯办。”就在这时候，云南大学学生何辰朔找到原国民党云南省第 6 行政区专员严中英，问：“为什么卢汉今天还在抓人？”严中英回答：“是警察局特务干的，卢主席并不知道。”何又说：“张铿是中共重要干部，卢主席如能把他释放，就是向中共表态，向人民立功的好机会。”严中英将此事转告龙泽汇，经龙泽汇了解此案是警察局长王巍伙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派驻昆明的调查组组长皮绍晋（军统特务）秘密干的。龙泽汇和严中英将情况报告了卢汉。卢汉即令省保安司令部派员到警察局把张铿提到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问明原委，以无罪释放。

7 月中旬，张铿和何辰朔又找到严中英家，张拿出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给严中英看，并要严转告卢汉，劝他走傅作义起义的道路。临别时，何辰朔低声对严中英说：“张铿是中共华南局派来滇、川工作的特派员。”

7 月下旬，张铿和何辰朔又到严中英家表示卢汉想起义，目前必须先做些准备，一是翻印些毛泽东著作，发给有关军政人员学习；二是成立基层政训班，培养骨干到保安部队营连任政治指导员；三是采取湖南程潜的办法，成立“云南人民自救会”，作为准备起义的核心组织。张铿的建议，卢汉认为可行。给张每月拨半开银币 1 千元作活动费，并倡导于 8 月 1 日在翠湖原云南讲武堂旧址省训团内，召开了“云南人民自救会”成立大会。与会者大多是卢汉旧部，除龙泽汇、安恩溥和严中英，还有吴少默、杨炳麟、李韵涛、许义浚、黄愚生、马子华以及社会人士杨东明、徐君植等。会上推选龙泽汇任书记兼军事组组长，严中英为副书记，安恩溥为政治组组长。张铿在会上做了形势报告。会上还通过了云南自治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是自救会员学习的主要文件。在卢汉的支持下，安恩溥和严中英还将《新民主主义论》秘密交“开智印刷公司”翻印了 5000 册。

一次，张铿提出：中共有一位姓孙的重要负责人在成都，原是四川大学的教授。目前昆明工作极重要，必须派一位高级官员做掩护，避开特务耳目去把姓孙的同志接来，以便开展工作。

但张铿没有从成都请来人，这使卢汉开始对他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卢汉失望地对龙泽汇说：“张铿是否是共产党人，很成问题，今后你们不要再和他联系了。”接着，卢汉让安恩溥去请杨青田打听，共产党有没有此人。杨青田的回答是“此人来历不清。”龙泽汇到石林再次与朱家壁会谈时，也顺便问了张铿的情况。朱家壁回答：“此人很可能是特务”。同时，卢汉得到的消息使他感到震惊。因为张铿所办的训练班（在保安直属营）招的学员，与原保安直属营杨维骞的学员发生摩擦，打死了一个人。一天，想讨好卢汉的萧毅肃说：“我们的特派员接管金殿直属营时打死了人，做错了不能不换掉，我保证新任服从你。”卢汉边听边想：从萧毅肃政治处派来的人，那就是特务呀！

龙泽汇从石林回来后，接到卢汉的命令，由龙泽汇布置了一批便衣武装人员和严中英一块，把张铿和有关主要人员全部逮捕，秘密关押进省政府警卫营。事后，卢汉对龙泽汇说：“严中英这个书呆子，害得我们都上当受骗了！”

原华北"剿总"副司令周体仁的特殊使命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西南、华南的进攻进展神速，10日贵阳解放，22日桂林解放，30日重庆解放。由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提出的解放西南"大迂回方案"，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已经基本实现，残存在西南顽抗的蒋介石军队已为强弩之末。

12月3日大清早，卢汉突然挂电话给省政府财政厅林南园，要他即刻赶到卢公馆，说有急事商量。急忙赶来的林南园被卢汉领到楼上的书房，拿出龚自知(国民党立法委员，前任云南省参议会议长)从香港给卢汉的信。说："想请你代表我与周林仁先生一块去一趟香港和广州，与中共华南局的张铁生联系，并去晋谒叶剑英将军。"林南园当即一口答应。稍后，卢汉将准备好的就昆明起义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四点要求告诉林南园。一是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的改编；二是云南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请量材录用；三是请中共中央派一要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处理与云南地下党的联系；四是卢汉本人在起义后希望行动自由能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游览，并请叶剑英将军转报中共中央，卢汉率部将于近期起义，请给予支援。

1948年下半年，经傅作义将军保举，周体仁担任了北平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华北"剿总"副司令。后来和傅作义将军一道率部起义。

周体仁早年在云南讲武堂便与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将军相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曾协助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将军在北平西郊对国民党嫡系起义部队进行改编。这时，叶剑英同志曾提出留周体仁在北平工作，然而周体仁表示：我是云南人，现在云南尚未解放，我希望去做卢汉的工作。时值中共中央即对争取卢汉有所布置，便委托周体仁出面，对卢汉进行策反工作。

卢汉和周体仁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又都是少数民族将军，两人促膝交谈，无话不说。当周体仁分析完蒋介石必败的形势后，卢汉感叹地说："傅作义带的兵比我的多，所在的地方比我的富，他尚且要投奔共产党，我卢汉何苦要死跟老蒋卖命呢?"最后，他两人认为，待起义时机成熟，即立刻与中共中央联系，并争取一致行动。

11月底12月初，卢汉认为起义时机已基本成熟，即恳求周体仁前往广州替他向中共领导人陈述详情。周体仁欣然同意。卢汉为再次表示他对起义的诚意，又决定让林南园做他的私人代表同周体仁一起去完成这项特殊使命。

卢公馆兵变，高级将领被一网打尽

卢汉送走周体仁的第二天晚上11时，临时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杨文清、马瑛、佴晓清和龙泽汇，一共5人。卢汉说："时机紧迫，如等解放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龙泽汇等知道起义将临，心情很激动，当然也很紧张。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6时方散。

9日晚，卢汉在自己家中大宴宾客，应邀前来的有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莲和副领事，英国驻滇总领事海明威，法国驻滇总领事戴国栋，一时间汽车盈门、宾主尽欢。就在卢汉以此场面做烟雾之前，已对"兵变"做了另一番布置，他首先令93军副军长佴晓清将陇生文师(278师)布防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张秉昌师(279师)沿金殿至长虫山一线构筑工事；张中汉师(277师)负责城区戒严，作城防预备队。并于当天下午5时左右，叫副官杨治华打电话叫来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和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卢汉将两位营长叫到花园里口授命令："我们起义了，今晚9点我召集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到这儿开会，到时把他们都扣留起来。"

晚上9点，李弥、余程万、沈醉、沈延世、李楚藩、童鹤龄以及后来由马瑛提出也被卢汉同意通知来开会的26军193师师长石补天等7人都已到达卢汉公馆会议室静候开会。9点过钟，石补天未见卢汉来，顿起疑心，便向卢汉的副官杨治华、陶林说："我肚子痛要走了，开会有余军长在就行了。"林、陶答复："卢主任片刻便到，请稍坐一会。"杨治华当即去报告卢汉。卢汉指示："马上动手!"

龙云青和徐振芳接令后，龙云青按事先安排，带着12名士兵，手持短枪，冲进会议室。在坐的诸位还以为是卢汉来了，一齐站起来。当持枪的士兵大声喝令道："不准动，举起手来!"李弥等这才如梦初醒，一个个惶恐不安地举起双手。龙云青让士兵搜查，没发现他们携带武器，便让他们坐好。与此同时，徐振芳把在客厅外面等候的随行人员也都缴械集中到了中餐厨房。

这时，李弥惊诧地问了一声："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了!"龙云青和徐振芳庄重地回答。

卢汉没想到时常出入他身旁的高级幕僚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共产党

旭日东升，霞光灿烂。昆明崭新的一天开始了。

上午8时，五华山上的值班连长匆匆去找警卫营长徐振芳，问："升旗时间已到，该升什么旗?"徐振芳一时也答不上来，忙去请示卢汉。卢汉哈哈大笑道："当然是升新国旗罗!"他叫徐振芳去找总务处长邹凤石拿旗，并吩咐他要同警卫部队一块参加升旗仪式。

这时，杨青田来见卢汉，说出："昆洛"这一暗号，瞬间让卢汉目瞪口呆。因为宋一痕从北京回来时，告诉卢汉如用"昆洛"这个暗号与他接头的人，便是中共方面的代表。卢汉没想到，时常出入他身旁充当高级幕僚的杨青田竟是他苦苦寻找的共产党！宋一痕见状，欣喜万端，忙说：

"原来就是你呀，欢迎，欢迎！"卢汉也恍然大悟，热烈地紧紧握着杨青田的手。

当即，卢汉在光复楼宣布，云南于1949年12月9日正式起义。在场的杨文清、马瑛、谢崇文、龙泽汇、林南园、曾恕怀、佴晓清以及吴少黔、杨青田、宋一痕等相互握手祝贺。

蒋介石撤守西南的计划彻底破灭

12月12日，国民党空军开始轰炸昆明，昆明保卫战开始。解放军4野、2野各一部乘汽车日夜兼程赶赴昆明。28日，解放军与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紧接着，"大陆最后一战"滇南战役开始，经23天作战共歼敌31030人，使蒋介石在大陆建立最后据点的迷梦彻底破灭。

1950年3月4日，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成立，由卢汉任主任，宋任穷、周保中任副主任。同时，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郭天民、郑伯克、安恩溥、潘朔端、谷景生、谢崇文、曾恕怀、胡荣贵为委员。

昆明起义经过艰险曲折，最终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成为现实。

蒋介石"御林军"兵变记

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第45军第97师，原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该师的第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余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

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频频失利，兵源枯竭，首都防务捉襟见肘，不得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算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军长是赵霞，第97师师长王晏清，1948年8月接任此职。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与王晏清多次接触，促其起义，并制订了活动计划。后因部下告密，王晏清被禁，在他脱离虎口后，遂与挚友密议，于1949年3月24日率部渡江北上，投身于人民的怀抱。"御林军"倒戈之义举，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一、新的选择——舅舅家里遇到了地下党

从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中，国民党损失折将264万人。经过战争第三个年度的头4个月，即1948年7月1日至11月2日沈阳解放，国民党又丧失了100万人马。而经济战线上，国民党政府也屡遭挫折，法币的发行量已为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上涨已为战前的390万倍。国民党败局已定。

王晏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北平赶赴南京，走马上任的。王晏清原为青年军第87军副军长，系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长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第18军任职。曾经参加过军阀混战，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和抗日战争的淞沪、南京、宜昌诸役。1945年任青年军第208师副师长。1948年208师改编为87军，他即升为副军长。当年8月中旬被任为97师师长。

王晏清来宁后举目无亲，只有城佐营6号母舅邓昊明家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对于邓昊明，南京地下党一直把他作为一位工作的对象。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不断地来到邓家，同王晏清作正面接触，交谈颇为融洽，深深地打动了王晏清的心。当时王晏清正欲寻觅一位引路人，以早日摆脱苦境。遂与陆平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辞去军务，投奔解放区，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南京地下党组织对于王晏清的明确态度作了认真研究。认为应该把争取王晏清本人，放在争取整个"御林军"起义的大背景下去考虑，纳入解放南京的战略部署，从长计议，统一行动。只有这样，才可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作用于全局。经地下党组织的深入工作，王晏清对此倍受鼓舞，他说："起义是要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只要对人民有利，个人的得失可以置之度外！"

二、挚友同心——中山陵前谋义举

1948年11月中旬，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线布防，三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设有团部，师司令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与289团毗邻，因此，王晏清同该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从不断接触中，王晏清发现，杨镇洲粗犷豪爽，邓健中沉毅稳健，但为人都很正直，三个人每每谈及战局，观点总是不谋而合。因此，王晏清决定首先争取这两位带兵的人。

一天，他们三人相聚中山陵，在无梁殿北伐烈士祠中，面对四壁镌刻的北伐阵亡将士名单，无不有感于衷。王晏清见时机已到，有所指地说："共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恐怕不是天方夜谭吧？像我们这般下去，将成为千古罪人。出路问题，现在应该迅速作出抉择。关键是看准方向，认清目标，而后则不惜丧生。"

杨镇洲和邓健中已完全领会了王晏清的意图，同时站起来说：

"我们坚决跟师座走！"

三、棋失一着——紧要关头遭软禁

1949年元月，国民党既设下和谈骗局，又加紧备战

活动。无数的江防工事正加紧施工，按国民党政府的意愿，要尽力造成一种划江而治，南北对峙的局面。南京地下党组织向王晏清传达了党的决定：认清国民党的骗局，起义准备工作照常进行。同时，正式通知他们今后的行动归第3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到时候，会通过电台指挥他们行动。

也许是出于激动，也许是出于急切，王晏清接连办了三件欠虑之事：

第一件事：在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王晏清为了给起义打一点思想基础，说了几句真心话，他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把握。"

第二件事：起义骨干赵昌然，自告奋勇去做守卫机场的宪兵队的工作，说："那里有我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王晏清考虑到控制机场的重要价值，表示同意了。

第三件事：在同陆平确定了3野同师部的电台联系方法后，王晏清返回师部才发觉自己还不知道向3野呼叫的信号，于是用电话同舅父联系，想找陆平问个清楚。接电话的正是陆平。王晏清开门见山地张口就问："你们的电台呼叫号是什么？"谁知"啊"了两声，就挂断了电话。这个从军部转出的电话，谁能担保无人监听呢？

果然，3月23日，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上午，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突然宣布撤销军长赵霞的职务，并把王晏清软禁在长江路上的卫戍总司令部。

四、当机立断　王晏清下达渡江令

就在王晏清苦于难以摆脱困境的时候，首都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突然来了。王晏清知道他曾在青年军第24师当过师长，为人比较持重，就抓紧机会向他述说苦衷，以求尽早脱身。"副总司令"，王晏清激动地说："我在18军、青年军任职多年，又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覃异之和颜悦色，似有同情之感，但却笑而不语。至下午5时，放走了王晏清。

王晏清离开卫戍总部后，只在家中停了五分钟，除了给夫人曹恬说了几句宽心话，关于起义的事情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接着就飞车江宁镇司令部。几十分钟后，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走王晏清的时候，王晏清已经召集杨镇洲、邓健中等骨干，商量起义的事情了。他们知道，在这紧迫的形势下，只能提前行动马上起义了。王晏清说："我并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起义，目的是想带领大家共同走上光明之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过于勉强你们，自己决定吧。"众参谋坚定了决心，他们都表示："跟师长走，决无反悔！"

晚上8点30分，王晏清下达了渡江命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首先开拔，开始向江边移动，289团随后开进。就在他们渡江后不久，即4月23日，守卫这段江面的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也在林遵司令的带领下宣布起义了。因此，渡江一路顺利，未遭堵截炮击。

25日凌晨2时，王晏清的起义部队终于都到了江北，在桥林镇集结完毕后，即派出四个联络组，直奔新店庙方向，寻找解放军。

五、霹雳一声——"御林军"兵变震京畿

张耀明正欲就寝，忽接45军军部报告，王晏清已率部渡过长江。他不禁大惊失色，心中叫苦不迭。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张耀明，命令他连夜赶印传单，悬重赏缉拿王晏清，天一亮就派飞机跟踪散发。然而为时已晚。

25日中午，黄克栗总算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3野第8兵团第25军张师长见到了王晏清。人们欢呼跳跃，庆幸自己的新生。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京城。月底的一天，王晏清见到了妻子曹恬和他们的儿女。

星转月移，岁月流逝。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王晏清和他的战友们的历史功绩。王晏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家人一起在南京朝夕相处，乐度晚年。他的母舅邓昊明现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杨镇洲在上海银行部门任职，邓健中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赵昌然在华东交通大学任教授。

（刘瑞年　陈欢敏）

（节选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

1948年，我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那暗无天日的魔窟里，我们亲眼看到许多革命先烈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听到许多革命前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讲述着激动人心的斗争事迹。革命先烈们赤胆忠心、坚贞不屈的革命品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魔窟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从字面上，很难看出它是一个万分恐怖的人间地狱。

1939年，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迁来重庆，当时

就霸占了郊区歌乐山下磁器口附近一片十分隐蔽的丘陵地带，建立了它的特务机关。

1941年，国民党派了它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帝签订了血腥的“中美合作所”秘密协定，由臭名昭彰的特务头子、军统局长戴笠任主任，国际特务、美帝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

中美合作所设在歌乐山下，周围四五十里，用城墙、碉堡、电网、岗哨、警卫严密地包围起来，任何人不能接近它，谁要是不小心走近这座魔窟，特务匪徒可以不加警告即开枪射击。国民党在中美合作所内，特为梅乐斯修筑了一座华丽的公馆，叫做“梅园”。“梅园”就成为梅乐斯发号施令、统率中美特务的指挥部。到中国来的美国特务，前后有一两千人，在特区内修建了成百栋房屋，办公室、特务学校、电台、军火库、射击场、酒吧间和舞厅，甚至还有银行并发行专为特务使用的钞票。所有的建筑物之间，都有纵横交错的公路相连，这些公路的名称全是以全国各省的名称来命名的，以示他们要横行全国。匪首蒋介石、美帝战争贩子赫尔利、金开德、柯克等人，经常在这里进进出出，视察、阅兵，他们把歌乐山下的良田美土，变成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深渊。

中美合作所内设置了许多专门用来囚禁革命者的集中营。集中营里的设备，从捕人的手铐、脚镣，审讯用的刑具、录音机，直到杀人的大口径手枪、无声手枪，都有着“U.S.A.”的字样。在这许多阴森森的集中营里，最大的要算白公馆和渣滓洞了。白公馆是一座楼房，建筑在半山上；渣滓洞是一长列男牢房，还有一栋女牢房，共有十八间牢房。四周围着高墙。附近有特务们的办公室和刑讯室。

被捕的同志一进集中营，身上的钢笔、手表甚至皮带、鞋带就全部被没收了，穿上编着号码的囚衣，从此你的姓名便没有了。二三十人被关在一间牢房里，每人所占的地方非常窄狭，所以大家称它为“一脚半”，睡觉的时候只能侧着身子睡，并且要分成两排，脚对脚地交叉着，带着脚镣手铐，连身都翻不动。每天只有十几分钟“放风”，其余的时间全被锢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使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头发开始发白了；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疾病传染的很快，有人得了坏血症，眼看着自己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由紫变黑，慢慢的腐烂，牙齿也全部脱落了。但是，革命者的意志坚强不屈，每天早晚，黑牢里都传出嘹亮的歌声：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无数的革命者为壮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人牺牲在这魔窟里呢？准确的人数已经无法清查了。单从集中营的容量来看，似乎并不太大；较大的白公馆里只能囚禁一百多人，渣滓洞也只能关三百人，再加上其它的集中营，最多也不过能关五六百人。但是，根据人们的记忆，中美合作所杀害的革命者要比它的容量多得多。原来，每一个革命者被捕以后，一般经过三个月、半年，就陆续被“密裁”处决了。只有很少的人被囚到三年五载。几乎每个黄昏，每天晚上，都有一些革命者被押走，远处传来几声枪响，他们就和人们永别了。从1939年到1949年，仅白公馆一处，经前面的同志一个个地留下来的口头材料，十年当中牺牲了两千多名革命者。渣滓洞比白公馆大三倍，牺牲的人就更多了，因为1946年以后，囚禁在渣滓洞的政治犯被全部杀绝，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所以1947年渣滓洞重新关人后，人们也就不知道过去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成千上万的先烈牺牲了，许多人连姓名甚至遗体都没有留下来。先烈们就义后，他们的遗体，有的被匪徒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了，有的被埋在荒山野林里，甚至还有的就埋在花园里；特务们在花园里休息、散步、谈笑，人们不会想到，就在这些屠夫的脚下，在那些美丽的花草下面，埋葬着革命者的骸骨。有的先烈的遗体，被敌人扔去喂养警犬！或是干脆抛进镪水池里，连骨殖也不让保存下来。

意志的闪光

在中美合作所，许许多多的革命者经受了残无人道的毒刑拷打，以坚强的意志，保持了革命者的节操。

中美合作所里一共有一百三十种酷刑，从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如美式的“水葫芦”，在一个橡皮球内装满辣椒水，动刑时，把橡皮球上的皮管塞进革命者的鼻孔，刽子手一脚踩住革命者的头发，一脚踩住橡皮球，辣椒水射进革命者的肺脏，肺中的血，从口里直涌出来。最毒辣的要算一种名为“披麻带孝”的刑法，把革命者的衣服脱光，用栽满成千根钢针的棍子，打在身上，钢针深深地刺进肉体，鲜血直流；革命者不屈服，刽子手就把盐、酒精，涂在受刑者遍体鳞伤的身上，那种痛苦，比火烧、比下油锅还要难受。如果敌人还达不到目的，就再用一条条的纱布，贴在革命者血肉模糊的身上，等纱布和血肉凝结在一起，野兽们再把一条条的纱布，从革命者的身上连肉带血地撕下来！在中美合作所里，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受过这种毒刑的同志能够幸免于牺牲的。他们常常在受刑的过程中，就停止了呼吸。

江竹筠同志，是一个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1939年加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在集中营里，我们都叫她江姐。

1947年夏，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南下，蒋管区人心大振。当时，重庆地下党决定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当即向党要求到农村去工作。组织上考虑到江姐结婚不久，刚生了孩子，没有批准她的要求；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时，他们互相勉励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解放以后再见面。

几个月后，川东农村工作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川东的斗争。江姐接受了党的联络工作的任务，带着孩子的照片，离开了熟悉的山城。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云阳和巫溪的武装起义对下川东震动很大，敌人调动了大批部队，到云阳去了。情况很紧急，党命令她到奉节去和老彭取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江姐走到近前，隐约看见城头悬着一排木笼，木笼里面挂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她心里很难过，不忍心看，走开了。又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应该向党汇报。但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到旁边去看布告。

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

"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对江姐是多么残酷、无情，她感到眼前发黑，城头、木笼好象在空中旋转。她想痛快地哭一场，但是，没有这个权利，城门口站着一排匪兵。只有让眼泪往心里流……

江姐要求党组织留她在彭咏梧烈士牺牲的地方坚持工作。党同意了江姐的要求。几个月后，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1948年的夏天，江姐在万县被捕，被移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一个多月的时间，刽子手没有中断过对江姐的严刑审讯，从她的口里，敌人没有得到一点东西。有一天黄昏，刽子手把江姐的双手绑在审讯室的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江姐昏死过去，刽子手用凉水泼醒，仍然得不到口供。特务们疯狂地吼叫着，拔出沾满肉丝和碎骨的竹签，再钉进去。江姐昏过去，又被凉水泼醒………

这天晚上，整个集中营通宵未眠，人们在牢门边守望着……早晨，昏迷的江姐才被刽子手抛进了黑牢。女牢的同志们，用尽了各种办法进行急救。

每个牢房的同志，都用竹笔写了许多慰问信和诗，秘密地传到女牢：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凉水浇着鼻孔，
电流通过全身，
人底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中熬炼，
象金子一般的亮，
象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这是千百万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腹吧，
挖得出的
只有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

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江姐：

一个月多来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动摇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当我们咀嚼着两餐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半夜被竹绑声惊醒过来，听着歌乐山上狂风呼啸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向你保证：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决不投降，象你一样地勇敢、坚强……

江姐躺在黑牢里。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她感到激动和不安。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我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望窗外已是新春"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随时准备过江！胜利的喜讯，终于传到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渣滓洞集中营里，人们互相传颂着喜讯，每一间牢房都在秘密的议论着。渣滓洞集中营里的同志们，决定利用春节敌人稍微放松监视的机会，在集中营里举行一次大联欢。

春节那天早上，楼一室一带头，十八间牢房同时响起了响亮的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歌声震撼着牢狱。那些酣睡的特务惊醒了，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慌张地跑来阻止：

"不准唱歌！不准唱歌！"

可是，几个沙哑喉咙的特务，要想挡住三百人的声音，就象蚊虫想要干涉春雷一样，毫无作用。唱歌是联欢的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是交换礼品。每个人都准备着礼物，送给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战友，作为联欢的纪念。最多的礼物是"贺年片"，那是用小块的草纸作成的，上面用红药水划上鲜红的五角星，或者镰刀斧头，写上几句心里的话。工人同志还准备了非常珍贵的礼物，他们从楼板上拔出钉子，磨尖了就是刀具，又收集一起破旧的胶牙刷柄，刻出一百多颗红的、黄的、晶亮的五角星，送给自己的战友。不同牢房的礼物是怎样交换的呢？原来所有的楼板、墙壁都是打通了的，每间牢房的墙上都钉得有一排挂破衣服的竹钉，只要把一颗竹钉拔出，墙上就现出一个小孔，把礼物放进去，再用筷子一捅，就传到另一间牢房里去了。敌人以为厚厚的墙可以隔离人们，他们哪里知道，革命者的心是永远隔离不了的！

吃早饭的时间到了，牢门刚刚打开，第三个节目又开始了，每间牢房都有人在门口贴上一副对联。所有的对联都是用草纸连接起来做成的。没有笔，就把筷子磨尖了来代替，有的还把笔尖破开一条小缝，写起字来十分流利；没有墨，就用钻木取火的办法把棉花烧成灰，滴上几滴水，就代替了墨。这些对联，都不是一个人写的，每一个人都要写上几笔，所以同一个字，有老年人苍劲的笔法，也有小孩子弯弯曲曲的字迹。最困难的，是对联的内容不好选择，既要写得敌人看不懂，又要让同志们一看就懂！有一副对联写的是：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

敌人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许他们看懂了不敢承认，也许根本就看不懂。他们说："这很象修仙炼道的人写的。"其实，对联的意思是说：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进行，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正在崩溃，"世上已千年"还形容不了变化的迅速咧！

有一副对联写得优美动人：

看洞中依然旧境；望窗外已是新春。

横幅是："苦尽甜来。"

有的对联引用古人的诗句：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头。

横幅是："大地春回"。

"春色"是人们胜利的欢笑，有什么铁锁，能"关"住渴望解放的心？

有一间牢房门口，贴着两条乐观而又讽刺的文字：

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出头。

横幅写上四个大字："乐在其中"。

特务终于发现这副对联有点刺眼，但是写对联的同志们齐声说：

"难道渣滓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么？"

特务所长只好回答："生活当然是这样的，不过'乐在其中'那个'乐'字总有点问题，应该改掉！"

一个同志立刻给他顶回去："我们把'乐'字改成'苦'字，'苦在其中'，你看如何？"

特务哑口无言，恨恨地走了。

当然，如果想着毒刑、疾病、悲惨的折磨，每一个人都会痛苦的。但是只要想到革命，想到胜利即将到临，就会叫人充满信心。"乐在其中"正是写出了那种向敌人挑战的革命乐观主义心情。

放风的时间到了，牢门一打开，人们都拥了出来。几个戴着脚镣的同志倔强地扭着秧歌，铁链撞击的叮当声作为音乐伴奏！这个节目太动人了，只有那些特务脸色苍白，偷偷地走开，不愿再看下去。

有一间牢房的"报幕员"宣布说："我们的节目是歌舞表演！"一出场，就是一连串的空心跟斗，博得同志们一片叫好声。原来，他们在牢房里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从未中断。接着，几个人聚集拢来，站成一个圆圈，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他们肩上，他们是在叠罗汉！一层，二层，三层……最上边站着一个微笑的人，他站得比集中营的高墙、电网更高，手里拿着一朵鲜红的纸花。歌声渐渐响起，"自由的花儿开放了。"

"这是个象征性的节目。"有人轻轻地说。

"是啊，好极了！他们公开号召锻炼好身体，就用叠罗汉的办法，翻过高墙，集体越狱！"

"好啊，好啊！再来一个！"掌声象炸雷一样，久久不息。

被掌声惊动的特务，又厚着脸皮走了过来，一看到这场精彩的表演，居然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叫好，真是一群愚蠢的动物！

女室的同志们出来了，她们把绣花被面拆下来披在身上，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好看。女同志们在院坝里走了一圈，就跳起秧歌舞来了。秧歌舞，在国民党统治区，是被严禁的，如果有谁敢于公开地、集体扭秧歌，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可是在集中营里，被捕的危险早已没有了，顶多不过在牢门上多加一把铁锁。

有人忍不住嘲笑道："蒋管区也有自由的地方——那就是集中营，可以自由地扭秧歌！"

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唱起歌来：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

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这时慰问解放军的歌声！在国民党地区，这样的歌曲，当然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在集中营里，却居然可以公开的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们，难道还有什么害怕的

么?

本来想看女共产党员表演节目的特务,脸色铁青,立刻在高墙电网上面,架起机枪,枪口瞄准着欢乐的人群。

"瞄准有什么用?没有上边的命令,他们还是不敢开枪!"

"真有意思,这里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开联欢会,还有人架上机枪保卫我们的安全咧!"

"哈哈哈哈!"

在集中营里,人们竟这样快乐地度过了胜利的春节。

江姐、陈然他们牺牲以后,人们的心里十分悲痛。在那绝望的境遇里,人们准备着迎接不可避免的最后的考验。终于,在江姐牺牲两星期以后,1949年的11月27日,敌人蓄谋已久的血腥大屠杀,就在"中美合作所"里开始了。一夜之间,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革命先烈全部被害。解放以后,我们在"中美合作所"找到的牺牲者的遗骸,共有三百三十一具。

人们记得很清楚:大屠杀是在27号下午从白公馆开始的。下午4点多钟,白公馆特务看守长杨进兴,突然走进黄显声将军的囚室,说道:

"警察长请黄先生去说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

望了望不怀好意的暴徒,黄将军迟疑了一下,接着就沉默地戴上了帽子,顺手从床上摸出一件什么东西,迅速塞进衣袋。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李英毅跟在黄将军后面,一齐跨出牢门。

隔壁牢房里囚禁着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那个四岁的小孩一眼看见了黄将军从门外走过,他赶快叫来他的姐姐。两个天真的孩子,挤在门边上,从风洞伸出小手,不住地招手:

"黄伯伯,你进城去?"

"黄伯伯,给我们带糖回来呀!"

"黄伯伯,黄伯伯……"

这时,黄将军忍不住回转身来,固执地凝视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正在挥动着告别的小手……

浓密的黑云,压在山头上;天,快要下雨了。

黄将军迈着沉着的步伐,走到了一条小溪附近。

突然——

"砰砰!"

"砰,砰!"

枪声轰响山谷间,传来一片回声。黄将军摇晃着身子迈了两步,站住了,回过头来,怒视着。

杨进兴把李英毅的尸体踢在一边,提着还在冒烟的手枪,从血泊中拾起黄将军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又提起黄将军的手臂,撕下那只带血的金表。金表答答地响着,时针正接近5点……

偷偷地躲在竹丛后边监视执行的所长忽然露面了,手上提着一部照相机,他要拍摄照片,上报台湾。

凶手翻动着正在冷却的尸体……

黄将军僵硬的手指,出人意外地还紧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刀,一把没有来得及刺进凶手胸膛的短刀……

人们在铁窗边,愤怒地注视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罪行!

细细的雨丝密密地飘落,天色开始黑暗下来。

枪声在旷野里刺耳地狂鸣!被囚禁在白公馆的同志,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被提了出去……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每个人的心都激烈地跃动。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强烈的感情——欢乐和痛苦,胜利和流血,在同一个时刻到临。耳边正响彻着壮丽的歌声,同志们正在齐声歌唱即将到临的黎明!

电光一闪,铁门敞开了!更多的同志被押出去了。这时,有一个同志忽然大声说道:

"别忙,我要写一首诗!"声音是平静的,但是比最坚决的命令还要严厉。

"什么?"

"别罗苏,出来!"

面前站着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

那个同志轻蔑地望了一眼那些阴暗的黑影,他便高声地朗诵起来——

同志们,听!

象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高吭的声音,继续从远处传来——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声音激荡着,象春雷击破层层密云。

………

白公馆的屠杀还没有结束,而更多的刽子手又赶到渣滓洞行凶去了!

半夜的时候,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开始了!

两百多人被锁在黑牢里,成群的刽子手站在每间牢房的风门边。突然,一声口笛,数十挺美制的卡宾枪对着各室的风门口嘶吼起来——

"格格格格!"

"碰碰碰碰!"

枪弹象骤雨不停地向室内倾泻着。子弹在屋子里乱飞,门窗、墙壁在吱吱地呻吟。

那时候,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挡住!一秒也不能停留,冲上前去挡住!让密集的子弹穿过胸膛,也要

挡住！

一个倒下去了，第二个又紧接着冲上去，一个、两个、三个……一排、两排、三排……象一座铜墙铁壁，挡住刽子手们的射击，掩护着同志们从后面打窗突围。

枪声、同志们突围的呐喊声，和临难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枪声越密，口号声也越大。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雄壮的歌声，顽强地压抑着密集的枪弹的嘶叫。

“格格格格！”

枪声又从牢房的后面吼叫起来，更多的同志倒了下去……

一片怒吼，不屈的人们用最后的声音呐喊：

“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尸体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

温暖的血，从死去的同志身上流出，地板上，积起了四、五寸深的血水……

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整整进行了三个多钟头。

有几个突出重围，躲在附近丛林中的人清楚地听见：洪亮的歌声停止了，口号声也逐渐微弱，最后完全歇了下来。只有几个重伤的同志，传来最后的喘息声，在那微弱的声音里，还隐约地听得见，他们在呼唤着亲爱的党和毛主席……

残毒的野兽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扫射以后，还不放心，他们把牢门打开，逐室的检查补枪。未断气的被打死了，尸体上再次地被贯穿着无数的弹孔……

匪徒们慌张地在牢房的四周堆起干柴，泼上汽油，纵火焚烧起来。然后，象野兽似的夹着尾巴逃跑了。

熊熊的烈火在渣滓洞燃烧，火光冲上夜空，照红了歌乐山。在那熊熊的火光中，仿佛升起低沉、壮烈的歌声：

…………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

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时，东方终于出现了朝霞，天，快要亮了……

（选自《红旗飘飘》，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叶飞谈“紫石英号事件”真相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1949年4月，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据当时我方报导：闯入我国内河的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向我军开炮，打死打伤我军252人。我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

最近，这一中英冲突的当事人叶飞（当时在江阴段指挥渡江作战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他写的回忆录《征战纪事》中，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来导发这一事件的第一炮，竟是由我军击发的；并且，是由叶飞司令员自己下命令开炮的。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征战纪事》中，对“紫石英号事件”是这样写的：

“4月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伦敦号与国民党军舰相伴，由东向西驶进我二十三军防区下面游弋。当晚，我中路军突破安庆芜湖线，渡江至繁昌、铜陵、荻港地区。21日下午，在我东路军渡江前，紫石英号、黑天鹅号等军舰竟然再次从长江上游向我战区驶来。

“大约下午4点半钟，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来电话报告，就在我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两公里处，有两三艘兵舰，游弋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

“我接到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因为军委和总前委通报过，林遵将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我便打电话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讯员旗？’陶勇同志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大概是洋鬼子的。’并说：‘这些军舰老是在我们正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我考虑只有半个小时我十兵团就要启渡，事不宜迟，于是我下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这些军舰迅速离开我军防区。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命令发出后，我前沿就升起信号，发出警告。

“原来这是英国军舰。看到我军信号后，没有任何反应，反而将炮口转向我军阵地。这时，渡江时间已近，不能再等待了。

“‘开炮！’”

“榴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长江上水柱突起，烟卷波涛。

“黑天鹅号带着浓烟溜了。紫石英号也被击中，在江上颠簸着……

“正在这时，野司（摘者注：指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播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哪……’他说不下去了。

"于是,我和陶勇订好了'攻守同盟',不论谁问,都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我们就更不能改口了。"

第二天(即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率领英国军舰开来报复,搅乱了我军正在渡江的后勤和民工船只,造成了一些损失,我军又以猛烈炮火将其击退。

接着英国皇家海军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它们"受到敌对部队的攻击",舰上人员亡42人,伤66人,其中有舰长卡格列。远东舰队第二指挥官、皇家海军中将马登也受了伤。

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领袖邱吉尔在下院发言,指责我炮击是"暴行",要求英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与此同时,英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

为此,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除斥责邱吉尔的狂妄外,严正提出:"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读者可能会问:叶飞司令员当时为什么要谎报情况,说是"英国军舰先开的炮?"

这得从当时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渡江后形势的估量和外事政策规定说起: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我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全国胜利在望。但是,我大军渡江这一战略行动,会不会遭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呢?这确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叶飞同志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

"当时,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威胁是存在的。"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这一电文中说:"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在渡江作战兵力使用上,本来以我第三野战军的兵力是可以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的,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美军干涉,第二野战军投入渡江作战就很有必要了。这还不算,毛主席又把第四野战军牢牢抓在手里,保持了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但,毛主席在外事问题上,还是一再告戒各级将领要谨慎从事,尽可能避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为此,党中央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它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要坚决予以回击。正由于党中央早有"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的规定,所以,当叶飞同志接到"野司"电话查询时,他只好推说是"英国军舰先开的炮"了。

也许正由于这个问题吧,当时我军代表和英军舰长在谈判中总是争执不休。对方要求放行,我方坚持说对方"始终采取狡赖态度,拒不承认侵略罪行",因而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我方代表倒也不是故意作难,因为,他们确信不疑地认为是"英国军舰先开的炮"啊!

后来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靠客轮掩护它逃出了长江。举世瞩目的"紫石英号事件"再没有引出更大争端,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叶飞同志为这次回忆录最后定稿时,又写道:"解放后,我和陶勇同志谈起这段往事时,只有一笑了之。如今,这件事也已成了历史事件了,我想,不妨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吧,不知陶勇在天之灵以为如何?"

(选自《大江南北》87年1期,由李一华摘编)

挑衅——搁浅——逃跑
——"紫石英"舰在长江的一次罪恶表演

三次炮战

1949年桃红柳绿季节,昔日百舸争行的浩瀚长江,已处于封闭状态,不见轮烟,不见帆影,只有江水滔滔,白鸥悠悠。

它的两岸,却异常繁忙、紧张。南岸,70万国民党军队散布在"千里江防",抓夫捉丁,挖壕筑堡,企图顽抗。北岸,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日夜操练,枕戈待旦,准备渡江。在江畔柳树丛中,杨树底下,隐蔽着一尊尊威武的炮群,炮口虎视着早已测量好的南岸目标。在沿江内河、湖泊,排列着整整齐齐的成百上千只木船,披着绿叶青枝,俨然是一块块树丛,一片片竹林,只等号令一下,即入江扬帆起航。

4月19日晚,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决定,立即发起渡江作战: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30万人组成的中集团,4月20日20时,在安徽省裕溪口至枞阳镇段首先渡江;由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8个军35万人组成的东集团,4月21日19时,在江苏省江都县至如皋县渡

江;由第二野战军第四、第五、第六兵团 9 个军 35 万人组成的西集团,在枞阳镇至望江段与东集团同时渡江。

当时,长江口外,上海附近,停泊着美国军舰,英国军舰,法国军舰,它们都虎视眈眈。帝国主义会不会对我渡江南进,进行武装干涉?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并明确表态:希望外国军事力量不要干涉中国内战,否则坚决予以回击。

4 月 20 日早 8 时半,泰兴县口岸附近的江面上,一艘军舰正溯江而上。人民解放军沿江观察所立即将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上级。开始,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还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军舰。因为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曾通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正在待机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于是,陈士榘司令员要前沿部队注意观察,看其有无挂出联络信号旗。前沿部队仔细观察,只见该舰挂的是花花绿绿的彩旗,舰尾挂的是米字旗,舰身涂有英国徽记。

"象是英国军舰"。前沿部队报告。

陈士榘司令员一听,猛的一愣。大战在即,英国军舰擅自闯进长江来干什么?是显耀武力?是刺探军情?是企图配合国民党军队阻止我军渡江?还是国民党军舰伪装成外国军舰?他迅速思考这些问题,但一下子又无法弄清。不管是属于什么问题,必须阻止其西进,以免影响渡江作战。他立即命令前沿部队升起信号旗,发出警告,要其迅速撤出长江。

来者果真是英国军舰——护卫舰"紫石英"号。它全身簇新,紫黑锃亮,十分象紫石英。排水量为 3000 吨级,装备有 76—130 毫米口径的火炮。它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颗水晶,一位骄子。它的舰长斯金勒海军少校,是皇家海军中的"年轻精英","超群之才"。

"紫石英"号上一海军中尉看到人民解放军升起的警告信号旗,连忙报告斯金勒。斯金勒看了看信号旗,冷冷一笑:"一百年来,大英帝国军舰在长江里从来都是畅行无阻!"说到这儿,他自豪地挺挺胸,昂昂头。接着,他轻蔑地说:"共军连一艘小炮艇都没有,还敢阻挡我们?不要理他,继续西行!"他命令所有炮口转向北岸,作好射击准备。

9 时许,"紫石英"号横行无忌地驶到三江营江面,北岸近在咫尺。斯金勒虽知道这是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禁区,但仍然命令英舰靠近北岸航行。驻守这一地域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在英舰右方、前方同时升起信号旗,发出严重警告,要其立即停止西进。斯金勒置之不理。

"轰——",人民解放军忍无可忍,只好鸣炮,再次警告英舰。

"啊!共军胆真大,敢在老虎头上拔毛,好好教训教训他!"斯金勒咆哮着,恶狠狠地下达命令:"向共军炮兵阵地开炮!"一排排炮弹落在炮兵第三团一连阵地,腾起一朵朵白烟。一连官兵当即阵亡 6 人,重伤 1 人,2 门野炮被炸毁。严阵已待的人民解放军怒火填胸,立即开炮还击。

"轰、轰、轰",一发发炮弹射向"紫石英"号,。如凌空霹雳,似五雷击顶,打得"紫石英"号前颠后簸,全身冒烟。斯金勒本以为经他一阵炮击,人民解放军会手足无措,老老实实任他们继续横行。他万万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会如此威武不屈,会如此猛烈还击。他急忙下令转舵逃跑,但为时已晚。一刹那,"紫石英"号已中弹 30 余发,后炮塔被击毁了,指挥台被打歪了,斯金勒被炸死了,副舰长威士敦受了重伤,其他官兵伤亡惨重。"紫石英"号左躲右藏,逃向南岸。驻守在镇江焦山上的国民党炮兵立即向解放军炮击,援助"紫石英"号。"紫石英"号因逃跑心切,偏离航道,搁浅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成了人民解放军炮兵射击的固定靶子。"紫石英"号欲战无力,欲跑不能,只好升起了白旗。解放军随之停止炮击。没过一会儿,英舰见没有动静,就降下白旗,重新升起英国国旗。人民解放军又继续炮击。"轰、轰、轰",刚打了几炮,英舰官兵慌忙再次升起白旗,还唯恐人民解放军看不到,升起一面又一面,连升了三面白旗。人民解放军见此又好气又好笑,当即停止炮击。

停泊在南京的英国海军驱逐舰"伴侣"号,得到"紫石英"号求救信息,奉命急忙顺流而下,气势凶凶地赶往三江营,同人民解放军又展开了一场炮战。"伴侣"号杀气腾腾,恨不得一阵炮击,就将人民解放军炮兵阵地全部夷平。第一个回合,"伴侣"号连中 5 弹,不得不全速下驶,以脱离人民解放军火力。略停片刻,它又掉转舰头沿北岸上驶,利用解放军炮兵阵地死角,占领有利位置,猛轰解放军阵地,许多解放军指战员惨遭伤亡。"伴侣"号正在自鸣得意继续上驶时,炮兵第三团榴弹炮连当即给予迎头痛击,击穿其联装主炮,击毁其指挥台,舰长罗伯臣中校亦被炸伤。"伴侣"号带着满身伤痕逃往上海。

停泊在长江口外的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伴侣"号先后受伤,十分意外,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立即乘坐"伦敦"号巡洋舰,并率"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驰援。这艘以大英帝国首都命名的万吨级巨舰,块头大,装甲厚,火力强,装备有 150——203 毫米口径的主力炮 15 门,是英国海军的主力。

4 月 21 日晨,"伦敦"号、"黑天鹅"号驶过江阴,向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搜索前进。直到 16 时许,还在江阴以西江面游弋窥视。

人民解放军同英舰在前两场炮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愿意使事件继续扩大。同时,东集团为了隐蔽战役意图,保证渡江作战的突然性,此刻也不愿意轻易动用火炮和部队,以免过多暴露我军部署。因此,只是发出信

号,警告英舰尽快撤离,尽早结束这一冲突。

再过两个多小时,人民解放军东集团也要发起渡江作战。第23军军长陶勇,不时看看手表,看看江面。第23军是东集团第一梯队的突击军,预定在江阴地段登陆。但"伦敦"号、"黑天鹅"号不东不西,正好横在他这个军的正面。他再次给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打电话:"那两艘英舰还赖在那里,不怀好意。只有把它们赶跑,才能保证作战计划的胜利执行。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叶飞司令员看看手表,当机立断,下达命令:再升信号旗,要英舰迅速离开。"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人民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升起警告信号旗,英舰仍然置若罔闻。人民解放军只好鸣炮示警。

炮声一响,英舰判明了人民解放军炮兵位置,找到了攻击目标,立即开炮轰击,第三场炮战迅即展开。顿时弹飞如雨,烟柱冲天。英舰虽然火炮口径大,射击猛,但毕竟势单力薄,而且它在明处,人民解放军在暗处,很快就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火力网,无法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发炮弹击中了"伦敦"号指挥台,舰长卡扎勒上校负伤,弹片撕破了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制服。梅登感到再抗衡下去要吃大亏,只好叹息地下达命令,掉转舰头,灰溜溜地向长江口外逃去。

21日傍晚,长江涨潮,"紫石英"号浮起,驶入镇江以东谏壁附近夹江,准备乘夜暗逃跑,但为时已晚。人民解放军东、西两大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已发起渡江战役。躲在夹江里的"紫石英"号不敢再移动一步。

22日晨,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江阴要塞,从江南、江北封锁了长江。23日,解放了镇江、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灭亡。这时,"紫石英"号已处在人民解放军严密监视之下。

震动世界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横行霸道了整整一个世纪。这次终于撞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拳之下,这是英帝国主义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三次炮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震动了世界。

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各报都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

美国、法国、苏联、瑞士、加拿大等国家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迅速报道了这一新闻。路透社还从华盛顿特别报道:"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死伤之重感到惊讶。"

最受震动的还是英国。"紫石英"号事件一传出,英国大哗。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发表声明,声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

前任首相邱吉尔提议:"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报复。"但是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对英舰事件和艾德礼、邱吉尔上述言论,纷纷进行指责和批评。5月5日,英国议会下院就英舰事件进行了激烈辩论。

议员罗伯兹说:在共军"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以前几小时,英国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驶,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的愤怒"。

议员盖莱奇责问英国国会:"假若一艘亲希特勒的国家战舰,在预定进攻日那一天(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笔者注)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

议员维也特说:"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但现在可不能这样做了。"

议员麦克米伦等指出:现在派遣航空母舰到中国是"无稽之谈",是"荒谬的"。"炮舰政策太过时了"。

英国下院的那次辩论,远远超出了英舰事件,而广泛地涉及到英国的对华政策。议员们虽然由于党派不同,观点不一,但大多数人认为,英国政府批准英舰进入长江、冒介入中国内战之险,是缺乏远见的,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英舰在长江肇事十分关注。4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英舰"此种与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的行动,绝对不能容许,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赔偿损失"。须"加强对江阴方面炮火封锁","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4月24日,新华社发表《抗议英舰暴行》社论。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英国军舰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和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和道歉、赔偿,严正指出:"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埔江及中国其他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作出许多指示,指出:如英方承认错误,并同意继续进行有关道歉和赔偿的谈判,我们即可让"紫石英"号开走;如英方无意承认错误,则必须阻止其逃走,但不要将其击沉。

百日谈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确定第八兵团政治委员袁仲贤兼任镇江前线司令员,直接领导处置这一事件,并指派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政治委员康矛召以上校军官身份出面进行谈判。英方直接负责这次谈判的是远东舰

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

4月26日，康矛召召见:紫石英"号一海军中尉，发表声明:"(一)英舰未经人民解放军许可，擅自侵入解放军防区，而且首先炮击解放军阵地，致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252人遭受伤亡，房屋村庄惨遭破坏，英国政府及海军当事人应对此暴行负完全责任。(二)英舰应向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道歉，并保证以后不进行与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相敌对的行为。(三)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保留向对这一暴行负责的英国当局要求赔偿损失、严惩凶手的一切权利。(四)'紫石英'号应停泊现地，不得移动，如无本军通知而擅自移动，我们即认为系继续寻衅，立予击沉。"并告知，他已受命为谈判代表，要英方迅速派出相应代表，举行谈判。接着，康矛召又致函"紫石英"号新任舰长克仁斯少校(原任英国驻南京大使馆副武官)再次重申了我方声明。

人民解放军为创造和谈气氛，早日解决问题，以利日后中英友好，对"紫石英"号只是采取监视措施，没有缴其武装，没有集中其人员，没有断其燃料，并协助医治伤员，供给生活用品。不料，英方却采取不合作态度，致使谈判迟迟未得结果。

英方采取的手段之一是避重就轻。这场谈判的中心问题，是要英方承认英舰侵犯中国内河和解放军阵地，并向中国道歉和赔偿。谈判中，布朗特致袁仲贤的多次备忘录中一再声称，这次事件是"偶然事件"，"不幸事件"，是"误会"。对责任问题，只字不提。英方为躲闪对英舰责任问题的谈判，始终不肯派出正式谈判代表，一直由克仁斯出面接谈。而克仁斯一再声明，他无权讨论责任问题，只能商谈"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问题。因英方采用这种耍赖手法，使谈判无法接触实质问题。

英方采取的手段之二是推托。布朗特说:"紫石英"号事件是涉外事件，"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决定"，需由英国大使出面。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中英还未建交，不可能有大使级谈判。英方利用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借故推托。

布朗特在谈判中用威胁手段，企图迫使人民解放军让步。5月23日，他在致袁仲贤的备忘录中说:"不予'紫石英'舰安全舰行的唯一理由，可能是它的移动影响到军事行动或者使舰艇陷于危险，出于任何其他理由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这一段文字虽然有些别扭，但用意十分清楚，就是人民解放军如果继续扣留"紫石英"号，那就要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应尽早让"紫石英"号安全下驶。至于英舰侵入中国内河和炮击解放军阵地，会产生什么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他却避而不谈。

两个多月过去了，谈判没有什么进展。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方准备作出一定让步。为此，袁仲贤向英方表示，如英方以适当方式承认英舰肇事的基本错误之后，中方可以考虑，将放行"紫石英"号与今后继续谈判道歉、赔偿问题分开解决。对此，布朗特表示欢迎。

7月27日，布朗特致信袁仲贤，提出一份供双方签署的换文稿，主要内容是:1. 准许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2. 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于1949年4月20日进入前线地带为招致误会之基本因素。皇家军舰"伦敦"号、"伴侣"号、"黑天鹅"号，亦均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而进入前线地带。3. 双方上级今后要求对长江事件进行任何调查或谈判，英国方面皆不反对。布朗特表示，如还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他愿乘一艘驱逐舰上溯长江前来商谈。从这封信看，布朗特态度似有转变，似愿意通过继续谈判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原来这是他为麻痹中方人士而施放出的一颗烟幕弹。

窃逃与拦截

7月30日晚，天空多云，月暗星稀;时逢大潮，江水上涨，波涛滚滚，响声如雷。21时左右，负责监视"紫石英"号的哨兵，忽然听到江中有"轰隆隆"的机器声，睁大眼睛一看，只见"紫石英"已急匆匆地向东驶去。哨兵立刻鸣枪报警。

驻守在谏壁东侧大港的第25军山炮团闻讯后，立即组织拦截。山炮团拦截部署尚未完全就绪，已见"紫石英"号紧随一艘客轮而下，当即向其炮击，令其停驶。"紫石英"号一边还击，一边加快航速，与客轮并列航行，以客轮作掩护，使解放军炮兵不便对它射击。首次拦截，虽然命中"紫石英"号30多发炮弹，但未击中要害，没有能够阻止它逃走。

当夜，特种兵纵队司令部急令江阴要塞和吴淞要塞分别组织拦截。

江阴要塞接令后，当即派两个排沿南岸巡查，派一个连沿北岸巡查，规定一发现英舰即发射联络信号。同时，命令各江防炮兵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只要发现英舰，不待命令就应发炮阻击。这时，月落星稀，能见度很低，江上又无照明设备，巡查分队主要靠耳朵侦听江面声音，判断有无军舰航行。巡查了两个多小时，未发现江面有异常现象。从大港至江阴约70公里，按"紫石英"号航速，两个多小时就该到了，为什么已过3个小时还迟迟不见踪影?正在大家迷惑不清时，忽然发现江阴黄山脚下有一黑色大物正悄悄地向东游去。

原来，英国人知道江阴要塞素有江防门户之称，现驻有人民解放军江防炮兵，火力较强，"紫石英"号如公开航行，很难闯过这一关。于是，便选择夜暗和落潮时机，停机闭灯顺流而下，偷偷逃越。

当黄山炮兵判明这个黑色大物就是"紫石英"号时，

立即向其开炮。但因居高临下，死角太大，射击效果不大。其他炮兵原来只注意向西警戒，没有料到英舰已溜到自己东边，重新调整方位已来不及。“紫石英”号见自己已经暴露，迅即开机加足马力东窜，逃出了第二关。

吴淞要塞得知上游两次拦截失利，自己是最后一道关口，重任在肩，丝毫不敢大意，主要领导亲至指挥所坐镇指挥，连夜严密布防，组织炮兵多道监视阻击，并用探照灯随时搜索江面。不用说是庞然大物军舰，就是一只小小的木船也别想由此溜出。可是，直至31日下午，还未见“紫石英”号露面。

与此同时，江阴要塞派出李团长率一小分队，携带报话机、战防炮、机枪，连夜乘汽艇沿江向东搜索，至31日下午抵达吴淞，也未见到“紫石英”号。

两相会合，才知道：“紫石英”号已在长江中消失，大家不由得大吃一惊。

“它会不会沉到江里？”吴淞要塞有的同志问。

“不会。”李团长肯定地回答，“据一商船报告，凌晨一时左右，还见它闭着灯快速下驶，说明它的伤势不重。再一点，沿江各处始终没有收到它的求救信号，说明它没有下沉危险。”

“那它会到哪里去了呢？”许多同志更加疑惑不解。

李团长沉思一会，皱着眉头说：“看来，它已逃出长江。”

“不可能！不可能！”吴淞要塞的同志纷纷摇头，“我们对江面一直监视得很严，难道它会长出翅膀飞过去？会土遁遁出去？”

“紫石英”号当然不会飞，也不会土遁，但它确实已经逃出长江。它不是由吴淞口出海，而是乘涨潮江水上涨之时，冒着搁浅的危险，由崇明岛以北夹江逃入海中。当时，南通和崇明岛方向，尚未派炮兵设防。英国人就钻了这个空子，致使“紫石英”号窃逃能以得逞。这就充分说明，“紫石英”号的窃逃，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的，难怪英方在谈判中始终没有诚意。

（选自《大江南北》，作者：陈兴）

炮击英舰始末

渡江战役前夕的4月20日晨，我和团长李安邦前往扬州八兵团司令部参加渡江作战会议。约9时，从扬州东南20公里的三江营方向传来一阵炮声。炮三团来电话报告：一艘英国军舰不顾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我在三江营阵地的炮兵同英舰展开猛烈炮战。英舰中弹30余发，悬白旗驶向南岸，在距我阵地西南约7000米处搁浅。

英国舰队！为什么率先向我挑衅的竟是英国军舰？我原想可能是美国先派军舰来阻挠我军渡江。

下午1时半，三江营又传来炮声。另一艘英舰从上游增援受创的英舰，又同我展开激烈炮战。该舰中弹五发后，全速下驶以脱离我火网，然后沿北岸折回，利用我七连阵地的死角，击毁我野炮两门。该舰继续上驶时遭我一连痛击，中弹累累，舰长罗伯逊中校负伤，乃掉头驶向下游。

据外电报道，肇事英舰为“紫石英”号，增援英舰为“伴侣”号。

这时，国民党公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中共中央军委决定4月21日强渡长江。我们立即赶回三江营，“紫石英”号已降下白旗，该舰的位置阻挡我步兵强渡和登陆。我二十军指挥员要求炮兵迫使该舰西移。七连向“紫石英”发炮，舰上升起爆炸的浓烟。江水受涨潮的影响，将“紫石英”号浮起。它缓缓地消失在薄霭飘逸的水天之际。

后来得知，有一发炮弹从吃水线下射入“紫石英”号弹药舱，但未爆炸（这枚炮弹现陈列在英国一家博物馆内）。外国的报道都对我炮兵极高的命中率表示惊讶。但我军的弹种不全，破甲弹和延期信管缺乏。虽然使英舰及其乘员受到很大破坏和杀伤，却未能将其击沉。

英国远东舰队获知“紫石英”号受创后，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4月21日晨，英国舰队驶过江阴，进入我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

在中国内战方酣、国共两军隔江对垒、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时，一支英国舰队竟强行通过解放军的防区，去增援一天前同解放军发生炮战的“紫石英”号，它们眼里哪还有国际公法！哪还有中国的主权！哪还有中国人民的尊严！

特纵炮团向英国舰队发出警告。英舰自恃甲坚炮巨，置我警告于不顾，反向我轰击，显示威力。我沿江炮兵一齐开火，霎时间，英舰纷纷中弹，冒起阵阵浓烟。“伦敦”号目标最大，中弹尤多。一发美制105榴弹击中其指挥塔，弹片撕裂梅登中将白净而笔挺的海军制服，舰长卡扎勒负伤。英国舰队被迫溃驶上海。

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消息震动了世界。

路透社4月21日报道：共军在扬子江炮轰四艘英国军舰，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权威人士对英国海军死伤之重感到惊讶。纽约各报均以最大字号发表这一新闻。

在伦敦，舆论为之大震……自由党的报纸质问英国海军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保守党的报纸则称赞英国军舰开了炮。

法国报纸均在头版予以报道。

瑞士的所有报纸都用通栏标题登载这一新闻。

“世界人民对此事有同样的质问：英国今日将何以是从？或者更笼统地说，英、美对于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何种

态度？”

美联社4月20日伦敦电引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英国有权派军舰进入中国内河，只要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另一些报道却指出：没有理由相信，“国民党的允许在中共方面也是会被接受的”。

美联社4月21日伦敦电引自由党《新时报》称：英国人想知道，“怎么我们的一些军舰会介入共军的渡江作战之中？‘紫石英’号在这个时候驶向南京，难道是绝对必要的吗？”

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引“紫石英”舰20日午夜给英国海军当局的报告：“仍在搁浅，死亡17，重伤20，60人泅水登岸……”22日报道，四艘英舰两天共亡42人，伤50余人。后来英国海军部公布，另有水兵和军官共103人失踪。

合众社记者高乐采访“伴侣”号报道：“左舷前部有一个约五英寸口径炮弹炸开的洞，另一个洞在船头右舷的吃水线附近。船身两边都有许多弹孔和疤痕，枪炮护板上布满了机枪弹痕。一边旁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评论共军的炮兵技术说，‘他们简直象是表演射击教范似的’”。

英国政府对英舰长江事件的反应很复杂。最初是公布“紫石英”号被“敌对”炮火击伤，连炮弹来自何方也未指明。4月21日发自南京的新闻说，英国驻南京大使已向北平中共当局提出抗议，该大使史蒂文当即否认，只说“沿江部队未接获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

英国前驻北平领事包士敦于4月21日奉大使之命前往北平外侨事务处，递交关于“紫石英”号中弹搁浅，英方将派“伴侣”号和“黑天鹅”号前往救援的一封信。随后递交关于“伴侣”号被击伤，“伦敦”号赴出事地点救援的另一封信，并要求转呈朱德总司令“颁发急令，予各英舰以保护”。递信时，英舰已出动，炮战已发生。这两封信不过是马后炮。

英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尤德于4月23日前往浦口，接洽救助“紫石英”舰，未能找到能够受理此事的我军高级指挥机关。

英国下院5月5日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热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反驳4月26日首相艾德礼所谓“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的声明；对邱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报复”的狂言和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关于英舰应留在南京的诡辩，展开争论。

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斥责邱吉尔要“实行武力报复”的狂言，驳斥艾德礼首相所谓人民解放军“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协助解放军渡江”的谎言，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愿意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弃锚尾随潜逃。9时15分，我大港炮兵向“紫石英”舰发炮警告，英舰还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强傍“江陵解放”号左侧行驶，使该轮不幸中弹沉没，船上数百名乘客伤亡惨重。

“紫石英”号继续东逃，被我龟山炮兵阻击，沿江步兵战防炮也投入战斗。“紫石英”号多处中弹，轮机发生故障，在天生港修理约两小时，又继续下驶。当时，台风使江水猛涨，江阴沿江炮位被迫移往高地。“紫石英”舰停机熄灯顺流而过，我炮兵未能发觉。“紫石英”舰偷越江阴后仓惶东逃，在黎明时撞沉我木船多艘。该舰利用水涨之机，避开吴淞口航道，径从崇明岛北口逃出长江。

（摘自康矛召：《长江风云——1949年英舰长江事件》）

谷正伦诱杀刘伯龙

1949年11月18日上午，贵州省西南部晴隆县县城内，一片混乱。街上到处是国民党溃兵，大多数店铺都上着门板，没有开业，只有几家饭馆仍在开张，里面坐满了划拳、喝酒的国民党军官兵，市面上到处流传着省城贵阳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消息。

晴隆县政府座落在县城一隅的一座低矮的山包上，院落相当宽敞。在通往这座山包的公路上戒备森严，几米就有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身着破旧黄军装。他们是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所辖的地方保安部队。停在院落门前小广场上的1辆带有鞭状天线的美式中吉普和6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上坐满着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每辆车的司机棚上都架着两挺加拿大式轻机枪。士兵们右臂上佩带的臂章上的符号显示着，这是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九军警卫营的部队。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阵自动步枪清脆的连发声，一名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士兵飞快地窜出了大门，直奔那几辆卡车跑去。

“弟兄们！快去救军长，军长被他们……”这名士兵一边跑着，一面大声疾呼，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阵排枪击倒在地上。

刹那间，围墙上、屋顶上、路边的树丛里都晃出许多保安部队士兵的身影，明晃晃的枪口都瞄准着这几辆卡车。

“八十九军的弟兄们！你们军长刘伯龙已被处决，赶快缴出武器，保证诸位的人身安全。”说着，门口走出来两名保安团的士兵，他们抬着一具肥胖的尸体，扔在了广场

上。这个人的下腹部中了好几枪，鲜血把将校呢军服都染红了，领口上两颗将星的领章也被扯掉了一片，左轮手枪枪套还挎在腰间。他就是陆军八十九军中将军长刘伯龙。

刘伯龙与谷正伦其人

刘伯龙是贵州龙里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任职军旅，是特务头子康泽手下的得力干将，曾任国民党军别动总队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

刘伯龙历来粗暴异常，嗜杀成性。在他任国民党新二十八师师长期间，曾在黔东一带搜剿当地苗族领袖潘致和、潘致祥的队伍。在一次冲突中，新二十八师参谋长陈瑞在镇远县的元兆、贵马两寨附近被流弹击毙。刘伯龙闻讯大怒，亲自下命令攻下对方所占的村庄，并且见人就杀，实行屠村。从此刘伯龙便有“屠夫”之称。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战略决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蒋介石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长江以南各省设立了许多编练区，扩充军队，将地方部队编组为正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贵州省也成立了以第三二八师和第三四三师编组而成的陆军第八十九军。刘伯龙被蒋介石直接委派为军长。由于刘到处抓权、抢权，与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全省保安总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终于惹出了一场杀身之祸。

谷正伦也是贵州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谷正伦担任首都卫戍司令、首都戒严司令兼国民党军首任宪兵总司令，曾控制国民党宪兵部队十余年。谷正伦不仅杀人如麻，而且城府很深，颇有谋略。他的两个兄弟（谷正纲、谷正鼎）也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因而，谷氏三兄弟是国民党贵州省籍人士中权势最显赫的家族。1948年，蒋介石任命谷正伦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就是想利用其家族在贵州有号召力，驾轻就熟，调动大西南后方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矛盾起因

1948年底，驻扎在贵州的第三二八师、第三四三师奉令编组为陆军第八十九军。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认为刘伯龙在黔东名声不好，乡人多仇恨他，且无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所以想从贵州籍的黄埔军人陈铁、王文彦、刘汉珍3人中选一人担任军长。但是蒋介石没理睬谷正伦的意见，却直接下令让刘伯龙担任八十九军军长。

1949年3月，刘伯龙到贵阳组建第八十九军军部，他自恃手眼通天、目空一切，很快就与谷正伦等人产生了摩擦。

首先，谷、刘两人在对待国民党桂系的态度上产生了分歧。当时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由代总统李宗仁控制。谷正伦认为自己与桂系向无渊源，在当时这种特殊的政治局面下，贵州省地处西南腹地，必须搞好与邻省尤其是与广西桂系搞好关系。况且白崇禧又手握数十万雄兵坐镇武汉，实是贵州前方的屏障。而贵州扩军军费所急需的烟土出口必经广西境内，也要取得桂系的合作。他曾多次派人前往联络。

然而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龙知道了。他认为逼蒋介石下台的桂系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绝对不能与桂系合作。于是用电台直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谷正伦为此十分恼火。

接着，双方在扩军问题上也发生争斗。谷正伦根据当时战局判断贵州早晚必有一战，特制定了临战应变措施。计划让出大城市，退到偏僻山区打游击，与解放军周旋。谷正伦深知扩军需统一筹划，慎重处置，粮、饷、械都是难题。因此，他在请示了行政院长阎锡山后，决定将贵州保安部队改编为一个军，由全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兼任军长。尔后又将原来的4个保安旅长、两个县长兼三县联防司令任命为6个师长，经费和人员都得到落实。

但刘伯龙却无视绥靖公署、省政府及省保安司令部的统一部署，借扩军以抓权，自恃手眼通天，随便下达委任状，委任师长、旅长。这就把谷正伦气得怒火万丈。

1949年秋，谷正伦为进行游击战，在贵阳设立了贵州自卫干训团，谷自任团长，以韩文焕为教育长，受训者多系省内的绅士和军人。一个星期天，刘伯龙突然派人秘密逮捕了干训团的王富文（凯里人）和王瀛洲（岑巩县人）。干训团见这俩人久不归队，就报告了谷正伦和韩文焕。由韩文焕出面给刘伯龙打电话询问此事，不料刘伯龙蛮横地一口回绝，拒不承认。后来得知这2人都被刘伯龙处决了。谷正伦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

同时，刘伯龙总想挤走谷正伦，觊觎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要职。他每次进见谷正伦时，常常趾高气扬，说话蛮横，也使谷正伦忍无可忍。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乘胜攻入贵州东部，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当国民党军撤出贵阳之前，谷正伦决定邀请一位名叫卢焘的前辈军人带领一支民间武装，维持贵阳秩序。卢焘是广西人，民国初年曾任黔军总司令，是谷正伦任黔军旅长时的老长官。这事又引起了刘伯龙的不满。他认为维持贵阳秩序就是把省城拱手让给共产党。11月14日，他率八十九军路过贵阳，派人将卢焘逮捕，不由分说押到西郊就给枪毙了。

这时，谷正伦已率部撤至晴隆县。当他得知卢焘遇害的消息，气得吐血病复发，当下表示非杀死刘伯龙不可。

设计暗杀

当时谷正伦与其保安副总司令韩文焕等人都住在晴隆县政府内，谷下定决心捕杀刘伯龙后，立即指示韩文焕布置执行，并召见了第八十九军的两位师长张涛和项荣，将其决心告诉了他们。这俩人平时对刘伯龙的专横也十分不满，加上谷许愿他俩在刘伯龙死后都可升官，因此两人都表示支持并保守秘密。最后，谷正伦等人商定，11月18日上午以任命刘伯龙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为由，诱骗刘到晴隆县政府来。然而由保安司令部的部队将刘处决，尔后由张涛控制第八十九军的部队。

当夜，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命令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负责处决刘伯龙。李成举立即抽调了大批神枪手连夜进入县府大院内。

11月18日早晨，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以谷正伦的名义与刘伯龙通电话，告诉他谷正伦愿将绥靖公署主任让给他兼任。

刘伯龙一听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想乘车赴晴隆县办交接手续。有人劝他慎重，认为电话真假难辨，还是看一看再说；也有的说“晴隆”与“擒龙”是谐音，此地为凶险之地，还是不去为宜。

但是刘伯龙当官心切，怕时间拖长了事情会有变化，他“官令智昏”，认为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不会出什么大事，就决定带上警卫、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向晴隆县进发。

刘伯龙乘车来到晴隆县政府，首先拜见了谷正伦。这次可能是由于升官了心里高兴，刘伯龙非常尊重地向谷正伦请示这，请示那。谷正伦一边与其周旋，一边对他说：“由你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布告正在东厢房里起草，你去看看吧！”刘伯龙告辞谷正伦来到东厢房，看到了正在书写着的布告。他趾高气扬地出了东厢房，又来到西厢房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的房间里吹牛聊天。

刘伯龙这样磨蹭，可急坏了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他请示韩文焕，能否进屋去刺杀刘伯龙，韩文焕害怕会误伤自己人而没有同意。这样，李成举只好只身来到西厢房，向刘伯龙敬礼后说道：“军座，您门前的警卫连长催您赶快启程呢。”刘伯龙这才站起身来带着4个卫士向门口走去。他们刚刚来到前院，李成举用手一揭帽子（这是规定开枪的暗号），顿时，屋顶上、墙头上的伏兵都开火了，刘伯龙和他的卫士纷纷倒在血泊中。

尾声

事后，谷正伦派张涛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并以“克扣军饷，紊乱军政（指刘伯龙乱委派师、旅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四条罪状作为处决刘伯龙的理由，呈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备案。

蒋介石得知刘伯龙被谷正伦处决的消息，勃然大怒，以“危险关头，不计精诚团结，却自戕手足，擅杀军事大员”为由，密令军统局西南站将谷正伦逮捕归案。岂料老谋深算的谷正伦早知这次要闯大祸，已为自己安排了后路。他曾任国民党宪兵总司令多年，门徒、爱将遍布全国。当时驻扎西南地区的6个宪兵团团长都是他的门生弟子。在此危急时刻，个个都肯鼎力相助，搭救老师。谷正伦经过化妆，携带着大批黄金、美钞在宪兵部队严密控制的机场上乘飞机逃往香港作寓公去了。军统局西南站因兵力单薄，根本无力与宪兵部队对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谷正伦乘飞机扬长而去。

（杨玉文）

南京政府覆亡前蒋李的“窝里斗”

一　蒋系、桂系宿怨萌发

国民党内蒋系、桂系之间的龃龉由来已久。权力之争、地盘之争，进而数次兵戎相见。八年对日抗战，在民族利益第一前提下，勉强结合在一起，抗战一结束，在权力分配上，双方矛盾又突出出来。白崇禧虽当上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但军事大权完全操在总参谋长陈诚手上。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是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官职。这位一级上将，抗战中曾喧赫一时，此时蛰居故都，百无聊赖。

迨至1948年底前后，国民党政府濒临总崩溃，蒋系、桂系之间夙隙萌发、龃龉重现。他们之间由暗斗转为明争，矛盾趋向白热化。

白崇禧由国防部长转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拥兵数十万自重。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由北平移居南京，活动频繁。一个雄踞华中，一个坐镇都门，遥成犄角。蒋系中所谓精锐部队，已在几个大战役中，损失殆尽。蒋介石此时对桂系已无可奈何。

二　寄希望于异邦总统选举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事上已呈一蹶不振势态。美国对华态度也随着中国国内局势变化而急转直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撤退驻青岛全部海军，紧接着所有驻华美国顾问也陆续撤退回国。

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这时正趋于白热化（1948年10月—11月间）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在竞选演说中，扬言当选后要大力援华，甚至出兵等等。蒋介石此时正处在

一筹莫展的危境中，美国"二杜"竞选总统，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杜威的当选上。"重要军话台"值班人员告诉："委员长非常关注美国总统的选举，命令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随时把选举情况用电话告之委员长。"1948年11月的一天，就是美国总统选举揭晓的一天，董显光、王世杰二人不时地把选举情况向蒋报告。

深夜，董显光叫接委员长电话，他向蒋报告说："……杜鲁门得票最多，蝉联下届总统。"只听蒋在电话中"哼哼"了两声，挂断电话，立即改叫外交部长王世杰电话："雪艇兄，马上发电报，祝贺杜鲁门蝉联总统……"

蒋接着派夫人宋美龄，以总统特使名义飞美，名为祝贺，实为求援。此行结果，宋在美遭到冷遇，一无所获，黯然回国。

三　总统小休　面授机宜

1949年元旦，蒋介石、宋美龄联名发表一篇《元旦告全国国民书》。文告中最后有这么一句："只要我俩一息尚存，决与共党周旋到底。"

讵料不出半月，元月十五日，蒋正式宣布"小休"。这一新鲜名词，既非总统辞职，也非解甲归田，把国人弄得都有些恍惚莫解。

总统新闻秘书曹圣芬随即在新闻发布会上释称："……以总统宵旰勤劳，身心疲惫，小休三月，藉资将息……"这一解释，是补充强调了总统不是辞职下野。所以副总统李宗仁，在总统小休期间，按宪法规定，只能代行总统职权。

同年元月十七日晚，交通部电信局人事室主任马××约我在杨将军巷他家吃饭。在座的有电信总局及二区管理局几位局长和处长们。饭后大家正在玩牌，约近10点钟，"重要军话台"值班邱桐阶打来电话给我："军务局俞局长在宁海路公馆等你，马上去。"

我借乘二区管理局姜局长汽车，直趋俞公馆。我到时，俞济时一人独坐会客室等候。勤务兵把我引入后，随手关门出动。一见面，他先让我坐下，寒暄了几句，就用一种深沉语气说："我们日内就要离开南京了……"我听后"哦"了两声。接着他慢吞吞，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走后……"说至此，他顿了一会，接着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你办……你跟我们很久了…"说至此，他又顿了一会，用眼注视着我数十秒钟。

我此时心情紧张，陡地站起，立了个正，郑重地说："请侍卫长吩咐好了。"(我一直习惯对他用老称呼。)他摆摆手，示意我坐下。他和我并坐在双人沙发上。他亲切地并带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委员长是很器重你的，这次还特别提到过你……不过，委员长这几天是很忙的，不打算接见你了……"我回答说："是的……"他紧接着又用郑重的语气说："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三人，经由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俞济时紧接着说："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把他们规定一种代号，即：李宗仁代号'甲先生'，白崇禧代号'乙先生'，黄绍竑代号'丙先生'。"俞济时又规定"我们两人在电话中(指俞本人和我)，不必称呼什么了，互报自己名字就行，姓都不必带。如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我听后，唯唯称是。并当面详记在日记本上。

俞济时呷了一口茶，关切地问："你还有什么问题？"我答："家属还在南京没有走。"他说："最近有一艘兵舰专送侍从室人员的眷属去福州，你如愿意，眷属即可随往。"我想我的家属是农村人，随侍从室眷属赴闽，有诸多不便，立即回答："现在就走一切没有准备，恐不能……"他说："也好，以后再想办法。"我又说："如果一旦紧急，那就……"他遂爽快而又坚定地对我说："那你不必顾虑，必要时我自会把你和你的眷属接走。"俞济时所说的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不论兵舰、飞机，他都可以随时调遣指挥。我随即站起，说："谢谢侍卫长。"临行，他又把我叫住，让我坐下，一再叮嘱："你一切要当心啊！特别是布置下面的人，要更加慎重、慎重啊。"我连连称："是。"他送我到会客室走廊台阶，握手告别。

我在归途中，从汽车窗看到那些高级官员住宅，多半是漆黑一片。说不定这些花园住宅里，已是楼空人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家召集"重要军话台"人员邱桐阶、李再兴二人，把俞济时所交代的任务作了详细交代。并加重语气对他们说："这是侍卫长的指示，是一项'特密'任务，除你们三人(还有一个车××)外，绝不许泄漏给其他任何人。每天用电话向我禀报。"又用命令口吻吩咐："你们在打电话给我时，要特别注意周围的人，例如同室的'次要军话台'等等。"还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关系非浅的问题。"最后，并命他二人把所有情况，转知今天没有到场的另一个"重要军话台"人员车××。

四　溪口遥控南京

1949年元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等人，晋谒中山陵。记得12年前(1937年12月7日)那次谒陵时，虽黯然神伤，但时隔八年还是归来了。而这次的谒陵，是在兵败如山倒，内挤外压无可奈何情况下进行，此时确有说不尽离情别绪。从步上台阶，到离开灵堂，蒋一言未发忧容满面，似乎预感这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的一次谒陵。

蒋、宋谒陵后，偕同军务局长俞济时，新闻秘书曹圣芬，随从秘书俞国华、周宏涛，英文秘书沈昌焕，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张廷桢，陆、海、空三军武官蒋祥庆、皮宗敢、夏××，总务局长陈希曾，以及副官、武装侍卫等人，分乘两

架大飞机，离京径飞奉化溪口。

我派“重要军话台”李再兴随机同往。

蒋介石虽正式宣布“小休”，离开首都南京，然而中枢凡涉及他的权力方面，丝毫没有放松。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下面略举数例：

增加敷设直达溪口长途电话一对，径衔接在“重要军话台”。军事上，蒋介石每天直接跟总参谋长顾祝同通话，询问战况并作指示，或电话参谋次长林蔚。蒋并直接跟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话，指挥调度空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遇事径向蒋氏请示，蒋也随时给予指示。

政治上，大至组阁问题，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不放手。行政院长一职，李宗仁原先拟请居正担任，蒋介石一再表示不同意。李宗仁无奈，改请何应钦，经蒋同意后，公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请辞，李宗仁即准备派他自己的特工人员刘诚之接替。蒋介石获悉后进行干预，拟派一个军统方面人员接替。但刘诚之是李宗仁的亲信，担任李的保卫特工多年，派刘任首都警察厅长，早为李宗仁内定。刘诚之与南京电信局局长计舜廷是莫逆之交，刘在未接任前，即借南京电信局局长室作为他的临时办公处所。刘在局长室筹划10多天，专等走马上任。所以李宗仁在这个地方官更动上，不理睬蒋的干预，迅而明令发表：刘诚之为首都警察厅厅长。此时蒋虽深表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蒋嘱咐前国民政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毛曾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是计舜廷的老上司，而且计得任南京电信局长，是毛推荐的）径函计舜廷，嘱其不要接近刘诚之，不要为其提供方便，信中有“新交不忘旧遇”等句。此事是溪口李再兴告知我的。便中我问计舜廷有否此事，计笑说：“老毛还跟我来这一套，什么‘新交不忘旧遇’……真有点……”

经济上，蒋仍加紧控制。典型的例子是，蒋要把国库存放的黄金和美钞运往台湾，遭到李宗仁和桂系权势人物的竭力反对，蒋不顾一切，饬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速用兵舰运走。

蒋介石虽然离职，然而他的权力并未放下，事事干预，理所当然引起桂系中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蒋氏离京一周中，李宗仁两次长途电话汉口白崇禧，召其来京商讨对策。白崇禧到京后，连日在李宗仁公馆开会，并作频繁活动。白崇禧到京的三天中，两次长途电话给隐居在湖南乡里的刘为章（斐），劝其出山辅助代总统。电话中有“德公急盼为章兄襄辅国事……”等话。但都遭到刘为章的婉言谢绝。

五 矛盾升级，暗斗变明争

白崇禧返汉后，黄绍竑连续长途电话白崇禧，冀其迅速策划两湖（湖南、湖北）一市（汉口）所有“国大代表”和两省一市参议员联名通电：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正式辞职，以利和谈。

黄绍竑、白崇禧在另一次通话中，有这样的对话，白说：“已经分头对他们（国大代表和参议员）联络好了，是不成问题的。连日他们都齐集在汉口开会，最后就是发通电了……”黄说：“健生兄（白崇禧），已和德公（李宗仁）商定准备把一些重要问题的经过先在报纸上发表。”白说：“好的，季宽兄（黄绍竑），主要把他（蒋介石）不放权一事，予以揭露。这一点，最好抢在我们这里发通电之前办好见报……”黄绍竑说：“是的……我是先和你商量一下，至于在报纸发表一事，已和通讯社商定了……”

1949年2月下旬，经由“美国合众社”发表了一则消息，内容有：“……对于蒋介石虽然离职，一直对于中央军政、经济……等等，握权不放，形成幕后操纵……云云。”紧接着，湖南、湖北两省和汉口市所有“国大代表”及参议员联名通电，一至要求蒋介石辞职下野，交出一切权力。

桂系所策划的一系列对策，带有激烈的攻击性，并公然在国内各主要报纸上发表。所在这些，使蒋介石颇感狼狈。正式通电下野？当然不肯。缄默下去，更为不甘。

桂系内部高层之间来往电讯（主要长途电话），统统被我们（重要军话台）所掌握，又由我提供给溪口方面。因而，蒋方对桂系一切活动，是了如指掌的。

蒋极为震怒，立派新闻秘书曹圣芬，驰赴上海活动，并选择在国内资格最老、销路最广的《申报》，发表针对桂系的如下新闻：

利用外国新闻机构阴谋者散布流言

某负责人发表谈话予以指斥

昨日报载：合众社记者张国兴2月19日南京电谓：“暂时引退的蒋总统，仍在发布命令，仍保有总统的足够权力，使渠能在未来的对中共和谈中，施用否决权。同时，渠正每日行使此等权力，俾洞开复职之门。”并谓：“蒋总统经常对防部及中央银行总裁，发出各种指示。”该记者甚至谓：“蒋氏在引退中，仍行使总统权力，似为李宗仁的对中共谋和，以及推行激烈的政治改革，受到一定的阻碍。反动分子在蒋氏荫蔽之下，在全国施展其影响及权力，以图阻挠或破坏李宗仁所作的和平努力。并准备迎蒋复职……云云”。中央社记者顷就合众社记者张国兴所发此项电讯，叩讯此间某负责人之意见，据称：“此显然系阴谋分子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及滥用政府区域之新闻自由权利，故意散布恶毒流言，企图诬蔑蒋总统赤诚为国之纯洁与伟大，破坏其信誉，离间蒋总统及李代总统之感情，制造险恶政潮，而加深中国之危机。所幸此类分子之手法，殊为笨拙幼稚，明眼人一见，即知其用意所在，而决不致为其所欺弄也……”

在报纸上互发新闻攻讦是蒋系、桂系互相倾轧的一个新的高潮。

桂系中高层包括所有拥李派在内，非要蒋全部让出权力而后快。而蒋又死死抓住这个权力不放。在和谈代表的提名上，李有李的看法，蒋有蒋有打算。是几经往返磋商才决定下来的。蒋介石自离京赴溪口后，没有和李宗仁通过一次长途电话。而李似乎也无须再向老蒋请示。所以双方的意见，都是通过张文伯先生沟通的。

六　国人瞩目之地——溪口

溪口是一时成为国人瞩目的军事、政治重心。显赫权贵，军政高层，其中有述职的、请示的，京、沪、杭、甬道上，冠盖如云。

这一地区的电信，特别是溪口的电信业务，跟着繁忙起来。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张廷桢电南京电信局局长计舜："嘱王正元克日赴溪口。"我当时以南京事务也相当重要，不克分身，立加派"重要军话台"邱桐阶乘飞机前往。

由于我所搜集和提供的李、白、黄的情况，在溪口方面是殊多价值的，深得蒋介石和俞济时的赞许。3月上旬，由俞济时出面汇我交通银行即支票一长，并附俞的亲笔信，信中多系嘉许勉励之词。

我和俞济时每次通话，完全按既定方法进行。双方拿起电话听筒，无须寒暄客套，随即各自通报名字后，我即报内容。话毕，互通一声"再见"挂上听筒。当时揣度，这样做丝毫间隙和漏洞都没有。其实，非但有漏洞，而且一直瞒着我有一个"大缺口"存在。另文再述。

蒋介石离京后，南京出现一段不算短的"升平景象"。商店复业，外逃部分人归来。主要是受报纸的影响，什么隔江分治哪，长江天堑哪……在此期间，蒋系、桂系之间互相倾力排斥，攻讦闹剧从未稍戢，从而愈演愈烈。

桂系实力派人物白崇禧，雄踞华中，拒不配合中央军事行动，对中央军令不予理睬。1949年3月间，有一艘满载军火的大轮驶往四川。装备和补充中央军驻川部队。事为白崇禧悉，船经汉口，被其截留。这批军火，全部装备了桂系部队。

白崇禧截留军火一事，在国防震动颇大。顾祝同电话向蒋报告。蒋听罢，未置一言，电话就挂断了。可见蒋氏气愤已极。

此时双方虽接近图穷匕首见，但究竟未达正式破裂程度，蒋只好忍气吞声。

（王正元）

资源委员会智拒蒋介石

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隶属行政院的负责重工业建设的机构。在1932年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公有31人的资源调查研究机关，但到1947年底，已成为拥有300余粗大中型工矿企业，近30万员工的庞大机构，几乎掌握了所有重要的重工业厂矿。资委会的各级领导人员，绝大部分是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战前后加入资委会工作的。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的前夕，他们不愿意为国民党政府殉葬，在正副委员长孙越崎、吴兆洪的带领下，团结全体员工，保护工厂，保护物资和保护高级技术人才，拒绝迁往台湾，为新中国献上一份厚礼。

软拖硬顶，南京五厂拒迁台湾

1948年12月，蒋介石召见孙越崎，命令他将资委会在南京的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五家企业立即拆迁到台湾去。这5家工厂是抗战胜利后，资委会利用大量美援设备，从各地企业中抽调大批优秀的技术、管理人才，在短时期内建成投产的。总资产价值约三四百万美元。资委会领导人当然不愿意看着它们被拆到台湾，他们决定弃暗投明，准备起义。但是，南京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公然对抗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孙越崎决定采取软拖的办法。他首先强调拆迁五厂需要大量经费，运输也难解决，想以此打消蒋介石拆迁五厂的念头。不料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一口答应照拨款项和车辆，并令将机器设备由铁路运至上海，再用轮船转运台湾。孙越崎无奈，只得与五厂负责人拟订了拆迁和重建的费用预算。他们有意高估了所需的费用，要求蒋介石拨款132亿元台币（当时约值60多万美元）。谁知，一向克扣建设费用的财政部这一次却马上以"紧急命令"的方式如数照拨。孙越崎与五厂负责人只得开始工厂拆迁工作，拆迁时，他们故意放慢速度，静候时机。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孙越崎当即下令将所有已运到江边码头的机器设备运回厂内重新安装，而已运到上海的马鞍山机器厂的机器，则权且交由上海机器厂接收。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下野后的蒋介石仍在奉化幕后指挥。过了大约3个星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突然致电孙越崎，声称奉层峰（即蒋介石）命令，要其迅速汇报南京五厂拆迁情形。在这关键时刻，孙越崎和五厂负责人下定决心"电报不复，工厂不迁"，继续拖延时间。五厂负责人沈良骅、黄修青、王端骧、任国常、张心田等商定由各厂分别向资委会写报告，说明因轮船已开走，机器设备暴露码头，风打雨蚀，受到损坏，请求搬回工厂。孙越崎批准各厂的报告，表示共同承担责任。这时，汤恩伯和南京卫戍区副司令等一再催促。孙越崎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找到李宗仁，向李提出：政府一边和谈，一边又将首都工厂拆迁，显得没有诚意，而外界人难免要将拆迁

工厂的责任归罪于李宗仁。李宗仁听后深以为然，当即表示支持孙越崎，不再拆迁工厂去台湾。有了代总统这支“令箭”，资委会不顾警备司令部的多次催促，并将搬回厂内的机器迅速安装就绪，重新生产。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批下了拆迁和重建的费用，资委会最初支取了54亿台币，余款存在台湾是作为在台湾建造新厂所用的。若这笔款子汇回大陆，就会暴露拒迁意图。于是，资委会财务处长季树农献上一计：命下属机构台湾糖业公司在上海销售食糖，所得金圆券直接分拨南京五厂，而将汇存台湾银行的五厂拆迁专用款就近交给台糖公司。这就巧妙的将余下的78亿台币留在了大陆。蒋介石得悉后，恼怒异常，下令将五厂负责人任国常等逮捕枪决，但命令刚下达，南京已经解放，拒迁五厂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虚于委蛇，技术人才留在大陆

资委会从成立起，通过资助学校开设有关专业课程，向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优先招收这些学生进所属企业工作，选派大批青年技术人员出国深造等办法，竭力扩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队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资委会所属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已达3万余名，其中40%以上是大学毕业或留学归来的专家。资委会决定弃暗投明后，首先考虑如何为新中国保存这批人才。

1948年10月资委会南京会议上，孙越崎在披露了自己准备带领资委会起义的决定后，一再告诫各企业负责人：各地企业人员，不要跟着国民党军队走，而要坚守岗位、等待解放。资委会为挽留数万技术管理人员安留大陆，又动用了历年积存的数百万美元外汇，分发到各个企业，让企业能在解放前夕的混乱状况中购储必需的生活物资，维持职工的基本生活。斗争仍在继续。1949年2月，行政院迁往广州，并规定直属机关一律迁往广州，否则停发经费。资委会作为院属机关，本该随同迁往广州，但孙越崎、吴兆洪等人考虑到本部一旦随迁便很难脱身，也会影响所属企业人员留待解放的决心。他们便借口要与在上海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联系，将本部和一些总管理机构的干部、技术人员迁至上海，并设自备电台，与各地企业联络。同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仅派少数几名职员负责。而孙越崎本人最初留在南京协助李宗仁进行“和谈”，后来也虚于委蛇，飞往广州，与行政院敷衍，以掩护在上海的资源委员。这就造成了：广州资委会有名无实，上海资委会有实无名。吴兆洪、季树农等人还将已在台湾的家眷接回上海，以表示留在上海不走的决心。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各机关大多撤离，唯独资委会按兵不动。上海地区的特务头子和国民党政府驻上海督运物资的官员纷纷前来催逼。国民党行政院又派出参事专门督导南迁，并主动送上去广州的飞机票。为了麻痹敌人，1949年5月12日，吴兆洪向报界透露资委会日内就要搬往广州的消息。这一消息于次日见报，吴兆洪也同日飞到广州，他特地到行政院各机关拜访一遍，造成资委会已到广州的假象。而在三天之后，吴兆洪又赶乘最后一班广州至上海的飞机飞返上海，隐居起来直到解放。

就这样，资委会本部和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才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1949年5月底，国民党政府派刘航琛继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但广州的资委会只剩下2名不管事的职员，档案、资料、账册都一无所有。蒋介石闻讯恼羞成怒，宣布要将资委会科长以上职员全部“通辑归案”，无奈已经为时太晚了。

以攻为守，大批物资完璧归赵

资委会所属企业众多，且其中不少企业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资委会原设有材料事务所专办物资进口购运等事宜。因此，除了各企业的机器设备外，资委会本部也掌握有大量物资。到1949年初，资委会掌握的物资中仅煤矿设备一项价值就达美金2000万元。所有进口物资中五金材料、工具仪表等通用物资，都立即分发至各企业存储。作为美援物资进口的大型设备，如10套5000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煤矿用卷扬机、空气压缩机、成套机械设备等，均运至武汉、长沙、株洲等地，分派专人保管，其余物资包括糖、铝、纸张、石油、各种成套设备和钨锑锡汞等待运出口的矿产品则集中存储于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时移交给人民。这些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怀疑。

此时，汤恩伯正奉蒋介石之命，在上海抢运物资去台湾，并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征用了全部台沪间往来船只。许多国民党政府要员及其眷属也纷纷设法逃离上海，运输工具极为紧缺。资委会当即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连夜编造了两本清册，一本是《半年来已运台湾物资清册》将资委会在台湾的十大公司在上海采购的物资全部列入，以表明资委会始终在积极转运物资，另一本为《急待抢运台湾之物资清册》，将资委会在上海70余家仓库中存储的体积庞大、数量又多的物资一齐列入，缮写上报警备司令部，要求“抢运”。这一招果然灵验，这时候警备司令部哪里有这么多船只可派？警备司令部既无力运输，也就不再前来催问了。

资委会就这样保住了储存在上海的大批物资，还从所属台湾糖业公司调运了16000余吨食糖到上海，又将正在黄浦江上的四艘油轮主动放水沉没，使其免被蒋军劫持。上海解放后，资委会将所有物资都完整地移交给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孙冶方等同志。玉门、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原资委会所属企业，也先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程麟荪）

历 史 考 证

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我党中央临时住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米高扬此行目的是什么？现在有两种不同说法。余湛、张光佑在《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一文中认为，有关米高扬此行是转达斯大林劝阻我过长江的口信，不过是我党内的"一个传说"，实则并无此事。1.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师哲说，米高扬一来就声明是"带着耳朵来的"。2. 斯大林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到1949年，斯大林态度比较谨慎了。3. 斯大林拒绝调解国共内战，表明他是尊重我党意见的。4.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未谈到过斯大林曾劝阻我过长江。

向青在《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长江之我见》一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1. 斯大林曾劝阻我过长江不是"一个传说"，而是出自毛泽东的亲自谈话。王方名在其发表于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文章《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中写到，作者亲自聆听毛泽东主席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这显然是指斯大林。2. 杨尚昆同志在1984年11月3日接见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时，就曾阐明米高扬曾经传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3.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日记记载：1月4日，星期二，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去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治中，张说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继续打下去，苏联则奉劝中国共产党停止于长江一线。是苏联对华外交人员向张治中透露了苏联的这个意图。4. 米高扬的儿子塞戈·米高扬在其回忆文章中说，米高扬知道斯大林反对过江，希望有"两个中国政府"。据此，向青认为"米高扬转达斯大林对毛泽东警告的事实，是有多方面根据的"。

（摘自《党的文献》，1989年第1、6期）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干什么

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却呆在南京不动，一直到8月2日才悄然离开中国。这是怎么回事？据《团结报》7月1日和7月11日牛大勇的两篇文章说，司徒雷登是在努力同中共领导拉关系。有关情况摘编如下：

早在1949年3月，司徒雷登就上书美国国务院，请求允许他在适当时机同中共领导人接触，表示他将提醒中共，如果中国建立起共产制度，美国便要"用一切方法使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果中共在他的威胁诱惑下"反应良好"，他就建议采取某种步骤，建立双方"良好而互谅的关系"。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批准了司徒雷登的计划，但认为他的那番威胁实在过分，命他把措词改得缓和一些。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得知昔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长期任该校校务长）的学生黄华担任了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便派秘书傅泾波于5月6日前往拜访，为他跟黄华会晤铺路。13日晚，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一次晤谈，气氛较融洽。司徒雷登讲了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民主之类的漂亮话；黄华表示，愿意见到美国承认中共政府，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商务和其它关系。司徒雷登则强调，若想获得美国承认，中共必须遵守现行条约。

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进行了第二次晤谈。黄华重申中共愿意和美国及其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司徒雷登不肯表示将停止援蒋，但宣称中共应意识到外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发展。

这时，司徒雷登接到从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说是中共内部在对苏对美方针上出现意见分歧。于是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他几十年来每年6月都在北平过生日，并出席燕京大学毕业典礼，今年还想去北平。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欧阳辰、周裕康等人为之牵线搭桥。6月26日，刚从北平回来的周裕康给他带来重要消息：毛泽东说，司徒雷登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28日，黄华正式通知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欢迎他前往北平，有关部门愿意为他在交通上提供便利，甚至可以允许他乘自己的飞机前往。司徒雷登即于第二天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并详陈北平之行的种种好处，同时也分析了不利因素，权衡利弊，他力主以去北平为好。但是三天之内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否决了他的这一计划。7月1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曾通过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传递信息。

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与中国共产党也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6 月 10 日，他与夫人在南京同司徒雷登晤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方的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陈铭枢旋赴北平。6 月 23 日，陈通过助手转告司徒雷登，说他已跟毛泽东、周恩来顺利接触，谈话令人完全满意。7 月 9 日下午，陈与司徒雷登晤谈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

备忘录系陈铭枢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虽然毛泽东在 6 月 30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但这并非"靠别人"之意。陈还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

那两个附件，一个是中共领导人联合对司徒雷登的答复，表示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制订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阅读他 6 月 15 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其中声明了对外政策的立场。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对司徒雷登那四个文件的答复，其中列举事实，驳斥了司徒雷登对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所作的比较，还举出 1937 年和 1947 年的中美贸易数字，证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受惠者，批驳了司徒雷登关于美中贸易对中国更有利的说法。

由于双方立场格格不入，1949 年美国与中共虽有对话的机会，却无和解之可能，司徒雷登就悄然离去了。

（选自《人物》89 年 6 期，作者：张南）

罗广斌在渣滓洞为何能幸免于难

1975 年 12 月，我在安徽合肥获宽释后，在学习、参观过程中，一位同志问我看过长篇小说《红岩》没有，我说没看过。他说：《红岩》是罗广斌、杨益言著的，其内容是反映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前后、国民党特务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又如何英勇顽强进行斗争等情况的。于是引起我对有关《红岩》作者罗广斌情况的一些回忆。

1948 年 6 月，我奉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令，由重庆行辕二处调任陆军第十训练处第二组组长（即情报处长，十训处即十五兵团前身），司令部驻重庆山洞（乡镇名），司令官是罗广文，参谋长赵秀昆。

1948 年秋，天气还很热时，我们几个组长和秘书习惯在晚饭后到山洞、陵园之间的公路上散步，有时还在路旁一颗黄桷树下的茶馆聊天。一天，在散步中，机要秘书方勉耕对我说："罗广文司令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罗广斌，被重庆行辕二处逮捕了，不知关押在何处，你自该处调来，可否向二处处长说情，将罗广斌释放？如办到了，那就给罗司令官帮了大忙。"我当时也想借此机会博得罗广文的信任，立答道："试试看吧。"过一些时，政工组长谷若虚和四组长邓秉杼又先后在茶馆闲谈中对我提起罗广斌事，请我为罗司令官向二处处长徐远举说情释放罗广斌。我答："让我先向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谈谈，请杨相机向徐说情。因徐远举是黄埔军校七期学生，湖北人。杨元森是黄埔军校五期学生，也是湖北人，而且是徐在军校时的区队长。他俩原系师友，又属同乡、同僚，关系至为密切。而我与杨的关系则是喝过血酒的'把兄弟'。"我找过杨元森后，杨对我的嘱托就积极去办。不久，杨元森即对我说，他已向徐远举谈了释放罗广斌的问题，徐答应相机尽力而为。1949 年 7 月中旬的一个晚间，我和杨元森、徐远举等跳舞后到徐远举家里打牌，趁饮宴之机，我直接对徐远举说："罗广斌事，罗司令官很关切，望早为设法解决。"徐答道："请罗司令官放心，我自会相机行事。"然后从此以后，我与罗广文常驻大竹，军务繁忙，无暇顾此，亦很少与徐、杨二人见面。

1949 年 11 月 25 日，十五兵团司令部驻綦江，罗广文亲率一 O 八军和一一 O 军的一个师，在南川白马山一线与解放军激战，午后因七二三团团长崔北川突然于战地起义，致全线崩溃。于是以营为单位撤退，各自渡江。兵团部则于 25 日星夜撤至重庆南温泉仙女洞。27 日，我们正侦察地形，准备布阵再作抵抗中，殊料午后突遭解放军侦察部队袭击，兵团司令部仓惶撤至重庆海棠溪。因数百辆军车阻渡，兵团司令部只好暂驻车部。我为了迅速了解部队败退情况和罗司令官在何处，急忙带两个警卫员以木船渡江至重庆行辕二处，想利用该处通信设备寻找部队的罗司令官。我到该处时，只见警卫组约有一班人守卫着。上楼后，见副处长杨元森一人坐守电话机旁。我与杨寒暄中，始知二处特务已全部逃走，文件已经焚毁。夜深了，杨元森叫警卫员买些酒菜，以饮酒话别，我则忙于发、收电话。大约半夜时，二处处长徐远举匆匆上楼，一见我即惊异地问："你们的仗是怎么打的？"我说："胜败乃兵家之常，那有常胜将军呢？"徐又问："罗司令官在那里？"我说："我还正在找他呢！"接着，徐远举转问杨元森："乡下的事怎么样了？"（按"乡下"是指中美合作所和渣滓洞监狱等范围）杨答："我正在催办。"徐说："乡下的任务一定要在明晨 7 时前完成，完成后，你就可离开重庆。"徐、杨交谈一阵后，徐又转对我说："今晚请你办三件事：第一，我把罗广斌交给你，请你一定把他交给罗司令官；第二，乡下有 300 支手枪，可以提 200 支，子弹 3 万发，已决定交给你部使用，限明晨拂晓前到童家桥取，否则另交别部

了;第三,(已忆不起)。"我当即回答:"我正忙于寻找部队和罗司令官,无法把罗广斌交给罗广文。"经我一再说明难办原因后,徐才说:"那我就自办好了,但其余二事,一定要按时去办,否则我不负责。"我答应尽力去办后,徐又和杨谈几句就匆匆离去。28日3时许,我和杨元森正饮酒谈论时局时,一O八军参谋长张元宪忽然与我联络上了,他要求我从速通知山洞的留守司令部,在28日8时前派一中型吉普到广阳坝接罗司令官。我着急地三番五次打电话,正与留守司令部接上电话时,杨元森急告我,他将取道川东北转成都。我们匆匆握别后,我亦于8时许赶回海棠溪兵团部。

1950年4月,起义后的十五兵团,奉令东调浙江杭州、余杭等地区。我当时任兵团的政二处处长兼一O八军军官队队长。部队到重庆暂住沙磁区等待轮船东下,我乘隙到重庆市中心一游。适重庆军管会枪毙渣滓洞大屠杀的刽子手徐贵林(绰号猫头鹰),罪状还贴在市中心精神堡垒的竖碑上面。一看内容,大吃一惊,猛然省悟到1949年11月27日晚徐远举到二处向杨元森说的"乡下任务",就是指的渣滓洞大屠杀罪行。徐远举与杨元森正是这滔天罪行的元凶。而罗广斌能幸免于难,诚可谓万幸矣!"在80年代里,我还多次听人说,罗广斌是在"文革"中,难忍"叛徒"罪名而跳楼自杀的。罗君枉矣,我总不免常为之怅怅然!

至于1949年11月27日晚,徐远举说他将自办"把罗广斌交给罗广文"一事的究竟何如,当时和今天我都还无由知道,殊感遗憾!

(选自《纵横》88年3期,作者:原国民党国防部某处情报处长林茂)

关于党旗上的字

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照片上我们看到,挂在主席台的党旗上有"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而现在的党旗则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曾列席会议的杨尚昆同志回忆:七届二中全会之前,中央有关同志曾讨论,设计一面党旗,用红底衬金黄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字样。全会便按此进行了布置。会议期间,大家又讨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这不太好。这样,以后的党旗又去掉了这几个字。

(选自《党史博采》90年3期,作者:石君)

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卷款潜逃真相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准备南迁广州,国防部亦已东移上海。在一片混乱声中,又冒出了一件怪事: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伙同总务长戈定邦卷款潜逃。

一月二十七日,他将秘密从国库局领得的中央大学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全部经常费、部分应变费,以及离校同学的公费共七千万元,串通总务长一起潜逃到上海。第二天南京各报披露后,立即轰动了石头城。

消息传出后,中央大学的教职工和学生被激怒了。他们冲进了校长室,殴打了会计主任,要他拿出钱来,并且说明周鸿经卷款潜逃的情况。消息传到教育部,高教司的唐司长带了四百万元到中央大学去平息众怒。这点钱太少了,于是学生和教授的代表去教育部陈雪屏代部长公馆请愿,这才又批准带回一千八百万元。代表们回到学校,群众仍不答应,决定到总统府请愿。陈雪屏鉴于形势的严重,又答应了学生们再送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元现款,以及到粮食部借粮的要求。

周鸿经在上海的公馆里听到中央大学的消息,特别是学生不再承认他是中央大学校长,便急急如丧家之犬似地在《中央日报》上刊出了私人启事,否认其曾"卷款潜逃"的事实。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学生和工友应变委员会见了报纸十分气愤,便于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为驳斥〈周鸿经启事〉声明》。

《声明》首先驳斥周鸿经《启事》所称"此次乘校中假期之便,来沪料理家事",说周氏潜行赴沪,时值两浦吃紧,"周氏身为一校之长,事先既未对应变工作有所布置,遽于此际以'家事'去沪,陷全校于无政府状态。"

其次,驳斥《启事》所称"行前曾征得教育部陈代部长之同意,并曾告知校中同事"。说事实是,陈代部长事后听说周氏已经离校,甚表惊讶,不可能事先曾表同意。既拟离校,理应委托教务长代理校务,但教务长罗清事先并不知道周氏即将离校,更未接获其任何委托。

第三,《声明》说,关于周鸿经卷款七千万潜逃之事,"乃系根据国库局某职员透露,周氏曾在该库领得七千万元。此款并未入帐,会计室出纳室自无帐可查,然至今下落不明。其为周氏卷逃,不难想象。""周氏主校以来,经济从不公开,前以阴谋迁校,私汇巨款至台闽,周氏党羽、体育主任江良规经手支领之一千三百元美金,下落亦不明。周氏走后,校中财库一空,后复查得戈定邦经手售与资源委员会之活动房屋四栋,迄未经会计室入帐,此款究不知落入何人私囊?"

这样一来,堂堂最高学府之校长的庐山真面貌终于

暴露无遗，周鸿经欲盖弥彰只能弄巧成拙。

戴季陶确系自杀而死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自杀身亡。三个月后，蒋介石的另一谋士戴季陶也因服毒自杀而撒手人世。

然而，当时报纸对于戴季陶之死的报导，却是另一种调子。官方中央社于二月十二日发表的消息是："国史馆馆长党国元老戴传贤先生，夙患心脏衰弱症，于一月前来穗养疴，寓东山东园，延李士梅医师经常诊治，其间时发时愈，终以体质太弱，乃于二月十二日晨，病象突转剧，神志亦入昏迷状态，比即延请姚碧澄、杨子韬两医师诊察，已不及救治，延至上午十时四十分在寓逝世。"第二天中央社发表的消息又推出了戴季陶的死亡证明书："戴传贤先生享年六十八岁，患心脏衰弱症，于民国卅八年二月十二日晨突然发作，至十时四十分死亡。特此证明。"

但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戴季陶却系自杀而死。

戴氏家属透露，戴季陶逝世前夜，曾服过量安眠药。病发后，医生为之洗肠灌治。如果确系中央社所称为心脏病发，那是不需要洗肠灌治的。抢救时，戴氏夫人亦在现场，由于突然变故而思想准备不足，以至昏倒在地。若非突然变故，她也不至于突然昏倒的。

戴季陶在临死前，曾草就遗书多通。其中有致蒋介石的，致李宗仁的，至孙科的，以及其他亲朋好友的。遗书只有一二人曾经过目，据称内中慷慨陈辞，对国是颇多评论，大有"壮士断腕"之慨。但有关方面禁止发表，因此其具体内容难以了解。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投奔孙中山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解放战争爆发后，他见到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对于政治颇为消极，时露厌世之感。并且转而信仰佛教，妄图从中寻找精神寄托。最后，终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以此了却一生。他的自杀表现了对他对国民党决策者的不满，也表现了他的回天乏力和无可奈何。这大概就是国民党政府对其自杀讳莫如深的缘故罢！

蒋廷黻弃妻夺妻解秘

一九四九年初，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一则"紧急启事"。这则"紧急启事"是江兆平律师受蒋廷黻夫人唐玉瑞的委托拟写发表的，指责蒋廷黻弃妻别恋，藐视本国法律。"启事"全文如下：

"江兆平律师代表蒋廷黻夫人唐玉瑞女士紧急启事，兹据上开当事人画称，本人自与廷黻结婚，迄今已廿有六载，生有二子二女，因外子为外交官员，本人乃率同子女相偕曾住美国，旋外子又出使他国，本人以子女求学不宜中断，并未偕往，不意于卅七年五月廿二日接到廷黻代理律师转来墨西哥法院离婚令一纸，实深骇诧。查本人与廷黻均系中华民国人民，关于结婚等一切事宜，自应适用中国法律，墨西哥法院无权受理，其所为之离婚令，依法应属无效，本人与廷黻之婚姻依然存在，曾委律师代为去函廷黻，声明离婚无效在案，在婚姻关系继续存在期间，廷黻如与其他仕女结婚或同居，自应负法律责任。讵料于卅七年十一月一日及同年十二月廿三日南京中央日报第六卷第六期周刊封面及纽约日报，先后刊登廷黻与一女子合拍照像，注明'我国代表蒋廷黻偕夫人抵达巴黎，出席第三届联合国大会'字样，查该时本人尚在美国，并未抵达巴黎，而蒋廷黻竟另有夫人，显系藐视本国法律。本人除保留诉讼俟廷黻本人回国后依法办理外，系恐外界不明真相，用委贵律师代表登报启事，以正视听等语，据此合代登报启事如上。"

这一则"启事"，真是理正词严。而大凡政界人士均知启事中所指蒋廷黻乃是中国民国政府派往联合国参加第三届大会之代表团团长，，这自然就不能作为夫妻间一般的离婚事件来对待。

蒋廷黻是湖南邵阳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曾任南开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一九四三年他以研究中苏关系为由访问过苏联及欧洲；后历任行政院的政务处长和驻英国大使。

就是这么一位极有体面的政府官员，去巴黎参加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率领六十三人妆费竟达十万美金，其生活之奢侈令人吃惊。那位上面紧急启事中所提的蒋廷黻新欢夫人，是随同一起赴巴黎的，成了蒋的外交夫人，他们去法国包的轮船仓位是二千四百美元的新婚套房，而一些外国的联合国代表，同乘一只船，只乘了六百美元等级的包房，蒋出手之大是惊人的。

蒋廷黻还特地请秘书长郑森南率领一部分人，兼职去保护这位所谓的蒋太太。这位蒋太太姓沈，名恩钦，原系救济总署处长沈维泰的妻子，沈维泰是蒋廷黻原来的下属。蒋夺人之妻为己有，又抛弃了自己的发妻与儿女，实在是伤天害理的事，而蒋却全然不顾这些。那位沈恩钦在外随着蒋廷黻出足风头，还每周在行政经费中支用二百五十美元。他们在法国招摇过市，给国人丢尽了脸面。

蒋廷黻参加联合国大会后，本应回到中国述职，但他却带着沈恩钦逍遥于海外，面对国人的议论纷纷，妻子的

抗议声明，全然不顾。这件事在南京上海等地影响很大，许多人士纷纷指责政府用人不当，要政府拿出办法来，然而，将在外而不受命，民国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

（摘自《民国官场秘闻》曾炎主编）

风云人物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 字润之。湖南湘潭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901年上学读书，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半年兵。1913年到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1918年4月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被推选为干事。同年夏天，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8月，第一次上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一段时间的助理管理员，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积极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湖南组织和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7月，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夏同陈独秀讨论了共产党创建问题。后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任中央局秘书。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3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5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1926——1927年，先后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长（也叫总干事）兼组织部长，并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明确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月任湖南省委书记。

1927年8月7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湖南，于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接着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任党代表、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兼第十一师师长。1928至1930年，先后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委书记。1930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前委委员、书记、总政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12月起到1933年2月，同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反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把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突围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错误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6月中共中央创办抗日军政大学，兼作政治委员。12月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规定，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夏，写了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

论》。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任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于1938年11月后开始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写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重要著作。1942年1月兼任中央党校校长，6月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为党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和内战阴谋，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和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时间，粉碎了蒋介石的战略进攻，并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解放全中国后的基本政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方针。

1949年9月21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日，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后的头三年，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革任务，胜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57年2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8年，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当他觉察到大跃进错误后，又积极支持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和其他方面"左"的错误。1962年，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1963年领导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他所认为已经再次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的阶级斗争。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1974年，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开始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66年由于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又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且延续了十年之久，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无可争议的巨大功绩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高尊敬。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　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六岁时上私塾。后来就读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积极参加天津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到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主持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开始创建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5年2月，领导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同年10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

一军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去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兼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在北伐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为排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改组，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全面分裂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1931年12月进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三人指挥小组。同年10月，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坚持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再次合作，在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努力制止反共逆流，克服投降危险。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1945年8月，和毛泽东一起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后率领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积极支持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2月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首席代表，同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1月，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关闭了和谈之门，他从南京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党的八届、九届、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建国以来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这种主张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的作用。还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1955年4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印尼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高举反帝的旗帜，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使党和国家进行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力图改变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国民经济状况。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规划。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患病后，一直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其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材料　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活动纪实

1949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具体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

平津战役刚结束，1949年1月31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住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处长周子健等，要他们立即到西柏坡去。他们到达后已是半夜1点多钟了。周恩来对他们说：叶剑英同志已来了电报，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订。你们要连夜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政协。这是首要任务。再就是接收3个地方：中南海、香山（作为党中央驻地）和北京饭店。又说：同时让住在李家庄的周建人、胡愈之、韩兆鹗、何惧、符定一等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去。事先，周恩来请杨尚昆为他们准

备了几辆不带篷的卡车。接着，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诉他齐燕铭一行赶赴北平的任务，并说明一起去了一些什么人。2 月 3 日早晨四五点钟，齐燕铭一行抵达北平，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参加了当天的入城式。这一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各解放区汇集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各界代表数百人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部队从永定门进城，到箭楼分两路行进。检阅的时间比较长，有 5 个小时左右。

进城后不久，2 月 26 日，我党召开了欢迎各民主党派人士的会议。林彪、彭真代表中央在怀仁堂致词，欢迎这些从各地区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这些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饭店。

3 月上半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 1948 年 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代表同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达成的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25 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抵达北平。各民主党派代表都到西郊机场欢迎。这次盛大欢迎，是周恩来组织的，连欢迎的地点、时间以及哪些人参加都是周恩来确定的。

5 月 24 日，周恩来宴请在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代表党中央同他们协商召开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等重大问题。6 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下设 6 个小组，分别完成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名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和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共同纲领等项任务。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6 月 18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纲领起草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于是，周恩来亲自动手，其中有好几天，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初稿写出后，周恩来又先后主持或指导了 7 次会议，其中 3 次共同纲领起草小组会议、两次政协代表会议和两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使共同纲领日臻完善。这个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特别是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经验总结，成为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份，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这一规定，对当时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9 月 17 日，周恩来主持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代表常委会做关于三个月来筹备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一致同意将新政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将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即将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至此，历时 3 个月的筹备工作胜利结束。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听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与会代表心潮起伏，长时间热烈鼓掌。会上，周恩来代表筹备会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为了完成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67、370 页）

这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周恩来从 3 月下旬到北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他都管。这期间，毛泽东到火车站去接过两个人，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程潜。这是周恩来周密考虑后建议的。有人问，主席，你为什么要去接程潜呢？毛泽东回答说，这样做，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好处。的确，这一行动对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和西南等地区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队的起义。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顷刻之间，在天安门广场上 30 万人的海洋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毛泽东启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旗的电钮及其线路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修建科找北京电业局一位技术人员安装的。因为这是一件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事情，为了防止升旗时电钮失灵，周恩来事前亲临现场作了检查，并指示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按电钮升不起来，就用人工拉上去。许多年后，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感慨道："总理考虑事情比我们具体工作人员还要仔细、周到得多啊！"

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个任命，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对他的高度了解、信任和支持。1948 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曾向中央工作委

员会负责人刘少奇、朱德等汇报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是怎么个搞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并且加重语气地说道："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这以后，周恩来便把精力集中到了筹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以及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上。

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是一件急需解决的重要事情。在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在研究需要量很大的政务院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议决定取消华北人民政府，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同时也从其他大区陆续抽出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加强政务院，如陈云、李富春就是从东北调来的。

在人选问题上，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是周恩来提名，同毛泽东慎重商议后，经政治局审定，再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鉴于民主党派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都应有所安排。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经验积累得也多，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在平衡中，值得一提的事有这么几件。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当时，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一个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又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将军，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向周恩来推荐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个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同时，周恩来委托薄一波每年请傅去作一次客。

二是劝说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1949年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经过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黄炎培终于同意接受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这时他已经年过70了。他的这一行动，使他的子女也感到难以理解。任职后不久，他在回答自己子女提出的疑问时，详告了周恩来向他动员的经过，并严肃地解释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三是李书城任职的问题。周恩来提议李书城当农业部长，有些同志不明白，为什么提他呢？周恩来认为，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党的一大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这样做，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负责人93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许多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道："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这个"周"是周到的意思。

政务院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政务院成立，并做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明了政务院的性质，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还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都应该有一个组织法，现在由政务院先规定原则，再由各部门自己拟定工作条例、组织条例，以便依法办事。

政务院成立后，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精神，周恩来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订，促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选自《风云七十年》，作者：熊华源）

董必武

董必武（1885——1975） 原名贤琮。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

革命后，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东京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不久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 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0 年同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国共合作后，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各级党部的工作。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 年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 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学习。1932 年回国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工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治法律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中共一大代表，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监委书记，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 年 4 月 2 日在北京病逝。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叶剑英

叶剑英(1897——1986) 广东梅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幼读私塾，后上中学。1916 年，赴南洋谋生。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后，先后于 1921 年、1922 年、1923 年参与出师桂林和两次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斗。1924 年，在建国粤军中任第二参谋长。同年，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后，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 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他通电反蒋，6 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支持在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并率领第四军教导团南下广东，于 12 月与张太雷、叶挺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 年，赴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 年秋回国，次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的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司令员。1934 年参加长征。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 月下旬，及时地向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报告了张国焘将以武力劫持中央、迫使红一方面军随张南下的阴谋，随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一起到达陕北。1936 年 9 月，被派往西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委员，在武汉、重庆等地参与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1 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45 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12 月，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停战谈判。1946 年 1 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蒋介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协定签订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全面内战爆发后，于 1947 年 2 月回到延安。3 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他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1946 年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1949 年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 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 年后历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制定了人民解放军各级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1966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 年 2 月前后，他同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从此以后，实际上解除了他在中共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71 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3 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5 年任国防部长。1976 年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实际上

再度被解除领导职务。

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81年9月，以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建议，主张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82年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因年事已高而辞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85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

徐向前

徐向前（1901——1986） 学名徐象谦。山西五台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幼时家贫，十岁时读私塾。两年后转入沱阳学校读高小，十五岁时辍学。几经周折，到河北阜平县远亲开设的书店当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两年后毕业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任教，后被辞退。到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任教两年。这期间，萌发了改造旧社会，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之念。1924年6月，入黄埔军校，11月毕业，分配在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3月任武昌中山军事学校教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随起义部队奔向海陆丰，在粤东地区参加红色政权的斗争。1928年初任红四师师长。

1929年6月，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鄂豫边，担任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1930年4月，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1年1年中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商城的长竹会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建立红四方面军，任总指挥，驰骋大别山，四次反"围剿"，领导和创建了鄂豫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10日至1932年6月下旬，率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四大战役，取得了歼敌四十六个团六万余人，击溃约四十个团，缴获各种枪枝四万余支的空前大胜利。创造了"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奇迹，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2年底，率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率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长征途中，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时刻，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与朱德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就出师抗日问题联名通电蒋介石。8月13日，从延安出发参加了洛川会议。25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师一二九副师长。10月2日，到南茹林八路军总部。遵朱德指示，到阎锡山部队中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日，参与指挥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此后，转战晋西北和晋东南与日军作战。1938年4月进入冀南。11月9日，任北方局山东分局委员。1939年6月2日，同朱瑞离开冀南去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创建和领导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7月，出席军委召开的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议。10月，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学习。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8月，任抗大总学习委员会书记，领导整风学习。1945年4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遵照中共中央"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率主力南下中原。1948年5月，以晋察冀军区为基础，与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合并成立华北军区，出任第一副司令员，并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政委。平津战役后，华北军区所属三个兵团分别编为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任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党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4月20日，解放太原。5月任太原军管会主任。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指挥了歼敌千人和万人以上的战役战斗百余次。素以战法灵活、沉着坚定、善于围点打援、诱敌聚歼等著称。爱兵爱将，信任下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享有崇高威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65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九大、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危难受命，祛邪扶正，同江青、张春桥等作面对面的斗争，为保持军队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曾为此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下放"到北京某厂、河南某地劳动，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三届、四届全国人大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984年以来，挥笔疾书写了《历史的回顾》长篇巨著，以教育后

代。同年6月16日，为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出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誓为中国革命和自己的历史增光添彩。

李天佑

李天佑(1914——1970)，广西临桂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3军团第68团副团长、团长，红3军团第5师13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10团团长，红1军团第2师副师长、第4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代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38军军长，第13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聂凤智

聂凤智(1914——1992)，湖北省礼山(今大悟)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第12师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9军第27师81团副营长、营长、营政治教导员、副团长，红31军团长、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员、队长、副团长，抗大第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胶东军区第5旅13团团长、旅长，中海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6师师长，第5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25师师长，第9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第三野战军27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南京军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明仁

陈明仁于1903年4月7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洪村陈家岭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为长子，下有明礼、明智、明信、明陶(生母樊氏病故后，由继母江氏所生)四个弟弟。祖父陈申其，祖母杨氏，自耕十多亩水田，维持全家生计。稍后，父亲陈保廉兴起家业，置有良田两百余亩，每年可收租谷一千余担，成为当地比较富裕的绅士家庭。

1933年9月，陈明仁升任陆军第八十师中将师长，隶属东路“剿总”司令蒋鼎文指挥，率部进攻陈铭枢、李济深创立的福建人民政府。随后，移驻延平，“围剿”闽赣边区的红军。不久，又参加对豫鄂皖苏区的进攻，在七里坪、新集等地与红军作战。嗣后，又率部进驻龙岩，一度兼任蒲城警备司令。1934年夏，所部二三八旅在福建沙县被红军击垮，旅长陈平裘落荒而逃。他指责这是蒋鼎文对情况判断不明，将全师主力分割使用造成的，引起蒋鼎文的忌恨。后来，蒋鼎文到第八十师防地察看，他又有意回避，更使蒋鼎文不满。不久，蒋趁八十师兵额未及补充之前，即派点验组到部队点名，对该师招募在途的新兵一概指为缺额，即以“大量吃缺，不服调遣”等罪名上报蒋介石。因此，陈明仁被免去师长职务，编入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几个月后，调任陆军第二师(师长黄杰)参谋长。当他得知这是蒋介石有意磨磨自己的傲气时，才没有拒任。1935年，又被蒋鼎文建议免去参谋长之职，到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他无心学习，每逢考试，便请戴坚、陈庚、黄彬等人代劳。

全面抗战的第二年春，陈明仁从陆军大学毕业，由于何应钦的关系，分配到军政部任部附。在这期间，曾被派为中将点验主任，负责点验湘、赣、浙、川四省的部队；还被任命为第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6月，调任预备第二师师长，重新带兵。

预第二师系贵州部队，战斗素质差。陈明仁上任后，率部开赴江西九江对日作战，归张发奎指挥，受李汉魂直接节制。但部队一到达战区，不少官兵就纷纷逃跑，师部的六个处长就逃脱了五个。陈明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不顾日机空袭，大抓军事训练。他晚上训练营以上的干部，天亮前训练连排干部，白天再由干部训练士兵。经过一个星期的大练兵，部队战斗力增强了。

不久，日军进犯九江地区。开始，张发奎、李汉魂奉蒋介石电令，不让预二师投入战斗，将其移驻瑞昌整训。后来，战况严重，才令该师参加九江会战。结果参战的其他八个师均溃不成军，唯独预二师作战得力，完成了预定任务。

1943年冬，日军渡过怒江，开始进攻滇西。次年春，陈明仁奉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之命，以副军长名

义指挥七十一军，从惠通桥、攀枝花渡过怒江，主攻龙陵。日军三十八师团长斋滕中将以主力扼守龙陵，由被称为“战争之花”的少将旅团长松井防守惠通桥西头的松山，构筑了坚固工事和坑道式前进阵地，以及堡垒群，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陈明仁即令第三十六师围攻松山日军前进阵地，指挥主力从左翼迂回龙陵县城先歼灭城郊之敌，然后攻城。他要求协同作战的盟军航空兵大队摧毁日军坚固工事后，令所属炮兵部队进行烟幕弹射击，掩护步兵冲锋前进，很快包围了松山。日军为解松山之围，从腾冲方面集中部队攻打龙陵。当时，七十一军的第八十七师作战不利，退至黄草坝。师长张少勋要求变换阵地，放开公路。陈明仁认为这正中了敌人之计，使其不仅解了松山之围，还可能长驱直入，进攻昆明。于是命令张部死守阵地，不能后退。张少勋又给总司令宋希濂打电话，陈述无死守的理由，宋同意万一守不住时可以撤退。恰好这时陈明仁要用电话，旁听到他们的对话，便气愤地说：“这样做将影响整个战局。今天，七十一军归我指挥，师长不能直接报告总司令，总司令也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严厉警告张师长：“若违抗命令，你就提头来见我。”张见后果严重，就开枪自杀了，陈明仁即重新委派师长。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在友军的配合下，终于将松山守敌和龙陵外围之敌大部歼灭，并击落敌轰炸机三架，日军松井旅团长剖腹自杀，敌主力退守龙陵城一隅，继续顽抗。

这时，陈明仁调整部署，以两个师的兵力分别由西北、东南同时攻城。但因日军逐屋据守，进展十分缓慢。他即亲临第一线督战，命令各师组成敢死队，昼夜轮番攻击，迫使守敌疲于应战。经过七天七夜的猛烈进攻，龙陵守敌二千余人大部被歼，一小股乘狂风暴雨之夜，突围窜入龙川江与大盈江之间的原始森林中。他立即派出一个步兵营追击，将一百余名残敌悉数歼灭。龙陵战役结束后，陈明仁接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1945年1月，陈明仁被卫立煌电召到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接受主攻回龙山的任务。日军一个残缺的联队，以回龙山为中心，在三台山一线构筑坚固工事，形成环形防御阵地，控制着滇缅公路，久攻不克。陈明仁认为只有步炮一致，方能取胜，要求盟国空军配合作战，并归自己统一指挥。卫立煌和盟国空军联络官表示同意，问其是否有把握攻下回龙山。他当场立下军令状：“三天不拿下回龙山，誓不为人。”于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美国空军少将赫奇随陈明仁来到七十一军前进指挥所。陈明仁立即召集各师长、炮兵指挥官、空军联络官和通讯兵营长等研究作战部署，决定采取各个包围击破的战术，将守敌分割全歼。为防止敌人逃入缅甸，先以一个师沿左侧山丘地带迂回深入，切断敌军退路；第八十八师及其附属部队沿滇缅公路两侧对回龙山进行强攻。同时，以炮兵一部向三台山阵地轰击，并调步兵向该方向集结，航空兵也不时地在三台山上空盘旋，以迷惑敌人。

第二天清晨6时30分，陈明仁首先命令炮兵向三台山开炮，进行火力准备。半小时后，命令佯攻部队向三台山发起进攻。日军果真上当，将主力迅速转移到三台山方面。8时许，陈明仁即命令航空兵出击，轮番轰炸回龙山高地。接着，集中所属部队和友军的一百余门山野炮、榴弹炮猛轰，掩护步兵主力冲锋。下午5时，遂占领回龙山主峰。随即，他命令部队向左右扩大战果，一直持续到黄昏，歼灭守敌八百余人，逃窜畹町的一百余残敌，也被七十一军的迂回部队消灭。当时，许多盟军将领交口称赞这一仗是“一部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陈明仁也被联军视为“杰出的中国名将”。

1946年1月，第七十一军奉命开往东北进攻解放军，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4月15日，陈明仁率部从永吉开赴四平，担负左翼的作战任务。途经金家屯以北地区时，受到驻防北大洼解放军的阻击，其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被歼，全师溃散，师长黄炎落荒南逃。

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19日，陈明仁率部前去怀德解围。部队出发后，上级又改令七十一军增援长春。部队进到怀德至公主岭之间时，突遭解放军猛烈阻击，八十七师损失大半，师长韩增栋被击毙；九十一师也伤亡较大。于是，上级又改变计划，命令七十一军退守四平。陈明仁即向杜聿明表示：“与四平共存亡”。

四平是辽北省的省长，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形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陈明仁看到四平守军仅有七十一军两个师的残部、五十四师一个团、军直属队和辽北两个保安团及三个铁路交警大队等二万余人，感到城孤力单，不易固守。但觉得自己平生以打胜仗著名，现蒋介石有令，学生不能不效忠，便孤注一掷，决定死守。6月初，他制订了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计划，以八十七师担任铁东、八十八师担任铁西外围工事的防守与构筑；军直属队（主要是特务团）担任核心阵地工事的防守与构筑，并派一个营守卫飞机场，五十四师一个团为预备队；重炮营占领铁东省保安司令部。其余部队由军部指挥，配合以上部队备战和工事的构筑。以军部为核心阵地，各部驻地为支撑点，并环绕四平周围构筑城防工事。陈明仁在军部召开的团以上军官会议上说：“有军部这样钢铁般的核心阵地和外围的坚强工事，保卫四平是万无一失的。”

6月13日，林彪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的主力和四个炮兵团，以及热辽军区、合江军区、松江军区的地方部队约十万余人围攻四平。黄昏，从南、西、北三方面发动攻坚战，并集中炮兵火力轰击西南角。陈明仁在军指挥所感叹：“炮火如此激烈，平生未见。”两天后，铁西的城防工事被突破，以新兵为主的八十八师，一经接触即溃不成军。与此同时，军部核心阵地亦被摧

毁，陈明仁的胞弟、特务团团长陈明信被俘。他转移到铁东继续指挥残部抵抗。第五天，在飞机配合下，命令部队拚死阻击解放军的进攻，双方对垒，相持不下。23日深夜，解放军又一次向铁东发动猛攻，陈明仁率所有残部抵抗。经约一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因伤亡过大，主动撤退。这时，解放军已占领四平地区的五分之三，于24日再次发动进攻，陈明仁仍坚持对抗。至28时，约十万援军赶到。30日，解放军主动撤出四平。陈明仁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四十多天，巷战十九个昼夜，一时博得蒋介石集团刮目相看，被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三十九军、七十一军开赴湖南，在长沙设立了兵团司令部。他经常与程潜联系，表示不改初衷，走和平道路，"把国家弄好"，并保证以程潜的"意志为意志"。但为了应付白崇禧，在公开场合，仍以主战派面貌出现。

4月22日晚，陈明仁参加程潜召开的一次各方代表会议，中心议题是：和谈破裂了，湖南怎么办？以试探各方对和平的意向。他被程潜首先指名发言表态，因见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高参扬继荣等主战派在座，只好违心地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领导之下作战到底，不能有其他企图。"程潜听了大惑不解，以为他变卦了，会议也不欢而散。第二天，陈明仁便回醴陵家乡去了。当程潜委托李君九、张严佛、温汰沫到醴陵询问究竟时，他才解释说："颂公也太糊涂了，昨晚开那个会，也应与我商量一下，使我有个思想准备。会上各色各样的人都有，要我当众表态，不是暴露自己吗？"并表明跟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决定以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人事处长李君九、经理处长温汰沫与程潜联系，以避免白崇禧的怀疑。月底，程潜为进一步控制长沙的局势，要陈明仁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他为取得白崇禧的信任，专程前往武汉向白崇禧请示，经同意后才接任此职。

在这期间，陈明仁对走和平道路仍存在一些疑虑，担心共产党算旧帐。针对这种状况，中共湖南省工委积极策动他的亲信李君九、温汰沫等人，经常给他讲解形势。省工委代表余志宏也亲自登门向他讲解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程星龄从香港回来告诉他说："章士钊与毛主席谈到你时，毛主席说，对陈明仁起义后既往不咎，还要重用。当时，陈明仁坐在他们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这样，使陈明仁逐渐消除了疑虑。

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解放了平江、醴陵、安乡等十余个县，对长沙取钳形包围态势。7月21日，陈明仁接到白崇禧的命令，要死守长沙；如守不住可撤往湘西另作他图。这时，程潜因白所逼前往邵阳，在离长沙前夕，委他代理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为了拉拢陈明仁，也建议广州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接着，长沙绥靖公署撤销，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他又被任命为总司令兼省保安司令。为了安定民心，陈明仁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决不在长沙城作战，我保证在长少城听不到炮声，甚至听不到枪声。"事后，他暗中将长沙警备司令部先后拘捕的；并经华中长官公署判处死刑的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分子释放，向长沙市民表明和平诚意。

7月30日，陈明仁得到白崇禧电告："程潜率带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缴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其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他敷衍过去。这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达长沙郊区春华山一带，第四野战军派出的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也已到达平江县城。陈明仁立即委托李君九、程星龄前往平江，邀请李明灏来到长沙商谈有关具体事宜。

8月1日，广州政府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携带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以及现金和武器，飞到长沙。信中说："弟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将来四川为尔后盾。"要陈明仁死守长沙，与共军血战到底。他表面上答应："为党国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日，广州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又拍来一份急电责难陈明仁："近日外间谣言甚多，盛传共匪将派代表与兄洽谈和平。素念吾兄忠诚党国，决不致中敌奸计。但人言可畏，希兄表明态度，以正视听。"他当即复电敷衍："近日共匪进犯湖北，由于我军将士奋勇作战，予敌重创。现正相持在汨罗、平江一线。外间流言蜚语，正是敌挑拨离间惯用伎俩，妄图瓦解我军军心，万恳钧座勿轻信谣言，以中奸计。"随即邀请汪士楷、李君九、温汰沫、张严佛、陈粹劳、吴相如、陈藏仲商量，起草《告第一兵团全体官兵书》，以及给台北草山蒋介石、广州行政院阎锡山、国防部顾祝同、衡阳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的电文，指出"时至今日，唯有倡导和平"，"停止战争"，"高举义旗"，才是出路。

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晚上8时，程潜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决定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将第一兵团改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兼兵团司令官。5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同意。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第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十多万市民夹道欢迎，庆祝长沙和平解放。可是，一兵团的副司令官刘进、彭璧生、张际鹏、熊新民和三个军的正副军长等拉拢部分部队叛逃，陈明仁对此深感不安。第四野战军负责人多方慰勉，肯定这次起义的意义和影响。随后，他被任命为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于13日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

"服膺新民主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尽驽骀，以图报效。"9月3日，应毛泽东电邀抵达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人的接见。会议期间，毛主席邀约程潜、陈明仁游览天坛。至祈年殿，毛主席与陈明仁合影后，问他准备放大加洗多少张照片分赠朋友。他说洗十打。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少了，洗五十打吧！这样就没有人说你被共产党软禁了。"几天后，毛主席又请陈明仁吃家乡饭。他主动提到四平之役，表示内疚。毛主席说："你今后仍旧带部队吧，我们已决定将你的第一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还由你当司令员。"最后，还要他去济南一趟，说："反动派造谣说杜聿明、王耀武已被我们五马分尸了。共产党要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从不杀也从不虐待俘虏。杜聿明、王耀武正在济南改造，生活得很好，你去看一下，并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下，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故旧部属，劝他们及早觉醒，莫再顽抗了。"陈明仁当即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11月1日，陈明仁所部七万余人整编为两个军六个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12月2日，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了成立大会。他宣布说："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踏上光明之路，开始新生了！"

（摘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戴季陶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原籍浙江吴兴，其先人入川经商，定居广汉。父戴小轩，出租土地，兼业中医。

戴季陶六岁入塾读书，并读过一些西洋史。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到业师徐炯的影响，倾向反清。1905年秋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秋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

1909年夏，他自日本毕业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翌年春，往上海先入《中外日报》，后又入《天铎报》任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抨击清廷腐败，言论激越。1911年春被官府通缉，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戴以新闻记者身份晋见。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专制野心日渐暴露，戴曾在《民权报》上著文揭露。6月，当唐绍仪内阁辞职时，他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1913年2月随孙中山访问日本。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讨伐袁世凯，戴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参加了《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4月底，戴随孙中山返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后，军政府改组，戴与孙中山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吴兴，与张静江多所交往。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上海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戴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的姿态出现，在他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讨论劳动问题，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但当时他已流露出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的路上去。6月戴季陶在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说："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不从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很危险的"。他主张"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在一段时间内，他还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于同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出。他的文章虽然也搬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然而实际上是阶级调和论。他声称"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思是说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也就不必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了。1920年夏前后，他与陈独秀等人颇多接触，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过一些活动，但后来却寻找借口拒绝参加组织而溜走了。在他研读《资本论》的同时，即1920年，戴季陶和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一起，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经营证券等投机生意，[①]颇有所获。他们也曾为粤军回粤讨桂资助过款项，但更多地却是把投机所得挥霍在花天酒地之中。到1921年，戴投机失败，信用上出现危机，退出了交易所。

孙中山在遭到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后，仍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当戴所乘的船驶向宜昌的途中时，得悉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便趁夜投江自杀，幸为渔民救起未死。从此他便信仰起佛教来了。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隐藏在国民党内的假左派（即新右派）开始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戴季陶这时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封，"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在他的鼓动下，1925年4月24日，黄埔军校内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5月，

他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反对国共合作。在上海设立了“季陶办事处”，一段时间内，他专门从事反共的“著述”。6、7 月间，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出版。这两本小册子是在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歪曲、阉割和篡改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人称为“戴季陶主义”，其基本要点是：（一）用“道统”论把三民主义曲解为渊源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爱”学说，是二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10]。（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1]。他认为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来解除被剥削者的痛苦。（三）提出所谓团体的“排拒性与独占性”，认为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把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当作“癌肿”，准备等待时机进行割除。

新右派的戴季陶原来和国民党老右派并没有密切关系，但既然要反共反人民，他就希望引老右派为同调。1925 年 11 月，国民党内的一伙老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以反对三大政策为目的，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戴季陶同邵元冲、沈定一等也前往赴会。会议开场前夕，老右派中有人认为戴、沈曾与中共发生过关系，把他们绑架出去并痛殴一顿，威胁他们不准与会。戴被迫返回上海。但他仍然恋恋地留下书面声明，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给予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以开除党籍的处分。由于蒋介石等人的庇护，对戴季陶以其“未曾与会”为理由，仅在关于弹劾“决议”中，“促其反省，不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12]，并仍选他为中央执委。会后，蒋介石召戴季陶来广州负责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的改组工作，10 月，戴任中山大学委员长。在“改组”工作中，戴通过令学生停课复试和教员停职另任的办法，以排斥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北伐军进到长江流域后，戴曾一度离开中大到江西去，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1927 年 2 月，戴受蒋介石的派遣赴日本活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进行会谈，寻求日本对蒋的“谅解”和“合作”，为蒋叛变革命找靠山作准备。3 月底，戴从日本回到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很快发生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不久，5 月，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纪纲”呼号。[13]接着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戴任教务主任。6 月，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他在校期间，多次发表讲演，向学生灌输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第二年汇集为《青年之路》出版。

1928 年 2 月戴季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10 月又被任命为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戴任院长后，即着手制定考试法。1931 年 7 月 15 日起，在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戴任主考。其后，戴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同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材。但是在独裁政治体制下，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大都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因此考试院只是统治者装潢门面的一个机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为应付这一事件，国民党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国策。11 月，戴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用“诵经护国”的办法来麻痹人民。

1932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期间，戴季陶奉命“视察西北”。他的一行并没有对西北应兴应革提出积极可行的计划，而是沿途为蒋介石集团对日不抵抗政策进行辩解，说什么“外交顺利”，“东北失了不要紧”。4 月 25 日戴在西安民乐园向两千多名学生发表讲演，其反共媚外谬论当场遭到爱国学生的斥责，戴所乘汽车亦被焚毁。

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戴季陶虽然名义上仍身居高位，但实际已无重大活动，只是以“元老”身份，为蒋介石的统治作点缀。蒋在 1934 年提倡“新生活运动”，戴就以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发表“尊孔读经”，“恢复固有文化”的谈话。但他又不是粹然儒者，而是越来越象一个皈依佛门的僧侣。抗日战争爆发后，戴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和重庆。1938 年 4 月，曾代表国民政府赴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分子进行联络。1940 年 10 月至 12 月，又奉命到缅甸和印度访问，拜谒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圣地。1943 年 10 月他遵照蒋的指示发起“制礼”问题的讨论，11 月由他写成了《礼制通仪》。次年 3 月，把《礼制通议》和他的《读礼札记》汇印成为《学礼录》出版。

抗日战争结束时，戴已身患多种疾病，但仍在 1947 年 6 月改组的国民党政府中维持着考试院院长的名义。1948 年 3 月所谓“行宪国大”开幕时，他勉强出席。其后，他要求免去其院长职务。6 月，改任为“国史馆”馆长。

1948 年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已处于大崩溃的前夕。戴应宋子文之约，携眷飞往广州。戴眼看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即将席卷全国，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对前途绝望，遂于 1949 年 2 月 11 日夜间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死。

（摘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珍闻轶事

毛泽东拒进中南海

1949年春，随着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临近，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搬进北平。

入城式之后的3月25日，毛泽东不事声张地进入北平。他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颐和园小憩。下午两点，乘车去西郊飞机场，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部队。毛泽东住在香山。

在前门箭楼上，叶剑英把周恩来的一封电报拿给了打前站的齐燕铭。周恩来要求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是一片海子，有的地方开阔，有的地方曲折却又连成一片淡蓝色的水域，这里是“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特意题写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中南海的清扫计划由曾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的周子建负责。华北军区派了一支庞大的卡车队，夜以继日地往城外拉太液池里的淤泥。整整三个月的辛劳，使中南海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

在政协筹备会开会的几天中，住在香山的毛泽东感到来来回回地跑路，实在不方便，耽误工夫。但是，他不搬。他不愿意进中南海。叶剑英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的报告是周恩来赞同的。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叶剑英就专门跑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去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含笑而言。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接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周恩来则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主要从安全考虑，四周的红砖高墙是很好的安全屏障。“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德总司令说。朱德表示赞同。少数服从多数，党中央终于搬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被安排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毛泽东自从搬进中南海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遍野小草更是适合他幽静的心境。初夏时节，这座古旧的四合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来。”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工作人员立即与花工商量，挪走了花盆，只是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对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鲜翠欲滴的两盆绿草。

（《党史博采》1992年12期）

进京赶考，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毛泽东用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干部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甲申三百年祭》是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历史论著，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由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郭沫若发表这篇论著是为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所作。毛泽东用这篇文章，告诫全党入城后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重演李自成的悲剧。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月后，党中央决定将领导机构迁往北平，在大家积极为进城做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革命的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

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这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的机关离开西柏坡起程去北平。午饭后，毛泽东刚走出门口，周恩来就跟了上去，交谈起来。周恩来问："没有休息好吧？"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风趣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选自《毛泽东的幽默》，作者：陈祥明、夏天然、邵华礼）

天翻地覆慨而慷
——毛泽东赋诗妙喻南京解放的形势

1949 年 4 月 22 日下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刚刚起床，得知我军已胜利渡过长江，高兴地同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这样做，对我们也有好处，给了我们准备渡江的时间。接着为新华社起草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的电讯稿。23 日下午，毛泽东在双清院落凉亭的藤椅上，看着《人民日报》关于南京解放的号外，心情十分高兴，随即回办公室给二野刘邓大军写了贺电并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央军委将此诗用电报拍发到前线，全体指战员受到巨大的鼓舞，大踏步地向西南、西北进军，走向了解放全中国、取得人民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新征途。

（选自《毛泽东的幽默》，作者：陈祥明、夏天然、邵华礼）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据国务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讲，周恩来生前有这样十条不成文的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来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可以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菜票，没有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七、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八、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摘自《人物研究资料》）

毛泽东的"四不"原则

1949 年 7 月，湖南和平解放以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是介绍别人进京。毛泽东的至亲即他夫人的哥哥杨开智，则准备动身进京了。

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是，毛泽东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他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他要树立一种风范。毛泽东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毛泽东的表兄弟们要求到北京来参加工作，毛泽东全部没有答应。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他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文运昌是毛泽东 16 岁时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荐人和担保人，曾积极向毛泽东推荐《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毛泽东曾称赞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作用。就这么一个表兄，毛泽东还是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以后，毛泽东曾三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并以自己的工资三次周济毛森品，可谓关怀备至。但当毛森品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时，毛泽东很委婉地说明："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

遇到特殊的关系，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坚决照章办事。杨开智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这且不说。更重要的是，杨家是支持革命的。在杨开慧被捕后，他们曾设法营救。开慧牺牲后，他们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以后又营救毛岸英兄弟。杨开智自己的女儿也在抗日战争中光荣地牺牲了。对于这样的至亲，在他提出要来京工作

时，毛泽东向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发出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电杨开智说："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后来，杨开智听从了他的劝告。

毛泽东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反对任人唯亲的。

（摘自《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彭德怀撕画像

1949年10月1日，新疆乌鲁木齐数万各族同胞拥上街头，欢庆解放，欢呼新中国成立。在沸腾的人流里，出现了领袖人物的画像，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彭德怀。人们高呼"万岁"的口号，群众互相呼应，声震天空。

这时彭德怀正应起义将领陶峙岳（前国民党军队新疆警备总司令）和鲍尔汉（前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邀请来到会场。他看见人群中抬着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对身边的人说："胜利人，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还给祖国，还给共产党！胜利，人民的胜利，党的胜利！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100个敌人还要多。"

说着说着，一排巨幅画像被众人抬着向主席台前迎面走过来。彭德怀大踏步迎了上去，笑了一下，说："我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画家了，还是扯下来，不要抬举着让它过闹市了"。说着，亲手将画架上的彭德怀像扯下来，撕了。人民群众中千百双惊奇疑惑的眼光立刻一齐向彭德怀射来。彭德怀知道欢呼群众并不认识他，可能以为他是混进来的坏分子，于是高声说："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这个画像上的彭德怀，请不要抬着我的画像。应该举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我们的红旗！"人们望着彭德怀，更高地欢呼起来！

（选自《党史博采》）

"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

建国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市长。他的岳父从汉口来他家作客，住了几天，他就对爱人张茜同志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国家都有一个规定，你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的父亲起初想不通，心想：女婿做市长，住一段时期吃几顿饭都不行么？陈毅就和张茜一起给他老人家做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国家才会兴旺，我们的革命事业才有希望。"老人听了这番道理，思想通了，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节选自《陈毅同志，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您》，载1977.1.5《文汇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怎么产生的

1949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议程中有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的条款，尽管有关部门收到数以千计的国歌应稿，却没有一篇尽如人意。为此毛泽东亲自召集了20多人的讨论会，共商此事，徐悲鸿也应邀参加了讨论，行前，他对妻子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妻子担忧地说："那可怎么办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1772年，法国马赛工人队伍高唱此歌进巴黎的，后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他沉吟片刻又说"人民胜利不能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进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激扬磅礴，歌颂人民意志和民族的感情，是对敌斗争的胜利标志，这歌词有什么不好呢？"讨论会上徐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认为此歌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大家纷纷发言表示赞成。最后，毛泽东综合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

（摘自《中共党史导读》）

魏炳义回家

新华社北平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电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南下路过河北阜城县时，某连副指导员特地陪着军械员魏炳义回家去看看，魏炳义的妻子刚刚织完布，正要走出门去，一见丈夫回家来了，连忙照顾副指导员和他坐下休息，慢声细语地说："队伍正忙着南下去解放全中国，回家看啥？自你走后，我不缺吃，也不少穿的，日子比过去强得多啦！"不一会，魏炳义回家的消息传遍了全村。村里的妇女会员们跑进屋来问长问短，非常亲热。魏炳义和副指导员两人正在应付不过来，村里共产党支部书记和二十多个党员也来了，他们谈了谈大军南下的蓬勃士气和后方人民支援南征的热烈情况后，支部书记就向他们介绍些本村建党、生产等工作，特别提起魏

炳义的妻子已经是一个有了四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并且是村支部的宣传委员了。去年她还被选为全村的织布模范。魏炳义在一旁听着，脸上一阵红似一阵，羞愧得说不出话来。他一九四七年冬天就在东北参加了解放军，到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在革命队伍里一直怕吃苦，老想家，工作不好好干，刚才一进门来，看见满屋里摆得整整齐齐的家私物品，就知道自己怕老婆挨饿改嫁的想法完全错了。现在坐在家里，简直不敢和妻子说话，生怕她问起这几年自己在部队里的情形。可是吃饭的时候他老婆偏偏问起来了"你在部队里担负什么责任？""入党了没有？"魏炳义满脸臊得通红，半天才吞吞吐吐地照实回答。他老婆立时沉下脸来，低头不语，夫妻俩都无心吃饭了。停了一会，他老婆对副指导员说："希望你回去后，多多帮助他进步啊！"接着她又对魏炳义说："好几年啦，连党也没有参加。眼看全国快要胜利了，还不好好干，往家跑啥！"只羞得魏炳义无话可答。第二天刚天亮，魏炳义对妻子说："我要回去了。恐追不上队伍。"他妻子一心只希望他赶快进步，也不多留。临走时又再三叮嘱他说："回连队后，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争取立功入党，以后再回来看我，我脸上也光彩。不然的话，我也跟着你丢人。"魏炳义坚决地说："你放心，我一定要在南征中立功入党。要不的话，就不回来见你和全村的人！"魏炳义回到连里，随即向全连指战员作了一次沉痛的检讨，各方面的表现大有进步。

智取华山的英雄今何在

电影《智取华山》中记述的"八勇士""天降"华山北峰，一举捣毁敌巢的故事，取材于真人真事，"八勇士"确有其人。

1949年5月，我解放大军席卷关中平原，被击溃的国民党陕西守敌保安第六旅旅长兼大荔行署专员韩子佩，率残部400余人，逃上西岳华山，妄图凭借"自古一条路"的华岳天险，负隅顽抗。我西北野战军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精心挑选了7个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侦察小分队。这7个人是：侦察参谋、小分队队长刘吉尧，班长、侦察员路得才，副班长，侦察员杨建东，战士、侦察员杨党成，战士、侦察员崔乾山和孟俊甫、杨自发。其中孟俊甫原是伪保安六旅的一个大队副，杨自发是孟的通信员，他们在华阴县临解放前宣布起义，为我军胜利解放华阴立了功。这7个人在华山东侧猩猩沟青年樵夫王银生的帮助下，夜攀悬岩绝壁，从无人上去过的华山另一侧登上山顶，奇袭北峰，打通并控制了上山之路，接应后续部队向西峰发起猛攻，迅速消灭了华山上的全部敌人，活捉敌旅长。战斗结束后，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带电影队慰问部队，并在华山上拍摄了我军（原参战部队）消灭敌人（由原参战部队人员化装）的实战纪录片。西北野战军授予小分队8位同志为全军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其中刘吉尧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全国解放后，"八勇士"中的崔乾山转业到宝鸡牛奶二厂工作，1984年病逝；杨建东转业到渭南通用机械厂工作，1983年去世；杨党成曾调空军某轰炸师工作，后复员回到华阴县农村，1983年去世；杨自发解放初复员回乡种田，不幸早逝；孟俊甫复员回乡，"文革"中因挨整被迫自杀；王银生解放初期为乡武装干部，后回家种田，"文革"中也遭难被整，粉碎"四人帮"后，当地政府为其平反落实政策，后被选为华阴县政协委员，1984年病逝。现在，"八勇士"中只有刘吉尧和路得才两人健在。

在智取华山中第一个登上山峰的侦察班长路得才，现年已72岁。解放后响应党的号召，复员回乡当农民。他从不居功，不向党和政府提个人要求，后来到铜川市一个公路道班当养路工，每月三四十元钱，常年累月不避风雨，为来往行人车辆修桥补路，被人们称为"老公仆"、"铺路石"，一直工作到67岁退休。

刘吉尧解放后一直在陕西省军区工作，曾任西安市莲湖区人武部部长、西安警备区顾问、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已离休。老英雄虽年过花甲，身体不好，但精神矍铄，直率健谈，常应邀到工厂、学校、机关、部队作传统报告。他十分怀念过去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屋里正堂上挂着他和王银生在华山脚下的合影照片。1987年，他还专门到铜川探望了路得才，共话战斗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关心过问"八勇士"。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放映故事影片《智取华山》时，周总理边看边让当时组织指挥解放华山的路东总队政委王生荣给他介绍这一战斗的全过程。当王讲到为我军当向导的当地农民王银生时，周总理问："那个老百姓现在干什么？"王生荣回答说："华山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总理又问："你和他们有联系吗？"王回答说："没有了，听说有几个还继续留在部队工作，有的退休回家了。"周总理说："要关心他们，把他们安置好，他们是为人民立了功的。特别是那个老百姓，是解放华山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是完不成任务的。"

（选自《军史资料》89年1期，作者：张继芳、张小平）

江竹筠烈士狱中给亲友的信

竹安弟：

……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我们在牢里也不白

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亲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竹姐　八月二十七日

竹江筠，就是江姐。四川自贡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那年29岁。

这封信是烈士在狱中用竹签子蘸着用棉花灰制的墨水写成的。

（选自何沁主编《中共党史学习参考手册》）

一份从渣滓洞带出的政治犯名单

1949年2月的一天，地下党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收到地下交通站转来的一份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政治犯的名单，并附有一封写给党组织的信。信的大意是：我们是一批政治犯，眼看全国即将解放，但是我们等不到这一天了，估计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会对狱中的犯人来一次大屠杀。现在已经开始屠杀，他们将个别犯人用无声手枪杀死，用王水（硝酸硫酸混合液）溶解尸体后埋掉。我们是出不了监狱了，只希望党组织知道大家的姓名，以留作永远纪念。这份名单上有70多位政治犯的姓名。

名单和信是由渣滓洞监狱的狱医刘石仁携带出狱的。

为配合狱外的营救，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开展了策反工作。刘石仁即是策反对象之一。

刘石仁，天津人，家住渣滓洞侧面山坳间，与牢房相距不到一里路，是个脾气古怪的医生，不易被人接近。国民党军队在刘石仁的家乡华北一带溃败的消息使他逐渐对共产党有所了解，这种变化为狱中的党员同志所注意。男牢古承铄、田一平、陈作仪，女牢江竹筠、胡其芬、杨汉秀都给他做工作。最初是争取他为重病号从狱外买急需药品，并审慎地把城里的几个地下接头点暗自告诉刘石仁。刘石仁先后与狱外党组织联系，购回肠胃消炎片2000多颗，鱼肝油90余瓶，另有葡萄糖、各种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物在关键时刻，为抢救垂危的难友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天，胡春浦、田一平、古承铄放风时遇见刘石仁，让他借查病机会到狱中来一下。放风后，刘石仁如约而来。

"刘医生，有件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胡春浦开门见山地说。

"但说无妨，只要我力所能及。"刘石仁态度很诚恳。

胡春浦拿出一份政治犯名单和一封信："这份名单和这封信十分重要，请你转交给狱外我们的同志，让他们设法捎到香港，由香港党组织转交中共中央，以便在恰当的时候，于谈判桌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刘石仁担着风险，将名单和信带给了狱外的地下党组织，几经辗转，到了邓照明手中。

邓照明知道手中这份名单的份量，眼下必须采取措施揭露国民党关押大量的政治犯，争取拖延处决时间，以待谈判桌上提出释放。邓照明想把这份名单在报上公布出去。于是他连夜提笔给重庆《大公报》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发表政治犯名单。没想到，国民党当局早已对邮政实行检查，特别是寄给进步报刊的信函都要开封检查。这封信自然在邮局就被扣了下来。幸好邓照明是用假名投递的，方免于遭难。敌特务机关根据这封信的投递方，以"通共"罪名逮捕了重庆《大公报》的编辑主任顾建平先生。同时，这个情报被送到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桌上。徐远举大发雷霆，共产党像孙行者一样钻到他的鼻子底下，他竟不知。徐远举立即召集渣滓洞监狱的大小特务开会，明令严加勘查。狱中的每个特务及所属人员都被一一盘问，刘石仁也被召进牢狱办公室，但他咬定对此事全然不知，特务也未从他身上发现蛛丝马迹，也就放他过关了。这次追查最终当然是不了了之。

顾建平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当时黄显声将军也已由息烽监狱转来。顾建平认识黄将军后，了解到黄将军的为人，就悄悄把真实姓名和职业告诉了黄将军。顾建平关押在此，外面的亲友都不知道，他清楚黄将军的特殊身份，很希望他能帮忙向外透个消息。在狱中是绝对不允许向外泄露囚犯的真实姓名和被囚地点的，如发现向外传递书信，轻则处刑十年八年，重则处死。但黄将军为了营救顾建平先生，慨然答应了顾建平的请求。他把顾建平写好的信装在他写给爱人黄彤光女士的信中，让关系较好的看守宋惠宽带出监狱交给黄彤光。黄彤光通过她在重庆《国民公报》当记者的同学夏在汶，将顾建平的亲笔信送到了李子坝《大公报》段经理家中。段得到此信后，多方设法营救，并披露顾建平被囚于白公馆监狱的消息。特务方面由于没有抓住顾建平的"罪证"，又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9年10月8日将顾建平释放。黄显声将军的义举使顾建平幸免于难，几十年过去了，顾建平仍不忘黄将军的救命之恩。

那份带给邓照明同志的名单，经过到香港去学习的同志的手，终于带了出去，交给了党组织，使党组织能够掌握狱中政治犯的情况。

（选自《纵横》91年5期，作者：郭绪忠）

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时针指向19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灯火辉煌，灿烂夺目。一个揭开我们古老民族历史新时代的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暴风雨般的掌声，如波涛涌起，震耳欲聋。毛泽东主席神色从容地凝视着全体代表，操着深沉、雄健、浑厚的湖南乡音致开幕词。"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声音，多么激昂、多么自豪。恰巧，在中南海上空，闪电划破漆黑的长夜，滚滚惊雷激荡着每位代表的心弦；旋即，雨过天晴，星光灿烂，仿佛在向世界宣布新旧中国的历史性交替。

历时10天的大会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和定都北京，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庄严宣告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下面，叙述的是新中国的标志——五星红旗诞生的经过。

"二九九二"

1949年6月16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正在主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制定新中国的国旗，会议决定成立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小组。马叙伦先生出任组长，叶剑英和沈雁冰任副组长。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张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为小组成员。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

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新中国国旗的设计，牵动着亿万颗赤子之心。短短一个月，应征国旗的信函就达1920件，图案2992幅。这一幅幅经过精心构思、文彩斑烂的国旗草图，来自全国各地和马来亚、印尼、朝鲜乃至遥远的美洲。在应征者中，有刚学绘画、未脱稚气的小学生，有引证古书以文言作说明的老先生；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也有教师、教授、作家；有机关职员，也有自由职业者，还有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这里，深藏着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热烈拥护新中国政权的真挚感情，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信念和力量。

8月16日，政协筹委会在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设立临时选阅室，集中陈列所有的应征设计图案。选评工作在热气腾腾、非常认真的气氛中进行。为了选定新中国的国旗，周恩来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亲自参加审查、挑选。应征的国旗设计图案，大致有四类。(1)红色旗面、镰锤交叉、加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镰锤象征工农联盟的政权。评选小组认为，这类构图立意虽好，却给人一种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2)红色旗面、嘉禾齿轮加五角星。这类构图画面复杂不符合国旗简洁之旨。(3)蓝、白两色或红、蓝、白三色构成旗面，旗面左上方或中央缀有镰锤、或置五角星、或置嘉禾齿轮。这类图案一半模仿美国国旗，又一半模仿苏联国旗。(4)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三色构成，配以红色或黄色五角星。国旗初选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反复研究，从2992幅应征来稿中精选出38幅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五星红旗

9月22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第二天，马叙伦、沈雁冰代表国旗拟定小组向政协会议主席团提出拟制国旗方案的报告。

国旗图案的设计要求具有：(1)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2)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庄严而简洁。依照设计要求，国旗拟制小组认为在精选的38幅图案中，最为合选的是"复字第1号"图案。这幅构图是：红色旗面下方三分之一处加一道、或二道、或三道黄色水波状条纹，旗面左上角缀有一颗大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一道黄色条纹代表黄河，二道黄色条纹代表长江和黄河，三道黄色条纹则分别代表长江、黄河、珠江，象征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和灿烂的文化传统。

9月23日上午，政协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这个图案备受赞扬和青睐。在热烈的气氛中，政协特邀代表张治中一语惊人，对这个图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坦诚地说：在这一片鲜红的国土上划三道杠杠，会给人一种国土被割裂的不愉快的感受，最好把这三条杠去掉，让祖国大地一片鲜红。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眼看国旗图案就要提交大会讨论决定，开国大典在即，国旗方案变动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张治中不相信还会有变动的可能。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周恩来、陈毅、李济深等应邀作陪。在宴会上，身材魁梧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宴会充满欢快、融洽的气氛。张治中与毛泽东比肩而坐，白天的事又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带着探询的口气，悄声对毛泽东说："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

你的意见，我当守秘密。”毛泽东微笑着让他说下去。“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张治中一边问一边紧盯着毛泽东。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你怎样？”张治中和毛泽东交往甚深，深为钦佩毛泽东的虚怀若谷和雍容大度。他望着毛泽东，白天盘旋在心底的许多话，终于象破闸而出的流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我反对这个图案，红色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连想到是一根棍子，象孙猴子的金箍棒。”听完张治中的这一番话，毛泽东略为沉思后说：“这倒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国旗设计协商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马叙伦、徐悲鸿、洪深、艾青、梁思成等40多人参加。张治中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走进会场一看尽是知名的文化人，画家，艺术家，唯独自己是军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毛泽东非常谦和地与他握了握手，并请他入座。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说明国旗“复字第1号”构图的情况，然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这幅图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想想看。”说到这里，他随手把印发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翻到第32图。这是一幅五星红旗，表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这个怎样？”毛泽东指着图案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注视着五星照耀下一片鲜红、平旷的大地，顿觉眼前一亮，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这时，也有二三人提出了异议：这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段，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后面两个阶级没有了，国旗不是又要改吗？”张治中和其他人在苦思冥想，会场一片寂静。雄才大略而又富于想像力的毛泽东很敏捷地说：那就把图案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五星红旗表现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一番话，如石破天惊，豁然开朗，得到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一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曾联松。他满怀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炽烈感情，度过好多个不眠之夜，千思万虑，精心设计了五星红旗。初步选定的五星国旗图样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他捧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红旗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大地；这颗大的星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四个星星，象征中华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觉得很好，寓意鲜明深刻。你们认为怎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中正式决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当天，第一面国旗的制作任务下达给北京美术供应社，由赵文瑞师傅缝制，这位在旧中国靠给人缝补浆洗仍难以度日的普通女工，是中国共产党把她一家从苦海里解放出来。当接受缝制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光荣任务时，她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我代表单位的全体职工把它精心缝制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她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投入紧张的工作，为了使针脚整齐美观，特地借了一台缝纫机。9月30日下午，这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制成了。它长460公分，宽338公分，用红色绸料做旗面，黄色缎料做五角星，鲜红中泛着金光，令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赵文瑞她们围着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跳起秧歌舞，沉醉在幸福的狂欢中。

国旗遐想

五星红旗是新中国诞生的象征，它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尊严和权力。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旗面左上方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形象地表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论；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全中国各族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五星红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标志。五颗星的结构，形成一个椭圆形如秋海棠叶子，象征中国的疆土领域；四颗小星则寓意我们伟大祖国4000年的历史（自有文字以来）及其灿烂的文化；星作黄色，象征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表达了中国的民族特征。五星国旗的整个构图，表现了一种强烈、完满的艺术美。旗面的红色，表达热烈，似红霞一片；星呈黄色，光明灿烂，文彩斑斑。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拱于后，似众星之拱北辰；大小呼应，疏密相间，给人以团聚、完整、饱满的感受。五星高悬在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江天寥廓，山河壮丽。整幅画面，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五星红旗也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象征。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天安门广场正中，一根22米高的白色旗杆高耸入云。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54个单位，象征中国共产党28年史诗般的战斗历程。毛泽东按动电钮亲自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五星

红旗。看着冉冉上升的国旗，毛泽东高兴地说："升得好。"人们眼噙晶莹的泪花，昂望着五星红旗，静听着毛泽东激昂、豪放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上 30 万群众沸腾了。海潮一样的欢呼声、鼓掌声响彻云霄。首都人民，全中国人民，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

历史会永远记着：五星红旗升起的这一天。

（选自《党史博彩》90 年 9 期，作者：都培炎）

新中国建立前夕关于"国号"的一次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决定，有过一次讨论。1949 年 9 月 21 日全国政协会议已经开幕。9 月 25 日深夜，收到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我随司徒美堂坐汽车从北京饭店前往。人陆续到齐了，一看多是 70 以上的老人，大约二三十位，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考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

周恩来开始讲话：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个发言的是民建的黄炎培。他说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第二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听了我的口译，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 CC 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象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语音响亮，听者都报以热烈掌声。

马寅初站起来，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并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阐述说：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的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法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来解释简称问题。他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陈嘉庚发言，他讲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他同意不用那个简称。他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会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他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摘自《美堂老人的烈士暮年》作者：司徒丙鹤）

他没有做张学良第二
张治中脱离蒋介石集团前前后后

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先生，生前曾在许多文章里，多次庆幸自己脱离蒋介石阵营，从而获得了新生，象过"年初一"（毛泽东语）一样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1

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

著名的北伐战争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并担任要职，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享有较高威望。后因不同意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多的接触。抗战胜利后，为避免内战，给蒋介石提出过许多和平建议，但均遭拒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此后，张治中至少两番触犯了蒋介石。一是为扫除国内和平障碍，让国民党内主和派李宗仁等放手工作，他犯颜直谏，要求蒋介石出国。李宗仁上台后，出于多种目的，立即于 1 月 27 日宣布愿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等 8 项条件为基础进行两党和谈。但张治中清楚，蒋介石的下野是表面的，事实上他还在老家浙江溪口指挥一切；李宗仁的命令、措施，实际上没有多少用处，大部分根本做不到。更何况蒋介石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他此时手中尚有半壁江山，怎会甘心坐下来与共产党平等谈判?而没有蒋介石的首肯，李宗仁与中共的和谈必然一无所成。为促进和平，3 月 3 日，他亲赴溪口见蒋，打算面陈利害，劝其出国。想不到他一下车，蒋介石就劈头给他碰了一个硬钉子，寒暄后第一句就对张治中及同来的人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接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一下子就封住了张治中的嘴巴。

张治中这次与蒋虽然没有谈成，但他还想再试试。在北平和谈期间，他更加感到蒋介石的留居国内，实在是和平的最大障碍，便不计后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交国民党代表团顾问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给蒋介石。信中，张治中一面痛陈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一面详述中共代表新兴力量蓬勃向上的气象，断言国民党如还想作最后挣扎，"纯属不合现实的幻想"，直截了当地要求"钧座（蒋介石）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最为有利。"并具体为蒋介石分析了出国的 6 点有利因素和 3 点可以克服的不利因素，得出了"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蒋介石接此信后反应如何，局外人包括张治中在内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这次岂止是"很气愤"！

另一件事是张治中积极奔走于国内和平事业，重重撞击了蒋介石的隐痛。蒋介石眼里从来就不曾有过共产党。如今损兵折将，桂系又乘火打劫，才被逼下野，违心地表示愿意谋和。但有一条，蒋介石是不让他的人去参加和谈的。张治中第一次去溪口，在与蒋谈及和谈代表人选时，吴忠信表示坚决不干，蒋即以赞赏的口吻说："不干也好！"当张治中也表示不愿参加时，蒋先说："这是值得考虑的"，后来又说："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脱不了。"后来，张治中被确定为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临行前于 3 月 29 日再次到溪口面见蒋介石时，气氛与上次就不大一样了。蒋介石在听完了张治中关于和谈准备情况的报告后，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而没有一句具体意见。张治中在返程的飞机上，屈武告诉他，在溪口时，蒋介石左右有人（即蒋经国）曾对他狠狠地说："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2

经国共双方代表的紧张工作，和谈取得了进展，几经修改，双方代表团一致同意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 4 月 20 日，国民党却拒绝了这个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了渡江战役。

蒋介石本来就不赞成国共和谈，当看到代表团专程送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文稿后，更是怒发冲冠，拍桌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张治中，是留北平还是回南京，就与他的个人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张治中却在 4 月 22 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 24 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他是"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北平来，以后南京政府拒绝双方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款，按照常例我应回去复'命'"。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天就到南京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一再向他表示恳切的挽留。周恩来说，随着形势的发展，仍有签订和平协定的可能。他还援引西安事变为例，说他那次未及阻止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致张遭幽禁，至今引为憾事；倘张治中此时回去，恐要遭受张学良同样的待遇，他绝不忍张治中又去做张学良第二。说到这里，周恩来情真意切地对张治中表示："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怎能再对不起你这姓张的朋友！"面对此情此景，张治中怎能不大受感动！在场的其他中共代表也纷纷表示，挽留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没有别的意思，"过去在南京重庆和谈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线索，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的意思。"

就这样，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全部留了下来。4 月 25 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代表。结果却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 9 人送上该机。这架飞机不但一个代表也没有接回，反而代劳送来了首席代表的家属，这不能不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3

张治中险些成为张学良第二，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故事。

蒋介石对张治中力劝其出国和过分热心于和谈是非常痛恨的，甚至将这些看作是乘他危难之际落井下石。如前所述，对张治中的要他出国，蒋介石当面作了“口诛”；而对于张治中致力于和平的努力，蒋介石则早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作了“笔伐”：“共匪于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作何感想也。彼等颜如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6月15日，即我军渡江战役结束不久，蒋介石就在张治中身上作起文章来了。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出了一则题为《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的电讯。紧接着，20、22日又继续发出了两则电讯，说张治中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公开将张治中一脚踢开。

再看看在和谈前就在背后狠狠地诅咒张治中“死无葬身之地”的蒋经国，逃台后子以父贵，以太子身分接任了“总统”。张治中当年若果真在谈判破裂后回去复命，即使过了蒋介石这一关，蒋经国这一关又怎么过呢？他除了沦为张学良第二，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十年过后，张治中本人回想起来，也认为当时如果真的回去，极有遭受蒋氏父子迫害的可能。他回忆道：“如果当时我回广州（这时国民政府已迁广州）复‘命’，必将逃到台湾，其结果即不被迫害而死，也难免郁积苦闷而死！”

（选自《历史档案》，作者：南懿）

此身莫向沟中殒
——李达与毛泽东

解放前夕，毛泽东致函李达：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1939年初，李达应冯玉祥将军之邀，为冯将军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周恩来也在重庆，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托李达的学生吕振羽看望李达并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当时，正值平江惨案之后和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对吕振羽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不会失节的。”由于后来周恩来出国治病，董老也不在，吕振羽便将李达的话告诉了南方局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意思是不欢迎李达去。是年9月，李达离重庆去桂林。周恩来回到重庆后，吕振羽将这些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周恩来很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李达未能去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惋惜。

1948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实际上就是请李达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李达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密信后，高兴得彻夜未眠，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解放区。可是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每天吃几片面包，进食很少，因此一时还不能长途跋涉。为了及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李达托熟人搞了个旧收音机。夜深人静之时，他全神贯注地秘密收听来自延安的新华社广播，充满了对解放区的向往之情。李达还尽量设法寻找最新的革命书报阅读。一次，他轻声对一位进步学生说：“给我找点进步书刊看吧，不学习不行啊！”第二天，这个学生给他送来了两本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其中载有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李达把它读了又读，兴奋地说：“天快亮了呵！天快亮了啊！”他还嘱咐学生们努力学习，抓紧工作，做好应变准备，特别要注意安全。

在中共华南分局指派的湖南大学法律系助教陈力新和湖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李梅彬二同志的护送以及程潜将军的关照下，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深夜两点秘密离开长沙，先赴香港，然后乘英国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安全到达北平。

“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到北平后，李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派人驱车到车站迎接，李达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单独接到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老同志亲自登门看望。周恩来、党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5月18日，李达受毛泽东邀请，到毛泽东家里（那时毛泽东家住香山）叙谈。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李达坐着小轿车驰往毛泽东家时，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使他陷入无限沉思和追忆之中。1926年，在武昌北伐军政治部的一次他和毛泽东的会面，恍如隔世，从那时分手之后，转眼20多年未见面了。久别重逢，该向毛泽东谈些什么呢？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一下自己1927年以来的经历和遭遇，检讨自己的过失，还要汇报湖南目前的局势和程潜求和的问题。

谈话中，李达首先向毛泽东检讨了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谈着谈着，不觉已是深夜。"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毛泽东见李达已有几分倦意说。"你自己不睡吗？""我刚上班呢！"长谈之后，李达比较疲劳，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便躺在毛泽东的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只见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

毛泽东认为李达思想上一直没有离开马列主义，可以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李达重新入党，这是党中央对他脱党后20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每当谈起这件事，李达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鉴于李达的身体状况，这次会见后不几天，毛泽东致函李达，要他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一些再议。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后来，这个请求获得批准。从此，他在教育战线上战斗了17个春秋。他在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为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李达说："你是理论界的'黑旋风'，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去湖北，曾多次与李达晤谈。毛泽东第一次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哪个？""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梅白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第一次见毛泽东时，他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连连"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毛泽东见状制止说："你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按：中共一大上，李达被推选为中央宣传局主任)现在我喊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二人入座后，李达面有愧色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道："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送走李达以后，梅白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1958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时，省委领导同志写了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打了清样送李达看。李达提了意见。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主张超过马克思。他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嘱咐梅白就这个问题请教鹤鸣兄。李达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使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目前我们党内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二是头脑发热。"

那一年，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这样的标语，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人告诉了李达。李达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这样讲法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于是，他打电话问梅白，这个口号是不是省委批准的。梅白答曰："当然不是。"李达便说："老弟，我要见润之！"

李达见毛泽东后第一句话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毛泽东不知来由，愣了一下，随后诙谐地问："噢，是不是鸿门宴呀？"李达颇认真地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问清来由后，便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李达听了并不高兴。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便接着问李达："新疆大不大？内蒙古大不大？西藏大不大？你看，浙江人多地少，但能够卖余粮，而新疆、内蒙古和西藏这些地方地大人少，却要吃供应，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嘛！这样的事多得很。三大战役、直罗镇战斗的胜利，都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李达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问："润之，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泽东也不转弯子了："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梅白看到两位巨人快吵起来了，便插话说："口号由省委取消。"可是，李达仍执着地说："口号取消，思想上不取消是不解决问题的。"这时候，毛泽东再也不说了。李达要走了，毛泽东站起来同他抱了抱肩膀，要梅白送送。在返回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达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啊！主观、客观，主观要符合客观；实践理论，理论实践……讲得多好啊！现在连润之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润之说了。他这

时候温度很高，39度，我只有30度。一党之主，一国之首，可不能发高烧呀！”

梅白送李达回武汉大学后去见毛泽东，他感觉到毛泽东在后悔，于是乘机问：“主席，您今天是不是讲得过头了？”毛泽东未置可否。

（选自《中华英烈》1989年1期，作者：王元慎）

打进蒋介石的老家
——忆解放溪口

在浙江省风光旖旎的四明山区，有一座美丽的城镇，这便是蒋介石父子的故里——奉化县溪口镇。1986年我赴浙江开会时，应东道主的盛情邀请，我们一行去溪口参观。

溪口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于1949年5月25日解放的，当时我任该师政治部主任，曾亲自参加了解放溪口的战斗。39年过去，旧地重游，思绪万千，解放军首次进入溪口时情景，犹同昨日……

1949年4月下旬我军胜利渡江后，挟雷霆万钧之势，长驱江南。5月3日，我师与兄弟的六十二师配合一举解放了浙江省省会杭州。数日后，我部奉命将防务移交二十三军，集结在萧山周围待命。

5月16日，我二十一军兵分三路，以温州为目标，向浙南进军。一路是军部尾六十三师为第一梯队由萧山经浙赣铁路东运金华，尔后沿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进到温州；一路是六十二师沿临浦、诸暨、丽水向温州前进；一路是六十一师沿绍兴、嵊县、天台、临海一线扫荡残敌，尔后向温州前进。

当时，国民党青年军在嵊县、新昌、天台一线布防。5月20日，我师前锋进抵嵊县以北、曹娥江畔之三界、仙岩，发现青年军二二〇师之两个营分守两地。师部立即命令一八三团向三界、一八一团向仙岩发起攻击。很快，三界之敌被全歼，仙岩之敌大部逃窜。我军跟踪追击，于5月22日上午占领嵊县县城，傍晚进占新昌县城。这时，我师奉命改归二十二军指挥，在新昌休息一天后即向浙东进击，以攻夺奉化、溪口。

蒋介石是奉化人，溪口是他的老家。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要消灭共产党与民心相背，以致连续损兵折将，不得不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是，他并不甘心失败，由南京躲到溪口，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继续控制军政大权，指挥作战，因此一个时期内溪口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指挥中心。我们于5月25日进入溪口时，当地群众有的讲，蒋介石头一天才离开，有的说已离开几天。后来知道，解放军过江之后，蒋介石到杭州、上海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又回到溪口做逃离的准备，而后率其亲随于5月24日离开溪口，到象山港登上“太康”号军舰逃离大陆。

5月24日下午，我师沿公路以日行130里的速度向东急进，以一八一团夺攻奉化，一八三团为前锋攻夺溪口，师部率一八二团随后跟进。出新昌城不久，师侦察队即在拔茅接受敌一工兵连主动投诚，全师的追击行动亦十分顺利，很快便进入四明山区。我们行军的道路两侧，一面依山，一面临水，夜间天上繁星闪烁，四周万籁无声；微风吹拂，凉爽清新的气流扑面而来，使人在疲困之际，感到畅快和舒适。拂晓之前，忽起大雾，远远望去，山峰连成一片；不一时，云块、山峰又全然消失，周围变成黑蒙蒙的一片，仿佛走进了神秘莫测的深渊。其景色令人叹为奇观。

由于已侦知溪口之敌已逃跑一空，5月25日上午部队即到塔下一带休息并午餐。饭后，部队进行了军容的整理，然后集合队伍作了进入溪口前的再一次动员教育。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反动政策，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军指战员对他怀有刻骨仇恨，为防止一旦进入溪口，可能发生仅凭朴素阶级感情发泄对蒋介石仇恨的破坏纪律行为，沿途我们已不断做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教育。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溪口，更有必要再次重申纪律，讲明解放溪口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

溪口水绕山环，风景秀美，因剡溪与锦溪汇合于此而得名，亦名锦溪村。镇东有武岭（亦称武山），屏障全镇。在镇口有武岭门，拱形的楼门洞上，前额题有“武岭”二字，出自于右任先生的手笔；后额也有“武岭”二字，系蒋介石自题。溪口镇傍山临溪而建，是一条约2华里的半边街。靠溪一侧砌石为堤，护以铁栏，沿街建筑是粉墙黑瓦的江南风格，商店店面多是可安上拆下的门板格式。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出生地玉泰盐铺和丰镐房均在这条街上。

我军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赴溪口。溪口镇的镇长——据说是蒋介石在撤逃时特地关照挑选的一位出身较贫寒的人，带着一些人到镇口的桥边，举着彩旗来欢迎我们。街上行人不多，商店照常营业，这里虽然是蒋介石的老家，但群众对我们到来并不惊慌害怕，干部们到群众家里访问也受到热情接待。

溪口解放的同时，一八一团解放了奉化县城，一八三团继续推进至江口一带宿营，师部率师直属机关和一八二团住在溪口镇及其附近的村庄。当时，师司令部住在蒋介石祖居丰镐房，是蒋母王氏及其原配妻子毛氏的住处。这是一幢老式楼房，坐落在街的中段偏东，面对剡溪临街而建。砖砌的大门，进门后有一段很整洁而窄小的甬道，走过一个月门是一处小庭院，正北一座大厅堂，匾额上是吴稚晖书写的“报本堂”三个字，这是专门供奉蒋氏祖宗牌位的地方。两旁厢房是两层的住宅，中间楼上留有蒋介

石和宋美龄的卧室，房间四周有走廊回绕。蒋母与毛氏卧室在东厢房，西厢房楼上则设一小佛堂，二人生前早晚在这里念经拜佛。厅堂及走廊挂着各式宫灯，系旧式世家府第建筑，虽不算很豪华，但却油漆一新，收拾得很干净。在老宅（原称素居）西首还筑有一小洋楼，据说是给宋美龄盖的，后面的一排水泥楼房是警卫人员住处。在丰镐房的近旁，有一户人家，主人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房子是新建的，家具红漆耀眼，油香扑鼻，只是人去屋空。我们政治部就住在这里。当晚，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张维召集镇上一些居民开会，宣讲我军约法八章，申明如发现部队有违纪行为，任何人均可到政治部报告。

第二天，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副师长叶泰清和我一起到溪口各处查看。出镇向西北约5里的白岩山鱼鳞岙，是蒋母王采玉墓地之所在。来到山脚，沿着小石板路蜿蜒而上，行至半山坡，有一碑亭矗立路旁，刻有孙中山先生所作的祭文；再上即达墓地。此处地形象一尊弥勒佛，据说风水先生说这里是最好的"龙脉"，蒋母坟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为了不压坏"龙穴"，石器不能过重，不能多用石板水泥，因而蒋母坟并不太大，看上去只是一个馒头形的普通坟墓。坟侧不远，筑有平房数间，当地人称坟庄，蒋介石题名为"慈庵"。蒋介石回溪口多住于此。我们到里面看了看，虽是几间平房，但却很豪华。蒋介石和宋美龄各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另有客厅、书房、会议室等，家具设备全是最新式的洋货。宋美龄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很雅致的挂屏，上面敷以薄土，植一株珍贵的兰花，一进室内即闻到散发的清香。蒋氏老屋丰镐房虽雕梁画柱，同这里相比，似还略逊一筹。我们把看房子的人找来问了情况，交代他继续把坟墓和房子看好，并命师警卫营派人协助看管，加以保护。

那天午饭后，我们又到镇上各处转了转。镇东的武岭学校据说是蒋介石耗资30余万建造的，屋宇轩敞，花木繁茂，规模相当可观，设施也很考究。学校分中小学二部，除图书馆、实验室外还附设有农场、牛奶厂等；农场里养有不少牲畜和家禽，其中有外国进口的良种肥猪和火鸡、鸭子等，还种了不少桃树，所产白蜜桃颇有名，专门办了一个罐头加工厂。当时学校师生都已离校，加工厂也停工了。在武岭的附近临溪有一所小洋楼，那是蒋经国的别墅，我们去看时那里比较零乱，满地纸片。据说，蒋介石下野回溪口时，那里架设了天线，警卫森严。看来这里是蒋介石在溪口的通讯指挥中心，参谋机要人员的住处。其零乱之状，显然是在我军到来之前，他们撤退时于混乱之中造成的。

5月27日我师奉命攻夺定海，除留一个营看守溪口外，其余均向宁波集中。部队在溪口驻扎期间，由于政治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深入、纪律严明，蒋氏故里的一草一木都得到妥善保护。蒋介石的祖宗牌位、蒋氏旧宅、蒋母墓、毛氏墓，及蒋介石、蒋经国住宅等均得到保护。未受丝毫破坏。部队人多，进驻后，为避免家具等受到损坏，首先把地上的地毯卷起来。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如象牙筷子一类珍贵之物散放各处，我军官兵谁也没有去拿。部队临走时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封存的物品一件不少。这样的军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

如今当我把当年我军解放溪口时的情景，讲给陪同我参观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朱之光听时，他说："一点不错，我是第一个证明人。当时我是解放后第一任宁波专员。溪口是我代表地方政府从部队接收过来的，当时的确保护得很好。"令人感慨的是，在十年动乱中受到破坏的溪口个别地方都已得到修复，而且增加了许多新建筑。当年武岭门外是一片空地，如今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剡溪上架起了一座新桥，方便了两岸人民及车辆通行……溪口解放已近40年，人民政府妥善地保护了蒋氏故里，群众生活亦有了极大改善。我到溪口故地重游时，蒋经国先生尚还健在，现在我写此文时，他已溘然长逝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数十载望故乡而不可见，实为遗憾！我深信如此憾事将不致于再发生在蒋氏后辈子孙身上，祖国统一大业定会实现。

（选自《纵横》88年4期，作者：李清泉）

《红岩》的原型人物

6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红岩》，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青年朋友争相传阅，革命传统教育的热潮，翻卷每个人的心海。

小说中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余新江、陈松林、许云峰、江雪琴、成岗、刘思扬、小萝卜头……不时在读者头脑中闪现，革命先烈不屈的英姿和高尚的品格，激励人们去工作、去学习、去战斗、去生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更是人们生命的支柱。《红岩》这部小说，前后再版几十次，发行逾千万册，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改编成了电影、戏剧、曲艺、电视等多种文艺形式，可谓家喻户晓，老少咸知，扬名世界。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取材于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在生活原型之外还有若干生活形象，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小说中一些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向读者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余新江。

余新江的原型人物名叫余祖胜。余祖胜是江西湖口人，精明能干，从小颇富正义感。其父是湖北汉阳兵工厂工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抗战爆发后，兵工厂迁来重庆，余祖胜随父来渝，入21兵工厂学艺。在厂期间，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疾恶如仇，被厂方除名。

后复入该厂，接触地下党，犹如黑暗中得到了光明。1948 年入党，仅几个月，便涉及《挺进报》案入狱，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狱中，他大智大勇，收集各类牙刷柄，偷刻了 100 多颗“红心”，以示对党坚贞，宁死不屈，在渣滓洞春节联欢会上，分送难友，鼓舞斗志。1949 年 11 月 27 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殉难，时年 22 岁。

《红岩》小说中露面的第二个人物，乃是令人痛恨的叛徒甫志高。他在大川银行做主任会计，兼“沙坪书店”经理；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沙磁区委委员，负责经济工作；书店也是党的备用联络站。由于他的叛变投敌，一大批地下党的优秀人物被捕入狱，给党造成了极大危害，堪称十恶不赦。许云峰、江雪琴等人皆因他的出卖而献身。关于这个人物，基本取材于生活中的几个原型人物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1948 年，川东的政治空气异常紧张，因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暴露，一些地下党员被捕。其中有些经不起严刑拷打和金钱地位的引诱，纷纷叛变投降，成为敌人鹰犬，为虎作伥。甚至有个别叛徒在狱中拟好了黑名单，准备在下次提审时交出去的当口，就被特务枪杀了，死后才在衣袋中发现黑名单。其原因固然说明敌人的残暴恶狠，同时也说明叛变人数较多，敌人已经掌握了具体情况，网住了“大鱼”，杀掉“小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于甫志高涉及的原型人物较多，这里只介绍两个较典型的人物。

刘国定，又名刘伸逸，四川新都人，抗战时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等职，被捕时任重庆市工委书记。刘的被捕是叛徒出卖，他又当上了叛徒，他出卖的李文祥、李忠良等人又叛变投敌，再次出卖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因此而牺牲被捕的达上百人，给地下党造成了惨痛损失。1947 年 10 月，川东临委成立，组织上考虑到刘国定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不检点，迷恋城市生活，准备将他调往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做些深入细致的工作。刘对党的这个安排大为不满，推三托四，极力反对；对作这个安排的上级同志恨之入骨。后来，他出卖了上下级同志和他所知道的其他人，重庆地下党一时处于瘫痪状态。刘因出卖“有功”，受到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被授予军统中校参谋、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头衔，并获得了“自由”的权利。当他的“油水”榨干之后，被一脚踢开，遭到冷遇。他躲到成都，日夜慑于地下党的惩处。为重新获得特务头头青睐，他编写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和《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两个反动文件，作为进一步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依据。南京、武汉解放后，刘惶惶不可终日。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进军大西南，他准备逃往香港，由于款项不足，未能成行。解放后，刘自知罪责难逃，便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950 年由成都押回重庆。在交待书中，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叛变是错误与被迫造成的，这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贪生怕死的行为产生矛盾的原因。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及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迅速作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

冉益智，四川酉阳人，抗战时入党，叛变前是中共重庆市委主管学运的工委副书记。投身事敌后，与刘国定争宠邀功，竞相出卖同志。他也被军统封为中校秘书、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等官职，并在特务头子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反动课程。撰写过《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动文章，刊登在军统报刊上。解放后，他竟然冒充革命志士，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登记，当即遭到斥责、揭发，几天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1951 年 2 月，经重庆市人民法庭审讯判决，将罪大恶极的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等人执行枪决。

许云峰，是小说中的一位主要英雄人物形象。他铮铮铁骨，宁死不屈，牺牲自己，保护同志，曾一度挖开地牢，完全可以自己逃命，但为了以后组织越狱时能救出更多的同志，毅然放弃了个人生的希望。这是多么崇高的革命精神啊！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根据小说《红岩》改编)中的许云峰，由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担任，他生动细微地塑造了这位地下党领导人的形象，使小说人物栩栩如生，跃然银幕。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不啻是千千万万忠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群众反映。但具体说来，他是依据两位先烈的事迹塑造的。

许云峰原型之一：许建业，1921 年生，四川邻水县人，邻水中学毕业的高材生，1938 年入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是地下党一位相当得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人。1948 年，任达哉被捕叛变，遂带领特务去抓他。本来，任对许的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他叫“老杨”，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职务和住址，每次由许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交换情况，商量工作。4 月 4 日上午，是许约任在磁器口街嘉阳茶馆接头的日子，当他正与另一位同志交谈时，见任达哉后面跟着几个人，东张西望地来了，行迹十分可疑。许建业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立即判断：任达哉叛变了。他迅速叫那位同志走开，因为叛徒并不认识他。许本人却沉着镇定地主动迎了上去，即刻遭到特务逮捕。敌人把他囚在行辕二处警卫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拒不提供任何情况，但内心十分焦急。当时，他的公开职业是志诚公司会计，在公司宿舍床下皮箱中还存放着党的机密文件，深恐敌人去抄查，一旦被发现，危害无穷。他急中乱“投医”，做看守兵陈远德的工作，托他送一封信出去，答应事成后由他在外的朋友送陈四千万元法币，为他介绍更好的工作。这封信是送给志诚公司董事、地下党员刘德惠的，内

容是请他立即把皮箱里的文件销毁。陈远德伪装同情，拿着这封信报告了上级。特务头子徐远举立即逮捕了刘德惠，包围了志诚公司，在徐建业床下皮箱里搜出了18份党员的自传，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调查资料和大批照片。敌人"按图索骥"，又是一大批地下党优秀分子被捕。许建业得知受骗，悲愤至极，以头撞墙自杀未死，转押至渣滓洞监狱。陈远德因行骗有功，从上士提升为少尉。由于许建业是单独关押，1948年7月22日在大坪公开枪毙，沿途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所以关于他被捕后的情况一直不详。后来，特务头子徐远举(此人乃《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交待：许建业被捕后，受了"吊鸭儿浮水"(将双手反绑吊起来的一种酷刑)、"考虑凳"(用一根长条凳，让受刑人双腿放在凳上，背靠墙坐成90°，再拿绳子把腿捆牢，行刑人一面压受刑人膝盖，一面在脚跟处塞砖，一般加至二、三块砖时，受刑人就昏过去了)等刑罚，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拒不再吐一字。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实如日月经天，永照人寰。

许云峰原型之二：韦德福，四川万县人，1930年左右曾在万县当宪兵，因不满国民党腐朽统治逃到重庆。1947年积极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人殴打成重伤逮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地牢。在牢室里，他用手指不停地挖，终于挖出了一个洞，但双手已鲜血淋漓，手指短了一大截，这是何等强烈的反抗求生毅力呵！他从洞中爬出，跳下10多米高的悬岩，因腿摔断，复被抓回，受尽酷刑。1948年7月29日被杀害。

《红岩》中另一位英雄人物——即威武不屈、凛然正气的江雪琴，人们都称她江姐。提起这位女英雄，不由得耳畔响起《红梅赞》悦耳激奋的歌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创作演出的歌剧《江姐》，就是根据小说中江雪琴这个人物改编的。江姐为人温柔善良，对敌人却疾恶如仇。她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被敌人杀害后割下了头颅，她本人又因叛徒甫志高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尽酷刑，竹签子钉手指、凉水灌鼻孔、电流通过全身、火烙铁烙胸脯……她都挺过来了，以一位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超人毅力击败了敌人，振奋了战友……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写小说，全是真人真事。她，就是原型人物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生，四川自贡市人；19岁在中学念书时入党。曾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1947年11月，她和爱人彭咏梧去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她担任联络工作。两个月后，彭咏梧不幸在奉节县竹园镇战斗中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赴万县参加新的地下斗争，因叛徒涂孝文出卖，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同年转押渣滓洞监狱。烈火炼真金，毒刑砺坚贞，她在狱中留下了令人潸然垂泪的千古颂歌。那天，渣滓洞里200多名难友，轮流守望在"风门"前，注视着从刑讯室传来的动静。因为一大早，特务就从女牢提走了江竹筠同志。那些能使许多男人都受不了的中外酷刑，江姐能忍受得住吗？能挺得过来吗？这一年的上半年，可算是中共四川地下党最为艰难的时期了。自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记书冉益智，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等相继叛变后，大批同志被捕入狱。在酷刑、枪杀、官禄、金钱的威逼利诱下，每一个人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甚至有个别平时大家认为表现很好、很坚定的人，也因为受不了酷刑的折磨而背叛了革命。监狱里所有的难友，都在为她耽心。

刑讯室里，特务法官张界一边命令刽子手用"夹筷子"的酷刑折磨江姐，一边怪声怪气地吼叫：

"你不是要革命吗？要革命总要保住自己的命才行啊！命都没有了，还革什么命？快把彭咏梧领导的那些人谈一谈！"

"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没有！"痛得满头是汗的江竹筠答道。

"快给我使劲夹！"

特务张界气得拼命嚎叫。

江竹筠昏了过去。

"哗……"一盆凉水浇过来，江竹筠开始慢慢苏醒过来：

"你们简直是群野兽，要想叫我开口……你们永远也办不到！"

就这样，她受尽了"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多次的严刑拷问，她都经受住了，没有屈服。江竹筠被押回牢房，已是黄昏时分，敌人整整折磨了她一整天，难友们都向她投去崇敬、关切、感激的目光。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向她赠诗慰问，诗云：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楼一室全体难友也写了诗《我们的丹娘——献给江竹筠同志》：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你，我们的丹娘，
所有正直的灵魂已为你的受难而忿怒。
穿过沉重的铁门传来的，
是我们兄弟般的同志的情谊。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象皮鞭抽打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一个个纸团投进女牢房。读着同志们写来的充满战友情谊的慰问信和诗，江姐心情万分

激动：

“同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由于她的手受了重伤不能动，便请同室的难友帮她写了封回信：

毒刑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壮别何需低泪眼，伤情切莫锁啼眉。”敌人从江竹筠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就要下毒手了。听见叫喊自己的姓名时，江姐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主义论》递给同牢房的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再细心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向难友告别……

敌人把一批革命志士押向电台岚垭，江姐走在中间。当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荒凉小道时，江姐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把千言万语凝成一句响亮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格格格……

机枪响了。在这荒野里显得那么悲壮，那么揪心。尚未到达预定的刑场，刽子手们就慌忙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江姐从容不迫地倒下了，时年29岁。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红岩》这部小说，既是一部革命史，也是一部英烈们真实事迹的实录。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虚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其一个甚至多个模特儿为依据的。小说再现了烈士们的崇高形像，再现了敌人的狠毒、卑鄙。千万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先烈，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人民共和国的光荣，他们是华夏的国魂和民族之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从昨天走向今天是悲壮的，从今天走向明天将是更加艰巨的！

（选自《人物》91年3期，作者：陈显涪、黄晓玲）

蒋介石与南京城黯然诀别

蒋介石于1949年最后离开南京的那一天，是1月21日。那天早晨，参加过国民党二大的中山先生信徒、中常委李世军，还睡在床上，蓦地听到电话铃声。他赶紧起床接电话，才知是吴铁城打来的电话，有一个重要会议要他参加。一个会议有劳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亲自通知，可见非同小可了。

10天前，55万大军在徐蚌会战中覆没；5天前，天津易手，北平守军已成孤军；长江北岸，现在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国民党首都南京已成危城一座。

李世军从住处坐车途经广州路、中山路口，被美军顾问团撤退卡车堵塞，绕道后，又遇抢米民众挡路。当他进入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已经超过中常会扩大预定开会时间9点，大门口的警卫已不如往日森严，一挥手就让车子进入院内。会还没有开，看到张道藩、谷正纲在客厅外踱步，一副阴沉的脸，见了他只是冷漠地点点头。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于右任、张群、何应钦、吴忠信、陈立夫、王世杰、李宗仁都在，大约40人上下。原来悬挂在墙上的油画，已经倒置在墙旁。

李世军在吴铁城旁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下，轻轻地问吴铁城：“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吴铁城无精打采地回答：“一会儿就知道了。”他可能不是故作神秘，他自己也许不甚了了。

9点半钟，身披斗篷的蒋介石走进客厅，大家都站起来，蒋介石点点头，请大家坐下。所有的与会者，已不象过去那样静静地期待着他发布惊人的新方案，各人已有各人的想法和打算。七十老人于右任满脸愁容，显出内心的极度痛苦：孙中山先生传下来的衣钵，中华民国的历史，将在中国的大地上结束，他愧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不能力挽狂澜。

蒋介石的心情看来也是非常沉重，从他讲话的凄凉声调中已见端倪。

他说：“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痛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在5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今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蒋介石这次的引退，直接原因起于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自汉口的“亥敬”电。白崇禧语虽委婉，但紧接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却咄咄逼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可以测知，蒋介石这次离开中华民国的首都，已非八年抗战可比，那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气壮山河，一定要打回来。南京受降，敌酋冈村宁次大将签字，他的声誉上升。接着大劫收，大动乱，他的声誉跌落到最低点，民心所向，不可挽回。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边，这次离开首都，已经不可能再卷土重来。

蒋介石又说：“以后的事情，都要拜托德邻兄维持，大家要以服从中正之心，来服从德邻先生，要把局面维持下去。”

在座的有些官员，眼看即将成为孤臣孽子，不惜背水一战，谷正纲站起来时，眼泪簌落落地流下来。他悲愤地说：“总裁，您不能走啊！您要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流泪的不止谷正纲，还有洪兰友、张道藩……

蒋介石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制止谷正纲的哭哭啼啼的讲话。他胸有成竹地说：“我已决定了，我只有离开这里，才能保证有时间休息，才能对时局进行缜密的考虑。”蒋介石有他自己的打算，自己的部署，愚忠至极的谷正纲，怎么能理解蒋介石的苦心呢！

蒋介石已经重新部署好人事，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

总司令,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节重庆,余汉谋执掌广州。不仅这样,他还把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他下定决心要在海岛上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他在引退前的一道紧急命令是: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他还先期派蒋经国等到溪口布置,为他退居幕后指挥一切作好准备工作。他收起了"总统"的这块招牌,还可以扯起"国民党总裁"的令旗。

蒋介石环视四周,意有未尽,怒容满面地说:"我们的军队是好军队,我们的将领是好将领,我们的人民都是忠于三民主义的人民。我们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党内的一些败类暗中与共党勾结,鼓吹什么和谈,尤其是立法院和监察院的一些人,毫不体谅中央困难。"

蒋介石从来不自己身上找出失败的根源。国民党统治多年,做了些什么值得称颂的事?党部变成官僚机关,人心已失。自己在内战中败北,却把责任推给别人。

坐在李世军旁边的立法委员黄宇人,悄悄对他说:"听见了没有?我们都成了罪人了!"

蒋介石似乎觉得不应加重大家的伤感,话锋一转又说:"时局虽然不利,但不要紧,会有办法的。"他要大家鼓起勇气,苦撑到时局有?转机"的时刻。他自认为他在历史上,曾度过种种难关,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他险些当了冯玉祥的俘虏,但他终于在最后赢得胜利。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退再退,但八年后,还是回到了南京。蒋介石要大家相信这一点,给大家打气。

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兄,你有什么话要说?"李宗仁战战兢兢抽动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说。

一个不知趣的人,CC 的走卒田昆山,却站起来将了李宗仁一军,指着鼻子问:"总裁走了,你李代总统能有什么旋转乾坤的办法?"李宗仁正在惶惑,不知如何作答。蒋介石却非常光火,立即制田昆山的讲话。

蒋介石再次说:"在此非常时期,大家要以服从中正之心,服从李代总统。"蒋介石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已飞到溪口,他要李宗仁替他守住残局,而他,则继续指挥兵马作战。

这次会开的时间不长,蒋介石在会上并没有宣布他引退的文告。会后,蒋介石便动身直接去明故宫机场,张群、何应钦等都去送行。

李世军为了让老伴放心,急于回家,没有去机场。他回到家,把开会情况略告老伴,即闻上空飞机嗡嗡不休。老伴说:"这是不是老蒋的飞机?"随即上凉台望去,那两架波音飞机,已离开城上空,而在中山陵上空盘旋,机尾上放出一溜白烟,向东飞去了。老伴向李世军说:"老蒋似在向南京,向总理陵墓最后告别了。"

下午,李世军接获李代总统的通知,约去傅厚岗邸谈话。

李世军问:"今后怎么办?"

梦想和共产党隔江而治的李宗仁,此时牢骚满腹,叹息道:"给我一分钱不留,兵不听我话,有什么办法?只有派代表去和共产党谈判了。"

(强剑衷)

史良虎口余生记

"上帝叫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1949 年南京政府倾覆前夕,国民党当局在上海等地疯狂地搜捕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民主同盟员大都列在特务的黑名单上。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史良,当时担任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由于她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当局对她尤其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是特务捕捉的最主要对象。事实上,自史良从重庆复员上海三年来,国民党特务就一直在监视她的行踪,只是时候未到,不便下手。上海临近解放时,他们便开始行动了。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曾发出密令,要"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

4、5 月间,史良因高血压在家中静养。当时解放战争已迫近上海,在宵禁时间内,她时常接到来处不明的电话,告诉她"小心,小心,今晚捕人"。4 月 26 日深夜,复旦大学民盟成员龚忠祥和谢开志被捕,民盟上海市组织进行了营救,史良还曾亲自找施剑翘的弟弟国民党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等设法营救,此时,她知道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正准备离家躲避。5 月 10 日下午,当她接到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的电话,告诉她今晚军警特务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她和丈夫陆殿栋立即离开家里,前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康花园公寓顾正寰(解放后在北京民航局飞行大队工作)家里躲避。顾是陆的好友,因上海战事紧张,全家已迁移他处,其房屋连同全部家具都交由陆家无条件使用。

5 月 11 日凌晨 2 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 20 余名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乘坐 3 辆吉普车,到开纳路(今武定西路)将史良的寓所团团围住,然后蜂拥入宅。警特用枪逼着工友宋阿福,问他:"户长陆昭华(殿栋)在哪里?陆史良在哪 里?"宋回答说:"我不知道。"话音未落,就挨了一记耳光。警特立即搜遍二楼三楼,并把全家大小人口集中一处,个别讯问。当他们得不到史良的消息时,一个特务头头即用手枪拍案怒骂:"岂有此理!决不能让她跑了。"临走时留下 5 个警特把守住宅,随后便开始在全市搜捕史良。

当晚,特务们又来到史家,他们将司机阿宝和宋阿福关闭一室,通夜严刑拷问,惨号之声,闻于邻里。阿宝受不住酷刑,供出了陆殿栋弟弟陆殿奎的住址,特务于是立即于次日(12 日)清晨赶赴陆家将他抓获,追问他史良的去处。当陆殿奎回答说不知道时,特务便对他进行毒打,并

威胁说："你是商人，没有政治关系，你的哥哥也一样。可是你嫂嫂是民盟要员，我匀要拘捕他们两人，你必须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我们，否则，只好对不起你了。"另一个特务接着说："我们监视你大嫂史良已有三年之久，现在命令下来要捉人，人又不见了。你既然不肯告诉你嫂嫂的地址，只好跟我们走。"陆殿奎就这样被带走了。

此时，司机阿宝又被迫供出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特务又将她的姑父母荣宝澧夫妇拘去关押在福开森路（今武闪路）20号。此处原为民盟秘密集会之所，此时已被特务占据。荣夫人看到荣宝澧年迈，不堪受刑，便说出了史良妹夫鲁莽（觉吾）的地址。14日天还未亮，鲁莽又被抓来福开森路20号。进来后，特务们为逼他说出史良的去向，便将他西装衬衣撕破，剥下裤子，全身施以滥打。这时特务将荣夫人释放，威胁她说："立即把史良找来，不然，你就来这里领你丈夫的尸体。"荣夫人听了悲愤万分，泣不成声，正要跨出大门，忽见她的儿子荣幼澧又被抓来，不觉心中痛如刀割。

史良在新康花园公寓住了几天，14日清晨，她妹妹史孟云（鲁莽妻）写一字条派男佣周大骑自行车飞驰送给史良，字条上写道："因鲁莽、姑父、司机、工友等已被逮捕，你们的地址不能保密，赶快离开原处。"史良和陆殿栋于是匆忙离开那里。她走出顾正寰家，还不知道投奔何处，哪里是可靠的地方呢？仓促间，史良猛地想起陆殿栋的表兄石懋钟家。石家住在南市小西小门1042弄3号，石懋钟当时在上海益丰搪瓷厂任会计科长，他是30年代上海咪吔洋行买办石南山的儿子。1936年12月史良拒捕去苏州投案前，曾在石家躲藏过，那时他家住在同孚路旭东里，后于1948年迁至南市小西门。史良夫妇俩为了避开敌人耳目，出门后乘坐一辆三轮车，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前悄然下车，佯称到里面的弹子房去玩，实际上是前门进，后门出。走出后门，即是凤阳路，那里有一祥生出租汽车行，她俩便乘坐出租汽车走了一段路，然后再改乘三轮车到达小西门石家。史良警惕地环顾周围，见无人跟踪，便先进石家大门，陆殿栋则在邻近的蓬莱路一家鞋店里等着，随即由石懋钟夫人戴敬文带他进家来。史良到达南市小西门时，看见里弄的墙壁上贴了许多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很明显这是国民党特务党徒们的"杰作"。史良决定到此处躲避，除了因为石家是亲戚，全家人都极可靠外，还因为平时不大往来，邻居不认识他们，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是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史良刚离开新康花园公寓不过20分钟，警备司令部的警特人员就赶到了那里，但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大失所望，只得悻悻然离去。

史良到达石家后，曾由石懋钟女儿石秀珍代拨电话给宋庆龄，请她出面援救，但未拨通。后又请戴敬文母女打电话探听她姑父母荣宝澧夫妇的情况，当她知道姑父和表弟因受牵连而被捕时，心中十分焦急，曾想去投案自首，以便使他们获释。后为石懋钟等所劝告阻，认为此时前去投案，无异去送死，而且不一定就能救得了他们。

史良的女秘书、盟务方面的助手田蕙青不知道福开森路20号已被特务占用，15日她去该处，当即被特务扣押审问。当特务未从她口中得到什么有关史良的信息时，便将她的衣服剥下，只剩下一条单裤，把手反绑在身后，吊在墙上，用皮带狠抽。打了一个小时，田蕙表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始终硬挺着，不肯屈服。一个特务说："她好厉害，其他女共产党员，受一刑就要哭。这样的打，她一点眼泪也没有，真不愧为史良的秘书。现在她既不肯招，先把她活埋吧。"田蕙青说："活埋我对你们无补于事，你们还是去叫陆昭华弟弟陆殿奎将陆家的亲戚朋友一个个写出来，然后你们去搜查。"随后，特务强迫陆殿奎写出他所知道的亲友地址。幸战事紧急，特务们急于逃命，来不及派人前去搜查。他们将拘捕的史良亲友和工作人员阿宝、宋阿福、陆殿奎、鲁莽、荣宝澧、荣幼澧、田蕙青7人，直接送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南市执行处拘留所羁押。5月15日这一天，特务们大肆洗劫史良家及她避难的新康花园公寓顾家的箱箧、衣物、家具、电器及所有摆设，全部一扫而光。

史良和陆殿栋在石家住了几天，南市区一带警察会同保甲长挨户检查人口。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连累别人，史良夫妇不得不转换地方。石懋钟夫人戴敬文当即提出可去她妹妹戴景贤家，妹夫张伯刚是长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人很开明进步，可保安全。随后石懋钟打电话给连襟张伯刚，暗示说家里有位女病友要到他家住几天，张表示欣然同意。于是史良夫妇立刻动身，雇了一辆出租汽车，由石懋钟夫妇陪同，护送前往张家。史良装着生病的样子，头裹白毛巾，紧靠在背垫上，人缩得矮矮的，以免被人发现。张伯刚家住在海格路（现为华山路）交通大学附近一座公寓大厦四层楼上，从南市小西门到海格路，有一段较长的距离，路上时常有警察拦阻行人盘问，检查身份证，气氛十分紧张。为了摆脱盘查，史良等乘坐的汽车开得很快，辗转好几个地方，最后平安到达海格路张伯刚家。史良向张表示歉意，张要她不必介意。

史良亡命在外10多天，一方面要设法营救因她而蒙难的亲友，另一方面自己也时刻提心吊胆，担心在亲戚朋友家久留，会引起不认识的人家怀疑而走漏消息，不得已，只好一步一步地向沪西接近人民解放阵地的地方移动。当她到张伯刚家的第二天，即5月24日夜11时，人民解放军装甲车11辆冲入霞飞路、海格路交通大学附近，次日上海解放，史良才从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在此以前，史良的亲友和工作人员7人在拘留所关了几天，执行处特务接到上级命令，要将他们用卡车装运到黄浦江边投入江中，因卡车在途中损坏，尚未到目的

地，解放军已至，特务们四散逃命，他们也才幸免于难。

据事后了解，经办这件案子的，是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即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就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毛人凤。

当史良知道上海市负责人。中共负责同志告诉她，党组织正在四处寻找她，听说她还活着，十分高兴。第二天（即5月26日），史良从张伯刚寓所返回家中，一路上看到的全上海市人民都在欢欣鼓舞的气氛中庆祝解放，内心无比激动，亲友们相见时都分外欣慰。当她见到宋庆龄时，百感交集，相抱而泣。6月间，史良和田蕙青介绍张伯刚参加了民主同盟。

不久，史良到北京，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出席了这年9月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史良向往追求的人民的新中国已经诞生。她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她自己；是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也救了她自己。

史良是个很讲情谊的人。石懋钟和张伯刚两家在她生命处于十分危险的时刻，不惜冒死援救、掩护她，使她大难不死，特别是石家曾两次隐藏她，她衷心铭感，解放后，史良任司法部长，每次到上海，都要去探望石家。石懋钟1960年病重住院时，她曾专门写信给广慈院院长，拜托他特殊照顾。对于因受牵连被捕亲友和工作人员蒙受的各种损失，史良曾拿出自己从事律师业务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积蓄予赔偿。

（周天度）

蒋介石1949年出访菲律宾、南朝鲜

1949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先后访问了菲律宾、南朝鲜。他的这次出访，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在蒋介石出访前，解放军已攻克南京，占领杭州，解放了京、沪、杭大片土地。蒋介石此时出访旨在建立国际反共联盟，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反共势力的支持，这是蒋介石此时想走的重要的一步棋子。为此，他不断制造舆论，宣扬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是抵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

他呼吁：一切反共产、反侵略、反极权主义的人们站在一起，精诚团结，集中力量，集中意志，百折不回，奋斗到底。蒋介石发表如此危言耸听的言论，无非是要引起国际反动势力的注意，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当时的菲律宾季里诺政府和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比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国内共产党等进步力量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朝鲜一半以上的国土被解放，严重地威胁着李承晚的统治，所以季里诺、李承晚和蒋介石唱着一个调子。，蒋介石说：“彼此之国势与处境与我正同”，“实有风雨同舟之感”，“彼此命运相关”（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所以，季里诺说：“赤色帝国主义猖獗于东方，吾人之自由有为其消灭之虞，太平洋国家，应群策群力，为本身谋福利。”竭力赞成“重新成立太平洋联盟，以应付赤色帝国主义之新奴隶制度威胁”（《中央日报》1949年7月4日）。

李承晚也叫喊：“亚洲局势非常危急，应当“立即组织太平洋联盟”，共同对付共产党的进攻。可见，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的意图是一样的，都主张结盟反共。接着，他们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一致同意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反共国家之军事、政治、经济联盟，藉以抵抗共产主义之侵略”。当时由于菲律宾的形势稍许好一些，所以蒋介石、李承晚就怂恿季里诺出来领头，“主动组织太平洋联盟”（《中央日报》1949年7月9日）。

蒋介石出访，组织反共联盟，也是为了拖住美国，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持。他在出访前夕向记者谈到“及时挽救中国，需要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何种步骤”问题时说：“余认为第一步美国对中国政府反共斗争，当重申其道义援助政策。……在大战中中国与美国为反抗侵略比肩作战，同生死共存亡之盟友，美国当不会漠视其昔日盟友长期陷于赤祸水深火热之中，而美国又为今日国际反共斗争之领袖国家，变不能独将中国置于援助范围之外。否则世界民主国家反共斗争之前途，不可想象”。（《中央日报》1949年7月7日）

蒋介石求援心切，竭立配合菲、韩政府领导人活动，尽力拉美国参加和领导反共联盟。他们直言不讳，“联盟的目标是希望美国参加”。“组织太平洋联盟之海上行动，必须来自美国’。“美国之领导，可以形成一团结中心，由于经济及国力限制，亚洲国家实力无力支持一真正有效之联盟”。（《中央日报》1949年7月9日）因为只有美国有经济、军事实力，能为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等反共政权提供经费、军火，甚至派出武装部队直接参战。

基于上述目的，蒋介石不辞辛苦，亲自出马，走访当时菲律宾、南朝鲜领导人。

1949年7月2日，蒋介石接到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关于欢迎访菲，“面商远东大局”的电报。他非常高兴，经过几天准备后于7月11日带着王世杰、黄少谷、吴国桢、俞济时、沈昌焕、张其昀、周宏涛、夏功权等一大批随员赴菲律宾访问。他一下飞机就发表声明：“余因季里诺总统之邀请，得访问菲律宾，私衷甚快。余此次系一私人资格旅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中，中菲两国站在同一战线作战，而余适预其役，菲律宾共和国宣告独立之日，除美国

政府外，中国复为首先与菲律宾政府建立邦交之国家，故余今日抵菲，自己感觉是菲律宾的一个老友。余此行为期甚短，但季里诺总统与余均盼此次会晤，对于中菲有关问题，尤其对于远东国家遭受共产主义威胁一事，能充分交换意见。”(《中央日报》1949 年 7 月 11 日)接着，就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等问题与季里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我们都认为中菲的关系应该强化，并且两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得以促进和更形密切。同时，对于远东国家协力求取充分发展，以保障他们的稳定与安全之迫切问题，也曾加通盘的磋商。鉴于他们在过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鉴于今日共产党对他们的自由与独立严重威胁，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有立即团结为一个联盟的必要，联盟的目的便在团结与互相以遏止并反抗此同一共同所遭遇到的威胁。”并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呼吁：“余等希望亚洲及太平洋其他各国终能起而响应此种同盟之最高目标。”(《中央日报》1949 年 7 月 12 日)蒋介石感到自己当时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与菲律宾总统发表联合声明，有点不伦不类，因而另外又发表了一个个人的声明：“本人虽然是以私人的资格应季里诺总统的邀请到菲律宾来与他会商，但本人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将建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联盟加以充分的支持，并采取行动完成上述联合声明中所说明的协议。”(《中央日报》1949 年 7 月 12 日)

使蒋介石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菲律宾总统为他留了一条后路。当联合社记者向季里诺总统问及在菲律宾成立中国流亡政府一事时，季回答说：“如果蒋氏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势将不加拒绝，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拒绝庇护另一国家的政府。”(《中央日报》1949 年 7 月 11)

蒋介石对菲律宾之行非常满意，所以一到台湾就发电季里诺表示“至深铭感”。

7 月 19 日，蒋介石在广州接到李承晚总统邀请访问南朝鲜的来电。蒋为了结盟反共，觉得“不能不有此一行”(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8 月 6 日，他带着一大批助手由定海抵南朝鲜访问。8 月 8 日，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只有团结，始能确保。”“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正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中央日报》1949 年 8 月 9 日)蒋介石照例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本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点，一定全力予以支持。这里，蒋介石由在野之人摇身一变为政府首脑。这表明，蒋介石将由幕后走向台前，是“复出”前的一次亮相。

蒋介石在出访期间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联合声明发表以后他又向南朝鲜记者发表谈话，说什么：中国和韩国是兄弟之邦，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一定能永远地团结一致，共同为自由、独立、统一的大目标迈进。

蒋介石与李承晚为达到结盟反共的目的，联名致电菲律宾总统：现在谨请阁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召集联合声明中所建议举行的会议。季里诺还是比较积极的，他把在碧瑶召集预备会的事交给外交部长办理，自己则重点做美国的工作。他非常清楚，太平洋联盟的成败关键在美国。当蒋介石在菲律宾访问时，菲高级官员就向蒋暗示过：“太平洋联盟之最后之成功，当视美国对之感觉兴趣之程度而定。”(《中央日报》1949 年 7 月 13 日)美国也很快就作出反应，表示不参加。其理由是：因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正取不干涉政策，将保持静观态度。季里诺说得婉转些：“美国因经济责任问题，不愿参加太平洋联盟。”其实，当蒋介石 8 月 6 日到达南朝鲜访问时，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美外交文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俗称白皮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蒋介石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而不是美国不支持。这给蒋介石组织反共联盟泼了一大盆冷水，蒋介石十分气恼，大骂：“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季里诺为使蒋介石不过于失望，而硬着头皮于 8 月赴美国访问。他与美国政府要员会谈，走访各方人士，发表演讲，鼓吹反共联盟，力劝美国参加，“敦促支持反共联盟’。(《中央日报》1949 年 8 月 10 日)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不予理睬。李承晚、季里诺也不再感兴趣，蒋介石只能听之任之，他努力想促成的反共联盟遂成为泡影。

(蒋顺兴)

于右任黯然别大陆

1949 年 4 月 15 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这天，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16 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和中共进行谈判。”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讨论，他首先表示于右任此时没有必要北来，他留在南京可以促使政府批准这个

协定，待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大家同意张的意见，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会上推定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宁南下复命并请示。第二天晨4点钟，周恩来找屈武谈话，谈及于右任北上问题，周说："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过事干涉。"周接着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16日上午十时，屈武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飞回南京，到南京后即乘车直往傅厚岗李宗仁公馆复命。会散后屈武前往岳父于右任公馆拜望，把北平和谈经过和李宗仁公馆会议情况告诉了他，认为"看起来这个《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于右任顿足道："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到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屈武这才将周恩来希望于先生留在南京的一席话原原本本讲了出来，于右任感慨道："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果然，4月21日晨，监察院长于右任只身被胁迫至沪，以后辗转香港、重庆二地，于11月29日抵达台湾，从此与夫人、女儿天各一方。1962年1月，病中的于右任，发出了怀念大陆的哀音：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本文摘编自《屈武文选》）

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

1949年1月21日正午，蒋介石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2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天下午4时10分，乘"美龄号"专机，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绕空一周之后，飞抵杭州。第二天，仍由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溪口。下野之前的1月12日，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国务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组长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架设电台，以便遥控指挥。

关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政局的事，史籍已有许多记载，这里仅录前所未闻的一件事。不久前，原阎锡山秘书、现美洲《中报》报系集团董事长傅朝枢来溪口时谈起：1949年2月，他陪阎锡山住在上海，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打去的电话，云有要事相商，邀阎速到溪口一行。17日那天，阎锡山匆匆赶到溪口。蒋介石在武岭门外恭候，两人携手步入丰镐房，在西厢房客厅，先是抱头大哭，然后摒退随员，商议机密要事。这件事，阎当时守口如瓶，只字未吐，直到去台以后，事过境迁，阎才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向傅朝枢泄露了此行的"天机"，就是密谋策划孙科辞职后的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当时，司法院长居正很有可能继任，居正是国民党元老，早期位居蒋介石之上，蒋怕由他组阁，难以控制，就特邀号称"足智多谋"的盟兄阎锡山前来共商对策。两人商量有顷，确定由陈立夫负责破坏选举，不让居正当选。陈立夫主管国民党的组织工作，深通此道，但蒋介石还是要他立下"军令状"，"如果居正当选，你提脑袋来见"。在蒋介石作了周密部署之后，居正果然没有出掌行政院，而由何应钦继任。

农历过年之后，蒋介石估计在溪口立足的时间不长了，就提前到葛竹外婆家辞行。过村后的第一件事是拜望舅父。他的舅父王贤巨把外甥让进屋里，叫出全家，按辈分大小一一见面问好，王贤巨的五位孙女依次上前叫蒋介石"伯伯"，蒋应接不暇，连说"伯伯没有带色花"。"色花"是奉化土话，意思是指大人送给小孩吃的糖果糕点之类的礼品。当时，五姐妹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10岁。所以，蒋介石觉得空手受礼，有点不大自在。当王贤巨的长工王涨才端茶上来时，听到蒋介石对他的舅父说："舅舅，我的总统位子已经交给李宗仁了，这次我要在葛竹多住几天，以后准备到五台山去修静。"后来只宿一夜即返回溪口。临行时，他反复嘱咐他的表弟王良穆"到溪口来"。王良穆后来说：表哥从来没有这样反复邀请过，他走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当时不便明说，心里是想带我一同走啊。

葛竹之行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大舅母张定根家里吃中饭时，对张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一起去？"张问："到哪里去？"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

这一年农历3月18日，是蒋经国的四十岁生日，在风雨飘摇危局中，蒋介石特别重视给儿子的精神支柱，特地为他题了一块祝寿匾额，上书"寓理帅气"3个大字，旁边还写了一段跋文："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余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

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中正题并跋。”生日那天，在武岭学校礼堂摆酒庆贺，招待亲信，笼络感情。

蒋介石知道这次离开溪口杳无归期，因此，凡与他关系密切的地方都一一亲临告别。除了一再在他母亲墓前默祷，拜别其父坟墓之外，他到过奉化县城，看了锦屏山，中塔，岳林寺，还有孤儿院；又去宁波方向，看了天一阁、金峨寺、天童寺、育王寺，又间道至小盘山，拜别先祖蒋摩诃墓；还遍访了奉化各地的蒋氏宗祠，足迹遍及三岭、楼隘、沙栋头、葛岙等蒋姓聚居的村落。

蒋介石最后离开溪口的确切日期是 1949 年 4 月 25 日(农历三月廿八日)。临行前，溪口父老为他送行，有人问他何时回来，他一言不发，伸出了 3 个手指头，让人猜想。那天午后，蒋介石一行从溪口出发，下午 2 时左右到达宁海县西店乡团堧村。从海塘下竹排，行半公里光景，即登汽艇；再由汽艇行 1 公里半，驳到“太康”号兵舰，然后，由狮子口出海，直驶上海方向而去。

关于蒋介石下海时的情景，当地曾为他撑竹排的戴扬土记得得很清楚，他说：蒋介石下海的前一天，我们会的 4 个保、40 名甲长都接到通知：“明天有一大官过境，所有甲长都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第二天，一共到了 20 张排，我与戴愈茂两人撑蒋介石坐的那一张，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排上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坐椅，排上坐了 5 个人，除蒋介石以外，还有蒋经国，俞济时和两名卫士。蒋介石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事后，赏了每个甲长 1 元银元，有的未发到，有的不敢要，大部分落入了保长的腰包。”

(摘自《民国春秋》)

流行风

电影《希望在人间》

这部影片仍由朱今明摄影、兰马、上官云珠主演，完成于 1949 年 3 月。它描写上海沦陷后大学教授邓庚白，因鼓吹抗日爱国思想被日寇特务机关逮捕；他及其全家在日寇凶焰下，临危不惧、英勇斗争，很好地再现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并对革命的叛徒、民族的败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邓庚白这个革命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典型，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重要意义。影片艺术构思不凡，情节引人入胜，但又都为塑造人物服务；导演处理上具有鲜明强烈的生活特色，表现了现实主义的特点；表演艺术也有着出色的成就，尤其兰马扮演的邓庚白，很好地体现了角色的精神风貌。

电影《三毛流浪记》

《三毛流浪记》——韩仲良摄影，王龙基主演。影片开头不凡：清晨，清道夫推着车子沿街倒垃圾，忽然从他车子里钻出一个肮脏可怜的流浪儿。于是，这个孩子白天流浪街头，晚上睡在狗窝，为了活命他跟别人学卖报、捡烟头、去桥头推车；遭流氓殴打后，被一个地皮分子收留了他，从此加入流浪儿童群，在街上偶然看到一人丢了钱包，他主动送还失主反遭毒打，诬他是小偷；这时被一个扒手头(关宏达饰)看中将他收为徒弟，逼他学偷；初偷失败他逃跑了；最后饥饿难挨，便效法卖孩子的样儿，标价自售，结果被一富家买作义子，于是他被打扮起来，成了“汤姆少爷”。三毛对上流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在宾客满堂，争看“汤姆”少爷时，他却溜进地下室，拿出许多好吃的东西款待那些流浪的小朋友。在主人命令驱赶下，一群流浪儿童东奔西窜，涌进大厅，经过一场混乱后，三毛脱掉西装，又披上麻袋片离开富贵之家，回到苦难流浪的小朋友中去了。

影片通过对三毛浪迹街头、饥饿、屈辱的生活描写，尖锐地嘲讽了旧社会的贫富悬殊、黑暗不平；同时也赞美了流浪儿童的质朴善良和友爱的品格。影片将流浪儿童置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表现他们种种的遭遇、不幸的命运，为富人收养纯属偶然，旧社会给他们的只有在流浪中死亡或是走扒窃的道路。影片采用讽刺对比手法，暴露统治阶级的虚伪，旧制度的罪恶。如“四·四”儿童节那天，富家子弟出入商场，任意选购自己喜爱的礼品，三毛和他的同伴们却被摒门外，这时广播里在讲什么“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一类谎言；再如童子军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时，三毛也禁不住跟着队伍踏起步来，而那个高喊“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的童子军教练，却回过头来不客气地打了三毛一棍……。

扮演三毛的王龙基，当时八岁，是昆仑公司作曲王云阶之子，他脖子细，脑袋大，很调皮，但聪明、活泼，一下被导演所看中，经著名化装师辛汉文设计造型、三撮毛，圆鼻头。表演果然成功，他在影片中真挚、动人地表现了流浪儿童三毛的机灵、聪敏和倔强的性格。

电影《水上人家》

《水上人家》——瞿白音编剧，顾而已导演，完成于1949年，是“大光明”第二部出品。影片表现解放前夕海边渔村的生活和斗争。渔行老板麦太公(顾而已饰)垄断渔市，盘剥渔民；欲逼渔家女阿妹(黄婉苏饰)以人抵债，这激起与阿珠相爱的余晋华(高占非饰)和其他渔民的愤怒和阻拦。有人提议大家结队去解放了的邻村去生活，唯余伯不同意，这时阿珠被麦太公抢走了，余伯觉醒，决定和大家同走。行前，麦志清(顾也鲁饰)、阿宝(狄梵饰)救出阿珠，并送她到海边。随之麦家管事和爪牙也追来海边，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斗，阿宝为保护余晋华而牺牲，余晋华也将杀死阿宝的管事击落岩下。最后船队向邻村开去。

影片正面提出了压迫与反压迫斗争的主题。通过对麦太公的描写，揭露了船主恶霸盘剥渔民，强占少女等罪恶；通过对余恶华形象的刻划，颂扬了青年渔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影片还体现了作者为全国胜利而欢欣和对解放区的向往。影片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都是鲜明的，象麦太公的阴险残暴，余晋华的敢于反抗，七叔的善良、阿珠的聪慧以及余伯的转变等，都比较真实、生动。

电影《恋爱之道》

《恋爱之道》——夏衍编剧，欧阳予倩导演。完成于1949年5月，南群公司出品。影片故事是倒叙展开的，在圣诞节之夜，由女儿宣布订婚引起父母回顾他们是怎样结合的。20年代初，周家浩(冯喆饰)和钱兰英(舒绣文饰)是一对恋人。不久家浩离开上海去广州，接着随军北伐。兰英在母亲主持下被迫与世交阔少张鸿昌(顾而已饰)订婚。后大革命失败，家浩回到上海，兰英不顾母亲反对，坚决与家浩结婚，并随他远走南方。一年后生下女儿元珍；母亲得知予以谅解，他们又回到上海家住。家浩在纱厂工作，不料厂主正是张鸿昌，他已与省长女儿(黄婉苏饰)结婚，俨然是个新贵，家浩愤然辞职。抗战爆发后，家浩夫妇带女儿流亡后方，在黔桂铁路某小站上当代理站长。老工人王健(方茨饰)很警佩家浩的耿直为人，其儿子友琛和元珍也相处甚好。后桂林大撤退，难民数十万。张鸿昌也来到此站，以私货冒充军品向家浩要车，家浩不予置理；这时女儿突发肺炎，兰英为救女去找张鸿昌要药，而他要以运走其私货为条件，家浩坚决拒绝。后张鸿昌恼羞成怒，指使随从硬抢车皮开走，老工人在与他们搏斗中牺牲了。抗战胜利后，家浩一家回到上海。最后，家浩望着妻子女儿赞叹地说：“她象她妈，在人生开始的第一步，她就挑选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电影《结亲》

《结亲》完成于1949年，是南群公司第二部出品。剧本由夏衍、葛琴根据葛琴同名小说改编，章泯导演，李露玲、冯喆主演。影片描写解放前夕的江南农村，曾做过地主家丫头的春梅，几年前丈夫被抓壮丁，如今突然传来消息说她丈夫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于是，地主们争相和她攀亲，认她做义女；而她却和乡亲们一道高高兴兴地迎接解放军进村去了。影片是一部相当简洁流畅的讽刺喜剧，它尽情地嘲笑了地主们企图采用“攀龙附凤”手段，作垂死挣扎的丑恶面目和可耻目的。

电影《珠江泪》

《珠江泪》——1949年夏完成。陈残云编剧、王为一导演。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蔡楚生的诸多帮助。影片描写战后珠江岸边一个农村，汉奸恶霸官仔贵(张瑛饰)买通省派国民党专员，摇身一变成为“清乡大队长”。他毒打控告他的农民张九(石坚饰)，勒逼大牛子(李清饰)和阿鸡(马孟平饰)交租纳粮。官仔贵看中漂亮的牛嫂(王辛饰)，便施计将大牛子和阿鸡抽了壮丁。他俩逃往广州做了苦力，后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在农村，乡长向牛嫂追讨壮丁费，官仔贵乘人之危，买下牛家房屋作抵押，企图污辱牛嫂。牛嫂也被逼逃往广州表婶(梁淑卿饰)家。后被鸨母肥婆三(陶三姑饰)骗去做女佣，企图逼她为娼。官仔贵害怕游击队的活动也逃来广州；一天他到肥婆三家遇见牛嫂，并污辱了她。这时，大牛子和阿鸡溃逃广州，得悉家乡解放。大牛子打听到妻子的去处，牛嫂在妓女阿梅帮助下逃出肥家，辗转与丈夫相见。最后，这群历尽艰辛、苦难的农民，打跑追来的官仔贵后，乘船向解放了的家乡驶去！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作者丁玲，主要内容：

小说以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五四指示”传达前后为背景，反映华北地区暖水屯的土改运动初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面貌，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战胜封建势力取得翻身解放的伟大胜利。它真实地表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土改运动的艰巨性。作品以广大贫雇农与恶霸地主钱文贵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同时围绕着主线，揭示了从地主、农民、干部到战争风云、历史

根源等各种性质的矛盾冲突。钱文贵阴险狡猾、老谋深算，对土改早有“应变”准备。由于广大农民当时普遍存在怕变天思想，加上自身的封建传统观念和宿命论思想等弱点，他们虽对钱文贵刻骨仇恨，但又怕扳不倒他。而土改工作组内部又对钱文贵认识不一，农村干部在斗争钱文贵上也各有思想顾虑，因此，暖水屯的反霸斗争一直找不到斗争的主要目标。后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来村，与工作组、村干部一起检查错误，总结教训，统一了认识，终于发动群众，斗倒了钱文贵，使暖水屯农民真正获得解放。在欢庆土地还家的大喜日子里，全屯一百名青年参军支前，保卫胜利果实。作品塑造一大批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的地主、农民、干部的形象，其中如恶霸地主钱文贵，农村干部程仁、张裕民，积极分子侯全忠、刘满，中农顾涌和黑妮等人物刻画得格外成功。全书结构严谨完整，布局错落有致，特别以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也取得显著成功。是反映土改运动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小说《暴风骤雨》

作者周立波，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两部。第一部反映从1946年党中央发表“五四指示”后松花江畔元茂屯土改初期的斗争情况。肖祥队长带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元茂屯，发动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但由于战争形势复杂，加上敌人造谣破坏，不少农民把分到的果实退了回来。工作队重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成立了以赵玉林为首的工农联合会，带领群众处决韩老六，韩的兄弟又领着土匪武装进屯，企图扼杀新生政权，赵玉林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第二部反映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郭全海继承赵玉林未竟之业，在肖祥队长支持下清除混入农会的坏分子，斗倒了地主杜善人，抓住了特务韩老五，取得了土改的新胜利。为保卫胜利果实，郭全海在新婚后带头报名参军，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途。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土改运动的全过程，展示了农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所经历的历史变革，歌颂了广大农民冲决封建罗网，在解放的道路上迅猛前进的革命精神。它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赵大嫂、白大嫂等一批新型农民的形象以及韩老六、杜善人等地主形象。结构宏伟完整，情节波澜起伏，曲折动人。作者善于通过矛盾斗争的尖端展示人物性格，大量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

诗《妇女自由歌》

旧社会，好比是：
黑格洞洞的古井万丈深。
井底下，
压着咱们老百姓，
妇女在最底层。
看不见太阳，
看不见天。
数不清的日月，
数不清的年。
做不完的牛马，
受不尽的苦！
谁来搭救咱？

多少年来多少代，
盼那铁树把花开。
共产党，毛泽东，
领导全中国走向光明。
中国人民大解放，
受苦的老百姓见到太阳。
土地改革大翻身，
砸碎了封建的老铁门！

从前的妇女，
关进了阎王殿！
今天打断了铁锁链！
妇女成了自由的人，
国家大事也能管问。
自由歌儿放声唱，
翻身不能翻一半。
走在阳光半天下，
锄掉荆棘闹生产。

支援前方大进军，
彻底翻掉蒋家天。
建设出来个新中国，
歌唱自由万万年！
歌唱自由万万年！

（阮章竞）

诗《历史的守卫者》

夜晚，在接近炮火的前方，

我看见我们的哨兵
守卫在一棵大树的隐蔽下，
那一副永远闭着深厚嘴唇
收着下颚的庄严的面容，
象一座古希腊神话里青铜的铸像，
整个的地球都旋转在他的脚下；
他铁山一样的屹立着，
仿佛凝视着无穷的远古直到现在，
凡所有属于他的每一秒钟，
都灌注了真实的代价和意义。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
今天这样黎明以前的夜晚，
正象我们今天这样黎明以前的时代。
无数的人在战斗，在呐喊，在工作，
眼看着那咯着血丝的恐怖和
　暗杀的统治已经完了，
一个又红又亮的
　辉煌的太阳就将升起，
就将照射着我们伟大的民族和土地，
就将照射着那矿山的烟突和丰饶的农场，
而且就将把这担负了历史守卫的战士，
镀成不朽的黄金的铸像一样。

（李瑛）

诗《诗人》

有奴隶诗人
他唱苦难的秘密
他用歌叹息
他有诗是荆刺
不能插在花瓶里
有战士诗人
他唱真理的胜利
他用歌射击
他的诗是血液
不能倒在酒杯里

（绿原）

歌曲《草原情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她那粉红的小脸，好象红太阳；
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象那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牧羊；
每天看着她粉红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变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历史档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表（1949年2月—6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参谋长　周恩来（兼）　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兼）
副总参谋长　聂荣臻　叶剑英
总政治部副主任　傅　钟
秘书长　杨尚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第一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
第一副司令员　张宗逊　第二副司令员　赵寿山

参谋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参谋长　王政柱　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生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王　震　参谋长　张希钦
政治部主任　孙志远
第二兵团司令员　许光达　政　委　王世泰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参谋长　张文舟

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　参谋长　李　达
第三兵团司令员　陈锡联　政　委　谢富治
副司令员　王近山、杜义德　政治部主任　阎红彦
副参谋长　王蕴瑞　政治部副主任　钟汉华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陈　赓　副司令员　郭天民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　政治部副主任　胡荣贵
第五兵团司令员　杨　勇　政　委　苏振华
副政委　张霖之　政治部主任　甘渭汉
副参谋长　潘　焱　政治部副主任　石新安

第三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　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　粟裕
第一副政治委员　谭震林　参谋长　张　震
政治部主任　唐　亮　政治部副主任　钟期光
第七兵团司令员　王建安　政　委　谭启龙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姬鹏飞　参谋长　李迎希
第八兵团司令员　陈士榘　政　委　袁仲贤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江渭清　参谋长　何以祥
第九兵团司令员　宋时轮　政　委　郭化若
参谋长　覃健　政治部主任　谢有法
第十兵团司令员　叶　飞　政　委　韦国清
参谋长　陈庆先　政治部主任　刘培善

第四野战军

司令员　林　彪　第一政治委员　罗荣桓　第二政治委员　邓子恢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谭　政　第一参谋长　肖克
第二参谋长　赵尔陆　副参谋长　聂鹤亭　陈　光
政治部副主任　陶　铸
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肖劲光　第一副司令员　陈伯钧
第二副司令员　韩先楚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唐天际
参谋长　解　方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程子华　政　委　肖　华　第一副司令员　李天佑
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彭明治　政治部主任　刘道生
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刘亚楼　政　委　莫文骅　第一副司令员　黄永胜
第二副司令员　刘　震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邓　华　政　委　赖传珠
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洪学智　第二副司令员　贺晋年
政治部主任　肖向荣
第十八兵团(总部直属)司令员兼政委　徐向前
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周士第
副司令员　王新亭　参谋长　陈漫远　政治部主任　胡耀邦
第十九兵团(总部直属)司令员　杨得志　政　委　罗瑞卿
副司令员　葛晏春　参谋长　耿　飚　政治部主任　潘自力
第二十兵团(总部直属)司令员　杨成武　政　委　李井泉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李天焕
铁道兵团(总部直属)司令员　滕代远　副司令员　吕正操
参谋长　李寿轩　政治部主任　王鹤峰

西北军区

司令员　贺　龙　政治委员　习仲勋　副司令员　王维舟
参谋长　张经武　副参谋长　朱早观

绥晋绥军区

司令员　贺　龙(兼)　政　委　李井泉
副司令员　谷志标　参谋长　唐健伯

东北军区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高　岗　副政治委员　李富春
参谋长　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　周　桓　副参谋长　段苏权

华北军区

司令员　聂荣臻　政治委员　薄一波　副司令员　徐向前
参谋长　唐延杰　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　政治部副主任

蔡树藩

华东军区

司令员　陈　毅　政治委员　饶漱石　副司令员　粟　裕　张云逸
副政治委员　谭震林　政治部主任　舒　同　副参谋长　周骏鸣
政治部副主任　唐　亮

辖山东军区

司令员　张云逸(兼)　政　委　康　生
第一副司令员　许世友　副政委　傅秋涛
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袁也烈
第二副政委　向　明　政治部主任　王集成

华中军区

司令员　林　彪　第一政治委员　罗荣桓　第二政治委员　邓子恢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谭　政　参谋长　肖　克
副参谋长　聂鹤亭　陈　光　政治部副主任　陶　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原国民党海军起义舰艇、人员统计

1949 年 2 月至 12 月，原国民党海军起义舰艇 73 艘，起义官兵达 3400 余人。

1949 年 2 月 12 日，鞠庆珍、王子良策动国民党海军"黄安"号军舰官兵 60 余人，在青岛起义，后驶到连云港解放区。

1949 年 2 月 25 日，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起义官兵达 570 人。舰长邓兆祥。

1949 年 4 月 23 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舰艇 25 艘，官兵 1270 余人，由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

同日，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舰队 23 艘，官兵 400 余人，在镇江江面宣布起义。

1949 年 9 月 19 日，国民党海军"长治"号军舰士兵陈仁珊，带领官兵 160 余人，在上海吴淞口外起义。

1949 年 10 月 26 日，准备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海军"联荣"号军舰官兵 70 余人，在李振华等人的策动下，起义回到广州。

1949 年 11 月 30 日，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军舰 5 艘，官兵 400 余人，在叶裕和带领下在重庆江面起义。

此外，国民党海军"灵甫"号军舰人员 70 余人和"永明"号军舰 28 人，虽策反军舰起义未成，但他们不畏艰险，从香港先后起义。

1964 年 10 月 4 日，赵宗礼驾驶的"1279"号登陆艇起义归来。

蒋介石：新年文告

（一九四九）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及宪政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我深觉建国事业陷于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愧万分。

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之主要目的乃在于为和平建设奠定坚固之基础，以期减轻人民痛苦。政府的首要的任务在收复东北，以期保持我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但不幸我们未能做到这些。

另一方面，济南已沦于共党，郑州、长春与沈阳亦相继陷入彼等入手。1931 年之沈阳悲剧现已重演。华北、华东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

处此国家危机，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徨悚栗。

决不放弃自由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家族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来决定。

政府应付这一局势的政策，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我们相信所有爱国公民均不能忍受共党之"清算"、"斗争"，他们绝不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处此危

急之际无所行动。

但我们也深知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大家也都希望战争及早结束。中正受全民的付托，负国家的重责，对于当前的局势自应有详切的检讨，而对于人民的希望更不能不作深长的考虑。

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

所以抗日战争再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

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

最后共党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与民族生存之道。

对共产党人诚意的试验

战争结束后不久举行之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所以我们同胞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问明共党对和平之意向究竟如何。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反之，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战争转变的枢机亦在于此。

我同胞须知今日惟有军民一致，坚持自卫战争，而在决战之中获得胜利，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更惟有忍受一时的痛苦牺牲，才能获致光荣的胜利。中正个人自参加国民革命以来，迄今凡四十年，我在每一长期战役之中，都是备历艰辛，饱经挫折，受尽诬蔑，无论失败到什么程度，我始终持有必胜之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遇。

要知道我们在斗争中所依恃者为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共党匪军的暴力能劫取我东北，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民族精神；能侵入我们的腹地，却不能侮辱我民族的人格。正义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要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而且必须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同胞们：当此民族危机之际，更觉中正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希望我爱国同胞与余共勉，团结一致，为保持宪法之庄严，中国领土及主权之完整，人民之自由，以及文物之延续而奋斗。国父说："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转自《中美系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李宗仁、何应钦致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北平六国饭店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一一。今日国家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于战乱不已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宗列祖，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退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之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全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

乃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名，窃恐由于此种狭隘与压作风之刺激，士气

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则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决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驯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抑必造成仇仇相报永远砍杀之悲惨局面，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

即以条文内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规定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府一切军事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亦应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得占之制度，关于整编程序规定为集中整理与分区改编两阶段，所谓集中整理，即是由共方所控制之整编委员会命令国军将防区与仓库物资等先行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再开赴共军认为适当之地点集中，以便分区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如此改编工作完成之日，即国军全被消灭之时。

在政治方面：1.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共军"办理各地的接受和移交事项"，中共不但要接收政府的军队和全国政权，而且要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之恐怖统治形式，以"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依照协定条文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质言之，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待共党之提议，而且政府参加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数及人选，均从听命决定。上述云云，不过略举数项，以为例证。

实则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决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之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也将因中共军队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得，势所必然，无待深论，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所忍出此？

总之：吾人今日如真能体认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同具有谋和之诚意，则必须泯除一切敌对与报复之心理，根据事实，适应环境，共策合理有效之方法，以达到彻底消弭战争获致真正永久和平之目的，因之政府除对中共此次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表示上述原则之意见外，仍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至于自今年元旦以来，政府军队每遇共军进攻，均尽可能极力退让，事实具有，有目共睹，然中共方面不但未能停止进攻，且自四月一日政府和谈代表抵达北平以后，若干地区之攻势，较前愈趋猛烈，殊堪遗憾。

慈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转自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

和平绝望奋斗到底

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现在共党匪军引渡长江，南京业已撤守，我爱国军民同胞，八年血战，从日本军阀铁蹄之下光复的首都，为时未及四年，又沦陷在共产国际铁幕之中。我们今日面对着这一种摧残人民自由、毁灭国家独立、威胁世界和平的黑暗的暴力，每一个国民的生命已经是与整个国家的存亡结成一体而不可分了！中正虽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而对于国家的危难，同胞的灾祸，仍自觉其负有重大的责任。际此忧危震撼之时，中正重申决心，誓与我全国同胞，共患难，同生死，并掬我赤忱，向我爱国军民特进一言。在对日作战时期，我们中国唯一重大问题，就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唯一的重大的问题了，所以中正在抗日战事甫告停止之时，竭尽心力，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

我们知道，共产党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中国所能单独解决，但在当时，我们认定这一问题如果由中国本身或国际共同以和平方法来解决，则抗战的成果，可

以保持，人民可以休养生息，国家建设可以顺利进行，而世界和平安全，方不致受其威胁。所以我们政府当时以最大的诚意，不惜忍让一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接受美国的军事调处，并四度颁发停战命令，以促进和平解决的成功。不料商谈调处经过了一年有余的时间，共产党不独毫无谋和的诚意，并且变本加厉，倒行逆施，利用和平商谈与军事调处的掩护，和国军停战的机会，进据东北，阻挠国军接受东北主权，并南渡黄河，扩大中原的战乱。政府至此，始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积极剿匪，在戡乱政策确立之时，我们知道如果剿匪军事不能在一二年以内到达成功的境域，不但人民痛苦如水益深，并且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将受严重的影响，我们中国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与世界人类同罹空前未有的浩劫。因此政府集中力量，动员作战，务期戡乱政策得以贯彻，军事行动迅速完成，以拯救国家的危亡，消弭人类的战祸。但是由于我们政治、军事的缺陷，中外人士的误解，再加以共产党宣传的毒素与间谍活动渗透于其间，使我们内政、外交与士气、人心，都不能适应剿匪动员的需要，遂演成今日的严重局势。

今年元旦中正重申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并洁身引退，以期促成和平的实现。三个月来，李代总统忍辱负重，与共党折冲，委曲求全。但是在此期间，共党公然发表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苏俄作战的宣言，暴露其国际第五纵队的面目，接着便提出了他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廿四款的招降书，迫使我军缴械投匪，撤除我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保障，最后更发出其总攻击令，突破我长江防线，向江南大举进犯。共党这次以强暴专横的态度，破坏和平商谈，继续扩大变乱，更是完全证明了他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更确切的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和平与民主，而是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征服，要把我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领土，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共产国际的基地，要把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炮灰，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这一严重局势的演成，始终是在我们苦思焦虑之中，这不止是中国一国存亡的决定关头，而世界民主国家对此都不能回避其影响，也就不能诿卸其应负的责任。

同胞们：我们看透了共党匪徒灭亡祖国、出卖民族的阴谋，我们领受了和平商谈两度失败的教训，我们对于匪军横暴残忍的进逼，只有全国一致，万众一心，奋起应战。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我们今后[illegible]战斗，亦是艰苦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会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会战争，和保障我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和平仁爱的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战争最后的结果，将要决定整个国家的存亡，将要决定每一个国民和家庭的生死与祸福。这一个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人民的自由生存方式，都必归于毁灭，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若是这一个反侵略、反共产战争果能成功，则国家是独立的国家，人民是自由的人民，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其光荣的贡献。为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现在这战斗是开始了！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的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我们今日只有在民族大义之下，不分职业阶级，不计个人恩怨，凡是不愿做共产国际的奴隶、牛马，不能坐视民族与历史、文化的沦亡，不能坐视祖宗庐墓、田园的丧失、家庭、夫妇、儿女的分离，一切反共产、反侵略、反极权主义的人们，站在一起，精诚团结，集中力量，集中意志，百折不回，奋斗到底，我深信必能克服当前的危机，达到最后的胜利。

同胞们：我们中国原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但在东方大陆，实是一个独立的大国，而且为国家独立、民族自由、为了民主和平而奋斗，持有光荣无比的历史。我们今日剿共是为独立自由和每一人民自身生存而战，也是为世界安全人类幸福而战，我今日不顾共产国际的诬蔑，不问民主国家的观感，站在反侵略的尖端，作世界反共斗争的先锋。我们相信世界人类必持正义，只要我们尽其在我，在国际社会上，一定是吾道不孤，但是，我们必须祛除依赖的观念，尤其是要洗涤侥幸的心理，中共在四月四日已经发出宣告，信誓旦旦，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苏俄作战了，他没有一点国家意识和民族思想，他对于祖国和同胞，也没有丝毫的爱护心和责任感。我们经过和平商谈的两度失败，绝对不能想像共产匪徒还会改变他的政策，更不能希冀他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知道：毛泽东甘心依附共产国际，做侵略国家扩张政策的工具，其为汉奸与汪精卫相同，而其心地之深沉，行为之险毒，远非汪精卫所能比拟于万一。汪精卫是在我们中国抗日战争受了挫折的时期，对抗战丧失信心，投降日本军阀，为了个人谋苟且偷生之地；而今日的毛泽东，乃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之后，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已经确立，建设事业正在萌芽滋长，人民生活正要走向复员进步的前途，不料他丧心病狂，竟带领了他共党匪徒，处心积虑，摧毁抗战胜利的成果，破坏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阻挠国家建设，妨害人民的复员和休养生息，甘心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他卖身投靠、卖国求荣的牺牲品。他每一步骤，每一行动，都是执行国际阴谋，谋逞狂妄野心，这岂是汪精卫所能望其项背？我们今日面对此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元凶巨憝，只

有恢复我们革命精神，发挥各人自己的力量，把握匪军的弱点，再接再厉，奋斗到底，不然我们如果稍存依赖，只有因循怠惰，任人宰割。如果中途妥协，只有投降，更只有低首就戮，自取灭亡。

我们承认过去东北和华北屡次的失败，我们预料当前局势，也许更要恶化，但是我们决不气馁，更绝不失望。要知道，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是匪军实力怎样坚强，而是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能从容不迫的在我们前方军队与后方民众中间，埋伏间谍，散播失败主义的毒素，以瓦解士气和人心，所以国家拥有优势的兵力，反遭较严重的挫折，中正对于过去政治、经济的缺陷和剿匪军事的失败，以致我们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躏和残杀，坠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来过这种黑暗地狱的活罪，这是我个人德薄能鲜，应该负其重大的责任。因为我对共产党的阴谋暴行，认识特为深切，所以我对国家的危难与人民所受的灾祸，愧疚尤其沉痛。但是我决不动摇我救国救民的信念，确信我们必能从共产铁幕之中，拯救我全国同胞，重登自由康乐的境域。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日只要我全国同胞，一致奋起，拥护政府，督促政府，使政治有适时的改革，经济有一定的方针，军政干部更能彻底觉悟，加强组织，只要我们接受失败的教训，使失败成为陶冶和洗炼，在政治上奏洗心革面之效，在军事上收汰弱留强之功，更使军事、政治优秀的人才与民众自卫活动，打成一片，为剿匪武力开辟广大无比的源泉，深认我们国家转危为安之机，就在共匪渡江深入的今日。

同胞们：我们更要知道，渡江是匪军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党暴露他最大的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固然共匪渡江以后，我们华南民众又要遭遇华北和东北同胞一样的黑暗和痛苦，但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前途的光明与最后的胜利，亦就在此开端。因为就战略和政略上来说，共匪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日本之所以急于南侵，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完成其控制全中国的梦想。而今日第三国际第五纵队之共匪，亦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前，控制全中国，为共产国际充实其应付世界大战之人力物力与资源，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中国剿共最后胜利的把握。我在抗战胜利以后，对上海群众大会说："我们还要再作八年苦斗，用过去八年抗战一样的精神，来准备牺牲与忍受痛苦，方能获得真正的胜利与成功"。这句话我就是为今日而说的。同胞们：不要丧气，不要悲观，只要起来决心奋斗，共匪就无法灭亡我们国家，亦不能奴役我们本身，不出三年，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同胞们：国家的危亡与个人的灾祸，是十分迫切了！共匪必败与反共必胜的道路，亦是十分明白了，救国自救的战斗，已经开始发动了，十一年前南京撤守政府西迁，乃是我们政府长期抗日战事的起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惟一的转机，所望我全国军民，一致接受李代总统的领导，全体将士，绝对服从何兼部长的指挥，扫除失败主义的心理，发挥一切可用的力量，支持反侵略，反共产、求生存、求自由、拯救国家、保障民主的神圣庄严的战争，达到最后成功的境域。中正个人领导国军服务政府二十余年，过失缺误，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寸心所内疚，但我效忠国家维护人民的一片耿耿赤心，自信可质诸天日而无愧。当此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历史文化绝续的关头，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贰，追随我全国爱国军民同胞之后，竭忠尽智，剿灭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共匪，策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自由，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愿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转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六十九辑）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6日　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正玩弄新的"和平"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更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坚决消灭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1月1日　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要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保存国民党反动军队等条件下与共产党谈判"和平"。

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

1月4日　华北人民政府颁令取缔会门、道门活动。

1月12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蔡畅为主任，邓颖超和李德全为副主任。

1月14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中国

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在下列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

1月14日　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在北平邀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和各大学的教授等，商讨和平问题。

1月16日　蒋介石召集张君励、左舜生、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等，研究中共所提和谈八项条件。

1月19日　蒋介石再次邀集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人密商对于"和平"之意见。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延长三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五十万军队。此外又决定由蒋保持对"和平运动"的领导权。

1月19日　国民党行政院政务会议决议：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

1月21日　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蒋由南京飞奉化，退到幕后指挥。

1月22日　国民党行政院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1月22日　是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称"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同日，李宗仁派甘介侯持函赴上海访宋庆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励等人，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入京，会商对和平之意见。

1月22日　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和平解决北平之双方协议。

1月23日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令行政院施行所谓七项"和平措施"，其内容为："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例外)；(3)裁撤戡建大队，交归国防部另行安置；(4)释放政治犯；(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纸、杂志；(6)取消特种刑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人民非依法不得擅行逮捕"。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愿在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2月1日　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五十六人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2月1日　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2月15日　原晋绥解放区与陕甘宁解放区合并。

2月17日　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李维果继任驻美大使(原顾维钧辞职)，任命周岩为浙江省主席、朱鼎卿为湖北省主席，派钱大钧为重庆绥署副主任、吴石为福州绥署副主任。

2月21日　华北人民政府在平举行第二次会议，二十五日闭幕。

2月23日　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召开政务会议，通过《财政金融改革方案》，二十四日公布，二十五日实施。

3月1日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六日闭幕。

3月3日　中原解放区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六日闭幕。

3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十三日结束。

3月5日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移平，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

3月6日　新华社报道，在溪口的蒋介石利用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恢复他的作战力量。

3月12日　何应钦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

3月24日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四月三日闭幕。

3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沈阳迁到北平。

3月26日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团四月一日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并决定以齐燕铭为代表团秘书长。

3月28日　国民党立法院在南京举行第一届第三期院会，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等人出席，主要议题是"督历政府，扭转当前的危局"。

3月29日　国民党政府指定张治中为和谈首席代表，并加派刘斐为和谈代表。同日，张治中赴溪口谒见蒋介石，请示机宜。三十日，张治中从溪口返回南京，即参加立法院秘密会议，报告溪口之行。当晚又在寓邸召集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烝、刘斐等，商讨赴平和谈各项问题办法。

3月31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等十人由南京飞抵北平。

4月1日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烝、刘斐等抵平。五日，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交换意见，至十二日，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4月2日　华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正式成立华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陆平

等二十五人为委员。

4月2日　蒋介石命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4月2日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建议,在和谈之前,双方军队固守原防,遭中共代表团拒绝。

4月7日　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决心谋和",要"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

4月8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具体实现八项原则复电李宗仁,指出实现八项原则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4月1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十八日闭幕。

4月13日　中共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在故宫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阐明各自的立场和意见。

4月14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选何香凝为该会名誉主席,蔡畅为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4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交国民党代表团。并在会议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应于此日前表明态度。十六日,国民党代表团黄绍竑、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飞回南京,请示签字问题。

4月20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彻底破裂。

4月22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逃往广州,总统府逃往上海。

4月23日　蒋介石由溪口飞上海布置防务。

4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平举行一届一中全会。

5月4日　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十一日闭幕。

5月16日　华北、河南、山东三解放区人民政府代表在济南集会,研讨统一治理黄河等问题,二十日结束。决定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会址设开封。

5月21日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承认国民党的形势"相当恶劣"。但仍表示要顽抗到底。

5月3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推选刘少奇为该会名誉主席。

6月5日　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抗议香港当局五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取缔社团活动条例》。

6月1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同时成立。

6月11日　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成立"最高决策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

6月26日　新华社揭露:国民党政府用美国一九四八年四月"援华"拨款而在美国所购买的军火武器,已运往台湾。

7月1日　北平各界三万人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

7月7日　北平二十余万人冒雨集会,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

7月9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滕代远、吕正操等五十三人为委员。

7月14日　蒋介石从台湾飞广州。十六日,蒋在广州组成"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蒋自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张群、孙科、陈立夫、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吴铁城、朱家骅等为委员。

7月23日　北平市军管会宣布:解散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其它附逆反动党派等反革命组织,查封其机关,严禁其活动,并令上述党派组织人员履行登记手续。

7月2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在平召开,会期二十五天。着重讨论了如何发动、组织和依靠工人阶级等问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工作。

7月26日　李宗仁飞福州。二十七日,由福州飞台湾。

8月1日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草山成立。

8月3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干部会议。华中局书记林彪、邓子恢宣布了关于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决定。

8月13日　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在台湾成立。

9月2日　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八日闭幕。六十余个国家六百余名代表与会,以肖华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会议。

9月7日　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到重庆。

9月1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重要提案。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为副主席。并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首都北京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当即宣布就职。

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〇年六月解放了除台湾和若干岛屿及西藏以外的全部国土。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外　交

1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各使馆迁至广州。

1月27日　美国驻国民党政府联合军事顾问团宣布停止工作。

3月29日　以郭沫若为团长，刘宁一、马寅初为副团长、钱俊瑞为秘书长的出席第一次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一行三十九人由北平起程赴巴黎。五月二十五日返国。

5月3日　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领袖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陈其尤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英、法、意、荷、比、挪、丹、冰、加、卢、葡等十二国政府签署北大西洋公约。

5月5日　英国政府宣布不卷入中国内战。但声明："凡对香港的任何攻击，将视作一种侵略行为"，同时，英国远东陆海空三军司令部与香港地方当局正式成立了防务委员会。六日，英国政府又宣布派巡洋舰一艘及喷气式战斗机一队"增防"香港。

6月12日　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一九四七年四月颁布的日本临时赔偿计划，终止日本对中、菲、荷、英四国的机械工具及其它工业设备等战争赔偿，以助日本"复兴"。同日，麦克阿瑟向十一国远东委员会宣布，美国反对恢复赔偿支付的任何建议。

7月16日　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

8月5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

8月10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回国。

10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将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军　事

1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主任。

1月16日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傅作义被迫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条件，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停战。自二十二日开始将二十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出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入城接收防务和市政，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及北平人民市政府正式入城办公。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

2月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宜昌东北之荆门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宋希濂部七十九军指挥所及该军九十八师一部，俘该军军长方靖。

2月7日　驻长江南岸芜清至繁昌荻港沿江地区的国民党一〇六军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率部五千余人举行起义。

2月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

2月22日　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在重庆召开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及重庆市军政长官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十八个军，加紧扩军备战。

3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成立，陈再道为军区司令员，李雪峰为军区政治委员。

3月9日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二百万人。

3月10日　胡宗南军开始回犯陕中，至十二日已先后侵占宁平、淳化、耀县三城及周围许多村镇。青海马步芳部八个团亦由陇东平凉、泾川、灵台一带向东出犯，十日占领淳化及其附近的通润等地。

3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到达北平。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3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召收工作团。

4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凌晨发起渡江战役。

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和浦口。二十八日，南京军管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

4月2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宣布约法八章。

4月29日　人民解放军在京沪杭三角地带进行的聚歼战役结束。俘敌官兵达八万余名。

5月1日　山西大同和平解放。国民党守军三十八师等部接受改编。至此山西全境宣告解放。

5月10日　胡宗南、马步芳纠集十七万余人由宝鸡地区向咸阳地区进犯，妄图重占西安。第一野战军部队经九天阻击，敌于二十五日西窜。

5月13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盐、平湖、松江、奉贤、乍浦、金山卫、昆山、太仓、嘉定。

5月14日，又解放青浦、南汇两县城。完成了对上海国民党军的三面包围。

5月14日　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百余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十六日解放汉口，十七日解放武昌和汉阳。

5月14日　人民解放军向浦东发动攻击。

5月22日　第二野战军解放南昌。六月六日，南昌市军管会成立，陈正人为主任。七日，南昌市人民政府成立，邓飞任市长。九日，南昌市警备司令部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治委员。

6月1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样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

7月10日　人民解放军在华中分三路向南进军。西路在宜昌以东至岳阳之间突破长江国民党军防线渡江；中路向鄂南进入湖南省境；东路在樟树到吉安之间，渡过赣江。

7月15日　上海军管会命令留驻上海的美国新闻处及英国新闻处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

7月18日　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宣称即将集募“国际义勇军”二十万人，以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已委托日本战犯冈村宁茨代募日本官兵十万人来华参战。

8月23日　第四野战军部队解放瑞金县城。

8月29日　第一野战军一部摧毁胡宗南军秦岭防线。

经　济

1月10日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将中央银行现金转移到台湾。

1月17日　国统区长江及沿海各线客运、货运票价加百分之九十，台湾出口货运客运以台币计百分之二十，转口费每吨上海至汉口加三百二十元，汉口至宜昌加二百四十元。

2月9日　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本年发放农贷五亿六千四百万元（人民币）。

3月1日　国民党统治区邮电开始实行加价，平信每件二十五元、航空七十元、电报及电话普涨百分之六十六。同日轮船客货运价一律上涨百分之七十六。

3月4日　上海国民党当局决定征收地方保安捐。

3月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电，指定平市之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盐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金城银行等五家商业银行，办理北平与解放区以外各大城市的汇兑业务。其它银行钱庄机关团体商民人等，均不得擅自办理此种业务。

3月15日　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开放对外贸易，并颁布《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华北区进出口货物税暂行办法》。十八日，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正式成立，并在天津办公；天津海关税务司公署、天津航政局、天津商品检验局亦同日开始办公。

3月24日　解放区、国统区开始通汇，比率为金圆券对人民币二十比一。

3月25日　上海邮局宣布：自即日起全国通邮。

4月1日　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金元券。

4月28日　上海国民党当局向各业同业公会催缴保安捐六百亿元，并限期当天交齐。

5月2日　华北人民政府电令各行署、省、市政府、自本月份起暂停征收薪资所得税。后又通令各级政府一律停征邮电、铁道等国营交通事业之营业所得税，停征工矿等公营企业之地方附加税。

5月29日　上海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公布税收政策。

6月5日　上海中国银行正式恢复营业。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经理曾山在复业大会上宣布，撤消该行原董事会的职权，指定华东财经办事处代理行使董事会权利。

7月20日　东北商业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达成了东北与苏联通商协定。

8月12日　华南解放区开始发行统一流通券，以便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

9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五百元与一千元两种新钞。

9月24日　华北人民政府确定娱乐税新税率。

9月24日　华东解放区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曾山为主任、宋甫和为第一副主任、方毅为第二副主任、许涤新为第三副主任。

文　教

1月1日　《河北日报》在保定创刊。该报由《冀中导

报》和《新保定日报》合并组成。同日,《晋中日报》在榆次创刊,《中原日报》在郑州创刊。

1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区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

1月16日　新华社天津分社成立并发稿。

2月2日　《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新华社北平分社成立。同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

3月15日　《人民日报》移北平出版。原北平版《人民日报》改版《北平解放报》。

3月22日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推选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并推选郭沫若、郑振铎、田汉、洪深、曹禺、肖三、曹靖华等十二人出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3月25日　新华通讯社总社迁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亦于同日迁平播音,改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同日,《中国青年》亦移平出版。

5月27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二十八日,上海《解放日报》创刊。

6月1日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为主任委员。

6月13日　上海《大公报》报道,华东军政大学正式成立。校址设在南京、苏州,陈毅任校长。

6月16日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林仲易任总经理。

6月19日　全国首次科学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朱德在会上号召科学界与工农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

7月1日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平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

7月2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十九日闭幕。

7月8日　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

7月8日　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在北平成立。

7月12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决定将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华北学院合并组设中国交通大学,暂设工学院和管理学院。

7月13日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十八日闭幕。

7月13日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在北平举行首次会议,筹委会主席胡乔木、委员王亢之、包元静、李纯青、吴冷西等二十九人出席。

7月14日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出席者一百四十余人。

7月1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在北平创刊。

7月21日　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戴爱莲任主席,吴晓邦任副主席。

7月23日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平成立。茅盾任文协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

7月23日　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二十七日结束。朱德莅会讲话,号召教育工作者加强团结,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7月26日　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阳翰笙为影协主席,袁牧之为影协副主席。

7月24日　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田汉任常委会主席,张庚、于玲任副主席。

8月9日　中国政治大学在平建成,谢觉哉兼任校长,李达、左宗纶任副校长。同日,东北军政大学奉命迁至汉口,改称华中军政大学、校长仍由林彪兼任。

8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委会决定在北平创办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并任命沈钧儒为院长,谢觉哉、李达为副院长。

10月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正式开学。

10月18日　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平成立。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0年

导言

一九五〇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中，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

新中国在一九五〇年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建国后在经济战线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对旧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改造，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当时全国的物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稳定物价，稳定人心，是经济战线上最急迫的问题。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决定一九五〇年发行二亿分折实公债。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三月三日，政务院据此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该决定实施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很快出现了初步好转，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从三、四月份起，物价停止上涨，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仅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至80%的土地。为改革这种不合理制度，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八月份颁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从一九五〇年秋冬开始在广大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底，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总战略和总任务，制定了建国头三年的总方针和战略策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最先完成的是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合理调整工商业，就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给私营工商业以必要的照顾，帮助其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为发展生产服务。当时重点调整了公私、劳资、产销等三方面的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〇年，党还加强自身建设和法制建设。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颁布执行。这在极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一九五〇年，新中国在军事、外交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继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的基本解放之后，从一九五〇年四月中旬起，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四月十七日晨，第四野战军渡海部队，在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独立纵队的配合下，在海南岛登陆成功，全部解放海南岛。第三野战军渡海部队于五月十六日在舟山本岛登陆，全部解放舟山群岛。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至二十四日，第二野战军在第一野战军少数部队的配合下，在大陆上进行了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给西藏的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九月十五日，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七万五千人、二百六十艘军舰、三百一十八架飞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为此，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粉碎了美国妄图侵略朝鲜的阴谋，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新中国一九五〇年在外交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中国并与越南、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瑞典、瑞士、芬兰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保卫世界和平。一九五〇年三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表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四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号召我国人民响应，发起了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到十一月十三日基本结束。全国签名人数达二亿二千余万人。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
- ●海南岛战役
- ●整风运动
-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 ●调整工商业
- ●朝鲜战争爆发
-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

背景介绍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财经会议预计8月至12月是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提出弥补财政困难和亏空的办法之一是发行公债。十二月十六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发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规定这批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的单位定名为分，每分所含的实物为：大米六市斤，面粉一点五市斤，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公债总额 为二亿分，在一九五〇年内分期发行。公债分五年偿还，年息为五厘。当日，政务院还颁发了《一九五〇年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条例》。第一期公债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起发行，总额为一亿分。

材料：

-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今正式开始发行全国各地正踊跃认购表示拥护

材料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今正式开始发行 全国各地正踊跃认购表示拥护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今（五日）起正式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所属十五个部、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营业部（西交民巷东口），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东交民巷西口），均于今日（五日）起开始办理代理发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事宜。首都全市人民正以热烈心情迎接政府这一英明措施，纷纷准备购买，完成预定的光荣任务。

北京市工商界已成立了“工商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并发表号召认购公债的宣言；各行业同业公会成立分支会，向全市工商界展开广泛的宣传劝购，并已开始了具体行动。

工人们虽然生活还不很好，但仍以实际行动起了带头作用，展开预先认购运动。人民印刷厂职工认购分数已近五千分，平均每一个工人认购一分多。华北电业公司职工在三日成立了胜利公债推行工作委员会，决定了具体推行办法。有的职工听到了消息，陆续跑到职工会议缴款认购。华北电业北京分公司在三日、四日两天就有二百零四人到职工会报名交款认购，认购分数已有三百八十四分。北京电讯局职工会各会员小组（每小组最多十五人）都分别学习讨论了有关发行胜利公债的文件，各会员都纷纷表示每人要购买一分，有的小组预先认购了一百五十分。许多职工都已将购买公债的款项准备好了，有的已存入人民银行。该局电机修配厂上月二十六、二十七两天内认购总数已超过七百分，表示了工人阶级热爱国家的热忱。

北京汽车修理厂职工四十五人中，已认购公债一百九十六分。北京被单厂工人消费合作社，在上月二十六日召开了所属八个分社和粮食部、照像部、食堂等职工会议，当场有三十人认购公债四十余分。北京中国旅行社全体人员在工会领导下，三十余人已认购折实公债一百余分，并号召全国各地中国旅行社积极购买。全市其他各工厂职工也都在纷纷认购中。

认购公债运动在各学校也正展开。师大女附中教职员工，大家从实际出发，根据各人具体情况，自动认购。迄今初步统计已有六百零三分。许多教员极为热情，愿意多买，但为照顾其家庭生活，校方劝其酌量减少。校方并将聘请有关方面作专题报告使同学了解发行公债的意义，回家向富有的亲戚朋友广为宣传。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育德中学工会成立大会上，该校张校长首先宣布认购十分，教导主任吴纯性及总务主任刘江邨立即响应各自认购十分，其他全部教职员工即纷纷争先认购，当场认购总数达一百五十十分（会议出席人数仅三十余人）。

（原载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背景介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十月二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巩固中苏两国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也到达莫斯科。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斯大林等举行多次会谈，讨论了中苏两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同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就有关两国的一些事项互换了照会。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材料：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始末

材料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始末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1949年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他们知道毛主席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因天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就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主席。

6时正，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是破例的一次，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特地作了这样的安排。会谈时只有我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青，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能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笑出声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幽默，但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席不肯明说，可能是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是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者说是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斯大林让步了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思路考虑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导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2日，这个《答记者问》见报。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言不攻自破。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发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决定。”

在此之前，还有这样一件事。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搭讪，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庆祝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周总理抵达新西比尔斯克后即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于是决定等周恩来到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投入了工作。

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的礼仪规模小些。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周总理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便随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将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定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中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等问题上。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取消了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了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设领事馆。

在1月22日在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在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我们承认蒙古独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即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会谈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和苏方向中国移交在新疆的一批武器弹药的问题。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

毛主席、周总理在条约和协定文本准备期间，还参观了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集体农场并看望了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为举行中苏友好条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毛主席、周总理和斯大林、马林柯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都在另一间客厅。

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柯夫、米高扬、维辛斯基、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

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哇！"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这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我如实作了翻译。毛主席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这样，斯大林就不好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用一针见血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毛主席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斯大林出席招待会

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

酒会预定晚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两位伟

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讲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周总理的祝酒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讲稿，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大家屏息静听。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准备启程回国。

周总理了解到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周总理还亲自为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分别准备了纪念品。

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毛主席、周总理一直送上汽车。几位女工作人员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站在冰天雪地里目送毛主席、周总理，久久不愿离去。望着望着，她们个个都流了泪，有的甚至泣不成声……

（师哲）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背景介绍

反对投机资本在取得重大胜利以后，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是由于军政费用逐月上升，财政赤字不断增大，货币发行量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的18,900亿元猛增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底的41,000亿元，仅两个月，就增发了一倍以上，因而物价又向上浮动了30%。二月六日，国民党飞机十七架分四批轰炸上海，投弹六七十枚，炸中江南造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等重要单位，死伤多人，造成人心浮动。投机资本又乘机活动，再一次掀起全国性涨价风，全国十五个大中城市二十五种商品物价指数，二月底较一月上升了一倍。

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钞票发行过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开始发行人民币，到年底大约发行了一百八十九亿元，而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底，则发行了五万零三百亿元，增长二百七十倍，因此物价必然要上涨。人民政府打击投机资本，只能使物价不猛涨、狂涨，保持暂时的稳定。要根本稳定物价，就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当地的主要问题是全国财政收支不统一。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适应当时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实行统一政策，分散经营，各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管理自己的收支，这种分散经营的办法，获得巨大的成功。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各解放区连成一片，财经工作需要统一的方面随之增加。首先在金融、铁路、邮电、外贸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但在财政收支上尚未规定统一管理的办法，形成了财政支出如军事费用、经济建设投资、救济费用等统一由中央支出，公粮、税收等收入则由省、地、县地方政府留用的状况。有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又向中央要求补助，这些就增大了中央的财政赤字。

为了解决全国的财政统一问题，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会议在陈云主持下，仔细地研究了全国的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就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四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这一决定。

决定分析了当时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特点，说明了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了十项决定，主要内容为三点：

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农业税（公

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

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仓库物资统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

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调度的总机构，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外汇牌价、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为了争取财政收支的平衡，还必须增加收入、节约支出。为此，在一九四九年底，就决定发行一亿分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成立了全国编制委员会，紧缩军政公教人员的编制和开支；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继续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以节约国家财政支出。

在政务院颁布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通知》，指出："政务院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和适时的，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按照党中央的通知，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各大军区都召开会议，提出保证贯彻执行政务院决定的具体措施；全国人民用各种实际行动来支持决定的实施。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起来了。

材料：

·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材料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政务院
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三月三日发出通令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已经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即希各级政府遵照执行。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文如下：

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根据各区报告：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已近九百万人；（二）去年秋季规定征收的公粮，虽已大部征齐，但在若干地区尚未征齐，且在征收工作中发生偏向。税收的实收数字与预定计划亦有距离；（三）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四）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由通货膨胀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已不能限于一地，而势必影响全国。但是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我们努力防止通货膨胀。

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与收支机关脱节现象，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一九五〇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但是必须指出：目前财政情况比之去年已有改善，进一步缩小财政收支之间的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作如下各项规定：

（一）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以薄一波为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聂荣臻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大市均分设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等编制。各部队各机关的首长必须亲自负责，核实现有人员马匹，消灭虚报估计数字。立即停止各机关不经批准自行添招人员及招人开训练班的现象。政府及企业部门编外及多余的人员，不得擅自遣散，均由全国各地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使用。各部门各企业如须增添人员，在经过适当机关批准之后，必先向全国编制委员会请求调配，只有调配不足又经适当机关批准时，才能另外招收。所有旧军队旧人员一齐包下来的政策不变，但在我军解放前已跑散人员，不必继续招回。自己要求回家的人员，不必强留。包下来的人员，亦不应采取消极的包饭态度，应该有步骤地加以改造和合理使用。

（二）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以陈云为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主任，杨立三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市、县各后勤部，各企业、各工厂，均分设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各级首长亲自负责，指导清查仓库，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仓库存货，无隐瞒地逐级转报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不得打埋伏，不得擅自转移。所有仓库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今年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定货。

（三）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和学生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定额。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费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务，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四）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粮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同时省、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有保管公粮不使损失腐烂与协助运输的责任。由于若干地区去年歉收和大城市需粮浩大，因此，必须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拟定全国范围的公粮调拨计

划，以便达到合理使用的目的。除人马口粮、集中起来的残废军人优待、救济、婴儿保育粮外，不经批准，各地不得以公粮发作经费。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审慎计算其可能，发出调拨命令之后，各省不得拒绝以本省公粮运济外省或其他地区。凡属拨给外地的粮食，均应拨给近地的好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制定关于公粮支付、保管、运输的各项规定。

（五）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收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如在二月底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三月中建立好，并代理地方库业务。三月份起所有税款逐日入库。离库较远之镇市，则由各地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时间按期入库，禁止延期缴库及挪借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全国财政开支恢复经济所需现金的最大来源，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

前述四五两项的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公粮征收额在内及税则、税目、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提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施行，不经批准，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减和变动。

（六）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与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各地人民政府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负有监督和协助本地贸易机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计划的任务。非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关不得改变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规定的业务计划。贸易机关与各企业、各工厂、各合作社的营业往来，均须依照经营业务的正常经济核算制度，不得以财政经费不足的理由，拖欠贸易机关的货款。一切经济机关之间的营业往来，必须严守信用，凡遇对方失信时，得向法庭控告。凡属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国营贸易机关每日售得的现金，必须逐日解缴国库，不得挪用延缴。各地贸易机关除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者外，不得向国库支取贸易金款。一切部队机关，必须严遵毛主席命令，不得经营商业。

（七）凡属国家所有的工厂企业，分为三种办法管理：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依此标准，责成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划清现有各国有工厂和企业的管理责任，并制定对这些工厂企业投资贷款的条例。一切公营工厂企业及合作社，均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按时纳税。一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经营的工厂企业，均须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其解交的总数和按期交出的数量，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地方政府根据情况分别规定之。

（八）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公营经济部门及各机关请求外汇，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私人请求外汇办法仍旧。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应受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业务上使用这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九）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对军队及地方经费的现金支付办法，应按照编制的确有人数，根据供给标准和全国概算所列的现金部分，按月按季地批准各部队各部门的预算，按期支付现金。其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对地方经费的支付，照供给标准应发经费中扣除其地方税收及企业收入所入的部分。国营企业的投资，文教社会事业费的支付，依照全国概算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支付之。国营企业请领投资款项前，必先有经过批准的相当的工程预算。为确保军政费、事业费及企业投资的币值，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短期的无利的或一定数量下低利的折实存款。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为保证上述各项经费的支出，必须严格地管理税款、公粮支拨、公粮实物变款、公债收入、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折旧金等等，以保证这些收入按时入库。

（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严格地实行上述九项，国家的财政困难就可能克服，军政费用的开支就可以保证，金融物价的大波动就可能防止，因此，必须严格地完全地予以执行。凡不实行、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纪，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这些分子以必要的制裁，来保障上述各项规定的严格实行。

在过去的时期，各级地方工作同志在支援前线、征收粮税等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今后仍负着极大的责任，他们的工作与军事胜利是分不开的。同时，在目前实行财政经济管理的统一，因为许多地方是新解放区，在工作进度上说，也有若干困难的。但由于财政情况的困难，收支机关的脱节，金融物价的不稳，因此，要求我们必须有进一步的统一。在公粮、税收划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以后，地方经费开支，比前困难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应该设想这种困难比之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继续不统一和金融物价大乱带来的困难，其程度和后果要小得多。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便防止和避免更大的困难。各地

领导同志必须保证在粮税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之后，一切地方工作同志不但不应有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发生，而且对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应有更加积极负责的态度，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地方工作同志的责任。

（原载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

背景介绍

婚姻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份，是构成社会的家庭制度的基础。婚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

旧中国的婚姻制度是野蛮、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封建主义的旧婚姻制度，是以夫权为中心的，强迫婚姻、买卖婚姻、早婚、重婚、纳妾、收童养媳，以及在家庭中翁姑与丈夫虐待、迫害媳妇，父母与丈夫对儿女、妻子的支配关系，都是其表现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妇女成了“家庭奴隶”，不但受政权、神权、族权的束缚，而且受夫权的束缚。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不仅妇女深受压迫，男子也得不到真正的爱情与美满的家庭生活，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被葬送了爱情、幸福和生命。

建国开始，共同纲领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婚姻法的公布与施行，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成果，其基本原则为四点，即：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利。

婚姻法的公布与施行，是进一步肃清封建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家庭生活的伟大变革。它促使强迫结合的家庭变化或解体，家庭内男尊女卑状况的逐步消失，平等和睦、团结友爱的家庭不断的产生。这就使得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更加积极地参加新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活动，使几千年来受压迫妇女群众得到真正的翻身。

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婚姻制度，在人们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尤甚。在婚姻法公布施行以后，仍有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虐待子女的非法行为发生，不少干部由于本身存在着封建思想，对此不理不问，甚至纵容、袒护。据统计，妇女因不能婚姻自由而自杀或被杀的，山东省在婚姻法公布后的一年内有 1245 人；苏北淮阴专区九个县，自一九五〇年五月至八月，有 119 人；中南区有一万多人。

为了保证婚姻法的贯彻实施，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件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必须把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对于干部与人民的思想教育当作长时期内的经常的重大政治任务；另方面，必须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罪行，采取严肃的法律手段予以制裁。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指示还要求省（市）以上地方政府有领导、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并于十二月底以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专题报告。

一九五一年冬季婚姻法大检查以后，在各级干部重视下，情况大为好转。可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后，对此又忽视了，妇女因婚姻不能自由而被杀或自杀的又有发生，并逐渐增加。一九五二年七月、一九五三年二月政务院两次发出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并在同年三月举行贯彻婚姻法的宣传运动月，宣传男女婚姻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并对由于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的，则依法判罪。

婚姻法公布以后，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基本上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树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出现了许多互敬互爱、民主团结的夫妇和家庭，成为新社会的基本细胞。

材料：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

材料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公布的国家大法之一。这一国家大法的公布施行，是中国人民在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和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的社会改革。这一国家大法公布施行以来，已经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封建压迫的旧家庭制

度正在逐渐变革，平等和睦的新家庭正在不断产生。大批新中国的男女，特别是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群众，得到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因而更积极地参加了新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建设事业。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根据各方面的报告，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有意予以宽纵、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做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致使被干涉者和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实上应有的保护。因此，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农村中，仍然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迫害妇女的生命，致使全国各地有不少妇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自杀。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和被杀的，中南区一年来有一万多人，山东省一年来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苏北淮阴专区九个县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到八月间有一百一十九人。这些数字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严重的警惕。各级人民政府对此严重情形绝对不应容忍。

最近几个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有些省（市）人民政府已先后发布了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对于上述违法现象加以处理和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件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为此，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必须把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对于干部与人民的思想教育，当作相当长时期内经常的重大政治任务，并领导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机关并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力合作，尽可能结合当地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中心工作切实进行；另方面，必须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罪行，采取严肃的法律手段予以制裁。各级人民政府对于这种已经发生的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案件，应即进行检查。已判者，如有错误，应予查明，依法处理；未办者，必须严加追究，依法制裁，务使每个犯罪者都受到应有的惩处。干部中如有宽纵、袒护罪犯，或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因而促成妇女被杀或自杀者，应按责任轻重，予以应得的处分。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

为了保证婚姻法的正确执行与贯彻，各级人民政府首先应教育干部，尤其是区、乡、村（街）级干部和司法干部，认真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各级司法机关与婚姻登记机关在处理婚姻事件时，必须严肃负责，遵守婚姻法的规定，并应通过具体事例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批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扬按照婚姻法处理婚姻事件的典型例证，在人民中树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新风气，而对于有教育意义的严重案件，则应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举行公审，以便正确而全面地教育干部和教育人民。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每个干部都应认识到：能否认真坚决地执行婚姻法；能否采取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解决婚姻案件，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能否积极支持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群众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反对封建思想的正义斗争；能否在处理自己本身的婚姻问题时以身作则地遵守婚姻法——这些，都是自己在政治上是否愿意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考验，也是能否严格地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考验。

本指示下达后，省（市、行署）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即督促所属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部门并邀请协商机关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有领导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有效办法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并查处杀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违法的案件。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将此项检查结果于十二月底以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专题报告。本年内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在开会时，必须进行一次关于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按级上报。

（原载 1951.9.29.《人民日报》）

海南岛战役

背景介绍

中南地区全部解放后，盘踞在海南岛的国民党残部十余万人，在其琼崖保安司令薛岳指挥下，修筑工事，企图长期固守该岛。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个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要在春夏之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积极进行战前准备，开展渡海作战训练，并筹集大批船只和作战物资。一九五〇年三月，解放军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和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发起海南岛战役。在海南岛我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解放军在五日和二十六日两次偷渡成功。四月十六日晚两个军的主力强渡琼州海峡，十七日凌晨在该岛北部强行登陆成功。经十余天激战，到五月一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余人，其余敌人逃往台湾。

材料：

- 我军解放海南岛
- 关于海南岛作战问题给林彪的电报
- 我军是如何解放海南岛的

材料一　我军解放海南岛

海南前线人民解放军已于四月三十日解放琼南第一大港榆林和三亚以及琼西要港北黎，歼匪一个整师，胜利结束海南岛战役。解放军于琼北击溃残匪主力的最后挣扎，进占海口、文昌，结束第一阶段的作战后，即分两路向前疾进。沿环岛公路南进的东路解放军快速部队，沿路击溃残匪妄图阻止我前进的一切挣扎抵抗后，于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时胜利进占榆林、三亚，并控制匪琼南最大空军基地三亚机场。西路解放军则于四月三十日晚十二时攻占琼西要港北黎。我军在进攻中于北黎附近歼匪第四军八六师全部，并于北黎港中俘获未及逃脱的军舰一艘。至此，人民解放军自四月十七日琼北敌前胜利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榆林、三亚、北黎为止，历时不足半月，即彻底粉碎匪海陆空立体防御和重点纵深防御，解放琼崖全岛，胜利结束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新华社五月二日讯）

材料二　关于海南岛作战问题给林彪[①]的电报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

中央转林彪同志：

（一）一月六日电及转来邓赖洪[②]一月五日电均悉。（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朝〕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③]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钩<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毛　泽　东

一月十日

材料三　我军是如何解放海南岛的

海南岛守敌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部5个军，海军舰艇50余艘，空军作战飞机25架，运输机20架，总兵力约10万人，企图以所谓“立体防御”凭险固守，把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广西战役结束后，四野确定以第40、第43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统一指挥，执行解放海南岛的作战任务。

在我以木帆船为主，无海空军配合的条件下，怎样实施渡海登陆作战？如何才能打破敌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当时没有经验。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依据金门战斗失利的教训，就解放海南岛问题指示四野首长：“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又致电四野首长：“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第15兵团首长根据上述指示，一面令各参战部队向雷州半岛预定的集结地域开进，迅速着手筹集船只，开展海上训练，作好渡海的各项准备；一面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与琼崖纵队沟通联络，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侦察情况，查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研究了金门岛登陆作战失利的教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太平洋的岛屿登陆战例，分析敌我情况，设想了各种登陆作战

---

①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

②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③ 冯白驹，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方案，反复权衡利弊。根据海南岛与琼州海峡的自然情况，夏季之前是“季节风”期，渡海登陆最为有利。但我如一次以1个军实施登陆，条件尚不成熟，原因是船只不足，同时无法对付敌海、空军的袭扰。我军大规模登陆准备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1950年2月1日，在叶剑英主持下，兵团召开了有两军和琼崖纵队首长参加的广州会议。会议根据当时季节风向的可能变化及船只准备情况，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在大规模登陆前，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我军的接应力量，改变岛上形势，破坏敌人的防御准备，创造大举登陆的条件，尔后再以主力登陆。

毛泽东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2月12日复示：“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从3月5日至11日，第40、第43军各组织1个加强营，利用夜暗和有利的风向、潮汐，分别在琼西北的白马井、琼东北赤水港偷渡登陆。3月26日至4月1日，两个军又各组织1个加强团在琼北玉包港、北湾港偷渡登陆。两批偷渡部队在琼崖纵队的有力接应下，均获成功。

经过两批4次偷渡，我军共渡过9个加强营，除伤亡、失联络者外，共登陆7000余人，加上琼崖纵队，我岛上接应力量已大大加强。此时，我军渡海登陆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并定下了实施大举登陆的决心。4月16日晚，登陆兵团第一梯队，以第40军6个团，第43军2个团，共2.5万余人，分左右两路从正面强渡海峡，途中击退敌舰的阻拦，在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的全力接应下，于17日凌晨在临高角至花场港地段胜利登陆，至19日，先后夺占临高、美台、加来、福山等要点。20日，薛岳急调6个师在美亭地区向我登陆部队反扑，在两个军的合力反击下，将敌击溃。薛岳见我主力已登陆，大势已去，22日令残部分路撤逃。我军于23日占领海口市。24日晨，登陆兵团第二梯队第43军5个团在天尾港胜利登陆，会同第一梯队分三路向南追击。东路部队于4月30日攻占榆林、三亚；西路部队于5月1日占领八所、北黎，全岛宣告解放。

整风运动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员数量迅速增多。1949年到1950年，新发展党员200多万，其中不少人带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入党内；老党员老干部中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官僚主义进一步滋长起来，摆老资格、恃功挟赏、“打天下坐天下”的落后思想表现得特别突出，用命令主义的粗暴作风去开展工作，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贪污腐化、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现象不断发生。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犯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方法是：首先由上而下地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某些指定文件；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后，总结工作，检查思想问题；最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作风。党内整风之后，推及党外干部。

1950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各级党的干部思想政策水平显著提高，作风大为改进。

材料：

- 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
- 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

材料一　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新华社讯）

据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周年纪念日前夕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超过五百万人。这个数目，比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根据一九四九年底的统计所宣布的四百五十万人增加了五十万人。在五百多万人中，地方党员约占三百六十五万人，部队党员约占一百二十万人，其余属于党中央直属机关和铁路系统。五百万党员中约有二百万人是去年和今年入党的新党员。在五年前的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一百二十一万人，而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四万人左右。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党内教育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已决定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广大的新党员的政治觉悟，而对发展党的组织采取严格和谨慎的方针。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并坚决阻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这次全会决定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而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胜利，进一步地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便顺利实现争取国家经济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伟大任务，已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

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的作风。

中共中央所发出的关于整党的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必要，是“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由于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指示规定：“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夏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

指示要求中共各中央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共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以便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

——转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〇年七月号

材料二　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①]的信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乔木同志：

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中央已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你为主任，负责审查各地整风文电并起草复电；尔后则负责注意这个运动的发展，替中央起草指导文电，并注意报纸刊物的报道和指导（六月上旬应写社论一篇）。各地整风指示文件均须经中央审查，截至今日止，已到者有华东，西南，西北，内蒙，一野等处，请你即于两三日内总阅一遍，邀集安子文，肖华[②]谈一下，逐一起草复电（请叫尚昆[③]注意各地有关此类来电，抄送你和安、肖），或者还须总复一电。其原则是大体可用者即予同意，须作部分修改者则予修改。关于学习文件，有关全国者须予统一。复电要快，本月内（只有七天了），均须将起草，送书记处各同志看过，并用四A级电拍发等事办理完毕，以便全国整风能于六月上旬一律开始。

毛　泽　东

五月廿四日上午六时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背景介绍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财经工作的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向稳定，表明了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经济战线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

首先，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占全国人口⅔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来得及认真实行。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还没真正解放和发动，约有40万国民党留下的土匪分散在广大新区与人民政府为敌，国民党特务分子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社会秩序尚不安定，西藏、台湾还没有解放。美蒋反动派继续勾结，加紧进行封锁、禁运、轰炸。政府中的军政费用开支还不能减缩，尚占财政开支的½。

其次，旧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经济结构正处在交替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协调状况。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使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习惯于投机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再加上国营贸易经济发展的步子过快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公债摊派过重，导致资本主义工商业顿时陷入停工减产或关厂歇业的困难境地。据统计，当时有14个城市的2945家工厂关门，16个城市的9347家商店歇业。大量的工商业倒闭歇业，势必引起整个市场萧条，失业增加。全国29个城市失业、半失业人数达160万，仅上海一地，失业工人就有15万人左右。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给经济恢复带来很大困难，也引起部分人的不满，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与政府和工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胜利，使骄傲自满和“左”倾急躁情绪在党内和政府的一些成员中迅速滋长，搞“四面出击”，甚至幻想一举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这就增加了紧张气氛，并有害于经济的恢复和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6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各省、市委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共42人列席

---

①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②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③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分别就土地改革、外交和统一战线、财政经济、军队整编等问题作了报告。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明了新中国前进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心任务,并规定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的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这个报告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报告中规定的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做好下列八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精简和整顿行政机构。(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教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认真开展一次全党整风运动,以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阐明我党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少数敌人的战略策略方针。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总之,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和美蒋反动派。这就是七届三中全会的战略策略方针。全会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方针。七届三中全会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材料:

-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材料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①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

---

①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

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

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背景介绍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70－80%的土地；而约占农村人口总数90%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有20－30%的土地。这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侮辱、陷于贫困落后的经济根源。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是民主革命基本任务之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决定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是随革命战争的进程，在一个个解放区先后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有1.2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半老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新解放区和即将解放的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总体上分为两阶段。1949年冬至1950年6月是边准备、边土改阶段。从1949年冬开始，已具备土改条件的华北和河南省、陕西省部分新区（约有2600万农业人口）进行土地改革，到1950年春胜利完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集中做好全国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为指导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土地改革法的修订。1949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动富农问题。次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指出“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3月，毛泽东亲自草电文，代表中共中央就土地改革法修订中的几个问题征询各地意见。经过反复酝酿修改，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全面铺开，提供了法律依据。

1950年6月至1952年12月，是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全面铺开阶段。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共6章40条，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和在农村的多余财产，征收祠堂、庙宇、寺院等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公地，由乡农会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分给同样一份。并规定保护工商业者，保存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各地都派出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组成土改工作队，投入这场空前规模的斗争。新解放区土改有计划、大面积地铺开。第一批土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1年春，在华北、中南、西北、华东等约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同时对其余1.6亿农业人口的地区的一部分，又先后有计划地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为下期土改准备条件。第二批土改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等约1.1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三批土改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千万农业人口地区进行。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步骤是：

（一）发动群众。各地组织了大批工作队到农村中去（每年达30万人以上），深入群众，召开农业代表会议，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批判“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等观点，宣传土地改革法，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由少数的贫雇农小组发展到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建立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作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在此基础上，通过“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帐”，讨论“谁养活谁”等方式，让农民用自身经历进行自我教育，以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然后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打倒地主。对罪大恶极破坏土地改革的恶霸不法地主，则召开审判大会，揭发控诉，并由人民法庭依法逮捕、惩处。打击地主阶级的威风，树立起农民阶级的统治权力。

（二）划分农村阶级。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将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为着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公布的《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稍加删改补充，并易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以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具体工作中首先通过农民协会组织群众，学习、掌握划分标准；然后进行试划，先把地主富农划出来，以分清阵线；再在农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采取自报公议方式，允许个人反复申辩，由群众审议评定。最后由乡人民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经过划分阶级成份，划清了农村阶级阵线，保证土地改革法的贯彻执行，为分配土地创造了条件。

(三)没收、分配土地。在划定阶级后，按土地改革法有关规定没收土地和多余财产，然后平分土地和财产。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土地。最后复查分配情况，解决遗留问题，颁发土地证，整顿加强农村政权。

1952 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土地改革取得巨大胜利。约 3 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它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 700 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农民获得了解放。

土地改革的完成，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势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人民政权的支柱，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改变了农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况，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发了农村中以识字扫盲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热潮。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项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材料：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节录)
-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材料一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节录)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

一、为了正确地实施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特公布本决定。

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一九三三年瑞金民主中央政府为着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公布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除开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用外，其余全部在现时的土地改革中是基本上适用的。这两个文件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曾经中共中央重新公布，并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加以应用，已证明其在现时的土地改革中是适用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将这两个文件稍加删改并加以补充后，再行公布，作为今后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文件。在这两个文件中，凡系本院所补充决定者，均加上“政务院补充决定”字样，并于这两个文件外，增补“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

三、由本决定所公布之文件，其文字解释如有与土地改革法相抵触者，均按土地改革法执行。

四、各省人民政府得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和本决定公布之文件所规定的原则，颁布划分阶级的补充文件。但这些文件应呈报本院备案。

甲、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一类。

有些地主虽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有劳动力仍不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与地主一律看待。

(政务院补充决定)

(一)向地主租入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转租于他人，收取地租，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二地主。二地主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其自己劳动耕种一部分土

地者，应与富农一例看待。

（二）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应依其职业决定其成份，或称为小土地出租者，不得以地主论。其土地应按土地改革法第五条处理。

（三）有其他职业收入，但同时占有并出租大量农业土地，达到当地地主每户所有土地平均数以上者，应依其主要收入决定其成份，称为其他成份兼地主，或地主兼其他成份。其直接用于其他职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

（四）各地地主每户所有土地平均数，以一个或几个县为单位计算，由各专区或县人民政府提出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决定之。

二、富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亦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并且是主要的。

（政务院补充决定）

（一）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的富农。对富农及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按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处理。

（二）地主家庭中，有人自己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或同时雇人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主要部分土地出租，其出租土地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三倍以上（例如出租一百五十亩，自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五十亩），在占有土地更多的情形下，其出租土地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二倍以上（例如出租二百亩，自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一百亩）者，不得称为富农，而应称为地主。其土地及其他财产，应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处理。但其自己劳动耕种部分的土地，在适当地加以抽补后，应在基本上予以保留。其参加劳动的人，如果在家庭中不是居于支配的而是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则其参加劳动的人应定为适当的劳动者成份，以别于家庭中其他不参加劳动的人的成份。

三、中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与主要的。这些都是中农。

四、贫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与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与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这些都是贫农。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劳动力，这是分别中农与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工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与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与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是工人。

（原载195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

今年六月三十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两周年。两年来，全国各地广大晚解放区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东北大行政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农业地区都因解放较早，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之前就已完成土地改革。华北区除绥远省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的二十万农业人口地区外，也已全部完成土地改革。西北区已在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中南区已在约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一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西南区已在约占全区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一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华东区已在约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所有这些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已经彻底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而解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力，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根本条件。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生产热情空前提高，他们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为自己的幸福和国家的建设而劳动着。整个农村面貌已经焕然一新。那些还没有进行和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畜牧地区，以及新疆省全部农业区的六十二个县和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一小部分地区。这些地区除畜牧地区外，将在慎重稳进方针下，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各区土地改革的成绩和情况如下：

华北区：全区绝大部分地区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前就已完成土地改革，绥远省是全区最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该省去年冬季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春耕以前

即已基本完成。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全省有一百三十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获得了一千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多亩土地，六万五千多头耕畜，六千一百八十六万余斤粮食和二十七万七千多件农具。至此，全省二百六十万农业人口中，已有二百四十万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其余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二十万农业人口的地区主要在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在今年七、八月间即可全部完成。

西北区：除新疆省外，截至本年五月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安等四省一市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些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农业人口，共达二千四百六十多万，约占西北区全农业人口二千九百多万人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一百一十四个县、市，农业人口一千五百多万；计有七百五十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一千六百多万亩；如连分得的其他财物者在内，便有一千一百万农民从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前年冬天到去年春天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地区，共有八百多万人口。至于陕甘宁老解放区的一百六十多万人口以及陕西省的半老区二十万人口，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以前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现在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新疆省全部农业区的六十二个县约四百万人口，青海高原、贵德、化隆、循化四县农业区的二十万人，甘肃定西区、平凉区的二十一万人，共计四百六十多万人。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今后在慎重稳进方针下有步骤地加以完成。

华东区：现全区只有福建、浙江沿海的个别岛屿共三十个乡和皖北淮河沿岸三十四个乡(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山东、苏南、苏北、浙江、皖南等省区全部，福建和皖北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徐州、青岛、福州等二十八个城市的郊区已经全部完成土地改革，而且大部已颁发了土地证。这些地区共有四万多个乡(村)，达全区总乡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现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结束工作和颁发土地证的尚有福建省的二千七百五十三个乡(村)和皖北区的三百二十五个乡(村)，预计在六、七两月份即可在全区范围内基本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在去年春耕以前，华东地区就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过去一年，华东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渔区、盐区和部分山区，皖北、山东和苏北过去的水灾区。这些地区在去年夏季开始，就陆续分别进行了多次的典型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进行实验，创造经验；各省、区人民政府又先后颁发了，于山林、渔区、盐区等不同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和办法。因此，虽然这些地区情况比较复杂，过去工作基础薄弱，但由于各省、区领导机关抓得较紧，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有了准备，因而运动进展顺利，政策的贯彻和群众的发动也较正常，到今年五月底止，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基本上完成至此，华东全区已有一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在这个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区共没收和征收耕地一亿一千万亩，分给了六千万以上的无地少地的农民。

中南区：中南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一九四九年冬季起，就在解放较早的河南省开始发动，而全面的展开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以后。截至目前为止，全区六省所辖的五百一十三个县和武汉、广州及其他城市郊区的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农业人口地区中，已有一亿一千八百七十五万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已基本上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东、广西两省已分别在本省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以上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区无地少地的农民已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亿三千多万亩土地。目前除广东、广西正乘农忙间隙(这两省农作季节不同)，在一千多万人口地区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外，中南全区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以人口计算，占全区农业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一，已完成复查工作的地区，则还只占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的百分之四十强。预计在明年春耕以前，即可全部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

西南区：自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两年以来，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四川地区和云南、贵州、西康等省二百六十个县以及十个市的郊区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个乡，人口共达七千三百五十九万左右，约占西南全区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一。至此，除少数民族区域和云南、贵州一部分地区外，西南区已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这些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计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已从地主阶级手中，转为贫农、雇农以及一部分土地较少的中农所有。至于现在尚未完成改革的云南、贵州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准备在今冬明春进行。

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面貌正在迅速改变。广大农民在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普遍的情况是：今年的春耕动手早、施肥多，掏渠打井防旱抗旱的劲头大；农民纷纷添置新式农具，采用优良品种并改进耕作技术。受到旱灾、虫灾威胁的地区的农民，普遍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抗旱捕虫运动，绥远集宁东区的七个县的农民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新修了一千多道水渠，另外又打很多水井，增加灌溉面积四十多万亩。西南区在今年春旱期中，就有一千二百万农民组织起来，在短期内战胜了旱灾的威胁。各地农民纷纷参加劳动互助组，并热烈地参加爱国增产运动。中南全区已有包括五百多万户农民参加的一百多万个互助组。该区江西省已有一万五千个互助组和八万四千多个个体农民参加了每亩千斤的水稻丰产竞赛，湖南省也已有二十多万户农民参加水稻千斤丰产竞赛。西南全区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现在已经发展到五十万个。西北新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其中甘肃定西、天水等专区以及青海的民和、乐都等县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组织起来。土地改革后，西北区农村中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也在蓬勃发展。许多农民提出口号："努力生产，报答毛主席！"

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而巩固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专政。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各地农民协会组织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华北区绥远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已从土地改革前的七十多万发展到现在的一百零四万九千多人。西北全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中南全区农民协会的会员已有四千多万人。西南全区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在上述各地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广大农村中，新中国青年的先进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并有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被选拔到农村中各级人民政府内，直接参加国家政权工作。

（原载 1952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报》）

调整工商业

背景介绍

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市场物价稳定下来，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昔日的虚假繁荣随之销形匿迹，投机资本将囤货吐到市场，一时出现部分的物资供过于求，售路呆滞。一些过去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工商业，如迷信品、奢侈品工商业，失去了市场；一些机构臃肿，经营不善的企业亦减产、停业；同一行业内盲目竞争，造成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得粉碎，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产销脱节，不少工业品价格倒挂，许多私营企业陷于存货过多，负债累累和停工减产境地，部分私营银行和私营商业停业倒闭。上海、北京、天津等 10 个大中城市，1950 年第二季度开业的私营工商业 5903 家，歇业的 12750 家，歇业户超过开业户 6847 家。这实际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脱胎前的痛楚。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被暂时困难所吓倒，他们消极经营，乃至解雇职工，关厂歇店。有些人把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归咎于人民政府的经济改组，主张用发展资本主义寻求出路。有的提出所谓"不要与民争利"，要求国营经济不要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则有少数人产生"左"的倾向，认为既然工人阶级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就不妨趁私营工商业困难之机，一举消灭资本主义。

人民政府认为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1950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调整工商业的任务，指出：今后几个月内财经领导机构的重点，应放在调整公私企业之间及公私企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5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 7 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研究物价稳定后出现的市场萧条等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制定了调整工商业的具体政策和作法。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工作。

（一）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的重点，即调整国营工商业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和负担。国家通过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使它们能够维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对私营商业，国家通过经销、代销等方式，使其有利可图，国营商业在扩大批发阵地的同时，减少零售商店的数量，把大量零售业务交给私营商店及小商小贩，除主要的大宗农产品和外销的农副产品外，其余农产品则组织合作社和私商收购、贩运；调整税负，国家适当降低税率，减轻民负，以利休养生息，将原 1136 种货物税减为 358 种。调整公私关系的实质是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得到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指导其转业转产。（二）调整劳资关系。坚持劳资两利原则，处理好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既保障工人的民主权利，又要资本家获得合理利润。从有利发展生产出发，用协商方式解决劳资问题，然后过渡到更固定的合同关系。调整劳资关系实质上是确立工人阶级在私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三）调整产销关系。主要在生产领域调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方向；在流通领域通过召开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以销定产，减少生产的盲目性，逐步走上计划产销的轨道。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使濒临歇业、倒闭的许多私人工商业得以复苏。1950 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 10 大城市开业的私营工商业达 32674 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 5.5 倍。调整后的 1951 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材料：

- 关于调整工商业（节录）
- 如何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

材料一 《关于调整工商业》(节录)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刘少奇

一、(略)

二、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根据共同纲领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采取一些具体办法来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目前的条件下加以组织与计划,以便克服公私企业之间以及各企业部门之间许多尚未进入正轨的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对于那些有可能维持、又于国计民生有益、但是发生困难的私人生产事业,人民政府应该给以帮助,这些企业的主人和工人群众也必须各尽所能,共同协力,以便把这些企业维持下来,等待情况的好转。为了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尽可能适当地统一与分配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的定货和加工,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这些定货和加工的数量极大,因为没有适当的统一和分配,常常发生各种毛病和损失。应该使我们的军政机关和企业机关尽可能地、一个一个地作出一定时期的定货预算和加工预算特别是大批的定货和加工预算,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交给工商贸易机关。同时,各地工商贸易机关应该要各地公私生产机关据实报告自己的生产情况,并加以调查,报告上级。这样,就使我们的中央工商贸易机关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统一与分配国家的各种定货和各种加工,并调节各企业的生产。这样,一方面,可使国家机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又可调剂市场,调节生产,救济许多困难的生产事业,并可刺激新的生产事业的发展。在国家定货和加工等方面照顾特别困难的上海工商业,乃是必要的。

三、某些生产的转业与私人资本的出路

过去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例如高级消费品工业,迷信品工业,投机商业,以放高利贷和买空卖空为目的的金融业等,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应该转业。又有某些暂时生产过剩的工业,例如纸烟、火柴、肥皂工业等,也不得不暂时缩小生产或转业。还有某些企业需要切实改变他们的产品为适合农民的用品,才能扩大销路。又由于投机事业的停止,社会已有很大数量的游资要求投放于生产事业。从根本观点上看来,无疑问,这是一些好的现象。无疑问,这又是要产生一些痛苦的。缩小生产、停工、转业,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失业或者改行。现在已有人问:我愿转业,但转到何处去?请人民政府告诉我,什么事业可以办?这个问题是提得对的。要具体确切地答复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需要经过具体的调查研究,我现在只能作一般的大体方向的答复。这就是说,凡适当地服务于人民的需要,特别是适当地服务于农民的需要,而国家现在又不能办,或虽然办了但还很少的事业,是可以办的。交通运输事业以及服务于国家经济重点恢复部门的事业,医药事业,也是可以办的。此外,还有某些特殊矿产的开采与提炼,某些特殊工厂的建立,某些电力站的安建等,国家都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之下,与私人订立合同,允许私人办理。现在人民政府还没有禁止私人创办任何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所以私人事业的活动范围是很广大的。国家企业与私人生产事业之间的某些不适当的竞争现象,以及在定货中在加工中的某些不适当的条件,在调整工商业的工作中应该加以改正。劳资关系也可以在国家劳动法令、集体合同及劳资协商机构中纳入正轨。所以,私人资本不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应该是老老实实地、不怕化费一些资本和气力地去经营那些确实于国计民生有利的事业。对于老老实实不怕化费一些资本和气力去经营生产的事业家,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他们以各项必要的便利条件,并给以指导,使其避免盲目性,帮助其事业的成功。……

(原载1950年5月20日《工人日报》)

材料二 如何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

上月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曾根据共同纲领公私兼顾的原则,着重地讨论了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问题,因为这是目前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

过去在公私工商业间的基本情况是怎样呢?

应当说,国营经济在过去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给了帮助的。国营企业对私人企业进行了大批的成品收购、原料供给、代销与经销等业务。国营企业大量收购了农民的农产品、副产品和手工业生产品。国营企业对合作社采取了委托代销、代销并给以适当优待的办法,扶助了人民合作事业的发展。国营企业曾通过加工、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广泛地与私人企业合作,鼓励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同样应当说,国营企业机关在执行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时是有偏向的。例如:有些国营企业在委托私人企业加工时,其所规定的加工条件有时过于苛刻。国营贸易公司在制订价格时,有时对私人企业的合法利润照顾不足。对于出口贸易的管理,有时失之过严。国营贸易的范围,也未与私人商业适当划分,使私人商业感到威胁。在原料收购中,正当的私人商业也有被排斥的现象。有些国营企业不肯参加同业公会;对于私人企业的经营方向,也缺乏必要的帮助与指导。这就使得有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还未能在国营经济统筹兼顾下,与国营企业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是部分的国家经济工作人员中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分工合作的思想。甚至于有人以为共同纲领的“有些部分”是不必实行的。这些同志有抽象的社会主义观念，而缺乏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他们忘记了共同纲领，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方面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只有中国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现在还没有可靠数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现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论人民民主专政”）。抱着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们，恰恰是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这些基本特点，因而，他们就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的错误思想，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害的。当然，对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对于私人资本家的投机倒把行为，国营经济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并引导它们转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过去应当如此，现在应当如此，将来也应当如此，但是，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应当认真地团结他们。

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什么呢？

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经济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必须熟读牢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济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各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每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之发展。”

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不仅一般地规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同时也正确地规定了公私关系，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把上述方针准确地加以实行。

在公私工商业关系中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呢？

这里首先应当解决公私工业关系问题。而在公私工业关系中，首先要解决对于私营工业的委托加工、订货与收购问题。

工业经济在目前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致只有百分之十。这是公私营工业的总和。对于有益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不采取团结与发展的方针，就将减弱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因此，国家应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予私营工业以必要的扶助。国家机关与国营企业对于工业实行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是国家扶植私营工业的重要形式。这就是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帮助私人资本主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也就是逐渐克服私营工业生产盲目性的方法。私营工业如果不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与领导之下来进行生产，而采取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无政府的盲目的生产方法，不但对于中国工业化不利，而且对于私营工业本身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在目前，由于通货稳定，虚假购买力消灭而引起的各种商品普遍滞销的情况下，这种订货、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的方式，对于帮助私人工业推销成品，活动资本，维持生产，以度过目前难关，更有极重要的作用。

国营企业应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向私营工业订货和收购产品的工作呢？

第一，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与可能。所谓需要，是说所委托加工的、所订的、所收购的货物应当对国家目前或将来有用。例如：棉纱、棉布可以供给军、政人员服装及稳定物价的需要；纸张可以供给出版事业的需要；钢铁产物可以供给工业及国防的需要。所谓可能，就是指所订的、所收购的数量，应当以国家现有经济力量的可能为限。如果超过这种限度勉强进行，势必引起通货膨胀，破坏物价稳定。这就不仅不利于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不利于私营企业自身。

第二，订货和收购的地区分配要适当，即必须根据各个地区各种企业的不同情况，从全局观点给以恰当的帮助。加工种类与加工地区之确定，应由中央统筹。在一个地区内的恰当分配，应由当地工商行政部门会同工商业团体和工人团体主持办理。在分配时，一方面要力求公平合理，公私兼顾，另一方面要使有关职工了解订货和收购的意义，以便保证生产计划按期完成。

第三，收购价格应根据市价，不应低于或高于市价。加工的“工缴费”应根据加工地区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计算工厂成本。凡市价低于成本，由国家赔本的订货，资方应以保本为原则；凡市价高于成本，国家有利的正常订货，资方应在成本以外取得合理利润。工缴费的确定，应由当地工商行政部门召集订货机关和承制的资方劳方共同协议规定。

第四，对公私工厂加工条件应当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偏颇。

第五，公私双方均应严格信守订货和收购合同。过去有些公营企业不遵守合同规定，拒绝收货，或迟付工缴费；有些私人企业也有少交货，晚交货，交坏货，甚至不交货的现象。这种破坏合同的行为，妨碍了公私企业双方互相信任和分工合作，必须切实改进。

上述五点是订货收购的主要原则。各地公私企业的订货收购关系，应根据以上原则进行检查。其中如有不适合的部分，在双方同意下，可从新改订。

在公私工商业关系中，亟待解决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公私商业关系问题。

私营商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不可少的。由于中国是个大国，而在国民经济中，分散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生产，占有极大的比重。因此收购农村副产品与组织城乡交流，是一件极为巨大的工作。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在人力上、财力上都还没有可能把这个交换责任完全担负起来。因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目前在全国商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小于私人商业，所以要把广大的分散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的交换行为大量地组织起来，成为合作社商业，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形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商业体系，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使这些在地区上分散的，在数量上庞大的农副产品，尽可能地进入城市；同时使城市工业品尽可能地流入广大农村，除了国营贸易机关和合作社应担任重要责任外，私人商业还有很大的重要性。

当然，私人商业也应当在国营商业领导之下来进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而不是相反。旧中国的封建性和投机性的商业，依靠垄断和投机的方法，严重地剥削小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超额的商业利润，这是广大的小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一致反对的。这种超额利润必须降低到正当利润。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规定："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为了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不使过高或过低，国营贸易机关在城乡交流方面，就必须维特农产品的适当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以保障农民、手工业者和消费人民双方的利益。事实证明，这个"操纵国民生计"的严重责任，必须放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的国营商业身上，而不能放在私营商业身上。但是私营商业如果不居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地位而居于服从国营商业领导的地位，那么，它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还可以发挥它的一定的作用了。

目前公私商业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收购方面的价格政策问题和销售方面的国营零售商业问题。

国营商业的价格政策，是公私商业关系的基本环节。在我们的国家中，正确的价格政策，应当照顾到生产者、贩运者和消费者三个方面，即是对三个方面都要有利，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继续进行、商品找到销路、物资能够交流。这是我们国家贸易机关决定价格的根据。今年三月全国物价平稳以后，在商业市场上出现了畸形的价格状态。它表现在：城市工业品价格高于乡村、工厂成本高于市价、部分商品批发价高于零售价、国营贸易机关的牌价高于市价。这主要是由于通货稳定以后，虚假购买力消失，而原来被囤积的商品涌进市场，以及一般消费者因有一部分物资的积蓄，暂时减少购买量，所造成的结果。而国家财经机关对于物价稳定以后的市场趋势预见不够，未能及时采取步骤，以减轻这种不合理的价格状态，也是形成这种畸形状态的一个因素。这种畸形的价格是必须改变的，而且是已经在改变了。国家贸易机关现已着手调整价格，实行三方兼顾的政策。在调整价格中，一方面应当防止私人商业对于小生产者与消费者封建性剥削；另一方面应当反对某些地方工作人员片面强调保护农民利益、盲目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偏向。对于农产品规定过高价格的结果，将使消费者无法购买，私商也因无利可图，不肯下乡，而国营贸易机关与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即令赔本运销，也必然无法持久。这种情况必然阻塞城乡交流，不仅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人商业不利，更基本地，则是一方面对于城市工业和工人阶级不利、另一方面由于产品滞销，对于农民本身也是极端不利的。

公私商业在销售方面所发生的重要问题，是国营零售商业问题。

半年来，国营贸易机关为了稳定城市零售价格，设置了一定数量的零售商店，这对稳定零售价，首先是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保障广大城市人民生活，起了极大的作用，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如果国营贸易机关，只进行批发贸易，不进行零售贸易，就无法实现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稳定物价"的任务。但国营零售商店的经营，应以稳定城市零售市场物价，防止投机商人任意抬高零售价格为目的；不应当企图代替一切私营商业。因此，国营零售商业应当适当地限制自己的经营范围，并使零售价与批发价保持适当差额，使正当零售商在国营贸易机关的价格政策之下有利可图。国营贸易机关供应物资的回笼货币主要依靠批发市场，不应依靠零售市场。国营零售商店大量零售的商品，应以粮食、食盐、煤、食油、布、煤油六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为限，至于零售百货店就更应有限制些，所有各种零售店的数目以足能稳定当地商品零售价格为限度。只有这样，国营商业才能既保证了物价的平稳，又为守法的私人零售商业保留了宽广的活动范围。

公私工商业关系，是公私兼顾政策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关系调整好了，公私兼顾的政策就在基本上实现了。

（原载1950年6月8日《人民日报》）

朝鲜战争爆发

背景介绍

1950年6月25日拂晓，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北犯，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其所部军队，“支援”南朝鲜。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于美国纽约时间6月25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的情况下，非法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不顾事实地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进攻南朝鲜。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由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南朝鲜军队外，先后参加联合国军的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16个国家；另外，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也提供了医疗船或派出战地医疗队。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出兵侵略朝鲜。

与此同时，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公开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朝鲜人民为正义战争而奋斗，直到献出最后一滴血。朝鲜人民军奋起抗击，不到两个月时间，解放了朝鲜首都汉城和南朝鲜大部分地区，把美伪军驱至釜山一隅。美国侵朝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纠集“联合国军”50000余人、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10月1日，麦克阿瑟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当晚金日成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希望中国尽快派兵支援。金日成还派朴宪永前往北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当面提出上述请求。

材料：

- 金日成将军的广播演说
- 周外长对杜鲁门声明发表声明

材料一　金日成将军的广播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人民军的军官和战士们！

活跃在共和国南半部的游击队员们！

我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发出如下的号召：

卖国贼李承晚的傀儡政府军队，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三八线全线向以北地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勇敢的共和国警备队为抵抗敌人的进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挫败了李承晚傀儡政府军队的进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后，已命令我们的人民军开始反攻，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人民军按照共和国政府的命令，已将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军击退，而进入三八线以南十公里至十五公里了。人民军业已解放了瓮津、延安、白川（按均在黄海道）、开城（按在京畿道）等城市和许多村庄。

我祖国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虽然为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而斗争，但是李承晚匪帮却发动了同族相争的内战来反对人民。众所周知，反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李承晚匪帮从很早以前就准备了同族相争的内战。南朝鲜人民虽然彷徨在饥饿线上，但李承晚傀儡政府却将从人民手中强迫征收得来的重税的大部分，浪费在军费的扩张和内战的准备上。李承晚反动派为了挑拨内战，疯狂地准备了坟墓。

他们在南朝鲜树立反动警察制度，迫使一切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转入地下，并逮捕、监禁、残杀爱国的进步人士。任何人只要对李承晚的反动制度和他所准备着的内战稍表不满，就会横遭迫害。

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卖国贼李承晚，实施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对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发展而斗争的数十万我祖国的优秀儿女，加以监禁或虐杀。

李承晚匪帮为了掩盖他们进行着的内战准备，继续不断地制造了三八线的冲突事件，致使祖国与人民陷于不安，并且企图把冲突事件的责任，嫁祸于我们人民共和国政府。李承晚匪帮在准备所谓“北伐”的过程中，甚至毫不犹疑地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朝鲜人民的死敌——日本军阀勾结起来了。李承晚匪帮为了维持其一己的私利和反动统治，并使我祖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变为美国独占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泉源，竟把我祖国南半部的经济完全置于美国独占资本家的支配之下。

美帝国主义者为在经济上使我祖国殖民地化，极力破坏了共和国南半部的民族经济。在美国资本的压迫下，中小企业家和商人不能不陷于破产的境地。在我们祖国的南半部，生产停顿，大部分的工厂和制作所倒闭，失业人数达数百万。农民直到现在尚未得到土地。人民彷徨在饥饿线上。

亲爱的同胞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我们祖国的所有爱国民主政党、社会团体及全体人民，为了避免同族相争的内战和流血的惨祸，曾尽了一切的努力，争取以和平方法统一我们的祖国。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即提出了和平统一我们国家的意愿。但是，李承晚匪帮破坏了这一意愿。李承晚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所谓"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支持下，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捏造了南朝鲜的单独"选举"，并加强了对我们祖国北半部的武装进攻和准备。

为了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完全独立，去年六月祖国战线旗帜下的南北朝鲜七十一个爱国政党与社会团体，曾提议以举行总选举的方法来和平统一我们的国家。全体朝鲜人民热烈地支持与拥护了这一提议，但李承晚匪徒们连这一提议也予以破坏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七日，祖国战线再度提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方案，反映了渴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朝鲜人民的意志。

但是，李承晚匪帮威胁地说，凡对祖国战线的和平统一方案表示支持的人，将被认为是叛逆，因此这一方案又遭到了破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九日根据各民主政党社会团体要求祖国统一独立及民主发展的坚决意志与愿望，提议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与南朝鲜"国会"联合成立单一的全朝鲜立法机关的办法，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李承晚匪帮怎样答复了全朝鲜人民所期望着的这一正当提议呢？

背叛朝鲜人民利益的李承晚匪帮，以发动内战来回答了全朝鲜人民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期望。

反动的匪徒们在他们所发动的内战中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李承晚匪帮妄图通过内战，在共和国北半部也实施现存于南半部的、和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一般无二的反人民的反动统治制度，以夺取我们人民所业已取得的民主改革成果。李承晚匪帮妄图从由于共和国北半部根据无价没收无价分配原则实施土地改革的结果而成了土地主人的农民手中夺取土地，重新还给地主，并剥夺朝鲜人民在我共和国北半部所业已取得的一切民主自由和权利。李承晚匪帮妄图将我祖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使朝鲜人民成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隶。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祖国与人民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为了消除我祖国当前的危险需要怎样办呢？

朝鲜人民在反对李承晚匪帮的这一战争中，必须坚决保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宪法，推翻南半部反人民的法西斯的李承晚傀儡政权，将我祖国南半部从李承晚匪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恢复南半部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委员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下，完成祖国统一，以建设强大的民主独立国家。我们为反对李承晚卖国匪帮所发动的内战而进行的战争，乃是争取祖国统一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战争。

亲爱的同胞们：全体朝鲜人民如不愿再一次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隶，就应该在打倒李承晚卖国匪帮的救国斗争中一致奋起，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胜利。全体朝鲜人民对站在李承晚匪帮背后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举一动应加以密切注视，提高警惕性。

我们人民军应坚守共和国北半部的各种民主改革，从反动统治下拯救南半部同胞，并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在为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发挥我们的勇敢及创造性。为了祖国和人民，应不惜自己的生命，竭尽爱国忠诚，斗争到最后的一滴血。

我们人民军的军官和战士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是由祖国和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他们是以爱国爱人民的精神培养出来的，以最新式的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他们是有经常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高度觉悟的朝鲜人民的军队。

共和国北半部人民，应把自己的一切事业，改编为战时形态。为了在短时间内无情地歼灭扫荡敌人，要动员一切的力量，应使一切工作，服从于战争和歼灭敌人的任务。应组织全国人民对人民军的援助，源源不绝地供应前线，供给他们一切必需品，保障军需品的紧急输送。对于伤兵要组织广泛的热爱的救护工作，应组织能圆满完成前线供应、巩固人民军后方的一切工作。

在后方要与捣乱分子及造谣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应迅速展开肃清特务破坏分子的工作。敌人是狡猾的阴险的，它必将以各种方法散布谣言，我们不要被反动的宣传所欺骗。共和国的政权机关，应消灭一切妨害全人民进行争取统一自由独立的战争的破坏分子。

共和国北半部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要以高度的警惕性防止敌人的侵害，以保卫共和国的一切工厂、制作所、铁道及运输、交通、邮电、机关，要忠实地执行生产计划和自己所负的任务，要以献身的努力，来及时地迅速地保障前线的需要。

共和国北半部农民，要为保障人民军的食粮并更多地生产农作物而努力。同时，为保障人民军的胜利，应在各方面尽力予以援助。

共和国南半部男女游击队员们，应展开更激烈的英勇的游击运动，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与建立解放区，并在敌人后方歼灭敌人，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袭击敌人参谋部，切断并破坏铁道、公路、桥梁及电信电话线等。要以一切方法截断敌人前后方的联络，到处消

灭卖国者，恢复人民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同时积极协助人民军。

共和国南半部同胞不要服从李承晚傀儡政府的命令，以怠工来回答其命令与指示，使敌人陷于混乱。

南半部工人应到处组织总罢工，举行起义，并应保卫工厂、制作所、矿山、铁道及其他工作场所，防止溃败的敌人的破坏，欢迎与积极协助人民军，以保障胜利。

南半部农民，不要给敌人粮食，保卫今年的收获物，广泛地参加游击队运动。应不惜一切来协助与支持人民军。

私人企业、中小工业家及商人，应援助人民军。在从美国独占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我们民族经济的斗争中，应协助人民军。

南半部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统一自由，并为取得能以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应协助反对李承晚匪帮的战争，并应积极参加大众的政治宣传行列，无情的揭露李承晚匪帮的罪行，在群众性的起义运动中，起宣传鼓动的作用。

南朝鲜傀儡政府的"国防军"官兵们：你们的仇敌正是李承晚卖国匪帮。为了祖国与人民，你们不要错过机会，应掉转枪口，瞄准李承晚匪帮。你们要转到人民军和游击队这方面来，协助争取祖国统一自由的全人民斗争。你们只有起来反对我们人民的仇敌。才能在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的斗士的行列中，取得荣誉的地位。

亲爱的同胞、兄弟、姊妹们：我号召全朝鲜人民要更紧密地团结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周围，以迅速消灭李承晚匪帮的武力与警察制度。为了争取我们人民所一致渴望的祖国统一，坚决奋起进行争取与保障独立的光荣的胜利。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坚决奋起进行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人民，必能取得胜利。我们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人民方面的。我相信，我们为祖国与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胜利。

统一我祖国的时机到来了，怀着胜利信心勇敢地前进吧！让我们在支援我们的人民军和前线中，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让我们人民要献出一切力量来消灭敌人。

为全人类的正义战争而奋斗的朝鲜人民万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

为争取胜利前进！

（原载195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周外长对杜鲁门声明发表声明

（1950年6月28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府挑起朝鲜内战之后，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七舰队并已奉杜鲁门之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藉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原载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背景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11月1日，发起了向西南进军的战斗。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不论从全局还是从西南局部来看，胜券已经在握。这时，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1949 年 10 月 13 日关于由西南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指示，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

西藏是中国领土，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席卷全国之际，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动分子则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于 1949 年 7 月制造了"驱汉事件"。党中央对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行为极为关注。9 月 2 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这次"驱汉事件"的目的，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并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西藏。9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我们预感到解放西藏将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

1949 年 12 月中旬，党中央转来了毛主席在访苏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的信，信的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元旦过后，党中央又转来毛主席从莫斯科给刘邓贺首长的电报，要求立即研究部署进军西藏问题。提出进军兵力只需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应争取于今年 4 月中旬开始进军。为此，指示进藏部队应迅速进驻打箭炉（今康定），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2 月 8 日，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持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并决定以 18 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广大藏族同胞欢欣鼓舞，他们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第十世班禅就率先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代表西藏人民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班禅在电文中恳切地陈述："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完整、呼吁奔走，未曾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毛主席、朱总司令接电后，于同年 11 月 23 日复电，表示欢迎和赞赏，并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愿望。此后，内地各省的藏族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也都纷纷集会座谈或发表文章，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但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以摄政大札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支持下，千方百计破坏我军和平解放西藏。1950 年 1 月，在英、美等帝国主义分子的挑动下，西藏地方当局企图派出一个非法的"亲善使团"赴美、英、印度等国活动，以表明其"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揭露了这个阴谋，指出：如果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中央表示欢迎，若是派出非法使团到各国进行背叛祖国的分裂活动，中央是决不容许的。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后，美、英等国也致电西藏地方政府，要求撤回代表团，西藏地方政府才不得已将代表团召回拉萨。

在西藏地方政府导演的所谓"西藏独立"丑剧破产后，仍不甘心失败。他们继续背离西藏广大人民的意志，拒绝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一方面，他们指使派往北京谈判团长期滞留国外，迟迟不赴北京；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并将藏军集结在昌都、那曲两线，妄图用武力阻拦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也曾三次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入侵"，并进行无理干涉。美帝国主义也利用联合国干涉我军解放西藏。对此，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干涉都是不能容许的。

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无视祖国人民热望的行径，中央一直采取克制态度，耐心等待他们能够及早改弦更张，转变立场。这时，藏族中的一些爱国人士，也在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积极贡献力量，以促进谈判早日举行。1950 年 7 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青海省当采活佛和西康省格达活佛前往西藏，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去面见西藏当局进行说服工作。当采活佛经海路前往，未能到达西藏；格达活佛从陆路前往，竟被反动分子于 8 月间毒死于昌都。反动分子的这一野蛮暴行，激起了广大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1950 年秋，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先后对西藏当局函电晓谕和派人劝说未获结果，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昌都进军。1950 年 10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10 月 7 日，我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克服了道路、气候等困难，开始向西藏进军。19 日，我军歼灭藏军主力 5000 余人，解放了昌都，打开了通往西藏的通道。

材料：

· 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忆昌都战役

材料　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忆昌都战役

在我政治争取面前，西藏地方当局置我党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于不顾，自恃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倚仗军事力量，一面施展拖延策略，将其和谈代表滞留印度，迟迟不赴京谈判，借以争取时间；一面接收外国军援，扩充藏军，武装民众，陈兵昌都，妄图以金沙江为界，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形势的发展，迫使我军与西藏当局，不得不在昌都进行一场军事较量。

1950年7月24日，王其梅与我率前指进驻甘孜，与吴忠、天宝会合。7月30日，苗丕一率领南路先遣支队157团进抵巴塘。

为了统一指挥解放昌都的行动，张国华军长、刘振国主任率军机关部分人员于9月5日到达甘孜。我们会合后，组成了18军前方指挥所(简称军前指)。

9月上旬，中共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第二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昌都解放后的有关政策及工委机关的建立。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了仁至义尽。1950年1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遵中央指示给西藏当局写信，阐述中央方针政策；5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绕加措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达赖速派代表团赴京谈判。之后，又由西康、青海派遣和谈使者，并通过我国驻印度使馆多次敦促西藏当局，派代表协商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8月22日，和谈使者格达活佛被害于昌都，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被软禁于黑河(今那曲)。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希望于9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以军事手段进占昌都。尔后，再做和平解决西藏的努力。

张国华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青藏高原气候特点，期于我军10月解放昌都。并指出：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们能于10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张国华说，毛主席对我军解放昌都后将主力撤回甘孜，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的部署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会议遵照西南军区"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的指示，根据藏军依托金沙江，扼守入藏咽喉要道，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柯(不含)线为重点，沿国德至盐井千里金沙江西岸，分南北两线，做分区配置的布势，决定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我与藏军针锋相对，分南北两个集团，对付藏军南北两线部署，将我军主要兵力用于藏军主要防守之北线生达、邓柯地区，以精兵奔袭类乌齐、丁青，出恩达，兜击昌都，抢占邦达，切断藏军主要退路，制约藏军西逃。主力则分路合击，割裂藏军部署，协同一致地向心机动，将藏军会歼于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及类乌齐、恩达地区。

会议认为，昌都战役的结果，为国内国外所关注，对解放西藏，尤其是争取西藏当局和平解决问题关系重大，歼灭藏军越多，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越大。会议号召参战部队，坚决机智作战，排除一切困难，达到歼灭藏军有生力量之目的。在战区内人人宣传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俘虏政策，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做好统战和群众工作。

会议决定，昌都解放后，立即成立以王其梅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昌都分工委，统一领导昌都地区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早日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认为，打好昌都战役、做好解放后的昌都地区工作，对稳定西藏、争取和谈、准备明年进军关系极大。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全体指战员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而努力。

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鼓舞了士气，为昌都战役的胜利，为战后昌都地区的工作，做了思想和政策准备。

会后，张国华要我陪他去拜访夏格刀登等上层人士。13日，我与张国华、刘振国赴玉隆、邓柯，了解玉隆至昌都运输300万斤粮食的畜力落实情况。当张国华确认了藏族土司、头人支援我军进军昌都的诚意和能力之后，才定下了进行昌都战役的最后决心。

这时，西北军区在彭德怀同志的亲自部署下，第二军独立骑兵师在新疆组成，其先遣连已进至西藏改则。青海骑兵支队已进驻玉树，完成了作战准备。

9月中旬，52师主力与先遣团会师甘孜，云南之126团先头营进驻德钦。各参战部队于9月26日向战区开进，北集团位于玉树、邓柯、德格地区，南集团位于巴塘、德钦地区，在金沙江东岸一线完成了战役展开，对昌都地区之藏军形成了弧形战役包围。

1950年10月6日，我军发起了昌都战役。

北集团为战役进攻的主要集团，由52师统一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钳击合围昌都及其以西之藏军。右路，由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率154团、青海骑兵支队、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担任战役迂回任务。当日，骑兵支队由玉树南下，154团、骑兵侦察连乘夜暗偷渡金沙

江。该路部队日夜兼程，每日以120至160里的速度强行军，抢占甲藏卡，直扑类乌齐，实施千里大迂回。中路，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155团、师直、军炮兵营、156团组成，担任战役主攻任务。于7、8、9日，隐蔽渡过金沙江，依次作斜梯形展开，向生达，昌都攻进。左路，由苏同卿、王达选率侦察营、工兵营和54师炮兵连组成，担任正面钳制任务，7日，于岗托强渡金沙江，向当面藏军进攻。

南集团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担任歼灭南线藏军、抢占邦达、八宿要点的任务。5日，云南14军之126团以及125团一个营在盐井方向发起战斗；7日，157团三路渡江，进击宁静。

我参战部队在进击中，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有的班长和党员要背90多斤。他们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在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的千里征途中，在海拔4000米的冰峰雪线上，在横断山脉的峰峦叠嶂中，风餐露宿，忍受着饥饿、疲劳和高原不适应带来的病痛，爬雪山，过草地，越冰河，蹚急流，奋勇直前，战役按预想的方案顺利发展着。

10月12日，南集团进占宁静，解放盐井，藏军第9代本格桑旺堆在我政治争取下率部起义，南线藏军所剩无几。北线藏军遭我打击后，逐步向昌都收缩。至18日拂晓，右路我骑兵支队以日行160里的速度急驰，累垮了战马500余匹，先于藏军4小时抢占了恩达。154团经36小时的强行军攻占了类乌齐，切断了藏军主要退路，胜利完成了战役迂回任务。中路之156、155团及侦察、工兵两营，分3路逼近昌都。至此，除157团正向昌都以南之邦达、八宿急进，封闭尚存的一个缺口外，藏军其它退路均为我堵死。

我各路部队进展神速，藏军在我强大攻势面前已无法抗拒我军攻势。18日晨，退集昌都的4个代本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退却。当晚，进至宾多，发觉退路已为我切断，即掉头南下，改向邦达、八宿方向撤退。行至宗驿山，遭我阻击，在我政治争取下，新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武器。至此，昌都战役遂告结束。23日，西南军区发来嘉奖令，庆祝解放昌都、类乌齐、江达、宁静、盐井、碧土等地，歼藏军5738名，争取第9代本起义的伟大胜利。

昌都战役使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藏军总兵力近⅔，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比喻的：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它的胜利，粉碎了西藏当局以武力阻止我解放西藏的企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背景介绍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继续北犯，占领平壤，把战火烧到鸭绿江、图门江边，疯狂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乡。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经反复研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军民向侵略者作战。随后，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一九五〇年内连续发起了三次攻势，给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集中约30万兵力，继续疯狂地分兵冒进。10月25日晚，李承晚军一个多营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志愿军遭遇，被全歼。揭开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接着，志愿军主力分兵猛攻，11月2日攻克云山。同时迂回侧翼威胁敌军。敌被迫全线撤退。11月5日战役结束。共歼美、李军15800多名，迫使敌军退至清川江以南。挫败敌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美军遭第一次战役打击后，仍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力不足，只是象征性出兵。美军总部广播称：“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麦克阿瑟调动20多万兵力，发出“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令。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定州、香积山、妙香山等预定战区时，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突然发起反击。将敌分割包围，“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翻马倒，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敌人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逃。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追歼敌人，12月5日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东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7日黄昏开始向长津湖地区反击。12月1日歼灭美军1个多陆军团及1个炮兵营。东线之敌向南突围。中国人民志愿军爬冰卧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予美陆战第一、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收复咸兴、元山、兴南地区。残敌由海上狼狈逃窜。第二次战役共歼敌

3.6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绝大部分地区，并解放了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美国侵略军被击退到“三八线”后，一面积极调整部署，一面抛出“停火建议”，以图争取时间，伺机再行北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采取正面突破，穿插迂回，分割围歼的战法，12月31日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附近。敌人调动兵力于洛东江预设防线，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30公里，企图诱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不利地形作战。彭德怀识破了敌人有计划退却的阴谋，加之运输线延长，供应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到达“三八线”及以南地区后，停止追击，休整待机。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了汉城及“三七线”以北广大地区。

材料：

- 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
- 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 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材料一　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根据《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刊印）

材料二　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须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材料三　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人民日报》社论

美国侵略者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在南面早已延伸到我国的台湾，在北面现在竟扩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了。美国的空军，愈来愈频繁地向我国边境袭击。现在一切事实，都彻底地打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外国助理人的花言巧语，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将侵略战争引向中国的罪恶阴谋。我国人民决不能坐视朝鲜战争的这种严重形势而置之不理。正因为这样，近日各地各阶层的爱国人民，纷纷主张以志愿行动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这种紧急的情形之下，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四日发表联合宣言，明确地说明中国人民对于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并对各地爱国人民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要求，加以热烈的支持。各党派联合宣言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历史文件。它向全世界忠实地表达了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共同意见和共同的行动纲领。我们完全无保留地拥护这个伟大的正义的宣言。在这里，我们愿就朝鲜战争和我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加以申述，以便帮助读者更透彻地了解这个宣言的意义。

在世界人民面前张牙舞爪的美国法西斯屠夫，为什么急于向朝鲜人民开刀呢？又为什么在其侵略朝鲜的同时，立即派遣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侵略我国的台湾省；并且同时宣布它对越南、菲律宾加紧武装侵略呢？为什么美国侵朝的空军竟连续侵入我国领空，肆行扫射与轰炸；侵朝的美国海军竟炮击我国的航海商船呢？为什么美国竟然这样疯狂地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我国边境而无所忌惮呢？这显然不是什么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美国整个军事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大资本家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法西斯都倒了，资本主义世界是大大衰落了，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以伟大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空前强大，因此就力谋用扩大侵略的方法来逃脱自己的危机。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计划，以欧洲和亚洲为两个主要目标。亚洲的重心是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夺取了中国，就等于夺取了整个亚洲。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曾经用极大的努力经过蒋介石的国民党来夺取中国，但是遭到了悲惨的失败。蒋介石被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亚洲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了。但是美国的冒险者就此甘心了吗？没有，绝对不是这样。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就发出警告说："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决定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于中国的进攻：朝鲜、台湾和越南。杜鲁门自己在六月二十七日的命令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制造了南朝鲜傀儡对于北朝鲜人民的进攻以后，杜鲁门随即下令派遣海陆空军大举侵入朝鲜，同时公开地夺取台湾，和加强干涉越南。在这三个方向中间，朝鲜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美国完成了对朝鲜的侵略以后，它的一把尖刀就可以插进中国的胸膛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会忘记，美国在东方的这一整套侵略计划，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实行过的"北进主义"和"大陆政策"的再版。

远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北进主义侵略政策的代表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之流就已经鼓吹"征韩论"，利用当时朝鲜的亲日派(所谓"开化党")制造政变。一八九四年，日本与中国在朝鲜、东满、山东、台湾等地进行了陆战和海战，即所谓甲午之战，并在战胜中国之后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日本由此不但控制了朝鲜，而且夺取了中国的台湾等地。接着，日本就从朝鲜进而觊觎中国的东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又根据朴资茅斯条约，夺取了旅顺大连和在南满的种种特权。一九一０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并继续利用朝鲜作为基地向中国东北和山东施行侵略。到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终于实现了全部侵占中国东北的步骤。此后，日本连续进攻热河、冀东和绥远，威胁华北。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法西斯就向全中国大

举进攻；并于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把战火烧遍东南亚。日本的这一连串侵略步骤，在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说得最清楚。田中义一说："穷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又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它的衣钵却被美国侵略者继承下来了。当年田中的奏折，被杜鲁门最近在旧金山演说中重谈了一遍。虽然是旧调翻新，但板眼依然不差。比如，田中说的是"征服朝鲜"，杜鲁门就说成了"对付朝鲜的侵略"；田中说的是"东亚为我之东亚"，杜鲁门就说成了"亚洲各国是我国工业社会的基础"；田中说的是"征服世界"，杜鲁门就说成了"在世界上建立法治"。而比田中表现得更贪馋的则是杜鲁门急欲从朝鲜直接扩大其侵略战争。他大叫"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是为了要在世界上建立法治的历次斗争中的巨大的一步"。他宣布"我们在进行战争"，而且要"扩大这一类帮助人类进步的工作"。

美国在前一个时期还极力隐蔽它发动战争并从朝鲜迅速扩大侵略战争的步骤。美国海军部长马休斯于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波士顿演说时宣称"我们甘愿偿付任何代价，甚至发动战争"，"我们会因此被称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我们也心安理得地接受。"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白宫新闻处曾慌忙声明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与马休斯演说同日发表的麦克阿瑟致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电报中关于侵略台湾的声明，也曾被杜鲁门下令加以"撤消"。但是事实早已证明这只是美国侵略者掩耳盗铃的把戏。不久以前，当着美国侵略军逼近三八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曾放出空气，声称"美军将停止于三八线"。后来又说是美军"应在距离苏联与中国边境稍远一些的地方即行停止"。但是事实又证明了这些都只是谎话。直到目前，美国侵略军逼近了鸭绿江，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仍然在散布烟幕，"保证在北朝鲜进军的麦克阿瑟军队不会推进到朝鲜边界以外"。但是按照历史的经验，作出这种声明，难道不正是美国侵略者将要"推进到朝鲜边界以外"的预兆吗？

由朝鲜人民军所缴获的李承晚傀儡政府的外务部顾问尹炳求致李承晚的信件，和电通社十一月二日纽约电所报道的美国高级军界人士关于美军在中国的战略计划，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地了解美国侵略计划的内容。尹炳求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给李承晚的信上说："必须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从三方面配合行动。这三方面就是：日本人必须沿着东北部突出地带穿过海参崴前进；朝鲜和美国的军队在解放了我们的北部领土后，必须穿过辽东半岛进抵哈尔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必须光复中国失去的领土(其中包括辽东省)。在战争胜利结束后，朝鲜和美国军队必须占领满洲。……在改造远东的下一阶段中，日本必须取得统治势力，将海参崴和西伯利亚的一部分交给它。"这个外务部顾问又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致李承晚的信中，附了所谓"韩美同盟条约"的草案，其中第七条写着："战争一定要在满洲领土上继续进行。""大韩民国总统除了复兴大韩民国主要利益所在的北朝鲜以外，保证将满洲和中国东部其他部分的天然资源的发展移交美国和韩国联合管理。"电通社的消息说：曾经杜鲁门批准的美国"一旦要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采用的战略计划分为两部。"第一部，详细谈到朝鲜和台湾对于完成美国在'反对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的基本目标和对于'保护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的战略重要性。另一部，讨论政治形势的几个变化涉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初，并计算到以美国军队参加'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美国高级指挥部建议利用朝鲜领土和朝鲜军队在满洲和北方某些地区进行作战，作为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印度支那、缅甸和香港的领土以及军事基地将被用作进攻华南的南方前线上的基地。强大的伞兵部队将由台湾运往上海周围地区及华中华南的其他地区。"美国政府对于这些暴露其阴谋的凭证，照例是不会承认的。但是今天美国扩大侵略的实际行动，难道不正是使人们相信这些凭证的可靠吗？

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门前了，放火者已经暴露了他们的野心了，我们处在侵略者刀锋之前的中国人民，怎样能够熟视无睹？怎么能够置之不理？我们的热血同胞，怎样能够不纷纷起来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或者有人会想：敌人现在虽然以陆军逼近我们的鸭绿江、图们江，虽然以空军轰炸扫射我们的边境，虽然以海军掠夺我们的台湾，但是究竟还没有大举进攻我们的国土。日本武装侵略朝鲜在一八九四年，而占领东北则在一九三一年，前后还有三十七年。如果我们竭力避免敌人进攻的任何借口，利用这个空隙来进行和平建设不是更好吗？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以为已经发起了进攻的敌人会允许我们有和平建设的时间和环境，而这却不合乎事实。今天的美国和以前的日本不同，美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停止在朝鲜那样久。而且日本当时也没有真正停止在朝鲜，它还是侵略了南满。我们永远不能够等待敌人大发慈悲给予我们以和平建设的时间和环境，而只有依靠坚决的奋斗来争取。敌人是不知道"慈悲"，也不依赖借口的，敌人的行动决定于力量的斗争。如果敌人不能够进攻我们，他就不去寻找借口了；如果我们

不能够或不准备抵抗敌人，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消灭敌人的借口，而只能鼓励敌人进攻的欲望。请回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吧，当时中国人民并没有去援助朝鲜，甚至也没有去援助被敌人压迫的中国自己的同胞，但是敌人不是仍然很容易地造出了进攻的借口吗？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以为敌人是不能够战胜的，而这却完全违反事实。今天的美国和以前的日本不同，它们是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日本进攻朝鲜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和平民主阵营，没有苏联，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有的是西太后和李鸿章的反动统治，在朝鲜有的是大院君李罡应和总理大臣金宏集的反动统治。在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时候，有了苏联，但是没有今天这样的强大，而中国仍然是反动的蒋介石的中国。但是今天呢？今天在全世界有了以强大的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它的力量应胜于帝国主义侵略阵营。今天在东方有了强大的有苏联同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它是在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它的力量远非满清和蒋介石所能够比拟。今天的朝鲜人民在北半部已经经历了五年的解放，在南半部也已经从曲折的斗争特别是最近四个多月的斗争中认清了朝鲜独立解放的唯一道路。朝鲜人民虽然在暂时居于优势的敌人面前受了挫折，但是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仍然是如火如荼地继续进行着，而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地位也仍然是不稳定的、脆弱的和危险的。中国人民的志愿行动将使朝鲜人民得到无限的鼓励和信心，使他们有可能转变整个的战局，有可能消灭和逐退立脚未稳的美国侵略军，并有可能强迫侵略者接受对于朝鲜问题的公正的和平的解决。

十分明显，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才能够得到教训，朝鲜和远东的和平才能够恢复，中国才能够免于被侵略，才能够在安全的条件下从事和平建设。

因此，正如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所说，我们必须坚决拥护中国人民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努力。让我们向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的爱国志士们致敬！让我们向他们欢呼万岁！让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作他们的后盾！

（原载195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任弼时

任弼时（1904——1950）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人。早年入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国。192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先后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代理总书记、总书记。1927年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6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8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赴长沙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中共湖南省委执行原定长沙暴动计划。1928年到中共中央工作。7月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务委员。1930年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月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长征途中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同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8年8月出席党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曾被派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40年3月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翌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曾任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并继续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47年任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1949年4月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并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生前撰有著作《山西抗战回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材料一　中共中央讣告 任弼时同志逝世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悲痛地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经过一年多的卧病以后，在十月二十七日十二时三十六分因脑出血逝世。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一九二〇年他在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四十六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和全中国的爱国人民，为了补偿任弼时同志逝世所造成的损失，学习任弼时同志的榜样，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人民祖国的国防，继续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和人民建设事业而奋斗。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政治家任弼时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材料二　痛悼伟大的人民战士 ——任弼时同志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

任弼时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不幸因病逝世了。新中国开国一年，各种巨大的建设工作正待举办，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所燃起的侵略战争的凶焰正待扑灭，在这样的时候，一个经过严重考验的、富有经验的、在人民大众中具有巨大威信的领导者——任弼时同志的逝世，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地是巨大的损失，悲痛的损失。

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二六年。从那时起，一直到他逝世为止，曾经四度在一起工作。在这些时间里，他是我的领导者，我的同志和我的先生。

弼时同志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政治上的原则性。弼时同志是很温和的人，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但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的立场是坚定的，是从来不向机会主义低头的。他用道理说服所有的同志，使同志们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反对机会主义，保障革命政党——共产党的统一。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同年年底在上海反对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先锋主义”倾向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弼时同志在这中间的功绩，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一九二七年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已经形成为危害革命运动的投降主义路线。当时，国民党中蒋介石一派已经公开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揭起了反革命的旗帜。在武汉政府中的汪精卫一派，也已经准备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投降，所以用“过火”为罪名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放在革命运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对汪精卫一派作无限制的让步，这就是取消革命，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投降，这就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实质；或者是发展工人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发展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组织和扩大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对革命完全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以伟大的工农的力量为基础，团结武汉政府中一切进步的和中间的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蒋介石和武汉政府内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党的正确路线。任弼时同志就是这种正确的革命路线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任弼时同志的领导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曾通过了一个政治意见书，向党的中央提出来。汪精卫叛变的前夜，陈独秀在武昌召集了一次党的紧急会议，弼时同志在会上宣读了这个意见书。投降主义者陈独秀斥责了弼时同志，并当场撕毁了这个意见书。当时所进行的这个斗争，虽然没有能挽救革命的失败，但对于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的继续坚持，是有重大作用的。

由于青年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有了功绩，在当时青年团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就产生了“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共产党，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受党的领导，做党的助手。“先锋主义”或者“第二党”倾向，就是使青年团也成为与共产党一样的政党，这就破坏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使命是要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破坏这个基本原则，必然招致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削弱无产阶级和解除其武装，和青年团自己对广大青年群众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这对于革命运动是很不利的。一九二七年底，以弼时同志为书记的青年团中央，对于这种“先锋主义”倾向作了斗争。这个斗争，在我国革命的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曾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严重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全国沸腾着抗日运动，但是蒋介石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向人民进攻，集中一百万兵力进行所谓"五次围剿"。人民军队——红军的主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往陕北。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后来公开成为叛徒的张国焘，来了一个分裂运动，反对党中央，并把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和其他一部分同志和一部分部队强留在甘孜地区。当时因为交通断绝，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无法知道张国焘的反党反革命的阴谋。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方面军到了西康，与四方面军会合，叛徒张国焘企图煽动二方面军反对中央。弼时同志当时是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在他和朱德同志、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等的领导下，战胜了张国焘的阴谋，使毛主席所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得到了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拥护。一、二、四方面军终于能在陕北会合，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推动了抗日战争，弼时同志的领导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弼时同志在青年团的建设中，在党的建设中，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都担负过重要的责任。这些建设工作是很困难的，要遇到许许多多复杂的麻烦的问题，领导者必须善于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弼时同志就是这样的领导者的一个例子。谁只要读过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所写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就可以知道，弼时同志是详细研究了许多有关的事实和文件，加以分析，才能把土地改革中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解决得那样透彻，把土地改革的理论推进一步。弼时同志处理过许多党的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写过许多文件，只要举出这一个例子来，就可以看见他是以怎样负责的态度和细密的研究来处理一切事情。

弼时同志曾经两次入狱，曾经经过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曾经经过像万里长征那样的惊涛骇浪。对敌人坚强不屈，对机会主义坚决斗争，对困难不低头，对人民无限忠诚，这是他的美德。人民的伟大战士任弼时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极有修养，并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

三十年不倦的紧张的奋斗，使弼时同志从一九四七年年底起患高血压症。但他仍坚持工作，到去年四月才不得不休息。休息了一年零二个月，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本月十八日，在党中央宴请世界青年代表团的宴席上，他还告诉我说他的体重已经减轻，血压已经降低，对于自己的健康很乐观。谁知这一次的谈话，竟成了永诀。二十六日得到他脑出血的消息，再去看他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二十七日竟与世长辞了！

党中央号召我们："学习任弼时同志的榜样，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人民祖国的国防，继续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和人民建设事业而奋斗。"

我们必定尽心尽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他的榜样，完成他的遗志！安息吧，亲爱的任弼时同志！

（陆定一　原载《人民日报》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

（孙业礼）

杨　根　思

杨根思（1922——1950）　江苏省泰兴县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作战勇敢，曾荣获战斗模范、爆破英雄和华东军区一级、三级人民英雄等称号。1950年9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同年10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29日，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分割围歼美军的战斗中，他率领1个排坚守小高岭阵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当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人时，他抱起10斤重的炸药包，拉响了导火索，冲向了敌群，炸死了大量敌人，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自己壮烈牺牲。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他"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及一级国旗勋章。他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1903——1950）　西藏著名爱国人士。一九〇三年出生于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内德西地村的一个农奴家庭。格达自幼聪颖，三岁时被认定为白利寺前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十九岁入拉萨最早的黄教寺院甘丹寺深造，苦读八年获得一等格西学位（相当于博士学位）。格达精通佛教经典，熟谙藏医学，在文学上也有很深造诣。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当地藏民由于对红军的疑虑和恐惧，纷纷在红军到来之前外逃。格达活佛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亲自到藏民面前宣传，并派喇嘛深入到农村牧场，动员外逃藏民回家安居生产。一九三六年六月，格达活佛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主席。之后，他更加积极地发动藏民救护红军伤病员，为红军筹办军粮马料。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军队和封建农奴主反攻倒算，杀害了许多博巴自治政府的成员。格达活佛挺身而出，同敌人进行周旋和

斗争，转移保护了红军留下来的二百多名伤病员。格达活佛为避开敌人的纠缠，携带红军和博巴政府留下来的文件出走拉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西宁后，格达活佛致电党中央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派代表绕道青海赴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献旗致敬。一九五〇年三月，西康人民政府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年六月，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后，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前往拉萨劝说和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早日谈判。格达活佛不畏英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的百般阻挠与威胁，行抵昌都并向僧俗各界宣传《共同纲领》。八月二十一日，格达活佛被英美间谍投放于茶水中的毒药毒害致死。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格达活佛的骨灰从昌都迁回甘孜，安葬于白利寺中。

材料　功垂青史

1950年8月，著名的藏族爱国人士、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47岁的生命。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为之震惊，雪山草地激愤含悲。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等单位，在西南重镇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王维舟、李达等人亲临大会致哀。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曾经与格达活佛在雅砻江畔相濡以沫的刘伯承将军送来挽联：

具无畏精神，功烈允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送的挽词，高度赞扬了格达活佛的革命献身精神：

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这位为国献身的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3年出生在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内德西地村的一户差巴（土司属下的农奴一般称差巴）家里。他自幼聪颖过人，3岁时就被认定为白利寺前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在幽静的寺院里，度过了童年生活。19岁时，格达活佛被送进拉萨最早的黄教寺院甘丹寺深造，经8年苦读，由于学识出众，获得一等格西学位（相当于博士学位）。他精通佛教经典，熟谙藏医学，在文学方面也有较深造诣。

1936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康北高原，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转战千里，终于在格达的家乡——甘孜会师。红军一进入藏区就布告群众，宣传民族宗教政策。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颁发布告说：

"本军以扶助藏民，解除藏民的痛苦，兴藏灭蒋，为藏民谋利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藏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勿得惊惶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

但在旧中国，由于历届政府对藏族同胞实行歧视性的民族政策，汉藏关系一直很紧张。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主的欺骗宣传，使藏民群众对红军深怀恐惧，因而在红军到来之前，差不多都跑光了。格达活佛通过结识朱德和刘伯承同志，了解到红军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亦深信不疑。他亲自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还选派喇嘛深入到农村牧场，动员外逃藏民回家安居生产，并发动喇嘛和藏民群众为红军探听消息、捐献粮柴、充当翻译和向导。他还写了不少赞颂红军的诗句：

"云雨出现天空，红气布满大地；未见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博巴，藏族的自称）在甘孜宣告成立，格达活佛被推选为自治政府主席。自此，身肩重任的格达活佛更是忙碌不停，动员喇嘛和藏民群众救护红军伤病员，为红军筹办军粮马料。在他的感召下，许多喇嘛和藏民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也要把节省的粮食支援红军。据当时红军政治部出具的收条或证明表明，仅格达主持下的白利寺，半年内交纳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0石，豌豆32石；还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还专为白利寺颁发布告以示感谢：

"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应予保护……"

红军临走前，朱德同志亲往白利寺与格达活佛话别说："我们就要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的人，要很好团结起来，把博巴政府办好，只要团结得好，就不怕敌人来破坏。我们红军一定会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的。"

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和封建农奴主疯狂地反攻倒算，博巴自治政府的许多成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在这危急关头，格达活佛挺身而出，同敌人进行周旋和斗争，他把红军留下来的200多名伤病员扮成喇嘛转移到白利寺和其它寺院，在他们伤愈恢复健康后，又派人把他们秘密送往内地。国民党驻藏人员曾经百般拉拢诱惑他，蒋介石还亲自圈定他为"国大代表"，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了。为了躲开敌人的纠缠，他携带着红军和博巴政府留下来的文件出走拉萨避难。

在拉萨的日子里，格达活佛一直思念远走的红军。当他听到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的消息时，心里十分快慰。后来，他偶尔买到了一本登有朱德照片的书，便供在家中日夜祈祷。这期间，他写下了40多首思念红军的歌曲。其中一首是：

"红军走后，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

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子，

高山，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

你给我们留下了金石的话语，

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每当有内地商人赴藏，他都亲自拜访，寻问内地情况和红军动态，有人从青海秘密带回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他如获至宝，秘密收藏起来。

1949年初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兰州和西宁等重要城市，格达活佛喜不自胜，立即联络甘孜的爱国进步人士，联名致电党中央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他更是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道青海赴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献旗致敬。表达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并请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康、藏。

1950年3月，西康人民政府成立，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特邀他参加政协第二次会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亦电邀他到京会晤。恰在此时，英美印等国进行阴谋活动，妄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我中央人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揭露外国的分裂阴谋，命令解放军火速进驻西藏，同时派遣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劝说和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早日谈判，以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格达活佛不畏艰险，毅然踏上了去拉萨的征途。行前许多友人对他的安全担忧，他说：“为了藏族人民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冒万难也是应该的，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等到西藏解放了，再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不迟。”

格达活佛行抵昌都时，英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福特百般阻挠他前往拉萨与达赖会面，并把他软禁起来。在滞留昌都期间，格达活佛苦口婆心地向僧俗各界宣传《共同纲领》，并致电拉萨友人，请为西藏的解放出力。8月13日，福特卑鄙地在格达活佛的茶里投下毒药。格达中毒后，仍不忘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坚持要给拉萨的友人及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子打电报，吁请他们投身于西藏的解放事业。8月21日，福特又一次投毒。格达活佛在圆寂前还高声呐喊：“死也不悔！”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生效，藏族人民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格达生前为之奋斗牺牲而未竟的事业终于实现了。党和政府依法惩办处决了杀害格达活佛的凶手，并把格达活佛的骨灰从昌都迁回甘孜，安葬在苍松翠柏掩映的白利寺中。党中央派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甘孜，向白利寺赠送了毛主席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的锦旗。

（吴占权）

珍闻轶事

第一套人民币

我有幸在纸币收藏家吴筹中老先生家见到第一套全新的人民币，大饱眼福。

如今能见到完整全新的第一套人民币，据说目前已发现的只有吴老先生的这一套了，前年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币图录》中的第一套人民币实样就是吴筹中先生提供的。第一套人民币计有12种面额：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伍万元。共计60种版面，其中壹佰元的版面最多为8种版面，其次是贰拾元计7种版面。币面上的图案也较为丰富，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

纸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主持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亲笔题写，字体为标准柳体。第一套人民币为什么会有60种版面之多，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1948年12月1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建址于石家庄，并于成立之日开始发行钞票，即第一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原版由第一印刷局所属石家庄印钞厂统一制作，北平、上海解放后则改由接管后的中央印刷厂北平厂和上海厂统一设计原版。由于当时处于解放战争的环境中，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除北平、上海印制外，在天津、西安、沈阳等地均先后印制过。由于当时各地印制生产的条件各不相同，造成了印刷质量上参差不齐的特点。

第一套人民币的功绩是完成了新中国统一中国货币的历史任务，到了1950年3月全国财经会议以后，基本上停止了生产。同时开始酝酿设计新货币，即第二套人民币。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第一套人民币改称旧币，第二套为新币，比价为壹万元比壹元。同年4月1日旧币停止流通。

（吴少华）

斯大林为毛泽东祝酒

俄罗斯双月刊《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5－6期连载了原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著名汉学家费德林撰写的回忆录《斯大林与毛泽东》。作者曾担任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的主要翻译。现将该文的有关内容编译如下，供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同志们参考(编者注：本文的标题为编译者所加)。

毛泽东有一次会见斯大林时对他说："斯大林同志，在条约(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编者)签定之后，我们想举行一个不大的招待会。"斯大林回答道："应该。"毛泽东说："不过，招待会不是在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别的地方举行。比如说，在'梅特罗波尔'宾馆。"斯大林问："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解释道："您要知道，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这对我们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不合适的。"斯大林说："是啊，但是我从来都不参加在餐厅或外国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来不去。"毛泽东坚持说："不，不，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招待会您不能参加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邀请您，请求您参加。您一定要答应啊。"

接着是沉默，斯大林没有急于回答。毛泽东一直凝视着斯大林，期待着主人作出同意的答复。"好吧，毛泽东同志，既然您希望这样，我参加。"斯大林终于作了回答。就这样，斯大林一生严格遵守的禁忌被打破了。

在2月14日预定的时间，中国的主人们和他们的客人都聚在"梅特罗波尔"宾馆的宴会厅里，等待着斯大林的到来。许多人的脸上挂着忧虑和不安。"斯大林会实现自己的许诺吗？他能来吗？"不少人作出了不乐观的预测。不一会儿，斯大林走了进来。他迅速地扫视一下门厅，当他发现我后，就不慌不忙地向我走过来。然后，他脱掉大衣，走进存衣间，挂上大衣和帽子，对照镜子整理一下头发随后问我："情况怎么样，大家都来了吗？"我回答说："是的，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其他朋友早已经到了，大家都在等候您。""那么，请带我去吧。"斯大林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把斯大林带进宴会厅，人们向他热烈鼓掌和不断欢呼。斯大林停下脚步，环视一下聚集在大厅里的人们，然后请我同他一起向站在一张长桌后边"主席团"位置上的毛泽东走去。两位领导人互致问候，相互握手，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身体情况。这时神采奕奕、身材挺拔、落落大方的周恩来带领一批中国同志陆续走到斯大林身边，向他问好，一一同他握手。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苏斯洛夫和布尔加宁也出席了招待会。大家举杯为两位领袖祝酒。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注视着并排站在一起的这两位领导人。他们不时地交谈着，斯大林讲的多些。

大家都在急不可待地等候着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斯大林讲话。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斯大林作了一个手势请大家注意，然后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感谢历史，是历史给我们造就了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英勇无畏的共产主义者。同志们，为毛泽东的健康和成就，干杯！"大家热烈干杯，接着又爆发了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董友忱)

关于"炮轰天安门案件"

"炮轰天安门案件"发生在1950年的北京，已成为39年前的历史。笔者曾参加此案件的处理工作，现记下当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或许不无意义。

一、离校来北京。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当时我在浙江大学外文系念书。我所在的这所国立大学，因学风严谨，有"东方剑桥"之称，学生多是苦读的穷学生。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校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捕牺牲，不少校友、同学入狱，我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焦灼，心向北方，企盼解放。

我们系的主修课是英语和英国文学，我学习到1950年夏毕业了。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中央机关，于是跟随政务院来校接学生的干部，乘火车直奔北京。当我在火车上看到天坛祈年殿的蓝色屋顶时，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

到达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后，我们几人被告知分配去公安部，先要去中央公安干校学习。中央公安干校的校址暂时设在道教胜地白云观。它是复兴门外一座陈旧的道观，当时附近只有几家农户，周围都是荒地，地上浮土深可没脚，它的北边不远却有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一直向西延伸，路旁是高大成行的杨树，可是路边空空荡荡，看不到一所房屋。原来这一带叫"新北京"，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修的路。现在的复兴门外，已建成高楼林立名符其实的新北京，白云观也经过修葺，恢复其名胜古迹的原貌。它已淹没在广播大楼后面的楼群中，要找到它真要费些周折呢！

由各大学来的学生组成干校的第十队，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我们学政治，学业务，还参加生产劳动，日子过得紧张愉快。我们穿上军装，从学生变成军人。

二、参加处理"炮轰天安门案件"。离建国一周年的日子近了，我们正排练话剧，准备节日演出。9月27日队部找了我去，说部里有紧急任务，要调几个懂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的同学去参加工作，其中有我。不久，一辆吉普车将我们拉到北池子小康家胡同。刚落脚就接我去草岚子，见到部内一局赵明处长。赵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大

学生。草岚子是市局的预审科，由吕岱同志负责。在这里拘留的对象，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

在这里拘留着几个外国人，其中有李安东(Riva Antonio)，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甘斯纳(Genthner)，德国人；哲立(Gerli)意大利人。这几个人是“炮轰天安门”案件主要的嫌疑犯。

原来在9月下旬，市局某同志发现山口隆一向东京某商社寄了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张天安门城楼草图，墙下有一台“消防压水机”，喷出的水流直奔天安门城楼，并注明水头要达到这个高度，似乎是一张消防设备性能的草图。

因为离国庆大典不远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要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这张草图引起了公安部门的警觉，因此山口隆一、李安东等几个外国嫌疑犯被拘留审查。从他们家中搜查到的文件中，发现许多关于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资料，有的情报上还附有我军的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姓名。李安东写给美国纽约大主教查浦曼(Chapman)的信中，曾表示“感到被当成间谍枪毙的恐惧”。山口隆一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更多，而且整理成卡片。

因为国庆已临近，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弄清案情。这案子由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对在草岚子的这批洋特嫌，加紧审讯。

审讯工作很紧张，有时整夜进行。吃饭睡觉也没有规律，工作一停就睡几个小时，起身后不是翻译资料就是继续审讯。经过内审外查，材料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等人虽然矢口抵赖，但铁证如山，连准备作案用的迫击炮也被搜查出来，才不得不供认那张图是寄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G－2(情报处)的，准备在我国庆一周年庆典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城楼，加害我国领导人。

这二人的罪证材料，经理整理、编目，打印成厚厚几本。1951年8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这个案件，将那张“压水机”草图也刊印出来。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这两个主谋犯，被押赴刑场，得到应有的下场；甘斯纳和哲立等被判处徒刑，刑满后被我国驱逐出境。

李安东是中国通，早年是向北洋军阀推销军火的军火贩子，以后当上国民党空军笕桥航校的意大利代表团上尉成员，为国民党出谋划策。他曾建议国民党的空军飞机不要装大口径机炮，而要装多门机枪，他为此还提供了计算公式。他是法西斯党徒，他的党证这次也被搜出。

这个案件在国庆节前被侦破，清除了一大隐患，保卫了国庆大典的安全。国庆一周年这天上午，我们在广场边观礼台上，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神采奕奕。这时机群轰鸣掠过上空，广场上的大炮和坦克，铁流滚滚，由东向西地接受检阅。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安慰。帝国主义分子的任何阴谋，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洪流。

(万嘉荣)

志愿军战歌的由来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国野心狼！”

这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曾鼓舞百万志愿军指战员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激励了一代中国热血青年为“保祖国，卫和平”而英勇战斗。然而，你可知道这首战歌的由来吗？

一九五〇年夏，为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某部炮兵第一师二十六团开赴鸭绿江边整装待命。在五连召开的表决心大会上，好几个班的决心书上都写着“保卫和平，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有的战士在发言中写出“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句子；几乎所有发言中都有“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口号。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将战士们发自内心的誓言记录下来，后几经修改补充，写成了一份诗歌形式的决心书。在全团出国作战誓师大会上，麻扶摇代表连队发言，这份决心书作为开场白，受到热烈欢迎。

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麻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等几处修改意见，随后引用于一篇战地通讯，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

作曲家周巍峙看到通讯后，为这首诗歌谱上曲，并冠以《打败美帝野心狼》题目，在全军、全国广为传唱。

一九五四年，全国评选优秀歌曲，这首歌获一等奖，歌名正式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齐继林)

彭德怀挂帅志愿军的确定过程

1950年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非常危急的情势之中，中国东北边境在美军炮火的严重威胁之下。10月1日夜，在毛泽

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金日成来电和朝鲜局势进行了彻夜讨论。2日凌晨，毛泽东急电邓华等"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并"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迫切问题：出兵时间和谁来挂帅。毛泽东说："朝鲜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会议对出兵时间初步确定为10月15日。关于谁来挂帅，原拟林彪出任。毛泽东说：林彪认为敌我装备极为悬殊，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找他谈了一次话，他又说失眠、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这怎么能率兵打仗！毛泽东提议彭德怀出任，得到常委的一致同意。这次会议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得到确定。

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美援朝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并把彭德怀同志从西安接来参加。在讨论中，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针对一些不同意见，彭德怀说"我们跟美国打，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是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他还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坚定的态度，对于迅速确定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

1950年6月25日晨，我国的邻邦朝鲜半岛爆发了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这本来纯属于朝鲜的内部事务，但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于27日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空、海军给予南朝鲜政府军以支持，同时又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针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我国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外交部长周恩来于28日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严斥美国对朝鲜及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2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攻占了南朝鲜汉城，并继续向南发展反攻。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了以美国为首共有16个国家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侵入朝鲜，协助南朝鲜军队作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军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授权他指挥美军和其它参加国的军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作战。9月15日当朝鲜人民军进攻到南朝鲜洛东江一带后，麦克阿瑟调集了陆、海、空军七万余兵力，乘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切断了人民军的后方供应线，于9月28日重新攻占了汉城，并继续向北进犯。9月30日夜，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此严重情况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于10月1日要求我国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10月2日，毛泽东主席电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军队至朝鲜境内援助朝鲜同志作战。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犯，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0月7日，美军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并派飞机不断轰炸我国边境城市丹东、宽甸、辑安等地，将进攻矛头指向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安全。鉴于如此严重局势，我国政府为了捍卫新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应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于10月2日决定派遣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去抗击向北冒犯之敌。10月2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和集结在鸭绿江北侧的13兵团(后改为志愿军)司令员邓华发电说"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一)彭德怀挂帅出征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下达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的利益，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所有后方工作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负责保证之……。

10月8日清晨，彭德怀和高岗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乘专机飞抵沈阳，立即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问题。10月9日，召开了志愿军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目前朝鲜形势和中央决定出兵的意图，要求各军在10天之内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但干部中普遍反映，我军武器装备太差，对美国飞机顾虑很大，对敌机毫无抵抗能力，大家要求志愿军出国作战时一定要有空军支援配合。因此，彭德怀和高岗于当天11时联名致电毛泽东请示："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指挥？盼速示"。

(二)周恩来秘密访苏

10月8日上午，另一架专机也从北京机场起飞，乘坐这架飞机的是总理周恩来和俄语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康一民，他们也是奉毛泽东主席之命，秘密飞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会谈。其任务是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问

题。当时林彪自称有病也同机前往苏联休养。由于国内只有苏制小型客机，这架专机8日飞抵伊尔库茨克，9日又飞抵鄂木斯克，10日才飞到莫斯科。这时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均在南方黑海海滨休养。11日周恩来和林彪在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军元帅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附近阿布哈兹区的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地，下午即和斯大林会谈。苏共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但主要是斯大林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插话。会谈首先是对朝鲜战场形势交换意见。斯大林认为：美军自从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疯狂向"三八线"以北进攻，对北朝鲜压力很大，现在看来敌人是不会停止前进的，按目前情况，如果没有后援，至多能维持一个星期，这意味着美军和南朝鲜军将陈兵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中、苏、朝三国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你们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从空中、海上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的。但苏军早已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活动，而不能到前沿和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于10月2日应金日成首相的要求"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援助朝鲜同志。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这对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此意已于当天电告斯大林同志，但我国由于长期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况且军队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悬殊太大，而且空军才刚刚组建，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时，苏联应该供应志愿军所有现代化武器装备，并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斯大林听后表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具体细节由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负责和苏联军方研究解决，并尽快运往满洲里交接。但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周恩来对斯大林关于苏联空军须在两个月后才能出动的态度感到失望。斯大林强调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不过是一种推托之辞。早在1950年8月苏联空军派别洛夫将军率领一个师共138架飞机（其中有米格—15型战斗机122架）已进驻中国鸭绿江北侧，同时苏军在中国的旅顺港和苏联的海参崴也驻有空军，完全可以配合志愿军作战。斯大林实际上是担心如苏联空军在朝鲜与美国空军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为了避免与美军的冲突，斯大林是想观察一下中国志愿军入朝后能否战胜以美军为首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双方在经过两个月的作战较量后，胜败可明朗化，到那时再决定空军是否出动。斯大林的态度显然是顾虑重重和犹豫推诿的表现。

事实上，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对"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击战役后，已将进攻之敌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又于1951年1月1日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1月4日攻克了南朝鲜首都汉城，1月8日继续南进到"三七线"一带后，这时苏联空军才于1月10日派出两个空军师，担任掩护中朝边境的安东（今丹东）至安州、辑安至江界两条短距离的后方供应线，而此时中国志愿军由鸭绿江至"三七线"漫长的后方供应线，依然暴露在美国空军肆意轰炸破坏之下，一切粮弹物资供应仍无保障，志愿军战士处在零下20度严寒的气候下，仅靠一把炒面一把雪与敌人作战。除作战伤亡外，因冻、饿、病伤亡者亦不少。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写道："后来我听彭总讲：斯大林说的空军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见该书第25页）中苏双方在10月11日晚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和周恩来即联名将会谈情况电告北京毛泽东。

（三）毛泽东突然下令"出兵暂停"

1950年10月12日，彭德怀、高岗和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根据毛泽东预定在10月15日出兵的指示，正日夜突击部署入朝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召开会议、进行政治思想动员。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也积极调动后备兵力，准备第一批志愿军在10月15日渡过鸭绿江入朝与"联合国军"作战。10月12日，毛泽东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发急电："请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可是就在10月12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又连续发出两份急电，忽又命令志愿军"暂不出动"。一份是12日20时发给彭德怀和高岗的电报，内容是："（一）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即志愿军——作者注）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另一份是发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的电报，内容是："（一）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三）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毛泽东在一天之内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突然采取"紧急刹车"，这无疑是与收到了斯大林、周恩来10月11日联名将会谈情况发给他的电报有关。该电报在11日深夜经斯大林、周恩来审定后，译成密码，再经莫斯科电台转发到北京苏联驻华大使馆，翻译成俄文，再由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然后再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处。这中间有一段周转和时差的时间，因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有五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莫斯科

比北京晚五个小时，该电在11日夜发出时，北京已是12日了，因此推断该电的中文译稿送到毛泽东处时，已是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了。由于斯大林推迟了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毛泽东感到志愿军装备太差，入朝后要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同敌人陆、海、空三军作战，此仗能否打赢？如果打不赢，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如何对付？这样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使他立刻陷入焦虑之中，他认为必须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讨论后再作决定。因此推断毛泽东10月12日发给陈毅的第一次电报中命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是在收到斯大林、周恩来11日晚(莫斯科时间)联名电报之前；当毛泽东10月12日(北京时间)下午收到斯大林、周恩来电报，告知苏联空军须在两个月后才能出动时，这和原来志愿军出兵时由苏联空军出动支援配合的方案发生了变化，所以他又在当天晚上立即给彭德怀、高岗和陈毅、饶漱石分别发急电，命令部队原地整训，暂不出动。这就出现了毛泽东主席在10月12日一天之内，对志愿军预定10月15日入朝作战方案，突然来了个"紧急刹车"。

(四)聂荣臻深夜打电话

彭德怀自10月8日飞抵沈阳后，连续三天通宵达旦的召开志愿军和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布置出国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这次是出国作战，时间又十分紧迫，且各种情况还不明确，因此他急于想提前入朝去和金日成首相会谈，当面了解情况，商讨中国志愿军入朝后如何与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共同对敌等问题。他在离开沈阳赴丹东前，曾于10月10日20时给毛泽东发电报请示："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11日)经安东(丹东)前往德川特报。"10月11日，彭德怀率指挥所全体人员到达丹东，立即和志愿军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各军渡过鸭绿江路线，讨论各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12日他亲自察看渡江地点，准备各军按预定计划10月15日过江入朝。可是，毛泽东在还未答复彭德怀的拟提前入朝的来电时，10月12日已接到斯大林、周恩来的来电，于是夜晚他和代总长聂荣臻商议，立即给彭德怀发电不要提前入朝，而是迅速回京开会。但聂荣臻计算了一下时间，从拟电稿到译成密码需要时间，再发到安东后，又要将密码译成电文，这样至少要四个小时才能送到彭德怀手里。为了使彭德怀迅速知道中央的意图，于是他急急忙忙的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总参作战部值班室，对值班参谋王亚志说："彭总现在哪里？是在安东吧？你马上给我接通安东彭总的电话！越快越好！"当时因志愿军领导机关刚刚组建，还没有将机关代号上报总参作战部，而作战部也没有直接和驻丹东的十三兵团部通过电话。幸而查到了驻丹东的第四十军代号，王参谋急中生智，立即请长途台挂接丹东第四十军司令部值班室。当时长途线路是党、政、军、民共同使用，但总参作战部要电话可以优先接转，几分钟后，四十军司令部值班参谋即回话找谁，因王参谋不知彭德怀是否已编了首长代号，只好直接对值班员说："北京有急事要找彭副总司令接电话！"对方说："首长住地比较远，现正在开会，须派车去接。"于是聂总长只好在值班室等候，他的表情很急躁，不停地来回踱来踱去。因电话等候时间太长，话务员不断催问："讲了没有？"一会又问："时间太长了，是否先撤线，待人来后再接通？"王参谋请示聂总长后，他大声说："告诉长途台，绝对不能撤线，要等下去！"约半小时后，丹东话机传来"首长已到，请讲话！"聂总急忙接过电话机，"彭总吗？我是聂荣臻，现在情况有变化！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请你速回北京面谈，听清楚了吗？"彭德怀接完电话不久，又接到毛泽东12日20时来电，催他和高岗回北京面谈。"这一情况使彭德怀感到很突然，几位志愿军领导人包括彭德怀自己在内都认为是不出兵或暂不出兵了。"

10月13日清晨，彭德怀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原总参作战部处长)搭乘由安东开往沈阳的火车北上，这位连续工作数昼夜的志愿军司令员，一头扎在卧铺上就呼噜噜的睡着了，直到13日中午火车抵达沈阳车站后才醒来。他了下火车就急忙赶到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早已等候的高岗简略交谈后，即一同乘专机飞回北京，到达北京饭店后即由聂荣臻迎接到房间内，彭、高、聂三人即开始密谈，彭德怀让随行的成普回总参作战部宿舍待命。

(五)毛泽东最终的决断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针对斯大林对当前朝鲜战场形势表现的忧虑，以及推迟了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方案的新情况，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进行了认真讨论。因此时朝鲜人民军大部份被隔在"三八线"以南，情况十分危急，时间紧迫，不容犹豫，政治局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也要立即出兵援朝。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

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为了防止部队认为出兵方案有变化而产生松懈情绪，他立即给在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马上拟电发给志愿军领导人邓华、解方等："各部继续加紧出国作战准备工作。"该电由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审批后按特急电发出。

13日晚，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

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极为关键性的会议，经过对出兵援朝的利害关系反复讨论后，出兵援朝，终成定局。于是毛泽东主席即在10月14日凌晨一时，又急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宋时轮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14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告知他中国人民志愿军预定的出动时间和入朝后的作战方案。至此，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2日对第十三兵团（已改为志愿军）和第九兵团入朝作战“突然暂停”一天后，又开始起动。几天之后，即1950年10月19日晚，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0多万人开始分批渡过鸭绿江，从而揭开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

（张希）

毛岸英牺牲经过

1950年10月下旬，毛岸英远离了祖国和亲人，来到了烽火连天的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在志愿军总部担任机要秘书。

跨过鸭绿江，朝鲜人民惨遭战祸的情景就呈现在眼前。一路上，由于美帝飞机狂轰滥炸，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工厂在燃烧，学校在燃烧，村庄在燃烧。疲惫不堪的朝鲜老乡，扶老携幼，拖着艰难的步履向北撤。朝鲜民族遭受到的空前浩劫，使得岸英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他想到身后就是自己亲爱的祖国，美帝侵略气焰如此嚣张，救邻即是自救。他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无比重大，恨不得立即奔上前线与万恶的美国强盗拼杀。然而，他这时已是一个富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把对美帝的强烈仇恨和对朝鲜人民的深沉的爱倾注到工作中去。在朝鲜战局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岸英同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利用各种机会，包括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要求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中朝友谊的教育，真心实意地感谢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对我志愿军的支援和帮助，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与朝鲜人民休戚与共。在维护中朝友谊，并肩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岸英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旗帜鲜明地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平时，他和总部的工作人员一道，在作战室里不断收集战况，翻译电文，和向前方部队传达首长的命令。他不分份内份外，日以继夜顽强地工作着，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进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1950年11月25日，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二次战役开始的第一天。由于24日下午敌机在总部上空不断侦察，首长决定今天除作战室留下两人值班外，其余人员一律进入防空洞隐蔽。

岸英因为前几天忙于整理参加中朝联军会议的记录，很少休息。但他有一股为革命拼命干的顽强劲。这一天，领导和同志们硬是把他拉到防空洞里休息来了。但岸英身在防空洞，心在作战室。他的心与前线部队紧紧地联在一起。他想：今天，第二次战役刚刚打响，前方部队在英勇地歼灭敌人，胜利地向前推进。有多少胜利喜讯需要通过作战室向首长报告，首长的命令需要通过作战室不断向部队下达。他坚信现在作战室值班的同志，是胜任这一工作的。但是，多一个人，总要多一份力量啊！更何况今天是战役的第一天，许多意料不到的紧急事情需要及时处理。

岸英再也坐不下去了。空袭警报刚一解除，他就从防空洞里冲出来，大步流星地奔向作战室。

作战室主任也赶来了。

作战室在紧张地工作着，首长的命令一个个及时顺利地下达着……。

正在这个时候，狡猾的敌机突然偷袭过来，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弹。站在门口的两位同志焦急万分地喊了声，敌机投弹了！爆炸的气浪便把他们冲倒在门外的山沟里，一个脸部被烧伤，一个身上穿的皮大衣、头上戴的皮帽子着了火。作战室和周围一大片地区刹那间升起了冲天的烈焰。

被气浪冲到山沟里的两个同志爬起来后就赶紧跑到大火边，高声呼喊着，“岸英，你们快冲出来！”

由于火势太大，加上近八百度的高温，烈焰一时无法扑灭。这时，同志们仍在高声呼喊，希望听到岸英的回音，看到他能冲出火海。然而，回答同志们呼喊的，却只有那山谷的回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儿子、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英雄战士——毛岸英同志为了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8岁。

岸英烈士牺牲后，遗体安葬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总部把岸英烈士的忠骨迁到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直到今天，岸英烈士仍安息于他生前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过的友好邻邦——朝鲜锦绣江山的土地上。

毛泽东谈毛岸英牺牲

毛岸英同志在朝鲜作战牺牲之后，彭老总决定带着建议部队休整的意见和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亲自回国向毛泽东同志陈词，免得电报讲不清楚。副司令们一致同意老总的决定。因此，等指挥所转移到君子里，彭老总就带着徐亩元，连夜登车北去了。

彭总来到北京，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彭总追到外地，主席正在卧床休息，警卫人员劝老总等主席起来再说，老总觉得不能再等，他拨开警卫人员，闯门而入。

毛主席从床上坐起来。彭总搬过一把椅子，向主席身边靠了靠，就毫不顾忌地直陈了自己的看法。

主席斟酌了片刻，说出这样一个方案：志愿军部队的补充，不能采取国内的常规办法，而要采取一种特殊办法，即全国所有部队，都可以作为志愿军轮番出国作战。这样，既顺应了全军将士的愿望，又可以锻炼我军各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都去摸摸"老虎屁股"。毛主席又说，新的志愿军部队出国，再把在朝鲜的部队换回来，需要一定的准备工作和时间，也还要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说到这里，主席问彭老总：是否乘胜利的余威，再打一仗？一则如能将敌人再歼灭一部，使之再向后退，三八线我军阵地可以更加巩固；二则为照顾同盟军的期望，也应再接再厉，不惜一战。

彭总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再组织第三次进攻战役，随即说："主席，我向你汇报一下毛岸英同志的牺牲经过……"汇报过后，彭总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他，使毛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主席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少顷，主席抬起头来，缓缓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个，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毛泽东委邵力子视淮

1950年秋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请邵力子和水利部长傅作义到他的住处相见。

主席说道："我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的。"又对邵力子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都很浩大。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了。"邵力子连连点头应承。主席又对傅将军说："将军虽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傅将军也连连点头。

不久，近七旬的邵力子，沿江淮流域作了一个月的考察，并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几天后，主席给邵力子打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1951年春节晚会上，主席见到了邵力子说："皖南、皖北、苏北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投入治淮工程，中央打算组织一个视察团去工地视察，如果先生身体能及的话，是不是请先生代我一劳，前往视察？"邵力子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委托。

毛泽东给自己家划成份

1950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已到了划分成份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同志家划什么成份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同志作了难。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把富农的成份划在一个革命领袖家，于心不安。

寅秋想来想去，主意已定。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一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信上寥寥数语，问道："那成份的事，还是冒讲罗？"寅秋说："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来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嘱托：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分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泽东同志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模范地执行政策的崇高品质，教育了乡政府的同志和家乡人民，"照政策办事"，不但成了韶山人民的口头禅，同时，也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朱总司令亲临二七厂视察

1950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全厂上下一片欢腾。朱总司令走下汽车，满面笑容，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人们凝视着朱总司令那慈祥的面孔，内心感到无比激动。

朱总司令认真听取了厂领导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好啊！你们发动工人保护了工厂，恢复生产快，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他不顾疲劳，在厂领导陪同下，视察了翻砂、客车、货车、机车等车间。他走到翻砂车间时，热情地握住二七老工人刘江的手问："你好！多大年纪了？现在你生活好吗？"问得刘江心里热乎乎的，说话时不禁热泪盈眶。

当朱总司令来到机车检修场时，场上的工人立刻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欢呼："朱总司令来了！""朱总司令来了！"整个广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在欢腾的浪涛中，朱总司令站在露天的迁车台上，做了长时间的讲话。他挥动着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号召工人们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发展生产，多修车、修好车，还要造新车。为恢复国民经济、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总司令的讲话铿锵有力，每一句话都打在人们的心坎儿上，激励着人们勇挑生活、支前两副重担，将革命进行到底。

朱总司令要离厂了，人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目送朱总司令远去。

他老人家对我们铁路工人的关怀和信任，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二七机车车辆厂掀起了生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14名工人踊跃地参加了志愿军，上了前线，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

（赵学勤　郑庆杰　郭庆远）

流行风

背景介绍

一九五〇年，人民共和国在新的道路上继续胜利前进，相继取得了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整风运动、调整工商业、土地改革、进军西藏以及抗美援朝等方面的一系列初步胜利。全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文艺等各领域涌现出来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之间广为流传。

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如马烽的《一架弹花机》主要描写了村合作社买进一架弹花机引起的风波；孙犁的《山地回忆》表现了子弟兵同人民之间在艰苦岁月和战争血火中所建立的血水深情；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塑造了一个好玩、好闹、好乐、"想把日子过痛快一点"的农村姑娘小环的形象；谷峪的《新事新办》描写了王贵德与凤兰两个农村青年的婚事；赵树理的《登记》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淑池的《金锁》叙述了一个流浪难民的故事；秦兆阳的《改造》则写了一个改造懒汉的故事。这些小说都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为素材，因而深受群众喜爱。一九五〇年反映战争的小说如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是描写太原战役的一部长篇小说；杨沫的《苇塘纪事》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坚持抗日的故事。

一九五〇年颇具影响的话剧是胡可、胡朋等创作的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剧本通过赵铁柱一家十三年的遭遇和赵铁柱父子觉悟成长的过程，揭示了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诗歌中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以真挚的感情，朴素的笔调叙述了三个妇女翻身解放的故事，可谓是新诗中的艺术珍品。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蒙古族民间叙事长诗《嘎达梅林》也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九五〇年流行的歌曲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盟歌》、《毛泽东赞歌》等。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及一些朝鲜歌曲开始风靡全国，此外歌颂中苏友好的歌曲如《中苏友好歌》等也广为传唱。

小说《山地回忆》

短篇小说。作者孙犁。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小说》杂志1950年第3卷第4期，后收入《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子弟兵同人民之间在艰苦岁月和战争血火中所建立起来的鱼水般的深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阜平的一位十几年未见面的农民大伯，他那一身自织自染布的衣衫，使"我"回忆起往事："我"随部队来到阜平，一天早晨在河边洗脸时遇到了一位叫妞儿的姑娘，她开始嫌"我"在上游洗脸弄脏了她的菜，转而发现"我"没袜子穿，又坚持要为"我"做一双。果然，第五天"我"便穿上了新袜子，用的是她准备为爹做袜子的布。妞儿说让"我"穿上这袜子在三年内打败小日本。渐渐地"我"与这家人熟了，把这当成了"我"的新家。妞儿是个说话不饶人、勤快善良、心灵手巧的姑娘。农闲时，"我"帮大伯去贩枣，妞儿就起早贪黑地做饭，并让大伯用贩枣得的钱买了织布机。她开始学习织布的全部手艺，当她织成第一匹布时，"我"离开了阜平。现在见到大伯，"我"便决定送他们每人几尺布，大伯让"我"给妞儿买红色的和黄色的，说是回去让她照样儿做面国旗，像城里人家一样挂在门口。作者的构思自然而不平滑，善

于以小见大，通过“细枝末节”体现时代精神，在写实的基础上把人物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使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

短篇小说。作者方纪。发表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5期。这个作品是作者创作的“不连续的故事”的第五篇，它塑造了一个“好玩、好乐、好闹……想把日子过痛快一点”的农村姑娘小环的形象。小环是村里有名的漂亮姑娘，外号“一枝花”，小青年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小环还是村剧团的名演员、台柱子，嗓子好，会的戏多，远近闻名。看戏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看她。这样一来，难免就有了闲话，有些人虽然抓不住什么把柄，却总爱传一些有关小环的坏话。贫农团成立的时候，有人提议让小环当候选人，又引出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议论，小环一怒之下冲出会场，从此消沉起来。动员参军的时候，村里的青年没有一个人报名，连党员大群也不带头。支部书记认为问题出在小环身上，就去找小环做工作。原来小环正在和大群闹恋爱，工作果然做通了。青年们在大群的带动下一个个报名参了军。在欢送入伍青年的大会上，支部书记让小环讲话，小环激动了：“我算什么？一枝花，浪荡女人，我往哪儿摆呀！”她大胆地批评了封建思想，流着泪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日子过不上来，我除了拾柴禾打草，就不兴找一点乐趣了？我人穷命苦，难道心也得苦？苦一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哩？”以后，青年们参军走了，小环也变了，她生产很积极，虽然也还唱歌，但只是低低地唱，轻轻地唱，像是只唱给自己听……作品立意较深，人物性格也刻画得鲜明生动，第一人称和倒叙的写法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作品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并曾引起争论。

小说《登记》

短篇小说。作者赵树理。最初发表于《说说唱唱》1950年第6期，后收入《1949——1979短篇小说选》(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登记》是一篇评书体小说，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张家庄，这个地区有个用罗汉钱作定情物的习俗。一个元宵夜，小飞娥发现女儿艾艾用戒指“换”了个罗汉钱，便知道艾艾有了心上人，这使她回忆起往事。年轻时，她也曾与男青年保安相好，也用同样的戒指“换”了一个同样的罗汉钱。她的丈夫张木匠知道后，用小锯梁子把她打了个半死。其实这都是婆婆的主意，因为婆婆年轻时就为同样的原因被丈夫用小锯梁子狠打过，这好像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不成文的规矩。每每想起这些，小飞娥就心冷，却没想到女儿又走上了自己的老路。张木匠也听说艾艾与小晚恋爱的事，便与小飞娥商量应下五婶保的媒，赶快把女儿嫁出去了事。相亲时，五婶的话又戳着了她的“旧伤口”，自己挨打、心酸，难道再让女儿受这份儿罪吗？她回绝了这门亲事，也就得罪了民事主任，因为五婶提的正是民事主任的外甥。艾艾的女友燕燕也在与同村的青年小进恋爱，但因母亲不同意，村公所不给开介绍信而不能登记。她了解艾艾与小晚的难处，便决定帮助他俩，终于说服了双方的家长。但民事主任成心报复，硬是不开介绍信，区里的王助理也“光说空话不办事”，不准他们登记。这时候，婚姻法颁布了，艾艾和小晚理直气壮地领到了结婚证，并被区上称为模范婚姻。燕燕妈也想通了，同意了女儿与小进的婚事。小说在艾艾、小晚喜气洋洋的婚礼和乡亲们的赞美、祝愿中结束。建国初期，当人们沉醉于解放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盛赞时，作者看到了传统旧思想、旧习惯对妇女身心的摧残，发现了新政权中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旧作风及其恶劣作用，用小说的形式深刻地揭示了妇女解放、反对封建残余和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教育农民的重要意义。作者用讲故事的手法，从罗汉钱说起，展开了一系列矛盾冲突，描绘了华北农村的风俗画。通过倒叙和心理描写等手法，用口语化、个性化的语言，引人入胜地写出了两代妇女的不同命运。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结尾，使作品表现出乐观、明朗、诙谐、幽默的基调。

小说《金锁》

中篇小说。作者淑池。发表于《说说唱唱》1950年第3、4期。作品写了一个流浪难民的故事。金锁本来无姓无名，但他能干活，又会自编自唱，被一个寡妇收养后才取名“金锁”。后来，金锁流落在恶霸地主曹五爷的家里当长工，曹五爷用公家的粮食从逃荒的难民中骗来了玉匣姑娘，名义上是答应金锁的要求，为金锁娶亲，实际上却是别有用心。金锁和玉匣看出了曹五爷不怀好意，要离开曹家，临行时一算账，金锁不仅没得到工钱，反而欠了曹家许多。这样，金锁只好先把玉匣送出，自己仍留在曹家干活抵债。曹五爷设下圈套，强奸了玉匣。玉匣不从，把曹家闹了个天翻地覆。曹五爷气急败坏，竟将玉匣和金锁一同治死。不料金锁死里逃生，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回到这里，终于清算了伪装开明当上了抗日村长的曹五爷的罪恶。这个故事虽然有些落入俗套，但写得生动曲折，富有生活气息。另外，人物也刻画得真切朴实，无当时许多作品摆脱不掉的概念化的毛病。小说发表后，有人提出了批评，

并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文艺报》多次刊发了评论文章，如 1950 年第 2 卷第 5 期有邓友梅的《评＜金锁＞》，陶君起整理的读者意见《读了＜金锁＞以后》，赵树理的《＜金锁＞发表前后》；第 8 期有赵树理的《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和常佳东等的《读者对于＜金锁＞的看法》等等。有的批评者认为，金锁这个人物形象是不够真实的，他表面上像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农民，却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他羡慕地主，讨好地主，甚至连地主调戏自己的妻子也无动于衷，看不到有什么反抗，金锁实际上是个脓包、地痞；金锁最后成了八路军连长，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小说也没有表现出来，显得牵强；作者把城市流氓的性格硬加到一个农民身上，歪曲了金锁的形象；金锁是个阿 Q 式的农民，作者把在革命运动中作为动力农民写成阿 Q 的样子，也歪曲了农民的本质。也有的评论者认为，作者在主观上还是同情劳动人民的，是想替劳动人民说话的，但是由于在生活、思想、感情上脱离了劳动人民，又由于过分注重个人兴趣而忽视了客观现实，所以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了一种站在旁观者立场上，对于劳动人民取笑、挖苦的态度。关于《金锁》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界最早的一次创作讨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也有不顾艺术规律的地方，但讨论者态度诚恳、意见具体，并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意见，对于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对于推动文学创作，还是有益的。

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长篇小说。作者碧野。新华书店 1950 年 7 月第 1 版。这是描写太原战役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 1948 年的华北战场为背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直至消灭山西太原的守敌的斗争，真实而又生动地再现太原战役的历史画面，从而表明和回答了"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和"为什么是无敌的"。作品着重写了一个英雄的连队，通过这个局部对太原战役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团长高陵、代理连长史德明、机枪手崔大宝及董二孩、郭毛子都很有光彩。高陵性格豪爽、个性突出，有着高尚的品德和优秀的指挥才能，缺点也较突出。最后不听政委的劝阻，莽撞出击而负了伤。史德明对党忠诚、坚定、沉着、临危不惧，是一位受战士欢迎的孤胆英雄。机枪手崔大宝朴实、顽强，一条腿被打断了，还用另一条血淋淋的腿站着继续战斗。腿被锯掉以后，仍然要求留在部队里服务；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无敌的力量"。小说在挖掘了"中国人民最本质的伟大性格，加以发扬光大，并为他们雕塑了栩栩如生的巨像"（张致祥：《写在前面》）的同时，也没有避讳英雄们的缺点。如团长高陵为给战士报仇，不听政委劝阻，竟放弃指挥，亲自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去突击敌人，结果负了重伤。代理连长罗模柄在敌人打毒气弹时，一度产生动摇，跑回团部请示怎么办，为此影响了战斗。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并没有神化，而是在歌颂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成长中出现的缺点。作品中的人物因此变得更加真实可亲。小说构思巧妙。故事发展张弛结合，紧张激烈和轻松愉快相交替。激战前夕，指挥员们却在游"晋祠"。战斗开始后，激烈的战斗场面也写得有声有色。一仗打完了，又穿插上饶有风趣的对话和快乐的小故事。而这一切"主要是从生活中来的，没有框框，因而生活气息较浓"（碧野：《再版前言》）。写人物，作者多用白描手法。1951 年，几家报刊发表了《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我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意见》和《论小资产阶级思想对文艺创作的危害性》三篇代表性文章，对作品进行"震惊文坛"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受批判的长篇小说。1979 年，湖北省文联为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平反。

小说《苇塘纪事》

中篇小说集。作者杨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年 7 月初版，编入《文艺建设丛书》。本集收《苇塘纪事》和《翻身爱情》两篇小说。《苇塘纪事》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坚持抗日的故事。1942 年日寇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冀中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成了敌占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军政机关转移到方圆百十里的大苇塘坚持斗争。日寇纠结了一万多军队对大苇塘进行"清剿"，大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留下一个大队与敌人周旋。专署李秘书随七区游击队行动，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教育曹保长和维持会长赵子芹。游击队在区委书记于振德的领导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协助八路军大队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小说将优美的景色同残酷的斗争结合起来，表现了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外敌践踏祖国大好河山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讲述了大苇塘斗争的故事。小说结构上有些散文化，笔墨不集中，描写有些表面化。《翻身爱情》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土地改革中的故事。小说以诚子沟的贫农团主席李茂林与王大爱的恋爱为发展线索，表现了翻身农民在婚姻爱情上的新生，也揭露了地主阶级不甘心灭亡的反动立场。李茂林在旧社会家贫无法娶亲，在土改斗争中，他带领翻身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很多人来给他提亲，他毅然拒绝了富农的女儿，看中了勤劳朴实、苦大仇深的王大爱。王大爱在旧社会被卖过两次，解放后毅然同当伪军的丈夫离婚，与李茂林相爱。老地主张天贵造谣诬陷李茂林，李茂林为此闹情绪，在工作队老范的帮助下，追出了谣言的来源，真相大白，李茂林又精神振奋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久与王大爱结婚。小说对李茂林的描

写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真实可信。

诗歌《死不着》

作者张志民，主要内容如下：

《死不着》写于一九四七年，是一首歌颂农民翻身的叙事诗。它运用对比手法，深刻地表现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农民群众翻身后的喜悦。

长诗分两部。第一部《五十七年阴间过》写"死不着"在旧社会五十七年的痛苦生活。"死不着"出生在赤贫的农民家庭。他的出生，不仅未给家庭添喜，反而为家庭增添了愁苦；父母为家庭又添了一张要吃的嘴而犯愁，给他取名叫"死不着"；母亲在月子里急瞎了眼。在他出生的同一天，他家附近的地主家也添了一子，但"有钱家添儿是'大喜！'"，他们家称肉打酒办酒席庆贺，给孩子取名叫"来喜"。不久，他母亲又生下他的妹妹，因"月子里就没有米汤吃"，母亲只得狠心将婴儿掐死，到有钱人家去当奶妈。死不着饿得瘦骨嶙峋，来喜拿着白馍让他在地下爬，不爬就把他踢倒在地。他"混身没有一丝儿布"，从小就是光屁股。过年时，来喜家"酒足饭饱笑盈盈"，他家"哭成一窝蜂"。来喜十岁上学校，死不着给他家放羊羔。后来，他不慎失手打死了一只小羊羔，不仅被地主赶出门，而且被强令赔偿而欠下一身债。来喜家作饭半街香，他家没有糊口粮，他爹挣来一块钱，让他去来喜家买米。可来喜爹说"米价又涨到了一块二"，"差一毛你也拿不去"。没法，死不着到来喜家地里拾粮食，但来喜爹硬说他偷了谷，把他无故毒打。后来，因为"欠下来喜家二斗米，滚来滚去还不起"，来喜爹就逼着把他娘卖了还账，他父子俩也被赶出住在山洞里。他爹不久被逼得跳涧身亡，他被迫变成了"讨吃鬼"。他讨饭讨了三年整，后又到来喜家当长工。"没有睡过个整宿的觉，没有歇过个整天的工"，"五十七岁就花了眼，一辈子落下了满身病。"

第二部《我活了》写死不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霹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命的共产党"。死不着等翻身农民把来喜父子吊在树上，一边抽打一边声讨。他被分给了三间大北房，五亩黑土地，"一只大羊半头驴"及家具、粮食等。尤其是没想到五十七岁，还娶了个新媳妇，成了家。他高兴得"刮了胡子唱大戏"，深深感谢毛主席。因而他请人写信给毛主席，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决心要"多打粮食支前线"，"一心跟着毛主席的道儿走"。

诗篇以通俗、浅近的语言，和鲜明的对比手法表达了翻身农民真挚而朴素的感情。

诗歌《漳河水》

作者阮章竞，主要内容如下：

《漳河水》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是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民歌形式的长篇叙事诗。它通过对三个妇女的解放前后不同生活经历的描述，反映了太行山区妇女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热情歌颂了她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解放和新生。

全诗共分三部。第一部《往日》。太行山中的漳河水畔，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这里居住的人们，生活却不是那么美满。漳河边上有三个姑娘，一个叫荷荷，一个叫苓苓，一个叫紫云英，她们是闺中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倾吐愿望。荷荷想配个"抓心丹"，苓苓想许个"如意郎"，紫云英想嫁个"好到头"。但在封建传统观念支配一切的旧社会里，婚姻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美好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父母亲嫁女图的是钱，而姑娘嫁人求的是心，听说父母要通过媒人把自己许给人了，姑娘偷偷烧香，暗暗许愿，希望能嫁个如意的人家。

待到三月里，姑娘们"三尺青丝盘成卷，抬过河，抬过川，"婚娶礼毕，才知道三人都未如愿。"荷荷配了一个'半封建'，天天眼泪流满脸，苓苓许了个狠心狼，连打带骂捎上爹娘，紫云英嫁了个痨病汉，一年不到守空房。"

苦命的姐妹，一同回到了娘家，在漳河沿边，含泪互相诉说着个人的不幸。十七岁的荷荷嫁了个四十的汉子，丈夫家中，上有婆婆，下有小姑，每天找碴生气。苓苓嫁的那家，汉子的心就像天上的云彩，好便耍，恼便打，苓苓从天明忙到二更天，还处处不顺他的眼。紫云英三月当新嫁娘，十月里就上新坟，有病的男人抛下了孤儿寡母，她有心改嫁，又怕带个孩子，再碰上狠心的婆家，只好咬牙守寡。三姐妹的命运都是这样苦，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她们愤怒，她们发狠，"恨咱不能拔起山，把旧规矩捣成稀巴烂，万代的脚踪要踏出路，千年的水道看流成河！"

第二部《解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太行山区，太行山区的人民忙着减租减息闹土改，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也得到了解放，她们飞出了囚禁的铁笼，高唱着自由的歌。

荷荷首先走出了阎王殿般的恶婆家院，她不顾"坏男人瞪眼，恶婆婆头昏"，宣布自己要婚姻自主，与"半封建"离了婚。荷荷工作好，能力强，要表有表，要才有才，很多人都想把情根往她身上栽，荷荷自己有标准。她看上了王三好，两个情投意合，不久便举行了新式婚礼。婚后，两人恩爱和睦，男人前方运军粮，荷荷又当上了妇女种地小组的领导，生活越过越美满。

苓苓也不甘落后，她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她丈夫二老怪对媳妇整天在外面跑很不满意，还想耍他大男子的威

风，互助组的人帮助苓苓与二老怪作斗争，苓苓给二老怪开了个“夜里学习班”，讲人民政府男女平等的号召，用事实说明女人并不比男人差，劝二老怪扔掉他的老规程。“荷荷的办法灵验快，一夜治服了二老怪。”“姊妹高兴唱起来，封建社会能糟踏人，胡提出来套老规程，母猪不敬人，女人不算人，养孩儿抱蛋，洗衣裳做饭，不想想俺们是占一半，盖房要靠柱和梁，不想想男女是心连肝，谁离开谁都没时光。”

紫云英挺起腰杆做人比荷荷、苓苓更难。她一个寡居，很多不怀好意的人来纠缠她，闲言碎语象污水一样往她身上泼。旧时的姐妹荷荷、苓苓来找紫云英，鼓励她“支起腰杆挺起身，靠自己劳动作自由人。”紫云英扛起锄头和姐妹一同上山闹生产，并严辞拒绝了纠缠她的人。“以后别再上我门，紫云英要重新再做人。”

第三部《长青树》。妇女走出家门，开荒种地，出头露面，一些带有旧思想的人不免说东道西。二老怪受过媳妇的教训，又受了村长支书的批评，还是不服气，于是想上山看看，女人们究竟是不是会种地，他偷偷地上山，查看妇女们种的地，只见“苗苗出土绿油油，瓜秧露芽肥展展，花不棱棱手艺巧，头有头是道有道”，不由得失声叫好。他连忙向妇女们认错并欢迎批评他的封建脑壳。又把那些说怪话的也拉上山，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哑口。

“漳河水，九十九道弯，漳河流水唱得欢，桃花坞，长青树，两岸踏成康庄路。万年的古牢冲坍了，万年的铁笼砸碎了，自由天飞自由鸟，解放了的漳河水欢笑。”

诗歌《嘎达梅林》

蒙古族民间叙事长诗。产生流传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依据嘎达梅林起义的历史事件创作而成。陈清漳、赛西、芒·牧林翻译整理，1950年曾在《人民文学》发表，1959年和1963年又两次重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首长诗两千余行，它真实地描述了嘎达梅林起义的始末，再现了他所领导的起义军，为了反抗王公贵族的封建统治和军阀的掠夺，为了谋求自由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嘎达梅林原是王爷府里职位低微的武官，出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他开始劝说达尔汗王爷停止出卖土地、残害百姓，遭到革职处分。后来他又为民请命，到奉天府请愿告状，不料王爷与军阀内外勾结，反将嘎达问成死罪，押进死牢。嘎达之妻牡丹闻讯后，忍痛枪杀了自己的女儿，烧了房子，聚众劫狱，救出嘎达，开始武装起义。起义军英勇作战四、五年，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在西拉木伦河畔被敌包围，嘎达及所率部众全都壮烈战死。长诗成功地塑造了嘎达梅林这一英雄形象，刻画了他的叛逆性格。嘎达梅林的性格典型地概括了蒙古族人民的斗争精神。长诗还侧重刻画了嘎林梅达的妻子牡丹的英雄形象，描绘了其他众多的人物，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生活面和起义斗争的复杂性。长诗继承了蒙古族民间叙事诗的传统手法，并有所创新。风格粗犷、豪放、悲壮，感情深厚激越，语言丰富多彩，充满草原生活的气息。

诗歌《我们的土壤妈妈》

儿童科学诗。作者高士其。写于195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出版。后又收入作者诗选集《科学诗》（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诗作形象而又生动、通俗而又科学地向孩子们讲述了土壤不断运动、变化、更新、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土壤的构成、特性、功能以及它与一切植物、矿物、微生物、地球、水、太阳等的关系，特别是和人类的关系。诗作采取拟人化的艺术手法，运用一系列适合儿童理解水平的比喻，来解释土壤的有关知识。作品首先把土壤称为我们的“妈妈”，“是地球工厂的女工，在大自然的计划中，她担负着几门重要的工作，”如经营各种矿物，养育各种植物，保护各种动物，培养各种微生物等等。接着，向孩子们讲述土壤与地球、人类的关系：“我们的土壤妈妈，像地球的肺，会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和阿摩尼亚；她又像地球的胃，能消化地球上所有的腐物；她还像地球的肝，能分解毒质，淘汰病毒，使传染病停止蔓延……”离开了她，地球不会存在，人类自然更不会存在。最后作品还激励孩子们，将来从事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事业，把沙漠变成绿洲，从荒芜走向繁荣，让“我们的土壤妈妈，更进一步展开她的工作”。这首诗把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在把土壤“人格化”的艺术表现中，既注意事物特性描述的科学性，又充分顾及到儿童的心理特点和理解能力。语言优美，构思巧妙，表达通俗、浅显、明白，深受孩子们喜爱。曾荣获1949年——1953年全国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

话剧《战斗里成长》

作者胡可，主要内容如下：

《战斗里成长》通过赵钢与赵石头父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中成长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依靠阶级的、集体的力量同敌人作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剧本共四幕，反映的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长达十三年的生活和斗争。一九三五年秋，华北某县城附

近，青年农民赵铁柱家的三亩水田被地主杨有德和杨耀祖父子假造文书强行霸占，他与杨家打了一年官司，心想有理走遍天下，官司应该能赢。谁知杨家官场上有亲戚，他们花钱买通衙门，赢得了官司。接到判决书后，铁柱气得要放火烧房；他爹赵老忠气得吃了砒霜。就在赵老忠还未咽气时，杨有德与杨耀祖父子到了，说法院判定：赵铁柱应归还侵占之水田三亩六分九，应赔偿诉讼车马费和名誉损失费五百二十五元，要求马上交钱。铁柱忍住悲愤，溜出门外，放火烧着了杨家。然后回到家里，嘱咐妻子安葬父亲后带着儿子铁蛋出逃，他自己决心外出当兵，"掀不倒他杨家大旗杆我就不回来"；如果自己回不来了，就要儿子长大后继续报仇。

铁柱走出后，他妻子带着铁蛋流落到了华北某大城市附近的某市镇，靠替人缝补浆洗维持生活。十年来，他们夫妻失去了联系，铁蛋改名石头，已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一天，他遇到两个便衣八路向他了解附近炮楼敌人的情况，他高兴地向他们作了介绍，并且指示了地形。而这炮楼里住着的正是他家的仇人杨耀祖，他现已是日本警备队的中队长。杨耀祖领人追查八路侦探时，怀疑石头与八路有联系，并怀疑他是赵铁柱的儿子，把他抓到炮楼后用刺刀扎。接着，他又带人来石头家，逼铁柱妻交代铁柱父子的下落，并将她毒打。他们走后，石头带伤回到家里，哭着要去当八路军，以报父子之仇。他母亲虽然不忍再受骨肉分离之苦，但为了报仇雪恨，还是坚定地送石头投奔八路军了。

赵铁柱离家出走后，改名赵钢，给人扛长活，在阳泉下煤窑，在车站当小工；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连长等职，曾负伤住院；后又上抗大受训，逐渐成长为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到了一九四八年，他已是解放军某营营长了。他们部队正准备解放太原。这时，赵石头也已参军三年，曾负伤立功。赵石头所在的部队已过黄河，又听说就要打太原了，就随伤员们一道来到了赵钢所在的部队。父子见面，互不相识。赵钢教育石头等战士，不能只想着报私仇，要"把自己跟天下受苦人拧在一块儿"，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石头被分到营部通讯班工作，后部队打到他家乡时，他坚决要求下突击班参加战斗，获准后他带领突击班冲锋在前。

这时，在铁柱妻所在的村庄里，杨耀祖正指挥着匪兵烧毁民房，说是要扫清射界。群众呼号哭喊，要求救人抢东西，被匪兵们赶开，铁柱妻也挨了打。不一会儿，解放军打进村来，边救火边歼击敌人，杨耀祖被击毙，杨有德被俘获，石头与母亲惊喜相逢。当石头向母亲介绍营长时，双方惊愕片刻后相认，激动地述说各自经历，全家得以团聚。但因还需继续战斗，赵钢父子匆匆告别亲人，又奔赴了新的战场。

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G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田汉词

聂耳曲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
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
来！起来！我们万人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F 2/4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麻扶摇词

周巍峙曲

（稍快雄壮有力充满信心）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
野心狼！野心狼！

歌曲《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

G调 3/4　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

金学铁词

郑律成曲

程若译配

（朝鲜歌曲）・坚定有力

在深夜里暴风雨吹打的山岗上，
血腥的战斗里虽然疲劳，
我们等待黎明时上升的太阳，
我们胸中的火焰都更加燃烧，
在烽火中胜利的旗帜飘扬，
高举刀枪响应领袖的号召，
我们歌唱我们的胜利辉煌。
英勇战斗为祖国不屈不挠用一切的力量

打垮美帝！用一切的力量
争取独立！在烽火中胜利的
旗帜飘荡，我们歌唱我们的胜利辉煌。

歌曲《我们是坦克部队》

G调2/4　我们是坦克部队
朴南秀词
郑律成曲
(朝鲜歌曲)·进行曲速度
f(齐唱)　程若译配
轰隆隆轰隆隆滚动着向前进，
要争取祖国的统一和独立，
我们是坦克部队英勇的突击手。
我们是打先锋的坦克部队。
奋勇地进攻，向着敌人射击！
破坏那凶恶的敌人的战壕，
保卫着祖国像铜墙铁壁。
我们是胜利的钢铁队伍。
高高举起光荣的旗帜，
高高举起光荣的旗帜，
勇敢冲破敌人的阵地！
勇敢冲破敌人的阵地！
坦克呀向前进，坦克呀向前进，
坦克呀向前进，坦克呀向前进，
前进奋勇地向前进！
前进奋勇地向前进！

歌曲《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4/4　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为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盟歌
朱子奇译词
诺维可夫曲
奥沙宁词
萧三校订
任虹配歌
降B短调(降B＝6)但未正式改名，故仍用原名。
(男声独唱)(进行速度)
世界各民族儿女，我们都热爱着和平。
我们还记得炮声，永不忘战友的姓名。
青年永远要记住，庄严隆重的宣誓。
在这苦难的年代，我们为幸福去斗争。
正义鲜红的热血，结成了巩固的友情。
举起我们的旗帜，争取神圣的权利。
在世界各个地方，在海洋在陆地上。
一切公正的人们，跟我们一同前进。
黑暗势力在猖狂，妄想把世界埋葬。
青年的朋友伸出你手赶快参加我们队伍。(合唱)我们
人民的幸福光辉的明天全属于我们。
忠实的朋友快团结起来消灭那侵略战争。
高唱友爱团结青年们！青年们！青年们！团结的
歌声挡不住也冲不散！冲不散！冲不散！
全世界都同我们青年高声唱团结的
歌声挡不住也冲不散！冲不散！冲不散！

歌曲《毛泽东赞歌》

郑律成曲
贾芝词
F调2/4　毛泽东赞歌
(和平明朗)
太阳笑红旗飘新中国诞生了
浪再大风再猛掌的稳走的平
工厂里马达唱农民们生产忙
亲爱的毛主席功劳呀比天高
英明的好舵手他把呀舵掌定
祖国的土地上一片呀新气象
有了他我们才有自由有快乐
全中国齐欢呼毛主席是救星
毛主席像雄鹰飞旋在高空中
有了他我们才打碎了铁镣铐
跟着他就幸福跟着他就光荣
谁要是敢进犯就把它一扫平
3/4 4/4 f
毛主席高举火把在前面把路照
美丽的和平世界我们一定要创造

歌曲《中苏友好歌》

中苏友好歌
安娥词
吕骥曲
(稍快、宏大地、乐观地)
1＝bE2/4
伟大的友谊，兄弟般的心，
山不能阻挡，海不能分；

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七万万人团结成铁的长城。中苏人民并肩前进，
建设新社会满怀信心；
为幸福生活，为光荣劳
崇高的理想鼓舞着我们。
冲破满天的战争的乌云，
英雄的人民保卫着和平，
全亚洲人民，全世界人民
在和平的旗帜下携手前进。
强大的力量，和平的堡垒，
自由人民永远的同盟；
万岁万岁毛泽东！万岁万岁斯大林！

歌曲《中苏人民并肩前进》

中苏人民并肩前进
李群曲
艾青词
（沉着·欢快）
1=G¾
中苏人民并肩前进，七万万人团结一心——
从伏尔加河到扬子江，友谊的歌声多么嘹亮！
为了各民族的自由，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力量可以阻挡！
我们在光荣的道路上前进——斯大林
毛泽东带领我们；全世界人民和我们在
一起，我们的歌声高入云层，全世界
人民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歌声高入云层……

1950年流行年画

中央文化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颁布开展新年画工作指示后，全国热烈响应号召，积极组织新年画制作及出版工作。新年画内容普遍反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反映了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民主生活，描绘了新中国的面貌，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获得了人民的普遍喜爱。1950年各地举行的新年画展览大都为群众所赞许，有很多优秀的年画在出版后销售一空。

一九五〇年新年画创作奖有：

甲等奖三名	作者
农民参观拖拉机	李琦
劳动换来光荣	古一舟
毛主席大阅兵	安林
乙等奖八名	**作者**
劳模会见毛主席	尹瘦石
新中国的儿童	张仃
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	冯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顾群
读报图	力群
欢迎苏联朋友	邓澍
创造新纪录	关健
支援前线图	姜燕
丙等奖十四名	**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阅兵式	张启
四季生产图	毕成、王角
人人敬爱毛主席	乌力吉图
建政权、选好人	乌勒
减租说理	徐立森
好副业	张怀信
支援前线	俊生、清泉
新中国的歌声	梅生
庆祝胜利努力生产	墨浪
河伯娶妇（故事画）	王淑晖
城乡互助物资交流	张建文
提高文化	任远桥
新疆代表向毛主席献礼	黄均
人畜两旺	梁青青

1950年最佳影剧

电　影：彩色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
　　　　黑白片：赵一曼、中华儿女
　　　　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
话　剧：红旗歌、思想问题
工人剧：不是蝉
歌　剧：白毛女、刘胡兰
京　剧：将相和、野猪林

历史档案

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特发行一九五〇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第二条　本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总额为两万万分，于一九五〇年内分期发行。第一期债额定为一万万分，于一月五日开始发行。

第三条　本期公债每分之值依下列规定计算之：

一、每分所含之实物为：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

二、上项实物之价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批发价，用加权平均法计算之；其权重定为：上海百分之四十五，天津百分之二十，汉口百分之十，广州百分之十，西安百分之五，重庆百分之十。

三、每分公债应折之金额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条一、二两项规定之计算法计算，每旬公布一次，以上旬平均每分之折合金额为本旬收付债款之标准。例如：一日至十日的平均每分之折合金额，于十一日公布，作为十一日至二十日收付债款之标准。

第四条　本期公债票面额分为：一分、十分、一百分、五百分四种。

第五条　本期公债分五年作五次偿还，自一九五一年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抽签还本一次：第一次抽还总额百分之十；第二次抽还总额百分之十五；第三次抽还总额百分之二十；第四次抽还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其余百分之三十于第五次还清。

第六条　本期公债利率定为年息五厘，照本条例第三条所规定之折实计算标准付给。自一九五一年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付息一次。

第七条　认购公债人须按缴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分之折合金额用人民币缴纳，换取债票。还本付息时，亦按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分之折合金额以人民币支付之。

第八条　本公债之发行及还本付息事宜，指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机构办理之；中国人民银行尚未设置机构之地区，得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其他机关代理之。

第九条　本公债不得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得向国家银行抵押，并不得用以作投资买卖。

第十条　凡有伪造本公债或损害本公债之信用者，依法惩处之。

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烈·扬努阿烈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

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交换。

本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章　土地的没收和征收

第二条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三条　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对依靠上述土地收入以为维持费用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事业，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另筹解决经费的妥善办法。

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当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第四条　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五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六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　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八条　本法规定所有应加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在当地解放以后，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方式转移分散者，一律无效。此项土地，应计入分配土地的数目之内。但农民如因买地典地而蒙受较大损失时，应设法给以适当补偿。

第九条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社会阶级成分的合法定义，另定之。

第三章　土地的分配

第十条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第十一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农民协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为便于耕种，亦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乡农民耕种者，即划归该乡分配。

第十二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连同其自有土地在内），适当地稍多于当地无地少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

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

第十三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无地少地人口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如下：

一、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三、家居农村的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均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得视其薪资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与其对于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四、本人在外从事其他职业而家属居住农村者，其家属应酌情分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五、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配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六、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工会证明其失业的工人及其家属，回乡后要求分地而又能从事农业生产者，在当地土地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七、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八、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有劳动力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十四条　分配土地时，得以乡为单位，根据本乡的土地情况，酌量留出小量土地，以备本乡情况不明的外出户和逃亡户回乡耕种，或作本乡土地调剂之用。此项土地，暂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但所留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全乡土地的百分之一。

第十五条　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的农事试验场或国营示范农场之用。此项土地，在未举办农场以前，可租给农民耕种。

第四章　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

第十六条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

第十七条　没收和征收之堰、塘等水利，可分配者应随田分配。其不宜于分配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第十八条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之法令继续经营之。

第十九条　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苗圃、农事试验场及有技术性的大竹园、大果园、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场等，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权原属于地主者，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归国有。

第二十条　没收和征收土地时，坟墓及坟场上的树木，一律不动。

第二十一条　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应妥为保护。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地主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不合农民使用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充作公用。

第二十二条　解放后开垦的荒地，在分配土地时不得没收，仍归原垦者耕种，不计入应分土地数目之内。

第二十三条　为维持农村中的修桥、补路、茶亭、义渡等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习惯予以保留，不加分配。

第二十四条　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五条　沙田、湖田之属于地主所有或为公共团体所有者，均收归国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河道两旁的护路、护堤及飞机场、海港、要塞等占用的土地，不得分配。已划定线路并指定日期开辟的铁路、公路、河道及飞机场等应保留土地者，须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

第五章　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

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

第二十九条　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三十条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第三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人民法庭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三十三条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耕畜、砍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法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

本条所称的大城市，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按城市情况决定之。

第三十六条　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汉人占多数地区零散居住的少数民族住户，在当地土地改革时，应依本法与汉人同等待遇。

第三十七条　本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业已基本上完成的地区。

第三十八条　凡在本法公布后开始施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除本法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三十七条所规定之地区外，均须按照本法施行。各地何时施行土地改革，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省人民政府以命令规定并公布之。

第三十九条　本法公布后，各省人民政府应依本法所定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提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第四十条　本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公布施行。

（原载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不要四面出击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

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解放战争四年战绩总结公报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四年（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四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公报如下：

（甲）解放战争第四年全年战绩：

（一）歼灭敌军营以上部队：正规军——二个军政长官公署，四个绥靖公署，一个长官司令部，十个兵团部，五十个军部，一百四十九个整师，五个师部，五十个整团，四十二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七十二万九千七百四十人，毙伤者九万八千五百二十人，合计八十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人。非正规军——二十七个整师，三个师部，六十个整团，十四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三千人，毙伤者七万四千七百八十人，合计四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

（二）敌军投诚部队：正规军——一个军政长官公署，一个警备总部，一个军部，十个整师，二个整团，四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十一万四千三百人。非正规军——八个整师，三十一个整团，二十一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二十七万六千四百三十人。另敌海军舰艇向我投诚六艘。

（三）敌军起义部队：正规军——三个绥靖公署，一个警备总部，八个兵团部，二十五个军部，七十四个整师，一个师部，二十一个整团，五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四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人。非正规军——十三个整师，十一个整团，三十二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九十人。另起义飞机五架，舰艇十八艘。

（四）接受我军改编之敌军部队：正规军——一个军部，三个整师，共一万三千人。非正规军——一个整团又二个整营，共九千零三十人。

（五）以上四项合计，敌军共损失正规军：三个军政长官公署，七个绥靖公署，二个警备总部，一个长官司令部，十八个兵团部，七十七个军部，二百三十六个整师，六个师部，七十三个整团，五十一个整营。除军以上指挥机关另行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二百六十六个师，一个团又三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一百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二十人。非正规军：四十八个整师，三个师部，一百零三个整团，六十九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

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二百六十七个团又一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九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人。总计敌军损失二百三十七万九千九百五十人，内被我俘虏者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人，被我毙伤者十七万三千三百人，向我投诚者三十九万零七百三十人，起义者六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人，接受改编者二万二千零三十人。

（六）向我投诚及被我俘虏与击毙之敌高级军官五百四十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九名，内正规军六十名，非正规军七十九名；被俘虏者三百八十三名，内正规军二百一十三名，非正规军一百七十名；被击毙者十八名，内正规军十名，非正规军八名。

（七）缴获：大小炮九千七百八十二门，计榴弹炮五十九门，野炮一百零二门，山炮二百三十四门，步兵炮六十八门，平射炮二十二门，高射炮五十二门，战防炮一百九十一门，机关炮四十九门，轻迫击炮二千六百八十三门，重迫击炮七十六门，六零炮五千四百三十四门，五零炮五十四门，火箭筒四百二十二个，其他炮三百三十六门；各种机枪六万六千零八十二挺，计重机枪七千四百三十二挺，轻机枪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三挺，冲锋机枪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四挺，高射机枪一百零三挺；各种枪枝一百一十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五枝，计步马枪一百零七万七千七百零一枝，短枪七万八千三百零三枝，战防枪二百八十一枝；掷弹筒五千三百七十九个，枪榴筒四千六百七十八个，火焰喷射器三十一具；飞机五十五架（内包括起义的五架），舰艇七十七艘（内包括起义的十八艘、投诚的六艘），坦克四十辆，装甲车二十八辆，机车三辆，汽车七千一百六十五辆，骡马六万三千七百三十六匹，各种子弹一亿二千八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九十发，各种炮弹二百四十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发，手榴弹五十九万一千零五十枚，炸药二十一万三千零十斤，电台一千一百八十二部，报话机四百九十二部，电话机九千二百四十二部。另被我击落敌飞机二十一架，击毁敌军舰九艘。

（八）第四年全年共解放国土面积五百五十三万二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一万八千人，县以上城市九百七十座。

（九）第四年全年我军在作战中负伤者五万九千二百人，阵亡者一万九千九百人，被俘者三千三百人。失踪者七千二百人，共计八万九千六百人。第四年敌军共损失兵力二百三十七万九千九百五十人。敌我损失兵力相较为二十六点五六比一。

（乙）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

（一）消灭敌军兵力：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匪"前进指挥部，三个军政长官公署，八个绥靖公署，二个警备总部，一个长官司令部，三个绥区司令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三十五个兵团部，四个整编军部（内三个兼整编师部），一百八十三个军部，五百七十二个整师，二十八个师部，四百一十一个整团，五百二十六个整营。以上除军以上指挥机关另行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七百六十二个师另二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五百五十四万二千四百七十人。非正规军——一百零三个整师，九个师部，五百零八个整团，四百二十个整营。以上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九百三十一个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人。总计消灭敌军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内被俘者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人，毙伤者一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六十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人，起义者八十四万六千九百五十人，接受我军改编者二十九万三千零三十人。

（二）向我投诚及被我俘虏与击毙之敌高级军官一千六百六十八名：计投诚者二百七十三名，内正规军一百六十六名，非正规军一百零七名；被俘虏者一千三百一十名，内正规军九百四十一名，非正规军三百六十九名；被击毙者八十五名，内正规军五十五名，非正规军三十名。

（三）缴获大小炮五万四千四百三十门，各种机枪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挺，长短枪三百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一十二枝，掷弹筒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个，枪榴筒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一个，火焰喷射器二百二十八具，飞机一百八十九架，舰艇二百艘，坦克六百二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八十九辆，机车一千零一十六辆，汽车二万二千零一十二辆，骡马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匹，各种子弹五亿零七百九十八万四千八百发，各种炮弹五百五十二万七千四百发，手榴弹三百六十三万五千八百枚，炸药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八百斤。另击落敌飞机一百九十架，击毁敌坦克一百五十六辆，击毁敌军舰九艘。

（四）截至解放战争四年为止，全国已解放国土面积八百四十九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四亿八千二百五十三万二千人（按：根据原解放区及解放战争三年中解放地区最近初步调查的人口数字为二亿九千九百七十一万四千人，较三年总结战绩公报中统计的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七万四千人增加了二千零四十四万人，加上第四年解放地区中人口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一万八千人，故全国人口总数已超过过去公布的全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之数字，特此说明），县以上城市二千零三十一座（解放后我新设县以上城市约一百零五座未计算在内）。另现尚为残敌盘踞之台湾西藏两省区约面积一百一十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千万，县以上城市二十二座。

（五）解放战争四年，我军共负伤一百零四万八千九百人，阵亡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人，伤亡共计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人，被俘一万三千七百人，失踪十九万六千一百人，总计我军在四年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五十二万二

千五百人。解放战争四年，共毙伤敌军一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人，我军伤亡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三比一；解放战争四年，共俘虏敌军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人，我军被俘一万三千七百人，敌我俘虏相较为三百三十四点八比一；解放战争四年，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一百七十七万三千四百九十人。总计解放战争四年中，敌军共损失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人，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五百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五点三比一。

转录《新华月报》一九五〇年九月号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元旦社论指出：1950年，中国人民将要解放全部国土，并将基本上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使国家转入生产建设的轨道。1950年的主要任务：①以一切力量完成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②厉行生产节约；③准备或着手进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④加强中国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月1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主席；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赵寿山任主席。

1月7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中国和朝鲜通邮、电报通讯和有线电话通讯等3个协定和2个附加协议书，自2月1日生效。

1月8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

1月9日　周恩来总理令香港原国民党政府机构员工负责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

1月10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

1月13日　香港招商局在汤传篪、陈天骏经理领导下，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并于7月13日至10月21日将13艘轮船先后开回祖国。

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1943年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同谋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凶手张光前、张思信、刘汉升、何贵庭等4犯已逮捕归案。

1月31日　留居青海省的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愿意率领全西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

2月1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1949年3月6日成立)宣告结束。

2月8日　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

2月14日　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签订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

2月28日　台盟在京举行"二·二八"三周年纪念会。朱总司令讲话：我军有绝对把握完成解放台湾的神圣任务。此后，一般年年举行。

同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

3月8日　北京召开纪念"三八节"大会。朱副主席号召：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此后，一般年年召开。

3月9日　濮阳中共地委及专署严重官僚主义，在运粮中造成混乱现象。使农民遭受极严重损失。15日，平原省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并公开检讨运粮中的错误。

3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3月25日　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文件。

3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教育部发出通告，规定六月一日为儿童节，废除旧的"四四"儿童节。

4月2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4月10日　新华社报道：青年团中央决定以五月四日为青年团成立纪念日。

4月1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举行，批准中苏条约及协定。

4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财委主任陈云《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国家的财政情况已有好转，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关于粮食状况，1949年全国灾情严重，但除个别交通不便的城市可能感到一时的粮食困难外，其他大、中城市均将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不会发生粮食恐慌。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中财委六个月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在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努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同日　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19日，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

会、中华职业教育社部分领导人座谈会上讲了话。两次讲话提出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的观点。肯定了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4月15～18日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总结了1947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了党章，取消了该党三大所通过的政纲，接受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该党政纲。决定停止在国内发展组织，加强团结华侨的工作，号召华侨回国投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4月15～25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举行解放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该会纲领。

4月24～29日　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5月3日公布。

4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

4月28日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表通告：全国自五一起展开和平签名运动，支持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呼吁书。

4月29日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立。

4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实行。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

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内存在着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央决定这次整风运动至冬季基本结束。

5月14日　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持下，北京市举行和平运动签名大会。接着，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34个和平大会分会。全国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踊跃签名，到11月份，签名人数近2.2亿人。

6月6～9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讲话。刘少奇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陈云作《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外交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作、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6月14～23日　一届政协二次会议在京举行。刘少奇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陈云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薄一波作《调整税收问题的报告》。会议原则通过《土地改革法草案》。毛泽东致闭幕词，建议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进行教育和自我改造。

6月28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法还就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分别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该法把过去中共中央颁布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法大纲》中"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规定，改为对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加以保护。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就国际形势等问题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帝国主义来管。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准备，就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6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在全国范围展开土地改革运动。

中共党员超过五百万。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首先整顿干部的作风。

7月5～27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呈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决议》、《关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关于基层合作社和各级联合社章程准则》等。会议宣布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成立。

7月14日　政务院第41次政务会议通过《农民协会组织通则》(7月15日公布)及《人民法庭组织通则》(7月20日公布)。

7月21日　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指出，镇压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发出了指示。从12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7月26日～8月11日　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公司法草案等。

7月27日　天津中纺一厂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发生工人自杀事件。纺织部等通报各地接受教训。

7月28日　政务院第43次政务会议通过商标注册

暂行条例，批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问题的决定》、《高等学校暂行课程》、《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专科学校暂行规程及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

吴耀宗等爱国的基督教人士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号召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是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开端。

8 月 4 日　政务院第 44 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于 22 日公布施行。《决定》对划分富农的剥削量作出新规定，即把过去剥削收入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 15%者为富农的规定，改为超过其 25%者为富农。规定凡经常雇请两个长工，或有其他剥削，其剥削量的总和相当于雇请两个长工以上者，才可算为富农。

8 月 11 日　政务院第 45 次会议通过《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8 月 16 日发布)、《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10 月 9 日发布)。

8 月 14 日　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

9 月 5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9 次会议举行，通过《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决议》等。

9 月 20 日　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使用办法、制作说明。说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464 人。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祝词，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大会通过《告全国军队、劳动人民书》和声援英勇抗击美帝侵略的朝鲜军民的电文。

10 月 1 日　首都 40 万群众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第一届国庆节。毛主席等出席。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号召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充分准备，为解放全中国、保卫国土、捍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10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布指示，提出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10 月 25 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消灭蒋介石残余势力。

10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46 岁。任弼时是湖南省湘阴县人，1922 年入党，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央根据地中央局组织部长，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红二、六军团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1 月 3 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司法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坚强干部作为骨干。

11 月 4 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发布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11 月 22 日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表中国和平签名运动总结称：中国的和平签名运动已胜利结束，到 11 月 16 日世界和平大会开幕为止，全国和平签名人数共计为 22370 多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 47%。

12 月 8 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

12 月 10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决议支持世界和平建议，通过明年底财政总概算，通过《关于结束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的决定》。

12 月 20 日　首都公安局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逮捕一贯道 120 余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取缔一贯道》。

12 月 29 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 1937 年 7 月所作论文《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经　济

1 月 1 日　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和粤(广州)汉(武昌)铁路全线通车。

1 月 5 日　轻工业部对 1950 年轻纺工业主要产品生产安排的计划为：生产纸张 17.5 万吨，棉纱 197.3 万件，棉布 3497 万匹，绒线 141 万公斤，毛呢 566 万公尺，麻袋 1700 万条，色布 2472 万匹。

同日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

1 月 6 日　政务院原则批准《关于全国铁路 1950 年工作计划概要》。至 3 月，公路、航运、通信、邮政也相继作了安排。铁路的工作重点是恢复未通车的线路，并增补已修复铁路必不可少的技术装备。

1月9日　湘桂铁路桂林柳州段通车。

1月13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京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山东6省所属各市的郊区均在今年内完成土地改革。

1月26日～2月7日　重工业部召开全国化学工业会议，订出了1950年化学工业的生产建设计划。

1月27日　政务院作出《关于关税和海关工作的决定》，3月11日公布。

1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实施铁道部1950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强调要制定统一制度，为制定经济计划打好基础。

2月13～25日　中财委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主要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四个经济问题。确定1950年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首先，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保证900万脱产人员的生活开支；第三，运粮救灾；第四，重点恢复经济，即把有限的投资首先用于农田水利，修复铁路，恢复电力、煤炭、钢铁等工业，以便解决国民经济的急需。

2月19日～3月2日　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电业会议，要求保证全年安全供电。

2月28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指示》。

3月3日　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整顿收支，并对管理体制作了若干规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采取一切办法保障实施。

同日　政务院公布《公营企业缴纳工商业税暂行办法》，以及《中央金库条例》。

3月7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

3月7～21日　全国劳动局长会议讨论了《工会暂行法》、《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各市劳动介绍所组织通则》、《关于开展工人业余教育的指示》等草案。

3月10日　政务院通过《关于全国仓库清理调配的决定》。

同日　中央外贸部发布《关于保证现金回笼的命令》。要求在统一的价格政策原则下，加速推销商品，保证回笼任务的完成。

3月11日　全国盐务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并经政务院批准发布。

3月12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1950年航务工作的决定》。规定：在交通部下设航务总局及国营轮船公司，领导航务建设、管理航运工作。

同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1950年公路工作的决定》。

3月15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抛售物资、催收公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指示》。3月中旬，中财委还发布了《关于各公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矿企业进行统一的全国普查的训令》。

3月19日　林垦部发布指示，号召开展春季造林运动。

3月20日　政务院发布指示，望各地抓紧时机，进行水利春修工程。

3月17日　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等13个团体，发起节约救灾，开展一两（或更多）米运动，协助灾区同胞克服灾荒。

3月24日　政务院通过并颁布《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规定：①国家财政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②各地所收的国家公粮及其折征之代金或其他实物、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③军事开支，统由军事系统按月按季编造预算，经批准后转请中财部核实后支拨。④严格执行预决算、审会计制度及严格的财政监察制度。

3月26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

3月31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设立统一搬运公司，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的决定》。

4月3日　政务院发布《契税暂行条例》。

4月7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为现金管理的执行机关，负责办理及检查现金管理事宜。

4月11日　交通部施行《全国汽车管理暂行办法》。

同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加强公粮保管工作的指示》。要求：①各有关部门提高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严防敌特匪徒破坏、抢劫、纵火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偷盗。②对粮库和存粮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及时过筛、扬风、晾晒、翻仓。③建立健全粮食管理机构，抓紧新粮库的修建。据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于5月又专门制定和颁布了《公粮保管暂行办法》，对各级粮库的修建及储粮的保管，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4月12日　中财委决定增加发行货币5,000万元，由贸易部掌握，收购农副产品。

4月13～24日　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确定了石油工业的方针与任务。

4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华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华北五省除绥远只实行减租外，尚有占新区总数24%的村庄，因灾荒不能进行土改或尚待完成。

4月22日　国家财委发出严禁机关部队经营商业

的指示。贸易部5月29日发布《关于接收机关部队经营商业办法的指示》。

4月29日　劳动部发布《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指出：劳资协商会议，是劳资双方协商有关改进生产、业务与职工待遇各项具体问题而设立的协商机关，不负企业经营与行政管理之责任，协商的内容包括：订立集体合同、生产计划之研讨与任务的完成及提高产量、质量、节约材料、工具、改进生产组织、改良技术、奖惩制度、职工的雇用、职级升降、工资、工时、生活待遇、企业安全、卫生、职工疾病、伤亡、残废、女工生育待遇等。

5月8～26日　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提出解决当前财经方面困难的措施：用扩大加工定货的方法，重点维持生产；用扩大农产品收购、增加农民购买力、组织工业品出口的办法，开导工业品的销路；举办失业救济；用适当方式将市场趋势公告全国，指导私营工业的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会议还研究了调整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①调整公私关系的原则是：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分工合作，一视同仁。②对私营工业企业，组织加工定货，鼓励出口滞销物资，指导私营企业联营，国家根据可能进行必要的收购，并根据不同情况定工缴费标准。③在国营商业指导下，允许私营商业的存在，并使其有利可图。④私人行庄仍可保留，但营业范围应有所限制，国家银行可与之联合放款。⑤在税收方面，一律按税律征收，并简化税目，改革征收办法。

5月11日　中央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建立与加强计划工作机构的指示》。要求各地企业及其管理机关应首先建立或加强各级计划工作的机构，并调配有相当能力的干部负责组织这一工作。同日，该部还发出《关于建设资金与生产资金严格分立的通知》。规定生产资金的建设资金分别筹划、运用和管理；各项资金严格禁止互相移用。

5月19日　中央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建立计划基础工作的指示》，要求企业制订各种定额，并以此为中心，把其它基础工作带动起来。

5月28日　中国煤矿生产一大改革——鹤岗等煤矿应用新采煤法，将在全国贯彻执行。

5月30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1950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主要内容是：①夏征国家公粮的总额，以大区为单位，不得超过夏收正产物（指农作物的主要部分，不包括秸杆等副产物）总收入的13%；地方附加以省为单位，不得超过国家公粮征收额的15%。②烈士家属、军人家属、供给制工作人员家属中生活困难者，孤寡老弱及夏收后灾区无力负担者，可以免征或减征公粮。③夏粮征收实行累进率：贫农最高不得超过其夏收的10%，中农不得超过15%，富农不得超过25%，地主不得超过50%。特殊户每年收入在2000石以上者，得由各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征收额，但最高亦不得超过80%。

5月31日　中财委试编出《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统筹安排各方面的投资为：经济建设投资总额为154.6亿斤米，文教卫生事业费为28.45亿斤米，社会事业费11.4亿斤米（东北除外）。

6月1日　中央贸易部发布《关于调整零售价格的通令》。指出：在确定零售价格时，必须根据零售成本（包括批发价格、运费、杂费、税用和损耗等）及合理利润比例来规定，以便使私营零售商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6月8日　经政务院批准，东北人民政府颁发《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组织条例》，正式成立了计划委员会。《条例》规定，人民计划委员会是东北人民政府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任务是：编制东北地区国民经济计划，并使其与全国计划密切结合；制定计划的实施方法与实施程序；领导东北人民政府所属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计划工作。

6月12～21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公私盐业运销会议，主要解决市场销售和价格问题，决定按季按月编造运销计划，在盐价政策上，照顾生产、贩运、消费三者的正当利益，商业利润一般为实支成本的5%左右。

6月17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决定：①拨出4亿斤粮食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②凡举办救济失业工人事业的地区，所有国营、私营的工商业企业的行政方面或资方，及所有在业工人和职员，均按月缴纳一定的失业救济金；③救济办法以以工代赈为主；④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广州五市失业现象最为严重，立即组织救济委员会。同日，劳动部颁发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

6月22日　新华社报道：邮电部邮政总局已发行全国统一邮票，原各地区发行的分区邮票9月1日起停用。

6月29日　中财委发出《对于今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指出：①按贸易部规定的牌价，放手抛售一切物资，不得惜售，不得抬价。②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以保证进口品价格的平稳。③适当地调整外汇牌价，以利进口，并对私人进汇尺度适当放宽。④加强黄金银元的管理，防止抬高黄金、银元价格，扰乱市场。

6月下旬　中央贸易部召开各大区贸易部长及华北五省二市商业厅局长联席会议，研究了在土产经营和国营零售贸易中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的问题。关于土产经营：①今后国家只经营主要土产的大部分出口品，让出土产的广大市场给私商经营，组织私商下乡，使现在集中于城市的游资到乡村去；②在价格政策上，既要对农民有利，又要使贩运者有利可图；③销路不畅的土产应劝农民减产甚至停产。关于国营零售商业：①零售公司的设置仅限于大城市及大工矿区；②零售公司经营，以粮食为主，最多不得超过六种商品和百货；③零售公司的零售店数量

应根据稳定物价的需要，作适当调整；④代销店不作为方向，已代销者应有步骤地逐步取消。

7 月 4 日　中财委颁布《关于适当限制某些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状态的生产的公告》。内容是：凡生产已发生严重过剩的工业（如火柴、卷烟、肥皂、面粉、丝织、酱油业等），过去仰赖外销市场，目前生产能力已超过需要的工业（如地毯、手帕、针织等），按销售情况适当限制产量。而生产已呈饱和状态的工业（如橡胶、玻璃、染织、毛巾、被单、铅笔、灯泡等），则不应再盲目发展。

7 月 13 日　中财委决定由人民银行收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

7 月 13～25 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进出口会议。中心议题是：调整对外贸易中的公私关系，恢复和扩展对外贸易。会议确定对外贸易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与扶助生产、调剂供求、平稳物价。并制订了如下原则和办法：①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家除经营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进口上、对民用器材的经营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②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联合经营"三种形式，把进出口商组织起来。③对私营进口商申请外汇、公私营企业订立出口合同的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并通过了相应的暂行办法。

7 月 16 日　河北省境内蓟运河灌溉工程完工放水。

7 月 16 日　新华社报道：为开发汉水水利，消除水患，汉江（即汉水）治本委员会最近在武汉成立，李先念任主任委员。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之一，全长 1300 多公里。

7 月 26 日　中财委发表《关于统一航务港务管理的指示》。

7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已完工，可蓄洪水 22 亿立方米。这一工程的建成，可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

同日　铁道部自 8 月 1 日起减低全国货物运价 11.9%。

8 月 1 日　国内民用航空正式开航。

8 月 11 日　政务院第 45 次会议通过《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16 日公布），批准发布《保障发明权专利权暂行条例》（17 日公布）。

8 月 25 日～9 月 18 日　全国工资准备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工资单位、工资标准、工资等级、技术津贴等问题。会议研究了解决工资制度问题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实物为计算基础，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制度；统一以"分"为全国工资计算单位；工资标准根据各种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技术繁简和劳动条件的差别来确定；工资等级，工厂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管理和技术人员分别为二级至五级等。

8 月 25 日～9 月 12 日　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提出上中下游统一规划，统一领导，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并拟定了 1951 年的具体施工方案。同时，成立了治淮委员会。

8 月 30 日　联结湘桂、黔桂两铁路的柳江大桥修复工程竣工。

8 月下旬　中财委召开计划会议，讨论编制 1951 年计划和三年奋斗目标。会议着重研究了全国的经济形势，提出在二、三年内经济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并为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会议认为，对工业要在调整中恢复，确定三年内在工业方面新的建设应放在加强国防力量上，新的建设必须经过调查、勘察、设计，然后按施工图组织施工。

8 月　我国开辟由天津经武汉飞往重庆的第一条航线。

9 月 1 日　中财委颁布《商标注册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商标局注册商标处理办法》及《各地方人民政府商标注册证更换办法》。

9 月 5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政务院 8 日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

9 月 13 日　新华社报道：贸易部发出通知，规定中央及地方各机关、部队、团体今后向国外有计划订货时，必须先经中财委批准，然后一律交由贸易部统一向外办理。

9 月 16 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

9 月 26 日　京汉铁路黄河铁桥加固工程完工，开始通行大型机车。该桥为全国三大铁桥之一，加固后行车效率较前提高 2 倍以上。

9 月 30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调整财政收支粮价的决定》，自 10 月 1 日起实行。

10 月 1 日　《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发布。

10 月 9 日　中央财经委颁发《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细则》、《发明审查委员会章程》。

10 月 14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年淮河流域水灾严重，豫皖境内受灾面积约 4000 余万亩，灾民 1300 万。遵照毛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决定治理淮河的方针，应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

10 月 29 日　政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

10 月下旬　中共中央发出《农副产品购销问题的意见》。包括：①责成贸易部按照粮布的合理比价，规定粮棉收购牌价，在保证粮棉市价不落于牌价之下的原则下，大

量进行收购。②中央责成财政部制定土产减税免税办法，铁道部要把土产运费减低到最低的可能限度。③各地除应积极供应农民生产资料外，还必须积极帮助推销城市工业生产的各种日用品。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统一调整全国工资问题的几个原则》：①各地各企业各单位工资高低不一，其中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亟应调整。但处理此问题必须慎重，不能随便加以改变。②调整工资的目的在于使现有的工资较公平合理，便于发展生产、加强团结。但调整办法是：高的不再高，低的逐渐向高的看齐，不应定一个折中标准，使高低双方都向中间看齐。

同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限期清理企业资产与确定企业资金的建议报告》。《报告》建议清产核资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结合 1950 年度的决算与盘存，清理中央直属(关内部分)的国营企业；第二期，清理委托大行政区代管的国营企业与地方企业。全部工作于 1952 年完成。《报告》规定此次清理企业资产与资金，不论何种来源，统一作价作为国家收入，由中央财政部登帐，然后再按照各企业的需要及国家经济建设方针，分别转为对各企业的投资。有余者，由中央收回另行支配；不足者，由中央补足。

11 月 8 日　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关于国家银行扶助合作社的决定》。

11 月 14 日　中央贸易部公布《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决定取缔以下 8 种投机性商业行为：①超出人民政府批准之业务经营范围，从事其他物资之经营者；②不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之交易市场交易者；③囤积、拒售有关人民生产或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图窃取暴利，以招致物价波动，影响人民生产、生活者；④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企图暴利者；⑤故意抬高价格抢购物资或出售物资及散布谣言，故意引起物价波动者；⑥不遵守当地人民政府所规定商业行政管理办法，扰乱市场者；⑦假冒伪造，使潮、掺杂或违反商品规格及使用其他一切欺骗行为，以谋取非法利润者；⑧一切从事投机活动者。

11 月 23 日～12 月 7 日　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会议研究并提出了 1951 年水利工作注意之点：要掌握重点，厉行节约；要加强计划设计工作，改进计划审核制度；加强施工中的组织领导，规定民工工资的统一计算原则；健全财务机构，加强财务工作。

12 月 1 日　政务院第 61 次会议通过《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和货币管理的决定》。其主要内容：实行决算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12 月 9 日　财政部发布《统一税政法令解释与发行中央税务公报办法》。

同日　政务院发布《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

12 月 14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

12 月 19 日　政务院公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税务复议委员会组织通则》。

12 月 28 日　《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及《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发布。

12 月 29 日　政务院第 65 次会议通过《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2 月 30 日公布。《条例》规定，企业必须切实执行政府一切有关劳动的法令，企业的财产和营业受充分的保护，经营管理权属于投资人，但与劳资双方利益有关者，应由劳资协商会议或劳资双方协商解决之。

12 月 30 日　财政部和海关总署联合拟订的《海关代征吨税办法》发布。1951 年 1 月 1 日实施此办法。

同日　中财委公布《设置财政检查机构办法》。

军　事

1 月 1 日　华东军区《人民海军》创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1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在 1949 年 5 月至 11 月中，浙江军区共歼土匪 4.5 万余名。

1 月 3 日　盘踞湖南嘉禾、临武、兰山三角地区国民党残匪王春珲部万余人经半月清剿已被肃清。

1 月 12 日　财政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命令，统一规定全国各地人民警察的等级划分、服装、领章、帽徽及其供给待遇标准。

1 月 14 日　我军进驻喀什城。

1 月 16 日　我国解放滇南要地蒙自。

2 月 5 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部发表解放战争第四年度上半年(1949 年 7 月至 1949 年 12 月)及解放战争三年半(1946 年 7 月至 1949 年 12 月)总结战绩公报。其中解放战争第四年度上半年共歼敌 259 个师，175 万多人，缴获各种炮 7400 多门及大量物资，解放县以上城市 953 座。解放战争三年半共歼敌 650 个师，744 万多人，炮 52000 多门，解放县以上的城市 1549 座。

2 月 6 日　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炸死炸伤 1500 余人，上海电力公司遭严重破坏，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

2 月 28 日～3 月 2 日　国民党飞机连日轰炸南京、广州等地。

4 月上旬　西南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

发起西南战役。11月5日解放贵阳，23日解放遵义，30日解放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的国民党先后宣布起义。12月30日，我军进入成都。1950年2月20日，我军进驻昆明。3月中旬至4月份，我军挺进西昌地区歼敌万余。至此，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4月17～30日　第四野战军渡海部队17日晨在海南岛登陆成功，30日攻克榆林港，海南岛全部解放。

5月18日　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6月25日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爆发。本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抵达汉城，并到“三八”线视察，进行破坏朝鲜和平统一、制造内战的阴谋活动。25日，在美国支持下，李承晚军队突然向“三八”线发动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宣布出兵朝鲜，武装干涉朝鲜内政。7月7日，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纠集由美国军官指挥的所谓“联合国军”。8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悍然北犯。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军解放浙江南部沿海的北麂山岛。

7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军解放浙江东部沿海披山岛。

7月31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部发布解放战争第四年（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及四年（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第四年共歼灭敌军（包括投诚、起义）237万多人，解放战争四年共歼灭敌军807万多人。

8月4日　珠江口外所有岛屿已全部解放。这次战役共毙伤蒋军第三舰队司令齐志洪等官兵300多名，俘虏100多名；击沉运输舰、炮艇7艘，缴获许多军用物资。

8月27日　美国飞机侵入我国安东，炸死炸伤22人。随后，美机轰炸次数日趋频繁，规模范围越来越大。

9月15日　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

10月7～21日　我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开始向西藏进军，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桑格旺堆11日起义，19日解放昌都。

10月8日　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图们江进犯，同时向我国境内空袭，严重威胁我国安全，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

10月6～20日　全国人民武装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0月6～24日　我军进行昌都战役。19日，攻占昌都，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基础。

10月19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彭德怀为司令员。

从10月25日～12月20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发动了三次反击战役，歼敌5万多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10月25日～11月5日　中朝军队在朝鲜温井进行第1次战役，歼敌13000人，迫使美李（承晚）军退至清川江以南。

11月12日　我军解放西康省西部重镇洛隆宗。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表公报称：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之下，自10月25日至11月8日，共歼灭美李军1.3万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收复了大片失地，使敌人妄图在11月23日以前全部占领朝鲜的计划完全破产。

11月25～12月24日　中朝军队发动第2次战役，彻底粉碎美侵略军11月24日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把敌军打退到“三八线”，歼敌36000余人。

11月2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带领一个排坚守阵地，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反扑，战斗到只剩他一个人时，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猛拉导火索，炸死大量敌人，完成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壮烈牺牲。他被追记特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奖章。他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杨根思1922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1日　政务院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号召全国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

12月6日　朝中部队解放朝临时首都平壤。

12月11日　中央内务部发布命令，颁发《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抚恤暂行条例》、《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

外　交

1月8日　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要求开除非法的国民党代表。

1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月19日　周恩来外长照会联合国，通知我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首席代表。要

求联合国及安理会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开除出去。

1月20日　周总理奉毛主席指示抵达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邦交的会商。2月26日，和毛主席一道回国。

2月8日　李克农副外长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郑重声明：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于近期内委任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讯日本天皇裕仁等五大细菌战犯。在中国方面，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参加，决不能再由早已丧失代表中国资格的蒋介石集团的人参加。

3月15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亚洲的声明。

3月27日　中苏两国签订协定，创办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开采新疆石油及有色金属。

中苏签订《关于创办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决定》。

3月29日　周恩来外长致电国际电讯联盟秘书长艾奈斯特，声明我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国政府已任命邮电总局局长李强为参加国际电讯联盟的首席代表。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已没有资格出席4月1日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广播会议。

4月1日　我国与印度建交。

5月9日　我国政府和瑞典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5月11日　我国与丹麦王国建立外交关系。

5月15日　周恩来外长就美国麦克阿瑟擅自规定释放日本战犯事发表声明，我政府对此绝对不予承认，美国政府必须立即纠正此种越权行为。

同日　在瑞士蒙特罗举行的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我国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蒋介石代表被逐出会议。我全权代表苏幼农于24日正式参加了会议。

6月8日　我国和缅甸联邦建立外交关系。

6月9日　我国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谴责美日反动派镇压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人民的暴行。

6月27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的决议”，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破坏世界和平。

同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非法侵占我国领土台湾。

6月28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沿海出动，这是对我国领土的武装侵略，中国人民必将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6日　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发表重要声明，指出安理会关于朝鲜决议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对我国的侵略，阻挠不了我国人民解放台湾。

8月1日　中苏民用航空公司7月1日正式成立，三条航线（北京—阿拉木图，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赤塔）正式开航。

8月26日　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指斥联合国容留蒋介石集团的非法代表，并通知他，我国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第五届联大代表，伍云甫为参加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执行局的中国代表，要求国际货币基金与国际复兴及发展银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同日　周恩来外长致电国际电讯联盟，通知我国任命李强为出席该联盟的中国理事。

8月27日　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就美国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扫射我国人民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9月13日　毛泽东主席电复南非联邦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议联合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南非联邦政府歧视及压迫南部非洲的非白色人民的主张。

9月14日　我国与瑞士联邦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0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大通过授权美国侵略朝鲜的8国提案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对这种严重状态不能置之不理。侵略者要对他们疯狂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

同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致电国际复兴及发展银行总裁布莱克，声明我国在该行的全部财产和权益属于中国人民。

10月17日　周恩来外长致电本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及秘书长赖伊，要求联大在讨论关于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两项议程时，必须有我国代表参加，并抗议联大将所谓“福摩萨问题”列入议程。

10月23日　周恩来外长就我国已任命伍修权为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事，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10月23日　我国与芬兰建交。

10月30日　我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指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预。

11月7日　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1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发言，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五项纲领。

11月11日　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主席贝勒勒，声明我们不能接受安理会11月8日关于邀请我国代表参加讨论联合国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报告的决定。周恩来外长指出，因为这项邀请剥夺了我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讨论中国人民最感迫切的问题，即美国

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问题的权利。提议：安理会应将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议案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合并讨论，以便我国代表在参加讨论时得以同时提出控诉。

同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是完全合理的和正义的行为，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中国方面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1月16～22日　郭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郭沫若团长11月18日在大会上发言，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领：①结束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侵略，要求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侵略军。②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何干涉。③要求宣布麦克阿瑟是战争挑拨者。④坚决反对原子武器及其他各种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的使用，并要求宣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政府为战争罪犯而加以制裁。⑤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

11月23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谴责麦克阿瑟擅自释放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

11月24日～12月30日　我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等，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会议。伍修权28日在会上控诉了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

12月4日　首都归国华侨发表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迫害马来亚华侨。

同日　周恩来外长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

12月5日　我国邮政总局致电通知万国邮政联盟，我国接受1947年在巴黎签订的《万国邮政公约》。

12月16日　我出席联合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成功湖（联合国驻地）发表重要谈话，指出我国对亚洲事务的重大发言权和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任何力量不能抹煞。

12月22日　周恩来外长就联合国大会14日非法通过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事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们坚决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停止其战争政策，必须退出中国领土台湾。

12月28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美国政府于12月16日发表公报宣布，冻结我国在美资金，并禁止美国船只开往我国港口。鉴此，我国政府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

文化教育

1月6日　政务院决定，人民大学招收产业职工。

2月17～28日　文化部在京举办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

3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文化部与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重新公布国歌歌谱。

3月14日　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加快培养工农干部。

4月1日　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在北京成立，统一领导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

4月24～29日　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总方针是：在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的目的下，团结全国卫生科学工作者，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人民的实际需要，进行卫生科研工作。首先应集中人力物力，解决危害人民最大的传染病、职业病和地方病问题。

6月1～9日　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改革及学制、领导关系等问题。会议指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才；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高等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等草案。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政务院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

同日　新华社报道：政务院颁发《保护古迹、文物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

7月11日　文化部公布《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等四个暂行办法。

7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政务院发出《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

同日　新华社报道：政务院公布《征集革命文物办法》。

7月22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

8月7～19日　首届全国卫生会议举行，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三大原则。

8月14日　政务院发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

8月18～24日　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周恩来在闭幕会上指出：科学界必须团结，分清敌友，破除门户之见，团结绝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为祖国服务。

9月20～29日　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通过《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工农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和《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六个草案，提请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审查批准后颁布施行。

10月3日　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

10月12日　教育部接办私立辅仁大学。该校是天主教会在1925年创办的，学校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一向掌握在教会所委派的外国人手里。

10月24日　国务院批准并公布实施文化部关于电影业五个暂行办法，即《电影业登记暂行办法》、《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产影片输出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

10月28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出版总署同日公布9月15日至9月2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的五个决议，内容包括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书刊发行、期刊和印刷业。

1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和联营书店五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书店，联合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

12月28日　政务院第65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

社会生活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接管的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最近完成了一部25万分之1的广西全省地质图。

1月23日　花旗营铁路撞车案件发生，死伤62人。

2月27日　河南国营宜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件，死亡矿工130人。

4月20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组成海事处理委员会，调查处理美国轮船“加利福尼亚金熊号”在大连开往烟台的航线上，无理撞沉我国“新安轮”，酿成旅客、船员70人惨遭溺毙的严重事件。

8月7～19日　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8月8日　新华社报道：察哈尔省山阴县(现属山西省)城南故驿村，发现战国时代的古城，初步发掘出人头骨、瓦罐、铜质箭头、铜钱等。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立南京博物馆在南京市内寻获大批史前彩色陶器。经鉴定，这批陶器是瑞典人安特生1923年、1924年在甘肃采集的。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长沙雅礼中学美籍教员俞道存盗运我国古代文物，被我公安机关发现，予以没收。被没收的古物有古代钱币、陶瓷等共18箱200余件。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1年

导　言

一九五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整党建党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得了伟大胜利，迫使美国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伟大祖国的一部分——西藏也获得了和平解放。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即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建国初期，大陆上还残留着国民党的溃散武装二百万人，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为此，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历时三年，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一九五〇年的整风运动中，暴露出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着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以及部分党员中存在着消极思想和腐化堕落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至四月九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

在思想领域内，一九五一年五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并从一九五一年秋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初步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推动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是思想领域内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共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推动了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一年内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使美国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士气低落等原因，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谋求政治妥协。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朝中军队代表和联合国军代表在开城举行了第一次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谈边打的新阶段，出现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相互配合，交织进行的复杂情景。

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于四月二十九日开始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的规定，我西南、西北军区部分部队分路先后开赴西藏。十月二十六日，由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和平解放。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镇压反革命运动
- 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役
- 整党建党运动
-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 西藏和平解放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镇压反革命运动

背景介绍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大量地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早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但有不少干部和党员在革命胜利之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大批怙恶不悛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抱怨。人民责备中国共产党“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说“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作主，不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特务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认为美国的战火已烧到中国大门，“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梦想的“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于是撕下伪装悔改的面具，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他们阴谋破坏铁路、桥梁、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源。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反革命地下军；有些地主以“蒋介石来了要杀头”来威胁农民，破坏土改。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杀。为人民解放军运输军粮的民夫，整队被杀。仅广西一省，人民政府干部被杀害的有3000余人。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务分子，一次放火烧毁电车59辆；汉口反革命分子制造的一起纵火案，烧死17人，使万余群众无家可归；美国间谍分子密谋在1950年国庆节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企图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实表明：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人民就不能挺起腰杆来。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的任务之一。”①要求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必须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右的偏向，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审慎研究处理；反右的同时注意防“左”，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指示，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群众，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各地通过召开各种类型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群众大会和公审大会，举办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展览会，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1951年春，在全国形成了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高潮。为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坚持党委领导，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倾向。镇压反革命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①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条例共21条，明确规定，对各种反革命的首要分子，解放后继续组织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的，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仍然继续参加反革命

活动的从严处理；对于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的，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的，解放后确已悔改的，特别是立功的从宽处理。这就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标准。

为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巩固已取得的成绩，公安部于5月10日至16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7个月来的工作，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自即日起，镇压反革命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对于有血债或其它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该处死者，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为防止运动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自6月1日起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归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归省一级；对隐藏在军政机关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对保证镇压反革命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这次会后，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步转入对已查出的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和在党政军机关开始清查阶段。

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重点进剿、分区驻剿、结合土改清剿潜散匪特3个阶段，至1952年底，共歼灭武装匪特240余万人，中国大陆基本上平息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

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上半年结束。共破获600余起特务案件，肃清200余万国民党残余武装，查清了很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在解放前杀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抓获。如1943年杀害中共中央委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凶手在迪化伏法；制造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一批特务凶手被处决。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已基本扑灭。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颠覆阴谋，巩固了人民政权，中国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人民群众交口赞扬，称之为"再一次翻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中，一些地区曾出现草率和粗糙现象，运动后期逐步加以了纠正。

材料：

- 湖南零陵特务纵火案纪实

材料　湖南零陵特务纵火案纪实

1951年3月7日，湖南零陵县城南门外的沙洲上，响起了一排枪声。蓄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零陵大火案的首犯张景星等22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场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场大火突然从"天"而降。古城街头顿成一片瓦砾，数千人无家可归

零陵县地处湘南，县城设在芝城镇，即今永州市。这里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历代文人骚客，在此无不留下赞美和感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便是其中的千古佳作。然而，这也是一座多灾多难的古城。早在唐元和七年，这里就遭受过连续三个月的火灾，为此，当地人专修了火神庙，祈保平安。

1951年2月20日，刚刚脱离战火摧残的古城又遭劫难。一场罕见的大火突然从"天"而降。

这天上午，零陵军民正在县城集会声援抗美援朝和欢庆元宵佳节。11时许，突然响起一阵阵凄厉的火灾报警声，给群情激昂的人们泼来一场冷雨。顿时，城内一片混乱，呼儿唤女，鸡飞狗跳……转瞬间，弥天大火冲上天空。由于北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栋栋房屋在啪啪作响的烈火声中倒塌。

零陵专署专员于明涛接到起火报告，迅速赶赴现场。只见街道两旁的大火如两条火龙飞快地向地委、专署、县府奔来。在党政机关旁边还有一个储满粮食的仓库也面临着被大火吞噬的危险。怎么办？

火警就是命令。

当时地委书记不在家，于明涛立即与两位副书记通电话。当他们赶到现场后，地委决定救灾工作由于明涛总指挥。

于明涛立即下令：一方面组织干部群众扑火，另一方面调动军队，实行全城戒严，以防敌人破坏……

大火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大火过后，城内一片瓦砾，惨不忍睹。据统计，这次大火共烧毁街道大约600多米，房屋500多栋，伤亡19人，全城近十分之一的人无家可归，财产直接损失达当时币制159亿元！

大火震惊了省委省政府，省府立即组织了慰问团，随带10万公斤大米于24日抵达零陵，慰问救济灾民。同时决定由银行贷出巨款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产，进行自救。

刚刚获得新生的零陵古城，为什么会遭此横祸？究竟是天灾人祸？还是过失失火？

政府一方面积极救灾，一方面紧急调查火因。

祸起学校，校内木楼板丝毫未损，紧邻房屋却荡然无存。何故？侦破小组，顺藤摸瓜，原来是……

零陵军分区中午接到命令，立即调集一个营，配合驻城公安干警全面行动。

几个城内巡逻战士在省立医院后院的干草堆里发现了大把火柴，他们立即跟踪追寻，又在医院围墙上发现一

个人正翻越围墙逃跑。一个战士"砰！砰！"两枪，那人被吓得滚了下来。战士们冲过去，在他身上搜出了火柴盒……

又一位执勤战士在兴隆巷的拐弯处，发现一个人正蹲在一堆干柴前，他走上去拍了一下那人的肩膀，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掉到了地上……

下午，县长刘新国闻讯从邮亭圩的土改工作点赶回来，只见城内一片废墟。他急忙赶到县公安局，对局长李秀山劈头就问："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李局长说："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抓了几个可疑的人。初步了解，火是最先从吉州小学开始的。"

"走，去吉州小学。"刘新国说。

面对刘新国的提问，吉州小学校长黄建中不冷不热地说："不清楚。"刘县长被他的态度激怒了："火是从你这里燃起的，你有责任帮助政府弄清楚！"随即，他顾不上和黄建中多说，拉着李秀山往现场走去。

在开始着火的地方，刘县长似乎看出了什么。"秀山，你看，那里是一些木楼板，上面被浇过水，丝毫未损。而紧邻的房屋却被烧得精光。这是什么原因？"

"嗯，奇怪。"李秀山疑窦丛生。他立即把教导主任喊来，要他解释。那教导主任顿时慌了手脚，吓得脸色苍白，答不上话来。他还以为县长和局长已经有了什么线索，便慌忙跪下："在点火前，校长给我们打了招呼，叫我们注意点……"他慌乱中竟说出了"点火"二字。刘新国和李秀山会意地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当即将黄建中带到了公安局。

侦破小组根据综合起来的各种情况，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蓄谋已久的故意纵火案。于是，顺藤摸瓜，立即审讯了黄建中和点火时被抓的艾某。他们招供出了河西纵火小组的一些成员。

当晚，又审讯了在押嫌疑犯唐某，唐某又供出了同案的三人。这三人都住在城西杨梓塘。第二天拂晓，公安人员迅速赶赴杨梓塘。在路上恰好碰到要抓的三人中的王某，侦察人员首先借故请其带路去找另外两人，结果来了个顺手牵羊。三人同时被捉拿归案。

在20日晚上，根据艾、黄二人的招供，连夜抓了15名案犯。

20日下午，侦破小组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诸葛亮"会，确定了"发动群众和以敌制敌相结合"的破案方针。并在第二天大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检举揭发。这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对整个案情的分析和案犯的招供来看，在押的仅仅是该案中的少部分人，大多数主犯仍逍遥法外。如只对在押犯进行审讯，可能短时间内难有突破性进展。

在侦破过程中，侦破小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个叫做张景星的人很有可能是该案的首犯。但是在押的案犯都不承认自己与张有什么关系。这就使得案件的侦破出现了短暂的困境。2月22日，侦破小组又得到一条线索，在押犯王养吾与张关系密切。于是，重点审讯王养吾。当天晚上，王终于交待了张景星的许多罪恶活动。

案情的侦破有了重大突破，出现转机。

张景星很快落网。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纵火案的全过程终于真相大白。在公安人员的努力下，结合群众的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先后逮捕了96人。其中大都是原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和历史不清的人。在人证物证面前，在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大多数案犯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同时，有的还供出了他们的特务组织关系。司法机关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特务纵火案。其组织是"湘桂粤黔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零陵支队"。总部设在香港。张景星是支队负责人之一。

我司法机关根据政策和法令对96名在押犯进行了甄别处理和定案。41名受蒙蔽的人经教育释放，33名协从作案人员被依法处理，22名罪大恶极的首犯主犯被处以极刑。

制造零陵大火案的特务组织被彻底摧毁。

张景星贼心不死，认为时机已到，要来一个里应外合。结果走向刑场，永远"死心"。

张景星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有如此大能耐，让这么多人为其卖命？

张景星，零陵白塘人。1947年从湖南大学毕业，在校时加入了国民党。他一直做着当官从政的美梦。但命运似乎并不器重他。毕业初始很不得意，靠投机取巧，好不容易到1947年才当上了国民党零陵县党部书记长。但好景不长，1949年中国共产党敲碎了他的美梦。因此，他对共产党抱有刻骨仇恨。表面上他服从他国民党上级的通电起义，交出了零陵县国民党党员名册。并似乎很规矩地在古城街上当一个摆摊小贩。实际上却贼心不死，暗地勾结联络"湘桂粤黔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并积极网罗原"零陵县党政委员会"中他的部下，扩展组织，伺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1951年，张景星见国民党有意借朝鲜战争之机，扩大战火反攻大陆，认为时机已到，企图来个里应外合。于是，元月19日下午，他召集王养吾等人在他家中开会，密谋策划这次纵火计划。但在这次一个多小时的会上，对纵火时间选在春节还是元宵意见不统一，一些细节问题也未定下。2月19日（即元宵节前一天），张再次召集王养吾等人来到永州八景之一的朝阳岩开会，细谋纵火计划。

这天正午过后，他们围坐在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块周围，张景星煞有介事地一手持笔记本，一手拿笔宣布开会。他说："我们这次放火的目的是：烧光零陵城，搞垮共产党。我们放火，要来一个调虎离山计，先从机关远处放

火，将人引到远处去救火后，再在机关、粮库附近放一把火。"他们把放火的日期就定在第二天，并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养吾带队在前进街等地放火；另一路由张景星带队在吉州小学等地放火。并且确定了采用煤油、硫磺、酒精等做为引火燃料。

张景星为了要同伙舍死卖命，鼓动说："你们放一把火，给5万元（折现人民币5元），多放多给。放火成功之后，香港总部还有重赏。"

下山时，他们个个笑容满面地预祝成功。然而，他们没有料到，在他们犯罪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灭亡。

张景星到底不是蠢驴，就在他开完会后，又径直走到县公安局去"汇报"自己近日的思想状况和活动，并表示要努力地"悔过自新"。

20日放火后，他仍假装镇静，照样在街头摆摊，窥测动静，又指使人在群众中散布大火是天灾，"解放时拆城墙，不应该拆掉防水防火塔……"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人民政府布下的天罗地网终于使他最后走向刑场，永远地死了那份贼心。

（杨邦国　蒋正洁）

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役

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入朝作战以来，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九五一年，中朝部队又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给了美国侵略军沉重的打击。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敌军引诱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成，为挽回败局，调集23万兵力，于1月25日发动全线进攻。敌人采取主力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等齐发展战术，企图乘中国人民志愿军疲惫之机，把中朝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中朝人民军队主动撤离汉城，在纵深100公里地带阻敌85天之久，歼敌7.8万余人，完成防御任务，并成功地掩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入朝各兵团的集结。

美军在朝鲜战场一连串的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吵。麦克阿瑟把战场上的失败归之于美国政府对他的种种限制，提出要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大陆，利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作战等来扩大战争。杜鲁门则认为麦克阿瑟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球出动的世界大战，甚至使用原子武器。4月5日，美国披露了麦克阿瑟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声称"把亚洲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私人信件。杜鲁门作出强硬反应，4月9日免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远东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统帅职务，并任命李奇微继任麦克阿瑟的职务。李奇微受命之初的主要任务为：全面掌握和领会华盛顿赋予他的保卫日本的首要使命，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贯彻杜鲁门坚定而明确的方针，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这对朝鲜战局，有很大的影响。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双方兵力都在百万以上。敌军在第四次战役失败后，策划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侧后海岸线登陆，"在朝鲜蜂腰部（安州至元山）建立新防线"。为粉碎美军阴谋，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春季反击战。在整个战线上将敌人击退50至70公里，共歼敌46303人。因中国人民志愿军技术装备落后，整个战役中"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营的建制六七处，一旦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美军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就拼命救援出被围之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由各民主党派发起成立的抗美援朝总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抗美援朝教育，提高全国人民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觉悟，扫除旧社会造成的亲美、崇美的思想和"恐美病"，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工人、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广大人民推行爱国公约，纷纷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家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前线。全国人民共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价值的款项。

材料：

- 汉江前线朝中部队取得重大战果
- 朝中人民军队在朝鲜中部前线反击战中八天共歼敌军二万余名

材料一　汉江前线朝中部队取得重大战果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汉江前线英勇作战中，业已取得歼敌两万多人的重大战果。

此次美国侵略军从一月二十五日起发动的冒险进攻，使用了兵力二十三万余人。其侵犯计划，据美国通讯社透露：第一步妄图重占汉城；第二步准备侵占北纬三十八度线及其以北地区。自敌人开始进犯后，现已战斗二十二天。我军在经过十八昼夜积极的防御作战后，即向南发起强大反攻。

敌军此次进攻重点置于水原、利川至骊州一线八十公里的宽正面，使用的兵力有美军四个师、英军两个旅、李匪军两个师及土耳其旅残部、希腊部队、菲律宾营等。原州地区敌人又集中了美军两个师又一个团，李匪军四

个师及法国部队、荷兰营等，向横城、洪川地区进犯，作为向汉城进犯的策应。此外美国侵略军又命李匪军三个师四个团另两个大队沿东海岸向北冒犯。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粉碎敌人的冒险进犯，乃以少数兵力坚强抵抗来犯敌军，使该方面的敌军伤亡惨重，进展异常缓慢，平均每天前进不及一点五公里。在十八昼夜顽强的阻击战斗中，中朝人民军队杀伤敌军达万人。

本月十一日夜，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发起强大反攻，一昼夜间即前进二十至三十公里，一举歼灭了大量敌人，并收复了横城。我军在横城地区的战果，据初步统计，共歼灭美国侵略军及李匪军一万二千九百余名，其中俘虏李匪军七千三百余名，美军五百五十余名，毙伤美军及李匪军五千一百四十余名。主要缴获有榴弹炮五十七门，边防炮十门，汽车五百六十七辆，坦克十四辆，另击毁坦克十三辆，击落敌机一架。

（原载1951.2.17《人民日报》）

材料二　朝中人民军队在朝鲜中部前线反击战中八天共歼敌军二万余名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中部前线举行反击战的战果，据清查共消灭美、英侵略军和李伪军等二万零七百九十二名，并缴获大量美造武器，击毁架数相当于美空军一个多战斗机大队的敌机。朝、中人民部队在四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共八天的作战中，将冒犯至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美军第二、三、七、二十四、二十五等师，及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骑兵第一师，英军二十七、二十九旅，土耳其旅，荷兰支队及李伪军第一、三、五、六等师和伪海军陆战队第一团等部敌军向南逐退了四十至七十公里，从而粉碎了敌军连续达三个月之久的疯狂进攻，并将上述之敌各消灭一部，其中遭受到沉重打击的有美军第三、二十四师，英军二十九旅、土耳其旅和李伪军和一、五、七等师。其中被全部歼灭的有美军第三师七团一个营、二十四师独立五团二营第五连、英军二十九旅步兵团一、二、三、九等四个连、和李伪军第一师十二团的第二营。总计毙伤美俘军五千八百五十九名，英军三千八百零七名，土耳其军一千零六十名和李伪军一万零六十六名，其中被俘敌军约占全部被歼灭敌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在八天的作战中，朝、中人民部队从敌军手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计各种炮三百零五门，其中榴弹炮五十四门、迫击炮五十七门、无后座力炮十九门、自动推进炮十二门及山炮、加农重炮、战防炮、化学迫击炮、机关炮、六0炮、火箭筒等各种炮一百六十三门。缴获各种枪四千一百六十一支（挺），其中重机枪一百六十九挺、轻机枪二百九十七挺、高射机枪二十六挺、自动步枪八百九十七支、步枪二千二百一十六支及卡宾枪、冲锋枪、短枪等五百五十六支。

这次反击战中，我军缴获和击毁了敌军的大量飞机和坦克，在前线和后方上空共击落敌机八十一架（按：本社二日播四月份共击落敌机七十四架系不完全之统计——编者），击伤二十架、击毁的敌机架数相当于歼灭美空军一个多战斗机大队。我军共缴获敌坦克三十九辆，击毁敌坦克七十六辆，并缴获敌汽车、装甲车四百九十九辆，另击毁一百六十八辆。此外，我军尚缴获大批弹药、通讯器材和许多军用物资。

（原载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

整党建党运动

背景介绍

一九五〇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一九五〇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各级党的干部思想水平显著提高，作风大为改进。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从下半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建党运动。在整党中，把党员划分为四部分人：1.具备党员条件的；2.不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3.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4.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中指出：这次整党，首先要将“第四部分人”①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1948年‘搬石头’的经验。”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共490人。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强调了执政党党员质量的重要性，并根据共产党执政近2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共产党员八项条件。会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现象。

整党的基本方法是：经过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地对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着重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做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此

基础上对每个党员作认真的审查，以便继续提高那些具备党员条件的好党员的质量，改造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并清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从而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政治质量和战斗力。重点放在老区和那些发展了党组织的地区，特别是那些纳新党员最多的地区。整党运动全面展开以前，首先是挑选一批经过考验、对党完全忠诚、作风正派，又有整党建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加以训练，然后派到党的基层组织去进行整党。其次是进行典型试验。县市以上党委选择几个支部，直接掌握，试行整党。典型引路之后，即根据经验全面铺开。

这次整党一般经过学习、登记、审查及组织处理四个阶段。

（一）学习阶段。组织党员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整党文件，听专题报告，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每个党员都明白做一个新时代党员的标准，明确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2、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每个党员必须下定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在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党、不投降敌人，不蜕化；4、一切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5、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6、经常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7、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8、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党员登记和审查阶段。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每个党员都要认真考虑是否能按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愿意则在规定时间内主动登记，详细说明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和思想作风；凡没有决心按党员标准来提高和改造自己或其它原因而自愿退党的，则不登记。党员登记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审查和鉴定。支部大会对每个党员的历史和政治经历全部审查清楚，作出书面结论，由会议讨论通过。

（三）组织处理阶段。根据对党员的审查和鉴定，发动党员讨论，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思想检查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把党员划分为四种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报上级党委批准。对"第二部分人"，经批评教育后，只要愿意改正，则保留其党籍，等待一个时期，并帮助他们改造提高；对"第三部分人"，则劝其退党；对"第四部分人"，则一律清除出党。

"三反"运动开展后，整党转入与"三反"相结合的阶段。中共中央于1952年2月3日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11月，10万名整党干部深入农村，整党运动进入高潮。机关整党着重总结工作，整顿队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行为，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在工矿企业，着重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旧的劳动态度；学校整党，着重清除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村整党，着重克服部分党员的消极"退坡"思想和"富农倾向"等。

1954年春，整党基本结束。经教育审查，党内约有不到10%的人不符合党员标准。据统计，1953年底，已有32.8万多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23.8万余人因完全丧失党员条件被开除党籍，9万多人被劝告退党。

在整党的同时，开展了建党工作。建党重点是完成土改的新解放区农村及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首先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建党中，执行了有领导有计划、积极慎重的方针，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履行入党手续，防止坏人混入，确保党员质量和党组织的纯洁性。截止1953年6月止，全国新发展党员107万人，新建支部8.2万个，党员数量由1950年底582万人，发展到639.9万余人；党支部由24.6万多个，增加到32.8万多个。

整党建党运动，端正了党风，纯洁了党的组织，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群关系，壮大了党的力量。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改革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创造了条件，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积累了经验。

材料：

- 刘少奇在整党中谈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

材料　刘少奇在整党中谈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

（一九五一年三月）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全体人民是工人。（我们党历来依靠无产与半无产）。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

要点另外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在农业中组织集体农场，这时，只能依靠工人及贫雇农，不能依靠一般农民，只是团结农民）。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因此，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这种革命斗争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斗争在内，并且还要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进行武装斗争（但不是说要当一辈子兵）。

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乡村中互助组、互助会、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式之一，是半社会主义。不怕牺牲自己一点，努力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会主义。公营工厂生产竞赛，更是社会主义。）

六、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28〕。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除开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背景介绍

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电影《五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人，生于一八三八年，死于一八九六年。据传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三十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五十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三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过活，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抗战时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学习武训办学精神，为劳动人民办教育，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一九四八年上海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已开始拍摄《武训传》，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新中国成立时只拍好三分之一，因人员离散而停拍。一九五〇年上海文艺界领导经过讨论，认为可以用来配合普及教育和扫盲运动的宣传，决定继续拍制。据该片编导孙瑜说，一九五一年二月影片拍好后，曾送给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审看，没有什么批评意见；朱德总司令说，很有教育意义。①电影《武训传》上演后，受到许多赞扬。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指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进一步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严肃地提醒全党注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学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从此，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并且进一步批判曾经肯定过武训的人和有关作品，涉及到陶行知、郭沫若等一大批进步人士。在批判运动中，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组"，江青参加了领导工作，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书。书中说武训是"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没有事实根据地乱扣帽子。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开了批判文章的恶劣先例。

当然，不论是武训本人还是电影《武训传》，都存在严

重不足之处。武训受欺压而不抗争、被侮辱而不怨恨，逆来顺受、奴颜婢膝，一副奴才相，丧失了劳动人民的应有骨气。电影《武训传》则把武训的许多丑恶行为、愚昧落后的东西当作优秀品质来赞扬、歌颂，甚至用农民武装反抗斗争的失败，来衬托武训兴办义学的成就，这些当然是错误的，应该批判的。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提倡教育、提倡劳动人民学习文化，无论如何总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能全盘否定。因此，这场批判运动，既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因素。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当时这场批判（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材料：

- 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
- 武训的真面目
- 郭沫若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材料一　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

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所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的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编导《武训传》记
　　孙瑜《光明日报》二·二六
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
　　长之《光明日报》二·二六
我看《武训传》电影
　　李士钊《光明日报》二·二六
我看了《武训传》电影
　　陶宏《光明日报》二·二六
介绍武训画传
　　罗纯《工人日报》二·二六
武训传
　　管大同《光明日报》二·二七
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看电影《武训传》有感
　　谷风《新民报》二·二七
关于电影《武训传》
　　王赓尧《新民报》二·二七
对《武训传》的意见
　　项惹愚《新民报》二·二七
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
　　董渭川《光明日报》二·二八
《武训传》观后
　　夙隽《新民报》三·一〇
论《武训传》
　　杨雨明、端木蕻良《北京文艺》二卷一期三·一五
《武训传》丑化了劳动人民
　　江林《新民报》三·三一
我对《武训传》的意见
　　林《光明日报》四·二
《武训传》能表现我们祖先的伟大吗
　　田家美《新民报》四·二
将《武训传》的争论明确起来
　　书亭《人物杂志》五·五
由武训和周大这两个人物谈起——《武训传》观后
　　赵桓《天津星报》三·一九
推荐《武训传》
　　阮丁《进步日报》三·一九
《武训传》观后感
　　梁鸿远、步云升、文清、夏文华《进步日报》三·二三
评《武训传》
　　时伟文《天津日报》三·二八
我看《武训传》
　　李韵《天津日报》三·二九
《武训传》教育了我
　　坤瑜《天津日报》四·四

不能接受武训的传统
　静知《进步日报》四·四
关于《武训传》
　程庆华《进步日报》四·四
我对武训的看法
　恂《进步日报》四·四
武训的"反抗"变成了帮忙
　洪都《进步日报》四·八
对《武训传》取材问题的一点意见
　方辉先《进步日报》四·八
关于武训不是我们好传统的商榷
　鲁南子《进步日报》四·八
我是怎样演武训的
　赵丹《上海大众电影》第九至十五期一九五〇·十·一六
武训传(报纸连载画传)
　孙瑜编，董天野画《新闻日报》一二·一四至一九五一·一·三〇
《武训传》与中国封建社会
　蒋星煜《大公报》一二·三〇
在苦难中成长的《武训传》
　王蓓《大公报》一二·三〇
我怎样表现武训的"梦"
　孙瑜《新闻日报》一二·三〇
编导《武训传》前后
　孙瑜《大众电影》第十四期一九五一·一·一
　《新闻日报》一·一
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
　戴白韬《大众电影》第十四期一·一《文汇报》一·三
《武训传》观后感……
　马佀贤《大众电影》第十四期一·一
育才学校师生谈《武训传》
　《大众电影》第十四期一·一
看了《武训传》的一些体会
　顾慰祖《文汇报》一·六
《武训传》半解
　史梁《新民报》晚刊一·六
对《武训传》的粗见
　立行《大公报》一·一三
从《武训传》谈起
　王鼎成《新闻日报》一·二七
小论表现历史人物问题——从《武训传》影片谈起
　言萌《文汇报》三·二九

下面是关于武训的几本在一九五一年初出版的新书：

《武训传(电影小说)》孙瑜著，上海新亚书店出版
《武训传》李士钊编，孙之儁绘，上海万叶书店出版
《千古奇丐(章回小说)》柏水编，上海通联书店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得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原载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武训的真面目

——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

影片《武训传》的编导者孙瑜先生所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一文(见本月二十六日本报第三版)中说："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群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这个意思就是企图引起读者和观众的一种糊涂观念，以为作者的"主观愿望"是革命的，只是影片发生了"反作用"。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作者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他的创作的客观实践来说明，这是最起码的理论常识。《武训传》影片的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已经在影片中表现出来了；影片所发生的作用，决不是与作者主观愿望相反的"反作用"，而正是作者主观愿望所必然产生的正作用。这正如武训的主观愿望，已经从他一生的历史事实中全部表现出来一样。

在《武训传》影片的主题歌中，作者对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指导思想不是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了吗？作者除了叹息“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绝望和诅咒以外，对于武训并无半个可以“算是批评了他”的字句。相反的，作者在这个歌词和其他许多文字中，都不顾一切地集中了所有的革命词汇，把武训歌颂为人世间最伟大的人物。

由于作者的这种思想支配与贯穿了全部影片，于是影片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刻画，就充满了不堪容忍的污蔑人民、污蔑革命、污蔑历史的恶劣形象，通过这一切形象就给予观众以极大的毒害。

为了达到作者的主观目的，影片编导的手法，极尽了歪曲和夸大渲染之能事。他甚至不惜捏造了周大这样的人物，硬把武训和太平天国拉扯到一起，构成“一文一武”分头进行革命的违背历史真实性的故事；并且极端歪曲地把太平军描绘成杀人放火的一群，用他们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成功”，来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来宣扬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影片假托一个梦境，把武训“行乞兴学”的迷梦神圣化起来，把“无自由由于无文化，有文化就是有自由”的荒谬公式艺术化起来；又用许多特写的镜头，拿“不倒翁”来代表所谓“韧性的革命战斗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影片中的发展，就是那一连串跪倒、磕头、爬行和承受拳打、脚踢等一切凌辱的“苦行”。作者企图将这极端反动的一切都说成是革命的，这难道还可以容忍吗？

有人说：《武训传》影片是要不得的；但是，历史上的武训和银幕上的武训却大不一样，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对于社会的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这种说法虽然是没有根据的。《武训传》影片和武训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影片把武训武装扮成了一个为武训所梦想不到的“革命者”，其流毒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武训，无疑是满清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工具。他在本质上是属于反动的封建阶级的人物，而决不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他老早就投靠了封建统治阶级，而背离了劳动人民。地主李老辫对待武训是骂、打、骗，不把他当人；但其结果，不是激起武训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而是造成了他向地主阶级的投降。武训从那时起，就死求百赖地跪倒在地主阶级的门前，爬、爬、爬，一直爬到封建统治者的庙堂上去了。

当时山东馆陶县塔头村有一个三品衔的武进士娄峻岭，堂邑县柳林镇又有一个进士杨树芳，这两个人都是当地当权的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比起李老辫那个地主来，势力就大得多了。武训受了地主李老辫的欺侮之后，却找到了这两个比李老辫更大的地主，跪在他们的面前，苦苦哀求，依附于他们的势力之下；并且经过他们，进一步投入了整个豪绅地主阶级和满清统治者的怀抱里去。这是武训的全部历史发展的关键，从这里才能看到武训的真面目。

据满清光绪十四年（公历一八八八年）山东堂邑县署“为行乞兴学义民武训请旌底案”中所附陈代卿作“武七传”稿：

“武七……梦人语之曰：汝一生困苦，无大享受，能创建义学，方有转机。既告，述所梦于柳林岁末杨树芳，杨曰：义学非可赤手办，汝后有钱交我存，决不汝负，毋听非人言，一误再误也。”

贾品重所作“武善士训墓志铭”也说：

“始则馆陶武进士崇山娄公生息之力居多；后则堂邑岁进士模民杨公筹划之劳尤巨。”

这就证明武训的“事业”，不但是以封建高利贷剥削为基础的，而且一开始就是与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相勾结，得到他们全力支持的。

以杨树芳为首的富豪耆绅们，不独帮助武训，“多方劝募，筹办义学”；并且联名请求满清朝廷给武训以“旌奖”。由于他们的推荐，堂邑知县郭春煦会亲自访问过武训，赠给十两银子，并向巡捕衙门呈请转奏。这个巡抚不是别人，正是屠杀太平天国和捻党起义人民的刽子手张曜。据“山东通志”所载，张曜称朗齐，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原籍浙江上虞。他于咸丰初年，在河南“带勇剿贼”（按即指与太平军作战），“屡立奇功”后被“擢为河南布政使”；同治初年，“官拜总兵，会剿张总愚股捻、临邑济阳之役，残毙悍贼万余”；后任“广东陆路提督”、“广西巡抚加尚书衔”。这个刽子手就任山东巡抚之后，继续大肆屠杀捻党起义群众。武训却得到了他的赏识，被召见于济南的巡抚衙门。张曜赏了武训二百两库银，又给他一本黄绫的化缘薄，上面钤了巡抚的官印，使武训可以毫无困难地到处募捐。随后满清朝廷根据张曜的奏折，封武训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的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死后，又由另一个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他立祠祭祀。

武训就是这样爬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庙堂，这是多么丑恶的历史呀！歌颂武训的人们，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却为什么要百般遮盖，歪曲历史呢？这样的歪曲历史是可以容忍的吗？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正视历史，无情地揭露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的无耻行为。

我说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这决不是过火的。这从封建主义者赞颂武训的文词中，完全可以得到有力的反证。贾品重所撰“武善士训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

“夫坚持乎求荣之业，而能致已于荣者，天所不得不荣之所，顺天者也。广阔乎求荣之途，而能致人于荣者，天又不忍不荣也，胜天者也。然后叹天之报施善人，果不爽也。”

这是反动阶级对于武训的“盖棺论定”。他们称赞武

训的"顺天""求荣",难道不足以证明武训出卖劳动人民,投降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可宽恕的罪恶吗?

有人说:武训生在那样的黑暗的社会,没有人领导他,因此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走错了路,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公道",其实是不合事实的无聊的辩解。

在满清黑暗统治下的咸丰四年,即公历一八五四年,武训十六岁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军队攻克了青州城,北渡黄河,在武训的家乡堂邑及附近的临清、高唐等县活动,太平军并驻守高唐县城达半年之久,武训为什么都置之不闻不问呢?以后捻军起义,又在整个山东掀起了农民武装斗争,武训已三十几岁了,为什么他还是置之不闻不问呢?很显然的,武训根本不是站在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因此,他和太平军、捻军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武训是站到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听命于地主阶级,接受地主阶级的领导,极大麻痹农民的斗争意志,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掩饰呢?

光绪年间出版的张清所作的"山东堂邑乞人武训兴学俗话传"叙明武训兴学的动机是:

"一人不学一人穷,人人不学人人穷,往后来看,穷人多了,什么做贼、诓骗、劫夺都能做出来了。到了这时候,有钱的过着也不安稳,穷的也不知死活了。"

清楚得很,武训所忧虑的就是地主统治阶级"过得不安稳",害怕"穷人"造反。因此他死心塌地奴颜婢膝地投靠于封建统治者,与豪绅地主合作,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有意识、有计划地充当了满清皇家御用的走卒。据"堂邑县志"载称:"(武训)自弱冠失恃后,即委家事于其兄,而以兴学为己任。"武训的兴学计划与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政策恰相符合,同时他的"苦行"又是欺骗落后群众的最好形式。这就无怪乎从西太后到蒋介石,一脉相承的反动统治者都把他当作最廉价的工具了。

如果不是依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武训的"义学"决难举办是可以肯定的。武训最初创办义学的经费是他和他的哥哥分家所得的三亩地,变卖了一百二十吊钱。他自己最初"行乞"的积蓄,有的说是六吊钱,有的说是九十吊。两项合计不过一百二十六吊或二百一十吊钱。他用这一笔资金,高利放贷,剥削地租,无所不为。据山东通志载:"(武训)得钱辄寄诸富家,岁以三分计息,铢积寸累,逐至志万。"武训自己也承认"存本钱,生利钱,兴义学,没心烦。""穷得使,富的保,修个义学错不了。"他的钱多了,就买田地。仅在柳林镇一处,武训竟占有了二百三十亩地,每年收租达三百六十八吊。这已足以证明武训实际上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残酷地吮吸着农民的脂膏,来为豪绅地主阶级宣扬封建文化,培养大小奴才。而这一切作为,武训是一律听从豪绅地主杨树芳之流的指挥的。"清朝物文献通考"称:"武训设学……宅舍经费惟备,倩人董理,已经不过问。"不但不过问,他甚至在开学的时候,如"清史稿"所述:"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燕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他之所以一直在表面上保持要饭的样子,无疑地是因为封建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奴才头子作模楷的原故。

实际上一切反动宣传家所称道的武训之所谓"孝义"和"苦行",不但在本质上是极端反动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非常虚伪的。据臧克家作"武训先生的义学症"一文中说他"不管见了谁,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要钱。他为人推磨,人家看不见时,偷向口里掩(吞)面,这样可以省了吃自己的饭、不幸被人家发觉,他也会陪笑的说:"不提防时驴还又(用口猛掠)口面呢!其实日子久了,他的这个小毛病早成公开的了。"当武训的母亲死了的时候,他的哥哥叫他回家守灵,他的回答是:"回家守灵可以,我哭一声,你得给我一百钱。"请问崇拜武训的人们,这就是你们所称道的"孝义"吗?这就是"苦行"吗?为什么你们对这些事实一点也不敢提呢?崇拜武训者不敢提起的事实太多了,诸如武训做媒,几乎包办了乡间男女的婚姻;做田房交易,从中取利。但是,这些无一不是有案可查的,谁能够掩盖得了呢?

过去的反动统治者,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对于武训备极赞扬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武训是属于他们一伙的,是封建帝王的御用走卒,是反动统治者最能欺骗人民而又最廉价的工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梁启超到陶行知,也许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成改良主义的老师,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也还不算什么奇怪。最可怪的是在今天我国的思想界,对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竟然完全丧失了政治警觉性;甚至还有一些人,在发现了错误之后,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地进行研究与检讨,而以粗枝大叶或口是心非的态度来敷衍搪塞,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因此,继续展开对于《武训传》的批判与讨论,仍然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任务。

(原载195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郭沫若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件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际问题具体地联系了起来,使很多读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自己也就是深受启发的一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武训传》的批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到了。我觉得谢兴尧先生的"武训其人其事"(《人民日报》五月三十日)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所附的"武训活动时期以华北为中心的国内大事表"及"武训捐资兴学收支表",使人们对于武训的真相

可以一目了然。

武训的存在，我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经过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开始知道的。我一直不会加以研究。但在一九四三年陶先生所主持的一个武训纪念会上应邀讲话，便也会盲目地称赞过他。一九四七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吊诗里面会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更好。(原诗被收入《蜩螗集》，因手中无书，原语无从引出。)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会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会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书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八月十一日)”

那是去年八月十一日的事。“画传”的编者李士钊先生早就写信来说：他在革大的学习结束了，他编的“画传”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不知怎的后来并无此事)，要我题个书名并写点意见。我勉强地应付了。这实是我的错误。我当时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扬的能事。

虽然我的题辞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是十分不够。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中其事。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又是要叫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武训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这又算是什么“奇迹”呢？反革命者在封建社会里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本来是极其寻常的事。

满清末年的武训和蒋介石匪帮统治时期的吴稚晖，大体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知识水平也不能相比。但吴稚晖容易认识，而武训比较不容易认识，原因是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会加以研究，那就更加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了。因此，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原载1951年6月1日《人民日报》)

西藏和平解放

背景介绍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以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急剧分化。1950年冬，以大札为首的一小撮亲帝势力，勾结帝国主义，挟持十四世达赖逃往边境城市亚东，准备逃往国外。这种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当即遭到广大藏族人民和部分上层人士的反对。经过斗争，1951年春，大札摄政下台，由十四世达赖“亲政”。在西藏爱国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前往祖国首都北京，同中央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和谈。

1951年4月，西藏代表团抵达北京。原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也由海路东来。于1951年4月下旬同时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李维汉、张经武等同志为中央全权谈判代表，和西藏代表团举行正式谈判。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向他们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政策，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谈判，双方圆满地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字。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西藏地方政府应按照人民的愿望，自动进行改革；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根据协议规定，胜利进驻拉萨。古城拉萨各阶层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欢迎解放军的到来，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热烈欢庆拉萨的解放。接着，人民解放军又先后进驻察隅、江孜、日喀则、亚东、阿里等地，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终于从西藏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了。

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藏族人民的历史和西藏民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使备受苦难的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开始回到祖

国各民族大家庭中来，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同时也为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我国现代革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材料：

- 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全权代表隆重举行签字仪式
-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节录）

材料一　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协议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双方全权代表隆重举行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就一切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讨论之后，已对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了协议。本月二十三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伟大祖国国旗和国徽下庄严地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陈云副总理主持（周恩来总理因身体不适，由陈云副总理代行）。参加签字仪式者，有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彭真、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张奚若、许德衍、蓝公武、张志让、龙云、沈雁冰、乌兰夫、傅作义、李书城、李四光、叶季壮、朱学范、刘格平、贺诚、赛福鼎等军、政首长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此外有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拉敏益喜楚臣、计晋美、纳旺金巴等。

隆重的签字仪式开始后，首由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签字，继由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签字毕，李维汉首席代表和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先后致词，然后朱副主席讲话。签字仪式在庄严、团结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当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及有关工作人员举行聚餐，席间相互频频为各民族大团结而干杯。同时，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亦举行庆祝晚会。

（原载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节录）

代表团到北京后，朱总司令为欢迎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五一”节在天安门上，我头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他们都没提有关和谈方面的内容；对我们的到来，都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问寒问暖，接待也很热情周到。我想，这实际上就是谈判的开始吧。

我们经陆路来的代表和经印度来的代表碰了一次头。他们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进行和谈的五项条件和内部掌握的要点，还带有盖章的公开文件。我们在昌都时，曾拿到西南军区制定的十条，并且仔细地研究过，基本同意以这十条作为谈判的基础，打算在这些条条上作些改动定下来，变成谈判的协议。但是，和他们带来内部掌握的条件相比，两者的距离太大了。从噶厦的公开文件看，主要条件：一是表面上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上要实行独立自主；二是不要向边境派遣武装部队；三是和平谈判时，要有中立国（指印度）参加。其基本想法可能是，还按袁世凯时期的老办法。那时（1913年10月13日）曾经在印度西姆拉举行过中国、西藏、还有英国参加的三方会议，就是这次会议，产生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这次，他们还想如法炮制。内部掌握的精神是，如因中间国事影响谈判的基本条款时，可以放弃。问题是要坚持不准派解放军到西藏边防这一条，另外还坚持中央派代表只许派文官，而且在不多的随员中，还必须是信教的！这就更离奇了。共产党里面到哪里去找信教的？

在昌都时，王其梅对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十条作过认真的解释。当时，我觉得这些条件很全面，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稍加修改就行了。现在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一是不让向边境派部队，如果一定要派，应把藏军改作解放军的名义派出去，实际上是让藏军守边防。不让解放军进西藏；二是派出驻藏代表，其随员只能带15人，不准带警卫。如果需要警卫，可从藏军里派出。这与十条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五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讨这些问题时，我发现经印度来的代表与从陆路来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了难以相处的局面。这样，我只好把准备谈判的根本任务暂时放下来，首先帮他们解除思想疑虑。我们同经印度来的两名代表和两位工作人员彭措扎西和桑多仁钦在一起，说是开会，实际是个形式，主要向他们介绍内地情况。我们从昌都来的，因与解放军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亲自体察过党的政策，对一些情况比较了解；而经印度来的代表，满脑子灌的是谣言，对情况不了解。这就有个向他们谈情况、统一思想认识，增加代表间的互相信任的问题。因此，先做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一条。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在谈判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我们内部思想的不一致，不在协议条款本身，而在于对共产党的认识。因此，我没有单独就协议条款统一认识，从他们带来的噶厦为谈判而制定的内部掌握条件来看，没有谈判基础。要否定它，就要有个统一的态度，对中央、对噶厦都要有个一致的态度，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

顾虑，肃清他们脑子里的谣言。我把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明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颇和土登列门也介绍了在昌都亲眼看到的情况。总之，通过这些去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

金中当时是下级官员，很有勇气，也跟他们讲了解放后的亲身感受，讲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我是首席代表，他们对我讲的事是真是假有些怀疑，所以在私下里询问金中。和我同路的桑颇比较年轻，思想开阔，接受新事物较快。他也做了不少解释和勉励的工作。总之，谈判前主要是统一代表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在五位代表中，有两位同我是亲戚关系，一位跟我合作共事多年，还有一位与我关系也好。桑颇的奶奶同我母亲是亲姊妹，我是他表叔；凯墨的父亲同我祖母是亲姐弟，他是我舅舅。凯墨的夫人和桑颇的母亲又是亲姊妹。这样，我进行工作很方便，桑颇也好做工作。我和土丹旦达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我们俩曾在一起负责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在拉萨建造住宅。他当时是孜准，我是协邦，我们前后合作共事有四年时间。所以，我和他关系很近，说话也比较方便。我和土登列门关系不亲不疏，通过在昌都一段时间的相处，关系还好，也能谈得来。因此，我同他们之间商谈协议条款，认识比较容易接近。我同凯墨个别谈过必须同意往边境派驻解放军的道理，否则，就无法进行谈判；而要同解放军合作，就要成立军政委员会。这样，凯墨没有什么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顺利地取得一致意见。

代表的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以后，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这是很关键的一着。因为你向噶厦请示一个问题，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同意，不仅拖延时间，还没法处理，甚至无法取得谈判成果。况且电报一来一往说不清楚，反而使问题拖延不决，无头无尾，更加复杂化。所以，整个谈判，只在班禅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直到和平协议签字以后，才由几位代表经印度返回亚东作口头汇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双方代表开始谈判。通过交换意见，酝酿讨论，我们代表团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再就是，解放军进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好开展工作。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成立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件小事了。因此，必须承认。我们还认为，象这样的意见，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我作为全权代表可以接受，但是，中央必须给我提供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我们代表可以接受在协议上签字，西藏地方政府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如果同意，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就在西藏呆不下去。我们的意见，应当允许他逃到印度，在印度观察西藏的变化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他对西藏解放后的情况了解了，疑虑消除了，愿意回来时，应准许他返回，并维持原来的地位和权利不变。我们提出把这一条列入协议。后经中央反复讨论，不同意写进协议；但可以形成一个附件，双方各执一份，对外不宣布，同样起作用。附件有七条，主要内容是，亚东噶厦如果不同意这个协议，达赖喇嘛可以到印度住几年，研究一下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愿意返回西藏时可以回来，不降低他原来的地位和权利。这样，双方谈判取得了一致意见，协议也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们估计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也就没和他们联系。

协议草本已经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就在这时，中央提出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整个谈判破裂，这是谈判中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历史上，噶厦与札什伦布寺之间发生不和，积怨很深。九世班禅跑到内地向国民党告状，以后，班禅从内地派人回过西藏，达赖喇嘛也派人到过内地，双方发生过联系，但结起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一直到十三世达赖逝世，关系才有所改善。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给班禅写过信，意思是达赖已逝世，希望他回去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这是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规矩。很多年以来，找达赖灵童时，班禅负责；找班禅灵童时，由达赖负责。九世班禅接信后，确实由内地动身返藏了，大概在 1937 年或 1938 年间。他带有国民党 500 人的军队和自己的警卫部队，到了青海的玉树。噶厦提出不能带国民党部队进藏，后来班禅从玉树到囊谦，在热喜龙须寺住下来，双方又经多次交涉，都没有商量妥。最后，九世班禅死在玉树。这就把事情完全闹翻了，隔阂随之又加深一层。札什伦布寺与噶厦之间的怨恨，有清朝留下的问题，有英国留下的问题，问题越积越多，怨恨积得更深。因此，在这次谈判中提出承认班禅问题，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西藏代表根本不能接受。我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班禅的问题与此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先碰到班禅到北京，中央要我们代表团去车站欢迎，当时我们不准备去，并且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来中央劝说我们，这是关系到搞好西藏内部团结的大事情，你们应该去，我们几个商量后，认为完全不去不行。于是便决定派代表团中名次最末的桑颇一人去车站欢迎，其他都没和班禅见面。

讨论班禅问题时，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炽烈起来。本来，我们与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谈判中一同交换意见，相互访问，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初步建立起信任，没有发生过问题。但班禅问题一经提出，矛盾就尖锐

地发生了。我们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认为这次到北京是办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班禅问题毫无关系，希图这次解决札什伦布拉章与噶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行！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拉章一起讨论解决。但是，中央坚持一定要把班禅问题包括在协议里面。我们坚持它与协议无关，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双方坚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

一次，双方代表团在一起开会，中央代表团说：这是西藏内部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解决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因此，这次一定要解决。我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推说地方政府只交代我们和谈问题，根本没交代我们谈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最后，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如不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我说："那好，已经达成的条款也可以不算！其他四个代表从哪里来，请你们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哪里。我已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们让我回昌都也罢，不让我回，留在这里也行。"

这样，在一个星期内，谈判面临决裂，已达成的协议也面临被推倒的局面，代表团内部，也作好了回去的准备。我们铁心了。把札什伦布拉章的事掺在协议里，我们坚决不干！

一天下午，孙志远打电话来，问明天上午九点与我会晤行不行？我说行，我就是来谈判的，怎么不行？

第二天，孙志远准时到了北京饭店。我们俩个单独进行会谈，由平旺作翻译。孙志远仍坚持中央代表团的意见，他说："中央和西藏方面的大事都已经谈通了，解决了，剩下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是西藏内部问题，还没解决。这是件小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小事上就统一不了？"我说："是大事也罢，小事也罢，这不用你作解释，我们清楚。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我们谈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谈判的必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协议签字，那就不要谈了。"我们不承认有这个问题，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

我们从九点谈到中午，三个人吃了饭又继续谈。孙志远还是继续解释，我就从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一直讲到下午五六点钟，最后，孙志远说了一句："你看这样办行不行？是不是在协议里写上这样的内容？即：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这一句话打破了多天的谈判僵局，我想了一会说："单是这样写是可以的！"为什么同意这样写呢？从五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关系非常和好。这是历史事实，没有理由不同意。问题是到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政府欺侮过札什伦布拉章，札什伦布拉章也欺侮过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是这样产生的。我把孙志远的这个意思和我个人的想法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一致说："这好说！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们承认了这一条。第二天重新开会时，就把它定下来了。因为这一条关系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请示。我在西藏铁兔年四月十二日给亚东噶厦发了报，电报大意是："有关汉藏谈判出现了在昌都的汉官和驻新德里的袁大使均未提及的新问题，即班禅灵童问题……这里不可能通过书信把每一个重要原则的细节报告清楚；我们经过商量，为了执掌政教者未来少受损害，我们忠实、慎重的想尽一切办法，打算尽快的解决……"四月十五日，我再次给亚东噶厦发电报："共产党政府已决定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因事关重大，我们已经决定承认，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

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亚东噶厦四月十九日复电说："……汉藏和谈进展情况，希作进一步说明，以免悬念，因为事关重大，要经常发来毫不含糊的请示电报，是为至要。班禅灵童问题，札什伦布寺四个堪布与堪厅官员联席会议，竭力要求达赖喇嘛认定，此次汉方坚持要求认定班禅，我们驻阁驻外的也一致同意。"

至此，所有的问题都统一了。这场谈判也就顺利地结束了。双方立即在协议上签了字。

（阿沛·阿旺晋美）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背景介绍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身受三座大山压迫，具有很大的革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并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但由于旧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旧思想的熏陶，在思想和灵魂深处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为了帮助旧知识分子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政府动员组织他们参加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项社会改革实践，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民主的方法，启发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对旧知识分子的初步改造，使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旧知识分子中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带来的旧思想、旧观点、旧作风和影响还不可能一

下子肃清。他们中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庸俗观点和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依然存在。为适应文化教育改革和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1年秋首先从京、津高等院校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帮助知识分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确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处于领导地位的观念。运动大致经过学习批判和组织清理两个阶段。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建议，根据北京大学职员暑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经验来推动教员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9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研究确定了这次学习改造运动的内容、目的和方法。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他从自己学习和改造的经验讲起，谈了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7个问题。指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才能够进步。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鼓励高等学校的教师树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的革命战士。

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励，京津各高等学校掀起学习改造运动的热潮。知识界对学习改造表现了很高的热情。10月间，京津两市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钱俊瑞任副主任委员，具体领导京津3千多名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用1至2年时间，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培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活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此后，全国各地高等、中等学校教师中相继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与此同时，中宣部就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指出："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其主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严重的自由主义，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学习"。根据中宣部报告，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到年底，整风学习在全国各地文艺界相继展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教育界扩大到文艺界。

1952年1月5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和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展开。"三反"运动开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同"三反"运动紧密结合，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

1952年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转入组织清理阶段。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指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高等学校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运动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限；肃清学校中贪污现象，打好在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工作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这次运动中，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25％的教师，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央指示要"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并肯定了北京科学院各研究所"一般不用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检讨会形式，由检讨者在副研究员以上人员组成的小组会议上做检讨报告，由别人提意见，做到认真严肃，本人接受批评即可，只有十分恶劣顽固抗拒者才需反复检讨，最后在全院性研究人员代表会或大会上检讨，接受批评后仍让他们工作。同时，要注意将检讨批判政治思想与检讨批判学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影响相结合，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组织清理中，要贯彻"不追不逼、自愿交代"和"严格审查、宽大处理"的原则。许多知识分子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卸掉了历史包袱，获得党和人民的谅解与信任。极少数罪行严重而拒不交代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1952年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

材料：

- 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节录）

材料　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节录）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　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 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

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　态度问题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

背景介绍

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连续遭到中朝军队五次重大战役的沉重打击后，一方面是迅速增兵，企图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挽救其败局。由战争开始时的近70万人陆续增至111万人；另方面是被迫接受谈判。由于损失惨重，大量战争物资消耗，内部矛盾激化，美帝国主义者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正如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不得不承认的："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因此，在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苏联政府1951年6月23日提出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举行停战谈判。早在停战谈判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指示我志愿军：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为此，党中央提出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

1951年7月10日的首次谈判会上，我方首先提出以"三八"线为停战的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后撤10公里，把这一带作为非军事区的公平合理的议案。然而美方却荒谬无理地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内，要求中朝两军从实际控制线的临津江以东后撤38公里至53公里，从临津江以西后撤约63公里，作为它的"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被坚决拒绝后，美帝国主义竟叫嚣说："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随即于8月18日集中8个师的兵力，向东线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向西线和中线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其夏、秋季攻势，美帝国主义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我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的所谓"绞杀战"。每天平均出动600架次飞机，在我通车线上，平均每7米就落弹1枚，主要地段每1.4米就落弹1枚，尤其严密封锁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所有交通枢纽和兵站仓库基地，企图切断前线粮食弹药的供给线，迫使与它订立城下之盟。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中朝两国军队英勇顽强地给予了美国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在前线，坚决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从8月中旬起，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接着又从9月底到10月下旬，继续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25万人，超过了前五次战役歼敌的总和，把战线牢牢地稳在"三八"线附近。在后方，中朝军民紧密合作，以大无畏的气概同美帝国主义的空中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在极其残酷艰难的战斗中，中朝军民总结和摸索出一整套有效对付美帝国主义"绞杀战"的办法。同时，我人民志愿军逐步组建了高炮部队、工程部队、铁道兵部队等保障部队，并且建立起一支航空部队，从而加强了反轰炸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从后方到前线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运输线上，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将运输效率提高了几倍、几十倍，保证了前线的供应。美国侵略军第八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绞杀战"的破产，他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惨败，政治上的孤立，迫使它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被美帝国主义片面中断两个多月的谈判，于1951年10月25日在开城南的板门店重新复会。11月27日，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无理要求，接受中朝双方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方案，达成了第一个实质性的协议："确定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各后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这是我们在谈判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材料：

- 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

材料　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经过五次战役，打了很大的胜仗。到1951年6月，我们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已经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美帝侵略者不得不停下来谈判。1951年7月10日，在战线西部我方一侧的重要城市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17天。从此，朝鲜战场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交织，边打边谈，断断续续，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经过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使敌人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是决心把朝鲜战争进行下去的，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点敌人开始时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他们想用武装力量来灭亡朝鲜是办不到的。在这样一个

军事形势下，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美国一个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当时的“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他提议立刻进行谈判，地点是在丹麦船上。同时也讲到：交战持续一天，双方都会有损失，我们宁愿提早会晤，提早谈判。这看出他们有一种迫切的心情。这样咱们就从容不迫了，马立克提出建议，李奇微首先响应了。我们通过金日成、彭德怀作出答复，说可以谈判，时间在7月10日到15日期间，地点在双方接触线上的开城。他们也同意在开城，而且说他们的代表团将乘自己的车到开城来，同时在车上带个大的“臂章”——大白旗。二者态度对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谈判时机到来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没有武装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不可能同我们谈判的。

对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的选择、布置、警戒等等，我们事先都做了准备。由于我们控制的地区还在开城以东几十里，因此我们特别抽调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原三五九旅，以后是四十七军的一个师负责警戒。会场设置在朝鲜一个大地主的庄园里。他们每天来，一部分从公路来，其代表坐直升飞机来。他们每次来都跟我们先联络好，我们放他们过来。他们有一定的识别记号，原来的那种骄气，一下子受到我们的约束和控制，他们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你要谈判，不遵守这些不行。就这样，7月10日开始了正式谈判。

双方由敌对的情况转入面对面的谈判，许多细节问题都要考虑到。首先碰到的问题还不是谈的程序，而是见面的程序。双方代表谈判前都先派出联络官，联络官可以谈得具体一点，如双方代表团来经过什么路线，所坐汽车停在什么地方，直升飞机降落的地点，来了后在什么地方休息等等都由联络官们具体商谈。因为双方联络官都接触过了，到时候就分别由联络官介绍双方代表，我们称为“朝中人民军队代表团”，他们叫“联合国军代表团”。我们这个代表团参加停战谈判还是头一次。一坐下，他们就抱上来一面联合国旗，这一下将了我们的军，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旗子。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一点事也不能让步，这是斗争，输一局都不行，于是我们马上回去准备。打什么旗子？当然是打朝鲜旗子，开城那地方准备得还是挺快的，上午告诉他们，下午就抱来一面大旗，这个旗比他们的高得多，这下我们坐在那里就很安然了，而他们就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谈判时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也是不能叫他们轻视的。

发言的时候，我方均由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发言，发言稿都是我们准备的，一些重要发言稿须报我党中央和金日成批准。每次谈判前我们都对敌人会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回答，怎样提出我们的主张，原来准备的发言稿要修改什么，中央回电是批准还是不批准，有什么新的指示等等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这是很细致、周密的工作，出一点漏洞都会被敌人利用。一切安排妥当后，会谈开始。谈哪几个问题呢？他们有他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但是他们提出了三点共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分界线问题。第二个是停战问题，停战要有保证，停战由谁来监督，规定哪些限制等等，也就是保障停战的稳定，不增加新的力量。第三个是战俘问题，停战就应该交换双方战俘。他们提出这三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因为在议事日程上这几个题目都是要讨论的。但是具体的还有很多争论。我们提出加上第四点，就是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也就是政治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算外国军队，撤出。但是你们美国军队也要撤出。然而也就为了议程是四个问题还是三个问题就争论了十几天。为什么谈判进行了两年零17天？仅为这事就争了十几天，我们主张四个，他们主张三个，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谈四个问题，但他们不明确提出来叫撤退外国军队，而叫做政治解决朝鲜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条到现在也未实现。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亲自去，美国代表是杜勒斯，想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有解决，到现在还是问题。

在讨论分界线问题、即在什么线上停下来时，美国一下子就提出来一个方案，并划出图来，要把分界线划到平壤、元山以北。事实上双方部队都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他要划在平壤、元山以北，那咱们还得撤退几百里，这怎么行！他们一拿出这方案，我们志愿军几个代表脸都气黄了，简直太无道理了！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次作战，你们只是一军——陆军，“联合国军”是三军——陆、海、空军，海军把朝鲜全部海面都控制了，空军把朝鲜全部领空都控制了，停战时必须把双方实力体现出来，要得到补偿。实际上是要朝鲜部队从停战线撤退，给他12000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通过谈判得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在谈判中也休想拿到。志愿军出兵的时候，叫“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呵！12000平方公里怎么能够给它？我们马上就把他们顶回去了，我们的理由是：你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上得到是妄想。我们只有一军就把你们打到这般情景，我们要是三军作战你们早就完了。这一点他们是无法驳倒的。

关于分界线问题，他们要12000平方公里，我们坚决反对。这时候会场上的斗争和战场上是如何表现的呢？会场上，首先敌人找茬儿，除了提出无理主张，什么所谓海空军优势论吧等等外，他们就找茬闹事。中午他们不能回去，就坐汽车在会场区转。当时规定会场区是不能有武装部队进去的，警卫部队也不能带武装进去。但恰好碰上咱们换防的部队错走进去，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照起相来，

在会场上提出我们违反协议，没有诚意，戴上大帽子，要求我们回答，在没回答前休会。于是谈判开始后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休会了。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指示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跟他们纠缠。我们是违反协议了，错走进去，承认这点之后会谈又恢复了。但他们还是采取这个办法——不提新方案，而我们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外交谈判就是这样子，哪一方面中止了就被动，你反对得有反对的理由，你赞成得有赞成的态度。这个"球"要踢回去，不能放在咱们这边。他们的无理主张坚持一天，我们就驳斥一天，重申我们的合理主张。最后，他们采取耍赖的态度，我们提出主张后，他们不回答，象没听见似的，于是会场停顿下来，一停就两三个钟头。双方谈判，两三个钟头没说话，可是这个没说话的是他们，我们讲完他们不回答，现在"球"在他们那里。最后他们只好提出，现在没有进展，休会。

因为这个"球"在他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它，孤立它，会场内外配合，逼得李奇微不得不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他提这个主张怎么怎么合理，共军方面怎么怎么样。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坚持，最后他讲出这种话：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可以理论的，只好让飞机、大炮、机关枪在战场上去辩论。同时他采取很多挑衅手段，破坏谈判，要谈判停下来，他们好在战场上动手。挑衅之一是把我们的一个排长打死了。因为我们的一个警卫部队每天在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地方警卫、搜索，他们就让伪军在路上设埋伏，把我们警卫部队的姚庆祥排长打死了。我们抓住了这个证据，寸步不让，抗议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破坏谈判。挑衅之二是，当时规定会场区和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公路飞机不能侵犯，结果不但美国的飞机来，而且趁那天电影散场汽车开大灯，人打着电筒，飞机就下来扫射。这完全是一种挑衅和破坏协议的行为。我们提出抗议，在他们没有答复的时候不能谈判。这样就中断了62天。他们不是说战场上见吗，不是机关枪、大炮去辩论吗，结果他就来了个夏季攻势，接着又来了一个秋季攻势。夏季攻势是在西线打的，主要打的是志愿军。但在西线他们没占什么便宜，四十七军守天德山守得很好，邱少云烈士就是在这个时候牺牲的。这边打志愿军不行，接着他又来一个秋季攻势，主要打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守了一个851高地，守得很顽强。敌人往那里冲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所以它管那个地方叫伤心岭，一提那个地方就伤心。当时美国三军联席会议的参谋长讽刺李奇微：按照你这样的进攻速度，要打到鸭绿江也得20年。我们说你20年也打不到。结果在战场上辩论也不行，还得谈判。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他们是死不起人的，机关枪、飞机、大炮都可以受些损失，消耗大也不要紧，可是人他死不起。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死了人军人家属可以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得给人家赔偿的。所以各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恢复谈判。要恢复谈判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先派飞机违反协议，这回不打代表团驻地了，而是在板门店扫射一个农民的牛车，这一扫射我们就抗议了。他说好，双方联络官会晤。原来双方都没有接触了，中断了，这下用违犯协议的办法来把钩挂上。我们后来开玩笑：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也很灵活哩！他们建议双方联络官恢复会晤，这当然好嘛，我们看出来了，他们是想要恢复谈判，那我们当然要去嘛。去了以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好。我们的联络官对打牛车一事提出抗议，人证物证都摆出来，他们的态度空前的好，说这完全是误会，我们错了，对不起。当场口头上就道歉了，并建议双方代表团会谈时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谈判中断了62天后又恢复了。

恢复谈判之后，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即彭总讲的要掌握和平旗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代表团一上来就提出就地停战，原来我们提在"三八线"停战，当时我们有的部队超过了"三八线"(西线)，他们的部队东线超过了，成S线，弯的。我们建议调整一下以"三八线"为界，他们不干，硬要12000平方公里。那么这次我们提出来就地停战，现在谁占领的地方就是谁的，部队在哪就在哪停下来，在这中间划条中间线，各后退2000米，成为非军事区。这个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他们仍然反对，说将来还有变化呀等等。他们的意思是：你占这个地方，将来我还让你再退。我们说，那么好吧，到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候再校对一次。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到时候，究竟哪一方会有有利的变化，还得看将来的事实，我们就是用这个理由来驳斥他们的。这样，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方案，达成了分界线协议。

（解方）

* 解方同志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是朝鲜开城停战谈判中的朝中方面的代表。回国后历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1984年去世。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背景介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科学著作集中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为了提高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也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毛泽

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共十六篇。这些著作都经过毛泽东校阅，其中有些地方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并由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题解和注释。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一九六〇年九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也相继出版发行。选集出版后发行量空前，并先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选集的出版推动了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推动了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材料：

- 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材料　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第一卷已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自今日起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六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五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著作，一律按照著作年月的次序编辑。选集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校阅，并由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果的文集，它的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共计论文十六篇，其中九篇是过去出版的几种《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编入过的。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即大家平常所称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或北伐战争时期）的著作，本选集编进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友人，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最大多数（主要是农民）反对少数的战略思想，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矛盾及其关于“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仅仅是一个幻想”。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已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这是和陈独秀的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完全相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描写和总结了当时农民革命的各方面经验及其在革命中所达到的种种结果，热烈歌颂群众的革命创造，拥护群众自己所创造的政治权力，指出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将被农民革命葬入坟墓，而一切政党都将在革命的农民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布尔塞维主义和陈独秀所代表的孟塞维主义处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由农民革命这一个突出的问题表现出来的公开的与完全的分裂，而正是后者的投降主义使革命不能够击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把大革命引到失败的路上。

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即大家平常所称的国民党反动与十年内战时期，或土地革命时期）的著作，本选集编入十四篇，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派背信弃义，勾结帝国主义加以血洗之后，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要如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从新建立革命的阵地，准备新的大革命及其胜利。这是一个极复杂的环境与极严重的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一小部分在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变成了取消派，并与托洛茨基派相结合，堕落为反革命。但是，毛泽东同志则把革命失败时所必需的有阵地的退却与可能的有阵地的新进攻相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向反革命力量较弱的农村进军。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个历史的文件里面，毛泽东同志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作了英明的分析：“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而“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得到了结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之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

同志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和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革命方针，并确定了革命区域的扩大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井冈山的斗争》是关于建设人民解放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篇极重要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著作中，叙述了当时的一般政治形势和具体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生动地描写了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退却如何在农村变成革命的新进攻，解决了当时革命斗争中所发现的各种具体的问题，批评了有些同志在实际政策上所犯的过左的错误。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在建设我们党和建设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曾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里面，根据中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家的特点，批评党内所反映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偏向，并提出纠正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同时也从而解决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进一步地说明了关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民众革命政权的问题，把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作为新的大革命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当时中国一系列的矛盾，来说明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中国老话，时常被毛泽东同志用以说明和估量新生的力量，新生的事物。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两篇著作所答复的关于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名著上所回忆过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提出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是由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独立的经验加以解决了。两次“左”倾机会主义拒绝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因而使革命吃了不少苦头。

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经验，解决了在分析农村阶级问题上发生的许多争论，纠正了在土地改革中的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

《我们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以及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同时进行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已被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初步地刻画出来。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强烈地提出了一切革命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观点，对于人民力量的能够压倒一切，作了科学的分析和热情的论述。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这篇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和当时党内有的同志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毫无阶级分析的提法和态度，完全区别出来。毛泽东同志杰出地分析了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变化，指出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中国红军长征所造成的新局面，给关门主义的幼稚病和悲观主义以驳斥，同时提出了强大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心力量之必要，以避免一九二七年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革命的主力军而只倚仗当时同盟者国民党的错误。这篇著作对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及其大政方针，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规定。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一部关于十年内战经验以及对当时错误路线的大争论的总结，同时又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准备。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经济的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极端复杂的战争问题，说明了革命与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驳斥了那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为着准备进攻所必须的退却(当时毛泽东同志叫做“诱敌深入”)的“左”倾机会主义，认为那种错误乃是很大的愚蠢的错误。这本著作事实上不只是一本关于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而且是一本关于政治策略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是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可能性初步变成现实性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这样提出关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之后，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中，就成为毛泽东同志和新的投降主义思想作斗争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这部著作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同志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争论的哲学性质，根据唯物论的原理，揭露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在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不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而且以党在长时期中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充实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

风云人物

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阿旺晋美(1911——　　),藏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1936年以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西藏地方政府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西藏地方政府嘎伦、昌都总管。1951年为西藏地方政府来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2年后,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副主任。1965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届、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材料　阿沛·阿旺晋美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在一百多年来,由于我们最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骗、挑拨,满清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我们民族的离间、分裂,使我们长期处在贫困和落后的境地。尤其是近几年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散布了许多对共产党污蔑造谣和骇人听闻的反动宣传,使我们对中央人民政府也存在着疑惑的心理。这一次,我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响应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来到北京参加光荣的有历史性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在昌都、甘孜、康定、重庆、西安、及广州、武汉,一路上受到各地首长的热烈欢迎与关怀,我们更亲眼目睹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区域自治的事实与初步成绩。这些事更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过去历代的反动政府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我们衷心地热烈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正确方针。

在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更衷心地感谢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对我们的关切指导,特别是以李维汉主任委员为首的中央代表们对我们诚恳耐心的解释,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帝国主义侵略者是我们祖国的更是我们藏族人民的最大敌人。也使我们认识到:藏族内部必须清除过去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政府制造的分裂。由于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召,藏族内部自前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以来的长期不和睦,也得到公平的解决了。今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之下,与全国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才能驱逐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巩固我们祖国的西南国防,也才能建设好我们繁荣富强的祖国大家庭。现在,我们很光荣地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藏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回到我们自己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祖国大家庭里来!

我们此次回去,一定要坚决执行我们全权代表所亲手签定的这个协议,同时我们要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我们祖国的西藏!

最后我们要高呼:我们的祖国,我们各民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郝建秀

郝建秀(1935——　　)山东青岛人。1949年在青岛国棉六厂当纺织工人,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1953年当选为纺织工业全国劳动模范、团中央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在中国人大速成中学学习,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1962年后,历任青岛国棉六厂技术员、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总工会主任、市妇联主任、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省妇女联合会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她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5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材料　郝建秀与"细纱工作法"

1951年,郝建秀在青岛国棉六厂当细纱值车女工时,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细纱工作法。这一工作法的具体成绩,表现在她创造了七个月平均出皮辊花率百分之零点二五的新纪录。

郝建秀工作法,就是一切工作环绕着减少断头和缩短断头时间进行。其主要特点是:巡回有规律,善于计划自己的工作时间,把各项工作适当的分配在每一次巡回

中,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做清洁工作上,因此,能够少断头和少出皮辊花。

郝建秀工作法的价值在于:少出了皮辊花,就等于多纺了纱。当时各厂平均皮辊花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若使每个细纱工人学会郝建秀工作法,那么生产效率即将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提高百分之一点二五。根据青岛推广的成绩,估计青岛国棉各厂全年可增产纱三千八百八十一件。如果这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增产数字就更可观了。郝建秀工作法不仅仅表现在提高产量上,而且质量亦在显著的提高。如由于少出了皮辊花,在混棉成份中就减少了皮辊花的数量;又如机器经常保持清洁,操作方法合理,有利于棉纱品质的提高。特别重要的是,郝建秀工作法的主要特点,是善于计划自己的工作时间,合理的组织劳动力,这个科学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此,每一个生产部门都可以学习,只要把这一基本精神与自己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为了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地纺织工业的领导机关,立即协同工会组织职工学习这一工作方法,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并取得较好成绩。天津棉纺二厂吴乃达小组,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创造了筒子机擦车流水工作法。该组擦一台筒子机所用的时间由十九个工时减少到五个工时。一年之内可多打筒子纱二百五十三件,节省人工费二万八千多斤粮食。在郝建秀工作法推广以后,天津、青岛、东北、上海等地的织布模范们,积极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钻研技术,进一步改进自己的操作方法,技术人员、工会干部也积极总结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经验,进行观察测定,和织布模范们共同分析、研究,集中织布模范们操作上的优点,总结出了先进的织布工作法——1951年织布工作法。

郝建秀工作法的创造,表现了工人阶级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性,表现了工人阶级对国家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它的推广,大大促进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向前发展。

珍闻轶事

毛泽东处理人际关系一事例

1951年春,毛主席在石家庄"休养"期间,除了选编和修订《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信函和电文。3月31日他亲笔写的两封《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读来耐人寻味,可谓我们共产党人正确、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范例。

彭友胜,是湖南衡东人,辛亥革命中,曾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任副目(即副班长),当时毛泽东在他那一个班当列兵。后来两人在广州又见过一面。可以说,彭友胜是毛泽东的老"顶头上司"、老同乡、老朋友了。建国后,彭友胜在家乡可能有困难,便写信给毛泽东叙旧,信写得很客气,其本意,明显是托毛泽东介绍安排工作。

毛泽东接到此信后,甚为高兴,也非常重视。虽然党和国家主席与一个退役小卒,地位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毛泽东对当年共过事的这位故人,充满了故旧的情谊。他没有假手秘书答复这一芥豆般小事,更没有像陈胜等农民领袖那样对当年穷哥们拒之于门外,置之不理,而是在百忙之中,亲笔写了两封长达千言的书信,为他介绍。当时毛泽东虽说自称"休养",实际上对党和国家的大事日理万机,从抗美援朝的战略战役部署,镇反政策的制定执行,到经济建设的宏图大业,他都在运筹帷幄。他在石休息三个月,亲拟的文电,单是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就有106篇。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过细地处理彭友胜的工作问题,反映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以及他重情谊的性格特征。

毛泽东的两封信是分别写给彭友胜本人和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劝彭友胜安心在农村工作和生活,说你被划为贫农成份,如果是群众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乡下能过得去,以待下乡或暂住乡下为好,因为到外面怕难找到适宜的工作。这里,毛泽东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支使,完全是朋友间的循循善诱,入情入理。

第二、在写给湖南省政府负责人的信上,毛泽东如实证明了彭友胜参加辛亥革命的身份,恳切地说明:"据我过去的印象,〔彭友胜〕是个老实人"。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真负责地说明,对彭友胜后来的历史和目前的情况并不清楚。这实际上是一份"证明材料",写得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伟人与普通人打证明,反映了毛泽东伟大而质朴的品质。

第三、向湖南省政府依据政策提出具体建议,请他们对彭友胜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可"照辛亥革命人员例",给以照顾,如给些钱安置,如介绍工作。毛泽东这里的建议,是"援例",即照政策,而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要求特殊开后门。同时,毛泽东再三声明,由于对彭后来的历史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请湖南"酌定"。这里,毛泽东的组织观念可见一斑。

第四、在坚持以上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也给彭友胜提供了方便，让拿他的信去找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昱龄。但声明，“不一定能有结果”。

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浓厚的人情味；既不违背政策和原则，又在办理渠道上提供帮助；既解决故人的困难，又不使他期望过高，更不给打保票；既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又不强加于下级。在这里，原则性、灵活性、政策性、做到了有机的完美的结合，实在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

今天，我们许多领导人，也面临亲友托情办事、请批条子等问题，简单拒绝并非良策，无原则迁就又绝对不允许，到底如何对待这类事，读一读毛泽东的这两封信，是会受到启发而有助益的。

(赵联增)

乔冠华秋吟三八线

1951年的金秋，我国外交官李克农、乔冠华与美国李奇微、乔埃，在朝鲜板门店进行举世瞩目的“停战谈判”。天气渐冷，寒衣未到，我方谈判代表团人员急切盼望。乔冠华挥笔给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首代函的“催衣诗”。谨录之如下：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注：美代表团乔埃等乘直升飞机前来赴会)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注：当时全国人口估计数字)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这首古今少见的“催衣诗”，虽为正史不载，但确有纪念意义，值得一读。

(李贻训)

彭德怀朝鲜战场遇险记

1950年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商讨抗美援朝大计。林彪振振有词，坚持不出兵。其实，他是有私心，怕影响他“常胜将军”的英名。彭总思前想后，同意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认为应该出兵抗美援朝，并且授命挂帅出征。有一句话道：文献策，武效命。他从受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祖国舍身效命的准备。

当时毛主席考虑到彭老总的安全，准备把志愿军指挥部设在鸭绿江北岸。

毛主席先是引而不发，问：“德怀同志呀，你对你的指挥所设立是怎么考虑的？”

彭总刚刚受命，未及多思，说：“我还没有很好考虑。”

毛主席说：“这样，中央考虑，为了你和指挥所的安全，为了免遭敌机轰炸，指挥所应设在鸭绿江北岸一隐蔽处。”

彭总双眉耸起，断然说：“那不行呀，主席。我的指挥所不能设在鸭绿江北岸。部队打到哪里，我就应当到哪里。为了指挥方便，我向来习惯靠前指挥。”

“你靠前指挥，中央考虑不安全么。你的统帅部，万一被敌人一下子炸掉呢？”

“设在北岸，影响不好。总而言之，主席，叫我彭德怀去，我就不能在北岸设指挥所。”

最后，毛主席还是没有“倔”过这位老总，同意了他的意见。

彭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并不是不知道战争这架机器每时每刻都在大口大口地吞噬掉难以计数的生命。往安东起飞的前一天，他让秘书向学校给在北京的侄儿、侄女请了假，他要抽空见见他们。他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有许多话，又不能明讲，只是把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每个孩子送了一件，他作了最坏的准备。

1950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志愿军从安东——辑安线渡鸭绿江，进入朝北作战。此日傍晚，细雨蒙蒙，风裹着雨丝直扑人面，鸭绿江上笼罩着灰色的水雾。江水泛着土黄色，吐着白沫，不停地奔腾着。彭总双手抱拳，对送行的军政领导说：“同志们，再见！”然后，他的吉普车冲上了鸭绿江大桥。26万大军，他带着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身先士卒首批入朝，进入朝北战场。当时，美军及其同盟军已疯狂地长驱直入到达朝北山区一带。彭总在新义州与朝鲜外长朴宪永会面后，在敌情不明的朝北山区奔波了两天两夜，到达北镇西北的小山沟大洞，与金日成会面。这时，大洞已成为敌后，敌人的大炮声清晰可闻。敌人一部分已经进到大洞东北的桧木洞了。中路敌人由熙川到了楚山。西路敌人由龟城到了大馆洞、新安州。两位统帅处境十分危险。彭总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时说：“当时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谈的大洞东北方面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幸免被俘。”

美军根据电台信号密集能很快判断出志愿军司令部的位置。志司曾经多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来电：“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请你

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但是彭总就是不躲飞机。其他领导同志让他到防空洞，他质问：“来朝鲜是来躲飞机的吗？”问得大家无言以对。1950年11月24日清晨，天刚刚亮，志愿军党委根据昨天敌机活动情况，决定志司机关干部全部上山，只有彭总不上。洪学智叫他，他说：“哪个要你多管闲事！”洪不说三四，且拉且拽，又有别人帮忙，总算把他挟持上山。刚刚上山，只见敌机直飞志司，对准彭总房子和作战室扔下凝固汽油弹。他站在洞外，亲眼看到美机把他的房子夷为平地。

彭总在朝鲜战场上，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全，有时候，哪里危险，他偏到哪里去。二次战役三十八军打了一个漂亮仗。他考虑我军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大胆迂回，包抄分割，靠的就是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未出国前，讲这些作战原则，还比较抽象。现在好了，有了成功的战例。所以，准备在三十八军开现场会，总结经验教训，鼓舞全军士气。当时，志司到三十八军驻地还有200多公里呢！沿途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下有流窜之敌和敌人埋下的地雷，路途很危险。彭总说：“邓华和洪学智在家，我到三十八军去。”邓、洪听了，这怎么行？很不安全呀？彭总问：“我不安全，你们去就安全了？”洪学智说：“老总与我们不同呀！关系重大呀！老总是统帅，不能去冒这个险。我代表你去吧。”彭总说：“我用你代表？”邓、洪坚持彭总不能去，要去的话，得请示中央。这样，彭总才算改变了主意。

四次战役后，志司从金化转移到了上甘岭西北百余公里的空司洞。管理处同志在彭总住房的门口，给他挖了一个小防空洞，直对着他的房子。一旦敌机来轰炸，彭总可以很快地进入那个洞子。洪学智发现这个洞子是直筒子，敌机直接就可以扫射到洞子里去。他连夜叫工兵连把洞子加深，并在洞口用沙袋堆了隐蔽墙。第二天，彭总进到洞子后，敌机像是知道内情一样，超低空飞来，对着彭总的房子和洞口劈劈啪啪猛扫一阵，房子被打坏，沙袋上打了70多个子弹眼儿。事后，大家都说好险呀！那时，美机飞行员技术很高，能从很远的距离对准洞口的小亮点平直扫射。

五次战役后，彭总在回北京面陈关于朝鲜作战见解时，觉得有必要就树立持久作战思想，同金日成同志交换意见。当时，敌机不停地对我后方封锁轰炸，企图瘫痪我后方。2月天气，大同江冰封雪盖，彭总乘吉普车乘着天黑从大同江的冰层上开过去了。第二天，彭总和金日城同志会面并取得一致的意见。

黄昏时刻，天色朦胧，彭总一行与金日成告别，走向回程。不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同江上厚厚的冰层被美机炸开了，大小不等的冰块在汹涌的江水上漂动。这怎么办？说不定，美机马上就转回来了。大同江上没有桥梁，更没有摆渡。中国军队的统帅也犯愁了。秘书杨凤安更是感到十分惶恐。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从上游漂过一块大冰块。彭总一看，说：“把车开上去！”司机一踩油门，吉普车居然开到冰块上了。这块大冰像无指挥系统的军舰似的在冰冷的江水上顺流漂动。彭总和杨凤安希望它能靠上对岸，可是眼看着靠上去了，又漂走了。这样，让彭总高兴了几次，又失望了几次。天无绝人之路。忽然，这块大冰以巨大的速度向对岸撞去。彭总像指挥作战似的，让司机赶快发动汽车，并且大马力向岸边冲去，果然成功了！杨凤安事后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彭总回到志司，立即向解方参谋长交待，志司要向前移动，要靠近第一线各军，以便与各军能直接通电话，直接掌握战场的情况。

他就是这样的一员战将。

（王波）

流行风

背景介绍

一九五一年，思想文化领域内最有影响的大事莫过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电影《武训传》是孙瑜于一九四四年酝酿，于一九四八年开始拍摄，于一九五〇年底完成的。它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片。影片上映以后，受到不少人的热烈欢迎，并对武训作了一些无原则的赞扬。鉴于影片的内容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道路问题，毛泽东特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他指出这部影片所宣扬的“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主义者投降。”他号召展开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于是，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讨论电影《武训传》的热潮，电影《武训传》一时成为人们关心和讨论的焦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看本书“热点寻踪”部分的详细介绍。

一九五一年的文坛又有几部颇有份量的著作问世。一九五一年十月，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出版（第二集于一九五三年出版，一九六二年，作者改定第三集，并与前两集合编，由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

小说以滹沱河沿岸的两个村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陈登科的中篇小说《活人塘》以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敌后斗争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基础，描写了薛陆氏一家救护解放军战士的事迹。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描写了解放战争中陕北人民保粮支前、英勇斗争的故事。此外有影响的小说还有萧也牧的《锻炼》等。另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歌剧《白毛女》于一九五一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著名诗人艾青，于一九五一年出访莫斯科时又写下了几首著名的诗篇，其中有《我们来到了莫斯科》和《苏联人民和我们在一起》等。其它有影响的诗还有田间的《雷之歌》和胡风的《睡了的村庄这样说》等。

五十年代初期，魏巍、巴金等作家亲赴朝鲜战场，通过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篇篇动人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它们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读者群，在全国人民中激起巨大反响。

一九五一年的话剧创作也获得了丰收。杜印的《在新事物的面前》是一部反映我国工业生活的作品，而老舍的《龙须沟》运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比龙须沟岸上的居民在新旧社会不同的生活命运，热情赞颂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周扬同志曾高度评价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

一九五一年的流行歌曲，继续保持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革命风格。本书选入《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人民的领袖万万岁》、《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中苏儿童友谊之歌》、《我们是春天的鲜花》等几首。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作者丁玲，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胡泰的胶皮大车被顾涌赶过了桑干河，暖水屯就传开了许多风声，人们说："共产党又来帮穷人闹翻身，该有钱的人倒霉了！"穷苦农民早就盼望这一天。可是现在，区里派来土改工作组(由文采、老董、杨亮和胡立功组成)，运动进行十多天了，群众仍未充分发动起来，恶霸地主钱文贵依然逍遥法外，坐在家里摇着羽毛扇子。

钱文贵浑名赛诸葛，极其阴险、狡猾、毒辣。他过去同保长们称兄道弟，日本人来了他又当汉奸。村里该谁做甲长，该谁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他势力很大，就像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解放后，许多人还都慑服于他，村上几次斗争别的地主，却没碰他一根毛。他看世界变了，就让儿子加入八路军，家里挂上了"抗属"的名。土改开始了，他暗中活动，指使白银儿、任国忠宣传迷信造谣言。他让当了村治安员的女婿张正典从内部破坏，把村干部的注意力引向绝望胆小的地主李子俊，怂恿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富裕中农顾涌，妄图把水搅混。他以侄女黑妮为钓饵，向农会主任程仁施美人计，妄想捆住程仁的手脚。他搞假分家，把五十亩地分散给儿子，宣扬自己是个"不穷不富"的中农。村里人背地里都骂他是"八大尖"里的"第一尖"，可在明里处谁也不敢得罪他。

开完会，下弦月已经升到中天，而村干部们谁也不想回家睡觉，又都聚集在合作社里争论着。支部委员李昌问："咱们这次该斗争谁？"正是这个关键问题，在工作组和村干部中有分歧。工作组长文采以夸夸其谈自得，不深入群众搞调查。思想胡涂的人认为李子俊地多，该斗他。程仁因与黑妮的关系，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支部书记张裕民心里有数，他看到时机不成熟就暂时没说话。内奸张正典更趁势加紧捣乱。一时间众说纷纭，人心不齐。群众看到地主们的旗杆未倒，心里顾虑重重。因此，土改以后的第一次斗争——向逃亡地主李子俊的老婆要红契，被这婆娘的眼泪哭软了，斗争无声无息地败下阵来。

张裕民毕竟是沉着老练、富有经验的老党员，他琢磨：老百姓盼望得到土地却不敢出头，是因为看到干部心不齐。眼前第一招是要串联团结干部，特别是两个占重要位置的程仁和老村长赵得禄。张裕民见工作组的杨亮肯动脑、有见解又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就和他在果园里倾心长谈。而后又向文采反复汇报说明。接着就和杨亮分别找干部们串联。民兵队长张正国、支部宣委李昌、合作社主任任天华、妇联主任董桂花，这些人都行动起来了。经过耐心说服争取，程仁也终于放下了思想包袱，赵得禄不但提高了觉悟而且及时提出了关于果子的问题。原来财主们都在抢时间往外卖果子，贫农们说，如果等着慢慢分土地，那果子的利就丢完了。农会总结了要红契失败的教训，决定抓住这时机在果子上打个有把握的胜仗，来鼓舞士气。于是把全屯十一家地主的园子看管起来，由农会统一摘卖，得钱统一分配。这下，果树园闹腾起来了，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原来害怕的、观望的也都动起手来，顾虑逐渐消除了。农会和工作组借着果园里的好兆头，又发动九家佃户向地主江世荣算剥削账，索取红契。积极分子郭富贵带领佃户们硬把这个当过多年甲长的家伙说倒了，一百二十七亩地的红契拿回来了！这件事振奋了全村的穷人，许多人纷纷要求算剥削账，要求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他们说，"以前咱总以为咱欠地主的，如今才明白，欠账的、还账的应该颠倒过来。"大家以苦引苦，控诉地主罪行，话题自然就说到钱文贵头上了。王新田说："咱十四岁时，钱文贵就要送咱去涿鹿城当伪军，后来咱卖了房

子，典了六石粮食才算了事，今天定要斗倒这个地主尖。”农民主动起来向地主清算，公开点出钱文贵，这在暖水屯是从未有过的事，说明有了觉悟的萌芽，但还不足以表明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可是文采同志却非常欣赏这小胜利，甚至说现在要防止过火，比如他就不同意分地主的浮财。张裕民、杨亮根据贫农的意见，提出重点打击钱文贵，胡立功完全赞成，而文采却极力搜集顾涌的材料。在土改斗争正走上高潮时，领导班子内部的分歧也愈明显了。

就像下场及时雨，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来到暖水屯。早在抗日时期，章品是第一个来到这村子的八路军，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就是张裕民。章品和暖水屯的穷百姓在生死斗争中血肉相联，他了解这里的干部和群众。他前两天接到县委书记的信并附有暖水屯的汇报，知道那里由区上派了一个缺少经验的知识分子去工作，半个月了还没开展斗争，心里就有了底。章品一来到村上，就走到老百姓家去了解核实情况，和村干部、工作组一起检查错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接着决定以支持刘满诉苦和罢掉张正典治安员为突破口，放手发动群众、把主攻目标对准钱文贵，这样，决战的战幕拉开了。

张裕民往台中一站，李昌高喊着：“打倒恶霸！”“打倒封建地主！”斗争钱文贵的农民大会开始了！整个暖水屯的人都拥在这里，人们喊着，尽力往前伸着拳头。只听“哗”的一声，民兵们一齐扳动了一下枪栓，会场气氛更紧张了。钱文贵眯着蛇一样的小豆眼，被按在台上。忽见人群中跳上一条大汉对着钱文贵骂道：“你这个害人的鬼、谋财害命不见血的贼、你把咱村子上糟践的不成……。”当那大汉反过身来，人们认得他是农会主任程仁，他挣脱了那无形的精神绳索，完全解放了。人们情绪激昂地呼口号：“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农民团结起来！”、“跟着毛主席走到头！”世世代代受屈辱的农民骤然间发现，这个世界彻底变了，他们感觉到有千斤的力量支撑着自己的腰杆，使他们直立起来了。

做了多少年牛马的贫苦农民终于第一次获得了土地。中秋佳节那天，全村欢庆土地还家，张灯结彩，整队游行，并欢送一百名青壮年组成支前队伍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保卫我们的土地！”“打倒反动派！”“拥护八路军！”呼声震荡在桑干河两岸，人们看着支前的队伍朝怀来那边渐渐地远去了。

小说《暴风骤雨》

作者周立波，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一个清晨，在东北松江省，由哈尔滨往东南的一条公路上，老孙头赶着一架四马拉的大车，坐着土改工作队萧队长一行人，正朝着元茂屯飞奔。

工作队的来到，使元茂屯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主韩老六（韩凤岐）采用拉拢、威吓手段，使一些受苦人不敢揭发他的罪恶，但工作队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深入群众做艰苦发动工作，终于找到受苦最深的农民觉悟分子赵玉林，揭发了韩老六许多罪行。屯里的老田头与韩老六有深仇大恨，女儿被韩老六活活逼死，老伴的双眼也被气瞎。但是，在群众真正的发动之前，老田头是不敢站出来控诉韩老六的。赵玉林只带领少数积极分子把韩老六抓来审问，结果失败了，并没有把韩老六斗倒。工作队也认真总结了急躁冒进的教训，继而又进一步深入调查，准备对韩老六打一场真正的硬仗。

郭全海、白玉山是继赵玉林之后工作队新发现的两个农民骨干。小郭的爹被韩凤岐气病被抬到雪地里活活冻死了。白玉山为了和韩凤岐打官司，县衙门庇护韩老六，白玉山被关进大狱，而且三岁的小儿子也被韩老六打死。郭全海和白玉山在赵玉林的带动下，组成了元茂屯农会的核心，在萧祥队长不断帮助和教育之下，觉悟日渐提高。尽管地主憎恨他们，散布谣言陷害，但也挡不住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坚强决心。之后，经过萧队长和农会委员们一番精心准备，第二次斗争韩老六的大会召开了，老田头的血泪控诉激起群愤，但是狗腿子李振江的“苦肉计”又破坏了会场气氛，斗争韩老六的事就暂时停下来了。斗争会虽然暂搁下来，但地主的活动并未停止，韩老六加紧疏散财产，同时收买农会成员，制造农民内部分歧，以图破坏土改。

工作队萧队长贯彻上级精神，抓紧分地，赵玉林等带头分地，打消了观望的农户对国民党所谓“反攻”的顾虑。元茂屯土改正进行时，韩老六发现小猪官吴家富参加农会活动，就伙同李青山对小猪官下毒手。韩家大院残害小猪官的消息传出之后，全村群众愤怒冲进韩家大院，救出小猪官，找到韩凤岐，报仇地火焰燃烧起来了。全屯一千多群众，发自内心的控诉，剥下了韩老六吃人的狼皮。由于他罪大恶极，民主政府支持群众的要求，把他枪毙了。

整倒了恶霸地主韩老六，元茂屯大解放，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斗倒了地主，农民们开始分胜利果实——地主的浮财。农会主任赵玉林，副主任郭全海和委员白玉山都表现出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模范作用，但女人总归是女人，老白家和赵玉林的女人对男人的行动都曾表示过不满或不解，不过，后来都想通了。赵玉林对女人说得好：“能对付穿上，不露肉就行。‘满洲国’光腚，也能过呀”，“别着忙，老百姓都有了，咱们就会有的。”斗倒了韩老六，逃到大青山当土匪的韩老七企图扑灭新生的农村政权，率领匪徒攻打元茂屯。赵玉林一马当先，组织了胜利的反击，严惩了匪帮。但是在这场反击战中赵玉林也英勇牺牲了。

萧队长在元茂屯斗争地主初步取得胜利的时候离开了屯子回到县城。第二年，萧队长带领一个由本县各区乡培养起来的青年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再次回到元茂屯时，元茂屯的农会主任已经不是郭全海，而是地主狗腿子张富英和国民党潜伏特务李桂荣，他们把持元茂屯农会，对初步翻了身的农民施行着"伪满洲国"变相的统治，农民敢怒而不敢言。萧队长来到，依靠过去的老积极分子，找回郭全海，再一次掀起对杜善人，唐爪子等大地主的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向地主进行了反反把、挖浮财、搜枪支等政治和经济的清算。在斗争中，严肃打击了幻想变天的地主唐爪子和杜善人，团结了观望动摇的中农刘德山，教育了王老太太、李毛驴等落后分子，提高了刘桂兰、白大嫂子等妇女干部的觉悟和能力。元茂屯农会在年轻的主任郭全海领导下更团结、更坚强了。在斗争胜利时刻，乘胜追击，郭全海、白玉山又到外县把韩老六的兄弟——日本和国民党特务韩老五抓获归案，根据韩老五的供词，农民自卫队在元茂屯终于挖出埋藏很深的卧底胡子李桂荣，元茂屯在萧队长领导下了取得反霸、反特的彻底胜利。元茂屯农民欢天喜地分到了第二次斗争果实，每家都分得了可心的牲口和土地。一九四八年，元茂屯的翻身农民过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兴的春节，不少家吃了半拉月的猪肉饺子。

元茂屯斗地主是胜利了，但是当时大部分中国还没有解放，人民和蒋介石匪帮的斗争仍在继续，政府和党号召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去彻底打垮蒋介石。元茂屯农会主任郭全海与积极分子刘桂兰刚刚结婚不久，小两口婚后生活正过得红火，但是为了带领全村青年掀起参军热潮，郭全海毅然报名参军，刘桂兰虽然流了不少眼泪，但她终究还是支持了丈夫的行动。由于郭全海的带头，王老太太也把刚刚结婚的大儿子送到队伍上。就这样，元茂屯的人们在欢腾的音乐声中送走了一百三十多名青年投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

小说《风云初记》

长篇小说。作者孙犁。小说写于五十年代初，是作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共三集。第一集195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集1953年也由该社出版；1962年作者改定第三集，并与前两集合编，由作家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小说选取滹沱河沿岸的子午镇和五龙堂两个村庄做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围绕高(高庆山、高翔)、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沉浮变迁，细致地描摹了冀中平原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生活形态和思想动向，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的壮丽画卷。1937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从保定、北平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日趋高涨。滹沱河北子午镇一户姓吴的人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秋分，小女儿叫春儿。秋分已出嫁到河南岸的五龙堂。十年前，这里曾有一次农民暴动，秋分的丈夫高庆山是一个领袖，暴动很快失败了，庆山出去，十年没有音讯。春儿与在子午镇上的地主田大瞎子家当小做活的小伙子芒种相爱，春儿帮芒种缝缝补补，芒种也抽空给她担水，做做重力气活。很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到了滹沱河两岸。夜晚，逃难的人们，有家难归，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惧，焦急和无依的痛苦，长久不能安眠。这时参加了红军，经历了长征的锻炼的庆山和当时暴动时的伙伴，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经过了北平十年铁窗生活的高翔都回到了家乡，担当起在滹沱河沿岸建立抗日武装和政权的重任。他们着手建立武装队伍，并改编了高疤率领的杂牌队伍。高疤以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贼，以门窗不动能盗走大骡子出名。芒种在春儿的支持下也参加了抗日武装。春儿协助学生出身的女干部李佩钟组织了妇女救国会。李佩钟是田大瞎子的儿媳，但她冲破了双重封建家庭的束缚，带着爱情和婚姻的痛苦担当起一县之长的重任。她们组织青年妇女为保家卫国的战士做军鞋，田大瞎子拒绝交军鞋，被李佩钟秉公持法惩罚了。不久，李仙钟的丈夫田耀武带领国民党中央军也到了这里，和人民自卫军的代表高翔、高庆山进行谈判。田耀武的浮词滥调背后掩藏着利用抗日进行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勾当，那就是挑起内战和磨擦，牵制共产党。为此，他拉拢高疤，不惜向日本人卖国求荣，企图使抗日成为泡影。李佩钟毅然同他离婚。一种要求战斗的情绪在春儿周身的血液里流转着，她不仅纺纱做鞋，还练习打枪，在全县妇女自卫战的检阅中获了第一名。此时的芒种已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春儿也向往着成为一名党员。芒种在战斗中负了伤，在春儿家养伤。一天春儿在门外拾到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高疤的老婆俗儿乘机造谣，诬蔑春儿，春儿机智地辟了谣，打击了敌人。一天晚上，在叛变了的高疤的帮助下，田耀武的军队冒充八路军包围了村子。李佩钟受伤。春儿由于对党的热情和忠诚，出色的工作而加入了共产党。她和芒种还分别参加了抗日学校的民运院和军事院。三个月期满，芒种毕了业回到部队上去了，春儿因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被留在了学院，当下一期学生的小队长。武汉失守，冀中地区的敌情更严重了，学院也被迫转移。春儿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前去慰问新到冀中的由贺龙将军率领的一二〇师。跟着这支队伍，春儿走遍了冀中地区，对家乡深切的情感使春儿更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芒种又上了前线，春儿在后方收公粮。田大瞎子想出坏点子赖租，结果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区政府逮捕。因为他罪行累累，被公审和从严法办。送

公粮的队伍绵延不断，春儿走在其中。隆隆的炮声和爆破声此起彼伏，这是向敌人进攻的洪大声响，是华北抗日战场上全民出动作战的声音。在艺术上，孙犁成功地塑造了春儿等典型形象，写出了冀中地区风土人情、自然风景中所蕴含的诗情画意，给人以清新明快的美感。

小说《活人塘》

中篇小说。作者陈登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初版。收入文艺建设丛书。小说以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敌后斗争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基础，描写了薛陆氏一家救护解放军战士的事迹。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解放军的真挚热爱，表现了"军民一体骨肉相联"的血肉关系。1946年冬，解放军某部在与敌人的激战中，战士刘根生负伤掉队，凶恶的敌人发现了他，并逼迫薛陆氏挖土活埋受了重伤的刘根生。薛陆氏以垂危的亲生女儿七月子换取了被活埋的刘根生，把他抬回家去，看伤治病。刘根生男扮女装，冒名顶替七月子，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新河集的人民群众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坚持了十五个月的斗争，当1948年3月解放军打过来时，刘根生奋不顾身地炸掉敌人的大碉堡，迎来了解放。小说写出了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的压榨下，新河集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作者与书中的主要人物有过生死与共的共同斗争经历，所以现实斗争的真实气氛，可以在作品中给人以较强的感染。小说并未回避斗争的残酷性，也不掩饰主要人物的思想矛盾和变化过程，因此更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小说中的薛陆氏、大凤母女都只是农村的普通妇女，作者并没有脱离她开们的思想基础去拔高人物，而是通过描绘她们一家与还乡团头子孙在涛的血海深仇和与人民军队的共同命运，写出了薛陆氏以亲生女儿换取解放军战士的崇高行动，性格发展得自然。当敌人逼她去挖土活埋刘根生时，"她在挑着泥，心里在念：'观音大士，你在天上撂下一个炸弹，炸死这两个比日本鬼还坏的黄恶鬼，救活解放军的命，我在三官殿门口唱三台大戏，我吃一辈子长斋……'。"这段描写符合人物的现实处境和人物的生活经历，形象朴素而感人。小说的其他人物，像沈金林、朱长青、李成功、小团子等都有较为鲜明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朴实自然的风格。

小说《铜墙铁壁》

长篇小说。作者柳青。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小说描写的是解放战争中，陕北人民保粮支前，英勇斗争的故事。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疯狂进攻。在党中央领导下，边区人民英勇反击。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展开的。沙家店粮店是故事的中心。这个粮店是专为供给进攻榆林部队粮食而设立的。粮店的干部知道，在战斗中"粮食就是胜利，粮食就是战士们的性命"，他们舍生忘死，坚持临时粮站的工作。民工们不顾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不断地用肩和背把粮食运往前线。当敌人快进入沙家店时，他们仍不放弃粮食的拖运工作，宁肯自己冒着性命危险，也不肯把粮食留给敌人。作品主人公、村干部、共产党员石得富，曾是支前模范，获得模范担架队员的光荣称号。回到村里以后，又担负起沙家店粮店的工作。他一度被敌人俘虏，但任凭敌人折磨，也没暴露一点军事秘密。后又从敌人手中逃出来，带着重伤给部队带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主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小说结尾时的出现，是小说一个成功的尝试。它第一次生动地描绘了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间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朴实、真挚的情感。小说脉络清晰、点面结合，颇具特色。作品的全部情节围绕着沙家店粮站的工作展开。石得富这个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小说的又一艺术成就。石得富朴实、热情、勇敢、坚贞，对党赤胆忠心，对工作认真负责，是柳青笔下较成功的农民形象之一。

诗歌《雷之歌》

抒情诗。作者田间。收入作者诗集《汽笛》(作家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这是一首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佳作。它以强烈的感情，鲜明的画面，讴歌了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表达了诗人对帝国主义无比憎恨的思想感情。全诗共六节二十四句。前三节，诗从以凝练的笔触，勾勒了朝鲜战时生活的一个片断，烘托出一派战争的气氛。在风雨雷电中，一个孤零零的孤儿，哀号在母亲的身旁。尽管他的"哭叫""好比雷声一样"，却不能唤醒被炸伤的亲娘；尽管他"抚着母亲的胸膛"，却不能保持母亲身上的余温。这一"叫"一"抚"，刻画真切，凄恻动人。诗的后三节，着重刻画了一个志愿军战士"我"的形象，描绘出一幅壮烈的画面。小兄弟的哭叫，震动了"我"的心。"我眼里含着泪"，"我一手抱着孩子，又一手举起枪"。"我的心像雷响，心上冒着火光，在狂风暴雨中，我奔

向前方！"这里，诗人通过"含"、"抱"、"举"、"冒"、"奔"几个动词的选用，典型生动地把一位泪满眶、恨满腔，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英姿描绘出来。诗作构思精巧，全篇以"我"的活动为主体，以"雷声"为线索，来展开画面的转化和情绪的波澜。诗作句式整齐，一韵到底，一改诗人早期诗歌错落的句式与自由的韵式。而诗风的明快，音节的和谐，与雷声同调，自然天成。"顶针"的形式和重复的诗句，如阵阵雷声，时断时续，震响全篇。景与情、声与调，和谐统一，浑然一体。

诗歌《睡了的村庄这样说》

抒情诗。作者胡风。写于1951年4月。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12期。《长安》1981年第3期重新刊载。这是一首洋溢着对劳动、和平与祖国的真诚热爱的颂诗。乘坐夜间列车的人数难以统计，望见车窗外面间有耀耀灯光的睡了的村庄的人次也不知有多少。然而，具有"心事浩茫连广宇"胸怀的诗人，却由这很少激动旅人们的平凡夜里的平凡村庄，激起了经验过的积淀在内心的人生悲喜情感，写下这首动人的诗篇。作品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以村庄自述的口吻，回顾村庄苦难的过去："我的皮肤在严寒和酷热里面烂过肿过/我的眼睛在羞涩和屈辱里面烧过痛过/我的胃囊在饥饿里面打过抖/我的心房在仇恨里面滴过血"，我度过了多少年"不眠的夜"；叙说村庄幸福的现在："我的倒塌的土墙都砌好了/我的破漏的屋顶都补牢了/我的窗子都糊上了新纸"，我"带着满身的清洁睡了/带着满身的喜悦睡了"；展望村庄黄金色的未来："星星的明亮的眼睛/守卫着我/天空的温柔的手臂/环绕着我/土地的纯洁的胸膛/拥抱着我/祖国守卫着我。"这里，村庄已成了作者的化身，作者借村庄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新中国主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首诗共十二节，一百三十一行。它运用自由诗体的形式，感情诚挚，格调高亢，语言流畅，排比、铺陈、对衬手法的大量融汇，更增添了诗的豪放之气，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我们来到了莫斯科》

一

渡过松花江和安加拉河，
我们从北京来到了莫斯科。

我们的祖国富饶又广阔，
五万万颗心向着莫斯科。

三边沙漠上的牧羊人想念着斯大林，
洞庭湖滨的农民向往着莫斯科。

站在红场上看红星，
红星还比太阳红。

红星闪耀高入云，
红星楼里住着斯大林。

看见红星就想起了您，
毛泽东的人民问候您：

一问您健康再问您安，
祝您长寿万万年！

二

翻过了长白山和乌拉尔山峰，
我们从天安门前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天安门上飞白鸽，
克里姆林宫上有大钟。

斯巴斯卡雅塔上的钟是斯大林的钟，
爱好和平人类的京城是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号召和平，
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同声响应。

斯大林的大钟指针最准确，
正直的人们跟着它走向胜利与和平。

拉普人从北极冰块上看指针，
马来亚人在橡树底下听钟声。
平壤的母亲们紧紧抱着孩子，
淮河的农民们要保卫自己的好光景。

听啊，克里姆林的钟声又响了，
亿万人高喊着：我们不要战争，
我们要和平！

1951年11月8日于莫斯科

（艾青）

诗歌《苏联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苏联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当春雷震动古老的中国大地，
年轻的海燕把第一次风暴掀起，
在温暖的广州湾里，
满载着友谊的巨船开来了，
桅杆上飘扬着耀眼的红旗。
那时候，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
可是，我的老师已经告诉我：
——苏联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当勤劳的农民愤怒地拿起武器，
对准血腥的太阳旗，
战斗在华北平原上的英雄们，
以更英勇的战斗，
遥向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战友们祝贺胜利。
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战士，
在最艰苦的战斗中我鼓励着战友们：
——苏联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当我们在圣洁的土地上肃清了豺狼，
第一面美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升起，
从遥远的克里姆林宫里，
传来了热情的祝贺，
传来了两万万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那时候，千万只火把照红了扬子江，
人们热泪盈眶地高喊着：
——苏联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当无敌的斯大林的保卫和平大军在红场站立，
千万只白色的鸽子从克里姆林宫上飞起，
我们从黄河岸边来到莫斯科，
我们带来了五亿人保卫和平的决心，
也带来了太平洋一样深厚的友谊。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结成兄弟，
当七万万双胜利的巨手交相紧握时，
我们的友谊就是和平事业决定性的胜利！

1951 年 11 月 19 日于莫斯科

（艾青）

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作者魏巍。最初发表于 1951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出版。作者通过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作者满怀深情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先头连抢占了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岗，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以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勇士们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击退。这场激战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后打扫战场时，看到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战斗的姿态，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的，有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个耳朵。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却消灭敌人三百多名，更重要的是他们牵制住了敌军，使我军主力部队能赶上来聚歼敌人。在汉江北岸，作者遇到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战士，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原是炮兵，当他目睹美国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后，就要求去步兵连，想法只有一个：“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得打得解恨！”一天，他从阵地下来，进村时赶上几架敌机空袭。一名朝鲜男子倒在院子里，敌机投下的燃烧弹点燃了房屋，浓烟中传来孩子的哭声。他想起了祖国的人民，于是冲进烈火封门的房间，救出了孩子，再去救孩子的母亲时，她已经不行了。他紧紧抱着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我们的战士住的是防空洞，吃的是炒面和雪，为的是祖国人民“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们的战士对祖国、对朝鲜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得到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戴着它回到祖国去！这就是我们的战士美丽而宽广的情怀，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50 年代初期，魏巍亲赴朝鲜战场，之后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通讯报告。《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发表的第七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信中表示要加紧生产，支援志愿军的英勇战斗。郭沫若认为，好的作品是“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谁是最可爱的人》发掘出了志愿军战士无比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因此，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读者群，在全国人民中激起巨大反响，而“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对志愿军最亲切的称呼，最崇高的赞誉。本文无论是选材、剪裁，还是主题的提炼，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语言的运用，都值得称道。首先，从材料的选择与使用方面来看，作者精心选择了三个内容，这与他在朝鲜战场上耳闻目睹的素材相

比，无疑是九牛一毛。据说作者的初稿共写了二十多个材料，最后忍痛割舍为三个，叙述时又注意了详略的安排，所以，典型、生动的材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其次，从主题的确立与表现上看，文章通过看似平凡的事迹，譬如吃炒面，蹲防空洞，写出了深刻的道理，真实地反映了志愿军战士的内心世界，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再者，在人物的刻画上，作者将典型人物的刻画与英雄群像的描绘相结合，勾勒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从而由战士的个体形象表现着志愿军的共体内涵。成功的人物塑造，使文章的主题得到充分地展示和深化。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根据内容的需要富于变化，时而壮怀激烈，引吭高歌，时而低回委婉，情深意长。对战士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通过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作者也很注意通过语言媒介和读者的情感交流。第二人称代词在文中多次出现，缩短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两者似在亲切地交谈，所以作者对志愿军的深厚感情与崇高敬意，自然而然地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为此，几十年来，本篇一直被视为报告通讯的典范，并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话剧《龙须沟》

作者老舍，主要内容如下：

解放前，初夏的上午，雨后。北京天桥东边有一条有名的臭沟——龙须沟，在沟旁的一个小杂院里，住着四户人家。赵老头孤身一人，他每年总是在这时候发疟疾，不能外出干活。王大妈是个老于世故、胆小怕事的人，以做手工为生，她警告二春，不要学她大姐，嫁出去就永远不回头，并说这里是块宝地，虽然脏，但有活干。赵老头也说，这儿的地好，人也好，只是做官的坏，恶霸坏。拉三轮车的丁四，拉了一天的车，晚上怕掉进臭沟里，在外面坐了半夜。一回来，丁四嫂就给他要买米钱，夫妻之间引起一场冲突。程疯子是个旧艺人，因为不肯低三下四伺候有势力的人，竟遭毒打。恶霸黑旋风的帮凶冯狗子踢了程娘子的烟摊，娘子不示弱，狗子便去打疯子。二春由屋内冲出打狗子，大妈惊慌地拉住二春，四嫂不敢上前。赵老头拿着菜刀从屋内冲出，吓跑了冯狗子。这时远外传来雷声，暴雨下来，巡长跑来大叫一声："妞子掉在沟里啦！"四嫂狂喊："妞子。"跑下。

解放后，小妞子死后一年。赵老头当了治安委员，教训冯狗子要改邪归正。疯子捧着小金鱼缸，到妞子坟上大哭一场，他还要求赵老头斗斗那个最厉害的恶霸——龙须沟。四嫂也要求赵老头去劝丁四。黑旋风被捕了，冯狗子来给疯子赔礼，疯子看了他的手说："啊，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春天，"量地的"来了，赵老头说是修沟的，王大妈不相信，说是来"跑马占地"的。二春高兴地扭起秧歌来了，疯子决定到民教馆去唱"修龙须沟"。夏天，修沟的队伍来了，修了厕所，安了自来水，大妈又抱怨二春到处乱跑。丁四听了赵老头的话，也改业当工人，起誓去挖沟。在修沟过程中，遇到暴雨，挖新沟的土又堵住了旧沟，水漫进了院子，政府及时组织干部群众抢险，挖沟排水，大家都非常感激。夏末，新沟落成了，还修了马路。小杂院变得十分整洁，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丁四当了工人，二嘎子进了工厂，程疯子有了管自来水的职业，在举行新沟竣工庆祝大会的一天，人人心情振奋，处处喜气洋洋。丁四穿了身新衣，唱着"解放区的天"跑了，王大妈也换了身新衣服，赵老头把这件事总结为"五福临门"，大家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大会，程疯子还为大会编了"数来宝"："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齐努力，多工作，国泰民安享太平。"大家跟着齐声唱道："享太平。"

《龙须沟》是一部出色的革命现实主义剧作。它以饱含激情之笔，勾勒了一幅丰富多采的生活图画。它通过沟的变化、人的变化来歌颂新社会，它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曲热情洋溢的颂歌。

歌剧《白毛女》

贺敬之、丁毅执笔，主要内容如下：

歌剧《白毛女》写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河北省某县杨格村佃农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的故事。喜儿三岁死了娘，与父亲相依为命，风里来雨里去，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邻居王大春的母亲王大婶很同情她，给她以关怀和照顾，使她这无娘的女儿能感受到一些温暖。喜儿十七岁那年，她父亲杨白劳与往年一样，在旧历年关时外出躲账。除夕这天，喜儿在家盼爹回来"欢欢喜喜过个年"；杨白劳以为已躲过年关逼债的日期，怀着侥幸的心情偷偷回家，并且给喜儿买了二尺红头绳。可是，狠毒、无耻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此时却在打着喜儿的主意。他令狗腿子穆仁智把杨白劳叫来，以还清所欠租粮和借款为由，威逼他把喜儿送进黄家。杨白劳不答应，黄世仁就令穆仁智写下卖身契，强迫杨白劳按了手印。杨白劳回家后，精神恍惚，痛苦万分，但强装笑脸，勉强与赵老汉、王大婶和大春喝酒吃饺子。待夜深喜儿睡着后，他喝下卤水，走出门外，跌倒在雪地死去。

第二天大年初一，正当喜儿抱着父亲尸首失声恸哭时，穆仁智不顾大春、大锁等人的阻拦，率人将喜儿抢走。喜儿成了黄母的丫头，受尽折磨、打骂；佣人张二婶则暗中保护和照顾她。在此期间，大春几次去黄府看望喜儿，都被赶回，而穆仁智则又到大锁等人家拔锅逼债，因而惹

得大春、大锁火起，揪住穆仁智狠揍。黄家打手闻声赶来，大锁被抓，大春外逃西北。不久，黄世仁将喜儿奸污；喜儿怀孕后，黄世仁又另娶妻妾。为了不使喜儿在办喜事这天坏他们的名声，黄世仁母子骗她不要露面，暗地里却商议着卖她。张二婶将真情告诉喜儿后，她大骂黄氏母子，遭黄母毒打后被关押起来。当天晚上，张二婶偷到钥匙，放喜儿从后门逃跑。黄家发现后，急派人追赶。狗腿子们追到河边，拾到喜儿掉落的一只鞋，以为她已跳河自杀，就转回家了。

过了一年多，村里纷传奶奶庙有"白毛仙姑"显灵，都去求签上供。其实，"白毛仙姑"就是喜儿。她出没深山野林，以野果和奶奶庙的供品充饥，为报仇雪恨而顽强生活着。一天，下着大雨，黄世仁与穆仁智从外回家，上奶奶庙避雨，忽然遇见"白毛仙姑"，吓得大叫。当喜儿看清是黄世仁后，抓起供果向黄世仁掷去，吓得黄世仁失魂落魄，抱头鼠窜。不久，大春率八路军打到县城，救出关押在狱中的大锁等人，帮助乡亲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斗地主，闹翻身。但由于黄世仁一伙借"白毛仙姑"散布"八路军，不久长"的谣言，农民一时难以发动起来。于是，大春、大锁遵照区长的指示，潜入奶奶庙，决心揭开"白毛仙姑"之谜。他们与"白毛仙姑"相遇后，喜儿以为是黄家的人来抓她，就扑向大春。大春开枪，喜儿负伤逃跑。大春等追至山洞，得知"白毛仙姑"即是喜儿。喜儿的遭遇激起人们的无比愤怒，人们一致要求为喜儿报仇。于是，区长亲自主持斗争黄世仁的大会，让喜儿等受苦百姓倒出苦水，控诉地主罪恶。最后，区长宣布逮捕黄世仁和穆仁智，准备公审法办；人们欢欣鼓舞，喜庆胜利。

剧本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得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

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招　司词
瞿希贤曲
mf 愉快・热烈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千万人的呼声
地动山摇。斯大林，毛泽东，斯大
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
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歌曲《我们是春天的鲜花》

F 调2/4 我们是春天的鲜花 张季词
活泼・愉快 ——少年儿童庆祝国庆歌—— 瞿希贤曲

礼炮响，国旗升；少年儿童真精神。
白衣衫，红领巾；活泼勇敢向前进。
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我们的心中多么
高兴！抬头望，天安门，毛主席微笑着
检阅我们。千万只小手高举起，向着
毛主席敬礼，敬礼，敬礼！
你的话，我们听；我们要做你的好学生。
时时刻刻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和平！
时时刻刻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和平！

歌曲《人民的领袖万万岁》

bB 调3/4 人民的领袖万万岁 郭沫若编词
每分钟 108 拍 贺绿汀作曲
太阳照在绿草地，草原显得更美丽。
最大的光荣属于谁？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山上的松树青青的哩，河里的流水滚滚的哩，
太阳的光辉暖暖的哩，毛主席的恩情深深的哩。
通红的酒杯斟满酒，我们的双手举过头。斟满酒，举过头；
斟满酒，举过头。万岁万岁万万岁，兄弟民族大团结！
万万岁，万万岁，人民的领袖万万岁！

歌曲《中苏儿童友谊之歌》

中苏儿童友谊之歌
稍快 袁水拍作词
卡巴列夫斯基作曲
中苏儿童手拉手，大家一起跳舞又歌唱。
人民的国家像花园，条条道路都开放。
中苏儿童手拉手，大家一起跳舞又歌唱。
中苏儿童好朋友，我们团结友爱好像兄弟一样！
我们前辈创造它，他们底鲜血换来这无上荣光。
中苏儿童好朋友，我们团结友爱好像兄弟一样！
在莫斯科红场，在北京天安门，中苏儿童向前进。
为了保卫它，建设得更加辉煌，就要准备一切力量。
飞过森林，飞过遥远的边境，歌声合成一个声量。
光荣的红旗在前面领导着我们，我们是保卫和平的后备军。

光荣的红领巾代表共同的理想，我们是未来底主人翁。
望着我们。万岁，我们
亲爱的毛泽东！万岁，我们亲爱的斯大林！

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袁水拍词
瞿希贤曲
朝气蓬勃地
1＝E2/4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
烟囱像森林，钢水在沸腾，新纪录不断地
出现，儿童在欢笑，老人享安康，从前我们受雨淋，
运来了地下的矿藏。多装快跑，快跑多装，把
找窍门要开动脑筋。修好江河，栽好树林，叫
今天我们住新房，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看，
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给农庄。
洪水听候使唤，叫沙漠盖上绿荫。
文化普及全国；看，光明照到边疆。
（副歌）
我们的力量移山倒海，劳动的热情无比高涨。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潮！

歌曲《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

1＝bB2/4
光未然词
李群·张文纲曲
稍快·愉快地
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活天天向上升，
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
我们工人劳动最热情，生产记录日日新；
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年年都是好收成。
我们热爱和平，从不侵略别人；
也不准侵略者破坏人类安宁！我们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心，举着和平的旗帜前进！
勇敢的五万万人民，结成一个大家庭。
从首都通向遥远的疆，到处是建设的歌声。
我们开辟了幸福的道路，一心奔向光辉前程。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领导着我们万里长征。
我们热爱和平，从不侵略别人，也不准侵略者破坏人类安宁！
我们和世界人民团结一心，举着和平的旗帜前进！

历史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为惩治反革命罪犯，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

第三条　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第四条　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其首要分子或率队叛变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参与策动、勾引、收买或叛变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加重处刑。

第五条　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处死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第六条　进行下列间谍或资敌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一）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者；

（二）为敌机、敌舰指示轰击目标者；

（三）为国内外敌人供给武器军火或其他军用物资者。

第七条　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一）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者；

（二）解放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者；

（三）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赎罪表现者；

（四）解放前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解放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五）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六）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第八条　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第九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下列破坏、杀害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一）抢劫、破坏军事设施、工厂、矿场、森林、农场、堤坝、交通、银行、仓库、防险设备或其他重要公私财物者；

（二）投放毒物、散播病菌或以其他方法，引起人、畜或农作物之重大灾害者；

（三）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

（四）袭击或杀、伤公职人员或人民者；

（五）假借军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从事反革命活动者。

第十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惑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者；

（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第十一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五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第十二条　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第十三条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第十四条　凡犯本条例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

（一）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

（二）在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

（三）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

（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

第十五条　凡犯多种罪者，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外，应在总和刑以下，多种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第十六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第十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第十八条　本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第十九条　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但不得挟嫌诬告。

第二十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在军事管制时期内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依照本条例审判之。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之日施行。

（原载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外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是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消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

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李　维　汉（签字盖章）

代表　张　经　武（签字盖章）

张　国　华（签字盖章）

孙　志　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　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　丹　旦　达（签字盖章）

土　登　列　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1951年5月23日于北京

（原载1951年5月27日新闻稿）

195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数量
一、总人口	万人	56300
市镇	万人	6632
乡村	万人	49668
二、社会劳动者	万人	
职工	万人	
城镇个体劳动者	万人	
乡村劳动者	万人	
三、社会总产值	亿元	820
工业	亿元	264
农业	亿元	420
四、国民收入	亿元	497
工业	亿元	84
农业	亿元	316
五、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	万吨	14369
棉花	万吨	103.1
油料	万吨	362.0
糖料	万吨	498.9
黄红麻	万吨	25.0
烤烟	万吨	24.2
茶叶	万吨	7.9
蚕茧	万吨	7.4
水果	万吨	156.4
大牲畜年末头数	万头	7041
猪牛羊肉	万吨	
水产品	万吨	133
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亿米	30.6
糖	万吨	30
自行车	万辆	4.4
缝纫机	万架	
手表	万只	
原煤	亿吨	0.53
原油	万吨	31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57
钢	万吨	90
水泥	万吨	249
木材	万立方米	764
七、运输邮电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631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269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1.49
八、国内商业		
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2.社会消费品零售量		
粮食	万吨	
食用植物油	万吨	
肉猪	万头	
鲜蛋	万吨	
水产品	万吨	
食糖	万吨	
各种布	亿米	
自行车	万辆	
缝纫机	万架	
手表	万只	
3.农产品社会收购总额	亿元	
4.主要农产品社会收购量		
粮食	万吨	
棉花	万吨	
食用植物油	万吨	
肉猪	万头	
鲜蛋	万吨	
水产品	万吨	
九、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9.6
出口额	亿美元	7.6
进口额	亿美元	12.0
十、财政		
国家财政收入	亿元	133.1
国家财政支出	亿元	122.5
十一、物价指数(以上年为100)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	112.2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	119.6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	112.5
十二、教育文化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所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5.3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38.7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156.8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4315.4
十三、卫生		
卫生机构病床数	万张	15.9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60.6
其中:医生	万人	39.7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社论。指出：1951年的中心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使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没有可能来破坏我们的伟大革命事业和伟大的建设事业。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的主要弱点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使它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经常性的工作，并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给以有系统的领导和管理。

2月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指示》规定：凡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有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的股份和财产，应予依法没收时，必须报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审核后转请中央人民政务院批准，方可执行。属于前条以外的一般土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和财产，经县(市)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时，应由省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者，可不经报请批准手续。

2月5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规定》。

2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布《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通报》提出：要确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土改完成后要立即转入生产及教育两大工作。要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工厂内以完成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作服务的观点。关于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张以重工业为中心。组织一个领导小组，负责五年计划的编制，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邵文。

2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共分21条，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推动了运动广泛深入地发展。本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5月10日至16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一些地区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因此，这次会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社论指出，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颁布，可以防止工作中的一切右的或"左"的倾向，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我国人民的利益，并为今后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

3月7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布《妇女代表大会组织通则》及贯彻执行该《通则》的通知。

3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市最近破获美国间谍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在天津的潜伏组织，捕获中外籍间谍罪犯21名。

3月底～5月中旬　由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所属文工团等共575人，分赴朝鲜前线和后方，慰问中、朝军队和人民。4月21日晋见金日成将军。

4月12～22日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制订了1951年的工作任务和解决监察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监委主任谭平山在讲话中指出：监察工作应围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生产建设等中心任务有重点的进行，纠正工作中各种不良倾向，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会议对监察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上下级关系以及分工等问题也作了规定。

4月15日　云南省专政机关处决1946年刺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及制造"一二·一"血案的一批特务凶手。

4月21日～5月8日　政务院召开的全国秘书长会议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各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同时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保守国家机密、进一步加强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处理群众来信和接见群众等建议案多起。

4月24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关于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

4月29日　美国武装间谍乌斯满匪首和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的凶手李英奇等，在新疆迪化伏法。

4月30日　政务院发布命令，征用英国在我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石油公司。

5月2日　中央治淮视察团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由代团长邵力子率领，前往淮河流域视察。

5月6日　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举行东北人民控诉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暴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报告前线英勇战斗大会。

5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指出：对美国的企业财产处理的原则是：凡有关我国主权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可予征用；关系较小，或性质上未便征用者，可予代管；政府认为有需要者，可予征购；对一般企业，可加强管制，促其自行清理结束。在上述方式中，应以征用及加强管理为主。

5月16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对《武训传》的歌颂，说明我们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要求开展讨论，彻底澄清混乱的思想。社论发表后，一场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在全国展开。由《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活动过的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事隔32年之后，1985年9月，胡乔木指出：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坚决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协议还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要求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在此之前，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了20多天的谈判，圆满地达成了上述协议。

5月28日　新华社报道：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

5月30日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致电达赖喇嘛。

5月31日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指示：省、行署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

5月下旬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和执行爱国公约的指示》。中央指示各地应大力推广，将此运动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应在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中起带头和模范作用。

6月1日　政务院第87次会议通过《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各级人民政府保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并于8日公布。

同日　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7日，抗美援朝总会又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

6月17～27日　国家侨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廖承志副主任委员作《侨委成立以来的工作总结与当前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与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和有关华侨土地改革、救济归国难侨、举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加强侨务机构等各项规定。

6月22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7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淮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于7月初完工，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这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

7月16日　全国铁路代表在汉口江岸公审“二·七”惨案的主要凶犯赵继贤，该犯即在当年林祥谦烈士遇害的地方伏法。

7月20日　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共计完成蓄洪、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约19500万立方，石漫滩山谷水库一座，板桥、白沙两处山谷水库的一部分，润河集蓄洪分水闸一座，其他大小涵闸62处，谷坊155座。

8月2日　公安部发布《关于管理往来港、澳旅客的规定》、《华侨出入国境暂行办法》。

8月5日　公安部公布《无线电器材管理暂行条例》、《城市旅栈业暂行管理规则》、《公共娱乐场所暂行管理规则》和《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8月8日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抵达拉萨。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西藏人民和爱国力量沿途支持下，胜利抵达拉萨。

8月13日　政务院发出通告，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8月17日　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对充当美国政府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我国的7名罪犯进行判决。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修（日本人）企图在1950年

10月1日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害我国领导人，上述两犯被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8月18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关系的决定》、《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职权补充规定》和《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细则》。

9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性质、任务、组织制度、审判工作制度、以及与检察署的工作关系。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了人民检察机关的任务、职权范围和组织机构及领导问题。它们的基本任务都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与一切危害人民革命、危害人民合法权益的反动行为及违法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以上《条例》、《通则》4日公布施行。

9月4日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收回前上海法租界未移交的公产14处。

9月5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

9月6日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保护国家机密的决议》、《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及省、市协商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公布。

9月14日　政务院第102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合同、议定书等的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国外交官及领事官优待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国外交官及领事官的行李物品进出国境征免验放优待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国外交官及领事官豁免税费暂行办法》。

9月18日　宋庆龄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典礼在北京举行。宋庆龄决定将奖金10万卢布全部献出作发展我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之用。

9月21日　政务院发布命令，自1951年10月1日起在新疆发行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并准在全国流通。

9月29日　周恩来向首都高等学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9月下旬，北京、天津20所高等学校教师300余人展开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

10月2～12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工作的任务首先是在广大劳动妇女中推广妇婴卫生和育儿常识。配合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大力普及推行新法接生，宣传育儿知识，减少妇女生育的疾苦；降低婴儿死亡率。

10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出《关于检查司法干部思想作风及对干涉婚姻自由杀害妇女的犯罪行为展开群众性司法斗争的指示》。

10月12日　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10月15日　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普遍开展郝建秀工作方法的指示》。郝建秀是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的工人，她创造了一套省时省力、产量高、质量好的科学的细纱工作法。纺织工业部认为，这是中国纺织生产工作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使今后生产竞赛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青年团中央决定，给纺织工业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创造者——模范青年团员、山东青岛纺织女工郝建秀授予奖状。

10月23日～11月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支持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要求的决议》。按照会议的决议，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应着重进行三项中心工作，即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毛泽东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

10月24日　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0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朝鲜政府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纪念日前夕，举行隆重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并分别授予志愿军17位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以勋章和奖章。

10月下旬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11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反贪污反浪费，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害现象。同时，中央在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1月5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暂行条例》。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

中央要求各地必须用足够的力量，发动与依靠工人群众，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在1952年底以前，对所有企业，首先对国营企业内部的残存反革命势力进行清理，并对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中央认为，开展这一运动的关键在于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分清敌我，区别对待。对有压迫工人的行为或其他轻微劣迹的技术工人、技术人员、高级职员和专家等，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应加以保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他们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对过去勾结反动势力欺压工人的职员和工人应与反革命分子加以区别，按罪恶轻重，劣迹多少，过错大小，悔改好坏，分别对待，不可笼统地“打倒一切”。

1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治淮第二年的巨大工程，现已部分动工，主要兴建河南省颍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

11月20～26日　青年团第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到会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11月26日　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同日　离开西藏28年的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计晋美等200多人返抵拉萨。

12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2月7日　政务院114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并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

12月21日　政务院第116次会议通过《国外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统一运用公营铅印印刷厂生产力的指示》、《关于建立全国报纸书刊发行网的决定》，批准《管理书刊出版业发行暂行条例》(1952年8月16日公布)、《期刊登记暂行办法》(1952年8月16日公布)。

同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授给话剧《龙须沟》的作者舒舍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12月26日　抗美援朝总会发起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到今日止已实缴捐款47.28亿多元，折合战斗机3152架，超过原来认捐数19%。27日总会发出《关于结束武器捐献工作的通知》。

经　济

1月4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以及现存的棉纱、棉布，均停止在市场上出售，由国营棉花纱布公司统一收购。各地政府必须负责管理好纱布市场，取缔投机囤积，并协助国营花纱布公司做好分配销售工作。

1月5日　政务院第66次会议通过《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规定：公股公产进行清理时，由中财委按照企业的性质、规模的大小分别指定主管机关负责。凡属全国性或特殊重要性企业，由中财委直接指定主管机关负责清理；仅属地方性质的企业，则委托大区或省(市)财委指定主管机关负责清理。对公私合营企业，各主管机关不直接管理，而由所派的公股代表、董事和监察人行使管理权。《办法》还规定了清理改组程序和清理期限。

1月7～10日　黄河水利委员会首次委员会议，讨论和决定1951年治黄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在下游继续加强堤防、巩固埽坝，大力组织防汛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保证黄河在超过1949年最高洪水位时，不发生溃决。在中、上游大力筹建水库，加强测验、查勘工作。继续进行引黄(河)灌溉济卫(河)工程，规划宁绥灌溉事业，并着手制订治黄的全面规划，以期逐步达到变害河为利河的总目标。

1月14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美国企业及个人存款申请动支的规定》。

1月15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会议提出：在尽可能扩大内销、争取国内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要扩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按照彼此需要，酌量改组生产，以适应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需要。据此，会议起草并修订了《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同日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总结1950年的工作，确定1951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方针是：巩固金融稳定，全面地开展国家银行工作。具体任务是：逐步地实行货币管理，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货币，推进货币下乡，开展私人业务(主要指银行通过开展储蓄、保险、存放款、汇兑等业务，加强同广大群众和私营企业的经济联系，最大限度地集中一切私人资金)，扶助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月17日　东北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竞赛条件。这个小组在1950年中，改进了15种工具，创造了25项新纪录，提前完成了任务，质量达到标准的99%。提出的竞赛条件主要是：团结技术人员，搞好师徒关系，遵守劳动纪律，注意生产安全，加强技术和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改进操作方法，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任务。

1月21日　贸易部、全国合作总社发布《关于对合作社社员实行配售的联合决定》。

1月25日　中财委发布《私盐查缉处理暂行办法》。

1月27日　中财委颁发1951年基本建设控制数字，并发出《关于做好1951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指示》。中财委认为：制定一个有政策有方针有可能实现的计划，必须由上而下地颁发控制数字与由下而上地编制计划相结合；基本建设必须先有设计后施工，必须先设有计文件与施工计划，才能施工；基本建设与生产管理要严格分开。中财委要求各部与管理局均应有专管基本建设的机构。

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公路的通车里程已达10万余公里，超过解放时5倍以上。

同日　财政部发布《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的办法》。

2月1日　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3月1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也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布告。两个布告宣布：土地租赁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布告对稳定农村形势，保证春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2月2日　政务院通过《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决定》。要求在1950年的基础上，全国粮食增加7.1%，棉花增加36.9%，麻增加69.1%，烤烟增加324.8%，茶叶增加35.1%，家蚕茧增加14.9%，柞蚕茧增加56.8%，油料增加9.7%，粮料增加29.1%，水产品增加20.8%。造林220万亩，育树苗5.6万亩，封山育林800万亩。提高农业产量的措施，关键是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和防止水旱灾害。水利建设计划投资21.2亿斤小米，主要治理淮河水系及永定、潮白、大清河，以减轻这些地区严重的洪水威胁。

同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

2月12日～3月6日　中财委召开全国工业会议。主要讨论：①1951年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计划，及与此相联系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基本建设管理问题；②中央与地方工业的划分，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级工业部门的分工、组织机构的干部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4月6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1951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要求在1950年基础上，国营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增长铁29%，钢材32%，化肥122%，煤10.8%，发电量21%。工业基本建设投资5.85亿元。投资比重是，重工业52.2%，燃料工业19.9%，纺织工业16.2%，轻工业6.2%，资源调查勘探3.1%。

2月14～26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李书城部长说，去年我国农业生产扭转了抗战以来的下降趋势。会议确定继续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决定。

2月14～24日　全国林业会议讨论并拟定了有关护林、"封山育林"、造林及森林合理采伐与合理利用问题的条例草案。

2月19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朱德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着重讲了编制五年计划问题。他说：中国工业要走上计划经济轨道。中央已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五年计划。现在编制一年(即1951年)计划，必须联系三年(恢复时期)计划，三年计划又要与五年计划相衔接，他还详细阐述了我国实行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2月26日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征收规费暂行办法》。

同日　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从3月1日起，重点试行，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2月27日　东北人民政府提出，1951年东北地区改进计划工作的几点要求是：加强计划的全面观点；加强经济发展观点；搞好规划与掌握好季度与月度计划；严格执行计划、定期检查计划并根据计划与有关部门订立合同，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今年计划工作的中心问题是，从发展的观点中来解决物资平衡、现金平衡、运输配合等问题，以便使整个经济更加活跃与发展。

3月1日　全国总工会发布《劳动保险委员会组织通则》。

3月4日　中国土产公司总公司在天津召开经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土产经营以扩大内销为主，大力依靠合作社，组织私商，积极推销各种土产。在全国范围内，以经营麻、烟叶、豆饼、肥田粉为主；各省市根据当地人民需要和自身经营能力，因地制宜地经营各种土产。

3月6日　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

3月7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关于执行劳动保险条例、缴纳劳动保险金的通知》。

同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保证棉粮比价的指示》，除要求各级政府大力进行组织动员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各种困难，改良种子及栽培方法外，决定适当提高棉价。

3月13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收费的决定》。

同日　铁道部决定自4月1日起先在全国铁路331个主要车站间举办负责运输业务。

3月17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麻粮比价、解决收购与粮肥供应问题的规定》。①麻粮比价，华东区黄麻每担生麻换大米8斗，河北、平原、山东、河南四省中等精洗洋麻每斤换小米3.5斤。②收购及粮食肥料供应，由纺织部门保证比价，积极收购。对产麻集中地区，贸易部门应及时供应粮食肥料。

3月20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的命令》，自4月1日起执行。收兑比价：人民币1元兑换9.5元。(注：本书1955

年 3 月 1 日前使用的人民币元，均为新币）。

3 月中旬　中央财政部召开全国城市财政会议，草拟了《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政务院 31 日公布实行。《决定》指出，今后城市地方财政平衡收支的原则是：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必要支出，反对铺张浪费。

3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土产会议加强推销土产的指示》。指出：有计划地召开土产会议，组织城乡、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打开国内市场，活跃城乡经济，是解决各地农村日益恢复和发展的农副土特产销售问题的关键。中央认为，农副土特产依销售情况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畅销货或行销货，如粮食、棉花、烟叶等；一类是滞销货。土产会议的任务是积极打开滞销货的销路。

3 月 23 日　政务院第 77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4 月 18 日公布，5 月 1 日起实施。《海关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关基本任务是，对进出口国境的货物、货币负责执行全面的实际的监管，以保证对外贸易许可制度的有效实施和进出口外汇全部由国家金融管理机关所掌握；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所公布的税则征收关税；同走私作斗争。

3 月 29 日　政务院公布《1951 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将财政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来管理。

3 月 30 日　中财委公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

4 月 1 日　财政部公布《棉纱统销税征收办法》及《棉纱棉布存货补税办法》。

4 月 4 日　陈云谈 1951 年财经工作要点。他说今年国家财经工作概算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经济工作要点：①城乡交流。②农业增产。③学会经济核算，学会管理经济，学会建设的知识和本领。④要解决一下管理的因地制宜。⑤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要计算我们的财力、人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和国防、人民生活的需要。⑥整顿财经队伍。

4 月 6 日　政务院通过了《关于 1951 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

4 月 16 日　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厂、矿企业原有劳动保险事业处理办法的规定》。

4 月 25 日　在全国合作会议上，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邵文作《如何做经济计划》的报告。他说：计划经济包括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劳动力配备和干部培养计划、成本价格计划、原材料消耗计划和财务计划。从我国现有的情况看，计划经济需要达到以下五种平衡：物的平衡，即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或城乡的平衡；进出口平衡；货币的平衡，包括财政收支的平衡、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平衡以及季节的平衡；劳动力与干部的平衡，即人的平衡。

4 月 26 日　政务院公布《妨碍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

5 月 4 日　政务院第 83 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24 日公布施行。决定：①把一部分国营企业、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管理。②分散在各地的由中央财经部门管理的企业单位，其一切政治工作均归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这些企业在执行上级交付的任务上，必须受地方当局的监督、指导和协助。

同日　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5 月 10 日发布，16 日起实施。

5 月 5 日　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5 月 10 日发布，16 日起实施。

5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区建立合作社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目前在新区除了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推销土产外，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来推销土产，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组社的原则是：以集镇为基点建立基层社；以推销土产为主要任务，股金由需要推销土产者交纳；盈余分配，股金分红可占盈余的 40%－50%，公积金占 50%－60%；土产品在本地推销，基层社可自办，但远地推销要靠省县合作社和国营贸易；对土产品特别是滞销的土产品，应多作代销、赊销、定销，少作现销；推销土产时，应优先卖给国家和合作社。

5 月 24 日　政务院公布《进出口飞机、机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进出口列车车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

5 月 25 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 1951 年民工整修公路的暂行规定》。

5 月 28 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作了如下紧急部署：①贸易方面，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小成多；坚持易货制度，力争在交换中不落空；加强缉私工作，防止猪鬃、矿砂等重要物资走私出口；结汇出口范围暂时不变。②金融方面，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暂停开新购买证，已开出的购买证，应分别情况，采取不同办法，保证资金安全；对港贸易，要改变过去开新购买证方式，具体办法由银行另行通知。

5 月　中财委计划局试编出 1951 年国民经济计划要点。提出：1951 年经济建设的方针是：①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前提下，进行恢复与调整及必要的重点新建。其重点是铁道、水利与重工业。②提高工

业设备的利用率，增加工业生产，并注意调整公私比重。③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提高经济作物(如棉、烤烟、麻)的生产。④大力组织城乡交流与内外交流，推销土产，并供给人民主要的工业日用品，及进口必要的工业原料。⑤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必要的准备工作。1951年计划主要指标是：国营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总值为31.7亿元，比1950年增长23%。主要产品产量：发电量38.8亿度，煤2925万吨，生铁116万吨，钢材59.9万吨，水泥147万吨，棉布2375万匹，纸7.8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长22%、11%、36%、46%、93%、1%、7%；棉纱107万吨，为1950年的93%。农业计划生产原粮2642亿斤、棉花2017万担、役畜5634万头，分别较1950年增长8.36%、48.3%、4.7%。交通运输计划，铁路、航运、国营汽车货运量分别为1亿吨、328万吨、174万吨，比1950年预计增长1%、86%、8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4.8亿元，其中用于重工业的占17.5%，水利16.5%，铁道25.5%。工业投资的分布重点仍为东北。

6月1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经济部门做好工作，说服并引导农民交售棉花，以保证纱布的生产。

6月3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指出：全国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应一律重行清理登记，并按1951年6月底的人民币价格，重行估价。国营企业应自有的流动资金，根据1951年国家所给予的生产任务，核定正常周转定额和周转率。国营企业应保有的固定资产，由各级核资委员会逐级审查核定。

6月6～26日　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①工作重点应放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独立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上面。②生产合作社应努力做到统一产品规格，统一原料标准，统一供销服务，统一计算盈亏，统一计件工资标准，按社员劳动多少进行分配。会议草拟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交各地试行。

6月21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195 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税制。老解放区，采用比例税制；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沿用1950年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实行累进税制，新解放区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实行缓进的累进税制。

6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7月1日起实行铁路、轮船、飞机三种旅客强制保险。

7月2日　农业合作银行在北京成立。该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属专业银行之一，主要办理全国农业、渔业、畜牧业、国营农场及合作社的国家投资拨款与长期贷款工作。

7月4日　中共中央批准李立三同志《关于各地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这次工资调整可分三类：进行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工资总额基本不动的原则下，在内部进行较合理的调整；根据技术定额测定法，审查工作定额，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报告》还指出，实行八级工资制，首先必须改善企业管理制度。其次，必须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7月5日　财政部发布《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

7月7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编制1952年国民经济计划程序的通知》。具体要求是：先由中央财经各部及大区财委提出对1952年控制数字的意见及计划草案，再由中财委综合平衡，提交政务院批准颁布。

同日　公安部公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7月20日　政务院第94次会议通过《预算决算暂行条例》，8月20日公布实施。《条例》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编造、审核预算的程序、范围和职权。

7月26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今后全国物价调整办法的指示》。决定采取如下措施：①尽一切努力，保障9月底以前全国纱厂每周开工4天4夜，10月份每周开工6天6夜。②在8、9、10三个月内，应适当紧缩银行投放，尽可能减少财政开支，以抽紧银根，减少市场冲击力量。③在各级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把财政、银行、贸易、合作社和机关生产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应付市场，并加强市场特别是纱布市场的行政管理。④从8月1日起，调整全国物价。

7月31日　中财委颁布《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价暂行办法》和《国营企业资产核定暂行办法》。

8月9～22日　轻工业部召开首届全国轻工业会议。根据积极发展供、销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会议确定轻工业的任务是保证军需供应，根据民需进行适当的扩充，降低成本，加速资金积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会议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做好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同时奖励推广代用品。会议对1952年主要产品的生产进行了安排。关于轻工业今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会议认为，全国应以造纸工业、制糖工业、橡胶工业为重点。而地方可根据当地资源、市场需要、技术条件等，着重发展原材料工业、农副土特产加工工业、文教用品及日用品工业。

8月10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改进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工作的指示》。指出：①认真进行设计，严禁盲目施工。②迅速编制1950年度基本建设工作的总结报告，将各建设单位的投资数、工作总量、开始使用的生产能力与固定资产，以及年终储存的材料与现金等分别列出上报。③正确掌握1951年计划的工作总量。④检查1951年计划的执行情况。⑤及时地正确地调整年度计划。

8月17～30日　第一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

定资金会议在北京召开。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目的，在于建立国营企业经济核算制的经营管理。会议讨论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方针、任务、条例和办法。订出了若干价格标准，拟定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使用的暂编统一会计科目等。

9月1日　财政部公布《临时商业税稽征办法》。

9月1～17日　海关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海关查私工作会议，讨论了查私工作的方针政策，通过了《海关人员使用武器规则》。

9月3～15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通过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

9月9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并于12月15日颁布试行。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决议草案规定，农民互助合作的主要形式有三种：①简单的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②常年的互助组。③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草案还指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应执行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正确的方法是：典型示范，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推广；坚持自愿与互利的原则。

9月11～25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951年上半年农业工作经验，拟定了1952年农业生产计划。

9月15日　中财委拟定了《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办法》，包括基本建设、生产计划、劳动计划、物资供应计划、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计划等编制方法，使经济计划的基础性工作有了初步进展。

9月19日　财政部分布《摊贩业税稽征办法》。

9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汽车制配厂职工自制汽车成功。

同日　关内铁路第一个妇女包乘组——济南铁路管理局浦口机务段女学习司机李实、于飞，在国庆日升为正式司机，于国庆日开始出乘。

10月9日　劳动部发布《关于搬运危险性物品的几项办法》。

10月29日　财政部公布《合作社交纳工商业税暂行办法》。

11月1～21日　全国织布工作法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总结出全国统一的先进织布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这是以青岛纺织女工郝建秀工作法为基础，集中了青岛、上海、天津和东北等地区织布的先进经验和理论知识，经过20多天的表演、观察、测定、分析和讨论总结出来的。

1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绥化机务段“1124”机车包乘组，从1948年1月到现在共安全运行30万公里，创造了全东北安全运行的最高纪录。

11月29日　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推行1951年织布工作法的指示》。

11月下旬　中财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对钢、铁、煤、电、棉纱、棉布、纸张、麻等29种主要工业产品1952年生产控制数字进行了安排。其中，钢106.6万吨，比1951年预计增长29%；铁152.4万吨，增长31.1%；煤5896万吨，增长31%；电71.4亿度，增长26.5%；棉纱333.4万件，增长31%；棉布4743万匹，增长37%；纸张37.23万吨，增长1倍；麻袋6278万条，增长84%。上述主要工业品产值中，公营产值为44.6亿元，占总产值的60%；私营产值为29.7亿元，约占40%。195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控制数字为20.5亿元，比1951年的17.6亿元，增加16%。

12月1日　天兰铁路天水到甘谷段通车。

12月24～31日　全国财政会议讨论1952年财经工作方针和财政概算。提出：1952年工作方针是：深入“三反”，增产节约，改进工作，迎接建设。工作重点是：不放松财政，并逐步转向经济，即转向工业、农业和贸易；财政工作在不放松收入的前提下，逐渐转向支出。财经工作部门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①开展“三反”运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②建立和健全中央、大区和省（市）三级财政制度，贯彻财政纪律。③确定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建设。④大力收购粮食，做好粮食统筹调度工作。会上中央计划局报告了对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计划5年投资2000亿斤（小米）。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50%，平均每年递增20%。全部工业中，公营占70%到80%。农业1957年比1952年增长10%，平均每年递增7%。几种主要产品产量为：钢500万吨、石油480—500万吨，煤1.1亿吨，汽车4.5万辆，造船24.5万吨，拖拉机1.1万台，机床1万部，木材2000万立方米，纸80万吨。5年建设铁路9000公里。新增工人200万人左右。

12月28日　中财委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展开核定资金工作的指示》。

同日　新华社报道：华东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结束。

1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已订出1952年全国合作社系统增产节约50.7亿元的计划。

12月　中财委颁发了1952年国营贸易数字。计划进货额79.7亿元，销货额122.3亿元。国营贸易的资金周转要求达到3次，即每4个月周转1次，较1951年减少31天。各项经营费用平均较1951年低18%至20%。

军　事

1月4日　中朝军队光复朝鲜首都汉城。全国各地群众欢庆胜利。

1月25日～4月21日　美国侵略军对朝中部队发动全线进攻，朝中部队积极防御作战，这就是有名的第4次战役。战役中，朝中部队歼敌78000余人，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

2月17日　美军残杀朝鲜人民和我志愿军被俘人员。

3月14日　在给予敌军沉重打击后，中朝人民部队主动撤出汉城。

4月22日～6月10日　中朝军队对敌发动第5次战役，歼敌82000余人。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

7月1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答复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会议，建议7月10～15日在朝鲜的开城地区会晤。4日，金、彭又答复李奇微，同意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停战会议，8日先举行预备会议。14日，金、彭又通知李奇微，同意在双方举行停战会议期间将开城划为中立区。

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举行首次会议。朝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提出三项建议。中首席代表邓华将军指出这是谈判出发点。

7月26日　朝鲜停战谈判第10次会议对会议议程达成协议，开始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9月2日　中央军委发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抗击日军兵力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抗击伪军兵力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主要战绩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兵力逐年增加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我解放区面积、人口统计》。

9月7日　新华社报道：朝中人民军队近10个月(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8月25日)共击落敌机1482架。

9月9日　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开往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先遣部队进抵拉萨。由张国华、谭冠三两将军率领的部队10月26日到达拉萨，并举行了入城式。12月20日两支部队在拉萨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

10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年综合战绩(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10月10日)：共消灭敌军38.7万余人，其中美军17.6万名；共击落击伤敌机2300架，缴获10架。

10月26日　张国华、谭冠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抵达拉萨，举行入城式。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于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达成了正式协议。

11月27日　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议，通过了小组委员会对于第二项议程的协议。我方代表就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提出了原则建议。

外　交

1月17日　周恩来外长就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意见，电复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主席阿彼拉兹。

2月2日　周恩来外长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我国政府干涉、侵略朝鲜的决议发表声明。

2月26日　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以下决议：《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德国问题的决议》、《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在朝鲜的“侵略者”的不公正的决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等。

4月18日　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为永灏轮被香港英国政府无理劫夺事件发表声明，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5月21日　我国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国和民主朝鲜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发表谈话。指出，这是联合国大会继非法通过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后，又一破坏联合国宪章的非法行动。

8月5～19日　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我国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瞿希贤作曲、招司作词)获作曲二等奖，舞蹈获一等奖。

8月15日　周恩来外长就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发表声明指出：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接受的草案，而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

8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在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定本》中，暴露了美国阴谋侵犯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主权的野心。

9月18日　周恩来外长就美国及其仆从国家排斥中国、单独签订旧金山和约事发表声明：中国政府认为它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11月1～7日　郭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会议通过了《告联合国与世界人民书》等11项重要决议。

11月18日　周恩来外长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苏联政府向第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四项和平建议。

文化教育

1月1日　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提出《有关戏改政策的三个问题》。①中国戏曲应改造成多种艺术形式的“百花齐放”，应以最大剧种为主要改革对象。②戏曲改进工作究竟应该着重表现现代生活还是历史生活，应该就各剧种的本身形式来决定。③以京剧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可以作为今天改进京剧的一个方面提出。

1月7日　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

1月16日　国家文委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实施办法》。

1月20日　卫生部正式接收美国津贴的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同年2月通过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医疗机构实施办法》。

2月12日　教育部接收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

3月19～31日　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学暂行规程》、《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关于积极扶持与改进私立中等学校的决定》和《关于省、市、县公立中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4月3日　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梅兰芳任院长。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周恩来的题词：“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

4月4日　卫生部公布《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关于调整医药卫生事　中公私关系的决定》、《关于医药界的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

同日　卫生部、教育部联合公布《关于发展卫生教育和培养各级卫生工作人员的决定》。

4月12日　福建省文教委员会接办美国津贴的协和大学及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并将两校合并为福州大学。

4月20日　政务院第81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省、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机构的规定》。

5月5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①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②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式进行修改。③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④戏曲艺人应在政治上、文化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⑤旧戏班社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⑥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导。

6月24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规定》。

6月29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1951年暑假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规定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筹分配，主要在地区间进行调剂。调剂的原则是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及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业务上的需要，适当照顾个别毕业人数过少的地区。

7月20～26日　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修改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通过了全国学联执委会选举法。

7月24日　政务院公布《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

8月6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8月10日　政务院第97次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0月1日公布实施。

8月27日～9月12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讨论了发展和建设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今后全国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应该采取稳定、巩固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的方针。会议对小学教师的待遇、小学教育的经费、小学学制改革、中小学教师在职学习，各级师范学校的调整与设置，大量短期培训师资的办法等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决定。

9月20～28日　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民族教育应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10月1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小学修业年限由六年改为五年，实行一贯制，取消初、高两级的分段制；明确规定了各种干部学校、补习学校、训练班和技术学校在整个学校系统中的地位和这些学校的制度。决定要求1952年开始，争取在5年内完成学制改革。

11月5～11日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协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结合增产节约和抗美援朝运动，面向劳动人民展开科学普及工作，争取更多的爱国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参加协会。

11月5～12日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胡乔木在报告中指出：为适应今天国家建设的需要，翻译工作必须加强和扩大，必须提高质量，并制定必要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制度。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2年

导 言

一九五〇年调整工商业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这期间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反动本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狂妄企图。于是，他们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恶手段，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部分留用人员腐败作风的影响下，党内少数人堕落了，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面前败下阵来。

为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大决策，为了不久的将来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行的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又一次大较量。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政治领域另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是八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颁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按照《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几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总结民族工作的经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遵照政务院的决定，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召开了第二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讨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经政务院讨论通过，于八月九日公布施行，使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有了指导方针。

在经济领域，一九五二年全国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十月十四日，美国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向金化东北的上甘岭朝中人民军队的阵地发动猛攻，企图分割志愿军防御体系，在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美军投入六万多兵力，前后共发动九百多次冲击，出动了三千多架飞机和二百辆坦克，但是，志愿军坚守四十三个昼夜，歼敌二万五千人，而阵地屹然未动。在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美国被迫于一九五三年恢复了中断六个月的停战谈判。

一九五二年，为配合在一九五一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调整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经过院系调整，使绝大多数省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使全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趋于合理。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三反"运动
- ●"五反"运动
-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
-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
- ●上甘岭战役
-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

"三反"运动

背景介绍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利用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限制其不利的一面。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和政府内部来。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拉拢腐蚀干部，寻找代理人。另一方面，在革命胜利后，大量带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政府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部分党员被胜利冲昏头脑，党政军内一些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进城以后，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贪污受贿，甚至蜕化变质。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廉明吏治，从1951年底开始，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原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巨大贪污案。刘、张二人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但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为满足一己私欲，不顾党纪国法，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贷款、干部家属救灾粮、地方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贪污盗窃公款1554954万元。

1952年元旦，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9日，政务院召集中央一级、华北一级和京、津两市高级干部，以及各界人士2300余人，举行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大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了《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3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

1952年1、2月份，是"三反"运动中发动群众打"虎"(打击贪污犯)阶段。各级党委亲自动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出现了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高潮。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公布了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地区性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公布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命令，组织了临时法庭进行公审，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各地播放大会实况。公审结果，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北京市举行公审贪污犯大会，将大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判处死刑。全国各地先后召开公审贪污犯大会，集中火力打"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大贪污犯、大贪污集团纷纷落网。

1952年3月，"三反"斗争进入处理阶段。3月11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克服了运动初期，按部门人为地规定、分配打"老虎"任务等过火和虚假现象。制定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贪污人民币1亿元以上者，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据此量刑标准，各地依据事实，进行定案处理。运动中，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占4.5%。

6月份以后，"三反"运动进入建设阶段。15日，中共

中央发出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指示，确定，这一阶段主要是交待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结合"三反"进行整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确定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进行民主制度为中心的制度建设。从各方面肃清"三害"的污毒。

材料：

- 北京市全力围剿大贪污犯
-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关于大贪污犯薛昆山等的判决主文

材料一　北京市全力围剿大贪污犯

由于贯彻了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和全面发动群众的方针，北京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经形成内外夹攻和层层包围的形势，现在正集中全力围剿大贪污犯。

上月中旬，在开始动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即明确指出：要把运动引向胜利，必须坚决贯彻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和全面发动群众的方针。为此，彭真亲自在党内外的干部大会和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随着，各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和各区、段、村以及工商界都召开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层层地、反复地进行动员，普遍引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重视。一个全市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便在这样的基础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运动初期，各机关企业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一般都是在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带头检讨之后，着重地从反贪污斗争开始；工商界就集中全力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的斗争，其他阶层人民检举奸商和干部行贿、受贿等不法行为也逐步展开。在这个阶段中，所有坦白和检举的材料，案情一般都比较小。这时候，在机关工作人员方面主要是经过明辨是非、划清公私界限之后，把群众的注意力逐渐引向较大的贪污犯案件上去；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继续动员消除顾虑，争取坦白交待较多和较大的案件，使运动继续走向深入。

接着，本月四日，各机关企业从天津铁路局北京分局开始，普遍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通过分别处理一批贪污分子的具体事实来进行政策教育，指出彻底坦白才是贪污分子唯一的出路。对不法工商业者，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为了打破他们的侥幸心理，促使他们彻底坦白悔过自新，自本月十三日开始进行重点检查，并将盗骗国家资财八十亿以上拒不坦白的奸商刘元敬等犯逮捕法办，同时发动全市店员进行检举。这样，便把运动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坦白的材料比较以前显著地增加了，在材料中也有交代较大案件的。

紧接着，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对不法工商业者派了十几个检查组进行重点检查，后又派几百个检查组进行大规模检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并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动员上千人组成二百六十多个工作组，直接深入到各公安派出所管界内，采取座谈、访问等方式，发动各阶层群众普遍进行检举。这样，连最隐秘的材料都被揭露出来了。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因为贯彻了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和全面发运群众的方针，进行以上种种的工作，已造成一个内外夹攻、层层包围的有利形势，使得许多大贪污分子孤立起来了。现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正领导全市人民对大贪污分子进行围剿。

（原载1952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关于大贪污犯薛昆山等的判决主文

大贪污犯薛昆山等七个案子，已经本院审理终结，今将对各该大贪污犯的判决主文作如下的宣告：

薛昆山

大贪污犯薛昆山，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混入我国营贸易机关，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犯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机关经济情报，为其私人经营的皮毛商店服务，严重地破坏国营贸易收购工作，大量套取国家资财，并在与公家合营福义和皮毛栈时，挪用与侵夺公款，投机倒把，谋取私利。该犯前后所犯罪行，使国家损失甚巨，现已查明其现有非法所得财产达二十三亿元以上，罪恶至为严重。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宋德贵

大贪污犯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亿元以上，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并拒不坦白，罪恶至为严重。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雷亚卿

大贪污犯雷亚卿，曾任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总务课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达一亿四千七百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达四亿元以上。发觉后，仍不肯彻底坦白。特判处徒刑十五年，追缴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孙建国

大贪污犯孙建国，曾任军委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受

奸商引诱,伙同走私,贪污受贿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并引进奸商打入国家生产机构,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本应严办,姑念孙犯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完全自动彻底坦白,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从轻判处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王丕业

大贪污犯王丕业,曾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并使国家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王犯罪行被发觉后始被迫坦白。姑念其坦白尚较彻底,并能戴罪立功,检举奸商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共达八十亿元以上,特判处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夏茂如

大贪污犯夏茂如,系中南区粮营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一亿二千多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本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即自动坦白悔过,并积极检举其他贪污罪犯多起,在运动中立了功。特免予刑事处分。其贪污受贿之款项除已退交者外,其余赃款应予追缴。并应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杭效祖

大贪污犯杭效祖,系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当起义时贪污发给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另行贪污了钢丝录音机一架。一九五一年整风运动中作了初步坦白,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真诚悔过,并保证将全部赃款交还国家,一年来杭效祖以戴罪立功的心情曾在技术上有所创造和发明。据此特对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另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

(原载1952年2月1日《人民日报》)

"五反"运动

背景介绍

在国家机关开展"三反"的同时,社会上工商界中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五毒"活动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一文。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11亿元(旧人民币),而且,竟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他还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勾引、腐蚀干部,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旧人民币)。运动中,揭露出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还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鲜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的交易中,获得暴利。上海市市长陈毅指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号召全市人民投入"五反"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不法资本家企图破坏"五反"运动的阴谋纷纷破产,"攻守同盟"相继瓦解,大多数坦白交待了"五毒"罪行,极少数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大盗窃犯被揭发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3月份以后,转入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重申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变。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回击;罪大恶极的必须坚决打击;正当经营者必须给予保护。并且规定了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按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程度和性质,将私营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等五种类型。6月1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处理"五毒"行为的总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当严者严之,当宽者宽之,不能虎头蛇尾,草率收场;也不对就"扩大化"问题不加纠正。处理方法是:资本家自报公评,工人店员集体审定,政府批准。三审定案。给前三类户发处理通知书。分类处理的结果,守法户占总户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人民政府团结争取了95%左右的私营工商户,打击面缩小到5%左右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由于建立了"五反"运动统一战线,短短几个月内取得了巨大胜利。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报告,运动至此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牢固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从国家机关内清除了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教育拯救了许多干部,教育了全体共产党员,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毒,澄清吏制,树立了廉洁朴素风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防止执政党

变质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加强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建立了工人群众对私人企业的真正的监督和管理，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材料：

- 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奸商刘元敬、李善长等逮捕法办
- 北京市人民法庭首次开庭对被捕的六十一户完全违法户宣告判决

材料一　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奸商刘元敬、李善长等逮捕法办

北京市奸商刘元敬、李善长等贪图暴利，互相勾结，危害军事建设，盗骗国家财产达八十多亿元，已由市公安局逮捕法办。

刘元敬是一个极端狡猾和卑鄙无耻的不法商人。北京解放后，他伪装积极进步，当上了北京市营造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又是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工商界所选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三年多来，他虽然受到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的耐心帮助和教育，却仍然不肯丢掉自己的欺骗、偷盗等恶习。一九五〇年，他和裕兴、裕德、大功、聚兴永等八家营造厂承包了其他军事建筑工程，总包价为二百八十五亿多元。刘元敬等八家奸商非但不尽自己的职责，来完成国家所委托给他们的这一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反而认为这是他们发财的大好机会，互相勾结牟取暴利，不惜破坏国防建设工程。他们在承包单价上抬高包价，在工程数量上以少报多，在工程质量上则偷工减料，总共盗骗国家资财达八十多亿元之巨。这些不法商人所承包的全部工程不合标准。新修水塔现已倾斜，不少房地已下塌，全部门窗发生裂缝，有十五幢房屋的房顶漏雨，全部电气工程有二分之一跑电，使国家资财蒙受巨大损失。刘犯元敬等为了达到盗骗国家资财的卑鄙目的，曾以巨款向验收人员行贿。对于刘犯元敬等这些极端卑鄙恶劣的犯法行为，参加修建工程的许多职工都很愤慨，曾经用各种方式向人民政府检举告发。

在北京市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后，虽然市人民政府和工商联，一再号召有行贿、偷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工商业者迅速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刘犯元敬却故作镇静，假装积极，抱定不坦白的"决心"。在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刘犯元敬在大会发言中更虚伪地说："营造业行贿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行贿的结果，使国家的基本建设工程受到严重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运动中努力改造我们的营造业。"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贼喊捉贼的欺骗手法而已。刘犯元敬因为是营造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在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随处都表现出一副"积极"的姿态。在工商界节约检查分会的历次会议上，都说他每天召开行业会员的大会小会，并且每天晚上都主持汇报。但是实际上营造业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作得十分不好，自动彻底坦白和检举贪污行贿行为的人尚不到一半。工商联主任委员傅华亭为了争取刘犯元敬坦白，曾经数次找他个别谈话，并要他作典型发言，带头把自己的违法行为交代清楚。而他则故意拖延，坚不坦白。直到十一日为止，他才承认自己曾向干部行贿十多万元，其目的是想借此蒙混过去。其余的几家奸商也同样一再拒不坦白，或者坦白得很不彻底。

尽管刘犯元敬这样极端狡猾和虚伪，充分表现了不法商人的卑鄙恶劣的本质，但是本节约检查委员会早已接到检举他和其余几家奸商的材料。因此在刘犯元敬等一再不肯坦白，不愿改过自新以后，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因为事实俱在，证据确切，即请市人民政府将刘元敬、李善长(大功营造厂经理)、沈景春(裕德营造厂经理)、万选之(裕兴营造厂经理)和焦国荣(聚兴永营造厂经理)五人逮捕，送交人民法院依法惩办。

十二日晚，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刘仁，特邀请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傅华亭等开会，当场宣布市府已逮捕了刘犯元敬等。刘仁主任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刘犯元敬是一个极端狡猾、虚伪的不法商人，虽然人民政府已经一再给了坦白的机会，但他竟敢以身试法，坚决不肯坦白。人民政府将刘犯元敬等逮捕法办，是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他并希望工商联积极不断地向工商界进行动员教育，开展反贪污、反行贿、反偷税和反对盗窃国家资财的运动。除罪大恶极者外，凡真诚悔改者，政府均将从宽处理。傅华亭和凌其峻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关于逮捕刘犯元敬等的决定，并表示要积极在工商界中深入开展反贪污反行贿运动。

(原载1952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北京市人民法庭首次开庭对被捕的六十一户完全违法户宣告判决

北京市人民法庭十一日首次开庭，对被捕的六十一户违法工商户宣告判决。列席旁听的有各区工人店员代表和各行业同业公会代表一百多人，另外还有各区尚未处理的严重违法的工商户五百多人。

这次判决的六十一户违法工商户，都是完全违法产，违法行为都极严重，而且在运动初期多方抗拒抵赖，市人

民政府即依法予以逮捕，但在逮捕后，经过教育，一般都愿意悔过自新，彻底交代自己的违法事实，有的并检举立功，因此得到降一级或降两级而按严重违法户或半守法半违法户从宽处理，免予判刑，宣布释放。例如永安茶庄经理李瑞棠，解放三年来经常地、大量地偷税漏税，情节十分严重，但被逮捕后彻底坦白，因此减轻一级按严重违法户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又如裕丰纸行经理吕均丰，是个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户，但在逮捕后，不但彻底坦白，并且检举了其他违法户的违法事实二十多件，在扣押期中还动员其他大盗窃犯坦白交代了问题，因此不但不判刑，而且减轻两级按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

在宣判中，对违法工商户的行贿问题，也同样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例如豫丰木器行仅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一项即达一亿七千七百万元，但被逮捕后彻底坦白，因此减轻两级按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其行贿部分也只处一倍的罚款。相反的如元利恒铁行经理张元森，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数目虽然只有两千二百七十五万元，但是在逮捕后仍不老实交代，因此仍按完全违法户处理，除补税、退出违法所得，和按行贿数额处以两倍罚款外，并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审判长王斐然宣判完毕，副审判长张鸿舜（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乐松生（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相继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除了说明对违法工商户处理原则外，并分别代表工人店员和工商界对这次正确的判决表示拥护。接着由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程宏毅讲话，他说："五反"运动的目的是清除"五毒"、改造违法工商户，因此违法工商户只要彻底坦白悔改，人民政府就从宽处理，反之就从重处罚。直到现在还没有交待或没有彻底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的不法工商户，应该从今天的宣判中取得教训，迅速地、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取得人民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最后他说：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一切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只要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都有宽广的发展前途。

（原载1952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

背景介绍

荆江，即长江中游从湖北省枝江县至湖南省城陵矶一段，河道弯狭，急流汹涌，江中洲滩鳞比，两岸平原低下，为长江流域水患最烈最多的区域。荆江北岸自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麻布拐之间有一道荆江大堤，全长一百三十三公里，堤高一般在十二米左右，面宽四米，内外坡度为一比三，为长江中游唯一的大堤。但以此十数米高的土堤，抵御四、五万秒立方流量，二米以上的流速，十数米高水位差的洪水，其危险性是不难想像的，所以，每到汛期水位高涨时，常有决堤的危险。

为了确保长江中游航运交通和江汉平原三百万人民，七百万亩良田的安全，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决策和英明领导下，决定进行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早在1950年1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就派人进行勘察和测量等工作。1952年1月，拟定出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在荆江南岸太平口和藕池口以东，荆江右堤以西，藕池口和安乡河西北，面积有九百二十一点三四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建立一个分洪区，分泄荆江洪水。1952年3月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召集湖北、湖南两省负责同志和中南水利、农林、交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一致同意这个计划。

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四次行政会议一致通过并发布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具体决定：一、荆江大堤继续培修加固，保证安全通过洪峰达到1949年的水位。二、荆江南岸蓄洪区堤工及南面节制闸立即动工，于6月底前完成，北面进洪闸争取同时动工，汛期前完成。三、蓄洪区移民事宜由湖北省人民政府负责，于汛前完成。四、1952年不拟分洪，如万一水量过大，需要分洪时，须经政务院周总理批准后方能分洪。分洪工程以军工为主。并决定成立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为秘书长。另成立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具体领导工程工作，以唐天际为总指挥，王树声、林一山、许子威为副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袁振为副总政委。为了使工程能早日动工，中南局于3月15日同时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有关各部门党的负责同志，必须遵照政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全力合作，及时完成。3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也发出通知，要求凡与分洪工程有直接关系的县、区党委在工程进行期间，都应以此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全力以赴。通知指出，已开始的移民工作应继续加强领导，妥善安置，务使移民安居立业进行生产。分洪区内的七个区，约二十四万居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迁移。

1952年4月5日，各工地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发布动员令，号召军工民工及所有参加工程的人员，立即行动起来，战胜一切困难，保证汛期来临以前完成任务。这个号召马上得到各工地工人"坚决克服困难，保证完成任务"的响应。

5月初，中共湖北省委组织一百六十二人的湖北省、武汉市荆江分洪联合慰问团，深入工地进行慰问，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工地视察工作，并颁发了毛主席奖给的四面锦旗。锦旗上有毛主席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荆江分洪工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于1952年6月20日胜利完工。前后仅七十五天，比原计划提前十五天完成。荆江分洪区可蓄积洪水五十五亿立方米，分洪时可降低荆江沙市一带水位一米，减缓水势和流速，增加荆江大堤的抵御力。全部工程的完成，不仅使荆江两岸千百万人民摆脱了水患之害，而且可以减轻洞庭湖的洪水负担，维护长江的交通航道，在分洪区内，因分洪落淤，地方增强，排水系统得到改良，而增垦农田十七万亩。

材料：

· 荆江分洪工程全部完工

材料　荆江分洪工程全部完工

长江中游巨大的荆江大堤加固和荆江分洪工程已于六月二十日全部完工。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顷发表公报，全文如下：

标志着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的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在本月二十日全部竣工。其中，荆江大堤加固工程于六月十四日竣工，太平口进洪工程于十八日竣工，最后黄山头节制闸和分洪区围堤于二十日同时竣工。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我们按计划的完成了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并同时全力以赴，在汛前完成了南岸分洪区围堤和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其中进洪闸长一千零五十四公尺，为我国第一大闸。在完成上述全部工程中，我们共作土方七百八十多万公方，混凝土十多万公方，砌石数万公方，扎钢筋数千吨。与此同时我们还完成了运输器材、工具、粮秣等一亿多吨公里。本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规定以三个月（九十天）完成全部工程，现在我们不仅缩短了时间，七十五天就完成了任务，而且在施工中都超额完成了工程定量。其中如混凝土工程，比原订计划超过百分之六，土方比原计划超过了百分之三点六。加固后的荆江大堤，即使再遇一九四九年一样的洪水，堤顶还高出水面一公尺。进洪闸、节洪闸和围堤构成的分洪区，虽然今年不拟分洪，但如遇荆江洪水过大，荆堤危险，即可能分洪以减轻荆堤的负担。

荆江分洪工程是个规模大、时间短、困难多的水利建设工程，工程从四月五日开工后，先后遇到十一个全雨天、九个半雨天，这样就使施工的时间更加紧迫。工程中复杂的技术问题使我们从设计到施工遇到许多困难。但由于我们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又以革命的精神依靠了群众，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办法，所以终于能克服困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这一巨大的胜利。参加工程的三十万员工，他们是由先进的工人、人民解放军和翻身农民所组成的一支坚强的劳动大军，凭着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劳动热情，接受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打破了一切陈规，完成了工程任务，而且符合好、快和节省的要求。施工中，各种工作效率都很高，上工效率较解放前的功效提高了一倍，混凝土也比解放前为高。而运输效率的提前，更对工程提前完成起了很大的保证作用。

现在，荆江分洪工程已经全部竣工了，剩下的只是善后工作。这次工程中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我们正在准备不日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会。节制闸并将举行放水典礼。我们三十万劳动健儿，都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总结现有经验的基础上，来迎接祖国更大规模的和平建设任务，争取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取得更大更加光荣的胜利。

（原载195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背景介绍

一九五O年六月一日至九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讨论了 改造高等教育的方针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认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才。教学内容、制度、方法等方面，都必须密切适应国家经济等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要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课程改革和领导关系的决定。

根据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精神，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当时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通过调整，使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例如，当时华北区调整后的高等院校为四十一所，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仍为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法学院并入北大。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撤销，有关系科分别并入其他高校。另外将各校有关系科分别合并，设置了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矿业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工业院校。再如华东区调整后为五十四所高等院校，以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为文、理科综合性大

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同济大学为测绘土木建筑类的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仍为师范大学，吸收圣约翰大学的部分系科。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之江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撤销，有关系科分别并入其他高校，另外设置了华东水利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工业院校。

通过院系调整，使我国工业院校基本上形成了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纺织等主要工科专业的齐全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完全培养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九五二年原来只能招收工科大学生一万五千人，经调整后招收了二万九千五百人，增加了一倍，为加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提供了条件。

在院系调整中，高等院校普遍取消了院一级的组织机构，而在系下设立教学研究室，成为统一领导和组织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基层单位。有些先进的教研室后来形成为团结和谐、学术水平较高、老中青相结合的工作梯队，在培养人才，提供科研成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院系调整中，由于缺少经验，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科、社会科学、政法、财经等学科的重要性，普遍降低其招生比例，还取消了某些专业；有些不应撤销的学校，如专收华侨学生的暨南大学也撤销了，后来不得不重新恢复；机械地将文科、理科与工科分开，不利培养文理工相通的人才；工科有些专业设置越来越细、基础知识不宽、专业面过窄，使学生毕业后工作适应性较差，并影响其以后的发展。这些缺点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时，生搬硬套而造成的。

材料：

-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

材料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现已基本完成。因而全国高等教育已出现了新的面貌。这次院系调整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的一个重大措施，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

这次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是以华北、华东两大行政区为重点，做校全面的调整。华北区以北京、天津为重点，调整后全区共设四十一个院校；华东区以上海、南京为重点，调整后全区共设五十四个院校。华北区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成为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调整成为新的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同时在北京新设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治学院等专门学院。华东区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成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同时新设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工业学院、华东体育学院等院校。南京的金陵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校名撤销。东北区的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同时新设东北地质学院、东北林学院、沈阳农学院等院校，中南区的中山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校名撤销。西南区的重庆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同时新设重庆土木建筑学院、重庆化学工业学院等院校。此外西北区新设新疆八一农学院。目前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都以积极愉快的心情，投入这一人民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运动。

这次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份的学生入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经过这次调整后，我国高等教育即可以和国家建设密切结合，改变过去教育和实际脱节及院系重复的现象。

在这次调整工作中，各校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华北区因北京天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初步方案在春季即已大体确定，因此自六月底便开始了思想动员，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首先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一千余人做了动员报告，对院系调整、课程改革、人事调配的原则做了全面的说明。并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各校也先后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在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和各校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各校教师们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完成院系调整工作，迎接新学校的建立，都积极地从事各种活动和准备工作，如举行联欢会、座谈会等，使院系调整工作有了良好的开始。院系调整的第一步骤是专业和系科的设置与教学计划的制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慎重研究反复讨论，许多教师都深切地体会了苏联教学计划的优越性；各校普遍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各校请苏联专家与教授举行了座谈会。清华大学请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回来的教授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苏联教学制度的经验，北京大学举行学习苏联教学制度的心得交流大会，同时并翻译了苏联高等学校几十种专业的教学计划

与教学大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师并在今年暑假中组织了“俄文速成班”，摸索出一些学习俄文速成的经验。目前华北区各院校的人事调配工作已基本完成，校舍设备调配亦已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迁移工作正在进行。其他各地区亦已根据中央这次院系调整工作的精神，积极进行中。

专业系科的设置确定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各校各种专业教学计划的需要，进行统一的师资调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调至外校和其他地区的教师达一百三十余人。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教师的思想觉悟在“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后普遍提高，经过动员报告说明了人事调配的原则，提出初步调配方案交各校讨论，教师们一致认为调配方案合情合理，表示服从分配和调动。九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了外调教师的招待会，马叙伦部长，钱俊瑞、曾昭伦副部长及各校负责人都为这次院系调整工作的成就表示慰勉。外调的教师则表示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原载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

背景介绍

1952年8月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民族政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推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两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1952年6月为止的统计，全国已经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共一百三十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四百五十万人。此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其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积极准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在已经建立了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各自治区的民族均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均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志逐渐地显著地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并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普遍政策方面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是伟大的，它能够恰当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因而也就能够巩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保证中国各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幸福的生活。

为了总结两年来各地民族工作的经验，继续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遵照政务院的决定，于1951年12月14日至31日，召开了具有全国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第二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结了各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统一了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着重讨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讨论中大家一致感到需要有一个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以便根据这一法规在全国应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把自治区逐步地建立起来，把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一切自治区正确地贯彻下去，因此，会议提出了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提出后，经政务院发给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省广泛的征求意见，于1952年2月22日提请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后，于1952年8月9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实施纲要》共七章四十条。根据《实施纲要》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依据当时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和历史情况，得分别建立各种自治区。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实施纲要》还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现阶段团结奋斗的总道路，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须遵循此总道路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公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措施，使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获得了指针。

材料：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报告

材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报告）

乌兰夫

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我现在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拟订经过和重要内容作扼要的报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大力地推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截至今年六月为止的统计，全国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共一百三十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计四百五十万人；此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其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准备建立民族自治区。在建立了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各自治区的民族均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均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志逐渐地显著地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均得到了改善并在逐渐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了，对毛主席、对祖国日益增涨着无限的热爱，对伟大祖国这一个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大家庭表现了坚定的信任。在将要实行自治的民族聚居区的各民族人民也同样是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准备迎接自己民族历史上新的开端。所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开国以来在民族政策方面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也说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而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是伟大的，它能够完全恰当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因而也就能够巩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保证中国各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幸福的生活。

在实行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需要有一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以便根据这一法规在全国应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把自治区逐步地建立起来，把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一切自治区正确地贯彻下去。无疑的，这将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立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历来对实施民族的区域自治的各项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的指示，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所获得的若干经验，我们也已经有可能来制定这样一项法规。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遵照政务院的决定，在去年十二月召开了具有全国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第二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结了各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统一了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着重地讨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草案。这个草案提出后，曾经政务院发给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的省广泛地征求意见，并于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提请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本月三日又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政法组及民族组联合座谈讨论，现在谨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批准。

关于这个草案，我准备就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　什么是民族的区域自治

民族的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的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依据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权利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区和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这就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过去有一些地区的若干汉族干部，由于对于民族的区域自治缺乏如上的全面正确认识，因而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存在种种疑惑和顾虑，如说：民族压迫已经取消，民族平等已经实行，还要实行区域自治吗？我们是主张走向大同境域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会不会助长狭隘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会不会妨碍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不了解正是为了彻底改变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仇视隔阂，为了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实行，才需要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正是为了使各民族将来能够共同走向大同境域，才需要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正是为了消除狭隘民族主义，为了更有效更迅速地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才需要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

另外一方面，少数民族中有一些人对于民族的区域自治也存在着许多误解，如有人认为区域自治是独立自主，不要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有人认为自治区只要自治，不要民主；有人认为既是自治区，就不要汉人；也有人怕实行了区域自治以后，现在热忱地帮助他们工作的汉族干部都会走了。

对以上种种疑惑、顾虑和误解，我们曾经进行了解释和教育，今后还应该继续进行。

二　自治区的民族组成问题

什么样的地方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呢？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凡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应该实行。但是由

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居住状况，并不完全是那么区划整齐界限分明的，所以就出现了自治区的民族组成问题。自治区的民族组成，是一个复杂而严肃的问题，适当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容易处理自治区的区域界线和行政地位两个问题。依据什么原则来处理自治区的民族组成问题呢？纲要草案上规定应依据各民族聚居区不同的民族关系、经济条件及历史关系并在民族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来处理民族组成问题。过去有的地方强调民族关系而忽略了经济条件和历史关系，有的地方强调了历史关系而忽略了民族关系和经济条件，最普遍的则是对经济条件不加注意。这都是不适当的。

根据以上原则来考虑自治区的民族组成，那么自治区的类型将有并且事实上已经有如下的三种，即：由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区；由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个别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建立的自治区；由几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第三种类型的自治区可以在民族杂居地区建立，它有利于民族间的互助合作，从而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

在自治区民族组成问题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包括汉族居民的问题。根据各地经验，纲要草案规定与汉族地区相连的自治区，因为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可以包括一部分的汉族居民区及城镇，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包括大部分的汉族居民，这是既有利于民族团结，又有利于自治区的建设的。

但是这样作需要经过有关民族的共同协商并获得同意，需要耐心地做很多工作，切不可轻率勉强。

三　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和自治权利

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是与自治区行政地位相当的一级地方政权，其建立和组织应该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但其具体形式，可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使能适合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面貌，成为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容易了解和乐于亲近的方式。自治机关主要应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组成，同时必须使自治区内其他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人员参加。

纲要草案上关于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十项条文，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这是自治区应有的权利，也是国家应该赋予的权利，是完全合乎各民族自治区人民的愿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这些自治权利充分地正确地行使，就能够充分发挥各自治区的积极性和自动精神，就能够加强民族的团结，从而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各上级人民政府对于这些自治权利，应该保障并帮助其实现。对于这些自治权利，各民族自治区不论其区域大小及行政地位如何，都应平等地享有，这是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而决定的；只是各自治区行使这些自治权利的规模，应该与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

四　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

纲要草案关于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的几条规定，基本精神只有一个，就是民族平等。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权利的行使，自治机关的巩固和自治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有赖于自治区各民族间的友好合作，有赖于各民族人民觉悟性和组织性的不断提高，因此就有赖于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能够保障自治区内各民族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并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人民。

各民族自治区的上级人民政府，应该重视对于自治区的领导，这对于各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决定的作用。在领导方法上，各上级人民政府需要足够地估计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使自己的指示和命令既符合于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又适合各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应该防止和纠正简单地搬用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办法。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所包含的重要问题，简单说来，就是这些。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受尽了民族压迫的痛苦，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得了翻身与解放，相信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通过和颁布，将更给各民族带来无限光明和幸福，全国各少数民族将为此欢欣鼓舞，更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更感谢毛主席！

以上报告当否？请予审议指示。

上甘岭战役

背景介绍

美国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停战谈判开始后，于一九五一年七月至九月先后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实行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的“绞杀战”，还实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朝人民军队艰苦作战，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二十五万人，使战线稳固在“三八线”附近。美国“细菌将军”李奇微，在世界人民的声讨中下台，美国克拉克上将接替其职务。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美国为了配合停战谈判，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向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志愿军防守部队在坚守阵

地、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进行了积极的防御作战。美国为了夺取志愿军两个加强连防守的597·9和537·7高地，先后动用了三个师六万余人，集中了三百余门大炮、一百多辆坦克和大量飞机，进行持续不断的轮番攻击，平均每天向志愿军阵地发射炮弹数万发，最多时达三十万发，这两个高地被削平了两公尺。志愿军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也先后投入了四万多人的兵力，展开了反复而激烈的争夺战，平均每天打退敌人三十至四十次的连续攻击。经过四十三天的鏖战，终于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坚守住了阵地，也再一次打破了敌人以军事进攻来"结束"朝鲜战争的幻想。

材料：

·上甘岭大捷中的英雄们

材料 上甘岭大捷中的英雄们

美国侵略者悍然中止停战谈判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对那个早已破产了的什么"军事压力"又产生了新的幻想。10月中旬，侵朝美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的中线发起一个"来势汹汹"的、"自进攻伤心岭以来最大一次的攻击"，使用了三个步兵师（一个美军师、两个伪军师）和一个美军空降团，百门以上的大炮，百架以上的飞机、百辆以上的坦克。他们选定五圣山前沿上甘岭附近的两个阵地（五九七·九高地和五三七·七高地）作为进攻目标，在10月14日把赌注押上了。

那天早晨五点三十分，一切还沉浸在晓雾中。突然，从南方飞来的密集炮火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黑色的战斗机群从空中投下重磅炸弹。敌军七个营的兵力，分四路爬上这两个山坡。但他们还没有爬到山顶，就有不少人张开两臂，丢下枪，向山坡上倒下去了。从北方来的我军炮火和从山头上掷下的手榴弹，在敌军人群中开着花。第一次的进攻就这样被我军打了下去。接着，又是炮火和冲锋。从上午五点三十分直到下午五点三十分，敌人一连进攻了四十多次，结果一千多敌人死伤在山坡上。最后，我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小山包，守卫部队转入坑道作战。于是，强盗们就洋洋得意地吹嘘着说："这是联军1952年向金化以北三角山以东红山堡（按：即五九七·九高地）第二次大的攻击，并攻占了共军阵地一部，现正努力向三角山进攻。"但是他们欢喜得过早了。两个钟头以后，我们的部队发动了反击，坑道中的部队也攻出来，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逃了回去，我军全部收复了阵地。

第二天，敌人上来六个营，反复争夺了一天，损失了一千八百多人。第三天，送来了四个营；第四天，又送来了一个营；……每天每天，敌人都是上来的多，回去的少。战斗将近一个月了。敌人在这儿已经送掉了四万四千多人，但这两个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有时，敌人占了表面，我占住坑道；有时白天敌人占了山头，夜晚就被我赶了下去。敌人用炽烈的炮火，不分昼夜地向这两个山头倾泻。在这方圆不过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一天中曾落过三十万发炮弹，山上寸草不留，石头都炸得粉碎。但尽管这样，敌人还是不能把它占据。

战士们就在那光秃秃的山头上依据巧妙坚固的坑道工事作战。正好祖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来到了前线，他们要亲自看看祖国的英雄子弟怎样作战。他们在山头上举起了望远镜。那时敌人正炮击着我们的阵地，那个红山堡笼罩在污灰的烟雾中。渐渐地雾散了一些，山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敌人攻上来了，突然，好象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山头上出现了我们的战士，他们把敌人打败了下去。等到敌人的炮弹飞来时，一下子又看不见一个人了。一会，炮一停，人影就在山头上跳起、卧下。我们的战士们灵活地在炮弹坑中跳来跳去，躲开敌人的炮火，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山去。

我们的指挥员总是反复地教育部队要机智灵活地作战，杀伤敌人，保存自己。他们爱惜战士甚于自己。在一次反击中，一营营长郝来会，为了更好地掌握情况，减少部队的伤亡，亲自带领连队上阵地，连续击退敌人几次的反扑。最后，情况不利时，他带着部队退守到坑道里。作战一天了，大家都很疲劳。郝来会营长就像照顾自己的兄弟一样安排战士们在坑道里休息，自己独个儿抱着一挺机枪，守卫在坑道口，打退敌人多次的侵扰。

我们的战士真是英雄好汉！战斗这样激烈、残酷，但他们始终是英勇、顽强、坚贞、乐观。战斗中人人向前，没有一个后退。许多二线连队都要求战斗，他们一致说，参加五圣山作战最光荣。伤员负伤后，要说服、强迫才退出战斗。伤员们请求不要把他们往后方送得太远了，以便痊愈后，能早日再上前线。

某部七连三排排长孙占元，是杨根思式的英雄。在10月14日的阻击战中，他带领全排争夺阵地，两条腿都打断了，仍继续指挥；夺取了阵地后，在打退敌人的反扑时，他一个人打两挺机枪，最后子弹打完，敌人又冲上来，他就拉开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的导火线，滚进敌人群中，牺牲了自己，炸死了冲上来的敌人。

二营营部通讯员黄继光，在17日那天，跟随部队一起反击，在冲锋的途中，他遇到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封锁着我前进的道路。他就对指导员说："我去！炸不毁它，也叫它打不出子弹来！"那时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前线，他对指导员说："让祖国人民听我胜利的消息吧！"说完，他就拿着手雷跑了过去。敌人的机枪射得非常猛烈，他在身中几颗子弹后，仍然用手雷消灭了敌人的机枪，以后又猛

扑到敌人的火力点前，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了胜利，为了祖国，黄继光光荣地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一营有一位电话员，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三次完成了架线任务，最后一次接线时，炮弹打中了他。在临牺牲时，他还挣扎着用已经麻木了的两手紧紧地捏着线头把电线接起来，保持电路的畅通。

11月2日，八连在五九七·九阵地上，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当时敌人有两个连，正要爬上他们左侧的阵地。一班战士朱有光、王万成看见了，就抱着两个并联在一起的爆破筒飞奔过去。这时敌人已先他们一步爬上了山头，并把信号旗插在阵地上了。他俩一看，情况紧急，便不顾一切，迎着敌人，冲了上去。朱有光高声地喊着："同志们，立功的机会到了！"王万成也喊着："同志们，捉俘虏呀！"就像他们是同许多同志在一起冲锋一样。他们两人抱着并联的爆破筒，扑入敌群，轰隆一声，敌人纷纷倒地，血肉横飞；余下的几个人吓破了胆，咕咕碌碌滚下山去了。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伟大的和平事业，他们慷慨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两个人击溃了敌人两个连。

坚守坑道的同志们的顽强不屈、亲密团结的精神更是动人。某部八连坚守在五九七·九阵地上的大坑道里达半个月之久。后来没熟粮吃时，就只能吃点生大米，但他们仍有着饱满的战斗情绪，战斗不息。敌人用扫射、用爆炸、用火焰喷射器来破坏坑道口，用砂土碎石来填堵，想把里面的人窒息。但所有这些都被坑道里的战士们击败了。在坑道里，战士们利用战斗空隙，展开互教互学，老同志教新同志熟练地使用爆破筒和手雷的技术，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他们坑道里仅有的武器。夜里，他们还派小组出去活动，把战斗推到坑道外边。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有水先让伤员喝，有粮先给伤员吃。没有负伤的伺候负伤的，轻伤的照顾重伤的。打仗的时候，伤员们就爬在地上给战士们压子弹，揭手榴弹的盖子。人多食物少，每个人都把可吃的东西让给别人吃。一次，七连的一个运输员，冒着炮火，给坑道内的同志送粮弹时，身上带着一个苹果，他自己走得口干舌燥，但舍不得吃，他要留给坚守坑道的同志们吃。可是，进入坑道后，他不知道该把这个苹果送给谁吃才好。他首先送给了连长，连长接到了苹果后，想到了步行机员，他一天到晚联络喊话，嗓子都嘶哑了，他最应该吃这个苹果。连长就把苹果递给步行机员。步行机员想到了艰苦作战的战士。战士想到了光荣负伤的伤员。伤员又想到了指挥作战的连长。这样，苹果传了一遍，谁也没有吃它。最后，连长说，大家都来吃吧。他轻轻地咬了一小口，便递给身边的战士，每个战士接了吃一口又传下去，每个人都吃到了这只苹果。

战士们在坑道里念念不忘地想着祖国。祖国人民的慰问品送到坑道里，战士们感动极了。他们接到了印着红字的慰问袋后，都活跃起来了，眼睛里闪着光彩。一位战士提议大家唱一个歌吧。大家都高兴起来了。唱个什么呢，讨论结果，大家同意唱"王大妈要和平"，大家就放大嗓子唱了。唱完了，还觉得不够。一个伤员支撑着身子坐起来说："我们守在坑道内，也是为了祖国。咱们大家唱个'歌唱祖国'吧。"大家就又愉快地唱了起来。

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英雄们，他们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把敌人的三个师都打垮了。

敌人倚仗的所谓"空中优势"，过去既没有吓倒人，现在是更加扯淡了。在离前沿四十来里的地方，白天都可看到运输的行列，络绎于途，敌人的飞机也奈何不得。我们有了强大的对空射击炮火。在前方指挥所里，一个同志告诉我：在敌人刚发起进攻的头几天，敌人的飞机还是相当猖狂的；但不久，它的气焰就收敛了——确切地说，是被打垮了。三十三天中，我们就打落打伤了敌机二百零八架。现在，敌人的炮兵校正机也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绝迹了，战斗机也不敢多来了。

现在，战斗还在持续着（前沿阵地上还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美联社的记者说："在争夺金化诸岭的战斗中，联军已进入决定性阶段。他们必须决定：要嘛由于人力物力的损失太大而停止这个战斗，要嘛就增加兵力进行一次大规模战斗，以获得一次彻底的胜利。"他这段话里，有一点说对了，就是"争夺金化诸岭的战斗"确已进入"决定性阶段"——美国侵略者失败的阶段。

（原载1952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

背景介绍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的短短三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下，终于在进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伟大成就。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通过土地改革，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等措施，一九五二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48.5%，每年平均增长14.1%。工业生产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44.9%，每年平均增长34.8%，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7%上升到26.6%。交通运输也得到迅速恢复。建国前后，人民政府着重抓了铁路运输的修复工作。到一九五〇年，大陆上的铁路已基本上修复通车。此后，又新建了来睦、成渝、天兰三条铁路共长1263公里，国内外贸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建国以后，全国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逐年增加，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62.3%。在这三年中，对外贸易也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初步的改善。由于实行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城市人民在三年之中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职工达到一千六百零三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一倍。一九五二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充分反映了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材料：

· 伟大的胜利

材料　伟大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但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统治和多年战争的破坏，1949年国民经济已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破坏、城乡阻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痛苦，整个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破坏不堪的烂摊子。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迅速医疗战争创伤，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从1949年到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努力，战胜了严重的困难，终于在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的情况下，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

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由于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夕对农业生产的种种破坏，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2263.6亿斤，平均每人仅418斤。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1949年的粮食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带来严重困难。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党和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是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改，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并及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除进行重点水利建设外，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兴修水利抗旱防旱斗争。初步改变了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河堤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在兴修水利工程上，三年完成的土方有17亿平方以上，这等于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所完成的土方。据统计，1949年全国水灾面积为1.2亿亩，1952年降到了2000多亩，同时扩大灌溉面积约8000多亩，1952年可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上升为19.6%，还有1.8亿亩农田改善了水利条件，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还制定了合理的价格政策，积极发放农业贷款。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引导农民按照国家需要种植各种作物，各地政府还规定了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和粮、棉、麻的合理比价，保证农民的合理收益，提高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为了帮助贫苦农民缺乏农具、牲畜、种子和肥料等困难，三年间国家共放农业贷款15.7亿元，有利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另外开展群众性的技术改进工作，推广科学种田。为了加速农业生产，党和政府积极贯彻农业科学技术与农民生产经验相结合的方针，推广新式农具，改进家耕作质量，三年中，全国施肥面积增加15%，优良品种面积扩大到近8000亩。同时，在三年中，动员了1.2亿人口，对各种病虫害的防治，估计减少损失折合粮食达300多亿斤。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有效措施，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483.9亿，比1949年增加了48.5%；粮食3088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42.8%，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1.3%；棉花2607万担，比1949年增长了193.4%，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高53.6%；其它主要农作物产量，1952年与1949年相比，增加幅度分为：大豆86.3%，花生82.6%，油菜籽27%，甜菜151%，甘蔗169%等等，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大家畜总数为7.646万头，猪存栏总数为8977万头，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27%、55%。水产总量达166.6万吨，比1949年增长2.7倍。

二、工业生产迅速恢复，生产资料的生产得到优先发展。长期战争对城市工业的破坏比农业更为严重，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党把对恢复工业生产作为恢复城市工作的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2)在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增产节约运动；(3)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发挥国营经济对私营工业的领导和帮助作用，等等。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粮食与原料，整个工业获得了比农业更快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343.3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144.9%，其中现代化工业达220.5亿元，增长幅度为年平均40.7%，因而在整个工农业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30%上升为41.5%，现代工业的比重由17%上升为26.6%。生产资料增长了227%，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了114.8%，使我国原来十分薄弱的重工业基础有了一定的加强。三年中各种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钢增长753.8%，达到134.9万吨；铁增长665.5%，达到192.6万吨；原煤

增长105%，达6649万吨；发电量增长68.4%，达到72.6亿度；原油增长260.3%，达43.6万吨；水泥增长333.3%，达到286万吨。大多数工业产品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幅度一般在5%－50%，连最困难的卷烟业，也超过战前的12%。在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对原有技术和工艺流程进行了改进，工业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在短短的三年我们已经可以制造成套的纺织机械，多种工作母机，矿山设备和3000瓦发电机组等等。

三、交通运输的恢复与畅通。长期的战争使铁路和公路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海运，解放初期，沿海运输船舶只剩下23艘，2.4万吨。解放前夕，整个交通运输几乎陷于瘫痪状态。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首先集中力量修复铁路，仅1949年一年，就修复了8300多公里，到1950年原有铁路基本畅通，同时为了开发内地资源又新修了来睦、成渝、天兰三条铁路，到1952年底，全国通车里程24518公里，接近解放前最高年份。在公路、航运和民用航空的恢复发展方面，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68公里增长到1952年的126675公里，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内河通航里程由1949年的73615公里增加到1952年92025公里；民航由解放初的没有航线，到1952年增长到13123公里。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比1949年增长了5%，公路里程增加了57%。公路水运的运货量比1949年增加了95.8%，客运量增加了79%。交通运输的恢复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四、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解放初期，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党和政府在城市中积极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积极建立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同时，利用私营商业的积极作用，推动小商小贩沟通城乡联系，促进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三年中商业流转额逐年增加，1952年达到276.8亿元，比1950年增长62.3%，农副产品采购额为129.7亿元，比1950年增长62.1%，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为14.1亿元，比1950年增长93.2%。对外贸易也取得可喜成绩，从1950年起，我国扭转了长期入超局面，实现了对外贸易的顺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极端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面前，帝国主义曾断言，新政权不可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并因此而垮台。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短短三年时间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奇迹般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52年比1949年，社会总产值增长82.2%，平均每年增长21.1%，国民收入增长64.5%，平均每年增长18.1%。总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短短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主要是：一定要发展生产力，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变革生产关系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等，这些经验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　明）

风云人物

黄继光

黄继光（1930－1952）四川中江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荣立三等功。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所在的营奉命夺取某高地，当连续攻下敌人数处阵地后，部队被敌人的一个集团火力点阻截，无法前进。他身为通讯员，挺身而出，要求担负爆破任务。他被任命为代理班长，率两名战士，勇敢地冲向敌人地堡。当一位战友牺牲，一位战友身负重伤后，他只身一人打垮了敌人的几个火力点，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他发现还有一个火力点在顽抗，增援的部队仍被封锁着，就忍着重伤的剧痛，继续向火力点爬去。当他接近敌人的火力点时，身上的武器弹药已全部用光。他毅然挺起胸膛扑上去，用身体堵住了敌人正在扫射的机枪射孔，为部队打开了通路，完成了攻克高地的任务，自己壮烈牺牲。根据他生前的申请，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材料　黄继光献身的一刻

十九日晚十点钟，我们紧跟着强大的反击炮火，一口气收复了"五九七·九"高地右侧的六、五、四号三个阵

地，眼看这条起伏的山腿就要被我们全部占领的时候，敌人主峰周围和零号阵地上残存的火力点突然复活了，上下交织成一片火网，向我们恶毒地飞盖过来，把我们压在主峰下面零号阵地的山脊上。这时我们的炮火已按时延伸射击了，前进的障碍必须我们自己来扫除。突击部队停下来，利用弹坑和敌人的尸体隐蔽自己。这时阵地上升起照明弹，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从这里我清楚地看到，距离我们五十公尺远的零号阵地前沿是两个并排的火力点，掩护着后边几公尺处一个囤兵的大炸弹坑；再后边三十公尺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地堡，这些火力点把山头变成了一个不易接近的顽固的碉堡。

现在，我连突击力量仅剩十六个人了，其中只有九个是战斗兵，要拿下零号阵地，困难是相当严重的。我和指导员冯玉庆同志计划，无论如何要继续反击；否则，天一明敌人必然依托零号阵地进行反扑，这一条山腿就守不住，那时，我们的血将是白流了。今后要支援"五九七·九"高地退守坑道的同志们作战，重行反击，又得花多大代价啊！因此，我决心剩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我立即把这九名战士组成三个组，编为我连战斗作风最硬的"功臣第六班"，准备对零号阵地上的地堡进行爆破。

这时，营参谋长张光生同志带着通信员黄继光来了。他听了我报告的情况后，斩钉截铁地说：

"不论花多大代价，天明以前一定要把零号阵地拿下来！"

执行爆破任务的第六班第一组的战士们，在密集炮火下接敌运动中牺牲了。第二组跟着上去。一连三个组的同志都英勇地倒在敌人的火网下。参谋长看着前仆后继的战士们不住连声赞叹：

"英雄！英雄！"

但情况却是更加严重了，叫谁再去呢？有战斗经验、能够担当这个繁重任务的，只有我跟指导员冯玉庆同志，加上连部两名通信员了。这正是党和祖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时候。我向参谋长请求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冯玉庆同志也同时向参谋长请求参加爆破。参谋长按住我们两个肩头严厉地说：

"不行，你们是指挥员！"

这时，站在他身旁的营部通信员黄继光挺身而出：

"参谋长，把任务交给我吧！"

参谋长一下握住黄继光的手，我看见他两眼闪光，显得十分激动："好！黄继光同志，你是青年团员，我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我连的两名通信员吴三羊和萧登良，在我和指导员要求任务的时候，早就着急的不行了，这回也立即要求参加，于是就决定他们三人再次组成"功臣第六班"，并指定黄继光任班长。

他们把冲锋枪搁下，皮带间插上手榴弹。黄继光从怀里掏出抗美援朝纪念章。萧登良也掏出纪念章和日记本交给我们。参谋长向他们说：

"为什么要留下纪念章呢？这是祖国给我们的荣誉，应该带上它打仗，去创造更大的光荣！"

指导员给他们三个重新戴好纪念章，拉着黄继光的手嘱咐说：

"好，去吧！要机动灵活。我们等着你们的胜利！"

黄继光望着指导员的脸，说出了自己崇高的心愿：

"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从入团那天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入党。这次在执行任务中，若是我能够上党员的条件，请首长介绍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党一定会吸收忠于祖国、勇敢作战的人，你放心去战斗吧！"

参谋长带着深沉的感情，又一次地叮嘱他们：

"同志们，祖国人民的代表就在身边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用胜利来回答祖国人民。"

"请告诉祖国人民，告诉慰问团的同志，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黄继光回答罢参谋长，就带着两个战友向敌人火力点匍匐前进。

参谋长望着自己的通信员黄继光的背影，松开咬紧着的嘴唇，说："他会胜利的！"接着又对我说："万福来同志，你们要及时报告情况，我去组织人员来支援你们。"他说着就转身向后爬去。

我的眼睛紧盯着这三个战士在敌人火网下跃进的姿影，他们灵活巧妙地利用弹坑和射击间隙隐蔽着前进，到敌人最近的两个火力点时，黄继光指挥两位战友成三角队形火速向前爬去。火力点突然向他们开火了。只见最前面的吴三羊迅猛地扑向一个炸弹坑里。一下子左右两个火力点几乎同时响起震动山岗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山梁。从烟火幕隙中看见那些隐蔽在弹坑里的敌人惊慌地向后面鞍部溃逃。黄继光和他的两个战友的手榴弹追着敌人的屁股响着，一阵急促的战斗后，顽抗的残敌逃进了最后一个火力点里。立刻，主峰周围和零号阵地上的机枪、炮火又集中火力向我们打来，阵地上又变成了一片迷迷蒙蒙，什么也看不清了。

指导员冒着炮火跑上去指挥他们继续战斗。营参谋长组织的四个同志也上来了。我正准备再拿上一个组去。忽然，萧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

"连长，快拿手榴弹来！"

"怎么样？他俩也负伤了吗？"

"吴三羊牺牲了。黄继光负了轻伤，不要紧。"他一面接着手榴弹，一面说："敌人炮火太密，人多了伤亡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你放心！"

敌人炮火稍稍减弱了些，阵地上烟雾散开了，我又望见黄继光得到弹药补充后，不知向伏卧着的指导员和萧登良说了些什么，他身影一晃又前进了。

离敌人那个地堡很近了。敌人显然发觉了他，火力猛得象拧开龙头的水管子，火光闪闪地向他喷射，曳光弹映出他那不大而结实的身子。在紫红色的烟尘中，一连四次跃进，但四次都仆倒在地上。

没有比这再叫人紧张的时刻了，只见在敌人机枪数秒钟的间隙里，一个黑黑的人影向前奔去。跟着，是一声巨响，硝烟把地堡和人影都遮没了，我心中一阵高兴，正想带战士们冲上去，却看见烟尘中的火苗又喷吐出来，这显然没有击中，而敌人的机枪发射得更加疯狂而凶恶了。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候，那条黑影子倏地在飞腾的烟火中闪现了一下。"他还活着！我兴奋地自语着。只见黑影一连隐现了几次，但除了敌人机枪狂叫外，听不见爆炸声。

"为什么他不打手雷呢？"我和营参谋长都非常着急的紧盯着前方，几个支援上来的战士一个个握着手榴弹准备冲上去。

正在这焦心的一瞬间，冲天的烟雾中又出现了黄继光的身影。这回看得很逼真，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那里烟雾稀薄，只见他直起身来，伸开两臂，猛虎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

正在闪闪吐射的火舌骤然熄灭了，狂吼的机枪声喑哑地低吟了两下，便完全哑巴了。

"同志们，冲啊！"在这刹那间所发生的一切，使我迅速地明白了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我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跃起身来，激动地高呼着，带着战士们冲了上去。在弥漫的烟尘中，在空气为之灼热的火海里，我们登上了零号阵地，全部歼灭了顽抗的敌人。

（万福来）

邱少云

邱少云（1926—1952）四川铜梁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10月11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反击敌占金化以西"319高地"的战斗中，他和全营战友奉命于夜间潜伏在距敌60余米的山脚，待次日傍晚配合大部队发动进攻，突然袭击敌人。12日中午，他被敌燃烧弹所引起的烈火烧身。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他忍受剧痛，坚持不动，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朝鲜人民为悼念他，在高地的石壁上刻下了"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部队党委根据他生前的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了特等功。1953年6月1日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6月25日又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以及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在他的家乡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

材料　伟大的战士邱少云

我军在金化西边三九一高地的反击战中，战士邱少云，为了保全整体，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壮烈地牺牲了自己。邱少云是志愿军伟大的战士，是祖国人民值得骄傲的子弟。

十月十一日，邱少云和他的战友，奉命到敌人阵地附近去埋伏，等第二天晚上发起战斗的时候，好突然去消灭敌人。

他们埋伏的地方，在三九一高地的山坡上，离山顶上的敌人只有六十公尺。要在这里隐蔽二十多个钟头，实在是不容易的。昨天，从这里飞出一只野鸡，敌人还连枪夹炮地打了半天。邱少云等趁着天黑，摸到了这里，他们分成小组，散布开来。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插上了茅草，凉风一吹，人身上的草和山坡上的草一同摆动着，露不出一点马脚。山上的敌人，可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连敌人讲话都能听到。

第二天十一点钟的时候，敌人胡乱发出一颗燃烧弹，忽然落在邱少云身旁，烧着了他身上的茅草。这时候，他要站起来，是完全可以把火扑灭的。邱少云想起，出发前，首长交代要严格遵守埋伏纪律。邱少云更加知道，要是他爬起来，埋伏在这里的几十位战友，就会被敌人发觉，就有可能被敌人消灭；这样就破坏了原定的战斗计划。他决定躺着不动。我军阵地上的指挥员，看到埋伏地点起火，连忙命令向敌人开炮，扰乱敌人的注意力。这时候，邱少云还是没有爬起来扑灭自己身上的火。烈火继续燃烧着他的身体。邱少云咬着牙，小声向靠近的战友李士虎说："胜利是我们的，但是我不能完成爆破任务了，交给你去完成吧！"说完，他把被烈火烧着的身体更紧地贴到地上，一直到牺牲，也没动一下。李士虎急得咬破了嘴唇，眼睛里像要冒火。但是，他和邱少云一样，和埋伏在那里的所有战友一样，想到了整体，想到了整个战斗的胜利，眼看着他亲爱的战友壮烈牺牲；忍受着内心的仇恨，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信号。

烈火烧了二十多分钟，直到邱少云牺牲后，烈火才熄灭了。

我们的英雄邱少云，就是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反击战打响了。敌人的阵地被我军的炮弹打得粉碎埋伏着的战士们从草丛里发起了攻击。李士虎飞也似跑到邱少云烈士身旁，用大衣盖住了他的遗体，抱起烈士留下的冲锋枪和爆破筒，高喊着"为邱少云烈士报仇啊！"他冲过两道敌人的铁丝网，把爆破筒塞进敌人的一个地堡里，消灭了地堡里的敌人。接着，满山响起了"为邱少云烈士报仇！"的声音，满山是爆炸敌人地堡的火光，满山是杀

敌的枪声。不到十五分钟，我军就占领了敌人阵地，取得了歼灭敌军一个连的胜利。

（郑大藩）

罗盛教

罗盛教（1932－1952）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模范，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月2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结冰的河里滑冰的朝鲜少年崔莹，不幸掉到冰窟窿中，听到惊叫声的罗盛教不顾一切，一面跑，一面脱衣服，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跳入冰窟，抢救遇险者，当他把朝鲜少年顶出水面救出来后，自己却因力竭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了特等功，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模范"称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他为"模范青年团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材料　朝鲜人民建立罗盛教烈士纪念碑与纪念亭　金日成将军题字赞扬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

朝鲜人民为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特在"罗盛教山"上建筑了庄严雄伟的纪念碑与纪念亭，并在十月三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参加典礼的有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会委员长宋昌稔，朝鲜人民军代表、当地人民代表、被烈士营救出来的少年崔莹　及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代表和罗盛教烈士生前战友等七百多人。

在一丈五尺高的纪念碑上，有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将军亲笔所题的金色大字"罗盛教烈士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共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的挽词："光辉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永垂不朽！"在纪念碑周围堆满了鲜花，在一座古典式建筑的纪念亭里挂着许多挽联。

典礼开始后，朝鲜劳动党、政府、人民军、当地人民的代表和朝鲜少年崔莹都相继讲话，他们都说：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将永远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他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朝鲜人民奋勇前进。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代表说："罗盛教烈士舍己救人的英勇行为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将更密切地与朝鲜人民团结一致，更加奋勇地打击敌人。"罗盛教生前的战友们报告了他们向罗盛教烈士学习国际主义精神的事迹。最后，全体参加典礼者在纪念碑前宣誓：今后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学习罗盛教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化悲愤为力量，决心以英勇战斗、积极工作和努力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实现罗盛教烈士"为朝鲜人民报仇"的伟大遗志。

（原载195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杨连第

杨连第（1919－1952）天津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排长、技术副连长等职。在1949年8月抢修陇海铁路八号桥时，他不顾生命危险，冒险登上了45米高的桥墩，提前完成了修桥任务，荣获了"登高英雄"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被选进主席团。1951年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被特邀列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人民的帮助下，他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修桥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荣立一大功二小功。1952年5月15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指挥抢修清川江大桥时，不幸被美军从飞机投掷下来的定时炸弹炸中，光荣牺牲，年仅33岁。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他"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铁路部命名八号桥为"杨连第桥"。其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连第连"。

珍闻轶事

侯宝林谈给毛泽东说相声

记得第一次给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说相声是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上半年某一天。参加演出的都是有点名气的演员，如京剧界的梅兰芳先生和吴素秋等同志都在那天同台演出。负责组织节目的同志把我和郭启儒同志合说的相声，放在最后压轴。毛泽东同志听得那样入神，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在眼前一般。

还有一次演出，剧场座位都是木排椅，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坐在剧场中间特意安放的两把藤椅上。前边的节目演完了，毛泽东同志拿起雨衣挽在左臂上，一边鼓掌，一边站起来准备要走，一看："嗽，还有节目！"就把雨衣放在旁边，又坐下来听。一直听完这个段子，为我们的演出鼓掌。我们又加演了一个小段儿，演出结束后，他才离开剧场。

解放后不久，我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懂得了文艺要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这时正值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日理万机中观看我们的演出，是对我们文艺工作的重视，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我们的相声，在旧社会是被当时的统治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在新社会大大提高了地位，我受到的教育和鼓舞是很大很深刻的。

毛泽东同志爱听相声。他听我说的相声，有150多段，其中50多段是新创作的段子，100段左右是传统作品。为了介绍我们过去的演出形式，我和几个老演员在一起特意挖掘出《字象》这个传统3人相声段子。这个段子早年相声撂地演出时，演员在地上用白沙撒字。现在拿到舞台上演出就不行了。我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了一块汉白玉石头，现砸现磨，筛成粉末，装在缝制的3个小布口袋里，到毛泽东同志居住的地方演出。他很欣赏这个段子。毛泽东同志只要发现传统相声中民族性的精华，就非常高兴。

《关公战秦琼》也是毛泽东同志最喜欢的相声节目之一。一般的相声节目，他很少听两遍，只有这个节目，他在一次演出后，又让我们重演一遍。陈毅同志也听过好几次。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瞎指挥。这个节目揭露旧社会里反动官僚什么也不懂，却依靠权势发号施令的丑态，是十分淋漓尽致的。即使在今天演出，仍有教育意义，仍有较强烈的剧场效果。《关公战秦琼》原是过去的艺人根据民间笑话改编而成的，我们在演出中又不断进行了整理，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

我给毛泽东同志说相声，当时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我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仰，很愿意拿我们的相声艺术，使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能休息一下，能笑一笑。另一种心情是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相声，也是为了了解这一个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情况，鼓励我们对它进行革新，使它成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发挥出更大的战斗作用。在建国初期，我和几位相声演员发起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在促进相声艺术改革和推动相声演员进行自我改造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以为这是与毛泽东同志关心、重视相声艺术，给了我们思想上的启发分不开的。

周恩来的外交幽默

周恩来是一位博学多谋、辩才杰出、富有幽默感的人。在长期对外交际中，周恩来以幽默一次次地巧解人意，化险为夷，深受众人的敬佩。

一次，他接见美国记者，对方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呢？"他又微笑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的，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走路了。"廖廖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

一次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吗？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在高级外交场合，他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1972年2月，他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

"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

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

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设宴招待外宾,正当宾主围着工艺品般的佳肴赞不绝口时,突然,用笋片刻成的一个中国民族图案,在汤里一翻身变成了"卐",来宾大吃一惊,面面相觑。这时,周恩来神态自若,随即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图案叫'万'字,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转而,他又爽朗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顿时,宾主哈哈大笑,一会儿就把这道菜吃个精光。

(摘自《中共党史通讯》)

十世班禅返藏纪实

历史积怨

班禅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在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代雍正、乾隆以来,一直归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直接领导,与达赖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清廷驻藏大臣撤销,噶厦乘机强迫扎什伦布服从达赖的统治。1914年噶厦政府在日喀则增设了后藏总管2人,总管后藏的16个县及班禅所辖的4个县和30多个相当于县的封建庄园。此后噶厦不断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所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致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为避不测,被迫于1923年11月,率领少数随从,逃出西藏,转入内地。

九世班禅到达内地后,正逢南北军阀混战,国家一时无力解决西藏问题。他艰辛地在内蒙古、东北和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29年3月,九世班禅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也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之后,国民党政府两次邀请九世班禅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商讨西藏问题和班禅返藏事宜,同时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

九世班禅担任西陲宣化使后,即派代表去拉萨交涉返藏之事。但是,当九世班禅准备返藏,于1936年12月行抵青海玉树后,受到了噶厦派来代表阻拦。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已无暇顾及处理西藏问题,因此指示九世班禅行辕和护送专使行署,考虑停止入藏。九世班禅回藏被阻后,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九世班禅自1923年逃亡内地以来,在祖国各地流浪了15年,最后客死他乡,终未实现其返回西藏的夙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矛盾和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宗教程序,在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藏胞家中,找到4岁的灵童官保慈丹,并接到青海塔尔寺作为九世班禅化身供养。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特准灵童官保慈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完成了法律上认定的程序。

积怨冰释

1951年4月,达赖派遣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5人全权代表,来到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与此同时,班禅等人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的陪同下也来到首都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统战部长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5人全权代表,开始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反复协商,谈判终于在5月21日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并于5月23日,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向达赖和班禅两 方面进行了说服,要求双方捐弃旧嫌,重归和好,并在《协议》第五和第六条里面,对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公平合理的规定,从而基本解决了达赖与班禅之间近30年的不团结问题。

《协议》公布后,十世班禅大师于5月30日致电达赖喇嘛,衷心地赞颂达赖为西藏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所做的贡献,并表示"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班禅向达赖伸出了友谊之手。

1951年12月,达赖从拉萨打电报给十世班禅,欢迎他早日启程返藏,团聚一堂,共同建设新西藏。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达赖和班禅的积怨终于释解。十世班禅返藏的时机成熟。

总理关怀

1950年12月中旬,范明应召向西北局习仲勋等同志汇报了西北军区关于进藏的设想和方案。12月31日,范明、汪锋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抵达北京,就西北进藏筹备工作向中央汇报请示。根据李维汉的要求,范明准备了一个关于进军西藏的汇报提纲,上报中央。

1951年1月30日晚,在北京饭店下榻的范明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要于翌日接见他们的通知。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了范明等人,详细地询问了西北局、西北军区关于进藏的具体情况,当即指示说:"西北军区解决的五件事,由你们起草电稿,中央发出,必须解决。中央给班禅答允的,如派干部和

卫队等，必须在三月前一律搞完毕。将来进藏你们可以分梯队走，如第一批，第二批。现在马上准备牲口和粮食。”

范明提出是否可由玉树经昌都然后到拉萨时，周总理答复：“不行，那条路上，西南有几万大军要通过，交通拥挤，同时，你们还有占领黑河口的战略配合任务”。

范明又提出，青藏公路停修后运输成问题。周总理说：“中央并未说不修这条公路，而是要西北调查沿路情况，究竟哪条路好修？全线多长？需要多少人工和材料？化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

周总理又说：“你们行动时，应与西南进藏部队通电报联络，可以找杨尚昆同志另要一份密码。出发后，第一梯队即归十八军指挥。”“准备工作要赶在3月底准备好，责成西北局与西北军区负责，将来完成不了，要向他们是问。”

周总理又掐着指头算起来，“班禅集团打上1500人，工委搞1500人，将来家属及其人员打上1000人，共4000人。”然后果断地说：“准备8000头牲口和其他物资，完全由西北局负责”。

总理转过头来，对李维汉和范明说：“范明同志代表中央起草一个决定，以中央名义下达”。

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关怀下，西北局、西北军区紧张地进行着护送班禅回藏的准备工作。到11月底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班禅返藏指日可待。

坎坷归程

1951年12月18日，习仲勋代表毛泽东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西宁，欢送班禅启程返回西藏。在隆重的欢送仪式上，十世班禅大师在与习仲勋互赠洁白的哈达时，紧紧地握住了习仲勋的手，深深地感谢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班禅及其亲属、行辕的全体官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副代表牙含章等的护送下，分乘多辆汽车向西藏进发。

经过6天的行军，十世班禅一行来到了香日德。从香日德再往前行，就不通汽车了，只能骑马。

班禅一行在香日德进行短暂休整后，继续前进，1952年2月底，他们来到了唐古拉山前。

唐古拉山横亘在青海与西藏之间，唐古拉山口最高处海拔5800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袭人，空气稀薄缺氧，人在山上行走，头昏脑胀，呼吸困难，四肢无力，就连牲口也大口喘气，迈步困难，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十世班禅一行在翻越唐古拉山的7天时间中，恶劣的环境夺去了十几个人和上万头骆驼、马、牦牛的生命。

越过唐古拉山，即进入西藏境内。十世班禅一行继续南行，几天后来到了安多麦马游牧部落境内，见到了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派来欢迎班禅的官员。他们向班禅敬献哈达，并说从这里起，即由西藏地方负责供应差役。和他们同来的还有许多藏族牧民，赶来了大量牦牛与乘马，使班禅一行缓解了因骆驼大量死亡而造成的运输困难。

班禅一行于1952年3月来到藏北的第一重镇那曲，受到西藏地方政府驻那曲的两个基巧（相当于内地的公署专员）和那曲寺活佛、喇嘛和牧民数千人的隆重欢迎。

这时，正赶上伪“人民会议”在拉萨闹事，中央代表张经武为了十世班禅的安全，来电要班禅一行在那曲暂停一些时间，待局势安定后再到拉萨。同时要求护送班禅的解放军官兵要提高警惕，防止亲帝分离势力搞突然袭击。为此牙含章和班禅行辕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应付可能发生不测的各种具体防范措施。要求大家作好精神准备和作战准备，禁止进藏人员单独上街，必须五六人以上携带武器集体外出。为显示威慑力量，防患未然，解放军官兵还在那曲郊外举行军事演习（有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邀请了当地官员和活佛参观。另一方面对前藏官员和活佛们，仍然表示友好，照常保持良好关系。拉萨伪“人民会议”事件结束后，中央代表张经武来电要十世班禅启程前往拉萨。

十世班禅一行来到离拉萨76华里的吉日时，西藏工委派范明副书记、西藏军区派李觉参谋长前来迎接，并一起研究了进入拉萨时应注意的事项。

同年5月1日，十世班禅安全到达拉萨，受到达赖政府及全市人民的隆重欢迎。拉萨市民的房顶上换上了新的经幡，门口用白灰画上了吉祥图案，这是拉萨市民用宗教仪式欢迎班禅的最高敬礼。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市在拉萨市的东郊搭起了欢迎帐蓬，全体高级及全体僧俗官员数百人参加欢迎仪式，奏着军乐、布达拉宫穿着古代服装的仪仗队，奏着军乐、载歌载舞盛况空前。欢迎仪式结束，在藏军军乐队引导之下，十世班禅乘轿进入市场中心。这时，轿子周围拥挤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想靠近轿子一睹班禅的圣体，有的人拿石块乱挤乱碰怀有敌意。人越来越多，轿子几乎不能前进了，随时有发生问题的可能。负责扶护的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结成人墙以防意外，其他警卫人员也都加强了戒备，注意动向，直至轿子进入大昭寺。

5月2日，十世班禅前往布达拉宫拜会达赖，商讨会见仪式的有关事宜。双方对于磕头、座位高低、献礼品等3个具体问题发生了争执。达赖方面提出在达赖和班禅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这种有损害于班禅固有地位的条件，班禅方面拒绝接受。中共中央对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原则是：班禅可让点步，但其固有地位必须维护。本此精神，中共西藏工委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几岁，虽不是师徒关系，但初次见面，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双方再行平等碰头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出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

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双方互赠礼物。经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范明副书记与双方交谈，双方接受了这一办法。会见时，尽管仪式问题仍有一些出入，但两位大师终于坐到了一起，推心置腹地讨伦西藏的现状、宗教等情况。

如愿以偿

十世班禅在拉萨住了一个多月后，回到了日喀则。这对他的属民来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五六万人从四面八方，甚至几百里远的地方赶来扎什伦布寺候迎。有的牧民赶着牦牛、带着帐篷，早在一个月前就来到日喀则等候。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和日喀则的市民们，自发地用红布或红纸做了许多五星红旗，全市家家户户，寺中每一僧舍，无不红旗招展。日喀则市区到处挤满了迎接班禅归来的男女老幼。当班禅和护送队伍进入市区时，群情激昂，有的过于激动，甚至嚎啕痛哭；有的念念有词，合手望天，默不作声；有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浓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宗教气氛，尽显其中。如此场面在日喀则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扎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室中，毛泽东的画像与释迦牟尼像并列悬挂。全寺僧众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倾注在对毛泽东主席的顶礼膜拜上。

班禅进入扎什伦布寺以后，举行了隆重的喇嘛教庆祝仪式，这一仪式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

与此同时，在中共西藏工委的关怀下，西藏地方政府恢复了班禅在后藏的地位及职权。

班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我和行辕全体人员得以光荣返藏，并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后藏所属百姓的差役已恢复到清朝乾隆癸丑（公元一七九四年）的规定，负担大大减轻，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后藏僧俗官员民众，莫不感激万分。"

（韩侠）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一九五二年的文艺创作，继续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有刘绍棠的小说《青枝绿叶》、陆柱国的小说《风雪东线》、刘溪的小说《大地回春》、巴金的通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

《青枝绿叶》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的《中国青年报》，叙述了翻身农民互助合作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满囤嫂、永春嫂和刘满囤等农民的形象。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以抗美援朝为背景，描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队，冒着风雪插入敌后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坚守阵地三天三夜的故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刘溪的《大地回春》以解放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同还乡团斗争的故事，塑造了李华光、李兰等共产党员的形象，是解放初期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之一。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是一篇记叙性散文，文章叙述了作者在抗美援朝前线会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经过。这篇文章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认为是抗美援朝期间通讯作品的典范。

本年流行的诗歌主要为一些抒情诗，如李学鳌的《每当我印好一幅地图的时候》、胡昭的《军帽底下的眼睛》、严辰的《心愿》等，另外如李季的反映荆江分洪工地小故事的诗歌《乌班》也深为广大群众喜爱。

在本年的流行歌曲中，与时事紧密相连的占了很大比重，如《消灭细菌战》、《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歌唱白云山》、《反对武装日本》等，另外一些歌曲如《"六一"国际儿童节歌"》、《斯大林颂》等依旧传唱不衰。

小说《青枝绿叶》

作者刘绍棠。发表于1952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后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下册。小说叙述了翻身农民互助合作的故事。1951年阴历六月，天气毒热。小说一开头就把时间选在农忙季节，迅速推出人物。收工回来，互助组长春果与副组长宝贵商量不让怀孕五个月的永春嫂下地。而互助组外，李满囤老婆却挺着个大肚子还得靠着篱笆泡烟水。汁珠落在桶里"叮叮当当"地直响。互助组里，永春嫂因不让她下地而不满，永春则非常感激组里的关心，加倍用劲干活，夺了状元红旗。互助组外，天麻麻亮，李满囤便喊老婆起床下地。棉花生了蚜虫，忙得他们没有歇的工夫。满囤想向单干户王富家借喷壶用，但王富不给情面，只好硬着头皮找互助组的宝贵。宝贵不但借了壶与药，还问他人手够不够。六月六，满囤坐在地边，看着棉苗长势好，眯着眼乐滋滋。宝贵他们已挂锄，出去找零活干。满囤嫂生孩子了，满囤刚咧开嘴，忽然想到棉花会夜雨脱桃，立即愁云满布。春果让宝贵他们帮助整治，和满囤换工。互助组里，

永春嫂还被拉到医院检查胎位，让满囤嫂羡慕不已。互助组干零活还挣来一头大青骡。互助组外，满囤顾了棉花顾不了高粱，不得已让满囤嫂扔了孩子下地，互助组又把他的孩子安排在托儿所换工。满囤小算盘打得精，认为这样换工比入组合算。满囤瞧上了组里的大青骡子，但被组里拒绝了，满囤嫂也骂他只想沾便宜，没脸没皮。收秋了，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满囤抱一门心思看看，再看看，认为"亲娘总是疼亲儿，自己耕种顶牢靠"，经过这一场竞争，最后终于认了输，入了组。刘绍棠通过满囤嫂和永春嫂生产的比较和满囤与互助组粮食生产的竞争，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对比手法的巧用是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

小说《风雪东线》

作者陆柱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初版。收《风雪东线》、《中华男儿》两篇小说。《风雪东线》以抗美援朝为背景，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队，在冰天雪地里穿插到敌后狙击敌人，冒着敌人飞机、坦克和大炮的轰炸，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坚守阵地三天三夜，为兄弟部队围歼敌军赢得了时间，最后炸毁敌人后退的桥梁，全歼被围困的美军。小说塑造了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群像。十六岁的小通讯员刘玉孩天真活泼，为了保护连首长的安全，用身体扑在燃烧弹上，壮烈牺牲；三排副李恢抱着炸药包，滚到敌人的坦克底下，与敌坦克同归于尽；陈善明为了掩护战友炸敌桥，单枪匹马冲向敌军；指导员于林伤病累困交集，昏死过去，醒来后仍顽强地战斗；还有英勇善战的连长郭怀忠，幽默风趣的机枪手李鸿，奋不顾身炸敌桥的王海。他们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不怕流血牺牲，以实际行动捍卫世界和平。《中华男儿》描写了志愿军某部一个尖刀营，穿插到敌后奇袭敌军的故事。他们通过敌人四十多里纵深的封锁，跋山涉水，穿越雷区，摸敌哨，打碉堡，穿插到美军二、三师的接合部狙击敌人，为大部队围歼敌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战后获"尖刀英雄营"的称号。小说着重刻画了一排长崔建国的形象，他们排是尖刀营的尖刀，他率领战士们奔袭穿插，机智灵活，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大量杀伤敌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崔建国一人毙敌三十多个，俘虏八个，缴获大量的武器，被记特等功，获"中华男儿"的光荣称号。两篇小说都热情地歌颂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揭示出他们崇高的精神风貌。小说语言朴实自然，但结构上缺少必要的剪裁，不够集中严谨，显得有些粗糙。

小说《大地回春》

作者刘溪。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3月初版。收入文艺创作丛书。这部小说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敌后同还乡团斗争的故事。在人民解放军转移到山东之后，国民党的军队和地主还乡团来到苏北，对老百姓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在区武工队长李华光的带领下，他们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组织群众进行抗租抗粮抗丁斗争，在斗争中人民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打下了白石村据点，击毙还乡团头子金小歪，经过严冬考验的人民重新迎来了温暖的春天。小说揭露了地主还乡团烧杀抢掠惨无人道的罪行，表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歌颂了武工队员们英勇的业绩。小说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武工队长李华光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率领武工队用穿插游击的方式不断地骚扰敌人，使敌后的人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定了人民群众必胜的信心。李华光的女儿李兰，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在主力部队转移时，上级规定妇女干部随队转移，但她却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母亲被杀害后，她压抑住满腔的悲愤，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在刺探敌人的情报时，不幸被捕，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决不泄露党的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质。还有刚强爽快机智勇敢的胡喜，沉默寡言的王黑腿，满怀杀妻之仇英勇杀敌的徐兴标，一度胆小动摇终于在斗争中坚强起来的刘家有、张美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小说也较为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如对李兰在爱情上矛盾心理的描写。李兰在九岁时与姨表兄张美玉定亲，可她却看不起胆小的表兄，而喜欢爽快的胡喜，但又下不了与张美玉断绝关系的决心，担心对不起母亲和姨母。这种描写很符合当时刚挣脱封建枷锁束缚的青年妇女的实际心理。小说情节生动，语言朴实自然，是解放初期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之一。

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作者巴金，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抗美援朝前线一个简陋的石洞里，来自祖国的十七位文艺工作者代表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而又敬畏的心情，等待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的会见。

一刻钟后，彭德怀司令员进来了，他那朴素的外表、慈祥的眼光、和善的态度，使人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顿时，代表们那种紧张、敬畏的心情全都消失了。和代表们亲切地握过手以后，彭德怀司令员也坐在板凳上，像

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谈了起来。他谈到朝鲜人民的勇敢、勤劳，谈到美国侵略者的残忍凶狠，谈到抗美援朝对保卫祖国的关系，谈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对美作战的经验，他分析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和美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然后又谈到朝鲜停战的前途。他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祖国和世界和平的热爱，他坚定的面容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聪慧的眼神中透露出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他的话吸引了全体代表的心，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产生深深的信赖感，甚至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然而，彭德怀司令员却说："作战主要的是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跟士兵一致的指挥员。"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直从容而又乐观地谈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谈到了。会见进行了三个钟头，代表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彭德怀司令员。洞外非常寒冷，下着大雪。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兄弟国家的土地上，是彭德怀司令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保卫着祖国的安全，保卫着世界和平。这些，中国人民是知道的，中国人民感激他们。

这是一篇三千来字的记叙性散文。文章记叙了作者在抗美援朝前线会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经过，写出了作者对彭德怀司令员的印象与感受，热情地赞颂了彭德怀同志对祖国无限忠诚，对朝鲜人民无限热爱，对帝国主义无比仇恨，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崇高品质以及他那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卓越军事才能，真切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彭德怀同志和志愿军战士无比崇敬的心情。

诗歌《心愿》

作者严辰。写于五十年代前期。收入作者诗集《繁星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初版)；又收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心愿》是一首直抒胸臆，表达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青春的抒情诗。它写作的那个年代，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崭新时期。诗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满怀豪情，"为了生活的光明和幸福"，在向困难进军中，"决不退缩，决不叫苦"。这也正是当时激荡全国大地的人民之情和时代之情。诗人用艺术的诗笔，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因而引起人民的强烈共鸣。思路开阔，联想丰富，是本诗的主要艺术特点。从官厅湖到拉萨河，从新安江到三门峡，从黑龙江到昆仑山，从长江到黄河，……联想的羽翼如彩云飞越，激励着人们建设美好生活的激情。全诗十一节，每节四行，句式整齐，语言朴素，流畅明快，亲切感人。

诗歌《军帽底下的眼睛》

作者胡昭(满族)。写于1952年12月。后收入作者诗集《光荣的星云》(作家出版社1955年6月初版)。诗作所要表现的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的主题是重大的，但诗人并没有作标语口号式的呐喊，而是通过一个战士对战场上的护士的眼睛的观察、理解，来抒发战士的情怀。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女护士军帽下那双眼睛"在四下搜寻"，履行着崇高的义务。这使"我"，一个志愿军战士心中涌起一股热浪，想起了妹妹"天真而明净"的眼睛，妈妈温暖深沉的眼睛。"深深地望了她一眼，我回身又扑向敌人"，"我要保卫那对眼睛"，因为那就是妹妹的、妈妈的、我亲爱的祖国的眼睛！作品传达了志愿军战士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决心，感情真挚，构思独特，形象具体、传神，联想自然、贴切，语言朴实。它是表现抗美援朝题材的优秀诗作之一。

诗歌《乌斑》

乌　斑

——荆江分洪工地小故事

安装第十孔阀门的那一天，
铆钉烧伤了杜文中的脸。
才出炉的红铆钉没有长眼睛，
把皮肉烧烂了半指宽。

过了几天伤口长好了，
可是，却留下一块大乌斑。
谁看见也要心痛地说：
"这么漂亮的脸上添了个小缺点！"

爱说俏皮话的张大有，
见了文中就扮鬼脸：
"参加荆江分洪烧坏了脸，
纱厂里那个女青年团员要把离婚手续办。"

文中到江边去洗衣裳，
掏出小镜子悄悄看；
离婚不离婚是小事，乌斑的确不体面。

评功会上记大功，
文中给爱人把喜信传，
捎带也写了受伤的事，

试试她有啥意见。

每天竞赛夺红旗，
做梦也在想着铆闸板。
日班夜班连着干，
脸上的乌斑早已忘到脑后边。

那天他创造了新记录，
一杆风铆枪铆了九百一十三。
端着脸盆正要去洗澡，
文书递给他信一件。

突然想起了脸上的乌斑，
一松手把水洒了一多半。
张大有正巧就在旁边，
把信夺过来边跑边念：

"听说你脸上烧了一个乌斑，
你问我心里喜欢不喜欢；
就是你被烧成乌人我也爱你，
——因为这是荆江分洪的纪念！"
1952年6月12日于太平口

（李季）

诗歌《回答》

回　答

一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二

有一个字火一样灼热，
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
有一种感情海水一样深，
但它又那样狭窄，那样苛刻。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满满地
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
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呵，
我怎么能够把一滴说为一斗？

三

不，不要期待着酒一样的沉醉！
我的感情只能是另一种类。
它象天空一样广阔，柔和，
没有忌妒，也没有痛苦的眼泪。
唯有共同的美梦，共同的劳动
才能够把人们亲密地联合在一起，
创造出的幸福不只是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巨大的劳动者全体。

四

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
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
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
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
难道生长在祖国的肥沃的土地上，
我不也是除了风霜的吹打，
还接受过许多雨露，许多阳光？

五

你愿我永远留在人间，不要让
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临到我的身上。
你说你痴心地倾听着我的歌声，
彻夜失眠，又从它得到力量。
人怎样能够超出自然的限制？
我又用什么来回答你的爱好，
你的鼓励？呵，人是平凡的，
但人又可以升得很高很高！

（何其芳）

歌曲《消灭细菌战》

D（愤怒肃壮）　郭沫若词　卢肃曲

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它临到死亡的边缘胆敢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我们为了人类的尊严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 让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臭虫苍蝇跳蚤一齐完蛋。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一齐动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一齐动员。

歌曲《打败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中速)(坚定有力)李建清词　马华曲

来呀,来呀,工农弟兄们,举起我们的钢拳铁臂,反对贪污,反对盗窃,把严重损害国家财富的罪犯抓来治罪!我们是祖国的劳动大军,祖国的财富我们要保护,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要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打个粉碎!打个粉碎!打个粉碎!打个粉碎!

来呀!来呀!全国的人民,布起我们的天罗地网,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把那些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盗贼全部肃清!我们是祖国的劳动大军,祖国的财富我们要保护,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明天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打个粉碎!打个粉碎!打个粉碎!打个粉碎!

歌曲《歌唱白云山》

(中庸速度　献给汉江前线的英雄们)

刘白羽词　郑律成曲

高高的白云山矗立在朝鲜汉江南

麦克阿瑟要从这儿进犯 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

炮弹炸翻了土地我们说不准你侵犯

大火烧红了山岩我们说不准你前进英

雄昂立在山巅英雄的鲜血光辉灿烂

中朝弟兄齐歌唱世界人民记心间

汉江的流水滔滔永远流呀流不尽

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胆战心寒

白云山白云山高高的 白云山

让我们高唱着你的英名冲向前

歌曲《反对武装日本》

(激昂、有力、快)

放平词　吕骥曲

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

我们艰苦抗战八年,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美帝国主义

要武装日本我们坚决不答应。

反对武装日本,反武装日本!

日本必须走向民主,亚洲必须走向和平,美帝国主义

要武装日本我们坚决不答应,

反对武装日本,反对反对反对武装日本!

歌曲《我是一个兵》

(干脆、有力)

陆原　岳仑词　兵仑曲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嘿!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他不留情。

歌曲《"六一"国际儿童节歌》

袁水拍词

马可曲

(稍快)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 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我们自由地生长在这光荣土地上。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努力,努力,努力,为了实现毛泽东的伟大理想!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到西藏,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歌唱,歌唱,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共同希望!

流行口号

1、庆祝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斗争的伟大胜利!

2、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3、向支援人民志愿军的男女担架队员、运输队员、医疗队员、铁路交通工作人员、后方勤务工作人员、战地文化工作者致敬!

4、向为抗美援朝而负伤的同志们致敬!

5、为抗美援朝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6、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

7、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为保卫人类、消灭细菌战而战斗!

8、向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的苏联人民致敬!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9、庆祝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朝鲜人民致敬!

10、中朝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日益亲密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11、庆祝越南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越南人民致敬!

12、向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致敬！

13、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日本反动派、力争民族解放与民主和平的日本人民致敬！

14、向世界各国反对战争威胁、保卫和平民主的人民致敬！

15、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扩张军备、准备新的战争的罪恶计划，要求缔结中、苏、美、英、法五国和平公约！

16、反对片面的对日和约！反对美帝国主义以日本为侵略基地、重新武装日本！

17、反对美帝国主义以西德为侵略基地、武装西德、分裂德国！

18、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发展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和经济贸易关系！

19、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万岁！

20、向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致敬！

21、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22、庆祝全国人民“三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坚决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23、庆祝全国人民“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坚决清除不法资本家违反共同纲领的“五毒”行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24、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5、向参加“三反”、“五反”斗争的男女工人、店员、职员、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各界人民致敬！

26、向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们致敬！

27、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28、庆祝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向参加土地改革的一切工作人员致敬！

29、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

30、宗教信徒们！发扬爱国精神，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民主的斗争！

31、国内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设独立、统一、繁荣的伟大祖国！

32、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

33、国外华侨团结起来！爱护祖国，为保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34、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35、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36、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37、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38、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39、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40、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万岁！

流行纪念日及节日

根据“统一全国节假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及“一九五二年新历书”，一九五二年流行的节日有：

一月二十一日	列宁逝世纪念
二月七日	“二·七”纪念日
二月十四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
二月二十七日	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
二月二十八日	“二·二八”纪念日
三月八日	国际劳动妇女节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逝世纪念
三月十四日	马克思逝世纪念
四月二十二日	列宁诞辰
五月一日	国际劳动节
五月四日	中国青年节
五月五日	马克思诞辰
五月十二日	国际护士节
五月三十日	“五·卅”纪念日
六月一日	国际儿童节
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七月七日	“七·七”抗战纪念日
八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八月五日	恩格斯逝世纪念
九月三日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九月十八日	“九·一八”纪念
九月二十一日	第一届人民政协开幕纪念
九月二十五日	鲁迅诞辰
十月一日	国庆日
十月二日	国际和平斗争日
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纪念日
十月十九日	鲁迅逝世纪念
十一月七日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
十一月十日	世界青年日
十一月十二日	孙中山诞辰
十一月十七日	世界学生节
十一月二十八日	恩格斯诞辰
十二月九日	“一二·九”运动纪念
十二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诞辰

历史档案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河北省委员会通过，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

刘青山，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现年三十五岁，一九三一年入党。张子善，现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前天津专区专员，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现年三十七岁，一九三三年入党。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他们本是可以继续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的。可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完完全全变成党、国家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了。

刘青山、张子善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为满足其极端腐化的生活需要，竟凭藉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一百五十五亿四千九百五十四万元的巨额，藉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四十九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十四亿元之多。

刘青山、张子善等在获得非法暴利、大量贪污后，则任意浪费挥霍，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现在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三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并亲手一次焚毁单据三百七十八张。

刘青山、张子善这种违法乱纪的非法罪恶行为，自然会遭到一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指责和反对的，因此，这些人们就成为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法罪犯极端痛恨的眼中钉。刘、张二人为遂行其贪污挥霍的卑鄙企图，就采取了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党的组织和人民干部。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拚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说是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向这个同志学习"。其次，他们在组织上除极力压抑民主、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施行其家长制的统治外，凡是坚持党的原则，维护人民利益，对刘、张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他们的同志，莫不遭受其打击与排挤；凡是意志薄弱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大肆拉拢，造成一个公然行盗的小宗派集团。这个小集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又是和资产阶级分子千丝万缕地结成了不解之缘。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等反党的"组织"原则。再次，刘，张"作贼心虚"，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则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到处拉人下水，恶风所及，邪气上升，以达其腐蚀党的组织和人民干部的目的。

由此可见，刘青山、张子善已不仅仅是两个普通的贪法罪犯，两个普通的窃盗，而是像党的二中全会所预见的，他们是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向敌人投降了的，并很快地实际上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从内部来腐蚀党和瓦解党。刘青山、张子善公然责令干部，要动员党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证完成"他们剥削民工三十亿元的"任务"。他们要把天津地区的党变成贪污罪犯们的驯服的工具，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事件的特别严重的地方。这一点，也正是曾经是一个革命者的刘青山、张子善身败名裂、背叛党和背叛人民的根本原因，正是河北省的党组织必须把刘、张贪污事件作为重大教训的意义所在，正是我党必须坚决把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并交政府依法制裁的理由。

在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正确领导下，河北省党代表会议终于揭发了刘、张的罪行，并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河北党的组织的一大胜利！希望河北全省同志，接受这一痛心的教训，为开展全省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肃清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河北党的组织而奋斗。

（原载 1951 年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

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节录)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
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薄一波

同志们:

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全国逐步开展起来了。这是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同样重要的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在几千年的封建政权的废墟上新建立起来的,为着保证革命胜利和迎接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成为一个绝不可少的革命运动。我现在还没有可能向同志们报告全国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但是,只要看一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属中央一级的军、政机关从十二月十日到最近为止所初步发现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明白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向全国号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必要了。

(一)中央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

北京中央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去年十二月十日左右开始的,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运动一般有了些进展,少数部门发动群众的情况比较良好,但是,就整个情况说来,多数单位对于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还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对于运动的指导,还没有能够贯彻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针。经过毛主席的指示,从今年元旦起,对于运动不够重视和对于发动群众不够放手的情况才根本转变过来。现在可以说,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北京中央各机关已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了,在有些单位已经深入下去了。

从一个月的运动所发现的材料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已经不是个别问题了,已经引起广大的群众的愤慨了。根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二十七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人。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一个人即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七亿元,该处副处长刘玉泽受贿一亿四千余万元。中央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一百斤。现宋、刘、蔓三犯均已逮捕法办。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一九五一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五千吨汽油,另有二千吨汽油,则因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政府共投资四千余亿元,主要厂房面积达四十五亩,由于设计不周、施工不善,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现正谋补救办法。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等。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也十分严重。首先是化大公为小公的现象相当普遍,单是中央燃料工业部即达七百三十亿元,虽然其中大部分的用途是正当的,但这种行动却是违法的。从本位主义出发造假账的现象也发现很多。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副局长陆达为太原钢铁厂假造五百零三亿元的开支,陆达已因此被撤职。机关生产在过去曾经有一定的作用,现在则成为破坏财政、腐蚀干部的重要因素之一。刘青山、张子善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实行贪污浪费,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就是他们营私舞弊、藏垢纳污的掩护工具。至于专款不专用,对上级财政机关打埋伏,在生活细节上公私不分等,更是常见的现象。

贪污、浪费和违反财政纪律现象之所以相当普遍存在,是和各单位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温床。凡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也多半是贪污浪费最厉害的地方。有些领导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整天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地“签名”“盖章”,对于实际工作和群众情况,既不了解,也不研究。这种作风,对于贪污浪费当然是最有利的条件。另外一些同志,终日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但是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一些次要的枝节问题上面,不能掌握住工作的中心、问题的本质,因而仍然对于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缺乏了解,也就不能够正确地引导群众前进。例如中央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为“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又如中央财政部对全国编余人员多批了二万七千人,结果多付了四百四十八亿元。再如天兰铁路某一段的定线设计,设计工程师们设计了十三条线路,争执了一年之久,没有结果,延误工期,不能及时施工。

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教育,有些贪污分子已开始觉悟过来,坦白运动已逐渐在北京开展起来。根据政府系统二十四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经有五百五十六个人自动坦白,军委后勤系统已有二百五十人自动坦白。中央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北京、天津工商界的坦白运动,也正在开展。

许多铺张浪费、违反财政纪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已经或正在公开进行自我检讨。大多数单位负责同志对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则是空前地普遍,也是空前地深

入。

群众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性，也开始发动起来。根据政府系统十八个单位的初步统计，已经有八百二十三人参加检举，被检举的人数，根据二十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共三百二十二人。又根据军委后勤系统初步统计，参加检举者五百六十六人，被检举者三十七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监察通讯员，在这个时期也开始活跃，前说的蔓焰案就是监察通讯员石新恩同志检举的。中央劳动部的监察通讯员许义舟同志检举了该部一个负责人曾冒领经费二亿四千余万元，作为本机关改善设备和生活之用。群众性的检举运动，今后必须用一切方法开展起来。

（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性质（略）

（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北京中央各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体说来，现在基本上已经发动起来了，绝大部分首长们都作了检讨，坦白和检举运动已初步发动起来。特别在新年以后一周内，运动发展更为迅速。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运动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多数的单位运动还没有深入，也还不够普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同志自我检讨还很不深刻，因而还没有能够有效地发动群众。有些单位领导的检讨，虽然比较深刻，但中层领导干部还没有认真的自我检讨。也有少数单位，把自上而下的检讨运动停留在党内，还没有迅速和广大群众见面。另外，有少数单位、或者一个单位中的少数部门，他们觉得他们那里没有发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可能，他们还没有深刻了解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所有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必须彻底改正。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共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于最短期内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务必使这一运动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要使每一个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受到这个革命运动的锻炼和教育。凡是抵抗这个运动的人，应当和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一样，立即给以撤职处分。

根据一个月来的经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能否开展和深入的关键，首先在于各单位的首长们能否以身作则，带头检讨，只要首长在群众面前的检讨作好了，群众就一定能够很快地热烈地发动起来。首长检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均应逐级地在群众面前检讨，不能有任何例外。各级负责干部的检讨，应当尽可能迅速地和群众见面，把群众斗争的锋芒，引导到、集中到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上去，不应当在党内转小圈子。因为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问题，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要求，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更加严格的责任。党员不仅应当受党内的监督，还应当受群众的监督。个别单位在运动中发生了领导干部不团结的现象，个别负责干部对这样严肃的革命斗争加了一些私人意气进去，因而使领导同志的检讨不能在群众中起有力的模范的带头作用，反而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混乱了群众斗争的目标。这种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否则对这种问题应该负责的干部，就要受到组织纪律的处分。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总方针下，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不应该主观地限制群众运动的范围。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运动的重点在某些部分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什么弊病就应当反对什么，什么弊病最突出，群众自然要求首先反对什么，这里绝对不能限制群众的斗争。有些单位明明是官僚主义最严重，但领导同志却只许群众反贪污、反浪费；也有些单位，明明是贪污最严重，却只许群众首先反浪费；也有些单位目前只准群众反贪污，不准开展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所有企图限制群众、躲避斗争的负责人，都应当立刻在群众面前作公开的检讨，并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法。

一切贪污行为，都是犯法的，都应当按情节轻重分别受到适当处分。但是一切贪污分子，除罪大恶极者外，如能作自动的彻底的坦白，则重者可以酌予减罪，轻者可以免予治罪。如果在自己坦白之外，还能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则可视其情况将功折罪。一般贪污分子应当迅速分清是非，消除顾虑，不应当以为坦白之后即丧失了政治前途。因为贪污的本身已经使贪污分子失去了前途，如果坦白自新，仍有一定的前途。有些人怕坦白之后受处分。他们不知道贪污必受处分，坦白则视其情况可以酌予减罪或免罪。有些人怕追赃。当然，贪赃必须追还，但对坦白者的退赃办法，可以视情况酌量办理。

一切犯法的工商业者，应当限期向政府坦白。应当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必须知道：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在和国家进行交易时用各种欺骗方法盗窃国家资财，在承受国家委托加工、承受订货或承受修建工程时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作好，以及从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盗窃经济情报等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卑劣作风，是违反新中国法纪的罪恶行为，是人民政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凡属有上述犯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当据实向政府坦白，公开声明悔过，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政府对于犯法的工商业者，除罪大恶极者外，凡能自动彻底坦白的，也可以视情况酌予减罪或免罪。一切偷税漏税的行为，必须制止。已偷漏者应补充，不坦白者补交之外，并应受罚。

一切违反财政纪律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化大公为小公、虚报浮领、对上级财政机关打埋伏、专款不专用、超制度支出、公私不分等，应一律迅速进行清理，忠实地详细

地说明情况，听候处理。其中如有贪污行为者，按贪污办理。一切机关生产，应迅速清理账目，听候处理。在清理过程中，绝对不许有破坏、偷盗、分散资财、抽走人力等行为。

一切有铺张浪费行为的工作人员，应当在群众面前进行公开检讨。不仅应当揭露浪费的事实，而且应当说明浪费的思想根源，保证不再犯。

一切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工作人员，应当在群众面前进行公开检讨。情节重大者，如检讨深刻，可以减轻处分。

为了迅速地彻底地揭露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除了号召贪污分子进行坦白、犯错误分子进行检讨外，应当在全国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只有充分地开展了检举运动，才能使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失去隐避的地方。也只有在全国人民中、在所有工作人员中培养成功了检举的习惯，才能使具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的人们有所戒惧。检举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一样是一种爱国的行为。一切爱国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不应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一切爱国者应该勇敢地担负起检举的任务。政府对于积极参加检举并卓著成效的人员，决给以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检举的方法，可以根据检举者的自愿，口头的、书面的、具名的和不具名的，公开的和秘密的，都可以。检举的内容，能有完全的材料固然好，有部分的材料、甚至只有若干线索，也可以。对于一切检举的材料，政府当负责加以调查，然后根据确切的事实，决定处理办法，决不诬害好人。政府保证检举者的安全，绝对不许任何人采取报复的行动。凡对检举人员进行报复者，应受严格的处分。全国各地的人民监察机关，均应当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各机关均应设立意见箱，便利检举运动的开展。

（四）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胜利而斗争

同志们！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这个运动的性质和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我都讲过了。我现在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运动能不能真正取得胜利的问题。有人认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自古已然"，是旧中国普遍的风气，决不可能在短期内反掉的。毫无疑问，我们是承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处理。毛主席之所以发动这个运动，不但是从必要性出发，而且是充分地估计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的。首先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人民的支持。人民作了国家主人之后，人民的利害和国家的利害统一之后，根据两年多的经验，全国大多数人民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但表示不满，而且愿意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了。在新中国，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是像在反动政权下面那样，人民不能够有反对的自由。人民从两年多的经验中，已经日益相信：人民政府是站在人民方面，决心要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所以，在去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以前，已有许多群众用各种方法，自发地开始了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两年来，国家监察机关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受到群众的拥护，全国报纸的读者来信逐渐地增加了这一方面的比重，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不能容忍的表现。东北大行政区比关内早一年开始和平建设，人民对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给予国家、也就是人民本身的危害，感觉也特别深切，因而有组织有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也比关内早几个月开展起来。人民政权和人民的完全一致，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定能够成功的最主要的基础。看不到革命胜利以后广大人民政治态度的变化，用保守的庸俗的旧观点来看新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是干部的条件。毫无疑问，在这一运动发动以前，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是在不同程度上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他们没有记住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在历史向前发展的新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用，加以足够的警惕。但是，除了极少数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不可挽救的堕落分子而外，绝对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以及民主人士对于伟大的祖国、对于人民事业，从来是忠心耿耿的。在毛主席敲了警钟，指出危险，说明利害之后，他们都已经或正在动员起来了。北京中央各机关绝大多数负责首长都在群众面前公开地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批评了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表示了改进 工作的决心，就是最有力量的证明。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各级负责干部的绝对支持，这一伟大斗争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现在这一伟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还正在开始。全体共产党员，全体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切组成部分，全国的一切爱国同胞，都应当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勇敢地充满信心地为彻底消灭贪污、消费、官僚主义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斗争。

（原载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

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

一、守法户：

迄未发现有任何违法行为，本人也具结保证无违法行为，经审查结果估计无问题者。对于这类工商户的处理办法，即给以守法户通知书。

二、基本守法户：

（甲）根据本人坦白具结及政府已有材料证明，其违法所得（主要是偷漏税，或小额偷工减料）总额未满二百万元，经审查结果估计纵有隐瞒，问题不大而又性质不恶劣者。

（乙）违法所得总额超过二百万元，但情节轻微，并彻底坦白者。

对于以上两种工商户的处理办法，其违法所得总额未满二百万元者，一般免退，少数情节较重者酌退一部；其违法所得总额超过二百万元者，只令其退出超过部分；并均给以基本守法户处理通知书。

三、半守法半违法户：

（甲）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等违法所得总额超过二百万元，其违法行为除使国家、人民直接遭受经济损失以外，无其他严重危害作用者。

（乙）情节虽较严重，但在"五反"中已彻底坦白并立功赎罪者。

对于以上两种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处理办法是"补退不罚"，并给以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通知书。

四、严重违法户：

（甲）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等违法所得数量较大，又有严重危害作用者，或虽无严重危害作用，但拒不坦白者。

（乙）完全违法户，但尚非罪大恶极，且已彻底坦白，并有立功表现者，得减轻其处罚，列入本类工商户。

对于以上两种严重违法户的处理办法，除令其退出违法所得外，并按情节酌处罚金。

五、完全违法户（即极严重违法户）：

（甲）对于国家社会建设事业（特别是国防军事设施），或人民安全有极严重危害作用的盗窃犯。

（乙）集体盗窃案的组织者和大盗窃犯。

（丙）藉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牟利，使国家人民遭受极严重损失，或有其他特别恶劣的犯罪行为者。

（丁）有严重违法行为，拒不坦白或抗拒运动者。

对于以上四种完全违法户的处理办法，应予法办，除令其退出违法所得外，并按其情节从重处以罚金，或判徒刑，最重者可判死刑，并没收其财产的一部或全部。

六、关于行贿行为的处理：

除在公平交易中的小额回扣或被勒索而无违法所得不应认为行贿者以及虽属行贿但情节轻微者外，其他凡有行贿行为者，应按其情节处以罚金。拒不坦白者，应加重其罚金。情节特别严重者，应加重处刑。

七、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一九五一年的，一九五一年以前的免予补退。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其他各项违法行为和违法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算起。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转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

第一条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严惩贪污的规定，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

第三条　犯贪污罪者，依其情节轻重，按下列规定，分别惩治：

一、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一亿元以上者，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

二、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五千万元以上不满一亿元者，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不满五千万元者，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或一年至四年的劳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

四、个人贪污的数额，不满人民币一千万元者，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刑予以开除、撤职、降职、降级、记过或警告的行政处分。

集体贪污，按各人所得数额及其情节，分别惩治。

贪污所得财物，应予追缴；其罪行特别严重者，并得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

第四条　犯贪污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严重或加重处刑：

一、对国家或社会事业及人民安全有严重危害者；

二、出卖或坐探国家经济情报者；

三、贪赃枉法者；

四、敲诈勒索者；

五、集体贪污的组织者；

六、屡犯不改者；

七、拒不坦白或阻止他人坦白者；

八、为消灭罪迹而损坏公共财物者；

九、为掩饰贪污罪行嫁祸于人者；

十、坦白不彻底，判处后又被人检举出严重情节者。

因贪污而兼犯他种罪者，合并处刑。

第五条　犯贪污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从轻或减轻处刑，或缓刑，或免刑予以行政处分：

一、未被发觉前自动坦白者；

二、被发觉后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自动地尽可能交出所贪污财物者；

三、检举他人犯本条例之罪而立功者；

四、年岁轻或一向廉洁，偶犯贪污罪又愿真诚悔改者。

第六条　一切向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贿赂、介绍贿赂者，应按其情节轻重参酌本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处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并得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其彻底坦白并对受贿人实行检举者，得判处罚金，免予其他刑事处分。

凡为偷税而行贿者，除依法补税、罚款外，其行贿罪，依本条例的规定予以惩治。

凡胁迫或诱惑他人收受贿赂者，应从重或加重处刑。

凡因被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并无违法所得者，不以行贿论；其被勒索的财物，应追还原主。

第七条　在本条例公布前，曾因袭旧社会恶习在公平交易中给国家工作人员以小额回扣者，不以行贿论。但在本条例公布后，如再与国家工作人员交易中仍有送收小额回扣事情，不论送者收者，均分别以行贿、受贿治罪。

第八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或套取国家财物者，应追缴其违法所得财物，并得按其违法所得的多寡，参酌本条例第四、五两条的规定衡量其情节，酌处罚金或判令赔偿因其罪行所造成的国家其他损失；其情节特别严重的，并得参酌本条例第三条之规定，予以刑事处分，或并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其彻底坦白，情节轻微者免予处罚。

第九条　凡收买、盗取国家经济情报以谋取私利者，应按其违法所得的多寡和情节轻重，参酌本条例第三、四、五、八各条治罪。

第十条　凡应追缴的贪污财物或其它违法所得，如无法追缴时，得由审判机关或议处机关商同主管行政机关酌情予以其他的处置。

第十一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依其犯罪情节，得剥夺其政治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第十二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贪污者，应参照本条例第三、四、五、十、十一各条的规定予以惩治。

第十三条　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领导人员，凡发觉其所属工作人员贪污而故意包庇或不予举发者，应依其情节轻重，予以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查机关、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

凡对检举人施行打击、报复者，应依其情节轻重，予以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犯贪污罪者，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十六条　现役革命军人犯贪污罪者，适用本条例

的规定。

第十七条　在本条例公布后，仍犯或再犯本条例之罪者，应从重或加重处治。

第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之。

（转录《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五月号）

1952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数量	指标	单位	数量
一、总人口	万人	57482	八、国内商业		
市镇	万人	7163	1.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267.8
乡村	万人	50319	2. 社会消费品零售量		
二、社会劳动者	万人	20729	粮食	万吨	2961
职工	万人	1603	食用植物油	万吨	76.5
城镇个体劳动者	万人	883	肉猪	万头	3442.5
乡村劳动者	万人	18243	鲜蛋	万吨	13.2
三、社会总产值	亿元	1015	水产品	万吨	77.9
工业	亿元	349	食糖	万吨	47.1
农业	亿元	461	各种布	亿米	30.8
四、国民收入	亿元	589	自行车	万辆	33.5
工业	亿元	115	缝纫机	万架	10.0
农业	亿元	340	手表	万只	38.5
五、主要农产品产量			3. 农产品社会收购总额	亿元	140.8
粮食	万吨	16392	4. 主要农产品社会收购量		
棉花	万吨	130.4	粮食	万吨	3903
油料	万吨	419.3	棉花	万吨	108.7
糖料	万吨	759.5	食用植物油	万吨	98.0
黄红麻	万吨	30.6	肉猪	万头	3742.7
烤烟	万吨	22.2	鲜蛋	万吨	19.4
茶叶	万吨	8.2	水产品	万吨	91.8
蚕茧	万吨	12.3	九、对外贸易		
水果	万吨	244.3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9.4
大牲畜年末头数	万头	7646	出口额	亿美元	8.2
猪牛羊肉	万吨	338.5	进口额	亿美元	11.2
水产品	万吨	167	十、财政		
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国家财政收入	亿元	183.7
布	亿米	38.3	国家财政支出	亿元	176.0
糖	万吨	45	十一、物价指数(以上年为100)		
自行车	万辆	8.0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	99.6
缝纫机	万架	6.6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	101.7
手表	万只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	102.7
原煤	亿吨	0.66	十二、教育文化		
原油	万吨	44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所	201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73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9.1
钢	万吨	135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63.6
水泥	万吨	286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249.0
木材	万立方米	1233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5110.1
七、运输邮电			十三、卫生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762	卫生机构病床数	万张	23.1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248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69.0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1.64	其中：医生	万人	42.5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一面。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税等犯法行为，逐其少数人的私利。对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打击和铲除。同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坦白或检举其犯法行为，坚决打击资产阶级向党的猖狂进攻。在此期间，中央还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开展三反斗争。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以高度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迎接1952年》的社论。指出在这一年中，我们将完成在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生产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并提出要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国防。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中城市开始，并很快掀起了高潮。最后核实退赃款达10亿元(不包括补税)。

1月28日　周恩来签发《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强调，要大力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首先要恢复与开辟交通，增设国家贸易与供销合作社，大力组织互助合作。在贷款上，老区应列为重点之一；在负担上，特别困难的，可宣布免纳一定时间的公粮。同时要加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要拟定老根据地的工作计划，争取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

同日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连续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线阵地和后方大批地散布各种含有鼠疫、霍乱、伤寒及其他传染病细菌的苍蝇、蚊子、跳蚤、虱子等。之后，又于2月29日至3月5日，先后用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我东北领空，散布带菌昆虫，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激起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2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举行公审大会，当场宣判对大贪污犯薛昆山(原畜产公司副处长)、宋德贵(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处以死刑，对雷亚卿等五名贪污犯分别情况判处徒刑或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10日，河北省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地委副书记)死刑。

2月22日　政务院12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力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于8月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批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依自治权限，制定本自治区单行法规。依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在国家统一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计划之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可自由发展本自治区的地方经济事业。《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境内少数民族人口达10%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到10%，但民族关系显著的省(行署)、市、专区、县、区和乡(村)，都可以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权利平等的权力的决定》，规定了对分散居住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改革习惯和信仰的自由，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等等。

3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规定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者，应从宽；少数情节严重而又拒不坦白者，应予严惩。对工商户，应区别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处理的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从严。5月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的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

3月28日　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并于4月28日公布施行。《条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是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

3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

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整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

4月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布《追认罗盛教为模范团员并追授奖状的决定》。罗盛教是志愿军某部侦察连连长，1952年1月2日，他由于奋勇抢救一个溺水的朝鲜少年崔莹而壮烈牺牲。

4月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指出：在西藏，我们要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入出口趋于平衡，争取藏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4月10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发行。本卷包括毛泽东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5月打退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的著作，共41篇。

6月19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正确认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

6月24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表两年来联合战绩公报：朝中部队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2年6月15日止，共击毙击伤俘虏敌军661,034名，其中包括美军291,011名；击落击伤敌机7,323架。

6月27日　《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经政务院批准，7月17日由公安部颁布施行。《暂行办法》规定：对历史上有罪恶，解放后既有悔改表现或悔改证明，又无现行的反革命活动，虽需给以一定的惩罚，但其罪恶程度尚不须逮捕判刑者，皆依法予以管制，使其改造成为新人。对被管制的分子剥夺其选举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力。管制期限定为3年以下，必要时延长之。

6月28日　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已先后到达北京。在前往沈阳、朝鲜实地调查后，于8月10日返回北京。31日举行报告书签字仪式和记者招待会。经过国际科学家两个多月的调查，更进一步证实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6月30日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已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7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第142次政务会议。人事部孙起孟副部长作了《关于调整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报告》；教育部马叙伦部长作了《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工资及学生助学金标准的报告》；卫生部贺诚副部长作了《关于全国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的说明》；财政部戎子和副部长作了关于实行上述措施国家财政开支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批准上述报告和说明后，决定发出《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和《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的通知》。

7月25日　政务院举行第146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人事部安子文部长《关于召开劳动就业问题会议情况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全局设想，从实际出发，从长远打算着眼，从当前要办能办的事着手，逐年做到消灭失业。这是全面解决劳动就业的唯一方针。《决定》要求，中央、大行政区、省和大城市应设劳动就业委员会，并建立有专人负责的办事机构，统一办理失业人员的登记、训练、改造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他们就业。

8月7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决定撤销贸易部，成立对外贸易部、商业部、粮食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

8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3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规定》，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8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标志》的社论，指出1952年我国的财政收支已经达到完全平衡，经济恢复与物价稳定，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

8月25日～9月4日　青年团第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到会讲话，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选出了胡耀邦等9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指出，这次会议：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引导青年善于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突出的任务。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反复教育启发下，从思想原则上基本弄清楚了青年团的各级团委应该如何工

作。③明确了团的干部的作风对于工作好坏有极大的意义。

9月　除新疆、西藏及台湾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土改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的获得7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贯彻有领导有步骤、分批分期进行的指导思想；贯彻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贯彻了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组成了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从而废除了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10月14日　侵朝美军开始向朝鲜金化东北上甘岭地区的我军两个加强连的阵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在不到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美军先后投入了4个师6万人以上的兵力，动用了18个炮兵营，出动了3000多架飞机和178辆坦克，向我军阵地轮番冲击。我志愿军先后投入了4万余人的兵力，与敌人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战，经过43天的激战，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这个战役我志愿军共歼敌军2.5万余人。

10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个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11月6～17日　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加强海外组织工作，继续巩固和纯洁国内组织，中央委员会由广州迁往北京。大会选举了由31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陈其尤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官文森为副主席。

11月12日　中共中央决定省委以上建立农村工作部。其任务是：帮助党委掌握农村各项工作的方针，而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1953年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邓子恢任部长。

11月1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和省、市的领导，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构；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高等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高岗为国家计委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为委员。秘书长马洪、副秘书长王光伟。1953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任。

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的主要内容是：①精减政权层次，加强中央和省、市的领导。②调整省、区建制，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其所属县、市分别划归山东、河南等省；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其所属县、市分别划归山西、河北等省；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现属山东、安徽的原为江苏旧辖之地区，均划回江苏省；河北与山东两省过去在毗连地区互划的县分，应归还建制。

11月20日～12月4日　全国妇联召开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会前，毛泽东亲自召集全国妇联主要干部谈话，对妇女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会议期间，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作了《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章蕴作了《关于当前妇女工作的问题》的报告，邓颖超作了《关于全国妇联国际活动的报告》。会议总结了两年来妇女工作的经验，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任务是：①有计划地加强妇女群众的政治文化教育；②妇女应与各阶层人民一道为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思想习俗而斗争，扫除妇女参加生产和学习的障碍；③大力开展妇婴卫生、儿童保育工作。

12月24日　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13次(扩大)会议。会议就中国共产党提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交换意见。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对上述提议所作说明中指出，建国初期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以政协全国委员会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这种过渡时期已经过去。我国将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为着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就必须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十款所规定的职权，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到会各委员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完全正确，符合全国人民要求。

经　济

1月9日　中财委发布《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划分建设单位为"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两种投资额。"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其全部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者为甲类建设单位，1000万元以下者为乙类建设单位；"限额以下"建设单位，其全部投资在20万以上者为丙类建设单位，20万元以下者为丁类建设单位。甲乙两类设计均需经中财委批准，两类建设单位需经中央部或大行

政区批准，方能进行设计。财务预算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审核和批准，分中央、大区两个系统，投资亦分别拨付。

1 月 15 日　中财委发布《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凡已确定资金，规定了合理的生产定额与消耗定额，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基层企业和地方公营企业，在完成经国家批准的计划（生产、销售、财务计划等）后，按规定从国家的计划利润或超计划利润中申请提留企业奖励基金。

1 月 25 日　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 1952 年农贷工作的指示》，提出如下原则：①全年农业生产贷款总额为 1 亿元。在“促进组织、提高技术、发展生产”的原则下，结合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针，进行贷款。②贷款用途的重点，应用于兴修小型水利、防治病虫害药械、购买种畜、添置新式农具为主。③在地区上，应着重粮食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及经济作物区。对新土改地区、贫乏的山区及渔牧业特殊地区，应给予照顾。

2 月 8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11 日，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关于保证执行政务院决定的指示。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把防旱、抗旱和春耕工作当作目前农村中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特别是区、乡（村）应自即日起至春耕完成为止，集中力量，组织群众防旱、抗旱，保证不误农时，搞好春耕。

2 月 9 日　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聘请苏联帮助改建和新建工厂的设计情况。报告指出，两年来，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 42 个，其中东北 30 个，关内 6 个，新疆 5 个，内蒙 1 个。总投资额仅关内和东北 35 个项目估算，共需 34 亿元，其中国外订货约占 30%。报告提到，在 42 个项目中，目前已作出初步设计并已经批准的有 15 个。

2 月 25 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 1952 年农业生产的决定》，总的要求是要达到并超过战前的生产水平。大部老区及完成土地改革、生产条件较好的新区，要求超过战前水平；一般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及部分老区，要求达到战前水平；灾区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要求接近战前水平。粮食在 1951 年基础上要求增产 8%，棉花增产 20%。《决定》还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应大力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又有坚强骨干的地区，可以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老区在两年内，新区在三年内把农村 80%－90%的劳动力组织起来。

2 月 24 日　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财委和财政部门在“三反”运动中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当前必需的业务工作。中财委还决定中央贸易部立即恢复收购土产及加工订货等工作，在 3 月份增拨该部款项 3 亿元，以加强收购、订货工作。

3 月 7 日　中财委下发《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初稿），征求各地各部意见。《大纲》规定计划工作的基本任务是：①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轨道上，向着新中国的工业化的道路前进。加强国防，提高工农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促进城乡交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水平。②调整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成份，统筹兼顾，并以国营经济为骨干，领导各种经济成分向健康的计划经济前进。③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的平衡，防止国民经济的失调。④合理使用劳动力，发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潜在能力。《大纲》指出，目前应该区别不同的经济成份，区别各个不同地区，区别主要部门与次要部门，区别主要产品与次要产品，抓紧重点，分别缓急，进行计划。

3 月 12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要求各级、各系统、各单位的机关生产，一般限于本年 4 月 30 日交归国家管理。

3 月 16 日　中央农业部颁发命令，奖励 1951 年农业生产模范，公布第一批受奖名单。命令号召全国农民要很好地学习丰产模范们的先进经验，向丰产模范看齐，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胜利完成 1952 年农业生产任务而奋斗。

3 月 22 日　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发出《关于 1952 年预购棉花工作的指示》，要求棉产区合作社预购棉花总产量 40%，秋后收购。预购办法，主要采用“信用预购”，即对一般富裕农民采用信用预购，农民以其产品或现款换购合作社的肥料、粮、煤及其他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需将其生产的棉花，交售合作社。其次采用赊销预购，即对生产确有困难者预付一部分定金，把其生产的棉花收购起来。这种定金不超过全部预购总值的 10%。

3 月 31 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这项工程于今年 4 月 5 日动工，6 月 20 日完工，提前 15 天完成计划。对保证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4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降低商品牌价的重大意义》的社论。指出，最近全国各地陆续降低了大量日用百货商品的零售牌价。降价的幅度平均在 8%左右。这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重要成果之一。

4 月 25～30 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土产交流会议。会议提出今年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在上年土产交流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国内土产交流的成绩，同时要完成出口任务，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正确掌握和合理调整土产价格，稳步的向前发展。

5 月 6 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关于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必须把鞍钢的建设作为重要

任务。如果确定两点建厂方针，另一点以放大冶为宜。报告建议：目前集中力量首先进行鞍钢的恢复和改建工程，争取迅速完工；同时，抽调力量进行大冶的矿山地质、工程地质的勘测、钻探、研究工作和厂址选择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恢复与改造鞍钢初步设计的报告》。设计中规定鞍钢的生产规模为，年产生铁250万吨，钢锭320万吨，钢材250万吨，职工总数为5万人。设备总动力为51.5万千瓦。全部工程7年内完成。

5月21～6月5日　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讨论1952年财政概算，"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市场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会议指出，财政收支的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编制1952年预算要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位，行政为第三位。会议要求1952年在全国(不包括东北)商品零售方面，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应控制在25%，私营商业应占75%。会上，李富春报告了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分行业计划的提要。他说，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交通业应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如何进行五年计划建设？他提出：①基建第一，生产第二；②设计新的建设项目，掌握新的技术；③组织干部技术力量；④加强资源勘测工作。分行业计划情况如下：钢铁工业，集中力量建设鞍钢，同时建设大冶；有色金属工业，力争生产6－8万吨；煤炭、电力工业，要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机械工业，1957年生产工作母机2.63万台；化学工业，新建三个化肥厂；水泥工业，1957年产量达到547万吨；纺织工业，新增200万纱锭；新建铁路1万公里，新建公路2385公里。

6月初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示全国各区分行，在6月份内，将现行存、放款利率分别降低20%－25%。规定：对私营工商业的放款利率，由现行的月息2.4分至3分降低为工业月息1.05分至1.65分，商业月息1.35分至1.95分。②对公营企业的放款利率，由现行的1分至1.5分，降低为6厘至1.2分。③对合作社的放款利率则比照公营企业的放款利率，并予以10%的优待。④对农业生产的放款月息定为1分至1.5分，水利放款定为7.5厘到9厘。⑤对一般存款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并缩小了存放利率之间的差额。同时，停办保本保值存款和折实存款。

6月16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今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查田定产，依率定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从今年夏征开始，农业税收由中央统一收一道农业税，地方附加一律取消，并由中央统一供给乡村财政的需要。

6月20～30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讲话指出：腐蚀政府机关，危害国家建设，阻碍社会前进的"三害"和"五毒"，已被大量扫除出去。这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正当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私营工商业不是没有前途，而是比过去更光明了。我们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按照不同的情况，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10%左右、20%左右到30%左右的利润。此外，他还对规定加工订货规格，畅通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降低银行利息、纠正税收负担中畸轻畸重的现象，调整劳资关系，以及防止再犯"五毒"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

6月27日　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决定将公费医疗预防的范围，自1952年7月份起，分期推广，使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享受公费医疗预防的待遇。

7月1日　成渝铁路建成并正式通车。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祝词。这条铁路北起成都南至重庆，全长505公里，1950年6月15日开工，1952年6月中旬完工。

7月3～14日　全国合作总社召开各大区合作社主任会议。到6月底，全国社员总数已达1.06亿人，股金1.3亿元，基层社35292个。零售与收购只分别完成上半年计划的67%和68%。会议确定的工作要点是：加强县、市合作社工作和对基层社的领导，大力贯彻合作社的民主制度，加强各级合作社的计划统计工作，推行新的会计制度，试行资金和商品周转率、流通费用率，伤耗率和纯利率等四项定率，改善经营管理，将合作社工作提高一步。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改革和整顿供应和推销工作的两个决定。

7月8日　中共中央关发出《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根据产品供销情况的不同，分别地、具体地规定各厂矿企业的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凡原材料足、销路好的企业，应首先注意增产，并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从节约原材料中争取增产；凡销路和原材料都有困难的企业，应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

7月上旬　中央贸易部召开各大区贸易部长会议。会议确定，下半年的工作方针是：以活跃市场，准备长期建设为中心，进行思想、组织、制度的建设，扩大城乡、内外交流。其具体任务有：①大力收购农产品，积极推销工业品。②合理的调整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和季节差价，要求今年秋后物价总指数稍提高一点。③继续开好各种类型的土产交流会议，进一步活跃城乡经济，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并做好土产出口工作。④检查与贯彻公私关

系方面的既定政策，研究与确定加工订货的规格，标准与工缴费，维持目前零售方面的公私比重；各种证照应加以检查，采购证一般不宜使用，以便私商下乡采购。

8月6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6次会议听取并批准了薄一波《关于1952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1952年预算收入和支出均为158.8亿元，比1951年收入增加41.7%，支出增加55.5%。在预算收入中，城市税收占44.3%，国营企业收入占23.3%，农业税收占12.3%。在预算支出中，国家建设费占49.3%，国防费占27.9%；行政管理费占14.3%。薄一波强调，努力发掘经济潜力，反对保守倾向，建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是能否正确实现1952年国家预算的关键。

8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受灾农民农业税减免办法》，规定：凡农作物因水、旱、风、雹、病、虫及其他灾害而致歉收的受灾农户，应减免其农业税。对歉两成以上者，依其受灾轻重，分为五等进行减免。并规定：政府人员匿灾不报或勘报不实者，应酌予处分；农户虚报灾情者，除查明纠正外，并按逃避农业税的规定，酌处罚金。

8月25～9月5日　合作总社召开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指出，一年来各地合作社经整顿后，社员人数虽由1951年的26万人减到20万人，但合作社的质量提高了，组织纯洁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会议决定，合作社今后应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和大工业生产不足的产品，尤其要组织特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出口。

8月31日　本月内，中财委颁发《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财委提出，今后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五年建设的方针是：①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②工业的速度，在可能条件下应力求迅速发展。③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应结合目前实际情况。主要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8%。工业总产值增加156%（即每年递增20%强），农业总产值增加53%（即每年递增8.9%）。工业中的公私比重1952年为67.3:32.7，1957年改变为79.5:20.5。财政收入1352.5亿元，总支出1360.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505亿元。其中工业占58.5%、农林水占15.6%，交通建设占19.2%，其他占6.7%。新建铁路12,323公里，修建公路17,877公里。煤矿工业年生产能力达9,321万吨。电力工业设备容量达445万千瓦。

9月1日　锦（州）承（德）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全长340公里。

9月9日　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发出《在全国机械工厂中开展生产能力查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工厂应根据重工业部印发的《机械制造厂生产能力查定法》，在10月10日以前完成查定工作，以适应即将布置的1953年年度计划编制的需要。

9月15～10月4日　中央商业部召开全国百货专业会议。根据中财委指示，该部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并确定今年第四季度先在百货系统实施示范。会议讨论了百货系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体方法和实施步骤，主要是：①分别不同情况，采取采购与分配，供应与批发相结合，零售与批发分开的原则，设置管理和经营机构。②在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的原则下，根据各级经营业务，暂划分为中央、大区、省（市）三级，并将资金直接核定于经营单位。③在商业部统一领导下，各级百货公司和采购供应批发站除受直属上级公司领导外，并受各该级商业行政部门的领导。

9月18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区1952年夏季物资交流的总结报告》时指出：有些地方，由于盲目扶持和迁就私商，致使某些私商又故态复萌。个别地区在交流中还发生私商围攻合作社，违约压价收购以及投机居奇等现象。所有这些，均应及时注意加以纠正。

9月29日　天兰铁路全线通车。天兰铁路西起甘肃省天水市，到达甘肃省会兰州，全长247公里。全线桥涵1000多座，土、石隧道40多孔。由于全体筑路工人和民工的努力，终于提前10个月完工。

9月21日　中财委召开1952年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主要讨论了1953年的财政概算，并结合研究了整顿乡村财政、扩大税源、市场情况、公私关系和价格政策等问题。中共中央在听取会议汇报后，原则上同意1953年财政概算的安排，并指出：对需要增加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项支出，要排排队，军费不能再加；不发公债，以减轻公教人员和农民的负担；1953年实行周转税，同意取消工资分；大区财政不作为一级，从1953年1月1日起改为中央的监督机关。

9月29日～10月5日　中央商业部、外贸部联合召开各大区贸易部长会议，讨论了如何具体执行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的决定。会议决定，从第四季度起，对目前国营贸易积压的价值20万亿元的商品，逐项加以处理。由于国际市场物价下落，对出口不利，会议提出两个办法，一是适当调高外汇牌价；一是加强进出口公司，并对私商加以组织，采取联营形式。经10月16日中财委抉择，决定先采用后一办法，如以后还有必要，再考虑调整外汇牌价。

10月6～21日　中央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1953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是：组织起来，推广科学技术，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丰产运动，以大力增产粮食、工业原料作

物，外销物资、畜产和水产。1953年要求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民达到60%（1952年预计为40%）；农业总产值为506亿元，比1952年增长12%。

10月10日　中财委颁发《1953年对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分配办法》规定：凡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经部或省市统一组织加工订货而生产的电力等35种产品，及贸易部门按国家计划统一进口与收购的物资，均由中财委统一分配，分别由各该主管部统一销售。凡需用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企业部门，均应按照其生产计划与基本建设计划以及原材料消费定额，核算其全部需要量，逐级审核汇总，向中财委统一申请。市场物资由商业部根据全国市场情况，做出市场销售计划，统一申请。

10月17日　塘沽新港开港。1951年8月政务院决定正式修建塘沽新港，经过15个月的努力，提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万吨轮船可乘潮入港。

10月22日　中财委讨论1953年的基本建设问题。陈云指出，1953年将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年，基本建设工作将在整个国家建设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工交部门必须确立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决心调集人员建立各部的专业设计和施工组织。根据上述精神，中财委于11月9日发出了《关于迅速准备基本建设的指示》。

10月25日　周恩来在同资本家代表人物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总的来说，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就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

11月3日　中财委下达1953年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贸易控制数字。主要为：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主要产品产量：生铁218万吨，钢166.5万吨，发电量88.95亿度，煤6,822万吨。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8.3%；粮食16,829.4万吨，棉花150万吨。国营贸易国内收购商品总值增加17.5%，销售总值增加43.1%。国营出口总值增长60%；进口总值增长23.4%。财政基本建设总的控制数字为76.6亿元，比1952年增长75%。重点是工业部门，共投资39.3亿元，比1952年增长150%。水利投资5.7亿元。根据基本建设控制数字所列内容，1953年限额以上建设单位有492个，其中300个是全部新建的。

11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决定对公私商业进行调整。调整办法是：①合理地调整价格，贯彻产、运、销兼顾的政策。国营商业应适当扩大批零差价，并提高批起点。对农产品，应规定适当的比价。②适当地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应以批发业务为主，零销商品以稳定市场物价为准。③要取缔妨碍正当私商畅通城乡交流的各种不适当的限制，但也要防止私商投机倒把。

11月17日～12月8日　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1953年地质勘探计划。这个计划规定钻探、地质、地形测量超过1952年10倍，槽探、洞探超过23倍。确定办好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和6所中等技术学校。

11月下旬　中财委与全总联合召开国营企业工资工作会议，讨论了国营企业工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主要是：①废除工资分，实行货币工资。②在调整工资标准时，急需发展的重要的企业可多加工资，一般的企业少加工资。③建立与生产特点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工资等级制度，对职员逐步建立职务工资制。④大力推行或改善计件工资制度与计时奖励工资制度。⑤从1953年起，取消年终双薪。⑥调整工资时，实行以产业部门为主，照顾地区的原则。会议还分别拟定了《关于国营企业调整工资的决定》等7个文件草案。195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原则同意这次会议关于工资改革的几项意见。

11月29日　中财委向中央报告关于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已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降低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但运动发展不平衡。为了使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中财委认为，必须加强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改良生产技术，注意工人安全福利，改善劳动条件，实行计划管理，为今后推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12月15日　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统计工作，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建立科学的统计制度。今后颁发调查表格或统计表格，必须经过一定批准手续；各级党政机关所需经济统计资料，由统计机构供给；统计机构必须建立经常的统计制度和统计工作。会议确定了《1953年全国统计工作纲要》，拟订了《各级统计机构组织通则》。1953年1月8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12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①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从事国家经济建设，这是制定计划的出发点，并且要以此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②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重点，集中资金和有限的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决不能把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建设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③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反对保守主义。④必须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并以平均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作为制定计划的标准。⑤必须广泛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以提高计划的科学程度。

12月23日　中财委召开会议讨论基本建设准备工作问题。中财委指出，从现在到明年第一季度，应该抓紧三个环节进行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即加紧进行勘察设计工作，组织与训练施工力量，进行工程材料的准备与运输。当前工作的重点是设计。

1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这个厂的经验是：①建立了各方面正常的工作关系，生产行政方面实行厂长负责制，定期召开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向职工代表会报告工作。党组织用加强思想领导的方法，保证实现生产计划。工会在党领导下组织群众的生产竞赛，注意改进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②贯彻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③实行了严密的组织制度。社论指出，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是十分切合时宜的。

外　交

1月25日　外交部就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和驱逐我国居民事发表声明。1月10日上午，香港英国当局先后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分别包围居留香港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马国亮、齐开韶、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8人的住所，并将他们分别押解出境。九龙东头村于11月21日发生火灾后香港当局不但拒绝救灾，并出动警察逮捕大批灾民，抢走各界人民运来的救灾衣物。香港当局还纵使蒋介石集团分子从港九地区潜入我境内进行破坏活动。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立即制止这种暴行。

3月21日　我国致力和平的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人，联合发电建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发表了《发起书》。6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筹备会议，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宣言》和《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的提议》。10月2～1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并通过了这个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

5月5日　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顾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亲手签字的一系列国际协定中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竟自行宣布它所一手包办的非法制定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并专横独断地解散远东委员会和对日委员会，这是完全非法的。由美国强迫日本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和平条约”，是企图以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周恩来外长声明发表后，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分别于9日、10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

7月13日　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承认1925年〈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的声明》和《为承认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各公约的声明》。这两项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1929年8月7日以中国名义加入的、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和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以中国名义签字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公约》的审查，认为上述议定书和各项公约，有利于或基本上有利于国际持久和平，并符合于人道主义原则的，因此，决定予以承认。声明同时指出：对于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各公约的某些条款提出了保留。

8月17～9月22日　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苏联政府领导人举行谈判，讨论了有关中苏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9月16日发表谈判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及两国外交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上述《公告》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的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末移交完毕。9月15日，两国外长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协议将苏联军队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的期限，延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

10月2日～次年1月11日　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0月8日刘少奇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祝词》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

10月28日　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发表《再度严重抗议英国政府劫夺我国两航留港飞机的声明》。指出：英国政府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留港的资财，绝对没有任何权力行使其管辖权，也

绝没有丝毫权力加以侵犯、损坏和转移。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其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非法行为。

12月21日　周恩来外长电告联大主席，严重抗议美国在蜂岩岛的罪行。1952年12月14日，美国军队在峰岩岛战俘营制造了打死朝中方面被俘人员87人，打伤120人的大屠杀案。全中国人民对此暴行表示极端愤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野蛮暴行，严惩负有全部责任的美国官员。

12月31日　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的签署仪式在哈尔滨举行，该铁路的中苏共管于今日结束。中国铁道部把原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这条铁路原是沙俄于1897～1903年所建，长2,400公里，称“中东铁路”。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完全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文化教育

3月13日 苏联部长会议颁发1951年科学和文学艺术斯大林奖金。我国作家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等荣获此项奖金。丁玲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贺敬之、丁毅获奖作品是歌剧《白毛女》。

5月19日　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辅仁大学由原为罗马教廷于1925年开办的辅仁社发展起来的，解放前有文、理、教育三个学院。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6月中旬　中央教育部着手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到9月下旬基本完成。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调整工作以华东、华北两大区为重点。经调整后，华北全区共设41个院校，华东全区共设54个院校。

6月20～2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荣高棠在会上作了《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体育工作的方针：在现有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积极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而服务。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选举朱德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

6月21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查禁京剧本〈引狼入室〉的指示》。指出：此剧所引起的效果只能使人愤恨满清统治者的引狼入室，面对英帝国主义处心积虑的侵略企图认识不足。对于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英雄气概毫无描写。剧本充满了下流的低级趣味。这个剧本实质上是反爱国主义的，立即通知各地停止上演与停止其剧本之发行。

7月8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的通知》，决定将学生的公费一律改为人民助学金制，并对原有人民助学金的标准作适当的调整。各级人民助学金的评定，应依据现在所颁布的标准和具体情况，由全体学生自报公议，民主评定，最后由学校批准。

7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下达1952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方案。1952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全国共有27,644人，全部统一分配。其中安排到工业、运输、邮电、水利等部门12,828人，农林、财贸、劳动、政法、卫生等部门7,661人，助教、研究生2,657人，医科师资400人，中等师资3,742人，另外分配到私营企业356人。

10月6日～11月1日　中央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演出的有1700多人；有京剧、评剧、秦腔等23个剧种，节目共有88个。大会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改革方针指导下，总结了三年来全国戏曲改革工作的经验，奖励了优秀的剧目和戏曲工作者。

11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的社论，就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圆满闭幕指出，这次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戏曲遗产的丰富。而戏曲艺术如何正确地、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更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应该把传统的优秀剧目和优秀的表演艺术加以整理而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必须用极大的努力，组织剧作家、诗人和音乐家，在民族戏曲的基础上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力更强的新戏曲。

12月1～11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广播事业局召开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作了《1953年广播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1953年广播工作的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中央台的基本建设，并训练一批基本建设干部；逐步撤销各大行政区广播台和合并一部分城市台，调整人力，精办节目，以提高中央台和省、市台的工作质量。会议特别研究了精办广播节目的问题。最后由梅益作了总结报告。

12月8～13日　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为大会作了报告，提出卫生工作要同群众相结合才能很好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3年

导 言

一九五三年是新中国新起点的一年。在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二年由毛泽东提出设想，即：10年之后，私营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将只占不到10%的比重，可以不费力地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组织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全国基层选举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由33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三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随即在全国各地掀开了大规模的基层普选活动，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同时，为了发展经济，使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占着领导地位。于本年开始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核心，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力开展。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作出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了一个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过程，在全国普遍地展开。同单干比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耕畜、农具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朝鲜战场上捷报频传，在中朝军队的强大攻势前，美军不得不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规定双方十二小时后武装力量停止敌对行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胜利，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它们利用各种渠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公安机关与之展开了坚决斗争，破获了两起间谍特务案，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同时，在党内也同各种违法犯罪事件及反党分子做坚决斗争，中共中央华北局纪检委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就是明证。

总之，一九五三年是不平静的一年，是新中国前进的新起点。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选举法》的通过及普选的开始和基层代表大会的召开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 ●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力开展
- ●上海破获两起间谍特务案
- ●中共华北局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
-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背景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大量任务，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并且由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稳定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局势。我国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力援助下，进行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在全体规模上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规定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材料：

·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材料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党长时期内探索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果。

早在3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论证中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时，就预言：在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以后，我们即可以“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40年代初，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到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作了全面的分析。明确地提出，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后，党的任务就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决议并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在建国前后的实践探索中党又逐步明确了实现这一转变的具体途径。

1950年6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讲到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和条件问题时，指出：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对此，刘少奇在同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解释，他认为，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就成为一个有强大工业和强大农业的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考虑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还不能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十年后，也许可以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步骤，也许还要等几年。

总之，根据当时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讲话，大体可以看出党中央的设想是，用大约10年——1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事业，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建设，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使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

本主义有一个发展;通过供销的信用的和生产的合作社把个体经济同国营经济联系起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繁荣兴盛之后,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使我国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建国前后,党中央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195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经验,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分析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和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越来越明显,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愈来愈尖锐。根据这一分析,同时考虑到我们已积累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相当经验,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将它们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农村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的农民,其中大部分贫下中农由于缺少其它生产资料,必然要去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出卖土地,而另一部分富裕的农民会发展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为了避免产生两极分化,同时为了帮助农民抵御自然灾害、兴修水利、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应该引导农民逐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基于上述的认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原来准备在完成国家工业化之后再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的构想作了重要改变,即从原来的"先建设后改造"改变为改造和建设同时并举,以原来的"一举进入"改变为逐步改造。提出了要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逐步改造的新构想。

根据新的构想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和贯彻,经历了以下的过程:1952年9月以后,首先经毛泽东提出,并在中央和有关的少数人之间进行酝酿讨论。在9月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等到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从那时起即"逐步过渡"的思想,是根据于毛泽东同中央的一些同志当时这样的设想,即:10年之后,私营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将只占不到10%的比重,可以不费力地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10至15年可以将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基本实现集体化。这一设想,毛泽东在1953年2月视察工作时,也向湖北孝感等地委同志解释过,但当时未向全党传达。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6月15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当即被政治局接受。至此,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告形成。这条总路线,明确地规定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目标和具体途径。

这条总路线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大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用社会主义工业化吸引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胜利;同时,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计划建设的实现。它体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相应地变革生产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反映了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另一个特点是逐步过渡,这是从我国经济落后的实际状况出发所采取的灵活的政策。所谓逐步过渡,是指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采取逐步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而在过渡的时间上采取分阶段的逐步过渡的办法。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讲过"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非常正确的。实践证明,要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是不适宜的。

总路线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和平改造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国策,这是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这是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具有中国特

点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法。这一方法在理论上实践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3 年 9 月，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组织讨论，征求意见，统一认识。9 月 2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表的国庆四周年口号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

为了系统地向全国人民进行总路线宣传，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12 月 28 日转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对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准确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提纲对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通俗系统的解释。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社会性质、社会经济构成和政治结构，既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在这个社会内，社会主义因素的优越性和它所占的领导地位，加上苏联的援助和有利的国际形势，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提纲进一步论证了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和目标。着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指出，只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可以促进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现代化；才可以保证逐步完成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改造；才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才可以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有把握地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国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发达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提纲最后明确指出，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胜利实现。

宣传提纲的公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思想上明确了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具体途径，极大地鼓舞和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1954 年 2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从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纲领。

《选举法》的通过及普选的开始和基层代表大会的召开

背景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第二条)三年以前国家刚刚开始建立，许多革命工作还在开始阶段，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不成熟。三年来，全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工矿企业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和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恢复了工农业生产，争取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及时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就成为当务之急。

材料：

-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材料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第二条）三年以前，国家初建，许多革命工作还在开始，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故当时根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的规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三年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矿企业民主改革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改革，进行了胜利的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坚决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肃清了残余土匪；特别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稳定了物价，恢复并提高了工农业生产，争取了国家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使人民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为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准备好了条件。今后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一方面继续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方面动员、组织和教育人民来实现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为此，必须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及时地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会职权的形式；用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俾能进一步地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以适应国家计划建设的要求。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现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的规定，决定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为了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的工作，并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为委员组成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以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奚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廷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为委员组成之。以上两个委员会应即制定自己的工作程序。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背景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大量任务，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且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系列胜利，稳定了远东和平局势。我国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2月4日至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决议》。决议一致同意周恩来副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会议认为，中国人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加强国防力量，粉碎美国侵略者对于朝鲜和我国的任何新的侵略阴谋，以争取朝鲜问题和远东其他有关问题的合理的和平解决；二，集中力量，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国防建设计划和社会文化建设计划，为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良好的开端；三，积极准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会议号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和国外华侨，在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结成更巩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致动员起来，为胜利地完成上述三大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前讲话，提出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材料：

·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材料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巩固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使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占据着领导地位。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开始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一五计划是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要求，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经验，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主持制定的。1952年6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在此基础上，由各地各方面充分酝酿和补充修改，最后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且颁布实行。

一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围绕这些基本任务，提出了12项具体任务。

一五计划的中心，是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五年内国家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支出766.4亿元，工业部门为313.2亿元，占40.9%；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工业部门为248.5亿元，占58.2%，这些资金集中用于新建和扩大技术先进的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等机器制造业。这些重工业新建设项目的完成，将改变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270.1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535.6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7%。国营工业每年平均递增18.1%。

一五计划提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达32.6亿元，用于发展农业的全部资金将达184亿元。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3%。粮食产量(包括大豆)由1952年年产3278.3亿斤，增加到1957年年产3856.2亿斤，平均每年递增3.3%，棉花由1952年年产26.1亿斤，增加到1957年年产32.7亿斤，平均每年递增4.6%。逐步克服农业过分落后的现状。

一五计划规定，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五年内，国家用于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基本建设经费为143.7亿元。五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家机关需要补充各类高等和中等学校毕业的专门人才共约百万人左右；同时，中央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林业等部门，也需要补充熟练工人约一百万人。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国家将有计划地调整、扩大和开办各类高等和中等的专业学校。到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生要达到43.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生要达到67.2万人，普通中学的学生数要达到470.4万人，并且要充分利用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训练培养各项建设人才。

一五计划规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邮电和商业。五年内国家对运输和邮电的基本建设投资为82.10亿元。迅速发展铁路、水运、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使主要运输部门的运输量和周转量得到较大增长。国家注重国内商业的发展，到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98亿元左右，比1952年增长80%左右。同时发展对外贸易，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物价。

一五计划规定在生产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五年内，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33%；农、副业的产值增长23.3%，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的产值增长12.2%，农民的收入增长近30%，农村人民的购买力，1957年比1952年将提高一倍。五年内，就业人数增加约420万人。病床将增长77%，医师人数将增加74%，人民保健事业将有较大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22.9%，人均占有的粮食、肉类、食油、棉布、糖类等主要消费品的数量都有较大提高。

一五计划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积极地、稳步地对农业、手工业化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要求参加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总农户的三分之一左右；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将达到210万人，比1952年增加8.6倍；把私营工业的大部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一半以上的私营商业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社商业。

一五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大步骤。这个计划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实现这个计划，将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奠定初步基础，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贫穷落后的面貌。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将更加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进一步改善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大事，有利于人类进步和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利于我国朝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迈进，这是一个实施经济文化建设的和平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第一个战略规划。

一五计划建设的规模是巨大的。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巨大数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可能这样做。

一五计划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积极而慎重地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投资比例和各项指标是切合实际的，规定的建设速度是合理的。计划规定：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6%，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4.7%，生产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7.8%，消费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2.4%；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3%，粮食产量每年递增3.3%，棉花产量每年递增4.6%。

五年内，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26.7%上升到1957年的36%。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39.7%上升到1957年的45.4%，消费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60.3%下降到1957年的54.6%。在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国营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以每年递增18.1%的速度增长。基本建设进展顺利，五年内，全国完成投资总额550亿元，工业建设项目一万多个。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大大地增强了基础工业的实力。从地域来看，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基本形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华北、西北、西南以及河南、湖北等省，也开始建成一批新的工业企业，初步改变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局面。

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良好，全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生铁、钢、钢材、水泥、发电量、机床、棉纱、棉布等二十七种产品产量提前一年完成。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运输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五年内，新建铁路三十三条，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通车，1957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一倍。工业技术基础得到加强，知识分子队伍扩大，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在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第一，清醒地估计形势，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的关系，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从实际出发；第二、搞好综合平衡，把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结合起来，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第三、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经验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虚心学习外国的经验和技术，积极引进，为我所用。既要反对依赖和照搬外国的一切，又要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第四、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和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

一五计划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五年计划。

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力开展

背景介绍

在对中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合作制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定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的原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把个体农业经济基本改造为集体所有合作经济。建国初期，在新老解放区，广大农民为了克服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和经济力量薄弱的状况，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在生产实践中，开始进行必要的互助和协作，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即已开始出现。当时称之为变工队，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一种方法，它明显地提高了生产力。建国初，广大农民继承了这一形式并加以改进，成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其特点是：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有，实行个体经营，在组内进行换工互助，或共同使用某些生产资料。互助组分为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的临时互助组，和成员比较固定的常年进行换工互助的常年互助组，后者有少量的公共财产。互助组较单干优越。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耕畜、农具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是农民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渐兴起与深入，农业生产互助组被初级农业合作社所代替。

材料：

- 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制定
- 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材料一　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制定

土改以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土改后个体农业拥有的生产工具严重不足，生产资料也十分缺乏，不少农民在生产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据对23个省的15432个农户的调查，1954年平均每户占有耕畜0.64

头，犁0.54部，水车0.1架。在资金方面，平均每个农户一年购买商品的货币支出，贫农为135.5元，其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占77.6%，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占22.4%，而直接用于买生产工具的，只有3.5元。中农为208.4元，其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占61.7%，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占38.3%，直接用于买生产工具的也只有7.6元。个体农业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生产工具和资金严重匮乏，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由于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和经济力量的薄弱，决定它不能兴办较大的农田水利建设，来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因而它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如遇天灾人祸，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个体农业经济的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经济，能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能办他们难于办到或办不好的农事，解决单门独户难以解决的困难。如通过互助合作，能进行必要的互助和协作，对某些生产要素，生产环节作合理的调节和安排，解决贫下中农因缺少大农具、牲畜等在生产中的困难。能兴办较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实行分工分业，开展多种经营。而且随着合作经济的逐步壮大和发展，还有条件接受社会主义工业在农业机械和其它技术方面的支援，创立新的社会化的生产手段。因此组织起来的合作农业，在农村生产技术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比个体农业更能发挥原有生产要素的作用，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农业产量，有利于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据农业部对东北、华北40个初级社的统计，1951年这些合作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单干户产量的39.3%。福建龙溪地委对四个县的五个社、五个互助组、五个单干户的调查，1953年早稻收成情况，初级社平均亩产量526斤，互助组420斤，单干户390斤。由此可见，土改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反映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工业所需的商品粮和相当一部分原料，依靠农业提供。据统计，1954年以前，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品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0%，占轻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1953年，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要求农业有计划地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但当时的个体农业，满足不了这一要求。

个体农业生产水平和商品率都很低，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商品粮和原料。而合作农业不但能比个体农业提高生产水平，而且商品率也比个体农业高。据国家统计局对25省1.6万多个农户调查，1954年贫农个体农户粮食商品率比社员低18%左右，中农个体农户比社员低5%左右。因此，合作农业比个体农业更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另外，农村两极分化对贫农经济地位的威胁，使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表现为高利贷、雇工剥削、租佃和买卖土地。据1952年华北局调查，在8个村中借债户占总户数的23%，比银行借贷面还要宽，借钱月利高于3分，借实物月利高于5分。又据吉林省调查，春借粮1斗，秋还2斗，借钱月利一般在10%左右，高的有30%。土改后，农村雇工剥削逐步增长。据1952年华北局在山西省7县22个村的调查，雇长短工者475户，占总户数20%强。据山东调查，如以土改前雇工总日数为100，则1950年为20，1951年为28，1952年为29。农村中租佃土地者，也逐渐增多。据1952年热河省对6个村的调查，1949年有34户，共出租土地128亩，1952年有122户，出租土地791亩。土地买卖也越来越多。据山西静乐县19个村的统计，有167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有471户新中农也下降为贫农。两项占农村户数的11%。这些下降户中有6～10%的农户成为赤贫户。农村的阶级分化，一方面表现这一些农户因无力抵御天灾人祸而破产，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富农的出现。据湖南省对9个乡的调查，从土地改革后到1954年，富农户数占总农户比重的变化是：土改时为3.2%，1952年为3.4%，1953年为3.6%，1954年为3.7%。据1952年东北局的调查统计，全东北有10%左右的农户成为新富农。这些新富农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在增加，因为它适应小农经济自发地发展的规律。如果听任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展，破产的贫农将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满，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富裕农民也会对国家不满，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

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将破坏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分散的小农经济是无法纳入国家计划的。小农经济自发地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土改后的一些农村里，由于一时放松了对农民的教育，对农村经济放弃领导，不少农民弃农经商。四川奉节县朱衣乡1953年秋收时有330多户放下生产做买卖。当时芝麻上市，他们在20天里收购了8万多斤并进行加工，趁合作社缺油时以高价出售。由于商业利润普遍高于农业，农民中自发地弃农经商，将使农业不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更趋尖锐，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将难以实现。在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前，农民中有囤粮拒售，甚至一些共产党员也拒绝将余粮卖给国家的情况，这些情况集中地暴露了小农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只有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直接同国家建设计划相联系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才能割断农民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实现他们与国家的联系和合作，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农民集体所有

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党确定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子恢曾经指出："不改造，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的。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方面从流通领域组织起来，并切断农民同资本主义的联系，使农民摆脱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和影响。其办法是实行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实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另一方面从生产领域组织起来，逐步将农民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摘自《党史导读》）

材料二　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大大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向前发展。1953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个别试办发展到在全国农村普遍试办的阶段，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4万余个。但在大发展过程中，在部分地区曾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贪多贪大，追求高级形式和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命令等。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在3月份短短的一个月内，连续向全党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队的指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等，以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1953年4月，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等三个文件，并且将这三个文件以《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全国。毛泽东专门为这本书的发行代中央写了通知，通知指出：这三个文件，"揭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认真学习，求得在思想水平上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胜利。

三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必须正确认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这两种积极性都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根据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一亿户个体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应该充分了解农民小私有的特点，决不能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生产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在现在发展农业生产事业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二、要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要使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积极稳步地推广农业生产的各种临时互助组织和常年互助组织，试办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互助合作形式是将农民逐步引向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必要过渡形式。但它在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性质。在组织互助合作社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经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渐进，任何急躁冒进都会挫伤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一个农民会相信强迫他们或侵犯他们利益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社可以在未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同样，只有用事实向农民证明，举办起来的互助合作组织，生产确实是增长的，个人收益确实有所增加，农民才会喜欢这些互助合作组织，才会推动这些组织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反之，如果互助组和合作社有无人负责的浪费和破坏现象，生产降低，或者生产多而分红少，不能得利，反而负债，就会使已参加者失望、动摇或要求退出，未参加者望而却步。因此，要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

三、发展农业生产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中心，衡量农业互助合作社办得好坏的第一个标准是是否增产。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各级党政部门应该积极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解决牲畜、农具、种籽、肥料等困难，政府应发放农贷和组织技术支援，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减少自然灾害（水、旱、虫灾），发展供销信用合作事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只有切实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了，才能促进农业互助合作的更好发展。

此外，文件还指出，在当前情况下，农村中存在一定的自由借贷、农村集市、自由贸易，和雇工自由、土地买卖、租佃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容许的；富农的发展是受限制的，但完全排除富农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对生产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在中央统一认识和得力措施的指导下，各中央局和省市委积极努力，很快对农村互助合作社作了认真的整顿和大力的帮助，使这次"左"的偏向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上海破获两起间谍特务案

背景介绍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少隐藏在宗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作为掩盖，从事间谍、特务活动，与人民为敌，进行反革命活动，为此我公安机关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材料：

- 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的破坏活动
- 肃清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

材料一　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的破坏活动

上海破获两起间谍特务案

广大人民和爱国教徒展开反帝爱国斗争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经过长期周密的侦察，在三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先后破获了两起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破坏活动的间谍特务案，逮捕了主从犯二十余名。经过详细的审讯，由于罪证确凿，各犯均无可抵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根据各犯罪情的轻重分别依法予以惩处。上海和华东许多城市的人民和爱国天主教徒，对帝国主义的这一卑鄙恶毒的犯罪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恨，一致拥护人民政府的严正措施，决心继续协助政府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危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损污天主教会的间谍特务活动。

三月二十五日逮捕的有主犯田望霖（Alain De Terwangne，天主教神甫，比利时籍）、林仁（Clement Renirkens，比利时籍）和从犯八名。田望霖和林仁都是以天主教神甫名义为掩护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田望霖在一九四八年来上海，原是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心腹。黎培里在中国控制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进行反动活动时期，曾派田望霖为组长；黎培里被驱逐出中国国境时，留给他两千元美金作活动经费；去年黎培里还给他秘密传来“指示”。上海解放不久，田犯即接替了被驱逐出我国国境的帝国主义间谍才尔孟的罪恶活动，勾结林仁，潜伏在天主教海门教区驻上海办事处，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开始到破获时止，长期进行着间谍活动。田、林两犯经常刺探我国各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机密，汇集编成情报后，用各种密码、密写发往国外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先后共有三十份，取名为“MEMENTO”。情报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一九五二年四月，田犯曾派本案从犯师保禄赴河北省保定市，以开办工厂为名，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师保禄是他们最看重的的爪牙之一。师犯在保定曾勾结了帝国主义分子平静修（已被逐出国境）和圣母军分子多人进行反动活动。田、林两犯并以金钱引诱等卑劣手段，欺骗和勾引青年教徒刺探情报，散布谣言。林仁曾先后给向明中学教徒学生吴宝昌二十四万元，要吴刺探情报，甚至要他“准备坐牢为主殉教”。田、林两犯自知罪行严重，平日行动极为诡秘。他们在住处布置了一个“小圣堂”，以掩护其罪恶活动；并预作布置，准备破案后，有人接替其破坏工作。田犯曾把两千美元、密码字典和国外联系地址等先后交给本案从犯林鸣奎，并嘱他在案破后继续进行间谍活动。田、林两犯把师保禄也列为“继承人”之一，田望霖把国外情报站的地址告诉师保禄，要师犯在他们“离境后继续报告”，并嘱师犯要“坚持下去，等待美蒋反攻”。上海市公安局根据长期的侦察与群众的检举，证明全部材料属实后，于三月二十五日一举破案。田犯所布置的警铃、警灯、重重门锁都失去效用，公安人员当场找到这批间谍特务分子的罪证：第三十号情报底稿、大量美钞、密码本、化学药水、国内外情报网地址及来往信件等等。

继田望霖、林仁间谍特务案破获之后，六月十五日，上海市公安局又破获了另一起以宗教为掩护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案，间谍特务分子翟光华（Charles Joseph McCarthy，美国籍，耶稣会神学院院长）、斐有文（Thomes Leonard Phillips，美国籍，帝王堂神甫）、葛怀仁（Joseph Patrick McCormack，美国籍，玛利诺会办事处负责人）、格寿平（Fernand Lacretelle，法国籍，耶稣会会长）、梅占元（Joseph Jean Deymier，法国籍，远东遣使会总视察）等十三人被逮捕。当场搜获手枪、左轮枪、盒子枪、手榴弹、各种子弹，及破坏了的电台、枪支零件，蒋匪党国旗、军事地图、收报机，气象测量计以及大批情报资料。并搜获在这些间谍分子主使下所窃取的我国家机密文件多件。根据缴获的材料证明，这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曾长期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解放前，梅占元等曾通过浙江省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搜集当地人民游击武装的情报，解放后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他们曾向外国特务机关报告蒋匪空降特务及美机散布细菌后的效果。这些间谍特务分子还利用教堂及其住所，包藏反革命分子，资助美蒋特务。上海解放后，潜伏在上海的美国间谍分子即长期以帝王堂作为联络接头之所。蒋匪毛森系潜藏在上海的武装特务、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皖区独立纵队”第二支队第四大队长邓习佩（已被逮捕），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就曾得到斐有文等的资助。反革命罪犯范泽生被帝国主义分子隐藏在首善堂内，此次与梅占元同时被捕。范是北京人，前保定教区神甫，一九四六年曾任蒋匪国民党清苑县党部区分部书记兼宣传委员及伪参议员。他曾组织还乡队，主

使爪牙逮捕我干部及农民，抢粮倒算；又勾结蒋匪军杀死我村干部范旦子，并将范旦子的心肝挖出，残暴异常。范匪于解放后逃至上海，化名范保禄，一直被梅占元等匿藏在首善堂内。这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并一贯破坏人民政府法令。如帝王堂、遣使会匿藏大批扬州、高邮等地的田契，在土地改革时并未交出；匿藏使用并化名出卖电台及电讯器材；遣使会、耶稣会多年来曾不断地、大量地私套外汇，转移财产，隐藏武器，又曾诱骗强迫青年赴国外受反动训练，阻止圣母军分子登记，破坏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罪行被公开揭发后，激起了全上海市各界人民与爱国天主教徒的公愤。各界人民及爱国教徒，连日纷纷集会，控诉、发表宣言、给报社写信，揭发和痛斥帝国主义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拥护人民政府逮捕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英明措施，决心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徐汇区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六月二十二日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天主教徒们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这两起间谍特务案的破获，也使一部分思想麻痹的人清醒过来。天主教徒许曼音医师自我批判说："过去我认为驱逐了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才尔孟等以后，天主教中大不概不会再有披着宗教外衣暗里却作反革命勾当的人了，今天看到揭露的田望霖等间谍特务案件，使我大为警惕。"杭州、南京、无锡、嘉兴、徐州等地人民与爱国天主教徒也纷纷集会，支持这一正义的斗争。与此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举办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用实物、图片等彻底揭发敌人的罪行。各界人民和天主教徒连日前往参观的很多，截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已有五万多人，直接前往登记要求参观的已有一千多个团体单位共二十八万二千多人。南京、海门等地的天主教徒也推派代表前往上海参观。

为了进一步动员各界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六月二十五日举行了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陈毅等四百余人。会上，上海市公安局代表马敬铮把破获上述两起间谍特务案作了详细报告。他在报告之后表示：上海市公安局对于一些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残余分子正密切予以注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衷心拥护人民政府逮捕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贤明措施，并保证以实际行动来参加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活动的斗争。许多天主教徒在发言中除继续揭发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罪恶事实外，并以切身体会说明了人民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惩潜藏在天主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陈毅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明确的：对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坚决依法保障的，今天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但对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则坚决地予以打击。最近破获的两起帝国主义间谍案，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的阴谋，这是上海人民与天主教徒们共同进行的反帝斗争的又一次胜利。接着他指出：现在有些帝国主义分子还在继续散布谣言，欺骗教徒，破坏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陈毅主席再一次声明：人民政府对那些长期被欺骗的暂时还未能分清是非的教徒，虽然是少数，但仍然采取耐心教育的态度，希望他们能从这次破案的确凿事实中认识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所进行的破坏罪行而毅然决心觉悟起来，脱离帝国主义分子的掌握，转到反帝爱国运动方面作一个爱国的教徒，这是人民政府所期望的，也是符合人民利益与教徒们本身利益的；对那些执迷不悟甘心受帝国主义利用的败类，人民政府一定依法惩处，绝不姑息。会议最后通过了动员各界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活动的决议。决议号召全上海人民行动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严肃的斗争；号召天主教内爱国的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行动起来，和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揭发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的破坏阴谋，为爱护祖国、保障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斗争。

目前，上海市各界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正根据市协商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进一步掀起反帝爱国的斗争。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肃清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

近年来在北京、天津、沈阳、南京等地陆续破获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案件。今年三月和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又先后破获了两起帝国主义间谍破坏案件。两案中的主犯翟光华（美籍）、斐有文（美籍）、格寿平（法籍）和田望霖（比利时籍）等，都是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会长或神学院长。他们在帝国主义特务机关的指使下，以天主教为掩护，驱使少数落后的天主教徒，刺探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教机密，破坏土地改革和各种爱国运动，企图危害人民民主政权。但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力量面前，这些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阴谋终于被揭穿了。这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阴险计划是又一个有力的打击，这是我国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又一重大胜利。

这两个案件再一次充分地说明，我国人民既然有能力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匪帮在中国的反动统

治，也就有能力粉碎帝国主义危害我国人民安全的一切阴谋诡计。不论这些帝国主义匪徒是多么卑鄙、阴险和凶恶，都无法逃出我国人民群众及我人民公安机关的巨掌。同时，这两个案件的破获也再次说明，帝国主义不仅在我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利用天主教和其他方式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而且他们现在正加紧作垂死的挣扎。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早就指示过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我国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天主教徒，都应该从已经破获和许多案件中吸取教训，提高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阴谋的警惕，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的间谍特务活动。

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散布"天主教是超政治的、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的"等等说法，来掩饰他们利用宗教进行与我国人民为敌的破坏活动。但是无数事实都证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我国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贯的和有计划的。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我国各地人民公安机关曾先后破获了邢台、齐齐哈尔、献县和沈阳的天主教间谍案，广东梅县天主教美籍主教福尔德间谍活动案，南京天主教耶稣会美籍神甫牧育才等反革命活动案，黄石天主教美籍神甫苏良反革命活动案，辰溪天主教美籍神甫翁明德通匪藏毒案，沅陵天主教美籍神甫高尔飞反革命活动案，广西郁林天主教美籍教徒其履根间谍活动案，天津天主教法籍主教文贵宾反革命活动案，北京意籍神甫马迪儒间谍活动案等等。这一批帝国主义分子虽然披着主教、神甫的外衣，实际上都是老牌的间谍特务。他们曾经长期勾结我国内外的反动分子，破坏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除继续为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收集情报以外，还恶意地散布了许多破坏世界和平和煽动世界大战的谣言，阻止和破坏天主教徒参加抗美援朝等爱国运动。他们极力为美帝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辩护，有的甚至准备进行武装暴乱，妄想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在这些已破获的案件中，今天本报发表的"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案件，更系统地暴露了帝国主义与我国人民为敌的凶恶面目。"公教青年报国团"是一个以天主教为掩护的反动武装特务组织，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特务机关的直接掌握之下，以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为基础，裹胁一部分落后的天主教徒组成的。从一九四六年开始，这个反动的特务组织，除在华北各地造谣破坏、刺探情报、组织反动武装侵扰解放区以外，还曾经为国民党匪军的飞机指示轰炸目标，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并派遣特务匪徒阴谋刺杀人民革命领袖。这一系列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证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一贯利用天主教，进行反革命的间谍破坏活动，它们说什么天主教"超政治"、"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只是掩盖它们罪行的烟幕罢了。

全国解放三年多以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各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特别是以天主教为掩护的间谍特务案件的陆续破获，已使广大天主教徒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他们自动地开展了反帝爱国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唯一目的，是从教会中驱逐帝国主义分子，肃清帝国主义在宗教事业中的影响，使天主教变成中国人民自办的宗教事业。因此，它完全是天主教徒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保护我国人民利益的爱国运动。但是仍然潜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却有意制造谣言，企图破坏这一爱国运动。他们的无耻谎言已为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徒所识破。爱国的天主教徒已经坚定地站起来了，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国的种种罪恶，把一批披着羊皮的豺狼赶出了教会。同时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等爱国运动，有的更勇敢地检举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间谍特务活动，使人民公安机关能够迅速破案。这些爱国的行动都说明，广大天主教徒的政治觉悟已经提高了，因而获得了各界人民的同情和赞助。但是应该着重指出，由于至今还有一批帝国主义分子窃据着天主教的神职，对于稍有爱国表现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动辄用"摘神权"、"停止神功"、"开除教籍"、"不给领圣体"等手段来威吓；因此，天主教内的爱国正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有些教徒还心存疑惧，不敢起来和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更有极少数的天主教徒长期受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中毒较深，至今仍然看不清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假面目，而在利诱和威胁之下，参加了间谍特务活动，犯了危害祖国和人民利益的罪行。这就说明，清除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对于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也是有力的支持。在这一反帝斗争中，少数误入歧途的教徒应该赶快悔悟，毅然决然地和帝国主义分子斩断关系，站到反帝爱国这一方面来。

毛主席指出："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去年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毛主席又一次说明："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见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报所载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谷同胞的广播词）人民政府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几年来曾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凡是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的爱国教徒，不论他们信奉哪一种宗教，他们的信仰自由都一概受到保护，他们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就是对于极少数误入

歧途的教徒，人民政府也是采取耐心教育的政策；只要他们能够悔悟，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同样加以保护。人民政府这种言行一致的态度，获得了广大教徒的拥护。这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决不是帝国主义的任何造谣污蔑所能歪曲的。但是必须严正指出：人民政府只保护正当的公开的宗教活动，对于那些以宗教为名而实际上秘密进行反革命间谍破坏活动的分子，则必须坚决加以镇压。这也是人民政府一贯的政策。人民政府决不因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容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革命活动，人民政府也决不因为要清除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一切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也为了使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受沾污，必须把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加以严格的区别，坚决把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这是每一个天主教徒应有的爱国行为，也是爱教的正当行为。

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者虽已接连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必然要继续利用一切方式对我国进行捣乱和破坏。我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都应该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因已取得的某些胜利而产生麻痹思想，而必须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

（摘自《人民日报》）

中共华北局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

背景介绍

我们的国家刚刚成立，一些党内的干部开始骄傲起来，他们带着浓厚的自私自利思想，处处患得患失，假公济私，凭借着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打击报复其私人对其他同志的仇恨。王振海就是这样一个人，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犯罪分子，严重在于倚仗手中的权力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目的。是我们党内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严肃处理的党员。

材料：

-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

材料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事件（见一月十九日本报第三版），已经处理完毕，于三月四日作出“关于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全文如下：

河北省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为了达到私人报复的目的，利用职权，阴谋陷害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经过我们长时期多方面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真相业已大白，王振海的反党罪行，业已完全证实。

李小六（即李英）是河北省无极县东牛村人，共产党员。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扫荡后，李小六被我方派遣至正定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并有一定成绩。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李积极领导本村农民向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斗争锋芒曾触及王振海的爱人张英个人的及其家庭的利益，自此即招来张英方面的仇恨。

张英（共产党员，当时任安国县城关区区委组织委员）的家庭，在过去曾是东牛村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一九三三年后下降为中农。张英自参加革命后，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并未得到改造。一九四六年张英从她娘家分得一部分土地，并将王振海和两个小孩的名字都写在她娘家的负担册上，以少纳对国家的负担。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时又在王振海家分了五个人（王、张及其小孩）的土地、房屋。张英在她本村的土地改革中，不仅不支持农民斗争，反而干涉土地改革，包庇家庭。一九四七年进行土地改革复查时，张英听到其家庭因怕斗争藏起的两个包袱被贫农团查获的消息后，即藉口这是她的包袱，亲自将包袱从贫农团手中要回，并反咬一口说包袱里短少了东西。为此贫农团曾令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事后张英表示这比打她几个耳光还要难堪，大不甘心。复查中，群众又将张英的本家叔父（在任伪保长的秘书时有贪污行为）清算斗争。一九四八年春，因当时群众不明政策，又以“查三代”的办法将张英家划为破落地主，将张英父亲李白雪扣押十余天，并计划拆掉张英在娘家所分的三间砖房。此时张英又回家住了十多天，直接干涉农民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由此引起区村干部的极大不满。经县委提出意见后，张英才被迫离开。自此以后，张英便对李小六怀恨在心，积极策动其爱人王振海，藉王之职权，对李小六实行报复陷害。

王振海和张英为了达到报复陷害的目的，并把这一罪恶目的巧妙地掩盖起来，首先利用李小六曾在伪治安军中充任过情报员这一事实，捏造了李小六种种“罪名”。

一九四八年八月，王振海亲赴无极县，向当时县委委员周鸿义、张济世等当面介绍了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将被我方派遣至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小六，诬说成是“投敌干部”，说“李在正定伪治安军当情报室主任时，对人民危害很大，我们的工作进不去，并杀过我们的区委书记”（意思是指张英的哥哥区委书记李硕彦是李小六所杀，而事实是李硕彦系被当时汉奸王荣贵向敌告密而被杀害的，与李小六毫无关系），又造谣说“当时无极县委决定将李小六作为‘单打一’的对象”。实际并无此事。张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及一九五〇年四月，亦向无极县委介绍了李小六的“情况”，把在村积极工作的李小六诬说成是“掌握村中大权，专闹宗派、闹不团结的坏分子”，说李小六“手黑”（暗杀人的意思）。王振海并把东牛村的贫富情况也给颠倒过来：东牛村明明是东头富西头穷，他却向县委硬说是东头穷（他丈人李白雪住东头）西头富（李小六住西头）。根据自己所捏造的这些事实，王振海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指示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撤销其村长职务。当时无极县委盲目地执行了王振海的错误指示，宣布开除李小六的党籍。但由于区委和村支部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李小六回村后仍过党的组织生活。王振海闻讯后，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与张英共同嘱咐定县地委委员晋仰贤办理此事。晋仰贤即督促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王振海并在地委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无极县委不切实执行他的指示。至此无极县委乃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派专人赴东牛村开除了李小六的党籍，建议政府撤掉了李的村长职务，并于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次逮捕了李小六。因李小六被捕前曾到河北省军区找过当时派他做情报工作的牛臻同志（河北军区侦察科长），并由牛写了证明信给定县专区专员赵树光和军分区司令员廖鼎琳，这才通知无极县将李小六释放。

这时，定县地委会才了解了王振海和张英的这种罪恶勾当。前定县军分区司令员廖鼎琳同志在地委会上指出：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所派遣的，有牛臻写给专员赵树光和他自己的信为证，张英的行动是个人报复。但是地委会既不将王振海、张英的这种严重的反党行为报告省委，也不向王振海展开正确的斗争，而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这实际上是纵容了王振海的罪恶行动。此后，王振海改变其手法，继续其阴谋活动，一方面对李小六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系我方派遣并有负责同志证明这一根本事实，装聋作哑，故作不信任；另方面在行动上则将其以前公开捏造宣传李小六“罪恶”的手法，改变为对县委欺骗、对地委和省委隐瞒的手法，利用一九五一年四月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机会，进一步企图置李小六于死地。当时王振海亲到无极县，瞒着地委指示县委将李小六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王振海此次向无极县委介绍李小六的“情形”时，对李小六当敌人情报员系我方派遣这一十分重要的事实，依然只字不提。无极县委在王振海此行以前，既未发现李小六有任何血债，又未接到群众任何检举材料，所以在逮捕第一、二批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均无李小六名字。在王振海指示后，无极县委便盲目地根据王振海所介绍的“罪恶事实”，将李小六列入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中，于五月报送地委审批。王振海亲自审阅了李小六的案卷材料，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亲自携带一批案卷赴河北省报案（其中有李小六），报案时又同样地隐瞒了李小六当情报员系我方派遣的事实，因而骗得了省的批准（批准逮捕、经审讯证实后再行定案）。于是李小六在同年七月二日第二次被捕。李小六被捕后，王振海即于七月底又亲赴无极县，督促无极县委调查搜集李小六的罪恶材料。其后虽经张英嫂子（李硕彦妻）等人捏词控告，但终未查出李小六任何罪恶事实。迟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李小六始被讨保释放，冤狱达十个月之久。

一九五一年八月，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但河北省委对于这样重大的案件，既不派人彻查，也不责令定县地委负责查清，却错误地写信给王振海本人令其作检讨。王振海不但不作任何检讨，反而明目张胆地追查检举人，大骂范文兴，声言要与范文兴到“中央、华北局打官司”，企图将主持正义的范文兴同志打击下去。当时大多数地委委员对王振海的这种目无党纪国法的行为，采取了毫无原则的态度，甚至地委委员申象山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地委党的小组会上，批评范文兴不经过组织向省委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并极端错误地追问范文兴反映问题的动机“是否有地位观念”。对于申象山的这种荒谬的说法，除副专员冀时新同志表示反对外，其他地委委员如林达宇、赵树光等竟不表示反对意见。十月底，地委派专员赵树光、组织部长李国庆到无极县调查这一案件。此次调查虽已证实“李小六无罪，张英对李小六挟嫌报复，王振海搞李小六是张英所策动”，但仅因王振海和张英矢口抵赖，地委也就不坚持真理，于十一月向省委写了一个混淆事实、掩盖王振海错误的假报告，而省委也竟相信了这个假报告，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这就再度纵容了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使其有坚持错误的余地。在李小六被宣告无罪释放两个月之后，王振海和张英居然还私自三次写信给原无极县县委敌工部长刘学及其他敌工人员，示意他们提供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企图顽抗到底。

一九五二年三月，范文兴同志再次向河北省委揭发了王振海和张英的犯罪行为，但地委依然无原则藉口案情复杂，将此案件推给了省委了事，而河北省委在这一问题上亦同样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以事情复杂，一时难以弄清为理由，错误地采取了“草草结了案”的办法，认为王振海主要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仅给以当众警告的

处分，草草结案。直至此次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调集河北省委、省检查委员会、定县地委、前无极县委各有关干部十余人，联合进行了反复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王振海的上述反党罪行才得以完全暴露，并一一予以证实。

以上全部事实说明：王振海和张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到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依仗职权，报复陷害革命同志，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王振海、张英才藉口李小六曾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不仅对此捏造种种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硬给李小六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王振海不在土地改革以前偏偏要在土地改革以后来提起李小六的问题，并在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已有负责人员证明之后，王振海还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在实际处理时竟不敢经过正当的组织手续，而实行瞒上欺下的办法。这一切，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罪恶的目的。由此可见，王振海已完全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地步，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分子。定县地委会(除了个别同志)在处理这一案件中的严重无原则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以及河北省委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官僚主义态度，放纵了这一事件的发展，因而也应担负一定的政治责任。

根据以上事实及该案的严重性质，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将对有关人员和有关组织作如下处理：

(一)对个人和组织的处分

王振海目无党纪国法，完全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利用职权，对革命同志实行报复陷害，并企图坚持错误到底，已证明其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严肃处理。

张英，现任定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是王振海事件的积极策动者和参加者，并在土地改革中包庇家庭，干涉土地改革，非法多占农民斗争果实，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并追回非法多占土地。

赵树光，前定县专区专员、定县地委常委委员，系河北省人民政府粮食厅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纵容王振海的错误负有重要责任。赵虽在地委会上听到过廖鼎琳介绍李小六被派遣关系和张英对李小六的报复行为，并曾亲自接到过牛臻关于李小六派遣关系的证明信，但仍以不负责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不向王振海展开坚决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赵与李国庆(定县地委组织部长)赴无极县调查此事件时，既不理睬县委提出的关于释放李小六的正确意见，调查中又有意向省委作假报告。一九五二年七月地委在处理王振海的问题时，更从个人得失出发，对这个重大的问题庸俗地看成是“范文兴与王振海的私人成见”，错误严重，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李国庆，前任定县地委组织部长(常委委员)，现任定县地委第一副书记。在此事件中，李毫无原则地把范文兴检举王振海的正义行动，看成是闹私人成见，采取了调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从所谓“维系两人的关系和不影响工作出发”，因而在一九五一年与赵树光到无极县调查后，本来事情已大体弄清，但却仍有意欺骗省委，向省委作了假报告。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林达宇，前定县地委秘书长，现任地委第二副书记。在此案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范文兴抱个人成见，为王振海的反党行为作辩护，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至于林达宇在工作中的其他错误，由河北省委查清后，另行处理。

申象山，前定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地委宣传部长。在此事件中，申不坚持党的原则，不向反党分子王振海展开斗争，反错误地批评范文兴不经组织反映问题“会极大地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李太(现任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工程公司副经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晋仰贤(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在事实大体查清后，还不向王振海进行斗争，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冀时新(前定县专区副专员，现任专员)、王树南(前定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现任唐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庆林(前定县专区合作社主任)，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均应作深刻检讨。

定县地委会，在王振海事件中表现了严重丧失党的原则，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调和主义、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对王振海的反党犯罪行为不开展坚决的斗争，对范文兴的正义行动不积极予以支持，反而肆行压抑；王振海的错误行为经地委会派人查清后，地委会不据实上报，亦不严肃负责地进行处理，竟有意地向省委作假报告，起了包庇纵容反党分子王振海的作用，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部分改组处分。

河北省委会未认真接受刘青山、张子善叛党事件的血的教训，仍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事件，对干部的错误特别对某些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使干部所犯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造成严重的恶果。决定给以指责处分。

原无极县委会盲目地执行王振海的错误指示，不听取下级干部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开除李小六党籍并两次错捕李小六，决定给以指责处分；给原无极县委书记周鸿义、组织部长张济世、公安局长张志超以当众警告处分。

(二)表　扬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积极地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揭发了这一严重事件，并对反党分子王振海作坚决斗争，应以表扬。

受害人李小六因积极领导土地改革斗争，为反党犯罪分子王振海、张英所陷害，含冤达四年之久，被无故开除党籍、撤掉村长职务，两次遭逮捕，冤狱十月余。因之，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应在东牛村召开会议，公开宣布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所派遣，摘掉其汉奸帽子，恢复其党籍，对其积极工作，坚持斗争应予以鼓励。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遵循采取集中兵力和优势火力，在运动中利用有利的山地地形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到 1951 年 6 月 10 日，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 19.67 万余人，其中包括美军 8.8 万余人。把美、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五大战役的胜利，使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1951 年 7 月 10 日，交战双方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材料：

-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 为促成朝鲜停战、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

材料一　朝鲜停战协定昨日正式签字

签字后十二小时起双方武装力量停止敌对行为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七月二十七日发布公报如下：

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已于七月二十七日朝鲜时间上午十时，在朝鲜板门店，由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海立胜)中将正式签字。各种文本现在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签字中。根据双方的协议，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十二小时起，亦即七月二十七日朝鲜时间下午十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而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他条款，亦一律于停火的同时开始生效。停战协定明白规定：双方司令官须分别在其指挥下的军队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与办法，以保证其所有部属彻底遵守停战协定的全部规定。而停战协定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正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级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代替前，将继续有效。

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与一贯支持，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已胜利完成了它的任务。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为促成朝鲜停战、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

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是中朝两国和苏联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贯主张。为了贯彻实现这个主张，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现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于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二月二十二日来信中所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表示同意，并建议双方代表立即恢复谈判；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一致同意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并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也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政府对于中朝两国政府的这种崇高举动完全赞同，并表示愿意尽力促其实现。这又一次表现了中朝两国和苏联的团结一致并坚持和平政策的不可动摇的立场。

早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我国周恩来外长在同年八月二十日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苏联的提案。周外长当时便指出：“朝鲜问题是必须而且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直至我国的安全因朝鲜战争的扩大受到严重侵害的时候，我国人民才起来抗美援朝，其目的也还是为了保卫和平；而且，就在朝中人民军队不断胜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言中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国周恩来外长的声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我国周恩来外长复联合国第一委员会电，同年二月二日周外长的声明以及以后的各次声明，都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

一九五一年七月，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提议之下，开始了朝鲜的停战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我方代表始终表现了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达成协议的精神。在谈判的议程上，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在停战和监督问题

上以及在战俘问题上，我方都曾一再提出了各种公平合理的建议。正由于我方不懈的努力，才使全文六十三款的停战协定草案全部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所制定的关于战俘安排问题的九款协定，只剩下关于战俘遣返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美方不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主张，而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来解决遣俘问题，那末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双方全部战俘包括病伤战俘在内，也早就遣返回家过和平生活了。但是，因为美方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坚持“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朝中战俘，以致我方完全不能接受，而美方又片面停止了谈判，这就使朝鲜停战问题拖延二十个月以上仍然不能得到解决。现在，我方进一步提出的新的建议，已经为在朝鲜停止战争，并进而为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其他问题打开了道路。如果美国方面具有谋取和平的诚意的话，则我方这个建议，是没有理由不能被接受的。

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问题，在双方业已达成协议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三款中，本来已经明白规定：“重病重伤战俘须予优先遣返”。而双方病伤战俘之所以至今还不能遣返，只是由于朝鲜停战谈判中断致此项协议无法实现的缘故。现在美方既然表示愿意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在战争期间先行遣返病伤战俘，我方由于对于病伤战俘的人道主义的关切，已经表示完全同意。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规定：

“除受本条第三项之规定之限制外，冲突各方必须遵照下条第一项之规定，将经过治疗后适于旅行之重伤及重病之战俘，不论其数目或等级如何，遣返其本国。”

“在战争期间，冲突各方，应依有关中立国之合作，努力商定办法使下条第二项所列之患病及受伤战俘收容于中立国。此外，彼等并得缔结协定，俾将经过长期在俘之健壮战俘直接遣返，或拘禁于中立国。”

“根据本条第一项之规定有资格被遣返之患病或受伤之战俘，在战事期间不得违反其意志将其遣返。”

这个条文中对于病伤战俘的遣返“不得违反其意志”的规定，是以作战双方军事行动还在继续的“战事期间”的情况为根据的，其目的在于保证病伤战俘不至被再投入战争。因此，我方同意按照这个条文的规定，首先交换双方的病伤战俘。这充分表现了我方的一贯维护日内瓦公约的坚定态度。

随着病伤战俘遣返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进一步对于全部战俘遣返问题谋求合理的解决。正如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三月二十八日给克拉克的复信中所说的，“我们认为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双方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使之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得以实现。”因之，我方所提出的新建议，就不但是为了解决病伤战俘的遣返问题，而且对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采取了新的步骤。日内瓦公约第一百十八条规定：“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这个原则在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一款中也已明白规定：“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须尽速予以释放与遣返。此项战俘的释放与遣返须按照本停战协定签字前双方所交换并校正的名单执行之。”为使这个原则得以实现，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曾在其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六日给克拉克将军信中提出“必须根据国际惯例、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和双方业已达成协议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实行全部遣俘，共具体实施方法与步骤可在谈判中进行协商。”这一次我方的新建议，就是在坚持这个原则的立场上将战俘的遣返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这是一个让步。这个让步，正如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声明中所指出的：“我们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原则，也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战俘中有所谓拒绝遣返的人，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由此可见，我方关于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这个新的建议，是我方为了促成朝鲜停战并进而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进一步措施。

事实已经证明，我方的新建议，正如苏联莫洛托夫外长的声明中所指出的，是“再一次在达成关于停战和结束朝鲜战争的协议上表现了首倡精神”；“这种举动将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们已经看到，不但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舆论都一致赞扬中朝方面的新建议，而且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舆论也表示热烈拥护我方的新建议。四月一日英国“工人日报”的社论说，“周恩来的建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议并没有放弃它原来根据日内瓦公约的原则所采取的立场，也没有接受美国所谓有不愿遣返的战俘的说法；然而，中国政府为着世界的和平利益，提出了这个新建议。”法国“人道报”同日的社论也说，“法国人民群众普遍赞扬周恩来的声明。中国的建议受到广泛的支持，甚至使反动报纸也不得不表示支持。”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等国进步的报纸也发表评论，支持我国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印度斯坦时报”在四月一日的评论中也说，“这个建议提供了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证明中国要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显然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会有这种真诚的和平愿望的，但是，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依靠谈判双方谋求和平的同样愿望和同样努力才有可能。朝鲜战争的长期事实完全证明，美国方面要以武力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应该

看到，只有实现朝鲜停战并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其他问题，才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在一起，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各国人民在一起，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我们遵循着国际和平政策，确信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能够和平共处的。我们爱好和平，愿为促成朝鲜停战、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但我们对于一切企图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的阴谋，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并要加强各方面的努力，以防止任何延宕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行动继续出现。

（摘自《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齐白石

齐白石（1864——1957） 现代著名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名借人吟馆主者、寄萍老人、木人等。湖南湘潭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喜爱绘画。十三岁跟叔父学木工，次年跟村里一个木匠学雕花木匠，并从师读书、学画。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得到塾师胡沁园和陈少蕃的赏识，教他读书、学画，使他的文化艺术水平有所提高。1890 年与师友组织龙山诗社和罗山诗社。1902 年至 1909 年曾“五出五归”，游历祖国南北，饱览祖国的名山大川，结识了许多文人画家，鉴赏了大量名画、秘籍、书法、碑拓，开阔了眼界。1909 年后，在故乡“寄萍堂”潜心作画。1919 年到北京定居，以篆刻和作画为生。到抗日战争前的十多年间，作画逾万幅，篆刻印章三千多方。1927 年被聘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于非闇、王雪涛、李苦禅等，均是他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辞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职务，贴出告示，不见客，不赴宴，不照相，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抗议。建国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并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画研究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1953 年九十寿辰时，曾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的“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荣誉奖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状。1954 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他为 1955 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1957 年 9 月 16 日在北京病逝。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笔法雄健，造形简朴，色彩明快。擅长于画花鸟虫鱼，也画山水、人物。认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也长于篆刻。有《齐白石作品集》。

李家发

李家发（1934——1953） 抗美援朝英雄。安徽省南陵县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3 年 7 月 13 日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轿岩山战斗中，当我部队进攻被敌地堡火力所阻时，他不顾一切，挺身而出，冲上前去，炸掉了敌人的几个枪眼，最后手雷用光，他毅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还在发射的最后一个机枪射孔，扫清了我部队前进中的障碍，自己光荣献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张澜

张澜（1874——1955） 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辛亥革命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后来，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主席。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继任主席。抗日战争后，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拒绝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伪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955 年 2 月 9 日在北京病逝。

徐悲鸿

徐悲鸿(1895——1953) 现代著名画家,江苏宜兴人。少年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抗日战争期间,屡次以己作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灾民,并参加民主运动。他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曾创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富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他的画能融合中西技法,而自成面貌,尤以画马驰誉中外。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五十年代初,人民获得了解放,热情讴歌伟大祖国,热爱和平,热爱伟大的共产党。《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其中优秀代表。同时,抗美援朝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关注的重大事件,也是作家们关注的重大事件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这场战争在许多作家那儿得到迅速的反映。他们的作品都集中地表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中华儿女高度的英雄主义壮烈胸怀和国际主义的高尚品质。其中影响较大的《三千里江山》、《上甘岭》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部小说。陆柱国的《上甘岭》也是作为建国后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批成果出现的。

歌曲《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

E=b2/4管桦词 瞿希贤曲

愉快、热情有力

(一)歌唱吧同志们,歌唱吧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为胜利歌唱!我们为志愿军歌唱!
英雄们战胜了凶暴的敌人
英雄们打开了和平的大门!
我们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
我们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

(二)自从那一天,敌人烧起了战火,
烧红了朝鲜全境直烧到祖国的大门!
英雄们告别了亲爱的祖国
告别了故乡告别了爹娘!
勇敢地跨过了鸭绿江前进
和朝鲜人民并肩向前打击敌人

(三)无数的战士,为全人类的幸福,
献出了高贵的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不朽的黄继光不朽的邱少云
不朽的杨根思不朽的罗盛教!
光辉的名字在全世界传遍
永远是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四)金黄的麦浪,荡漾在辽阔的原野上,
工厂和矿山的烟囱修筑得直上云霄!
火车上满载着机器和木材
向着建筑工地飞快地奔跑!
我们的祖国一日千里向前进
我们的祖国一日千里向前进!

(五)歌唱吧同志们,歌唱吧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为胜利歌唱!我们为和平歌唱!
时刻都准备着粉碎那阴谋挑衅
和平的胜利要我们来巩固!
我们坚决为持久和平斗争
永远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

注:此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3年八月十二日二十一点三十分到二十一点五十分广播。并于八月十七日到二十日每天十九点三十分到二十点教唱。

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开阔明朗美丽其格词曲

1=A3/4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的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爱家乡
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歌唱共产党
毛主席啊共产党
照耀我们生长
尾声：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小说《三千里江山》

长篇小说，作者杨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小说描写了一支中国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为保护江桥、支援前线所经历的战斗生活。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必须有一条畅通的铁路运输线。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一支由铁路工人姚长庚、姚志兰、关天宝、车长杰组成的援朝大队，离开祖国，开赴前线。为了保证铁路线的畅通，把物资弹药运向前线，他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敌机的严密封锁和破坏，战胜了冻土和寒冰，保证了五次战役的节节胜利，扭转了整个朝鲜战争的局势。在战斗中，中朝两国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姚长庚是作品中普通的工人形象。他具有三十多年的工龄，外表看来沉默少语，耿直倔强，但内心充满了对生活和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朝鲜人民的革命情谊。当敌机轰炸桥梁时，他坚守岗位，负了伤咬紧牙关把弹片挖出来。有人说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姚长庚是这样回答的："人生下来，不是为死，是为了活，谁愿意死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死要死在正处，为祖国、为人民，死了也值得。"

姚长庚的女儿姚志兰也是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她温柔文静而又热爱生活，崇拜女英雄刘胡兰。当祖国需要她的时候，毅然地推迟了婚期，奔赴朝鲜战场。在父亲的教育下，她不断进步，成长。她当电话员，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电话线被炸断了，她想尽一切办法传达上级的命令。当她被炸弹震昏以后，还在心中挂念着命令传达到了没有。

车长杰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老实、淳朴，甚至有些愣头愣脑。到了朝鲜以后，他得了泪蒙眼病，夜里干活看不清东西。有人说他存心捣乱，他不吭声，怕一旦别人知道了会调他回国。在大块流冰冲向大桥的危急关头，他勇敢、机智地把流冰炸破，使大桥免受毁坏。后来，因为在敌机下坚持工作而壮烈牺牲。

作者善于运用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和内心世界来刻画人物。"写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写他们的性格和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光写那些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杨朔）因此，尽管姚长庚、姚志兰、车长杰等人没有在战场上和敌人直接交锋，但是由于作者注意了从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小事和人物心理着手来刻画人物，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富于鲜明的个性。

在叙述笔调上，作者吸收了章回小说的精华。

（周鲁侠）

小说《上甘岭》

中篇小说，作者陆柱国。最初在《解放军文艺》1953年3月号至5月号上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初版，1956年再版，1958年第三版。小说描写的是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斗故事。1952年秋天，美国侵略者为了争夺朝鲜金化以北上甘岭的几个山头，在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投入了六万兵力，倾泄了四万多吨炮弹，战斗空前残酷。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像巨人一样坚守阵地，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进犯敌军在一个半月的战斗中死伤二万五千人，损失飞机二百多架。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下写了光辉的一页。小说以一个英雄连队的战斗生活来反映这一伟大的战役。上甘岭战役开始后，这个连队守卫前沿阵地，和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表面阵地争夺战，在杀伤大量具有优势装备的敌军后，人员和弹药消耗过大，退守坑道，待机反击。在坚守坑道的战斗中，忍受着敌军百般摧残和重重封锁，在缺粮断水的艰苦条件下，一直坚守坑道达二十天之久，终于配合主力部队转入反击，收复了全世界瞩目的上甘岭阵地。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千万个志愿军英雄创造的伟大业绩。小说所描写的乃是它的部分英雄人物的部分事迹。然而通过这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动形象，已可以表现出整个战役的真实面貌和志愿军战士的神奇功绩。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志愿军群体英雄的形象。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宋占方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浑身是伤的战士徐成彬用自己的躯体充当机枪架，王继保和战友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去背水，牺牲在路上。小说不仅真切地描写了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为和平事业舍身杀敌的高昂士气，同时也着重刻画了志愿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如永远站在战斗前列，关心爱护战士的连长张文贵，坚定沉着、在任何时候都充满着毅力和信心的营教导员吕安国。在他们身上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由于作者对战斗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与体验，所以在许多场合都从正面描写各种战斗行动。常常通过人物本身的具体行动来展示人物的心情。在刻画英雄人物时，虽然没有从多方面来丰富和发展人物性格，但却能以简练、概括的笔触，巧妙地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加以描写，正是这些人物的主要方面，具有无限的感人力量和巨大的革命教育作用。作品准确地处理了正面描写战争的残酷与歌颂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之间的辩证关

系，它在险恶、严峻的战争画面上所塑造的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是感人至深的。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摄制成同名故事影片。

电影《智取华山》

1953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黑白　12本

改编：郭　维、纪　叶、东　方　导　演：郭　维
摄影：陈民魂　布景设计：秦　威
作曲：陈　地、李季达　录　音：蔡　军
布景副设计：王桂枝　剧务主任：纪少岚
剪接：严尚华　洗印：董鸿翼、陈福庭
照明：张海山　剧务：金保生、赵义虎
场记：于　清　化妆：李恩德、王希钟
服装：王　峰　特技：张玉珊、姜亦素
音响：娜　雷　演奏：北影管弦乐队
指挥：曹　鹏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李金榜——团　长　许又新——政　委
杨庆卫——参谋长　郭允泰——刘明基
田　丹——路德亮　阎增和——孟士俊
李雨农——朱开富　白尔纯——杨小保
黄　非——王生齐　高　平——刘家典
刘　柳——常生林　胡　朋——常　母
张　茜——常　妻　贾　六——深山老人
方　化——匪旅长方子乔　黎莉莉——匪旅长妻
管宗祥——匪参谋长　陈志坚——匪关营长
刘　宗——匪侯副营长　赵义虎——匪副官
安　然——匪排长　梁　新——匪班长
李　岩——匪　兵

根据任萍、王宗元等原著改编。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军队向南逃窜，敌旅长方子乔带一部分敌军逃上华山，企图利用华山天险负隅顽抗。解放军某团侦察参谋刘明基率领侦察人员，在当地药农常生林的向导下，打破了民间"自古华山一条路"的说法，从后山小路登上北峰，占领了制高点千尺幢。敌旅长组织人马疯狂反扑。正在危急时刻，回去送信的常生林领着大部队赶到，全歼了敌人。影片成功表现了人民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

历史档案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表

〔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成〕

第一表　工业农业总产值计划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计算单位：亿元

项　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1952年	1957年
总　计	827.1	1,249.9	151.1	8.6	100	100	
工业	270.1	535.6	198.3	14.7		32.7	42.9
其中：现代工业	220.5	449.9	204.1	15.3	26.7	36.0	
工场手工业	49.6	85.7	172.6	11.5	6.0	6.9	
手工业	73.1	117.7	160.9	9.9	8.8	9.4	
农业及其副业	483.9	596.6	123.3	4.3	58.5	47.7	

注：手工业产值中，包括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值，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1952年为2.5亿元，1957年为31.9亿元，增加11.9倍。

第二表　工业总产值计划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计算单位：亿元

项　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1952年	1957年
总　计	270.1	535.6	198.3	14.7	100	100	
国营	142.6	328.1	230.1	18.1	52.8	61.3	

合作社营	8.6	23.6	273.6	22.3	3.2	4.4	
公私合营	13.6	118.3	865.9	54.0	5.0	22.1	
私营(包括加工定货部分)	105.3	65.6	62.3	—9.0	39.0	12.2	
在总计中:生产资料生产	107.3	243.0	226.5	17.8	39.7	45.4	
消费资料生产	162.8	292.6	179.7	12.4	60.3	54.6	

注:五年内没有合营的私营工业部分,1957年比1952年增长22%,平均每年增长4.1%。

第三表　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计划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发电量	亿度	72.6	159	219
原煤	万吨	6,352.8	11,298.5	178
原油	万吨	43.6	201.2	462
生铁	万吨	190	467.4	246
钢	万吨	135	412	306
钢材	万吨	111	304.5	275
焦炭	万吨	286	668.5	233
烧碱(折合100%)	万吨	7.9	15.4	194
纯碱	万吨	19.2	47.6	248
硫酸铵	万吨	18.1	50.4	278
硝酸铵	吨	7,486	44,000	588
硫化青	万吨	1.6	1.8	111
青霉素	万瓶	15.3	2,900	18,929
氯霉素	公斤	—	6,000	—
各种磺胺	公斤	80,617	844,000	1,047
汽车外胎	万条	41.7	76	182
胶鞋	万双	6,169	10,831	176
蒸汽锅炉(蒸发量)	吨/时	1,222	2,734	224
汽轮机(蒸汽透平)		—	84,500	—
水轮机(水力透平)		6,664	79,500	1,193
内燃机	台/万马力	1,528/2.76	10,630/26.02	696/942
发电机	台/万	746/2.97	2,938/22.7	394/765
电动机	台/万	91,147/63.9	135,515/104.8	149/164
变压器	万千伏安	116.7	261	224
金属切削机床㈠	台/吨	13,734/16,298	12,720/20,292	93/180
双轮带铧犁	万具	0.5	68.9	13,611
谷类播种机	部	344	35,350	10,276
机车	台	20	200	1,000
客车	辆	6	300	5,000
货车	辆	5,792	8,500	147
民用船舶	艘/排水量吨	84/21,485	1,347/179.111	1,604/834
载重汽车	辆	—	4,000	—
自行车	万辆	8	55.5	694
原木	万立方公尺	1,002	2,000	200
火柴	万件	911	1,270	139
机制纸	万吨	37.2	65.5	176
水泥	万吨	286	600	210
平板玻璃	万平方公尺	2,132	4,000	188
棉纱	万件	361.8	500	138
棉布㈡	万匹	11,163.4	16372.1	147
麻袋	万条	6,735	6,800	101
食用植物油	万吨	72.4	155.2	214

糖	万吨	24.9	68.6	276
面　　粉	万吨	299	467	156
盐	万吨	346	593.2	171
卷　　烟	万箱	265	470	177

㊀1957年金属切削机床台数虽少于1952年，但吨数则较1952年增加80%，而且技术提高，种类增加，普通的小型机床减少，新式的较大型的机床增多，每台的切削能力也有所提高。

㊁1952年和1957年棉布产量中，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合作化手工业所生产的以机纺纱或部分机纺纱为原料的棉布，除棉布产量以外，其余产品均不包括个体手工业和组织起来的手工业所生产的产量在内。

第四表　主要农作物生产计划

项　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播种面积（万亩）	每亩产量（市斤）	总产量（亿斤）	播种面积（万亩）	每亩产量（市斤）	总产量（亿斤）	播种面积	每亩产量	总产量
粮食作物	185,968.3	176.3	3,278.3	191,479.2	201.4	3,856.2	103.0	1114.2	117.6
其中：稻	42,573.4	321.5	1,368.5	44,486.4	367.6	1,635.4	104.5	114.3	119.5
小　麦	37,169.8	97.5	362.5	40,025.7	118.6	474.5	107.7	121.6	130.9
大　豆	17,519.0	108.7	190.4	19,023.6	118.0	224.4	108.6	108.6	117.9
杂　粮	75,674.3	136.2	1,030.4	73,224.0	149.7	1,095.9	96.8	109.9	106.4
薯　米	13,031.8	250.5	326.5	14,719.5	289.4	426.0	113.0	115.5	130.5
技术作物	17,844.6			22,685.8			127.1		
其中：棉　花	8,363.6	31.2	26.1	9,500	34.4	32.7	113.6	110.3	125.4
黄麻洋麻	237.2	257.6	6.1	207.8	351.8	7.3	87.6	136.6	119.7
烤　烟	279.1	158.8	4.4	418.5	187.0	7.8	150.0	117.8	176.6
甘　蔗	273.7	5,200.4	142.3	405.4	6,499.7	263.5	148.1	125.0	185.1
甜　菜	52.6	1,819.1	9.6	213.0	2,005.9	42.7	404.9	110.3	446.4
油料作物	8,571.0			11,807.7			137.8		
其　他	8,070.8			13,212.1			163.7		

第五表　牲畜头数增殖计划

项　　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马	万匹	613	834	136
牛	万头	5,660	7,361	130
羊	万只	6,178	11,304	183
猪	万头	8,977	13,834	154

注：牛包括黄牛和水牛，羊包括绵羊和山羊。

第六表　交通运输计划

项　　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货运量				
铁路	万吨	13,206.4	24,550	185.9
内河	万吨	934.1	3,686.4	394.6
沿海	万吨	388.4	1,146.1	295.1
汽车	万吨	2,071.8	6,749.3	325.8
航空	万吨	0.2	0.56	275.0
货物周转量				
铁路	亿吨公里	601.53	1,209.00	201.0
内河	亿吨公里	36.28	152.92	421.5
沿海	亿吨海里	19.80	57.51	290.5
汽车	亿吨公里	6.78	32.11	473.5
航空	万吨公里	243.00	805.00	331.3
客运量				
铁路	万人	16,320.6	24,700	151.3

内河	万人	2,891.6	5,604	193.8
沿海	万人	70.0	147	210
汽车	万人	4,406.2	11,414.6	259.1
航空	万人	2.2	5.44	245.6
旅客周转量				
铁路	亿人公里	200.45	319.66	159.5
内河	亿人公里	19.07	34.08	178.7
沿海	亿人海里	1.00	2.37	237
汽车	亿人公里	19.52	57.32	293.7
航空	亿人公里	0.24	0.91	378.5

第七表　社会商品零售比重计划

项　　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零售额(亿元)	比　重	零售额(亿元)	比重	
社会零售总额	276.6	100	498.3	100	180.1
国营商业	43.8	15.8	102.2	20.5	233.2
合作社商业	50.5	18.2	171.5	34.4	339.5
其中:供销合作社	49.7	—	166.9	—	335.5
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社形式的小商业	182.3	66	224.6	45.1	123.2

注:在1957年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的零售额中,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的零售额占53.2%,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占46.8%。

第八表　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

项　　目	五年投资额(亿元)	占总计的百分比
全国投资总额	427.4	100
工业部门合计	248.5	58.2
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合计	32.6	7.6
运输和邮电部门合计	82.1	19.2
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合计	12.8	3.0
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合计	30.8	7.2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合计	16.0	3.7
其他	4.6	1.1

第九表　劳动工资计划

项　　目	职工总数(万人)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平均工资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总计	1,012.4	1,548.4	152.9	133	
工业	286.4	513.5	179.3	127.1	
其中:国营	251.3	383.6	152.6		
农业、水利、林业和气象	23.9	61.0	255.5	133.5	
建筑业	102.1	176.5	172.9	119.0	
运输和邮电	71.6	109.3	152.5	120.4	
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	113.4	208.7	184.1	128.0	
金融	30.5	37.7	123.4	124.6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	152.3	157.8	103.6	165.7	
文化、教育和卫生	228.2	274.4	120.3	138.2	
城市公用事业	4.1	9.6	234.7		

注:1.本表不包括私营工业、私营建筑业、私营商业、私营运输业、私营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手工业、搬运业等方面的工人职员数,这些方面的人数估计到1952年为1,089.7万人,1957年为975.7万人。

2.本表所列各部门五年共增加536万人,如减去由私营工业、私营商业等方面转为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职员114万人,实际增加为422万人。

3.工资中已包括分值变化因素和由包干制改为工资制的因素在内。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和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所以比较高,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和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的原来平均工资基数比较低;基本建设单位的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所以比较低,是因为这个单位的工人职员的原来平均工资基数比较高。

第十表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计划

项　　目	1957年比1952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百分比	1957年比1952年成本降低的百分比
中央各工业部		22.0
其中:重工业部	67.9	20.7
燃料工业各部	63.6	18.3
机械工业各部	65.2	40.1
纺织工业部	10.4	9.1
轻工业部	75.5	23.0
运输部门		24.0
其中:铁道部	77.9	21.1
交通部		47.6
其中:河运	163.8	
海运	100.2	
国营贸易商品流通费		33.0
其中:商业部		48.6
粮食部		9.3
对外贸易部		29.7

第十一表　教育事业计划

项　　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9.11	43.46	227.4
其中:工科	万人	6.66	17.76	266.8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63.56	67.18	105.6
其中:工科	万人	11.14	24.40	219.0
高级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26.02	72.40	278.2
初级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222.99	398.30	178.6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5,109.80	6,023.00	117.9

第十二表　文化事业计划

项　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报纸全年发行量	万份	160,896	249,671	155.2
杂志全年发行量	万份	20,424	39,423	193.0
图书全年发行量	万册(份)	78,574	121,165	154.2

电影放映队	队	1,110	6,614	595.9
电影院	座	746	896	120.1
摄制影片(年摄制数)	部	46	97	210.9
翻译及配音影响(年译配数)	部	34	102	300.0
文化馆	个	2,448	2,600	106.2

第十三表　卫生事业计划

项　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医院病床	万张	13.8	24.4	177.2
城市	万张	8.2	16.5	200.0
县镇	万张	5.6	7.9	142.4
疗养院(所)床位	万张	1.6	5.5	337.1
区卫生所、卫生防疫站、保健所和保健站	万个	1.0	1.7	165.1

注：本表包括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全国总工会和电力、煤炭、石油、重工、机械、纺织、轻工、地质、建筑工程、林业、水利、铁道、邮电等各部的卫生事业。

根据一九五五年第八期《计划经济》。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发行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第三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四月十日起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是毛泽东同志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的著作，包括《〈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学习和时局》、《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和其他论著。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演说，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分歧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反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观主义的作风，指出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大力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处理党内思想问题的方针。整风运动收到极大的成效，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名著里所说，"这种成效，主要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整风运动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争论问题。这是整风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大论争反映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结果。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扫除了关于文艺问题上的许多错误和混乱，开辟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同志集中了整风运动的经验，同时也是集中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工作的长时期的经验，对于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作了最好的说明。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是党在当时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毛泽东同志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一方面主要地反对了离开发展经济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保守观点；另方面反对了不顾时间地点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毛泽东同志根据了列宁斯大林关于经过合作的道路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了中国农民原有的生产合作(变工之类)的经验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在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在现在历史条件下，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

财产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组织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总结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历史意义说:"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节,如果不在适当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整风运动奠定我们党准备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则为这个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即正当斯大林格勒英勇保卫战的重要关头写的。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论文里,预见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并作了以下的断语:"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学习和时局》一文对于党在抗日时期的历史作了基本的总结。在这篇论文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预见中国人民已经有可能由取得乡村的胜利进到取得城市的胜利;已经有可能由取得各个根据地的胜利进到取得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并进到取得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获得和巩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避免骄傲和努力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八年中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这个报告继《新民主主义论》收到了动员全国人民的极大效果。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会后所写的文章里,毛泽东同志都着重地指出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预见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地位的危险性,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以避免在可能到来的新事变面前的惊惶失措。

选集第三卷附录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中央对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所作的详细结论。这个文件,对于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成就,作了扼要的说明。

新华社九日讯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十日起,由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广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及全国交通便利的中、小城市的新华书店同时发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各地分公司也自十日起发行一部分。

这次发行的第一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共一百五十万册,是在北京、上海、长春三地印就后运往各地发售的。边远地区及交通不便的城市,由于运送费时较长,来不及在十日同时发行,将在十日以后发行。

第二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准备印六十万册,今年下半年可以发行。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以《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为题发表社论,指出,1953年是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项伟大任务: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开始执行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逐步制定的),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建设计划;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还指出,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也需要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1月1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各级党委应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情况。根据上述指示,各地开始了新"三反"运动。3月19日,中共中央又针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在1953年内,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指出,我国农业基本上还是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只能用价格政策,必要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指导农业生产,并纳入国家计划。

1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三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32人为委员；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安子文、彭真、邓小平等23人为委员。

1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1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批准海关与对外贸易管理机关实行合并的决定》，并通过和批准了各项任免案。任命：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副主席刘秀峰、张苏、李烛尘；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高崇民、张明远、李卓然、汪金祥、顾卓新；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马明方、杨明轩、赛福鼎、马鸿宾、黄正清；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副主席曾山、粟裕、马寅初、谭震林、张鼎丞、柳亚子、陈嘉庚、盛丕华；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邓子恢、叶剑英、张云逸、程潜、张难先、李先念、李雪峰、陈铭枢；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宋任穷、卢汉、邓锡侯。

2月4日　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我国人民当前重大的任务是：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巩固和壮大国防力量；第二，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第三，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准备和参加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结束前，毛泽东讲话，着重指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我们的经验不够，要诚心诚意向苏联学习，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应该经常深入下层，检查工作。

2月1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2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建立了以刘少奇为主席及28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2月1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总结了1952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总收入189.3亿元，超过原预算的19.2%；总支出163.2亿元，超过原预算的2.8%。1953年国家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均为233.5亿元。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70亿元，比上年增长51%，而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21%。预算公布不久，财政和信贷资金周转，就处于困难的状态。到6月，财政赤字根据预算所列收支计算，已近30亿元。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通知》指出：①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并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各大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②各省、市的财经委员会，应按照国家计委与省、市党委及人民政府指示，综合编制长期和年度计划。③在目前，各大区的财委仍应负责汇总省、市报送的各种计划，并组织地区的物资和劳动平衡工作。④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人民政府，应由财委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领导计划工作。

2月14日　《人民日报》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了3周年之际以《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建设我们的国家》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援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向苏联学习的指示说，为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向苏联学习。

2月15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该决议曾于1951年12月以草案形式发给各地试行，这次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据统计，到1952年年中，有各种形式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约803.4万个，参加的户数达4542万户。《决议》指出，党在目前对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具体有三个方面：①在新区和互助运动薄弱的地区，应有领导的大量发展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②在有初步互助运动基础的地区，应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③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有领导地、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认为，在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必须批判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消极的态度，二是急躁态度。

2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计划而斗争》的社论。社论用曾经驾机撒布细菌的两名被俘军官的供词，揭露和证实了美国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罪行。

3月5日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逝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分别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出唁电。3月7日，吊唁斯大林逝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离京赴莫斯科。毛泽东主席发表题为《最伟大的友谊》的悼念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通知，将广西省宁明县属之“镇南关”正式更名为“睦南关”。

3月6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作好农村由社会改革到生产的转变的指示》指出：①系统地教育干部是转到生产的第一个关键。②大力宣传中南行政委员会新颁布的“结束土改，发展生产”的布告，着重宣传保护私有财产权与劳动所得，允许雇工、借贷自由等政策，号召增产节约，勤劳致富，爱国发家，开展爱国丰产运动。③在不伤

害个体经济积极性的条件下，引导农民开展劳动互助合作运动。

3月8日　在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的汇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16日又发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7日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19日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上述四个指示，对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和解决办法，作了分析。指出：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要求在组织互助合作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利益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稳步地循序而进。各级党委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作了大量工作，到6月初，急躁冒进倾向基本得到纠正。

3月30日　李富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中国五年计划问题。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原则确定后，周恩来、陈云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联领导人商谈经济援助的具体细节。前后历时8个月，对每个项目都进行了比较详细周密的研究。

4月1日　中共中央把三个农村文件汇编成册，毛泽东命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为组织学习这本书而发出的通知指出：这三个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4月3～23日　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传达毛泽东提出的要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邓子恢根据中央指示，把原订全国互助合作五年发展计划加以缩减，老区发展到70～80%，新区发展到50～60%左右。

4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指示》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要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

6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6月30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毛泽东又提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被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采纳，写进了宪法。

9月7日　毛泽东召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着重讲了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作用。根据三年多的经验，党确定的方针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或统购包销和收购经销等三种形式；在商业方面也有公私合营、代购、代销在种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稳步前进，不要太急，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时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减轻了工商界中的某些思想顾虑。

9月～10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规定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问题。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配合高岗的反党分裂活动，演了一场"讨刘倒安"的闹剧。党中央及时察觉和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计划。

9月8～11日　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会议在北京扩大举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分别作了有关国家经济建设问题及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周恩来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题讲了三个问题：①为什么现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②提出了在总路线指引下确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③提出了关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和办法。在总结发言中，周恩来提出：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努力建立自己的工业，那就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次会议全面提出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明国家资本主义是引导私人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而使

改造的性质和目标更加明确。

9月16～18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举行第27次和28次会议。第27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所作《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及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会上，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对梁漱溟进行了批评。第28次会议在听取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委员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所作证明之后，通过了关于推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一般推迟到1954年1月底以前完成；有些省市如有困难，尚可推迟到1954年3月底以前完成。

9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的口号，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行总路线而奋斗。

10月4日　中共中央批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批语指出：华北局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认为互助组织的形式已过时，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

10月15日　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个体农民 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对富农和富裕中农有利。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就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不一定去解散大社。老区要多发展一些合作社，有些新区只要搞好几个典型，可能比老区发展得快。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最后结果是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未完成土改或工作很落后的县，可以不派数字。

10月26～11月5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讨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16日经中央讨论通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据此，在中央批准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决议》列举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个优越性，要求各级党委继续发扬“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并强调必须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决议》要求，从1953年冬到1954年秋收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已有的1.4万多个发展到80万个左右。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这项工作是为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着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需的伟大政治工作。

11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行政编制的通知》。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财政预算的紧急通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各大区党、政、人民团体各机关，除原拟今年增加约16万人概不增加外，应在1953年编制预算的基数上精简编制14.05万人（中央一级机关及全国工会系统、公安系统不包括在内）。

12月5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由192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基本原则是：既应根据国家建设的确实需要、保证必需的土地，又应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对土地被征用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向高岗提出了严重警告，并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根据此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12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它的根本思想，早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初步提出。1950年9月以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1953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在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随后，毛泽东在审批一些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时，对总路线内容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中央宣传部编写的提纲，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批发的。

经　济

1月1日　中财委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在全国施行。此次税制的修正，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实行了"公重于私，工重于商"的政策。取消了对国营和合作社经济的必要优待和方便。施行的结果，一方面影响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尤其是私营大批发商与国营竞争、争夺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在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财经会议上，对这个修正税制进行了纠正。

1月2日　政务院召开第165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正的决定》。1952年2月以来实行的劳保条例实施范围只限于铁路、邮电、航运三个产业及100人以上的工厂、矿场，有些待遇规定也偏低(如疾病医疗待遇)。此次修正的主要内容是：实施范围扩大到工厂、矿场及交通事业的基本建设单位和国营建筑公司；提高劳动保险待遇，废止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医疗期以6个月为限的规定，增加养老补助费，放宽养老条件等。

1月6日　郑州新建的一个现代化的棉纺织厂——国营郑州棉纺织厂开始生产。目前我国已新建起6个相当规模的现代纺织厂，并从去年5月以来陆续投入生产。

1月8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国家统计局，各级政府及各业务部门均应按照需要，在第一季度内建立和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规定遵照执行。假报数字或谎报统计资料者，视为对国家不忠实的行为，应予严厉处分。

3月3日　东北一座巨大的发电站——0170发电站完工开始送电。这个工程去年7月13日开始施工，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全部完成投产。

4月1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1953年粮棉比价的指示》。为了防止盲目扩大棉田，保证粮棉相应发展，中财委决定实行新的棉粮比价。同1951年颁布的棉粮价格相比，1斤棉花在小麦区由原来8斤小麦调整为6斤4两到7斤半小麦；小米区由8斤半小米调整为6斤12两到8斤小米；大米区由8斤半大米调整为6斤12两到8斤大米。同时，中央商业部调整粮食与纱布的季节差价。粮价按照全国平均水平提高3.99%，纱价在产地城市下调2.5%，布价在产地城市下调2%，在销地城市及乡村平均下降3.5%。8月30日，中财委又公布了1953年到1954年的棉花差价。其总幅度规定在9%左右，分三次上提；11月初比9月新棉价提高3.5%，从12月中下旬到春节后再各提一次。

4月19日　中共中央同意中财委2月22日《关于目前国营工矿企业管理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应从加强计划和管理着手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各部门企业应抓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发动群众讨论计划并查定定额；建立和健全责任制，主要是个人专责制、互助联系的合同制和厂长责任制，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克服浪费现象；开展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经验；加强安全卫生；调整工资，逐步确立合理的工资制度。

4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提要规定：1953年工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上年增长12.35%；农业总产值增长6.4%；工业总产值增长23.61%。主要产品产量：粮食17,577万吨左右，约增7.2%；棉花139万担左右，约增7.6%；钢162万吨，增长22.1%；原煤6,133万吨，相当于1952年预计数的98%。国营贸易收购额146亿元，增加19.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88亿元，约增加20%；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76.3亿元。铁路货运量增加6%。全国高等学校招生7万人，在校学生达21.6万人，增加8.6%，并选派400人以上赴苏留学。职工人数增加11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74.3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占51.77%。农林水占13.4%，铁交邮占16.9%，文教卫生占8%。新建大中型项目136个。新建铁路铺轨608公里。为了完成上述计划，《提要》要求国营企业必须做好下列几项工作：①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②建立和健全责任制。③大力推广先进经验。④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⑤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保证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中央要求发动群众对计划提要进行深入讨论。修正其中的缺点，使之更加切合实际。

5月16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指出：增产粮食是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救麦保秋"是当前粮食生产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受灾地区当前救灾工作的基本要求。为了完成1953年的粮食增产任务，要求普遍深入地动员和组织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指导与帮助农民，及时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努力改进耕作技术。在受灾地区，要将生产救灾工作做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5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一机部《对目前国营机械工业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意见》。指出：机械工业今后的任务是对现有工厂的基础加以调整和进行可能的技术改造，并与新企业的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为此：①摸清需求，有计划地把现有机械工厂组织起来，进一步明确分工，促进协作，发挥潜力，争取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②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加强生产的组织工作和责任制，从而保证质量，组织均衡生产，使生产管理走上正常轨道。③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第一机械工业部还必须和各大区财委共

同研究如何使现有的地方国营和私营的机械工业能更好地和国营机械工业配合起来。

6月5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1953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指出，征收农业税，要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公平合理、鼓励增产的负担政策。并宣布：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

6月9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编制1953年度计划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检查了编制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及问题。《报告》指出，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中，贪多冒进思想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与这种思想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不可忽视的任务。

6月上旬 国家计委着手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此草案从1951年起中财委即着手编制，1953年初又经国家计委多次修改。

6月14日～8月中旬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大会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①进一步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②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即：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的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③总结了四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会议还分别就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

7月9日 政务院召开第185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贯彻"谁种谁有、伙种伙有、村种村有"的政策，切实保障所有权。在安排上，要根据可能条件，量力而行，既不延误时机，也不贪多冒进。并要合理采伐，防止森林火灾。

7月底 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胜利完工。这一工程是1951年3月开始施工的，历时2年多时间。

8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这个办法在1952年中财委制定的《暂行办法》基础上，作了以下规定：①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应当根据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情况，国家经济建设总的方针、政策和长期计划所规定的基本任务来制定。②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规定平均的先进定额；另方面又必须具体计算实际可能。③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④对不同的经济成分、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编制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⑤中央主管部和地区两个编制计划的系统，各有侧重。⑥年度计划确定后，中央各部、大区、省（市）及其所属各级计划部门，均应制定季度计划。⑦在下列情况下，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可对计划进行部分的修改或调整：(1)发现潜在力量可超额完成计划而又适合国民经济需要；(2)政府规定新的任务或对某种需要发生未能预料的重大改变；(3)国外大宗订货不能按期到达而影响其完成任务；(4)根据政府决定企业领导系统有所改变。

8月17日 国家计委召集各大区、省、市及中央有关各部对计划工作、地方工业、物资调拨和统计工作等进行座谈。李富春提出：①关于编制计划问题，学习苏联经验，必须与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计划工作要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②地方工业主要应为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地方新建企业应尽可能"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推销。"③关于物资分配问题，其范围应"逐步扩大，量力而行"，充分照顾到地区平衡。要建立物资储备。

8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增加生产来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坚持削减一切可以削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减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坚决保证财政部提出解决赤字的具体方案的实现。

同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税率按1952年规定执行。今后征收公粮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在未完成或未进行查田定产地区一般应停止进行查田定产工作，根据土改时群众评定的和历年调查的田亩产量材料，参照当年丰歉情况，经群众评议规定。已推行查田定产的地区，因定产畸轻畸重引起群众不满的，可有步骤地进行调整。

8月31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规定：取消绝对按计划的、专款专用的、以贷款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等实物为主的办法，改为保持大体计划，按地方按需要发放，由群众自行支配，并以发放现款为主的办法；贷款偿还期限，根据农民的经济状况及不同用途分别规定；贷款必须按照各地生产季节及时发放，必须贷给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农民，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之间必须作合理分配，实行双方兼顾的原则。

9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决定》指出：建筑工程部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工业建设。建筑力量的使用方向，应当首先保证工业建设，特别

是重工业建设，其次才是一般建筑。为了使建筑工程部集中力量执行工业建设任务，决定将该部担负的国防工程任务，移交军委有关部门；一般民用建筑企业的管理，移交地方。

9月17日　国家计委同中财委初步确定了1954年国家财政预算方案。国家计委在报告中提出：关于财政收入，包括发行6亿元公债，合计为214.2亿元。关于财政支出，合计为214亿元。其中经济建设费72亿元，社会文教费32亿元，行政费23亿元。报告还指出：收入比较接近实际，如果各方面努力，还可增加一些。支出必须抓紧，以免突破预算。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颁发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指示》。中央指出：编制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方针是：①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和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②充分发挥国营工业的设备效能，发扬地方积极性，以保证工业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的需要。③把发展粮食和棉花作为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千方百计努力增长。④扩大国营及合作商业阵地，进一步控制和缩小私人大批发商的活动。⑤把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当作国家建设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⑥从各方面积累资金，支援国家建设。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为：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上年增长16.4%，主要产品增长量：发电量13.9%，原煤11.7%，钢10%，生铁31.5%，棉纱10.8%，棉布18.5%。农业方面，粮食暂定增7%，棉花9.6%。财政收入约208亿元。经济建设拨款72亿元，重点保证“141”项中续建的28个项目和新开工的12个项目。商业部系统销售总额比上年计划增加34%；私营批发及在农村的零售额将略有减少。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4%。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比上年增长12.9%，中等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增加61%，普通中学增加24.6%。

10月6日　对外贸易部发出《关于秋后收购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做好秋后收购工作，完成出口任务，扩大内外交流，换回工业建设所需物资。要求，在内外销兼顾与结合的原则下，一方面做好对内市场的调剂和供应，一方面积极组织出口货源，保证出口任务完成，并认真执行优货优价、劣货劣价的政策，防止随便提价压价、提级压级的错误做法。

10月8日　中共中央批转纺织工业部《关于目前纺织工业基本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恢复，除蚕丝外，棉纱、棉布、麻袋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有棉纺纱锭566万锭，过去86%集中在沿海地区。为了使工厂接近原料基地和内地市场，五年新建的棉纺工厂和印染厂，主要应在沿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等地。中央同意新建200万纱锭的方案。

10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①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②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③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人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严禁私商经营粮食。④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据粗略估计，国家每年需掌握商品粮700亿斤，除去农业税收粮食275亿斤外，须向农民计划收购431亿斤，比1952年农民缴纳和出卖的粮食多30余亿斤。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实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粮食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上述《命令》和《办法》均于23日正式公布。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同意中财委关于目前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的报告，决定在全国实行油料的计划收购。中财委的报告提出，对油料作物的统购与粮食统购一同进行。在统购区统购油料时不准私商收购油料。1953年度全国统购油料折油68.5万吨。

11月15日　国家计委批准成立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负责制定矿产储量分类法，审查和批准各种矿物原料的储量，掌握全国矿产资源的平衡工作。这个委员会由地质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科学院、国家计委派人组成，由地质部宋应任委员会主席。

11月23日　政务院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私营粮商，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食品工业及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有计划地予以供应，不准私自采购或转售粮食。农民向国家交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之余粮，可以售给国家粮食部门和合作社，或到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

11月30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各工业部检查和总结1953年工作，抓紧进行1954年计划草案编制工作的部署报告》。《报告》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①摸清需要与可能。为了切实掌握1954年的供应情况，必须进行主要物资的平衡计算，以及对技术力量、财政力量、原料供应等的平衡。②发展的速度问题，要采取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保证达到必要的工业增长速度。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注意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力争已改建的企业及早投产；切实推广先进经验；有计划地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各方面的配合协作问题。

12月2日　中财委批准商业部和合作总社《关于划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工业品、手工业品经营范围的共同决定》。《决定》规定：工业品的批发业务统一由国营商业经营，手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由合作社经营。凡合作社商业为满足社员需要而购进工业品时，国营商业应首先

满足并切实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12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发行公债总额为人民币6亿元。利率为年息4厘，自1955年起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分8年作8次偿还，自1955年起每年抽签一次。

12月25日 毛泽东复电鞍山钢铁公司，为三大重点工程——新型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系统工程相继峻工并投入生产表示祝贺，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就。

同日 政务院发出由198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产油料作物的指示》要求：①领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②适当地扩大油料作物栽培面积；③大力发展一些不与粮食争地，适于山坡生长，又能起到保持水土作用的木本油料作物；④各大区、省应制订增产计划，并由省指定发展油料作物的重点县；⑤人民银行可适当发放贷款加以扶助，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应推行预购合同，做好收购工作，保证合理的收购价格；⑥积极发展互助合作，增产油料作物。

12月下旬 人民银行调整放款利率。全国解放以后，银行即着手逐步降低利率。这次调整放款利率又进一步规定：国营工业定额放款4.5厘，国营贸易6.9厘；工业生产合作社4.2厘，供销合作社关内为6.3厘，东北为5.1厘；公私合营工业为4.8厘至1.4分；私营工业9厘至1.65分，私营商业仍为1.35分至1.95分；农业生产与副业生产为1分，而设备性放款为7.5厘。

军事

1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6月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他"特级战斗英雄"称号。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的营奉命夺取597.9高地，战斗中他忍着7处伤口的剧痛，毅然以胸膛堵住敌人正在扫射的机枪射孔，保证突击队顺利冲上去，消灭了敌人。为此，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7月13～1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6月中旬，朝鲜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假借"就地释放"之名，无理扣留我方战俘27,000余名，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我志愿军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集中5个军的兵力和1000门火炮，组成3个突击集团，发起金城战役。共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7月16日 蒋介石集团向我福建南部沿海的东山岛进犯。我守岛部队与民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歼敌3000余人，击沉敌登陆艇3艘，击落敌机1架，粉碎了蒋军的进犯。

7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甘肃剿匪部队自3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甘肃、青海边界地区对匪患进行清剿，共计歼匪1380余名，肃清了该地区的残匪。

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据统计，三年来共毙伤敌1,093,839名，其中美国侵略军397,543名，李承晚伪军667,293名，其他帮凶军29,008名，缴获各种武器车辆10几万件，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

8月30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党委决定，追认邱少云烈士为中共党员。1952年10月11日在一次反击战斗中，他和全排战友奉命潜伏于敌前沿。在敌人的炮火袭击中，他被敌人发射的燃烧弹烧着了衣服，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他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烈火焚烧，直至光荣牺牲，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9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毛泽东在训词中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9月1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4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通过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电》。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抗美援朝工作已告一段落，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12月～次年5月 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军民组织实施奠边府战役。这是继中国政府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要求，于1950年派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以大量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取得边界、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战役的胜利后的又一重大胜利。

12月7日～次年1月26日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确定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讨论了我军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的重大问题。

外　交

1月21日　外交部长周恩来就美国政府派遣飞机侵入我东北领空进行战略侦察发表声明指出：1月12日，美国飞机一架侵入我东北安东地区领空，被我击落。最近两个月来，美国空军曾先后多次侵入我东北领空，施行轰炸，致使我国居民死伤多人。声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3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议谈判双方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5月15日　中苏两国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五一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即2个钢铁联合厂，8个有色冶金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3个选煤厂，1个石油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7个化学厂，10个火力电站，2个医药工业企业及1个食品工业企业。这91个项目连同以前已签订的50个项目一同进行。上述"141"项将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分别开工。《协定》规定，对上述项目中，中国政府组织生产一部分配套用的辅助性的半制成品、成品和材料，完成建设上述企业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的20%—30%的设计工作。

5月15日　以协定议定的形式规定苏联对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保证完成各项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1954年10月12日，苏联政府又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15个项目。至此，共签订了156个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

8月24日　外交部长周恩来就联合国大会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问题发表声明。指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应先行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凡派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在朝鲜进行战争的国家，可被考虑作为停战的一方参加会议。联合国大会的任何建议，如果符合本声明的各项原则，中国将予考虑作为举行政治会议的基础。

9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第430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决议案提出答复，建议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国家，应该是在朝鲜交战双方的全部国家。

11月12～26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访问期间，两国政府举行了会谈，并于23日发表示会谈公报。

11月22日　我国政府与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我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朝战争时起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我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全部无偿地赠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国政府还决定于1954年至1957年的四年间，再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给朝鲜，作为恢复朝鲜国民经济的费用。

12月31日～1954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文化教育

1月13－24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会议提出1953年全国文教工作的方针，即"整顿巩固，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同时制定了1953年文教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教育是文教工作的重点，而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中心是培养高级、中级人才，会议指出：要研究解决高校教改中的问题，大力整顿中等技术学校，大量吸收工人入学，要整顿巩固中小学，特别要大力整顿小学，要纠正扫盲工作的冒进作法，确定"积极准备，重点推行"的扫盲工作方针，在文教工作者中要继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2月23日　第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952年开展扫盲工作，推广"速成识字法"以来得经验和教训。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扫除文盲工作必须整顿》的社论。

4月1－14日　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会演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艺人在会演中演出了27场，100多个音乐舞蹈节目。

4月28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工业、运输技术人员的现状和培养办法》。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我国自1932年至1947年共培养大学、专科毕业的工科学生29,600人，且大部分未参加技术工作。解放后三年内本科、专修科毕业学生21,000人。按五年建设需要计算，共需工业、运输、地质及建筑方面各级技术人员约30万人，另需增加技术工人102万人。报告提出：技术人员主要靠学校培养。现有高等学校48所，五年本科毕

业生和专修科毕业生，各有5万人可供分配。现有中等技术学校180所，五年有17万人可供分配。三者合计有27万人，与需要接近平衡。报告说，为了给第二个五年计划供给足够的工业技术干部，五年内高等工科学校应贯彻专业培养专才专用的方针。

5月29日　政务院举行第180次政务会议，会议批准了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通过了《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决定》。会议决定：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实施统一的领导；1953年继续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原则是：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等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和改造、培养师资的办法，为今后发展作准备。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华北、华东、东北三区主要进行专业调整，西南、西北两区院校则进行局部院系调整。

6月4日　文化部电影局发出《关于电影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的指示》，决定自1953年起三年内推行经济核算制，准备自1956年起电影企业全面推行计划管理。要求各企业在推行期内管理好企业资金，拟定并试行各种定额、会计制度与统计制度；建立各种责任制与奖励制度；加强技术管理，提高质量与保证安全生产，逐步地正确编制电影的国民经济计划与财务收支计划，并通过这些计划来进行电影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完成国家所核定的任务。

6月5～22日　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认为，当前教育中存在着两种不平衡：教育事业与国家建设需要及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教育事业内部存在着各级学校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教师量少质差与学校发展规模、要求的不平衡，教材、校舍、设备与需要之间的不平衡。正确地有步骤地解决不平衡问题是普通教育的中心要求。今后教育工作必须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

6月20日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全国高等院校1953年暑假招考新生的规定》。鉴于1953年高中毕业生不敷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4月18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从机关、部队和厂矿中选送干部2000人，经补习后升入高等院校学习。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计划招生7万人，实际招生7.2万人。录取新生中，有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批毕业生1500人。

8月1日　政务院下达《关于1953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指出：1953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的基本方针，仍是“集中使用，重点配备”。配备的重点是基本建设的施工、设计方面和高等院校的助教、研究生。业务部门领导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基本上分配给各业务部门。这次毕业的学生共34,985人，实际分配31,974人。1953年寒假毕业生共5,378人，分给重工业、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占43%，分给高等院校的占10%。

8月19日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正式出版，该药典收录各类药品和制剂共531种，它的编辑出版，为全国药品生产、供应、检验、管理以及药品质量规格和检验方法提供了一条科学法规，受到国际医药界的重视。

9月10～23日　高教部举行第一次全国综合大学会议。会议确定，培养出能胜任各种建设事业的专家，是新型高等学校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所应遵循的道路，也是综合大学的基本方针。综合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为经济和文化部门输送研究和教学干部。

9月22日　为适应全国小学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仍实行“四二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教育部颁发《试行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对1952年2月5日颁发的暂行教学计划作了修订。

9月23～10月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周恩来总理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周扬所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工作报告的决议，修正通过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出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实际生活，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用艺术武器来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

9月28～10月13日　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确定高等师范教育的方针是：“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并明确了高等师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修订了一些专业的教学计划，规定了实施和培养师资的办法，为今后几年高等师范教育拟制了一个工作纲领。

11月1日　中央体育学院成立(后改名为北京体育学院)，钟师统任院长。

11月26日　政务院第195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现有高等师范学校31所，在校学生超过旧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份的1946年的1倍以上，4年来共毕业学生2万人以上。目前小学生人数已达5,500余万人，比旧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份的1946年增加135%。《指示》确定：今后高等师范教育工作应采取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

的方针。

12月5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开展春节农村文艺活动向农民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在宣传内容上，要求：以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和"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文章为依据，着重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伟大目标，宣传互助合作运动和互助合作的好处，宣传扩大生产投资、争取明年增产，宣传踊跃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等。

12月12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私营剧团登记和奖励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克服和防止过早地不成熟地将私营剧团改为国营的急躁情绪，也要克服任其盲目发展、不加强领导的倾向。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拟订私营剧团登记条例，在一定的城市中进行私营剧团登记。

12月24日　政务院第199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指出：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省文化主管部门应着重管理全区流动放映队的工作；划定放映队的活动地区，根据情况分别交由专区或县文化主管部门直接领导。放映队应逐步实行企业经营并须做到逐年减少国家补贴；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地瘠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稳步前进，避免操之过急。

社会生活

1月16日　政务院第167次政务会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在全国普遍建立卫生防疫站，标志着应用医学预防理论和技术进行疾病控制、监测以及卫生监督、宣传和科研活动逐渐走向正规化。

2月间　中央建筑工程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建筑工程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建筑部门的基本情况，并确定了1953年的工作方针：建筑工程按五类排队（国防工程、重工业工程、文教系统工程、一般财经机关和机关团体工程），首先保证主要工程，然后适当照顾其他工程；除大力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外，在组织上应以整顿与巩固现有力量为主，并有计划的培养后备力量。

3月19日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由晏福民率领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国加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后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乒乓球锦标赛，这次锦标赛中，中国男队被评为一级第10名，女队为二级第3名。

4月15～23日　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关于《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的决议。报告指出：大力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充分的发挥她们的潜在的劳动力量，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各方面的建设，是今后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在一切生产企业中，要逐步地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并逐步解决妇女的特殊困难。会议修改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章程，选出蔡畅、邓颖超等125人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选出候补委员28人，还选出了蔡畅、李德全等35人为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的代表。

4月17日　政务院举行第175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5月2～11日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北京举行。大会听取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作的《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国家建设时期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系和教育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计划，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阶级和全国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过渡到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等四项决议。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大会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总工会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9～11日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筹委会主任鲍尔汉向大会报告了筹委会的工作，讨论通过了协会简章，确定了今后的任务。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协助人民政府继续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会议选举鲍尔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5人为副主任，委员83人。

5月30～6月3日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赵朴初居士作报告。佛教协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会议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错为副会长。

6月10～15日　中华全国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首都举行。大会先后听取了廖承志作的《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而奋斗》的报告和钱伟长作的《关于修改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简章》的报告。讨论通过了三项决议，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廖承志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刘导

生、钱三强、吴晗、区棠亮为副主席。

6月23～7月2日　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蒋南翔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大会听取了胡耀邦所作题为《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的报告和李昌所作《关于修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的报告》。刘少奇在祝词中提出了青年团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他说：青年团全体团员要和党一起，站在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最前列。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主席团时说：青年团除了应继续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外，还要有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并勉励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大会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选举产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

7月1日　我国新建第一座巨型露天煤矿——阜新海州矿正式进入生产。该矿东西长3.6公里，南北宽1.5公里，从1951年5月开始开发，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

8月9日　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体育比赛中，中国游泳选手吴传玉以1分8秒4的成绩获男子100米仰泳冠军，获此项目的金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国际体育竞赛的赛场上。

8月2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对"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作了说明。中国少年先锋队仍然是广泛性的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学习和各种集体活动中，团结和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壮健、活泼、勇敢、诚实的新的一代。

9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和有利于城市建设工作的管理，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应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定总体规划。城市发展规模与发展远景，可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布局的初步意见处理。除少数需要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直接帮助设计规划外，一般工业城市及改建城市均由大区城市建设部门直接领导，由城市建设委员会拟订。

9月26日　著名现代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徐悲鸿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徐悲鸿，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抗日战争期间，屡以己作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灾民；并参加民主运动。他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曾创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寓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他的画能融合中西技法，而自成面貌，尤以画马驰誉中外，北京有"画家徐悲鸿纪念馆"。

10月23～11月12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沙千里作关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李维汉作了有关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并号召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必须积极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并积极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会议宣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并通过了章程，选出了领导机关，陈叔通为主任委员，李烛尘等13人为副主任委员，沙千里为秘书长。

11月8日　中共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关于新厂建设的城市中组成城市规划与工业建设委员会的建议。国家计委建议，各中央局和同时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新厂建设的城市的市委，应立即成立城市规划与工业建设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为：①统一考虑与合理安排各新建企业的厂址和住宅区，并制定有关的城市规划。②组织各企业相互交换、校正与检查基础资料；组织地区性共同资料的统一提供。③组织新建企业之间和新建企业与原有企业之间在建设过程中的协作。④根据各企业已定的初步规模，统一考虑当地水量、电力、蒸汽、运输以及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的平衡。

11月20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建国初期，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达1,930多万人，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达100亿元（家庭和农民的手工副业未计在内），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1953年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有4,806个，社员30万人，全年总产值达5.2亿元。会议认为，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计划在1954年内，参加各种形式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手工业劳动者达90余万人，总产值增至10亿元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要为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建立巩固的基础，到1957年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成员发展到500万人，总产值达到60亿元以上，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4年

导　言

一九五四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是我国各项制度走向完善的一年。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土地改革已经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协定的鉴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由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主持。指出：我国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援助，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各级组织法，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恩来为总理，陈云等为副总理。这项大会通过并公布的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它是在长期的准备、充分的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了亿万人民群众意志的产物。

为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开展了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同样是我国外交战线上成绩卓著的一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由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中印、中缅三国的实践，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大意义，为打开中国的外交新局面而奠定了基础。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通过**
- **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
- **日内瓦会议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通过

背景介绍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临时性宪法《共同纲领》载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作为过渡形式，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三大改造的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人民民主政权已经进一步得到巩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已来到。1952年12月，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建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就全国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建立了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3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选举法》。接着，全国各地根据《选举法》开展了人口普查、选民登记、选举人民代表和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从12月起，各地先后开展了基层选举工作，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后共产生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226人。这次普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

材料：

- 一届人大的召开及新宪法的通过
- 六亿人民心花开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
- 会场的一角

材料一　一届人大的召开及新宪法的通过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到会代表1210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订宪法和几个重要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主持开幕式并致词。他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宪法草案起草的依据，宪法草案的性质和内容作了详细说明。经过讨论，20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1日，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23日，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人民政府5年来的工作成就，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前进的道路，说明国家经济建设的唯一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伟大任务。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赛福鼎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

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它是在长期的准备、充分的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集中了亿万人民群众智慧的产物。

1953年1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经过1年的工作，起草了宪法草案的初稿。1954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并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同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宪法草案，交全国人民讨论。共有1.5亿人参加了这次历时2个月的宪法草案讨论，提出100多万条修改补充意见。再度修改后的宪法草案，经过于9月9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部宪法总结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宪法问题的正确原则，并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等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精神贯彻始终。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它规定了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宪法的这些规定充分表明，在我国建立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无法比拟的。

宪法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庄严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宪法还总结了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明确规定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这对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还对国家的职能、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及应尽义务和我国的外交政策等作了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颁布实施，以法律的形式表达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愿望，确定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并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　六亿人民心花开

代表们走进了会场，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

他们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把，放下镐头，放下笔杆、圆规……同他们所爱戴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们一起，商量着国家的大事。

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有很多是各个民主党派、各个民主阶层的代表者，他们是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表达者。

这里有亲历近代中国政治风涛的白发老人，这里有在新时代成长起来、刚到选举年龄的先进青年。

他们来自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来自绿色的海滨，来自内蒙古的草原，来自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西藏高原，来自昆仑山雪峰下的绿洲，来自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他们是哈萨克、维吾尔、彝、苗、僮……族的代表。他们穿着鲜艳的节日的盛装。

飞越了太平洋、印度洋……的浪涛，他们来到祖国。他们是侨居南洋、欧洲、非洲……的祖国同胞。

人民给了所有这些代表们以无上光荣，也付托给他们最重大的责任。他们脸上流露着兴奋和严肃的表情。

这会场曾经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现在建筑得更加宏伟壮丽了。它使人联想到我们祖国，祖国的面貌五年来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当时，我们的西南、西北远没有解放。现在我们已经快走完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二个年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应得的地位，已经

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了。人民的团结加强了，人民民主制度也进一步地发展和巩固。

下午三时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了。

天安门前，北京的晴空里升起了光荣的国旗。

中国人民的最亲爱的领袖毛主席向大会致开幕词。他以坚定有力的声音宣告中国人民的总任务，他说的每一个字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深深地打进每一个人的心坎。他们为他的每一句话鼓掌。

在全国各地，人们在收音机前倾听着。

也倾听着刘少奇代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是的，代表们就要在这会场上制定为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所梦想，为六亿人民所渴望的宪法。

他们代表着全体人民，来到这里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可是他们很多人的祖祖辈辈，曾经吞咽着眼泪过日子。很多人自己也曾经受尽苦难，直到解放的一天。

坐在这里的有杰出的农业劳动模范。从前他们连地主的院子也不敢经过，要绕着路走。他们从来也跨不进任何一个衙门的门槛，除非是被捆绑着双手，可是现在他们以主人翁的身份走进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今天坐在主席台上的就有一个农民，他是山西省代表李顺达。他从前没有出过家乡的山沟，解放后才到了县里。他说："过去国家大事哪捞得上管！"可是解放后他上北京，到苏联，现在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过去，连梦也梦不到啊！"

五十七位当选为代表的农业劳动模范都有着类似山东省代表吕鸿宾的悲痛历史。解放前吕鸿宾一家因为没有吃的，投奔关外，回来的时候一家九口只剩下两口。解放后他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他说："这次庄里选到乡，乡里选到县，县里选到省，省里选到中央，"真是不知道该怎样高兴。他抚摸着到北京后领到的全国人民代表当选证书。他那双从小当木匠、佃农的手结着厚厚的茧。也许为了有茧，不容易感觉；也许为了爱护证书的烫金皮面，他不用手心却用手指背轻轻地来回抚摸着那本证书。

九十八位工业劳动模范的故事也有着不少共同点。旅大市代表刘立富沉痛地诉说，他从小就当小贩学徒；卖过豆腐，十四岁就在码头上背豆饼，"挨皮鞭，挨木棒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我们这些被瞧不起的人当了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了！"

前些时候，抚顺市代表张子富也愤怒地谈到解放前受煤矿把头压迫侮辱的事实。有一个把头规定他们每半个月轮番剃去半边头发。后来换了另一个把头，却规定他们每人都要剃去眉毛。都是为了容易辨认，不好逃掉。他说："我父亲放羊，大兄放牛，自己放过猪，现在都得到了这样大的光荣。"

一百四十七位妇女代表更加兴奋。申纪兰这个山西的一个农村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从前像中国绝大多数妇女那样只是守着锅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解放后翻了身，还出席过世界妇女大会。

上海市代表纺织女工裔式娟得到自己当选消息的那天晚上，刚好她上夜班，起先自己还不知道。走进车间，就有不少人来拉她的手，向她道喜。一个老年女工对她说："你们虽然也受过苦，可是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老年人受的苦有多深。到北京去，好啊！你代表我们全体女工投票吧！"

多少劳动人民，多少妇女，甚至连一个正式名字或者所谓"学名"也没有，到老还是用着爹娘在他们小时候呼唤的"阿狗"、"六孩"、"阿妹"、"小妹"……这些奶名。可是，就是这样的人，今天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代表当中有三十四位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全国闻名的郝建秀就是刚到选举年龄的青年之一。辽宁省代表煤矿工人谷发明今天二十四岁，他特别感激国家对青年的爱护。

黑龙江省代表星火集体农庄主席朝鲜族金白山的话，使人相信同样也表达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心情。他说，只有在新社会少数民族才能享受到平等权利。他回想起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让他们说朝鲜话。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能进自己的学校，读朝鲜语的课本。

代表着海外一千二百多万华侨的华侨代表们的出席，充分表现了祖国对它的海外子女的深切关怀。他们长久以来受歧视受欺侮，现在他们也能够挺直身子抬着头走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国的十二万华侨工之一的李广臣代表，到法国的时候才二十来岁，现在回国已是六十开外的白发老人。他无限兴奋地说，他看到的祖国已经完全变了样，人也变了样，青年人说的话他几乎听不懂了，他们受到了新的教育。

年老的代表们为他们能够亲见国家的转弱为强而欢乐。这里坐着九十三岁的画家齐白石，八十七岁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他们不能不有许多感慨。前些时，在她家里，七十七岁的华侨代表何香凝取出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缔造的临时约法，指点上面载有人民应得的民主权利。她颤声说："可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哪里得到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做尽了剥夺破坏人民权利的一切罪行。"

甘肃省代表张治中告诉记者他的感想：蒋介石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军政、训政、宪政"，实际上是"军政"到底，打内战到底。反动统治的最后几年，为了欺骗人民，搞什么国民大会和选举，还不是他一个人独裁？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这次大会的召开，却是新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广东省代表蔡廷锴记起了蒋介石搞伪"国大代表"选

举的许多鬼事。包办、收买、贿赂，你抢我夺……得不到手的人为了泄愤，把一口棺材抬进了伪"国大"会场！他说，现在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有了各项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

张子富代表记得当年国民党在他们矿区搞伪"国大"选举。把头把矿工们的图章一个个收去，装了一大口袋。选出来的人就是打骂工人的特务。他愤愤地说："他们拿我们自己的拳头打我们自己的眼！"

一千二百二十六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意志，来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

还在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骑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时候（一九四〇年），我们敬爱的领袖发出了光芒万丈的科学的预言，他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新中国是我们的。"

九年后，这条航船全身显现在一片霞光的东方大海上。新中国成立了。

十四年后的今天，这条航船，由人民掌着舵，向着更加光辉灿烂的航程前进。

那舵就是全体代表们将要制订的宪法。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辽宁省代表榨油工人李川江说，宪法是我们的工作指针。

好些代表们在代表组的讨论会上说，宪法是幸福的保证书。有一个农民代表说，它是共产党给人民找到的宝贝。有了它，可以保证过渡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山西省代表马六孩感到宪法的每一条都和他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他七、八岁就给煤窑上的父亲送饭，自己十来岁就背煤。解放前，他的孩子才九岁，也下了煤窑。一个哥哥给煤砸死，一个哥哥病了没钱医，十六岁就死了。四个妹妹生下来就被溺死。可是现在他家住了新房，过着幸福的日子。一家八口，五口上学。自己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几年来好几次上休养地去度假期。"过去哪谈得上劳动者有休息权？不休息也还要担心挨饿。"他曾经连续做过七个班，一连五十四小时在井下干活。失了业，到处流浪，还要过饭。

不少代表同军队代表王维福、抚顺市代表王崇伦、辽宁省代表韦玉玺说得一样。韦玉玺说，国民党的法是老百姓挨打的法。王维福说，过去的法律是剥削工具。

今天坐在主席台上的王崇伦曾经这样说，新中国的宪法是从人民群众当中，经过公开的讨论产生出来的宪法。"革命的老前辈们给我们打下江山，争来各项民主权利，我们要用宪法把每一项都固定下来，好好保护它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来保证宪法的实施。"带头遵守宪法是他们的共同誓愿。

代表们也为了大会将要办的另一件大喜事而兴奋着。许多代表异口同声地说，当群众欢送他们来北京的时候，都嘱咐他们要选举最亲爱的人来做自己国家的领袖。

军队代表王有根得到当选消息的时候，正在学校学习。许多同学和教师们来祝贺他，形成了一个座谈会。他们热情地说，最好在投票的时候，也能把他们的名字签上。山西省代表曲耀离来北京的时候，拖拉机站上的人也来送，说千万要替他们也投一票。另一个山西省代表吴春安说，他动身的时候，社里的一个老社员，七十多岁了，特地奔跑过来招呼他，他还以为他要捎什么东西。可是老头儿说的，就是大家心里都有的那一句话。新疆省代表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微笑地告诉记者，当他经过阿尔泰草地的时候，一个过去贫苦现在有了十几头牲口的哈族牧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说了一句："一定要选他老人家啊！"

从珠穆朗玛峰到鸭绿江边，从塔里木盆地到珠江三角洲，六亿人民怀着同样的心愿。这是中国的大喜日！六亿人民心上开了花！

（原载 1954 年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作者：袁小拍）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

一、宪法制定缘起

1949 年，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得以建立起来。建国初虽无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 1953 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

1952 年 12 月 24 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的第 43 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以全国政协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按中国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7 条第 10 款规定，于 1953 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着手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全国政协常委会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认为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讨论了全国政协的建议，做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说，及时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充分的条件。既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有自己的法律——宪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政府委员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提议。最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决议。

为了进行宪法起草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刘少奇、周恩来等33人。宪法起草工作进入具体准备阶段。但因1953年若干省份灾情严重，为集中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3年9月18日召开第2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迟到195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就使宪法的起草工作及各项准备工作，获得了更加充分的时间。

二、毛泽东亲自领导起草宪法

1952年12月，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了办公室搜集有关制定宪法的资料。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初稿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1954年1月7日，起草小组在杭州开始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首先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就此于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同志征求意见。刘少奇于翌日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提出初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研究讨论一个多月，将初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下旬，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5日，提出三读稿。2月28日、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并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负责，以董必武为主，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以及宪法起草小组的意见，将三读稿加以研究修改。3月8日，提出四读稿。3月12日、3月13日、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从而基本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的草拟工作。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以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8同志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对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作最后的修改后，提交中央讨论；(二)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由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954年3月16日召开第53次会议，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座谈宪法草案初稿，共有500多人、分17个组参加讨论。

三、宪法起草委员会七议七改宪法草案

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可以大修改，也可以推翻另拟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完全接受了党中央提出的初稿。会议决定：宪法草案的讨论，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外，政协全国委员会也进行分组讨论，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会议还决定：正式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

3月28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下设编辑组、会议组、记录组、联络组、总务组作为委员会的职能机构，紧张而细致地开展各项工作。

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从3月25日至5月5日，共进行40天，参加者500多人，开会260次，平均每组开会15次，最多者达20多次。各组发言热烈、认真，提出的意见和疑问除重复者外，达3900多条。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宪法的讨论，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通知》，要求各地党委认真讨论并对整个讨论加以领导和组织。于是，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广泛地进行了对宪法草案初稿的热烈讨论，参加者达7千多人。大体由4月上旬开始，5月底结束，提出的意见和疑问共2900多条。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等也积极进行了讨论。各方面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对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针对宪法草案写得比较简单这一情况，毛泽东说："宪草要简单、明了"。我们国家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将宪草写得简单、明了些，是有好处的，等将来有经验时，再制定详细的宪法。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情况，多制定些子法。至于母法——宪法，就不能随便变更、修改，否则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宪法草案，除总纲外，其他各章节都写得比较简单。

5月6日至5月22日举行召集人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组召集人、副召集人，秘书长、副秘书长，顾问等。召集人联席会议是在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以前和在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召开的，主要是对各小组所提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和意见进行反复讨论、研究，然后，将基本上一致的重要意见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为讨论修改宪法提供正确的参考意见。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认真的逐章逐节的讨论，整理出了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意见，并于5月26日，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

5月27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正式讨论宪法草案初稿。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序言和第一章总纲。

5月28日，进行第三次会议，讨论第一节至第三节，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

5月29日，进行第四次会议，讨论第二章第五节民

族自治机关，第六节法院和检察机关，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5月31日，进行第五次会议，讨论第二章第四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及遗留问题，并对宪法草案初稿再次进行通盘讨论。在休会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出1954年5月31日修正稿，提交下次会议讨论修正。

6月8日　进行第六次会议，根据5月31日修正稿，会议进行了全盘讨论。

6月11日　进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并通过6月8日的修正稿和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要在最近开会，宪法草案大概在15日以前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还要进行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时间的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解释，组织讨论。今天的会议是对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的审查。虽然大家对条文都很熟悉了，但是今天要表决通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它读一遍吧。"宣读条文后，李维汉就修改之处和修改原因作了说明。接着又进行讨论。最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付诸表决，一致通过。

宪法草案的通过，标志着宪法起草工作胜利结束。毛泽东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每一次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将来全国讨论以后，会有好的意见提出来，会有所修改，但总的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动了。"

四、人民讨论，人民修改

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21人发言，一致表示拥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作出三项决议：(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予公布。(二)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应立即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组织对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向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对于宪法草案内容的说明，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出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三)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继续进行工作，收集人民的意见，加以研究，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以前完成宪法草案的修改，并准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宪法草案通过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宪法所以得人心，大家所以赞成，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宪法公布以后，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觉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道路可走，有了章程。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为了做好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在公布之前，中共中央于5月2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

自6月15日宪法草案公布起，历时三个月，全国一切城市和农村，广大人民群众都投身于积极讨论宪法草案的热潮。

经过全民讨论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于9月8日的第八次会议上，对宪法草案又作了较大修改，并提交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9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五、根本大法庄严诞生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15日召开。9月14日，全国各地人民代表都已云集北京，大会召开前夕，又广泛听取了人大代表对宪法草案的意见。根据人大代表所提意见，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对宪法草案又作了修改。出席会议的除政府委员44人外，还邀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组组长21人列席会议。

会上，毛泽东提出："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改了比较好。"一个地方是：序言第三段，"'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九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宪法》，瑞金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布的《瑞金宪法》，《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符其实。""另一个地方是：第三条第三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五字上，代表中有人提出说不妥，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并且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有了规定。所谓有'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你信仰宗教也好，不信仰宗教也好，你可以信这种宗教，

也可以信那种宗教。……既然有第88条，第3条再讲'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重复了。这是西藏代表提出的意见，说这样写法不好，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说'改革宗教'还可以。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倒是多了，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喇嘛 教等等。我看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字删掉好；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一点，刘少奇的宪草报告中应当提到。"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下午4时，在通过会议议程之后，会议随即进入第一项议程。首先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他的报告不断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9月16日下午至9月18日下午，讨论宪法草案和刘少奇所作的宪法草案的报告，在会上发言的代表共计89人。所有发言的代表都兴奋地表示拥护宪法草案，同意刘少奇的报告，并一致建议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宪法。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中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作者：王德昌、郝和国）

材料四　会场的一角

周立波

九月二十日是个晴朗的好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一天正式诞生了。

下午二时，离开会时间还差一点钟，我们乘车驰过北海和中南海间的金鳌玉带桥，从政务院北门开进中南海。走了一段路，我们进了怀仁堂，里边的灯光还没有全亮，全场还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和监票人员在走道上走动，小声地谈论些什么。

我坐上了我的席位，从容地看看四周围。高悬在两边廊子上的六角宫灯的红穗，在通风器下边流动的空气里轻轻地飘动。主席台上，灰绒幔子的当中，我们的国徽在台顶灯光的照耀下，发出金色的、晃眼的光彩。

代表们渐渐来到了。少数民族的男女代表都穿着自己民族的颜色鲜亮的盛装。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穿起了团花的黄缎子袍子。达赖的上身还套一件起蓝花的黄缎子坎肩，黄袍的袖口镶着一截大红的缎子。

下午三点，会场东面的门口，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会场里爆发一阵热烈的鼓掌。毛主席晒得黑黑的健康的脸上含着微笑，转过身子向代表们扬手。

执行主席们走上了主席台，周总理站在当中，宣布开会。会场首先通过了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和监票人的名单。往后，执行主席要大会秘书处的一位同志朗读了宪法草案的全文，接着问道："大家还有没有最后的修改的意见?"回答是一阵鼓掌，讨论了很长的时日，大家再也没有修改的意见了。

报到的代表是一千二百十二人，今天出席一千一百九十七人，只有十五人由于患病而缺席。执行主席宣布了核对的人数。

全场分设了十个票箱。监票人已经站在票箱的旁边。各个代表组的执行组长开始发票了。

浅红色的表决票上，用汉、蒙、藏、维四种文字印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旁边的框框里也用上述四种文字印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顶上的长方格是投票人画圈或是画×的地方。

执行主席和监票人投票以后，全体代表跟着投票了。

我在浅红色的表决票上庄严地画了一个圆圈，站起身来，和附近的代表们一起，排成一行一行地，有次序地走到票箱的跟前，把票从红漆箱的长方小孔里投了进去。

离我的座席不远，有一位贵州苗族女代表，穿件黄缎子花袖上衣，系条青裙子。她随着大家，走到票箱，庄严地把票投入，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在我右首的走道上，我看见了两位从井冈山下来，参加了长征的、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们穿着黄呢子军服，手里拿着表决票，向票箱走去。看着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根，人们不禁想起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的艰难、曲折和长久。

我看见了董必武同志、林伯渠同志、徐特立同志和蔡畅同志，中国革命的前辈，毛主席的老战友，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代表们，也随着大家，走近票箱，投入了他们的画好了圆圈的红票。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参加了多少艰险的战斗！特别是董老，他和毛主席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看着他的微弯的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那天，没有那一天，就不会有往后三十三年人民有组织的轰轰烈烈的战斗，也不会有我们通过人民宪法的欢欣鼓舞的今天。

我看见了帅孟奇同志。她戴着眼镜。她的一只眼睛半瞎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里，她给灌了混着汽油的冰水。汽油呛进了鼻子，毁坏了眼膜，从那时候起，她的目力变差了，走路很吃力。现在，她扶着手杖，跟着大家，慢慢地走近了票箱。

我也看见胸前挂着闪亮的奖章和纪念章的许多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都投了票了。

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学者、教

授、工程师、教员、起义将领、各少数民族代表和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的代表都投完了票，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位穿青袍、戴花镜、右手拄一根红漆拐杖的老人身上。他是画家齐白石，今年九十四岁了。长长的胡须和前边的稀发一片雪白。这位木匠出身的老画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终于看见了人民的宪法，并且参与了它的表决。

投票完毕，主席宣布开票箱。我们前面的八号票箱的锁给打开了，监票人和计票人把票取出来点验。其它的票箱也都打开了。全场鸦默鹊静地，只听见计票人的轻微的点票的声音。

秘书处的人把投票总数报告了执行主席。主席紧跟着宣布：投票张数和发票张数相等，表决有效。全场爆发了长久的、热烈的鼓掌。这时候，挂在怀仁堂的米黄色的方柱上的电表指着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

休息半点钟以后，主席宣告：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场一致通过了。代表们全体起立，鼓掌，欢呼，许多人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许多人喊"毛主席万岁"，暴风雨似的掌声延续了五分钟。

这部宪法是毛主席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公布以后，全国人民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讨论，提出了一百一十八万多条修改的意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里，对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以及宪法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和说明。

我们的宪法表现了六亿人民的意志和心愿。它记录了我们革命的过去的成果，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目前的情况，它将保证我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消灭剥削和贫困，胜利地走向繁荣和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主席用诗一样的文句向大家宣告：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将永远地记住我们的领袖和导师的这些话。我们将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4年9月30日）

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

背景介绍

为了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在思想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务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

这一时期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53年1月到1954年9月为第一阶段，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各级党校、开办马克思主义夜校、业余大学等形式，组织党和政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继续学习列宁、斯大林等人论经济建设的著作。这一阶段进行的是和风细雨式的正面思想教育，对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7月为第二阶段。这时由于对《红楼梦》研究引起的争论，使党和政府中断了原来的思想教育计划，改以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为主要内容。一方面通过举办讲演会，对全体干部和500万知识分子普遍宣讲唯物论，批判唯心论；一方面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批判科学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宣传唯物主义思想，肃清唯心主义思想。结果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论争，以致动用专政机关，从而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对全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从1955年8月到1956年12月为第三阶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的出现，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重要，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和政府开始调整知识分子的政策。

材料：

- 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 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
-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材料一　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俞平伯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研究。1952年9月，他把旧著《红楼梦辨》增删后，以《红楼梦研究》为名再版发行。1953年5月，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第9期对该书作了推荐

介绍。之后，他又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其中一篇《红楼梦简论》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953年3月号上。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难免也存在一些缺点。

1954年秋，两个青年文学爱好者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文艺报》未被采用，继由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又发表了他们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他们在上述两文中认为：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和"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出发，否定了《红楼梦》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价值，用烦琐考证的方法把人们引向了不可知论，其思想根源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李、蓝的文章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0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并附上李、蓝的文章，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批评《文艺报》、《人民日报》某些人"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指出，这种"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值得注意；并提出要批判俞平伯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的信便将原来正常的学术争论变成了批判俞平伯等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群众运动。

文艺界的党组织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信。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俞平伯、蓝翎等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俞平伯沿袭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应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对古典文学研究中一直未肃清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会议指出：自由争辩是学术研究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方式之一。这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是个开端，希望继续展开讨论。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界某些领导人容忍和颂扬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曲求全，对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从而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推上了激烈的批判斗争阶段。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联席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揭发了《文艺报》的错误，决定改组其编辑部，重订其办报方针。同时，全国各地报刊、文教部门、高校文科系、文艺和科研团体、各民主党派等，也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开座谈会、批判会，全国形成了一场批判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群众运动，并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斗争"，直到12月才告一段落。

材料二　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为了更好地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批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1953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以此为契机，红学家俞平伯将28年前出版过的《红楼梦辨》"有的全删，有的修改"，"共得三卷十六篇"，改名为《红楼梦研究》[①]，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随后他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②]等几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其中《〈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和《〈红楼梦〉评介》，是受俞平伯之托，由王佩璋代写的）。

"小人物"的挑战

古典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把古代的艺术珍品变成新的历史时期的群众所能接受的宝贵财富。《红楼梦》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从对各种版本的校勘、考订、追根溯源到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思想倾向的评论，涉猎甚广而且颇有建树。他的论著对于帮助向读者介绍《红楼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不能给读者以正确的方法，而且其中有不正确的观点。现实向《红楼梦》的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论中解脱出来，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能够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学习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对红学家的挑战。

1953年5月，《文艺报》第9期的"新书刊"专栏里，介绍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这本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不久，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合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向

---

①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

② 载《新建设》杂志1954年3月号。

《文艺报》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这篇着重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9月中旬，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江青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借此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编辑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后来《文艺报》同意转载（登在1954年第18期上），主编冯雪峰为该文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文章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这两位青年批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

10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文艺报》和《人民日报》，支持两个青年对俞平伯的批评，并且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对胡适派的斗争。他说李、蓝的两篇文章，“是对三十多年以来的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①

10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极其严厉地指责文艺界某些领导人“长时期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

文学艺术的各级党组织及时地将毛泽东的信向文艺学术刊物编辑部和其他学术研究机关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传达。10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和学习毛泽东的信，与会者作了初步的思想检查。10月20日，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指出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清除胡适派唯心论的影响是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

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联席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认为《文艺报》的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委会。

与此同时，首都和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部门（各大专院校的文科各系）、文艺团体和各民主党派也都纷纷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形成了比批判电影《武训传》规模更大的思想批判运动。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梦讨论集》4集，共收入讨论文章129篇，近100万字。这些文章论证的主要思想，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的倾向性，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深刻地揭示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这些文章主要批评俞平伯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用烦琐的考据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他们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俞平伯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所谓“自传说”。俞平伯认为，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一句话，“《红楼梦》有自传的性质”。这个观点同胡适的“自传”说有某种历史的联系。批判者认为，《红楼梦》和其它文学作品一样往往融进了作者自身的经历和生活感受，但它毕竟是艺术典型的创作。《红楼梦》写的不是曹雪芹个人的遭遇，也不是他一家的悲剧，它是对当时的整个封建社会面貌的艺术概括。说它是作者个人的“自传”，就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否认了《红楼梦》是曹雪芹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封建社会进行解剖的典型意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4—135页。

二、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和"钗黛合一"说。俞平伯在一些文章里，也讲到《红楼梦》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但他认为曹雪芹对这个大家庭和封建社会的现实所抱的态度是："既无所赞美也无所贬抑"，即所谓"怨而不怒"，不象《水浒》那样"有些过火"和"锋芒毕露"。俞平伯还认为曹雪芹对书中所写的人物是一视同仁的，无所谓爱憎和褒贬。他列举"金陵十二钗正册"中钗黛二人"合为一图，合咏一诗"；第五回对秦可卿的描写："鲜艳妩媚有似宝钗，风流袅娜又如黛玉"，"乳名'兼美'"，"红楼梦曲引"中有"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金指宝钗，玉指黛玉，"悲"、"悼"都是痛惜的意思，等等。根据这些，他断定钗黛"名虽二人，人却一身"，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批评者指出，"双美合一"，抹杀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把互相矛盾的两个人物形象调和在一起，否定了作者爱憎的倾向性，也就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积极意义。

三、所谓"色空观念"说。俞平伯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无非是"由盛而衰，由富而贫，由绮腻而凄浮，由骄贵而潦倒，即是梦，即是幻，即是此书本旨"。由色空观念出发，产生了许多真假反正，可彼可此，无所谓肯定或否定的人物。批评者指出，《红楼梦》有"空"的思想，但它不是主要的。《红楼梦》写的是现实社会的悲剧，它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面貌。作者对于"情"和"道"是持憎恶、批判态度的。"色空观念"论，直接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特色。

四、所谓"脱胎"说。俞平伯在论述《红楼梦》的"传统性"时，认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源于《西厢》"，认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主题，都是由《庄子》、《诗经》、《春秋》、《左传》、《楚辞》、《金瓶梅》、《西游记》、《水浒》、《西厢记》等书"脱胎而来"。他从《红楼梦》中找出个别情节或词句，同它以前的古典作品加以对照，根据它们之间有相似之点，从而得出"脱胎而来"的结论。批评者指出，学识渊博的文学作家利用前人的文学成果，或者由于描写人物的需要，借用古典作品中的故事或语句，是不足为怪的。把这种利用前人成果说成是文学的"传统性"，那是对"传统性"的曲解。在说明《红楼梦》同过去文学作品的继承关系时，要着重地阐明作者的独创性，而不应当牵强附会地去推测作者的模仿性。"脱胎"之说，否认了《红楼梦》的独创性，也就贬低了这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价值。

五、实用主义的烦琐考证。批评者认为，俞平伯的上述观点，都是用烦琐考证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这种方法不是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科学的研究，而是对书中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一些个别的情节或词句，孤立地主观附会。这种方法是"新红学派"惯用的基本方法。它不可能使人真正理解《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

（摘自《文坛三公案》）

材料三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两位"小人物"发起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还只是文学艺术范围内的事。同年10月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却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高度，发动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这场斗争不局限于《红楼梦》研究，也不局限于古典文学，而是要"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流毒和影响"。从俞平伯转向胡适，有一位学者对此作了通俗的解释：

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是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①

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九个方面，即：

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
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
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观点的批判，
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观点的批判，
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
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联席会议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并推郭沫若为主任。参加会议的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的编辑将近100人。讨论会延续到1955年3月，共举行了21次。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

① 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大学中的流毒》，《新史学通讯》1956年元月号。

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论述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意义，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

1954年、1955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内掀起了学习唯物辩证法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高潮。如批判梁漱溟的错误思想——封建复古主义的文化观、"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在教育界，批判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医药卫生界，批判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工程建筑方面，批判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这个批判运动的中心。从1954年12月开始，全国各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八册，收入150多篇文章，计200多万字。

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的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①。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历史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祖国的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有许多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的思想观点和治学方法深刻影响的文化学术界的老前辈，如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如贺麟，他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评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②

这次批判，规模之大，"参战"者之多（大部分是知名人士），持续时间之长（达两年之久），批判范围之广，都是空前未有的。

这次批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胡适的一生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了全面的清算。"五四"以后的30年间，胡适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很深的影响。解放以后，经过政治学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旧文化旧思想受到了批判，但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直没有触及。1954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同《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③。

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认为，胡适思想的影响，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中，都还严重地存在着。这些旧的思想影响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阻碍作用。所以这次批判，不仅使很多人开始懂得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什么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开始同胡适思想划清界限；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清扫基地。

（摘自《文坛三公案》）

---

① 汪子嵩等：《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195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② 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③ 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

日内瓦会议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背景介绍

1954年，为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时期外交战线上的任务是：继续加强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积极支援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和平运动，支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继续执行国际和平政策及发展与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政策。

为完成上述任务，针对朝鲜战争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尤其针对美国政府在朝鲜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在印支半岛支持法国扩大侵略战争、在台湾海峡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等罪恶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力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国防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材料：

- 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 日内瓦会议散记

材料一　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提出了召开苏、美、英、法、中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10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的建议，并宣告："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① 苏联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尤其亚洲和法国人民，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印支战争。但是，美、英、法三国政府却迟迟不予答应。

1954年1月9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才能促进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解决，才会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向即将在柏林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发出警告。

1月25日至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苏联政府的坚决支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和印支和平问题。尽管美国政府坚持在会议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的意思，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组成了一个近200人的代表团。要求代表团在会议上"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②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国家的代表。会上，以中、苏、朝、越四国为一方；团结合作，同美、英、法等国展开了复杂的斗争。会议历时87天，大致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4月26日到5月7日，主要讨论如何巩固朝鲜战后和平和在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

为维护朝鲜半岛和亚洲和平，中朝苏三国代表商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项原则：(1)6个月内撤退在朝鲜半岛的一切外国军队；(2)在不受外国任何干涉的条件下，由南北朝鲜人民举行自由选举；(3)在独立、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长南日向会议提出。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特别是对朝鲜和印支问题的立场，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揭露美李集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阻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罪行，批驳杜勒斯等对中国的攻击和诬蔑，并表示中国愿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承担一切义务。

由于美国等侵略国家单方面宣布《十六国共同宣言》，致使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毫无结果而被迫结束。

第二阶段，从5月8日到7月21日，主要讨论恢复印支半岛和平问题，参加国有中、苏、越和美、英、法及南越、柬埔寨、老挝等国。

5月7日，越南人民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法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法国拉尼埃政府仍希望美国参战帮其挽回败局。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法国外长皮杜尔歪曲印度支那的历史，否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无视法国失败的事实，仍提出了以战胜者自居的停战建议。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苏、越三国代表的反对。但法国政府坚持顽固立场，致使关于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讨论无大进展。6月18日，拉尼埃内阁

---

① 转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5—6页。

② 转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5—6页。

倒台，主张停止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法国政府新内阁。他宣称，如果7月20日前不能达成停战协议，他就辞职。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有了转机。

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在会上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对策取一致行动，由越南提出了法国承认印支三国主权与独立、从印支三国领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由印支三国自由普选等八项建议。周恩来在会上两次发言，揭露了法国扩大印支战争的罪行，批判了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谬论，利用美英法之间的矛盾，争取英法，孤立美国。周恩来会见了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以及追随法国的柬埔寨王国、老挝王国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还飞赴印度、缅甸访问，争取他们支持中国对印支问题的立场；返回国内，同正在中国休假的越南政府首脑胡志明就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特别南北越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同时，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还同会内外许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人士广泛接触，使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的立场，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

由于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的共同努力，由于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法国人民的支持，由于法国新政府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政策，终于签订了在印支半岛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7月21日，中、越、苏、美、英、法、柬、老、南越九国共同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保证恢复印支和平。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虽然关于朝鲜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但它签订了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仅此即可表明，国际争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求得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经验，为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国际会议，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事实表明，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关于指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述评》）

材料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早在1953年12月，中印两国政府就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进行谈判，周恩来对代表团谈话时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即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根据上述原则，顺利地达成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6月26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应邀访印。28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公开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认为两国在“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适用这些原则。”

29日，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时，同缅甸总理吴努也发表了联合声明，申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中缅两国关系，并向世界各国发出了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进一步阐明：根据这些原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①

这样，由中国提出，经中印、中缅三国实践、并向全世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分国家大小、社会制度异同，主张国际一律平等、和平共处，无疑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正确政策。它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政策、殖民主义政策针锋相对，得到了世界上弱小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持。美国政府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在全世界、特别在亚太地区煽动反华反共，纠集反革命军事集团，企图挑动新的战争，引起一些国家和人民对共产党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恐惧和疑虑。中国同印、缅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双边关系的铁的事实以及中国总理与印、缅两国总理声明中关于“不输出革命”的公开声明，揭穿了美国政府的欺骗宣传，解除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恐惧和疑虑。

中国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取得的初步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它为打开中国的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摘自《风云七十年》）

材料三　日内瓦会议散记

1954年4—7月的日内瓦会议，是英、美、法密商之后提出召开的。这个会议和中国有关系，应该有中国参加，但那时中国同英、美、法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便从此进入了国际舞台。

周总理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出席日内瓦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第116页。

议。为了弄清英、美、法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会议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我们要争取解决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以及我们应采取何种策略，做哪些准备等等，要同苏联进行详尽的磋商。为此，周总理从 4 月起始，三次访问莫斯科，我三次都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周总理第三次到莫斯科是在中国代表团组成之后，于日内瓦会议的前夕率中国代表团到达的。中国代表团除周总理任首席代表外，副团长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团员有乔冠华、陈家康、龚澎、马列、蒲寿昌、康一民等一百余人。我的名义是顾问，到了日内瓦，又称"政治顾问"。为了使中国代表团成员对国际会议都能有个了解，莫洛托夫安排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给中国代表团讲话，主要内容是他们在国际斗争中的经验和许多具体问题的细节。

中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从莫斯科一前一后出发，一切都进行得准确无误。座机途经柏林降落时，民主德国外长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在苏联代表团即将到达时，中国代表团起飞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律着中山装，戴八角帽。到日内瓦下飞机时，场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对中国代表团不无好奇。

苏联在日内瓦有他们老早以前的房产，并有专人管理，莫洛托夫就住在那里。中国代表团则是租的别墅，很可能到处都有窃听装置，所以在会议期间，周总理总是到莫洛托夫的住处去商谈问题，每隔一两天总要会面一次。有时也同朝鲜外长南日会谈。过了几天，莫洛托夫回访周总理，他说周总理拜访他的次数多，他也应该到周总理这里来，不过有个条件，不能在这里谈任何机密问题。有时他们谈话只能耳语，室内播放音乐。尽管如此，重大问题仍是在莫洛托夫那里谈。

日内瓦会议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亚洲问题拿到国际会议上讨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对英、美在会议桌上的策略虽然不够了解，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有丰富经验的。

到达日内瓦的当天，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即到会场参加座次的排列。虽然规定是按各国国名字母的顺序排列，但仍有策划的余地。王炳南的任务就是尽量设法把朝鲜、越南和苏联排在我们的近邻，其他不必管。

英国和苏联商量，会议主席由艾登和莫洛托夫担任，轮流主持会议，并商定主席有权指定助手组成自己的主席团。第一天是艾登主持，他选的助手有一名是土耳其人。第二天是莫洛托夫主持会议，他给自己选的助手一个是葛罗米柯，一个是费德林，另一个是我。其实这些助手并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同英国对等。但美国代表团听说中国人进入了主席团，便气得要死。

会议开始，先讨论朝鲜问题。整整吵了一个半月，没有弄清一个问题，仅仅"谁是侵略者"都扯不清。侵略者是要对这场战争负责，赔偿战争损失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互相指责对方是侵略者。南朝鲜代表像疯了一样，狂吼乱叫说中国侵略了他们，还问"谁打的第一枪？!"北朝鲜立即反击说："你们打的第一枪！是你们打过了三八线，我们才自卫还击的！"美国代表也喊叫"中国侵略！"而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风马牛不相及。这样吵闹了一个半月，渐渐都感到厌倦了。英、美、法密商不再开下去了。莫洛托夫及时掌握了这一动向，告诉我们朝鲜问题要暂告一段落。中国代表团一直表现得沉着冷静，周总理的几次发言都是充分说理的。这时周总理又一次发了言，大意是说关于朝鲜有些问题还是可以取得一致的。由于周总理的发言很有内容，很有感染力，比利时的代表被感动了，他站起来响应，说周总理的发言"有合理的部分"，应该认真讨论。美国代表团对他的发言很生气，隔着好几张桌子给他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别说了，可是他没有懂得，还在讲。美国代表团急得没有办法，干脆递过条子去，他一看条子傻眼了，赶紧向主持会议的主席艾登声明："不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误会了，我不是要延长会议。"英、美、法决定了休会，对周总理的发言更听不进。

美国的首席代表先是国务卿杜勒斯，他见了中国代表头都不抬。中途换成史密斯，此人似乎有点灵活性，但因国内规定了不许同中国代表握手，不许作友好的表示，所以他很想表示点什么而又不能。当莫洛托夫同周总理散步时，他上前同莫洛托夫握手，而对周总理是拉拉袖子；在同莫洛托夫谈话时，眼睛却盯着周总理。

莫洛托夫为了帮助中国同英国的接触，亲自设计了一次会见。他在自己的别墅摆了鸡尾酒，请周总理和艾登出席。三方各有四、五人参加。中国方面有张闻天、乔冠华、蒲寿昌（英语翻译）和我。这次宴会打开了中、英交往的门路。此后，艾登到中国代表团住地访问过周总理两次，周总理也回访了艾登一两次。

朝鲜问题告一段落之后，会议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在休会期间，周总理访问了印度，又回到北京，然后再赶回日内瓦。

复会以后，就是讨论的越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主动权很大。奠边府战役为在会议上的我方加了一个大大的砝码。

法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此时还是皮杜尔。这是个亲美分子，表现得有恃无恐，爱酗酒，头脑不清醒。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全军覆没，将领被俘，以皮杜尔为首的法国代表团沮丧已极。这天的会议，他们到会很晚，当他们全都戴着黑纱、黑领带，头也不抬，哭丧着脸进入会场挤坐在一起时，越南代表团有人笑出了声。皮杜尔恼羞成怒，发脾气说："死了那么多的人，将军、元帅的下落不明，还笑！"范文同用法语（他的法语比法国人还地道）回答："他们的

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会照顾他们的。"皮杜尔还在生气，骂越南"傀儡"。范文同当即用法语反讥道："没有想到你们是在同傀儡打仗，同傀儡打仗还损失那么惨重?!"噎得皮杜尔无言以对。

皮杜尔垮台，法国首席代表换上了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孟戴斯—弗朗斯。他是犹太人。此次谈判成功与否，对他的地位能否稳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法国的谈判成功是什么，他们的意图是大打、小打，还是不打，我们并不很清楚。

孟戴斯—弗朗斯住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周总理访问了伯尔尼，顺便也拜访了孟戴斯—弗朗斯。从他的谈话中，周总理了解到法国经不起越南战争的消耗，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急于拔出陷在越南的这只脚。但是法国又是个宗主国，死要面子。只要能给它一个稳定的局面，使它在形式上体面地撤出越南就满足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地位也就稳住了。这对越南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周总理心中有了底，并将这底交给了越南，说服范文同不要在16度、17度线上计较，给他点面子，换取法国军队的撤出是很合算的，"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们的。"于是越南问题只用了一两个星期就解决了。

会议决定，越南问题有关各方在7月20日举行签字仪式，会议两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出席签字仪式。法国代表团高高兴兴给国内报告了这一喜讯，并吹嘘"法国胜利了"。法国国内全部动员起来准备届时收听这一好消息，但未能如愿。越南、老挝、柬埔寨互相有矛盾，但在对付法国时，却是绝对一致的。他们为了使法国代表团在国内丢面子，千方百计找借口拖延签字时间。法国国内急疯了，一再打电话问签字了没有？孟戴斯—弗朗斯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然而签字仪式就是不能举行。周总理和我们为了获得最早消息和了解具体情况，都到莫洛托夫的住处等候他回来，还曾数次打电话询问。回答还是没有签字，莫洛托夫也着急。周总理坐在沙发上睡着了。次日凌晨一点多钟，莫洛托夫回来了。问他发生了什么问题？莫洛托夫笑着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那三个国家整法国，硬是推到午夜12点过后才签了字。

（摘自师哲：《日内瓦会议散记》）

风云人物

翦伯赞

翦伯赞(1898—1968)，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十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十二岁入常德中学预科，十四岁升入该校本科。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关心时局，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1916年，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旋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商专毕业后，回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师。1924年夏，自费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6年回到北京，失业，寄寓于常桃会馆，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烈士的鲜血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面目，他放弃"实业救国"的幻想，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是年7月，经老同学董维键介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加入国民党。1927年初，他奉命以总政特派员身份，北上策动阎锡山起兵响应北伐。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合流的阎锡山企图逮捕翦伯赞，幸得商震相助脱险。从此，他丢弃国民党籍，另找真理。在北平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在他们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1930年至1931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发表了《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等论文；和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1933年春，翦伯赞在天津意租界被捕，后被驱逐去上海。1934年5月，他随国民党元老覃振赴美国考察司法，游历了欧、亚、非、美洲许多国家。回国后，在上海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先后发表《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等论文。此外，他还发表了《在红⺈字旗下》等反法西斯文章。

1937年5月，翦伯赞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由南京到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等组织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常务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宣传全面抗战。1938年夏，他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长沙出版，进一步阐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40年2月到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还在文化学术界和政界上层人物中进行统战工作。这时，他开始撰写《中国史纲》，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我国自战国至秦汉社会

性质的转变。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史书。此外，他还连续发表了六十余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颂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论文。

1946年1月，翦伯赞应中国民主同盟之聘，以民盟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5月，经南京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积极推动民主运动。他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编《大学月刊》；并在大夏大学任教，讲授"历史方法论"。内战爆发后，翦伯赞团结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积极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0月，根据党的安排，翦伯赞前往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和学术研究活动。他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九个副刊。他发表了《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等二十余篇论文，指出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的命运，批判第三条道路，激励人民的斗志。

1948年11月，翦伯赞奉中央电召，与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侯外庐等二十余人北上。1949年1月4日抵党中央所在地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北平解放后，他与胡愈之、吴晗等随军入城，参加文化接管工作。

解放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历史研究》编委等职。此外，他还担任过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与范文澜等曾共同发起编纂约有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他主编了其中的《义和团》和《戊戌变法》两个专题。他与陈述等人合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与邵循正、胡华合著《中国历史概要》；与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主编《中国史纲要》。此外，他还就历史教学、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发表了不少论文。

从1963年起，翦伯赞无端遭到关锋、戚本禹等政治骗子的批判，被扣上"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大帽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遭到残酷的批斗、监禁。1968年12月含冤去世。1978年9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范 文 澜

范文澜(1893—1969)，中国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浙江绍兴人。早年读私塾，14岁进山阴县学堂(高等小学)读书。1909年，考入黄炎培任校长的上海浦东中学堂；下半年转入杭州安定中学堂，1912年毕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后，曾一度担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18年到1926年间，先后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河南汲县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并一度担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统计员。1925年，在天津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编辑出版书刊。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又失掉关系。

1927年5月，因遭天津反动当局的迫害，范文澜离开天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后又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在北京期间，会见了李大钊，和个别党员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和互救会建立了联系。1930年9月，曾被阎锡山逮捕，旋经北京大学校长、国学系主任和教授等联名营救获释。

1932年夏，范文澜曾因父丧回浙江老家料理家事。返京后，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鲁迅到京时，他曾接待鲁迅和左联、社联的代表，在其家中会谈。1933年夏，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囚禁四个月，经蔡元培和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等二十四人联名营救，于1935年1月获释。同年，编写《大丈夫》一书，宣传爱国思想，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外卖国，对内残害革命人民的罪恶，主张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1936年到开封，在河南大学任教，主讲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程。从1926年到1936年间，先后出版了《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专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和王兰西、嵇文甫等创办《风雨》周刊，后又创办《经世》半月刊和抗战讲习班及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年已四十五岁的范文澜，毅然放弃大学教授的职务，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游击队战士。此后，随着政治思想的不断进步，他的学术思想也不断提高，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38年至1939年间，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范文澜先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旋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后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参加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939年春，到竹沟镇河南省委宣传部帮助进行干部教育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党组织把他送往延安。

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书，是中国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中

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为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4月，范文澜离延安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又兼任该校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他和成仿吾任副校长。此外，他还兼任华北大学研究部主任和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到北京。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吴玉章任副会长；范文澜任副会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他还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之一，并主持日常工作。1956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4月，当选为第三届政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除继续主持《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外，还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论文。1969年7月，范文澜在北京逝世。

张鼎丞

张鼎丞（1898—198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张鼎丞原名福仁，福建永定人。出身农民家庭。19岁时高小毕业，因无力继续升学，便担任了小学教师，历时十年。1925年至1926年间，张鼎丞被选为本乡乡长兼小学校长。在大革命的影响下，他开始参加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并曾被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任为国民党永定县党部常务委员兼农民运动指导员。但他认为永定县的国民党内有不少贪污土劣分子，因此不肯就职。1927年5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率领家乡的部分农会会员，参加了广东省的大埔农民暴动；随后，经饶龙光、张高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张鼎丞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在永定县溪南里从事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党员发展到一千多人，农会会员发展到六千多人，青年半武装组织“铁血团”也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1928年4月，在永定县党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当选为中共永定县委委员，并被指定为负责武装起义的总指挥。6月，在他的领导下，溪南里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并攻破了永定县城。在暴动的农民撤出永定后，组建起闽西的第一个红军营，下辖三个连，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接着，在溪南里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28年7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成立中共闽西特委，郭滴人任书记，张鼎丞任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同时，成立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丞和邓子恢，傅柏翠等三人任委员和副总指挥。8月，龙岩、上杭、永定三县的农民暴动武装，全部集中在溪南里，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三个团。永定溪南里的农民武装改编为第五十七团，张鼎丞兼任团长，邓子恢兼任党代表。

1929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打下龙岩、永定后，张鼎丞和邓子恢领导闽西六个县的农民举行暴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拥有八十万人口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张鼎丞兼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了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规定今后的任务。在这次会上，张鼎丞当选为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兼特委军委书记。8月，在他领导下，对闽西地方游击队进行整编，正式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张鼎丞任纵队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2月，张鼎丞又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后，率第四纵队离开闽西，跟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

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张鼎丞等三十五人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在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外，他还兼任闽粤赣边红军学校（原名为闽西红军学校）政委等职。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部长。1932年，在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张鼎丞和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坚决拥护毛泽东为根据地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反对在福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因而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迫害。张鼎丞被撤销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调到瑞金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实际上只是让他到基层做征集粮食的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张鼎丞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12月，经陈毅提议，并由中共江西分局书记项英批准，张鼎丞被派回闽西

开展游击战争。1935 年 4 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个营，从江西突围到达永定，和张鼎丞等会师。接着，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张鼎丞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谭震林、邓子恢任副主席，在敌我力量相差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鼎丞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经香港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1937 年，方方返回闽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他先后派邓子恢等同闽西南的国民党当局谈判，建立了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0 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另成立闽粤边区特委，张鼎丞任书记。

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下辖两个团，近二千人。张鼎丞任第二支队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他们率部挺进敌后，在苏南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39 年 7 月，张鼎丞奉党中央的命令回到延安。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整风指示，坚决抵制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1945 年 4 月，张鼎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54 年 9 月、1959 年 4 月和 1964 年 12 月，在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均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任职期间，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和刑事犯罪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成绩卓著。1975 年 1 月和 1978 年 2 月，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 年 9 月、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和 1977 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0 年 8 月，他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辞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并获得批准。他的行动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1981 年 12 月，张鼎丞因病逝世于北京。

艾思奇

艾思奇(1910—1966)，中国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其父曾任蔡锷的护国军秘书长。2 岁时随母迁居昆明，7 岁入私塾，11 岁入国民小学。1924 年到香港(其父因反对云南军阀唐继尧，被迫流亡香港)，进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分校(教会学校)，读小学高年级。1925 年返回昆明，插班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二年级。在共产党员李国柱和进步教员楚图南等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27 年初，艾思奇到南京。他大哥李生庄在南京东南大学专修西洋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会负责人。其时，正是北伐战争期间，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庄闻讯逃沪，艾思奇被捕。经宗伯李根源(曾任黎元洪政府内阁总理兼农商总长)交涉，保释出狱。不久，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1928 年春，因胃病返回昆明。其时，唐继尧已垮台身死，艾思奇之父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1930 年，他再度赴日，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这时，他已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激于爱国义愤，弃学归国，于年底返回昆明。

1932 年，艾思奇到上海，在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教。1933 年，写成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办的《正路》创刊号上。后经杜国庠介绍，加入社联。从此，他便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1934 年，经共产党员柳湜介绍，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了许多《读书问答》在《申报》读书问答栏发表。11 月，为满足群众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创办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任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这时，他撰写了题为《哲学讲话》的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 年底，又以《哲学讲话》为题，结集出版；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此书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使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大众哲学》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在解放前共印行了三十二版。

1935 年 10 月，经周扬、周立波介绍，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至 1937 年间，他担任《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在主编李公朴被捕后，他又负责杂志的全部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著作，并和郑易里合译了《新哲学大纲》等书；他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者有章汉夫、于光远等二十多人，他还参加了《文化战线》旬刊、《战线》五日刊等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此外，他还参加了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

1937 年 9 月，艾思奇和周扬、何干之等离开上海赴

延安。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9月，根据毛泽东提议，延安新哲学会成立，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会务。同年底，中央马列学院成立时，被调到该校任教，后又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193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同年，和何思敬、杨超等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每周集会一次，着重讨论《实践论》、《矛盾论》的问题。后来，中宣部也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等，张闻天任组长，艾思奇任指导员。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又改为中央研究院。艾思奇任该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1943年初，调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主任。1945年8月，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翌年任总编。在延安期间，他还兼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主编等职。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开封地委副书记和登封县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还兼任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哲学专业教材编写组组长等职。解放后，他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3月，在北京病逝。遗著有《艾思奇文集》；还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书。

珍闻轶事

四个现代化思想的问世

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曾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摘自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戏谈姓名

黄子云

毛泽东以其超常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敏捷的思维，常在不同的场合用姓名开玩笑——戏谈姓名，在历史上留下许多轶闻佳话，给后人诸多的教益和启迪。

初见毛泽东之前，人们不觉有几分神秘、好奇，甚至是紧张和敬畏。为了改变对方的这种情绪，制造轻松的谈话气氛，缩短与对方的心理距离，毛泽东常常幽默地用对方的姓名开玩笑。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对新来的保健医生朱仲丽开玩笑说：“你是人中最美丽的罗！”朱仲丽连忙摆手：“哪里！”毛泽东笑着说：“哪里？就在你的名字上啊！仲丽嘛，自称人中之丽呀！”朱仲丽感到惊奇，马上解释说：“啊！不是有意这样叫的。我原来叫朱慧，来延安后，随便起个名字代替原来的名字。”毛泽东听了说：“朱慧，很好嘛，人是智慧的。”他略微沉吟，又说：“仲丽，不如重理。”朱仲丽赶快说：“那就改了吧。”毛泽东笑着说：“不，不要改了，我是和你说着玩的。”这使朱仲丽感到毛泽东十分亲切，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位新来的卫士初见毛泽东时很紧张，毛泽东就问他叫什么名字。那卫士回答说：“张宝

金，弓长张，宝贝的宝，金银的金。”毛泽东笑着说：“好啊，有你来我就不怕了，因为宝贝金银都有了，还怕什么？”毛泽东风趣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使张宝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

另一位也姓张的卫士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也非常紧张激动，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憋得脸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旁边的一位同志介绍说：“这是警卫连小通讯员张木奇。”毛泽东就问是哪几个字，并将自己的大手摊在张木奇面前，叫他写出来。张木奇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沾湿，就在毛泽东的左手中写，毛泽东望着手心说：“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张木奇点点头。毛泽东笑着说：“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奇，对不对？”大家都笑了。张木奇也笑了，他紧张的心情在笑声中消失了。

1958年9月，张治中带着秘书余湛邦随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他们在武汉下船后，张治中把余湛邦介绍给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当时船上很嘈杂，余湛邦顾虑毛泽东听不清楚他的名字，便赶快迈前一步，握着毛泽东温暖的大手，紧张而拘谨地自我介绍：“我叫余湛邦。”他考虑到自己的名字不好念，容易听错，而且自己的广东腔吐字不准，便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泽东问：“是干钩于吗？”余湛邦心里责备自己太疏忽了，怎么报名而不道姓，于是赶快说：“是人未余。”毛泽东微笑地说：“ yu 姓很多，有干钩于，有人未余，有人则俞，还有虞姬的虞。”然后，毛泽东用手指一指长江说：“还有水里的鱼，其鱼甚多呢！”这句风趣幽默的双关语，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余湛邦那种紧张、拘谨情绪一扫而光，船上的气氛马上活跃起来，领袖与普通干部、群众就像老朋友一样，叙谈起来。随后，毛泽东指着张治中笑着问大家：“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字文名白吗？”大家都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原来他在青年流浪时当过预备警察，取名警魄，后来不当警察了，此名不用了，就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魄字中取一个‘白’字，成为文白，他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顿时又哄笑起来。

毛泽东一行从武汉到达杭州后，浙江省的几位省领导来见毛泽东，毛泽东一一为张治中介绍，当介绍到省委书记霍士廉时，毛泽东说：“是霍去病的霍。”然后转头对霍士廉说：“你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霍去病在汉代战功很大，可惜27岁就死了。”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毛泽东说：“他这个人厉害，口衔天宪。”大家都笑了起来。

1962年在中南海的一个周末晚会上，毛泽东问他身边的一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那位女同志告诉毛泽东她叫崔英。毛泽东听了很风趣地微笑着对崔英说：“那么你的爱人可能是姓张了？”崔英被问得茫然不知所措，毛泽东又问：“你读过《西厢记》吗？”这时崔英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毛泽东猜说她的爱人可能姓张的由来。因为《西厢记》写的是崔莺与张生恋爱的故事。于是，崔英不禁笑起来，毛泽东也大笑起来。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荻第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为他读书（此时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疾），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见面后，毛泽东微笑地问：“你大概喜欢秋天吧？”卢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又问她会不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一诗，并与她共同吟诵。原来，毛泽东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卢荻秋”幽默地说她的名字。卢荻紧张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继续。

毛泽东经常通过戏谈对方的姓名，很快就把领袖与普通人之间的那堵无形之墙推倒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戏谈对方的姓名，往往不只是为了活跃气氛，而且是将他要表达的观点或道理包含于幽默之中，寓理于趣，寓教于乐，让人在笑后有所领悟。

在重庆谈判期间，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名流邀请毛泽东做一次演讲。演讲后，有人问他：“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回答说：“国共两党的矛盾是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上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了豪迈的笑声。“那毛——？”不待那个人问完，毛泽东就接着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毛’。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这一对姓氏即兴的随意解说，既风趣诙谐，又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

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一天，毛泽东刚刚登上一座小山岗，迎面碰上了骑在马上的新华社副社长范长江。毛泽东一见到他，用手掂的柳条棍朝他扬了扬，风趣地说：“哦，你这‘长江’也流到西北高原上来了！”话音刚落，一阵欢笑声从队伍中爆发出来。毛泽东接着又说：“范长江呀，你该叫‘翻山岗’啦！”又是一阵欢笑声。范长江笑得更厉害，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毛泽东对范长江同志姓名的这一戏说造成的欢畅的笑声，驱走了同志们爬山越岭的疲劳。

1947年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我看他的‘金刚’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还说：“他们四口缸被我们搬来了三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后面有人喊：“叫李日基！”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日念成二。他接着，“对，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跑不了啦！”全场哄地大笑起来。这样，毛泽东就把胜利后的开心大笑送给了同志们。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问一个新来的卫士叫什么名字时，那卫士回答说：“封耀松。”毛泽东又问：“噢，那你是不

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封耀松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说："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噢。那是一个字，懂了吗？"这不仅使封耀松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可敬可亲，而且使他对自己的姓氏的"封"字有了更深的认识。

还有一次，在中南海春藕斋的舞会上，毛泽东指着一位和朱仲丽初次见面的女孩子，问朱仲丽："你猜，她姓什么？她的耳朵起火了！"朱仲丽一时被难住了，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望着朱仲丽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朱仲丽才说："她姓耿！"毛泽东笑着说："我说你是聪明人啦！但人家耳朵并没有起火，好好的。她这个人，不是耿耿于怀，而是忠心耿耿。"接着说："耿直的人最好。有人逢人只说半句话，不肯全抛一片心，这不好。要讲真心话，以诚相见，有高尚的风格。"大家在愉快的笑声中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教育。

1965年，毛泽东在接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及其机要秘书程思远时，在畅叙一番之后，毛泽东问程思远："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程思远回答说："思远就是想得远，正因为想得远，我才回来跟毛主席和共产党嘛。"毛泽东笑了，又问道："你有别字吗？"程思远答道："没有。"毛泽东说："那好，我来给你取个别号。我国古代有个大文豪韩愈，他的别号叫退之。现在我给你取的别号是'近之'。"这使程思远很受感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朱德也受到攻击，被诬蔑为"军阀"、"黑司令"。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就座后，毛泽东又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毛泽东最后这一句谐音双关语，使87岁高龄的朱德听后很激动。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选自《党史通讯》）

流行风

歌曲《向北京致敬》

塔依浦江作词

苏里坦木拉脱作曲

吹散了天上的乌云，扫清了地上的灰尘，我们的心像甘露一样清润，毛泽东的时代多幸福。

幸福的种子撒在花园里，美丽的幼苗已茁生，北京城，我们给你捎上一封信，毛主席我们向你致敬！

我们保证用一切努力，叫幸福的花朵更茂盛。曙光，已照遍我们的新疆，毛主席给我们无穷力量。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生命！祝福你万寿无疆！

[注]唱完第三段时重唱

（"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生命！祝福你万寿无疆！"一遍结束"哎"字延长十一拍）。

唱法说明："向北京致敬"是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比较受欢迎的一首歌曲。词和曲的作者都是新疆维吾尔族民间艺人。新疆著名歌手阿依木尼莎经作曲者的口授学会了这首歌曲后，曾在新疆各地演唱，为各族人民所喜爱。这首歌表现了新疆人民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愉快的情绪以及他们对毛主席的敬爱。虽然情绪上还不够热烈，但仍然是一首较好的歌曲。演唱这首歌曲，要有开朗活泼的情绪，副歌要唱得非常亲切；曲调中几处拖长音的地方，要唱得不感拘束，使全曲情绪连贯一气；装饰音要圆滑自然，不要生硬。

这里发表的曲谱系根据阿依木尼莎演唱的钢丝录音记录下来的，歌词则是根据马志芳、艾圆瓦尔夫等人的译词，经过整理而配歌的。

（原载《歌曲》第六期）

小说《铁道游击队》

长篇小说。作者知侠。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曾多次再版。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战争的作品。抗战初期，鲁南山区八路军某部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派遣原枣庄煤矿工人刘洪和王强潜回枣庄活动。回来后，他俩夜袭洋行、飞车夺枪，在铁道边开始了最初的活动。根据上级指示，他们通过创办炭厂，在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中间积极发展人员，组建铁道游击队，先后吸收了彭亮、林忠、鲁汉、小坡等十二名工人入队，同时山里给他们派来了政委李正。游击队的第一次行动是再次夜袭枣庄洋行，由于情报准确，计划周详，他们一举捣毁了这个以洋行为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初战告捷后，他们撤离炭厂，在临（城）枣（庄）线上开始与日寇进行周旋。为了配合山里的反扫荡斗争，他们巧袭客车，全歼鬼子一个押车小队。此事震动了津浦铁路沿线，鬼子被迫从山里撤出大批人马，在铁路

西侧进行扫荡。而他们则西去临城附近，以微山湖为依托，巧妙地打击敌人。由于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联手合围游击队，队长刘洪不幸负伤，交通员芳林嫂机警地掩护了他，并为他精心治疗。战斗中，两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形势日益严峻，游击队奉命进山整训。整训期间，队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彭亮、林忠、鲁汉、小坡光荣入党，刘洪也伤愈归队。当他们重新回到微山湖畔时，这里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临城鬼子特务队长冈村趁他们整训之机在这一带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游击队由于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处境十分困难。在困难面前，有的队员思想产生了动摇，想开小差出去单干，幸亏小坡及时发现才制止了这一严重情况。为了打开局面，他们除掉了几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其余一些在受到警告和教育后，也不敢再替鬼子卖命，反而向游击队通风报信。这样一来，冈村苦心经营的特务队土崩瓦解。接着，主力部队又下山消灭了附近两营顽军，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们重新活跃起来，在铁路沿线扒粮车，截药品，炸火车，撬铁轨，还化装鬼子潜入临城，击毙了凶狠残暴的特务头子冈村，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冈村死后，松尾被调到临城，这个新来的特务头子老奸巨滑，派人四处侦察，终于嗅到了游击队的一些行踪。一天，他带着几个特务伪装乞丐，摸到芳林嫂家，正在这里开会的刘洪等人主动出击，全歼来犯的特务，只有松尾一人漏网。恼羞成怒的松尾次日带领大队鬼子进村烧杀抢掳，因为没有抓到芳林嫂，他们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屋。鬼子的暴行激怒了刘洪，他率队与鬼子展开了激战，李正赶来制止了他的蛮干，但不幸负伤。冬天到了，山里的部队急需棉衣过冬，命令他们想办法解决。林忠奉命争取了沙沟车站伪站长张兰，在他的帮助下，截下两节满载布匹的车厢，并将布匹顺利运进山里，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截布车后不久，游击队出了叛徒。队员黄二因偷布被发现，竟投奔了松尾。由于他的告密，许多秘密交通站被破坏，林忠和鲁汉小队也遭敌包围，全队壮烈牺牲。游击队闻讯悲痛万分。彭亮只身潜入临城，击毙了这个可恶的叛徒。这时，游击队已发展成包括短枪队和长枪队在内七十多人的队伍，鬼子对此深感不安。为了确保铁路安全，春节过后不久，他们调集七千多人马，围剿微山湖。游击队在湖中的微山岛上顽强抵抗，歼灭敌军七百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敌军占领了微山岛。李正急中生智，命游击队化装成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在鬼子汉奸对湖边的严密搜索中，芳林嫂不幸被捕，她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秋后，大队鬼子撤走后，游击队重又回到了湖边，他们很快控制了这一带的铁路交通线，并承担起护送来往干部的任务。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日本鬼子被迫放下了武器。在铁路边上，游击队庄严地接受了近千名日军的投降。以后，刘洪又带人打进徐州城，救出了饱经折磨的芳林嫂，并开始投入反对内战，保卫解放区的战斗。这部小说情节曲折跌宕，把铁道游击队的敌后斗争写得有声有色，塑造了刘洪等一批抗日英雄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并突出描写了他们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但作品整体结构略嫌松散，对人物的描写也不够充分。小说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小说《党费》

这是一篇短篇小说，是作家王愿坚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篇构思新颖独特的小说，作品把特殊的党费——咸菜，交给山上的游击队，把他同支援党的武装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作品把咸菜这个细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描绘，从而把故事情节组织得完整缜密，使人物形象感人。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娓娓动听地讲述着革命故事，易使读者感到亲切而且易于产生共鸣。作者在构思情节时，非常讲究伏笔的运用，开头提出悬念，引起读者兴趣，结尾感事抒情，发人深思，充分体现作者的艺术风格。

党　费

王愿坚

每逢我缴党费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一九三四年秋天。这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时期。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分队，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上了山，但仍然与群众保持着联系，领导着当地的地下斗争。不久，敌人实行“移民并村”的绝着，割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政治委员魏杰同志派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我的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游击队的联系。落脚站是附近一个大村子八角坳，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她送丈夫参加了红军，家里就剩下她和一个五岁的小妞儿。一天黑夜，我悄悄进了村，按标记找到她的窝棚。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最流行的《送郎参军》的小调。天快亮了，我连忙按规定的暗号敲开了门。和正在择菜叶的她接通了关系。她见了我很激动，不一会就掀起衣角擦擦眼睛。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关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可是看了刚才这情景，听了她的

话，她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她忽然觉得应该给我弄点东西吃，就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从一个破坛子里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叫我凑合着吃点。我好久没见盐味儿了，这咸菜吃起来真香，又不由得想起山上正严重缺盐的情景。我一面吃着，一面传达上级指示，她都坚决而有信心地表示完成任务。鸡叫时，我要趁早晨雾大赶回去。在出门的时候，她打开党证，拿出丈夫给她留下的两块银洋，要交党费。我见她困难没接受，她想了想，觉得目前"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决定不缴钱，而缴实用的东西。

半月以后，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找黄新同志。一到门口，就见她在灯下忙着。屋里摆着各种各样腌好的咸菜。小妮子闹着要吃，她便哄孩子说要去卖钱，不能吃。长期饥饿而又吃不到盐的小妞子，忍不住嘴馋，伸手抓了一根豆角，就往嘴里填。黄新却伸手夺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我不禁心酸，批评黄新太委屈孩子了。黄新说："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正说话间，白匪来捉人了，她为了保护我，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晚，我把孩子、咸菜都挑上山去了。

《党费》是王愿坚的代表作。小说以"我"两次下山为线索，通过他在两个短暂生活片断中的所见、所闻，把黄新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刻画了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女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小说《保卫延安》

长篇小说。作者杜鹏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6 月初版，1956 年 1 月再版，1958 年三版，1979 年 4 月四版。这是一部描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史诗性作品。小说以宠大的气魄，在较大规模上反映了 1947 年 3 月至 9 月延安保卫战斗的历史进程。1947 年 3 月，蒋介石调集了以胡宗南为首的几十万军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妄图一举歼灭我三万西北野战军，消灭我党政军首脑机关——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实行战略转移，主动撤离延安，在西北地区与蒋军展开了千里周旋的运动战。彭德怀将军正确地执行了中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思想，率领西北野战军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处处主动，以局部的优势兵力一个个歼灭敌人，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历史胜利。作品从撤离延安开始，以周大勇连队的战斗生活为中心情节，描绘了这场延安保卫战中的几个著名战役。青化砭伏击战：3 月 19 日，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隐蔽青化砭，陈兴允旅长率其部队沉着镇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全歼敌人一个整旅 4 千人，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第一个胜利。蟠龙镇攻坚战：气急败坏的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复仇，彭总乘势以陈部中的小股部队冒充主力，佯装撤退，从蟠龙镇地区出发，牵引着十几万敌人主力北上，边走边打，迷惑敌人。同时主力部队紧紧包围住蟠龙镇这个储备敌军粮食弹药等军事物资的重要据点，随着彭总一声令下，蟠龙镇攻坚战打响了。此时，胡宗南主力的十几万人马却在远离蟠龙镇的绥德城里寻找我军主力呢。不容敌军增援，蟠龙镇精锐守敌七千人已全部被歼。当敌人精疲力竭、饥饿难忍地调头爬回蟠龙镇一线时，我军早已转移休整去了。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搞得敌人人财两空。陇东高原和长城线上的周旋：我军在短暂休整后，便日夜兼程钻森林、翻山沟向西挺进，越过陇东高原，进入陕甘交界的荒漠地带，打败了胡宗南的帮凶马鸿逵匪徒，粉碎了敌人的合围计划，收复了三边地区。接着，西北野战军沿长城东去，朝敌人的盘踞地榆林挺进。榆林交战，消灭了敌人两个团、两个营和四个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后，我军突然撤出战场，"英雄部"第一连连长周大通和他的连队奉命负责掩护主力撤退。当周大勇和战士们按时完成阻击任务追赶主力时，却因骑兵通信员牺牲而失去了联络目标。面对敌人的重兵重围，周大勇异常镇定，沉着地率领战士边打边退，不仅杀出一条血路，而且在辗转突围中主动出击，一举捣毁了敌人的粮站，切断了其给养。在苦战血搏中，身负重伤的周大勇和负伤的战友们被敌人围困在山洞里，他们拖着流血伤残的身躯以极坚强的战斗精神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终于争取到战友解救的时间，转危为安。在长城线上这场寻找主力的战斗中，一连涌现出像王老虎那样身负重伤竟奇迹般拼死爬回部队的硬汉；李江国、马全有那样在敌人圈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英雄。这些钢铁战士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崇高信念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主力部队的行列。沙家店歼灭战：此时，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彭德怀同志的准确判断和精心部署下，正在发起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性意义的沙家店围歼战。8 月 20 日，战斗打响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被全歼，至此，敌人开始全线溃退。沙家店一战，扭转了西北战局，开始了收复延安的大反攻。与此同时，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威震和长江南北；陈庚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胡宗南老巢西安岌岌可危；陈、粟大军出师鲁西，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几大战场上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小说正是在这种广阔的背景上，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实况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在正面突出我西北野战军英勇善战的同时，也描绘了敌军的狡猾、凶残、愚蠢、自傲，

并穿插了陕北人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配合主力，支援前线作战的动人情景。在艺术上，小说着重刻画了我军官兵陈兴允、李诚、卫毅、周大勇、王老虎等人的形象，突出了周大勇勇敢善战，追求理想，热爱人民的革命战士的本质特征，形象比较丰满可信。相形之下，地方干部李玉山和他父亲李振德老汉的形象就显示得抽象、一般了。彭德怀作为西北战场的总指挥，在全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相当突出感人。作品以鲜明生动的情节表现了这位将帅贯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的坚定性和朴素无华、平易近人的品质以及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镇定乐观、沉着果断的大将风度。小说气势恢弘，风格粗犷雄壮，无疑是建国初期战争题材长篇创作的"里程碑"。但作品发表后，由于受错误政治斗争的牵连，使其受到不公正待遇。1959 年以后，小说不再印发，1963 年被指令销毁。"四人帮"横行时期，作者及书中描绘的那位质朴、诚笃、刚正的老元帅，遭到了空前的厄运。随着党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保卫延安》重新恢复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诗歌《阿诗玛》

作者：黄铁等。

长诗《阿诗玛》以热布巴拉家强娶格路日明家的女儿阿诗玛为中心事件，展开了撒尼族两个阶级的对立和斗争。阿诗玛天生丽质，从小热爱劳动，手艺高强，歌声动人。有钱有势的热布巴拉想让阿诗玛嫁给他的儿子阿支，于是通过长舌巧嘴的媒人海热到阿诗玛家讨婚，花言巧语要骗取阿诗玛的父母同意。这时阿诗玛放牛回来，坚决表示"清泉不愿和浑水在一起"，"绵羊不愿和豺狼在一起"，"我决不嫁给热布巴拉家"。于是热布巴拉便派人抢走了山茶花一样美丽的阿诗玛。在热布巴拉家，阿诗玛不为利诱所动，不为威武所屈，像一棵万年松，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你家的谷子堆成山，我也不情愿。你家金银马蹄大，我也不稀罕。"阿诗玛坚持斗争，盼望着哥哥阿黑前来营救。

善良勇敢、嫉恶如仇的阿黑，正在很远的地方放羊。他预感到家中出了事，便用了三天三夜赶回家中，这时阿诗玛已被抢走。于是他背上弓箭，骑上黄膘骤马，怀着满腔仇恨，追赶而去。"翻过数不清的峰峦，跳过数不清的深涧"，"翻过十二大山，跳过十二大涧"，终于赶到了热布巴拉家。于是阿黑与热布巴拉展开了一场英勇而机智的斗争，在唱歌、砍树、接树、撒米、拾米的比赛中阿黑都取胜了，又粉碎了热布巴拉放虎伤人的阴谋，最后终于用神箭射中了热布巴拉家的供神桌，逼使热布巴拉从黑牢中放出了阿诗玛。但热布巴拉仍不死心，他央求崖神泛起洪水，结果阿诗玛被洪水卷走了。阿诗玛虽然被邪恶势力无情地吞噬了，但她的精神不死，她的形象永存，化为撒尼人民生活中最亲切的回声，在人民心中激荡。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

1954 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2 本
编剧：徐　进、桑　弧　导演：桑　弧、黄　沙
摄影：黄绍芬　布景设计：胡倬云、张曦白
作曲：刘如曾　录音：朱伟刚
洗印：万国强　配音：薛志昌　剪辑：朱朝升　特技设计：万超尘、姜亦素　照明：陈安卿、康涌涛　绘景：胡若思
制景：孔兴友　化妆：田志高、倪亦非　制片主任：苗祝三
剧务主任：丁　里　美术顾问：张光宇
演奏：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剧团音乐队
指挥：刘如曾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袁雪芬	祝英台	范瑞娟	梁山伯
张桂凤	祝员外	吕瑞英	银　心
魏小云	四　九	金艳芳	师　母
吕云浦	老　师	冯小侬	祝　仆
吴天芳	梁　父	项彩莲	梁　母

根据华东戏曲研究院舞台剧本改编。

祝员外的女儿祝英台在侍女银心的陪同下，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路遇书生梁山伯，结为兄弟。此后两人同学三年。

一天，祝英台的父亲写信叫女儿回家，英台临走时请师母为她做媒，成全她和梁山伯的婚事。

山伯送英台的途中，英台不断向他暗示自己是个女子，山伯一直不解她的用意。最后英台只得假说自己做媒将家中九妹嫁给山伯，山伯应允。

山伯回来后，师母告诉山伯，祝英台托她做媒的事，山伯这才恍然大悟，立刻赶到祝家求婚。不料祝员外已把英台许配给了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山伯与英台无奈，临别时立下誓言："生前不能夫妻配，死后也要成双对。"

山伯回家后，忧郁成病，不久就死了。英台闻此噩耗，悲不欲生。当父亲逼她出嫁时，她提出一定要到山伯墓前祭墓，否则宁死不上花轿。祝员外只得答应。当花轿路过山伯墓前时，祝英台出轿，扶碑痛哭。突然坟墓裂开，英台跳入坟墓中去。梁、祝化成一对美丽的蝴蝶，在鲜花丛中自由飞舞。

电影《渡江侦察记》

1954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黑白　11本
编剧:沈默君　导演:汤晓丹
摄影:李生伟　布景设计:丁　辰
作曲:葛　炎　录音:苗振宇
军事顾问:慕思荣　顾问助理:高锦堂　副导演:葛　鑫
副制片主任:江雨声　剧务主任:徐　进
演奏:上海乐团交响乐队　指挥:黄贻钧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孙道临	李连长	齐　衡	吴老贵
孙永平	小　马	康　泰	周长喜
中叔皇	杨　威	穆　宏	参谋长
王少奇	侦察科长	李玲君	刘四姐
莫　愁	陈四奶奶	李　农	陈老爹
陈　述	敌情报处长	崔超明	敌军长
辛　克	敌连长	王　钧	敌谍报队长
石　灵	敌炮兵参谋	郑　敏	侯登科
马　骥	侯　妾	李　季	侯　七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蒋介石反动派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大军渡江。渡江前夕,解放军某部侦察连李连长率领一班侦察员,奉命渡江侦察敌情。过江之后,他们与白马山游击队队长刘四姐取得了联系。敌人发觉后,立即派兵搜索。李连长等扮成敌军,巧妙地通过敌人封锁线,击毙了伪保安队队长侯登科,到达游击队根据地。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插入敌人心脏,搞到敌军江防工事图,摸清了敌榴弹炮阵地的部署情况。不料被敌情报处长发现,出动大批军队,企图消灭这队侦察兵。侦察员周长喜为掩护同志壮烈牺牲。敌人进攻游击队根据地,李连长他们与江北失去了联系,于是就派吴老贵和小马突围出去,乘天黑泅过江去送情报。吴老贵为掩护小马而牺牲。小马及时地把情报送到我军参谋长手里。此时,留在江南的李连长也率领部队突围出来。解放大军排山倒海似地渡过了长江,李连长、小马他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影片歌颂了我军侦察人员英勇机智、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

电影《鸡毛信》

1954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黑白　8本
改编:张骏祥　导演:石　挥
摄影:罗从周　布景:魏铁铮
作曲:黄贻钧　录音:黄力加
制片主任:顾也鲁　副导演:谢　晋　配音:薛志昌
化妆:姚永福　洗印:萧寿生　剪接:陈　曦
演奏:上影乐团交响乐队　指挥:黄贻钧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蔡元元	海　娃	马　立	桂　妞
蔡安安	狗　娃	舒　适	爸　爸
李保罗	农会干部	曹　铎	民兵小队长
杨公敏	民兵甲	郑健民	青救会干部
李　镛	民兵小王	蒋　锐	张连长
冯　笑	小　刘	刘　非	一排长
周伯勋	猫眼司令	田　陇	小胡子队长
周志峰	日军曹	程　之	歪　嘴
于明德	黑狗甲	王　岚	黑狗乙

根据华山同名小说改编。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有一次接受了民兵分配的任务,给八路军去送一封紧急的鸡毛信。途遇日本鬼子,海娃急中生智,将鸡毛信拴在绵羊的大尾巴里,连羊带人都被鬼子抓了去。但由于小英雄的机智勇敢,不仅保住了鸡毛信,还把鬼子引入山中,被八路军全部消灭。八路军根据鸡毛信里报告的情况,紧接着又袭击了日本鬼子的据点,活捉了猫眼司令。影片歌颂了抗日小英雄的机智勇敢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影片公映后,深受观众特别是儿童观众的热烈欢迎。

历史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序　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首都北京，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这个宪法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

我国各族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

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第七条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

第九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

第十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第十一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二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第十三条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　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第十五条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八条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第二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包括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延长任期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二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制定法律；
（三）监督宪法的实施；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决定国民经济计划；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十一）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
（十二）决定大赦；
（十三）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
（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十九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解释法律；
（四）制定法令；
（五）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六）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七）改变或者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策；
（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的个别任免；
（九）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一）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二）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
（十三）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和其他专门衔级；
（十四）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五）决定特赦；
（十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十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十八）决定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戒严；
（十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第三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和法案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三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第三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第三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

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选举和任期，应用宪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选举和任期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四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五）改变或者撤销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

（六）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八）管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九）管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

（十）管理民族事务；

（十一）管理华侨事务；

（十二）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三）管理对外事务；

（十四）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

（十五）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行政人员；

（十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十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主持国务院会议。

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

第五十一条　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作。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根据法律、法令和国务院的决议、命令，可以发布命令和指示。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十四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

第五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十六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五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第五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第六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一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

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六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分别由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各一人，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各若干人和委员各若干人组成。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发布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有权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的执行，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五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六十七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应当根据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关于地方国家机关的组织的基本原则。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

第六十八条　在多民族杂居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六十九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第七十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七十一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七十二条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第六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七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七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四年。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七十七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第七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八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八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期四年。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

第八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第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第九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九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

的权利和利益。

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和平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一百零三条　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一百零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第一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的决议）

一、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列宁说："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团结，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行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小私有者），逐步实行对资产阶级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的包围着我们；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中央认为，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都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列宁和斯大林曾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一样"，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

二、为着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

作。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遵守下列各项规定：

（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三、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但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本决议也以这些负责同志为主要对象。对于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应由各级党组织根据本决议的精神负责进行关于增强全党团结的教育，保证本决议在全党的贯彻。全党干部都应当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着鼓励和指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是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

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

企业的公私合营，应当由人民政府核准。

第三条　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第四条　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条　对于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公私双方应当对

企业的实有财产进行估价，并将企业的债权债务加以清理，以确定公私双方的股份。

第六条　对于企业财产的估价，公私双方应当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参酌财产的实际尚可使用的年限和对于企业生产作用的大小，协商进行。

企业财产的估价，应当有职工的代表参加；在必要的时候，由人民政府工商行政机关派人指导。

第七条　合营企业可以吸收私人投资。

第八条　合营企业的股东对于合营企业的债务负有限责任。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九条　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

第十条　合营企业有关公私关系的事项，公私双方代表应当协商处理；遇到有重大问题不能取得协议的时候，应当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或者提交合营企业的董事会协商后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

第十一条　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且加以任命。他们在企业行政职务上，都应当有职有权，守职尽责。

第十二条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原来的情况量才使用；对于在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原有实职人员，应当给以适当照顾。

第十三条　合营企业应当采取适当的形式，实行工人代表参加管理的制度。

第十四条　合营企业对于工资制度和福利设施，应当参酌企业原来的工资福利情况、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逐步改进，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

第十五条　合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财务、劳动、基本建设、安全卫生等方面，应当遵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机关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同行业的或者在生产上有联系的合营企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经过公私有关方面的协议，并得到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的核准，可以实行联合管理或者合并。

第四章　盈余分配

第十七条　合营企业应当将全年盈余总额在缴纳所得税以后的余额，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依照下列原则加以分配：

㈠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㈡企业奖励金，参酌国营企业奖励金以后的余额作为企业公积金。

㈢发付股东股息红利和提取，按企业的有关规定和企业原来的福利情况，适当提取；

第十八条　公股分得的股息红利，应当依照规定上缴；私股分得的股息红利，由私股股东自行支配。

企业公积金，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的用途，由合营企业依照国家的计划投入本企业，或者投入其他合营企业，或者依照本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投入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企业奖励金，应当以举办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和奖励先进职工为主要的用途，由经理或者厂长同工会商定预算，提交本条例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适当形式的组织和职工代表会议通过后使用。

第五章　董事会和股东会议

第十九条　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关，对下列事项进行协商：

㈠合营企业章程的拟定或者修改；

㈡有关投资和增资的事项；

㈢盈余分配方案；

㈣其他有关公私关系的重要事项。

董事会听取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年度决算报告。

董事会重要协议，应当由合营企业报告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并请求批准。

第二十条　规模较大、股东较多的合营企业，一般应当设立董事会。公私双方董事的名额由公私双方协商规定。公方董事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派任，私方董事由私股股东推选。

董事会应当定期开会。

第二十一条　规模小、股东少的合营企业，可以不设立董事会；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有关公私关系重要事项，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他们的重要协议，应当由合营企业报告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并请求批准。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可以定期召开私股股东会议，报告董事会的工作、处理私股股东内部的权益事项。

在不设立董事会的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代表可以协商召开私股股东会议，报告有关公私关系的重要事项、处理私股股东内部的权益事项。

第六章　领导关系

第二十三条　合营企业应当分别划归中央、省、直辖市、县、市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领导。

第二十四条　人民政府工商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合营企业有关工商行政的事项。

第二十五条　人民政府财政机关和所属的交通银

行，负责监督合营企业的财务。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并适用于运输企业、建筑企业的公私合营。其他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可以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个别的合营企业，由于情况特殊，需要采取同本条例第九条第十七条规定不同的办法的时候，应当经过公私双方协商同意并报请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施行，修改时同。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的社论。社论指出：去年国家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约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3，重要的建设项目有130个。今年国家将进一步集中力量进行重工业的建设和铁路建设，将有近70个新建和扩建完成了的工厂、矿山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17%左右；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在15,000个的基础上发展到35,800个。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要引导手工业走合作化的道路。社论号召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力量，坚持“积极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

同日　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学习王崇伦首创精神的通报》。王崇伦是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的青年工人，先后8次改进工具，并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在一年内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量。2月8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题为《发扬王崇伦工作精神提前完成国家计划》的社论。

1月8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决议》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应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20%左右。

1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指出，要逐步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努力增加电影出品的数量。要稳步地建立全国电影放映网和逐步建立电影工业。

1月14日　政务院举行第202次会议，听取和批准了政法委员主任董必武所作的《1954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的报告；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暂行办法》。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3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进一步发展。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1.79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43%比1952年增加20%以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4万多个。另外，还有“自发社”4,000多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不包括“自发社”）27.3万多户，占组织起来农户的0.57%，比1952年增加了3倍多。

2月6～10日　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批准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1954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2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随后，中央分别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3月12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要求各地保持清醒头脑，切实把4.5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已超过原定到秋季发展到3.58万个的计划）办好，为行将到来的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作好准备。

3月17日～4月10日　第四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确定，今后检察工作的方针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国各级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工作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运用人民民主的法制，从检察工作方面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各种危害经济、危害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为、危害国家秩序的违法犯罪分

子进行斗争，检察所有国民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违法犯罪案件，并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月 2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经各方人士认真讨论修改后，6 月 11 日举行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该草案。

4 月 2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5 月 12 日　李富春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经过逐步的、相当的时间，毛泽东提出大致 15 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从数量上看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0%左右；从质量上看，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报告》说，“一五”期间 141 项工程建成后，将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5 月间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工业八部 1953 年工作总结和 1954 年工作部署报告》。对 1954 年工作的部署，中央着重指出：①切实改进和提高工业计划的工作质量，整理统计资料，定期修正和提高技术经济定额，逐步摸清国家建设在各方面的需要，切实做好产、供、销计划的平衡工作。②切实加强工业基本建设工作。继续集结并提高基本建设力量，贯彻以“141”项及其直接有关的国内或其他兄弟国家设计的建设项目为重点的建设方针。③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区域管理制，以建立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带动各种责任制的建立和生产组织、劳动组织的改进。④继续开展劳动竞赛。

6 月 3 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达到国家对农业方面所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7 年要做到：粮食年产 4,000 亿到 4,200 亿斤，棉花年产 3,800 万担，油料作物、畜产品、木材等原料作物也要保持相应增长。会议还大体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 年计划发展到 30 万个或 35 万个；1957 年计划发展到 130 万个或 150 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 35%左右，合作社的耕地发展到占全国总耕地的 40%以上；1960 年前后，在全国主要地区争取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6 月 14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 30 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在宪法草案公布之后至 9 月上旬，全民讨论结束，提出 118 万多条修改补充的意见和问题。

6 月 17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1 次会议听取并批准了 1954 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在预算草案报告中说明：1953 年国家预算计划执行情况是良好的，收入 215.5 亿元，完成原预算的 105.9%，支出 213.9 亿元，为原预算的 91.6%，加上上年结余，到年底共结余 42.8 亿元。1954 年国家预算规定，收入为 213.8 亿元，总支出 249.4 亿元，使用上年结余 17.5 亿元。支出的分配：用于经济建设的拨款为 113.2 亿元，占 45.4%，比上年增长 31.6%；用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的拨款为 36.7 亿元，占 14.7%，比上年增长 15.2%；国防费用 52.7 亿元，占 21.1%。1954 年国家预算中，地方预算支出共 5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

6 月 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协议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6 月 19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 32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关于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听取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邓小平作的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地区，选民资格审查的结果，登记选民总数为 323,809,684 人，占进行选举地区 18 岁以上人口总数的 97.18%。参加投票的有 278,093,100 人，占登记选民的 85.88%。全国各地共选出 5,669,144 名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6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指出：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强调，手工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引起全党重视。

8 月 20～22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58 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就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9 月 9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 34 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9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由刘少奇委员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还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9 月 12 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 1953 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公报》公布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基本建设增长比例的具体数字。

9月15～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各项组织法;通过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国家领导人员。《宪法》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经济制度,《宪法》承认现有五种经济成份,并规定: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以发展生产合作作为改造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国家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他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报告》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庄严地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起,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任命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

10月1日　首都各界群众举行盛大阅兵式和游行,庆祝建国五周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登上天安门检阅台检阅。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

11月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批准国务院设立下列20个直属机构:国家统计局、国家计量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央气象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国务院宗教事业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人事局、国家档案局、中央机要交通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专家工作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12月21～25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宣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等16人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常务委员65人。

经　济

1月4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中财委关于有步骤地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提出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或者可能更短一点时间)积极而又稳步地将国家需要又有改造条件的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中财委认为:1954年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应以"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为工作方针。计划将500个私营厂矿(17亿元产值)转变为公私合营。对公私合营的有关政策问题,包括清产定股,实职人员的安排、使用,私方代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地位、职权、利润的分配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原则规定私方的股息与红利占1/4左右。

2月15日～3月1日　全国国营纺织厂厂长会议和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纺织工业今后的方针任务,着重研究了1954年的工作部署。

2月16日～3月5日　国家统计局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加强国营经济统计,并以工业统计和基本建设统计为重点;适当地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的调查,并着重做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统计研究;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统计,并着重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

2月21日～3月10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金融会议,会议提出,在稳定金融的总方针下,1954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实行现金管理,大量吸收存款,建立金库,掌握外汇,控制游资,以稳定金融、扶植生产。

3月3日　中财委公布《关于1954年粮食比价的指示》。规定1954年棉粮比价为:1斤棉花在河北、山东、晋中、豫北相当小米7斤5两至8斤4两;在陕西、河南、晋南相当小麦6斤12两至8斤;在湖北、江西、湖南相当二级米7斤4两至8斤4两;在江苏、浙江、安徽相当中籼米7斤4两至8斤4两。在东北和西南,比价由当地财委自定。

3月15～21日　燃料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石油勘探

会议提出了寻找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新石油、新天然气田和油母页岩资源的任务；并决定提高地球物理勘探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各盆地成立综合研究队，以加快石油勘探的速度和提高勘探的质量。

3月23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1954年农产品预购工作的指示》，规定1954年国家委托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通过预购合同制向农民预购粮食、棉花以及花生、茶叶、麻类、蚕茧、羊毛等农牧业产品。

同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中财委《关于逐步推行煤炭分区产销合理运输制度的报告》。根据全国产煤和用煤情况，划分13个产销区(包括由国家统一分配的45个煤矿)，在按地区进行产销平衡的基础上，规定煤炭的基本流向及流动范围，限制和禁止过远的、对流的和重复的运输。

4月7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发展毛猪生产的指示》，要求农业部门建立新的养猪基地，国营农场、林场和牧场应把养猪列为生产任务，农业社、互助组要动员在农民家多养猪，多养猪的给予适当奖励与照顾。国家还决定拨出12.9亿斤杂粮和豆饼，扶持重点地区发展养猪业。

4月1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8人工作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

5月6日　政务院通过《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条例》按采用发明(或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后12个月内所节约的价值大小，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提奖比例和奖励期限。创造、发明奖励期限3年到5年，提奖比例2%到30%；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奖励期限1年，提奖比例分别为0.5%到20.%到10%。对积极协助他人实现建议者也给予适当奖励。

5月10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商业部1953年工作的基本总结与1954年任务的报告》。1953年下半年起，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前进的步骤快了一些，对有些被代替的私商又未能及时适当安排，使城乡交流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阻滞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同意商业部提出的国营与合作社商业批发零售总额的比重应暂停前进，就地踏步，到后半年看情况再定前进步骤的意见。并强调，对被代替的私商要妥善安排转业或负责接收。

5月28日　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决定》确定改变过去在国营工矿企业中所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实行厂长负责制，并逐步推行生产区域管理制。

6月4日　我国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座现代化造纸厂——国营安徽造纸厂正式投产。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一些商品必须实行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同时，要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分别不同行业、不同情况，有计划地代替和安排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执行这个指示，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企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商业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7月14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和《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纲要》就职工录用、调动和辞退；企业行政和职工的基本职责；工作时间；处分等四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定。

7月20～25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临时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华全国合作社总社监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通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的决议》。确定供销合作社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①通过供销业务，开展城乡交流，为农业生产服务，以支援国家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②根据国家计划和价格政策，通过合同制度和有计划的供销业务，把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并促进其社会主义改造。③在国营商业领导机关的领导下，扩大有组织的商品流转，领导农村市场，逐步实现对农村私商的改造，并占领资本主义商业在农村的阵地，逐步切断农民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联系。

8月1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纺织机械制造厂在山西省榆次建成并正式开工生产。

同日　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大型川江货轮——“人民一号”在国营沪东造船厂下水。

8月3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3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基本情况及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提要(草案)》。国家计委《报告》提出的计划安排包括：国营与地方国营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20.1%。有步骤地把私营工业企业改为公私合营企业，年内计划合营的有500个私营厂矿，产值约17亿元。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4.192个发展到95,000个，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比重由上年的43.4%扩大到58.9%。加强重要物资的分配，使其尽可能逐步地摆脱自由市场的影响。1954年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999亿元，增产12.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占33.1%，工场手工业占7.4%，个体手工业占6.6%，农业占52.9%。工业增长速度17.4%；农业增长速度9.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70.8亿元。基建投资76.2亿元(包括1953年结转4亿元)，比1953年增长23%。

9月2日　政务院举行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

能和资本家自愿，采取积极而又稳步发展的方针，对企业原有资产的估价，应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评定。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9月9日　政务院举行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棉布计划收购的命令规定：所有的机纱、手纺纱、交织棉布，一律由国营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完全用手纺纱织成的棉布，由中国花纱布公司通过供销合作社进行收购，允许手纺纱织布户和消费者直接进行少量的交换。居民的定量，按城市与农村、城市中不同阶层有所区别，全国平均为20.83尺，相当于定量前的水平。政务院命令规定：凡生产棉花的农民，应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将所产棉花除缴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部分外，全部卖给国家。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及各地分支行正式成立。

9月20日～10月5日　全国第一次计划会议，讨论了1955年计划控制数字和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问题。10月13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及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主要控制数字如下：1955年计划投资88.79亿元，为上年预计数的125.9%。工业总产值计划为468.4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12.4%，低于五年计划年平均增长15.5%的速度。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暂定为23亿至24亿元与上年预计数相近。粮食的控制数字定为3,700亿斤，棉花2,928万担，比上年分别提高7.2%和19.5%。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达到51万个以上。

9月29日　国家计委作出对公私合营企业产品销售和物资分配的规定。这是继政务院公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后作出的。主要内容是：①凡合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列入国家计划的归国家统一分配；没有直接列入计划的，可由中央主管部门或地方企业主管部门向合营企业进行加工定货，将其产品收购后列入统一分配；②其所需统配物资，也由国家分配供应；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核算，合理议定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供应价格。

10月10～31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进行初步的技术改革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个计划时期，将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为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是合适的。报告提出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1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编制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作的指示》。中央指出：除个别省（如辽宁）工业比重很大，省委应当把工作重点摆在工业方面外，一般省委都应该明确地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农（牧）业方面。

1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自1950年至1954年10月，国家银行已发放农业贷款36亿多元，其中仅1954年1月至10月发放的贷款就有6.68亿元。同时，国家还拨出救灾用款，5年共约为11亿多元。

12月20日　《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1955年1月开始发行公债6亿元，利息定为年息4厘。偿还期限由8年改为10年，从1956年起每年还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也于今日通过，并发布了主席令，予以公布。

12月8日～次年1月6日　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1954年，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供销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小组达4.1万个，比上年增长8倍多。由于进展较快，工作有些粗糙。1955年这方面的中心任务是：把手工业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继续摸清楚，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拟定供产销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安排计划，以便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改造；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社（组）。1955年计划合作社社员发展到190万人，其中，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控制在87万人，供销生产合作社社员不少于45万人。

12月31日　陈云在全国公私合营会议上讲话，提出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以调整私营工业生产。

军　事

3月5日　根据中央军委1953年10月10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领导机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机关为基础，于本日在京成立。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属各铁道工程师，均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建制。

4月15日　中共中央、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颁发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关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在修改审批该《条例(草案)》时,特别加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

7月31日　新华社报道:自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作战中,肃清了沿海各省国民党军残余,并解放了舟山群岛、嵊屿列岛、厦门岛、海南岛、万山群岛等重要战略岛屿和其他岛屿共46处。

8月6日　总参谋部电复新疆军区,同意将22兵团部与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机构。1973年3月,该兵团建制被撤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业已辞职,现由邓华将军任司令员。同时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9、10两个月从朝鲜撤出7个师。至10月3日,这7个师全部返回祖国。

9月9日　政务院第224次的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征集补充兵员的命令》,规定从1954年11月1日至1955年2月28日,征集补充兵员45万人,补充兵员在年满18周岁至20周岁的男性公民中征集。该命令指出,这次征集补充兵员,贯彻了义务兵役制的基本精神,有了服役期限的规定,是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的一种过渡办法,也是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开始。

9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2月12日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实行三大制度(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全国军区的划分、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干部的培养等问题,通过了实行三大制度的政治工作报告和全国各大军区的划分方案。

12月31日　新华社南京消息:据初步统计,从1954年1月1日到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华东地区陆、海、空军、公安部队和当地广大民兵对蒋军作战综合战绩如下:击落、击伤蒋军飞机131架,起义1架。击沉、击毁、击伤蒋军各种舰艇船只33艘、缴获21艘。渡海解放浙江沿海岛屿3个。打死、打伤蒋军376名,俘获2,646名,向我投诚的123名。

外　交

4月24日～7月23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朝、中、苏提出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等方案,提交大会讨论。而美国纠集侵朝国家发表所谓《共同宣言》,使朝鲜问题的讨论毫无结果而陷于中断。在会议期间,越南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伟大胜利,法国侵略军主力全军覆没,使越南北方全部解放,改变了整个印度支那战场的局势。我国政府代表团因势利导,就印度支那全境停止敌对行动提出六点建议,打破了会议僵局,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从而结束了从1946年至1954年7年多的印度支那战争。

6月25～28日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了印度,并举行了会谈。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今年4月29日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所规定的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6月28～29日　周恩来总理应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邀请访问了缅甸。两国总理举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

7月3～5日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中越边境举行会谈,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7月23～8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归国途中,先后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与格罗提渥总理就进一步发展中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于7月25日发表了会谈公报。

8月1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扩大)在北京举行。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他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情况,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中越边境会谈等情况,在会上作外交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批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外交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8月19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命

令，宽赦坦白认罪的西井建一等417名前日本军人。

9月28日～10月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

9月29日～10月10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波·贝鲁特率领波兰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纪念庆祝活动。

9月29日～10月12日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国庆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局势举行了会谈。10月12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了《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同时全文公布了两国政府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此外，公布的还有：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中苏蒙三国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这次会谈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0月5日　我国和挪威王国建交谈判圆满结束。双方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15日　国务院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所作的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后，通过了《中苏关于将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售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四个股份公司是分别在1950年3月27日和1951年7月28日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合建股份公司的协定，按平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根据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的新协定，将这四个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前全部出售给中国。会议还决定，苏联股份移交后，上述股份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营大连造船厂。

10月16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赞成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手续的决定》。

10月19日～30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

11月19日　我国与荷兰王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11月23日　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今日开庭宣判，依法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的间谍特务分子约翰·托马斯·唐奈、美国间谍机关投到我国大陆的特务分子许广智等11名罪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以空投间谍特务分子的“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连队上校司令官约翰·诺克斯·阿诺德等11名罪犯分别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11月30日～12月16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了我国。

12月8日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其完全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文化教育

1月14～27日　全国中学教育会议讨论了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方针任务，进行教育改革，培养提高师资和解决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

3月12～23日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54年文教工作的方针任务是继续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推进各项文教事业，培养国家建设所必须的各种建设人才，特别是有关工业建设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并积极地增进人民的健康，提高人民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

3月24～30日　第四次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文教会议的精神，总结了1953年的工作，确定了当前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1954年文化工作计划。会议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必须切实改进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鼓励各种文学艺术的自由竞赛，正确地开展文艺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采取积极的适当的措施，改进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活动的条件，加强艺术工作者的劳动纪律，以促进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的繁荣。对于1954年全国文化事业计划，会议规定继续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

4月1～22日　高教部召开的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议确定，高等财经教育，按“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步骤发展。按照这一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适当缩减招收新生的比例，而以轮训在职干部为重点。

4月8日　政务院第212次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规定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成员。要改进教学，以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学生，相应地改进教学方法。继续改进学校的领导工作，校长对学校工

作全面负责，但必须以领导教学为中心。

4月16日　文化部在批复东北文化局《建议停演或禁演评剧〈麻疯女〉的意见》中指出：今后对于不良剧目，除在政治上内容反动者外，一般不宜过多采用行政命令禁演的办法，而应着重思想上的揭发和斗争，采取召开座谈会，在报刊上展开批评的方式，来影响其他民间职业剧团，启发自觉，自动放弃上演，较为妥善。

4月28日　教育部发出通知，规定从1954年秋季起，初中一律不设外语课。

5月3日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协会以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为宗旨，会上通过了协会章程，并选举楚图南为会长。

5月4日　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布"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暂行条例、暂行项目标准、预备级暂行条例的通告》。《通知》说，本委在1954年的工作计划要点中提出：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中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简称劳卫制）的预备级，并选择其中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全国各部队，亦应有计划地逐步推行劳卫制。业经1954年2月11日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批准。现特公布，自即日起施行。

5月20日　政务院举行第22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国家民委的工作报告和《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也均有学习和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不论已有文字或没有文字的各族人民，凡是自愿学习和使用汉语汉文或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者，各级人民政府均应予以保障和帮助，不得歧视。

5月26日　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指示》指出了民间职业剧团的努力方向，强调了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责任。

6月7～17日　高教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等专业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确定：中等专业教育要大力整顿并有计划地发展，进一步明确领导关系，积极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7月25日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伐利亚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上，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智取华山》获"争取自由斗争奖"，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获音乐奖，这是新中国拍摄的故事片在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获奖。

7月28日　《光明日报》发表任继愈《老子哲学》一文。此后，在哲学界就"老子哲学"问题展开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老子其人与其书；"老子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老子哲学"的阶级本质。

8月6～16日　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会议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两亿多青壮年文盲。

8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广播事业局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国中小学推行广播体操的联合指示》。

10月5日　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决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为全国性的6所重点学校。《决议》指出，确定重点高等学校是为了使一些学校在贯彻中央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加强行政领导等各方面能够先走一步，取得经验，由高等教育部及时总结推广，以带动其他学校共同前进。

10月16日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向全党提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任务。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在校刊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在《光明日报》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指名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看不到这部作品的伟大的反封建倾向和杰出的艺术价值。他们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

12月2日　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会议决定成立"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其他省市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组织。随后，全国各地的报刊有计划地陆续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3月1日，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社会生活

1月16～21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北京举行。体委主任贺龙作了题为《在总路线的照耀下，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而奋斗》的报告。

1月21日　政务院举行第203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条例》。

1月28日　政务院第20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

划机构的指示》，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区）、省属市及县人民政府，应设立计划委员会。

2月1日　新疆人民政府颁布更改一些含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地名的决定。据此，迪化市更名为乌鲁木齐市。

2月21日　政务院举行第205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题为《为祖国锻炼身体》的讲话。

2月25日　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通则》规定，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是在区乡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由人民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民间纠纷的群众组织。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解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节进行政策法令教育。

3月6日　绥远省建制正式撤销，原绥远省辖区由内蒙古自治区统一领导。

3月12日　中共中央同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由李葆华为主任。该委员会根据“根治黄河水害，发展黄河水利”的方针制定了黄河综合规划，包括远景计划和第一期计划两部分。远景为用几十年时间，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一系列拦河坝，从而把黄河改造成为梯河。第一期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黄河的防洪、发电、灌溉和其他方面最迫切的问题。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并决定开始进行勘查设计和施工。

3月21日　农业部颁发1952年“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分别授予模范工作者任国栋、劳动模范李顺达、郭恩玉和吴春安等4人。任国栋是中共黑龙江省郭尔罗斯后旗旗委书记。1953年东北全区推广他提出的“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等措施，共增产粮食100万吨。李顺达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他在1952年春向全国发起爱国丰产运动，并领导社员超额完成生产计划。郭恩玉是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1952年他改进经营管理，实行劳动定额、包工包产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全面丰收。吴春安是山西省翼城县西梁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1952年他学习和推广植棉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获得丰产。

4月5～20日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确定，今后监察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向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作斗争，防止和克服一切阻碍和破坏总路线的行为，进一步加强监察工作，提高监察工作的效能，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财经企业部门的生产、经济、财务活动逐步实行严格监督检查。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活跃初级市场，加强城乡物资交流》的社论。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进行农村粮食调剂工作。办法是在集镇设立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由农民和消费者按政府法令直接交易或农民彼此间互通有无。

4月14日　我国第一台7,000千瓦水轮机在国营沈阳高压开关厂试制成功。

4月15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务院第213次政务会议联合举行。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的决议》。

4月20～2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发表了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王崇伦等7人写的《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技术革新运动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议书》。

4月25日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市改名为“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蒙语意为“青色的城”。）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北京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于5月上旬竣工，蓄洪量为22亿多立方米，可灌溉农田40余万亩，使永定河的4.7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受到水库的控制。这一工程是在1951年10月开工兴建的。

5月1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中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49次会议上以23票对21票得到了确认。国际奥委会秘书长梅耶致函中国奥委会说：“我愉快地通知贵会，在本月初，我会的雅典会议上，贵会已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承认。”

5月18～6月1日　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业卫生会议，确定开展工业卫生工作必须实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面向生产，依靠工人，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6月10～28日　建筑工程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会议明确了城市建设必须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建设应把力量集中在“141”项所在地的重点工业城市，以保证这些重要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

7月22日～8月6日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通过了四项决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推选了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

7月26日　我国首批飞机制造成功。

7月31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出《关于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指出，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最中心的任务是更进一步教育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热烈拥护和踊跃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

7月31日　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国派出37个队共128名运动员。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派出百人以上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性的运动竞赛。

8月9～15日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宣言》、《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向各国青年男女号召书》、《关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及其成员组织参加国际农村青年大会筹备工作的决议》、《关于举行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决议》。

8月10日　经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公布《外国侨民居留登记及居留证签发暂行办法》、《外国侨民旅行办法》、《外国侨民出境暂行办法》。

9月3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第5次会议，通过了邓小平委员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完成的报告》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公告》宣布：各地区和各单位所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226人。其中妇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1.99%；少数民族代表177人，占代表总数的14.44%。

9月6日　我国第一艘自制的大客轮"民群"号，从上海启碇，开始了在长江航线上的处女航。

10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战胜洪水》。社论说：自6月起，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雨量集中，形成了我国数十年来罕见的洪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两岸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洪斗争，几年来建设的水利工程在蓄洪、分洪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从而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

11月1日　国家统计局发展《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报告的公报》。调查的标准时间是1953年6月30日24时。调查结果，全国人民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其中直接调查登记的人口为574,205.940人。直接调查登记的人口中，男子占51.82%，女子占48.18%，年龄在18岁以上的占58.92%，17岁以下的占41.08%；汉族占93.94%，其他民族占6.06%；城镇人口占13.26%，乡村人口占86.74%。

11月5日　位于安徽省霍山县境内淠河东源的佛子岭水库工程全部完工。水库可蓄水5亿多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发电4,000千瓦。

11月23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

12月25日　康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全线通车(正式交付使用分别为1957年5月和1955年)。康藏公路起自雅安，终于拉萨，全长2,255公里，平均海拔3,000公尺以上，投资20,686万元。青藏公路起自西宁，终于拉萨。全长2,100公里，平均海拔4,000公尺，投资3,730万元。

12月28～29日　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会上选出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新的领导机构，宋庆龄当选为会长。

12月3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主席令，公布了上述三个条例。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5年

导　言

一九五五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取得伟大成就的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飞速实施，有的已经提前完成，及时调整工业的发展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视粮、棉生产情况，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避免彼此脱节。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

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改造继续进行，但加快了改造的速度，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高潮。同时，全国近半数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公私合营轨道。出现了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把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推上了新阶段。

为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路线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做出了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定。反对高、饶的斗争最后胜利，全党更加团结统一。

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大部分公开敌人被肃清了，但仍有少部分未查清。他们以各种身份，内外勾结，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国家采取社会镇反与党政机关内部肃反的方针，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大大震慑了敌人。但留有不少后遗症，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

与此同时，新中国加强了国防建设。设立了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积极地有步骤地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世界和平。实行了军衔制，向朱德等10位授予元帅军衔。

在外交上，周恩来率团参加了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取得了伟大胜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缓和亚非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人民生活中，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扭转了国家在粮食购销中的被动局面，稳定了人心，又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同时，为了转变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待遇的不合理性，实行了工资制，取得了一定成就。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军队建设
- 高、饶事件
- 粮食统购统销
- 肃反运动
- 万隆会议
- 国家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背景介绍

自从一九五三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一九五五年在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一五"计划最后确定时间较晚，党和政府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导下，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干中学、学中干，不贻误建设的时间，逐步摸索和积累经验。一九五三年初，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国民经济刚恢复，党和政府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发展方针。有了一九五三年建设的初步经验，总路线也开始广泛宣传，于是，党和政府便提出了"积极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一九五五年，因前两年农业受灾发展缓慢，国家多购了几十亿斤"过头粮"，造成农村关系比较紧张，党和政府便及时提出了"全国平衡，统筹安排、增产节约、重点建设"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全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许多"一五"计划指标提前实现，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口号。同时，根据每年的发展方针，党和政府又具体制定了年度发展计划，一般于上年第四季度提出下年经济发展控制数字，各部门据此制订本部门的年度计划，每年上半年总结去年计划执行情况、作出财政决算，确定当年计划、作出财政预算，从而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逐步实现。

材料：

- 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
- 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
-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 青藏、康藏公路建成通车

材料一　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

工业建设方面，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首先集中抓基本建设，新建和扩建一批厂矿，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3年，按照国家计划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重大工程项目达173项，其中限额以上的项目为107项，重工业方面有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自动化高炉、大型电站、露天煤矿、汽车制造厂、重型机械制造厂、船舶制造厂、机车货车制造厂、纺织机械制造厂等；轻工业方面有棉纺织厂、亚麻厂、造纸厂、制药厂、橡胶厂等。配合工业建设，还要修建改建铁路数千公里。

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从1952年开始建设，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1953年11月以前先后建成(无缝钢管厂15个月，大型轧钢厂16个月)。这些工程投入生产后，生产情况很好。无缝钢管厂于1953年10月27日轧出了第一根无缝钢管以后，已正式进行两班制试轧性生产。大型轧钢厂在11月30日开始到12月15日的热试轧期间，轧出来的大型圆钢、无缝钢管管胚和重型钢轨等产品，大部分都是一级品。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改建的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也在12月9日顺利地炼出了第一炉铁水。经过严格的技术检验证明，三大工程的建设质量十分良好，试轧出来的大部分产品也都合乎规格。这就为大规模的正式开工打下了巩固的基础。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上书毛主席报告三大工程开工的喜讯。25日，毛主席复信祝贺并予慰勉。1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信鞍钢全体职工，祝贺鞍钢三大工程开工生产，并送上35毫米电影机两部，作为祝贺的礼物。1953年12月26日，在鞍山隆重举行了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七号炼铁炉三大工程的竣工典礼。鞍钢三大工程的竣工投产，对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实现国家工业化有重要意义，对于巩固国防，发展农业和交通运

输业以及对于整个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有极大的重要性。

材料二　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

过去，我国长期是一个“万国汽车的展览馆”，据初步统计，先后进口和使用过 130 多种厂牌的汽车，可就是没一种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把发展我国自己的汽车工业列为重要计划。1953 年 7 月 15 日，我国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规模宏大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隆重举行了奠基典礼。

毛泽东在这个厂的白玉基石上题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开工兴建，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大成就”。该厂从 1953 年 7 月 15 日开工到 1956 年 6 月基本完工，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力争三年完成建厂任务的指示。1956 年 10 月 14 日，由国务院任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国家验收委员会结束了验收工作，举行了开工典礼，正式移交生产。该厂第一期工程投资总额 6.5 亿元，每年能生产“解放牌”载重汽车三万辆。与此同时，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产“解放牌”汽车，于 1956 年 7 月中旬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作为对建厂三周年的献礼。它在经过必要的行车试验和完成开工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之后，从 1956 年 9 月份以后开始大量生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结束了我国自己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解放牌”汽车是一种通用型的载重汽车。这种中型卡车，装有 90 匹马力、6 个汽缸的汽油发动机，最大速度为每小时 65 公里，载重量四吨，汽车满载时经济时速为 30 公里到 35 公里，比较适合于我国目前现有公路干线和桥梁负荷等条件。它靠压缩空气刹车，比较方便灵活，完全可以保证行车的安全。“解放牌”汽车，是以苏联吉斯 150 型汽车为范本，并根据我国公路条件和使用条件改进了部分结构而设计制造出来的。全车由 2600 种、共 1.1 万个零件组成。

在使用性能和经济性能上都是比较优越的。“解放牌”汽车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它是按照正规的工艺标准和现代化生产技术来制造的。许多易磨损零件都采用了先进的工艺方法，加强了它的坚固耐用性，便于维护和保养。这种汽车还具有可以使用低级汽油或混合汽油，耗油量也比交通部门当时定额低的特点。“解放牌”汽车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飞跃发展，是我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大成就。

材料三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长江自古称为“天堑”。武昌汉口隔岸相望，过去只能依靠木船和轮渡运送南来北往的物资和行人，费力费时，极不方便。遇上狂风和浓雾的时候，木船轮渡停航，南北交通往往被迫中断。解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南北运输更加繁忙。在武汉建设一座长江大桥，对全国对武汉市都是迫切需要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将使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结起来，从而使南方的湘桂铁路、浙赣铁路、鹰厦铁路、来睦铁路、黔桂铁路和川黔铁路等干线与北方的陇海铁路以及其他线路贯通无阻。这对全国范围的物资交流，对于武汉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1949 年夏天，武汉刚解放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就对旧有的四次测量资料进行了研究。1950 年 3 月至 1954 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组织了大批技术人员，先后两次对大桥进行了新的测量，钻探了 8 个比较线，并进行初步设计。整个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包括横跨武昌、汉阳两岸的长江大桥正桥和引桥，横跨汉口、汉阳两岸的汉水铁路桥和汉水公路桥，以 10 座市区内的跨线桥和京汉铁路汉口车站到粤汉铁路武昌车站的 17.4 公里地段内的铁路连络线工程。大桥的桥身将建筑在武汉市内的龟山、蛇山间最狭的江面上。为了负担重大的运输任务，整个的桥梁建筑物，从桥墩最低端算起，直到桥顶最顶端，其高度相当于 20 层的摩天大楼，不管是洪水季节还是枯水季节，上溯长江的船舶都可以自由地从这里通过。作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汉水铁路桥，于 1953 年 11 月 27 日正式开始兴建，该桥全长 372 米，9 墩 10 孔，桥墩 30 米，最大跨度为 55 米。该桥于 1954 年 1 月基本建成，1955 年 1 月 1 日正式通车。紧接着，1954 年 5 月中旬，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兴建汉水公路桥的决定，它和汉水铁路桥及长江大桥形成整个武汉长江大桥的运输体系。该桥桥面为四车道，两边的人行道宽 3.75 米。1955 年 12 月 25 日建成，12 月 31 日正式通车。1955 年 9 月武汉长江大桥正桥正式开工。经过两年的时间，于 1957 年 9 月 25 日胜利建成，并于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它在我国桥梁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标志着我国桥梁工程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材料四　青藏、康藏公路建成通车

几千年来，在紧相毗连的青、康、藏三地之间。在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由于重重高山，滔滔激流，阻挡着西藏人民和祖国内地人民的密切往来；加之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利用这种交通阻塞的情况，对西藏和其他兄弟民族进行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致使西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长期贫困和落后。为了巩固国防和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央指示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的同时开始对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进行勘测和施工工作。康藏公路于1951年夏季开始修建，青藏公路于1953年春天开始动工。修建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公路建筑史上少有的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康藏公路要越过无数像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要跨过几十条深谷激流，其中包括澜沧江和怒江天险，还要穿越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和深没及膝的湖沼地带，沿线有很多地方都是坚石陡壁，人烟稀少，有800多公里根本看不到人迹。青藏公路也要跨过通天河的四大支流和其他十数条河流，要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等九座大山。筑路英雄们在党所指示的"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精神的鼓舞下，创造出""担架排土"、"火烧水激爆石"等几十种新操作法，提高了工效。在峭壁激流上架起了230多座桥梁，从坚石中凿通了2860多个涵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让宽广平坦的公路铺筑在"世界屋脊"之上。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正式通车(正式交付使用分别为：青藏公路1955年；康藏公路1957年5月)。拉萨各界3万多人在布达拉宫前新建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大会。毛泽东为青藏、康藏公路全线通车的题词是："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青藏公路起自西宁，终于拉萨，全长2100公里，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以上。康藏公路起自雅安，终于拉萨，全长2255公里，平均海拔高达3000米以上。青藏公路、康藏公路的正式通车，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战胜大自然的创举，是祖国经济建设的又一伟大成就。它开辟了祖国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的交通大道，对于巩固国防和加强各民族间及藏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具有重大意义，对促进西藏人民和沿线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背景介绍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关于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提出了"剥夺剥削者"的原则。可见马、恩认为，无产阶级经夺取政权以后，要通过国家政权用革命手段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剥夺，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财产，这是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则和普遍真理。但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剥夺剥削者"？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各国特点有不同的形式和方法。一种是通过国家政权，没收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把它收归国有，另一种是采取赎买的政策，改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研究了马克思的思想，曾经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赎买政策的理论，把这一理论中国化，制定出我国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方针政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丰富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

材料：

· 文明、巧妙地消灭资产阶级

材料　文明、巧妙地消灭资产阶级

1950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之后，通过抓紧税收与发行公债，由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而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下子解决了。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所形成的虚假繁荣，也忽然破灭了。商品的销路突然下降，许多资本家由于商品卖不出去，无钱发工人的工资，都在大声叫苦。陈云同志负责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召开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我以上海工商局长的资格，参加了这个会议。陈云同志在党组会议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如实说出，以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那

次参加会议的并不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长，而且有代表资产阶级的高级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人。大家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但总括起来，不外是“商品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么一句话。会议开了半个月，陈云同志焦心考虑，在向中央汇报之后，在总结会议上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情况，并宣布：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消息一经传到上海，就顺利地在扩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抗美援朝需要许多军需物资，同时还由于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对工业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顿然活跃起来。资本家就改变了态度，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或者还按合同完成任务，宁愿按合同的规定罚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在上半年，资本家感谢国家给他们的加工订货；到下半年，资本家却认为加工订货是一根捆住他们手足的绳子了，进而千方百计要脱去这根绳子。斗争怎能不日趋尖锐呢？直到“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才低头接受加工订货。

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回来后向中央提出两个报告：一个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另一个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同志首先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中央统战部顾维汉部长和其他副部长都参加了。记得那天下午的汇报，突出了加工订货的问题。调查组的同志指出，各个部门需要时就向资本家加工订货，不需要时就拉倒；有的资本家形容说，“哑时急如星火，去时无影无踪”。另外，还谈到工缴费、税收等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李维汉同志提出，这些问题有必要提到党的统一领导上来解决。

这次调查的结果，不仅发觉了加工订货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所突破。李维汉同志提出，收购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形式。

同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并认为收购在当时已经日益缩小，不必再弄成一个形式。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就只包括低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两种形式了。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在讨论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应限于加工订货，而应逐步扩大为公私合营。

中央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大家才同意，只有高岗反对。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言不发。毛主席要李维汉找高谈谈。散会后，李问高有何意见。高说：“你读过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李说“读过。”高立即用尖刻的语调说：“布哈林不也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吗？”

会上的另一个分歧点，是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什么人。李维汉同志提出，把资本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民；林伯渠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工人，否则，改造成为什么人呢？难道改造成为地主吗？不能。难道改造成为农民吗？也不能。只能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定由李维汉给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改组”的提法是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改组”而来的）。在政治局讨论时，胡乔木同志提出，把“改组”改为“改造”更为确切、更为科学些。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都同意胡的意见，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提法，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提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同时，李维汉同志提出“双重改造”。那就是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商企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政策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

中财委“六办”成立初，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个《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这个文件是经陈云同志研究之后送中共中央，中央于1954年3月4日批准的。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就是“稳步前进，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条件、供产销平衡的可能、干部和奖金的准备以及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一批较重要的较大的企业，并把它们办好。”这就是当时简称的“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

当时把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称为“吃苹果”；而把余下的小企业的合营称为“吃葡萄”。各地党委对于“吃苹果”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的，主要是开办干部训练班，把企业中的秘密党员和工会干部都找来训练。合营一个厂要好几个月，工作做得相当细，把准备合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资金、原材料，甚至桌子、板凳，都调查得清清楚楚。1954年搞了一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只有2000多家，加上解放初期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而变成公私合营的1000家，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共有3000多家。

1955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7月间，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扩大的中执委会议。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中南海去。主席问我：“资本家在开会吗？”我说：“是，他们正在开会。”主席又问：“资本家头头都出席吗？”我说：“差不多都来了。”主席告诉我：“明天下午约他们的头头到中南海来见面。”

第二天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

的有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盛丕华、李烛尘、胡厥文、荣毅仁、胡子昂和郭逮活几个人。在陈叔通简单地汇报了全国工商联的会议情况之后,毛主席就和风细语地对他们说:现在农业合作化的浪头正在席卷全国。工商界面对这种情况,一定是心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在座的除资本家代表人物外,还有恩来、少奇、陈云、陆定一几个领导同志和统战部的徐冰、平杰三和我。散会后周总理向主席建议再谈一次,参加的资本家的人数要增加,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毛主席同意周总理的意见。

两天之后,把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的一百多名资本家,都邀到怀仁堂来座谈。毛主席又把上次的内容,更生动地讲了一次。

在毛主席同资本家代表谈了两次之后,陈云和陈毅两同志也先后在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陈毅同志的报告,主要是推动资本家接受改造。陈云同志的报告,除了分析经济形势的发展之外,还提出两点:(一)为了解决"吃苹果"与"吃葡萄"的矛盾,今后公私合营将有计划地按全行业进行;(二)在利润的分配上,从"四马分肥"改为按资本每年给予定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的中执委会议结束后,各地资本家一回去,便把毛主席、陈云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传达了。在党内,在工会系统也同时传达了毛主席和陈云同志的讲话。这样,全国的职工和资本家都轰动起来了。

在毛泽东同志同工商界代表谈话之后几天,陈叔通到我的宿舍来看我,提出要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告工商界宣言,号召工商界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说,现在全国总工会已经发表告全国工人同志的宣言了,如果工商界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对工作的进展不是很有利么?我把此事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并送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告全国工商界宣言的文稿。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提交政治局讨论。当夜,即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会议。因毛主席已离京休息,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统战部列席会议的,除李维汉和徐冰两同志外,还有我。少奇同志先要我把事情经过和文稿内容作一扼要的汇报。我汇报后,即展开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不可以让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有几位同志坚持反对,理由是: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怎能容许资本家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表宣言呢?持反对意见的人越来越多,空气也就越来越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问我:"问题是你提出来的,你的主张是什么?"我那时被那种反对的意见所动摇,于是说:"既然问题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关系到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问题,那么,就让我明天去说服陈叔老吧!"恩来同志听到我这么说,就很严肃而亲切地对我说:"你是一个老党员,在中央统战部中,你又是分工主管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副部长。像这样大的事情,难道你没有反复考虑?没有考虑工商联发表宣言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害?一听到反对的意见,不作进一步反复思考,就动摇起来,收回自己的意见,难道这是对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吗?工商联告全国工商界的稿件,我已经看过,内容是要求全国资本家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样一篇对工商界的宣言,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害处呢?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什么害处呢?为了社会主义改造,我认为可以同意陈叔老的要求,让全国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个宣言。"陈云和陈毅两同志也同意总理的意见。少奇同志深思之后,决定同意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推动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宣言。

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的中执委会议结束的时候,不但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而且发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隔了两三天,毛主席从内地回到北京,叫我去汇报资本家开会情况,总理、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在座。主席问我"致敬电和告工商界书是谁写的?是不是共产党员写的?如果出自党员的手,就不好。不要自己吹捧自己。"我作了回答之后,周总理说:"这两篇都写得不错,致敬电写得颇有感情。"毛主席指示,把由胡乔木同志执笔,在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和全国工商联的"告工商界书"及"致敬电",印成小册子,作为基层干部和资本家学习的教材。

1955年11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会议。会前周总理抓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并准备了一个党内文件。会上周总理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次会议,为党内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1956年1月,工商界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这首先是在首都北京发动起来的,接着上海、天津等城市也纷纷行动起来。资本家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声中,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为什么会进行得这么顺利?首先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资本家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使许多资本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必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资本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中央的带动之下,各省、市委和地委都大力地在做这项工作。其次,各地工人群众在党的教育和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纷纷起来推动资本家实现公私合营。资本家之所以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从多数人来说,是迫于形势的。这就是当时所流传的"大势所趋,不得不走"。再次,资本家中的进步分

子,在这次运动中也起了作用。他们认为,与其后合营,就不如早合营。当时天津有这么一句话,"先买船票,可以先坐好船位。"刘少奇同志很重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现公私合营,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工作作了评价。他说:"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是从被迫到自觉的表现。"

(摘自许涤新:《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背景介绍

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手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对现代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必须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也才能提高手工业的生产水平。我国由于现代化工业产品缺乏,建国初,手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供应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种重要经济力量。据统计,当时的手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值不计在内)的产值达100亿元。手工业不但在大城市的工业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且在小城镇工业中则几乎全都是手工业,全国约有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2000万人左右。由于个体小私有的手工业劳动者,其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小私有的生产也很难克服生产和产品销售的困难,不能避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控制和剥削。因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引导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组织起来,实行生产上的分工协作,可以逐步改进落后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收入,从而就可以增加公共积累,为进一步改善技术装备和劳动条件准备物质基础;同时也可以提高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组织起来,更便利于手工业生产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建立经常的联系,并取得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扶持和帮助,摆脱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和控制,也有利于手工业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市场的供求关系合理安排生产,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材料:

-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情况

材料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情况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是必要的一课。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谈谈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情况。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占国民经济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又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①

刘少奇在同年5月《谈几种合作社的分工》中,对手工业主张从供销入手,先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为手工业者收购原料,推销出口产品。"还谈到合作工厂,说"合作工厂……是高级的合作组织,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不好组织。""要办广大群众需要的、容易办的合作社。"同年6月,他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把合作社经济列为国民经济成份之一。"它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1950年7月他在《合作社的目的和性质》中说: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独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自愿地将自己当作生产者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织,去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生产的合理化与提高生产技术,以便扩大产品的市场,比较高价地出卖产品和比较廉价地买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合作社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鼓励,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道路进行的。它的指导思想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改造小生产的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在建国初期,及时制定了恢复

① 《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第4卷第1433、1434页。

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采取从供销入手等积极措施，充分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它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做法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上而下地起来；目的是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发挥他们固有的生产经营灵活、产品多种多样、能够适应人民不同需要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的优点，帮助他们克服规模细小、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及封建保守、行会观念、生产盲目、自发倾向等弱点，改变旧中国小生产被压迫、受剥削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是由个体私有制变为集体公有制、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的主要途径。

我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逐步加快的。1955年上半年以前的几年里，总的来说，发展是快的，也是稳步前进的。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合作化高潮，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偏高，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显得过快、过急，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党中央察觉后，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纠正。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一、着手典型试办，逐步摸索前进

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一方面根据需要和可能，帮助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积极引导个体手工业向集体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对手工业合作社进行了典型试办，摸索前进。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手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压榨，加上长期的战争破坏，致使本来就很不发达的中国经济（包括手工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进行恢复生产的。因此，党和国家的政策，主要是帮助手工业劳动者克服困难，恢复生产。一方面充分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那些资金不足和采购原料有困难的个体户，组织加工订货，给予银行贷款，支持他们搞好生产；对那些失业、生活无着的手工业工人，组织他们建立生产互助组织，进行生产自救，积极为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发展前途教育，选择了一些觉悟较高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手工业劳动者，重点试办合作社，以便从中摸索经验，树立旗帜，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准备条件。这些积极措施，加上全国解放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使解放前濒临绝境的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典型试办。当时首先组织起来的，是以革命积极性最高的手工业失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为主体，选择同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棉织、针织、服装鞋帽、铁木农具、建筑材料、木材加工、食品加工、造纸等行业为重点，组织了第一批手工业合作社。

其中最著名的有从"三把榔头"起家的上海市铁床合作社、从"破铜脸盆"熬糖起家的北京市第一食品合作社、由24名木杆秤工人组织起来的武汉市度量衡生产合作社，和由217户红炉手工业炉主组织起来的山东省潍坊市新胜红炉合作社等，后来都成为我国手工业合作社的旗帜和骨干。同时，对于一般的个体手工业户，还从供销入手，通过发原料、收成品，组织了大量的加工订货小组。国家商业部门对这些小组，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通过供销业务，组织生产。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个体手工业者逐步克服供销困难，摆脱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控制和剥削，而且有利于国家掌握货源，稳定市场，扶助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并为进一步实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

但是，也应当看到，不少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由于经验不足，缺乏明确的方针和必要的制度、办法，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有人就认为："国家工业化，手工业可有可无，""手工业落后，应当逐步淘汰。""搞手工业工作前途不大。"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1950年7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为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刘少奇、朱德到会讲了话。刘少奇说："过去的合作社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一般还没有走上正轨。""主观原因是办合作社的方针不明确，办法不完全。""客观原因是中国过去没有办合作社的经验，没有办合作社的传统，合作社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呈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决议，关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关于基层合作社和各级联合社章程准则草案的决议，并选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和监事。

会后，各地在狠抓手工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对已有手工业合作社的整顿工作和新社的典型试办。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1951年6月，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总社成立一年来的手工业工作，明确了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方针，任务，有计划、有领导地对原有合作社进行整理，先整顿、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是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到半机械化进而机械化，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会议认为，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同时为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服务，为工业、基建和交通运输服务、为出口需要服务。会议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初步明确了手工业合作社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并规定了组织合作社的六条基本原则，即：（1）入社自愿；（2）每个社员必须参加

社内劳动，并按照工资比例缴纳股金；(3)主要生产资料，如进行集体生产所必需的工具、机器、设备、厂房等应当公有；(4)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和劳动分红制；(5)合作社雇工不得超过社员人数的15%，资本家不得入社；(6)合作社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由社员参与生产和业务的管理。

1952年8月，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研究了建立生产合作社联合社问题，修定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会议着重总结这一时期组织和管理合作社的经验。强调因地制宜，就地取村、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主，有调查、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组织一个，巩固一个。9月30日，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颁发《市(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明确手工业合作社是手工业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场所的缩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三年恢复时期，手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由1949年的585.5万人增加到736.4万人(如果包括广大农村集镇的1200多万农民兼营性手工业生产人员在内，合计约2000万人)，产值由1949年的32.3亿元上升到73.2亿元，达到解放前最高年产值——1936年产值的96.6%。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由1949年的300多个发展到2700多个，社员由1949年的8.8万多人发展到25万人，产值增加到2.5亿元。这个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工作是稳步前进的。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普遍发展

1953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各方面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大量增加。这时，分散、落后的个体手工业生产同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由于前一时期手工业合作社的典型示范作用，广大手工业劳动者和手工业工人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从此，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普遍发展的新阶段。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详尽地作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11月20日至12月17日，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过程中，刘少奇听取了总社代主任程子华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指示，首先着重讲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同时讲了为什么要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的目的、组织对象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强调集体经济要保持稳定。朱德在会上作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强调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改造的必要性。他主张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应该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不同形式，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绝对不要规定一个死格式到处硬套。会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总结了几年来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和初步经验，明确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党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发布了指示，要求“各地切实办好现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作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准备。……并成立各级手工业管理机构和各级手工业联社。”这次会议为手工业合作化的全面发展铺平了道路。

各地在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精神时，一般都很注意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手工业劳动者的要求，采用多种多样的灵活组织形式，引导手工业劳动者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既反对要求过高过急，贪多贪大，盲目发展，也反对放任自流，听其自然，停步不前的倾向，并继续注意整顿和发展相结合，注意培养典型，树立榜样，因而手工业合作化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比较健康。

在注意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的手工业管理部门，还注意加强了对个体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目的是了解手工业情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指导其发展方向和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平衡价格，稳定市场，逐步减少和克服其盲目性，有步骤地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

1954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12月召开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4年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确定了1955年的任务，讨论了基层社的社章草案，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到会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重要讲话。陈云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讲话。他在分析当时工业生产中的矛盾和解决办法时，指出：“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社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太快了，就会出毛病。”①。这次会议是我国建立手工业专管机构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继续总结了3种组织形式的发展经验，着重研究了当时供产销不平衡的复杂情况和一系列政策问题，确定了1955年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进行统筹兼顾，全国安排；整顿、巩固、提高现有合作组织；适当发展新社。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4.1万多个，拥有社(组)员113万多人，(另有自发组织的社、组员113万人，相当于合作

① 《陈云文选》1949年——1956年第269、270页)

社、组员的总数)全年产值11.6亿元。应当说,1953年、1954年两年的发展已经是够快的了。

1955年5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会议报告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地方工业部门应在对各种经济类型工业进行统筹安排时,必须对手工业的安排与改造同时予以考虑,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供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

在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社的普遍发展中,大家都很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地群众创造的3种主要组织形式。即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或经过这两者中间的一种,过渡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一种发展过程。但并不是都经过这个过程,而是因地制宜,因社制宜。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对象,在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前后,一直是各级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机关摸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进一步明确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主要组织对象为手工业独立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而手工业资本家不应吸收入社,对他们要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各地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建立,从1951年开始到1953年先后成立的有省、市级14个,县、市级19个。手工业合作社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1954年以前是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1954年12月后是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各级手工业联社,是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组织自愿组成的联合经济组织,是手工业合作社的直接的组织领导和业务领导机构。同时,为了加强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团结,加强手工业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团结,并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少地区除采取召开手工业劳动者代表会议以外,还组织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

三、手工业合作化高潮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0月4日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讲话,促使手工业改造也逐步掀起了高潮。

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加快,对手工业产生了强烈影响。手工业者要求组织起来的情绪也十分高涨,建社速度也明显加快了。据统计,1955年6月到12月半年内,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从4.98万多个发展到6.46万多个。社(组)员从143.9万多人发展到220.6万多人,增加了53.5%。特别是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并说:"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以后,既形成对手工业合作化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也形成对手工业战线干部的巨大压力。

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于12月9日召开了全国重点地区手工业组织检查工作座谈会,检查了所谓"与总路线要求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加快发展,迎接高潮,全面规划,计划平衡"的新的组织任务。接着于12月21日至28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研究提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完成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1956年1月7日党中央批转了这个全面规划。规划的总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人员总数的70%,1957年达到90%,1959年至1960年全部组织起来。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速度已经过于快了,但实际的发展速度又大大超过规划的要求,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问题。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所谓"与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是不存在的。1955年12月底,刘少奇听取了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主任白如冰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的汇报,做了重要指示。指出:要保持手工业特点,注意发展速度,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要适度,花色品种不能减少,质量要提高,要加强领导等等。所有这些,为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工作没有出现太大的混乱。

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刚刚结束,正当历史翻开1956年第一页的时候,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就象大海的层层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首先北京涌起了第一个巨浪。在郊区县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带动下,城市工商业者1月1日上街游行,首先提出了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从1日到10日,全市各区的个体手工业者,有的挂起"迎接合作化"的大标语,要求入社;有的自动串联,酝酿建社;有的成群结队,申请报名入社。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掩盖了领导和群众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1月10日,全市10个城区和近郊区29个行业的手工业者,分别集会,庆祝了全行业实现合作化。有5.38万个个体手工业者入了社。至此,北京的社(组)员人数就达到全市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5.6%,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1月15日,在天安门全市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上,北京市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代表徐淑芹,代表全市手工业者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呈交了北京市实现全行业合作化的报喜信。1月30日,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代表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员向中共中央呈交了报喜信。

1955年上半年以前的手工业改造工作,步子本来比

较稳，具体政策也比较明确，民主办社和自愿互利原则执行得也比较好。下半年实际情况是：控制不住了。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反映了当时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一面，不能泼冷水。当时批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提出手工业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造成急躁冒进。1956年3月4日，毛泽东以及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听取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会汇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时，毛泽东还是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但他也察觉到一些问题，指出：“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这篇讲话的主题是强调：“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4－265页）

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为9.91万个，社（组）员达到509.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1956年产值比1955年增长15.61%，其中集体手工业产值比1955年增长2.68倍。至此，中国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伟大变革，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集体工业经济。从总体来看，发展方向是对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全国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是在当时对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影响下发生的，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方法，去实现个体劳动者所有制改造的复杂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同时对保留一部分手工业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积极作用也认识不足，把一些本来可以不组织的个体户，也组织起来了，给后来遗留下大量的调整、整顿工作和不利影响。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察觉到高潮中出现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中心是解决过多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等问题。经过调整、整顿，继承和发扬了手工业的优良传统，促进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使工作未受重大损失，并初步显示出合作化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我国手工业改造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促进新时期集体工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表现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尊重实践，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集体经济长期存在，稳定发展；坚持按集体经济性质和特点办企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正确处理集体工业企业的分配关系；坚持技术进步，加快人才培训等。发扬这些经验，将促进集体工业企业顺利地健康发展。

（选自《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

军队建设

背景介绍

1953年，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时，美国政府并未因侵朝战争失败而放弃侵略中国的企图，继续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美国的战略部署是：从南朝鲜经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支那到泰国对中国组成一个半月形包围圈，以南朝鲜、台湾、印支半岛为三个基地，准备伺机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为此，美国于1952年11月开始重新武装日本。1953年2月撤掉不把台澎湖列岛作为进攻中国的保证，放手让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8月，同法国制订“纳瓦尔计划”，企图18个月结束越南战争，把越南作为新的侵华跳板。1954年4月7日，面对越南人民奠边府战役的节节胜利，美国总统艾森豪维尔极力煽动反华，声称：如果印度支那支持，共产党就可以转向日本、台湾，与菲律宾结成防御锁链，并将成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威胁。7月21日，印支停火协议刚在日内瓦签订，美国以一架英国运输机在海南上空被中国误击为借口，派遣联合舰队到海南岛东部海面，并派机侵入广东省上空击落中国两架巡逻机，扫射海上波兰商船及中国护航舰，向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同时，将运往印支战争的80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转运台湾，向台出售喷气式战斗机；指示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派炮舰“访问”台湾；命令美太平洋舰队准备“随时采取行动”。蒋介石集团亦大肆向日本购买军火，在台澎岛上进行“治安检查”，抓丁捕人，将3.2万青年学生编入蒋军训练，进行战争动员。新的战争濒临一触即发的边沿。9月8日，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定《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立“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军事集团，联合反华。10月，在南越扶植吴庭艳傀儡政府。11月16日，杜勒斯叫嚣用军事力量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2月2日，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为了保卫祖国领土权不受侵犯，保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集中力量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材料：

- 军队正规化建设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
- 我国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 党的军事领导机构沿革概述

材料一　军队正规化建设

建立健全国防建设领导体系和防御体系。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决定国家设立国防委员会，代替原来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国防委员会正副主席和委员；国务院除保留公安部外，增设国防部，任命彭德怀为部长。同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亦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在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担负对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11月9日，毛泽东根据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叶剑英为监察部部长，黄克诚为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为财务部部长，建立了全国军事系统的中央领导机构。

195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将全国原有之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内蒙古、济南、兰州、新疆、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西藏等12个军区，1956年增设福州军区，分别担负本地区的国防和国防建设任务，从而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区防御国防体系。

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研工作。这一时期，国家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并通过仿制，已能自己生产大口径火炮等50多种制式武器和喷气式歼击机等。兵器工业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实现了"一五"计划的总产值指标，解放军的装备得到较大改善。为反对美国的核讹诈，1955年，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负责筹建核工业，1956年开始研制火箭和原子能，致力增强国防力量。

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总结了建国以来全军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确定新时期全军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即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会后，全军迅速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首先，大力加强全军政治工作。195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全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与各方面的关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强调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各军兵种陆续召开了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命名各种英雄、功臣称号，为全军树立学习榜样。1955年9月，国家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分别授予荣誉勋章，表彰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激励全军争取更大光荣。其次，大力加强正规化建设。1954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全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的薪金制三大制度。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并公布试行。7月30日，由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实行。这是中国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2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决定全军实行军衔制。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向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衔；周恩来总理向粟裕等在北京将领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59位少将及其以下各种军衔。实行军衔制是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各级军官在军人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加强部队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军队干部质量、促进军官将军工作作为自己的长期甚至终身的职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全国国家工作人员改行货币工资制，军队干部也实行了相应的薪金制。再者，大力加强军事训练。中央军委提出了"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掌握现代化武器和其它军事技术，学会组织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方针，颁发了训练大纲，在全军开始了统一的正规训练。1955年冬，在辽东地区组织了一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演习，检验训练成果。实践表明，短短几年，部队战斗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为了打击美蒋反动派的战争挑衅和反革命骚扰，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军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

(一)撤兵朝鲜，加强国内国防力量。1953年9月至1955年10月，中国履行朝鲜停战协定，分三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19个师，加强国内国防力量，增加对付美蒋反动派发动新战争的应变能力。同时，仍留一部分志愿军在朝鲜，一面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一面对付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可能发动的新的进攻。

(二)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不仅以大批军事物资支援越南人民，而且让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越南帮助越南人民抗法卫国。他们组织的著名的奠边府战役，打败了法国侵略者，粉碎了美国由印度支那侵略中国的阴谋，巩固了南部边防。

(三)痛击来犯之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针对美蒋反动派的空袭、炮击、派遣特务等罪恶活动，全国军民针锋相对，坚决予以打击。在国内，深入开展肃反运动，使一切原有的新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地。边防上，仅1954年1月1日至12月20日，驻华东地区边防军和当地民兵，就击落敌机39架、击伤敌机92架，蒋机起义归业1架，合计达132架；击沉蒋军大型护航驱逐舰、"太平

号"及其它舰艇8艘，击毁击伤25艘，合计33艘。同时，击毁蒋军在沿海岛屿上的炮兵阵地12处、指挥机关4处、活动码头1处、仓库6个等，并解放了浙江沿海的头门山、田岙、蒋儿岙3个岛屿，毙伤俘及投诚蒋军3145名，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为了根除蒋军对大陆的骚扰破坏，1955年1月18至19日，华东解放军集中一个步兵师，137艘舰艇，航空兵22个大队，三军协同作战，一举解放一江山岛，迫使盘踞在大陈各岛蒋军仓惶撤退。至此，除台澎诸岛外，东南沿海诸岛全部解放。

(四)做好解放台湾和反对美国发动新战争的充分准备。针对美蒋反动派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驻守华东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边严惩美蒋反动派的侵犯行为，一边与当地人民加强战备，准备随时对付美蒋反动派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揭露、控诉、声讨美蒋反动派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激发了全国人民保卫祖国的热情。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由于苏联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支持，由于美蒋反动派内部矛盾重重、力不从心，使他们最终未敢向大陆发动新的战争。

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日趋缓和的新形势，对全军今后的工作重新进行了研究，要求解放军一面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保卫国防；一面更多地发挥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全军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人民坚决打击美蒋反动派的一系列胜利，使中国国防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事实表明，中国人民已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1955年5月，根据中国政府要求，经中苏双方友好协商，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走。至此，除台湾、香港、澳门外，中国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国防。

(摘自《新中国四十年史》)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

主席台正面悬挂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挂着国旗。

在主席台上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接着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授予元帅军衔礼成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

毛泽东主席接着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今天参加典礼接受勋章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批授予勋章人员名单中的在座人员。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王宏坤、王近山、王震、王树声、甘泗淇、朱良才、刘志坚、刘亚楼、刘道生、李克农、李达、李涛、宋任穷、陈赓、周士第、周保中、罗瑞卿、洪学智、孙毅、倪志亮、张宗逊、张爱萍、张云逸、张经武、郭天民、许光达、莫文骅、彭绍辉、傅秋涛、程世才、黄克诚、粟裕、冯白驹、赵尔陆、阎红彦、赖传珠、谢富治、萧克、萧劲光、萧华、谭政。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有：冯仲云。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有：王尚荣、王诤、朱明、刘少文、李天焕、吴先恩、陈外欧、周仁杰、周纯全、孙超群、徐深吉、唐天际、张广才、杨至成、杨秀山、郑维山、萧向荣、谭家述。

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有：方毅、王平、刘少卿、刘其人、吕正操、陈士榘、罗舜初、苏振华、张国华、杨成武、阎揆要、韩伟。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有：欧阳毅。

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有：孟庆山。

荣获一级解放勋章的有：王文轩、王再兴、王光华、王奇才、王宗槐、王秉璋、王振祥、王智涛、王辉球、牛书申、

孔石泉、甘思和、石志本、朱军、皮定钧、刘子云、刘文辉、刘中华、刘西元、刘华清、向仲华、李人林、李中权、李赤然、李呈瑞、李贞、李耀、李继开、吴烈、吴涛、何延一、何基沣、何维忠、何辉、谷景生、谷广善、沙克、余秋里、陈沂、陈云开、陈庆先、周希汉、周彪、周彬、苏进、苏静、易耀采、丘会作、丘创成、丘蔚、封永顺、乌兰夫、查国祯、段德彰、胡奇才、孙仪之、袁子钦、袁升平、袁渊、徐德操、张令彬、张平凯、张池明、张史侠、张延发、张治中、张开荆、张雄、张轸、张瑞、张逊之、张震东、张贤约、梁必业、常乾坤、曹达诺夫·扎依尔、梅嘉生、彭富九、贺东生、傅作义、傅崇碧、傅连章、程潜、黄火星、黄志勇、黄振棠、黄陆生、喻缦云、杨尚儒、叶青山、頓星云、董其武、赵熔、漆远渥、熊伯涛、邓家泰、邓逸凡、郑国仲、潘峰、蔡顺礼、阎捷三、卢汉、龙道权、欧阳文、谢有法、钟汉华、薛少卿、邝任农、魏传统、谭右铭、饶正锡、饶守坤。

授衔、授勋典礼于下午六时半在胜利进行曲的军乐声中宣告完成。

今天参加授衔、授勋典礼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军官，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军事学校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参加。

（摘自一九五五年《人民手册》）

材料三　我国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并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并决议将这一草案，交由国务院发给各级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征求人民意见，以便再加修正，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现在这个兵役法草案就是根据这一条宪法的精神的，是完全符合于我国人民的利益和国防的需要的。

我国的义务兵役制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和实际需要并且吸取苏联先进的军事建设经验，逐步建立的，是我国军事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现时在我国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的条件是完全成熟了的。我国人民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剥削和奴役，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后，经过五年来的经济恢复和各种社会改革的完成，现在已经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受破坏，政务院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发布征集补充兵员的命令以后，全国各地才有成千上万的适龄青年报名，响应征召。特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不断地有大量群众写信给国机关，热烈请求以服兵役履行公民义务的机会。这就说明实行义务兵役制，不但是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并且已经成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的爱国主义的共同要求了。

为了我国人民自身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应该用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制，因为过去的志愿制，是由一部分人长期当兵去争取人民的解放，捍卫人民的复兴，这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如果我们继续志愿兵制就将是不合理的了。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让三部分人长期为国家为人民而当兵，却不使大多数人来服兵役。这样不但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会妨碍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的。只有实行义务兵役制，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有必要的常务兵力和雄厚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以准备随时反击敢于进犯我国的侵略者，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的安全，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祖国的安全、没有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能够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能够创造幸福的生活的。

现在，兵役法草案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必须依法服兵役。兵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两种。服役年龄规定为年满十八岁到四十岁。服现役的期限，依据军种的不同，分为三年、四年和五年。兵役法草案并规定军官以军队工作为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职业，军士和兵服现役期满后编入第一类预备役续服兵役。未被征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和平时，免服现役的应征公民编入第二类预备役，并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接受一定时期的军事训练。这就使得我国每一个适龄公民都有参加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利益的光荣机会。

按照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需要，军队干部必须成为职业军官。由于他们的责任更重大、业务更深邃，所以服现役的士兵又必须经过相当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兵役法草案所规定的陆军三年、空军四年和海军五年的现役期限，就是根据掌握这些军事装备和学习现代化作战方法所需要的时间而拟定的。兵役法草案又规定了经过训练的军士和士兵，服现役期满后就可以依法转入预备役，而新的应征公民，依法入伍接受军事训练。这样，每年有大批受过训练的人依法转入预备役，同时也有大批新的适龄公民入伍受训。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我们的国家不仅将拥

有足够的常备兵力，并且可以拥有极其雄厚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就能够迅速地组织起大量的作战部队去反抗侵略者。

实行义务兵役制，还可以使我国军队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因为绝大部分人民群众都有子弟或亲人在军队中服现役，或者服预备役，因此全心全意就必然更加关心军队，爱护军队，能够更积极地支援军队。同时，也由于广大群众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保卫祖国是可以和保卫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设成果发生更为密切更为广泛的关系，因此在国家遭受侵略时，必然能够以无比的勇敢和智慧同敌人作战。这就使我国所有的军队和全体人民更加紧密地结合成为足以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国防力量。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这些资金和人才不可能依靠任何外力来取得，而要依靠我们自己的积累和培养。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后，因为国家拥有雄厚的后备兵力，在敌人侵犯时就可以迅速征集他们去反抗敌人，所以在平时，就不必要保留大量的常备兵，而可以逐步缩减到必要数量，以节省出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平时用于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事业。同时，因为我国人民解放军是以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部队的，而军队又是过着集体生活，便于进行教育的，所以根据兵役法草案的规定，我们国家每年都要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进入人民解放军受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教育，每年也要有相当数量服役期满的军人退伍回来参加和平建设。所有退伍回来的军人，都受过三年至五年集中训练。他们一方面在部队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并且得到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锻炼。另一方面，他们也学会了许多科学知识和技术，这就使我们国家能够不断地获得大量的集中地受过社会主义教育和有一定技能的建设人才，就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兵役法草案同时还照顾了我国的社会习惯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独子和维持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平时免服现役，就是为了不至因服现役而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这些规定不仅可以大大减轻人民群众的代耕等优待负担，减少政府的救济费用，并且有利于生产。

由此可见，兵役法草案的各项规定，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我们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兵役法草案的宣传。并征求人民对兵役法的意见，各地的经验证明：只要详细和正确地给人民群众讲清了义务兵役制的各种具体规定和意义，人民群众就对这一制度表现出更加热烈的拥护，认为这是一种既能增强国防力量又能增强建设力量的好制度，征集补充兵员的工作也能顺利完成，甚至大大超过原定计划。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推行这一制度在我国还是首次，它关系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民群众中有一些人由于对定的制度生疏，因此还有或多或少的疑问和顾虑。为顺利推行这一制度，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应该组织广大工作人员好好研究和讨论这个兵役法草案，了解它的精神实质和各种具体规定，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义务兵役制是建立在人民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向人民群众进行普遍的宣传。有些地区虽然发生过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但是经过广泛的深入宣传和细致的解释，群众的疑虑就自然消释，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就暴露出来，孤立起来了。事实说明，义务兵役制是完全合乎我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虽然在开始推行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积极宣传这一制度，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它就会变成人民群众爱国的积极行动。

同时，在人民解放军中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大家一方面了解义务兵役制的好处，另一方面了解由志愿兵制改变为义务兵役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能逐步推行。因此，有些同志虽然在军队服务很长了，但是仍然不能马上复员，否则就将会影响国家安全和建设事业。他们仍然应该加紧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知识与技术，掌握现代化的装备，警惕地保卫祖国。

我国六万万人民正以空前的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因此也就迫切地需要加强国防，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和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推行义务兵役制，将把人民群众这种保卫祖国的要求和坚强意志组织起来，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使我们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挑衅和进犯。

（《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

材料四　党的军事领导机构沿革概述

（一）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产生于何时？据笔者手头的材料，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气势磅礴工人自卫军的组织”，在工会中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和成立军事委员会，并提出要健全和扩大中央工作机构。有的文章说，会后便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年底改称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主任。又据《聂荣臻回忆录》的记载，1925年，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他们一行20多人（全是学军事的）于8月上旬离莫斯科回国，9月上旬抵上海，由陈独秀分配工作。其中“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这是我们党中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党委已成立

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看来，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产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在中央设立专门军事机构的客观要求，王一飞的建议更起了促进作用，于是中央在北京召开的“10 月会议”便作出了相应决定，到年底又正式定名为“中央军事部”，也可以说至此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是正式成立了。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虽未设立主管军事工作的专门机构，但对这方面还是注意了的。如 1924 年 5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就要求在士兵中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注意军官学校的工作，在军校中建立党的组织。同年冬，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取得孙中山同意后，以黄埔一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成“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此为基础，1925 年 11 月又在广东肇庆组建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成为当时我党掌握的唯一正规军队。

到了 1926 年 2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为了准备北伐战争，加强党对北方国民军的工作，使之“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支撑北方局面，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决定中央应“建立一强有的军委”。这年冬，周恩来等人由广东到上海，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书记周恩来。1927 年 5 月，军委机关迁汉口，在周恩来领导下，军委成员聂荣臻、王一飞、欧阳钦等各有分工，人手虽略有增加，“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 10 个人”。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举行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在 8 月 9 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王一飞任秘书，同时决定在周恩来未回到中央以前由王一飞代理部务。

1928 年 7 月党的“六大”结束以后，由杨殷（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次年八月杨殷在上海被捕遇害后，仍由周恩来（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军事部部长。到 193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后，红一军团于 1930 年 6 月 25 日发布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打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旗子，中央苏区也于 1931 年 1 月 15 日成立了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受苏区中央局领导，同年六月改由毛泽东任主席，十月又改由朱德任主席），设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又改称中央军事部，部长仍为周恩来。

须指出的是，虽然“六大”时未经大会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草案）》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但于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但实际上限于条件（中央军事部设在上海，远离红军和根据地），“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这种情况到 1931 年 11 月“中革军委”成立后，才有了根本改变。

（二）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11 月 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机构，负责“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军事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规定“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其附属机关的一切训令，红军应立刻坚决地执行”。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中央军事部成员也陆续进入苏区，设在上海的军事部实际上便成为留守处了。中革军委取代了中央军委，党的军事领导机构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政府机构了（当然，中革军委实际上仍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

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五月，随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分开，增补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因朱德又是红军总司令，要经常随总司令部在前方指挥），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实际上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就由他们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了”。

1934 年 2 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革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副主席有周恩来、王稼祥。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并未改变军委领导，这由朱德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发出的大量电报和新发现的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已得到确证，即“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之后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又组成了中央军事领导小组，全权处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因而成为全党全军最重要的实际领导机构。

1935 年 6 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为统一指挥，加强团结，7 月 18 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调整后的中革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副主席为张国焘、周恩来、王

稼祥。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公布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12月，中革军委调整和扩大组织，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任命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杨尚昆为总政治正副主任。

这一时期，中革军委又常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如1924年7月15日的《北上抗日宣言》和1936年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均是。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要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要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革军委也须就相应地恢复为党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形式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冯家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增为11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毛泽东为军委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则称主席、副主席。1938年11月增补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1943年3月又增补刘少奇为军委副主席。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闭幕，8月间组成了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为委员。

到1949年4月，为着适应夺取全国胜利的客观需要，中央军委对外又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三章“军事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至此，党的军事领导机构再次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政府机构。

(四)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任命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又任命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这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时，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9月28日，也就是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的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指出要由中央军委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2人组成中央军委，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便形成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格局，虽然具体组成人员不完全相同(国防委员会中有一些党外人士)，但主体部分就是那些人。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9月林彪取代了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并决定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到1966年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有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负责，有叶群、邱会作等人。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负责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到次年3月24日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事件发生后，又进一步改组了军委办事组，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当了办事组组长(原先组长为杨成武)，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办事组成员。“新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后，军委常委就停止了活动，不再开会了”，“使林、叶、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中央军委，‘合法’化了”。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组成了新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月间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2月5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取消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叶剑英被解除了对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党中

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次年七月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1977 年 3 月 7 日中共中央通知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之后组成了新的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7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知，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军委副主席(杨为常务副主席)。

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的第二部宪法)第十五条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的设置被正式取消了。1978 年 3 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新中国的第三部宪法)的有关规定与此相同。1982 年 12 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第 9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第 94 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第 62 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新宪法的规定，1983 年 6 月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这样，在消失了多年之后，又有了以国家机构形式出现的军事领导机构，从而“根据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恰当地规定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当然，正如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所言，”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我们从人员组成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情况。1987 年 10 月中共“十三大”上，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中把“党的中央军事委员”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委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1988 年 3 月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赵紫阳、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还决定洪学智等为中央军委委员。

以上，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机构沿革的大概情形。由于笔者接触材料有限，所见材料又未必完全可靠，故本文所述难免有不准确之处，热诚欢迎识者指正。

(选自《党史博采》1988 年第 5 期)

高、饶事件

背景介绍

1953 年，为适应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中央曾设想调整中央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考虑是否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国家是否采用部长会议制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一线二线的主张。同时，也在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人事安排。这时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时机，积极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材料：

·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

· 高岗向党发难的背景

材料一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

高岗、饶漱石都是党的高级干部。高岗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3 年初他们从东北和华东调到中央工作。

1953 年 6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利用批评财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玩弄阴谋诡计，捏造材料，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发动对财政部负责同志的过火斗争，把一般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为路线错误，借此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党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同时，他无耻地吹捧抬高自己，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中央觉察到高岗的不正常举动，确认了财政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性质属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并未构成路线错误。从而纠正了在高岗影响下产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排除了干扰。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会后，高岗以休假为名，跑到华东、中南继续进行其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散布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说什么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两个党，并自居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还说党是军队(即他高岗)创

造的，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中，应当进行彻底改组。同时，他还把私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补充人选传播出去，妄图由他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饶漱石从资产阶级个主义出发，以为高岗篡权成功在望，和高岗勾结起来，支持和参加高岗的阴谋活动。他以揭发中央组织部的问题为名，通过打击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中共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企图。

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公然出面反对。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野心更大了。他用拉拢的办法，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拱倒刘少奇。他又找陈云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这种在党内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不正常办法，引起了邓小平和陈云的警觉，立即向毛泽东反映，揭露了高岗的阴谋。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毛泽东对高岗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准备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61人，列席52人。毛泽东因为休假没有出席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指出威胁党的团结的种种因素。诸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全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够；一部分干部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对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对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被工作中的一些成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决议提出了全党高级干部必须遵守的6条规定：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此作为指导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全党团结的中心是党中央，任何地区、部门的党的组织和工作，都必须置于中央领导之下，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向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海市委扩大会议，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

大量事实证明，高岗从1949年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起，应"东北特殊"、"东北先进"等论调下，对抗中央领导，制造独立王国。他破坏中央威信，散布流言蜚语，造谣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实行家长式统治，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压制民主。他在取得毛泽东信任并调到中央工作后，更加骄横狂妄，把刘少奇、周恩来看作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企图施加阴谋手段排除，同时公开向中央要官要权。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腐化。

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多年来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他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错误分析形势，投机取巧，同高岗勾结起来，进行分裂党的篡权阴谋活动。

中共中央在查清高、饶反党活动的基础上，向全党作了通报。全党通过学习《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检查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增强维护党团结的自觉性，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叙述了党与高、饶斗争的经过和重要意义，总结经验教训。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个决议在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获得批准。至此，中国共产党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胜利结束。

（摘自《新中国四十年史》）

材料二　高岗向党发难的背景

《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试论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斗争》中说："高岗自恃对革命有功，……抓住党纠正工作中某些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倾向的时机，便急不可待地把他们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推到了顶点。"高岗向党发难的背景是什么？他的"经济内阁"与"党纠正工作中某些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倾向"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这使他"利令智昏"？

一、1951年高岗得了"两分"

1951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结局是：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高岗的意见得到了肯定。

第一个问题：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建国以后不久，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同党、政府、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来了。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邓子恢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作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邓子恢的意见曾于7月29日在中南局关于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情况的电报中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4日，刘少奇为此拟稿批转邓的报告①，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作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同日，《工人日报》登载了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全国总工会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9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邓文。

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作"特务"，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对邓子恢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1951年4月，他主持写出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准备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该文对邓子恢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说，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是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高岗于4月22日写信请毛泽东审改该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4月29日，胡乔木就此事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5月16日，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951年10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报告说：有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矛盾，甚至否认"公私兼顾"的政策可以适用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李立三明确表示："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从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的内容来看，刘少奇同李立三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不久，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1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

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负责指导全总党组工作(刘少奇外出休假，实际由李富春主持)。12月13日至22日，李富春主持全总党组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李立三，第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第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等。并指出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于是，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就以李立三被解除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而告结束。实际就是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肯定了高岗的意见。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作的自我批评中说，对于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就是见证。这就使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业互助合作。

土改以后，我国的个体农业要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党内意见是一致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劳动互助的形式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的积极作用，党内也无异议。但对农村实行中农化以后，是否应当允许少数富裕中农冒尖，以及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合作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党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之一是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为此，应该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增强，使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以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刘少奇则持另一种意见。

5月4日，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作了批复，指出：省委"抓紧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提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目前"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发表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进一步作了说明。他说，中国将来一定要达到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场)，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而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还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强大的工业，没有强大的国有化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因此，"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

根据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刘少奇于5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报告说：在三年准备(还有16个月)之后，我们来一个十年经济计划。到十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应要改变，那时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据此他指出：有的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提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提出要组织农业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十家、八家、三十家、五十家的农民组织起来。土地、牲畜、农具共同使用。当然这种合作就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为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要中央办公厅印发马列学院学员、各中委和中央局。刘少奇在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自发热情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了，并且去加以阻止或避免。并且认为山西省委提出的：应该逐步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党内关于中国农村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意见中，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②]。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就在这重要时刻，高岗于10月14日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③]。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经济上升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95%。其中上升到中农水平的约占60—70%；较土改时有显著改善的约占25—30%；上升户中约有20%已成为富裕中农。新富农发展较慢，据各省中发展最多的黑龙江省统计，约占农户的0.8%。"东北农

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当前组织起来的合作互助组，主要有四种形式：插犋组；农业三大季换工组；农业、副业结合，长年不散，比较定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型的，即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产、并进行集体劳动的。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报告认为合作互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季节性的、单纯农业生产的、小型合作互助组（第一种形式），到农业三大季的插犋换工（第二种形式），再到农、副业结合的常年互助（第三种形式），然后到土地入股、集体耕种，或共同占有一定数量的公共生产工具，共同生产的农业合作社形式（第四种形式）。”报告列举合作互助组的作用主要有三点：第一、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了新式农具的使用范围，容易使农业逐渐走向计划性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第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使农民破产下降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小；第三、教育组织了农民，起了逐渐地改造农民经济、改造农民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的作用。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同时力争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能够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 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

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以后，于10月17日将此件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嘱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充分肯定了高岗的报告。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4]这样，高岗就又得了“一分”。

二、在批评“新税制”中高岗组成了“经济内阁”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于1953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新税制规定：“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牌价核税；加工、定货、包销者同。”也就是不分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认为，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5]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年1月9日建立，周恩来任书记——引者注）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部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各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5月1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6]。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即：

（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作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中央作出的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与之同时，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而这同他1951年得的“两分”，显然是有着直接关联的。正因为此，高岗认为已经组织了“经济内阁”，并准备进一步跃登龙门了。

三、毛泽东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高岗利令智昏

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央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对“新税制”等问题作了尖锐批评，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还对把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走到集体化的道路，看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的观点作了尖锐批评，并强调要反对“分散主义”。

高岗急于在此时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和会后连续向周恩来、刘少奇发难，显然对毛泽东的上述批评作了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毛泽东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提到“离开总路线”的高度进行批评，证明周、刘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联系在此以前在组织分工上的重要调整，他认为周恩来、刘少奇已“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他自己则被认为是“一贯正确”，又组织了“经济内阁”。这是利令智昏，企图一举将周、刘拱倒，取而代之。然而，历史的规律是，凡是个人野心家，热昏头脑，为夺取权力搞阴谋活动的人，无一不以身败名裂而告终。

注　释

①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②《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4期第6页。

③中共中央东北局《党的工作》第120期。

④《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13页。

⑤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选自《党的文献》1989年第2期）

粮食统购统销

背景介绍

一九五三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就。由于统购统销的实行，国家有效地保证了城市工矿区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的需要，保证了经济作物区农民、灾区人民和渔民、盐民、林民、牧民、船民的需要，保证了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粮食的统购统销，市场就不可能继续稳定，而一九五四年那样严重的灾荒，也就无法平稳渡过。因此，今后必须坚持和加强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对这个政策抱任何怀疑态度和松劲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但是应该承认，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工作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统购方面，我们向农民统购的粮食，加上征粮部分，虽然不到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它完全合乎农村经济的规律，对发展农村经济也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在我

国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对粮食生产、需要、余粮、缺粮的情况很难完全摸准，加上在我国发生重大水灾时，不得不向非灾区农民多购一些粮食(非灾区农民支援灾区人民是完全应该的)，因此，某些地方任务分配得不够合理，有的农民应该出售的余粮没有购足；而对有的农民，则国家统购的粮食超过了他们的余粮界限。统销方面，国家销给农村的粮食突破销售指标很多，有一部分真正缺粮的农民的供应却没有落实保证，许多并不缺粮和有余粮的农民倒买进了大批粮食。这就是有些应该供应的农民，确实供应不足；而全国普遍的和大量的情况是，许多不该供应的也供应了，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该迟供应的却早供应了。城市粮食供应管理松懈，供应标准偏宽，因此影响到城市粮食倒流回农村，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浪费粮食的现象相当严重。以上所述供应过多、供应不当和管理松懈的缺点是我们粮食工作中的基本缺点。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从工作上检查，除了我们没有抓紧搞好统销外，主要是我们还缺乏一套必要的具体制度和办法，使工作有切实的依据；许多干部存在着重购轻销的思想，对粮食统销工作在促进粮食生产、保证粮食需要上的意义认识不足，也就是对统销在保证粮食分配合理上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农村的粮食统购和统销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在划清余粮、缺粮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同时安排。

材料：

- 迅速向全体农民宣传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

材料　迅速向全体农民宣传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

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正在开始春耕或准备春耕，为国家和自己生产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广大农民都了解增产粮食的重大意义，也看到两年来国家所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对于农民和全国人民都是必要的，有利的。但也有许多农民不知道：每年国家要向他们征购多少粮食？他们生产的粮食，有多少归国家征购，有多少归自己支配？

答复农民的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这对于提高农民的增产积极性有极大的关系。农民“摸了底”，才不会误以为他们生产愈多，国家收购得愈多，农民所得的利益不够大。这就是说，国家每年征购粮食的一定的数目应当在春耕的时候就预先向农民宣布，好让农民根据这一点订出自己的增产计划。

国务院和党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应以乡为单位，迅速确定全乡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字，一律向农民宣布，使每一户农民都知道自己起码应该生产多少粮食，使有余粮的农民知道自己只要卖给国家多少粮食，使缺粮的农民知道自己能够向国家购买多少粮食。

国务院规定：在秋收后，只要年景正常，国家就按照春天宣布的数字向农民收购，无论农民增产了多少，征购的数字都不再变动。因此，农民就可以自己多留余粮，自由支配这些余粮，增加生产的利益就可以完全为农民所得。只在一省或几省范围内有某些地区发生严重灾荒的时候，灾区的粮食统购数字势必减少，灾区农民的粮食供应量势必增加，丰产地区的农民才需要多卖些粮食给国家，帮助国家调剂对灾区人民的供应；但增购的粮食数量，也不能超过丰收农民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四十。

本年度粮食预计统购数字，中央已经分配到各省，各省要很快按级分配到乡。各乡要用最快的方法传达到每户农民，使家家心中有数，早日把全年的家务安排妥当，积极投入春耕生产运动。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成绩是伟大的。依靠这个正确的政策，国家合理地调剂和供应了各个方面对于粮食的需要。一亿左右的城市和工矿区的居民得到了适量的粮食供应。约五千万经济作物区的农民、五千万缺少口粮的农民和几千万在去年遭受水灾的农民，即约近二亿农民的口粮，两年来同样得到了基本的保证。我国产粮区的广大农民，节衣缩食，勤劳生产，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帮助缺粮农民渡过困难，对国家作了光荣的贡献。

但是，由于我国的粮食产量在短期内不可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由于统购统销是一项新的工作，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还不能马上建立一套详细周到的制度，在这项工作中间，就难免发生一些缺点，因为各乡征购的数字没有预先规定和宣布，农民容易感觉不摸底。有些地方的农民感到统购的数量大了一些，自己留下的数量少了一些，粮食的销售还有不够公平合理，甚至造成浪费的情形。这些缺点都必须坚决克服。

粮食不能充分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工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大量开垦荒地和帮助全国农业完成技术改造的程度，农业合作化的任务也不能在很短期间用突击的办法勉强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动员全国农民每年增加粮食的生产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不足的情况就会减少一分。粮食产量的增加取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着增加生产这个环节，都必须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任何损害，都必须竭力克服和避免。

当前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关键是改善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和严格按照自愿原则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

作社，而前者的影响更为普遍和重大。粮食统购统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是既要掌握必需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正确规定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统购数字太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会妨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果统购数字过小，就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缺粮农民、经济作物区的农民和灾区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物价的稳定，妨碍国家的建设。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就是保证统购统销数字切合实际、既不偏高，又不偏低的一项重要措施。

实行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农村工作干部在粮食工作中也就便于掌握政策，分清界限。各地根据分配的具体购销数字，该购的必须购足，不该购的坚决不购；该销的就销，不该销的就不销。粮食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不仅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可以克服，而且全年的粮食生产和购销工作有了适当的预先的安排，也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对农村工作进行统一的部署。

抓紧供销工作，提倡节约粮食，是今后粮食工作中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国家严格控制了收购数字，也就必须严格控制供应数字。现在国家规定的收购数字是很紧的，根据这个数字订出的销售计划也就必须抓得很紧。过去，许多地区在粮食工作中重视统购，忽视统销，无论城市和农村，统销工作都有不少问题。在城市，粮食统销一般偏松，有些地方有严重的浪费粮食的现象。在农村，应该供应而未供应或者供应不足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情形是不该供应的也供应了，应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这一部分是由于在农村中宣传节约不够，一部分是由于有些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这就加重了粮食产区的统购任务，并使国家的粮食收支平衡计划有被突破的危险。现在国家根据粮食收购计划和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合理的粮食销售计划；这个计划只许缩减，不许突破。我们国家粮食统销的原则是公平合理地组织供应，既要保证城乡人民合理的需要，又要努力缩减统销的数目，并努力减少粮食消耗。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军队的全体人员要以身作则，力求节约粮食，以便带动全体人民，把全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浪费粮食以及在粮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现象彻底消灭。鉴于粮食供应工作中不公平合理的现象相当严重，适当压缩销售又是实现粮食收支平衡计划的可靠办法，各地应该根据不同情况，组织必要的力量，在最近期间对粮食统销工作进行一次检查，使粮食统销工作做到公平合理，保证本年度的粮食销售计划的顺利执行。

我国广大劳动农民是积极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依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对农民的援助，我国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加以统购统销的及时实行，基本上适应了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现在国家又实行了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从根本上克服了统购统销工作中的缺点，农民只要积极增加生产，就能更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好地满足自己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各地农村工作同志应当充分运用这一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办法，把它迅速地、普遍地、正确地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为争取一九五五年的丰收而奋斗。

（摘自《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

肃反运动

背景介绍

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于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揭露和肃清。混入党内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各种身份、形式为掩护，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的财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国仍旧退回到被压迫的、落后的、穷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在各个方面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成为维护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当务之急。

材料：

- 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材料一　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人民的检举并经过长期的侦察，在九月八日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以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首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龚品梅及其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金鲁贤、李式玉、陈云棠、朱洪声、张希斌等罪犯，现在正对这批罪犯逐一进行审讯。

在逮捕龚品梅等罪犯的同时，公安机关在这批罪犯主持的主教府、教堂、修道院中，搜获了大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其中有这个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阴谋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指令、密件、收发报机、电讯器材、各式枪支、子弹和从国家机关盗窃到的机密文件。这些罪证，有的埋在主教府的地下暗井中，有的放在教堂的神像背后，有的放在跪凳的底板下。

公安机关还在现场搜出大批秘密保藏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党旗、国旗。

公安机关在搜查的时候，在上海市重庆南路仁爱会总院里发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私设的一座秘密监牢。这座监牢很窄小，门框上装有铁栅栏，栏杆比大拇指还粗，门上的铁锁比拳头还大。有一名被迫害的修女舒海云，在这座监牢内被囚禁了十个月。她是因为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周葆英表露了不满情绪而被监禁的。公安机关在徐家汇献堂会女修道院内发现了另一座秘密监牢。这座秘密监牢是由龚品梅亲自批准设立的。

根据这次搜获的许多罪证和历次在上海天主教内破获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案件中得到的证据，已经查明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并组织起来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查获的一件题名为“怎样对付共产党”的会议记录中证明，早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在他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具体布置了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被查获的还有前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惠济良(Haouisee August，已病死)在解放前发出的题名为“行动的时候到了”的紧急指示。惠济良在这个指示中就提出今后“必须要有一个勇敢的兵士组成的军团才行”。而龚品梅就是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的阴谋部署下，出任上海教区主教，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解放后，以龚品梅的“神学顾问”名义从事指挥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格寿平(Fernand La Cretalle，已被驱逐出境)在他的供词中就曾承认：“为即将来临的解放作好准备，应该很快的有一个中国主教在上海，……有了一个中国主教更方便。……我要用一切力量抵抗人民政府并帮助中国神甫和中国教徒与我一起抵抗政府。”“当龚品梅担任主教后……他们是真正的组织起来了。……一九五〇年八月，全部重新组织了各堂口…。开始更有效地抵抗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这些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在上海解放前把金鲁贤、朱洪声等罪犯送到国外受专门训练。金鲁贤、朱洪声回国后，又隐藏在上海天主教组织内，分别充任各项重要职务，组成了从事颠覆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爱纪伯”(意思就是集团)，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领导核心。

在获得的罪证中查明：自上海解放以来，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的指使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经进行刺探国家机密情报的活动，并且一贯针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和国家的各项中心工作，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活动。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李式玉和龚品梅的私人秘书沈保义，曾搜集上海地区人民解放军坦克装备、飞机场等军事情报，供给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沈保义还受过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田绳霖(Alain De Terwagne，已被驱逐出境)的使用密码的训练。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另一首要分子陈辅民在被捕后供认，他从一个担任税务工作的教徒手里，获得了税务机关的税务总结资料。

公安机关还搜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指令下，用各种办法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盗窃来的许多重要情报。在徐家汇修道院蒋卫琳的房间里搜出了一批从治淮工程部门盗窃来的工程计划和“施工须知”等机密文件。这是被派遣潜入治淮工程部门的反革命分子王逸如供给的。龚品梅的“法律顾问”侯之正通过混入铁道部衙讨总局第二设计分局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搜集了西北地区铁路的建设情报，他在索取情报的信上说：这是“为了天主的需要”。

一九五〇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龚品梅曾先后在主教府和董家渡堂召开了有格寿平等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参加的会议，布置破坏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会议决定把教会所有地契匿藏或拍成照片保存，妄想在蒋介石卖国集团复辟后据以夺回土地。会议又规定了向教徒进行反对土地改革的“讲道”内容。同样的会议和规定还布置到上海以外的地区。公安机关在破案时查出大批匿藏的地契和拍成的地契照片，其中有许多地契和照片是为一些地主恶霸分子所匿藏的。

一九五〇年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侵占台湾，使中国的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全国人民奋起抗议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军，自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时，龚品梅为了破坏全国人民的正义的爱国行动，曾发出了禁止教徒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军事干部学校的指令。这个指令现在已被查出。指令中说：参加人民军队“构成了犯罪的机会”、“应受惩罚”。并且指令那些所谓“由于无知而参军者”“积极设法退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还诬蔑当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神圣战争为“不正义的战争”，禁止教徒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陈云棠等同时在各处天主堂内极力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吹嘘，公开进行无耻的恫吓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

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大批汉奸、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藏在天主教修道院、董家渡天主堂等处。当时仅在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金鲁贤主持的修道院里，就查出汉奸汪精卫的伪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若愚等十多名反革命分子。龚品梅亲自在教堂内公开为已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祈祷”，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叫作“光荣家属”，并且经常派人前去“慰问”。龚品梅所领导的反动组织“圣母军”(即圣母御侍团)的首要分子中很多是蒋贼特务分子，例如“圣母军上海分会会长”就是蒋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国际情报站”的特务沈多森，“圣母军诸宗徒之后支会

指导司铎"就是蒋贼"三民主义青年团平津支团分团主任"白玉珩。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并且责"圣母军"人员登记和退团，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便在十月二十日发出禁止"圣母军"分子向公安局登记或退团的命令，以后又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秘密布置了抗拒登记和毁灭罪证的办法。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更有计划地进行了恶毒的破坏。龚品梅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出通告，以所谓"天堂为基本路线"威胁教徒"不要走歧途"。这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金鲁贤、陈云棠以"讲道"为掩护，在各处教堂内连续针对国家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方针，进行诬蔑。一九五四年二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王方在龚品梅住地——"主教府"连续三天作了六次"讲道"。王方说："有人梦想从新建立起美丽幸福的天堂来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说"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不可能提高的，提高了就要犯罪"。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教堂内外疯狂地宣传战争，反对和平，仇视我国人民所从事的一切有利于国际和平的活动，这次搜获的许多指令和密件中，有关于禁止教徒参加和平签名的指示，有关于禁止教徒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备忘录，有关于不准教徒参加政府召开的会议和组织学习的指示。这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李式玉还曾公开叫嚣说："最好把氢弹丢到苏联去，苏联完蛋了，他们的政权（指中国人民民主政权）也自然完蛋。"另一首要分子傅鹤洲也造谣说："美国伞兵要来了，把相信共产党的全部杀光。"

在侦讯中还查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一系列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不仅利用原有的宗教组织形式，而且还指使他的爪牙建立了"神鹰党""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救国革命党"（又称"为主为国为民党"）等反动秘密组织。"救国革命党"曾指使党徒倪圣德混入崇明县的民兵队发展组织，并且搜集当地军事设施等情报。又经查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一九五二年六月曾派遣其爪牙贾智浩乔装学生和商人潜赴石家庄、保定等地，从事秘密反革命活动。还派遣一些爪牙到北京、济南、青岛、南京、杭州等地混进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罪犯都被公安机关捕获，并且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天主教内反对其反革命活动的广大爱国教徒给予种种迫害，并且藐视政府法纪，多次聚众骚乱。一九五三年六月，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格寿平等相继为我公安机关逮捕后，龚品梅唆使一部分反动分子到破案现场骚乱，喊反动口号，散发反动传单，阻拦公安人员执行任务。一九五三年进行普选的时候，第一残老院老年工人徐宝山（六十岁）、丁晚成（六十四岁）等当选为选民小组长。第二天，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黄华（神甫）就不许他们领圣体（宗教处罚的一种形式）。不久以后，混入残老院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傅友贞被政府判处管制两年，在宣判大会上，徐宝山、丁晚成等揭露了傅友贞的罪恶，又被指为"得罪了天主"，被罚捧着大十字架，当众跪了两三小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董家渡非法软禁和凶殴五个爱国教徒，并聚众殴打前往处理的公安人员。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龚品梅的顾问张希斌在大通路堂私刑拷打和非法监禁教堂职工顾平生。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还破坏全国各地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且指挥隐藏在一些地区的天主教组织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派出骨干分子到武汉市的天主教组织内向反革命分子刘和德介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验。武汉市的"公教青年"分子佩戴黄白两色袖章监视爱国教徒，不准爱国教徒领"圣体"的办法，就是向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学习来的。

上海广大人民和天主教徒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龚品梅及其集团的首要分子被逮捕以后，全市人民和广大教徒热烈拥护，纷纷向政府控诉并揭露这一集团的罪行。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　罗瑞卿

我完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四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想说一说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的保证——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为创造我们未来的幸福而奋斗的时候，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活动恰恰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的财产，破坏社会主义的建设，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国仍旧退回到被压迫的、落后的、穷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因此，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就不能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要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就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我这样说，不否夸大了事实？那么，让我们从几个实例来看看最近时期反革命分子是怎样破坏着我们的建设吧。

一九五四年一月，安徽芜湖纱厂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烧毁二万三千多纱锭，损失一百六十余万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沈阳建筑工程局第三分公司职员蒋匪特务田玉昆，放火烧掉工地材料仓库的全部建筑器材和三幢宿舍，并把救火的工地中共支部书记张殿龙同志打昏。

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石油批发站反革命分子龚阿宝，利用国庆节值班的机会偷将该站二〇二号油池打开，使石油流入通黄浦江的河沟，企图引起严重火灾。幸亏河沟事前已被堵塞，未酿巨祸，但石油已被放走二千六百多斤。

一九五四年十月，广州破获了一个以蒋匪特务吕薄冰为首的三十一名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集团，这批反革命匪徒准备了铁锤、铁棒、石灰等凶器，计划伪装搭客，把民生轮船公司的民轮在航行途中劫往台湾。

一九五五年六月，陕西朝邑县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麦场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登场的一百多亩麦子全被焚毁。

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说明反革命分子对于我们的基本建设、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农业，都在进行着疯狂的破坏。

反革命分子有许多破坏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来进行的。

一九五四年三月，太原重型机器厂唯一的五吨大型汽锤遭破坏。这个汽锤可以锻造一吨以上的锻件，每天可以创造一万元的财富。

一九五四年三月，丰沙铁路二十号隧道发现顶部有巨大的空洞，工程师反革命分子董殿凯故意违反本人所熟知的施工规则，用废木料填塞，外涂灰浆，掩饰隐患，阴谋使隧道在通车的时候受震坍毁，企图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事故。

一九五四年七月，河北下花园煤矿第一矿，由于副矿长兼主管技术员三青团分子李德厚，故意采取错误的采掘办法，使瓦斯大量积聚，发生爆炸，牺牲职员工人三十八人，中毒一百五十六人，直接损失财产五十余万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某国防工厂助理工程师国民党分子张韵私改图纸，造成了废品和返修品八千四百件，装成的五百零九件武器试射时都不能准确发火。这不但是国家财产上的巨大损失，而且这种武器在战场上不能杀伤敌人，反而可能杀伤自己。

我们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的、善良的人们，为了发展生产，建设祖国，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付出了多少劳动，克服了多少困难啊！但是这些反革命强盗只要出一个坏主意，转眼之间就可以使多少宝贵的生命死亡，无数的财富化为灰烬。请看反革命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凶恶毒辣到了怎样的程度！

或者有人以为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对于普通人民也许并不反对吗？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例如一九五四年夏天武汉的防洪斗争，这是关系所有居民的安全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加破坏了吧？但是有个原蒋匪少校军官五级推土机司机李建勤，故意破坏修堤用的九吨推土机，使它七天不能推土。另一个国民党员地主分子电业局技工王杰英，在市内抽水的紧急时机故意烧毁变电所的变压器，使六十部抽水机停车十八小时。这一类的破坏事故在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竟发生了一百多起，其他放信号弹、制造谣言、煽动民工逃跑、乘机捣乱市场、在制造防汛器材中掺假骗钱等事件还不在内。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反革命分子在人民中间是绝对孤立的，他们同任何普通人都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们仇恨人民，仇恨人类，仇恨社会。“我几乎恨一切人”，胡风分子的这句话，代表了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心理状态。

反革命分子虽然是一些亡命的强盗，但是他们是受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鼓励和指使的，因此他们的活动远不限于破坏建设。他们还在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反革命的复辟。

反革命分子为了进行颠覆活动，竭力收买一些社会的败类参加他们的组织，并且用各种不同的名目来欺骗某些落后分子作他们的工具。据一九五四年河南、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八省和上海市的不完全统计，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件八十三起，其中二十七起即有反革命分子一千零七十四名。香港蒋匪特务机关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曾经给他们所派遣的一个特务分子许波平规定，发展到十五人，每月薪金港币一百元；发展到二十五人，每月二百元。这个人在半年内果然发展了十九个特务。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就是按这种“争取人、联络人”的方针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抵抗社会主义改造而结成的一些秘密团体，在最近两年内比在“五反”时期是增加了，其中有些竟直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例如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祥仄锯木厂的老板周长明，竟纠合党羽，组织所谓“各界人民反共总会”，印发反革命传单。

潜伏在宗教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活动的外衣，也在进行着发展反革命秘密组织的阴谋。一九五三年五月和一九五四年三月，河北献县地区和永年地区破获了两起利用天主教名义进行叛乱活动的秘密组织，仅地洞、暗室、夹壁墙就查出了一百几十处，最大的地洞可容一百多人。

反动会道门也是反革命分子发展组织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九五五年一月，陕西省破获了一个“一贯道”化身的“中道”，仅反动道首就捕获了四百三十四名，挖出各式地

洞、暗室一百零二处，缴获大批枪支、子弹、蒋匪党旗和其他反革命罪证。

反革命分子的颠覆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我国许多机密情报偷送给敌人。

例如：天津五达贸易行监理李芳五，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亲去香港接受特务机关的训练和任务，负责给敌人调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装备、调动，重工业厂矿的分布，通讯器材的管制状况等等；他不但利用自己的企业在天津成立"交通站"，而且还计划吸收他的哥哥和朋友在兰州和沈阳成立"交通分站"。

上海东华园制梅厂经理徐孟奎，一九五一年去香港加入特务组织，同年回上海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即向香港特务机关用密写方法报告军事和政治情报十余次，军事情报包括海军船舰停泊情况等。

蒋匪特务王砥中在一九五三年潜入广东，骗取了广东省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技术员的职务，在半年中间给香港蒋匪特务机关送去了军事、政治、工程等情报二十多件，在工程情报中包括广州新建船坞的详细情报；此外，他还搜集了关于武汉造船厂、长江大桥等八项情报准备送出。

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特务黎英，在一九五四年三月潜入广州，也在半年中间给香港美国特务机关送去了有关广州驻军、高射炮阵地、飞机场和粤汉铁路运输情况等情报二十多件。

反革命分子在某些农村中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还企图暴乱。

例如浙江东阳县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反革命分子纠合匪徒百余人，自称"剿共司令部"，分路攻打象岗区青溪乡和宅口乡的人民委员会，青溪乡的正副乡长都被捆绑砍伤，幸经县公安部队赶到救出。

美国"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和蒋匪"总编府资料组"联合派遣的特务分子伍杰三在潜回安徽庐江家中后，就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武器，企图利用一九五四年秋季水灾的机会，到大别山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

一九五四年在山东菏泽出了七个"皇帝"，一九五五年三月又在河北张家口专区出了一个；这也是敌人组织暴乱的一种形式。

反革命分子另一项突出的活动是凶杀和暗害。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沈阳西郊大榆树村蔬菜生产合作社财务委员李景云全家八口，被三个反革命富农分子杀死。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甘肃玉门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何志荣，由于怀恨家人反对他的反革命活动并强令他劳动，竟在夜间杀死两个弟弟、儿媳、侄儿、侄女，砍伤妻子，又跑到乡人民委员会企图杀死乡长和中共支部书记。

混入河北石家庄专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反革命分子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王丕昌等三人，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内故意制造多次医疗事故，造成残废二人，死亡十人，内有中共县委书记一人。他们甚至得意忘形地对院内的共产党员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你说怎办就怎办吧。"

但是反革命分子并不以杀害少数人为满足。一九五四年国庆节前夜，蒋匪保密局曾派它的行动处副处长姚恺如到香港，布置一个对广州的大规模的爆炸。姚匪从一九五四年六月起，就个别地选择、训练和派遣了特务十二名，完全由姚匪个别地指挥，个别地分配任务和供给炸药。这伙匪徒们所领到的爆破器材有美制烈性炸药、燃烧药、雷管等五十四盒。匪徒们计划在一九五四年国庆节实行爆炸，目标有国庆节的纪念会场、游行队伍、戏院、茶楼、工厂、仓库、油库、车站、桥梁、兵营、飞机场、政府机关等。

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是说不完的。但是我想，从刚才举出的这些例子，已经可以看出他们的狰狞的面目了。

各位代表！对于这批穷凶极恶、灭绝人性的反革命匪徒，我们在座的任何人还能够加以容忍吗？任何善良的中国人，任何希望中国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甚至只希望自己安居乐业的中国人，对于这批匪徒的滔天罪恶，还能够无动于衷吗？任何人听了这样骇人听闻的阴谋，还能够认为反革命分子不过是"几条泥鳅掀不起大浪"，因而安慰自己吗？

或者有人要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已经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多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已经镇压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目前还有这样多反革命分子在活动呢？

毫无疑问，从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以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巩固。由于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大部分在事前就受到了制止，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破坏事件，一般地也能迅速破案。仅在一九五四年内，破获的特务间谍案件即达六百一十九起。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自满。如上所说，反革命分子仍然造成了不少严重的破坏；而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还在潜伏着，准备着制造更多的破坏。

当然，反革命分子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愈往后还要愈少。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六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反革命分子究竟不止几百个几千个。大家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灭亡；但是我们也不能设想他们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灭。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要记着，只在六年以前，我国的大部分土地还是由反革命势力统治着的，反革命多年的统治留下的垃圾是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扫清的。

第二，我们也要记着，反革命统治在我国大陆上虽然

被彻底推翻了，但是蒋介石匪帮还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盘踞着台湾，帝国主义还在颠覆着我们，我国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还在受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支持。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曾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明目张胆地作证说："我们所希望的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办法……是用促成内部瓦解的行动。"在美国政府的每年预算内，就公开地规定着专用于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一亿美元的经费，其中并有五千万美元政府可以秘密使用，而不向国会报告。美国在我国周围设立了大批的间谍组织。很明显，他们的方针不是白定的，他们的钱不是白花的，他们的组织不是白设的。至于蒋介石匪帮进行特务活动所用的力量，更是大家所知道的了。

第三，我们还要记着，我国正处在阶级斗争剧烈的过渡时期。过去的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或虽已判刑而已期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受到打击的地主阶级分子，以及其他因为贪污、盗窃、伤害人命等各种罪行而受到正义的打击的分子，有许多人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还在图谋报复；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又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拒绝改造，图谋反抗。

这样，就使得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成为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只要国内的阶级还存在，国外的帝国主义还存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也就必然要存在。

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得到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次运动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被发现和镇压的并不多，而敌人今天的主要活动方式却是暗藏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反革命分子在多数情形下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以便于保护自己，并且力求钻到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府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内部来进行破坏。前面所举的一些反革命活动的事例，大部分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过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打击，这是反革命活动在最近期间显得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革命分子这样嚣张地活动，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对待呢？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同他们妥协，实行和平共处。但是这一条他们不赞成，他们不肯跟我们和平共处。反革命分子的宗旨就是要消灭我们。有人说：应当对反革命分子宽大些，应当给他们出路。但是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历来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今后也仍然要实行这个政策，反革命分子是懂得这一点的。而那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并不因为宽大而受到感动，反而常常利用我们的过分宽大来作恶。前面说过的三青团分子李德厚，在一九五0年就曾因为瓦斯爆炸，被判处徒刑二年，缓期执行，在缓刑期满后被提升为副矿长。这还不算宽大吗？他还没有出路吗？他受了感动没有呢？他的"感动"的表现，就是再一次制造伤亡一百九十四人的爆炸！又有人说：反革命分子所以活动，还是因为我们工作中有缺点。但是人民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反革命分子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完全两样的，人民认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坚决是最大的缺点，反革命分子却认为我们不让他们有反革命的自由是最大的缺点。玉门的反革命分子何志荣把自己一家人都杀了，因为他家里人不要他继续反革命，这难道能说是他家里人有缺点吗？那批在广州准备爆炸的特务并没有人去惹他们，可是他们却企图把广州人大批地炸死；那批暗藏在武汉防洪组织内的特务也没有人去惹他们，可是他们却企图把武汉人大批地淹死。大家请看，同反革命分子还能有什么和平共处呢？如果宣传同反革命分子和平共处，那究竟是对谁有利呢？

同反革命分子既然没有妥协的可能，在我们面前就只剩下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安全和幸福，把一切反革命匪徒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加以肃清！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首先需要提高警惕。反革命分子能够暗藏下来，甚至暗藏到我们的政府机关、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中间，能够进行他们的各种危害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在许多人中间生长了一种极危险的麻痹自满情绪，以为反革命分子已经镇压得差不多了，天下已经太平了，这种麻痹自满情绪给敌人开了方便之门，机关用人制度不严，使坏分子容易钻进来并保持他的职位。国家的机密、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要害保护得不好，让敌人有接近的机会。对敌人可能的破坏缺少戒心，以至有时在敌人的破坏计划已经露头的时候，还没有发觉和采取必要的行动。公安部门在这个方面犯过许多错误。许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没有坚决镇压，引起群众抱怨说："反革命想复辟，'宽大无边'是不是也复辟了！"总之，许多同志缺少敌情观念，忘记了敌人的存在，忘记了或者不相信敌人随时随地都在找我们的空子准备袭击我们。因为这样，这些同志就在实际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否认了现实政治中革命和反革命不能妥协这一种最基本的事实，因而不能不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到什么程度，让我在这里介绍一段反革命政治流氓的活动史。

有一个国民党员李万铭，历充蒋匪军二0七师文书、准尉政治干事，陕西安康人，现年二十八岁。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解放，李万铭伪称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十月毕业后，伪造印信，混入常州市政府建设科任科员。随后又伪造印信到当

时的苏南行政公署撞骗，被判处徒刑三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假释出狱。

这个骗子被释放以后更猖狂了。他伪造了第二野战军的介绍信到陕西，冒称是荣誉军人转业，居然被陕西省民政厅介绍给安康专署。这时他又伪造了党籍的证明信，并且被专署机关支部信以为真，因而不但骗取了专署民政科科员的职位和残废军人的证章，而且混进了共产党内。一九五一年十月，李万铭被派赴西安西北农学院学习。随后不久，他又想出更大的骗局，捏造了一个"历任红军连、营长和志愿军团参谋长"的履历，和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组织部要他"到中南局报到"的命令。这个荒唐的命令本来是容易识破的，但西北农学院党总支委书记竟当真给他介绍到西北局转中南局，而中南局组织部也竟分配他到中南农林部，使他担任了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秘书主任。以后又由于他的种种谎骗，升任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委书记，并且同一个女共产党员结了婚。

一九五三年九月，这个反革命骗子被调来中央林业部，林业部拟任为行政处长，他因为"患病休养"，尚未到职。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他伪造了一位高级将领给他的电报和"亲笔信"，说是某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并要他"火速乘飞机去兰州商谈军务"。林业部的同志真热心，毫不思索就给他买了飞机票，使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飞到了西安。他又找到原来的西北农学院党总支委书记，还想再到那里去鬼混两个月，以便弥缝眼前的欺骗，制造下一步的欺骗。但是这一次这位党总支委书记同志警觉起来了，他发现了他的马脚，这才由陕西省公安厅加以逮捕。

李万铭的骗术，说来是幼稚可笑的，但是他在一九四九年的半年中和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一月的四年中，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竟然都一一蒙混过去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多么辛辣的讽刺！我们的许多同志的警惕性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是在睡觉吗？有些人到现在还认为我们的警惕性并不低，认为现在我们大声疾呼地要求提高警惕性是多事；那么，请问这样的同志怎样来解释李万铭事件的发生呢？这样的同志难道不正是李万铭等反革命分子所求之不得的吗？

我们要知道，李万铭事件决不是一件什么偶然的和孤立的"奇闻"，这是我们国家机关大批工作人员麻痹自满的表现，正是这种麻痹自满使许多反革命分子敢于为非作歹，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教训，而公安部门尤其应该得到教训。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里，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好比卧薪尝胆一般。

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必须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用提高革命警惕性的任务来教育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教育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成员，教育国家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教育全国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严密各种制度，堵塞各种可以给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漏洞，才能及时地发现反革命分子而加以肃清。这是我们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最重要的前提。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必须发动群众，使保卫治安的专门工作同群众斗争相结合。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当然需要专门的工作，但是专门工作机关的人员究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更不可能做到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了群众的合作，他们的地位和力量就完全不同了。大家知道，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得到伟大的成绩，主要地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过去几年中，许多反革命案件的破获，也是群众协助的结果。群众在眼睛亮起来以后有很高的积极性和无限的智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群众中间就很难暗藏下去，因此他们最怕群众起来同他们斗争。例如：对外贸易部查出了三个特务，其中一个特务王桐另外又发展了三个特务，并企图建立反动武装。地方工业部纺织局查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雨田，这个反革命分子不但窝藏了一个有血债的特务达六年之久，而且直到上月（六月）八日和二十五日，还把纺织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一一加以评点，列了一个准备有朝一日逮捕问罪的"黑名单"！建筑工程部华北工程管理局财务处的群众，由于平日对该处的反革命分子钱荣灿已经掌握了若干材料，所以在一次小组会上就使他无法继续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

问：你为什么说国民党时代生活好？

答：我在长辛店铁路上当会计主任，每月赚十袋洋面。

问：你怎么到的长辛店？

答：坐平汉路火车来的。

问：一九四五年平汉路火车不通你怎么能来？

答：我是一九四六年八月来的。

问：你平日不是常说一九四五年在北京结的婚吗？

答：……这个……这个……我要想一想……

就这样，钱荣灿再也答不上来了。他只好招认他过去所说的履历完全是捏造的，他原来是国民党铁道兵团的少校军官。

很明显，如果不是发动群众，这些黑暗的角落就不容易暴露，而反革命的细菌就会在里面滋长活动起来，危害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人民的安全。

我们从前面的实例看到，反革命分子是有空必钻的，因此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在所有的组织中和全国人民中开展起来。有人说：我们的业务太忙，顾不上。问题是你顾不上整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可是顾得上来整你呀！又有人说：反革命分子在别处是有的，在我们这里没有。

可是几乎所有查出反革命分子的部门，原来也都以为自己的部门是干净的呀！因此，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把群众普遍地无例外地发动起来。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必须坚持贯彻正确的政策。提高警惕性，发动群众，这些都是正确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严格划清反革命分子的界限。毛主席给我们提出这样两句口号："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必须成为全国公安机关以及全国人民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指南针。公安机关对于各种反革命案情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详细的材料和确切的证据，严格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防止错捕人，防止"逼供信"，做到既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又保护了好人。

前面已经说过，国家在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上的政策，仍然是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我们所说的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是说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肉体上消灭掉，而是说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只有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才需要依法处以极刑。对于其余的反革命罪犯，大部分将实行劳动改造，使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办法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卓著成效。对于罪恶比较轻微的人，则将采取就地教育的方法。我们要求一切犯罪分子向政府坦白地说明自己的罪过，并且帮助政府查清其他犯罪分子的事实。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原则是：抗拒者从严，坦白者从宽，立功者可以将功折罪。这就是说，除了犯罪者的犯罪情节轻重以外，我们还将根据他们在犯罪以后的表现，分别地决定给以严肃而又适当的处理。

各位代表！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随着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的发展，人民的革命力量是在一天一天地不断地加强，而人民的敌人则是在一天一天地不断地被消灭。帝国主义者和蒋匪帮在过去每年都梦想他们在中国还有点什么"希望"便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永远不自满，永远保持警惕。让我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在警惕中进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完成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注：本文有所删节——编者）

万隆会议

背景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受到严重削弱，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许多亚洲国家摆脱长期的殖民统治，取得了国家独立。非洲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帝群众运动也日益兴起，黑暗的非洲大陆露出了曙光。

但是，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在亚洲，美国政府积极纠集反革命军事集团，企图取代英法而重新置亚洲各国人民于奴役之中。印支战争刚结束，美国又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阴谋发动新的战争。亚洲和平安全受到新的威胁。在非洲，英法帝国主义为了维护殖民统治，一边疯狂镇压各地民族解放运动，一边利用地区、部族、宗教矛盾，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或进行伪善的"改革"，分化瓦解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苏美英法柏林外长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上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形势和小国通过斗争赢得胜利的事实，引起亚洲许多弱小国家不满，激发了他们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只同斗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材料：

· 万隆会议的召开

·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材料一　万隆会议的召开

当柏林会议结束正在筹备召开日内瓦会议时，1954年3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了召开亚非各国会议的建议。4月28日至5月2日，与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同时，印尼、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科伦坡举行会议，具体讨论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12月28日至29日，五国总理根据亚非各国的愿望，再次要印尼政府开会，决定正式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它24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

中国人民对召开亚非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召开亚非会议极端恐惧和仇视，企图阻止会议的召开。4月11日，当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飞赴印尼时，被美蒋特务在机上安放的定时炸弹于中途炸毁，造成机上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各1人殉难。

但是，周恩来率陈毅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如期赴会，受到印尼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表示：我们为召开亚非会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们相信：亚非会议一定会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对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维护亚非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作出有

价值的贡献。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胜利开幕(故称万隆会议),共29个亚非国家的340名代表出席会议。美国政府派出70多名记者到万隆活动,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间某些隔阂,挑拨离间,制造纷争,特别是用“共产主义威胁”来挑拨各国同中国的关系,企图将会议引向歧途。

为粉碎美国政府等破坏会议的阴谋、保证会议成功,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日下午,针对会议一般性发言中某些国家对中国内外政策的误解和非议,周恩来临时将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即席作补充发言。他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明确指出: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曾受过或仍在受着殖民主义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寻找解决这些灾难和痛苦的办法,就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中国为避免会议陷入争论,决定将可以提出的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搁置不提,就是为了求同而存异;虽然与会各国思想意识、社会制度不同,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宗教信仰自由各国皆然,中国信仰社会主义,但仍有其它各种教徒,这并未妨碍中国内部团结,也不应成为亚非国家大家庭中团结的障碍;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也决不会利用华侨对所在国进行颠覆破坏;相反,美国正在颠覆中国,若有人不信,欢迎各国代表随时到中国参观访问。他呼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亚非国家的团结而努力①。

周恩来的发言,揭穿了美国政府制造与会国与中国不和的阴谋,解除了各国的疑虑和恐惧,使与会各国共同接受了“求同存异”的倡议,为会议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4月22日,中国代表团利用会议之机,同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妥善地解决了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以实际行动消除了许多有关国家对此的疑虑,也促进了会议的成功。

同时,针对某些国家代表提出的“台湾独立”的错误主张和对中美对峙造成远东紧张局势的担心,23日下午,中国、印度、缅甸等八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议,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首先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领土不可动摇的立场,同时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周恩来的声明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了为谋求亚洲和平、愿与美国和谈的灵活态度,使亚洲各国对中国的和平诚意有了更实际的了解。

美国政府破坏会议的各种阴谋遭到了破产。在“求同存异”的方针下,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4月24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就发展和加强亚非各国经济和文化合作、保障人权和自决、解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共同的主张,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体现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历史上被称为“万隆精神”,受到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根据中国和平外交的总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并取得了伟大胜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在亚非会议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实际行动,与亚非各国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结成了反帝反殖的国际统一战线,壮大了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也牵制和制止了美蒋反动派在台湾海峡可能采取的战争冒险行动,从而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缓和亚非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新的贡献。

(摘自《新中国四十年史》)

材料二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运筹帷幄——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对会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灵活应变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

亚非会议的宗旨触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一家大报《路易斯邮报》就曾毫不掩饰地承认道:“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在阻止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又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

---

① 《亚非会议文件选辑》,第34—37页。

章，捏造新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使会议达到预期目的，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于4月初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方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4月3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审核了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全体人员名单。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党和国家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彭真、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及其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一周以后，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

临危不惧——"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周恩来在险象环生中出现于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4月7日，周恩来拖着刚动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离京去广州。

4月11日，当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离香港启德机场约五小时后，在大纳士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东经107°59'38"、北纬3°53'12"）上空爆炸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应约出访缅甸，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在这以前，周恩来以他对敌情的特殊敏感，曾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4月9日，周恩来在确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启德机场进行破坏活动后，指示外交部立即将有关情况通报英国方面。很快，香港政府在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因忽视了对飞机的安全检查，致使台湾敌特周驹得以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面对险恶丛生的局势，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对他说来，身处危局险境的事何止一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一行驱车由延安南下西安途中，在劳山附近遭土匪袭击，同行30余人仅幸存7人。但是就在第二天，他又赶到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4月12日，我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并且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同一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关心他和全体同志安全问题的来信。他立即写了回信，他在短信中深情地说道："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但是"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把周恩来一生都在忠实实践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盘托出。这就是他常说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直亲自过问和关心着破案和善后工作。在听取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处理善后工作的汇报时，周恩来沉痛地说：历史将永远记住，烈士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他要申健把烈士骨灰盒留给他，由他带回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如今仍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周恩来以他那丰富的斗争经验，终于促使香港政府在进行大量侦破工作之后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对犯有谋杀罪的国民党特务周驹已经发出逮捕状，要台湾当局将已逃到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香港政府处置。

4月14日，周恩来飞抵仰光，同缅甸、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领导人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周恩来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一定会成功。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抵雅加达。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又遇雷雨，无法穿越，被迫暂时降落到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到达雅加达，几乎急坏了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同志，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一平风波——周恩来在会议出现分裂危机的情况下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隆重开幕。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充满着友好与和睦。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指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会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会场上，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为此幸灾乐祸，有的同情和焦虑。很多人由此断定会议已经出现不可避免的分裂危机。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局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

休会后，他赶紧对自己的翻译浦寿昌说：“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他一句接一句地讲着，浦寿昌飞快地记着，周围二片肃静，只听见沙沙沙的写字声。不一会儿，一篇2000多字的从内容到文字都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出来了。

当报名发言的各国代表几乎都讲完了的时候，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会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他在作了简要说明之后转入正题，第一句话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顷刻间，会场一片肃静，全场都在屏息聆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解释道：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

首先，“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尽管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最后，他用诚恳而亲切的语言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们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座位，去同周恩来握手。与会代表，包括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5月4日，一位目睹会场情景的美国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对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评论说：“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绝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再平风波——周恩来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

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紧张异常。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持局面，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23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发表了被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与会各国代表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29国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

归纳成七项原则。即“(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并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说:周恩来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广交朋友——频频的会外接触与赤诚交往,周恩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几乎与所有会议代表团团长“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自由接触的机会。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想方设法地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当年在亚非会议上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常常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的。

其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缅甸总理吴努会后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颠覆之害。

其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那样“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但是,在会外,周恩来毫无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

4月23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顷刻之间,周恩来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到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从17日抵达万隆到24日会议闭幕的八天中,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事务工作,已经耗去了周恩来相当多的时间,再加上频频的会外接触、交往,使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睡觉总时间没有超过20小时,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常常地打动了随行的陈毅,他曾经觉悟而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对你非常佩服,我不但工作不如你,我熬夜也不如你!”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千叮万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国后不要把这一情况告诉久病中的邓颖超,说所欠的睡觉帐回去后他将补上。其实,他并没有兑现过。周恩来逝世后,这位同志才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邓颖超。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作为新中国的优秀代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位外国记者报道说:“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一位美国记者感慨地在他的报道中惊呼道: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5月7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满载着向全国人民汇报的累累果实,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李济深、郭沫若、贺龙、李先念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

背景介绍

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待遇,从各级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过着几乎一样或者差别极小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这种制度和当时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是相适应的,对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保障战争胜利起了巨大的作

用。但是，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式的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需要用新的制度来代替。此外，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对大量留用人员维持着原来的工资待遇，已经出现了供给制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存的不合理的局面。1952年，为了适当提高供给制待遇的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决定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津贴。但这种津贴的数目不大，一般说来，他们的收入仍然比工资待遇人员的收入少得多。

材料：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工资制
- 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的命令”

材料一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工资制

为了解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不合理问题，国家决定从1955年起全部实行工资制，结束工资制与供给制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制度，国务院于1955年8月31日，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命令规定，为了实行“按劳取酬”和“同工同酬”的原则，自1955年7月1日起，将现在国家机关中一部分工作人员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有利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为此，颁发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全国各地物价津贴表”和“关于某些特殊地区工作人员实行实物供应的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9级，最高一级649.6元，最低29级为21元，最高为最低的31.1倍。命令还规定，全部实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工作生活费用，都应由个人负担。为此，同时还发布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居住公家房屋、使用公家家具、用水用电和送子女入托等收租收费的暂行办法，并责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参照这些办法，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各项收租收费办法，在各该管辖区发布施行。

（摘自《中共党史导读》）

材料二　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的命令”

为了统一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制度，国务院于八月三十一日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

命令规定：为了实行“按劳取酬”和“同工同酬”的原则，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份起，将现在国家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中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并有利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命令规定：全部实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应由个人负担。现行的包干费、老年优待费、、家属招待费、病员伙食补贴、回家旅费、妇女卫生费、生育费、保育费、保姆费、儿童医药费、公费生待遇、一供一薪（即一方供给制待遇，一方工资制待遇）的工作人员子女教养补助费以及行政费开支标准中有关工作人员子女入学学杂费和宿舍费等项规定，都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份起废除。

命令规定：全部实行工资制待遇后，凡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使用公家家具、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应一律缴租、纳费。国务院已制定中央国家机关的各项收租、收费办法和宿舍取暖补贴办法，随命令发布；并责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参照中央国家机关的办法，综合当地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各项收租、收费办法，在各该辖区发布施行。

命令规定：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份起，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表修订为货币工资标准表；同时，为了解决各地区之间存在的物价差额，制定物价津贴表，一并发布。

命令规定：为了符合“同工同酬”的原则，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份起，取消部分工作人员的“保留工资”（即有些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后，保留了原来的较高的工资标准）。命令还规定：有些人因取消保留工资，生活上确有困难的，或者有些人由供给制待遇改为工资制待遇后，因多子女而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用机关福利费予以补助。

与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的同时，为了保证某些交通不便、物资缺乏地区工作人员的生活需要，还发布了“关于某些特殊地区工作人员实行实物供应的决定”，自一九五五年十月份起实行。

风云人物

高岗

高岗(1902—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1月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区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为建设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从1949年起开始进行反党阴谋活动。1953年调到中央工作后,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反党阴谋被中共中央察觉并于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后自杀。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他的党籍。

饶漱石

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同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1955年被开除出党。1975年3月病死。

李富春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不久参加旅法青年的进步组织工学励进会(后改称工学世界社),积极投入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5年初赴苏联学习,同年7月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革命斗争,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长征开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后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参加红军长征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在党的组织工作和财经工作中做出了成绩,特别在参与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时期,一再显示了他的领导才干,对克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他还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对发展根据地科技事业付出了心血。抗日战争结束后,被派到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委等职,参加了开辟和建设东北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在东北解放后,积极组织东北工业基地的恢复与建设,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政

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做了重要的工作。1953年4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6月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又兼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主持全国的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八届扩大的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9日在北京病逝。

罗瑞卿

罗瑞卿(1906—1978)，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四川南充人。1923年，考入南充中学读书。在该校学习期间，因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到出钱供其上学的外祖父反对，终至决裂。1926年6月，离家出走，踏上了艰难的革命征途。10月，由成都抵重庆，经任伯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时，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改编成中央独立师，前往平叛。罗瑞卿参加了这次战斗。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奉命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行至途中，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学生被遣散。当时，他在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劝其参加改组派(即第三党)，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不久，他终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由团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此后，他便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罗瑞卿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大队长和支队党代表。不久，又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等职。1931年5月，他和师长曾士俄率红四军第十一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在观音岩战斗中，他的腮部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1932年，罗瑞卿升任红四军政委，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国民党张贞全师，攻占闽南重镇漳州。5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罗瑞卿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等职。

1936至1939年间，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副校长等。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教育方针，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为党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材。西安事变发生时，党中央派罗瑞卿到西安，任红军代表团副团长。他积极协助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1939年，罗瑞卿率领几千名抗大和延安其他学校的学员，东渡黄河，深入敌后，把抗大转移到太行山。1940年，罗瑞卿被调离抗大，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和彭德怀、左权等一起指挥八路军同日本侵略者作战。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等职。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初，罗瑞卿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长，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和策略，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委等职。他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先后参加指挥张家口保卫战、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太原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役，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罗瑞卿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而且也是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他担任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1938年，他写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总结了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政治工作经验。1940年9月，他写的《野战政治部对百团大战的政治工作总结》一文，总结了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1947年3月，他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许多新的政治工作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校长，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9月，

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罗瑞卿主持政法、公安工作期间，对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公安、政法干部队伍，对加强对敌斗争，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主持总参工作期间，对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对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瑞卿曾对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作过坚决的斗争，因此，遭到林彪的诬陷和迫害。1966年5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在这次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错误地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罗瑞卿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他们乘罗瑞卿摔伤左腿的机会，强行截掉了他的伤腿。"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恢复了工作。1975年，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但这时他又遭到"四人帮"的迫害。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为罗瑞卿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8年8月，在联邦德国治病时不幸逝世。

邓子恢

邓子恢(1896—197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邓子恢，福建龙岩人。1913年，考入龙岩县中学(后改名福建省立第九中学)，在校四年。1917年2月，考上龙岩县政府公费留日生，东渡日本，在东京东亚补习学校学习；后因公费不够开支，家庭又无力补助，被迫于1918年4月辍学归国。同年底，到江西崇义县他堂兄经营的杂货店当店员，历时九年。

1921年春，邓子恢从江西崇义回到家乡，在桐风小学担任短期小学教员。他联合本县青年，组织奇山书社，宣传新思想，会员前后共达二百多人。1922年，邓子恢看到《向导》，知道中国已有共产党组织，即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加入共产党，但未得答复。1923年9月，创办《岩声》报，并撰写大量文章，揭露军阀官僚黑暗统治，热情传播马列主义。1925年秋，经友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先后在龙岩、崇义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后成立崇义县杰坝区国民党党部，任常务委员。1926年12月，经中共崇义县支部书记陈赞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邓子恢在崇义县杰坝圩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5月，他和陈赞雍领导农民进城，举行五一示威，逮捕了崇义县的反动县长，并成立了崇义县临时行政委员会。陈赞雍任主任委员，邓子恢等任委员。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潜回龙岩，和郭滴人等恢复了国民党龙岩县党部，邓子恢任秘书，郭滴人任组织委员，在共产党内，他则担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他们利用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合法机关，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在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农民协会。

1928年阴历2月，邓子恢领导龙岩县后田篆农民举行暴动，成立闽西第一个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不久，调任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后又调永定县工作。7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郭滴人任书记，邓子恢任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任总指挥，他和张鼎丞、傅柏翠等三人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委员和副总指挥。8月，龙岩、上杭、永定三县的暴动武装集中在永定县溪南里，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三个团。张鼎丞兼任第五十七团团长，邓子恢兼任第五十七团党代表。

1929年3月，邓子恢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打下龙岩、永定后，邓子恢等领导闽西六个县的农民举行暴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起拥有80万人口的闽西革命根据地。邓子恢兼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了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邓子恢继续当选为闽西特委书记。

1930年3月，在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外，他还兼任红十二军政委和闽西红军学校政委。6月，党中央执行立三路线，要闽西红十二军攻打广东的潮、汕，他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结果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撤销了领导职务，调到闽东，任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到福建沿海开展白区工作。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子恢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即财政部长)。后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对他进行批判，并降职为财政部副部长。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又被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邓子恢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1935年4月，他和谭震林、陈潭秋等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营，从江西突围出来到达福建的永定，与张鼎丞领导的部队会合，成立了闽

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1936年，被补选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闽西南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另成立闽粤边区特委，张鼎丞任书记，邓子恢任宣传部长。1938年1月，根据国共双方协议，闽西南红军游击队遂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下辖二个团，近两千人，开赴抗日前线。张鼎丞任第二支队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则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

1939年4月，邓子恢随新四军军长叶挺到江北视察，后留在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一起工作，并兼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和淮南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时，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后又兼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和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他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和中原野战军副政委，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和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邓子恢曾被错误地批判为"右倾"。他根据我国农业的特点提出"由于农业是野外作业、手工操作、周期性长，所以农业生产要'包'，不'包'责任制就建立不起来。""把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正确地统一结合起来。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是'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制度"，"适合于目前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责任制，是鼓舞社员积极劳动、改进技术、提高劳动效率的良好制度"。邓子恢提出的在农业中要实行责任制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45年6月、1956年9月和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子恢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邓子恢曾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2年12月，邓子恢在北京病逝。

王树声

王树声（1905—1974），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原名宏信。湖北麻城人。7岁开始读书，1924年高小毕业。1925年本地教私塾。1926年任麻城县乘马岗小学校长，同年加入国民党，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就在麻城乘马岗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同地主阶级开展斗争。1927年4月，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及红枪会共万余人，围攻麻城县城，镇压麻城的农民运动。王树声受中共麻城县委派遣，到武汉请援兵。在武汉，他找到董必武，由董必武经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从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抽调了三百多名学员，武装支援麻城农民的革命斗争，赶走了反动派。当时，他任麻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等职。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王树声和陈再道等一起，在乘马岗区继续组织和发动农民，准备武装起义。同年11月，参加戴克敏、吴光皓、潘忠汝等领导的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王树声被留在黄安、麻城北部坚持斗争，任队长。1928年初，他在黄冈县里畈找到农民军主力，即跟随吴光皓、戴克敏转战木兰山、柴山堡等地，并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的分队长。

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皓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下辖四个大队，王树声任第一大队党代表，并担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此后，他继续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中工作，历任红一军支队长、团长，红一军总预备队指挥、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等职，积极参加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第十一师师长。在河南省潢川县战斗，曾负重伤。1932年10月，王树声随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任红七十三师师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红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红四方面军由原来的四个师扩编成四个军。第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王树声任军长。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在此期间，他率部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

1935年，王树声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岷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1月，王树声随西路军渡黄河西征。他开始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红九军军长，后任西路军副总指挥。1937年3月，在部队严重伤亡的情况下，西路军总指挥部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并决定由王树声、李先念、李卓然等七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将剩余的部队编成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打游击。不久，他

率领的右支队遭到失败。他又带着部分骑兵和手枪队共百余人，在祁连山转战游击了三个月。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沿途讨饭回到延安，表现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回延安后，被调到抗大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又转到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

1938年冬，王树声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1939年任代司令员。1940年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1942至1944年间，被调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从延安、晋西北、太岳、太行分别抽调部队进入豫西，成立了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纵队司令员和政委。1946年7月，在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攻下，他率部突围到达鄂西北，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并兼任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鄂豫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历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湖北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中共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外，还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9月，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6年9月、1969年4月和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树声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4年1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珍闻轶事

发行新的人民币

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以便利交易和核算，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命令规定：新人民币自1955年3月1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同时收回旧币。新币面额，主币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五种，辅币分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六种。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所有旧币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全部收回。自新币发行之日起，持有旧币者均可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代理兑换机构，按法定比率兑换新币。从1955年5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兑换一万元以上的旧人民币。命令还规定，凡伪造或行使假币，依照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治罪；凡借发行新币进行投机或经营兑换新旧币从中渔利者，依法严惩。

为了使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能顺利进行，各地曾组织了大批报告员和宣传员，向广大城乡居民宣传国家的倾向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了7万个以上的兑换机构和代理兑换机构，在比较偏僻的地区，还设有流动兑换组织。从1955年5月10日起，全国城乡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已全部是新人民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除5月1日起已停止兑换一万元以上的旧币外，从6月11日起，全国各地银行停止收兑五千元以下的旧人民币。至此，我国发行新人民币的工作胜利完成。

国务院发行新币命令公布后，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认为这是人民币进一步稳定和巩固的表现，是我国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表现。从政府提前公布发行新币的命令，就证明了政府发行新的人民币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这与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突然公布所谓币制改革，使人民无法躲避"票子化水"的损失，是根本不相同的。在发行新人民币期间，市场情况正常，代销活跃，物价平衡。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七大城市为例，如以1月物价总指数为100，3月、4月均为99.61%。在这个时期，人民储蓄数额增长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解放牌"汽车介绍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产"解放牌"汽车，已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三周年前夕试制出来了。这种汽车经过必要的行车试验和完成开工生产各种准备工作以后，将从1956年9月份以后开始大量生产。

我们的国家长期是一个"万国汽车的展览馆"，先后进口和使用过一百三十多种厂牌的汽车，可是没有一种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从现在开始，全国人民可以看到国产的"解放牌"汽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奔驰了。

解放牌汽车是一种通用性的载重汽车。这种深绿色的中型卡车，装有90匹马力、6个汽缸的汽油发动机，最大速度为每小时65公里，载重量为4吨，适合于工厂、农场和各个交通运输部门装载工业产品、原材料、建筑器材、矿石和农产品用。这种汽车满载时经济时速为三十公

里到三十五公里，比较适合于我国目前现有公路干线和桥梁负荷等条件的。如在我国东北和华北广阔的平原地区行驶，还有足够力量牵引一个到两个拖车，增加载运量一倍左右。这种汽车的车身短，底盘高，能在我国康藏高原和西南、西北等山区的公路上行驶，如果装上高越野性轮胎，也可在一般土路上通行无阻。它采用压缩空气刹车，比较方便灵活，完全可以保证行车的安全。

解放牌汽车，是以我国用户使用多年的苏联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并且根据我国公路条件和使用条件改进了部分结构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全车是由二千六百种、共一万一千件零件组成的。它完全保留了吉斯150汽车的优点。因此，在使用性能和经济性能上都是比较优越的。

解放牌汽车也是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的一种汽车。它是按照正规的工艺标准和现代生产技术来制造的，许多易磨损的零件，都采用了先进的工艺方法，因此加强了它的坚固耐用性，同时也便于维修和保养。另外，根据我国燃料工业发展情况，这种汽车还可以使用低级汽油或采用我国大量使用的混合汽油，耗油量比交通部门现行定额还低。

随着我国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解放牌汽车这种轻型的交通工具，有着极为广阔的用途。除了利用它来担负日益繁忙的运输任务以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把这种载重汽车改装成为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如公共汽车，加油汽车，运水汽车，倾卸汽车，起重汽车，工程汽车，冷藏汽车，推雪汽车，煤气发生炉车，压缩煤气车，压缩空气车，专用牵引汽车，闭式车箱载重汽车等。

黄妈妈送子应征

本报讯最近，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送她最小的儿子继恕应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早在去年十一月，黄妈妈听到征集补充兵员的消息后，就曾多次想起继光儿的英雄形象。当她看见自己新盖的瓦房，看到农业生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在进行和平劳动和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和孩子们给她的热情的书信时，对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侵略战争更加感到愤恨。她想：“我不能眼看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破坏，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解放台湾，我应当送继恕去参军。”有一天夜晚，黄妈妈把继恕叫到自己房里，说“继恕，国家要征集补充兵员了，你继光哥哥没完成的任务，你能替他去完成了！”继恕听了妈妈的话，兴奋地说：“保卫祖国是我们青年的责任。妈！你放心，我一定首先报名应征。”

今年一月，黄妈妈从省里开会刚回到家里，继恕便把他已经在全县青年民兵代表会上写了应征申请书的事告诉了妈妈。黄妈妈高兴地说：“好孩子！你若没申请，我还要替你抢个先哩！”后来，黄妈妈又在继光乡青年团员大会上向大家讲了送继恕应征入伍的决心。继恕也立刻在会上报了名。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我报名”“我报名”的喊声，五十五个适龄青年都报名应征了。在英雄的母亲和弟弟带动下，继光乡有近百分之八十的适龄青年都报名应征了。

在继恕要离开家乡的前夜，黄妈妈和儿子在灯光下作了离别前的一次谈话。黄妈妈用热爱眼光望着儿子说：“继恕，我爱你像爱你继光哥哥一样。你哥哥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他为人民立了功。你要向哥哥学习，记住你是英雄的弟弟。”继恕激动地说：“我想到继光哥哥时，什么困难都不会怕。我一定要学习他的英勇精神，保卫我们的伟大祖国。”这天夜晚，黄妈妈还和即将走上保卫祖国岗位的儿子互相订下勉励的条约。

第二天，黄妈妈亲自把儿子送到区上，并亲手给儿子戴上两朵大红花，在鞭炮、锣鼓声中，黄妈妈拉着儿子的手，走在送行队伍的最前面，她谆谆嘱咐着继恕说：“你是妈妈的好儿子，一定要做个人民的好战士。你要向继光哥哥学习，争取立功当英雄！”

（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中国政府是何时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首先得到成功的运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已呈现出美好的前景。早在五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设想，其中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和主张，是“一国两制”思想的先导。当时，一般都使用“争取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1956年。如《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主持编写的《中国国情大全》一书写道：“从1956年开始，我们党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①]；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共统战史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一书更明确地写道：“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限制，在1956年以前，我国政府没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问题。”“1956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政府开始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②]少数同志认为，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亚

非会议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3]当然，还有个别老同志认为，在1958年炮击金门的硝烟中，才"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4]

其实，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是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参加万隆会议的8个代表团团长举行的小型会谈上的发言和声明。

所谓"台湾问题"，在五六十年代实际是两个问题。一是因美国非法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而引起的中美两国的国际争端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由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立物，是影响和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它的解决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事。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这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之为台湾问题的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当然，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却又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前一个问题的存在，增加了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政府用和平方式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可能性；相反，前一个问题的完全解决也就为解决后一个问题消除最主要的国际障碍，提供了比较现实的外部条件，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实际包括通过中美双边会谈和平解决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以及通过国共谈判方式实现中国和平统一两个方面的内容。

万隆会议期间，鉴于与会各国对1954年以来日益加剧的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深表关注，特地于4月23日安排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8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谈。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重点发言，阐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里，中国政府第一次表明对于台湾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方面都愿意和平解决的立场。会谈后，中国代表团发表如下郑重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台湾问题的国际方面，早在1955年3月7日，中国政府就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保卫和平，中国赞成举行一个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万隆会议后，5月13日，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使中国政府愿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第一次见之于正式的官方文件。6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尼记者时重申了中国愿意同美国谈判，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7月中旬，中美两国达成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谈判的协议。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国际形势和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报告时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8月，受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郑重声明的鼓舞和感召，寓居美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统一问题的建议，在海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上述事实表明，认为1956年才第一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是不准确的；认为1955年5月13日才第一次提出该主张，则可能是误解了周恩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的内容，其实这一报告不过是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和声明的文字复述。

注　释

①学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31页。
②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704页。
③中宣部宣传局编辑《时事报告》1990年第11期第24页
④叶飞：《征战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11月第372页

（选自《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

流行风

报告文学《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作者柳青。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12月号。这篇作品通过一些艺术形象的描绘，表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这就是“看一个运动是不是到了高潮，就要看平素落后的人是不是投入了运动”。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原来抱着“混社”态度的陈恒山，高兴地奔上了合作化这条路；宋志让这个坚定沉默的保守派，受到了所有人的攻击，他用眼泪为私有制送了终；不知道农业社这个名字的聋子，也积极叫嚷着要联合；准备在社会的激流中旋转一圈就要归于幻灭的泡沫，也被带动起来，随着生活的激流前进了。人们心理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作品还从生产力的角度，挖掘了农民心理变化的原因，就像作品中所说的那样：“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不能靠抽象、笼统的说教，而必须靠互助组、合作社多打粮食，提高生产力的事实去教育人们，使他们觉得走这条路对自己有利，如果不照这样生活，就是吃了亏。”比如作品写到陈恒山的变化，就是因为过去他“光是没朝镐河滩里的石头借钱”。合作化使陈恒山够吃、够穿、够用了，这才促成了他“睡在床上也觉得浑身是劲”的变化。作品所反映的这种可贵的思想，显示作家高远的政治眼光。这篇作品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于人物言谈举止的真实描绘之中，比如陈恒山蹲在地上，吸着旱烟，用心听着广播以及像小孩子一样合不拢嘴的情态，他对着收音机讲话的情景，真切地表现了社会的前进引起人们精神心理的巨大变化；二是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在作品中，作者用纯朴的文字、诚恳的语调，叙说着秋收时节镐河岸上的村庄异彩纷呈的生活场景，描写着农村中人们心理的变化过程，渲染着富有时代特色和历史纵深感的风俗图画，使人感到如话家常般亲切和质朴。

（杨华）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

柳　青

晴朗的秋收时节，镐河上的村庄弥漫着扬粮食的尘雾。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股清香稻谷的气味冲着鼻孔。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用收割过玉米的几亩地，做了三个大场，虽然按地点适中，分布在镐河南岸，但是彼此可以相望。成年人手执鞭子，牵着牲口碾场；妇女们有的从庄稼垒起的墙壁上拉下来稻捆子，有的用木杈抖场；精壮的庄稼人——男的和女的，赤脚上穿着麻鞋，从稻地里挑来新的稻捆子，放在场边，一边走着，一边朝着跟老奶奶要的自己的小孩笑笑，又到稻地里去了。……所有这些紧张的劳动，都是在扬粮食的尘雾底下进行着。在场的四边，一忽儿一个新的粮食堆凸了起来。一些白胡子老头吸着旱烟，为它们的数量打着赌，谁也不相信自己会输眼，等着干部们过斗。太阳接近西边的地平线，男人们和女人们收拾完家具，向中间的大场聚拢起来，从朝鲜回来的炮长、共产党员董廷华笑咪咪地钻进为了夜间照看粮食搭起的稻草庵子，小心翼翼地抱出一个四灯的直流收音机来。过了一刻，从北京广播电台发出的音乐，就在暮色苍茫中悠扬嘹亮地飘荡开来。你看那些坐在扫帚和麻袋上的男男女女吧，多么陶醉啊！

“你们劳累了一天，为啥还不回去吃饭呢？”

“我们听听北京今儿说些什么，回去吃过夜饭就不来了。……”

啊呀！好大的气概！这是一九五五年秋天中国的乡村吗？这是我住了三年的皇甫村吗？我的祖国，你不是在前进，而是在飞奔！我是多么幸福，和这些人在一起——在我面前的人群，有七个共产党员，十三个青年团员；我知道他们谁正在申请，谁正在为了可以申请而暗自加劲。在我参加这个社的建社工作时，只有一个党员，没有团员。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吗？老年人为了自己的儿子、姑娘和儿媳妇没有入党或入团很不高兴，和他们说话进气很粗，眼光里带着责备的表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变化？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使人睡在床上也觉得浑身是劲的变化呢？

五十几岁的陈恒山蹲在我跟前，吸着旱烟，用心听着广播。

“好嘛！就照这么办。对着啦……”他在和收音机谈话。

我笑他：“你说啥？”

“我就爱听这个盒盒说的话，”他答非所问地说。“听一天也不腻味。唔，这就是替毛主席传话的嘛……”

看到这老头对合作化运动也显出关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办社两年以来，陈恒山参加的会是有数的几

回。他说："给我派下啥活，我干啥活。会我不参加。"打发人去叫他，他大咧咧地睡在炕上，搂着娃吸旱烟。对他，社干部没有一个不发愁的。他的问题很棘手：地少、娃多、劳力弱；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主义"能把他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除非他的娃们长成了大人。建社的时候，旁人卖了小牛交股份基金，他卖了小牛还账；原谅他吧，因为他"光是没朝镐河滩里的石头借过钱"（这是他自己的话）。一次又一次分配，他的收入一次又一次增加；但是在几十户社员中，只有他一户够生活。先是够吃，缺穿的，"光交购布证不交钱，人家给扯布"。后来勉强可以穿上了，点灯、吃盐还是问题。社里经常给他借钱，却没有任何名义不要他还。只有今年订出秋收预分方案的时候，他高兴了，像个小孩一样喜得合不上嘴——这条路真个有奔头啊！嗬，陈恒山够吃、够穿、够用了！你看他干活的那股劲头吧，再也看不出一点"混社"的态度了。

陈恒山的事实把那些最谨慎、最保守的农民对农业社的疑虑都打消了。社员们普遍从镇上买回席子扎新席囤，成了风气，这使得多少还想再看一两年的人打定了主意。在秋收以前扩社的时候，只要锣声一响，哪怕大雨如注，哪怕天黑地黑，霎时间小学校的教室挤得满满的。如果有人开谁的玩笑说，"你今年入社恐怕审核不上吧！"那人脸色立刻变了，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满村找社干部，说话带着要哭的神情。……

"今年扩社和去年大不一样，"有一回，社主任王家斌快活地对我说。"人家把家庭会开好，等着报名。有两家邻居，为一点纠纷，多年不说话；现在，不要干部调解，自动讲和了，准备一齐报名。有些人为人有毛病，不等旁人提，自动地要求检讨……"

我知道胜利社这回扩社的曲折的经。头一回，二十二户；在关起门处理问题的时候，多少人还在掀社的门。不得已，第二回开了点缝，想放几户进来，却涌进来十几户。最后，村子沸腾起来了，连那些按照自愿和领导掌握规划到来年入社的少数农户，也没耐心等来年了，只好把全村自愿和有条件入社的人，全收了进来。这样，做好了统一播种冬麦的安排，才开始了秋收。现在，在秋收中间，村子里普遍谈论着另外的事：要买抽水机，要扩大几百亩稻田面积。

在皇甫村四村第三选区，只有一户没有入社，他叫宋志让。他喂一匹好母马，一年下一个骡驹。他的这点"优越性"使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碰一碰他的母马。如果把他的母马拴到社里的马号里去，那就等于把他的灵魂没收了。他会变成一个没有力气，拿不起任何轻便农具的人；虽然他的身体那么结实，劳动那么卖劲儿。

"宋志让，"有人问他，"你几时入社？"

"富农几时入社？"他反问。

"富农嘛，现在说不准……"

"富农几时入，我几时入。"

他的口气的肯定说明他的态度有多么坚定。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听闲话，更传播闲话。他把自己的东西当做宝贝，私有制对他是天经地义。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起鸡叫睡半夜地劳动着，一阵也不闲。别说参加互助组吧，他就是进终南山，到镇上去赶集，都不结伴，总是独来独往。没有分地，也没买地，他家里的人经常吃得饱，穿得新。他的家庭总是和睦的，他的情绪始终正常，既不趾高气扬，也不垂头丧气。村里人说他落后也罢，赞美他会过光景也罢，他都无动于衷。他简直不像一个活人，而是某种抽象的概念的化身。

但是在一九五五年的秋收时节，宋志让抬不起头来了。他开始一边干活，一边叹气。他的家庭变成了经常吵闹的场所。他的老婆、儿子、女儿……所有的人都攻击他，不给他安宁。他想顺顺气气吃饭，不可能；他想静悄悄睡一下，不可能——他们向他这座沉默的堡垒发动总攻。他们是活的人，他们要串门，要上学；他们要和人来往，要说要笑；他们也爱母马，但是受不孤单的痛苦。他们进一步对付他——宋志让从地里担着稻捆子回来，发现场里的活没人干。他蹲在场里，低垂着头，一大滴一大滴的眼泪掉在地上，一滴摔几瓣……

哭吧，宋志让！你用眼泪送私有制的终吧！

整个皇甫乡到处是扩社和建社的声浪，除了地主、富农和受过管制的人，没有多少人不在争取入社。

有一天早晨，我到神禾塬上去散步，碰见第五社主任李观水。

"老柳，我们碰上个难题，你说怎么办好？——聋子要入社。让他入吧，他的两个耳朵简直聋得像洋灰灌了似的，再大的声音也听不见，光能靠手势和他说话，大伙都嫌麻烦；不让他入吧，他又不哑，在村里乱吵嚷。"

我笑说："叫入吧，他还有个儿子……"

"儿子才十三、四，不懂啥，也不会干啥。"

我答应了解了解再说。

啊呀！这聋子是这样聋啊——把我不叫同志，有时还叫老爷。他耳朵听不见，又不识字，是个睁眼瞎子，时代的变化他都不大感觉出来。他的神禾塬崖根的窑洞，在秋雨中坍了，和儿子借住在寡妇郭高氏的大门道里。人们告诉我，按照地亩、地等和人口给他计算出的农业税，他还把它说成是给他派下的粮，要求减少。他要参加农业社，却不知道这个名词。

"我也要联合！"他大声嚷着。

旁人指指他，摆一摆手。

"不！我也要联合！"他坚定地说，指着寡妇郭高氏："为啥有福他妈能联合呢？"

旁人指指耳朵，又摆一摆手。

他说："没要紧，我能看见！我也要联合！"

大伙哈哈大笑。他认为旁人在愚弄他，他吃了亏。

“甭把我当傻瓜！联合里头的庄稼长得好，牲口壮实。有福他妈从前不喂牲口，这阵常拉大骡子套磨子，当我看不见吗？这回说啥我也要联合！……”

你看：还有比这个聋子再落后的人吗？这回说啥我也要联合！……”

你看：还有比这个聋子再落后的人吗？但是他看到了最主要的一点。

皇甫村六村有个老头，一天早晨在镐河边的马路上挡住我。我在皇甫村住了这些年，好像根本没见过他。他说他常见我，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住在村里的哪一块，和某人隔墙。我的印象里有许多头发胡子灰白的老头，他们的名字我听过就忘了。当我决定把这个老头和我的谈话写进这篇短文里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这自然怪我粗心；但另一方面，也的确说明这类老头在村里并不积极，他们与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无关。如果把我们当今的社会比做激流的话，他们是激流旁边的漩水湾里的泡沫，在那里漩几个圈儿，就准备幻灭了。但是现在，他把我拉在马路旁边的一棵白杨树底下，显得很不平。

“柳同志，我有一件事，你能给我办吗？”

“什么事情？”

“我们村里东头秋后建社，我要入……”

“你在他们的互助联组里吗？”

“我没入互助组。有八亩地，我自个种着。”

“你家里几口人？”

“三口。娃在县中上学，我和老伴在屋里。”

“你给他们说过吗？”

“我给他们说的早。他们说：‘好嘛，等建社干部来了再说。’可是他们开会不叫我。见天黑我就早早吃了饭，在屋里等着。他们今儿也不叫我，明儿也不叫我。听说他们开会，要把麦往一块种，我心里更着急。他们不是拿句空话骗我吗？”

老头说着，眼里射出凶狠的目光，显出他是个性格倔强的老人。

“你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吗？”

“没问！”他气愤地说，“听人说嫌我劳力弱。我劳力弱？我那八亩地哪年撩荒了？地里场里的活儿，啥我不能干？我光是不能养娃！”

我忍不住大笑。可以看出他们不叫他，或许是有顾虑的。他和我说话大吵大嚷，就显着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我转转弯弯地说明：一个人不应该吵嚷。有时候的确是旁人不对，有时候自己也会有点毛病。如果表现出自己愿意改正平时为人的毛病，光剩下旁人不对，那就好办了……

“我有毛病，”他果然承认，“我入过几回互助组，都没到头。可是开会把我叫上，我好检讨呀！”

最后，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入社。他表示为了这事件，他不怕把官司打到北京。他说：我不是草草率率做出这个决定的；他到全皇甫村的六个老社里打听过。在决定以前，他有好几夜没睡着，并且到县中去和儿子商量过。今年镐河涨大水，冲了六村的几十亩稻地，他看见了的。单干户和互助组有人蹲在地边哭鼻子，而社里的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成夜看水口，排水。有几户被洪水冲了稻地的社员，和旁的社员一样不着慌。这件事使他再也不能拿旧脑筋来考虑新社会的事情了。说他在申请以前就顾虑人们要不要他；他儿子打消了他的顾虑——办农业社和私人合股做生意不一样，这是一条社会主义的路，任何人也不能排挤……

我告诉他，他的问题在秋收以后六村实行全村规划的时候，可以得到解决。

看一个运动是不是到了高潮，就要看平素落后的人是不是投入了运动。不是看大势随大流，而是实际上有了认识，表现出主动，他们觉得走这条路对自己有利，如果不照这样生活，就是吃了亏。在中共皇甫乡支部委员会上讨论合作化问题的时候，许多同志都说，去年秋冬在各村建社，总有人说这样的话：“是崖，某某敢跳，我也敢跳！红了黑了，试它一年再说。”而今年，人们密切注意着邻居们的动静，唯恐酝酿扩社和建社的时候，不把自己考虑在内。现在，关于土地，关于牲口、农具，关于投资，关于劳动组织和关于分配，已经不是那么生疏的困难的问题了，顺利地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变成农民生活中的现实了。

最近我经常想起我们在一九五四年春办全区唯一的只有十三户的胜利社时的情景。那好像不是去年的事情，好像已经过若干年。那时候横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阻力，现在没有了。但是，并不能说，我们今后可以在没有困难和阻力的路上前进了。去年和今年，走合作化道路的是首先觉悟的农民，他们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是农村社会的先进人物。明年，大多数社里都会有了。巩固合作化制度，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一点一点清除人们意识中的私有制残余，并不比把他们吸引到这条路上更容易啊！只有那些以为这下再没什么困难的人，才在胜利的时候跌跤。

让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下，从一个高潮进到另一个高潮！

（原载《散文特写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小说《三里湾》

1952年9月的一个晚上，农村女青年王玉梅从夜校回来，发现哥哥王金生有一个奇怪的笔记本，上面写着：“高、大、好、剥、折、……”她与嫂子两人猜了许久，也未猜

出谜底。后经金生解释才知——"高"是土改时得好处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合在一起的大家庭；"好"是土质特别好的户；"剥"是有轻微剥削的户。他根据这些不同的户采取不同的方针。金生是三里湾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一心一意走合作化的道路，唯有弟媳小俊受了母亲"能不够"的影响，闹着和金生分了家，并且变着法儿整治丈夫。金生的弟弟玉生性情有点像父亲，能做别人做不来的巧活，他因为创造发明曾获得县里奖的特等劳动模范的奖状。这天，玉生正忙着给农业社修场磙。而游逛一天的小俊却认为这是扯淡的事，并摔坏了玉生心爱的工具。玉生已经经历数次的吵闹，此刻，他想这日子不能过下去了，于是向农业社的组织提出了离婚。三里湾两个初中生灵芝和有翼正在相爱。他们虽然都在村的夜校里当教员，但两个家庭都没有参加农业社。灵芝的父亲范登高，虽然是个村长，但经常做些小生意，还雇工放牲口，已有了轻微的剥削。群众都认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翼的家庭更在三里湾出了名，父亲老实，作不了老婆的主，人们称为"糊涂涂"；母亲惯于蛮搅蛮缠，人们称她"常有理"；还有大哥"铁算盘"，大嫂"惹不起"。他们总是把大门关得紧紧的，不和邻里来往。这时，灵芝提议，她与有翼订个公约，各人给各人的爹治"病"，治好了让他秋天入社。玉生在发明创造中遇到了困难，而灵芝拿来纸笔一算便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之后，他常得到灵芝的帮助。玉梅也很羡慕有文化的人，她在心里也偷偷地爱着有翼。秋收了，金生想让灵芝到农业社当会计，并以妹妹玉梅去换工。灵芝的哥哥铁算盘一算，玉梅是个好劳力，干农活比初中生妹妹强多了，便欣然应允。而灵芝却提出要换不能只换她一个人，也要把有翼换到农业社里。除了有翼，糊涂涂家的儿媳菊英也是一个局外人。她在这个家里只有开门关门的份儿，只有干重活累活的份儿。菊英三天两头磨面，这天又磨了一天面，但婆婆只给她一碗稀面汤吃。菊英已不能忍受这种虐待，决然提出分家。调解委员会前来调查的时候，有翼虽然同情嫂子，但却惧怕母亲，他的态度暧昧。灵芝恼怒他的畏缩不前，令他写出书面检讨。并因此产生了对有翼的蔑视。金生希望菊英分家时，分到那块刀把地，因为农业社的大渠要从这块地里经过，但糊涂涂遵照古训把这块地给了另一个儿子。共产党员范登高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党内与群众的批评。灵芝也因父亲的景况与自己的工作搅得难以入梦。她夜晚起来，正和玉生相遇。灵芝又被玉生的创造热情所感染，引起对这个年轻人的爱慕。常有理察觉儿子与灵芝来往过密，担忧又要娶来一个菊英，于是自作主张把订婚送给了小俊。有翼又哭又闹，长卧不起。常有理认为儿子中邪，为其请神问卜。灵芝看了眼前的一幕，认为有翼缺少应有的反抗性，便毅然和玉生订婚。有翼闻讯冲出家门，这举动被人称为一场"革命"。有翼已经失去了灵芝，再也不能失去玉梅，于是背逆家庭的意志向玉梅求婚。但玉梅也有自己的条件——那就是不在你妈手下当儿媳妇。年轻人的举动终于教育了老年一代。玉梅的爹范登高过去决定，加入了农业社。糊涂涂在外当干部的儿子也把属于自己的刀把地捐给农业社，而糊涂涂也随大势参加了农业社。农业社的大渠破土动工，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八月中秋到了，灵芝与玉生，玉梅与有翼都选择在这个月圆的日子里结婚。经过生活一番教育的小俊也和满喜结下良缘。

电影《董存瑞》

1955 年电影制片厂摄制黑白 11 本
编剧：丁洪、赵寰、董晓华　导演：郭维
摄影：包杰　布景设计：徐渭
作曲：雷振邦　录音：林秉成
剧务主任：敬然　特技摄影：郭甲东
特技设计：蔡光
演奏：长影乐团指挥：尹升山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张　良	董存瑞	杨启天	郅振标
张　莹	赵连长	周　凋	王　平
张　茜	董　姐	张　辉	指导员
任　颐	罗志英	王寅申	牛玉合
王　枫	王海山	韩巨清	孙大光
宋保义	刘玉林	刘世龙	通讯员
陈光廷	冯宝苑	航　利	区小队长
郭玲玲	玉兰子		

抗日战争末期，民兵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炸毁村庄，残杀人民，燃起了董存瑞心中仇恨的火焰。经过战斗的锻炼，董存瑞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我军被敌桥型暗堡所阻。董存瑞冲到桥下，但找不到炸药支架，为了争取时间，减少战友伤亡，保证整个战斗的胜利，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桥型暗堡，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通过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成长故事，歌颂了人民英雄的高尚品质和培养、造就英雄的人民军队。影片公映后，曾引起极大的轰动。

新闻纪录影片《黄河大合唱(歌曲)》

1955年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黑白5本
作曲:冼星海　作词:光未然
编导:吕班　摄影:高洪涛、王喜茂
美工:秦威　录音:刘钊
音乐顾问:何士德、李焕之
演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
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新影厂管弦乐队
指挥:时乐蒙、李静
男声独唱:岑冰　女声独唱:教蕴瑜
朗诵:林仲华

此片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逝世十周年拍摄。

《黄河大合唱》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等组成。

历史档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决议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审议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请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第一批名单,决定授予朱德等一百三十一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一百一十七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五百七十人以一级解放勋章。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人员的名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九月二十三日举行了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国务院总理建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名单,决定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会议接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提请授予勋章的第一批名单,决定对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方毅、王宏坤、王恩茂、王新亭、王震、王静、王树声、孔从周、甘泗淇、朱良才、皮定钧、刘亚楼、李文焕、李克农、李延禄、李寿轩、李达、李涛、宋任穷、宋时轮、余秋里、吴法宪、吕正操、陈士渠、陈再道、陈先瑞、陈伯钧、陈奇涵、陈赓、陈锡联、周士第、周保中、周桓、周纯全、罗瑞卿、苏振华、洪学智、徐立清、徐海东、马尔果甫·伊斯卡果夫、唐亮、韦国清、乌兰夫、张令彬、张宗逊、张学思、张爱萍、张国华、张云逸、张达志、张经武、曹达诺夫·扎依尔、郭天民、许世友、许光达、毕占云、崔田民、彭绍辉、贺炳炎、傅秋涛、傅连暲、傅钟、程世才、黄克诚、黄永胜、曾生、粟裕、冯白驹、冯仲云、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叶飞、赵尔陆、赵寿山、廖汉生、郑华、郑维山、阎红彦、阎揆要、赖传珠、谢富治、钟期光、萧克、萧劲光、萧华、韩先楚、韩振纪、谭政、谭冠三、谭家述、饶正锡等人,分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会议决定授予一级解放勋章的人员中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刘文辉、刘善本、李明灏、吴化文、何基沣、陈明仁、林

遵、阿沛·阿旺晋美、高树勋、马鸿宾、张克侠、张治中、张轸、陶峙岳、傅作义、程潜、曾泽生、董其武、裴昌会、郑兆祥、郑宝珊、郑锡侯、潘朔端、庐汉、韩练成等人。

这次会议决定第一批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有一百三十一人；第一批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有一百一十七人；第一批授予一级解放勋章的有五百七十人。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四日新华社讯）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5年的任务》的社论，社论说：1955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3月21～3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又指出，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还指出，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由毛泽东作结论。毛泽东的讲话和党的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主要内容是：①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对党的腐蚀和破坏，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②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③要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④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党的民主；⑤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希望党的干部要奋发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4月4日　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五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和选出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5月14日　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7月1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展开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和打击的指示。指出：1951年镇反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揭露和肃清。混入党内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加紧了他们的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给予严厉打击。于是，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肃反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严格区分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反革命集团和落后小集团的界限。

6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下一生产年度的农业合作社发展计划，即在今年春65万个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阐明了肃反斗争的目的和原则，着重批判了对党内外反革命分子麻木不仁的右倾思想，并对运动的开展作了具体部署。《指示》指出，这次运动主要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内部进行。肃反斗争须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肃反斗争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社论。

7月31日　中共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是：①论证了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指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②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指出工业化需要建立大规模经营的农业，农业的机械化又需以工业化为条件。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③强调了实现合作化对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④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方法、步骤、组

织形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阶级路线等问题，并提出了只有在社会制度方面完成了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在技术方面完成了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科学命题。另一方面报告强调反对"小脚女人"，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的正确意见是犯了"右的错误"。

9 月 2～30 日　新疆省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拥护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撤销新疆省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提议和决议。省人大会议闭幕时，宣告自治区正式成立。

9 月 13 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 21 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9 月 15～19 日　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雅安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撤销西康省的决议，并决定从本年 10 月 1 日起，西康人民委员会及所属机构停止行使职权，宣布撤销。各自治州、市、县人民委员会和各专署受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领导。

9 月 20～30 日　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会议选举赛福鼎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在大会闭幕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10 月 4～11 日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发展农业和生产合作社，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问题。会议根据 7 月 31 日毛泽东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新的规划：①在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到 1957 年春季以前合作社发展到当地总农户的 70%—80%，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②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大体上可以在 1958 年春季以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③互助组运动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还很少的地区，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的时间。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0 月 29 日　毛泽东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 月 1 日至 21 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 月 16 日至 24 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 年 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1 月 7 日　国务院举行第 20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1 月 9 日，人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议通过了这个《章程草案》，并决定由国务院发给县以上各级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征求意见，修改后再提交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章程草案》共分 12 章，规定了合作社的性质、任务、社员权利义务以及劳动报酬等。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化的发展，分为初级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章程草案》还提出，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作为公有化股份基金，按入社土地或土地和劳动力分摊。贫农生产资料折价不足抵交应摊派数额的，由国家拨发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交付（国家为此拨款 1 亿元）。这个草案于 1956 年 3 月 17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

11 月 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和写了碑文。

11 月 29 日　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重工业各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会议确定以下几条原则：①重工业各部均须根据"一条鞭"（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对各种经济采取统筹兼顾方针）的精神对有关的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

业加强领导，进行全面规划，要积极地主动地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②各行业的全面规划必须根据长远计划，结合技术经济条件进行摸底排队，通盘进行安排。③重工业各部要负责拟定全面规划的方案，研究私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合理地分配任务并将其纳入各行各业的经济计划之内。④现由三机部管理的钢、铁、重化工、煤、电等应即着手分批移给重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

12月2日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分别召开会议，座谈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随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分别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

12月21～28日　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第五次会议制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要求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以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从现在今后几年内争取使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且逐步进行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

12月26～29日　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在1955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热河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从1956年1月1日起停止行使职权。

12月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30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会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副主席请假或外出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接见使节。

12月29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减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国家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人员配备方面，存在上层领导机关重叠、编制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而基层组织骨干缺乏、领导力量薄弱；在事业、企业单位中行政管理机构庞大，非业务人员或非生产人员过多的问题，对此，国务院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事业、企业单位，都必须本着“精简机构、紧缩编制、调整干部”的方针，认真地、彻底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精简，并根据紧缩上层、充实基层和生产建设单位的原则，作出精简计划和人员编制方案，分别报递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核。

经　济

1月6日～2月8日　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确定，1955年的计划方针是：全国平衡、统筹安排、增产节约、重点建设。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①在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的同时，积极而可靠地增加农业生产。②增收节支，保持建设规模和国家财力的平衡，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标准。③要统筹安排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60万个，1957年达到205万个，占农户总数的50%左右。到1957年，私营工业的改造控制在60亿元产值以内，手工业的改造控制在300万以内。4月12日，中央在批转这次会议文件时指出：①农业增产速度的迟缓是我国目前整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克服这方面的弱点。②在建设速度上，必须作全盘的合理安排。③在巩固和提高国营经济直接计划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把其他各种经济逐步地纳入计划。

1月10日　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农业生产合作已经发展到48万个，在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在基本完成发展计划的地方，要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原计划过高的可适当收缩。

1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出：近几个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其原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中过早过多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折价又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指示》制订了新建社宜采取耕畜私有公用，解决饲料困难，拯救灾区耕畜等保护耕畜的政策措施。

1月2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命令》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自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元等于1万元。

2月10日　中央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侨汇问题的报告》。从1950年到1954年，全国侨汇收入6.8亿美元，等于同期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外汇收入的一半左右。但是侨汇自1952年来连续下降，主要原因是侵犯侨汇的情况严重。报告建议，大张旗鼓地贯彻侨汇政策，坚决纠正强迫命令或变相强迫借用侨汇；承认侨眷依靠侨汇生活是合法的，对侨眷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应适当照顾。鼓励用侨汇建筑房屋、兴办学校、医院及修桥铺路。鼓励华侨投资，阶级成分不因投资关系而转变，参加工作按其能力定职定薪。2月17日，

国务院通过并颁发了《关于坚决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

3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4年粮食年度，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这一年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于是全国农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状况。《指示》指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将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工农联盟，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据此，《指示》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决定本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900亿斤。同时，要求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

3月15日　重工业部召开基本建设会议，总结两年来的经验教训，讨论确定今后的任务。会议指出，重工业部在过去两年中只完成五年计划草案中26%的任务。今后的基本任务是：改进基本建设单位及建设安装企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使它走向更适合于担负复杂的工业建设，并努力争取全面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保证建设工程按期投产。会议指出，今后必须首先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通盘筹划和相互协作，反对执行计划的保守倾向和工作中的本位主义，并纠正和避免投资使用上的浪费现象。

3月25日　中国农业银行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4月5日　轻工业部召开生产工作会议总结了1954年的任务是：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下，加强计划性，改善经营管理，厉行节约，克服浪费，提高技术，保证质量；增加积累，合理满足社会需要。会议确定，凡市场需要而原料供应又有保证的产品，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增产；对目前产销基本平衡或有积压的产品应严格执行计划，非经部或局批准不得增产。

4月8日　中央批转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和关于召开私营式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提出，1955年计划扩展合营企业2,508户，产值17亿元，职工约20万人；到1957年，计划扩大15,000多户，产值54亿元，职工60余万人。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干部的总路线教育，认真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4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举行第10、11次会议，分别听取了四川省长李大章和广东省长陶铸关于两省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报告。第11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和城市建设总局。

4月12日　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商，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1954年入秋以来，城市私商的营业额大部分下降，经营困难，失业增加。在农村购销工作上，给农民留粮不足，对副食品和饲料等需要照顾不够，而某些工业品又不易买到。公私关系、农民和国家的关系都较紧张。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商业应作必要的退让，使所有零售商能在可以维持的水平上继续经营，然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对私商逐行逐业加以改造。在农村，小商贩的改造应根据自愿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完成统购任务后农民的多余产品，应允许农民自由买卖。供应应尽可能满足农民需要。同时，中央决定粮食由粮食部直接采购，油料、生猪由商业部采购，另成立农产品采购部负责棉花、烟叶、麻等主要农产品采购。供销社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农村的商品供应和农村私商改造工作。

4月21日～5月7日　中央农村工作部受党中央委托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肯定了成绩，指出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小生产、小私有的本质认识不足，对办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是产生冒进的主要原因。会议研究制定了纠正和防止早进的办法，并制定了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办好互助组，照顾个体农民的工作方针。

4月25日　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同意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基本情况和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要求各部门和各地区速将计划下达到基层单位，切实执行。中央认为1955年计划增加职工数过多，这一部分计划暂不批准。《报告》提出，1955年的主要指标：①工农业总产值为444亿元，增长7.7%。②农、副业总产值为543.7亿元，其中粮食产量3,608.6亿斤，棉花产量2,606.6万担。③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98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当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1,079个。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0.4%。⑤铁路货物周转量比上年增长9.8%。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31.1万人，比上年增长22.9%；中专在校学生达到56.1万人，高中在校学生达到56.9万人，较上年增加约4.8%。⑦财政支出较上年约增加16.3%。

5月12日　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重工业产品价

高利大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钢铁产品的平均利润率为57%，机械产品为37%，重化工产品为38%，重工业产品普遍价高利大。中央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即1956和1957两年，重工业各部门调拨价格每年下降5%～10%，经过两年后基本上达到合理的比价。

6月1日　中共中央地区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省市工业厅局长会议提出：近一、二年，有些地方工业尤其是私营企业，遇到了生产任务、原料不足，工人和设备有余的困难。会议进一步要求安排生产必须与增产节约相结合，还必须与对私营工业的改组改造工作相结合，以克服私营企业盲目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落后现象。会议强调，今后必须以实行专业管理、加强技术领导为重点，相应地加强财务成本管理，建立健全责任制度，以便改善工业管理工作。

6月1日　中国第一座列车发电厂在佳木斯市开始供电。

6月18日　国务院举行第12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6月10日提交国务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会议还决定了就国家机关的全部工作人员自今年7月份起一律实行工资制待遇问题发出通知。

6月22日　国务院举行第13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预算草案，并决定把上述文件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会议还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撤销燃料工业部。

6月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7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定于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对将要提请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草案作了说明。

6月25日　国家计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重新编制的1955年度劳动计划的工人数比上年增加27.1万人，较原计划减少45.9万人。

6月28日　薄一波在向中央报告关于《目前重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时提出了如下意见：①改进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贯彻增产节约，增加社会主义积累。②要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加强业余教育，合理使用现有技术人员，各部、各工厂应有计划地筹设科研机构。③加强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配合。

7月5～30日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批准了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会议还通过了撤销热河省、西康省和关于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农产品采购部等项决议。7月21日，陈云副总理作了《关于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发言，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并对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提出了5条重要意见。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式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占55.8%。工业占总投资的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和邮电占19.2%。五年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年平均增长14.7%），其中70%左右由原有企业增产，30%左右靠新建企业。私营工业企业有一半转变为公私合营。农、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平均年增长4.3%）。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3左右。原有私营商业将有半数以上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就业人数增加420万人，工人平均工资增长33%，农民购买力将提高近1倍。11月9日和12月19日，国务院先后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下达各地和各部遵照执行。

7月1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批准暂行办法》的通知。《暂行办法》规定，凡国家投资的基建工程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基建工程的设计及预算文件的审核和批准，均按本《暂行办法》办理。《暂行办法》还对国务院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的审核批准权限作了规定。

8月18日　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1954年超计划利润分成和使用办法》。规定：1954年国营企业的超计划利润，40%留归企业主管部门使用，60%解缴国家预算。利润分成部分可用于弥补1955年基建计划内已列项目

的资金不足，弥补企业流动资金的不足，弥补技术组织措施费和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的不足，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本身行政方面的基建和企业单位计划外的福利设施。

10月4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及其报告。中央指出：各部门、各地方在编制计划草案时，必须发掘潜力，克服困难，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计划指标，努力争取实现。国家计委党组《报告》中提出的控制数字如下：工业总产值为483.5亿元。粮食总产量为3,740.5亿斤，棉花产量为2,996万担。基建总投资额为112.7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厂矿建设单位为555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51亿元。全铁路货运总量为20,800万吨。国营经济各部门职工人数达到1,463万人。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10.5%，主要产品的出厂价格比1955年总平均降低6.2%，总降低额为8亿元。人均工资增长4.9%。高等学校招生12.6万人，毕业学生6.7万人，在校学生达到34.9万人。11月29日，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党组对上述计划作出修改，主要是调低了工业总产值和基建投资总额等项。

10月8日　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计划1956年财政收入279亿元，支出亦列279亿元。其中经济建设费为135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比1955年增加15.95%；文教费32亿元，行政管理费22.8亿元，都比1955年预计略有增长。

10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规定：国家计委是国务院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方面的职能机构，主要进行以下工作：综合编制长期的和年度的经济发展计划草案；审查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区、市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各部门、各地区计划执行情况；编制主要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草案和国家物资储备计划草案；编制长期的、年度的综合财政计划草案等。《条例》还就国家计委在上述工作中必须注意的原则，以及同各部委和省、区、市的关系作了规定。

11月1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发行总额定为6亿元，年息4厘，分10年偿还。

军　事

1月1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颁布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及奖励办法的通告。指出：蒋军官兵起义、投诚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对个别或集体投诚归来的蒋军官兵，人民政府不咎既往，一律给予宽大待遇，立功者受奖。起义部队，一律按人民解放军宗旨整编；对起义军官，量才录用，并保护其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彭部长还向我解放军发布对投诚或自动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的五条保证的命令。

1月18日　浙江前线我军渡海作战，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全歼岛上蒋军官兵1,000多名。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12月16日，又乘胜解放了鹿山列岛。至此，浙江沿海蒋军盘踞的岛屿全部解放。

2月7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并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决定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2月8日，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2月12日，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和奖章条例》。《决议》指出：为了表彰革命功勋，发扬光荣传统，规定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此次会议还通过的《关于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和《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规定：国旗勋章、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和荣誉奖章，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建有功勋的人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功人员；并以国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授予建有功勋的部队和兵团。9月以后，全军各大单位先后举行了授勋典礼。

2月11日　国务院决定，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6个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军区。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1967年5月和

1969年12月，内蒙古军区和西藏军区先后改为省军区，分别归北京军区和成都军区领导。1979年5月，新疆军区改为乌鲁木齐军区。

2月12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

3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师将于3、4月份从朝鲜撤返祖国。发言人同时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已返国，杨勇将军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6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总监部，叶剑英为部长。

9月16日　国务院举行第18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1955年征兵的命令和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的第一批人员的名单，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讨论和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服装制式和军衔肩章、领章和兵种、勤务符号的样式，决定从10月1日起在全军实行。9月27日，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将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将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31人、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同日下午，国务院举行授予军官将官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10月2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言人宣布：从10月10日起至26日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有6个师已经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外交

1月2日　南斯拉夫外交秘书长波波维奇电复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欢迎同我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月5～11日　联合国秘书长马舍尔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哈马舍尔德举行会谈，并于10日发表联合公报。

1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1月20日　我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月24日　针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月1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鼓吹由联合国斡旋，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人干涉，并指出“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海峡撤走”。

4月1日　中印两国政府发表关于印度政府将其在西藏地方所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设备和驿站及设备交给中国的公报，移交仪式在拉萨举行。

4月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次会议。会议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通过了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决议。

4月18～24日　亚非各国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间的友好合作，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了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亚非地区29个国家的代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也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作了几次重要发言，严厉批驳了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造谣中伤，就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发表了声明，提出了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会议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依据中国和印度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要求有关国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间友谊的精神，统称为“万隆精神”。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会后，周恩来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印尼，并发表了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6月25日～7月7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率团访问我国，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中越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目前国际局势重大问题。一致认为，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必须予以制止，日内瓦协议必须予以贯彻。双方还一致认为中越两国在经济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合作将有助于两国人民为和平建设的努力。我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政府。会谈后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公报。

7月25日　中美两国通过联合王国（英国）的外交

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为解决平民遣返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于8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9月10日，双方大使级代表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

8月1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发表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同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2月21～30日　朱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化教育

1月～6月　在全国开展了对胡风的批判。1月21日，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5日至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北京举行第13次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全面的彻底的批判。于是，批判胡风的运动立即在全国展开。胡风的文艺思想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就其整个体系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解放前，党曾对他进行过有益的批评，但胡风及同他联系较密切的一些人士，一直不服。1954年7月，胡风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他把党要求作家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号召作家到工农兵当中去，提倡作家思想改造，提倡作品的民族形式以及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于是，中央决定开展对胡风的批判。胡风问题的性质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自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后，就把胡风等人的问题看成"反革命集团"，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了。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错误地将胡风逮捕，并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至6月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和第三批材料以及《必须从胡风反革命案件吸取教训》的社论。从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错误地转向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予以平反。1988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重新发表了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1985年6月8日逝世。

1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草案》对汉字简化的目的和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公布了《798个汉字简化表草案》、《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

2月5～7日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了第13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扬、丁玲、老舍等关于赴苏联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经过的汇报，讨论了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的工作方向和计划，决定以开展文艺领域内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开展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加强作家协会的集体领导和加强总会与各地分会的联系作为协会1955年工作的中心任务。会议还就中国作家协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选作了调整。

4月11日　首都文化界举行梅兰芳、周信芳艺术生活50年纪念大会。会上文化部长沈雁冰代表文化部颁发了荣誉奖状。

5月19日～6月16日　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修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的文教计划部分，讨论提高文教工作质量，合理布置和统筹安排全国公私文教事业，检查和研究文教部门如何宣传唯物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及改进领导等问题。会议着重讨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增加培养干部的数量。

5月31日　国务院举行第18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筹组学部的报告。6月1日至10日，中科院召开大会，宣告成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四学部。大会讨论并修改了中科院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选举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6月3日，周恩来总理任命了233名学部委员。

6月2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生产的发展，积极有计划地扫除农村中的文盲，并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要在过渡时期内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三、五年争取基本上扫除主要乡干部的文盲。《指示》认为，由合作社、互助组统一管理农民的生产和学习，把二者结合起来，应当成为今后发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

10月15～23日　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确定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方针、步骤，并对根本改革汉字的准备工作交换了意见。

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了八点建议和要求。10月25日、26日教育部召开座谈会，研究了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和在学校中用普通话教学的步骤、要求，以及训练教师，编辑普通话教材等问题。

12月12日　文化部发布《关于书籍、杂志使用字体的原则规定》。规定书籍排印正文应不小于老五号字；除农民报和儿童报一律不得用小五号字和六号字排印外，其余暂不作规定。

12月6～15日　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就继续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和讨论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初步规划。

12月19～28日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职工业余教育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的问题；明确职工业余教育的方针任务，以及系统研究解决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业余教育中的各种问题。会议决定，到1958年，将全部扫除现有职工中的文盲。会议拟定的今后12年内全国发展职工业余教育的初步规划规定，到1962年，将现有近代产业职工大部分提高到业余小学毕业程度；到1967年，将现有近代产业职工中基层干部和技术工人大部分提高到业余初中毕业程度，一部分提高到业余高中毕业程度。同时，要积极发展业余中专教育和业余高等教育。会议还对各级业余教育的组织领导、师资配备和经费来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

12月27日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他为本书写了序言，并以"本书编者"的名义对其中104篇写了按语。他指出，自7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以来，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速。他着重指出：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应该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各个方面，批判和克服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12月30日　文化部发布《关于汉文书籍、杂志横排的原则规定》。规定自1956年起，新发排的汉文书籍，除影印中国古籍以及少数有特殊原因不能或不宜横排者外，应一律采用横排。多卷集书籍已出版的各卷已直排者，以后各卷右仍直排，将来修订重排时再改为横排；新创刊的汉文杂志除特殊者外，一律采用横排。

社会生活

1月6日　《光明日报》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竞赛司公布的截至1954年为止的全国各项体育运动的最高纪录。计有田径、游泳、滑冰、举重、自行车等五个方面的84项最高纪录。

2月9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张澜，四川南充人。1903年留学日本，因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1906年参加了保路同志会，并为股东会副会长。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加入进步党。1917年11月，任北洋政府四川省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1925年12月任成都大学校长，他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支持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使其得到最快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为民主同盟），任执行委员、主席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贯义》等。

2月16～26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决定》和《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定》。

2月19日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抗议第16届国际奥委会墨尔本组织委员会在邀请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参加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同时，又邀请蒋介石集团的所谓体育组织参加这个运动会。不久，中国奥委会正式宣布不参加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状况，用更多时间和

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3～1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积极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全国1,000万少先队员只占全国适龄儿童的13%，占中、小学适龄儿童的26%，少先队组织的发展过于缓慢，必须采取积极大量发展的方针。

3月8日　中央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问题。

3月9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七次会议，听取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汇报；通过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其他几项发展西藏建设的重要决定。

3月11日　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亚洲国家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郭沫若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并被推举为出席“亚洲国家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3月15日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自香港回到广州，并发表《告台湾袍泽书》。称赞祖国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突飞猛进，希望在台的亲朋故友早日觉悟。

3月中旬　毛泽东找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后指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根据各地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不同情况，他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并共同议定了对当前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安排。

3月22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巩固工作。并且指出，在大发展之后，进行整顿巩固工作，社数和户数有合理减少是必要的。但是，此通知发出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发展新社的工作，不久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

3月25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建议该省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地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整顿结果，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收缩到3.7万个，减少近1.6万个。当时，加上其他省收缩的5,000个合作社，全国共缩减合作社2万个略多一点。

4月12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和《关于总会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决议》，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6月18日　瞿秋白烈士遗骨由福建长汀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周恩来主祭，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安葬仪式上作了瞿秋白生平的报告。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八七”会议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与周恩来一起纠正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终年36岁。

7月1日　兰（州）新（疆）铁路黄河大桥正式通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铁桥。

7月1日　黎（塘）湛（江）铁路正式通车。全长340公里。它的建成为活跃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2日　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离京赴波兰首都华沙。

8月5日　国务院第17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主要内容是：①根据分配到乡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数字，由乡政府发动群众深入讨论，划分余粮户、自足户、缺粮户，并一次评定全年粮食产量、交售任务和供应量。②分户核定的余粮户交售任务，在正常情况下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缺粮户的供应量，每年核定一次。③国家向余粮户统购粮食，一般应占其余粮数的80%—90%。④在一省或数省发生严重灾害时，国务院可指定丰收的省酌量增购，但增购数不应超过农户因丰收而增产部分的40%。这次会议通过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规定：①市镇非农业人口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标准。②工商行业用粮和粮食制成品用粮，由各单位编制用粮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核以用粮供应证。③市镇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一般居民饲养的从事生产、运输的牲畜所需饲料，按定量标准编制计划，经批准核发供应证。

8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0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决定》。

8月7日　国务院举行第16次全体会议。各省、市、

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在京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着重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问题、国家机关整编工作问题和基本建设投资及费用的削减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统一领导屠宰场及场内卫生和兽医工作的规定。

8月3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决定自1955年7月份起，将现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

9月2日　中央批转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关于加强城市、工矿区副食供应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国家必须采取适当保证城市、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大大稳定价格的方针。食用油类采取计划供应；肉类、食糖实行控制供应；蔬菜采取保证供应；鸡蛋、鱼类视货源适当供应；黄花、木耳、榨菜等干菜类自由买卖，不加限制。中央同意报告提出的办法，指出：社会主义商业也必须逐步加强副食品的经营，以便有力量控制市场，稳定价格，保证供应。对城市、集镇的私营熟食业，应有计划地、逐渐地把它们组织起来进行改造。

9月18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建议更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10月2～9日　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邓小平等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将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第三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中央指出：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把确立企业管理方面的一长制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企业中的重大问题一般都提交党委会讨论。

11月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轻工业计划产品分工管理办法的通知》。指出：如何把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必须逐步做到按行业确定隶属关系，划分管理系统。凡是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产品，分别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统一筹划，合理安排。凡是由地方负责平衡或分配的产品，由地方有关部门分别负责计划和安排。

11月1日　兰（州）新（疆）铁路兰州至张掖段（539公里）开始通车。

11月1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0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指出：①凡设置市人民委员会的地区和县（旗）以上人民委员会所在地（游牧区流动的行政领导机关除外）；或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居民50%以上是非农业人口的居民区都是城镇。凡中央直辖市、省辖市，或常住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县以上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工商业地区均列为城市，其他地区都列为集镇。②工矿企业、铁路站、工商中心、交通要口、中等以上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所在地和职工住宅区等，常住人口在1,000人以上不足2,000，且非农业人口超过当地常住人口50%的疗养条件，年疗养人数超过当地常住人口50%的疗养区，可列为城镇型居民区。③市的郊区中，凡和市区毗邻的近郊居民区，无论它的农业人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一律列为城镇区。

11月19日　国务院布《关于基本建设工程设计任务书审查批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了设计任务书的审查和批准权限。

11月28日～12月9日　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和农业部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蔬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安排蔬菜的生产、供应和销售，并规划城市工矿郊区蔬菜生产的合作化和城市菜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指出，目前城市工矿郊区国营蔬菜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产蔬菜的数量还很小，社会主义在商业蔬菜市场上的领导力量还很小，社会主义商业在蔬菜市场上的领导力量还很薄弱，个体农民的蔬菜生产有很大的盲目性。据此，会议规定了关于蔬菜生产合作化和菜商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原则。会议还交流了蔬菜经营上产销结合、组织群众性储备以及管理蔬菜市场方面的经验，安排了蔬菜的产销问题。

12月12～23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确定了1956年的农业生产任务。规定1956年的农业生产要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生产指标。粮食总产3,980亿斤，棉花总产3,550万担。会议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有效的增产措施。

12月21日　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农业17条》，征询各地意见。17条提出：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级形式。在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地荒山；各地区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给；粮食亩产，黄河、秦岭、白龙

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达到800斤。七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四害;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修好各种必要道路,并建立有线广播网和乡社电话网。

12月27日　我国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第一个自动化水电站——北京官厅水电站开始发电。

12月29日　国务院同时发布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和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以及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三个指示。主要内容是:①全国已建立的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必须慎重对待,妥善处理。根据已建立的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各种不同情况,国务院就民族区域的划分、名称的更改等,提出了若干具体处理办法。②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应建立民族乡,凡是过去建立的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应改建为民族乡。③对于过去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县和乡;对于联合政府的专区和区,应改建为自治州和自治县,或改为专员公署和区公所,作为省和县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6年

导 言

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由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建立75.6万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87.8%。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社达到10万个，社员509万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92.2%。同时，取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成功。少数民族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不断纠正"左"倾冒进和右倾保守倾向，由于一九五六年农业获得丰收，年初全国形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党内外滋长了急躁冒进情绪。反冒进的提出，使大冒进倾向逐步得到纠正，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乱子"，保证了"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一五"计划提前一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明，几年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已经转变为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提前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过渡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全国呈现一派空前未有的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全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一九五六年，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国内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处理各种关系中不当，引起了矛盾，国际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各国共产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毛泽东为此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反冒进
-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及“双百”方针的提出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背景介绍

1956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不寻常的：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从此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我国国家的任务由阶级斗争转为向自然界开战、由政治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就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

同时，中国面临新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席卷全国，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可望提前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进行三年，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预计亦可提前一年完成。中国即将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际上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未能处理好农业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等，出现了市场货物不足、货币不稳、人民不满、民族关系紧张等矛盾；尤其是1956年2月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后果》的报告，暴露了苏联国内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等许多问题；同时，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帝国主义也乘机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高潮。怎样借鉴苏联经验、避免或少走弯路，成为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材料：

-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

材料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

中共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和政治局多次讨论，在总结中国几年来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1956年4月2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大家的意见，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讲了十个问题，即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轻视农业而产生了严重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未犯原则性错误。但今后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还为主，还是投资重点，但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发展重工业。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过去因朝鲜战争和国际局势紧张，使我们对沿海工业重视不够；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个和平时期。为使工业布局适当平衡且利于备战，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工业。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用沿海新建工业更多更快地积累，才能更有力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国防建设不可不有，但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因此，必须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多搞经济建设。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

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按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还要处理好地方间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为了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我们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那一般不是重点。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不镇压反革命，就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危险。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但在中国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的转变。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按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也可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九）是非关系。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我们的方针是，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有人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但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社会科学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的对的方面，我们还一定要努力学习。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最后，毛泽东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道路总是曲折的，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但是已经存有这个思想了。文章提出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就是分清敌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党和非党关系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问题，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他许多关系，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规模的敌对斗争已不再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课题。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总之在论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绝大多数矛盾关系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开始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它体现了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同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判定正确的政策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中共八大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在国内方面，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在这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国内矛盾，总结经验，制定政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国际上，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了第 20 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破除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

性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丑化了斯大林。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东欧一些国家，以往根据苏联的经验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暴露了弊端，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9个外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应邀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也列席了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关于党的主要任务、执政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等项问题。这些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

会议指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段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起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二）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就近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比较突出的问题，强调提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决议指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中国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三）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要求继续加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四）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原则和重要措施：第一，要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第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第四，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原则，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第五，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政治原则。在党内不允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允许有分裂党、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第六，保持党的先进性。大会号召为提高共产党员的标准而斗争。

（五）大会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在9月28日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17名政治局委员，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节录)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

毛泽东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缓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坦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地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缺点。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第286—289页）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节录）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刘少奇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二，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这个总路线是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提出的，在1954年已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没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认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不相信我们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党坚决地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很明显，如果我们党接受这些意见的任何一种，我们就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已经在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委员会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今年6月的统计，全国1.2亿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有1.1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1.7%。其中，有3,500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7,500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

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个体渔

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

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中达到的。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1949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人民政府接着用极大的努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国营运输业和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工业产值在1949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6.3%,到1952年就已经占41.5%,而到1955年,就已经占51.3%了。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原料和主要的货源,逐步地实现了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全国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了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必须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政策和步骤,才能使我国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乐于参加集体经济,使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步骤呢?现在,我们就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别地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中,有60%到70%的贫农和雇农群众。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很容易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他们不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全国农民平均每人只有3亩耕地(约等于1/5公顷),南方许多地方每人只有1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所以在农村中仍然有60%到70%的贫农和下中农。在继续个体经营的条件下,他们要想过富裕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这就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不富裕的农民积极地响应我们党的号召,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随即在农民中广泛地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这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劳动组织。由于互助比"单干"优越,在1952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在1954年又增加到将近58%。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党中央在1952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一种初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1951年底还只有300多个;由于它又比互助组织优越得多,到1955年上半年已经发展到67万个,参加的农户约1,700万户。从1955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随后,初级合作社又开始大批地改组成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由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

事实证明,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们对于下中农以至贫农仍

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富裕中农一般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们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和互利的政策。自愿和互利的政策是适用于一切人的，对于中农更有重要的意义。党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规定在合作化初发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又规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资料的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他们的利益，占他们的便宜；当然也不让中农损害贫农的利益，占贫农的便宜。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正确政策，也对于中农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从 1953 年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并且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这就基本上消灭了市场上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在 1955 年，国家又规定把购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适当地多购 70 亿斤粮食的错误，这就消除了农民担心政府收购过多的疑虑。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针，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停止了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

对于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贯地注意了领导农民防止和反对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们加入全作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才决定分别地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由于实行了以上的政策，我们就能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 4 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 1.1 亿农户组织成为 100 万个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级的和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在极小范围内能够自产自销以外，都要依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和借给资金。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没有保险。他们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现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说，很多的手工业和产是必须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这主要地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广大需要，部分地也是为了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渔民、盐民、小商小贩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渔业、盐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内陆续有所发展。到 1955 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29%。手工业和其他人体经济合作化的大发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组织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组。小商小贩所组织的合作小组，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销代购，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的经营方式，照旧保存它们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如前面所说，早已被革命消灭了。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有矛盾的。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这就是说，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保持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们在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几年来，我们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于私营经济基本上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就使得私营工厂工人免于失业，同时也使得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由于这个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维持下来，并且有一些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对于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起了辅助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突的，因此资产阶级中总是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或者违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条件方面，在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1950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1952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注意防止和纠正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

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从1950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了1954年，又进一步地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由于国家经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在1954年，这种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商业已经大量地发展起来。有了这些准备以后，到1955年秋冬之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润(例如1/4)给资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赎买的办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允许的，并且是有利的。这已经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这就是在企业改造的同时，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积极态度的，我们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们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们。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在资本家中举行讲演会，座谈会，开办学习班，组织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中间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顽固分子。一句话，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根据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并不

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这个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去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做到的。

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政策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在我们的面前还摆着许多迫切的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今后的任务呢？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政策，争取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且领导那些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但是我们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不允许有任务的强迫命令。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保证现有的100万个左右合作社尽可能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许多遗留问题，或者还需要调整现有的组织形式。多数合作社还缺少领导几十户、几百户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的经验，党必须帮助合作社的干部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这种经验。许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错误地忽视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为了有效地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合作社的组织，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并且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以前的个体农民，现在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员，这是几亿农民生活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合作社的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谨慎地担负起社员群众所委托给他们的重大领导职务，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的利益服务。他们应当了解：只有使社员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而且使社员的收入能够每年有所增加，这样的合作社才能够巩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经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顾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错误的。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要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将在长时期内保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下保持各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各种合作组织都必须注意保持和发展原来的个体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优良传统。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须不减少而要增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方面，同样地应当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方面的需要，分别地解决它们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不要轻率地作千篇一律的处理，以免造成损失。对于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继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并执行自己的在企业改造方面、生产方面和团结教育资方人员方面的任务，并且选拔职工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企业和管理工作。对于资方人员，应当进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建立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工作的良好关系，并且继续加强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只有在完成以上所说的各方面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彻底地解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够继续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不长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

三、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三年又八个半月。到明年，我国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编制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种成就了。

我们大力发展了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已经扩建了东北钢铁工业基地，开始了内蒙古、华中两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新建和扩建了一系列的电站、煤矿、油井，一系列的有色金属厂矿、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一系列的机器制造厂，一系列的轻工业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施工694个，完工455个。实际上，施工的项目将达到800个左右，而可以完工的项目则将接近500个。在计划规定的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亿元中，前3年所完

成的和今年计划完成的已经达到355亿元，占计划数83%。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90.3%，这个规定将超额完成。今年年度计划中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原计划的1957年的指标，而钢、钢材、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汽车轮胎、棉纱、棉布、纸张等项，今年的计划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1957年的指标。由于重工业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6,000千瓦至12,000千瓦的发电设备等等。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到1957年将有60%左右可以自给。

我国的农业，在总产值方面和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方面，也有可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计划规定1957年比1952年增长23.3%。在1953年和1954年两年都因为严重自然灾害，增长很少，但是在1955年已经比1952年增长14.8%。今年我国虽然又有比较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风灾，但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粮食产量是可能达到原计划1957年的水平。

在水利方面，我国过去3年内，在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和其他许多河流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进行了施工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此外，各地农村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

在运输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建设铁路新线4,000余公里，公路干线10,000公里，今年都将超额完成。

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也都有迅速的发展。

职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预计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1952年增长33.5%。国家和企业每年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费、职工医疗费、职工文教费和职工福利费，共约占每年工资总额的13%左右。4年总计约44亿元。国家在过去3年中修建的和今年计划修建的职工宿舍共达五千几百万平方米。

应当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个别的指标，例如石油原油、食用植物油、卷烟的产量，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将不能完成计划。但是整个说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超额完成。

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和工程项目，虽然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为了完成某些重大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计划，却还必须适当地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作紧张的努力。对于其他限额以上的工程，也要争取尽量地完成预定计划。

各个重工业部门虽然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为了保证基本建设计划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钢铁、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必须相应地增多煤、电、石油、有色金属和化学制品等等的生产。同时，还应当相应地解决运输和城市建设等问题。

在农业方面，必须进行严重的努力。粮食、棉花必须力求继续增产。油料作物、猪和其他牲畜、有些副业产品在过去几年中增产不快，有的甚至一度下降，必须由农业和商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它们的尽速增产。

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将紧接着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讨论和通过我们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同志将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专门的报告。

什么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呢？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这个方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简单地说来，就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般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第二个五年内，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上述薄弱的和缺少的项目，争取在1962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可以有70%左右能够自给，其中包括部分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我们必须逐步改善这种情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来发现种类更多和数量更多的地下资源，并且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在第二个五年内，基本的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左右。除继续建设东北、华中、内蒙古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外，将在三门峡周围地区、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在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以后，全国很多的机器制造工厂、冶金工厂、电站、煤矿、石油企业、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将拥有现代先进技术装备。

重工业各部门的生产需要大大提高。在1962年，需要把钢的产量由1957年原定的计划数412万吨增加到1,050万至1,200万吨，煤产量由1.13亿吨增加到1.9

亿至 2.1 亿吨，电产量由 159 亿度增加到 400 至 443 亿度。

轻工业也需要有比较快的发展。在 1962 年，要求棉纱由 1957 年的原定计划数 500 万件增加到 800 至 900 万件，食用植物油由 179 万吨增加到 310 至 320 万吨，糖由 110 万吨增加到 240 至 250 万吨，机制纸由 65 万吨增加到 150 至 160 万吨。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 1962 年，要求生产粮食 5,000 亿斤左右，棉花 4,800 万担左右，并且应当力争超过这两个指标。大豆、油料、糖料、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也必须积极发展；副业中的养猪业，特别需要努力发展。

铁路、公路、水运等项运输事业以及电讯事业都需要继续发展。对于原有线路应当逐步地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继续合理地组织运输，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现在的铁路运输已经在某些地方呈现紧张情况，必须积极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要求新建铁路 8,000 至 9,000 公里，把兰新铁路修到中苏边境，把西北、西南各省用铁路干线联接起来。

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轻视自己的技术力量，不去积极使用它和培养它，是不对的。

按照初步的计算，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国民收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增长 50%左右。除增加国家的积累以外，人民的生活将得到相当的改善。五年内，职工人数将增加 600 万人至 700 万人左右；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 25—30%；农民的全部收入也将增加 25—30%；粮食、棉布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如食油、食糖、煤油、煤炭等的供应，都将有所增长。

从以上所说的简单轮廓可以看出，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而迅速的进展。按照这个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更大的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了，我国的财政状况也随着有了改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资金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最有效、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增加建设费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一步节减军政费用。党中央在 1950 年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这个方针没有能够早日实现。虽然近年我国已经努力节减军政费用，但是，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32%，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 56%。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军政费用的比重下降到 20%左右，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 60—70%。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也必须适当地集中使用资金。因此，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第二个五年内必须首先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同时，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地使用而奋斗。我们的一部分消费物资必须出口，以便换来工业建设需要的机器装备。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这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以下，我们将就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概括地说明一下我们在过去几年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和当前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

工业

在工业方面，这里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的布局问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职工生活问题，企业领导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础的。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 1949 年，只占 26.6%。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我们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在 1952 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约占我国全部工业产值的 35.6%，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这个比例将有可能上升到 40%以上。

为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

我们决不能那样办。

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他们想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第一，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就可能出现商品不足的情况，就可能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并且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建设的时间比较短，资金的周转比较快，所以资金的积累也比较快，而轻工业所积累起来的资金正可以用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资金、原料、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对于建设重工业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在工业的布局问题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

为了合理地布置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工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上海、天津等工业区已经发挥显著的作用。在第二个五年内，除开充分利用东北和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发展工业上的作用。

在第二个五年内，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押，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中小型企业。

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一方面，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得不够，以致地方工业不能够合理地发挥潜在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机关也曾经不顾全国生产设备是否有余，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因而也造成了国家的损失。这两种偏向都必须纠正。

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无论地方国营企业或者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样，为了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工业、运输业以及其他一切部门的基本建设单位，都必须提高工程的质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我们已经生产了许多质量优良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建成了许多质量优良的工程。但是由于一部分企业的设备落后和技术水平不高，一部分企业缺乏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制度，特别是一部分企业的领导机关没有充分地重视保证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只是片面地重视保证数量和进度，所以有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是不好的，某些产品不合规格，成为次货。商业方面统购包销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执行这个制度所发生的缺点，以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曾经一度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也降低了许多轻工业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责任心，甚至造成了许多产品质量下降的严重情况。这些情况已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扭转。一切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短期内熟练地掌握有关的技术，并且逐步地改善设备落后的状况。一切企业都要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对于不合标准的产品和不合规格的工程应当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应当积极地改善原料、材料的质量和原料、材料的供应工作。对于轻工业产品，应当严格地执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并且在一部分产品中逐步地推行选购制度。尤其重要的，必须在一切有关的工人和职员中进行关于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思想教育，彻底地纠正那些对于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在入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渐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职工群众有许多困难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而忽视全国和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必须向职工群众说明。但是，在另一方面，片面地强调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忽视职工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也是不对的。目前职工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而且是可能解决的，之所以没有解决，只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工会组织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积极努力。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态度。

处理职工生活问题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一切企业的

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工作是不是健全。企业的健全的领导应当是怎样的呢？

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企业的领导者，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应当善于把企业的当前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善于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企业中各方面的领导骨干，都应当善于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积极帮助解决困难。

企业领导工作的改进，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努力，而且需要上级国家机关的努力。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并不是说，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需要减弱。恰恰相反，许多上级机关并没有真正深入企业，它们对于企业的领导往往是不及时和不具体的。我们的经济部门和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

农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业收入的增加方面提出了巨大的任务。应当怎样完成这些任务。

我们是在没有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机耕面积，预计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0。计划增加的耕地面积，同第一个五年一样，只能达到几千万亩，即近于全国原有耕地面积的1/20。化学肥料的产量，到1962年，每亩播种面积平均还摊不到3斤。因此，在第二个五年内，农业增产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采用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等项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应当看到，依靠这些措施，实现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在水利方面，现有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1/3，在其余2/3的耕地中，有许多是可以找到水源灌溉的。在肥料方面，人畜粪尿和绿肥等自然肥料，来源很丰富，肥效也高，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是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肥源的。我国农村有丰富的人力，而且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只要正确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上述措施，完成建议中的第二个五年的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在第三个五年内，保证粮食和棉花的增产，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保证其他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产品的增产，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统计，除去自给性的副业不计外，各种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产值，在全国农业产值中约占50%左右，接近甚至超过粮食所占的比重，因而对于农民收入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对于轻工业、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贸易的供应，又有极大的意义。拿养猪来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把养猪的数字从1957年的计划数1.38亿只增加到1962年的2.5亿只左右，就是因为养猪关系到全国城乡的肉食、农作物的肥料、猪肉猪鬃的出口，非大力发展不可。因此，各个地方的党组织、政府和它的农业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于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领导。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之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在发展副业生产的问题上，应当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的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目前，有许多合作社比较忽视甚至不合理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种偏向应当纠正。

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价格政策，一般地是适当的，是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的，但是，在执行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几年来，某些经济作物、养猪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不快或者减产，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些偏低。这些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当在经过研究以后，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

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增加收入。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90%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不但需要国家有正确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而且需要合作社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我们应当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商业

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在国内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按今年的计划将比1952年增长66.3%。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发展了城乡的物资交流，供应了人民的需要。在对外贸易方面，今年的进出口总值将比1952年增长65%。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的进口商品是以生活资料为主的；1950年以来，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已占90%以上。我国的对外贸易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对设备和器材的需要，并且发展了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友好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按照初步的估算，国内社会商品零售额1962年将比1957年增长50%左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由于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基本上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产品中的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部分，都在经过社会主义商业分配给工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大的消费群众。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民对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的需要增长，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由于对外贸易要求出口的物资愈来愈多，今后我国商业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人民群众和对外出口的需要，通过价格政策和采购措施来推动工业和农业增加产量，改善质量；必须进一步发展商业网，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对于工业品、农业产品的采购和供应，并且使商业网的安排，适应于商品采购的需要和群众购买的方便。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要求在目前认真地改进购销关系，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和适当地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我们的国营商业曾经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对于农产品，除粮食、棉花、油料由国家实行统购以外，其余的大部分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或者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对于城市和集镇的市场，实行了严格的管理，统一议定商品价格，并且限制了某些私商贩运活动的范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这就是前面说的，一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产品和事业产品减产，一部分物资交流受到妨碍。现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经过了12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经常波动。解放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基本方针是稳定物价。这就是说，不管当时某些物价是否合理，首先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在稳定以后，再对某些十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是成功的，它对我国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商业部门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在继续执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拟出一套适合于目前具体情况而有利于工农业的比较完整的价格政策和价格方案。收购价格的规定，必须达到有利于增产的目的，这是我们物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为了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在收购和销售两方面，都必须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对于当地收购、当地销售的商品，收销差价过大的，应当适当地缩小；而对于低值的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适当地扩大。此外，还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国家的物价政策而寻求不应有的商业利润的行为。

商业工作的巨大的任务，要求全国的商业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会做生意。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我国商业所积累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商业工作的干部和专家，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拿1949年同今年计划相比，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从116,000人增加到380,000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1,268,000人增加到5,860,000人，小学生数从24,390,000人增加到57,700,000人。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1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16亿册。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106,000张增加到今年的339,000张。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1倍左右，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也有相应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1956年至1967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的部门，在12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 12 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

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仅仅 7 年的时间内根本改变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的缘故吗？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缘故吗？

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

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参加了国家管理工作，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建设成为勤勉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由于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由于人民政府的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安定。

、资产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就是它首先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使国家成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统治剥削者的工具。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是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毫无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路线，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

事情很明显：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够取得胜利，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力量能够负起这种领导责任呢？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有远见的和大公无么私的领导，就是贫苦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必说本性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产阶级

了。我国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

人们会问：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真正的一种形式，那末，为什么又有其他阶级、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呢？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别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80%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都注意了继续加强这种联系。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着应有的重要地位。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农民。但是应当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于农民的具体利益重视不够的缺点还是不少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联盟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在同时，由于许多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过高地估计目前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和滥用合作化所产生的"便利"，在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继续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坚决克服这些缺点。

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比较分散，我们过去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比较薄弱。现在他们组织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已经吸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但是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

诚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是我国社会主义上除开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人数最少的一个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软弱性。但是不论在过去和现在，这个阶级在我国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在过去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见，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

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中得到帮助。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共 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党必须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将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他们。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贡献一份力量。

由此可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这个制度已经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工作就是完全健全的了。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常常脱离我们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不是发挥了而是妨碍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制度已经一切都已完备了。它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使自己逐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

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们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济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家的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我们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

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采取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的方针，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3,5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已经有2,800万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有220万人口的地区正在社会主义改造，有近200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300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今后，在尚待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这就是说，一切改革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有力斗争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

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键是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一些新的工业基础，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继续这样做。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应当为完满地实现国家的这个计划而共同奋斗。同时，为了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政府，还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举办一些地方工业。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是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

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几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汉族干部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的大多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党给他们的任务，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见，不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是由自己在那里包办代替。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某些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是有关的。

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有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民族在其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认为少数民族一无长处、样样不如汉族的观点，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

忽视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其中许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资源。如果认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单凭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所有上述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观点，都必须切实改正。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

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民的安全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我们在1950年领导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给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严重的打击。在1955年，我们又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的机关中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秩序，加强了国家的安全。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给以宽大的处置。大家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感到困难，因而在反革命分子中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是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在今后，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仍然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且应当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

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第290—253页）

反冒进

背景介绍

1956年经济计划的执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业总产值为586.6亿元，比上年增长3%，即139.1亿元，几乎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前三年实际增长的总和（即170亿元），总产值超过“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535.6亿元的9.5%。在“一五”计划所列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7种产品的产量，提前一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一五”计划的1/3，前三年只完成“一五”计划的54.6%，而加上1956年完成的在内，就达到了86%。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总产值仍然增加了27.4亿元，超过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23.8亿元的水平。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粮食总产量为365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154亿斤，增长4.4%，总产量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农业的大丰收为经济建设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必须根据我国的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要科学的计算和正确的政策。离开客观物质基础，认为通过批判保守思想就能批出一个高速度，这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是盲目急躁冒进的表现。

材料：

· 冒进 · 反冒进 · 反反冒进

材料　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从1955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产生了两种不同思路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一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近乎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

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5年，国民经济一直健康发展，成效显著。

在这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也热了起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过不久，在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三大改造高潮兴起已初见端倪后，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开始关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转而批判在这个方面存在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这些领导人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17条》。这个文件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不切实际地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推动力量，强调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项目更多、数量指标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它要求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7%、10.4%的速度递增，到1967年达到1万亿斤、1万万担。这样，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了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季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远景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而且使正在编制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受到继续加码的严重干扰。

这时，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思考和周密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的急躁冒进倾向。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数字都很大"。"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采取了防止冒进的积极措施，对影响1956年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各项主要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很高。这个计划要求工农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钢铁、煤炭、粮食、棉花分别比1955年增长15.9%、68.1%、61.4%、16.8%、9.2%、18.3%。同时，国家计委在这个月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也居高不下。稿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增长到5469亿元，15年共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到1967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有象征性的下降(仍然高达9500亿斤)，15年共增长2.9倍，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只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递增8.2%，才能实现9500亿斤的指标。

4月，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齐头并进，已经造成资金供应紧张、建筑材料与机器设备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开始混乱，使国民经济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周恩来、陈云等在这时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1956年计划还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1956年、1957年和第二、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但是，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对严峻的经济局势熟视无睹，有的甚至提出还要追加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

二

为了努力使国民经济持久地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从5月起，周恩来等把精力由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冒进的工作上。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同月，周恩来还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决1956年国家预算指标过高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提出必须"反对急躁冒进倾向"。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预决算报告稿，并研究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发生的冒进情况，从而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压缩指标，制止冒进。

首先，继续宣传反冒进，削减1956年计划预算指标，引导本年度经济工作由冒进向健康方向发展。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并根据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削减国家预算，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减至140亿元。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因此，"这次人大会议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15日，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因此，"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所接受。

由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这段时间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支持，以及6月20日《人民日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的宣传，使各级领导干部开始从思想上重视和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使本年度经济自下半年起，逐渐从冒进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二五"计划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否定冒进的"二五"计划方案，制订积极稳妥的

二五计划建议。

7月，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到编制"二五"计划建议上面。"二五"计划是1955年8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实际的轮廓数字，可是由于反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被纳入冒进的远景计划的"二五"计划的指标也跟着订高了。这些高指标使得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解决，编制工作陷入困境。

为了争取在仅有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能够向八大提交一个可行的方案来，7月初，周恩来连续召开3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第二方案。会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认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经过充分酝酿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继续削减"二五"计划指标，"精打细算"，"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8月，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又继续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国家计委在7月下旬提出的新方案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国务院已经敲定的、别人又在这个稿子上作了修改的粮棉指标，"到1962年粮食生产5200亿元、棉花5200万担"，修改为"到1962年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且在一旁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经过反复推敲，"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3年）的建议》，就这样诞生了。

第三，以"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为出发点，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指导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

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入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研究。这个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7月开始编制的。由于要照顾各方面提出的要求，因此计划控制数字中的某些指标仍然偏高或者是冒进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国务院举行了第10次常务会议，结合总结1956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实事求是地确定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经过充分的酝酿研究，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一五"计划，认为"成绩很大，可是应该承认，缺点错误也不少"，主要表现在"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他提出1957年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这个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确定。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后，陈云根据已经确定的方针，主持制订了1957年经济计划。

为了深入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1957年计划的制订和今后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发言。他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并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① 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并且说明应当以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②。

1957年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三

从1955年底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时间，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思路，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正当周恩来、陈云等开始全面总结"一五"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争取"二五"计划取得更大成绩而奋斗的时候，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关注，再次转移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

这时，毛泽东头脑中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赶超思想，开始以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下决心要使社会主义建设来一个"大跃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步骤地开展清算所谓反冒进错误的反反冒进斗争。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他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同周恩来、陈云曾多次指出过各项指标冒进了的《农业40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由于党内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所以在会上也没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见。

1958年1月，毛泽东又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头两天就抨击反冒进，指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性、方针性错误。16日，他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批评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44页。

②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44页。

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使反过冒进的领导人坐卧不安,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这时,再次耳闻目睹毛泽东批评的周恩来,在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准备的基础上,于19日晚作了检查。他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且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未作任何辩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但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在全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刮起"大跃进"之风。

接着,1958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在成都、4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3次会议继续反反冒进。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会上继续作检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在开会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为此,被认为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应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指定再次在中共党的代表会议上进行检讨。

在周恩来、陈云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①。

同时,开展反反冒进的目的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又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尤其强调"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大局"。这样,就使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发动的反反冒进斗争,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破常规、打破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而"大跃进"运动却演出了一幕使国家和民族遭受"大灾难"的历史悲剧!

(作者:史唯,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及"双百"方针的提出

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共中央在三大改造取得重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提出提前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于是,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召开大规模的会议专门来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充分利用科学知识,提高生产技术,加快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

材料:

· 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

材料　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

——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情况介绍

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的逐步开展,时时处处都碰到需要知识分子这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进入关键性的第4年,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

正是这个时候,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经过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自身的业务实践等锻炼,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

①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本变化。同时，建国后党和政府花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数量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以迎接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内却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六不”现象，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世界科学技术到50年代后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着，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发达国家各主要生产行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好同我国各主要生产行业的现状形成较大反差。

中共中央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根据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的问题，根据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状，感到迫切需要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这样，组织全党认真地研究和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制定一整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便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将于1956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以下简称中央10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为了做好筹备工作，本着“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的原则，周恩来、彭真等首先抓了调查研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特别是向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认真地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11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座谈会上，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领导小组。他认为：“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当天，他又召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布置这项工作。

中央10人小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向中央上报的调查研究材料，应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中小学校6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3类典型，并且要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做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3项内容，努力从宏观与微观、正面与反面等各个不同角度去研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为了更好地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央10人小组还组织人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观点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分类整理，编辑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知识分子问题(文献摘要)》。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花费很大精力对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对比研究，真切地了解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状况。这就为科学地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经过上述紧张而科学的调查研究，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10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同时，周恩来还主持起草了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与会人员济济一堂。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57位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1279人。

大会由刘少奇担任执行主席。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开宗明义，把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一)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强调要坚决摒弃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周恩来在报告中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强调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和建国后培养出来的“知识界的新生力量”,“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据此,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就科学地回答了在即将来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究竟依靠谁的问题。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产生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重要根源,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不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全党坚决摒弃这种错误倾向,消除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为此,他提出了3项有力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二)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思想,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作了深透的分析。他指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周恩来发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紧急呼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同时,还提出了既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坚持务实精神来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和方针、政策。

(三)提出了知识分子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要求,并且指出了改造的有效途径。

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知识分子需要继续进步的实际状况,并且从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需要改造的一般原则出发,指出:我国“正处在过渡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必须“继续改造”,党和政府也“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

接着,周恩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个方面都受了影响。”他强调说,“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上述情况表明,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以及知识分子需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主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16日至20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进入小组会讨论和大会发言阶段。在大会上发言的有61人,另有26人因时间关系未能在会上发言,会议印发了他们的发言稿。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11个专题报告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发言一致拥护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的基本精神,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共识。与会代表还对周恩来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提出了重要的补充修改意见。会议决定,上述文件经最后修改定稿后,将公开发表或以文件形式下达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肯定“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并且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三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工作。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指示“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

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5月，成立了国务院专家局。根据知识分子会议的决定，专家局立即担负起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并据此制订了工作计划，以改善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为重点，指导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处理。

根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6年2月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和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组织领导下，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于10月编制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及若干方面的具体计划。这个宏伟规划在1962年就基本上实现了，总共提前了5年时间。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再一次重申：“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选自《党史文献》，作者：熊华）

风云人物

谭平山

谭平山（1886—195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之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谭平山原名鸣谦，字诚斋，号聘三。广东高明（今高鹤）人。出身贫苦，其父为裁缝。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又加入国民党。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和雷州中学校长。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学习。1918年11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关押。1920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并与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创办《群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

1921年初，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谭平山和陈公博等在广州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任支部书记。接着，又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宣传员养成所”。9月，陈独秀离开广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书记，广州的工作则由谭平山全面负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谭平山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主任。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候补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3年6月，谭平山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后任中央驻粤委员。11月，他和廖仲恺等九人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谭平山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组织部长。积极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利用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机会，安排了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的各级领导职务，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平山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共驻国民党党团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成员和组织部部长。11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谭平山和苏兆征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国民政府工作，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兼任农政部部长，积极协助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工作。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农

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等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平山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北伐战争的胜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大革命后期，他也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发表《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8月，谭平山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是主席团的实际主席。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又辗转到达香港。11月，在"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给予了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了党籍。1928年，谭平山从香港回到上海时，才知道自己已被开除出党，既无处申辩，也无法再参加党的工作。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谭平山即和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即第三党。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枪杀后，谭平山亡命香港，后又移居欧洲。这时，他仍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斗争。1933年11月，退出第三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谭平山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斗争。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恢复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设计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以后，蒋介石的反共独裁面目进一步暴露，也由于周恩来、董必武等的关心和帮助，使谭在政治上逐渐同党站在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43年夏，他和陈铭枢、杨杰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被选为五个常务委员之一，是实际上的主席。

解放战争时期，谭平山继续公开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和独裁的政策，使蒋介石又恼又恨，企图加以暗害。为此，他于1947年出走香港，与国民党政府决裂。1948年1月，他在香港参加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5月，他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身份同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不久，到达东北解放区，并转赴北京，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和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副主席等职。1956年4月，在北京病逝。

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爱国人士。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生于江苏苏州。其祖父曾任苏州知府。7岁时开始读私塾，1903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1904年，参加殿试，中进士。1905年，以新科进士身份被派往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

1907年，沈钧儒回国后，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并兼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曾聘请鲁迅为该校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宣布独立，并成立了都督府，沈钧儒任警察局局长。1912年5月，经褚辅成介绍，加入同盟会。8月，参加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

民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浙江教育司司长、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孙中山成立的广州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政学系创办的《中华新报》主笔、参议院秘书长等职。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段祺瑞毁法，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等斗争。1923年，沈钧儒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并从事宪法的研究与著述。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时，沈钧儒和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支持北伐战争，反对盘踞东南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北伐军攻占浙江后，成立了浙江省临时政府，沈钧儒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省政府被解散，沈钧儒也遭到逮捕。不久获释，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业务，曾掩护和营救过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33年，他参加了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

1935年12月，沈钧儒和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对敌经济绝交"等十二项主张。1936年1月，他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及其他爱国人士，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他和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华南、华北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救亡团体，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他和章乃器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1936年11月，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即"七君

子”入狱。在狱中，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继续坚持爱国立场。与此同时，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7月31日，在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把“七君子”释放出狱。

出狱后，沈钧儒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2月，他在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任主席，并创办了《全民》周刊。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发行量达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这时，他和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11月，沈钧儒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认为“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沈钧儒是创议人之一。1942年，沈钧儒和救国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该组织改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沈钧儒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在抗战期间，他为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成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选为主席，积极参加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之一，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达成了政协的五个决议。7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沈钧儒又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1947年1月，他出席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并当选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并被强令解散。他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担负起了恢复民盟总部的工作。

1948年1月，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重建民盟临时总部，由沈钧儒、章伯钧等常务委员轮流代理民盟主席(主席张澜当时还在上海)。5月，他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9月，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他和郭沫若、李济深、谭平山等55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公开声明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蒋介石，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6月，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之一，参加了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因新中国已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全部实现，1949年12月，沈钧儒主持召开救国会会议，发表宣言，宣告历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主席等职，张澜逝世后，沈钧儒于1956年2月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50年，他曾率领中央访问团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慰问。1951年，他出席了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该会副主席。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会议上曾指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1963年6月，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珍闻轶事

袁光回忆审判日本战犯

1956年在沈阳，我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代表6亿人民审判了日本战争罪犯。

1956年1月，参加审判工作的检察院、法院、司法部三个单位的有关人员，集中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分别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几次听取审判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从中日关系长远利益和对日本人民深切的同情出发，做出了不让日本负担对华战争赔款的决策，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董必武和彭真多次对审判准备工作进行直接指导，尤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定要遵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熟知日本情况的廖承志两次给特别军事法庭的同志作报告，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使有关人员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还请国际法专家、担任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教授等三人当我们的顾问。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分赴沈阳和太原，准备开庭。

1956年6月9日，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开庭。

受审的日本战争罪犯是:前日本陆军第一七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第五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第五九师团第五三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第三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五九师团第五四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第一三七师团第三七五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少佐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和第三九师团第二三二联队本部中尉俘虏监督军官兼情报宣抚主任鹈野晋太郎等8人。

开庭后,我请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上所控告的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根据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人的证词一件一件核实的。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8名被告人一一低头认罪。

法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退庭进行评议。经过3天评议后,于19日上午8时30分开庭宣判,宣读了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徒刑20年,藤田茂、上坂胜徒刑各18年,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徒刑各16年,船木健次郎徒刑14年,鹈野晋太郎、木神原秀夫徒刑各13年。刑期至判决之日算起;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在沈阳审判的同时,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分别审判了日本特务间谍案及原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等9名被告人的战争犯罪案;7月份,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又审判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都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过各种不同的重要军政职务,分别犯有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僭夺我国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等罪行,并分别判处20年、18年等不同徒刑。

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先后分三批释放了1017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7月22日,特别军事法庭又将身患重病的武部六藏予以假释。至此,我国关押的1062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全部处理完毕。

(摘自《辽宁党史通讯》第3期《历史的审判一回忆在沈阳审判日本战争罪犯》一文。)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经过

据我从侧面所知,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得比较早,而且很明确。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针对创办《历史研究》这个刊物第一次提出来的。我所知道的事实经过是这样:

1953年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在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和其他与加强历史研究有关的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和黎澍。郭沫若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讲话。记得他说,最近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一个是语言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胡乔木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对于办刊物,经过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我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这时对我和尹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但有两点,陈伯达没有明白地讲:(一)这次开的会是否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集会?(二)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会上谁也没有对这两点提出询问。

知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我记得那是两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

今年5月中旬,也就是报纸上发表文章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在档案中查到了线索。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陈伯达在讨论“讲话”中发言,说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他一陈伯达在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上传达了这个方针。这是当时的记录,应当算是文献了。同一天,毛泽东作讨论总结,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宣布《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在讨论之后,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陈伯达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上讲的,没有正式指出名字,在怀仁堂大会上递条子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都说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事关重大,陈伯达不可能随便讲,而且再三重复。至于这个方针是对办历史刊物讲的,还是对历史研究委员会讲的,它本来是一回事。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措施之一,就是办《历史研究》刊物。第二,头一次提出百家争鸣,并且作为一条方针,是在1953年8

月5日以后，10月初以前。因为陈伯达讲得很明白，请示方针，是在委员会成立以后；而传达方针，则在10月初第一次委员会上。第三，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看来最初并没有赋予这个口号以后来全面讲双百方针那种重要意义。而且百家争鸣，后来的解释也几经变化。但不管如何追踪，“百家争鸣”作为一个方针的历史，它的起头是在1953年秋天。

（摘自《文献和研究》第4期《“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一文，作者刘大年。）

“双百”方针未能贯彻的原因

三十年来，“双百”方针未能贯彻的原因，首先在于我们党在这一方面工作中的指导思想的失误。

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演说。社会现象是具体的，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我们往往简单地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丰富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被广泛引用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明证。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竟然只剩了这样一句话！这样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又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永久化、简单化，忽略了历史条件，不区别研究的领域，用阶级斗争的眼睛看待一切问题，必然使“双百”方针受到干扰乃至破坏。

对知识分子的“左”的看法和政策。早在1955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解决，有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又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大整党外知识分子；在反右倾斗争中又大整党内知识分子。其间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提出“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批判打击。

强调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实际上二者很难分开，特别是社会科学，本来是学术问题，很容易被上升到政治问题，于是“双百”方针就不适用了。我们过去往往试图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来维护“双百”方针，其实这是消极的，也是办不到的。要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承认人民在政治问题上根本不应该有发言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都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双百”方针无非是人民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说法，这种自由必须以宪法规定的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言论自由获得充分的保证为前提。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证。三十年来，“双百”方针的曲折无不与此有关。

关于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的立论的错误，是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一分为二”的结果。于是，自称为无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其实未必真是），就可以排斥或否定被称为资产阶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其实也未必真是），并给扣上越来越吓人的政治帽子，于是扣帽子、打棍子流行起来。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科学、艺术都是这样，当然不只两家，也不是那么简单地都可以归之于两家，就是无产阶级内部、资产阶级内部也不能只是两家、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学术流派是不科学的。照此办理，只能产生一言堂，乱贴政治标签，使帽子、棍子满天飞，何来“双百”方针？

不了解学术发展的规律，不承认认识是逐渐完成的，不允许犯错误，一认为是错误，就帽子、棍子交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问题。自然科学中试验几百次、上千次是常有的事，而社会科学中却不容许犯一次错误，那还有什么学术自由讨论，还有什么百家争鸣！

文化中专制主义流毒的影响。党中央在提出百家争鸣时指出，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但是，由于文化中专制主义流毒的影响，往往有这样的领导人，不是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学术工作者之一的平等身分参加讨论、说话或写文章，通过自由讨论，寻求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自居，自己以为什么都懂，什么都是专家；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纯洁性自我标榜，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或者好像他自己就是党的化身，说什么“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说话”。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学术自由讨论就此破坏殆尽。

对于“双百”方针之不能认真贯彻，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原因，上面几点可能是其中荦荦大者。当然，提出了“双百”方针是向民主自由跨前了一步，而“双百”方针三十年饱经沧桑，不能贯彻执行，溯本求源，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加上高度集中统一的斯大林模式。

邓子恢倡导总结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

在经营管理上，邓子恢倡导总结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1954年4月，他在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

告中指出，农业合作社要把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搞好，建立责任制。从实践看，当时不少初级社，实行了包工作业。山西省在1953年建立的初级社中，有80%左右采用了这种制度。1954年秋季河南省郏县92个初级社，其中实行临时包工的有40个，实行季节包工的19个，实行常年包工的6个，实行包工包产制的3个，采用死分活计的只有24个。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为提高劳动效率起了重要作用。

从1956年1月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转向以办高级社为主。3月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54.9%。由于办社形式改变过快，经营管理比较混乱，许多高级社没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制，社员干好干坏分不清，影响了生产。

针对这一情况，1956年4月，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级社要搞好生产，必须"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同年6月，他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没有全面的计划管理，没有具体的劳动分工，没有适当的定额管理制度，是不可能办好的。管理不善，分工不明，定额偏高偏低，都会造成生产上的损失。必须帮助他们迅速编好固定的生产队，划分耕作区和副业组，制定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计酬，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建立牲畜的饲养管理使用等制度，并要制定适当的增产指标。

邓子恢的上述意见，在一届三次人代会上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得到了体现。《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实行包产和超产奖励""合作社可以实行包工，按照所计算的劳动日数量，把生产任务包给生产队。"

为了实行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1957年9月14日，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物"的"三包制度"；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可以实行"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等。9月15日，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把一年来各地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制度做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对党中央的上述指示做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所谓"三包制"，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好办法。是比较少弊端、少争吵，从而也是比较进步的制度。他在说明这一制度的同时指出，某些深远山区三五户的小村庄也可以包产到组，个别不适宜集体包产和零散的农作物也可以包产到户。

所谓"工包到组"、"组包片"，是处理队与组关系的一种好办法。他认为，按片按季节包工，比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好，是比较进步的，可以避免队长"临时派工"浪费时间的毛病。我国在初级社就采取了评工记分的办法，高级社化后仍沿用。这个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办法，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说明，早在五十年代，邓子恢就提出按季节包工，取代评工记分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见，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一个大胆尝试。

所谓"田间零活包到户"，是处理组与组员关系的一种灵活的办法。采用这一办法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可以避免耕作粗糙的现象。

所谓"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就是说劳动组织必须适合于生产的需要，他说，"敲钟集合、等齐下地"，"干活一窝蜂"、"班排进攻"这类浪费劳力的做法，必须克服。就是集体干的活，也要分块、分地段、划清界限，彼此分头进行，贯彻执行个人责任制，以收人人努力之效。

他还对牲畜实行"分户喂养、养用合一"等制度作了说明。

他强调指出，既要增加劳动出勤率，又要提高劳动效能，就必须建立健全适合于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管理制度，把社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集体劳动要有统有分，统分结合。1957年9月，邓子恢在关于农村情况和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一些地方误解了集体劳动，锄地、耕田、拔草，都一窝蜂在地里干活，像打老虎一样。这叫没有明确分工个人负责。有些事可以集体劳动，有的事情不要集体劳动。这几年来思想方法有毛病，说社会主义要集中，就不能分散，分散就是个体经济，这是机械运用教条。遗憾的是这一远见卓识的思想，并没有被接受。几十年来，我们把苏联集体农庄的集体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固定模式，片面的理解为分散就是搞个体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高级社化后，尽管遗留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推广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粮食还是增产的。

在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邓子恢依然主张在人民公社内实行三包一奖制。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他进一步阐述了农业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并为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做了很大努力。他的许多见解，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广大农村逐步推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向前发展了。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邓子恢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见解》一文，作者高化民。）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始末

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是1956年1月由周恩来首次提出的。这一论断在提出之前有个形成的过程；在提出之后，经过长时期的曲折道路，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建国初期，鉴于我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谨慎，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划分，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明确规定：“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教育部指示，人民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育部曾为此通告全国。实践证明，上述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到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明确地提出和详细地阐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周恩来对这一论断的提出和阐述，形成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理论和思想，这是我党在认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为我党从总体上正确地制定知识分子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这一正确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在1961年和1962年期间，为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我党曾经作过重大努力。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到“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倾错误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党不仅完全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而且在此基础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又有新的发展。

其中，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的这些论断，首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实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拨乱反正，起了先导和关键作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又进一步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作用，党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了重大的改变。主要表现为：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强调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强调科学文化程度高一些的比低一些的、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在物质待遇上要高一些；强调吸收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等。这些政策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和关怀，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重大的作用。

（摘自《学习与研究》第2期，作者荣国章。）

流行风

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短篇小说。作者王蒙。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后收入《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小说通过一个区党委组织部新调来的年轻干部林震与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之间的矛盾，深刻地抨击了我们国家机关内部有待于克服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林震原来在小学当教员，是个对党忠诚、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理想的年轻共产党员。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发现厂长王清泉工作不负责任，官僚作风严重，根本不适合当厂长。于是回到区委会，林震便把自己的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只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但不让他“陷到这里边去”。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说“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但这不是违法乱纪，“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林震觉得韩常新整理简报凭主观、不真实，而刘世吾却打着哈哈说老韩真高明。林震勇敢地提出区委会存在许多缺点，刘世吾便开导他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

完成的”。刘世吾给林震的印象是突出而新鲜的：他工作很多，却能一星期看完四本《静静的顿河》，拼音文字草案公布的第二个月，他便开始在开会时用拼音文字作记录了；某些传阅文件，他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听汇报时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材料；当秘书赵慧文因家庭生活的不快找到他时，他只是空发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对林震的工作热情和主动精神，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冷嘲热讽；他还有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刘世吾参加革命多年，工作上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但他对工作失去热情，变得冷漠、保守、敷衍、疲沓。在区委会唯一能与林震沟通的是赵慧文，她也曾“看不惯”、“激动地吵过”，但他们渐渐明白“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当王清泉的问题被党报揭发后，区委书记亲自过问，王清泉终于受到应有的处分。林震觉得这件事充分暴露了组织部工作拖沓的缺点，应该很好地检查，接受教训，改进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带到了常委会上，满以为会引起震动，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又一次失望。不过，会后有人通知他区委书记找他，他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小说到此结束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

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铁路线上活跃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的领导下，专门破坏日寇的铁路运输线，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日寇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围歼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在战斗中负伤，在芳林嫂家里养伤时，与寡妇芳林嫂产生了爱情。日寇屡遭失败，老羞成怒，到处放火烧村庄，激怒了刘洪，他决定在微山湖边摆开阵势与敌人决战，李正赶来劝阻，不幸负伤，将队伍撤到微山湖，才免遭损失。游击队经过休整，队伍扩大了，打得敌人寸步难行。日军军官小林调集了鲁南地区全部日伪军，进攻微山湖，企图消灭铁道游击队。刘洪带领游击队杀伤鬼子主力部队后，化装日军突围出来，并全歼了岗村特务队。抗战胜利前夕，李正伤愈归队。游击队打击了蒋军，救出了被捕的芳林嫂，截击了逃跑的日寇。

影片具有传奇色彩，游击队员的塑造各有特色，歌颂了游击战士的机智、勇敢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电影《上甘岭》

一九五二年秋，美国侵略者在板门店谈判休会期间，在朝鲜中部三八线附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夺取我上甘岭阵地，并进而攻占五圣山，用武力达到他们在谈判桌上达不到的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下，坚守上甘岭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接着，他们又根据上级的指示，撤进坑道，拖住敌人的进攻。后来，他们与后方的联系被敌人切断，粮少弹缺，情况十分艰难，但他们凭着惊人的毅力，在坑道里坚持了二十四天，赢得了时间，使我军取得大进攻的胜利。从而使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迫使美国侵略者在板门店重新坐下来谈判，并无可奈何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张忠发等志愿军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电影《祝福》

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

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一个穷僻的山村里，早寡的祥林嫂得知婆婆和远房亲戚卫老二，要把她卖给山里的贺老六做老婆的消息，逃到鲁镇给镇上的地主鲁四老爷家当佣人。第二年的清明时节，她在河边洗衣服，被卫老二和她的婆婆抢走，卖给农民贺老六。一年后，祥林嫂生了一个儿子，夫妇感情很好。后来，贺老六为还债，干活累出病来，断送了性命，祥林嫂心爱的儿子阿毛也被狼衔去，房子也被大伯收去抵债。祥林嫂只得重回鲁四老爷家帮佣。道貌岸然的鲁四老爷把祥林嫂看成不吉祥的罪人，每逢祭祀拜神时，碗筷器皿都不让她沾手。后来，她听人说只要在庙里捐一条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就能洗清罪过。她照这样做了之后，在一个祝福的晚上，她兴冲冲地端了供品出来，不料被主人大加责骂，将她驱逐出门，从此过着流浪行乞的生活，终于在又一个祝福的年夜，在漫天风雪之中死去。这是夏衍同志解放后电影创作的一代表作。并为以后文学名著的改编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电影《家》

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

辛亥革命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正在衰落崩溃。高家长房的三个儿子受着封建礼教的压迫。大少爷高觉新极其软弱，不敢怒，不敢言，屈从于封建礼教和家庭包办婚姻，牺牲自己与梅小姐的爱情和幸福，被迫与李瑞珏结婚。后，瑞珏也被折磨致死，家境一天天衰败下去。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觉新最后终于开始觉醒。二少爷高觉民与琴小姐相爱，为争取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而进行斗

争，最后拒绝家庭包办的婚事，离家出走。三少爷高觉慧与丫环鸣凤相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孔教会会长冯乐山要娶鸣凤做小老婆，鸣凤不从，投河自尽。觉慧毅然脱离家庭，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电影《十五贯(昆曲)》

根据浙江昆苏剧团《十五贯》整理小组整理本改编。

常州府无锡县肉铺老板尤葫芦借来十五贯本钱，他逗弄女儿苏戍娟说是卖她的身价。女儿信以为真，当夜逃走。

深夜，专靠赌博为生的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为偷盗十五贯钱，杀死了尤葫芦。天明，街邻发现尤葫芦遇害，找来官差，娄阿鼠乘机诬告苏戍娟谋财杀父而逃。

苏戍娟逃出后，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追赶来的邻人对他们两人产生怀疑，恰巧又在熊友兰身上搜出十五贯钱，于是就把两人扭到县衙。知县过于执听信了娄阿鼠的话，以苏戍娟勾结奸夫，盗钱杀父的罪名，将苏戍娟、熊友兰判了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其中有冤，在都堂面前力争延缓斩期。况钟经过调查，发现娄阿鼠有嫌疑，又得知他现藏在东岳庙内，就乔装算命先生，以看相测字为由，套出娄阿鼠确是杀死尤葫芦的凶手，便将娄带到衙门，升堂问罪，终于揭开了十五贯的真相。

诗歌《回延安》

抒情诗。作者贺敬之。发表于《延河》1956年第6期。后收入作者诗集《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9月再版)。这是一首表现了特定时代情绪的抒情名篇。诗人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对革命圣地延安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离别十后后重回延安，心情无比激动："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要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诗人进而描写延安亲人的欢迎，回忆自己的成长，赞颂延安的巨大变化和伟大历史功绩。诗篇由难忘的会见场景生发开去，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歌颂延安人，歌颂延安精神，使诗的激情升华为革命之情，人民之情，时代之情。这火样的激情，既来源于诗人对生活的挚爱，也来源于诗人对历史和时代的深刻认识。全诗采用了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以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和清新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诗篇将"黄土"、"宝塔山"、"白羊肚手巾"、"小米饭"、"油馍"等陕北高原和延安特有的、带典型意义的事物，编织成诗意葱茏的画面，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诗篇还精选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准确而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感情上的每一微妙而具体的感受，"抓"和"贴"，就用得贴切传神。恰当地运用比兴手法，又增强了诗的抒情情绪，收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历史档案

我国首次颁发科学奖金

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得奖论著已经评选出来。得奖的研究成果共有34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这些得奖研究成果的作者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和业务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得奖人将获得金质奖章、奖状和奖金。奖金一等奖一万元，二等奖五千元，三等奖二千元。

中国科学院颁发1956年度
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通告

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1956年度评奖工作，已进行完毕。现将评定结果公布如下(次序分学科排列，同学科同等奖按姓名笔划排列)：

科学研究论著名称	作者	作者工作单位	奖金等次
数　学			
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	华罗庚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一等奖
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	吴文俊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一等奖
K展空间和一般度量空间的几何学，射影空间曲线论	苏步青	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二等奖
力　学			

项目	作者	单位	奖励
工程控制论	钱学森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一等奖
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	钱伟长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二等奖
	合作者	胡海昌　叶开沅	
塑性大应变的轴对称平面应力问题在金属硬化区的解法和一般性的结果	李敏华(女)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三等奖
横观各向同性弹性体力学的空间问题	胡海昌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三等奖
物理学			
金属中的内耗与金属的力学性质的研究	葛庭燧等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二等奖
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的研究	何泽慧(女)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三等奖
	合作者	陆祖荫　孙汉成	
关于晶格的理论	黄昆	北京大学	三等奖
卤素计数管与强流管的制备和戴传曾它们放电机构的研究	李德平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三等奖
	合作者	项志遴　唐孝威　李忠珍(女)	
化　学			
贝母植物碱的研究	朱子清	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三等奖
	合作者	陆仁荣　黄文魁	
橘霉素化学的研究	汪猷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三等奖
	合作者	丁宏勋　屠传忠　贾承武	
分子结构理论	唐敖庆	东北人民大学	三等奖
高分子化合物分子量测定的研究	钱人元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	三等奖
动物学			
关于蓖麻蚕的试验研究	朱洗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三奖等
	合作者	张果　蒋天骥　王高顺等	
植物学			
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	钟补求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二等奖
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	曾呈奎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	三等奖
	合作者	张德瑞	
农　学			
兔化牛瘟病毒的研究	袁庆志	哈尔滨兽医科学研究所	三等奖
	合作者	沈荣显　氏家八良　李宝棨	
医　学			
中华按蚊在自然情况下传染马来丝虫的研究	冯兰洲	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三等奖
地质学			
辽东太子河流域地质	王钰 卢衍豪 杨敬之 穆恩之 盛金章	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	三等奖
中国古地理图	刘鸿允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三等奖
三水铝矿和高岭石加热相变化的研究	章元龙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三等奖
地球物理学			
西藏高原对于东亚大气环流及中国天气的影响	叶笃正 顾震潮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等奖
关于弹性波的传播理论与地震探矿的一些问题	傅承义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等奖

项目	作者	单位	奖级
动力学			
燃气轮的研究	吴仲华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	二等奖
冶金学			
钢中氢气的研究	李熏等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三等奖
低合金钢代用品的研究	吴自良 周　仁等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	三等奖
球墨铸铁的研究	周行健 邹元义等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	三等奖
关于奥氏体共格性的转变机构	李　林(女) 柯俊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三等奖
石油化学			
合成汽油的芳烃化的研究	彭少逸 郭爱贤 陈英武等	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	三等奖
氮化熔铁催化剂用于流体化床 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	章元琦 楼南泉 张存浩 王善鋆等 卢佩章	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	三等奖
土木建筑学			
直流电在土中作用及其对土的物理力学性的影响	汪闻韶	水利部	三等奖
变截面刚构分析	蔡方荫	建筑工程部	三等奖

对以上科学研究论著的作者，由中国科学院授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章、奖状和奖金。奖金一等一万元，二等五千元，三等二千元。对集体工作的奖章、奖状授予和奖金分配，按“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处理。对获奖论著的书面评审意见将在“科学通报”刊布。

院长：郭沫若

（摘自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

体育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修改草案）于1956年4月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体委）公布试行。

体委在1956年4月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公布试行。根据这些条例，参加田径、体操等32项体育运动的运动员，可以按照他们的运动成绩等条件，获得等级运动员称号。等级和称号共分五级：运动健将、一级、二级、三级、少年级。裁判也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同时公布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于1956年7月下旬至8月初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加强领导各级体育协会，充实基层活动。对于“劳卫制”项目标准（草案），决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并且对于推行劳卫制锻炼，需视本身条件决定，并必须防止事故。

第一批运动健将

1956年10月18日，体委宣布了我国第一批40名运动健将的名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授予他们运动健将的证章。这批运动健将的名单如下：

田径（男子）

刘敬仁　李中林　周连立　李大培　马翔龙　蔡艺墅　徐体权　于金安　马长路

田径（女子）

交蕴珍　郑凤荣　石宝珠　傅雪雁

体操（男子）

鲍乃健　王辉泽　乔振英　吴树德　韩毅　陆恩淳　徐仁杰　杨健民

体操(女子)

陈孝彰　戚玉芳　蓝亚兰　郭可愚　张飞子　郑馥荪　姜秀芝　孙孝贞

游泳(男子)

林锦珠　穆祥雄　戚烈云　王强立　陈运鹏　徐致祥

举重

陈镜开　林仲英　殷国华　李白玉　黄强辉　赵庆奎　朱鸿全

射击(男子)

张铉　李杰　董瑞光　张志明

射击(女子)

曹靖芬　傅洁

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56年11月22日到12月8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选派一支队伍参加这届奥运会,于10月7日在北京举办了参加第16届奥运会的选拔赛,参加选拔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运动员1,400多人,包括来自香港、澳门的选手。经过比赛,共计选出运动员98人,组成了中国选手队,参加田径、体操、游泳、举重、射击、篮球和足球比赛(我国早已取得足球复赛权)。选手队名单如下:

田径队:蔡艺墅、张启山、于金安、马长路、周连立、李中林(以上男子)。石宝珠、郑凤荣、傅雪雁、姜玉民、文蕴珍、刘玉英、刘兴玉、郑玉如、姜培珍(以上女子)。

举重队:陈镜开、陈永博、殷国华、黄强辉、朱鸿全、赵庆奎、李白玉。后备队员:林仲英、徐鸿林。

游泳队:穆祥雄、戚烈云、徐致祥、林锦珠、穆瑞龙、李喜庆、林立、张天辉、张家琛、黄阜峋、何仕根(以上男子),戴丽华(女)。

体操队:男子组:鲍乃健、王辉泽、陆恩淳、徐仁杰、杨健民、乔振英、韩毅、吴树德。后备队员:夏德君、杨家杰。女子组:郭可愚、陈孝彰、戚玉芳、蓝亚兰、张飞子、郑馥荪、姜秀芝、孙孝贞。后备队员:马文娟、王毓玫。

射击队:张志明、谭炳贵、张铉、董瑞光、李杰、韩国斌、赵善俊、刘佳秋、徐雨华、张守智。

篮球队:王利发、白金申、杨伯镛、王兆钰、鞠汾康、米宝荣、蔡集杰、刘二柱、张锡山、刘贵乙、钱澄海、马清盛。

足球队:张俊秀、徐福生、朴万福、孙宝荣、王德发、谢鸿钧、王克斌、陈成达、王立惟、张京天、成文宽、丛者余、陈家亮、张宏根、崔曾石、史万春、年维泗、方纫秋、孙福成、王陆。

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违反在一个国家只能承认一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原则,无理坚持两个中国奥委会和允许台湾单独派运动员参加第16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甚至无理干涉中国人民内部的事务,妄自修改我国的名称,而且还接受了所谓台湾体育组织的诬蔑性提案,要在国际奥委会第52届会议上讨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通知台湾运动员参加10月在北京举行的我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的问题。更令人愤慨的是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竟在奥林匹克村开幕式时,升起了早已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集团的旗帜。在我们提出坚决抗议以后,国际奥委会和第16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仍不改正错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荣高棠特致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和第16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不能容忍这种人为地分裂中国的阴谋”,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信誉,遵守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宪章,迅速改正这一错误作法,而在中国只承认一个国家奥委会,这就是唯一能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取消台湾派运动员单独参加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权利”。并坚决表示“在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中国的运动员不能够参加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国选手队曾在广州、武汉和上海等地举行表演赛,取得不少新成绩,如女子铁饼运动员创造了五十公尺九三的新纪录,最轻级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挺举成绩达到一三五·五公斤的世界最高纪录。

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苏联运动员以622分名列第一,美国的运动队第二,共得497分。14个国家运动队获得名次和总分列表如下。除这14个国家之外,还有31个国家各得3分。

国名	获得名次的人数						分
	1	2	3	4	5	6	
苏联	37	29	32	15	22	9	622
美国	32	25	17	18	10	8	497
澳大利亚	13	8	13	9	10	5	239.5
德国	6	13	7	15	8	8	204
匈牙利	9	10	7	8	11	5	193
英国	6	7	11	6	9	8	162.5
意大利	8	8	9	6	3	4	161
瑞典	8	5	6	5	6	7	140

日本	4	10	5	6	4	5	130.5
法国	4	4	5	6	6	6	105
罗马尼亚	5	3	4	5	4	4	93.5
芬兰	3	1	10	6	2	3	91.5
波兰	1	4	4	6	2	7	70.5
捷克斯洛伐克	1	4	1	8	2	9	65.5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预见1956年将会出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号召全国人民为提早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1月7日　国民党台湾民用航空局台北旅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事务员翟笑梧，驾驶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一架，起义飞回祖国大陆。

1月30～2月7日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陈叔通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董必武的《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陈伯达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2月1日　国家计委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发出《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下达问题的意见》。

2月1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地方各级计划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通则规定，地方各级计划委员会是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受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在计划业务上受上级计委和国家计委的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计划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国家颁发的各项政策、指示、控制数字，并结合当地情况，对本地区各个经济部门和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的一切资源，综合编制本地区的经济计划，并且组织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统计工作必须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社论。指出：统计工作是国家计划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经常地掌握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连续的完整的统计资料。

3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普遍整顿合作社，开展春耕生产》的社论。指出：当前农村的迫切任务，是整顿巩固合作社，开展备耕工作，以迅速建立合作社内的生产秩序，迎接大规模的春耕生产运动。

3月5日　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指出：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底以前速度慢了一点。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以100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手工业的总产值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低了一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要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保护民间老艺人。国家应帮助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

3月12日　中央发出《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号召全国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争当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下，争取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3月16～26日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召开全国城市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研究了城市手工业合作化工作中存在的集中和分散生产的问题，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供产销、生产资料作价、保护特种工艺等问题，并且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意见。4月底，全国组织起来的人数达450万人，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

委会党组《关于当前手工业合作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领导手工业生产和改造工作。《报告》还对手工业改造范围的划分,手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生产资料和股金处理,小业主入社,以及保护、提高特种工艺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

3月30日 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企业改组方面,采取大部不变、小部调整的方针,80%的企业在改组中不合并。为保证公私合营后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他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对部分百货商品,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对商品设计人员要给予奖励;实行优质优价;保证供应优质原料;并由内行的人专门负责抓质量、品种。在资方人员的安排方面,他指出,合营以后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适当安排,原来担任经理的可以在改组以后的企业或公司里担任经理或副经理。资方人员的工资不予降低。夫妻店公私合营以后,除少数经营商品与人民生活关系不大的可采取合并起来给定息、拿工资的办法外,一般不予合并,只采取经销、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

4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提出,必须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

4月6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最近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审判工作在新形势下正确执行国家刑事政策的问题,确定了当前人民司法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严格遵照国家的政策法律,为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革命法制,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4月20~5月10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使全国范围的正在开展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2日 根据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国华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以陈毅为首,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3月26日前往拉萨祝贺,并在西藏各地进行慰问。会上,陈毅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他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次光辉的胜利。大会总结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工作,制定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宣布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主要负责干部的任职。同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决定: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个重大问题。主要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有更大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必须兼顾,要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要使工人、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与地方两种积极性。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要有分析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4月25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34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免于起诉和分别从宽处刑等处理。

4月29日 《人民日报》登载《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提到四川江津地区有些社实行"包工包产"。随后又发现安徽的芜湖地区、阜阳地区,山西的榆次地区,江苏的盐城,广东的中山,浙江的温州地区,都出现了包产到户,而以浙江的温州地区为最多,约有1,000多个社,17.8万户,占入社农户的15%。

4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1955~1956年3月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达100.8万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5%。由于小社并大社的结果,3月底的社数比1955年底减少了81.6万个,但入社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已由40户增加到98户,初级社平均50户,高级社平均250户。

4月 中共中央转发商业部党组《关于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对于不雇工或只雇一两个工人的小商店,应根据其经营商品的特点和在商品流通中的不同作用区别对待;对少数经营不属于人民日常需要的小商店,可适应合并,定股定息、统一核算,并逐步实行计件工资制;对户数多的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行业的商店,一般不宜合并,可通过代销形式进行改造;饮食业中除一部分比较集中的

可合营并店外，相当大的部分只能在国营专业公司的管理下由他们自营。对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该作必要的调整。报告还提出，在商业经济改组中，应采取指定原来的正、副经理或有经验的职工专门负责，对他们自产的商品执行优质优价，保证其特有的原料供应等办法，以保持经营上原有的优良特点。

5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会议认为，在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时，应实行以下原则：①明确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②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业和事业，应尽可能地交给地方管理。③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④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⑤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⑥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稳步进行。

6月4日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福建省委关于争取90%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建议，指出这是进一步巩固合作社的关键，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

6月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委托各部、会、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批设计任务书的通知》。指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设计任务书审批问题的请示报告》等三个报告，都是从简化审批程序的要求出发和符合让各部(会、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动办事的精神的。

6月15～30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先念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指出，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总数为307亿元，支出总数为307亿元，收支平衡。廖鲁言作《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个章程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任务、经营管理和管理机构、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归属、资金的筹集、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财务管理和收入分配、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工作等做了明确的规定。会议还通过了提案审查意见，以及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条款的决议。李富春在题为《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的发言中指出，根据过去三个年度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6年计划的预算，“一五”计划所规定的任务，能够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陈云在题为《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的问题》的发言中设想了管理生产的新办法：即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管理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购销；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商业部门批发机构的一部分上缴利润指标，应该移交给工厂承担；银行应采用我国银行中原有的那些灵活的支付办法；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仍然担负着保证城乡供应和稳定市场物价的责任；除国家统一调拨的原料以外，仍然由采购部和供销社统一采购和供应原料；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工厂增加生产和增加设备，都应在计划的平衡范围内进行。周恩来在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7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中指出，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所以我们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他强调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

7月21日　陈云在全国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会议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指出，使用资方人员有两个好处：一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二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美国专家；现在资本家敲锣打鼓来要求工作，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吸收资本家参加业务工作，好处多、坏处少，可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7月28日　国务院公布《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就目前对于小商贩的业务安排问题，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合作商店方面的问题，关于适当解决小业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定息、公私关系、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工资福利、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国务院的指示指出：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所有在职人员，都应当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加以安排。关于定息问题，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

8月15日　原台湾蒋军空军军官学校少校黄纲存驾驶AT－6型高级教练机起义飞回大陆。

8月18日　在我国关押的1,062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全部审判完毕。这些罪犯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我国的战争期间曾对我国人民犯有各种罪行。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对这些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适当处理。我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君久、武部六藏、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4个案件共45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了不同年限的有期徒刑；对其余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免予起诉，立即释放，并且交由我国红十字会移交给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协助遣送回日本。

8月30日　中共中央批发劳动部党组《关于城市失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指出，今年春季，根据20个省和3个直辖市的调查，全国省辖市以上的城市中，大约有160万失业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安置，估计目前尚有失业人员约100万左右。《报告》提出，解放城市失业问题，必须和发展生产相结合，把安置失业人员就业和补充工业、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进行。

经　济

1月10日～2月7日　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制订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1月13日　国家计委的《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平衡情况简报》指出，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基建规模过大。解决的措施是：挖掘潜力、增加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增加进口；反对浪费和宽打窄用的做法；物资部门要分清主次缓急，全面平衡，早作安排。

1月25日　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草案）》共40条，其主要内容有：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社。部分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在12年内，按照全国不同地区，使粮食平均亩产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棉花亩产分别达到60斤、80斤和100斤。《纲要（草案）》还就畜牧业发展、兴修水利、改善土壤、改进耕作方法、荒地荒山绿化、国营农场发展、水产养殖、农村卫生和科学文化教育、农村商业、信用合作以及城乡支援等问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会上，周恩来就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等问题，陈云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的问题，李富春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和今后的远景规划的问题作了发言。

1月26日　党中央正式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月8日　国务院举行第24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在合营时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并于11日公布执行。上述文件的主要内容是：①确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私股利息率为1厘至6厘。②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从宽处理”和“尽量了结”的方针，对公私合营后原私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房屋、土地的估价和公积金、债务等其他财产关系的处理，作了原则规定。③规定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不要轻易地改变它们原来的生产和运销规律、经营制度和服务制度等。只有在经过充分准备、仔细考察研究、统筹规划的条件下，才能妥善地对它们逐行逐业地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企业改造等工作。

2月22日　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比上年增长19.7%，已达到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水平。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比上年增长9.3%；粮食3,989亿斤，增长8.4%；棉花3,556万担，增长17%。基建总额147.35亿元，增长70.6%。铁路运输增长9.9%，内河运输增长36.2%，海上运输增长24.2%，汽车运输增长35.4%。邮电函件增长11.5%。社会商业零售总额477亿元，增长17.4%。社会购买力比上年增加70.7亿元。国营、合作经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文教卫生等部门工作人员总数1,78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上述部门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计划比上年增长8.1%，工资总额增加11.9亿元。高等学校招生18.3万人，在校学生达到40万人，增长39.1%。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4.4万人，在校学生达到80.1万人，增长49.5%。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6.6万人，在校学生达到79万人，增长36.2%。3月，国务院批准了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2月29日～4月7日　全国工资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内改革现行工资的规章制度。会议对工资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工资水平的高低问题；改革工资制度的方针、步骤和工资制度如何统一问题；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中的若干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新的工资方案。

3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合作社合并时，各社原有的公

共财产、公积金、公益金，统一转为合并后的大社所有。各社之间多少不等，不必补齐，新社员入社也不补交。各社没有还清的耕畜农具归公的价款、没有归还的农贷、社员投资和其他欠款，都由合并后的大社归还。富裕中农的入社生产资料折价款，对其超过应交股份基金 2 倍以上的部分，只付利息，超过一定年限（例如三年）后，转为股份基金。

4 月 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要求在一两年内，生产合作社应集中力量搞好生产，不应当过多地兴办长期才能收益的基建。其他文化福利事业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举办。对目前需要举办的文化福利设施，也应力求节省、简朴。

4 月 3 日　李富春在全国工资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国工资政策的原则是：①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搞平均主义就不能促进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②必须符合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工资政策上鼓励主要经济部门和主要经济地区的发展，照顾人烟稀少地区的发展。③必须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工人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根据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增长指标来确定工资增长的指标。工资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4 月 14 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 1956 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补充报告》。批示要求，在基本建设项目及其进度的统一安排过程中，必须使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注意设计、设备、材料和施工力量等主要环节的全面的和综合的平衡，在确保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安排和调整基建项目和进度。

5 月下旬～6 月中旬　国务院召开全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会议确定增加工资 14.08 亿元，用于 1956 年的为 12.5 亿元。这个方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实施，并决定一律从 4 月 1 日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经过这次工资改革，1956 年原有职工平均工资每月增加 6.65 元，比上年增长 14.5%，并在工资制度方面解决了 4 个主要问题：①实行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②调整了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③改进工人工资等级制度，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④改进企业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按职务规定统一工资标准。

6 月 1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几项规定》，就关于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会议，关于检查计划的根据和标准、检查计划完成的计算方法、计划执行情况的实际数字、“一五”计划的调整和执行情况的公布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

军　事

1 月 1 日　《解放军报》正式出版。该报是军内报纸，其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的命令、指示；宣传国内外的形势和我军的任务；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及英雄模范事迹；指导军政训练，交流工作经验，介绍先进军事科学知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3 月 1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经过一年的试办后举行授旗、开学典礼。

外　交

1 月 18 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自 1955 年 9 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以来，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取消禁运和准备中美外长会议两项议题，至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指出：美国企图要求中国片面地执行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承认美国霸占台湾和允许干涉中国内政，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美国坚持这种无理要求，使中美大使级会谈拖延不决，美国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责任。

2 月 4 日～3 月 27 日　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突然在秘密会议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报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思想混乱。苏共 20 大后，我党中央几次表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2 月 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总理和政府的邀请出访这些国家后回到北京。

2 月 10～25 日　中共中央应苏共中央的邀请，派遣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为首的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即将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2 月 1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公布了从 1955 年 7 月 15 日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来往文件，揭露日本政府借口没有收到中国政府的建议，回避使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消极态度。

2月13～21日　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率团访问我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2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丹麦王国政府已协议决定，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且互派大使。

4月5～8日　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两项协议。

5月26日　北京——拉萨航空线试航成功。

5月29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菲律宾外长加西亚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南沙群岛"理应"属于菲律宾一事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我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合法主权，绝不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6月5日和7月3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题为《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和《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文章。

5月30日　我国政府和埃及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7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指出："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帐"，"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我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

8月10日　我国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决定互派大使并互设大使馆。

8月20～26日　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应我国政府的邀请，率领老挝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和富马首相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文化教育

1月28日　国务院第23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会议批准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2月9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送请全国政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分别组织座谈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根据各方面所提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提请国务院公布。

3月1日～4月5日　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有41个剧目的导演分别获一、二、三等导演奖，有41个话剧团演出的50个剧目分别获一、二、三等演出奖，有259个演员分别获一、二、三等演员奖。3月3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出席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的全体代表。

3月6日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就开展文学创作、开展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青年作家的培养、发展兄弟民族文学、国际文学交流，以及编辑出版工作等作了规划。

3月9日　国务院举行第25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3月15日　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在北京成立。协会的任务，是协助政府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章程，并选举陈毅为会长。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各地在5年或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2到3年内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3年或5年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文盲的95%左右；5至7年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达70%以上。《决定》要求各地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出扫除文盲的实行规划。

4月16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①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需要永久保存的档案，应当分别集中到国家的中央档案馆或地方档案馆保管。②全面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建立统一的归档制度。③迅速整理开国以来的积存档案，要求在1956、1957两年内完成。④积极收集和清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建国前的革命历史档案，以省为单位进行收集和初步整理，交中共中央档案馆筹备处保存。各地各单位代管的旧政权档案，除应由公安部门组织清理的以外，都应由原代管机关负责在1956和1957两年内做好清理和整理工作，以便向指定的国家档案馆集中。⑤国家档案局应充分发挥对全国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作用。⑥加强各级档案机构，国家档案局应全面规划。⑦加强培养干部、提高档案工作的业务水平和科学水平。

4月18日　《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任之和常学思《辩证唯物主义论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与《真理有没有阶级性》两文，引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真理；真理与科学是否相等；社会真理有无阶级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应如何区别；科学理论经实践验证为正确以后，还要不要修正。

4月19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剧团

演出的《十五贯》后，对剧团人员讲话，他称赞《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5月17日，在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上他再次讲话指出：《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在谈到《十五贯》的强烈民族风格时，他指出，要"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在谈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时，他说："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

5月2日　毛泽东主席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讲学术，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在今天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5月12日　文化部在《关于推荐〈十五贯〉在全国各戏曲剧种进行上演的通知》中指出：《十五贯》，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建议全国各种戏曲剧团尽可能普遍采用演出。

5月20日　《农村工作通讯》创刊。这是毛泽东建议创办的。它的任务是，在巩固和提高合作社的工作中，在推广和交流先进经验方面，担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帮助各级领导同志集中、传播由群众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经验，以便推动合作事业的前进。

5月31日　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自本年秋季起在若干综合大学举办函授教育。先在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开办数学、物理、化学、法学、动物学、植物学、图书馆学等专业，共招生790人，函授生的培养目标与正规高等教育相应专业的学生相同。

8月25日在第八届国际儿童电影展览上，中国木偶片《神笔》获一等奖。

社会生活

1月4日　中、蒙、苏三国政府关于建成从乌兰巴托到集宁的铁路，并在三国之间开始铁路联运的联合公报发表。1952年9月15日，中、蒙、苏签订了三国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规定苏、蒙共同负责修建从乌兰巴托经扎门乌德到蒙古国境的铁路；中国政府负责修建从集宁经二连到中国国境的铁路。经1955年9、10月间三国铁路代表会议讨论了有关联运的各项问题。

1月6日～1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检查了工会领导工作，制订了今后工作的初步规划，通过了《关于动员全国职工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动员职工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决议》、《关于加强产业工会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会工作的决议》。

1月14日～20日　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还着重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使他们能够积极工作。会上，毛泽东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月15日　北京各界20多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第一个实现了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累计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6日～26日　国家体委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制定了1956年体育工作的初步计划。会议确定了加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的方针，并就制定12年体育工作规划问题交换了意见。

1月23日～2月4日　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卫生事业12年规划、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苍蝇)和消灭危害人民最大疾病的规划，并确定了当年的工作方针、任务。

1月24日　《国务院关于纠正与防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现象的通知》规定：①各级人民委员会在审核和批准征用土地计划时，要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确定和核定建设单位的用地数量、用地位置、土地补偿和居民安置计划是否合理。未按规定程序申请并得到批准的，不得征用土地。②各建设单位在征用土地前，必须详细拟定计

划，并由各上级领导机关审核和监督。③建设单位不再使用或多余的土地都应无偿收回，不得自行处理。

2月9日～16日　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该社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下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员和该社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大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副主席梁希。大会通过了关于社务报告的决议、九三学社社章和关于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2月9日～20日　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同盟章程和关于修正同盟章程的说明；选出了中国民主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高崇民。

2月21日～29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批准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通过了《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大会选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何香凝、程潜、谭平山、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龙云、邓宝珊、陈绍宽为副主席。

2月22日～29日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举行。廖承志代表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大会致毛泽东主席的保证书和致全国工商界青年的一封信。

2月22～3月4日　国家建委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若干年内设计、建筑、城市建设的初步规划以及改进基建工作的基本措施。会议拟定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发展建筑工业的决定》、《关于加强设计工作的决定》等草案。5月8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下达。

3月23日　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原计划在5年内扩大农田灌溉面积480万公顷，现已达到800万公顷。

3月　西藏黑(河)阿(里)公路全线通车。这条公路全长1,300多公里。

4月1日～4日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16届执行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准备召开一次探讨原子及热核子武器危害性的国际科学会议的问题，并就核武器所带来的危险发表了特别声明。会议还讨论了建立国际交换科学资料的机构、关于促进各国科学界互相接触等问题。

4月5日～14日　中国致公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致公党的任务，是要在扩大和发展华侨爱国团结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华侨提高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带动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党务报告，通过了关于今后方针任务的决议；通过了新的章程；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其尤为主席，官文森为副主席。

4月11日　根据1955年8月签订的中缅两国航空运输协定，中国民航局经营的昆明—曼德勒—仰光之间往返航线；缅甸联邦航空公司经营的仰光—曼德勒—昆明—广州之间的往返航线，今日开始通航。

4月29日　官厅水电站第三台发电机组正式开始运转。至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

5月5日　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在安徽省金寨县境内)建成。梅山水库是治淮工程之一。坝身全长558米，坝高84米，最大坝高88.24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连拱坝。

5月1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等机构。

6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上海参加解放军和上海举重联队同苏联队举行的一场友谊比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1955年创造的最轻量级双手挺举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11月29日，陈镜开又在上海创造双手挺举135.5公斤的成绩，被国际举重和健身联合会承认为正式世界纪录。

7月13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汽车。该厂是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的。毛泽东把这种汽车命名为"解放牌"。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产。该厂投资总额6.5亿元，年产载重汽车3万辆。

7月31日　中国登山运动员史占春等12人同苏联19名登山运动员一起登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征服了这座从未有人攀登过的被称为"冰山之父"的冰峰，并刷新了中国运动员的登高纪录。半月以后，中国登上运动员陈荣昌、彭仲穆和6名苏联登山运动员又于8月15日登上新疆境内的另一座处女峰——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再一次创造了新的登高纪录。

8月1日～24日　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参加表演的有4500名音乐工作者，共举行90多场音乐会，演出近700个作品。

8月11日～23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检查和总结了六年来的工作，通过了大会的决议，确定了民促会的任务，通过了民促会章程，选举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主席为

马叙伦，副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大会还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

8月11日～9月1日　全国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召集的。座谈会认为，运动发展大体上是正常的，但由于手工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发展迅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座谈会就手工业合作化后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座谈会强调发展生产，适应社会需要，增加社员收入，是办好手工业合作社的标志。并指出，为进一步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手工业的生产和改造工作，必须由地方党委、政府统一规划与加强领导。

8月20日　新华社报道，玉门油矿开始在老君庙油田上试验石油探测技术上的最新成就——原子能放射性测井。利用原子能探测石油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7年

导　言

在以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从1957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建设时期。

新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动荡和复杂的。国际上主要是苏共中央全盘否定斯大林所引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国内则面临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轨换型的问题。在八大正确路线指引下，党在1957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步。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思想、文艺领域里“双百”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执行。4月开始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的工作上也有失误，主要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造成了很长时间内未能很好地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严重后果。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逐步萌发，直接导致了后来“大跃进”年代党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地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
- ●继续贯彻“双百”方针
- ●中共开展整风运动
- ●反右派运动及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
-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大跃进”运动的开始酝酿和“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

背景介绍

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还有没有矛盾？它们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课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标志着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的形成，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材料：

- ·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
-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 ·彭真针对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各种顾虑作报告
- ·刘少奇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周总理和苏联贵宾在笕桥机场畅谈人民内部矛盾

材料一　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

毛泽东主席在2月27日到3月1日召集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毛主席在2月27日下午的会上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

2月28日整天和3月1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对毛主席的讲话分组进行了讨论。3月1日下午，进行了大会讨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

出席这次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原载1957年第七期《新华半月刊》）

材料二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2月27日到3月1日，有一千八百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在3月5日到2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和在3月6日到3月13日举行的、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召集而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都着重讨论了这个报告。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话，讲话的内容除了关于思想战线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外，也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关。随后，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相继召集的会议上，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所召集的会议上，也都讨论到这一个题目。因此，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无疑将促进我国目前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使我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更加巩固，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

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呢？

我们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相反，如果说，事物内部没有矛盾，倒是绝大的奇谈。

在阶级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经常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当某一种生产关系严重地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和要求新生产关系的革命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要变得特别尖锐，直到反动阶级推翻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矛盾和斗争才会基本上结束，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之下，新的矛盾和斗争又会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内部矛盾的情况和矛盾的性质虽然有所

不同，但是矛盾的存在这一点却是永远不变的。

我国人民经过英勇的斗争，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接着，经过一系列的巨大的努力，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敌我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也就是说，曾经长期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敌我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生产力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面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我国人民内部，例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在各民族人民之间，都形成了伟大的团结，人民群众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认识到在人民群众和自己的领导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是阶级社会中所梦想不到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就不再有矛盾了。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会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意见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意见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

我们打算在这里着重地谈一下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

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这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完全不像敌我之间的矛盾那样，是在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法，必须从原则上跟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区分开来。为了正确地处理这类矛盾，必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愿望，批评和斗争就难于达到新的团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外的机会再作比较详细的讨论。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某些领导工作人员自己既不了解下情，又不听取群众意见；许多该办而又能办的事拖着不办，该解决能解决的问题放着不解决；甚至粗暴地压制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粗暴地损害群众的权利和利益。这种严重地官僚化的领导工作人员虽然在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中只占少数，但是只要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被发现、被纠正，他们就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正当的不满。因此，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首先严肃地认真地克服领导工作人员中的这种官僚主义现象。

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扩大人民民主生活，以便加强群众对领导者的监督。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他们要求参与管理国家工作和集体事业的积极性也增长了。这是实现国家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人民民主生活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机关和学校，都必须积极扩大民主生活，健全各种民主制度，发扬高度民主的作风。比如合作社中的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机关工作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学生的定期会议，都应该经常化起来，充分发挥这些会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会议中，都要造成一种让群众真正自由发表意见的空气和愿意发表意见的兴趣，广开言路，真正实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要求。领导者对群众的意见不仅要倾听，更要认真处理。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否正确，能否办到，领导者都必须加以研究，作出答复。凡是正确可行的，应该接受执行；凡是不可行的或者暂时不可行的，也应该公开解释。对群众的意见既不允许置之不理，或者敷衍搪塞，也不能胡乱许愿，哗众取宠。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群众提出批评的问题如果确是由于领导者的错误，那么，领导者应该坚决地勇敢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应该向上下左右去推诿。经验证明，向群众实事求是地承认错误，并不会丧失自己的威信；相反，回避自己责任的人，用欺骗和高压办法保护自己"威信"的人，即令成功于一时，最后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在群众面前破产。在任何一个单位中，只要群众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而领导者又能积极接近群众，跟群众同甘共苦，那么，那怕客观的条件再困难些，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也能够顺利地解决。

为了完满地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民来说，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就不会正确地理解生活和劳动的意义，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个人同集体、同国家的关系，就不会正确地理解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显然是削弱了。我们有不少的领导者，沾染了一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旧习气，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命令主义倾向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他们往往只是要群众这样干或那样干，并不告诉群众为什么要这样干或那样干。他们往往只把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简单地交群众去完成，而不教育群众去了解完成这些任务对国家和对群众自己有什么意义。他们长了嘴巴，却不到群众中去作宣传。有些时候，作起宣传来，也是片面地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困难方面，使群众最后觉得是受了骗；或者夸大事情的困难方面，而不指出事情的光明方面，使群众陷于悲观。无论在工人中间、农民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许多思想上的混乱都是由于领导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而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必然使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复杂化起来。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群众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本来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情况和困难。因此，当领导上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群众中产生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原是极自然的，这个责任不在群众，而在领导。领导者之所以被称为“领导者”，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行动上指挥群众，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有责任给群众透彻地指明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使群众了解为什么要向这个方向前进，为什么要沿这条道路前进。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求各单位的领导人经常向群众作报告，跟群众谈话，要正确地讲解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尤其要正确地讲解群众关心的一切切身问题。

为了加强对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这一工作抓起来，经常了解群众中的思想情况，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推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人都这样作，而不要把这一工作仅仅委托给党委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教育部门。

事实证明，领导者愈是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愈是注意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愈小愈容易解决；相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愈严重，或者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愈薄弱，内部矛盾就愈大、愈尖锐。只要我们既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又努力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及时地解决，而人民的团结（首先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团结）就会不断地巩固。

我们的党同广大人民群众有血肉一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党在长期同群众在一起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不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经验。在过去，党已经领导群众推翻了一切压迫者，胜利地解决了各种敌我矛盾。在今后，只要我们党能够继续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地同官僚主义和其他错误的思想作风作斗争，我们也一定能够领导群众共同克服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顺利地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原载1957年第九期《新华半月刊》）

材料三　彭真针对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各种顾虑作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4月20日召开的、有两千八百多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扩大会上，就全市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作了报告。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在19日作了这次会议的总结。

截至在目前为止，除中央直属机关外，全市已有党内外干部、高等学校教职员和中小学教职员、高等学校学生、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界约三十五万多人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引起了十分广泛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许多人认识到两种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必须采取不同方针和方法，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少干部检查了过去与中央方针抵触的思想情绪、生硬的工作作风和片面的思想方法。许多老教授、文学家、艺术家们表示要积极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力量。但是，在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暴露出不少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主要的错误思想是害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放出许多毒草，造成群众思想混乱，使工作不好作，对群众不好领导等等。

针对着这些问题和顾虑，彭真在大会上着重地讲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键在于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彭真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反革命残余已经基本肃清，人民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了。但是我们很多同志，在认识上却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因此，不少同志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糊涂想法，不但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有时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处

理方针和办法。

关于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彭真说，关键是在于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采取根本不同的方针和方法来处理。对待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打倒、压服、强制改造、消灭敌人；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家务，怎么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处理呢？除了对违法犯罪的分子应该依法处理外，对于一切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同志式的态度，民主的方法，讨论说服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请愿不是违法，闹事不应害怕

彭真指出，有些群众推派代表向上级领导去请愿，要求解决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正当的手段，并不是违法的行为，领导干部不应当害怕，更不应当阻挠、压制。至于有些单位领导上官僚主义很严重，不讲民主，连小小民主都没有，或者在群众中缺乏应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起来"闹事"，也不应当害怕。应该和群众很好地商议，正确地解决。对于群众提出的要求，凡是应该办和可能办的，必须迅速地解决；对于群众所提的现在还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和错误的意见，应该实事求是地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怕放、怕鸣的人是怯懦的人

彭真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使我们认识不断提高、工作不断前进的推动力，既然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们对于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同思想，就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要认识到，事物是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错误，只有在放出来以后，只有在争鸣中，才能有比较，才能明辨是非。只准你鸣、不准我鸣或者只准我鸣、不准你鸣都是不对的。怕放、怕鸣的人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

彭真说，党与非党的关系现在基本上是好的，但是问题也不少。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党员与非党人士要亲密地合作，遇事很好地商量，不要"敬鬼神而远之"；要相信群众，虚心听群众的意见，耐心共同讨论。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思想工作

彭真提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思想工作是一项复杂的、艰苦的工作。他指出各级党委都要作思想工作，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思想工作。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要作思想工作。怎样做思想工作？彭真说：就要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把群众中的意见搜集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研究分析，并且和群众很好地商量，然后再贯彻到群众中去。有些同志不接近群众，不搜集群众意见，或是听到了意见也不研究，就是喜欢乱戴帽子瞎扣名词，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全党要重新学习，改造思想

最后，彭真指出，在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全党要重新学习，改造思想，按照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精神，总结工作，检查思想，进行整风，以便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尽快地学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杨述针对会议期间大家提出的有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密切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小学教育、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党员要主动和非党知识分子接触

杨述在谈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说，本市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目前党和非党知识分子间的关系还不够密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也作得不够。在今后各项工作中，党员和党外同志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共同讨论和解决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地和非党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同志式的接触。

（原载1957年第十期《新华半月刊》）

材料四　刘少奇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早在1951年，刘少奇在高岗和邓子恢争论国营工厂中在行政领导和工人群众之间有没有矛盾的问题时，就写了题为《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基本任务》的笔记，他支持邓子恢认为有矛盾的意见，不同意高岗认为没有矛盾的意见。他深刻地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国营工厂管理机关和工人群众个别部分之间的矛盾，就是属于后一类矛盾。对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去解决。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提出和探讨两类社会矛盾的文献。

在1957年2月底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3至4月间，刘少奇南下经石家庄、郑州、长沙、广东到上海，在各地阐发了他对两类矛盾问题的见解。他说，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了，领

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了,这是新情况。他主张: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如果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起来,没有必要地激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本来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的办法,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4月下旬,刘少奇先后作了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讲话。

材料五　周总理和苏联贵宾在笕桥机场畅谈人民内部矛盾

记者刘时平报道:周恩来总理今天在杭州笕桥机场上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伏罗希洛夫主席座机抵达之前,周恩来总理曾和先行到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长叶留金和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交谈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话题是从周恩来总理向贵宾们介绍西湖风景开始的。

周总理拿着杭州全图含笑对客人说:"今年我已来过杭州两次,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两句。"

拉希多夫同志接着说:"领导同志总是很难抽出时间到各处走走的。"

周总理说:"是的,应该多到各处去走走。老是呆在北京是会产生官僚主义的。北京的城墙高,容易把领导同群众隔离开来。"

拉希多夫开玩笑地说:"城墙高也有个好处,使官僚主义不会播散开来。"

周总理笑着说:"另有一个好处,要是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城墙还可以挡一阵。不过,这还是不保险的。城墙是可以被冲破的。近四十年前,我们北京学生就曾冲进过北京古城,反对过当时的官僚和军阀。"他指着两个向拉希多夫同志和尤金大使献花的小朋友说,"假如我们的官僚主义不改,他们将来就会冲进城墙的。"

拉希多夫同志说:"听说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反对官僚主义。"

周总理说,"是的,昨天我还在这里向二千多个党内外干部作过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新的整风报告。我们现在整风是反对三个主义,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在1942年到1944年间,我们就曾整过风,那时主要是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首先是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特别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以求得全党的团结。现在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并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要整风,整风是应该经常进行的,不整风,过了几年思想就会生锈,整风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会使我们不断地前进。这个办法要一直传下去。人总是这样,稍有成绩,就会骄傲。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以为我们有了缺点,人民也会原谅我们的。"

尤金大使说,"是啊,人们总是以为,既有人民的拥护,他们就不会有官僚主义。"

拉希多夫插上说,"悲剧也就在这里。人们往往有了官僚主义,而自己还不能觉察到。现在中国进行这个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时,周总理指着两个小朋友说,"你们再过十年,如果领导还有官僚主义,你们就要反对。"接着,总理又说,"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

尤金大使说,"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承认矛盾,检查缺点,区别处理方法,就可以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

(原载195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继续贯彻"双百"方针

背景介绍

继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文艺界、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1957年初,"双百"方针得到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一方针的鼓舞下,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知识分子拍手称快,一吐胸中怨气。"大鸣"、"大放"的局面逐步形成。

材料:

-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放"就是领导

材料一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章伯钧1957年3月1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全体会议开得很精彩，大家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发扬民主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对于国家事务、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大会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一新型的民主方式，值得我们努力发扬、积累经验，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日趋完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重大变化的时代，我们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都有亲切的体会，以我个人来说，我是生在十九世纪之末的人，单从政治生活这一纵断面来看，就经过三个专政：第一是晚清时代地主王朝的专政，第二是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专政，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第三就是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三个专政孰优孰劣，大家可自作比较，看哪一个专政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孙中山先生是反对封建主义专政的人，今天在座的朋友中也有不少的人参加了反清运动。第二个专政表现了两个形式，其一是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所谓政党的活动，关于那些情景，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实堪痛恨；其二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而为人民所消灭了的。从1949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日起，我们就参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活动，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有很多同志对于新中国的成就，说出了很多确当的评价，证明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专政，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三大敌人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在这三个专政之外，我们这些人还亲身体验过三种类型的民主生活，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发展起来的，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以后的高级政治生活方式。这种新型的民主方式，在我国历史上无例可援，在其他国家也无适当的先进经验可供吸取，只有由我们自己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化生活的传统和新的生产关系的需要，逐步创造新的经验，逐步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

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

一、根据以上的看法，来谈谈几个实际问题。

（一）民主党派长期共存问题：自从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全国各方面已有很多的讨论并有许多精确的见解，我现在要说三点：(1)我们要在心理认识上排除对长期共存的怀疑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自去年到今年，已经多次反复地指出长期共存的理由并且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中共同志能了解能贯彻这重大的方针。今天的主要问题则是我们民主党派，究竟如何担负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责任。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而长存。(2)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和基本干部应该了解自己的责任，了解自己有三个力量在监督我们：第一个力量是社会力量，也就是人民力量，他们要注视民主党派能否做有利于他们的工作，如果有利，他们自然拥护支援，如其不然，他们就要加以批评，就要发动社会舆论的压力。第二个力量就是共产党的监督力量，民主党派固然有使用监督权，共产党也很自然可以使用它的监督权，它在人民中的威信是最高的，假若它对某一党派有了批判，那个压力是一定来得很重的。第三个力量是党派内部的民主力量，今天参加民主党派的成员，一般是为要求进步要求提高而参加组织的，要求能做到有利于人民和国家又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为抬高某些个人某些党派而来助长声势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假若党派工作犯了错误，自然招致内部民主力量的压力。(3)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须注意以下的事：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过去的保守关门主义是不对的，今天要加以改变，但是要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也是很危险的。在长期共存的前提下，民主党派的组织自然是日益扩大，那是毫无问题也是应当的。它们的成员有老年，有中年，也应当有青壮年，但是只贪发展，不顾巩固，摊子过度大了，会有种种难以逆料的困难产生出来的。

（二）民主党派在组织工作方针方面：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依我看，还要保持适应的重点分工，互相支援，互相协商，依据成员的自愿，在有利于工作的需要上，可以适当的交叉，也可以进行调配，今天成千成万的农民可以成立高级合作社，可以组织工作队，难道“万派同源，百川归海”的民主党派，还不能进行互相合作吗？在民主党派之间绝不能存有谁大谁小的思想，而只应有争先恐后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互相尊重的精神。

（三）民主党派的肃反问题：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肃反工作，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民主党派很多成员在机关、学校、团体和企业内完成了肃反工作，但是还有些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尚没有参加肃反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肃反原是国家的政策，民主党派如自外于国家政策，那是不妥当的。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因有特殊情况，只是推迟了社会改造和民主改革工作，而不是放弃了改造和改革。民主党派应当自己负责选择适当时间，选择适当方式，准备工

作条件来把肃反工作做完做好。同时毛主席最近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示明年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运动，并号召民主党派人士也可自愿参加。我们也应作精神准备。

（四）今后民主党派的工作任务：比提出“长期共存”方针以前，是更有所加重的。发展组织工作固然加强了，但是政治工作、岗位工作和学习工作尤当加强。依我看来：第一，政治工作可分为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搞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进行互相监督，和对国家政策方针及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并制定建设性的建议。第二，民主党派成员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并加以提高，做到人有一业，业有所长。第三，民主党派应当有计划地有领导地组织成员经常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通过实践的活动，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成为具有工人阶级思想马列主义世界观的脑力劳动者。

密切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

二、其次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和其他问题。

（一）领导关系问题：民主党派一面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地位平等，而另一面又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否有矛盾？照我看来，有矛盾，也没有矛盾。如果依照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认识这一问题，把自由独立和平等用作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武器，即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来使用，这诚然是一个矛盾问题。如果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认识这一个问题，把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理想放在无阶级对抗、无经济剥削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上面，那末，我们民主党派在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力量，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武器，而又以建设社会主义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这个大前提之下，来进行自由独立平等的政治生活，那是没有矛盾的。民主党派依据宪法所予的民主权利对于日常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就应当自己负责。

（二）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党员共处的方式问题：解放以后，共产党员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互相合作和日常生活接触关系基本上是日趋融洽，日趋团结的。但问题依然不少，有待解决。我们对此事要作比较细致的分析，要有一定的耐心。在阶级思想意识方面、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方面，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方面，这在双方原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逐步发展，接触面渐广渐深以后，再经过学习、运动和工作中更加相互了解，思想意识渐趋一致，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是逐渐缩小了，而最后会达到无距离的境地。问题是双方的，问题的解决是有一定过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无论在工作上学习上和其他各方面，要首先确立主人翁的思想，不必自卑，也不必自高，一切尽其在我。所谓“百依百顺”固属非是，即有，也恐怕只是少数个别现象。所谓“阿谀奉迎”更不能概括一切。依几年来的情形看，共产党员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由生疏而逐渐进到相熟，由顾虑警惕照顾而逐渐进到尊重和信任，党中央、毛主席和统战部是经常重视团结合作的政策方针，并力求贯彻执行的。我们不能用个别的局部的或暂时的特殊现象，来概括全部或团结的前途。

（三）互相监督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只想谈一个方面，就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进行监督问题。自从这个问题在去年提出以后，共产党特别是各级统战部进行了自我检查和邀请各方人士进行批评，他们的工作有了不少的改善，对于团结工作有所裨益。但是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请恕我把无党派人士也拉进来）却未曾向共产党朋友要求给以批评，我们自己也好像没有进行自我检查。我们不能以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他们的监督，又不能以为参加了各个运动就是共产党的监督。互相监督是一种人民内部日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方式。要做到双方互相依赖，做到有职有权，实行双方互相监督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采取主动，要求共产党朋友，选择各种适当方式，进行批评，把过去的某些不恰当的工作方式改变一下。

（四）民主多了呢还是少了呢？自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一些人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将受到影响，马列主义将受到影响，恐怕民主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又将抬起头来；用心是善的。但是对问题的看法恐怕不正确，这个伟大的民主方针之提出，正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稳步地扩充民主范围，丰富民主生活内容和加强民主制度，以便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士，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发扬马列主义真理，绝不是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开方便之门。特别有人考虑到百家争鸣之风起，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会把马克思主义损伤了或曲解了，甚至有人说现在只有唯心主义者能争鸣，马列主义者不许争鸣，这是不符事实的。问题的中心在于成熟的马列主义者能领导“百家”和“百花”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化艺术各方面发扬独立思考、自由辩论，达到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目的。一百年来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都在反对马列主义，批评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我希望在百家开始争鸣的今日，大家要有宽容的心情，不要急于以“卫道者”自居，对那些求进步或勉强求进步的多数知识分子，开始发言的时候就给他们拦头一棒，以阻塞鸣路，这是不妥当的。旧的学术文化遗产中，有好的成份，让他们鸣，让他们放，对丰富马列主义是有益的。

新的东西里面也有坏成份，让他们鸣，让他们放，教条主义或修正观点也就会显露出来。凡是用教条主义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人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好同志。其次，又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民主不足，认为既要发扬民主，又何必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何必强调集中？这个说法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说是受人欢迎的，但是我们已经不是走那条道路，而是走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最近几年来，民主化的政治生活正在日益丰富而不是日益枯缩。

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协的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政协问题：在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下，政协的任务和工作是将要日益加重起来的，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要日趋完善和充实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有两院制，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和南斯拉夫也有联邦院与民族院，和联邦院与生产者院的两院形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必强同于人，也不能强同于人。中国政协从作用与发展来看，它正走向加强和扩大。我认为可以考虑到从第三届起给以更多的政治任务，如协商建议和监督三方面权力是可以加强起来的。从实践政治生活中，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这次政协会议以后，我们对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工作要进一步地加强起来，我希望要在今年适当时间召开一个全国政协工作会议，解决一些大会上所提出的工作问题。

同志们：我的话谈完了，所提出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粗糙的，因为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护社会主义，也爱护民主，所以不顾粗浅和错误，浪费了同志们许多时间，请同志们批评和指正。

（原载 1957 年 3 月 19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搞教育的老朋友们的心情。所谈的无非是一孔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庭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三十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笺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

这自是真理之中的事。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 1 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规则，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之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脑”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划，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二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更得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坐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客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就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业务。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罢。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先得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得谈谈各家的异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没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的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朋友们，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们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间房、二本书"静静的做做功课就是指这个。说得具体一些，他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说是可贵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们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说来，我认为并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人满意的情况，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们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说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问题。自从规定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贯彻，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大约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得到了保证。8 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教师还不能保证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教师比例已降到十分之一以下，这个问题虽则不能说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愿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说来时间问题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书少，而是编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问题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别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的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徬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然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自我填题目、

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需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不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发报了上级，交了卷了。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惟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的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已自觉到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的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说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说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书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些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哪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哪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对头的。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他们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学术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却还没有这个条件。

积极的东西搞得不好会变成消极的东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线应当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要求不能满足，别人还是红脸白脸地来对待他，他心里就会不服气，会产生情绪。我体会到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就有这些情况，最初确是有人反对学习苏联，本质上是立场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些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加分析，会觉得立场又不稳了，其实性质是和过去不同的。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确有一些地方把学习苏联简单化了。有些苏联传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人提出了怀疑或不同意见，反而受到批评，于是搞出了情绪。这些情绪并不是从立场问题上发生的。但一有情绪，消极因素也跟着滋长，那就不好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

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歧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歧视了就鸣不成。

究竟考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远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还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我想：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发生的，由来已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同聊天，谈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很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认为国家大事自有贤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个看法和主张，等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势，自觉很孤陋寡闻，不要说别的，连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说起来都觉得绕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没有资料。第四，多年来养成了没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懒汉习惯。我们曾经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头寸都不很合。说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赖呢？虚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没有了主张了呢？不论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的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认水平不够，说不清楚。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质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说到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超过我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原载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对于执行这个方针的初步效果，应该作怎样的估计呢？

我们认为：执行这个方针的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

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要看到这个方针在文化建设上产生巨大的收获，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中，学术文化的各部门已经比过去表现得活跃。在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法学界、生物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自由的论争；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的批判性的研究；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扩大了范围；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电影、戏剧、戏曲、音乐、美术活动方面，在民族文艺遗产的整理和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方面，也都表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气。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这些都是好现象。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的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茅盾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本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了解：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人民内部的不正确的思想，不能够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讲道理、开展批评、进行说服教育的办法。而在目前，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坚持这一方针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五亿以上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思想上离开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足为奇的。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用讲道理的办法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因此，这种作法和想法是不正确的。

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各家的争鸣中，出现了正确的新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好处；就是出现了不正确的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马克思主义欢迎一切真理的发现，因为一切真理的发现（无论这些发现者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都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党性，但是这种党性同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不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转化为它的反面——教条主义。

人们问：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是不是相冲突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也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客观存在所要求和决定的，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规定或者取消的。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工人阶级既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居领导地位，既然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上居领导地位。事实上，没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虽然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在思想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这个思想斗争，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去领导。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让资产阶级思想去领导思想领域，这就是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号召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工人阶级和

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不允许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去领导。这里首先要认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反动阶级用高压的手段来限制人民的言论，硬要人民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也采取各种必要的步骤，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的方法。

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也就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项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任务。可以断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科学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不断地取得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者要靠自己的理论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来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时候，需要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平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虚声恫吓的态度，片面的、武断的、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在主观上虽然也要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因此，他们的批评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混乱。应该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因为这样，就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愿意提出这一点，来与读者共勉。

（原载 1957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放"就是领导

——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侧记

突破了五万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从舞台上看到了不少阔别已久和素昧平生的传统戏曲剧目，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在锣鼓喧天丝竹幽扬声中，作为一个观众，对于舞台上"新气象"的出现，感到衷心喜悦。饮水思源，我们得感谢去年六月间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开放剧目"的决定。

4 月 10 日，文化部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开放剧目的方针，这是繁荣戏曲事业进程中又一件大事。

从第一次会议到第二次会议，相距十个月。

十个月来，各地文化领导部门和戏曲工作者贯彻了第一次会议的方针，做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作进度之快，可以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名句来形容。

在第二次会议上，从大会到小会，一连串的数字说明了丰收的美景。开幕那天，我听说从第一次会议以来，全国发掘的戏曲剧目是四万多个，整理和上演的是四千多个。十八日会上，文化部艺术事业局负责同志根据新的统计作了补充说明：已经发掘的估计五万有零，上演的是一万有零。不论是四万和五万之比、四千和一万之比，听起来都令人惊奇兴奋。

剧目解放　皆大欢喜

挖掘剧目工作的同时，还救活了不少古老而优秀的剧种。江西、湖北、山西、福建、河南各地都有很大的收获。从会上的发言听来，江西省反映的情况最有典型意义。埋没了几十年的青阳腔，已经在江西都阳县挖掘了出来，很有趣的是，当地老百姓教孩子读书，就把青阳腔剧本当课本念，戏曲工作者一到那里就拿到四十个剧本。

有人说，过去编写中国戏曲史，只能根据文献，断了线的地方，接不上头；挖掘剧目工作中各种新发现，为戏曲史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活资料，例如若干剧种之间声腔演变的关系，找到了来龙去脉，断线的地方，有些也能接上头。他的结论是：开放剧目不止是剧目本身的收获，推而广之，它影响到文学艺术事业其他部门，如剧种、声腔、音乐等等，成为整个文化艺术界的财富。

听说有些艺人、观众把剧目开放叫作"剧目解放"，"开""解"二字是一音之转，这不是误会，确实是太高兴的话。从来自各地代表的发言中，我们知道大多数剧场上座率普遍提高，艺人的收入有了增加，日益丰富的上演剧目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好多人把这种现象形容作“皆大欢喜”，倒也非常确切。

十个月来，剧目开放工作收获是巨大的，但从总的形势衡量，“放”的不是够多，而是很不够，待开发的潜力比起已经发掘的数目可能还要多得多；必须继续发掘，挖的又深又广。发掘必须结合整理、改编工作，挖掘剧目也有必要和挖掘表演艺术结合……很多新问题，提到了第二次会议的日程上来。

陈其通的论点受到批判

第一次会议开会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刚刚提出，这一次会议上，大家在发言中联系到“放”和“鸣”，联系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于这次会议来说，“放”和“鸣”是一个广阔的背景，指导和推动着这一次会议向新的方向前进。因此，会上流行着“争鸣一番”和“鲜花”“毒草”等名词。有人联系得很好。

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有关戏曲剧目有害的论点，在这次会上受到了严正的批判。陈其通等人在文章中说：“在‘百花齐放’中，还是应该以提倡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一位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了这一论点的危害性：“全国挖掘的传统剧目有五万多个，上演的有一万多个，如果按照陈其通四位同志‘开放新花为主’的论点，发动几万人也未必能搞出这么多的剧目。可见这个‘为主’看来有党性，实际上没有党性；‘为主’看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不解决戏曲剧目工作问题的空话。”这位代表的发言，大家认为很中肯。对于不从实际出发，不分析具体情况，片面的、武断的教条主义者来说，空谈“为主”的论点，也反映出他们对待民族艺术遗产虚无主义的态度。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戏曲剧目工作，不但是不解决问题的空话，而且有害。

牛鬼蛇神　　鲜花毒草

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中，牛鬼蛇神能不能上台，还在研究阶段，会议结束了不久，文化部把过去明令禁演的“奇冤报”开禁，刘世昌的鬼魂上了台。当前的问题，是牛鬼蛇神能不能都上台？会议的发言比较深入地接触到“探险山”的问题，发言者强调了这出戏人民性的一面，很有说服力。明令禁演的戏除了“奇冤报”，还有十一出，将来是不是都要开禁呢？听说文化部正在研究。有人说，“奇冤报”是在第一次剧目中工作会议闭幕以后开禁的，这次会议闭幕以后，可能有些禁戏会跟着开禁的。这虽是推测之词，也不算毫无根据。有人阐释了禁戏的问题，他们说，解放初期，敌我矛盾很尖锐，当时禁戏，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是政策问题。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已告结束，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禁戏政策已经失去它的意义，所有那些禁戏，在现阶段已转化为思想上的是非问题，是人民内部的事。根据这个大前提来看，禁戏可以恢复公演，而且有利于“放”。

牛鬼蛇神，实际上可以归纳到鲜花与毒草的问题范围之内。会议上对于鲜花与毒草广泛地交换了看法，综合起来，有以下四点：(一)在“放”的过程中，出现毒草是很自然的事，新的创作也不能保证没有毒草，用不着惊慌失措。(二)不让毒草“放”，也就会妨碍鲜花开放；正等于过去清规戒律太多造成上演剧目贫乏的现象。(三)辨别它是鲜花还是毒草，是要等它“放”出来以后才能知道的，不能把它闷死在地底下。(四)已经开放的剧目当中，还存在着鲜花与毒草纠缠不清的问题。

从理论探讨中，也接触到实际问题：上海市和江苏省的代表在会上见了面，谈起“王文与刁刘氏”，上海本来认为这出戏有毒不能上演，江苏省却已动手整理。有人针对这个情况说：“你认为有毒，未必真有毒。”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引人深思：坏戏去掉毒素、可以变好戏、毒草可以变鲜花。

口放手放　　手放心放

从大会到小会、每个人的发言从未流露出怀疑“放”的方针，而是用很肯定的语气表示拥护“放”的方针。但这是不是等于说每个人都真正解决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似乎并不尽然。会议进行的中间，我偶然和一个代表交谈，他直率地承认领导放还有些心中无数：“要大胆的放，要把‘放’的权利交给艺人，又要鲜花和毒草竞赛，又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那该怎么领导呢？”我没有追问这位同志后来怎样解除顾虑，但我深信他会找到答案的。因为在会议继续深入讨论交流经验当中，提供了很多借鉴的地方。

福建省“好”的经验就很多；主要是福建省文化局贯彻了第一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放”的精神，反反复复地交代了政策共有五次之多，领导同志又亲自下到民间职业剧团辅导“放”的工作，艺人有顾虑，领导予以教育帮助。因此，福建省挖掘了一万多个剧目，居全国第一位。

有人说，“放”就是领导，各地文化部门，当前的任务就是要领导“放”，而不是其他。

出现了坏戏怎么办？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代表们同意一份文件上的解决办法：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求得统一。组织这种讨论就是领导。讨论归讨论，不能成为限制上演的手段；讨论中一定会有批评，这种批评也不应该成为变相的控制、压服。这种讨论可以通过各种组织形式进行，先从剧团内部到剧团外部，通过讨论提高艺人的认识。如果领导“放”，是群众路线的问题。有些领导还不大相信群众，“口放手不放”、“手放心不放”，主要是把艺人

和观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估计过低，唯恐艺人只顾上座不负责地演坏戏，唯恐观众没有辨别毒草的能力以致中毒，还怕坏戏多起来，新戏被老戏压倒，所谓“四怕”。有人认为这不足为虑，首先是要相信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并不很低；七年来的戏曲改革工作成绩不容抹煞，好戏还是主流，今后也会如此；至于新戏剧目的减少，绝不会是长远现象。因此，不应该对“放”的方针采取消极的态度。

很多代表都说出“放”对繁荣戏曲事业的好处。有一位代表一下子就列举了六大优点。其中有一条是说，“放”有利于反官僚主义，他说直到现在，河南省还有违反中央政策不经请示擅自禁戏和强迫艺人取消某一腔调的粗暴态度。最后他表示：参加这次会议，增加了“放”的信心，但顾虑回到地方贯彻会议方针有问题，首先是省的党政领导会不会有思想阻碍？省要贯彻不好，到了专区、县、乡一定出毛病。必须解决领导问题，希望中央支持。这些顾虑确也合情合理。

从会议上文化部首长的发言当中，我体会到中央对于“放”的方针是十分坚决的，虽然会议还没有做出总结，但我深信中央会采取各种步骤来贯彻这个方针。这里可以引用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戏曲剧目要继续大胆的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

（原载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

中共开展整风运动

背景介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共和国从革命时期转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阐明了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和方法。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在整风运动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利用“大鸣”、“大放”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6月中旬开始，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9月份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开始了批判“反冒进”，这样致使整风运动偏离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违背了原来的目的，受到了极大的干扰。随后又开展了所谓全民整风运动，经过1958年春的“双反”运动后，到6月份宣告整风运动基本结束。这次整风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材料：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节录）
- 三个大老虎变成大妖魔　奇特逻辑给人打上烙印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节录）
- 贯彻“鸣”和“放”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 “三大主义”阻碍新闻事业的发展
- 首都经济学家在座谈会上揭发
- 鸣放的空气浓厚　老报人慷慨陈词
- 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材料一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节录）

（一九五七年五月）

《人民日报》编者按：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五月八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五月八日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哪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今天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

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三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有人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一九五〇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章伯钧还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还有人认为：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章乃器发言时说：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益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他说：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像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五月十五日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

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摘自1957年第11号《新华半月刊》）

材料二　三个大老虎变成大妖魔
奇特逻辑给人打上烙印

解放几年来，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惊人的成就，使每一个有知觉的人都感到无比的兴奋。这说明在我们革命事业中成绩是主要的，也是巨大的。今天是要大家谈一下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关于成就方面，个人的感受就不多费时间。这不等于说我对它没有认识。

自从各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大家对于“鸣”和“放”都有了初步的体会，但是应该承认，大家还在思想上存在着顾虑，或者说有些“怕”的心理。在这同时，人们也基于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热爱，又想响应大胆“放”和“鸣”的号召，因此在不少人的内心产生了矛盾。

“齐放”与“争鸣”既是国家长期的政策方针，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有顾虑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有些人在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争鸣的过程中，遭受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报复，至今没有合理的解决，因此不能不自己问自己，再一次的“鸣”和“放”会收到怎样的后果？对人民事业会不会起点好的作用？

回忆过去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运动，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肯定而又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但没有发生什么大影响；个别领导人反而因为职权过大，民主不够，加上执行过火的保密制度等因素而更滋长起来，这三个为害的大老虎，现在变成一个三头六臂的大妖魔了。以反官僚主义为例，在三反和新三反中都是主要的题目，以后在党和报纸的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对它开过火，结果对它一无损伤或者效果不大。敢真管的人，每经过一次运动就少一批，因而官僚主义者越来越气焰万丈。本来，作为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若犯了害人的官僚主义是十分可耻的事，但是常常到见一些领导人把“官僚主义”等名词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口头禅，在群众面前常常轻松愉快的嘻皮笑脸的说：“嗯，我是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似乎心里在说，谁敢把我怎么样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是中央提出的新政策，可是过去，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词句，大家都很熟悉。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的这些教导，都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永久的至理名言。不过在个别基层单位领导的执行中确有偏差，甚至造成不良的后果。他们常把有些刺痛自己毛病的正确批评和意见，积存起来，借下一次运动，来一个大报复，像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因此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发言的人，被扣上犯了反领导或反革命罪行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对领导不满，不满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种奇特的逻辑不光是在个别机构中存在，而且据一位老同志说，有过这样一回事，一个老同志的外甥，因为别的孩子，不愿同他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不跟我玩，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我舅（他的舅舅是党员），反对我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个别有执法之权的人利用这一逻辑，曾给人们心理打下了不易磨灭的烙印。而且在一些机关里，应用这种“幼稚逻辑”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不首先揭发和根除它和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给“鸣”与“放”的前途上，留下很大阻碍。

上述由个人好与恶出发，利用“幼稚逻辑”违犯中央政策的事例，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个别或少见的。人们鉴于“是非皆因多开口”，于是，有人矢志把嘴上加个无形的封条，来个“守口如瓶”，甚至来个“六亲不认”，免得找麻烦。也有些所谓“脑筋灵活”的人，体会到别人由于“歌

功颂德”而“获益不浅”，于是想到“不识时务”、不具体考虑“上者所好”而冒昧发言，是不好的，所以索性倒向只有歌颂的一面，作一个“顺风倒”。我觉得这股歪风的滋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危害很大的。

1956年，毛主席指示在肃反斗争中应“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说明共产党和国家对于纠正缺点和错误的严肃态度。但是某些部门纠正错误的行动却有些不严肃，某些领导人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还对斗错了的人说“这是党对你一个考验”或者说“你总有点缺点吧，至少态度方式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就这样来一个“平分秋色”。在这些情形影响下，不少的人不敢说话，好不愿意说话，因为说了没有用。

其次，犯过错误的个别领导的思想中，还可能有“怕放”的意识。但是大势所趋，不放吧又怕受中央批评，于是来个“旁移重心”的作法。尽量避开不谈由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议所造成的重要事件，把本单位许多类似婆婆大娘互相说闲话的矛盾拉出来，“从长讨论”，以此作护身盔甲，掩盖自己的过失。倘若“不得已”涉及自己，就用些口头技巧，庸俗的自我检讨(当面检讨事后不改)，当作过关护照。据群众们谈西安市有的医院就是这样在肃反和八大文件学习以后，群众们提出相当严重的问题，领导上只是轻描淡写的、肤浅的检讨一下，然后就被调换一个工作岗位。为什么 会这样？是不是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这样的作法，会不会叫群众觉得，上级的处理脱离实际？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主要在领导方面。谈到领导又主要是个别党员，领导作风问题。这些个别的党员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告诫，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特权思想。例如一位公职干部曾让公家的裁缝，给他私人加工一条裤衩，作好之后，他不满意，怒责裁缝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不作好？”在评工资的时候，党员之间也有互相抬高的现象；在高干升大学时，不但有优先报名之权，有位同志考试时并不懂得题目的意思，结果也保送入了学。医院是不许随便加添职工的，可是院长的爱人，只要一张条子就上了班，当时骗群众说是“自费学习”。后来证明每月领薪金。

有一位高级医务人员几年来作了很多种科学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得不到本单位领导的支持，曾提过尖锐的意见。于是在肃反中，这个单位专门组织了大会斗争他。肃反以后，这位医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以前被作为罪状的许多行为，却一变而为工作成绩，总结为先进事迹。此外有些领导者对某些平常印象不好的人，常夸大其缺点，利用幼稚的逻辑，借运动的机会，大肆斗争。

总之，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看，主要的还是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两种主义和主观主义一般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个别地方则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我赞成主要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但是对有特别严重的情节者，应当予以特别处理或法律制裁，有的朋友警告我：“不应当这样提法，以免将来遭受报复”。我觉得只要谈出来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而且合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应当把个人得失问题置之不理。

我建议，在这次整风运动中，(1)对于一般的和严重的情节，应分别对待。(2)设立招待室，使群众能尽其所言。(3)不给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者以领导运动之权。(4)为了彻底作好这一工作，应当特别着重群众路线的作法。

(原载195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节录)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许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天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

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天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象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五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继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会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会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

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认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六月一日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致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摘自1957年第12号《新华半月刊》

材料四 贯彻“鸣”和“放”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于5月8日在沈阳邀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郭厚德 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研究员
民主促进会会员
谭其猛 沈阳农学院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李贤瑗 东北财经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陈建侯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顾学裘 沈阳农学院教授
民主同盟盟员
左耀先 东北工学院教授
无党派人士
彭清源 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
民革党员
时昭涵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赵鸿翥 东北财经学院教授
民革党员
万籁天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无党派人士
徐公振 沈阳师范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陈彦之 民盟沈阳市委会主任委员

有些党员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接受党的领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郭厚德

（一） 党与非党的关系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来，有良心的人，都能认识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多数党员是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发生了偏差或错误后，基层干部往往不作解释，更不肯认错，过去对，现在也对。以致造成了党群间的隔阂。

这种隔阂，在群众方面的表现是：工作中老是怕犯错误，因为错了一点，就有被扣大帽子的可能。以致顾虑重重，失掉了主人翁态度，产生了作客思想。于是沉默寡言，学“金人三缄其口”，生活上寡交游，少来往，以致“六亲不认”，如有些人对来客不敢留饭，怕人说在搞小集团。在党员方面的情况是：以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态度矜持，谦虚不够，喜欢恭维，厌恶批评。高视阔步，见人似睬非睬，气势逼人。还有些新入党的党员，入党前，尚能和群众有说有笑，入党后就拿起架子来，前后判若两人。群众说，“究竟党员不同于凡人”！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穷酸，碰到有些党员的高傲自大，于是来一个“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党员的想法是，知识分子应该向党员靠拢，不靠拢是落后。这样，彼此的距离，只有越来越远。

（二）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有的党员把党和党员的关系搞不清楚，往往把自己代替了党。他们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是接受党的领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逻辑的推论无疑是“你不服从我，就是不服从党。”在这种宗派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某些基层单位变成了“功立王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十分不正常。如某些领导，对不能“体会领导意图”的干部，往往以“异己分子”的态度对待，对善于阿谀的干部则加以提拔。

（三） 新老教师间的矛盾

老教师，一般是喜欢别人对他谦虚、和蔼，也希望别人尊敬他。张良圯桥三纳履，才博得一句“孺子可教”。青年教师如能对老教师诚诚恳恳，虚心学习，老教师是愿意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青年的。老教师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学识、技能带到坟墓中去殉葬的。可是有些青年教师不肯虚心求教。他们说这些“老古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知道的那些旧东西没有什么用了。还有一种想法是，向老教师求教未免贬低自己的威信，于是强不知为知，“胡弄”学生。学校号召老师要“带徒弟”，可是“徒弟不认老师”，谁又肯“强为人师，自讨没趣”呢？

克服这些矛盾，双方都有责任。党中央最近提出了整风运动，是最及时的。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

高教部对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和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谭其猛

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先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我首先对高教部提些意见。高教部修改教学计划时，强调政治理论课要占总学时的10%。但是对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却很少考虑。几年来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从学生的思想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许多学生在背后谈论的净是什么职位、名义、工分和爱情问题。最严重的是灰色情绪。他们问“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说：“集体利益我体会不了，个人利益呢，在从前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可是现在和一个普通职员差不多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青年学生中间的灰色情绪正在滋长着。这种不健康的情绪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却看不见，只是干“经典注释”的玩意儿。理论学习的实验室就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论教员就是辅导员。高教部对这些问题不注意，单纯强调应占总学时百分之几。教职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是如此。解放初期，大

家没听过政治课，觉得新鲜。后来觉得总是那一套，没有新东西，等于照本宣读，许多人不感兴趣，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理论学习呢？

有人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放'吗"？这个问题提的很可笑，说明是有顾虑的，怕扣帽子。我举一个例子：李森科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硬把量变到质变的公式往生物发展上套。可是过去几年来成为生物科学中的经典。当然，把李森科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实际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高教部在指定研究生不和有关部门商量，选送留苏学生不按照专长，这都说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非常严重的。

"你捏了一个泥菩萨，自己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大家对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有反感。李贤瑗

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 所以有隔阂，两方面都有问题。知识分子主要是有顾虑，肃反的副作用还未消除，大家有戒心，就怕有朝一日又被拿出来整，算笔总账。从党方面说，主要由于许多小问题的累积从而影响了党群关系的正常化，真可说是"冰生于水，非一日之寒"。我个人回顾了一下，问题确实不少。比如有一次我们来讨论教师安排问题，有一位助教大多数与会的人认为留在教研组合适，认为他适宜于作教学工作，只因为这个助教在大学毕业那学期曾参加过"青年军"（肃反的结论并不是反革命）。当时院的一位领导就不同意，认为应当调到图书馆去工作，但其他教师仍然坚持称此人有培养前途、应留在教研组。一位院领导乃说：国家培养的人才乃是德才兼备的，他不具备这条件。这一棍子打下来，没人敢说话了。这件事传出后，影响很不好，大家都认为"只要历史有问题的，就不培养"。

最近学校选先进工作者，有人反对由上面提出候选人，主张由基层组织提出。据说院长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结果，大家按上面提出的名单投票了，投票后当然就意见纷纷。

房子问题，有少数教师的居住条件太差，有一讲师祖孙三代、六口人，才住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教务长夫妇二人却住三间房子，据说教务长本人曾表示愿意让出一间，但总务科不同意"让"。

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接触不够，教师们反映说："只有开会、个别谈话才能见到面。"领导上在进行批评时，有时也不够慎重，未调查清楚事实就乱批评、乱戴帽子。大家对这种批评很反感，有人冷冷地说："你捏了一个泥菩萨，你自己又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

就是由于上面这一系列的情况，于是造成了党群之间的隔阂，亟须进一步改善。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在学术上争鸣，一方面要尽量的"放"。但要做到这点，还需要创造条件，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时期。因为财经学院的教师们都是解放后才开始向苏联学习，要想一下子就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还不容易，所以要耐心等待。此外，对若干值得争鸣的问题，领导上应当善于抓，及时提出来，组织大家讨论、争鸣。

财经这门科学没有实验室，研究的对象是数字。今天，一牵涉到数字，就往往牵涉到"机密"。这个问题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有很大改善，但也还有不少问题亟须解决。比如有些企业单位不把全套材料给你，把生产实习当作"负担"，有些文件就不给你看等。希望光明日报能代我们作进一步的呼吁。

科学院不要将院墙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的科学研究压得太低了。陈建侯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目前分在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三个系统中进行。过去几年，它们对国民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也抵销了不少力量。郭院长在全国政协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协调工作，我觉得这样做很对，希望快做。否则像今天大家争着挂牌子的作风，要想达到国际水平，恐怕有点"痴人说梦"。

"科学奖金"本意很好，不过科学进军的高潮没有掀起，倒掀起了"人心向院"的高潮。科学研究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大家都知道这样说，究竟如何结合，恐怕还值得考虑。有人说，做理论题目，可能得到科学奖金，名利双收；有人说，复制国外配方，可以结合新产品试制，虽无名，利还不少。我不反对奖励，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对人民、对国家有点用处的科学研究，还是理论结合实际，实际结合理论的好。

我觉得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报告水平，需要多多提高。为此，应把科学研究看作是全国人民的公事，不是哪个单位的"私事"。科学院不要将院墙修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研究所压得太低了。我非常拥护袁翰青先生"科学基金"的倡议，科学院应当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各方面在科学基金补助下，可以结合生产、结合教学，展开研究工作，自成一家之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其次，我想谈谈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问题。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绩。不过，在"专业培养"、"学用一致"问题上，我认为大家还可以商讨。目前，专业是否分得过细了一些，忽视了基础课程？过去训练通才不好，因为太通了，一无所长；现在训练专才好，这又觉得太专，只知道一点儿，也不见得好。比如桐油罐子，装桐油当然很好，但是有时没有桐油装，装香油就用不上了。现在、年年都在闹专业同学改行问题，真是公私交困，各有苦处。我觉得大专学校应当减少院系，集中教学力量教好基础课程。例如，化学方面，教旧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等就算培养到70%的程度。至于什么工艺专业、造纸、制革、橡皮、油漆、塑料等等，放在四年级教。这样，国家建议什么，在四年级就多开什么；国家不要什么，就少开什么。既灵活，又方便，学生无改行之忧，国家有得人之实。橘逾淮为枳，在外国先进的，在国内不一定先进，不能生搬硬套的学习。

还有，选送青年出国培养是国家的大事，既然肃反运动已基本完成，不应当再由内部决定，选拔人员就不能限于党员团员，只要成绩达到标准，就有被选送资格。选拔应举行公开考试，宗派主义是阻塞贤路的。

中央卫生部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思想很严重：药学人员所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沈阳药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顾学裘

我们药学专业的问题很大。在医药卫生部门，药工人员不安心工作，学生不安心学习，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其实，中国的药学在古代就很繁荣，李时珍（明朝）集药学之大成，当时中国药学超过了世界水平。但是到现在为什么这样落后呢？我认为这与中央卫生部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希望光明日报替我们呼吁一下，我对健康报的希望不大。在健康报上，一年也看不到几篇有关药学问题的文章。

我现在对中央卫生部提几点意见：

1. 重医轻药的思想很严重。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从中央一直贯穿到各个基层单位（医院）。药学人员在这些单位所处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过去卫生部门曾批判过王斌、贺诚的宗派主义思想，但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在目前仍严重存在。现在，对中医与护士工作比较重视了。但是对药学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某地有一个新建医院，在将要开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安置药房，草草地找了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对付了事。至于药房设备简陋、技术低下，药工人员没有得到像同级医务人员的待遇等情况，在各地医疗单位中普遍存在。我们教学部门也不例外。在沈阳药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可是学校出布告，却总是由此院长具名。

2. 1954年的医学院校调整，原来是要达到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目的，可是结果不是这样。沈阳药学院是由东北、、浙江药学院和山东医学院的药学系合并起来的，合并起来，招生数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学生的质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有的院校还因调整而积压了人力。这些问题希望卫生部研究，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

3. 在全国医学教育会议中，讨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时，卫生部领导上不能倾听大家的意见，摆了许多大框框、小框框；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总之限制重重。使许多参加会议的老教师不能充分发表意见，因此，这些计划和大纲不能不脱离实际，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很多困难，各校不能不加修改，造成了现在一班一个计划、一个大纲的混乱现象。

一个专业分设三处没有必要：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左耀先

设新专业应该统筹兼顾。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在东北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都有。一个专业分设在三处有没有必要，很值得研究。如果放在一个学校里，人力物力都可以节省。如一个专业分设三校，招生数与国家需要数不相适应，对毕业生的分配也有问题。

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可是在这方面却有些问题：1. 学校与科学研究机关的关系不明确。我认为学校与研究所不仅是配合的关系，根本就应该把研究所设到学校里边去。研究员可以教课，教师可以做研究工作。2. 学校与工厂的关系问题。冶金工业部给学校和工厂都有通知，要求学校与工厂共同负责培养学生。可是一到实习的时候，工厂就觉得麻烦，认为照顾学生实习是个负担。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带番号的厂子，根本不许可学生去实习，毕业生却要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学生对这些厂的实际知识缺乏，分配到那里去是否能适合生产上的需要，我们就完全不了解。

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开大会挂着红条条，在实际工作上起不了作用。彭清源

财经学院向科学进军的最大困难是得不到实际资料。我们曾和中央财政部联系，要求把我校作为一个发文单位，给一些资料，始终没有结果。在沈阳，财务工作做得较好的厂矿，不欢迎我们去，怕我们打扰他们的工作。财务工作有问题的厂矿欢迎我们去，为的是要我们帮他们解决困难，但我们在那里不可能获得先进的资料。最可笑的是，连本校财务科都拒绝供给资料。我校有位教师准备研究高等学校的财务工作，向财务科索取资料，财务科答称如果不是检查工作，我们没有时间提供资料，之后又说账目不能看。

有人说："向科学进军，不要光吹号，不上马。"这话对的。但是，资料问题解决不了，叫我们怎么"上马"？有的教师反映：财经科学的研究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高教部应支持学校和更多的有关业务部门跟它建立关系。

其次我想谈一谈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的地位和工作关系问题。有人说："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每逢开什么大会，总看见民主党派的人挂着红条条，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实际工作上却起不了作用。"我看这种反映是符合实际的。拿我们学校说，一些场面上都少不了我们，就是实际工作插不上手。例如评薪定级，领导上都最后确定了，才召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会，名为讨论，实际上是走形式。

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已经有这样呼声：我们不愿意当

花瓶了！

怎样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怎样在基层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加以考虑的问题。

关于工作职权，目前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我是做系的领导工作的，系内决定一个问题，常常因干部科不同意，行不通。例如系资料室有位留学生，能够做研究工作，系里决定把他调出来，教务长也同意了，但干部科通不过。现在肃反已经结束，问题基本搞清，再单纯的从“政治”出发，不仅不能使人信服，恐怕也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人事调配不当，有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不恰当。时昭涵

目前的人事工作方面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而且相当普遍。我建议中央加强全国的人事工作。

拿我们单位说，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文盲，勉强能阅读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调配技术人员的工作。调配不得当的当然就不会少。有人讽喻这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例如我们单位是搞化学工程研究的，可是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却是学肥料的，学药物的。

人事工作干部不了解干部情况，但又掌握着分配、使用的大权，这是一个矛盾。因此，我希望中央考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干部来做人事工作？目前有些单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怕是不恰当的。

我还想谈这么一个问题：科学研究工作依靠外行来搞，还是依靠内行来搞？我是研究化学工程的。据我知道，“化工”作为专门的学系，最早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苏联近年来才在大学里设化工系。当初我们学习苏联，一些行政领导同志自己不懂业务，又不接受内行的意见，简单地认为在苏联化工不成为独立系统，我们也应该这样。于是大批的化工研究人员改行了。现在发现这样做不对，才开始在大学里设化工系，可是已经走了几年冤枉路。其实，当初能听一听内行的意见，这种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再说我们单位的化工研究室，工作方向一直不能确定下来。这倒不是我们研究人员不知道化工应该研究什么，而是行政领导上不采纳内行的意见。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要配合生产，但不知道化工研究应该配合什么生产，于是各种任务都下来了，至于这些是否属于化工研究的范围，或是否是化工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却不予考虑。其结果，当然研究方向就确定不了。

再举一例子：我们单位早前修建一间试验室，正赶上增产节约运动，领导上要削减修建费用以贯彻节约精神。当时内行人提出意见，认为实验室要求有一定规格和标准，不然要出毛病。领导上不听。后来房子草草盖好，外边火车经过时震动，使精密仪器受到损失。于是又加固修补，所耗费用竟比节约的钱大得多。

有事向领导上接头还得先挂号。领导脱离群众是严重的。赵鸿翥

关于“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这个公式始于团结，终于团结。但是团结总要有一个过程，至少也得先认识，才能团结。我们学校的教师们彼此不认识，老大贵姓不知道，历史情况不知道，团结何从谈起。我联想到旧社会的学校有职员录，印着各人的职务、简历。新社会的学校没有这东西，可能是保密，只有领导干部才能知道。肃反运动时，又要我们对不相识的人进行斗争，实在令人为难。

关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很忙。只有少数人因工作关系才能接触；大多数人只有在听报告的时候才与领导同志发生关系。在旧社会学校负责人与教师常常接触；新社会，即使在路上遇见，彼此也不打招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一点感情也没有。有事想和领导上接头，还得先挂号，甚至等多少天谈不上话。领导脱离群众是严重的。

要使戏剧繁荣，非打倒教条主义不可。万籁天

目前文艺创作赶不上建设高潮的发展。就剧本说，不是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不上座，好的极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教条主义则是其中主要的。按教条主义要求，这个写不得，那个写不得，写得的便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我们过去搞戏，有“没有斗争，没有戏剧”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便是“生活就是斗争”，可是教条主义者硬是回避斗争，不正视生活。

最近上演的“洞箫横吹”是一个较好的剧本，但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却左一鞭、右一鞭的打它。说什么“党委书记和群众打扑克，是不对的”；“军属有困难是不符合实际”等等。这种教条主义不打倒，戏剧能繁荣吗？

从今年起，作家要靠写作以维持生活了，这是推动创作的好办法。但是，要做起来，恐怕也不容易。辽宁有的作家怕饿饭，改行了。写一部作品不容易，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成的。特别是话剧剧本，写出来，上演税制度不健全，作家生活仍不能保证。如“双婚记”，现在全国都在演，作者到今天为止才拿到四百元上演税。

这几年话剧演出质量老提不高。有些好京剧观众百看不厌；话剧演过一次，再演就没有观众了。原因何在？据我看，台上台下生活一样，观众又何必花钱进剧院呢？现在演员的基本训练太缺乏了，说话听不见，咬字不清楚，形象不鲜明，性格不突出。听说北京戏剧界已经开始注意基本训练，这是很好的。过去，我在鲁艺教演员基本训练，有人给我扣了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弄得几年不敢吭声。现在看来，当一个演员，基本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沈阳师范学院领导用人只凭个人好恶，把尚未学俄文的党员，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叫不懂历史的人作历史系主任。徐公振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在患难的时期，党与非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抗战时以至于解放战争的年代，特别是东北在解放初期正处于尖锐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真能同甘共苦，团结合作，体现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的实质。

全国胜利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好像有人在高高的砌墙，使多年的患难老友，也在宫墙外望，于是造成了严重的隔阂。这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这一墙将它开始拆撤。我们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拆就把它拆到底吧！恢复大平原，恢复过去的真挚友谊吧！共同的建设我们美丽的庭园。

我过去曾听到一个旧及门说，他说："老师！我看党与非党之间，好像是少东家之与柜伙。"当时被我批判了，其后我也觉得有些值得寻味。

沈阳师范学院的矛盾，基本上也是党和非党间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上。拿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来说，领导上是我行我素，既不采纳比较负责人的意见，甚至党委副书记都不共作商量。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仍旧没有变化，领导上的用人仍只凭个人的好恶和驯顺与否为标准。过去并不考虑其政治文化的修养和专业与学识的成就，常提拔一些不懂学术的党员为领导。有人反映尚未学俄文的党员，领导上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自己的老婆并不懂历史，叫她作历史系主任，甚至两年不检查她的工作，尽管搞的乱七糟八，他还啧啧称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对丧品败德的亲近，他武断的替他掩护，毫不考虑问题已经昭昭在人耳目了；对于有建议和反对的表示，领导上则大肆打击，突出的表现在肃反运动和每次讲话中。压迫教师与学生的气焰，以权威自居的思想作风，使科学研究，受到一定影响。这还和领导上本身的好大喜功思想存在着矛盾哪。当然党外人士也有严重的缺点，作为揭发主要矛盾来看，兹只谈其一面。

为什么有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好，建议党在整风中从思想上进行检查。陈彦之

为什么有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好？为什么这些矛盾长期未得解决？我建议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彻底检查一下，特别应该从思想上来进行检查。

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所以造成隔阂，原因很多，从思想上来说，还有一个对知识问题的看法问题。那就是有些党员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要突击一下就能掌握了。"他们完全不了解知识积累之不易和学习过程中的艰辛。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就产生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教学设置上的速成思想。过去曾出现过许多速成教学，如识字速成法、数学速成法、俄文速成法等等。尽管这些速成法曾风行一时，结果都行不通，还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有些人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进了夜大学以求速成。在学习中跟不上去，他却不想到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反怪老师不照顾工农子弟，还给老师扣帽子。可是在夜大学呆了几个月回机关后，在填学历表时，却把原来的"小学程度"改填成"大学程度"了。这是一种不朴实的作风。从这里也说明，学习是没有什么捷径可寻的。苏联有些工人出身的科学家，并不是速成或突击而来的，仍然是经过多年的辛勤学习，多年的苦苦钻研才得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做事情就不是从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利益出发，当然就不能够很好地团结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下才获得解放的。解放之后，党中央仍然是重视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可是有些党员不能体会党的政策，他们搞宗派，排斥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校长对教授都是十分恭敬，罗致教授，或是重金礼聘，或是登门邀请。今天有些大学里，甚至总务科科员也可以申斥教授。知识分子就不免有今昔之感。

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能引起全党从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原载1957年5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五　"三大主义"阻碍新闻事业的发展

首都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初试"鸣""放"

新闻界也要大鸣大放。昨天（16日）在首都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这个要求，并且说：新闻界到现在还没有放，希望领导部门对此问题表明态度，开放"绿灯"。

有人在会上说：在新闻工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认为，这三座大山限制了新闻自由。不少发言者举出具体事例，说明官僚主义怎样阻碍了新闻采访。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说：最困难的是有些机关、有些会议，根本不让记者参加，"使我们有力量也使不出来"。中国青年报去年发表了二百多篇批评性的稿件，受到了不少责难和挫折。有人甚至对青年们有没有资格批评业务部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根本表示怀疑。文汇报记者杨重野说：有些机关真是"侯门深似海"，连传达室这一关记者也很难通过，好容易闯过这一关，见了秘书也能毫不留情地回绝记者的采访。

发言者指出，在新闻单位内部也存在着官僚主义。有的单位"衙门化"，机构重叠、人事臃肿。能写新闻的人当

了领导，不出来采访，一些新手在外边跑，写不好新闻。有的新闻拖了很久才见报，失去了新闻的时间性。会上有人说：新华社就有人认为：有些新闻既然是只由新华社发表，那么迟一些也无妨，可以“后发制人”。

带病参加这个会的新闻界前辈张恨水先生对有些报社内编辑记者多至几百人的情况，表示惊讶。他说：人虽多，而报纸还是办得不那么完满。有些记者一个月也不写一条新闻。他问道：这些记者都干什么去了呢？有些新闻单位到处拉稿子，稿子拉来了，却不看，一放几个月，最后把原件退回来，还说什么已经失去时间性了。张恨水说，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对新闻界存在的严重的宗派主义，许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介绍上海新闻界情况的时候说：有些机关发表新闻的时候，常对非党报说：这个新闻等解放日报刊过以后，你们再登。文汇报杨重野说：去年在云南边境举行中缅人民联欢大会时，云南省委决定除新华社、云南日报记者外，其他报社记者都不许参加；有些作家要求参加，也被拒绝。当时只是由于周总理看不见记者问起来，省委才忙着到处去找记者。

新闻界前辈顾执中说：过去上海申报、新闻报有很多老记者老编辑，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毛病只是业务观点重，脱离政治；这些老记者老编辑都有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报社里的机器设备，都是他们用心血换来的，可是，解放以后，他们都进了被称为养老院的新闻图书馆。他认为：不让那些没有政治问题的老报人作新闻工作，是不对的，这就是宗派主义。顾执中还说：新民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受压迫的，解放以后，也没有得到照顾，听其自生自灭。

有人对新华社“一花独放”表示不满，认为有些报社记者写新闻积极性不高，原因在此。顾执中说：中宣部应该鼓励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办通讯社。邹震也认为：为了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应该有更多的报纸、更多的通讯社；各民主党派有自己的讲坛，无党派人士也应当有自己的讲坛。

会上许多人都认为新闻可以抢先，应该抢先；时间是新闻的生命。反对有些新闻单位毫无理由地拖延和迟发新闻的作法。大家都提出新闻工作者应该发挥创造性的劳动，加强独立思考、独立负责的精神，多发表生动、活泼并且富有人情味的新闻和通讯，报纸版面要有色彩、多变化。

在座谈会上，还谈到报纸究竟应该出几张的问题、要不要广告的问题；也谈到报纸的党性和政治性、思想性和趣味性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对当前报纸的标题不生动、不简练，也提出了意见，认为在这方面还应多向前辈报人请教。

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工作，也有人提出了意见。他说：新闻工作者协会是群众团体，但是它给人的印象是“新闻首长协会”，是脱离群众的。

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行的。参加座谈会的有新闻界前辈、首都和其他地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共二百多人。座谈会将在17日继续举行。

（原载1957年5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六　首都经济学家在座谈会上揭发

经济学界壁垒森严宗派主义严重

自昨天下午开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批邀请首都经济学家座谈关于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很多经济学家反映：经济学界弥漫消沉、涣散情绪的原因，是新老壁垒森严、宗派主义严重。

郑林庄说：经济研究所成立以后，经济科学的研究好像回到中世纪寺院中去，与俗人隔绝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一开头就说，今天推开门进来，能够与许多老朋友聚在一起谈谈，真是太难得了。接着他指出，解放以后，曾经有过一个新经济学会的组织。那时一些经济学界的老朋友还常常有个开会碰面的机会。但从1953年以后，这个学会的活动不知什么原因，无形就停止了。经济研究所成立以后，大家想它总可以更好地领导团结全国经济学家，把学术研究工作推动起来，结果情况刚刚相反。从此，经济科学的研究就好像回到中世纪寺院中去与俗人相隔绝，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外贸学院教授武坛干说，一直到今天我到这里来开会时，还有人问我，经济研究所在哪里？经济研究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彼此联系之少，由此可见。

孙毓棠说：目前经济学界的情况是，工作努力，情绪消沉。

什么原因造成经济学界这样消沉、涣散呢？经济学家孙毓棠说，很多人反映：目前经济学界的情况是“工作努力，情绪消沉”。原因有二，一是对老经济学家的知识积累否定太多；一是对老经济学家的进步估计不足。很多人已经是马列主义知识比旧知识多得多，结果仍然被戴着旧知识分子的帽子。辩证法的观点，认为事物都在运动变化，这条真理就是好像对老经济学家不适用。此外，还有一些人为的措施，造成了新老的不团结。例如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的委员，几乎一个老经济学家也没有，“经济研究”的编委会也有同样的情况。科学院冠盖如云，学术风

气稀薄。很多老专家都被压得看不见了。因此，很多人存心做"和尚"，工作努力，情绪消沉。

滕茂桐说：宗派主义有三种表现方式。新老不团结便由此而成。

经济学家滕茂桐以南开大学为例，说明宗派主义是造成新老不团结主要原因。宗派主义表现有三种方式。一是根本否定老经济学家；二是闭塞言路；三是巧立名目，排斥异己。例如南大过去有位老教授，研究经济史已经数十年，同学反映他教得很好。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校方派了一位年青人到人民大学学习，两年以后回来就代替了这位老教授的教课了。老教授不给教课怎么办呢？办法倒不少。被安排在南大的"财经研究室里"，他根本不属于经济系。里面有很多老经济学家都在悠游岁月，无事可做。原来，南大还有个对外贸易专业，后来也被取消了。

严仁赓说：对旧经济学和老经济学家应否全盘否定，已经到讨论解决的时候了。

北京大学教授严仁赓说，否定一切的态度真是要不得。一方面是全盘否定旧经济学，一方面是全盘否定老经济学家。过去，在经济学界，几乎有这样一种风气，上讲堂对旧经济学只能批判，批判时必须声色俱厉。谁要提到一些旧名词，就要被人扣上"唯心主义"、"反动学说又在冒头"的帽子。全面否定，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某些经济资料的不准应用。例如一引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就一定要加上"根据美国官方发表的经过大大缩小或大大扩大了数字……"，如何如何。似乎只有这样，才算立场坚定，才算阶级性最强。至于到底是否真正缩小或扩大，就再不去调查研究了。经济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这是肯定的，但旧经济学和老经济学家是不是可以全盘否定，今天已经到了提出来讨论解决的时候了。因为，像南开大学那样投闲置散无所事事的老经济学家还有不少。有的老经济学家长年累月的学术著作，只要有一个人稍一批评，就被停止出版。

徐毓枬：现在教经济学好像和尚，只会念经。

经济学家徐毓枬认为，经济学界除了新老团结，宗派主义问题以外，还有一种严重的情况是研究工作不接触实际。他说，现在教经济学实在太没有意思，好像和尚只会念经。最近，听说有人还要招资本论副博士研究生，我看这些人只能成为道行很高的和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现实政策问题不敢接触。例如，轻重工业的比重问题，当提出一比八的时候，所有发表的文章就一律说这是"合理的、必要的、可能的"。当提出一比七的时候，又说是"合理的、必要的、可能的"。类似这些牵涉到政策的问题是不是就完全不可以讨论呢？特别是一些非党的刊物。这是可以研究的。在英国当1925年以后决定恢复金本位的时候，凯恩斯就还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讨论呢？

吴半农说，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情况，同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基本规律有配搭不上的情况，值得研究。

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在国际经济研究工作中，还有两个矛盾值得研究。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看，有些情况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基本规律有配搭不上的情况。例如，经济周期危机问题，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来，就值得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发展的，但发展不好就要成为修正主义。其间道路很窄，这是一个矛盾。另一个是，我们对某一个国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常因同那里的共产党看法有些不同，发表有困难。这也是一个矛盾。

会上有的专家还批评了对部门经济不重视的倾向。有的专家批评了目前领导上对一些财经机关干部学校的研究力量，几乎完全看不到。他们好像孤儿野草一样，随人踩踏，可有可无。还有很多专家认为，保密工作虽有若干改正，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些单位只肯借出结论性的资料。实际上，目前我们要的是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大家都想独立思考，做创造性的研究。

参加昨天下午座谈的主要是首都一些高等院校的教授专家。今天下午，将继续邀请企业部门等单位的经济学家举行座谈。

（原载1957年5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七　鸣放的空气浓厚　老报人慷慨陈词

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继续举行

首都新闻工作者17日继续举行"新闻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老报人陈铭德、张友鸾等。参加座谈会的新闻工作者积极要求发言，座谈会决定18日继续举行。

新华社丁宝芳用自己在采访工作中的遭遇来说明记者的苦闷。她问：记者究竟是应该发挥独立思考、独立负责的精神来工作呢？还是只按照领导意图来办事？她说：记者忠实于客观事实、报道有利于党的事业，符合党的政策，是应该允许记者大放的。

人民日报复景凡认为办报方针值得好好研究，现在情况是上下都不满意，问题很多，例如报纸是反映下边情况，起个"耳朵"的作用？还是贯彻领导意图起个"嘴巴"的作用？

陈铭德介绍了上海新民晚报的情况。他说：新民晚报1953年改组以后，提出了恢复原有的传统风格和"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报纸面目一新，销数扶摇直上。陈铭德说他在新民晚报这一转变中的体会是：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要满足群众的要求。关起

门来办报，群众就会厌弃。一个报纸如果能解除了教条主义的模子，一定会受读者的欢迎。他说：如果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那么新闻工作者就是厨师；一个好的厨师做出来的食物，不但要有营养价值，并且要作到色、香、味俱全，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食欲，而色香味与营养也并不是矛盾的。陈铭德提出了怎样接受旧报纸优点的问题，他说，解放前不少民间报纸，无论在采访、编排以及经营管理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不能一笔抹煞，全盘否定。他认为：一个报纸要替读者说出他们要说的话，不要板起面孔教训人，要站在读者这边，读者才能把报纸当作知心的朋友。陈铭德最后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增办非党报纸，二是建议首都办一个晚报。他说：全国非党报纸只有五家，非党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把报纸当作"百花齐放"的园地，那么园地多了，就能开放更多的花朵；如果把报纸当作"百家争鸣"的讲坛，讲坛多了，就能辩明一些是非。陈铭德强调旧报纸的经验值得吸取，老报人也应该受到尊重。他说：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教授，桃李满天下，院系调整后，在北大整整作了四年总务工作，最近才开课。这就是用非其才，安排不当。还有很多老报人改行的改行了，转业的转业了，我们应该大力发掘老报人，使他们能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出一把力。今天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和前辈报人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历史不能割断。

老报人张友鸾轻松而有风趣的发言，不断引起哄堂大笑。他用"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有白头"的诗句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表达他对新闻工作的留恋。他说：新闻工作就是有那么一种魅力，使我永远怀念它。但是今天老了，编报作不了夜班，采访和年轻同志在一起也成了怪物，不用等进农业展览馆，就会被人喊"滚出去"了！对于今天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工作队伍的壮大，他表示不胜欣羡，他说：我借用毛主席的词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张友鸾在提到对记者的尊重与信任问题时说：从最近报纸反映的情况看来，今天新闻工作还没有得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好像哪里有报纸，哪里就有"三座山"。有人说：记者像苍蝇。这在二三十年前听到是不足为奇的，今天却不能不使我惊异。我认为记者不是苍蝇而是蜜蜂，它可以酿蜜、作蜡，还能帮助百花齐放。把蜜蜂当作苍蝇是无知。也有人讨厌蜜蜂，因为它有刺，会刺"三大主义"者。他认为报纸要想成为读者的知心朋友，就要质量高，供给读者知识、学问和趣味，不仅要软些、软些再软些，并且要软中有硬。认为报纸只应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板起面孔教训人或是必须死读硬啃才能读下去，结果读者一定会消化不良，是行不通的。张友鸾反对报纸横排，他说据说横排看起来快，眼睛舒服，我看直排看起来也不慢，几千年，中国文字都是直行的，我们的眼睛也没退化了；又说横排是为了拉丁化，那么等拉丁化了再横排也不晚。毛主席写给诗刊的那封信就是直的。我所以反对横排是因为它限制了版面的分栏和变化，使得报纸呆板起来。

大公报萧离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怎样继承旧新闻工作传统问题，他说，大公报合并改组后，没有保持过去的传统和风格，今天情况很不妙，不但读者有意见不爱看，我们在报社工作的同志也不爱看，思想波动。中宣部为什么没有考虑发展这个报的特点，让它办得更有生气呢？萧离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说：大公报是负有国家宣传任务的，可是和其他报纸不能相比，几次出国采访大公报记者都没有份。中国新闻社朱凤藻批评中宣部对于中国新闻社不关心、不支持。他说中国新闻社好像新闻界的私生子。

人民铁道报范四夫和人民航运报赵琪介绍了专业报纸工作的困难。范四夫说：我们是"非新闻界的新闻人士、非铁路界的铁路员工"。中宣部的不关心，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垄断，对我们说来，也有深切的感受。

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提到北京日报登了有关人民生活的新闻和图片，曾受到一些读者和社内干部的责难，认为"不严肃"、"不像党报"，实际上这些人也喜欢看这样的新闻，但是他们却说这些新闻没有思想性、阶级性等等。周游认为这是对报纸的阶级性、思想性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他说：报纸的指导性在于用事实，用新闻从政治上、思想上教育群众，而不是说教。

老报人王芸生一开始就说：东风吹起，春水皱了。以新闻界应有的敏感性，是应该鸣放起来的。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两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关于宣传片面性的问题，王芸生说，例子很多，如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等等，喜当然应当报，成绩也是肯定的，但就没有缺点了吗？西施的脸上难道真的连一点点黑点也没有？他问在座的安岗说：你是报道鞍钢的专家，鞍钢出的重轨就有废品，运出去几千里再退货，造成很大损失，为什么看不见报纸批评呢？问题是我们习惯这样的工作方法了。因为有人认为这样不会"犯错误"。王芸生提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报社劳动生活率太低的问题，他说许多记者不记，编辑不编，工资照拿，真是记者不记、见怪不怪，编者不编、司空见惯。胡乔木同志在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批评有些总编辑不编报不写稿、专稿领导的那段话，真可"浮一大白"。周总理曾问过我大公报如何改进，我说正在研究，只是劳动效率太低，我最没办法。总理真是英明，一语道破个中原故。总理说，这一方面是解放区带来的供给制思想：干不干、二斤半，再加上新解放区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因此许多单位摊子很大，许多人不作工作，工资照拿。总理鼓励我一定要想办法改进报纸，但是对劳动生产率提不高，我还没想出什么办法来。

（原载1957年5月18日《光明日报》）

材料八　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近来全国各地普遍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界人士连续举行了座谈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们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地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北京、上海等地已有的经验表明，只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揭露出来，才能够使我们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同时，也只有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是说，我们要让各方面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就是把整风运动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互相结合，认真地实现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说的"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该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

在这些日子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有益处的。只要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善于接受一切有益的批评，认真研究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切实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一定可以达到填平和拆除党内外之间的深沟高墙、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大大改进工作的目的。近来，有的地方开始这样做了，已经发生良好的效果。

但是，也还有一些同志对于党在党外"争鸣"的同时进行整风，并且要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他们听到各种意见大放大鸣，并且有的意见是针对着自己的，于是在思想上就放不开，觉得岌岌不可终日，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了，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被动"，自然不妙；可是，还是现在小被动以免将来大被动好些呢？是继续大胆放手，让大家大放大鸣好些呢？还是束手束脚——既束住自己也束住大家——好些呢？我们是赞成前者的。矛盾既已存在，不解决，只会加深；掩盖是掩盖不了的，正如纸包不住火一样。

其实，目前党外人士揭露的主要的矛盾问题，同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决不是关起门来，仅仅依靠我们党内同志自己想出办法就能够解决的。这是要依靠党外人士和我们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我们不应该采取关门整风的办法，而要采取开门整风的办法，虚心地认真地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近来正是由于党外人士大放大鸣的结果，才使我们更加认识了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其中有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对于我们的整风和改进工作当然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

从群众方面来说，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也将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现在，人们都在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人们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提高。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群众的鉴别力，不能把群众的鉴别力估计得太低了。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前的漫长年代里，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星星之火。然而从它传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一天比一天掌握了更多的群众。尽管它的敌人屡次宣布它为非法，为洪水猛兽，但它还是生根而且发展了。进步的群众冲被迫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要接近共产党，接近马克思主义。这就可以证明，人民群众从来就是追求真理的。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去帮助群众辨别真伪、美丑和善恶；并且要让真的科学、善的东西、美的东西战胜假的东西、恶的东西、丑的东西。

经过这一次争鸣和整风，我们要使党内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在战斗的锻炼中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科学、新文化将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这是符合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的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证明：它一方面从人类变革的宝库中大量地不断地吸收养料，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和革命学说，再回过来指导实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一切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作斗争。它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正是在于它从来不是停滞的。它不仅不会在敌对的思想面前倒下，而且只会更加茁壮地成长。

我们希望在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过程中，党内外的意见能够进一步沟通，彼此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应该继续鼓励人们大胆地争鸣，配合我们党内的整风，随时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随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原载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反右派运动及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向党提

出批评建议，并且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的正常步骤。会上，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很好的，有的还切中时弊。但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旗号，利用“大鸣”“大放”的形式，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肆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并于6月8日正式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等文章，并于7月1日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样，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8月，宣布粉碎了右派的进攻，但要求继续深挖右派，很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走向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所谓“右派”进行了复查，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材料：

材料一　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活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

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压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原载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央决定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极少数右派乘机进攻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指示》还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马寅初等都到会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于五月初和五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十三次，七十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次发言。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五月十五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陈叔通五月十六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的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

潮。

一、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二、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三、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偏差和错误很大很大”，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起来，“由各方造成舆论”。四、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五、他们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六、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右派分子人数虽然极少，但能量不小。在他们所煽动的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一部分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摘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830至833页）

材料三　反右派斗争的酝酿发展过程

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这年一月十八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察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两个座谈会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六月八日结束，我在会上都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六月八日工商座谈会结束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我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且批驳了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言论，指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

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两篇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反右派，但实际都是准备反击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从六月八日正式发动。当天，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七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在“六·八”指示中，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在“七·一”社论中，批判又进一步升级，不但点名批判了所谓“章罗同盟”，并且把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错误地说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宣称右派分子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在这些指示和社论的部署、号召下，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摘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材料四　工人说话了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在这以前，有一部分职工曾经对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延长定息、撤销公方代表等问题表示过意见。现在，激起工人们发言的是性质更重大、范围更广阔的政治题目。在这一次，各地工人发言非常踊跃，情绪非常热烈。要求发言的工人很多，写信给报纸的工人也很多，报纸上发表的，不过是工人的意见的一小部分。很明显，广大的工人群众看出了，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风，这股歪风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的。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而应战了。

在近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但是也有少数并不如此。这少数错误的意见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而且发表这种错误意见的人，还力图造成一种空气，不允许人们加以反驳，甚至对于反驳者进行威胁。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怒，使他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也无法沉默。

广大的职工群众看得清楚，如果听任这种右派野心分子飞扬跋扈，那么，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将受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就将会受到危害。职工群众了解，我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流血奋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在过去的长时期奋斗中，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态度，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多的信任，哪些人们应该受到最少的信任。他们也知道，不管说话的人怎样说得漂亮，如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工人群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各地职工座谈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拥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有意见，他们也要帮助党整风，帮助党组织改正错误，克服缺点。但是他们懂得，当有人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一致，击退这些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

最近有一种论调，仿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因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倒是工人阶级应该向资本家学习许多优良品质。但是话刚说完，事实的考验马上就来了。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的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既然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因为据说，工人阶

级一“鸣”,就会妨碍别人“鸣”。怪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当然,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工人阶级“鸣”了,并不是不允许别人“鸣”。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谁也没有妨碍谁。其次,如果工人阶级一“鸣”,有力地驳倒了一些错误言论,使得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再无理可“鸣”,那么,这种错误的言论受到一些“妨碍”,于国于民,到底又有什么不好呢?

(原载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材料五 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永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有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结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

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讨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原载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六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自本报编辑部9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

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始成一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9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利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登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

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原载 1957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

材料七　民盟反右派斗争初步取得胜利 章罗联盟在各地的阴谋逐渐显露

从中央到地方揭发出一批右派骨干分子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自 6 月 18 日决定盟内整风、展开反右派斗争以来，截至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组织，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约有五百人。章罗联盟在各地阴谋的概貌，已逐渐显露。

就已被揭发的这些右派分子所任的盟内职务来看，有副主席二人，中央常务委员 38 人中占 12 人，中央委员 142 人中占 35 人（包括常委），候补中央委员 41 人中占 13 人。还有许多是担任地方组织负责人的。他们一般都是大知识分子。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反共联盟，成了全国右派分子的司令部。

章罗联盟在各地都有骨干，有的已经形成了据点。章罗联盟在北京的据点是以曾昭伦、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黄药眠、钱端升、叶笃义、范朴齐、张志和、浦熙修、陈新桂等人为骨干，他们控制了民盟中央，向全国各级组织发号施令。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据点是以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赵文璧、孙斯鸣、陆诒、许杰、徐铸成、万鸿开、赵望、韩鸣、周永德、程应镠、谢仿林、朱立波、曲友诚、吴茵、莫筠等人为骨干，并且勾结了盟外的王造时等人。在四川的据点以潘大逵为首，在成都的骨干有赵一明、韩文畦、张松涛等二十多人；在重庆的有舒军、李康等十余人；在雅安的有罗西玲、杨志农等人，在南充的有张默生、张崇古、吴仲钧等人；此外在泸州、内江、遂宁均有他们的代理人。在湖北、武汉的据点以马哲民为首，以戴今生、项粹安、张云冕、陆鸣秋、朱裕璧等为干将，并在武汉市的许多基层建立了据点。在沈阳的据点以陈彦之、程厚之等人为骨干。在湖南的据点以杜迈之、康德为首，以陈新民、屈子健、刘文炳等人为干将。在浙江的据点以姜震中、宋云彬为首。在广东的据点以钟平为首，以林孔湘、应云霖、董每戡、侯黄等人为骨干。在广西以林焕平为首，以万仲文、卢显能、黄中文为骨干。在安徽的据点以童车五、王晋齐、吴伯敏、马轶廛等人为骨干。在青岛的据点以陈仰之、薛艺农、冯德先等人为骨干。在山西的据点以王文光为首，以田羽翔等数十人为骨干。在甘肃的据点以杨子恒、李化方为首。在陕西的据点以韩兆鹗、李子健为首。在福建的据点以何公敢为首。在河南的据点以王毅斋为首。在江西的据点以许德瑗为首，漆裕元、向法宜、王秋心等为骨干。在济南，民盟市委机构则为右派分子所控制。在贵州以吴雪俦为首。在天津以王大川、杨思慎为首。在吉林以余瑞璜、杨清、丁克全为首。在黑龙江以关贵武、许振英为首。

上述章罗联盟的据点及其党羽，现据他们自己的交代，以及群众的揭发，都证明了他们有的是直接接受章罗联盟的指挥，与章罗联盟有直接联系；有的则是与章罗联盟有间接联系。上下串连，八方呼应，特别是在中共宣布整风以后，他们利用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的机会，疯狂的向党进攻，掀起了满天乌云。

章罗联盟派驻湖北的专员马哲民，曾以"改变高等学校现行制度"来"以盟代党"，夺取大专学校中党的领导权。6 月 12、13 日，在马哲民策动下，以杨焕尧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组织了汉阳第一中学生罢课并上街游行，甚至出现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和口号。

在上海方面，沈志远承认他是忠实执行章罗的反动政治路线的，5 月 14 日，沈志远在上海民盟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煽动性报告，用十分恶毒的词句，诬蔑党的工作。经沈志远的煽动和彭文应、陈仁炳的策动，戏剧音乐

界、电影界、高等学校、司法、新闻等五个方面的火就燃起来了，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账”，为反革命伸冤。陈仁炳、陆诒又提出“搬石头”“夺帅印”为行动口号。他们除了向落后分子开门，积极搞大发展以外，还想篡夺上海的文汇、新闻、新民三家报纸的领导权。

在四川的潘大逵认为凡是有公民权的即可吸收入盟，他还认为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取得“工作条件”，叫嚣“要改变协商方式”，向党“要阵地”。

湖南的杜迈之、康德、魏猛克联盟，想攫取文艺部门的领导权，以康德为核心的“文艺沙龙”中的成员和它的外围组织，几乎打入所有省市文艺部门，他们还狂妄地订出了所谓接管计划，由杜迈之任省教育厅长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康德任省文化局长，严怪愚任长沙市文化局长，魏猛克任省文联主任和“同人报”社长，蒋寿世任湖南剧院经理，田洪任国营湘剧团团长，（非盟员）翟翊任省皮影木偶剧团团长。在对湖南的高等学校进攻中，突出的是中南矿冶学院陈新民、胡为柏在杜迈之指挥下，企图夺取党对鸣放运动的领导权，以及肃反善后工作的领导权。

在广东有以民盟省委秘书长钟平为首的小集团，贯彻执行了章伯钧的用组织来保证鸣放的罪恶指示，亲自和派人到各大学点火，叫嚣取消党委制。

天津王大川在鸣放期间和右派分子杨思慎、李宝震等人勾结，不但推广对抗党领导的“经验”，还亲自指使民用设计院民盟小组向党进攻，并攻击天津日报。

广西的林焕平联合了胡明树、李文钊等组成文艺界中的反党总联盟，攻击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日报。

浙江的姜震中、宋云彬在大专学校成立“助党整风工作委员会”，企图篡夺整风领导权。

陕西李子健一贯敌视党员和工农干部，他说：“不但现在瞧不起他们，今后永远也瞧不起他们”，“干脆成立一个‘功臣馆’把这些人全调去，让能干的人去工作”。又说：“人事工作不管人才，只管奴才”，“人事干部整天翻阅人家材料，简直和国民党特务一样”，还要“党给民主党派让出阵地”。

甘肃的右派阴谋家杨子恒在整风开始时就曾发表“两个立场论”的谬论，他说“一千二百万党员是一个立场，五亿九千万人民又是一个立场”。他和右派分子李化方搞反党联盟，说什么将来我当刘邦，你当张良。李化方还提出了完整的反党纲领来向党进攻。

章罗联盟及一切右派分子的最终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谋求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可是在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后，他们的阴谋完全破产了。全体盟员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正在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摘自195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

材料八　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了。我们在7月28日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评论，现在需要对于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许多地方的材料看来，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在全国解放前后入党的，但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实际上却干着危害党和人民的罪恶勾当，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配合起来，从各方面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应该看到，把这样一批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揭露出来，这对于我们的党来说，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是一件大好事，是反右派斗争的一项很大的成绩，这对巩固和纯结我们的党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在我国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参加我们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定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都必须效忠于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在党的领导之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应当肯定，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绝大多数老党员，都是符合于这个标准的，都愿意作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已经为历次革命斗争，也为这次反右派斗争所证实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党不是与世隔绝的，即使我们怎样严格地挑选党员，也会有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混进党内，也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因为经受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蜕化变质。这就决定了，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都会有一批党员，因为个人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背叛党。这样的人，不但已经失掉了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且已经同党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决不应当有任何的姑息和宽容，必须同他们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党的纯洁，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党无愧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领导者。

我们党的许多同志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不论是在过去或者现在，他们对待叛党分子的态度，都是坚决的、严肃的。在这次反击右派斗争中，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陆续地被揭发出来，就是因为许多同志采取了对党和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但是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在党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同党外右派分子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以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对广大群众也

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这样一场为保卫党、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保卫社会主义前途的严重斗争中，这些同志竟然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如此姑息宽容，这说明他们没有站稳立场。

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外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会起危害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把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彻底暴露出来，使他们在群众中间陷于孤立。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我们也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把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彻底暴露出来，使他们不能在群众中间起迷惑的作用。要知道，我们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挥者，任何一项比较重大的方针政策，都要由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见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来制定，都要由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人民群众来贯彻执行。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道理似乎是易于理解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不懂得，他们宁愿把“猛虎”放在身边而不去触动。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么？难道是一个忠于党和人民的人应该采取的态度么？

必须同党内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还因为他们挂着一块“共产党员”的招牌。也正因为他们和党外的右派分子有这个不同，他们就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就更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他们会比党外右派分子带来更为严重的危害。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同志也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了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以为，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是在一起共过患难的。因此，他们对划这种人为右派分子，不仅有一种惋惜情绪，而且也觉得拉不下面子。他们不懂得或者忘记了，一个人有较长的党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过较多的工作，这固然是好事，任何人都不应该加以抹杀；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就更不应该犯错误，他们成为右派就更不能够宽恕。这样的党员背叛了党，这就说明他并不爱惜自己的历史，并不看重党的教育和党的纪律。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们惋惜的呢？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的人中间，有许多都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是抱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加入我们党的。有人是想从党内来破坏我们，也确实作过不少坏事，只是由于他们的活动比较隐蔽，没有及时地被揭发出来。有人把我们党当作追逐个人名誉地位的工具，当个人的欲望一再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由不满党而发展到仇恨党，最后更走上了反对党的道路。很明显，这些人虽然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和我们走着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越大。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些人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因而大大减少了我们的隐患，这难道还不是很大的好事吗？

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严肃，决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宽容，这当然不是说，在划党内右派分子时可以草率从事。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他们的材料的时候，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在切实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划为右派分子，这是错误的；对于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划成了右派分子，这也是错误的。各级党委在大力纠正温情主义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错划右派的现象。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极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内和党外的反右派斗争中都取得胜利，才能更加巩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不论对党内或党外的右派分子，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这是党和人民要求于每个共产党员的，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

（原载 1957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

材料九　反右亲历记

1957 年 3 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第二天，我去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

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人家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地代表按界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此时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说，这正如电影《甘露寺》中所说的："贾化。"

3月10日下午，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携登车，赶到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院墙粉刷陈旧，一大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座椅。我被引到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等在门口。听到康生一一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对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看其他报纸。"毛主席的赞赏使我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及舒新城，其他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反正没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坐在我对面。康生先说："今天毛主席全天邀约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地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有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纸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北办人员听了很受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12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

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后来，我作为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考察，在苏期间，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当年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好时机。我们决定5月9日回国。这次访问历时44天，收获不少。加上回京后又处理了几天事务，那时所谓的鸣放，已接近尾声。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报社有关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此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访了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访苏经过。他说：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还是说说报纸的工作吧；你们出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30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报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们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入京，必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无非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正式上班。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我说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与非党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地回绝了。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谈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会也快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证，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毕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盛意难却，我当天去了。发言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党群之间的隔阂即"拆墙"的问题(听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找出来的)。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说他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数。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了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合作。我举《文汇报》为例，说《文汇报》，就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的业务，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现在领导干部应当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不久进行"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的规律。当时有人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一片热诚想介绍当时《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社会上"墙"能不能拆除的争论。用以后来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后来一声令下，"反右"之风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运动是由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接着6月初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序幕。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另一篇社论(据说是伟大领袖亲写的)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了44天，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其他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这就是被伟大领袖指的"《文汇报》写了检查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有些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确指出，"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

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一切都是早已部署好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开始，市委宣传部希望我接替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立法委员开始点了我的名。我想到风已慢慢刮了，但是还没有想到雨点会溅到我身上来。我去看石西民部长。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于是我们又设法面见这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是不能由您一人负责，我已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踏入右倾泥潭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时，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为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是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说，“章罗联盟”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吗？我翻阅1957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计划、有领导、按步骤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关于纲领性的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宏文印成文字时比1957年我们听到的录音，大部分已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创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章罗两位，从而涉及浦熙修，然后抛出袁涉兴教授。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以我为中心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新闻界的盟员，最后牵到基层。斗争的方法也非常技巧，当集中力量斗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以立功赎罪。

7月初，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我，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我在是年7月2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已列入打倒对象了。

（摘自徐铸成：《阳谋——1957》）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背景介绍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动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整风、反右派斗争问题、关于农业问题、关于体制和劳保福利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还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虽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修改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意见。

在会上，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过于严重估计，一些人认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不适合了，今后若干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总结讲话时，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表态。他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他又重复强调了三大改造以前，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肯定地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会上，对1956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

作法，再一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改进委员会。

综上所述，在阶级斗争的估计上，在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反映了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是：由于全会全面肯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和做法，便进一步助长了反右派斗争扩大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由于全会轻率地接受了修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的意见，这就导致了后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确结论，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轨道。

材料：

-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节录）
- 做革命的促进派（节录）

材料一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节录）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

（一）运动的一般情况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乡各种反革命分子，农村中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整风，也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办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人民中的犯法分子也要给予法律处分，这种处分也有教育作用。

四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还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经过批评和教育，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用大力团结和教育中间派，这样才能孤立右派，壮大左派。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农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他们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武器去进行斗争。此外，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只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是很容易明白的。

运动证明了：在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在各级党、政府、人民团体、企业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党在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但是从群众的大鸣大放中，也揭露了我们在工作上和作风上的大量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不改正是危险的。同时，在党员和团员中也有

少数的右派分子，另有一部分人则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已经得到显著的成效。特别是那些鸣放得充分的单位，和那些注意改正工作缺点的单位，成效更显著。整个运动发展的情况是：右派被孤立被分化，中间派向左靠，左派力量在增加。

但是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不能前紧后松，必须争取全胜。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运动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当然，有些单位的情况同机关不同，运动发展的阶段也就不完全相同。例如农村，有大鸣大放，有对于坏分子的斗争和对于富裕中农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同于机关中的反右派。对于农民和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像机关干部那样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工人、农民、学生在着重整改阶段都要继续鸣放，督促和帮助领导干部整改，但是并非他们自己也着重整改，那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此外，在第三、第四阶段如果继续发现右派，或者原有的右派还没有低头，当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务。所以对这四个阶段不能看得太死。总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四个阶段都必须经过，并且都必须搞透。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

（二） 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

党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贯的。党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并且争取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在学术文化范围内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这些方针政策都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党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必须逐步工人阶级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教育必须加强，错误思想必须批判，“毒草”必须锄掉。对于“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教育群众，为了锄掉可以作肥料，为了在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党并且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资产阶级对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没有反抗，这是因为：(1)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2)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3)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最近时期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立场。右派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左右两派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派。右派要同左派争夺中间派。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的整风就是他们的“时机”。

右派分子一般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人参加过反动党团，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但是历史是发展的，人是变化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也有许多人现在有了转变。相反，一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

派甚至左派现在却成了右派。这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政治分化。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要十分注意团结中间派的工作，并且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已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应该看到，有些右派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改造以后对人民还是有用的。

在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该坚决及时地转入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现在有不少单位对于转入整改缺乏决心，应该纠正。所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是说已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不是说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总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是不会悔改的，他们要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多数右派分子也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转变。但是只要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就是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其中少数人具有右派观点外，还有其他严重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在思想教育和批评反省阶段，必须集中力量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以系统的批判。这是这次整风运动所必须完成的最重大任务之一。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对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根本改变许多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

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切实整顿许多文教组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和地方都要在最近时期定出分门别类的具体计划，大力贯彻执行。

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

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

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要通过整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实际，并且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掌握分寸。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最近都开过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应该帮助他们在继续深入中央和省市的斗争的同时，把斗争积极地有步骤地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去，然后转入一般整风，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的办法大体上和各民主党派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参加工商界骨干的整风，或者另外编组整风。对于资本家中的右派分子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和他们对于工人群众思想的侵蚀，要加以揭发和批判。对于他们中间的严重违法活动应该进行斗争，以便教育多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地下工厂”要禁止，要变成地上的，以便加以管理、监督和改造。小型工商业者则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能的时候也可以组织辩论，略如工人、农民中的整风办法。他们中间有严重违法活动的，也要进行揭发和斗争。总之，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像过去的某些运动那样把一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业者）忘记了。

（摘自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做革命的促进派（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节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大跃进”运动的开始酝酿和“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背景介绍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在莫斯科作了修改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是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同意并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后，为了恢复1956年跃进发展的方式，搞一个新跃进

的舆论准备的第一步。不久，刘少奇于 12 月 2 日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八大上宣布：我国将在 15 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公开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大跃进”运动的舆论在逐步形成之中。

另外，1957 年 12 月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材料：

-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节录）
- 发动人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 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节录）
-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情况

材料一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节录）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一九五六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节自 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原载 1957 年 6 月 27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烈的欢迎，鼓舞起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和保证我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纲领。实现这个纲领，就将保证我国农业的巨大发展，保证我国农民生活大大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也将促进和保证我国工业的顺利发展，保证我国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和全国人民生活的稳步的和普遍的改善。我们要立即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广泛地展开一次关于这四十条纲要的大讨论化，使全国人民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现在正是冬季生产和准备明春生产的重要时机，在这个时候讨论四十条纲要，正好可以从下而上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和实际经验，制订省、县、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各级计划，结合冬季生产、兴修水利、大量积肥等项运动，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同时，广大群众目前正进行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在这个时候进行关于四十条纲要的讨论也是适宜的。只要划出一段时间，在农村大约七个晚上到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逐条宣读，逐条讨论。在不同的群众中可以有不同的讨论方法，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可以多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可以少讨论；重要的问题要多讨论，不大重要的问题可以少讨论。讨论的过程应该成为挖掘生产潜力、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过程，应该成为制订或修改社、乡、区、县的生产规划的过程，应该成为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大动员的过程。

一九五六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的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总计一九五六年全国有二十九个县、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产指标，即纲要中规定的一九六七年的生产指标。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就有七个千斤县。北方贫瘠地区的甘肃定西县在一九五六年增产的粮食达到了一九五三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县、市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规定的一九六七年的生产指标。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个社达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个社达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个社达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个社达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个社达到了千斤以上。又如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每亩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三十四斤，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别的省区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指标，那末，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一百多亿斤。

为了在讨论中使群众能够对于各种认识问题辨别清

楚，并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各地在讨论四十条纲要的时候，抓住中心的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和如何在十二年内达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能不能和如何在几年内赶上和超过原来富裕中农的收入？应该怎样争取明年农业的大丰收？在讨论中还应该想出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马上开始实行。江西崇仁县日升农业合作社最近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的时候，抓住了这些中心问题，讨论的结果很好。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农业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过去的老法太保守。于是他们马上提起了劲头，制订了今后五年的生产规划，争取到一九六二年粮食亩产量达到一千斤，即提前五年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河南林县高家台农业合作社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总结了几年来兴修水利的成绩。社员们一致认为过去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今后还是大有可为。他们一面讨论，一面制订规划，立即把兴修水利的任务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现在大家干劲很足，一个规模空前的兴修水利和准备明年大生产的高潮已经发动起来了。如果说去年全国已经有二十九个县、市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指标；那末，今年至少总有几十个县、市会达到或超过这个指标。只要各地抓紧今冬明春的生产环节，加紧冬耕冬种，大力开展水利和积肥运动，为明年的农业增产打下基础，我们相信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地区能够提前实现农业纲要所规定的指标。

各级党委应该抓紧目前的时机，发动广大群众认真讨论农业纲要的修正草案，振作精神，鼓起一把劲，既要反对消极自流，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喊。我们必须向右倾消极情绪和说空话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赞扬群众中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情。现在有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全乡、全社的会议上提出了“跨过黄河！跨过长江！”的口号。他们的意思是说，黄河以北也要争取把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八百斤。这些口号是好的，并且有少数单位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新中国的人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努力向先进的标准看齐，要虚心地热情地吸取先进地区的经验，特别是与本地条件相同或相似的地区的经验。在每个县里，也会有比较先进的地区，至少也可以找到比较先进的乡、社和生产队。要用最大的热情对待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好经验，使它成为鼓舞和引导全体人民前进的力量。

发展农业，并不只是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事情。人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关于四十条纲要的大辩论中间，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成员和街道居民、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发展农业同自己的密切关系，提出自己对发展农业能做和应做的一些事情，并且尽快地开始实行。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行动起来，要尽快地把可能抽调的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加强农业战线上的领导和力量。辽宁省已经决定并且着手下放的干部有二十多万人，江苏省已经决定并且着手下放的干部有十三万人，其他各省、市也都在陆续下放。他们采取的办法叫做“一放到底”，直接到基层去工作，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很好和很重要的措施。能够下乡、上山去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都要尽快下乡去，上山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要在这次大辩论中把自己对待农业生产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同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次大辩论中，同样应该进一步了解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更快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四十条纲要所规划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让我们展开全民的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

（原载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

这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一九五六年，我国已经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又展开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我国人民多少年来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任何国外和国内的敌人，再也不可能阻止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这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又是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转折点的时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力量。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使苏联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若干最重要方面超过了美国。最近在莫斯科，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随后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也举行了会议，这两个会议发表了两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这两个会议的成功，证

明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经济战线上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同时，必须继续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

（节自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情况

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

工业方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产值指标。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650.2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平均每年增长18%。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超额14%。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超额15.3%。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156个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有68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重工业是整个五年建设的中心，它的投资占工业部门投资总额的85%。主要工业产品也都超过了原计划的1957年的指标。

农业方面，五年中虽然遭受了程度不同的自然灾害，但全国仍然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新增加灌溉面积21810万亩，比1952年增加69%。1957年农业和农村副业总产值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6年增长3.5%，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

交通运输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新建和改建铁路近1万公里，比"一五"计划超额35%。

文教建设相应发展。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合计为28万人。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44万多人，比1952年的19万多人增长了130.9%。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人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五年内，就业的职工增加了约870万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安置。1957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了42.8%。1957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明显变化。五年中，国家对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达39.3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1%，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11.4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29.5亿元，增长1.3倍。粮食产量和牲畜头数都有较大增加。交通事业亦有所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事件人物》）

风云人物

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1906年在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美国获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因写文章、作演讲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于1940年12月被国民党当局关押、软禁，1944年恢复自由。抗战胜利后，又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离开国统区，经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五

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他长期从事教育和经济工作，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经济学家。1957年，他通过调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但从此他长期遭到错误的批判。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恢复了他的名誉和职务。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材料　新人口论（节录）

（马寅初教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国农村过去长期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经过了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经解决了。土改之后，农村中发生了新矛盾，这就是个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矛盾。经过了几年来的斗争和艰苦工作，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产矛盾。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略）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略）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略）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略）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略）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略）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略）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略）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略）

十、几点建议

（一）一九五三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智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一九五八年至迟在一九六三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制人口，为的是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作过人工流产，很快又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有三十五万之多，病床有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他们的身上，

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虑。(略)

(原载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张奚若

张奚若(1889~1973)爱国民主人士、教授。字熙若。陕西朝邑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参加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北京政法大学和中国大学政治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中央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主持并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反对国民党召开伪国民大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奚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共整风运动中,张奚若对中共内部的一些不良作风提出了批评意见,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八日,张奚若在北京病逝。

材料　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张奚若13日分析"三大主义"的根源的发言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和一些人的共鸣。昨天,他在会上又严正批评了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他所谓的"四大偏差"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在批评"好大喜功"时,张奚若说,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为最突出,最受人喜欢。因为,在他们看来,大的东西是近代工程。其实,大的东西并非都是近代化的。张奚若举例说,新建的北京饭店的那个大礼堂,大则大矣,适用与否,却是不管的。去年在那个大礼堂举行学术报告会,效果是:在前排的听来声音太响,坐在后面的人又听不清,结果不得不改到天桥剧场去举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六层只用了三层营业,据说上边有礼堂、办公室,但没有货仓。只顾礼堂、办公室,而不管货仓,也是一妙事。许多人对"伟大"这概念搞不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前两天我看北京日报上登的北京建设规划,看了以后捏了一把汗,又是好大!凡此种种,都是只顾数量大,形体大,大则大矣,未必伟大。庞大的庞字与伟大的伟字含义是不同的。现在常常说,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又等于集中主义。过去,玻璃厂的旧书画店很多,东西也很多,大家可以逛,国际人士也想观逛,艾德礼到中国来之前就在日内瓦提出到了中国一定要看北京的玻璃厂。现在要集体、集中,结果只好合并、关门,现在的玻璃厂除了卖古玩旧字画的"宝古斋"和卖旧书的"来熏阁",所剩不多了。并进那两个店,地方不大,许多货品堆积起来,字画也挂不出来,这就由于有些人认为搞社会主义就要集体,就要集中,由集中而合并,由合并而关门,只要大的,不要小的。玻璃厂的这些小书店,小字画店,只好关门,剩几家,有的只好改成油盐铺和煤铺,在玻璃厂再看不见文化了。

好大喜功的第二点是组织要大,从玻璃厂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也要大,生活娱乐也要大。于是小的文娱场所都收起来了,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方便不方便。"老子就喜欢大",其大无边。现在连一件衬衫,衣领也显得特别大。美国什么都喜欢大(谈到这里,他念了几句英文,是美国夸耀说美国什么什么是世界第一,什么什么是世界最大,引起全场大笑),我们反对美帝,但偏偏学了这些坏东西。

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气一点说是由于"幼稚",比如小孩子要苹果总是要大的,不管好不好吃。好大的结果必然粗糙。文化,不细致,结果是使人脑筋简单,思想笼统。

他说,天安门上平时也竖八根旗杆,好像八根牙签,配在巨大的建筑物上,很不好看。我跟市长说过,并未见效,午门上也装了避雷针。午门修了几百年了,雷都没有光顾过,而今天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由于有了原子能什么的,雷就要光顾午门了。

张奚若接着谈"急功近利"。一切都要速成,要快。说什么向科学进军,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可以考副博士等等,等等。作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杨振宁、李政道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杨振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大学毕业也已经十几年了,而且毕业十几年的大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说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可能这批人中间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有些人会变成书呆子,但不要紧,六亿人

口出几个书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办，尽可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办。

关于"鄙视既往"，张奚若说了很多，批评得也很尖锐。他说，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阶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来"鄙视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变，但还不够，这偏差还很严重。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之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

张奚若说，当然有些人不是存心打倒，他们是对旧社会不大了解，但说他们对新社会了解也不见得，他们就会搬洋教条，只知道旧的要打倒。

最后谈到"迷信将来"时，张奚若说，我们都知道五十年后一定比现在好，不是黄金时代在过去，而将来黑暗。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问题是好事也要分开办。要知道，发展也不是机械地、等速地进行。机械化好不好，什么都机械化就不一定好，因为世界上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办机械化，其它国家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将来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好。对将来不能有机械的看法。

在结束发言时，张奚若作了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他说，比如作衣服，头一次作得长了，第二次又短了，头一次瘦了，第二次又肥了，怎么都不行，就是要适当。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适当的配合。脑筋简单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我们脑力劳动者很大的负担。他说，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应该看得出今后该怎么办。我想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

（原载 1957 年 5 月 16 日《光明日报》）

流行风

电影《柳堡的故事》

石言、黄宗江根据石言同名小说改编。

故事梗概：

1944 年春，在苏北柳堡村整训的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爱上了房东家的二妹子，在部队的纪律面前，李进只好将爱情压在心底。部队离开柳堡后，伪军中队长刘胡子将二妹子抢走，李进等闻讯前去营救。此后，二妹子更爱救她于水火的的李进了，李进因为不能违犯部队纪律爱二妹子，心中很痛苦，但他最后还是抑制了个人感情，随部队出发远征。五年后，当已提升为连长的李进率部路过柳堡时，与正带领粮船支前的二妹子意外重逢。这时的二妹子，已入了党、当了干部，并一直在等待着李进。剧本用抒情诗般的笔调，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环境下的一对青年人纯洁而美好的爱情，揭示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而革命集体又应关心个人的深刻主题。作品在塑造人物、提炼主题上，追求着一种健康、活泼的格调。

小说《红旗谱》

长篇小说。梁斌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小说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上朱严两家三代人与恶霸地主冯老兰父子斗争过程的描写，对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艺术概括。作者出色地塑造了朱严两家三代农民的不同形象。朱老巩是旧式侠义英雄的典型；朱老忠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典型；运涛、江涛等则是在党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代新人。小说热情歌颂了中国农民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是一部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作品极富传奇性，善于通过故事展示人物性格；并注意选择精彩的群众语言，通俗简练，自然流畅，叙事写景都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些使小说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

长篇小说。玛拉沁夫作。作家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小说描写了抗战胜利后察哈尔草原的斗争生活。日寇投降后，草原处于沸腾、动荡之中。是跟共产党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脱离祖国而"独立"？人们一时如同走进茫茫草原，认不清方向。这时国民党特务操纵贡郭尔成立了保安团；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也派工作组组建了骑兵中队。经过一番斗争，在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人们终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光辉道路。小说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蒙族人物形象，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尤其是对主人公铁木尔成长过程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只有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各族人民寻求民族解

放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的道理。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烈的抒情性，情节曲折，富于浪漫主义传奇色彩。

小说《林海雪原》

长篇小说。曲波作。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

小说叙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解放区为了巩固后方、保卫土改、支援前线，组织了一支36人的解放军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在人烟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残匪周旋作战。他们智擒小炉匠、奇袭奶头山；活捉"一撮毛"、假献"联络图"、会师"百鸡宴"；调虎离山，大战四方台，最终干净、彻底消灭残匪。作者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出色地描绘了小分队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塑造了人民战士的英雄群像；同时也成功地描绘了国民党残匪的百丑图，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新的典型。小说以它传奇性的题材、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和自然景色，使之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小说《山乡巨变》

长篇小说。周立波作。有正、续篇，正篇先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起连载。作家出版社1958、1960年出版。

正篇写的是1955年初冬，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到清溪乡帮助开展合作化运动。她与其他党员干部一起，注意发挥党团组织的带头作用，吸收盛淑娟等进步青年入团，广泛宣传合作化优越性，耐心做亭面糊等自私观念较重的老农民的思想工作，并同暗藏敌人进行斗争，使清溪乡最终实现合作化。续篇讲述了1956年高级社成立后斗争的深入和合作社的巩固发展。小说概括了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和基本面貌，反映了农村从生产关系到人们精神思想的巨变，塑造了这个转变过程中各种人物形象。小说语言生动、朴素，富有地方色彩，细腻传神地描绘了50年代中期处于巨大变革中的江南农村的真实画卷。

小说《红日》

长篇小说。吴强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小说以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背景，以我山东部队一个五战五胜的常胜英雄军为中心，选取了三个重要而联贯的战役——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来展开故事情节。我军的对手是蒋的王牌七十四师。二次涟水战役，我军受挫，敌人得意忘形。我军认真总结经验，一举在莱芜战役中歼敌五万余。紧接着，我军迅速组织了孟良崮战役，全歼敌七十四师。它生动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从敌强我弱到敌弱我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发展过程，成功地塑造了我军从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直到普通战士等一系列英雄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反面人物形象，尤其对张灵甫的狂妄骄横写得入木三分。这些成就为当代文学中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小说《百炼成钢》

长篇小说。艾芜作。发表于《收获》1957年7月创刊号，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小说围绕九号平炉甲、乙、丙班三位炉长间的矛盾冲突展开情节。青年炉长秦德贵忘我劳动，勇于革新，创造快速炼钢新纪录。在危急关头，他冒死救炉抢险，保护了全厂安全。甲班炉长老工人袁廷发由于技术上留一手的保守思想，和维护自己劳模的优越感，与秦德贵产生矛盾。乙班炉长张福全，为了个人主义的追求，不惜烧化炉顶搞快速炼钢，并在爱情上与秦德贵产生纠葛。在三个炉长的矛盾中，又有暗藏的敌人李吉明从中挑拨，波澜起伏，构成小说主要线索，展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钢铁工人沸腾的生活和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有很强的时代感。作者巧妙地将平易的故事情节和广阔的生活画面通过快速炼钢这一中心事件加以贯穿，并充分发挥细节描写的作用，刻画自然，平易感人，是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这一薄弱环节中较早的一部成功之作。

小说《五彩路》

中篇小说。胡奇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同时出版。获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作品描写的是解放军在西藏雪山上修筑康藏公路时发生的故事。藏族少年曲拉，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艰难的生活赋予他坚强的意志。解放军修公路的消息传来，给在农奴制重压下的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燃起了希望之火，也给曲拉带来了幸福的幻想。于是他秘密地约好小伙伴丹珠和桑顿及小女孩娜木，一起去找寻五彩路。他们勇敢忠诚、团结友爱，经历了寒冷、灼热、饥饿的种种磨难，冲破了雪山、大江的阻挡及领主设置的藩篱，终于找到了五彩放光的公路，找到了解放军，迎来了新生活。作者以美丽清新的笔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勇敢顽强、富有

理想的藏族儿童的动人形象，作品内容丰富，主题意蕴深远。小说中引用不少富有西藏民族特色的民歌、民间故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一篇艺术成就较高的儿童文学作品。

小说《红豆》

短篇小说。宗璞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

作品以北平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彼此倾慕和共同爱好使这对青年产生了爱情，但对革命和人生道路的不同认识又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江玫最终用理智战胜感情，没有与齐虹一起离开祖国，留在了即将解放的北平，并成长为党的干部。作品细腻深婉地描写出江玫心中“一面在开花，同时又在萎缩”的复杂心绪，可信地描写了她把自己（连同她的感情）交给人民革命事业的痛苦历程，揭示了祖国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主题。作品以其揭示情感世界的真实细腻而形成强烈的艺术魅力，并曾因此而遭到错误批判。

童话《宝葫芦的秘密》

中篇童话。张天翼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1—4期，收入作者童话集《给孩子们》，该集获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故事写一个名叫王葆的小学生，他爱学校，关心集体，有远大理想，就是不爱动脑筋，贪图现成。他在梦中得到了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他要做数学题，算式和答案便摆在桌上；他要向图书馆借画报，画报就进了他的书包；他和同学下棋，想吃掉对方的马，“马”就冲进他的嘴里……一连串事实使王葆恍然大悟，原来宝葫芦什么本事也没有，只会骗和偷，他终于下决心和它决裂了。作者通过想象和夸张，描绘了宝葫芦的魅力，巧妙地将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它告诉小读者：一切都要靠劳动来创造。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作品标志着作者建国后童话创作上的新收获，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童话创作的新成就。

散文诗《草木篇》

散文诗。流沙河作。发表于《星星》1957年1月创刊号。后收入作者诗集《流沙河诗集》。

作品由《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五章组成。作者从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诗句中生发联想，写了白杨孤傲耸立、宁折不弯的形象；写了依附丁香向上爬，缠死一棵又窥视另一株树的藤；写了不以鲜花向人献媚，在野地沙漠中活得那么顽强的仙人掌；写了傲雪迎霜，百花中笑得最晚，却笑得最美的梅花；写了生长于阳光照不到的河岸，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的毒菌。通过对这些植物形象的拟人化描绘，象征人类所具有的不同品性，以深刻的哲理“寄言立身者”。

散文诗《叶笛》

散文诗。郭风作。写于1957年。收入作者散文诗集《叶笛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

作品以清丽的语言描绘“故乡的叶笛”，它的构造如此简单，仅两片绿叶放在嘴唇上；而它奏出的声音却充满深情，传达出人们对故乡、对生活的热爱。这声音发自人们内心的深处，因为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要歌唱光明、幸福。作品共分四节，每节均以使用排比句式为主，且一、三，二、四节结构上大体对称，使情感的抒发热烈而回环；语言韵、散杂陈，表达情感细腻、悠长，很好地传达出作者“对于乡土，对于乡亲和对于新的时代的爱情”。

诗歌《早霞短笛》

散文诗集。柯蓝作。1957年作者以“早霞短笛”为总题，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诗刊》、《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等报刊发表散文诗几十首。作家出版社1958年结集出版。

“鲜艳的早霞，照耀在我们的头上，这是我们用画笔在天空涂上的色彩。”作者以满腔的热情、清丽的色彩、深邃的笔意讴歌我们这个“将永远生活在黎明的早霞里”的时代，赞美那些为建设和保卫美好生活忘我工作的平凡的人们，如《报时的人——参观上海电话公司报时台》、《水兵——写给水兵》……。作者还特别善于描绘自然景物的某种特征以表达某种哲理，如“用它的古老，苍劲，和常青的树叶，来赞美庄严的斗争”的《千年松》；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泥土，换取生长出更多更绿叶子的《落叶》……。这些作品短小隽永，耐人寻味，充满早霞一般迷人的色彩，洋溢着作者对新生活深沉热烈的爱，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朵奇葩。

诗歌《白雪的赞歌》

长篇叙事诗。郭小川作。发表于《诗刊》1957年第12期。后收入作者叙事诗集《雪与山谷》。

作品叙述了主人公于植因在敌后当县委书记的爱人杳无音讯而引起深深的痛苦。但她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积极投入土改斗争。然而没有完全平静的心又产生新的不平静：爱子患重病，治疗中，她同医生产生了超出一般友谊的感情，但她用理智战胜了感情。最后，于植与爱人重逢，幸福地走上新的征途。作品赞美了主人公高尚的情操，表现了她象雪一样洁白的美好心灵。艺术形式上采用了半自由体的“四行体”，便于表现缜密细致的感情和流畅舒缓的节奏，这些与诗的内容正相合拍，形成作品细腻感人的艺术魅力。

戏剧《茶馆》

三幕话剧。老舍作。原载《收获》1957年创刊号，后收入《老舍剧作选》。

旧北京裕泰茶馆的老板王利发，在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半个世纪里，为求得一生存之地，费尽心机迎合世风，经营茶馆却每况愈下。最终被恶势力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上吊自尽。全剧通过描写王利发和与茶馆有关的“小人物”的辛酸际遇，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腐朽，透露出社会变动的信息。最后一幕，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老人一边撒纸钱自我嘲讽，自哀自悼，一边唱着葬歌与旧社会告别；而帮工康大力在西山参加了八路军，康顺子决心投奔康大力，王利发死前嘱咐儿子媳妇去找康大力，则透露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这个戏不是正面反映社会变革，而是通过一个角落的演变，以小见大，自然地透露出整个社会变动的信息，深刻地揭示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戏不靠情节取胜，而是“以人立戏”，以栩栩如生的人物见长。语言朴素、洗练、生动，犀利而又富有幽默感，平淡中显出神奇。

戏剧《布谷鸟又叫了》

四幕六场话剧。杨履方作。原载《剧本》1957年1月号，戏剧出版社1957年出版。

农村女青年童亚男性格开朗，喜欢唱歌，绰号“布谷鸟”，她常和男青年申小甲对歌，有封建思想的人看不惯，她的对象、团支委王必好也认为她思想作风有问题，向她提出“约法五章”，亚男忍无可忍，坚决拒绝。当亚男了解到小甲的确爱她时，她毅然宣布和小甲相爱。团支书操纵团员开除了亚男的团籍，亚男在痛苦中得到共产党员郭家林的帮助，又向党支书讲明了真相。结果，团支书和王受撤职处分，亚男被批准同申小甲一起学开拖拉机，“布谷鸟”又开始叫了。这出戏通过写童亚男的恋爱纠纷，生动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恋爱婚姻问题，并批评了党支部书记“只关心生产、不关心人”的错误。作者善于在严肃的矛盾中提炼喜剧性格，整个戏的风格清新明快。此剧曾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戏剧《拉郎配》

九场川剧。沙汀等根据传统戏《鸳鸯绦》改编。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日。选入《川剧喜剧集》。

皇上选美女，民间有女儿家莫不纷纷求婚。秀才李玉探母途中，懵然为乡绅王夏强拉招婿。李玉不从，跳墙逃走，遇杂耍艺人张采凤父女，经张父说合，李玉与采凤结成姻缘。钱塘县令有女待嫁，为避选美，也强招李玉为婿。公堂上，三家争求一婿，适钦差到此，以采凤粗野，令配李玉，官、绅二女被选入宫。此剧以喜剧的形式，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在使人发笑的喜剧冲突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与原传统戏相比，改编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更新和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含蓄、幽默、风趣，“三拉”（文拉、武拉、官拉）虽然都是写的“拉婿”，但却“拉”得各有性格和特色，毫无重复感。

历史档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内容摘要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同样，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的，解决这些矛盾不需要根本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日益巩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二、讲话系统地阐明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要反映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为了明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一般说来，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必须用专政的、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第三、讲话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提出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便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第四、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深入考察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工作中的具体矛盾，提出了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毛泽东还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鼓吹极端民主、绝对自由的资产阶级倾向。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明确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概念，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这个讲话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进一步阐明了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标志着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

(一)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

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二）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三）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摘自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克服1956年的经济建设有冒进的问题，搞好1957年的建设，通过了《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的巨大进军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做必要的调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指示要求调整1957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根据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合理地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照顾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具体地安排1957年度的基本建设计划，同时要求大量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地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善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同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对当年经济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调整计划。

5月31日，国务院第5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基本建设是增产节约的重点。建设要从国情出发，要根据我国人多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特点，反对盲目地追求现代化、机械化和高标准，力争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由于调整了建设规模和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1957年的经济积极稳步发展，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

195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通知要求应该注意以下的三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加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籽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各农业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这种做法不仅能够减少社员补贴干部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通知认为实现上述三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农业生产的高潮。

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示首先指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十二个省（市）的三百五十个县（市）。血吸虫病已经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它严重地影响着病害流行地区的农业生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将危及我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指示接着分析了近一年来在防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后，对今后防治血吸虫病提出了以下几项要求：第一、必须采取积极治疗的方针，以求配合积极的预防工作，使病人逐年减少，这是逐步达到全部消灭血吸虫病的一重要方面。第二、对血吸虫病既要积极治疗，又要积极预防，使其由控制感染到逐年减少感染，同时配合治疗以便最后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因此，单纯治疗，忽视预防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三、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第四、防治工作必须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第五、必须坚决进行反复斗争，坚持到底，做到有始有终，决不半途而废。

指示最后指出，加强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消灭血吸虫病的基本保证。并规定流行地区乡以上各级人民委员会，凡是尚未建立防治委员会的，均应当迅速建立起来。为了保证防治工作不致被当前农村中各项繁重的任务所挤掉，规定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在规划每个时期的农村工作任务时，应当把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列入生产规划，提出具体任务，同农村生产统一布置、统一检查贯彻执行。指示特别指出，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布置和推广防治工作时，必须充分地照顾到他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和宗教风俗特点，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稳步地进行防治工作，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

文化部发出通令禁戏全部解禁

新华社16日讯　5月14日，文化部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

从1950年到1952年，文化部陆续禁演了二十多个剧目，京剧有杀子报、海慧寺（马思远）、双钉记、滑油山、引狼入室、九更天、奇冤报、探阴山、大香山、关公显圣、双沙河、活捉三郎、铁公鸡、大劈棺、全部钟馗；评剧有黄氏女游阴、活捉南三妇、全部小老妈、活捉王魁、僵尸复仇记、因果美报、阴魂奇案；川剧兰英思凡、钟馗送妹。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禁演的有薛礼征东、八月十五杀鞑子等等。

去年到今年5月初，曾解禁了奇冤报和探阴山。从14日起，其他剧目全部解禁。

（原载1957年5月17日《光明日报》）

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指示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认为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论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指示要求：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指示最后强调：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

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195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央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展开，接着应继续进行一系列整顿工作。整社内容包括：一、整顿干部作风，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要把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犯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多数干部，同那些违法乱纪、犯有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区别开来。二、调整社队的组织。合作社规模过大的、不适当的，应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调整，或者把社划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队）自负盈亏。三、统筹安排，使社员各得其所。对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五保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老农和从事手工业、运输业等非农业劳动的社员，要安排他们适当的劳动，处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得到合理收入，对富裕中农，应根据互利原则，处理他们入社生产资料的遗留问题。四、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中央在发出整社指示的同时，还就农业生

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贯彻互利政策问题，单独发了具体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1957年10月22日公布施行。这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二项和第一百条的精神制定的一个行政法令，它总结了我国八年来治安管理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治安管理工作的明确方向，规定了治安管理的法律准则。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于少数进行违法活动的坏分子来说，是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的武器；对于人民中有某些轻微违法行为的人说来，是国家约束他们的纪律；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进行自我教育的工具。毫无疑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公布施行，对于进一步保护国家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巩固国家纪律，维护公共秩序，教育全国人民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集体观念，都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大建设成就录

1. 武钢开始建厂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主体厂房之一的耐火材料厂，于1957年4月8日正式破土动工。根据国家批准的建设计划，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在今年将陆续动工兴建的主体厂房共有五个，除耐火材料厂外，还有炼焦化工厂、炼铁厂的一号高炉、选矿厂、烧结厂。其他二百个左右的单项工程，也将在年内开工。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开始兴建的重点建设工程。它将利用大冶的铁矿来炼铁，利用峰峰、萍乡、淮南等地的煤来炼焦。这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钢、轧钢、炼焦化工和耐火材料等十五个主体生产厂矿和三十多个辅助生产车间及附属车间，是一个完整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将用大高炉和大平炉装备起来，它的设备和技术之先进是我国历史上所未有。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一期工程将在1961年建成，建成以后，每年可以产钢一百五十万吨，还可以大量供应我国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各种钢材。武钢第一期工程建成和投入生产以后，将使我国钢铁生产总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2. 鹰厦铁路全线通车

从福建厦门到江西鹰潭的鹰厦铁路，于1955年2月开工，1957年4月12日正式通车，全线长达732公里。从此，厦门不再是孤岛，鹰厦铁路象一条强大的血管，把我国东南交通最困难的福建省和祖国内地的铁路网联接起来，加强了福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便利了人员往来，使富饶的福建省能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人们把它称为“福建人民的幸福之路”。

3.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武汉市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1955年9月大桥工程正式开工，1957年9月25日提前建成。它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是近代科学技术在大桥建设上的创举。正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的建成，使全长1216公里的京汉铁路和全长1103公里的粤汉铁路连成一线，使湘桂铁路、浙赣铁路、鹰厦铁路和黔桂铁路等南方铁路干线同北方铁路干线连结起来，使大江南北的运输从此畅通无阻。这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物资交流，对于武汉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北京天文馆开幕

我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于1957年9月29日正式开幕。

北京天文馆是在1955年秋天动工兴建的，它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帮助下建成的。这座天文馆内的主要建筑物是天象厅，厅里可以看到一架复杂而精巧的天象仪。它把各种天文现象放映到穹形的屋顶银幕上，构成一幅逼真的“人造星空”。这架天象仪上的每一个电动机都能前进或是倒退，因此，它能“预算”千百年后的天象，也能重演过去的天象。除天象厅外，还有展览厅、讲演厅、小天文台和小气象台，这些地方陈列着很少见到的各种天文陨石、天文仪器、气象仪器的实物和模型。

这座天文馆能和世界上二十座天文馆中最好的并驾齐驱。它的任务是培养我国的天文学干部，收藏天文学史料和陨石，同时为了普及天文科学还出版通俗的天文学图书和刊物。

5. 新藏公路建成通车

1957年10月5日，世界上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新藏公路是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叶城起，越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到西藏高原阿

里地区的噶大克，全长一千一百七十九公里。这条公路有九百一十五公里在海拔四千米以上，有一百三十公里在海拔五千米以上，最高点海拔五千五百米。

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之间有几百公里过去不但没有路，也从来没有人迹。解放后才组织了骆驼运输队往来于新疆和噶大克之间，但由于阿里地区辟处边陲，海拔平均四千多米，山路崎岖险峻，用骆驼驮运，来回一趟需要四、五个月。同时，由于冬春雨季，大雪封山，每年仅能驮运一次，交通很不方便。

新疆公路部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维吾尔族、藏族人民的协助下，大力进行勘查，于 1954 年确定这条路线，即公路从叶城出发，穿过一百公里的戈壁，沿着哈拉斯塘河进入喀喇昆仑山。再翻过五座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峰，然后进入阿里地区，循着八百里的便道，才抵达噶大克。这条公路从 1956 年 3 月开始施工，由于喀喇昆仑山地形复杂，空气稀薄，气候变化多端，给施工增加极大困难。但是，承担筑路任务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他们战胜了高山病的威胁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经过十九个月艰苦战斗，修成了这条横跨昆仑山和西藏高原的世界上最高的公路。

新藏公路通车后，来往于新疆和阿里之间只需五天时间了，使物资供应和旅客往返较前大为方便，噶大克著名的羊毛也能运销内地。

6. 吉林化工区三个化工厂建成投产

吉林化工区三个化工厂——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于 1957 年 10 月 25 日提前完工投入生产，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电石和多种染料。其中吉林电石厂生产的电石是有机合成化学工业中的一种重要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出二三千种同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电石气和盐酸合成以后，就可以生成过氯乙烯，它是制造人造皮革和合成纤维的原料。电石同其他化工产品化合可以制成人造毛。由这三个化工厂构成的吉林化工区的建成投产，是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先声。它在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中起到示范作用，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化学工厂建设积累了基本建设和生产的经验，并培养了各种人才。

7. 鞍钢建成三十八项重点工程

鞍钢建设者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国家规定的各项重点工程到 1957 年 12 月 27 日已全部投入生产，鞍钢已经建设成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

五年来鞍钢建成了三十八项重点工程，其中有机械化的露天铁矿、现代化的选矿和烧结厂、自动化的大型高炉、规模宏伟的炼钢厂、新型的大型轧钢厂、新式炼焦炉、耐火材料厂、碎铁厂等。这些工程绝大部分比国家计划提前建成。

五年来建设者们提出了近两万件合理化建议，推广了七百六十多项先进施工经验和节约原材料、加速工程进度的新技术，共给国家节约了九千万元建设资金，用这些资金可以建设九座自动化炼铁炉。

由于这些工程陆续投入生产，使鞍钢整个面貌焕然一新，钢铁基地的作用大大加强。日本帝国主义用几十年时间建设的鞍钢，技术设备落后陈旧，手工操作占很大比重，生产能力很不均衡，矿石生产比炼铁能力小一半，炼钢能力比炼铁小三分之一，轧钢能力又比炼钢小一半，经过五年的建设，这种殖民地企业的特点已基本上改变过来。今年铁的产量比 1952 年提高了三点一倍，钢的产量提高二点七倍、钢材的产量提高了三点三倍，超过伪满最高年产量两倍到三倍半。我国过去根本不能制造的很多种钢材，现在能大量生产。如架设在武汉长江大桥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厂房上的大型工字钢、槽钢和角钢，安装在全国很多轮船上的龙骨，铺设在成渝、兰新、鹰厦和集二铁路上的铁轨，焊接在玉门和克拉玛依的输油管以及电机工厂用的矽钢片，制造拖拉机用的履带等。鞍钢在 1952 年只能供应全国五百多种产品，而 1957 年已经能生产五千多种。鞍钢支援的生产建设单位也由 1952 年的几百个，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个。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

2 月 18 日～26 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交流了 1956 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取得丰收的经验，讨论研究了 1957 年巩固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作。

2 月 27 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

义社会要在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方法，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3 月 5 日～20 日　全国政协第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 11 国的报告，陈叔通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增产节约运动。认为，增产节约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规定政协各级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的重大政策的协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3 月 6 日～13 日　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作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要把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

3 月 16 日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管理会议上讲民主办社问题。他说，农业社要坚持用民主管理，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民主办社，首先要作好长远的生产规划与当年的生产规划。国家计划必须与农业社经营的独立性相结合。农业社的财务必须公开。干部要有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农业社规模越大越好的想法。他说包工包产制确定以后，可以三年五年不变。

4 月 24 日　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们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现在要多强调民主的扩大。

4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指示》于 5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次运动首先从县级以上的党组织、军队团级以上及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组织开始。

4 月 28 日　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作题为《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指出，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5 月 6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的批评，大多数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利。继续对我党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以利于整风。

5 月 8 日～6 月 3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了 13 次座谈会，对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治生活提出批评和意见。统战部长李维汉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和帮助是党的既定方针，长期共存的共同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他表示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很多是正确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错误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5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要求在基层组织中，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

5 月 15 日～25 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胡耀邦所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出了团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运动的方针和任务。青年最重要的任务是：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他针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5 月 15 日～6 月 8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辩论。与此同时，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卫星界等，都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征询意见。

6 月 8 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于 9、10、11 日先后发表了题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三篇社论；从此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直至 1958 年夏季基本结束这一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对此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错划了一批“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6 月 2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76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条例》规定，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担负着依法惩治反革命

分子，预防、制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保护人民民主权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责任。

6月26日～7月15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董必武《关于最高法院工作的报告》，张鼎丞《关于最高检察院工作的报告》，彭真《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乌兰夫《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确定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7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新人口论》

7月17日～21日　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一文。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强调，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此，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7月15日～8月2日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中国天主教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应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爱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并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了委员、总主教和主教。会议通过了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

7月20日～8月6日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检查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交流了民族工作经验，讨论了今后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指出，除极少数人的问题外，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是要使所有民族都得到发展，关键在于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会议认为，八年来，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中的成绩是伟大的。全国已有占少数民族聚居人口总数90%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有85%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已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大约200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34万多人，发展了40多万共产党员和60多万共青团员。

7月26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

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化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进行大辩论，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提倡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并在群众中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指示下达后，各地农村采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并同斗争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结合在一起进行，遗留下不好的后果。

9月9日～20日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任务是总结第二次全国妇代会以来四年多的妇女工作经验，讨论并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妇女的任务。大会选举了新的全国妇联领导机构；通过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9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一是在工人群众提意见基础上边整边改；二是围绕一些重要的问题，组织群众讨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缺点，办好企业，促进生产和建设。

9月14日　中共中央同一天发出三个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中央要求进一步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整顿干部作风，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调整社队组织。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组织规模大小，容许有各种差别，多数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在社队关系问题上，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中央指出，要把合作社的统一经营、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的三包制度，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应切实建立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工包

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中央指出，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在实现合作化之后，主要是经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恰当地调节社员之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收入问题。

9月20日～10月9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

11月13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时说，我国在1957年真正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争取15年超过英国。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

12月2日～12日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作了《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大会修改了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当前的基本任务，是要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执行即将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争取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经　济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新年的展望》的社论。指出，1957年的计划安排首先应当注意清除建设和生产脱节的现象，使每一项建设，特别是重点建设，都要经过周密的考虑；使新工业基础的辅助项目和各种服务性的设施，都能相应地配合进行。其次，人民生活的改善决不应该超过生产增长的可能性。《社论》要求必须在各个方面展开一个普遍的增产节约运动。

1月3日　国家计委《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5年远景计划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提出，15年远景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提早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基本上完成工业的技术改造，推进对农业和运输业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巩固国防力量；基本上完成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城乡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上消灭城市失业和乡村贫困。15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初步方案是：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速度，"二五"16.9%、"三五"11.3%、15年12.2%。基本建设规模，"二五"期内经济各部门的支出约为1,80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为1,400亿元。

1月15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各部负责综合平衡和编制各该管生产、事业、基建和劳动计划的规定》。指出，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加强综合平衡同分级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编制1957年度计划草案时，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应负责汇总审查和平衡全国有关的生产、事业、基本建设和劳动计划。国务院就工业生产、农林水利和气象、交通运输、商业、基本建设、文教卫生、劳动和干部等部门的计划编制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2月2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2次会议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提交国务院的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并责成国家计委根据这个建议会同各部、委、国务院各办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委会迅速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报经国务院审查后，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决定。

2月5日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1957年钢铁材料市场供应办法的报告》。商业部建议：严禁基建和大工厂等申请单位向市场乱抓钢铁及其制品。商业部门除规定的非申请单位外，一律不供应申请单位；在钢铁市场的供应上，要兼顾手工业生产与日用品工业生产两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钢铁供应必须首先用于生产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央指出，必须适当调整1957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在工农业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大量节减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控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2月16日　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4.05万千伏安、15.4万伏电压的巨型电力变压器。这台变压器是三线圈结构形式，重152吨、高7.4米，安装面积46平方米。

2月20日～31日　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业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出了农、林、渔、牧业等方面2,000多种实物和近5,000件标本、模型、图表、仪器、机器等。

2月22日～3月11日　第四次全国计划会议安排了1957年计划：工业总产值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分别比上年增长11.7%和0.7%。农业总产值621.2亿元，比上年增长4.9%。粮食和棉花分别比上年增长4.7%和3.8%。会议确定适当增加农业投资，压缩基本建设、行政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开支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定为111亿元，较上年减少了20.6%。

2月28日　国务院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

城市市场管理的意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当前市场管理的方针应当是既要管理，但又不要管死，一切措施和办法都要有利于生产和流通。建议：①市场管理部门应审查、修订或拟订新的市场管理办法。②会同有关部门领导和管理交易所和交易市场；恢复和建立一些贸易货栈、交易所和农民贸易市场。③管理个体手工业户和其他自产自销工业户的市场购销活动。④会同各业务部门对外地采购人员进行登记、辅导和教育管理。⑤协助各业务部门贯彻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除强调继续贯彻"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外，决定在全国范围将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13.64%。农村、城市的销售价格每斤提高 2 至 7 分，并将屠宰税由 13% 降到 8%。4 月 18 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酌量增加农业社社员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问题的通知》，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按照每户社员养猪头数，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猪饲料。分配给每户社员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已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的 10%。

3 月 1 日　大同水泥厂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之一，年产数十万吨硅酸盐水泥。

3 月 18 日　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 1957 年煤炭市场安排的报告》。《报告》提出：①城乡都必须大力节约煤炭。②保证城市最低限度的必要供应；对非申请单位的一般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维持 1956 年供应水平；压缩机关、团体烤火煤和砖瓦窑业用煤。③适当减少农村供应。措施是：①积极组织小煤窑生产，煤建公司积极收购，收购亏损专报商业部弥补。②各地应把节约煤炭工作列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③各地党政机关领导商业部门进行供应对象排队，掌握供应。④在供应农村煤炭的地区早做公布。对灾区和严重缺柴区的农民生活用煤应有适当照顾。

3 月 21 日～4 月 26 日　全国先后分两批召开了有关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到年底以前，对多种行业统一核算的综合社和产品复杂、人数过多、分布面过广的制造性合作社，以及撤点过多、集中过大难于管理的修理服务性合作社和全县、全区范围内一竿子插到底的大行业社，采取分社、增设服务点、改变核算关系等不同方法，基本调整完毕。会议认为，合作社收入的分配原则应为"先工资、次治病、后积累"。手工业社的工资福利，在城市，一般不应超过同行业、同等技术设备的地方国营工厂；在小集镇和农村，不应过多地超过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会议认为，对待产品零星复杂又不甚重要的行业，可以在较长时间保持他们的个体经营方式。

4 月 8 日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工程正式动工。这个包括黑色冶金工业各个部分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

4 月 12 日　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线长 690 公里。

同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指出，鉴于 1950 年颁布的《公私营煤矿暂行管理办法》、《土采煤窑暂行处理办法》和《公私营煤矿安全管理要点》三个文件对小煤窑限制过严，要求过高，决定暂行停止执行上述办法，鼓励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根据自产自销的原则，就地开采小煤窑，以解决当地民用和工业用煤。

4 月 13 日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始施工。这是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兴建的一项重大工程。

4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研究和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建议》。国家计委建议，在初步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着手研究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关的重大问题和比例关系，主要有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计划统计的体制和方法问题，以及财政金融、内外贸易、人民购买力、利润、税收、物价、成本等问题。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关部委，迅速着手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

4 月 20 日　国家计委党组将执行《中央关于 1957 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建议：①在大中小型结合的情况下，多考虑些中小型规模的厂矿。②尽量利用国内设计和设备。③改变某些脱离实际，过分追求新技术和高度机械化的思想，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④在安排建设项目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利用地方的潜力和原有企业的潜力，然后再安排新建项目。

4 月 29 日　陈云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他指出，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求得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可以有各种办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争取农业大丰收的运动，是实现上述两个平衡的主要办法。而有计划地提高某些商品的价格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5 月 1 日　李富春、薄一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对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建议：①严格控制建设用地。②适当降低建设标准。③城市的住宅建设原则上不再兴建，由现有的住宅中适当调剂。④今年各单位计划建设的修理厂等，应一律停建。⑤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一律停止扩建。⑥抽调一部分副部长、司局长，到大的厂矿、商店任厂

长(经理)或党委书记。⑦城市公共和服务性的建筑要降低建筑标准。

5月24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9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纲要》规定，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将水土保持工作规划列入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规划以内，制定水土保持工作的分期实施计划，统一安排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纲要》强调，山区应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群众生产的实际需要合理规划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封山育林、育草、保护林木和野生树草等护山护坡植物。

6月3日　薛暮桥在《对现行计划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提出应该对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建议：首先，将计划指标分为指令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两类。其次，对主要产品，采取分级管理的制度，国务院只掌握少数最重要的产品。次要产品，让企业按照需要决定生产计划。第三，国家计划采取掌握重点，分级管理的原则。第四，五年计划应该有分年度的数字。

同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认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积极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是基本建设。《指示》要求：①采取一切必要的形式，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增产节约的思想教育工作。②所有基本建设单位，都应该将多余的或者现在不用的土地立即退还给农民耕种；凡属非生产性的建筑，立即降低造价。③一切单位都应检查现行的各种制度、定额和标准。④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指定主要负责人，督促、指导和管理所属各单位的增产节约工作，要制定今年的增产节约实施方案。

6月11日　辽宁阜新煤矿一座年产150万吨煤的大型矿井——平安竖井投入生产。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建矿井中，已投产的最大的一座。

6月14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电刷制造厂——哈尔滨电刷厂基本建成，开始试制产品。这是1954年6月开工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

7月17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锅炉厂——哈尔滨锅炉厂正式开工生产。该厂1954年10月正式开工，1956年8月开始试产，年产约3万吨重量的电站设备。

7月25日～8月22日　第五次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和控制数字。会议提出编制1958年度计划控制数字的方针是：在肯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提高农村水利投资比重，增加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的投资；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的生产；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和充分利用小工业、手工业的政策。

8月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各级人民委员会设立物价委员会的通知》。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辖市、县及相当于县的镇，需要设立在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物价委员会，由省长或副省长、市长或副市长、县长或副县长直接领导，吸收有关方面的人员参加，设立办事机构，处理具体工作。《通知》还就中央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工作的分工和对物价的审批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8月16日　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第四季度中民用布供应问题的报告》。决定1957年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为16尺，如果棉花丰收，可增加到18尺。

8月1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规定指出，粮食、棉花、油料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烤烟、黄洋麻等22种重要的土产品，38种重要的中药材和供应出口的苹果、柑桔等，都由国家委托国营商业部门、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这两类物资都不允许在自由市场买卖。

8月21日　国家经委在《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了以下原则：①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计划工作制度。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总投资额、重大建设单位、职工总数、平均工资以及各项主要事业和发展，由国家统一平衡和控制。②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分为国务院管理的计划指标，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管理的指标，以及基层单位自行管理的计划指标。国务院管理的指标，分为三类：即指令性指标、参考性指标和计划性指标。③简化计划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加强各级计划机关的综合平衡和调查研究工作。

9月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冶金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目前黄金生产情况及今后发展黄金生产的意见的报告》，决定要大力恢复和发展黄金生产，把黄金生产作为国家的主要生产指标之一。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事挖金、淘金。黄金生产一律免税。对群众采金，国家给予必要的补贴和贷款。

9月5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劳动工资座谈会上作报告指出，在劳动工资方面要考虑的，一是国情、二是从6亿人民出发统筹安排。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①许多劳动工资制度，不是从6亿人民出发，而是从2,400万人(注：指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出发。②许多规定刺激了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增加。③注意了城市的建设，而对农村建设注意不够。④照搬苏联经验，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够。

9月上旬　中共中央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着重研究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①我们的方针是抓住机会，保证正常的粮食收购(即维持在850亿斤多一点的水平)和实行少销，以便以丰补

款。②丰收了，合作社和农民也应多留一点。必须照顾农民、国家两方面的利益。③要保证不多销，必须按季、按月下达销售指标。

9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指出，兴修农田水利，要因此制宜，贯彻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巩固与发展并重、兴建与管理并重、数量与质量并重和投资少、收效快的原则。是年冬至次年春，全国农村兴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至1958年上半年，已扩大灌溉面积4.5亿亩，加上原有的灌溉面积共达9.7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7%。

9月25日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提前两年正式交付使用。大桥全长1,155米，投资1.37亿元。

10月1日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提出：①促进农业增产，是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②工业生产必须有进一步的增长。③交通运输事业应有相应的发展。④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初步定为116亿元。⑤职工工资总额将比1957年预计增长4%，农民的购买力增长6.4%。⑥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应该在巩固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⑦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编制好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关键。《指示》要求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立即抓紧时间编好1958年度计划草案。

10月4日　我国已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邮电通信网，使北京和全国每个地区都脉脉相通。

10月5日　新藏公路建成。公路从新疆南部叶城起，越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到西藏高原阿里地区的噶大克止，全长1,179公里，最高点海拔5,500米。这条公路是从1956年3月开始施工的。

10月8日　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基本建成。它已经成为一座拥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油田建设和石油科学研究等部门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

10月11日　《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发布。规定：①国家在计算和核定农业社和单干户粮食征购或供应数量时，1955年“三定”时国家核定的粮食定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量不得增加。②国家对余粮和自足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国家增购的数量，一般应为增产部分的40%。③国家在核定农业社的粮食征购或供应数量时，不能因分给社员自留地而减少。④对单干户的粮食统购统销、农业税征收和国家负担，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办事。⑤关闭粮食市场，由国家粮食机构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农业社和农民进行粮食品种的调剂。⑥国家在核定农村和市镇的全年粮食供应数量以后，必须按季分月逐级下达粮食销售指标，坚决执行。⑦农业社由于缴纳农业税而发生缺粮情况，对缺粮部分可以全部或部分改征代金或经济作物。⑧城市居民口粮标准偏高的地方，应把标准合理地降低下来。

10月15日　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1955年9月大桥正桥工程正式开工，1957年9月25日全部建成。这是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正桥为铁路公路两用，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

10月2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农村副业生产的通知》。要求：①农村中的副业生产应该都由农业合作社采取大公经营、小公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方式，加以统一安排。②农业合作社可根据集体经营的各种副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分别成立副业生产队或副业生产组，负责经营。家庭副业收益全部归个人所有。③农村中尚未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可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副业生产队(组)。④农业合作社安排副业生产(包括手工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料的来源和产品销售的可能。⑤农村中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个人，其本人和家属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完全自愿。⑥农村中的人力和畜力运输力量，农业合作社也应做统一安排。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1次会议通过，并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

10月25日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第一期工程——肥料厂、电石厂、染料厂正式建成，投入生产。肥料厂于1954年5月开工，年产5万吨合成氨。染料厂和电石厂于1955年动工，年产分别为1,846吨染料和6.2万吨电石。

11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3次会议通过《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8年1月1日开始，发行6.3亿元公债。

11月1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三个规定，确定自1958年起施行。《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中规定：①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凡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②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等。

11月1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关于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工

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是:新录用的普通工的工资标准应该相当于当地一般中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劳动力较强的农民收入加上城乡生活费用的差额,新录用的勤杂工的工资标准最高不超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第30级的标准;学徒学习期限为3年,学习期间的生活补贴为伙食费加少数零用钱;适当放宽退休条件,调整退休后的待遇,并规定凡同父母、配偶不住在一起的职工每年给假一次,所需往返车船费超过本人月工资的1/2时,由行政方面补助超过部分的1/2。

11月28日～12月12日　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编制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安排是:基本建设总投资130.59亿元,比原提出的控制数字增加13.46亿元。工业总产值725.6亿元(包括手工业),比控制数字增加24亿元。农业总产值642.5亿元,比控制数字增加11.6亿元。

12月1日　我国第一座半自动化的缫丝厂——绵阳缫丝厂正式投入生产。该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之一,1956年7月动工兴建。投产后,可年产白厂丝2,631公担。

12月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7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国务院规定:对种植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这些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可以酌情提高,但最高不得超过正税税额的30%;对于零星种植和在山地种植以及刚开始推广的经济作物,或者种植虽较集中但获利超过粮食作物不多的经济作物,农业税附加的比例不要提高,或少提高一点。

12月9～24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生产,规划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和1958年的农业生产。农业部长廖鲁言在讲话中要求从省到专区、县、区、乡和农业社,逐级都要定出分期、分批、分步骤地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具体规划。他指出:农业增产潜力极大,问题是向自然斗争必须弄清情况,摸清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对不同地区用不同办法,不能千篇一律。号召“苦战10年,实现40条”,要求各地推进1958年的农业生产高潮。

12月13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5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21日发布。《指示》决定:①对个体农户,乡镇人民委员会可委托他们所在地或附近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教育和加强领导。②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有责任对个体农户的生产活动、播种、计划、纳税和农产品交售进行必要的监督。③有责任对个体农户宰杀牲畜、砍伐树木依法进行全面的管理。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个体农户摊派义务工和款项。⑤个体农户分摊的一切负担,应比照合作社农户的负担办理。⑥对于在生产上有困难的个体农户,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劳动互助。⑦农业合作社应争取个体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不愿加入的,听其自便。⑧对尚未允许参加合作社的地、富和反革命分子,应依照有关法令进行监督和改造。

12月16～26日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讨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手工业合作社,继续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通过了手工业合作社的示范章程,成立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朱德在会上作了《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今后很长时期中,手工业都将是国营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集体所有制长期地固定下来。

外　交

1月7～17日　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匈牙利和波兰。1月7日和8日在莫斯科,中国政府代表团和民主德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就国际局势和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问题,以及当前国际形式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新闻公报。1月10日,匈牙利、中国、苏联三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就扩大和巩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接触,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和全面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会谈公报。1月11日到16日,周恩来在波兰进行了友好访问。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建立在思想和目标的一致性上,建立在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上。1月16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布达佩斯,同匈牙利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就匈牙利局势、双方关心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1月19～23日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阿富汗。访问期间,与阿富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一致同意加强两国现有的文化联系,支持万隆会议的原则,支持亚非人民为维护他们的自由和独立、促进世界和平而进行合作的事业。

1月25～30日　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与尼泊尔王国政府阿查里雅首相进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重申他们对万隆原则的支持。

1月31日～2月5日　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锡兰。两国总理就国际局势和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发表了声明。

4月7日　以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11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

4月15日～5月6日和5月24～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他进行了会谈。5月26日，发表了《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报》。

9月14日　以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10月11日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两国政府还签订了1958～1960年期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

9月27日～10月5日　以卡达尔·亚诺什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在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两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对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匈两国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联合声明。

11月2～21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访问期间，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随后，举行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两个会议分别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争论，最主要的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①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强调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②在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但《宣言》并没有充分表明我党的这些观点。为此，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备案存查。此外，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还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科技文教卫生

1月24日　中国科学院颁发了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这是我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得奖的研究成果共有34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由中国科学院授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章、奖状和奖金。奖金一等1万元，二等5,000元，三等2,000元。作者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和业务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已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获得一等奖的有：力学家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数学家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和数学家吴文俊的《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获二等奖的有：苏步青、钱伟长、葛庭燧、钟补求、吴仲华等。这次获奖所涉及的学科有：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医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动力学、冶金学、石油化学和土木建筑学等。

2月8日　国际科学界商定，从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底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我国决定参加国际物理年7个学科的观测。即在我国不同地区进行地磁要素的观测、地震的观测、太阳黑子和其他太阳活动现象的观测、宇宙线的观测、高空电离层观测、经纬度测定、气象观测等。

4月8～12日　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规定该协会活动的宗旨是：联系和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全国道教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5月10日　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和负责人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①负责监督远景规划，特别是重点研究任务的实施；②负责编制科学研究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③解决各个系统在科研工作中的重大协调问题；④管理全国重点科研工作的基金；⑤统筹安排高级专家的培养、分配和使用的计划。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秘书长范长江。

8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规定，华侨投资办的学校，校名由创办人自定，校长由创办人或校董会提名。当地政府应主动协助解决建校中的具体困难。

9月16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齐白石是现代书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号白石，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以卖画、刻印为生。57岁定居北京后，专业卖画、刻印。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建国后，他的书画、篆刻活动益见勤奋。

9月29日　我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开幕。馆内的一架天象仪，能预算千万年后的天象，也能重演过去的天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8年

导　言

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偏离了八大路线，发生了严重失误。1980年12月16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1958年开始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二是错误地处理了阶级斗争问题，没有很好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1958年在继续开展反对右派斗争的同时，党制定了一条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高速度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其结果是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并直接导致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以及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

世 纪 热 点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
-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 ●"大跃进"运动
-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炮击金门、马祖岛

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

背景介绍

1958年，反右派斗争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直到1958年夏才基本结束。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被划为右派的人，分别被开除党籍、团籍、厂籍、校籍、军籍，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下放农村或厂矿监督劳动。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

1959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在"文革"前，各地先后分五批给33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经过两年多艰苦细致的复查工作，截至1981年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基本上得到了改正。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也都根据政策作了妥善安排。从而，使许多人从长期的政治困境中解脱出来，得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材料：

- ·各民主党派中央举行会议讨论开展一般整风并对右派分子作出处理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决议
- ·总政机关党委会、高院军事审判庭开除右派分子陈沂的党籍和军籍

材料一　各民主党派中央举行会议讨论开展一般整风并对右派分子作出处理

各民主党派最近分别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或盟员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问题和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月19日到25日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民革主席李济深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报告。李济深从民革成员的政治状态和组织状况说明民革开展一般整风的重要性。他指出，民革成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多数人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有些人还有着反动统治思想的残余，对于社会主义还是有抵触的，还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的。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还不心服或不完全心服，对劳动人民翻身坐天下还看不顺眼，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法律和生活方式还有许多留恋，有时流露今不如昔的感叹，甚至有些人对反动阶级的消灭感到切肤之痛，这些思想感情都是反动的，都是和右派相通的。这种立场是同他们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不相称的，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大风大浪当中，就会迷失方向，站不住脚跟，甚至有坠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因此，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一般整风，争取在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上，继续向前跨进一大步。

会议还决定撤销龙云的副主席职务，陈名枢的中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委职务，黄绍竑的中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谭惕吾的中常委、中委、中央妇委副主任等职务，李竣龙的中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作了处理。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月26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扩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分别作了处理，同时通过"关于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盟立即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职务；撤销叶笃义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职务；沈志远的中央常务委员职务；马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曾昭伦中央常务委员、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撤销费孝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药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撤销潘光旦中央常务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等中央委员职务。

会议还听取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所作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高崇民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民盟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就要通过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组织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这是民盟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两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1月18日到26日举行了第二十九次会议(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的职务；撤销单鸣歧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其他职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钱孙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的职务。民建会和工商联两会中央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分别受到了处分。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都在26日的会议上讲了话。陈叔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工商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的，这说明了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运动的锻炼，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为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陈叔通说，两会中央及各地方组织都应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仍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他希望大家继续为取得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而努力。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是1月13日到25日举行的。会议认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右派斗争中暴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民进的各级领导机构和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的错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因此还必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各级组织内全面展开一般整风，使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向左推进一大步，为民进的根本改造奠定基础。会议决定撤销林汉达的副主席职务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职务。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扩大)，从1月15日到25日举行。会议决议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撤销黄琪翔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执行局秘书长职务；撤销李伯球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局副秘书长职务；撤销杨逸棠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撤销王一帆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撤销张云川、李士豪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被撤销了职务。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在闭幕会议上作了"彻底清算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发言。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郭则沉在会上作了"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的发言，对农工民主党七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作了初步的小结。

郭则沉说，农工民主党解放前在章伯钧的领导下长期地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投机活动，解放以后，也未经过根本的改造，它的成员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有不少人受了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利用和影响。他说，我们所取得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还只是根本改造农工党的一个开端。今后要进一步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一步根本改造成员的政治立场。

中国致公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1月16日到23日举行了第七次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由于致公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虽然在全党范围内基本上胜利结束了，但各地方组织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还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转入以改变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运动。会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还作出了决议，并且对中央常务委员会历来有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进行了检查，纠正了若干错误。

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1月18日到24日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顾执中社内的一切职务；撤销陆侃如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董渭川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袁翰青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撤销薛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分别作了处理。

会议提出，九三学社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大多数社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事实证明，只要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九三学社是可以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社员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知识

分子的根本转变是可能的。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九三学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全社规模的一般整风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右派路线在各级组织中的影响，明确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使全体社员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月14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盟员代表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各地方组织应该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入以改变政治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使台盟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和解放台湾服务的政治力量。

（原载1958年2月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

一、罢免右派分子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二、罢免右派分子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罢免右派分子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四、罢免右派分子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罢免右派分子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原载1958年第5号第29页《新华半月刊》）

材料三　总政机关党委会、高院军事审判庭开除右派分子陈沂的党籍和军籍

本报讯　总政治部机关党委会决定已经总政治部和党中央批准，将党内右派分子陈沂开除出党。

又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控告，认为右派分子陈沂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严重，完全丧失革命军人应有的品德，已于3月6日判决，剥夺陈沂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并开除军籍。

（原载1958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七月，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不叫反革命，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有可能转变过来"。当时对右派的策略是一打一拉，先打后拉。这篇文章还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说："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对于正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文章提出"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青岛会议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发生了严重扩大化。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文件虽未指出前一段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倾向，但提出"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可惜，这个《通知》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分子。

在青岛会议期间，我草拟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发各地执行。文中提到，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现在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可以促使他们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加的。后来，我在有些文章、讲话中说"资产阶级分子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大弯子"，就是从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演化而来的。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

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左"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一九五六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些估计，否定了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在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处理上，打击面过大，处理也过严过重，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人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比较知名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

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六月十五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六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六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对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中央统战部虽向中央作过反映，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之。

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摘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背景介绍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规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

这条总路线是在建国后八年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1955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关于反右倾保守的讲话中提出，要利用休战加快建设，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社会主义。随后，他根据周恩来、李富春的提议，把这些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毛泽东赞扬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号召全党"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发展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这个概括。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方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它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突出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正确地反映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从这方面来说，它是"八大"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片面强调高速度，忽视客观规律的问题。高速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却被忽视了。这条总路线是在不断反右倾和发动"大跃进"的气氛中提出的，在贯彻执行时，片面强调它的灵魂是高速度，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因而这条总路线的通过，进一步助长了

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发展。

材料：

·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

材料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对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结论。会议肯定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对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正确分析的基础上，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提出了与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结论相反的论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会议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生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

会议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状况，作了错误的分析，轻率地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轻率地把知识分子又划为资产阶级范畴，否定了 1956 年 1 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分析。这些重大的改变，给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会议还正式制定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规定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提出了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领导建设工作的要求，以及改进管理体制、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他还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摆官架子、摆资格、看不起人是低级趣味。在谈到“大跃进”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

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了一些相应的正确决定。但会议在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上所作的分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这些重大问题上的错误，不仅使党在工作重点和主要矛盾两个问题上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的状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既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又促使党在阶级斗争方向的错误愈来愈严重起来。

这次会议，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由于会前和会议期间，连续不断地批评和指责 1956 年“反冒进”的正确主张，这种不正常的作法，使党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中央的集体领导遭到损害，党内“左”倾急躁思想随之滋长起来。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手册》）

“大跃进”运动

背景介绍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条战线出现了加快发展的新形势，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情况认识不足，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干部，在生产热潮中逐步失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滋长起片面强调人的意志、片面追求高速度、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早在 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把那时中央有的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

同年 5 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谈到“大跃进”时，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份“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

6 月间，钢铁工业拟定“大跃进”的目标，酝酿 1958 年钢的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设想 1959 年超过三千万吨，1962 年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各协作区也召开农

业会议，纷纷提出农业的“大跃进”目标。像西北这样一向低产的地区，提出全地区每人平均粮食产量 1958 年要达到一千一百斤，1959 年要达到两千斤，到 1962 年要突破三千斤。在农业增产措施方面，大力推广土地深翻，要求全国必须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并推进密植。同时，报刊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如小麦亩产达到七千三百二十斤，早稻亩产达到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还批判了“农业增长有限”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等错误口号也流行开来。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全面修改了中共八大所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并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宏伟规划”，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 1958 年钢的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即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作为 1958 年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

为了发动全党、全国人民完成这一任务，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为了硬要实现这个任务，此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支援“钢铁元帅升帐”。经过 4 个月的奋战，全国总算炼出一千一百万吨钢，但其中有三百万吨土钢基本上不能用或使用价值极小，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动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到处泛滥。直到 1960 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损失。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在工农业比例关系方面，农业战线受到极大削弱，生产大幅度下降。在工业交通内部，由于实行“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各行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严重失调。在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从而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当然，它终究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失误。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材料：

- 批判反冒进
- 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 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
- 中共中央书记处布置钢铁生产任务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 财政部反映炼铁大量亏损
- 全民大办小煤窑
- 谈浮夸风

材料一　批判“反冒进”

1956 年上半年，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 1958 年春天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形势，使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他们认为，我国已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出现的“一天等于 20 年”的伟大时期，应该打破“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的“常规速度”，进行一次“巨大的跃进”。认为右倾保守是党内主要危险倾向，1956 年的“反冒进”就是右倾的表现，应该在党内不断地反右倾。1958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工作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他说：没有 1956 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共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 6 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3 月 8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事件人物》）

材料二　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1958年1月，毛泽东又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头两天就抨击反冒进，指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性、方针性错误。16日，他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批评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使反过冒进的领导人坐卧不安，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这时，再次耳闻目睹毛泽东批评的周恩来，在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准备的基础上，于19日晚作了检查。他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且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未作任何辩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但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在全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刮起“大跃进”之风。

接着，1958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在成都、4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3次会议继续反反冒进。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了反冒进“错误”。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会上继续作检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在开会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为此，被认为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应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指定再次在中共党的代表会议上进行检讨。

在周恩来、陈云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的目的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又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尤其强调“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大局”。这样，就使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发动的反反冒进斗争，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破常规、打破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而“大跃进”运动却演出了一幕使国家和民族遭受“大灾难”的历史悲剧！

（节自史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原载1990年第2期
《党的文献》，本文标题系编者所加）

材料三　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我国今年夏季农业收成的公报发表了。在这个公报里，我们首先看到这样几个数目字：夏收粮食总产量一千零一十亿斤，超过去年夏收粮食总产量四百一十三亿斤，增长了69%。其中夏收主要作物冬小麦总产量六百八十九亿斤，超过去年的总产量二百七十九亿斤，增长了68%。这是几个不平常的数目字。它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里，我们就来同自称为“小麦王国”的美国比一比。1949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只有美国小麦总产量的44%，时间仅仅过了几年，我们不仅赶上了它，而且大大超过了它。可以肯定地说，以后将会永远超过它。大家可还记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到两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吗？在“白皮书”的序言上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太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能过日子。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的——星星面粉，日子却特别过得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

我国的小麦产量，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增长呢？是去年收成很坏，基数太低了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1957年，全国冬小麦总产量四百一十亿斤，单位面积产量一百一十二点八斤；1956年冬小麦大丰收，总产量四百三十一点四八亿斤，单位产量一百一十八点三斤。两年相比，

1957年比大丰收的1956年是低一些，但如以相等的播种面积相比，总产量也只低二十亿斤左右，单产只低五斤多。而今年，冬小麦播种面积比1957年缩小八百多万亩，总产量却增加了二百七十九亿斤，单产则增加了八十点二斤，提高了71%。那么，是不是今年特别风调雨顺，"老天爷"特别照顾呢？也不是。今年的冬小麦从播种到收获，自然灾害并不比往年少。主要产麦区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干旱。安徽七十天无雨，河南、山西百日无雨，河北更遭到近三十年所未有的大旱，二百多天没有透雨。除了干旱，小麦生长期间各省都分别遭受到霜冻、风、雹和病虫等灾害。虫害面积也比去年普遍。河南省在小麦扬花灌浆时节，全省三分之一即二千四百万亩麦田发生了吸浆虫，四百万亩发生黄锈病。安徽省除治小麦锈病，每天出动了七百七十八万人，占全省农村整半劳力的50%以上。由此可见，既不是基数太低，也不是风调雨顺。那末，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小麦的惊人增长速度，是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结果。这个总路线使我国五亿农民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震天动地，翻江倒海。这个总路线使我国五亿农民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敢于推翻农业的历史，敢于与天公较量高低。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夺得了空前大丰收，开辟了我国农业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冬春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积肥三千亿担，大规模的农具改革运动等等旷古未有的奇迹，都是人造出来的，都是人作成功的。这就给夏收作物大丰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农民们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奇迹，打破了历来认为农业只能够逐步慢慢发展的农业渐进论者们的荒谬理论。那些"理论家"死守住"缺水利、没化肥、没机器，农业产量就不可能大量增加"的一套老调，念念不忘，一直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地说：我国农业不可能跃进式地增产。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机器、化肥、水利都是人制造和建设出来的。去冬今春以来的生产建设高潮所创造的种种奇迹，如果还没有使这些人觉悟过来的话，现在已经拿到手的第一批丰产的硕果，总该能够使他们觉悟过来了吧！

自然灾害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大敌。因此，许多人迷信"老天爷"，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老天爷"身上，说什么"作事在人，成事在天"，"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今年夏季大丰收的事实证明，"老天爷"再高明，也还是算不过我们六亿多人民，"成事在人"而不在天。前面说过，今年灾害并不比往年少，播种小麦时期就遇到严重干旱。要是在往年的话，麦收是会要受到损失的。可是，今年就不同了，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政治在生产上挂了帅，人民群众有了教育自己提高自己的最好方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哪里干旱就在哪里展开大辩论，看是天战胜人，还是人战胜天，就马上展开抗旱斗争。结果，干旱不但没有能够成为播种的障碍，反而变成了大兴水利永远战胜水旱灾害的动力。河南、河北两省水利修得又早又多，正是抗旱斗争的成果。河南小麦得到成倍的增产，也要归功于抗旱斗争的胜利。河南省博爱县小麦连续遭到风、霜、旱、涝、虫等五次灾害，可是，他们的"跨黄河、越长江，十年规划，一年完成"的英雄口号，恰恰是在和灾害斗争中提出来的。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之下，每遇一次灾害他们就展开一次大辩论，五次灾害掀起五次大规模的斗争。终于只夏收一个季节，这个县小麦亩产量就达到了五百二十斤，跨过了黄河，其中三分之一整十万亩的亩产量达到八百斤，超过了长江。十年规划不需一年只需一季就完成了。某些人看了博爱县这样的情况不免大为惊奇，其实，这有什么奇怪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好事和坏事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问题决定于人采取什么态度。当人们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不迷信，不靠天，积极起来与天斗争的时候，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平年也可以变成丰年。如果人们只在那里摇头叹气，听凭"老天爷"摆布，好事也不一定能得好的结果，丰年也会变成歉年。

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我们说，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今年夏季大丰收表明，我国的农业发展情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许多旧思想旧看法都需要加以彻底改变，才能使我们的工作适应今天的情况。比如，过去曾有不少的人，认为条件坏，产量低的地方不能大量增产。又有不少的人，认为条件好产量高的地方也不能大量增产，理由是产量已经很高了，上不去了。现在，这些看法都被事实打破了。湖北省襄阳专区，就是全省有名的低产区，去年夏季大丰收，产量由一般年景的五、六亿斤激增至十四亿三千万斤，今年更翻了一番，达到三十亿斤以上。全区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由去年的一百五十四斤跃增到三百斤以上。河南省偃师县是小麦高产县，小麦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达到单产二百六十二点四斤，1957年因灾也产二百二十八斤。今年，这个县曾有不少人认为小麦在这样高的产量基础上，再要有大的增产是不可能的，没有想到全县平均产量竟达到了五百七十多斤。究竟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国的农业增产潜力有多大？看来现在谁也不敢下断语了。的确，我们不应该再用一个框子，像紧箍咒似的把自己的头脑束缚起来了。仍然以小麦来说吧，当前全国平均亩产量还不到二百斤，可是最高产量已达到七千多斤。可见，增产潜力是远没有到顶。麦子如此，其他作物也是如此。有些人喜欢引经据典，说历史上没有的，今天就不可能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不可能有，小麦高额丰产的奇迹告诉他们，历史上没有的，今天的确有了，外国没有的，中国的确有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

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我们不再做历史和外国的思想奴隶了，我们已经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人了。

夏季生产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争取今年秋季生产大跃进的信心。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71%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的水稻、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更加大量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跃进呢？我们要乘胜猛进，毫不懈息。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我们要用更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人口多，生产粮食更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原载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都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经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

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颗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价。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说了。

（原载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作者：刘西瑞）

材料五　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

毛泽东主席最近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毛主席9月10日至15日在武汉，看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出铁；会见了工人群众；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看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们办的许多小型化学工厂，同武汉大学师生见了面；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同工人见了面；在武汉同各方面的干部见了面。15日，毛主席由武昌经鄂城、大冶到了黄石港，沿途看了丰盛的农业、大冶铁山、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群众见了面。16日上午，毛主席到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会见了安庆人民群众。当天毛主席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城，沿途经过桐城、舒城、肥西三县，看了丰盛的农业，看了一个人民公社，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广大的人流。毛主席第一次访问了合肥城。在这里，毛主席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看了农具展览场；又看了工业农业产品和发明的展览馆。毛主席在合肥会见了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芜湖，看了工厂，会见了干部。20日毛主席到了马鞍山钢铁厂，会见了工人和市民群众。毛主席20日到南京，跟干部们见了面，然后到上海，会见了干部，看了一个钢铁厂。毛主席已经在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对记者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90%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原载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材料六　中共中央书记处布置钢铁生产任务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汇报和研究钢铁生产问题。根据钢铁生产将完不成9月份任务的情况，会议要求，各省（市、区）要力争把9月份的钢铁任务多完成一些。到30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

这次电话会议后，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迅猛地开展起来。10月底，全国用于钢铁战线的劳动力由8月底的几百万人增加到6000万人，全国新建炼铁炼钢土炉达到几百万座。

（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材料七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从8月17日到8月30日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和其他问题。

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棉花将达到七千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按照今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比去年增产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万吨至八百五十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会议初步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会议指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期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在最短期间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

高速度的、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严格保持全国范围的建设事业的计划性、纪律性。会议认为：计划工作应该分级管理，各级地方组织应该保有适当的机动权；但是各级的计划都必须是统一的全国计划的组成部分，各级地方组织都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对国家计划共同负责，共同努力。会议讨论了以深耕为中心的关于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并且作出了决定。

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是在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必须通过群众的鸣放讨论。

会议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教育工作的方针，并且分别作出了决定。会议还对加强民兵工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等问题作出了决定。

从8月25日到8月31日，中央同时召集了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在工业生产会议上，具体讨论了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和检查，加强各方面的协作，保证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计划，保证完成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重型机床的生产计划，大力加强钢铝的生产，实行全民炼钢、全民炼铝等项任务。

（原载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材料八　财政部反映炼铁大量亏损

（1958年12月7日）

中共中央批准财政部《关于土法炼铁的亏损处理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在土法炼铁上问题不少，从财政上说，亏损就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据各地材料，土法炼铁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高达460元，估计全国平均至少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即每吨土铁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到150元。今年全国土铁产量估计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为了发展土法炼铁，鼓动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完成国家钢铁生产任务，建议从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以后算起，生铁亏损采取国家和地方分担的原则。即生铁亏损由国家补贴的数字，全国平均每吨补贴100到150元；各地具体补贴多少，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上述原则和实际亏损情况，提出意见同财政部商量决定。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27页）

材料九　全民大办小煤窑

当前钢铁战线上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煤不够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几乎无一例外。南方缺煤少煤的各省，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在盼望着从北方运去的煤。北方盛产煤炭的各省，因为钢铁增产，运输紧张，支援外地的任务又很重，也感到用煤不足。云南、四川、湖南、河南四省，资源比较多，对煤炭抓得比较早，外调任务也不重；但是这几个省煤炭问题同样尖锐。这还只是炼焦煤的情况。由于现在对煤炭用户的"排队"是焦煤第一，因此，一般工业用煤，如机车，电站用的煤，比起焦煤来，紧张的程度就还要严重一些。

煤炭供应这样紧张，是不是因为生产状况不妙呢？不是的。今年我国煤炭工业的跃进是空前的。国家原订计划今年生产二亿一千万吨煤。现在煤炭部门的职工决心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完成这个指标。9月份全国产煤二千四百万吨以上，已经大大超过了英国的月生产水平。

那么，问题何在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钢铁的增产速度势如疾风骤雨，几乎每个月都要翻一番。对煤的需要量不但随之急骤增长，而且需要提前储备。结果，虽然今年煤炭工业发展得非常快，仍然落在形势的后面。特别是南方各省煤炭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有的省几乎根本不产煤炭，现在钢铁工业突然大大发展起来，需要的大量煤炭主要靠北方运去。这样，就造成了煤炭紧张的另一因素——运输紧张。而由于北煤南运，火车走的里程长。在北方出煤的省份，车子开走了要很久才能回来，这就影响到境内需要的煤也不能按计划疏散。钢铁元帅一马当先，燃料和铁路交通这两个先行没有赶上前去，反而落在了后面，这就是当前煤炭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形势，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党中央提出钢产量翻一番，就是要以钢为纲，带动各工业交通部门向前跃进。目前煤炭供应紧张，固然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但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一个煤炭生产跃进的好机会。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许多事情是逼出来的。就远处来说，没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就没有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就近处来说，今年我国工业的跃进，在一定意义上是农业跃进逼出来的。现在，钢铁一马当先，就压迫其他工业和运输交通部门非赶上去不可。这就叫做形势迫人。这是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知道，煤不够用，就要影响出铁；铁炼不出来，就要影响出钢。难道我们听任煤炭继续紧张下去，威胁着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任务不能完成吗？当然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以解决，而且必须很快地解决。

解决的办法是有的。首先，现有的大煤矿应当进一步增加生产。这些煤矿应当充分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克服薄弱环节；领导干部要深入生产领导生产，哪里是薄弱环节，领导干部就在哪里挂帅；要加强准备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采取"母鸡下蛋"、"办卫星矿"的方式大办小煤窑；新建的矿井要努力争取提前投入生产。这样，在大煤矿中出现一个更大的跃进，是完全可能的。其次，铁路交通部门应该尽量挖掘潜力，采取措施，争取多运、快运。

职工们千方百计地提高运输效率，推广锦州和常州的经验，力争把车辆的周转时间缩短到两天左右，把在车站停留装卸的时间缩短到六小时以下。海运部门也在努力减少港口停泊时间，争取更多的煤从海上走，以减轻铁路的负担。经过铁路交通部门职工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期望，不久的将来，运输情况会有所改善。

但是，这些办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只靠现有的大煤矿，产量的增长终究有一定的限度，而且现在炼

铁是遍地开花，十分分散。用集中的大煤矿去供应分散的小高炉，在交通运输上困难很多。目前运输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限度；修复线、设轮渡都不能一蹴而就。何况，铁路和轮船不能全部用来运煤，目前生铁、机器、木材、水泥、粮食、棉花等等的运输都很急迫，有的且和焦煤同样是为钢铁服务的。对这些物资，必须在运输上作必要的合理的定排。

出路在哪里呢？三十六计，还是走"小、土、群"的道路是上上计。我们知道，党的"大、中、小结合"的方针适用于一切部门。我们不能设想，钢铁工业实行"小、土、群"的方针，全国到处开花，产量急骤增长；而煤炭工业只依靠大矿就能够与之相适应。钢铁工业用两条腿走路，煤炭工业也必须用两条腿走路。不依靠全党全民来办煤矿，煤炭工业就不可能赶上钢铁工业的速度。煤炭工业部最近提出了"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土高炉"，"哪里生产千吨铁，哪里就搞万吨煤"的口号，这应当作为所有地区的行动口号。特别是缺煤少煤的地方，要保证钢铁大跃进，必须就地解决燃料问题，依赖外援是不可靠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痛切地感到了。不少地方的经验证明，采取"小、土、群"的方针，就地开采小煤炭是最好、最快、最能解决问题的道路。广西柳城县组织十万野战军，一天突击生产了八万六千吨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9月份全月，铁道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广西全区运去了九万九千吨煤。现在仅仅一个县、一天时间，就挖了八万六千吨。依赖外援还是自力更生，依靠大矿还是依靠小窑，两条道路孰优孰劣，何去何从，真是再明显也不过了。

走"小、土、群"的道路，各地都自力更生搞煤炭，任何省份都是有条件的。过去人们总说江南少煤。现在这个论断彻底破产了。最近湖北、湖南、浙江都发现了丰富的煤藏，其他省份虽然没有发现大的煤田，但是分散的小块的煤田很多，凡是有铁的地方，附近一般都有煤。至于北方各省开小煤窑的条件，更是处处都有。

但是，现在有一些人看不起小煤窑。他们嫌土窑小，出煤少。他们不了解，一个土窑虽然出煤少，一天只有三五吨，可是小矿可以开得多、开得快。河南宝丰县突击挖了五百多个煤窑，二十多天中，煤的日产量就由七十吨一跃而上升到三万多吨。要是建大煤井，肯定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大的跃进的。而且，小窑是大窑的基础。现在是小型的，将来在资源较多的地方，一定会有些小型的逐渐发展成为中型的、甚至大型的。现在是土的，将来实行技术改革，就会逐渐变成洋的。"先用土法跨上马，逐步实现机械化"，这样就可以在原来没有煤炭工业的地方发展起煤炭工业来。

还有一些人不主张搞小煤窑，理由是小窑会破坏资源。这种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在旧社会，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地乱挖乱采，有些时候资源难免会遭受一些破坏。但是，小煤窑一般都挖得较浅，多半在煤田的露头或边缘部分采掘，大煤井则主要在深处采掘，现在开小煤窑又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因此，对于将来煤矿的扩建不会造成严重影响。

解决任何财政经济问题，一向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开源、一是节流。除了上面所说的大开小煤窑、力求自力更生以外，各地还应该努力节约煤炭，节约运力，现在一般的土高炉用煤都比较费。洋高炉一般的炼一吨铁只要两吨半煤；但是土高炉却要用四吨、六吨，甚至八吨、十吨。用煤多，也同炉型有关，同操作有关。因此，为了节约煤炭，各地应当选择比较好的、用煤较省的炉型加以推广；应当努力提高生铁的产量和质量，少出烧结铁和海棉铁，以相对地减少煤炭的消耗；还应当尽量使炉子不间断地生产。现在有些土高炉可以连续生产半年以上，有些只能连续生产两三天就要检修。把炉子放冷，再重新升火，煤当然要用得比较多。至于一些重点企业，洋炉子，则要努力改变一向娇惯的胃口，尽量吃就近的煤，消灭不合理运输。例如，现在鞍 钢还要用相当多的开滦煤，武钢则要用一部分江西萍乡的煤。这样，就使得本来靠近南方、向南方运比较合理的煤，在运输紧张当中走回头路，向北方运。东北是我国炼焦煤生产较多的地区，鞍钢是不是可以就近用东北的煤，而不用开滦的煤呢？武钢用焦作、峰峰、开滦的煤，都是由北向南的顺路，是不是可以不用萍乡的煤呢？目前不少钢铁厂在用煤方面还存在着迷信，一定要按照所谓配煤比，把各地的多种的煤按一定比例配起来炼焦。这样便使铁路形成相向运输，浪费目前已经极为紧张的运输力，在港口装卸方面也造成很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浪费。现在，上海的钢铁厂已经改变了这种习惯，难道其他企业就不能改变吗？我们想，这些企业如果下决心打破所谓配煤比的教条，把当前煤炭和运输的紧张状况告诉全体职工，发动职工来想办法，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形势逼人，逼得越紧，人就越要争上游。现在煤炭如此紧张，将小煤窑遍地开花，逼得铁路轮船南北畅通，逼得土高炉提高技术，逼得洋高炉扫除陋习，这是一件大好事。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当今之局势下，各条战线上都将会涌现无数的英雄好汉；而各路英雄齐献身手，全国人民又将会看到整个工业、运输战线上将出现一个更大的跃进局势。

（原载 1958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

材料十　谈浮夸风

想起大跃进，就想起当年报纸的宣传，那真是一派

“海外奇谈”、一片“杜林夸大狂”。大跃进失败(当年是不承认的)之后，一九六一年，听说少奇同志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说这几年很多事情，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对此，报社又认真作了检查，记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就曾带了一个有关浮夸错误的检查，由于后来形势逆转，没能拿出来。

如果现在翻翻大跃进时期的报纸，相信不仅对报社的同志，对大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也会很有教益的：老中青三代，或脸红心跳，或目瞪口呆。

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急于求成的思想就已露头，对形势估计不切实际，如说苏联两颗卫星上天，“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粮食“卫星”上天，是六月份开始的。河南遂平五亩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五斤，接着是湖北，后来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共约二三十个)，有两次报纸头版通栏套红标题是亩产多少万斤。省一级的“卫星”，一九五八年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四个早稻千斤省；广东、四川两个粮食千斤省；四川、河南、甘肃、安徽四个省人均粮已过千斤(湖南直到一九六〇年三月，还发表了人均千斤粮、一头猪的计划)。后来就放钢、铁、煤的“卫星”。日产生铁，最先是河南鲁山一千吨，禹县四千吨；不久，广西鹿寨二十万吨；后来河南三天产三百万吨，广东一天产八十七万吨。九月到十一月，这类“卫星”共放了三十一个。

急于求成创造的“奇迹”，连篇累牍，层出不穷。几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凡事“化”：“水利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电、办铜、办铝、办小煤窑、办铁路、办业余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总不下五、六十项。此外，还有十九个省消灭了文盲；很多省、县、公社，几天之内办起了若干大学；河南登封县文村乡一个乡办起了十二所大学；方城县建立了三百多所文艺学院，等等。水利化的浮夸尤为严重。半年苦战，河南实现水利化；徐水县三个月基本消灭了水灾、旱灾。其他如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是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小麦压倒美国，水稻超过日本，棉花总产、单产都已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等等，不胜枚举。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以上旧事重提，列举了这么多“海外奇谈”，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有这种风气，但是流风余韵是不是还有点呢？多年来一阵风搞惯了，报刊也惯于“闻风而动”，特别是办好事的一阵风更容易刮起来。前不久不是宣传过做厂服、穿西服、免费供应午餐吗？不是各种各样的公司，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吗？宣传万元户光荣，有的地方不是想方设法凑“万元户”吗？农村条件不能同城市比，现在不是在报道“电冰箱村”、“彩电村”、“洗衣机村”吗？社会力量办学校是大好之事，值得提倡，可是也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办大学风；不讲条件，不讲质量，借助名人，乱挂牌子，甚至有的为赚钱办学，一个人牵头办几所大学。所以，有些事情，回想回想、忆忆苦，还是有好处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原载1985年5月8日《光明日报》)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背景介绍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由农业社小社并大社发展起来的。1958年7月，河南省有些地方开始办起人民公社。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他多次与当地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大社可以包括工、农、兵、学、商。许多地方的负责同志在汇报情况时也都强调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当地领导同志曾汇报了他们对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的缘由。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方名字，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字”，同时，毛泽东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当地负责同志请示大社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段话。“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直接转成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兵学商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并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适合办大农业。决议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的下达，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人民公社一哄而起。8月底9月初，河南、辽宁就基本实现了全省公社化，河北、安徽、黑龙江也进入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到10月底，也就是北戴河会议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原有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成为26578个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

农户的99%以上。全国平均28个半合作社并成一个公社,平均3个多乡并为一个公社,有的则是一个县一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4637户。

在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搞"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违背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因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后,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通过调查研究和一系列会议,陆续作了一些纠正。但是,由于后来错误地发动"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共产风"再度泛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又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逐步地解决了当时所能认识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

材料:

- 辽宁省并社运动
- 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
- 徐水人民公社颂
- 办好公共食堂

材料一　辽宁省并社运动

根据中央关于并社问题的指示精神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我省于今年五月间进行了一次并大社的工作。经过合并,全省由九千六百个社并成一千四百六十一个大社,平均每社二千户左右,其中万户以上的社九个,最大的一万八千户。并大社的同时,调整了乡的规模。全省由二千八百五十四个乡合并成一千二百二十六个乡,其中一乡一社的占百分之八十三。基本上是一乡一社。

这次群众性的并社运动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从一九五六年起,全省就办了三百九十九个千户以上的大社,这些大社分布在全省各个市县,并且都办的不错,在生产上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冬今春在农村掀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高潮之后,很快就显示出现有社的规模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矛盾。小社不但许多事情没有力量举办,而且使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既限制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正如群众所说:"小社已经成为大跃进的绊脚石。"由于大社优越性的实际教育和生产的迫切需要,所以群众对并大社表现了强烈的要求。领导提出并社以前,群众纷纷向领导上申请并社;领导提出并社之后,便马上行动起来,表现了一种势如破竹的气概。

接着并大社运动来的是,农业生产高潮和人们的思想大解放。过去人们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现在也敢想敢干了。如宽甸县在并社前,明年只计划开水田二十二万多亩,并社后,就增加到四十五万亩,较原来的计划增加了一倍。盖平县太阳升社原团山子社和东海社沿海有二千公顷荒地可以开垦,过去因为社小力量有限,没人敢开,并社后,立即作出了开垦荒地的计划,今年就能将五百公顷荒地变成肥沃的水田。

以上就是我省开展并大社运动的简单情况。下面着重介绍一下我省领导并大社运动的几点体会。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像任何事情一样,在并社运动中也贯穿着两条路线和两种方法的斗争。在搞并社运动以前和刚一开始的时候,在并社与不并社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有些干部主张并大社,有些干部反对并大社。反对并大社的理由是:我省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仍然使用旧式的"弯弯犁",现在不需要并大社;大社管理工作复杂;干部没有经验,领导不了;小社有穷有富,并大社会增加穷社和富社的矛盾,影响合作社的巩固。为了统一干部认识,各地除组织干部学习中央并社指示外,还着重总结了现有大社的优越性作教材来教育干部。

事实证明:目前大社比小社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社大人多仍然可以搞大生产,可以发挥现有的生产潜力和劳动潜力。拿盖平县太阳升合作社来说吧,它是在一九五六年并起来的一个二千四百户的大社,由于充分利用了大社的优越条件,实行了因地制宜,大搞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结果在办大社头一年,社的总收入就增产了百分之三十五,并有百分之九十三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在农业大跃进运动中,办大社的必要性就看的明显了。大社的生产一般都搞的轰轰烈烈,而小社生产则冷冷清清,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事实证明了:大社的管理工作虽然比小社要复杂一些,可是领导大社也有许多优越性条件,比如:骨干力量集中,便于发挥集体智慧;贫农优势大,能够压倒一切歪风邪气;社的单位少,便于县乡直接领导。只要善于发挥这些有利条件,就能克服管理复杂的困难,把大社办好。如全省从一九五六年起就办了三百九十九个千户以上的大社,一般都办的好,不但在生产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干部,积累了办大社的经验。同时也只有办起了大社,才能在做的当中,得到教训,培养锻炼干部,"前怕狼后怕虎"的态度是不能造就干部的。

事实证明了:并大社后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建设,使全体农民都共同的富裕起来,我们是积极的领导全

体农民合并大社，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呢？还是消极的等待穷社"赶上去"然后再并社呢？显然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特别是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办起来一些大社，经过一、二年的生产发展，这些悬殊现象就基本上解决了。当然有些大社因为穷富悬殊太大，并社的头一年富社要减少收入一些，但可以通过包工包产给以适当的照顾。所以并大社不是扩大了穷社和富社的矛盾，而是缩小了或消灭了这个矛盾。

这些生动的事实教育了干部，干部又领导了群众。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基础上，全省便很快地掀起了一个并大社的浪潮。

加强领导，坚持条件

在并社运动中，我们曾提出一乡一社是我省最适当的形式。乍一看来，这和坚持并社条件有些矛盾，实际上并没有矛盾。因为，一乡一社就是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并社四个条件的具体化。我省并社前共有二千八百多个乡，每乡平均四个行政村，一千多户，并社后一千二百多个乡，每乡平均八、九个行政村，二千五百户。在目前生产规模已经突破村界的情况下，社的规模控制在二千户左右，即基本上一乡一社是适宜的。因为，这样才便于打开地界，实行机耕作业和统一进行灌溉；便于组织生产协作，搞大的基本建设；便于统一筹措资金，举办各种建设事业。也就是说，这样才能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同时，根据过去办社的情况来看，一乡一村才能把生产单位和行政区划统一起来，使乡一级党、政领导机关更加直接深入生产领导生产，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当然这是最适当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在不具备搞一乡一社条件的地方，一乡多社也是可以允许的。

一般地说，我们在并社运动中是坚持了并社条件的，因此运动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也有个别地方错误地认为越大越好，不注意坚持并社条件，盲目地追求"全省第一"。有些县已经并了社，又见到别的地方比自己并的还大，又要求并，一并再并。结果给社的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有少数地方在并社运动中，忽视必要的思想教育工作，一声令下就把社并起来了，结果产生了强迫命令的现象。根据这些情况，省委已经通知各地除加强对大社的指导，妥善解决并社中的遗留问题外，社的规模要有意识地稳定下来，以便于更快更好地统一规划生产和进行基本建设。

以共产主义精神处理经济问题

几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大社，各社的经济基础是不同的，不但各社公积金、公益金、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权和债务的数量有多有少，就是各社社员缴纳的股份基金的标准也有高有低。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在干部和群众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从发展生产的长远利益出发，承认各社经济上的那些差别，一律不算旧账；另一种是，以平均主义思想处理并社中的经济问题，强调找平补齐，强调算老账。我们在处理并社的经济问题上坚持了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了平均主义思想，规定：小社的公积金、公益金、公共财产一律转为大社所有，小社债权和债务不管多少一律由大社承认，社员缴纳的股份基金有高有低也不拉平。事实证明，这样作是合适的。不但减少了并社中的纠纷，加快了并社工作的速度，而且还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把干部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发展生产的共同利益上去。相反，有些地方在经济上斤斤计较，强调了不吃亏，多的要往回拨，少的要往里填，结果吵了一、二个月也并不起来。可是一强调共产主义精神，纠纷就马上解决了，社也很快地并起来了。

在并社过程中，少数地方也曾发生过偷分公共财产，私分马草马料和乱砍树木等不好现象。许多地方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除了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批判本位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以外，还规定出一些制度和纪律，向各小社宣布，共同遵守。如风城县白族乡就规定了五项制度和纪律：(1)原小社的现金贷款一律不准私分和动用；(2)原小社内的物品资金、粮食等等不得私自处理和毁坏；(3)原来牲口作价一律不动，不得抬高并社时吸收的牲畜作价，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评定；(4)所有账目不得涂改；(5)所有党团员、干部不准弄虚作假。这些制度和纪律对于防止上述现象也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结合生产，推动生产

过去我省并社都是利用农闲季节来搞，而这次却是在春夏之交的生产紧张季节进行的。因此，不少干部都耽心，并社会不会影响生产？为了打破干部顾虑，各地都向干部进行了并社和生产关系的教育，说明：现在小社已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并大社就是为了推动生产，不并社反而会影响生产，不能用前两年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新形势。

事实证明：我们省的并社工作，不仅没有影响当前生产反而大大地推动了当前生产，我们的主要作法：首先是从生产入手，通过并社推动生产。在规划并社的同时，就要规划大社的生产，先把大社的生产搞起来。各地都提出了"为了迎接并社，必须搞好生产，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作为并大社的献礼"的口号，这对于提高干部、农民的革命干劲，推动当前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在领导力量的使用上，除少数人领导并社工作外，其余的集中力量领导生产。第三，对社的组织机构采取"上动下不动"的办法，即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把大架子首先搭起来，按原来各社的范围不动，分别组成作业

区(生产大队),原有的生产队一般不动,少数规模过小的队可以进行合并,如果打乱重新编队会影响生产的。第四,并社和财产处理两步走,先抓紧建立领导机构和安排当前生产,然后再逐步处理并社中的经济问题。

(原载1958年第17期《新华半月刊》)

材料二　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

毛泽东主席在8月6日到8日视察了河南农村。

毛主席在河南省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和棉田;襄城县梁庄、薛元等农业社种植的烟叶和谷子;长葛县"五四"农业社的玉米田和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种植的红薯和稻子。当毛主席在这些地方视察的时候,干部和群众都向毛主席热烈欢呼,并且争着向毛主席报告农业社发展、巩固的情况和农业大丰收的情况。毛主席在视察时同群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陪同毛主席进行视察的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以及有关地、县、乡的党委负责同志。

6日下午,毛主席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乡社。这里的人民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已经在全乡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毛主席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并且参观了这个公社的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又到田间观看了棉花的生长情况。毛主席和在"幸福院"里过着晚年幸福生活的老年人握手,并且谈了话。在滚珠轴承厂里,毛主席详细地观看了用土法生产滚珠轴承的过程,他对这个小工厂在两天时间里就生产出五千多滚珠极为称赞。毛主席对于田间一望无际长得特别好的棉花感到特别高兴。毛主席走到正在棉花地里喷射杀虫药剂的女社员面前提议说:"作作给我看看",六个女社员兴高采烈地给毛主席作了表演。毛主席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挑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主席在襄城县的梁庄农业社、十里铺乡薛元农业社等地观看了烟叶和谷子生长的情况。这里种的云南多叶烟,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每棵有七十多个叶,每亩计划产三万斤。毛主席高兴地走到烟叶地里,仔细地观看了烟叶的生长情况,并向梁庄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张富德等详细询问了烟叶的种植和收获等方面的问题。

在长葛县"五四"农业社,毛主席观看了长得很好的麦茬玉米。这里有四十亩密植麦茬玉米,已经长到六尺多高,计划亩产两万斤,附近的另一块干部玉米试验田长得更好,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毛主席称赞了这些生长良好的玉米。毛主席问县委书记吕炳光今年的产量,吕炳光说:"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问:"能达到吗?"吕炳光满怀信心地说:"一定达到,秋后到北京给主席报喜。"

在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毛主席看到了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薯以及这个社第一次试种的水稻,并且对这些作物生长的情况表示满意。毛主席看到高粱的时候,就问:"有没有种多头高粱?"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铎回答说,有许多地方种了这种高粱。毛主席说:"这种高粱产量高。"

毛主席在河南农村视察了三天后已经离开河南。毛主席这次视察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无比的力量,各地人民决心以更大的成就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视察过的农业社都修订了生产计划,决心争取更大的丰收。

(原载195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徐水人民公社颂

也许我把谢坊村描写得有点儿夸张,其实徐水的文化村已经出现了不少。大寺各庄和南张丰也是文明兴盛,大王店办起了艺术训练班,北里村的狮子舞走遍了欧洲,迁民庄吹歌会的演奏通过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史端的舞蹈,留东营的剧团和创作组,以及崔庄农民的自学学习,同样都航行在文化海洋的上游。但是,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标志,还在于粮食的高产;而从庄稼生长情况来看,谢坊村尽管也是百花齐放,却到底要比双大寺各庄等地略为逊色一些。

徐水有二百多座水库和两千多眼机井,动力抽水机一千台,已经实现了灌溉机械化。有二十多辆拖拉机,完成了轴承化和正在完成农具改革的半机械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王店聚宝盆水库附近通过粪便供养的山药地,一棵秧子就已结了十二斤果实,这自然是正在成长的卫星。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毛主席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栽满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实。还有毛主席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秧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作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从每亩二十万斤直到一百万斤。大寺各庄还有多样化的沼气山药。用粪垒成个堆堆,外面使土密封,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个竹管直通粪堆,

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用粪垒成一个长长的对称的山坡，沿着山坡把土砌成一级级的楼梯，在每一级楼梯上栽山药。再就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宝塔，再沿着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插入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是栽种箩卜。所有这些利用沼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素。大寺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

沼气作物和使狗肉汤肥田，并不是大寺各庄所独有。漕河人民公社的漕庄，有一块二亩六分地的沼气试验场，那里更是花团锦簇。那是当地过去的乡党委第一书记刘廷奎所主持的科学研究组的的野外试验室，组员有乡技术员曹清海、村支部书记魏克敏和过去的村农业社主任魏文林，以及其它几个社员。那片长方形的地里，最北头的中部是一个二分地的塔形沼气山药堆，十五层环形梯级，折合平地四分，插秧五万棵。西侧六个小堆，有三堆沼气山药，共占地一分，插秧数各为三千五、一千七和一千五百棵，另外还有三堆不带沼气的山药。这几个堆堆大小都相同，是为了比较有无沼气和稀密栽植的好坏而采取不同措施的。南面还有一亩拱圆形的沼气山药，下铺一层平均二尺厚的马粪，上面是粪土，再上面一层是好土；这个立体折合平地一亩三，插秧七十五万棵，此外，两侧的零星空地还有一些平地沼气山药，和一亩六千棵的给秧子搭了架的山药。那一亩拱形山药计划产一百二十万斤，只要每一棵上长斤半多山药，七十五万棵秧子就可以保证这个卫星数字；从眼下的生产情况来看，这一颗卫星的上天应该说是毫无问题，因为一棵长一二斤山药本来就是值不得一提的低产。那二分塔堆上的五万秧子，看现在的情况，也可以成为亩产百万的卫星射上天去。一亩六千棵的搭架山药，共灌了四条狗的肉汤，也已长成了茁壮的卫星模样，看来同样会直上云霄。

一棵白菜五百斤

这块沼气试验场的南端和两侧，还有磨盘形的、圆瓦形的以及每条埂道上种四行或六行的白菜和萝卜。从白菜卫星来说，大寺各庄有一分地堆了四十个方形的立体，每个立体面积二平方尺，每个立体上要求长一棵五百斤的大白菜；漕庄试验场的平地上也有计划培育成每棵五百斤的白菜，而漕庄试验场地的中央空地上，还有用大瓦罐和大花盆摆成“卫星”二字的一片试验作物，罐内和盆内种了四样不同的萝卜和许多白菜；有一个大花盆移栽了一棵多穗玉米，给打了五 C.C. 葡萄糖；另外一个盆里是一棵山药，主秧分出十三株，又用压蔓而变成二十六株，连同主秧，共二十七处长山药；这棵山药注射了二十 C.C. 葡萄糖，要求单产一百斤。这整个试验场原来是一片荒坟野地，但现在，紧邻这里的保定郊区每天都有人过来游览，说是来逛花园。

小麦亩产十二万斤

漕庄也和大寺各庄与谢坊一样，是已经电气化的村子。沼气试验场里也就有电灯设备，有夜晚亮堂堂的科学研究组的试验棚兼宿舍棚。试验场边还正在修建一个水塔，准备以后给这里作人工降雨。现在试验场边还翻了一亩地准备种冬小麦，由于我在很早以前和刘廷奎研究过高产小麦的事，他也就曾在那一亩地边诡秘地眯着眼儿笑问我：

“你猜猜这亩小麦要搞多少万斤?”

“八万?”我反问着。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高的数字。

“嘻嘻”，刘廷奎用巴掌捂着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这搞的是十二万斤！”

想要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我问刘廷奎的措施，他告我说，现在是在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十二万斤。

多么豪壮的雄心！多么宏伟的气魄！刘廷奎还在培育多色棉花和新的山药品种，并在个人生活上攒钱买照相机；他要用照片来记录科学试验的过程，用照片表扬先进和推动工作。他有着冲破天的乐观和朝气，一刻也不放松向别人学习。用狗肉汤上地，就是从大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高玉生那儿受启发而来。他同高玉生以及现在漕河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师义发，是长期竞赛的死对头和互相学习的好同志。师义发在南亭村搞了大面积的多穗玉米卫星，如今棵棵近丈高，每棵九、十个穗。刘廷奎也搞了八十亩高产多穗玉米，并搞了多穗高粱。这些卫星作物在大寺各庄和谢坊也都茂盛无比。他们和大寺各庄都还搞了每亩四十万棵的卫星谷，现在棵高一公尺多，秸秆粗如木棍、穗长五寸，至少可以达到亩产两万斤。

皮棉亩产五千斤

最后还该回到大寺各庄，回到那儿的七亩棉花地。那里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个，成铃四十个，花蕾四十五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一百一十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近二千斤。但人们还

要叫棉棵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有稀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盖被单，棚下用电灯光照明的催生的一片。这里亩施底肥五万四千斤；过磷酸钙一百二十斤；追硫铵四次，共用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遍，浇水两次，整枝十八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气，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二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今年的两千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两千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原载 1958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办好公共食堂

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以后，人民公社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分配问题；是办好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问题；是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在这三大问题中，公共食堂和儿童福利事业这两件事情如果办不好，就不可能巩固生活集体化，不可能从家务劳动中把妇女解放出来，而使整个生产受到影响。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

在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和广大农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愈来愈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只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广大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今后的根本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并运用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使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工、农业生产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向前跃进。

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求高度的组织化和集体化，要求广大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更大的发扬。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举办公共食堂，正是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措施；也正是实现生活集体化，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键。正因为这个原故，便随着农业生产全面地不断地大跃进，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展，公共食堂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普遍地发展起来。据东北、华北地区九个省市初步统计，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有一百零七万四千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食堂。现在这种公共食堂制度，正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城市发展。时间不会太久，公共食堂定会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那种把公共食堂看成是“生活小事”，从而忽视对食堂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不值得在食堂工作上花费“领导的精力和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公共食堂不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是五亿农民的生活问题，不久还会变成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这不是小事情，而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是全民的大事情。特别是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以后，公共食堂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全体社员劳动果实的分配问题的一个方面，办不好就会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公社的整个生产，公共食堂之所以不是“生活小事”，还在于它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只有开始把琐碎的家务普遍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事实正是这样，河南省实现公共食堂化以后，每个社员一天可以多出三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或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 30%左右，同时使六百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解放出来。这样庞大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还不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吗？

那种把办好公共食堂看成是一件“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务工作”的观点，也是不对的。第一，这种事情不简单。当好一个家庭主妇，办好一家人的伙食，使全家吃得满意，已经不易；办好几百人几千人的食堂，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第二，公共食堂工作绝不是单纯的事务工作。举办公共食堂，实行集体吃饭，是改变全体农民的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的大问题，在初期，群众会感到不方便、不习惯，如果食堂再办的不好，群众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和问题。通过公共食堂，也通过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改变群众的生活习惯，培养群众的集体主义的思想，这怎么能叫做“简单的事务工作呢”？由此看来，办

好公共食堂，不仅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都应该把公共食堂办好。

办好公共食堂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用同样数量的粮食、油盐和菜蔬等，要使社员比分散作饭时吃得饱，吃得好，节省粮食、柴炭，讲究卫生，使社员感到方便满意。食堂的饭菜要多样化。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作到：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多样，有菜有汤。公共食堂除供应基本菜以外，还应根据当地的生活习惯，尽量免费供给酱油、醋、酱、葱、蒜、辣椒等调味品。食堂内还可以增设小卖部，每天准备几种质量较好的荤菜或素菜，由社员自己出钱购买。公共食堂要注意改善伙食。在目前，一般地说，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举行会餐。公共食堂要经常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教育，提倡创造发明，发扬传统的优秀烹调技术，创造新的地方名吃，在饮食领域内做到百花齐放。

公共食堂要讲究卫生，餐桌、餐具在饭后都要擦洗、消毒，饭厅、厨房要经常打扫，米要淘净，饭要煮熟，水要煮开，饭菜要注意保暖，开水要及时供应，做到不吃生饭、冷饭，不喝生水。患传染病的社员的餐桌、餐具要分开擦洗，消毒和分开使用。

公共食堂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要自己养猪、养羊、养鱼、养家禽；要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制酱制醋，腌制小菜等；有条件的地方，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也可以自酿食堂用酒，以改善伙食。人民公社的蔬菜、生猪、家禽、蛋品等生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公共食堂生产部分，主要是自己食用；一是专业队（场）生产部分，主要是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剩余的再用以改善伙食。

公共食堂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和哺乳期内的母亲，应当在饮食上给予适当照顾，必要时可以单独建立食堂。在有少数民族的人民公社里，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汉、回族杂居的地方，应该为回族建立单独的食堂。

现在已临深秋，各地公共食堂应该赶快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修建新的简易饭厅；北方较严冷的地方，尤应及早解决。冬天有取暖习惯的地方，到严寒的时候，为了减少在冰天雪地中往来走路的困难和解决取暖问题，可以把食堂的范围缩小至邻近的几户或十几户，社员家庭烧炕取暖另发烧柴；也可以暂时把食堂、柴炭、蔬菜等发给各户自己做饭。

公共食堂规模的大小，对办好公共食堂有很大关系。太小了就不能充分发挥公共食堂的优越性，起不到解放生产力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的作用；太大了又不易管理，增加经营上和社员吃饭的麻烦。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应以生产队（连）或企业、事业组织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为合适，一个单位建立一个食堂。如果生产队较大，居住比较分散，也可以一个队建立几个食堂。在居住过分分散的地区，目前又不能改变这种分散的情况时，公共食堂可以暂时缓办。公共食堂应该适应生产的需要，及时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为了突击某项生产任务，大批劳动力远征、或者实行田头扎营，如目前大批钢铁军上山开矿炼铁，大批深耕队伍实行"十到田"，日夜突击深翻地，公共食堂也应该上山、下田，或及时地建立临时性的"随营食堂"。

办好公共食堂，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县以下的党委和支部，应有一个书记或社（队）长负责领导食堂工作。同时，乡、社干部应该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应再有自己单独的食堂。这样他们更能了解食堂情况，更关心食堂，更能够及时地帮助食堂改进工作。食堂要配备政治坚强、有业务能力的干部担任管理员。食堂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应该由政治进步、身体健康、克勤克俭并热心食堂工作的社员担任。患传染病的社员不能担任食堂工作。在食堂工作的社员，要和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同等劳动力得到相同的工资报酬，有技术的厨师，还应当给予一定的技术补贴。

公共食堂是体现"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场所，要办好食堂，必须全体社员参预食堂的工作和管理。要民主选出食堂的管理委员会，并定期开会研究改进食堂工作，定期公布账目，要经过社员讨论制定食堂公约，并充分运用大字报经常征求社员意见，改进食堂管理。

办好公共食堂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党委负责，书记动手，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县和公社的党委除经常总结交流食堂工作经验，表扬先进，推动落后，使食堂工作不断改进，使广大社员都感到方便满意外，还要经常加强社员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社员的集体生活习惯和提高社员政治思想觉悟。同时，还要教育全体社员提高政治警惕，防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原载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炮击金门、马祖岛

背景介绍

1958年7月，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为配合美国的侵略，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旨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并命令大小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蒋军不断炮击我沿海村镇，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为了打击美帝的侵略气焰，严惩蒋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于1958年8月23日向金门蒋军和驶往金门的蒋军运输舰进行了突然、准确、猛烈的大规模警告性炮击。9月初，美国从四面八方抽调力量，加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兵力，

并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蒋军驶往金门的运输舰护航，扩大对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对我军进行了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在此情况下，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于9月8日、11日和13日，对金门和驶往金门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猛烈炮击，予敌以沉重打击。同时，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武装挑衅的高潮。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妄 图把台、澎、金、马变为所谓"国际问题"的阴谋，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撰写了两篇国防部长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10月6日的文告提出：从当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10月25日的文告：逢单日为炮击日，逢双日停止炮击，使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得到充分供应，以利他们长期固守，但以不引进美航为条件，若有护航不在此例。从此，我人民解放军采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的方针。从8月23日到1959年1月7日止，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炮击和不定时的零炮射击，十三次空战及三次海战，共击沉击伤蒋军各型舰艇二十三艘，击落击伤蒋机三十四架，毙伤蒋军官兵七千余名，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了美、蒋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材料：

- 蒋机窜扰大陆，台湾加紧备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 毛泽东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论目前形势(节录)
- 强大炮兵严惩金门蒋军
- 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 国防部彭德怀部长再告台湾同胞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 震惊世界的炮战

材料一　蒋机窜扰大陆　台湾加紧备战

新华社24日讯　美国在武装侵略中东的同时，指使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在美国的指使下，蒋介石集团已经在17日命令它的所有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停止一切休假。蒋帮飞机连日向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上空进行窜扰活动，空投反动传单和物品。19日，马祖岛上的蒋军还举行了军事演习，加紧战争准备。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也日夜进行侦察巡逻活动。

据合众国际社消息：从7月17日以来，美国在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官员们就同蒋介石集团"整日整夜地保持接触"，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华盛顿的电讯说，这是由于中东的危机，美国必须加强"保卫台湾"的部署。

美国侵略者为了利用蒋军做侵略炮灰，正在加强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扩大台湾美国军事基地。不久前美国赠给蒋军海军的十一艘舰艇已经运到台湾。在今年内，美国还要给蒋帮八艘舰艇。

据台湾报刊透露，最近美国拨出五十多万美元，雇用了大批的日本工人，准备在台湾中部新建筑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大批美国工程人员目前已经开到了台湾。

（原载1958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新华社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浬)。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二）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十二海里(浬)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岳岛、大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岛屿。

（三）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四）以上（二）（三）两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1958年9月4日于北京

（原载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毛泽东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论目前形势（节录）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八日上午继续举行。

在今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讲了话。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出：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原载1958年第18号《新华半月刊》）

材料四　强大炮兵严惩金门蒋军

新华社福建前线8日下午1时电　福建前线我军发言人宣称：盘踞金门及其附近岛屿的蒋军本月4日以来连续向我厦门附近沿海村镇进行炮击，使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正在上课的江头镇第三中学的学生蒙受了重大伤亡。同时，今日美蒋海军在台湾高雄以南枋寮附近海域进行联合的登陆演习并且扬言进攻中国大陆。为了警告这种挑衅，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今日再次对盘踞金门的蒋军，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

新华社广州8日电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机部队伤F86型美制蒋机两架。

今天上午九点五十分，美制蒋军F86喷气战斗机两批十六架，窜入广东省南澳岛地区上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我人民空军当即凌空迎击，打伤蒋机两架。受到严重打击的蒋军飞机，狼狈地向台湾方向逃去。

新华社8日上午11时讯　继9月7日四艘美国军舰侵入我国领海之后，9月8日上午十时四十分起，又发现有美国军舰八艘先后侵入我国金门、厦门地区的领海十二浬以内，进行活动。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声明，在我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以后，美国军舰竟又一次侵犯我国领海，这显然是蓄意挑衅的最危险的行动，中国政府对此再次提出严重警告。

（原载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材料五　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新华社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湾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

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6日上午1时

（原载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六　国防部彭德怀部长再告台湾同胞
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新华社2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原载1958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七　震惊世界的炮战

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这是震惊世界的炮战，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是史无前例的一战。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同志，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同志："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呀！"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

指挥。”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我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和副政委刘培善同志，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7 月 19 日我们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 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 月 27 日收到毛主席致彭（德怀）、黄（克诚）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同志为总参谋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我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首先，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 7 月 27 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 8 月 13 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 50 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损失 20 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炮兵调来约 3 个师，还有一个坦克。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团，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 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 130 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三十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8 月 20 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专机赶去。21 日下午 3 时，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主席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我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在一起住。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8 月 23 日中午 12 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猛烈和密集，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 5 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 5 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主席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包括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还有台湾蒋介石，包括外国人，美国艾森豪威尔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进

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主席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三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中东局势由此缓和下来了。艾森豪威尔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完全被毛主席调动了。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六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四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我军实行对金门大规模炮击，就这样把美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了，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浬)，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坚强决心。

8月下旬，我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9月7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们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出决定的。我就立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我们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我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主席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准不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我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7日中午12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情况直报北京，毛主席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他们大骂"美国人混蛋"，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们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

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军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

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此后，我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1958年8月下旬开始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了台湾海峡，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攻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之战，又把美帝国主义的底摸得清清楚楚了。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呢？下一步的文章怎么办呢？顺理成章的是，下一步就只有登陆解放金门了，如果金门解放，那么马祖的解放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顺手牵羊就是了。此时金门已被我军炮火封锁了一个多月，海上补给线已断，金门蒋军的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已消耗得差不多，金门的防御工事也已被我军炮火摧毁得差不多，可以说是已到了弹尽粮绝之日了。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垂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总以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出乎我们意料，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国防部文告。文告宣布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

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击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文告发表以后，金门前线炮声沉寂，但台湾海峡风浪依然。台湾当局和美国政权慌了手脚！

台湾当局一则说这是“骗局”，一则说这是“发动新攻势的喘息”，一则说这是要“无条件投降”，一则说这是“离间中美合作的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是心慌意乱，语无伦次。

这是“骗局”吗？不是，因为炮击千真万确地停止了。

这也不是“喘息”，因为人民解放军并不打算攻占金门。

这也不是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因为我们国防部长明明说是“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又怎么会是“无条件投降”？

至于说到“离间”，实际上台湾当局和美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美妙。我们只要求美国人休管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休想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蒋介石也心里有数，寄人篱下，仰承鼻息，滋味很不好受。

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呢？

先提“停火”，后提“永久停火”，实在荒唐！正象毛主席说的“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10月6日国防部文告宣布暂停炮击金门一个星期，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是给金门蒋军以补充给养的机会，也是给台湾当局以考虑和平解决的机会。一星期届满后，为了再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并给台湾当局以充分的时间去考虑，10月13日，我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

但是，台湾当局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并邀请杜勒斯到台湾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在我停炮后又一度进入金门水城，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的条件。因此，我国防部于10月20日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

炮击金门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而且变成一个长期的斗争了。在军事上的斗争形式，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这种奇特的战争方式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

从此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作者：叶飞　标题系编者加）

风云人物

柳亚子

柳亚子(1886—1958)字安如,江苏吴江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组织南社,任社长。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通缉,逃往日本。一九二八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柳亚子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病逝。遗著主要有《柳亚子诗词选》等。

黄敬

黄敬(1911—1958)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到北平大学读书。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共晋察冀区、冀中区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书记,晋察冀中央局第二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党的八大当选 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在广州病逝。

流行风

歌曲《今年产钢千万吨》

P=1
mf
时乐蒙词曲
今年产钢千万吨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加紧奋战四个月钢铁开花红似锦
行动起来鼓足干劲
干部上前线
带头前进
加强协作
力量无穷
土炉洋炉
钢水奔腾
总路线照亮人心
要为祖国立功勋
钢产任务翻一番
今年产钢千万吨

(原载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口号"大跃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大跃进"口号溯源

关于"大跃进"的口号,目前一般认为第一次出现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其实,这段论述并不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在此之

前，《人民日报》发表的其他社论和文章早就提出了。

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的八届三中全会，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及所谓"右倾保守思想"，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了宣传和贯彻其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开始了"大跃进"的发动。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像河北这样领导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社论，反复提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字眼。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二十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957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的文章，该文认为河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是冒进，而是跃进"。学术界认为这与毛泽东的一则指示有关。

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中写了一段批语："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开始……"

（原载《党史纵横》1989年第5期）

毛泽东赞赏"大跃进"的口号

李银桥

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他生活极为俭朴，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到他这样的伙食，他就满意了。他也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同志开会，研究"想个办法"，尽快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一种热潮。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热切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很快便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人同毛泽东一道走着，我跟随在后面。

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与毛泽东边走边议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

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节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标题系编者所加）

小说《苦菜花》

长篇小说。冯德英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

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胶东半岛的一个山村王官庄。游击队一举消灭了大汉奸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政权。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更深入了。王唯一的儿子王竹投了日伪军，当上了中队长；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突然回到村里，伪装进步，暗地进行间谍活动。残酷的"扫荡"和屠杀，阴险的告密和陷害，使王官庄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终，他们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并清除了隐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母亲"——仁义嫂的描写，在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完整的革命母亲形象。小说情节动人，并善于在尖锐的冲突中刻画人物心理活动。作品的抒情色彩十分浓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青春之歌》

长篇小说。杨沫作。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小说主人公林道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为反对养母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黑暗现实中，她四处碰壁，认识到个人奋斗是没有出路的。在共产党员卢嘉川、江华等帮助、启迪下，她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因参加革命活动，她被捕入狱。经过狱中斗争的锻炼，她更加成熟了。出狱后她

入了党，并被调到北大做学生工作。她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迎着敌人的水龙、大刀，和革命战友们一道勇往直前。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面貌，描绘了当时我国知识界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状态，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真实地展示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

长篇小说。李英儒作。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小说描写1943年我地下工作者在古城保定的斗争故事。县委书记杨晓冬在武工队梁队长，金环、银环姐妹，及杨妈妈的帮助下，潜入古城，将内线斗争与外线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对日寇及伪军司令高大成、伪省长吴赞东和特务队长蓝毛等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他们护送首长安全过路；混入匪巢散发“贺年片”宣传苏军胜利；破坏敌人抢粮计划……。由于叛徒出卖，晓冬和母亲分别被捕。母亲跳楼殉难，晓冬被同志们营救，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古城斗争有了新的局面，晓冬又奉命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小说以“野火”喻敌人凶焰，以“春风”比革命力量，将古城斗争与晋察冀边区以至全国的抗日战争联系起来，是一部反映我党地下工作的优秀作品，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获得读者喜爱。

小说《上海的早晨》

长篇小说。周而复作。共四部，第一部、第二部作家出版社1958、1962年出版；第三部、第四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小说反映的是建国初期上海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生活，以及党所领导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按作者总体构思，第一部写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前夕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第二部集中写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党领导下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第三、四部则写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资产阶级分子怎样选择自己的前途、决定自己的命运。作品成功地描写了以徐义德为首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主要通过他们的活动来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同时也写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断的发展壮大，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的伟大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这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继《子夜》之后又一部正面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生活的杰作，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

中篇小说。高缨作。发表于《红岩》1958年第3期。

故事发生在刚从奴隶制度下获得解放不久的凉山地区。汉族农民任秉清，在县城偶然地遇到了他在13年前失去了的女儿。她是在小时候被奴隶主掠进凉山的，后来成了彝族农民马赫的养女。两个父亲都深爱着达吉，都渴望能和女儿生活在一块，而达吉对两个父亲也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于是，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动人心弦的戏剧冲突。党的民族政策和劳动人民崇高无私的品质，深厚的阶级情谊，使矛盾迎刃而解，由相争到相让，达吉同是两个父亲的好女儿。小说以诗的激情和语言，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独特经历和性格的复杂性，歌颂了在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民族关系下，劳动人民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品深沉隽永，引人入胜。1961—1962年，全国文艺界曾围绕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

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

中篇小说。杜鹏程作。发表于《延河》1957年8期，东风文艺出版社1958年6月出版。

作品以宝成铁路工地建设为背景，描绘了一支铁路工程队开辟秦岭，打通铁路线的战斗生活。阎兴和梁建，这两个当年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一同脱下军装，换上了工作服。可是他们在和平的日子里萌发了新的矛盾，“两人谈话格格不入”，中间“隔着一层东西”。自觉的历史责任感，使阎兴像战争年代那样，朝气蓬勃，指挥着建设战线的千军万马。工地上复杂的矛盾冲突，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风暴洪水的袭击，便桥的被冲垮……都没有使他折服。而经过战火锻炼的梁建，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意志消沉，把革命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严重的个人主义使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小说还塑造了年轻的老革命刘子青、新老知识分子韦珍和张如松等人物形象，艺术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探求生活的意义，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漩涡中，深刻揭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热情洋溢，语言优美凝练，把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小说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所做的探索，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

意与讨论。

小说《百合花》

短篇小说。茹志鹃作。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等集中。

小说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某战地包扎所中的一段小插曲：某团部小通讯员奉命护送女文工团员去前沿包扎所，并协助她到一位新媳妇家为伤员借被子。返回前线以后，他为了掩护地方担架队员，壮烈地牺牲了。新媳妇含泪用她唯一的嫁妆——一条枣红底、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为小通讯员成殓。作品生动地塑造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两个闪光的人物形象。歌颂了革命战士勇于献身的崇高品质，表现了军民之间鱼水相依的深挚情感。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语言清新、俊逸，描写细致、准确且富有诗意。

小说《三年早知道》

短篇小说。马烽作。发表于《火花》1958年第1期。后收入《农村文学读物丛书・短篇小说》第三集。

"三年早知道"是聪明能干又爱发议论的中农赵满囤的绰号。他原是自私自利，耍奸取巧的落后人物，怀着个人小算盘入了社，成了社里的"头痛社员"。但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使赵满囤也逐步转变，知道"替全社打算"了。但起初仍带有小私有者的积习，用欺骗方式拦截过路公猪，为社里母猪配种。作品通过一连串喜剧故事，表现赵满囤从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转变为热爱集体的先进农民的过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品语言幽默而通俗，故事性强，是表现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精神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的优秀作品之一。

叙事诗《杨高传》

长篇叙事诗。李季作。共三部：《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玉门女儿出征记》。从1958年9月起，先后在《收获》上发表。前两部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后一部作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

杨高是陕北三边地区一个孤苦的放羊娃。在党的启发下，他参加了红军，经历了艰苦曲折的生死考验，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解放后，他作为残废军人，却毅然复员来到玉门油矿，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战争"。作者将七言体民歌和北方民间说唱形式（如鼓词）结合起来，有变化、有创新，深刻、全面地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生活，充满了激情和诗意，在新诗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诗歌《我是一个装卸工》

诗歌。黄声孝作。写于1958年8月。收入作者诗集《歌声压着长江浪》，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这是一位工人诗作者对自己工作、生活的充满自豪的歌唱。诗人以夸张手法表现出"威镇长江万里程"的装卸工人的气魄、干劲与决心。他"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生产战斗在江中"，在他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举起泰山还嫌小，能把地球推得动"。作品采用七言民歌体形式，用群众口语歌颂劳动、歌颂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干劲，洋溢着强烈的劳动气息和码头工人强烈的责任感。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林金编剧。故事梗概：

1939年春，党中央派电台政委李侠赴上海，与纺织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以作掩护，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在共同斗争中，他们产生了爱情，结成伴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逮捕了李侠夫妇，他们坚贞不屈，进行了巧妙斗争，不久获释。与李侠同时被俘的国民党特务姚苇，误以为李是商业电台人员，便拉拢他为汉奸电台工作，李侠深入虎穴，取得大量重要情报。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大搜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正在此时，有两份绝密情报需立即发出，李侠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当他刚发完电报时，敌人已采用分区停电法查出并包围了他的住所，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告别信号……。剧本摆脱了同类题材电影作品的通病，既没有过份地渲染地下工作者的神出鬼没，也没有故弄玄虚地安排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所塑造的我党坚强的地下工作者李侠这一英雄人物形象，普通实在、可敬可亲。

历史档案

《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

毛泽东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求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关于人民公社的“发明权”

毛泽东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定。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山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钢铁、总路线。

（选自毛泽东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原载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

《红旗》编辑部按：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是由嵖岈山附近的二十七个农业合作社在今年四月间进行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有九千三百六十九户。这个公社八月间拟定了试行简章草案，本刊特为发表，以供研究和参考。

第一条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第二条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

为此，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在社会的产品很丰富和人民有高度觉悟的条件下，逐步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第三条　年满十六周岁的公民都可以入社做正式社员。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允许他们入社做非正式社员，依照法律取得政治权利的，可以做正式社员。

社员都有遵守社章，执行社内的决议，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正式社员除了有精神病的以外，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和监督社务的权利。非正式社员在社内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但在经济上可以和正式社员享受一样的待遇。

第四条　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各个农业合作社社员所交纳的股份基金，仍分记在各人名下，不计利息。各个农业合作社社员的投资，由公社负责偿还。

因为迁入和长大到十六周岁而入社的社员不要补交股份基金；迁出和死亡的，也不能抽走股份基金。

第五条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

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私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作为本人的投资。

单干户加入公社，除了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以外，应该将全部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这些生产资料，要按照原农业合作社的规定，折价抵交股份基金，多余部分作为本人的投资。

第六条　公社必须继续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土壤、普及良种、繁殖耕畜、防治病虫害、合理地密植、深耕细作，保证农业生产的继续高涨，公社必须积极地改良农具，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电力化。

公社必须尽快地发展工业，首先是建立开采矿产、冶炼钢铁、制造滚珠轴承、加工农产品、制造农具、制造肥料、制造建筑材料、修理机器、水力发电、利用沼气以及其他的工厂和矿场。

公社必须有计划地兴修道路，疏浚河道，改善交通工具，安装电话，逐步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网。每个大队要设一个至两个邮递员，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为社员服务不另收费。

第七条　公社要建立供销部，它是国营商业的基层机构。供销部的资金由上级国营商业机关拨给，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供销部的盈余应当上缴给国营商业机关，但公社可以提取一定的比例。公社必须保证供销部完成国家的统购、统一收购任务，执行上级国营商业机关的计划和制度，同时有权对供销部进行具体的业务领导。

供销部要在各大队建立分部，并且在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建立门市部，在开饭的时间营业，做到普遍地便利群众。供销分部单独核算，盈亏由供销部统一负责。供销分部的资金，先由社员过去所交纳的供销社股金抵充，如果不够，再由供销部设法补足，这些股金不再分红。

供销部参加县供销合作社为社员。

第八条　公社要建立信用部，信用部是人民银行的营业所。信用部的资金，由上级人民银行拨给，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信用部的盈余应该上缴给上级人民银行，但公社可以提取一定的比例。公社必须保证信用部执行上级人民银行的计划和制度，同时有权对信用部进行具体的业务领导。

信用部应当在各大队建立分部，并且在各生产队设立服务站，做到普遍地便利群众。信用分部单独核算，盈亏由信用部统一负责。信用分部的资金，先由社员过去所交纳的信用社股金抵充，如果不够，再由信用部设法补足。

信用部和各个分部是公社和各个大队的金库，成宗的现金出纳，都应当经过信用部和各个分部办理。信用部办理公社与其他经济单位之间，以及公社内部各核算单位之间的非现金结算，对社员不实行非现金结算。

第九条　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

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在将来生产高度发展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减少社员劳动的时间，增加他们学习的时间。

公社要鼓励和帮助社员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工作，首先是进行培养良种、改良土壤、栽培林木、繁殖牲畜、消灭病虫害、改进耕作技术和改良工具的研究和试验。

第十条　公社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壮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应该编成民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担负国家所分配的任务，民兵在受训和执行任务期间，工资照发。

公社要负责动员兵源和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烈士家属、残废军人和现役军人，他们的家庭缺乏劳力的，由公社给予适当的优待。

第十一条　公社按照乡的范围建立，一乡一社。为了便利工作，实行乡社结合，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任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乡长兼任社长，副乡长兼任副社长，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兼任乡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第十二条　公社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的重大事务，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社员代表大会应当包括各个生产队和各个方面（例如妇女、青年、老年、文化教育人员、医务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工业人员、商业人员、少数民族等）的代表人物。

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务。管理委员会由社长一人、副社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下设若干部或者委员会（例如农业、水利、林业、畜牧、工业交通、财政粮食、商业、文化教育、内务劳动、武装保卫、计划、科学研究等），分别掌握有关的工作，各部和委员会的人选，由管理委员会提名，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管理委员会可以推选出常务委员，处理日常工作。

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监察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在工作上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的领导。

社员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任期均为两年。对于极不称职的个别人员，在任期末满以前，原选举单位可以撤销他的职务。

第十三条　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以便实现

生产当中的责任制。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将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每一大队又划分为若干生产队，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保证完成全社总计划的条件下，生产大队有具体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具体支配生产开支和奖励工资的一定限度的机动权。大队和生产队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或者节约了生产开支，公社和大队应当适当地拨给奖励工资。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候，以大队为单位建立拖拉机工作队。工厂、矿场、林场、牧场等，规模较大的由公社直接管理，规模较小的可以交给大队管理。小型的机器和设备（例如缝纫机、沼气池、制造颗粒肥料的设备等）可以交生产队管理。

大队设立社员代表会议，由本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组成。大队社员代表会议选举大队长一人，副大队长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大队管理委员会。选举监察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监察委员会，任期均为一年。

生产队由队社员大会选举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人组成队务委员会领导工作。

第十四条　公社在收入稳定、资金充足、社员能够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他们的工资等级，按月发给不同的一定的工资，有特殊技术的，可以另加技术津贴。逐月所发的工资可以有多有少。在公社收入较多和社员需要较大的月份，工资可以多发，其余的月份可以少发。遇到特大的灾害，可以酌情少发工资。

在实行工资制以后，应当定期评比各个单位和各个人的劳动情况，对于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很好的，应该发给奖励工资；对于工作消极、没有完成任务的，可以扣发工资，作为处罚。全社全年的奖励工资，最多可以占到基本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奖励工资分为三部分，分别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掌握。分配工作任务和评比劳动情况，要以平均先进定额为依据。

实行工资制以后，旷工照扣工资，但每人每月可以请假两天，妇女可以请假三天，工资照发，妇女生孩子可以休假一个月，工资按半数发给。因公负伤的，在休养期间，工资照发。因为久病旷工影响生活的，用公益金给予补助。

在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时候，可以先实行计件工资制，规定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每月按照社员实做劳动日多少，发给一部分或全部劳动报酬。

公社的管理机构要厉行精简，全部管理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全社工资总数的百分之一，各种会议也应当加以精简，尽量使它不侵占生产劳动的时间。

第十五条　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对于个别不好好劳动并且屡劝不改的懒汉，经过社员会议，可以监督他们从事劳动，加以改造。

第十六条　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的基础是全体社员"各尽所能"。每个社员都应该自觉地遵守以下的劳动纪律：（一）积极参加劳动；（二）爱护公共财产；（三）保证工作质量；（四）服从指挥调动；（五）自动进行协作。

公社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依靠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开展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评比，逐步使"各尽所能"成为每个社员的自觉行动。

第十七条　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

第十八条　公社要逐步建立和健全医疗机构，逐步做到：社有中心医院，能够收容一般重病号；大队有门诊所，能够诊治轻病号；生产队有保健员和接生员，能够进行预防疾病、看护病人和为产妇接生的工作；在有条件的时候，公社要建立疗养院。

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中心医院对无法治疗的特殊重病号，应该介绍到适当的医院治疗，并负责开支旅费和医药费，但对衰老病和慢性病的人，暂时不作介绍。在经济充足的时候，公社实行公费医疗。

第十九条　公社对于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废的社员，要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负责加以安排和照顾，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必要的保证。公社要组织幸福院收容没有儿女的老年人，组织他们参加轻微的劳动，给予必要的供给，使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

公社要建立公墓。在生产和建设需要的时候，经过坟主同意，可以迁移现有的坟墓。

第二十条　公社要逐步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对全社居民点的安排和住宅的建设，做出通盘的、长期的规划，并且逐步付诸实施，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小的居民点可以适当地、逐步地合并。

按照规划新建住宅，由公社统一备料派工。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租金要相当于维持修理所需要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　公社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培养身心健全的共产主义公民。要逐步做到社有图书馆、剧场和电影放映队，大队有俱乐部、业余剧团、歌咏团和球队，生产队有小型的书报阅览室和收听广播的设备。

第二十二条　公社每年的全部收入，应该按照以下的项目进行分配。

一、扣除当年度消耗的生产费。

二、扣除公共财产的折旧。

三、向国家纳税。

四、支付社员的口粮。

五、支付社员的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

六、留下公益金，用于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福利事业。公益金一般不超过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

七、其余部分，全部作为公积金，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包括交通建设）。公社应该逐步做到有够用一年至二年的粮食储备和必要的工资基金。

收益分配工作以保证高速度地扩大再生产为原则。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应当逐年提高，但工资提高的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增加的速度。在社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包括粮食供给）达到富裕中农生活水平以后，工资提高的速度应当放慢，以保证尽快地发展工业，保证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电力化。

第二十三条　公社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家的经济计划和本社的具体情况，制订长期的建设规划和年度的计划。公社对各生产大队、工厂、矿场、牧场、林场，生产大队对各生产队要分别规定具体的产量计划、技术措施计划、生产开支计划和劳动力使用计划，以便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合理地执行奖惩制度。

制订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产品交售计划、商品流转计划、机器设备采购计划、金融计划的工资计划，必须经过国家计划机关及有关部门审核平衡。然后付诸实施。

第二十四条　公社实行民主管理。公社、大队、生产队、工厂、矿场、林场、牧场、拖拉机工作队、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食堂和民兵组织，都必须建立活泼的、经常的民主生活。各个核算单位的财务收支账目，和奖励工资的分配清单，必须按时公布。一切管理人员都必须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要发动群众运用大字报进行批评、自我批评、表扬和建议，以便不断地克服工作当中的各种缺点。

第二十五条　公社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要发动社员勤劳生产、充分利用公社本身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各种非生产的设备和建筑，可以从简的应该尽量因陋就简。

第二十六条　公社必须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各个核算单位都必须及时制订财务收支预算，都必须遵守使用现金的制度和手续，都必须按时清结账目。

一切公共财产都必须有专人负责保管。对于不负责任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的，公社应该给以批评或者处分。对于贪污、盗窃、破坏公共财产的，应该严肃处理；对于情节严重的，要请上级司法机关法办。

（原载1958年9月4日《人民日报》）

其它重要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于1958年1月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为了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增长的要求，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二项“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的精神制定的。全文共二十四条。条例所规定的制度概括起来，就是：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和变更更正等七项登记。其中常住人口登记，主要是掌握固定居住人口的基本情况，而其他六项登记，则是掌握人口的增减和变动情况。这些项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少了任何一项，都不能掌握人口的全貌，都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因此，这些制度都是必要的。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是适用的。但是，也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和农村交通条件不方便，条例在某些具体制度上也作了不同的处理。总之，从条例的内容和手续上都可以说明，既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又照顾到便利群众，这是我们户口登记制度的一个特点。

这个条例的实施，无疑地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将起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国家在行政管理上的一项重要措施。

2.《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拟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1日，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这个文件，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从1958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为了贯彻这个原则，毛泽东具体地规定了整个经济建设必须抓好的十四项工作，工业、农业方面各要

抓好的十四项工作，并且要求省、地、县都要按照上述三个十四项工作制定出计划，定期检查、开展评比。

二、要求生产计划制定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帐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帐，在地方是期成的。全国评比，要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这种三本帐的思想，是造成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动员口号。如：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今后五年到八年内，普遍地提前实现原定1967年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在五年到十年内，各地方的工业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都要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

四、提出了改革规章制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当时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修改和废除，鼓励群众去打破那些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

五、提出了一些工作方法。如抓试验田，突破一点推动全面；抓两头，带中间；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集中地展览先进产品等等。

3.《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在全国各省市，广大群众正在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讲卫生，消灭危害当地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且纷纷提出规划，准备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要求，即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指示强调，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要求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

为了领导好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指示要求各地应当切实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必须同城乡生产相结合，使运动直接为生产服务，并且把除四害讲卫生的计划放在总的生产建设的计划之内。(2)、在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中，必须使群众力量与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3)、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的一项带根本性的重要措施。为了保障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也应该大跃进。决定在谈到除四害运动近一年取得的成绩后，强调指出，由于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是活东西、滋生很快，今天打得看不见了，稍一放松，过一个时候，它又繁殖起来了。因此，除四害，讲卫生应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放松。同时，在经常努力的基础上，一年又要搞几次突击。只有这样，经常工作和突击运动，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才能最后把四害消灭干净。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基本消灭传染病的危害的国家，人人体格健康，人人身强力壮，以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更大的发展。

4.《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

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通知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通知号召，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结论，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

5.《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指示首先指出，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造林事业，对于促进我国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的改变，具有重大的意义。指示接着指出，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不足，木材蓄积量只有六十亿立方米左右，森林复盖率只稍多于百分之十，而且集中在少数地区。森林不足和分布极不平衡，不但妨碍了基本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很多地方由于光山秃岭大量存在，水土流失和水旱风沙灾害严重，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以来，历年造林事业有很大成绩，但是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为了迅速使造林运动得到普遍地、有计划地发展，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改变我国森林不足和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指示提出四点办法：(一)、必须作好规划。为了改造自然、保持水土、征服水旱灾害，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基本建设和各种林产品工业，为了改善农民生活特别是山区农民生活，全国森林面积应该在十年内翻一番。并要求

在定造林规划的时候，应该同时考虑到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规划。应该根据当地的情况，使林业的发展和经营同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和经营适当地结合起来。造林规划除了要注意面积和速度，还要注意树种的搭配，必须兼顾国家建设和群众生活的多种需要，按照自然条件，定出适当比例。并在一切需要和适宜种草的荒地荒山，还应该把种草列入绿化规划。（二）、必须在群众中作好思想动员，并且坚持依靠合作社造林为主，同时积极发展国营林场的方针。（三）、必须努力提高造林质量，作好造林前的准备工作和造林后的育林工作。造林不仅要求多快，而且必须好省，必须种得密，活得多，长得快，避免过去有些地方耗费了人力物力而收效不大的现象。为此，在造林以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四）、必须做好更新工作和护林工作。

6.《关于企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

1958年6月2日，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把体制下放问题进一步具体化。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发出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的文件，提出了企业下放的总原则。这就是，各个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根据这个原则，6月2日中央提出了如下具体办法：一、轻工业部门所属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单位大部分下放。二、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除了保留北京通讯枢纽以及北京通各省的长途通讯干线和邮政干线的管理权以外，其他单位全部下放。交通部所属公路的设计施工单位，除保留必要援外单位外，全部下放。三、农垦部除直属三个地方国营农场外，其他均交地方管理。粮食、商业部门所属的加工企业，全部下放。对轻工、纺织、冶金、一机、化工、煤炭、水电、石油、建工等九个工业部门应当下放的企业、事业单位数，也分别作出具体规定。中央要求各部门一律于6月15日以前，也就是只用十几天的时间，就要完成全部下放企业的交接手续。

7.《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文化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教育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正确地领导教育工作，坚持党的教育工作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实现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

8.《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几个月来人民公社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大的政策界限，作出了比前一个决议较为明确的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针对一些公社成立以后就宣布实现了全民所有制、甚至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决议划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指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觉悟程度，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听凭人们主观愿望，想早就早。农业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虽然比过去扩大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变为全民所有制了，更不等于转变为共产主义了。

二、针对一些公社在分配上搞全面供给制的现象，决议指出：在公社社员的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应当占有主要地位。

三、针对那种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的积极作用、企图对公社的产品实行调拨的主张，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四、针对一些公社把社员的私有财产归公的做法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提出的一些重大政策，对于澄清当时的一些糊涂认识，对于整顿人民公社，减缓"共产风"的蔓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决议的有些规定，，仍然超越了现阶段的客观条件。例如，决议坚持实行部分供给制，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说成是一个"创举"；要求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分期分批地建设新型的园林化的乡村居民点；坚持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等。

建设成就

1. 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开馆

1958年4月1日，我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建立在陕西西安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落遗址上。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1953～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经过五次发掘，整理出房屋遗址45座，圈栏2座，储藏窖穴200多个，陶窑遗址6座，墓葬250座，还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一万多件。博物馆的一座2300平方米的大厅，把这些发掘的房屋遗址和窑穴保护起来，房屋遗址中的柱洞、断墙、路面和窑穴等都经过硬化，以便长久保存，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2. 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

1958年5月1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揭幕。它是1949年9月30日由毛泽东主席亲奠基石、1952年破工兴建的。碑高37.94米，立在一个面积约3千平方米的平台上。四周围绕着二层汉白玉石栏杆。碑身正面刻有毛泽东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刻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碑座四周镶嵌着10块以革命史迹为内容的浮雕。揭幕这天，首都各界人民代表登上碑前的月台，向人民英雄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并敬献了花圈。

3. 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建成、运转。这座原子反应堆是重水型的，热功率为7千到1万瓩。它的设计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它的主要用途是进行科学研究和制造同位素。回旋加速器，可以把a（阿尔法）粒子加速，使它的能量达到2500万电子伏特。它们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4.《红旗》杂志创刊

为加强理论宣传，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红旗》杂志。经过筹备，《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出版。杂志“发刊词”指出，它的任务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它遵循的方针，是善于密切地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尊重新鲜的事物，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真理，坚决地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潮决裂。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宣传、解释、论证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该刊于1988年6月停刊。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上旬　中共中央召开杭州会议，讨论技术革命和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把1956年纠正国民经济急躁冒进偏向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成是所谓“促退派”，有“右倾思想”。

1月9日　国务院举行第68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协定1958年执行计划》，决定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制式服装及军衔肩章，会议还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并决定将这两个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1月11日～22日　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九省二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南宁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7日，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提出今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次会议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1月13日～26日　中国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会议，撤销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绝大多数是被错划的。

2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指出，我国正面临着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提出了要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

2月13～2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规定以后不得再提“反冒进”的口号。

3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3月5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韦国清（壮族）任自治区主席。

4月9日～14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会议指出：全国青年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下，继续加强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建设我们的国家。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选出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及委员。

4月15日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发表。文章对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河南省封邱县应举社给以充分肯定。指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时间了。文章重申，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5月5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5月8日　北京大学举行辩论会，批判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平衡论”。马寅初在会上为自己的观点申辩，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答辩文章：《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

5月25日　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出版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红旗》创刊号于6月1日正式出版。

6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向技术革命进军》的社论，提出中国的革命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这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6月26日～7月9日　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提出统计工作必须实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给统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6月29日　中共中央同意劳动部的报告，决定放松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确定今后劳动力的招收、调剂等项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管理，1958年的招工计划，不必经过中央批准。这就为职工队伍的急剧膨胀开了口子。

7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文章，宣传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从此，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公共食堂。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共有公共食堂390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4亿，占农村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

8月上旬　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徐水、安国和定县，河南省新乡、襄城、长葛和商邱县，山东省历城等地。在山东视察时，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9日　在全国协作区会议上，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思想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工资制度、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等，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要考虑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围绕着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传徐水县农民正在沿着人民公社的道路，奔向“共产主义的乐园”。这篇报道，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宣传的。一是，描绘徐水县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二是，把徐水县说成是一个高产的典型。宣传徐水正计划放几颗“高产卫星”，例如1亩山药120万斤，1棵500斤等。报道最后还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9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把它作为楷模，向全国推荐。

9月5、6、8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他说，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前又侵占了黎巴嫩，还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这些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会议还就李富春所作关于1959年国家建设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所作关于财政和商业工作的报告、陆定一所作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周恩来所作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9月10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发表题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

9月11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就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要“拔白旗，插红旗”，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倾向，大立共产主义，要彻底批判“条件

论”、“习惯论”,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

10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从7月各地试办、8月普遍推广到实现公社化前后不过两个多月,如果从开始并大社算起也不过半年左右。在原来75万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的农户达总户的90.4%,平均每社4797户。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的和已经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县联社的,据13个省统计已有94个。

10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林伯渠在讲话中说,全国实行区域自治的已有35个少数民族,人口共达2500多万,约占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90%以上。

10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发展,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的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10月31日　毛泽东题为《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讲演和谈话的辑录,在《人民日报》发表。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代表腐朽势力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没有前途,它们的一切猖獗,不过是表示垂死挣扎;第二部分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革命的人们有理由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中又要重视他们;第三部分论述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将被打败。

11月2日～10日　中央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简称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指出了以下三个问题:①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②关于商品生产问题。批驳了党内有些人,以陈伯达为代表,提出废除商品、货币的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为了团结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③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的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指出:“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这次会议,标志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作出努力。

11月21～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在批评“共产风”的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看来“两个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他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并提醒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初步地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

11月21日～12月2日　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京召开。胡耀邦作《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报告指出,青年要积极参加劳动,提高本领,要向又红又专的目标前进;要把敢想敢干精神同实事求是作风密切结合起来,要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

11月28日～12月10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样作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强调,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提出,必须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会议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2月　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我国经济学界就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讨论。这个讨论最初开始于1956年下半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商品的概念和商品生产的范围,商品生产的消亡,价值规律在目前我国条件下的作用。这场讨论,对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价值规律是一个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校,进一步明确了认识,但分歧仍然不少,有许多实际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12月3日～16日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召开。会议肯定了全国妇女在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建设中作出的贡献,并指出广大妇女应继续努

力前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增长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劳动和社会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　济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指出，我们要在15年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同日　宝成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这条铁路从1952年7月1日开始施工，全长668公里，贯穿陕、甘、川三省19个市、县，使四川省有了同全国铁路网联结起来的铁路干线。

2月1日～11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薄一波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提出《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提出1958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如下：①工业总产值747.4亿元，农业总产值688.3亿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14.6%和6.1%。②财政收入和支出为331亿元。③基本建设投资145.8亿元。④国内市场可供商品总量比上年增长6.5%。⑤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5.5亿元。这个计划草案大会通过后由国务院正式下达。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机构的决定》。

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指出，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的结论。

3月1日　我国云南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的国际联运正式开始。至此，中断了16年的中国昆明铁路和越南铁路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3月9日～26日　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并认为我国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会议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等37个文件。会议通过的文件，对各项经济指标的规定，比2月间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本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由14%提高到33%。会议把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期限，又从5年至10年改为5年至7年，并进一步要求要7年内(争取在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3月22日　中共中央同意财政部党组的报告，决定对我国的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一是，减少税收的种类，把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统一税"。二是，简化征税办法，工业品在工厂一般只征一道税。为了取得经验，从4月起，先对棉纺织等行业的产品，实行改革办法。在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于9月3日起在全国普遍试行。

4月1日～6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河南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划汇报，还听取了安徽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并号召各省搞民歌。还阐述了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

4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标》。主要是：①对于个体手工业户，除某些不适合组织集体生产的外，都要组织他们加入手工业合作社。对于小商小贩，也要把他们组织成合作小组、合作商店或者使他们成为国营商业的代购和代销人员。②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不得超过同行业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小商小贩的收入水平，一般不得超过当地国营商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国家要采取经济措施加以控制。

4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指出：对各类产品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的制度，对计划管理工作要逐步实行"双轨"的计划制；要改变基本建设程序，放松国家对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的审批和管理。

4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成都会议讨论通过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关于机械化的意见指

出: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全国各地应当普遍积极推广,争取五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此后,各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兴修水利、举办农业机械化事业和并社的工作。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社"等不同的名称。报刊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有9369户的一个大社的消息。

5月6日　中共中央批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帐。在下发了有关第二本帐的报告之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动员全党、全民为实现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帐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跃进的新情况和成都会议的精神,对今年的计划指标又进行了调整。

5月12日　我国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

5月29日　国务院决定,从1959年起,停止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各省、市、自治区在确有必要时可以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地方公债的利息,年利率一般不宜超过2%。公债偿还期限,一般不应超过五年。6月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国家共发行7次经济建设公债,总额为38.42亿元。

6月1日　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协作区。中央要求,各协作区应当根据各个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此后,8月10至13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工作时,对建立工业体系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指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6月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将体制下放问题进一步具体化。4月11日,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指出各个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根据这个原则,6月2日的规定提出如下办法:①轻工业部门所属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单位大部分下放。②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除了保留北京通信枢纽以及北京通各省的长途通讯干线和邮政干线的管理权以外,其他单位全部下放。交通部所属公路的设计施工单位,除保留必要的援外单位外,全部下放。③农垦部除直属三个地方国营农场外,其他均交地方管理。粮食、商业部门所属的加工企业,全部下放。对轻工、纺织、冶金、一机、化工、煤炭、水电、石油、建工等9个工业部门应当下放的企业、事业单位数,也分别作出具体规定。要求于6月15日以前完成交接手续。至此,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有80%(880多个)下放地方管理。

6月3日　一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个新条例对原来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税收条例作了若干重要的改变。规定农业税的征收,在全国各地区统一实行比例税制;全国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

6月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①印花税、城市房地产税等七种税收,交给省、市、自治区掌握。②基本上归中央掌握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四种税收,各省、市、自治区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减税、免税的措施。③对于工商税的征收环节和起征点的规定,省、市、自治区可以机动处理。

6月11日　十三陵水库的建设者经过140个昼夜的紧张劳动,提前完成拦洪大坝的土方工程。这条拦洪大坝耸立在十三陵的蟒山和汉包山之间。6月30日全部完工,7月1日举行落成典礼。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追加1958年基建投资25亿元,并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追加投资分配意见的报告。这样,就使1958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达到200亿元。

6月30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省安国县娄底乡卓头村小麦亩产5103斤的浮夸报导。此后,各地报刊连续登载粮食高产"卫星"。截止9月25日,小麦亩产最高的报为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报为130,435斤。

同日　在苏联帮助下,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型原子反应堆正式运转,回旋加速器也已建成。这座原子反应堆热功率为7000到1万千瓦。回旋加速器,可以把a粒子加速,使它的能量达到2500万电子伏特。

7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陈伯达的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指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这样一种组织,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他又在题为《在毛泽东旗帜下》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7月5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制度的几项规定》,确定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在保证不降低生产能力、不推迟交工日期、不突破投资总额和不增加非生产建设比重的条件下,将基本建设投资交

由有关建设部门和单位统一掌握，自行安排，包干使用。

7月23日　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称这一年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达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69%。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指出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所谓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在随后发表的《年底算帐派输定了》(8月3日)、《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8月13日)等社论中，反复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8月1日　从包头到兰州的包兰铁路正式接轨通车。这条铁路长990公里，是连通西北和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干线。

8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号召一年之内要建成中小转炉200座以增加年产1000万吨钢的能力；建成1.3万座小高炉，以增加年产2000万吨生铁的能力。各省、市、自治区，从专区到县镇，从公社到大队，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抢建高炉、转炉。

8月17～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努力，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提出1959年的工业和农业要用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主要指标为，粮食产量8000亿至1万亿斤，钢产量2700万吨至3000万吨。会议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二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30%左右，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35%左右。到1962年，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比1957年增长3倍左右；钢、原煤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则增长五、六倍甚至十几倍。会议还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认为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必然趋势。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教育工作的方针，讨论了加强民兵工作、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从8月25日至8月31日，中央同时召集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

9月11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指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认为，深耕是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中心，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要求各地区在今后两三年内，必须把一切可能深翻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3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土层太薄的田地，要在两三年内，采取"借客土"的办法，把土层加厚到1尺以上。同时，全国需要改良的3.3亿亩盐碱地、红壤土等瘠薄田地，要求两三年内，必须全部改完。在此之前，7月27日，农业部曾在河北省长葛县召开现场会。此后，各地农村都调动了大批劳动力，掀起了所谓"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浪潮。

9月10～29日　毛泽东视察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一些地方和企业。在视察过程中，当听到安徽省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当谈到钢铁生产时，毛泽东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9月29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在当前的各项生产建设中，首先应当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

9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介绍9月15日河南省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4吨。这个数字，超过了东北全区生铁的日产量。

9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加强协作、共同负责的原则，强调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

9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规定：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体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9月27日　建设在北京郊外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第一批中国自制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经从这座原子堆里生产出来；从原子堆里横腰的孔道中引出来的中子和两种射线以及从加速器发出的每秒34,000公里速度的粒子已经被用来进行原子核物理研究。

10月7～9日　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会，介绍天津新兴钢厂土铁炼钢的基本措施和经验，推广了土铁炼钢法。11至16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议，推广土炼钢法。《人民日报》并为此发表《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的社论。从此掀起土法炼钢高潮。

10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肯定了一些企业取消计件工资的做法，并列举了计件工资的所谓五大"罪状"，从此取消了计件工资制。

10月18～30日　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提出，1959年工业的中心任务是要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中

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的国民经济计划方案基本不变。

10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突击完成农产品收购调运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我国农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但目前农产品收购和调动工作完成得不好。应当收购的农产品还远远没有调运出来，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农产品供应，已经显得紧张。在当前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收购与调运工作，必须发动群众，把突击收购与经常收购结合起来，突击运输与经常运输结合起来。要求在大搞钢铁、大搞农业的同时，插入收购和调运运动。

10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安国县、山西长治地区、陕西长安县、山东单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用总耕地的1/3种庄稼，1/3种树种草、1/3休闲）的耕作制度，确定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大搞大面积高额丰产田。

11月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中药材的生产要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野生动、植物药材为家养家种，这是发展中药材生产和解决中药材供应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逐步满足人民医疗需要的根本办法。

11月27日 我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轮"跃进号"下水。

12月7日 中央批准财政部《关于土法炼铁的处理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在土法炼铁上问题不少，从财政上说亏损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据各地的材料反映，土法炼铁的成本全国平均至少在250元—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今年土铁产量估计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建议从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以后算起，生铁亏损采取国家和地方分担的原则。

同日 中央批准粮食部党组关于粮食调运问题的报告提出：同上年同期比较，今年7月到10月，粮食征购数量减少88亿斤，销售和出口数量增加52亿斤，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减少一百几十亿斤。许多地方纷纷要求调入粮食。

12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对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即实行"两放、三统、一包"。"两放"，就是把国家在农村的商业、粮食、财政、银行等财贸机构，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领导和经营管理。"三统"就是人民公社在政策的执行、计划的制定和流动资产的管理等三个方面，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规定。"一包"就是把国家在农村的各项税收和下放企业利润等收入，统一计算，扣除原来由国家开支的行政费和事业费，由公社按收入差额，包干上交国家。

12月23日 国管院发布关于企业流动资金问题的规定。1958年，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实行70%由财政拨款、30%由银行贷款的办法。国务院这次规定，从1959年起，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一律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过去国家财政拨给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全部转作银行贷款，统一计算利息。

军 事

3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3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5月27日～7月22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检查和总结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工作，针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对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军事方针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彭德怀作总结发言。会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在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也发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缺点。会议对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

10月6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10月20日 国防部发布命令指出：台湾当局从19日夜到20日晨在金门海域引进美军护航，我军恢复炮击。

10月2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批人员撤出朝鲜。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回国。30日，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授朝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他们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争辉。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外 交

2月14日～21日 周恩来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经过同朝鲜政府

协商后,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从 3 月 15 日至 10 月 6 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4 月 23 日　中苏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和 1958 年两国货物交换议定书。

7 月 31 日～8 月 3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我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并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了苏方在不久以前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9 月 4 日　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以基线向外延伸 12 海里(浬)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在基线以内的水域,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都是中国的内海岛屿。

9 月 4 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为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表示,尽管美国政府以武力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缓和消除。但是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11 月 22 日～12 月 8 日　金日成首相率朝鲜政府代表团到我国访问。访问期间,中朝双方对所讨论的当前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等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并发表了《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坚决要求美国和参加联合国的其他国家从朝鲜撤出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强烈谴责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1 月 10 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三个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 月 25 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艺术院校对待民间艺人必须妥善安排的通知》,指出:今后艺术教育要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加强培养学生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必须使学生具有群众观点,热爱与工农兵有密切联系的民间艺术,并向民间艺人学习本领。要求各校应为艺人设立工作室或训练班,采取以带徒为主的方式培养后一代。

1 月 28 日　共青团中央发表《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对勤工俭学作了相应的规定。

2 月 24 日　教育部、内务部联合通知各地试行《聋人汉语手指字母方案》。

3 月 24 日～4 月 8 日　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等问题。会议指出,文化革命必须完成五项任务:大力开展识字运动,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积极发展工农业余中学和小学,普及小学教育;发展普通中学,提高中学教育质量;加强和改进各级师范教育;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3 月　文化部在《关于肃清黄色音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群众中进行一次不买黄色音乐唱片、歌片,不唱黄色歌曲、不听黄色音乐、不跳黄色交际舞的宣传教育。并提出,对现有黄色音乐唱片、歌片,应该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取缔,不让它们继续放毒。

3 月 28 日～4 月 16 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会议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做到每个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都有一种适用的文字。在此以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机构已帮助 12 个民族(壮、布衣、苗、彝、黎、纳西、傈僳、景颇、哈尼、拉祜、佧佤、傣族)设计了 18 种文字方案。

4 月 1 日　我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开放。这座博物馆建立在陕西西安附近半坡村的一座距今约 5000 年以前的村落遗址上。

4 月 4 日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提出,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其他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归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根据这个意见,7 月 20 日教育部提出:在现有的 227 所高等学校中,这次下放 60 所;在现有的 1321 所中等专业学校中,这次下放 143 所。要求 8 月 15 日前全部交接完毕。

4 月 7 日　我国举重运动健将黄强辉以 155 公斤的成绩打破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1 月 29 日,他又以挺举 158 公斤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

5 月 23 日　文化部在《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中要求各制片厂,努力摄制能够反映这个伟大时代,适应这一形势要求的影片,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大力争取完成并且超过各厂生产计划的第二本帐。艺术片的题材,必须尽量反映大跃进的情况,将当前涌现的新人新事迅速拍摄成艺术片,或艺术性的纪录片、或一般性的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增加反映工农业跃进题材的比重。

5 月 30 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即：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两种教育制度；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同时推行。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互相补充。

6月28日　上海广慈医院抢救一位被铁水烫伤面积达89.3%的炼钢工人丘财康成功。据外国医学文献记载，人体的皮肤烫伤面积如超过70%，就很难救治。丘财康的起死回生，首创医学史上的奇迹。

8月20日　中央科学小组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向中央写出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认为苦战三年，就可以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提前五年，即1962年，就完成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9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指示》规定了教育事业"大跃进"的目标：全国用3至5年时间，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都有中学；用15年左右时间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

9月26日　我国运动员陈镜开以140.5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27日，我国跳伞运动员赫建华、耿桂芳、崔秀荣以9.817米的成绩，打破女子1000米集体定点跳伞14.84米的世界纪录。

9月30日　我国举重选手赵庆奎以176.5公斤的成绩，创造了世界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1月30日，赵庆奎又以177.5公斤的成绩刷新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

11月5日　我国女子跳伞运动员李淑花、崔秀英、李淑慧在600米集体联合跳伞中，以12.39米的成绩，打破了21米的世界纪录。

12月22日　毛泽东在《致陆定一》的信中，建议将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刊登的、反映北京一个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12月30日　我国游泳运动员穆祥雄以1分11秒4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59年

导　言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一年。首先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在短期内迅速地平定了叛乱。其次是纠"左"的中断和"反右倾"斗争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2月1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并继续纠正"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此后于4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都继续贯彻执行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方针。但是7月2日至8月16日的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接着，一场"反右倾"的运动迅速展开。其结果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同志，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更长时间，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严重困难。

在"左"倾错误严重干扰下，我国人民在经济建设、文化、体育等各方面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
- ●庐山会议
- ●“反右倾”运动

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

背景介绍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入藏后八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采取放慢民主改革的步骤和耐心等待的方针，坚持和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欢迎。然而，西藏地方集团和上层反动集团，却不顾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的武装叛乱。武装叛军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拉萨的机关。17 日，达赖喇嘛等人潜往印度。19 日夜，反动集团指挥藏军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 3 月 20 日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开始了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作战。3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人民解放军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经过两天多的战斗，迅速摧毁了叛乱集团在拉萨、山南地区的两个指挥中心，接着又迅速消灭了流窜在西藏其他一些地方的残余叛匪，进驻边境国防要点，控制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广大地区。到 1959 年 11 月，叛乱集团的主要力量被歼灭，武装叛乱基本平息。在平叛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毙、伤、俘叛匪 93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械 35500 余支，各种炮 70 余门，电台 41 部，并击毙、俘获空降特务 25 名。

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梦想，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妄图搞“西藏独立”的阴谋，极大地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促进了西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

材料：

- ·解放军已迅速平定拉萨叛乱
- ·我军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
- ·“康巴叛乱”的真相
- ·西藏平叛纪实

材料一　解放军已迅速平定拉萨叛乱

新华社 28 日讯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 3 月 19 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 22 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一些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3 月 28 日发布命令，除了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叛乱集团 3 月 10 日劫持达赖喇嘛，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包围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拉萨机关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的武装叛乱，3 月 10 日就开始了。达赖喇嘛原定在 3 月 10 日到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礼堂看戏。到军区礼堂看戏的事，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3 月 10 日这个日期，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西藏叛乱集团到了这一天，却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且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

叛国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一直蓄谋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准备武装叛变

西藏叛国分子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这些叛乱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自从 1951 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以来，他们就蓄谋撕毁这一协议，准备武装叛变。由于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政策正确，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纪律严明，受到西藏各界人民热烈爱戴，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阴谋在藏族人民中得不到支持。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这是西藏人民所热烈欢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已于 1956 年 4 月成立。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中央为了等待这些反对分子的觉悟，还在 1956 年底，就告诉他们，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

西藏地方政府六个委员，有两个是爱国分子，其余四人已公开叛变。他们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

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为噶厦，委员六人，称为噶伦。在六个噶伦中，两个是爱国分子，即阿沛·阿旺晋美和在 3 月 10 日被叛匪打伤的桑颇·才旺仁增。其余四人中，宇妥·扎西顿珠已在 1957 年叛离祖国，逃往叛乱分子在国外活动中心的噶伦堡；另三人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在这次也已经公开叛变，在这以前，这些叛国分子即已利用他们在噶厦中的合法地位，纠集上层反动势力，勾结外敌，实际指挥康藏两地一些最反动的大农奴主，在雅鲁藏布江以东、以北、以南若干地方，组织叛乱武装，反对中央，背叛祖国。他们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叛乱的指挥中心的噶伦堡，其领袖为被撤职的前任藏王（藏语称为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他们的武器，不少是从外国输入的。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叛乱根据地，就有多次接受蒋介石匪帮的空投接济，还设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遣的许多特务电台，进行阴谋活动。

反动集团把中央对西藏地方政府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在 3 月 19 日竟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从去年 5、6 月间起，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就指示叛匪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并且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得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因此，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他们在拉萨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武力以后，终于在 3 月 10 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

在 3 月 10 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中央代表在复信中欢迎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同时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负责平息叛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不但毫不悔改，还决心扩大叛乱。他们在 3 月 17 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并且在 3 月 19 日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决的希望消灭了。西藏反动势力最后选定了使他们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解放军奉命讨伐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经过两天多战斗，已彻底粉碎拉萨叛匪，俘获叛军四千多人

3 月 20 日上午 10 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进行讨伐。人民解放军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据初步统计，截至 23 日止，已俘获了叛军四千余名，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一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

西藏人民是爱国的。西藏已有一个坚决要求解放的劳动阶级和很大一部分赞成改革的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间派人士

拉萨叛乱的迅速平定，说明西藏叛国集团必然灭亡，西藏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首先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国分子。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人，而叛匪只有两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因为被欺骗裹胁而参加的，并且还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过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西藏人民绝大多数是极端贫苦的农民和牧民，他们迫切地希望从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西藏上层和中层也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他们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并且主张民主地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

度，使西藏逐步地变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地方。这样，西藏已有一个坚决要求解放的劳动阶级，和很大一部分赞成改革的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间派人士。目前的任务，首先是平息叛乱，建立和平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对于叛乱分子的方针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中央已指示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广泛团结一切没有参加叛乱的藏族同胞，负责保护西藏农牧工商政教各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对于俘虏和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许报复、伤害和侮辱。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3月23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3月23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鉴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尚被劫持，国务院决定在达赖喇嘛被劫期间，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并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阿沛并兼任秘书长。在西藏各地，一俟秩序恢复，都将陆续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并开始执行自治职权。在目前时期，自治制度与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制度同时并行。随着叛乱的平息，和平秩序的建立，自治制度将逐步完全代替军管制度。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把西藏的形势完全估计错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原载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我军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

新华社拉萨23日电　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罪大恶极的西藏叛国集团进行讨伐，继彻底平息拉萨地区叛乱之后，又在山南地区获得了很大胜利。我军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匪盘踞的巢穴。我军已控制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在迅速平定拉萨叛乱之后，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分东、西、中三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对喘息未定的叛匪展开扫荡。叛匪在我各路大军追剿之下，一触即溃，狼狈逃窜。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我军先后攻占了雅鲁藏布江以南、江孜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则拉宗以西的仁本宗、拉加里、乃东宗、泽当、颇章溪卡、琼结宗、札期、札囊、哲古宗、达马宗、拉康宗、生格宗、多宗、隆子宗、加玉宗、觉拉溪卡、贡戛宗、错拉宗、浪卡子宗、岭溪、白地宗、打隆宗、杰得秀、拉绥溪、古如郎杰宗、郎宗、金东宗、下江、下洛、克宗等三十多个宗（溪）和广大村庄，并分别粉碎了盘踞在各地的叛乱武装，毙伤俘敌近二千人。截至21日晨止，我军已进占平山口、卡达等地。至此，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的所有边境要点已全部在我军控制之下。叛匪在我沉重打击之下，土崩瓦解，除被歼灭者外，许多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向人民解放军缴交武器回家生产，一部分叛乱分子逃往印度。现在只有少数残匪窜入偏僻山区。我军正在当地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乘胜追剿零散叛匪，不日即可肃清。

人民解放军平叛大军在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迅速在山南各地普遍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摧毁了长期残害当地人民的反动政权，并对遭受叛匪残害的当地人民进行了救济。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完全站在解放军这一边，热

烈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大军一到，他们就像遇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愤怒地向解放军控诉叛匪的滔天罪行，要求解放军为他们报仇。当他们看到反动政权长期残酷杀害藏族人民的印鉴、军队和法鞭被取缔的时候，更是欢欣若狂，藏民们都说：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指反动政权的印、军队和法鞭）被推翻了，从此我们翻身了。藏民们纷纷焚香顶礼，欢庆新生，同声感激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救命恩人。

人民解放军在平叛战斗中，纪律严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大军过处，秋毫无犯。解放军官兵在进军途中热情帮助群众春耕、治伤治病的行动，已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山南地区广大僧俗爱国人民也以各种实际行动积极支援解放军讨平叛乱。他们热情地烧咸茶给解放军喝，让房屋给解放军住，自动地为解放军踏雪引路，追歼残匪。长期遭受叛匪蹂躏的雅鲁藏布江沿岸的贡戛、泽当、乃东、杰得秀、札期等宗溪的藏族农民，还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抢修被叛匪破坏的公路和桥梁，为解放军整修前进的道路。许多藏族人民并且自动地赶着牦牛和骡马为人民解放军运送粮食和物资。他们坚决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西藏的新生，为了永远过幸福的生活，一定要彻底肃清叛乱分子，解放军到哪里，就坚决支援到哪里。

山南地区位于拉萨东南，在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是我国和印度、不丹接壤的边境地区。长期以来，以恩珠仓・公布扎西、甲马仓、三多仓为首的叛乱分子，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行背叛祖国的叛乱活动。他们不断接受从外国输入的武器和不明国籍的外国飞机的空投接济，进行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在拉萨叛乱中，恩珠仓・公布扎西股匪也是主力之一。目前，这股叛匪已被人民解放军迅速粉碎。这对于加速平息西藏地区的叛乱，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载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康巴叛乱”的真相

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举出了“康巴叛乱”这一事实，企图证明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是，恰好从这一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解放以来，谁在处心积虑地破坏着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谁是破坏十七条协议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所谓“康巴叛乱”（康巴是藏语，指康藏高原东部、四川甘孜一带藏族地区）是这个地区的少数反动的奴隶主、封建主为了保持他们黑暗的统治，而胁迫部分群众挑起的。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严重地危害了当地藏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这些灭绝人性的叛乱分子，正是听命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

“康巴叛乱”的指挥者是谁？

现在已经获得的许多事实证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是这次反革命叛乱的指挥者。

1955年夏天，西藏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赤江・罗桑益西等随达赖喇嘛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经四川时，索康・旺清格勒和赤江・罗桑益西即分两路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北南两部，沿途煽动和指使叛乱。索康经康定、甘孜、德格等地，赤江从南路经乡城、稻城、理塘等地，最后在昌都会合。根据现有材料证实，当时索康等曾对上述地区反动分子指示说：“你们内部要好好团结，世界上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矛盾，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和阻挠民主改革。阻挠不成，就组织武装叛乱。要叛乱，必须与外国取得联系，才能达到藏族独立的目的。”他们并且要求今后加强联系，如果有困难，他们可以给予帮助。在这以后，这些地区就先后发起叛乱，而赤江住过的理塘喇嘛寺和索康住过的甘孜大金寺，都成为首先发起叛乱的寺庙和叛乱的中心。

叛乱在理塘地区发动后，曾经蔓延到甘孜自治州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康巴叛乱分子通过各种方式，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首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断派人前来指挥叛乱。如1956年，他们就派人参加原西康南部地区叛乱匪首在义敦县喇嘛寺举行的会议，指使叛匪坚持下去，全面反抗，成立叛乱组织，并与西藏叛乱组织统一名称。他们说：“你们不是孤立的，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你们死也不能投降！”他们还要求叛匪每月向西藏地方政府汇报一次，并派最熟悉情况的人进藏联系。这次会议研究了叛匪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叛匪间相互支援、以及加强武装叛乱等问题；并通过了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一封信。此外，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经常以讲经说法为名，派人到处煽动叛乱。有些地方“讲经者”一走，叛乱就立即开始。

其次，康巴叛乱分子不断假借朝佛、经商名义，派人进藏向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汇报叛乱情况，接受他们的指示。仅据原康南地区叛乱头目、“五路民团总指挥”定雍阿称自己供认，就先后派十来人进藏汇报，带回信件、指示。在有一次带回的信件中，西藏叛国分子指示他们：“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外国将有帮助”。

第三，西藏叛国分子经常以骡帮、商队作掩护，运来大批枪支、弹药等武器、物资，偷渡金沙江，援助康巴叛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缴获的武器中，还有不少是外国制造的。

最后，康巴叛乱分子还把财产、人员等大批运往西藏，交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保管。叛乱失败后，许多叛乱头目纷纷向西藏逃跑，西藏反动集团将他们收留起来，重新

加以武装，让他们继续进行各种非法活动。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康巴叛乱分子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经由这个反动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做着各种美梦，自以为得计，妄想把叛乱的火越烧越大，达到他们"驱汉独立"的反动目的。

叛乱分子的滔天罪行

叛乱期间，这一小撮无恶不作的康巴叛乱分子，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到处流窜、奸淫烧杀，给金沙江以东、康藏高原东部的藏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不仅破坏道路桥梁，包围机关，杀害藏、汉族干部，就是普通的藏族人民也逃不脱他们的毒手。在叛乱分子劫掠下，不少富饶的山村变成了废墟，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叛乱分子为了壮大声势，不惜采取一切极端残酷的手段，强迫群众参加叛乱。白玉县的叛首四郎刀登，在绒盖乡等地，为了威逼群众参加叛乱，首先放火烧毁了藏民的房舍，劫走了财物，把坚决不愿参加的人剥皮、挖心，一刀一刀的凌迟处死。这群叛乱分子把群众威逼上山以后，规定谁投降立即枪杀全家。有一百多个年老体弱的农民活活在山上饿死。有些老人走不快，就被叛乱分子吊死在山上。有的逃跑不遂，被叛乱分子捉回来切成碎块、砍为肉泥，抛在野外。有些村庄的农民，在叛乱分子来到前，虽都跑到山林里躲藏起来，仍然不能幸免于难，房屋被烧光，财物被抢光。叛乱分子袭击康定县菩萨绒乡时，一个瞎子没有来得及躲掉，结果衣服被剥得精光，冻死在野外。

叛乱分子杀人害人的手段，其残酷程序令人难以置信，据新龙县部分乡的统计，被叛乱分子挖眼睛、割鼻子、抽脚筋的就有一百三十八人之多，用剥皮、割心、下油锅等刑法处死的有一百二十人。日巴乡的反动分子，把一个藏族妇女的头发一根根地拔光，当时满头鲜血，惨不忍睹，理塘喇嘛寺一个叛乱头子，对寺庙劳动人民出身的喇嘛不发口粮，企图活活饿死他们。一个喇嘛出来反对，反动分子便割去他的嘴唇、砍掉他的双手，还把他的手臂放在滚开的酥油里煮。叛乱分子到处对人宣传说："杀死一个干部，胜念万卷经；打死一个积极分子，如修一座经塔。"他们就是这样，打着宗教幌子来大搞杀人放火的勾当。

最近，甘孜县举行了一次叛乱分子的罪证展览会，会上展出的罪证，无不惊心怵目，令人发指。这里展出了一张完整的人皮，是甘孜县城区的叛乱分子从一个藏族小孩身上剥下来的，人们看见这张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人皮，都悲愤欲绝。这里还有一颗人心，也是叛乱分子亲手挖出来的。在一个叛乱分子家里，还搜出了盛满鲜血的头骨。走进这个展览会，人们真是很难相信这些行为是人干出来的。这些血迹斑斑的事件，只是叛乱分子罪行的点点滴滴，在这片辽阔的高原山区，几乎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都有叛乱分子欠下的一笔血债。

叛乱平息以后

康巴叛乱分子的血腥罪行，并没有吓倒当地善良的藏族人民。他们纷纷起来反抗，配合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短期内就彻底平息了叛乱，开始重建幸福的家园。

现在，民主改革已经在这里胜利完成。广大的贫苦藏族人民分得了土地、房屋和牛羊，有的地区实现了合作化并建立了第一批人民公社。去年，全州农业区粮食生产获得空前丰收。普遍增产30％－40％，有的县增产达一倍。在过去被叛乱分子盘踞的地区，人民都开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原载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西藏平叛纪实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对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叛乱。这是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打着宗教、民族的旗帜，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背叛祖国，妄图永远维护其封建农奴制度而掀起的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军在西藏广大人民的要求下奉命平叛，经过了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平息西藏叛乱的任务，为西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西藏叛乱发生经过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绝非出于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10月24日，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达赖喇嘛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的墨迹未干，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即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出面，反对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独立"。这些人到处寻衅滋事，在大街上唾骂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枪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军区第一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他们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卖粮给进藏人员，妄图乘我补给困难之机，把解放军饿跑。尤为甚者，他们竟向拉萨调集藏军，阴谋发动武装暴乱，把解放军赶走。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在作了相应的防卫准备后，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大局出发，三次致函达赖喇嘛，并冒被"扣留"之险，亲自前往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指责少数分

裂主义分子和伪人民会议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破坏协议、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罪行，敦促达赖喇嘛责成噶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严正要求和伪人民会议分子破坏协议、破坏团结、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行分裂祖国的大量事实面前，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明令予以取缔。达赖也宣布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但后来，伪人民会议名亡实存，一直得到西藏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也受到保护和优待，他们继续进行着破坏协议、分裂祖国、反对西藏人民的活动。1955年夏天，他们支持的伪人民会议分子又蠢动起来。当达赖等人从北京开完全国人大会议返回西藏时，阿乐群则等伪人民会议的代表人物到康定、雅安迎接，并上书达赖，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名誉，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他们在理塘召集康南（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地区的反动头人20余人聚会，确定：在康区（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采取"武"的一手，组织武装"起义"；在拉萨采取"文"的一手，同共产党搞政治斗争，争取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独立"，两手配合，互相支持。他们派人常驻康定，利用邮电局电台，通过暗语，与康区反动头人保持联络，进行指挥。接着，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来和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在随达赖返藏途中，在康定新都桥分南、北两路，沿途进行破坏祖国团结统一、策划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他们对被接见的土司、头人、上层喇嘛、活佛说："你们内部要好好团结，世界上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矛盾，我们要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和阻挠民主改革，阻挠不成就组织武装起义。要起义必须与外国取得联系，才能达到藏族独立的目的。"并要求他们今后多联系，如有困难，西藏噶厦可给予帮助。1956年春，阿乐群则在拉萨即通过邮电局电台向康区发出正式进行武装叛乱的信号。赤江、阿乐群则等人住过的理塘寺和索康等人住过的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分割、包围袭击地方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者达数百人。该两地成为康区南北地区叛乱的中心。在康区发生武装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则通过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派人与叛乱武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派人参加康区叛首会议，派骡帮以商队的名义向叛乱分子运输武器弹药，康区叛乱武装也经常派人以朝圣、念经和行商之名到拉萨向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汇报。康南叛首丁雍阿臣被俘后供称，他曾先后派10余人到拉萨汇报，有一次得到的指示是："迅速扩大武装，外国将有帮助"。据青海玉树地区叛乱头子供称，从1957年2月开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在到拉萨"朝佛"的青海藏族地区上、中层人士中策划叛乱，这些人士中的某些人还到了印度噶伦堡。与此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又借"学经"为名，派大批喇嘛到青、甘藏族地区煽动、指挥叛乱。在甘南甘德县日乎寺就缴获有所谓"大藏族独立国"的文件。1958年1月，玉树扎武百户仁庆才仁从西藏给扎西才旺多吉、索昂则莫等人去信说："达赖指示不要走合作化。政府一定叫你们走，你们就组织人马打。赶走共产党，才能宗教信仰自由，才能保住千百户及活佛的地位。你们不要怕共产党，我支持你们打共产党。我们的后面有印度、美国支持。你们打不过，来西藏。"接到信后，扎西才旺多吉、索昂则莫、蔡作祯、白马丹增4人当即密定，攻打政府，占领县城，并确定了攻打各县的指挥人员，拟定了"赶走共产党，成立新政府"的人选。大量的证据证明，康、青等藏族聚居地区的武装叛乱是西藏上层集团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一手策动的。策动邻区藏族地区的武装叛乱是他们在西藏发动全区武装叛乱、妄图实现"大西藏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1956年4月22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在会上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达赖喇嘛，并致贺词。筹备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在委员会全部51名委员中，除5名共产党员委员外，其余46名委员都是藏族，达赖喇嘛还担任主任委员。但就是这样，也为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所不容，他们竭力予以反对。在召开成立大会期间，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对昌都地区江达宗（县）解放委员会主任、江达地区头人齐美公布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康区的武装叛乱）。还说："这是达赖的指令"。齐美公布返江达不久，即随德格小土司乌嗄及其管家俄马日郎上山叛乱，与邻区窜入的叛乱分子纠合一起，在川藏公路岗拖至妥坝段抢劫骚扰。到8月底，该段公路21个道班被抢劫一空，仅8、9两个月，叛乱分子对来往汽车伏击两次，袭击1次，部队和地方人员伤亡22人（内亡8人）。11月，叛乱又扩大到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地区。曾于1955年护送过赤江·洛桑益西的宁静宗解放委员会主任、头人普巴本·泽旺多吉率60余人，于11月25日突然袭击守卫澜沧江竹卡溜索的解放军分队，副连长以下25人全部惨遭杀害。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党委鉴于昌都地区发生的局部叛乱已有为数不少的藏族群众被裹胁进去，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坚定不移地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上采取自卫的原则来解决昌都地区的叛乱问题。

1956年11月间，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纪念活动。是否应邀前往，中央指示由达赖、班禅自行决定，体现了中央对他们的充分信任。达赖一到印度，就被西藏的内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所包围，而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引诱、拉拢，各方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向达赖施

加影响，企图挟持达赖在国外领导分裂祖国的活动，同时在拉萨等地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及其随行的一些主要官员思想也发生动摇，对返回祖国迟迟不决，经周恩来总理多次教育、规劝后才于1957年4月返回拉萨。

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了的。其中第11条指出："有关西藏的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西藏社会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农奴制度，政治、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西藏人民长期陷于穷困落后的深渊，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不进行社会改革，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西藏的生产建设就无从谈起，人民就永远得不到翻身。但考虑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中央对于在西藏的改革问题，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并确定在将来的改革中，坚持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即仿照内地城市对民族资本家那样的作法，国家赎买三大领主的生产资料分给农民，并对这些贵族、官员、活佛、喇嘛在政治上给予安排，政府把他们包下来，生活上不因改革而降低，并将逐步得到提高。在改革的方法上，由达赖喇嘛决定，由西藏人民自己去改革。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进行，而决不能够由别的民族去代替进行，也不能由中央下命令来改革。在改革的时机上，考虑到一部分上层人士"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待后年执行"，采取等待的方针。中央的上述方针、政策早就反复多次地向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上层代表人物开诚布公地讲清了。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期间，一部分上、中层人士对邻区藏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抱疑虑态度，表现恐惧和不安，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副总理及西藏工委的主要领导在发言中就西藏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时机、方法等也作了进一步阐述。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8月18日复达赖喇嘛的信中再次肯定了上述方针政策。毛主席在信中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9月4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藏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不谈改革，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再看情况实行。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于同年12月29日、30日，1957年1月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3次和达赖谈话，恳切地告诉他：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产生的前后经过。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向全国全世界作了宣布。根据党的"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1957年3月决定，大量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工委系统的地方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这些人都撤回了内地。留驻西藏的少数人员，只在拉萨、日喀则、噶尔昆沙、林芝、泽当、黑河等城镇及其附近的不到20个地方设点驻守。"六年不改"和西藏工作的收缩方针的决定，表明中央是严格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的，它得到了西藏广大上、中层人士特别是得到爱国进步的上、中层人士的一致拥护，他们更加信任中央，心向祖国。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认为6年之后仍然要改革，其农奴制度迟早也要覆灭，他们叫嚣要"永远不改"，从而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同时加快策划武装叛乱的步伐。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流窜到西藏的以恩珠·公布扎西、夏格·郎加多吉、甲马·桑培等为首的康区叛乱头子，于1957年5月在拉萨组成了"曲细岗珠"反动组织，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即"大西藏国"所要揽括的地方。该组织一成立，即以向达赖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在召开捐献活动的筹备会议时，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出席了他们的会议。7月4日，"曲细岗珠"向达赖正式献"金宝座"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噶厦以达赖名义向参加仪式的藏、川、滇、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的组织成员回送了礼品。尔后他们又向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地区。接着，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他们成立武装并不断扩大其力量，炮制了"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革命纲领和口号。1957年，西藏噶厦大幅度地调整区划、机构及其领导人员，委任了一批分裂主义分子担任宗本（县长）、基巧（相当专员）等职务，以强化其反动统治。又经过一段串联、酝酿活动后，在1958年4月20日，由邻省窜入拉萨的近5000名叛乱武装的头目及藏军，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曲细岗珠"组织之内，并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各自承担了将来叛乱时所担负的任务。6月15日，恩珠·公布扎西等带两名藏籍美特和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根据地"。24日召开有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卫教军"，由恩珠·公布扎西任司令，夏格·郎加多吉、甲马·桑培等任副司令。"卫教军"一成立，就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空投、陆运武器弹药等物资援助。西藏噶厦更是全力给予支持。早在3月他们就给各宗（县）、（区）寺庙下令要大力支持"曲细岗珠"组织，积极为叛乱分子筹备粮秣。噶厦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向叛乱分子发放粮

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叛乱武装则有恃无恐，气焰嚣张。7 月 21 日，在拉萨以东仅 80 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 1 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接着，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车辆，使副团长殷春和、营长杜效模、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军政人员 10 人被杀害，22 人致残，汽车被焚毁和破坏 10 余辆，并劫走我大量武器弹药。到 1959 年初，武装叛乱活动加剧升级，愈演愈烈。叛乱分子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各地解放军和党政机关。泽当中共山南分工委、扎木中心县委、丁青县委和驻这些地方的解放军先后被叛乱分子围攻，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两次共 77 天，丁青县委被围攻 90 余天。叛乱分子所到之处，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残害僧俗人民和爱国进步人士，无恶不作。墨竹工卡有 84 户群众被叛乱分子抢劫一空，连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被抢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及其管家叛乱后，不顾众僧反对，抢走寺内金银珠宝，焚毁经书，捣毁佛像；山南凯松溪卡，一个仅有 50 户农奴的村庄，“卫教军”在村里设了一个粮食站，家家被洗劫，妇女被奸污，从 10 来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无一幸免，这个村庄被蹂躏达 10 个月之久。乃东县群众平措反对叛乱，被“卫教军”挖心致死；那曲地区牧民白达向解放军报告过情况，被叛乱分子挖掉了双眼。叛乱分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对于从 1958 年 7 月开始的在噶厦管辖区由噶厦直接策划、支持而发动的局部叛乱，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指出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认真担负起制止叛乱进而平息叛乱的责任。并告诫他们，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实行武装平息叛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提高警惕，加强防御，坚持“保点、保线、自卫”，坚持不先打第一枪的原则。根据中央的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采取了必要的防卫措施，驻拉萨和各地的党政机关与企事业等单位成立了民兵，分别编成团、营、连、排战斗组织，配备必要的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草、饮水，准备必要时就地进行自卫。只是在威胁到交通和驻地安全时，才采取必要的自卫性的有限的反围攻或出击的军事行动。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曾去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通报了帝国主义特务、邻区窜入西藏的叛乱分子，勾结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要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的情况，重申了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和叛乱的既定方针。指出噶厦对叛乱分子采取纵容、支持的立场是错误的，请达赖责令噶厦转变态度。但是，西藏噶厦对中央的忠告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支持叛乱活动。他们开始从藏军中选派号兵、机枪手去山南帮助训练“卫教军”，10 月以后，又准许藏军的官兵携械去参加叛乱武装。一开始第二代本即去了 200 人，其它各代本有 20 至 50 人陆续去山南参加叛乱，到年底发展到整排、整连集体去参叛。11 月 2 日，达赖曾召集全体噶伦、孜仲、马基（即藏军司令）及三大寺的堪布、堪苏（即卸职的堪布）开会，“希望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担负起平叛的责任”。11 月 5 日，噶厦召开全体官员会议，名为传达讨论达赖的指示，实际开成了一次反对中央、准备叛乱的会议。继后，在 12 月 20 日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主持召开的“官员代表会议上”，公开反对达赖去北京出席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分裂主义分子叫嚣：“为了宗教和民族要与中央战斗到底”，藏军代表发誓：要为维护西藏农奴制度而牺牲。会议还决定“要把达赖喇嘛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和他们战斗”。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准备发动全区性武装叛乱的动员大会。到 1959 年初传昭期间，西藏噶厦又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他们指使藏军在大街上绑架青藏公路管理局两名汉族工人，由达赖的姐夫一代本（即达赖的警卫代本）彭措扎西进行非法审讯，随即捏造出离奇的谣言：“汉人行刺达赖，凶手当场抓获”。传昭的最后一天，按例达赖应出席讲经，但被取消了，并造出谣言：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关枪，正对讲经台，要谋害达赖。藏军还企图去贸易公司搜查，蓄意制造紧张局势。在传昭期间，分裂主义分子还散发大量传单，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叫嚣“西藏独立”，加紧制造叛乱的舆论准备。

2 月 7 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邀请前往布达拉宫观看“跳神”（又称“送鬼节”，一种宗教仪式）活动，达赖与邓少东、郭锡兰进行了交谈。达赖希望看军区文工团演出，邓少东、郭锡兰表示衷心欢迎。当天邓少东即把达赖要看文工团演出的意愿通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旺清格来等噶伦及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对达赖要看文工团演出这件事十分重视，做了充分准备。3 月 1 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面见达赖，请其确定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达赖说：现在传昭完了，“格西”（宗教最高学位）也考完了，看演出的时间大体确定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即公历 3 月 10 日、11 日或 12 日），具体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3 月 5 日统战部副部长梁洪会见洛桑仁增，商量达赖看演出的时间并将拟就的一个邀请陪同看演出的人员名单交给他，他表示同意这个名单，具体日期请示达赖后再告。3 月 8 日噶章·洛桑仁增电话通知统战部：达赖定于藏历 2 月 1 日（即 3 月 10 日）到军区礼堂看演出。3 月 9 日统战部一位处长将接待计划交给噶章·洛桑仁增，他表示同意，当即发出请帖。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利用达赖将到军区看文艺演出之机，加紧发动叛乱，公开叛国。9日夜间，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墨本(市长)洛卡娃·泽旺仁增向一些市民宣称：达赖喇嘛明天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奉噶厦命令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看戏。3月10日晨，西藏噶厦的警察代本(即第二代本)俊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一起荷枪实弹，穿梭奔驰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11时许，商店纷纷关门，抢贮饮水。"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谣言传遍全市。12时左右，昌都堪穷(仅次于堪布职务的僧官)、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去晋见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大门口，被叛乱分子用石块砸死。接着，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汽车去罗布林卡，临近大门时，遭到叛乱分子的石块袭击，车窗被砸坏，桑颇头部被砸伤，司机迅速驾车离开现场，方幸免于难。下午3时左右，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索朗降措遗体系于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两公里，惨不忍睹。同时，叛乱分子纠集1000余人在市区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反动口号，沿途张贴"西藏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等反动标语，撕毁墙壁上的宣传画，捣毁交通指挥亭，抛掷石块，打砸机关、百货公司门窗，向执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投石块，恣意寻衅。就在此时，噶伦索康、柳霞、夏苏3人到西藏军区会见中央驻藏代理代表、军区政委谭冠三，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事态发展到使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谭冠三政委当即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并经过1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是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谭冠三最后要噶厦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今天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抚恤、慰问死伤者，妥当处理善后事宜。索康返回罗布林卡后，立即召开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与会者100多人，索康开始就造谣煽动说：军区请达赖喇嘛看戏，没有通知噶厦是不对的，所以达赖喇嘛不能去。当天的会议决定：从那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并决定，由索康·旺清格来、噶章·洛桑仁增、雪苦巴、大惹·多阿塔青、凯墨·索安旺堆和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18时左右，叛乱集团派堪穷喇嘛拉、仁希(即四品官之意)沙龙等12名所谓"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蔡伯尔竟然接见了西藏叛乱分子，并表示要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黄昏时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命令三大寺的1400多名喇嘛和分散潜伏在拉萨周围的武装叛乱分子利用夜暗向市区集结，并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一部分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控制之下。

3月10日以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活动继续发展，局势日趋恶化。11日叛乱集团召开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准备作战；三大寺立即组织"先锋队"；凡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即日前来登记悔过，否则必将严惩。并派人星夜分赴工布、彭波、江孜、山南、曲水等地送噶厦命令，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当天，又派人去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声明西藏已"独立"。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的"雪"(地名)印经厂，召开"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除僧俗官员"代表"外，还有近千名武装叛乱分子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推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即堪布秘书)土登降秋、孜本雪苦巴、孜本凯墨巴5人为"人民会议"领导；调整"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组织，任命拉鲁·次旺多吉为总司令。13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溪发布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定将依法惩处"。16日、17日，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两封，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幸福事业会"及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以设法谋求他们的支持。上层反动集团在大力策划组织叛乱的同时也积极作出逃准备。噶伦柳霞等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及金砖金币，征集骡马、鞍具，并向罗布林卡集结。16日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其北面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至17日除继续向该站射击外，又向油库射击。该站民兵未经请示向叛乱武装还击"六〇"迫击炮弹两发，落在罗布林卡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就是后来西藏叛乱集团和国外反动派制造的所谓"中国人的两发炮弹落入罗布林卡池塘里"谣言的真相。他们歪曲事实，对我进行诬蔑攻击，说什么就是这两发炮弹，把达赖吓走的。17日夜，达赖和索康、柳霞、夏苏3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藏军等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足以表明他们的出逃是有组织、有预谋的。3月18日在罗布林卡召开了"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会上宣读的达赖

17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各司令转全体人民的一封信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汉藏团结已处于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并使佛教、政治不致受损，我本人和负责政治的僚属们不得不暂时出走……云云。3月26日，达赖一行逃抵隆子宗，召开群众大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代表达赖宣布西藏已“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并决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任命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前为代理司伦），还以“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名义向各宗溪发布命令，要求僧俗人民遵守“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斗争。达赖一行经错拉、沙则（兼则马尼）、仲昆桥，于3月31日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至达旺迎接，给予“贵宾礼遇”。4月18日，他们抵达印度提斯普尔后，即由印度外交部官员向记者散发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竭尽歪曲造谣之能事，谈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叛乱的经过，并说什么中国把“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声明谎话连篇，漏洞百出。世界舆论当即指出，从声明的内容、形式、使用的文字及某些观念和文体看来，是由别人精心编造，强加给达赖的。4月22日达赖一行抵达印度穆索里后，再次以达赖名义发表声明称，4月18日在提斯普尔的声明，是在达赖授意下发表的，表达了达赖的看法，真是欲盖弥彰。此后，达赖集团在印度继续进行背叛祖国、反对西藏人民的活动。1960年7月，他们在印度的达拉姆萨拉召开所谓“首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并将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在后来每年的这一天，达赖集团都要进行纪念和发表声明，进行坚持“西藏独立”、反对祖国的种种活动。中央对达赖一向是仁至义尽的，拉萨叛乱发生后，中央仍竭尽全力予以争取，达赖在出逃拉萨前也曾先后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写了3封信。在3月11日的第1封信中说，反动分子正在借口保护他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他的活动。对此他正设法平息。在3月12日的第2封信中，再次说明反动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制造的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他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达赖还说他已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他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就在3月16日，达赖出逃拉萨前1天给谭冠三的第3封信中，达赖还说，他已经向噶厦官员进行了教育，并表示几天之后，设法到军区。鉴于上述信件内容，在达赖出逃拉萨后，中央即指示西藏工委“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集团挟持达赖”，对达赖是留有余地的，并且长期地给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达赖逃往国外后，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否认他是被劫持的。达赖说：“我从拉萨起程时，是按照我的意愿出发的，而且也是由我决定的，而不是由我的仆从们带走的。”达赖说给谭冠三的信是出于“缓和双方愤怒的情绪”，“消除没有武器之我的人民与汉人军队一触即发的危险”，“使拉萨人民得以在和缓中生存”。达赖说，这就是写信时的“真实想法”。根据上述情况，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会议作出撤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职务的决定。

达赖出逃后，留在拉萨的叛乱集团加紧军事准备，他们打开布达拉宫军械库向叛乱分子配发武器弹药；抢占要地；破坏拉萨通外的公路桥梁，破坏通讯设施，烧毁民房。至3月19日，聚集在拉萨之敌已达7000人左右。叛乱分子控制了罗布林卡、药王山、布达拉宫和市区的大昭寺、小昭寺等坚固建筑，对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形成分割包围态势。3月20日凌晨3点40分，盘踞于罗布林卡南侧之叛乱武装首先向我在拉萨河南岸执行任务的分队开枪射击，随后在市内和郊区向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罗布林卡北侧之叛乱武装数百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连续3次冲击，被我由80余名职工组成的民兵连击退；盘踞在市区北侧小昭寺及其附近的叛乱武装，集中1000余人向建筑工程处发起攻击，并一度攻入院内，被该处民兵打退。继后，叛乱武装攻击中共西藏工委机关，炮袭西藏军区司令部。

经过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长期酝酿、长期策划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终于爆发了。

依靠政策，依靠群众，平息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掀起的武装叛乱，遭到了包括爱国上层贵族、官员、活佛喇嘛在内的西藏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3月20日10时，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向围攻党政军机关的叛乱武装进行反击，经过两昼夜激烈战斗，于22日拂晓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这一胜利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西藏全区性叛乱失去指挥中心，不仅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也是给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拉萨反击叛乱武装的同时，驻藏部队迅速解除了日喀则、亚东、江孜、协噶尔、定日、黑河、噶尔昆沙各地藏军的武装，接管了这些地方的反动政权，使西藏的重镇完全置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迅速增调部队进入西藏，与原驻藏部队团结一致，共同担负平息西藏叛乱的任务。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决平息西藏叛乱，彻底解放西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粉碎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一切阴谋”的指示，同时为了避免叛乱大幅度地反复，加速平叛斗争的进程，确定在平叛斗争中采取“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在平叛斗争的行动上又采取了“先平息叛乱的中心地区，后一般地区；先边沿，后腹心地区；先公路沿线，后偏远地区；以及先农区后

牧区”等步骤。当拉萨反击战一结束，新入藏的部队陆续进入拉萨、昌都等地后，西藏军区即于 4 月初挥师南下，对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一举荡平了叛乱武装的老巢，解放了被叛乱分子长期蹂躏的山南地区广大人民，截断了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从陆地上资助叛乱武装的主要通道。7 月初、8 月底又相继对聚集在纳木湖（腾格里海）和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保障了公路运输的安全。在昌都地区，从 4 月中旬开始，先后组织了对昌都东北、盐井及昌都东南两个地区的平叛作战，基本上歼灭了昌都南北地区及川藏公路沿线的大股叛乱武装，控制了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在西藏全区完全控制了城镇和交通干线，进驻了大部分边防要点，基本构成了“关门平叛”和对腹心地区集股叛乱武装分割的态势。1960 年乃集中主要力量对腹心地区几大股叛乱武装发起进剿。从 2 月底开始，首先对恩达、丁青、嘉黎、倾多地区（代称 1 号地区）和申扎、萨噶、定日地区（代称 3 号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之后，又组织了对盘踞在温泉、黑河、巴青地区（代称 2 号地区）、昌都东南地区（代称 4 号地区）及阿里、宁静、三岩地区的叛乱武装的进剿，先后经过 6 次较大的进剿战斗，特别是 1、2 号地区的两次战斗，全歼了叛乱武装主力，歼灭了美帝国主义派遣的（通过空降）藏籍特务，缴获了大批空投的武器弹药、电台，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在西藏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美梦。

在大股叛乱武装被歼以后，漏歼的少数叛乱骨干分子则分散逃至荒山僻野，四处流窜。1960 年下半年即转入清剿。至 1961 年底，在西藏全区范围内基本上肃清了公开活动的武装叛乱分子，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净化”。1962 年上半年，我军进驻墨脱地区，歼灭了最后一股叛乱武装。随着平息叛乱斗争的胜利，部队陆续进驻边境要地，设防守卫，逐步在西藏全区形成“关门平叛改革”的态势，并结束了西藏长期存在的“有边无防”的局面，从而也有利于巩固腹心地区平叛斗争的成果。在实施上述“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中，充分注意了各个阶段和各个战斗之间先后关系的衔接，达到集中力量分别歼灭敌主力的目的。在每一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上又采取“进剿”与“清剿”两步。在进剿阶段，集中足够的兵力，多路分进合击，进入叛乱地区，迅速歼灭叛乱武装主力，摧毁反动统治，站稳脚跟；清剿阶段，部队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清剿残余叛乱分子，进行民主改革，直至成股的叛乱武装基本肃清，群众基本发动起来，改革的局面打开，再把部队转移出来开辟新的地区。这样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使叛乱分子的生存条件和活动地区越来越小，政治上越来越孤立，更便于我彻底加以歼灭。

党中央、中央军委还提出在平息斗争中，为了较快地、彻底地平息西藏叛乱，必须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实施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消灭叛乱武装力量，才能打垮叛乱分子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斗志，促使叛乱集团内部的动摇分化，从而为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给叛乱分子一条出路，才能加速瓦解叛乱武装力量；只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同叛乱分子斗争，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从根本上保证平叛改革的胜利。西藏的叛乱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反动的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是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意愿的，坚决叛乱、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更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上层反动官员、农奴主、头人胁迫、欺骗拿起武器的一般群众，我们应尽一切可能采取政治的手段，把他们从叛乱武装的阵营中争取回来。各平叛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对主动投降回归的叛乱分子，不论其罪恶大小、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政策。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并广设招降站，动员一切力量宣传党的政策。3 年平叛中，从空中、地面散发宣传品 30 万份，党政军民一齐出动招降、劝降。在强大的政策威力感召下，出现了叛乱分子自动来降、父母劝儿、妻子劝夫、弟妹劝兄和亲串亲、友连友的劝降局面，在全部的平叛过程中，政治争取来降的占歼灭叛乱分子总数的 41.9%。在战斗中对于绝大部分被欺骗、胁迫上山叛乱的一般群众，不论其是主动或被迫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都加以保护，发给他们口粮、路费，送其回家生产，一律不再以叛乱分子对待。

党中央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区性武装叛乱后及时提出：“必须结合平息叛乱斗争，采取边打边改的方法，完成西藏全区的民主改革”。平息叛乱，为民主改革铺平了道路，实行了民主改革。

西藏人民在平叛中起了重要作用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倒行逆施，背叛祖国，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意愿发动武装叛乱，激起了百万农奴极大的愤怒。他们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自身的解放，与人民解放军一起，前仆后继，同叛乱武装进行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殊死斗争。3 年平叛斗争中西藏民工随军支前 15800 余人次，出动牦牛（骡马）104400 余头（匹）次，在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有的翻山越岭为解放军带路；有的赶着牦牛或者自己带着给养支援解放军；有的自动组织起来为解放军整修前进的道路，不顾天寒地冻，洪水泛滥，突击抢修。他们豪迈地说：“解放军平叛到哪里，我们就坚决支援到哪里！”有的地方组织自卫武装，主动出击；有的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搜山，成千上万的

群众拿着刀矛、棍棒，四处搜捕叛乱分子，陷敌于无隙可躲、无洞可藏的境地。林芝地区东久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在一条100多里长的山沟里遍设岗哨、观察哨，村与村、牧场与牧场、牧场与村之间都建立联络，一村发现敌人，各村出动，一人发现叛乱分子，人人齐追。广阔的深山成了密织的天罗地网。有一次，东久村农奴拉巴发现叛乱分子逃跑，他带着一只狗跟踪追击，在雪山上潜伏了1天半，终于活捉了3名叛乱分子。在江达地区一次围歼叛乱分子的战斗中，当地群众自动组织搜山，做到"山山有了望哨，条条路口有岗哨，部队到处能得到情报"。有一个10来岁的小孩，拉着马尾四渡急流给解放军送情况；有位60多岁的老阿妈，自动在森林里放哨，叛乱分子到后，她躲入林中，把叛匪人数数清后就跑去给解放军报告。黑河地区年逾6旬的牧民占堆和嘎，用自己身佩的一把腰刀，同11名武装叛乱分子搏斗，砍死4个，砍伤1个，其余弃马丢枪狼狈逃跑。宁静（芒康）县农奴洛桑泽仁带领民兵捉捕叛乱分子，用身背的步枪托砸死叛匪1名，俘5名。28岁的藏族青年登巴，在了解到宁静地区的叛首普巴本潜藏的巢穴后，主动给解放军带路，歼灭了该股叛乱分子，在战斗中登巴就击毙了两名敌人。堆布村芒果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农奴，一天叛乱分子逼他参加叛乱去打解放军，遭芒果拒绝，敌人就下毒手砍掉了他的右手。部队到后为他治疗，并帮助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芒果深受感动，主动提出给解放军当义务侦察员，不消灭叛乱分子、不报仇不罢休。他背着糌粑经常外出了解情况，在仅1个多月的时间里，报告3次准确情况，据此部队歼敌30多名。他还和其他人一起活捉了1个叛乱分子，大家称他为"独臂侦察员"。贡觉县农奴降村扎西，在叛乱分子的威逼下曾参叛，1个多月后跑回，以后主动向解放军报告情况。当他了解到叛首麦巴本·贡布多吉潜藏的地方后，立即向工作组报告，并亲自带路顺利地歼灭了该股敌人，击毙了贡布多吉，活捉叛乱分子8名，缴步枪5支、手枪4支。打拢宗扎西多吉是年仅22岁的草场牧工，一天8名叛乱分子到牧场抢牛羊，并威胁说："你向解放军报告就杀掉你全家"，但扎西多吉没有被吓住，他一面应付着敌人，一面叫家里的人去报告解放军。由于路远，当解放军赶到时敌人已逃跑，他又立即带领部队跟踪追击，最后歼敌4名、俘1名，缴步枪3支。类似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至于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他们的贡献更是巨大的。总之，西藏人民在平息叛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功绩应永载史册！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五辑）

庐山会议

背景介绍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省庐山举行，统称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前期（7月2日至7月22日），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和今年的任务等十九个问题，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准备经过讨论，形成《纪要》，发给全党。到会的同志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讨论。

在会议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不是很浓厚。有一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地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因而对国内形势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正"；另一种则认为形势很好，不愿听对"左"的倾向的批评。一些人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民主气氛不够。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他提出会议安排到15日。另外，毛泽东还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强调重工业，挤掉了轻工业、农业，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安排到7月15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彭德怀的信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是肯定了1958年的成绩，第二部份是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德怀的这封信，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的，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讲过他在信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接着，会议便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发言中，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者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不同

意有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

从7月23日起，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直到全会结束，这一段时期为庐山会议后期。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毛泽东还严肃地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讨论调整了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中央还于8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

材料：

- 庐山会议前期讨论的十九个问题（节录）
- 庐山会议前后
- 1959年庐山会议纪事

材料一 庐山会议前期讨论的十九个问题（节录）

六月二十九日在船上，毛主席同各大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座谈，征求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准备在庐山讨论的问题，刘少奇和朱德是六月三十日上山的。周总理是七月一日上山的。陈云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七月二日开过一次常委会，确定了要讨论的十八个或十九个问题。其中国际形势一题，是旅途中同总理通电话时，总理建议加上的。

我的记录本上载明：七月三日，中南组开会，首先传达下述十九个问题；是组长口头传达，并无文件。所记内容，同别组的传达，详略与题目次序小有差异，后来我又对照别组的文本补记了一些。

一、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五七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山东、河北建议：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不谎报、不浮夸的例子。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荷泽的一个队；一本，《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各省找几个例子；一本，从去年到现在中央各种指示文件（加省市的）。三本书十万字左右，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县社领导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程度。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说来，湖南省委有三句话，他们说的巧妙：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产品都要有）农业十二项：粮棉油麻烟茶糖菜丝果药特。工业有轻有重。过去“两小无猜”，把精力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丰收，今年又大春荒。一路看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个省，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去年许多事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我们曾批评过斯大林一条腿走路，自己提出过要两条腿，反而一条腿了。大跃进中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些问题，但包含积极因素。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现在形势好转，盲目性少了。何时能彻底好转？争取明年五一节。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楚：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三、任务（或分成两个问题，即今明年任务，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各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重挤掉了农、轻，也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轻，就好了。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钢明年只能增400万吨，达到1700万吨（或6、7、8三个数：1600万、1700万、1800万）。以后几年也是年增400万吨，2300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1000亿斤。六四年搞到10000亿斤。恢复农业四十条。指标比原定的稍高一点，还是十二年达到。两个口号不变。十五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人的脑子逐渐实际，要让下面去超过。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四年才能达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农轻重。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六亿七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日子过得舒服，才利于

建设，便于积累。赞成成立三机部，搞农业机械，还成立农业研究院。过去土改时说过："炮是要打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如果忘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实际挂帅的是农，其次是轻。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准备犯四年错误）。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定一下。

有两种积极性：盲目性和实事求是。还是要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搞一平二调）。总的看，十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真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是多数）是权利归他是共产主义，否则是资本主义。山东有的地方发现抢粮之事，这很好，可引起注意。搞社会主义是会坚持到底的，不会一日或忘的。美国如打来，我们最坏退到延安，但还会回来的。

四、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要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强调集权，统一领导。统得不可不死，不可过死。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已。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是老小不要钱。湖北是半供给制。供给部分要少，三七、四六。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工资，大部分办不到。

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产多少，粮食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增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一九五九年的四大指标定高了，现在陷于被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大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十三、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0.07%)，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了。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关系。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出机关。（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十年，讲统一战线时，一切都忘了。

……

（节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材料二　庐山会议前后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

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未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墙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

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的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予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苏联五年计划，国民经济翻一番，每年即递增百分之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作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〇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作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

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作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天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摘自《彭德怀自述》）

材料三　1959年庐山会议纪事

邓小平同志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的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一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恶化的过程，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其中一个看似偶发、实则必然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从反右派肇始，在"大跃进"中普遍发展起来的"左"倾观点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对整个经济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破坏，产生了长久的消极影响。本文就这次会议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纪事如下。

一、庐山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左"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1955年冬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已为建设伏下了冒进的根子；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被纠正后，毛泽东又多次尖锐地批评"反冒进"犯了右倾错误。这种错误地批评，促成了"左"的思想日渐滋长。以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左"倾思想又从政治思想领域逐渐波及到经济工作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占上风。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论断，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向"左"的转折。接着，党中央在1958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如"一月南宁会议"、"二月北京会议"、"三月成都会议"、"四月汉口会议"，都接连不断地反右倾，使"左"的空气越来越浓。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以高速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大跃进"运动由此逐步展开。特别是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钢铁当年翻番和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之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竟动员八九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在全国农村一阵风似地把74万个合作社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一下子把"大跃进"推向了高峰。结果，许多超越阶段的空想的东西，甚至神话般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和"共产风"，在城乡严重地泛滥开来。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客观的比例关系被打乱，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被动混乱的局面，政治空气也趋向紧张。

大炼钢铁和公社化高潮，时间虽不长，但破坏性极大。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使城乡形势急转直下。情况的变化使党中央有所觉察，并下决心纠正当时发现的一些错误。在毛泽东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在半年时间内连续召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以纠正高指标、"五风"错误。这使人们过热的头脑开始降温，"五风"有所收敛，紧张空气有所缓解，形式逐步好转。总的说，这只是一种应急性的权宜性的纠正。

但从全局来说，党仍然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独特创造，是不能动摇和不容怀疑的。在第二次郑州会议

上，毛泽东虽然承认犯了“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并说“党内的主要错误还是‘左’”。然而那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至于全局上体现“左”的指导思想的“三面红旗”，则仍是要坚持和高举的。这是贯穿于当时历次会议和各种文件、讲话的基调。即便是钢铁、粮食等主要指标作了几次调整之后，各项指标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规定1959年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为1亿担；1959年2月，中央还发出文件要求力争超过上述指标，粮食达到13000亿斤、棉花1.2亿担)；“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等问题虽受到批评，但是一些地方“五风”并未完全停下来；急于过渡的步子虽放慢了一些，把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推迟到15年、20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但这仍然是一个极不现实的时间表。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12月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所讲：至于进入共产主义，一定要苏联进入以后，我们才进入，我们要在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再等三五年再进入，苏联是15年，我们是2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样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有利，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即使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不宣布并不吃亏。这表明，虽然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已正确地指出：“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然而实际上，那时党的指导思想仍深陷在“左”的窠臼中，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仍远没有落到中国现实的土地上。这个基本情况就决定了纠“左”必定是艰难曲折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良后果进一步暴露。城镇粮食供应短缺，市场紧张，农村发生了外出逃荒、浮肿病流行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些同志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党反映情况和意见，表现出他们忧国忧民的热忱和为党、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有的同志向中央写信，尖锐指出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的同志还认为，“超越阶段与平均主义是‘大跃进’中的两棵野草，它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和分配方式，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有的同志还明确提出：“今天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而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党内外都希望进一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

1959年6月15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讨论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周恩来、李富春也在会上指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很不够。这次会议强调综合平衡，进一步下调了钢铁的指标，为庐山会议作了一些准备。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庐山会议前，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所采取的纠正行动，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之中。这种纠正从根本上说，就是以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为界限，任何超越和偏离这个界限的纠正都将是不允许的。实际上，当时的纠“左”主要限于对过高的指标和对基层的某些过头行为的局部调整和抑制，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高层决策和全面指导思想的纠“左”问题；对经济生活中一些严重失调现象的纠正，也没有触及导致或助长经济决策失误的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根源。不仅如此，还将这方面“左”的东西视为“正宗”并日渐强化，强调斗争而忽视党内团结与和谐，强调崇尚领袖权威而忽视党内民主，不少人对这些不正常现象已习以为常，不以为非。这就是庐山会议召开前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庐山会议的召开及其曲折过程

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是包括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是八届八中全会。按照会议的实际进程，大体可分为三段。

(一)“神仙会”阶段

原来预计政治局扩大会议只开半个月，会议的设想是继续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的方针，即“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跃进。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还把“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想到困难。去年做了一件蠢事，把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达到。像粮食的指标10500亿斤，恐怕要4年才能达到。粮食能否每年增加1000亿斤？钢铁每年增加多少？能增加400万吨？毛泽东对粮食、钢铁生产建设虽然提出了问题，但他乐观地估计现在形势好转了，盲目性减少了，主观主义减少了，到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因此，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着重指出，去年安排国民经济的顺序是重、轻、农、商、交，我们搞过十大关系，就是要两条腿走路，可以说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应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毛泽东称赞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强调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方面安排好这是关系到6亿5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会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他明确指出“大跃进”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

路线。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等等。为了深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结合实践认真读书，好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会议从 7 月 3 日至 10 日的安排是，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山观日出、游览风景、名胜古迹；有的作诗填词。会议气氛轻松活泼，被戏称为“神仙会”。

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小组参加会议，和各地同志一起议论形势，总结经验、交流思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少奇在一次发言中说：1958 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全党全民都得了经验，也碰了钉子，全党全民变得更聪明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了不起的收获。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他在另一次发言中又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趋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序的“大跃进”。

朱德的发言强调，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我们对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供给制实际是共产，不能共农民的产。办公共食堂，在生产方面有好处，在消费方面吃了亏。食堂办不好，暂时都垮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兴家立业。在目前要巩固家庭制度，要让农民搞些家庭副业，农民有东西卖出来，也有钱买东西，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就活跃了，人心稳定了。六亿人口的中国，农村不稳定一切都不好办。

董必武在发言中强调要在党内造成说老实话的空气，建议全党学习党章，每个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老实。

彭德怀参加了西北小组讨论，几乎每次会都发了言，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1)应认真总结经验，按经济规律办事，防止骄傲情绪。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讲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一〇七〇’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他认为，“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同时他也肯定“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很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2)对人民公社和全民办钢铁表示怀疑和否定。他说：“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公社没一个垮的，像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他认为“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 13000 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体系，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的事情。”(3)提出纠“左”比反右难的看法。他联系党的历史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容易产生右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决裂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 月至 11 月)发生的，而影响不止 3 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了。”(4)要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率直地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他还提出，“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中央的其他同志、中央部委和大区、省(市)的负责同志，也相继在小组会上发言。总的看，这段小组讨论的气氛是认真的和平静的，大家都摆情况、讲问题、谈看法，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党心、人心所向。如对刮“共产风”、忽视比例关系、不尊重客观规律、用大轰大嗡、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生产以及多快与好省分家等问题，各抒己见，认真分析错误的程度和原因，总结应该记取的经验和教训。会上的主要呼声是继续纠正错误。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是护短的。他们强调的是“大跃进”的成绩，而且认定今年仍然可以“大跃进”，赶上英国决不要 15 年。他们虽也承认工作中有不少问题和某些方面的被动，但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责任不在毛主席、党中央，而在各业务部门和基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们看得轻而易举和过于乐观，认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有些问题也正在解决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被动局面已经有很大好转。所以，他们强调，不能把比例失调归咎于“大跃进”运动，不能把有干劲的人说成是主观主义者，不能用落实指标来掩盖保守思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纠正错误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需要强调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以便继续“大跃进”。讨

论的情况表明，与会者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第一，对“大跃进”所造成的形势怎么估计，到底成绩有多大、究竟问题有多严重？第二，对八个月来纠正错误的程度作何评价，是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还是改正得不够有力？第三，当前的任务是继续努力纠“左”，还是应反对右倾保守？

7月10日，针对小组讨论中的问题，毛泽东在组长以上的小范围会议上讲了话。关于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认为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作这样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他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毛泽东还回顾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简单说就是3000万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1倍，办公社刮了“共产风”，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我们开了许多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关于人民公社，他说我不相信人民公社会垮，问题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总路线，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我总是对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以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他还提出要坚持农村公共食堂、保留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批判物质刺激。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会议下一步进程和开法，他建议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结束，并请有关负责同志将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几个文件，交大家讨论修改后下发。

在这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研究问题，仔细算帐，落实主要指标，调整1959－1960年度的国民经济建设任务。

7月14日，由胡乔木等综合整理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以下简称“记录”）下发与会同志讨论。“记录”内容包括：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等12个问题。“记录”在“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里，讲了成绩之后，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有三：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比例失调，二是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三是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记录”认为主要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的经济规律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完整地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于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记录”强调，在肯定成绩之后，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记录”还提出1960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当在作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翌日，在分组讨论“记录”草稿时，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基本观点，要求重新改写文件中“形势与任务”部分，对成绩要充分估计、概括有力。他们提出要鲜明的指出，1958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按着高速度发展的转折点，一年之内完成了“二・五”计划中钢、煤、粮、棉4大指标；人民公社一个没垮，证明了它的优越性；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新发展；文件应理直气壮地鼓劲，同时，他们认为，缺点不能讲得太多，要指出缺点的本质是前进中发生的、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不是方针性的，并且已经逐步得到解决。目前虚夸等已不是主要偏向，而在调整、落实指标中的松劲现象，“气压下降”的情况倒更值得注意，特别应警惕部分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低估成绩、高估缺点的严重现象。他们坚决主张到1962年我国的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数量要赶上、超过英国。对“记录”草稿的讨论反映出，在小组讨论中已经表现出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对错误纠正的程度以及对当前主要思想倾向的估计等问题，不同意见仍然存在，并且分歧进一步明朗化了。在这期间，周小舟等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会上一些提批评意见的同志感到有压力，希望会议能开得更活跃些，广开言路，把问题进一步摆开，以利总结经验。周小舟等讲到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发展的一年，估产过高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听到这些意见时，毛泽东并未表示反感，还说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说，1958年有些事他也有责任，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家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在谈到陈云同志管理经济历来稳重时，毛泽东讲了曹操打袁绍失败后想念郭嘉的故事，不无感慨地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想贤妻”。毛泽东最后表示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应该在肯定成绩伟大、保护“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听取各种意见；同时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要做到既批评缺点又鼓舞干劲；希望大家尽快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给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以相当的鼓舞和勉励。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接陈述意见。他听说会议很快就要结束，而不少同志尚未冷静地研究“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因此深为“左”倾错误不能得到进一步纠正而感到忧虑。他在给毛泽东信的开头就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上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他在信中肯定了“大跃进”取得的成绩，同时尖锐地提出一些仍然存在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他特别建议：要“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这样一封无论从政治上、组织上都符合原则、符合实际、合乎常情的信，由于它的尖锐、坦诚和直言不讳而招致了始料不及的不公正的对待。

（二）从纠“左”到反右的大转折

从7月16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尔后，彭信于7月16日被发给与会同志。

从16日开始，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打乱原来按大行政区划分的六个小组，重新编组开会。17日传达了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和“得多于失”的讲话。会议继续讨论“记录”草稿，并着重讨论了彭德怀的信。在小组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虽有个别提法欠妥，但基本上符合实际，表示同意；同时也有一部分同志提出疑问，表示反对。彭德怀参加第四小组并在19日发言中说明，他的信是仓促写成，是供给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他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不怀疑的，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他还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之内要消灭文盲，全民办这，全民办那，等等。这种“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在小组讨论中表示支持彭信的一些同志，赞扬彭为人刚直，对党赤胆忠心，认为他的信对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至于有些问题说得简单一些，有些词句欠斟酌，可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有的同志说会议已开十几天，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不是很浓厚，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夸大缺点。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

有些同志还补充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如说武昌会议前，人们只讲打破平衡、打破比例，不大敢说比例关系，没有很好综合平衡。应看到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相当严重的。有的同志尖锐指出，那一时期有骄傲自满情绪甚至不可一世，以为超英赶美不在话下，苏联也不放在眼里，有的滥用党和主席的威信，说的是政治挂帅，实际是主观主义挂帅。有的同志认为所有制变更过快，“共产风”刮的时间虽很短，但危害不小，有的地方热得过火，竟提出两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说这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算过分，尽管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还有的同志说，彭信中说主席处理经济问题“不得心应手”，如果指建设上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等等。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就彭信和“大跃进”中的失误，发表了各自的意见。黄的话不多，主要是在19日小组会上谈了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他还在别的场合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啦，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呀！

周小舟也在19日的小组会上发了言，他讲：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这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彭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是可以斟酌的。关于得失问题，总的来讲得大于失，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但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0000个土炉，有两万个炉子根本没有生过火，某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些，我看就只有失而无所得。谈到总路线时，他说我们都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刮“共产风”也是想快一点搞共产主义，其结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应该引为教训。对于基层干部的浮夸作风、强迫命令，应该看到这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有很大关系。我们只是鼓下面的劲，某些事情办法不具体，或者我们自己的心也是“虚”的，然而也总是去鼓劲，这样发生的错误我们首先就负有责任。周小舟主张会议把缺点讲透，否则是难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把缺点讲透，找出经验教训，不仅不会泄气，反而能够更鼓正确的干劲。

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他的发言明确、中肯，受到人们的注意。他先申明：“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他首先表示成绩说够，我赞成；

同时认为缺点讲透也很必要。他指出，认为缺点已经或正在改正就可以不必再讲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经过了这样一段过程，事后诸葛亮，问题看得更清楚，回过头来严肃认真总结，印象才会深刻。至于说讲缺点就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那是不会的。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的，因为大家不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能上升。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与哪个算帐。对于缺点，他同意“记录”草稿提出的三条，还建议加一条：下放太多，体制紊乱。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认为缺乏经验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但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应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目的是为了避免今后重犯这些错误。他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它与政治、军事规律不一样)，纠正那种不讲经济核算只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帐的偏向。在所有制问题上，他明确提出：集体所有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它的生命力，要把它巩固下来，不要强调改变。他主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缩小供给部分，反对搞平均主义。他说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张闻天的发言除了讲经济问题外，还讲了民主问题。根据党的历史经验，他深感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必须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指出：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党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能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接着，张闻天就彭德怀的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彭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如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 10 年，彭说 1 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彭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关于纠“左”是否比纠右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张闻天的这些见解是实事求是的，不乏真知灼见，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对彭信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同志，发表的意见也很尖锐。他们认为彭对成绩只作了抽象的肯定，问题却讲得太多、太具体、太严重，不是鼓劲而是泄气，不是支持群众运动而是乱了人们的思想，再反“左”，今年指标就无法完成。因此，要大讲成绩，说去年成绩是空前未有的、史无前例的、永远不能改变的。这些同志强调，要防止冷冷清清，防止回到老路上去，认为在“大跃进”中出了“一个指头”的一点乱子，比“四平八稳”下出乱子好。有些同志进而指出彭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把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抛诸脑后”、“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纠‘左’比反右难”等等，是暗示党中央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会议的发言记录和材料，并找了不同意见的双方谈话，但就毛泽东本人说，倾向本来就是有了的，反映在他在会议开幕时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上。这个形势总估计是不能受到动摇的，对于具体的错误则可以做有限度的纠正。而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显然突破了这个限制。于是，毛泽东断定，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怀疑党中央指导思想的，是针对“三面红旗”的。因此，他是很难接受和容忍的。于是，置人们的正确意见于不顾，决心进行“反击”。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成为庐山会议风云骤变的一个转折点。他对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我们检查多次，你们就没听到。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无非是骂祖宗三代，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

一股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泽东劝党内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他说有一部分同志也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注意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有些人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不过还有 30 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他们的论调。

毛泽东说：去年 8 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1958 年、1959 年实在有一大堆事没有管，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 1070 万吨钢是我建议、下的决心，从此闯下大祸，9000 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赔了几十亿、“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办公社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刮了“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付出了代价。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人民公社会不会垮？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毛泽东还讲，总路线是他提出来的，有一股干劲比那些凄凄惨惨要好。他批判了彭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观点，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属于右的性质，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影响下，右起来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持“左”倾观点的同志，打击了提批评意见的同志，对同情和支持彭德怀信的同志是一个警告。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他讲话之后，整个会议气氛急转直下，由纠“左”转向反右。原来持“左”倾观点的人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更加理直气壮、言辞激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在毛泽东的批评下首当其冲，心情沉重。特别是彭德怀的沉重心情更难以用言语形容。他认为主席英明伟大，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这次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决定反右是不适当的，这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一大批人，而且在经济上还会出现一个大马鞍形。有些同志埋怨彭不该写信，并好心地劝他检讨。多数同志虽然不能不表态，但批评基本上还是保持着与人为善的态度。

7 月 26 日，毛泽东就一位持有与彭德怀相似观点的同志，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写了《对一封信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作为 7 月 23 日讲话的补充，给批右升了温。“评论”说：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些方面的材料感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 1958 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 1957 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评论”还说：党中央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的估计成绩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 9 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错误并不可怕，就怕因批评而泄气，评论再一次强调：“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虽未达到 1957 年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庐山会议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评论”要求党内那些在紧急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的同志“迅速转变态度。”

至此，庐山会议完全转向“反右倾”，不仅对事，而且对人，形成了一边倒的不正常局面。有的人态度越来越激烈，调门越来越高，帽子越扣越大。如说彭的信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挑战书，性质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方向、立场错误，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之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彭信通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只讲反面教训，不讲正面经验；只讲冷，不讲热；把局部暂时的东西说成是全面的长期性的东西；把几亿干部、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的说，主席讲形势是三句话，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吃红烧鲤鱼中段”，他们的主体、重点是放在“问题很多”上面的，在讲成绩部分还埋有三颗地雷。有的说，彭信定性（指从分析形势到路线提出完整的一套右倾观点），张的发言定量（指夸大缺点、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冷嘲热讽）；彭的信是纲、张等发言是目，纲举目张，互相配合。

随着会议的“升温”，那些被视为思想模糊、摇摇摆摆的同志，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不坚定。有的说在主席讲话和写“评论”之前，自己在政治上害了感冒病，没有觉察到目前我们正处于内外夹攻的紧急关头，没有看出彭的信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若不是主席及时敲起警钟，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有的承认自己头脑里想的是“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到庐山来很想作些研究，对已经出

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事物"——右倾思想的发展和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没有看到和感到,这表明自己政治嗅觉不敏锐。有的表示要收回过去支持彭德怀的发言,表示要同彭划清界限。尽管在许多同志心目中并不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右倾反党,尽管他们感到这种政治定语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但在不断加温的政治气候下,他们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外,很难再作出别的选择了。

会议的发展已不允许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揪辫子,打棍子,以势压人。为揭穿所谓"右倾本质",有人提出彭的错误是他在历史上一些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认为讨论彭的信只有联系他的历史才能讨论得透,清算他的旧帐比从理论上分析信的论点更为重要。这个意见立即被会议采纳。于是会议转而清算彭的历史旧帐,采取了新帐老帐一起算的做法。中央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彭的历史错误,毛泽东归结一句话:彭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事实上,彭德怀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但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失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某些失误,可是这些问题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庐山会议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重翻历史旧帐,这就既不利于明辨是非,又必然伤害同志,损害党的团结,在党内斗争中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同时会议对张闻天等同志也进行了这样的批判,并追查了他们与彭德怀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给他们加上了所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的帽子。毛泽东在这期间连续批示文件,指出:"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并严厉指责彭等"在庐山会议上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号召全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的反对派和怀疑派"。

7 月 29 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修改指标,落实 1959 年经济建设项目;二是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要讨论回答这个问题。中央随即派专机限期将未上山的中央委员接到庐山出席八届八中全会。

(三)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对彭德怀等"批判斗争"的进一步升级

8 月 2 日至 16 日,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75 人,候补中央委员 74 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其他负责人 14 人列席了会议。

在 8 月 2 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简要的谈了改指标的问题,说八届六中全会决定的 1959 年钢、煤、粮、棉等指标是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到年底还有 5 个月,还是改了好,要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指标。然后着重讲了路线问题。他说,初上庐山,7 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的味道,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攻击总路线的自由,要以批评去年工作为主,抓住已经改正的缺点来破坏总路线。他们对 9 个月以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是压制民主。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 9 个月的"左"倾,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风也没有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这篇讲话规定了全会的主题,并为错误地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反党集团"定了调子。

8 月 3 日至 10 日分小组开会,按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保卫"三面红旗"的基调,对彭德怀等展开了"揭发"和"批判"。其间,有关负责同志向未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介绍了彭等"发难"经过及进行"反击"的情况。8 月 13 日至 15 日全会召开大会由彭、黄、张、周作检查。并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组织追查。

大会、小会上进行的政治批判,火气更大了,纲上的更高了,看不到平静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影子。8 月 10 日,毛泽东在安徽的一份材料上针对彭张等人写了一段批语说:"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为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同日,毛泽东在另一个文件上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各省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加之,彭上山前,出访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于是毛更把彭、张、周等的意见同赫鲁晓夫的说三道四联系起来,指责彭等庐山的言行是配合修正主义向党进攻。8 月 11 日,毛泽东再次在全会上讲话,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分析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说他 30 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特别严重的是武断地指责彭德怀这次向党"进攻"是想在党内挂帅。在全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集中概括为:一个纲领、两个否定、六个反对。即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和他在会议期间的发言、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着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这个纲领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彭德怀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追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非组织活动,集中地是要他们交代如何把锋芒直指党中央和毛主席,如何阴谋篡权。当有人反映彭德怀等曾议论过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不够,民主生活不正常,特别是主席不大容易听得进大家意见,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等问题时,在许多人中引起了可以理解的激愤之情,这在当时不仅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且成了有政治野心的证据。多年来,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过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使他受到全党的尊敬,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但是,由于较长时期以来,党内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个人崇拜风气。只要对领袖提出批评意见,就是反党,议论领袖是非法的、有罪的。彭德怀等的言论也就自然地被视为是"恶毒攻击"毛泽东和企图"取而代之"的严重问题。甚至连彭德怀过去的名字——彭得华,也被作了望文生义的解释。说这表明他早有政治野心,就是要立志得到全中华,如不被打死,就要当总司令、当皇帝。

对于彭德怀等同志这些对毛泽东的私下议论,毛泽东是非常认真对待的。他于8月15日在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的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一段批语,作了极其尖锐的回答:"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派朋友。"

确实对毛泽东的见解表示非议,这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很快就使彭德怀等同志陷于极度的孤立。一些好心的、对革命怀着至诚信念的同志都习惯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以维护领袖的权威为己任。他们尽管对彭德怀等同志素无恩怨与恶意,对他的许多观点表示同情或持有同感,但也不能对所谓的"斯大林晚年"的说法保持沉默。他们从各方面论证了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许多根本不同点(如说斯大林晚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民主,提倡个人迷信,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而毛泽东则与之相反),特别强调: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而毛主席虽60几岁,但他的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青,真正是充满朝气、生动活泼、一往无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和他对于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毛主席非常欣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确实是他精神状态的一个写照。许多同志都是赞成这样的分析和意见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彭德怀等在这个问题受到的批评、谴责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多、都重,都更难于被人们容忍。

彭、黄、张、周等同志在不断的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大帽子。彭德怀事后说明,当时想到的是我党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持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①。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接受了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战友的倾心地和热泪盈眶的劝告,为顾全大局,违心地作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检讨。但他对"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两个问题则坚决地予以否认。他认定"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②。

黄克诚也出于同样的心情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主张人民公社迟办一点也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怕急、怕猛、怕有副作用",特别是"当用猛烈的群众运动、急风暴雨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和精神阵地时,自己就动摇、彷徨、担忧",当一些地区出现某些比较严重的现象时(如浮肿病、饿死人、农村流亡等)他甚至担忧到睡不好觉的程度。黄克诚被迫承认这些是"资产阶级和富裕

---

① 《彭德怀自述》第277页。

② 同上,第279页。

中农思想在头脑中的反映”。

周小舟在受到批判后，许多事情想不通，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给他写信、送《邱迟与陈伯之书》，希望他“迷途知返”。他虽然不得不作检讨，但不夸大、不虚构事实，向主席反映情况完全是个人的看法，而决不是从“军事俱乐部”里来的什么东西。在8月3日的小组会上，他还用彭德怀给他谈过的两件事情，来说明彭德怀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是从心底里敬佩主席的。他在8月12日晨接到毛泽东的信并于12日晚与主席长谈之后，于8月1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认为说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总路线是推论出来的，他感到很伤心。信中说：根据全会精神，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的性质，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而我本人曾和彭有所接触，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较深，和张闻天同志曾有一次谈话，其中详细经过，在8月10日晚以前有重要隐瞒如此等等，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总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张闻天也被迫检讨多次，不能过关。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声色俱厉的信责问他：“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愿借你同志之著，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张闻天在千钧压力下，尽管十分痛苦，但却表现了极大的坦然。他在写检讨的过程中曾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问题还是党内民主。后来他一再对身边的同志表示，他对7月21日的长篇发言并不后悔。他说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么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他承认发言中谈到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张闻天虽身处逆境，仍在思索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如何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问题。

与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有的地方也开始了“反右倾”斗争。山上山下、会内会外，互相影响，交错升级。8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学员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辩论的材料上批示：“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他认为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人也比江西党校较少。”他要求“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办一场……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做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意义。”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断定“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它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因此，对右倾思想、情绪、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干劲，坚决反对右倾。8月9日辽宁省委作出了“反右倾”的部署并上报党中央，毛泽东于8月12日看到后立即批示：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8月14日中央向各地转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和辽宁省委的报告。

8月16日毛泽东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源及其它》为题，写了一段批语，严厉而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段话可以认为是毛泽东对庐山会议所做的政治总结。自此，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和不同思想的斗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更被进一步归结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一重大失误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违背了毛泽东本人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他培育了几十年的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并进而在实践中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

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各项文件通过后，毛泽东再次讲话。他认为，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像刚才通过的决议那样的总结，就是反右倾、鼓干劲。开始不对头，后来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把原来的19个问题放到第二位去了。彭、黄的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就感到惊奇，这一点要讲清楚。他还谈到海瑞问题，说他提倡左派海瑞，对右派海瑞不喜。他认为这半个月的会开得很成功，取得了胜利，避免了大马鞍型，防止了分裂。

八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于8月17日开了一天的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职务。

三、庐山会议的后果

庐山会议是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成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这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本已是极大的失误；而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庐山会议上又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翘尾巴”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对象能量也不大了。于是，开始认定：阶级斗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判断和唯心的阶级估量，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还肯定这类阶级斗争将会斗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因此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全党现在必须作战，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此，庐山会议还提出了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斗争的错误口号。这一系列错误影响极为严重深远，甚至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谬论，都与庐山会议肇始的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其次，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从延安整风直到解放初期，我们党内的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有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庐山会议在这方面是一个倒退。它用政治批判、政治运动的办法压制不同意见，在党内生活中紧张关系代替了民主空气。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体察民情、注重实际的同志，因为对“左”的做法持有异议或保留，并按组织原则向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而被列为批判重点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在党内生活中敢讲真话、敢于直谏者日渐减少，许多地方言路堵塞、鸦雀无声，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交互作用，加剧了“一言堂”、“一边倒”的不正常的风气。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不仅在工作上、决策上造成了许多的失误，而且还给了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的活动以可乘之机。

再就是经济工作中左倾指导思想随着“反右倾”的推进还继续膨胀、蔓延并迅速占据上风，使我国整个经济生活重新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困境。庐山会议把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一些正确措施，又当成右倾错误加以批判。同时把“大跃进”中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当成正统的东西接受下来，而且更系统化和更带有政治色彩。例如公然讲“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主张“趁穷过渡”，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都在“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作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和推崇。特别是在反复宣传当前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是“右倾”之后，纠“左”不仅事实上完全中断，而且从此成为天下之大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和压力下，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畅行无阻，左倾错误比1958年发展得更加严重。1959年拼命猛攻钢铁指标，结果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积累率竟高达43.8%，比1958年还高4.5%。这样就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还要求1960年钢产量达到1800万吨，力争2000万吨。蛮干硬拼的结果使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个国民经济险象环生，比例失调，元气大伤。整个经济生活爆发了危机，我国被推进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八辑，作者：陈诗惠）

"反右倾"运动

背景介绍

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于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任务"。从而把所谓"反右派"斗争推向全党。在"反右倾"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1958 年以来所出现的"左"倾错误得到继续发展，"包产到户"遭到批判，公共食堂、"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起来。

庐山会议后期所开始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损失，部分地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大批地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但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

材料：

- 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
-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 一九五九年纪事

材料一　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

人民公社以强大的集体力量，推动着一浪高一浪的生产高潮，也推动着我国整个社会奔腾前进。这是 1959 年我国农村的主流。历史的前进，总是要经过斗争的。时代的渣滓，总是不肯前进，总是想要阻挡前进的道路。

1958 年，1959 年，两年间，我国的历史已经进展了多么远！原来的七十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转化为二万四千多个强大不知多少倍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可是，前一个时期，曾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幽灵，要把人们拖回"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者单干户的老路上去。当然，"互助组"早已过时了，"单干"这个名称更早已变得很不雅观了，不好公然拿出来了。为了迷惑人，他们就借着整顿公社和实行包干包产的机会，大要鱼目混珠的把戏，给陈旧了腐败了的货色换上一些看来似乎比较时兴的外衣，叫做："土地下放"，"包产到户"，"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地段责任制"等等。这虽然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但就其性质来说，却决不可忽视。这种现象说明，当前的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在进行。

"包产到户"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请先看看这个鲜明的对比：湖北宣恩县万寨公社机场管理区有两个相隔不远的生产小队；一个坚持集体生产，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另一个"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生产搞得一团糟。好的队是五小队，自然条件不好，可是，队的领导干部坚决依靠贫农，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长，全队团结一致，干劲很大，样样生产活动走在前面。在抗旱斗争中，除固定少部分劳动力专门从事集体的副业生产以外，其余劳动力都集中力量抗旱，加强田间管理，结果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仍然很好；副业方面，七个月的收入，每户就可分得二十多元。糟糕的队是十一小队，地势较低，土壤、水源等条件都比五小队好；可是，队的领导干部只听信部分富裕中农的话，队里组织涣散，干劲不足，他们除了按照规定分给社员饲料地以外，还拨出很多土地"下放"给社员个人经营。贫农社员几次提意见，队长不听。在抗旱期间，稻田几天之内就干裂了口，连田边的泉水也没有利用，收成很低。在副业方面，一分钱收入也没有。

"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凡是这样做了的地区，不止在生产上造成了损失，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河南新乡地区沁阳县西尚公社范村大队有个李春荣，在当地实行"包工定产到户"以后，自己去搞商业投机活动，另雇短工种地。洛阳地区临汝县富裕中农姚长坤等，在当地实行"包工包产到户"以后，就用砖刻上名字埋在地界上，并且说这就是"土地还老家"。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一时又猖狂起来。

"包产到户"之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和活动，在它们刚一出头露面的时候，就碰到广大贫苦农民和大部分基层干部的反对。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仍然顽固不化，他们用种种伪装、想种种"理由"，为资产阶级和部分富裕中农反社会主义的私货寻找销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的最大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做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看看上面的这些例子吧，这样做，究竟是提高了什么样的"积极性"，提高了什么人的"积极性"？他们还热衷于把这种做法"长期固定下来"，说是为了"要人和土地

发生感情”。看看吧，这究竟是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只会使一些人对资本主义充满感情！只会破坏人们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崇高感情！有人主张“划分地段，把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说这样可以“加强社员对生产的责任心”，是把“责任制一竿子插到底”。当人们纷纷指出这是回头走单干道路的时候，他们又说：“这不影响所有制，只是生产管理的方法问题”，“只是集体生产中一种分工合作的形式”，“地段责任制不仅不是走单干的回头路，而且更利于发展生产，巩固与提高人民公社”。实际上，既然是把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全部或大部工分也固定到户，也就仍然是把生产单位缩小为单家独户，试问，这有什么“集体生产中的分工合作”可言呢？这同个体所有制究竟有多大区别呢？居然把这也叫做“有利于巩固与提高人民公社”，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最恶毒的破坏和污蔑。主张这样做的人大肆宣扬它的“优越性”，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家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重活轻活、粗活巧活都能做；一家人生活时间一致，行动一致；可以提高每个社员的责任心，提高劳动效率”。一家人男女老少不那么“齐备”的，该怎么办呢？据说，“可以自愿结合，划分地段，互相换工。”原来是“互助组”又来了。可是，劳动力怎样在大范围内统一调度呢？怎样保证用集体的力量改造自然、改革技术呢？一家人的行动一致了，而一队人的行动又怎样保证一致呢？对小块地的“责任心”可能是加强了，而对全社集体事业的责任心又会如何呢？显然，这都是一些一戳就穿的反动谬论。

在人民公社里，要不要包工包产呢？要不要实行责任制呢？要的。在以生产队的所有权为基础的情况下，生产队一方面要服从全社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一方面可以把生产小队作为包工包产单位，这是符合分级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的。“包工包产到户”，同小队的包工包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田间管理中有一小部分零星分散的、不需要组织集体劳动的农活包给社员个人来做，这是允许的；可是，这部分农活只占整个生产用工的一小部分，决不可能是大部，更不可能是全部；只可能是短期的临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固定的。“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同小部分零活的责任制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集体经营是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的基本的经营方式，家庭副业和饲料地的经营只能放在极其次要的、补助的地位；集体劳动永远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的劳动方式，随着生产工具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适于包给社员个人单独做的农活必将越来越少。这样的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决不能有一点违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包工包产，并不简单地是方法问题、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生产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想在这些地方钻空子，必须谨防。界线必须划清，阵地必须固守。

当党和群众起来反对和制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活动的时候，他们还要“留个点，比比看”。单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以后又和合作化“比”了好多年。都证明了只会把农民拖向贫苦的深渊，还要“试”什么？还要“比”什么？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通统烧毁，一个“点”也不许留！人们知道，不要说“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的实质了，就连“包产到户”之类的鬼名称，也不是那么新鲜的东西。在1957年，在一些地方，这个阴魂就出现过，有的叫做“三包到户”，有的叫做“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凡是出现了这些做法的地方，就立即同统一经营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计划生产归于乌有，统一分配也成了空谈，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在实质上发生了向个体所有制倒退的变化，部分富裕中农乘机隐瞒产量，对抗粮食统购统销，黑市活动大量增加。很明显，这是资本主义的阴魂。部分富裕中农对它鼓掌欢迎；贫农、下中农则气愤填膺坚决反对。在党的领导下，在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很快就把这个阴魂赶跑了。

资本主义的阴魂未散，或者散而复聚。前一个时期，当天空又有几片乌云飘动的时候，它就又来了。当然，它在强大的人民公社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无论它是多么微小，总是对社会主义有害的；只要它一出现，就一定要同它斗争，制服它。要制服它，不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集体力量发扬得强大而又强大，把集体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结结实实。

（原载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1958年中国出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赞扬。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多数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展开了一场斗争。

公共食堂“办不得”吗？问题根本不是办得办不得，广

大群众已经自觉自愿地在那里办了，问题是我们对这现象该如何理解，该如何对待。公共食堂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我国农民长期遭受封建统治的压榨剥削，加上水灾、旱灾、虫灾常常连年袭击，几千年间，我国农民不是成千上万死于灾荒，就是大多数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据 1920 年至 1936 年极不完全的统计，十六年间死于灾荒的人口达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人。1942 年到 1943 年，只河南一省饿死的人就有几百万。在平常年景，大多数农民也是终年勤劳，不得一饱。能过"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还算是"过得去"的。有许多贫农甚至常常"家无隔夜之粮"，"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吃饭问题对我国农民来说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呵！

解放以后，土地改革以后，粉碎了反动统治和封建主义的枷锁，农村的生产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的提高。可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力量还是非常单薄，特别是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民要经常吃饱吃好还是相当困难。经过共产党的指引和农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切身体会，人们认识到了，要克服困难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土地改革以后，劳动互助运动接着兴起，为了适应集体生产的需要，就有一些农民实行过"合伙做饭"，"集体吃饭"。这就是公共食堂的萌芽。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普遍成立高级社以后，生产集体化的规模扩大了，集体生产和分散吃饭的矛盾就更尖锐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许多农业社里办了农忙食堂。到了 1958 年夏季，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农忙食堂更象雨后春笋一般处处兴起；并且有一些开始转为常年的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适当范围的生活集体化成为广大群众普遍的要求，公共食堂这种新兴的生活福利组织，很短期间就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普遍地建立起来。今年上半年，各地的公共食堂经过整顿，在总结过去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的基础上，贯彻实行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大多数都巩固起来了。据调查，经过整顿以后，河南省共有公共食堂三十二万个，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 99%。四川农村有五十九万多个公共食堂，安徽农村有二十万五千个公共食堂，上海市郊各县有两万多个公共食堂。北京市郊区有七千多个公共食堂，最近还在不断增加；此外，还有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农村公共食堂都办得比较多、比较好。其它各省和自治区的农村公共食堂，也都采取了各种适应当地条件的措施而日见巩固。广大群众不但办了公共食堂，而且办得很好，将来还会办得更好。一些被解散的食堂又由群众纷纷恢复了起来。"办不得"论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眼见得是破产一条路了！

公共食堂究竟是不是节约了劳动力，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呢？事实是，公共食堂一成立，就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使她们有可能直接投入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或者工业生产。据河南省调查，全省农村一千零几十万户，过去有一千万妇女常年忙于家务劳动，有的完全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只能参加部分的农业劳动。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之后，全省只有一百二十万个炊事员做饭，加上其他服务人员，也不到二百万人(将来这部分人力还可以节约)，再加上托儿所、幼儿园占用一部分劳动力，至少还可以节省六百多万个劳动力。再以福建省来说，该省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以前就是比较多的。可见，福建将乐县在办公共食堂以前，虽经一再动员，妇女经常下田劳动的也不过五千多人。办公共食堂以后，这个县的妇女经常下田劳动的达到 一万二千多人。因此，全县的农事活动普遍比去年提早了一个节令。办食堂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动力，而且也使全体在食堂吃饭的男劳动力出工整齐一致。农忙时食堂还把饭送到田边，更加节省了农民来回跑路的时间，减轻了他们的劳累，保证了他们的休息。因此，这个县各个公社的工效，普遍提高 20%－30%，今年的晚秋作物能普遍多锄一次草、多追一次肥。

公共食堂是不是改善了社员生活呢？这是肯定无疑的。据河南遂平等十六个县四十六个公共食堂 4 月份的统计，平均每人消费粮食三十三斤(其中包括薯类五斤半)，菜二十斤，全月伙食费用合计四元多。这个生活水平，同过去当地同一时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比较起来，显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地社员最满意的是办了食堂以后生活的稳定。许多社员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每天能吃到一斤粮食，又是白馍又是菜，从前想也不敢想！当然，这个生活水平还不高。但是我们不能用城市生活水平去比，更不能用经济比我们发达的国家去比，而只能用过去来比，用大多数农民单独起火的情况来比。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确是保证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将保证它的继续改善。

公共食堂是不是使社员在生活上感到不方便、不自由呢？如果是那样，食堂是不会维持下去的。的确有些食堂在开始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整社以后，各地公共食堂都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办法。同时，采取了各种灵活的方式：可以常年或者只是农忙的时候在食堂吃；可以全家或者只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在食堂吃；可以全天或者只选一顿、两顿在食堂吃；可以主食、副食都由食堂供应，也可以只在食堂定主食或副食；可以在食堂里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有些地方还实行"一堂多灶"并设立小卖部，谁愿意吃哪一种就吃哪一种。总之，尽量给社员以方便，使大家再也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正如四川武胜县一些农民的歌唱所说："往日收工回家来，先挑水来后拿柴；眼看太阳偏西坡，我还在家出不来。如今吃饭不用忙，收工过后进食堂；只要出工钟声响，无牵无挂把工上。"难道这就叫做对社员不方便，不

自由吗？跟攻击公共食堂“消灭了家庭生活”的人们说的恰恰相反，公共食堂不但不排斥家庭生活，而且带给许多农民家庭更大的幸福。入了食堂，一家人仍然可以聚在食堂里一桌吃饭，也可以打回家里一桌吃饭，而他们是吃得更好了，更方便了。而且，这减少了多少家庭中夫妻、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的纠纷和怨恨！妇女们解脱了锅台、碾台、炕台的束缚，参加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就是男社员，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过集体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大家在集体生活中眼界日益开阔，思想不断进步，心情就更加愉快。公共食堂在改进饭食卫生方面也有很好的条件。社员不在家里做饭，住的地方也容易清洁了。

公共食堂是不是会浪费粮食和其它物资呢？初办的时候，有些食堂缺少经验，没有很好地统筹安排，又喜逢大丰收，确曾多吃了一些粮食和副食品，有的也多用了一些燃料，这是难免的。各地在整社的过程中，采取了各种具体的措施，建立了必要的制度，饭菜实行供给制的范围，也由各地方、各公社、各生产队、各生产小队根据具体条件和具体计算自行规定，这种浪费现象已经迅速地消除了。食堂的规模，都按照利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作了调整。食堂是群众性的集体福利事业；正像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别的集体事业一样，它比个体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可以用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来克服各种困难，可以创造越来越多的条件来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得又好又省。现在，各地食堂都注意了经济核算和物资的综合利用，按照农忙农闲、热天冷天、过年过节的不同需要，有计划地使用粮食、副食和燃料。随着管理人员、炊事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的日益熟练，公共食堂不仅可以更多地节约劳动力，还可以节约不少物资。据河南省七千多公共食堂统计，它们在最近三个月内就节约了粮食七十八万多斤。据一些地区调查，凡是办得好的公共食堂，同分散做饭的时候相比，燃料可以节约30%以上；每年添置炊具的费用，可以节约60%左右。很多食堂由于节约，有了赢余，还养猪，养羊，种菜，腌菜，增加了食堂饭菜的花色品种，增加了副食品的供应。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共食堂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美好的前途。它将随着人民公社生产的发展，随着社员收入的增加，而日益成为提高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

共产主义者从来主张彻底解放妇女，使妇女同男子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一同建设美好的社会，一同创造幸福的生活。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首先要消灭阶级之外，还要逐步创造条件，做到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中工作仅占她们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只有在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列宁：“伟大的创举”）现在，我国农村妇女开始“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了，“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了，社会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的多年理想，虽然还不能完全变成现实，总是开始变成现实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大喜事！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口口声声讲群众利益，甚至讲共产主义，可是对于这件解放广大妇女劳动力、促进家务社会化的事业不但没有鼓掌欢迎，热烈支持，却在一旁大施攻击。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尽管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何尝有半点共产主义的气味！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农民群众大量举办的公共食堂，是热情支持的。在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满腔热情地对办好公共食堂的目标和方法，作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规定。它说：“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成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诚然，这些要求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但是它们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逐步实现。新生的事物必然会碰到一些困难，必然会发生一些问题。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在新生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发生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革命者对待新生的事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积极地支持它克服困难，热情地帮助它解决问题，而决不应该对它采取冷淡无情的态度。1919年6月，列宁说过，共产党员必须关心共产主义的幼芽。他说：“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他还说：“不管情况是怎样困难，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看，列宁对于公共食堂这样的共产主义幼芽是采取多么坚定多么热情的态度！在我国，公共食堂已经基本上普及于全国农村，办好的条件完全具备。人们有什么理由不对这些新兴的大有前途的事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呢？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分子借我国的公共食堂为题而发出的种种谩骂，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消灭家庭”之类的鬼话，从共产主义刚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及其奴仆们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早在1848年，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诬蔑已经作了最有力的驳斥,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公共食堂本不是中国农民的发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早就有了公共食堂吗?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办公共食堂是为了赚钱,为了剥削劳动人民。我们农村中的公共食堂尽管还很简陋,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就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食堂高出百倍。帝国主义者采用各种借口咒骂我们,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粉碎了他们加于中国人民的枷锁,永远取消了他们掠夺中国人民的自由,永远脱离他们过自己的越来越好的生活。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中国发生的"使我们目瞪口呆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不过是为主要任务——生产——服务的需要的改变。生产!生产得更多、更好、更快!"(巴黎"世界报"1958年9月27日刊载的纪兰的报道)。显然,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

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话是说对了。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它的公共食堂,都属于这一类事情。我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会越办越好。在现阶段,它们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原载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一九五九年纪事

(一)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惯例,每年的七月二十日开始放假四十天,九月一日开学。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新学员已经开始陆续到校报到了。这天的深夜,忽然接到中宣部陆定一同志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中央决定,现在是大跃进的形势,高级党校不开课了,应入学的干部留在原工作岗位,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已经到校的,要动员他们返回原单位。各教研室的教学干部和工作人员,要组织起来,分别下放到城市工厂和农村社队去参加大跃进。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只好照办。各教研室都已安置好了剩下哲学教研室的干部还未确定下放到何处为宜。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工作都好的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即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我也有点眼热,于是建议,哲学教研室的干部就下放到这个"先进"省去学习。是年九月,哲学教研室的同志们由艾思奇同志率领,到达该省。省委组织部门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禹县、长葛、密县、登封四个县的社队参加劳动和学习。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我去武昌参加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带了几名同志到河南,去看望我们下放在那里的干部,并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到郑州后,在省委招待所住了几天,许多老同志听说我来了,就到招待所看我,闲谈中他们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做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来调查,确属事实。我听了感到十分震惊。那时,河南省党代表大会刚开过,省委把大会的简报和发言送了我一全份。我已通知我们下放在四个县的干部集中在登封县,以便听取他们的汇报。省委送给我的那一大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我第二天要去的那个县县委书记在省党代会的发言记录。我高兴地立即取下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看了,心中十分纳闷,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省委派了一名干部送我到登封县。我召集下放干部开会,请他们汇报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我们的那些干部都是做了多年的地方工作的,富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去时,他们已经在当地学习了四个多月,把当地情况摸的很清楚了。开会时,省委送我来的干部也在座,我们的干部发言情绪很不高,尽说些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话,我还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到了深夜,我们的干部来找我了,反映了他们几个月来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看到的和报纸上所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举例说吧,有两个同志反映,他们所在的城关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吃,儿子没有,他娘只好哭着回去了。有粮,娘总是要给一点罢。但是他没有粮,给什么呢?!他们所在的公社,社员已经没有粮吃了。报了千斤省的地方,怎么刚秋收后不久,就没有饭吃了?他们所在的县,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下放干部参加该县县委工作,当县委书记。我对党校的下放干部说,你们把情况报告给那位书记嘛。他们说,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也没有办法,只好让老百姓把红薯藤晒干,磨成面,

做糊糊喝，聊以充饥。

河南省平西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7320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之谜》，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这位党委书记到处作报告，胡吹他们的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伟大成绩”。一九七五年我被放逐在陕西潼关，听那里的人们说，他在潼关也作了这样骗人的报告。

某县城关公社有个公社干部，很有一套弄虚做假的本事。上边来人检查粮食，她领着这些人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有许多粮食，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也有粮食，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一堆，而且下面都是草垫起来的。还有个公社，就像演戏一样：“报！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流动红旗被夺走了！”“不好了！”于是赶快动员群众，谎报成绩，要把红旗夺回来。社员们想不通，就对社员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以亩产玉米一万斤的“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社员们说，没有那么多呀，这不是实事求是。书记说，算了，这一次就是这样吧，下一次再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带着这个亩产万斤玉米的“大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终于取得了“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衣锦还乡。还有一个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130万吨钢，登在《人民日报》上。如此等等，几天也说不完。这就是大跃进年代号称全国第一的千斤省的人民生活真实情况。其他同志也向我反映了许许多多他们亲眼看到的浮夸虚报、弄虚做假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听了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意作假，当如之何？”

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这本领已经失传了，没地方学。我们要的是真铁、真钢，不是要假“卫星”。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个别同志甚至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一九五九年，有一位哲学家就在河南的一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种情况熟视无睹。后来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这位哲学家听了愤愤不平地说，河南省没有主观主义，谁要说河南有主观主义，他要挺身而出为河南辩护，谁要是讲河南有主观主义，那就是“一次反映论”。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们弄虚做假，放假卫星，不许小民说一句“有主观主义”。谁说谁就是“一次反映论”。弄虚做假，放假卫星，究竟需要几次反复，几次试验，才能认识那是“真理”呢？弄虚做假，放假卫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吗？在大跃进年代，这位哲学家说，共产风就是革命风。在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时候，真有几个自认的或者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助风施威，火上加油。当然，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分子可以不去说他们，对于这样的人，哲学不过是他们为达到这样或那样的卑鄙目的的敲门砖。

在河南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日子里，真是让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这也深深地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思索。

回到北京后，我就十分注意中央党校南院的几十亩水田和华北小学校院子里的小麦试验田。我想亲自动手解剖一、两只“麻雀”，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这时华北小学校的一亩小麦试验田，长势十分喜人，许多同志看过后都说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小麦。当时任农业部长的廖鲁言同志参观过这块小麦地，他说：“这小麦长得这么好，至少也要打一千斤。”收获时节，结果实收小麦七百斤。其它地方的小麦试验田，亩产都在五、六百斤左右。我由此想到：若要亩产七千斤，必须密植十倍，那麦子根本就没有地方生长了。这就证明，河南放小麦亩产七千多斤的卫星是假的。

我曾说，当时某省有一条独特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弄虚作假，力争全国第一，为个人取得无上荣誉。

（二）

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中央高级党校要恢复开课了，下放在各地的教学干部和行政工作人员都要调回学校。在河南的下放干部，返校时路经郑州，向省委辞行，省委第一把手亲自接见了他们。省委第一把手非常谦虚，要我们的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些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他们返校后，向我述说省委第一把手接见他们的情况和谈话，当听到省委第一把手说他们的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的时候，我的“灵机”一动，茅塞顿开，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笑着说道：“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不意这话闯下了大祸。不知道这话怎样被康生知道了，他又报告了中央，说这话是说中央的，甚至说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年夏天，中央宣传部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在学习班学习的有好多熟人。七月二十九日是个星期天。他们相约到中央高级党校来看我们。这一年我们的机关生产搞的不错，蔬菜瓜果获得丰收，便留他们在我们的食堂共进午饭。饭前大家在一块随便谈天，在闲谈中自然而然地就扯到各地弄虚作假、刮“共产风”的一些轶闻轶事。当时我也凑热闹地说了几句：“毛主席讲了多次尊重唯物

论、尊重辩证法。但我们在实践中究竟尊重了多少？毛主席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而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有多少？依我看来，在某些怪事中，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定指标能按浪漫主义办事么？怎么能以写诗的构思来定指标呢？”我当时只是抽象地这样说说，没有谈具体事实。

其实，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中央经委会有个内部刊物叫做《经济信息》，有一期上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某省制订当年钢铁生产计划，原订钢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订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了，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据报道，制订计划的人还说，这个任务是否能完成，还很难说。当时看了这条消息，心想：我们天天在提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可是某省领导钢铁生产的部长们，对于本省生产钢铁、钢材的设备究竟有多大，难道竟那样心中无数吗？怎么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竟然荒唐到这样的程度？

我对学习班来访的同志们又说，这几年我国哲学水平并不怎么高。有人把唯心主义讲成唯物主义。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宣传玉米亩产一万二千斤的书也出版了，这是宣传唯物主义，还是宣传唯心主义？某县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讲哲学，讲稿到处发。据说听众有250万人，科学院哲学所还印发了她的两本讲稿。这到底是哲学的兴旺，还是哲学的贫困？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刮来的时候，我们连这么一阵风都挡不住。这些“风”，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三）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清晨，中央高级党校的党委办公室同志告诉我说，河南省委党校有个参观团，还有抚顺市委党校校长来访问我们，问派谁接见。我说，我接见。我接见他们，只是想同他们谈谈，我们办党校，应当给在校学习的干部多讲一点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道理。

那时，“共产风”刮的很厉害，在理论界也刮起了一阵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这股“风”后来在十年动乱中，又刮了起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就有人说“实践就是理论，读书就是教条。”有些人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对立起来，甚至规定讲哲学只准讲《实践论》、《矛盾论》，多讲一点也不行。其实，那只是毛主席在延安讲过的那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篇，并不是全部。我们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可是对这一套作法不能持不同意见，一提不同意见就要给扣上“轻视主席著作”的帽子。

我对来访的同志们说：“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作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依据条件，可是我们有的哲学家却在那里大批“条件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干什么都可以不讲条件。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我又对他们说：要让干部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现在谁要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

我在结束讲话时，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做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讲这些话一定要得罪人，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

我即席谈了以上一些话，想用此引以为戒。并希望从事党校事业的同志，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能够教育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没有想到他们回去后把我的讲话整理打印出来，到处散发，还给我寄了一份。我一接到此打印稿，就感到要惹祸了。我打长途电话嘱他们收回，但已经迟了，他们散发出去许多份数，很难收回了。

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党面临着应当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会议初期定的议题也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同志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但是，却被认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八月初，我接到通知去庐山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大约是八月十日，我同在京的中央委员们乘专车出发，十二日到达九江，然后上了庐山。这时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经打印。安子文同志给我送来一份，我仔细地阅读后，认为彭德怀同志讲的很实事求是，许多观点我也是赞同的，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但听说他为此事遭到严厉的批评，犯了严重错误。我想起我还有一份讲话稿，内容与彭总讲的基本相同，说不定也会为此惹出事情来，便嘱咐我的秘书黄静华给北京中央党校打电话，侯维煜同志因病不在党校，就嘱伍辉文同志将我那份讲话打字稿快收起来，千万别散发出去。我回到北京时，见到这份讲话打字稿并没有散发，这才略微放心。庐山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康生打来电话，说有事"请"我去他那里一趟，我只好遵命。当我到他那里时，陈伯达在座。安子文同志也被找去。康生问我：听说抚顺、河南学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参观，你对他们作了番讲话，有这件事没有？我说：有此事。他对此再也没讲什么。其时，辽宁、上海等地有人已经向他告发。

次日，康生召集了中央高级党校的党委委员，但我这个党委书记除外，都到中宣部开会，由他亲自布置了对我的批判，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曹轶欧煽风点火说："山上山下，一文一武。"意即：彭德怀是庐山会议上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而杨献珍则是在山下"反对三面红旗"。这种种批判，还美其名曰："背靠背的斗争"。会上又有人提出了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写的一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讲稿有问题，甚至说我"抗拒陆定一部长的批示"。我听到后感到惊诧与愕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高级党校在组织上归中央组织部管，理论上归中宣部管。我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本来是作为给中央高级党校学员讲课写的讲稿，作为不成熟的意见，送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派来两名同志找我，建议我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我认为文章意见不成熟，仍需修改，便没有同意公开发表。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陆定一同志有什么批示，怎能说我是"抗拒陆部长的批示"呢！康生对我继续搞什么"背靠背的斗争"，我也只好"奉命"在中央党校写"检查"。一次又一次的写，总也过不了关。

彭真同志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看还早的很哩！"康生又批示中央党校，再次找出我的一些讲稿来"继续批判"。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〇年七月，整整连续批判了七、八个月，最后我只得写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才由康生批准停止批判。在批判斗争我时，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到了一九六四年批判"合二为一"时，又把这个问题翻了出来，材料还是那些，这时提价升级，作结论时定了十大罪状。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十大罪状的基础上加码拔高，帽子就更多了。在监狱里有时我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自己回答说"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

文革期间我被关在监狱里整整八年，从监狱放出来，又被流放到陕西三年半。闯祸的总根子就是这一次对抚顺市委党校校长和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的谈话。这个谈话，却为大跃进年代的一些奇闻奇事留下了一点微弱的痕迹。因此，我说过：一九五九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王关山整理，原载《求索》1984年第5期）

风云人物

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原名彭德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后给富家放牛，当过煤窑工人和挑土工人。一九一六年投入湘军。后任连长，并在连里组织救贫会。一九二〇年因派人杀了一恶霸地主被告发，遂弃职潜逃。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连长、代营长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参加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彭德怀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领导平江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十一月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他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先遣队司令等。参与指挥了红军的东征、西征。曾任陕甘宁支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征军司令员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副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协助朱德总

司令率八路军挺进敌后，组织百团大战，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为保卫党中央、解放中国大西北作出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一九五〇年十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后回国，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第六至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被错误地当作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理。一九六五年任建设大三线的副总指挥。

彭德怀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他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达八年之久。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他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出版有《彭德怀自述》。

材料　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〇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

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原载《彭德怀自述》）

张闻天

张闻天(1900－197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又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五·四”运动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不少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担任工作。一九三〇年底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临时中央局成立后,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瑞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等。一九三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摒弃王明的“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起草了会议决议,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等。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一九五五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理,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逝世。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对他作了全面、公平的评价,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主要著作有《论青年修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等。出版有《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

材料　张闻天庐山蒙冤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虽然身在外交战线,但对国内工作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张闻天从这年9月就看到问题和缺点不少,并深为忧虑。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张闻天是竭诚拥护的。然而他还力图从指导方针和根本理论上寻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从东北到西南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当时“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深刻原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尖锐、明快地揭露了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问题。16日,毛泽东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张闻天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精神,辞谢一些同志的好心劝告,坚持犯颜直谏,7月21日下午在华东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详细分析了比例失调、“共产风”、强迫命令、虚报浮夸、下放过多、体制紊乱等缺点的严重后果,指出了“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发言”尤其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探究原因,从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民主与集中等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指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张闻天在“发言”开始后即点出,“比例失调”一条可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一条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在“发言”中,张闻天从理论高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批评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夸大主观能动性而不考虑客观条件,只讲政治挂帅而忽视和违反经济规律,急于“过渡”和平均主义导致否定集体所有制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并进而指出,造成种种问题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为此,他认为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张闻天在发言的最后,还无所畏惧地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当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一时期正确思想的最高水平。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却因为这篇发言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他被指责是同彭德怀“文武合璧”进行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下庐山回到北京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交代根本不

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这时虽然还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摘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略》，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35)）

黄 克 诚

黄克诚(1902－1987)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湘南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大队、支队、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长征，并立下重大功勋。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并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遭到错误批判，与彭德怀等同志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的冤案得以平反，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来担任第二书记。一九八七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材料　杨尚昆同志在黄克诚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同志。

黄克诚同志是湖南永兴县人。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后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大队、支队、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参加了巩固发展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曾率部担任前卫，在抢渡湘江、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等战斗中，屡建功勋。

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同志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第二、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等职。先转战晋冀鲁豫，后率部南下，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他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固守城镇，分散游击，领导军民粉碎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多次大规模"扫荡"。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时地反击了顽军的阴谋破坏和进攻。1945年，他组织指挥了阜宁、两淮等战役，解放了苏北广大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同志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三万余人进军东北，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克诚同志担任湖南省的领导工作。1952年后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参与制定国防战略方针和军队建设方针，参与领导全军各项重大制度的制订和落实，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发展和转变作出建树。他提倡顾全大局，勤俭建军，节省军费开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黄克诚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意见，遭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和彭德怀等同志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但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黄克诚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一心想的是人民，是共产主义事业，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庐山会议所作的错误决议，黄克诚同志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他虽已双目失明，年迈体弱，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端正党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直至他病重住院后，仍十分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关心和支持第一线同志的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黄克诚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总是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浮作风。

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他不居功，不擅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作风民主，知人善任，关心群众疾苦，热诚爱护干部，人们都愿意在他面前讲真心话。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并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黄克诚同志勋劳卓著，德高望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思想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以他为榜样，为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黄克诚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新华月报》1987 年 1 月号）

周 小 舟

周小舟(1912－1966)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名周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之一。参与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一二·九”运动作了重要贡献。后赴延安，任毛泽东的秘书。曾多次受中共中央委派，同国民党要员谈判。一九三八年到冀中等游击根据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历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

新中国成立后，周小舟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政委，中南军区党委常委，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等。

一九五九年，在中共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被打成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受到错误处理。直到一九七九年予以改正，恢复名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小舟在广州逝世。

材料　实事求是，何惜乌纱

——怀念周小舟同志

小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含冤辞世，至今整整十五年了。

为查勘五强溪工程，一九七九年初秋到长沙，我去过小舟旧居。当时一阵莫名的寂寞之感袭来：蓉园已是花千树，不见周郎谈笑声。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南时，我与小舟在开封初会。大概由于是同乡，年岁、经历相差不远（他比我大五岁，“一二·九”以前入党），共同熟人不少，好尚又多相似，因而一见如故。湖南有句俗话：“长沙里手湘潭票。”“票”字含义不易说清，硬要翻译，假、大、空近似，即善耍嘴皮的漂浮人物。小舟是湘潭人，跟“票”恰相对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之后约一年半时间，正副职的工作关系，我们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某种交心关系。二十年后的寂寞之感，勾引起“大跃进”年代的往事：独自徘徊谁共语？到乡翻似烂柯人。“大跃进”尤其庐山会议这一段史实，最能说明小舟的为人。

一九五九年柘溪开工，五、六月间，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他正下乡一个月归来，丰富了第一手资料，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农民积极性、公社供给制、大队核算、公共食堂、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关于“大跃进”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忌讳，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从追悼会的悼文中，才知道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到湖南，见到大好形势，曾夸奖过他：“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说到他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是结果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物力人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一九五八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他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

七月初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期，我与小舟来往较多。毛主席在会前视察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湖南的工作颇加称赞。小舟带上山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受为会议的方针。当时少奇同志也反复讲：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到七月二十二日为止，会议还称为“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周总理三次找国务

院各部开会，谈形势，算细帐，强调陈云同志的三个平衡。大家座谈之余，游山赋诗，心情愉快。毛主席的两首诗——《到韶山》、《登庐山》正由小舟传播开来。这两首诗是主席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的。小舟在抗战前后，当过主席的秘书，也爱好诗词（“小舟”之名，即由主席叫他“小周”而来）。我们同在中南组，开会后不几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将两首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并将原信给我看。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微有出入。《登庐山》还有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的松快心情。我的本子上还有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颈联为：“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这都可说明会议前期大家的情绪。

按六个大区分的小组会，讨论主席提出的读书（读政治经济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十九个问题。小组会上，可说议论纷纷，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如不赞成“以钢为纲”，公社化过早，等等，还不能完全畅所欲言。有不少同志护短，转不过弯，直至反对批评过分密植。小舟是率直而言的。我的笔记本上，记有他七月四日的发言：一千零七十万吨不如八百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总产值至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按：其实这也很难做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湖南省县以上一千个项目，只有三百个经过批准。他还谈到食堂反对派的六条意见：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会议原准备半个月左右结束，主席指定乔木、小舟、家英和我等七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论述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经营管理、食堂等几个主要问题，总结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指出今后方向。

此时发生的影响当代历史的不幸，即小舟同彭德怀同志的往来以及导致彭总写那封信。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之后，彭总来到湖南，由小舟陪同三天，到过湘潭乌石（彭总家乡）、韶山和株洲。沿途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迁拆一空；有上千人挤在一丘二十亩的田里搞深翻；听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还看了一些土高炉。后来彭总又去平江。小舟介绍，这是个“刮共产风”较严重的地方，干部的强迫命令也厉害。他们之间谈得比较深。上山之后，小舟又找彭总谈过两次话。彭总表示，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小舟就根据眼前经验：“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怂恿彭总去谈。原来七月十一日夜，主席找小舟、周惠和我去漫谈过一次（以后还谈过几次）谈得很是融洽。主席认为一九五八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夜谈话情况，小舟给彭总讲了。彭总于是决定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自己的主要看法。小舟还建议彭总根据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予以整理，系统写出，这就是后来批判彭总时，追究小舟为“宣传员”、“提供材料”和“当了参谋”的由来。

彭总的信是七月十六日印发给大家的。小组会议从此起了一些变化，多围绕这封信和《会议纪要》继续讨论形势。有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很赞成彭总的意见，且多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康生和华东那个头头等人，更是兴风作浪。七月十九日，小舟在小组会上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特别谈到得失问题：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加区别。比如湖南搞了五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点过火；有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就只有失而无所得。缺点少讲，或讲而不透，是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更鼓舞正确的干劲。他以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大家知道，七月二十三日主席作了反“右”的讲话之后，会议急转直下。小舟是第四个受到千钧压力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作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没有生造或夸张一星半点事实；相反，他还为彭总辩护。八月三日小组发言中，小舟举出彭总跟他谈的两件事，以说明彭总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一是井冈山会师、毛主席不准井冈山的人议论湘南失败，以利团结。彭总说，可见毛主席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总说，很久以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总从心底敬佩主席。

这个时刻，我与小舟还碰过面，他非常感慨，说准备撤职，摘下乌纱帽，但希望有机会去办好一个农场。小舟是一个对革命对自己极端负责的人，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主客观之势太不相容，许多事他想不通，非常伤心，非常痛苦。八月十三日写给主席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假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去年到广州，见到小舟的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辞世前的情况。我们党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大风大浪之中，有许多同志能够立如砥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小舟正是这样坚持并以身殉的人。也许他一时有绝望之感，人谁不有一时的迷误呢？这只是说明他的极度认真，执著于自己的信念，而决不是脆弱。要知道，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党已给庐山会议作了正确的结论。与此有关的受过委屈还活着的同志，如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是小舟（和彭总、洛甫同志等一样）却以五十四岁的盛年抱恨以终。小舟当年企盼的党的集体领导、高度民主生活，正在到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欣逢盛世，怎能不加倍思念故人呢？神州遍地皆春色，只是词场少一人。小舟是爱旧诗词的。上庐山第四天，我的登含鄱口句："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颇为小舟称赏。故人谈笑仍如在，使我伤怀奏短歌。小舟同志，愿将下面这首七律遥祭你在天之灵：

周郎意气永兴叹，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澜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原载李锐：《怀念廿篇》）

流　行　风

小说《创业史》

长篇小说。柳青作。第一部 1959 年 4 月开始在《延河》连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 年出版；第二部上卷 1977 年出版。

作者原计划写四部，从互助组写到人民公社成立，反映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小说第一部以渭南地区"蛤蟆滩"为典型环境，围绕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激烈的矛盾斗争。斗争中，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取得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等各种典型人物的精心塑造，展示了农村最初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胜利，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巨著。作者善于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习、色调统一起来，广泛采用古典小说艺术手法进行创作，在长篇小说创作民族化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电影《中华儿女》

故事梗概：

1936 年，东北人民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纷纷加入抗日联军。女战士冷云、胡秀芝等，接受了炸毁敌人军车的任务。在完成任务归队的路上，发现大批敌人正偷偷向抗联大队驻地进发，冷云一面派人给大队送信，一面率领战士把敌人引诱到牡丹江边。战斗中，许多同志牺牲了，最后只剩下胡秀芝等八位女战士，她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保持民族气节，毅然投江自尽。剧本表现了中华儿女在同侵略者的斗争中，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剧中的胡秀芝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党的优秀战士，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根据此剧本拍摄的同名影片在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自由斗争奖"。

电影《五朵金花》

故事梗概：

白族青年阿鹏与金花，在"三月街"盛会上相识定情，约定来年此日再会。第二年，阿鹏提前来到大理寻找金花，他接连找到了四位金花：先是与积肥模范金花、畜牧场金花产生了有趣的误会；接着，炼钢厂金花由于对他过份的热情，使其丈夫起了疑心，又引出很多笑话；拖拉机手金花举行婚礼时，阿鹏赶去，发现自己所爱的副社长金花正坐在新娘席上，他误认为是她结婚了，相当扫兴，而副社长金花也误认为阿鹏已变心，悄悄退还了他的定情礼物。正当阿鹏要返回家去时，炼钢厂金花与其夫弄清了事情原委，赶来帮助他们解除了误会。"三月街"这天，阿鹏和金花又幸福地相会在蝴蝶泉边。这是一部抒情喜剧，有闹剧性质。它借一对青年有趣的爱情故事，反映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以及他们幸福、欢乐的生活，赞扬了人与人之间真诚而美好的关系。轻松愉快，风趣动人。

电影《林则徐》

叶元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

道光年间，林则徐领旨赴广州禁鸦片，得到了两广总督邓廷祯的支持，他们整饬了残破的海防，又在群众帮助下，扣留了英国鸦片商船，迫使英国领事义律交出了全部鸦片。继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焚烟，禁烟取得了初步胜利。清廷投降派穆章阿、琦善等暗与英商勾结，想方设法破坏禁烟。1840年，英军发动侵略战争，林则徐领导抗英斗争，又取得了胜利。但道光帝惧怕英军入侵，又偏听投降派谗言，革去了林则徐钦差大臣职务。英军趁势驱师北上，道光帝震惊。最后，林则徐被发配新疆。而广州三元里人民高举"平英团"的大旗，自发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剧本围绕禁烟和抗英两件大事，描写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真实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忠君与爱国的深刻矛盾中，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感人形象。

电影《桥》

于敏编剧。

故事梗概：

1947年春，东北某铁路工厂为支援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总工程师因看不到群众力量，对完成任务缺乏信心，少数工人也有畏难情绪。面对困难，电炉组长梁日升不顾重病缠身，带动工人从雪地里扒出被遗弃的废钢铁30多吨，并坚持试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修复了炼钢炉，并取得了试验的成功。与此同时，铆工组长老侯头发明风钻铆钉法，提高了工效。经过同心协力的苦战，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也是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电影剧作。它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后方工业战线的斗争生活，通过塑造梁日升、老侯头等工人形象，热情歌颂了翻身后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态度。

电影《聂耳》

于伶等编剧。

故事梗概：

为躲避国民党迫害，1930年夏，19岁的聂耳从云南来到上海，先在一家商行做伙计，商行倒闭后，迫于生计，又考进"五花歌舞班"当琴师。这时，他在女友郑雷电和地下共产党员苏平鼓励下，参加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并撰文痛斥黄色歌舞，旋退出歌舞班，去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他随苏平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进步电影界工作。这期间，创作出了《扬子江暴风雨》、《毕业歌》等许多革命歌曲。1935年春，组织上决定派聂耳去苏联学习，行前，他根据田汉的歌词，谱写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他在赴苏途经日本时，不幸溺水逝世。剧本描叙聂耳从一个彷徨、苦闷、爱好文艺的青年，在民族危机中走上革命道路，以音乐作为武器，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概括地反映了30年代的时代特征，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较好地把文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喜剧《纸老虎现形记》

五幕讽刺喜剧。陈白尘作。原载《收获》1958年第6期。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再版。

1958年，美、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中东，引起阿拉伯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起来斗争，推翻傀儡政府，建立民主政权。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由于利害关系，造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这一切，使受华尔街老板支持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白宫统治者，陷于极端恐慌的境地；演出了一幕幕丑剧。美帝国主义者还派出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威胁主持正义的中国人民，因而又增加了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绞索。剧本通过荒诞、滑稽的故事情节，用"漫画式"的手法，刻画了杜勒斯等艺术形象，在强烈的喜剧冲突中，揭示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话剧《最后一幕》

三幕话剧剧本。蓝光作。原载《剧本》1958年第6期，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一个演剧队，在国统区北平演出抗战戏《一家子》，演出已剩最后一幕了，由于剧本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被当局强令停演。又派出特务向世仁任该队队长，以控制演剧队。演剧队导演兼副队长应放和地下共产党员白大姐等，团结全队演职员，巧妙地同敌人展开斗争。中秋夜，他们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撤离北平，奔赴延安，投入了党的怀抱。剧本通过演剧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曲折斗争，歌颂了党的正确领导，歌颂了周恩来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敌演剧队宣传抗日主张所取得的胜利，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构思巧妙，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在对敌斗争的严酷氛围中，却不失喜剧色彩。

话剧《东进序曲》

八场话剧剧本。顾宝璋、所云平作。原载《解放军文艺》1959年10月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年出版。

1940年夏，为了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消灭日寇，新四军挺进纵队遵照陈毅（剧中更名陈秉光）的指示，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迅速发展了革命力量和进步势力，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泰州二刘"，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斗争求团结，争取其中立，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了破坏抗日团结的反动派顽固分子，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有国民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剧本象一首激昂的战歌，热情歌颂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歌颂了陈毅和他领导的新四军。剧情紧张、热烈，扣人心弦，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人物个性鲜明。

话剧《蔡文姬》

五幕历史话剧。郭沫若作。原载《收获》1959年第3期，后收入《沫若剧作选》。

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文姬，在中原战乱中与家人失散，幸遇南匈奴左贤王，结为夫妇，生下一男一女。但她一直怀念故土和已故的父亲。曹操平定中原后，派董祀、周近为使节，前往南匈奴迎文姬归汉，以继其父业，续修《汉书》。于是文姬陷于国家、民族感情与抛儿别女的矛盾痛苦之中。后经董祀耐心表述曹操的"文治武功"和民族融合政策，文姬方消除了疑虑，决心以国家民族为重。同时左贤王也为之感动，文姬得以归汉。曹操偏听周近对董祀的诬陷，责令董祀自裁。文姬闻讯，面见曹操，仗义执言，澄清事实真相，使曹操收回成命。最后，曹操设法接回文姬的儿女，并出面作媒，使董祀、文姬成百年之好。剧本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和曹操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深刻主题。剧本入戏快，矛盾迭起，特别是文姬内心矛盾，缠绵悱恻，扣人心弦，饱含浓郁诗情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历史档案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二十二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一些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三月二十八日发布命令，除了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的武装叛乱，三月十日就开始了。达赖喇嘛原定在三月十日到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礼堂看戏。到军区礼堂看戏的事，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三月十日这个日期，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西藏叛乱集团到了这一天，却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且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

西藏叛国分子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这些叛乱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自从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以来，他们就蓄谋撕毁这一协议，准备武装叛变。由于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政策正确，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纪律严明，受到西藏各界人民热烈爱戴，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阴谋在藏族人民中得不到支持。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这是西藏人民所热烈欢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已于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但是，由于西藏地方

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中央为了等待这些反动分子的觉悟，还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告诉他们，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

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为噶厦，委员六人，称为噶伦。在六个噶伦中，两个是爱国分子，即阿沛·阿旺晋美和在三月十日被叛匪打伤的桑颇·才旺仁增。其余四人中，宇妥·扎西顿珠已在一九五七年叛离祖国，逃往叛乱分子在国外活动中心的噶伦堡；另三人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在这次也已经公开叛变。在这以前，这些叛国分子即已利用他们在噶厦中的合法地位，纠集上层反动势力，勾结外敌，实际指挥康藏两地一些最反动的大农奴主，在雅鲁藏布江以东、以北、以南若干地方，组织叛乱武装，反对中央，背叛祖国。他们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噶伦堡，其领袖为被撤职的前任藏王（藏语称为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他们的武器，不少是从外国输入的。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叛乱根据地，就有多次接受蒋介石匪帮的空投接济，还设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遣的许多特务电台，进行阴谋活动。

从去年五、六月间起，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就指示叛匪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并且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萨，打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的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因此，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他们在拉萨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武力以后，终于在三月十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

在三月十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中央代表在复信中欢迎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同时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负责平息叛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不但毫不悔改，还决心扩大叛乱。他们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并且在三月十九日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决的希望消灭了。西藏反动势力最后选定了使他们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进行讨伐。人民解放军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据初步统计，截至二十三日止，已俘获了叛军四千余名，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一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

拉萨叛乱的迅速平定，说明西藏叛国集团必然灭亡，西藏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首先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国分子。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人，而叛匪只有两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因为被欺骗裹胁而参加的，并且还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过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西藏人民绝大多数是极端贫苦的农民和牧民，他们迫切地希望从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西藏上层和中层也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他们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并且主张民主地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西藏逐步地变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地方。这样，西藏已有一个坚决要求解放的劳动阶级，和很大一部分赞成改革的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间派人士。目前的任务，首先是平息叛乱，建立和平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对于叛乱分子的方针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中央已指示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广泛团结一切没有参加叛乱的藏族同胞，负责保护西藏农牧工商政教各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对于俘虏和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许报复、伤害和侮辱。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

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鉴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尚被劫持，国务院决定在达赖喇嘛被劫期间，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并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阿沛并兼任秘书长。在西藏各地，一俟秩序恢复，都将陆续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并开始执行自治职权。在目前时期，自治制度与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制度同进并行。随着叛乱的平息，和平秩序的建立，自治制度将逐步完全代替军管制度。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把西藏的形势完全估计错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原载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

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原载1967年第13期《红旗》）

《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于1959年7月17日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决议首先阐明改革的重大意义。会议一致认为，西藏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现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决议说，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残

余的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会议认为中央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采取和平的方针，即在改革中，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和自上而下的进行协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决议指出，根据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实现民主改革应当分为两步走：首先是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和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为下一步分配土地打下基础。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决议提出，当前必须贯彻执行以下各项政策：

（一）、在农业区，对于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包括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对于未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包括其代理人）出租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同时应解放朗生（即家奴），改为雇工关系。对于三大领主在1958年以前放给劳动人民的债务，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在1959年放给劳动人民的债务，实行减息。

（二）、在牧区，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牧主的牲畜，仍归原牧主所有；对于参加叛乱的牧主的牲畜，仍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同时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减少牧主剥削，增加牧民收入。牧区债务，按农区办法处理。

（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在民主改革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寺庙中必须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对于爱国守法的寺庙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喇嘛的生活，由政府统筹安排，寺庙的收入不够正当开支的，采取补贴的办法予以解决。

决议最后指出：充分发动群众是实现“三反”“双减”和民主改革的关键。要求在工作中，必须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决打击叛乱分子和抗拒民主改革的反动分子，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农（牧）民协会。区以下的农（牧）民协会在民主改革期间，代行农村基层政权职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两年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由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为了使这些人以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进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现在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

（原载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决定说，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的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于12月4日特赦首批战争罪犯三十三名。其中包括有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三十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有二名；原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一名。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从9月下旬开始到12月为止，第一批特赦的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共一万二千零八十二人，其中特赦释放的反革命罪犯二千四百二十四人。普通刑事罪犯九千二百六十九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以及判处无期徒刑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共三百八十九人。

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建国10周年前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特赦令的发布，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具有重大的教育作用，使他们感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便有光明的前途。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分化瓦解和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

重大成就

1.《中苏经济合作协定》

1959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关于双方进行合作在1959年到1967年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器制造、电机制造、无线电技术、建筑材料等七十八个大型工业企业和电站的协定。这项新的协定是对现有的关于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业化的协定的补充。

协定中规定，苏联以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进行研究和设计工作、供应设备、仪器和某些专用材料，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在企业的施工、安装、调整和开工生产方面给予技术援助，并且接受中国的专家和工人到苏联的相应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学习。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发展机器制造业和培养本国熟练的工程技术干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方面将自行创造协定中规定的企业所需要的大部分配套设备，并且负担上述某些企业的勘察设计工作。

同过去的协定一样，这次协定也规定，苏联方面把规定由这些企业制造的产品的生产特许权无偿地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生产和制造协定中规定的企业所需要的配套设备。

协定中规定由苏联供应的设备、设计和其他各种技术援助的总值共为五十亿卢布左右。中国方面将根据中苏现行贸易协定，向苏联供应商品以偿付苏联供应的设备和技术援助。

2.中国运动员首次获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1959年3月，我国21岁的乒乓球选手容国团在联邦德国多特蒙特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力挫群雄，荣获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称号。这是我国在世界性体育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冠军。同时，我国还有4名男子运动员在这项比赛中进入前八名。我国男女乒乓球队从1953年开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我国男队被评为世界第一级第10名，女队被评为第二级第3名。短短六年过去，他们即一跃而成了世界知名的劲旅。这种快速的进步，反映了新中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景象。

3.容国团获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中国选手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了1959年世界男子单打冠军。

这次男子单打比赛集中了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四十多个优秀选手，容国团在这些名将的会战中，闯过八关，连败七将，其中包括一个前世界冠军、一个欧洲冠军、一个国家冠军、一个国家亚军。先后厮杀二十六个回合，才最后取得了世界冠军的光荣称号。

容国团的胜利打破了日本在世界男子单打这项比赛中操纵了多年的优势。

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规模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并检阅了体育队伍。参加开幕式的共有8万多人，其中有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各民族运动员7700多人。运动员中有工人、农牧民、学生、教师、干部、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战士等，来自汉、蒙、回、藏、维吾尔、壮、苗、哈萨克、朝鲜等20多个民族。绝大部分运动员都是新中国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的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包括了640名运动健将和2740多名一级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上，他们成批地刷新纪录，有664人、844次分别打破田径、游泳、举重、赛艇、射箭、飞机跳伞、航空模型、无线电、射击、航海模型等106项全国纪录；有7人分别打破了游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等4项世界纪录。在球类和其他各项比赛中，竞技水平也普遍提高，新军突起，人才辈出，取得了优良成绩。在整个竞赛过程中，各民族运动员们表现出了团结友爱、互相协作、胜不骄败不馁的高尚风格和优良的道德品质。

5.北京十大建筑建成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从1958年开始动工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于1959年9月建成。它们是：

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饭店。北京十大建筑物的迅速建成，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6. 人民大会堂建成

庄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经过一万四千多名建设者的创造性的努力，以十多个月的空前高速度施工，于 1959 年 9 月 24 日建成。

人民大会堂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它同天安门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相鼎立。轮廓完美、体型庄严，是北京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建筑面积达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体积有一百五十九万六千五百立方米。它由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五千个座席的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建筑结构十分复杂，装修工程的工作量很大，仅大理石、花岗石、水磨石、剁斧石等就有十七万多平方米。

人民大会堂，有各种现代化的设备。在顶棚、地下和四周墙壁，安装的声、光、电、空气调节和水暖等设备，有一千多个大小工程项目。各大厅、会议室和一些办公室的温度和湿度，都可通过电动的遥远控制的办法随时加以调节。热源有高压蒸气、高压热水和煤气。还有广播电视传真和拍摄电影等设备。通风管和风道全部穿行在地板下和顶棚、墙壁之间。大厅和会议室都按照室内装饰的特点安装照明设备。

这个规模宏大、设备现代化和有高艺术水平的建筑，是于 1958 年 9 月开始草拟设计方案，10 月底破土兴建的。这项工程是由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和三十多个市政建筑施工单位协作负责施工的。施工过程中，还有十八个省市的七千多名建筑工人参加了建设工作。他们团结一致，密切协作，有力地保证了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工程完工后，有关部门曾邀请全国建筑界著名专家组成竣工验收委员会，对这个工程分别进行综合验收和专门验收，专家们认为工程质量优良。

7.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1955 年开工建设，1959 年 11 月 1 日正式建成、投产。该厂建厂过程中，得到全国各地工厂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有 130 多个工厂为它提供了设备，近 600 个工厂为它生产了各种辅助材料，140 多个工厂为它培养和训练了干部和技术工人。该厂是我国第一流的、具有最新技术装备的拖拉机制造厂，有完整的生产体系，完善的辅助部门和服务系统。年产“东方红”牌柴油履带式 54 马力拖拉机 1.5 万台。该厂的建成和投产，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8. 重庆长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

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胜利建成，于 1959 年 12 月 11 日举行通车典礼。

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北接成渝铁路，南连川黔铁路，重庆成为这两条铁路的枢纽。这座大桥的通车，使我国的首都北京，通过京广、陇海、宝成、成渝和川黔等铁路，和边远的西南更紧密地连接起来。特别是四川和贵州两省之间的物资交流，对促进经济繁荣，将起巨大的作用。

过去，因为大江阻隔的川黔铁路没有修建，四川与贵州之间的物资运输极不方便。由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运往贵州的钢材、机器设备等往往要经过成渝、宝成、陇海、京广等铁路或由长江水运、再黔桂或湘黔铁路转运，差不多要绕半个中国才能运到贵州。由贵州和四川东南部运往重庆的矿石、煤焦、生铁等，运到重庆长江南岸后，全靠人力和木船运输，往往要辗转几天才能运到对岸的工厂区。白沙沱长江大桥通车后，就可大大改变四川、贵州两省之间运输不便的状况，增加运量，缩短运输时间和节约运费。

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完全由我国的技术员工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双线铁路桥。大桥全长八百二十米。从 1958 年 9 月开始动工，原计划两年建成。我国的桥梁专家和桥梁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冲天干劲和无穷智慧，坚决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先后实现了一万多件技术革新建议，使这座大桥只经过十四个月就修建完成，而且质量优良。

9. 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一月份统计，截至一九五九年年底止，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九千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七个省市。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七个省市区。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六个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七个省区。

(摘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指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跃进计划，同时又是一个建筑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上的可靠的计划。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敢想敢说敢做，同时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提倡实干、苦干、巧干的精神，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企业共增加新职工1,900多万人，(其中1,000多万来自农村)相当于原有职工的两倍。为了控制职工队伍的急剧增长，中央要求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各省、市、自治区1959年劳动力计划，必须报告中共中央批准。

2月2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指出：所谓十分指标，就是在可能范围内的最高指标。由于1959年的任务大大超过去年，这就更要求我们对于各项指标采取十二分的措施来保证实现。二十四分干劲就是要用双倍的努力去确保十二分措施的有效的执行。

2月7日　中央决定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将国家机关行政一、二、三级合并为一级，其工资标准降低为400元。从1959年3月起，一、二、三级的党员干部实行降低后的新工资标准；非党员干部的工资待遇，一律不予降低。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民公社要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的社论，要求各地建立"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主要是实行"四定一奖"制，即定生产指标，定投资，定上交任务，定增产措施，超产奖励；也可以实行"三定一奖"、"六定一奖"制，或者实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投资)制度。

2月27日～3月5日　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有制。他认为，必须首先检查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实际上否认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指出：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这些论述，触及了公社化错误的一些实质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规定以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农村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3月9日　毛泽东就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5日、17日，他又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及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问题给第一书记通信。毛泽东要求各地通过这些会议，要让广大农村干部了解当前人民公社遇到的主要矛盾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和办法；讨论如何保证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以便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吹共产风、脱离群众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学会善于想问题，做工作。

3月10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西藏地方政府中多数噶伦(即委员)与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破坏统一；杀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郎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等人；并且在3月19日夜间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于3月20日开始讨伐、平息叛乱。到11月，叛乱集团的主要力量被歼灭，武装叛乱基本平息。同时，我军进驻西藏边防。在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3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有破必有立》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除了对那些需要改革的规章制度继续进行改革之外，主要的任务应当是“立”，应当是把破了以后还没有立起来的规章制度立起来。

4 月 2～5 日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为全会作准备工作。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指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议修改和调整了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会后，受毛泽东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就落实钢铁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研究。

4 月上旬　中央将政治局通过的题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上海会议纪要，印发各地党委。纪要所列问题，主要是：①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时候，一般是以相当于原高级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凡是以几个原高级合作社并成的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如果群众不同意，就要调整过来。②基本核算单位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它对于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有固定的使用权，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能轻易调动。超过包产的收入，除按比例上交生产大队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归小队所有。③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要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县联社、公社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财产，或者公社、大队、生产队无偿调用社员私人的财物，都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④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力，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方面的，一般不应少于 80%；而经常用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的，不能超过 20%。

4 月 15 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第 16 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就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成员的名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成员名单交换了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准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以及准备在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以及西藏问题。

4 月 18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维汉作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并通过有关决议。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4 月 18～20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并批准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一致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会议通过的 1959 年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5 月 4 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颁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

5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在优质的基础上高产》。社论提出：在生产和建设中，必须提出严格的质量要求，特别是那些关键性的重要产品，尤应如此，否则就将造成恶劣的后果。要保证提高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健全企业管理工作，必须尊重科学，必须坚持政治挂帅。

5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部《关于 1958 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 1959 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决定将中央上海会议确定的 1959 年全国职工人数由减少 509 万人改为减少 800 万。工资总额增加 33 亿元，其中 8 亿元用于提高平均工资水平。《报告》强调要把增加人数和工资的决定权力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决不能放任自流。

6 月 1 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召开经济理论讨论会。会议联系农村人民公社化提出的新课题，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关于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问题；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交换关系的性质问题；③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6 月 15 日　毛泽东召集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今后 7 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

6 月　《学术月刊》发表平心《论生产力性质》一文。随后，7 月号《新建设》上发表平心《论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性质》，9 月号《学术月刊》上发表平心《再论生产力性质》。从 10 月份开始，在《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上就生产力问题展开了争论。争论围绕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

7月5日　毛泽东在看了李先念、陈国栋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以后，提出了几点意见，着重指出：①多种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要恢复私人菜园，酌给自留地。②农民要恢复糠菜半年粮，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要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③除灾区外，各地要增加牲口和猪的饲料粮。要在3、5、7年内，力争做到1亩田1头猪。

7月7日　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宣布在西藏地区使用人民币。7月29日，又决定进行以人民币收兑藏币工作。

8月2～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是继续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形势、今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体制问题、公共食堂问题、三定政策等共19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现在的领导工作岗位；同时，作出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断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

8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贯彻是不可能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财力和物力。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

9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的社论。同时，《红旗》杂志发表题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的社论。

9月14～17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是适宜的。9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这个建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

9月15日　毛泽东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会议，就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关于国庆10周年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进行座谈。

9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

9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谢富治任公安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和罗瑞卿兼任公安部长的职务。

9月26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登上天安门检阅台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庆祝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60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等。观礼的还有我国各民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和华侨、港澳同胞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大会举行了阅兵式和有70万人参加的群众游行。

10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逝世，终年75岁。

10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世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就1958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的郭月争《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提出不同看法，于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哲学界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否是对哲学根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概括，是否能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同理解；②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错误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③"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反映论"是否是哲学中认识论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

10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央指出，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包产到户"，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要求各地认真加以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10月26日～11月18日　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要求，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增产节约

运动。

11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要求各地找出一批典型材料，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彻底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目。从而使“反右倾”进一步扩大化。

12月4日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人民政府战犯管理机关对在押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全面的严格的审查，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首批特赦释放33名。其中原属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30名，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2名，原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1名。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和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发给职工一次“1959年跃进奖金”。发放范围，除“1958年跃进奖金”规定的行业以外，增加了学校、医院、科学研究、戏剧、电影等事业单位的职工。个人奖金，生产工人每人最高不超过本人半月的标准工资，其他职工每人最高不超过40元，学徒工每人不超过12元。

经　济

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发给职工一次“1958年跃进奖金”。奖金总额为1958年12月份(或11月份)1个月实支工资总额的1/2。个人奖金额，一般可发给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数额，学徒可以每人发给10元。厂一级党、政、工、团负责干部，不发给个人奖金。

1月2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鼓劲，不可松劲，要继续同所谓“观朝派”、“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会议提出1959年粮食产量要争取达到1.3万亿斤，棉花产量要争取达到1.2亿担，均高出于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指标。

1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冶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整个冶金工业计划，确定1959年全国生铁、钢材、铜、铝产量的增长速度，都比急剧增长的1958年还要高；重点建设工程达到100多项，基建战线比1958年拉得还要长。按照这个计划，燃料和原材料的供应，都成了大问题。特别是焦炭的需用量比1958年翻一番，靠现有炼焦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焦炭供应问题，会议提出了两条应急措施：一是突击建设简易炼焦炉。冶金部要求一个月内就赶制出这种简易设备，两三个月内就要建成投产。二是继续搞土窑炼焦，生产土焦。

1月下旬～2月1日　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以及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这次会议全盘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认为在我们国家“大跃进”不是临时现象，以后年年都会“大跃进”。前两个月压缩空气，松一点。现在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力争。同时，会议针对在个别方面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副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供应不足及原材料比较紧张的问题，指出1959年要抓副食品生产，抓轻工业生产，要优先发展材料工业，特别是重视发展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等采掘工业，使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保持适当比例。李富春在会上谈了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指出：总的说是“基本不变，个别调整”。各项工作的安排首先是为了确保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凡是与保证2,000万吨钢有关的指标和项目安排在前面，凡是今年承担了主要生产任务的建设项目要先施工。

2月6日　中央作出关于正确组织炼铁生产的几项规定。为了促使小高炉降低焦炭消耗量，加强经济核算，规定：①冶炼一吨生铁消耗的焦炭量，小高炉(包括土高炉)最高不应超过2,000公斤。②简易焦炉和土焦炉都应普遍用洗煤炼焦，保证焦炭质量。③保证加入高炉的矿石的含铁量不低于30～40%。④要在半年的时间内，把小高炉生产的每吨生铁的成本降低到200元左右。

2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报告》。报告中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公社的收入分配和加强公社领导等问题所提的意见，中央原则同意。报告说，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关键，在首先保证实现四大指标(钢、煤、粮、棉)的前提下，全面合理分配劳动力。要实现四大指标，又保证其他生产建设的发展，今年的劳动生产率要提高一倍左右。这就要采取大搞工具改革、改善劳动管理，做好政治工作等办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59年应保证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收入，其余的不减少收入；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一半。为了加强公社领导，用一个月的时间，使每一个公社都做好初步整顿工作。

2月7日　连贯贵州和广西的黔桂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干线全长605公里。

2月15日　中共中央批准1959年计划，并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及其附件，作为安排本年度工作的依据。中央认为，这个计划虽然注意了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但在实践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随时注意调整。《说明》提出，必须确保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所公布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完成，使国民经济在1959年能够继续有一个大的跃进。

3月1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陈云题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文章。指出，工业的布局，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一些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现代工业不能没

有分工和协作，在一个省、自治区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在布点上，应该把多数企业分散地建设在中小城镇或者有矿产资源的地方。在规模上，应该大量地兴办中小型的企业。他还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我们固然要争取速度，但是在质量方面绝不能有任何忽视。

3月2日　煤炭工业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了"全国煤矿职工红旗竞赛"广播大会。会议提出，全国煤矿职工永远要鼓足干劲，永远要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确保完成1959年生产3.8亿吨煤炭的任务。

3月1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企业隶属关系的通知》。指出：根据中央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不变，个别调整的规定，批准40个企业调整隶属关系。其中34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6个企业由中央有关部下放地方领导。4月28日，国务院又发出通知，批准46个企业调整隶属关系。其中21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1个企业由中央有关部下放地方领导，24个企业改由地方与国务院有关部双重领导。

4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7月15日以前，要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1959年以来，钢的日产水平一般在3万吨左右，赶不上计划日产4万吨左右的要求。为了把钢产量突击上去，书记处决定：从现在起到7月15日止，分三个阶段逐步把钢的日产量提高到5万吨。

4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以及整个工业生产建设问题。会议后，财经小组又反复研究了这些问题，在认真分析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的基础上，确定1959年钢材的可靠指标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5月11日和15日，陈云先后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了财经小组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他说，把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退到可靠的阵地，是为了扎扎实实的前进。

4月29日　毛泽东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各级干部的一封信，谈了有关农业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包产问题上，生产队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在密植问题上，要因地制宜，上面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在粮食问题上，10年内，切不可讲任何大话和高调。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抓得很紧很紧。要有储备粮。在播种面积问题上，目前几年应当实行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在作风问题上，一定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他指出，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4月间　陈云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同志。根据当年物资供应与购买力之间有四五十亿元的差额，着重谈了缓和市场紧张问题。①粮食是现在稳定市场的重要物资，一定要省吃俭用。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控制销量。②组织10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供应市场，弥补一部份差额。③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可以让他们恢复生产。④对上年多招收的1000多万工人，必须认真精简，安排到农村去。⑤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的运输力量，工业不要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此外，还谈了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

5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对私养家畜家禽等问题作出了规定。6月11日，中央又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和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等4个问题的指示。中央规定：①对猪鸡鹅鸭实行集体喂养与社员个人喂养并重的方针。生猪，应当80%－90%放到承包单位和私人喂养，只留少数由基本核算单位喂养。②恢复自留地制度。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面积的5%。③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种树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④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其收益完全归社员自由支配。

5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规定：在今后5月至9月内，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侨汇地区、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其他所有农村用油，一律暂时停止供应。

5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对农村分配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具体规定：①必须实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当占收入的60%左右，并且使90%以上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农业税、生产费用和公积金、公益金等各项扣留占40%左右。②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和奖惩制度。③继续推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在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中，工资部分要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要占30%－40%左右。某些收入水平过低、暂时无力实行供给制的地方，可以继续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

6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指出，1959年全国社会购买力超过社会商品可供量50亿元左右。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的主要措施是：①从本年6月份起，要求节约公用开支8亿元；6、7、8三个月中，除特殊情况外，暂时停止拨发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方面的经费。②本年内要把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减少800万到1000万，从而减少工资方面的支出15亿—18亿元。③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④动

员城乡居民积极储蓄。

6月1日　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工业工作部的报告，要求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中央工业工作部建议国务院各工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认真抓一下企业管理工作。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原有的和新建立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查和补充。对于某些必须由上级管理机关统一规定的规章制度和直接掌握的重大问题，有关机关应当尽快作出具体规定，发布实施。

6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调整后的钢产量（不包括土钢）1，300万吨，钢材900万吨，煤炭3.4亿吨，铜9万吨，铝7万吨，水泥1，100万吨，木材3，800万立方米。同时，国家计委对上述6种主要物资的分配计划也作了一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240亿元（其中留预备费18亿元）；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缩减为788个。

6月18～23日　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发展副食品生产应当实行城乡并举的方针。城市近郊区，以生产蔬菜为主，同时生产其他副食品；远郊区以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作物为主，同时发展畜牧业、渔业。在生产中，应当实行公私并举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它副食品的生产。关于手工业的发展，会议提出首先应当恢复过去被挤掉的、目前人民迫切需要的商品生产，同时考虑长远的市场需要。

6月23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公制为基本计量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原来以国际公制为基础所制定的市制，在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通用，可以保留。市制一律改为10两为1斤。

6月29日　毛泽东在庐山同一些领导同志谈经济工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方针问题，他说，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还说，过去陈云提过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6.5亿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关于综合平衡，他强调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关于经济管理，他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7月3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工作方面的几项决定》。规定：凡是1958年以来，动用银行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基本建设或者用于其它财政性开支的，都应当用财政款项归还银行和企业。根据中央指示，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过去的帐目作了清理。结果，1958年和1959年各地区、各部门动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作为财政性开支的款项共有100亿元，除已经处理的50.5亿元外，剩余的49.5亿元由中央财政负责归还39.1亿元，由地方财政和企业部门负责归还10.4亿元。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鉴于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出现春荒，中央曾在4月2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把城市的粮食销量压缩1/10左右，但未见好转。7月31日的指示要求，对粮食生产、收购、销售和管理等环节作出全面安排。确定1959年粮食定产为5，000亿斤原粮，定购为1，100亿斤贸易粮，定销为820亿斤贸易粮。从1959年起到1961年3年不变。

8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指示中提出的18条措施，一类属于调整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强调凡是转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对生产不利的手工业合作社，要采取适当步骤退回来；由小并大以后，不能保持原有品种和数量的，对人民生活不便的，要适当地划小。一类属于落实生产条件和供销渠道，指出所需要的原材料，基本上依靠地方安排，有些主要原材料由中央统一安排。再一类属于加强经营管理，强调应当对手工业按行业、按产品实行分工分级管理，应当实行经济核算。

8月26日　根据八届八中全会的建议，国务院提出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并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主要调整指标为：工业产值1，470亿元，钢产量（不包括土钢）1，200万吨，原煤3.35亿吨；农业总产值738亿元，粮食5，500亿斤，棉花4，620万担。其他工农业产品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8月27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决议要求，在1959年一年的时间里，就要在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方面，完成和接近完成原定1962年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同时，提出在从1958年算起的10年内，就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并且要大大提前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为了达到上述“跃进”目标，全会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的社论。

9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继续上收企事业单位。根据民航事业统一集中性较强、技术性较高的特点，中央决定对民航的各项事业实行统一集中管理。1958年6月下放地方管理的地方航线和农业航线，改为以中央为主的双重领导。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从1960年1月1日起，改变若干煤矿企业的管理体制，实行以煤炭部为主的双重领导。12月18日中央根据石油地质勘探多是大区域性勘探的特点，又决定除江西、福建、广东、

山西之外，收回1958年下放地方的石油普查队，建立区域性综合性的石油普查大队，由地质部领导。

9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规定：①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的第一类物资（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物资）和第二类物资（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以及某些国家规定有交售任务和第三类物资，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剩余的部分可以拿到集市进行交易。社员家庭和个人生产的副业产品、手工业品，不论属于哪一类物资，都可以在集市出售。②出售一、二类物资，一律执行国家牌价；其它物资，按照不同品种，分别实行国家牌价、限价或者议价。

9月24日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为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确定新上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使全年施工限额以上项目又达到1,000项以上。11月22日，又确定追加13.6亿元基建投资。国家投资总额又达到281亿元，重新回到4月上海会议确定的水平。

9月25日　我国石油勘探工人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油田以"大庆"命名。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投入开发，打破了大油田只能在"海相地层"（即古代是海的地方）才能找到，我国是"贫油国"的说法，使我国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

9月：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数万名建设者经过近一年的奋战，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先后在北京建成。

10月10日　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提高大豆、花生、甘蔗、甜菜、菜油的收购价格，以促进这些产品的生产。收购价格提高以后，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提高了销售价格。

10月15日　我国自制的第一种直升飞机——旋风25型直升飞机，开始成批生产。这种直升飞机设有现代领航和驾驶设备，可以在夜间或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安全飞行。它在飞行的高度、时速和载重量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0月16日　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将各地根据八届七中全会调整计划的精神，降低一些偏高的指标，视为一个"小小马鞍形"。会议认为，还有1/10的工业企业右倾没有反透、干劲没有鼓足，仍然处于落后状态。要求在第四季度，要使工业总产值完成486亿元，保证全年完成1,600亿元。钢、生铁、煤炭生产都要求超过全年计划指标。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指出，①要充分利用人民公社优越条件，组织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搞大江大河治理、中小河流域规划和开发。②贯彻以蓄水为主、社办为主、小型为主和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方针，全面规划、综合利用。③兴修水利季节性很强，全年80%的任务要集中在冬春完成，要做好劳力安排。④"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水管好，用好，充分发挥水的作用。并要采取措施，制止灌区盐碱化，争取二、三年内对已经盐碱化的加以改造。⑤开展冬季积肥、造肥运动。此外，还对搞好水土保持、解决牧区人畜饮水问题提出了要求。

10月25日～11月26日　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研究了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研究确定了编制计划的方法和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提出，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预计增长26%（其中工业增长31%，农业增长17%）；钢1,840万吨，煤炭4.25亿吨，发电量555－580亿度。粮食6,500亿斤（不含大豆），棉花6,000担，猪3亿头。基本建设投资340亿元，限额以上项目1.596个。财政收入700亿元。会议研究了支援农业问题。1960年供应农业的生产资料总值可达100亿元，比1959年预计增长33%；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为39.1亿元，比1959年预计增长78%。银行增拨人民公社贷款5亿元。

10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工业生产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庐山会议以后，运动发展得很快很猛，在生产、财贸各个战线上有些问题也露了头。是否头脑有点开始发胀，要注意。中央决定1959年减少职工600－800万人，9月底已减少500万人，但下面又开始招工。要注意控制。

11月1日　我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在洛阳举行落成典礼。该厂是1959年开始动工兴建的，年生产15万台54马力"东方红"牌柴油履带拖拉机。

11月21日　重庆长江大桥已经全部建成。经验收证明，工程质量优良，决定提前交付使用。它是继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横跨长江的第二座大桥。大桥北接成渝铁路，南接川黔铁路。全长820米，是一座双线铁路桥。

11月22日　我国试制成功了4台电动机车和内燃机车。它们是"韶山型"电力机车，"卫星型"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巨龙型"电传动内燃机车和"先行型"电传动内燃机车。

12月8日　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中指出，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建议各级党组织对养猪业认真地研究，采取措施，并组织一个畜牧家禽业委员会或小组去领导。把猪升到六畜之首。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我国一定要走这条路线。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来源就解决了。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

12月25日　浙、皖、苏、沪四省市关于人民公社过渡（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问题座谈会结束。

会议提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对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必须进行适当控制。

外　交

2月18日　我国同越南在北京签订《关于中国政府给予越南政府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关于中国政府给予越南无偿援助人民币1亿元的换文》、《关于中国政府1959年援助越南政府的议定书》、《关于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1960年到1962年的长期贸易协定》等七个文件。根据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无偿援助的换文等文件规定，我国将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3月3日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郑州签署关于两党的联合声明。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了签字仪式。

3月6～18日　应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邀请，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贺电。

3月14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和设宴招待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及其夫人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3月19～25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40周年庆祝典礼。朱德在庆祝会上发表讲话。

4月1日　根据今年2月中朝两国签订的航空协定，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4月24日　以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公安部的邀请，前往上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

4月27日～5月7日　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为首的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9月1～12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次、第7次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已存的现状，而不应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一部分争执的地方，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协议，以保持边界的安宁。报告严正谴责了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边界纠纷，掀起的反华运动。

9月8日　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复信，阐明我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的立场。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

10月11日　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公报。两国外交部长认为，凡有可能在亚非国家间造成隔阂的问题，均应按照万隆会议的原则以友好方式加以处理。在印尼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过程中，应该寻找适当的方法，解决定居在那里的华侨的经济地位可能受到影响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印尼经济的发展和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受到尊重。

10月24日　我国政府就联合国大会14届会议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挟持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声明郑重指出，西藏是我国的领土，平定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完全是我国内政，任何国家和组织都无权过问。

11月10日　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信中建议两国总理近期举行会谈。

12月9日　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写信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严重抗议印尼最近发生的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并提出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三点建议：①两国政府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同时讨论和规定实施这个条约的办法；②切实保护自愿保留中国国籍或者选择印尼国籍而未获批准的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③对于流离失所或不愿继续留印尼的华侨，我国政府准备安排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希望印尼政府分批分期遣送他们回国，并保证他们归国途中的安全。

文化教育体育卫生

1月2日　新华社报道：1958年我国教育战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到90%以上。和1957年相比，幼儿教育增加了20倍以上，小学增加40%以上，各类中等学校增加了一倍

多，高等学校增加70%以上，工农业余教育也有成倍的发展。

1月25日　《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作了很高的评价。2月19日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3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史学界、文学戏曲界的注意，并展开了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曹操是否是民族英雄，是不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曹操谋求中国统一是否违反了历史规律，舞台上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可否不一致。经过讨论，多数人基本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但在提法和舞台处理上还有不少分歧。

3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1958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中央决定，1958年以来新建的高等学校，凡是招收的学生是初中毕业或高小毕业程度，教学计划以及新开课程是中等学校水平的，应当分别改为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应当分别改为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或初级中学和初级技术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但修业年限不满两年的，分别改为专修班或干部训练班。

4月6日　我国21岁的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中，以3比1战胜9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匈牙利选手西多，荣获世界冠军称号。这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从1927年举行以来，中国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的称号，也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5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出：为了逐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指定北京大学等1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学校。1960年，又两次决定新增加重点学校共48所。至此，全国重点学校达64所。

7月7日　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33名登山运动员（女8人，男25人），于北京时间下午6时20分，攀登上慕士塔格山顶，创造了全队集体安全登上海拔7,500米以上高山人数最多的新的世界纪录。打破了1956年7月31日，中苏混合登山队的31名男子登山队员第一次攀登这座山峰时获得成功的世界纪录。

9月13日～10月3日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届运动会进行了42项比赛和表演赛。有7名运动员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名运动员844次打破106个单项全国纪录。

9月14日　我国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这架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运算1万次，能精确算出极复杂的计算问题。这是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其他有关部门、工厂以及研究机关合作研究试制成功的。

10月18日　邓子恢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发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文章认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各地实行过的三包奖赔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提成奖励、减产者赔），是适合目前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责任制。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0年

导　言

1960年是在“更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再度刮起之中开始的。1月7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又一次规定了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的高指标。会后，在“大跃进”、“反右倾”的形势下，各省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致使“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困难地区，并降低供应标准，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渡过经济困难。6月24日到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苏共代表团对中共进行全面进攻。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7月上旬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并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上出现的反华浪潮，中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中国登山运动员首次登上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庆石油工人举行了石油勘探大会战，打出了中国第一口油井，结束了中国没有石油出产的历史，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在11月上旬至12月1日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
- ●中国登山队员首次登上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
-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
- ●我军炮轰金门举行反美武装示威
- ●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

背景介绍

庐山会议后，在广泛发动起来的反"右倾"运动中，为了"反击"国内外对"大跃进"运动的所谓"诬蔑"，表明反"右倾"对革命干劲的鼓舞和经济建设的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又对生产建设的各项指标进行了不断加码，从而形成了1960年上半年的"更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再度刮起。1960年国民经济因此而遭受严重的困难。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采取措施，包括降低供应标准、采集制造代用食品、精减职工人数，压缩社会购买力等以渡过经济难关。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缓解"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大路进"错误的认识也逐渐深化起来。196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几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初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任务。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终于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材料：

- ·严重经济的困难
- ·为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而奋斗
- ·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
- ·大种瓜菜

材料一　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并且发生在1958年的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尚未得到基本缓解、全国许多地区又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之时，因而造成了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第一，农业、轻工业下降。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膨胀，主要生产指标太高，加上"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的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2126万担，减产1292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3405万担，下降50.9%。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下降了28—60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第二，粮食极度缺乏。严重缺粮问题1960年5月就已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6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主要城市也只能销8、9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虽然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和6月6日等几次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但是，粮食的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11月，中央确定调运粮食24亿斤，有关省、区却只完成14.5亿斤。同月，北京、天津、上海共销售粮食5.7亿斤，而调入的粮食却只有3.7亿斤。实际上，当时实在是没有多少粮食可供调运。据统计，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仅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样一减一加，再加上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使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以至于不得不压低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

至于农村，缺粮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

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了35%以上。另外，串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竟高达30%。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了1000万人。

第三，市场供应紧张。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战线太长，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也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324.1亿元。加上巨额赤字，1960年的社会购买力就从1957年的675.1亿元猛增到716.7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的市场供应出现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紧张的状况。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社会商品零售额7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年终未实现的购买力总额达到了176.4亿元。

1960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人均消费量，粮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农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猪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镇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农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减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1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

第四，财政赤字严重。“大跃进”的错误，还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危机。1960年1至6月，财政收支还比较正常，但到7、8月间，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月份收入53亿元，比上月减少12亿元，下降17.3%；8月份，又比7月份减少2.3亿元，下降4.3%。到年底，国家财政收入共572.3亿元，支出654.1亿元，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0.8亿元，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1957年上涨了25.4%。

如果说，在1960年初总结1959年的工作时党中央还认为国民经济比例正常、市场繁荣稳定、1960年应该继续“跃进”的话，那么，面对1960年中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就不得不再度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并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大跃进”战略是否正确的问题。

（摘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

材料二　为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而奋斗

1960年7月，党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次会上首先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随后，李富春同志在研究1961年计划时，又进一步发展为“调整、巩固、提高”，就是说国民经济计划要按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安排。向周总理汇报以后，总理提出在“调整、巩固”后边加上“充实”两个字，于是就完整地形成了八字方针。同年9月30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这个方针，还向全党作了宣布，并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八字方针呢？八届九中全会公报说，提出八字方针是“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后有些同志又说是鉴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些当然也是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三年“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客观经济规律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此前，人民生活等都比较好，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建设规模搞得大了一些，市场和人民生活有点紧张。为了使稳步增长，1957年适当调整了一下前进的步伐，提出注意防止急躁冒进，这本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后来说是“马鞍形”。1958年初，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会后，又连续“反右倾”。1958年3、4月，成都会议更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妥的人。总理和陈云都为1957年的反冒进做了自我批评。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8月，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比例失调，主要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从1958年开始的。经过连续三年的瞎指挥，国民经济到1960年其基本比例已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突出的表现是：

粮食严重不足；基本建设规模太大，没有后续力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设备损坏严重，许多企业无法继续生产；工业和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浪费惊人，损失严重。这五个方面，突出反映了提出八字方针时的经济状况。说明再不调整，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调整，是由于三年“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破坏了比例关系。

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但当年并没有执行，就在1960年12月中央仍然发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1961年，由于高级干部中对形势认识不一致，有些同志害怕反右倾，害怕被说是对三面红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因此尽管那时已认识到不调整无论如何是不行了，但仍然不敢大胆调整，所以，这一年调整不狠，耽误了一些时间。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把问题捅开了，经过讨论，认识开始走向一致。同年2月，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研究了财政赤字和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对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如何调整也做了研究，陈云同志在《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一、把今后的1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恢复，第二阶段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要3至5年，在这一阶段工业要放慢速度，投资要减少。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用于农业。六、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要把注意力从工业交通转到农业和制止通货膨胀上来。同时，提出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每人供应3斤黄豆。供应范围由小到大。要在城市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搞些山珍海味充实高级饭馆等。

同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并要求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完成。

中央成立了由杨尚昆、习仲勋等同志组成的中央精简小组，负责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等事宜。

3月，召开了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首次总结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这次总结尽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做了一些过分的估计，与当时存在的实际困难很不协调，但毕竟对当时困难的主要原因做了分析，这对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当时的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这些看法只在内部讲了讲，没有对外公布，所以全国人民还是不知道的。

根据一系列的会议，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在1962年5月，就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系统地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对如何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做了非常具体的安排。中央财经小组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在报告中又系统地陈述了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八大困难。

中央财经小组提出，对整个国民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像现在绷得这样紧。财经小组的争取经济形势根本好转的指导思想是要退的多，争取快，准备慢，采取的措施是继续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对工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报告，对彻底地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那么，那时究竟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除了在农村进一步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以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在城市恢复奖励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恢复多种规章制度等以外，就经济工作本身来说，调整的内容主要是：

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整顿了秩序，整顿了经济；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基本完成。总理详细地论述了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总理又提出，在1965年中，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1966年开始进行第3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摘自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

材料三　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国际上，我们党同苏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发展，大论战日趋激烈和公开；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政府也一再掀起反华合唱。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为克服暂时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在国际上坚决顶住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打退了美帝和印度政府的进攻。

为着克服暂时困难，党中央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贯彻政策，克服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在中央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具体工作条例，如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九十五条，教育六十条、科技十四条，等等。中央统战部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起草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文件。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了有七

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会议前后，又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在为克服暂时困难而进行艰巨斗争的三年中，我们和各级统战部门在中央和有关党委领导下，适应暂时困难时期国内外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等方面，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促进改造对于保持和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加强全国的团结，使全党能够集中力量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迅速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贡献。

从一九五九年进入暂时困难的开头一段时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反右倾"运动正在党内开展，由于连年"大跃进"和掀起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上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等"左"的错误做法的连续不断的冲击，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他们对于国内形势和当时称作"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怀疑、不满以至抵触；对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党大论战有很多疑虑和担忧。在生活上由于供应紧张，也有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当时的阶级关系，如何看待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多数人的紧张？成为当时统战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性问题。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多数和少数、主流和支流；区分落后和反动、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等等，判明了多数人的基本动向，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紧张：一种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引起的紧张，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另一种是由于我们革命和建设工作急躁前进的"左"的错误而引起的紧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的紧张，是属于后一种性质。他们是跟而不是反。现在看来，他们的紧张，固然有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的某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无法跟上，不可能不感到紧张。但在当时，我们主要是强调了他们世界观上的原因。针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这种基本动态，我们在统战工作中一般地实行了主要方面抓紧，次要方面放松的方针，主动缓和同他们的关系。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的前提下，政治上予以信任，工作上使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为了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向党外人士提出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同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切实纠正过去由于"左"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得人心的事，认真贯彻政策，增强团结，尽可能地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领导周围，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同努力；使极少数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陷于孤立。由于判明了形势（是跟不是反），提出了任务（改造世界观、进行形势教育），采用了新方法（神仙会），因而逐步出现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不仅为保持这条战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调动了党外人士和积极性，为克服暂时困难增加了助力。实践证明，我们在暂时困难时期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

（摘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

材料四　大种瓜菜

"头伏萝卜，二伏菜"，现在正是大种瓜菜的季节。各地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组织人民公社、生产队和广大社员以及机关、学校、企业，千方百计地大种瓜菜。

自从今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蔬菜工作的指示"以来，各地党委进一步加强了蔬菜生产的领导，许多地区春播和夏播的蔬菜面积都比去年有所扩大，农村大部分公共食堂种的菜也比去年多，入夏以来市场蔬菜供应量不断增加。这说明今年蔬菜生产形势很好。但是，这还不够，还要把蔬菜生产搞得更好，还要大种特种瓜菜，作到农村人民公社不仅蔬菜自给，还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并有更多的蔬菜供应城市；各个城市也要努力作到蔬菜自给或基本自给。有些地方提出城市人口每天吃到一斤以上蔬菜的奋斗目标，是很好的，可以作到的。最近北京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种菜群众运动，农村人民公社从各个方面抽调了大批劳力，机关、街道、水利工地抽调了大批支援力量，纷纷赶赴蔬菜生产前线，力争管好夏菜，种好秋菜，上海市和广西、青海、云南等省、区，也都在大抓蔬菜生产。一个全国规模的夏季大种蔬菜的运动已经形成。

努力增加蔬菜生产，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措施，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了，不仅需要更多的蔬菜，而且需要质量更好的蔬菜。蔬菜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主要是由蔬菜供给的。多吃蔬菜，实行粮菜混吃，既能增加营养维护身体健康，也能节约粮食。今年我国的自然气候很不正常，有的地方在去年大旱之后，又遇到了严重的春旱；有的地方降水太多；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又遇到了强台风的袭击。虽然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人类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的今天，严重的

自然灾害毕竟还会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损害。瓜菜是一种生长快、产量大的作物，多种瓜菜对于挽回前一时期由于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有巨大作用，对于防止可能出现的灾荒，也有巨大的作用。有些受灾地区已经提出了每人要有一千斤红薯、二千斤菜、一千斤胡萝卜和一千斤代食品的奋斗目标，这是很好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实现。一切有灾的地区都应该这样做，无灾地区标准虽然不一定这样高，但也要大种瓜菜，同时大晒干菜，大腌咸菜。

夏季是大种蔬菜的理想的最好季节。夏季气温高，雨水充沛，蔬菜生长期短，收获快，产量高。各地要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自然条件，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大种瓜菜高潮。各地领导干部应该深入公社、生产队检查夏菜播种情况，切实帮助解决扩种夏菜中的劳动力、种子等具体问题。凡是没有完成播种计划的地方或种得不足的地方，都应该赶快突击抢种，力争完成计划，把夏菜种足；已经完成播种计划的地方，也应该利用一切休闲地，通过间作、套种、混作等办法，增加蔬菜夏种面积。天津市郊区各人民公社，利用秋季前的留白地，加茬套种快熟菜三万多亩；河南内乡县在群众性的大种夏菜高潮中，利用零星空闲地和开荒地种瓜菜近四万亩；浙江嘉兴专区从5月份以来，发动群众利用田边地角等零星杂地扩种夏菜达九万多亩，这说明各地种植瓜菜的潜力是很大的。在大种瓜菜中，要尽可能多种一些南瓜。南瓜是一种既耐旱又耐涝的作物，是一种不择土质到处能种的作物，而且产量高，用途广，容易贮存。南瓜既可以作菜，又能当主食；既可以用来制糖、酿酒，又是很好的精饲料。

蔬菜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一样，种和管是紧密相连的。在大种瓜菜的同时，要加强蔬菜田间管理，提高单位产量，力争实现高产多收。今年许多地区都增加了一部分新菜田，许多瓜菜又是种在开荒地和零星土地上，更需要加强管理。田间管理的中心是水、肥、保(治虫)。要勤浇水，多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保证夏菜生长健壮。在大种夏菜的同时，还要准备秋菜生产，把播种面积落实，把劳动力安排好。把肥料、种籽等生产资料准备好。

努力增加夏菜生产，这不单是重要的经济任务，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不只为了当前改善人民生活，也为了促进畜牧业和农业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应该像抓粮食一样抓蔬菜生产。现在，夏季丰收已经到手，广大社员正在信心百倍地夺取秋季大丰收。全国各行各业也掀起了支援农业的高潮。这些都是增产夏菜的有利条件。只要加强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一定能够把夏菜种好管好，把秋菜生产工作准备好，争取全年蔬菜大丰收。

(原载1960年7月9日《人民日报》)

中国登山队员首次登上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

背景介绍

珠穆朗玛峰高耸于喜马拉雅山之巅，是世界第一高峰，海拔8848.13米。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在我国著名的登山家、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率领下，开始向这座世界第一峰进军。他们冒着漫天的风雪，踏过陡滑的冰川地带，穿过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区域，翻过尖削突兀的岩山峭壁，经过三次高山适应性行军，最后在珠峰海拔8300米的高度建立起营地。

1960年5月17日，中国登山运动员开始了进军主峰的拚博。经过一周的艰苦行军，三名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终于在5月25日凌晨北京时间4时20分集体安全登上珠穆朗玛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上顶峰的创举，在新中国体育史上翻开了光辉的一页。

材料：

- 立志攀上最高峰
- 登山英雄夺取顶峰战斗经过
- 珠穆朗玛山中的日日夜夜
- 在攀登珠峰中五十三名登山英雄打破全国记录

材料一　立志攀上最高峰

喜马拉雅山上传来胜利的消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被我国登山运动员征服了。登山队员们踏上海拔八千多米的世界高峰，这件事情使人们感到兴奋、愉快，也从中得到了启发，受到了教育。我们的思想好像随着登山队员们的步伐，攀上了高耸天际的山峰，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广阔的天地。

我国登山队员从北坡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可算是攻下了地球上的"尖端"，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创举。近半个世纪来，外国的登山家望着这座高峰跃跃欲试，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能从北坡攀登上顶峰。然而，我们攀登上了。请看，那连飞鸟也通不过的山巅上，不是已经留下了祖国英雄们的足迹了吗？真是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在英雄的中国人民的眼里，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登山队员们不是只凭着身强力壮才攀上世界高峰的。他们身上那股强大力量，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有着

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出千万倍的革命志气，有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如铁似钢的革命毅力。高峰耸立在眼前，敢不敢去征服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登山英雄们有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世界高峰在他们面前也变得渺小起来了。看看那些险恶万分的自然环境和条件，英雄们的凌云壮志和革命气概就更加使人敬佩不已了。万年的积雪、陡峭的冰墙、险恶的原始冰川，嘶叫的旋风，巨大的雪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这一重重的困难中，随时都会遇到危险，每一步都可能掉进万丈深渊。但是，登山队员们凭着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凭着他们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坚强信念，凭着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把这一切都征服了。英雄们的凌云壮志，使得珠穆朗玛峰巍峨的山颠低头了，狂风暴雪驯服了，英雄们的双脚从险恶的冰雪中踏出了一条通往世界高峰的道路。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证明，任何困难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征服的。“有志者事竟成”，革命者的脚下，道路是无限宽广的。

登山队员的英雄行为，正是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的反映。我国人民要攀登的不只是这座八千多米的世界高峰，而是千千万万座崇高而又艰巨的世界高峰，是一切科学技术文化的高峰。“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国人民正像那些英雄的登山队员一样心怀大志，鼓足干劲，向着一切世界高峰的光辉顶点迈进，立志要攀登上所有世界上的高峰。

（原载 1960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登山英雄夺取顶峰战斗经过

三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登山英雄，在返回中国登山队海拔五千一百二十米的大本营后，向新华社记者叙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夺取顶峰的战斗经过。

5 月 24 日北京时间九点半，运动健将王富洲、运动健将屈银华、运动健将刘连满和一级运动员贡布四个人，离开中国登山队设在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五百米山坡上的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地”，开始了征服珠穆朗玛峰最后一段险峻而艰苦的旅程。

他们前进不久，就遇到了二、三十年前曾经使英国“探险队”碰了壁的著名的“第二台阶”—座落在达海拔八千五百七十米到八千六百米之间、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的岩壁。

四个人奋力登到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时，遇到了最后约三米垂直而光滑的岩壁。这时，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刘连满在前面开路，他用双手伸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向上攀登，但四次攀登四次失败。这时，就决定用搭“人梯”的办法，让战友们踏在他的双肩上进行攀登。当他们全部登上“第二台阶”的顶部时，才发现这垂直光滑的约三米高的岩壁，竟使他们花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当天傍晚，当他们上升到海拔八千七百米的高度时，他们带的人造氧气已经剩下很少了。刘连满因为过度疲劳，体力已经非常衰弱。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这三名共产党员立即停下来举行党小组会，决定刘连满留下，由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继续前进。

天已经黑下，三个人依靠着微弱的星光，顽强地继续前进。

深夜，当他们到海拔八千八百三十米时，三个人所带的人造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他们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氧气没有了，但我们能后退吗！屈银华和贡布坚定地说：继续向前。他们抛掉空氧气筒，用坚定而迟缓的步伐继续向前。

头痛、眼花、气喘、无力这一切高山缺氧的反应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但他们仍然相互鼓励地前进着。

在越过一片点点白雪的岩石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喜马拉雅山脉群峰的一座座黑影，都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在他们的头上，只有星斗，再也没有可攀登的山岩。

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沿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登上了它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顶峰。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 5 月 25 日北京时间清晨四点二十分。经过了近十九个小时的搏斗，他们忍受着缺氧和摄氏零下三十多度严寒的煎熬，已经异常疲劳了。王富洲、屈银华的四肢也已受了冻伤。

但是，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变得那样兴奋和激动。

藏族队员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了登山队员们托他带上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小型白色毛主席石膏像。他把国旗和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到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

这时，王富洲摸着黑，拿出一本“体育日记”本，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

“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

1960 年 5 月 25 日四时二十分”。

（原载 1960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珠穆朗玛山中的日日夜夜

世界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多少年来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它那陡峻的山岩高耸在遥遥的天际，乳白色的浮云飘游在它的脚下，纵深的峡谷里倾泻着一望无垠的原始冰川，巍峨的山岭上覆盖着积存万年的白雪。有时，嘶叫的旋风刮得天昏地暗；有时，巨大的雪崩震撼

得地动山摇……。

近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探险队多次远涉重洋，试图由这座巨山的北路攀上它的峰巅，但每次攀登都宣告失败。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被西方登山者认为是地球上一个难以接近的"神秘地区"。

但是，今天，在珠穆朗玛峰北路"难以攀登"的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地带，中国登山健儿们搭起了一座座银色的帐篷；在被称作"白色死神"的珠穆朗玛"雪崩"区域，中国登山健儿们踩出了通向顶峰的大道；在被称作"飞鸟也不能通过"的珠穆朗玛顶峰上，中国登山健儿们留下了人类的足迹。

为了彻底揭开珠穆朗玛峰的秘密，中国登山健儿们在珠穆朗玛峰变幻莫测的山岭间，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日日夜夜……。

山地灯火

深夜了，珠穆朗玛山下风雪弥漫。

登山队大本营绝大部分帐篷里灯火已经熄灭，队员们早就钻进了能御严寒的鸭绒睡袋。

但在大本营正中的一座帐篷里仍然灯火通明，人声喧闹。在用装罐头的木箱堆成的"方桌"周围，一堆人正聚精会神地商量着什么。

这是登山队队部在开会。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身体结实的中年人——登山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史占春。他是我国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之一，几年来曾不止一次地率领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征服了许多座险峻的山峰，多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遭受过雪崩的袭击，掉下过危险的冰岩。艰险吓不倒他，死亡威胁不了他。史占春一边静听着别人的发言，同时也不时地提出各种问题，并把别人的意见记到笔记本上。

坐在史占春对面的是登山队副队长、运动健将许竞。如果从表面上看，怎么也不能想像这个"文弱"的青年人，却是我国登山运动界的一员虎将。他很少讲话，只会埋头苦干。在每一次登山活动中，许竞几乎都担负侦察路线和为大队开辟前进道路的艰难任务。

许竞刚刚汇报了由他率领的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的情况。现在，队部要根据他们侦察的资料，研究并选择一条通往北坳的最安全的路线。北坳顶端拔海七千零七米，这里完全是"冰雪世界"，万年积雪和巨大的冰墙，挡住登山者的去路。过去，许多外国探险队都在北坳碰了壁。因此，这一地段被视为攀登珠穆朗玛的第一道难关。

队部领导干部们仔细地研究着地形图，低声地交换着意见，最后终于采纳了侦察组的建议，从四条路线中选择出一条最好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要越过四条冰裂缝和四段很陡的冰坡，但可以避免"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会议还估计了在这条路线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讨论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保证登山队顺利通过，征服北坳。

阵阵风雪从帐篷缝隙钻进，一股股刺骨的寒风使灯光吹得忽明忽暗。人们继续讨论着，从全面的登山活动计划到生活小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作出了恰当的安排。

这些领导干部虽然白天整天都在工作，这时候也多么想躺下来休息休息，但他们知道，他们几个人少休息一分钟，整个登山队的工作就会提高一步。因为，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这样光荣又这样艰巨，他们一想到这里，就又精神抖擞了。

急　报

在大本营里，人们围聚在一张巨幅的天气图前。

天气图上，一道道黑色曲线表示的低压寒潮，从遥远的北极圈移到了中亚细亚大陆，又移到了绵延起伏的喜马拉雅山区。

各种气象仪表指示，二十四小时以后，珠穆朗玛峰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九级狂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

可是，两天前已经上山的登山队员们，根据计划，正巧将在二十四小时以后，从海拔六千四百米的营地出发到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地带。恶劣的天气会给登山队员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大本营的同志们顿时紧急动员起来，必须想办法把预报迅速传送到山上去。

无线电报务员在预定的联络时间，开始同海拔六千四百米的营地进行紧急联系。但是，天空中除了静电摩擦的"劈拍"声外，听不到对方电台的回答。报务员罗家谯焦灼地敲着电键，长时间地呼叫着对方的呼号。他已经顾不得寒冷和疲倦。他知道，这次电报对山上的战友们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预定的联络时间过去了，罗家谯的手指从酸痛变成麻木，但他仍然没有听见对方的回答。凭着长期的高山工作经验，他想，如果对方只是发报机失灵而收报机是完好的，就有可能收到他的电报。因此，他毫不灰心地坐在发报机前，一边呼叫，一边拍发电报的内容：

"注意！注意！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七千米以上地区天气将要恶化……"

为了使对方能准确地抄收，罗家谯不厌其烦地将每一个电码重复拍发了好几遍。他多么希望，他的劳动将能给山上的战友们带去平安和胜利……。

尽管这样，大本营的同志们仍然放心不下，万一山上的电台收听不到呢？第二天天不亮，共青团员魏广福和谭克元，就顶着风雪出发了。他们要步行到海拔六千四百米的营地，把天气预报送给战友。从海拔五千一二十米的大本营到海拔六千四百米营地，上升的高度将近一千三百米，中间要经过陡峻的山脊，危险的冰川地带，全程达十

七公里多。登山队员们在平日的正常行军中,需要走三天。但这两个从小生长在江南平原上、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今天却背着冰镐,决心在一天内走完三天的路程。

他们的呼吸愈来愈困难了,双腿愈来愈沉重了。他们的眼前迸散着金星,汗水从他们的额头淌下。

刺骨的旋风卷起茫茫的粒雪迎面打来,他们来不及转身就被风雪掷倒在地上。

天黑了,魏广福和谭克元又冷又累又饿,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了,再爬起来。他们忍受着满身的酸痛,一步一步走去。他们想,即使脚抬不起,用两只手也要爬到同志们的身边。

当他们到达海拔六千四百米营地时,已经是子夜时分,风雪刮得更大了。他们把天气预报亲手交给了自己的战友,他们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是他们的嘴边显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他们到达以前,虽然在海拔六千四百米营地上的同志已经从无线电报里收到了这个消息,做好了安排,但对这两位青年战友的到来,仍然表示了最大的尊敬和感谢。

开路先锋

茫茫的云雾遮盖着北坳的顶端,陡峭的冰坡上,阵阵狂风卷起了密云般的积雪。

几个黑色的人影,正在风雪中艰难地移动。这是登山队的侦察队员们在为大队开辟安全通向北坳顶部的道路。北坳是珠穆朗玛峰北坡上的一道峭壁,矗立在珠穆朗玛峰北峰与主峰之间,四百米长的冰坡使它像城墙一样挡住人们的去路。在它的冰坡上,隐藏着无数雪崩的槽印,几乎每年都发生过巨大的冰雪崩。近三十年来,北坳的冰雪中不止一次地倒卧过外国"探险家"的尸体。

要登上珠穆朗玛顶峰,首先要攻破北坳这座"难关"。

运动健将许竞、彭淑力、刘连满等六名优秀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侦察小组,冒着珠穆朗玛山中恶劣的天气,向北坳进发了。

在不测的冰雪和岩石上寻找一条通向主峰的道路,没有向导,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人走过;也没有地图,因为还没有地理学家对它进行过绘测。只有依靠侦察队员的双眼,找到安全的地带;只有依靠侦察队员的双脚,从冰雪中踩出道路……。

侦察队员们拿着冰镐,鞋底上绑着尖利的冰爪,一个跟着一个,向上攀登。在这里进行侦察,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如果不注意保持身体的重心,一阵旋风会把你卷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粉身碎骨;如果不注意选择脚下的路线,掉进纵深的冰缝,就连人影都找不到;如果不认清地形,沉重的雪崩会把你埋葬。但是,勇敢的侦察队员们彼此保护,彼此帮助,采用各种登山技术,以每小时上升八十米的速度前进着。

风雪更大了。从高空刮下的暴风,撞击着主峰和北峰的岩壁,带着冰渣和粒雪以每秒三、四十米的速度回旋着,翻滚着。侦察队员们穿着高质量的鸭绒衣裤,戴着特制的防寒帽和手套,仍然感到严寒刺骨。为了争取时机,给大队开避道路,侦察队员们顾不上休息,仍然顶着风,匍伏在冰面上坚持向北坳的顶部挺进。

现在,他们来到了一道冰裂缝前。这条冰裂缝狭窄、深陷、坡度在七十度以上,像一个"胡同",必须从这个"胡同"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的顶端。

运动健将许竞和彭淑力用背紧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运用最复杂的攀登技术,一寸一寸地向上方移动。这个动作需要全身用力,不到两三分钟,他们全身就被汗水湿透,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没有坚强的意志,只要稍一放松,就会摔落下来。他们咬着牙,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向上攀登。这个不到三十米高的"冰胡同",竟使他们花费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攀登上去。

当他们到达北坳的顶部时,天已经黑了。这时,他们才想起,他们已经在风雪中搏斗了十多个小时,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忍受着寒冷,忍受着疲劳,但终于胜利地找到了一条绝对安全的路线,打开了攀登珠穆朗玛峰顶的第一关。

冰峰雪塔间

山脚下,岩石旁,河谷里,峰岭间,到处是高耸的森林般的冰峰雪塔。有些像尖削的宝塔,高插天空;有些像婆娑的古树,伸展着枝桠;有些像巍峨的宫殿,分布着整齐的亭台门户;有些像汹猛的瀑布,一泻万丈。但它们都像水晶一样透明,像银子一样洁白,像波涛一样闪耀光辉,像宝石一样绚丽多彩。

这是在漫长的年代形成的珠穆朗玛峰奇异的冰雪世界。

在这里,你看不到那活跃奔跑的喜马拉雅野羊群,也听不到那高翔的云雀的鸣叫。没有树木,甚至连那紧帖在石缝里的藓苔和野草也找不到。长达数十里的峡谷里,除了茫茫的冰雪和令人难忍的严寒看不到别的东西。

今天,中国的登山运动员们就在这里的冰坡上,支撑起一座座银灰色的帐篷,建立了整整齐齐的帐篷"村落"。在两座冰柱中间两根帐篷杆上系着鲜艳的红绸,构成了帐篷村落的彩门。巨大的岩石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欢迎你们,登山英雄们!"

在登山运动员还没有开始进行高山适应性行军以前,大本营的后勤工作人员就不辞劳苦,在珠穆朗玛峰的丛山峻岭间,建立了许多座帐篷营地,储备着充足的食品和燃料,为登山运动员们创造了舒适的休息环境。

登山运动员们感激地把营地称作"高山饭店"。

每当登山队员们踏雪蹬冰，走完了一天的行程以后，人们就可以在帐篷里点起汽油火炉，从"仓库"里领到特制的干燥饭、成都的鸡蛋挂面，内蒙古的炼乳，拉萨的牛羊肉，北京的鸡蛋和酱菜，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食品罐头和水果罐头，凭各人的喜爱，做出美味的南方米饭和北方的水饺。

在每座高山营地上，都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登山队员们亲热地把他们叫作"经理"。

在海拔五千九百米的营地上，担任"经理"的是一个朝气勃勃的青年人、北京地质学院四年级学生纪克诚。怀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几年来，纪克诚同登山队员们一起到过许多座山岭，为国家找宝藏。现在，他又在珠穆朗玛山中"安家落户"，一方面为登山队员们服务，一方面利用空闲攀岩走壁，探测这座山峰的秘密。

现在，在纪克诚的登山背包里，装满了珠穆朗玛山坡上多种多样的岩石和矿产标本；在他枕头边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他对珠穆朗玛峰观测和考察的结果。

无论是在晴朗的清晨，还是在风雪的深夜，纪克诚都要住在这深山的低矮帐篷里，听冰川的暴裂和风雪的咆哮。但是，纪克诚并不感到孤单，也不寂寞，虽然这山谷里异样的荒凉，但他正紧紧地与祖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事业里。

红色救急包

在滚石垒垒的峭壁上，在四顾无边的雪地里，在险陡的冰崩地带，在深邃的冰裂缝旁边，无论登山队员们走到哪里，青年医生吴永生就背着红色救急包跟到哪里。

吴永生是我国一所医科大学里的教师，他的身体并不很好，但为了保证登山队员们的健康，两年来，他背着药包，扶着冰镐，与登山运动员们一道，出入在祖国高山地带。在每次行军途中，吴永生一会儿走到队伍的前列，一会儿又留在队伍的后边。他一面抹掉满脸的汗水，一面喘着气为队员们治病。别人问他："累吗？老吴！"他总是谦和地笑着说："没啥！没啥！"

当队伍在营地休息下来，别人在喝茶吃饭的时候，吴永生却背着药包从这个帐篷出来，又走到那个帐篷里去他挨个儿询问队员们在高山上的反应，为他们检查内脏、测量体温和脉搏。别人问他："饿吗？老吴！"他仍然笑着说："没啥！"

有一次，吴永生跟随登山运动员们出发到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北坳冰坡顶部去正遇着一场少有的大风雪。由于长时间的高山行军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吴永生感到剧烈的头疼和恶心，但是，他仍背着药包，踩着绳梯，往六、七十度的冰坡顶端攀去。绳梯在空中摇晃着，他的眼前朦胧一片，他的双腿软弱而颤抖，他的双臂麻木而疼痛。有好几次，他真想停下来，哪怕就在冰坡上躺一躺也好啊。但当他望见登山队员们正在他前面顶着风雪前进时，他想：我是医生，我要保护同志们的健康，我怎么能抛开他们不管？不！一定要上去，上去！他终于与登山队员们一道到达北坳。

吴永生不仅为登山队员们治病，同时还认真地进行着高山生理和医疗的调查研究工作，准备为祖国医学界整理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高山生理和医疗的经验。这个刻苦耐劳的青年医生，受到了全体登山队员们的爱戴。不管冰山多么险陡，也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只要这个红色的救急包出现在登山队员的行列中，人们就感到安全和力量。

（原载 1960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在攀登珠峰中五十三名登山英雄打破全国纪录

中国登山队在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一共有五十三名运动员到达了海拔七千六百米以上的高度，打破了七千五百九十米的我国男子登山高度的最高纪录，这个纪录是由运动健将史占春等六人 1957 年在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

中国登山队是在去年年底组成的，全队共二百一十四人（包括后勤等工作人员），其中一部分参加登山活动，除有三人达到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顶峰外，还有二十五人达到了海拔八千一百米以上的高度，这是世界登山史上罕见的成就。

这次打破全国纪录的五十三名运动员和他们所达到的高度是：

到达海拔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共三人：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

到达海拔八千七百米一人：刘连满。

到达海拔八千六百米二人：史占春、王凤桐。

到达海拔八千五百米十二人：许竞、多加（藏族）、石竞、拉八才仁（藏族）、邬宗岳、群贝坚赞（藏族）、索南多吉（藏族）、米马（藏族，战士）、云登（藏族）、茨仁（藏族）、米马扎西（藏族）、却加（藏族）。

到达海拔八千一百米十人：张俊岩、刘大义、衡虎林、成天亮、马保昌、多吉甫（藏族）、谢武成（藏族）、塔木君（藏族）、扎西（藏族，三十三岁）、米马（藏族、石匠）。

到达海拔七千六百米二十五人：陈三、王富葆、曾曙生、雷耀荣、多吉、（藏族）、索郎（藏族）、罗布（藏族）、丹增（藏族）、洛桑（藏族，战士）、桑珠（藏族）、扎西旺堆（藏族）、嘎吉穷白（藏族）、达娃茨仁（藏族）、扎西（藏族，二十五岁）、扎西（藏族、二十七岁）、扎西（藏族，三十四岁）、穷达（藏族）、达娃同珠（藏族）、洛桑（藏族，农民）、边安民、搭木真（藏族）、张小路、边巴茨仁（藏族）、茨旺（藏族）、扎

旺(藏族)。

(摘自1960年6月2日《人民日报》)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

背景介绍

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中部，介于哈尔滨市与齐齐哈尔市之间。1959年9月26日，中国石油勘探工人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3号井喷出了油流。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全国人民双喜临门，因此取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组织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并且陆续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石油厂矿、院校中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几千名科学技术人员和千万多名职工参加这个大会战。经过一年的勘探开发，到1960年底，大庆地区就探明了全部油田面积并大体计算出了储油量，对大庆油田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材料：

- 一部艰难创业史
- 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

材料一 一部艰难创业史

全国解放前夕，我国陆上只有玉门、独山子、延长三个油田和四川石油沟、圣灯山两个气田，以及东北的几个人造油厂和少量的原油粗加工装置。全国只有八台破旧钻机、五十二口油井，只有八千多名职工。1949年，原油产量仅为12万吨，其中天然油7万吨，人造油5万吨。就在这样极端薄弱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石油工业开始了生气勃勃的然而也是艰苦的振兴时期。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就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派了大批优秀的军队干部转业到石油战线，领导和组织石油职工，开展了重建油矿的工作。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玉门、延长油矿和东北人造油厂的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生产原油43.5万吨，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32万吨的1.3倍。

为了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主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命令中说："我们将在光荣的祖国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党中央在解放初期采取的这个重大措施，为石油队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石油工业，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新中国石油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面对茫茫大地，究竟何处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中找油?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贫油"，而我们自己又缺乏经验，缺乏资料，处于一个艰苦的探索时期。广大石油职工肩负祖国的重托，怀着矢志振兴中国石油工业的愿望，首先在西北的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区内，转战戈壁沙滩，不畏艰难险阻，主要靠榔头、罗盘，靠露出的油苗，靠地面地质工作，通过钻探，先后发现了新疆克拉玛依、玉门鸭儿峡、青海冷湖等油田，建设起建国初期的几个石油生产基地。与此同时，还着手建设兰州炼油厂，扩大东北页岩油和四川天然气的生产。到1957年，全国生产原油145.7万吨，比1950年增长6.3倍。但是，我国依赖"洋油"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石油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为了摆脱石油工业的落后局面，根本问题是要大力展开勘探，发现新的油气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同志，十分关心石油工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1958年主管石油工业期间，专门听取了石油部的汇报，指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石油勘探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处理好战略、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分别轻重缓急，选准突击方向。这对指导当时西南、华北、东北几个大盆地的勘探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国十周年前夕，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境内的一口探井(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依据这个地区的区域地质勘探资料，松辽盆地北部很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1960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门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组织全国三十七个石油厂矿、院校的人力和物力，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

这场会战，是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打上去的，是依靠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取得胜利的。会战第一年打了一场艰苦的勘探仗，基本探明了油田的面积和储量。随后又用两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了这个大油田。到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实现了我国石油的基本自给。同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结束以后，我国即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我国陆相地层中首次发现大油田，使人们思想获得一次大的解放。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

潘钟祥、谢家荣、李春昱、黄汲清、张文佑等，曾经从地质理论上指出，我国（包括东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而大庆会战又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从而打破了那种认为“中国贫油”的悲观论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国石油发展前景的估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不仅拿下了一个大的油田，而且锻炼和培育了职工队伍。以“铁人”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会战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志气，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精神，胸怀全局、忘我劳动的风格，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作风，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这种在党的领导下，几万名职工的充沛干劲、创造精神和主人翁责任感，对赢得这场会战的胜利，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的建设是“两论起家”，通过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基本经验，对推动石油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大庆油田基本建成以后，石油勘探队伍进入渤海湾地区，在渤海之滨的盐碱荒滩上，开展了为祖国找油找气的又一场艰苦战斗。这个地区的石油地质条件，与松辽盆地有很大不同。由于地质上的多期构造运动和多期沉积，以及断层，切割的影响，使各种不同年代的生油和储油地层在地下互相交错迭置，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存在多套地层和多种类型的油气藏之中。这种复杂的地质情况，对年轻的石油勘探工作者来说，又是一场新的探索和考验。

经过十多年工作，在整个渤海湾地区的九十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包括辽宁、河北、京津、河南、山东等六个省市，首先发现了胜利、大港油田，随后发现了辽河、华北油田，后来又发现了中原油田。这是继松辽盆地发现大庆、吉林油田之后，在我国东部地区发现的第二个大的含油气区。这两个油区的形成，使石油工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石油生产重点由西部向东部转移，就近供应东部工农业发达地区的需要。

在此期间，我国炼油工业也获得相应发展，先后建成了催化裂化、延迟焦化、铂重整等一批炼油装置，加工技术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到1965年，我国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所需的石油产品，无论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实现全部自给。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时期，石油工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石油战线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努力排除干扰，坚守生产岗位，没有一个油田停工停产，为了保证国家必需的能源供应，在当时石油勘探工作难以展开、储量增长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各油田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为国家多产原油。1966年至1976年，全国原油产量从1454万吨增长到8715万吨，平均每年增长720多万吨，对于支撑当时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石油生产建设继续取得进展，从1978年起，全国原油年产量突破一亿吨，我国进入了世界主要产油国家的行列。

（节自《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
原载《光辉的成就》上册）

材料二　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

我国石油工业今年又获全面丰收。到十二月十一日，全国原油产量已经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油品的，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

今年石油工业给农业、轻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的一些产品：硫铵、炭黑、洗涤剂原料、石蜡、沥青等，也都提前一个多月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产量比去年分别增长了18%到35%。

石油的品种也比过去增加了。现在全国已能生产好几百种石油产品，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两倍。过去依赖进口的许多高级石油产品，这几年都已试制成功和正式生产。油品合格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使用性能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各项指标。

由于石油产量和品种迅速增加，现在我国需要的石油产品，已经可以基本自给。我国过去一直是依靠国外进口“洋油”；现在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在大量增加石油生产的同时，今年石油工业的建设规模也大大超过往年。仅新建成的炼油装置总加工能力，就比去年新建的增加了四倍多。这些工程质量都很好，经国家验收被评为优良级的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很多重点工程都是一次试车投产成功。如已在今年建成由我国自己设计和建设的大型炼油厂，建设时间比过去建设的同类炼油厂缩短了将近一年，投资省，用材料少，并且充分采用了我国炼油工艺技术的最新成就，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比较先进，建筑安装质量全部达到了国家标准。

今年各地石油企业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因而，不但月月季季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也普遍提高。据前三季度的统计，全国钻井、采油、炼油等各项可比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中，已有四分之三超过历史先进水平。

（原载196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我军炮轰金门举行反美武装示威

背景介绍

炮轰金门的战斗最早始于1958年夏。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使用了一个“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办法，既达到惩罚美国人介入的目的，又保证蒋军对金门的补给。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并在我方认为需要的时候，就来真格的。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我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当即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并搞了一次“万炮轰瘟神”的大规模的炮战。国内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武装示威运动。

材料：

- 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 万炮齐发轰“瘟神”
- 炮轰“瘟神”　还我台湾
- 狠打瘟神
- 请听听中国人民钢铁的声音吧

材料一　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在17日下午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全文如下：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同过去的杜勒斯一样，向来对你们不怀好意。一年多以前，杜勒斯到你们那里去对你们施加压力，要你们服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把台湾完全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我们打了炮，你们抵抗了美国人，杜勒斯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野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台、澎、金、马一切爱国同胞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名声越来越臭。不久以前，艾森豪威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受了美国很久很深的压迫，对美国的反抗也最猛烈。艾森豪威尔这次从太平洋东边跑到太平洋西边来，就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侵略阵地，加强它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压迫。对于这么一个“瘟神”，人们是知道应当怎样“欢迎”他的。这次艾森豪威尔宣布要“访问”的地方，到处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艾森豪威尔是硬着头皮来的。切不要以为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多么厉害。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起来一轰，就叫美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就把美国的两个忠实走狗李承晚、曼德列斯赶下了台。美国在日本驻扎了重兵，岸信介卖国政府死心塌地要跟美国订立军事同盟。可是日本人民不答应，一次斗争接着一次斗争，闹得天翻地覆。艾森豪威尔被英勇的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他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已经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台、澎、金、马的爱国同胞，你们当然不能容许艾森豪威尔在你们头上耀武扬威。三年前，你们捣毁过台北的美国“大使馆”，这是反美爱国斗争的光荣纪录。当美国的忠实走狗，随人俯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知道，你们并不甘心忍受美国的欺侮。美国人在那里策动“台湾自治”，制造反对派，已经使你们伤透脑筋。事到紧急关头，美国人不会对他的走狗讲什么义气。李承晚、曼德列斯，就是前车之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人，看了这种情况，能不寒心？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坚决斗争。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一切不愿意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台、澎、金、马爱国同胞，一定都会赞成。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特此事先说明。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只，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近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

（原载196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万炮齐发轰“瘟神”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强大的炮兵部队于6月17日晚八时向蒋军盘踞的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进行了强大示威炮击。震天动地的隆隆炮声，掀起了台湾海峡强大的反美风暴。

开炮前，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站广播的前线司令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指出：这次炮击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

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

在福建前线炮兵阵地，祖国英雄的炮兵战士和参战的英雄民兵们一齐上阵。命令一下，霎时间，万炮轰鸣，无数道弹光划破台湾海峡夜空。英雄们激昂地高呼："艾森豪威尔滚回去，开炮！""美国侵略者滚出台湾去，开炮！""滚出日本去，开炮！""滚出朝鲜去，开炮！""滚出亚洲去，开炮！""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领土台湾，开炮！"愤怒的炮火，像倾盆大雨落在金门岛上。

被美国战争祸首艾森豪威尔到亚洲策划新战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活动所激怒的英雄的福建前线军民，今天纷纷集会、座谈，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向正来台湾途中的"瘟神"艾森豪威尔，向美国侵略者表示严正的抗议。他们说，中国人民反对战争贩子艾森豪威尔到台湾来！美国侵略者不滚出台湾，中国人民决不罢休！

到发电时止，反美示威大炮击还在继续进行。

（摘自196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炮轰"瘟神"　还我台湾

艾森豪威尔在国际舞台上究竟担任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和平使者"？还是世界人民的公敌？这是早已明白了的。传说瘟神是专门散布病疫、祸世殃民的。首恶不除，大难不止，人们向来把这个凶煞当成死敌。用瘟神这个象征罪恶的称号，加诸美帝国主义及其代表艾森豪威尔，使它既富有与人民为敌形象性，又揭示了这个凶煞的僵死腐烂、外强中干的本质。

不管瘟神多么巧于装扮，但是瘟神毕竟是瘟神，人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总会认清它的面目。记得半年之前，艾森豪威尔还是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呢；可是半年来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特别是亚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形势的新发展，把这位凶煞的衣冠剥了个精光。人们极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木雕泥塑，也极清楚地看透了它的充满病毒的肺腑，全世界人民正在深恶痛绝地揭发它的罪恶，使这位凶神无地自容。

这次，艾森豪威尔远东之行的丑态百出，绝对不是因为行色匆忙，来不及装扮，而是由于亚非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迫使这个"瘟神"原形毕露，无法装扮了。看远东不少的被压迫民族的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烈火到处烧起，只烧得"瘟神"坐不住白骨殿了，于是急心出巡，准备后事。难道它不曾料到此行不吉么？作贼胆虚，当然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它不敢行却又不得不行，强盗总是挣扎在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和这种不可摆脱的悲苦命运之中。举世腾笑，四面楚歌，菲律宾人民的石头，日本人民的闭门羹，中国人民的万炮齐轰，使这位硬着头皮"旅行"的瘟神只好抱头鼠窜了。坏事作尽，面子丢光，进退维谷，丑形毕露，就是瘟神此行的最好写照。

凡是晓得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人，谁都知道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950年6月27日美帝国主义公开武装侵占台湾以来，再过几天就是整整十周年了。十年来，美国侵略者妄想制造"两个中国"，以实现永远霸占台湾的阴谋，并且在台湾海峡猖狂备战，加剧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十年来，美国侵略者野蛮地摧残台湾同胞，屠杀掠夺，穷凶极恶，把我国一座美丽富饶的宝岛变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艾森豪威尔这次悍然闯进台湾，坚持推行美国强盗集团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制造远东紧张局势，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6月17日和6月19日，金门前线万炮齐发，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是极其集中地反映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强意志，同时，也极其集中地表示了伟大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蔑视、鄙视，充分表现了伟大中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威力。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是决不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前乞求和平。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通过多年反侵略斗争的实际经验，最懂得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的道理。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一定要解放台湾，坚决实现祖国的统一！

（作者马少波，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6月18日）

材料四　狠打瘟神

在日本人民的铁锤下，岸信介不敢出来跪迎美国主子，叫艾森豪威尔碰了锁头。这是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一大胜利，这叫世界人民看清：艾森豪威尔的确是瘟神，非狠打不可，而且只要打的狠，连瘟神 也得取消预备好了的偷入东京的直升飞机。你不怕他，他就怕你！这也叫世界人民看清：不管修正主义者怎么卑躬屈膝地给艾森豪威尔脸上搽粉，身受其害的日本人民却看得十分清楚，瘟神就是瘟神，不管他脸上搽了多么厚的粉。我们应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敬！

中国人民早就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他是美帝的头子，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他到台湾，我们就万炮齐发，驱除瘟气！台湾是我们的，必须收回！我们不许瘟神霸占我们的领土，不许他加紧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我们有六亿多爱国人民，有百发百中的大炮，有反美帝的决心与经验，必能打倒瘟神，收复台湾！

修正主义者说艾森豪威尔也讲和平。呸！艾森豪威尔不老老实实坐在家里，而到东方来散瘟放毒，正是加紧备战、加紧侵略的疯狂表现。他的确疯狂，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刚刚破坏了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又到东方来兴风作浪！好吧，他既来了，我们就叫他抱头鼠窜地滚回去！打倒无恶不作的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头号代表艾森豪威尔！坚决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六亿多人民的爱国的表现与决心！让我们与全世界所有反美的人民团结起来，乘胜前进，坚决斗争，瘟神必会灭亡，人民必定胜利！

（作者老舍，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6月18日）

材料五　请听听中国人民钢铁的声音吧

台湾海峡向来多风多浪，波涛汹涌。艾森豪威尔知道这点，可万万料想不到这次竟会遭到那么大的风险，差点儿叫惊涛骇浪把他卷进太平洋里去。瞧啊，海水像山似的立起来，海峡上弥漫着一片浓黑的烟雾，而空中又震动着多么可怕的声音啊。却原来是中国人民特意为他安排好的隆重仪式，“迎接”他“光临”台湾。

中国人民是最讲礼节的。你来的时候，用大炮迎你；你走的时候，也不会忘记用大炮送你。“欢送”的礼炮又是那么激烈。简直好像直轰到艾森豪威尔的后屁股上，轰得他翻斤斗滚出台湾去。

这个海盗头子这次到远东来做“亲善访问”，事先煞费苦心，安排妥当一个精彩无比的节目。他认为自己将会像一个征服世界的天王似的君临远东，到处接受的将是鲜花和欢呼。艾森豪威尔绝对没想到事情竟会糟到这步田地。在菲律宾、在冲绳岛、在南朝鲜，处处碰壁。这还不算，顶叫他懊恼的是日本，顶叫他胆颤心惊的就是中国人民了。

预定在日本的访问，本来应该是他这次出行的高峰。在那里，他准备拿着地球当高尔夫球，跟那个老侏儒岸信介玩上一场球赛。日本人民却偏偏跟他做死对头。尽管岸信介从希特勒的阴魂得到亲传的衣钵，使用法西斯手段对日本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结果竟像火上加油，激起日本人民更英勇的斗争：抗议、示威、罢工、罢市，反对他艾森豪威尔到日本去访问，反对日美新“安全条约”……声势那样壮大，最后到底推翻了那个卖国首相岸信介。至于这个“瘟神”呢，还算他见机的早，垂头丧气地取消了访问日本的计划，才没遭到他的“先行官”哈格蒂一样的命运。这件事自然弄得他和美国政府丢人现眼，声誉扫地，可是又有什么法儿呢？就是他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愿意拿着自己的老命到火山口上去冒险。

在台湾，真弄得他有点儿魂梦不安。从中国大陆上发出的那狂风暴雨般的炮火，把他脚下的土地都震得乱颤。这不是炮，这简直是中国人民发出的山摇地动的怒吼。每一发炮都在指着鼻子斥责他艾森豪威尔，每一发炮都在对着他的耳朵发出鄙视的冷笑。

美国海盗仗着第七舰队强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说什么台湾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拿着它当跳板，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跟中国人民为敌，跟亚洲人民为敌。殊不知这只“不沉的航空母舰”竟是个要命的大套索，套得美国海盗脱身不得。当艾森豪威尔拖着两只沾满血污的臭脚，踏上台湾，刚一伸头，他那又细又长的脖颈子就伸进套索里去中国人民把绳子扣儿只那么轻轻一拉，就勒得艾森豪威尔透不过气来，差一点憋死。

现在艾森豪威尔虽然侥幸从远东逃脱，溜回他在太平洋东岸的老巢，他却永远也逃不脱中国人民的炮火。那炮火就是中国人民的吼声，中国人民的每一声怒吼也像炮弹似的照直击中艾森豪威尔的脑顶心。炮声和吼声连成一片，一齐向美帝国主义轰着，轰着，一直要轰到我们解放自己祖国的领土台湾。

这种巨大的响声也在震动着整个世界。菲律宾、南朝鲜、日本、以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哪儿会听不见呢？这响声给了各国人民莫大的支持，给了他们有力的鼓舞，使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战斗着。亚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懂得，这不仅表现出中国人民强大的力量，更表现出整个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强大无比的力量，对于像美帝国主义这样人面兽心的野心狼，说人话他是不懂得的。请听听中国人民钢铁的声音吧。

（作者杨朔，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6月19日）

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背景介绍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在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这样，中苏关系出现了重大裂痕。

材料：

· 我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

· 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断合同，撤走专家

材料一　我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

6月17日，我党以彭真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参加会议，19日到达布加勒斯特。22日晚，我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谈，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我党，并突然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苏共中央6日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通知书"的中文译本长达八十四页，是苏方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的。6月24日，十二国党代表团召开会议，赫鲁晓夫带头操纵会议对我党发动了突然袭击，一些代表团根据苏共的"通知书"，宣读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发言稿，围攻我党。6月25日、26日，五十一国党代表团召开会议。苏共领导散发诬蔑、攻击我党的材料，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形式发言，对我党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

我党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了苏共领导违背两党协议，玩弄阴谋诡计，对我发动突然袭击的卑鄙伎俩。指明我党对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曲解、污蔑都是无用的。我党代表团发表了严正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谴责苏共领导破坏宣言、违反协议、以老子党对待兄弟党的恶劣态度。我党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支持。为了顾全大局，我党代表团在会议公报签了字，同时，在26日，发表了书面声明，严厉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中的作法，在国际共产产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

材料二　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断合同、撤走专家

1958年7月，苏联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海军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我国，遭到中方严正拒绝。此后，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地中断了345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同。此外，还决定在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的短短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中国政府多次进行挽留，然而苏联政府始终坚持其决定，蛮横无理，说撤就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苏联方面又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

风　云　人　物

林　伯　渠

林伯渠（1885—196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名林祖涵。字伯渠，湖南临澧人。一九〇四年入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学习。一九〇五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日学生规则罢课回国。曾在长沙创办振楚学堂。一九〇七年到吉林任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一九一一年回湖南，在新军和巡防营从事兵运工作，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一九一三年任讨伐袁世凯军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逃亡日本。不久回国。一九一六年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湖南督军署秘书、湖南省财政厅长等。一九一九年冬到上海、广州，创办《革新评论》，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林伯渠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改组国民党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九二

四年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一九二七年三月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任军委秘书长。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研究院和特别班学习。一九三〇年毕业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政府国民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办事处主席、特区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四〇年和吴玉章等组织并领导新文字协会，大力推广拉丁新文字。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北京病逝。

王　进　喜

王进喜（1923—1970）劳动模范、大庆油田工人。甘肃玉门人。一九三八年在甘肃玉门油矿当徒工。学徒期满后留玉门油矿做工直至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玉门油矿钻井队队长。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〇年春，王进喜率一二〇五钻井队到东北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他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工作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群众誉为“铁人”。一九六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任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等。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北京逝世。

材料　王铁人的故事（节选）

王铁人，是大庆人对王进喜同志的亲热称呼。

在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中，王铁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以“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豪迈誓言，带领英雄的一二〇五钻井队，创造了全国钻井进尺的最高纪录，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六十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中，王铁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斗，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甩掉我国石油落后帽子的伟大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铁人”。

王进喜是带着一股子什么气来大庆的呢？

一九五九年，王进喜代表英雄的一二〇五钻井队到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一次，他看见马路上汽车背个包来回跑，感到奇怪，就问别人：“这是哪国造的，上面背那家伙干什么？”人家告诉他，因为咱们国家缺油，汽车没油烧，烧的煤气。王进喜听了，心里就象锥子扎的一样。真急人啦，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没有汽油烧还了得？作为一个中国的石油工人，能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能让帝国主义看我们的笑话吗？

可那时候，偏偏就有些人说“中国贫油”，只能靠“洋油”过活。这种论调说起来还满有点历史渊源呢！早在一九一四年，有个美国佬来到中国考察石油时就说：“中国没有石油。”过了六年，一个艾·斯达金的美国人又公开地说：“中国石油储量极其贫乏。”到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反动派又“请”来一个美国石油“专家”，这家伙吃饱喝足之后，装模作样带着一伙人跑到戈壁滩上，打了几个窟窿，放了几眼炮，最后只说了句：“建议你们忘却了吧！”就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贫油国”的帽子，一直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大量的“洋油”搜刮着中国人民的血和汗！

王进喜在旧社会，受尽了阶级苦，民族苦和中国贫油落后的苦。他下决心要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一听有人说“中国是贫油国”这样的论调就非常气愤。他说“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在外国的地下，不埋在我们的地下。”凭着他多年的实践经验，他一直相信中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相信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王进喜和全队工人到达大庆车站。

他们来到大庆火车站。眼前呈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到处堆满了器材，到处挤满了人。人们高声喊着——湖南话、四川话、甘肃话、北京话、上海话……好像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个小站上来了；再加上火车的吼叫声，汽车的喇叭声，马的嘶鸣声，器材的撞击声……把个小站给搞得热气腾腾的。

王进喜到会战指挥部打听，调度员说钻机还没运到，要他们继续在原地休整待命。看着眼前这派紧张热烈的战斗场面，王进喜心想，石油工人从天南海北赶来会战，为的是早打井、早出油，甩掉“贫油”帽子，发展我们自己的石油工业，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和大家一商量，决定全队人员留在车站，帮助卸运器材。

他领着队员们来到一列载着庞大的泥浆泵和钻井器材的平板车跟前，第一个跳上车厢，一边解绳扣一边对大家说："先别管是哪个队的，是来打井采油的都往下卸！"他们七手八脚地卸起来，一口气就把一车器材卸完了。接着，这个井队的大架子来了，那个井队的小架子也来了，他们担子拣重的挑，一个个都帮着卸了下来。站上来货多，人手不够，他们就帮着铁路工人卸下了成车的煤炭和成堆的行李……不几天，王进喜领导的"义务装卸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车站。

站台上立刻出现了一片龙腾虎跃的激战场面。什么棕绳、撬杠、铁管、圆木……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用上了。人们拉的拉、抬的抬、扛的扛，硬是用肩膀和双手，把六十多吨重的钻机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了几十里外的井场上。

王进喜奋力扛着钻机，操着浓重的甘肃口音，唱起了自编的号子：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都不怕。
…………

"嗨嗪——嗨嗪""嗨嗪——嗨嗪"雄壮的号子声，在大庆草原上回响，就像进军的号角，震得天摇地动！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王进喜和同志们把钻机装上了钻台。朱副指挥看见王进喜右肩突起很高，知道他肩膀给压肿了，紧紧握住他的手，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天一夜的紧张安装，四十多米高的井架巍然屹立在草原上，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擎天柱。王进喜让工人们把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金光闪闪大字的红牌子挂在井架顶上，让它永远鼓舞一二〇五队战斗！

钻井设备已快速安装完毕，水管线还没有接通。钻机没有水，就像人没有血液一样，动弹不得。王进喜心似火燎。他想干革命不能等，时间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就是要快摆硬上。他对大家说："没有水，我们端水也要开钻！"

端水？几十吨水上哪儿去端？要端多久？用什么来端？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井队的面前。有的人不同意去端水，说："这简直是瞎胡闹！"王进喜问他："我们打井怎么是瞎胡闹！"那人反问道"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王进喜响亮地回答："就是我们国家。"他从马棚里拿来脸盆，在盆底拍了一把："走，咱们用盆盆端水去！"

初春的大庆，还没有解冻，结冰的水泡子（小湖泊）上还能行驶马车。王进喜找了根撬杠，砸了半天，才打出了碗口大的一个窟窿，又和同志们费了好大劲，冰面上才露出了一米方圆的水洞。

炊事员赵振林听到队长领着大家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把队里仅有的两只水桶拿了出来。立刻，大桶、小桶、脸盆、水壶、灭火器的外壳，都成了运水的工具，连石油工作头上戴的铝盔都用上了。

王进喜一双手提了两只桶，跑在最前面。大家一会小跑，一会紧走，恨不得一下把全泡子的水舀到井场！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四日，太阳像一团火球，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王进喜迎着东方的万道霞光，披着那件沾满油污的老羊皮袄，一个箭步跨上钻台，检查完开钻前的准备工作，用他那粗壮而有力的手握住刹把，一阵轰鸣，开钻了！

王进喜消瘦的面孔变得更加肃穆，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一股热血涌上心头。这时候，他觉得手里的刹把不光是个打井的工具，而是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刺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刺刀，他紧紧地握住刹把，全神贯注地向地层打下了第一个单根……

大庆草原的第一口井打成了。千年封闭的大油田，乖乖地打开了大门，终于喷出了乌黑发亮的原油！

这口井，闪烁着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芒。

这口井，打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

这口井，雄辩地说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能在短时间内，高速度、高质量地拿下大油田。

（摘自《大庆人的故事》）

王富洲

王富洲（1935——　），登山英雄。1935年生于河南省西华县，出生于农村家庭。从小热爱劳动，后到北京地质学院学习，并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1960年3月25日，他参加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并与其他二名队员终于在5月25日凌晨北京时间4时20分安全登上珠穆朗玛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上顶峰的壮举。

材料　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英雄王富洲

5月17日，绒布河谷阳光灿烂，在中国登山队大本营的广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第四次行军突击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在这庄严的时刻，王富洲和中国登山队所有突击顶峰的队员都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只要我们的心还在跳动，坚决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攻克珠穆朗玛峰而奋斗到底。

这是王富洲第二次向党宣誓。第一次是在1956年，那是他在入党的时候，他为无产阶级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举起右手向党宣誓过。

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的农村里。那里是有名的黄泛区。1948年，毛主席的队伍解放了豫东，才给他带来温暖和幸福。在党的抚养教育下，使他受到了高等教育，并且把他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人。

从小就热爱劳动的王富洲，还在中学时代，就爱上了大自然，爱上了祖国的山河，立志要做个工业尖兵，遍访全国的高山大川，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寻找资源。后来，他终于进入了北京地质学院。1957年，他和同学到柴达木去实习。在旅途上，一连要坐十来天的汽车，许多没出过远门的同学，开始时不能适应这种生活，吃不好，睡不好，增加了旅途疲劳，思想情绪就不正常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王富洲总是不声不响地为大家接洽膳食，安排住处，帮助同学解决思想问题。

在野外勘察，经常要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碰得不巧。还会错过住处，挨饿夜宿荒山。这时候，王富洲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肩上的背包经常是两个，甚至三个。

王富洲从野外工作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没有坚强的身体是不能很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的。因此虽然自己的工作比较多，他还是坚持经常的锻炼。这就使他有了较好的体质。

两年前，当王富洲结束了大学生活时，党组织又让他和一批登山学员一同到苏联去和苏联登山运动员一起，共同攀登海拔七千一百三十四米的列宁峰。苏联老大哥从登山技术和生活等各方面，都给了王富洲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使他进步得很快。

去年，王富洲作为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的一员，参加了征服新疆境内慕士塔格峰的战斗，并登上了海拔七千五百四十六米的顶峰，获得了健将的称号。

在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第三次行军中，按照中国登山队的总体计划，要在海拔八千米以上建立营地和把突击顶峰时所需要的物资运到那里。王富洲和其他队员担任了这个艰难的任务。1月29日，当他们从海拔七千零七米的北顶部出发，沿着冰雪坡前进时，遇到了狂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七度，人们呼出的气立刻在嘴边结成一圈白霜，鼻孔被冰冻封盖住，走动几步就不得匍伏在地上躲避风寒。王富洲看到谁走累了，就过去拿下他背包里的东西，放到自己的背包里。最后，他背上的东西越来越重。

随着海拔的上升，空气中的氧气更加稀薄，王富洲每走动一步都很困难，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呼吸上气不接下气，但他没有吭声，继续坚持前进。到达海拔七千四百的地方，由于负重过多，忽然晕倒了，当他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就说："不要紧，我的体力还很好，能继续上。"于是，他又背起背包和队伍一同前进了。

5月24日——突击珠穆朗玛峰顶峰这一天，担任突击小组组长的王富洲，和他的战友刘连满、屈银华、贡布结好主绳，绑上冰爪，同留下来支援的副队长许竞等人紧紧拥抱告别以后，王富洲就挥了一下冰镐说："出发，向珠穆朗玛峰最后一段突击！"当天下午七点钟左右，他们到达了海拔八千七百米地方，在一块大岩石下休息。这时，他们检查氧气筒，发现气压表的指针大大下降。王富洲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议，要大家减少氧气流量，并决定让体力过度消耗的刘连满留下。人造氧气很少了，而登山技术熟练的战友又要留下来一个，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王富洲对同志们说："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这时刘连满说："我不能走，我还能爬！"但王富洲又以坚定的声音向战友刘连满保证说："你安心休息，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三个人又继续前进了。王富洲不时地喊着："小心！""保护住！"这不只是警告，而是在提醒战友和自己，你现在并不是孤独一个人，而是有着同志在身边，有着坚强的集体。

困难又来了，前进的方向"骤然"凸起一道光溜溜的冰坡，斜坡虽然只有两米长，可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它是多么长的里程啊！走在前面的贡布，"拍"的一声滑跌下来，王富洲和屈银华接着向上攀登也连续滑跌到原来的地方。大家累得连一句话也不想说。王富洲想，难道能让这个小坡挡住吗？不，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上去！他站起来，脚下的冰爪在冰面上试了再试，最后狠狠把冰镐扎在前面的冰里，拉着冰镐的柄，让屈银华和贡布在后面推，这样攀上冰坡。随后，他再把两个人拉上来。

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三个人的氧气已全部用光了。他们摔掉了空氧气筒，又艰难地前进了。

断了氧，他们的腿变得有千斤重，挪动一步比先前要多付出几倍的精力，只能一步一休息。当时，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只知道前进。最后。他们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尖端。这时，王富洲才记起看表，已是5月25日四时二十分了。他们终于走完了"世界上最长的里程"，把珠穆朗玛峰顶峰踩在脚下。他们安放好纪念品以后，三个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心中在默默地想着：亲爱的党啊，我们完成你所交给的艰巨任务了。

（原载1960月24日《人民日报》）

贡　布

贡布（1933—）登山英雄。1933年出生于西藏定日北部昂仁县的一户农奴家庭，藏族。西藏和平解放前，他一直给农奴主充当奴隶。西藏和平解放后，1956年，贡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炊事员、战士。1959年被吸收

为中国男女混合登山运动队队员。1960年3月25日，他与队友参加了攀登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并于5月25日凌晨北京时间4时20分安全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材料 昔日的奴隶今天的英雄

——记藏族登山队员贡布

"贡布、那个就是贡布！"贡布刚刚走出从拉萨飞来的伊尔—十八滑轮螺旋桨大型客机的机舱，北京机场的欢迎人群中，就高声喊出了这位大家从报道中早就熟悉了的登山英雄的名字。

热情的人们一浪卷一浪似地涌上前去，争着同他握手，感激并祝贺他和他的两个战友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就是他——曾经给西藏农奴主当过十多年牛马的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在突击顶峰的那些关键的时刻里，同他的亲密战友王富洲、屈银华彼此鼓励，互相帮助，克服重重困难，从北坡登上了资本主义国家登山家登了七次都登不上去的珠穆朗玛峰顶峰。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昔日受尽压迫的奴隶，一跃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登山英雄呢？

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激烈战斗刚刚结束，记者就曾请他谈谈感想 但是，这位身材健壮，神采奕奕的青年人沉默了许久，才激动地说：我自己有什么可谈的呢？今天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敬爱的党，就不会有我今天的这一切！

二十七年前，贡布出生在西藏定日北部昂仁县的一户农奴的家庭里。因为家庭穷困，那年他不到九岁，就不得不跟随父亲一道，为农奴主充当奴隶，用夜以继日的劳动换取主人几小块贫瘠的"差地"，借以维持全家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这几小块"差地"也被主人收回去了，贡布全家人便不得不开始到处流浪。

一年年的过去，贡布为农奴主种地，放马，赶骡帮。他住过马棚，卧过羊圈，饿肚子跋涉在丛山峻岭间，担负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沉重劳动。但是，在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贡布全家人仍然只能受苦受难。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认识到，在有农奴主的地方，永远也不会有农奴的幸福。

西藏和平解放后的1956年，贡布终于摆脱了苦难，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开始了人的生活。在部队里，他第一次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当过炊事员，当过战士，工作非常积极，在盖营房和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中，都曾经受到奖励。在部队里，他也第一次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他学习非常努力，目前已经能看藏文报纸和用藏文写信。

1959年，贡布被吸收到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参加了征服新疆慕士塔格峰的活动。当他第一次登上冰雪世界，他的全身变得那样不听使唤，费了很长时间刚攀上几米，脚一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不到几个小时，就累得不行。而他看到许多汉族队员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像矫健的雄鹰，自己又羡慕，又着急。他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登山队员！

党组织知道了这一情况，就派了最优秀的教练员负责帮助他掌握各种复杂的登山技术，帮助他学习政治和文化。从小就生活在西藏，并长期参加体力劳动的贡布，有着良好的高山适应性和耐久力，以及良好的耐寒能力；加上他刻苦学习，只一年多时间，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现代化的登山技术，成为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伍中的一名骨干力量。

在这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贡布就曾经到达海拔八千五百米的高度。可是，在他保护战友下山时，脚不慎扭伤了，动一动就痛得满身出汗。回到中国登山队大本营的时候，他突然遇到了喜出望外的事情：他六十四岁的父亲从遥远的家乡特意赶来看他，并且给他带来了家乡的干羊肉和奶酪等吃的东西。父亲告诉他说，家乡土地改革以后，他家里也分到了地，过去那些苛捐杂税全没有了，农奴们第一次开始了自由的劳动……。家乡的巨变，给了贡布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克服困难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信心和力量。他想，如果没有共产党，他的家哪有今天这样美好的生活，他自己又怎么能够成为光荣的中国登山队的一员呢！

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的战斗快开始了，党组织为了照顾贡布的伤势，决定他留下来休息。不参加第四次行军。贡布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到队部去，坚决要求参加第四次行军。他说："即使我突击顶峰有困难，但是我可以当个运输队员，把物资运送到海拔七千六百米或八千一百米！这样，我也算为夺取顶峰出把力了。"队部见他很坚决，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最后，他终于同战友们干出了惊动世界的英雄业迹。

在登山队的集体中，贡布不断地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启发、帮助和教育，使得他更加热爱集体和具有着坚强的毅力。他平常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苦干。在这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中，他一到营地，就抢着搭帐篷，干这干那。在陡峻的冰坡上，他自己艰难地喘着气，却还抢着为别的同志背东西。

在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中，贡布和战友们担负了侦察任务。有一天，他们驻扎在海拔六千六百米的冰坡上。夜里，刮起了特大的暴风把一顶没有住人的高山帐篷刮得不知去向。贡布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一清早，大家还没起来，他就和另一名藏族队员米马一道，跑到一里多地以外去寻找，终于把这顶高山帐篷从一处冰岩下找了回来。后来，在总结这次行军经过时，登山队党委在大会上对贡

布这种抢救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了表扬和奖励，使贡布感动得落下泪来。在过去的多少年中，他像牛马一样诚实地劳动，得到的却是农奴主的无理辱侮；今天，他不过做了他份内应该做的一件小事，党就给了他这样大的光荣和鼓励。

5月25日，当贡布从顶峰凯旋回到海拔八千五百米的“突击营地”以后，他又和战友刘连满担负起下山报告胜利消息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时，天气已经变坏，风雪交加，而他们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感到异常疲倦了。贡布走到途中，困饿得实在不想走了，一蹲下来就要睡着，这时，共产党员刘连满就鼓励他说：“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你不能安全返回大本营，又怎么能算胜利者呢？”贡布被感动了，毅然坚持下了山……。

中国登山队征服世界最高峰的战斗胜利地结束了。贡布和战友们告别了珠穆朗玛峰，经过日喀则，回到了拉萨，又来到了北京，到处都受到了热情而隆重的欢迎。

（原载1960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流　行　风

歌曲《人民人力量不可挡》

中速　坚实　有气势

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势如台湾海峡滔天浪。大炮隆隆响，对准美国狼，坚决要把它赶下太平洋！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红旗一定要在阿里山上飘扬！

全世界人民力量不可挡，结成一道反帝国的铜壁铁墙。绞索拉得紧，斗志坚如钢，不许美帝再猖狂！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小说《三家巷》

长篇小说。欧阳山作。作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策源地的广州的一条小胡同中的种种纠葛。这里住着手工业工人周家、买办资产阶级陈家和官僚地主何家。周与陈既是连襟又是亲家；陈与何也结成了亲家。尽管历史的发展构织了三家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革命洪流冲击下，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最终撕破了笼罩在他们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出鲜明的阶级分界。小说表现了革命风暴带来的巨大社会动荡，揭示了各种阶级的人物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作品中对省港罢工、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变的描写，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题材上的一个空白。在艺术上，作者善于借鉴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手法，如刻画人物多用白描，较少烘托；讲述故事有头有尾，顺理成章，较少倒叙、插叙等。作者也十分注意对地方生活风貌的精细描画，以及当地群众口语的恰当使用，使作品带有浓郁的南国风味，这些构成作品鲜明的民族风格。

电影《董存瑞》

电影。丁洪等编剧。故事梗概：

1945年，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我解放区青年踊跃参军。年仅16岁的董存瑞也要求参军，但没被批准。不久，日寇发动大扫荡，他再次向连长表示了参军决心，终于如愿。入伍后不久，在一次作战中，他由于不顾纪律约束，受到连长批评。以后，在连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董存瑞不断成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部队为敌人暗堡所阻，董存瑞带着炸药包冲到暗堡下，为争取时间，减少战友伤亡，他毅然手托炸药包进行爆炸，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剧本没有回避主人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弱点和错误，通过一系列合乎情理的情节和场面，描写了董存瑞由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电影《今天我休息》

电影。李天济编剧。故事梗概：

这一天是民警马天民的轮休日，别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约好上午相见。赴约途中，遇见一位乡下老大爷的小猪掉在河里，马天民帮他救了上来，还送他到了要去的钢铁厂，因此错过了约会的时间。介绍人又约他下午跟女方去看电影，可恰好一位居民的小孩患了急病，他又帮助将小孩送进医院，等事情办好，约会的时间又过去了。晚上，他刚要应约去女方家吃晚饭，不料少先队员捡来一个皮夹，他几经周折，才找到失主。女方对马天民几次失约

很生气。正在这时，她的父亲来了，原来他就是那位乡下老大爷，于是，一场误会消除了。这部喜剧集中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新道德风尚。它的喜剧冲突是生活中喜剧冲突的反映，是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所产生的喜剧性。剧本成功地运用"误会"的手法，塑造了马天民的正面形象。

戏剧《十五贯》

八场昆曲。浙江《十五贯》整理小组根据清代朱素臣传奇《双熊梦》改编。原载《剧本》1956年6期，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出版。

市民尤葫芦借得十五贯钱回家，与养女苏戍娟开玩笑，戏言已以十五贯钱将其卖出。戍娟信以为真，连夜出逃。赌棍娄阿鼠深夜经过尤家，见财起心，杀死了尤葫芦，抢走十五贯。苏戍娟路遇青年商人熊友兰，结伴同行，被差役捉拿。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臆断，从熊携带账款十五贯，并与苏同行，就断定二人通奸杀人，卷款潜逃，将他们定成死罪。苏州知府况钟监斩，复审中发现案情有出入，乃夜见巡抚周忱，力陈己见。后经况钟乔装勘访，终查明事实真相，稽拿凶手娄阿鼠归案。剧本高度赞扬了况钟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的精神品质，和他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批判了过于执主观武断、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作风。改编本扬弃了原剧中的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思想，使主题更加突出。在结构上，删除了原作侯三姑与熊友蕙的一条线索，简化了剧情的头绪，加强了戏剧冲突的真实性。《十五贯》的改编，为传统戏曲作品"推陈出新"提供了成功经验，所谓"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戏剧《杨门女将》

九场京剧。范钧宏、吕瑞明根据传统剧《十二寡妇征西》改编。北京宝文堂书店1960年出版。

宋仁宗时某日，杨家天波府内喜气洋洋，佘太君和穆桂英等，正为镇守边关的杨宗保庆贺五十寿辰，突然传来宗保阵亡的噩耗。此时，朝廷震惊，意欲向西夏求和。佘太君力抑悲痛，怒斥主和谬见，毅然以百岁高龄挂帅领兵，亲率杨家女将出征。在识途老马和采药老人帮助下，杨家女将飞越天险，将计就计，奇袭敌营，一举获得全胜。剧本着力塑造了佘太君、穆桂英为代表的杨家女将的形象，歌颂了她们不计私仇、以国事为重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艺术构思上，吸取了扬剧《百岁挂帅》精华，另辟蹊径，重点写了"寿筵惊变""灵堂请缨"等场次，将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较其他相同题材的作品，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

戏剧《关汉卿》

十二场历史话剧。田汉作。原载《剧本》1958年3月号，1960年5月修订，后收入《田汉剧作选》。

剧作家关汉卿亲眼得见无辜的朱小兰屈死在封建统治者的屠刀之下，激起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决心写一个剧本予以揭露和抨击。在名演员朱帘秀等人鼓励支持下，一部反对黑暗的封建统治，为民请命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写成了，演出之后，封建统治者大为恐慌，对关汉卿软硬兼施，未能奏效；便将关汉卿与朱帘秀同时逮捕下狱，在狱中，虽受尽折磨，二人却心心相印，互相鼓励，视死如归。最后，关汉卿被解南下，一曲《沉醉东风》，代替了千言万语的诀别。作家巧妙地通过写关汉卿一生中的一次战斗，成功塑造了具有"铜豌豆"性格的、为人民而斗争的剧作家关汉卿的形象，戏中戏的艺术手法，使情节更曲折，形象更生动，剧中有诗，诗中有戏，富有艺术魅力。

历史档案

《国务院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

1960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指出：鉴于近来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出现的反华、排华的活动，大批华侨无端受迫害的情况，中国政府决定："对于那些流离失所、无法谋生或者不愿意继续在海外居留的华侨，将根据他们的志愿，安置他们在国内生活和参加建设。"并表明"不仅热烈欢迎受到迫害的华侨回国，而且也热烈欢迎所有愿意回国的华侨回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国务院为了做好接待和安置

归国华侨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在回国华侨入境的港口，设立接待机构；责成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省（自治区）的人民委员会负责做好归国华侨的安置工作。指示中对归国华侨的安置原则也作了具体规定。

"鞍钢宪法"

这是毛泽东对鞍钢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经验的称谓。196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毛泽东为中央写了批示，肯定了这一报告，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并要求各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推广鞍钢经验，有领导地、一浪接一浪地开展城市技术革命。"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两参是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指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鞍钢宪法"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因"左"的思想影响，有些正确原则并未很好实施。

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讯
原载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两年多来，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中央曾经多次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但是实际上这股风并没有真正得到纠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当前农村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并作出了十二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所有制问题。它强调指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种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公社和公社的派出机关，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要乱加干涉；公社不能用削弱队有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在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前提下，应当坚持生产队的小部分所有制，要把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发挥它们组织生产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的问题。它规定：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必须在1960年内，至迟在1961年春耕以前，全部退赔偿付清楚。

三、关于保证农业生产劳动力问题。它除了重申必须保证农忙季节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之外，还明确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占用的劳动力不能超过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都归生产队支配。

四、关于收入分配和社员生活问题。它强调指出，集体扣留的积累比例不能过大，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必须占到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要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

这封指示信，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例如，坚持实行部分供给制；坚持实行每个生产队都必须办公共食堂，并且要求把社员的口粮分到食堂。尽管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封指示信对于整顿人民公社、煞住"共

产风”起了重要的作用。

林彪元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

林彪元帅在最近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问题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出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四个原则，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很好地运用和发挥，为我军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新的时期中政治工作和整个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林彪元帅说，我军政治工作有很好的传统，有毛主席的思想领导，有毛主席的很多指示和范例，有很好的基础。他指出，几年来的政治工作是前进了，缺点是对思想问题注意得不够。但从今年 5 月以来，全军有十二万干部下连队，下基层，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大搞政治思想工作，情况就转变过来了，有很大的成绩，有了新气象。

林彪元帅说，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主席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好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要抓思想，把工作重点转到思想上来，工作方法从机关转到连队，从上层转到下层，发动群众来做的工作。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和地方上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样。我们是发动拿武器、穿军衣的群众 。把群众发动起来，思想和人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他说，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他仗就打不好。

林彪元帅指出，政治工作领域中，有四个问题是相互有关系的，这就是：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武器是要人去使用的，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靠人。当原子弹、炮弹打过以后，到接近敌人几十米时，还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觉悟和牺牲精神。进攻时你能上去占领阵地、才能取得胜利；防御时你能顶得住攻击，才能打垮敌人。这是决定胜利的关键问题。武器和人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搞，但更要重视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这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而且这只有我们办得到，我们的敌人是办不到的，因而这是我们专有的，是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的。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但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做好了，思想可以管人，政治可以管人，人也可以管人，部队就可以搞得好。毛主席建军，首先是搞政治工作，把军队建立在政治基础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觉悟，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最充分的发挥出来。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哪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共产党要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活的问题去进行教育，不能抽象化。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也要，但重要的是活的思想，书本也要与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书本上没有的。要以实际为中心，用无产阶级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思想工作要反映实际，要按实际情况去进行工作，这是唯物主义。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三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都作过透彻的说明。主要是抓活的思想，摸下面的思想动态，按照中央的思想来布置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回答问题。书本是要的，但进行书本教育时要联系实际。政治工作就要使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达，不要梗塞。政治部的主要部门是宣传部，这是做思想工作的部。

林彪元帅号召要像打仗一样，集中兵力，突破口子，现在就是从政治工作领域内突破思想工作这个口子，使政治工作提高一步，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原载 1960 年 10 月 8 日《人民日报》）

重要成就

1. 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

1960 年 4 月 15 日，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东风号”万吨轮从投料到下水，共实现 300 多项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改进设计、改进工艺达 180 多项，采用了多种新工艺、新技术，使建造周期一再缩短，最后只用了 88 天，比原计划提前 11 天，其中船台周期仅 49 天。“东风号”全部材料和设备都是国产的，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的载货量为 10000 吨，排水量为 16000 多吨，航速每小时 17 海时，续航力 12000 海里。如从上海起航，中途不加燃料、饮料、便可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直达英国伦敦。

2. 新安江水电站建成

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之

一。主体工程始建于1957年4月，经过三年时间的施工，于1960年4月建成发电。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整座电站总投资4.8亿元，共装有7.25万千瓦和7.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九台，总装机容量为66.25万千瓦。按照设计，每年平均发电量为18.6亿度。电站拦河大坝最高达105米，厂房全长216.1米。电站的控制流域面积达10442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为每秒357立方米，设计洪水流量为每秒27600立方米。正常高水位下水库总库容达178.4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为114.3万亩。该站是目前华东地区最大的多功能水电站。

3.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馆

为纪念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向广大军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1958年开始修建，1960年8月1日开馆。

军事馆陈列的历史文物，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史迹和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光辉历史。

4. 我国第一条跨江高压输电线架通

我国第一条跨越长江的二百二十千伏高压输电线路，于1960年1月27日在武昌西湾和汉阳沌口胜利架通。这是我国电力工业建设史上新的科学成就。

这条过江线，是沟通武汉、鄂北、丹江等地区强大电力网的主要干之一。它的电压是二百二十千伏，根据需要可升到三百三十千伏，一天能输四百二十五万度，可以把青山热电厂所发出的强大电流通过长江送至汉口、汉阳，供应工农业生产需要。

这条罕见的高压输电线路，是我国自己设计施工的。工程于1958年7月1日动工。这是一项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施工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工程，电线的跨越是用两座特高直路钢筋混凝土塔完成的。两面各固定在一个耐张塔上，直路塔高度为一百四十六点七五米，相当于四十多层楼房，是我国电业史上最高的电线路塔，也是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物。它的下横担导线最低悬挂点高度为一百一十二点九五米，跨越段导线六根，直径为三十毫米，架空线两根，直径为二十四毫米。八根线长均为二千八百米，共重七十五点八二吨。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下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0月1日起，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编入《选集》第四卷的，是毛泽东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即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著作。这个时期，即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是我国人民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时期，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两个中国命运、两个中国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的基本内容。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四年奋斗，经过规模空前浩大的国内战争，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选集》第四卷就是这个胜利斗争的伟大纪录。

《选集》第四卷共刊载毛泽东的著作七十篇，其中有三十五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著作，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发展，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是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获得的伟大成果。这些著作，对于党和人民曾经起了非常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

《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科学工作，都是重要的事情。这部著作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将成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加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年“大跃进”的代价

196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2065亿元。只达到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高指标的69.3%。

农业——在1959年已大幅度下降之后，继续大幅度下降。

1960年农业总产值415亿元。比1959年又下降了12.6%。

粮食产量，据1961年核实，只有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2874亿斤的水平。

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跌到了1951年2062万担的水平。

油料作物，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比1957年下降54%，跌到了建国时的水平以下。

就农业而言——3年并没能够“跃”进，恰是大幅度地“跃”退了。

一方面是粮食产量自1959年起连续下降，另一方面是高征购、高销售。1957年度征购粮食961亿斤，占年产量的24.6%，比较正常。1958年度征购1095亿斤，占年

产量的 27.3%，已经多了。1959 年度征购达 1348 亿斤，占年产量的 39.6%。1960 年度征购 1024 亿斤，占年产量的 35.7%。使得农村留粮，由 1957 年的 2940 亿斤，减少到 1959 年的 2052 亿斤，1960 年的 1846 亿斤。1960 年比 1957 年减少 37.2%。按人口平均的农村粮食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409 斤，降到 1959 年的 366 斤，1960 年的 264 斤。1960 年比 1957 年减少了 35.3%。

在高征购但又高销售之下，国家库存周转粮耗多补少，连年下降。1958 年 6 月底，国库存粮 386 亿斤，1959 年 6 月底降为 343 亿斤，1960 年 6 月底又降为 127 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几，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全国大约缺少 3000 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从 1961 年开始至 1964 年，每年进口 100 亿斤左右，1964 年以后逐年减少。”

对于经过“大跃进”折腾后的粮食形势，1960 年 10 月 21 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渡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59 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轻工业——出现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

1960 年轻工业产值 550 亿元，比 1959 年减少 9%。棉纱产量下降了 28.6%，棉布下降了 28%。食糖等某些轻工产品下降了 60%。人们很需要的轻工日用品供应日益减少，呈现出奇缺现象。

重工业——在农业、轻工业大幅度下降的同时，更加孤军冒进。

1960 年重工业产值 1100 亿元，比 1959 年增长 25.9%。加上 1959 年、1958 年的冒进增长，1960 年的重工业产值比 1957 年增长了 2.3 倍。

钢的产量 1866 万吨，比 1959 年增长 34.5%。钢材增长 23.8%。原煤增长 7.5%。发电量增长 40.4%。水泥增长 27.5%。金属切削机床增长 32.9%。

一方面是重工业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 1960 年的农业比 1957 年下降了 14.8%。重工业的发展不但完全脱离了农业基础的状况，与轻工业的情况不相适应，也为重工业自身所无法承担的。重工业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比例更加失调。1960 年与 1957 年相比，农业的比重由 43.3%，下降到 21.8%，轻工业由 31.2%，下降到 26.1%，重工业则由 25.5%猛增至 52.1%。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效益下降。

1960 年全国基建投资总额 389 亿元，比已经很膨胀的 1959 年投资又多 39 亿元，增加 10%。1958 年至 1960 年基建投资合计 996 亿元。比“一五”计划 5 年的总和 550 亿元还要多 81%。这种庞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 1958 年粮、棉高估产（产粮 7500 亿斤、产棉 6600 万担），计划 1962 年要达到钢产量 5000 万至 6000 万吨的目标来安排的。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 1960 年底后，也站不住而掉了下来。

1958 年至 1960 年，3 年共增加国民收入 312 亿元，同期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 246 亿元，即新增加的国民收入的 80%，用于投资。1960 年，在国民收入比上年减少了 2 亿元的情况下，基建投资还新增加了 39 亿元。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多达 1815 个，比上年增加 454 个。致使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高达 54.2%。3 年的积累率，1958 年上升到 33.9%，1959 年又上升到 43.8%，1960 年仍为 39.6%。

基本建设的职工队伍愈来愈大，1960 年来达到 692.8 万人。基建投资的效果愈来愈差，1960 年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上年的 69.2%降到 68.8%，大大低于 1957 年的 93.4%的水平；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率由上年的 12%降到 9.8%，大大低于 1957 年 26.4%的水平。

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

3 年“大跃进”中发生大量财政赤字，1958 年为 21.8 亿元，比 1956 年冒进造成的赤字要高出 3 亿元；1959 年赤字猛增为 65.8 亿元；1960 年赤字又高达 81.8 亿元。三年合计 169.4 亿元。1961 年仍有赤字 10.9 亿元。

为弥补赤字，大量增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1957 年年末的货币投放量为 53 亿元，1959 年上升到 75 亿元，1960 年上升到 96 亿元。作为 3 年“大跃进”的后果，1961 年又高达 125 亿元。

一方面是多发票子几十亿元，另一方面是国家掌握的商品急剧减少，库存锐减。这两方面失衡，物价就上涨。许多商品国营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价格高于国营牌价达数倍至 10 余倍。1960 年零售商品的货源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高达 74.8 亿元，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 10.4%。

人民生活——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 3 年（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严重困难之中。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调查，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406 斤降为 1960 年的 327 斤，减少了 19.4%，其中农村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23.4%。植物油的平均年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4.8 斤下降为 1960 年的 3.7 斤，下降了 23%，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31%。猪肉的平均年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10.2 斤下降为 1960 年的 3.1 斤，下降了 70%。其中城市的人均消

费量下降了78%。

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地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为，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一个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千万，一个经济损失估算3年为1200亿元，这集中地说明了3年"大跃进"的惨重代价。

而且，后来又用了5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使之恢复到1957年的产量总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弯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8年的时间。而恰是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中弥补不了的重大损失。

（节自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指出：在新的10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月3日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机关及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最近为2.6万人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月17日　1959年全国各地下放了25万名干部到基层进行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

1月21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关于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裁军问题致各国议会和政府呼吁书的决议；批准设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最高人民法院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免。

1月26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出今后3年的奋斗目标是：①提前5年实现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10年赶上英国的口号。②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争取提前完成农业机械化4年中解决的任务，并为提前完成10年大解决的任务作准备。③提前5年实现科学规划纲要。8年的基本任务是：1、建成全国独立的经济体系。2、基本上完成四个现代化。3、分期分批地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到基本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4、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2月2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我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4日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廖承志在会上报告了接待和安置归侨的准备工作情况

2月8日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参观访问了全国20多个城市后，于1月25日回到北京。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并设宴招待。2月8日离京回西藏。3月4日，班禅向西藏各界上层爱国人士报告内地参观情况时说，西藏一定要走幸福康庄大道。

2月16日　国务院第9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评定和提升全日制中、小学教师工资级别的暂行规定》。会议最后还讨论通过了县、市行政区划分变更事项。

2月21日　山西省平陆县凤南公社张店营因食物中毒的61个民工，经各方面的大力抢救已全部脱险。平陆县委及县人委向参加抢救的卫生部、空军司令部等四部门致谢。卫生部奖励和表扬空军某部官兵和特种药品经营部。4月2日，山西省平陆县举行大会，公审放毒谋害61名筑路民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德才、回申娃，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各个地区组织试验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要求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大造声势。

3月17日　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已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审并判刑。这个反革命案件是上海市公安机关1955年9月8日破获的。龚品梅等10名案犯，是披着宗教外衣旨在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重大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核心分子，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在美国侵略

者和罗马教皇阴谋策划下1950年8月组织起来的，一贯破坏国家政策、法律、法令的实施，破坏和平，勾结、包庇帝国主义间谍，窃取国家机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私藏枪支、弹药和秘密电台，私设监牢，迫害教徒，图谋策应美国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复辟。

3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指示》，批转《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三个材料。批示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指出，就全国来说，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争取到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更好。

3月22日　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原则(即鞍钢宪法)：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3月30日～4月10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富春作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上述三个报告。周恩来总理就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问题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月1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5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切实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持续大跃进的指示》指出，一切单位都必须根据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的原则，根据既有大集体又有小自由的原则对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进行统一安排，切实做到劳逸结合。重申不但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的制度。农忙时必须保证每天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10小时。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有关省、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地集运外调。

5月29日　林伯渠在北京病逝。

6月5日～9日　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工会运动当前的活动和任务的总决议》、《关于工会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贡献的决议》、《关于日本局势的决议》、《关于朝鲜形势的决议》等。

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8年来的文件建设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前两年我们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强调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7月5日～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8月18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根据前段时间开始酝酿的想法，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应当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以后在会议讨论农业、冶金和计划等问题时，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个意见。8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一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指出：①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到珠江流域地区，平均每人360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每人每年300斤左右原粮。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些；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②城市的口粮标准，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商品粮)。

9月26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劳动部《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9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共70篇，其中有35篇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6个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对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10月7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记要》的指示中指出：今年冬季，要以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对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为武器，

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清除混入我们队伍中的不纯分子，通过整风整社，把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把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彻底搞好。

10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两个文件中指出：从 1958 年冬天以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指示》强调，纠正"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坚决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指示》还指出，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在各经济部门之间必须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在农业战线上必须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这是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头等要素。

10 月 23 日　一个学邢燕子、发奋图强大办农业，积极建设农村人民公社的高潮，在河北广大青年中掀起，并在全国发生巨大的影响。据上海、山西、黑龙江等 18 个省市的统计，全国有 600 万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农业第一线。邢燕子是河北宝坻县回乡知识青年。

10 月 25～26 日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 35 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颁发土地所有证的指示》和《关于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中赎买未参加叛乱农奴主及农奴主代理人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的赎买金的支付办法》。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12 条》)。

11 月 8 日　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今年下放到农村的 7800 多名干部坚持"四同"，发扬革命传统，思想获得丰收，为建设农村人民公社做出了贡献。

1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就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对省、市、区党委发出指示。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指示》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使局面转过来。

11 月 19 日　第二届人大常委第 32 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决定。刘少奇主席同日发布特赦令。28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第二批战犯 50 名。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的指示。要求抓紧瓜菜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大搞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要严格控制劳动和工作时间，保证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干部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要严格控制，不可过度。凡是口粮标准已经减得差不多的地方，不要再减口粮标准。对现有的浮肿病人，要限期治好。

12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发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讨论记要。指出：在以贯彻紧急指示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等"五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首先应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把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

经　济

1 月 1 日　兰(州)新(乌鲁木齐)铁路在元旦前夕通车到新疆哈密。到此，兰新铁路全线通车的里程已达 1315 公里。

同日　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这项工程是 1958 年 9 月开始兴建的。大坝截流后，可形成一个面积达 100 多平方公里的水库，蓄水 49 亿立方米，灌溉农田 1500 多万亩。

1 月 4 日　全国冬修水利高潮已持续一个多月。现在各地正在兴修的大、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共 150 多万处，全国上工人数达 7000 万人以上。到 1959 年 12 月底，全国水利工程已完成 116 亿土方。

同日　中国农科院各专业研究所、室及院部各单位以 433 项研究成果向党、向 1960 年元旦献礼。

同日　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贷管理体制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自 1959 年初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信贷管理办法以来，起到显著作用。为贯彻信贷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原则，对现行信贷管理办法作了补充规定。

1 月 7～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制定了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为 1840 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为 30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会议还提出 5 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和 8 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设想，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包括城市)，把城市人民公社也试办和推广起来。

1 月 11～20 日　国家计委、建委和财政部在广州联合召开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包干经验交流会。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1959 年全国实行投资包干的建设单位有 5000 多个，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40%左右。会议肯定了投资包干制度的积极作用，确定要广泛地推行这项制度。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 1960 年继续推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的办法。

1 月 12 日　我国目前跨径最大的片石混凝土拱桥—河南省唐河大桥今日建成。

1 月 13 日　1959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已基本实现了

良种化。良种推广面积已达18亿多亩，占全国播种面积80%以上。

1月1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综合财政计划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编制1960年计划的同时，都必须编制综合财政计划，随同国民经济计划一同上报。省属市、专区、县原则上也要逐步编制综合财政计划。

1月16日　轻工业部制盐工业局勘察队，最近在湖南省衡阳专区茶山坳一带，发现了巨大的古盐矿。

1月18日　哈尔滨市政第二工程处第二工程队创造成功混凝土生产线联动线，消灭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劳动效率提高了20倍。

1月19日　山西大同煤矿同家梁矿工人毛阿毛经过3年的努力，创造成功了"大同一型装煤机"，能代替24个人劳动。

1月25日　1959年我国工业积极支援了农业。1959年与1958年比较，国家供应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总值增加了22%；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分别增加了409%和128%；排灌机械增加了80%；化肥增加了64.4%。

1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应当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目标，并进而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蔬菜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抓紧春季蔬菜生产，同时做好全年工作安排，要一季接着一季，季季都很抓紧。

2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经过一年开发，到1960年底，已经初步探明了油田面积，原油产量为97万吨；1961年增加到274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51%。

同日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改进农村人民公社商业管理体制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人民公社供销部是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营商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受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和县商业局的双重领导。人民公社供销部挂两块招牌。一块是原来的招牌，一块是供销合作社的招牌。国务院同时批转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对基层国营商业实行利润提成的规定》。

2月24日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这一工程于1958年8月26日动工。大坝合龙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1000万亩面积的黄河平原灌溉网和山区扬水灌溉网。

2月26日　全国许多厂矿企业以厂社挂钩、分片包干、一包到底等办法，大力支援农业技术改造。辽宁、江苏、上海、甘肃、黑龙江等省、市许多厂矿企业帮助广大农村修理农具、农械。辽宁全省412个人民公社中已有386个同工厂挂了钩。这些厂矿还有计划地传播技术经验，从人力、设备、技术等方面帮助公社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业。

同日　广东省英德县马口造纸厂失火，驻马口硫铁矿的49名公安干部和民警，奋勇抢救国家财产，12人献出了生命，其余全部负伤，北京、上海等地有关部门，尽力予以支援。

3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渔业春汛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水产部门，必须加紧渔业春汛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积极发动群众，掀起春汛生产的高潮，争取海、湖、江、河春汛生产的全面丰收。劳动力要统一的安排。要加强海洋渔场的统一领导。

3月4～14日　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财政银行工作、企业财务工作现场会议，号召全国城市财政、银行和企业财务部门掀起一个协作各方参与生产和大搞群众性经济核算运动的高潮。

3月2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目前八项物价问题的通知》。指出：①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7个省(区)粮食收购价格加以提高。②粮食销售价格原则上不做变动。③在全面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地区，适当提高油菜籽和生猪的收购价格。

4月1日　京承铁路已全线建成，在承德车站举行通车典礼。

4月7～13日　《人民日报》分别报道了郑州、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变化。

4月14日　中央批准冶金部提出的钢产量三本帐的计划，并批准铁道部、煤炭部和冶金部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联合报告。冶金部在钢产量第二本帐即2040万吨的基础上，又提出第三本帐，争取达到2200万吨，比人代会确定的计划1840万吨(第一本帐)提高360万吨。为了与钢产量的第三本帐相配合，煤炭部提出全国煤炭产量争取达到7.8亿到8亿吨；铁道部打算在加强现有铁路干线、支线的同时，修筑12000公里土铁路和轻轨铁路。

4月21日　于1958年5月动工兴建的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全长近3公里，是我国目前黄河上最大的一座铁路复线桥。

4月21日　16个省市的财贸书记在合肥举行的粮食工作会议上，着重研究了改变农村粮食管理体制问题。会议认为，由承包单位(生产小队)和社员管理粮食的制度，不符合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强基本队有制和逐步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因而提出将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保存和管理，任何动支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

4月23日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

级的远洋货轮“东风号”最近在上海下水。

4月27日　铁道部、交通部、煤炭部提出取消计件工资的制度。多年来实行计件工资的铁道、交通、煤炭三个行业，改为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制度。

4月29日　中共中央批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的两个文件，指出当前急需大抓狠抓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特别是原材料的生产。会议讨论了工业交通战线的10个问题。会议提出，要贯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由小到大的原则，大办“小土群”、“小洋群”。会议还提出，工业要支援农业，要大大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抓紧农业机械工业的基本建设。

5月7日　中共中央同意商业部报告，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定量。把1960年全国平均每人的棉布定量由原来的24尺减为22尺。5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在5月7日规定的基础上全国平均每人的棉布定量再减少1尺多。

5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指出对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必须统筹安排，不能抓一头，丢一头。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和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第一线。针对某些干部包庇自己亲友逃避农业劳动的现象，中央还指出，在我们国家中，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形成一种特殊阶层，干部包庇亲友，安置较好位置，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表现的一种。

5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定要搞，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指示》指出，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人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危险性很大。凡是犯有贪污行为的人不论贪污数量大小，都必须退赔；计算的时间一般从1959年算起；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大体上以200～300元为宜。

5月30日　中央批准1960年计划第二本帐，同意并转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决定把它做为党内必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帐，要求各部门和各地区立即抓紧时间，组织执行，并以此为准来安排和检查工作。中央强调指出，要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大力保钢，争取今年钢产量达到2100～2200万吨。

6月4日　全国机械工业大力推行“无切削加工”办法，大大提高生产率，节省机具和生产力。

6月14日　全国各地纺织工业部门广泛试用野杂纤维纺纱织布，取得显著成绩。北京、上海、青岛、河北等9省市试制成功400多个新品种。

6月21日　中国民航伊尔—18涡轮螺旋桨大型客机，已在北京——拉萨航线试航成功。

7月1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化学纤维工厂在保定正式投入生产。

7月2日　加速实现农业电气化，促进农业技术改造的群众办电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据统计，全国已建成各种电力站40万千瓦左右。

7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秋季蔬菜生产的指示》。《指示》指出：全面做好秋季蔬菜的生产工作，力争每人平均种好1～2分地。全面搞好秋菜的播种和田间管理，务必把秋菜种够、种好、储足、用好。

7月21日　山西省委、江苏省委、吉林省委、福建省委等，最近分别召开会议，确定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领导，继续深入开展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运动。各省委并且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分别制定措施，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来自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和城市人民公社的义务劳动大军纷纷深入田间，协助农村做好当前的收、管、种的工作。8月间，甘肃省委动员10万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抽调5000名干部下放到公社。内蒙古区党委决定抽调5%的旗县干部到公社工作。湖北省选拔3000名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

7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全党大抓农业》的文章指出：有必要在一定时间内，把重点转移到农业上来。工业要把农业当作第一位的任务，一定要真正优先安排与发展和农业有关的生产；二是要适当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腾出一部分原材料来支援农业。

7月24日　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人民，几年来已治理了6000多万亩沙漠，16%左右的瀚海已经被制服。

7月25日　目前“厂社挂钩”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形式有新发展。辽宁以挂钩工厂为主，吸收单位组成支援委员会；安徽省采取大小厂搭配、小厂联合、专业对口等办法，统一调整厂社挂钩关系；哈尔滨市以城市公社带县、以厂带社、厂社挂钩、一包到底，全面系统地支援农业；上海市采取区县挂钩、厂社挂钩、支援郊区。

7月30日　国家计委发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的通知。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着重发展原材料工业以及基本建设应以中小为主等方针，保证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持续跃进。对工农业和其它各部门的生产建设要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原则，以1962年生产6000亿斤粮和3000万吨钢为纲进行全面研究和安排。

同日　中共北京市委同意并经中央批准，决定饮食业实行凭粮票供应的办法。

8月5日　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从7月初到现在，组成近100个工作组，深入生产第一线，着重解决各行各

业的生产关键和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

同日　中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坚决贯彻执行。同时指出，由于可供调运的煤炭、生铁的省份，在经过努力后仍不能实现原定钢铁生产指标，那就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煤炭和生铁供应的可能，适当调整指标。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规定：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今后5个月里，要把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压缩2%左右，全国共压缩5亿元。这些经费都应当存入人民银行，在1961年2月底以前不得动用。

8月7日　西藏建成8400多个互助组，有10万多农户参加，参加的农户占已完成民主改革地区总农户的85%。

8月19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并强调指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根据调整计划，应当停建和推迟的项目，必须坚决停建和推迟；继续施工的项目，应当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次计划调整后，非经中央批准，不得再增加项目。国家计委、建委对基本建设计划提出压缩的原则是：凡是没有开工的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不再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除确保一批增产原料、材料和支援农业的重点项目外，其余应停建的停建，应推迟的推迟，规模过大的要化大为中、化大为小。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和文化福利设施，除必要的学校、宿舍、营房外，尚未开工的一律不再开工。

9月21日　浙江省31位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最近分别荣任农技师和工程师。

9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严格现金管理制度的报告》。《报告》提出的主要措施是：①实行新核定国营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保存现金的限额。②国营工业销售收入的现金，必须及时送银行，不能自行保存。

9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提出：①本年食油销量严格控制在19.5亿斤，较上年压缩了3.8亿斤。②降低食用油定量标准。③适当压缩工业用油中的食用植物油用量和食品业用油量。

9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①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要尽可能地支持农业。②工业的发展，要着重注意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搞好填平补齐，抓紧设备维修和产品配套，加强新产品的研制，加快国防新技术的发展。③基本建设必须以中小为主，继续缩短战线，保证重点。④在全面安排劳动力和人民生活的条件下，安排好生产和建设，保证群众过好日子。坚决控制社会购买力，保证市场的稳定。⑤各项文化教育事业必须有控制地发展，着重进行巩固、提高。

10月1日　西藏钢铁厂一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从此结束了西藏地区不能出铁的历史。

10月15日　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建筑工程部《关于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要调动国家的、地方的、工矿企业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分期分批地建设住宅，力争三、五年内基本缓和居住紧张的局面。今后凡是新建大中型企业，都应建设相应的住宅；原有企业的超额分成，除用于技术措施外，主要应该用于修建职工宿舍。各省、市、自治区应从地方自筹资金中抽出一部分，用于城市住宅建设。国家应该每年拨出一定投资和材料，帮助重点城市修建一部分机动房屋，以便调剂周转。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这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麦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方法主要是发动城乡大小食堂，土法为主，自己动手、自做自吃。

11月15～23日　第9次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1961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计划安排。李富春在会上作的报告，归纳了几年来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1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强调，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大事情，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把钢的生产水平突上去，确保全年计划任务的实现。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关于劳动力安排和干部下放五人小组提出《关于1961年劳动力的安排要点》。安排方针是：按照首先保证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其次基本建设需要，第三服务行业的需要，第四其它非生产性建设需要的原则，全面地合理地分配劳动力。要从各方面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农业整、半劳力数量，恢复到1.55亿人左右。要进一步精简下放国营企业、事业的职工，从现有职工中精减502万人。

12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冻结、清理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和企业专项存款的指示》。中央、国务院决定：①从1960年12月25日起，下列各项存款予以冻结：各机关、团体、学校、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不包括工资、伙食费、助学金、救灾费、外事费、对

人民公社的清理退赔款等);国营企业在银行的专项存款;基本建设单位的已完工程包干结余资金存款和自筹资金存款。②经过审查清理,凡是资金来源合乎国家规定的,承认存款单位的所有权,但在1961年6月30日以前原则上不要动用;凡不合国家规定的资金,一律交回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或归还银行。

12月22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出《关于1961年粮食和市场问题的安排要点》。《要点》提出,1961年粮食和市场的安排,必须强调吃饭第一,全面安排人民生活,渡过灾荒,稳定市场。各项措施若能落实,1961年秋后市场供求将会大体平衡,但上半年仍很紧张。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计划初步安排的意见》。《意见》指出,1961年和今后三年内必须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争取农业特别是粮食丰收;必须对经济、财贸、文教等各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有意识地放慢速度,以利于争取主动。

军　事

1月4日　解放军在过去一年中,圆满地完成了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英勇保卫了祖国东南沿海;迅速平息了西藏叛乱;坚持不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各部队军事训练大面积丰收;文化教育蓬勃发展;全军献出4000多万个劳动日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铁道兵在25条铁路线上完成了国家铁道工程建设计划。

1月11~19日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民兵的战略问题同时研究了构成全民防御网的民兵战略布局和开展民兵工作方法问题。会议认为:要搞好民兵工作,必须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组织好工会、共青团、妇联、体委、教育等有关部门的协作;确定了省军区、军分区主要职责就是搞好民兵工作;明确了全军各军兵种、各部队都要帮助组训民兵,积极开展民兵工作。

1月22~27日　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作了报告或发言。会议在研究讨论了我军战略方针、国防建设问题之后,通过了《1960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

4月5日　解放军驻徐州部队和徐州市人民举行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奠基典礼。同日,淮海战役碾庄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碾庄举行落成典礼。

4月18~27日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罗瑞卿作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报告,陈正人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薄一波作题为《引导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不断跃进》的报告。

6月17日　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在《告台、澎、金、马同胞书》中宣布: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

8月1日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于1958年开始修建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日开馆。馆内2万多件历史文物,纪述了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史迹和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史。

9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在长沙成立。工程兵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训练工程兵副营职到副师职的军政干部的舟桥建筑指挥干部。

9月14日~10月20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军队的政治工作,对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方向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作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共14条,其主要内容包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思想工作,党支部工作,青年工作,民兵工作等。

外　交

1月9日~19日　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海因里稀·劳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访问。18日,两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和两国政府关于1960年至1962年交换货物的协定。

1月14日　我外交部就日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1月15日　徐学惠应苏联赤塔整形器材厂厂长洛玛诺夫的邀请到赤塔安装假手。我全总致电全苏工会中央和洛玛诺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写信给洛玛诺夫,感谢为徐学惠安装"中苏友谊之手"。年仅18岁的徐学惠是云南省瑞丽县人民银行陇川农场营业所营业员,1959年3月3日,她与抢劫营业所的六个逃亡缅甸的国民党匪徒进行殊死斗争,双手被匪徒砍断。

同日　中国帮助蒙古建设的一座拥有现代化机器设备的毛纺织厂正式移交,并投入生产。

1月18日　被迫离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司徒赞回到深圳。他在当天路过香港时发表书面谈话,谴斥印度尼西亚当局的排华行为。

1月24日~29日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缅甸联邦

总理奈温将军来我国访问。28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2月21日　我文化部对美国侵略者阴谋劫夺我国在台湾的大批珍贵文物提出严重警告,并发表声明。

2月28日　台北市3.5万多居民愤怒地冲进台北"阳明山公园",反对美国霸占这个公园的最好部分,专供美国人游览,不准中国人入内。

3月10日～23日　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应邀来我国访问。3月21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经济援助协定》,以及两国政府的联合公告。

4月11日～15日　廖承志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几内亚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届届非人民团结大会。会议通过了《第二亚届非人民团结大会宣言》、《关于朝鲜、越南、蒙古、老挝、冲绳岛和也门的决议》和《关于和平共处和裁军问题的决议》等。

4月15日～29日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在尼泊尔访问期间,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友好条约》签字仪式,还交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的批准书。

5月5日～9日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访问柬埔寨。8日,周恩来总理和波伦首相发表了联合声明。

5月9日～14日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访问越南。14日,中越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公报。

5月9日　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就印尼有关当局武力劫持我国政府派往印尼接侨的"大宝康"号轮船,向印尼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照会。13日,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就印尼三马林达军事当局武力软禁我国领事事件,向印尼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照会。

5月14日　中缅两国政府在仰光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的批准书。

5月27日～6月1日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等。

6月2日～22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等访问我国。

6月6日　我国政府发表关于支持苏联政府新的裁军建议的声明。指出:这是苏联政府争取实现裁军的又一次努力。

同日;中苏两国签定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在重大医学问题方面的科学合作协定》。

6月27日　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和各国兄弟党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交换了意见,签署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26日,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有分歧的。

7月5日　我国和加纳发表联合公报,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11日　我外交部给印度尼西亚照会一件,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爪哇军事当局杀害华侨的罪行。5月下旬起,印度尼西亚瓜哇军事当局,在右势力集团的指使下,又掀起第二次大规模排华活动。

7月16日　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7月25日,未等我方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担负着重要任务。

8月1日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瑞士驻华大使纳维义为庆祝瑞士国庆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国主张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英、法、日、越、甸、柬等国舆论,一致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这一和平倡议。

8月15日　国务院第102次会议,通过了中捷领事条约、中蒙友好条约,核准了《中国和伊拉克两国政府贸易协定、支付协定》、《中朝两国政府关于国境河流航运合作的协定》。

8月21日～27日　陈毅副总理在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26日,发表了中阿两国联合公报。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续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

9月10日～15日　塞古·杜尔总统率领的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访问。13日发表了中几联合公报,同时还缔结了中几友好条约,签订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

9月28日～10月4日　缅甸总理吴努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中缅边界条约10月1日在北京签订。

10月4～15日　由李渊副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我国。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

10月23日～11月11日　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的邀请，贺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朝鲜访问。25日，代表团出席了平壤市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战10周年报告会，贺龙在会上讲了话。

10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的古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等12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

12月1日～10日　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典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提出了许多正确意见，体现了兄弟党即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会议发表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告世界人民书》。

12月19日　我国同柬埔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在北京签订。

同日　国务院第107次会议核准了我国政府和印尼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

文教卫生体育

1月7日　国务院第9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

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业余教育委员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广泛开展业余教育工作，是我国文化革命中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

2月8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南疆考古队，在新疆民丰县发掘出一对男女合葬的“木乃伊”。据鉴定，死者大约距今2000年(相当于东汉时代)。

2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今后文化艺术工作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文化艺术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开展普及工作，同时又切实注意提高质量；大力发展业余活动，同时又抓紧培养和提高专业队伍，并使专业和业余密切结合。

2月23日　文化部关于影片保密问题作出规定：在制定新闻纪录、科学教育影片的选题计划时，应征求当地有关业务部门的意见，凡属保密范围以内的题材，除内部发行的影片外，一概不得拍摄；凡需经保密审查的影片，均需经该电影制片厂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业务主管部门、保密委员会审查通过。

2月28日　中国农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会章，选出了理事会。中国农学会正式成立。

3月6日　1957—1959年，我国已有26名女运动员11次打破了田径、跳伞、登山和射击等8项世界纪录。

3月10日　在广东省韶关马坝市郊区狮子山后石岩洞穴中，发掘出马坝人化石，这是我国在华南地区第一次发现的远古人类化石。据鉴定，马坝人化石是我国除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以外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是生活在距今约一、二十万年以前的古人类。

3月11日　中国数学会最近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问题和数学教学改革问题，并改选了理事会。华罗庚当选为理事长。

3月12日　北京最近成立了我国第一所神经外科研究所。

3月15日　两年来，全国各地已办起了3万多所农业中学，有学生296万人。

3月19日　苏联科学家在月球背面确定并定名一些新的环形山和圆谷，其中一个是以我国科学家祖冲之命名的。

3月25日　中苏等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粒子”。发现人之一，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对新华社记者说，人类对基本粒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3月　在云南省孟连自治县消灭了全国最后一例天花，至此取得了我国彻底消灭天花的巨大成果。

4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坚决制止剧团“挖角”行为和取缔所谓“流动演员”个人流动办法的报告》。《报告》提出：从1959年起被“挖走”的演员，应一律动员他们回到原来的剧团去，如原剧团与“挖角”的剧团或双方的文化领导部门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可补办正式调动手续；戏曲演员的个人自由流动演出，应予坚决取缔。

4月18～25日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一届男子篮球比赛在北京举行。比赛结果：中国获冠军，波兰第二，苏联第三。

4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项很重要的创造，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5月18日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孙景桥以91.5公里的成绩，创造了活塞式直升模型飞机飞行直线距离的世界纪录。

5月22日　我国女运动员华绍林、赵慧华、梅华，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跳伞比赛中，以平均距靶心2.82米的成绩，打破了女子600米日间集体定点跳伞新纪录。

5月25日　由我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率领的登山队，从3月25日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于5月25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等安全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一海拔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路攀上顶峰的创举。在登山过程中，另有26名登山运动员几次登上海拔8100米以上高度，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罕见的成就；53名运动员到达了海拔7600米以上的高度，打破了我国男子登山的最高纪录。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攀登世界第一高峰成功"。

5月29日　由44名科技工作人员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在藏族人民协助下，初步完成珠穆朗玛峰东、西、北三面约7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科学考察。

6月1～11日　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先念、陈毅就当前经济情况、国际形势分别作了报告。有28个代表团、3000多个先进单位、2000多个先进工作者和特邀代表分别在会上受奖。

6月2日　文化部发出贯彻执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通知。《意见(草案)》提出：文学艺术工作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要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

7月21日　我国跳伞运动员杜菊芳、李文秀、武永兰以平均距靶心5.546米的新成绩，打破了女子600米日间集体跳伞世界纪录。

8月10日　河北、江苏、陕西三省农业中学第一批4万多毕业生，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

8月14日　南京农学院采取"组织配套、专业成龙"的办法，下放800多师生到农村人民公社，帮助他们建立科学技术家底。

9月5日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农业部、卫生部联合向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加强粪便垃圾污水管理和灭螺、防治家畜血吸虫病的通知。

10月6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所综合大学——新疆大学正式成立。

10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废除版税制，同时对目前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

10月22日　中央决定在原定20所重点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再增加44所重点高等学校。在64所高等学校中，有综合大学13所，工科院校32所，师范院校2所，农村院校3所，医药院校5所，外语院校1所，政法、财经学院3所，艺术、体育学院各1所，军委所属院校3所。

11月20日　我国影片《欢腾的西藏》，在今日闭幕的第三届国际短片和纪录片电影周上获得了一等主要奖。

11月21日　西南农学院师生组成一支农业科学播种队，一年来，走遍四川省内59个县、市。沈阳农学院今年先后派出18个专业的4000多师生，把技术配套成龙地送到农村，广东中山医学院师生围绕以保护农业劳动力的健康为中心，积极协助农村开展医疗卫生工作，从多方面支援农业生产。

11月24日　青海大学正式成立。这所大学是由原青海工学院、青海畜牧学院、青海医学院和青海财经学院合并而成，设有工业、农业、畜牧兽医、医学和财经五个系，下分21个专业。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1年

导　言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大规模调整。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际上，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华恶浪。在此国际背景之下，印度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借机掀起反华运动。中印关系日趋紧张，边界争端向着大规模战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中国政府更进一步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分别与朝鲜、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加纳、尼泊尔等国签定了友好互助条约，极大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对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
- ●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工作条例
- ●印度掀起反华运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背景介绍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1958年以来，不注意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导致犯错误的教训，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指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并号召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大家都去做调查研究。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为了系统解决这些问题，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起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工作，并于3月上旬和中旬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三南”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各地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并给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同志到县、社、队进行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3月14日至23日，“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全党从现在起，把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都带头深入到农村、工厂、商店、文教、科技等基层单位，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

材料：

- ·毛泽东派出调查组
- ·难忘的调查（节选）

材料一　毛泽东派出调查组

1961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初期我们党的工作的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1961年初以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许多文件，从而在全党形成大搞调查研究之风，这对于纠正农村工作和实际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稳定社会形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一个全党动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工作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先后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他发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等。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的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使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过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仍然保留了实行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等规定。这样，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刘少奇同志从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进行调查。他在湖南的

44天当中,有32天住在农村。他走家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各种座谈会,亲自察看山林、水塘、屋场、集市、社队企业、食堂等。5月7日,刘少奇同志在他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同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刘少奇同志在湖南调查期间,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志通报了调查的情况。

周恩来同志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同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5月7日,他向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同志通报了四个问题,即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评工记分问题、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

朱德同志从3月26日至5月5日,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5月9日,他就公共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等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陕西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陈云同志于6月下旬至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上蒸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他亲自到农民家走访,了解社员种自留地、住房、吃饭等情况。他把在农村调查到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给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他给邓小平写信说:“农民对我们党有赞扬,也有批评。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

4、5月间,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各中央局,以及中央、省、市、自治区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也都先后到县、社、队进行调查工作。综上所述,大搞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形成。经过调查,摸清了农村真实情况,为正确制定党的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为了进一步解决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中共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央、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对农村调查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对办农村公共食堂、分配制度等问题,作了重要改变。将原《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应该积极办好食堂”改为: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在分配制度方面,把原草案中保留三成的供给制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等规定,从而在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农村中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党中央在总结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的调查研究工作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这个指示说:“从今年三月中央广州会议以来,各级党组织,一般地已经开始注重调查研究。这种风气,应该继续发扬。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把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科学的工作,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中央这一指示发出后,各级党委负责同志都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论述,作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个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展开了。

毛泽东同志继续调查研究农业方面问题。1961年9月,他到河北邯郸地区作调查,召集了山东、河北部分省、地委书记,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研究讨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9月29日,他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村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他在信中还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他要求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自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他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的问题。全国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求,普遍进行了关于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调查和试点的结果证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愿望要求,深受他们的拥护和欢迎。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正

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小队）。这是农村政策的重要改变，从而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问题，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纠正了生产队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使之适应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上充分说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和修改，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丰硕成果。

在全党大力开展对农业调查研究工作的推动和影响下，其他各条战线也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961年初，在中央书记处分管经济计划和工交工作的李富春带领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等九个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为起草工业条例准备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了我国第一个《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的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战胜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又一重大成果。在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从1961年到1962年，党中央还先后制定和批发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科技十四条》、《中学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文艺八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商业四十条》、《财政六条》、《银行六条》、《医院工作四十条》等条例。

以上农业、工业、文教卫生、科技、财贸等方面的条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条战线经验的总结。它分别规定了比较适合我国情况的具体政策。这些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纠正各方面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好转，重新出现了大好形势，使党的工作重新纳入较为正确的轨道，从而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重新认识和掌握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

（摘自刘成荣：《六十年代初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其作用》）

材料二　难忘的调查（节选）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重提了调查研究的问题。1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是从1961年1月毛主席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开始的。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是浙江调查组的组长。在浙江调查组里，田家英比我们都熟悉党的农村政策，领会毛主席的指示也比我们深刻。他在整个调查中，随时向中央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

调查组进村之后，发现群众有些疑惑，基层干部虽然忙于张罗但也在探听调查组的意图。如何打开这种"捉迷藏"的局面？田家英提出，先不忙于开会，要挨家串户，普遍接触，个别访问，就是地主富农，也一样串户了解。使调查人同干部和群众很快地融洽起来，以便了解真实情况。调查组的意图通过这种形式，很快就传播开来。

问题是逐步揭开的。首先是食堂问题，因为食堂是当时非常尖锐的问题。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萌芽而普遍建立的，家家户户都取消了私灶，不管怎样分散，都必须到食堂打饭。"大锅饭"就是这样吃起来的，"共产风"也是从此刮起的。民以食为天，进入困难时期，粮食紧张了，食堂问题就突出地提在群众面前，成了不可绕开的问题。下去调查的同志都知道，在此之前，为调查食堂问题，有些同志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是，群众首先向我们提出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后来群众说，这是试调查组的胆量的。在调查组内部讨论，大家感到有压力而产生疑惑时，田家英谈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发自肺腑的话：压力的确是存在的，调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任务就是，排除一切干扰，了解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向中央反映，我们不直接处理问题，这由中央考虑决定；反映问题不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但要依据客观材料，分析问题，不能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一股脑端上去。只要是情况属实的，材料是准确的，我负责向中央反映，如果要打屁股，也首先打我的屁股。大家放心搜集群众的意见，在吃饭问题上，群众是有话要说的。于是，专门调查食堂问题的座谈会召开了。尽管我们已经作了说明工作，在七八个人的会议上，还是没有人大胆直言，群众也有被批判的经验了。我们听到的只是简单地颂扬食堂的声音，几乎来回重复"食堂好，食堂好"，准备记录的同志，除了写下不同的姓名之外，发言内容都是一样的。会开得很沉闷，发言的人似乎言不由衷。散会之后，一位中年妇女迟迟不走，把调查组的同志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其实，她对食堂意见很大，一连讲了几条罪状：一是老人小孩病人无法照顾；二是干部有私心，多吃多占；三是人人感到不方便；四是下地干活的壮劳力吃不饱；五是浪费大，谁都不节约。经过串门访问的结果，证明这位中年妇女的意见，是代表了多数人看法的。禁区就这样突

破了，使我们了解到真实情况。田家英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确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同田家英一起调查，一直是紧张的，不停地提问，不停地跑路，不停地思索和不停地阅读。他采用的方式是找人谈心聊天，使被调查者感到他是个朋友，一见就可以谈"知心话"，用不着说"应付话"，所以他能很快地掌握真实情况，他自己说，这叫深入见真情。

在浮夸风盛行的情况下，调查粮食产量是一大难题，阻力很大，干扰特多，在好的生产队里是这样，在差的生产队里更是这样。我在富阳五星大队调查时，仅粮食产量一项，亩产到底多少，其说不一，调查了一个星期，仍然不知底细。基层干部一个意见，老农一个意见，青年一个意见，妇女又是另外一种意见。会上一种意见，会下又是一种意见。我确实坠入五里雾中，在田家英的启发下，找了一些人谈心，他也亲自找了生产队的会计谈心，会计拿出了第二本帐。我们又找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和仓库保管员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真情，意见一致了，帐目也相符了。终于弄清了产量，也进一步揭发了浮夸风正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标逼着虚报而造成的。通过调查，大家认识到浮夸风的危害，直接影响了生产，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以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党和群众应有的密切联系被隔绝了。五星大队之所以是个比较好的生产队，是因为几年中生产没有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没有大的增长却也没有大的下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还是比较正常的。在当时说，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为什么这个队能够保持这样的局面呢？从调查中分析，这个生产队在"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流行的情况下，以老农和生产队干部为核心，有组织地抵制了"五风"。例如，他们对来自上面的生产中的瞎指挥，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为了强调实行密植，上面规定一亩下种籽 120 斤，他们将其中大部分煮熟，当作种籽下地入土，上面派人来监督时，确实下了规定的数量，其实煮熟的部分便成为肥料，为了使干部不受批判，路边种得密一些，里边仍照常规，"检查团"来了，路边一走，就过关了。对"共产风"和"浮夸风"他们都采取了一套对策，既顶住了"五风"，又能继续生产，所以他们没有遭到"五风"带来的伤害。田家英听了这些生动的事实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作法。

经过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材料，田家英对我国农村合作化的历史得出如下的结论：互助组和初级社是群众最满意的，因为当时真正遵循了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到了高级社的初期，还是正常的，高级社后期，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公社化是一哄而起的。现在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在当时，不突破很多框框，就很难作出这个肯定的判断。

毛主席在信上提出要作比较调查，即调查一个好的生产队，再调查一个坏的生产队。我们调查了比较好的富阳的五星大队以后，转到差的环二大队，没有经过县里的安排，我们是通过一个在五星队乞讨的孩子了解到一些情况后去的。田家英在调查访问时，偶然遇到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乞讨，他当时就把这个孩子作为访问对象，从这个孩子口中，了解到他讨饭的原因以及他家乡的困难情景。在田家英的倡议下，以这个孩子提供的情况为线索，调查组跟踪转移到富阳环山村的环二大队进行调查。

环二大队是个落后队，调查组的同志在这个队调查期间，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由于口粮短缺，男女老少一致反映饥饿使他们无法生产。我们进村后，逐户串访，相迎的每张脸，几乎都是两腮塌陷，眼大无神，接着便是一阵诉苦或哀号；看看他们的家里，不仅生产资料所剩无几，就是生活资料也当卖一空，有的床上仅有一床破被甚至是一张草席……我们走访一次，不知要流多少眼泪。田家英告诉我，他走过多少农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相，像遭过一场洗劫后的情景。在这个大队里不仅没有看到耕畜，而且全队没有一只家畜。当食堂开饭的时候，人们眼巴巴盯着的是大锅里的稀粥，因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 4 两或者 3 两米。当调查组的同志们端起自己的稀粥时，一口也吃不进，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在我们面前一群孩子正伸出他们的空碗，你怎么能咽得下?! 只好把粥分到这些空碗里。大锅粥无法填饱群众的肚子，不少人靠作绿肥用的红花草充饥。这个队，群众的生活是这样状况，可以想象它的生产已难以为继。生产队长是个老实农民，他虽然每天照例喊人、派活，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因为主要劳动力，已经弃家外出，一往江西，二往外村，有的另谋生路，有的出去讨饭。据调查，1960 年，一个劳动日值，只有 0.0302 元，农民说，还抵不上一支香烟。结果是，劳动一年，只有 2.53 元钱，换不回口粮。全队 224 户，弄得户户倒挂，都成了欠债户，全队共有人口 803 人，人均欠债 48.18 元。连续 3 年没有一个姑娘嫁到这个队。

为什么地处"鱼米之乡"的富春江流域，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生产队呢？调查表明，主要是"五风"危害的结果，当口粮发生严重不足时，仍然虚报余粮，增加征购数量，群众到野外自寻野果野菜充饥时，个别负责干部不仅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认为是"往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捣鬼行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严厉批判，以至发生吊打群众的事件。这样，引起了群众的极端不满，情绪非常低落。

调查组的到来，牵动了全体社员，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们很快变成了群众的亲人。在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连久病不起的老人，也被人扶到会场，每个调查组的成员都被围得紧紧的。当田家英在会上讲话时，多少双渴望的眼睛盯着他。他首先说，我们来自北京，是中央机关的工

作人员，对不起各位父老，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他十分激动，满脸泪水。仍然大声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诚恳地接受你们的委托，我一定及时地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反映群众的呼声，反映这里的真实情况。目前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总是有办法克服的。当干部的遇事要和群众商量，要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我相信会好起来的。这时，会场由寂静变成了欢呼，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珠。一位老人以发自内心的深情说："这才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呐！"田家英气愤地斥责了曾经打骂过群众的干部，说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他答应负责将这里的问题向县委和省委反映，并建议采取急救措施，恢复这个队的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他特别在会上宣布调查组成员的姓名和他们在北京的地址，以便同社员联系，也使社员放心。散会时，群众说，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些"暖心的话"了！多少人争着同他拉手，抚摸他的衣服，依依不舍，久久不散。

（摘自马仲扬：《难忘的调查》）

对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

背景介绍

早在 1960 年冬，中共中央就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1961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决定从 1961 年起，在两三年内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调整的中心内容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发展；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

材料：

-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 "八字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

材料一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0 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重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果断地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党的工作发生了重要转变，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转变也是党为战胜 1959 年到 1961 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调整、巩固、补充、提高"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酝酿、完善和形成的过程。1960 年 8 月间，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的时候，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应当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随后，李富春在研究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正式提出"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周恩来在"调整、巩固"之后又加上"充实"二字，形成了"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9 月，中共批转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 1961 年 1 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从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由于各级领导指导比较正确，措施果断有力，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 1962 年，农村政策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农民的积极性逐渐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改变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从地区来看，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生产总量已经恢复到或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1962 年底也开始出现了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总之，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好形势。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段时间的调整工作，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着重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并搞好一批设备的更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 1965 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

材料二 “八字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

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的意见，首次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此之前，于8月间，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时，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应当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以解决近几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的问题。8月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认为李富春提出的调整、巩固和提高的意见正确，并且加上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同时，确定安排1961年计划的具体方针是(1)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2)工业的发展，着重注意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填平补齐、设备维修和产品配套；(3)在全面安排劳动力和人民生活的条件下，安排国家生产和建设，保证群众过好日子，保证灾区群众休养生息；(4)基本建设以中小为主，继续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5)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力量。

（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工作条例

背景介绍

在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基础上，从1961年3月起，党中央陆续制定了关于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三年多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农业六十条”经过各地试行、征求意见后，在5月21日至6月12日举行的北京工作会议上，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的规定，停办了公共食堂。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

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又举行了庐山工作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会议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对建国以来，特别是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工业企业管理的一些指导原则。另外，会议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

在这一个时期，中共中央还陆续批发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以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

中共中央制定的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当时情况下的各项具体政策，不但对于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至今仍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材料：

- 《农业六十条》
- 《商业四十条》
- 《工业七十条》
- 《高教六十条》
- 《科研十四条》

材料一 《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以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为基础，总结了人民公社三年多的经验，对于纠正社队规模过大，公社对下级管理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但这个条例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等条文。

《农业六十条》经过各地试行与征求意见后，5、6月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度的规定,决定粮食分配到户,停办公共食堂,并扩大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执行对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但修正草案仍规定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无法根本解决大队范围内,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1961 年 9 月,毛泽东在邯郸同山东、河北部分地方负责人研究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之后,给中央常委和有关负责人写信说:六十条还缺一条,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受影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10 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从而解决了自 1956 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1962 年 8 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全国各地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情况,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又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将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此外还作了一些别的改变。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经 1962 年 9 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发各地继续试行。

材料二 《商业四十条》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

《商业四十条》明确规定了商业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提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主要是:

一、规定农业同工业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必须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

二、根据各种农产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分别采取统购、定购和议购的办法,并通过合同形式确定双方的责任。

三、确定分期分批地适当提高若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供应农业的工业品不准随便提级提价。

四、决定从中央到县都要建立和健全物价委员会,加强物价管理工作。

五、强调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销或合并的农村供销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在集市上出售完成国家合同任务后的多余物资。

六、对于品种繁多、来路分散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要恢复过去的物资交流会、庙会、合作货栈、骡马大店等传统商品流通形式,坚决纠正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和管理过严过死的作法。

七、改进国营商业工作,把商业行政部门同商业企业分开,恢复必要的专业公司。

八、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商店营业时间应该方便群众,限量供应商品的进出帐目要定期向群众公布,依靠群众监督和堵塞"开后门"的漏洞。

实践证明,商业工作条例规定的一系列原则、制度、政策和办法,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这个条例的大部分内容,在 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得到了重申和发展。

材料三 《工业七十条》

1961 年 9 月 16 日,党中央颁发的我国第一个《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它是由邓小平主持,由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在深入调查研究,吸取工业企业各类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制订的。

这个条例草案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8 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条例草案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规定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集中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全厂生产有秩序地进行。规定企业的技术工作,由总工程师负全部责任。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勤俭节约,讲究经济效果。规定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搞平均主义。规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

《工业七十条》的公布和试行,对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起了重大作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随着企业形势的好转,我国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

欣欣向荣的局面。

材料四　《高教六十条》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从1961年初开始研究、草拟。7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于北戴河召开会议,对条例草稿逐条进行了讨论,并作了修改。9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讨论,正式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于9月15日发布试行。

这个条例草案分十章六十条(简称《高教六十条》),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后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主要是:

一、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规定了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对学生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应当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规定在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服务。

四、规定学校中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

《高教六十条》对克服高教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对我国高教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到1965年,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高教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材料五　《科研十四条》

1961年上半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1961年6月,在报请中央审批《科研十四条》时,聂荣臻还就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科研十四条》和"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科学研究业务的情况,条例草案明确指出: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即出成果,出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研究机构的一切工作、一切措施,都必须保证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

二、针对在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的号召下,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把科学当作迷信来破除的情况,条例草案提出,要建立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与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即三敢三严)的优良学风。

三、针对1958年"红专辩论"中"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的错误,请示报告和条例草案中特别分析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报告指出,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给一些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妨碍了更多地出研究成果和科学人才。报告认为,"白专"的提法不确切,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必然联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因此,建议废除"白专"这个批判用语。

四、针对许多学术机关在所谓群众性学术批判中,双百方针受到破坏的情况,请示报告和条例草案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

五、条例草案还要求,在人才的使用、培养、提拔上要防止"平均主义"倾向,对于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的青年,要予以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

《科研十四条》和"请示报告"对这个时期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起了重大的作用。

印度掀起反华运动

背景介绍

中印两国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边界争端问题。1951年,印度军队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边境东段推进,侵占我九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又在中段侵占我二千平方公里,并企图侵占西段我三万三千平方公里领土。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边境武装冲突,于1959年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积极主张,建议双方在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停止巡逻,但遭印度政府拒绝。

从1961年开始,印度先在西段、后在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多次挑起边界冲突。11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美国归国后,立即在国会中公布了印度政府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印度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报刊立即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反华运动,对中国进行一连串诬蔑、攻击和威胁。中印关系不断恶化。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

材料：

· 尼赫鲁访美归来掀起反华狂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

材料一　尼赫鲁访美归来掀起反华狂涛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访问美国后回到新德里的当天（11月20日），在印度议会人民院就中印边界西段状况进行新的捏造和歪曲，攻击中国。同一天还公布了印度政府10月31日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的摘录，诬蔑中国进行了"新的侵入和侵略活动"，"侵略之上又加侵略"。

在这以后到12月5日的半个月当中，他还接连发表了八次攻击中国的谈话，其中包括11月28日他在人民院发表的长篇反华声明。

据印度报业托斯报道，尼赫鲁20日对中国的诬蔑"在人民院引起了哄动"。

在他11月20日发表讲话以后，印度一些反动政党的领导人先后对中国进行诬蔑和攻击，甚至纠集暴徒到中国总领事馆前滋闹。印度许多资产阶级报刊，显著刊载了他的讲话，还接着发表大量诽谤中国的言论。这样，印度朝野又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浪潮。

印度这个反华浪潮是在尼赫鲁访美归来以后、美国在联合国内外发动的大规模反华运动的前夕掀起的。在尼赫鲁访美期间，他同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讨论了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并且一再发表反华言论。

印度当局这次捏造中国"新的入侵"的主要题目是所谓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新设了三个哨所"。但是，就是在这个主要题目上，尼赫鲁在几次发言中都说不清事实，而且越说越糊涂。甚至印度人民院的议员也指责他"混乱不清"。

印度新闻处的报道说，尼赫鲁20日在人民院说，"在过去几个星期间，中国人在两条边界——1956年所存在的边界和1960年（中国人占领之后）的边界——之间的地段内他们自己的哨所以外，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哨所。新的哨所在1956年边界以外，但是在1960年的界线以内。"

过了五天，尼赫鲁在北方邦台拉登的公众集会上又说，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又修建了一两处哨所（按：印度10月31日照会说是三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占领了任何新的领土。

11月27日，尼赫鲁对国大党议会党团讲话时，又说建立哨所"可能并不是很危险的，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后面隐伏着他们（中国人）的不良意图。"

11月28日，尼赫鲁在人民院的声明中谈到这件事时，有时说是中国"重新进行的活动和侵略"，有时又说，"中国人建立这些哨所这件事是应该反对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过来了一英里，因而占了那里的某一片领土，而是因为这是背后怀有侵略心理和进行侵略活动的迹象。"他说，"如果认为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又有大片地区——我不知道多少，一千或者两千平方英里——被占了，那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紧接着又说，"这是应该反对的，因为甚至在国际边界上单单是建立这种哨所就是一种侵略活动"。

关于所说的"新建立的中国哨所"的位置，尼赫鲁27日在国大党议会党团会议上说，"有些中国的检查哨是在他们1956年地图中所说的界线的后面，有少数几个是在前面。"但是他28日在人民院又说："在过去的两年间，我们发现中国人建立了三个哨所。""在这三个军事哨所当中，有两个——拉达克境内空喀山口——库尔那克堡地段内当布古鲁地方的一个和尼雅格祖地方的一个——实际上是在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国际边界上，"（按指印度政府片面要求的边界）"我们不十分肯定它们是在这边一两英里还是那边一两英里，因为在这种高峻的山区要确切弄清实际界线是相当困难的。"

一位议员插话说："那么，它们必定是在（印度）这边，如果有疑问的话，那么，它们显然是在这边。"尼赫鲁说："让我们假定是这样。我们是这样假定的。但是我只是说它们是在国际边界附近。"

尼赫鲁又说，第三个哨所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哨所，那就是在这个拉达克地区更北面的地方的那个哨所。他说，"这个哨所是在他们过去的哨所稍为更西面一点"，"它往西移了两英里"。但是，当议员问他中国的新哨所离旧哨所有多少英里，他的回答却是："我不能确切地说，但是可能是十或十二英里。"

关于所谓中国新设哨所建立的时间，尼赫鲁在27日对国大党议会党团说，鉴于地形艰险，"要弄清这些检查哨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是不容易的。"他在20日向人民院说，是"在过去几个星期间"，而28日他在人民院说，"大概这是今年这个夏天建立起来的。很难说出确切的日期，因为我们是通过侦察了解到有这些哨所存在的事情的。"

尼赫鲁在28日人民院的声明中还提供了许多事实，表明印度政府在不断掀起反华浪潮的同时，正在加紧进行向中国挑衅的军事准备。

他说，"我们不能采取冒险主义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使我们在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陷入更大的困难。在这些地区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必须干的，因此我们必须为此进行准备。"

他说，“从军事观点和从其他观点来看，局势一直在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将继续采取步骤加强这些事情，这样，最后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收复他们占有的这些领土。”他说，“这不是个导致战争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发生大战。在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不是小事情。”

他用很大的篇幅报告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采取的军事准备和其他活动。他说印度在东段“现在正在修建直到边界的一条公路”，在西段也“一直在修筑这些公路，并且在合适的地方为我们的武装部队修建基地。”他说，“这种准备（指为在这些地区打仗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的基础就是正在迅速修建的这样一个公路系统。”他说，“印度成立了专门在高山上修筑公路的陆军部队”，并且为了供应这支陆军部队向外国购买运输飞机等。

他说，在中印边界西段，通过新修成的斯利那加一列城公路已把物资和人员运到拉边克，“在合适的地方修建了军事基地，从这些基地派出了前沿哨所”。他承认，“我们已在拉达克边界各地建立了六个以上的新哨所，重要的哨所”。

他还透露，从1950年开始，印度就“尽最大力量加强整个边界的阵地”，在印度一独立以后，印度就“把力量集中于东北边境特区（指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那里建立许多哨所”。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尼赫鲁发出这些战争言论时，引起了印度人民院一些议员的欢呼。

尼赫鲁12月1日在阿拉哈巴德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再次说，在过去十年中印度在中印边界的军事活动已经“作出充分的安排”，他说，“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在边界的活动加强了”。但是，他又说，他始终准备同中国政府谈判边界问题。

12月2日，他在加尔各答再次诬蔑中国“侵略”，说印度要准备好对付“侵略者”。但是，他说，不得仓促从事，“任何冲突都孕育着严重后果。”

（原载1961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1年12月6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全文如下：

1961年11月20日，印度政府发表了印度外交部同年10月31日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的摘录。在照会中，印度政府竭力抵赖中国政府1961年8月12日照会所提出的印度方面侵犯中国领土、领空的事实，同时，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对印度进行了“新的侵入和侵略活动”，“侵略之上又加侵略”。在11月20日同一天，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尼赫鲁总理也在印度人民院提出了同样的指责。11月28日，尼赫鲁总理又在人民院发表了进一步攻击中国的声明，印度政府还发布了中印两国政府来往文件的第五册白皮书。在此期间，印度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对中国大肆诽谤。印度右翼政党一哄而起地发出一片反华喧嚷。在加尔各答和孟买，一些歹徒公然到中国总领事馆门前寻衅闹事。个别不明真相的印度人士，也迫不及待地跟着对中国作了不公正的批评。各种迹象表明，印度方面正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掀起一次新的反华运动。为了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澄清事实，明确是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除了已于1961年11月30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对印方10月31日照会予以驳斥外，现在发表声明如下：

印度外交部照会大肆攻击中国进行了“新的侵入和侵略活动”、“侵略之上又加侵略”，究竟拿出了什么根据呢？印方的根据之一，是说发生了十一起所谓“中国人侵入印度领土”的事件。根据之二，是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建立了三个新的哨所，并且越出了所谓“1956年中国在拉达克所要求的界线”。但是，正如中国政府在1961年11月30日照会中所清楚地驳斥了的，印方的这些根据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对于印方列举的十一起所谓中国人侵入印度领土的事件，中国政府11月30日照会逐项做了答复，说明经过中国政府的认真调查，证明它们都是无中生有的。在这十一起所谓的事件中，有四起是早经中国政府驳回了的，至于其余的七起，有一些连简单的日期都说不清楚，更不用说有什么事实的根据了。由此可见，印方提出这些指控是极不严肃和不负责任的。关于所谓中国军队设立“新哨所”并且越出了“1956年中国在拉达克所要求的界线”的说法，正如中国政府11月30日照会所指出的，也完全不符事实。事实是，中国军队从来没有越出过中印西段传统习惯线，更没有在那里设立任何新的哨所。中印西段传统习惯边界是十分明确的。1959年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信中提及的1956年中国地图所标明的，就是这条边界；中国官员在1960年中印官员会晤中提交印方的地图所标明的，也就是这条边界。印方指控中国新设了哨所的三个地点，都在这段边界线以东的中国境内，一贯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其中，尼雅格祖和东经78度12分、北纬35度19分两处的中国哨所早就存在，根本不是新设立的；另一处当布古鲁从来没有设立过哨所。印方的指责不仅是凭空捏造，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尼赫鲁总理11月20日和28日在人民院的两次讲话中，特别抓住所谓中国军队设立了新哨所的问题大作文章。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越多，就越是漏洞百出，进一步证明印方的指责纯粹是虚构。

尼赫鲁总理11月28日在人民院对于所谓三个新哨所设立的时间和地理位置的叙述，可以说是一团混乱。关于设立的时间，他先说是在过去两年中，接着又说是在今年夏天。关于三个哨所的位置，他同印度外交部照会的说法也不同。尼赫鲁总理说，“有两个实际上是在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国际边界上；”又说，“我们不十分肯定它们是在这边一两英里还是那边一两英里。”当一位印度议员毫无根据地说，“那么它们必定是在这边，如果有疑问，那么，它们显然是在这边”时，尼赫鲁总理也居然说，“让我们假定是这样，我们是这样假定的。”尼赫鲁总理又说，他更加强烈反对的，是第三个哨所。但是，他没有勇气公开承认，印度外交部10月31日的照会曾经错误地把这个哨所的经纬度说成是东经78度12分、北纬33度19分。只是在印度的反动报纸根据这个错误的经纬度大叫大嚷中国占领了印度的大片领土以后，印度政府才悄悄地照会中国政府，把经纬度更正为东经78度12分、北纬35度19分。这一切说明，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是根据连自己都不能肯定的情况，甚至根据任意的假定和错误的资料，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一个政府的领导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能够这样不择手段，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的惊讶。

中国从来没有侵略印度，更不用说进行什么新的侵略或者“侵略之上又加侵略”了。这是任何诽谤、诬蔑都改变不了的事实。多年以来，恰恰是印度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例如中印边界西段的巴里加斯，中段的巨哇、曲惹、什普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东段的兼则马尼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直至喜马拉雅山麓的广大地区。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始终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两国的边界纠纷。但是，印度政府却把中国政府的这种合理态度看作是软弱的表示，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更加频繁地侵犯中国的领土和领空。

根据中国政府曾经向印度政府提出过的事例计算，从1960年以来，印度军队和人员侵犯中国领土的有17起，200余人；印度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有45起，53架次。为此，中国政府曾经发出多次照会，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这类非法活动的严重性，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由于最近几个月来印度方面的这种非法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政府在1961年8月12日、10月7日和11月2日接连向印度政府发出了四个抗议照会。印度政府除了对中国政府1961年8月12日和10月7日两个照会做了答复、尽量抵赖以外，对中国政府1961年11月2日的两个照会，至今没有答复，甚至没有把中国政府10月7日的照会和11月2日的两个照会编入印度政府最近发布的中印两国政府来往文件的第五册白皮书。但是，印度方面侵犯中国的领土和领空的事实，并不能因此而掩盖起来。事实是，从今年5月中旬到10月，印度军队和人员在中印边界西段斯潘古尔、碟穆绰克和中段萨兰、乌热等地越出了印方实际控制线，侵入中国境内。特别在碟穆绰克地区，印度武装人员以它非法占领的巴里加斯为据点，节节向中国境内推进，设立非法哨所，甚至越过了恰尔丁拉山口一带印度片面主张的边界线。在乌热地区，印度政府违反了中印双方关于互不向该地派遣武装人员的协议，公然派遣印度军队进驻并修筑碉堡。在这五个多月里，印度飞机有30起、33架次侵犯了中国领空。

印方对中国领土、领空的这些新的侵占和侵犯，不仅有中国政府经过仔细调查核实的事实为根据，就是从印度政府10月31日的照会和尼赫鲁总理11月28日的声明中，也可以找到直接和间接的证明。

印度政府在10月31日的照会中虽然力图抵赖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事实，但是，不得不承认印度军队和人员在碟穆绰克和乌热地区进行活动。印度政府还公然说，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地点，除一处以外，都在印度片面主张的边界线的印度一侧，因此不管印度方面在那里采取什么行动，都不构成对中国领土的侵犯。这就是供认不讳，印度方面蓄意片面地改变边界现状，准备进一步侵犯和侵占中国的领土，因为，印度所片面主张的边界线不仅大大超过中印传统习惯线深入到中国领土，也远超过印度目前的占领范围。

尼赫鲁总理11月28日的声明清楚地说明，印度从很早以来就在不断加强边境军事部署，大量建立哨所，修筑公路。他说，“我们已尽量大力量加强我们沿整个边界的阵地。”他谈到不仅在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沿线“建立了许多哨所”，而且“在拉达克边界的各个地方建立了六个以上的新的哨所，重要的哨所。”他说，印度在东段“现在正在修建直到边界的一套公路”；在西段也“一直在修筑这些公路，并且在合适的地方为我们的武装部队修建基地，”“从这些基地派出了前沿哨所。”

尼赫鲁总理并没有讲到这里为止，他还毫不掩饰地指出了印度这样做的目的。他说，“在这些地区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必须的，因此我们必须为此进行准备。”他还说，“从军事观点和其它观点来看，局势一直在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将继续采取步骤加强这些事情，这样，最后我们会能够采取行动收复为他们(中国)占有的这些领土。”这就是说，印度政府已经从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转向以武力实现它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中国政府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印度政府的这种政策是极其危险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印度提出领土要求。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还主动地决定，在整个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停止在实际控制线本

侧二十公里的地区内进行巡逻。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中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但是，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战争叫嚣和军事威胁吓倒。如果印度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扩大非法占领，它就必须对因此而造成的新的紧张局势负完全的责任。

事实上，印方不仅利用边界问题大作文章，而且还在利用其他问题加剧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印度政府违反自己的诺言，变本加厉地纵容逃亡在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今年 10 月间，印度政府公然允许他们先后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污蔑中国的报告和关于所谓西藏的“宪法大纲草案”的声明，使西藏叛乱分子俨然以“流亡政府”的身份在印度进行活动。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方面一再据理提出的交涉，一批接着一批地迫害和驱逐居住在印度的华侨。印度政府一再破坏和违反 1954 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封锁和限制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却反诬中国应该负责。印度政府无理限制中国驻噶伦堡商务代理处的正常活动，使该处业务陷于停顿状态，却反而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方面限制了印度驻华机构。印度政府的所有这些做法都进一步人为地恶化了中印两国关系。

印度政府如此热衷执行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这显然不能从中国方面找到任何理由，而只能是出于印度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某种需要。但是，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绝不反映印度广大人民的愿望，而只能使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印友好的分子拍手称快。中国绝不会因此损伤一根毫毛，倒是印度政府越来越暴露它的真实意图，在印度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处于越来越难堪的地位。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同一切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友好相处。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也是世界的两个大国，更需要友好相处，对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中国政府正是从中印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始终认为：目前中印两国的边界争议只是一个暂时性和局部性的问题，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同缅甸和尼泊尔已经根据这些原则圆满地解决了相互间的边界问题。因此，中印边界问题同样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即使一时不能解决，双方也应该尊重边界的现状，保证边境地区的安宁，不利用边界问题来损害中印友谊。中国政府本此立场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两年来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和缓局势、推动边界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措施。不幸，这些努力都没有得到印度方面应有的响应。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于中印友谊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中国维护中印友谊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会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对于来自印度方面的反华叫嚣，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中国政府这一次发表声明仍然不是为了争吵，而是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中印边界的事实真相。中国政府衷心地希望，印度政府能够改弦易辙，以中印友谊、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为重，同中国政府一道，为改善两国关系、为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而共同努力。

（原载 1961 年 12 月 7 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陈赓

陈赓（1903－196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湘乡人。一九一六年曾到湘军鲁涤平部当兵。一九二一年在长沙铁路局当办事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期间，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组织发生接触。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参加湖南长沙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大学旁听。同年年底到广东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并与周逸群等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年十一月毕业并留校工作。参加了广东革命运动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省港大罢工中参加工人纠察队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奉派到苏联去学习。一九二七年二月回国，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任特务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同年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起义，因负重伤转到上海治疗。一九二八年四月化名“王庸”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从事秘密工作，与国民党的特务和共产党的叛徒进行斗争达四年之久。一九三一年九月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第十二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等。一九三二年秋在反“围剿”中负重伤，往上海治疗。一九三三年三月因叛徒出卖被押解往南京、南昌等地。在狱中坚贞不屈，曾当面痛斥蒋介石。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出狱。同年五月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红

军学校校长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任干部团团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等。一九四五年任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率太岳兵团挺进豫西，豫陕边境，解放洛阳，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南下浙赣和两广。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等。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等斗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一九五四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六年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等。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病逝。

梅兰芳

梅兰芳(1894－1961)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活动家、四大名旦之一。祖籍江苏泰州，出生在北京。八岁学戏，九岁拜吴菱仙为师学旦角。十岁即登台，演出青衣兼刀马旦。后正式搭班喜连成，继续向秦稚芳、王瑶卿等名家学戏。并经常与一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同台演出，博采众长，艺术上日臻成熟。一九一三年到上海演出时，使古装新戏风行全国。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两次赴日本访问演出，受到日本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誉其舞姿为“梅舞”。一九二七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时，与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一九三〇年到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访问演出，轰动美国。一九三五年到苏联演出。随后访问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不顾日伪威逼利诱，蓄须明志，拒绝演出，以卖画典当为生。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舞台，演出昆曲。上海解放后应陈毅邀请参加各界人士座谈会。同年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等。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相继到全国十余个省市巡回演出。一九五二年到维也纳参加第三届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年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贵妃醉酒》，获荣誉奖。一九五三年到朝鲜慰问演出。一九五六年第二次赴日本访问演出。一九五七年获国际舞蹈协会颁发的荣誉奖章，成为该会第十四位艺术家。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梅兰芳剧团团长等职务。

梅兰芳继承和发扬京剧艺术的优良传统，使旦角的表演艺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梅派”艺术。在近六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创造了从古代到近代具有中华民族典型性格的众多妇女艺术形象，给中华民族戏曲艺术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艺术财富。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梅兰芳在北京病逝。

材料　梅老师，您安息吧

8月8日这天，正是我们北京京剧团在唐山矿区作为期一月慰问工人演出结束的日子，临别演出由我主演传统剧目《王宝钏》。当日我团领导方面就得知我师逝世消息，因照顾我的演出情绪，未肯告诉我。但，在我要去剧场时，听电台播送新闻报道，突闻我师逝世消息，百感交集，心情万分悲痛，回忆起二十多年来恩师待我的深情厚谊，不禁泪如雨下。

我十八岁那年，与马连良先生初次去上海演戏；那天正巧也演《王宝钏》，我在场上突然听得台下一阵大乱，观众有的站起，有的鼓掌叫好，我还以为自己演戏出了什么毛病，吓得心里直跳，后来定神细看，原来是梅兰芳先生看戏来了。那时正在日伪统治时期，先生气节高尚，已留须明志，息影舞台。观众突然见到梅先生光临，所以热烈地欢迎他。我心里在想：梅先生这样大的名望，居然肯来看我演戏，我既受感动，又觉紧张，始终心跳不停。在我和马先生对口唱“快板”时，前后竟唱颠倒了一段，马先生没想到我会唱错，他仍按原词唱下去，我没有办法接唱，只得把刚唱完的唱词，又得重复唱一遍。戏完之后，梅先生到后台来看我，我很害羞就哭了。梅先生百般的安慰我，他说：“别难为情，当初我年轻演戏时，听说老前辈来看戏，心里发慌，也唱错过；心情紧张，难免出错，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先生又极力夸奖我，哪句唱得好，哪里作得对，不住鼓励我，才把我害羞的情绪扭转过来，破涕为笑了。梅先生竟是那样的温厚慈祥，对同行后辈青少年一代，如同爱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亲切，使我深受感动；初次会面就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时有人倡议要我拜梅先生为师，梅先生表示同意，并约我明日到先生家里去。这一夜我高兴得睡不着觉，但，心里又很为难；因那时的风气，必须备办盛大的宴会举行拜师典礼，而我学戏时是卖给业师的，尚在为师效劳期间，无法筹措这项花费，心里焦急万分。不意次日我到梅先生家，只是磕头行礼的简单仪式，就拜了师傅。先生命我每日去学戏，在上海演出期间，梅先生不辞辛苦，一连给我说了《宇宙锋》、《别姬》、《奇双会》、《生死恨》等好几出戏。先生说戏非常认真，处处有准地方，不厌其烦的教，必至满意为止。给我说《别姬》的舞剑动作，一招一式，指点细致，先生累得通身是汗，我再次请他老人家休息，先生总是不肯。当时，梅葆

玖弟才几岁，梅先生说："你看我今天教你，将来等我的小孩长大，还盼着你教他们呢。"以梅先生的名望地位，对我这样一个后生晚辈也竟这样谦虚，委婉措辞，无非为鼓励后进，存心仁厚，真是一位慈爱的长者。回溯前景，愈增孺慕依恋之情，不胜悲痛。不料初会先生之日即演《王宝钏》，今闻先生逝世之日又演的《王宝钏》，一喜一悲，却都是通场心绪不安。这场演出，临上场前，我极力镇静，反复在背唱词，生怕心乱在场上出错，但在演出当中，仍不时回忆恩师抚爱培育之旧情。

从我初见梅先生，至今已历二十余年，所见先生为人温厚善良、谦虚大度、恭谨自持，待人以礼；一贯保持高雅风度。先生对待亲友，一向最讲礼貌，对方得意之时如此，对方不得意愈甚。当初我到先生家习艺时，先生每次总是迎入送出，直至距今一月前，与先生最后一次会面时，仍然礼待如初。先生崇高的道德品质，永远是我辈学习的榜样。在我们京剧界同行同业中，凡接近过梅先生的人，无不赞扬梅先生宽厚仗义的为人。贫困相求，先生无不援助；很多老前辈只要提起梅先生，异口同声的说："梅先生一辈不多说（人之短）、不少道（人之长），只要一开口，就对人有好处。"

解放后，我师见到日月重光，政治澄明，热爱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以年近六旬的高龄，又复粉墨登场，重上舞台，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爱。我师艺术青春再现，反倒显得更年轻更活跃了。十一年以来，忠心耿耿，为了人民革命事业及人类和平事业，不断活跃于国内外舞台上，日夜不懈的辛勤劳动着，献出所有精力。解放以来，在百忙之中，仍不断精益求精的钻研艺术，对所演剧目，时有改进与革新，无止境的探索推求，登峰造极，琢炼艺术精品。先生勤奋不懈的进取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先生对培养第二代，向不遗余力。解放以来，又收了不少青年徒弟，忙中抽暇热情地教徒习艺，有很多青年演员获得教益；并在我师不断演出中，使后辈见到最宝贵的形象教材。我师若再多活些年，会给我辈更多教益，可恨万恶的病魔夺去了我师生命，实在是我们文化艺术界的一大损失，令人无限惋惜，无限沉痛。

敬爱的老师，请您安息吧！您的名字将永垂人民的青史，万古流芳！您未竟的志愿，将由我们后辈来担当，我们绝不负恩师的教导，亦步亦趋的追随老师的脚步，走向红透专深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教师！您放心安息吧！

（作者张君秋，原载1961年8月《人民日报》）

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爱国华侨领袖，福建厦门人。长期侨居新加坡，经营米业、黄梨（菠萝）罐头、房产和橡胶业，并热衷兴办华侨和家乡的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一九一〇年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一年被新加坡闽籍华侨推举任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资助孙中山和福建省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从一九一三年起，他先后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和商科等学校，在新加坡创办道南小学、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师范及水产航海等校。一九二一年创办厦门大学。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成为拥有资产一千二百余万元的南洋著名工商企业家。以后遭英、美、日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压，企业失败。他还曾创办《南洋商报》。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任新加坡华侨组织的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号召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救国活动。一九三八年在新加坡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一九四〇年三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视察，拒绝参加国民党。同年五月到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继续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广大华侨，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独裁和投降，积极推动南洋华侨抗日爱国运动。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沦陷后，他到印度尼西亚避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创办《南侨日报》，发表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行，支持祖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六月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在团结海外华侨和关怀家乡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

材料　我所敬佩的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先生是我一生几十年来最敬佩的朋友中间的一个。

我第一次认识陈先生，是1917年去新加坡，当时华侨领袖林义顺在会场介绍相见。那天的会，是我向侨胞报告祖国情况。那时叛国称帝的袁世凯刚死不久，军阀混

战，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政治不上轨道，人民说不尽的痛苦。人民受了痛苦，还不认识痛苦从哪里得来，和怎样解除痛苦。看到祖国危险的前途，只有把人民唤醒起来，特别是青年一辈，不论在国内在国外，急需展开教育。我所报告的，大意是这样。嘉庚先生会后特约我谈话，并告我他在原籍厦门，已从1912年（民国元年）在本乡同安县办一学校，名集美学校。但难得相当的校长。新加坡也正在创办一华侨中学。槟榔屿也创办一华侨中学。都要我介绍校长。我那次去南洋，原是为国内创办暨南大学——初名暨南学校向南洋各大埠宣传办学目标和招收学生。陈先生对这点，尤表深切的同情。我回国后，很快地为嘉庚先生介绍了集美学校陆校长，新加坡中学涂校长，槟榔屿中学许校长。

不久嘉庚先生回国了。在种种困难之下，一心一意地独力经营集美学校，扩充为小学部、中学部、师范部、女学部、蒙养园部、通俗教育部、同安教育部。——还资助同安县立男女小学。——一切都亲自督导，所有经费完全由他个人担负。

先生的资源是在南洋种广大的橡树园获得的。华侨橡树园，先生是先导。为了专心回厦门办学，不再去南洋。嘱弟陈敬贤去南洋经营一切。所有收入，每年几十万、百万都向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祖国政府备案，向乡人公开报告。悉数汇归厦门，为祖国办教育事业。

新加坡西洋人商于嘉庚先生，筹办一大学，要求先生捐款，先生提出条件，要设华文科，学生至少读华文二年。订了约，先生自捐十万元，还募集几十万。先生的散财，是处处掌握原则的。

先生长期在厦门办教育，专心研究，发现种种问题，随时向我函问。一问一答，既答又问，还涉及祖国政事。先生亲笔复写给我的信，二三年间，前后积有三十余封。后来嘉庚先生决心进一步办大学了。

我应嘉庚先生的邀请，1919年去厦门，既看到集美学校的校地、校舍一切设备，师生朝夕认真教，认真学。又带我看到即将开办的厦门大学基地和建筑中的校舍。我也同意于他预定聘请南洋侨界负有盛名的林文庆为校长。所特别使我大大感动的，先生自身衣服朴素，起居俭约。我曾访先生的家庭，先生先辈是寒苦的。先生发了那么丰富的资财，从没有在故居添置一椽一瓦，添一些时新装饰，完全符合“敝庐”两字。而先生所办的学校校舍那么辉煌宏伟，都是我所亲眼见到的。“大公无私”，先生真当得起这四字。

先生给我看亲笔所写筹办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附大学计划：（节原文）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我“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拟“创办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大学生不分省界，高等师范，闽省、他省规定名额。”“民心未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惟是个人之力有限，望海内外同志共同负责。”这些话给予海内外同胞以大大感动。

对日抗战开始，我全心全力地忙于当地组织和各地奔走宣传，这一时间，和先生失却直接的联系。

解放了，我和先生很早通电致意，先生很早来京参加新中国组织，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并努力推动国外侨胞的团结。先生凡有发言，都忠诚鲠直。这是先生一贯的作风，他的内心总是拥护党，拥护政府。

先生患了顽固的病，由于党和政府对先生种种关怀，医务工作者积极治疗以及医药方面的种种优越条件，绵延了三年多，我以老朋友资格最后省视，先生慷慨地对我说：“我太惭愧了，你我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你能跑来跑去为人民服务，我常年在病榻上，真对不起老百姓。”我答：“先生贡献太多了。国内国外，那么多新生力量，中间一部分，还不是先生一手培育起来吗！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都有先生贡献的一分力量在内。”

嘉庚先生长逝了。解放十多年来，先生所办各种学校，早整个地捐献给国家了。但原来担任的常年经费还是由先生捐献。

我所认识的不少资本家，尽管是“民族资本家”，很少像陈嘉庚先生尽其所入归公，一点不留私有。我愿再说一遍：陈嘉庚先生是我几十年来最敬佩的朋友中间的一个。

（作者黄炎培，原载1961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流行风

歌曲《娘子军连歌》

1=C 2/4（影片《红色娘子军》主题歌）
梁信词
黄准曲
进行曲速度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

共产是主义，党是领路人。奴隶得翻身，奴隶得翻身。
渐慢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们要翻身。

（原载1961年7月8日《人民日报》）

歌曲《北京一哈瓦那之歌》

1=4/4 2/4
中速雄厚豪壮
萧三词
马可曲

北京，哈瓦那，中国和古巴，
你在海之角，我在天之涯，
你在那一边招呼，我在这一边回答。
北京，哈瓦那，中国和古巴，
看太平洋岸上，风展红旗如画，
看加勒比海滨，怒放革命火花。
北京，哈瓦那，中国和古巴，
吹起反抗的号角，点起战斗的火把，
整齐我们的步伐，斩断美国佬的魔爪。
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和古巴，我们是
兄弟，我们是一家，我们并肩前进，把
共同敌人打垮，把美帝国主义打垮，打垮，打垮，
彻底打垮！

（原载1961年6月5日《人民日报》）

小说《红岩》

长篇小说。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

小说以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通过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形成纷繁的斗争场面；同时又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将这三条线索联结起来，汇聚到狱中斗争上，集中描写革命者为迎接全国解放，挫败敌人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作品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国民党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但又都具有“红岩般高大、雄伟、坚强的基本特征”的共产党人形象，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

长篇小说。李六如作。共三卷。第一卷、第二卷作家出版社1957、1961年出版，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作品按照历史发展过程，以主人公季交恕的活动为主要线索，艺术地再现了自清朝末年至土地革命初期这段历史。作者通过充分展现丑恶社会的世态人情、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北洋军阀的烧杀淫掠及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对残暴的统治者和吃人的旧制度给予深刻揭露和彻底否定；通过对康梁变法的死水微澜，辛亥革命的悲剧结局及北伐成果被蒋介石窃取等历史事件的描述，暴露了改良维新派的保守、革命党人的幼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软弱、妥协及共产党中右倾投降的血的教训；通过对武昌起义的壮丽图景、共产党人的英勇活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北代战争的胜利进军及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的描绘，歌颂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是一部历史性的长篇小说，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

小说《欢笑的金沙江》

长篇小说。李乔作。共有《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三部，作家出版社1961、1962、1965年出版。

小说主要描写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开辟

凉山彝民区工作，争取彝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经过。在解放战争中被击溃的国民党残余逃入凉山，制造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彝族人民识破敌人阴谋，协助解放军消灭了残匪。彝族人民也彻底摆脱奴隶制枷锁，开始建设和平幸福的新生活。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彝族干部丁政委的形象；同时刻画了一批各具特性的奴隶主和奴隶形象。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较早反映党的民族政策胜利的长篇小说。作品展现了优美的凉山风光，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小说《归家》

中篇小说。刘澍德作。发表于《边疆文艺》1961 年 2—11 月号。

小说描写了有 40 年患难之交的朱升和李宽两家，在合作化道路上发生剧烈冲突。老一辈绝了交，悔了儿女亲事，使朱彦和李菊英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分手了。五年后，菊英农专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了“农学家”，决心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贡献力量。身为共产党员、生产队长的朱彦，尽管和菊英私人关系上有隔阂，但在工作上仍真心给予支持和合作。他俩忘不了少年时代深厚的友情，同时，又都因五年前老人的决裂和两人间的误会而伤透了心。不过，在生产、学习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中，在思想道路一致的基础上，两人在感情上都起着复杂而微妙的变化，结成了新的友谊和新的同志式关系。作品通过细腻的、深刻的内心解剖和内心分析，多方面突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舒展自如地表现了生活。作品语言朴实含蓄，生动简练，从云南农民口语中汲取了养料，使作品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发表后，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过争论。

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短篇小说。陈翔鹤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 年第 11 期。后收入《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第二册。

作品以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晚年生活为题材，写他去庐山东林寺访友，正遇寺内大做法事很生反感，重新勾起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夜半一觉醒来，打算将那早已打好腹稿的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写出，可又感力不胜任。“人生实难，死之如何！”陶渊明默念着这代表他对生死看法的诗句，心里想着临死前该办的事情。作者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加以出色的艺术创造，将陶渊明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融和到他一天的生活情景中去表现，语言典雅却又通俗，流畅且富有情致，显示了主人公身处乱世不求苟活的洒脱达观性格。是当代文学短篇小说创作题材方面的新开拓。曾遭到错误批判。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电影。乌·白辛编剧。故事梗概：

1951 年，一股匪特企图从新疆某山口入境，阴谋建立伪政权。他们派一女特务假冒边防军战士阿米尔的恋人、从小漂流在外的古兰丹姆，潜入境内，刺探情报。边防军杨排长根据牧民尼牙孜大婶的失踪等情况，对假古兰丹姆产生了怀疑，并通过这条线索，在边民帮助下，掌握了敌情，粉碎了匪特的第一次越境计划。伪装的匪首阿曼巴依亲自护送真古兰丹姆回到故乡，杨排长采用“对歌”的方法，识出了真、假古兰丹姆。阿曼巴依为了灭口，派人杀死假古兰丹姆，准备在巴罗脱节那天，袭击边防哨所。我边防军民将计就计，将匪特一网打尽。剧本突出体现了民族大团结的主题。尖锐的矛盾冲突同人物命运、感情纠葛编织在一起，情节跌宕曲折，节奏感很强，有着诗情画意的背景和浓重的抒情色彩。结构上，敌我友三条故事线索交差错落，繁而不乱。

电影《洪湖赤卫队》

1961 年春节期间，彩色歌剧艺术片《洪湖赤卫队》在武汉和北京上映。

这部影片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合拍的。影片是根据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创作而成。歌剧“洪湖赤卫队”是湖北省实验歌剧团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创作的新剧目，这一剧目通过洪湖赤卫队的斗争故事，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歌颂了在湘鄂西根据地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等人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它于 1960 年 2 月在武汉、北京、天津、黄石等地上演后，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央许多首长和首都文艺界的许多同志看过这个戏后，都认为：“洪湖赤卫队”创造了民族化、地方化的歌剧风格。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对歌剧“洪湖赤卫队”进行了改编，成功地把它搬上了银幕。影片上映后，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被首都观众誉为是今年上映的最佳影片之一。广大观众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影片，是一首慷慨激昂的革命历史英雄人物的颂歌，也是一篇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活教材。《光明日报》在发表观众的评介文章说：这部影片“突出的

思想成就，在于它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洪湖赤卫队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在艰苦斗争中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从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革命观点的无比正确性。"武汉观众在纷纷组织的座谈中，一致表示要学习洪湖赤卫队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精神，立志做新时代的韩英。

电影《红色娘子军》

电影。梁信编剧。故事梗概：

琼花是椰林寨地主南霸天的丫头，她不堪忍受压迫，一次又一次逃跑。正当她又一次逃跑失败被关进水牢时，被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救出，并在他指引下参加了娘子军。由于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琼花第一次执行任务，便违犯纪律，提前开枪，暴露了目标，受到组织处分。不久，她随洪常青打入南府，配合娘子军解放了椰林寨，活捉了南霸天。但狡猾的南霸天乘隙逃跑，琼花奋勇追捕敌人，身负重伤。伤愈后，经过洪常青的帮助，她克服了个人复仇思想，火线上光荣入党。洪常青为掩护娘子军撤退而英勇牺牲后，她接过重担，继任党代表。最后，她和战友们活捉了南霸天。剧本十分成功地塑造了琼花——一个从女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动人形象，概括了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历史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色娘子军连的成长。主人公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根据此剧本拍摄的同名影片在第一届"百花奖"中获最佳故事片奖。

电影《钢铁战士》

电影。成荫根据武兆堤等同名剧本改编。故事梗概：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集结大量兵力，向我军某部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张排长率领战士狙击敌人。完成任务后，被敌人切断退路，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张排长和炊事员老王、通讯员刘海泉等不幸被捕。在监狱里，张排长与战友一起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老王与小刘也先后为革命捐躯。两个月后，敌人在战场上大败，张排长又回到了部队，被誉为"铁骨钢筋"的战士。剧本表现了我军指战员宁死不屈的钢铁意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作者注意克服写英雄简单化、概念化的通病，运用生动、曲折的情节，较好地塑造了张排长、小刘、老王的动人形象。根据此剧本拍摄的同名影片在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和平奖"。

京剧《海瑞罢官》

九场京剧。吴晗编剧。原载《北京文艺》1961年第1期，北京出版社同年出版。

告老宰相徐玠之子、恶少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毒打农民赵玉山，气死赵子，抢走其孙女赵小兰。赵玉山与儿媳洪阿兰到县衙告状，不料县令王明友贪赃枉法，反将赵玉山当堂杖死，斥逐洪阿兰结案。应天巡抚海瑞，到任途中闻知此案，巧审徐瑛和徐府家奴徐富，查明事实，不顾朝廷命官及徐玠和乡绅等胁迫，毅然将徐瑛处斩。然后，罢官南归。剧本巧妙地截取海瑞斗争生活中的一段，着重刻画他刚直不阿、敢于与强暴势力抗争的坚强性格和意志，肯定了"清官"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剧作者既尊重历史，但又并不拘泥于历史，在不破坏剧作真实感的前提下，虚构了处斩徐瑛的情节，使全剧结构更为完整统一。此剧曾被"四人帮"打成大毒草，至1979年才予以平反，并重新上演。获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荣誉奖。

京剧《谢瑶环》

十二场京剧。田汉参照碗碗腔传统剧目《女巡按》等重新编剧。载《剧本》1961年7、8月合刊，收入《田汉文集》第8集。

唐宫廷司籍女官谢瑶环，敢于坚持正义，为民请命，被武则天升为右御史台，并女扮男装，巡抚江南。在苏州伍员庙，谢瑶环适遇权臣武三思之侄武宏等不法豪门子弟强抢民女，义士袁行健打抱不平。谢瑶环执法如山，严惩了恶少，并与袁行健由相识而永结同心。后武三思等为报私仇，将谢瑶环害死，武则天得知，惩办奸佞，亲自为谢瑶环昭雪平冤。剧本在热情歌颂谢瑶环为民请命、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的高贵品格的同时，揭示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谢瑶环悲剧命运的必然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古为今用，但并不简单地比附现实。情节的安排环环紧扣，引人入胜。先声夺人的紧张开端和耐人寻味的悲剧结尾，都表现出剧作者的匠心独具。此剧曾被"四人帮"打成大毒草，至1979年才予以平反，并重新上演。获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荣誉奖。

昆曲《李慧娘》

六场昆曲。孟超根据明代周朝俊传奇《红梅阁》改编。原载《剧本》1961年7、8月合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出版。

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擅权，终日歌舞宴乐，偏安江南。一日，贾似道携姬妾出游西湖，遇书生裴舜卿痛斥贾似道弄权误国，侍妾李慧娘对其流露赞美之情。贾似道心怀疑忌，回府后即将慧娘杀死，又诱裴生入府，囚之书房。慧娘不甘屈死，其鬼魂至书房与裴生相会。贾似道派人来杀裴生，慧娘将裴生救出，并给贾似道以惩罚。剧本描写了以贾似道为代表的南宋统治者糜烂的偏安生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南宋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性。通过对李慧娘这一有人性的"厉鬼"形象的刻画，肯定了在"厉鬼"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愿望。剧本语言典雅华美，结构上删除了原传奇中有关卢昭容的一条线索，加强了李慧娘这条线索的戏剧冲突，使剧情显得更加简练，结构更加紧凑、完整。此剧曾被"四人帮"打成大毒草，至1979年才予以平反，并重新公演。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节录）

（1961年1月）

八届九中全会还听取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在1960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由于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已经大大提高。钢产量已从一九五七年占世界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煤产量已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机床的拥有量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倍多。工业总产值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多。农业方面，由于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〇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但是，过去三年中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日益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效的灌溉面积三年中增加了三亿多亩；农业技术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三年中排灌设备增加了八倍左右，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广泛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不但减轻了过去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八届九中全会认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在农村中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帮助社员度过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并且为今年农业的增产做好准备。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是说，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原载1961年第3—4期《红旗》）

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1961年1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文件，重点是强调集中统一，以利于克服经济困难。主要规定是：

一、经济管理的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二、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

三、中央各部直属企业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

四、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安排。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进行调整时，必须商得主管部门的同意。

五、财政必须集中；各级都不许搞赤字预算。货币发行权归中央。

六、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都不许突破。

七、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1年8月12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

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申述如下：

最近印度军队、人员和飞机在中国边境地区一再侵犯中国领土、领空，甚而公然进行武装挑衅，中国政府现在提出如下严重的事例：

（一）1961年7月9日中午约12时，武装印度军人30余人逼近到中国西藏地区斯潘古尔以西的传统习惯线。其中印度军人9名先后越入中国境内，并到达约东经78度46分、北纬33度36分处，他们会同留在境外的印度军人共同向中国境内无端开枪13发。同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又有武装印度军人两名越入中国境内，并到达约东经78度47分、北纬33度35分处。直到当日下午5时左右，上述非法越境的印度军人才完全撤出。

（二）今年4月以来，印军不断从它非法占领的位于中国碟穆绰克地区的巴里加斯，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把非法巡逻的范围扩大到古热羊圈（约东经79度26分、北纬32度41分）和拉多（约东经79度29分、北纬32度42分）一带；5月间印度军队竟然在俄加（约东经79度26分、北纬32度50分）非法设立哨所；最近，7月5日，印度军人30余人竟携带轻重机枪等武器到卡尔果（约东径79度28分、北纬32度40分）一带进行非法巡逻，7月22日还深入到恰尔丁拉（约东经79度24分、北纬32度32分）进行非法巡逻。

（三）1961年7月21日至22日，携带武器的印度军人6名，从印度非法占领的中国葱莎地区，越过塔加山口，深入到中国萨兰（约东经79度09分、北纬31度31分）东南约一公里的地方，进行了侦察活动。

（四）今年6月间，印度官方人员约15名携带电台一部再次越入了中国的乌热地区，并在该地驻扎下来，进行非法活动。

（五）印度飞机一再侵犯中国的领空，事例如下：

（1）5月19日和5月20日上午10时许，印度飞机各一架侵入中国西藏地区的且坎（约东经79度37分、北纬32度54分）上空进行侦察。

（2）6月3日11时左右和7月15日上午10时48分左右，印度飞机各一架从印度边境的丁如泽机场方向侵入中国西藏地区的以拉（约东经78度53分、北纬33度33分）上空进行侦察，而后仍向丁如泽机场方向飞去。

（3）6月9日上午12时45分左右，印度飞机一架从印度木尔格方向侵入中国新疆的约东经78度12分、北纬35度19分一带的上空进行侦察，而后沿中国境内的奇普恰普河返回。

（4）6月8日上午9时左右和7月17日上午12时11分左右，印度飞机各一架沿苏班西里河，飞越中国西藏地区的马及墩（约东经93度37分、北纬28度40分）上空，并进一步侵入雅勒普（约东经93度19分、北纬28度44分）上空，进行侦察，而后从原路返回。

印度方面的上述行动，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领空和主权，重新引起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维护边界现状和边境安宁，以有利于两国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中国边防哨所并为此一律继续停止派出巡逻队，印度方面却与此相反，把中国的善意当作软弱的表现，任意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扩大非法占领范围。中国政府对此不得不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这种做法将导致严重后果。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责令所有越境的印度军队和其他官方人员立即撤回，并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1年8月12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推广信阳地委在三类社队进行夺权斗争，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经验。《报告》认为"当前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中央的批语认为，信阳地委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

1月14日～18日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同意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月30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决定派李先念副总理为谈判和签订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通商航海条约的全权代表；决定撤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其业务合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2月8日，中央作出国家建委与国家计委合并、工交政治部与国家经委合并的决定，明确国家建委的工作由国家计委负责。

1月下旬～2月下旬　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的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2月下旬，各调查组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2月28日　去年归侨人数等于过去10年的总和。为妥善安置归侨，国家新扩建了25个华侨农场、11所中等以上华侨学校和47万平方米建筑物。

3月15日至下旬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3月22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指出当前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是：分配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等。因此，需要制定一个条例，对发现的问题作一系统解决。要求征求省、地、市、县、公社和社员对这个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

3月20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赎买政策，截至2月底止，向被赎买户办赎买手续的工作基本结束。

3月23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中央决定将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全党高、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还要求县级以上各级党委，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作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都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4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必须继续精简职工，动员部分在外的民工和自流农民回乡。计划到1961年底，将精简职工人数由502万人增加到800万人，其中带工资和不带工资的各为400万人。今后需用农村劳动力时可优先录用带工资下放农村的职工。除精简下放职工外，争取在两年内有200万左右城镇人口下乡。

4月22日　国务院举行110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通商航海条约》，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会议还核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通过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暂行管理办法》和《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

4月24日　中共中央转发人民银行《关于1961年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会议提出，为贯彻以调整为主的八字方针，除了适当降低农贷利率，免收1955年合作化时给贫下中农的放款和清理旧农贷以外，要改进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和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办法。

4月25日　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要他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信中说：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段时间，为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15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5月2日　西藏藏族工人与基层干部队伍正在成长

壮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区有2.4万多名藏族工人，其中50%以上是平叛以后参加工作的；有1万多名藏族基层干部，平叛以后有3000多名劳动人民子弟先后派赴祖国各地学习。

5月7日　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炭子冲，同干部和社员谈公共食堂、包产到户、退赔、民主办社等几个农村政策问题。他指出：食堂没有优越性，这样的食堂要散；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退赔问题，要扎扎实实算一回帐，算得疼一点，这次教训很深刻。

5月9日　朱德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1958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的面过大了，目前仍保留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也很少实行原来合作社时的制度。要发展手工业生产，必须恢复手工业合作社时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信中还谈到陕西省、河南省干部群众反映办食堂不仅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分散干部的领导力量，同时对病人、老幼照顾不到，对群众更不方便。

5月下旬～6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手工业工作。会上毛泽东着重就农村工作问题讲话指出：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套具体政策，要好好总结经验，逐步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陈云就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讲话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3亿，工业摊子铺得太大，是不恰当的，应该下决心精简，动员一部分职工还乡。应当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但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而且保证农业上去。会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拟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若干规定》即《商业40条》，拟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35条》。

6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出：中央3月22日提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全国农村讨论和部分地区试行后，得到很好的反映。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后，发给全国农村讨论和试行。修正草案对原草案作了某些重大修改。包括：取消了草案关于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中，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取消了草案关于生产队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规定，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将草案中规定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5%改为一般占生产大队耕地面积的5%～7%。

6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规定》指出：平调从人民公社成立后算起，凡违反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抽调和占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彻底清算和退赔。谁平调谁退赔，而且要以实物为主。

6月22日　毛泽东批转习仲勋的报告，要求进一步精简各级机关。自1960年9月以后，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原有24万多人，已精简了8万多人。毛泽东提出，应当再减4万人，共减12万人。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都应按照这个计划坚决精简。

6月30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在首都举行。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光荣伟大的40年》。

7月8日　李富春在华北三省汇报煤炭生产和分配问题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几点意见。①煤炭、粮食是关键问题，不抓住这两个环节，全国的经济形势就会溃退。粮食要抓紧生产，抢种一亩算一亩。②要估计到暂时的困难不是一年的问题，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要有两三年或更长时间。③重工业要有计划按比例地退，轻工业和农业要有计划按比例地上。“大跃进”的毛病是一哄而起，现在不要一哄而散，这样不利于贯彻农轻重方针。④今年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但没有抓住要害。今后两三年要少搞农业机械，多搞小农具、化肥和农民生活用品，同时注意城乡兼顾。⑤要恢复手工业，恢复传统产品、传统原料和传统基地。⑥当前城市职工实际工资降低，物资供应紧张，城市人口下乡，多数企业靠贷款生活，这四个问题交错一起，如没有思想工作和具体政策解决，就有出问题的可能。

7月9日　国务院第11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商条约》、《关于结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决定》。

7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严斥美国肯尼迪政府为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玩弄的新花招所谓“继承国方式”。据新华社10日报道，腊斯克6月27日在芝加哥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正在推行所谓“继承国”的阴谋，企图阻挠联大讨论中国席位问题。

8月12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享年88岁。

8月下旬～9月中旬　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重点是工业问题。拟定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60条》)。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讲了话。

9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许新的‘九一八’事变在亚洲重演!》纪念“九一八”事变30周年。

9月19日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41次常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选举委员会,班禅任主席,张国华、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5人任副主席。

9月29日　毛泽东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并附去他召集的邯郸谈话会记录以及湖北、山东、广东、河北等省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

10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此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选择试点,以便取得经验。

11月1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争取1962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要求在农村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11月23日　中共中央批转《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在体制下放后,对小队的规模一般都作了调整,一般是20户到30户左右,也有10几户的,群众认为这样划合理。中央认为:邓子恢这个报告很好。建议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2月16日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等单位最近又摘掉370多名右派分子的帽子。

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战犯。

经　济

1月上旬　李富春主持的由国家经委等单位组成的调查组,前往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工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是为了寻找整顿企业的办法,草拟工业工作条例。6月间,中央指定薄一波准备条例的草拟工作。7、8、9三个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工业条例草稿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最后归纳为70条,提交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由毛泽东签发。

1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提高粮食和一部分其它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收购价格,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平均提高20%。同时1960年已经开始实行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照旧执行。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以后,销售价格暂不提高。肉、禽、蛋和油脂等农产品,从1961年3月到夏收期间,先后提高收购价格,并相应提高销售价格。执行结果,全国平均收购价格粮食提高25%,生猪提高26%,家禽和蛋类提高37%,油料提高13%。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①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②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上下一本帐,坚持“全国一盘棋”,不准打赤字预算。③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加强管理,进行整顿。④坚决纠正把不应摊入成本的开支挤入成本的现象。⑤不许把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不许把信贷资金用于财政性支出,不得赊销和挪用国家的商品和物资。

1月18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1961年对外贸易工作安排意见》。总的是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精神。在出口方面,拟大大减低主要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进口原料加工出口的商品,即“以进养出”的商品。在进口方面,进口80亿斤粮食,增加进口市场需要的原材料,增加进口化肥。各类进出口物资次序为:①粮食;②化肥、农药、油脂;③加工后转出口换汇的物资和化工原料;④工业原材料。2月7日中央批准了这个计划。

1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中心是强调集中统一。

同日财政部确定调低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加强企业利润留成资金管理。指出,企业利润留成资金一律不得用于计划外的基本建设,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开支,更不允许用于建造行政用房。规定主管部门集中的部分不得超过企业利润留成的20%。从1961年起,把全国企业利润留成率由1960年的13.2%左右降低到6.9%。其中,中央各部属企业利润留成率由1960年的15.82%调整为6.7%;地方企业利润留成率由1960年的12%调整为7%。

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要求把1961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从上年的80亿元左右压缩到40亿—50亿元。

1月23日　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调整1961年第1季度基本建设计划。决定第1季度将基建投资由28.8亿元压缩到20亿元左右;大中型建设项目由原安排的855个压缩到不超过500项。非重点项目和非

重点单项工程，坚决停建。2 月 23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安排 1961 年第 1 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责成国家计委按照有多少材料、设备做多少事情的原则，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在年度计划未下达以前，把结转的材料、设备都调用于生产上最急需的项目上去。

2 月 7 日　根据中共中央 1 月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规定精神，确定将原下放地方管理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湛江等 10 个沿海港口，收归交通部领导。以后，又将重庆、九江等 10 个长江干线重点港口，天港航道局、上海筑港局等 6 个工程局以及两个工厂、两个交通学校和一个驳船公司，改为以交通部为主管理。在 1961 年中，一些工业部门也对部分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作了变动。

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切企业都要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度》。社论强调指出：规章制度的改革，必须先立后破。社论要求，所有企业都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各科室的责任制，都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设备检修、材料管理、定额管理、质量检查等各项规章制度。

2 月 25 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在全国各地区进一步扩大高价糕点和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在 3 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

2 月 2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迅速为农业机械化培养干部》。该报 27 日报道：河北省工业、交通、农业等部门通力协作，采取上下结合、分级负责的办法，培训农业机械技术人材，已有近万名农业机械手走上第一线。

4 月 2 日　国家计委对 1961 年基本建设计划进行调整。确定 1961 年基建计划预算内投资由原定的 167 亿元缩减为 129 亿元。正式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定的 900 个减为 771 个（不包括国防工业）；加上少量施工的收尾、维持和筹建等项目 325 个，共为 1096 个，比 1960 年预计完成数减少 739 个。

4 月 3 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经委《关于节约煤炭的报告》。《报告》指出，1960 年第 4 季度以来，煤炭生产出现紧张局面，要求各行各业都必须制定年度、分季度、分地区的节约指标和具体措施，纳入国家计划。中央同意在工业、交通 10 人小组的领导下，设置一个煤炭节约办公室，由国家计委、经委和煤炭部各指定一位党组成员兼任此项工作。

4 月 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购重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励的指示》。决定：在 1961 年到 1962 年的粮食年度，每收购一担棉花，奖励 35 斤粮食；每收购一担花生仁、芝麻或烤烟，奖励 20 斤粮食。实行这种奖励办法，这一年度国家共需拿出 17 亿斤粮食作奖励。

4 月 10 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号”机车坚持包乘制，15 年来连续安全行车 120 多万公里，成为京山线运输效率高成本低的先进机车。

4 月 18 日　中央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马鞍山车轮轮箍厂实行设备成套预安排，即一次交由机械部门成套安排生产，并组织设备的成套供应。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和经委逐步推广这一做法。于是，当年国家选定了 30 个重要建设项目实行成套设备预安排。

4 月 20 日　《人民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从 1960 年秋天到现在已外调 45,700 多头耕畜，支持晋冀鲁豫等 11 个省、市、自治区春耕生产。

4 月 29 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农业放款利息，自 5 月 1 日开始，利率一律从现行的月息 6 厘降为月息 4 厘 8。

5 月 1 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 1 月至 4 月，全国大中小钢铁企业轧制出 40 多万吨农用钢材，支援农业生产急需。

5 月 7 日　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接着，又批转了胡乔木 8 日的报告和邓小平、彭真 10 日的联合报告。周恩来等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当前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评工记分等几个重要政策问题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周恩来报告正在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办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并且指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产到组，这个办法势在必行。

5 月 10 日　李富春谈 1961、1962 年的计划问题。1961 年以来，国民经济仍然处于被动局面。一是物资供应紧张，工业生产水平继续大幅度下降。二是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三是农村春播进展缓慢，田间管理很差。四是商品库存逐月下降。五是财政金融也出现不少问题。李富春指出，5 月间，国家计委要会同各部门、各地区把当前各个行业的实际情况摸清楚，计划指标不能实现的，则延长到 1962 年去完成，可以不再重新编制 1961 年计划。

5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同意国家计委、科委《关于安排 9 种大型设备生产任务的报告》，要求列入年度计划，争取按期投入生产。9 种大型关键设备是：3 万吨模锻水压机，1.2 万吨卧式挤压水压机，1 万吨油压机，2800 毫米铝板热轧机，2800 毫米铝板冷轧机，2800 毫米单机架冷轧薄钢板机，20 辊 500 毫米冷轧带钢机，8 毫米—80 毫米冷轧钢管机，120 毫米—200 毫米冷轧钢管机，共计 13 套，合计主机重 3.8 万吨。

5 月 16 日　新华社报道：商业部、农业机械部和农业部最近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全国农业机具的调剂交流活动，共调剂交流了机引犁等农具及其配件和排灌机械的配套设备 32 万多件。

5 月 16 日　陈云代中央化肥小组向中央起草了《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8 月 11 日，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报告提出了发展化肥工业的两个方针问题：在 1962—1964 年三年内，应该搞大型的氮肥厂，不应该搞小型的氮肥厂；建设大型氮肥厂不能齐头并进，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粮食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它地区布点。

5 月 17 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提出从 1961 年 7 月 1 日起，国营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原为全部由银行贷款，改为 80%由财政部门拨款，20%由银行贷款（1962 年 1 月 6 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又发出通知，规定从当年 1 月 1 日起，银行不再参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的贷款工作）。

5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和副研究员王幽兰等，从 1951 年开始在蟾蜍科动物中用涂血针刺法进行人工单性生殖的实验。1959 年 3 月出生的世界上第一只"无父"母蟾蜍，今年 3 月产卵，繁殖出 800 多只蝌蚪，其中多数已成长为小蟾蜍。

5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关于改进和加强国家物资储备体制的报告》。报告提出，恢复设置专业物资储备领导机构，与物资供应合并的要分开。同时规定，国家储备物资是后备力量，不经中央批准各地无权动用；国家储备仓库的固定资产和机械设备等，地方也不得自行拆除和动用。

5 月 31 日～6 月 1 日　我民航局试航机完成往返锡兰的试航任务。

6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28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上述文件指出：①城镇粮食销量，1961 至 1962 年度争取压缩到 480 亿斤至 490 亿斤，比上年减少 30 亿斤至 40 亿斤。②城镇人口，3 年内必须比 1960 年底减少 2000 万人以上。③精简职工的主要对象，是 1958 年 1 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

6 月 17 日　财政部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对农业税的税率加以调整。①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加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从 1957 年的 11.6%降为不超过 10%。②各地的地方附加相当于正税额的比例，由过去的 15%到 30%，一律降为不超过 10%。调整后的新税率，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

6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发到全国各基层单位。

同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发到全国各基层单位。

6 月 22 日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重新调整基本建设项目的通知》。《通知》要求把全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 129 亿元压缩到 70 亿元左右，并立即下决心压缩一批建设项目。

6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正在建设 8 个新的大型化肥厂，另有 7 个化肥厂正在进行扩建工程。今年国家计划在哈尔滨扩建、新建的 13 个轻工化工厂和车间，正加紧建设。重庆 15 个轻工业工厂，正在扩建、改建一批车间和增添部分设备。

7 月 7 日　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当前财政收支情况的简要报告》。1961 年上半年，国家收入预计 172 亿元、支出 167 亿元；全年收入预计至多能达到 350 亿元左右。比年初预算减少 258 亿元。为了收支平衡，要把支出压缩到 350 亿元。

7 月 14 日　新华社报道：粤、桂、湘、鄂、豫、云、贵等省、区化工部门，6 月底 7 月初在梧州举行物资调剂会议。会上签定协议合同 1380 份，调剂物资 1000 多种，总值达 1171 万多元。

7 月 17 日～8 月 12 日　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 1961 年计划执行情况和 1962 年计划控制数字。会议对这两年，主要是 1962 年计划指标作了如下安排：粮食产量，1961 年预计 2700 亿斤，1962 年增产 8%～10%；煤炭，1961 年预计为 2.7 亿吨，1962 年底拟定 2.5 亿吨；钢产量，1961 年预计是 850 万吨，1962 年拟定为 750 万吨；机械工业，安排好产品和配件的生产；基本建设 1961 年预计 78 亿元，1962 年拟定安排 42.3 亿元，比上年减少 35.7 亿元。10 月 6 日，中央批转这个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依照控制数字的报告编制 1962 年计划。

7 月 20 日　新华社报道：东北西部防护林带已初步形成，南起辽东半岛，北迄大兴安岭南麓，绵延 1200 余公里，东西宽约 300 公里。不久前，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东北三省林业部门座谈会，检查总结 10 年来工作及研究今后发展方针和规划问题。

7 月 24 日　安徽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其办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户，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

8 月 3 日　中央将煤炭工业部《关于三年来工作的检查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直属煤矿。《报告》指出：在生产方面，重点加强现有矿井的开拓、延伸、掘进和巷道的维修。停止一切不合理的采煤方法，对近年来简易投产的新井进行配套补齐工作。在基本建设方面，重点是提高工程质量，严格按照标准移交新井。在企业管理方面，重点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改进劳动工资工作，安排好职工生活。

8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鞍钢等钢铁企业上半年赶

轧 20 多种钢材，供应 27 个省、市、区的轻工业部门。上海轻工业机械制造部门制成近 3000 台专用设备，供应各地轻工业工厂使用。

9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为扭转工业工作的被动局面，文件从调整、管理、生产等方面作了八项规定。《指示》指出：①所有工业部门和企业，今后 7 年内都必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近 3 年内以调整为中心。②在工业管理中，要改变过去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③抓住煤炭的数量和质量，钢材的品种和质量等中心环节。④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稳定市场。确定了 40 种迫切需要增产的轻工业、手工业产品。规定各工业企业都必须加强经济协作，整顿管理工作，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纪律性。中央要求：凡是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凡是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短期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闭，或者关闭一部分。

9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 70 条》)，发给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国营企业讨论，并选择若干企业试行。

同日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①完成农产品收购计划，增加商品供应，稳定国内市场。②多挤出一些东西出口，换取外汇，保证 1961 年进口 100 多亿斤粮食的用汇。③把 18 类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定下来，以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④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1961 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要由上年的 80 亿元压缩到 40 亿元。

9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六处跨越腾格里沙漠的包兰铁路，由于沙漠边缘初步营造成一条长 45 公里、宽 1—2 公里半的防沙林带，火车自 1959 年春天以来从未因沙害发生停车事故。

9 月 29 日　新华社报道：煤都抚顺大规模开发深部煤层。胜利、老虎台等几个大型矿井普遍延深 100 米，开拓出 7 个采区。地面运输网和电力网改建工程也基本完成。

10 月 7 日　中共中央原则上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改进计划工作的几项规定》，转发各级计委试行。

10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3 年来，江西省以下放干部为骨干建成的 200 多个国营垦殖场，有职工 140 多万人开荒 30 万亩，造林 570 多万亩。

10 月 12 日　李富春就制定 1962 年计划问题给中央局、计委、国务院各工业部发信。信中强调，中央批发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是留有余地的，应本着实事求是、千方百计、鼓足干劲的精神来制定明年的计划。

10 月 13 日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发出《关于加强成本计划管理工作的几项规定的联合通知》。《通知》规定，中央各部负责编制所属企业的计划，省、市、自治区计委负责编制所属县以上的地方企业和农业计划。基本建设、事业费、四项费用、农副业生产及生活福利等费用均不得计入成本和流通费。

10 月 21 日　新华社报道：珠江三角洲电动排灌网广州—佛山—江门之间的一条 11 万伏高压送电线路，3 月施工，现已正式送电。

10 月　陈云在煤炭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拟定计划指标，要看各方面的条件，有多少能力，就搞多少，不能凭主观愿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就是按比例。要做到按比例，第一条是算帐，第二条是根据算帐结果定计划，第三条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指标。过去几年，指标高，物资少，生产吃老本，基建不配套。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摊子太大，又不下决心下马。他还讲了基本建设问题，工资奖励制度和职工生活问题，技术人员问题，企业管理制度等问题。

11 月 15 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座谈、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许多同志认为，今后对于两大部类的关系、农轻重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速度与比例的关系等问题，除了继续从理论上深入加以研究外，还应当具体探讨这些关系的数量界限。

11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塑料工业发展迅速，全国有 20 个省市建立了塑料工厂，今年前 10 个月生产的聚氯乙烯塑料为 1958 年的 12 倍。

11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台北地区新近发掘大批史前文物，证明原始文化和中原同一系统。

11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前沿各族人民，从 1951 年开始防治流沙，经过几年封沙育草，固定和半固定流沙 190 多万亩，营造 350 华里的防护林带，改造沙漠为农田和牧场。

12 月 6～11 日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听取国家计委 1962 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①当前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调整紧。②真正的调整工作在明年。当前重要问题是解决吃的。③明年指标较低，有意识留有余地，争取超额完成。④明年计划以调整为中心，基本建设加强集中统一，投资可安排 50 亿元左右。

12 月 22 日　新华社报道：1958 年以来，我国农村出现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电力灌溉面积在 100 万亩以上的灌区已有 10 多个，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重要的粮棉产区和重要的蔬菜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有粮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等。据

报道，今年我国生产的动力排灌机械，可灌溉 700 多万亩良田。

1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初步建成纤维板工业体系，现在全国 27 个省、市、区建立了纤维板工厂或车间。

12 月 31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钢铁企业获得新成就，1961 年炼成 40 多种重要新钢种，轧成 30 多种重要新钢材。

军　事

1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去年，各部队共做了 4600 多万个劳动日，其中 70%以上用于支援农业。

3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因病在上海逝世。

4 月 9 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国防工业部门 1961 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报告》。计划规定，国防工业的材料、设备和投资的分配原则是：基建重于生产，尖端重于一般，质量重于数量，维修重于制造。基本建设的重点，是确保"两弹一机"的研究试制和小批生产的重点项目及配套工程。

5 月　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其中《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步兵战斗条令》于 1961 年 5 月 1 日颁发全军；《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于 1963 年 5 月颁发全军。

7 月 5 日　新华社报道：国防部最近颁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26 日、30 日报道：今年以来，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与革命传统教育。

7 月 16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此前在北戴河曾召开国防工业会议，讨论关于导弹、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随后，将坚决上马的决心报告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意这个意见。经研究，在研制武器方面，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

7 月 21 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许多部队的领导干部，普遍在连队、舰艇、机组等基层单位建立基点，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上下关系，加强了连队工作。

7 月 31 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进藏部队 10 年来协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誉满高原。云南边防部队几年来培养出大批民族干部和战士。

9 月 14 日～10 月 20 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心是讨论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 1929 年古田会议的传统，总结了全国解放以来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经验。

10 月 18 日～11 月 4 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了连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团支部和革命军人委员会等工作条例。《政治指导员条例》要求政治指导员做好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并且系统地总结了如何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党支部工作条例》强调了党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党员做群众工作和党的民主生活。《团支部工作条例》强调了对团员和青年群众的教育。《革命军人委员会的条例》肯定了在连队中要开展三大民主。规定了革命军人委员会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和连长、政治指导员指导下全体军人的群众组织。肖华在会上谈了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的 10 条原则。

外　交

1 月 2 日～9 日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参加了缅甸独立 13 周年庆祝典礼和进行友好访问。中缅互换边界条约批准书。周恩来接受吴貌貌总统授予的一枚特制的"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有者"勋章。1 月 9 日，双方发表联合公告。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仰光签定。此后，在仰光举行了中国工业、农业展览会。

3 月 18 日　中朝两国 1961 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中国帮助朝鲜建设一批轻工业项目的议定书分别于 18 日、28 日在北京签字。中朝文化合作协定 1961 年执行计划 31 日在平壤签字。

4 月 3 日　国务院举行 109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4 月 6 日～16 日　缅甸总理吴努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我国云南省度假。两国总理并借此机会就当前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16 日，发表联合公报。

5 月 2 日　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交换批准仪式在金边举行。3 日，此条约在北京公布。

5 月 16 日　陈毅外长率领我代表团前往参加和平解放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陈外长 5 月 24 日在大会上发言，提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五项原则。

6 月 10 日～16 日　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于 15 日签署了联合公告。

6 月 13 日～15 日　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应邀来我国访问。14 日，双方互换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条约

批准书和核准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合作协定的照会。

6月19日　我国和苏联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莫斯科签订。

7月10日～15日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应邀到我国访问。11日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5日发表了《中朝联合公报》。

8月14日～19日　加纳总统兼政府首脑恩克鲁玛访问我国。18日，两国友好条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及文化合作协定在京签订。

9月18日　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宣布，基赞加代总理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已经宣告结束，而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则同台湾蒋介石集团保持所谓外交关系，两国外交关系不得不暂时终止，我国政府决定撤回我驻刚果（斯坦利维尔）大使馆。

9月22日　中国、马里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

9月22日～10月3日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应邀访问我国。10月2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古巴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

9月28日～10月15日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应邀访问我国。10月5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10月15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联合公报》；同日，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修建公路的协定》。

10月15日～23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9日发表了讲话，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各国共产党之间，应在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兄弟般的互相支持和合作，决不应该有任何损害团结的言论和行动。

11月24日　中朝两国代表团在北京签订补充议定书，同意延长关于在鸭绿江和图们江运送木材议定书的有效期限。

12月6日　我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并公布了中印两国政府自1961年8月以来就中印边界问题来往的八个照会。

文教卫生体育

1月11日　在太平天国起义110周年纪念日之际，曾经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南京成立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1月　《海瑞罢官》在北京首次演出。在1959年下半年的一次政协会上，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海瑞戏。1960年底，剧本写成，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为区别于其他的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

2月1日　国家体委公布了294项截至1960年年底的各项运动全国纪录，其中197项是1960年创造的。

2月7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提出，今后三、五年内，农村16岁以上的在校生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应控制在2%左右。中小学一般都不招超龄生。部分农村全日制中学和高小，改为半学习、半劳动，农业中学改为业余学校。要求1961年高等学校招生25万人，比上年减小9.4万人；中专学校招生50万人，减少11万人；普通中学招生335万人，减少99万人。文化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减为4.62亿元。

2月15日　我在台湾珍贵文物中的253件精品，已被美舰由基隆港盗运美国。

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体育馆——能容纳1.5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建成。4月初，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此举行。

3月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同时公布了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第105次会议通过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指示》指出：必须做好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必须坚持勤俭办事业的原则，不要大兴土木。《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不得破坏和擅自运往国外。各级人民委员会对于所辖境内的文物负有保护责任。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有：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馆建筑物共33处；石窟共14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共77处；石刻及其他共11处；古遗址共26处；古墓葬共16处。

4月4～14日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优秀选手们进行了精彩的比赛。中国男子队获得团体赛冠军；女子队获得亚军；庄则栋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丘钟惠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4月7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各地文物古迹得到妥善保护，目前已初步整理文物11万多件，修缮古迹10多处。

5月1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卫生部对全国17个大制药厂派驻厂代表，以加强对药品质量的监督。

6月9日　新华社报道：16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论已由有关部门编写完成。

6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中的鸟岛，1959年5月被发现，从1960年4月起，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就到岛上进行考察研究。人民政府并把鸟岛列为禁游区，加以保护。

6月29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的报告》。这一年，共有毕业生16.2万人，约有6万左右分配到县、镇和公社，占毕业生总数的1/3以上。从1962年开始，对地方实行6个大区分配大学生，不再直接分配到省、市、自治区。

6月30日　国家科技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主要内容是：保持科研工作的相对稳定；科研计划既要力争先进，又要留有余地，并且要有适当的灵活性；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红与专统一起来。只专不红是不对的，只红不专也是不对的；研究所的行政、业务工作，党组织不要包办代替，应当通过行政、业务部门去组织实现。

7月1日　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同时开幕。革命博物馆陈列的文物记录了100多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展出的陈列品有历史文献、图片、资料，革命领袖人物、先烈和革命群众使用过的实物，他们的手迹等。据《人民日报》18日报导：中国历史博物馆自1958年建馆以来，收到群众捐献的文物12,242件。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运动员今年上半年共打破62项全国纪录，其中有8项打破了世界纪录。

7月30日　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很好。我希望不但在江西省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

7月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由中央批准试行。中央要求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宣传和贯彻这个条例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条例》规定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反对轻率上马下马，任意打乱和中断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中央还批发了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获得1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短片银帆奖。

8月8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试行的通知》。《通知》就剧院(团)的方针、任务，剧目，提高舞台艺术质量，提高艺术水平，培养人才等问题作了规定。

8月8日　戏曲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曲学院院长、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在京病逝，享年67岁。

9月15日　中央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60条》)，发到教育部直属的26所高等学校讨论试行。文件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教授、副教授等老教师的作用；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学校中党的领导权力集中在校党委一级；系的总支委员会对行政工作是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9月19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各种不同的剧种、曲种，不同的艺术流派和各种体裁的传统剧目、曲目，以及有特点的唱控、曲牌、表演技术、脸谱、服装道具等，都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笔记、画图、记谱、录音、照相等方法，如实地记录下来。

10月25日　新华社报道：著名的"尺算法"创造人、木匠出身的于振善，今年应聘到河北大学任教。他继"尺算法"和"数块计算法"之后，又创"划线计算法"和"连乘连除立体划线法"模型。

11月1～9日　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国道教协会章程》和《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决议》，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领导机构人员，陈樱宁被选为会长。

12月9日　新华社报道：辽宁省建平县发现一个原始人类的上臂骨化石。这具化石和周口店中国猿人的上臂骨较为近似。这具化石被命名为"建平人上臂骨化石"。

12月11日新华社报道：唐代京都长安城遗址已被发掘出来。中国科学院唐城发掘队四年多的辛勤劳动，发掘勘测结果证明：长安城当时周围有70多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大五倍以上。

12月22日　《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认为农民反封建并非把它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也认为农民起义并不曾自觉到反抗封建制度。随后，史学界就农民战争问题展开了讨论。其焦点是：农民革命是否反对封建制度和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农民起义军所建立的政权性质；农民战争是反对王朝官府还是反对地主，以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2 年

导　言

1962年，是国民经济开始恢复的一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既承认了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又总结了在经济工作中的许多经验，从而更加坚定了党在1961年提出的“八字”方针，为国民经济的回升、战胜困难等奠定了基础。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针，在处理印度对我边境侵犯的事件中，做到了有理、有节，在领土上决不让步，对印度军队的挑衅、侵犯给予坚决回击，同时又建议进行合理的谈判，解决双方的边界争议，这种做法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赞许，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在美国派遣飞机入侵我领空一事上，我政府提出了多次警告，并成功击落了入侵飞机，打击了美国和蒋介石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我国的尊严。也鼓舞了其它弱小国家，增强了反帝反美的信心。

1962年，苏联在新疆策划了伊犁暴乱，大批人民逃往苏联，这使得两国关系开始冷淡、并导致了以后的中苏公开决裂。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七千人大会
-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 我国击落美制 U—2 飞机

七千人大会

背景介绍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党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一些同志对于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 1961 年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方面，很不得力，成效不大。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共有代表 7000 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讲话。

刘少奇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材料：

· 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材料　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泽东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雅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即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

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背景介绍

从1951年起，印度军队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边境东段推进，侵占我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后又在中段侵占我二千平方公里，并企图侵占西段我三万三千平方公里领土。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边境武装冲突，于1959年提出通过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积极主张，建议双方在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停止巡逻，但遭印度政府拒绝。从1961年开始，印军先在西段，后在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

线，蚕食中国领土，多次挑起边界冲突。1962年10月20日，印度政府调集陆军十多个旅的兵力，出动空军配合，在东、西段同时对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这次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20日开始，在东段歼灭印军第七旅和其它一部，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27个侵略据点。第二阶段，自11月10日起，我军又拔除了印军入侵后修筑的16处的据点，收复了失地，保卫了我国领土的完整和边境安全。11月22日，我军单方面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后撤20公里。到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计划。此间我方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交还印方。在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分期释放了全部印军俘虏3942名。

材料：

- 我外交部再度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印方必须停止军事挑衅撤回军事据点
- 我建议十月十五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 入侵的印军发动猖狂进攻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 我国向印度提出最严重最强烈抗议
- 我国防部发言人正式宣告
-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
- 我边防部队释放第一批被俘印军伤病人员

材料一　我外交部再度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印方必须停止军事挑衅撤回军事据点

新华社9日讯　中国外交部今天公布了6月2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件照会。今年4月30日中国政府曾经照会印度政府，就印度入侵中国西藏设立新的侵略据点等事件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印度政府撤走其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印度政府在5月14日的来照（这件照会今天也同时公布）中不仅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反而狡辩说，印度政府负有保护它所入侵的地区的责任。中国政府6月2日的照会对此予以坚决驳斥，并着重指出：中印边界形势中“当前的问题是印度政府停止军事挑衅并且撤出印方在中国境内的军事据点和印度军队”。中国政府的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驻华大使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通知中国政府已经收到印度政府1962年5月14日对中国政府1962年4月30日照会的复照。

二、印度政府在复照中不仅拒绝撤出它的军事据点和入侵军队，反而狡辩印度政府负有保护它所入侵地区的责任。这就进一步表明印度方面决心侵占中国领土，并且为此不惜挑起流血冲突。对此，中国政府不得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三、复照又一次重复了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的大片领土是印度领土的滥调。中国政府在过去历次有关的照会中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滥调。谎言终究是谎言，真理终究是真理。印度政府不管重复多少遍，都不能把谎言变成真理。事实上印度复照承认在大约东经78度06分、北纬35度17分和东经78度02分、北纬35度21分的地方设有据点，并且四出进行活动，恰恰证明印度侵占了中国领土。印度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入侵活动，反诬中国早已设立若干年的东经78度12分、北纬35度19分的中国哨所是新近设立的，说什么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活动是侵略性巡逻，是企图包围印度士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四、印度政府在复照中重提它在1959年的建议，即，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政府将其人员撤到中国地图所标的边界线以西，中国政府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官方地图所标印方主张的边界线以东。复照还提到为了和平解决，印度政府准备在谈判期间和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允许中国继续使用阿克塞钦路于非军事交通来往。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许？这简直是荒唐！至于说到1959年印度政府的老建议，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12月17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就已指出它是不公平的，表面上似乎“平等”，实际上是要中国单方面撤退。这种情况，印度政府是完全清楚的。尼赫鲁总理在1962年5月14日在议会说，这个建议“完全只适用于拉达克地区（应读作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完全不适用于东部地区，因为我们在东面不会撤退。在拉达克地区，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非常小规模的撤退，几个村庄，而对他们说来，则意味着大规模撤退”。这就是说，印方所吹嘘的这一“非常公平”的建议，实质上是印方要以从几个历来属于中国而最近一个时期才为印方所侵占的地点的撤退，来换取中国方面从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历来属于中国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撤退，而印方还原封不动地继续占领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中国领土。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过去不能接受，现在同样不能接受。

五、有理由相信印度政府提出上述建议是不严肃的。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印度政府的建议，那么，印度政府就应该准备把上述建议所包含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界，也就是说，规定中印双方从所谓麦克马洪线到中国地图所标明的中印东段边界线中间的地区撤出所有人员。但是从尼赫鲁总理5月14日在印度议会中的讲话看来，印度政府是以不这样做作为重提这个建议的前提的。怎么可以设想中国政府会接受这样一

个要它屈服的片面条件呢?难道中国是一个战败国吗?很明显,印度政府提出这个建议是并不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认真考虑的,它这样做,看来,不过是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罢了。

六、但是人们的视线是转移不了的。当然中印边界形势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印方坚持用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在中国境内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使边界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自从中国 4 月 30 日提出抗议以来,正像中国在 5 月 28 日照会所指出的,印度军队又在中国新疆境内设立了另一个新的军事据点,并继续在新疆和阿里地区进行入侵和挑衅。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证明,印度政府目前所追求的是不惜挑起流血冲突,侵占中国领土,改变边界现状,而决不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即便是中印边界局势由于印度方面的侵略和挑衅变得如此紧张的现在,从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仍然是开着的。但是中国决不会在武力威胁面前屈服。当前的问题是印度政府停止军事挑衅并且撤出印方在中国境内的军事据点和印度军队。中国政府重申它 4 月 30 日和 5 月 28 日的抗议和要求。印度政府有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改善中印关系的诚意,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2 年 6 月 2 日于北京
(原载 1962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我国建议十月十五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新华社 22 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公布了它 9 月 13 日给印度驻华大使的一件照会。同时公布的还有印度政府外交部 8 月 23 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两件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2 年 9 月 13 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且就印度政府 1962 年 8 月 22 日答复中国政府 8 月 4 日照会的两个照会申述如下:

一、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拒绝尽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表示遗憾。

二、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恣意诬蔑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进行所谓侵略活动。为了寻找借口拒绝同中国政府讨论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在来照中坚持:“除非自 1957 年以来被武力改变了的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得以恢复,目前的紧张局势得以消除,否则讨论是不能够开始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边界问题经过谈判得到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原有的边界状况,不应该以片面行动加以改变。中国政府严格遵守这个立场,在中印边界各段,从未越过实际控制线,更谈不到进行所谓侵略活动。这是任何诬蔑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以武力改变边界状况的,恰恰是印度政府自己。印度政府的这种侵略活动,不仅出现于中印边界西段,而且遍及中印边界中段和东段。如果说,在讨论边界问题以前,必须先恢复以武力改变了的边界状况,那么,印度军队就应该在中印边界各段从他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撤出。中国政府曾经多次抗议印度政府的侵略活动,并且一再要求印度政府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它的军队。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印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一切争端,而且从来没有为谈判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现在,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同时,却反而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可以肯定地说,用这种并不巧妙的手法来掩盖印度政府对谈判缺乏诚意,完全是枉费心机。

三、印度政府装着好像是关心边境紧张局势的和缓似的,其实就在印度政府一再声称希望和缓边境局势的同时,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的入侵和挑衅活动却变本加厉。自从 8 月 4 日以来,印度军队在西段中国境内又增设了十一个军事据点,向中国边防人员又进行了十四次的开枪射击,甚至伏击中国边防部队运输小组、开枪近二百发之多。印度方面的这些日益加剧的侵略活动使边境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个新的危险点。这些事实彻底揭露了印度政府所谓愿意和缓边境紧张局势的虚伪性。

四、边境紧张局势是应该和缓的。中国政府在 8 月 4 日的照会中指出,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和缓下来。但是,印度政府一方面坚持向中国境内推进、用武力更改现状和加剧边境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却说什么“规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近五年来被武力更改的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和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是讨论边界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预备步骤”,这种提法完全是荒谬的。有必要再一次提醒印度政府:只要印度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就一定要遇到中国的抵抗,印度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在上述事实面前,人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度政府并不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只是拿和平谈判作幌子,来推行它蚕食中国领土、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尼赫鲁总理在 1962 年 8 月 22 日在联邦院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奉行的是一种所谓“双重政策”,印度要“通过政治压力、军事压力或其他压力”来取得它想从中国取得的东西。采取这样

或那样的政策是印度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要指出：谈，中国是欢迎的；打，中国是要抵抗的；奉行一种假谈真打的政策不会替印度带来什么好处。

六、印度政府的两个照会中用了不少篇幅企图证明，印度对中国领土的侵犯"纯粹是印度政府根据安全的需要而决定的内部事务"。对于这种荒谬的说法，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历次照会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驳复，这里不准备重复。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政府为了替自己拒绝讨论边界问题寻找借口，竟然把中国外交部长8月3日在电视谈话中和中国政府在8月4日在照会中所阐明的中国对边界问题的立场说成是对谈判提出了先决条件。任何国家有申述自己立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政府从未说过，除非印度方面接受中国的边界立场，讨论就不能开始。相反，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怎么能够说，中国政府一申述自己的立场就变成提出了先决条件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印度政府不想谈判，就不妨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不必这样挖空心思，从毫无道理的地方去找道理。

七、在中国方面看来，在中印两个亚洲大国之间，长期保持边境紧张局势，总是不好的。为了和缓边境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再一次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中国政府相信，这一措施如果能够付诸实施，不仅可以使边境紧张局势马上和缓下来，而且可以使中印边界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之前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八、中国政府仍然认为中印两国政府应该迅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而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中国政府深信，这样做是符合中国人民、印度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的。中国政府正式建议，两国政府指派代表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从10月15日起开始进行这种讨论。有关细节，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国政府等待印度政府的答复。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2年9月13日于北京

（原载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入侵的印军发动猖狂进攻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　我国向印度提出最严重最强烈抗议

新华社21日讯　最近，印军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扯冬地区设立侵略据点，并且不断进行威胁挑衅。我国政府曾就此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印度方面不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竟然在9月20日至21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猖狂的武装进攻，打死我边防军官一名，打伤我边防战士一名。

为此，中国政府于9月21日向印度政府提出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立即从扯冬、择绕桥等地撤出。中国政府并且保留要求印度政府道歉和赔偿的权利。

中国政府指出，如果印度政府不立即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那么，为了保护择绕桥桥西的中国边防部队的安全，为了恢复他们同后方的联络，中国方面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如果印度部队在中国部队的防御行动中仍然开枪射击，则中国部队必将坚决自卫，而印度方面在中国自卫火力下的任何伤亡，都必须由印度方面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新华社21日讯　根据中国西藏地区的边防部队的紧急报告，非法侵入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扯冬地区的印军于20日24时向我守卫在择绕桥桥西的边防哨兵进行挑衅，开枪射击。从20日24时至21日7时，印军连续四次开枪，先后打枪六十余发，打手榴弹七枚，打死我军官一人；打伤我士兵一人。直至发电时止，印军仍在不断向我射击。目前情况已发展到十分险恶，战火可能在扯冬地区发生，中国有关当局正在等待进一步报告中。

（原载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我国防部发言人正式宣告

新华社22日讯　我国防部发言人今日就印度侵略军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战斗情况，发表声明如下：

在东段，盘踞在克节朗河和丘散谋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于21、22两日，多次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进行坚决回击后，印军一部分仍在原地继续战斗，另一部分向达旺方向转移。在打章山口和棒山口以南的印度军队，为了配合克节朗河和丘散谋地区印军的进攻，于22日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经我边防部队坚决反击，现战斗尚在进行中。

为了防止印度侵略军再度发动进攻和边境冲突的扩大，我边防部队已经在22日自克节朗河地区进驻龙布地区。

在西段，印军在我新疆和西藏领土上设立的侵略据点，在印军发动进攻后，经过三天战斗，一部分已经被我边防部队清除，一部分据点中的印军已经撤走。但是，仍有一部分侵略据点为印军继续盘踞。

自从今年春季印度侵略军先在中印边界中段和西

段，接着又在东段，进一步侵入我国领土、建立侵略据点后，我国政府一方面强烈要求印军从我国领土撤走，另一方面一再建议立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屡次要求和建议，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至10月6日，印度政府更断然关闭了谈判之门。印度军队依靠他们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侵略据点，不断向我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并且终于在10月20日晨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至此，我边防部队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坚决进行自卫还击，打退印军的进攻，收复被印军侵占的领土，清除印军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一切侵略据点。

中国政府为了谋求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曾经一再表示，在东段，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我们不越过这条线。可是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这种极大忍让看成是软弱的表现，竟得寸进尺地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样，印度政府就最后地破坏了这条线的约束。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告：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中印两国人民的永久友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愿望。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就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也决不排除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可能。

（原载1962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五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

最近，中印边境上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十分不幸的。中印两国人民从来是友好的，今后也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印两国竟由于边界问题而兵戎相见，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过去利用中印两国人民的无权状态，企图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方面在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把它在东段的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地向北推进到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在中段和西段，直到1959年以前，除掉个别地点外，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范围基本上是符合传统习惯线的。尽管印度方面在东段占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又在1959年挑起两次边境冲突，并且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的要求，中国政府始终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和平解决之前，尊重双方实际控制范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片面行动改变边界状况。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4月到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并且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初步协议。可惜，中国方面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响应。其后，中印两国官员会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中印双方对于边界问题即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不应该导致边境冲突。早在1959年，中国政府就多次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且停止边境巡逻，以求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避免冲突。在印度方面拒绝了这些建议之后，中国又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这一边停止巡逻，以期有助于和缓边境的局势。不料印度方面却利用了这种情况，先在中印边界中段和西段，后在中印边界东段，步步进逼，深入中国境内，建立了几十个军事据点，不断引起武装冲突，使边境局势日益紧张。

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一再要求印度停止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状况，重新回到谈判桌子上来。最近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印度政府坚持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才能举行谈判。

尤其使中国感到震惊的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10月12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接着，在10月20日，印度军队就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除了进行自卫还击而外，没有旁的选择。

目前，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这种严重局势的发生，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痛心，也引起了亚非国家和人民的不安。中国和印度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呢？中国和印度究竟有什么理由发生流血冲突呢？中国不要印度一寸领土。中印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和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中印两国的关系纵然目前十分紧张，也没有理由抛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

现在，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郑重地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

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

中国政府呼吁印度政府对上述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呼吁亚非各国政府作出努力，推动上述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呼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中印友好、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 1962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

材料六　我边防部队释放第一批被俘印军伤病人员

新华社邦迪拉 5 日电　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今天在邦迪拉释放了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印军伤病人员六十四名。这是我边防部队释放的第一批被俘印军伤病人员。

我边防部队将上述被俘印军伤病人员交给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后，今天下午，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和印度红十字会派来的人员办理了交接手续。在交接时，我方人员向印方人员介绍了这些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抢救、治疗和生活情况，并将每人的病历表一份和伤病人员总名册一份交给了他们。印度红十字会派来的阿护鲁瓦里亚医生在我方存留的今天被释放的印军伤病人员总名册上签了字。

印度红十字会派来接运这些伤病人员的医生，对于我方给予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治疗情况表示满意。下午五时半，印方派来的三十三辆汽车载运着这次被释放的印军伤病人员离开邦迪拉。许多人在临走时从担架上坐起来向我方人员招手告别。

中国红十字会曾在 12 月 4 日通知印度红十字会，除 11 月 30 日通知在 12 月 5 日释放的被俘印军伤病人员五十三名（其中一名经过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外，另有十二名被俘印军伤病人员，也于今天在邦迪拉同时释放。

（原载 1962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

我国击落美制 U—2 飞机

背景介绍

1962 年，美国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援蒋反共的政策，妄图借用蒋匪的反共情绪，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因此，美国的 U—2 飞机不断在全球进行间谍活动，主要是侦察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搜集有关资料。为此，美制 U—2 型飞机曾飞入苏联领空，继而又在我华东等沿海地区不断侵扰，我外交部多次提出了抗议，但美国自恃其军事力量而置之不理，我解放军空军经过周密的部署，终于在 9 月 9 日击落美制 U—2 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给予了美国当头一击。

材料：

- 警告美国侵略者
- 我击落 U—2 飞机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
- 首都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 U—2 飞机的重大胜利，粉碎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

材料一　警告美国侵略者

9 月 9 日上午，我空军部队击落侵入我华东地区的美制蒋匪帮 U—2 型飞机一架，给予美国侵略者以严重的警告。我们谨向警惕地守卫着祖国领空的英勇的空军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敬意。

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侵入我领空，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是最近以来，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美国 U—2 型的间谍飞机，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发生在美国 U—2 飞机从日本基地侵犯苏联远东国境之后不过十天，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法新社透露，美国政府最近已进一步扩大利用 U—2 型飞机在全球进行间谍飞行的计划。美国把三架 U—2 飞机派到英国，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大西洋方面”；而在“太平洋方面”，也在大大加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透露说，“从远东基地起飞的 U—2 型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 U—2 间谍飞机活动的加紧，正是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加紧新战争准备的一个具体步骤。

自从美帝国主义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向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阴谋被揭穿之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进犯中国的意图。可是，现在

它却派遣U—2飞机侵入我国华东地区进行侦察，这又是什么意图呢？人们都晓得，美国总统军事特别助理、10月1日起即将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9月7日飞到台湾，8日竟到金门进行军事部署，爬上太武山，窥察大陆；并且巡视了台湾中部的空军基地。美制蒋匪帮的U—2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同泰勒的亲自到台湾面授机宜，显然密切相关。

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活动，是同美国蓄意在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计划分不开的。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于它在老挝所遭到的失败，不仅在老挝继续捣乱，并且利用泰国等仆从国家威胁柬埔寨的中立，加紧对南越人民的血腥镇压。泰勒这个以主张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出名的肯尼迪亲信，这次亲自前来远东，到日本、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等地进行军事部署，就足以表明美国决心要在远东扩大侵略。

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美国猖狂地对古巴进行挑衅，公然叫嚣发动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并且在西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9月7日，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十五万名后备役人员，据白宫发言人塞林格说，"肯尼迪决定要求授予征召的权力是由于总的国际局势。"值得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采取这一系列加紧备战和到处挑衅活动的时候，也正是肯尼迪政府竭力做出各种和平姿态的时候。最近以来，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同苏联以及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并且还在裁军谈判中装模作样，端出两个换汤不换药的停止核试验的方案来，企图要人相信，它是多么希望停止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U—2间谍飞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却完全揭穿了它的底细，就像同样的事件在两年前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细一样。

现在，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愿意谋求和平的肯尼迪，实实在在干着的，却是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勾当。人们由此可以明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道地的好战的政府，它的所谓"和平战略"的那一套，无非是配合和掩盖其黩武战略的一些手法罢了。全世界人民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谨防上当，坚决揭露和挫败肯尼迪政府加紧扩军备战的罪恶计划。

材料二　我击落U—2飞机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

在美国官员装聋作哑或公开抵赖后，美国务院终于承认通过供给蒋匪帮的U—2飞机收集我国军事情报。

军事情报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日承认，美国通过它给予台湾蒋匪帮的U—2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

在铁的事实的面前，国务院发言人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是美国供给蒋介石匪帮的。

在早些时候，为了掩盖美国在这个事件中的干系，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都曾装聋作哑，拒绝就美国是否曾向蒋介石匪帮提供U—2飞机一事发表意见。而在台北，所谓"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个发言人，并且公开抵赖，说什么美国向蒋介石匪帮提供U—2飞机以及蒋介石匪帮使用美制U—2飞机对他说来是个"新闻"，他"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点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美国供给蒋匪帮以U—2高空侦察机这一事实时，企图把这件事说成是美国一家飞机公司同蒋匪帮之间的商业买卖。这个发言人说，在1960年7月，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同台湾蒋介石匪帮签订了一项出售U—2飞机的合同，而国务院发给了把这些飞机运到台湾的出口许可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承认，美国政府曾经在美国"训练了一些中国国民党U—2飞机驾驶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这些事实时，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制蒋匪帮U—2飞机的窜扰中国大陆，同美国并无关系。但是，他接着不打自招地说，"可以设想，根据美国和它的同盟者通常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国民党中国人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

美制蒋匪帮U—2飞机之被击落，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和丧气。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承认，这件事"使美国感到为难"。他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材料三　首都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粉碎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今天下午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大会集中地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定要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今天，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充满了庆祝胜利的洋洋喜气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愤激情绪。会场上，坐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部队各兵种的军官和战士，武装的民兵，以及工人、学生、机关干部、郊区农村人民公

社员和首都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大会的进行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举起拳头，强烈地高呼："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阴谋！""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在大会召开的同时，首都的许多工厂、学校、机关、商店、部队和郊区农村，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收听大会实况广播后分别举行集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各人民团体代表刘宁一，各民主党派代表程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和首都工人、农民、民兵和学生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集中地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们在讲话中一致表示拥护我国政府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的声明，并且严正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侵犯和不可欺侮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必将像U—2飞机的下场一样，遭到毁灭性的迎头痛击。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首长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程潜、王绍鏊、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萌山、胡耀邦、刘宁一、蔡畅、老舍、王照华、张寅安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首先致开会词。他说，我人民解放军这次击落美蒋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个最坚决最有力的回答。这显示了我军的强大威力和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我们衷心地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敬意。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就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声明。廖承志说，美国U—2飞机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愤。现在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战争侵略罪行的怒潮，正在形成。我们感谢各国人民对我国的支持和同情。他说，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一定会被粉碎。

郭沫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热烈祝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落美制蒋匪帮U—2飞机的重大胜利。他说，这是对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当头棒喝，是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

郭沫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把U—2飞机基地扩大到四大洲的十个以上地区，这些基地的主要锋芒都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这又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必将进一步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不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计划。

郭沫若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挑衅的同时，正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一系列凶恶的进攻。他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进行的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值得引起各国人民的严重警惕。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风云人物

李克农

李克农（1898—1962）安徽巢县人。现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克农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即已参加进步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1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1年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

行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等职务。对建设和组织党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事变前后，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务。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9 年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的部长和中央军委的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并被选为第一、第二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抗美援朝和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斗争中，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外交政策，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国防有显著功绩。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克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对党无限忠诚，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英勇顽强，坚定机智，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李克农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战斗的一生和忘我的劳动精神，是全党全军同志的学习榜样。

龙　云

龙云(1884—1962)，彝族，云南昭通人。1914 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任滇军团长、军长。1927 年发动政变，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 13 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后逐渐支持反蒋民主运动。1945 年 10 月，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免除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1948 年 12 月秘密去香港，1949 年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0 年 1 月由香港到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宋　恩　珍

宋恩珍(1920—1963)黑龙江人。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 年从部队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62 年在一次火灾中奋不顾身地抢救公共财物，被严重烧伤，1963 年去逝。

材料　宋恩珍舍身抢救公共财产

1962 年 11 月 8 日，这天天还未亮，帮助王永富屯生产队运送公粮的汽车，在生产大队仓库门前加油时，汽油中不慎飞入火星，引起一场火灾。大火迅速由仓库延及紧邻的供销合作社。这时，正在场院装车的宋恩珍和社员们一道急速奔来抢救。在宋恩珍的指挥下，一部分社员抢上房顶砍断火路，宋恩珍自己和一部分社员，冒着浓烟烈火数次冲进火中，为供销社挽救出了布匹、棉花等许多物资。这时，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又突然发现供销社房里还有一桶煤油没有抢出来，如果着火爆炸，不仅供销社和生产大队仓库的物资要被全部烧掉，而且在房顶上救火的二十多名社员的生命也很危险。在这紧要关头，宋恩珍又奋不顾身地冲进屋里，去挽救这个盛满煤油、敞开口的三百多斤重的大油桶。他把油桶拼命往外挪动时，油桶里的煤油溅满了他全身。但是他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还是使劲往外搬，好容易搬到离门口一步远的地方，共产党员张凤江抢上前去接他。这时，房顶一团火球正好掉到宋恩珍脚上，他全身立即燃烧起来。当他冲出门外的时候，全身已烧得像一根火柱，身上的火苗窜得比房檐还高。他本想到空地上扑灭身上的火，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堆柴垛，怕再引起大火，又转身奔向另一处空场。这时，很多社员围上来帮他灭火。他喊："不要管我，你们赶快救火去！"生产大队的会计陈万福连忙拿棉被把他裹住，帮他扑灭了身上的火，这时他全身许多地方已经烧焦了。社员们看到他的这种英勇行为，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宋恩珍当天就被送到庆安县人民医院，后来又转送到黑龙江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医务人员发现他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五，其中百分之五十五是三度烧伤(烧伤程度分三类，三度即最严重)。皮肉都已烧焦，医护人员注射时，得割开肉来找血管。身上有许多部位连肉也烂掉了，露出了骨头。受了这样严重的伤，他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生产队的事情，当公社干部和社员们前往医院探望他时，他总是问生产队的两匹种马有没有抢救出来，生产队副队长有没有烧伤，现在谁在管队上的事，队里的

粮食有没有打完，公粮有没有送完等等。当他发高烧昏迷的时候，还时常高喊起来："救火啊！冲！""赶快送公粮……"。

中共黑龙江省委和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对宋恩珍的英勇行为和对他受伤后的抢救治疗工作极为重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第二书记、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等负责人都曾到医院去慰问他。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还动员了全省医学界的有关专家和各方面力量来全力抢救他的生命。中央卫生部、公安部和其他地区，对宋恩珍的烧伤治疗也给予很大的关怀和支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送来了许多贵重药品。上海派专机送来曾经治疗上海钢厂工人丘财康烧伤的广慈医院主任医生陈德昌参加抢救工作。在这场极为紧张的抢救工作中，专家、医护人员采取了一切措施，尽了最大的努力。

1963年二月二日，宋恩珍因伤势过重，千方百计医治无效，光荣牺牲。

三日，黑龙江省各界人民在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为宋恩珍举行公祭，在公祭大会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号召全省的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宋恩珍烈士舍己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为了表彰宋恩珍为革命事业战斗的一生，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批准，在入殓时，为这位光荣的复员军人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好转，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也活跃起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色娘子军》是一部优秀故事片。影片公映后，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获得了首届电影"百花奖"。并获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万隆奖第三名。

电影《李双双》、《槐树庄》同样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这说明我国的电影创作和欣赏水平有所提高。

小说有《刘志丹》及许多优秀的散文、诗歌等。其中《李双双小传》曾被改编为电影，受到好评。

小说《李双双小传》

作者：李准

李双双是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今年二十七岁。在公社化以前，她在家里整天围着孩子和锅台转，从没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可是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却把双双给"跃"出来了。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是在一张大字报上。

一九五八年开春，全乡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向水利化进军的高潮，因劳力缺乏，社里党支部发动群众想办法。李双双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了办食堂的主意。乡党委罗书记和社里党支书看了这张大字报，认为这个办法想得好，但不知双双是何人。正在纷纷议论时，喜旺推着小车从地里回来，听说双双贴了大字报，先吓了一跳。又听罗书记赞扬大字报写得好，他才慢吞吞地说："就是俺做饭的写的。"话音一落地，大家轰地一声笑了。

喜旺推着空车一路走、一路想：好险哪！好在她还没有把我们打架那个事亮出来。哎，这个直性子女人，以后可真得小心点哩。

双双和喜旺打架是正月初七那天，双双要同群众一道去修渠，喜旺不同意，她偏要去。这天晌午双双回家晚了点，一进家几个孩子就闹着要吃饭。可早已到家的喜旺，却直杠杠地躺在床上吸烟。双双急得一心火，数落喜旺不帮她做饭。喜旺说："哎！我就不能给你起这个头。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由于喜旺拿板作势，故意气双双，两人就厮打起来。闹过这场之后，双双想：这样闹也不是常法，我总不能让这个家缠我一辈子。后来她听长水媳妇桂英说，水库上成立了食堂。双双立刻想到，"咱们村怎么不成立食堂！"因此，她就写了这张要求办食堂的大字报。

喜旺回到家里，一面为双双的大字报引起罗书记的重视感到高兴，一面又劝双双不要净想鲜点子。他不相信乡里会批准双双要求办食堂的大字报。忽然有线小喇叭响起来了。广播说，乡党委根据群众要求，要在孙庄办一个公共食堂。于是，大家一齐动手，准备了家具，又选炊事员。先选了四婶，接着提出了喜旺。喜旺有意推辞，双双说："放着排场不排场，放着光荣不光荣！我就见不得'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狗肉不上桌'这号人！"老支书也劝他为大伙服务，不要再推辞。喜旺红着脸说："要是这样，那我刚才说的不算，'俺做饭的'说的那个算就是了！"大家又轰地一声笑了。喜旺搔着头皮想着，忽然感到这个称号是多么背时啊！

食堂头一顿饭吃的是小米绿豆面条，群众叫"鲤鱼穿

沙”。吃饭的时候，双双故意把面条在碗里挑得大高往嘴里吃着，吃得很香的样子叫喜旺看，意思是说：我也吃上你做的饭，好气气他。喜旺看见只装没看见，把脸歪在一边。

公社化以后，双双在猪场喂猪。后来喜旺因给孙友做供菜，浪费了食堂的东西，群众贴了批评他的大字报。他怕得罪人，便想趁势下台，不再干炊事员。老支书不同意，希望找一个强实的人领着喜旺干。双双说：“老支书，我去食堂当炊事员怎么样？……我保证‘政治挂帅’！”大家一致赞成。喜旺得知双双要和他一起进食堂，不高兴。

双双当了炊事员组长，来头就不一样。头一天，把几堆砖头抬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又用石灰把个食堂院漂刷得像粉妆玉砌一般。家具也来了个大搬家、大刷洗。为消灭老鼠，双双又带领炊事员大挖老鼠洞，不料挖出了富裕中农孙友埋在地下的水车。双双非常生气，说：“原来这老家伙还想走老路啊！”马上汇报给了老支书。

春节前，全县举行了一次食堂大检查，孙庄食堂评为全县一等红旗食堂。正月开春，社员正大浇小麦返青水。因去年红薯收得多，每天要吃三分之一的红薯。大家吃絮了，剩饭很多。双双又心疼、又可惜，就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粗粮细吃”的难题。喜旺也在双双带动下，改革了炊事工具，创造了一种“多孔台阶式煎饼灶”，找到了快速摊煎饼的办法。当大家吃到可口的饭菜时，无不交口称赞。

（节选《人民文学》）

电影《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节选)

一　女奴

夜。

黑云乱翻，狂风怒吼，雷声隆隆。风摧残着椰林蕉丛，闪电照射着海南岛独特的山河景物。

五指山屹立着。

在高入云霄的五指峰上叠印1930年。

暴雨落在荒凉的山路上。

枪声。

一个女人的头部，从一株旅人蕉后伸过来，面向镜头。她头发凌乱，脸上有鞭痕，瘦瘦的面庞，浓眉，长目，深眼窝。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她机警地四下张望。

远处传来枪声。

她急转身逃去。——

雨雾中，现出她健壮的身影。她拼命地向前跑……

一群黑衣人迎镜头追来，其中一人鸣枪。前边的两个恶奴打着桐油大宫灯，灯上有两个醒目大黑字：“南府”。

山路上走出一位骑高头白马的“华侨巨商”。旁边跟着挑担子的“男仆”。

骑在马上的“主人”，二十七八岁，魁梧粗犷，穿一身对他不很相称的漂亮西装，戴凉帽，穿皮鞋。“男仆”，十七八岁，娃娃脸，却努力效法成年人的深思熟虑的姿态。

枪声。

“主人”立刻警觉地勒住马，倾听。近处又响了一枪。“仆人”望着“主人”。后者用手势告诉前者：稳住！

二人警惕着，又向前进。

在一个岔路口，遇上了逃跑的女奴，迎面飞奔过来。

女奴对骑在马上的“老爷”投了一个仇恨的目光。看看他们并没拦阻，她便从他们身边跑过，继续向前逃命。

“仆人”同情地看着女奴跑远了，刚想说话，却被“主人”制住。

打着宫灯的恶奴们，急急追过去。

“主仆”仍然向前走着。

“仆人”噘着嘴叨咕：“……前边跑的像个丫头，后边追的一定是南霸天家的打手。……”

“主人”同情地听着，点着头。

“仆人”用十分恼怒的口气说：“这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这些白狗子都……”

“别叨咕了，小鬼！”骑马的“主人”温和地制止，“当心，前边就是椰林寨。闯过这一关，就回到苏区了。现在不能多管闲事。”他再压低声音友好地警告：“根据地等我们的钱用哪！”他的手，自然地伸过来抚摸着小鬼肩上沉重的担子。

现在，他们离寨门已很近了。透过雨雾，可以看见椰林寨的北寨门。

北寨门前，站着两个军不军、民不民打扮的团防局的团丁。当他们走近门口时，立刻有六七个团丁，在一个满口金牙的人率领下，包围了他们。

“站住！”“大金牙”喊着，“哪来的？”

“广州。”挑担子的“仆人”放下担子答。

“干什么的？”

“我们是华侨，回乡祭祖。”“仆人”答。“主人”没理会。

“大金牙”眼睛盯着行李：“华侨？妈的，共产党密探吧！检查！”

“乱叫什么？”“主人”现在真的一派老爷腔，坦然地，“叫他们检查好了！”

“仆人”去解担子。

团丁们并不注意这主仆两人，却伸脖子看行李中有什么“油水”。

这时，打宫灯的黑衣人，正押着五花大绑的女奴，向

寨中走去。

“主人”非常注意地看着他们走过。然后，又用仇恨、轻蔑的目光投向蹲在地下翻箱子的“大金牙”。“大金牙”翻出一些来往书信。拿出一封封印着：“洪兄松本金手亲拆”，下落四个大红字：“陈济棠缄”的信。在正面看了看，又倒过来看。他不识字。把信放下又翻，发现一捆又一捆的大批银元，大喜。

“大金牙”龇牙笑了：“财神爷……带走！”

在本县土皇帝、民团总指挥、大地主南霸天私设的刑房和监狱里，一片痛苦的呻吟夹杂着镣铐的声响。

犯人——无辜的农民，填满了牢房。他们骨瘦如柴，衣破裤烂，周身刑伤，奄奄一息。

在刑房里，有吊在棚上的，绷在墙上的，“坐”在老虎凳上的……

刚刚被抓回来的女奴——琼花，被吊在梁上，瞪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刚强地咬紧牙，忍受着瘦小的恶奴头目老四的鞭挞。

恶奴头目老四用公鸭般的嗓音问：“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我问你还想跑吗？奴才！”

“跑！……看不住就跑！……跑！”女奴琼花狠狠地说。

老四挥动皮鞭，鞭鞭见血，抽打着琼花。琼花不躲闪也不呻吟，怒视着他。这时刑房中央的厚木板门被推开了。跟着踉踉跄跄进来两个人：骑白马的“主人”与挑担子的“男仆”。“主人”姓洪，真名叫洪常青，那“仆人”叫小庞。

小庞紧跟着洪常青进来，后面跟着歪帽斜眼的“大金牙”。看门的“酒鬼”从门外再把门关好。“大金牙”把洪常青和小庞推到墙根处。

精疲力尽的老四，扔掉打开了花的鞭子走过来。他打量着两个“犯人”，用发抖的手点香烟。

“大金牙”请安：“四爷！”

“干什么的？”老四问。

“是华侨！”“大金牙”说，“有银子！”他用食指和大指比银元。

洪常青在这一瞬间，把环境观察了一番，目光中露出思考与迅速决定了对策的神情。他先发制人，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们这些民团，简直是土匪！”

老四惊疑地望着洪常青。

“大金牙”提枪想动武，被老四拦住了。

“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常青命令道。

洪常青和老四的两双眼睛对视。一忽儿，老四的目光中，渐渐现出疑问：这是个什么人物呢？

二 “贵 人”

一件大信封，下角有“陈济棠缄”的醒目红字。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南霸天在画外说。

县民团总指挥南霸天的办公室内，南匪正检查洪常青的东西。老四已经伸脖躬腰站在南匪身后。

南霸天身旁站着一个奇瘦、奇长、一脸灰死肉的大管家。

“看看这！”南匪对大管家说。他一手指着桌上的东西。

大管家翻看着：一长卷礼帖，一堆来往书信，礼帖和书信旁边，是一捆捆银元。

南匪的声音：“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建宗祠的。”

大管家忙着整理“华侨大户”的东西。把封面写着“重建南氏万代宗祠随喜礼帖”字样的大帖理好，和十几封信件摆在一块：“那么……请他来一下。”

南匪：“不。”转对大丫头：“更衣！”

南匪换了一件长袍，再穿马褂。丫头大樱战战兢兢地伺候着。南匪在忙乱中说：“这儿从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长都上了名，更不要说海南岛的豪门！”

大丫头给他戴上镶着顶玉的帽头。

南匪推开大樱递过来的手杖，急忙忙走出户外。

（节选自《中国电影剧本选集》第 7 集）

电影《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节选）

一七

校园里。皎洁的月光透过树头的枝叶，投下稀疏的斑影。萧涧秋在树丛中徘徊着，犹如当年他在西湖边上一样的情景。他身后的屋子里亮着灯光。

客房内书桌上放着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八行的信纸上只写了一个头：“亲爱的岚：”湿润的毛笔搁在一旁。

陶岚轻轻地走进房来，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就走到桌前看那张信纸。她凝视了一息，走至窗前向校园的深处寻视着。萧涧秋已经发现她的身影；他稍微高声地说：“岚，我在这里。”

陶岚随即跑了过来，高兴地问：“你在给我写信吗？为什么又不写下去呢？”

萧涧秋低着头慢慢地说：“当我提起笔来就失去了勇气。”

“这还要什么勇气呢？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好了。”陶岚说到后一句声音特别小，头也低了下来。

萧涧秋心思沉重地说：“我在考虑。”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可以对我说吗？”

萧涧秋没有回话。

"要是你感到还是写信方便的话，你就写吧。我明早来取。"她说完转身要走。

"不！"萧涧秋挽留着她。

"那你就说吧。"陶岚睁着大眼睛看着他。

萧涧秋又顿了一下，似为难地说："大概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陶岚已经感觉到不是她所希望的了，她淡淡地说："你说吧！"

"关于采莲和她母亲，我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救济她们。"他顿息一下才接着说，"我决计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陶岚像遭到霹雳似地周身有些发抖，要不是有一棵树支撑了她，她会倒下。

萧涧秋没有敢看她，只是低声地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法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亲自去对她说明。"

陶岚呆立着没有说话。萧涧秋这才转过头来看着她问："你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吗？"

"不，你是对的。"她再也抑制不住地哭着跑去了。

萧涧秋追上几步，呆望着她跑去的身影。他心里说："真是节外生枝，枝外又生节地永远弄不清楚。"

一八

第二天的早晨。萧涧秋从自己的屋里出来。校园里散游着许多学生。

"萧伯伯。"采莲叫了一声跑到他的身边。

萧涧秋稍稍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

"妈妈让我来上学的，还给我换了新衣服。"采莲高兴地指着身上的半新上衣。

"妈妈还哭吗？"

"不哭了。"

上课的预备铃响了。萧涧秋与采莲分手道："你去上课吧。中午我同你去看看妈妈。"

采莲点点头跑向另一个院落，那是小学的部分。萧涧秋走向教务处，他踏进门看见一些教师在高声谈笑着，好像他们都是些无牵无挂的自由人。他为了要解除自己的忧念，就向他们走近去。可是，他总说不出一句话，好像他们是一桶水，自己是一滴油，终究溶化不拢去。

没有一息，陶校长跟着进来。他似来找萧涧秋的，可是他却非常不满地向大家说起话来："事情是非常奇怪的，可是我闷在葫芦里，莫名其妙。"

大家立刻静了下来。陶校长继续说："昨天晚上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什么事，母亲说，妹妹从此不嫁人了，说是因为萧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萧先生要结婚，而妹妹偏不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谋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萧涧秋。他有些尴尬地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方谋立刻向陶校长问："那么萧先生要同谁结婚呢？"

"你问萧自己吧！"陶校长回答。

于是方谋随即转向萧。萧说："请你们去问将来吧。"

教师们一笑。方谋说："回答得真巧妙，使人坠在云雾之中。"

陶校长接着慨叹地说"所以我做大阿哥的人也给他们弄得莫名其妙了。"

"无用奇怪，未来自然会告诉你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甚清楚。"萧涧秋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各人一时默然。

陶校长缓和地说："老友，我看你近来的态度太急促，象这样的办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

"也许我要一败涂地。"

"全不懂，全不懂。"陶校长摇着头。

各人的疑团都聚集在各人心里，推究着芙蓉镇里的奇闻。正在这个时候，阿荣领着西村的陈奶奶来找萧先生，萧涧秋立刻紧张地迎上去问："什么事？"

那位老妇人的嘴唇只是打战，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先生，采莲在哪里呢？她的妈妈吊死了！"

"什么？"萧涧秋大惊地问。

老妇人气喘地说："我……我想到她两天来没有吃东西，就烧了一碗粥送过去，谁知推不开她的门。我大声叫她，也没有人答应。我慌了，跑去找来几个男子汉，硬把门砸开。她吊在那里，手脚全凉了。她没有一个亲戚，怎样预备她的后事呢？"老妇人又向四周看了看问，"采莲在哪里呢？也叫她去哭她妈妈几声。"

萧涧秋这时才清醒过来似地说："不用叫采莲，我去吧。"他又转向陶校长说，"慕侃，放学的时候，请你将采莲带回家，让陶岚照看一下。"

萧涧秋等不及同老妇人一道走，他径直地跑出校门。

一九

黄昏，陶家厅堂。采莲闹着要回家，陶岚紧紧地拉着她的小手不放。

陶慕侃和母亲都站在一旁，以怜悯的目光看着孩子。采莲不断地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等萧伯伯来了带你回去。"陶岚哄着她。

"我认识路，我要回去，我要找我的妈妈。"

陶岚忍着泪说不出别的话来。陶妈妈说："岚，你带她到厢房去玩玩琴吧！"

这一下倒提醒了陶岚，她很快地接着说："对！我带你去弹钢琴。"说着就拉着采莲走入厢房。

采莲看见了钢琴，果然不闹了。陶岚坐到琴前，将采莲放到腿上，教她以手击键，发出清脆的单音。采莲脸上

露出笑容，她侧仰着头问："你会唱歌吗?"

"好，姐姐唱给你听。"陶岚放下采莲，让她站在旁边。她一面弹一面轻声地唱起来。(歌词另拟)她好像在为文嫂的不幸而哀悼，又似抒发着自己内心的忧闷情感。

她唱着唱着不觉流下了眼泪，采莲在一旁呆呆地看着。

陶岚的歌声飘荡到庭院中。萧涧秋拖着疲乏的身子跨进大门，也随着歌声轻步走进了厢房。他唯恐惊动她们似地在门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歌声替他吐出了悲哀与惆怅。不知什么时候采莲发现了他。陶岚的歌声停止了。

采莲扑到萧涧秋的腿上说："萧伯伯，你带我回家。"

萧涧秋抚摸着孩子的头，慢慢地说："妈妈出远门去了，你就跟着陶先生吧，你是最听话的孩子。"

由于萧涧秋的脸色沉重，她似被吓愣住了，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脸。

陶家厅堂。晚餐已经布置好，陶慕侃提着酒壶要为萧涧秋斟酒，他却以手盖杯说："我不喝。"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为什么又不喝呢?"陶慕侃仍欲斟酒，萧涧秋微笑地摇摇头藏起酒杯。

陶岚却在一旁劝道："你喝吧！你喝吧！喝醉也好，或许你会舒畅些。"她从哥哥的手里拿过酒壶强为他斟满了一杯，也为自己斟上一些。

"我知道萧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事情过去了，就不用再想了。"陶慕侃说着举起酒杯，"来，喝了这一杯。"

陶慕侃一饮而尽，他们俩都只是呷了一点。

从门外走进三位教师，方谋也在内，他不客气地说："我们想加入你们喝杯酒。"

"好的，好的。"陶慕侃急忙答。

陶岚起身让位进房去了。他们不客气地坐了下来，陶慕侃为他们一一斟酒。

方谋喝干了一杯酒说："芙蓉镇又有半个月可以热闹了。采莲母亲的猝然自杀，竟使每个人听得骇然，唉！可真算是一件新闻，母亲殉儿子，母亲殉儿子!"

"真是一位好妇人，实在使她活不下去了。太悲惨，太可怜!"

另一位教师说："我们从街上来，没有一家不是在谈论这件事，谁都说她应当照烈妇论。"

萧涧秋不禁冷笑了一声。方谋似恭维地对他说："萧先生，你在我们镇内的名望大极了，谁都知道你是她们的大恩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呢!"

萧涧秋自我嘲讽地说："以后我们学校可以拿我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

方谋红起脸，吃吃地说："你不要误会，我完全是敬佩你的话。他们本来在下雪的那几天就要冻死的，幸亏你毅然去救济他们。这样的结果是萧先生当初料想不到的。"

萧涧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怒，他沉痛地说："我想不到的是，我没有救活她们，反而杀害了她们；我想不到的是，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又为我举杯喝彩。"他站起来举杯向方谋道，"来！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他说完一饮而尽。方谋胆怯地看着他。萧涧秋痛恨地说："小人之心，小人之口。"他愤怒地将酒杯放下，酒杯在桌上碰碎了。

全桌的人都惊骇地愣住了。陶慕侃说："他喝醉了。"

(节选自《电影创作》1962年第3期，原名《二月》)

电影《槐树庄》

内容提要

《槐树庄》是一部描写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电影文学剧本，作品真实朴素地描写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整风反右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作品并成功地塑造了郭大娘这一农村妇女、共产党员的典型形象，描写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风浪，和革命群众一起，高举革命大旗，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前进。

歌曲《一步一层天》

一步一层天

1=6B2/4

胡可词

晨耕曲

行进速度　浑厚雄伟

(女高音)

(女低音)

十年乾坤转，

(男高音)

(男低音)

沧海变桑田，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层天。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

历史档案

教育部关于1962年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

1962年6月18日

根据教育事业进一步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要求，1962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切实保证新生质量，认真按照统一规定的标准，选择政治上、学业上优秀，健康条件合格的学生入学。

现对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作如下规定：

一、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仍然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治区办理的全国统一招生的方式。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高等教育厅(局)应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本省、市、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建立招生机构，根据本规定和有关招生工作的部署，统一办理本省、市、自治区招生的各项工作。

艺术、体育院校(包括师范院校的艺术、体育系科)对学生有特殊的要求，今年继续实行提前联合招生的办法。

所有的高等学校，均应在当地招生机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招生工作。

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在30周岁以下，经当地招生机构指定的医疗单位进行健康检查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即可申请报考：

(一)今年的高级中学毕业生，持有学校介绍报考的函件；

(二)今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经主管业务部门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升学，并持有学校介绍报考的函件；

(三)党政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群众团体等在职人员，经所在工作单位批准，并持有所在工作单位介绍报考的函件；

(四)转业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持有原籍县(大、中城市为区)以上的人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部队团以上单位的证明函件；

(五)归国华侨学生和香港、澳门学生，持有国内侨务机关或“港澳高中毕业生回广州升学指导委员会”的证明函件；

(六)其他知识青年，持有人民公社或区以上人民委员会的证明函件。

三、参加全国统一招生的学校，按招生专业的不同性质，分三类举行考试，其考试科目：

(一)理工类各系科各专业(包括师范院校的地理系科、综合大学的自然地理专业)，农林院校的农业生产机械化、农业气象、土地规划、农业物理学、农业化学、农业电气化、农业机械设计制造、农田水利、森林采伐运输机械化、林区道路工程及房屋建筑、木材水运、木材机械加工工业、林产化学工业、木材纤维化学、林业机械设计与制造、木工机械设计与制造、森林气象、工业捕鱼、渔业机械、水产品加工等专业，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专业，考试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

(二)医、农、林类各系科各专业(包括医药院校的药学专业)和生物学系(科)各专业[已列入(一)类的各专业除外]，体育系科各专业，心理专业，考试语文、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外国语。

(三)文、史、政法、财经、艺术类各系科各专业，综合大学的经济地理专业，考试语文、政治、历史、外国语。

报考艺术、体育和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专业(系科)的加试科目，由有关部门和学校自行规定。

外国语分俄语和英语两种，参加考试时由考生根据所学任选一种。没有学过外国语的，可以申请免试。但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外国语专业的考生，不得申请免试。

四、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在7月20日至22日举行。申请报名的起止日期和其余提前联合招生的学校的招生考试日期，由省、市、自治区招生机构自行确定并公布。

五、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人数，由教育部制订调配方案。省、市、自治区所属高等学校如果需要到其它省、市、自治区招收部分新生时，由有关省、市、自治区之间自行协商确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62年12月1日起主动开始后撤呼吁印度政府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给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的信

新德里

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理先生：

由于中国边防部队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我们两国之间不幸的边境冲突已经停止，局势已经有所和缓。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主动开始后撤，一直撤到离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这一边20公里。在形势出现转折的这个时刻，我认为有必要写信给你，直接呼吁印度政府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我们双方共同推动当前的局势向更和缓的方向发展。

阁下当然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这个声明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在此以前，我又在11月19日和22日向贵国代办班纳吉先生详尽地说明了这个声明的精神和内容，我相信他一定已经向你作了报告。很遗憾，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阁下得到应有的反应。

我们双方都很了解彼此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目前重复这些分歧是不必要的。中国政府认为，我们双方当前的任务是停止边境冲突，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创造适宜的气氛，以便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分歧，而且我们应该有信心，这些分歧是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得到友好解决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分歧同当前的任务纠缠在一起，以致边境冲突停不下来，谈判根本无从开始。中国政府决定率先停火和撤回自己的边防部队，正是从这个考虑出发的。

中国政府的决定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主动措施，并不以印度方面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作为条件。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年9月8日或10月20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

我愿意强调指出，仅仅是中国一方面把自己的边防部队撤退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以外的地方，并不能保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也不能防止边境冲突的再起。相反，如果印度方面不合作，已经实现的停火还会有遭到破坏的可能。因此，中国政府诚恳地希望印度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样做，我具体建议，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中印边界各段双方协议的地点会晤，商谈有关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20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等问题。

两国官员会晤的实现，将标志着我们双方从战场回到谈判桌旁，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如果两国官员会晤取得结果并且付诸实施，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

一个月来的边境冲突，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国在印度的使领馆、银行机构和侨民，甚至遭受到即使在两国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有的待遇。

我认为，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必要地恶化两国之间的气氛，显然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总理阁下，世界上只有不怀好意的少数人要使我们两国继续打下去。我们两国的共同朋友都为我们实现了停火而感到高兴。他们热情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使已经实现的停火成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起点。中国政府已经走了第一步——停火，还将走出第二步——后撤，我希望印度政府积极响应，也朝着同样的方向作出努力。我等待你的答复。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1月28日于北京

国务院命令

（不另行文）

1962年11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21次会议通过，任命：

王观澜、张修竹、郝中士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杜星垣为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王力为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局局长，刘一心为建筑工程部施工管理局副局长，孙明三为建筑工程部非金属矿及地方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杨沛为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局副局长；

于龙江为铁道部机务局副局长，范友韩为铁道部太原铁路局副局长；

张子高、赵访熊、高沂、李寿慈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免去：

杜星垣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林岩的铁道部上海铁路总局局长的职务。韩洪甫的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赖平的铁道部兰州铁路局副局长的职务，范友韩的铁道部蚌埠铁路局副局长的职务，于龙江的铁道部哈尔滨铁路局副局长的职务；

赵化风的建筑工程部第一工程局局长的职务；

肖须知的江西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的职务。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1月17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 月 4 日～10 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分别举行报告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作关于西藏情况的报告；由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代理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作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报告。

1 月 11 日～2 月 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支持美共正义斗争。

2 月 1 日　首都各界人士集会纪念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 300 周年。同日，郑成功纪念馆在厦门开幕。19～28 日，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厦门举行。会议对郑成功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收复台湾的重大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3 月 27 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 115 次会议，通过将由周恩来总理向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将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3 月 27 日～4 月 16 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并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4 月 16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 6 万余人，在苏联通过其领事策动诱骗下，逃往苏联。5 月 25 日，苏联又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新疆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粉碎了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

4 月 18 日　周恩来在政协三届三次会上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报告。

4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5 月 7 日～1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 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会上，刘少奇作《目前的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

5 月　李维汉在民族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即《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总结了 1958 年以来民族工作的伟大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作了重要阐述。讲话重申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讲话要求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搞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根本。

6 月 1 日　国务院第 116 次会议，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房产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并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6 月 16 日　彭德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信(即“万言书”)，说明“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强加于他的罪名。

7 月 18 日　刘少奇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作题为《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的讲话。

7 月 22 日　毛泽东批发陶涛、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

7 月 25 日　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颁发通告，宣布对驾机和驾舰艇起义的蒋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联络办法。

8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班长、五好战士雷锋因公牺牲。

10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将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发到全党。

10 月 24 日　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成长，已有包括 10 多个民族的干部达 11.15 万名，比 1949 年增加 40 倍以上。

11 月 5 日　《中朝通商航海条约》在北京签字。同时还签订了《中朝关于 1963 年到 1967 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中朝政府关于 1963 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等文件。

11 月 9 日　国务院任命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邓子恢等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免去邓子恢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职务。

11 月 19 日　全国工业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今后工业生产建设的任务，提出 1963 年工业方面

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①增产农业迫切需要的化肥、农药以及运输和排灌机具；增产市场需要的轻工业品，特别是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日用品，增产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产品、木材等燃料和重要原材料。②争取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方面前进一大步。③减少亏损，增加盈利。④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凡是还没有根据《工业70条》进行整顿的企业，应当立即动手加以整顿。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认真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要做好计划生育的宣传与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

经　济

1月2日　豫、晋、陕、内蒙、宁、甘、青等七省（区）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3万平方公里。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

1月9日　第七次全国粮油工业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研究和安排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

1月10日　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发出《关于颁发国营企业四项费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提出，根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有关规定，自1962年起，除了商业部门仍实行利润留成办法外，其他各部门的企业，不再实行利润留成办法。

1月20～30日　全国水稻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对水稻科学研究方向、关键性课题以及如何改进试验、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月3日　解放军大力支援农业。一年来，全军支援各地生产建设的义务劳动日共2000多万个，其中80%以上是支援农业生产的。各部队还为公社生产队修理制造各种农业机械1.5万台，农具10多万件，培训技术人员1.2万多人。

2月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62年基本建设初步安排的紧急规定》。《规定》要求，在正式的基建计划下达前，暂按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0日印发的安排意见，即投资59.5亿元、大中型项目718个来部署工作。凡不属这个范围的工程，都应一律立即停止施工；个别计划外的项目，地方和部门认为必须继续施工的，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对已安排的基建投资和项目，要逐渐进行审查和排队，力争最重要的项目的材料、设备、投资不留缺口，并且动员库存物资用于当年工程。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2月14日　中共中央决定，要求196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再减少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500万人以上），下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600万人。

2月21～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西楼举行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

2月28日　为了改变前几年财务机构被大大削弱的状况，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迅速健全财务机构，补充业务人员。中央决定，1962年财政部门的编制人员增加4万人，银行部门增加6万人，商业部门补充50万人。

3月6日　李富春在全国清仓核资电话会议上部署清仓核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月20日发出彻底清仓核资的指示，并成立领导小组，由薄一波担任主任，谷牧、姚依林担任副主任。

3月7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讲了以下问题：①现在可以不搞10年计划，先搞5年计划。10年计划第一阶段是恢复，第二阶段是发展。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②要管好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民生的问题，是重要的国策。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满足了当年生产需要以后，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③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留有余地。

3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3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中央的批语指出："农村中有些群众和基层干部搞单干的情况，最近一个时期，在不少地方继续发生。"要求派出得力干部，向农民很好地进行说服解释，帮助他们搞好集体生产，使情况逐步地改变过来。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禁各地进行计划外工程的通知》。指出，正在建设的所有计划外的工程，一律停止施工，特别是楼、堂、馆、所，不论建设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即停止施工。重申，建设大中型项目，都要报中央批准；地方小型项目由中央局批准，中央各部直属的小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批准。

3月25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就1962年如何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消灭赤字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3月26日　中共中央将财政部关于征收农业税两项措施的报告，批转各地执行。1962年的全国农业税由1958年的388亿斤调减到215亿斤，大体只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同时，从1962年起，给各省、市、自治区增加7%的机动征收数，由中央统一掌握，用于减免少数特大

灾欠地区的农业税。这样，全国仍能完成 215 亿斤的征税任务。

3 月 31 日　沪、津、沈、宁等地已建成 10 个以上的玻璃纤维厂。我国电机、电气、建筑和轻工业等工业部门已采用玻璃纤维制品代替工业用布，效能很好。

4 月 16 日　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集市交易税试行规定》。《规定》指出：征收集市交易税，应该根据集市交易活动"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有利于发展农副业生产以及国家对其收购政策。集市交易税征收管理原则是：对国家不需要掌握的产品从宽，需要的掌握从严；对售价低的产品从宽，对售价高的产品从严；对农民出售自产品从宽，对从事贩卖的从严。

4 月 17 日　刘少奇在同中央办公厅石家庄调查组汇报时的讲话中说：管理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物资部门也是个商业部，要基本上照商业部的办法管理。商业部能供应 6 亿人民，难道你们就不能供应 21 万个企业？同年 10 月 10 日，他在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物资管理工作时指出：实际上物资部门也是商业部门，是处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

4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作出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 6 条决定：①切实扭转企业大量赔钱的状况。②坚决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的错误做法。重申了不许挪用上缴利润和税款等"十个不许"。③坚决制止各单位之间相互拖欠货款。④坚决维护应当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⑤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⑥切实加强财政监督。

4 月 25 日　中央原则上批准国家计委关于 1962 年国民经济的调整计划。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②尽可能增加日用品生产。③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④缩小基本建设规模，特别是缩小重工业、交通部门的建设规模。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由原来的 60.7 亿元减为 46 亿元。

4 月 27 日　农业机械部门今年以来把 10 万马力的排灌动力机械和 5000 多台水泵运往农村。其中 90%是支援粮食主要产区和经常受旱涝灾害的地区的。

5 月 1 日　国家经委对物资管理办法提出改革意见。

5 月 4 日　中央决定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要求供销合作系统的体制，应当大体上恢复到 1957 年以前的状况。

5 月 26 日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明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提出了三项重要决策：①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②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③坚持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大大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对没有生产任务和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分别实行停产关闭、适当合并、缩小规模、改变任务。

5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中央要求：全国职工人数要在 1961 年年末的 4170 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 1056 万人～1072 万人。全国城镇人口要在 1961 年年末 1.2 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 2000 万人。上述精简任务，要求在 1962、1963 年内基本上完成，1964 年上半年扫尾。

同日　内蒙古境内的黄河航道与贵州昔称天险的乌江，最近先后开辟了客运业务。

5 月 30 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全国各地货币回笼情况的资料》。

5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同意颁发《关于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的规定》、《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几项规定》。

6 月 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和合理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要求：①必须坚决做到人粮相符。②目前城镇粮食供应标准一般只能保持现有的水平，不能提高。③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生产基地所生产的粮食，应当逐步抵顶一部分国家粮食，以减少国家粮食的供应。④严禁对干部个人饲养家禽、家畜供应饲料。⑤大力减少农村的粮食销量。

6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妥善保管、处理下马基建单位和关闭停产企业的物资。对于这些物资的处理，属于地方企业、事业单位的，要经过省、市、自治区的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批准；属于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要经过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和商业部批准。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动用、转让、出卖，不得损坏和私分。

6 月 28 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农业生产部队，12 年来改良盐碱地 400 多万亩。

7 月 11 日　邓子恢在高级党校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农业要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主张。他指出，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管理中的混乱，是造成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克服平均主义，必须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8 月 2 日　国家计委发出调整 1962 年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指出：计划内施工项目，凡是属不具备施工条件的，下半年停建；下半年应当把财力、物力和劳动力集中使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轻工市场、国防和解决原料短线产品所急需并且条件好的项目上，力争在这方面多建成一些项目。

8 月 11 日　津浦、沪宁、沪杭、浙赣四条铁路部分地段使用钢筋混凝土轨枕代替木枕，是铁路部门节约木材

的重要技术改造之一。

8月14日　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煤矿推广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目前全国共有43万米巷道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支架，每年可节省12万多立方米木材。

8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资金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家决定增加一部分农业贷款，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9月23日　中共中央对粮食工作作出新的规定。

9月24～27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以及插话。

9月25日　我国钢铁企业今年以来，试制119种、约180多个规格的钢材新产品，其中一半以上是为农业和轻工业试制的。

9月26日　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化肥厂上海吴泾化肥厂首期工程已建成试车，年产硫酸铵10万吨。

同日　天津新港新建成能停泊5艘万吨轮船的第三码头。

10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要求把城市工作的重点转到组织工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上。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将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发到全党。这个新的修正草案，保留了草案关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本规定，继续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10月中旬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对1962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作了检查。情况查明，1962年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和加强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一年，计划安排基建投资(包括追加投资在内)比上年减少一半以上，楼、堂、馆、所的建设基本上都停止了。

10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扭转工商企业亏损，增加盈利。指出，1963年应当争取全国工商企业的亏损数字比1962年减少30亿元至40亿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求那些由于管理不善而造成亏损的企业，要力争在1962年第四季度或1963年第一、二季度内，基本上做到不亏损。那些产品质量低劣，成本很高，短期内又不能扭转亏损的企业，要坚决停止生产。

10月21日　国家为了从资金上帮助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从7月到9月底，全国已发放长期无息贷款3亿元。

10月23日　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

10月下旬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提出，明年的计划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计划的主要安排是：①集中力量加快农业的发展，尽可能地发展轻工业，继续放慢重工业的速度，重点搞好内部比例的调整和产品的质量、品种。会议拟定，1963年，农业增长8.5%，轻工业增长7.2%，重工业增长4.4%。②财政收入安排327亿元，比上年增加27亿元。③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到85亿元，加上上年结转的投资和地方自筹资金等，总投资为100亿元。

10月29日　解放前一度衰落的我国古代名窑——浙江龙泉青瓷窑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产品品种已扩大到400多种。

同日　北京建成一座现代化大型竖井，年产煤60万吨。

11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

11月26日　国家计委、经委、财贸办公室、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提出《关于处理1961年以前财政遗留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

11月29日　农业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结束。会议讨论了农村形势，交流了增产经验，要求争取明年以粮棉为中心的农业和畜牧业丰收。

12月1日　劳动部关于加强城市闲散劳动力的安置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几条安置闲散劳动力的途径。

12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经济合同的通知》。《通知》要求：①从1963年起，各部门、各地区进行的基本建设，一律都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②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经济合同。各生产企业必须按合同要求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

12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转《安徽改正"责任田"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安徽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万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其中在8月中央工作会后自动改的2.3万多个。已改的队连同原来坚持集体生产的队共有10万多个。《报告》指出，今后改正责任田的要求是：在1963年春耕生产以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过来。

12月13日　国务院最近颁发《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

12月15日　国务院公布《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

12月18日　全国产棉省、市、区和集中产棉县代表最近在北京开会，讨论了粮棉并举的方针和奖励种棉的政策等。到会代表一致保证明年按国家计划种足种好棉花。《人民日报》19日发表社论：《千方百计争取明年棉花

增产》。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坚决执行国家计划和预算，严格管理资金和物资的指示。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1963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要求在大力完成粮食增产计划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棉花实收面积达到6000万亩，棉花产量达到2100万担到2200万担，国家收购棉花1700万担到1800万担。

12月30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在1963年9月底以前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已经开业的城乡工商企业立即进行一次全面登记。

12月　1962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围绕经济生活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举行了多次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会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①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

军　事

3月　中央军委于2、3月间，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的建议，确定了整编方针和编制原则，制定了新的编制装备方案，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

6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罪恶阴谋得逞。我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首先在全军指战员中，开展了以控诉美蒋罪行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接着掀起了群众性的杀敌练兵热潮。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物资装备方面，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充分准备。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和民兵，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投入支援前线的备战工作。

6月19日　毛泽东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早在1958年8月29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同年9月29日，他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又强调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8月5日　澳门蒋介石特务在进入我方边境的旅客行李中，安放烈性炸药和定时器，制造了炸死炸伤由港澳回乡探亲的旅客20多人的血腥爆炸事件。同日，广州市公安局破获蒋帮阴谋爆炸红星轮案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蒋帮特务分子伍珠死刑，立即执行。

9月9日　我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此后，我空军部队，于1963年11月至1967年9月，先后又在华东、华北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军U—2型飞机4架。各次参战部队均荣获国防部的嘉奖。

10月　印军入侵我国，我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10月　广东沿海军民全歼9股窜犯大陆的美蒋武装特务。美蒋在1962年夏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的阴谋破产后，于10月1日至12月6日，连续派遣武装特务窜入我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游击走廊"。这些特务分为9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已登陆的8股和另在广东阳江县山区空投的一股武装特务，均被我军彻底歼灭。

外　交

4月23日　由彭真率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朝鲜，金日成首相接见代表团。5月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真一级国旗勋章。

7月8日　我国政府就印度军队新近侵入新疆地区严重事件向印度政府致送备忘录。我外交部并于10日、16日向印度政府提出照会，抗议印度军队最近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增设军事据点，进行新的军事入侵和挑衅活动。

7月16日　陈毅外长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9月21日　我政府就印军在扯冬地区打死打伤我官兵事件向印度提出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据新华社报道：最近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我西藏的扯冬地区设立侵略据点，不停地向我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我边防哨兵。

12月18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再一次最严重抗议印度政府迫害华侨，并决定派船前往印度，接回愿意返回祖国的华侨。

12月25日～27日　蒙古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来我国访问。26日，《中蒙两国边界条约》在北京签字。

12月31日～次年1月9日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锡兰政府和科伦坡会议的亚非6国访问我国。8日，中锡两国联合公报发表。

科技文化卫生体育

1月19日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决议》和皮漱石作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四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修改了该会章程；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的领导机构人员，皮漱石主教被选为主席。

1月27日　首都地质工作者集会纪念我国成立最早的自然科学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成立40周年。

同日　上海郊区发现9处远古时代文化遗址，说明上海一带冲积平原早在2000——3000年前就已形成。

2月12～27日　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选出第三届理事会，推举班禅额尔德尼和应慈为名誉会长、选举喜饶嘉措为会长、阿旺嘉措为副会长。

2月16日～3月8日　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2月18日　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的修建年代进行全面复查，肯定第275窟和较晚的10余洞窟建于16国时期。

2月25日　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目前农村剧团问题的报告》。《报告》重申必须坚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不允许有脱产文工团和群众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业余、自愿原则的指示。

3月17日　2000多年前秦代都城咸阳的故址，已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过部分勘探和发掘。从已出土的遗址和器物中，对咸阳故都的位置、范围等情况和秦的物质文化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3月25日　我国冰川冻土的考察研究工作有新进展。从1958年以来，连续考察了祁连山、天山和帕米尔部分现代冰川，开展了基本理论的研究，查明了青藏高原冻土的分布，研究了特殊的物理地质现象和地貌类型。

4月2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完成调整任务，要争取快，准备慢；争取好，准备差。在谈到调整措施时，他指出：①精简城市人口，必须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这样，精兵简政才有出路。②每个部都要按行业提出企业排队计划，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③要通过控制各种购买力和动员全面节约，来弥补市场差额。④要合理地控制货币投放，坚决地控制外汇，有意识地抽紧银根。⑤要紧缩文教、科研部门的开支。

4月10日　清代道光年间女作家李桂玉写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在福州发现了完整的抄本。这是目前我国流传的一部最长的古典小说。

4月19日　中国亚非学会在京成立。选出周扬为学会会长。

4月27日　以《百花奖》命名的读者影片评奖结果揭晓，获奖的影片有：故事片《红色娘子军》；纪录片《两种命运的决战》、《亚洲风暴》、《征服世界高峰》；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美术片《小蝌蚪找妈妈》；戏曲片《杨门女将》等。

4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

5月18日　陕西乾县唐代永泰公主墓的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出土的大型壁画、石刻线画、彩陶雕塑和工艺品等文物，为研究我国盛唐时代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5月19日　教育部确定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职工。提出：①大幅度裁并高等学校，特别是裁并急剧发展起来的、条件很差的农科学校。高等学校原有845所，保留400所，减少学生12万人。②大幅度裁并中等专业学校。原有2724所，保留1265所，减少学生32万人。③进一步精简职工。中等以上各级学校共精减教职工34万人，其中教师7.3万人。

6月2日　文化部发出贯彻执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者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通知。《意见（草案）》提出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

7月15日　一块1400多年前的"东魏侍中骠骑大将军太保刘懿墓志铭"石刻，最近由山西省忻县专署农业科学研究所干部王连喜捐献给国家，这块石刻是几十年来下落不明的书法艺术珍品。

7月16日　北京市4000多名急需提高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12年来已基本上在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轮训完毕。

7月27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卫生部颁发《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8月1日　《红旗》杂志第15～16期，刊载了刘少奇修改补充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8月4日　著名男子跳高选手倪志钦在北京以2.1米的成绩创造了"剪式"跳高的世界最高纪录。

8月22日　几千名水文地质人员两年来踏勘南北重要农牧业区，查明了10万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分布详情，为华北平原的200多个县编制了农田灌溉水文地质图。

8月28日　全国高等学校今夏毕业生有17.8万多名。连同这一批毕业生在内、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毕业生已达90多万名。

9月8日　文化部关于对违反当前政府精神的影片停止发行的通知。通知决定《柳湖新颂》、《你追我赶》、《新的一课》等46部影片停止发行。

9月11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博物馆、图书馆可以根据本身业务需要直接收购文物、图书的通知》。

同日　活跃在北起鸭绿江口、南到西沙群岛的一支海洋生物资源考察队伍，经过8年的实地考察，基本上摸清了我国海洋动植物资源。

10月8日　国务院发出保护和利用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要求贯彻“护、养、猎并举”方针，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10月10日　国家科委和农业部最近邀请各个学科的60多位农业科学家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农业科学技术队伍问题。周恩来讲话指出：必须把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抓住农业技术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12月11日　文化部颁发《关于各种电影剧本与影片审查的规定（草案）》，自1963年起试行。《规定（草案）》指出：对国产故事片的电影文学剧本、导演分镜头剧本、摄制提纲解说词以及完成样片，对各种译制的外国影片等均需经过主管领导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准发行放映。

12月15日　文化部党组织提出关于艺术表演团体领导体制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要求建立和健全院（团）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改变那种由党委（总支、支部）代替行政领导全面工作的做法，并规定了艺术表演团体的党总支或支部的主要任务。

同日　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最近一年来新订1000多个技术标准，还修订了许多旧技术标准。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3年

导　言

1963年，国内、国际形势都比较严峻，国内在经济上刚开始有所好转之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紧张起来。毛泽东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使得国内普遍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其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造成了在基层干部中打击面过宽、过严的行为，使得过去的阶级斗争又严重扩大化了。这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安心生产的积极性。

国际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攻击我党的文章，造成了中苏两党开始论战，苏联政府公然背信弃义撤走在我国的专家，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中苏的分歧、分裂是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原蒋军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充分说明蒋军在台湾统治的黑暗。

中英在九龙城上的纷争，也说明了英国想进一步蚕食我领土，我党及人民作了坚强的抵制。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徐廷泽驾机起义
- ●中英领土纷诤
- ●中苏两党论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背景介绍

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十中全会后，湖南省和河北保定等地在农村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些做法，并作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社教运动从试点到大规模展开，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运动的做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运动在前期主要内容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期则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致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向极端。

材料：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

材料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月11～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财贸工作和中小学教育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推荐和印发了湖南、河北两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运动的报告。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敌人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是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在运动中，我们坚持了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教育干部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层层训练，层层放包袱，层层搞深搞透。领导带头，一层一层地搞，这是最基本的经验。”“在群众中展开运动时，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地、县委书记都亲自搞重点，亲自掌握运动。”“在一个生产队搞运动，关键是组织好阶级队伍。只要把贫农的优势树立起来，中农便主动靠拢，敌人便受到孤立，一切‘牛鬼蛇神’都会很快收缩回去。”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这次运动的基本作法是：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指全会公报、农业决定、六十条），高举毛主席的思想旗帜；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经过这次教育，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明确了，克服了单干风；改善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推动了粮、棉征购工作的顺利完成，新的生产高潮在广大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毛泽东在推荐上述两个报告的同时，还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并要求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十中全会说有阶级斗争，现在就是一场斗争，对象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严重的分散主义。”“现在看来，即使在经济上消灭了资产阶级（还）不行，还要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现在是困难时期，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没收、打击消灭，不能搞赎买。因为他们现在是搞破坏的。”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

徐廷泽驾机起义

背景介绍

六十年代，蒋介石在台湾以各种方式向大陆渗透，不断派遣特务到沿海及内地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但均遭我沿海军民的共同打击，在我政策的鼓励下，加之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导致蒋军中有些人寻找各种机会返回大

陆，而空军就有这种机会。1963年6月2日，原蒋军空军第二联队十一大队四十三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美制F—86F喷气式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在华东某机场着陆。徐廷泽的这种弃暗投明的义举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林彪元帅授予他少校军衔，并奖给黄金二千五百两。

材料：

- 北京盛会欢迎徐廷泽驾机起义归来
-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张治中傅作义蔡延锴接见徐廷泽并嘉奖他驾机起义的爱国正义行动

材料一　北京盛会欢迎徐廷泽驾机起义归来

北京市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光荣驾机起义归来的原蒋军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曹里怀空军中将、王兴纲少将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廖沫沙主持。

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在会上首先讲话。他代表北京市各界人民，对徐廷泽光荣起义的爱国正义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我们希望成为人民空军光荣成员的徐廷泽少校，像过去驾机起义归来的刘善本、黄纲存等同志一样，积极地在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中，在保卫祖国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作出贡献。

王昆仑在讲话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唆使蒋匪帮窜扰大陆，把台湾变成对中国大陆和整个亚洲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军事基地的罪行。他热烈祝贺人民空军前天夜间击落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的美制蒋帮P2V型飞机的胜利。他对一千多万台湾同胞在美蒋黑暗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侵略者必须从台湾滚出去。

王昆仑说，徐廷泽驾机起义的爱国正义行动，对美国侵略者和蒋匪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蒋军官兵树立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榜样。我们希望蒋军官兵们，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同祖国人民一道，为反对美国侵略、解放台湾作出贡献；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个人前途为重，驾机起义，乘舰起义，携械起义，光荣归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同祖国人民一道走向幸福美好的未来。

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林遵接着讲话。他说，徐廷泽的起义不是偶然的。这是蒋军官兵越来越痛恨美国侵略者，越来越不满卖国殃民的蒋匪帮，越来越希望摆脱黑暗和痛苦，越来越向往祖国大陆的光明和幸福的生动表现。

林遵海军少将说，祖国人民对待蒋军起义投诚人员，从来都是本着爱国不分先后的精神，一律予以热烈的欢迎，并且还根据他们贡献的大小，论功行赏，量才录用，给予妥善的安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国民党空军有四十二人驾驶三十一架飞机光荣起义，海军也有两千多人驾驶三十多艘舰艇起义来归，他们都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器重。他们工作都很称心满意，生活过得美好，前途无限光明。他希望蒋军海军官兵，以徐廷泽为榜样，走二舰队、“重庆”舰的光明道路，驾驶舰艇起义归来。

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刘善本在讲话中，热烈祝贺徐廷泽摆脱了美蒋反动派的魔爪，走上了新生的道路。他说：“徐廷泽起义归来这一行动，必将进一步鼓舞台湾军民反对美蒋的正义斗争，增强蒋军人员走起义爱国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他希望今天仍然在台湾过着屈辱生活的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走徐廷泽的道路，弃暗投明，回到祖国怀抱。

徐廷泽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对北京市人民的热情欢迎，表示万分感激。他愤怒控诉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罪行。他说：美帝国主义已经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控制了台湾。台湾的军队完全被美国的所谓“军事援助顾问团”控制起来。蒋军各个部队所有的作战、训练等重大计划，都要经过美国人的同意才能实施。美国人还不断指使蒋匪空军人员驾U—2型和P2V型间谍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

他说：“美国人在台湾随意欺凌和侮辱中国人。他们把台湾军民看作奴隶。有一次，我在新竹公园的美军俱乐部外面，还亲眼看到十多个美国军人带着他们的老婆，坐在十多辆三轮车上，叫台湾三轮车夫围着俱乐部赛跑，举行所谓三轮车‘跑马赛’。三轮车夫们跑得气都喘不过来，美国佬却坐在车上疯狂大笑。美国人还玩弄和污辱蒋军空军人员的妻子。有一个蒋军空军作战长失事摔死了，他的妻子就被一个美军顾问人员霸占了。”

徐廷泽在讲话中还揭露了台湾蒋匪帮媚美卖国、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他说：“他们对外采取卖国的政策，甘心受美国人的摆布，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台湾军民，则采取法西斯独裁恐怖的特务统治。在台湾的那些高官显贵们，无穷无尽地搜刮民脂民膏，把搜刮来的大量金钱存放到美国的银行里。对台湾人民和一般军事人员和公教人员的生活疾苦，根本不加过问。”

徐廷泽说：“在台湾，我们最大的苦闷就是看不到有一线光明的前途。因此，家在祖国大陆的蒋军人员，十分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向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就是在这种思想下驾机归来的。这次驾机起义的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却反映了很多蒋军飞行员的愿望。”

徐廷泽说，"我回到祖国怀抱以后，祖国给予我的荣誉是崇高的，对我的奖励是极其优厚的，我得到了极大的温暖，我好像一棵即将枯萎的幼苗，在祖国怀抱里得到滋润，恢复了青春，得到了新的生命。今后，我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的领导下，虚心学习，积极工作，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解放我国领土台湾贡献我一点微薄的力量。"

徐廷泽讲话后，少先队员向他献了花。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文辉、卢汉、侯镜如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还有：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蒋光鼐、梁思成、余心清、凌其峻、林巧稚、王源兴，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台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陈炳基，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北京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驻京部队官兵代表，以及徐廷泽的家属和现在台湾的蒋军人员的家属。

获得释放的前国民党战争罪犯杜聿明、宋希濂，同徐廷泽见了面，并出席了大会。

（原载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接见徐廷泽并嘉奖他驾机起义的爱国正义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今天下午接见了驾机起义光荣归来的原蒋军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并且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叶剑英元帅对徐廷泽说："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对你驾机起义归来这一爱国正义行动很赞许，他让我代表他向你表示欢迎和祝贺。"

叶剑英元帅对徐廷泽说："你的起义，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光明的追求，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因此，祖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并且完全信任你。"他勉励徐廷泽今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祖国人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说："你现在还年轻，前程是无限光明的。"

叶剑英元帅说，徐廷泽的起义，反映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对美蒋黑暗统治的不满，对伟大祖国的向往。他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我们希望台湾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爱国的光明道路。只要他们起义回来，都会同徐廷泽一样，受到欢迎和器重。"

张治中、傅作义和蔡廷锴三位副主席在谈话中，热烈祝贺徐廷泽获得新生，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少校。

张治中副主席说，徐廷泽驾机起义归来是一种勇敢的爱国正义行动，是值得表扬的。他对徐廷泽说，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旧中国不能比的。他期望徐廷泽今后好好学习革命道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好好工作，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

傅作义副主席说，徐廷泽的起义，是他看清了在美蒋黑暗统治下没有前途，因而弃暗投明。他说，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备受外国人的欺凌，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伟大祖国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正在为实现祖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祖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这样的一个伟大祖国，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蔡廷锴副主席说，解放后十多年来，祖国建设成就之大，人民生活之幸福美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过去我们连续遭到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克服了困难。现在，全国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已经大大好转了。他希望徐廷泽有机会到各地去参观，亲眼看看令人鼓舞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三位副主席在谈话中，还向徐廷泽问到了他们在台湾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和学生的情况。他们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看清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为反对美国侵略、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徐廷泽听了叶剑英元帅和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副主席的亲切谈话以后，兴奋地说："今天，我听了各位首长对我的勉励，非常感动。今后，我一定在各位首长的教导之下，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尽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祖国人民服务。"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上将、甘泗淇上将、萧向荣中将、吴法宪空军中将、林遵海军少将、刘善本空军大校等。

接见后，叶剑英元帅等同徐廷泽和他的家属一起，共进晚餐。

（原载1963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中英领土纠纷

背景介绍

英国政府在占领香港后，不断在香港岛附近扩大其地盘，蚕食中国领土，六十年代，香港英国当局企图将历

来属于中国领土的九龙城寨据为己有，便采取强制手段，拆除九龙寨房屋，强令居住在九龙城寨的居民迁移。香港英国当局的这种做法，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再次引起了中英领土上的纷争。

材料：

· 外交部严重抗议英国政府侵犯我国主权

· 香港英国当局应即撤销拆迁九龙城寨计划

材料一　外交部严重抗议英国政府侵犯我国主权

香港英国当局最近企图采取强制手段，拆除历来属于中国领土的九龙城寨的房屋，强令居住在九龙寨的居民迁移。香港英国当局这种作法，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对此已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九龙城寨位于九龙东北部，人口有两万余人。这个地方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管辖权属于中国。近几年来，香港英国当局多次企图强拆城寨房屋，迁移当地居民，但均遭受居民的反对而未能得逞。最近香港英国当局竟提出了限定拆迁的日期，态度极为嚣张，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注意。

一九六○年五月，香港英国当局发表了"九龙东北部发展草图计划"，竟把九龙城寨列入其计划范围之内，当地居民对此纷纷表示反对，并向"香港城市设计委员会"提出抗议。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香港英国徙置事务处派出三十多人，进入九龙城寨的东头村道、龙城路、龙津路、光明街等街道上，张贴徙置通告，进行调查登记，并宣布根据"东头村第二期徙置计划"，要把上述街道的房屋拆除，并迁移居民。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香港英国徙置事务处人员，又多次进入城寨，向上述街道居民强行派发"徙置通知书"。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派发"徙置通知书"时，香港英国警察处还派了数十名武装警察布防，如临大敌。当地居民对香港英国当局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我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召见英国驻华代办贾维，对香港英国当局在九龙城寨强迫拆迁的行动，表示严重的关切，并要其转达香港英国当局慎重考虑它所采取的行动。但是英国政府不但没有改变态度，相反在一月七日由香港英国徙置事务处进一步向城寨上述街道居民派发"拆迁通知书"，蛮横地宣布要将居民们的房屋分别在二月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十九日和二十日以前拆除。这批房屋约近二百间，居民二千余人。

香港英国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警告，公然提出限定拆迁的日期，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九龙城寨的居民对香港英国当局这种日益进逼的蛮横做法，一致表示强烈反对和严重抗议。当地的房屋业主和其他有业权利益的居民，在香港英国徙置事务处派发"徙置通知书"和"拆迁通知书"时，纷纷拒绝接受。许多居住在城寨的工厂厂主、学校校长、商店店主、医生和房屋业主指出，如果香港英国当局强行拆屋迫迁，将使他们家园破毁和丧失谋生条件，各种有业权利益的居民，将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害，而几千居民将被迫走上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绝境。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一月十四日还刊登了"九龙城寨居民联合反对拆迁委员会"负责人和许多居民代表的谈话，对香港英国当局侵犯中国主权、损害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作法，表示最坚决的抗议。

强迫拆迁九龙城寨的事件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香港英国当局在英国政府的指示下，采取步步进逼的极其蛮横的恶劣态度，已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我外交部已在一月十七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郑重指出九龙城寨是中国的领土，管辖权属于中国，历史上一向如此。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责成香港英国当局立即撤销拆迁九龙城寨的决定，并停止任何有关拆迁的行动。

（原载196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香港英国当局应即撤销拆迁九龙城寨计划

九龙城寨居民联合反对拆迁委员会十八日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香港中英文报纸记者三十余人，另有城寨居民代表约四十人。

反对拆迁委员会主任委员黄中平在招待会上代表这个委员会发表了反对拆迁的书面声明，一些居民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他们反对拆迁的坚决态度。

九龙城寨居民联合反对拆迁委员会的声明说，自去年香港英国当局企图拆迁九龙城寨以来，城寨居民立即提出抗议，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尊重城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中国的主权地位以及居民的传统生活权利，撤销拆迁城寨的计划，但香港英国当局不顾城寨居民的抗议，竟加紧进行各种准备拆迁工作。声明指出，连日来香港警务处增派警员日夜进行巡逻，并恐吓威胁居民代表不准反对拆迁，这完全是蛮横无理的。声明强调表示，城寨居民坚决反对拆迁。

声明说："现在，我国政府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郑重指出九龙城寨是中国的领土，管辖权属于中国，历史上一向如此，要求英国政府责成香港英国当局立即撤销拆迁九龙城寨的决定，停止任何有关拆迁的行动。这是严正而且合情合理的声明，香港英国当局，应该立即

接受我国政府的声明，撤销拆迁城寨的计划。现在，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拆迁的态度，希望香港英国当局慎重考虑，不可再蛮干到底。”

中苏两党论战

背景介绍

中苏两党论战，是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论战内容既涉及意识形态，又关涉国家利益。

分歧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开始的。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苏中联合舰队，毛泽东为捍卫国家主权，没有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从此，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9年9月，苏联发表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大规模围攻；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有关合同和协议，使双方论战急剧升级。在1962～1963年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国方面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了九篇评论，使论战达到了高潮。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

材料：

-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节录）
-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节录）
- 中苏论战大事辑要

材料一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节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

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

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覆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提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摘自 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节录）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

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做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出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的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么，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

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来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辨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节自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中苏论战大事辑要

1964年11月～1966年5月

1964年11月21日　新华社播发了《红旗》杂志社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1965年3月5日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照会苏联外交部，就我国留苏学生参加各国学生反对美帝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苏联军警镇压一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1965年3月20日　《人民日报》第三版在《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关于苏共领导非法召开三月分裂会议的消息、公报及苏共领导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第一号命令和第二号命令，并加了编者按。

1965年3月23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1965年6月13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发表编辑部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1965年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苏联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

1965年11月11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

1965年12月30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题为《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的文章。

1966年3月22日　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

1966年5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批驳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公开造谣诬蔑我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无耻谎言。

1966年5月10日　共青团中央复信苏联共青团中央，表示中国共青团不能派代表团参加全苏列宁共青团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摘自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人民日报》）

风 云 人 物

雷 锋

雷锋(1940～196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湖南省望城县人。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毒打成疾致死,兄、弟在苦难中夭折,母亲含恨自尽。七岁成孤儿,依靠穷乡亲们照料度日。一九四九年八月家乡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上了学。学习刻苦,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斗争。高小毕业后在乡人民政府当通信员。后调中国共产党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一九五七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望城县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山钢铁公司化工总厂建设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一九六〇年一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锋把毛泽东著作看成“粮食”、“武器”、“方向盘”,以“钉子”精神挤时间刻苦学习。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热爱人民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立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处处以关心别人为重,热情帮助战友,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群众赞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九六〇年在人民生活遭到严重困难时,他把省吃俭用节余的二百元钱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带病参加抚顺地区抗洪抢险,坚持奋战七昼夜,直至战胜洪水。他关心少年一代的成长。在抚顺市担任校外辅导员时,经常给少年讲革命故事,作忆苦报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耀,做了好事不留姓名,受到赞誉不骄傲。一九六一年六月任班长后,他带领的第四班一直是先进集体。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因公殉职。在部队两年零八个月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被选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并被评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年先锋队辅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于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都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他的事迹的文章。

材料 解放后我有了家 我的母亲就是党

雷 锋

我决心应召

一去年12月3日,当我在焦化厂工地听了李书记的征兵报告之后,我的心激动得无法平静下来。夜深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跑到车间办公室,叫醒了李书记,问他我能不能报名参军?李书记说:“怎么不能?像你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参加解放军是顶呱呱的哩!”他仔细看我一眼说,“哎呀,你怎么没穿棉衣就跑来啦?外面正下雪,不冷吗?”李书记顺手把一件棉衣披在我身上,告诉我天亮就报名,让我先回去休息。我回到宿舍,就坐在桌旁写起入伍申请书和决心书。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想到车间报头一名,哪知道青年工人马守华比我去得还早,头一名让他报上了,我只好报了个第二名。

参军,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而且是培养革命青年的大学校。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怎么叫我不高兴呢?

当我在入伍登记簿上写上我的名字,并特别注明“我坚决要求参军”时,一段辛酸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祖辈给地主家当佃户。父亲长年劳动维持不了一家半饱的生活。过年时,哥哥领着我出去“送财神”,讨点米来吃。要是赶上富人家办喜事,也出去讨点剩饭剩菜。我们家住一间破茅屋,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为了挡挡风寒,常用几捆稻草堵在门口,冷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取暖。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我哥哥只好去一家机械厂当童工,手被机器轧断,脑袋撞破,回到家里没钱治疗,活活被折磨死了。接着小弟弟也饿死了。妈妈为了养活我,到地主家做工,也被害死了。剩下孤孤单单六岁的我,给人家放牛,喂猪,上山砍柴,我的手又被地主砍伤,露出了骨头,鲜血直往外流,疼得我喊娘,娘不应,喊爹,爹不答。那时我虽年纪小,对那些要命的野兽般的地主和黑暗的旧社会是多么恨之入骨。那时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来搭救我,我一定要拿起枪,粉碎那些狗豺狼,为爹妈报仇!

伟大的党啊!您搭救了我,给我吃的、穿的,送我念

书，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祖国的工农业建设，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要是没有您，我很难想象自己的一切。今天您需要我，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永远忠于您，忠于人民，继承长辈的革命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入伍第一天

今年1月8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自己最崇高的愿望。

祖国啊！到处都有我慈祥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我到达部队的头一天，因为乘火车时车厢里热，我脱掉了衣服，下车受了凉。深夜睡不着觉，止不住地咳嗽，发烧，有时还发冷。下半夜了，营长来到我们宿舍，有的同志被子没有盖好，他轻轻地给盖好。他发现我还没睡，走到我身边见我咳嗽，就轻声地问："你感冒了么？"我说："没什么。"当时我想，这点小病还是不告诉首长的好，以免麻烦首长。营长连夜查铺三次，发现我一直没睡，知道我感冒了，就从卫生连叫来一位医生给我诊治，吃了药，叫我好好睡觉。亲如爹娘的营长啊，怕我冻着，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还送来一床新被子，都盖在我身上。我激动的泪水流湿了枕头，我真想掏出自己的心来献给党，我下定了决心，入伍了，一定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一堂政治课

1月4日早饭后，我们新兵营的同志集合在一个大礼堂里，政治处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他说：你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你们要好好学习政治和现代军事科学技术，要熟练手中武器，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消灭胆敢侵略我国的敌人……吴团长接着给我们介绍了本团的光荣历史，讲了战争年代许许多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课后放映了电影《董存瑞》。当我看到战斗英雄董存瑞英勇炸碉堡的时候，我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决心向他学习。课后回来，找到一本《解放军画报》翻着看，看到了战斗英雄黄继光的遗像，我把他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每天写日记，我要先看看他，想想他。参军第一堂政治课给了我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

把知识教给大家

4月上旬，我来到运输连，和三十多名新同志一起开始学习汽车构造、汽车原理和驾驶。学了一个星期以后，有的同志认为进度快，记不住，不好学。和我一个班的佟占佩同志，接受能力差一些，今天学了，明天就忘了。他感到学汽车理论很吃力，第一次测验考了个不及格，有些灰心了。排长（也是汽车教员）对我说："你学得好些，要好好帮助佟占佩同志，下次测验，你们都得五分那有多好！"

我想排长说得对：自己学习成绩再好，将来只能开一台车，要是大家学习都好，那不是能开更多的汽车吗？连长也专门分配我帮助佟占佩，怎么个帮助法呢？课后小组讨论，我总是让他先发言，不懂的地方就提示一下，渐渐有了起色。有一天，我们讨论汽化器的构造和工作情况，他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就拿着图给他讲解，他还是摇头说记不住。我分小节讲，讲一小节，让他重复一遍，这样一句一句地教，教了两个多小时，他终于明白了。我们起早贪晚地在一起学习，他有了明显进步。第二次测验，结果得了五分，大家都为他高兴。

部队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我们运输连开了初小班、高小班和初中班。连里缺少文化教员，动员大家"兵教兵"。我自告奋勇当一名兼职小教员。连首长分配我负责高小班。开始碰到很多困难，主要是事情多，忙不过来。每天要学技术专业，我是技术学习小组长；大家还推举我当了连队俱乐部学习委员，每天给大家读报、广播、教歌。现在又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就是业余时间一点不休息，加上晚上少睡点也忙不过来。连首长鼓励我做好这些事，免去了我的公差勤务，让我集中精力把文化课教好，我一想到党对我的培养，工作再忙，困难再多也不在话下。我教高小语文课和算术课，多数同志反映还好，也有个别同志就是不用心听讲。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的文章，我给大家读，说明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乔安山同志文化程度比别人低，学习信心也不足，一学数学就头疼，上课不带笔和本，有时还缺课。有一次，我让他做作业，他说钢笔丢了，我把自己的一支笔送给他，还给他订了一本作业本。他很受感动，学习热情渐渐高起来，考试成绩也不错。我按期完成了教学任务，全班总评成绩优秀。

照顾一位老太太

6月上旬，我因公外出，在沈阳火车站乘车回抚顺。早晨五点钟，到了上车的时间，我背着背包刚走近天桥，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背着个大包袱，走几步歇一歇，很吃力。我急忙赶上前去，帮助老人背起包袱，搀扶她上火车。老太太累得满头是汗，喘了半天气，才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孩子，大娘忘不了你呀"。上了车，人很挤，我给老人找了个座位，自己就站在老人的身旁。火车开动了，因为我没吃早饭，肚子饿了，我拿出在车站买的两个面包，送给老太太一个。她接过面包，说："你这个当兵的，真好，我见到儿子叫他写信给你们首长……"老人说她从山东来，到抚顺去找儿子，但又不知儿子的住处。她掏出一封信叫我看，记得上面写的地址是"抚顺市××信箱第

四宿舍”。这个地方我当然不知道，但为了使老人安心，我就说：“大娘，你莫急，有地址就好办，下了车我帮你去找。”六点多钟到了抚顺，我把自己的背包存放在车站，背上老人的包袱，领着老人四处打听，走走停停地快九点钟了，终于找到了——这个“××信箱”原来是个保密工厂。老人见到了儿子，高兴得满眼是泪说：“儿呀，要不是这位军人同志帮娘找，今天难得见到你……”临走时，他们母子二人千感谢万感谢的，送出我很远。我本不想汇报这件事，因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谁知，那老人的儿子果真给部队写来一封信，请求领导表扬这位不知名的战士。那天我回连晚了三个小时，想瞒也瞒不住……

愉快的星期天

前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卫生连去看病回来，走到半路上，看到团部前面那块空地上正在建筑楼房——听说要盖一所小学校。心想，领导经常讲要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反正今天我休息，何不和工人同志一起参加点劳动呢！我鼓起勇气跑到工地找了一辆手推车，帮助工人同志推起砖来。一气推了八九车。工人们开始休息了，我还是一个劲地推。工人们感到很奇怪：从哪里来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帮助推砖？有一位穿蓝制服的同志走到我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我本不想告诉他，可身边一个工人同志说：“他是我们建筑公司第二工区党总支李书记。”这下把我难住了：不说不好，说吧，他们准又是一通表扬。我只说今天没事，参加点劳动是应该的。可是不行，他们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只好说了。星期天两餐饭，我一气干到快吃晚饭了，回到连队。傍晚，工人们敲锣打鼓地来到我们连，送来一张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连里同志这时才知道我带病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说来也怪，参加点劳动，我的肚子反而不痛了，所以我开玩笑说：参加义务劳动能治病……

节约二百元钱

我从小受的苦，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部队首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我们的国家不富裕，还有困难，一定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我每花一分钱都很自然地联想起过去的生活，告诫自己不能忘本。今年春节，连队卖苹果，每人可以买两斤，很便宜，同志们都买了，但我没买。这个春节，我只花了两角五分钱理发，别的钱分文未花。同志们说我穿的袜子不象样了；应该换双新的了，但我补了补还照样穿着。……今年7月，我去参加军区工程兵体育运动大会，天气热得很，不少同志都跑到场外去买汽水喝，我也想买一瓶，掏出钱往外走，发现那里有自来水管，我又把钱收起来，上前拧开水龙头喝了个够。我这样做，有的同志说我是小气鬼，太熬苦自己了。我是想，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国家有困难，大家来分忧，就要一点一滴地做，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每月发六元津贴费，我只留五角钱零用，余下的都储蓄了。入伍半年多，节约了三十二元，加上我在工厂节余的工资，现在储蓄了二百多元。

支援人民公社和辽阳灾区，就是用的这笔钱。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上街去理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望花区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想：一个新建立的人民公社，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去支援。我想到了这些，就到储蓄所取了二百元钱。我到了望花区公社说明了来意，公社干部只说收下我的心意，但是不收钱。我说这钱是人民给我的，我现在把它还给人民，支援人民公社发展生产，你们一定要收下这点钱，就像父母的收下自己儿子的钱一样，是不必客气的。说了半天，公社只收下一百元。不久，报纸上有消息说，辽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我是从辽阳参军的，对那里的一切怀有很深的情谊。那里受了灾，我不能袖手旁观。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把公社没有收的一百元寄给了中共辽阳市委，请他们转交灾区人民。

做这种事——自己应该做的事，本不想叫领导和同志们知道，因为党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谁知事后公社党委和辽阳市委都给部队来信表扬我，使我很不安……

防洪抢险

暴雨一连下了几天，抚顺地区的洪水不断上涨。8月3日那天，我们连接到上级命令：到郊外上寺水库去抗洪抢险。当时，我身体不好，连长让我在家执勤。我讲了价钱：“在这种时候，不能把我留在家里！”我和全连同志到了水库，连夜开掘溢洪道，团长、政委和我们一起战斗在溢洪道中。雨下得很大，堤坝不断塌方，大家挥舞锹镐越干越欢，什么苦呀，累呀，全不在话下，只想到保住水库就是保住了煤都。一不小心，我手中的锹被塌下的土方打掉了，天黑雨大没找见，我只好用双手当锹挖泥，手指挖破了皮，但当我看到右手腕上的伤疤，又想起了过去的苦，心想今天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手指破点皮算得了什么，我继续干。连长见我用手挖，就让我搞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马上收集连里的好人好事，进行口头广播，带领大家唱歌、喊口号，溢洪道里活跃起来了，大家顶风冒雨越干越欢。一连干了四天，我病倒了，晕倒在堤坝上。同志们把我扶到一个老乡家里，连长让卫生员看着我，不许我再到工地去。我躺在老乡的炕上，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外面的暴风雨撕裂了我的心，我要上工去，卫生员又不让。从挎包里拿出日记本，翻开第一页，我一眼看见了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像，他的眼睛盯着我，仿佛在说：雷锋啊，雷锋！在这种时候你能躺在老乡家里休息

吗?这种力量鼓舞着我,我用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说服了卫生员,又跑到水库工地上去了……

伟大的党啊,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要永远做您忠实的儿子,做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哪怕高山、大海、巨川,就是头断骨粉,也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原载《我们的朋友雷锋》)

欧阳海

欧阳海(1940——1963)湖南省桂阳县人。一九五八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部队连年立功受奖,被评为各种标兵。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一列客车将要跟一匹驮着炮架的战马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想的只是旅客的生命和人民的财产,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舍身抢救列车,光荣献身。年二十三岁。欧阳海同志的格言是:"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他真正做到了:为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时,脸不变色,心不跳!一九六四年二月,国防部命令授予舍身救列车的伟大战士欧阳海生前所在的班以"欧阳海班"称号。中共中央中南局号召学习欧阳海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材料一　勇献青春成壮曲　笑洒热血谱新歌

京广线上,北上武汉的二八二次列车,乘坐着五百多名旅客,正在江山如画的原野上飞驰。

苍绿的山岭上,露出了衡山白塔。

前面是危险弯道——峡谷。

司机精神一振,探身窗外,冒着扑面的疾风斜雨,向前了望:一队解放军骡马炮兵,正迎面走来。眼前,嗖的一声,闪过一个斗大的"鸣"字,列车鸣笛报警,飞进了险谷……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火车飞快地临近炮队,突然间,一匹高大的驮着钢铁炮架的战马,惊狂地窜上了路心。

急转弯!陡坡路!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脊背上唰地冲起一股冷流,冷彻全身,急忙拉下紧急制动闸!但是,雷霆万钧的惯性力,依然推着千吨列车向前猛冲、猛冲……

五十米,马不动!四十米,马不动!三十米,马,还是一动不动。一场灾难眼看无法避免!

危在眉睫!

蓦地,队伍中冲出一位战士,跃上铁路,恰在车抵马尾的一瞬间,奋力推开了战马……

列车安然停稳了,抢救列车的战士壮烈牺牲了!

一首时代的颂歌,一支青春的壮曲,在一个战士英勇献身中谱成!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个难忘的日子,将同一个光辉的名字——欧阳海,一起载入英雄的史册。

这位伟大战士的一生,只有二十三年!

材料二　脸不变色心不跳　忘我精神贯长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清晨,轻风扑面,细雨沾衣。欧阳海率领全班,走在野营队伍的最后,担任收容。

朝前看,嗬!好险的一道峡谷,两道钢轨,明晃晃,亮铮铮,像条弯曲的臂肘,绕过山脚,吃力地延伸过来。

七班,紧跟着人欢马跃的炮兵连,进入了峡谷。突然,不远处,两山缝隙里,冲出一列火车。列车驶近了,炮兵连一匹胆小性躁的黑色驮马,骤然受惊,背负高大的钢铁炮架,疯狂地窜上铁道,横在路心,竖耳瞠目,瑟瑟打抖,死活不动。

雷霆万钧的车头,喷吐浓烟,鼓起强风,风掣电闪地逼近、逼近……

五十米,马不动!四十米,马不动!三十米,马,还是一动不动!

急转弯!陡坡路!三十米距离,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四秒钟后,脱轨覆车的惨祸,即将发生!

谁能捉住抵胸的羽箭?谁能扑灭燃眉的烈火?

列车滚动巨大的钢轮,响声隆隆,恰如排山倒海,越逼越近……

上去,粉身碎骨!不上,车毁人亡!上?不上?这惊心动魄的时刻,还容得斟酌吗?欧阳海这样的人,还用得着斟酌吗?

欧阳海箭步飞身,抢上路心,水淋淋的雨衣,噗拉拉地飘起,高高地扬向风云变色的天空。他脸不变色,心不跳,拼出性命把战马推离了道轨……

列车停稳了,旅客的危险消除了!

副班长在染血的车轮下,抱起重伤的欧阳海,失声痛哭,呼唤着班长的名字。

风停了,雨住了。雪白的云层里,射出了色彩缤纷的阳光。霞光万道的云空,搭起了虹桥。欧阳海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看朝夕相处的战友,又看看转危为安的列车,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安详地合上了眼帘。

谢　臣

谢臣(1940——1963)回族,河北省易县西水冶村人。一九五三年,他十三岁时便参加了农业生产,给农业社放牛、牧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加入共青团,被评为人民公社的模范社员。同年十二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地进行军事训练,关心和热爱群众,多次受奖。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他所在连队的驻区遭到特大洪水侵袭,他积极地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奋不顾身,在洪水中抢救遇难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二十三岁。某部党委根据他生前的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北京部队为表彰谢臣的功绩,追认他为"优秀共青团员"。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国防部追授谢臣以"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并授予他生前所在的班以"谢臣班"的称号。

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参加鄂南暴动后,历任连、营、纵队党代表。一九三〇年起,历任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并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一政治委员。他参予领导第四野战军消灭了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又参加了解放天津和北京的战役,并继续南下解放了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南各省。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且最善于联系群众和团结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革命化的建设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我们号召:要学习罗荣桓同志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珍闻轶事

崔嵬与《小兵张嘎》

一九六三年,《小兵张嘎》的拍摄准备工作开始了,可是小主人公嘎子的扮演者还没有确定下来。摄制组的同志被原小说封面上所画的张嘎吸引住了:一双炯炯的黑眸,咬着手榴弹弦的小嘴,显得既天真活泼,又机智灵敏。他们决定按图索骥,带着这本小说到北京各小学、少年宫、活动站去物色小演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从粗选的几百名小孩中精选了八十多名,满以为从中选出三两个出色的嘎子是不成问题的。谁知导演崔嵬看后却不满意。摄制组的同志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把几张孩子的照片和小说封面的嘎子对照给他看。崔嵬一看,才明白了症结所在。"这哪像农村孩子呢?完全是小面包,"他说,"画封面的人并不懂生活,嘎子的头巾都结错了,这是陕北的包法,冀中地区羊肚巾结是打在后头的。"他要求嘎子的形象应该是虎头虎脑,难看一点不要紧,哪怕是蒜头鼻子,只要"嘎"就行。于是,摄制组的同志又找了三四个月,光崔嵬过目的孩子也有三四百人了,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崔嵬头脑中嘎子的形象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呢?人们一点也摸不准了。崔嵬提醒他们到农村去找,"可农村的孩子不会表演呀?"人们说。"不要以为那些会朗诵和表演节目的孩子才算会表演,我们需要的是能在银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的孩子。"好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未找到理想的对象。后来,于蓝给北影送去几张照片,其中的安吉斯(扮嘎子)、吴克勤(扮胖墩)一眼就被崔嵬看中了。可是这两个小孩,除了形象特征以外,从朗诵和表演节目来看,他们一点也不符合上银幕的标准。

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摄制组的同志来到白洋淀外景地。这是六月天，崔嵬忙着复查外景，导演组的其他同志便把小演员们组织起来排戏。可这些孩子的确不会表演，对台词的时候，演胖墩的吴克勤居然象念课文那样念台词。摔跤一场戏中他有这么一句台词："嘻嘻，嘎子同志。"他把"嘻嘻"的笑声念成说话一般，引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怎么办呢？这些小家伙简直不堪造就。这时，崔嵬回来了。他一看，说："嘿，这怎么行？"他再不让小演员排练了。第二天，他规定演嘎子和胖墩的小演员都脱光膀子，赤脚跟白洋淀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演玉英的李小燕练划船，小演员们玩得可开心了。十几天过去了，三个小演员都晒得黑黝黝的，化妆师担心晒得太黑了不好化妆，崔嵬却说："不要紧，就要那个黑劲。"他始终不给小演员们排练，相反，他跟他们一起游泳，组织他们和当地孩子摔跤。有的人担心孩子放野了，戏照样不会演，他说："真野了，演嘎子就不难。"一切都好像在他的意料之中。

拍摄开始了。崔嵬选择了嘎子和胖墩在大堤上摔跤作为第一场戏。这两个孩子居然像水银灯下的老手似的，那么松驰、自然，毫不顾及周围的一切，十分认真地在摔跤。摄影机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崔嵬成功了。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先拍这场戏，他说："道理很简单，我们要让他们去游戏而不是让他们去表演。他们一旦觉得拍电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他们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很容易进入到规定情景中去。"

许多人在看过《小兵张嘎》之后，都说小演员的表演真挚、生动，充满了农村的泥土气息。这同崔嵬善于给小演员们创造最真实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拍摄中，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小演员引导到剧中的规定情景里，激发他们第一次最真挚的情感。有好些时候，拍摄完全是在一种很巧妙的布置下进行的。

《小兵张嘎》中，有一个嘎子要夺罗金保的枪，被罗金保一把掀倒在地的镜头。崔嵬根据演员倔强的个性，决定给演员一个突然袭击，以取得最真实的效果。他作了一切安排，只有安吉斯一人以为是试戏。开拍以后，扮演罗金保的演员张莹一把将安吉斯推出去，安吉斯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霍地蹿了起来，瞪着张莹，那潜意识好像是在说"你这家伙怎么动真的"——这一神情和剧中所要求嘎子的神情完全吻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李双双"的产生

一九六三年五月，《大众电影》举行的第二届电影"百花奖"选举活动开始了，雪片般的选票纷纷飞往北京，人们一致推选《李双双》为这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扮演李双双的张瑞芳获最佳女演员奖，扮演喜旺的仲星火获最佳配角奖。

人们如此喜爱电影《李双双》，这是同编剧李准在生活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分不开的。

一九五八年春天，李准来到一个名叫龙头村的山区村庄。这个小山村非常秀丽，背靠着山，村后有很多处泉水。村子里的人正在筑石坝，打算把这些水蓄起来浇地。

他被老队长安排住在妇女队长家里。这位妇女队长到县里开会去了，家里只有她公公。李准就住在这位妇女队长的房屋里，他发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墙上、窗子上，到处贴满了许多小纸条。他走近一看，只见这些小纸条上写着：

"我真想学习呀，就是没有时间。"

"水库的'库'字，就是裤子的'裤'字，去掉一边的'衣'字。"

"决心学文化，天大困难也不怕！"

"谁聪明！谁憨？见人多了，工作多了就聪明！锁在家里不见人就憨！"

"如今兴握手，真好。用右手握。"

……

看着纸条上这些火焰般的句子，这些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理想和挑战的句子，李准很激动，这些句子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他开始孕育李双双这个人物了。

遗憾的是，他在这个村子里等了几天，却没有等到这位妇女队长，她又到外县参观去了。他在村子里访问了一些人，这些人向他讲了这个妇女队长的很多故事，使他几乎连她的音容笑貌都可以想见了。但他始终没有见到她。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在他眼里又出现了这样的人物。

夏天，李准在一个生产队帮助锄玉米时亲眼看到了一场妇女吵架。这场架吵得很厉害，并吵出几个人物。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外号叫"母老虎"的妇女在这个村子住，她很厉害，干活时总爱多占点工分。这天又因为评工分的事情和她的小组长吵起来了。这位小组长是个直性子姑娘，黄头发，扁扁的大嘴，有一双像要喷出火焰的眼睛。她们在地头评工分，突然声音高起来了。

"三分，给她上三分。不能光看面子，怕她呢！你们去看看她锄的地！只图快。"组长带着气斩钉截铁地说，下边几个妇女说着，也表示同意组长的意见。

那个"母老虎"突然一甩胳膊站了起来，她说："今天的工分我不要了，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我离了它也能过！"她说着锄头也扔了，扭头就走。

"你不要算了，能吓唬住谁！"

"我不要，送给你去买药吃，叫你吃十辈子！"那个小组长没生过孩子，正在吃安胎药，这句话是揭她的短处。

"买药吃也比偷公家萝卜强！"

"我就是偷啦！你那'肉电报'去队里翻吧！"

"不用翻，村里三岁小孩都知道谁叫'三只手'！"这位小组长因为这句话说得对仗精巧，又过瘾，因此自己也忍不住格格大地笑起来……

下工时候，李准和一个老头在菜园里，看见这个小组长扛着两张锄头走了过来。那个老汉就故意问："怎么扛着两张锄啊？"

"当小组长的优待嘛！"她笑了。

"我还准备给你敲敲脸盆子助威呢，怎么就不吵了？"

"别说了，大爷！情理不顺，气死别人！我也不是老想和她吵嘴。这如今回去还得给人家说好话。"她说着笑着，那么轻松，那么愉快，好像刚才没有发生吵架一样。

后来，李准又从菜园老汉那里打听到这位妇女组长的其他事迹。从这个小组长身上，他获得了李双双这类人物的性格基础，那就是大公无私。李双双这个人物开始在他脑子里活起来了。但是，这个人物应该放在怎样一个环境中和人物关系中来反映，才能更好地掌握李双双这个人物的分寸感和时代特点呢？他的心中仍旧没底。后来，他在生活中又遇到一桩事，终于使他孕育的人物瓜熟蒂落。

有一次，他同报社的一位记者到一个公社去，顺便访问了几个食堂炊事员（大跃进中兴吃集体伙食），但这位炊事员的事迹都很一般，不大动人。

最后一天，他们正准备走，忽然来了一位二十六岁的妇女，看样子是来公社帮人家登记结婚的，她一进门就大声地说："听说你们是来访问食堂炊事员的，我说说我的事，你们听吗？"

对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当然欢迎，何况人家是自己找来谈。他们便给她倒了一杯水，接着，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讲他们村如何办食堂，她爱人当炊事员如何会做菜，又怎样图当"好人"，结果社员们如何把她爱人弄出来，把她选进去。讲他们中间（她同她爱人）怎样吵架、打架，又怎样和好。她和他们那个食堂的管理员又如何作斗争。讲得既生动、又亲切。她简直把他们当作她娘家的亲人一样，无话不谈。在谈完之后，他们完全为她的生动故事所吸引了，就决定不走，到他们村子里去，打算在群众中再作些调查，并且也想访问一下她的丈夫。她在临去时，却交代他们说："你们要去调查，可不要对人一样看待。我们小孩他爹虽说有那点落后思想，可他是无产阶级，和我们那个管理员不同，他不是无产阶级！"

经过调查，这个女炊事员的经历，使李准获得了能够结构成一个故事的线索。从丈夫先干一项工作，没有干好，他的爱人接替了他的这项工作这条线来写，故事很自然地起承转合。《李双双》终于问世了。

指挥棒下搞阴谋　和平讲坛出怪事

在昨天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幕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企图利用崇高的和平讲坛为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怪事。

法国天主教人士马道尔，二十八日在就核战争威胁和裁军问题作报告时大肆吹捧不久前被刺杀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向肯尼迪的"善意""致敬"，对他表示"怀念"，说什么肯尼迪之死是"对国际互相信任气氛的很大的打击"，甚至建议大家起立为肯尼迪"默哀"。这一提议根本未经主席团会议讨论。当马道尔的提议还没有被英语译员译完时，全场照明灯就顿时大亮，纷纷拍摄电影。可见这是经过事先周密布置的，是在一小撮人的"指挥棒"主使之下，企图盗用会议名义来美化美帝国主义首脑人物、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加于会议的阴谋。

这时，苏联代表团团长考涅楚克首先带头起立表示无限悲痛。接着，印度代表团全体成员垂头丧气地站起来。

中国代表唐明照立即愤慨地站起来表示反对，并且要求发言，严正抗议这一可耻的行动。但是，会议执行主席、波兰代表德乌斯基却不同意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这时，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代表端坐不动，拒绝为肯尼迪"默哀"。有一些事先知道这一阴谋的代表团在早一些时候从会场上避开了。

经过再三协商之后，执行主席最后同意了中国代表唐明照向大会做简短的发言。唐明照代表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所做的发言全文如下：

"如果我们对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突如其来地强加于我们的默哀建议不提出抗议，我们就是对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真诚，我们就是对自己不诚实。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许多不同国家的人民团体的代表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们不仅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而且他们的国家同美国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建议在这个会议上为美国死去的总统默哀是极其不恰当的。

"我们的会议应当是讨论有关世界和平问题，有关同和平的敌人作斗争的问题的会议。这个会议不应当被利用来颂扬在世界各地举行干涉、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国政府的领导人。

"我们的会议应当为之默哀的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死去的总统，而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英勇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男男女女。"

中国代表发言时，全场一片寂静。各国代表们都严肃

地屏息聆听了中国代表的发言。特别是中国代表要求为反美斗争烈士们致敬的建议,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许多国家代表跑来向中国代表表示热烈赞扬和祝贺。首先是美国代表跑来同唐明照以及中国其他代表热情地握手。他们都说:“你们的发言非常好!”一位智利代表说:“你们的发言是合情合理的,我完全同意。在这个会议上不应为肯尼迪默哀。”另一位瑞典代表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在这样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为肯尼迪默哀是不适当的。”比利时代表也曾积极支持唐明照的建议,在会场上要求发言表示同意中国建议,但是主席团对他的要求采取了可耻的置之不理的态度。

莫桑比克、乌干达等许多非洲代表在上午会议结束后,都跑来同中国代表热烈握手,表示支持中国代表团的立场。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二十八日发表书面声明,严正谴责和抗议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幕会议上发生的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默哀”的活动。声明全文如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抗议向杀害我国同胞的凶手肯尼迪致敬。对南越加紧侵略战争的是肯尼迪,驱使雇佣军进攻古巴的是肯尼迪,在南越试验‘特种战争’,甚至使用化学毒物的也是肯尼迪。全世界遭受美帝国主义残害的人——老挝、朝鲜、委内瑞拉、南越等地的人们都强烈谴责向他致敬的做法。”

(原载1963年《人民日报》)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63年,党的文艺政策进一步开放,逐渐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因而在这一年,涌现了一批新作,如小说《李自成》,生动、真实地描写了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军事集团、政治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面貌,特别是再现了农民起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和开拓。

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诗篇热情歌颂了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感人至深地塑造了雷锋的光辉形象。

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通过鲁大成率领的一支连队在上海南京路上放哨,与潜伏的阶级敌人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激烈斗争的故事,生动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产阶级战斗的队伍。话剧获得了很高评价。

另外,在电影、歌曲等方面,也同样掀起了热潮,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获奖电影是《李双双》、《槐树庄》。这充分表明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

小说《李自成》(节选)

姚雪垠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又直逼北京城下。城内十几万逃避清兵侵扰的难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而豪门贵族却依然歌舞升平,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面对内忧外患,崇祯皇帝召见朝臣,商议对策。二十八岁的崇祯皇帝,企图励精图治,挽救日渐颓败的明朝江山,做一代“中兴之主”。他把李自成看作最大的心腹之患,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下诏命兵部尚书兼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一鼓荡平起义军,将李自成、刘宗敏等或阵斩、或生擒。

李自成率义军由陇东南和汉中进入潼关南原地区,被官军包围,通往河南、湖广、四川的道路被堵死,处境万分危急。为突围进入河南,以李自成、刘宗敏为首的农民军同官军展开了惨烈的大血战,因众寡悬殊、地形不利,义军损失惨重,官军包围圈逐渐缩小。为了转移目标、保存实力,李自成、高夫人兵分两路突围。李自成率数千精兵突围后,身边仅剩将士十八人。他们暂到杜家寨,招集散亡人马,后转移至商洛山中。李自成面对着粮草奇缺、军心紊乱、杆子骚扰等困难,思虑万千:义军的“老十三家”,消灭的消灭,投降的投降,现在主要剩下他继承的高迎祥这一家了。难道就此风消云散吗?他决心操练人马,重整旗鼓,为此,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赴谷城,劝说张献忠(已受招)再树义旗,共举大事。

崇祯十二年夏,张献忠派人告知李自成,端阳节第二天起事的日期不变。时值商洛山瘟疫流行,闯营将士多数病倒。但李自成为实践自己的诺言,取信于张献忠,以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再次树起了“闯”字大旗。

崇祯得知李自成漏网,立命迅速出兵进剿。大战迫在眉睫,李自成处在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之中。恰在这时,驻守石门谷的杆子头目坐山虎挟众鼓噪哗变,李自成以大智大勇平息了内部叛乱;寨主宋文富策应官军、偷袭闯

王老营的阴谋，也被刘宗敏设妙计粉碎。接着，义军上下同仇敌忾，先后在野人峪、智亭山、白羊店等多处挫败官军，取得了商洛山保卫战的胜利。

战事的失利使崇祯惊慌失措，他为挽救危局，亲派首辅杨嗣昌出京督师。杨嗣昌身负重任，日夜兼程到达襄阳，布署兵力，摆开决战架势。他采用的策略是：对张献忠实用全力进剿，一鼓荡平；而对李自成只是加紧围困，“防其逃逸”，然后“用计诛之”。所以他在主攻兵强马壮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同时，便派叛徒周山暗中勾结李自成部下，企图瓦解闯营，擒拿李自成、刘宗敏等义军首领。

在这种情势下，李自成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迅速突围。因此，他率领人马，选择了一条官军意想不到的路线，强渡汉水，来到鄂西。李自成本打算与张献忠合兵共御官军，不料张献忠称王称帝心切，惟恐李自成同他争夺天下，在军师徐以显怂恿下，要暗害李自成。李只好迅速拔营，潜伏在竹山、郧阳之间的山岭之中。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正当崇祯财源枯竭、筹饷无着，被重重困难围困在紫禁城中的时候，杨嗣昌进剿张献忠的军事计划也屡屡落空，他的几十万大军被张献忠拖到四川，致使河南、湖广兵力空虚。因此，李自成抓住这个战机，率义军迅速冲出郧阳，直下河南。李自成采用“只攻山寨，不破城池”的方略，迷惑朝廷和官军，加紧筹集粮草，招兵买马，很快声威大振。不久，牛金星、宋献策、李信和红娘子相继来到闯营，得到李自成重用。宋献策被拜为军师。年底，李自成人马扩充到十几万，开始由防御转入大举进攻。崇祯十四年正月，他攻破河南重镇洛阳，杀了福王。同时又调兵遣将，攻打河南首府开封，但遭失败。同年二月，张献忠也在屡挫杨嗣昌之后，智取了杨的老窝襄阳，杀了襄王。只后悔当初未除李自成。杨嗣昌希望断绝，感到“天威莫测”，服毒自杀。

崇祯连遭重大打击，手足无措，几乎失去常人乐趣。他命丁启睿接任督师，又命傅宗龙（从狱中放出）任陕西、三边总督，限他两月内入豫剿闯。崇祯身旁只剩洪承畴这个有用的大臣，但因关外对东虏作战吃紧，不得不派洪承畴出关，去解锦州之危。

崇祯十四年春，罗汝才脱离张献忠，同李自成合伙，被授予“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称号，不乐（因李建号“奉天昌义文武大元帅”，罗想称为副元帅，未遂），又暗中与张勾结，保持中立地位。八月，张献忠兵败淅川，秘密来到罗营。罗怕走露风声，遭受惑疑，主动向李自成告密。李陡起杀张之意，罗又从中解张之危。年底，李自成二次攻开封，因与罗同床异梦，不肯卖力，加上城内兵力雄厚、拼死抵抗，又未获胜。

崇祯十五年二月，洪承畴兵败松山，被清兵捕获，本想以死尽节，但在清廷百般诱惑之下，终于投降。

李自成正准备第三次攻开封时，袁时中率人马投奔闯营。李为借重袁时中，把义女慧梅许配与他为婚。但未久，袁时中叛逃。第三次打开封，李自成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寄希望于拖时间，消耗城内物力财力，让城内发生兵变投降。左良玉率部援救开封，因左良玉实力强大，李自成集中全力对付，在朱仙镇大败左良玉。左良玉率残部返回襄阳。李岩建议趁朱仙镇大捷余威，跟踪追击，直捣襄阳，彻底消灭左良玉，然后在中原设官理民，恢复农桑，以此作为立脚之地。李自成因怕分兵力弱，又急于早日攻下开封建立名号，未能采纳李岩意见。不久，官军扒开黄河，滔滔洪水，迫使李自成再次从开封撤兵，然后，李自成下令讨伐袁时中，袁时中遂投降官军。慧梅始终感念李自成的恩德，不愿跟随袁时中背叛闯王，决心除袁，最后自尽。

诗歌《雷锋之歌》

贺敬之

让我一千次选择
是你
还是你呵
——中国！
　　让我一万次寻找：
　　是你
　　只有你呵
　　——革命！
看，站起来
你一个雷锋
　　我们跟上去
　　十个雷锋
　　百个雷锋
　　千个雷锋！……
升起来
你一座高峰
我们跟上去：
　　十座高峰，
　　百座高峰，
　　千座高峰！——
　　千条山脉呵，
　　万道长城！……

诗歌《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郭小川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这片土地哟，头枕边山、面向国门，
风急路又远啊，连古代的旅行家都难以问津；
这片土地哟，背靠林海、脚踏湖心，
水深雪又厚啊，连驿站的千里马都不便扬尘。

这片土地哟，一直如大梦沉沉！
几百里没有人声，但听狼嚎、熊吼、猛虎长吟；
这片土地哟，一直是荒草森森！
几十天没有人影，但是蓝天、绿水、红日如花。

这片土地哟，过去好似被遗忘的母亲！
那清澈的湖水啊，像她的眼睛一样望尽黄昏；
这片土地哟，过去犹如被放逐的黎民！
那空静的山谷啊，像他的耳朵一样听候足音。

永远记住这个时间吧：一九五四年隆冬时分，
北风早已吹裂大地，冰雪正封闭着古老的柴门；
永远记住这些战士吧：一批转业的革命军人，
他们刚刚告别前线，心头还回荡着战斗的烟云。

野火却烧起来了！它用红色的火焰昭告世人：
从现在起，北大荒开始了第一次伟大的进军！
松明却点起来了！它向狼熊虎豹发出檄文：
从现在起，北大荒不再容忍你们这些暴君！

谁去疗治脚底的血泡呀，谁去抚摸身上的伤痕！
马上出发吧，到草原的深处去勘察土质水文；
谁去清理腮边的胡须呀，谁去涤荡眼中的红云！
继续前进吧，用满身的热气冲开弥天的雪阵。

还是吹起军号呵！横扫自然界的各色"敌人"，
放一把大火烧开通路，用雪亮的刺刀斩草除根！
还是唱起战歌呵！以注满心血的声音呼唤阳春，
节省些口粮作种籽，用扛惯枪的肩头把犁耙牵引。

哦，没有拖拉机、没有车队、没有马群……，
却有几万亩土地——在温暖的春风里翻了个身！
哦，没有住宅区，没有野店、没有烟村……，
却有几个国营农场——在如林的帐篷里站定了脚跟！

怎样估价这笔财产呢？我感到困难万分，
当我写这诗篇的时候，机车和建筑物已经结队成群；
怎样测量这片土地呢？我实在力不从心，
当我写这诗篇的时候，绿色的麦垅还在向天边延伸。

这笔永恒的财产啊，而且是生活的指针！
它那每条开阔的道路呀，都像是一个清醒的引路人；
这片神奇的土地啊，而且是真理的园林！
它那每只金黄的果实呀，都像是一颗明亮的心。

请听：战斗和幸福、革命和青春——
在这里的生活乐谱中，永远是一样美妙的强音！
请看：欢乐和劳动、收获和耕耘——
在这里的历史图画中，永远是一样美丽的花纹！

请听：燕语和风声、松涛和雷阵——
在这里的生活歌曲中，永远是一样地悦耳感人！
请看：寒流和春雨、雪地和花荫——
在这里的历史画卷中，永远是一样地醒目动心！

我们后代的子孙啊，共产主义时代的新人！
埋在这片土地里的祖先，怀着对你们最深的信任；
你们的生活，纵然每分钟都是那么一帆风顺，
也不会有一秒钟——遗失了革命的灵魂……。

未来世界的主人啊，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
埋在这片土地里的祖先，对你们抱有无穷的信心；
你们的道路，纵然千百倍地胜过当今，
也不会有一个早上——忘记了这一代人的困苦艰辛。

是的，一切有出息的后代，历来珍视革命先辈的遗训；
而不是虚设他们的灵牌——用三炷高香侍奉晨昏；
是的，一切有出息的后代，历来尊重开拓者的苦心，
而不是只从他们的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原载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　漠雁　吕兴臣

（提　要）

连长鲁大成、指导员路华、三排长陈喜率领战士们在

奔腾翻滚的硝烟中冲进上海。代号叫老开的马处长指挥敌兵反抗。鲁大成和八班长赵大大穷追老开。春妮拉着一车军粮跟在部队后面。春妮救护伤员……

仲夏，上海南京路。夜雾蒙蒙，炮声依稀。青年学生童阿男和林媛媛在街头工事里发现老开、老七一伙匪徒，鬼鬼祟祟走来，童阿男让林媛媛去告诉解放军，老开等匪徒换上解放军军装抢走了林媛媛的母亲林乃娴和表哥罗克文的手提包和小提琴。阿男拦住老开的去路，却被老开打昏塞进阴沟里。林媛媛领着陈喜、赵大大进大楼搜索，地下党员周德贵也带领着鲁大成、路华赶来。这时，通信员送来紧急命令，要他们站马路、守卫大上海。鲁大成想不通。战士们从阴沟里找到了童阿男。指导员路华教育大家："一场新的阶级斗争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了。"鲁大成下了决心："走，站马路！"

南京路上，华灯初上。老七、非非等匪徒想混进游园会去进行破坏，在游园会门口站岗的正是新入伍的童阿男。童阿男的姐姐卖花女阿香哀求赵大大买花，一位美国记者趁机拍照，他们抓回记者，押往军管会。童阿男向陈喜请准假，陪着女友林媛媛到国际饭店吃饭去了。女特务曲曼丽吹捧排长陈喜，陈喜有点发昏，对来队看望他的妻子春妮十分冷淡。阿香被老七追打，跑来找阿男，正好遇到赵大大，救了她。陈喜说赵大大"黑不溜秋的，靠边站"，他向鲁大成报告，"一切都很正常"，"连风都有点香"，鲁大成意识到"这种思想不整一整，南京路这个地方不能待"。

当晚，部队驻地。赵大大闹情绪要求到前方去。阿香突然来找童阿男，赵大大感到她家出了什么事，背起枪随阿香去了。陈喜将一双老布袜子扔出窗外，洪满堂走过院子，捡起布袜扔进屋。陈喜又把袜子扔至屋角。春妮见到陈喜心情非常激动，她甜蜜地回忆着三年前和陈喜结婚的日子，可陈喜冷冰冰的走了。春妮感到意外，指导员路华也感到惊讶。洪满堂交来了陈喜扔掉的布袜子，鲁大成说"香风吹进骨髓里了"。在支部会上，路华分析了形势，教育大家认清这场斗争的重要性。会后大家分头行动。通信员报告，"赵大大叫一个大辫子给拖走了"。童阿男回来，经不起连长的批评，脱下了军装，离开了部队。

当晚，公园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阿香告诉赵大大，今晚半夜有人逼她去香港，卖给一个大老板，是为了抵押欠债。还要求赵大大"告诉我弟弟，今晚千万不要回家"。赵大大向鲁大成汇报了情况。

子夜，苏州河畔，路华在童阿男家里，同童妈妈谈话，并把自己的钱交给童妈妈，说是替阿男保存的津贴费。路华问童妈妈阿香出了什么事，童妈妈说因还不起印子钱，老七逼她去香港，还说只要童阿男在苏州河的舢板上和老七碰碰头，往事就一笔勾销了。路华叫通信员打电话报告连长，说这里有情况。阿香回来，又告诉路华，今晚老开等又要"借我的手杀害我的亲弟弟"，并让路华快走。这时，老开等人冲进来，与路华厮打，路华受伤，阿香被抢走，路华挣扎追去。阿男回来，童妈妈告诉他路华送钱的事，阿男悔恨不已。路华抱回被扔进苏州河的阿香，又去追老七，阿男也跟着追去。鲁大成带着队伍赶来，陈喜见此状受到一次教育。连长留下赵大大护送阿香去医院，其余同志去追捕敌人。

部队驻地。连队开会欢迎童阿男。童阿男不好意思，躲进伙房，路华让他跟大家一起欢迎童妈妈和周大伯。周大伯讲了童阿男的父亲早年参加斗争和壮烈牺牲的事迹。大家深受感动。阿男奔到童妈妈膝下大哭，他接过连长送来的军装和班长送来的枪，捂头悲恸，陈喜要求调他去学习，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鲁大成掏出洗好补好的布袜子交给他说："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找找思想根源吧！"陈喜读完春妮写给路华的信，颇受教育，扑在桌上哭了。鲁大成告诉路华，刚才司令部来电话说，老七虽然落网，老开还在活动。要通知所有岗哨，严加警戒。还说，今晚的游园会，陈毅司令员要参加。

南京路，花店门口。曲曼丽将提琴匣塞在非非手里，并说："东西在里面。"然后二人进花店。陈喜遇到曲曼丽，他俩约好在会场上见面，陈转身告诉赵大大，要注意提琴匣子，并要他转告童阿男，叫童阿男准时赴约，一刻也不要离开林媛媛。赵大大抓住非非，打开提琴匣，没发现什么。阿香告诉赵大大，非非把匣子里的松香交给了一个女学生，女学生又把它放进一束白玫瑰里了。赵大大买了一束红玫瑰。[暗转]在菲莉咖啡店门口，老开提着箱子遇到曲曼丽，对表，示意，走去。罗克文醉醺醺地走出咖啡店，曲曼丽把花交给罗，请他转送林媛媛。赵大大将红玫瑰交给童阿男，要他找到林媛媛，把她手中的白玫瑰换回来。[暗转]游园会一角。林媛媛在演出。罗克文把白玫瑰献给林媛媛，阿男说里面有炸弹，林媛媛一惊，花落在地上，阿男捡起一块松香大的东西跑了。罗克文要抓曲曼丽去公安局，曲开枪将罗打倒，曲正欲开枪打林媛媛，陈喜从侧面打一枪，正中曲曼丽的手腕。[暗转]医院走廊。林媛媛焦急地等待罗克文病情的消息。路华教育林媛媛，并赠送她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林颇受感动。

第二年秋天，部队驻地。节日气氛，阳台上挂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标语。春妮接到路华和洪满堂的信，拎了一篮苹果走来，欢送陈喜、赵大大、童阿男赴朝作战。春妮埋怨陈喜不给她捎信，陈忙解释准备到了朝鲜再彻底向她检讨，春妮偎依在陈喜怀中，感叹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指导员又告诉阿男他被批准入团了。童阿男向指导员请求，"在我离开部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上站完最后一班岗"。

霓虹灯下。童阿男全副武装在站岗，新入伍的阿荣前来接岗。欢乐的人们在送行。在灿烂的灯光下，一队威武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唱着嘹亮的战歌走过。

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歌剧片《洪湖赤卫队》选曲）
（韩英、秋菊二重唱）

1=F 2/4 4/4

梅少山、张敬安、梅会召、欧阳谦叔词
张敬安、欧阳谦叔　曲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韩英唱）四处野鸭和菱藕啊，
（秋菊唱）啊，秋收满畈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啊，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历史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战争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判处无期徒刑的战争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赠送古巴政府一批救灾物资给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

哈瓦那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我国人民对古巴灾情非常关怀，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古巴人民的救灾工作，并对你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鼓舞。现在仅就我们力所能及，紧急筹调一批物资赠送古巴政府，作为救灾之用，以表示我国人民对受灾的古巴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物资清单附后。

我们坚信，人民的团结要比风暴更为有力。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你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考验，重建被天灾所破坏的一切，并且建设得更好。

谨致革命的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日

中国政府赠送古巴政府救灾物资清单

物资	数量
大米	二万吨
小麦、玉米	三万吨
茶叶	二十五吨
猪肉罐头	二百万公斤
棉布	三百六十万米
胶鞋	一百万双
水泥	二万吨
钢材	一万吨

中国边防部队历次交还给印度方面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清单

一、武器弹药：

英制五一毫米迫击炮　七十五门（五十八门完好、十七门缺少零件）

英制八一毫米迫击炮　五十四门（十五门完好、三十六门缺少零件、三门严重损坏）

英制一〇六点七毫米迫击炮　七门（缺少零件）

英制七五毫米榴弹炮　六门（二门缺少零件、四门严重损坏）

英制八七点六毫米加农榴弹炮　三门（二门缺少零件、一门严重损坏）

英制八七点六毫米榴弹炮　十八门（十四门缺少零件、四门严重损坏）

美制九〇毫米火箭筒　三十七具(二十六具完好、八具缺少零件、三具严重损坏)

掷弹筒、枪榴弹筒　十二个(十一个完好、一个缺少零件)

重机枪　二十二挺(七挺完好、十三挺缺少零件、二挺严重损坏)

美制七点六二毫米坦克机枪　六挺(缺少零件)

英制七点七毫米轻机枪　二百六十一挺(二百二十三挺完好、二十六挺缺少零件、十二挺严重损坏)

加拿大制九毫米冲锋枪　五百五十二支(四百八十八支完好、四十一支缺少零件、二十三支严重损坏)

美制七点六二毫米半自动步枪　三十支(全部完好)

英制七点七毫米步枪　二千一百零五支(一千七百五十支完好、三百零六支缺少零件、四十九支严重损坏)

手枪　五十七支(四十支完好、十二支缺少零件、五支严重损坏)

信号枪　七十九支(七十一支完好、四支缺少零件、四支严重损坏)

各种炮弹　二万二千四百余发(全部完好)

各种子弹　二百一十三万九千余发(全部完好)

九〇火箭筒弹　一百三十七发(全部完好)

手榴弹　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七枚(全部完好)

信号弹　五百发(全部完好)

地雷　一千八百九十五个(全部完好)

英制七点七毫米轻机枪预备枪管　二百零八个(全部完好)

英制七点七毫米轻机枪弹匣　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全部完好)

加拿大制九毫米冲锋枪弹匣　九百五十个(全部完好)

二、飞机、坦克、车辆:

苏制米—4式直升飞机　一架(堪用)

英制水獭式运输机　一架(严重损坏)

美制M—3A3坦克　二辆(缺少零件)

各种类型汽车　一百一十七台(五十台完好、六十七台缺少零件)

三、军事装备器材:

美制空压机　四台(三台完好、一台缺少零件)

推土机　七台(六台完好、一台缺少零件)

英制压路机　一台(缺损零件)

发电机　四部(一部缺少零件、三部严重损坏)

油机　二部(全都完好)

电台　六部(一部完好、五部严重损坏)

步谈机　十部(八部完好、二部严重损坏)

电话机　七部(一部完好、六部严重损坏)

电线　五千余米零六捆(部分完好、部分损坏)

电池　十箱(全部完好)

望远镜　三十具(全部完好)

降落伞　四百顶(全部完好)

铁丝网　二百八十余捆(全部完好)

园锹　一百六十把(全部完好)

十字镐　一百九十把(全部完好)

油桶　七百五十七个(四百九十七个完好、二百六十个破损)

其他军用装备器材(包括工兵、观察、通信器材,钢盔,降落伞绳等各一部)

四、军用被服装具:

军用毛毯　一千六百二十五床(全部完好)

军用大衣　三百四十八件(全部完好)

军用服装　二千七百六十余件(二千四百一十余件完好、三百五十余件破旧)

蚊帐　三百六十八顶(全部完好)

被子、床单等　三百六十余件(全部完好)

(原载1963年《国务院新闻公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2月8日　中共中央决定国家计委成立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邓子恢、程子华、薛暮桥8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主要是讨论研究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的方针、政策、任务及主要指标,研究和确定实现计划的重大措施,并且定期听取计委日常工作的汇报。

同日　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该部除直接管理原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十总局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外,同时管理地方无线电工业,并对整个无线电工业的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

2月11～28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这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

年)的过渡阶段。这段时间的调整工作,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着重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并搞好一批设备的更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会议讨论了财贸工作、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教育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先是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中央强调,运动的各个阶段,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坚决不能因为开展群众运动,放松对日常生产的领导。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的基层逐步展开。

3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沈阳部队某部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3月21日　中共中央同意交通部党组的报告,决定在交通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政治工作机构。

3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调查材料。指出:昔阳县的县社两级干部,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到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

3月30日　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实行特赦。最高人民法院4月9日特赦释放战犯35名。

5月2～12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5月9日　毛泽东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

5月10日　中共中央将宋任穷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指出:必须团结绝大多数(90%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5月25日　人大常委会第97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和全国物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5月29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官僚主义和过好"五关"》的报告。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病症,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6月29日～7月10日　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百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会议确定,安置下乡的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农村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其次,才是建立新的国营农、牧、林、渔场。

7月3日　李富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月14日　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相,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中苏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

8月2日　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我国政府7月31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并且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8月8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8月29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9月6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一评)。

9月13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分开信》。

9月26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

10月16～25日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二次社

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该社主任陈一凡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章程》。

10月22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1月15～16日 刘少奇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作了重要讲话,彭真就人大二届四次会议的主要问题作了报告。

11月19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

12月12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参观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并作了重要指示。指出:要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缺点。湖南省委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到先进的省市学习,努力克服盲目骄傲自满的问题。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不能一分为二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要求把学习别部、别省、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按照中央指示,全党进行了一次反骄破满教育。

12月23日～次年1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把创造四好连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肖华在会上就目前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作了报告。他讲到:①关于进一步创造四好连队运动。②关于干部教育和培养。③关于加强机关建设。

经 济

1月2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1963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问题向中央汇报的提纲》。《提纲》要求:通过挖掘生产潜力和利用清仓物资,增产更多的商品,增加一两亿元的财政收入;在支出方面,对支援农业的各种物资从严掌握,并将原定的1963年长期无息贷款减少2亿元,对供销社的贷款也要通过扩大股金的办法适当减少;严格控制劳动工资,切实完成1963年的减人计划。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委最近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讨论工业形势和任务,确定今年主要工作,坚决完善地把工业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1月3日 中共中央批准下达1963年基本建设计划草案。草案是按照77.1亿元的总规模进行安排的。

1月26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关于1963年全国生产供应预拨会议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中央提出:各地区和各部门必须督促检查所属企业,严格按照订货合同安排生产,组织交货。同时,要安排一批机动物资和进口一部分稀缺物资,交由物资管理总局掌握使用,以保证国家计划能够顺利执行。

2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草拟的《李富春同志关于编制长期规划工作的讲话要点》,报送中共中央,并发各地。《要点》提出:编制长期规划,要有20年的远景设想,就是要基本上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文化四个现代化,基本上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还有10年的轮廓计划,目标需要在计划编制过程中逐步明确起来;并要有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目标,就是集中力量基本上解决吃穿用问题。

3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决定》。指出:①今后5年内,在粮食逐年增产和农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要适当增加征购,增加上调,严格控制销售,减少进口,补充库存。②对生产队包干的粮食征购数目应在中央分配的征购计划的基础上,按照全国平均计算,加上10%左右的机动数。③收购主要农产品奖售物资,除个别调整外,一般维持在上年水平。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并将中央精减小组、国家计委、劳动部关于继续完成精减任务和调整工资的报告作为附件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指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阵地,今后对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应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凡是可以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替的,应当积极地采取措施,逐步代替。有些零星的小产品,不便代替的,也可以区别对待,把它保留下来。

3月13日 中共中央将《民委党组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业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发给各少数民族及有关地区研究执行。《草案》规定:牧业区的生产方针是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逐步实现畜牧业和农业、副业、林业、渔猎相结合。加强牧业的技术改革,改良工具,培养草原,改进放牧和饲养管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畜牧业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彻底改变游牧经济的落后状态。

3月16日 中共中央同意轻工业部党组的报告,决

定全国烟草工业统一由轻工业部管理，并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统管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市场。

同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统计工作试行条例》。《条例》指出，统计是计划的基础，是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重要工具，必须随着计划工作的日益加强而不断加强。要加强统计部门对国家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作用，揭发计划执行中的各种问题。全国的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负责统一领导。

3月19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全国物价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提高粮食的销售价格和棉花的收购价格。为了不增加农村职工的困难，卖给农村职工的粮食不提高价格；在城市和农村销售的行业用粮、工业用粮的售价一般提高到不亏本的水平。棉布收购价格提高以后，棉花、絮棉和针织品的销售价格不变。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补充规定指出：社员的宅基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社员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需要建房用宅基地，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利用闲散地，新建住宅地，不收地价；社员不能随便扩大墙院、宅基地，已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

3月25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暂行规定》对城乡市场上正当交易和投机倒把之间的界限、当地进行商业活动和长途贩运之间的界限、探亲访友携带少量物品和长途贩运投机倒把之间的界限都作了具体规定。

3月28日　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支援穷队投资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支援穷队的投资，应当有重点的发给那些生产资金特殊困难的生产队，决不能平均使用。并规定了支援穷队的投资的使用范围。有关部门定期检查投资使用情况、保证专款专用，人民银行应监督支付等。

4月4日　石油部提出1963年增产节约计划。主要指标是：原油保证增产12万吨，争取20万吨，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保证增产5.8万吨，争取10万吨，为外国轮船加油用的燃料油增产3万吨；节约用水1381万吨，节约用电2615万度，节约燃料油31700吨，节约管理费用5%，增加上交利润2000万元。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石油部的经验好，要求各部门、各地区研究并仿照执行。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肥皂工业集中管理的报告》。《报告》指出：肥皂工业和肥皂有关的产品全部由轻工业部门管理，生产和基本建设统一由轻工业部门规划和安排。原由粮食部、商业部、化工部等非轻工业系统（劳动系统在外）管理的肥皂工厂、油脂化学厂，一律移交轻工业部门。原有的肥皂工厂，保留83个，其余的一律关闭，自发性的地下工厂一律取缔。轻工业部在分配产品时，要适当照顾供油地区。

4月10日　国务院第130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编制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两个直属机构，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会议通过《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

同日　全国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改革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农业长期规划的方针、任务、政策和方法问题。会议提出10年发展农业的方针和任务是：因地制宜、分别轻重缓急地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提高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适当扩大耕地；以粮为纲，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争取大部分地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适当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对农产品的需要。

4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1963年调整物价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各种物价的具体安排意见是：①农产品收购价格适当提高。②消费品零售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③农业生产资料的出厂价（包括拖拉机和农用柴油等5类产品）适当降低。④重工业产品出厂价，不作重大调整。⑤集市贸易价格争取继续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并调整和平抑短途运价。

4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问题。决定：①今年计划不变。不再搞“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了”。②价格不变。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后，价格不要降低。③减人仍按中央原定的指标。随着运动的开展，能够多减少的人员也不要多减，以保证职工的积极性。④对领导干部特殊供应的物品，取消肉、蛋、糖，保留植物油、烟、黄豆。

5月3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告1963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主要情况。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的形势很好。在农业方面，春耕准备工作比往年抓得早，大部分越冬作物长势良好，夏季可望有一个好收成。在工业方面，煤炭、木材、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步增长。在市场供应方面，情况大有好转。在财政信贷方面，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结余10.4亿元；货币回笼20.5亿元。

5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邮电通信网路已延伸到广大农村，目前一般的县都有了10个左右的邮电局、所，95%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通上电话，邮路总长达270多万公里，长途电信线路总长比1957年增长54.9%。

5月20日　国务院第131次会议，核准《关于延长中国和伊拉克贸易协定的协议》；通过《森林保护条例》。《条例》分总则、护林组织、预防和扑救火灾、防治病虫害、奖励和惩罚、附则等章节。《条例》规定：国家、集体所有的

森林和个人所有的林木，都予以保护。国家集体的森林和个人林木所有权归谁，产品就归谁支配。

6月1～15日　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研究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对1964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主要指标的设想交换了意见。会议确定1964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工业生产，加强国防，加强交通运输，适当扩大建设规模，适当改善人民生活，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争取国民经济进一步的全面好转。具体指标为：农业增长7%左右，工业增长8%～10%，财政收入增长1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5%～20%。

6月20日　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单独列出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六大城市计划指标的通知》。11月23日，国家计委又决定从1964年开始，对哈尔滨也单独列出计划指标。

6月29日　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和财办联合提出《关于加强支援农业资金计划管理的几点试行意见》，要求在编制1964年计划时试行。《试行意见》明确规定：以预算、信贷计划为基础自下而上地编制支援农业资金计划，属于拨款方面的由财政部门负责审查，而且要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同时上报，经核定后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县计委应当把支农资金计划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经过县把大部分支农资金分配到使用单位。

7月6～25日　国家经委召开中央局经委主任会议。会议认为，我国工业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新形势，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最突出的是产供销之间发生了新的不平衡，部分产品出现了暂时积压的现象。为促进工业形势的更大好转，会议要求：①下半年要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各种产品，对少数供过于求的产品适当地限制或减少生产。②积极解决某些工业企业产品的积压问题。③改进企业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7月20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各级农业资金小组加强农业资金管理的报告》。国务院指出：各级农业资金小组一定要领导好各有关部门，切实管好、用好国家直接支援农业集体经济的资金。国家用于国营农林水利企业、事业的资金，除分别责成各主管部门负责管好用好外，农业资金小组还必须抓紧督促检查，以真正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充分发挥投资的效果。

7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确定拿出11亿元用于40%的职工提升工资级别，提高部分地区的工资，适当调整过于偏低的工作工资标准，适当扩大计件工资范围，改进奖励制度。通过这次调整工资，积存的职工工资问题，部分得到了解决。

7月24日　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追加下半年基本建设投资7.75亿元的建议。由于各部门、各地方的要求，追加下半年基本建设投资共达15.1亿元。把原定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全年追加的投资算在一起，共86.84亿元，即为调整后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

7月30日　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邓小平强调，今后三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每个行业都要确定重点是什么。

7月31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1日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精简城镇人口和职工，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6日　薄一波在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谈1964年计划。他说，1964年计划要瞻前顾后。归纳起来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在3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摆法。

8月1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收购子棉和皮棉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目前棉花收购工作，应根据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8月17日　国家计委印发8月15日报告中共中央的《关于1964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初步安排意见》和附件。这个计划控制数字的总轮廓是：1964年工农业总产值1475亿元左右，其中农业产值495亿元左右，工业产值980亿元左右。工业产值中，生活资料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7%左右；生产资料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11%左右。安排意见还初步设想了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轮廓。

8月18～27日　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周恩来讲话，要求各地加强领导，争取在棉花生产战线上打更大的胜仗。会议提出关于做好当前棉花增产几项重要工作和提高明年棉花产量几项主要技术措施的两个建议。

8月29日　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出《关于国防工业1964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1964年国防工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尖端科研试制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力争原子能工业两年计划目标的实现；加强常规装备生产，争取主要装备的生产有较多增长，更好地满足军队装备和储备的需要。基本建设投资，安排的重点是：继续以“两弹”为中心，保证原子能工业和导弹生产、科研建设的重点工程，

适当加快无线电、航空工业和其他急需的补缺配套项目的建设。

9月5～27日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对外贸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对外贸易计划会议。会议提出，今后组织出口货源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力发展适合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的商品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以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的特点。

9月5～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问题。会议确定，把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

9月16日～10月1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①进一步做好工业的调整工作。②努力做好商业工作，按照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克服环节过多，机构重叠、迂回运输、商品倒流，以及地区之间互相封锁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③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业生产。④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⑤积极开展计划生育。

9月17日　国务院决定将兵器工业、造船工业从第三机械工业部分出来，分别成立第五机械工业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

9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第一个硫化铁选矿厂——安徽向山硫化铁选矿厂首期工程完工，每年能处理40万吨原矿。

9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和安装的新安江水电站已向上海、南京、杭州输送强大电流，还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田排灌提供了大量动力。

9月2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对中央草拟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继续研究。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下达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1964年计划的基本要求是：争取农业有一个更好的收成，工业生产持续上升，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基本建设着重做好水利工程和基础工业的充实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更新改造的工作，国防工业有所壮大，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地全面好转。

11月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独创的新型耐火材料——镁铝砖在天津钢厂等处显示优异性能，天津钢厂一座平炉连续炼出1304炉钢，鞍钢一座大型平炉连续11个月炼出626炉钢。

11月12日　中国农业银行在北京成立。它是国家的专业银行，是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它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的计划、预算、政策和制度，办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拨款和贷款。配合有关部门对支农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组织，调剂农村资金，协助农业部门辅导公社和生产队财务会计工作。

1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制成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大型捕鲸船。

11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展农村集体副业是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件大事》的社论。指出：发展集体副业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并指出发展农村副业应以集体经营为主，同时也要支援农村家庭副业发展。

11月17日～12月3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并审查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1964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批准了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批准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周恩来在会上就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任务作了讲话。

11月22日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批转五个部《关于农业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草案）》的通知。指出要求按草案的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改进工作。

1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海洋运输业日益发展，沿海运输网初步形成，海港吞吐能力扩大；远洋航运开辟通往东南亚、欧洲、非洲三条航线，先后到达过30多个港口。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的指示。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12月10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拟出《关于基本建设拨款的几项规定（草案）》，经国务院发布执行。

12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全国物价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对煤炭价格作以下调整：①提高大同、阳泉、焦作、峰峰、鸡西、鹤岗、阜新等矿务局的一部分煤炭出厂价格；降低本溪、北票、舒兰、资兴、萍乡等矿务局的一部分煤炭出厂价格。提降相抵后，平均每吨煤提高1.5角左右。②提高东北、内蒙、山西、贵州等地区的煤炭市场销售价格，每吨煤分别提价1～2元。

12月15日～次年1月7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也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做政治工作，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12月18日　谭振林传达邓小平关于制订农业长期规划的指示。关于农田基本建设问题，邓小平提出第三个五年可以先搞5亿亩稳产高产田，第二步再搞5亿亩。第三个五年用于农业的总投资，可以从国家投资、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这三个方面考虑，主要用于

水利。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自给。今年原油等主要油品的产量超额完成计划，石油产品达几百种，比1957年增加两倍；今年新建的炼油装置总加工能力比去年新建的增加4倍多。

军事、外交

1月13日　中国和尼泊尔政府在加德满都签订《关于修建加德满都——拉萨公路议定书》。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香港英国当局最近企图强拆九龙城寨房屋，迫迁居民。我外交部严重抗议英国政府侵犯我国主权。

1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国防部最近批准授予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英雄战士雷锋生前所在的四班以"雷锋班"的称号，1月21日举行命名大会。

2月2～27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罗荣桓、罗瑞卿到会讲话。肖华作《两年来军队创四好连队的基本经验》的报告。报告指出，两年来全军开展四好连队活动，加强连队的建设，总结出12条基本经验：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弱，决定是否坚持"四个第一"；连队建设最根本的是做到四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平时工作为战时工作作准备，是连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等。

2月8～28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应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友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就两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交换了意见。2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

2月23日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再次强烈抗议印方变本加厉冻结和夺取中国银行在印资产、加紧迫害该行人员的行径。

4月12日～5月16日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联邦、柬埔寨王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同访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等。

4月17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者破坏日内瓦协议，制造老挝紧张局势。

4月25日　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在上海的某部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命名大会5月5日于上海举行。许世友代表国防部宣读命令。8月1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展览在北京展出。14年来，这个连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珍惜人民的财富，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分钱、一寸布。八连的干部对上尊重，对下关心，同级很团结。他们认真做群众工作，能正确对待荣誉等。

4月　我国政府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第一次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中国医疗队。到1982年底，中国派出的医疗队达6500余人次。

6月1日　原蒋军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发布命令，授予徐廷泽以解放军空军少校军衔，表彰他弃暗投明的爱国行动。

6月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门司港的途中于5月1日沉没。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海军舰船组成调查编队，经14昼夜的搜索探摸作业，查实"跃进号"系触礁沉没。

6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云南境外的41名美蒋官兵，因反对美蒋驱使他们窜扰祖国大陆的罪恶勾当，最近毅然起义归来。

6月19日　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P2V型飞机一架。

6月29日　国务院第133次会议，核准中国和叙利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和马里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和索马里贸易和支付协定。

6月29日　公安部发表公报：我东南沿海军民21～28日连续歼灭从海上偷渡登陆的6股美蒋武装特务。

7月5～20日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就现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22日发表了会谈公报。

7月12日　公安部举行授奖式，奖励自动缴械投诚并有重要立功表现的5名美蒋武装特务；11日还遣放了11名被骗为蒋匪帮运送武装特务的台湾籍船工。

9月14日　国务院第135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9月28日经人大常委第102次会议修改后批准。

9月15～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应崔庸健委员长的邀请访问朝鲜。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亲切会谈。

10月12日　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全军以《条例》为保密工作的依据，坚决贯彻执行。

10月23日　国务院第13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草案》。

11月1日　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再次击落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的美制蒋介石集团U—2型飞机一架。

11月4日　公安部发表公报：我东南沿海军民连续

歼灭9股美蒋武装特务；在越南偷渡登陆企图窜入我广东的6股美蒋武装特务，被越南军民全部歼灭。

11月18日　解放军战士欧阳海，在火车与驮着炮架的马车即将相撞的危急之际，奋不顾身地将马车推出铁路，避免了列车出轨，保障了旅客安全，自己却壮烈牺牲。部队追认他为"爱民模范"。1964年1月22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欧阳海班"。同时在3月19日，新华社发表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的题词，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

12月13日～次年2月　周恩来访问缅甸、阿尔及利亚等14个亚非国家。1月15日，周恩来在答记者问中阐明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①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②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受援国的主权。③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④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家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⑤帮助受援国建设的目的，是力求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⑥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⑦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⑧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教育科技文化体育

1月2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师成功地把一个工人完全被轧断的右手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前臂完全性创伤性截肢再植手术"在世界医学界是少见的，在国内是第一次施行成功。

1月5日　国家体委公布截至1962年底的305项全国纪录，其中80项是1962年创造的。

1月23日　《文化部关于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报告》中提出：调整农村放映网，充实农村放映力量；改进农村影片节目的供应，增加农村影片拷贝的供应量；整顿和培训农村放映队伍，提高农村放映队的服务质量。

1月29日　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发表《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讲话。他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1日　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上海开幕。会上，周恩来号召踏踏实实开展农业生产运动。柯庆施提出办好人民公社的三个环节：民主办社好，干部思想作风好，党的支部好。

2月8日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讨论制订1963年至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规划根据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充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的要求，确定了研究项目1300多个，要求建立一系列研究试验中心，对发展农业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2月17日　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改进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管理体制试行方案。试行方案提出，要加强文化部所属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对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的领导；全国各种电影发行节目、拷贝由总公司统一收购、分配和调度。

2月20日　文化部党组就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为农业服务的问题向中央宣传部提出请示报告。提出：艺术表演团体为农业服务，中心是要深入农村，为农民演出；认真选择适合农民需要的剧(节)目。

2月21日　文化部党组就关于发展戏剧创作的几项措施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提出了加强领导，奖励一批优秀的剧本和剧团等项措施。

2月22日～3月8日　卫生部召开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提出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医学科学部分；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改称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并下设各专题委员会。

2月24日　我国24岁的选手罗致焕在1963年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的男子1500米比赛中，以2分9秒2的优异成绩，荣获世界冠军。这是我国选手自1957年开始参加世界速度滑冰比赛以来，第一次夺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

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广东南雄县的"红色岩系"地层内，发掘出一批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有助于鉴定"红层"地质时代和研究脊椎动物系统演化。

3月10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组织农村文化工作队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青团中央拟于最近联合组织农村文化工作队，去农村工作。报告并就工作队的任务作了规定。

3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前进，中央责成教育部拟订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试行，强调了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中小学教育事业要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举办中小学教育。

3月24日　新华社报道：由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的首批6个农村文化工作队最近分赴冀、豫、鲁、晋、辽、皖6省农村，帮助开展农村文化工作。

3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医疗事业发展迅速，全国2000多个县都设有县医院，到1962年底，全国县医院正规病床比1957年增加1倍多，医疗技术人员增加80%左右。

3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演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鬼魂形象的题材。

4月8日　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杂技团和个人，一律停止"飞车走壁"的表演。

4月13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射箭女选手李淑兰在广州全国射箭通讯比赛中打破5项世界纪录；男选手徐开财打破两项世界纪录。

4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远航西非海岸的"和平号"远洋货轮最近从科纳克里胜利返回广州。

4月17日　文化部发布《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级文化部门，对本地区的文物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作出鉴定和科学记录。

4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在陕西兴平县窦马村发现一件2000多年前的珍贵文物"嵌金铜犀尊"，为研究我国铜器、手工艺史、美术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4月20日　我国著名举重选手陈镜开，在北京以151公斤的成绩打破次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

5月2日　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讨论了今年对一些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研究了今后逐步防治病虫害的工作。

5月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解放13年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有160多种，700多万册。

5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的报告》。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体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练员等级制度。

5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文联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文艺战线，发挥文艺战斗作用的问题。

5月22日　第二届国产影片"百花奖"揭晓，影片《李双双》等获奖。

5月24日　文化部、财政部发出《关于管理电影发行收入的若干规定》。要求全国电影发行收入统一集中上缴总公司；总公司除去应支付的费用及企业利润留成外，全部上交中央财政。

5月25日　文化部颁发《关于各级电影发行放映业务机构职责、任务的规定(草案)》的通知，对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各大区代表处，省、市、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县电影管理站的职责、任务等作了规定。

5月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3月决定停演"鬼戏"。5月5、6、7日，《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

6月1日　文化部党组提出关于专区(市)、县所属国营戏曲剧团改为集体经营剧团向中央请示报告，建议对剧团进行调整精减以后，把专区(市)、县和大城市区所属国营戏曲剧团，一律改为合作性质的剧团，由戏曲工作者集体经营管理，自负盈亏。

6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科委和文化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

6月26日　我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在京成立。筹委会决定派出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首届运动会。贺龙被推选为筹委会主席。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对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试行草案)》。《决定》规定了加强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对教育部、中央各业务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管理高等学校的职权分工作了规定。

7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若水的《桌子的哲学》一文。此后，哲学界陆续发表有关文章，展开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先有桌子的观念还是先有桌子的存在。以若水为代表，认为桌子的观念对创造它的木匠来说，先于桌子存在。以黄林为代表，则认为先有桌子后有桌子的观念。以时鸣为代表，认为桌子和桌子的观念孰先孰后的情况都存在。

7月16日　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评功授奖大会在京举行，庄则栋等9人立特等功。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跳伞选手崔秀英、耿桂芳、赵月英21日在京打破女子日间1500米集体定点跳伞世界纪录。

7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中西药品的经营管理实行由商业部、卫生部共管，卫生部门要充实和加强药政机构，作好药政管理工作。

8月17日　倪志钦在京跳过2.2米，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跳过这个高度的男子跳高选手。

9月30日　国家科委下达《1964年科学技术中间试验计划控制数字》。列入计划的共149个项目。

10月10日　国家体委发出通知，决定10月15日起实行新的运动员和裁判员等级制度，同时公布新的运动员等级标准。

10月28日　新华社报道: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经验,在正常年景下,他的试验田亩产可达千斤左右。

11月3日　国务院发布《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分7章共27条。规定:发明是指一种新的科学成就,它必须具备:①前人所没有或国外虽有而未公布的。②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应用的。③比现有的是先进的。《技术改进条例》分5章共28条。规定:技术改进则是指群众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经过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使生产和工作更加多快好省的。对发明和技术改进采取荣誉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发明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垄断,全国各单位都可以利用它所需要的发明。

同日　新华社报道: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目前已有2万多所小学和200多所中学,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增加2倍多,中学生人数增加4倍;10多个民族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11月8日　中国伊斯兰教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鲍尔汉主任作《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了第三届委员会的领导机构人员,鲍尔汉继续当选主任。

11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机构已拥有一批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实验室。

12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制的数学电子计算机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几年来,在天气预报、农业机械化规划等方面,在力学、原子能等科学研究中,都使用了电子计算机。

12月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关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建成遍布全国的气象服务网,全国有90%以上的专区(盟)和80%以上的县(旗)设立了气象服务台、站。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4年

导　言

1964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成就，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得到了体现。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促进世界和平，我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核垄断，为全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同时，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有扩大化的趋势，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渡到四清运动，说明了党的政策有失偏颇之处，过份夸大了斗争，而忽略了建设。

在外交上，巴西政府于1964年4月无理逮捕了我九名工作人员，我外交部和全体人民及世界上其它友好人士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终于迫使巴西当局释放了我被捕人员。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农业学大寨运动
- ●四清运动
- ●巴西当局无理逮捕我九名人员
- ●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农业学大寨运动

背景介绍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停止了对我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困难局面，严峻的形势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在没有外援或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闯过难关，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于是，在与严重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谱写了一曲曲自力更生的凯歌。大寨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就是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典型。

1963年，山西省首先兴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大队受灾害严重红旗不倒”的新华社电讯，称大寨大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介绍了大寨人的事迹。同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运动遂在全国兴起。

材料：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节录）

材料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节录）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今天本报发表的题为《大寨之路》的通讯，就是说的这个大队怎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同穷山恶水作斗争的经过。这是一篇极其感人的通讯，值得人们仔细地读一读。

大寨村座落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中，全村的土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坡之上和沟壑之中，土质十分瘠薄，耕畜和农具量少而质劣。解放以前大寨人民在地主和富农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极其穷苦的日月，全村有一半多的人当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出外讨吃讨穿。解放了，人民重见天日，实行了土地改革，又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然而大寨的自然条件却仍然十分困难。

但是，特别困难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使翻了身的大寨人民垂头丧气，相反地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一九五三年，是这个穷山村组织起来的第一年，他们就制订了一个改造自然的雄伟规划，决心要使穷山沟变成富饶的米粮川。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这种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

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而要改造客观世界，不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是同自然界作斗争，就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坚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前进。对困难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考验人们是否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试金石。大寨人民出色地接受了这种考验，使大寨的山河变样，使穷大寨开始变成为富大寨。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单位有困难，国家或者别的单位加以支援，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每个单位来说，首先不应当是要求国家和别的单位支援，而应当像大寨大队那样，充分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生产和工作。因为只有每个单位都这样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迅速发展。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

风。

………

我们所以要学习大寨人民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有永远向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就需要经常地、认真地进行科学试验。

大寨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的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原载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四清运动

背景介绍

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后，便夸大了阶级斗争，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1964年9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决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强调要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结果，使运动实际上发展成一场在基层进行夺权的斗争，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以至混淆敌我的严重错误。把以前的"四清"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上层，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政草案）（节录）

材料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节录）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一九六三年夏秋以来，各地根据这个文件的决定，在经过试点以后，广泛地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多来，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这次运动，对于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同时，又充分地证明，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这次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决定草案，为了解决运动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现在，中央又根据新的经验，对这个规定草案作了重要的修改。下面就是经过修改后的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工作，一般说来，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个阶段是组织建设，主要是整顿好党的基层组织、社队组织和民兵组织。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是密切联系的。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就要给第二阶段的工作，做好准备，打下基础，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以后，就应当注意逐步吸收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在运动中培养一批新的骨干。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在全国农村完成这个运动，大约需要五年、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

出的要求："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从省、地、县各级领导，一直到工作队，到工作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努力工作，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质量，达到高的或者比较高的要求。毛泽东同志说过："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六个条件是衡量和检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成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

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能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又不认真地检讨和改正，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

二、领导人员亲自蹲点。省、地、县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蹲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领导人员靠着听汇报、看书面材料，来了解情况、领导运动，那就肯定不会做好工作，肯定会犯错误。蹲点，必须真正蹲下去。要从头到尾地把一个点上的工作做完，从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直到搞好了"四清"、搞好了对敌斗争、整顿好了组织、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贯彻了"六十条"、掀起生产高潮，一直做完，有始有终，这样，才能取得完整的经验。要蹲在一个生产大队，并且以一两个生产队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亲自参加，亲自动手，这样，才能有亲身体会，真实感情，才能取得直接的经验。

三、组织坚强的工作队。

四、放手发动群众。

五、正确对待运动和生产的关系。

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以下略。

巴西当局无理逮捕我九名人员

背景介绍

六十年代初，美国为了进一步控制拉丁美洲，便在拉美各国积极寻找代理人，发动政变，以便使这些国家听从于美国的指挥。1962年，美国在巴西搞了军事政变，政变上台的巴西当局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国内大肆逮捕各国人员，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镇压国内群众运动。

中国有九名从事贸易和新闻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巴西的工作完全是合法的，然而，巴西军事政变当局无视国际法，听从美国计策，悍然逮捕我九名工作人员，并对我工作人员进行严刑逼供，还妄想把我人员劫到台湾，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巴西军事法庭居然判处我九名工作人员十年徒刑。

巴西政变当局这种无理的行为遭到了我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严正斥责，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之下，巴西政变当局不得不宣布释放我九名被捕人员，并向我国政府进行道歉。

材料：

- 强烈抗议巴西当局严刑逼讯我被捕人员
- 巴西政变当局必须立即恢复我国人员的自由
- 美蒋特务捏造罪证漏洞百出成为笑柄　巴西当局必须悬崖勒马停止诬陷迫害
-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
- 全世界公众舆论愤怒声讨对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
- 从巴西胜利回来的九位同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材料一　强烈抗议巴西当局严刑逼讯我被捕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强烈抗议巴西军事政变当局进一步迫害九名中国工作人员。发言人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巴西代表处副代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王耀庭和工作人员马耀增、宋贵宝，赴巴西经济贸易展览会筹备小组组长侯法曾和工作人员王治、苏子平、张宝生，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和工作人员鞠庆东等九人，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爪纳巴拉州遭到巴西军事政变当局无理逮捕，到今天为止，已被非法拘留长达十二天了。这些中国人员所属的各有关机构曾经就他们被捕事件，向巴西军事政变当局一再发出严正的声明，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

法权益，以便恢复他们的正常业务活动。巴西军事政变当局对这些正当要求竟悍然置之不理，不但没有迅速释放他们，反而捏造什么“进行间谍活动”、“煽动叛乱”等等毫无根据的指责来加罪于他们。据报道，巴西军事政变当局甚至还对他们施加了毒刑审讯，进行了种种非人道的虐待和迫害。

特别应当指出，根据报道，巴西军事政变当局在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下，正在同蒋介石匪帮进行勾结，要将中国被捕人员押送台湾。蒋帮驻巴西伪大使许绍昌正同瓜纳巴拉州当局紧张磋商。蒋帮特务分子也已从台湾赶到巴西瓜纳巴拉州进行活动。事态的发展，充分表明这一严重事件完全是由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而由巴西军事政变当局执行的。

中国政府对于巴西军事政变当局这一践踏国际法起码的准则、破坏国际交往中应守的国际信义、侵犯基本人权、无理拘捕、严刑逼讯、甚至阴谋绑架中国人员的极端严重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巴西军事政变当局立即停止对上述九名被捕中国人员的迫害，并且立即释放他们，切实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否则，巴西军事政变当局必须对于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原载 1964 年 4 月 15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巴西政变当局必须立即恢复我国人员的自由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墨西哥朋友艾伦娜·萨斯盖斯·戈麦斯和智利朋友马里奥·阿朗西比亚，在首都各界人民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斗争大会上，谴责美帝国主义唆使巴西政变当局对中国九名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的政治迫害。

郭沫若说：“美帝国主义策动了巴西政变之后，唆使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巴西的九名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并且企图把他们劫往台湾。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其目的是要破坏中国同巴西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拉丁美洲掀起一个反共反华浪潮。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西政变当局的这种无理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郭沫若代表中国人民正告美帝国主义和巴西政变当局：“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同中国人民为敌，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并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他说：“我们希望美帝国主义同巴西政变当局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中国人员的迫害，并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

墨西哥朋友艾伦娜·萨斯盖斯·戈麦斯说：“当巴西的民主政府刚想实行某些民族主义的改革，并为土地改革采取初步措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从进行威胁发展到鼓励和帮助巴西反动派发动政变。现在的巴西政府一心想讨好美帝国主义，竟把为促进中国和巴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使两国人民进一步了解，而在巴西进行合法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位公民监禁起来，并加以虐待。我们殷切地期望在巴西的中国朋友们能很快重新获得自由。”

智利朋友马里奥·阿朗西比亚说：“美国在巴西精心谋划的军事政变就是帝国主义法西斯经过最大伪装的、最倒退的表现。九个中国工作人员，在国际法和人权完全被践踏的情况下，被拘捕了起来，受到拷打，现在还在受着种种迫害和威胁。”他说：“为什么如此憎恨和疯狂地反对中国呢？难道中国有什么地方损害或者侵犯巴西了吗？只有帝国主义和它的同伙才这样痛恨中国。”

他们的这些讲话，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支持。

材料三　美蒋特务捏造罪证漏洞百出成为笑柄　巴西当局必须悬崖勒马停止诬陷迫害

新华社记者就美蒋特务伪造“信件”诬陷在巴西被捕的中国人员一事，发表评论如下：

巴西当局无理逮捕九名中国人员已经一个多月了，对中国人员的一切诬蔑造谣都无效了，揭穿了，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五月八日，巴西陆军警察局路易斯·弗朗萨上校忽然向新闻界发表一封据说是“藏在一支没有电池的手电筒”里的信件，企图作为中国人员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证”。这一封拙劣伪造出来的“信件”，虽然由巴西当局宣布，但一看便知，它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的“杰作”。用这样的东西作“罪证”，还想愚弄世界舆论，只能暴露伪造者的愚蠢和无耻。

巴西当局是四月三日逮捕中国人员的，逮捕之时，严密的搜查至少进行了八小时以上。巴西瓜纳巴拉州保安局长古斯塔沃·博希斯上校随即宣布，没有指控中国人员犯罪的证据，也无任何涉嫌的物证。在一个月零五天以后却突然出现了这封据说是用中文写的信。这分明是美蒋特务栽赃诬害。巴西当局根本无法证明这封信是中国人员的，而且这封荒诞的伪造“信件”，漏洞百出，稍加解剖就可以揭开伪造者的原形。

这封信是由一个署名“郑同志”的人写给一个“王同志”的。这首先就不符合中国人民的习惯。“郑”和“王”都是中国人的姓，姓郑的姓王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中国人写信从来是以名字来称呼对方的，更没有哪个人在署名时能用“同志”来称呼自己，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封“信件”编造说：“郑同志”原先是在巴西工作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在瑞士伯尔尼”写了这封信，而他是在这个日期的“几个月之前离开巴西的”。“信件”又编造说：“王同志”听说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份”要到伯尔尼，和“郑同志”“商谈有关继续”“郑同志”在巴西的工作问题”，然后去巴西的。可是奇怪的是，“郑同志”并没有见到“王同志”，而是留下了这封信。

被捕的九名中国人员中确实有三个姓王的：王唯真、王耀庭、王治。但是，王唯真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巴西从事记者业务的，如果“郑同志”原来就在巴西“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在巴西见面，而要远涉重洋跑到瑞士的伯尔尼去谈话呢？王耀庭和王治是分别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到巴西，从事贸易和筹备展览业务的。从时间说，都与伪造信的时间完全矛盾，一查即明。这个“郑同志”的信究竟是写给哪个“王同志”的呢？美蒋特务想用伪造信来陷害他们，不是扑空了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郑同志”既然在巴西“工作”过，还认识许多巴西人，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代表中国的哪个机关前去巴西的呢？巴西政府曾经发给他入境签证了吗？曾允许他长期居留过吗？巴西当局拿得出这些证件来吗？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郑同志”，在瑞士等着会见另一个不存在的“王同志”，这就是编造这封信的故事基础！这个“郑同志”当然没有在瑞士见到“王同志”，所以这封信上说，这封信被留在瑞士，而现在它忽然在巴西出现了，要为中国人员的“间谍活动”作证了。信是怎么留下的？怎么取的？谁都不知道。但是，被诬为“国际间谍”的中国人员竟被说成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把这样一封公开写明要进行“间谍活动”的信亲身带到了巴西，并且妥为收藏，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自己被捕之后，让巴西当局“搜查”出来，作为“罪证”。这是美蒋特务诬陷无辜的惯技，他们总是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从受害者那儿“搜查”出他们制造的任何东西来的！

谁是这封“信件”的真正作者？只要看看写信人所使用的奇特“风格”和语汇，就足够说明他的身份了。请看：“我现在告诉您几个主要人物的葡萄牙文姓名”。在伪装者的头脑中，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人的姓名用葡文拼写，竟然是要特别注明的！假如说是英文拼写的，法文拼写的，注明一下还说得过去，巴西人的名字是用葡萄牙文拼写的，有注明的必要吗“我曾向我们的组织建议派他们到我国去受特工人员训练”。“我们的组织”，什么“组织”呀？老实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普通是用“向上级建议”，从不用你们无可奈何编出来的“向我们的组织建议”。一看，这封信就是假的。你们很可利用我们这个说明，再编造一封像样一点的“信件”。并且，写信的人还要明明白白地写着“受特工人员训练”呢！还有，什么“正统的共产党人”，“天生的领袖”等反动派口中的词汇以及“信件”中人们熟知的美蒋特务的“风格”，都恰好暴露出伪造者的狐狸尾巴。

今天，在里约热内卢，美蒋特务正在横行无忌，美联社四月九日从里约热内卢发的消息就曾报道，蒋匪帮专门派了特务去迫害九名中国人员。他们对中国人员的迫害和种种诬陷统统破产之后，又用伪造“证件”的栽赃伎俩诬害中国人员。但是，他们制造的“罪证”太拙劣了，现在来栽赃也太迟了！

中国驻巴西贸易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工作是光明磊落的。他们执行中国的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遵守巴西的法令，一贯为促进中巴人民的友好而努力，这是任何人歪曲不了的。这封“信件”中列举了一些巴西人士的名字。据合众国际社五月十八日电，巴西军事法庭十八日下令逮捕这些人。这显然是要在这些人中间找出合乎他们需要的假人证，企图罗织中国人员干预巴西内政的罪名，以便用“违反国家安全”的律例，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是，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截然相反的行为，是无法栽到中国人员身上的。这封信既然纯属伪造，这些罪名也自然加不到中国人员头上。相反地，这只能充分暴露了诬害中国人员的邪恶阴谋。

根据巴西《商业日报》五月九日刊载的消息，和伪造信件一同被“搜查”出来的还有一张“密写墨水的使用法和配制方法”。按照美蒋特务陷害无辜有逻辑，“间谍”似乎都要随身携带谍报工作须知之类的教科书的。“王同志”既然把作为“间谍罪证”的“信件”亲身带到巴西并且妥善保存，当然也要携带和保存“密写墨水的使用法和配制方法”的了。天下有连密写信方法都不懂的“间谍”吗？美蒋特务合法地在巴西横行，竟达到这样的程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巴西当局宣布上述伪造“信件”之后，美国新闻处立即在五月十一日加以转播。美国合众国际社又在五月十三日从里约热内卢发出一则消息，引用巴西当局人士的话说，“这些中国人如果被判犯有间谍罪，就将在此服刑，或者这些中国人被引渡到福摩萨（台湾）去”。蒋帮的中央社也对这个事件特别热心起来，从幕后走上前台，公开叫嚷起中国人员的“罪证”来了。这就使真相大白：站在这一国际政治阴谋背后的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勾结蒋介石集团劫持中国人员押送台湾，这一阴谋计划正在通过这封伪造“信件”加紧进行。

应当严肃地指出：现在是巴西当局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不要再受美蒋特务的蒙骗，继续上他们的当。把他们伪造的荒诞的“信件”作为“罪证”来审判中国人员，只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替巴西丢脸，玷污巴西人民的声誉。巴西当局应当改悔过来，立即停止对九名中国人员的迫害、诬陷，停止把他交付审判，并且恢复他们的自由和正常业务活动。

（原载 1964 年《人民日报》）

材料四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巴西当局非法判决中国人员的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以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悍然对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等九名无辜中国人员判处十年徒刑。这是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进行的严重的政治迫害。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巴西蓄意策划的反华阴谋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这一非法判决感到极大的愤慨，并且向巴西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

自从九名中国人员被非法监禁以来，中国有关方面一再向巴西当局发出严正的呼吁和抗议，要求迅速恢复他们的自由。世界各国的公正舆论和主持公道的人士也都纷纷表示声援，并且对巴西当局这种破坏国际信义的行为同声提出谴责。但是，巴西当局对这种正义的呼声竟然一概当作耳边风，继续倒行逆施，硬把“进行颠覆活动”的莫须有的罪名栽在中国人员身上，把他们提交军事法庭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巴西当局始终拿不出任何人证物证来证实中国人员犯有被诬控的任何罪行。相反，中国人员的辩护律师苏布拉尔·平托和出庭作证的巴西各界著名人士，却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中国人员是在巴西政府的同意下，合法进入和留驻巴西的。他们在巴西进行有关贸易、筹备展览和新闻报道的业务活动，都是光明磊落的，完全正当的。巴西当局对这些无辜的中国人员的审讯和判决，无论在事实上、道义上或法律上，都是毫无道理的，完全非法的。

必须指出，这一骇人听闻的诬陷中国人员的案件从头至尾都是美帝国主义所策划的。一向无所不用其极地敌视和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利用它在巴西制造军事政变的机会，对中国人员进行诬控，显然是企图借此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破坏中国同巴西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卑鄙手段决不能损害中国的一根毫毛。倒是一味屈从美帝国主义意志的巴西当局，使巴西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际信誉受到了沾污。

巴西当局这种肆无忌惮地践踏国际法准则和司法尊严、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公愤和遭到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中国人民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再一次严肃地警告巴西当局：迅速恢复九名中国人员的自由。否则，巴西当局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责任。

（原载1964年12月《人民日报》）

材料五　全世界公众舆论愤怒声讨对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

古巴报纸今天发表评论，强烈谴责巴西当局对九名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阴谋。

《今日报》的评论指出，“这出司法丑剧是国际关系上无耻的政治迫害和无比的罪行，它清楚地证明，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反人民的阴谋能做出多么卑劣的事来。”

《革命报》在国际评论中指出，对中国人员的无理判决是“违反巴西法律、破坏国际法、违反正义原则的行为，是政治迫害运动的结果”。

智利《号角报》社长阿尔贝托·坎博亚发表谈话说，审讯和判决只不过是一出假面戏。巴西当局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损害正在急遽上升的中国的威信，但是这个企图已经完全破产了。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编辑部的文章指出，巴西当局对九名中国人员的判决是践踏国际法起码准则的穷凶极恶的行为，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忍无可忍的挑战。

文章指出，这次审讯过程再次清楚说明，巴西当局屈从美国的意志，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按照既定的计划，对中国人员进行判决，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凶恶面目。

文章要求巴西当局立即撤销对中国公民的非法判决，恢复他们的自由。

越南《人民报》今天发表评论指出，巴西当局悍然判决九名中国人员十年徒刑，这是它们的极其卑鄙的行动。这种行动再一次暴露了它们屈从美帝国主义的命令的真实面目。评论说，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是这一案件的惨重失败者。它们已经而且正在遭到全世界进步舆论的严厉谴责。

英中友好协会昨天在这里发表声明指出，“逮捕、审讯和判决在巴西的九名中国公民完全是对司法的嘲弄。”

声明谴责说，巴西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同蒋介石集团相互勾结，捏造了判处中国人员十年徒刑的“证据”。

昨天，一批英国公民在伦敦散发传单，抗议巴西军事法庭对九名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并要求释放他们。

（原载1964年《人民日报》）

材料六　从巴西胜利回国的九位同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从巴西回国的我九位贸易、新闻工作者今天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九位同志的代表王唯真在会上列举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迫害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宣布，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反动派精心制造的这个政治迫害案件，已经以我们九位中国同志的光荣胜利和敌人的可耻失败告终。

有一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这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今天上午十时开始举行。当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马耀增、王治、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等九名同志走进会场时，记者们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王唯真在依次介绍中国九位工作人员后说：尽管这个政治迫害案件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作为受害者，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以自己的亲身遭遇，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野蛮迫害罪行。

王唯真接着答复中外记者踊跃地提出的问题。他指出，九名中国工作人员在巴西被非法逮捕这件事，同去年四月一日的巴西军事政变有着密切的联系，谁都知道，这两件事都是美帝国主义长期精心策划的。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巴西代理人悍然非法逮捕中国人员，干出这种卑鄙勾当，目的是为了切断中国和巴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破坏中国的国际威望。

他指出，巴西政变当局甘愿在这件事上为美国火中取栗，还有它国内的原因。巴西军事政权企图通过对中国工作人员的迫害，制造一种便于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恐怖气氛。

王唯真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巴西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对他们实行酷刑拷打、秘密审讯、栽赃诬陷、专断"判决"和无理"驱逐"等一系列丑恶的罪行。

在这方面，他详细谈到我国九位同志在酷刑拷打的情况下，坚贞不屈，粉碎敌人把他们绑架到台湾的凶恶阴谋的经过。他说："我们九位同志热爱祖国，他们抱着"头可断、志不可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坚定信念，通过绝食等等形式的斗争，终于迫使巴西特务宣布放弃绑架他们去台湾的阴谋，取得被非法逮捕后的首次重大胜利"。

王唯真和其他八位同志还拿出了中国的"仁丹"、"羚翘解毒丸"、"一片丹"，针灸用针、新华社向世界各地发行的图片，在巴西书店中可以公开买到的巴西地图等等实物给到会的记者们看，生动地揭露了巴西当局把这些东西硬说成是毒药、毒针等等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的"罪证"的丑行。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普通的药品和日用品，可是巴西反动派却竟把它们当做九名中国工作人员的所谓罪证。在场的记者看到这些实物，听到王唯真的叙述不时发出哄堂大笑。

王唯真还描绘了巴西军事法院"审判"他们的丑剧。他说，九名中国工作人员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立场鲜明的强调声明，指出他们不是前来受审的，而是前来控诉的；应该受审的是那些制造这一迫害案的罪犯们。他逐一列举事例指出，军事法庭传来它自认可能有助于对中国工作人员实行迫害的原告证人。可是，这些证人据实陈词，原告证人反而当庭成为证明中国工作人员清白无辜的被告证人。

（原载 1965 年《人民日报》）

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在军事上，必须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加强国防力量。为此，要改变过去在武器装备上的落后状态，提高军队战斗力。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核试验上，更为关心。

美国在四十年代便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并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具有较大的杀伤力，拥有了原子弹便说明国防力量强大。苏联随后也制造出了原子弹，这样，苏美两超级大国拥有核武器，形成了核垄断。

核垄断的形成，造成世界政局的不平衡性，苏美两国凭借手中的核力量，到处进行核恐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便采取不承认政策，致使中美两国处于对立状态，苏联也靠其手中的核力量，想把中国置于其保护伞内，面临两大核垄断的夹攻，中国人民毫无惧色，并坚信自己能造出原子弹，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安全。为此，中央军委在聂荣臻元帅的亲自领导之下，召集了专家开始进行核试验，在一无外援、二无材料的环境之下，中国的科学家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终于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宣告了核垄断的破产，也说明了中国人民有骨气保卫自己。并倡导中国在任何形式之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材料：

- 新闻公报
-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首脑
- 大漠深处的蘑菇云

材料一　新闻公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

试验。

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以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辛勤劳动，大力协同，使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原载196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原载1964年《人民日报》）

材料三　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月十七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日，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为此，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即：

"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顺致最崇高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

材料四　大漠深处的蘑菇云

1964年，随着原子弹在酒泉联合企业的一家工厂整装完毕，原子弹及其装配者将来到基地的消息很快到了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委员会的主任张爱萍也加强了与周恩来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青海第九设计院领导人的联系。

为了安全，工程师拆卸了这颗原子弹，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送。周恩来早已指示要确保第一颗原子弹在组装、运送和爆炸时的安全。第九设计院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吴际霖，在贯彻周恩来指示方面不遗余力。他准备了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制造的列车来运核爆炸装置。一位高级干部对吴际霖说，"所有分配给一号专列的煤都必须筛选一遍，以便把雷管和任何其他爆炸材料找出来，这些东西在矿山时可能就混在了煤里。"这意味着工人们必须筛选出10余吨煤。在从甘肃前往新疆的路上，"所有旅客列车都已接到了命令为这一专列让路。在火车经过的地方，高压动力线路都予以切断。"吴际霖还注意到，派来检修这辆专列的铁路工人都已配备特制的铜榔头，这种榔头不会产生火花。在火车载着爆炸品正式开车之前，所有的铁路和安全人员都已进行了一系列训练，对所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再次进行了检查。

中国政府极为关注8月底离开酒泉装配工厂的这一列火车的安全，一节车厢装载这颗原子弹的一半和第九设计院将参加第一次试验的专家。当列车通过甘肃和新疆时，这两个省份的公安厅长上了列车，直到列车通过各自的行政区域为止。他们给吴际霖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路线图，并详细列明了已采取的安全措施。当时，吴际霖和王淦昌也一起前往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在这个省的边界，吴际霖和王淦昌为"月台上一幕动人的情景所吸引"。当火车驶出时，他们注意到一排排铁路警察和安全官员"像一组雕像那样肃立在车旁"。公安局长说："自昨夜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这条铁路线上的所有重要的车站都采取了同样的安全措施。"

在甘肃和新疆的每一个车站，吴际霖和公安干部都一起亲自检查装有爆炸材料的车厢。负责安全的官员们和技术人员既要注意核装置，又要注意设在车厢分隔间的控制板。每一次火车开始运行时，吴际霖都要求人们不断地报告温度和震动的情况，在铁路的每一个"危险的"曲线上，他都要检查容器的稳定情况。吴际霖和火车司机保持着直接联系，可以命令火车减速行驶，以便减少震动。这样，火车载着这一核装置经过漫长的旅行到了试验基地，然后，汽车又把这一装置送到了爆炸现场。

在原子弹的这一部分被送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几天之后，聂荣臻命令空军运送原子弹的核心部分。一位姓胡的助理研究员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安全局的高副局长被指定随机护航。当这位安全官员知道他正在为之护航的这架飞机的任务后，有些担心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他问胡："宇宙射线照在原子弹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胡肯定地回答，"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的连锁反应。"而且胡立即朝控制器走去。但这位安全官员仍然紧张不安，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高一再要求胡测量宇宙射线的指数。当飞机终于在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着陆时，高副局长表示了极大的欣慰之情，他亲手把这颗原子弹的核心部分交给了第九研究院院长李觉和吴际霖。

即使在基地狭长的着陆跑道上，各种安全保卫措施和程序也异常繁杂。飞行员和机上的护航人员把装有铀核、仍旧密封和上锁的容器从飞机上卸下来，把它放入一辆特制的汽车里。来到试验现场后，甜当着在场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负责安全保卫的官员，揭去了封条并且打开了锁。这些人亲眼检查了容器中装的东西之后，才代表装配组签了字，并负责保管这一核武器部件。

在张爱萍的全面指挥下，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玉和科学家程开甲，已在全力以赴地为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在夏天的时候，在核武器的部件运到基地之前，人们已经竖起了一个带有电梯的铁塔，这可以把原子弹安置到距离沙漠地面120米的地方。从塔中出来以后，工人们开始安排监控网，电缆，活的动物，军事装备(包括飞机、坦克、大炮以及战舰的上层结构)。各种各样的军事官员和观察人员陆续来到了这里，第九研究院的领导李觉、吴际霖、朱光亚和王淦昌，负责对整个试验区域、对铁塔为爆炸现场的其他设备进行周密的检查。

在准备过程中，一次空中对试验区的侦察使人们真正大吃一惊，照片显示出作为爆炸现场的地方有人居住，安全官员下令试验地带的侦察员立即进行搜索。几天以后，一支侦察兵发现了野营的迹象。搜索继续进行。基地的侦察员偶然遇上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国民党军队的亡命者，这是一群自1949年以来拒不投降的士兵：几个人，形容憔悴一身破烂，……一个婴儿"哇"地哭了一声，而大人们则粗鲁地吼骂起来。男性的亡命徒骑上马逃之夭夭。又花了三天多时间才找到了爆炸现场附近的200多个秘密居住点。

一切其他事情都按常规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总指挥部的最高领导人，张爱萍对现场实验工作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和副部长刘西尧(当时是现场总指挥部的副司令员)亲自检查了铁塔。在和李觉一起登上铁塔的最高层时，张爱萍问道："在把原子弹从地面运到塔顶时，你能保证安全吗？"李觉用肯定的语气作了回答，并且补充说："参加核试验的人甚至练习了徒手到塔顶，已经爬过了几次了。"

张爱萍的信心增强了，他下令用一个模拟的原子弹，将爆炸前的一切程序最后进行一遍演习，这颗模拟的原子弹在8月份就已制造出来了。然而，当演习正在进行之际，巨大的风暴突然袭击了爆炸现场。八级大风在这地区是司空见惯的，技术人员还没有从铁塔上下来，巨风已开始猛烈地袭击铁塔，但是，李觉下令演习继续进行。在铁塔脚下的一个帐篷里，李觉、吴际霖和其他人用电话与留在铁塔里的技术人员保持联系，命令他们把整个暴风雨夜晚的各种仪器指示数记录下来。巨大的风暴使电梯失去了控制，李觉命令从特工队特别挑选出来的战士，带着食物和水，爬上铁塔，送给那些留在塔顶的人。天刚刚亮的时候，演习和风暴都停止了，只有电梯遭到了损坏。张爱萍宣布这一大胆的演习获得了成功。

仅仅剩下两项准备工作有待完成了：核对计算结果和确定爆炸时间。第一项准备工作在爆炸的前一天进行。然而，由于担心第一颗原子弹有可能是一颗"哑弹"，张爱萍打了一个加急电报给第二机械工业部，要求进行最后一次计算。他要求在北京工作的第九设计院的理论物理学家"保证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二机部长刘杰立即指定周光召和其他两位数学家完成这一任务。尽管绝大多数技术资料早已送往试验基地，由于缺乏资料，周光召小组不得不重新做绝大部分早已做过的事情，并且轮流上班，以便完成这一计算任务。第二天早晨，爆炸的数据计算出来了。周光召和他的同事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证明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到那个时候，爆炸的时间已经确定好了。中国的新闻报道说，基地上一位姓杨的年轻技术人员在1964年国庆节之夜的梦中预言了爆炸的时间。杨醒来后，冲出帐篷，欢呼道："党中央已经批准爆炸的时间了"。

蔡工程师和他的同志们被小杨的欢呼声惊醒了，问"出了什么事？"杨技术员做了一个梦。杨兴奋地说："我梦见党中央已经决定爆炸的时间了。定了三个15的时间！他的同事们突然明白了：第一个15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纪念日；第二个15意味着今天以后的第十五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15意味着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点爆炸。"

几天以后，党中央对长期天气预报进行了研究，命令爆炸时间为：10月16日15时正。基地的人没有一个表示出惊奇。不管是真是假，杨技术员做梦的故事已经成了目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些人的传奇之一。

15日下达了代号为"投篮"的命令，这个命令代号是根据基地篮球运动员的建议而取的，命令意味着把铀和雷管与原子弹的其他部分装配起来。从酒泉联合企业运来的部件已经存放在试验基地的装配车间里，在装配开始之际，只有5个人被允许进入这一地下车间。李觉感到，他必须是这5个人当中的一个，以便使参加这一危险工作的其他人的思想安定下来。两天前，技术人员已经把爆炸部件组装起来了，现在，他们当中的4个人已把核部件装进去，并把整个原子弹安装完毕。李觉因整个过程准确无误而向他们表示祝贺。

现在，原子弹的保险已被部分地打开，15日午夜以前，整个原子弹已装配完毕。二机部安全保卫局的官员们决定，不准开动任何电力，不准安装任何其他炸药。

15日，当爆炸即将来临时，爆炸现场的人几乎没有谁想到了诸如此类的核威胁，一位姓曹的科技大师镇定自若地监督人们把原子弹移入到一个圆柱体的容器中

(约2米高,1.5米长),然后将其从地下车间移到地面。在地面上,他的部下把它放到一个手推车上面,两位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向铁塔。

当把原子弹转交给铁塔里的工作人员后,另两位科学家把一路上所进行的每一步骤都正式记录下来。当转交仪式进行时,李觉、吴际霖、王淦昌和朱光亚肃立在旁边。原子弹转交给铁塔工作人员之后,他们的领导人陈能宽对原子弹的护卫者下令说:"升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也随之开拍。

120米高的铁塔顶端的技术人员接过了原子弹,并把它装入铁塔。在以后的几小时里,他们把塔中所有仪器的指示数都记录下来,并把雷管装入原子弹。几天来,李觉、朱光亚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接通电路和作最后检查的时候,李觉、张蕴玉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下了铁塔。

铁塔小组马上前往23公里远的试验现场控制室。李觉把铁塔控电室的钥匙交给了控电室的负责人。采取这一步骤是从确保安全出发的,以防任何人靠近铁塔而引起原子弹爆炸。这是在原子弹爆炸以前检查清单上所列的最后一个项目。在15点以前的几秒钟内,开始读出了人们极为熟悉的数字:10、9、8、7……读到"0"的时候,司令员一声令下:"起爆!"

喜悦的心情席卷指挥部,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玉都激动得"发抖"。张爱萍要求对他们面前出现的景象作科学的肯定。"这是核爆炸吗?"王淦昌作了肯定的回答。张爱萍挂电话到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下面是通话记录:

"我是张爱萍,请接刘杰同志。"

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刘杰和其他几位干部正在等待消息。当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接电话的这位干部紧张得电话筒掉到了地上。刘杰把电话筒拾了起来。

"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

"请重复一遍!"

"原子弹确实爆炸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将立即报告!"在这之后,刘杰拿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接周总理。"

"我是周恩来。"

"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报告了我们的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蘑菇云已见到了!"

"好!我将立即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总理给刘杰打来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再一次证实它是否确实是核爆炸,以便使外人相信!"克尽职守的刘杰立即把毛主席的命令传达给张爱萍。张回答说,确确实实是核爆炸,并且已经进行了这样的证实。这时,刘杰显然已开始激动得发抖,但他再一次同总理通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确确实实爆炸了",他告诉周总理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党中央和毛主席可以放心。"几小时以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

([美]J·W·刘易斯萨里泰:《大漠深处——中国原子弹密闻录》)

风　云　人　物

龙梅、玉荣

龙梅(1953—),玉荣(1955—),内蒙古人,在1964年2月一次放牧中,十一岁的龙梅和九岁的玉荣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冒着暴风雪,舍身护羊,在风雪中搏斗了一天一夜,终于使羊群安然无恙,而这两位小英雄却差点送上了生命,这两位小英雄的事迹传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她们的热潮。

材料　暴风雪中一昼夜

在内蒙古草原上,最近有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冒着暴风雪昼夜保护羊群,险些付出了生命。这两个小姑娘由于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敢于舍己为公,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她们动人心弦的英雄事迹,在草原上到处传颂。

二月九日早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新宝力格公社蒙古族牧民吴添喜要外出帮人刷屋,没空放羊,他的十一周岁女儿龙梅、九周岁的玉荣便要求母亲允许她们出去放牧,临行时母亲再三嘱咐不要远走。龙梅、玉荣一心想把羊群放好,见附近牧草稀疏,就往远处走去。

翻过一座雪坡快到中午时,天气突然变化。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发出尖厉的吼声,卷着大片大片的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飞奔上前拦堵,可是羊群不听她们指挥,两人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很快便消失在无边的雪海中。

这时候,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七度,姐妹俩踏着深雪跟着羊群艰难地走着。妹妹玉荣的小脸已经冻肿了,但她

依然倔强地跟着羊群奔跑。约摸走了三四个钟头，天色渐渐黑下来，不远处现出三间被雪封盖着的房子。姐妹俩耽心社里羊群走散，一个也不愿进屋暖暖身子。两人商量好，当天夜里就住宿在野地里，决心不离开羊群。

她们正跟着羊群继续前行，忽然发现一只母羊掉队，看样子快要冻死了。龙梅想背上羊走，背不动，放下吧，又心疼。“羊死了也得交到公社去。”她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把那只母羊放到一座高坡上，打算回去时再带走。

又走了一段路，风稍微减弱了些。两人把羊群拦在一片低洼地方，坐在雪地上休息，想等风雪平静下来再赶羊回家，这时，姐妹俩又看到一只老鹰趴在小羊身上，龙梅抡起羊叉劈头一击，打死了想啄羊的饿鹰。由于极度疲乏，姐妹俩慢慢合上眼，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

深夜，雪时落时停。龙梅冻醒了，睁眼一看，羊群不见了，妹妹也不见了。她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叫玉荣，没有一点回声。她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怕天黑再走失散，就肩并着肩，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羊群继续前进。她们就是这样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经走出了七十多里。

第二天拂晓，北风怒吼，大雪纷飞，两个小姑娘依偎在石坡上酣睡着。

火车一声长鸣，龙梅被惊醒，她这才知道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便连忙喊醒玉荣，这时她忽然发现玉荣的一只毡靴丢了，光着的左脚插在雪里。十一岁的姐姐疼爱妹妹，刚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玉荣却颤抖着催促姐姐说：“羊又走远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快去拦羊，咱俩一起往回赶路呀。”这时龙梅的身子也冻僵了，她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往车站方向走去。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在风雪中看到一个蒙古族小姑娘艰难地跨过一道铁轨，浑身哆嗦着向他走来。他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搓两只冻僵的手。刚进门的守车整备员张仁贞，看到这情况也急忙参加抢救。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张仁贞立即用电话通知值班员，接着铁路职工们便四处去寻找孩子。在同一个时间里，白云鄂博邮电局的职工又主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矿区党委书记巴彦都荣（蒙古族），党委书记连忙找区长伍龙商量，决定火速组织力量救人。就在这个时候，许多机关工作人员闻讯赶来了：矿区卫生所副所长张培谦，背上药箱奔往车站；矿区粮食局的人们套上大车，装上草料，驰向茫茫雪野，抢救冻饿的羊群。

在同一个时刻，张仁贞、王振山已经越过两座雪坡，在离乱石坡不远处发现了俯伏在雪地里的小玉荣，她的下半身已经被雪盖住。张仁贞连忙上前轻轻拍掉孩子身上的浮雪，把她抱到怀里。两人急忙轮换背着玉荣跑回车站。

龙梅、玉荣那天出去放牧以后，她们的母亲呼达古娜一直放心不下，暴风雪来临时，呼达古娜心里越发不安，跑去找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单斯楞。单斯楞不在家，他的妻子阿迪娅听说龙梅、玉荣牧羊未回，便不顾自己的病还没有痊愈，连忙跳上一匹马，迎着狂暴的风雪向那无边无际的雪野飞驰而去，而且一路放声呼唤。

龙梅、玉荣和一群三百八十四只羊失踪的消息，惊动了生产队冬营地上的每一个牧民。人们纷纷向着茫茫雪原奔去。可是，一昼夜过去了；两个孩子仍然不见踪影。人们对两个孩子不幸的遭遇，都感到痛心，孩子的妈妈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正在大家万分焦虑的时刻，公社党委书记龙涛骑马赶来告诉大家：“两个孩子得救了，正在矿区医院里，三百八十四只羊仅仅冻死了三只。”牧民们闻讯之后，个个喜出望外。新宝力格公社干部立即骑马前去矿区医院慰问。在龙梅、玉荣住院期间，矿区党委还几次派汽车把她们的父母接来医院探望。老夫妻俩看到两个女儿得救，他们噙着激动的眼泪对医生们说：“要是在旧社会，两个小闺女早就没命了，她们的生命是党和毛主席救活的。”

最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党委通报表场了这两个蒙古族小姑娘舍己为公的高尚风格。在白云鄂博矿区，学习小英雄的活动正在热烈展开。

（原载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64年，小说《艳阳天》引起了轰动，作者通过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描述，充分展现了围绕着农业合作化而进行的复杂斗争。小说发表后，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戏剧上，《年青的一代》、《江姐》、《朝阳沟》等也获

得了较大的成功。其中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还获得了1964年优秀话剧奖。

在电影上，根据长诗改编的《阿诗玛》1964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这是一部以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为题材的优秀影片。影片公映后，长期受到观众的欢迎。

歌曲：这一时期主要以革命歌曲为题材，歌颂社会主义，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都是非常普及的歌曲之一。

长篇小说《艳阳天》

作者：浩　然

内容提要

"春蚕结茧、小麦黄梢"的季节，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肖长春正在水利工地劳动。一天，他突然接到两封来信。一封是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写的，说社里工作一切都好，要肖安心在工地干，"完工之前，你就不必回来了"；另一封是东山坞团支书焦淑红写的，告诉肖"社里的问题非常多"，"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回来，越快越好"。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肖长春的警觉，他敏锐地感到，在东山坞高级合作化后的第一次大丰收之时出现这种情况，非同小可，于是急忙赶回东山坞。

回到东山坞，迎接肖长春的，是一场既尖锐又复杂的斗争。麦收即将开始，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对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十分不满。窃据农业社副主任职务的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抓住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等人想走回头路、想多捞一把的心理，把他们鼓动起来，并且煽起阶级立场不稳，被他腐蚀拉拢的生产队长贫农马连福对农业社的不满情绪，一起大闹要土地分红；而他本人则处于半幕后半幕前的状态，指挥、挑动。在这场关系到巩固集体经济的斗争中，肖长春坚持原则，认真对待。在研究分配问题的干部会上，被马之悦当"枪"使的队长马连福突然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农业社和肖长春，大吵大闹要土地分红。这个意想不到的场面使肖"又惊讶，又气恼"，准备给予迎头痛击。在这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肖看到了马之悦眼色中的撩拨之意，顿时冷静下来，迅速扭转了局面。在肖长春和广大贫下中农巧妙的斗争下，马连福理屈辞穷，马之悦的阴谋也未能得逞。马之悦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一方面鼓动弯弯绕、马大炮等闹缺粮，另一方面怂恿肖长春去富裕中农家翻粮食，让肖违反政策，造成混乱。肖长春识破了他的诡计，闹粮风波不久就平息了。

马之悦进一步与弯弯绕、马大炮相勾结，还与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串通，倒卖粮食，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并搞"四条管子一齐下"的阴谋，妄图一举搞垮农业社和肖长春。肖长春与之针锋相对，一是抓整顿队伍，一是组织监视坏人的活动，并按"四快"的要求积极安排麦收工作。焦克礼顺利接替了马连福担任了一队队长，韩小乐接替了马立本的会计工作，马之悦一伙的反动气焰受到沉重的打击。

当遭雨淋的麦子已上场，急等打好晒干入库之时，马之悦又煞有介事地煽动群众放弃打场，去找被马小辫暗害的小石头，妄图让麦子烂在场上，以搞垮农业社。肖长春忍着个人失子的悲痛，领导大家坚持打场，最后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东山坞农业社夺得了革命生产双丰收。全书结束时，马之悦、马小辫等一伙坏蛋已陷入群众的包围之中。经过斗争的洗礼，我们的农村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艳阳天。

小说《前驱》

《前驱》是以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为主的中年作家陈立德的长篇小说。小说源本于1956年创作的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电影剧本《北伐先锋》，由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而改写成的小说。作品定名为《前驱》，即"大革命三部曲之一"。

它描写1926年到1927年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一支武装部队，在北伐战争中的一段生活。小说通过几次战役的描写，刻画了几个共产党员士兵的形象，特别突出地刻画了青年连长万先廷的成长过程。小说还揭露了蒋介石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和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垂死挣扎。小说196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话剧《年青的一代》

陈耘1963年创作的话剧《年青的一代》，是六十年代以青年一代成长为内容的不可多得的优秀剧作。剧本以中学毕业生报考高中，大学，大学毕业生即将走向新生活的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为背景，通过描写革命青年肖继业为开发祖国地下宝藏而自觉到艰苦地区工作，烈士子弟林育生则为在大城市建设安乐窝东奔西跑到处钻营而引起的大大小小的冲突，表现了一场激烈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

剧本除了成功地塑造了肖继业和林育生这两个性格恰好相反的艺术典型外，还成功地塑造了永葆革命本色的老干部林坚、萧奶奶；进步青年林岚、姚向明；短暂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李荣生、夏倩如；心地善良而认识模糊的夏淑娟等一系列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像。该剧曾

对六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起过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1965年，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摄制成电影后公映。

四幕话剧。陈耘、章力挥等作。原载《收获》1964年第3期，上海文化出版社同年出版。

地质学院毕业生肖继业等服从祖国需要，到青海地质勘探队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可是他的同学、烈士的后代林育生，却害怕艰苦贪图享乐，一年前就借口患病，回到上海，并以假医疗证明欺骗组织，拒绝归队。肖继业借回上海检查、治疗腿疾之便，动员林育生归队，于是，在一对好友之间展开了两种人生观、两种幸福观的搏斗。最后，林育生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在他生母牺牲前写的血书感召下，幡然悔悟，随着伙伴归队，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戏描写了不同的人对生活、工作、分配等问题的不同看法，用鲜明的对比手法，深刻揭示了两种世界观、两种幸福观的对立斗争，揭示了青年人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承下去的重大主题。全剧风格严肃、深沉，300多字的血书，振聋发聩。该剧于1964年获优秀话剧创作奖。

歌剧《江姐》

七场歌剧。阎肃根据小说《红岩》改编。原载《剧本》1964年10月号，人民戏剧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4年分别出版。

重庆解放前夕，地下共产党员江雪琴接受党的指示，前往华蓥山加强游击队的活动。她机智地通过了敌特封锁线，又强忍着丈夫彭松涛（游击队政委）被敌人杀害的巨大悲痛，到达华蓥山与游击队司令双枪老太婆并肩战斗。双枪老太婆的丈夫几年前被捕，下落不明。她们相互鼓励，加倍努力工作，既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又展开武装斗争，沉重打击敌人。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敌人的酷刑，未能动摇江姐，“攻心”战也被江姐瓦解。在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中，敌人仓惶逃窜前夕，疯狂屠杀狱中革命者，江姐壮烈牺牲。全剧真实再现了黎明前夕，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深刻揭示了敌人必然灭亡的命运，成功塑造了具有崇高理想，高尚情操，机智沉着，舍身忘我的共产党员江姐的英雄形象，情节具有传奇色彩，引人入胜。

戏剧《朝阳沟》

六场豫剧。杨兰春编剧。原载《剧本》1958年7月号，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出版。

城市女青年银环，高中毕业时，与农村同学栓保相爱，他们志同道合，决心献身农村建设。银环不顾妈妈反对，来到栓保的家乡朝阳沟落户劳动，得到栓保一家和乡亲们的厚爱。艰苦的劳动，曾经动摇过她献身农村的决心。在栓保一家、老支书和朝阳沟群众帮助下，她的认识得到了提高，重下了决心。后来，妈妈把她骗回城里，劝她留城当干部，但她却说服妈妈，使妈妈也高高兴兴到朝阳沟落户了。这是一部成功描写农村生活的喜剧，它围绕银环下乡落户劳动一事，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银环、栓保娘、银环妈等人物形象，尖锐批评了轻视农业劳动的错误思想，并反映了50年代末期北方农村的新风貌。艺术上质朴、自然、乡土气息浓厚；较好地将戏曲化和文学性揉和在一起，戏剧语言富于音乐性和内在的节奏旋律。

话剧《千万不要忘记》

四幕五场话剧。从深作。原载《剧本》1963年10、11期合刊，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出版。

老工人丁海宽之子丁少纯，是个积极热情单纯的青工，他的岳母是歇业的小业主，笃信“金钱万能”，有严重的利己主义思想。她的腐朽思想不断侵蚀丁少纯，导致丁少纯不切实际地追求物质享受。直至发展到违犯纪律、造成生产事故。最后在丁海宽等教育下，他决心悔改，并正确处理了与岳母的关系。这个戏将与岳母的斗争上纲为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它揭示的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微杜渐”，则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剧本戏剧悬念组织得好，情节波澜起伏，形象栩栩如生，有较浓的生活气息。该剧于1964年获优秀话剧创作奖。

电影《阿诗玛》

根据长诗改编的《阿诗玛》，1964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葛炎、刘琼根据同名长诗改编的《阿诗玛》，是一部以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为题材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美丽的白族姑娘阿诗玛，与勤劳勇敢的青年阿黑相爱，最后被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支暗算，让洪水冲走，变成回声的美丽动人的悲剧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坚决反抗和斗争。影片公映后，由于艺术上的成功，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电影《怒潮》

吴自立、未央、郑洪编剧的《怒潮》　1963年由八

电影制片厂摄制，吴自立、未央、郑洪合作编剧的《怒潮》，是一部以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为题材的优秀影片。影片描写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南乡农民协会主席邱金由于误认敌人为友，不幸被捕险遭杀害，为县特派员罗大成所救。在罗大成的启发下，邱金重新组织农民武装，与敌人斗争。但中央特派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怀志，大喊农民运动过火，并撤了罗大成的职，强令解散农民武装，致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罗大成不幸牺牲，王怀志也死于敌手。最后，邱金带领农民武装，参加了秋收暴动，前往井冈山。影片公映后，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作者也惨遭迫害。"文革"后得到平反昭雪。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1=c 2/4

中速稍快　　郁　文词

王双印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1=F 2/4

洪　源词

生　茂曲

热情、坚定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克己为人是模范，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紧紧握住手中枪，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历史档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

根据国务院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关于简化字问题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批示："同意你会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汉字简化方案'中所列的简化字，用作偏旁时，应同样简化，'汉字简化方案'的偏旁简化表中所列的偏旁，除了四个偏旁(纟、讠、钅、饣)外，其余偏旁独立成字时，也同样简化。你会应将上述可以用作偏旁的简化字和可以独立成字的偏旁，分别作成字表，会同有关部门下达执行。"现特将这两类字分别列表通知如下。请将本通知下达到你省、市、区各级学校和各新闻、出版、印刷部门。

一、下列九十二个字已经简化，作偏旁时应该同样简化。例如"爲"已简化作"为"，"僞嬀"同样简化作"伪妫"。

愛爱　罷罢　備备　筆笔　畢毕　邊边　參参　倉仓　嘗尝　蟲虫　從从　竄窜

達达　帶带　黨党　動动　對对　隊队　爾尔　豐丰　廣广　歸归　龜龟

國国　過过　華华　畫画　匯汇　夾夹　薦荐　將将　節节　盡尽　進进　舉举

殼壳　來来　樂乐　離离　歷历　麗丽　兩两　靈灵　劉刘　盧卢　瞄瞄　鹵卤

錄录　慮虑　買买　麥麦　黽黾　難难　聶聂　寧宁　豈岂　氣气　遷迁　親亲

窮穷　嗇啬　殺杀　審审　聖圣　時时　屬属　雙双　歲岁　孫孙　條条　萬万

爲为　烏乌　無无　獻献　鄉乡　寫写　尋寻　亞亚　嚴严　厭厌　業业　藝艺

陰阴　隱隐　猶犹　與与　雲云　鄭郑　執执　質质

二、下列四十个偏旁已经简化，独立成字时应该同样简化(糸金言食一般只作左旁时简化，独立成字时不简化)。例如，"魚"作偏旁已简化作"鱼"旁，独立成字时同样简化作"鱼"。

貝贝　賓宾　產产　車车　齒齿　芻刍　單单　當当　東东　發发　風风

岡冈　會会　幾几　戔戋　監监　見见　龍龙　婁娄　侖仑　羅罗　馬马　賣卖

門门　鳥鸟　農农　齊齐　僉佥　喬乔　區区　師师　壽寿　肅肃　韋韦　堯尧

責责 義义 魚鱼 專专

三、在一般通用字范围内，根据上述一、二两项规定类推出来的简化字，将收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州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伪满州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予以释放。

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战争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判处无期徒刑的战争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3日　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2月4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最后3名日本战犯。至此，关押在我国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

3月20日　《人民日报》就知识青年董加耕自愿回乡务农发表社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

3月22日　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3月31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最近举行联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访问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等14国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5月中旬～6月1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政治工作和财贸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6月11～29日　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胡耀邦作《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关于修改团章的报告》；邓小平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修改的团章，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胡耀邦继任书记处第一书记。

7月14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8月1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作《半工半读、亦工亦农》讲话。指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结合的，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又是学校制度。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从长远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8月1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组织托拉斯的工作应尽快从酝酿规划阶段进入试办阶段。为了取得经验，今年由中央各部试办第一批工业、交通12个托拉斯，力争在今年第3季度组织起来，并以托拉斯为单位编制1965年计划。托拉斯统一掌握国家批准的劳动计划和工资总额，有权根据国家规定，在所属单位之间调剂使用。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

10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新闻公报：16日，中国在本

国西部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1月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29次会议，决定设立物资部，批准撤销国家物资管理总局。

11月12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南省委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是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农。

11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支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12月15日　毛泽东号召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12月17日　国务院第151次会议决定：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12月～次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会议对1964年下半年的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二十三条"要求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经　济

1月7日　李富春在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谈长期计划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主要内容是：①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把农业摆好，把国防摆好，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基础工业。②要克服过去各级计委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③财力物力有限，必须考虑用在什么方面更有效。④常规武器在7年内，做到品种齐全、成龙配套，集中力量突破尖端。⑤提出三个目标：5亿亩基本农田，20万吨化学纤维，1000万吨化肥，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计划工作就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了。

同日　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汇报时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生产出来的物资，必须按合同收购，不能积压在工厂里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

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机械工业正向几百个重点建设项目提供复杂、精密、重型的设备，为我国自力更生地逐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创造条件。

1月26日～2月9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逐步扩大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面积，使我国人民对粮棉的基本需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证，是全国最重要的建设任务。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2月10日　《人民日报》登载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

2月12日　国务院举行第141次全体会议，薄一波副总理谈当前工业交通部门的工作情况，会议通过《外国人入境出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2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关于1964年国防工业生产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1964年国防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军用品产值占88%，增长20%，全部可比产品计划总成本比上年降低9.6%。

同日　国务院召开工业交通长期规划会议，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政策思想、计划方法和中心任务问题。会议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穿用；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

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商业部门改善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商业部门把比学赶帮和"五好"企业（政治工作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好、经营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干部作风好）、"六好"职工（政治思想好、执行政策好、完成任务好、团结互助好、爱护公共财物好、经常学习服务态度好）竞赛运动开展起来。

2月20日～3月9日　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生产队是国营农场的基层单位，要做好生产队的工作。各级农垦部门和农场，必须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一切工作要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临前线，深入生产队蹲点，不断总结办好生产队的经验，全面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竞赛活动。

2月24日～3月19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全国财贸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农产品收购政策问题。会议提出随着生产的增长，要相应合理地增加派购任务；主要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价格，应在现有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下来。

3月3～14日　国家计委、经委、一机部、农机部共同召开全国机械工业调整工作会议。

3月5日　新华社报道：历史上长期缺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石山地区，几年来，修建了3.8万多处引水设施，近百万各族居民及35万头牲畜饮水不再发生困难。

3 月 5～14 日　第三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在京举行。

3 月 6 日　中共中央批转《李富春同志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建议：①中央各部门新建企业单位，除十分必要，经国家计委批准的以外，一律不准摆在北京。②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空地进行建设，原则上不许再占用近郊区农田。③实行房屋的统一建设和统一调配。

3 月 10 日～4 月 11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长期规划会议。会议提出：农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成 5 亿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

3 月 16 日～4 月 3 日　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订了 1964 年工业交通政治工作的重点，确定组织广大职工坚决扎实地学习解放军，做好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创造“五好”企业、培养“六好”职工，加强基层建设，把工业交通部门的全体职工锻炼成一支革命化和现代化的产业大军，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4 月 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草稿）》印发各地研究讨论。这个草稿是参照解放军的各级政治工作条例，略加改变而成的，它把军队实行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个第一”，树立“三八作风”，开展“五好运动”等运用到工交系统。

4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大中城市，凡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影响较大的行业，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应当全部或者基本上掌握起来，争取在年内把应当代替私商的行业和地区基本上代替起来。

5 月 7 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严格禁止楼馆堂所建设的规定》。指出：今后，从中央到基层单位，不经批准，都不得以任何名义进行楼馆堂所建设；既不许新建，也不许扩建和改建。

5 月 9 日　国家计委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关于编制 1965 年计划工作进度的通知。通知指出：196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做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完成调整时期的任务，力争农业生产接近 1958 年水平，尽最大可能做好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更新、专业协作的工作，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为第三个五年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6 月 22 日　农业机械部最近授予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机械厂等 4 个农机工厂和班组先进单位的称号。23 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机械厂的正确方向》的社论，指出：农业机械厂要面向农业，面向生产，面向实际。针对农业生产中最普通、最实际、最急迫的问题，来决定企业的产品方向。

6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指示指出：这个草案总结过去一段时期各地有关贫下中农组织的各方面的经验，对这个组织的性质、基本任务、会员问题、组织机构问题、领导成员问题，它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同社队组织的关系、它的经常工作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中央决定，不论是点上或者是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都要将这个草案和“双十条”一起，在农民和农村干部中间广泛地宣读和讲解。制定本地区的贫下中农协会组织细则，报中央局批准后实行。

7 月 3 日　李富春给国家计委写了关于编制 1965 年计划的指示信，要求在计划工作中，注意对几个政策问题的研究。在物价政策上，要适当调整原材料和机械产品价格；消费资料的售价根据薄利多销的原则适当降低。在文化教育政策上，要整顿和提高现有文艺队伍；有计划地在城乡试办一些简易的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并将一部分中学改为职业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控制人口的增长。在劳动工资政策上，试行两种劳动制度，搞一两个亦工亦农的工厂作试点，在森工、铁路建设上试行义务“工役”制，继续精简职工和减少非生产人员。

7 月 20 日　人大常委会第 124 次会议，通过 1963 年国家决算和 1964 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决议指出，1963 年国家决算收支超过原预计情况，收入情况更好，它反映了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的新形势。1964 年国家预算是一个保证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好转的预算。

8 月 4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磷肥工业获得成就，全国 2/3 省市已建起了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和施工的近百个大中小型磷肥厂，年生产能力达 200 万吨以上。

8 月 14 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转水产部制定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草案）》，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8 月中旬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根据上述讲话精神，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

8 月 22 日　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讲话。

指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

8月24日　李富春、薄一波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报告提出，攀枝花地区，地理位置好，资源丰富，地形隐蔽，是建设后方战略基地的理想地区。"三五"期间先建攀枝花钢铁厂，争取在1972年前建成一个年产60万吨左右钢和5万吨化肥的联合企业。

同日　新华社报道：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6年来为国家培养了1万多专业人才。

8月26日～9月7日　农业机械部和农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工具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农机具的改革要继续贯彻执行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主的方针。会议要求：①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的体制。②大力办好专区、县农机具修造厂。③抓好科学研究，发展新产品。④做好推广工作，做到又快又好地出研究成果。⑤加强修理力量，做好修理工作。

9月1日　中共中央批示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批示》指出：《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望各级党委和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检查和整顿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建厂工作报告》及西南局的批语。

9月5日　中央书记处就计划工作作出指示。主要内容是：①三线建设要落实。②一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质量。③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④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

9月13日　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问题，并要求国家计委按照汇报提纲精神制订明年计划。汇报提纲主要内容是：①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调整第一线，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战略思想，争取用7年到10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②积极研究和采用新技术，进行工业革命。③按专业化和协作原则改组工业，先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6个城市进行，并推行"托拉斯"。④改革劳动工资政策，1965年选择有条件的技校、中专、农中试行半工半读，在季节性工厂试行亦工亦农，在某些矿山试行轮换制。⑤改革设计、施工和基本建设程序工作。⑥改进财政体制和制度，对非生产性的东西控制严些，对生产事业以促进生产为原则。⑦建议中央成立国民经济工作的统帅部，由毛泽东和刘少奇挂帅。⑧彻底改革计划工作，克服从框框出发的错误。经济、计划工作必须认真进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并同干部、群众和中央商量。各级计委领导必须加强和调整，人员必须精简。

9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普通劳动者那样真正劳动——评重庆水轮机厂"三定一顶"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所谓"三定一顶"的制度是：干部参加劳动，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并在技术水平提高、能够独立操作以后，就顶替班组的定员，像普通劳动者那样真正劳动。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机械工业新产品迅速增长。最近几年，每年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都在千种以上，现在已能制造各种大型复杂的成套设备和精密度要求很高的设备，如1.2万吨水压机等。

9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学工业突飞猛进。今年100多种重点产品的产量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高效化肥和高效农药增加很多，有机化工产品和药品生产发展很快；过去没有的一些生产部门已建立起来。目前全国有50多个大中型化工工程正在施工。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轻工业和纺织工业日益繁荣，今年头8个月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总产值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纺织、制糖、造纸等行业的23种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去年同期。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工业部门提供大量设备物资支援农村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今年头8个月，为重点粮棉产区提供可灌溉5700多万亩农田的排灌设备。拖拉机产量、型号增多。今年以来供应到17个省重点粮棉产区的化肥达360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76%。我国机电排灌事业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农村使用电机灌溉的农田面积比1957年增加5倍；今年各地新建扩建的一批排灌站，共增加排灌设备40多万马力。

10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机械站事业获重大进展，全国农用拖拉机总数已达10万多标准台，70%以上的县已建立农业机械站。

10月30日　中共中央同意印发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据此安排经济计划工作。1965年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后方。1965年三线建设的任务是：在交通运输方面，采取分头、分段、多点同时施工的办法，集中力量建设西南三条铁路干线。1965年计划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1735亿元，比1964年预计增长9.8%；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8%；工业总产值增长11.8%。国家财政收支各442.3亿元。国家预算内总投资134亿元。初步安排的大中型项目690个，其中三线187个。

11月2～14日　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第一次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旅游事业应采取"政治挂帅、逐步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会议确定：1965年接待8000人，到1969

年达到 4.5 万人。

11 月 2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路运输战线上，目前已有 1.4 万多名汽车司机分别突破安全行车 20—70 万公里的纪录。

同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民主改革后农业、工业和文化事业迅速发展。6 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超过以往几个世纪，现在全区粮食总产量比民主改革前增加 50%以上；解放前连一颗螺丝也不能制造，现在已建成 50 多座中小型工厂，全区已有工人 2 万名；民主改革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贵族对藏文的垄断，现在藏族语言文字已得到空前广泛的应用。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

12 月 18 日　周恩来《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的战略是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和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

12 月 20 日～次年 1 月 4 日　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 1965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 1965 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的决议。通过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转发物资管理部《关于 1965 年物资供应形势的估计、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 7 点建议：①挖掘生产潜力，尽量组织原材料的增产，并统一合理利用超产物资。②严格控制国家已定生产计划，基建计划不能层层加码，在物资供应上反对“层层剥皮”和把缺口留在重点、短线产品及重点项目上。③适当增加物资部门的库存。④充分动员和利用社会库存。⑤加强机电产品配套和成套生产。⑥大力开展节约代用和利用次、废料，以补物资的不足。⑦增加一些外汇，有计划地组织短线物资的进口。

12 月 25 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农林牧副渔业产品收购量全面增加，按货币计算，今年收购的各种农业产品比去年增加近 10%，林业产品增加 7%，畜牧业产品增加 38%，副业产品增加 7%，渔业产品增加 11%。

军事、外交

1 月 10 日　周恩来总理和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布尔吉巴发表中突联合公报，并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2 月 1 日　《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坚持“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把加强基层建设的经验学到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

2 月 5 日　新华社报道：国防部最近发布命令，授予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的称号。同时，国防部还发布命令，追授解放军某部炮兵连驭手谢臣为“爱民模范”，授予谢臣生前所在的五班以“谢臣班”的称号。

4 月 7 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全军，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把四好连队水平变为广大连队水平，把五好战士水平变为广大战士水平。

6 月 1～11 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元帅和由他率领的也门共和国访华代表团应邀访问我国。9 日，签订了《中国和也门友好条约》、《中国和也门文化合作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6 月 11 日　美制台湾蒋介石集团 P_2V 型飞机一架窜扰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海军防空部队击落。12 日，国防部颁发嘉奖令奖励。

6 月 28 日　新华社报道：国防部最近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汽车运输部队某部五连二班以“西藏高原钢铁运输班”的称号；授予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广东省总队某部第六连队以“红色前哨连”的称号。

6 月 29 日　公安部发布公报：从 1963 年 11 月到 1964 年 6 月，我粤、闽、浙沿海军民歼灭 9 股美蒋武装特务，共 74 人。

6 月　全军开展“比武”活动。1 月 3 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活动。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6、7、8 月间，全军分为 18 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表演的共 1.37 万余人。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于 6 月 15、16 日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表演，对受阅部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

7 月 7 日　我空军部队在华东某地上空，再次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 U—2 飞机一架。该部受到嘉奖。自 1958 年以来，我军已击落了 10 架美制蒋介石集团间谍飞机。

8 月 25、28 日　新华社报道：国防部最近发布命令，分别授予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九连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称号、沈阳部队某团四连为“神枪手四连”称号、海军某部三连为“节约炊事用煤先进连”称号。

9 月 28 日～10 月 3 日　刚果(布)共和国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代巴访问我国。10 月 2 日，签定中国和刚果(布)友好条约和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海运协定。3 日，发表中国刚果(布)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9 月 29 日～10 月 4 日　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访问我国。11 月 3 日，两国签定了联合公报、

友好条约和关于中国向马里提供工业项目协定。

10月4日　原蒋军海军“大金门侦察队”下士赵宗礼驾驶登陆艇返回祖国大陆。国防部长林彪发布命令，授予赵宗礼以解放军海军少尉军衔。

11月5～14日　周恩来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等进行了会谈。

11月10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展览在北京展出。

11月15日　空军某部击落侵入我国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国军用无人驾驶侦察机一架。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民兵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贯彻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

12月13日　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弃暗投明起义归来。

12月18日　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华东某地上空，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RF—101型侦察机一架。该部受到嘉奖表扬。

12月21日　中国政府和埃及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确定中国给埃及无息贷款19430万元。此外，在这一年中，中国政府还同老挝、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签订了援助协定，规定了各种形式的援助额度，全年共签订了对外援助额为88746万元（其中无偿援助37053万元）当年对外援助财政拨款为124000万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1%。

教育科技文化体育

1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教育部拟订的《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七年（1964—1970）规划要点（初步方案）》。《要点》提出：除办好一批中小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外，应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小学教育，积极试办和发展职业教育，为青少年劳动就业做好必要的准备。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农业机械站工作发展迅速，1963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业机械站增加2.87倍，拖拉机增加4.67倍。全国已有60%以上的县建立了农业机械站。

1月8日　国家体委公布截止1963年底为止的305项全国纪录，去年创造的有94项，其中12项打破世界纪录。

1月10日　文化部批转在京音乐院校调整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同意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四院校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对调整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

1月11日　我青年速度滑冰队在柏林举行的国际速度滑冰比赛中，获三项冠军，三项亚军和四项第三名。

2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体委第一次授予我国43名围棋手段位称号。

2月13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即春节座谈会）。他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革，现在这样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他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提倡自学的精神。

3月7日　文学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和教育部发出联合通知，明确规定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

3月16日　文化部等5个单位举行优秀科教影片授奖大会，35部优秀影片的制片厂、29名电影工作者、25名科学工作者和7个集体技术指导单位获“为农业服务奖”。

同日　我国乒乓球选手在莫斯科国际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全部5项冠军。

3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行设计制成第一台直径7.6米的大型提升绞车卷绳筒。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新开辟的京昆、京沪、京广三条直达航线先后正式通航。

3月24日　全国邮电工作会议，评选出北京39电话分局等四个企业为“五好”企业和先进企业。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和中国昆虫学会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林害虫生物防除学术会议在武汉举行。

3月27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成立。

4月4日　全国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上海闭幕。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现在已治愈病人和消灭钉螺的面积占原有总数的2/3，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的县（市）已达到240多个，使流行县（市）数比解放初期减少了2/3以上。

5月2日　我国登山队10名运动员首次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处女峰”——西藏境内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

5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取消剧本上演报酬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为避免剧作者取得过高的不合理的报酬，立即取消剧本上演报酬办法；对于优秀剧作给予荣誉和一定的物质奖。

5月16日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从1961年起，《解放军》报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这次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一书，就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该报刊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编纂而成的。

5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在新疆准噶尔盆地首次发现距今9000万到1亿年前的翼龙类化石。

5月18日　我国著名举重选手陈镜开在上海以

151.5公斤的优异成绩打破了次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他第9次打破世界纪录。

6月9日　吴浮山在太原跳过1.79米的高度，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三个能够跳过这个高度的优秀女子跳高运动员。

6月16日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科技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行授奖仪式，1400多项工业新产品获奖。

6月27日　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此后，在上述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同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7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964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当年全国高等学校有930多个专业共毕业20.17万人，各地区和各部门要求分配毕业生31.6万人，不足11万多人。分配原则与前两年基本相同，但突出了面向基层，要求刚毕业的学生尽先安排到基层参加劳动实习，和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不应放在上层机关。同时，试行分配一些农科、医科、师范及工科中某些专业的毕业生，到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

7月4日　纪念玄奘逝世1300周年法会在西安大慈恩寺举行。来自亚洲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代表团和代表参加了法会。

7月9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著作选集》甲种本和乙种本于7月初出版，从10日起在全国发行。甲种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编入毛泽东从1927年～1958年的著作37篇。乙种本适合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阅读。编入毛泽东从1926年～1963年的著作37篇。

7月24日　《人民日报》摘要刊登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衍发的《评李秀成》。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这些文章，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展开了争论。

7月31日　在我国戏曲改革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胜利闭幕。大会历时两个月，有29个剧团、2000多人参加，共演出了35个剧目。

8月17～23日　我国选手戚风娣和徐润珍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网球比赛中获得女子双打冠军，徐润珍获得女子单打亚军。

8月21～31日　1964年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名科学家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朱德、陈毅、聂荣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等国家和科技界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各国科学家在理、工、农、医、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语言文字与文学、哲学与历史等学科委员会中宣读和讨论了200多篇科学论文，广泛探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学术问题。会议交流了科研成果和经验，探讨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科学事业，促进各国科学技术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8月21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处理戏曲演员高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现在享受超过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最高一级工资标准待遇的，应该一律降下来，降低到他们的文艺级别应得的工资。

8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地质部门今年派出近万名水文地质人员在26省、市、自治区勘探地下水源，为几十个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产地提供水文地质资料，同时为21个水利建设工程进行地质勘探。

8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继断手再植手术成功后，又为一工人成功地接活一只断臂。

9月17日　文化部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为解决学术问题进行的和在工业、农业、水利、交通、国防、城市建设等基本建设工程范围内配合工程进行和考古发掘方可进行，私人和私人组织的团体，不得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9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国营农场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与1957年相比，农场总数增加1倍，耕地面积扩大1.37倍；1963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食和豆类比上年增加88%。

9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境内的黄河过去只能行驶木帆船，最近首批机动船正式开航。这是河南的黄河航运史上的创造。

9月21日　我国一所新的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高等学校——中国音乐学院成立。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迅速提高。1956年以来，我国运动员先后92次打破43项世界纪录；1959年以来8次取得世界冠军称号。目前全国等级运动员已超过1000万人，其中包括运动健将3000名。

9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城乡医疗卫生保健网已初步形成。到1963年底，各级医院的正规床位比1949年增加6倍多；疗养院(所)正规床位增加20多倍，医疗技术队伍逐年扩大。

10月6、8、13日　毛泽东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由3000多人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空政文工团歌剧舞剧院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卫生部、教育部等最近发布《中小学校保护学生视力暂行办法(草案)》，并通知各地城市学校试行。

10月18～22日　有亚洲8个国家参加的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行。我国选手徐寅生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和徐寅生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11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陕西蓝田县的公主岭，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这是我国现有的唯一的猿人头盖骨。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盖骨，已在解放前被盗而下落不明。猿人头盖骨是研究人类起源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在我国的周口店、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芬发现过猿人的头盖骨。

11月12日　卫生部批复《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检定暂行规程》，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正式投产。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印数稿酬，只按字数一次付酬，再版不再付酬。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可以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12月3日　文化部党组提出关于对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某些专业艺术表演人员坚持练功问题安排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建议：某些技术性较强的必须照顾的行当(主要是舞蹈、戏曲、杂技演员和器乐演奏员)的基本技术练习，应根据当地“四清”、“五反”工作的情况，安排适宜时间。

12月7日　国家编制委员会、卫生部颁发《关于卫生防疫站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草案)》。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5年

庚子三卷之五

导　言

196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这一年中，尤以意识形态领域的过份批判突出，以“合二为一”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表明了阶级斗争要从文化上进行一次“革命”，这次意识领域上的批判，把政治斗争引入文化领域，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传统，将众多文艺作品诬为“毒草”，进行批判，并对许多文艺界人士进行人身攻击、政治迫害，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文艺界掀起的这股狂风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兆。

在体育上，我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荣获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振奋了人心，也鼓励了国人。

在军事上，我海军舰艇部队在东南沿海击沉了美制蒋帮两艘军舰，保卫了我国东南沿海海防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同时，也给蒋帮一个严重的警告。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我海军舰艇部队击沉美制蒋帮军舰两艘**
- **我男女乒乓球队双获第28届世乒锦标赛冠军**
-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背景介绍

在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于1959年4月党中央上海会议期间，向领导干部提出了学习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于6月和9月，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海瑞的文章。1960年又写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

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对及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有所发展。江青和康生趁机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虽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

1965年初，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背着党中央进行策划，密谋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经过7、8个月时间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毛泽东认可后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剧中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并不了解姚文元的政治背景，对文章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做法提出了反驳，中央书记处和北京市委领导采取慎重态度，北京各报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这篇文章，毛泽东对此不满，更加深了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搞"独立王国"的主观臆断。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一定性，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

材料：

- 《海瑞罢官》(历史剧)
- 《海瑞罢官》写作经过纪实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节录)
- 谈评《海瑞罢官》
- 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
- 毛泽东谈《海瑞罢官》"要害的经过(节录)

材料一 《海瑞罢官》(历史剧)

吴 晗

海瑞(公元一五一五——一五八七)，号刚峰，广东琼州(今海南岛)人。生活朴素，性格刚直、耿介，是明朝著名的清官、好官。

他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主张用重刑严惩贪污，建立廉洁的清明的政治局面；主张节约财力；严格执行政府规定的制度；抑制豪强地主；主张举办减轻贫农力役的一条鞭法；还大力兴修水利，减轻苛捐杂税；重视审判案件，平反冤狱。他反对为非作恶的贪官污吏、恶霸乡官。但是，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虽然骂过皇帝，因此坐牢，几乎被杀，皇帝死了，却又大哭。

当时人民喜欢他，歌颂他，大官僚，大地主，乡官反对他，骂他，排挤他。但也有一小部分有正义感的官僚和青年知识分子支持他。

这个戏写的是他作应天巡抚(当时通称江南巡抚)任上的一部分事情。时间在公元一五六九年六月到一五七〇年一月，共七个月。这年海瑞五十四岁。

地点在苏州，当时应天巡抚驻地。应天巡抚管应天(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及广德州，还兼管浙西杭、嘉、湖三府税粮。巡抚职权：一、管理民政；二、总理粮饷；三、提督军务；四、弹劾官吏。

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明朝称在朝作过官，罢官后在家闲住的叫乡官，这种人都是大地主，有钱有势；叫乡绅、绅富、绅衿等等，一句话，都是官僚地主。)

故事的情节：通过徐阶的第三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农民赵玉山的独子，又在清明节抢走赵玉山的孙女赵小兰，毒打赵玉山，赵小兰的母亲洪阿兰到县衙告状，县官王明友庇护徐家，不予受理。徐瑛用贿赂买通王明友和松江知府，叫家人徐富上堂作证，证明清明节徐瑛并未出城，王明友当堂杖杀赵玉山，斥逐洪阿兰结案。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

海瑞便服到任，在路上从洪阿兰和众乡民口中，知道徐瑛的案情和当地人民被乡官霸占土地的情况。

海瑞拜访徐阶，徐阶教他要严厉执法，王子庶人一般看待，主要意思要他用重法制裁"刁民"顽讼，保护乡官利益。海瑞提出洪阿兰一案，徐阶矢口抵赖，并且指使徐瑛叫徐富伪装秀才上堂作证。

海瑞决心平反冤狱，命令乡官退还强占平民的田地，和家人商量，他母亲极力赞成，更坚定了决心。

断案一场，海瑞揭穿徐瑛家奴的伪证，依法判罪，当堂处理了一批贪官污吏。

徐瑛被判死罪，徐阶亲访海瑞，讲过去交情，要求从宽处理。海瑞不顾情面，据理驳斥，展开正面的斗争。徐阶提出交田赎罪，海瑞严正指出，强占民田要退，徐瑛犯法要办。徐阶又恫吓这样做犯众怒会丢官，海瑞仍不为所动。最后声明绝交，徐阶发怒而去。

徐阶不甘心失败，和亲友密议反攻，派人上京城买通宫里太监和朝官，罢免海瑞。新抚戴凤翔赶来上任，海瑞已得秋审朝旨，处决徐瑛、王明友二犯，戴凤翔多方阻挠，海瑞不为所动，下令处决，再交巡抚印信，罢官归田。

戏中的戴凤翔是弹劾海瑞罢官的人，是江南乡官在朝的代言人，这里为方便起见，就让他代海瑞作应天巡抚。

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材料二　《海瑞罢官》写作经过纪实

《海瑞罢官》到底是怎样写出来的，事实经过究竟如何？我认为，今天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澄清。

宣传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1959年初，上海会议期间，许多同志都谈到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应提倡敢讲话，敢讲真话。一次，毛主席看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海瑞传》找出来看，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触怒了皇帝，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主席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事后，钱俊瑞同志向文艺界一些同志说了此事。吴晗同志是研究明史的，因此大家就建议他写文章宣传海瑞精神。同时，乔木同志也找了吴晗同志，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他很快就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接着又写了《论海瑞》一文，发表之前交乔木同志。当时胡乔木同志参加庐山会议，会后才看了这篇文章，除提出一些意见外，还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他谈了。吴晗把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并加上了一段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话，发表在195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上。由此可见，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发表有关海瑞的文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积极写作的，而且写作时间早在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约吴晗同志写有关海瑞的提纲，准备编一出京戏。吴晗同志允诺，在写提纲时，曾说："我不懂戏，也不大爱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总会有这个原故，那个原故，不能不放过机会。因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地道的外行。"他感到很吃力，动笔写了几次都觉得不大像提纲，有些踌躇，想打退堂鼓，但又不好反悔，便硬着头皮写出一个提纲。提纲写的主要是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期间，令乡官退还霸占农民的田地，为百姓平反冤狱和疏浚运河、防治水害等几件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提纲送京剧团后，京剧团的同志感到他们对海瑞这个人物缺乏研究，要把这个提纲改写成剧本，恐难成功，最好还是请吴晗同志自己改写。

1960年初，魏静生、马连良、王雁、李慕良等同志到市人委找吴晗同志，要求把提纲改写成剧本。当时，吴晗同志表示，没有写过京戏，写不了。经过他们再三邀请，才答应试一试。3月，写成五场《海瑞》剧本送京剧团。王雁、马连良等同志又到吴晗同志家里讨论修改。稿本印了一次油印本，两次铅印本。曾分送文化、戏剧界的负责同志齐燕铭、老舍、陈克寒、王昆仑、孙方山、阿甲、肖甲、马少

波等同志征求意见。他就是这样写一遍，讨论一遍，重写一遍，边写边改，边排边改。前后共修改7次，直到1960年底才定稿。

这个剧本原名《海瑞》，在几次彩排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志感到，剧本有历史事实，但题目太大，缺乏戏味了，高潮不突出，矛盾不尖锐。1960年夏，吴晗同志邀请了一些历史学家、戏剧家在市人委会议室研究讨论《海瑞》剧本，到会的有王昆仑、孙方山、老舍、魏静生、王雁、李慕良等同志，吴晗同志还要我参加会，帮助他记录大家的意见。会上讨论热烈，提出的主要意见：首先是剧名《海瑞》太大，剧本写的只是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期间的几件事，由上任到罢官这一段，剧名和戏的内容不贴切，不如改为《海瑞罢官》更切合实际；其次是在剧本中海瑞令乡官退田事，在舞台上不好表现，缺乏戏剧性，不如把平冤狱作为主线，退田作为副线；再一点是剧本的结尾描写海瑞罢官离任的场面，使人感到灰溜溜的，戏没有达到高潮。建议去掉几场戏，让海瑞斩了徐瑛，然后交印，以罢官结束。与此同时，袁震同志（吴晗的爱人）告诉我说，吴晗同志的老友蔡希陶同志出国考察，路过北京，到吴晗同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也提出应该加上"罢官"的意见。吴晗同志采纳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1960年底彩排后，将剧名由《海瑞》改为《海瑞罢官》。这一点，吴晗同志在剧本序言中也曾讲到："剧本原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写的只是海瑞生平一部分，才改名为《海瑞罢官》。"

1966年3月，市委派吴晗同志去昌平县大东流公社参加农村社教运动，我随同前往。当时"四人帮"、康生、谢富治一伙正大搞阴谋活动，对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加挞伐。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彭德怀是打仗有功的将领，我很钦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有关系。"还说："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我劝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会把问题搞清楚的。他表示深信不疑，说："对，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想事实真象总会大白于天下的。"我在他办公室工作多年，据我了解，平时他和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上的关系，也无私人交往。说《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同志翻案，完全是江青一伙对他的蓄意陷害！

（原载《历史内幕纪实（上）》）

材料三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节录）

姚文元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材料四　谈评《海瑞罢官》（节录）

江　青

……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的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

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举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材料五　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

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节自《红旗》1967年第9期）

材料六　毛泽东谈《海瑞罢官》“要害”的经过（节录）

胡　绳

1965年12月21日，家英和我，还有其他三人，一起在杭州听到毛主席的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谈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就因为有这句话，这次谈话后来成为一篇著名的讲话。由于这篇讲话和家英之死有点关系，我想在这里说一下。

有的记载说，毛主席是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作这个讲话的。其实，这不是一次会议，而是11月21日，毛主席把我们五个人找到杭州，当天就简单地谈了一下，说是要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他认为，每本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这一次谈话根本没有提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10天前这篇文章已经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这次谈话只是要大家考虑可以先出哪几本书和如何写序的问题。他说过几天再约这几个人谈一次。我们几个人就在杭州等待第二次谈话，等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期间，毛主席突然到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那就是对罗瑞卿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的会。这次会议后，他又到杭州，才有了12月21日的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是原来的5个人。这次谈话历时3小时，毛主席所谈的仍然是原来的主题，不过他谈的海阔天空，还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谈到《海瑞罢官》。

在这次谈话以后，家英以为这篇讲话内容重要，建议搞一个讲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家英这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按他的职责来说，这样做似乎是必要的。但他所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因此，在家英、我和参加谈话的另一个人一起，凭记忆和谈话时所作的简单的笔记来进行整理时，家英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都不必记入讲话纪要里。我同意他的意见。结果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参加整理谈话纪要的还有另一个人，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了一个短时期，他就是关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像是由康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4个人在一起，这4个人中“一分为二”，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另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五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他并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算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有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并不是原来讲的主题，原来的主题以后再也不提起了。家英参加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德怀同志，也不同意把吴晗同志的剧本从《海瑞罢官》和彭德怀同志牵连到一起，这恐怕是他的真实想法。

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成为家英的罪状，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再加上其他原因，家英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受到了他所受不了的压力。

（节自《忆家英二三事》）

我海军舰艇部队击沉美制蒋帮军舰两艘

背景介绍

1965 年，美国在越南扩大了侵略战争，为了配合其活动，美将一些武器提供给台湾蒋介石政府，蒋帮在得到美的援助后，便积极跟随美政府，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破坏，并且叫嚣要"反攻大陆"。

美制蒋帮的军舰连续不断地在我东南沿海炮击和扣留我渔船，抓捕和打伤我渔民，严重地威胁我渔民海上生产和安全。

美制蒋帮军舰的这种挑衅行动，激起了我广大海军及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我海军进行了还击，击沉了蒋帮军舰两艘，取得了重大胜利。对于美制蒋帮军舰的破坏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材料：

- 我海军舰艇部队击沉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林彪副总理嘉奖他们打得坚决干脆漂亮
- 干脆漂亮的海上歼灭战

材料一　我海军舰艇部队击沉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林彪副总理嘉奖他们打得坚决干脆漂亮

新华社广州六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今天在东南沿海前线，击沉了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最近以来，美制蒋帮海盗舰艇，连续在我东南沿海进行骚扰活动，破坏我渔业生产，炮击和扣留我渔船，抓捕和打伤我渔民，严重地威胁我渔民海上生产的安全。

今天凌晨，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又窜入我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渔场，进行破坏活动。经我多次警告无效，我担任护渔任务的海军舰艇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蒋舰发起了攻击，当场将这两艘蒋帮军舰击沉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今天颁发嘉奖令，表扬今天凌晨在东南沿海前线连续击沉美制蒋帮军舰两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说，八月六日凌晨，海军连续击沉了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蒋帮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有力的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行为的严重警告。

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加强战备，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嘉奖令说，近来，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破坏，并且叫嚣要"反攻大陆"。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突出政治，继续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护渔护航，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材料二　干脆漂亮的海上歼灭战

六日凌晨，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贼头贼脑地窜入南澳岛和东山岛附近的渔场，进行骚扰破坏。这时，日夜巡逻在东南沿海前线担任护渔任务的我海军舰艇部队，在对敌提出警告无效后，奉命出击。命令一下，英勇的水兵们立即开动舰艇，在漆黑的夜海里，破浪前进，直扑敌舰。

最近以来，美制蒋帮海盗舰艇连续窜入我东南沿海，炮击渔船，抓捕渔民。渔民们怀着无比的愤怒，向水兵们控诉敌人的罪行，有些受害者还一再请求海军战士痛打海盗，为他们报仇。水兵们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把一份又一份"为保护渔民而战"的请战书，送到指挥部。

在征途上，击沉两艘美制蒋帮军舰的英雄"海上先锋艇"，一马当先，向敌舰杀奔而去。艇长石天定站在指挥位置上目不转睛地了望着前方，指导员徐寿祺往返于各个战位上，鼓励战士痛打海盗军舰。弹药手们把一批批炮弹搬上甲板，炮手们反复检查着射击准备工作。这些祖国人民忠诚的子弟兵，决心要在严惩海盗的战斗中首创战功。

霎时间，前方出现炮火射击的闪光，这是剑门号和章江号敌舰在轰击渔船。水兵们一见，怒火冲天，加快航速，神速接敌。距离敌舰五海里、三海里……直到同敌舰相距很近的时候，我军舰、艇部队一起开火，只见无数条火龙般的弹光，划破海空，飞向敌舰。

"海上先锋艇"和兄弟艇首先英勇地插入敌人两舰之间，把章江号团团围住，海军健儿们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勇猛战斗作风，很快把敌舰的指挥台打得起了火。经过一场准确而猛烈的炮击，这艘在东南沿海屡次破坏我渔民生产的敌舰，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随着隆隆的爆炸声，敌舰舱面上的水兵躲的躲，逃的逃，纷纷落水，敌舰随即葬身海底。

剑门号上的敌人，见势不妙，拼命向外海逃窜，一边

逃跑，一边慌忙打炮。我英勇的海军战士哪能让它逃掉！指挥员命令："全速追击，靠近狠打！"舰艇飞速前进，猛追上去。炮手们瞄准敌舰，一阵猛打，连连命中。敌舰腾起冲天大火，舱底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逃上舱面，就随着这艘大型猎潜舰一起沉到大海里。

当太阳升出海面，我海军健儿迎着朝霞，押着从海上捞起的俘虏，全部胜利返航。这时，我空军战士驾着雄鹰在天空向他们致意；渔民们也兴奋地到码头上欢迎凯旋归来的亲人，称赞他们打得干净，打得漂亮。

我男女乒乓球队双获第28届世乒锦标赛冠军

背景介绍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整个世界水平，旧中国由于国家衰落，战乱不断，因而在解放前很少组队去参加比赛，即使派队去参加了，也是名落孙山。新中国成立后，遵照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全国各地掀起了体育运动的热潮。乒乓球在亚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一项运动。中国乒乓球队成立后，经过艰苦的训练，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团体小组第四名。1961年，在第26届世乒锦标赛中首次获冠军，第27届又获冠军，在1965年第28届上，中国男女双获冠军，充分显示了中国队的实力。

中国男女乒乓球队的获胜，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提高了中国的知名度，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因此，中国队的夺冠，受到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扬和其它国家的鼓励，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材料：

- 我男女乒乓球队双获团体赛冠军
- 盛赞我男女队双双荣获冠军
- 五项冠军争夺战

材料一　我男女乒乓球队双获团体赛冠军

以攻势凌厉著称的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今天却出奇制胜，用"柔克刚"的办法击败了猛打猛攻的上届世界冠军日本队，从而获得了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团体冠军。这场决赛的结果是三比〇。

比赛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观众热烈祝贺中国女子队从一九五三年参加世界锦标赛以来第一次取得女子团体世界冠军，日本队获得了世界亚军。

中国女子队今天上场的是两名横握拍的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日本队出战的是两名直握拍的攻球名将关正子和深津尚子。当观众知道中国队排出了这个惊人的阵容时，全场为之轰动。

这场决战的具体结果是：

郑敏之胜关正子——二比一（二十一比十一、十八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二）

林慧卿胜深津尚子——二比一（二十一比十六、十八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五）

林慧卿、郑敏之胜关正子、深津尚子——二比〇（二十一比十一、二十一比十四）。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今晚十一时三十分（北京时间二十日晨六时三十分）夺得了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团体冠军。他们在决赛中以五比二战胜了日本男子队。日本队又一次获得世界亚军。

这是中国队继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之后，第三次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

这场比赛的具体结果是：

张燮林负于高桥浩——一比二（十六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二、十六比二十一）

李富荣胜小中健——二比〇（二十一比十八、二十一比十九）

庄则栋胜木村兴治——二比一（二十一比十三、十五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八）

张燮林胜小中健——二比〇（二十一比八、二十一比十）

庄则栋负于高桥浩——〇比二（十八比二十一、二十比二十二）

李富荣胜木村兴治——二比一（二十二比二十、十五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一）

庄则栋胜小中健——二比一（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十六）。

（原载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盛赞我男女队双双荣获冠军

世界乒乓球坛人士纷纷赞扬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获得第二十八届世界锦标赛团体赛冠军的胜利和顽强的斗志。

中国女队十九日夺得"考比伦"杯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蒙塔古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女子队大大提高了她们取得重要比赛的胜利信心。这一场比赛引人入胜。中国教练派出两名防守型的运动员来对付猛攻猛打的日本选手的大胆决策是应该得到庆贺的。"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副主席埃尔德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女运动员打得非常出色，她们的防守无懈可击。这是一场我曾看到的最好表演。"

他说，他对中国派两名防守型的横拍选手出阵表示惊讶，因为人们惯于看到进攻型的、直握拍中国运动员出阵比赛。他说，"中国女将的步法完美坚定，运用自如，毫不拖泥带水。"

日本队教练荻村说，中国女运动员今晚打得很好，她们比去年有了很大进步。他说日本的女选手是无可指责的。她们已尽了一切力量，但是她们还是被中国队打败了。他还说，"日本女运动员的水平有了提高，但是中国女运动员的水平提高得更多。"日本代表团的负责人、日本乒乓球联合会副主席山本弥一郎说："中国女队是非常强的，日本女队在决赛中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才输掉的。"

日本女子队教练儿玉在评论中国女子选手的坚固防守时说，中国人的削球防守同欧洲选手的不一样，中国选手几乎是从地面上把球捞起来，球的旋转性很大，难以回过去。

他又说，"虽然我们一直知道你们的女队是一个劲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就在现在遇到挑战"。

他又说，"我们没有想到中国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大的进步。例如，林慧卿以前曾经输给深津尚子，但是这一回却打败了深津。虽然我们今晚打得很好，但是中国选手打得更好。"

荻村在评论中国男子队打败日本队而第三次蝉联获得"斯韦思林"杯时说，"我们的年轻选手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更强的队赢去了冠军。"

瑞典乒乓球名将阿尔塞在评论中国男队同日本男队决赛时说，"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日本人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

（原载1965年《人民日报》）

材料三　五项冠军争夺战

二十五日下午，蒂沃利公园体育馆里的二十张乒乓球台只剩了中间的一张，因为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五个单项都只剩下了两名或两对优胜者，他们在这里展开决战，争夺五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称号。

参加锦标赛的近四百名男女选手，今天绝大部分都脱去了运动衣，成了观众。参加这五项决赛的，只有六名中国选手和四名日本选手。

这五项决赛，有三项由中、日两国选手对垒，有两项则是中国选手之间的交锋。两国运动员施展了各自的拿手绝技，使五项决赛场场都打得十分精彩，有四场都打满了五局才分胜负。

攻对削的"马拉松"战

首先进行的是林慧卿对日本选手深津尚子的女子单打冠军争夺战。

这是她们两人自一九六四年以来的第四次交锋。去年，深津访问中国时，曾经两次赢过林慧卿。而在这届锦标赛的女子团体决赛中，林慧卿也曾经以二比一战胜过深津。由于两人势均力敌，因此，这场决赛的胜负属谁，在赛前很难预料。

深津吸取了在女子团体决赛中因未摸清对方来球的旋转性能，攻球失误过多而被林慧卿削败的经验教训，一交手就打得非常谨慎，她轻易不起板扣杀，而是采取了稳拉弧圈球的办法争取胜利。林慧卿仍然以稳健的削球来对付。场上是这边正手拉一板，那边反手削一个。在五局中有四局都打到了规定的比赛时间，而不得不采用"轮换发球法"。

第一局，林慧卿的削球出界和落网的很多，比分一直落后，结果以十二比二十一失利。这一局，深津总共只扣了两个球。

双方换边再战，深津越拉越稳，越拉越转，比分总是超出。当她以十二比七领先时，她突然又想用攻球得分，但是她的攻球不是出界就是落网，反而被林慧卿追了上来。在十六比十八，深津领先时，比赛已打到十五分钟的时限。这以后两人就突然改为全力进攻，因为比赛规则规定，这时发球者必须在十二板内得分，否则就判失分。结果林慧卿以十七比二十一再失一局。

第三局对林慧卿来说，是争取胜利的最后机会。这时，她已经逐渐适应深津的加转弧圈球，越削越稳，并以落点的变化来调动深津左右奔跑。深津有些求胜心切，连扣几板都未收效。场上又恢复了"持久战"。到九比七林慧卿领先时，又打满了时限，不得不再次采用"轮换发球法"。此后，双方又加快了速度。林慧卿长抽短吊，连连得分，以二十一比十五扳回一局。

第四局深津拉球失误达十六次之多，林慧卿以二十一比十三又扳回一局。这时场上的比分打成二平。

随着战斗的进展，场内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决定性的第五局里，深津一开始扣了两个球失误以后，再也不肯起板。两人又展开"马拉松"战，比分交替上升。当打到十一比六深津领先时，又开始采用"轮换发球法"。在这之后，林慧卿虽然奋起猛追，但因比分落后过多，从而以十六比二十一失掉了这一局。

二十岁的深津尚子终于在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就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林慧卿第一次取得单打亚军。

“闪电般”的对攻战

接着，庄则栋和李富荣在万余人的热烈掌声中，进入赛场，开始了男子单打的冠军决赛。

这是他们两人接连第三次在世界锦标赛上争夺男子单打冠军了。这本身就是世界锦标赛史上的一项新纪录。因为自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开始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两名选手接连三次在一起争夺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同女子单打决赛成鲜明的对比，两人一交手就展开了“闪电般”的快速对攻，观众情绪高涨，为场上出现的每一个精彩镜头热烈鼓掌和欢呼。

在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中，庄则栋连续大板扣杀，把李富荣逼到靠近挡板附近。李富荣在接过几个球以后，突然从远台猛扫一板，打了一个“回头球”。庄则栋腾空跃起，以硬对硬，又狠杀一板。李富荣立刻跃身横扑救险。随着球儿来回，场内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李富荣扑球落空，观众又发出一片惋惜声。这时，庄则栋和李富荣上衣都已湿透。

第五局中，庄则栋、李富荣猛烈对攻，打得难解难分。最后，庄则栋以二十一比十五获胜，又一次取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庄则栋和李富荣接受了奖品以后，立刻被记者和向他们表示祝贺的裁判员和观众包围起来，长达十多分钟。

以“柔”克“刚”的激战

同第一场女子单打决赛一样，第三场女子双打决赛也极紧张。林慧卿第二次出场同郑敏之合作，仍以多变的削球同日本的攻球手关正子和山中教子决战。头四局，双方各胜两场。第五局又打得难分上下，一直打到十九平。这时，裁判员站起来，宣布第五局已经打满了规定时间，应该采用“轮换发球法”。

比赛继续开始后，观众小声数着：“一、二、三、四、……”，突然山中教子起板猛扣，球出界，比分变成二十比十九，中国选手领先。接着，关正子和山中教子小心翼翼地一板一板地拉。这时，很少起板的郑敏之看准机会，突然反手抖腕一击，球闪电般击中对方的中路空挡。比赛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结束了。

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女子双打世界冠军的林慧卿和郑敏之出场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和男女运动员都向她们表示热烈祝贺。关正子和山中教子也同她们握手，祝贺她们取得新的成就，日本乒乓球队领队山本也从球场的另一边跑来同中国运动员握手。许多观众从看台上绕道来到赛场上，请林慧卿和郑敏之在本子、球拍和乒乓球上面签名。

“精彩激烈的攻守战”

男子双打决赛是在两对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庄则栋和徐寅生展开猛烈攻势，但张燮林和王志良两人经常在离球台好几米远的地方，以优美的姿势，把来球都轮流削了回去，就好像在对手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防线”。庄则栋和徐寅生往往扣上十几大板才能得一分。

这两对中国选手的精彩球艺深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比赛最后以庄则栋和徐寅生的胜利宣告结束。接着，在一阵阵有节奏的掌声中，获得这届男子双打前三名的八名中国运动员一齐走上授奖台。中国选手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流动奖杯“伊朗杯”。

至此，中国乒乓球选手在这届锦标赛中已经取得了五项世界冠军，创造了参加世界锦标赛以来取得世界冠军最多的纪录。

“又一场三比二”

最后一场混合双打决赛，由日本选手木村和关正子对中国选手张燮林和林慧卿。

木村是今天第一次上场，精力充沛。而中国一对选手中的林慧卿已是第三次上阵。在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决赛中，她已经经历了十局激战。

比赛开始，双方都打得很谨慎。木村和关正子面对这两个中国著名的削球手，不敢拿出他们拿手的大板抽杀，而是用稳拉弧圈球的办法，等待对方失误来求得胜利。第一局里，张燮林同林慧卿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削球水平，日本选手先胜一局。

第二局和第三局，张燮林和林慧卿逐渐适应了对方的打法，两人轮流用转与不转的削球控制了战局，使木村和关正子拉球和扣球连连失误。其中第二局木村和关正子丢了十二分，第三局丢了十三分。结果，张燮林和林慧卿连胜两局，以二比一领先。

这时，从五个单项决赛以来已经连打三场十三局的林慧卿，体力有了更大消耗，有经验的日本选手利用了这点，以长拉短吊迫使林慧卿的削球和扣球连连丢分。尽管林慧卿和张燮林顽强抢救，日本选手仍然处于得分领先的优势，最后又连赢两局结束了这场激战，为日本队在这届锦标赛上夺得了第二项世界冠军。

（原载 1965 年《人民日报》）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

背景介绍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

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从1962～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批判。

1962年8、9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根据康生提供的材料在全会上作了讲话，实际上支持了康生的做法。会后，关心和支持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了两个批示，提出了并不符合实际的严厉批评。文艺界根据这两个批示的精神进行了整风，文化部、全国作协、全国文联和全国剧协的一批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遭到了批判和处理。

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文艺界不同作品和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当时进行的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把许多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及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并把它们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政治问题高度来对待，从根本上违背了党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党的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

材料：

- 把《刘志丹》定为反党小说是一大冤案
- 我与小说《刘志丹》案（节录）

材料一　把《刘志丹》定为反党小说是一大冤案

刘尚雅

一九五六年，工人出版社向我母亲李建彤同志约稿，写一本《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她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走访了革命老根据地的山山水水，采访了老干部二、三百人。一九六〇年，又回到陕甘宁老根据地，访问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积累了十七本采访记录，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经过集中提炼，艺术概括，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歌颂了刘志丹光辉壮丽的一生，描写了他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与强大的敌人及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陕甘宁根据地的艰苦过程，展现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

她前后一共写了六稿。一九六二年春写出了第五稿（上册），征求意见。不想这样一部小说，却触犯了某些人。例如书中描写一个被游击队改编的土匪，后来又叛变投敌了。有个头面人物，认为那个土匪就是他的哥哥，气急败坏，去找那个“理论权威”告状。

这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理论权威”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他立即下令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还将作者自己废弃了的第三稿印了三百本，一齐拿去批判。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先把这书定为“反党小说”，然后再找罪状。利用他制造的“语录”，挥舞起大棒，大整党政军干部，大整文艺界干部，大搞文化领域的法西斯专政。

以害人起家的“理论权威”，与革命的老干部为敌，早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他就对西北一些老干部，大搞特务活动，钉梢、侦察。他也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由此看来，这不是仅仅一个小说案件，这是他通过这一文字狱蓄意制造一起政治案件。借批一本书，打倒陕北的一大批干部和革命群众，这就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先无中生有搞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后又发展为“西北反党集团”，再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总之，不讲真理，毫无事实，罪行随意捏造，规模随意划定，上至国务院副总理，下至老区的革命群众，株连成千上万的人，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冤案。

一九六二年冬，那个“理论权威”定下调子，以他为首，组织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监委三合一的专案组，对我妈进行了“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找人，陷害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

从一九六二年整到一九六六年，还定不了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理论权威”更加变本加厉地煽风点火，把天津南开大学的八·一八组织叫来，进驻作者机关，联合北京各大专院校的一些造反组织，组成了批判《刘志丹》的强大兵团，并在各省设立了联络站。这些人拿着“首长”“顾问”给的材料，在全国范围内批《刘志丹》，凡各省与此稍有关联的领导干部，都被揪斗，实行了大规模的迫害，一时弄得乌云压顶、群魔乱舞。

一九六七年一月，他们到我们家来抄家，抄走了小说第六稿。因为第六稿无空子可钻，他们就扣压下来，隐瞒中央，继续批判第三、五两次草稿。同时，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又抛出黑文，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诬蔑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说什么“他们企图假借这些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随着他们政治调门的提高，作者也遭到了更大的迫害，他们把她投进地下室关押起来，由武装人员提审，一关就是三年。我父亲刘景范同志在答辩时给"理论权威"提了点意见，叫他别搞逼供信，不要陷害好人，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监禁了七年。那个"理论权威"摧残民主，践踏法制，造成这种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古今中外都罕见。

同时，他们给小说罗列了四大罪状。

一曰：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小说。

作者当时提出质问："基本，百分之几算基本？""翻案？什么叫翻案？写三十年代的事，怎么能为五十年代的事翻案？"罗炎一共出场八次，是五个人的材料综合起来的，是小说人物，不是真人，为什么说他是高岗，而不是别人呢？这完全是用毛主席评判过的旧红学索隐派的评论方法，硬给《刘志丹》小说扣帽子。

二曰：刘志丹同志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

作者说：我是宣传毛主席思想的，凡是重要的地方，都写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如果这是"剽窃"，应当欢迎"剽窃"，大家都"剽窃"，全国的革命早就胜利了，岂不更好！

三曰：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作者当时提出："写得太好？哪件事是假的？哪件事无出处？可以指出来！"他们无法对答。他们的所谓"分庭抗礼"，实际是贬低中央苏区，挑拨陕北和中央的关系。"理论权威"派来的人把小说中的人物掰开揉碎分析，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说陕北干部都是"坏人"。作者当时就批驳："'坏人'创造的根据地，中央接收不接收？"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四曰：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同志。是为他篡党"制造舆论"。

其实，许钟和罗炎一样，是一个小说人物，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就是在小说中写了一个真人，像报告文学那样的文学形式难道不允许存在吗？谁上了小说谁就有了野心，就要反党，这是什么逻辑？而那个"理论权威"却硬说这些老干部要篡党，把他们统统打成坏人，把革命队伍的阵线搅乱，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在反党。

"理论权威"和"四人帮"一伙，挥舞他们的大棒。陷害了多少革命的老干部啊。就《刘志丹》小说牵连的人来说，就有：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郊外。劳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六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死，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丽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吕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

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馆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这些案子有的到现在也未理清。

《刘志丹》小说一案，绝非一部书，一个案件的问题。从此书、此案开始，文字狱大兴。他们曾以总结此案为名，作出三条规定：一、不许写一个完整的根据地；二、不准写路线斗争；三、不许写真人真事。以后就拿这把刀子，在文艺界东杀西砍，他们大搞影射比附，主观臆测，说这是为彭德怀翻案，那是为贺龙歌功颂德，任意定这本书是"翻案"，那本书是"反党"，弄得文化园地百花凋零，一片空白。

"理论权威"和林彪、"四人帮"策划的阴谋，一定要追查；散布的流毒，一定要肃清。今天，是用社会主义的法制，惩处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了。

（原载1979年2月1日《解放军报》）

材料二　我与小说《刘志丹》案（节录）

习仲勋

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我留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恩来同志让我开完会到北戴河去休息。我去休息了两天，便回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那个"理论权威"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一下那个条子，那个"理论权威"后来就把这句话强加在毛主席头上，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

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之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过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我正在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毛泽东同志、恩来同志的关怀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深信我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之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就在那些时候，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给我创造了学习环境，让我刻苦学习马列著作，还给我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一九六五年，党安排我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我每日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半天，拜工人为师，从工人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对我世界观的改造有很大的帮助。

（节选自 1979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原文标题"永远难忘的怀念"，
本文标题系编者所加）

风　云　人　物

李　宗　仁

李宗仁(1890～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广西陆军学堂毕业。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五年后，改任国民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十二月去美国，长期居住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在北京病逝。

材料　李宗仁归来秘闻录

1956 年 4 月，两位在香港报界的朋友又来到了程思远的寓所里："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程思远并不感到意外。他在近来日子里的沉思中已早早想"通"了。第二天，他当即回答，毅然北上。

程思远首次进京，立即就受到周恩来的宴请，而且晤谈了 3 小时之久。原来，"邀请"并不是李济深这位桂系元老的策动，而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

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只有一条我不同意，"周恩来说："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

周恩来还谈到白崇禧："白崇禧一向很自负，号称'小诸葛'，其实他在政治上没有远见，他竟听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

大陆解放时，白崇禧的主力被解放军吃掉，残兵败勇逃到海南岛。蒋介石在[illegible]于内外交困境地的白崇禧心神不定，遂派李品仙等人在白周围游说，并以"国防部长"之职为诱饵。白经不住诱惑，终于从海口飞到台北。谁料，一进去就成了一件"摆设"，只要蒋介石要对海外的李宗仁等桂系"感诏"时，就让白出来传诏。后来李宗仁与程思远从海外回归大陆后不久，白崇禧便悻悻地无息而终。因为，蒋介石再不需要他了。

谈及这些往事，程思远说："应该说，我的新的政治生命，是从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开始的。"

程思远首次北上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了在美

的李宗仁。不料，李宗仁大怒：这么关系重大的事，为什么事前没商量?！对台湾问题虽提出建议，但中间立场迄今没有变化！

如果换了其他人，对顶头上司的这番“怒斥”也许是要“诚恐诚惶”的了，但是，程思远和李宗仁之交却非同异常。程思远已做了李宗仁30多年的政治秘书，参与过李宗仁和桂系高层的一切秘密。他与德公之交，不是“刎颈”，也可谓“莫逆”了。他知道德公此刻首尾两端的心境。

如果说前两次入京均是公开的“观光”的话，那么，第三次北上则是秘密地进行的。

1960年，年青气盛的肯尼迪入主白宫，仿佛给僵硬的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人们普遍希望肯尼迪有所大作为。李宗仁似乎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他在美国递给肯尼迪一封信，祝贺肯当选，并望在其任内，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他接到了白宫的复函，肯尼迪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以慎重研究。

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可李宗仁却如获至宝，将复函寄予在香港的程思远，并嘱送周恩来处参阅。

1961年6月，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就是为德公的信函的事。总理见到程，话并不多，主要就是要程设法去欧洲一趟，与李宗仁会面，劝他不要对美国抱有过高的幻想。总理说，肯尼迪上台后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切切叮嘱：德公再不要抱那些虚幻的想法了。

李宗仁决定出国赴美。行前在香港办理各种手续时，蒋介石派了两批人来港挽留他。李宗仁对之不置一词。他已完全对蒋家王朝绝望了。果不久，蒋介石原形毕露，操纵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宗仁所任副总统的职位。

李宗仁赴美之前，特嘱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想，德公这是欲借香港这块自由港之便捷，作好伸缩进退之准备的。可以说，当年的安排今天果然派上用场了。

程思远自上次受周恩来之嘱后，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一事而筹划。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1963年11月，终于有眉目了：双方约定12月瑞士见。

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上京，向周恩来请示。这是第四次北京之行。

11月15日，午夜，中南海西花厅。

刚从酣睡中被叫醒前来的程思远，看着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深夜仍精神奕奕，直叹“世所罕见，世所罕见”。

周恩来主要要他向李宗仁转述“四可”原则：即，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一句话，一切由德公自己决定，我们悉听尊便。

程思远当即将“四可”原则背诵下来。临别，总理迎着夜里的寒风，一直把程思远送上门外的汽车。

瑞士。苏黎世。

从美国飞来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夫妇，这些天明显地感到了自己身后的“影子”。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从美国跟到葡萄牙，再从里斯本跟到苏黎士，现在又同时住进了李氏夫妇下榻的Savoy饭店。

难怪呀，李宗仁这次旅欧是他自1949年去美后的第一次外出。

幸好，如约而来的程思远无意中在罗马被耽搁了几日。这几日，李宗仁夫妇只得与他的一个亲戚出游宴客打发时日。这使两个精明的特务误会了：李的亲戚是一地道商人，与政治绝无关系。看到李此行仅是探亲，别无目的，于是解除了监视跟踪。

程思远心急如焚地从罗马赶到苏黎世时，两个特务刚刚离开。事后，程犹有余悸地回忆说：“我无意中的迟到，竟有那么大的妙用，实在料想不到。”

这一次传递信息的欧洲旅行成功地避过了世人耳目。程思远在夫人石泓的巧妙掩护下，竟使香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去了一趟欧洲。12月23日，李宗仁从欧洲飞回纽约，对前来迎接他的亲友们则说了一句“难懂”的话：“好险呀！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

第五次北京之行是1965年6月18日。

10年之间，五上北京。这次是该有收获的了。程思远此行是为接李宗仁夫妇归来而赴京作最后的请示。

抵京之日正值周总理启程出访非洲各国。程思远领到一笔旅费，并得到保证，在苏黎世将有人助他一臂之力。

返港前，有关方面在统战部餐厅宴请程思远。虽然厨师摆出了这餐厅名闻京师的名菜——“烧方块砖肉”，可程思远归心似箭，却全然没有品出这道菜肴的滋味。

6月28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与早到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

行前，李宗仁变卖了他在纽约的房产，遂招来许多猜测和怀疑。此行困难大大增加。

幸好，北京的“一臂之力”及时出现了。有关方面根据翔实的情报通知滞留苏黎世的李、程等人：“立即离开瑞士。”

情报是准确的。李宗仁等走得好险呀！当他那位经商的亲戚从机场把他送走后回到家里，便见两个彪形大汉在等着他了。那两人手扬着一份电报，声称一定要当面交给李宗仁。李的亲戚对他们说：“李德邻先生和他的夫人到罗马去了。”

“那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

两个汉子往沙发上一坐。从此就将那位亲戚“软禁”了一段。直到李宗仁回到大陆的消息传出，他们才快快离开。

台北在这次行动中彻底地失败了。不仅仅是两个特务的扑空，不仅仅是最后关头仍发表"李不会去大陆"的荒唐声明，而且是几十年来以特务自炫于世的国民党当局的威风扫地。

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

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的李宗仁先生出现在大型苏式客机的舷梯旁，身后是旗袍裹身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秘书程思远先生………

周恩来、彭真等到机场热烈地欢迎李宗仁先生的归来。首都机场，一片绚丽的阳光。

回国后不久，李宗仁即接到邀请：毛泽东在中南海等他。

中南海。游泳池边。

毛泽东迎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德邻先生，国民党骂我们'共匪'，你回来就不怕上'贼船'吗？"说得李宗仁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当人把程思远介绍给毛泽东时，毛用力地握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人们不明白毛泽东今天的兴致为何如此之高。他与李宗仁没说几句，便邀之下池游泳。李推辞说不会。毛又邀程思远，程欣然允诺，旋即各自换了泳衣，与毛泽东在池子里把臂同游。

（摘自邹爱国、薛建华：《他陪同李宗仁秘密归来》）

柯庆施

柯庆施（1892～1965）。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至1936年，在上海、南京、武汉、安徽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市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逝世前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刘亚楼

刘亚楼（1911～1965）福建武平人 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期间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师长，指挥强渡乌江、夺占泸定桥等战斗。抗战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1939年至1945年，在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在天津战役中任前线总指挥。1949年11月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

王杰

王杰（1943～1965）山东人。为我军某部战士，在学习雷锋活动中，他一心一意以雷锋为榜样，刻苦学习，乐于助人。1965年，为了掩护十二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党中央领导人为王杰题词，号召广大群众学习王杰的这种革命精神。

材料　革命青春的赞歌

——记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我们时代的又一个董存瑞、黄继光式的英雄，雷锋式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同志，为了掩护十二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英勇地牺牲了。

这些天来，王杰的名字，像春雷一样，响彻在祖国的每一角落，激荡在亿万人的心里。王杰同志的光辉事迹和他一心一意为革命的精神，正鼓舞着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更加奋勇前进。

王杰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光彩夺目的。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一生，以服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

从王杰同志立下这誓言直到他英勇牺牲，整整过了四年。年青的王杰，投入到革命部队的大熔炉里，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经过实际斗争的锤炼，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中学生，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现在，我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向读者介绍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最亲密的战友——王杰。

读毛主席的书　走革命的路

一九六一年七月，从山东金乡中学初中部刚刚毕业的王杰，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参加了部队。当他第一次戴上军帽、穿上军装的时候，他高兴地问指导员："我现在算是个革命战士了吧？"指导员亲切地对他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必须好好改造思想，改造思想最根本的一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王杰被分配到工兵一连，刚去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新鲜。工兵一连，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连队，王杰所在的六班，过去在赴朝抗美作战的一次战斗中，曾连续作战三十多

个小时，配合我坦克部队击毁美国侵略军坦克三辆，荣立二等功。他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感到很自豪。副连长高绍忠是一连的老工兵，战斗英雄，他讲战斗故事，王杰经常听得入迷。心想：我也要像副连长那样，当个战斗英雄。但是怎样实现这个抱负呢？

一九六三年三月，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使王杰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巨大动力。他以雷锋为榜样，拿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和雷锋比，越比越觉得自己差得远。王杰按照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的教导来认识自己的家庭，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要甩掉这个“包袱”，要达到雷锋那样的高度，必须加倍努力。有一次，他去帮助群众做好事没有请假，班长批评了他。王杰没想到，自己做了好事，还挨批评，心里不高兴。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他又想起雷锋。雷锋是个很守纪律的战士，自己不请假就外出，就是违犯了纪律。这样一比，差距找到了，心里就再不埋怨班长，反而觉得班长批评得很对。王杰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学英雄和改造自己的。

人民的勤务员　革命的“老黄牛”

王杰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他的牺牲，却强烈地震动了人们的心。在王杰事迹展览会上，许多观众一边参观一边落泪。为什么这些与他素不相识的人这样激动，这样悲痛？因为王杰是人民的好儿子。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革命战士的优秀品德。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得到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由衷的尊敬。

王杰同志在他那光华四射的日记里，不只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心愿：一心一意做人民的勤务员，做革命的“老黄牛”。在他的日记里，经常提到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他立下誓言：要像雷锋一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王杰把为人民服务这个崇高的目的和自己的每一个具体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

处处为同志们做好事，成了王杰的习惯。能做到的，他尽力去做，自己不会做的，他也千方百计，想办法出上一分力量。就在他右手被沥青烫伤以后，他还用左手帮助同志们扒石渣，用左手端着脸盆到山下河沟里，半盆半盆地为上工的战友们打好洗脸水。住了医院，他还帮助护理员擦地板、送药、倒开水。一事当前，王杰从来不分你的我的，只要是革命的，对同志有利的，他就全力以赴，越干越起劲。连队成立义务理发组时，他再三要求参加。同志们说他不会理发，可他总不死心，理发组一“开张”，他便拿着自己的毛巾和肥皂，跑去为同志们洗头。他见同志们蹲在地上洗头不得劲儿，就搜集废木料做了一个洗脸架。就这样，他硬是“挤”进了这个服务小组，成为不可缺少的一员。

王杰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以火一样的热情，为人民、为同志做了许多好事。在他生前，就有同志称他为“活雷锋”。但是，王杰始终牢记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的教导，认为贡献于人民的应该越多越好，要求于人民的应该越少越好。他给自己订下一条法规：“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野营时他把好的铺位让别的同志睡。出公差他争着干。越是在行军疲劳的情况下，他越要多站岗。他常常提早起床，挑水扫地，把全班、甚至全排同志的洗脸水打好……。

放眼全世界　豪情满胸怀

一九六三年春天，部队开展“每日一雷”活动。王杰和老战士齐昌君搞互助，练习布雷、起雷。开始，他发现不了齐昌君埋的雷，而他自己埋的雷，齐昌君总是很快就找到了。有一次，王杰跑到草地上，铲下一块草皮，把雷埋好，再把草皮原封盖上去，细心伪装好，结果还是被齐昌君发现了。王杰纳闷，就向齐昌君取经。齐昌君说：“你这次埋的雷比前一次好多了，但还有缺点。你在埋雷时，踩倒了两棵小草忘了扶起来，这样，狡猾的敌人一看就能发现。”王杰受到很大启示，就更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不久，他埋的雷别人就很难发现了。为了大量杀伤敌人，王杰改革了布雷方法。他还创制了七种教学工具，帮助战士更快地掌握杀敌本领。

王杰的战友告诉我们，他生前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脚下踩着山和水，
怀里揣着全世界……”

这首气魄雄伟的歌，唱出了王杰同志高昂的斗志和开阔的胸怀，反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具有多么崇高的国际主义情操。

一心一意为革命　刀山火海也敢闯

一九六三年八月，部队去抗洪。出发之前，王杰就表示了这样的决心：“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到哪里就冲向哪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怨言。”在抗洪斗争中，运土时，他扛得多，跑得快。扛草包，别人扛一捆，他扛两捆。一天夜里，他们去运木料，夜色茫茫，洪水一片，连长喊道：“谁的水性好在头里探路！”话音刚落，王杰霍地站出来，爽朗地回答说：“我去！”他在水中一步一步探索前进，挺胸破浪，毫不畏惧，几次掉进深坑，洪水没过头顶，可是他一探出头来，就招呼：“同志们注意，这儿是窄道！”“同志们注意，这儿有深

沟！”就这样，他为同志们探出了一条安全的通路。

王杰同志从不怕任何艰险困难。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也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一九六四年七月底，部队在某山区施工。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战士刘承科和吴庆忠从睡梦中惊醒，出去一看，只见山洪卷着乱石，奔腾咆哮一泻而下，雷鸣电闪，犹如山崩地塌。他们忽然发现在暴风雨中有一个黑影在跳动，仔细一看，原来是王杰，正在不顾一切地抢救施工物资。他们就奔向山沟，和王杰同志一起抢救，一直搏斗了四十多分钟，终于把施工物资抢救了回来。

王杰在他短短的生活道路上，已经历了多少次严峻的考验。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我懂得了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斗争才是真正的幸福。”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

这金石般的语言，表达了王杰同志对党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王杰同志以自己年青的生命谱成了一首雄伟壮丽的革命青春的赞歌。

从部队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人们到处传诵着王杰同志的英雄事迹。一个向王杰同志学习的群众性运动，正在全国、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

王杰同志英勇牺牲了。千千万万个王杰正在迅速成长。他们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肩负起革命的重担，朝着党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更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让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光荣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新的一代！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65年，由于对文艺界的批判不断，而且文艺界的争鸣从一般讨论上升为政治斗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电影、话剧等遭到了批判，在这种情况之下，文艺领域出现了混乱、萎缩的局面。

尽管这样，广大文艺工作者还是创造了许多优秀的节目，如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不但在当时广为流传，到今天还普遍受到人们欢迎，有百看不厌之感。

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烈火中永生》电影，是一部以解放前夕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狱中斗争为题材的优秀影片。影片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歌曲仍以革命歌曲为主，如《社会主义好》等是人们比较熟悉和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

京剧《智取威虎山》

十二场京剧。上海京剧院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改编。原载《剧本》1964年12月号，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出版。

解放军某部侦察排长杨子荣，奉命化装成敌联络员，打进威虎山座山雕匪部，为大部队歼敌刺探情报。他深入虎穴后，用假“联络图”取得了座山雕的信任。从奶头山逃出来的匪徒栾平，认出了曾俘获过他的杨子荣。杨沉着机智，舌战栾平，软硬兼施地迫使座山雕处死了栾平。除夕夜，他配合参谋长少剑波率领的部队，在“百鸡宴”上，将威虎山匪徒一网打尽。剧本较好地把握了原小说的创作思想，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中肃清残匪的复杂斗争。不强调原作的传奇性，而着力刻画人物，突出表现杨子荣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艺术构思上，两条线索平行发展，通过少剑波到夹皮沟发动群众的一条线索，衬托了杨子荣打入威虎山的一条线索。情节的安排曲折跌宕、张弛有致。此剧为现代戏的改编、创作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

京剧《红灯记》

十一场京剧。翁偶虹等根据同名沪剧改编。原载《剧本》1964年11月号，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我地下共产党员、铁路工人李玉和，奉命将一份密电码送交柏山游击队。由于王警尉的叛变，李玉和在粥棚以号志灯为暗号，与联络员接头时，险被日寇逮捕。敌宪兵司令鸠山，为得到密电码，抓走并杀害了李玉和和李奶奶。铁梅接过父亲手中的号志灯，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密电码胜利送上柏山。途中，游击队消灭了追赶铁梅的鸠山等敌人。剧本出色地解决了戏曲反映现代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它十分注意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塑

造李玉和一家三代的感人形象，鲜明而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的火焰扑不灭，革命的红灯代代传这一主题。全剧结构紧凑、自然，情节安排一环紧扣一环，红灯的运用贯穿全剧，成为刻画人物、推动剧情发展和表现主题思想不可缺少的手段。

京剧《芦荡火种》

十一场京剧。汪曾祺等根据同名沪剧改编。载《人民日报》1965年3月18～20日（改名《沙家浜》），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出版。

18名新四军伤病员，被沙家浜群众转移到芦苇丛中养伤。敌人跟踪而至。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在上级党领导下，以"春来茶馆"作掩护，利用自己曾救过伪"忠义救国"司令胡传葵这一有利条件，以及胡传葵和其参谋长刁得一之间的矛盾，巧与敌人周旋，掩护了伤病员，并和沙奶奶等一起，配合新四军打回沙家浜，活捉了日寇黑田和汉奸胡传葵、刁得一。剧本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江南水乡人民同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十分成功地塑造了阿庆嫂、刁得一的艺术形象，在运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全剧充满浓郁的水乡风情，剧情有张有弛，表现了剧作者铺排和结构故事的能力，"智斗"一场尤其出色。较沪剧剧本，更加成熟和深化。

电影《烈火中永生》

196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周皓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小说《红岩》改编的《烈火中永生》，是一部以解放前夕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狱中斗争为题材的优秀影片。影片描写1948年重庆解放前夕，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共产党员江姐和重庆地下党领导人许云峰先后被捕，押到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江姐和许云峰等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以顽强的意志击破了敌人的梦想，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人生的壮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国共两党两种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敌人虽然杀害了江姐和许云峰，而难友们却越狱成功，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影片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电影《舞台姐妹》

1965年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林谷、徐进、谢晋编剧的《舞台姐妹》，是一部以越剧艺人生活为题材的优秀影片。影片描写江南农村童养媳竺春花因逃婚进入越剧戏班，与戏班教戏师傅的女儿邢月红结拜为姐妹，走村串镇演越剧，受尽豪绅伪警们的欺侮。后又因邢师傅被警方杀死，春花与月红卖身葬父，成为上海某戏院唐经理的摇钱树。唐经理企图利用姐妹俩演反动剧目，遭到春花拒绝，但月红却被唐经理诱骗走入歧途，姐妹俩彻底决裂。春花走上进步的道路，月红被反动派利用。解放后，姐妹俩重又相见，春花帮助月红提高了觉悟，一起开始了新的舞台生涯。影片相当成功地塑造了春花的艺术形象，通过她的命运概括了一代戏曲艺人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戏剧《打铜锣》

湖南花鼓戏。李果仁根据柯蓝小说《三打铜锣》改编。原载《剧本》1964年第7期。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出版。

湖南某农村的收割季节，大队管委会派蔡九哥"鸣锣关鸡鸭"。去年，各家各户都能遵守队里订的制度。唯有林十娘明知故犯，还花言巧语骗去了蔡九哥的一个锣槌。今年，蔡九哥又碰到林十娘偷放鸭子下田糟蹋粮食。他坚持原则，帮助林十娘改正了错误。剧本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农村两种不同人物及其思想境界，热情赞颂了蔡九哥坚持真理、为了集体利益不怕得罪人的高贵品德，对林十娘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的不良习气，则进行了善意的讽刺和批评。在一连串的喜剧冲突中，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喜剧人物形象。语言风趣、幽默，乡土气息浓郁。

话剧《激流勇进》

三幕十四场话剧。胡万春、佐临、仝洛根据胡万春中篇小说《内部问题》改编。原载《剧本》1964年第3期，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出版。

上海某钢铁厂技术员欧阳俊发明了一种新的炼钢法，他由于受满脑子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技术科副科长的影响，急于试验，以便写出学术论文，名扬全国。但是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深入调查研究了的副厂长王刚，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试验；而工作飘浮，忙于事务的徐厂长，怕背上不支持新生事物之过，于是不调查研究即批准试验，结果烧坏了炼钢炉。正在生病的王刚勇于负责，和工人一起抢修了炉体，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帮助改进了技术，终于使试验成功。这个戏突破了当时创作中支持革新必是正面人物，反对革新必是落后人物的框框，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具有新意。

歌曲《社会主义好》

李劫夫词曲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二部合唱）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注：轮唱时，第二部迟起一小节。第一部唱到末尾要把“来到”两字重复一下，使与第二部同时结束，即将第一部最后一句唱成这样：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来到！

歌曲《小扁担，三尺三》

（故事片《李双双》插曲）

李准词

向曲　曲

1＝D　2/4

（女生齐唱）

轻松愉快，快步进行速度

小扁担三尺三，小扁担三尺三，咳哎咳哟嗬咳哟嗬咳！姐妹们，姐妹们挑上不换肩，咳哎咳哟嗬咳哟嗬咳！一行儿排开走的欢，好像那大雁咳上青天。咳哎咳哟嗬哎咳哟嗬咳哟嗬咳哟嗬咳哎咳哎咳哟嗬咳！

仓库满囤儿尖，仓库满囤儿尖，咳哎咳哟嗬咳哟嗬咳！看着，看着丰收心里甜，咳哎咳哟嗬咳哟嗬咳！多打粮食多生产，日子一年咳胜一年。咳哎咳哟嗬哎咳哟嗬咳哟嗬咳哟嗬咳哎咳哎咳哟嗬咳！

词《菩萨蛮》（五首）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

其一

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偷火。
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
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
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

其二

昂昂七亿移山志，忍能久久为奴隶！
双手扭乾坤，教天认主人。
浮云西北去，孔雀东南舞。
情景异今宵，天风挟海潮。

其三

攀山越水寻常事，英雄不识艰难字。
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
登临何限意，佳气盈天地。
来者尽翘翘，前峰喜更高。

其四

西风残照沉昏雾，东方红处升霞柱。
雾暗百妖横，霞飞四海腾。
霞旗扬四海，壮志惊千载：
愿及雾偕亡，消为日月光！

其五

从来历史人魔战，魔存那得风波晏？
此日揽长缨，遥看天地清。
长缨人卅亿，垓下重围密。
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

作者：胡乔木

贺新郎

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心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是芳春男共女，瞎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作者：胡乔木　原载 1965 年《人民日报》）

历史档案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议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我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与我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不相符合。它使等级表面化，对我军革命化建设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为了保持和发扬我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密切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我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建设，建议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请审议决定。

取消军衔制度后，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须作相应的修改。要将这两个文件修改得比较完善，还需一定时间。我们建议，在这两个文件未修改好以前，先将军衔制度明令取消，待两个文件修改好后，再上报审核。

国　务　院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国防部关于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我军现行的军衔制度。因此，对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的称呼，规定如下：

一、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的相互称呼，可称 1. 姓名加同志，如"张克坚同志"；或 2. 姓加职务和姓名加职务，如"张连长，李指导员"和"张克坚连长，张志勇连长……"；或 3. 职务加同志，如"司令员同志，政委同志，班长同志，战士同志……"。4. 如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务时，可简称"同志"。

二、废除原按军衔的称呼，如"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上士"、"列兵"，和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如"某某总"等。

三、在行文上，对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可称同志或称主席、副主席。

特此通知。

中国乒乓球队在历届团体赛中的成绩

新华社卢布尔雅那十九日电　资料：中国乒乓球队从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来在历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中的成绩。

第二十届(一九五三年)

男子团体小组第四名。被国际乒乓球联合会评为一级队第十名。

女子团体小组第四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二级队第三名。

第二十一届和第二十二届未参加比赛。

第二十三届(一九五六年)

男子团体小组第二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一级队第六名。

女子团体小组第六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一级队第十一名。

第二十四届(一九五七年)

男子团体小组第一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一级队第四名。

女子团体小组第一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一级队第三名。

第二十五届(一九五九年)

男子团体小组第一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一级队第三名。

女子团体小组第一名。被国际乒联评为一级队第三名。

第二十六届(一九六一年)

男子团体冠军

女子团体亚军

第二十七届(一九六三年)

男子团体冠军

女子团体第三名

第二十八届(一九六五年)

男子团体冠军

女子团体冠军

我国强烈抗议印度政府策动反华丑剧

中国外交部二十六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一群印度暴徒二十四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寻衅闹事,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照会指出,这幕反华丑剧是印度政府一手策动和组织的。印度政府企图借助于这幕反华丑剧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和印度军队从中锡边界中国一侧仓惶逃窜的狼狈相,是肯定达不到目的的。

中国外交部照会的全文如下:

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且申述如下: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一群印度暴徒,在印度官员和国大党领导人的率领下,赶着一群羊,到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门前寻衅闹事。他们大吵大闹,叫嚷什么中国为了"威胁和恐吓印度捏造了荒谬的借口","中国为了几只羊和几头牦牛就要发动一场世界战争",等等。这幕丑剧是印度政府一手策动和组织的。中国政府为此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印度政府企图借助于这幕反华丑剧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和印度军队从中国锡金边界中国一侧仓皇逃窜的狼狈相,是肯定达不到目的的。

几年来,你们矢口抵赖印度军队曾在中锡边界侵入了中国领土,构筑了侵略工事。可是在我们提出限期拆除侵略工事的要求后的几天之内,入侵中锡边界中国一侧的印度军队,就不能不在中国部队的监视之下仓惶逃走,留下累累的罪证,使你们几年来苦心编造的谎言一下子宣告破产。你们这样的丑事,怎么能够掩盖得了呢?

分明是你们理亏心虚,所以你们不能不匆匆忙忙全部撤走侵入中锡边界中国一侧的印军,并且平毁了部分侵略工事。但是,你们又觉得面子上太过不去,于是你们反咬一口,说什么中国为了几只羊和几头牦牛就要发动一场战争。其实,你们心里完全明白,这是故意撒谎,不然你们为什么在我们的限期满期之前,就把入侵印军全部撤走了呢?你们在中锡边界越界劫走的边民和牲畜必须如数归还,但是中印之间的问题绝不止于几只羊和几头牦牛的问题。你们对西藏进行颠覆活动是几只羊和几头牦牛的问题吗?你们在中印边界各段侵占了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几只羊和几头牦牛的问题吗?不是的。所有印度对中国的入侵、骚扰和武装挑衅都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都是必须清算的。

侵略和反侵略的界限是永远模糊不了的。现在全世界都看到:是印度发动了一场侵略巴基斯坦的战争,危及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正是中国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坚定的反侵略立场打击了你们的侵略气焰。你们感到十分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企图用什么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的谎言来要挟中国放弃它的正义立场,那是永远办不到的。印度政府应该明白,即使有了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撑腰,你们也不能对自己的邻国为所欲为。

为了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那里得到犒赏,你们搞次把零零落落、不象样的反华游行,那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但是,中国政府必须提醒印度政府,凡事都要有它的界限,超过界限是不行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社论。社论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1月14日　中共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3月20日　《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公报。2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指出，三月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

3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批准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决定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决定将建筑工程部分为建筑工程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谷牧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刘裕民为建筑工程部部长，赖际发为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

5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0周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0周年的文章。

5月12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12～14日，首都各界共有90万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12～19日，我国各地共有330万人举行反美大示威，声援多米尼加人民的抗美卫国斗争。

5月17日　中共中央批准湖北、湖南两省委关于今后农村四清运动部署问题的请示报告。两省的报告都决定在1967年底基本完成农村四清。中央的批语指出，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部署今后的农村四清运动。同时要求在符合6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

6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我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政府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

6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27～28日，全国27个城市27万民兵举行反美示威游行和集会，声讨美国侵占台湾。28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首都知识界人士为反对美国侵占台湾15周年举行集会。

6月30日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调整了组织机构，通过了领导成员。郭沫若、廖承志分别担任两机构的主席。

7月24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又红又专是时代对青年的要求》。

7月27、31日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由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随同回国的程思远先生。

8月25日　三届人大举行第15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

9月1～9日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致电祝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会上作了报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作了筹委会工作报告。

9月18日～10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

9月30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干部隆重集会，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央代表团团长贺龙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国务院和军委向自治区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10月12日　国务院根据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请示，批准将“僮族”改为“壮族”；“广西僮族自治区”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10月26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政府不参加导致分裂的亚非会议，抗议阿尔及利亚主席严重破坏亚非会议所一贯遵循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强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造成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分裂形势。

10月30日、11月10日　《解放军报》以《一心为革命》为题，先后发表解放军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模范共青团员、五好战士王杰的日记摘抄。从10月31日起，首都各报相继转载王杰日记，并分别发表社论或编者按。

11月10日　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3～19日　毛泽东先后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

12月8～15日　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

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 月 30 日～次年 1 月 18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经　济

1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当前市场物价的决定》。

1 月 25 日　新华社报道：1964 年度全国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计划已超额完成，到 1 月 15 日，入库的粮食、棉花、油料、烤烟、麻类和生猪等分别超过国家计划 2%到 30%以上。

2 月 23 日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闭幕。会议确定当年工交部门的基本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推进比学赶帮运动，组织生产建设高潮，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2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①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和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分别由冶金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②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③为了加强对西南建设的领导，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2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李先念在会上作了报告。

3 月 3 日　中共中央批转 1965 年 1 月财贸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①打击粮食投机，平抑集市粮价。②限制土纺土织，统一经营土纱土布。③限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经营活动。

4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经过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 1965 年工业交通工作要点和 1965 年工业交通政治工作要点。

4 月 30 日　我国自制的第一座维尼纶工厂建成投入生产。这项工程是由化工部第一设计院、纺织部设计院等部门采用国际先进工艺自行设计的。

5 月 6 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公室、第八机械工业部、农业部关于改进农业机械化工作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把由农业部门管理的农业机械业务，全部划归八机部负责统一管理。并成为全国统一的农机销售公司，统管全国农机产品的销售工作，以克服销售业务过于分散、中间环节过多的现象。

5 月 11 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天津召开全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经验交流会。

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工业生产建设高潮领导的通知。

5 月 27 日　新华社报道：鞍钢一座大型平炉连续使用 1 年 8 个月，共炼出 1210 炉钢，创造了炉体综合长寿新纪录。

5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批转 1965 年 5 月财贸工作会议纪要。

6 月 16 日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①5 年搞 1080 亿元的基建投资，规模过大，搞 800 亿、900 亿元。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粮食生产 4800 亿斤的指标过高。钢搞到 1600 万吨就行了。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②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搞农业要学大寨，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少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是靠养猪、养羊，搞绿肥。③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小一点、慢一点，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投资要压到 300 多亿元。④工业布局不能分散。⑤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根据这一精神，国家计委对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了修改。

6 月 17 日　粮食部、物价委员会《关于统购粮食实行加价奖励的通知》规定：①以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为单位，国营农场以场为单位，人均全年向国家提供的公粮和商品粮，超过 100 斤部分的商品粮按统购价给予 12%的奖励金；②计算奖励粮食数量的人口，按照当年生产队参加年终决算分配的实有人口计算；③生产队向国家提供的公粮和商品粮，都按原粮计算；④生产队全年向国家提供的公粮和商品粮，按粮食年度计算；⑤粮食加价资金，原则上应当如数分给得奖的生产队；⑥奖励金的发放，应在全年征购工作结束后进行。

6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全国夏熟粮油作物增产，是近几年来获得的最好的一次夏收，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超过 1964 年。

7 月 2 日　全国畜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工作。近 3 年来大牲畜总头数增加近 1000 万头，上年年底生猪存栏数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会议要求实行农牧并举，全面发展畜牧业生产。

7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已能制造上千种纺织机械；能成套生产供应棉、毛、麻、丝、针织、印染、粘胶纤维设备。

7 月 10 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召开的全国畜牧工作会议要求在全国掀起一个畜牧业生产新高潮。会议认为，必须贯彻执行农牧结合、以农养牧、以牧保农、农牧双丰收的方针。会议要求把发展大牲畜放在首要地方。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上半年，我国有28个制造化肥厂的新建和扩建工程投入生产；全国化肥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产化肥160万吨。

7月19日　《人民日报》就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发表《不仅是为了找"零花钱"》的社论。社论说：发展多种经营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要把"以粮为纲"4个字孤立起来，以为有了粮食就可以代替一切，必须相互促进。

8月21日　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要坚决地快搬、早搬。对搬迁项目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搬迁建设。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改造低产田的斗争向大面积扩展》，介绍浙江省衢县改造低产田的经验，指出大面积改造低产农田，是一项长期任务。

9月2日　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850亿元，财政收支各3050亿元。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农村副业。

9月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水利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

9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新兴的工程机械工业已在我国建立起来，目前已能生产100多种工程机械。

10月4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主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对组织农村副业生产、活跃农村市场等问题作了研究和布置。

10月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农田防护带——东北地区西部防护林带，经过当地农民15年的努力，已营造了300万亩的农田防护带，使近200万亩耕地和几十万亩草原受到保护。

10月13日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和安排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建设重点是：钢铁工业重点建设攀枝花、酒泉、武汉、包头、太原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工业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碳工业，建井总规模5658万吨，重点建设贵州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建设水电站和火电站99个，装机容量153万千瓦，重点建设四川的映秀湾、龚咀，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的夹江、湖北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天然气，继续进行华北和大庆油田的建设。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等。11月21日，中央正式批准和下达了这个计划。

10月中旬　农业部、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制度改革会议。会议认为，必须把繁琐、难学的会计制度改革成简明适用、易学易懂的会计制度。《人民日报》28日发表了《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生产队会计制度》的社论。

10月27日　全国物价会议确定从1966年起将6种主要粮食的全国平均收购价格提高13.6%，停止超额加价的办法；对农用生产资料、西药、卷烟实行降低价格；调整西南、西北地区和豫西、鄂西等地区的石油、食盐、百货和文化用品的地区差价。

10月30日　《人民日报》登载《下丁家大队是改造自然的好榜样》一文，介绍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10年来治山、治水、整地造林，发展副业生产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编者按语，称赞它为华东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1月30日　国务院将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物资部四个部门拟定的基建计划、物资使用、工交财务管理方面的三个规定（草案），发给各地方、各部门试行，以便进一步贯彻执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军事、外交

1月10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加诺总统宣布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决定。

1月23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巴西当局22日悍然以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处中国贸易、新闻9名工作人员10年徒刑的行径。经过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以及各国主持正义人士的支持，巴西当局被迫于3月5日下令"驱逐"我9名人员。4月21日，9名同志回到北京。

1月29日　布隆迪宣布暂时中断中布两国外交关系，并且要求中国大使馆和大使馆全体人员在两日内撤退回国。3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布隆迪王国政府无理中断中布两国外交关系。声明表示，任何时候，只要布隆迪王国政府愿意重新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都愿意予以考虑。

2月1日　公安部发表公报，宣布我东南沿海军民从1964年7月到1965年1月，又连续歼灭7股台湾当局派遣的武装特务196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来者不拒，全部歼灭！》。

2月5～6、10～11日　由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在访越、朝途中来到北京。5日，周恩来、陈毅宴请苏联代表团，宴会后双方进行了谈话。11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了苏联代表团。

2月9、13日　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重申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并号召全世界支援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正义斗争。8～10日，首都各界300万人举行示威，声讨美国武装侵略越南，支援越南反美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10日首都举行的群众集会。8～12日，全国有1100万人走上街头，声讨美国侵略越南的罪行。

2月13日　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直达无线电话线路。

同日　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互电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北京和莫斯科分别集会庆祝。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维护中苏团结而斗争》。

2月16～23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和夫人访问我国。20日，签订中国和坦桑尼亚友好条约。23日，两国签署联合公报。

2月16日　周恩来总理电贺冈比亚独立。陈毅外长致电贾瓦拉总理，通知他我国政府决定承认冈比亚。

3月2～9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访问我国。7日签署中巴联合公报，宣布根据1963年3月两国签订的边界协定所进行的标界工作已经完成，两国边界议定书不久将由两国外交部长在巴基斯坦签字。

3月5日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长抗议照会，就苏联军警4日镇压参加莫斯科反美示威的中国留学生一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16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拒绝苏联外交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照会。

3月22～25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应邀访问阿富汗。24日，两国签订中阿边界议定书、中阿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和中阿文化协定。

3月23～27日　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的葬礼。

3月25～30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应邀访问巴基斯坦。26日，两国签订中巴边界议定书和中巴文化协定。

3月27～30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阿尔巴尼亚。

3月30～31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应本·贝拉总统的邀请访问阿尔及利亚。

4月1～4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后到阿联、巴基斯坦和缅甸进行短期友好访问。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鉴于美国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为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16～26日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10周年的庆祝活动。4月17日，发表刘少奇为纪念万隆会议10周年的题词。18日，首都各界1万多人为此举行集会。同日，外交部举行招待会，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在会上说，亚非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进一步把帝国主义赶出亚非大陆，为实现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新亚洲和新非洲而斗争。

4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国防部最近颁发命令，授予海军航空兵某部副大队长舒积成以战斗英雄的称号，表彰他在华南地区上空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功绩。

5月14日　新华社公告：5月14日10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了又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中国政府重申：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衷心希望核战争永远不会发生。

5月22日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了这一决定。

5月24日　国务院公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6月2～3日　周恩来总理应阿尤布·汗总统的邀请访问巴基斯坦。

6月4～8日　周恩来总理应尼雷尔总统的邀请访问坦桑尼亚。

6月19～30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应阿联政府的邀请访问阿联。

6月28日　周恩来总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阿联总统纳赛尔在开罗举行会谈。30日发表新闻公报，重申决心在阿尔及尔举行亚非会议，加强反帝反殖民斗争，呼吁亚非各国为取得会议最大成功给予充分支持和合作。

7月11～16日　乌干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访问我国。

7月13日　中越签订《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7月14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7月19日　中国和毛里塔尼亚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26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致电毛里塔尼亚总统兼外长英克塔·乌尔德·达达赫，祝贺两国建交。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7～27日，由邓小平总书记率领的中

国共产党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致了贺词。

7月21～28日　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访问我国。

7月24日～8月1日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访问我国。

7月29日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印度军队在上半年内26次侵犯我国边境提出强烈抗议。

8月6日　我海军舰艇部队在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海面，击沉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台湾国民党军舰两艘。

9月3日　首都各界人民隆重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罗瑞卿在会上发表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9月8日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军连续侵犯我国领土和主权。9月20日盘踞在中国——锡金边境中国一侧的印度军队在我部队逼近后，全部逃走。《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逃走是可以的，赖掉是不行的——评中锡边界入侵印军狼狈逃窜》。

9月20日　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1架，并活捉美军上尉飞行员1名。

9月20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最近召开民兵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进一步实现民兵的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

9月29日　陈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我们欢迎蒋介石、蒋经国能像李宗仁这样参加国共合作，欢迎台湾省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怀抱，参加这个合作。

10月25日　新华社报道：10月4～22日，印度尼西亚陆军部队多次对我国纺织专家进行拦路检查和搜身，我大使馆就此事件照会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严重抗议印尼陆军威胁和侮辱我专家。在此之前，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还多次非法侵入我大使馆。9月30日起，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局势突变，陆军少将苏哈托控制了局势。

10月　应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要求，我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

11月4日　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照会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就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组织暴徒2日袭击我驻棉兰领事馆、侮辱我国旗、国徽和领导人的极端严重事件，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此后，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疯狂迫害华侨，反华事件继续升级。

11月14日　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美制台湾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潜艇“永泰号”。

1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林彪对解放军下年度的工作提出了五项原则。即：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②坚持四个第一，要抓活思想。③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抓四好连队。④提拔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⑤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11月28日　中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物资援助的协定。在这一年中，中国还同其他国家签订了援助协议。1965年中国对外签订了额度为33.7亿元（其中无偿援助20.2亿元）的援助协议，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最高的一年。

12月14日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5省司法机关，对1962年以来在5省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降的64名台湾蒋军武装特务，以及运送武装特务的12名船员，决定免予刑事处分，宽大释放。

教育科技文化体育

1月15～27日　全国青联四届二次会议、全国学生十八届代表会议同时在京举行。在青联会议上，修改了青联章程，选举和补选了青联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在全国学生代表会议上，修改了学联章程，决定恢复中等学校学生会参加学联组织，恢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学联组织；推选出新的全国学联委员会。

2月15日　新疆第一所农业科学院在乌鲁木齐成立。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次学术性的药剂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2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北京等七省市一些医疗单位、医学教学单位和医学研究单位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

2月27日　广东举重选手陈满林在北京以118公斤的成绩打破推举世界纪录。

3月4日　新华社报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书出版。

3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和安装的第一套尿素设备在上海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尿素。

3月18日　我全国生物化学委员会主席王应睐致电抗议国际生物化学协会少数领导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且正式宣布我国退出该组织。

3月26日～4月23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

3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号召农业科学工作者

上山下乡同群众一起大力发展样板田，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三结合的样板田，促进农业科学实验运动》。

4月7日　《人民日报》开始开辟专栏讨论“怎样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

4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学工作者把野生油瓜培育成家生油料作物，已在云南南部和中部地区栽培推广。

4月15～25日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中国运动员在7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5项冠军和4项亚军。20日、26日，贺龙先后电贺我乒乓球队取得的巨大胜利。

4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创制成功新型的超声波测厚仪，已在上海成批生产。

4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电机厂创制成功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

4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红灯记》，在广州、深圳、上海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5月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台50万伏标准电容器在西安试制成功。

5月5日　新华社报道：在短时间内我国试制成功大马力内燃机车，并已成批生产。内燃机车的成批生产，表明我国铁路运输牵引力革命的开始。

5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高精度变频电源在上海制成。

5月12日　国家体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共青团联合发出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的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尤其是青少年要学会游泳。

5月22、23日　中国举重运动员叶浩波在广东东莞县以109公斤的成绩，再创最轻量级抓举的世界纪录，刘殿武在布加勒斯特以149公斤的成绩打破中量级推举的世界纪录。

5月25日　新华社报道：被称为“塑料王”的聚四氟乙烯最近在上海试制成功。

5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影片《林家铺子》的署名文章：《〈林家铺子〉是一部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

5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以来，由于普遍试行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我国农村入学儿童大量增加，教学效果逐步提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办好半农半读学校》。

6月4日　新华社报道：一种新型塑料改性聚苯乙烯在兰州试制成功并已成批生产。

6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乌兰牧骑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前进》一文，介绍这个活跃在内蒙古草原上的文艺工作队。

6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高压阀门厂在河南开封建成并正式投入了生产。

6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压延玻璃车间最近在株州建成，并已正式投入了生产。

6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经过八年的反复实践和研究，探明华南地区的花岗岩是分属四个地质时期，打破了40多年来认为这个地区花岗岩都是同地质时期形成的传统看法。

6月23日　我国47位科学人员离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到北京。

6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医务人员，最近成功地为河南省商城县农民陈本年切除了一个重达107.5斤的脂肪瘤。

6月26日　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6月27日　新华社报道：一种高效能分离物质的新材料——各种类型的分子筛在我国试制成功并已成批生产。

7月7日　新华社报道：江苏盐城专区新洋农业试验站科技人员，以水利、绿肥、造林等综合措施，治理、改造大面积盐碱地获得成功。

7月7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运动员共创17项世界纪录，打破143项全国纪录。创世界纪录的包括跳伞6项、射箭4项、举重3项，射击和航空模型各2项。

7月31日　《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贺龙的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陶铸的文章：《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针——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8月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最近在上海试制成功。

8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判电影《不夜城》。

同日　《人民日报》开辟《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讨论专栏。

8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青年气象工作者提出“暖云降水起伏理论”，突破了国际气象学界沿用10多年的云是怎样变雨的旧论点。

8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卫生部、商业部、化工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切实把药品产销重点转向农村，开展中西成药下乡工作。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建的第一座维尼纶工厂最近已全面投入生产。

9月11～28日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贺龙致开幕词。

9月15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钢丝厂最近制成一种世界上极少数国家能制造的精密产品——铁路铝电阻元件。

9月17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密切合作，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蛋白质，也是迄今为止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有机化合物。这一科研成果，使人类在认识生命奥秘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

9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长海医院最近为1名病人安置1具我国自制的人造心脏瓣膜成功。

9月21日　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9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新建的现代化的保定电影胶片厂正式投入生产。

9月26日　李宗仁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有关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及其他问题。

同日　我外交部和红十字会分别发表声明，抗议国际红十字常委会邀台湾出席国际红十字大会，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宣布同国际红十字常委会断绝一切关系，并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大会。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究制造麻疹减毒活疫苗成功。

10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高精度半自动万能外圆磨床最近在上海试制成功。

10月19日　中国和尼泊尔正式直接通邮。

10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电弧等离子体射流喷枪在上海研究成功。

10月31日　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1966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性的纪念大会。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11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8820马力重型低速柴油机在上海制成。

11月24日　毛泽东接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向斯特朗女士80寿辰表示祝贺。

11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五位数数字电压表在上海制成。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6年

导　言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这场运动是一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为全国范围内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批判吴晗及其他学术界知名人士的文章。为了遏止这种学术批判中恶性膨胀起来的"左"倾偏向,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旨在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中央将《提纲》批发全党。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3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谈话使形势急转直下。4月9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文化大革命"规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重新确立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机构,它标志着"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在全党逐级传达贯彻,国内政治形势出现动乱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迅速席卷全国,成为风云一时的群众组织,后来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纲领。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为了扫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令。林彪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成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的动员令。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此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无政府主义泛滥,各项工作难以进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工农业生产面临严重的危机。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五·一六通知”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 ●“炮打司令部”
- ●《十六条》
-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 ●“破四旧”、“立四新”
- ●“大串连”
-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 ●“踢开党委闹革命”
- ●印尼排华浪潮
- ●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留学生

“五·一六通知”

背景介绍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逐条“批驳”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条罪状。通知还阐明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决定撤销四人的职务，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们的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会议还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展开。

材料：

- ·毛泽东致林彪的信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材料一　毛泽东致林彪的信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在5月6日你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将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节自《大动乱年代》）

材料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材料三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背景介绍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经康生授意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5月25日贴出的诬陷、攻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鼓动群众起来打倒“黑帮”、“黑组织”。同日，毛泽东批准派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材料：

- 从“六一八”事件和“黑帮大院”看聂元梓的反动面目（节录）

材料　从“六一八”事件和“黑帮大院”看聂元梓的反动面目（节录）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对革命干部乱打乱斗的严重政治事件。“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在全市、全国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对各级党委、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打砸抢的浪潮。这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及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而又颇有权势的那个人，公然干扰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乱党、乱军、乱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步骤。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聂元梓煽动起来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京大学迅速泛滥起来，干部和部分教师开始受到冲击，不时出现乱批乱斗干部等现象。到了六月十八日上午，情况有了急剧发展，出现了全校性的大规模乱打、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在校园里设了所谓“斗鬼台”、四处抓人，乱打乱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六十多个干部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身上贴大字报，被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拉着游街，而且还发现有多起污辱妇女的流氓行为。当时，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工作组长在两个围斗干部的地方训了话，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广播讲话，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揭露了当场被揪住的几个坏人。

陈伯达、江青及那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对北大的运动和“六一八”事件是一清二楚，但是，由于他们急于篡党夺权，搞乱全国，便施展卑鄙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抓住这一事件，大耍阴谋诡计。他们始而高喊要揪出“六一八”事件的后台，既而吹捧“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他们亲自到北大，以所谓“调查”文化革命为名，以座谈会的形式召见聂元梓等人，煽风点火，蓄意挑起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鼓动他们起来反对工作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更是得意忘形地欢呼“‘六一八’革命精神万岁！”他们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公然煽动无政府主义，要群众脱离党的领导，“依靠自己救自己”，江青还在大会上大耍无赖，又是哭，又是骂，气势汹汹地吼叫：“有胆的就站出来，我们不怕！”完全是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她欺骗蒙蔽和假手天真无知的青年，在台

上当众批斗工作组组长，并用皮带抽打他。江青对此感到非常得意，还肉麻地和那个打人的青年亲吻拥抱。

“六一八”事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政治恶果。首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北京大学，被陈伯达、江青及那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篡夺了领导权。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变成了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据点。乱批、乱斗，大搞打砸抢抄抓等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倒行逆施，规模更扩大，方式更多样，手段更狠毒，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加恶性发展。这时候，聂元梓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她秉承江青“十六、十七年官僚机构重重叠叠，学校也是这样，要搞掉”的旨意，学着陈伯达的腔调，鼓吹“上揪下扫”，对上把矛头指向上级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元梓是北京市高等学校中第一个揪斗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实行“大弯腰”、“坐飞机”等体罚的。她也是第一个写大字报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对下则把学校中层以上的干部打成“黑帮”，把学有专长的老教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基层干部和许多教师也都列为“黑帮”和“社会基础”，扣上“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等帽子，给他们剃阴阳头、挂牌子、罚跪、戴高帽、游街批斗。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抄家之风，甚嚣尘上。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几天之内，就有一百多人被抄家，有的教师书籍被抄一空，甚至有的人连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被抄走。在教职员中，被挂上黑牌子监改劳动的人数以百计。更有甚者，聂元梓之流为进一步迫害干部和群众，加紧对他们的镇压，由打砸抢抄步步升级，发展到私设公堂、监牢，四处抓人，任意刑讯逼供，以至挑动武斗，把人活活打死杀死，被打身残和留有后遗症的，为数更多。

聂元梓一伙在北大校内私设的刑讯点和牢房共有二十多处，其中“劳改大院”是最大的监狱。他们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许多干部和教师，统称为“黑帮”。因此“劳改大院”也叫做“黑帮大院”。他们对这些同志施行残酷的暴行，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他们制订了一套森严的戒律，不许随便交谈，不许大声说话，不许笑，走路不许抬头，打出血不许擦……。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当中，来北大串连的共二百一十二万四千多人次，其中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达十七万九千六百多人次。在全国，北京大学成了乱打乱抄、乱批乱斗的黑“样板”，是林彪、江青一伙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橱窗”……

（原载 1979 年 1 月 19 日《北京日报》）

“炮打司令部”

背景介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责自 6 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张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邓小平，并把分歧上升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分歧和斗争。

材料：

· 炮打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原载 1967 年 8 月 5 日《人民日报》）

《十六条》

背景介绍

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 8 月 1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刘少奇派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 月 8 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是

在“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下形成的，它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针、方法和组织机构，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纲领。《十六条》和此前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材料：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材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辩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误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玩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

努力避免片面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原载 1966 年 8 月 9 日《人民日报》）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背景介绍

“文革”发动之初，1966 年 5 月 29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1966 年 6、7 月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先后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张大字报，中心意思是“造反有理”。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消息传出后，北京市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统一名称为“红卫兵”，没有成立组织的学校也迅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

8 月 18 日，毛泽东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检阅首都“红卫兵”，并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此后，“红卫兵”组织由北京发展到全国，由中学发展到大学和部分机关、企业，成为“文革”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材料：

-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节录）

材料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节录）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就像昨天那样清晰。当年卷入那场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在他们已经进入成熟的中年时候，在中国已经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改革年代，仍然在默默地、不止一次地进行着严肃的反思。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衰落的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线路。

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都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但是作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较早觉醒因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那场运动对于我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

要寻找红卫兵的思想轨迹，就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64 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66 年 5 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 57 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 5 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偶然的，是个插曲。

…………

5 月 29 日，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形势和对策。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 月 2 日，各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慑。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尔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

然而，真正把红卫兵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

大字报仗打翻了天，工作组进驻学校，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我们大受鼓舞，把这看成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不错，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说它的名气大，那是因为后来毛主席支持了它。这篇东西写出来后，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就贴了出去。这下可热闹了，工作组非常紧张，向我们“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

呢？我一点也不慌，拿出了确凿的根据——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对证核实。我们想，也许我们阐述得不清楚，那就再来一篇，于是就有了"二论""三论"，无非是对第一篇的补充。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东西，不仅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只是些口号词藻的堆砌，什么"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有压力。但我们反复琢磨，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于是，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我们把前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上还有一处"热烈支持"，是对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讲的。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和"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

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但这仍然只能算是嘹亮的前奏，真正的高潮是1966年8月18日——

所有当年的红卫兵都知道这个日子。那天天安门前集会，各学校的学生潮水般地从东西长安街涌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和许多红卫兵一起登上了红色观礼台。我们高兴坏了，颇为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而自豪。一会儿得到通知说："今天要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很可能毛主席还要亲自出来接见。"我第一次登上这巨大的城楼，俯看广场热烈的场面，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毛主席那天穿军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很多老干部没有准备，一见到后也纷纷赶回去换装。毛主席显然是经过考虑才穿军装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是表示坚决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意味着毛主席向亿万群众明确了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我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新华社记者为我们拍下了照片，那时我刚满18岁。

8.18之后便是大串连。红卫兵杀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毛主席则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四个月的时间连续接见了八次，这种举动实在异乎寻常。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从65年下半年到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酝酿过程不可谓不长，但仍形不成全国的声势。65年秋，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顶着不发，只好到上海去出小册子，这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也很强。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是使局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9月之后，卜大华开始从"左派"的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他们原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而他们在京广线和沿海一带串连，看到的却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的组织、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轰"和"火烧"。到处是"打倒"，到处是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竟是这种结果吗？就是用这种疯狂的破坏方式去打倒一切、毁灭一切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各地的待遇有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上主席台就座。在认真了解了湖北的情况之后，卜大华他们支持了湖北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激动地挽着卜大华他们的手臂高呼口号。后来王任重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北京的形势也大变了，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他们信任的王任重同志也被炮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党呢？一个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党难道只是由少数几个好人组成的吗？

大串联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对不论什么人都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级组织的领导人到什么程度才该打倒？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讨论到深夜。毛主席给我们的那封信尽管说了三个"热烈支持"，但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然而冷酷的事实常常否定了我们讨论的结论，面对这一场我们曾经那样热烈响应的革命，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们的特殊地位也使我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党内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桥剧场，江青把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像哄小孩似地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有人背后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我心里很别扭，觉得有一种阴暗的东西让人不愉快，同年10月份，社会上出现了炮轰陶铸、王任重同志的高潮，陈伯达、王力找我们了解王任重同志和我们接触的情况，我们如实讲了，认为这种接触是光明正大的。没想到陈伯达不阴不阳地摇摇头，王力弦

外有音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党。

66年12月，在经过了迷惘、徘徊和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忍不住了，公开贴出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东西都还是很肤浅的，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革命，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现象提出了疑问，尤其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不得一点意见的做法表示不满。比如"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我们还再要加上一句：心胸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们的做法大大激怒了他们。67年1月25日，我被扭送入狱。对此我最大的感觉是气愤而不是害怕，难道仅仅因为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可以抓人吗？在监狱待了88天，没有人理我。我愤怒地要求将我释放，我渴望辩论，渴望见到最高领导人。我巴不得他们提审、批斗，我会拿出自己的全部辩论才能和他们干一场。可就是没有人理我。后来监狱的管理员透露说："你们都是中央文革让抓的，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干等了快三个月。4月22日，监狱突然一个一个牢房提人，一下子点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红卫兵。我们说这回有戏看了，要是去批斗才有意思，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没想到不是去批斗，而是坐着大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说了一句"委屈你们大家了。"当时我们都哭了起来，觉得委屈，委屈极了。还有一个原因，好久没见到周总理，这回又见到了。周总理问："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我站了起来，但哭得说不成话。总理那天很严肃，开始是一声不响，后来也流泪了。总理说："在这里见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后来我们还得知，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帅和副总理向中央文革发难，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教而诛！十七八岁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们。

——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由此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红卫兵迅速分化了，一部分人由于沦为"革命对象"的子女和自身的思考而变成文化革命的对抗力量，另一部分人则或向造反派靠拢，或被潮流裹挟着前行。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中国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绵绵十载。卜大华也像千百万人一样，因卷入了这场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而在心灵上备受创伤。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他由悲痛转而愤怒，他坚决拒绝参加所在席位的"运动办公室"，拒绝揭发所谓"政治谣言"。那时的中央对"四·五事件"的态度使他震惊和极为失望，他觉得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否定的眼光来看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他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极度的痛苦，远胜过67年的锒铛入狱。他甚至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所幸的是这种念头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四人帮"的倒台使他迅速振作起来。

我当然没有消沉，消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伟大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仅因为它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还因为它是从根本上避免文化革命悲剧重演的唯一途径。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代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要做的事情很多，真正有志气的青年人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年来我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责任感和热情却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原载《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

"破四旧"、"立四新"

背景介绍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说"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从8月20日起，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行动迅速蔓延到全国。"破四旧"行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但却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赞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受到鼓励后，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把"破四旧"运动推向狂热的程度。他们毁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行。"破四旧"、"立四新"，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材料：

-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节录）
- 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

材料一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节录）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

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命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头上，贴出充满革命豪情的向旧世界的宣战书。宣战书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过去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基本禁止改革。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红卫兵”们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职工，搬掉了门上“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命名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激动地说，“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我们砸毁它，是决心彻底捣烂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是彻底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陋规习俗。

“亨得利钟表店”的革命职工们，在一九六四年以来曾经两次提出改掉老字号的要求，但由于前北京市委阻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职工们在“红卫兵”的鼓舞下，经过集体讨论，已改名为“首都钟表店”。

二十日晚上，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命名的“徐顺昌服装店”改名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人们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东风压倒西风！”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送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就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也是你们的后台，你们这里已经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来得到了理发馆、成衣店、浴室等服务行业革命职工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开座谈会，写决心书，发表声明。东城区百货管理处的一位干部说：早在一年半前，我们许多商店的革命职工就提出要铲除掉过去遗留下来的资本家的旧字号，但是前北京市委不让我们改换。这次首都的“红卫兵”们干得好，我们表示热烈支持。

“卫东服装店”（原“蓝天服装店”）全体革命职工在给“红卫兵”关于反对做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的革命行动，保证以后不加工不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阶段。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灭资”。

…………

（原载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首都和各地红卫兵们带头掀起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创举，更广泛地得到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各地工农群众和红卫兵们并肩战斗，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攻击，形成了一股不可抵御的巨大洪流，任何顽固的旧势力都将被这股洪流彻底冲毁，妄图阻挠这股洪流的一切牛鬼蛇神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气势磅礴的横扫“四旧”革命风暴，连日来席卷了全国各城市。广大红卫兵和工农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乘胜前进，扩大战果，铲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臭根子和任何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江苏无锡、徐州、苏州、常州、南通、镇江、扬州等市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们，最近几天在广大工农群众的

热情支持和配合下，向“四旧”展开了猛烈进攻。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职工砸掉了挂了九十多年的老招牌，换上了“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街道上群众纷纷鼓掌欢迎。这个店的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校名改为红卫兵小学。南通唐闸大生一厂职工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攀上厂门口的钟楼，把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张謇题的“大生一厂”四个字全部凿掉，改名为南通市第一棉纺织厂。镇江脱粒机厂职工开着宣传车上街，配合红卫兵们进行破“四旧”、立“四新”的宣传。

在英雄城市南昌，“黄庆仁药栈”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拿起铁锤砸掉了挂了一百四十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和对面“兴无”商店相呼应的“灭资药店”新招牌。“阳明路商店”的革命职工，砸碎了为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王阳明招魂立碑的店名，换上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商场”的新招牌。当场红卫兵们把沿用资本家招牌的“东南商店”改名为“东风商店”时，商店里、街道上顿时鞭炮齐鸣，掌声雷动，人民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东风压倒西风！”

在南昌市郊的原“湖坊”公社，二十四日有三千多名贫农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顶着烈日，高举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捧着决心书，举行了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的大会。大会决心废除“湖坊”旧名，改为“东方红”人民公社，以实际行动响应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创举。

横扫“四旧”的革命浪潮，近日来席卷了东北边疆吉林省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地处长白山区的通化市各中等学校，出动了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旧招牌，改换了一些街道的名称，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白城市国药二店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帮助下，砸碎了广生堂门前挂了三十二年的两个葫芦招牌，这两个招牌原来是大资本家挂起来的。吉林市革命小将们发出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这个市的“福源路”食品店在一些革命小将们的帮助下，砸碎了一百多年的旧牌匾。在长春市，革命职工还专门为红卫兵们设立广播站，让他们发表演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河南、洛阳、开封、新乡、安阳、焦作、鹤壁、许昌等市的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向“四旧”发动了猛烈攻击。洛阳市的解放后新建的影院、剧院、公园和新修的道路都以封建时代的遗址命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广大工农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对这种状态再也不能忍耐，他们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老爷们拿劳动人民的革命成果，去为帝王将相竖碑立传。王城公园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们的鼓舞下，敲锣打鼓地把公园的名称换成“劳动人民公园”。在开封市，许多商店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并肩战斗，砸烂了一些商店的旧招牌、旧装饰。元隆、义丰厚商店和王大昌茶店等革命职工，和红卫兵一起动手砸掉旧招牌，换上红光闪闪的新招牌的时候，职工们激动万分，齐声高唱《东方红》歌曲。在焦作市，革命小将们和革命职工一起为一些理发店改名的时候，店门前掌声、欢呼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昌市的革命群众把一户门上卖国贼袁世凯题的“清正廉明”匾打翻在地，人们都说反得好，砸得好，人们热烈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在青海省西宁市，革命小将们天不怕地不怕地革命造反精神受到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的坚决支持。原大十字百货商店和饮马街影剧院的职工，在革命小将们的倡议和鼓舞下，分别把他们所在的商店和影院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字。全国大庆式企业、西宁运输车辆厂的工人，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誓作革命小将们的后盾。马坊公社的贫农下中农为了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他们和革命学生一起，把原来的马坊公社改为工农兵公社。

乌鲁木齐街头这几天到处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许多商店里都在非常醒目的地方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挂起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红色布标，柜台内外张贴了无数破旧立新的大字报、决心书、倡议书。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招牌，换上了“工农兵”、“革命”、“文革”、“抗美”等富有革命意义的新牌号。一些饭店、旅社的各族革命职工，大破陈规陋俗，大立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经营思想。工农兵餐部（原“鸿春园饭店”）等饭店的广大革命职工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从工农兵的需要出发，开始向顾客大量供应价廉味美饭菜，受到群众欢迎。

拉萨市街头这几天也沸腾起来。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数百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扛着向旧世界宣战的宣言书，敲锣打鼓走向街头，大破“四旧”。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在宣战书中说，拉萨市解放十几年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三大领主上的精神枷锁还牢牢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实在容忍不下去了！现在应是清算他们的时候了！拉萨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倡议给带有封建农奴制和迷信色彩的地名、街名、房名改换名称，倡议文艺单位禁演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戏剧等等。拉萨市广大工农群

众纷纷表示誓做红卫兵小将们的坚强后盾，为把拉萨市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城而并肩战斗。拉萨城关区三百四十多名共青团员和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听到红卫兵小将们上街大闹革命的消息后，激动得跳起来，第二天，他们就走上街头，和红卫兵们一起闹革命。今天，拉萨市郊区堆龙德庆县六个乡的翻身农民，派出二百八十人的一支队伍，高举着毛主席像，手捧毛主席著作和刚收获的青稞穗，来到拉萨中学声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表示，翻身农民们坚决和革命学生站在一起，彻底挖掉一切封建根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 1966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大串连”

背景介绍

1966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在 6、7 月份，便有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连。通知发出后，大串连在全国出现了高潮。大批北京学生也到全国各地串连、“点火”，建立“联络站”，冲击机关，揪斗干部。各地工人也参加了串连。全国停学、停产串连的人数以千万计，给交通运输造成沉重负担。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 月 16 日、12 月 1 日又连续发出通知：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但大串连风直到 1967 年 8 月以后才基本结束。

材料：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材料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目前，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将来京参观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1)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3)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1)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2)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3)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4)为了保证来京参观的学生和教职工旅途健康，可根据旅途长短，由各地自行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

活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推选负责人带队,负责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和教职工来京时间的先后,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接待部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实组织安排,使来京的革命师生参观好,学习好,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材料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自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门上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全国掀起了革命师生大串连的高潮。预计到十一月二十日止,来过首都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九百万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举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见大会。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同时,为了准备明年春暖季节更好地、更有计划地免费输送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也需要对前一阶段的运输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前一阶段使用过度的客车、客轮进行必要的检修。因此,决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他们要凭免费票上车、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为了实现林彪同志的这一号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围内、专区范围内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沿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背景介绍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从8月31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又先后七次检阅红卫兵,共1100多万人。

材料:

-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材料一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十八日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

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今天上午整整六个多小时中，一直和百万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检阅百万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庆祝游行时，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流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像。在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学生们兴奋地围在敬爱的毛主席身边，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上午七时半，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时，全场万众欢呼，无数只举着红色《毛主席语录》的手伸向天安门，百万颗火热的心飞向毛主席，百万双闪耀着革命豪情的眼睛仰望着毛主席。

(1989.8.19《人民日报》)

材料二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在震撼全国和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在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首都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革命小将的第八次接见，也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这次接见，显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串连和学习的一次胜利的总结，它将促进全国革命师生实行全程步行革命大串连。

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连同国庆节在内，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这样众多的革命群众见面，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

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举行的第八次接见大会上，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怀着无比幸福、无比激动的心情说，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您这样伟大的天才，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您最最热爱群众，最最相信群众，最最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您的心和革命群众的心紧紧相连，您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我们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革命小将们说，毛主席连续八次接见我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是对全国革命青少年和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接见，推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他们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迅速带回去，很好地总结革命串连和学习的经验，更好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更加深入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改造世界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得更好。……
……

1966.11.27《人民日报》

"踢开党委闹革命"

背景介绍

"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在毛泽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令下进行的。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最初是由全军文革小组起草的，其基本点是要坚持党委领导。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修改了文件，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泛滥全国，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

止活动，各项工作难以进行。

材料：

· 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材料　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　委　总　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印尼排华浪潮

背景介绍

1966年3月，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苏哈托上台，中国同印尼的关系趋于恶化。自2月以来，印尼右派势力唆使人迫害当地华侨，袭击中国外交使团驻地，打伤、枪杀我外交人员和使馆工作人员，我向印尼提出最强烈抗议，并决定接回愿意归国的华侨。11月，印尼陆军当局一手策划和导演了袭击在棉兰等候船只回国华侨的血腥事件。

材料：

· 一千多名受害华侨从印尼回到祖国怀抱

材料　一千多名受害华侨从印尼回到祖国怀抱

新华社湛江十日电　一千零六名在印度尼西亚遭受残酷迫害的爱国侨胞，乘光华轮于今天上午回到湛江港。湛江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青少年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港口码头上热烈欢迎这些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面前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回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阳光普照的湛江港，今天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和毛主席语录的海洋。到处响彻《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声。在港口停泊的轮船，升起了五光十色的信号旗。码头附近的建筑物和高大的龙门式起重机上，挂着鲜红夺目的巨幅标语，上面写着："向在印度尼西亚受迫害的侨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迫害华侨"。从码头到出口的大道上，四千多名工农兵群众、革命青少年和红卫兵，高举毛主席像、毛主

席语录牌和大红的欢迎标语牌，迎着朝阳，载歌载舞地热烈欢迎受害侨胞胜利归来。

八时二十分，停泊在港口的轮船汽笛长鸣，飘扬着五星红旗、高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光华轮徐徐靠近码头。爱国侨胞和英雄海员们一排排地站立在甲板上。码头上顿时鼓乐齐鸣，欢声雷动。广播器里不断播送着欢迎词，向爱国侨胞和光华轮的英雄海员们表示敬意和慰问。人们举着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挥舞着花束 和红旗，欢呼着、跳跃着，高呼："欢迎！欢迎！""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船上的侨胞和海员们一个个高举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激动地向祖国亲人招手。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轮船上、码头上，歌声、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发扬了光荣的爱国传统，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面前坚持了民族气节的侨胞们，陆续走上码头。这次回国的侨胞，有许多原来侨居在印度尼西亚亚齐地区的司马委、鹿树昆、美伦、瓜拉新邦、西吉利、打京岸等地。他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在祖国七亿人民的坚决支援下，不畏强暴，团结一致，曾同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迫害行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司马委的许多华侨在被迫离开住地的前几天，还在自己的房门口贴上了五星红旗。右派暴徒们对他们采取了恐吓、毒打等野蛮手段，企图撕下五星红旗。爱国侨胞为维护祖国尊严，同在印度尼西亚武装军警掩护下的右派暴徒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直到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地，庄严的五星红旗依然贴在家门口。他们被赶到集中营式的棉兰"临时收容所"以后，同其他地方的受害侨胞一起，又向印度尼西亚军警和美国特务的挑衅活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专程前来迎接受害侨胞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一心，同曾积极组织司马委爱国华侨进行英勇斗争的章贵昌紧紧握手，赞扬他们斗得好，不愧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华侨罗鹿珍曾在棉兰浮罗吧烟的难侨"收容所"里，组织侨胞同印度尼西亚官员的勒索、刁难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他带着胜利的激情，领着一家大小走上岸来，他对欢迎群众说："中国人民不可侮。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可以战胜一切敌人！"

1966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留学生

背景介绍

1966年7月2日，我高等教育部向我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目前全国各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中央批准，将接受来华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或一年。9月19日，高教部给各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苏联政府决定中国在苏留学生休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材料：

· 最强列抗议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全部留学生

材料　最强烈抗议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全部留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十月二十二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兹杜霍夫，交给他一份照会，就苏联当局加紧反华和恶化中苏关系，无理决定我国全部留苏学生休学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苏联临时代办理屈词穷，竟拒绝接受我外交部的照会。余湛同志对这种无理态度，表示极大的遗憾。

我外交部的照会说，据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通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苏学生休学，并限令他们于今年十月份离开苏联。这是苏联政府悍然破坏中苏文化合作协定，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国关系的严重事件。

这个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制造出来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所有外国在华留学生休学一年，明年暑期和今年年底毕业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苏联在华留学生原计划今年年底毕业，基本课程已经学完，可以提前毕业。毕业时间在与苏联方面原则商定后，再由学校根据各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与苏联学生具体商定。对此，尽管中国方面多次催询，苏联方面一直不予答复，却自行将苏联留华学生召回。就在苏联学生回国的第二天，苏联政府竟诬赖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苏联留学生休学，并借口所谓对等原则，突然宣布勒令全体中国留学生限期离开苏联的决定。

照会说，苏联当局的借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休学一年并不单对苏联在华留学生，而是对所有外国在华留学生。在苏联并不存在所有在苏外国留学生休学一年的情况，片面决定中国在苏留学生休学，分明是一种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行为。

苏联领导破坏中苏两国交换留学生的关系，蓄谋已久。长期以来，苏联方面就对我国派遣留学生百般刁难，极力减少我国留苏学生的人数；对我国在苏留学生的学

习制造种种困难，片面改变他们的学习专业，限制他们阅读资料和进行实习，制造借口把他们赶回中国，甚至对他们进行策反活动，现在终于把我国留学生全部赶回。你们颠倒是非，企图将破坏交换留学生关系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这是枉费心机的。

照会说，应该指出，苏联政府这次赶走中国留学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最近以来，苏联领导精心策划了一个新的世界规模的反华运动。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华材料，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恶化中苏两国关系。所有这些，再次暴露你们高唱什么反帝"联合行动"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同美帝"联合行动"反华倒是货真价实的。

照会最后说，对于苏联方面卑劣的反华行径和恶化两国关系的行为，我们提出最强烈抗议，并决定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于十月二十七日离莫斯科回国。

风云人物

李　达

李达(1890— —1966)　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后曾两次到日本留学。1918年5月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掀起一次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同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辞去宣传主任职务。会后到长沙，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4月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同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党组织。在这以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6年发表《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3月回长沙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9月又回到武汉，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1930年至1931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至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并多次受党组织委托到冯玉祥将军处私人讲学，说服冯联共抗日，同时还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1935年发表的专著《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国内有广泛影响。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初再度到重庆冯玉祥处，促进冯同共产党的合作。1941年9月后，长期困居家乡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5月到北京，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1949年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1950年至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至1966年任武汉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会长等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含冤去世。1980年被彻底平反昭雪。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周　扬

周扬　原名周起应，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头目。湖南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大夏大学毕业后，曾留学日本。

周扬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惯使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曾窃踞"左联"书记要职，主编《文学月报》、《文艺战线》。1935年，带头围攻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

迅。他根据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资产阶级口号，疯狂反对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他在1936年抛出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就是鼓吹"国防文学"的大毒草。

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天才巨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表面假装拥护，实际却拼命诋毁。在《讲话》发表的同年，周扬译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并写了大毒草《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公开宣扬修正主义理论，反对《讲话》，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

解放后，周扬是刘邓司令部的得力干将，先后窃踞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要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推行刘邓路线，制定和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周扬大肆鼓吹"全民文艺"，极力提倡"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有鬼无害"论、反"题材决定"论、"间接服务"论等，以此来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周扬是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早在1935年，胡风在"典型"问题上贩卖修正主义私货时，周扬和他唱的本是一个调子；但当大家批判胡风时，周扬见势不妙，也假惺惺地打起"批判"旗帜，伪装正确，耍两面派。以后，在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中，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和反右斗争中，周扬都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搞假检讨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继而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

周扬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意旨，利用文艺为刘邓黑司令部篡党篡军篡政制造舆论。1961年炮制的《文艺十条》(后修改为《文艺八条》)，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纲领。周扬招降纳叛，把文艺界沦为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周扬肆意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攻击鲁迅，为"三十年代文艺"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多年来，周扬之流在文艺界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周扬的黑手还伸到了高校文科阵地。从1960年到1965年，大开文科教材黑会，集中全国高校文科的反动学术"权威"，编写封、资、修教材，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总之，在三十年代，周扬是一个蒋介石牌的"国防文学"的发明者；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是一个假"左派"、真右派；在六十年代，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这就是周扬三十多年来一脉相承的反革命生涯。

(这是"文革"中对周扬的"盖棺定论"——编者)

张春玉

张春玉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十六连副班长，共产党员。1941年生在石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自1963年入伍以来，一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处处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一心为公，一心想着革命，关心战友胜于关心自己。1965年6月30日凌晨，在隧道施工遇到意外塌方的危急时刻，他舍生忘死，奋勇抢救负伤战友，不幸被塌下的万斤巨石卡住达两个多小时，造成严重伤残。在生命垂危关头，他念念不忘毛主席、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充分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硬骨头战士的高贵品质。在养病期间，他高度自觉地读毛主席的书，无论伤痛多么严重，从未放松或间断过。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学习心得和日记。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毛主席，我浑身是力量"，这是张春玉的钢铁誓言。

1966年5月，国防部授予张春玉同志以"铁道兵硬骨头战士"的光荣称号。

麦贤得

麦贤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某部轮机兵。共产党员，贫农出身。自1963年入伍以来，一贯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说："要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只有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针，才不会走错路。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把革命工作干好，才会少犯错误，战胜一切困难。"他牢记阶级仇恨，苦练过硬本领，处处以英雄人物为榜样，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1965年8月6日，在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的战斗中，麦贤得同志头负重伤，在脑浆外流的情况下，仍英勇顽强，坚守岗位，确保机器正常运转，顽强地坚持战斗达三小时之久。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度觉悟和压倒一切敌人的硬骨头精神。敌人的炮弹片严重地伤害了麦贤得的脑神经，一度神志昏迷，但他仍然处处表现了一心为革命，一心向着毛主席的崇高感情。他刚能发言吐字，就唱《东方红》；神志稍一清醒，就要护士拿《毛主席语录》给他看。他右手不能动，就用左手艰难地学习握笔写字。最先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麦贤得同志，拿起笔，作刀枪，狠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他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坚定地支持红卫兵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光荣地出席了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

会，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国防部授予麦贤得同志以“钢铁战士”的光荣称号。

刘英俊

刘英俊(1946——1966) 沈阳部队某部炮连战士。吉林省长春市郊人，贫农出身。1962年夏天入伍。他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真正做到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他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1966年3月15日他与同班战友去黑龙江佳木斯市郊进行训练时，刘英俊同志驾驭的那辆炮车的辕马受惊狂奔，他为了救护六个被吓呆了的小孩，不幸自己被车马压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死时二十一岁。

蔡永祥

蔡永祥(1948——1966) 浙江省军区某部三连战士。安徽省肥东县人，贫农出身。1966年2月入伍。平时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处处以白求恩、张思德、雷锋为榜样，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迅速地成为一个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1966年10月10日在守卫钱塘江大桥时，发现有一根大木头横压在轨道上，这时刚好有一列车红卫兵专车飞驰而来，蔡永祥同志为了保卫一列红卫兵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奋不顾身，冲上轨道，排除了障碍，使红卫兵和大桥安全脱险。而他自己却不幸壮烈牺牲，死时十八岁。

珍闻轶事

姚文元一笔杀五人

姚文元秃笔一挥，写就《评“三家村”》。打响了“十年内乱”的第一枪，姚文一出，忠良纷纷受整，仅直接因这篇妖文而惨死的就有5人，间接的不知有多少。

第一个死于姚笔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姚文见诸报端后的第七天，即1966年5月17日，54岁的邓拓写好遗书，便愤然辞世。

第二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因为凭着正义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不适当的评语，而被陈伯达、江青以“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勒令停职检查。5月23日，年仅44岁、才华横溢的田家英弃世于中南海。

吴晗一家4口，有3口死于姚笔。1969年3月18日，吴晗的发妻、历史学家袁震愤然离世；10月11日，吴晗被打得胸积淤血惨死狱中，终年60岁；吴的女儿因吴受牵连患了精神分裂症，于1976年9月饮恨自尽。

(摘自《历史内幕纪实》)

“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元旦前夜，《解放军报》值班副总编冯征正在等待着1966年《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稿大样。当时林彪正在苏州，社论稿是一位副总编带到苏州送审后再传回的。

冯征摊开社论大样，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32个标题大字赫然在目。他仔细审阅，发现与原稿有很大不同。当他读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时，禁不住紧锁双眉，喃喃地说：“这是一种新提法”。对此，他十分困惑。不久前，毛泽东不是批了“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吗？于是他在大样上写道：“这样的评价，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一句顶一句就很好了，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这是形而上学！这样形容毛主席的话值得考虑。”冯征原以为这些话是出自社论稿起草者之手，责任使他感到不安：如果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传出去，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冯征拿起电话要通了苏州，连夜和在苏州的那位副总编通了话。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问“新的提法”的出处。苏州的回答是：“句句是真理”是一位领导人讲的，“林总”同意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林总”亲自加的。“新的提法”出自“林总”。这并未解决冯征的疑虑。他立即向总政治部某负责人请示：“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回答是“不经过‘林总’不能改”。作为报纸大样的签发人，冯征深感具有权威性的军报社论，怎能宣扬形而上学呢！他再次拨通了苏州的电话，说：“‘林总’有时为了强调一个问题，爱说过头话，是不是建议把这句话改一改？”回答是“不行”。这样，1966年开始的那场“十年浩劫”的一个灾难信号——《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就以林彪在苏州审阅过传回北京

的原文付印了。

（摘自《党史信息报》）

毛泽东不要“四个伟大”

“文革”初期，林彪为清华大学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四个伟大”风行全国。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他气愤地对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说着，他发火了，又冒出一句：“永远健康？还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要宣传个人。

杨成武按照毛泽东的话做了。在总参的一次大会上，他没有喊“永远健康”的口号。这下激怒了在场的叶群。回到休息室，她气急败坏地冲着杨成武喊道：“杨代总长，不喊林彪永远健康没有关系，林彪的内脏都是好的！”说罢扬长而去。

不久之后，林彪在人民大会堂驻京部队万人大会上宣布：“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就是杨成武的问题……”杨成武被以“为二月逆流翻案”、“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罪名撤职关押，直到林彪集团垮台才得以平反。

（史理）

邓小平“猫论”的出处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使用的这个比喻蜚声中外。现在国内国外出版的研究邓小平思想的书籍，往往用他的“黄猫黑猫”一语，有的也将此概括为“猫论”，并加以发挥。然而，许多人虽然很熟悉这个比喻，但并不十分清楚其同处与本来含意，甚至不少人还把比喻中的“黄猫”误为“白猫”。

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是他在1962年7月的两次讲话中提出的。一次是7月7日，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的，这次讲话经整理收入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另一次是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问题时讲的。在后一次讲话里，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邓小平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渡过，用什么办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恢复起来，是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这些形式尽管受到农民欢迎，生产也有恢复，但在当时却是不合法的。邓小平用“黄猫黑猫”这个比喻，主要是为了形象直观地阐明“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而应当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在邓小平两次讲话后一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了所谓“刮单干风”，而且强调这股风越上层就越在，最根本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把问题提得很高。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把“黄猫黑猫”这个比喻指责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

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变，早已判明了这段公案的孰是孰非。薄一波一次曾问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他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邓小平的这两句话，对我们理解这个比喻有很大的启示。

邓小平1962年的这两次讲话，不久即因毛泽东的批评而收回，但讲话中引用的这个比喻为什么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呢？除了“文革”中这句话曾被歪曲和攻击的反效应外，主要的是因为比喻本身形象生动，邓小平运用得极为贴切，表现了他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态度和求实务实的思想方法。

当然，任何比喻都有它的局限性。“黄猫黑猫”的比喻既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就不宜任意地到处套用。如果把这个比喻表现的求实精神解释为：不管姓资姓社，只要能发展生产就行”，那就更与作者原意大相径庭了。

（南达）

“五大学生领袖”

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五所大学造反组织的头头。他们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他们五个人都是在本校带头造反而被推举为头儿的，曾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赞赏、支持，被封为“左派”，“学生领袖”，横行无忌，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如今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聂元梓　“文化大革命”前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带头抛出了大字报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她是造反组织“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并爬上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九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宝座。她曾接受江青的指示，带人去上海造反，煽动并参与了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

的一系列活动；在康生、谢富治的指使下，组织"新北大公社揪叛徒兵团"，陷害朱德、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校内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政治和人身迫害。依照刑法，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蒯大富 原清华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率先造工作组的反，成为清华"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后来又担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负责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等职。1968年分配在宁夏三0四厂工作。他曾当面接受张春桥指使，带领人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积极组织策划打倒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活动，派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及办公室，抄走大量绝密、机密文件；制造了"清华百日大武斗"，以武力对抗"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造成多人伤亡；在校内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提前释放，仍回原单位，现在宁夏青铀峡铝厂工作。

韩爱晶 原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曾为北航"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11月分配在湖南省株洲三三一厂工作。他受戚本禹指使组织实施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彭德怀的活动，煽动打倒徐向前、叶剑英，诬告陷害北航学院领导。已构成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谭厚兰 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中为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全主任。1968年10月到北京军区四六二七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调回师范大学隔离审查。1975年8月结束审查，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谭厚兰在戚本禹的授意和指使下，带人到曲阜"讨孔"，破坏了孔府、孔庙、孔林及鲁国故址中的名胜古迹和部分珍贵文物，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戚本禹的授意指使下，诬陷诽谤谭震林和余秋里，进行搞乱国务院农林口、工交口的活动。依照刑法，谭厚兰构成诬陷罪和破坏文物罪，1978年4月19日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鉴于谭厚兰的犯罪发生在特定的条件下，且认罪态度较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谭厚兰于1982年病逝。

王大宾 原是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采矿工程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王大宾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8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他在戚本禹指使下，组织人挟持、批斗彭德怀，诬陷彭德怀"阴谋政变"，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使彭德怀人身遭到迫害。他组织人非法查抄了彭德怀的住处，将彭德怀多年保存的珍贵资料和文件212份擅自扣留。王大宾还先后主持策划诬陷余秋里、谭震林、何长工等领导人的活动。对原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聂克、教授冯景兰、杨遵仪等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王大宾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1983年10月26日，王大宾刑满释放后，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

举手怪癖

甲问："你为什么老是捏紧拳头频频举手呢?

乙说："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造反派里是专门领头呼口号的。"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学校里谁怕谁

"文革"中教师成了"臭老九"，学生动辄造反，谁也不敢惹。有人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重新填词唱之——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不是学生怕老师，
而是老师怕学生!
学道多助，
师道寡助，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师道的尊严一定灭亡，
革命的学生一定胜利!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有"二庆"没有

某校有位老师教小学生"工业学大庆"。

学生问："大庆是谁?"

老师答道："东北有个老贫农，名叫大庆……"

学生又问："有二庆没有？"

老师认真回答："这个我不知道，不敢乱说！"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红小兵的关卡

在中学、大学的红卫兵热衷于"革命大串连"的时候，小学生组成的"红小兵"也在"革命"——在公路上到处设关卡，挡住行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某日，一农民被手持红樱枪的红小兵挡住。农民想了好一阵才背出一条"粮食紧张，人要活泼"。估计是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记错了。红小兵们面面相觑，不知领袖是否有这条语录，也只好放行了。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外语口试

"十年动乱"中，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开始了。在外语学院的日语面试室里，主考教师在考一位考生。

教师说："请你先写两个简单的日语句子吧！"

考生摇了摇头说："我只会说，不会写。"

教师想了想，就说："好吧，你就说几句吧！"

那位考生想起了几部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一振精神，拉起粗嗓门喊："你的，太巴壳 太巴壳——日语意为"香烟"的拿来，我的米西米西的有。"他见教师猛地瞪大了眼睛，心中更得意，将手往空中一挥，做了个劈刀的手势，大喊："八格牙鲁！你的瞪眼睛的不要——！"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红色的八月（节录）

整个8月是红卫兵的天下。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

在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战绩"有：

枪支268支，子弹11056发，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此外更改了数不清的旧街名、旧牌号……

枪支弹药也许可以算是某种战绩，但抄家来的黄金、现钞等物，无疑是借"革命"的名义对人民财产的非法掠夺。

使红卫兵的形象在世界的眼里变得狰狞起来的，还有对人权、人格的粗暴蹂躏——

8月23日下午，三点半，燥热，憋闷。一队腰扎皮带的女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歌，冲进了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闯入编辑部，把稿子、刊物撕碎；又冲进文联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养尊处优"、"精神贵族"、"裴多菲俱乐部"，一边手里的剪刀挨个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些窟窿……紧接着，她们从文联、文化局两个门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大院里，四十几个人站成一圈，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老"牛"们一个个劲吊黑牌，弯腰九十度。二十几个女红卫兵则站在圈外，手挥皮带往老"牛"们的脊背上骤雨般地抽打，一下，五下，十下……身上随皮带光动，遮去了一切曲线的旧军装，灼热似两颗烧红了的煤核的眼睛，被仇恨扭曲的脸部，阴沉、麻木，像被雷电击中的枯木，因为竭尽全力而又力不可支，引起的咻咻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魅力，泯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驳落了！活脱脱变成一台以皮带绞肉的机器。

当打到二十几下时，也站在圈里的老舍，皮开肉绽了，鲜血淋漓了，两腿麦秸杆一样在那里摇颤。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圈外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他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炼狱……

下午四点半，老"牛"们被红卫兵押解到国子监街孔庙。那里已经堆满小山似的京剧行头——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红卫兵们手持舞台用的木刀，勒令他们将这堆行头一趟趟搬去院中间。行头点着火后，红卫兵又要他们在浓烟上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往他们的脑袋上砍去。突然，不知哪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流血了，头破了，真他妈的太嫩！"被称作"老东西"的正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又流进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今天，他以一片凝固的鲜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红色的尸布。

他死了，25日下午，发现他死于太平湖。有人看见，老舍从24日早晨起，就坐在太平湖西岸边，直至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塑，眼睛里溢出一股奇特、梦幻般的光。也许先生是在和叠影于湖面上的屈原、田横五百壮士对话；也许先生的心，随着《四世同堂》里被迫穿上白布红字坎肩的祁天佑，在古城蹒蹒游街，尔后，一直跟着他走进了护城河……

（原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题目为编者所加）

周恩来、陈毅在1966年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其首要一着就是打倒一批担任党、政、军领导要职的老干部。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招致林彪"四人帮"更加残酷的迫害。为了同林彪"四人帮"更好地抗争到底，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挺身而出，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保护了大批的干部。对此，我们从"文革"初期他为保护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而作的种种斗争中可窥一斑。

陈老总连连"放炮"
周恩来阻击"揪陈"

陈毅生性刚烈，豪爽，对一些看不惯或不理解的问题，一向敢于直言不讳。"文革"前，曾有人为此向周恩来反映，说陈毅讲话像"放炮"。周恩来回答说："不要怕放炮嘛！"并称赞陈毅讲话"比我有气势"，就是有时难免"走火"。

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和陈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周恩来在忧心冲冲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有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而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在公众场合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连连"放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中央文革"一伙试图搞乱军队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大好听，但还是要讲。如果我字当头，我就不讲了，不讲就不会犯错误。但我还是要勇敢地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作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陈毅的隆隆"响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的嘻笑怒骂赢得了台下的阵阵笑声和掌声。陈毅"火力越来越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又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的这一发发"重炮"把江青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歇斯底里："反击！反击！"于是，陈毅的11月讲话及叶剑英等老帅在这一时期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并很快在首都北京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红卫兵在江青一伙的指点下，喊着"要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的口号，向外交部发起了冲击。此时，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开初，周恩来对他们耐心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但红卫兵代表不听劝告，仍一味纠缠。周恩来不得不提高声调严肃地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

最后，周恩来告诫与会的红卫兵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不能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这次谈话一直到次

日凌晨。谈到最后时，双方都有点情绪失控。红卫兵代表们咄咄逼人地说：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群众。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也发怒了。他大声说道：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指陈毅），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说到这里，周恩来略缓了缓口气，说：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急步退出会场。

然而，就在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红卫兵的同时，江青来到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红卫兵中间煽风点火，为"革命小将"们撑腰打气。她鼓动说，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你们不要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我们是心连心的，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与此同时，"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在不同场合煽风点火："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革命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等等。他们甚至还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1967年1月5日，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周恩来得悉后，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亲自出面找到大会筹备处负责人，加以劝阻。他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军内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阻。

在周恩来的多方奔走、劝阻、周旋下，"揪陈"恶浪暂时日渐平息。然而，更艰巨、更险恶的斗争还在后头。

（节选自《抗争，为了更好地抗争》
（北京）白水天）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一、毛泽东睡不着觉，突然问陈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文化大革命"十年，给我们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并且时常伴随着危险。

这10年，我是时刻不离主席身边，保卫他的安全。不论在驻地值班，还是接见国内外宾客，我都在场，负责开门、接送客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几十部主席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上几乎都有我接送客人的镜头。每次外出，都由我来安排外出人员、外出行动计划和火车停驶、哨兵的布置和各种警卫方案的落实。每到临时驻地更是精心安排，包括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外出巡视、参观。我们始终把保卫主席安全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

有一次我们很紧张，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问我："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也带很多。我带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敌人。"主席点头表示满意。为了主席游泳安全，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都先与一些人试水，了解水情，察看上下岸是否有危险。主席无论在哪里游泳，我们都跟随左右，以利于掌握各种情况，保证他的安全。

二、毛泽东频频出巡，警卫工作更加紧张

主席经常外出，有时一走就是几个月，我家里的事就一点也管不了。如1974年7月7日外出至1975年4月13日才回京，出去了9个多月时间。家里也不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越是节假日越紧张。妻子、儿女都不能照顾。我爱人身体不好，常有病，全部家务和培养教育孩子的工作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确实够她操劳的。我时时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尽管这样，她还是积极支持我的工作。因为我肩负的职责既神圣又重大，而且带有特殊性，爱人十分理解。

我跟随主席多年，并在他老人家亲自指导下多次回农村搞调查研究，回来后能够实事求是地汇报。因而，主席对我非常了解和信任。要是有段时间不在，主席见到我就会问："小陈，好长时间不见了。"这种关心和信任，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做好警卫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跟随主席外出或接见群众的场所，一旦出现危险，我们对自己和同志们提出：刀子来了敢挡，炸弹来了敢扑（用自己的身体保卫主席安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多次被人群包围，"七·二0"事件，"九·一三"事件等我都在场。

主席多次提出：必须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用和平手段通过渗透和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这一思想的提出，不能不说具有战略眼光。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主席更加重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忧虑。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本意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因而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1966 年春夏之间主席游井冈山。7 月 11 日再次在武汉横渡长江，畅游 15 公里，共用 65 分钟。当人们看到主席站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江中游泳的人流时无比兴奋。两岸观看的人群激动万分，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也不断向群众微笑致意，不时高呼"人民万岁"。7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巨幅照片。我们由此产生了对 73 岁高龄的主席的无法形容的信赖感。

主席在上海、杭州、南昌、井冈山、长沙、武汉等地巡视完后，7 月 18 日返京，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

8 月 5 日上午，工作人员在游泳池南边的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于那个地方人来人往，观看的人比较多。吃完午饭，路过这里，我看不少人都在围看大字报，便凑上去看个究竟。大字报写道："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还针对党的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揭示说："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我看了大字报的内容并不很理解。8 月 8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四、毛泽东要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回来几天很忙，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从当时的情况看，我知道要搞大的政治运动了。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涌向设在中南海西门外对面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锣鼓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激动人心的场面表现了群众对主席的无比敬仰，使居住在中南海的人为之震动。8 月 10 日晚 7 时 15 分，主席散步走到中南海西门。听到门外喧闹声，信步走出西门，来到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主席突然出现在群众面前，人们异常激动，欢呼声又响成一片，群情鼎沸，一双双手伸过来，争先与主席握手。没有几分钟，汇集的群众越来越多，族拥着主席登上讲台。当时，府右街道路交通中断，有上万人汇聚于此。主席连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主席散步，一般只跟一个警卫，这次主席步出西门我们事先没有丝毫准备。中南海西门值班的仅有一个分队，除哨兵外，机动人员仅剩下五、六个人，根本维持不了当时的秩序。我听到主席出西门的消息，十分焦虑，立即集合部队，跑步到接待站，挤进人流，分开人群，清出一条路，请主席回中南海。聚集的群众不断增多，跟在主席的身后继续向中南海涌来。

主席回到中南海，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主席风趣地说："警卫部队不来解围，我回来不容易喽！"后来得知，群众散去，光地上的鞋、包就收了几箩筐，还有几个人被挤伤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语言报道了这次毛主席接见群众的场面。

主席被群众包围回不来，对我们警卫工作提出了新问题。当主席接见群众，被成千上万人包围着出不来时，安全就成了大问题。因为，里面的群众想出来，外面的又往里挤，秩序无法维持。平时主席出去，我只带十几个人，足可应付一般情况。但若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就很难保证主席的安全了。有几次十分危险，群众越聚越多，我们十几个人根本冲不出来，只好等兄弟部队或机动部队前来解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遇到过多次类似情况，并想尽一切办法做群众工作，努力保证主席的安全。

(节选自《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作者：陈长江)

毛泽东八见红卫兵

1966 年 8 月 18 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 1 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 5 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着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

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十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 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称呼主席，就要在前面加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修饰词。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经主席审阅过。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点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 8 月 18 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 月 31 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 50 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 8 月 18 日那天差不多。

9 月 15 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 8 米宽的道路，用 12 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 4 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 70 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 月 1 日，国庆 17 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 10 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 12 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 4 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磊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 7 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林彪走下车，尖着嗓子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谁也不听，不久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1 日接见红卫后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 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

主席和总理决定，11 月 25 日、26 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 300 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

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

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蓬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后，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节选自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经济战线三个回合的斗争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六条》)。其中第14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然而，实践让人们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生产和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冲击。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义不容辞地作出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力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在经济领域的全面发动，从而尽量减少经济方面的损失。虽然斗争未能阻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但是，党内健康力量所进行的这些斗争无疑是"文化大革命"10年历史中一个重要篇章。

第一回合　林彪等人乘机制造动乱
刘少奇、邓小平联名上书

最初一次限制"文化大革命"在经济领域发动的努力，发生在1966年六七月间，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为此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还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前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就紧锣密鼓地大搞其唯恐天下不乱的活动了。他们首先从北京点火，从批判北京市委发难。6月1日后陈伯达操纵《人民日报》连发7篇社论，号召"反修防修"，煽动"横扫一切"。于是北京的部分青少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由学校而社会，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第一线的基层单位也开始发生动乱。日益紧张的局势，使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十分焦虑。为了防止局势的继续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特地于6月30日联名写信给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他们在信中如实地报告了国民经济各部门运行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建议。信中写道："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刘少奇、邓小平的信引起了毛泽东对生产情况的关注。7月2日，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来信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七·二通知》)。

《七·二通知》下达数日后，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狠抓经济工作。当时担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道："我们这些人，在这一段已经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都在背着十字架兢兢业业地工作。关于三线建设和基建工程兵问题，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由周总理主持，都听过我们的汇报。""周总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且他已经看出这场运动可能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抓得比以前更紧了。"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一个《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七·二二通知》，进一步将不同单位的情况加以区分，分别提出了要求。

《七·二通知》和《七·二二通知》明确了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放在文教单位和地专以上党政机关。工交企业、基建、财贸等基层单位则必需保证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与原来的"四清"计划相结合，按照《二十三条》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这样就严格地限制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范围，起到了稳定基层、稳定生产建设单位的作用，暂时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震动和破坏。不过，时隔不久，社会动乱便大大地升级了。

第二回合　毛泽东进行"文革"再发动
周恩来连连发文抓生产

第二次限制"文化大革命"在工交企业和农村全面铺开的努力，发生在9月间。那是针对8月份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为保证完成三秋任务而展开的。

毛泽东7月18日由武汉回到北京后，陆续采取了若干措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再发动。林彪、江青等人乘机推波助澜。

首先是撤销工作组，批判工作组。毛泽东回京听取各方面汇报后，因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的冷冷清清的局面，面对工作组问题上两种对立的主张，支持了否定工作组的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批评了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决定撤销派驻各校的工作组，"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8月1日，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表示"热烈地支持"他们，说他们的行动表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矛头引向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

8月8日，林彪在全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作用。""要闹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红卫兵运动便风起云涌般地发展开来。在林彪破"四旧"立"四新"口号的鼓动下，一部分红卫兵大干打、砸、抢、抄、抓的非法活动，并且开始到各地串连点火，"炮打"各级党政领导，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使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再一次受到破坏性冲击。据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材料表明，红卫兵已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工矿企业等基层单位。当时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回忆说："红卫兵大串连，使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了，'停产闹革命'，使一大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由于很多部长遭到批判、靠边站，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也动转不灵，面临瘫痪半瘫痪的局面。"

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恶化，确保秋收、秋种、秋购三秋任务按时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在周总理、陶铸的主持和坚持下，在9月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竭力限制"文革"浪潮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第二次冲击。

9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9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从9月10日起，派人民解放军不带武器，协助铁路维护联运列车、联运车厢和各停车站的秩序。"

9月14日这一天，中央连发两份文件，重申中央、国务院7月2日和7月22两个通知仍然有效。同时，针对近期严重的情况做出了若干新的应急规定。一份是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农村五条》），另一份是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简称《工厂六条》）。

9月15日，在第三次接见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周总理发表了显然与林彪讲话调子不同的讲话。

9月15日，《人民日报》配合宣传中央两个文件精神，再发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

9月25日，中央发文，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在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

9月26日，中央发文，同意华东局9月25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能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在周总理、陶铸、李富春等领导下进行的上述各项工作，迅速缓解了从8月份支持红卫兵运动以来对经济生活带来的第二次破坏性大冲击，及时地保证了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但是三秋尚未完全结束，形势又急转下。

第三回合　林彪等人抓住时机点火
周恩来审时度势搞疏导

镜头一　林彪、江青等人为了搞乱全国，在乱中夺权，一直处心积虑地企图打倒中央第一线不赞成他们主张的领导人。在6月和8月两次煽风点火没有完全奏效的情况下，10月，他们又连续采取了几个搅乱全国的重大步骤。

首先，林彪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7周年纪念大会宣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红旗》第13期社论则抛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10月5日批转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写成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从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一股"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由此掀起。

为了继续解放大多数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努力、很不得力"的问题，从10月9日到28日，召开了长达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集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

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10月2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讲话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名，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随后，陈伯达的讲话被印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于是，红卫兵串连的声势大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再度形成高潮。

总之，林彪的国庆讲话、10月15日的《紧急指示》和陈伯达的小册子，起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再一次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的作用，于是全国城乡都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所席卷。工农业生产建设受到的破坏性冲击远远地超过了前两次。

按周总理指示精神，10月30日，就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中央答复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按照《十六条》中第十四条和中央九月十四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坚持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但是，11月8日，张春桥、戚本禹在接见北航红旗5个学生时，却不顾中央历来禁令，公然支持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张春桥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11月10日，上海发生了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聚众卧轨拦车，阻断沪宁交通的"安亭事件"。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发表前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并坚持按此意见定稿。

11月11日，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赴沪后，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擅自签字承认"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组建及其卧轨拦车的恶性事件是"革命行动"。张春桥此行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采用了先斩后奏的手法，事后才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这一本就在事实上完全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自7月以来连续发出的关于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从而为合法地搞乱工交企业开了先例。

镜头二　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和地方主管经济工作的一批领导同志，以周恩来、陶铸、谷牧、余秋里等为代表，又进行了一次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斗争。

11月中旬，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11月15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提出拟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的时候，"先用5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当天，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负责。"

11月16日，工交企业座谈会开始，参加会议的有5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7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会议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展开的。原定的5天会期被大大超过，实际开了近20天。

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以下简称《十二条》），是陈伯达等人得知要讨论这个问题时抢先搞的。陈伯达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加上《十六条》、《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等中央文件，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与王力、陈伯达的如意算盘相反，在工交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十二条》却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大家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

谷牧同志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搞了一个修改稿。修改稿明确写上了"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3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次日晚，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态说，《十五条》不行，可能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征求意见。毛泽东的指示显然突破了中央从7月以来的一条重要规定，这是因为他已经支持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

11月24日，周恩来在座谈会讲话，使会议发生了某种转折。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当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在毛泽东表态以后，陈伯达也摸到了底数，他把修改任务揽过去，搞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草案）》），并提交会议讨论。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对于陈伯达的《十二条》和谷牧的《十五条》各有取舍，但基本精神是坚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要保证生产。这使来自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工交座谈会的与会者不可能从思想上认同。但与会者听了周

恩来24日讲话后，知道周总理已无力回天，对陈伯达拿出来的《工业十条(草案)》才不得已表示接受，同意上报。

镜头三　林彪、江青等人从他们派去的中央文革记者的快报中，早已了解到工交座谈会的动态，并做了压制打击的准备。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并正式通过《工业十条(草案)》。

谷牧首先汇报了会议简况，然后就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作了汇报。谷牧说："对于在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从工交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到"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工交生产不能中断生产的连续性。这几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高级领导机关、各部委、各省委的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考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当有不同。"

"从这些特点出发，十条照顾了这些特点，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质量；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工人群众不能到外地串连等。因此，拥护十条。"

谷牧最后强调说："如果上述工矿企业三个特点站得住脚的话，有这么个考虑，对于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恐怕不能全部采取停职……请中央批准，各中央局、各省市，工交各部进一步把生产的班子落实一下，……反正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领导指挥系统要建立起来，不能中断。"谷牧的汇报，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它不仅反映了工交座谈会参加者的呼声，也表达了所有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群众的意志。

谷牧汇报后，林彪、江青等人立即以汇报为靶子，对谷牧、陶铸展开了围攻批判。在12月5日林彪主持的会议上，江青首先攻击工交战线的领导人都"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

12月6日，林彪对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他说：这次工交座谈会开了20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并说："昨天的会(指谷牧的汇报)把工交会议原来的一套完全打乱了，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要"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陶铸等一批领导同志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谷牧当时戏称为"万吨水压机"。在此种政治高压下，他们迫不得已作了"检查"。请看陶铸等领导同志当时的发言。陶铸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与此同时，余秋里、谷牧与到会其他领导人也谈心，"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会议就在充满政治高压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气氛下，正式通过《工业十条(草案)》。

《工业十条(草案)》照顾到了工业生产的连续性，规定了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及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等条款。正是这些条款凝结了工交座谈会正义斗争的某些成果。但是，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此以前，中央坚持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要纳入四清运动，与原定四清部署相结合，分期分批，进行正面教育。而《工业十条(草案)》的基本精神却强调要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放手开展"四大"。邓小平在6日会议发言作了一个极好的概括："解决工矿企业里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是不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的方法来搞？关键问题是这个。"这个《工业十条(草案)》，"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的革命化。"

在《工业十条(草案)》的影响下，全国城市财贸单位、商业服务业等基层单位也相继效法，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开展"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破"四旧"纪实

没有红卫兵运动，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毛泽东发表"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的讲话；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8·18"接见百万群众时，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一步步地终于走到公开支持红卫兵向"反修"前线冲杀。

"8·18"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几乎全部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处于青春骚动期的青少年学生，以急不可耐的心情迫切地想显示一下他们的力量。

"破四旧"最早由《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明确提出，并为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所肯定。"8·18"大会上，林彪再一次为"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煽动性号召后，红卫兵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显示他们力量最好的方式。

8月20日，在受毛泽东接见而产生的激动心情中，30万北京各红卫兵组织的"小将们"走上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破"四旧"是从给街道、工厂、公社、商店、学校、机关等设施改名开始的

8月20日后，北京市的公共汽车站牌都被红卫兵涂

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长安街被称为“东方红大街”；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被改成了“防修路”；东安市场改成了“东风市场”；亨得利钟表店改成了“首都钟表店”；悬挂了 70 多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摘下，店名也被更改为“北京烤鸭店”；同仁医院更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荣宝斋被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清华附中改成了“红卫兵战校”；景山公园改为“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中华影院改成“红卫兵影院”。

仅几天功夫，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通牒信和更改名称的大红喜报。虽然建筑物以及城市格局并无大的变化，但“到处是革命的标语，到处是豪迈的歌声，到外是革命的行动，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这表面上的一派“革命”气象，使急于建功立业的红卫兵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胜利感和满足感：他们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碎一个“旧世界”，同时又建立起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全国其它地区的红卫兵们也仿效北京红卫兵大兴“造反”之风。在上海市，有 48 年历史的上海永安公司的招牌被砸烂，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店名；《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具有 50 年历史的上海最大游乐场所“大世界”几米高的大招牌被红卫兵拉下，换上了“东方红剧场”的新名字；著名的豫园也被改成了“红园”。

8 月 20 日以后，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职工和红卫兵砸碎了嵌在墙上达 38 年之久的“劝业场”大匾，换上了“人民市场”的新店名；中原公司改名为“工农兵商场”；有 45 年历史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天津人民歌舞剧院改称“东方红歌舞团”；宁园公园改名为“二七公园”。据报道，全市有 40000 多个百货、副食品商店、门市部，其中需要改旧名称的全部改换了新店名。

在广州市，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被改成“东风楼”；广州协同和机器厂改成了“广州柴油机厂”；《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在杭州市，东坡剧院、东坡路以及西湖的苏堤都被改换了名称；沿用了 300 年的张小泉剪刀铺改成了“杭州剪刀店”。

中州大地同样被卷进了这场破“四旧”的浪潮。洛阳市许多影剧院、公园和新建的道路原来是以其丰富的文物遗址来命名的，此时大部分都被更名。开封市的 4 个区鼓楼区、龙亭区、南关区、顺河区依次更名为红光区、红星区、红旗区和红卫区；郑州市第 11 中学被更名为“抗大第一附中”；艳芳影像馆改成“工农兵照像馆”。

破“四旧”的飓风也横扫了东北的白山黑水。长春市专门为红卫兵设立了广播站，让他们宣传更改道路、店铺的名称的意义。哈尔滨著名的秋林商店改换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沈阳市的福禄寿食品店改成了“国营立新食品商店”。

在成都市，驰名中外的陈麻婆豆腐饭店被改成了“文胜饭店”，麻婆豆腐也被改成了“麻辣豆腐”。

甚至连世界屋脊上的拉萨市也同样无法幸免，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扛着“向全世界宣言书，敲锣打鼓走向街头，大破‘四旧’”，许多“带有封建农奴制和迷信色彩的地名、街名、房名改换名称。”著名的八角街改名为“立新大街”；拉萨市西藏医院“门孜康”被改为“劳动人民医院”；西藏武装叛乱时的重要据点药王山被更名为“胜利峰”；历世达赖的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对于道路、店铺、医院、学校、工厂、体育场等设施的更名活动只是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红卫兵的“横扫”，许多大中城市都已“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然而这种对文化改造表层的理解，既是红卫兵急欲显示力量的无知表现，又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中农民意识的集中反映。把文化改造总是看成政治行为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化思维方式的顽疾。因此，当更名活动告一段落后，扫除“封、资、修”就又成为了各红卫兵组织新的兴奋点。

为了“向旧世界宣战”，红卫兵要“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对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来说，效法先辈“建立新世界”的志向在“改名”活动中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满足，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全国新闻媒介的支持。初战告捷使他们变得自我膨胀起来，红卫兵此时以“向旧世界宣战”的“尖兵”自诩，他们也就必须再以新的行动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扫除“封、资、修”首先是对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装、装饰等的攻击，然后是对中国文化的化石——文物、遗址的破坏。

8 月下旬，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上海市南京路口、贵阳市繁华街道都贴有告示：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许留“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发型；穿火箭式尖头皮鞋的当场破尖，穿“牛仔裤”的要剪开裤管……。各地的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都设立红卫兵“破旧立新站”，许多妇女当场被强行剪去满头青丝，穿高跟鞋的被勒令当场扭掉后跟，牛仔裤被当众从裤管口直剪到大腿根。

8月23日，一些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堆放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当中纵火焚烧。在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上演了一场"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东安市场的橱窗玻璃被砸得象雨点一般喷射到马路上、电车上。拥有私房产权的市民在红卫兵的敦促和最后通牒威胁下，都以房管局"申请"上交房契，许多人更改了具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名字，变为"红岩"、"卫东"、"捍彪"、"继红"、"永革"、"文革"之类带有"革命意义"的名字。

8月24日，北京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了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8月26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接管由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8月31日，由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8名外国修女被驱逐出境。

旧文物既然产生于封建时代，不管它本身有无阶级性，有无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在红卫兵的眼中都是必须予以"革命"的对象。

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和教职工家属共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有两座小佛像被红卫兵拖走。海淀区朱房村的汉城遗址内珍藏的丰富的遗迹资料，也被红卫兵挖得面目皆非。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保存的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红卫兵拉倒，佛身断为三截，两手全部断残，成了一堆废铜。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长城拆毁108华里。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寺内，戒台上的数千个大佛和周围的小佛像全部被红卫兵砸光。为人熟知的白塔寺、潭柘寺、团城、圆明园遗址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在文革时期间有4922处被捣毁，其中大多数是被毁于1966年8、9月间。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的行为向全国推广。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一来，不仅使北京市的"破四旧"运动进入新高潮，而且也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各地。在上海市，8月23日，成千上万红卫兵和造反师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演讲，张贴大标语，要求把上海市改造成"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城市。"红卫兵用大字报将南京路上商店的富于艺术气息的橱窗封住。濒临黄浦江的外滩建筑群一直是红卫兵们的眼中钉，然而大楼推不倒，红卫兵就把安置在大厦前的铜狮子推掉，把嵌在墙壁上的各种建筑标志和装饰铲掉。红卫兵还把上海海关的钟原来的报时音乐改成了《东方红》乐曲。上海万国公墓中被红卫兵视为"反动人物"或带有"封、资、修"情调的墓碑都被砸掉，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捣毁。上海市主要干线上的约100多块巨型广告牌，被红卫兵一夜之间全部用"毛主席语录"覆盖。

上海所有的教堂、十字架都被砸，祭坛被毁，圣经被烧。始建于三国时代(公元247年)的龙华古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下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相传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静安寺中，红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的静安寺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在寺人的全力营救下幸免于难，但设于玉佛寺边门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在天津市，8月23日，红卫兵勒令天津所有的个体商贩1702人、修配服务业人员2801人全部停业。8月25日，红卫兵组织发出"通知"和"命令"等，要求停销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商品，劝业场停销商品达582种，占全部经营品种的10%。在红卫兵的督虞下，塘沽海关的职工把大沿帽、关徽、臂章、铜钮扣统统视为帝国主义旧海关的标志和"封、资、修"的货色而弃之。传统曲艺相声被当做低级趣味停止了演出。位于解放北路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原租界建筑群中，许多建筑上的外饰物和建筑标志都被红卫兵砸毁。始建于清初的大悲辽吉的佛像法器被抄，院中所藏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

在武汉市，设置在武汉关大楼顶上的铜制模型船标记，被红卫兵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拆了下来并当众砸毁。

河南省，郑州市国棉四厂的职工和红卫兵们打掉了"龙头鹤舞"的大门和厂露天舞台上的"嫦娥奔月"图像。郑州纺织机械厂职工则与红卫兵一起捣毁了厂内所谓的"封建主义遗物"，清洗了厂区和各车间的标语牌，换上了毛泽东的语录和"革命"口号，洛阳市红卫兵在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砸掉了无数小佛头像。

杭州市是名胜古迹集中的城市，红卫兵在这里得以大显身手。他们捣毁了国家重点文伯保护单位苏小小墓和"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也不翼而飞了。

在海口市，红卫兵捣毁了座落于市郊滨涯村的海瑞墓。原为石砌的墓穴，前立神道碑、石供器、石人、石狮、石羊、石马、功臣坊及亭园都被砸毁。

8月27日，山东冠县二中全体师生，砸开武训墓。以后柳林农中、卫生学校师生相继到达，他们一起捣毁武训墓，挖出武训尸体并抬尸游行。大柳林北门上场院举行公

审大会，将骨殖砸烂焚烧。11月9日到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红卫兵在曲阜捣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共破坏文物6618件。

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尽管位于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但仍然有红卫兵进行"横扫"。南山寺门前汉白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头全部被砸毁。

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扫除"封、资、修"的行为，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他们毁掉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毁掉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经验与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扫除"封、资、修"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政治上的过分集权、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加上红卫兵对"异类"文化的毁灭，实际上都在强化着一种唯上意识和权威人格。红卫兵砸碎的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物、遗址，而是在践踏中国悠久的物质积淀；禁止的也不仅仅是现代的服饰、装潢，而是在毁灭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流行风

背景介绍

一个时代所流行的东西往往都从各个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客观历史现实。这是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能动反映的结果。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起潮涌，整个国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均受到空前的冲击。政治上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迫害之风横行。文化艺术领域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控制，形成"万马齐喑"的悲剧性局面，有的只是歌功颂德或是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极浓的作品。这一时期的"革命"京剧几乎垄断了整个文艺舞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流行的口号、歌曲、戏剧电影（很少）就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成为我们了解"文革"的一个信息窗口。

流行口号

1.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2. 无限忠于毛主席
   无限信仰毛主席
   无限热爱毛主席
   无限崇拜毛主席

3.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4. 作红卫兵后盾！向红卫兵致敬！

5.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7. 造反有理！

8. "破四旧""立四新"

9.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歌曲《造反有理》

1=bB $\frac{2}{4}$"造反有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坚定、有力、豪迈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
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
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
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主义。

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C $\frac{2}{4}$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歌曲《你不打他就不倒》

你不打他就不倒

1=C2/4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
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
倒。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
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
自己跑掉。

歌曲《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A2/4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
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F2/4

中板、热情、奔放地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
打起背包就出发。哎，祖国要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边防线上把根扎，
雪山顶上也要发芽。哎，祖国要我守边卡，
边防线上把根扎，雪山顶上也要发。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顶风冒雪把武练，
过硬本领人人夸。哎，祖国要我守边卡，
顶风冒雪把武练，过硬本领人人夸。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翻山越岭去巡逻，
边卡开遍五好花。哎，祖国要我守边卡，
翻山越岭去巡逻，边卡开遍五好花。

结尾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戏剧《红色娘子军》

第一个工农兵的革命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带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攻克了最顽固的京剧堡垒，同时对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芭蕾舞，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这个改革的第一个辉煌成果。

毛主席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周扬、林默涵之流，正是这样，他们狂热地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大肆叫嚷要芭蕾舞"洋到底"，"学到家"，竭力维护旧芭蕾舞，使那些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毒素的《巴黎圣母院》、《天鹅湖》等剧目充斥社会主义舞台。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无耻地说："看《天鹅湖》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水平也很高，也有教育作用。"

在文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江青同志带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对旧芭蕾开始了改革。她说：你们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芭蕾舞已经走上没落颓废的道路，我们的芭蕾舞不能走这一条路，我们的芭蕾舞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无产阶级芭蕾舞这面大旗要靠我们来扛了！又说："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江青同志希望剧团革命同志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并且安排演员下农村劳动，创作组到海南岛生活。她鼓励同志们要贯彻毛主席的洋为中用的伟大方针，不要当外国人的奴隶，要走自己的路，要使旧芭蕾舞的形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敢于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

《红色娘子军》的成功，使一个在西方世界里逐渐趋于没落的古老艺术，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它标志着剥削阶级统治芭蕾舞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历史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英雄已经大喊大叫地登上了芭蕾舞台。

（1967.《解放军文艺》第七期）

电影《大浪淘沙》

一九二五年，知识青年靳恭绶、顾达明、杨如宽，因不满黑暗现实，逃离家乡寻求出路，途中救起逃婚的余宏奎，四人结盟为兄弟，来到济南进了山东第一师范学校。靳恭绶认识了共产党员赵锦章老师，余宏奎认识了国民党员薛健白老师。他们四人在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时常在一起秘密读进步书籍，谈革命道理，开始接触革命活动。在这期间，他们还结识了两个女同学谢辉和刘芬。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赵锦章同他的爱人共产党员宋珠萍一起转移南方，参加了北伐军。在一次声援北伐的示威游行中，学生们与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靳恭绶表现得很勇敢，余宏奎则十分怯懦。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六位青年学生怀着激情赶到武昌。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出身、经历和志向的不同，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余宏奎投靠了在国民党35军当参议的薛健白；杨如宽为了个人爱好，参加了北伐宣传队；靳恭绶、顾达明、谢辉和刘芬投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久，靳、顾二人被分派到湖南长沙军分校，与在分校任教官的赵锦章重逢。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伪装革命的薛健白带着余宏奎潜往长沙策反。余想利用顾的忠厚老实，摸清分校共产党的情况，遭到对方的斥责。赵锦章根据顾、靳二人报告的情况，预感到反革命将有行动，一再向领导提出积极的建议，都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拒绝。不久，长沙果然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随之，反动分子也在分校制造事端，企图清洗校内的革命力量。薛健白诱捕赵锦章的阴谋未逞，又指使余宏奎杀害赵锦章。已加入共产党的靳恭绶、顾达明奋不顾身救出赵锦章。他们根据赵临终前的嘱咐，回到武昌，通过宋珠萍找到了党组织，与谢辉、刘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杨如宽在北伐失败后，于悲观失望中当了逃兵。在“七·一五”武汉反革命叛乱前夕，汇集在武汉的革命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转移农村，消灭了前来拦截的反动武装。靳恭绶、顾达明枪决了叛徒余宏奎，跟随革命队伍，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的风浪中继续锻炼成长。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

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际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

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1966.8.14《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5月4日～26日　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包括“文化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毛泽东虽然未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由刘少奇主持进行的。会议的主

要内容：1.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5月4日会议正式开始时，首先听取了康生关于中共中央通知起草情况的介绍和对彭真的所谓揭发。随后，会议根据康生颠倒黑白、肆意诬蔑的发言，错误地开展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揭发批判。诬陷彭真为搞政变的头目，诬陷罗瑞卿为阴谋篡夺军权，陆定一被诬陷为迫害林彪一家的“后台”，杨尚昆被指控为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会议于5月23日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实际上，彭真等四位同志受诬陷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左”倾错误，或对林彪一伙作了一定的斗争，所以被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障碍，必须先除他们。2.通过了在会前由康生、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通知》首先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其次，《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批判。它指责《二月提纲》的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通知》对《二月提纲》还进行了逐条的批判。3.《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这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主要目的。《通知》错误地估计了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当时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毫无根据地认为党正面临着异常的危险，“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依据上述对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的极端“左”倾的错误估计，《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5月18日，林彪在第三次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引证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历史，宣扬“政变经”，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用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手法，别有用心的鼓吹个人崇拜，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他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宣称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篇蛊惑人心的讲话是林彪妄图篡党夺权的重大步骤。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掌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发动的阶段，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下旬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在校内开展批判活动。

5月30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指示：同意。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诬蔑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打倒“黑帮”、“黑组织”。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煽动文化教育战线广大群众和“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资产阶级“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篇社论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6月初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时，制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此后，50多天里，北京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4日　《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北

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彭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是被“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冲垮的党的地方基层组织。《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称赞北京大学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统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

7月20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新部长为陶铸，顾问为陈伯达（仍挂副部长名义）。林彪、江青之流为了篡党夺权，故意捏造、歪曲事实，诬陷中宣部扣压所谓左派稿件（指关锋、戚本禹文章），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系诬指吴晗），肆意制造了“中宣部阎王殿”的大冤案，以窃取舆论大权。他们长期迫害、监禁当时中宣部的负责人和广大干部，要把中宣部诬为“阎王殿”予以“彻底砸烂”。同时把理论、教育、宣传、文艺、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战线统统诬为“黑线专政”、“修正主义统治”、“牛鬼蛇神成堆”。省、市、自治区和地县各级宣传部门也受到株连，被打成大大小小的“阎王殿”或分店、“代销店”，使党经过多年工作培养起来的宣传文教队伍遭到一场浩劫。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批准中宣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才予以平反纠正。

7月28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消息传出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8月1日～12日　为了进一步扫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很紧张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2.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3.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8月4日　毛泽东批发中央文件时指出：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

8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制定了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具体计划和发行计划。《毛泽东选集》在会后两年印行3,50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乙种本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一般都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负责印刷。

8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批《孙治方的“理论”》一文。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进行“批判”。主要内容是：认为孙治方主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主张把折旧下放给企业，给企业相对的独立性，是鼓吹经济自由化；主张用利润指标来“推动企业管理”，就是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等。

8月10日　毛泽东于下午7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3日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传达贯彻工作，布置“文化大革命”和处理干部问题。林彪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他提出对“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以及“没有干劲的”罢官。

8月18日　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又七次接见。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学生、教师1100多万。林彪在8月18日、31日和9月15日的接见大会上讲话时极力进行煽动“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

8月22～29日　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20日，首都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将原有地名、店名、校名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反帝医院”、“井冈山战校”一类新名称。倡议修改宪法、废除国歌，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等等。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此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立即效法，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违法行动，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

8月24日　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终年67岁。老舍原名舒舍予，满族，北京市人，1899年生。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周恩来直接关怀和帮助下，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到美国讲学并进行创作。1949年应召回国后，老舍热情的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老舍彻底平反，并于1978年6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颖超、廖承志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8月24日　原武汉大学校长，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达，因遭受林彪、江青等的迫害逝世，终年74岁。李达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代表出席了一大，经选举，担任党中央的宣传主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毛主席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教育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达被诬蔑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被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市委关于给李达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的决定。

9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在6、7月，便有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连。8月，到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期间，大批北京学生也到全国各地串连、“点火”、建立“联络站”，冲击机关，揪斗干部。通知发出后，大串连在全国出现高潮。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节，适当的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

10月9～28日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使“文化大革命”解除了所谓来自中央的“阻力”。但党内广大党员和干部，对于这场运动中种种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错误做法深感困惑不解。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仍处于波动、抵触和不安的状况。为了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中央决定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便集中解决“中间”(指各级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运动来得猛，只有5个月，难怪同志们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他提出对待所谓“乱”的方针，他主张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林彪于10月25日作了煽动性讲话，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1.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煽动人们要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去批判“资反路线”；2.大肆鼓吹“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的谬论，为无政府主义制造论据；3.林彪别有用心地宣扬毛泽东关于“乱子”两重性的观点，并歪曲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思想。陈伯达在讲话中将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抵触态度者，扣上所谓“怕字派”的帽子。他们这些反革命的煽动，目的是搅乱全党和全国，以便乱中夺权。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如何传达作了具体部署，对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原则性的答复。关于大串连影响火车运行计划问题，他提出全部徒步，搞军事化有全程徒步；要求红卫兵只限于学校，其他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他提出红卫兵不能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不要打人、体罚等。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党和政府机关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审查、挨批斗。很多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被当作“反动权威”、“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冲击，甚至抄家、坐牢房。党团员被迫停止了一切组织活动。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10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连。在此以后，中央又几次重申了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

11月11日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选集》出版。12日，北京100万多人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董必武副主席致开幕词。周恩来总理讲了话。宋庆龄副主席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讲话。

11 月 13 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陈毅讲话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我 1927 年参军，当解放军 39 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徐向前在大会上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不要当圣经念。""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贺龙在大会上也讲了话。11 月 29 日，几位老革命家又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讲了话。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磊。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这就否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你们的做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叶剑英说："如果你们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不久就受到批判。

11 月 16 日　于本月 9 日成立的以王洪文为首的所谓"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聚众闹事，公然截断火车，堵塞交通，制造反革命的"安亭事件"。

11 月 28 日　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央和各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和各地 2 万多人出席了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会议披露：中央军委决定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2 月 12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因病于 1966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8 岁。吴玉章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 年在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 年到 1937 年，由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1938 年回国后，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等职务。全国解放以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并曾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七大和八大会议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2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要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四大"；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应当平反。

12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前言》除别有用心地鼓吹个人崇拜外，又提出用"立竿见影"的方法学习毛泽东著作，破坏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12 月 27 日　在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下，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回北京批斗。在此之前，江青、康生授意关锋、戚本禹整理材料、写信、诬告"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在批斗过程中，对彭德怀百般虐待和进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

12 月 28 日　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等制造了上海康平站武斗事件，打伤 91 人，在全国开创了利用武斗夺权的恶劣先例。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通知》规定：从现在起到 1967 年暑假，由解放军派出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15～20 天)军政训练。由此，人民解放军派遣干部、战士进驻各级学校，进行军政训练，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号召广大革命师生应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虚心"向解放军学习"，和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团结一致，把大中学校军政训练搞好，把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经　济

9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消，资方人员工作另行安排”；“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把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把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合作社。

10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纯氧顶吹转炉车间在上海建成。纯氧顶吹转炉是60年代的先进炼钢技术，9月6日炼出了第一炉优质钢水。

10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第一批10万水轮发电机组，其中的两套机组已经安装并投入生产。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有关研究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和职工，用合成的方法获得重要的化工原料——苯，并投入生产。苯是制造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染料以及农药等重要的基本原料。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都只能从炼焦、炼油过程中提取苯，产量受到限制。一些工业发达国家近百年来一直设法扩大苯的来源，至今仍在摸索试验。我国用8年时间，用合成方法生产苯，为我国苯的生产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决定(草案)》。规定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各单位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军　事

7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8月1日　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备战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1978年7月成立了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构。

10月5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注意保护少数”。《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指出这个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从此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都停止活动。

10月27日　我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我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正快速地向前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加这次试验的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致以热烈的祝贺。

10月28日　我国在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这次核爆炸的成功，把我国核武器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外　交

5月18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来驻华大使馆，驳斥印度尼西亚政府抵赖反华排华罪责；严正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华侨，释放全部被捕被禁华侨；并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在最近期间派船接回自愿回国的的受难华侨；建议两国政府立即具体商谈，妥善安排，使接运华侨回国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6月10日～30日　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16日～24日)、阿尔巴尼亚(24日～28日)，28日发表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阿公报。回国途中，周总理非正式访问了巴基斯坦(28日～30日)，周恩来总理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了会谈。

7月3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责美帝悍然连续轰炸河内、海防。声明指出：中国从来一贯地、无保留地、尽一切可能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并且从其他方面给予越南以支持和援助。现在，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加严重的阶段，使我们的这种支持和援助，更加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我们将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根据越南人民的要求，随时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

7月22日　刘少奇主席发表声明称：中国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的后盾，中国辽阔国土是越南的后方。同日，首都近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22日～24日，全国各地共有1,000万人为此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8月6～21日　应朱德委员长的邀请，由议长阿卜杜勒·贾巴尔·汗率领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

8月17日　应中共中央邀请，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和夫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到机场欢迎。

9月7日～10月3日　应朱德委员长邀请，索马里国民议会议长谢赫·穆克塔尔·穆罕默德·侯赛因率领索马里国民议会友好代表团访问我国。

9月12日～10月6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9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为接运和安置遭受印度尼西亚政府迫害自愿返国的华侨，我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成立，廖承志任主任委员。

9月20日　根据中法两国的航空交通协定，巴黎——上海航线今天正式通航。

10月21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尼政府集体驱赶华侨，大肆掠夺华侨财产的行为。照会指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侨的迫害越演越烈，已发展到集体驱赶华侨的地步。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竟然利用中国政府派船接侨之机，大肆掠夺华侨财产，断绝他们的生计，企图一批一批地把他们赶出印度尼西亚，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政府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停止迫害和驱赶华侨，切实保证华侨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否则，印度尼西亚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10月22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联当局无理决定我国全部留苏学生休学一事，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决定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于10月27日离莫斯科回国。

10月28日　我国驻加纳共和国大使馆照会加纳外交部，对加纳当局20日片面宣布中断两国关系、撤离驻华使馆一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照会说：加纳当局片面中断两国关系，中国政府被迫宣布撤回我国驻加纳大使馆全体人员。

11月17日　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华大使，向他宣读了一份备忘录，对匈牙利政府破坏中匈两国文化合作，恶化中匈两国关系，无理决定不准我5名留学生继续在匈学习，提出强烈抗议。

科技文化教育卫生

5月20～24日　1966年新兴力量举重邀请赛在北京举行。22日，我国次轻量级选手萧明祥先后以155公斤和157.5公斤的成绩，两次刷新了这一级别的挺举世界记录；我国轻量级选手邓国银以145.5公斤的成绩，打破了苏联运动员卡楚拉创造的轻量级挺举145公斤的世界记录。

6月4日　解放军选手李淑兰在西宁举行的1966年全国射箭锦标赛中，以283环的成绩，打破了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台普托娃创造的女子70米单轮279环的世界纪录。

6月12日　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中共江苏省委做出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6月1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的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人民日报》6月18日全文发表了这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因"文化大革命"，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本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

6月20日　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批发全国。6月18日，北大一些人避开工作组，揪斗干部、群众40多人，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打人，侮辱妇女。工作组发现此事后，对群众进行了教育，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北大工作组将此事写成北大文革简报第9号。刘少奇在转发这个简报中，认为："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指示"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项文件发出后，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陈伯达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指责"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他提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的口号。7月28日，江青发表谈话煽动武斗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8月5日，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6月27日　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和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自本年起，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

7月2日　高等教育部向我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目前全国各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中央批准，将接受来华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或一年。9月19日，高等教育部给各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自本年起，我国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达7年之久。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独立编纂的1969年和1970年中国天文年历已胜利完成。天文年历是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一种工具书。它详细登载太阳、月亮、大行星和千百颗恒星在一年内不同时刻的各种精确位置，以及预告日食、月食和各种特殊天象。天文年历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能够独立编纂。

7月23～3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亚州、非州、拉丁美州和大洋州33个国家及一个地区性学术组织的10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大会。讨论会收到99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广泛涉及物理学的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基本粒子、原子核物理和固体物理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讨论会集了四大洲科学家的团结和友谊。讨论会的成就表明，四大洲觉醒了的人民和科学家，有志气、有才能、有信心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讨论会认为，只有首先反帝反殖，才能使四大洲各国民族的、人民大众的科学事业得以发展。

10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又一次成功地运用小血管缝合方法，给一个工人接活了完全断离的拇指，使我国断肢再植手术在国际上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1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六年零九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这一杰出的科学实验，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的伟大历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7年

导　言

1967年，正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中指出的那样，是“全国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极“左”思潮进一步泛滥，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在此影响下，全国先后又有8个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被“造反派”夺了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使全国更加陷入了混乱的局面中。

2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及因此造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当时被诬为“二月逆流”。

3月，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这是一起重大冤案。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而采取的极端恶毒的措施。在这个大错案中，大批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被审查、关押。从此，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到1967年6月，全国有5,000多人受到审查并受到残酷迫害。

对曾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进行迫害在更大程度上隐藏着一个更大更毒的阴谋——打倒刘少奇同志。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开始了在报刊上不点名对刘少奇进行攻击。4月3日公开批判刘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月6日，在江青策划下，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刘少奇。从此，共和国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便有组织地展开，直至将刘少奇置于死地。

5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这是因为当时全国出现了武斗的严重恶劣局面，它影响和破坏生产，破坏社会秩序与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社论要求停止武斗，要文斗，严禁打、砸、抢，恢复秩序，进行生产。社论发表后，各地武斗并未停止，在林彪、江青唆使下，反而日益发展。7月22日，江青在河南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武斗便急剧升级。

在国内极“左”思潮的泛滥影响下，我国的对外政策也罩上了一层“左”的色彩，外交政策出现了严重偏差，在国际政治领域内开始不切实际地搞“革命输出”，搞阶级斗争，在国际上造成极不良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纷纷向我国提出抗议，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反华、排华的浪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

总之，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错误连续恶化的一年，形势越来越紧张，且在林彪、江青的唆使破坏下变得失控。一句话“全国山河一片混乱”。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一月风暴”
- ●“三支两军”
- ●“二月逆流”
- ●“揪叛徒”
- ●北京“夺权”运动
- ●“要文斗，不要武斗”
- ●“七·二〇”事件
- ●共和国的最大冤案始末
- ●香港“五月工潮”
- ●1967 年的外交困境

“一月风暴”

背景介绍

1 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6 月，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风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因此，“一月风暴”实际上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时机，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便夺取政权的一大举措。

材料：

-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材料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新华社上海八日电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前，刊登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

“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以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原载1967年1月5日《文汇报》）

“三支两军”

背景介绍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情况下，“三支两军”虽然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主旨任务是支持“造反派”，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必然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材料：

- 解放军示威游行支持革命左派夺权
- 中央军委命令

材料一　解放军示威游行支持革命左派夺权

据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连日来，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示最热烈地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外、无数支浩浩荡荡的钢铁队伍，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红艳艳的旗帜，威武雄壮地举行示威游行，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示威！向胆敢反对革命左派夺权的一切敌人示威！游行队伍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向革命左派致敬！""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等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切阶级敌人的威风。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先起来夺权的上海，黄浦江畔、南京路上，江流滚滚，吼声震天。驻沪陆海空三军战士一批接一批地走上街道，一面高呼口号，高唱战歌，一面向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散发表达战士决心的传单："我们紧握手中枪，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如果谁敢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动武，我们就坚决还击，砸烂他们的狗头，叫他们粉身碎骨，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援真正的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向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某部队的游行队伍经过复旦大学门口，正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战的革命师生立即欢腾起来。干部战士们对他们高呼："坚决支持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革命师生深受感动。鼓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许多部队指战员全副武装，走上大街、工厂和郊区农村，表达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心。示威队伍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军装、神采奕奕的彩色画像，挥动《毛主席语录》，时而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而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示威队伍所到之处，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某工厂的老工人看见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队伍时，眼眶里闪着喜悦的泪花，激动地说："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心贴心，在我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派解放军支持我们，为我们革命左派夺权撑腰。有解放军作我们的坚强后盾，阶级敌人再顽固，再狡猾，我们也不怕。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争取夺权斗争的全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部队保定驻军某部的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在保定市区行进，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广大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同解放军一道前进，汇成了一支数万人的游行大军。广大革命群众，看到毛主席在革命的重大关头，派子弟兵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万分激动地和部队指战员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日夜警惕守卫在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指战员，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战斗命令，欢声雷动，一片欢腾。福州驻军广大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前线空军某部派出直升飞机，在福州、南昌、九江、上饶等地区上空，散发下十多万份表示人民解放军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传单。许多革命群众，拿着从空中飘下的传单，兴奋地和解放军指战员热烈拥抱，亲切握手，激动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有你们的坚决支持，有你们作坚强后盾，我们浑身增添了无穷力量！"

七亿神州，红旗招展，全军上下，决心如钢。解放军指战员的游行示威队伍，有的乘坐卡车，有的排成整齐的队列，浩浩荡荡，威武雄壮。指战员们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在南京市，南京部队某部的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一位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三十多年的老红军战士、战斗英雄李长林，过去，为了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他英勇战斗，负过七次伤；今天，他走在游行队伍中，斗志昂扬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过去为了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手中夺权，革命前辈不惜流血牺牲；今天为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我们同样不惜流血牺牲，坚决支持，誓死保卫。"兰州驻军某部指战员，今天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全军指战员一致表示，我们最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要革命左派需要，我们立即出动，全力支援革命左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窃取的各种大权统统夺过来，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我们严正警告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你们胆敢反抗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夺权，胆敢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坚决还击，砸烂你们的狗头！把你们彻底消灭！

（原载 1967 年 1 月 27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央军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二月逆流"

背景介绍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开始便遭到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等老革命家的抵制与批评。为此他们与林彪、江青集团作了激烈的斗争。林彪、江青便把这些老革命家视作政治绊脚石，千方百计要搞倒他们。这两种力量终于在1967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及中央军委会议上有了一次正面的尖锐冲突。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代表人民意志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集团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由于他们歪曲事实，使得毛泽东当时对此事件有了一个错误的认识，于19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当时，这一大闹怀仁堂事件被诬为"二月逆流"。

材料：

- 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 怀仁堂会议记录（节录）
- 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

材料一　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11月13日）

陈毅的讲话

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要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

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你们在单位受打击，到中南海、国防部告诉，毛主席同意这样做，林彪同志支持，但不能直接行动，可住招待所。派代表到中南海、国防部等待得到答复。

徐向前的讲话

军队的领导同志要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林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我们军队院校要作文化大革命的好榜样。希望同志们不要作坏样子，不要作有损于我们军队荣誉的坏样子。过去发生错误是难免的，不责怪大家。我们没有很好领导，没有很好诱导，我们也有缺点，应该向你们作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

叶剑英的讲话

要有阶级感情。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再说一遍，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

材料二　怀仁堂会议记录（节录）

（1967 年 2 月 16 日）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

2 月 16 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议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同志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节自《大动乱的年代》)

材料三　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

布　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同志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同志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到了林彪手里，林彪十分恼火。他想不到，谭震林同志竟敢这样仗义执言、慷慨陈词，公开反对他们一伙"打倒一切"的罪恶阴谋。

二月十九日，林彪在谭震林信上写了一个批示，把信转交毛泽东同志。

林彪在信的批示中写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过去曾多次指出，要保谭震林同志，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千方百计要打倒谭震林同志。林彪多么希望毛主席看了谭震林同志的信件，看了他自己在信上的批示，能有一个表态，支持他们打倒谭震林同志。可是，毛主席只淡淡地批了"已阅"两字，就退了回来。

林彪顿时恼羞成怒，立刻将毛主席的批示撕成碎块，丢到墙角的痰盂里去了。

站在一边的秘书，看到一向叫嚷"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林彪，竟这样粗暴无理地对待毛主席的批示，感到很过意不去。后来，他趁林彪不在的时候，将毛主席的批示，从痰盂里捞出，晾干，又拼凑到一块，复制保存到中央档案馆。

(原载《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揪叛徒"

背景介绍

"揪叛徒"的风潮是1967年3月开始的。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关于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冤案。这起轰动国内外的"61人案"是一个更大政治阴谋的预示。预示着林彪、江青集团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且被捕入狱的刘少奇。"揪叛徒"这股恶风使得全国有许许多多的同志受到审查与残酷迫害。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 中共中央关于"揪叛徒"问题的通知

材料一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像他

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徒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材料二　中共中央关于“揪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北京“夺权”运动

背景介绍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国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在1967年被“造反派”夺了权。掀起了所谓的“全面夺权”。北京也在1967年4月20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北京市委、市人大彻底解散。彭真同志由此受到巨大冲击。彭真的被打倒无疑是正在兴起的打倒刘少奇运动的一个部分。

材料：

材料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节略）

新华社二十日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住地，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在世界革命人民仰望的革命灯塔——北京，今天传出了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个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胜利地诞生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同志，副主任委员是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四位同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彻底垮台了，它宣告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倒台了。这是继毛主席和党中央一九六六年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之后，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的飞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我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它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创造了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增添了不朽的篇章。

今天，首都全城沸腾，数百万革命群众沉浸在火热的革命气氛和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有十万多人参加的在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是全城欢腾的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到会热烈祝贺，宣布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且作了重要讲话。首都无产阶级和全市革命群众，无限感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他们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一系列伟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说，在这个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原载1967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要文斗，不要武斗”

背景介绍

在全国大夺权的浪潮中，整个社会的秩序陷入了严重混乱。当时为了所谓的“夺权”，出现了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这是极为恶劣的事态发展。武斗造成国家财产的极大破坏，使生产几乎停顿，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人民日报》在此情况下于5月22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力图煞住这种事态的发展。但由于林彪、江青的唆使，武斗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日益发展。7月份，江青更是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使武斗急剧升级。这表明，“文革”形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本人所不能控制的了。

材料：

- 立即制止武斗

材料　立即制止武斗

近来，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群众组织之间，出现一股武斗的歪风。它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妨碍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影响和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秩序，破坏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坚决煞住这股歪风。

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决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决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而是懦弱的表现。在群众间进行武斗，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正如林彪同志所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当前，正当全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的时候，出现这股武斗歪风，决不是偶然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捍卫和贯彻执行十六条，做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模范。

革命派和一些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一些受蒙蔽的群众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正确地对待他们，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放下包袱，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抱着同志式的态度，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去解决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毛主席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学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善于同他们谈心，善于同他们商量，相信他们会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欢迎他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对一些受蒙蔽的同志，不应该歧视，不能侮辱，不能打击报复，不要动不动就把人家说成是“逆流”，“反扑”，“老保翻天”。

对于一些认识不清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来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分清敌我，认清斗争大方向，并且虚心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要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犯了错误，只要认识到了，改了，就是好同志。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不服气，在无产阶级真理面前，没有什么丢面子的问题。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迷失方向，那就有可能被坏人利用，跟着别人搞武斗，那是很

危险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和分歧，是正常的现象。只要争论的双方都能真正以大局为重，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多作自我批评，那么这些意见和分歧就不难解决。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也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求得解决。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应当允许别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决不要抓住对方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放，拼命地"上纲"，热中于"打内战"，人为地制造对立，甚至导致武斗。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是全国亿万人民所要求的政策。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一切革命群众要坚决捍卫这一政策，坚决反对武斗，立即制止武斗。

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这个《重要通告》指出：

"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

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

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毛主席批准发布的这个《重要通告》，全国各地工、农、兵、学、商和广大干部，都应当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的《通知》，以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伟大的历史文件》等重要文章，开展整风，总结经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提高斗争艺术，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七·二〇"事件

背景介绍

"七·二〇"事件是林彪、江青集团在武汉制造的一场打击武汉军区和一派群众组织的事件。1967年4月在江青煽动下，武汉少数"造反派"头头挑起武斗，甚至发展到以后公然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7月14日，王力和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到武汉后却公然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7月20日晨，武汉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这一说理斗争，被诬为"反革命事件"。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七·二〇"事件后，许多干部和群众被诬为"反革命"遭到残酷迫害。

材料：

·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节录）

材料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节录）

七月十九日，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我和钟汉华同志的检讨；下午三点多钟，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王力用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一九五六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六七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

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多钟。而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开始行动了。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题，并且解释清楚，王力到水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用心何在?

散会后，我和钟汉华同志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正在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 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立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围。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这天上午，主席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磨到中午时分，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同志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就在七月二十日这天，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江水一样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七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所希望的。

七月二十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勾结在一起，派邱会作和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和上海，邱会作临走时，江青交代他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了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

邱会作到武汉后，立即和主席身边的人“商量”，决定把主席转移到上海。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毛主席，邱说：林彪、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和江青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

另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主席边看信边笑，将信将疑，走不走，走，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没有下定决心，延至晚上八点多钟，主席同意去上海。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主席坐空军的汽车，在刘丰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向主席讨回信，主席问他：为什么要转移？又说：想游泳，现在看游不成了。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林彪、江青给主席的信写的什么内容，从来没有清查过。一九七四年，张春桥在京西宾馆的一次讲话中不打自招地供认说，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我想，毛主席对林彪、江青是存有戒心的，如果没有戒心，不论书面还是口头同意林彪的"兵变"之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七月二十日，总理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即决定重返武汉。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总理不以为然，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丢在山坡机场，仅带着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总理到武汉比邱会作晚了八九个钟头，主席已经决定去上海了。

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同志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七月二十一日，总理又叫我们去找王力，一心想把局势稳定下来。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七月二十日下午，叶明同志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叫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谁知张昭剑为了邀功请赏，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哄骗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吓得屁滚尿流，跟着张昭剑，在小洪山上连滚带爬，一直躲到第二天。

王力在山上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尤其卑鄙的是，张昭剑竟然对我们封锁消息。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总理叫我们找找王力，我们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觉得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便向总理作了汇报。

刘丰不知怎么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他中午窜到二十九师。一去就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善于投机的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王力要刘丰"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速报告了林彪。

这天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同志和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我和钟汉华同志，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但是，总理的话，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根本不执行。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〇"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甚至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恶毒攻击和诬蔑武汉军民。《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吴法宪和刘丰串通一气，说空军要对"七·二〇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听，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林彪。七月二十三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孔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本来，总理坐的飞机比谢富治和王力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

为了扩大声势，却让总理坐的飞机提前降落，逼总理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以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关锋第二天对王力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阴险狡诈的林彪，明明是自己胁迫毛主席离开武汉，反过来却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用主席的名义来打击敢于反对他的武汉军民。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开始了一场对武汉军民空前规模的舆论围剿。

（节选自《武汉“7.20事件”始末》陈再道，
原载《中国老年》总第1—5期）

共和国的最大冤案始末

背景介绍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一案被称为共和国史上的“最大冤案”。这场冤案由始至终均是林彪、江青集团精心策划、组织的。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开始，报刊上便把斗争的焦点指向刘少奇，毫无根据地称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光如此，林彪、江青为了彻底地打倒刘少奇，便直接控制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擅自决定逮捕干部、教授、炊事员等11人，严刑逼供，“突击审讯”，制造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的伪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林彪、江青的阴谋得逞，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材料：

-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节录）
-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节录）
- 中共中央通知
- 刘少奇被迫向红卫兵作的检讨

材料一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节录）——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戚本禹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向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

欠帐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

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

(原载《红旗》1967年第5期)

材料二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节录)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些阶级斗争的词句当然只是骗人的鬼话,当然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养》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重印。在几种版本里,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这样的《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触动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9页)“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1页)很显然,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修养”,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养》一书讲了国家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讲国家问题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不讲国家的阶级性质,绝对不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修养》一书偏偏抛开无产阶级专政,而像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那样,抽象地讲国家问题。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

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而讲什么“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这简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把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三段话是：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的改造”。

“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很明显，《修养》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他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修养》一书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也说明《修养》的作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修正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

“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就是《修养》一书的公式。这个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

真的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原载 1967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材料四　刘少奇被迫向红卫兵作的检讨

(1967 年 7 月 9 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7 月 4 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一)

1966 年 7 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 8 月 1 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

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8月2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参加你们8月2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几句话。

8月3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8月4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8月5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星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交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1966年)6月1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50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的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让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50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的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1966年5月16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8月5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8月2日的全院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来第三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8月2日和8月3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8月4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8月4日找工作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建议改选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负担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讲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他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还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的错误其及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予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成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

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

1967年7月9日

(原载1967年7月23日《反修红卫兵报》)

香港“五月工潮”

背景介绍

1967年轰轰烈烈的运动影响到了香港的工人。5月初开始，他们便用大陆上反击“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有力武器——大字报作为斗争的工具与港英当局进行了斗争。对这一明显受到国内政治气氛影响的举动我国政府是积极支持的，认为这是香港工人的觉悟与响应祖国关于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口号的表现。5月6日下午，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强剥削展开了斗争。香港当局竟出动大批武装警察与“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11日下午，再度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与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学生与各界代表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很多人。对此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材料：

· 香港爱国同胞仇视鄙视蔑视英帝

材料　香港爱国同胞仇视鄙视蔑视英帝

据新华社香港八日电　香港工人阶级正以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坚决反击港英当局最近颁布的所谓“禁贴煽动性标语”的“紧急法令”，他们说得好：“你有你的紧急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他们英勇地捍卫大字报，张贴大字报，要让更多的大字报出现在香港、九龙和新界各地。

七日晚，“天星”渡轮、油麻地渡轮和九龙仓三个单位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天星”渡轮工人同香港同胞一起，运用大字报这个新式武器，斗得港英当局威风扫地。港英当局怕得要死，慌忙颁布禁贴“法令”，并偷偷摸摸出动警察、特务上船撕大字报。这正好说明港英当局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说明大字报是狠狠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最害怕大字报，把它撕了，我们就要加倍地贴，要贴得更多、更高、更使人注目。

六日晚上七时左右，近百名港英“防暴队”和“水警”，开到“天星”渡轮码头，摸黑把渡轮工人张贴的抗英大字报、标语撕去。工人们立即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从晚上十时起，各渡轮陆续停航，七日继续停航，抗议港英当局一再无理撕毁大字报。

太古船坞三千多工人六日全部停工，抗议港英当局勾结这个厂的总经理卡素对工人贴大字报进行恐吓。工人们迫使卡素等人签字承认太古船坞工人斗委会的严正要求，保证工人的正义行动不受干涉。六日和七日，太古船坞内部出现了许多新的战斗性的大字报和标语。

香港电灯公司和中华电力公司红磡发电厂的工人，六日分别抗议港英当局撕去工人们的大字报。他们把大字报重新贴满厂房内外。工人们表示积极响应伟大祖国号召，展开仇视、鄙视、蔑视英帝国主义的运动，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港九各地包括港英当局开设的玛丽医院以及九龙城隧道、慈云山徙置区等地，七日同时出现用油漆写的中、英文标语和大字报：“粉碎港英反动统治！”“清算港英百年血债！”“打垮港英法西斯法令！”“港英必败！我们必胜！”“毛主席万岁！”这些大字报和标语显示了香港爱国同胞敢于蔑视英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

(原载196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1967年的外交困境

背景介绍

1967年中国先后与印度、苏联、印尼、英国、蒙古、缅甸、肯尼亚发生外交冲突。除了这些国家的错误反华立场这个原因外，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极“左”色彩也是加剧这些冲突的重要原因。中国当时在国际上所奉行的“革命”立场，使得1967年的外交处于困难之中。这里选取几篇抗议书。

材料：

· 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 我外交部向肯尼亚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印尼法西斯政权悍然中断同我国的外交关系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

材料一　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二十八日召见缅甸驻华大使信瓦瑙，向他提交一份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中国政府在照会中就缅甸政府唆使和纵容暴徒，在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连续袭击中国大使馆和其他中国机构，侮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劫走中国国徽，以及从二十二日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残酷迫害华侨的事件，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要求缅甸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保证中国大使馆和其他中国机构、中国派往缅甸负责中国贷款工程的人员和中国侨民的人身和财产 的安全，归还被劫去的中国国徽，严惩凶手。中国政府并且保留要求缅甸政府赔偿一切损失的权利。

韩念龙副部长就缅甸暴徒二十八日更加疯狂、更加野蛮地袭击中国大使馆、当场杀害中国专家刘逸的严重事件，向缅甸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声明保留进一步提出交涉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照会的全文如下：

缅甸联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缅甸联邦驻华大使馆，并申述如下：

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报告，六月二十六日，约两千名缅甸暴徒在缅甸当局的唆使和纵容下袭击了原南洋中学、原华侨中学，毒打华侨学生和去探望他们的家长，华侨多人受伤，至少有一人当场死亡。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外交人员闻讯赶去，竟受到暴徒的无理凌辱，他们乘坐的汽车也被暴徒砸坏。

六月二十六日晚、二十七日清晨和中午，多达数百至一千余名的缅甸暴徒又多次袭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它的各住地以及新华社驻仰光分社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驻仰光办事处等机构。这些暴徒冲进院内，大肆破坏建筑物，甚至纵火焚烧。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些暴徒竟然侮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并抢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在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和其他中国机构的过程中，在场的缅甸军警袖手旁观。尽管中国大使馆一再要求缅甸政府采取措施保证使馆安全，缅甸政府却置之不理，听任事态扩大，甚至威胁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要走出使馆。缅甸武装军警并参预了对华侨学生的镇压。

与此同时，缅甸暴徒还在仰光华侨居住地区抢劫华侨财产，残暴殴打华侨，有的华侨重伤致死。一片反华、排华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华侨居住地区。

最近，各种情况表明，缅甸暴徒袭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及中国其他机构并残酷迫害华侨的一系列严重事件，完全是缅甸政府所蓄意策划的。

六月二十二日，仰光原中国女子中学的缅甸学校当局，强行剥去华侨学生佩带的毛主席像章，并公然侮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激起华侨学生极大的愤慨。六月二十三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临时代办就这一事件向缅甸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指出华侨佩带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是华侨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剥夺，并且要求缅甸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缅甸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步骤防止事态的扩大，反而于六月二十三日宣布封闭原中国女子中学和原华侨女子中学。此后，据消息报道，缅甸当局又无限期关闭了九所华侨中学和小学。这样，就揭开了这一次全面反华、排华运动的序幕。

中国政府认为，缅甸政府唆使和纵容暴徒侮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袭击中国大使馆和其他中国机构、劫走中国国徽、残酷迫害华侨的一系列事件，严重地损害了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粗暴地破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问，缅甸政府到底要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要把两国关系搞到什么地步？中国政府就此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缅甸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保证中国大使馆和其他中国机构、中国派往缅甸负责中国贷款工程的人员和中国侨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归还被劫去的中国国徽，严惩凶手。中国政府并保留要求缅甸政府赔偿一切损失的权利。

必须指出，中缅两国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果缅甸政府置广大缅甸人民的愿望于不顾，一意孤行，继续执行疯狂的反华排华政策，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缅甸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原载 1967 年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我外交部向肯尼亚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新华社一日讯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董越千一日召见肯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玛依莎，向他提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中国政府在照会中就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李颉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肯尼亚一事，向肯

尼亚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肯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玛依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中国。中国外交部照会全文如下：

肯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肯尼亚共和国政府无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李颉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肯尼亚。这是肯尼亚政府肆意破坏中肯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对此，中国人民极为愤慨，中国政府向肯尼亚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宣布肯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玛依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零时起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中国。

肯尼亚政府为了制造这一严重恶化两国关系的事件，胡说什么大使馆破坏了外交惯例，对肯尼亚政府进行了直接攻击，干涉了肯尼亚内政，等等。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是，姆博亚先生别有用心地在议会上把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恶毒诬蔑中国。中国大使馆写信给登载姆博亚讲话的《东非旗帜报》和《民族日报》以澄清是非，这是完全正当和无可非议的。

肯尼亚政府妄图把破坏中肯两国关系的罪名扣到我们头上是办不到的。事实恰恰相反，几年以来，肯尼亚政府干了许多破坏两国关系的坏事。肯尼亚政府的一些部长多次公开反华，恶毒攻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甚至对中国总理进行人身攻击。肯尼亚政府至今已先后四次无理驱逐中国人员。肯尼亚政府还纵容暴徒五次砸毁了中国大使馆的新闻橱窗，严重地侵犯了中国大使馆的特权。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为加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和维护中肯两国人民友谊而尽自己的努力，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

目前，美英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正在疯狂地反华。他们已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反华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肯尼亚政府目前所采取的严重破坏两国关系的行动，正好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违背了肯尼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利益，损害了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中肯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如果肯尼亚政府追随帝国主义，一意孤行，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肯尼亚政府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原载 1967 年 7 月 2 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印尼法西斯政权悍然中断同我国的外交关系

雅加达消息：以苏哈托、纳苏蒂安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人政权在十月一日武装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卑劣的手段，践踏国际关系的起码准则，悍然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印尼反动政府十月二十三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是它充当美帝苏修反华走狗的丑恶面目的大暴露。照会宣布关闭印尼驻华大使馆，撤走全部人员。照会甚至狂妄地无理限定中国政府在十月三十日以前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和驻棉兰、马辰、锡江等地领事馆，撤回使领馆全部人员，从而中断了两国关系。

随后，印尼官方喉舌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电台和右派报纸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反诬中国“破坏”两国关系，并大肆宣扬印尼反动政府已经“关闭”了它的驻华大使馆。

这一恶毒的反华行径是苏哈托、纳苏蒂安之流一手精心制造的。十月九日，由苏哈托召集的“内阁主席团”紧急会议专门策划了同中国中断外交关系的阴谋。这一天，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给中国政府发了个照会，并且发表反华公报，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反华公报在宣布撤走印尼驻华大使馆全体人员的同时，极端横蛮地说：中国政府“必须撤走在雅加达的全部中国大使馆人员。只有在接到印尼驻北京外交官员关于他们已安全抵达香港或达卡的报告之后，印尼政府才能准许中国飞机在雅加达着陆。”

为了制造借口，公报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对中国政府大肆造谣中伤，攻击中国“违背文明国家的传统和习惯”，使印尼驻华使馆人员的“个人安全没有保证”。它甚至厚颜无耻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据称，这个反华公报是回答中国政府最近就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制造的反华暴行交给印尼反动政府的有关照会。众所周知，十月一日，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和一千多名暴徒，武装袭击和彻底破坏了中国大使馆，当场枪伤、打伤中国临时代办黄文胜等全馆二十名同志，制造了国际外交关系史上罕见的法西斯暴行。对此，中国政府于十月五日照会印尼驻华大使馆，向印尼法西斯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决定立即派专机前往雅加达，接回中国临时代办和其他重伤人员。

但是，中国政府的这一合理要求却遭到印尼法西斯政府的无理拒绝。反华公报说：“印尼政府不会允许中国专机进入印尼境内”。十分明显，印尼法西斯政府早就千方百计迫使中国政府撤回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部人员，

以达到它破坏两国关系的罪恶目的。

反华排华，破坏两国关系，是苏哈托——纳苏蒂安法西斯军人政权为了讨好美帝苏修而采取的一贯政策。最近，这个法西斯政权的反华行径更加变本加厉。不久前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举行过密谈的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在回到雅加达后，反华气焰十分嚣张。他在接见袭击中国大使馆的反动学生组织头目时，大肆攻击中国在印尼搞“颠覆活动”，并且毫不掩饰地叫嚷：“我们将向(同中国)中断外交关系的方面走去”。接着，马利克在雅加达对报界说：“我们正在干的是设法(同中国)中断关系”。他承认：“中断(同中国)关系，是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印尼政府下令从北京召回它的人员的时候开始的”。

印尼法西斯政府在破坏同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同时，更加明目张胆地同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加紧勾结。据透露，马利克从美国返回雅加达路过香港时，曾同蒋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主任马树礼“会晤”。回到雅加达后，马利克就扬言，“如果台湾自称是台湾共和国，印尼可以承认它”。据蒋帮中央社十日报道，马树礼对印尼法西斯政府决定同中国中断外交关系表示高兴，说这“增加了”印尼同蒋帮“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这些情况表明，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完全是蓄谋已久的。美帝苏修支持下的这个反动政权如此一意孤行，疯狂地与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为敌，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它越是加紧反华，就越要加速它自己的灭亡！

(原载 1967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二十六日发表声明，对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二十五日出动军警和便衣特务，野蛮镇压向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献花圈的中国留欧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毛泽东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留欧洲学生六十九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朗读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表达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

中国学生的这一行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全中国和全世界包括苏联的革命学生、革命青年和革命人民，都会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和赞扬。

但是，这些中国学生却遭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野蛮镇压。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

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这一法西斯暴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列宁斯大林墓前疯狂镇压中国学生，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嘴脸。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们听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凡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人，凡是背叛革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德意日法西斯没有好下场。蒋介石没有好下场。沙皇俄国没有好下场。考茨基没有好下场。赫鲁晓夫没有好下场。你们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中国学生的鲜血，已经不是第一次洒在莫斯科的街头。旧债还没有清算，新债又添了一笔。这笔笔血债，都必须彻底偿还！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这一血腥暴行，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自从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就一直串通美帝国主义，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头子们，四出奔走，对着社会主义的中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一连串的狂吠。这就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在中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却痛在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心上，也触动了他们的灵魂，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猖狂反扑，掀起一个新的反华高潮。

一支由六十多人组成的小小的学生队伍，手捧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本，刚刚读了两段，就吓得你们魂不附体，竟然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二三百人来武力镇压。这最生动地表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何等强大的威力，而你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又是何等的虚弱无能。你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纸老虎。

老实告诉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学生、革命青年和七亿人民，不是好惹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难道还怕你们这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苍蝇吗？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还有什么花招，统统使出来吧！你们的一时猖獗，不是表示了你们的强大，而只是表

示了你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现在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世界的时代，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苏联的上空，尽管暂时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们深信，它必将被革命的风暴卷去，伟大的、具有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绝不会容忍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这样横行霸道，他们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一个红彤彤的崭新的革命的苏联必将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必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原载 1967 年 1 月 27 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谭震林

谭震林（1902.4——1983.9）一位由小职员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 81 年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

他，1902 年 4 月 2 日，出生在攸县城关镇一个贫苦职员家庭。9 岁入学读了两年私塾，便进印刷厂当了学徒工。但他好学，自己精读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历史书籍。他曾这样说过：“中国的历史，我怎么了解的呢？我是从书纸店里了解的。因为小说里《水浒》是讲造反的。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是搞农民起义的。读了，就晓得革命。”20 年代初，早期的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产业工人运动，谭震林这个极普通的书纸业工人，亦在湘东偏僻的茶陵和攸县县城组织发动了两次工人斗争。

谭震林的斗争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被攸县党的负责人余来发现。在余来的帮助下，谭震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于 1926 年 10 月，由余来、戴述人介绍入党。大革命期间，他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等职，是攸县工农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之后，谭震林潜入茶陵，以书纸业工人身份坚持隐蔽斗争。1927 年冬，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推选为主席。随即，谭震林跟随毛泽东投入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土地部长。他多次深入宁冈、永新农村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制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特别是在井冈山根据地遭敌人“会剿”的严峻时刻，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动摇，谭震林却明确指出：“我们手里有枪，我们就能站稳脚跟。”因此他被毛泽东誉为“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1929 年 1 月，谭震林随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闽西，先后任红四军前委委员、红四军军委书记和红十二军政委等职，率部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特别是 1932 年 2 月一举击破闽西军阀钟绍葵旅，连克武平、上杭。周恩来称赞红十二军“有铁一般的坚固，火一般的声威”。

1932 年 5 月，谭震林担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指挥全军区积极投入苏区建设。但因支持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对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且同省委一起坚决抵制了王明“左”倾路线，受到排挤和打击，1933 年秋被撤销一切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主力红军长征，谭震林被留在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在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努力从事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使一支仅数百人的红军发展到 2000 余人，为捍卫和发展闽西南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谭震林任副司令员（随即调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于 1938 年 1 月开赴江南抗日前线，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一带，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同年 9 月又奉命西进，在清水潭、马家园等处打败了日寇的进攻。随即又在繁昌保卫战中，以七战七捷的光辉胜利，严惩了日寇的“扫荡”。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不得不承认谭震林“指挥得力，将士同心”。

1940 年 3 月，谭震林被派到苏南东路地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苏南东路地区地处长江咽喉，是沪宁路、沪杭路的枢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

位。叶飞领导的抗日武装西进之后，这里几乎成了敌、伪、顽的一统天下。谭震林在十分险恶的处境下，以“江抗”、“民抗”两支弱小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部队以“东出昆（山）嘉（定）太（仓），西进澄（江阴）锡（无锡）虞（常州）”为行动方针，6月挥师江阴，7月进军太仓，10月直达沙洲，铲除了东路地区的伪顽势力。到年底，整个东路地区除了县城、长江沿岸港口和锡沪公路几个敌伪据点之外，其他所有城镇和广大农村都成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东路的抗日武装也得到壮大。1941年1月，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时，江南抗日义勇军被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并兼苏南区党委书记。

1942年10月，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他时而“穿件簇新的蓝布长衫，下摆拖到地上，头上是一顶深褐色的铜盆帽”，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开明的上流社会阶层中活动；时而“上身着一件小布衫，下面却穿着一条草绿色的军裤”，深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194 年，他率部粉碎了日寇对淮南的无数次“扫荡”，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广大地区，扩大了根据地。

解放战争初期，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1946年9月，为抗击国民党军对华中解放区的进攻，他同粟裕指挥部队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等苏中地区，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带甲业农”。建国之初，他担任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副政委，浙江、江苏两省委书记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成功地领导了华东地区的清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治理淮河等重大斗争和建设工程。1954年12月谭震林调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4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他以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深入全国各地从事调查研究，探索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他针对各地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的现象及时进行了批评，还提醒人们注意“晚上一片红灯，白天一片红旗”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带来多少副作用”。为了解决合作社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1957年5月，他亲自回家乡攸县搞民主办社试点，驻社下队，倾听群众呼声。他认为：“社干部的作风不民主，遇事不同群众商量是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农业社对生产统得过死，卡得太多，管得太宽不利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他坚决反对平均主义，提倡劳动致富，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所得，即使万贯家财也是光荣的”。

在大跃进年代里，谭震林的务实精神受到了冲击，当了“浮夸风”的促进派。但是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认真总结教训，主动承担责任。

60年代初以后，谭震林一直主管农业各部门的工作，他不辞辛劳，走遍了全国大部分农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性的发展措施和意见。他指出：“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建设，包括水利、林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教育，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取我们能用得上的外国经验，走自己农业发展的道路。”他大力倡导科学兴农，在1964年1月西北地区农业规划会议上，号召科学家“从实验室、试验地里走出来，跟大田、跟农民结合”。又邀请在京的著名农学家座谈，希望“各方面的科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混合兵种，共同为一个目标服务”。他还要求各级领导把6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业生产高潮引向稳妥、扎实、科学的发展轨道，切忌重犯“左”的错误。

“文革”期间，谭震林抱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担心“造反”、串联冲击农业生产。1967年1月，他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农口“文革”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中，建议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他还毫不妥协地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在1967年2月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同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进行了一场正义的坚决的斗争，即所谓“大闹怀仁堂”。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谭震林被打倒。

1969年冬，谭震林被送到广西桂林“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3月才返回北京。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50年来为党为人民奋斗所建树的光辉业绩，他被选为党的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十二大的中顾委副主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晚年，他仍抱病坚持工作。1983年9月30日，正当谭震林激情洋溢准备出席国庆大典前夕，便溘然逝世了。

陶　铸

陶铸（1908，1——1969，10）湖南祁阳石洞源人，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同盟会会员，1918年因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被人告发杀害。10岁的陶铸因而辍学，1922年随族戚到安徽芜湖木号当学徒，1925年5月到汉阳竹木厘金局当稽查员。血泪的家史，艰苦的生活，促使陶铸发愤图强。尽管劳动繁重，他仍酷爱读书。当时武汉新思想活跃，陶铸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听时局演讲，他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萌发了革命的愿望。1926年初，他南下广州，入黄埔

军校第五期学习，并于“中山舰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革命洪流。

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底回到祁阳发动“年关暴动”，次年6月，因祁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辗转衡阳、长沙、武汉、徐州，在北京找到党组织，1929年9月被派往福建做兵运工作。从1929年到1933年，先后任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他曾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和南京中央监狱，被国民党叛处无期徒刑。狱中4年，他组织共产党员，团结难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在狱中坚持刻苦学习，比较系统地钻研了马恩著作。“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陶铸经营救出狱。不久，被调任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坚决贯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武装的方针，出任了由董必武发起，与国民党有识之士石瑛、民主人士李范一等合作举办的应城县汤池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班之主任，培养了300多名干部和上千名农民骨干，发展了一批党员。武汉和鄂中沦陷后，陶铸依靠这些力量，建立起以大洪山为根据地的鄂中游击区。

1940年，陶铸到延安学习，1年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王稼祥同志政治秘书、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秘书长，后又兼任总政宣传部长等职。他编印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领导作风》三本小册子，指导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5年5月，他以华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党的“七大”。

日本投降以后，陶铸奔赴东北，历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沈阳解放后，他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1949年1月，任四野军政治部副主任，平津战役中，奉命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贡献。

北平解放后，陶铸受命组织南下工作团，5月抵武汉，任军管会副主任。不久，任中南局常委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又赴长沙负责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并代表中央军委向起义部队授旗。

1950年10月，陶铸任广西省委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广西的剿匪任务。

1951年12月，陶铸到广州出任中共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1953年代理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省委书记。1960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直到1966年6月离穗赴京，他在广州整整工作15年。

陶铸到广州之初，广东省的土改尚未展开。由于他工作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广东省的土改在比内地起步晚的情况下，于1953年胜利结束。同时，他还正确地领导了“镇反”和“三反”、“五反”，迅速恢复了广东的生产和社会秩序。党的总路线公布后，他又积极地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亲自抓出了全国闻名的棋盘农业合作社和冠山农业合作社。

陶铸特别注重抓农业。广东土改结束后，即及时指出今后的任务应全力转向生产，提出“生产压倒一切”的口号，发动农民勤劳致富。他重视农业科学的研究，在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还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从1954年开始，广东全省大修水利，广东由进口大米省一跃而成粮食自给有余省，经济作物产量也逐年上升。他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干部群众兴修水利，发展林业。在工业方面，陶铸提出以轻工业为主，配置一定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要把广州从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大”后，全党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失误而带来严重损失，陶铸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便果断制止。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陶铸坚决贯彻执行。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东主持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陶铸被指定为起草委员会主任。8月，他又主持中南局南岳会议，起草了《关于当前经济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对中南地区的经济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陶铸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和工作生活上的困难。1955年12月他就指出，知识分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革命的”，应予“重视和信赖”。1961年又指出，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次年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主张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使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结交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朋友。他在广东专门成立了“高知”办公室，适当解决他们的副食品供应。对不愿去台湾的历史学家陈寅恪，陶铸关怀备至，为他配助手，帮助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问题，在院内修白色甬道，使这位患眼疾的老人也能散步。一些老专家老教授发自肺腑感叹：“知我者，陶铸也。”陶铸还以过人的精力，对科教文卫各方面的工作予以重视支持。他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多年，在他的关怀下，广州盖起科学馆，眼科医院，电影制片厂，办起了《羊城晚报》、《广东画报》，聚集了一批批科技人才。

陶铸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写作才能。无论是戎马倥

偬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从未停止过写作。据不完全统计，他的遗著有300多万字，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领域。这些著述，有的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有的抒发革命理想和情操，部分收入《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二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散文《松树的风格》、《革命的坚定性》等熔铸了他的理想和风格，迸射出熠熠光芒，成为人们传诵的佳篇。

陶铸又是一位诗人，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我欲问天何瞆瞆，漫凭热泪哭施罗"，"五年狱中艰辛过，一笑昂然对镜头。珍重此身须记取，阶级仇恨尚深留。"这些诗句，宣泄了对敌人的恨和对同志的爱，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拼将赤血灌春花"的情怀；"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抒发了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

1966年6月，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兼文办主任。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顾问。由于陶铸坚持原则，刚直不阿，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成为他们篡党窃国的障碍，遭到他们的忌恨，陷害和打击。1967年1月，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诬陷陶铸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叛徒"，从此，他失去人身自由，但仍威武不屈，顽强斗争。他写道：自杀，就是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究竟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陶铸的身体受到致命的伤害。1968年10月前后患了胰腺癌，得不到及时治疗。次年3月虽经手术，但马上扩散了。于1969年10月18日溘然逝世。

李　文　忠

李文忠(　　——1967)人民解放军某部六连四排，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先进集体。排长李文忠同志，贫农出身，共产党员。他和四排全体战士，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誓言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1967年8月19日，李文忠同志奉命率领全排战士，护送南昌县蒋巷区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回农村闹革命，在横渡赣江，行船遇险时，李文忠同志和四排全体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舍生忘死，奋战激流，使五十余名落水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安全脱险。李文忠、李从全、陈佃奎三位同志，在抢救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67年12月7日，授予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

郭　嘉　宏

郭嘉宏(1943——1967)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贫农家庭里。1964年高中毕业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了镇江象山园艺场蚕桑工区，不久被选为生产队长，1966年被选为"镇江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农业先进生产者"。1967年1月9日，郭嘉宏同志在京串连期间遇某工地失火，为奋勇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珍闻轶事

刘少奇的遗嘱

1967年4月9日午餐时，刘少奇听儿女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十分震怒。他推开饭碗，气愤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王光美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刘少奇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

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刘少奇在激动地讲完上述一番话以后，情绪便安静了下来。他平静地给儿女们留下以下遗嘱：

“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王光美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刘少奇坚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最后，刘少奇站起来，激昂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缅怀刘少奇》）

两位伟人的最后一次面晤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紧接着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由第二降到第八。这以后，刘少奇就正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了。

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少奇郑重提出二条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并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两位伟人的最后一次面晤。从这以后，刘少奇的处境越来越恶劣，对他的迫害越来越升级。

（摘自《缅怀刘少奇》）

周恩来、陈毅在1967年

陈老总拍案而起
周恩来保陈“过关”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以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高度肯定了这一夺权行动。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公然叫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于是，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的狂潮。“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夺权”的问题，周恩来、陈毅等与“中央文革”一伙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对此，周恩来尽量不与“中央文革”一伙正面冲突，只是始终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各部门的业务权，造反派对各部门的业务权至多也只能是“监督”。而陈毅却难以压抑住冲心的怒火，再次拍案而起。

1967年2月16日晚，中南海外事会议室。刚刚与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闹怀仁堂”的陈毅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和刚刚在外交部“夺权”的外交部“革命联络总站”的代表们，向“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说到这里，陈毅拍案而起，几乎是怒吼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再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这样，我陈毅宁可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陈毅缓了缓口气，又语调低沉地说：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陈毅的这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借毛泽东对陈毅“大闹怀仁堂”表现的不满，对陈毅大兴问罪之师。外事口的造反派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霎时间，“炮轰陈毅”、“打倒陈毅”、“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甚嚣尘上。面对这样的局势，周恩来心急如焚。

本来，在1月24日，周恩来亲自坐镇，精心布置，帮助陈毅闯过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万人大会“检查”关。那天，为了斗争需要，陈毅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暂时作点“应景”的“检查”。陈毅在大会上念的那份“检讨书”，也是周恩来再三修改定稿的。陈毅念完“检讨书”后，周恩来又为陈毅说了一些话，说陈毅同志为党工作40多年，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主席走的同志。他还说，一切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17年来外事方面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样，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陈毅当外交部长的工作成绩，封住了造反派的嘴巴。

不料，“检讨”刚过半个来月，陈毅在2月16日又打出这么一排“重炮”。的确，陈毅的这排“重炮”使周恩来对他的保护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由于周恩来对陈毅等一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遏制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因此，“中央文革”一伙对周恩来越来越不满。当时街上甚至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身已陷入了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然而，关键时刻，周恩来没有退缩。

1967年5月11日上午，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相继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标语。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事口的造反派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小时的谈话。会上，造反派对周恩来轮番围攻、起哄。

造反派：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自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我们要求陈毅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本来“五一”节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带头搞这样一个游行示威，还称要把陈毅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无法担这个风险。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请你说清楚些。

周恩来：你们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揪外交部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你们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你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批判错误可以，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造反派：什么条件？

周恩来：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

……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的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眼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周恩来又转向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的。不要在这里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

造反派继续给周恩来施加压力：我们下定决心，就是要打倒陈毅。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也用强硬的语气说：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主席思想也不同意这样做。不光是陈毅，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我现在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

……

谈话不欢而散。

两天之后，外语学院的造反派置周恩来的劝阻不顾，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组织代表，向他们发出最后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5月29日，毛泽东从一份材料中看到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抓住陈毅“问题”围攻周恩来，社会上也出现一股“炮打周恩来”的苗头，当即挥笔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领导组同志们做说服工作。

周恩来的严正警告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做依托，造反派们的“揪陈”行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陈老总几番遇险 周恩来舍身"陪斗"

1967年8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广大军民为反对以王力、谢富治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在武汉处理问题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而进行的群众性抗争(王力一度被群众扣留并被打伤)。然而，这一事件却被"中央文革"诬为"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而本来不起眼的王力因在这次事件中"光荣"负伤而名噪全国，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功臣"，也成为造反派们顶礼膜拜的"榜样"。

8月7日，王力瘸着一条"伤腿"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造反派汇报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王力用蔑视的口气反问：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 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有人说你们的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造反派抱怨说：有人说外交部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

王力说：这话不对。革命、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干革命那么"文明"啊?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坚决支持你们。

在王力讲话的煽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又一次向陈毅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氛围中，周恩来试图阻止造反派揪陈毅去作"检查"已难以做到了。周恩来深知陈毅性情刚烈，如造反派借"批判会"之名搞什么"低头、弯腰、认罪"之类，势必引起冲突，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更使周恩来忧心的是，他怕造反派不守信用，把陈毅揪走，转而秘密关押、迫害。1967年1月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就是被造反派长时间秘密关押、迫害致死的。周恩来曾为此痛哭流涕。出于上述考虑，从那时起，周恩来不得不亲自连续参加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以"陪斗"的方式来保护陈毅，这样既可随时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举动，又可确保陈毅不落入造反派手中。有时如果自己确实有事脱不开身，他就委派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前去参加，以随时掌握会场情况。他还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的口号、挂"打倒"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变相武斗、体罚等。

就在王力讲话的同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对陈毅的"批判会"。周恩来顶着正午的炎炎烈日，赶往参加会议。当他来到会场门口时，先到一步的卫士长成元功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当即止步，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了协议，为什么还这么干?并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才肯进入会场。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于是，周恩来就抱臂胸前，脸色严肃地站在裸露在烈日之下的台阶上不动。双方僵持着，整整一个钟头过去了，周恩来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地滚落在烤得火热的水泥台阶上。造反派眼见这个阵势，被迫摘下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

又是一次对陈毅的"批判会"。周恩来因接见外宾不能前去参加，便派卫士长成元功和秘书钱嘉栋到会。造反派得知周恩来不能到会，认为时机到了，立即布置了几百人准备冲击会场，揪走陈毅。为防陈毅走脱，造反派把陈毅来时坐的汽车轮胎给扎破了。情急之中，成元功拉着陈毅临时藏入一卫生间内。钱嘉栋紧急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调来两个连的战士迅速开到现场。这样，陈毅在成元功等人的保护下，乘坐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并不甘心。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周恩来亲临会场，精心布置。他指示傅崇碧司令员将警卫部队布置在台下，以防不测。果不出所料，会议开始不久，突然从会场二楼垂下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会场秩序顿时出现混乱。周恩来"噌"地侧身站起，两道目光愤然直逼坐在一旁故作镇静的造反派头头。随即退场以示抗议，并命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事先布置在台下的警卫部队迅速形成了一道"屏障"，把造反派挡在了周恩来、陈毅一行的身后。造反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陈毅离去。

8月16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悍然宣布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几位副部长被宣布停职"检讨"，我国外交陷入失控。8月22日，造反派和一些红卫兵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又一次就陈毅"问题"围攻周恩来，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医生紧急给以吸氧。造反派声称要组织"群众"冲击会场，要"拦截陈毅的汽车"。周恩来愤怒地斥责：你们谁要拦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会场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物极必反，这是任何事物无以逃脱的规律。就在王力等人狂妄嚣张至极之时，周恩来也在酝酿解决王力等人的方案。8月底，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材料报到毛泽东处，并提出要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毛泽东看完王力的"八七"讲话

后，愤然指示："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乱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毛泽东批准了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的报告。此时，江青、康生虽是痛失两员"干将"，但也只好"丢卒保帅"。

8月31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夺权"后那个"代理部长"的造反派头头，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一度失控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回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手中。陈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又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

——节选自《抗争，为了更好的抗争》

（北京）白水人

知青趣闻录

手　表

知青多无细软，手表更是稀罕。一日，某君由省城返乡，腕上多一计时之物。此物虽系家传，然年久失修，走时步履维艰，常有劳逸结合之举。一知青偶对某君问以时刻。某君先开窗，伸头仰望天空之日，复回首，低眉俯视腕上之珍，而有愧色，乃答曰："下午了。"问者啼笑皆非。

美　声

知青赵某，高且壮，嗓音尤佳。每展歌喉，其声低沉浑厚，圆润自如，且声震屋瓦。友人皆哀其生不逢时。有女知青久闻其名，未闻其声。一日偶过赵某所居茅舍，时正值黄昏，野旷山空，万籁俱寂，忽闻暮雾中有男低音飘然而至，其声美妙，果如所传，赞叹之余，不禁失笑。

徐明

抢吃"忆苦饭"

一天，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自然要尝忆苦饭。也不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意，拿出队上积存的几十斤谷子碾成米，加上好几百斤厚皮菜，煮了一大锅。会议进行中，旁边那锅菜稀饭早已弥漫出团团白雾，发出一阵阵诱人的清香。社员们个个翘首咂舌，不时扭头望着这团迷人的白雾，心里巴望发言快点结束。孩子们紧紧围住那锅灶不肯离去。当队长宣布开始吃忆苦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争先恐后，拿碗取钵，递到锅前。两个掌勺人应接不暇，累得满头大汗。我也拿着大搪瓷碗，舀满一碗，"嘘、嘘"地只管喝不管烫。这哪是忆苦饭呀，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顿美味佳肴。是啊，吃了几个月的红苕早已生厌，现在喝着这香喷喷的厚皮菜稀饭咋不觉得滑腻爽口嘛。不一会儿，一大锅菜稀饭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说安逸。"忆苦思甜"真个"成功"了。

张建军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出版始末

1967年，我国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从中国政坛上消失后，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北京总工会等单位的一些党史、工运史研究人员便着手纠正"工人运动领袖"的舆论导向，并商定举办《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筹备处成立后，立即在首都艺术院校油画师生中物色创作人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刘春华碰巧参加了油画筹展人员会议。会上，召集人布置了绘制毛主席七赴安源的任务，刘春华因坐在门口，重头戏便摊给了他。

随后，大队人马直抵安源。刘春华等立马走访当年的老工人，熟悉文字材料、道具、环境，并夜以继日地赶绘草图。返京后进行草图观摩时，刘的作品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要求修改。但由于刘固执己见，未能在限期内完成修改任务。

1967年10月1日，展览如期在历史博物馆举行。如云的观众对《毛主席去安源》推崇备至，留言整整写满4本。有的呼吁出版该画册，有的则称出版后认购几百张。但按当时规定，筹备处无权确定此事。年底，《人民画报》拟用该油画，将其制版后送交中央文革审查，江青阅后甚为中意，当即签发。

不久，筹备处为了展示"文革"中文艺繁荣盛况，决定在建党47周年之际推出一批力作。江青看了不少作品甚感失望，便又想起曾签发过的《毛主席去安源》。1968年7月1日，《毛主席去安源》被印成单页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往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并制成邮票、像章，收入中小学课本。

据有关部门统计，该画共印发了9亿张之多。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寝室里唯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油画；毛泽东一生从未去过中国美术馆，但却兴味所致将该画调到中南海。

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毛主席让我回乡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

毛主席支持这一行动,并把它看作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从此,夺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而激烈的夺权狂潮,带来的是全国空前的混乱。

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要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维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

全国的形势并未因这些指示的颁布而改变其混乱局面,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干扰。为此,毛主席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这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起到了稳定局势的积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警卫部队派出干部和战士到六厂、二校、铁道部专运处、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维护党中央机关正常工作运转。部队在国家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但是由于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和战士思想缺乏准备,地方工作经验不足,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和干扰破坏,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使军民之间鱼水关系一度有所损害。到了1972年8月21日,主席指示撤回"三支两军"人员。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大批遗留问题,使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逐步得到恢复。

按照主席当时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事情远不像他老人家设想的那么简单。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一旦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开展起来,很难一下子就让它风平浪静,何况当时全国已陷入混乱、无政府的状态。

5月8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在全国蔓延,派性斗争不断升级。这天上午,主席睡不着,在游泳池边散步,他看到我,说:"长江,给你15天时间,回家看看,摸摸农村文化大革命情况和生产情况。"我赶忙交待了工作,马上去买火车票。

月底,我回到北京。一天下午,主席叫我去他书房单独谈谈。我和主席像拉家常似的谈了一个多小时。有问有答,把我所见所闻全讲了出来。

我首先汇报说:"5月10日我到达扬州,街面热闹非凡,几个学校的师生都上街敲锣打鼓、游行,两派辩论也是相互指责,非常激烈,'保皇派'一面成为一派,指责另一派的罪状。"

主席说:"派性斗争北京有,影响到了全国。"

我说:"听群众反映,几派之间有时还进行武斗。"

主席讲:"我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几派要联合。"

我说:"你说的话对他们有利的就执行,各派都用你的话攻击对方。"

主席说:"原想今年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难收场。"

我接着说:"坐火车一路上时间没准,有些车站比较乱,交通秩序不够好。正常运行应该两天就到家,结果路上耽搁了,11日才到家。我利用劳动中间休息和晚上时间找社员了解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映。他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似懂非懂,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不能理解。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学生和国家机关干部的事,农民不能放弃生产闹革命。种庄稼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什么都不行。学生靠家长养,串联闹革命可以;机关干部和工人国家给工资,可以停产闹革命,我们不种地没有粮食无法生活。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主席听后笑着说:"他们挺讲实际的,生产就是一天不能停。"

从主席赞赏的语气中,我看出主席对几亿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搞好生产表示满意。

毛泽东问谢富治:大字报多少钱一斤?

我在农村听到各种各样的谣传,到处可见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学校、县城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社员家都悬挂着主席像,语录人手一册。有的大字报写着×××是走资派,×××跳楼了,还有的写主席找到一个儿子等等,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我把沿途所见所闻讲给主席后,主席当时就问我:"大字报写我找到一个儿子,你相信吗?"不等我回答,主席又接着问我:"你为这事辟谣了没有?你在我身边工作快20年了,我家的一切事,你都知道,有几口人更清楚。"

主席吸了口烟,语气缓慢地说道:"李敏,李纳、岸青、邵华、毛远新、李云露(江青的姐姐)、王博文(李云露之子),就这些人,大多上学,有的星期天才回来,现在又都

工作了，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连江青也很少让她来，你们都看到了？”

我接过话说：“在家这些孩子，我看着他们长大的，都很有礼貌，见到我都叫叔叔，他们什么事，我都知道。”

这时，主席胸脯起伏，有些激动，继续说：“不要说毛泽东没有找到一个儿子，就是找到一个，也不值得大写和特写。他们这样大写特写的目的是什么？”

说到这儿，主席面露不快之色，我心里也涌起阵阵不安。可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是解释不清的，就是当时辟谣又有谁会听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大字报太庸俗了，把私人生活的小事或捕风捉影臆想出来的事都付诸笔端，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由于大字报的许多内容可信度很差，所以后来人们对大字报也不怎么看重了，出现了卖大字报纸的现象。后来有一次主席问谢富治：“娃娃们揭大字报卖，多少钱一斤？”谢说：“七分钱一斤。”主席笑着说：“那娃娃们发财喽？！”

我正想得出神，主席又问我：“你们村有多少人当兵？”我回答后，主席接着说：“青年人到部队锻炼两年就够了，最多不能超过三年。要把兵役法改短一些，让更多的人到部队锻炼。’

我听主席这么一讲，十分兴奋，便说：“部队是个大学校，能培养各种人才 ”

谈到破“四旧”的事，我讲了自己的看法：“红卫兵破除迷信，捣毁土地庙，不信鬼神可以，但有些红卫兵太过头了，连凤凰自行车的牌子也要砸掉，看到有人戴外国进口表也要砸，有点乱来。盲目排外不好。在农村，我听人们议论，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向驻我国的外国机构造反，还制造了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事件。”

听到这儿，主席十分生气地说：“这事我已知道了，这样干是无知，是做蠢事，是极‘左’分子干的。”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当时社会上有些造反派，越闹越凶，甚至肆无忌惮地冲击军事机关，叫喊“抓军内一小撮”。当谈到这种现象时，主席果断地回答：“军事机关不能冲，担负着战备任务和保卫国家的安全。”

我向主席汇报，没写提纲，只是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他主要是想了解几亿农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听我讲家乡的农业生产搞得较好，“文化大革命”对农民的生活生产影响不大时，主席表示满意，他说：“什么时候都要依靠广大农民、工人、干部的大多数，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基础。”

最后主席说：“今天你谈的不错，讲了不少，使我对农村的情况有所了解。”我站起来和主席握手告别，离开了书房。这次谈话是我一生中和主席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主席忧国忧民的心情使我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他的求实精神也更加使我难忘。

1967 年 7 月 13 日下午，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后，诙谐地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会上主席决定到外地巡视，指定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同行。

毛泽东出巡，解决武汉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秩序不够好，有的地方形势比较严峻，武斗成风，加之铁路交通很不正常。根据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的指示，我多带了一些警卫人员。以前一般只带 20 多人，这次挑选了 120 名有经验的警卫战士和干部，都是精兵强将。临行前，我们反复动员，让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战斗，并准备齐全了武器弹药，还做了明确的分工。即前去火车站 50 人，编三个战斗分队负责开路，观察沿路两边制高点有什么情况没有，及时向主车汇报；后尾车 30 人，分两个战斗小分队负责后尾，防止追随主车的现象发生。我在主车，共 40 人负责保卫主车，当时规定无论是行车或临时停车，都要时刻警惕，保证主席的安全。我们每人配备了手枪，装备了 10 挺机关枪、100 支冲锋枪和弹药。

这次行动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外出，心情比较紧张，主要是担心主席的安全。当时要求大家为了保卫主席，要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晚上，我们陪同主席从北京出发，开始巡视大江南北。第一站是武汉。

15 日晚，主席到达武汉。

主席住在东湖宾馆梅岭 1 号，这里十分幽静。

连续两个上午，主席召集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和武汉军区、地方有关同志，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的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

由于武汉情况复杂，主席取消了畅游长江的计划。后来听说主席给向他汇报工作的人做了如下指示：对武汉问题，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主席讲话精神，当时与主席随行的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想不通错在哪里，很难接受。

后来，陈再道、钟汉华到梅岭 1 号见主席，主席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主席还说："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工作。"

可是，谢富治、王力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有意加剧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还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就激起"百万雄师"组织的强烈不满，加上二十九师对军区不满，冲到军区大门口，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乘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装着警笛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讲话是什么意思？武汉军民一起涌向街头，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全副武装的指战员，排成四路，举行游行，高喊"打倒王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了东湖宾馆周围，封锁了武汉市区，并中断了长江和汉水河的交通，阻止住武汉三镇的反对派。有的还占领了火车站、电话中心和机场，并在全城建筑据点，几派之间打伤了不少人。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我把部队布置在东湖宾馆周围，以防游行人群冲进来。从 7 月 20 日早晨开始，我们在驻地周围，时刻高度戒备，大卡车上架起机关枪，战士们头戴钢盔，全副武装，以防意外。

周总理得知武汉事态不断扩大的消息，决定亲自来武汉处理问题，他最担心的还是主席的安全。

7 月 20 日下午，总理带了 200 名警卫部队战士和两架大型飞机直飞武汉。由于吴法宪搞鬼，故意把周总理乘坐的专机，调到山坡机场降落。山坡机场距武汉五六十公里，我们抽 20 名指战员与地方配合，把总理接到东湖宾馆。总理带来的部队没有随我们一道入城，考虑在当时情况下避免发生误解。

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再道、钟汉华、杨成武、汪东兴等。总理希望尽快稳定武汉局势，稳定军区领导班子。总理还亲自和杨成武、汪东兴研究主席的安全和转移问题，同陈再道、钟汉华研究解围武汉机场和东湖宾馆到机场沿线道路开通问题。他还亲自查看机场，把自己坐的飞机从山坡机场调过来，让主席坐，晚上又检查了必经的道路。20 日夜，主席乘吉普车，我们部队乘两辆卡车，缓缓开出东湖宾馆，向机场转移。一路上关卡很多，部队调动频繁，气氛十分紧张，有一触即发的感觉，各派都做了战斗准备。由于总理细致的安排和各方的协商，我们一行总算顺利到达机场。我带 20 多个人和主席乘一架飞机，其余的人上另一架，连夜飞往上海。此时，我悬着的心总算平静一些，多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搞得人十分疲惫。

武汉事件，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军队官兵对中央文革小组极"左"错误的强烈不满，致使局势发展到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主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8 月底，他批准总理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这是主席对中央文革大为不满的表示。

随后，中央连续发布了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武汉事件中，李作鹏、刘丰有意制造混乱，当天扬言："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打倒陈再道。"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声讨"七·二〇"事件，并要武汉军区负责。

24 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赶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林彪、叶群等人指使三军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包围宾馆，要揪出"黑后台"，把矛头直指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等一大批军队负责人。顷刻间，"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满城皆是。从此，全国性的舆论大围剿，为"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

当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

25 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王力、谢富治等人，林彪姗姗来迟。他在会上发表讲话："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仅是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还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

我们住在上海，心里却十分惦记北京的局势，听机要通讯员说：中南海周围有很多单位安营扎寨，搭起篷子，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吵声、喊声、闹声不断，要揪刘少奇，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

"许世友不能被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接来吧"

此时，全国形势陷入无政府状态，打砸抢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每年一度的广交会推迟一个月，主席的专列从武汉开到上海都很困难。

主席到上海后，派人找来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了解当地情况。事后，杨成武向主席汇报："有人要打倒许世友，听说许世友要到大别山去。"主席一听，有些担心地说："打倒许世友，其他几个大军区的陈锡联(沈阳)、杨得志(济南)、韩先楚(福州)不都要被打倒吗？许世友不能被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接来吧！"

杨成武站起来回答："我就去！"

主席摆摆手："不，你不要去，派张春桥去！你知道派张春桥去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张春桥是反对许世友的呀！"

没过多久，许世友果真来了，我站在门口接他，看他情绪不高。许世友大步迈进门口，看到主席，很动情，"主

席”一声还没有喊出来，就哭了，这种情景令我终生难忘。看得出，他对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主席招呼他坐下，安慰道：“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是个大军区的标兵。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好好掌握住。你要靠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去好好干。”

许世友一听，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回答：“主席你放心，我有几个军。敌人来他几十万，我也能打垮他！”

许司令员从主席那里谈话出去，情绪和来时大不一样。他对主席的忠诚是世人皆知的，直到“九·一三”事件，他都在时时刻刻关心着主席的安全。

主席除在上海找王洪文、张春桥和驻军领导人调查了解情况外，一路上还找了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领导人做工作。主席巡视了南方几省，不满意自己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对几派相互武斗，使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不高兴，更为忧虑和焦急。他再次强调要各地领导做工作，团结工人、农民和干部的大多数，团结群众组织的大多数。

我们一路上得到各地领导和铁路部门的密切配合，于9月4日顺利回到北京。

9月5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主席回京的“极为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套红大字标题报道了这条消息。

视察期间，主席不断作出指示，其中心强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号召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领导班子实行“三结合”。主席还重申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曾忧虑地对总理说：“中国现在就像要回到八百诸侯纷争的战国时期。”

主席在谈话中还批评红卫兵说：“要告诉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主席在巡视期间，听到看到的情况，使他对全国严重的混乱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他要总理采取措施，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这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形式同往年差不多。我们派一些人到天安门执勤。

这天上午9点40分，主席从游泳池出发，我的车在前面开路，10点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庆祝活动没有新的内容。林彪发表了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林彪的讲话充满了鼓吹个人崇拜的语言。

（陈长江口述　李忠诚　伏慧敏执笔）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节录）

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讯，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13年前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张重一，1967年时67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就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疸，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而且同刘少奇、王光美毫无关系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我们且看这些报告吧：

1967年10月24日专案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江青批阅同意。

就是江青批准的这一纸计划，使张重一最后惨死在病床上。

1967年11月9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记述了审讯张重一这一骇人听闻暴行的全部过程。报告是这样写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切正直的人们，请看看这篇“自供”的报告吧。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残暴凶狠难道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什么“花岗岩脑袋”？这是他们对正直人的诬陷。
什么“拒不交代具体罪行”？因为事实根本不存在。
什么“大力抢救”，“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他们把

人类救死扶伤的医学科学，变成了追逼口供的手段！

他们不惜一切，日夜逼问的所谓"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究竟是些什么呢？

记者听过两盘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实况录音。据记者了解，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共有80多盘。但是，后来有些被洗毁，只剩下20盘了。就是这20盘录音带，成了江青残害人民、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铁证。

把若干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那将是冗长的。特别是，其间有许多时间是病人的哀号声，要求"把手掰一掰"、挣扎着要起来又被按倒的声音，有命令吃药的喝斥声，有"快说，快说"的逼问声，以及垂危病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呻吟，等等。我们略掉这些，只记录其中的几节，让录音带来控拆江青们的暴行吧：

录音带发出沙沙的声响，把人们带进阴森恐怖的审讯室，这里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癌症的扩散，使他生命垂危；剧烈的疼痛使他呻吟、哀号，不断扭曲身体。床头悬吊着输液瓶，扎在他手臂上的输液针管摇荡着。几条汉子围在床前，几只粗壮的手按住病人的四肢。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审问；一个衰弱无力，语无伦次、不时夹杂着哀号的声音在回答。

问：张重一，你把你知道的王光美的情况交代一下！

张：哎……哟……这，这是完全应该的。得让我好好想……

问：你想了好几天了！

张：我应该说，我是想王光美这个人，现在还没想得清楚。

问：王光美是特务不是？

张：（含糊不清的低语）

问：你了解什么情况？

张：跟他父亲的关系！

问：她父亲是怎么个关系？

张：嗯，哎……我怎么这么糊涂呀，现在又搞不清楚了。

问：你现在一点也不糊涂！你今天把问题交代清楚，好住院去。

张：（含糊不清的嘟囔音）……我愿意。

问：她父亲叫什么？

张：唉，唉，我忘了……嗯，我感觉这里面有错了。哎，我说的可能是刘少奇，我说乱了。

（挣扎的声音，几个人叫"不要动"、"不能动"、"你一动就危险"的声音。一个长时间的混乱。）

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

张：嗯……我昨天……好像说过。

问：王光美是特务与刘少奇是什么关系？

张：与刘少奇……关系，我不知道。

问：你要端正态度，否则对你没好处！

让我再抄录几节。还是那个粗暴的审问声。回答是混乱的，病人显然是处在神志更加不清醒的状态中。

问：你认识袁绍英是谁吗？（注：袁是杨承祚教授的夫人）

张：认识，是杨承祚的小舅子。

问：你认识杨承祚的老婆吗？

张：认识，她叫袁振新。（注：杨承祚的夫人叫袁绍英）

问：这人是男是女？

张：男的。

问：这人在哪？

张：哎……我闹不清楚。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很是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张：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审讯者设下圈套对一个垂危病人诱供、逼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从垂死者口里捞取诬陷材料的紧迫状，被审者在昏迷状态中受残酷折磨语无伦次的情景，都由录音带真实地再现在人们面前了。

就是这样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被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使江青们如获至宝了。江青、康生、谢富治就凭张重一的，以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祚的这样一些"口供"，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指挥下，遭受刑讯逼供的还有丁觉群、孟用潜等，因为他们在1927年、1929年分别同刘少奇同志共同做过一段时间的党的地下工作。

丁觉群1967年9月3日写的材料说："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他搞了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

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这样的“交代”，江青是不需要的。于是，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降落到丁觉群身上。

他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9月25日，他又专门给审讯他的人写信：“老杨：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江青需要的，正是这种“打破事实框框”的伪造！

孟用潜，1929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同志一道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有关，他们被取保释放了。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江青、康生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不仅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而且要打成“内奸”。

孟用潜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1967年6月22日专案组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江青在另一个呈阅件上批：“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

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他们制造伪证所采用的手段，还有更离奇、骇人听闻的。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介绍王光美作军调部我方翻译工作。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崔月犁也遭诬陷、迫害。他们审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他不知道；审问他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38，这群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审问人又逼他背“百家姓”背诵到“蒋沈韩杨”，又是一顿打。他们拿来杨承祚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祚”，给他看，让他念。就这样，崔月犁就成了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也成了他自己介绍王光美“打入”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就是江青、康生等人这样制造出来的；许多人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也是江青一伙这样制造出来的！

（原载《历史和审判》，作者：李耐因）

所谓“二月逆流”的始末

聂荣臻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二月十六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

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二月十六日下午,恩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

两个月以后的四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和操纵各种群众组织,对老同志们每天都在打倒、炮轰、纠缠,使你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林彪、"四人帮"一伙看到有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同志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们发动了总攻。

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

我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同我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可以挑拨我和这些同志的关系,另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份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实际上简报中他们塞进了许多私货,同志们在会上除了一般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此外,如果哪位同志不积极揭发批判我,还可以被他们记上一笔立场不坚定的帐,真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别的老同志在会上的处境,也跟我大体差不多。

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他心里有鬼,他的福建话别人又听不懂,咕咕囔囔,我根本没有理他。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

'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事情很明显，林彪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

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阴违。一月五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

（原载《聂荣臻回忆录》下）

"联动"事件始末（节录）

1967 年夏天，北京"八一"学校院内，举办过一个名噪一时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展览以所谓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把充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急先锋"的"联动"成员，描绘成一群"腐化堕落"、"穷凶极恶"、"青面獠牙"、"手挥皮带"，专搞打、砸、抢的"暴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炮制展览会的阴谋家们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联动"的"高级消费品"是外贸部抄家得来的财物；匕首、铁棒等凶器是从公安局借来的；自行车是从一些学校学生手里扣下的；外国画报是从图书馆搬来的；而那些被毁坏的教具和标本则是蒯大富、聂元梓之流指挥一些打手一手砸坏的……

这是一个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呵！

那么，这些阴谋家们精心策划这样一个骗局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时，号称"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对此做了最好

的说明："现在中央文革直接抓这个展览，让大家看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不行？不反击资本主义行不行？国务院在这里搞了些什么东西？"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二十年前，围绕着"联动"事件和这个展览会所发生的一切，反映了"十年动乱"中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和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一)

1966 年 11 月 27 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同许许多多人一样，在"文革"开始时，也曾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运动的漩涡，有过狂热的举动。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出人意料的发展，却使他们渐渐地清醒过来。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牛皖平和其他几个人是最近才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乱了！"这个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本来是想到外地开开眼界，找点"教育改革"的经验的。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斗、批、改三阶段吗？他和校"文革"的几个人就曾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半农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可是，西安、武汉、广州……一路上，他们所到之处，省委、市委的各级班子几乎都瘫痪了，造反派的"炮轰"正逐步升级。难道这些领导都成了黑线人物？都不能用了？他是带着满腹疑团回到北京的。

而作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云压城"的景象：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崛起的蒯大富、聂元梓之流，转眼间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左派"。他们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像"拳头"一样到处乱打，竟有恃无恐地发展到揪老师、冲击军事机关、炮打国务院了。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就是那个"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之流，青年们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清华附中的卜大华记起了这样一件事：那还是八月初在天桥剧场召开的一次辩论"对联"的大会上，江青突然把他和几个学生"红卫兵"的负责人找到一间化装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我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接着，她又煞有介事地对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说："平平，你是不是镇压革命同学了？你应该很好地向同学们检讨……"正讲的时候，江青突然看到一位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在做记录，不知怎地发起火来："呵，你是来做密探的吗？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怕他们！团中央胡耀邦原来是个红小鬼，现在我看是个胆小鬼……"

…………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三司'，咱们是'四司'。"有人说。

"要不就叫'造反兵团'……"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我看就叫'联合行动委员会'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言起草"联动"宣言。

12 月 5 日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这天夜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为了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全力以赴，冒着刺骨寒风，奔走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些标语在动乱的年代，就好象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几声步枪的连发，青年们觉得很不过瘾。殊不知就是这几条标语也足以刺痛"中央文革"及那些打手们的神经了。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正悄悄来临。

按照既定方针，"联动"成员们开始行动了。12 月 6 日，牛皖平等十余人来到一个蒯、聂控制的组织，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了几十个打手的围攻，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牛皖平等人未及开口，只好冲出重围，主动地撤了出来。

12 月 7 日，"联动"再次派出石油附中、农大附中的同学二十余人前往这个组织所在地，谁知，他们竟用电话调来上千人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周总理派周荣鑫同志前来调解。蒯、聂之流不容他人发

言，竟然围攻周荣鑫同志，周荣鑫同志耐心劝解，直至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一二·二六”大会被躲在灯火楼里的蒯、聂之流派出的“特务”照了相，连同大会的传单自然是火速送到江青等人的手里，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具体描述他们当时恼羞成怒的丑态。但两三天后，当时某大学“红卫兵”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接到的电话却很说明问题。

电话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打来的：“怎么样？在‘联动’的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

“我们，我们……”这位“司令”还想解释什么。

“不要解释了，”戚本禹仿佛在极力抑制着心中的怒气，“你们考虑考虑，连个‘联动’也对付不了，今后你们还想不想当左派！”

电话挂断了。戚本禹及其主子没有说完的话，在后来出版的1967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这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这伙野心家们恶狠狠地宣称：“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接着文章又使用了“实行专政”、“法律制裁”、“天罗地网”、“坚决消灭”等词汇，透出不可抑制的杀机。

他们宣判为“反动派”的是在“一月风暴”中被夺了权的各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而作为“反动组织”的“联动”，当然也在其中。

绞杀令下达了。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1月1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开大会，“安排”“联动”成员，原校筹委会主任赵战平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下午三点，赵战平的“检查”还没做完，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十三个大专院校共三千多人突然包围了会场，同时公安局还出动了五十余名警察，抓走了赵战平、邹平等三人。接着他们便以“捕获‘联动’巨头”为名，在西单、东单、王府井等处，押着赵战平等游街示众，以欢庆所谓的“胜利”。

1月19日下午，蒯、聂之流又纠集了上万人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过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把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了。当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这些无私无畏的青年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

当蒯、聂围抄北大附中时，“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同志死死抱住电话机就是不撒手。几个人粗暴地压住他，从他怀里抢走电话机，并砸坏了桌椅……一番血洗后，于增寿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空荡荡的教室，这位老工人的儿子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1月25日下午四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集三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了。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似的，师生一概许进不许出。五时左右，搜捕开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统统踢开，暖气道被拆开，天花板被踩坏。当时在校的320名职工宿舍有一半被抄，仪器室、标本室、图书馆被砸得乱七八糟。前后抓走32名学生，甚至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抓走关进了监狱。

这一罪恶行径激起“联动”成员极大愤怒。他们看出幕后操纵者是“中央文革”，于是就组织起来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要人。但“联动”代表几次到公安部要求面见谢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见。而随意抓人的情况却愈演愈烈。于是，气愤的“联动”成员们就在公安部的墙壁上刷上了“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没想到这更加招致了围攻和殴打。很多“联动”代表同时遭到逮捕。这就是所谓“冲击公安部”的真相。

…………

4月22日，这是他们难忘的一天。这天晚上，监狱灯光球场突然大放光明。院子里开进来好几辆大轿车，一百多名“小政治犯”被叫出来上了车。拉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停下来，他们被带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等候。突然，大厅的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走了进来，青年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哗”的一下全部站了起来，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周伯伯……”顿时哭声喊声响成一片。周总理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这一百多个孩子，脸色蜡黄，眼泡是浮肿的，男孩子头发有寸把长，女孩子的短发乱蓬蓬的……总理不忍再看下去了，他挥了挥手让青年们坐好，然后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了起来。

大厅里一阵沉默。

总理又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和激动，他低着头，默不作声。

总理说：“你的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与总理的目光相遇了，总理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总理明确地指出：“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

“联动”成员们本以为放出监狱便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但他们没有想到，“四人帮”在一月夺权和反击“二月逆流”之后，已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牢笼，在这洒满烈士鲜

血的土地上，“正义”被捆住了手脚，“民主”被戴上了镣铐……

“联动”大胆的反抗，深深激怒了正待扶摇直上的野心家们，报复是残酷的！牛皖平被释后，又被揪到学校和父亲所在机关批斗，随之取消他的预备党员的资格，连上山下乡的权力也被剥夺，在家中等候两年多仍无出路，只得化名回老家去落户，至今还用的是假名字；孔丹的妈妈许明因揭露江青的丑恶面貌，遭到迫害，倍受凌辱，终使这位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的女同志含冤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为“反动”儿子的“后台”；贺邯生参军后，在一次行军途中不慎把腿上的韧带撕断，仍坚持步行一千多华里，但因“联动”问题，参军不到三个月就被“赶”出部队；郭大勋也被“赶”出部队，因为“联动”，两年之间不得安排工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但更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及蒯、聂之流还根据张春桥的“阶级关系新变动”，利用宣传机器把“联动”描绘成“土匪”、“流氓”，并且列出这样一个公式：“干部子弟＝联动＝反革命”，在人们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偏见。

…………

在1976年的清明节，他们的怒吼和天安门广场的国际悲歌汇聚在一起，在金风飒飒的十月，他们的欢笑又和举国上下胜利的锣鼓熔合在一起。同时，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79年2月，胡耀邦同志首先对“联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牛皖平、马晓军等人的申诉书上批示道：有关部门应对“联动”问题，“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善后。”

同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对“联动”成员发出复查结论，指出：“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把群众组织‘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是别有用心的”。

1984年2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将孔丹、董志雄的一封来信印发后给政治局、书记处，同时明确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

同年4月，在宋任穷、王震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公安部和团中央分别召开了当年“联动”主要成员的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同时，《红旗》杂志社也向“联动”成员发出通知，对“联动”问题正式予以平反。

（原载1986年第5期《追求》，作者：乔伊　徐雅雅）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极“左”思想进一步泛滥，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自上海所谓的“左派”夺权后，全国均掀起了“夺权”风潮，所谓夺权乃是夺“走资派”的权。社会舆论也一致指向“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文艺领域也展开对“走资派”与“叛徒”的大批判。所以这一年流行的口号如“斗烂、斗臭、斗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及“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死谁！”均反映了形势的特征。京剧《海港》的出现与流行从当时对它的评论来看就是针对所谓“修正主义者”与“走资派”的。

流行口号

1.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4.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5. 文攻武卫！
6.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7. 向革命左派致敬！
8. 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9.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0.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11. 斗烂、斗垮、斗臭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

戏剧《海港》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一个反映六十年代上海港码头工人斗争生活的戏《海港的早晨》，出现在淮剧舞台上。这株新生的幼芽虽然得到码头工人的喜爱，但却遭到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们的百般鄙薄与刁难。一九六四年春，江青同志看过后，满腔热情地肯定了这出戏。她认为这出戏出现在当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戏剧舞台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江青同志还亲自到码头找工人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并建议上海京剧院进行改编和移植。她再三强调，改编首先要加强码头工人立足海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气概，

歌颂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要满腔热情地塑造铲煤女工出身的党支部书记和码头工人出身的装卸组长。对青年工人韩小强要写得单纯而可爱，具有远大理想，他的不安心工作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江青同志的指示给《海港》划出了前进的航线。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他们后台的支持下，大肆污蔑这出戏"丢了传统"，"完全生活化了，没有艺术性，谈不上是戏"。甚至狂妄地叫嚣《海港》是"大毒草"，扬言要把唱腔一句一句地批倒、批臭。

《海港》第一次成功地在京剧舞台上表现了六十年代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受到了广大工农兵极其热烈的赞扬。上海港的码头工人万分激动地说："《海港》写的是真正的工人，真正的工人登上无产阶级戏剧舞台就是好。"还说："看了《海港》，忘不掉旧社会的苦难！看了《海港》，更扛得起支援世界革命的千斤重担！"来自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是对《海港》的最大鼓励和最权威的批准，也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包庇和支持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沉重打击！它像一发重型炮弹，射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粉碎了他妄图歪曲历史、丑化工人的阴谋！

（本文转载自《解放军文艺》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以上这篇文章的矛头所向，目的何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历史档案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解决了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但是，当时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教训，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中心课题。它不仅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的命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新的伟大的榜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甘心剥削制度的灭亡，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挑战举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道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揭露了出来，群众把他们斗得威风扫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和那些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

责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们暂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些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毛主席的声音，像一声春雷，在极短的时间内，红卫兵在全国各学校和许多工厂、农村发展起来了，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革命的红卫兵，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他们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头。他们起了先锋作用。

革命大串连，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倡导的。革命师生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连成一片。革命大串连，在全国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这条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它在党内的影响，兴风作浪。他们使用阴一套、阳一套的种种手段，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把他们暗中所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账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帐的。"秋后算账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账。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能够蒙蔽一些群众呢?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党的领导，把相信党说成是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还特别宣扬这样一种论调，

就是要人们不讲原则、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领导。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解决王明路线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事实上，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坚决接受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坚决反对奴隶主义，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无所畏惧地按照这个原则办事，并且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为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所掌握，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被缴了械。

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做了许多政治思想工作，广大革命群众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有些同志已经改正了错误，有些同志正在改正错误。这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对于那些还不肯改正错误的人，应当大喝一声：必须悬崖勒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群众玩弄两面手法，那就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流了，或者证明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深刻的。几个月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亿万群众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要压制群众，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保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

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有些革命学生走到工厂，走到农村，开始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机关干部中，涌现出了更多的革命闯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了。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

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按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四清运动要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工人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斗垮工矿企业和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挖掉。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说过：“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同样，在今天，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

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碍生产。因此，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种田、织布、炼钢是为了什么？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只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还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群众起来大搞革命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其中有的人，甚至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快要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

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主席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今天，也是这样："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也是这样：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下厂下乡和本单位斗、批、改，要作合理的安排。对于前一段本单位的斗争，要作必要的总结，进一步明确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分清大是大非，端正下厂下乡的态度和认识。

下厂下乡，要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眼睛向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包办代替。

下厂下乡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到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更明确地认清大辩论中的是非。只有工厂、农村彻底实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听取工人和农民的声音，才能切合实际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们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

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造成这样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同亿万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广大群众在这种大民主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这种大民主，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学校。

毛主席告诉我们："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我们运用大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而只能是少数人对革命群众的压迫。

我们提倡的大民主，是在毛泽东思想集中指导下的

大民主。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压制别人。在人民内部，如果只允许自己发表意见，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那就违背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动被他们蒙蔽的群众进行武斗，来压制革命，这是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不用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不会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搞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制裁。一切革命群众，都应当协助和监督我们国家的专政机构，执行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任务。对于那些思想反动、但没有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由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偶然的。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就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存在着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动路线的人，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在工矿企业，在农村，在大中小学和文化各界里，在党政机关，在各个领域内，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清除它的影响，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农民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在各个战线上，都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使我们的党政机关，彻底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至于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打倒，那是咎由自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将更加坚强起来。

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提高和整顿。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善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把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定还要玩弄新的花样，继续捣乱。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当然，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也是纸老虎。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纲，结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一步响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的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锻炼和壮大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月4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月30日含冤去世。

1月初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在上海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8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等，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此前后林彪煽动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对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在林彪，张春桥等人的煽动下，夺权之风刮遍全国。1967年，继上海之后，1月14日山西、1月25日贵州、1月31日黑龙江、2月3日山东、4月20日北京、8月12日青海、11月1日内蒙古、12月6日天津等八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了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更加深了混乱的局面。

1月11日　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2月3日　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但是，由于他提倡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因而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日趋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

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指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和各地出现了许多所谓全国性组织，它们都不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少数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的。”对这些“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

2月　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同年1、2月间中央军委会议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谢富治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2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贫下中农“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信中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

2月2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对干部队伍有一个基本估计；对犯错误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但是，社论要求坚决打倒“走资派”，因而广大干部仍然继续遭到各种迫害。

3 月 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以后，1967 年 2 月 4 日、19 日和 3 月 7 日，又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3 月 7 日毛泽东还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了批示(即“三七指示”)。这些文件要求全国的大、中、小学师生和红卫兵停止一切串连，全部返回学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文件规定中学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搞好师生生活。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3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社论，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社论提出“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在此以后，大批学生回到了学校。但是由于夺权斗争的开展，以及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制造事端，所以各个学校非但未能真正实现“复课闹革命”和“大联合”，而且由于各种矛盾的出现，各派组织反而在校内打起了“内战”。

3 月 10 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发表了毛泽东一段语录：“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3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 1936 年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31 年前后，由于敌人的搜捕和叛徒的告密、出卖，中共北方局的许多干部被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们在狱中表现坚贞不屈。当时，在狱中的薄一波等人，组成党支部，领导被关押的人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革命气节。1936 年，党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薄一波等 61 人在狱中的表现，指示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他们出狱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党中央对 61 人出反省院的问题作过审查，对他们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制造了这个轰动国内外的“61 人”的大错案，对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大加审查、监禁关押。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揪叛徒”的恶风。到这年 6 月，全国有 5,000 多人受到审查。对他们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栽赃诬陷，残酷迫害。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 5 人，因长期遭受折磨，含恨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61 人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4 月 1 日　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4 月 3 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举行群众大会，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 月 6 日，在江青策划下，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刘少奇。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社论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毫无根据地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彻底肃清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4 月 12 日至 18 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 月 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诬陷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却被置之不理。5 月至 10 月，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擅自决定逮捕革命干部、教授、炊事员等 11 人，严刑逼供，“突击审讯”，制造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的伪证，以便置刘少奇于死地。

5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刊登江青 1964 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目的是为了把她树为京剧革命的所谓“领导和发动者”、“文化革命的旗手”，为她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5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8 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说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5 月中旬　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企图诬陷周恩来。他们利用国民党 1932 年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

事"诬陷周恩来,并在社会上煽起一股反周风浪。深知"伍豪启事"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恩来当即写信报告毛泽东,并附有关于"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后来,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从而使林彪、江青等人的鬼蜮伎俩未能得逞。

5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社论指出:近来,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群众组织之间,出现一股武斗的歪风。它影响和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秩序,破坏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必须坚决煞住这股歪风。社论要求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和毛泽东批准于5月15日发布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这个《重要通告》的主要内容是:1. 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2.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3. 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动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4. 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5. 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担负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6. 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社论发表后,各地武斗并未制止,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反而日益发展。

5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同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纪要》毫无根据地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6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7条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

6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8岁。李立三是湖南醴陵县人,生于1899年,早年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和刘少奇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发展党组织。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1925年冬,他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6年回国。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秘书长,积极领导了武汉和华中地区的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2月以后,他在香港、广州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冬到1930年,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30年6月至9月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党派他去苏联学习,曾先后参加过赤色职工国际和外文出版局工作。1946年春,李立三从苏联回国,先后担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上半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曾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对李立三进行许多诬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为其彻底平反昭雪。

7月18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7月20日　林彪、江青一伙在武汉制造一场打击武汉军区和一派群众组织的事件。早在4月16日,江青煽动说:"成都、武汉都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在他们的煽动支持下,武汉少数坏头头挑起武斗,甚至公然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7月14日,王力和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武汉。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使两派组织联合起来的指示,公然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7月20日晨,武汉一派群众组织质问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这一说理斗争,被林彪、江青诬为"反革命事件"。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之后,指使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派人到各地,串连当地群众组织"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枝弹药,挑动武斗,制造事端。"七·二〇"事件后,许多干部和群众被诬为"反革命",遭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26日,党中央给所谓"七·二〇"事件和受迫害的人员正式平反。

7月22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不断出现武装占领校舍,火烧大楼,开枪打死打伤学校师生、群众的事件。许多学校和单位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等事件,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8月4日　王洪文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事件，关押、打伤650多人，张春桥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8月7日　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要“砸烂公检法”。接着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事件。在公安部内，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225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谢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整个公检法机构陷于瘫痪状态。

同日　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反动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掀起反对周恩来、打倒陈毅的逆流，制造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的事件，使外交工作陷入混乱。他们制造了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只是由于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旗帜鲜明地保护陈毅和外交部，才及时制止了他们的反动行径。8月底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　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错误地断言，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斗争的实质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行了严重地歪曲，文章着重诬蔑刘少奇“四十多年假革命、反革命”，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文发表后，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8月17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办事组于本日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此后，还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他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干了很多坏事。

8月2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杨明轩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同日　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再次鼓吹武斗说：谁要武斗，我一定还击自卫。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章对陶铸1962年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1964年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进行攻击和诬陷。文中还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9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社论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而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大批判。”

9月16～17日　周恩来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要求红卫兵做自我批评，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

9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他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强调说：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重申：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要扩大教育面”；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要求各级组织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执行。但由于毛泽东仍然错误地坚持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和他们控制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和相当一部分的党政军权，继续制造混乱，因此大乱的局面无法结束。这种“天下大乱”始终达不到“天下大治”。

10月1日　首都50万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林彪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提出“要在组织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10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说：毛泽东最近指示“要斗私，批修”“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

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大中小学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事宜。在此以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开始复课。但《人民日报》10月30日摘转《长江日报》10月22日社论说："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校内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由于坚持搞运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并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逝世，终年60岁。爱新觉罗·溥仪即宣统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1924年废除皇帝称号出宫。1925年2月移居天津。1931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我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1964年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1月6日　首都人民隆重集会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主要论点是：1.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社论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这种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严重误解和歪曲，它给林彪、江青一伙反党乱军提供了理论根据。

11月23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长篇文章。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由贸易、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是所谓"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12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由陈伯达摘编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包括1927年至1967年期间，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书信、语录等共51条。中央在通知中说：这本书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各地要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伟大纲领的群众运动。

1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请求报告》的批示中指出：1. 绝对权威说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 禁止为领导人祝寿。

12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由此，全国小学以红小兵取代少年先锋队达11年之久。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毛泽东选集》今年出版8,640多万部，《毛泽东语录》出版3.5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4,750多万册，《毛主席诗词》出版5,700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经　济

1月10日　江南造船厂又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巨轮"朝阳号"下水。

1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提出：1.要提高警惕，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少数坏人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与集体财产。2.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3.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4.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5.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章对一些地区的"造反派"乘机要挟革命领导干部为他们增加工资、福利，滥发经费、物资等现象，反诬为"走资派"在腐蚀拉拢群众，"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章号召：要"百倍提高警惕，识破阶级敌人玩弄的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此文发表后，1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整理的《毛主席论反对经济主义的语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所谓批判经济主义妖风的运动，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革命领导干部。

3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一封信。信中规定："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特别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号召"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

3月19日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决定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他说：在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要夺权，即使是需要夺权的也不要夺权，把春耕工作做好。22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召开，周恩来又到会讲话，号召工人阶级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6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6月5日　《解放日报》首先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把《工业七十条》说成"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下旬开始动工修建的从长沙到韶山铁路建成通车。

军　事

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就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作了五条规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虽然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三支两军"的主旨是支持"造反派"，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必然带来消极的后果。

1月28日　中央军委发布8条命令。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毛泽东批示："所定8条，很好，照发。"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今后一律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3月20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变本加厉地鼓吹乱党乱军。他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4月24日　我人民解放军空军一举全歼侵入我广西某地上空美机2架。中央军委颁发嘉奖令，向参战空军部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美帝国主义自4月起，再次疯狂轰炸越南北方，进行新的战争"升级"。同时，连续派遣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我国领土，进行猖狂的战争挑衅。我空军部队奋勇迎击入侵美机，4月24日至5月1日，连续击落入侵我广西地区上空的美国军用飞机5架。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氢弹爆炸成功，是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飞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一切有关人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同时，重申我国的一贯立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外 交

1月16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方面在1966年内频繁地侵犯我国领土、领空。照会说，1966年内，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和中国——锡金边界，侵犯中国领土达73起，印度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达71架次。如果印度政府坚持反华，继续在边境对中国入侵挑衅，那只能害己。

1月26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就苏联政府对我留欧学生敬谒列宁和斯大林墓遭到镇压一事，表示强烈抗议。2月5日，我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苏联政府2月3日指使人员闯进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砸坏新闻图片橱窗，并殴打我使馆人员的暴行。

3月7日～16日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4月11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军队最近越过中国——锡金边界，在中国一侧私立石堆，妄图单方面改变中锡边界线，对我进行新的侵略和挑衅。照会正告印度政府，停止在中锡边界的挑衅活动，停止一切诬蔑中国的叫嚣，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4月23日　外交部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尼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包围封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的严重事件。26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粗暴地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宣布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和驻雅加达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心病狂地迫害华侨的反华暴行。27日，首都10万人集会坚决拥护政府声明，愤怒声讨印尼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

5月15日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我国外交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声明指出，5月6日下午，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强剥削，进行斗争。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事后又拘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树胶塑胶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度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且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很多人，对此，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5月27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蒙古制造的反华法西斯暴行。1967年5月21日下午3时，蒙古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在乌兰巴托火车站对前往车站欢送被蒙方无理驱逐的3名华侨教师的中国人员，进行了野蛮的围攻殴打，当场打伤多人，并拘捕华侨20余人。更为严重的是，蒙古政府竟纵容警察特务殴打和强行扣押了在场的中国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人员。声明严正要求蒙古政府公开承认错误，立即释放被捕的全部中国人，严惩肇事凶手和主使人，赔偿一切损失。

5月31日～6月5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6月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参加讨论会的来自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朋友。

6月9日　我国政府就6月5日以色列在美帝策动和支持下，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事件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7日，中国各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美、以武装侵略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7、8两日首都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声讨美、以侵略者。

同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了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纳·桑穆加塔桑。

6月12日　外交部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照会，就印度驻华使馆人员在北京非法从事间谍活动一事，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印度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鲁冠南大会，宣判将其驱逐出境，立即执行。同日，外交部宣布印度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三天之内离开中国国境。6月15日，外交部再次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照会，强烈抗议印度政府无理强迫我两名外交人员离境。指出这是对中国有关当局最近处理鲁冠南间谍案所采取的卑劣的报复手段，是印度政府蓄意进一步恶化中印关系的严重挑衅步骤。17日，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一份照会，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我使馆并中断我使馆与国内电报联系一事，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6月21日～25日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访问我国。25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6月下旬～7月　缅甸政府策划了一系列反华暴行。6月28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最紧急、最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在26日和27日连续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的暴行。6月29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说：鉴于缅甸政府把中缅关系推到空前恶化的地步，中国政府决定不再派去驻缅大使，并将根据情况的发展采取其他必要措施，30日开始，北京、上海、昆明数十万人连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声明，最强烈抗议缅甸政府的法西斯暴行。7月1日，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转交我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7月5日，外交部两次照会缅甸

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缅甸政府无理拒绝我国政府派遣中国民航班机接运重伤华侨回国治疗。要求保证我调查华侨受害情况人员的安全和顺利工作。

7月1日　外交部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我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8月10日　外交部照会缅甸驻华大使馆，最强烈地抗议缅甸政府连月来唆使军队杀害我边民7人的暴行。中国政府严正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惩办凶手；赔偿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并给他们的家属应有的抚恤；公开道歉，立即释放被无理关押的中国边民，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8月11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缅甸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缅甸军队和飞机不断侵犯我领土领空。照会说：据中国边防部队报告，1966年10月至1967年7月，缅甸军队和飞机连续不断地侵入中国云南地区进行侦察、骚扰和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缅甸飞机侵入中国境内共6起43架次；缅甸军队从境外向中国境内开枪挑衅2起；缅甸武装部队越境20起，263人次。照会指出，7亿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缅甸政府的军事挑衅将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厉惩罚。

9月8日　我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在北京签订。之后，1969年11月14日，三国政府铁路代表团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又签订了中、坦、赞三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补充协定。1970年7月12日，中、坦、赞三国政府又在北京签署了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议定书和关于坦赞铁路施工问题的会议纪要。经过五年又八个月的艰苦努力，1976年7月14日，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胜利竣工并全线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全长1,860公里。

9月10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军60余人于9月7日越过中锡边界，侵入中国境内架设铁丝网，并刺伤我边防战士2人的挑衅行为。照会说：印军如继续挑衅，印度政府必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11日，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严重抗议印军向我边防部队发起攻击。照会指出，本日上午7时40分，印军60余人在乃堆拉山口越过中国——锡金边界，侵入中国境内。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截至中午，印军已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25人，现在印军进攻还在进行。照会严重警告印度政府，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停止侵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9月16日，我军按照我国政府的通知，从维护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出发，把入侵我国境内被击毙的印军尸体14具和枪支弹药，全部交给印方代表。

9月26日～10月11日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努马扎莱总理率领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

9月26日～10月14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率领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10月14日发表阿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新闻公报。

9月26日　外交部发表关于关闭我国驻突尼斯共和国大使馆的声明。声明说：今年以来，突尼斯政府肆意散布反华言论，诽谤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最近，突尼斯政府对中国大使馆进一步采取敌视态度，禁止大使馆发行新闻公报，限制和阻挠使馆人员的正常活动，非法扣留应邀在突尼斯工作的中国乒乓球教练；突尼斯政府还配合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9月19日，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就9月14日中国外交部致突尼斯外交部的照会，提出了最无理的要求，限期中国大使馆向突尼斯外交部递交所谓道歉照会，否则，将宣布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关闭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并召回大使馆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10月1日　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印军再次越过边界进行武装挑衅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中国政府严正警告印度政府：印度军队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挑衅，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10月4日　我外交部照会缅甸驻华大使馆，严正揭露奈温政府撕毁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0月31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从缅甸接回我国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

10月5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组织武装军警暴徒捣毁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暴行。我国政府决定立即派专机前往雅加达接回受重伤的外交人员。

10月20日～24日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元首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率领代表团访问我国。25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10月27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反动政府中断两国外交关系。声明指出，1967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反动政府又一次出动大批反动军警和1,000多名暴徒，武装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枪伤、打伤中国临时代办和大使馆全部人员。这是两年以来的第43次武装袭击，是国际外交关系史上少有的法西斯暴行。中国政府对此曾于10月1日和10月5日向印尼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和严正要求，但被印度尼西亚政府蛮横拒绝。接着，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0月9日和10月23日来照，悍然宣布关闭其驻华大使馆，撤走全部人员；同

时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在10月30日以前关闭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和驻棉兰、马辰、锡江等地领事馆，撤回使领馆全部人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中断两国外交关系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提出强烈的抗议。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所采取的严重步骤，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暂时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各领事馆并撤回使领馆全部人员。

11月7日～29日　应中共中央邀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席爱·弗·希尔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科技文教卫生

5月23日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从25日起，《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5个文件：1944年1月9日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年5月20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摘录——《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10月16日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63年12月12日关于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批示和1964年6月27日关于文艺界各协会及其刊物的改造问题的批示等。如前所述，后面两个批示是错误的。

7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文章。文章全面否定建国17年的教育工作，诬蔑建国17年的教育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破烂"。制定高校、中学、小学工作条例是大搞"智育第一"、"技术至上"。建国以来教育工作中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9月，《红旗》第10期发表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文章，鼓动对建国17年的教育路线进行大批判。

8月24日　中国红十字会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不出席将于9月5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红十字协会第29届理事会和代表会，并不再担任红十字会协会的执行委员。声明并宣布，在中国红十字会缺席的情况下，对第29届理事会和代表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我们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1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一台太阳无线电望远镜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安装、调试成功。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在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又一次发现了研究人类起源的极为珍贵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包括额骨、枕骨等。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8年

导　言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指出1968年全国的任务是：一、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深入展开大批判，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三、整党。

1968年是“大批判”全面发展的一年，这场运动涉及的范围之广是空前的，且对以后的批修、批林批孔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它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委会成立为标志达到高潮。

在“大批判”的浪潮中，掀起了一场“文艺革命”。这种“文艺革命”是为了配合当时对于所谓的走资本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而来的，是江青利用文艺领域以求进一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

1968年强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批判所谓的“多中心论”，由此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旨在“纯化”无产阶级，进一步打击“走资派”。与之相适应，在党内进行了整党，进行“吐故纳新”，这方面的重大举措是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吐故纳新”、“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大批所谓的“内奸、叛徒、走资派”清理了出来，形成了对很多无辜的干部、群众进行迫害的一股恶风。为了对干部进行“革命”教育、实行干部的革命化，当时还搞了“五·七干校”，让干部下放劳动，做到能官能民。

1968年底掀起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党和国家号召知青去边疆，去艰苦的地方工作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以便将青年“锻炼成钢铁”，从而“大有作为”。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杨余傅事件”
- ●“斗、批、改”运动
- ●“文艺革命”
- ●“教育革命”
-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 ●“吐故纳新”
-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 ●“五·七干校”
- ●“上山下乡”运动
- ●“英国间谍案”始末

“杨、余、傅事件”

背景介绍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突然提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三人要打倒吴法宪等人，排挤黄永胜，想篡夺空军的领导权，宣布撤销三人职务。这件事便是“杨余傅事件”。

这个事件完全是林彪集团制造的一起冤案。林彪撤销以上三人的职务而任命三个亲信便使得自己完全控制了中央军委办事组，夺取了军队更大的权力，为以后的阴谋打下更好的基础。

材料：

· 所谓“杨、余、傅事件”(节录)

材料　所谓“杨、余、傅事件”(节录)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

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过去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派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一九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节自《聂荣臻回忆录》下）

"斗、批、改"运动

背景介绍

这场运动始于1967年。1967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工作人员以"8341"部队的名义，陆续到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等单位进行"三支两军"。1967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批阅，认为此件"写得最好"。5月25日中共中央与中央文革向全国转发了此材料，从而把"斗、批、改"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68年9月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使得"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材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材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地处我国西南、西北反帝反修前哨的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胜利诞生了！

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我们向西藏和新疆各族革命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和新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以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向两年来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全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致以热烈的战斗敬礼！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和新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较量和顽强斗争，终于把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和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挖了出来，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分裂祖国统一的迷梦，给了帝、修、反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颠覆破坏阴谋以沉重打击。

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尽情地热烈欢呼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革命人民所取得的这个伟大胜利！

我们坚决地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坚持不懈的战斗，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同时，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在贯彻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每项工作中，更好地肩负起领导一切的伟大历史使命。

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

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抓好典型。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坚决执行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必须亲自选择一些点，从中吸取经验，指导面的工作，并向中央作报告。要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十分注意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

毛主席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捣乱和破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一定要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随时准备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敌人如果胆敢碰一碰我国的神圣领土，发动武装侵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它们歼灭。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阔步前进！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原载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文艺革命"

背景介绍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自领导了对"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斗争的"文艺革命"，尤其是"京剧革命"，利用文艺舞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当然，在"文艺革命"下产生的样板剧目，除去江青为了个人野心而安插、篡改的部分内容外，其余部分也还是应当肯定的，如《红灯记》无论在唱腔、表演、音乐设计、道白等各个方面，都注意既保持京剧特有的程式，又突破了旧的程式，使之适合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性格，所有这些均还是应肯定、继承的。

材料：

· 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材料　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取全面胜利的崭新阶段。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巨流滚滚向前，一泻千里，冲刷了残留在我们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使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江青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京剧革命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它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它在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胜利。每当我们回忆起江青同志领导我们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峥嵘岁月，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江青同志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是她，以最坚定的立场，最敏锐的政治嗅觉，选择了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发动总攻击的突破点——"京剧"这个顽固的堡垒；是她，以最顽强的战斗精神，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冲锋陷阵，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了文艺舞台，从而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序幕；是她，以最炽烈的革命激情，矗立了震撼世界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戏。这八颗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明珠，具有巨大的能量，它敲响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意识形态的丧钟，在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亿万革命群众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又为我们各条战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毛泽东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回顾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的历程，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搞戏，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正如江青同志常常告诫我们的那样，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场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文艺战线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的前哨阵地，资产阶级要复辟，总要先做舆论上的准备，向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权。解放以来，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其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推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他们把文艺作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阵地，哪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占领文艺舞台，是关系到红色政权变不变色的严重问题。为了使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江青同志毅然决然地率领革命文艺工作者开展京剧革命，从这个最顽固的堡垒打开缺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的焦点，就是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为哪一个阶级

的政治服务，也就是无产阶级占领舞台，还是资产阶级占领舞台。江青同志反复强调一定要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占领京剧舞台，使京剧舞台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她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她指出：要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

江青同志在京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首先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关键，着力塑造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因为只有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才能有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否则，如果让那些红脸黑心，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或者被歪曲了的工农兵人物，以及"中间人物"为主人公，那末这个作品势必成为宣传修正主义的货色，为中国赫鲁晓夫效劳。因此一个戏是否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关键就在于是否成功地塑造了主要的无产阶级的光辉的英雄形象。当前两个阶级在文艺舞台上斗争的焦点，也表现在这一个问题上。阶级敌人知道，让那些才子佳人死灰复燃，公开爬到舞台上的可能性是不大了，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在舞台上树立他们的代言人，用种种卑劣的手法，来阉割、歪曲剧中的主要人物，从而达到他们占领革命文艺阵地的罪恶目的。

例如《智取威虎山》，我们要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这个主题，因此，就必须要通过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具有革命大智大勇精神的和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以他们作为主人公。相反如果把杨子荣塑造成一个浑身匪气的"江湖豪侠"和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者，那么这个戏的主题必然变成宣扬中国赫鲁晓夫之流，脱离群众，盲动、冒险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拼命在剧本中增添反面角色，把座山雕等反面人物写得十分嚣张。为了突出反面人物，他们还特地聘请了老反革命分子贺绿汀为定河老道的四句反动唱词谱曲。他们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篡改这个戏的主题，以它来表现中国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投降主义的军事路线。

再如《海港》，我们是以表现阶级斗争为纲，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为主题，因此，就必须以方海珍、高志扬这样的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立足码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为主要人物。反之，如果让余宝昌那样的内心空虚、精神分裂的"中间人物"为主人公，那么，这个戏的主题就会成为鼓吹培养中国赫鲁晓夫的接班人。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居心叵测，在他的直接指使下，妄图把这个戏的主题变成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的戏。为了达到这种罪恶的目的，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的黑干将，也是从人物塑造入手，来向我们进攻，他们竭力把落后青年工人余宝昌这个"中间人物"作为主要人物，要所有的正面人物都围绕着这个"中间人物"满台转。而把支部书记和装卸组长等主要英雄人物的英雄行动场面，穿插在余宝昌的行动场面之间，作为辅助情节。

江青同志十分敏锐地识破了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为了击退阶级敌人的进攻，为了使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文艺阵地，她十分重视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塑造，特别重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江青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是创作社会主义文艺的极其重要的经验，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它可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文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可以使我们的革命文艺舞台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智取威虎山》的创作就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把原来剧本中设计的一大串牛鬼蛇神，什么定河老道、蝴蝶迷、一撮毛、栾平老婆……等等，全部砍掉，而又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加强了杨子荣等正面英雄人物的形象。例如：原来的第三场，是写一撮毛凶杀栾平老婆的戏，现在砍去了这一场，而换上了表现杨子荣深山问苦的戏，突出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与劳动人民的鱼水关系和阶级感情以及我军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在正反面人物同场的戏里，也有意地压低了反面人物的嚣张气焰，而着力突出正面英雄人物，并使主要英雄人物始终居于主宰地位，一改过去那种反面人物居于主位的局面。第六场，原来是让座山雕坐在舞台正中，据高临下，气势逼人，而杨子荣则弯躬屈膝，侧立一旁，两人交锋中，杨子荣一直围绕着座山雕打转，江青同志很敏锐地觉察到，她指示我们，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以后，不应该靠装得像敌人一样去战胜敌人，而是靠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忠。又说，杨子荣在舞台上不动则已，一动就应该是一个英雄塑像。根据这些重要指示，把座山雕置于舞台的侧面，让杨子荣立于正中，始终让杨子荣牵着座山雕的鼻子满台走，突出了杨子荣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

《海港》的创作也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以表现阶级斗争为纲，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为主题思想，努力塑造并突出以方海珍为中心人物的一系列立足码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形象。在这个戏的人物塑造中，在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方海珍、高志扬、马洪亮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在这三个人物中又着重突出了方、高，在方、高中又以方

为主。为此，我们在戏中把方海珍放在矛盾冲突的中心，给方海珍以许多实际行动和能够经常按毛主席教导去分析判断问题。这样，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有着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就树立了起来。例如：原来的"壮志凌云"一场，是通过妈妈和舅舅的家庭教育使落后青年转变的，这样自然就突出了妈妈和舅舅的家庭教育的作用。为了塑造方海珍，毅然决然地把妈妈这个人物拿掉，而让方海珍出场，通过讲述海港斗争史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使余宝昌转变。这样就突出了方海珍，显示了工人阶级英雄人物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雄心壮志。

在京剧革命中，江青同志不但参加斗争实践，而且参加了艺术实践。在艺术实践中，她不但抓主题思想和英雄人物塑造这些大的原则问题，而且还围绕努力塑造并突出体现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英雄人物这一中心课题，狠抓艺术细节问题。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一腔一板、一个领章、一个帽徽、一件服装、一道灯光，都十分细致地去推敲，务使更好地突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江青同志的这种"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不知多少次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在艺术实践中，江青同志的异常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无比坚定的政治立场。她对每一个细节，都是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管别人如何反对，她坚决地坚持下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即使它在艺术上有什么可取之处，也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加以抵制。在创作过程中，她时时处处考虑是否突出了主要的英雄人物，例如有些场次、有些人物，别人称为有"情节"有"戏"，可是江青同志一眼看出，它有损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毅然决然地把它砍掉。而她之所以这样重视塑造并突出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目的很明确，就是让这样的英雄人物充分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主题，从而使舞台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江青同志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原则，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提出过极为重要的意见，如在京剧音乐创作上，为了真正使音乐创作为政治服务，曾对我们作过许多具体的指示，根据她的指示，我们曾总结为"一个主要任务"，"三个对头"，"三个打破"的工作守则。"一个主要任务"，是指戏曲音乐的主要任务是着重通过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途径塑造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而不是像旧戏所搞的那样，为了"造气氛"、"打补钉"、"点缀色彩"、"悦耳动听"。要达到这个主要任务，则必须做到"三对头"——思想感情对头，性格气质对头，时代气息对头，而不是像过去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音乐设计只是为了"表达唱词"、"表达情绪"等等。要完成"三对头"，则又必须做到"三个打破"，即：打破唱腔流派，打破唱腔行档，打破旧有格式。"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永远是革命文艺创作的光辉指针。

参加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的过程，是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使我们深深懂得，革命文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给人民以教育和鼓舞，带动大家前进。这样革命文艺才能有生命力，文艺舞台才能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江青同志的英勇斗争和艰苦卓绝的实践下，终于使杨子荣、少剑波、方海珍、高志扬等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屹立在京剧舞台上，大放异彩，光焰夺目，牢牢地占领了革命的文艺舞台，开辟了无产阶级一代文艺的新纪元。

风展红旗如画。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京剧革命的形势大好，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断取得伟大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那些被赶下政治舞台和艺术舞台的牛鬼蛇神，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也不可能放弃他们妄图复辟的企图，阶级斗争在继续，京剧革命的斗争也在继续！挖掉了一条黑线后，还会有新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的形式今后也将更复杂，更尖锐，京剧革命仅仅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但是，因为我们有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率领，我们有夺取彻底胜利的充分信心，我们一定要勇敢投入战斗，披荆斩棘，闯关夺寨，创造更多更高大的光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

"教育革命"

背景介绍

1968年7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比大专院校毕业来厂工作的毕业生强，前者思想先进、工作能力强；后者思想落后、工作能力差。由此得出结论，以往受"剥削阶级"、"修正主义"支配的旧教育制度再也不适合新形势了，要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对教育进行革命。以下几个材料就是介绍当时"教育革命"的基本方向的。

材料：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材料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人民日报》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

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这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先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〇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哪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

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像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一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繁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机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组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背景介绍

这个提法是在批判所谓“多中心论”及“老大难”单位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在“斗、批、改”运动中出现了“多中心论”与“老大难单位”，使得“一小撮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因此就必须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样一场运动使得大批无辜的干部与群众遭到迫害，同时为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派驻的工宣队，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学校中派性斗争的混乱局面，但也给学校教育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

材料：

· 马蜂窝就是要捅

材料　马蜂窝就是要捅

当前，上海革命形势大好。但是，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条战线上还存在一些“老大难”单位。这些单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就是搞武斗。这些单位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很坏，已经成为发展大好形势的阻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障碍，成为害群之马，落后的死角。对这些“老大难”的马蜂窝就是要捅。这是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需要，是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是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的需要，是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也是当前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

在中央两个“布告”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给北京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的巨大鼓舞下，上海以工人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三结合的、数以百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入了“老大难”单位，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直接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出现了极为鼓舞人心的一片新景象，“老大难”的帽子正在一顶顶地被扔到垃圾桶里去。由此可见，“老大难”不仅必须解决，也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老大难”难在哪里？有少数单位，就是“难”在“坏人掌权，好人受气”。在这些单位里，一小撮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对外抵制，对内控制”，“对上封锁，对下高压”，压制群众，打击报复，实行白色恐怖，大搞武力统治。特别严重的是，封锁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领部的声音，蒙蔽和欺骗群众，使自己单位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对这些单位，就要坚决支持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炸开阶级斗争盖子，开展夺权斗争，把领导权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老大难”还“难”在有些头头中了反动的“多中心论”的毒，资产阶级派性十足。他们占山为王，认友为敌，迷信“实力底下出政权”，大搞“以我为中心”。这些头头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居民，脱离了群众的大多数，群众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他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对这些头头，要发动群众起来对他们实行监督。

解决“老大难”，归根到底，一要靠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二要靠群众起来。阶级敌人最最害怕的就是这两条。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一小撮不管是登台表演、煊赫一时，还是隐藏幕后、策划密室的阶级敌人，就会立即现出原形，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速、准确、全面地把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声音，落实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宣传队的工作既要轰轰烈烈，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又要扎扎实实，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真正从思想上发动起来。

解决“老大难”，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用种种卑鄙的手法，进行阴谋破坏。他们妄图挑拨宣传队和群众的关系，他们叫嚷“过去十二级台风也顶住了，这次二十四级台风也要顶得住”，以此维持动摇的军心，加强内部控制。他们叫嚣“不要跳，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妄图吓住群众，捂住已经在冒烟的火山。他们还道道设防，进行干扰，制造事故，破坏生产，力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阻挠运动的开展。但是，这一切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要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敢于顽抗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将被广大革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

（原载上海《工人造反报》第一五五期，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转载）

（原载196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吐故纳新”

背景介绍

1968年7月8日《人民日报》提出要把“清理阶级队伍与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的短评，目的是要使“广大革命群众更加认清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提高对敌斗争的自觉性……坚决打击一小撮叛徒、

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挖出极少数埋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其后又提出整党的方针即"吐故纳新"。实际上还是要将刘少奇等一批所谓的"叛徒、特务与走资派"清理出党。

材料:

·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材料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北京第一机床厂革命委员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励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战斗意志,稳、准、狠地打击了无产阶级的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重视政治上、思想上的对敌斗争,向群众进行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开好小型批判会,这些经验都是好的。

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阶级敌人进攻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两个重要侧面。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可以使广大革命群众更加认清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提高对敌斗争的自觉性;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可以教育广大革命群众,认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得更深入、更彻底。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可以使革命大批判同各单位的实际斗争联系得更加紧密,同各单位的斗、批、改联系得更加紧密。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了极少数埋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为革命的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活材料。这样,就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政治大革命的阶级内容和重大意义,从而更积极地投入革命的大批判,使之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才能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肃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毒害,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清理阶级队伍的成果。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必将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地为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必将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原载1968年7月8日《人民日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及时的。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共和国史上的最大冤案最后铸成。

材料:

· 中共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公报

材料　中共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

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五·七干校”

背景介绍

1968年兴起的“五七干校”是配合当时整党的需要，是为了使干部“革命化”，使机关“革命化”，通过干部的下放劳动达到精简机构，改造干部的世界观，使他们真正做到“能官能民”，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目的。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客观背景下，反而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材料：

· 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

材料　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
——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基本体会

今年五月七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的光辉日子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原省直属机关的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的一个机关农场，创办了一所“五·七”干校。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无比英明，无比正确。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将永远照耀我们的前进道路。

光辉的"五·七"指示是办校的根本方针

在筹办"五·七"干校的时候，省革命委员会就明确指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

…………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学员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群众工作，批判资产阶级，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以农为主，办工业，办林业，办牧业，办副业，整个干校出现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在同大自然进行战斗中，学员们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和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联系起来，哪里艰苦就向哪里冲。他们脚上打起了血泡，手上磨起了厚茧，大家深切地感到：这就是最好的学习，这就是革命。

"五·七"干校是"炼人"的。在干校，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这个问题转的。学员的生产劳动、学习、军训、日常生活，都和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锤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紧紧地联结起来。战地整风、地头讲用会、颂扬会、战评会、批判会，已成为"五·七"干校学员们自觉的制度。学员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更浓了，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更深了，改造世界观的愿望更强烈了。学员们都说：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我们领航，我们就能够在荒山僻野中，踏出一条反修、防修的大道来！

改造世界观是办校的根本任务

世界观的改造，对反修防修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柳河"五·七"干校从创办的那一天起，就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改造世界观，一定要把住要害。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个"私"字。对干部来说，"私"字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个"官"字上。有些干部过去就是由一个"私"字，追求一个"官"字，演变成一个"修"字。"官"字就是要害。要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就是要狠狠地打掉这个"官"字。

"五·七"干校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它的条件和环境，对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对打掉"官"字，极为有利。学员们从大城市来到山沟里，从大楼搬到茅草房，从当"官"到为民，这一切变化，都不能不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引起世界观的大震动。学员们说："到了'五·七'干校，不管你'官'有多高，镰刀、锄头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问题还不仅在于要打掉官架子，更重要的是要铲除当官作老爷的思想。

过去，不少干部在世界观的改造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我们通过举办学习班，组织学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解剖自己的世界观。同时，随时随地引导大家从路线斗争上找问题，在世界观上找原因。有些干部，文化大革命前官气十足，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判，把官气变成了怨气，经过革命大批判，他们的"理论"输光了，又把怨气变成了泄气，躺下不干了。到了"五·七"干校以后，提高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

有些年轻的造反派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造反派，世界观没有多大问题了。只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没有同时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到了"五·七"干校以后，他们才察觉到自己灵魂深处也有想当官的坏思想，从而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住窝棚，吃野菜，爬大山，过沼泽，别人认为干不了的事情，他们干，还要干好。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要求你迅速地作出抉择，或者是冲上去，或者是退下来。冲上去，"公"字就胜利了；退下来，"私"字就得逞了。这里是"公"字和"私"字交锋的"二百米地段"，是两种世界观打"白刃战"的地方。由于学员们有着改造世界观的强烈愿望，思想革命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原省委宣传部一位中层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生产劳动，舒舒服服地干"革命"，结果把"革命"二字变成了"当官"二字，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到"五·七"干校以后，他下决心铲除当官作老爷的思想。有一次要刷大油罐，罐里有沼气，进去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他高声朗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跳了进去，终于把油罐刷好了。这件事使他久久不能平静，他说："五·七"干校是一座高温高速的大熔炉，只要自觉地改造自己，就可以和当官的观念彻底决裂，迅速实现思想革命化。

五个月来，"五·七"干校的学员同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荡涤了当官作老爷的思想，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贫下中农意味深长地说："有了你们这

样的干部，我们就放心了！"

同工农兵相结合是办校的根本途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柳河"五·七"干校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到工农群众当中来了。学员同原来农场的一百多名工人和贫下中农混合编队，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有一段时间，有些同志虽然身在工农群众中，思想感情上却和工农群众结合不起来。这些同志，有的家庭出身很好，来自工农群众之中，曾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后来由于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渐渐地变了。到了"五·七"干校以后，彻底地"亮相"了。他们和贫下中农感情不一，语言不同，群众对他们满腔热情，他们却与群众离得很远。还有些同志，他们接受的是旧学校的教育，自以为了不起，轻视工农群众。到了"五·七"干校以后，架子老大，思想感情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有的竟然提出："是我们教育他们呢？还是他们教育我们呢？"

这种情况说明：到工农群众中来，并不等于就同工农结合了。要真正做到同工农相结合，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结合的过程，就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为了使学员更广泛、更好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请进来"，就是请外面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到干校传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给学员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课；"走出去"，就是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到工矿企业、农村生产队进行社会调查，从事群众工作。干校创办五个月来，我们先后请进十六人到校给学员以再教育，派出六个学习队到外地学习。我们还同周围的人民公社和林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跟两个生产大队挂了钩，作为干校学员从事群众工作的点。学员们在同工农群众结合的过程中，看到了过去自己长期觉察不到的致命弱点。他们说："接触了贫下中农，才发觉自己一身灰，不洗不行了。"

有一个学习队，到干校附近的新山大队进行社会调查。一位老贫农给学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课。这位老贫农在文化大革命中，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当阶级敌人对他进行打击陷害时，他毫不动摇，坚定地说："有毛主席给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在那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他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听广播，倾听毛主席的声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广大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终于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许多同志联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深切地感到，我们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不如贫下中农深，阶级立场不如贫下中农坚定，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如贫下中农高。大家说："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学员们和广大贫下中农汗流在一起，心连在一起，立足点开始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思想感情开始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有一位领导干部，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但是长期住大楼，蹲机关，严重脱离工农群众，用他的话说："没当过一天普通劳动者，没作过一天基层工作。"到了"五·七"干校以后，在同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次，他给一个生产队脱谷，非常精心，把掉在地上的粮食一粒一粒地拣起来，社员们看了都很受感动。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五个月的革命实践，学员们脸晒黑了，手脚沾满了泥巴，但心更红了，灵魂更干净了。他们和工农群众亲了，工农群众和他们也亲了，和工农群众亲了，就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得紧了，就想大事了，就想革命了。学员们普遍感到：到了"五·七"干校是一次重新入伍，入了工农兵的队伍，入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队伍。有个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有次日本侵略军大扫荡，一位贫农老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面前把他掩护下来，但他进城后滋长了官气，和工农群众疏远了，把救过他的贫农老大娘也忘了。到"五·七"干校后，他当了猪官，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使他又想起了那位老大娘。他痛切地说："我过去忘掉的不是一位贫农老大娘，而是忘掉了一个阶级，忘掉了天下的受苦人。"他本来不会写诗，但是他想到这位老大娘，想到了天下的受苦人，他就在自己劳动的地方，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身在猪舍羊圈闹革命，志在五洲四海一片红。"

现在，学员们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豪迈地说：站，要往高处站，站在时代的高度；看，要往远处看，看到共产主义的未来；干，就要往大的干，干一番彻底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新华社哈尔滨十三日电）

（原载 1968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

"上山下乡"运动

背景介绍

1968 年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广大知识青年在党与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满怀豪情，奔向农村、边疆与农民一起工作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山下乡"运动虽然

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从而带来了广泛的社会问题，但是广大知青为开发边疆，支持农业生产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是不容否定的。这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有的社会政治现象应在共和国史上重写一笔。

材料：

· 革命知识青年斗志昂扬奔赴社会主义农村

材料 革命知识青年斗志昂扬奔赴社会主义农村

广大贫下中农热情欢迎细心做好安置工作

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连日来继续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纷纷报名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正在化为亿万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许多地区出动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少地区举办了知识青年、街道居民、革命家长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许多革命干部和老工人，召开家庭谈心会，教育子女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辉道路。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更加广泛地开展了写红色书信活动，纷纷写信鼓励自己在城市的亲人和同学到农村安家落户，动员在农村的亲属热情接待前来落户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

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喜讯传来，已在乡下安家落户的广大知识青年，兴高采烈，无比激动，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说：“我们的路走对了！我们到农村，不是来‘镀金’的，而是来扎根的。我们要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一走到底！”许多已经在农村安农落户多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作出了贡献的知识青年，纷纷畅谈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和体会。河北宝坻县革委会常委侯隽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六年多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指引着我前进。贫下中农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勤劳朴实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革命的高尚品德，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我逐渐克服旧学校给我的坏影响，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我虽然人离北京远了，可是心却离毛主席更近了。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到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等地农村安家落户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和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用自己的亲身体会，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黑龙江通河县红太公社红太大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农村是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老师。要革命，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块！从北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白音宝力格公社落户的知识青年说：我们到内蒙古虽然只有四个月，但是在贫苦牧民的教育下，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革命。我们要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生根、开花。

这两天，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天津、吉林、浙江等许多地区又有一批知识青年，手捧宝书，身背行装，奔赴农村，奔赴边疆。还有更多的知识青年，写申请，表决心，要求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杭州市两天来有近千名知识青年斗志昂扬地奔向黑龙江和本省农村。他们豪迈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方向，惊涛骇浪不迷航。我们要一辈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正从兰州去河西走廊农村安农落户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在列车上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立即在车厢里举行讲用会，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献红心：要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西藏拉萨中学的许多学生纷纷表示要尽快地到广阔的农村、牧区安家落户。他们说：“我们翻身农奴子弟最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到牧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地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认识到，教育自己的子女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他们纷纷举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家庭会，动员子女到农村去。这两天，有不少干部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子女去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有的干部连夜给子女整理行装。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地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斗、批、改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各种措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许多地区的革委会成立了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小组。山西河津县革委会，要求全县各级革委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城乡，使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求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做好欢迎、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陕西富平县革委会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当晚，就与西安市有关部门联系，决定提前迎接一千五百名中学毕业生到本县安家落户。驻上海长宁区安化中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校按班、排、连举办了学习班，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大大提高了全校知识青年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自觉性。

连日来，全国各地广大贫下中农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正在积极准备热情迎接和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许多贫下中农望着毛主席的画像，激动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信任我们，把教育知识青年的大事交给我们办，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好青年一代！黑龙江林口县建堂公社合兴大队的一位贫农社员，为了迎接下乡的知识青年，把自己准备结婚用的新房留给新社员住。肇州县双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除了为来这里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做好一切生活准备工作外，还准备让他们进村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饭，开的第一次会是忆苦会，上的第一堂课是毛泽东思想课。江苏淮安县钦工公社韩庄大队组织老贫农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与下乡的知识青年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最近又打了报告，要求多分配一些知识青年给他们。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贫下中农和老红军战士，为到这里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做了井冈山的革命传统饭“红米饭南瓜汤”。老红军战士给他们讲述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史。知识青年们无比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接过革命的红旗，学习贫下中农的榜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井冈山干一辈子革命！

（原载 1968 年 12 月 24 日《人民日报》）

“英国间谍案”始末

背景介绍

1968 年的中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间谍案，间谍乔治·瓦特系英国人，他以“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身份来中国，做出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事。下面几篇材料概括了这起间谍案的始末。

材料：

· 兰州市公安局破获英国间谍案

· 北京宣判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诈骗案

材料一　兰州市公安局破获英国间谍案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根据革命群众检举，最近破获了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案件。

乔治·瓦特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在来中国以前，接受了“维克斯——吉玛公司”负责人、英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杰伊布置的窃取情报的任务；来中国以后以工程师身份为掩护，进行旨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积极为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乔治·瓦特在中国期间，以特务手段窃取了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大量偷拍我国禁区照片，严重地危害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罪恶重大。

兰州市公安局在破获乔治·瓦特间谍案的同时，还发现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波德·迪卡特（西德人）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尽管英帝国主义情报机关通过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以贸易为掩护，派遣间谍，该公司并在经济技术上进行诈骗，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但其罪恶活动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手段十分狡猾，但他们终于逃不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的中国人民的巨掌。

乔治·瓦特和波德·迪卡特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慨。革命群众一致要求给予英国间谍分子严厉惩处。

（原载 1968 年 3 月 13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北京宣判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诈骗案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日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宣判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诈骗案大会”。被告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不敢前来应诉，大会进

行缺席宣判。

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与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签订的工厂合同，自判决之日起立即废除；限“维克斯——吉玛公司”在中国的人员，自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离境；“维克斯——吉玛公司”赔偿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的经济损失六十五万英镑。这一严正判决充分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宣判大会开始后，全场革命群众朗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宣读判决书。

判决书指出：被告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签订了供应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工厂的合同。三年多来，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的大量事实证明，被告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根本不按规定履行合同，蓄意进行诈骗。它派遣来中国的所谓技术人员，有的不称职，有的是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间谍分子乔治·瓦特来中国前，接受该公司负责人杰伊布置的搜集情报的任务，在中国期间大量窃取了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积极为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该犯已被我国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另一名所谓工程师彼德·迪卡特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已被我国公安机关驱逐出境。

判决书指出：合同规定，被告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向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供应最现代化的设计和技术，质量最优良的设备和材料；实现合同规定的保证数据。但是事实证明，被告没有掌握合同工厂的主要技术，并且一再玩弄骗局。其他如技术文件的交付，设备材料的供应及实习人员的安排等方面，被告也一贯采取拖延、推脱、抵赖等手段，进行诈骗。

判决书说，被告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的罪行，是以贸易为掩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蓄意进行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和诈骗，企图危害我国安全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全场热烈鼓掌，拥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严正判决。革命群众指出，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但是我们决不能容许任何敌人乘机在我国进行破坏和捣乱。革命群众还高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义！”“打倒英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宣判大会结束时，全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原载 1968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萧瑞怡

萧瑞怡（1948～　　）男，湖南新化人。出身农家。高中时期，爱读马列经典著作。1968 年毕业后留校“复课闹革命”，年仅 20 岁。他后来回顾说：“因目睹长期搞阶级斗争的弊害，痛感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带来的灾难以及个人崇拜活动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到北京上书毛泽东。”1968 年 5～6 月中旬，他先后三次写《上书》。《上书》约 12000 字，内容 6 个方面：1. 中国以农立国，首先应“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公有，按人口多少、劳力强弱合理借给各户耕种的“借田借土制度”。2.“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施仁政于天下。3.“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民思想”。“个人崇拜会造成物极必反的反感情绪”，“浪费人力物力”，“破坏了外交关系”，“造成了中国人的虚伪性”，降低了在校学生的教学质量，“桎梏人的思想，产生专制独裁”。4.“严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减轻人民负担，反对官僚主义。5.“法要当，刑要严”。6.“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他因《上书》遭通缉，流浪于洞庭湖区。1970 年被捕。1978 年平反，被安排在社办中学任民办教师。在此期间，他写《共产真义说》，再次上书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该《上书》对共产主义概念作了理论阐述，否定了“共产”等于“共食”——大锅饭的错误观念，以及将共产主义理想混同于现实生活的错误做法。在刚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到作业组的政策之时，他大胆地提出，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在于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工业责任到人等主张。1985 年，他在湖南师院平江分院中文班学习，1986 年毕业。现在中共新化县委党校任教。

姜明亮

姜明亮(1942年～　　)男,安徽人,为人忠厚,性格耿直,思想求实。1958年姜明亮考入三河中学,任初一(一)班劳动委员。时值"大跃进",打擂台他只保证小麦亩产600斤,但高中班却保证30万斤,同时由于他对"大炼钢铁"不积极,曾被插过资产阶级白旗。从9岁起,因其母多病,弟妹幼小,家庭贫困,他就承担了生活的重压,做家务,捡煤碴,钓鱼捕虾,做临时工兼学校电工等,以维持学业。中学期间,由于其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曾于全地区组织的作文竞赛中获一等奖,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高小到中学毕业的九年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中国历史小说、"传记",知识面较宽。

1964年8月,姜明亮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水中兵器系,攻读水声专业,曾任六四级大班文娱委员,被列为入党对象。由于贺龙元帅向全党推荐了著名的徐寅生讲话,他开始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以及有关的"传记"和"回忆录"。

十年浩劫开始后,他通过观察和冷静的思考,认识到林彪、江青搞的那一套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他与他的三位同窗好友闻福众、吴小林、胡清亮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系统的批判,从痛苦和彷徨中觉醒。他写了长达万言的材料,上书中央。并于1968年4月写成长达35页的批判林彪、江青的大字报贴到校园,公开揭露林彪、江青的反党阴谋。当天,姜明亮即被打成"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惨遭毒打,备受折磨,关进牛棚,强迫劳动。与此同时,"工宣队"通知姜明亮父母说:"姜明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接班人林副统帅"。家庭被迫与其断绝关系,中断了生活费的供给。姜明亮每月仅以学校发的9元助学金维持生活,因为年轻,加上劳动强度大,饥饿难忍,只好利用打扫食堂的机会,收集残羹剩饭充饥。一年后,其女朋友也被迫和他断绝关系,使其在精神上进一步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在此困境之中,姜明亮仍未忘忧国忧民,愤然写下:"身陷牢笼不可悲,忧国忧民壮心随;但悲国运衰落时,举国假话满天飞"的诗句。

1970年秋,姜明亮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下放到安徽省蒙城县广播站当工人,当时蒙城县所在的阜阳地区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而蒙城历史上以贫穷落后出名。面对艰苦的环境和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姜明亮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十二年如一日埋头苦干,自强不息,为蒙城的广播事业做出了贡献,蒙城县广播站成为全地区、全省的先进单位,他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3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随着"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垮台,西北工大于1972年和1977年两次为其平反。多年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压力没有改变姜明亮的读书爱好,他研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自然科学书籍,他对无线电技术精益求精,成为县城内小有名气的技术权威,1981年秋他被提任为蒙城县广播局业务股长,评定为助理工程师。

1981年12月在中共蒙城县第四届党代会上,姜明亮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于会外当选为中共蒙城县委委员、县委常委。1982年3月调任县工业局副局长。7月调任县化肥厂党总支书记,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使这个建厂以来连续十年亏损,累计亏损额达1000多万元的全地区著名的"老大难"企业,一举扭亏为盈。

1983年11月,年仅41岁的姜明亮出任蒙城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并于1984年4月蒙城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县长。姜明亮走上领导岗位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开拓前进,他的诗"莫畏人言乱纷纷,莫道责任重千斤,鞠躬尽粹干四化,天下谁人不识君"成为他工作的生动写照。经过努力,原来因讨米要饭者众而与凤阳齐名的蒙城县发生巨变,1984年蒙城县的整个经济工作在全地区夺魁,从而打开了新局面,他于1985年初受到地委表彰,地委书记陈复东亲自为姜明亮披红挂彩,表示祝贺。由于姜明亮在畜牧业上的贡献,1986年受到农牧渔业部国家畜牧局的表彰。几年来,蒙城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87年蒙城县工农业总产值达67362万元,比1980年翻了两番多;财政收入达3214.4万元,比1980年翻两番,增长率位全省第二;农民人均收入456元,比1980年增长7.6倍,县内80%的农户盖了新瓦房,户均3.6间。蒙城县粮食连年丰收,被定为全国小麦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和低芥酸油菜的生产基地县;牛猪羊生产水平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被国家和省定为肉牛生产、山羊板皮和瘦肉型猪基地县。蒙城的工业、农业、畜牧业、乡镇企业、物资、商贸流通、财政、城市建设等分别成为阜阳地区、安徽省的先进单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姜明亮被省新闻界誉为"明星县长"。

姜明亮在工作中敢于顶官僚主义,敢于保护人才,保护农民利益,坚决支持改革者、企业家,不怕来自上面的和传统观念的压力,被文艺界称为蒙城的"李向南"。1984年春,农田林网化的热潮在阜阳地区掀起,一时树苗奇缺,有些县为落实上级指标,从群众中筹资二三百万元到外地买苗。姜明亮根据实际情况,指出外地苗不适应当地土壤气候,成活率低,劳民伤财。在常委会上提出:"不图形式,不抢先进,今年育苗,明年赶上"的意见,表示宁可自己受处分,不给群众造成损失。全县1984年育乡土树

苗2.5万亩，1985年即解决了全县植树用苗，群众又向外地出售树苗收入三百多万元。1986年三秋季节，农民急需化肥，在县化肥厂门前排队多日却很难买到，可有些人拿着各种“批条”把大量的化肥运走，农民又焦急又气愤。姜明亮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挺身而去，亮出大名，在化肥厂门前贴出“县长的告示”：不管任何单位或领导批化肥的条子概不供货，农户凭粮食交售卡定量供应……。告示贴出后，老条无效，再无新条，许多农民买到了化肥，无不称颂县长为民着想。《农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称赞：蒙城县县长姜明亮，打掉“小纸条”的威风。

姜明亮在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注重学习理论，并结合实际，撰写了《发展县级经济要注重决策》、《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系列加工业》、《兴办地方工业，发展县级经济》、《努力搞好横向联合，大力振兴蒙城经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从实际出发，为群众办实事》等几十万字的文章，部分发表在省级刊物上。1985年姜明亮参加了全国农业系统工程第七期培训班，组织蒙城县60多名科技人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和生态农业的原理，对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工副业、商贸、科教等系统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论证，制定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近、中、远期总体规划。此举受到著名农业专家沈亨理、杨挺秀等人的肯定和赞扬。1986年姜明亮曾被邀去四川省主办的第一期农业系统工程培训班上介绍经验。

刘振武

刘振武(1926年～1968年)，男，广西博白县新田乡亭子村人。高中文化。1948年12月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博白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振武是一位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凭着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愤怒揭露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批判极左路线，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不幸含冤病逝。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愈演愈烈，广西各地不断出现乱斗人、乱打人、乱杀人的现象。面对险恶的局势，刘振武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决心向党申明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观点。1968年7月21日，与全国各地蜂涌而上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形式相对立，刘振武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两篇文章。他在《宣言》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党“受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他一针见血地揭露林彪、江青集团“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分裂出去的”、“由极为少数的几个人所组成的‘派’”。“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地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地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倒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整个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的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这个‘派’性中央，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系统地实行‘做个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刘振武在《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中指出：“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都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林彪)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月11日，刘振武被捕。在审讯中，刘振武直言不讳

地说："1959年处理彭德怀，我认为不妥当。'文化大革命'中，突然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打倒了我认为不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妥，不如拿这些钱来搞生产。一系列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因此，写了这么多东西。""我考虑毛主席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中国如果复辟，就是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完成。"刘振武还说："我还准备写三篇文章。一篇是《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中心思想'八大'路线不应改变，八届中央委员不应该打倒。另一篇写关于工农业生产，恢复奖励制度，实行按劳分配的问题。第三篇写对将要召开的党的'九大'的看法。可惜这三篇文章来不及写，我就被捕了。"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境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68年9月20日含冤病逝在狱中。

珍闻轶事

吐故纳新

毛泽东对整党的一个形象指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组织被砸烂，党员(除军队中外)都停止过组织生活。随着各级革委会的建立，整党建党工作成为一项迫切任务。196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中引用毛泽东讲的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吐故纳新本是一句成语，出自《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毛泽东借用来形象地比喻整党工作。

吐故纳新包括思想上和组织上两部分。思想上的"吐故"，即"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判他的黑'六论'"；思想上的"纳新"，即"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不同的人要求吐的也不甚一样。《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六厂二校"经验中就有区别。例如，对于党员干部(新华印刷厂代理厂长)是"长期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工作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党员群众(新华印刷厂一个普通党员)是"长期以来受刘少奇黑《修养》毒害较深，缺乏革命朝气，在政治上有些死气沉沉。"而知识分子党员则是"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轻政治，读书作官，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思想上"纳新"的标志是"过去是业务不离口，现在是革命宝书不离手。过去是追求成名成家，现在是废寝忘食为革命"(以上均见清华大学整党经验报导)。组织上的"吐故"就是把所谓"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纳新"就是吸收"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把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结果，"吐故纳新"中处分了一些不该受处分的党员，吸收了相当数量不够格的人入了党。据河南某县一个公社统计，开除党籍、劝退、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占全公社党员的3.4%，加上受到其它党籍处分的占全公社党员的5%以上。从1969年4月到1973年(九大到十大)的4年间，总共增加新党员600多万。

由于指导思想错误，不仅没能把党整好，反而造成了党员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和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效忠信

以表示感恩戴德、竭诚尽忠为内容的信写效忠信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党营私，维系其蝇营狗苟关系而采用的一种卑劣手法。

这类信中有对主子肉麻的吹捧和阿谀奉承，有愿为主子肝脑涂地、永效犬马之劳的誓言，有向主子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请求；充分表现了封建的人身依附的特点。例如：江腾蛟在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由于反军乱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68年4月29日，被免去了南空政委的职务。然而他却被林彪保护下来，留在北京。当时林彪给他打气说："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情况还会变化的。"江腾蛟对林彪感激涕零。1968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彪一家就先后写了20多封信，一再表示："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忘的大恩"，"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这个曾被授予少将军衔、50多岁的人在写给20来岁的林立果的信中说："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的感

激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和你的心……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表示:"天变、地变、宇宙变,红心永不变,""永生永世、子孙万代都要作林副主席的忠诚战士。"

1969年7月,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给江青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中,您像待孩子一样对我们进行训子工作。""山连山,水连水,江青是我们的知心人。"到了1972年,蒯大富在被审查中,再次向江青表忠心时写诗求助江青,"旗手率我斗群魔","安得恩人再训子"。他称江青为自己的恩人,希望江青像对待儿子一样来对待他。

效忠信再现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丑恶灵魂,也是他们依附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铁证。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站错队

对不支持造反、表"错"了态或者参加被定为"保守组织"的人的评语。

"文化大革命"斗争复杂,组织众多,而又不允许任何人不参加,不表态,因此每一个党员干部,以至一般群众都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对一个组织自认为是革命的参加了,但中央文革某人说那个组织是保守的,于是所有参加该组织的人都算"站错队"了。对某一党政负责人反错了是"站错队";保错了,也同样是。而且风云变幻急剧,今天是造反派,明天可能因某一件事处理失当,又变成了"站错队"。而一旦站错了队,打击歧视接踵而至。故当时有"搞不断的斗争,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的歌谣。

毛泽东企图缓解这种情况。1967年7、8、9三个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是他在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对所谓站错队和保守派划在一起而表示的态度。但是196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却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

"站错队"既然是受了修正主义毒害的结果,自然要好好清理,因此,使许多群众在运动中受到压制、打击和排斥。特别是后来的"整党建党"中,许多运动初期没有造反的党员长期写检查而不让过关,有的甚至被打成"修"字号党员而被开除党籍。实践证明,这种"站错队"论,不仅违反实际,而且遗患无穷。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毛泽东在1968年

听说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打死打伤很多人,毛泽东气愤地说:"造反派,真的反了?!"毛泽东接见造反派头头,周总理命令下掉蒯大富的武器。

1968年,社会动乱局势相对趋于缓和,但武斗严重。毛主席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以外,他还指示有关部门组织由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领导大学的工作。

我们警卫部队抽出一大批指战员参加了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遵照主席的指示解决校内的派性问题,结果被学生造反派打伤了不少。

清华园的"四·一四"造反派被围困100天,个个疲惫不堪,中央派去的宣传队帮他们拆除据点,解除武装,并送他们重返安全地带。

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拒绝放下武器,他们向冒雨行进的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投掷石块,并用大刀、长矛砍杀。这一天,他们打死打伤很多人,还扣压了100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主席气愤地说:"造反派真的反了?!"

一天晚上,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找人谈话,直至深夜零点才回中南海游泳池休息。

凌晨两点多,电话铃又急促地响起来。电话是总理打来的,他向主席报告了清华园武斗的情况,并请主席马上到大会堂。

我听到值班警卫的报告,立即调车,集合警卫部队,准备出发。

在门口,我看到主席缓步走出,面露不快之色,很不高兴地上了车。深更半夜唤起主席要召开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主要解决武斗问题。车到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停下,主席走进118厅。

周总理首先迎上来,说:"主席,这么晚又把你惊动了。"

主席轻声地说:"不来,没有办法呀!"

这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陆续来了,还有工人、宣传队的代表。主席仔细倾听了几方汇报情况后,决定召见红卫兵造反派。

我迅速指定几名战士把守大会堂西门,检查造反派身上是否携带有武器。

没有多久,蒯大富坐车来了,他很神气地对我说:"我

要见毛主席”。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拦住他的去路，请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他听不进去，争执了一会儿，依旧不肯放。我当即派两名大个子战士上前，不容分说，干净利落地下了他的武器，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

随后到的几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等也都一一被搜查，以确保主席的安全。这一切，我们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做的。

夜晚召见首都几位风云一时的红卫兵领袖，主席没有把他们当成光荣的造反派来欢迎，而是对他们迷失方向表示气愤和失望。主席坚持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有权介入学校的观点，还要求红卫兵下到农村参加劳动，很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主席严厉地批评几个造反派头头大搞武斗的错误。指出：“如果有谁继续反对解放军，跟解放军打仗，毁坏交通工具、杀人、放火，那便是犯罪，要坚决消灭之。”

毛主席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经过两年的实践，主席逐渐发现，这些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复课闹革命，但他们仍置之不理，热衷武斗。

会议持续到清晨还没有结束，上午又继续开。最后蒯大富表示：执行主席指示，无条件投降。

这次会议较有成效，主席把一批由工人、解放军、干部组成的“军、干、群”三结合小组派驻大专院校。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见警卫战士宿舍贴着他的像片和语录，风趣地说：“你们都是‘保皇派’呀！”

中南海的驻地和室外游泳池的北面、西面都有些空地，另外，主席院内还有五分多地。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全部开垦出来，种上苦瓜、辣椒、油菜、生菜、黄瓜、空心菜、冬瓜、大葱、大蒜、红薯、玉米、豆角等。1966年8月主席搬到游泳池后，经常散步到菜地，有时摸摸看看，称赞大家的手艺好。有时，他还教我们南方菜如何种，走到菜田里亲自示范。给主席烧饭的大师傅经常光顾菜地，选一些新鲜蔬菜。

一次，主席出来散步，看到同志们正在菜地里劳动，高兴地说：“我可以经常吃你们种的新鲜菜啦！”

有的同志高兴地大声说：“主席，我们菜种的很多，想吃什么叫大师傅来摘好了。”

一次，主席散步走到我们警卫部队驻地。他走进一个宿舍，看到同志们都在学习，房内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切井然有序，十分高兴。主席向战士们问好，并说：“警卫战士爱学习、讲卫生好。”主席环顾四周，见墙上贴着许多语录，中间还有主席像时，风趣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保皇派呀！”

同志们齐声说：“我们就是要保卫毛主席。”

主席开心地笑了。他还关切地询问同志们的生活情况，有多久没回家？是什么地方人？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主席要走了，他再次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搞好团结。”大家见主席要离开了，齐声说：“祝主席身体健康。”

主席一年到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只是工作时间太长或太累了，才抽点时间出去散步或游泳，这既是一种锻炼，也是最好的休息。主席带着满意的微笑，离开了警卫战士的宿舍，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64年后，主席身边取消卫士，以前卫士所承担的工作全部由值班战士完成，烧开水、打扫卫生、送东西和文件、烧锅炉、开冷风、种花、种菜、管理园林，样样都干。

有一年冬天，刺骨的北风狂啸，锅炉突然发生故障，关暖气的水管开关坏了，沸腾的水不住地往外流，若持续下去，就要影响主席房间里的温度。帮助烧锅炉的警卫战士侯玉灵，冒着烫伤的危险，当机立断，用自己的棉大衣裹住水管，不让滚烫的水流出来，保证锅炉正常供水。为此，侯玉灵被中队评为勇敢的战士，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

1968年秋天，“文化大革命”进入紧张阶段，主席的活动频繁，加重了我们警卫工作的任务。

毛主席亲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主席不断地开会，找人谈话，差不多每天中午都要到大会堂参加活动，晚上12点多才回中南海休息。

10月13日，在开幕式上，主席发表了讲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分组讨论了所谓“二月逆流”和“一贯右倾”同志的问题。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错误地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会上，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由于毛主席反对，未能得逞。

会议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时，趁机组织围攻参加过二月抗争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组织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他们的目的就是想乱党、乱军，在乱中夺权。到1971年11月14日，主席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主席的讲话等于公开给“二月逆流”平了反。

10月20日全会中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当晚9时被送进301医院。

由于八届十二中全会斗争紧张，我担心主席的安全，手术第三天便急急往回赶。领导和同志们都劝我多休息几天，可是这会儿，我哪里能躺得住？保卫好主席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10月23日，我陪主席到大会堂。主席一见面就问：“听说你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急性阑尾炎，动了个小手术，住了三天院就好了。”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我最怕主席因为我们的事而分散精力。

他关心地说：“现在感觉怎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现在工作很忙，你要注意休息。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

除去住院的三天外，全会从开幕到闭幕我始终都在现场，与同志们坚守岗位，认真负责，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我被评为8341部队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还出席了总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毛泽东指示：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11月，湖南某部解放军指战员，将自己种的桔子用火车运到北京送给毛主席。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警卫战士，他将五、六筐桔子转送给一中队全体同志。战士们十分激动，非常感谢主席对警卫战士的关心，并表示坚决做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让他老人家放心。

这一年，主席曾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柳河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及毛主席的批示。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创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大城市的家庭妇女及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受到下放劳动的启示，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纷纷迁回原籍或农村，成了下放劳动的一种补充内容。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的一段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实际上，主席早在1955年就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按照这个要求，许多知识青年陆续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走向远离父母的地方。这期间，也有一些地区把造反派、闹派性的人送到农村，无形中增加了农村的负担。

林彪让黄永胜当上总参谋长

江青曾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其中特别提到黄永胜处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才能”。林彪抓住时机，利用江青的讲话，于1968年将黄调入北京。3月22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当着主席的面，给当时的代总长杨成武罗织了所谓五大罪状，趁机安排黄永胜取而代之，担任了总参谋长。为更得心应手地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林彪将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视为心腹，并全部安排他们在军中担任要职。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吴法宪被提升为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李作鹏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邱会作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从此，作为正式机构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不再开会讨论，实际上军委办事组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停发了送各位老帅的文电。有了林彪的撑腰与暗示，黄、吴、李、邱在党内和军内的活动也就更有恃无恐了。他们在军内对于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干部，变本加厉地实行诬陷迫害，老帅们和一些高级将领几乎没有一个逃脱他们的打击。林彪对他手下“金刚”效忠他本人的行动，十分满意和赞赏。1969年林彪对他们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

（选自陈长江、李忠诚等《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九大”的一、二、三

一

“杨、余、傅”事件后，是江青提议，任命文一呈为北京卫戍司令。任命的当天，她发去一份公函，信封上写：文一呈司令亲收。值班参谋拒收此件，原因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司令，只有一位傅崇碧。”

信件被打了回来，江青暴跳如雷：“拿我不当回事儿？我要开一万人的大会，介绍文司令，开十万人的大会，介绍黄永胜。”

江青的怒，意在要把军委办事组、北京卫戍区，都置于她的控制之下。

那位文司令经常走动于江青门口，不时反映些情况，说些动态，打些小报告。

黄永胜本来就和林彪、特别是叶群近，在北京当总参谋长两个月，没理过江青这座庙，没烧过一柱香。

江青蕴好了气，一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突然指着黄永胜的鼻子喊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中央文

革，封锁我的消息，调动军队布署的报告，没报告我。”

黄永胜解释说：“江青同志，你误会了，这是主席定的：调动军队的报告，不要写那么一大串名字，今后只报主席、副主席、总理就行。”

江青蛮横地接着喊：“你们挑拨！我现在宣布三条，一、总理，康老，文元，找黄永胜、吴法宪谈话，你们要清理思想。二、黄、吴停止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三、黄永胜不能率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那个党和国家大事都要通过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就经常这样风风雨雨，变化无端。

因为代表团和名单已通报阿方，行期又近，迫在眉睫，不得已周恩来去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说得轻俏，但坚决：“不要理她。”

为了缓和，周恩来带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这一班军委办事组成员，去见江青。周特别嘱咐他们：“要忍耐，有什么话，现在不要当面顶，以后慢慢讲清楚。”

江青见他们进来，破口嚷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党中央，穿着军装、戴着红领章、红五星，不觉得可耻！这是我给你们争来的！”

按照总理的要求，大家都默不作声。

等江青又嚷了几句以后，周总理问黄永胜：“你们代表团什么时候动身？”

黄永胜领会了，说：“后天下午六点。一是来向江青同志请示，看还有什么注意事项。二是来告别。”

江青宣布：“中央文革不派人为你们到机场送行，回来也不派人到机场去接你们！这是惩罚！”

毛泽东通过别的渠道，听说了一些江青的恶作剧。他指示周恩来：“要开江青的会，让她做检讨。现在就开。”

黄永胜都吃了安眠药，已经快要入梦了，被叫起来去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听江青作检讨：

“我有错误，对军委办事组的三条规定不妥当，是因为我在病中，在发高烧，说胡话，脱口而出，请同志们谅解，不要计较。”

江青检讨完了。人们说着宽慰她的话：不要生气，气伤肝，有话慢慢说。正要散去，有人送来毛泽东的一个条子，上面写：

中央常委不要怂恿江，江不对的要批评。

江青听罢，愣了一下，放声大哭。

谁闹得清楚，这是哪一出？

为着试探，也为着拍江青的马屁，叶群在人前人后说：我要提议江青同志作政治局常委。

江青为着拉黄永胜，当然不止这一票，她当他的面说：“我准备提你为政治局常委。”

试探的各种气球，飘到了毛泽东的面前，他说：“我坚决不同意，我不能同江青共事，你们要提她当常委，我就不干。”

还有另一组谈话，倒是颇不相同：在京西宾馆，周恩来对胡耀邦、上将李志民、老革命帅孟奇、宋任穷说：“很好地做个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然后进‘九大’中央委员会，好为党工作。”

周恩来走后，四个人谁也不吭声，憋了半天，前志愿军政委、高等军事学院政委、将军合唱团指挥李志民问胡耀邦：“怎么办？”

胡耀邦异常干脆地说：“检讨什么？没有错，不检讨。”

几个人同声：“不检讨。”

没检讨，也没能进“九大”中央委员会。

又有一组谈话：叶群来到林彪跟前，温情又急切地说：“要让永胜进政治局常委。你不提，怕没人说这个话，你要是肯说上一句，也不会有人反对。”

林彪心里正乱，听到叶群说到黄永胜时的那种语调，那种情绪，就乱上又加了烦。正觉得不是味儿，叶群偏再添一句：

“永胜的身体又好。”

林彪动了颜色：“你个臭婆娘，有多大的脸面？有多少鬼心思！”

叶群被刺中心坎，她抓过一张纸，写了一串反击的文字：——不要吵，这样，工作人员听不见——你终日躲在房间里，算计别人，阴险，难以捉摸，心怀仇恨，整天以假象骗人！

林彪看着纸条，浑身大抖。叶群忙上去抱住，在他的怀里剧烈的抽泣。那样子，好像两个人同时在笑，而且笑得不行，又好像同在一辆颠簸的车上，颤动不已。

这也是一出呵，看吧，还有哪！

二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总理、康生、黄永胜开会，商拟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黄永胜向叶群透了这个风，同时告诉她：名单上有你。

叶群得到消息立刻把心思全部集中在这里：怎么样才能保证“叶群”这个名字不被划掉。分析当前形势，划掉这个名字最大的可能是谁呢？林彪。什么时机？他现在身体不行，不能去参加会。毛主席那边商拟之后，必定请周恩来到毛家湾来征求林彪的意见。迟疑不得，要把周总理先堵住，这边再打林彪的主意。想罢，叶群先给吴法宪打了电话：

“胖子，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你要想办法帮我！周、康、黄正在“一一八”那里开会，散会以后，你要让黄拖住周、康，别让他们到毛家湾来。详细情况我以后告诉你。快去办吧。”

什么事到了吴法宪那里都是任务。而且：“保证完成啊，叶主任，我尽一切努力，你放心！”

要说动林彪，得找林立果。眼下又不知这个老虎窜到了哪处山林。于是令秘书们紧急寻踪。

七点二十分，吴法宪来了电话，是值班秘书接的："请你报告叶群同志，我跟黄总长咬了耳朵，告诉他了，从'一一八'那里散会，让他拦住总理，不要去毛家湾。这个意思，我跟黄的警卫也说了。估计问题不大。"

值班秘书不摸底细，问："你讲的这是什么呀？叶主任能懂吗"？

吴法宪说："她一听就明白。"

叶群听了秘书的报告，心里安静了一些，这时，林立果也找到了，正在返回毛家湾的路上。

毛主席主持的会完了。不出叶群的预料，毛指示周、康，带着商拟的方案，去征求林彪的意见。出了人大会堂的"一一八"号房间，黄永胜建议周总理："已经这么晚了，林总可能早就入睡了。是不是明天再去，或者我们现在就写一封信，明天一早就送过毛家湾。"

周恩来觉得也对。于是进了福建厅，他亲自起草给林彪的信。

吴法宪第二次给叶群去电话："事情办成了。你好好睡觉吧，做个好梦给我们啊！叶主任永远健康。"

叶群抱着林立果的肩，央求地对他说："你老爸身体不好，活不了几年，我要是能参加政治局，将来对你会大有好处。你去给他做些工作，到主席那里开会也好，主席派人来也好，听到政治局有我的名字，可千万不要让他乱讲什么不同意的意见。这件事做好了，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这次进不进政治局，对妈妈一生是个关键！"

"你自己怎么不去讲？"

"下午吵了嘴。吵的真不是时候。"

林立果去了。叶群躺在床上，仔细推敲进入政治局的各个门口。她忽然坐起：严谨的周总理，会不会一大早来毛家湾？不得了！她抓过电话，要通周总理：

"您还没休息吗？总理。"

"我正在起草给林副主席的信。"

"他正要我给您说一声，说您一夜未睡，写个信来就行了，不用亲自来当面谈了。他近几天又不好，见了人就出汗。"

叶群放下电话，"整理"出一份《周总理电话记录》：

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是经过了预选，又经过主席亲自召集会议商拟的，如果林副主席没有什么意见，不用批字，划圈就行了。主席本来派康老和我当面向林副主席说明名单商拟的经过，并征求林副主席的意见。又恐影响林副主席休息，就写了这封信，不再去当面谈了。信，明早即派人送到。

第二天清晨，有周总理处送来的亲笔信，选票清样，林彪亲收件。

叶群把"电话记录"也拿出来，对秘书说："一齐报进去。"

秘书给林彪念了总理的信，又念了那份"电话记录"，把选票清样端到林彪面前，让他过目。

林彪情绪颇佳，扫了一眼，说了一句："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哟。"然后一摆手——通过了。

秘书出来，向叶群做了汇报。叶群展开那选票清样，像元帅审视作战地图，但那目光不是综览全局，而是紧盯在自己的姓名上：印得真切，此刻正在生辉。她的心花开了，在清样上拍了一掌：敲定了。对秘书命令道："替首长把圈划好，派人，退总理处。"

在正式投票前夕，黄永胜几个人，来到毛家湾向林彪做紧急汇报。

黄永胜说："北京卫戍区，文，这个人，原来就是江青同志提议任命的。上来就跟那边靠得很紧，天天到江那里去打小报告，常常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给军委办事组洒胡椒面儿。"

吴法宪灵机一动，插空补充了一个具体事实，情节曲折，但他说得简练："文，向江打过一个小报告，说《人民日报》记者金风，是蒋介石的侄女。江青同志就说要把金风抓起来。我报告说：金风是空军战斗英雄赵宝桐的爱人。江青同志叫我告诉赵宝桐同志立即跟金风离婚。麻烦得很呀！赵死活不离。后来，我们给他又找了对象，年青、漂亮的对象！金风关起来了，我们又帮赵宝桐结了婚。"——情节曲折还不在前面这一折，林彪完蛋，'四人帮'倒台，金风无罪出狱，得知赵宝桐已不是自己的丈夫，向各有关方面提出严正抗议！赵宝桐一听说金风完全是平白受冤，自己驾车，高速奔来北京。见了金风，二人抱头大哭！他们共同声明：我们感情如初，之所以离异，全是江青强加！而且金风根本不承认离婚——她完全不知此事！吴法宪他们后来给赵宝桐找的这位年青美貌的姑娘呢？已经生了一男一女！当初不是她追逐名位，现在，也已有了感情！"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作了一厚本小说！可是，人间悲剧竟是写之不尽！

林彪表示："那就不让文进政治局，但要让他作中央委员。"

叶群似无心地问了一句："看过他的档案没有？有没有什么辫子？"

无心的发问，成了重要的提醒，邱会作立即调来文的档案，发现：有两次被捕！

黄永胜说："散布出去。抓紧时间，赶快在代表当中散布出去。"

很快，如墨渍一样，不声不响地扩散开来：文，有变节嫌疑。

接着，又传来林彪的意思。这样的事情不会有原话。那意思是：江青、张春桥一帮子，威信太高了，不好，要布置几个人，不投他们的票，不能让他们得全票。

黄、吴、李、邱四大将，又分别回到自己的领地，如此这般，一番布置。

选举结果出来了。

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只有北京卫戍司令，文，没进政治局。

江青一看自己竟不是全票，跺着脚骂："老娘的威信还不如你们高？这才怪！"

她秘密布置人，查选票："看谁捣了老娘的鬼！"

江青找到林彪，她想问罪，想哭诉一场。但是，还没等她开口，林彪先说话了：

卫戍区的文，总是拉你的大旗，威胁军委办事组的几个同志，黄永胜他们没有对你，主要是对文有很大的意见。文这个人，可能还有叛变行为，我正要叫他们去向你报告，请示一下怎么处理。"

江青的反应是快的，转变的速度也是急的，有时过度，她全忘了来意，说："把文抓起来！"又是风风火火，去找了黄永胜："我们要搞好团结，把文抓起来，我们就是要一致！"

黄永胜沉思了片刻，说："那也用不着吧。把他调动一下，也就是了。"

受林彪的旨意，黄、吴找文正式谈话。谈话的方式是开门见山，内容也实实在在。但是，整体结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计。

黄永胜说："因为你历史上的疑点，江青同志亲自向林副主席建议，要把你抓起来！"

文，只觉得头顶响了一声炸雷，他被震懵了。

吴法宪说："林副统帅，黄总长我们都不同意。"

黄永胜又说："林副主席已经向主席报告，主席也已批准，调任你为成都军区副司令。"

文，这才又苏醒过来，在这一刹那，他的理智处于最佳状态，因而说出了一句是至理的话：

"天下有了江青，就永远不会太平！她就是当今武则天、慈禧太后。"

黄永胜接着告诉文："林副主席要接见你和你的爱人，回去准备一下吧。"

文，又进了感情最激动的境界：顿时，热泪满面。

送走了文，吴法宪问黄永胜："怎么调他到成都？有什么学问？"

黄永胜告之底细："文，过去跟成都司令有矛盾，现在弄在一块去，好掌握。林副主席是很懂'矛盾论'呵。"

吴法宪说："林副主席，你总长，对文也有真心哪！好，很宽大，很为怀。"

黄永胜被吴法宪一句"真心"，诱导出真正的真心话："抓起来，就被江他们控制了，把过去的事都得翻腾出来，对我们有什么利？"

吴法宪装了一阵糊涂，摸准了各个角色之间的距离，为自己下一步在这舞台上的进退，定好了尺寸。

这件事，还有一个尾声，颇有戏剧性，写于此，以再认识一下"生活"，那"真实的生活"：

那个即将卸任北京卫戍司令的文，当年上任不久，就在黄永胜的办公室，拉过来一位秘书，李。他交给这个秘书的任务就是：注意黄、吴等人对江青同志有什么攻击性言论，或者有什么非议，你直接告诉我。

秘书李，曾不断地把一些二话，传给文。现在，文完了，但秘书李还不明细里，他正在秘密起草"九大"投票经过，准备上报。这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李当场被人发现，立即被囚禁，并且，连夜用飞机押运外地。

在押送的机舱里，秘书李偷写了一张纸条：

敬爱的江青同志：

请你救我，我有重要的话，要当面向你报告。

他把纸条丢在座位旁边，期望服务人员打扫机舱时，发现它，转上去。

这张纸条是被发现了，也转上去了，但去的是另一条路线。服务员交给了服务队长，队长交给了师长胡，胡交给了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交给了黄永胜，并且惊叹地说："又一个小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哪！千真万确，阶级斗争，复杂、激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处。我说的是那个秘书李，他挣扎着摸这边，觉得是天，摸那边也以为是天，可怜他不知自己蒙在鼓里。

三

"九大"还有一项非正式、也少为人知的内容，我顺便记在这里，算作一件旧日新闻——叶群为自己的儿、女选对象。事物、或者称作艺术家们进行创作的生活，真如汪洋大海的浪涛，经常在我们的意想之外跳出来，令你惊愕。

还是在一九六七年，叶群就向吴法宪交待过："凡是在北京开人数较多的会议，都要派人去给我们两个孩子物色对象；女的，必须具备'国家面貌'。男的，要选一个全面的人，这个人要有罗秘书那样的形象，于新野那样的能力，保卫处长杨那样的忠诚，报社记者苏那样的写作水平和性格。"

在挑选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完善条件，建全了组织——对此，也请不必吃惊，事情真的就是这样。

组织：上海早些时成立了"找人小组"；北京，有专门班子。

经验：没有全面总结，但扼要的已经有了若干条：到人多的地方去找：公园门口、百货商店、工厂、学校、火车站、码头。林立果向他们布置说："一般情况下，出动的人可以少一点。关键性时刻，比如上山下乡的要走了，要投

入力量，不要把大鱼漏掉了。跑掉了，就找不回来了。"看见好的，就紧盯梢跟住，一追到家。有时见一个小男孩不错，就问他有没有姐姐？哥哥？有的看眼睛很好，但戴着口罩，就上去说话，使对方摘下口罩，看个全面。有的不知皮肤是否细嫩，就约去游泳。但此事不能搞群众运动，人家知道了不理解。

条件：叶群数次明确："我们就这两个孩子，在上面接触的人多，政治上要可靠，外形要过得去。。。。女的，身高要一米六三至一米六六，太高了也不好，单个出去没什么，两个人一块出去，人家就会议论。性格要好，有的不爱讲话，遇事易闷气，还得别人猜。有的爱顶嘴，也不好。主要条件是长相，思想不好可以慢慢变，长相不好，一辈子变不过来。"林立果曾经强调过："找人的政治条件，不要抠得太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不要紧，很复杂的可以移植：就是要重新认一个政治条件好的父母，来改变成分的情况。"

至于条件的细则就更多了：抬头，脸上无皱纹，鼻子端正不露孔，浓眉毛，双眼皮，不胖不瘦，皮肤细白红润，头发多、黑、有光泽，牙齿……，不再详列。

还有意义：叶群说："要把这件事办好，这件事办好了，林副主席就放心了，使他高兴，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多的贡献。"一个干将的夫人参予此事，她向具体工作人员讲："这件事是最大的忠，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光荣，最大的信任！"随着林立果被捧为天才、超天才，精神领袖行位的不断升腾，"找人"的意义也就逐渐深远、伟大，其中种种，还将使你不住地惊讶。但，这是后话，我将在第二部中提及。现在，先介绍叶群在"九大"期间亲自"找人"的情形——这是两位秘书的追记：

"九大"开始分组活动。一天，叶群回来，进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说："我刚参加会回来，开会时，我特别注意看人，发现有的代表长得不错。今天，我就见到一个男的，长相很漂亮，看上去很年轻，身材也好，我挺高兴。后来一打听，人家早结婚了，还有了两个孩子，白欢喜一场。不过，这倒使我得到启发，'九大'这么多代表，年轻人又多，说不定就碰上个好的。多了我们也不要，男女就各要一个呶。我看这是个好机会，现在正在分组活动，人少好看清。我是哪个小组都去，但都是晚上去的，眼睛不好，近的还可以，远的就不行了。你们秘书比我随便，可以当大会工作人员，到各小组去物色物色。但不要传出去，叫别人知道就惨了。"

秘书甲、乙说："去看可以，不过希望不大。代表当中，年龄大的占多数，有些年轻的，过去派出去'找人'的人，恐怕也都看过了。"

叶群说："那不一定，你们去看看，有，更好，没有，我们也就放心了。"

甲、乙问："会议期间，林办秘书在会场转来转去，目标大，有没有影响？另外，我们没工作证，怎么进会场？"

叶群大不耐烦了："其他负责同志的办公室，也有工作人员参加会，碰到熟人就说听听讨论情况。会场就三个地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京西宾馆。一是跟我一起进去，二是找黄总长的秘书宋。你们看可以不？"

"可以。"

"代表的简历，你们谁看过？"

甲："我看过。"

叶群问他："符合条件的多不？"

甲："对这一点没注意。"

叶群指示他们说："你们再看看，把符合条件的给我拉个名单，注明是哪个省的，明天早晨，把单子给我。"

我们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中选了三十一个人列成名单，第二天一早，交给了叶群。

当晚，叶群带我们到了北京饭店。黄永胜、吴法宪在楼下大厅接我们。几句寒暄之后，叶群对我们说："我们三个现在到各组去看望代表，你们两个别的事别管，跟在我们后面，就是看人。"

我们随黄、吴、叶上楼，先到东北组，由辽宁的司令陪同，各小组转了一圈。就在吉林小组听会时，叶群走过来，坐到我们身边，咬着甲的耳朵说："右角那个男的不错，这里太远，你到跟前去看看。"

甲走过去看，不久，便离开会场。刚一到走廊，叶群就急忙地问甲："你看那个人怎么样？"

甲回答：年龄大了，白头发很多。"

叶群扫兴："糟糕。"

然后，又到湖北组，由武汉的司令陪同，转了一圈，没发现可供选择的对象。

又接连走了几个小组，叶群对秘书们说："今天没收获，碰到一个还是白头发。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黄总长还有事情。"

吴法宪忙插上来说："我也走了，我也走了。"

过了两天，下午。叶群把我们带到京西宾馆。她说："今天两个任务：一是看看，二是作证：我和老夫子（陈伯达）到河北组解决保定问题。本来是他管，硬拉我来。去，就得说话，说话，两派就各取所需，搞不好，还会有人说我插手保定。你们听听，将来有问题，好做个证明。"

这一天，只参加了会，没找到美男、美女。

又过了两天，陈伯达、吴法宪到北京饭店参加华东组大组会，叶群带了我们来继续"找人"。

大组会的人很多，包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我们照叶群的安排，在会场外围转悠了两趟，便坐在后面的记录席上。不大的工夫，叶群从会场的前面，走到我们身旁，小声地问："怎么样？发现什么人没有？"

甲："人很多，看不清，能看到的没发现。"

叶群更小声地吩咐我们："你们到楼上中南组去，要

注意，总理在那里参加会，你们从后边进去，他不会注意。你们去找黄总长的宋秘书，他在那里担任记录。江西的代表当中，有一个不错，叫于什么，我看过。宋秘书认识他，让他指给你们看，咱们晚上回去研究。”

我们到楼上，找到了宋秘书，看了那个于，便回了毛家湾——林彪府地。

晚上，叶群回来便问我们：“看到没有？怎么样？”

我们说：“看到了，人还不错，长得单薄，身体怎么样，不知道。”

叶群说：“听说此人有组织能力，但是个造反派头头，身体不太行，鼻子大了点，不理想。”

接下来三天，我们又去看了三次，仍然没有新的发现。

是第七天，晚上，叶群急急忙忙往办公室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说：“我在京西宾馆礼堂看演出，立果在家吗？”

秘书乙：“在。”

叶群问：“你们秘书谁在？”

乙说：“我……。”

叶群：“废话，甲呢？”

甲接过电话，答：“在。”

叶群说：“我看演出时，发现一个女的，特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叫……叫谌琦。你们两个秘书，叫上老虎，马上来这里，我等你们。”

我们到了京西宾馆，叶群像指挥战斗一样，跟我们说，越急她还越啰嗦：“吴司令员正在楼上开会，开了一晚上，我派小王到楼上去叫他下来。让吴司令员找那个女的，叫谌琦，谈话，你们几个就坐在旁边看，一下子都看清楚了，就在休息室看，那里灯光好。”

正说着，吴法宪从楼上下来了。叶群忙上去拉住他的胳臂：“我发现一个女的，长的特别特别好，我们要细看看。你出面跟她谈话，随便扯，问她讨论情况，参加“九大”的感想，见到毛主席……你怎么谈都行，要让她开口。”

吴法宪道：“那好办，好办得很。”

叶群对秘书甲说：“你跟我到剧场去，我指给你看，她在哪儿坐着，然后你把她叫出来。”

当叶群把谌琦指给甲看后，甲走到谌的面前：“你是谌琦同志吗？”

那女子答：“是。”

甲：“请你出来一下，吴副总长找你谈一谈。”

谌随甲走出剧场，来到休息室。

我们和林立果都坐在吴法宪旁边，叶群坐在稍远的地方装作休息。

一见面，吴法宪东拉西扯，问了谌的家庭情况，年龄，学历，参加大会的收获，见到毛主席的感想，今后的决心。他突然地问：“你的身高有一米六七了吗？我看有。”

女孩子说：“没有，一米六三。”

吴法宪走到谌琦面前，把她拉起，用自己的身体跟这女孩子边比边说：“一米六三，一米六三，看起来我不如你高，好得很，很好，一米六三好。”

谌琦去后，叶群忙凑过来，高兴地问林立果：“你看我找的这个不错吧？我们在各组跑了多少次，一个也没发现。这个是我亲自发现的，他们把好的都给漏掉了。”

几个人都注视着林立果。但他不表示任何态度。

叶群急了，问：“怎么不说话呀。老虎？”

林立果冷冷地回答她：“我还没有考虑好哪。”

在驱车回毛家湾的路上，林立果向秘书甲、乙说：“叶群给我找的人，一般地不能沾，知道为什么吗？她是要利用她给我找的人控制我，能上她这个钩吗？”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是，生活，并不总是把真实的面孔向着你，往往完全相反，于是，便产生了虚伪、欺骗、奸诈、愚弄……

还记得吗？使劲儿往人们的灵魂深处硬灌的“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如此不三不四，都是人家这些高觉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创造发明出来的，而且把林彪树为光辉榜样。望尘莫及，你看人家，多么会忠，忠到了什么程度，忠得多么辛苦，废寝忘食，用尽心机。

对，跟着学吧，除了那十来个“一小撮”——他们不够资格——之外，全国革命群众们，心往忠字上想啊，劲儿往忠字上使，步往忠字上迈，血往忠字上流吧！

来吧，我们一齐跳起忠字舞！不然，我们就没有今天，更没有明天。

傻！真傻！整个地傻帽儿！无神论者成了“官教徒”，还创造了一套“官教仪式”，并且带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悲哀！

（节选自《十年动乱》）

康生其人其事

心狠手毒害人成性

十年浩劫中，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诬陷和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许多重大冤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

据查证，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

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839名。如1968年5月16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诬陷贺龙同志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给贺龙同志戴上了"国民党"、"军阀"、"土匪"等一大堆帽子。康生还伙同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同志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

被康生点名诬陷的800多人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33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20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陈再道、梁必业、黄岩、李启明等200多人，还有不少各界知名人士。康生随心所欲，凭空捏造，任意给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死党"、"帮凶"、"败类"、"坏人"、"反革命"种种罪名，甚至把反他也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加害于人。他对革命同志心狠手毒，还表现在他写的一些所谓"定罪"批语上。这些批语使用了"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突击审讯"、"送监狱"、"铐起来"等许多恶毒字样。一道令下，就置大批干部于死地。已查明，被康生直接点名迫害致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就达80多人；致残致病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党的"九大"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康生勾结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干了几桩罪大恶极的勾当。一件是：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中附上他亲自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竟达总数的71%。再一件是：1968年8月23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报告，把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61%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件是：1968年8月28日，康生、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把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情况分类排队，开了个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划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严重错误"的，竟占50%左右。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残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凭证"；同时，它也成了康生所犯罪行的铁证。

康生诬陷和迫害干部，其特别恶劣之处，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些人的情况，却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利用权力，捏造罪名，制造冤案，蓄意陷害。下面列举的，只是其中几个最突出的事例：

薄一波等61位同志1936年出狱，是由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经党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康生1943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1944年他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竟闭起眼睛说瞎话，硬是诬陷这些同志为"反共叛党"，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揪叛徒"之风，陷害了一大批同志。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件"，也是康生一手捏造的。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制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拘禁，以后又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1946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经我党中央营救，除公开叛变的十多人外，130多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6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那时候，康生甚至跳上汽车，同一些同志热烈拥抱。但是，1967年，这批从新疆回延安的同志，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和审查。康生明知此案一切情节，不但不说明真相，反而无中生有，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8年之久，大部分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26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伙同谢富治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自治区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1968年2月4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1969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因"内人党"等冤案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达34万6千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

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三十年代在苏联就认识康生。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康生共事过。以后，他到华北白区工作的情况，康生也是了解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亲自指使专案人员，搞了大量假材料，制造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刘仁案件"，陷害和株连了一大批人。1968年1月，康生在一份捏造的报告上，杀气腾腾地加上批语："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从此以后，刘仁等同志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1973年10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1969年惨死于狱中。

康生陷害干部，竟然荒唐到单凭他的一次"相面"就可以定案的程度。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同志，就是这样被迫害的。

1968年1月2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一个会议室，康生对赵健民同志作了一次既是十分滑稽又是卑鄙无耻的

谈话：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1936 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的一个政治假案）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 40 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根。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 8 年之久，直至 1978 年 7 月才得到彻底平反。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1 万 4 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1967 年 4 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信口雌黄，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像个特务。"就这样，由于康生的"一见定案"，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 6 年，直到 1978 年底才得以平反。

（节选自《历史在这里沉思》）

江青和林彪的勾结

于有海

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写道：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但是，江青、姚文元之流在法庭上总是抵赖、掩饰他们同林彪一伙的丑恶关系。直到 12 月 24 日的法庭辩论中，江青还说什么她这一帮"是按中央的决议办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听林彪指挥的"，似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勾结过！甚至完全颠倒黑白，说她这一帮人是"反对"林彪的。

可是抵赖、说谎最害怕的是事实，我们还是看事实吧！

事情还得从他们一起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起。林彪、江青究竟向刘少奇身上泼过多少脏水，可以留待以后再说。这里只讲他们两个人在给刘少奇定"罪"时表演的一出双簧戏。1968 年 9 月 16 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纵的专案组编造伪证、整理报送的刘少奇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上，写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诬陷之词，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林彪看了江青写的东西，正中下怀，马上批写"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在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恶活动中，林彪、江青一唱一和，双簧戏一直都是演得惟妙惟肖的。

1966 年 9 月 8 日，林彪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接着，江青就在会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大刽子手"，"要把贺龙端出来"。

1966 年 12 月下旬，江青叫嚷"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江青看后又叫"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

在共同的反革命活动中，江青和林彪之间，正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彼此"完全同意"的。

至于在他们的勾结中，林彪花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资"收到了怎样的"一本万利"，事实早已作了回答；江青从林彪那里捞到了多少"好处"，同样不再是新闻了：

她是由林彪任命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的；

她通过林彪的老婆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非法查抄郑君里、赵丹等五位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以销毁有关她的丑恶历史的材料；

她还跟叶群秘密交易，迫害了解她老底的孙维世，

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如此种种，都出于他们共同的反革命野心——篡夺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江青和林彪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吹捧，互相抬高对方的身价。

江青的为人，包括她心狠手毒、反复无常、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等恶劣的品行，在老干部中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林彪在 1966 年初就向人吹捧说：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1968 年 3 月，林彪居然使出了一个罕见的招数，他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 9 级提高到 5 级。他还把江青吹上了天。林彪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林彪说这话大概也觉得离谱，心虚，所以又赶紧补了两句假大空的话："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

也就是在这次林彪讲话的大会上，叶群带头狂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回报林彪的捧场、抬举，当然不仅是她一再叫喊的林彪是什么"光辉榜样"、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她要发挥的"伟大的作用"、"很大的创造性"之一，就是满足林彪当"接班人"的权欲。1968 年 10 月 27 日，江青在一次讨论党章的会上，极力鼓噪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她甚至用耍无赖的口吻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1969 年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的一次会上，江青在利用合法形式，配合林彪篡党的时候，她进一步用了耸人听闻、影射攻击性的语言。她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当然，所有这些，还只是大面上的东西，是披着一层所谓"合法"的外衣进行的阴谋活动。林彪、江青私下里频繁密谋的事情，还有更多是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四人帮"被粉碎后，从江青的住处查获了一份电话记录，光是 1969 年到 1971 年 9 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她和林彪、叶群之间来往的电话即达 470 余次之多，即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他们之间就要进行一次电话联系，互相关心，互相问候。翻阅一下 1971 年 4、5 月份江青保留的电话记录，就可以看到江青同林彪、叶群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

那时，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了 8 个月，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里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些什么电话呢？例如：4 月 29 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 月 2 日，江青在电话上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 月 14 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

此后，江青和林彪相互勾结，还可以列举两个引人注目的证据。

其一，1971 年 6 月 9 日，她亲自导演，给林彪照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秃头像。这张秃头像后来刊登在 1971 年 7、8 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江青还为林彪头像命题："孜孜不倦"！

其二，1971 年 9 月 8 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人送来几个西瓜。江青立即回电话："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以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 月 12 日下午，也就是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荒野的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 4 个西瓜游颐和园。她感激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江青和林彪之间不仅有过勾结，而且始终勾结，勾结到林彪亡命之际。这就是历史。它清楚地表明：江青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林彪的，恰恰相反，江青一伙同林彪一伙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合伙进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罪恶活动的。如果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部也有矛盾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合谋的犯罪过程中，争夺权力，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是毫不奇怪的。

(节选自《历史在这里沉思》)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人们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春天，北京发生了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现在，经党中央批准，已经正式平反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从二十三日凌晨到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江青叫嚷："傅崇碧不得到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进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她煽动说："冲击中央文革，这是什么性

质的问题?要抓什么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当场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又当众讲了这样的鬼话。江青一伙为了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对这一骗局又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指责北京卫戍区对"冲击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查清"，甚至说什么冲中央文革时，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车里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

这真是千古奇闻。事实究竟怎样呢?

原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三月五日夜，江青要傅崇碧等同志去过问此事。他们把调查的情况当面向江青、陈伯达报告。江青不相信，要傅崇碧同志派人继续查找。傅崇碧同志和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几位负责同志查来查去，结果还是这样：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具了收条。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

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传达室代为联系，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江青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吼叫："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姚文元在一旁帮腔："傅崇碧，你是没有请示。"傅崇碧同志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但根本不容他开口。真像林冲被骗入白虎堂，一场预谋的恶剧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决说明了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江青却说不可能。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点。这时，江青只好要姚文元把人叫来。保密员一来，江青不问情由，劈头就骂："你是个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正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随手翻阅一会，突然脸色大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天后，江青又对傅崇碧同志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即三月二十三日凌晨，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同志调动工作，而且限令即刻离京。第二天，又升级了，宣布傅崇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撤职审查。此后，接连四次抄傅的家，并将家属、子女赶出北京。

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送给新任命的卫戍区司令员。收发室的同志不了解傅崇碧同志被撤职的情况，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把信退了回去。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决定。接着，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同志的秘书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三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姚文元又下令逮捕傅崇碧同志的前任秘书，并要"询问傅崇碧和他们冲钓鱼台的情况以及他带进的厚皮包内藏的是什么。"其实，他携带的皮包装的完全是文件和办公用品，哪里有什么枪枝、子弹?

显然，这是江青一伙预谋的一个圈套，一场卑劣的政治暗算！

在上一个预谋的圈套正在演出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三月八日晚上，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

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去要材料的同时，聂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她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三月十一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与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她还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谎言。明明是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明明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商量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这样，傅崇碧同志就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三月二十八日，哈斯一到办公室，即被隔离审查。四月二日，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其中说："我前几天就说过，我记得哈斯有问题，但一时记不起是什么问

题。现在党校来信，揭露哈斯问题，使我想起此人是叛徒杨献珍、孙定国反对主席的黑干将。”“他们同杨、孙一起疯狂地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和‘思维存在的同一性’。哈斯还写了文章，不知是谁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到卫戍区，对此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至少要监护起来隔离审查。”真是满纸谎言，恶毒诬陷。

人们不禁要问：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理论家”为什么挖空心思，制造如此卑鄙的骗局，必欲置傅崇碧同志于死地呢？

这是因为，傅崇碧同志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地掌握着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总理、叶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多少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少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当时社会动荡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极大地障碍着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起初，他们妄图用谣言、恐吓、利诱的手段拉傅崇碧同志。这一着未能得逞，他们就罗织罪名，阴谋除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北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等候开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在林彪讲话的时候，陈伯达、江青一伙像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周总理。他们喊的口号多是反对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会议结束，傅崇碧即刻启程，周总理送他到门口，语重心长，叮咛再三：“要保重身体，要经得住考验。”总理叮嘱有关人员好好照顾傅崇碧同志。

傅崇碧同志被撤掉职务，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七年。七年里，他受尽折磨，多次被审。在他被放逐的第二天，那个“理论家”就指使人要傅崇碧同志承认，他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同志。审问人甚至提出这样离奇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你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这些问话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老帅们包括贺龙同志，是开国奠基的勋臣宿将，对于他们，他只有尊敬和爱戴，哪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他跟着党和毛主席出生入死打江山，身上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七个窟窿，怎么说要反对毛主席？七年里，尽管扣发了工资，他每个月还是如数留出党费，在票面的一角注明月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竟没有人敢收他的党费。七年后回到北京，他才把积下的党费交给组织。七年里，周总理一直关怀着他，为他的问题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下，傅崇碧同志回到首都，终于见到了周总理。身患重病的总理心情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傅崇碧同志握着总理的手，哭了，总理的眼睛也湿润了。总理问他身体怎么样，嘱咐他先检查身体、看文件，好好学习，再谈工作。

回顾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非常明白：这是江青和林彪狼狈为奸，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他们为了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制造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又炮制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老同志，然后把他们的死党、爪牙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位。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他们阴谋策划出来的。

现在，沉冤昭雪，林彪、“四人帮”也成为历史的沉渣。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我们要牢牢记住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这是值得深思的。

（原载 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作者：张万来）

恢复历史的真相
——阿甲谈京剧《红灯记》创作经过

黄　华　英

阿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和著名戏曲编导。他自 1938 年到延安后，一直活跃在延安等地的京剧舞台上，从事京剧艺术创作和京剧改革工作，有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和很高的艺术理论修养。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和名誉院长。1984 年他离休后，潜心总结经验，并研究中国戏曲的表演和导演理论，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已经写出了十几万字的书稿。

阿甲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看上去却还是精神矍铄。听了我提出的问题：京剧《红灯记》的创作经过，他捋着髭须，陷入了回忆和沉思。默然良久，他慢慢地说：

那是 1963 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决定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当时全国许多京剧团都创作演出了很好的京剧现代戏，中国京剧院也在积极准备。大约在九、十月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交给我一个沪剧《红灯记》的本子，他说江青建议把它改成京剧。我看了本子，觉得不错，便按照京剧的特点拟了一个改编提纲。由于我当时还负责《战洪峰》和《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排练，忙不过来，就把《红灯记》的改编提纲交给翁偶虹写初稿。然后，我根据这个戏的导演构思对初稿做了基本的修改，写了第二稿。在排演过程中，边排边改，前后共计九稿，都是我自己执笔。这个戏的音乐设计是刘吉典同志，老旦唱腔设计是李金泉同志，李玉和的唱腔设计是曾经扮演过李玉和的著名演员李少春同志。在创作排演过程中，由林默涵同志率领，我们还到上海去观摩了沪剧《红灯记》。

1964 年 5 月，我们首先排出了前五场戏，文艺界的同志们看后反映十分热烈，一致称赞。七月，全戏完成，我

们请周总理、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同志们观看彩排。大家都很满意，认为这是现代戏中一出难得的好戏。于是《红灯记》正式公演，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江青仅仅是推荐了剧本，在整个排演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到过排演场，也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关剧本创作的意见。当时，一直是林默涵同志在抓这个戏的创作。

谈到江青，阿甲平静的语调渐渐变得激愤起来：

《红灯记》公演后，引起观众很大反响。这时，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她要我陪她看《红灯记》。看时她是激动的，我看见她擦眼泪，看完后还上台向大家祝贺。可是过了两天，江青突然把我和李少春等人叫去，板着面孔说我们把戏改坏了！我们很吃惊，问她哪里改坏了，她也说不出什么名堂。除了抽象地说"监狱斗争"要改为"刑场斗争"，李玉和唱段太少和京剧不能用"吹腔"（这是她的无知）之外，她只提出了些诸如补丁应当补在哪里，铁梅的红头绳应当到哪里去买，李玉和的化妆应如何如何等鸡零狗碎的意见。

类似这种鸡毛蒜皮的或概念化的意见还有不少，但是对《红灯记》的主要情节和唱段，江青没有提出过任何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我逐渐看清了江青的卑鄙用心：她并非不知这个戏是改编得很好的，否则她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她所以要否定我们的改编，提出这样那样的刁难，无非想以此说明戏是按她的意见搞出来的，企图把功劳归于自己。

由于江青的种种干扰，我只得把她那些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意见，想方设法搞得具体合理，使之符合剧情的需要。一次，我对张东川同志说，江青的意见不好办。我只好勉强接受她一些意见，而又不损害自己的艺术构思。但是，这样做是很难的，江青仍然对我极为不满。一次，她纠缠到周总理那里，大发脾气，说我不听她的意见。周总理深知江青其人，很理解我们的困难，对江青说，你先去休养，《红灯记》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后来，总理委托林默涵同志抓好这个戏，并调了《红灯记》的有关材料去看，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林默涵同志也知道江青的为人，为了抓好这个戏，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我们排除了许多困难，在创作上也出了很好的主意。可是江青从北戴河回来后，仍然念念不忘《红灯记》，又来插手。她说她被蛇咬了一口，睡不着觉。可见，江青为了抢夺这个戏，是如何煞费了苦心！

尽管有江青的种种刁难，《红灯记》的基本成功之处，是由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心血凝成的，是磨不掉的。所以，它总是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64年底，毛主席（主席不止看一次）、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观看了《红灯记》，给我们很大鼓舞。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还上台接见了演员，江青十分得意。这时，江青本人及其追随者已在无耻地鼓吹《红灯记》是江青的功绩了！江青上台与演员见面时，看到我，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这出戏的成功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我不听她的意见，戏的成功是她的功劳。接着她又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跟你谈，将来你会知道的。"当时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含意。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张东川、刘吉典以及一直抓这个戏的林默涵、管过一段《红灯记》的徐平羽都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时，我才明白：江青早在那时就在策划迫害文艺工作者的阴谋了！

还应提到一件事，"文革"前，中国京剧院根据领导的安排，将《红灯记》的剧本译成了几国文字，准备为各国驻华使节演出。江青得知后，大动肝火，在电话中质问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说："这是谁的主意？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报告主席！"徐平羽同志莫名其妙，只得取消了这次演出。后来我们才知道，为驻华使节演出《红灯记》是周总理的意见，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

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疯狂的年代，我和《红灯记》的编导、作曲等都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军代表找我训话说："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可以是杀头，可以是坐牢，也可以从宽。关于《红灯记》，今后你就不要开口了，它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如果你还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你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关系，对你没有好处！"我心里明白，他们是在威胁我，堵我的嘴。我想，历史总有一天会说明真相的！

"听刘长瑜同志说，您曾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出庭作证，是吗？"我忍不住发问。

阿甲脸上展露了笑容，他回答说：是的。1980年，我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当面揭露了江青抢夺《红灯记》创作成果、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当时她哑口无言。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其他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化部清查运动批判组也撰写了批判江青掠夺《红灯记》的文章。应当说，《红灯记》已回到艺术家和人民的手中。《红灯记》本身和江青利用它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是两回事，我们不应该把孩子和脏水一同泼掉。

谈到京剧《红灯记》在京剧改革中取得了哪些有益的经验时，阿甲说：《红灯记》在表现现代题材的内容时，无论在唱腔、表演、音乐设计、道白等各个方面，都注意了既保持京剧特有的程式，又突破了旧的程式，使之适合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性格。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总结的。

我非常赞成这个意见。我问阿甲："您对重新排演《红灯记》有什么看法？"

阿甲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红灯记》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重演《红灯记》，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在艺术上，可以使《红灯记》在京剧现代戏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得到继承、巩固和发展。目

前，除了个别演员需要调整之外，当年的编导、作曲、演员都还健在。只要领导支持，演员阵容整齐，有财力、物力和严格的排演纪律作保证，重新加工整理剧本，排演《红灯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

（原载198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关于“斗、批、改”的几则轶闻

（一）到农业第一线去

九月十四日，夜已经很深了，工人宣传队住室里一场激烈的争论仍未停止。

“你快回去吃饭吧，明天我们研究以后答复你。”这是宣传队指导员的声音。

“不行，现在就要答复。不批准，今天我就不吃饭！”这是王晨钟同学的声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得从头说起。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最新指示的鼓舞下，洛阳十九中许多毕业生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可是，三年级六班的头头王晨钟，在节骨眼上有些退缩。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老工人陈长福，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跟王晨钟同学进行了多次谈心，很快地就成了小王最好的朋友。一次，老陈非常诚恳地问小王：“你是革命造反派头头，为什么不带头报名上山下乡？”小王却回答说：“革命造反派应该照顾照顾嘛！叫老保下农村去。”老陈一听，知道小王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不浅，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王啊！你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可不要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你想想，你是革命造反派战士，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为了给自己在毕业分配中争条件呢？”一席话把小王说得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终于承认了错误，并揭发了学校走资派散布的“造反派头头应当照顾”的反动言论。

第二天，在老陈的推动下，全班同学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狠狠的揭发和批判，并对学校里的走资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小王走上了讲台说：“毛主席让我们走同工农相结合的路，我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我坚决报名到农业第一线去，去滚一身泥巴，去炼一颗永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会场沸腾起来了。“向王晨钟同学学习！”“坚决支持王晨钟同学的革命行动！”“紧跟毛主席，坚决到农村！”口号声经久不息。

天很晚了，老陈顾不上吃晚饭，拿了两个馒头，骑上车子就向王晨钟家里飞去。为了了解学生家长的情况，与家长取得配合，老陈早已跑遍了班里每个同学的家。现在，他已是第三次去王晨钟家里了。在老陈的耐心帮助下，小王全家都积极支持他上山下乡。可是小王却没有被批准，首批七十八名城市知识青年到灵宝安家落户的光荣榜样上，没有小王的名字。这怎能不叫他着急呢？

这就是小王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原因。

最近，王晨钟同学终于被批准下乡了，他实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老陈把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双手捧给小王，小王激动地把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别到老陈的胸前。小王和他的同学在工人们的帮助下，胜利地走上了新的征途。

（二）“连心饭”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翼城县革委会常委吴春安同志率领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翼城中学后，照例被引到教师灶上去吃饭。老吴一边吃，一边想：“咋不见学生呢？一家人吃饭，咋光见大人，不见小娃？”他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教师的小灶，学生单另吃“大锅饭”哩！

这件事引起了老吴的回忆：当年在凸里村给地主扛活，自己不是吃糠窝窝，老财不是吃白馍馍吗！在革命的学校里咋还有这种特殊现象呢？毛主席说，要官兵一致，当老师的和当学生的在一个锅里吃饭才对呀！

饭后，老吴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宣传队的同志们，大伙儿都同意老吴的看法，说：“在学校里，还不和解放军的官兵一样嘛，为啥教师和学生要搭两个锅呢！”第二天，老吴他们就不声不响地拿着饭碗到学生灶上吃饭了。

翼中的教师灶，是从建校以来就有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小将们造了它的反，停了一年多。可是，后来一部分教师又借口“学生和教师不能绝对平均”、“大灶副食少，营养不足”，就把小灶又恢复了。老吴对小灶的意见传到了教师的耳朵里，大家就议论开了，多数教师认为，老吴说得对，小灶是特权思想的反映，应该立即撤销。也有的教师说：“这是小题大做。”

老吴带头到学生的大灶去吃饭，影响很好，绝大部分教职员都自觉地离开了小灶，和学生一起吃大灶。教师们和学生在一个锅里吃饭，看起来事小，意义可不小。教师和学生每天上课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把心就贴在一起了。教师们深有体会地说：“大灶饭是‘连心饭’，好极了。”红卫兵小将也高兴地说：“今后，我们要更好地服从贫下中农对我们的管理和教育，和老师们一道，努力实现思想革命化。”

（三）“我一定要积极参加学校的斗批改！”

王朝碧是东北工学院七〇化学班的学生。入学时，村里贫下中农都高兴地说：“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穷

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咱穷人家的孩子也上大学了。”小王怀着为毛主席、为贫下中农争气的雄心壮志，脚穿草鞋，身着带补钉的衣服，告别了贫下中农，从四川省来到了东北工学院。

可是进学院不久，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小王的思想起了变化。他看到有的同学穿着所谓时髦的新衣服，从讨厌到羡慕，自己也想方设法买了一件穿上，把那件带补钉的衣服塞在床底下，把草鞋也扔到了一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王受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蒙蔽和坑害，整天东游西荡，不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成了“逍遥派”。

鞍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东北工学院以后，宣传队的叶东林同志知道了小王思想演变的情况，决心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引导他和同学们一道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有一天，他去找小王谈心，看见小王正在补一件破衣服，就抢过衣服一边缝补，一边问这件衣服的来历。原来这就是小王刚入学时穿的那件旧衣服。工人师傅进校后，个个穿着带补钉的工作服，可是干起活来却比谁都有劲。王朝碧被工人师傅的精神所感动，又把这件旧衣服找出来缝补。叶师傅看到小王的思想开始转变，就和他一起忆苦思甜，一起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毒害青年的罪行，一起讨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一起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对小王说：“过去咱贫下中农受苦，就苦在没权上，现在咱贫下中农能念大学，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好领导。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在学校里大搞封、资、修的教育，想把我们青年一代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跟着他们那一伙坏蛋去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受二遍苦，遭二遍罪，咱们能答应吗？”小王听了叶师傅这番话，回想起自己家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和离家时贫下中农的嘱托，泣不成声。他坚定地回答说：“不能答应！永远不能答应！”

叶师傅把补完的衣服递给小王，又把自己胸前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取下来戴在小王胸前，小王激动地说：“叶师傅，你给我补的不光是一件衣服，而是补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一堂阶级教育课。过去我上了走资派的当，今后我一定要积极参加学校里的斗、批、改，挺起腰杆和走资派斗，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从此，小王又活跃起来了，他以自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切身经历，批判、控诉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毒害，颂扬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处处走在前面，勇敢地杀上了斗、批、改的战场，成了学校斗、批、改中的小闯将。同学们都说：“小王变样了！”

（原载1968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三则轶事

辽宁省金县湾里公社林场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两年多来，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在本大队落户的十五名知识青年进行了再教育。下面就是他们教育青年的几个小故事。

（一）老队长治“病”

知识青年郝玉华刚到农村那阵子，有个“关节炎病”了，三天两头犯，下地干活时犯了病，就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小郝说她这病不适合在农村劳动，得回大连休息。可是，后来小郝并没回大连。如今，她的病早就好了，劳动中拣重活干，上山下岭样样行。若问是谁治好了她的病？她说：“是俺队的老队长。”

老队长叫林喜昌。头一回听说小郝病了，他心里挺着急。后来一了解，小郝的“病”是这样得的：小郝在大连的时候，一心想到农村好好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可是一到林场大队第四队，就后悔了。她觉得在这个山沟里闷乎乎的，没有什么前途，于是就千方百计找借口回大连。

老队长知道了这个底细，就想：小郝怕苦怕累，想回城里贪图安逸，这不是在革命道路上要当逃兵吗？从此以后，老队长就和贫下中农经常找小郝谈心，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一天，小郝又“病”，老队长就坐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学习“老三篇”，并向她讲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英雄故事。小郝越学越躺不住了。她觉得自己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对不起革命先烈，她决心要在农村扎根，并在群众中狠斗了私心。从那以后，小郝的“关节炎”再也不发了。

（二）小邹的一件衣服

下乡知识青年邹丽君有一件补了又补的蓝花衣服，是她最爱穿的一件。提起这件蓝花衣服，里面还有一桩故事哩！

那是刚下乡的时候，小邹衣服破了，她既不愿补，更不想穿。有一次，她的那件蓝花衣服破了，她立即换上一件新的学生装，顺手把那件破衣服扔到墙角去了，再也没理它。

过了几天，一个傍晚，小邹和伙伴们说笑得正高兴，一眼看见贫农王大娘拿着一件衣服走了进来。大娘问：“这是谁的衣服？”小邹说：“我的，怎么到你手里了，大娘？”大娘说：“我看您成天没有闲工夫，就把这件衣服拿回去洗了洗，补好了。”小邹接过一看，不在意地说：“大娘，这件衣服早就打成废品不要了。”王大娘一听，寻思了半晌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在旧社会咱穷人哪穿得起

这样的衣服啊！你们这一代过上了好日子，可千万不能忘本哪！”

这一夜，小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千万不能忘本哪！”大娘这句话在她的耳边不停地回荡。她想起了爸爸在旧社会光着脚板在雪地上给资本家做工的悲惨情景，感到羞愧难当。她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认识到把劳动人民的血汗随便“打成废品”，就是丢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王大娘给我补的不仅是衣裳上的窟窿，更主要的是堵上了我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门。

从此，小邹穿上了带补钉的衣裳。

(三)林大娘的心里话

苦大仇深的林大娘听说中国赫鲁晓夫宣扬“剥削有功”、“穷人欢迎剥削”的谬论，真气炸了肺。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她看这帮小青年的火力不猛，心里就纳闷。可是仔细一琢磨，觉得这也怨不得她们。她们刚从学校出来，过去受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哪里能体会到贫下中农的阶级苦有多深哩！想到这里，林大娘就想把一肚子心里话对姑娘们说一说。

去年的五月七日是小青年下乡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林大娘为小青年做了糠菜饼子、苦菜汤。一吃起忆苦饭，林大娘便泪水满面地讲起了自己的家史。林大娘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人一年到头给地主当牛做马，还是吃不上一顿饱饭。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外讨饭了。有一次到一个地主家门口讨饭，狼心狗肺的地主不仅不给一粒米，还放出恶狗咬人。林大娘一边控诉，一边挽起裤腿，露出被狗咬后留下的伤疤，大娘愤怒地说：“地主是咱穷人的死对头！中国赫鲁晓夫胡说什么‘穷人欢迎剥削’，就是替地主富农说话，妄想拉咱们走回头路，吃二遍苦，咱们坚决不能答应，我豁上老命也要跟他拼！”

林大娘的控诉，激起了全体知识青年的满腔怒火，姑娘们向贫下中农坚决表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毛主席，永远不回头！”林大娘激动地说：“这才是俺的心里话。”

(原载1968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金向阳)

知青下放的几件轶事

(一)送女下乡记

二十一日晚上，南京部队工程兵某部助理员田方有，从广播里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心情无比激动。他和爱人王振卿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连夜给两个月前奔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的心得体会，勉励女儿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走到底。

两个月前，田方有的大女儿田蕴玉初中毕业了，他和爱人商量把女儿送到农村去落户。但是，他爱人有个活思想，觉得夫妻俩都有工作，孩子多，家务重，里里外外现在全靠着蕴玉，她一走，就象缺了一只胳膊，家务事没有个帮手了。田方有发现他爱人有这个活思想，就和爱人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夫妻俩边学习、边议论。田方有说，咱家的孩子老待在家里，不去经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见阶级斗争的大世面，这样下去可要变修啊！让孩子到农村去锻炼改造，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照亮了田方有爱人的心，她也表示，不能用“私”字捆住孩子。夫妻俩下了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女儿送到农村去。

接着，夫妻俩又和女儿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起斗私批修，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提高了女儿的路线斗争觉悟。蕴玉愉快地表示坚决奔向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让女儿到条件好的苏南还是到条件差的苏北去？田方有的爱人又有自己的考虑。她想：老田的故乡是在苏南，那里是鱼米之乡，把女儿送到那里去，生活条件好些，还有亲人给照顾。田方有看出了爱人的小算盘，他想：培养革命后代，不能在温室里培养。艰苦炼红心，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一南一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头脑里的反映。于是，他召集全家开了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用自己的家史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

在旧社会，田方有的父亲从小给地主放牛、当长工，眼看六个孩子在饥饿中挣扎不下去了，先是被迫把田方有四岁的妹妹卖了，后来又把田方有弟兄三人送给了别人。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重新团聚。田方有血泪斑斑的家史，激起了全家人对旧社会，对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刻骨仇恨，更激发了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田方有的爱人又一次斗掉了“私”字，她站起来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干革命！干革命就要艰苦奋斗，我赞成蕴玉到苏北农村去安家落户。蕴玉听了爸爸的忆苦，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她说，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我们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想把我们引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我们决不上他的当！她当场向全家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到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一辈子扎根在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蕴玉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田方有全家在毛主席像前

开了一个家庭欢送会。田方有把一套《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五篇"送给女儿，又把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挂在女儿胸前，希望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征途上阔步前进！母亲也千叮咛万嘱咐，要蕴玉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现在，蕴玉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思想越炼越红，身体也越来越壮，贫下中农都夸她象个农村姑娘了。

（新华社南京二十六日电）

（原载196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二）坚决到深山窝铺去

小乔一九六〇年考入了山西晋南医专。小乔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家扛活，放羊，从来没有一个念书的。是毛主席领导贫下中农翻了身，小乔才得到了上学的机会。临上学时父亲一再嘱咐他："今天你能够上学，这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千万不要忘本，要为咱贫下中农争气。"刚开始上学，小乔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自从来到医专，书是越读越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也接受得越多，他的思想感情离贫下中农也就越远了。特别表现在毕业分配问题上，不愿到深山窝铺艰苦的地方去。

小乔的思想被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李发现了。李师傅想，是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年人的毒害，使小乔忘了劳动人民。中国赫鲁晓夫把青年人推向了修正主义的黑路，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把他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李师傅遵照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来教育贫农家庭出身的小乔。李师傅回忆道："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象你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才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可是，有的人读了十几年书，就忘了本，不愿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李师傅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触动了小乔的痛处，他回想起临上学前父亲对自己的一再嘱咐，沉痛地流着眼泪说："李师傅，我错了，是我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忘了本，我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贫下中农，更对不起毛主席！"李师傅很严肃地说："人民把你供养到医专毕业，你却不愿为人民服务，不愿到深山窝铺去！你知道那里有多少贫下中农在盼望着你们？有的病人在等待着你们去看病？"老工人的话句句铭刻在小乔的心里，他激动地对李师傅说："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到深山窝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贫下中农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很好地改造思想，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

思想问题解决了，小乔愉快地向学校递交了到深山窝铺去的决心书。

解长宣

关于1968年"大批判"运动中的几件轶事

（一）大批判解开两个阶级兄弟的疙瘩

饲养员刘功臣和生产队长刘汉杰，在旧社会一块儿给地主当长工，是一对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兄弟。可是，后来两人却结了疙瘩。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在山东的代理人，大肆贩卖中国赫鲁晓夫"物质刺激"的黑货，刮起了一股"奖金挂帅"的妖风。这股妖风也刮到了山东益都县阳河公社刘家庄大队。饲养员刘功臣喂的牛繁殖了一头牛犊，原生产队长就奖了他五元钱。当繁殖第二头牛犊的时候，新任队长刘汉杰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奖励他。刘功臣心里想不通，就对刘汉杰有了意见。

不久前，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这个大队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贫下中农们回忆了旧社会的苦。提起那黄连般的日子，刘汉杰和刘功臣都想起了当年的一首歌谣："要吃庄子（指郭家庄子地主）饭，得拿命去换，养儿不见儿，泪水阳河宽。"汉杰说："解放前，我和功臣给地主扛活，和猪睡一个栏，和狗吃一个盆。那年腊月，大雪一尺多厚，我病在猪栏里，功臣卖了仅有的一件破棉衣，换来一点药，治好了我的病。没了棉衣，夜里，俺俩就心贴心地挤在一块……"汉杰越说越心酸，功臣泪水似泉涌。

第二天，学习班搞革命大批判，大家愤怒地说，中国赫鲁晓夫搞什么"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私"字腐蚀我们的灵魂，引诱我们跟他走资本主义的邪道，好让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真是比毒蛇还毒！汉杰说："什么'工分挂帅'、'物质刺激'，这些黑货是包着糖皮的砒霜。如果让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要回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重新给地主当牛作马。我们绝不能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

（二）五厘钱引起的一场辩论

最近，在山东即墨县营上公社王家后戈庄大队第三生产队里，为五厘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队里的牲口饲草不多了，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抽不出劳力去割饲草。队委会决定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割青草，每斤奖给五厘钱。决定公布以后，在社员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发动学生割饲草首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为革命割草的教育，并给以合理报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钱"字当头，是

把人们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邪路上领。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厘钱一斤青草，队里和个人都有利，学生干的有劲，队里也解决了牲口饲草的不足，是件好事。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引起了大队革委会的重视。

一天晚上，大队领导同志，到这个队里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伟大教导。接着，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贫农社员刘平礼说：五厘钱乍看起来是小事，可它给学生种下的是一条"私"根，这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赫鲁晓夫就是想用"金钱挂帅"、"物质刺激"这套黑货，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小利，引诱我们走资本主义邪道，用"私"字腐蚀咱们的灵魂，想使咱变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接着，青年社员刘振说："五厘钱事小，走什么路子的事大。'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中国赫鲁晓夫毒害咱贫下中农的砒霜。他想利用'物质刺激'见效快，'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呸，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咱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大寨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记工法，咱贫下中农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不计较工分，不计较报酬，农副业生产都空前大发展，这靠'物质刺激'能办到吗！"

辩论越来越热烈，是非越来越分明。原来想靠五厘钱调动割草积极性的人，经过辩论也恍然大悟。他们从五厘钱里看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时，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兰德宝在大家的启发下，憋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这五厘钱的辩论会，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过去我嘴里虽然也说政治，可作起来老觉得不如抓生产要紧，结果越抓越被动，越抓越乱，今天的辩论会，给我解开了疙瘩。原来我千抓万抓，头脑里缺少了阶级斗争。今后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贫下中农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忠东兵）

（三）一次田头批判会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传到浙江省金华县雅畈公社二村大队，整个村庄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广大贫下中农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公报，并且把认真学习公报和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结合起来，村头、地头、家庭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坚决打倒大叛徒刘少奇"的怒吼声，响彻了整个村庄。

十一月七日，二村大队八个生产队的社员兴高采烈地下田收割晚稻。各个生产队都在田头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社员们利用劳动休息时间一面学习公报，一面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第七和第八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联合召开了专题批判刘少奇大砍农业合作社的田头批判会。

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叶碧荣首先发言。他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在农村里流毒很深很广，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今天我们就要狠狠批判刘少奇大砍农业合作社的罪行。一九五四年，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办起了农业合作社，当年粮食获得大丰收。第二年合作社社员由十八户发展到二百五十多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却下了大砍农业合作社的黑指示，限期要"坚决收缩"合作社，强迫贫下中农退社。他这样一砍，我们的合作社只剩下五十七户，集体经济大大削弱了。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不到一年，合作社又发展到二百六十多户，以后又办起了人民公社，粮食年年增产，生活年年提高。现在我们的产量比合作社时翻了两番，队队有余粮，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壮大。要不是有毛主席英明领导，使刘少奇的阴谋未得逞，我们社会主义农业能有今天这样强大吗？他的发言使贫下中农深受感动，他们连连振臂高呼："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贫农李根相紧接着站起来控诉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破坏合作社，罪恶滔天。我父亲给地主当了三十多年长工，在毛主席领导下翻了身，带头参加了合作社。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的黑指示一下来，他的代理人就说我家劳力少，农具少，又没有耕牛，强迫我们退了社。那一年，碰到旱灾，合作社人多力量大，粮食得到大丰收，而我们退了社，就减了产。刘少奇就是要我们贫下中农走资本主义黑路，要我们贫下中农重受二遍苦。现在刘少奇被永远打倒了，我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的绊脚石被搬掉了。我们一定要永远紧跟毛主席，一辈子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李根相说出了贫下中农的心里话，许多贫下中农纷纷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大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颂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狠批刘少奇大砍合作社和推行"三自一包"等黑货的反革命罪行。

田头批判会结束了。贫下中农们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一次又一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忠于您的革命路线！

新华社记者

（四）街头批判会

夜，已经很深了。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西尼气林场，八十三岁的赵老大娘，还在一字一句地学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一年，中国赫鲁晓夫亲自到这个小小的山村来鼓吹过"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屯上的职工家属们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大揭发，大斗争，大批判，取得了辉煌战果。可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中国赫鲁晓夫的一小撮忠实走卒，近来，又走东家，串西家，到处放风，甚至公开喊冤叫屈了。

这阵右倾翻案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在职工家属学习班里，赵老大娘说："依我看，那帮坏家伙是秋后蚂蚱，非蹦跶两下不可。这是一面。另外，还有一面，咱屯里的街头大批判，不在批判上下功夫，打不到他们的心窝，就批不深。"赵老大娘的一句话，提醒了大伙，他们通过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认识到：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自从那天起，西尼气林场职工家属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伟大教导，事先做好准备，每周批判两次。今天，赵老大娘正在紧张准备的时候，郭大娘的媳妇也在教她学"假的就是假，伪装应当剥去"；唐大嫂一边喂孩子，一边背诵"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敬老院的王大爷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叭嗒、叭嗒"抽着旱烟，反复地琢磨"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一伟大教导的深刻意义。整个屯子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职工家属们加紧学习毛泽东思想，准备迎接明天的街头批判会。

太阳刚刚下山，职工家属区一支支批判大军出动了。从小孩到老人，把一小撮走资派团团包围在大街上。赵老大娘恨得咬牙切齿，用拐杖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们这帮坏蛋和中国赫鲁晓夫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张开臭嘴离不了一个钱字。钱！钱！钱！想让俺想着钱，忘了权，你们好偷偷摸摸地把大印抓过去。旧社会，我十岁就给地主当丫环。新社会，我八十多岁了，还能念上毛主席写的革命书。哪条道好，哪条道坏，俺心里有数。你们想夺俺们的权，就死了那条心吧！"郭大娘揭了阶级敌人推行"利润挂帅"的老底，她说："想让俺工人阶级走回头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万万办不到。"唐大嫂剥了阶级敌人搞"物质刺激"的画皮，她说："用小'甜头'，引着我们吃大苦头，祖祖辈辈给你们这些反动派当牛当马，是妄想！"敬老院里的王大爷一遍又一遍地领着大家喊："这个案，一万辈子也翻不了！"西尼气林场职工家属的街头大批判，成了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在大批判中兴起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原载 1968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

（五）走毛主席指的路一分不能偏

山东牟平县姜格庄公社王家庄大队领导班子，为了扩大副业生产，决定开设个豆腐坊。这时，有的人说："做豆腐是技术活，包工到人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大多数社员不同意这种意见，主张采用大寨式记工法。大队领导班子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抓住这个活思想，展开了大批判。

会前，大队领导班子首先领导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伟大教导，然后展开讨论。有人说："从调动积极性出发，还是包工到人合适。"听了这话，老贫农罗福山霍地站起来说："毛主席号召咱们组织起来，咱们要心往集体上想，劲往集体上使，一个心眼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赫鲁晓夫鼓吹'三自一包'，那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咱决不能上他的当，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开倒车。""对！咱贫下中农的忠心永远迎着红太阳，毛主席咋说咱咋办。"这是青年社员王成岗粗壮有力的声音。他把拳头用力一挥，象宣誓似地说："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一分一度也不能偏。"

会场上发言的人越来越多。贫协负责人张永方争着说："中国赫鲁晓夫的'三自一包'，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越大，私心越重，路越斜。就拿麦田管理来说，过去'包工到人'，庄稼粗种粗打。今年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私批修，人的觉悟提高了，麦田管得好，丰收在望。发展集体经济要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靠物质刺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接着，大家又讨论以前中国赫鲁晓夫大刮黑风的问题。妇女队长罗翠花气愤地说："中国赫鲁晓夫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的'三自一包'就是一把软刀子。咱吃亏上当是因为头脑里有'私'字。"大家决心狠斗"私"字，猛批"修"字，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通过这场革命大批判，大大提高了社员的阶级斗争观念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进一步懂得了为革命种田的道路，抗旱抢种搞得热火朝天。

（宋佐昆）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68年掀起了"斗、批、改"热潮，搞起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与"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与此相适应还进行了"文艺革命"与"教育革命"，年底又有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浩大运动。整个68年的流行口号、歌曲、歌谣与戏剧均反映了该年的特色。

口 号

1.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3. 一定要搞好斗、批、改！
4.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5.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6.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7.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8.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歌曲《全国山河一片红》

1＝A4/4
稍快、欢腾、热烈地
洪源　刘薇　石祥词
　　　生茂　唐诃曲
一阵阵凯歌震长空，
一面面红旗舞东风，
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
红色革命委员会纷纷诞生，
毛主席的光辉普天照，
万里山河一片红。
一朵朵葵花向太阳，
一颗颗红心向北京，
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
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红色政权威力无穷。
一步步紧跟毛主席，
一个个胜利有保证，
巩固胜利发展胜利，
狠抓阶级斗争提高警惕性，
彻底搞好斗批改，革命到底代代红。
〔副歌〕
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
胜利保证，万岁！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文化大革命。

歌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1＝F2/4
进行速度
韩笑　革非　词
劫夫　曲
万里河山
红烂漫，胜利凯歌冲云天，
军民团结，加强战备，我们一定要
解放台湾！台湾是我国神圣的
领土，我们决不容美帝霸
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
随时准备解放台湾。紧跟毛主席的
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随时准备解放台
湾。解放台湾。

歌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1＝♭B2/4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坚定有力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
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
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
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
政治觉悟。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供电局全体革命战士谱曲）

歌曲《农业学大寨》

1=F$\frac{2}{4}$

李红　词曲

"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毛主席的
指示记心怀。思想领先
政治挂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永做
革命派。爱国家,
爱集体,共产主义风格放光
彩。学习大寨人,永走革命路,
紧跟领袖毛主席,大步朝前迈。
大步朝前迈。

知青歌谣

知青歌谣是从知青的悠悠岁月中诞生,也是岁月留给知青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公元1968年12月22日夜,阵阵寒风里,满街高吼的宣传车和收音机里传来了"最新指示"。接着,一代人的大规模迁徙从此揭开序幕。

当时,迅速出现一首知青歌谣,它是沿用人们熟悉的电影《英雄儿女》插曲曲调,填以新词:

最新指示下达后,
马上就要别故乡,别故乡。
告别亲爱的朋友们,
知青就要去远方,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广阔天地炼红心。

有一首《武汉知青之歌》,描写知青和心爱的姑娘泪眼相送的离情别景:

不忘那一天,
你送我下农村。
来到了船码头,
眼泪往下流。
等到轮船一开走。
你向我招手,
呀,我的小妹呀……

另一首叫《流浪者之歌》:

汽车开走尘土飞扬,
只见爹娘昏倒在大路旁。
衰老的爹娘望儿供养,
儿子却要去远方。

这确实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离城时某些场面的真实写照。

"知青"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自然对下农村的态度各不相同。一首依藏族民歌《献给亲人金珠玛》曲谱改词的知青歌这样唱道:

不捡烟锅巴呀,
不喝加班茶呀,
也不去打群架,
扇上一个漂亮的盒盒儿(即姑娘),
带到农村去安家。
嗦——呀拉嗦,
带到农村去安家。

想象中的竹篱茅舍、小桥流水、鸦背夕阳和牧童牛背短笛横吹的"农村典型场景",被贫乏单调、孤寂沉重的现实冲淡殆尽。故园与异乡的巨大反差,激起知青们对故乡和亲人多少"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思念!依据三十年代一首《秋水伊人》改词的知青歌,淋漓尽致地描述和抒发出成都知青的这种望乡情思:

望断蓉城,
不见妈妈的慈颜。
更残漏尽,
难耐衣食寒。
往日的欢乐,
方映出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处去?
空有泪涟涟。
几时才能回成都?
妈妈呀!
几时才能回到那故乡的家园?
那滔滔的锦江水,
壮丽的人民南路,
依旧是当年的情景。
只有你的女儿呀,
妈妈呀!
已坠入那绝望的深渊。
只有你的女儿呀,
妈妈呀!
正忍受着无情的摧残。

它在成都知青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乃至今日，当年游子，犹能记唱这“望断”遗曲。

一首沿用《班长拉琴我唱歌》曲调改词的知青歌唱道：

知哥拉琴，
知妹唱歌，
知哥知妹穷欢乐。
一个窝来两只雀雀，
知哥也要扇盒盒(儿)。

另一首知青恋歌，则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知青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忠诚的等待：

男：知哥的茅屋空半间，
知哥的门窗缺半扇，
知哥的木床空半边，
知妹你说可怎么办？
女：羊儿肥不肥问青草，
花儿香不香问蜜蜂，
美丽的知妹有的是，
就怕你害羞不敢找。
男：你说不敢找，我就找，
面前的知妹就是好！
一根苦藤两朵花，
知哥知妹是一家。
女：知哥知妹心一条，
可惜我们命不好。
等到三年大招工，
那时再把朋友交。
男：你说三年就三年，
哪怕等上二十年，
只要知妹心不变，
我知哥心甘，心甘又情愿。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被命运抛掷异乡的青年男女！共同的境遇，共同的语言，往往容易促成两颗年轻心灵的相互撞击，迸发出爱的火花。

据印尼歌曲《哎哟，妈妈！》改填新词的一首知青歌唱道：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
(伴呼：呱呱呱呱呱！)
是从那蝌蚪变出来。
(伴呼：呱呱呱呱呱！)
美丽的姑娘从哪里来？
(伴呼：呱呱呱呱呱！)
我们一起从成都下乡来！
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年轻人就是这样乱弹琴！

有趣的是，在女知青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谣曲：

嫁个军哥守空房，
嫁个干部要下放，
嫁个工人守厨房，
嫁个知哥最稳当。

由情如烈火的爱恋发展到正式结合，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归宿。知青概莫能外。不过他们的结合，却有自身的特点和风味。只要人对事对，两心相印，便管不了那么多格式、规范。一些男女知青的结合，煞是洒脱。只需两个人铺盖一卷，再把两张单人床抬来拼成一处，便算成了家——这就叫“两个雀雀一个窝”，或称“爱情合众国的诞生”。

“贫贱夫妻百事哀”，确属至理。知青婚后的生活虽不乏卿卿我我的甜蜜与感人的牧歌情调，但恼人的经济困窘也会于其间投入浓重的阴影。许多地方一个工分才值两角左右。靠这样菲薄的收入，要维持日常生计已属艰难，如果再添上“拖斗”(小孩之谓)，个中况味，实在苦不堪言。遂有谣云：

人家的丈夫，
杀鸡又炖膀。
知妹的丈夫，
杀鸭子(扒窃)被擒住。
咪——嗦嗦咪哆，
被呀嘛被擒住。

人家的丈夫，
当官拿数数(指工资)，
知妹的丈夫，
年终要倒补。
咪——嗦嗦咪哆，
要呀嘛要倒补。

人家的丈夫，
都有楼房住，
知妹的丈夫，
光呀嘛光屁股！
咪——嗦咪！嗦咪！哆！
光呀嘛光屁股！

强烈的对比，活画出知青婚后生活的痛苦与艰辛。这里，知妹并不只是在埋怨自己的丈夫没出息，实则是对多舛的命运和不公正的境遇表示内心的愤懑和不平！

在知青歌谣中，虽有不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一类感兴即兴式的谣曲，但也不乏精心构思，情富辞美之作。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搜集、整理出来，那该是怎样一部煌煌民间巨著啊！它既是一代人命运的沉重叹息，青春梦幻浓重的投影，更是有血有肉、五光十色生活的真实见证……

（摘自《知青档案》）

戏剧《红灯记》（京剧）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3 本

改编：中国京剧团《红灯记》
导演：成　荫
　　　剧组集体
摄影：张冬凉
美工：任回兴、寇鸿烈、姜振奎、刘　千
录音：李　林、吴汉标
演出：中国京剧团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浩　亮	李玉和	高玉倩	李奶奶
刘长瑜	铁　梅	谷春章	磨刀人
夏美珍	田慧莲	杜福珍	田大婶
袁世海	鸠　山	孙洪勋	王连举

抗日战争时期某敌占区，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铁路工人李玉和家，祖孙三代是在"二七"大罢工中结成的一家人。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电码的任务，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日寇宪兵队长鸠山软硬兼施，逼他交出密电码，李不为所动。鸠山无计可施，将李玉和、李奶奶杀害。铁梅继承先烈遗志，在群众的帮助下，把密电码送上柏山。柏山游击队消灭了追赶铁梅的鸠山等敌人。

历　史　档　案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了。

东方红，太阳升。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空前广泛和深入的革命群众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革命的大批判正在各条战线上进一步展开，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罪行，大量地被人民群众揭露出来，使人们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有了更具体、更清楚的认识。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教育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正在逐步出现新的面貌。文化大革命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导弹、氢弹的试验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农业生产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全国热气腾腾，到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

形势大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以后，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有力地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在视察时所指出的"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的科学预见。

在新的一年中，全党、全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是：

第一，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正像林彪副主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新的一年，将是几万万革命人

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各级领导同志、各革命组织，要大抓狠抓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首先就要学好用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要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各项具体政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直接掌握，变为亿万革命人民自觉的革命行动。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最根本的保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要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要用，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经常检查，及时总结。什么人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自作聪明，正路不走走歪路，就一定会迷失方向，就一定要犯错误。各革命组织，都要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指南。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言行，无论来自右的方面，或是来自极“左”方面，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该成为学习最新指示、执行最新指示、宣传最新指示、捍卫最新指示的模范。

第二，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

新的一年中，我们将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中狠批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革命的大批判，要结合各项任务，持久地开展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在新的一年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努力帮助更多的革命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勇敢地站出来革命。要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团结对敌，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克服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大力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维护它的革命权威，帮助它的完善和发展，使它在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发挥强大的威力。

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改革中，要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抵抗，继续依靠广大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力支持革命的积极分子，支持革命群众中的新生事物。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党的领导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好全面规划、典型试验这两件事，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使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能顺利地向前发展。

第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整党运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清除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出党。犯过严重错误的少数党员，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坚强。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为领袖的、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整顿党的组织的同时，共青团、红卫兵、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提高觉悟，纯洁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以及其他党、政工作部门，要把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当作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

第四，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新的一年中，他们将担负起更多更重要的任务。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加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团结。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贯彻执行林彪副主席提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一系列着重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

教育，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要热烈响应林彪副主席发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战斗号召，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爱民工作。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群众学习，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进行深入、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军指战员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巩固国防，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保卫伟大的祖国，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五，抓革命，捉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九六八年的工农业生产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各级领导都要政治挂帅，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抓好生产工作，把它当作夺取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广大革命群众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财产，自觉地加强劳动纪律，坚决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歪风。要大力抓好交通运输。要健全和加强各级生产领导班子，重要的生产和科研部门，要迅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保证一九六八年的工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些光荣的任务，要经过艰巨的斗争和努力。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还会采取各种形式，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大好形势下，也会有某些阴暗的角落，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需要继续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在幕后或幕前猖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扰乱社会治安的阶级敌人，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解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革命越向前发展，就越是深刻地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无产阶级的"公"字和资产阶级的"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只有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中大学大用"老五篇"，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紧跟毛主席，真正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给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他们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造谣诽谤，已被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东风完全压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让那些老爷们去绝望地叫喊吧！我们将继续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紧紧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中的伟大成就，必将进一步激醒全世界。

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祖国、为人民创建新的功勋，去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1968 年元旦社论）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要求"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社论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任务，发表了毛泽东有关党的一段论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被称为"50 字建党大纲"。在社会主义改

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只提已经不是主要社会矛盾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却不提党的基本任务——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也不提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这个“建党大纲”是完全不正确的。

5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在这个《经验》中，虽然强调了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的指示，但整个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加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实际上，是搞了残酷斗争，无限上纲，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就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发布《七·三布告》，提出6条措施：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2.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3.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5.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6.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就西北和陕西发生打砸抢事件发出《七·二四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等。

7月21日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同年8月，康生又制造了诬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和诬陷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名单。同年12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在这4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103人(占总数的72%)，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52人(占总数的52%)，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76人(占总数的47%)，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这些被诬陷的人先后都受到迫害，其中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8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2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4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6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11人。1966年至1970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24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制造了大批冤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还诬陷迫害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大批领导干部，先后制造了大量冤案，如“新疆叛徒集团”冤案，“广州地下党”冤案，云南“赵健民特务案”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等等。

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提出，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了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8月26日　《人民日报》刊载《红旗》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全面否定知识分子和“左”倾思想指导下，文章诬蔑解放以后的学校“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并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据的地方。”

8月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贫下中农自本月底起，陆续向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社、队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后来简称“贫管会”)，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把本社、队范围的中小学管了起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极大地搞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

9月5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写的编者按中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已从事工作的人，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的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红旗》第3期还发表了另一篇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其中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

《红旗》还在第3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指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以“再教育”和“同工农兵结合”，进一步搞乱了教育战线，摧残了知识分子。

同日　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继1967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1968年1月5日江西、1月24日甘肃、1月27日河南、2月3日河北、2月5日湖北、2月21日广东、3月6日吉林、3月23日江苏、3月24日浙江、4月8日湖南、4月10日宁夏、4月18日安徽、5月1日陕西、5月10日辽宁、5月31日四川、8月13日云南、8月19日福建、8月26日广西、9月5日西藏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所谓新阶段，即斗、批、改阶段。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扩大他们所篡夺的权力。

9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座黑色金属重介质选矿厂建成。

9月28日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出版。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1～4卷为64开精装合订本，采用优质的薄凸版纸、小而清晰字体，体积比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分卷本和合订本减少了⅔和½以上。

10月5日　《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了编者按：“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在编者按中还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办起“五·七”干校，但大办“五·七”干校，并没有达到精简机构和干部革命化的目的，大办“五·七”干校在许多部门和单位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10月13～31日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和通过党章草案。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受诬陷性批判。会议召开时，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在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10名，递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共74人。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33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会议一开始，就进一步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林彪、江青一伙指示他们的亲信把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六位老同志分割在几组里，围攻批斗。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朱德、陈云。林彪在10月20日说：“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又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议，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全会通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全会最后通过公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了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等部署。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继续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下去。

10月16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并错误地认为，“这是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社论引用了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社论发表后，全国展开了批判所谓“刘少奇的‘黑六论’”即

“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并开始了“整党”运动。由于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增添“新鲜血液”,结果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党员当做“废料”“清除出党”或停止他们的组织生活。而把许多在“造反”中表现“突出”的人当做“新鲜血液”吸收入党,并在建立各级党组织的过程中,又有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混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造成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严重不纯。

11月25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条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社论要求要大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运动”,完成所谓的“斗、批、改”的伟大任务。

1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邓宝珊,甘肃天水人。同盟会的会员。曾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抗战期间,任国民党21军团军团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兼华北“剿总”副司令。1949年初起义。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甘肃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11月28日　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徐特立很早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早年任湖南女校教师、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提倡并亲自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南昌起义。曾任中央革命根据地教育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参加了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党的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2月3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诱。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外　交

1月7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1月3日派遣飞机猖狂轰炸中国停泊在越南锦普港口的货轮“红旗158号”的强盗行为,我船员多人受伤,船身遭严重破坏。

4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发表。4月4日,一向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以此为直接导火线,美国各地的黑人纷纷走上街头,袭击反动军警,焚烧剥削黑人的商店,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巴尔的摩等大城市,都陷入一片混乱。美国黑人武力抗暴斗争的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内统治和对外侵略政策。美国统治集团出动5万多名军队进行镇压,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黑人,逮捕了黑人达一万多名。为了声援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他指出:“这一枪杀事件,激起了美国广大黑人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它显示了在2,000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毛泽东的声明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我国亿万人民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毛泽东的声明,坚决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日本各界人士发表谈话热烈欢呼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声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给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非洲自由战士欢呼毛泽东声明是光辉的真理。世界其他各地革命人民都表示热烈的欢呼和赞扬。

5月21日　新华社报道,首都50万工人、“红卫兵”、革命群众大示威,支持法国和欧洲、北美各国工人,声援法国学生反对法国政府血腥镇压学生和反对腐朽的教育制度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7月6日　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纺织厂正式建成。这个纺织厂是1966年7月,由中国援助动工兴建的,名为“友谊纺织厂”。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正式落成。它是坦桑尼亚最大的、第一个国营的现代化纺织印染联合企业,年产2,400万平方码布匹和200万磅棉纱,是东非第一个拥有印染设备的最完备的工厂。

8月23日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强烈谴责苏联悍然出动大量武装力量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

9月29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

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塞尔·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科技文教社会生活

6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毕业分配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指出1966年、1967年大专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并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到农场去的学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

7月22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引用了毛泽东在编者按清样中写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上海机床厂是我国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人民日报》编者按把《调查报告》鼓吹为是"提出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诬蔑上海机床厂"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把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分工歪曲为"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把当专家、工程师，统统说成是"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是"资产阶级的头衔"等等。"七·二一"指示发布后，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各地相继仿效举办这类学校。办学方式也有变化，包括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以及短训班等，统称为"七·二一大学"。据统计，至1972年，全国有七·二一大学68所，学生4,000人。

7月24日　中国和越南国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7月27日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遵照毛泽东的号令，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毛主席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工宣队进校时，该校群众组织的头头蒯大富下令开枪，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多人。

8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发现巨猿齿化石。我国科学工作者最近在湖北省境内第一次发现了对研究人类进化问题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巨猿齿化石。巨猿是一种体型巨大的古代猿类，它生存在大约距今100万年的早更新世。巨猿化石对于研究和探讨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和正确理解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具有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在广西发现过3个保存相当完整的巨猿下颌骨和1,000多颗巨猿牙齿化石以及有关材料。今年又在湖北省西部发现了200多颗巨猿牙齿化石。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制成第一批静压传动内燃机车。常州内燃机厂、大连工矿车辆厂、石家庄动力机械厂等单位，在有关科研单位大力协助和支持下，仅用22个月左右的时间，自行研究设计并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批静压传动内燃机车，使我国工矿内燃机车的生产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12月1日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在油田试钻成功。全机总重量约300吨，由总功率为3,000马力的柴油机带动。钻机的单机重量较轻，便于运载移动，适用我国多山河矿区。

12月29日　经过9年的辛勤建设，1968年9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首先建成通车；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又提前建成通车(原定1969年7月1日通车)。当日上午，南京市5万军民冒雨齐集桥头，隆重举行庆祝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仪式。入夜，桥上386根灯柱上的1900多盏玉兰花灯，齐放光明，绵延近10里，犹如银河落在宽阔的江面上。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69年

导　言

毛泽东曾经估计：文化大革命可能要搞两至五个月，并设想在1967年的适当时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结束运动。由于夺权之后对运动失去控制，召开“九大”迟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1968年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主要是为“九大”的召开作准备。全会闭幕后，召开“九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林彪、江青集团都把召开“九大”看成是夺取最高领导权的良机，在会前加紧了篡权活动。

在“九大”召开的前夕，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70多人，入侵我国领土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15日和17日，苏军在坦克和大炮掩护下，又连续发起两次进攻，被我军守岛边防部队所击退。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中苏关系的恶化，对党的“九大”产生了重大影响。在3月中旬召开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出“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三句话，作为召开大会的任务。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要求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党中央的政治报告和党章，选出了由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自始至终笼罩着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林彪江青集团的成员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约占有半数席位，掌握了很多权力。但在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时，林彪、江青集团的阴谋没有得逞，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等老帅仍被选为副主席。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不复存在。

“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斗批改”的任务很多，主要内容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和“教育革命”。“斗批改”阶段一直延续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才被迫中断，前后经历了三年时间。“斗批改”给各条战线造成了新的混乱。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印度政府反华暴行
- ●对知识分子“再教育”
-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斗、批、改”
- ●苏军入侵我西北边疆
- ●苏军入侵我八岔岛地区
- ●除四害，讲卫生

印度政府反华暴行

背景介绍

印度政府去年12月30日指使其议会议员马·拉·桑迪带领几百名印度暴徒和西藏叛匪袭击中国驻印度使馆，打伤我使馆工作人员4名。这次反华暴行，完全是印度政府蓄意制造的。

材料：

·印度政府指使暴徒和西藏叛匪袭击我使馆

材料　印度政府指使暴徒和西藏叛匪袭击我使馆

新华社三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反动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指使印度暴徒和西藏叛匪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打伤使馆工作人员四名，破坏使馆的门窗、电灯、汽车。这次反华暴行，完全是印度反动政府蓄意制造的。

在这个严重事件发生前两天，出面组织这次暴行的印度议会议员马·拉·桑迪就公然宣布他要纠集一些人在三十日到中国大使馆去举行一次什么“示威游行”。桑迪的反华计划公然在二十九日的印度报纸上公布。据《印度时报》三十日报道，桑迪组织这次“示威”，得到了地方司法行政长官的许可。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桑迪带领几百名印度暴徒和西藏叛匪到中国大使馆门前集结，举着用英文书写的反华标语，叫喊反华口号，恶毒地诬蔑和攻击中国。十一时许，一群匪徒拿着匕首、棍棒等凶器，冲进大使馆，疯狂行凶，打伤四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印度政府派遣警察和特务，封锁和包围中国大使馆，任何印度人和外侨要去中国大使馆，都要受到印度警特的检查阻拦。然而，这次几百名印度暴徒和西藏叛匪去袭击中国大使馆，却可以通行无阻。当匪徒们冲入中国大使馆时，在场的印度警特毫不制止，有的还把包着铁皮头的警棍交给行凶的匪徒。

在匪徒们实现了对中国大使馆的打砸计划以后，印度警察才假惺惺地出面“干预”，用汽车载走了几十个人，送到警察局。印度政府还说什么“要惩办肇事者”。这完全是装腔作势，自欺欺人。据《印度时报》报道，“带头冲向中国大使馆大门的印度人民同盟议员马·拉·桑迪没有被逮捕，因为他没有犯什么法。”而西藏叛匪的头目洛布桑喇嘛却去印度警察局给行凶的叛匪送特制的食品。

事件发生以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陈肇源立即向印度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印度反动政府害怕世界舆论的谴责，竭力推卸责任，硬说它自己同这一反华暴行无关。更加恶劣的是，印度反动派开动它的宣传机器，散布谣言，反咬一口，把事件发生的责任硬栽到中国大使馆头上，胡说什么这次袭击大使馆的暴行是由于中国外交人员向暴徒和叛匪们“挑衅”而引起的。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几百名匪徒，拿着匕首、棍棒，狂叫反华口号，却不是挑衅行凶，而挨打受害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倒成了“挑衅”者，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编造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印度反动派为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捏造的各种借口，互相矛盾，破绽百出。印度报刊竭力把这次事件的参加者说成只有西藏叛匪，但是印度政府的喉舌印度新闻处却不得不承认，桑迪率领去中国使馆“示威”的有“西藏人和印度人”。这就暴露了印度反动派妄图洗刷自己罪行的狼狈相。

印度反动政府制造的这次反华暴行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印度反动政府就曾指使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进行打、砸、烧，把八位使馆工作人员打成重伤。去年九月下旬，印度反动政府公然允许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派“代表团”去印度参加甘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十一月二十七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又公然在新德里“接见”叛匪头目达赖；最近，印度反动政府和国防部长斯瓦兰·辛格一再发出反华叫嚣，对我

国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这一切都表明印度反动政府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猖狂挑衅的罪恶活动。这也再一次暴露出印度反动政府最近一再声称要"解决它同中国之间的问题"的说法，是极其虚伪的。

但是，一切反华的人，都必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决不会有好下场。美帝国主义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也是如此，甘心充当美帝、苏修走卒的印度反动派，越是疯狂反华，就越明显地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它的丑恶嘴脸，就越要加速它彻底垮台。

（1969年1月4日《人民日报》）

对知识分子"再教育"

背景介绍

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提法，始于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驻清华大学工宣队《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再教育"在"斗批改"阶段得到了发展，使很多知识分子进一步受到打击和迫害。

材料：

· 驻南开大学工宣队做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材料　驻南开大学工宣队做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从旧学校出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驻南开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最新指示，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知识分子，用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知识分子，促进他们的思想革命化，有力地推动了全校的斗、批、改。

驻南开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时，首先从阶级教育入手。他们一方面让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给革命师生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方面组织革命师生访贫问苦，编写出身贫苦的学生的家史，参观三条石阶级教育展览馆，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革命师生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觉悟。不少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师生，受到教育以后，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忘本思想，表示要牢记阶级苦，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旧社会被卖掉过几次。他上大学后，他哥哥为了让他永远不忘过去的苦，不忘阶级仇，把他当年的卖身契寄给了他。由于这个学生受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却把卖身契扔在箱子底下，忘记了阶级的深仇大恨。在老工人的再教育下，他提高了阶级觉悟，把卖身契拿出来，贴在床头，用铁证控诉了吃人的旧社会，狠批了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他说："这阶级的仇恨，将永远激励我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经过阶级教育，大大增强了广大革命师生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

林彪副主席指示我们"'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宣传队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组织革命师生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教育革命师生。宣传队还针对知识分子往往学用脱节的坏作风，引导革命师生带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增强他们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自觉性。有个学生原来资产阶级派性十分严重，宣传队几次找他谈话，但他觉悟很慢。于是，宣传队一位老工人就和他一块活学活用"老三篇"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帮助他用毛泽东思想对照自己的言行，终于使这个学生认识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带头狠批资产阶级派性，自觉地给其他同学做政治思想工作，对实现学校的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

驻南开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引导革命师生在革命大批判中破私立公，在对敌斗争的火线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批倒批臭，同时把批修和斗私结合起来，把师生们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加速他们的思想革命化。有个贫农出身的青年助教，原来是用一根扁担挑着铺盖来大学读书的。当时他为了不忘过去的苦，把这根扁担保存下来，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可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这根扁担慢慢成了他的"思想负担"。特别是他毕业留校当上助教后，怕那些"教授""权威"们知道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被人家看不起，便在一个深夜偷偷把扁担扔在校园的湖里。在革命大批判中，他来到当时扔扁担的湖边，向革命师生控诉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

通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大提高了革命师生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全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新水平。

宣传队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还通过自己的实际

行动，用工人阶级的面貌来影响和改造他们。毛主席教导说："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宣传队全体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加强自身的革命化放在首位，处处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榜样，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带头人。工人宣传队中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没有文化，让同他结成"一对红"的那个学生帮他识字。这个学生写了老工人的名字教他认，老工人马上说："你先教给我'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他还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咱们时时刻刻不能忘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老工人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使这个学生深受感动。他说："我们和工人阶级千差万差，首先差在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上。"

由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地投入了学校"斗、批、改"的群众运动。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背景介绍

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和指挥车各1辆，悍然入侵我国神圣领土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经一个小时战斗，给入侵者以歼灭性的打击。3月4日至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我珍宝岛。我守岛军民不畏强暴，给苏军以应有的惩罚。3月17日，苏军又先后出动坦克3辆，步兵100余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再次向我进攻。我军以前沿和纵深的火炮对登陆的苏军予以突然猛烈的还击，毙伤入侵坦克一部，其余仓皇逃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卫了祖国神圣领土，大大鼓舞了我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信心。

材料：

- **苏修叛徒集团指使苏边防军悍然侵入我国领土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 **苏修再次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 **珍宝岛地区军民团结战斗的动人故事**

材料一　苏修叛徒集团指使苏边防军悍然侵入我国领土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三月二日指使苏联边防军悍然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公然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苏修叛徒集团蓄意制造的这次极为严重的武装挑衅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新的严重罪行，这再次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本月二日九时许，苏联边防当局派出大批武装部队，携带全副装备，并出动装甲车、卡车、指挥车多辆，悍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向在这个岛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我边防部队进行挑衅。当时，我边防部队以极大的克制态度，多次向入侵苏军发出警告，令其停止挑衅，退出我国领土。入侵苏军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气焰更为嚣张。九时十七分，入侵苏军公然向我边防部队疯狂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入侵挑衅者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

苏修叛徒集团一手挑起的这次极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苏修叛徒集团就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不断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并多次制造流血事件。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到今年三月二日两年多中的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就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几次打伤我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抢劫我枪支弹药。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苏修叛徒集团先后十八次出动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以北七里沁岛地区，破坏我群众的生产，多次打死打伤我正在劳动的群众。苏联边防军还多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以南卡脖子岛地区。苏联军用飞机侵犯我黑龙江省领空的次数就更多。

苏修叛徒集团蓄意侵犯中国领土，不断制造流血事件的罪恶行径，是它长期以来勾结美帝，猖狂反华，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苏修叛徒集团的这些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军民的极大义愤。中国人民严正警告苏修叛徒集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的神圣领土绝对不容侵犯。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

（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苏修再次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三月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开始，苏修叛徒集团先后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武装部队，从冰上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开到岛的中部、南端和西侧的中国河道，向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猖狂挑衅。

我边防部队向入侵的苏修武装部队提出严重警告，令其立即撤出我国领土。苏修武装部队无视我边防部队的严重警告，悍然于八时许首先向我边防部队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奋起自卫，给入侵挑衅者以迎头痛击。

苏修武装部队在我沉重打击下，到下午一时后，竟然从乌苏里江东岸苏联境内纵深地区，用重炮向我珍宝岛和乌苏里江我侧岸上进行疯狂的轰击，纵深达七公里之多。与此同时，苏修武装部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岛上巡逻部队进行冲击。我边防部队坚决还击，到下午七时许，把入侵者全部赶走，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领土。

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三月十五日的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一手制造的。我外交部在三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半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但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竟然无理拒绝约见。事隔几小时以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抗议声明”，一方面假惺惺地说，它“正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又一口咬定，说什么珍宝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叛徒集团提不出任何一个根据，证明珍宝岛是它的领土。它不敢提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明确规定在这一段的中俄边界是以乌苏里江为界，而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于中国管辖，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苏修叛徒集团蛮不讲理，硬把中国领土说成是苏联领土，还装出要和平的样子，这是假和平真侵略，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坚持勾结美帝、猖狂反华、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豺狼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警告 那些头脑发昏的反动家伙：“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苏修叛徒集团如此穷凶极恶地猖狂反华，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苏修叛徒集团欺侮它的所有邻国，公然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它勾结美帝，扩军备战，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妄图瓜分全世界。全世界一切反侵略的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196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珍宝岛地区军民团结战斗的动人故事

正当全国亿万军民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向着新的胜利奋勇进军的时刻，我们满怀无限崇敬的心情，访问了战斗在祖国反修前哨珍宝岛地区的英雄战士们。他们在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神圣领土、粉碎苏修叛徒集团武装挑衅的斗争中，团结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动人的团结胜利之歌。

关心集体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战友比关心自己为重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日日夜夜守卫在祖国反修前哨的边防部队指战员们，时时刻刻把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铭记在心坎里，落实在行动上。无论在平时，在战时，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干部和战士之间，战士和战士之间，人人都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集体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战友比关心自己为重，充分显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

一天，我边防部队某分队副班长、共产党员孙耀民同战友们一起前往珍宝岛执行任务。这时的乌苏里江正是冰雪初融。当他们踏上通往珍宝岛的江汊上的冰面，沿着事先拉好的钢丝绳前进的时候，突然，“卡喳”一声响，前方的冰层沉塌了一大块，冰面裂开一道一米多宽的大口子，挡住了战士们的前进道路。这时刻，孙耀民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顿时，他心中升起红太阳，浑身是胆有力量，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使同志们安全通过，胜利完成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把身体伏在钢丝绳上，两脚蹬着冰面，用自己的身体搭了“桥”，让同志们从他的背上通过。战士们深深被他的英雄行动所感动，谁也不忍把脚踩在自己战友的身上。孙耀民理解战友们的心情，坚决地说：“同志们，不要犹豫，为了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取时间通过！”在他一再要求下，同志们才

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背上通过。他的胸腹紧紧地压在钢丝绳上，冰水浸透了他的军装，他一动也不动，一直坚持到战士们全部从他的背上走过去，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集体比关心个人为重的伟大胸怀。

还有一次，在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在某分队进行正常巡逻时，突然遭到苏修叛徒集团重炮的疯狂轰击。为了战士们的安全，分队长李起运挺立在炮火中，向后面的战士们发出"卧倒"的口令。一发发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四班长庞继学看到这种情景，十分感动，立即跃身而起，冲到李起运跟前，用力把他按倒，紧紧伏在他的身上。李起运见庞继学用身体掩护自己，也很感动，忙说："不要管我，照顾同志们要紧！"说罢，一翻身把庞继学翻到自己身下，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庞继学急忙说："你是指挥员，不能失去指挥。"说完，又猛然一翻，再次把李起运翻到身下。就这样，他们遵照毛主席的"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教导，以实际行动，在炮火声中，写下了干部爱护战士、战士掩护干部的动人诗篇。

在激烈的战斗中，指战员们这样互相爱护，在平时的生活中，指战员们也同样互相关怀。在一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斗结束后，上级党委的领导同志给守卫珍宝岛的某边防分队送来一箱苹果，表示他们对前方战士的慰问和关怀。但是，指战员们谁也舍不得吃。他们马上想起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分队，把这箱苹果原封不动地送给了兄弟小分队。兄弟小分队的同志说啥也不肯要。互相推让了许久，才达成协议：各留半箱。然而留下的这半箱苹果，他们还是不肯自己吃，又把它送给正在前沿执勤的二排同志们。二排长柳春义和战友们看着红艳艳的苹果，心里同样想着别的战友，不肯自己吃。执勤时间结束了，他们又把这些苹果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前来接班的战友。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阵地上交了三次班，这些苹果也一次一次地如数交了下来。战士们满怀革命豪情，写诗颂扬这种团结战斗的革命情谊说："手握钢枪心向党，赤胆忠心保边疆。团结战斗有力量，誓为祖国站好岗。"

把方便和安全让给别人，
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

守卫在祖国神圣领土珍宝岛地区的我英雄的边防部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的伟大教导，无论是在执行巡逻任务，还是在反击苏修新沙皇武装挑衅的战斗中，兄弟巡逻分队之间，处处把方便和安全让给别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在三月二日和三月十五日的自卫反击战中，友邻巡逻分队之间，密切协作，共同对敌，形成一个钢铁般的拳头，给入侵挑衅者以应有的惩罚。

在激烈的战斗中，某巡逻分队班长周登国，暂时失去了直接上级的指挥，立即主动接受友邻巡逻小分队指挥，英勇顽强地去消灭敌人；某巡逻分队指导员杜永春，看到兄弟巡逻小分队受到敌人火力威胁，马上采取措施，主动把敌人火力吸引到自己正面来，给兄弟巡逻分队创造有利战机，同心协力消灭入侵挑衅者。荣立集体战功的某边防分队炊事班，为了使战友们及时吃上饭，冒着敌人的炮火，踏着冰雪，坚持火线送饭，把热饭热菜，送到每个战士面前。司务长张登成带领炊事班两名战士送饭来到三排阵地，看到和三排共同战斗的还有兄弟小分队的同志们，立即热情地把苹果和干粮先送到兄弟分队战友手中，并且比自己分队的战士每人多分一个苹果给他们。兄弟分队的同志不肯多收。炊事班的同志说：我们是共同战斗的阶级兄弟，哪怕有一个苹果也要分一半给你们。兄弟分队的同志们激动地说："你们送来的不仅是苹果，而且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送来了祖国人民和战友的关怀。我们一定要更好地顽强战斗，狠狠打击苏修入侵挑衅者。"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今年三月二日，苏修叛徒集团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进一步加剧了中苏边境紧张局势。为了保卫祖国边疆的需要，珍宝岛地区某地急需架设一条通讯线路。这条线路要穿过大雪覆盖的密林，通过冰冻很深的沼泽地。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当地某村革委会闻讯后，立刻带领全村群众再三向边防部队要求参加这项架线工程。得到批准后，全村群众立即举行了架线誓师大会。广大贫下中农和民兵在会上坚决表示：一定积极协助边防部队，高标准、高质量地迅速架设起这条反修通讯线路。

紧张的架线战斗开始了。全村上自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儿童，冒着严寒，踏着冰雪，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战歌，同高山冻土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山高路滑，电线杆子难运，民兵们就穿着单鞋，攀着小树，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沼泽地上面的冻土硬得象石块，他们就抡大锤，打钢钎，一层一层地刨开冻土层。军民齐心协力，人人红心向党，经过十多天的日夜奋战，一条反修通讯线路终于在乌苏里江畔高高地架设起来了。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架设的不是一条普通的电话线，是一条军民团结反对帝、修、反的革命线。

英雄的珍宝岛军民，亲密无间，鱼水相依，在严惩苏修入侵者的自卫反击战斗中，更是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三月十五日，当民兵得到苏修入侵者又一次首先开

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的消息后，立刻奔赴战场，抢救负伤的阶级兄弟。一位民兵看到我被迫自卫还击的边防战士很长时间没有喝水，立即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半壶水拿出来给战士们喝。边防战士们看到民兵也很口渴，要他留下自己喝，这位民兵坚决要战士们喝，推让来，推让去，谁也不肯喝。最后，半壶水送到了边防巡逻分队负责人手里。这个巡逻分队的负责人在纸条上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兵民是胜利之本"，连同半壶水一起，传给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战士们接过毛主席语录和半壶水，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一个传下去，谁都不肯喝一口，最后还是让负伤的同志喝了。半壶水是有限的，但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军民革命大团结的伟大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战斗在珍宝岛地区的广大军民，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就依靠这种伟大的团结，给了苏修入侵挑衅者以严厉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此时，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都没有"重建"，因而代表不是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是由少数人协商推举的，甚至个别非党员竟当上"代表"。"九大"的主要议程有三项：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更加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九大"在个人崇拜的"左"倾狂热的支配下，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接着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并且决定了主席团秘书处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

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它标志着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会自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

“斗、批、改”

背景介绍

“斗批改”的任务早在《十六条》中就已经提出。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这个革命，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九大”前的“斗批改”主要是为夺权斗争服务，“九大”后的“斗批改”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运动成果。

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以大批判开路，狠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继之以“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和“教育革命”，1971 年由于“九·一三”事件而被迫中断。“斗批改”未能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预期目的，反而给各条战线造成新的混乱，给后来的拨乱反正带来困难。

材料：

· 抓紧革命大批判

材料　抓紧革命大批判

“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对吗？不对。它完全不符合思想战线上的实际情况。这种论调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它只能帮助一小撮阶级敌人麻痹革命的人民，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去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贯穿着革命的大批判。我们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两面派，批判了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批判了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当形势正需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批判各种阻碍斗、批、改的反动思想的时候，怎么能够说“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呢？事实上，尽管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变换口号和形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决不应当停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这是革命的真理。不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已经占领了，如果不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些阵地就有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的危险。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为了真正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必须抓紧大批判的工作。

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哪里？

第一，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文化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它的影响。三年以来，我们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广泛的大批判，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批判还需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搞好了，我们的斗、批、改才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以文学艺术而论，各个方面都还有一批毒草，需要选择其典型者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等等方面，过去党内外的修正主义者曾经散布过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修正主义的谬论，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批判它，它就会放毒，就会毒害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我们的方针就是把毒草化为肥料，通过革命大批判，使人们在各个领域中都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香花，

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深刻地认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以便在对这些毒草或者对类似的毒草用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时，广大的革命群众能够及时地识别它们，自觉地批判它们，揭露它们。

这里所说的批判修正主义，包括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批判。对于过去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文化界、思想界、科学界所散布的毒素，必须进一步加以肃清。对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最近一个时期所散布的种种疯狂的侵略言论，必须继续加以揭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作为美帝国主义帮凶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进一步看清苏修纸老虎的本质，使人们充分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做好粉碎美帝、苏修侵略的精神准备。

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

必须指出：在少数同志和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是危害革命事业的，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是腐蚀人们革命意志的，要坚决加以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会引向混淆敌我，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使自己鬼迷心窍；无政府主义会引向一切"以我为核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闹独立王国。我们必须反对这些东西。一切共产党员、革命的人们，都要顾大局，应当坚定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许可把宗派主义即资产阶级派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老干部都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些错误的倾向是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有在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坚决的、恰如其分的批判之后，它们才会被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要用思想斗争的武器克服错误倾向，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目的。就是说：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里需要指出：决不允许从宗派主义观点歪曲党的政策，阳奉阴违，各取所需。不论从右的方面或者从"左"的方面歪曲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批判。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每个战斗号令，做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一切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对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些人，即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失败了，不死心，总想钻空子，煽阴风，点阴火，在他们认为比较薄弱的环节，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用种种方法来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和青少年；或者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破坏斗、批、改；或者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或者利用封建宗教迷信，妄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所有这些，总的都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批判这些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广大革命群众擦亮眼睛，口诛笔伐，使资本主义倾向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揭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不断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我们坚决实行这一条。证据确凿的坏人闹翻案怎么办？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要照此办事，什么地方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企图翻案，我们就发动广大群众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又一次把它斗倒。

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就是我们当前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总的说来，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任务。为了搞好革命大批判，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群众要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注意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要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也要组织少数人占有充分的材料，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只要各级领导抓紧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发现、锻炼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并且在革命大批判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群众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196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苏军入侵我西北边疆

背景介绍

6月至8月，苏联边防军先后侵入我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我国牧民和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战士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这两次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是苏联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的新表现。

材料：

- 苏军侵入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 苏军悍然侵入我铁列克提地区

材料一　苏军侵入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六月十一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六月十日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蓄意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照会指出，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必须改变对中国推行领土扩张、武装挑衅的政策。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六月十日晚九时三十分，苏联军队数十名，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对正在该地放牧的三名中国牧民进行猖狂挑衅，并绑架一名中国牧民。当晚九时四十分，中国边防人员前往交涉，苏联军队蛮不讲理，竟首先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中国女牧民一名。我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是苏联政府一手制造的一次新的流血事件。随后苏联军队又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侵入中国境内，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事态还在发展中。

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领土、蓄意制造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立即停止武装挑衅，立即将被绑架的中国牧民交回。中国政府保留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必须改变对中国政府推行领土扩张、武装挑衅的政策。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于北京

材料二　苏军悍然侵入我铁列克提地区

八月十三日上午，苏联方面出动直升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名，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两公里，无端地向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的边防人员进行突然袭击，首先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我边防巡逻人员在遭到苏联武装部队的袭击后，随即后撤至我境纵深。但是，苏联军队蓄意挑衅，竟继续增调大批武装部队和坦克，向我境纵深推进，对我边防巡逻人员进逼包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边防战士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截至发电时，苏联方面还在不断增兵，一直不停地对中国边防人员进行射击。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苏修叛徒集团指使其军队挑起这次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联美反华的又一新罪行。近几年来，苏联军队多次出动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侵入我铁列克提及其南北两侧地区，处心积虑地进行武装挑衅。早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苏联军队在我铁列克提地区就出动挖土机，毫无道理地破坏了我巡逻路七公里。今年六月中旬，又调动武装部队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领土，深入我境三公里，修建公路，构筑工事，私立界标。八月八日竟对我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只是由于我们的克制，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事实再次证明，苏联政府嘴上说要使边境局势正常化，而实际上却在不断采取措施，加剧边境紧张局势，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们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如果你们不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不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全部入侵部队，而继续扩大武装冲突，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严厉的惩罚。

（196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苏军入侵我八岔岛地区

背景介绍

7月8日，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侵入我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的八岔岛地区，开枪射击我国居民。随

后又派6架次飞机侵入八岔岛上空，低空盘旋侦察，进行威胁，还强行登上八岔岛放火。这次武装挑衅，是苏联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的又一表现。

材料：

· 苏修叛徒集团指使苏联边防部队悍然侵入我八岔岛地区武装挑衅

材料 苏修叛徒集团指使苏联边防部队悍然侵入我八岔岛地区武装挑衅

七月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苏修叛徒集团指使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明目张胆地侵入我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对我正在岛上从事生产劳动的居民开枪射击，我英雄的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赶走了入侵者。

但是，苏联边防军仍不甘心，悍然出动炮艇，用重机枪和火炮向我八岔岛地区疯狂射击达六分钟之久。随后又派遣飞机六架次侵入八岔岛地区和我国领土八岔村上空，低空盘旋侦察，进行威胁。十六时二十分，一批苏联军人还强行登上八岔岛，放火烧我民房、树林，大火一直燃烧到深夜未息；二十一时，还有两艘苏联炮艇，仍停留在我内河——八岔河口水道上，对我进行武力威胁。

这次武装挑衅，是苏修叛徒集团对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又一表现。我们要严正警告苏修叛徒集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好欺侮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冒险，就必将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1969年7月9日《人民日报》）

除四害，讲卫生

背景介绍

“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中心，而爱国卫生运动则是“卫生革命”的重要内容。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大张旗鼓、除四害、讲卫生》文章强调了“除四害、讲卫生”具有移风移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

材料：

· 大张旗鼓 除四害 讲卫生

材料 大张旗鼓 除四害 讲卫生

最近，有一些地区，在党的“九大”精神的鼓舞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教导，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个运动锋芒所向，横扫了“四害”，改变了卫生面貌，取得了显著成绩。

伟大领袖毛主席多年来提倡的除四害，讲卫生，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健康，它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它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

“预防为主”的方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就必须积极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当前，我们正在贯彻和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革命和生产，确实都是很忙的。但是，我们不能把除害灭病的卫生工作与革命、生产对立起来，不能因为革命、生产忙，就放松或不抓卫生工作。搞好除害灭病的卫生工作，能够减少各种疾病，增强人民体质，保证全国人民更好地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革命、生产越是忙，就越要注意保护广大人民健康。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永远是忙的。如果认为“革命、生产忙，卫生工作就顾不上”，那么，卫生工作岂非就永远“顾不上”了吗？问题在于思想上是否重视卫生工作。只要我们十分重视卫生工作，革命、生产再忙，也会去抓，也会“顾得上”的；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教导的“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办事，妥善安排中心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的关系，就可以把卫生工作抓起来。

除害灭病的卫生工作，抓与不抓，情况大不一样。一些地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证明，只要思想上重视，认真地去抓，很快就可以见效。各地应当狠抓一下卫生工作，把夏季爱国卫生运动搞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红卫兵和红小兵除四害、讲卫生的积极性，家家动员，人人动手，摸清“敌情”，讲究“战术”，打一场除害灭病的人民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歼灭蚊子、苍蝇、老鼠、臭虫、蟑螂等害虫，才能造成“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风气，才能在短时间内收大效。革命的医务卫生工作者，在这场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要做好技术指导工作，要加强和工农兵的结合。

各级革命委员会在领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爱国卫生工

作中推行的"物质刺激"、"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认真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各项卫生制度。全国城乡各地，今后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爱国卫生运动，定为常例，坚持下去。

目前，正当夏令，是蚊子、苍蝇、臭虫大量繁殖的时节。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既做"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又做除四害，讲卫生的模范，大除四害，大讲卫生，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向一切害人虫发动一场大进攻！

过去，"华佗无奈小虫何！"如今，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害虫"无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危害人民健康的"小虫"，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69年8月6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刘少奇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早年在北京、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到安源煤矿参加领导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随后任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1月领导了武汉人民夺回汉口英租界的英勇斗争。同年4月，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参加了顺直（即河北）省委的领导，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党的六大时选为党中央检查委员。

1930年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大，被选为执行局委员，并留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全总党团书记。1932年冬，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全总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历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春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并对过去党的秘密工作中的错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抗日战争初期，他坚持中共中央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

1943年回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47年春，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和副主席。1959年第二届和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他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含冤病逝。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刘少奇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

贺龙

贺龙生于1896年，湖南桑植人。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湘鄂西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二军总指挥、前委书记、第二军团总指挥。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历任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

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

1935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9年9月6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终年73岁。1974年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周总理致悼词，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悼词以及举行仪式的消息均未公开发表。

珍闻轶事

三忠于四无限

个人迷信的典型口号。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忠字的本意是全心全意为之效力，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支配。封建时代，对忠字有这样一个解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绝对服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林彪、“四人帮”则是以“革命”的名义，以“突出政治”为借口，以“路线斗争”为棍子，要求当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亿万中国人民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忠于无产阶级的领袖。完全颠倒了无产阶级领袖和人民的正常关系。

林彪、“四人帮”把这种“忠”抬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无极限。并说“忠”是“最大的政治”。表现在：对毛泽东个人各方面的颂扬，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如“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举世无双的”，“无可比拟的”……只要是表示对他崇拜，怎么做都不过分。如男女老少一日数次地表“忠心”，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做语录操；各单位争相建造数层楼高的毛泽东大型塑像，家家户户像供神一样摆放着各式小塑像，上班时在单位拜，下班后在家里拜，没完没了。拜的次数越多，越是“忠”。报刊上也极力宣传“三忠于，四无限”的典型。例如：这类“英雄人物”牺牲前必喊“毛主席万岁”；抢险救灾，人都烧（淹）死了，手中还“紧紧握着《毛主席语录》”；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救房子，不要粮，首先拿起“语录本”往外冲。报纸的报导夸奖他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无限热爱”云云。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带有浓厚封建宗教气味的言行，表面极端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已经遭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唾弃。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早请示，晚汇报

“文化大革命”中，把毛泽东作为偶像顶礼膜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

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是：每天早晨一上班，开始学习或工作前，集体立正站在毛泽东画像前，仰望画像，手握“语录本”贴胸，由一人带领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边喊边把“语录本”一起举向上前方，按节奏摆动。之后，由领头人代表大家高声向毛主席画像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您的……教导，决心……”。最后宣布解散，各就各位。这一程叫“早请示”。

“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只是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或就寝之前，向毛主席画像各自述说一天所干的事情。如学了多少条“语录”，记了多少字的笔记、心得体会；解决了什么问题，思想上有何收获，对照“伟大教导”还有什么“差距”以及今后怎么办等等。

类似宗教仪式的这一形式主义做法始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但因它符合个人崇拜的需要，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风迅速普及全国各地。中间几经制止，而且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还曾发过文件，要求“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但都禁而不止。在林彪摔死以后，随着个人崇拜思潮的低落，这一形式主义做法遭人厌恶，直至废弃。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百丑图”

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手下画的一幅丑化中央领导人的漫画。

画面上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人头密集、相貌丑陋。共有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人100多名。诬蔑他们给刘少奇抬轿子，吹喇叭，搞阴谋篡权活动。极大地丑化了共产党，迎合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反革命需要。

北京搞了百丑图后，上海、西安都跟着学，并被传到国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忠字舞

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的集体舞。

跳这种舞时，人们都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呀”时，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抬头眼望语录本上印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便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心口处紧贴，表示“心中的”，接着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空中的太阳……

那时跳这种舞，不分男女老少，不论时间，场合，一呼必俱应。按当时的说法是：“跳好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所以，不管白天、夜晚，在车站，在码头，在街道，在广场，在田间地头，在饭前饭后……一切有人群的地方，必有人跳这种舞。甚至在沈阳火车站还出现过不会跳忠字舞不许上火车的事情。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珍宝岛事件背后的秘闻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的战斗震惊了整个世界。前苏军以先进的坦克，横行霸道，我军的各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这种T62坦克构成威胁。这时，几位老帅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苦苦寻思。在他们的干预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就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肩上。但是，要求穿甲弹、破甲弹击穿不同厚度的钢板，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科研人员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没有准确的数据，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幸运的是得到计算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不幸的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我国刚刚研制的计算机里更不可能输入解这种方程式的程序。

这一情况很快被叶剑英元帅知悉了，他指示一定要加速研制出新型穿甲弹、破甲弹，并提到在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讨教。此时的刘光志，正在被管制劳动，除了一大堆的历史问题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当年刘光志曾主持过希特勒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火炮设计。两位奉命到山东的军人知悉这一切后，不禁犯了难：解这道方程式、关系我军科研的动向，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啊！

怎么办？两位军人商量许久，最后决定，只让刘光志解方程式，如果他能解开的话，别的一字不漏。

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的菜园里，两名便装军人拿出了那个方程式说：“我们是搞教育的，碰到一个难题，希望你能帮助解出来。”

刘光志老人细扫了两眼，闭目沉思了一会儿，问：“这方程式是干什么用的？”

“当然是教学用的。”“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冷冷地将纸片塞到他们手中，重新摸起了锄把。

“你，你怎么这种态度？”老人冷瞟了他们一眼：“既然不相信我，还找我干什么？”

几天以后，两位军人又来了。这次他们穿着军装，拎着两兜营养品，背着校领导，直接摸进老人的家门。

两位军人歉意地说：“首长批评我们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

刘光志拦住说：“别说了，都是我的不对，我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误了国家的大事情……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都在这里。”老人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纸，纸上标满了各种方程式和最后的数据。

年长的军人惊疑地问：“您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研究破甲弹、穿甲弹，打坦克用的。”刘光志说完，顽皮地挤了挤眼睛。

“简直神了，老先生，没有方程式，您怎么算出这些数据的”？另一名军人叹服地喊。

老先生敲了敲脑袋，“我这手脚不利索，可这儿还灵光。”

不久，新研制的破甲弹和穿甲弹，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得弹痕累累，炸得坑坑洼洼。

前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摞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

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才叹息着说：“我想起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林辑）

"阶级斗争"第一课

1969年2月24日，我们下乡的第一天。

晚饭后，我们在屋里搭临时地铺。生产队长丁万如来了。我们以为队里要开欢迎会，可是，丁万如却开门见山通知我们："今晚队上开大会斗争国民党分子，你们也参加。到时候还要靠你们学生扎起哟。"一听说斗丘八，大伙的劲来了，路上折腾的疲劳也消失了。

批斗大会在庙里院坝召开。那年头，皓月当空时，社员们才打着松树脂火把，三三两两地来了。高山气候，到了晚上冷飕飕的，因此，山里人大都披着羊皮褂，头上包着白布，但不少人却又光着赤脚。院坝中央摆了一张桌子当主席台，上面放了一盏马灯，丁队长坐在桌前，主持批斗会。

别看丁队长没有念过书，却噼哩啪啦地讲了一大通革命道理，接着，他提高嗓门，大喝一声："国民党残渣余孽陈先涛站出来，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随即，人群中站起来一个影子，弓着腰，慢腾腾地走到院坝中间，面向大伙，低头垂手。我仔细一瞧，愣住了。在我的想象中，他准象电影里的烂丘八，歪戴帽子斜穿衣。可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五十岁开外，身体硬朗，只是长年背太阳过山背略微有点驼，穿一件补疤的黑布衫，外面披了一件灰色羊皮褂，头上包着白布，光着泥脚杆。脸给亚热带的烈日晒成腊肉色，风风雨雨在上面犁下弯弯曲曲、纵横交错的沟纹，眼光无神。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

队长首先发难：

"陈先涛，你老实交待，当丘八杀了好多人？"

陈先涛嗫嚅道：

"冤枉呀！那阵子我是在印度打日本人呀！"

我后来得知，他老家在川中一带，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随军远征印度，打日本。战后，不清楚他是退伍还是开小差，来到这荒凉的山庄安家落户。公社化后，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四清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

"陈先涛，你还想抵赖。"我们这些刚来的新社员胸中也燃起了无名火。

"天呀，我从来没有杀过自己人。"他的声音颤抖，脸开始抽搐，双手开始哆嗦，似乎大祸就要临头。

山里批斗人不像城里黑牌子加高帽子，口诛笔伐，他们更爽快更实在。丁队长率先冲上前，朝陈先涛的脸上重重地劈了一掌，留下紫色五指印，伴着一声惨叫。见队长动了手，社员们群情激愤，高喊："不承认就打，打呀！"夜色朦胧，火把燃烧，马灯光、白头巾、灰色羊皮褂、散乱的人影闪烁，吼声此起彼伏，使我想起电影里演的当年农民斗土老财的热烈场面。触景生情，我们几个手也痒了。温胖、盖子、老杨和我都解下从城里带去的"文明产品"——皮带。大家你一鞭我一鞭，一鞭又一鞭，他的衣衫破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脸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文革初期，我是"麻五类"，没有资格荣升"天兵天将"去横扫牛鬼蛇神。想不到，到了广阔天地的第一天，我就幸逢"舞鞭抽敌"，上了这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第一课。

那一夜，1969年2月24日之夜，我兴奋得难以入睡。然而，那一夜却悄然无声地将我的灵魂钉在耻辱柱上……

（选自《知青档案》）

两个人的批判会

一天，供运连汽车班的同志准备在下午完成运输任务后，回厂召开批判会。由于上级临时增加了运输任务，参加运输的同志没有按时回厂，只有在厂工作的王文忠和高占生同志按时到了会场。班里的同志没有回来，两个人还批不批？小王想：批修要靠主动，斗私要靠自觉，放过了这次批判，就是放跑了"私"和"修"这两个敌人，不利于继续革命。班里的同志没有回来，是等还是不等？小高想：同"私"和"修"两个敌人作斗争，既要有愚公挖山不止的毅力，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放过了一分一秒的时间，就是对"私"和"修"的迁就。两颗心真是想到一起了。这时，小王便想了个主意，对小高说："我看这么着，我发言时你记录，你发言时我记录，批判会结束后，把斗私批修的战果向全班汇报。"小高连声叫好。两个人针对共同存在的问题，选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公私溶化论"作为批判的活材料。

批判会开始了。小王和小高站在毛主席像前，共同背诵了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小王先发言，小高作记录。小王愤怒地说："刘少奇的'公私溶化论'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我来到汽车班后，一心想学开汽车，觉得现在下点苦功夫，学会了开汽车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因此，班长分派我作别的工作就不积极干，这正中了刘少奇的毒，必须肃清！"小高马上接上去说："我过去也中了刘少奇的毒，'私'字也'冒'了头。有一次，班长让我跟车装卸，有的车拉砖，有的车拉石灰，我怕装卸石灰呛人，就赶快跑到拉砖的车上。毛主席教导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批臭刘少奇的'私'字经，不狠斗头脑里的资产阶级'私'字，心就会背着毛主席，耳就不听毛主席的话，腿就迈不到继续革命的路上。"

排炮阵阵，弹无虚发。两个人越批越激动，越斗劲越足。最后，小王和小高又打开红宝书，共同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决心处处听毛主席的话，作一

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

（选自《人民日报》）

干燥窑前狠批"活命哲学"

马达轰鸣，大窑旋转。一连工人们为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正在紧张地劳动。突然，灼成二号干燥窑内的火蕊子堵住了，干燥窑被迫停下。怎么办？窑内温度达二、三百度，如果等降温后进去捅开，就会影响一天的生产；要是现在进去，随时有被烤伤的危险。是等降温后进去，还是现在进去？有些人犹豫不决，一个青年工人说："还是等降了温再进去吧！"

在共产党员、二班长刘风忠的带领下，一场批判大叛徒刘少奇的"活命哲学"的战斗打响了。刘风忠首先打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然后他第一个发了言："大叛徒刘少奇狂叫要'钟爱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充分暴露出他是个怕死鬼。我们工人阶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要'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做到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饱经风霜的老工人马上抢着说："刘少奇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就是不让咱们工人阶级革命，是白糖包红矾，皮甜心毒。是打着'关心'的旗号，让咱们个个都成为贪生怕死的可怜虫，让咱们再受把头鞭，我们决不答应。我们宁为革命前进一步死，决不为活命后退半步生。"大家越批越有劲，不断愤怒地高呼："打倒刘少奇的'活命哲学'。"那个青年工人也激动地说："刘少奇被打倒了，可是他的'活命哲学'的流毒，时时刻刻像细菌一样侵蚀我们的头脑，今天，我一看窑里二、三百度的高温，就闪过了一个'怕'字，这是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没有肃清的表现。我们应该牢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把火蕊子捅开，要顶着危险上。"

刘风忠说："干燥窑就是战场，火蕊子就是堡垒。窑内的高温，没有我们工人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决心高，我们一定要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火蕊子捅开！同志们有决心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有"。

共产党员刘风忠和那个青年工人把棉衣用水蘸湿穿上以后，明知窑中险，偏向险中冲，他们高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钻进窑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大窑又开始飞转了。

马达又轰鸣，大窑又飞转，把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选自《人民日报》）

一块语录板的故事

一走进巴拉塔呼生产队古赫的蒙古包，就会看到毛主席像下边挂着的那块毛主席语录板。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块小黑板上面写的不是毛主席语录，而是古赫的工分账。那时，由于长期走场放牧，十几天才能记一次工分，古赫怕忘了下夜、饮羊的次数，专门搞了块小黑板，把自己劳动的工分记在上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吹遍了内蒙古草原，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里参加支牧的解放军，深入到各个放牧点和蒙古包，帮助广大贫苦牧民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天，班长田忠信同志捧着红宝书，走进古赫的蒙古包，一眼就看见了这块记满了工分的小黑板。经过了解，他知道这个年老的贫苦牧民中了大叛徒刘少奇鼓吹的"工分挂帅"的流毒。他决心拿这块黑板作反面教材，帮助古赫一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肃清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在学习班里，田班长帮助古赫首先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毛主席的教导使他心明眼亮，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的光辉形象印在他的脑子里。田班长又引导古赫一家以毛主席"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为武器，针对刘少奇的"公私溶化论"，展开了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使这位在旧社会世世代代当奴隶的老贫牧大大提高了觉悟。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激动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可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却用'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黑货来毒害我们，想让我们只顾牛羊、工分，忘记政权。这真是狼给羊拜年，没安好心！"说着，他一把扯下那块小黑板，气愤地说："这就是刘少奇毒害我们贫下中牧的罪证。几年来，它像一个大包袱压得我迈不开步，我一定要把它砸烂！"说着就要摔。这时，古赫的爱人急忙跑过去，抢下这块小黑板，擦掉上面的工分账，双手递给田忠信，请他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写在上面。

从此以后，这块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语录板就变成了指引古赫一家前进的明灯。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古赫都把它抄在上边，不但自己学，还背上语录板到其它蒙古包里去宣传。他们游牧千里，走到哪里，就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和这块毛主席语录板带到哪里。

今年八月的一天，知识青年桑革放牧的一群羊，被特大的暴风雨打散了，大家都分头去追赶。当时，古赫的肺病犯得正厉害，领导和同志们让他休息。他看到语录板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立刻浑身充满力量，不顾一切冲出了蒙古包，在茫茫的雨海中，向羊群追去。暴风雨打得他喘不过气来，刚刚跑出一里多路，就一头晕倒在草地上。桑革跑来扶起他，眼里含着泪花说："古赫阿爸，你的身体不好，快回去休息吧！""放牧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要管我，快去赶羊群！"古赫说完，推开桑革，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迎着暴风雨，又继续前进。在暴风雨中，古赫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了三个小时，终于把打散的羊群全部找了回来。

金色的阳光照在草原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过去眼里光看到工分的古赫，现在成了大家称赞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红山石　内宣新

（选自《人民日报》）

小秦把拐杖扔掉了

今年五月份，在一次抢修刨床的突击战斗中，电工车间青年工人小秦不小心扭伤了腰，被送进了医院。经过多方治疗，他的腰逐渐好转，便回到了厂里。但小秦由于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钟爱自己"的流毒，担心把身体搞垮了。为了保养身体，少参加一些厂里的活动，他特地做了一根拐杖，每行动一步，都不肯离开它。

正在这时，厂里广大工人群众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高潮，车间、班组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人人都投入战斗。一天，车间革委会主任来到了小秦的房间，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新指示，介绍厂内工人群众狠批大叛徒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新胜利的生动事迹，并且勉励他积极向疾病作斗争，继续为人民立新功。这一切，使小秦受到很大震动，他想，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工人，应当做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钢铁汉，绝不能受刘少奇"活命哲学"的影响，为了"钟爱自己"，去当革命的逃兵。小秦越想越呆不住了。在第二天召开的批判大会上，他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批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说话间，他把腰一挺，手一挥，把那根拐杖摔出老远。他说，让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和"钟爱自己"的黑货见鬼去吧！

打这以后，小秦每天都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并且坚持参加劳动。

（选自《人民日报》）

第五次批判会

前段时间，柳州铁路局机电厂二连七班接连召开了四次批判会。全班同志人人口诛笔伐，狠批了大叛徒刘少奇推行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没料到刚过几天，"奖金挂帅"的流毒又在班里有所反映。班长张月才发现前几次批判会虽然开得不错，但是有的人却没有把自己摆进去、狠斗头脑里的资产阶级"私"字。

这天晚上，七班组织了第五次批判会。大家首先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伟大教导，然后人人批判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并紧密联系自己的活思想，狠斗私心杂念。青年工人李桂琴指着右手上的一块伤疤愤怒地说："'奖金挂帅'，这是包着糖衣的砒霜，可真把我害苦了。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我在车床上加工零件，一不小心碰伤了手，鲜血直流，痛得我差点昏过去。当时的车间领导为了掩盖工伤事故，好使车间继续拿'安全奖'，就叫我包扎好伤手，照常上班。我手痛不能干活，他就叫我站在车床旁边装装样。这样，那个月全车间照样得了'安全奖金'。但是，我的手却因为没有及时治疗，拖延了好多天伤才好，影响了生产。"

第五次批判会越开越热烈，一直开到深夜。活生生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全班同志，使大家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从此以后，全班革命和生产搞得朝气勃勃。

（选自《人民日报》）

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0月18日，黄永胜把"紧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全军，所以也叫第一个号令。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缓和局势，根据中苏两国总理北京会晤的协议，恢复两国之间的边境谈判。苏方代表将于10月19日到达北京。林彪以防止苏方借谈判的烟幕发动突然袭击为借口，于17日发出紧急指示。

第一个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领导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敌情，并迅速报告。事后，林彪于10月19日以电话形式向毛泽东报

告"紧急指示",企图以先斩后奏的方法迫使毛泽东同意。毛主席当即制止,指示"烧掉"。

但发布第一号令却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和边远山区安家落户,有的被送进五七干校。同时,还把所谓该审查、受审查的干部群众,强行遣返原籍或分散到内地。

发布第一号令的实质是林彪检验自己的命令效力、图谋政变的一次预演,给社会和广大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毛主席对林彪说:"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

1969年3月,苏联军队两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苏联政府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指责我方首先使用武力。苏联舆论还公开威胁中国:"如果中国的挑衅活动持续下去,苏联将使用它的全部战略火箭武器。成百上万的中国人将会因毛泽东的鲁莽政策死于战火之中。"

毛主席在"九大"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莫畏南山虎,应防北院鸡。"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那天,我们从中南海游泳池出发,分乘三辆黑色轿车到大会堂西南门。我在最前面一辆车上开路,主席乘坐中间一辆保险车,后尾车是警卫人员。

北京的春天,阳光格外明媚,不冷不热。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看上去精神饱满。下车后主席先到118厅稍作休息,然后走向主席台。

主席以激昂的声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代表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会议期间,警卫任务格外繁重,我们不断研究如何做好随卫,既要目标小,又要能战斗,以确保毛主席安全。平时在京活动,我仅带十几个人就可以了。这次我挑选那些有战斗经验,机智灵活的战士,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毛主席也曾指示:"要提高警惕,带好武器弹药,防止有人破坏。"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张耀祠副主任也深入部队,给战士们讲形势和国内外敌特搞破坏、暗杀的活动情况,要我们时刻提高警惕,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们与北京市公安局、总参部队密切配合,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九大"前后的警卫任务。

我虽然不是代表,因工作的需要,时刻都站在主席台边上,什么都看得清,听得到。

令我不解的是,"九大"将许多功勋卓著、在广大党员中很有威信的革命老干部排除出中央委员会。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也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这次大会不仅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而且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主席对大会和选出的政治局,所抱的态度可谓忧喜参半。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提醒她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

针对林彪异乎寻常的吹捧,主席清醒地说:"我从来也不相信,我的那几本书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可是他却把那些书捧得那么高,全国都跟着学。"

1969年时,主席怀疑林彪吹捧他是别有用心。"九大"后主席几个月没有露面,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后又到长沙、南昌、杭州。

后来,主席曾对林彪说过:"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了吗?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他担心,万无一失的上帝,意味着远离人间,怀疑林彪是有意架空自己。

(陈长江)

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带走了中南海的鱼刺和土

1969年7月,我们住在杭州。当时有些地方刮起杀猪砍树风,起因是在生产小队合并中,富队怕穷队沾光,于是就杀猪砍树分给社员,以免穷队在合并中占便宜。猪杀了,树砍了,家底薄了,不仅原来富裕的队没有生产积极性,而且穷队一看没什么光沾了,也失去了搞好生产的热情和干劲,于是富队和穷队的生产都受到了影响和损失。主席听说农村的这种现象,马上叫我回家,看看情况如何,一共给了我5天时间。

7月30日早晨离开杭州,晚上赶到家。我用两天时间走访了4个公社20多个生产小队,同江苏省梅安县管农业的同志交谈。他们(包括省里)都没有提出合并生产小队的问题。现在每户社员有自留田,家庭副业也搞得不错,社员生活逐步好起来。"文化大革命"对家乡的农业生产影响不大。

3日回到杭州,我详细地向主席汇报了家乡的情况,他比较满意地说:"农业从1956年后,几年政策不稳定,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一定要稳定政策叫农民放心"。

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时刻想到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没有忘记中国大多数人。

1969年是建国20周年，主席邀请各族人民的代表、英雄模范人物和各界著名代表人物参加国庆活动。同时也增加了造反派的代表。代表们在观礼台观看白天的活动，晚上观看焰火晚会。

这些代表们被请进中南海，暂住一中队大楼的一、二层，我们警卫人员全部集中住三层。

9月26日下午，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敲锣打鼓到中南海西门夹道欢迎代表们的到来。来到毛主席驻地，住到主席身边，代表们十分兴奋。我看到在代表中有著名的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劳动模范李素文、造反派代表王洪文等人。

周总理、邓颖超及住中南海机关的许多领导一起来看望客人们。消息一传出，住在楼上的客人，都拥到一层，场面十分感人。大家争着与总理握手。总理在亲自检查了客人住的房间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代表们觉得住在主席身边，分分秒秒都值得珍惜。他们想方设法找一些特殊性物品留作纪念。有的把中南海的花、草、树叶做成标本珍藏起来；有的代表把中南海的鱼吃完后，把鱼刺保留下来；还有的从主席住地带走了一捧土……

代表们走后，主席见到我说："这次以我名义请来的代表住在你们中队，他们反映你们服务周到，吃得也很好，他们有的见到我反映很满意，说过了一周战斗化的集体生活很有意义，感谢同志们。"

（陈长江）

1957年，我第一次见到了林彪

我1957年跟主席出差住在杭州时，第一次见到了林彪。

一天晚上，我在门口值班，林彪、叶群来看主席，进到值班室，我才看清他的模样。我印象中的林彪是我军的一员猛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指挥了千军万马，应有大将风度。当林彪走下车，我很是奇怪，天气并不是很冷，他却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缠着围巾，戴着帽子。叶群解释说："首长身体不好，怕风、怕光、怕冷、怕出汗。"林彪的瘦小身材、秃头顶、面无血色，与我想象中的形象差之千里。

后来的10多年，我见林彪到主席这里开会或接见外宾等几十次。冬天，他坐在保险车里，大衣、皮帽子，腿上棉裤，一应俱全，连围巾都裹得很严。走起路来要人搀扶。夏天，也要扣顶帽子，两腿套上一尺多长护膝。每次到主席这里，来走之前都要到值班室脱穿一番，时刻注意防止风、光的袭击。林彪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患有结核病，深居简出。可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俨然变了一个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成为中国政坛十分活跃的特殊人物。当"九大"党章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后，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林彪身体很糟糕，远不如主席健康，他很难长寿，但又不敢贸然说出。

1969年10月1日，"九大"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主席和林彪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以他那细弱带有鼻音的嗓音发表国庆讲话，他始终埋头于讲话稿中。天安门前100万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上空，淹没了林彪的声音。没过多久，江青、叶群拉主席、林彪与身边几个人在天安门城楼照像留念，我也在其中。这张照片也成为历史的一瞬。

（陈长江）

毛泽东听说林彪送来的"第一个号令"的电话记录后，说："烧掉"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的"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这一天，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指挥，而第二天，林彪才以电话记录形式向主席报告，企图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主席同意。此时，我们与主席正住在武汉东湖宾馆，主席听说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

林彪、黄永胜得意之后又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

这个"号令"关系着全军总动员、准备打仗的大事，不经党中央研究，不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请示，擅自下令，是绝不允许的。主席听到林彪调动全军之事很生气。汪东兴主任来后向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林彪调动全军想干什么?"要我们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林彪一伙通过这次阴谋，把一些在北京居住工作的老同志强令疏散到外地，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扫清障碍。10月中旬，许多老同志被赶出了北京，疏散到全国各地。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从化县；陈毅迁往石家庄；叶剑英到了长沙；聂荣臻去了邯郸；刘伯承到了汉口；徐向前去了开封；陶铸被送到合肥；陈云、邓小平被迁到江西；就连身患重病的刘少奇和徐海东也分别被疏散到开封和郑州。

（陈长江）

主席说：打篮球不要老想赢人家

1969年秋，“九大”以后，我们和毛主席到武汉住了一段时间。我这次带的人比较多，全部住在宾馆、客房有困难，部队分别住在三号小礼堂和游泳池。

主席一有空，就看一中队战士和武汉军区警卫营篮球比赛，我们赢得次数比较多。主席提醒身边工作人员：“要尊重地方上的同志，尊重他们的首长、炊事员、烧锅炉的工人、服务员。他们的工作即便有不当之处，也不要讲。你们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人家都兢兢业业地招待，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粒粮、一度电，要注意和地方搞好关系。比如打篮球吧，不要老是想赢人家。”

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认真检查了自身有无盛气凌人的地方，是不是做到了谦虚谨慎。同时，我们还根据多次外出的情况，制定了不少规定：不吃人家招待的烟、糖、水果；不用人家准备的毛巾、肥皂；时刻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参加了武汉市的绿化活动，在长沙还帮助当地[illegible]这一切，都受到地方首长和工作人员的赞扬和好评。

主席得知一中队警卫战士工作出色，看到我高兴地说：“你们保持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对地方影响很好。”

我说：“主席，你到地方不也是本着尽量少麻烦人家的原则吗？自己带被褥，吃的也带，对警卫战士影响很大。”

主席听后开心地笑了。

主席的生活十分简单，吃饭几个小菜。用地方上东西，走时叫管理员一定给人家结账付钱。20多年，我很少看到主席参加宴会，每到一个地方人家请客，主席是不参加的。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一般都交礼宾司处理，有些吃的送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

（陈长江）

“他跟过去大不一样啦！”

前些时，山西省平陆县西侯公社北张大队第一生产队为了使更多的麦田能施上底肥，决定发动社员再投交一次肥料。六十九岁的老贫农杨天有，主动跟儿子将羊粪从圈里起出来，打碎，堆在门前。接着，又几次找队干部，提出先收他家的这堆羊粪。

一天，队干部组织一部分强壮劳力，逐家逐户收肥。挨到杨天有家时，父子俩又是装肥，又是担运，忙个不停。当时，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往事：去年，因为收杨天有家的羊粪，收肥的人每次都被他连吵带骂赶出了门。现在，他主动、热情地投交羊粪的积极性，使大家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有人夸他说：“老杨啊！你真是大旱的禾苗逢甘雨，跟过去大不一样啦！”杨天有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中了大叛徒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毒，上了他的当，首先想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和集体，做了不利于集体利益的事；如今，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武装了我的头脑，革命大批判使我分清了是非，我坚决不走资本主义的死胡同，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就这样，杨天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积极为革命种田，主动把三千多斤羊粪，全部投给了生产队。

西侯公社通讯组

“红席匠”斗私批修

陕西省眉县东方红公社红星大队第三生产队老贫农侯怀荣，有一手祖传的打席手艺。自从生产队打席组织成立后，他拿起四十多年不离身的打席刀，一股劲地为集体打席，是全队有名的“红席匠”。

前一时期，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侯大爷的思想一度出了岔。他想：集体打席组还没有开工生产，趁这个机会，出外买点苇子，抽空打几张席，拿到市场出售，赚几个钱方便方便。于是，他把那把心爱的打席刀取出来擦了一遍又一遍……。

侯大爷的举动，引起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李周锁的注意。为了不使阶级兄弟走错路，李周锁就主动找到侯大爷，和他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

侯大爷的打席刀，来历不平凡，李周锁早已心中有底。一开始，李周锁和侯大爷一起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然后指着侯大爷的打席刀，意味深长地说：“咱可不能忘了这把刀的历史啊！”一提起打席刀，侯大爷辛酸的往事立即涌上心头，他说：“我十五岁那年，就拿着这把刀，跟着父亲学打席，把一家的日子都寄托在这把刀上。可是，我父子俩拚死拚活地干，全家人还是没吃过一顿饱饭，炕上没铺过一张囫囵席。到头来，还被逼得家破人亡，没出一年，父亲、母亲和弟弟就活活饿死，连个棺材都装不起，只好卷了一张烂席。从此，我又拿着这把刀，流落在外，给地主干活，挨打受气，少吃缺穿。”侯大爷越讲越激动，越批对大叛徒刘少奇越恨，懊悔自己不该产生为自己打席赚钱的错误念头。他坚决表示要和资产阶级“私”字一刀两断，一个心眼走社会主义道路。

批判会结束后，侯大爷又擦开了他那把打席刀。不过，他这次擦刀再不是想为自己打席赚钱了，而是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为集体多打席，打好席，为建设社会主义出

力！

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柳州铁路局机电厂二连的车间里，放着一颗奇怪的铁钉。它有四只锋利的“脚”，不管怎么放，它总是三只“脚”立地，一只“脚”朝天。工人们看见它就想起了阶级敌人，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颗奇怪的铁钉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原来它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前一段时间，二连有的同志认为，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空前巩固和加强，阶级敌人再也不敢动弹，可以专心搞生产了。车间革委会委员、二连连长赵宪桐觉得苗头不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的表现。于是，他立即领导大家在车间里、机床旁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人人口诛笔伐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通过深入的革命大批判，大家擦亮了眼睛，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又挖出了一个平时装得很“老实”的阶级敌人。原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私自制造了一批四脚钉，企图把这批四脚钉撒在公路上，破坏交通运输。他因为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偷偷地把四脚钉销毁了，只留下一枚，妄图伺机进行破坏活动。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在革命大批判中被群众揭发出来以后，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工人们说：“我们一定要把大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倒批臭！”他们怀着对刘少奇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手执四脚钉，对这个反革命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在铁证面前，这个反革命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

（选自《人民日报》）

坚持劳动是斗出来的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到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的深刻意义。

文化大革命前，我认为自己是工农干部，根子红，苗子壮，又在农村工作，经常和群众打交道，不参加劳动，也忘不了本，变不了质，脱离不了群众。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我官做大啦！眼里没有庄稼人啦！群众的意见听不进啦！这些批评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感觉到自己忘本、变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懂得了“脱离劳动会变修，参加劳动能防修”的道理。

县革委会成立时，我又担任了领导工作。历史的教训和群众的信任，使我决心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远不再脱离群众。但是，要使自己真正像一个老百姓，并不容易，这里是有斗争的。

一次，我到一个公社蹲点，见社员出门都背着粪筐，自己背不背呢？思想上有斗争。开始想：我是个领导干部，背粪筐不体面，还是不背吧！以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的教导，又想：为什么社员背粪筐不觉得不体面，我背粪筐就觉得不体面呢？这哪里像个普通劳动者、像个老百姓呢？这还不是“老爷”思想在作怪吗？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克服了错误思想，也就和社员一样背起粪筐了。

粪筐背起来了，思想上又产生了斗争，总觉得有些臭，有些脏，心情不舒畅。我又翻来覆去地想：参加革命前我也背过粪筐，那时为什么不嫌臭不嫌脏？现在为什么就嫌臭嫌脏了呢？社员们背着粪筐，谁也不嫌臭不嫌脏，而我为什么就嫌臭嫌脏呢？这还不是因为自己形式上像个老百姓，思想上并不像个老百姓吗？这还不是“官”字在作怪吗？实质上，不是粪便脏，而是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脏；不是粪便臭，而是自己还想做官当老爷的思想臭。

经过反复斗争，我逐渐养成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习惯。不论走到哪里，碰到什么活，我都和群众一起干。这样，群众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有什么问题也乐意向我反映了。这对我了解情况，做好工作，有很大帮助。

（徐升海）

磨一手老茧　铸一颗红心

去年十月，我下放到安福县枫田公社枫田大队插队劳动。头一天干活，就累得腰酸背痛，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一样。我想起了城市里的舒适生活，觉得这样艰苦的劳动真不是滋味。在这里，柴要自己砍，菜要自己种，饭要自己烧；早上露水扫，中午汗水漂，晚上冷水澡，实在吃不消。老贫农张福田，看出我的心事，就找我谈心，同我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教导，并热情地对我说：“农村天地广阔，我们多么希望你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啊！”他还鼓励我：三天肩头四天腰，坚持下去就好了。毛主席的教导，老贫农的教育，使我很受感动，我的思想才渐渐转过弯来。

去年冬天，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去撒牛粪，社员用手抓起来撒，而我却怕弄脏了手，只用两个手指拈一点撒一点。老贫农周梅之恳切地对我说：“没有牛粪臭，哪有大米

香！弄脏了手不要紧，等会洗洗就干净了。"老贫农的话，说得我脸上直发烧。我想起了毛主席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的教导，认识到贫下中农的思想的确比我干净得多。

从此，不管是脏活累活，我都和贫下中农一起干。我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磨一手厚茧，炼一副铁肩，铸一颗红心。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我还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贫下中农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我逐渐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把我和贫下中农紧紧连在一起了。

（刘而汉）

从挑水受到的教育

挑水，本是件平常的事，但在"五·七"干校里挑水，却给了我很深的教育。

一次，领导上决定让我去烧水。我有点想不通，认为烧水活又轻，又离开了同班的群众，不利于自己的锻炼和改造。连长对我说："过去大家都为你服务，现在你为大家服务，这不正是放下官架子，改造思想的好机会吗？"我一听，也对，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其实，烧水的活也并不轻。不久，我们连的工地转移了。工地附近没有水，从挑水的地方到烧水的地方，来回有三、四里路。一次，我挑着一担水往工地走，越走越吃重，就产生了埋怨情绪。这时候，我猛然想起一件事。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我还在牡丹江铁路局，有一次，我坐公务车到沿线小站检查工作。晚上，我看到卧室里有洗澡设备，于是心血来潮，想洗个澡舒服舒服，就叫工人同志给烧洗澡水。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从革命群众的揭发中，才知道供应我洗澡的水，也是车站工人从一、二里路远的地方挑来的。当时，我对革命群众的揭发，认识还不深刻，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自己挑这样重的水，走这样远的路，有了切身感受，认识也就深刻了。想起当时工人挑水为我这个官老爷服务多么不应该，而今天我为广大群众服务是多么应该。要埋怨的话，只能埋怨自己的思想觉悟低，怎能埋怨挑水距离远呢？想到这里，劲头就来了，担子也就不那么重了。

每次，我挑着开水送往工地，同志们从老远的地方跑来接我。一到工地，同志们亲热地喊，"老栗头，累了吧！快坐下休息休息。"我听到"老栗头"这三个字，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

"老栗头"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听到的称呼，回想过去，同志们都管我叫"书记"呀！"政委"呀！谁要叫声我的名字，都有点不舒服。而今天听起"老栗头"这个称呼却很舒服。从听着不舒服到听着很舒服，这的确反映了思想感情的变化，过去是做官当老爷的思想感情，现在有了普通劳动者的思想感情。

（栗占华）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69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又安排很多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为自己夺权作更好的准备，他更加狂热地掀起个人崇拜之风，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便笼罩在一片极"左"思潮的泛滥中。此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东西自然受到影响，如当时口号中的"两个拳头"打人就是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不客观的认识产物，"备战、备荒"是对战争危险的过高估计等。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1＝C2/4

中速稍快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歌曲《东方红》

1＝F2/4

中速庄严

1.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2.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

3.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注：第三段唱完反复时唱到“得解放”用高八度唱。

歌曲《歌唱社会主义祖国》

1=F2/4

壮大行进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是灿烂阳光。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我们奔向前方。奔向前方。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七亿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军民团结斗志昂扬，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马列主义新篇章，革命人民朝气蓬勃，一代新人茁壮成长，跟着毛主席当革命闯将，红彤彤的世界靠我们开创。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亮了我们的胜利航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一、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二、庆祝二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伟大胜利！

五、向全国各族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

六、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七、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八、抓紧革命大批判！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十一、备战、备荒、为人民！

十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十三、一定要解放台湾！

十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五、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十六、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

十七、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

十八、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十九、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二十、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二十一、向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致敬！

二十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二十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二十四、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二十五、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二十六、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二十七、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二十八、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二十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芭蕾舞剧《白毛女》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明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革命小将们创作并演出的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齐声欢呼：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伟大思想的光辉，使这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得到了新生！我们一定沿着您的文艺路线去夺取新的胜利。

毛主席早就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上海市舞蹈学校的革命小将们，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对流传了二十多年的《白毛女》赋予了新的生命。原来的歌剧、电影《白毛女》掺杂了周扬之流的许多反动

观点、歪曲、丑化了劳动人民。例如，杨白劳对地主不敢斗争，含冤喝盐卤自杀；喜儿甘受地主婆的虐待，对黄世仁有“幻想”等等，这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糟粕和毒素，统统被文艺革命的先锋战士和革命小将们荡涤得干干净净。

《白毛女》是继《红色娘子军》之后又一出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的好样板。它是文艺革命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和革命小将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胜利，是“小人物”革命造反精神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本文转载自《解放军文艺》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略有增删）

历史档案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满怀信心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各民族亿万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 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能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地方、军队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党的基层组织,每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对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胜利闭幕。

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在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的过程，充满了极其热烈的革命气氛。当大会宣布当选名单，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长时间地热烈欢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的胜利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会在四月十五日进入第三项议程后，代表们认真地负责地进行了工作。根据大会主席团规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先由各代表团自由提名，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意见，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给各代表团，经过充分协商，产生出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经过这样几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地民主协商，商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提到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在当选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党、政、军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在工厂、农村生产岗位劳动的优秀党员，有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有从事文化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有各族的优秀的男女共产主义战士。代表们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有力地表现了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空前的朝气蓬勃，空前的革命团结。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

大会代表高兴地说：这次大会，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严肃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基本经验，确定了党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的任务和政策，今天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这次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大会结束之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会认为，应当进一步在全国开展一个伟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大会期间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四十八年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明确形势、任务和政策，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余毒，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是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夺取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有步骤地、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具体分析各地的情况，注意到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订出必要的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巩固工农联盟，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共同对敌。要注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动向，同妄图复辟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同违反毛主席政策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作斗争。

大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各级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要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恰当地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各级领导同志要了解全局，抓好典型，总结经验，掌握动向，把工作做深做细，克服一般化。在胜利的形势下，同志们务必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警惕资产阶级腐蚀、分裂我们党和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和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向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向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同胞，向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好事的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大会号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促进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创立新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向正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五大洲的革命人民，向坚持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的英雄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战斗的敬礼。大会庄严宣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彻底粉碎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阴谋，把反对帝、修、反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他们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种种困难和曲折，国内外反动派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敌于天下。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美帝、苏修和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阴谋破坏和无耻侵略，都必将被有充分准备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彻底粉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伟大时代。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30日　李宗仁逝世。李宗仁生于1890年，广西桂林人，字德邻。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广西陆军学堂毕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1945年后任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曾和蒋介石一起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任代总统、12月去美国，1965年7月，响应祖国号召，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大地，回到北京。李宗仁临终前，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道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祖国内外形势，真是大好、特好，越来越好"，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信上还说："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4月1～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这次大会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以及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起来，绝大多数党员也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和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仍处于被

审查、被监禁的状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回顾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胜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的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林彪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大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丰功伟绩"，全面肯定和发展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方法，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以所谓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在刘少奇头上，报告根本无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客观事实、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加以宣扬，并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因而过分地强调了要准备打仗。2 日～13 日，各组代表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作自我检讨。14 日，举行第二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九大通过的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5 日～24 日，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规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得超过 250 人，后改为 270 人，规定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规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 53 人。24 日，大会选出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在 4 月 28 日举行的第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除了上述 5 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同时，也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4 月 6 日　爱国人士张治中在京逝世。张治中，1890 年生，安徽巢县人，字文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 年参加北伐，1928 年后曾任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5 年国共谈判任国民党代表，1946 年参加军事调处小组为国民党代表，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 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遂留北平。同年被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6 月 12 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的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7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社论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论述。并认为"这是我们党几十年建党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关于整党建党，社论提出，"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判他的黑'六论'"等等，把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刘少奇对党建设上的思想理论上的伟大贡献，完全对立起来。社论以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提出要在组织上进行整顿。整顿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并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同时，要求把在所谓"革命的大风浪中经过考验"的"造反派"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关于整党的方法，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 月 30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陈绍宽，因病治疗无效，在福州逝世，终年 81 岁。

10 月 17 日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任命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次日，吴法宪未经中央批准，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日　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在“紧急指示”影响下，大批党政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和偏僻农村，有的送进“五·七”干校。

10月22日　甘肃省兰州专政机关破获美帝间谍案。兰州市专政机关在广大群众配合下，破获了美帝间谍特鲁茨·封·许林德（西德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案件，并依法进行了公开审判。美帝间谍特鲁茨·封·许林德，先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份为掩护，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罪恶严重。群众一致要求给予严厉惩处。兰州专政机关依法判处特鲁茨·封·许林德有期徒刑10年。

11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论重新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在一年前发出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各地在执行中，实际上，把在大专院校工作的教职员和干部，以及广大科技人员，包括干部中的不少老弱病残者，也都下放“五·七”干校或农村插队落户。

11月12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诬陷和残酷的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病故。终年71岁。

11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陶铸，因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终年61岁。

经　济

2月16日～3月24日　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会上批判了“托拉斯”、“短线平衡”等观点和做法；提出条块关系以“块块”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生产短线产品的大集体手工业可以改为全民所有制。

7月6日　红旗渠工程已全部建成。红旗渠是1960年开始动工兴建的。河南林县人民迎着各种困难，从山西省平顺县的侯壁断起，穿越太行山的许多悬崖绝壁，1966年，建成了宽8米、深4.3米、引水量为25秒立方米、长达140华里的总干渠和203华里的干渠，把漳河水引进了林县。到今年7月，又胜利地完成了以红旗渠为主的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支渠配套工程的竣工，使全县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盆地，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全县水浇地面积已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

7月15日　安徽大型水利工程裕溪口船闸胜利通航。安徽省为沟通长江和巢湖航运而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裕溪口船闸，继节制闸、拦河坝建成之后，胜利建成并提前通航。新建成的裕溪口节制闸和船闸，全部用的是钢筋混凝土。节制闸共24孔，长200多米。它同已建成的巢湖闸构成了巢湖流域裕溪河的梯级水利枢纽，防洪保护面积达220万亩，蓄水、引水灌溉面积达329亩。船闸闸室长195米，宽15.4米，可以同时容纳两艘千吨轮船。它的建成，使裕溪口船闸以上280公里的航道畅通无阻。长江、巢湖之间的航运，再也不受裕河枯水季节河道水浅的影响了

7月22日　《人民日报》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为题，发表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把“一切为了生产”，强调产值，强调数量，强调利润，评奖制度，统统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厂路线，否定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把“五定”（定项目、方案、图纸、金额、效果）、“四道关”（技术科审定，财务科算帐，厂长批准，供销科备料）说成是“技术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严重压制了工人的创造精神”，是“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扣、罚。”以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否定了厂长和各级负责制，以“精兵简政”撤销了必要的科室。建立了所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等“新制度”。

9月15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红旗》杂志1969年第9期的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把农民的一些合理性的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说成是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复辟资本主义。煞有介事地说，“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只要不是“以粮为纲”统统被说成是“自由经营”是“资本主义”。出售农副产品，凡不卖给国家，到集市“自由买卖”都被视为是“修正主义黑货”，提出“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一些农民提出应“少留多分”，甚至是多劳多得都说成是“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是要拆集体经济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老路。”等等。《红旗》杂志编者按：“农村如何搞革命大批判？这篇调查报告提出的问题，可供参考。”

9月23日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建成。这个工程在1961年开始兴建，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安装的，是解决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抗旱和排涝等问题的一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整个工程，由3座大型抽水机站、5座中型

节制水闸，3 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 10 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机动引水和自流引水进行抗旱、排涝。在里下河地区遇旱时，3 个抽水机站可以实现当地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实行南水北调，抽引长江的水，灌溉大运河自流灌溉区的淮安、宝应、兴化、高邮、江都五个县的 250 多万亩稻田。在里下河地区积水受涝时，3 个抽水机站可以一昼夜抽水 250 万立方米的速度排水入江，受益范围包括高邮、江都、泰县、兴化、泰州等 5 个县、市。此外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还便利于苏北内河运输。

9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药品全面大幅度降价。降价后药品价格，比 8 月 1 日前下降 37%，比 1950 年下降约 80%。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下降。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

军　事

1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某部一连“为人民战胜烈火的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968 年 1 月 26 日，在某化工厂发生了严重火灾的关键时刻，黑龙江军区某部一连留在营房的 17 名同志全部挺身而出，英勇顽强，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冲向火海，英勇战斗，14 名同志光荣负伤，3 名同志壮烈牺牲。指战员们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战胜了这场特大火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防止了一场更大爆炸事故的发生。

9 月 29 日　我国胜利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外　交

3 月 2 日　苏联边防军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2 日晨，苏联边防军出动 70 余人、装甲车 2 辆、卡车和指挥车各 1 辆。悍然入侵我国神圣领土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了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3 月 4 日至 12 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我珍宝岛。3 月 15 日，苏军使用坦克 20 余辆，装甲车 30 余辆，步兵 2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我发起攻击。我守岛军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 9 小时，打退了苏军的 3 次攻击，再次给了苏军入侵者以应有的惩罚。3 月 16 日，苏军登岛收尸，我军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严密监视，未予出击。3 月 17 日，苏军又先后出动坦克 3 辆，步兵 100 余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再次向我进攻。我军以前沿和纵深的火炮对登岛之苏军予以突然猛烈的还击，毙伤入侵坦克一部，其余仓皇逃窜。

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入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并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苏联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3 月 4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论。全国亿万军民满腔怒火声讨苏联当局的武装挑衅，坚决支持我国政府的抗议照会。港澳爱国同胞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纷纷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反击苏联当局的武装挑衅。在这期间，我国政府对苏联当局派出大量军警、特务包围我使馆、侵略我国领土，多次提出抗议。

3 月 16 日　中共中央致电缅共中央深切哀悼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牺牲。缅共主席德钦丹东于 1968 年 9 月 24 日下午 5 时 20 分，惨遭谋害。

6 月 1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蓄意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8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于 6、7 两月，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领水、领空，有计划、有准备地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提出抗议。

8 月 20 日　中国红十字会严正宣布拒绝参加第 21 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谴责国际红十字会常委会追随美国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我红十字会宣布，对于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中国红十字会将不受约束，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8 月 24 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应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

9 月 4 日　中共中央为胡志明主席逝世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突患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以后，于 1969 年 9 月 3 日逝世，享年 79 岁。

中共中央的唁电指出：“胡志明主席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越南的革命实践。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

共产主义事业。"当天,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逝世。

9月11日　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后,从河内回国途中,路过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设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鲁尔等,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同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26日　刚果(布)总理拉乌尔率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在这之前,前来参加我国国庆活动的还有越南总理范文同、柬埔寨首相朗诺、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哈基·托斯卡等率领的代表团,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代表团。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庸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我国国庆活动。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朝鲜党政代表团,同崔庸健委员长等亲切握手,并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0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针对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的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政府在1969年6月13日发表了一个为沙俄帝国主义辩护和恣意诽谤中国的声明,并且继续在中苏边界全线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同苏方进行谈判,和平解放中苏边界问题。

10月20日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参加谈判的中国方面有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等人;苏联方面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等人。

11月26日　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地拉那,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庆祝活动。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柬埔寨表示极大愤慨,并表示支持西哈努克亲王11月22日就美帝轰炸、扫射和炮击柬埔寨蒙多基里省达丹地区和达丹军事哨所的侵略事件所发表的声明。

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

1月5日　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安装的富春江水电站胜利建成发电。这座发电站是1965年底开始全面兴建的,提前两年建成发电。

同日　河北建成世界先进水平大型氮肥厂。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的具有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肥厂第三期工程已胜利完成,正式开工生产。

这项完全采用新的流程、新的催化剂、新的大型设备的近代化大型氮肥工程的胜利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氮肥工业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我国尿素生产技术跃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大规模日全食综合观测取得辉煌成果。我国一支科研队伍,对1968年9月22日在新疆地区发生的日全食现象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综合观测,取得了辉煌成果,为我国科研工作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出了新的贡献,使我国日食研究工作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担负综合观测这次日全食任务的队伍,是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会同中央气象局、高等院校和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等10多个单位,共100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他们在新疆西部昭苏、特克斯、伊宁,南部喀什以及乌鲁木齐等日全食、偏食地带,进行了地面和高空观测。这次观测,包括太阳活动区对电离层影响的联合观测,日冕——黄道光的高空和地面观测,日食地球物理和大气效应等数十个研究项目。其中射电——电离层联合观测取得了太阳活动区对电离层影响的丰富的综合性资料。日冕——黄道光观测,是在11,000千米高空采用非密封舱飞机观测的,取得了太阳周围空间很大范围的观测结果,远远超过了世界水平;同时还拍摄到了非常清晰的日冕照片,获得了大量日全食对大气和地球物理影响的观测数据,进一步开展了"日——月——地关系"的研究。

1月2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报告把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大多数教师说成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对这些知识分子要进行"再教育",对于父母被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审查的学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这些学生作到划(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清(肃清刘少奇和反动分子对自己的影响)、站(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报告还把全校各级干部说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才"给予适当的工作"。把著名学者刘仙洲、梁思成、钱伟长等100余名教授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

他们要"批"字当头,给予出路,还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的上述报告是中央向全国推广的"六厂二校经验"之一。"六厂二校"指当时由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进驻的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查明:上述报告列举的"典型"都是假案。当时该校6,000名教职工中,被审查的有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的两个月中,有10余人被迫害致死。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125,000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在上海诞生,并正式发电。这台具有世界水平的汽轮发电机组,不仅在汽轮发电机上采用了我国首创的"双水内冷"这一世界最新冷却技术,而且在锅炉和汽轮上还采用了高温高压、中间再热等一系列世界先进技术,因而这台机组具有容量大、体积小、重量轻、耗煤低等特点。它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0月8日　我国最长的双曲拱桥新沂河大桥建成。这座双曲拱桥公路桥名叫"沭阳新沂河大桥"。这座公路桥全长1,267米,由连续39孔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双曲拱组成。这座桥的建成和通车,把江苏北部的各条公路干线都连接起来,对促进苏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制的万吨级挖泥船胜利下水。这艘万吨级耙吸式挖泥船的主要特点是载泥量大,功效高,操纵灵活,适应性强,船体结构合理,挖泥操作自动化程度高,只用15分钟就可以装满一船泥。船上还装有各种技术先进的新设备。这艘挖泥船主要用于疏浚沿海港口的航道。

10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出白单4号玉米优良品种。经过示范推广,普遍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山西、贵州试种,都分别获得平均亩产600到1000斤,较其他玉米增产20—30%左右。这种玉米还具有抗病、耐旱、耐涝和果穗部位适中等优点。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0年

导　言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各自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势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因此，林彪集团图谋提前“接班”，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0年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书面提出在宪法上规定设国家主席，并别有用心地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提出要把全会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大会。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次受到毛泽东的反对。针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宣讲的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称天才”的骗局，公开点名批判陈伯达。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批判，挫败了林彪集团和平抢班夺权的阴谋。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便加紧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8月28日，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10月，在林彪的策划下，已当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之子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集团”。

华北会议的召开，使林彪一伙的政治处境更加艰难，也激励着他们反革命政权夺权野心的恶性膨胀，他们武装政变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九届二中全会
- ●“五·二〇声明”
- ●中美关系的松动
-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 ●“工农兵大学生”

九届二中全会

背景介绍

1970年8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林彪不顾会议议程，第一个发表长篇讲话，大讲“天才”问题；紧接着，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同时在各分组会议上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为“称天才”的材料，并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

材料：

·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材料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　泽　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五·二〇声明”

背景介绍

1970年由于美国在国际上搞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出了头，因此它不仅在国际上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在国内也面临着反战情绪高涨的窘迫处境。针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局势，同时也为了鼓舞东南亚人民与中国人民抵抗美国的信心，毛泽东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五·二〇声明”。在声明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

材料：

· “五·二〇声明”

材料　“五·二〇声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原载：1970.5.21《人民日报》）

中美关系的松动

背景介绍

从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上增兵，中国面临苏联军事侵略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争夺，也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谋求改善美中关系。双方均作出一些友好的表示，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松动。1970年1月，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

材料：

-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京
- 公告

材料一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十日讯　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有：美国乒乓球协会国际委员会主席拉福德·哈里森，美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蒂姆·博根，美国参加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乔治·布本，代表团领队杰克·霍华德；代表团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约翰·坦纳希尔、埃罗尔·雷塞克、格伦·科恩、乔治·布雷斯韦特；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康尼·斯威里斯、朱迪·博琴斯基、奥尔加·索尔特斯，以及布本夫人、雷塞克夫人和迪克·迈尔斯（记者）。

今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李梦华、吴晓达、邹伯贤、凌青、尹佐珍，以及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员和运动员王传耀、孙梅英、仇宝琴、杨俊、盛新华、陆巨芳、何祖斌、苏国熙等，前往机场迎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和运动员们走下飞机时，对前来欢迎的中国主人不住地挥手致意。随后，中美两国运动员在一起照了像。在机场休息室里，中美两国运动员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中国运动员说，中美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是友好的，我们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美国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一再表示，他们很想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现在来到了北京，心里感到很高兴。

（原载197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公　告

新华社十六日讯　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原载 1971 年 7 月 17 日《人民日报》）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背景介绍

血吸虫病曾经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之一。五十年代政府便花大力气对此病进行了防治。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958 年他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来表达他对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欣喜。

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也是如此。1970 年又召开了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血防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血防工作领导小组并制订了短期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这些对防治血吸虫病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材料：

·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材料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毛主席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写下了光辉的诗篇《送瘟神》，热情地歌颂了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群众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国亿万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一场轰轰烈烈的“送瘟神”的人民战争打响了。不少长期以来血吸虫病危害严重的地区，现在革命、生产的形势和健康卫生的面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总结了经验，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制订了在较短时期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并且重建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血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后，南方各地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结合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春耕准备工作，立即出现了新的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我们在血防战线上早日消灭“瘟神”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血防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历来十分激烈，十分尖锐。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血防工作曾经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刘少奇一伙曾经诬蔑血防工作搞群众运动是什么“大呼隆”、“劳民伤财”；刘少奇在血防战线上的代理人、大叛徒魏文伯还鼓吹“有土必有螺”、“血吸虫病消灭不了”等反动谬论，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是一伙政治上的“瘟神”。如果我们不把政治上的“瘟神”打倒，就不能取得对自然界“瘟神”斗争的胜利。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防战线形势大好，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我们既有了正确的领导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有了防治方法上的具体经验，可以预期，今后的血防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进展。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斗、批、改的组成部分，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放到议事日程上，不应该算做是斗、批、改以外的事情。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保护劳动人民的战斗力，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南方农村，危害人民最大的疾病是血吸虫病，这个事你不管，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落空。所以，把血防工作和斗、批、改对立起来，不认真抓好这件事，是没有理由的，是站不住脚的。

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各级党委、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有负责同志挂帅，进一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血防工作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观点、备战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现在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单位抓得紧，有些单位抓得不那么紧，甚至有的单位还不够重视。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各级领导。领导抓紧了，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要反对多头领导，相互推诿，结果大家都不抓。要统一各方面的力量，

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血防工作不只是卫生部门的工作，而且牵涉到农业、工业、水利、宣传、商业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同血吸虫病的斗争，全部经验集中起来，就是深入持久地反复地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要彻底批判"专家第一"、"技术第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克服单纯依靠业务部门的错误思想。要坚持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群众运动和专业防治队伍相结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广大农村已经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中医草药也有了更大的推广，"赤脚医生"在成长，知识青年大批下乡，这些都是重要的新生力量，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一定能够早日消灭血吸虫病。

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在较短时期内消灭血吸虫病而奋斗！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70.3.10《人民日报》

"工农兵大学生"

背景介绍

"工农兵大学生"是"文革"中的一种特殊产物，这种大学生招生的办法不是通过高考，而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来源是不受年龄与文化程度的限制的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以及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等。

材料：

-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节录)

材料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节录)

(1970年6月27日)

《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意见如下：

一、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二、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三、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四、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五、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六、学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十九元五角)，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十九元五角。解放军学生由部队负责供给。

七、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十月十五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一九七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述《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省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

风云人物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生于甘肃玉门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在玉门油矿当徒工，解放后任钻井队队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春，为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党派他率领1205钻井队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在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他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作出了贡献，被人们誉为"铁人"。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5月担任大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

聂元梓

聂元梓(1921—　　) 河南滑县人。女。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工作。1964年调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后，任首都大中专红代会核心小组组长、新北京大学公社委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珍闻轶事

"一打三反"

指1970年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活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见另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遭杀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工农兵学员

按所谓教育改革新办法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地仿行，各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废除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人、农民(实际是下乡知识青年)和解放军战士。为与过去的大学生相区别，称为"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据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例如，有的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½+1/2=2/4的笑话。广大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严重降低了教学水平。

也有少数工农兵学员，经过文化补习和刻苦自学，掌握了较高的专业知识，并在当前的四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设国家主席之争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毛泽东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3月9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林彪当时住在苏州。他知道了毛泽东的意见，又喜又忧。喜的是：毛泽东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当然就是轮到他这个党章已明文规定的"接班人"了。忧的是，毛泽东同时又提出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如果真的不设，那无异是说，谁也别想当这个主席。

向来是"毛泽东表态我表态"的林彪，这时也顾不得自己创造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了。

3月9日，也就是毛泽东提出意见的第二天，他急忙指使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打电话："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接着，林彪又两次给毛泽东打电话，提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让秘书给林彪回了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其他什么也没有说。

林彪明白，这是不作回答的回答，等于是说："对你的建议，我还是原来的意见。"

林彪不死心，4月11日夜11点30分，他把秘书叫进来，口述了他的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口述完自己的建议，让秘书复诵了一遍，便叫秘书立即用电话报告中央政治局。

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的意见。毛泽东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用三国时的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据《"联合舰队"的覆灭》）

庐山的政治较量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秉承林彪的旨意，在会上极力鼓吹"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

陈伯达还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陈伯达戴上刚取下的眼镜，看着手稿："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的发言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指出："关于'天才'的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又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说："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后不久，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政治审查。

（据朱仲丽《女皇梦》）

孤独的晚年

1970年夏天，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内，位于北海与南海之间一处名叫"游泳池"的地方。

这处建筑，是建国以后为中央领导同志游泳而修建的，包括室内和室外两个游泳池。毛泽东就住在室内游泳池旁，一间供临时休息的、不太大的房间里。此处还有一个大厅，这间大厅，就是人们在电影、电视里熟知的那间会客室兼书房。

当时毛泽东已是77岁的高龄。经过四年的"文化大革命"，他显得苍老了，头发已经花白，往日"满面红光"的风采已由苍白的面色所代替。但他头脑仍是那么清晰，反

应仍是那么机敏，仍是那么健谈。

此时，他仍担任着党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除非有重要的外宾需要会见，他才去人民大会堂或者去钓鱼台，平时，他就在"游泳池"住地办公。那时，他整日整夜与文件和书籍打交道，而与旁人，特别是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交道很少。平时，给他打电话的人也不多。所来的电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家人以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打来的，可以说，找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不多。

他与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的联系，主要是同周恩来的面谈，或通过电话与信件方式进行的。此外，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外宾，也是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面见毛泽东的主要机会。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虽然被一些人的宣传神化了，实际上他每到入冬或开春的时候，总要生病，而且得的是比较严重的、老年人易生的病。但他的身体情况是极其保密的。特别是在他患重病期间，为了大局，为了安抚民心，还要给予人民一副"健康"、"愉快"和"轻松"的形象。毛泽东的病，只有很小范围内的人知道，病到什么程度，则知道的人更少。

1971 年初，毛泽东患了大叶性肺炎。

开始时，他只是因为患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这时，对于病人来说，最需要的是卧床休息和积极治疗。恰恰这两点毛泽东很难做到。他离不开吸烟，又不大信医，以致他的病情愈来愈重。

毛泽东有些时候确实是坚持己见并很固执的人，在看病、治病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大相信药物的作用。对于医生，他则说：医生的话，只能相信三分。他相信自身的抵抗力，认为得了病，总是可以抗过去的。这在他体质好、年龄相对来说不算太大的时候，也许能做到。但当时的毛泽东已早过古稀之年，各方面的功能都已减弱，仍靠自身的抵抗力去"抗"显然已经不行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病拖的时间长了些，毛泽东自己也因此受尽了痛苦与折磨。

由于咳嗽，不停地阵咳，使得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极了，才能睡一会，在沙发上打个盹。这时候，张玉凤以及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从事保健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不分昼夜地照顾和护理他。为了让他早日康复，吴旭君想了很多办法。

这件事后，徐涛考虑与江青结怨已深，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回医院工作。

毛泽东不愿他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徐涛。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块！"

那时，要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毛泽东精力牵扯很大。毛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与江青分居了。

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个好医生只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始终相信徐涛，关心徐涛。徐涛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两个贺喜，并送一套新出的他的选集。徐涛有了女儿，毛泽东又祝贺说："我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孩子会走了，他让送到他那里去玩。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毛泽东向老太太表示谢意：小徐和小吴在我身边工作，你老人家也是作出了很大贡献。徐涛离开中南海后，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者聊天。徐涛的爱人吴旭君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20 多年。

（据《天涯》增刊）

神通广大的子爵号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实际上由大小两套人马组成，有人把它们称之为大联合舰队和小联合舰队。小联合舰队由江腾蛟（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等人为骨干组成，以自称为康曼德的林立果为头子。大联合舰队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林彪通过叶群来指挥和控制这支大舰队。年少猖狂的林立果给舰队中的头面人物分别起了一些不伦不类的代号。也许是他对飞机特别偏爱，代号的名称都是从飞机型号中借用来的。例如吴法宪因为体胖肚圆，两头小中间粗的安 2 型飞机就成了吴法宪的代号。黄永胜被称作协和号。而叶群，则被他起名为子爵号。

林彪拼凑起这套班底，应该说是不容易的，是他多年来拉帮结派、苦心经营的结果。而子爵号叶群，则在其中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她不仅亲手把黄、吴、李、邱等几个主要成员拉上林彪的贼船，而且把他们驯服得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对此，除了这一伙人本身品质卑劣以外，不能不"归功于"叶群的权术和手腕。

叶群早就看准了草包司令吴法宪是一个有奶便是娘的人物，便有心拉拢他。"文革"前叶群让吴法宪同她一起到江苏太仓县农村搞四清蹲点。1965 年底，林彪发动了对罗瑞卿的突然袭击。为了拢住吴法宪，叶群首先出面对吴法宪施展又打又拉战术。

1965 年 12 月的一天，在罗瑞卿问题上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的吴法宪，接到了叶群打来的电话："林总讲，你同罗长子关系也很好。……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

应该考虑考虑。"

吴法宪一听慌了神，软骨头的本性使他立即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

叶群听罢心中暗喜，马上换出一副亲切的口气说："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顺便告诉你，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到五级。为了要调升你的级别，林总把另外一个同志的级别也调升了，这是为了使你不突出。"子爵号略施小技，草包司令就上钩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法宪被群众冲得不亦乐乎。1967 年 1 月，正当他难受之际，叶群一个电话把他救了出来。她在电话中对吴法宪透信儿说："林总要请江青讲话保你，要打倒刘震、成钧、何定一，你快点写材料。"果然，江青在同林彪进行幕后交易之后，于 1 月 13 日亲自在空军发表讲话保吴法宪，而把刘震等三名空军领导干部点名打倒。

于是，吴法宪死心塌地当了林彪的走狗。吴法宪对此供认不讳。林彪摔死后，他在供词中说："我的一切提拔都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

叶群拉拢邱会作的过程是富于戏剧性的。1965 年 10 月，邱会作利用职权奸污女服务员之事被人告发，丑闻败露，在总后勤部机关引起强烈反响，部长的位置即将不保。邱会作跑到林彪、叶群身边痛哭流涕。叶群敏锐地感到拉拢这个总后勤部部长的时机到了。经过一番谋划，几天后她把邱会作和他的老婆胡敏找来，安抚说："我同林总商量了，他说：你小节上有错误，这是因小失大的事。但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突出政治的，改变了总后勤部过去历来见物不见人的最大毛病。他们要开你的会，让他们去开，你自己去对付他们的会，但方针由我们来掌握。"过了几天，林彪在一个场合讲了一番表扬总后工作的话，邱会作被暂时保住了。

但是，由于邱会作多年来在总后作恶多端，群众早就对他憋了一肚子气，因而"文革"开始后邱会作再度成为冲击的对象。1967 年 1 月 24 日，总后机关的干部群众对邱会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挂黑牌、"喷气式"都用上了。邱会作顶不住了，便又故技重演，向叶群写信哭诉："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林彪、叶群一看火候已到，马上出来做手脚。1 月 25 日凌晨，叶群特意穿上笔挺的军装，驱车到总后机关，向余怒未息的机关干部出示了由林彪、陈伯达签署的手令："立即将邱会作放出来，不得自由拘留。"群众一看，只得将邱会作交给了叶群。

叶群将狼狈不堪的邱会作拉上汽车，直送西山保护起来。临别，叶群还抚慰说："林副主席是相信你、依靠你的。"

此刻的邱会作，对叶群感激涕零，恨不得喊干妈才好，立即写下一份题为《零点得救》的效忠短文：

零点得救

1967 年 1 月 25 日 0 点 40 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的妻儿子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象炸弹一样爆发出来。当时我的心脏阵阵发痛，我服了一片药之后，我也不管它了。但是我用最大的忍耐忍住了没有掉泪，因为我发誓了。

最后她（指叶群）又说："林总命令我 6 小时以内办妥这件事，否则林总就要亲自到你们机关找你去了。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那时我不回去，他真要出来了可了不得。

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去接一个人，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使人流下温暖的热泪。

邱会作

1 月 25 日

就这样邱会作成了林彪、叶群的死党。后来每逢 1 月 24 日，邱会作和他老婆都要向叶群写信效忠。

瞎了一只眼的独眼龙李作鹏，也在这一期间经过类似的情节，踏上了林家的贼船。

叶群与黄永胜的勾结似乎开始得要晚一些，但却后来居上，更胜一筹。他俩的关系不同寻常，除政治上互相利用以外，还有一层见不得人的暧昧关系。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1968 年 3 月的所谓"杨余傅事件"，实际上是林彪在军内为排斥异己搞的又一次突然袭击。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突然打倒。就在这时，黄永胜由林彪提名调到北京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到北京后，黄永胜与林彪、叶群一拍即合，立刻成为林彪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在黄永胜和叶群之间，却发生了连林彪也始终蒙在鼓里的苟且之事。黄永胜这个口口声声表示要"忠于林副统帅"的人，却不声不响地给他的"副统帅"扣上了一顶绿帽子。

黄、叶之间的关系是何时开始的？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无从查考，我们只能摆出一些事实，供读者分析。

在毛家湾的林家大院里，除了林立果、林立衡各住一个套间以外，其余的大片房子，大体上是西半部分为林彪占住，东半部分为叶群占住。他们长期分居，各有自己一整套生活起居设施，互不干扰。叶群曾经在私下场合几次

流露，她和林彪是“政治上的结合”，还说：“我象古代的宫女，别人看我过的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其实是无限凄情，一腔幽怨。”

黄永胜调来北京后，使叶群感到有了一个摆脱自己“宫女”生活的机遇。黄永胜对此也是熟门熟路。于是，两人很快勾搭上了。他们频繁来往，经常用代号互相联系，背着人三天两头甚至一天几次地长时间通电话。他们的这种诡秘行动连林立果也感到十分狐疑。有一次，林立果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用窃听器偷录了叶群和黄永胜的通话。林立果偷录的这次电话录音，使我们终于揭破了黄、叶之间的神秘面纱，戳穿了这一对男女的龌龊勾当。

这是一次长达100多分钟的通话，时间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1970年秋。这里摘录的是一些主要片断：

叶：在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找男朋友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到对你这样的程度。我心中有一股对你爱慕的热流，觉得青春没有再来的时候，但感情的花怒放了。第一次对你的爱慕是珍宝岛的讲话，我觉得，哎呀，我太晚了，认识得太晚了，时间流逝得太多了。对你，在广东是有机会认识的，为什么失之交臂呀！

黄：嗯，是呀。

叶：到面前的人就错过了，一过就是一二十年。当时就觉得，我多不幸啊！第一次惋惜自己，也惋惜对方。我回来大哭一场。我觉得我为这么一个好的人，赴汤蹈火都不在乎。你知道我讲这些的目的性吗？

黄：我知道。

叶：再就是怕你要追求生理上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同你联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黄：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你放心。

叶：你知道一点我的疾苦，如果我病了，你问我一声。在你那里是一声，在我这里就是千斤万斤的黄金，比金刚钻还宝贵呀！

黄：你不用这样讲了。

……

叶：你这一段好点没有？一看你走路那样，我简直替你着急。你要休息好。你的几句话，就能使我多睡几个钟点。

黄：那好，我以后一定抽空多看看你，多安慰你，请你放心。

叶：我告诉你，那个没有来。我还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九不是那个事。因为没有反应，另外，我一直在这方面不增加你的负担。你看我很少讲。

黄：哎，对！

叶：在北戴河都不讲，而且我们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说着哭了起来）

黄：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

叶：（不断抽泣）我相信你是等我的。不过，你放心，我没有反应。

黄：你不要难受好不好？你要难受，我也活不了啦！

叶：我现在也逐渐体会到你需要我，因为失掉了我，你会很悲痛的。

黄：对。这个环境啊，不大方便。

叶：你知道，你的手绢到现在还在我的乳罩里，一天到晚捧着你。你知道不容易呀！

黄：好，好。

叶：再就是你不要因为我受拘束，你对周围的人，可以开开玩笑。我不能老陪着你，我这里也忙。我心胸不狭窄，你跟别的女人，可以跟她们热一点，不要顾虑我，我甚至把她们当作小妹妹一样。

黄：第三者，我不赞成。

叶：你喜欢别人，也可以，但有一条，她嘴巴要特别稳。如果她一旦讲出去的话，牵着一块把我牵上，那你就太对不住我了。那就会发生惨变，那我的家庭也会发生惨变。

黄：我决不追求第三者。

叶：我觉得不管张啦，王啦，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决不拘束你。我有荣誉感，怕将来日子长了，你觉得拘束，怕我心胸狭窄。

黄：我不愿意听这个话。

叶：为什么你那么僵哪，人家过去说你那么乱，我都不信。我要不要找那个女孩谈谈，暗示她配合你一点。

黄：不要谈，不要谈。

叶：可有时候我不在，她可以替我，精神上你在我这边。

黄：你不在，就跟我打一个电话，我就感到很安慰。

叶：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这个环境，能打破这个堡垒不容易的，你知道这个轻重吗？另外，我听了关于你那么多坏话，我们发生6月21号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黄：那我知道。

……

“九·一三”事件以后，人们在清点叶群的物品时，在她的卡片盒里又发现了黄永胜写的一首诗：“缠绵几个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看到这些材料，我们对叶群和黄永胜的特殊关系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确实“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子爵号春风得意，大显身手，在叶群的牵线搭桥和多方笼络之下，使林彪逐渐培植起一伙死党。他们抱成一团，互相吹捧，狼狈为奸。九大以后，黄、吴、叶、李、邱都成了政治局委员，窃取了党内军内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叶群还对这“四大金刚”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力交给别人。”

1970 年 5 月 14 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同游览长城、十三陵，又是题词赠诗，又是拍照留念，打得火热。叶群在赋诗中出了一句自认为的“警句”：“相将奋起卫红旗”，并解释说：“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相和将要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此时，这一伙人可谓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他们似乎感到，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

（选自《在历史的档案里》）

戈壁滩上开展了土方草药运动

我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在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深入发动群众，在戈壁滩上积极开展土方草药运动。我们和“赤脚医生”、卫生员一起，登门访问、拜贫下中农为师，调查当地土方草药，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就收集到草药一百二十六种，土方二百零一个。

为了使这一运动进一步发展，公社革委会在干部开会的时候，举办了土方草药展览会，受到了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和欢迎。很多群众说：“原来这些都是药，我们还把它当野草”；“我们那里也有这种草，要挖多少有多少。”会后，群众性的采药、献方运动在全公社范围内广泛兴起。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几岁的红小兵都积极行动起来了。一位老贫农队长沈正福，一次就献方四十多个、草药五十余种。西沟二队下中农张金英老奶奶亲自把草药送到合作医疗站，第二天，又让她孙子背来了半麻袋草药。有的生产队还组织专人上山采药。

为了充分发挥土方草药的作用，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自制了防治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二十多种制剂。西沟大队“赤脚医生”刘吉珍，只用一口锅，就试制成功了防治感冒、支气管炎、胃肠病的十余种丸、散、汤剂。还把自制的“艾醋汤”挑到田间、炕头，替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这些自制的各种中草药制剂，药源广、成本低、保存易、疗效好、服用方便，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贫农社员十分激动地说：“土方草药是个宝，防治疾病疗效高，合作医疗就是好，全靠毛主席的好领导。”

目前，玉门地区一个以土方草药为主的群众运动，正在戈壁滩上广泛深入地展开。

（甘肃玉门市黄闸湾公社
卫生所革命领导小组）

户户建立草药篮

东沅公社合港大队，于去年一月份办起了合作医疗制度后，掀起了一个人人动手挖草药，户户建立草药篮的群众活动。全大队建立了草药篮三百七十余个，占全大队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平均每个草药篮里有中草药二十余种。

草药篮的建立，等于每家每户办起了“小药房”。贫下中农有个头痛脑热，疮疮疖疖的小伤小病，就用草药篮里的草药自己治疗。既节省了上医院看病的时间，又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大大节约了合作医疗的经费开支。白沙坪生产队社员舒宽林的草药篮有几十种中草药，还利用屋前屋后栽种了一些中草药。他家大小五口，参加合作医疗以来，只有一次他的大女儿患病，花了合作医疗费三角钱，其余的人生了病都是自己用草药篮里的药治好的。有一次，他的小孩发热、咳嗽、鼻塞，他给熬了紫苏等几味药，吃了就好了。

贫下中农家里的草药篮，不但自己治病用，而且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你家缺什么药，我有就支援你，这种病我不会治，别人就帮我治。白沙坪生产队贫农社员胡久才患沙塞病，小便困难，十分胀痛，社员舒宽林闻讯上门，撮了些金钱草、车前子等草药，煎服二剂就给他治好了。

（江西省靖安县东沅公社
合港大队革委会）

雨　衣

工地上，马达隆隆，歌声嘹亮，工程兵五连的同志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战备施工。突然，狂风裹着暴雨劈头盖脸地打来。连长高声喊着：“同志们，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我们要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是！”战士们激昂地回答。雨越下越大，新战士谢金城刚准备穿雨衣，忽然看见连长淋着雨推着板车飞奔而来。谢金城想起连长前几天还发过高烧，下这么大雨，他没有雨衣怎么行呢？他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心想：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连长风里来雨里去地带领我们进行战备施工，如果他被雨淋病倒了，就要给革命工作造成损失。发扬团结友爱精神，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光大。谢金城趁连长推着车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迅速地将雨衣披在连长的身上。连长回过头来，看着谢金城和冒雨工作的同志们，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这不是一件普通的雨衣，它体现了我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而建立起来的崭新的官兵关系。雨衣虽小情意深啊！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一转身，把雨衣披

到了飞快奔跑的二排长身上。二排长马上又把雨衣给了战士。一件雨衣在工地上传来传去，谁也不肯披。虽然天气较冷，但工地上热气腾腾，干部战士心里都热呼呼的。

（云　鹰）

雪山顶上寻亲人

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清晨，雪更大了。住在新疆下马咋山的一位年近七十岁的哈萨克族老人托克逊土尔地，不时开门远眺。他焦急地盼望着亲人解放军的归来。

昨天晚上，驻在离托克逊土尔地家不远处的解放军某部七连的一辆汽车，路过老人家门前，上山了。汽车刚走，天气突变，夜里下起了大雪，急得老人坐卧不安，他想："雪这么大，解放军如果迷了路，困在雪山顶上怎么行？"等了又等，仍然看不到汽车的踪影，听不见发动机的响声。天亮后，他就背起烤饼冒雪上山了。

山上风大雪急路滑，一不小心摔下悬崖峭壁，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老人不顾这些，高一脚、低一脚，十分吃力地向山上爬去。大雪盖住了山路，忽然老人眼前一黑，掉进了雪窝里。当他醒过来时，衣服已同冰雪冻结在一起。他用力撕拉开，才一步步爬出雪窝。他想，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没有解放军同志来到草原，这里永远也升不起红太阳。于是，他鼓起更大力量在雪地上走着。到了下午，老人忽然发现一块大石头的背风处有汽车走过的痕迹。再攀上了山头，看到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困在汽车下。

"解放军同志！"战士们听到老人的喊声，立即跑到他跟前。"老阿塔（老大爷）！是您……"同志们激动得把老人高高地举了起来。老人快活地看看这个，摸摸那个，笑着说："我可找到你们了！你们没冻坏，我就放心啦！"

（《人民日报》通讯员）

天山上的医疗队

在天山深处的红太阳牧区，活跃着一支全心全意为各族贫苦牧民防病治病的新疆军区某部医疗小分队。

二月，大雪覆盖着山野。这天，小分队王泽民和徐国昌又冒着风雪出发了。在到红太阳公社六队的路上，要翻过两座海拔四千米的青石山。过膝的积雪，刺骨的寒风，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稍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正走着，猛然一声巨响，头顶上崩下的雪块，砸到他俩身上，王泽民滑到了雪窝里。他爬出雪窝，和徐国昌一起，啃了几口干粮，吃了几口雪，又勇敢地前进了。

天黑后，他俩来到哈萨克族贫苦牧民莫尔达希老大爷的家里。不久前，他们曾为老大爷治过病，现在又专程探望他的病情。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老大爷一家人。

（《人民日报》通讯员）

井台上的一盏马灯

一天早上，解放军某部七十一分队炊事班长杨明轩和新战士小张出去担水。他俩冒着拂晓前的寒风，摸黑来到了井边，看到井台上点着一盏马灯。借着灯光，他俩迅速地打好了水。往回担时，小张说："这是谁来担水，把灯忘记带走，等天亮我一定把它送还主人。"

天亮了，小张高高兴兴地去取灯，到井边一看，灯不见了。

晚饭后，，小张再去担水，井台上还是挂着那盏马灯。小张把水挑回家，就和班长来到井边，提起灯到周围贫下中农家打听是谁挂的。可是跑遍了整个村子，也没问出个下落。第二天，才从一个小孩那里了解到这是韩大爷挂的灯。说起韩大爷，炊事班的同志们便想起他几次到连队问寒问暖，征求意见，帮助解决困难的事。

韩大爷名叫韩庆祝，他是赵固公社韩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他不仅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带头人，也是拥军优属的好榜样。他看到七十一分队的解放军战士为落实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整天在风沙里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经常晚上来担水，就想，井台上结着很厚的冰，天黑冰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到井里去。解放军摔坏了身体，这就是我们的拥军工作没做好，对毛主席不忠呀！想到这里，他不声不响地把家中的马灯，拿来挂在井台上。从此，一到夜里，韩营一队的水井上就点着一盏马灯。

灯的秘密解开了。炊事班长杨明轩和小张来到韩大爷家，感谢韩大爷对解放军无微不至的关怀，劝韩大爷不要再在井台上点灯，并要给韩大爷灯油钱。韩大爷不仅不收油钱，还含着泪花对班长说："旧社会我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地。有了毛主席，有了解放军，我们才当家作了主人。翻身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解放军，这点小事是我应当做的。"

（据新华社）

再教育日记选

1970·4·18

下雨，未出工。

昨晚发生了两件事：

1、大队长郑重通知：美国发射了一个宇宙火箭到西昌，估计今晚或明天就会到达。然后一再叮咛：听到声音或响动，你们要赶快起来啊！社员徐某等六人被派在晒场上等火箭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气氛严肃紧张。据说，一队通知的是：美国今晚要派火箭来空投特务，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

2、昨天上午知青汤某等到一队帮忙打架，晚上十时许，公社"群众专政大军"十几人奉公社革委之令到我队来捉拿他们。宣读"圣旨"毕，喝一声"绑起来！"就把他们双手倒剪，高高捆起，押到公社。当晚就开了斗争会，公社领导的拳足立刻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再教育，然后把他们关在"公社监狱"(仓库下面)蹲了一夜。今天生产队已通知在大队开他们的斗争会。

1970·4·25

出工：薅包谷。

几个社员又摆起了"食堂化"，说当时半个月就有参观团来一次，于是规定每人每天扣五钱米，等到来参观时就酣吃一顿。余某说："只有这顿才吃得饱啊！"王某："嘿，你敢这样说！那会儿说食堂不好，就是攻击社会主义，要扣你的饭，还要半夜三更弄来斗，弄来打，打死了没声没气就完了。死个人连死个鸡都不如，死个鸡还可以管几个钱，死个人死了就算了。"他们还介绍了当时发明的"火米饭"：把谷子蒸熟，晒干，碾出来后再蒸成饭，三两米可蒸一大碗。罗某说：看起来一大碗，拿筷子一戳，就是一个大窝窝！

新华社发表新闻公报：我国于昨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发表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70·5·21

出工：浇苕、浇烟。

晚上开社员会，公社书记宣讲大好形势。最后他说："有人说，煤油一家人一个月分配4两不够，告诉你们，不是没有煤油，是战备存留了；如果发多了，还不是浪费点完。又说买不到线，嘿嘿，衣服穿得还是不算好烂嘛！"

1970·7·4

出工：全社知青到公社学习(1970)2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国家计委关于知识青年工作的报告)，同时还学习了3、5、6号文件和省革筹有关文件。某部长说："有人以为要把过去扣掉知青的口粮归还。我们认为，现在开始执行(70)26号文件，就不再扣了，但以前扣的也不能补。"又说："有人担心26号文件得不到贯彻，这只消问问你自己贯彻没有。你自己贯彻了，贫下中农也就贯彻了，基层干部也就贯彻了。你自己不贯彻，就不要怪别人不贯彻。"呜呼！

1970·10·28

出工：挑草。

听说新河逮捕了三个知哥，因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在成都散发了二百多份。据说为此事全西昌的知青都被清查过：谁有《列宁全集》，三、四月间谁回过成都。

1971·1·13

出工：舂墙。

晚上夏某帮我挑谷子回来，闲谈时摆到了他的情况：食堂化时他家有六人，父母得水肿病进了"水肿院"，吃不饱，就猛喝盐开水，结果头肿得同身子一样粗，眼睛鼻子都看不见了，虽然天天打针吃药，终于不治而死。几个月内，哥哥、姐姐和妹妹相继过世，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有一次，他又气又饿，病倒在床，三天没吃一点东西。第四天早上，他嫂嫂给他拿来一点米，正在煮稀饭，队长李某进来，说：你还在这里？快出工去！他说：我人不好，几天没吃东西，做不动。李说：能吃稀饭的就要做活路！说着抓起他的双脚就往外拖。夏说："食堂化的事提不得。食堂下放时斗争李某，大家围上去打啊打啊，打得他喊妈都喊不出来。我挤进去，耳朵上使劲咬他一口，咬穿了，现在还有四个牙齿印！"

1971·2·10

出工：拉电线。

昨天晚上发下一张招工表给我填，今天交上去了。大队长代表贫下中农签的鉴定是：此人表现一贯很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认真，从未参加过武斗。

1971·2·22

出工：挑水捂谷种。

这几天大家在一起，话题总是招工。张×说，床单厂招工的人告诉他，招工时，把表一一排开，首先把出身不好的剔掉，只要出身好的；然后再把其中家庭稍有一点问题的都刮掉，根本不管贫下中农签的意见和本人表现。易×说："我是在给我老把子赎罪。说是重在表现，我想不通。这样下去会不会过左？如果过几年没有改变，我真要自杀了！"看来，不仅"重在表现"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在根据事实考验着"重在表现"。

1971·2·23

出工：开沟、上山打火。

我的表已被打回公社来了，是因为我表中填了"大舅在台湾。"

同时打回来的还有肖×。他父亲是工人，表中填到：父亲解放前曾被迫参加袍哥。遂曰：还说"被迫"，可见本人对此事缺乏认识。

何×今天回来说，某地招工人员看上当地一个女知青，便对她明说：你只要同我结婚，我一定招你。伊欣然应允，对方也一诺千金，婚成后即将她招入该厂。

1971·3·13

出工：平渔塘。

接妈2日信，知我招工未成，催我回去。

别家千里，尺素传情，披览未毕，泪湿沾襟。正懊恼情怀，偏天涯思亲！书此以记：

一封家书来故乡，难禁热泪即盈眶。
老母倚门望儿归，游子天涯忆亲娘。
横眉敢向千夫冷，多情不堪字数行。
声声呼唤紧催迫，铮铮硬骨化柔肠。
奈何支离心绪短，几发归思又徬徨。
慈颜几番梦中见，欲宽亲怀语无良。
世间多有不平事，铸成千家辛酸长。
众愤何当平坎坷，春风万里喜洋洋？

（选自《知青档案》，作者：支戈）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70年，一些经过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的革命历史歌曲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教育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但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左”的烙印。这一年，《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二部京剧样板戏在全国各地上演。

歌曲《工农一家人》

1＝D2/4
聂　耳　曲
刚健有力
集体重新填词
工农弟兄们哪，我们是一家人哪，
本是一条根哪，都是受苦人，
工农本是一条根哪，工农本是一条根。
我们盖的房，我们种的粮，
地主买办黑心肠，都把我们剥削光。
仇恨满胸膛啊，怒火高万丈啊，
砸碎旧世界呀，才能得解放啊，
彻底砸碎旧世界，我们才能得解放。
大家一条心哪，跟着共产党啊，
拿起刀和枪啊，杀尽狗豺狼。
工农要翻身把家当啊，工农要翻身把家当。
4/4
工农团结紧哪，万众一条心哪，
砸碎铁锁链哪，翻身得解放啊，
2/4
砸碎了锁链得解放啊！砸碎了锁链得解放啊！
（稍慢）
得解放啊！得解放啊！

歌曲《毕业歌》

1＝C2/4
聂　耳　曲
朝气蓬勃地
集体重新填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
抗战的前方！听吧！
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
战斗的红旗在飘扬。
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
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
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
埋葬。我们要和工农
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
民族解放胜利的曙
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
响。同学们！同学们！快行动
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前方！

歌曲《抗日战歌》

1＝C2/4
冼　星　海　曲
雄壮有力
集体重新填词
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
全国同胞们，奋勇向前进！
我们是抗战的队伍，我们要团结紧，
高举革命红旗，勇敢杀敌人。

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
高举革命红旗，胜利向前进！

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
紧握手中枪，歼灭侵略军！
我们是抗战的队伍，我们要团结紧，
高举革命红旗，勇敢杀敌人。
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
高举革命红旗，胜利向前进！

歌曲《战斗进行曲》

1＝G $\frac{2}{4}$
佩 之曲
自豪地
集体改词
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
背上了子弹带呀，勇敢上前方。我
挎上了手榴弹，要消灭那蒋匪帮；我
刺刀拔出了鞘呀，刀刃闪闪亮！我
一步冲上前呀，叫他把刺刀
尝！别看它武器好，正义在我
方！我撩倒一个，俘虏一个，撩倒一个，
缴获它几支美国枪！嘿！几支美国枪
(把)毛主席的话，要永远记心上；
我不忘血泪仇，我怒火满胸膛。
我奋勇又当先，我对准那蒋匪帮。
我刺刀拨出鞘呀，刀刃闪闪亮！
我一不冲上前呀，叫他把刺刀尝！别看他武器好，正义在我方！
我撩倒一个，俘虏一个，撩倒一个俘虏一个，
缴获它几支美国枪！嘿！我几支美国枪！

歌曲《大刀进行曲》

1＝C $\frac{2}{4}$
麦 新 词曲
威武地
集体改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
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
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
消灭！(喊)冲啊！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喊)杀！

京剧《沙家浜》

抗日战争时期，沙家浜集镇住着以指导员郭建光为首的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头子胡传魁、刁德一秉承日寇黑田意旨，来到沙家浜进行搜捕。郭建光率领伤员暂时隐蔽于芦荡。地下工作者、党支书阿庆嫂以开茶馆为掩护，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同敌人展开斗争。她利用胡传魁和刁德一之间的矛盾，与他们进行智斗，设法使伤病员安全转移。胡传魁和刁德一妄图通过拷问沙奶奶破坏沙家浜的党组织。阿庆嫂和沙奶奶互相掩护，从而了解了敌司令部的虚实。随后，与伤愈后的十八名战士组成的突击排一起，配合大部队的行动，再度解放沙家浜，活捉了日寇黑田和汉奸胡传魁、刁德一。

京剧《智取威虎山》

一九四六年冬，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取得辉煌胜利，为落实毛主席“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某部团参谋长率一支追剿队进入深山，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以便消灭逃进威虎山的座山雕土匪武装。参谋长派侦察排长杨子荣改扮土匪，打入威虎山。杨多次战胜凶恶、狡猾的座山雕的盘问与试探，取得了座山雕等人的信任，被封为威虎山老九。他利用“九爷”的身份，以“练兵”为名，送出情报。当追剿队得到情报整装待发时，被我方逮捕的土匪栾平在被押送途中逃到威虎山，给杨子荣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杨临危不惧，主动进攻，亲手处死栾平。并借为座山雕祝寿之机，将全部匪徒集中在威虎厅用酒灌醉，追剿队和民兵及时赶到，全歼顽匪。

历史档案

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公开论战，激烈搏斗，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蓬勃发展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新的条件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英雄的越南人民的铁拳，把美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越来越广阔地鼓舞着亚、非、拉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堤坝，一块一块地塌了下来。漫天的革命烽火已经燃烧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震撼西方的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病入膏肓。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爬上世界资本主义霸主地位的美帝国主义，没有过多久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它扩军备战，到处侵略，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把一根根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被全世界人民越勒越紧了。自称世界"最富有"的美国，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越来越贫困和饥饿。美国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反对垄断资本集团的斗争和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使美国反动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一任任的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美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曾经吹嘘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华尔街老板们，无可奈何地哀叹美国进入了"困难的年代"。美帝国主义的急剧没落，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上极其深刻的、新的总危机。

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修叛徒集团加速走向彻底破产。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赫鲁晓夫，曾几何时，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渣滓。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之流，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他们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侵略扩张，彻底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激起了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不过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既不能挽救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覆灭，也不能挽救它自己的灭亡。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垂死的新殖民主义的变种而已。

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相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巩固，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朝气蓬勃。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展开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大胜利准备了条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大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空前大普及。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深远历史影响，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成为世界革命的希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的革命力量壮大了，阶级阵线分明了。世界基本矛盾的新发展，必然要继续引起革命。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

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不管美帝、苏修怎样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管它们施展多少阴谋诡计,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它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军队,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一定不会辜负世界人民寄予我们的希望。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当前,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各条战线深入发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进一步全面落实。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新事物到处出现。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毛主席在"九大"期间一再指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地、深入细致地、积极而又慎重地做好斗、批、改的各项工作。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在整党建党中,自始至终都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认真地学习新党章,对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认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的教育,进行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教育,批判各种右的或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要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和新党章的各项规定对照自己,彻底改造世界观。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指示,使运动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深入地、持久地向前发展。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落实到每一个省、每一个县、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一项事业。要注意调查研究经济工作中各项政策性的问题。订计划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毛主席最近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毛主席这个伟大指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远见,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全世界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全中国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领导机关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精兵简政,以适应战备的需要。要巩固和完善各级革命委员会,继续加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要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继续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要更进一步提高,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四好,加强战斗力,随时准备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立新功。

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敢于侵犯我国,我们就坚决把他们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同日还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

3月17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会议之前，3月8日，毛泽东曾就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提出意见，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到会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因此，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4月11日，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且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作报告。4月12日，毛泽东对林彪的建议作了批示，指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时，林彪一伙还不死心，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就一语道破了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野心。

5月20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他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21日和22日，首都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所在地分别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五二〇声明"。

8月23日～9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全会的前一天，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要求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一个分裂的会，失败的会。23日，全会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有三项：1.讨论修改宪法；2.审定国民经济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在全会开幕会会议上，林彪在事前没有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按照事先的预谋，突然发表了蛊惑人心的长篇讲话，推翻政治局的决定，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同时，以颂扬毛泽东个人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声称他要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在林彪讲话之后，其集团成员便纷纷活动起来，妄图将会议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家经济计划问题，吴法宪却提出要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蓄意改变全会的议程。同时，陈伯达等人连夜加紧炮制"称天才"的材料，并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宪法条文。叶群还特别嘱咐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含着眼泪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8月24日，陈、吴、叶、李、邱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编选经过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按照林彪的调子，也大讲"天才"问题，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等等。随后，陈伯达又抢先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制造了一场混乱。党中央、毛泽东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的谬论，并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李、邱谈话，并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检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严厉指出，陈伯达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全会在挫败了林彪集团的突然袭击之后，仍就原定的会议议程进行工作。经过讨论，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9月6日，全会闭幕。在闭幕会

上，毛泽东着重讲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并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11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读(或选读)马、恩、列的6本著作和读毛泽东的5本著作。翌年3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的批示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的需要，我国重新出版马恩列重要著作。第一批已经出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和列宁著《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2月6日　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除马列之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而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以知道了。"

12月22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系统地揭露和深入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撤去郑维山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由谢富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吴德兼任政治委员。从1971年1月下旬开始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

为引导批陈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2月19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毛泽东指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部队传达到团(县武装部)党委常委，相当于团级的军管会正副主任；地方传达到县和相当于县级的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经过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揭发批判，以及深入学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戳穿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使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林彪及其同伙并不想真正悔过，而是继续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经　济

2月15日～3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订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当时，由于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于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要"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建立10个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纲要》要求：各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大多数下放地方管理，少数实行双重领导；试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试行物资分配大包干；实行财政收支大包干；计划制度实行由下而上，"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会议规定，1970年的工业总产值要比1969年增长17%；197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要比1969年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指标，规定1975年粮食要达到6,000亿斤到6,500亿斤；钢要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煤要达到4亿吨到4.3亿吨。从而造成了新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并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全长1,085公里。它北接宝成铁路，形成了纵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祖国各地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距离也由于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而大大缩短了。对于在这个地区修建铁路，外国的筑路专家曾断言根本不可能，但是广大筑路军和工程技术人员，响应毛泽东主席"成昆线要快修"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和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艰苦奋战，凿穿了几百座大山，修通了427座隧道，架设了653座桥梁，比原计划提前修成了成昆铁路。

9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社论说"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社论强调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去搞经济建设的"左"倾错误观点，说要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就"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12月25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军　事

2月10日　我海军防空部队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下午，美帝国主义军用无人高空侦察机一架，侵入我国广东省海南岛地区上空进行侦察挑衅活动，当即被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某部击落。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64年以来击落的第20架美帝国主义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令嘉奖击落美机的人民解放军海军防空部队某部。

3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指挥员徐海东由于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在河南开封逝世，终年70岁。徐海东是湖北大悟人，生于1900年。他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湖北黄陂组织游击队，参加黄麻工农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他在党的八大、九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8月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在北京成立。9月15日正式开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被撤销。

11月24日　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军普遍进行了长途野营拉练。毛泽东在批示中还指出："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从此以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批示执行，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外　交

3月19日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国内发生政变后，由莫斯科到达北京。

3月21日～28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率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访问中国。22日下午，李先念副总理同阿拉法特主席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

3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3月21日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派加紧扩大侵略老挝战争的严正声明。

3月29日　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因患动脉硬化性心脏病，久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斯特朗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她曾6次访问中国。1927年，她深入湖南农村，称赞湖南农民斗争是"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崭新力量的威力"。1946年，她第5次来中国，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她称颂毛泽东接见她时发表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1958年，年已72岁高龄的斯特朗，克服重重阻难，毅然第6次来到中国。以高昂的热情和犀利的笔锋向世界读者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4月5日～7日　周恩来总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的邀请，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周恩来总理同金日成首相在亲切、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于4月7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4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坚决支持4月22日至25日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团，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率领的老挝人民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人民代表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代表团，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某地举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

5月4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侵柬和扩大印支战争。4月30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大举入侵柬埔寨，向柬埔寨人民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同时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平、义安两省地区恢复飞机轰炸。这是进一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声明对西哈努克亲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的声明，表示坚决的支持。

5月5日　周恩来总理写信给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5月10日～13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访问我国。

6月10日　应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的邀请，罗共中央执委会委员、常设主席团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今天上午乘专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访问。

6月15日～20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艾南希·古莱德率领索马里政府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艾南希副主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

7月14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法国图片社记者弗朗索瓦·德勃雷和米歇尔·巴尔保，就中法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向他们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中法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却都热爱独立，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害怕大国的迷信必须打破。

7月15日～22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刚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弗雷德·拉乌尔和由他率领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周恩来总理等同拉乌尔副主席在亲切友好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8月2日～13日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率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3日和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鲁巴伊主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在双方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8月7日，两国政府在京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8月6日～13日　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率领苏丹友好代表团，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7日和1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尼迈里主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8月12日，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京签字。

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坚决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联合声明。1970年10月9日，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卖国集团宣布成立所谓的高棉"共和国"。10月10日发表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联合声明》，揭露了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共和国"的非法和欺骗性及其反人民、反民主、反民族的实质；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承认朗诺的"共和国"。

10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发表关于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5日　中国和赤道几内亚在圣伊萨贝尔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2月18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斯诺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1928年开始，他多次来中国。曾访问了我陕北苏区和红军，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中国，著有《中国巨变》等书。毛泽东同斯诺的这次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到"个人崇拜"问题。当斯诺谈到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他的谈话中，曾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但"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二是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东西很不赞成，即讲假话和虐待俘虏。毛泽东说，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的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人家问他为什么踢人时，他又说"没人踢"。这就是讲假话。毛泽东强调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三是谈到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正在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也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他作为旅行者来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因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但毛泽东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说，尽管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最终还是可以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的。

科技文教社会生活

1月5日　凌晨1时，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7级地震。受震地区的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积极进行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并且采取了抗震救灾的有力措施，使灾区人民受到了极大地鼓舞。

4月24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运行情况良好，各种仪器工作正常，遥测仪器不断发回各种数据。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是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响应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

5月16日　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中国式大型单晶炉在北京制造成功。北京玻璃总厂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一起，在大办电子工业的热潮中，树雄心，立壮志，自力更生，自己设计和制造成功一台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中国式大型单晶炉，并且生产了制造大型可控硅元件所必需的大面积硅材料，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作出了新贡献。

5月18日　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全部竣工。豫、皖、苏三省人民，从1966年11月开始，动工兴建横贯豫、皖、苏三省淮北平原的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经过淮北45万民工几个冬春的奋战，把拓宽的沱河与开挖的新汴河相连接，构成了一条横贯豫、皖、苏三省，长250公里的大型河道。这项工程的竣工，为沱河、淮河流域的洪水开辟了一条宽畅的出路，从而减轻了淮河的排洪量，解决了历史上经常遭受水灾的豫、皖、苏三省淮北14个县(市)的1,500万亩耕地的排洪排涝问题。这项工程对根治淮患具有重大意义。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述《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高等院校在停止招生和停课4年之后，开始招生复课。在招生办法上，《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以来一直采取的行之有效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规定今后高等学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且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样，不仅使大批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被拒之高等院校的大门之外，而且造成了大学、中学教学秩序的极端混乱。在高等学校，由于实行"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规律，广大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其结果是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7月2日　大型人工河——湖北省汉北河胜利竣工。这条运河是汉北水利工程的主体工程。全长110多公里，河槽深7米。加上同时建成的7处大型排洪涵闸和其他工程，共完成土石方6,000多万立方米。这条大型人工运河，流经湖北省粮棉集中产区——天门、汉川、应城、云梦和孝感等县。该地区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地势低洼。过去只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老天门河和两座小型排水闸，每遇大雨，就要造成水灾。汉北河挖成后，就把这个地区的主要湖泊串联起来，把积水引入新河，排入长江，从而使这个地区的农田免遭水涝之灾。

7月21日　《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由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署名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文章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炮制的。文中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6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强调，要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并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实行"开门办学"；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等。

11月6日～20日　周恩来总理用5个夜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师生代表座谈外语教育问题。当谈到解放后17年外语教学工作时，周总理指出："对外语教学，要一分为二。不能把合乎毛主席思想合乎规律的也否定了。"周总理着重指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要练好"三个基本功"，即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他说："苦练应当成为原则。要学好语音、语法、词汇，做到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能译，这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1月17日　治理海河水系"北四河"下游骨干河道开工。"北四河"包括海河水系北部的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和蓟运河。流域面积达85,600多平方公里。解放前，"北四河"经常泛滥成灾。解放后，经过初步治理，"北四河"流域的面貌已开始改观。这项工程全部完成后，将为河北北部和京津郊区防洪防涝、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并将从根本上解除海河水系北系的洪水对天津市和京山铁路的威胁。

12月28日　上海试制成功40万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勇于创造，自己设计，并且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试制成功了40万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为冶金、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以及生产单位进行观察和分析物体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精密的仪器。它对于发展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都极为有用。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1年

导 言

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从3月21日到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3月底4月初，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为“头”，上海以王为“头”，杭州以陈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随后，“联合舰队”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活动。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林彪集团惶恐不安，猜测三中全会将要端出他们的问题。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林彪集团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虑，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当接到谈话内容的密报后，林彪、叶群下决心采取行动谋害毛泽东。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8日，林彪写了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由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反常活动有所察觉，机警地改变了行程，打乱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部署。11日深夜，林彪、叶群获悉谋杀毛泽东的计划破产后，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南逃广东，另立中央，分裂国家。

9月1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晚10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报告，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命令该机立即返京。林彪、叶群眼看南逃计划败露，于13日零时左右在山海关机场登机强行起飞，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14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古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3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一场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九·一三”事件
- ●第二十六届联大——重返联合国
- ●“两个估计”的提出
- ●“工业学大庆”
- ●卫星发射成功

“九·一三”事件

背景介绍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关于这个事件的性质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有很多很多的著述，这里就提供几个较重要的文件。

材料：

- ·“九·一三”事件
-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节录)

材料一 “九·一三”事件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节录)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

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材料二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节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

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第二十六届联大
——重返联合国

背景介绍

1971 年 11 月 15 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会议召开，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出现在联合国舞台上。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全面阐述了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代表的讲话受到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欢迎，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第二十六届是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使得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这次大会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材料：

- 欢迎您，七亿人民的代表
- 中国代表团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受到热烈欢迎
- 乔冠华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的发言

材料一　欢迎您，七亿人民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代表团，肩负七亿中国人民的重托，于十一月十一日中午顺利到达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

十一日上午，当得悉中国代表团要到达纽约的时候，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常任代表以及来自各国、各地的几百名记者，很早就来到机场等候。十二时三十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出现在纽约市的上空，徐徐降落。机场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联合国提案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联合国的代表，一个个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下飞机，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互相致意。大家有着共同的心情：我们坚持长期的斗争，终于胜利了！

中美人民情谊深

美国人民由于受到美国反动派的阻挠，同中国人民隔绝了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感到格外亲切。美中友好协会的一份贺电说得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集团这个阿尔巴尼亚提案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在旅途中，中国代表团就收到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夫妇从瑞士伯尔尼发来的贺电：“愉快的到达。万岁！良好的祝愿！”另一位美国友好人士格林从加利福尼亚州发来电报说：“欢迎你们，最热烈地祝贺你们和你们的同事。”

听说中国代表团即将到达纽约，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马上赶到机场迎接。他们当中，有来自纽约市的，有来自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的，还有从远处亚特兰大等地赶来的。当中国代表团的车队驶入纽约市的时候，沿途不少行人高兴地互相转告说：“中国来的！”“中国来的！”不少人招手说：“欢迎！欢迎”有的美国友好人士，其中有些是美国黑人，在机场迎接代表团之后，又赶上代表团的车队，不断向代表团欢呼、挥帽致意。

代表团住的旅馆门口围着不少人，正在观看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不少记者也早已等候在这里了。一封封电报、信件从各地寄到了代表团的住处，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愿意提供协助，希望能约见代表团的同志，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一位几十年前曾经在中国侨居过的美国老年妇女埃莉克斯激动地说，看到中国代表团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她指着自己的心说：“我从这里热爱中国。”说着便流下了兴奋的眼泪。有两位女青年追上电梯，要求中国代表团成员签名留念。住在同一所旅馆的一对夫妇说：“非常高兴见到你们。祝你们胜利。”旅馆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还亲切地称呼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为“我的好朋友”、“我的兄弟”。

乔冠华团长在到达机场时向美国人民致意时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二十多年来，美国少数反动派妄图孤立中国，但他们丝毫破坏不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许多美国友好人士都强调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乔冠华团长这个讲话好极了。

喜气洋洋迎亲人

对久居在这里的爱国华侨来说，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好几百名爱国华侨，喜气洋洋，很早就来到机场。他们有的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有的打着红布横幅，上边写着：“热烈欢迎祖国驻联大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当代表团的车队在他们面前缓慢驶过的时候，他们热情地欢呼，高唱《歌唱社会主义祖国》。代表团的同志们不断向他们挥手致意。随后，一个个花篮送到代表团的住处，有华侨学生组织的，有妇女组织的，有商界的，有新闻界的。华侨来访络绎不绝。一位华侨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真

正代表。"这里的华侨报纸也连日发表消息、文章,欢迎祖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感到自豪。《华声报》发表的一份贺电说:"我们衷心热烈欢迎毛主席从祖国派来的亲人。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第一次把祖国人民的真正意向带到联合国。"

携手并肩共斗争

五星红旗在纽约东河之滨的联合国大厦迎风飘扬。各友好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团正期待着中国代表团于星期一(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始参加联合国大会这一隆重的日子。中国代表团在会见各友好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的时候,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都表示,许多年来一直期待着中国代表的到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而并肩战斗。各友好国家代表的勉励,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人民将永远珍惜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月二十九日声明指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这是当前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奋斗!

(摘自 1971.11.16《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国代表团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受到热烈欢迎

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十一月十五日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乔冠华团长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另发),他的讲话在会议厅里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会议在当地时间上午十时半开始。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座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他说:"我作为大会主席,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他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马利克致词后,许多国家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他们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最后共有五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其中包括提出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附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提案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联合提案国的代表,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区、东欧、西欧、北欧等地区的代表。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越来越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当地时间下午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但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

许多代表的欢迎词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了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有的代表还热情地朗诵了毛主席的诗词。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词以后,乔完华团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了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对大会主席和代表们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对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表示了同情的其他一些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乔冠华团长的讲话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欢迎。在他讲话过程中,会场非常安静,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倾听了他的讲话。当他讲话完毕时,会议厅里又一次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再次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亲切握手,表示热烈祝贺。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始终洋溢着一片对中国友好的气氛。

在会上致欢迎词的各国代表(按发言次序)有: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东欧国家),荷兰(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丹麦(代表北欧五国),摩洛哥(代表阿拉伯国家),美国(东道国),阿尔巴尼亚,法国,智利,布隆迪,哥斯达黎加(代表拉丁美洲国家),赞比亚,古巴,上沃尔特(代表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意大利,加纳,马来西亚(并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尼泊尔,奥地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秘鲁,苏丹,马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乌干达、缅甸,几内亚,刚国人民共和国,日本,阿富汗,锡兰,墨西哥,伊拉克,喀麦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土耳其,苏联,伊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匈牙利,塞浦路斯,波兰,蒙古,印度,黎巴嫩,多哥,索马里,突尼斯,尼日利亚,保加利亚。

(摘自 1971.11.17《人民日报》)

材料三　乔冠华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各位代表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主席先生和许多国家的代表对我们表示的欢迎。

许多朋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将把这些转达给全体中国人民。

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来到这里，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同大家一道参加联合国的工作，感到高兴。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就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才被长期剥夺，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恣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二十三个提案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也都为此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表示了同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个。在新增加的八十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二十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事务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的。就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来说，正是由于一七七六年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美国人民才赢得了独立。正是由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法国人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伟大列宁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一小撮腐朽反动的力量则是惶恐不安，极力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武装侵略别的国家，颠覆别国的合法政府，干涉别国的内政，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别的国家进行控制，任意欺负别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是局部战争从未停止。现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有曲折、有反复的，但是反对人民和反对进步的逆流，终究不能阻止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主流。世界一定要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而决不是走向反动，走向黑暗。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台湾的一千四百万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归还祖国，台湾同胞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一再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并且公开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无意干涉。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违背自己的诺言，派遣武装力量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今仍然留在那里未走。现在有些地方

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在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定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立场，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蹂躏这三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遭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和平倡议。美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美国及其仆从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是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

朝鲜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就从朝鲜撤走了，但是美国军队至今还继续留在南朝鲜。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四月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八点纲领；坚决支持它提出的废除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非法决议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正义要求。

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一定能够收复阿拉伯国家的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国政府认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有义务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任何人也无权背着他们，拿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交易。

各种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区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扎尼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白人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浬领海权、保护本国资源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展开的维护民族权益、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解散军事集团、撤走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是正当的。但是，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在扩军。他们搞的所谓核裁军，完全是为了垄断核武器，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决不会背着无核国家参加核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中国的核武器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作为第一步，首先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如果真想裁军，就应该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于做到的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裁军愿望的严峻考验。

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

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我们坚决反对有的国家以"援助"为手段，企图控制和掠夺受援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逐步改变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1971.11.17《人民日报》)

"两个估计"的提出

背景介绍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于1971年4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出来的。这两上估计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长期以来成为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身上的精神枷锁。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集团为在教育战线争夺领导权，即为了夺权以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与接班人而提出的。通过它，"四人帮"打击压制了一大批的教育工作者与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恶劣的影响。

材料：

·"两个估计"是怎样出笼的

材料 "两个估计"是怎样出笼的

所谓"两个估计"就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是"四人帮"一伙在1971年4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出来的。长期以来，"两个估计"成为套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教师身上的精神枷锁，危害严重，流毒深广，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四人帮"是怎么炮制出来"两个估计"的呢？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一伙蓄谋已久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姚文元就伙同林彪、江青，大肆攻击教育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成就，竭力丑化、打击知识分子。1969年6月，张春桥、姚文元就在上海组织人马，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纲要》中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1971年，在筹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过程中，"四人帮"预感到对如何估计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问题"会引起争论"。张春桥一伙为此加紧进行阴谋策划。1971年3月18日张春桥同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定下了调子。张春桥说："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那个余党说："如何在使用中改造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上海较突出，有的年纪大，光养着不行，过于重用他们又翘尾巴，不批判放毒，一批判就躺倒。"当张春桥听说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估计有争论时，他恶狠狠地说：教育战线"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业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张春桥的这一番恶毒的黑话，后来带到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成为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四人帮"一伙千方百计篡夺这次会议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把"四人帮"的干将、亲信拼命塞进去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又竭力排斥原教育战线的同志。在出席会议的631名代表中，"文化大革命"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沾过教育战线边的，仅占三分之一。在会议的领导成员和工作机构中，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同志竟连一个也没有。这样，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情况。但尽管如此，会议的许多代表仍然提出，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四人帮"一伙对此大为恼火，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扣帽子、打棍子，竭力压制这些同志。迟群诬蔑这些同志"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同志"到底是哪条路线上的人"，叫嚷"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他们用所谓"大批判开路"，把片面搜集到的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材料抛出来，大造舆论。他们还在会上秘密串联，搞特务活动。"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死党，几乎每天晚上都把他们指派的几个所谓联络员召集起来，分析有

关省市自治区的动态，经常向王洪文汇报。王洪文也以“探望”为名，窜到会议驻地，亲自出谋划策，撑腰打气。在“四人帮”一伙的把持下，这次会议造成了一个对十七年、对知识分子只许说坏话、不许说一句公道话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正式抛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对于第一个估计，原稿一开始是这样写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这已经十分恶毒的提法，张春桥还嫌不够，又进一步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纪要》中还说：“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了十分猖狂的程度。”这里面的“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也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对于第二个估计，《纪要》初稿写道：“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通过痛苦的磨炼”。张春桥对这样的写法还觉得不满意，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同时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两个估计”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正式出笼，同年8月以中央名义批转全国，从而成为打击压制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

“两个估计”出笼后，遭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于1977年下半年推倒了反动的“两个估计”。1979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撤销了载有“两个估计”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工业学大庆”

背景介绍

“工业学大庆”是毛泽东在60年代末向全国人民提出来的一个号召。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经济的热情与信心。当然作为一面红旗，其在当时客观的历史环境下，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的地方。1971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的一年。这时又提出开展“工业学大庆”的运动目的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以期再次掀起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效果不大。

材料：

- 工业学大庆

材料　工业学大庆

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

“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几年来，毛主席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越来越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工业面貌。今年，在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党代表大会提出进一步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个以大庆为榜样，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发展。这对于推动工业战线的斗、批、改，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大庆，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工业的道路。

发展工业走什么道路，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斗争。马克思主义主者坚持列宁的观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这个斗争，是唯物历史观和反动的唯心历史观的斗争，是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还是用机械化取消革命化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著名的“鞍钢宪法”的批示等光辉著作中，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工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号召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推动工业建设不断高速度地发展。

大庆油田会战，就是在一九六〇年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迎着帝修反掀起的反华恶浪，迎着刘少奇一伙在工业上刮起的下马黑风，打上去的。英雄的大庆工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头顶蓝天，脚踩荒原，不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讽刺打击，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条条框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甩掉了西方资产阶级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贫油国家”的帽子。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庆工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以出色的成就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精神，是我国工业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

学大庆，就要像大庆那样，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两论起家，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

学大庆，就要像大庆那样，大学解放军，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当作对自己的指示，把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建军方向，当成自己的建设方向，实行政治建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

学大庆，就要像大庆那样，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

学大庆，就要像大庆那样，坚定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总之，学大庆，就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才能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建设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思想和路线问题。思想对了，路线对了，我们在发展工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会得到正确的解决。为什么大庆油田的建设发展这么快？为什么有些企业的生产长期徘徊，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马列主义多些，能够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马列主义甚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差。这个历史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取。要看到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统一论，还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还要经历长期的斗争。谁要是对这场斗争掉以轻心，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几年来，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发展充分证明，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阶级斗争的规律总是这样，我们做出一点成绩，就会有人不高兴，我们的成绩越大，他们越是要骂街。大庆出了油，出了经验，出了一支革命化的队伍，狠狠地刺痛了刘少奇一伙。他们千方百计要砍倒大庆这面红旗，或者否定大庆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或者把大庆的一些具体经验偷换成资产阶级的货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从形"左"实右的方面破坏大庆。我们有些同志，多年来不读马、列，对阶级敌人变换各种手法向我们发起的进攻，丧失了批判能力，受了骗，上了当。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批修整风。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调查研究。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才能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

大庆的经验充满高度革命精神，没有一个革命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是学不好的。王进喜同志，是大庆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也是大庆领导班子的优秀代表。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当了中央委员不骄不躁，一面工作，一面劳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进喜同志是毛主席表彰过的那种老实人，是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等革命作风的榜样。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向王进喜同志学习。要有更高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更大的革命干劲。那种安于现状的中游思想和因循守旧的庸人哲学，必须彻底抛弃。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抓好本地区学大庆的先进样板，以点带面，领导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踏踏实实地、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不要生搬硬套，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一有成绩就翘尾巴。这样，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是头脑冷静的促进派。

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大庆的工人，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革命干部，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家属和青年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团结，艰苦奋斗，保持大庆光荣传统，发扬大庆革命精神，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1971.6.20《人民日报》）

卫星发射成功

背景介绍

继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1971年又成功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卫星。这表明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当时卫星发射的成功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这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

材料：

·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材料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我国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重量二百二十一公斤。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二百六十六公里，最远点一千八百二十六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九点九度，绕地球一周一百零六分钟。

卫星在三月三日至十五日运行过程中，用二〇·〇〇九兆周和一九·九九五兆周的频率，成功地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现仍在继续进行预定的科学实验工作。

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所取得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从事研制、发射卫星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民兵及有关人员表示祝贺。希望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遵照伟大导师毛主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认真钻研，大力协同，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1971.3.17《人民日报》)

风　云　人　物

林　彪

林彪(1907—1971)　湖北黄冈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军事教导团任排长，后在叶挺部队任连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后随朱德、陈毅参加湘南暴动。1928年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年底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1929年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任红四军军长，1931年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指挥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多次打败了敌人的军事围剿。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1936年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1937年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续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与聂荣臻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坂垣师团辎重部队千余人。1938年底去苏联治病。1942年2月回到延安，不久赴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48年后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及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与陈云、罗荣桓等同志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随后又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及海南岛。同年6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后改为中南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9月任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狂热鼓吹个人崇拜，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叶 群

叶群(1917—1971) 福建闽侯人。林彪之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去延安。"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系列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67年后,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员等职。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等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未遂,即与林彪密谋,派儿子林立果组织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1971年9月与林彪合谋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9月13日与林彪、林立果等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她永远开除党籍。

林 立 果

林立果(1945—1971) 原籍湖北黄冈,生于陕西延安。1964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曾组织秘密集团"联合舰队",并制定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图发动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后因事情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与林彪、叶群等驾机外逃苏联,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陈 伯 达

陈伯达(1905—1989) 福建惠安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大学教授。1937年赴延安,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建国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成为实际负责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1966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中共中央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的名义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9年9月20日在北京去世。

珍闻轶事

毛泽东南巡

1971年8、9月,毛泽东到南方各地的一次重要巡视。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对彻底解决林彪问题有所准备,毛泽东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指出他们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活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说"这件事还没有完"。他号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还针对林彪一伙的"大树特树"、"一句顶一万句"、"天才"、"超天才"等荒谬提法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在途中,毛泽东多次带领被接见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亲自逐字逐句地讲解。要求"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泽东在南巡途中的讲话,使党政军高级干部为应付并粉碎林彪一伙可能的突然事变,做了思想准备和政

治准备。

毛泽东令陈励耘胆颤

1971年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人前往迎接。一走进毛泽东的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对他很冷淡。当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劈头就是一句："你在庐山犯了错误了吧！"

陈励耘吓了一跳："是，我有错误。"

工作人员让陈励耘等人在沙发里坐下。刚坐定，毛泽东又对着陈励耘说：

"吴法宪在庐山串联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

陈励耘耷拉着脑袋："我在庐山犯了错误。"

毛泽东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指"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删去了嘛！你也不看一看文件?!"

陈励耘战战兢兢地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

"你们在山下没有讲什么?"毛泽东查问。

"就是在山上那一次。"陈励耘辩解说："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有见过面。"

毛泽东说："要学习《国际歌》和列宁那篇文章。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呵?"

使陈励耘害怕的，不光是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批评，在毛泽东到达杭州的当天，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毛泽东离开他乘坐的专列，到了在杭州的住所。陈励耘事先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到他时，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你——怎么又来了！"

"我——我是分工管这件事的。"

陈励耘慌慌张张地说着，灰溜溜地躲开了。他从毛泽东这句话里，从毛泽东的表情里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仅是冷淡，而且是十分讨嫌。他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岌岌可危！

(据《林家王朝黑幕》)

毛泽东休克了一次

1971年冬天，毛泽东再次患病，这一次病来得突然，就连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没料到。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的缺氧，毛泽东突然休克了。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吴旭君首先发现这一情况，马上打开游泳池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叫道："快——来！"

张玉凤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卧室和治疗室)。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也陆续赶到了，这是张玉凤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的紧张情景：在场的主治医生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复述一遍药物名称后，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毛泽东的体内。打针、用药，一次一次地循环……

此时的毛泽东仍处于休克状态。有一位心脏科的年青专家扶起他，用力捶毛泽东的背部，并有节奏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张玉凤也帮他捶背，并叫着："主席，主席。"

周恩来总理不知何时悄悄地赶来了，他真诚地要求在场人员：要全力抢救。并很动感情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张玉凤想，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当时的形势是：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还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开。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若有个好歹，人民群众没有心理准备，各级领导没有心理准备，周恩来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

面对严峻的现实以及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周恩来不能不紧张。他从来没有走路困难的先例，而这一天，他接到汪东兴的报告后，坐车从西花厅住所赶到游泳池大门口时，竟很久下不了车，下车后又挪不动步……

在一阵紧张的抢救过程后，毛泽东终于慢慢睁开了双眼。他有些愕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和围在他身边的人，那目光像是在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毛泽东的突然苏醒，使得在场的人都高兴得象孩子似的笑了。好像刚才什么事都真的没有发生，一起站在床边的周恩来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人事不知时，微笑着，不无幽默地说了一句："我好像睡了一觉。"

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去坐坐。他们问毛泽东："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毛泽东看看大家，又看看周恩来，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江青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毛泽东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周恩来为了鼓励参加医疗抢救和为毛泽东服务的所有同志，他自己出钱，请大家吃了饭。这顿饭，破例由人民大会堂师傅做好送到中南海的，遗憾的是总理因为忙，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他在百忙中抽空同毛泽东的

工作人员一起照了像。

（据《海南纪实》创刊号）

导演乒乓外交

1971年4月的一个凌晨，毛泽东还在凝思，毫无睡意。他的焦点仍是那份写字台上的请示报告。这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周恩来已经写上"拟同意"三个字。本来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过报告后用笔做了圈阅，向下级做了传达：主席不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可事后他并没让秘书拿走归档，到了夜深人静，他又把思绪集中在这份报告上。

根据近年近月的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尼克松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着手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他感到美国在远东的力量不够，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可以玩中国牌来压苏联，所以尼克松一上台就开始做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试探。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美国方面想进一步与我们接触、对话的信息。周恩来也曾谈起过美国半个多月前，宣布取消到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希望对方会有互惠行动的公告。加上几天前，突然发生在日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向我方领队表示想来华访问一事。毛泽东感到：面对种种信号，他面临的将是一项重大的抉择，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我们也需要同美国改善关系。所以，一个民间团体的要求并非小事，首先该让谁到中国，是总统？还是让这伙已到门口的球员？时机难逢，稍纵即逝，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好？这也许是打开已结有20年坚冰的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窗外已开始天亮了，毛泽东经过反复的思考，毅然作出最后的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的邀请一宣布，不仅把美国方面惊呆了，也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喜出望外，马上批准了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着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尼克松连夜召开了特别会议。

作为总统特别助理的基辛格博士同样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世界知名学府哈佛的教授，一向以高傲自信著称，此刻，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年到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那么，毛泽东今天这一着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人。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他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是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的。由此，他又突然联想起美国进步作家斯诺被请上天安门一事。

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21周年大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并排观看国庆典礼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这张照片应该被当作向美国方面发出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这位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隔几年，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斯诺与夫人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发排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然而，他传达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现在基辛格才真正领悟到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行动沉着。从中他也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乒乓球队访华后，美国政府怎么办？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谋划着下一步行动。尼克松面对着桌上摆着的研究中国的材料说：毛泽东把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作为信息向我传达，我没想到，那他同斯诺讲：我作为总统或旅游者去中国，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是什么意思？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基辛格很快思路大开，他说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很快启程，秘密访问了北京，并为总统访华做着准备。

基辛格来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发表总统访华时中美会谈公报。面对两国的巨大分歧，周恩来总理本着毛泽东制定的："公开摆明分歧是解放问题的开始"这一方针。使中国方面在如何发表公报的谈判中，从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谈判之后，基辛格钦佩地脱口而出：毛泽东的公开摆明分歧的方针，既可以使双方盟国与朋友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人士确信公报是真诚的，这种能独出心裁的方式就是中国方案的精妙之处。

台湾问题曾使会谈陷入僵局。周恩来说，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是不会变的。基辛格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当毛泽东得知台湾问题是双方分歧的焦点时，他谈到：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100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本着这一精神，周恩来又重新提出了中国的方案，并豁达地告诉基辛格：毛主席

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既表明我们有耐心，又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基辛格一听说毛泽东讲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使他更感觉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说的话，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处世的原则与灵活。

经过多少次努力，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发表了著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美方在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作出要在台湾逐步减少武器供应和军事援助的承诺，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1973年，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双方决定设立联络处，中美正式有了外交关系。

自从1971年4月毛泽东导演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后，尼克松加紧了访华的准备，不到1年，历史把毛泽东和尼克松——一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人、一个世界头号反共分子带到了一起，尽管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但是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尽管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历史的因素。但他们的会晤，随着岁月的流逝，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无疑是一个超世纪的重大事件。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却高屋建瓴地指出：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小球推动了大球，自中美"乒乓外交"之后，尼克松确实起了带头羊的作用，特别像联邦德国这样资本主义强国都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宗旨出发，紧跟尼克松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日本，1971年7月15日美国白宫的这个声明，也有如一声霹雳，使小小的岛国震动起来。在日本人称之为"尼克松冲击"下，日中接触的国门大开。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访华，舆论界也大声疾呼，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尼克松访华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越顶外交"，既然在战略转换上有美国"越顶"在前，为何日本不可在同中国建交上"超顶"于后？舆论、民间鼎力相促，从此，一场建交前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从田中首相表明建交决心到两国外长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不过82天，由此，写下了日中关系史的新篇章。

亲手结束日中两国数十年不幸历史的日方代表田中角荣首相曾经谈到：作出决断揭开了日中两国永远和平帷幕的是中国的毛泽东，这一决断不仅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全人类。

"一条线"和"一大片"

小小的乒乓球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中美关系改善后，中国的对外战略由60年代的"反帝反修"转变为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霸，在这个战略思想指挥下，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部署意见。

所谓"一条线"，既中国通过团结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直到美国，组成东西一条线，截断和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

所谓"一大片"，是在这个"一条线"的主导下，联合亚、非、拉一大片国家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美国是"一条线"中要争取的主要国家，但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仍坚持反对。

中国这次调整对外政策，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摆脱了十几年来孤立状态。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有助于越南问题的顺利解决，这就解除了来自南北两面的双重威胁，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霸权。

其次，调整对外政策后的中国，在世界上广交朋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中美关系改善后，使得一些原来追随美国的国家放弃了它们长期采取的敌视中国的政策。1971年10月又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跟在中日建交、中德建交之后，西欧除梵蒂冈外，所有有独立外交权的国家都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70年代是中国外交非常活跃的时期，这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共有75个，是前20年建交国家总数的一倍半。

最后，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正式形成。70年代初期至中期，是这种战略三角关系的鼎盛时期，尽管中国是三角中最弱小的一方，但在美苏势均力敌的天平上，中国的法码就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辛格作为一个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当事人，对这一段的历史经验谈起亲身体会时说过：他非常欣赏毛泽东所制定外交政策的风格，在他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对外国际环境的十分精确的分析的基础上的，这种政策谋求的是使各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益处，即要求人们承认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利益得不到满足，是决不会接受一项长期协定的。因此他总是乐于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们在捍卫中国的利益时是非常强硬的，但他们又是很公允的。

"九·一三事件"前后

乳房癌的真相

在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得意忘形，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向党中央发难，当即被毛泽东识破和挫败。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破产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黄、吴、叶、李、邱纷纷被迫检讨。1970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以严厉的口气批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了九霄云外。"

至此，林彪一伙慌了手脚，背地里却加快了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步伐。1971年3月，以康曼德、林立果为首的小"联合舰队"，在上海巨鹿路889号秘密据点里制订出了发动武装政变的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小"联合舰队"的成员们从人员、组织、武器等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准备，落实武装政变计划中的各项措施。

1971年8月，林彪、叶群龟缩在北戴河海滨，却没有一点清闲悠雅的心情，日夜紧张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们看到，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亲自领导批陈整风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毛泽东称之谓"甩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的断然措施，使林彪一伙的营垒阵脚大乱。他们懂得，批陈整风运动虽然表面上还没有触动林彪本人，但矛头所向十分清楚，一场较量已经不可避免。

黄、吴、李、邱在北京眼看要招架不住了，林彪、叶群心里十分恐慌。为了稳住自己的阵势，他们觉得当务之急是必须设法回北京给部下们打打气。

8月的北京，天气炎热异常，政治斗争更是处于紧张而又微妙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亲自回北京，必然使自己的阴谋更加暴露，所以他不敢贸然出动。叶群决定找个借口自己回北京走一趟。经过一番搜索枯肠，她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8月2日晚，叶群洗完澡刚披上浴衣出来，便乍乍呼呼地要公务员赶快把保健医生找来，说是在洗澡时发现左乳房有一个肿块，必须马上检查。

进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位男的。叶群故作紧张地说："像我这样的年纪，绝经前后，我怀疑十之八九是恶性肿瘤，可能是癌。请大夫帮助诊断一下。"说着，把胸前的浴衣解了开来。

这位医生哪敢真的去捏摸这位副统帅夫人的乳房，只急于要推卸诊断责任。他象征性地按了一下，忙说："我看叶主任赶快到北京去确诊一下，这里的医疗检查设备不够。"叶群正中下怀，连忙嘱咐这位医生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回北京的借口，叶群怕夜长梦多，不敢拖延。8月5日晚，她给周恩来总理打长途电话，装模作样地说："总理呀，我胸前长了个小瘤子，我开始没有当一回事。医生看后没有把握，说有可能是恶性的，一定要我到北京确诊。请总理保密，在确诊前不要告诉别人。"周恩来对这种事情当然不便否决，只得同意了。第二天，叶群就回到了北京。

坐落在北京西郊五棵松的301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楼高院深，环境幽静。8月6日，这里的特级病房区增设了游动哨，平白添了几分神秘气氛。原来，叶群已经悄悄地住了进来。叶群住院后，先不忙检查身体，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通知邱会作，并要他让还在青岛的吴法宪赶快回来。

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以为叶群真的得了癌症，焦急万分。8月7日上午，吴法宪急匆匆飞回北京。听说叶群已经回家。当天下午即带着老婆驱车直抵毛家湾林宅。两人脚底生风来到叶群住处，却见叶群正泰然自若地坐着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聊天。

吴法宪不知底，忙问："叶主任，你的身体……"

叶群望着吴胖子气喘吁吁的模样，不禁有点好笑，轻松地回答说："还没有最后确诊，好像问题不大。我们正在谈豆豆的婚事呢！"

第二天，叶群的诊断报告出来了，说根本没有什么乳房癌，一个小小的肿块经过打针已经自行消失。

吴法宪、邱会作得到报告，似乎有点猜到了其中奥妙。当晚，两人一起驱车来到叶群住处，听取指示。

叶群在这天下午已经同黄永胜关紧大门密谈了将近三小时，这时见吴法宪、邱会作来到，她顾不上寒暄，立即同这两位死党展开了实质性的谈话。叶群问道："你们在北京形势怎样？"

吴法宪说："国庆节前要开四届人大。这个会上一定会批判陈伯达，这一批肯定会联系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作检讨，恐怕过不了关。"

邱会作哭丧着脸："人大的范围那么广，各种代表都有。我们不作检讨不行，一作检讨就臭名远扬。"

一听这两个人都准备检讨，叶群提醒道："事情不那么简单。现在作检讨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检讨就算完了，你还得准备挨多少人批。这样一来，岂不身败名裂？你们都作检讨，我和林副主席怎么办？"

这一说，吴法宪和邱会作没了词儿，只坐着发呆。叶群又说："林副主席一作检讨，对全党、全军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坏的影响，说透了，就要垮台。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干的。他从来都没有检讨的习惯。这次人大会议，的确不好过关。在批陈整风会上就有人提出庐山是一场未遂的政变。老实说这不只是指陈伯达和你们，已经指到林副主席

头上了。你们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吴法宪已经六神无主，茫然地问：“那怎么办？”

叶群强作镇定，说：“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是有的。林副主席和你们是分不开的，你们几个人都要保住。就这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你们也不必紧张，现在离人大还有二三个月，办法还来得及商量。林彪同志还得摸摸底，摸清底，才好摊牌。”叶群扫了一眼面前两颗耷拉着的脑袋，打气道：“林副主席不慌，你们慌什么？我们自有办法。”

叶群怕别人怀疑，不敢在北京久留，三天后飞回了北戴河。来去匆匆的三天，虽然效果不够理想，但总算摸到了一点情况，对自己的同伙起了一个暂时稳定人心的作用。

惊弓之鸟

正在林彪、叶群一伙惶惶不安之际，又传来一个令他们又惊又疑的消息：8月14日，毛泽东主席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林彪、叶群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摸不着头脑，但预感到凶多吉少。

毛泽东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作了停留，会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不正常活动，并且几次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指出，庐山发生的这场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当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陆续探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后，十分惊慌。他们知道，摊牌的日子快要到了。

“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取而代之。”这是林彪研究了古今中外政变史之后总结出的经验。他们决心乘毛泽东南巡的机会在途中下毒手。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小“联合舰队”下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并派周宇驰等人具体部署谋杀计划。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抄起红铅笔，在一张16开纸上写下了发动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于是，一场罪恶的武装政变的机器正式开动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这场武装政变，由穷凶极恶的林立果在前台指挥。它的最高决策者当然是林彪本人，但林彪不敢轻易露头，子爵号叶群就担任了幕后指挥的角色。

进入9月的北戴河，气候已经开始凉爽。天空像被水洗过似的那么蔚蓝洁净，阵阵海风吹动着朵朵白云，令人生出许多幻想。每年夏天，林彪和叶群几乎都要住进北戴河莲花石96号别墅避暑。这里是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之一。1971年的夏季快要过去了，可叶群却不但顾不上欣赏海滨景色，反而整日价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她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为紧张烦躁的几天。

9月9日，这位子爵号整天躲在房间里与在北京的黄、吴、李、邱频繁通话磋商，几乎没有中断。她与黄永胜在电话中一谈就是90分钟。这时正好吴法宪在北京有急事要同叶群商量，电话却怎么也接不过去。吴法宪催了几次长途台总机，话务员也毫无办法，把这个草包司令急得抓耳挠腮，在屋子里团团转。

叶群和黄永胜的通话一停，总机连忙把吴法宪的电话接了过去。吴法宪在得到了叶群关于准备飞机的电话指示以后，马上给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下达了命令：“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9月10日，叶群继续用电话遥控。这天她光同黄永胜的通话就有5次，最长的一次长达135分钟。

可惜，这些机密电话连长途台总机也无法监听，当然更不可能留下录音，外人不得而知，成了千古之谜。

自9月8日下达政变手令以后，林彪和叶群紧张地注视着武装政变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一直到9月10日晚，林立果的“联合舰队”还没有最后确定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具体办法。子爵号急了，觉得这样犹豫不决要耽误大事。为了催促“联合舰队”加快行动步伐，也为了防止有的部下在这种关键时刻退缩怯阵，她决定向政变队伍“抽鞭子”。9月11日，叶群先给林立果打电话，发了一通火，紧接着又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这位子爵号在电话中又是威胁又是利诱：“……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们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

王飞见子爵号火气不小，急忙辩解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活到快50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听出了王飞的心虚，进一步打气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紧接着又胁迫说：“你们忙乎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好不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

王飞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不满地说：“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吗！哪有不困难的事？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泽东）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这位子爵号在抽了一顿鞭子之后，又装出一副体贴下属的腔调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来自北戴河的子爵号抽鞭子电话，把林立果一伙抽

得鸡飞狗跳，政变工作的步伐越发加快了。王飞立即赶到西郊机场，同已在那里的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密谋了在沪宁铁路硕放站附近炸毛泽东专列的谋杀计划，并决定由江腾蛟、鲁珉南下具体指挥和执行。

然而，就在这伙丑类紧锣密鼓策划谋杀计划但尚未付诸行动之际，即9月11日晚上，从上海打来的一个报信电话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北上了！

叶群在北戴河得到这个密报，大惊失色。她知道费尽心机制订出来的谋杀计划已经在瞬时间化作泡影，当场同林彪抱头痛哭！

毛泽东的行动完全出乎林彪、叶群的意料之外，使他们煞费苦心策划的阴谋一下子全乱了套。

毛泽东这次去南方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等地都停留了若干天。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也会分别停留几天，回北京当在25日以后。但是，毛泽东却一反常规，采取了令人捉摸不透的举动。9月8日午夜，毛泽东在杭州刚用完夜餐，突然叫来有关人员，下令把他乘坐的停靠在笕桥机场专线上的专列立即趁夜转移，调到了绍兴附近。第二天下午3点刚过，毛泽东在预先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当晚，毛泽东乘专列到了上海，专列停靠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他本人却不下火车。11日上午，毛泽东在车上同许世友等人谈了话。被林立果预定要利用接见机会谋害毛泽东的上海空军某军政委王维国，却被挡在车下不许上车。在上海停留还不到一天，11日下午，毛泽东专列又突然离开上海，一路飞奔向北。沿途各站，毛泽东都不让停留。9月12日下午，专列安然抵达北京。而在这个时间，林家"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还刚刚商定。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暗杀计划是否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对这一点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出人意外的行动，把林彪一伙的计划全盘打乱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子爵号的覆灭

毛泽东的神速行动，不仅使林立果"联合舰队"的暗杀计划彻底破产，更使林彪、叶群惊得失魂落魄，茫然不知所措。子爵号这时方寸已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北戴河莲花石96号楼里，几天来笼罩着一股莫名其妙地紧张气氛。工作人员们只见叶群、林立果一伙慌里慌张地出出进进，神色十分诡秘。

在密室里，林彪、叶群赶紧策划了逃往广州、另立中央、武装割据的方案，并开始进行各种准备。

为了遮掩他们的不正常活动，叶群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女儿林立衡与张军医举行婚礼。叶群派人把林立衡召进卧室，亲热地说："豆豆，你和张××的婚事，早点办了吧！就这两天怎么样？"

林立衡这两天正被弟弟林立果透露给她的林彪叶群要逃跑的消息弄得晕头转向，哪有心思谈结婚的事？便赶紧借口推辞："我例假来了，痛经很厉害，过几天再定吧！"

叶群一听话不投机，忙换了个话题说："你们在这里好好休息，不要向外打电话、写信，过几天，爸爸要带你们去大连。衣服带了吗？"

林立衡继续推辞说："大连我去过，我身体不好，不想去了。"

叶群生气了，马上抬出林彪来压她："这是你爸爸的意见，要你陪他去大连。你这几天不要走，就在这里休息，看看书。"

到了9月12日，林彪、叶群已经决定赶快外逃，林立果的准备工作似乎也做得差不多了。这天下午，林立果带着一大堆文件、行李，乘上林彪的专机三叉戟256号直飞北戴河。按照他们的计划，这架三叉戟256号飞机，将用于第二天林彪、叶群逃往广州时乘用。

这时，叶群决定让林立衡当天立即结婚，以掩饰他们的反常举止。下午，叶群突然把林立衡和张军医找去，说："你爸爸对你们的结合很满意，一起合个影吧！"

正说着，果然见林彪走了进来，一副强作欢笑的样子，说："照张相留念吧，我刚刚刮了胡子。"

让工作人员给他们四个人照了几张相之后，叶群悄悄地拉住林立衡的手，背着张军医说："豆豆，你们今天晚上就结婚吧！"

林彪也上来帮了一句腔："结了婚，你们可以放开些，我们也放心了。"

林立衡着急地说："这怎么行，太匆忙了，国庆节回北京再说吧！"

叶群有点不高兴："国庆节太忙，我们那时候顾不上你们这些事。就在这里简单举行一个婚礼吧！"

林立衡还是不愿意在这种兵慌马乱的气氛中干这种事，找借口说："那不行，我们还没有谈到结婚的程度。"

哪知叶群冷笑了一声道："这骗不了我。前天晚上是谁在你的卧室里整整呆了一宿。"

林立衡这才明白自己一直被人监视。只听叶群又说："如果不举行仪式，今天晚上先同居吧！"

林立衡红着脸反抗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何况我现在正来例假呢！"

叶群却因为迫切需要用女儿的婚礼掩盖阴谋，坚决地说："那就先订婚吧！"

下午3点半左右，订婚仪式开始了。叶群似乎触景生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凄凉绝望的情绪，抱着女婿的肩头哭了起来。在一片闹哄哄的气氛中，叶群又强颜欢笑、指手划脚地把女儿女婿拉到一起，说："你们应该在大家面

前接个吻。照俄国人的规矩，客人一喊‘苦啊，香啊’新郎新娘就要当众接吻。”

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无可奈何地听从了叶群的摆布，但心里却清楚地感觉到在这出闹剧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当天晚上，根据叶群的指示，莲花石96号楼放映厅里上映香港电影《甜甜密密》和《假少爷》。表面上是为庆贺林立衡订婚，实际上是为了把林立衡夫妇和工作人员都吸引去看电影。

林立衡根本没有心思去看什么电影。她设法偷听到了叶群和林彪的零星谈话，很快溜出来把情况报告了北戴河警卫部队。警卫部队马上向北京作了汇报。这时大约是9月12日晚上10时左右。

过了不到一小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的消息传到了北戴河。林彪、叶群、林立果惊恐万状，觉得一刻也不能拖延，决定改南逃割剧为北逃出国，立即飞往苏联。

子爵号叶群这时又亲自出马，要出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个花招。深夜11点22分，叶群用保密专线接通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的电话。她强作镇定，故意放慢语调说：“报告总理，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富于秘密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更是不动声色：“请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答：“空中动。”

周恩来故意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

叶群脱口而出：“没有。”

周恩来机智地稍一试探，林彪、叶群的马脚便露了出来。周恩来放下电话即向李作鹏交代说：“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9月12日深夜11时40分，叶群把警卫秘书叫到林彪房间。林彪装模作样地说：“今天晚上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一到就走。”

叶群故意看了一下手表，说：“我们先走，到山海关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

警卫秘书刚出门，叶群又追出来低声对他说：“赶快告诉司机，首长马上就走。”一见四周无人，叶群故作亲切地拉着警卫秘书的胳膊闪进一个盥洗室，焦急地说：“快点吧！十万火急。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你快去调车！”

林彪的专车很快开了过来。光着秃头的林彪在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的簇拥下，迅速钻进汽车。警卫秘书也上了车。

红旗牌轿车的车门刚关上，叶群立即说：“快，到山海关机场。”到这时候叶群还没忘记笼络人心，匆匆忙忙补了一句：“老杨和李秘书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可没想到，汽车开到警卫部队居住的58号楼附近时，受到了警卫部队的阻拦，一位警卫部队干部在路上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此刻已经不顾一切，狠狠地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过去！”

汽车加速冲了过去。这时，车上的警卫秘书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断然喝了一声：“停车！”

司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刹住车。警卫秘书趁机迅速下了车。叶群刚反应过来，愤怒地叫道：“李秘书，你想干什么？”林立果则立即拔枪射击，打伤了警卫秘书的胳膊。汽车又扬长而去。

红旗轿车以上百公里的高速驶向机场。9月13日0点20分，载着林彪、叶群等人的汽车开到了山海关机场三叉戟256号专机旁边。

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在这里只抄录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等5人写的一份材料。材料中讲了他们当时目睹的林彪、叶群叛逃时的情景：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1971年9月13日0时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飞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0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林彪、叶群等乘坐的256号飞机在叛逃过程中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在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荒无人烟的野草地上，留下了9具烧焦了的尸体。

在横七竖八地暴露着的9具尸体中，唯一的一具女尸，就是叶群。只见她衣服头发全部烧得稀烂，全身近乎赤裸，左臂摔成两截。

9月16日上午11时，距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80小时之后，叶群等人的尸体被不明真相的中、蒙双方有关人员分别装入木棺，埋葬在荒野中一个无名高地的小山坡上。

叶群，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恶女人，就这

样永远地葬身在异国的荒漠之中。曾经猖獗一时的子爵号，可耻地彻底地覆灭了。

选自《在历史的档案里》

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叛国外逃，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附近。

根据国内指示，并经蒙古外交部同意和安排，我驻蒙大使许文益率领我们三人于9月15日下午乘蒙方提供的专机赴飞机坠毁现场视察。蒙方陪往的有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及一些有关专家、记者、电影摄制组。

飞机2时45分起飞，航程300公里，一小时后即达温都尔汗的一个简易机场。肯特省一位副省长、省政府秘书及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全部人员分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奔赴失事现场——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下午6时抵达现场。这是一个草原丘陵间的沙土质盆地，十分平坦，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800米，北、东、南三面被高低不等的土包环绕，西面则是一个斜坡，连着通向西北10公里的贝尔赫莹石矿的小路。飞机失事发生在这片平坦草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50—200米，是个倒梯子形。

飞机坠毁状况

首先观察了甩在现场边缘的机尾，它从中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斜卧在那里，一眼就可以看到机尾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这明白无误地显示是我国的喷气飞机。

飞机着陆点正好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29米的草皮被擦光，其西侧不远有深约20厘米的一道平行浅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了燃烧区，出现飞机碎片，从少到多，由小到大，散布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大片带舷窗的机身，其东略偏南20米左右的一段机翼上有“…56”字样（后来判明是左翼的外展部分）。至320米左右，有一扇钉有“旅客止步”塑料牌的门，其东南侧30米处有一架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联装座位架及座垫，成三角形分布，每边距离40米左右，座机东40余米有一段机翼，上有“中国”二字（后来判明是右翼的外展部分）。

机头燃烧区距着陆点530米左右，火势最猛，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大堆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它的正东20米左右有一大段机翼，上有“民航”二字（后来判明是右翼的内展部分），其根部“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的草丛中尚有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歪斜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西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

机头以北50米范围内有三摊共九具尸体。第二、三摊尸体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它的旁边堆有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

现场巡视花了1小时50分，太阳早已西下，天色灰暗下来。双方商定死者安葬问题之后至深夜10点多才返回到温都尔汗。

尸体的察看和埋葬

9月16日上午9点多，第二次来到飞机失事现场。主要是检验尸体并安葬。我们把尸体由北向南编为一至九号，然后逐具进行察看，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尸体面部大都已模糊不清，无法确认，根据事后验证，一号尸体为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左臂骨折，小腿有茶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流凝至脑后；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二号尸体为林立果，衣服全部烧光，皮肤烧伤不重，左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眼眉及头发焦而未烧完；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凶恶。三号尸体为刘沛丰，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受伤严重，鼻尖以上全部裂开，正如俗语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四号尸体为特设机械师邵起良，头顶有一伤痕，血迹流经右耳上部至眼角，面部眼眉以下至下腭全部摔烂。五号尸体为林彪，衣服全部烧光，皮肤烧灼不重，头皮有绽裂，露几道头骨；眉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右门牙至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顺额部流至右头顶；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右手心都烧起燎泡，整个尸体削瘦、短小、肿胀，看上去像个孩子。六号尸体为机械师张延奎，头发略焦，眉毛全无，舌外吐，鼻尖有左嘴角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翻转身来，撒尿约十几秒钟，似乎内脏尚未烧坏。七号尸体为空勤机械师李平，头发焦而未脱，鼻尖以上至两眉以下，面皮烧伤较重，肚皮上亦出现焦油状烧痕。八号尸体为叶群，烧灼最轻，衣服全烧光，头发基本完好，只额前略焦；两眉焦而未脱，右眼角有一银元大焦痕，左嘴角烧伤，左臂内身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脚底均烧伤起泡。九号尸体为驾驶员潘景寅，衣服全烧光、皮肤烧灼较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层层，糊成一片，头发全焦，胸部左右锁骨上下，两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大腿焦泡连连。

以上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不个个都是焦骨残骸，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地毁坏过程中造成的。大部伤势都不重，而且躯干完整。但皮肤烧灼都较厉害，而且多数尸体都难以辩认。从个别尸体似有火中挣扎状来推测，飞机爆炸一瞬间被摔昏而未完全死去，是被草地大火烧死。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均呈樱桃红色，加以停放已达80小时，个个僵硬肿胀似蜡人，看上去显得比较年轻，特别是那具女尸当时看来只有30岁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好像作了准备。

逐个查看尸体后，即按蒙古的习惯进行入殓埋葬。最后举行了简单的致哀仪式。

飞机坠毁的原因

根据蒙方的看法，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的影响下，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另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50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由于自然现象成灾的因素可能性不大。

从现场周围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的距离，以及死者身躯烧伤不重，尸体完整，无高空摔折等情况来看，不像在空中着火爆炸，而是接地后爆炸着火。从现场的一些情况分析，飞机擦地痕迹29米后消失，说明机身曾经跃起，右翼外展部分(有"中国"两字)摔在联装座架左手的火场边缘，右翼内展部分(有"民航"二字)技术研究，对尸体进行的法医鉴定，特别是对机上的三个机械师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机的经过进行调查，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他们三人原来就是三叉戟机组人员，曾多次执行过专机任务，家庭出身、政治历史没有问题，现实表现较好，技术比较熟练。9月6日确定"256"号代替"子爵号"飞机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后，由空34师100团政委提名他们三人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专机任务，留场待命。12日林立果去山海关是当日下午5时临时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没告诉他们去哪里。当时潘景寅还向机组布置明晨6时30分起床，7时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道飞机要到哪里去。深夜12时左右，潘景寅突然叫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惶来到机场，这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他们三人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至于失事飞机的几个尸体头部有血迹，而且一般流向右边，即由北向南(六号尸体血迹流向左边，因其头朝西血流方向也是由北向南)，说明是飞机爆炸时撞伤，急速甩出所致。尸体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弹孔。五号尸体(林彪)更没有外电所传的蜂窝状窟窿。

蒙方对这次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比较克制，虽然提了口头抗议，但语气缓和，而且很快同意并安排我们去现场视察，视察中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由于蒙方的友好协助，我们的视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为中央了解林彪叛逃的下场及时提供了真实情况，发挥了使馆前哨站的作用。

(原载1988年1期《党的文献》，
作者：孙一先　沈庆沂　王中远)

叛机在清晨降落

1971年9月13日清晨。燕山脚下的怀柔县。勤劳的社员迎着晨曦陆续走向田间。忽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渤海所村和景峪村之间。只见人们好奇地跑到直升飞机降落的地方，与此同时，两村的民兵也不约而同地奔向飞机降落地方。人们谁也不会想到，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当时，我是军代表、怀柔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天早上6点多钟，我刚刚起床，县革委值班室便传出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值班员说是本县沙峪公社阎副书记打来的电话，说一架飞机降落在渤海所村景峪村北处。他既没说飞机的国别，又未说飞机型号。我和县里的几位领导当即紧急商议，认为不是国内飞机出了意外事故，便可能是外敌的侦察飞机入侵，不论哪种可能，都要认真对待。当即议定：一是由我和武装部朱部长迅速赶赴现场，查明情况，见机行事；二是迅速报告北京市委和卫戍区，并通报当地驻军。

6点半左右，我们乘坐北京吉普风驰电掣般地向渤海所村驰去。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还带了一个警卫人员，并备了一支冲锋枪。

县城距出事地点并不太远，不大功夫，我们便来到了渤海所村头，这时村边已聚集了很多人，我们车子刚停下，便看到了好几个民兵手持镰刀和砍刀，押着一个30来岁的男子过来。这人上穿白色长袖衬衣，下着蓝裤子，右腋下夹着裹着手枪的绿色军上衣。此人看上去身体很壮实，只是鼻子扁平的脸上露着仓惶和沮丧的神色。一看外表，就知道此人是空军的一名干部。

不等我们盘问，他便主动自我介绍，他叫李伟信，是上海空军部队的一名干部，并说这架坠落的飞机上共有五人，两个人在旁边玉米地自杀了。他们要叛国出逃。我们来不及细作审问，立即命令刚赶到的县公安局的同志将他看管好，便向现场奔去。

渤海所村南景峪村北有一条不大的小溪。此时一架标有军徽的3685号直升机，坐南朝北，横骑在河床上。直升飞机的四周十几米外，守护着手持农具的民兵们，这是因为为防止"文革"打派仗，民兵们的武器已全部收入仓库。我和朱部长走近飞机，粗略地看了看：

前舱一名年轻的驾驶员伏身在驾驶坐位上，胸部已被子弹射穿，鲜血染红了衣服和座椅。右边是另一名驾驶员的位置，椅子的靠背上也有穿过的弹洞，看样子在这之前机上曾有一场激烈地拼杀。

民兵告诉我们，飞机上下来的一个人到南边景峪村去了。我们没有细查飞机上的情况，就很快赶到小村生产大队部。我们到时他已向沙河机场他的上级机关打过电话，这人个子不算高，中等身材，上身穿的皮衣，下身穿蓝裤子。我们问了问情况，他说他叫陈士印，是飞机大队副大队长，是奉命执行任务，并说飞机是要叛国出逃，还说了一些其他事情。民兵又告诉我们玉米地里发现了两具尸体，所以对他也未加细问，把他交给了民兵加以看管。并很快赶到了发现尸体的玉米地里。

在飞机坠落处西北方向大约500米处，一块长得很茂盛即将成熟的玉米地里，躺着两个身着空军服装的男子，他们并排头东脚西地躺着，各人手边都有一支手枪，每人的太阳穴上都有射穿的洞，喷溅的血洒得满地都是。两个人中，一个较胖，且秃顶，年约40多岁；一个较瘦，年约30多岁。那个胖子右手腕出了一些血，用手帕裹着出血处，还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黑凉鞋。从李伟信的交待和他们身上带着的证件看，那个胖的叫周宇驰，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另一个叫于新野，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副处长。

通过现场察看和李伟信、陈士印的交待，我们初步印象，这是一场严重的叛国事件。

大约是8点钟左右，北京卫戍区的李刚副司令员来了，卫戍区驻当地部队的师团领导及负责勤务的小分队也随李副司令来到现场。我们立即向副司令汇报了情况，并带他察看了现场。根据李副司令的指示，由三方代表（县革委、县武装部和卫戍区当地驻军）组成现场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现场工作的指挥和调度，我代表县革委参加了指挥小组的领导工作。现场总指挥是李副司令。自他来到现场后，我们就在他的领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各项工作。小分队到后很快从民兵那里接过了现场的警卫，并封锁了该地区，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当我们正在察看现场时，空军沙河机场一个连长带领20多人员全副武装乘一辆大卡车来到此地，说奉他们首长命令来处理直升飞机事，机警的李刚副司令当即决定不准他们接近飞机。李副司令问那位连长知道卫戍区有规定不经卫戍区批准部队行动不能携带武器，他说不知道，为此就根据卫戍区的有关规定将他们带的全部武器收缴了，命令他们到当地卫戍区部队营房休息待命。一些其他人员也是受到了同样待遇不准进入。小分队很快架通了与上面的电话，李副司令迅速地把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根据上级的指示要尽快把两个活人李伟信和陈士印送走。那时林彪从山海关乘机逃跑，中央和上面有些机关是知道了这件事同林彪有密切联系，我们不知道，但李副司令略知一二，所以当时情况很复杂，应该送往哪里呢？李副司令经多次请示，特别自己进行了周密的考虑才决定还是先送到卫戍区。为了确保不出意外，决定由驻军张团长和县武装部朱部长各乘一辆车押送二人。车一路没停顺利地送到了指定地点，听候中央的命令。

在李副司令的指挥下，我们对直升机进行了彻底的清查，并一一进行登记和拍照。我是第一个登上飞机的，在驾驶室里，搜出了一幅"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行图，在周宇驰的座位上还发现了一张苏联伊尔库茨克机场导航资料和图表数据。不用说，飞机是准备飞往苏联的。在飞机的后舱里，有几个军用背囊里面装满了中央和军队的各种绝密文件，还有小型录音机和一大笔美元。此外，在舱里还有一只木箱，装有一支冲锋枪和数百发子弹，整个飞机除在前舱玻璃和舱壁上有几个枪眼外，其他都是完好的。看来，飞机能够平稳地完好地降落在此处，驾驶员是用了相当的心思了。我们也检查了驾驶员，他叫陈修文，瘦高个，30多岁，没有穿飞行服，只是穿了一身普通的空军夏服，上衣兜只有一个空香烟盒，裤兜只有一条手帕，可以看出他的出勤是毫无准备的。

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身上也没带什么东西，只是各带两支手枪。

清查完后，很快就将陈修文的遗体和周于二人的尸体及文件物品送往北京。

中午，我们和战士们一起在现场休息，吃饭。大家一边吃，一边议论。说到周宇驰自杀后的那副狼狈相，有的战士突然对周宇驰穿一只鞋发生了兴趣，有人建议，应该马上把另一只丢失的鞋找回来。我和其他几名领导同志也觉得，作为现场的物证材料，能够找回来当然更好。于是，由一位亲眼见到他们行走路线的民兵连长带路，几名战士便去寻找那只丢失的凉鞋。周宇驰等人离开飞机也不过走了几百米，那只丢失的凉鞋很快便找到了。在找鞋的路上，大家还发现了许多被撕得粉碎的纸片，几个有心的战士凡是能找到的纸片，都一一地搜集回来。为了给上级有关部门提供比较全面的物证，我们把它细心地包好，全都送到了北京。这些在田间地头凑巧拣回的碎纸片，后来成了林彪搞政变更为重要的物证材料之一。当然，我们知道的具体内容还是一个月后从中央文件上看到的。

纸屑连同三具死尸及其他物证材料送回北京后，有关方面的专家对碎纸片进行了拼接复原。原来这是林彪

亲笔书写的两份重要材料，一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政变的手令，上面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另一份材料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记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重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　林彪　九月八日"。原来这两封信都写自九月八日。是林彪要他的死党刘沛丰当日交给林立果，并要林立果亲手将后一封信交到黄永胜手中的。林彪万万没有料到他的亲笔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正好作为其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重要物证，终于昭然于天下。

"3865号直升飞机事件"的原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从李伟信、陈士印的交待和后来了解的情况，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

13日凌晨，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都在空军学院，周宇驰突然找到李、于说，他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决定立即北飞。大约在3点钟，他们赶到北郊沙河机场，找到两名直升飞机驾驶员，也就是陈修文和陈士印。周宇驰因在那里学习过开飞机，所以能很快直接找到人。周宇驰命令他们快加满油，准备起飞。因直升飞机前后舱是隔开的，前后不通，前面只能坐三个人，所以周宇驰说他坐前舱，要于新野和李伟信坐后舱。飞机起飞后李伟信心里总打鼓，声音颤抖地问于新野："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于新野壮着胆子说："不成功便成仁！"

飞机没飞多远，由于歼击机的迫降，加之驾驶员陈修文已察觉他们的企图，从中作了手脚，飞机不是按预想的方向飞，而开始下降，周宇驰最先发觉了飞机在降落，他厉声逼问："为什么降落？"

陈修文没有理会，飞机仍在继续下降，眼看就要接近地面了。"听见了吗？不服从命令我要开枪了！"周宇驰的话音刚落，他手中的枪响了，子弹射穿了陈修文的胸膛，飞机随即着陆。于新野慌慌张张从后舱钻出来，并懵懵懂懂，毫无目的地向前舱打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中周宇驰的右手腕，浑身溅满鲜血的周宇驰摇摇晃晃地走下飞机，气急败坏地责骂于新野："你为什么乱开枪？把我的手都打坏了！"骂完，周宇驰恶狠狠地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说完，他一手提着枪，让李伟信在前边开路，让于新野搀扶着他，向西北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周要求坐下来休息，他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成了，我们今天要死在这里了！"于新野和李伟信相互望了望，谁也没说话。他们知道遍野都是人，插翅也难逃了。不一会儿，周有气无力地和于、李商量："咱们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如果你们不怕，都自己死。"李、于二人点头赞同第二种意见。于新野像丧家犬一样看看周宇驰说："还是自己死吧，你喊一二三，三人同时开枪好了。"于是三人站起来，面向西方，枪口同时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周宇驰喊："一二三。"三支手枪同时扣动了板机，周、于二人应声倒地，李伟信却朝天放了一枪，他看了一眼两具尸体，收起了枪，用上衣裹好，狼狈地走出玉米地，向民兵投降了。

此事已过去了十七年了，而当时当地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崇高觉悟及英勇无畏的精神仍时时感动着我。

（原载1989年1期《炎黄子孙》，作者：杨发勋）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71年，耳闻目睹仍然是颂歌和样板戏，没有什么新的形式和内容。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上演，一度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使人民在艺术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感受。

歌曲《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1＝F $\frac{2}{4}$ 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委会宣传队

集体词曲

庄严热情、进行速度

从北京到边疆，革命红旗迎风飘扬，祖国大地阳光灿烂，各族人民纵情歌唱。毛主席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英明的领袖，您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着革命前进的航向，您制定的革命路线，是我们胜利保障，您领导的国家巍然屹立在东方。亿万人民热烈欢呼放声歌唱。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从北京到边疆，革命红旗迎风飘扬，祖国大地阳光灿烂，各族人民纵情歌唱。毛主席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英明的领袖，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您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团结坚强，您领导着我们奔向共产主义前方。亿万人民热烈欢呼放声歌唱。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歌曲《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A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宣传队集体创作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的党，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在伟大革命征途中乘风破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航向。万岁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

伟大、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朝气蓬勃团结如钢，反帝反修斗志昂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昂首阔步奔向共产主义胜利前方。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

舞剧《红色娘子军》

十年内战时期，海南岛上的恶霸地主南霸天命狗腿子将奴仆吴清华卖掉，清华闻讯后逃跑。一群恶奴奉命追捕，清华与之展开搏斗，这时南霸天随后赶到，清华在他的毒打下昏死过去。红色娘子军连的党代表洪长青与通讯员小庞化装侦察经过椰林，救了清华，并指引她投奔革命根据地，参加红色娘子军。

为消灭南匪，常青乘南霸天祝寿时，智闯匪巢，以便里应外合聚歼群匪。清华报仇心切，过早暴露信号，致使南贼漏网。常青对犯了错误的清华耐心教育，提高了她的觉悟。

南匪勾结国民党军队进犯根据地。常青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后，为掩护战友撤离，负重伤被俘，英勇就义。不久，红军解放了椰林寨，击毙了南霸天，在火线上入党的清华，接任了娘子军连党代表的职务，红色娘子军连在革命的烽火中发展壮大。

历史档案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

伟大的七十年代第一年过去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中，迎来了战斗的一九七一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

世界处在革命的大变动的过程中。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美帝国主义以及社会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侵略、压迫和控制，推动着亿万人民起来革命。我们看到：各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反对本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紧密汇合；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北美、大洋洲的革命群众运动，互相呼应；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美国人民反对尼克松反动统治的斗争，联成一气。越来越多的小国，敢于拿起枪杆子，坚持战斗，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继续开展。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日本人民反对冲绳美军基地的斗争，有新的发展。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进攻，正在受着更大的锻炼。几内亚共和国击退了美葡殖民者的入侵，胜利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推动了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和颠覆的斗争。被美帝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各国，正在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海权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连绵不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失败，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促进了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不断高涨，使美帝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许多的中、小国家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革命斗争，使哥穆尔卡跟着赫鲁晓夫、诺沃提尼之后倒了台。社会帝国主义在东

欧的殖民统治陷入深刻的危机。这件事不仅说明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一步破产，而且说明修正主义统治的脆弱性。

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反帝反修的斗争中并肩前进。我们同越南劳动党、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紧密团结，互相支援。我们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正在斗争中进一步联合起来，充满信心地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站在一个行列。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从实力地位出发，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人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向他们学习，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为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而共同奋斗到底。

过去的一年，我国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标志，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地结合起来。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广大 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运动，正在健康地深入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农业连续九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新的高涨。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越来越旺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叛徒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导党和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毛主席在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且教导我们：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坚决执行这条路线，我们就能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有了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新中国，才有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今天。这个历史经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一天也不能忘记。

一九七一年，将是我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的一年。我们将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今年，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作为干部学习的主要课题，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的前进。全党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党的高级干部更要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带领广大群众更好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我们要在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把斗、批、改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扎实。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开好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继续抓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今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毛主席教导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第四个五年计划

期间是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我们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努力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各地党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

今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继续贯彻执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要全面地按照四好的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革命化、战斗化建设。要搞好民兵建设，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全国军民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3月22日　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不甘心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失败。他认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便开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2月，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到苏州的一所别墅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3月18日，林立果等从杭州到上海。3月21日，林立果按林彪、叶群的指令，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司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司副处长）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座楼房的密室进行 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接班"；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泽东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接着，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林立果把这个武装政变计划叫做《"571工程"纪要》。林立果要于新野按在杭州密谋的框框，负责文字起草工作。3月22日至24日，罪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完整地炮制出来了。全文包括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九个部分。他们妄图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强调"不管准备或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特种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杀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氏天下。按照这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的规定和要求，林彪反革命集团立即行动起来，急不可耐地加紧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步伐。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在"批陈整风"过程中，为了打破林彪集团包办的一统天下的局面，1974年4月党中央决定李先念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参加从4月15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有449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讨论了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3月被迫写的书面检讨。党中央、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告诫叶群要从路线上端正态度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指出军委办事组（改组之前）"欺骗中央"，"老是被动"，要求他们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会议继续深入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会上还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会议交流了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4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再一次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周恩来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宣布：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为第二政治委员。并决定由刘子厚担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组

长。

4月29日 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李四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李四光，字冲揆，卓越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湖北省黄冈县人，生于1889年。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解放前一直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立即由英国启程返国，途中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于1950年5月回到北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忠于祖国，忠于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地质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遗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地质学》、《地学力学概论》、《地震地质》以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6月15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谢觉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谢觉哉，又名焕南，湖南省宁乡县人，他生于1883年，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任《湖南民俗报》总编辑、《湖南民报》主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26年12月，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后在上海、沈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秋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8月14日～9月12日 毛泽东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湖北、河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着重谈了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同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及同他们一伙关系诡秘的人。在武汉，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在长沙，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在杭州，毛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原7350部队政委陈励耘的经历和他同吴法宪的关系。毛泽东对林彪及其同伙关于林立果的种种吹捧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指出“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南昌，毛泽东还特地把许世友等人从南京叫来，向他们讲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出：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在南巡途中，一路上毛泽东还多次带领被接见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亲自逐字逐句地讲解这两首歌词。毛泽东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对于动员党员、干部起来同林彪一伙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应付林彪一伙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

9月5～13日 林彪反党集团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5日和6日，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谈话内容，为林彪一伙所窃取。他们猜测在国庆节前后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决定实行两项反革命阴谋：1.乘毛泽东外出巡视之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林彪以“接班人”的身份宣布“接班”；2.如上一计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同日晚，林立果同周宇驰、江腾蛟等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密谋，或用火焰喷射器和四〇火箭筒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或用一〇〇高炮平射打火车；或让王维国带上手枪，乘毛泽东接见时，在车上动手；或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9日和10日，林立果等又密谋，继续具体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除了8日夜间提到的一些办法外，又提出了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通过时，炸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他们还提出了让陈励耘派飞机轰炸火车等办法。同期，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通过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高级接触”，部署反革命政变。但是，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已于11日下午乘列车提前离开了上海，并于当日晚上10点多钟安然地通过苏州车站，跨过硕放铁桥。这就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12日，

林彪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后，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并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晚，毛泽东安抵北京。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得知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飞机叛逃，立即向北京报告了情况。周恩来总理获悉报告后，立即向吴法宪查问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下达限制飞机起飞的措施。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还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场站下达指示：256号专机必须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惊恐万状，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密谋。当晚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阴谋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13日零点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仓皇登上飞机，命令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坠落，机上8男1女全部摔死。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彻底破产。"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9月14日～12月　"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及其罪行进行了清查和处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党高级干部通告林彪仓皇外逃，自取灭亡。10月1日以后，逐级下达，使全党、全民都了解事情的真相。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待，而且活动频繁，毁灭罪证，党中央遂于9月24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交待问题。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夺回了被林彪一伙所篡夺的权力。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等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到后来的1973年8月20日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党中央批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与此同时，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的学习和讨论，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1.对林彪一伙长期以来相互勾结，阴谋抢班夺权，制订《"571工程"纪要》，计划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2.对林彪一伙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和他们利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许愿等手段，拉拢腐蚀干部，结党营私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组织纪律，破坏、取消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3.对林彪一伙所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最、最、最"、"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等等形而上学的论调和"天才"论进行批判；4.结合批林，以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进行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教育，进行组织纪律教育；进行加强党的领导的教育；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和党的干部政策教育等等。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还要求全国各地结合这一运动进行理论学习，认真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书，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起来揭批林彪一伙的反党罪行，争取当时国家形势的好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仍受"左"倾思想的指导和江青等人干扰和破坏的严重存在，它不可能彻底完成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清算林彪一伙反党罪行的历史任务。同期"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这时期起至1972年底，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极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结合批林整风运动，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纠正极左错误，并克服它在经济、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为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国内形势开始出现了新局面。

经　济

1月21日　川西平原人民改造都江堰渠系工程基本完成。都江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建的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它引岷江水灌溉四川省西部平原的农田，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解放后灌溉面积不断扩大，但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仍满足不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它的渠道存在着"长、多、宽、弯、浅、乱"等缺点。有的100多公里长的渠道，灌溉时"上游饱，中游缺，下游干"；排水时"上游畅，中游满，下游淹"。有的渠道上下18拐，占地多，造成下湿田多，不利于机耕，因此，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1970年春天，四川省领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都江堰渠道的设想，并于同年8月正式作出决定，把改造都江堰渠系工程列为全省水利重点工程之一，得到

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拥护。川西平原200多万水利大军，只用一个冬天就基本上完成了原定3个冬春完成的改造都江堰渠系的主要工程，为这一地区农业的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月24日　京郊治涝工程3条主河道通水工程提前完工。流经北京市东南郊区的温榆河、凤河、港沟河，是海河水系上游的3条河流。过去，这3条河由于槽浅、河道窄，历史上多次泛滥成灾，严重妨碍着北京郊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北京市郊区广大人民群众出动10万民工，从1970年10月上旬到12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已提前胜利完成3条主河道通水工程。从而使北京郊区四分之一的耕地改变了低洼易涝的局面，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继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工程之后的北京市的又一大规模水利工程。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豫皖苏鲁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经过20年的治理，陆续建成一批中小型和大型水利工程，兴建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入海出路。各地还兴建了一批水利排灌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淮河流域抗御洪、涝、旱灾能力大大加强，灌溉面积迅速扩大，使多灾低产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8月11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银行利率，其中贷款利率降低30%左右，存款利率降低20%左右。

8月14日　国务院决定提高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降低部分支农产品、机械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

11月30日　国务院决定对1957年以前的三级工、1960年以前的二级工、1966年底以前的一级工，升一级工资，这次调资面为28%。

12月5日　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一指示，集中地体现了周恩来自“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对林彪、江青一伙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生产管理制度要进行整顿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曾不断地强调整顿问题，并亲自领导了整顿的工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建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接着，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拿到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进行讨论。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原则，提出要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允许少数重体力劳动搞计件工资。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上述两个稿子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它对实际工作却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为了扭转林彪一伙鼓吹“空头政治”导致的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的错误倾向，周恩来在1972年8月8日接见回国大使时，明确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在这一年里，周恩来还连续抓了出口援外产品，国内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号召广大职工为革命学文化、钻技术。为了解决林彪一伙搞独立的大军工体系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国防工业的管理体制作了较大的调整。1972年11月，国务院将分散在军委各部门领导的35个电子工业企业，划归四机部统一管理。以后又把林彪一伙强行上收的那部分军工企业，重新划归地方领导，并撤销了林彪一伙把持的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统一领导几个军工部门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农村着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同时还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社员分完兑现的各项具体政策。为了刹住“穷过渡”的歪风，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的罪行。

1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路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1970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解放前增长了7.9倍，民用汽车增长9倍，70%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大部分生产大队都通了汽车。近5年来，全国新建公路十几万公里。1970年铺的沥青，渣油路面里程比1965年增长5倍，民用汽车增加了60%，运输成本降低19%。特别是一些原来交通比较落后的山区，公路建设发展更为迅速。

军　事

1月11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说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通过要求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外　交

1月25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2月10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埃及首都开罗签字。宣布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12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孙德胜、同苏发努冯亲王，分别于8日和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3月5日～8日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3月8日，在河内周恩来和范文同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3月13日　台湾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三等秘书孙际洲回到祖国首都北京。孙际洲不满台湾当局的反动统治，在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前往西贡途中，于3月5日在日内瓦起义，毅然回到祖国首都北京。

3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府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科威特签署，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25日～27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问中国。

3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月7日　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是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等4项冠军。

4月14日　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在4月10日，在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来中国访问的。

5月6日　中国和圣马力诺关于建立领事级正式关系的议定书在法国首都巴黎签字。两国政府决定现阶段自1971年5月6日起建立领事级正式关系。

5月26日　中国和奥地利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签字。决定自1971年5月28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6月1日～9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亲切友好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就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6月6日，中罗两国联合公报在北京签字。

7月9日～11日　周恩来总理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举行会谈。7月16日发表会谈公告。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7月10日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的邀请，到达平壤，参加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定10周年庆祝活动。同日，以朝鲜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仲麟为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应中共中央和我国政府的邀请，到达北京参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庆祝活动。

8月16日　我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8月20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声明指出：1971年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宣称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指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权”。这是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9月24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9月21日出动大批飞机轰炸越南北方广平省的罪行。

10月6日～13日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9日，我国政府同埃塞俄比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

10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商谈，基于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决定恢复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工作，并将派出大使。

10月13日　我国同布隆迪在达累斯萨拉姆签署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布隆迪共和国政府为了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决定自即日起恢复两国之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10月20日～26日　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

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在此之前，本届联合国大会曾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从10月18日开始，进行了一周的专门辩论，并对美国和日本佐藤政府等联合炮制的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这一提案被否决。2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关于联大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的正式通知。29日，我国政府就26届联大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决议发表声明。声明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痛斥了美、日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了中国永远不做欺负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的严正立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并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及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大第26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57个国家的代表和大会主席致欢迎词。乔冠华团长在会上发表讲话。

11月2日～13日　由朝鲜、埃及、日本、毛里求斯、尼泊尔和中国乒乓球协会共同发起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

11月9日　我国和黎巴嫩在巴黎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1月12日　我国和卢旺达在基加利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1月18日　我国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这是我国为了防御而进行的必要和有限制的一次核试验。

11月20日～27日　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

12月7日　我国和塞内加尔在达喀尔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2月8日　我国和冰岛在哥本哈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2月14日　我国和塞浦路斯在纽约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2月16日～29日　我国外交部和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先后多次分别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和印度外交部就印度武装人员和印度飞机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事件；就印度政府纵容印度人和西藏叛匪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挑衅事件，分别向印度政府和印度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

12月16日　我国政府为反对印度对巴基斯坦继续发动侵略战争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的正义立场。

同日　由苏丹民主共和国副总统兼国防部长人民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率领的苏丹政府高级代表团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的访问。

12月30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日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划入日本"归还区域"，重申我国对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声明指出：不久前，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现在，日本佐藤政府竟然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私自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本来就是非法的。现在，美、日两国政府再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科技文教社会生活

3月3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量221公斤。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266公里，最远点1,826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9.9度，绕地球一周106分钟。卫星在运行过程中，用20,009兆周和19,995兆周的频率，成功地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

4月15日～7月3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是在张春桥、迟群等操纵和把持下进行的。会议一开始，上海的徐海涛等人抛出了"黑线专政论"，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谬论曾受到一些与会者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受到张春桥和迟群等人的压制。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于7月6日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并针对会议上关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毛泽东主席也曾指示，估计17年教育工作不要过分。但是，张春桥、迟群一伙封锁了毛主

席的指示，抵制周总理对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张春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会上，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炮制出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作出了所谓“两个估计”：一是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二是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还说“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是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中共中央于8月13日批转了这个《纪要》。由于“两个估计”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成就，因此，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工对《纪要》中的“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遭到了张春桥、迟群等人的压制和打击。“两个估计”极大地挫伤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教育战线广大群众起来批判“两个估计”，要求拨乱反正。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7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在近几年中，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展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发掘和清理了很多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发现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在这些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历史文物，有的是以前很少发现或第一次发现的。例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公元前100多年）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两座古墓，墓凿成于石山之中，工程艰巨，规模宏大，浑如地下宫殿。墓中有各种铜器、金银器、陶器、漆器、丝织品、车马具等随葬品2,800多件。其中有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两套“金缕玉衣”。这两套“金缕玉衣”，是以玉石琢成长方形的小薄片，四角穿孔，并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缀联而成，贴身穿在尸体上，企图保存尸体不朽。在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一空，两件玉衣的部分金线和玉片已经断裂，现经整理、加工，已全部复原。这些历史文物，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中外友好往来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8月7日　新华社报道：海河水系“北四河”的主要工程之一——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的开挖治理工程已胜利完成。“北四河”包括海河水系北系的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和蓟运河。永定河原是海河北系最大的一条河流，流经河北省和北京市郊区，到天津市北郊区屈家店同北运河相接，汇入海河。由于永定河含沙量较大，中游河道逐年淤高，因此常常溃决改道。特别是汛期洪沥争道，不能畅通下泄，给河北省和京津沿河地区造成洪涝灾害，严重地威胁着天津市和京山铁路的安全。而在天津市北郊区屈家店到塘沽区北塘海口之间，新开挖的长63公里，宽500米，深4—8米的永定新河，可使汛期来自永定河、北运河的洪水不再流入海河，而通过永定河直接入海。再加上同时开挖成的北京排污河，就不仅能够免除洪水对天津市和京山铁路的威胁，为河北省北部平原和北京、天津两市郊区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成功地用X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2.5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这是继我国首先在世界上人工合成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以后，在蛋白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大分子，它含有约700个原子，原子之间的距离为1.5埃左右。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直接观察到这样微小的空间结构，而是借助一种叫做X光衍射的方法间接推算得到的。经鉴定的结论是：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可靠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它为以后研究胰岛素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上又前进了一步。

10月28日　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革命团结及革命纪律性，《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人民日报》刊登了《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并发展评论员文章：《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在近几年间，出土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包括一批比较重要的原始文化的遗物。武威县雷台的群众，在1969年发现了一座东汉墓（公元25—220年）。墓内出土金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漆器、石器共220多件。墓中发现了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品——踏飞燕的奔马。它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铜质奔马，长尾翅举，作昂首嘶鸣、飞腾前进状。为了显示奔马的飞驰，作者大胆想象，在马的右后蹄下踏着一飞燕，其他三脚悬空，赋予了深刻的意境，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2 年

导　言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文革”一时进入“波谷”时期。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出现了转机。

1972年元旦社论，强调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国民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企业管理混乱，工业生产发展滞缓。周恩来鼓励各级领导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6.6%。

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1972年1月，周恩来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作的悼词中，肯定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4月份，在周总理指示下，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1个月内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了体检。有些同志还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获得自由，住院检查，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我国外交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经过谈判，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20多年以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9月，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我国，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协议。在1971年和1972年两年中，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一切活动贯彻着一个基本精神，即纠正“左”的错误。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讲话的精神，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的3篇文章，代表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愿望。

但是，“四人帮”攻击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是“大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就无形中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助长了“四人帮”的气焰。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尼克松访华
- ●1972年的整顿
- ●“拥政爱民”运动
- ●中日关系正常化
- ●普及教育运动
- ●“红旗一五一事件”
- ●何香凝逝世
- ●陈毅逝世

尼克松访华

背景介绍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当时的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不能自拔，最大的对手——苏联又在国际上向美国发起凌厉攻势，严重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由于越战的重负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中国此时的“文化大革命”亦日趋陷于困境，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国际上西方大国的封锁依然没有放松，外交上与美、日、德等经济大国隔绝。珍宝岛战役后苏联重兵压境，两国边界气氛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因此，对付苏联的共同国家利益使得美中两个大国有走到一起的必要。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使了尼克松的访华，这一次访华意义深远，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他访华的一周“改变了世界”。

材料：

·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来中国访问

材料　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来中国访问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于二月十七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

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正式成员有：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总统助理罗·霍尔德曼，白宫新闻秘书罗.齐格勒，总统军事助理空军准将布·斯考克罗夫特，助理国务卿马·格林，总统副助理德·查平，总统特别顾问约·斯卡利，总统特别助理帕·布坎南，总统私人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国务院司长艾·詹金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约·霍尔德里奇和基辛格的高级助理温·洛德等十三人。

在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离开白宫时，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在场送行的有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和他的夫人，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以及内阁成员等。尼克松总统的两个女儿也在场送行。

尼克松总统一行在来中国途中将经过夏威夷和关岛，并作短暂停留，预计将在二月二十一日到达北京。

尼克松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发表讲话。他说：“这将是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当然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将到那里进行的一周会谈而完全消除。”

他说：“当我们瞻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据报道，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对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表示支持。民主党参议员汉弗莱发表声明，希望通过这次访问，美国同中国“初次实现非战争状态的对话”。

又据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

（新华社1972年2月18日讯，
2月19日《人民日报》）

1972年的整顿

背景介绍

“九·一三事件”后的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还把党政军的重权交给周恩来等人。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发动和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力争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以求发展。1972年的头九个月，在周恩来的整顿下，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起色，工农业建设均取得一定的成果。

材料：

· 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 我国基本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

材料一　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农业生产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多年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支援世界革命人民，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全国人民的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本身的进一步高涨，都要求农业战线在继续增产粮食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进一步实行全面发展。

能不能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指导思想如何。必须把这个重大的方针，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必须狠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干扰和破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指明了，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只要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办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依靠广大群众，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扩大多种经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过去狠抓粮食生产是正确的，今后也必须把粮食生产抓紧，决不可稍微放松。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说不上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继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同时，也必须注意，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进的。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方面确有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才更有利于使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和有各种专长的社员各尽其能，而且在各个季节都有活可干。发展多种经营，可以为集体经济积累更多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这就又可以腾出更多劳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滩、"四旁"等等，单一生产粮食不便利用的，实行多种经营就都能排上用场。肥料不足，从发展牧业、林业、油料、养蚕等等方面，正好可以开辟更多的肥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地力、物力的潜力是可以一挖再挖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综合利用，正是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一条广阔的道路。这样做，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对此，应当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资本主义的多种经营，有社会主义的多种经营，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决定于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只顾赚钱，不顾国家计划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样搞多种经营当然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是必须批判、必须制止的。但是，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正是为了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战胜资本主义势力，才更要下气力领导群众搞好多种经营。这个重要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我们不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那就等于在这个阵地上给资本主义让路，那才是错误的事情。

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教育社员先公后私，反对弃农经商。

以粮为纲，是就全局而言。就各个不同地区来说，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积极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和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生产。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区、林区、渔区，应分别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为主。这些地区，当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单一经营；但是，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或留粮标准，要保证每人平均口粮不低于附近粮食产区的一般水平。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不是不看实际情况，不分主次缓急，一涌而上。多种经营的项目很多，必须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国家的计划，适应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需要，统筹安排。要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

国营经济应当尽力促进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业部门要提供多种经营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商业部门要加强多种经营的产品的收购工作，正确执行党的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批判

资本主义倾向，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全面规划，落实党的政策，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一定能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4月16日）

材料二　我国基本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我国基本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形势很好。

一九七一年，全国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总额比一九七〇年有较大增长。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化工、轻工、纺织、交通运输和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进度都比较快，工程质量也较好。数以百计的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大型钢铁基地、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汽车厂、化肥厂、造纸厂、煤矿、铁路、公路和水利工程等，陆续建成投入生产和交付使用，使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快的增长，工业布局进一步得到改善。

我国基本建设所取得的新成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去年以来，基本建设战线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开展批修整风，深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基本建设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

去年以来，各级党组织通过狠批"条条专政"，进一步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促进了基本建设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各地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下，在抓好大型骨干工程建设的同时，注意了多搞中、小型的工程项目；在发展基础工业的同时，注意抓好农业和轻工业的基本建设。现在全国多数县已建立起不同规模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小水电站、小有色金属矿等工业企业，使中小型企业成为工业生产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去年小化肥厂和小水泥厂的产量，都已占全国化肥和水泥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不少地区还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资源，建设了一批小化纤厂、小糖厂、小洗衣粉厂，以及其他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小厂，对于改善工业布局、支援农业和增加市场日用工业品的供应，起了重要的作用。河北省衡水酒厂，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只用了几个月时间，花了十五万元，就建成了一座日处理甜菜五十吨的小糖厂，而过去建一个这样的厂一般要一年时间和五十万元的投资。由于发挥了地方积极性，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去年完成的土石方达五十多亿立方米，增加旱涝保收面积三千多万亩，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的指示，一九七一年以来，冶金、煤炭、石油、化工、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和各地方的党组织，普遍加强了对矿山工作的领导。他们充分发动群众，狠批刘少奇一伙的"先建厂、后建矿"，只搞加工、不抓原料、材料的反动方针，掀起了大打矿山之仗的群众运动，使全国的矿山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去年新增加的铁矿石的开采、精选和烧结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为今后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本溪钢铁公司对已经投产的南芬铁矿进行技术改造，大挖潜力，去年的产量比设计能力增加了一半；他们还采取"会战"的方法，集中力量建设歪头山铁矿，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三百多万吨的采矿能力，并相继建成四个选矿系列和一台大型烧结机投入生产，比过去建设同等规模的采矿、选矿、烧结工程，要少用一两年的时间。沿海和内地的许多省、自治区，小铁矿的采矿能力也有较快的增长。邯郸冶金采矿公司，依靠群众，多搞小矿山，老矿带新矿，促进了矿山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去年铁矿石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了三倍多。煤矿建设继续取得进展。去年矿井掘进进尺，比前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有些过去的缺煤地区现在已基本上实现煤炭自给。

基本建设战线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去年的建设工作中，根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认真抓收尾、配套和续建工程，使更多的基本建设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发挥投资效果。许多省、市和部门，集中人力、物力，优先保证收尾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去有些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少数设备或者辅助工程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去年以来，各部门注意了填平补齐工作，使这些项目迅速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能力。仅电力部门通过这样的措施，就提高了发电能力几十万千瓦。

一九七一年，各地基本建设部门还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革新活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普遍实行有工人、干部和设计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现场设计，大搞设计工作的群众运动。他们学习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吸取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做出了一批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好设计。群众性的设计审查，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各地的科研、设计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继续研究、试制和推广了一些新结构和新工艺。去年在各地的工业建设中，较普遍地采用了各种轻型的厂房结构，这些结构可以节约钢材百分之三十、水泥百

分之四十左右。

（1 月 9 日《人民日报》据新华社讯）

“拥政爱民”运动

背景介绍

“九·一三事件”后，对于解放军与全国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由“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变成“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并且强调解放军要“拥政爱民”。1972 年一月初发动了这个运动。目的是对军队进行整顿，加强部队的“革命性”教育，加强部队与群众的联系，加强部队间、部队与群众间的团结以清除林彪集团的影响。“拥政爱民”运动本身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

材料：

· 全军广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

材料　全军广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伟大教导，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广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进一步增强军政、军民之间的革命团结，加强了部队的革命化建设。

全军各部队坚决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一九七二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通知》，在最近迅速展开了拥政爱民运动。各部队领导机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知》，对广大指战员深入进行人民军队建军宗旨和光荣传统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搞好拥政爱民运动意义的认识。北京、沈阳、南京、昆明、兰州等部队许多团以上领导干部，顶风冒雪，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连队、哨所，向广大指战员讲解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的精神，宣传人民解放军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回顾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团结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带领大家深入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广州、福州、济南、武汉、成都等部队和新疆军区，派出群众纪律检查组，认真检查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还举行军政、军民座谈会，总结过去一年拥政爱民工作的经验，制订拥政爱民的措施。在井冈山时期创建的老红军部队北京部队某团，春节前专门派出负责干部到驻地的县委和县革委会，汇报过去一年来部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收获，听取地方党政机关的人民群众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的团结。党的好干部门合同志生前担任过指导员的某部五连指战员，同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大滩大队党支部一起学习《通知》，指战员们决心以门合同志为榜样，同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由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达斡尔等九个民族组成的新疆军区某部六连指战员，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顶风冒雪赶到附近大队宣传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虚心向各族人民学习。战斗在三支两军第一线的各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此期间也都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广泛征求工人、贫下中农、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决心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和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夺取斗、批、改的新胜利。

在拥政爱民运动中，各部队指战员学习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经验。天津驻军某部党委组织指战员到天津第二毛纺厂、天津第四棉纺厂，请老工人介绍学哲学的经验和体会，使干部、战士受到了很大教育。吉林驻军某部指战员，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东盛大队，听取黄顺玉介绍她认真看书学习的好经验。昆明部队某部二连和某部二营，在春节前夕分别来到全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云南第三矿和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沧源佤族自治县红九公社阿佤大队，学习工人、贫下中农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先进事迹，上了一堂生动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课。

在这同时，许多部队还热情邀请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到部队作报告，介绍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和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经验。不少部队还派出学习小组，深入到工厂、矿山、农村，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并肩劳动，虚心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四川省石棉县武装部的干部战士专程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请安顺公社的干部讲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介绍安顺人民学习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大渡河上投石断流，扩大耕地面积的情况，并且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改水造田的战斗。郑州警备区指战员专门邀请当年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给部队讲述四十九年前京汉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跟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历史，学习工人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彻底革命精神。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中，一面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一面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革命传统，满腔热情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许多部队派出文艺宣传队、医疗服务队，深入山村、海岛、边寨，热情

为各族人民演出和防病治病。正在野营训练的许多部队，走到哪里就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沿途为人民做好事。具有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的沈阳部队某部三连战士，自己制作幻灯机和《白毛女》、《收租院》等幻灯片，在野营训练中沿途为人民群众放映。驻在海南岛五指山区的某部指战员，深入苗村黎寨，和贫下中农一起修理各种农机具，一起积肥、运肥，支援春耕生产，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提前完成了备耕任务。

在拥政爱民运动中，驻守在祖国千里边防、万里海疆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和驻地各族人民群众畅谈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的同时，共叙军民团结战斗，共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革命情谊，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民联防，把祖国的边防、海疆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

中日关系正常化

背景介绍

中日两国在1972年前虽然外交上处于互相隔绝状态，但民间往来一直没有中断。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日本迫于寻求国外的市场，自然中国便成为其首先考虑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日本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需要亚洲的稳定。其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使得日本认为需要摆脱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态势，树立作为新兴经济大国的形象。因此，日本民间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很高，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亦认识到正常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于是便在1972年9月份进行"越顶外交"，田中首相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

材料：

-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离开东京到达北京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　本　国　政　府　联合声明

材料一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离开东京到达北京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东京时间八时十分（北京时间七时十分）乘专机离开东京羽田机场，直飞北京，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陪同田中内阁总理大臣访问的有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其他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等。

到机场送行的有：内阁副总理大臣、代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通商产业大臣、代外务大臣中曾根康弘，总理府总务长官、代内阁官房长官本名武，法务大臣郡佑一，厚生大臣盐见俊二，农林大臣足立笃郎，运输大臣佐佐木秀世，邮政大臣三池信，劳动大臣田村元，建设大臣木村武雄，行政管理厅长官滨野清吾，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环境厅长官小山长规，外务省外务事务次官法眼晋作。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副议长森八三一，众议院副议长长谷川四郎。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自由民主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长铃木善幸，政务调查会会长樱内义雄，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主社会党书记长佐佐木良作。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田川诚一，爱知揆一，赤城宗德，江崎真澄，山下元利，竹下登，中村梅吉，井出一太郎，久野忠治，西村直己，水田三喜男，松浦周太郎，神田博，高桥英吉，渡部恒三，永田亮一，鲸冈兵辅，小川半次，山口敏夫，河野洋平；社会党国会议员日野吉夫，川崎宽治；公明党国会议员正木良明等。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田中内阁总理大臣的夫人、大平外务大臣的夫人和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的夫人。

故松村谦三先生的儿子松村进，以及荻原定司等也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和代表许宗茂。

三百多名送行者排列在停机坪上。田中内阁总理大臣、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然后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

（新华社东京1972年9月25日电，
9月26日《人民日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由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陪同，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乘坐机首挂着日中两国国旗的专机从东京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外交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长白相国，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

今天，首都机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日本国国旗。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走下飞机，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周建人、姬鹏飞等，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田中角荣内阁总理大臣的随行人员还有：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木内昭胤、杉原正、小长启一，内阁总理大臣秘书早坂茂三，内阁官房长官秘书官西田真也，内阁总理大臣秘书田中利男，外务省亚洲局地区政策课长秋山光路，外务省情报文化局报道课长浅尾新一郎，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栗山尚一等。随同来访的还有记者团和技术人员。

前往机场迎接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愈之、林巧稚；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人士符浩、于桑、周培源、谢冰心、刘希文、张香山、王海容、苏杰、谢鑫鹤、石少华、李梦华、阎钧、郝中士、吴忠、杨德中、申光、马仁辉、王冶秋、高富有、陆维钊、韩叙、彭华、王晓云、张占武、董林、高建中、孙平化、王笑一、庄则栋、刘远、王炳宇、武建华、陈抗、高锷、刘华、李孟竞、马毓真、林丽韫、王效贤、江培柱等。

在北京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松本俊一、大久保任晴，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安田佳三和代表藤田公郎、姬野瑛一等及他们的家属，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 1972 年 9 月 25 日讯，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 联合声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日本国外务大臣
姬鹏飞(签字)　　大平正芳(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新华社 1972 年 9 月 29 日讯，9 月 30 日《人民日报》)

普及教育运动

背景介绍

1972 年进行的普及教育运动，是国家为扫除文盲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但是在当时的路线教育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加上师资素质、经费问题，教学设备等各方面的欠缺，因此所收到的效果不大。

材料：

- 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

材料　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

目前农村普及教育工作的重点应当摆在哪里？是普及小学五年教育，还是着重发展中学，普及七年教育？有些地区的同志在思想上不是很清楚的。

一些同志认为，现在学龄儿童大部分都上了学，小学教育已经"普及到顶"了，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发展中学。也有的同志说，群众要求发展中学的心情十分迫切，劲头也大，应当在发展中学方面多下功夫。因此，在教师的调配和教育经费的使用上，多着眼于中学，不利小学五年教育的普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毛主席发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伟大号召以后，我国广大农村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小学教育有了进一步普及。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和破坏，许多地区，尤其是山区和边远地区，小学五年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不仅还有少数学龄儿童没有入学，而且要使已入学的学生巩固下来，坚持受完五年教育，也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据山西平顺县的调查：一九六〇年全县入学儿童真正读完五年的占入学人数的百分比相当低；一九七一年读完五年的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有了很大提高，但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三。这说明，要使学生坚持受完五年小学教育，像解决学龄儿童入学问题一样，需要做很多细致、艰巨的工作。因此，当前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应当放在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上，首先满足广大贫下中农子女上小学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那种"普及到顶"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中，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在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对那些中途停学的学生，要给他们重新入学或补习的机会。各地还要特别注意发动和组织女孩子入学。要教育农民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残余作斗争，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女孩子同男孩子一样上学读书。

文化大革命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贫下中农子女上小学不易，上中学更难，因此他们要求发展中学的迫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学的发展，一定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与可能，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群众的负担能力，以及师资力量等条件，有步骤地发展。欲速则不达。不能"一口想吃两个桃"，不能同时把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和普及七年教育一下子都解决。如果在发展中学上过多地占用人力、物力、财力，那就会妨碍小学五年教育的普及，这是不符合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由于各地条件的不同，普及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小学五年教育基本普及，师资力量、经济条件许可，而又不增加贫下中农负担的情况下，也应当积极地逐步地普及七年教育。

在广大农村普及教育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各地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我们应当再接再厉，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又扎扎实实地把普及教育工作搞好。

(1972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

"红旗一五一号事件"

背景介绍

"红旗一五一号事件"发生在尼克松访华后的 8 月份。当时"红旗一五一号"所属的一只救生艇停泊在越南义安省宇岛附近海面上。美国空军认为这是一只水上供应艇，可能是中国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美物资而予以摧毁。这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中国政府给予了美国政府强烈抗议。但是不能不看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抗议方式与尼克松访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既没有采用过分充满火药味的攻击性语句，也没有发动起群众集会以示警告。从这个事件上可见，中美两国在相互的关系上开始进入克制、谨慎的多层次接触阶段。

材料：

· 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奉命发表谈话驳斥美国抵赖炸毁我国救生艇

材料　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奉命发表谈话驳斥美国抵赖炸毁我国救生艇

美国军用飞机最近炸毁中国停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义安省宇岛附近海面的“红旗一五一”商船所属的救生艇，炸死我船员五人的严重挑衅行径，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我国外交部已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八月二十五日，侵越美军司令部在一则声明中宣称：美国海军确实在八月二十二日摧毁了一只在荣市东北十一英里处活动的长三十英尺的水上供应艇。”但又说，“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所袭击的是一只救生艇，我们不以第三方国家的船舶作目标，”企图抵赖罪责。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奉命就此发表如下谈话：

一、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国救生艇被炸后，我停泊在附近的“红旗一六〇”商船随即起锚驶至出事地点，查明该艇被炸时的方位为：北纬18°47′56″，东经105°45′12″，地处越南民主共和国荣市东北十·七五英里。当天，附近海面没有任何其他船艇活动。

二、我被炸救生艇长二十四·六英尺，宽七·九英尺，型深三·一英尺。艇上没有甲板。艇边涂白色，并标有“红旗一五一”中文船名。艇里涂橙黄色。艇上没有载运任何货物。因此，决不可能视为“供应艇”。

三、我被炸救生艇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美机在轰炸前曾多次低空盘旋侦察，是完全可以辨认的。

美机炸毁我国救生艇，炸死我国船员五人，这是一个不容置辩的铁的事实。现在，侵越美军司令部既承认在该时该地炸毁了一只艇，又毫无根据地硬说炸是一只“供应艇”，显然是在玩弄花招，进行抵赖，逃避罪责。

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商船的一切挑衅行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政府保留要求赔偿损失的合法权利。

（新华社1972年8月26日讯，
8月27日《人民日报》）

何香凝逝世

背景介绍

1972年9月1日，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95岁。何香凝女士早年随同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运动。1924年，她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改组国民党，同中共合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何女士辞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职务，同蒋介石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解放后，她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病逝前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材料：

·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何香凝副委员长大会灵柩运到南京在廖仲恺先生墓地举行安葬仪式

材料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何香凝副委员长大会灵柩运到南京在廖仲恺先生墓地举行安葬仪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何香凝，因病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五岁。

九月五日下午，首都隆重举行了追悼何香凝副委员长大会。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外交部等处下半旗致哀。六日在南京举行了何香凝副委员长的安葬仪式。

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里悬挂着何香凝副委员长的遗像。

会场里摆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江青、许世友、陈锡联，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以及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妇联、外交部、卫生部等部门，和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参加追悼大会的有：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陈云、李富春、许德珩、傅作义、蔡畅、邓颖超、华国锋、吴德。他们向何香凝副委员长的家属廖承志、廖梦醒、经普椿等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大会由朱德委员长主持，宋庆龄副主席致悼词。

宋庆龄副主席说：“何香凝女士早年随同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其后，

又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护法运动。一九二四年，她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毅然辞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职务，挺身而出，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她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坚决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政策，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皖南事变后，她严厉斥责蒋介石策动内战的罪恶阴谋，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她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积极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以后，何香凝女士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她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她义正辞严地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她经常以诗、画热情地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她关心国家大事，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贯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领土完整和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

"何香凝女士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战友，是廖仲恺先生的革命伴侣，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革命派杰出的代表。她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何香凝女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我们深切地哀悼何香凝副委员长，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参加追悼大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马纯古、区棠亮、贝时璋、邓初民、卢汉、史良、庄希泉、朱良才、严济慈、吴有训、吴冷西、陈奇涵、武新宇、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罗叔章、竺可桢、季方、赵忠尧、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胡耀邦、童第周、谢扶民、彭绍辉；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刘斐、朱蕴山、杨东莼、张奚若、陈此生、周培源、赵朴初、荣毅仁、徐伯昕、曾泽生、董其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以及全国妇联的负责人王良恩、杨德中、刘剑、刘友法、李启煌、李金德、连贯、康克清、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何英、王海容、林一心、谢华、吴庆彤、侯春怀；

民革中央常委甘祠森、刘仲容、吴茂荪、侯镜如、许闻天、钱昌照，委员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李蒸、陈离、焦实斋；

全国人大代表、美术界代表、知名人士以及何香凝副委员长的亲属和生前友好王震、吴德峰、沙千里、庄明理、黄鼎臣、田富达、吴桓兴、朱光亚、黄长水、张国基、罗青长、何莲芝、张瑞华、于立群、傅崖、古元、李可染、蒋兆和、周海婴、龙潜、程思远、邓广殷和夫人、马海德、苏菲、柯弗兰、柯如思、爱德乐、帕特、杉山市平和夫人、路易·艾黎、陈依范等。

参加追悼大会的还有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

追悼会结束后，何香凝副委员长的灵柩由专车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墓。

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郭沫若，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车站送灵。

刘友法、邓颖超、谢扶民、李金德、刘斐、朱蕴山、陈此生、甘祠森等，以及何香凝副委员长的家属廖承志、廖梦醒、经普椿等，护送灵柩到南京。

九月六日下午，何香凝副委员长的灵柩运到南京，在南京市东郊廖仲恺先生墓地举行安葬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杜平、吴大胜、杨广立、肖永银、蒋科、方敏、刘其章、方明等，参加了安葬仪式。

护送何香凝副委员长灵柩到南京的刘友法等以及何香凝副委员长的亲属参加了安葬仪式。

参加安葬仪式的还有：在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政协委员，省、市民革负责人：吴贻芳、刘国钧、计雨亭、刘树勋、张敬礼、张光中、任崇高、陈鹤琴、范存忠、丁光训、陈中凡、廖运泽、廖运升、赖愓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三百多人。

何香凝副委员长患病期间，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曾前往医院探望。

何香凝副委员长逝世以后，遗体在九月三日入殓。灵柩停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前往医院向何香凝副委员长的遗体告别。前往告别的还有民革中央委员、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何香凝副委员长的生前友好，其中有李震、王树声、粟裕、方毅、申光、曾涛、刘新权、张香山、章文晋、杨骥、丁雪松、林月琴、王定国、刘崇仁、童小鹏、李质忠、周荣鑫、沈谦、溥杰和夫人、林达光和夫人等。

（1972年9月7日《人民日报》）

陈毅逝世

背景介绍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与世长辞。陈毅同志是广大群众熟悉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1月10日，陈毅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同志致悼词，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了追悼会。

材料：

-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材料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陪同下，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有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追悼会会场中央，悬挂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毅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献的花圈，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朱德、何香凝等献的花圈。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献了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震、王宏坤、王树声、王辉球、王新亭、邓颖超、刘伟、刘贤权、华国锋、陈士榘、李强、李震、李富春、吴德、张才千、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鼎丞、张翼翔、苏静、肖劲光、余秋里、耿飚、曹里怀、曾山、彭绍辉、粟裕、蔡畅、滕海清、方毅、吴忠、张令彬、杨俊生、赵启民、唐亮、郭玉峰、黄文明、黄作珍、黄志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陈继德、田维新、张贤约、封永顺、周希汉、吴信泉、姚国民、李家益、李真、胡奇才、罗华生、周世忠、栗在山、阎揆要、贺光华、宋时轮、刘忠、董超、张云龙、郭鹏、陈正湘、王诤；

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王良恩、张耀祠、杨德中、任允中、申健、冯铉、杨玉衡、刘宏贤、张香山、姬鹏飞、李耀文、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王海容、陈德和、白相国、吴德峰、肖友明、彭林、史子才、谷广善、潘友宏、孙晓风、刘洪章、谢北一、刘湘屏、吴庆彤、刘建功、郑屏年、武葆华、王俊卿、刘同新、解力夫、王国权、丁西林、李梦华、康克清、林佳楣、于立群；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

陈毅同志的生前友好也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共一千五百多人。

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的遗体告别。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

陈毅同志病重住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新华社1972年1月10日讯，
1月11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周培源

周培源(1902年～　　)男，江苏宜兴人，物理学家。1924的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美国，研究理论物理。1929年归国后，曾经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1950年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部部长，兼副校长，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五届委员，全国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1971年出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7月在他任此职期间，就中国基础科学落后一事上书周恩来总理。

材料　周培源上周恩来书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在学校中科研工作的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王若水

王若水，男，1926年10月生于上海，童年在湖南度过，抗战期间在四川避难。1946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是学生社团“呐喊社”的积极分子。他们以壁报为武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48年5月，王若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国民党大逮捕中，奉组织命令赴冀中解放区。

1949年春，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城，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50年底，王若水到《人民日报》理论组当编辑。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理论组组长。在理论组期间，王若水主持过“图书评论”专栏，参加了对胡适的批判，撰写过批评梁漱溟封建思想的文章，起草过宣传“双百”方针的重要社论，并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好评。

1958年，他下放到湖北枣阳农村一年。

从1960年初开始，他站在艾思奇一边，和杨献珍一派就“思维和存在性的同一性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1961年和1962年又先后发表了《辩证法的命运》和《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

1962年，王若水发表《桌子的哲学》一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王若水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文革”前夕，王若水担任了《人民日报》评论组组长，“文革”中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

1972年，《人民日报》遵照周恩来指示，成立了一个"看大样"的班子，王若水是其中一员。当时，对于如何批判林彪的路线，党内有分歧。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却唱反调。这年10月，王若水组织了一个版的文章，批判林彪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于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文汇报》内参上登上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应，说《人民日报》这一版文章否定"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要《人民日报》讨论。

在此情况下，王若水上书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提出反"左"是正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讲话是错误的。他没想到，张春桥的话其实正是毛泽东的意思。这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悦。毛说王若水主张批极左思潮"并不高明"。这表面上是批评王若水，实际上也是批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此机会，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

1974年，王若水被赶到干校劳动改造，以后又被送到北京市郊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回到报社，获得平反。

珍闻轶事

《毛主席语录》

林彪自主持军委工作后，曾多次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背警句"就够用了。随后又提出"活学活用"的所谓"三十字方针"。根据林彪的指示，从1961年5月起，《解放军报》以显赫位置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该报登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编纂成书出版。最初只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2月由林彪写了"再版前言"扩大发行到全中国，甚至流传到国外。

《毛主席语录》把从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摘取的只言片语，分成三十三类：一、共产党；二、阶级和阶级斗争；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五、战争与和平；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八、人民战争；九、人民军队；十、党委领导；十一、群众路线；十二、政治工作；十三、官兵关系；十四、军民关系；十五、三大民主；十六、教育和训练；十七、为人民服务；十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十九、革命英雄主义；二十、勤俭建国；二十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二十三、调查研究；二十四、纠正错误思想；二十五、团结；二十六、纪律；二十七、批评和自我批评；二十八、共产党员；二十九、干部；三十、青年；三十一、妇女；三十二、文化艺术；三十三、学习。这本书多数印成64开小本，采用鲜红塑料封面，故又称为"小红书"。

"文化大革命"中，它成了每个中国公民必备的东西。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喊万岁，都离不开它。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毛主席语录》频频晃动。亿万群众也人手一本，随身携带，逢大、小集会，必拿出来一齐挥动呼喊口号，或打开来，集体选念其中的某段。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万　岁

这一词本为臣下对君主表示祝愿其长生不老，活一万年之意。自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之后，逐步演化成皇帝的专称。即只能对皇帝呼："万岁"，祝"万寿无疆"，称皇帝为"万岁爷"。如果别人使用了，那便是犯了"僭越"的大罪，要杀头，甚至满门抄斩。伴随"万岁"这个至尊的称呼还有显示这种地位的一整套威仪。

历代封建皇帝沉缅于至高无上的"万岁"尊称和"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三呼威仪之同时，也为一批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之徒大开投机钻营的方便之门。无它能，唯靠颂赞万岁有术而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者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虽有工人万岁、农民万岁、工会万岁之类的口号，但具反特权，争平等的特殊含义，是反封建的造反行动。当时并没有对领袖个人呼万岁。全国解放后，领袖万岁的口号开始出现。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其呼声越来越高。林彪一类也就把它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重要手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形象出现，以至使这种封建糟粕在全国泛滥成灾，不但毛泽东个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喊遍全国城乡，而且由此引申而形成种种仪式，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万寿无疆"歌等等。毛泽东所提倡的种种所谓"新

生事物"，也无不以"万岁"称之。如："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月风暴万岁"，"四大"、"造反"均万岁……这种种万岁，肆虐10年，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世代难忘的灾难和不幸。

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80年7月30日发出《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明确废止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个人崇拜口号和做法。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虽然仍保留于天安门城墙上，但对个人已不再使用"万岁"这个词了。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大民主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主要方式。即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方式产生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认为"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抓住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因此，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运用和发挥。

"大民主"在当时的主要做法是：任何组织都可以随意召开批斗大会，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当众侮辱、打骂，还美其名曰"大辩论"，以致辩论成了批斗的代名词。造反派头头振臂一挥，就可带着群众上街游行，随意呼喊："打倒×××"；任何一个人都可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刷一张大字报，以抢先、惊人为快事。"大民主"造成大混乱。它搞得工厂随时停工、停产，学校随时停课，群众组织随心所欲地罢某人的官，撤某人的职，抄某人的家，开除某人的党、团籍，为林彪、"四人帮"乘机夺权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属于政治的范畴，是有阶级性的概念，只有高低之别，并无大小之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抽掉了阶级内容，否定集中指导，否定纪律，鼓吹"每个人应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有半点约束"。"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要无法无天"等是这种"大民主"的典型口号。正如邓小平曾尖锐指出的，它是"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大民主"的提法和做法都是有害的。它已被我国1982年通过的宪法所否定。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一种声讨的形式。

批判，本来是哲学上常用的语言，意指对一种理论观点要进行分析，肯定其正确的部分；系统地指出其错误部分，加以否定。其主要特点是讲理。正确的批判，无论过去、今天都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批判的。而"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大批判"，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规模地、不间断地以势压人、以权整人的一种特定的错误手段。用当时的说法，叫"革命大批判开路"。大批判的特点是：范围广、规模大。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方面；要求各地都要找出所谓散布、推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驱使群众一哄而起，批领导，批同事，甚至自己批自己；构置无数个战场：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专栏"举目可见，奇谈怪论的文章充塞报刊、广播。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大三

群众对中央文革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的蔑称。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发号施令的指挥机构。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组织搞打砸抢抄抓；相互勾结、利用，在中共中央内部组织反党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更高权力。其所作所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切齿愤恨，叫他们是"大三"，即三个大坏蛋。

粉碎"四人帮"后，江青、陈伯达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中共中央对已死去的康生，也作出了相应的处理。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一抓三促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简称。

"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最早见于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随着"文化大革命"广泛展开，涉及到各个方面，各行各业，甚至军队，

于是又补充促工作、促战备两项，而成为“一抓三促”。

口号的最初提出，是为了强调在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后来的报刊、文件宣传则远远脱离和超出了这个范围。所谓“抓革命”，就成了单纯强调开展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似乎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大发展，工作、战备才能出成果。甚至把“抓革命”与“生产、工作、战备”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纲与目的关系，把“一抓三促”夸大地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根本指导方针。1967年《红旗》杂志第四期文章写道：“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是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种表述，在生产和其它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后来，使许多人不敢也不愿去放手地抓生产、工作和搞战备训练，生怕被指责为是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的“修正主义”。

生产、工作、战备等，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不同的要求，需要根据不同的特点，经过实事求是的认真努力才能搞好。绝不能用笼统地“抓革命”就可以促进的。当然，在生产和其它工作中，都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其内容并不同于当年的“抓革命”。因此，“一抓三促”这一口号已完全丧失积极意义，而不再被使用。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让“乔老爷”去联合国

1972年10月，第26届联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上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国民党的代表立刻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当时，我国没有估计到进入联合国来得那么快，没有估计到第三世界的力量与美国的失控；对出席联大，当时确实没有一点准备。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还经毛泽东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

（据《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

毛泽东提拔王洪文之谜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不几天后，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但他不知来干什么。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79岁的毛泽东，由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于是，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但他觉得闷得发慌，不如在上海自在。他打电话给上海的马天水，他说：“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时出去，夜里3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作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据《人世间》1988 年第 10 期)

毛泽东洒泪悼陈毅

1972 年 1 月 6 日深夜 11 点 55 分，陈毅同志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人数为 500 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对于追悼会的规模，政治局已通过，周恩来也无力改变了。

这几天来，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以及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何尝不愿满足这种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呢?可是，政治局定下的规格，他无权改动。

只是，离追悼会的时间越近，周恩来的心情愈加沉重。

1972 年 1 月 10 日中午。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宁。

自从 8 日圈发了陈毅追悼会文件后，没有人提醒他，今天是 10 日，下午 3 时，陈毅追悼会将在八宝山举行。中饭后，毛泽东照例午休，宽敞的卧室，寂静无声。突然，毛泽东缓缓坐起身，向进来的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着，便向门口走去。工作人员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一旦决定去做的事情，抗争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有两位抱大衣扶毛泽东上车，有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的电话。

周恩来接到电话，像严冬刮起一阵东风，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康茅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的追悼会。"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迅速超过毛泽东的专车。周恩来赶到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了张茜：毛泽东要来。张茜听后，双泪长流。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张茜忍住哭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周恩来慨然说："他一定要来。井冈山上的战友就是他了。"

休息室里，落座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看见张茜进来，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他两手撑住沙发扶手努力想站起来迎接。张茜快步上前扶住毛泽东，满脸热泪哽咽着问道："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赶到了。毛泽东开始与西哈努克亲王谈话，张茜坐到他的旁边。陆续来到的几位老帅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倾听着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们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 9 月 13 日，坐一架飞机要逃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西哈努克亲王面部紧张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西哈努克亲王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摔死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在毛泽东谈话即将结束时，张茜真诚地请求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夹大衣，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 600 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里悲痛的气氛。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一切同志。

(据《报刊文摘》)

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为党工作

林彪自我爆炸之时，邓小平正在江西新建县一家拖拉机修配厂里监督劳动，当一名钳工。1971 年 10 月 1 日前后，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的报刊、广播中没有出现"副统帅"林彪出席国庆活动的报道，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不久，问题有了答案。11 月 5 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听传达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

文件传达的"政治待遇"。它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有了新的转机。邓小平听到林彪垮台的文件传达,内心十分激动,回到家中感慨地说道: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时,党内的一些老同志也在为邓小平复出,奔走力荐。1972年"五一"节前后,先期由江西返回北京的王震将军接见了邓小平的子女毛毛,并且说,毛主席对邓小平是有区别的,他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解释了一些问题,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这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很快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的信之后认为,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旋即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实际上等于对邓小平的重新出山开了绿灯。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主席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于8月1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的身边协助。江西省委接到中央通知后,立即派黄知真前往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向邓小平当面转达了中央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的通知。此后,江西省委安排邓小平夫妇参观了革命圣地井冈山,重访了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脏瑞金,以及瓷都景德镇等地。

尼克松访华前奏曲

70年代初,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几条秘密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

也许是出于巧合,就在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的前后,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袒露了他发自心底的一个愿望:"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为了恢复同中国的接触,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有必要建立起一条"保密的通信联络途径",这将是一条"不受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和传统仪式的阻碍、双方都信得过的途径。"

这一设想于1970年10月底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开始实施。当时这两位总统应邀来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会。

11月25日,叶海亚·汗总统访问白宫,尼克松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巴基斯坦渠道"。其实,早在1969年7月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他就曾笼统地向叶海亚·汗商谈过这一想法。此时尼克松正式告诉叶海亚·汗,美国已决定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因此,请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中国传递口信,说明他准备派出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与中国高级人员对话,希望中国人了解美国是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的,并准备同中国签订某种贸易协定。

次日,尼克松又利用同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机会建立了"罗马尼亚渠道",再次向中国表达了希望进行高级对话的愿望。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又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公开的外交信号,他在祝酒辞中耐人寻味地说道:"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这是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改变,是用一定的方式承认了新中国的客观存在。尼克松确信,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肯定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

秘密渠道很快就发挥了作用。11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问中国,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中国方面表示,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叶海亚·汗得到这样的回答感到十分欣慰,他回国后立即指示外交秘书舒尔坦·汗(一位中国通,曾任五年驻华大使)亲自负责中美联络的秘密渠道。

其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中国外交官把中国方面给美国的信息亲自交给舒尔坦·汗，然后由他用密码或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阿迦·希拉里，再由希拉里直接交给基辛格。美国给中国的信息照原路返回。为了严格地保守机密，除了叶海亚·汗之外，舒尔坦是唯一知情的巴基斯坦官员。舒尔坦还亲自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解说美国的密函，并提出参考性的意见。舒尔坦解释说，这是"由于微妙之处很多，打印出来的密函是死的，可能耽误对话，甚至产生误解。"中国方面通过舒尔坦了解到许多关于美国方面的问题。

12月9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到白宫转达了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口信。口信记在一封手写的函件上，希拉里对基辛格解释说，他没有被授权可将这个函件留下，因此，他只能读给基辛格听，再由基辛格逐句把它记下来。基辛格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忙于干这种刻板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也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信息随发随收的时代，我们竟回到前一世纪那种外交办法－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的方法。"不管怎样，"一件带有根本性的重大事件"毕竟发生了，尽管"其方式是学究式的"，甚至带有几分原始的色彩。

美国方面认为，虽然中国方面在口信中强调，邀请美国总统特使去北京主要是为了讨论解决台湾问题，但这不过是用了一个惯用的"标准的公式"，可能为了保密，或是提防美国失信。也许用这样的措词向昔日的头号敌人招手"不那么有损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进而美国人判定，中国方面邀请美国特使访华，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一个省的前途，"而是受到比这更深刻的当务之急的驱使，必定涉及到中国安全问题本身。"为此，美国在给中国的回答口信中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不久，罗马尼亚渠道也活跃起来。齐奥塞斯库在访美之后，指派他的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去北京传递信息。中国方面的答复与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到美国的那个口信大致相同。周恩来还表示，鉴于尼克松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他在北京也将受到欢迎。齐奥塞斯库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将罗马尼亚驻美大使科·博格丹秘密召回国内，指示他尽快将中国的答复传递给白宫。1月11日，博格丹当面向基辛格宣读了中国方面的信息。基辛格有些不放心地问，中国的意思是否是要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来作为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先决条件。博格丹回答说，他不能随意解释中国方面的意思，但就他个人的感觉是，"中国总理实际上是建议白宫考虑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折中方式——而不是告诉美国应该做什么。"1月29日，基辛格向博格丹转达了美国方面的信息，其内容与一个多月前给希拉里的那个信息完全相同，这是为了防止中国方面发生误解，对两个信息作出不同的判断。唯一不同的是，考虑到罗马尼亚同苏联的关系，美国的这个信息是口头的，而不是像给希拉里的那样是用打字机打的，这也表现出美国对巴基斯坦渠道的偏爱。

此后，中美利用巴基斯坦渠道传递了多次口信，终于导致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从而为毛泽东和尼克松历史性的会见开辟了道路。

二、巴黎新渠道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使华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双方选定巴黎作为中美之间进行直接联系的新地点。其原因：

一、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已建立起双方的直接接触，就不再需要巴基斯坦这个中间环节了，今后的一切联系应将改由中美在巴黎直接进行。

二、中美双方在巴黎都有担当这项秘密使命的恰当人选。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具有丰富的外事经验，又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和信任。"9·13"事件发生不久，周恩来曾特地嘱托即将出访法国的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说："你明天一早就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黄镇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美国确定的人选也非同小可，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通晓多种语言，以职业军人身份从事情报和外交活动，曾在罗斯福到尼克松的五届总统（肯尼迪除外）手下服务，深得他们的赏识，并曾几度担负秘密使命，奔波往返于各国之间解决棘手问题。

三、这一时期美越正在巴黎进行秘密谈判，基辛格可以利用去巴黎与黎德寿秘密会晤的机会，与黄镇大使进行秘密接触，交换意见。

巴黎渠道很快开始启用。美国方面的信件由基辛格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起草，报尼克松批准。然后由一位可靠的工作人员亲自送往巴黎交给沃尔特斯，再由沃尔特斯面交黄镇大使。整个过程极为秘密，甚至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美国驻法大使沃森这样的人物都不知情。中国方面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非常之少，在驻法大使馆中除了黄镇之外只有一两个负责具体接待的官员知情。

1971年7月16日，沃尔特斯将军收到白宫的第一个指令，要他于7月19日向黄镇大使递交7月16日尼克松总统致周恩来总理的函件。基辛格秘密访华时，美国

方面曾表示,美国将与莫斯科继续打交道,但美国将把可能与苏联达成的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谅解,都详细地通知中国。尼克松在这封信函中确认了这些承诺;为了表示友好,美国方面还把基辛格7月16日向新闻记者介绍北京之行的情况的稿子随信附寄,白宫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礼貌,能够表明美国很关心促进中美关系……

(北京)宫力

刘连长探家

去年五月,炮三连党支部安排连长刘永文探家。刘连长家在辽宁朝阳县,离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三百多里地。他想,连里有二十二名战士家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在探家期间能对这些战士的家属进行一次访问有多好。

刘连长回到家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妈妈还不停地念叨着:"这次回来了,你可要好好和妈唠一唠,把家里的事办一办。"刘连长对妈妈说:"连里有许多战士离家两三年了,他们的父母也和你一样,想念自己的儿子,我也应该把战士在部队的情况向他们家里唠唠,让他们的父母高兴高兴。"刘妈妈很赞成儿子的想法。

刘连长来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对战士家庭的访问。他顶风冒雨,跋山涉水,从这村走到那村,从这家走到那家,把战士在部队的情况向家长作了详细介绍,并把战士家属给他讲的家史、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史,以及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仔细地记在小本子上。就这样,刘连长在几天之内跑了七个公社、十五个生产大队,走遍了全连所有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战士的家庭,把部队的关怀带给了每个战士的家属。

回到部队后,刘连长逐个向战士转告了家乡的情况以及亲人对他们的希望。战士们听了,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决不辜负亲人的期望,要一心一意干革命。

(《解放军报》通讯员)

开　水

夜深了,营长施福田仍然坐在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阵阵寒风吹得窗纸哗哗直响,施营长想:战士们休息得怎么样?他们冷不冷?于是,他披上大衣出去了。他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班又一班,给这个战士掖掖被角,给那个战士盖盖大衣。走着,走着,来到了九连无线电班的住房。无线电班副班长吕志奇身体有点不舒服,口干舌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听到有人进来,以为是换哨的同志回来了,顺口说了一句:"你看有开水吗?给我倒点。"施营长急忙走到床边,一摸暖瓶,没水。他小声对战士说:"你等一下,我去找点。"小吕一听是营长的声音,连忙说:"不,营长,我自己去吧!"没等他把话说完,施营长已端着缸子走出去了。到伙房一看,也没有开水。这时,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教导在他耳边响起,他迈步走出炊事班,顶着寒风,跑到自己的住处倒了满满的一杯水送给吕志奇。

阶级感情深,官兵团结紧。吕志奇端着营长送来的水激动地说:"营长,你送来的不只是一杯水,而是送来了干部关心战士的一颗心,送来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啊!"

(《解放军报》通讯员)

知青故事

(一)捉贼记

1972年初春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四个女知青坐在油灯下摆龙门阵,唱歌,嘻嘻哈哈好不热闹。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消磨时光。农村的夜晚,实在太长太长。当单独住在屋西头的桂花走后,我们三人也熄灯睡觉了。

半夜里,我突然被一阵凄厉恐怖的喊叫声惊醒,"有贼啊,捉贼呵!"回了一下神,我赶紧喊:"恒志,徐贵,快起来,桂花遭贼了!"我一下跳起来,慌忙穿上衣裤,伸手去开门。可门扣打开以后,门却怎么也打不开,她们俩也来一起使劲,还是拉不开。还是恒志灵醒,说:"拐了,肯定门遭扣了。"于是我们三人一起放开喉咙高喊:"高队长,高幺爸,李大爷,快捉贼啊!桂花遭贼了!"这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几分钟后,周围的农民打着火把,拿着锄头扁担赶来了。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婆婆奶奶都赶来了。李大爷跑在前面,赶紧给我们开了门,才知道门不仅紧扣,还在门扣里插了一节篾条。门外,只见可怜的桂花,一扫往日的英姿,只穿着内衣内裤光着脚,见我冲在前面,立即扑上来,紧紧地抱着我,全身筛糠似的,不住地颤抖。我赶紧搂住她,把她拖到床上,用温热的铺盖捂住了她冰冷的身子。这时刚从部队转业的长寿已把小伙子们兵分三路,向各方搜寻。好一阵,我们才从桂花那继继续续的叙述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她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轻轻的、好像老鼠咬东西似的声音惊醒。紧接着,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一道耀眼的手电筒光直射她的眼睛。她本能地坐起来也打开手电筒,并高喊:"有贼!"可无奈对方手电光太亮太亮,照花了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刚要下床,已被一双强壮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按在床上,一个低沉的男音威胁说:"再喊,杀死你!"并把冰冷的菜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可桂花依然高喊,用力又踢又打,同那人

拼死搏斗，终于挣脱，跑出了门。而那人也一头扎进夜幕里，慌忙逃窜了。大伙来到桂花屋里，只见菜刀、手电筒落在地上，煤油灯打翻了，顺着砖砌的桌子，往地下不住地滴油，也打湿了桂花抄有外国民歌的小本子。这时各路人马都回来了，一无所获。问桂花，她也只说是个男的，力气很大，至于什么特征，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折腾了半夜，大家也辛苦了，书记发话叫大家回去休息，由他明天向公社汇报，村民们散了。夜，又恢复了平静，桂花还在我的怀里发抖，而我们却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支书就到公社去了，不知为什么特意带走了桂花那抄有外国民歌的本子。中午收工时分，在我们的盼望中，支书那瘦小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小路上。可他只是说公社要派人来调查，就什么也没有说了。那黑黑瘦瘦的脸分外严肃，似乎心事重重的样子。而桂花的本子，却被留在公社，说是要研究研究。下午公社武装部却因此事带走了我们邻队的两名男知青，关押两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只好无罪释放。理由更为奇怪，我们这里都是贫下中农，没有人会干这样的事情，要干，只有知青。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事情也不了了之。就这样倒也好，想不到一条条流言蜚语，却在生产队的田边地角，悄悄地蔓延开来。这个说："你看桂花那女子，裤子绷得紧紧，难看死了，你看她那双眼睛，亮晶晶的，一副野像，专门勾引男人。"那个讲："前几天，在田里干活她还不是在讲，做梦都梦见男人压在她身上吗？我看有啥子贼哦，肯定是自己想男人，想疯了，发梦癫。"而略知内情的支书夫人还补充说："你们还不晓得她在本子上写的什么哟，什么情呀爱的，公社都把本子缴了，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舆论杀人呀，谁受得了这样的待遇，何况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在人们眼里，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假的，一切都因为是桂花爱唱爱抄写外国歌曲，资产阶级意识太浓所造成的。

（林淑贞）

（二）夜宿金沙江

一天，听说金沙江对岸的云南省巧家县要演露天电影，我们便高兴得发了癫，一大早邀邀约约共七个男女同学，一齐下山乘尖尖船过了江对岸。这天天气很热，太阳高照，走饿了，大家拿出玉米馍、红苕、甘蔗来吃，口渴了路边喝口泉水，走累了，大家在路边林荫处睡一觉。到了县城已是下午了，便在商店买了些白糖红糖和"前门"、"光荣"烟之类的东西。

看完露天电影，已是晚上九点左右，来的时候没想到的问题这时冒出来了：过江没有船了，怎么办？住旅馆身上又没有钱。大家商定，还是往回走，到金沙江边去睡。

走出县城，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出来时又忘记了带电筒。为了不致掉到金沙江里去，便决定一人牵一人的衣服走。有人还是险些掉下江去。现在想来真是后怕！

到了江边，大家扯起嗓子喊船家，回答的是金沙江的涛声。无奈，便按预先的决定，夜宿金沙江。

由于白天太阳大，把江边的沙晒得暖融融的，我们便按各自的身长，用手刨出了一条沙沟作床，用江边的鹅卵石做枕头，待人躺下去后，再把刨开的沙往身上盖，直到把全身盖完，只露出仰面朝天的脸在外面。

连续而紧张的赶路，大家非常疲倦，一支烟的功夫，便都睡熟了。

睡了好一阵，我感到脸上热呼呼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舔，昏昏糊糊之中，我定了定神，睁眼一看，是一条狗，惊慌之中，仿佛看到了有好多狗，便下意识的惊叫"打狗！快起来打狗！"听到喊叫声，大家惊醒后也附合着喊"打狗！"，"打狗！"，"打狗喔！"……乱吼乱追打了一阵之后，野狗跑了，沙床也整乱了，瞌睡也惊醒了。大家怕野狗再来，都不敢睡了，于是坐在沙地上，唱起了苏联民歌《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山野
河上漂着柔美的青纱
……

朝阳出来了，金沙江跳动着金色的光辉，对岸的尖尖船在金色的光芒中，向我们缓缓地驶来……。

（叶尚言）

（三）中央文件的"规定"

据当时的文件规定，知青不管做多少工分，都要按生产队单身劳动力的吃粮标准分配。可眼看决算就要结束了，我的吃粮标准还未定下来。这可是件大事。于是我找到队长，麻起胆子对他说，按中央文件规定，我该吃生产队单身劳动力的最高标准。×××的分粮标准是491斤，我就应该分这个数。要是不执行，就违反了中央的知青口粮分配政策。队长一听中央文件四个字，一下就慌了神，忙问保管员："中央文件上面是不是说的张华松该分491斤？""是说的张华松该分491斤嘛。""既然中央文件上面写得有就分嘛。"这样，高标准的粮食当夜就进了我的米柜。

（张华松）

（四）轰动效应

山区农村的物资生活差，其文化精神生活更差，远不是城里人可能想象得到的。记得下乡时，我带去自己装的四管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头一晚上拿出来一放，可以说是产生了轰动效应，引来满屋子大人娃儿坐满一地。尽管收音效果很差，但听众热情之高是我始料不及的。时间已很晚，仍迟迟不愿离去。最后要走时提出看一下机子里是

什么东西。随你怎么说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么名堂，可就是不甘心。无法，只有满足其愿望才得以收场。一连几天，天天晚上来听，坐上一屋人，简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谎称电池用完，谁知热心听众竟自己带电池来，弄得我哭笑不得下不了台。现在回想起来心头仍不免还有些内疚。

（罗晓虎）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72年的文艺界并没有因为内政、外交的进展而有多大的起色。流行在中国土地上的依然是颂歌和样板戏。从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中，可以体会到人民对美和艺术的渴求，从京剧《奇袭白虎团》中，又可以看出当时舞台形象的苍白和"脸谱"化。

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宽广、热情地

陕、甘民歌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热烈地　快板

(男)千家万户(齐)哎咳哎咳哟(女)热腾腾儿的油糕(齐)(男)围定亲人(齐)哎咳哎咳哟(男)把门开(齐)哎咳哎咳哟(女)摆上桌(齐)哎咳哎咳哟(男)热炕上坐(齐)哎咳哎咳哟

(男)快把咱亲人迎进来(齐)依儿呀儿来吧哟。(女)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齐)依儿呀儿来吧哟，(男)(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齐)依儿呀儿来吧哟

满天的乌云哎咳哎咳哟，风吹散哎咳哎咳哟，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晴了天。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晴了天。千里的那个雷声噢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陕北民歌

1、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2、山川万里气象新，五谷生长绿茵茵，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翻了身。

3、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为了革命得胜利，为了革命是胜利，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歌曲《前进！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洪源词

田歌　田光曲

豪迈地　　进行曲速度

彩霞万里，凯歌震天。时代的洪流滚滚，历史的车轮飞转。前进！向前进！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迎朝阳，向胜利，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向前！大寨红花开遍了祖国原野，大庆精神传遍了工厂矿山。钢花映红蓝天，大地献出粮棉。卫星飞向太空，金桥跨越天堑。

革命红旗召唤着团结战斗，七亿人民踏平了千险万难。创造光辉业绩，谱写壮丽诗篇。保卫红色政权，建设锦绣江山。万岁！万万岁！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迎朝阳，向胜利，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向前！

戏剧《奇袭白虎团》

1972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3本

一九五三年七月，美帝国主义及李承晚伪军在朝鲜战场上假谈真打，破坏停战谈判，他们以"王牌军"首都师"白虎团"为主力，向我方猖狂进攻。为揭穿敌人"和谈"骗局，粉碎他们的进功，我志愿军派侦察排长、战斗英雄严伟才率领一个尖刀班，在朝鲜人民军联络员韩大爷、战士金大勇和朝鲜群众金大嫂的协助与志愿军某营的密切配合下，化装成美、李伪军，机智地冲破道道难关，插入敌人心脏，捣毁了"白虎团"团部，为我军全线反击创造了有力条件。

历史档案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

胜利的一九七一年过去了。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我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跨进了战斗的一九七二年。

当世界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的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过去的一年，整个世界激烈动荡。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帝、苏修同包括它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更尖锐了，更扩大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激起亚非拉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侵略和反侵略、革命和反革命的局部战争连绵不绝。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修正主义集团日趋瓦解。各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在这种局面下，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更加深入。从帝国主义的战略后方到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革命斗争蓬勃高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统治。

美帝国主义的处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困难。它推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不断遭到挫败。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斗争的发展，美国人民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涨，大大地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由于美国同日本、西欧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它们之间转嫁危机、争夺市场和原料基地的搏斗愈演愈烈，美国遇到了战后二十六年来最严重的挑战。这些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打着种种骗人的幌子到处伸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压迫苏联各族人民的同时，竭力控制和剥削所谓"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且拚命向世界各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绞索套到自己脖子上。过去一年中，苏修勾结美帝搞核交易，签订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在许多国家搞颠覆活动，威胁巴尔干，破坏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特别是悍然支持印度反动派武装侵略巴基斯坦的可耻行径，使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痛斥，陷于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幕后交易，就可以任意摆布别国命运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日益加强，一切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既突破了美国政府的阻挠，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又违背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意志，以一百零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中小国家在联合国里能够联合起来发挥这样令人鼓舞的作用，正义的呼声能够这样占上风，美苏两霸陷于这样孤立，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联合国发生的变化，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生动反映。

但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总是要拚命挣扎、继续捣乱。一年来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它们的日子越是不好过，就越要进行疯狂的侵略、干涉和颠覆，甚至不择手段地挑起新的侵略战争。因此，各国人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地总结经验，加强团结，增强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争取新的胜利。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友谊进一步发展，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组

织，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并肩前进。我们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战斗团结更加巩固，同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紧密配合，同阿拉伯人民、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互相支持。一年来，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同许多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更加增进，我国又同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充分说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所有这一切，鼓舞着我们信心百倍地为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而努力奋斗。

过去的一年，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看书学习、反骄破满、批修整风，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向深入，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广大干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逐步形成了风气，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深入进行，激发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一九七一年，我们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连续十年丰收，粮食生产在受灾比较重的情况下，比大丰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长，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两千一百万吨，标志着整个工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设进展较快。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有某些提高。人民解放军建设得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空前巩固。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年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执行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作为重要内容。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要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搞好革命大批判，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什么是摆脱或削弱党的领导。毛主席历来主张光明正大。刘少奇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玩弄阴谋诡计，造谣诬蔑。我们坚持光明正大，就能识别和抵制那种反党反人民的阴风，不断增强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必将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推动各项工作前进。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目标，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斗、批、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和单位，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要分析情况，总结经验，研究政策，全面规划，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要继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委会和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党的原则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并做好工、农、青、妇、知识分子等各个方面的群众工作。党组织要坚持群众路线，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经常注意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

动制度，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敢于同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毛主席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促进各条战线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抓紧军政训练，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要加强民兵建设。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全国军民要认真学习国际形势和党的对外路线和政策，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坚决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切侵略、颠覆的阴谋。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台湾省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所谓"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或类似的阴谋。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的成就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我们要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面对着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用新的胜利，争取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月1日《人民日报》）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讯　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十五时（北京时间），我国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中国政府再次声明：我国进行必要的和有限制的核试验，是为了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召开世界会议，来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首先达成所有核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核武器的庄严协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爱好和平国家一道，为争取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奋斗。

上海公报

中美双方二十七日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全文如下：

联合公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

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新华社上海1972年2月27日电，
2月28日《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71岁。陈毅是四川乐至人，1901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解放后，还曾任上海市市长等职。陈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陈毅的追悼大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简述了陈毅一生的主要经历，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指出：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一大损失。

8月1日　国防部为庆祝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9月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何香凝，广东南海人，1878年生。1904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民国以后，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护法运动。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部长。1947年与李济深等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还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何香凝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是廖仲恺的革命伴侣，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全国解放前，她积极追随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她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9月6日，何香凝的灵柩运到南京，在南京市东郊廖仲恺墓地举行了安葬仪式。

9月29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这三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据此，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上述三种人的住房情况作了调查。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3级教授以上）和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208人，“文化大革命”前原住房1,036间，20,105平方米。在“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91人（189户），占三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行政9至12级的干部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总面积的41%以上。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要求批判极左思潮和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要求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10月14日　《人民日报》刊登署名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个阴谋家的丑史》3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批判文章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严重事实尖锐地指出，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煽动无政府主义，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他们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小生产者的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这3篇文章是报

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而组织的。早在这以前，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就先后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正确意见，实际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在这以后，周恩来继续为纠正极左错误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周恩来的正确意见遭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就在10月6日的3篇文章发表后，张、姚迫不及待地指使别人在上海召开所谓"工人座谈会"，假借上海工人的名义，攻击这3篇文章是"大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给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党的政策扣上"复辟"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同年12月17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这就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批极左的正确意见。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批林整风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结果，党内的左倾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了。

11月12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为孙中山诞辰106周年举行纪念仪式。纪念仪式由民革常委委员陈此生主持，刘友法、李金德、朱蕴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民革中央委员会向孙中山塑像献花篮致敬。同日，江苏、南京、上海、广东、广州市等省市领导机关、政协和民革委员会各界代表，也分别举行了纪念仪式。

12月10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邓子恢，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邓子恢，1896年生，福建龙岩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任闽西特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分局书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建国后，还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团结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经　济

5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建成大批机井，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取得显著成就。据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江苏、北京、天津等省、市统计，1966年～1971年新建的机井，相当于1966年前十多年机井建设总数的3倍。仅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近年来就新建机井40多万眼，利用机井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占总灌溉面积的一半。

6月　刘家峡水电站——陕西眉县的刘天关输电线建成输电。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也是我国目前距离最长、电压最高、输电量最大的输变电工程，电压为33万伏，输电能力为42万千瓦，全长534公里。

9月6日　财政部决定将财政收支包干办法改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工作已取得巨大成绩。现在，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已经得到扭转。黄河下游两岸已建成引黄涵闸60多座，虹吸工程80多处，灌溉面积已达800多万亩。1971年，黄河流域的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79%和137%。

9月30日　长沙湘江公路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它是一座17孔双曲拱桥，主桥长1,250米，宽20米，可以并排通过4辆卡车，在最高水位时，2,000吨的轮船也可以在桥下通行无阻。通到橘子洲头的长282米的支桥也同时建成。

10月1日　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建成正式通车。大桥全长1,390米，是我国目前黄河上最长的一座公路桥。桥面可以并排通过3辆卡车，两侧各有1.5米宽的人行道。这座大桥的建成，把原来被黄河隔断的公路连接了起来。

10月10日　新华社报道：辽宁、吉林两省解放后大规模地治理辽河，取得重大成就。在辽河上游和各主要支流共修建水库22座。修筑堤防4,500公里。全辽河流域共有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辽河流域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比解放前增加1倍以上。辽河的治理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四平等大中城市工业用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10月13日　湘（湖南株洲）黔（贵州贵阳）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全长900多公里。它的东头和湘赣铁路相连，西头和1966年建成的贵昆铁路相接。这样就在我国

南方构成和陇海路平行、横贯我国东西的第二条交通大干线。这条铁路建成后，大大缩短了西南地区与北京和华东、中南地区的距离，密切了西南与北京和全国的联系。使云、贵、川三省增加了一个大的进出通道，从根本上改善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1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试制成功一台每秒钟能运算11万次的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经过半年来1,600多个小时的运转，表明性能良好。它与同速度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比较，结构简单，体积小，适用于工农业、科学研究等部门运算各类数据。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它是专供输大型机械设备的。车身长21.3米，加上牵引车全长31米多；宽3.7米，有96个大轮子，全部由液压控制。经过多次载重试车，运行情况正常。经过鉴定，证明性能良好，符合设计要求。

12月29日　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640亿元，国民收入为2,136亿元，粮食产量为24,048万吨，钢产量为2,338万吨，原煤为4.10亿吨，原油产量为4,567万吨。

军　事

1月7日　我国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7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关于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3个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8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三支两军的人员就陆续撤回军队。

外　交

5月14～18日　由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领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5月16日　我国同荷兰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同意自1972年5月18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

6月5日　我国和希腊在地拉那签署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在6个月内互派大使。

6月25日～7月5日　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应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我国。29日，中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建设棉纺织印染厂的协定在北京签字。7月5日，周恩来总理同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在经过友好会谈后，在上海签署一项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公布了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的结果，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斯里兰卡政府提供一项长期无息贷款。

6月27日　我国和圭亚那在伦敦签署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政府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根据进一步发展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7月8～17日　应我国政府的邀请，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委员、临时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伊斯梅尔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7月16～27日　应我国政府的邀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21日，中国政府和阿拉伯也门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8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在此之前，8月11日上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晤了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正式转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要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8月24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国飞机于8月22日悍然炸毁停泊在越南义安省宇岛附近海面的中国商船“红旗151号”所属的一支救生艇，炸死5名中国船员的严重挑衅行动，提出强烈抗议。26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奉命发表谈话，对美国企图抵赖炸毁我国救生艇的罪责进行驳斥。

9月17日　由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9月19日　我国同多哥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政府还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9月25～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陪同下，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我国。在此期间，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先后举行多次会谈。

27 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29 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政府决定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 8 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10 月 11 日　我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

10 月 17 日～11 月 8 日　以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为团长、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维为副团长的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7 届大会。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11 月 6 日　我国和马尔加什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 月 15～25 日　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和夫人应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我国。18 日,中、尼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

11 月 19 日　我国和扎伊尔共和国在巴黎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 1972 年 11 月 24 日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11 月 21 日　我国和牙买加在渥太华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1 月 28 日　我国和乍得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即日起建立两国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11 月 30 日　周恩来批准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外事会议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报告,这对于肃清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1973 年 3 月 8 日,在中联部、外交部举行的招待在京外国女专家和中国女专家的招待会上,他继续重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阐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对外国专家和中国同志应该一视同仁,过一样的政治生活的政策。

12 月 9～16 日　由贝阿沃吉总理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应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我国。13 日,中国政府向几内亚政府提供财政贷款的协定和提供商品贷款的协定在北京签字。

12 月 14 日　我国选派 16 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本年连同派赴法国的留学生 20 名,共派出留学生 36 人。这是自 1966 年停止派出留学生以来,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12 月 21 日　我国和澳大利亚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2 月 21 日　我国和新西兰在纽约签署联合公报,自 12 月 22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文教科技社会生活

8 月 1 日　新华社报道:一座距今 2,100 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葬里,从尸体、棺椁到大批的随葬器物,都保存比较完整,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古墓埋葬女尸一具,由于墓葬采取了防腐措施,使尸体不仅外形基本完整,而且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楚。墓的随葬器物共有千余件,其中最珍贵的是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长 2 米多、上宽 92 厘米、下宽 47 厘米的彩绘帛画。帛画内容丰富。整个画面,从下到上,表现了地下、人间、天上的景物,线条流畅,描绘精细,色彩绚丽而对比强烈。实为我国古代帛画中前所未见的杰作。是我国现存的 2,100 多年前唯一的一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这座古墓葬的发掘出土,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以及医药、防腐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10 月 6 日　《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针对旧中国科学基础异常薄弱和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理工不分、忽视理科教学的严重情况,特别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人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破坏的严重事实,指出:综合大学理科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使学生既懂得马列主义、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又必须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具备做科学实验、理论分析、概括和计算工作的能力,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他们能够根据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分析并予以解决。理科的任务是既要培养出为当前生产所需要的具备自然科学理论训练的工作人员,又要培养出为国家今后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所需要的理论工作人员。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对工农业生产、医学卫生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最根本的,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是为了适应学习新学科、掌握新技术和继续提高的需要。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那种否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谬论的一种否定。它集中地体现了周恩来要求整顿被林彪、江青等人严重破坏的教育工作的强烈

愿望。早在这以前，周恩来就提出了要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意见。1972年7月，周恩来指示周培源：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过了不久，周恩来再一次指示周培源：“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在这一时期中，周恩来还表示赞成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些学科的大学生。但是，周恩来要求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在周培源10月6日的文章发表后，张、姚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3年

导　言

由于毛泽东只批林彪的极右，不批极“左”，江青、张春桥等更加有恃无恐，“左”倾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了。他们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勾结的真相不但没有被揭露，反而以“反林英雄”的假象迷惑人们，使已经有了转机的各项工作又遭到新的挫折，全国形势再度变化。

1973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又一次宣传了毛泽东讲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把以批判林彪为中心的批修整风运动说成是“首先是批修”，也说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即，批判极右。

尽管如此，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还是有所发展。1973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8.4%，工业总产值增长9%，超过上一年增长6%的速度。文化教育也开始重新走向正规，大学招生中，文化考试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筹备党的“十大”。会议确定了“十大”代表产生的条件、方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方法。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虽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揭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也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干扰破坏，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共“十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毛泽东想借助“批林批孔”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多次提出要批孔丘，批“尊孔反法”。这一口号被江青等人所利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全国展开。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文字改革
- ●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 ●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
- ●中共“十大”召开
- ●西藏的巨变
- ●张铁生的“白卷”——批“回潮”运动
- ●“红小兵黄帅”
- ●“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

文字改革

背景介绍

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还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之间，必须简化汉字。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成为70年代初文字改革的指导方针。

材料：

·汉字精简　大有可为

材料　汉字精简　大有可为

汉字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回答。汉字由于几千年来的积累，数量是庞大的。如果以公开出版的收字较多的字典为依据，汉字大约有五万个。在这五万个字中，绝大多数是现在用不着的古字和古异体字；还用得着的字，大约有一万个，其中异体字、专业字、生僻字、告示不常用的字占多数。

根据几个单位的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正文（包括题解）共六十六万多字，所用不同的单字约三千个（由于统计的目的和方法不同，结果也不一致，多的三千零九十四个，少的是二千九百五十二个）。在这三千个字中，在全书出现一百次以上的有七百四十六个，共出现六十一万三千多次，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出现五十至一百次的有二百二十二个字，出现一万五千多次，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其余的两千多个字，出现二万一千多次，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三点二。

这两千多个字，在全书出现五次以下的有一千零六十六个，其中有二百三十九个只出现两次，四百二十四个只出现一次。对照一九五二年教育部公布的两千个常用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用了其中的一千八百三十七个，没用到的有一百六十三个。

小学识字教学以多少字为合适？根据编写教材单位的经验，三千个字比较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要求小学语言课本编入三千五百个不同的单字，但是编写的实际结果，只在三千字以内，于是，又增加了一些人名、地名和文言字。最近几年有些单位编写的小学语言课本，单字均在二千八百个左右。印刷厂的常用字盘的字，一般在二千五百个到三千五百个之间，但不常用的备用字盘的却超过了这个数目。

用常用字盘排印政治书籍和其他普及读物就够用了，只有排印文艺作品和化学、医学等专业书籍才缺字。缺的是科技专用字、人名地名专用字、文言字、方言字、象声字等。这些字并不常用，数量却不太少，给文字工作机械化、自动化的开展和提高造成很大的困难。例如，某厂有个自动照相排字车间，常用字盘的字全部包括了排印毛主席著作所用的字。他们用常用字盘试排了《红旗》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和新华社通讯《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两篇稿件，用字八千多个，只缺人名字一个，象声字三个。由于缺这四个字，他们就不得不几次使用备用字盘，而使自动排字的速度受到影响。

从毛主席著作、小学语文课本和印刷用字的情况来看，常用字是不多的。即使加上各类专业的常用字，常用字的数量也不会增加许多，在通用汉字中仍然是少数。由于汉字字数太多，而且又是非常用的字多，这就给儿童学习和成人使用造成很大的负担，给文字工作广泛开展机械化、自动化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精简汉字的数量很有必要。

早在建国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便给我们指出，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简单，才算得上简化。遵照这一指示，有关部门在精简汉字数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今后还应该坚定不移地做下去。首先，在通用字中，大力精简非常用字。非常用字数量很大，是精简的重点。精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改换生僻地名字，淘汰现代汉语中已不用的文言字，改换或淘汰科

技中生僻或重复的字，改换音译外国人名地名难字等。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去掉汉字多年来的一个累赘。其次，精简常用字，办法是用笔画少的同音字代替笔画繁难而又不易简化的字，归并多余的同音近义字、派生字等，这样就可以使汉字较为精练起来。此外，象声字还不少，且又在不断增加。这种字只表音，不表义，用汉字表音又常不准确，因此，可以考虑逐步用汉语拼音来代替这种字。

字数减少了，会不会发生字不够用、词汇的发展受限制等情况呢？我们认为是不会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以内容十分广泛、词汇非常丰富的《毛泽东选集》来说，所用的单字只有三千个，这就是说内容好的篇幅长的著作，实际使用的单字并不多。二、需要大量精简的是非常用字，这种字有许多早已在现代语言中失去作用或作用很微小，把它精简掉只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工作。三、一部分繁难的常用字，书写不便，群众已用简易的常用字代替，在广泛流行和应用中没有发生意义上的混淆。四、现代汉语词汇是很丰富的，加以词汇总是朝着复音词的方向发展，即使今后不断增加新词，也并不需要增加新字，仍然可以在通用字中找到适合的字来组成新词。至于翻印古籍或特殊需要，当然是可以不受精简字数的限制。

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各种途径，逐步精简汉字的数量，是大有可为的。经过精简，汉字就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可以设想，汉字数量大大减少以后，通用字的教学就有可能在小学阶段解决，这就大大有利于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字数精简也有利于文字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给汉字在实现拼音化以前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8月2日《人民日报》，作者：卜力）

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背景介绍

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合作。1973年，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双方代表团访问，日中友好议员同盟也在日本东京成立。

材料：

- 中日友好的新篇章——记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材料　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记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富士山下春深如海，中日友谊比春意更浓。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怀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在从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八日的一个多月里，访问了日本的四十七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十八个，进行了参观、访问、会晤、座谈、集会和宴会等近五百次活动，接触了广大的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妇女、文化、科学、教育、艺术、新闻、体育、宗教、政界和经济界等数以万计的各界人士，探望了老朋友，结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廖承志团长等还会见了田中首相、三木副首相、大平外相和中曾根通商产业相等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访问地区之多、接触范围之广，都是中日友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生动地表明，关心和支持中日友好的队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这次访问为中日友好历史谱写了新篇章。

无论是在东京、京都和大阪，还是在冲绳、四国和北海道，日本人民都是用最热烈的场面来欢迎代表团，借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由二十二个政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中央级的欢迎委员会，仅委员人数就近三千人。地方上的欢迎委员会几乎都是由各界人士和县知事、市长、县或市议会议长联合组成的。真是朋友遍天下，友谊满东邻。

在福冈，当地居民穿着民族盛装，用传统的、大规模的集体舞蹈《咚大鼓》来迎接代表团。往年舞蹈中的彩车是用寺庙的形象装饰起来的，今年特地换上了大熊猫的模型。两千人各手持两块写着“日中友好”字样的木板，一面齐唱民谣，一面有节奏地敲着木板跳舞。日本朋友给马纯古副团长等戴上樱花冠，穿上樱花袍，陪同他们走进《咚大鼓》舞蹈的场地，这时全场高呼：“日中友好万岁！”

在长崎，一千三百位各界人士联合举行盛大酒会欢迎代表团。卧病中的长崎县知事久保勘一特致电代表团祝贺访日成功。在一片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当地的工人、青年和学生表演了龙舞。龙舞是古代从中国传到长崎的。好客的主人特意用这个节目来欢迎中国客人，说明长崎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往来关系。酒会上，访问过中国的日本朋友聚集在一起，用中国话高唱《东方红》。欢迎委员会送给每位与会者一个木制酒杯留念。日本朋友拿着木制酒杯把代表团的每个成员团团围住，请他们在酒杯上签字。

在日本海沿岸的第一大城市新泻，日本各界朋友一千多人在体育馆里举行欢迎宴会。由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的百人舞蹈队，先在会场的二楼唱起新泻民谣，跳起佐渡舞。然后，跳着舞下到一楼，跳进人群，最后拉着中国客

人一道跳。接着,代表团里的文艺工作者也唱了京剧和刚刚学会的日本民歌《渔民小调》。这时,会场上呈现一派兴高采烈的气氛。当地日本朋友说:“新潟县人民这样热情地欢迎外国代表团,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亲切感。新潟人民的感情是向着中国人民的。”

其他各县也都用具有当地特点的形式,热烈欢迎代表团。参加欢迎接待工作的日本朋友之多是空前的。大家感到,这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结果。许多日本朋友在交谈中都谈到日中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的重要意义。他们纷纷表示要求实现这个声明。

代表团的成员深入工厂和农村、渔村,同日本的广大劳动人民见面,亲切交谈,出现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场面。

他们访问山形县的烟草工厂,同五百多位男女职工会见,并且分头进行了座谈。他们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访问秋田县的农村,同老农和青年农民促膝谈心。他们到青森县的海藻养殖场,登上渔船同渔民一道边吃海扇,边谈心。他们到只有五户人家的村松町上杉部落,在一所只有三名小学生的学校里,日本朋友演唱革命现代京剧。

李素文副团长和团员王崇伦等访问岩手县谷村新兴制作所时,同那里的男女职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当中国朋友谈到中国的男女平等,女同志也做领导工作、男同志在家里也带孩子和烧饭时,日本工人高兴地笑起来。一位日本工人说:“我以前在《人民中国》杂志的照片上看到中国工人在愉快地劳动,每个人都面带笑容。今天听到你们的介绍和看到你们的形象,我更加理解为什么中国工人总是笑嘻嘻的了。”

副团长张香山、财丽琴和团员邢燕子等冒雨访问了三重县的农村,并到农民西田一郎家谈家常,就农作物的选种、施肥、灌溉等交换意见。西田一郎的老伴拿来刚刚从园子里摘下的鲜草莓招待中国客人,他们的儿媳背着小孩站在一旁静听。离别时,老农的儿媳打着雨伞把张香山等送上汽车。中国客人跨越东海来到日本,就象到邻村走亲戚一样亲近。

副团长赵正洪等同日本乒乓球界进行了多次的亲切交往。赵正洪祝贺日本在第三十二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日本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获得女子双打冠军,赞扬了日本乒乓球队在比赛中勇敢顽强的精神,并且对日本乒乓球队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还不辞劳苦,为加强国际体育界的友谊而分头访问东南亚和欧洲,表示敬佩。日本乒乓球协会副会长城户尚夫对中国朋友说:日本乒乓球界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乒乓球界的友谊和团结。

代表团到处亲身体会到日本人民珍视日中友谊精神。代表团从佐世保到长崎、又从长崎到熊本的一百公里的沿途中,欢迎的人群几乎是不断的。很多农民自发地从田野里跑到路旁向代表团招手致意。一位妇女从很远的地方坐了七个多小时的车赶到札幌参加座谈会。她一到会场就积极发言,同中国妇女交换意见。日本的著名跳高运动员杉冈邦由特地从九州赶到东京,向郑凤荣等详细地介绍跳高的新技巧。在长野县的一个车站,停车只有两分钟,六十多岁的日本朋友小山峰啸和他的夫人从老远的地方赶到站台,冒着满头大汗找到周丽琴乘坐的车厢。他从车厢外伸进手来同周丽琴握手,接着又递进两盒粽子,并且说:“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周丽琴说,这位日本朋友访问上海时曾同她见过面,可惜还来不及深谈,车子就开动了。

代表团在访问期间,收到了日本各界朋友写来的许许多多的信和电报,有的表示问候,有的邀请代表团去访问,有的要求访华。代表团把这些函电装满了一个大皮箱带回中国。还有许多日本中学教师同学生一道来访问代表团成员,要求同中国中小学生建立通信关系。

许多日本朋友为了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正在幼儿园里,在学校里,在家庭中,在社会上,抓住各种机会,来培养日中友好的接班人。

代表团中的七位女同志访问了东京中野区的一所幼育园。天真烂漫的日本儿童,挥舞着自己制作的中国国旗和日本国旗欢迎中国阿姨。他们围成一个圆圈,活泼地唱起歌来:“郁金香,开满园,红色白色和黄色,朵朵鲜花都好看……”。这些小朋友在教师的教导下,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请中国阿姨把自己制作的手工和图画转赠给中国小朋友。代表团中的青年工作者访问东京港区白金小学时,孩子们正在上课。他们见到中国客人进来时,都微笑示意,表示欢迎。等下课铃一响,小学生们便蜂拥而来,和中国客人握手,并争先恐后地同中国客人合影留念。这所有一千多名学生的学的校校长对中国朋友说:“日本和中国是亲密的近邻,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思想教育学生的。”

于会泳副团长等到日本著名的艺能(日本的一种古典戏剧艺术形式)演员野村万藏家里作客,七十多岁的野村特地带着他的儿子和孙子为中国朋友表演了日本的古典戏剧。冲绳县的一位妇女新垣典子,一九五六年曾参加日本青年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现在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那次访华起,十七年来一直为日中友好而努力。这次代表团访问冲绳时,她带领三个孩子来欢迎代表团。她的上初中的长子对代表团团员说:“我妈妈教育我,长大后一定要搞日中友好工作,我决心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奋斗!”

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成员的种种见闻都说明了一点:中日友好确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日友好事业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呈现出美好的前景。正像廖承志团长在访问期间一再谈到的那样:中日两国人民世

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一定要实现的，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 1973 年 6 月 3 日讯，6 月 4 日《人民日报》）

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

背景介绍

1973 年 6 月 27 日，我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我国一贯坚持这样的立场，即我国的核试验完全出于防御目的，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

材料：

·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材料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午，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再次声明，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继续同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

（新华社 1973 年 6 月 28 日讯，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中共"十大"召开

背景介绍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249 人，代表全国 2800 万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成为政治局常委。此后，王、张、江、姚在中央的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八月二十四日，大会正式开幕。

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大会选举了由一百四十八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

大会一致通过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广泛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征求代表候选人所在地区或单位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最后选出了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全体代表认真阅读了大会的全部文件的草稿和草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十大的召开。

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来自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五湖四海的大会代表，通过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巨幅画像的大厅，进入了庄严的会场。他们之中，有的是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有的是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党员代表。工农兵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妇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待解放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

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带着全国二千八百万党员的委托,各族亿万人民的心愿,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进行了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高兴地说,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当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热烈鼓掌声和口号声。

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他们有的是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的优秀战士,有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入党的青年同志。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代表们兴奋地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文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指出: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乱,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西藏的巨变

背景介绍

西藏各族人民自1951年和平解放,回到祖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扶持和帮助下,正逐步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西藏旧貌换了新颜。

材料:

- 西藏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

材料　西藏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西藏高原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西藏自治区的农业生产,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百万翻身农奴欢欣鼓舞地说: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是西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新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曲凯歌。

今年,西藏高原农业生产出现了鼓舞人心的大好形势。全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增了产。继去年五个

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跨入了这个先进行列。全区三十二万克(一克相当于一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达到四十斤以上。根据初步统计，西藏今年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同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相比，增长了近一倍半。西藏的农业丰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加速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在西藏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对帝、修、反和达赖叛国集团恶毒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无耻谰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过去的西藏，在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千百年来，西藏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原始落后状态，用木犁耕地，用牛踩场，生产水平低得可怜。广大农奴和奴隶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加上反动的三大领主的残酷迫害，致使藏族人口逐年锐减。一九五九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百万农奴一举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统治，民主改革的熊熊烈火燃遍万里高原，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了主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西藏的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高潮。全西藏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乡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一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为西藏农牧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地域辽阔，全区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百分之七十的农田分布在海拔三千到四千一百米之间的河谷地带，无霜期短，气候变化无常，土壤条件复杂，旱、霜、雹、风等自然灾害繁多。从苦难的深渊中站立起来的百万翻身农奴，在这些极为不利的自然条件面前，他们不拜倒在大自然的脚下，唉声叹气，无所作为，而是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自豪地说：我们要做大自然的主人，决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他们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英雄气概，重新安排西藏河山。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以大寨为榜样，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勇敢地向大自然进军，创造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连想也不敢想的许多英雄业绩。

地处楚河畔的江孜、白朗、日喀则三个县，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三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大力根治楚河，疏通河道，修堤筑坝，改造荒滩，引水灌溉，使这条千年古河，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今年，沿河三县的农业又获丰收，粮食总产量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了将近三倍。像楚河两岸人民这样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生动事例，在西藏高原到处可见。仅去冬今春，全区新修梯田、台田、园田近三十万克，新修和维修水库、水塘一千五百多个，新修水渠总长三千四百多公里，扩大灌溉面积三十万克。目前，西藏高原的农田灌溉面积已占全区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生产条件的迅速改变，为西藏高原农业的大幅度增产和高产、稳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百万翻身农奴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在这高寒的“世界屋脊”上，世世代代基本上没有越冬作物。这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被有的人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事。然而，打碎了封建农奴制度枷锁的百万翻身农奴，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指导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大力改革耕作制度，开展科学种田活动，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获得成功。现在西藏高原上的冬小麦，已经扩种到海拔四千零五十米的地区，更可喜的是，在大面积的丰产中，还出现了小面积克产一千四百斤的高产纪录，创造了冬小麦栽培的奇迹。今年，整个基本地区冬小麦的实收面积比去年扩大一倍多，又获得大面积丰产。这一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千百年来的陈旧传统观念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百万翻身农奴，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运用自然界的规律为人类服务。

在旧西藏，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压抑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旧的制度虽然改变了，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当西藏展开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要开山修渠，一些受封建迷信思想束缚的人就说神山不能动，神水不能引。阶级敌人乘机利用这种“天命”思想造谣惑众，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百万翻身农奴运用战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大破“天命论”，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今年三、四月间，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加查县，有九千多克冬小麦地里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地老虎”虫害。中共加查县委带领全县人民，积极投入扑灭“神虫”的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光捕捉活虫就达三万七千多斤。加查人民消灭了虫害，赢得了农业丰收。今年，这个县的一万四千克冬小麦，平均单产过了“黄河”，全县的粮食单产又继续上了《纲要》。尼木县人民批判了“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让水改道是违背菩萨的意志，永远办不到”的反动谬论，斗风雪，战严寒，劈山引水，筑坝截洪，使全县保灌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今年全县粮食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党动手，大办农业，这是西藏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西藏自治区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牧区，带领群众开展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自治区的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牛、羊、马等牲畜，比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三倍。养猪、造林事业发展也很快，并初步建设了一些果园、茶园，发展了蔬菜生产。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昔日贫困落后的旧西藏，今日面貌大变，全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3 年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张铁生的"白卷"——批"回潮"运动

背景介绍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招生后，想通过上大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但在文化考试中，语文只得了 38 分，数学得了 61 分，理化几乎交了"白卷"。在答理化题时，他将准备好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答案背面。毛远新等人如获至宝，亲自为文章乔装打扮，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在《辽宁日报》显著位置发表。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成为攻击周恩来的"有力武器"，张铁生则成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

材料：

·《辽宁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

材料 《辽宁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

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

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分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原载 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

张铁生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 1968 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 18 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 27 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 2 天的复习的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

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的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分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红小兵黄帅"

背景介绍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1973年9月，曾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于10月21日给《北京日报》写信，登在《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由《北京日报》选编的日记摘抄。黄帅成了还处在迷顿时期的小学生的反潮流的榜样，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时髦的口号。

材料：

-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 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

材料一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人民日报》编者按：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红小兵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按语。现转载如下，供同志们学习、研究。

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同时要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政策，使青少年们更加朝气蓬勃地成长起来。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支持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关键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来　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教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 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 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 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

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期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 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 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记摘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他带理不理，不像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原载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黄帅的一封公开信
——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

《人民日报》编者按：革命小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热烈赞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说得有理，驳得有力，值得一读。

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坚持革命、还是折中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为教育革命大好势拍手叫好

王亚卓同志：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看到你来信的开头语，使我不平静地读了好几遍，和你一样，我对你的来信也“想了许多许多问题”。报上发表了我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引起你给我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春节几天，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你同我们的分歧。欢迎你对我这封回信继续提出批评。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来信

说："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作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我认为，我们根本的分歧就是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好"，还是"糟"？我们全班、全校、北京市和全国都出现了如《元旦献词》指出的——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过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使师生对立；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使师生重新团结、战斗在一起。现在我的班主任老师革命干劲更大了，他说："教育革命对我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做好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永远不会忘记受到的深刻教育。"他已成为我们的好战友、好榜样、好"班长"。有一位过去教过我的老师还主动来班征求意见，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班上，同学们写出的大字报、小字报一批又一批，纪律自觉遵守，劳动不怕出汗，学习质量提高，后进的同学也赶上来了，成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领巾班。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拍手叫好，而是埋怨指责，这只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说："继你之后，又出来个辛苦愚，说的话更是没道理"，还说在报纸上"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到指责老师的文章"。看来你真是一位既"关心"批修又"同情"老师的人了，因为我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捡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高压、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你是一位政治工作干部，来信说："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你关心的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判断"香花"还是"毒草"的政治标准，你把我们革命的师生引向分裂，把我们从教育革命前进的大道上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多么相似！希望你立即猛醒！

你对我"要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的确我们的分歧是存在，是严重的大是大非不可调和的分歧。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开历史的倒车，办不到，办不到！在十大精神鼓舞下，我们青少年就是要发扬"五敢"精神，要斗，只有狠狠地斗，才能坚持进步、坚持变革、坚持革命！

你的来信帮助我认识到，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要把手拍得最响，把声放得响亮，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红小兵　黄帅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2月12日《人民日报》）

"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

背景介绍

中共"十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此时，毛泽东既希望尽快结束动乱，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又忧虑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他认为林彪的右倾与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关，想借助"批林批孔"来统一全党的认识。1973年5月以后，他多次提出批孔丘，批尊孔反法。江青等人接过这个口号，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炮制了《从林彪与孔孟之道》，从而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材料：

· 毛泽东提出"批孔"（辑录）

·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一 毛泽东提出“批孔”(辑录)

(1973年5月—9月23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与江青的谈话:

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厚古薄今、开倒车。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谈话: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选自《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新中国编年史》 廖盖隆 人民出版社 1989年7月)

材料二 林彪与孔孟之道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运动,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抵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的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

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〇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们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舆论界“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了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家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像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的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

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任宰相，一上台就杀了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 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要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真正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　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要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群以忠”。像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

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关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2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

风云人物

李庆霖

李庆霖，男，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他原是莆田县一所中学的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给领导干部和就社会问题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又下放到城郊公社小学任教。1969年，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高中毕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

只能与千千万万和他同样家境出身的青年一起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在莆田贫穷落后的一个山区乡村插队落户务农。当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广大农民难得温饱，贫穷的山区更是缺衣少食，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生活就成了大问题，同时，他们还因农村宗派关系、插队落户寄居寄食关系等，其前途和命运完全由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或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一手操纵，时而饱受人格或肉体的凌辱。李庆霖的孩子在农村的生活只有靠家里支持，一年劳动到头，甚至连理发钱也挣不到手，致使李庆霖的家境贫困难以为继。而有权有势有后台的却拉关系、“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纷纷远走高飞了。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子弟就只有“扎根农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流一身汗”的份了。

1973年初，李庆霖冒着不测风险，斗胆上书毛泽东，如实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生活困境和自己家庭的处境，以及干部子女“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的不正之风。毛泽东收到这份难得的反映民众疾苦的上书，亲自复信李庆霖，答复他要对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加以“统筹解决”；并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毛泽东的复信引起了全党对知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严重问题的重视。中共中央为此下达文件，与毛泽东的复信一道发至全国，并在城乡各级广泛组织群众学习讨论，以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继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当时已经上山下乡的800万知识青年和关于今后知青工作“统筹解决”的6条原则，提出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班子，由第一书记挂帅；要解决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实际困难；对已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知青，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适当增加安置经费；对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知青的犯罪分子，要依法惩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严禁逼婚；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落户变成主要以下几种形式：1、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知青点；2、单独建立青年队；3、单独建立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农场；4、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以后就招工、招生、招干又发了几个文件，要求杜绝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的特权现象和不正之风。800万知识青年和此后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条件由此有了一些改善。李庆霖也因此成为社会民众钦佩的敢于为民请命的一代英雄。后来，“四人帮”一伙利用李庆霖的社会影响，把他捧为“反潮流”的勇士，福建的帮派头子也极力拉他入伙以壮声势。李庆霖本人对此受宠若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投靠“四人帮”，成为他们“反右”、反对周恩来的一个工具。

（编者）

张　铁　生

张铁生，辽宁兴城县人下放知青。原为白塔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1973年他参加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时在物理考卷的背后写了一封信，信中请示“各级领导”在这次考试中“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张铁生的这一举动正好被“四人帮”加以利用，一时间张铁生成为“白卷英雄”，轰动全国，围绕张铁生的白卷问题“四人帮”搞了一个“反潮流”运动，煽动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极为恶劣的歪风，张铁生为此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担任了铁岭市农学院的领导职务，甚至当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被送劳动改造。

珍闻轶事

“四结义”

表示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王维国四人之间反革命交情至深，如同结拜成把兄弟一样。

1970年6月30日，江腾蛟、周宇驰、王维国坐着由林立果开的林彪专用轿车——可以防弹的保险“红旗”车，去逛长城。周宇驰得意忘形地说：“战友（指林立果）开的车，不但技术上是保险的，在政治上也是绝对保险的，我们坐的是一辆永远翻不了的政治列车。”王维国附和着说：“这是一列光明的车，胜利的车。”江腾蛟连声说：“对！对！”车里传出一阵狂笑。在去烽火台的路上，年龄都比林立果大一倍的江腾蛟、王维国，像奴才一样，左右两边搀着林立果向上攀登。从八达岭去十三陵的途中，江腾蛟谄媚地说：“我们这也可以说是车上‘四结义’！”

这四个家伙，确实抱作一团，狼狈为奸，为林彪图谋反革命政变卖命效劳。当然也都罪有应得：林立果随同林彪一起机毁人亡；周宇驰开枪自绝于人民；江腾蛟、王维国被依法判刑。

别致的拐杖

在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生活中，有一根别致的拐杖——一根小竹竿。现收存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

一次晚饭后，毛泽东同志在灯光暗淡的路上行走，险些被一块小石头绊倒。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就随手从路边的竹林里折了一根小竹竿递给毛主席，而后非常认真地对主席说："主席，您这么大年纪了，也该置一根拐杖了。我们明天上街去替您买一根。"主席举起刚才折下的小竹竿，笑着对工作人员说："这不就很好嘛！"毛主席好像看出工作人员还想说什么，就又严肃地说："现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的生活都还不富裕，我们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啊！"毛主席饱含觉悟的话语，使工作人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回到住地，工作人员就将那根小竹竿仔仔细细地修整了一下，把刺手、不光的地方都修光。从此以后，毛主席就一直使用这根普通的小竹竿。

有一次，毛主席到南方某地视察，刚巧一位外宾也在那里休养。一天，毛主席会见那位外宾时，那位外宾看到日夜为中国和世界大事操劳的毛主席，竟用着这样的拐杖，很受感动，就对毛主席说："主席，我的这根拐杖送给你用吧！"毛主席对外宾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十分风趣幽默地说："不用啦，还是你用你的'文明棍'，我用我的'打狗棍'。"毛主席对自己这样的要求使那位外宾对他更加敬佩。

"今天该我为你们服务了"

毛泽东同志对同志很热情，感情很真挚。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服务人员把饭菜、茶水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放下手里的工作，站起来双手接过去。有时实在放不下手里的工作，就笑着向服务人员点点头表示谢意。每逢过年过节，毛主席便嘱咐炊事员把饭菜做得好些、多些，并亲自把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请到一起就餐。他给大家倒酒、夹菜、端饭、拿饭，要大家吃饱吃好。常常在这时候对大家说："你们成年累月为我服务，你们很辛苦，今天该我为你们服务了。"有时工作太忙，他就简单地陪着喝几口酒，吃几口，向大家问个好，便匆匆回办公室工作去了。毛主席这样平等待人，使身边的同志感到非常温暖，就好象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选《每周文摘》

语　录　歌

将某位领袖人物的某段话、某段文章配上谱，谓之"语录歌"。"文革"初期语录歌风行全国，小学生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有人说，语录歌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创造"。因为它的"歌词"不讲韵律，并且有大量的关联语词，如"因为"、"所以"、"但是"、"于是"等等，这是任何歌曲都不曾有过的。但是，林彪的"《再版前言》歌"使所有"语录歌"小巫见大巫。《再版前言》全文不算标点共737个字，有作曲家费尽心机谱了曲，还有宣传队上台演唱。但由于这首奇特的歌太长，终究没有几个人能唱完。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要是马克思在中国

某大学教授第十三次被揪斗，在家写完第十四份《检查书》后，老妻在旁小声嘀咕："要是马克思现在在中国就好了！"教授说："好什么？要是马克思现在中国，肯定要写出比《资本论》还厚的《检查书》！"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抄家的新闻

红卫兵打砸抢抄，无所不为，所到之处，对方是战兢兢，不敢声张。但抄某著名相声演员的家时，他们都遇到意外。只见演员的五个儿子穿一色的黑衫，每人拿一面盆，从大到小成一横队，一面敲一面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问："你们为啥都穿黑衣？"

答："我们是黑五类嘛？"

问："为啥敲盆子？"

答："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鸣锣开道！"

众红卫兵高呼口号："打倒×××"。只见五个儿子一起倒在地上。问"为什么倒地"。答曰："按红卫兵规定的口号，打倒、打倒，不倒不行。"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犹意岂止酒

有位老大爷拿着酒瓶上街打酒，走了好多条街都没打到，老头儿气愤地说：，

邓小平打得倒，

我就打不到（音倒。指打不到酒）；

邓小平打不倒，

我就打得到（音到。指打得到酒）。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喝　酒

老陆平白无辜地被揪斗以后，回到家里借酒浇愁。爱人劝他：“这种六十度的烈性酒不能多喝。”

老陆苦着脸说：“六十度算什么？这几天，我在厂里天天尝的是‘九十度’！（弯腰被斗争）。”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永远健康

“四害”横行时，有个社员偷着进城去卖兔子。一个顾客看了看，不放心地问：“这兔子没有病吧？”

社员听了不服气，把兔子举起来掂了几下，高声说道：“这兔子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喊原来的……

一次，某造反组织为武斗中的“死难烈士”开追悼会，他们特地请了一位卖凉粉的人来领呼口号，因为他嗓音洪亮，一声呼喊，大有震天动地之势。

当主持人宣布：“现在请大家呼口号。”即示意卖凉粉的照着预先交待好的口号喊。谁知卖凉粉的一生都没经历过这么大、这么庄重的场合，吓傻了眼，楞头楞脑地呼了一句：“英雄不死——”忙又补上：“还有精神。”主持人急慌了，忙凑近他的耳朵说：“错了，错了，快喊原来的。”。

那卖凉粉的楞了一下，即刻习惯性地呼喊道“卖——凉——粉！”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文革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三国四方”

50 年代至 60 年初期，我国军工生产受“大跃进”、“放卫星”等冒进运动的影响，使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都不同程度出现过偏差。但是，受冲击和破坏最大的，却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了。

“文革”中，在军委办事组内，握有大权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于 1969 年 8 月，趁着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之机，各自揽权，分别成立了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为组长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以海军司令员李作鹏为组长的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电信工业领导小组，以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为组长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形成了我国军工生产的“三国四方”局面。

在他们自成系统、乱提要求的瞎指挥下，军工战线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的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不少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强令废除，使科研生产陷入一种异常混乱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产品，在“需要就是计划”的口号鼓惑下，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低劣且不配套。仅海军部队接收生产出的 5 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有 469 项。全军 1969 年至 1971 年接收的 700 多架“歼 6”型飞机，竟有 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一些产品不是无法装备部队，就是装备部队后发生严重事故，千百次较大的失误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

例如，我军于 1963 年研制成功的 63 工自动步枪，1967 年 5 月经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批准，强令年产 60 万支。这一脱离实际情况的“硬指标”，竟然超出了工厂实际年产能力的 5 倍！

工厂为了赶任务，自行简化工艺 100 余项，完全不照科学规律办事，进行大肆的粗制滥造。这一批 50 万支自动步枪先期装备部队后，广大指战员普遍反映该枪射击精度差，故障多，射击时有时还向后喷火，而且多次发生“炸”伤人事故。为此，战士们公开喊出了“还我半自动”的呼吁。

1967 年 11 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国防科委组织了全军第一次反坦克武器实弹射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参观结束后要求步兵连、营、团三级都要改进反坦克武器。1969 年 3 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军委再次将步兵团以下单位的反坦克武器的科研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要求组织“会战”。当年 8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诸事缠身的百忙中，还曾亲临试验靶场观看实弹射击。经过 3 次定型试验，在最后决定投入批量生产的 82 毫米无后

座力炮的69式40火箭筒时，主管当时全军常规武器装备工作的邱会作却从中作梗，不但不同意大量生产，而且还另外抽调了一批人开始搞一种性能和质量均不如69式40火箭筒的所谓"改进型"。这一"私货"未经靶场和部队试用检测，便于1970年决定大量生产并装备部队。后来，当这批"改进型"不断发生事故后，才被迫停止使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蓬勃开展的的军工战线的技术革新活动被迫处于停顿，就连负责军品质量控制和验收任务的驻厂军代表制度，也一度被取消，致使大量武器装备不经检验便带着质量问题交付部队使用，严重影响了作战、训练任务的完成。

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关键就在于不顾国民经济状况的客观实际，搞"假大空"，什么每年要生产坦克5000辆，飞机3000架，战斗舰艇15万吨、炸药50万吨……等等，不仅脱离了当时我国军工生产的实际可能，而且冲击了军工战线的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还把大量隐患交给了部队。

马振扶公社学生事件

"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生了一起被江青一伙指为"教育战线复辟回潮的典型"的一起学生自杀事件。

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初二(1)班学生张玉勤英语考试成绩不好，并且在考卷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校方批评后，她投河自尽。此事发生后，当地政府作了适当处理。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江青从一份内部刊物上得知此事后，立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大骂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大喊要"控诉"，并指使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去抓这个典型。按照江青的意图，迟、谢2人来到马振扶公社，置南阳地区、县、社3级党委的结论于不顾，用两个半天开了两次包括死者家属在内的座谈会，炮制了一个《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情况简报》。《简报》说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马振扶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其实质就是复辟"。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南海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一伙煽动要把此事当做"实际"来联系。迟群在大会上叫嚷："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现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此后，马振扶公社中学负责人罗长奇、张玉勤的班主任杨天成被判刑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斗罗式、杨式人物280余人，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大肆宣扬这件事，就是为他们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论找证据，结果使各所学校刚刚有所恢复的必要的教学制度和秩序再次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1974年1月31号中共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情况简报》文件。对此事重新作了处理。

毛泽东器重邓小平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份《决定》指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决定》还要求"各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1973年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开会。至此，邓小平重新返回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在这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同年5月20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时，特别提到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并且指出，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以其杰出的才干再次获得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此时，由于周恩来已身患重病，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逐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和邓小平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建议。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时再追认。毛泽东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且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事隔半天，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的谈话

中，对邓小平的工作安排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指示："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以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并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接着，毛泽东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各位将军宣布了对邓小平的新任命，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政治局请回一次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同志)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可以改一改吧。"为鼓励他的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就是错误……"

北京高力

毛泽东与基辛格纵谈东西方关系

1973年2月15日下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飞抵北京，这是他对中国的第5次访问。2月17日晚上11时，基辛格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周恩来会谈，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忽然把一张字条递到周恩来的面前 。周恩来按照会谈的原话题继续谈了1分钟，然后宣布"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和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

几分钟后，基辛格和洛德坐上周恩来的汽车，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往市中心。这时是深夜，街道上已经行人绝迹。车子快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时向左一拐，穿过与宽广的瑟马路平行的长长的红色宫墙，进入一座由红漆圆柱支撑的传统中国式的大门。车行约1英里，便停在了毛泽东的住宅前。

进去后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便看到毛泽东在摆成半圆形、蒙着褐色罩布的沙发前面伫立。屋里放满了书：毛泽东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墙的书架上，到处都是书。

当基辛格和洛德走上前与同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说："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啰。"

在谈到美国的旧对华政策时，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他笑起来了。

基辛格说："是两个从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

毛泽东赋予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以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坚持说。"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考验我们一下。"毛泽东风趣地说。

毛泽东接着说："只要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

在谈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向客人提示说他受到激进派的压力。但是，毛泽东说得很隐晦，基辛格未能立即体会他的意思。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毛泽东不放心基辛格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基辛格终于明白，毛泽东对他的夫人江青搞的那一套表示不满。

1973年11月12日是个星期一，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

同过去会晤毛泽东的情况一样，这次会见也是命令式的(至少基辛格觉得是这样)，收到邀请时，基辛格正与周恩来举行研究中美关系的例会。

基辛格与周恩来同乘一辆红旗轿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沿墙摆满了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里与基辛格握手，互致问候。毛泽东还同陪同基辛格前往的美国外交官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俩年龄都要大，他已经80岁了。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谈话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打算把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基辛格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回答说。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基辛格，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

"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

毛泽东在与基辛格谈话时还谈到1969年他同未经邀请就来到北京机场讨论缓和中苏紧张关系问题的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会晤，再次表明他对苏联领导人的蔑视。毛泽东说："我说，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

一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毛泽东继续说：“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一千年。”……

很有必要大有作为

——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孙立哲给知识青年们的信

孙立哲同志和他的同学们，到延安地区插队以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我们向记者推荐孙立哲同志这封信，希望大家读一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们想一想从这封信里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其他战线的同志们看一看上山下乡的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是如何学习、锻炼、成长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是多么英明，伟大，意义是多么深远。

——《人民日报》编者

知识青年同志们：

你们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发表五周年了。在毛主席伟大号召指引下，千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受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号召是非常英明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完全必要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预见，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社会主义农村的面貌，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们将要取得多么伟大的胜利。

老一辈革命者，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希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待于我们去继承下来。我们知识青年要勇于肩负重担，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跟二十名同学一起，来到延安地区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延川县关家庄大队插队落户的。

延安是革命圣地。我无法用文字向你们表达我看到延河、宝塔山时的心情，我们瞻仰了革命旧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学习毛主席在延安十几年的伟大革命实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照毛主席关于“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的教导，我们批判了自己过去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高手低的弱点，决心从小事做起，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同他们一起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们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加上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贫下中农生了病，往往要跑十几里路去诊治。有的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小病拖成了大病。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知识青年商量，把自己从北京带的常用药品集中在一起，谁家有了病人，我们就送药上门。这样，使不少生病的贫下中农恢复了健康。这以后，在贫下中农和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当上了赤脚医生。不久，我们就办起了大队合作医疗站。

说到这，我不能不告诉你们我思想感情的变化。一次外出买药，跟我一起去的是个贫下中农（现在是赤脚医生）。那天正下大雪，跑了三十多里山路。我筋疲力竭。到了镇上，我说：“先找个旅馆歇歇。”他说：“不，公事要紧，先买了药再说。”我说：“那就先到饭馆吃顿饭吧。”他听了，从背包里取出从家带来的馍说：“不要费钱了，饭都带着呢！”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是呵，贫下中农和我们想的就是两样。当天，我们连夜踏雪回村。路上，他抢着把药品都背在自己身上。他发现我脚板磨出水泡，二话没说，从自己的棉袄上抓下一把棉花垫到我的鞋里。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四年多来，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帮助和关怀，使我的思想感情逐渐发生了变化。

自那时起，我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实践中刻苦钻研医疗技术。为了学会针灸我在自己身上练针。同学们也都争着让我在他们身上练习扎针。在大家的支持下，我比较快地学会了一些基本医疗技术，并开始为贫下中农治好了不少常见病和多发病。

以后，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暑寒雨雪，只要知道谁生了病，我就上门治疗。一天夜里，邻队一个贫农的未满周岁的婴儿病危，我闻讯立即翻山赶到病儿家。孩子因为患中毒性消化不良，处于昏迷状态，必须立即输液。我们医疗站没有输液设备，这里离大医院又远，病情危急，不能坐等。我望着病儿父母焦急的神情，一股阶级感情的热流涌上心头，我决心用注射器给孩子输液。我用手托着针管，跪在病儿身边，慢慢为病儿注射葡萄糖和生理盐水。由于我的身子不能活动，时间长了，疲劳万分。我默默的背着毛主席关于“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教导，一直坚持了四十多小时。当我看到孩子慢慢睁开了小眼睛，看到父母脸上的喜色，我感到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心贴得更紧了。

不久，外村抬来一个患急性肠梗阻的病人，必须立即开刀。但我们不会做手术，只好翻山把病人转送到几十里以外的医院去。由于路太远，病人在半路上不幸死去了。我心里十分难过，深感自己没有为贫下中农尽到职责。我当即下定决心，要学会做外科手术，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建设新农村出力。

消息传开后，有人嘲笑说：“医学院一天也没上过，就想在土窑洞里开刀，太狂妄了！”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却热情鼓励和支持我。不过，说实话，像我这样一个初中

毕业生，要学会做外科手术，的确有很多困难。但我想，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不是不可克服的。我怀着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的强烈责任感，开始学习做外科手术。

白天，我给社员看病。夜晚，坚持在煤油灯下翻阅医学书籍和资料。一有空就在自己的衣服、被子、床单上反复练习结扎缝合技术。我还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在一家医院里见习了一个多月。医院里的同志听说我是从延安回来的知识青年，都非常热情地指导我。回村后，我们经常在猪、狗、兔、鸡等动物身上做生理解剖和手术实验。贫下中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手术床，大队木工帮我们做了一个木板床；没有高压消毒器，贫下中农就把自家的蒸笼送来；需要学习解剖、做实验手术，贫下中农就把家犬牵来。总之，需要什么，贫下中农就送来什么，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为了取得开刀的知识，我必须亲身实践。一次，我的右脚大拇指害了嵌甲，趾甲深嵌在肉里，鲜红的肉芽被顶了出来，必须动手术把趾甲拔掉，剪去那块肉芽。有人建议我去县医院做手术。我想，这不正是一次学习开刀的好机会吗？我就在脚上打了麻药，拿起血管钳向鲜红的肉芽插去。因为麻药没打好，血管钳刚触到肉上就疼得难受。我有些犹豫。可我一想到革命的需要，想到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一咬牙，猛地把血管钳插进肉里，一直坚持把手术做完。

经过半年多的实践，我初步掌握了一般的外科手术技术，利用一孔土窑洞，办起了手术室。贫下中农看了都高兴地说：这真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啊！一位复员军人还兴奋地向我们讲起了战争年月，我军医务人员在破窑和窝棚里抢救伤病员的动人情景。我们想，这里条件虽然简陋，但比白求恩大夫当年在战场上的条件强多了！

手术室建立不久，我们为那位复员军人取出了胡宗南匪徒留在他身上的三个弹片。他拿着留在他身上的二十多年的弹片夸赞我们。这以后，我们经常做些小手术，受到群众的欢迎。

一九七一年初，一次重大的考验来了。一个贫农女社员突然发病。我闻讯赶到时，只见她面色苍白，蜷卧在炕上不时呻吟。经过仔细诊断，是胃溃疡.穿孔并发性腹膜炎。必须立即切开腹腔修补胃穿孔，否则将会导致中毒性休克而死亡。在这重要的时刻，我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送走吗？山高路远，势必加重病情，会发生意外，由我们做手术？这么危急的病人，这么简陋的设备，行吗？……病人的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恳切地对我说：“不要怕，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治好治坏我们信得过你！”病人的丈夫，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凤利，想起他弟弟死在送往大医院途中的情形，坚决要求我们就地做手术。贫下中农对我们怀着多么大的期望和信任啊！为了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我们拟定了手术方案。村里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小组的同学闻讯赶来，大家动手，做好准备。没有麻醉师，知识青年小陈主动承担。我们参加手术的三个知识青年和本村那位赤脚医生，都被这动人的情景鼓舞着。手术开始后，我们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工作，经过长时间的紧张战斗，终于圆满地做好了手术。阶级姐妹的生命得救了，我们高兴极了！

第一次大手术的成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通过实践，使我们看到，医学和任何科学都不是难不可攀的，只要努力钻研，是一定能够掌握的。从那以后，外地找我们看病的贫下中农越来越多了。有时，从早到晚，每天要诊治几百人。我们也常背起药箱，巡回医疗，向贫下中农请教草药、偏方，并上山采挖中草药。在实践中，我们的医学知识由少到多，医疗技术逐步提高。四年来，我们逐渐掌握并运用腰椎麻醉、硬膜外麻醉和针刺麻醉等方法，作了胃穿孔修补、肠梗阻、子宫外孕、子宫切除、甲状腺全切除、关节复合术、骨结核病灶消除术等较大手术一百九十多例，大小手术共计一千多人次。我们常这样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土窑洞，使我们在偏僻山乡和土窑洞里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

亲爱的知识青年们！我向你们介绍的这一切，为的是用事实证明毛主席指出的这条真理：“知识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为的是把我们每点成绩都化作子弹，共同射向刘少奇、林彪一伙，使他们的什么“下乡镀金”“读书做官”、“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见鬼去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不是这样吗？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每个革命青年的前途都是无限的。

在接受再教育中，我们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却把我们看得非常重。四年多来，我们村的贫下中农像父母一样关心和照顾我们。我身体不好，常犯胃病，我的房东康儿妈特意去镇上买了一块红布，亲手做了一个陕北流行的兜肚，让我戴上保暖。我有时病倒了，人们就做些好饭好菜，并热心护理我。曾让我做过手术的一位女社员，偷偷量了我的鞋样，做了一双鞋送给我。她寓意深长地说：“我这双鞋，样子不好看，可穿它走咱陕北的山路是最好不过了！”贫下中农对我们寄托着多么深切的期望啊！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工作，在革命征途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即使这样，党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荣誉。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在谈到青年人应当怎样安排自己的任务时指出：“在任何乡村和任何城市里，每天都能实际解决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要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

样"。在祖国的乡村，在广阔的田地里，我们每个知识青年，不就是应该这样去做么？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勇往直前，不辜负老一辈革命者的殷切期望，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可靠接班人。

此致

革命敬礼！

孙立哲　于延安地区延川县

（原载1973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九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精心炮制的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下简称《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转载。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大肆宣扬：《答卷》作者"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更是得意忘形，到处狂叫：《答卷》作者"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份所谓《答卷》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它完全是"四人帮"蓄意炮制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要拣"石头"打人，是蓄谋已久的。

一九七三年四月，国务院下达了大学招生文件，强调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明确指出：要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这些规定，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招生办法，既同"以分取人"那种旧的招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同否定学文化这种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文件发下不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北京，同"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进行了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回去以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胡说什么："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他们一方面同意搞文化考查，一方面却要"保留批判权"，这不是赤裸裸地说明他们存心要整人吗！

当时，兴城县是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的一个试点。本来，在兴城考区，考生可以翻书，考题不是偏题怪题，考试方法也不是突然袭击。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瞎说是什么"闭卷"，"搞得很紧张"，"从教师本身来看有些问题，考试方法也有问题"。他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辽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次大学招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搞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一次试验，路线是正确的，即使有些地方由于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了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不难纠正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抓住文化考查大做文章，以百倍的疯狂咒骂："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反攻倒算之嫌。""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居心险恶地叫嚣："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予希望的人都给卡了。"他们此唱彼和，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把攻击的罪恶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指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心怀卑鄙的目的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弄虚作假，真是费尽心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给领导写信一事。"四人帮"在辽宁决定要《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当时，有不少群众反映，《答卷》作者在信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暴露出他自己倒是个"大学迷"。"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心切，竟说什么："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两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七月十八日，他在退给《辽宁日报》的送审小样上，竭力为所谓的《答卷》乔装打扮，把最能反映《答卷》作者写信意图的最后一段话，即"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统统删掉了，并亲自改写了"编者按"，为《答卷》涂上一层"反潮流"的油彩，指定第二天（即七月十九日）立即见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他精心改写的"编者按"，胡说什么《答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却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是墨写的谎言。事实是，六月二十八日下午，这个自称为"自

我表现胜似黄牛"的《答卷》作者参加语文考试，谈《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竟不知所云，只得三十八分；二十九日上午，他参加数学考试，只得六十一分；下午，又参加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的六道小题，得六分。结论很明白：《答卷》作者参加了所有的考试，每门考卷都答了题，他交的根本不是什么"白卷"。

《答卷》作者写信的目的，完全是乞求上大学，向上爬。考试前，他借书复习功课；考试时，他按期赴考。第三天下午考试，他睡过了时间，竟从窗子跳进应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答卷》作者就给领导写过乞求上大学的信。这次在县里考试，他答理化题时，"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深感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即将变成泡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故伎重演，把卷子翻过来，掏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本子，从上面抄下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答卷》作者在信中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现在一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答卷》作者的生父，解放前是兴城县一家粮业油坊的股东、经理，公私合营每月还收房租，拿定息，政治历史也很不清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所谓的《答卷》发表之前，也曾装模作样到兴城县，作关于《答卷》作者"情况的调查"，但是不顾事实，美化《答卷》作者"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考试结束后，《答卷》作者还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还到了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的要求，《答卷》作者上大学临行时，还对他的生父说："这回我可熬出来了！"大量事实证明，《答卷》作者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迷"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把他捧起来，吹起来，"诱以官、禄、德"，完全从属于"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揭露"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四人帮"需要有《答卷》作者这样的人，充当他们的前台打手，在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说他们想说的话，办他们要办的事。果然《答卷》作者随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打着所谓"反潮流"的旗号，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逝世以后，他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堕落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

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我国上空的那股乌云。这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的炮制者——"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被揪出来了，《答卷》作者也现出了他真右派的原形，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要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乘胜前进，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辽宁日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揭穿一个政治骗局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

《人民日报》编者按：一九七三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下，加"编者按"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接着，又加"编者按"发表了小学生答复王亚卓同志的信，使提出正确意见的三位同志惨遭政治迫害。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我们发表了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同志写的题为《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为这三位同志平了反，并在"编者按"中表示：我们要"彻底揭批'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所犯的一切罪行，一笔一笔算清楚。"

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小学生的全部日记，并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

粉碎"四人帮"后，小学生事件拖了近二十个月，现在总算基本上弄清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再次说明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谎言是掩盖不住的，一桩桩，一件件，到头来都会水落石出。

（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教育战线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使各级各类学校遭到巨大的破坏。《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就是一个突出的反革命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日报》是有帐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阶级异已分子姚文元指使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转载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在自己的按语中，吹捧这个小学生"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

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姚文元还指令《人民日报》在转载《北京日报》这个材料时，配一个中关村一小“形势大好”的“简短新闻”，从另一个侧面来肯定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四人帮”在北京的那个女黑干将在这个新闻中加上了“要看到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危险性，要向他们应战”一句，公开表明了“四人帮”炮制这个黑典型，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后，“四人帮”就开动他们手中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把一个十二岁的五年级小学生，吹捧成“可爱的革命小将”、“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树起了这样一个“革命小将”，便立即在教育战线掀起大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师道尊严”的恶浪。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学校，又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就拿北京为例，短短几个月内，仅学校的玻璃，就被砸碎二十多万平方米；好的校风、学风遭到极大的破坏。广大干部、群众、家长，无不对此痛心疾首，而“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却得意洋洋，称赞这“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夸奖小将“造反精神”“可爱极了”。事实充分说明，《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大批“师道尊严”，大树“反潮流”人物，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一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查，彻底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干部，一直强烈要求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罪行。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一个署名“钟诚”的教师给大会写信，对长期不认真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批评，反映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呼声。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所谓“不能完全否定‘师道尊严’存在”。“日记确是小学生本人所写，内容已经查证落实”云云，完全是欺人之谈。现在，我们向广大读者披露“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真相，以便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二）

五年前，《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展的前夕，当有人跑来跑去“调查”的时候，中关村一小的同志曾愤愤地指出：“这完全是一出戏”。事实正是这样。

所谓小学生的“来信”，完全是在小学生家长的指令下制造出来的。也可以说，“小学生的来信”，实际是“小学生家长的来信”。请看事实：

小学生家长在“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前两个月，即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别有用心地进行了频繁的活动。

十月十六日，小学生家长到中关村一小找班主任谈话。这时正是那个小学生和班主任矛盾比较“尖锐”的阶段。可是小学生家长在班主任面前，根本不提及那个小学生同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问班里的同学对这个小学生有什么意见。同时，他背着班主任，向在校的同学们调查×××是不是学校领导成员，是不是党员，并向同学们发泄他对班主任的不满。

十月十八日，小学生家长给中关村一小党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说什么“一个小学生在日记中说出自己对老师的意见，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写这封信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通过这件事的解剖：有许多问题是值得引起人们的研究的”。

十月十九日，小学生家长又跑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他从那里听到了“师道尊严”这个词，但不解其义，回到本单位立即向一个同志询问“师道尊严”是什么意思。于是，在十二月二十日的“小学生”日记上，“师道尊严”这个词就第一次出现了。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于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一个小五年级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带有严重政治性的信？熟悉小学生的老师认为，像“来信”结尾那样的长句，小学生根本不会使用，背后肯定有人唆使，操纵和支持。果然，现在查明，小学生的“来信”中最厉害的话，如说老师批评她“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毒攻击老师”，她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些话，同家长的信一字不差。其他，如“班里还出了简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一段话，也基本上同其家长信中的话一样，只是语言、人称有些改动而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树为“反潮流英雄”的小学生“来信”的真相。

（三）

小学生的“来信”为伪造的，那么，为“来信”提供根据的“日记摘抄”，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最初，用小学生署名向几家报刊寄出那封信时，并没有日记。见报时才增加了“日记摘抄”。我们看了这个小学生一九七三年的全部日记，经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日记摘抄”同样是为了迷惑视听而歪曲、编造出来的。

小学生的日记从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十一月五日止，共一百四十篇。九月四日以前的所有日记中，没有任何一处反映出师生之间有对立。相反，倒是几次提到班主任对她的帮助和教育。例如，小学生在六月九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两个同学指出她不虚心，同学一给提意见，“就凳(瞪)眼睛”，“老师批评时也不服气，由(尤)其当上红小兵以来很严重”。这是“说明我当上红小兵以后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六月二十一日记，详细记述了她对班主任严格要求学生的认识。这天全班小学生

参加修篱笆。班主任看见他们修得不合要求，让拆了重修。这个小学生写道："这时我才意识到篱笆修得很不好，左看右看不合式(适)，老师说得对，老师这种认真精神值得我学习"。班主任也在这个学生的日记上写过一些评语，如"写得认真"，"希望为革命努力学好外语"等，给予鼓励。事实表明，这里记述的是尊师爱生的关系，哪有什么"师道尊严"可言。

再看小学生反映和班主任闹矛盾的日记，即九月五、六、七、二十八日，十月一、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日的十九篇，这该是"师道尊严"的真凭实据了吧！但是，许多事实又都是小学生自己也否定了或基本修正了的。这十一篇中间，就有三篇是小学生检查自己的错误，或说明自己批评老师不当的。例如，九月六日的日记，是检查五日在课堂上当教师批评一个同学的错误时，自己表现不好的。又如，十月一日的日记，小学生分析和检查了三篇日记("日记摘抄"中九月五、七、二十八日三篇)的缺点，说，"第一次提意见是一次教师批评我，我发现一些语句不够确切。……第二篇日记我是全为帮助教师而写下的，……现在我认识到对教师有意见可以提，但又得保证有利于团结，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今后一定改正。第三篇日记我是完全在情绪上写的。""所以这篇日记写得很不好，今后改正。"十月二十九日小学生还在日记中总结检查了"最近两个月"自己和老师闹矛盾"影响了老师工作，也影响了自己学习"，小学生"在情绪上"对老师提了批评，就是敢于"反潮流"吗？当然不能。正因为如此，这些日记就在"摘抄"者的手中"落选"了。

但是，"日记摘抄"中，确实把"师道尊严"说得很严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见报的六篇"日记摘抄"，我们不一一说了，只看两个实例，事情就一目了然。例如，十月十九日的日记，全文九百字，经过"摘抄"，用了一百四十字。小学生在这篇日记中集中记录了那段时间老师对她作的十多条批评，编者只"摘"了四条。老师严正向这个学生指出的："在这次斗争 中，你反潮流反错了，你把老师当作反潮流的对象反，反错了。毛主席是提倡领导有一点缺点就反吗？"这些话被删去了：老师揭露小学生的父亲在后面捣鬼，制造师生对立的话，如"小学生对老师提意见过头了一点，只能说明小学生比较幼稚，这话不可能是你写的，是别人教你的"，也被删去了；教师旗帜鲜明地反对乱扣"师道尊严"大帽子的话，被删去了；老师告诫这个小学生对同学的一些错误，不应当"上纲到政治性错误"的话，也删去了。又如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原来写着："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你(指老师)提意见，说什么(我)老不承认错误，就抓住老师的一句话不放……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编者"摘抄"为："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经过这样"加工"的"日记摘抄"，教师被渲染成为"师道尊严"十足，连学生提点意见也不接受。

还需要指出的是，报纸上刊登的几篇日记本身，不全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本来这个小学生五年级时还不是红小兵，这说明她确实有缺点。正是刚刚接手五年级的班主任，看到她的学习、纪律、劳动等方面都有进步，才把她发展为红小兵。这年下半年，班主任发现这个小学生由于受家长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参加劳动、遵守纪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方面有明显的退步。老师出于关心，曾多次对这个小学生进行教育，这无疑是对的。即使老师的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一点，甚至有一些错误，学生提出意见，提出批评，这与"师道尊严"有什么相干呢！如果老师对学生进行这些批评和教育，就是"师道尊严"，那么，教师还要不要教育学生，要不要管学生，要不要指出学生的缺点、错误？教师对小学生只能说是，不能说不，还要教师干什么！

事实被歪曲了，是非被颠倒了，于是一个十二岁孩子被树成"反潮流英雄"、"可爱的革命小将"。"四人帮"那两个黑干将当时就吹捧小学生，说什么"一个很小的小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从此，这个小学生就被吹捧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又是请她在报上写文章，大会作报告，又是上银幕，赴宴会。

"来信和日记摘抄"抛出以后，虽然人们普遍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是小孩子的责任。北京内燃机厂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看得更清楚了，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

欺骗不能持久，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四人帮"炮制《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真相，终于被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其实，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现在彻底揭露"四人帮"炮制这个事件的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为了消除"四人帮"给小学生造成的压力，并使小学生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人民日报》转载了"来信和日记摘抄"，欺骗了广大读者，起了极恶劣的作用。我们决心和广大师生、干部一起，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一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 1978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73年"文化大革命"陷入更深矛盾中，"九一三事件"后，江青集团夺权的步伐加快，他们在中央搞帮派，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提倡要注意纪律，注意团结，那时《人民日报》就重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它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艳阳天》这个电影则是反映当时江青与周恩来之间的斗争。江青借批"资产阶级"的农村政策，借"批林批孔"来影射周恩来。妄图加以陷害。

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A4/4 红军歌曲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电影《艳阳天》

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0本

根据浩然的同名小说改编。

一九五六年秋，东山坞合作社民兵排长肖长春带领群众进行抗灾自救。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马之悦却利用国家贷款跑买卖，放弃农业生产。肖长春与之进行斗争，通过整党整社，马被降职，肖当了支书兼社主任。在肖长春的领导下，成立高级社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小麦丰收。一九五七年整风时，马之悦煽动生产队长马连福和富裕中农弯弯绕闹土地分红，妄图破坏麦收，搞垮农业社；他还勾结地主分子马小辫阴谋杀害肖的独生子；进而又在路线觉悟低的李乡长保护下，赤膊上阵。……

历史档案

新　年　献　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三年元旦社论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满怀革命豪情，跨进了一九七三年。

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以革命的敬礼！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外交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批修整风运动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广大干部和群众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开展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地落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了新的提高。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更加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推动下，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好收成。工业生产继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煤、原油、化肥、电力、交通运输等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财政贸易情况良好，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教育革命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取得了新的成就。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在各条战线蓬勃兴起，茁壮成长。

我国政府和人民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我国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友谊继续发展，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促进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那些千方百计破坏这场大革命的牛鬼蛇神，那些做梦也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已经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笑。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胜利了，不要忘乎所以。过去军队打仗，打了胜仗就要总结经验，指出新的任务，继续前进。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批修整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十大"路线继续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各级党委要严重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刘少奇一类骗子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在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全党同志，要坚持不懈地认真看书学习。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下苦功夫学好中央规定的几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识破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伪装，从政治上、从思想上、组织上把那些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批修整风中，要认真汲取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要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修整风搞好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继续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我们要充分看到广大群众在批修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只要我们真正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较快地前进。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搞好农业，加强农业。农业战线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做到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战线要抓紧基础工业，加快原料、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步伐，促进钢铁和整个工业的发展。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工人群众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坚定地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服务。人民解放军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各条战线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在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做好工作。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各条战线夺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内

部，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基层党组织要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贫下中农组织、妇女组织，应当经过整顿逐步健全起来。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注意培养新干部，特别是要注意从工人中、从妇女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干部，并努力帮助在职干部更快地提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不管老干部、新干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整个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改变着面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中、小国家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苏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出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不论苏修、美帝玩弄多少阴谋诡计，都不能阻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最近，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袭击。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如果美国政府不立即停止轰炸，不签署"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协定"，坚持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我们深信，胜利一定属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在欢度新年的时候，我们对台湾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对港澳同胞表示怀念。我们对海外侨胞致以问候，祝愿他们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多的贡献。

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月1日《人民日报》）

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动作说明

（七岁——八岁）

一、伸展运动（二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侧平举。

2. 两臂肩侧屈，五指并拢触肩。

3. 两臂斜上举（掌心相对），同时起踵、挺胸、稍抬头。

4. 两臂经体侧放下，还原成立正。

5—8同1—4，但第七拍换右脚做。

注意事项：(1)全蹲时，两膝并拢，臀部低于膝，但大小腿不要靠紧。(2)脚后出时，两腿不要弯屈。

三、踢腿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侧下举，同时左脚前出一步，右脚起踵，重心移至左脚。

2. 两手叉腰，同时右腿伸直向前上方踢起。

3. 还原成"1"的姿势。

4. 还原成立正。

5—8同1—4，但出右脚踢左腿。

注意事项：踢腿时，上体要正直，脚面绷直，支撑腿要伸直。

四、体侧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经体侧至两手扶头后（指尖相对，同时左脚侧出一步（与肩同宽），脚尖点地，重心在右脚上。

2. 上体向左侧屈（两膝不要弯屈）。

3. 上体直立，同时两臂摆至侧平举。

4. 还原成立正。

5—8同1—4，但向右侧做。

注意事项：(1)两手扶头后时不要掩耳，两肘与身体在同一平面。(2)上体不要扭转或前屈，不低头。

五、体转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左手叉腰，右臂屈肘，手放左腰间（掌心向上），上体自然向左转体约45°，同时左脚侧出一步（与肩同宽）。

2. 右臂经体前伸直向右侧平举，并摆至正后方（转体约135°），眼看右手。

3. 还原成"1"的姿势。

4. 还原成立正。

5—8同1—4，但出右脚向左转体。

注意事项：上体不要后仰，两脚不要移动。

六、腹背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左脚侧出一步（与肩同宽），同时两臂经体前至上举（掌心向前），上体后屈，抬头。

2. 上体前屈，手指触地。

3. 还原成"1"的姿势。

4. 还原成立正，但两臂可自然后摆。

5—8同1—4，但换右脚向右侧出一步，最后一拍还

原成立正。

注意事项：两腿不要弯屈，上体所屈时不要挺腹。

七、全身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左脚顺脚尖方向迈出成弓步，同时两臂经体前斜上举（掌心相对）。

2. 上体前屈，同时两臂经体前向后上摆（掌心向上）。

3. 两臂向下经体前绕至左臂前斜上举。右臂后斜下举（掌心都向下），同时上体抬起眼看左手。

4. 还原成立正。

5—8 同 1—4，但左右相反。

注意事项：上体前屈时不要低头，后腿不要弯屈也不要起踵。

八、跳跃运动（二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脚跳成左右一开立，同时两手叉腰。

2. 两脚跳成并腿站立。

3. 两脚跳成左右开立，同时两臂经体侧摆至头上，击掌一次。

4. 两脚跳成立正。

5—8 同 1—4。

注：做这套体操时，呼吸要自然。一般做舒展、上举、扩胸等动作时，应注意吸气；做下蹲、前屈等动作时，应注意呼气。

（6 月 1 日《人民日报》）

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动作说明

（九岁——十二岁）

一、伸展运动（二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经体前至胸前平屈并后振（指尖相对，掌心向下）。

2. 左脚前出一步，重心移至左脚，右脚脚尖点地，同时两臂经体前舒畅 直（两手翻掌）摆至侧平举并后振。

3. 两臂向下经体前摆至斜上举（掌心相对），挺胸，稍抬头。

4，两臂经体前向下自然后摆，同时左脚收回。

5—8 同 1—4，但出右脚做。最后一拉还原成立正。

注意事项：动作要连贯舒展。

二、下蹲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侧平举。

2. 全蹲，两膝关拢、两手抱膝，眼看前下方。

3. 起立，同时两臂侧平举，左腿侧腿侧摆，脚面绷直。

4. 还原成立正。

5—8 同 1—4，但换右腿做。最后一拍还原成立正，同时两臂屈肘握拳于腰侧（拳心向上）。

注意事项：(1)全蹲时，臀部低于膝，但大小腿不要靠紧。(2)侧摆腿与支撑腿的夹角成 45°。上体要保持正直。

三、踢腿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同时两臂屈肘握拳于腰侧（拳心向上）。

1. 左脚顺脚尖方向迈出成弓步，同时右手向前冲拳（拳心向下）。

2. 身体重心前移，左腿伸直，右腿绷直上踢，同时右臂收回屈肘握拳于腰侧（拳心向上），左手变掌拍右脚面。

3. 还原成“1”的姿势。

4. 还原成预备姿势。

5—8 同 1—4，但左右方向相反。最后一拍还原成立正。

注意事项：踢腿时上体要正直，两腿要伸直。

四、体侧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伸直向内绕至侧平举（掌心向上），同时左脚侧出一步（与肩同宽 0，脚尖点地，重心落在右脚上。

2. 左手叉腰，右臂上举带动上体向左侧屈（两腿不要弯屈），然后上体直立。

3. 再向左侧屈一次，然后上体直立。

左脚收回，两臂经体侧平举至体前交叉（接下一拍两臂向内绕环的动作）。

5—8 同 1—4，但向右侧做。最后一拍还原成立正。

注意事项：(1)上体不要前倾，两腿不要弯屈。(2)臂的摆动要与体侧屈的动作协同配合。

五、体转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右臂侧平举、左臂前平举（掌心都向下），同时左脚侧出一步）与肩同宽。

2. 上体左转 90°，同时左手翻掌，左臂摆至侧平举，右臂经体前摆至胸前平屈，眼看左手。

3. 还原成“1”的姿势。

4. 还原成立正。

5—8 同 1—4，但左右方向相反。

注意事项：上体不要后屈，两脚不要移动和起踵，两臂要举平。

六、腹背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经体前平举、翻掌、侧摆至侧平举（掌心向上）。

2. 两臂经上举（掌心向前，眼看手），接着上体前屈，手指触脚尖。

3. 两臂上举(掌心向前),上体后屈,同时左脚侧出一小步,成左右开立(一脚距离)。

4. 两臂经体前向下自然后摆,同时左脚收回。

5—8同1—4,第七拍换右脚做,最后一拍还原成立正。

注意事项:上体不要后屈,两脚不要移动和直踵,两臂要举平。

六、腹背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臂经体前平举、翻掌、侧摆至侧平举(掌心向上)。

2. 两臂经上举(掌心向前,眼看手),接着上体前屈,手指触脚尖。

3. 两臂上举(掌心向前),上体后屈,同时左脚侧出一小步,成左右开(一脚距离)。

4. 两臂经体前向下自然后摆,同时左脚收回。

5—8同1—4,第七拍换右脚做,最后一拍还原成立正。

注意事项:(1)两腿要充分伸直。(2)上体后屈时不要挺腹。

七、全身运动(四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左脚顺脚尖方向迈出成弓步,同时左臂前斜上举、右臂后斜下举(掌心都向下),眼看左手。

2. 右腿屈膝,左腿伸直,重心移至右脚,同时上体前屈,左臂上绕至右手触左脚面、左臂下绕至后举。

3. 还原成"1"的姿势。

4. 还原成立正。

5—8同1—4

注意事项:(1)手臂绕环时要靠近身体。(2)两脚不要起踵。

八、跳跃运动(二个八拍)

预备姿势:立正。

1. 两脚跳成左右开立,同时两臂侧平举。

2. 两脚跳成并腿站立,同时两手叉腰。

3. 两脚跳成左右开立,同时两臂经体侧摆至头上,击掌一次。

4. 两脚跳成立正。

5—8同1—4。

注:做这套体操时,呼吸要自然。一般做舒展、上举、扩胸等动作时,应注意吸气;做下蹲、前屈等动作时,应注意呼气。

(6月2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一百四十八名)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秘书长　张春桥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汪东兴　华国锋　吴　德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　盛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　体　王　震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王淮湘　王德山

巴　桑(女)　尤太忠　毛远新　韦国清　韧彩猷

文香兰(女)　瓦力斯江·吐尔地　白如冰　皮定均

玄顺姬(女)　任　荣　刘子厚　刘兴元　刘庆棠

刘建勋　刘春樵　乌兰夫　孙玉国　江礼银　朱光亚

朱克家　朱秀峰(女)　朱明仓　华林森　年继荣

邢燕子(女)　陈　云　陈永贵　陈先瑞　孜　牙

杜　平　杨　勇　杨得志　李大章　李志民　李瑞山

李秀兰(女)　李素文(女)　张凤英(女)　张平化

张世忠　张达志　张江霖　张延成　张秀芝(女)

张体学　张恒云　张宗逊　张洪池　吕玉兰(女)

吕存姐(女)　吴向必　吴桂贤(女)　时克启　宋佩璋

余秋里　佟纯良　汪家道　佘各德　苏振华　周　兴

周一良　周建人　周丽琴(女)　宝日勒岱(女)

冼恒汉　林丽韫(女)　金祖敏　赵紫阳　郝建秀(女)

浩　亮　耿　飚　徐向前　徐景贤　郭宏杰　郭沫若

倪志福　唐岐山　唐忠富　唐闻生(女)　海呷子

钱学森　聂荣臻　秦基伟　诸惠芬(女)　梅小丫(女)

尉凤英(女)　黄林英(女)　盘美英(女)　曹轶欧(女)

曹莲凤(女)　康健民　梁锦棠　姬鹏飞　彭　冲

韩　英　韩先楚　粟　裕　解学恭　曾绍山　曾思玉

谢振华　谢静宜(女)　董明会　雷桂梅(女)　谭启龙

赛福鼎　蔡　畅(女)　蔡协斌　蔡树梅(女)　潘世告

鲁瑞林　樊德玲　魏秉奎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王　洪　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下面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践。

在这个方面，修改稿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须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不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久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反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

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变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中还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地方、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改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

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3 年 9 月 1 日讯，9 月 2 日《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2 月 28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 26 周年。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许德珩、廖承志，以及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台湾同胞代表共 100 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傅作义副主席主持，廖承志、傅作义、许德珩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代表和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代表等、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发言的人一致指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到会的各界人士对"二·二八"起义的烈士表示深切悼念，对烈士家属表示衷心的慰问，对所有台湾同胞表示亲切问候。

同日　原台湾当局驻澳大利亚伪大使馆商务专员宋伟斌和夫人及儿女一行 4 人，乘飞机到达北京，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3 月 12 日　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孙中山逝世四十八周年。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和许德珩、廖承志，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委员，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同日，上海、南京、广州各界人士也分别举行仪式和活动，纪念孙中山逝世四十八周年。

5 月 21 日　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战线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指出：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了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报告反映了科教战线群众对批林整风等问题的看法和情绪，如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愈"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报告把这些正确的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说成是"攻击"。

5 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到会人员共 246 人。5 月 20 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 3 项任务：筹备召开党的"十大"，讨论批林整风问题和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决定由张春桥等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同年 7 月，由张春桥等起草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党章（草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由毛泽东审阅，批示"原则同意"。

7 月 19 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原写在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的物理化学试卷背面，信中说：为了实现他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文汇报》还发起了"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红旗》、《教育革命通讯》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署名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张春桥、迟群说这是"复辟"、"反攻倒算"。与此同时，张铁生被吹捧成为"反潮流的英雄"，江青说他"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还说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江青一伙就这样为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典型，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张铁生不仅进了大学，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职务，还混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8 月 24～28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代表 1，249 名，代表全国 2，800 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有 3 项：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

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也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干扰破坏，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虽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揭露了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但又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大会通过的党章也是九大党章的继续，重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要求全党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个别地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东西，如指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求党员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批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在组织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8月30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取得党中央副主席的地位，江青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10月4日　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自1968年12月22日起，5年来全国有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28日　《北京日报》发表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红小兵黄帅10月21日向报社递送她的信和日记摘抄。黄帅的信是她和班主任教师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家长让她写的，日记摘抄刊于《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迟群、谢静宜见到后，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静宜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编者按语说："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又另加编者按语，从此，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与要求统统被说成搞"师道尊严"，许多教师被迫检查受批判，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学校又遭到破坏，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经　济

2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讨论1973年全国棉花生产计划，制定了发展棉花生产的措施。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对农、林、牧、副、渔业和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项生产，要因地制宜，统筹安排，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种足种好棉花，棉田面积要合理布局，适当集中，争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棉。

3月6日　中共中央决定邮政部和电信部合并，恢复邮电部。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机械工业部门努力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至1972年，全国组合机床的产量超过了1966年以前十年总和的2倍，技术水平和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现在，以组合机床组成的自动线占我国现有机械加工自动线的四分之三以上，它已经在汽车、拖拉机、电机等行业广泛应用。组合机床是在集中专用机床和普通机床优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效自动化的机械加工设备，采用它或由它组成的自动线生产大批定型产品，可以成倍提高生产率，保证产品质量。

9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上海、江苏、湖南、湖北、河南、山东、辽宁、四川8个省、市组织了8个医疗队，在最近先后出发去西藏。这8个医疗队共有440多名医务工作者。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支援西藏，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8个省、市组织的医疗队将分别深入西藏的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昌都等城乡地区，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帮助藏族卫生人员提高技术水平，扶持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要有计划地调查研究高山不适应症和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情况，提出有效的防治措施，同时注意研究西藏特殊的药材。

10月2日　吉林省前扶松花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这座公路大桥1972年4月20日正式开工兴建。大桥全长1,389米，桥面车行道宽9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5米，两侧引道总长7.5公里，是当时松花江上最长的一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式公路桥。

10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铁道部门在南京市东北郊建成一座大型列车编组站——南京齐化门车站。南京齐化门车站担负着沪宁、津浦、宁芜3条铁路干线的货运列车编组任务，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也是我国铁路系统的现代化大型编组站之一。车站股道长100多公里，桥涵有120多座，自动化程度较高。南北货运列车到达这里，经过解体作业以后，按照每节车辆的不同到达点，立即重新编组出站。这个车站是当年5月交付

使用的。

本年　工农业总产值为 3,968 亿元，国民收入 2,318 亿元。粮食产量为 5,299 亿斤，原油产量为 5,361 万吨，原煤产量为 4.17 亿吨，钢产量为 2,522 万吨。

军　事

6 月 27 日　正午，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12 月 12 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 月 21 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12 月 22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 8 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

外　交

1 月 10 日～20 日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10 日和 12 日，周恩来总理和蒙博托总统举行会谈。14 日，中、扎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

1 月 26 日　中国和智利两国政府间的海远协定在智利外交部签字。

1973 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家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 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1 个烷基苯厂、43 套综合采煤机组、3 个大电站、武钢 1.7 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项目。

2 月 15 日～19 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我国。22 日发表访问公报宣布：经商定，中美双方在不久的将来相互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

2 月 21 日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国际航线正式开航。这条航线通航后，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横渡阿拉伯海，飞跃南亚大陆到我国的上海，航程 9,000 多公里，只需 10 小时左右，大大方便了中埃两国和亚非两大洲之间的友好往来。

3 月 9 日　我国和西班牙在巴黎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 月 25 日～4 月 2 日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希乔和夫人，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28 日，中喀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4 月 5 日～15 日　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举行。经过激烈比赛，中国运动员胡玉兰和郗恩庭分别获得女子单打和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中国运动员梁戈亮和李莉获得男女混合双打世界冠军。

4 月 1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 4 月 6 日致各国国会和政府的信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封复信，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作出的又一新的努力，表示坚决的支持和声援。

4 月 19 日～24 日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埃切维里亚总统举行了会谈。4 月 24 日，发表联合公报。

6 月 20 日～27 日　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应邀访问我国。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里共和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7 月 27 日～8 月 1 日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马里安·恩古瓦比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恩古瓦比总统举行了会谈。7 月 30 日，我国政府向刚果政府提供的一项贷款协定在北京签字。

8 月 2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西哥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熊向晖，代表我国政府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在签署时，熊向晖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签署议定书，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裁军和核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有任何改变，特别是这不影响中国政府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一贯立场。

8 月 25 日～9 月 6 日　亚非拉乒坛史上的空前盛会——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经过三大洲各国朋友的共同努力，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86 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和其他朋友，共 1,100 多人，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会。它显示了亚非拉乒乓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亚非拉人民和运动员的大团结。这次友好邀请赛历时 13 天，通过各国各地区朋友的友好交往和紧张比赛，取得了圆满成功，9 月 6 日胜利闭幕。

9 月 11 日～17 日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蓬皮杜总统举行了会谈。9 月 17 日，发表中法公报。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方面特别是在发达的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

9 月 1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上沃尔特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公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上沃尔特共和国政府，根据两国的利益和愿望，通

过友好协商，一致决定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10日～17日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举行了会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

10月31日～11月4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和惠特拉姆总理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11月6日～15日　塞垃勒窝内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应邀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总理同史蒂文斯总统举行了会谈。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在北京签字。同时，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击化民和塞拉勒窝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米纳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会谈纪要。

11月10日　我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通知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秘书长科林·戈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参加1960年6月17日在伦敦签订的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和1966年4月5日在伦敦签订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并退出1930年7月5日在伦敦签订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我国在加入1966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时，作了如下保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区域的划分，不受该公约附则二第49条和第50条有关规定的约束。姬鹏飞部长还受权声明：蒋介石集团盗用中国名义对此两公约的接受，是非法的，无效的。根据上述1960年和1966年两个公约的规定，这两个公约将于1974年1月5日起对我国生效。

11月18日～23日　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应我国政府邀请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阮友寿主席举行了会谈。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关于1974年中国给予越南南方共和无偿经济援助的协定在北京签字。

12月7日～14日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德瓦和王后艾什瓦尔雅·拉吉雅·拉克西米·黛维·沙阿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比兰德拉国王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

1月15日～29日　1973年全国冰上运动会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

1月20日　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经拉瓦尔品第和我国首都北京、到达上海的国际航线正式开航。

2月6日　本日18日37分，我国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为7.9级，震中地区为北纬31.1度，东经100.4度。地震后房屋倒塌，人、畜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四川地方领导机关，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参加救灾工作。

7月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研究人员最近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进行了解剖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具距今2,100多年的尸体，不仅仅内脏器官完整，而且主要病变尚可确认。这次解剖，为我国古代医药、防腐以及其它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丰富的科学资料。解剖发现，女尸硬脑膜完好，但脑组织已散碎呈渣滓状。腹壁的层次分明。各内脏器官完整，但体积均已缩小。食道、胃及大小肠内有甜瓜子138.5粒，说明墓主人是在吃过甜瓜不久死去的，死亡时间当在瓜熟季节。用电子显微境观察，女尸的某些组织微细结构保存良好，从女尸肌肉、胃、肝、骨、头发等取样测定血型，证明为A型。经多方面检查，死者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冠心病严重，左冠状动脉一部分分管腔几乎完全阻塞。全身多处动脉粥样硬化。总胆管内有一块像蚕豆大的胆结石。肝管内也有一块黄豆大的胆结石。死者年龄五十岁左右，脂肪丰满，皮肤没有褥疮。看来系因急病而死。根据上述病症推断，由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致死的可能性最大。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经过解剖后，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外形。内脏器官等已制成标本，与尸体一并作了防腐处理，妥善保存。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有关单位共同设计试制成功。经3,000多小时的试算运转证明，这台计算机性能稳定，质量良好，主机的解题能力、外部设备和管理、语言编译、符号汇编三套程序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设计要求。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继电子管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由于它采用了集成电路，因此，具有体积小，储存量大，计算速度快，性能稳定可靠以及耗电量少等优点。我国制成的这台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字长48位，内部储存容量13万字，加上磁带机、磁盘机、打字机、作孔机和输出、输入机等，共有9种22台外部设备。这台大型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台计算机的成套外部设备，以及主机上所有固体集成电路，多层印刷板等，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有的设备系第一次试制成功，不仅满足了这台计算机的需要同时也为生产同类型或更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积累了经验。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光电等高仪研

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用的光电等高仪，经过近两年的观测使用证明，性能良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由于地球的自转，使日月星辰看去都是东升西落，等高仪就是用来观测恒星经过地平高度为60度的等高圈的时刻的，综合各天文台站多种仪器的观测资料，可以测定精确的时间和纬度变化，供航空、航海、大地测量、无线电等方面应用。过去我国各天文台站都是使用进口的目视式等高仪。用人眼瞄准许星象，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中国科学院从1968年底开始，经两年半时间，研制成功了第一台光电等高仪。它的口径为15厘米，选用反射光学系统，将老式的目视观测改为光电自动记录，自动化程度较高。测时精度达到了3‰秒，测纬精度达到了4%角秒。

9月8日～11日　国务院生产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及有关高等学校负责人等98人。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并说不光文科院校要批孔，各类学校都要批孔，要把批孔与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迟群还在会上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10月初，周恩来批评了迟群的这些论调。

10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工业、医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广泛研究和应用放射性同痉素与射线的新技术，取得了许多可喜成绩。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上广泛开展辐射育种工作，已育成几十个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等作物的新品种，这些品种具有高产、早热、抗病虫害、抗逆性强等特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在工业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上海等地的化学工业部门用辐射聚合方法试制成功聚甲醛、聚三氟氯乙烯等。活化分析是正在迅速发展的一项新技术，用这种技术可以把原来没有放射性的桐经中子或带电粒子照射使其中的普通元素变成具有特征的放射性样品，再用仪器鉴定和测量就可以分析出样品的成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用这种灵敏度很高的快速分析法测定纯金属和半导体材料，批出二十几种微量杂质，为进一步提高上述材料的质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我国最早应用放射性同位素是在医学方面。这种新技术已成为许多医疗单位诊断和治疗某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临床诊断方面应用最广的放射性碘，用来诊断甲状腺疾病简易可靠，已被许多医院所采用，准确性达到90%以上。

10月27日　新华社报道，首都医院医务工作者采用药物和手术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绒癌和恶性葡萄胎取得显著疗效。绒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约80%的病人初次就诊时，肿瘤就已发生转移，已转移的病例过去被视为"不治之症"。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采用大剂量化学抗癌药物治疗绒癌和恶性葡萄台胎取得显著疗效。自1958年至1870年，这个医院共收治绒癌病人296名，经治疗后病人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90%左右下降到29.2%；收治恶性葡萄胎312例，病人死亡率由解放初期25.9%下降到1.8%（近二年无死亡）。所有治愈出院的病人经长期随诊，到1972年为止统计，约三分之二出院已经超过5年，六分之一出院已经超过10年，有3例出院已经超过14年，她们都恢复了健康，走了生产建设岗位。

1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部门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可喜成果。激光是6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它是把某些具有特定性能的物质放在光振荡器里，在外加能源的激发下，发射出的一束高强度的光。在工业、农业、医疗、卫生、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用途。自1961年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不断发展。当时，我国已研制成功数十种常用的激光材料和各种配套元件。由于激光具有能量高度集中和朝着一方向发射等性能，广大科研人员和有关单位把它应用在打孔、划片、焊接、测距、测长、准直和医疗等方面。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根治海河取得巨大胜利，海河是我国华北地区主要水系之一，流载范围西起太行山，东临渤海，北跨燕山，南界黄河，总面积达26.5万平方公里。过去，海河由于上游支流多，源短流急，洪水量大，而中下游地势低洼、河道狭窄，宣泄不畅，经常泛滥成灾，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害河。在全国解放前的580年间，发生洪水灾害387次。全国解放以后，对河道进行些治理，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海河上游山区修建了密云、岳城、岗南等一批大型水库。这些工程的修建，有效地抗御和减轻了水旱灾害，但还经不起较大洪水的袭击。1963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实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10年来，海河流域各省市依靠群众，对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辽河、南辽河等五大河系和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普遍进行了治理：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还开挖、疏浚了270多条支流河道和15万条沟渠，在河渠上新建了6万多座桥、闸和涵洞。这些工程的完成，使海河中下游初步形成了河渠纵横、排灌结合的水利系统，排洪入海能力比1963年提高了5倍，比解放前提高了10倍多。同时还扩建和新建了一批水库，使海河流域大中型水库达到80多座，小型水库1,5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发展到271处。占海河流域面积一半以上的河北省，1973年农业获得新丰收。海河流域广大地区的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1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合水县板桥公社境内的马莲河畔，最近发掘出一具剑齿象化石。这具剑齿

象骨骼属于一个老年体，身高约4米，体长约8米，门齿长3.03米，门齿直径(近端50厘米处)36厘米，是世界上已知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一。剑齿象是一类灭绝的古象，生活在300万年前的第三纪末到1万年前的第四纪初，较现代象体格大、门齿长、臼齿的嚼面上有横脊。这类象的化石，至今到亚、非两大洲有新发展，但都限于骨或者牙齿之类的零星部分。这次在合水县发现的各部分骨骼，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完整的剑齿象化石。它对全面，准确地了解剑齿象的体质形态和其他理论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同时为第三纪末到第四纪初的地层分析和陇东地区的古地理环境、古气候条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古生物依据。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民航事业获得很大发展。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我国国内已经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连结着全国70多个城市，国内航线里程比解放初期增加近5倍，旅客和货远运量分别增长45倍和30倍。在国际民航方面，我国已经同100多家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新中国民航事业从创办时起，就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为人民生活服务。除了从事客货运输外，我国民航还用专业飞机从事防治农林病虫、进行人工降雨、除草、施肥、播种、造林和护林防火等作业。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4年

导言

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评论，要求“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求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 成果”。“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展开。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集团别有用心地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写了大批文章，在报刊发表。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他们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造舆论。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反复辟倒退”、“反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口号下，搞串联，拉山头，打内战，开大会，围攻老干部。因此一些领导干部再次被打倒，一些单位领导班子又一次瘫痪，使九一三以后刚刚好转的政治局势又趋向恶化，逐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再次受到破坏。

当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警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第一次提出王、张、江、姚搞“四人帮”问题。8月，毛泽东为了稳定局势，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酝酿国家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四人帮”以为这是自己登台组阁的好机会，加紧了阴谋活动。毛泽东于10月4日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11月，江青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公然伸手要官要权。毛泽东批示说：“不要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并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同抱病主持国家人事安排工作的周恩来及王洪文进行了4次谈话，明确表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他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并决定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次在其他副总理前)、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委托周恩来筹组政府工作。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西沙海战**
-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
- **●苏联绑架我外交官员**
- **●“三个世界”理论与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
- **●批意大利影片《中国》**
- **●“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批“周公”**
- **●基辛格访华**

西沙海战

背景介绍

1973年8月底，南越当局非法侵占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又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1日以后，我外交部多次声明和警告，南越并未收敛其侵略行径，反而出动海空军入侵我西沙群岛中的永东群岛。我忍无可忍，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给予来犯之敌以应有的惩罚。

材料：

- 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部队侵犯我国西沙群岛我渔民、舰艇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

材料一　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部队侵犯我国西沙群岛我渔民、舰艇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一月十五日以来，南越西贡当局，竟出动军舰、飞机侵犯我西沙群岛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向我正在生产的渔民和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海军舰艇开枪开炮，悍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对我国人民进行猖狂挑衅。

一月十五日下午一时许，南越西贡当局派军舰对我在甘泉岛附近生产的四〇二号渔轮进行骚扰破坏，并向竖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该岛炮击，无理要我渔轮离开我海域。

一月十七日上午八时许，西贡当局军队侵占我金银岛；下午三时又强占我甘泉岛，公然取下我国国旗。

一月十八日下午，西贡当局的舰艇两艘蛮横无理地冲撞我四〇二号和四〇七号渔轮，在羚羊礁北侧，将我四〇七号渔轮驾驶台撞毁。

此后，西贡当局不顾我方多次警告，变本加厉地继续挑衅。一月十九日上午七时许，西贡当局的军队又企图强占我琛航岛。我岛上渔民义正辞严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要他们离开我国领土。但是，他们竟然向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我渔民多名。我渔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还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十时二十分，西贡当局的舰艇向我琛航岛开炮。十时三十分，西贡当局的飞机四架轰炸扫射我琛航岛。与此同时，西贡当局的舰艇也向我巡逻舰艇炮击，我舰艇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长期以来，南越西贡当局对我南海诸岛怀有领土野心，非法占据了我南沙、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去年九月，西贡当局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并入它的版图。今年一月十一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西贡当局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并重申我国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但是，西贡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出动武装部队进一步侵犯我国领土，挑起武装冲突。西贡当局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我国人民决心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如果西贡当局一意孤行，不立即停止对我国领土的侵犯行径，必将自食其果。

（新华社1974年1月19日讯，
1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最近，南越西贡当局在入侵我国西沙群岛，遭到我国军民的痛击之后，竟然于二月一日再次出动军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所属南子岛等岛屿，在岛上非法设立所谓“主权碑”。这是西贡当局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对中国人民新的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强

烈的谴责和抗议。

中国政府已多次声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不容许西贡当局以任何借口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新华社 1974 年 2 月 4 日讯，
2 月 5 日《人民日报》）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

背景介绍

1974 年 1 月 12 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 1 月 18 日将此材料发至全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影射攻击周恩来，为他们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造舆论。

材料：

-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材料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孔孟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孔孟彭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污蔑劳动人民只会说“恭喜发财”，只能想“油盐酱醋柴”。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的路线的老根。

苏联绑架我外交官员

背景介绍

1974 年 1 月 19 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随员关恒广

同志，在任职期满、奉调回国的途中，抵达伊尔库次克车站，遭到苏联当局的非法绑架和审讯，被诬蔑为“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的间谍情报”而驱逐出境。这是苏联当局对中国政府宣布驱逐苏联间谍分子马尔琴柯等5人的报复措施。

材料：

· 我国政府就苏联当局绑架我驻苏使馆外交官员和对待我国国际列车的法西斯暴行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材料　我国政府就苏联当局绑架我驻苏使馆外交官员和对待我国国际列车的法西斯暴行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二十五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面交一份抗议照会，对苏联当局绑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和野蛮对待中国国际列车的法西斯暴行，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司长向中国驻苏联大使提出口头声明，诬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随员关恒广同志“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的间谍情报”，毫无道理地将他驱逐出境。这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宣布驱逐苏联间谍分子马尔琴柯等五人的卑劣报复。

关恒广同志是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期满，奉调回国的。他所乘坐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第八次国际列车，于一月十九日凌晨两点五十分（莫斯科时间）抵达伊尔库次克车站，当时车上旅客都在睡觉。苏联警官和身着白大褂的人登上列车，声称发现在前一站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下车的一个苏联公民患黑天花传染病，要全体旅客下车接受“检疫”。中国列车长一再向苏方提出，旅客正在休息，外面天气太冷，如需检疫，请检疫人员登车检查。苏方均横加拒绝，硬要旅客下车。关恒广同志被从床上叫醒，和其他旅客一道下车接受检疫。但是，苏方检疫人员对与所谓“黑天花病患者”有过接触的第五号车厢的苏联旅客不检查，对其他旅客只稍加询问，马马虎虎地看一看，便即放过，唯独对住在七号车厢的关恒广同志却详细查问，故意说关“脸色不好，眼睛红肿，情况复杂”，强迫将关单独留在检疫站，要他和一些乔装成传染病嫌疑者坐在一起。这时，苏方预先布置好的一个自称华侨的女特务主动与关搭话，并企图塞给关一本画册，另一个打扮成护士的苏联妇女当即大叫一声：不许传递东西！话音未落，一名中尉警官率领一批暴徒冲了进来，中尉从女特务手中抢去了画册，其他人一拥而上，原来在室内坐着的所谓传染病嫌疑者也一齐动手，他们不顾关的抗议，将关架上停放在检疫站后门的警车，强行押到伊尔库次克市基洛夫区警察局。苏方在绑架了关恒广同志之后，立即宣布疫情报告不确，停止检查，马上开车。

在警察局，一名少校警官对关恒广同志进行非法审讯，长达十三小时之久。他装模作样地从上述那本画册中取出自造的所谓“情报”，诬蔑关搞间谍活动，遭到关的严词驳斥。当日晚，他们将关押上飞机，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机场，苏联特务机关，在苏联外交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对关再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关恒广同志的多次抗议下，苏方才于二十日凌晨将关交给中国大使馆。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绑架关恒广同志，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导演的一幕反华丑剧。其手法的拙劣和卑鄙，实在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

苏联当局无视国际法准则，公然绑架中国外交官员关恒广同志，引起了中国列车全体乘务员和中国旅客的极大 愤慨，他们几次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放回关恒广同志，并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取得联系。苏方不仅蛮横地加以拒绝，而且出动大 批警察和特务，包围中国列车，将中国列车上的制动设备全部破坏，抢走和撕毁车厢上停车用的红旗讯号，砸碎车厢玻璃，并派出五、六十名警特，将中国列车强行押送到苏蒙边境。

对苏联当局绑架中国外交官员和野蛮对待中国国际列车的法西斯暴行，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苏联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必须对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 1974 年 1 月 25 日讯，
1 月 26 日《人民日报》）

“三个世界”理论与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

背景介绍

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同志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提出了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大大推动了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1974 年 4 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正式阐述了这一理论。

材料：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像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哪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

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三鼻给、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露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

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持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

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新华社联合国 1974 年 4 月 10 日电，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

批意大利影片《中国》

背景介绍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 1972 年春来中国访问，拍摄了一部题为《中国》的影片，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侮辱我国人民。影片自 1973 年以来在欧美某些国家放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材料：

·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材料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人民日报》评论员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

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像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

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

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像，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像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像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

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彩，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月30日《人民日报》）

“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批“周公”

背景介绍

“批林批孔”运动到了1974年，王、张、江、姚“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指使其写作班子写了大量文章，在报刊发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他们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造舆论。“四人帮”还企图在军队方面打开突破口，向叶剑英、周恩来施加压力，诬蔑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右得不能再右”，是“维持会”。

材料：

·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材料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如果我们穷根究底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祖师爷应该推孔老二。研究孔老二这个历史上的骗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

大凡政治骗子，总有一套骗术。他们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一本正经。孔子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一部《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有三十八处之多，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什么“民主信不立”（《论语·颜渊》），说来说去，无非是表示他们的说话是算数的。有一次，孔子由于经常言行不一而遭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怀疑，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捶胸顿足，发誓赌咒地说：“你们这些小子，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论语·述而》）其实，孔丘此人，历来是极不老实的。他公开宣称：做父亲的偷了羊，做儿子的应当当替他隐瞒。反之，儿子犯了罪，父亲也应替他隐瞒。这就是真正的“正直”（《论语·子路》）。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的逻辑吗？

孔子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士”？孔子回答：只有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忠臣、孝子才可称为“士”。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只不过是卑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罢了，根本不配当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谋臣（《论语·子路》）。总之，不骗人，就成不了“君子”，当不了野心家。他还公开鼓吹同党内部也要相互欺骗，说：“可以同他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能和他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知道内情，参与机谋。”（《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即使是同党也不能信任，必须各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深得孔门心传的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骗术，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这就是说，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大人物”，说话不一定要兑现，行动不一定要做到。这是赤裸裸地提倡骗子哲学。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这套骗术揣摩备至，心领神会。他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收集在精心编纂的《四书集句》内，奉为至宝，并且宣扬：“谁不会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由此可见，这伙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混日子的。他们不说谎，就一天也混不下

去。

……

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伪君子的虚伪行径，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中所采取的垂死挣扎的手法。因此，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要搞复辟、开倒车，就都要尊孔学、学孔学，向孔子这个政治骗子的祖师爷顶礼膜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全盘继承了从孔孟到朱熹的骗人衣钵，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亲自编纂了《四书集句》，抄录背诵，身体力行。他还公然标榜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抄录《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他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成“虎穴”，只是勉强地暂时地“栖”一下，到一定时候就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他的野心极大，不能“说破”即不能公开，不能见太阳，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同一小撮死党去阴谋策划。用什么方法能不被识破呢？就是“随机应变”，即随着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进行不断的投机，以欺骗人民，欺骗党，用表面的伪装的“变”来“掩饰”他不变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他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它集中地表现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无论是孔子还是林彪，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今天，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彻底批判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行为，可以增强我们识别林彪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能力，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此文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转载时略有改动）

（3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

基辛格访华

背景介绍

1974年11月25日至29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来华访问。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曾六访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这次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坦率、广泛和有益的会谈。

材料：

- 周总理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夫人　乔冠华外长举行欢迎宴会　基辛格国务卿举行宴会

材料　周总理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夫人　乔冠华外长举行欢迎宴会　基辛格国务卿举行宴会

周恩来总理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医院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基辛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儿子和女儿。

会见时在座的有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长、王海容副外长、朱传贤司长、唐闻生和章含之副司长以及廉正保。

（新华社1974年11月25日讯，11月26日《人民日报》）

外交部长乔冠华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及其一行。

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副主任约·霍尔德里奇和联络处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乔冠华外长在宴会上首先祝酒。他说，“三年多来，基辛格博士曾六次远涉重洋，来我国访问。这一次又来到北京，使我们双方有机会继续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对此我们感到高兴。”

乔冠华外长说，“自从国务卿先生上次访华，已经过去一年了。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证明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整个世界处于激烈动荡和不安之中。这是各种矛盾激化的反映，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总是在动乱中向前发展的。我们认为，这种动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乔冠华外长指出，“中美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在隔绝了二十多年之后，两国之间来往的大门打开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在这里，我们应当提起尼克松先生在这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同时，我们也欣赏地注意到福特总统要继续执行上海公报的声明。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我们双方本着坦率精神交换意见，增进了解，总是有益的。总的说来，这几年中美关系是向前发前的。我们相信，国务卿

先生这次访问，将为上海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作出贡献。"

基辛格国务卿在祝酒时说，"福特总统这次派我来访问，是为了继续进行我们每年所进行的富有成果的交换意见，使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继续下去。"他说，"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和在此后几年的发展，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权宜之计，而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福特总统在开始办公的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主任，重申"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并继续追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基辛格国务卿说他今天高兴地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并在会见中回顾了过去的多次访问。他说，"在过去几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稳步向前发展的。我这次来访是为了继续这个过程，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成功的。"

出席宴会的还有王海容、黄镇、贝时璋、朱穆之、马仁辉、王冶秋、林平、朱传贤、唐闻生、章含之、王珍、朱霖、钱大镛等。

（新华社1974年11月25日讯，
11月26日《人民日报》）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王海容，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贝时璋、朱穆之、马仁辉、王冶秋、林平、朱传贤、唐闻生、章含之、王珍、朱霖、钱大镛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美国总统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基辛格博士的夫人南希·基辛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其他随行人员，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副主任约·霍尔德里奇，出席了宴会。

基辛格国务卿首先在宴会上祝酒。他感谢中国主人给予他们的接待。他说，我这一次访问人民共和国是继续我过去访问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回顾了国际问题，加深了相互了解。我们表示要致力于根据上海公报原则继续正常化的进程。他重申，改善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既定原则。

乔冠华外长在祝酒时说："几天来，我们双方本着坦率的精神，回顾了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增进了我们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对一些共同点的认识。我们双方都表示准备按照上海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为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做出努力。"

上午，基辛格博士和夫人等美国客人游览了天坛公园，基辛格博士的夫人还参观了北京妇产医院。

（新华社1974年11月28日讯，
11月29《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白智清

白智清，男，1945年出生，四川成都市人。1965年从成都一机校毕业，分配到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当技术员。他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心盼望着国家富强、中华振兴，为此，甘愿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被卷入了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之中，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革命大批判"中，白智清读到了彭德怀元帅1959年写的"万言书"，这使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作冷静思考，并逐渐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在"十年浩动"的前八年，白智清只是默默地为无数老干部、为无数无辜的民众受迫害而愤愤不平，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在实际的斗争中，白智清认识到，是江青、张春桥等"三男一女"，搞得全国不得安宁，是他们要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祸国殃民。

1974年，当"四人帮"一伙丧心病狂地迫害周总理时，白智清以"心赤客"为笔名，发出数封鞭挞"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信件，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而受到处理追查。

白智清满怀一腔怒火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痛骂她："你的疯母狗病又发了，又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搞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你头上戴了多少顶堂皇的桂冠，也不管你现在是如何的不可一世，末日就在眼前。人民，全中国人民将狠狠处死你这个民族的罪人，那无情的历史将永远把你和那一群狗打入十八层地狱！"

白智清出于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又给敬爱的总理和叶帅，还有其他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信，他在信中说："当前斗争发展到此时此刻，锋芒所向之处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在你们身上。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

灭，是时候了……如果到了‘后党’形成，大权在握——最后到国破家亡便悔之晚矣！！！”

他还给邓小平写了信，希望他能尽快搞出个社会主义的法典来，拯救中国社会。

1976 年，动荡的岁月。白智清懂得，要反对江青、张春桥，不仅要靠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主要的要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到人民中去点火。

1976 年 2 月 7 日夜，白智清奋笔疾书，以“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姓名，写下《我爱我的祖国》这张震撼山城的大字报。

第二天，白智清把它工工整整地贴在解放碑前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交电大楼的墙壁上。人们很快就注意到这张不同凡响的大字报，一传十，十传百，有的竖起大拇指称赞，也有的刷出大标语，谩骂：“白智清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绝无好下场！”“揪出白智清的黑后台！”

紧接着，白智清的第二张大字报也写好了。他调好浆糊装在饭盒里，准备了一把浆糊刷子，带上大字报，要到他的老家成都去把火也点起来。

3 月 2 日晚上 11 点多种，白智清登上开往成都方向的列车。次日清晨，他一到成都，没有回家，在一个旅馆登记了住宿，就匆忙上街，他要为自己的第二张大字报找好战斗的地方。

3 月 4 日清晨 8 点半钟，白智清来到昨天选好的“点火场”——成都最热闹的地方——盐市口，从胸前的衣襟下掏出写好的大字报，从容地从第一张贴到第十二张。

赫然的标题，使人们的心都猛然一惊：《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当时全国的许多大家报中，第一张用自己的真名实姓，直指张春桥的大字报。揭露得如此深刻、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字报出来，使整个蓉城都轰动了。他说出了四川人民久久压抑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成千上万的人挤到盐市口仔。仔细观看，坚决支持这张大字报，以致在 3 月 5 日当“四人帮”的走卒用大标语覆盖白智清的大字报时，遭到怒不可遏的冲击，从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成都三・五事件”。

蓉城的火点起来了，白智清冒着随时都有被抓起来的危险，抢时间完成手头还有一张未完成的大字报。

白智清机智地转移到一个僻静县城的一家旅馆，开始了他的《二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准备把它贴到西安和郑州去。

就在 3 月 4 日夜，“四人帮”在成都的黑干将邓兴图等人把在盐市口所发生的一切向“四人帮”作了报告。在王洪文的授意下，公安部的一张捉拿白智清的通缉令飞遍全国。

1976 年 6 月 22 日中午 12 点多钟，白智清就在广汉县的那个旅馆里被捕了，随后被关押在成都的一所监狱。

在监狱里，白智清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利用一切能够说话的机会，向人民呐喊，他向上当受骗审讯他的公安人员揭露张春桥等人的罪恶，表达自己对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使在场的审讯人员都为之动容。重庆的一位公安人员悄悄地对自己的老首长说：“这个同志真了不起，白智清是个英雄！”

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白智清以“天安门事件”的同伙的罪名，被押往成都、重庆等地批斗。他对批斗会上强加给的他的一切诬蔑之词，报以轻蔑的一笑。

王洪文办公室催着要把白智清处以死刑，但在省委的抵制下，“四人帮”的阴谋未能得逞。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白智清终于在 1978 年 7 月 31 日被释放。

珍闻轶事

毛泽东钦佩达尔文

1974 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会见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泽东于是与希思谈起达尔文来。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钦佩达尔文的著作为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斯诺那本书的传播。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多次提到达尔文和进化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这个讲话的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节里，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

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毛泽东为希思了解他的读书生活而感到高兴,他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 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毛泽东指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

(据《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毛泽东与李政道的“对称”论

“请你谈谈,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毛泽东问。

那是1974年5月30日,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中,“四人帮”居于权力的峰巅。李政道博士十分痛心地看到,在这个文明古国,他出生的地方,教育几乎完全停止了。苦闷之中,他急切地希望找到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哪怕改变一点点也好。

没想到那天清晨约6点钟,他住的北京饭店的房间里电话突然响了。李政道被告知,毛主席打算在一小时后,在中南海住处见他。尤其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见面时他想了解的第一件事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

根据韦伯斯特词典,对称的意思是“平衡的比例”,或者“产生于平衡的比例的形式美”。在中文里,对称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含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个静止的概念。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社会进化的基础在于变革。动态,而非静态,才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要素。他强烈地感到这种认识对于自然界肯定也是对的,所以奇怪为什么对称会在物理学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在会见中,李政道是唯一的客人。坐椅之间是一个小茶几,上面放着铅笔、笔记本和两杯绿茶。李政道把铅笔放在笔记本上,把笔尖指向毛泽东,然后再把笔尖转向自己。铅笔转过来又转过去。他指出,这运动没有一刻静止,但这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毛泽东很欣赏这样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李政道解释了爱因斯坦根据等价原理的对称要求而建立的相对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他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问题,它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出人寻求自然界对称的迫切愿望同他建立富有意义的平衡社会的强烈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天,李政道在机场收到了毛泽东的送别礼物:一套阿瑟·汤姆森的1922年版原版著作《科学概要》。

(据《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8期)

毛泽东批“四人帮”

197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毛泽东说:“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着许多人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咧。”毛泽东曾提醒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还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不到一年,毛泽东在1975年5月,又批评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呢?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人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后来,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批评会是由邓小平主持的。江青忍气吞声,在政治局上作了口头自我批评,会后就翻脸骂人。但迫于毛泽东的威信,她不得不又作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　青

1975年6月28日

但事实证明,江青和上海帮对毛泽东的批评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

(据朱仲丽《江青外传》)

“我要做自我批评”

1974年夏的一天,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他自然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同志,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

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子，我保你。我是保他的。”

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cr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据《杨余傅事件真相》）

第一副总理职位之争

1974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10月13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10月4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10月4日晚上，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步。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主席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他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这位年迈的主席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救……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10月18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10月17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点也不快乐，在江青那里聚集。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时，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楣，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已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然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竟王洪文太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10月18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少，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他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王说的无非是“邓小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之类。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张春桥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10月20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月后——12月23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1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共产党人，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

1949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擅长处理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起火的。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1966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8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1967年所说的那样：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2月28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据《天涯》增刊)

《三上桃峰》事件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借晋剧《三上桃峰》而制造的一个政治事件。

1974年初，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举行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山西省选出晋剧《三上桃峰》参加。此剧取材于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通讯《一匹马》。写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赞扬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马，以支援春耕的共产主义风格。但不料却触怒了"四人帮"，被抓住作为批判"文艺黑线回潮"的突破口，黑典型。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初澜的名义，发表了经姚文元亲自修改11处，由江青、张春桥定稿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采用穿凿附会的卑劣手法，把这出戏同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社教"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扯在一起。编造说王光美曾给该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于是得出结论说：桃峰就是桃园，《三上桃峰》戏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以此为发端，不到两个月，批判文章就象一场瘟疫，蔓延全国。一时间，打倒"回潮派"，"复辟派"，"翻案派"的狂涛平地而起，冤案迭出。以致谈"马"变色，同这件事毫不相干的连环画册《大红马》也被奉命立即停印。湖北有个儿童剧《桃山新苗》，因为沾了一个"桃"字都专门开会，重新研究。"四人帮"一伙还把这出戏同山西一个搞文艺评论工作的赵云龙的文章联系起来。赵文曾批评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是把文艺的手段和文艺的目的混为一谈。江青一伙在文化部的代理人于会泳说这篇文章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四人帮"的淫威所及，阴云密布，许多人被隔离审查，受到批判，斗争。赵云龙也被迫害致死。

1978年9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的文件，正式宣布为因该事件蒙受冤屈的领导干部，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

长沙告状

"四人帮"为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而有计划进行的一次阴谋活动。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十分嚣张，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不意十月初传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消息，"四人帮"十分不满，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在1974年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利用"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据理反驳，"四人帮"没有达到压服的目的。会后，江青即令王洪文(这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到她的住处"碰头"。经过彻夜密谋后，决定由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江青特别嘱咐要赶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见毛泽东主席之前去。

19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味道"(王洪文供认，这是姚文元讲的)。还说，他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他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让他向主席汇报。他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向毛泽东主席告发邓小平与江青吵架，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等等。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

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王洪文供认这"是江青的话,由我去说的")。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供认,这是张春桥讲的)。

王洪文在法庭上供认,所谓"庐山会议味道"意思是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 1970 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对于这次长沙告状之行,王洪文于 1980 年 6 月 27 日笔供:"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这次去长沙告状……主要是恶人先告状,抢在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前,目的是要毛主席了解吵架的所谓'真相',也就是了解邓小平同志的所谓问题。……实际上是诬蔑陷害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阴谋活动。"

毛泽东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诬告,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并坚持"总理还是总理",坚持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决定由周恩来和王洪文共同负责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这样就使"四人帮"的阴谋未能得逞。

大盗康生

1980 年,北京有关部门曾经在故宫博物院内举办了一个康生侵占文物图书的展览,展出了长期以来康生以各种手段窃取国家和许多知名人士的珍贵文物数千件,历代珍本善本图书数万册。其中有不少是可以称得上国宝的稀世珍品,价值连城,例如宋版元版孤本图书,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一千多年前的砚台、印章、碑帖和书法、绘画名作,三十万年前的史前文物玳瑁化石等等。怪不得当时有的外宾参观了这个展览之后啧啧惊叹说:"谁说中国没有百万富翁?谁拥有这些珍品中的几件就是百万富翁,康生是一个亿万富翁。"

康生占有的这些图书文物,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依仗权势在"文化大革命"中趁火打劫来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康生来说,确实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正如林彪所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康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捞到一大批珍贵文物图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说康生是什么都不懂的窝囊废,那是不公道的。他对书法、绘画都懂得不少,而且这方面他还有一点怪才。比如写毛笔字,他不但能用右手书写还能用左手书写,看起来也还有些功夫。在画画方面,他甚至要与齐白石争个高低,因而有意在作画时署名"鲁赤水"。可惜人们还是喜欢欣赏齐白石的画,谁也没有把他"鲁赤水"放在眼里。除此之外,康生对古董有着特别的兴趣。"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小病大养,很少工作,整天就琢磨这类玩艺儿,有时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的浪潮,许多文化名人被抄家扫地出门,大批历史悠久的庙宇古迹被砸,无数文物珍藏遭散失破坏。康生欣喜地感到,他大捞一把的机会来到了。于是,他一面拚命鼓励"砸烂四旧"、抄家,一面瞅准机会侵占图书文物。

1969 年夏天,康生打听到从北京各地抄来的文物图书,有一批已经集中到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他估计里面肯定有不少好东西。有些著名的文物,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听说,无奈物各有主,虽朝思暮想却得不到。现在天赐良机,他岂肯错过?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些宝贝弄到手呢?他毕竟还披着"中央首长"的外衣,总不能夜里跑去破门撬锁吧!况且,康生的手虽然很长,但还没有直接伸到北京市文管处,因而还不能指望那里的人给他送上门来。当然,这对康生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大难题,他抬起头来望了一会儿天花板,眼皮向上翻了几翻之后,决定先去那里看一看,试探一下再说。

7 月 8 日,康生装做顺便路过的样子,来到北京市文管处。工作人员一看康生这样的大人物驾到,当然笑脸相迎,欢迎中央首长的亲临视察。康生进门后一本正经地问:"听说一些抄家来的东西集中到你们这里了,你们整理得怎么样啦?"工作人员回答:"这些东西最近才陆续送到,数量又多,还来不及清理,都在仓库里堆着。"康生一听有门儿,忙说,"是啊,你们一定要保管好。有些东西恐怕你们还不认识吧?来,你先带我去看一看。"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康生来到一间屋子,只见各种古色古香的图书、文物堆得乱七八糟,一捆捆,一箱箱,有许多还没有打开。康生一看这混乱模样,知道有机可乘,转过脸对工作人员说:"这些东西你们还是先不要动,我想里面有不少是防扩散的,有些还需要鉴别。这样吧,你们负责看管好,我专门找个时间来为你们鉴定一下。对这些四旧东西怎么处理中央文革也还需要研究,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他们都是内行,等我们来看了再处理吧!"转了一圈之后,康生装出要往外走的样子,一双眼睛却在东张西望。他是在想,既然来了总不能白跑一趟,这次先顺手牵羊搞一点,同时也以此试探一下这里这帮人的态度。他一眼看到从一捆书里散落出来的一本古线装书掉在地上,连忙捡起来,掸了掸土,好象无意中发现似地说,"这本书怎么掉出来了?哦,是一本《百家姓》。哎,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后来不知给谁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康生不等那工作人员回答,径直夹着那本《百家姓》走出门外,上车一溜烟走了。

这第一回,虽然拿到的东西不多,但总算没有空手而归,而且为以后的行动摸到了经验。回到家里,康生很高兴。他是个懂得文物价值的人。他知道那一堆堆破烂似的东西里面,蕴藏着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实在令人眼红心馋,他决心要猎取这些东西。康生爱抚地翻了翻手中的这本清朝《百家姓》,心想,今天总算

不虚此行，很快就可以大干了。

这次侦察，康生还得出另一个经验。从文管处的一个仓库就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出来的图书文物数量巨大，要把如此众多的宝物都拿来窃为己有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要尽量把其中最好的尖端的那部分捞到手。为了有目标地去选择那些尖端东西，康生决定把自己已经收藏的图书文物浏览清理一下，以便发现一些线索。这天，康生不顾天气炎热，爬到自家的藏书楼上，把门窗关好，又检阅了一遍原先搜得的各种古旧书。康生特别喜欢搜集古书，特别是对明朝盛行淫风时期民间刻印的那些淫秽小说书刊尤为偏爱。他发现自己的藏书楼里已搜集了不少这类黄色古本书刊。康生的所谓"搜集"，有许多是以"借"的名义从北京图书馆弄来的。"借"来之后，他在上面盖上"康生藏书"印章，编入私人图书目录，整整齐齐放在藏书楼里。好些书已经"借"了十几年了，康生也忘了是从哪儿弄来的，早已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了。他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些书，思索着还有哪一种著名的善本书没有弄到。忽然，他一拍大腿，想起一个人来，自语道："对呀！傅惜华，我怎么忘了呢，傅惜华有好书，要赶快去搞。"康生匆匆收拾了一下，急忙走出藏书楼，连手也顾不上洗，立刻坐上汽车直奔北京市文管处。

不能不承认，康生在这方面确实有眼力。傅惜华长期担任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是国内有名的藏书家，"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了。傅惜华为收藏珍本善本书耗费了一辈子心血，他的私人藏书以丰富、稀有、完整和版本古老名扬海内外，尤其是戏曲小说方面的藏书，更是又多又全又好。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康生就对傅惜华的藏书垂涎三尺。但傅惜华是个爱书如命的人，所以康生只能眼红眼红而已。现在好了，"破四旧"的风一刮，傅惜华的家是必抄无疑，此时不去大捞一把，更待何时？

康生一到文管处，下车就问："傅惜华的书你们集中起来了没有？"谁知，文管处内部也因为"造反"、"破四旧"等等闹得混乱不堪，真正干事情的人不多，再说他们也不知道康生顾问对这位傅惜华有特殊的兴趣，因此竟还没有把傅惜华家抄出的藏书拉到文管处来。康生一听有点着急，他怕那些好书被别人捞了去，连忙严肃地指示说："你们要赶快去办，把他的书集中到文管处来，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等书运来了你们告我一声，我要亲自过目鉴别。"正说着，康生一眼瞥见旁边有一本古版《石头记》，他一手抓过来，边翻边说："这部《石头记》是八十回的改写稿子，我拿回去看看。"说毕，康生出门扬长而去。顺手牵羊，不能空手而归，这是康生每次去文管处都不会忘记的。

二十多天后，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到通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集中到了国子监藏书库。康生一听，立刻驱车前往。由于这些书刚拉来，还杂乱地堆放在一个旧仓库里。室内蜘网遍布，尘土老厚，一股霉烂味，还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破旧家具什物。文管处人员实在没有料到这位首长会这么快就来"过目鉴别"，所以没有来得及清理。望着康生那一身洗烫一新的毛料学生装，工作人员们心里直打鼓，连连向康生解释道歉，检讨自己工作没做好。不料这回康生竟没有计较这些，只让工作人员快带他到书库去。

一进那脏乱不堪的库房，一股阴冷污浊之气迎面扑来。康生却不怕，他就近往脚边一个烂木箱上一屁股坐下去，准备破捆挑书。不料那木箱已经腐朽，经康生的身体一压，几乎要散架，直朝一头歪倒下去，差点没把康生摔个四脚朝天。"他娘的！"康生不禁嘟哝了一声，只得又调整了一下屁股的位置，将就着坐稳了。他找书的心情实在迫切，根本顾不上别的了。

康生迫不及待地打开手边的一捆书。从上往下看，康生眼睛一亮，发现了一套好书，连忙把它抽出放在一边。接着，他又去破第二捆……

康生边挑边对旁边的文管处工作人员说："这些书都是傅惜华的吗？"工作人员答："是的。我们把其中的明刻版或较好的抄本选出来八百多种，这一大批还没有细看，估计还有不少好的。"康生指了指自己挑出来的一堆书："这些我可以看看。"这时，由于这个仓库又冷又有霉味儿，冻得康生连打了两个喷嚏，鼻涕也流了出来。他忙用沾满灰尘的手抹了一把，不得不停止了挑书。康生抬头一看这里的书实在不少，要一捆一捆去挑是无论如何吃不消的，便对文管处人员说："我还是先看看你这书单吧！"康生接过书单边看边念叨，"这里其中有一种书，我在1949年看见过，是东安市场刘鸣可的，那时他要的价钱太高，在那儿摆了很久，后来又还给他了。1949年以后我又追这部书，托了很多人找这部书也没找见，现在从这个书单里见到了。"文管处人员说："可能这部书就是您1949年看到的那部书，让傅惜华买去了。""对，很可能就是那部书。"康生这才发现从书单上挑书是个简便的办法，于是掏出笔来在单子上划记号，一面划一面说，"傅惜华这批东西有的很好，我过去没见到过。如明刻赏心亭本《欢喜冤家》十册，明刻消闲居刊本《拍案惊奇》十六册，明刻的《浓情快史》六册，都是很少见的。"他说着把书单交给文管处人员，交待说："这个单子上我划圈的要找到，划杠子的一定要找到。划圈圈的重要，划杠子的更重要。等找到后你们拿给我过一下目。"康生这时又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流出了一大把鼻涕。这间仓库里的温度实在是低了一点，他感到有点支持不住，只得拿上挑出的几种书，匆匆离开书库回家。

一进家门，康生觉得头重脚轻，当晚就发烧三十九度五。曹轶欧忙着给他请医生配药，一直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好。消息传到文管处，"中央首长因视察文物工作劳累

成疾”，文管处人员似乎觉得有照顾不周的责任，于是康办秘书一个电话，他们就只得乖乖地将康生在书单上划记号的书如数送上门去。所以，康生觉得这次感冒还算划得来，省却了再去那霉烂仓库的劳顿。

以后，康生又多次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有时是拿图书，有时是拿文物。不过，这样每次都说“拿回去鉴别”或者“借来看看”，连康生自己都觉得不大好，因而有些时候他也掏钱“买”了。一天，康生在文管处赏玩古懂，他拿起一部经书，爱不释手地翻阅着。他知道这件东西很稀罕，却明知故问地对旁边一位年长的文管处工作人员说：“这是哪个朝代的呀？”那位工作人员据实回答：“这是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手写，世上仅存三件，非常珍贵。”康生“哦”了一声说：“这件东西还可以，我研究书法史用得着它，我买了吧！你们看要多少钱？十元差不多了吧？”那位老文物工作者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种价值上万元的稀有文物只付十元，亏他说得出口。但他当然不敢点破，只有强笑几声推说不知了之。这部宋拓汉石经就这样被康生花十元钱买去了。后来，他又陆续从文管处“买”了不少文物。花五元钱买了一幅价值数千元的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花一毛钱买了一幅价值一千多元的宋画院仿赵千起蛟图，每次花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买去了四百多方历代铜印和鸡血石、田黄石等名贵印章，其中有汉代陈宫、董永等稀有名人铜印，有的名贵鸡血石一方就值上万元。据有关部门在康生死后统计，康生侵吞的图书，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要八万六千多元，康生只出了二千三百多元；侵吞的文物，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价需七万四千多元，康生只付了二百五十二元。

就这样，康生还不满意。有一次，文管处对康生要的几件文物报了一个价，虽说还是比一般文物商店的最低估价要低得多，但比象征性收费要稍高些。康生当时讪讪地没说什么，回到家就让他的秘书给文管处打电话指责说：“开这么贵的价，你们还让康老吃饭不吃？这可是对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表现哪。”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向康生要价？从此，康生来要文物图书，不管给不给钱，给多少钱，也就无人敢说、听其自便了。

正当康生为轻轻巧巧地得到一大批文物图书而陶醉不已的时候，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天夜间，突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喂，康生同志吗？我是叶群。听说康老最近正在鉴赏抄家来的文物，林彪同志对此也很感兴趣，还有黄总长他们也想看看，能不能带我们去开开眼界啊？”第二天，在钓鱼台开会休息的中间，老夫子陈伯达也跑来把康生拉到一边说：“康老，哪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抄来的文物吧，你可不能一个人捷足先登啊！”

康生不由得有点懊恼。显然，这一帮人得到了风声，都想来分肥。没办法，这些人现在都炙手可热，不让他们也捞一点是无论如何交不了差的，反正东西有的是，让他们也分点吧，这样也好堵住他们的嘴。于是，康生对他们都满口答应，担保下次一定带他们一起去文物管理处仓库。

果然，1970年5月2日，康生带着他们来了。北京市文管处堆放抄家物资的库房里，一下子拥进以康生为首包括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内的一大帮人。这一伙人一开进库房，简直就象一群蝗虫落地，拚命大嚼起来。康生和陈伯达直奔珍贵文物，几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和叶群则把手伸向了金银珠宝。一忽儿工夫，他们各人面前都堆了一摊。老夫子陈伯达望了望站立一旁的几个管理人员，觉得这样公然抢占未免有失体统，于是想出一个遮丑的妙法，假惺惺地从自己挑选的图书中抽出两本说：“康老，你对古书有研究，这个应该赠给你。”康生立刻明白：“对对。你对古画内行，这里这幅画你拿去鉴别一下吧！还有，这几件不知是什么老古懂，请叶群同志带给林副主席鉴赏一下吧！”一时间，他们发现这似乎是个保持首长身份的好办法，于是纷纷谦让起来，我送给你，你赠给他，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他们各自装了一堆，打道回府了。这一天，文管处库房遭到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浩劫。望着被洗劫一空的库房，管理人员无不目瞪口呆，几乎掉下泪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5月2日的行动中似乎少了一个应有之人。不错，就是江青。那一天，江青正好偏头痛发作没去成。圆滑的康生当然不会忘记她，他知道这个女人特别小心眼，好事少了她的份儿哪行？康生不情愿地从拿来的文物中挑了端砚、古墨等几件，派人给江青送了去。

江青可并不满意。她一看这么好的东西自己只拿到一丁点儿，心想康生、叶群他们肯定捞足了，用这么一点残羹剩饭来应付差事，这不是存心欺负老娘吗？她立刻要通了康生的电话：“康老啊，你送给我的端砚和墨真好，太好了，我太喜欢了。你知道我也是爱好古董的啊！近来身体不大好，我想找一些文物古书看看，调剂一下脑子，你能陪我去一趟吗？”

康生当然又是满口答应。1970年11月6日下午，康生陪同江青到文管处的另一个库房。一个多小时后，两个人各自抱了一堆名贵印章和砚台等等文物凯旋而归。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去文管处等存有抄家文物的地方，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我们在这里实在无法一一记述。这还不算康生等人以其他方式窃得的文物在内。例如1970年5月，北京市文物局征得一件从永定门外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合印章，天真地拿给康生这位“古董鉴赏家”鉴别，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又如1970年初，康生到北京工艺美术公司为他加工一方砚台，用他从大庆白捞来的一块玳瑁化石做砚盖，另外选用名贵石料配制乌龟形砚身。工艺美术公司特地雇佣了一百四十四个工匠

到山西采了西方大紫石，但因断层太多没有成功。末了，又从石家庄觅得一块香油磨石高价买下，前后用了一年时间，花了八百多元，才算做成了乌龟形砚身。康生仅付了四元人民币，就将这方珍贵的玳瑁化石龟形砚攫为己有了。再如，由于康生对搜集淫书特别喜好，他专门要北京市公安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来的淫秽书刊集中到市文物管理处，然后跑去亲自过目，先后拿回家二十多部，在潜心欣赏之后精心收藏。他还亲自动手对有的书进行重新裱装，为有几部他的书配上楠木盒、套上塑料袋后放好，并一一亲笔题写书签，一有空就拿出来阅读。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或单独或结伙地去劫掠文物图书，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仅有案可查的，被他们一伙掠夺的图书就共计三万四千多册，文物五千五百多件。其中，康生自 1968 年至 1972 年间就先后三十多次去北京市文管处，窃走图书一万二千多册，掠去文物一千一百多件。这些文物图书，主要是从北京近百位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家中抄来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齐白石、尚小云等私藏的以及二十多个单位、三十多个仓库中查抄来的文物。康生，真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文物珍宝的盗窃犯。

叶剑英、邓小平部署保卫、收复西沙三岛军事行动

1973 年 8 月底，南越当局在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 6 个岛屿之后，于 1973 年 9 月，又公然宣布，已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 10 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此后不久，南越海军在西沙海域更是有恃无恐地制造事端，他们不但撞毁在这一带捕鱼作业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甚至还把中国渔民抓到岘港，进行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的领土。

1974 年 1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多次声明，多次警告。

南越当局并未因此而收敛其侵略行径。

1974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南越海军的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共 4 艘军舰窜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它们在对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 402 号、407 号渔轮施行堵截围追等挑衅后，又向挂有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

1 月 17 日上午，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登陆，下午又派兵强占了甘泉岛。

中国国旗被登岛的南越士兵扯下，守岛民兵的说理斗争不起作用……

有关南越军队疯狂进行军事挑衅的报告呈送到了中南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即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研究对策，在报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后，决定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保卫中国领土不受侵犯。

决心下定，叶剑英很快找到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和其他军委领导人，着手部署打击入侵敌舰，收复被其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

1974 年 1 月 17 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立即派出舰艇，驶往西沙永乐群岛海域进行巡逻；同时命令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海军舰艇进驻西沙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广州军区指示南海舰队派出广州基地扫雷舰 10 大队的 396、389 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 73 大队的 271、274 号艇，务于 17 日至 18 日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海南军区派出 4 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派出猎潜艇第 74 大队的 281、282 艇，驶抵永兴岛附近实施机动。海上编队指挥员由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担任，海上指挥所设在猎潜艇第 73 大队的 271 号艇上。

为配合海军行动，广州军区命令南海舰队航空兵 22 团派出两架战斗机，飞抵永乐群岛上空进行侦察巡逻，并要求广州军区空军派出部分兵力随时给予支援。

应该说，从中国军事部门的部署上来看，中国政府直到此刻仍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力。中国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其根本出发点，还是在于守卫自己的疆土不受侵犯，而不是消灭来犯者。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派民兵上岛，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打仗。

中国海军 271 编队和所载的 1 个民兵排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时，正值气焰嚣张的南越驱逐舰"李常杰"号和"陈庆瑜"号两舰在甘泉岛附近拦截中国渔轮。对此，我 271、274 两艘猎潜艇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迫使其最后转向离去。

1 月 18 日上午，连续几天游弋于甘泉岛附近海域的南越海军"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再次驶近中国 407 号渔轮，利用喇叭筒高声喊叫，强令中国渔轮离开。

面对机枪、大炮的威胁，407 号渔轮船长杨贵毫无惧色，面对面地对喊叫的南越军官说："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不走，就叫你们船沉人亡！"这名南越军官却回报以恶狠狠地恫吓。

在威胁不奏效的情况下，"陈庆瑜"号恼羞成怒，竟开足马力一头撞过来，将 407 渔轮的驾驶台撞毁，在这严重

关头，快速赶来的我 271 编队再次向其发出警告，这才迫使其离开……

海战打响了——中国海军并没有派出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也没有运用“冥河式导弹”，中国海军以敢于“刺刀见红”的气概一举击沉南越护航舰“怒涛”号

1 月 18 日深夜，风高浪急。

决心与保卫西沙的中国海军一较高低的南越海军，增派护航舰“怒涛”号赶到永乐群岛海域，与先期入侵的“陈庆瑜”、“李常杰”、“陈平重”3 艘驱逐舰会合。

1 月 19 日清晨，与中国海军对峙了一整天的南越海军，决心以军舰的优势，一举吃掉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海军巡逻舰艇，进而强占永乐群岛。

“李常杰”号和“怒涛”号率先拉开了海战态势。两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接近中国海军编队；而“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则从羚羊礁以南外海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

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的这 3 艘驱逐舰和 1 艘护航舰，大的为 1770 吨，小的也有 650 吨，总吨位为 6000 多吨，舰上共装有 127 毫米以下口径火炮 50 门。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 4 艘舰艇，最大的才 570 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 80 吨，而小的只有 300 吨，总吨位加起来只不过 1760 吨，还不足对方最大一艘舰只的吨位，此外，我方 4 艘舰艇仅装备有 85 毫米口径火炮 16 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装备实力悬殊极大。

此刻，舰大炮大的南越海军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而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

南越海军的企图十分明显。

针对这一敌情，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海上指挥所和各舰艇编队随时保持高度的戒备，在与南越海军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如果其敢于发动突然攻击，则应立即给予自卫反击。

按照广州军区的部署，海军南海舰队下达指示，命令 396 编队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负责监视“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

各舰艇编队根据命令，迅速驶到指定海域。

南越军舰见状，似乎并未把这些小吨位的中国海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中国海军舰艇已几次发出警告，但他们仍然不相信中国人敢动真格儿的。

于是，仿佛象是要考验一下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李常杰”号昂着炮首，大摇大摆地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这是一场比钢铁但更比意志的考验。

与“李常杰”号面对面斗争的是中国南海舰队扫雷舰 10 大队的 396 号和 389 号扫雷舰队。扫雷舰对驱逐舰，这在南越海军眼里，似乎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因此，“李常杰”号也才敢如此猖狂地横冲直撞过来。

396 号与 389 号两舰此刻并不畏惧吨位 4 倍于自己的对手，依然毫不减速地迎了上去，同时再次发出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李常杰”号仗恃着自己的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猛地撞向我 396 号舰，使 396 号舰的指挥台柱、左舷栏杆及扫雷器均遭到损坏。

肇事之后，“李常杰”号竟径直从两艘中国军舰中间穿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继尔放下 4 只橡皮艇，在中国军舰的眼皮子底下运送 40 余名南越官兵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首先向中国民兵开枪进攻，挑起了蓄谋已久的流血冲突。

驻守广金岛的中国民兵虽然是第一次与南越正规军交手，但当他们奋起还击时，即毙敌 1 人，伤敌 3 人，使入侵者在遭到当头一棒之后，只得被迫撤退。

登岛行动受挫后，南越海军决定改变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

4 艘南越海军舰只在占据了有利的外线阵位之后，突然向中国海军编队的 4 艘舰艇开炮轰击。

中国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造成少数人员伤亡。

忍无可忍，无路可退。

中国海军编队当即给予还击。

根据敌我双方的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编队指挥所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

接到命令后，中国海军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接近目标。

猎潜艇 73 大队的 271、274 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艘驱逐舰；而 396、389 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南越海军头目见状，立即命令拉大距离，以发挥自己远程火炮的威力。然而，中国海军虽说船小火力弱，一俟处于近战阵位，则令对手很难不挨打。

两舰距离不断缩小——

中国海军舰艇居然已与南越海军舰艇船舷相接，令其饱尝了一番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的弹雨。

经过 13 分钟的激烈战斗，南越海军的阵脚完全被打乱了。

“陈庆瑜”号为南越海军的指挥舰，尽管它几次试图以炮火上的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 271 艇和 274 艇则认准目标不放松，集中火力攻击它的主炮，并在战斗中击中其驾驶台和指挥通讯设施，造成该舰的通讯中断，指挥失灵。

“陈庆瑜”号见势不妙，拖着滚滚浓烟急忙逃跑。

我 274 号艇为不失有利战机，紧紧追击。这时，敌“陈平重”号为解指挥舰之围，从右侧方对我 274 艇进行拦截。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74艇的电舵突然发生故障，此时如不加以控制，无疑将要冲到"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中间，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274艇艇长李福祥一面镇定地命令转换人力舵操纵方向，同时指挥主机班由全速前进改为全速倒车，终于重新占据有利阵位。

然而，274艇虽然在近战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但打近战所要冒的风险也相当大。一发炮弹落在艇指挥台上爆炸，也使艇上通讯线路受损，指挥中断。好在指挥员们临危不乱，沉着地用口令和手势顽强指挥作战，打得"陈庆瑜"号多处中弹，甚至甲板上的几个南越士兵和舰挂军旗也被炮火扫进了大海。

就整个海战形势而言，中国海军尽管还算不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这个战术思想原则，则得到了灵活的运用。我271艇和274艇集中火力打敌指挥舰"陈庆瑜"号，而396舰和389舰亦是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使其受伤。

南越海军的"怒涛"号为给"李常杰"号解围，趁机向389号、396号实施偷袭。两艘中国扫雷舰立即调转炮火，一齐向"怒涛"号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它的舱面上，由于弹药舱被打中，"怒涛"号顷刻间爆炸起火。

为了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脱，389舰继续紧迫不舍，对它进行猛烈的炮击。

值得一提的是，389舰是中国海军50年代的老舰，接到命令时，刚从工厂维修回来，甚至还来不及试航、试炮，便连夜开赴西沙参加海战。经过一番殊死激战，虽然南越海军"怒涛"号受伤而逃，但389艇实际上也是带伤追击的。

389舰当时的指挥台已被敌炮火打坏，人员伤亡很大。但全舰官兵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坚守战斗岗位，英勇作战。

当海水从弹洞涌入弹药舱时，已身负重伤的战士郭玉东，脱下衣服扑向弹洞，保住了战斗所需的弹药。后来，他在腰部及两膝都受了重伤之际，仍然坚持为战友们运送炮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抢修被炸坏的发电机，副机舱内的5名战士，在硝烟弥漫、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坚持战斗，最后全部英勇牺牲……

就这样，389舰以压倒一切的大无畏气概，直向"怒涛"号逼驶而去。

距离越来越近——

"怒涛"号虽然受伤，但自觉舰大能支，倒也有几分庆幸。可是舰上的士兵一见389舰的拼命架势，却不得不心虚的纷纷卧倒在甲板上。

389舰在离"怒涛"号只有十几米之际，水兵们端起机枪、冲锋枪对准其舰上的各战位即是一阵横扫，同时又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好一场恶仗，好一番"海上拼刺刀"！

南越军舰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但在慌乱还击中，却有一发炮弹打在389舰的两部主机之间，舱内顿时爆炸起火，并迅速四处蔓延。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在烈火中，共有6名战士牺牲，不少人被烧伤。幸好及时扑灭了火势，保住了舰艇。

389舰受了重伤，舰体发生倾斜，航行速度也慢了下来。

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舰，认为时机已到，便立即掉转船头向389舰袭来。

这时，389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了，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深水炸弹，准备敌舰靠近时给以沉重的回击。在低速下发射深水炸弹，很可能会炸伤自己，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海战中，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

装好深水炸弹的389舰向"李常杰"号冲去，正准备发射时，却遇我396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害怕再遭痛击，急忙逃往外海。

见"李常杰"号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恋战，分别掉头朝西北及东南方向落荒而去。

"怒涛"号由于伤势严重，远远地被甩在了后面，这时，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指挥所当即命令在琛航岛以东海域待命的南海舰队猎潜艇第74大队281艇和282艇出击，决不让"怒涛"号逃掉。

281艇从有利位置全速接近"怒涛"号，仍然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10条炮管一齐猛轰，致使其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

"1·19"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自己的失败，并在"怒涛"号被击沉后的当天，制造了一系列的骇人"新闻"，说在这场海战中，中国海军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同时在交战中还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海战结束后，中国军队乘胜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军队手中夺回被占三岛

海战这一回合结束后，1974年1月19日，广州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求参战部队和民兵立即发起收复永乐群岛中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

其时的战斗部署如下——

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的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总共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及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打下该岛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进攻，最后攻击金银岛。在进攻的同时，组织海上力量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西沙永乐群岛中的这3座岛屿，是1956年被南越军

队占领的。登陆夺回这3座岛屿，意义重大，在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74年1月20日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分乘海军舰艇和渔轮向三岛开进。

到达预定位置后，登陆部队换乘橡皮舟和小舢板，在海军舰艇炮火的掩护下，以4连、5连和两栖侦察队按3个梯队在甘泉岛东南滩头登陆。

面对勇猛顽强的中国军队的攻击，侵占该岛的南越军队见难以抵抗，不得不放弃滩头阵地后撤至甘泉岛的中部地区。打头阵的4连在占领滩头阵地后，不给敌人半点喘息，仅用10多分钟就迫使被围的南越军队官兵全部缴枪当了俘虏。

拿下甘泉岛后，5连和两栖侦察队及部分民兵，不顾疲劳，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一贯战斗作风，又分乘1艘护卫艇和1艘扫雷舰进至珊瑚岛南侧礁盘海面，再换乘橡皮舟，分3个梯队，从该岛的西南、东南及南面向入侵的南越军队同时发动进攻。

5连第一梯队指战员在向珊瑚岛出击途中，不幸橡皮舟被敌子弹打穿，人和武装都翻到海里，为不贻误战机，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水中踏浪前进，保证按时抢占了滩头阵地。

入侵该岛的30余名南越官兵只得往岛中央逃遁。

战斗打响后，担任第二梯队的两栖侦察队的指战员们，为了配合5连行动，在离岸700多米的地方，纷纷跳入海中，向岸边游去，登陆后，与5连汇合并肩战斗，使四散逃跑的南越士兵大多举手投降。

但是，也有少数顽敌钻入岛中央的碉堡内开枪抵抗。对此，中国军队给予了猛烈的还击，并用越语向其喊话，最后迫使这些南越官兵打出白旗走出碉堡缴枪投降。

在打扫战场和搜捕歼敌的过程中，我登岛部队又在树林中抓获了珊瑚岛南越军队最高指挥官范文鸿少校。

1974年1月20日下午，南越当局得悉甘泉、珊瑚两岛被中国军队夺回的消息后，立即派出"麒麟"号军舰搭载了1个营的兵力，往援珊瑚岛。

中国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空军为了保证收复3岛战斗的顺利进行，也立即派出了军舰和作战飞机展开迎击态势。南越当局经过海战的较量，害怕"麒麟"号舰此番增援有去无回，只得在该舰仅距西沙永乐群岛40多海里的海域时，下令返航。

甘泉、珊瑚两岛收复后，一连向金银岛发起了进攻。登岛后，发现侵占该岛的敌军早已随南越海军舰只逃跑，于是，收复金银岛的主攻部队未发一枪一弹，便顺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西沙海战与登陆战结束后，南越当局竟欲再较高下，无奈中国沿海三军严阵已待，最后不得不发出"应当避免下一步与中国作战"的哀叹……

在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一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在收复甘泉岛和珊瑚岛及金银岛3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部队和民兵俘虏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也当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在保卫西沙群岛的战斗中，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67名参战人员受伤，我389舰被击伤。

西沙之战结束后，南越当局为捞回挨打的面子，曾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南越海军除派出2艘驱逐舰由头顿和芽庄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嚣。

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中国驻守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部队和官兵，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的紧急备战，完全进入了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知再打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当避免下一步与中国作战"的决定，缩回头去。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关于保卫西沙的军事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亲自参予决策和指挥，对于"四人帮"妄图再次陷害党和国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阴谋，是一个有力的回击，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70年代后期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74年的文艺界是在逆境中求发展求生存的，由于江青对文艺界的干扰，使得文艺界长期处于一种“万马齐喑”的悲惨地步，但追求光明的努力在文艺界却一直没有停过，由于各方的努力，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74年出了几部比较优秀的影片：《闪闪的红星》与《创业》便是其中出色的两部。

电影《闪闪的红星》

1974年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1本

改编：集体　王愿坚、陆柱国执笔　导演：李俊、李昂

摄影：蔡继渭、曹进云　美工：任回兴、张征

作曲：傅庚辰　录音：甄明哲

独唱：邓玉华、李双江　演唱：解放军歌舞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队　指挥：胡德风、徐新　演奏：新影乐团　指挥：冯光涛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祝新运——潘冬子　傅贯君——吴修竹

张桂兰(配音)

高保成——宋大爹　李雪红——母亲

赵汝平——潘行义　刘继忠——椿伢子

刘　江——胡汉三

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

一九三一年红军解放柳溪乡时，从土豪胡汉三的皮鞭下解救了刚满七岁的小冬子。冬子的父亲为保卫胜利果实，杀敌负伤，在做手术时，主动把麻药让给阶级弟兄。这些都深深地教育着小冬子如何爱同志和恨敌人。

一九三四年秋，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出发前，父亲给冬子留下一颗红五星。红军走后，柳溪乡又处于白色恐怖中。

遵义会议召开的喜讯，使冬子和母亲受到极大鼓舞。之后，冬子亲眼看到母亲为掩护乡亲们撤离而从容就义的情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了。在党和革命前辈的抚育之下，冬子逐渐成长。在一次战斗中，他用柴刀砍断竹索，和宋大爹一起掀掉桥板，切断敌人退路，迫使“靖卫团”伪军向游击队投降；在为山上的游击队筹盐时，又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他利用在米店当伙计的机会，送出情报，搞沉敌人的粮船，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他还沉着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最后砍死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

一九三八年，江南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的父亲前来迎接游击队员们，冬子见到了父亲，他带上了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加入了红军。

电影《创业》

1974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5本

编剧：集体，张天民执笔　导演：于彦夫

摄影：王雷　美术：王崇　作曲：秦咏诚

独唱：边桂荣　演奏、演唱：长影乐团、辽宁省歌舞团　指挥：尹升山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张连文——周挺杉　李仁堂——华程

陈　颖——章易之　朱德承——油娃

宫喜斌——秦发愤　章　杰——许光发

王者兰——姚云朗　邵德兴——范师傅

迟志强——魏国华　欧阳儒秋——周大娘

李　瑛——陈淑芬　张冲霄——老周师傅

浦　克——田大爷　刘庆生——赵春生

刘树纲——王副指挥　刘国祥——冯超

庞万灵——美国顾问

一九四九年，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来了解放。周挺杉在党的干部华程的教育下，为粉碎美帝封锁及其散布的“中国贫油”论而斗争。

十年后，我国石油落后的帽子仍未甩掉，专家工作处长冯超崇洋媚外，推行错误路线；总地质师章易之被“贫油”论束缚着思想。周挺杉对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他不相信我国没有大油田。就在这时，北方草原上几口探井喷油，在那里组织了石油会战。周挺杉钻井队前去参加会战，他和华政委一起，提出打破洋框框，甩开勘探，拿下大油田。但是，当了会战前线副指挥的冯超和章易之还主张走老路。冯超用两面派手法为周挺杉等制造障碍。周挺杉钻井队以“两论”为指导，艰苦创业。在紧要关头，所谓的兄弟国家背信弃义，断绝油料供应。冯超又里应外合，制造停井和井喷事故。周挺杉和工人及职工家属在党

的领导下，揭露了冯超的历史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使章易之受到教育。从而为国家拿下了面积大、产量高的创业油田，实现了原油自给，使帝国主义的预言破产、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失败。

历史档案

元旦献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

战斗的一九七三年过去了。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进了一九七四年。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战斗的一年。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祖国大地欣欣向荣。

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的热潮。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我们党更加朝气蓬勃，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我国人民意气风发，为革命大干苦干，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基本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交通运输日益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信誉越来越高。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成果。

国际上同样是一片大好形势。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局势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过去的一年，苏修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中东石油，搞得剑拔弩张，促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世界大动荡的局面。苏修散布的所谓国际局势“和缓”的谎言，已为无情的事实所粉碎。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世界人民日益觉醒，阔步前进。越南和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赢得了重大胜利。柬埔寨爱国军民战果辉煌。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事业取得新的成就。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战争，冲破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对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世界更加壮大，更加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衰败没落、危机重重。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声东击西，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它到处伸手，到处碰壁，面目更加暴露。它在世界上已经是声名狼藉，处境越来越孤立。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胜利。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日益加强。我国已同九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贯彻十大精神，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林彪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批林，批判林彪路

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要坚持学好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反复学习的。还要努力读一点历史和小说。马列主义弄通了，路线才能搞对头，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的原则，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我们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搞好斗、批、改，把教育卫生革命、文艺革命等进行到底。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继续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今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关键性的一年。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下去。这样，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工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使国民经济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来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深刻领会十大文件强调抓大事的重要意义，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各级领导机构都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认真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抓好典型。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要把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真正落实到各个基层。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加强建设，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战斗力。要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加强民兵建设，特别是城市和边疆民兵的建设，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1月1日）

一种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属工厂的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研制成功长城203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经鉴定，这种计算机比国外同类型的计算机存贮量、速度都大大提高，操作更易于掌握，逻辑线路结构简单，体积小，功耗低，使用方便，即将投入生产。

长城203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是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的一项重大成果。研制过程中，数学所工厂的工人和科技人员通过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大大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群策群力，日夜奋战，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短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这种计算机比普通的台式计算机增加了函数运算，扩大了存贮量，提高了速度，能方便地编制、调整和修改程序，在程序的控制下自动进行运算，并配有小型打印机，磁带机，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小型计算系统。它不但可以象普通台式计算机那样通过手工操作解决简单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通过编制程序，解决各种比

较复杂的计算问题，部分代替通用电子计算机的功能。由于这种计算机轻便，易于使用和维护，比通用电子计算机更容易普及和推广。

（新华社讯，6月8日《人民日报》）

1974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闭幕

一九七四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五月十五日在广州胜利闭幕。

一个月来，交易会接待了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朋友、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共两万五千多人前来洽谈贸易和参观访问。我国各对外贸易公司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同各地的贸易界朋友签订了大量出口和进口贸易合同，并且向他们了解了各国人民对我国出口商品在质量、品种、花色、规格、包装、价格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

在这届交易会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界朋友比上一届增多。赤道几内亚、加纳、伊拉克、喀麦隆、马达加斯加、缅甸、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家，还派了贸易代表团或国营企业公司代表团前来洽谈贸易。交易会对于第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贸易界朋友给予积极支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同他们达成的贸易额比历届交易会都有增加。

随着我国化学、机械、钢铁工业的不断发展和许多新工业部门的建立，我国出口商品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出口商品的结构不断变化。在这届交易会上，我国的化工、五金和机械仪器产品等十分畅销，在整个成交额中所占比重有较大增加。我国传统出口的大宗商品，如松香、陶瓷、茶叶、猪鬃、裘皮、肠衣、山货、草柳制品等，也供不应求，销路很好。

交易会举行期间，各国朋友、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参观了本届交易会展出的四万多种展品和一批先进典型的事迹，并且访问了广州市及其附近的一些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医院、学校、“五七”干校，观看了文艺、杂技、体育表演。

十五日晚，交易会在东方宾馆、广州宾馆和人民大厦同时举行盛大闭幕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外国朋友、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以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共四千多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李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根生，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范群，分别在招待会上讲了话。他们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他们说，目前，我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决心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在招待会上分别向到会来宾祝酒。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广东省军区负责人叶建民、杨树银、梁锦棠、刘继发、张景耀等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结束后，来宾们分别观看了中国京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和上海歌剧院演出的音乐、舞蹈节目。

（新华社讯，5月16日《人民日报》）

我国黑龙江省肇源县发现较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化石

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人民公社社员平整土地时，在距离地面约五米处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古代猛犸象骨架化石。发现这样较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化石，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猛犸象又叫长毛象。这次肇源县三站人民公社发现的猛犸象，身长六米左右，体高三米零一，其粗大扭转的门齿曲线长度达一点四三米。据推算，它活着的时候体重可能达四、五吨。这种动物生存于第四纪晚期，距今至少有一万多年。它生活在古代松花江流域的河湖岸边草地上，靠食寒冷地区的植物，如粗糙的草类和芦苇等过活。

猛犸象是一种灭绝了的古代象，过去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等地虽曾发现过这种象的化石，但大多数是零散的牙齿和部分颌骨及四肢骨，从未发现过这样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化石。这次在肇源县发现的化石，不仅丰富了我国第四纪古生物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研究松嫩平原一带第四纪晚期的地层、古生物、古气象、古地理等提供了新的实物根据。

（新华社讯，4月15日《人民日报》）

全国今春近四十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全国广泛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各地广大知识青年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通过深入的批

判，知识青年们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初步统计，入春以来，全国已有近四十万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广大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文件，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还重温了毛主席在三十五年前写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感到格外亲切。他们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青年们用毛主席的教导作武器，反复深入地批判林彪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谬论，批判林彪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学而优则仕"等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青年们说，毛主席热烈赞扬当年延安青年坚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习革命理论，实行生产运动这一正确的方向，指出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鼓吹孔孟之道，宣扬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妄图把知识青年引向邪路。这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继续前进。

各级党组织在领导知识青年批林批孔时，还广泛开展了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请老工人、老党员、老干部给知识青年讲家史，讲革命斗争史，讲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还邀请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回城作报告，举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展览会，或者组织青年到历届毕业生插队落户的农村去作调查，用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的事实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通过这些教育活动，青年们受到了激励，受到了鼓舞。他们说，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再受二遍苦。我们决不让林彪的复辟阴谋得逞。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在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用实际行动来批判林彪、孔老二，同他们宣扬的剥削阶级思想彻底决裂，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通过深入的批林批孔，各地知识青年斗志昂扬，踊跃报名上山下乡。有些地方的青年发出倡议，写大字报，写决心书，迅速形成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上海、陕西、河南、安徽等省市，都在很短时间内便有四、五万知识青年结队到了农村和边疆。首都有三个中学的五十三名应届毕业生带头发出倡议，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报名，目前第一批已有三万多青年奔赴农村。天津市有的知识青年参观了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听了老工人回忆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激发了革命热情，现在已斗志昂扬地奔赴黑龙江省农村安家落户。南宁市结合批林批孔运动，先后举办了三十一场下乡知识青年报告会。兰州市组织下乡知识青年汇报团，给城里的知识青年和家长作报告，听众达十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得到广大家长的支持和鼓励。许多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许多家长在子女出发前，召开家庭批判会，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勉励子女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更加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都采取各种措施来搞好安置工作。上海市派出两千多名机关干部到祖国各地去，同那里的上海下乡知识青年、贫下中农一道战斗，协助当地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今年又迎来了六十多名郑州市下乡知识青年，各生产队都成立了由干部、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三结合小组，认真做好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由于各地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得好，知识青年到农村后，革命热情一直很饱满。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批林批孔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

（新华社讯，5月5日《人民日报》）

我国游泳协会发表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游泳协会声明

最近，国际游泳联合会执行局蛮横决定，禁止我国运动员在亚运会上同亚洲各国运动员进行比赛。这是对中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公然敌视，也是对亚洲体育事务的粗暴干涉。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游泳协会表示强烈的谴责。

亚洲运动会是亚洲人民和体育界自己的事务。亚洲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参加亚运会的各项比赛，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和运动员的正当权利。国际游联执行局中一部分人士无视亚洲人民的愿望和权利，作出这一蛮横决定，强加于亚洲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妄图破坏亚洲体育界的盛会——第七届亚运会。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的作法只能把他们自己同亚洲人民和体育界进一步对立起来，只有使他们更加被动、更加孤立。

近几年来，国际游联中的极少数头头多次乞灵于"处

分"、"停止会籍"等手段来恫吓、破坏世界各国人民和游泳运动员，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和游泳运动员之间的友好来往，粗暴干涉各国的主权和内部事务。这就不仅暴露了他们是顽固阻碍世界游泳运动健康发展的绊脚石，而且说明了他们的处境日益困难。

长期以来，他们容许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游泳协会窃据我国合法席位，坚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动立场。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它根本无权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中国人民和运动员坚决反对任何妄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体育界的情况也是一样。各国体育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界，为维护独立自主权利、反对国际体育界霸权主义的斗争，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和运动员要求同中国人民和运动员进行友好往来的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一形势下，不少国际体育组织作出了符合历史潮流的决定，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近一个时期来，在不同的国际单项组织中，许多朋友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体育组织，恢复我合法席位。在国际游泳联合会执行局中也有不少委员主持正义。我们对这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表示感谢。任何人如果一意孤行、坚持这种横行霸道的做法，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增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往是亚洲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和游泳运动员是永远也孤立不了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和游泳运动员一起为发展友好交往，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为世界游泳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新华社 1974 年 8 月 20 讯，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

我国西沙群岛出土和发现大批重要历史文物

从今年一月起，我国西沙群岛陆续出土和发现大批瓷器、铜钱及石碑等重要历史文物。这些文物，再一次雄辩地说明西沙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在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中，仅瓷器一项就有九十五件，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都有。这表明自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间，西沙群岛就没有断过我国沿海地区人民的足迹。

在永乐群岛的甘泉岛试掘点仅二十四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发掘出唐宋瓷器三十七件，其中，唐代瓷器有十一件，器形都属于罐的口、肩、腹和底部，罐的造型及釉色多数具有广东地区特征，在罐系的制作上有的具有福建地区特色二十六件宋代瓷器，大部分为青白釉，少数为青釉，有刻花、点彩等装饰，有的与广西村窑发掘出土的瓷器特征完全一致，可以推知是广州西村窑的产品；少数与广东潮安笔架山窑发掘品一样，可以推知是属于潮安窑的产品。

岛上发现的元代瓷器较少，只在永乐群岛的金银岛及北礁的礁盘各发现一件，两件都是青瓷，胎较白，纹饰及支烧方法，明显的可以看出是浙江龙泉窑的产品。明代瓷器共发现四件，其中一碗一盘是江西景德镇民窑烧造的青花瓷，碗心画螃蟹，盘里画飞凤，纹饰都较生动。清代瓷器较多，出土及采集的共四十一件。金银岛出土的三件青花夔龙纹盘，埋于一米深珊瑚沙中，出土时完整无损。这三件盘都是景德镇民窑的产品，烧造时间是在清代雍正时期。在全富岛礁盘采集的青花盘碗与岛上小庙内的青花盆、碗共二十件，青花色调大体相同，纹饰部分都有断纹，具有福建德化窑青花瓷器的特征。

综观西沙群岛出土和采集的历代瓷器，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浙江及江西四省，从数量看，广东、福建两省瓷器占三分之二以上。由此判断，唐代以来在西沙群岛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以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为主。

经过调查，西沙群岛各岛的地上遗物尚有小庙多处，包括已拆毁的小庙在内共有十三处。这些小庙多数建于清代，结构简单，都是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垒砌而成。调查时有的小庙内尚放有石雕像、瓷观音像、香炉及盆碗等供器。小庙的建造者是广东、福建两省沿海的渔民，庙内的瓷供器就是以前渔民带到岛上的。

在岛上还发现有石碑四块，两块时间较早的出于宣德群岛的北岛，出土时碑已破碎，碑文相同，均刻"视察纪念"四字，视察时间都在清光绪二十八年，说明是清政府派人视察西沙时所立。此外，在永乐群岛的晋卿、广金两岛发现北宋末"圣宋元宝"和明初"洪武通宝"铜钱各一枚。在北礁的礁盘边缘发现沉船一只，打捞出由汉至明历代铜钱八百多斤，文字能辨认的达八万多枚，其中"永乐通宝"数量多达五万枚，是未经流通使用过的。"永乐通宝"铜钱铸于永乐六年。沉船中有这样大批新铸钱币在内，渔民与民间商船是不可能的，沉船可能与明永乐时期奉派出使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有关。

多少世纪以来，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祖祖辈辈到西沙、南沙群岛从事海特产生产。解放后，文昌、琼海等县渔民仍于每年农历十一月去西沙、南沙诸岛捕海龟、捡海参、拾海螺、割牡蛎，到第二年台风季节到来之前返回海南。《水路簿》①是渔民们世代相传指导航海的"针经书"，

里面记录着西沙、南沙诸岛之间的航向和里程，所有地名都是渔民们多年习用的传统名称。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一大发明，水罗盘用于航海也以我国为开端，最早见于宋人《萍洲可谈》②，书中提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可知宋代航海晴天靠日月星辰定向，阴天就靠水罗盘指南了。元代开始出现专门记载航海的针路专著，《大元海运记》③里说"但凭针路定向航船"，说明用水罗盘定向导航已成为主要方法。明清两代进一步把千百年来我国无数航海家和大自然搏斗的宝贵经验加以总结，明初《武备志》，晚明《顺风相送》，清初《指南正法》等书都详细地记载海上航线、航向、里程以及海水深度。《水路簿》继承了明清航海定向计里的传统方法，但又与明清航海专著不同，明清两代航海专著主要都是通往东西洋的航线，《水路簿》则专门记录西沙、南沙群岛各岛之间的航线。

西沙和南沙、中沙、东沙等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的领土，不但我国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从西沙群岛出土的大批历史文物也充分表明，千百年来我国人民一直在这里居住和生产。瓷器、铁锅、石碑、小庙、铜钱铁证如山，写出了西沙群岛的历史归属。

注：

①这本《水路簿》是琼海县潭门公社老渔民苏德柳五十多年前抄写的抄本。

②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卷二，一八页。

③雪堂丛刻本，十七页。

（据12月6日《光明日报》，作者：冯先铭）

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最近对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三号墓出土的帛书，用墨把古书抄录在帛上，字体为小篆或隶书，共有十二万多字，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这些佚书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据初步整理，这次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写本两种，上下篇的次序与今本相反，文字也有出入；《战国策》一万二千多字，一半以上是今本所没有的；《易经》四千多字；以及其他秦汉以前的古书，共十多种。

出土的《老子》甲本卷后有三篇古佚书，没有篇名，第二篇抄录伊尹论九主的一段，约一千五、六百字，讲到九种君主，特别肯定"法君"。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这些古佚书，有的内容具有比较明显的法家思想，对于研究我国自战国至西汉初期法家思想的演变很有价值。

在佚书中，还有《易说》约七千字；《相马经》四千多字；《医经方》一万多字；《二十八宿行度》约四千字；以及关于刑德、阴阳五行的书。

此外，还有湘江漓江上游地图、驻军图等，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地图。

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中还发掘出竹简六百多枚。其中四百多枚是随葬物品的清单；二百枚是医书，文体与《黄帝内经》相似，据推测可能和已经失传的《黄帝外经》有关。

继一号墓之后，三号墓也发掘出彩绘帛画，共有四幅。一幅覆盖在内棺上，一字形，长二点三三米，与一号墓帛画内容大体相似，细部有许多不同。一幅挂在棺室西壁，长方形，长二点一二米，宽零点九四米，画的是车马仪仗的场面。棺室东壁的帛画已严重残破，但从残片中仍可看出画有房屋建筑、车骑奔马、妇女乘船等场面。另一幅藏在漆盒内，同医书竹简放在一起，已经破损，画面上有静坐、伸臂、屈膝、抱腿、下蹲等各种姿势的人物单个排列，并有"腹痛"、"腰痛"字样的题榜。

这次发掘出土的器物，有漆器三百多件，数量之多，造型之大，制作之精，都超过了一号墓出土的漆器；兵器有弓、弩、戈、矛、兵器架等；还有木俑、丝织品等。在墓坑填土层中，发现了一件完整的木柄铁钗（音插），全长一百三十九点五厘米，上刻"五"字，钗口包有凹字形铁口。这是当时劳动人民的生产工具，能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非常难得的。

这次发掘，进一步肯定了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年代、墓主人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二号墓棺椁和随葬物已残腐，但出土了"长沙丞相"、"軑侯之印"、"利苍"三颗印章，说明这二号墓是第一代軑侯利苍的墓。据《史记》记载，利苍在汉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以长沙丞相被封为軑侯，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一八六年）。三号墓从骨骸看，死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墓内发掘出记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的木牍，可以断定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墓主人是利苍的儿子，第二代軑侯利仓的兄弟。从地层关系看，二、三号墓早于一号墓，说明利苍的妻子比利苍晚死。

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墓的发掘工作，是在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年初由湖南省博物馆等单位进行的。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已由国家严格保护，并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中。

（新华社讯，8月19日《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7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王树声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王树声，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河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党的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艰苦奋斗，积极工作，诚恳坦白，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月18日　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3月，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提出要批孔。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7月前后，毛泽东作诗两首，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始皇。同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江青等人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妄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他们"组阁"篡权的罪恶目的。1月24日和25日　江青等人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直机关及国家机关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江青企图把大会讲话录音发至全国，煽起打击周恩来的运动。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还布置一些人到部队"放火烧荒"。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班子"梁效"、"池恒"、"罗思鼎"等文章大搞影射文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江青甚至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他们还大肆宣扬"儒法斗争史"，影射我们党内的斗争。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让一部分老干部出来工作诬为"复旧"、"请隐士"、"举逸民"，并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动所谓批判"右倾回潮"运动，使许多刚刚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再次被打倒。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在江青等人掀起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中，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吹捧"女皇"。江青还胡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为她自己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

由于江青等人的破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来经过周恩来及全党努力刚刚趋向好转的局势又急剧恶化起来。整个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及生产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全国重新出现大动乱的局面，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后，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扣住江青等1月25日大会的录音，不准他们发往全国。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1月2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王稼祥逝世，终年68岁。王稼祥，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全国解放后，任中国首任驻苏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年初，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7月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而抚宁县是王光美搞"社教""蹲点"的地方，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支援春耕。江青一伙御用写作班子的文章却无中生有的说王光美1966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因此，硬说戏的要害是所谓"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姚文元亲自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反动文章作了11处修改，又经江青、张春桥定稿，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全国各大报转载，霎时间搞得全国舆论界阴云密布。于会泳还把这出戏和山西一个评论工作者赵云龙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赵文批评了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的目的混为一谈。于会泳说这篇文章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赵云龙在这场灾难中被迫害致死。

4月3日　"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这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反周比较突出的代表作。江青一伙在批孔的幌子下，按照他们的需要，借题发挥，以似是而非的材料，影射比附，指桑骂槐，妄图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4月1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傅作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傅作义，山西临猗人。傅作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特别在和平解放北平、绥远中立下大功，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反动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等职，在天津解放后，他作出了顺应历史的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于1949年1月率部起义。建国后，曾任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担任了20多年水利电力部部长。20多年来，傅作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的事业中，他与中国共产党竭诚合作共事，做出了积极贡献。

6月14日　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7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毛泽东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了"上海帮"，他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10月11日　中共中央为将在最近期间召开的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18日　王洪文飞往长沙"告状"。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四人帮"加紧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的"风庆轮"事件（交通部派去协助"风庆轮"首次远航欧洲工作的李国堂、顾文广在船上拒绝和抵制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迷外""卖国主义"而受迫害，诬蔑李、顾"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返航后遭批斗并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攻击邓小平。邓小平作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当晚，"四人帮"密谋。次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造谣说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并明确表示仍由周恩来筹备和主持四届人大的工作。

11月12日　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江青不听告诫，又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揭露和抵制，"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归于失败。

11月19日　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张云逸，广东省文昌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广西右江参加领导武装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七军军长、新四军副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党的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11月29日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彭德怀，湖南省湘谭县人，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彭德怀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八路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65年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党的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错误批判。被强加上了反党罪名，蒙冤受屈。十年动乱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丧失人身自由，被长期"专案审查"，直至含冤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为他恢复名誉。1978年12月24日举行彭德怀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悼词指出，彭德怀是深受我国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热爱党

热爱人民，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他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2月23日　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24日，毛泽东又向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翌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用邓小平，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经　济

3月20日　我国第一艘2.5万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投产。浮船坞是在水面上修理船舶用的"大船"，它比定在岸上的宏大船坞有许多优点：能够移动使用，建造周期短，投产较省，可以利用水域，不占用土地。它对发展我国远洋和沿海运输事业，改变港口面貌，支援造船工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黄山号"和以前造出的几艘万吨级浮船坞比，工程量大、工艺复杂。浮船坞全长190米，宽38.5米，坞墙高达15.8米，能抬举修理载重量2.5万吨至3万吨的海轮。船坞里面有电站，以及修理船舶用的机械、电器、坞木加工等全套设备，自动化、电气化程度较高。

5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在华北东部滨海地区建成了大港油田。自1966年到1973年，这个油田年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原油产量平均每年递增60.9%，大港油田是继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之后，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勘探、建设起来的一个新油田。已经获得的大量地质资料表明，这个油田的油气资源丰富，油层厚，渗透性好，原油性质好，经济价值高。这个油田的开发，为我国提供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对改变我国燃料构成，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上半年，由于江青等人以"批林批孔"旗号，再次掀起批判所谓"右倾回潮"运动，全国的政治局势出现新的动乱，工业生产从逐渐恢复转为大幅度下降。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帐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

7月5日　天津新河船厂建成我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500吨浮吊。500吨浮吊是继百吨浮吊之后，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又一艘大型起重吊船。船体总长67.7米，宽25.2米，排水量3600吨，主钩起重量为500吨。浮吊还设有两个50吨的副钩，主、副钩可以同时使用。由于采用了大功率可控硅无级调速装置，浮吊工作时，电压变化稳定，起落速度均匀。通过各种性能试验和试吊证明，这艘浮吊质量良好。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一台水电机组在哈尔滨制造成功。哈尔滨电机厂设计制造的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经过一年多运行发电表明，质量符合要求。机组采用了新技术、新结构，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为我国发展新型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组提供了设计和制造经验。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渤海湾地区建起了又一个大油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距离我国一些工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比较近，海陆运输方便。它的开发建设，对于高速度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改变我国的燃料构成和燃料工业布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胜利油田是从1964年开始建设的。胜利油田所处的地区，在地质学上属于华北盆地。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曾经认为，华北没有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海相沉积，又广泛分布着火成岩和变质岩，不可能有油。我们的油田建设者们就在被说成不可能有油的地方找到了大油田，打出了高产油井。胜利油田的成就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油田勘探、开发的理论，对加速我国同类地区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有很大意义。

1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三门峡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委托外国设计，设计的基本方案是以高坝大库拦泥蓄水发电。1957年动工，1960年9月建成蓄水。由于对泥沙淤积估计错误，水库运用后，泥沙淤积十分严重。淤积部位并且从潼关向渭河迅速发展，形成"翘尾巴"，水库有报废的危险，而且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面对这一不利的局面，进行逐步改建，加大水库泄流排沙能力，使水库能保持一定库容，合理地发挥效益，整个改建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安装，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进行的。改建后，效果显著。水库泄流能力由在库水位315米(海拔高程)时泄放3080秒立米，增加到1万秒立米。泄流能力加大了，排沙能力也加大了，不仅可以使库容得到保持，而且潼关河床高程也有下降，为减轻渭河下游淤积创造了条件。这样，改建后的三门峡工程，就能发挥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的综合效益。

12月21日～28日　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会上宣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教学工作实行"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

工分等所谓"经验"。迟群、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农经验具有"战略意义"。毛远新提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并说:"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在此以后,全国掀起了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

1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大庆—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输油。管道工程是1970年冬开工,到1973年国庆节前完工。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己提供设备、自己施工建成的第一条大口径、长距离的"地下大动脉"。管道全长1,152公里,北起黑龙江,纵贯吉林、辽宁两省,南到河北,像一条地下长龙,穿过江河、山岭、铁路,从松嫩平原一直伸展到渤海之滨。在输油管道的地面上,每隔六七公里设有一个泵站,为原油加压、加热,使原油在输油管里能够保持一定的速度和温度,流畅无阻。为了给泵站提供动力和便于生产调度,还相应地建设了电源和通讯配套工程。一年多来的输油情况表明,工程质量良好,机泵运转正常,输油安全平稳。大庆原油通过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流进山海关,在秦皇岛装车装船,运往祖国各地。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艘海洋地质勘探浮船出海试钻成功。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海洋地质勘探浮船"勘探一号",前不久出海试钻,在黄海南部海区成功地打了一口石油地质普查井。"勘探一号"在出海试钻中,在有关部门大力协助配合下,完成了在海上钻探的定位、抛锚、试放下水器具、钻井、固井、测井、起锚,以及各类仪器的全面试验任务。这艘勘探浮船在遇到8级大风和9级阵风的情况下,船体未发现形变;锚系可以把船锚泊在井位上,保证浮船正常作业。钻井设备和各项新设计的附属设备,以及各类专用仪器,工作情况都很正常,水下器具在海底组装一次成功。"勘探一号"首次到较深的海区试钻,获得成功,这是我国海上地质勘探事业的一个新发展。

外　交

1月19日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面交一份抗议照会。指出: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维·阿·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和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中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捕获。对苏联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南越西贡当局武装侵犯我国领土西沙群岛的琛航岛发表声明。指出:1974年1月15日以来,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海空军入侵我国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他们出动军舰撞坏我渔轮;派遣武装部队强占我甘泉岛和金银岛;特别严重的是1月19日,西贡军队向我琛航岛发动武装进攻。派遣军舰和飞机向该岛进行野蛮的炮击和轰炸,打死打伤我渔民、民兵多人。西贡军舰还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国舰艇首先开炮袭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西贡当局派遣军队侵犯我国领土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抗议。声明重申了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外长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的立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一向为中国领土。"声明指出:为了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行动。我舰艇部队和渔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给了来犯之敌应有的惩罚。

2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签订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发表声明,指出:1974年1月30日,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汉城签订了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的协定。该项协定在东海海域片面划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南朝鲜的所谓"共同开发区"。由日本和南朝鲜共同投资,在该区域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中国政府认为,根据大陆架是大陆自然延伸的原则,东海大陆架理应由中国与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现在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划定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对此,中国政府绝不能同意。如果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这一区域擅自进行开发活动,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2月21日～3月2日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应邀访问我国。2月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卡翁达总统,在谈话中,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在卡翁达总统访问我国期间,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了会谈。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赞比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2月25日～3月2日　应我国代主席董必武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同布迈丁主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当前重大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3月15日　我国和几内亚(比绍)在科纳克里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

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面交一份抗议照会，对苏联政府派遣飞机侵入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提出强烈抗议。照会指出，1974年3月14日，苏联米一4型武装侦察直升飞机一架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纵深，不止一次地在哈巴河县境内降落，进行间谍活动，机上3名军人和飞机被中国国防部队和民兵当场捕获。

3月24～31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克·尼雷尔，应我国代主席董必武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总理同尼雷尔总统举行了会议。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4月1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访问我国。27日发表联合公报。中国和柬埔寨签订关于1974年中国无偿供应柬埔寨军事装备物资协定。

4月2日　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届会议上讨论亚洲近海矿产资源的勘测议题时，中国代表重申：中国沿海海域及中国所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资源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只有中国才有权勘探和开发这些海底资源，任何无视中国主权，任意在中国沿海海域及其所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的勘探和钻探活动，都是非法的。对于中国和相邻或相向的国家间有关大陆架管辖范围的划分，应由有关国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确定。

4月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说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5月6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应邀访问我国。双方为进一步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在交换教师和留学生，交换新闻、电视、电影、图书资料、组织体育比赛等文化科学合作方面进行了协商。

5月28～6月2日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马来西亚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宾·达图·侯赛因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拉扎克总理举行了会议。5月31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5月30日　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关于中苏界江问题发表谈话。1974年5月23日塔斯社报道的所谓苏联外交部声明，根据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苏边界线经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这个汇合口就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城下。中国船舶经两江汇合口的主航道航行，是中国不可剥夺的权力。但是，苏联竟把这段约100公里的中苏界江说成是它的内水，把中国内水抚远水道说成是中苏界江，并且自1966年以来一直以武力阻挠中国船舶经两江汇合口航行。苏联外交部5月23日的声明，就是要中国首先承认苏联提出的上述领土要求，然后才能考虑中国民用船舶在这段界江的航行问题。中国方面早已多次拒绝，现在也绝不接受这种无理要求。

6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共和国公布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9月8日～15日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应邀访问我国。李先念副总理同戈翁总司令就进一步发展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非洲当前形势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其它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

9月17日～27日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应邀访问我国。邓小平副总理同达达赫总统举行了会谈。19日，中毛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11月5日～11日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威廉斯总理，就进一步发展中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代表具体商定了互派留学生等协议。

11月10日～18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访问我国，邓小平副总理同鲁巴伊主席举行了会谈。13日，我国政府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科技文教社会生活

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这项工程是为了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江而兴建的关键工程，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整个枢纽包括一条总长达5里的大坝；一座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的电站；一套国内第一次制造的、一次可以提升载重150吨驳船的升船机，以及引水总量为600秒立米的两个引水灌溉渠道。成昆铁路1970年7月1日正

式通车。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西抵云南昆明，全长1，085公里。这条铁路建成通车后，北接宝成铁路，形成了纵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四川、贵州、云南3省物产丰富，聚居着彝、苗等数十个兄弟民族。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后，对于加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促进西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变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成昆铁路在四川、云南两省的万水千山之间，飞越大渡河，穿过大、小凉山，横跨金沙江，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大型或中型桥梁，每2.5公里就有一座隧道。全线桥梁和隧道总长400多公里。工程之艰巨，为世界铁路建筑史上所罕见。

3月29日　我国自行设计建成试验性地热发电站，北京电力工业部门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在河北省怀来县设计建成一座试验性地热发电站。这座发电站不消耗燃料，没有普通发电站的烟囱和锅炉设备，也不用建设水利发电站所需要的拦河坝，只是利用从机井里抽上来的天然热水，把蒸发器里的低沸点中间介质加热，化为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它具有发电成本低，易于操作和维护等优点。这座发电站的机组经过长时间的连续运行考验，性能良好。达到了设计要求。

4月14日　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人民公社社员平整土地时，在距离地面约5米处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古代猛犸象骨架化石。发现这样较完整的猛犸象骨 架化石，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猛犸象又叫长毛象。这次肇源县三站人民公社发现的猛犸象，身长6米左右，体高3.01米，其粗大扭转的门齿，曲线长度达1.43米。据推算，它活着的时候体重可能达4～5吨。这种动物生存于第四纪晚期。距今至少有1万多年。它生活在古代松花江流域的河湖岸边草地上，靠食寒冷地区的植物，如粗糙的草类和芦苇等过活。猛犸象是一种灭绝了的古代象，过去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等地虽曾发现过这种象的化石，但大多数是零散的牙齿和部分颌骨及四肢骨。从未发现过这样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化石。这次在肇源县发现的化石，不仅丰富了我国第四纪古生物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研究松嫩平原一带第四纪晚期的地层、古生物、古气象、古地理等提供了新的实物根据。

5月11日　我国云南省昭通地区与其邻接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发生强烈地震。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1级，震中地区在北纬28.2度，东经104度。震后房屋、人、畜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党中央、国务院当即派慰问团到灾区慰问。地震地区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战胜了地震灾害。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4，000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新成果。这批竹简是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1972年4月发现的。这批竹简的发现，使《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是否实有其人等国内外长期存在的疑案得到解决，特别是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8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为支援西藏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海、辽宁、江苏、河南、四川6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选派389名教师前往西藏参加建设。这些教师将分配到8所中学加强那里的教学工作，还将协助自治区在拉萨市筹办一所师范学院。选派教师在业务上配备了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农业及体育、音乐、美术等各种专业人材，并为受援学校配备了教学仪器和 图书资料。

8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批气敏半导体器件研制成功。中国科学院吉林应用化学研究所研制出气敏半导体器件，为我国电子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气敏半导体器件是用对易燃易爆气体敏感的半导体材料制成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利用这一器件能把一定浓度的可燃性气体转换成电信号的特性，可以组装成各种检测仪器，用于可燃性气体的监测、分析、报警、火灾烟气报警和防止大气污染等，在石油、煤炭、化工、电力、电讯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有广泛的用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迫切要求解决对各种易燃易爆和有毒气体的监测、报警。科研人员急国家之所急，突破技术难关，制成我国第一批气敏半导体器件，并且试制出几种应用这一器件的可燃性气体检测仪器样机。经初步试用证明性能良好，受到有关部门的欢迎。

8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从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发掘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获得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三号墓出土的帛书，用墨把古书抄录在帛上，字体为小篆或隶书，共有12万多字。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这些佚书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这次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写本两种，上下篇的次序与今本相反，文字也有出入；《战国策》12000字，一半以上是今本所没有的；《易经》4000多字；以及其他秦汉以前的古书，共10多种。还有 湘江漓江上游地图、驻军图等，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地图。此外，还发掘出 彩绘帛画、漆器、兵器、木俑、丝织品等。这次发掘，进一步肯定了马王堆三座汉墓主人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二号墓是第一代轪侯利仓的墓，三号墓是利苍的儿子（第二代轪侯利仓的兄弟），一号墓是利仓的妻子。从地层关系看，二、三号墓早于一号墓，说明利仓的妻子比利苍晚死。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功DIS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经试算运转证明，这种计算机性能比较稳定，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它的研制成功，为我

国国民经济的一些部门推广和普及电子计算机，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机型。

9 月 5 日　中国女运动员李亚敏在第七届亚运会上，打破女子标准手枪 25 米 60 发的世界纪录。李亚敏的成绩是 555 环，打破了澳大利亚女运动员特里姆于 1970 年在美国的菲尼克斯创造的 554 环的世界纪录。

9 月 9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女运动员姜胜玲以 308 环的成绩，打破苏联的克捷万·洛萨别里泽 1973 年创造的女子 70 米单轮射箭 307 环的世界纪录。姜胜玲是山东省射箭代表队的女运动员，她在西宁举行的 1974 年全国射箭比赛中刷新了这项世界纪录。

10 月 29 日　北京——卡拉奇——巴黎国际航线正式开航。中国友好参观团乘坐首航班机前往巴基斯坦参加开航庆祝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从卡拉奇经拉瓦尔品第到北京的国际航线和从巴黎到北京的国际航线，已分别于 1973 年 1 月和 9 月正式开航。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5年

导　言

喧嚣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其结果是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严峻的形势急切呼唤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整顿。1975年伊始，《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便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大办农业、加强工农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基础工业，认真抓好国防工业。”表明了中央要使经济状况好转的意向。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而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和进行整顿。

全面整顿期间，邓小平提出了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以国民经济为纲。全面整顿使1975年的国民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该年成为“文革”中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全面整顿的实质是对“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的较为系统的纠正，而国民经济的好转，又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实现安定团结与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的真诚愿望，但他不能容忍反对“文化大革命”。8月，江青集团根据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9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进行歪曲事实的汇报，攻击邓小平，使毛泽东对“全面整顿”的态度起了本质变化。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的批示，从此开始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的成果被否定，已经纠正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又重新出台。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邓小平复出
●全面整顿的措施与成绩
●整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卫生革命
●普及大寨县
●特赦全部战争罪犯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评《水浒》”运动
●中国外交新进展
●蒋介石逝世

邓小平复出

背景介绍

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亟需进行整顿，而整顿又亟需有才干的领导者。周恩来病重，使邓小平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毛泽东一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1972年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中就曾肯定他的功绩。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从此复出。

材料：

-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材料一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①

（1972年8月14日）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按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新华社1975年1月17日讯，1月18日《人民日报》）

全面整顿的措施与成绩

背景介绍

周恩来病重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

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成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根据中央决定，在铁道部长万里的主持下，仅两个月就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铁路运输状况大为改观，震动了其他各条战线。5—10月，各项整顿全面展开，先后对工业、农业、国防、科教、文艺等方面进行整顿，并落实了干部政策。

全面整顿的时间不长，但成果是喜人的，无论工交、农业，还是其他战线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总的来看，这一年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是“文革”期间经济发展最好的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一年。多年蹒跚不前的国民经济，重新走向恢复和发展。请看下面一组材料。

材料：

- 工交战线进行整顿的措施及其成果（辑录）
- 全面整顿给经济带来的转机（节录）

材料一　工交战线进行整顿的措施及其成果（辑录）

（1975年8—10月）

路线对头　后来居上（节录）

——徐州铁路分局迅速由后进变先进的经验

《人民日报》编者按：徐州铁路分局的变化说明，由后进变先进并不难。只要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了，党的政策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总之一句话，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了，即使是“老大难”的单位，问题多复杂，都是可以解决的。

……

在学习和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过程中，徐州铁路分局党委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狠抓了加强革命团结的工作。他们发动群众消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分裂革命队伍所造成的影响，努力解除部分干部、工人中存在的思想隔阂。现在，领导一条心，群众一股劲，讲大局，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全分局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的革命景象。

广大工人、干部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联系实际大讲毛主席、党中央对铁路工作的关怀，大讲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认清团结战斗搞好铁路运输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狠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的罪行，认清加强革命团结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保证；摆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论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认清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实质。他们还瞻仰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的陵墓，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进一步激发无产阶级感情。大家越学心里越热乎，越学感情越融洽。原来有些思想隔阂的同志都表示要把仇恨记在林彪身上，坚决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

（原载1975年8月6日《人民日报》）

全国煤炭工业战线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节录）

今年以来，我国煤炭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工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深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促进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形势越来越好。

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煤矿生产的原煤和洗精煤，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五点六和百分之二点六；开拓进尺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二点九，准备煤量、开拓煤量和可采煤量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煤矿的基本建设也是近几年中完成得最好的一年。

……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各地煤炭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突出地抓了领导班子的建设，端正思想政治路线，进一步加强党对煤炭企业的领导。许多企业的党委根据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分析了本单位领导班子的状况，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实行开门整风，进行充实调整。一些企业经过初步整顿和建设，情况有了显著变化。原来较好的领导班子，现在更加团结、坚强；过去抓阶级斗争较差，抓生产斗争劲小的领导班子，现在抓阶级斗争站排头，在生产当中能够带头；过去存在着资产阶级派性的，现在克服了资产阶级派性，加强了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有些过去干劲不足的干部，现在是有病不肯休息，下井就顶一个班劳动。领导班子得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就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下去，党对企业的领导就加强了。枣庄、徐州、淮南、西山、乌达等二十五个矿务局的领导班子经过充实和加强，生产节节上升。这些矿务局第三季度增产的煤炭，占全国煤炭增长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很多煤炭企业对影响革命和生产的资产阶级派性，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许多领导干部直起腰杆，站到了斗争第一线。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对极个别利用派性作掩护，制造事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打击和斗争。群众之间自觉总结经验教训，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煤炭产量很快提高。

（原载197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全面整顿给经济带来的转机（节录）

柳随年　吴群敢

通过贯彻整顿的方针，迅速地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主要产品产量，粮食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棉花4762万担，减少3.3%；钢2390万吨，增长13.1%；原煤4.82亿吨，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万亿度，增长16%；棉纱[illegible]2万件，增长16.9%；铁路货运量8.9亿吨，增长[illegible]%。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总规模达392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illegible]39个，其中当年新建项目90个，全部建成投产167个，部分投产的310个，新增固定资产250亿元。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6426万人，比上年增加26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7‰，比上年降低1.8‰。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增长9.2%。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水平。财政收入815.6亿元，财政支出820.9亿元，财政赤字5.3亿元。这一年尽管还存在着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积累率[illegible]%，比上年提高1.6%，接近1971年水平）、财政收支出现赤字，职工人数增加过快等问题，但从总的看，这一年经济发展状况是比较好的，事实充分地说明，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在摆脱了停滞倒退局面之后又走向恢复和发展。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取得的转机被"四人帮"破坏之后，又出现的新的转机。

……

（原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

全面整顿的前期，毛泽东对各项整顿措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多次就有关问题进行批示。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的批示无疑对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背景介绍

全面整顿同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从一开始就遭到江青集团的阻挠和抵制。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开展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下两篇文章是姚文元、张春桥在理论宣传领域抵制整顿的反映。

材料：

-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节略）
-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节略）

材料一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节略）

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像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成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

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

……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

……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3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材料二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节略）

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

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 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

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 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 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

卫生革命

背景介绍

1975年4月的“讲究卫生”运动是在全面整顿大力

展开的形势下进行的，是在卫生领域的一次政策调整。运动进行之时，正值毛泽东关于卫生革命的“六·二六”指示十周年。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防止疾病的产生和蔓延，提高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城市的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保健身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材料：

·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

材料　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卫生革命，积极开展除害灭病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前，我们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教导，再接再厉，切实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卫生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卫生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要联系卫生战线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做一些调查研究，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坚持在卫生领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使卫生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服务，把医疗卫生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除害灭病，增强体质，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保证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必要条件。那种把卫生工作同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能不能正确处理卫生工作同革命、生产的关系，关键在于领导。只要各级领导端正认识，全面考虑，统筹安排，就可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搞好卫生工作。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疾病减少，精神振奋，革命、生产、工作和学习生气勃勃。

要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必须克服“来了运动一阵风，运动过后就放松”的现象。疾病能不能预防，卫生面貌能不能改变，爱国卫生运动的成绩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 在于能不能把突击运动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除害灭病工作不抓不行，抓一阵松一阵也不行，什么时候放松了，什么时候就“四害”繁殖，疾病回升。因此，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下去，一抓到底，抓出新的成绩。

去冬天气比较暖和，蚊蝇大量过冬，认真搞好今年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更为重要。现在正是除害灭病的关键时刻。各级党委必须抓紧时机，动员干部和群众迅速行动起来，男女老少齐动手，大讲卫生，大除“四害”，进一步改变城乡的卫生面貌，振奋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4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

普及大寨县

背景介绍

普及大寨县是整顿工作在农业领域的一个表现。1975年9月15日，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会议确立了全党、全国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方针。

材料：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胜利闭幕

材料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胜利闭幕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九日下午在北京胜利闭幕。

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洋溢着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主席台上方，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十面红旗。会场里悬挂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学大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巨大横幅标语。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陈永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周建人、李素文、姚连蔚、王震、孙健，出席了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经过全体同志一个多月来的努力，开得很好。大家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伟大意义的理解，提高了对大寨根本经验的认识。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陈永贵副总理说，参加会议的代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讨论了邓小平副主席的重要报告和华国锋副总理的 总结报告，参观了大寨、昔阳的

建设成就，交流了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了普及大寨县和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召开的规模很大、意义深远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的现代化，会更有力地带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大加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备战备荒的物质基础。经过这次会议，同志们感到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回去大干的决心更大。许多先进地区的同志，看了大寨和昔阳，觉得自己步子迈得还不大，表示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再大批，干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再大干，要不断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建设。原来困难比较多的地方的同志，也感到形势逼人，决心赶上去。我们相信，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将迅速到来。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会议结束以后，大家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把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今后的战斗任务，迅速而广泛地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去。首先，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用会议精神统一各级党委的思想。党委思想一致了，才能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既是一场革命，就会有阶级敌人的破坏，就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我们一定要敢于斗争，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资产阶级派性斗，还要同一切干扰运动的错误思想斗。以顽强战斗的精神，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胜利。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普及大寨县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统一部署下去，要抓得很紧很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按照会议的要求，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统一认识，订出切实有力的措施，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为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做出新的贡献。要切实抓好今冬明春的工作，要有一个好的开端。

陈永贵副总理最后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政策、方针和工作方法，全党动员起来，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和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一些省和县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一致表示，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学习了大寨的根本经验，学习了各地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会议结束以后，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把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今后的战斗任务，迅速地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去。他们表示，决心做到有了成绩不骄傲，有了困难不泄气，用坚韧不拔、顽强战斗的精神，保证实现普及大寨县和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宣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时，全体代表长时间鼓掌，热烈祝贺这次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方面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教单位的代表，财贸系统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国务院有关单位的代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财贸、外贸等专业会议的代表，共七千多人。

（新华社 1975 年 10 月 20 日讯，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

特赦全部战争罪犯

背景介绍

1975 年 3 月 17 日举行的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19 日，我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一决定，共释放战犯 293 名。并宣布：愿意回台湾者，给足路费，提供方便。释放全部战犯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定团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

材料：

- 十名最近特赦释放人员离开北京回台湾
- 六十五名被宽大释放的美蒋武装特务分别取道厦门港口、深圳回台湾
- 我国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材料一　十名最近特赦释放人员离开北京回台湾

最近特赦释放的人员有十人十三日离开北京，途经香港回台湾。

愿意回台湾的特赦释放人员是：王秉钺、陈士章、王云沛、周养浩、蔡省三、段克文、张海商、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

人大常委会最近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时，曾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王秉钺等人在被特赦释放以后，提出了回台湾的申请，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了他们去台湾的路费，并发给往返通行证，如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新华社讯，4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六十五名被宽大释放的美蒋武装特务分别取道厦门港口、深圳回台湾

最近被我司法机关宽大释放的要求回台湾的美蒋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有六十人于八日下午从福建沿海厦门港口，乘船驶往蒋帮控制的金门岛，回台湾同他们的家人亲友团聚。有五名宽大释放人员于同日离开深圳，路经香港回台湾，同家人亲友团聚。

这批回台的宽大释放人员于五日分乘火车和飞机从北京到达福州、广州。他们离开福州、广州前夕，福建省革委会办公室、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分别举行了招待会，为他们饯行。福建省革委会办公室、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负责人在招待会上分别讲了话，祝他们旅程顺利，早日与在台湾省的家人亲友团聚。

宽大释放人员对我人民政府宽大释放他们，并为他们回台提供各种方便表示感谢。

（新华社讯，10月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我国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国司法机关最近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这一重大措施，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肃反等伟大的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势力，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犯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罪行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我公安机关遵照毛主席关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他们进行了长期教育和改造，使他们逐步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改恶从善的表现。其中许多人已经先后释放。这次决定对在押有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安定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体现了毛主席和我们党对反动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实行改造和给出路的伟大政策的胜利，体现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宽大释放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的释放证，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适当安置。

在宽大释放这些人员的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对服刑期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转业证明书，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宣布给予公民权，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适当安置。

各地司法机关负责人，勉励所有被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同时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并提供方便。政府给每人发了新制服装和零用钱，还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被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人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他们表示决心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思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这次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中有：

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宋思一，国民党第一兵团少将副司令官兼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陈南平，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少将参谋长李致中，国民党九十七军少将副军长郭文灿，国民党新三军少将参谋长李定陆，国民党第七军少将参谋长江棠，国民党新十一军少将参谋长王念琪（王维侃），国民党第七军一七二师少将师长刘月鉴，国民党四十三军七十师少将师长郑汶河……

（新华社讯，12月24日《人民日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背景介绍

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情况，引起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的态度发生变化。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次上书的批示，揭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的帷幕。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成为"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信号。

材料:

- 刘冰等四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批示
- 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汇报

材料一 刘冰等四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批示

刘冰等人第一次上毛泽东书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和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作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求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作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 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 委 吕 方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刘冰等人再次上毛泽东书(节录)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八月十三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作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作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曾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 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两次来信的批示

（1975年11月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摘自《大动乱的年代》）

材料二 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5年9月底—11月初）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 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 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摘自《大动乱的年代》）

"评《水浒》"运动

背景介绍

8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道："《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评《水浒》"运动是江青集团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评论而掀起的一场别有用心的运动。它的目的就是要批判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投降派"，实指周恩来与邓小平，尤其是搞全面整顿的邓小平。

材料：

- 鲁迅论《水浒》
-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材料一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3月3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

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

中国外交新进展

背景介绍

全面整顿也为外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1975年，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对外关系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拓宽与加深了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同西欧、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也日益密切。

材料：

· 一九七五年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材料　一九七五年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一九七五年，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在外交战线上取得新胜利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国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又有新的发展。今年，先后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有九个，即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菲律宾、泰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孟加拉、斐济、西萨摩亚、科摩罗。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反帝、反殖、反霸的战友。这样，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先后同我国建交的就由去年的九十八个国家，增加到今年的一百零七个国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这一年里，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往来更加发展。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我们在各方面进一步加强了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到目前为止，今年已有十多位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今年四月，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隆

重热烈的欢迎。中朝双方就讨论的所有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对增进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同志也在今年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于今年九月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在取得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后，第一次派出自己的光荣使者——乔森潘、英萨利率领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于今年八月来我国访问。越、柬代表团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越、中柬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菲律宾和泰国两国首脑来我国访问的时候，都同我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发展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开创了良好前景。在这一年里，从地中海的马耳他、非洲大陆的冈比亚，到拉美的圭亚那等国首脑，也远涉重洋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一年来，我国同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二世界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也进一步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今年五月，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问了法国，双方就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了意见。在这次访问前后，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西德总理施密特等第二世界国家首脑和英国前首相希思、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等著名人士，也应邀来我国进行了访问。今年，我国还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并决定派驻代表。

不久前，美国总统福特来我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有助于增进了解，有利于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双方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一九七五年，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五年，世界五大洲的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体育、卫生、科技、艺术、新闻等各种类型的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这期间，我国也派出了各种类型的代表团，前往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些相互的友好访问，进一步增进了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这一年里，我国体育运动员同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国际体育交往。我国的杂技团、武术团、乐团、艺术团等文艺团体，今年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了友好访问演出，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

一九七五年，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在坦、赞人民和中国援建人员共同努力下，我国援建的长达一千八百六十公里的坦赞铁路，已于今年六月提前完成全线的铺轨任务，并开始客货运试营。目前，我国同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并同其中七十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或贸易议定书。今年参加我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第三世界国家客商和朋友之多，是历史上空前的，也是成交量最大的。在去年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易额比一九七〇年增长两倍的基础上，今年又有新的增长。这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反对超级大国转嫁经济危机，正在进一步通过相互贸易交往，来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和互相支援。

为了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今年我国又增加国际航空线和进一步发展海运事业。万象——广州、苏黎世——上海等新航空线都在今年开航。目前，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远洋轮船往来于世界各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二十多个港口。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相比，目前我国远洋运输载重吨位增长了十二倍多，船舶增长了近八倍。

一年来，我国在对外关系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是我国政府和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结果。在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团结合作，争取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新华社1975年12月24日消息）

蒋介石逝世

背景介绍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简短的报道，并再次表明了解放台湾的信念。

材料：

· 蒋介石死了

材料　蒋介石死了

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月六日报道，蒋介石死后，蒋帮由伪“副总统”严家淦接任伪“总统”，以继续维持其对台湾人民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的代表，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

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延残喘，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怀有爱国心的蒋帮军政人员也将更加认清形势，积极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新华社讯，4月7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康生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叔平，又张绍卿，化名赵容。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进上海大学读书。

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成为王明的副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他积极追随王明，鼓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伙同王明打击迫害在苏联的一些中国同志。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从1939年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起，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革命同志，制造多起冤案。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内战时期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领导整风学习。

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革命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4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利用权力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串通，捏造罪名，打击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提出批"唯生产力论"的口号，破坏工农业生产，歪曲篡改马列主义，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了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张志新

张志新(1930——1975)女。天津人。曾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任干事。"文化大革命"中，她公开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的暴行和篡党夺权的阴谋，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逮捕，在狱中她经受了各种摧残迫害，仍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献身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1974年8月2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75年4月3日被判处死刑，次日即被杀害。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为她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以《要为真理而斗争》为题报道了她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

李天德

李天德(1939 年～　　)，男，出生于四川荣县一个穷苦工匠家庭。幼年丧父，童年丧母，靠大哥抚养读完小学，中学。1956 年 9 月考入重庆大学。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因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提出异议，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旋因曾与云南籍右派学生在劳改时不堪折磨，谈到想去云南混碗舒心饭吃，而被打成"妄图偷越国境"的"反革命小集团骨干"，于 1958 年 12 月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处 5 年徒刑。他在狱中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并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出狱后，不放弃忧国忧民之志，1965 年底，他写了 5 幕 9 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人民文学》和《剧本》两个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 1957 年反右斗争为背景，对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整人"性质有所抨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7 年 7 月，又以"现行历史反革命"罪被判 6 年徒刑。1972 年刑满释放后，仍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四川茴溪茶场管制劳动。1975 年 1 月全国四届人大提出了建设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人选。他心中燃起希望火之，决定毛遂自荐，上北京献治国安邦的国策。1975 年 5 月 5 日，他以李笑天的化名写了《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这份上书。《献国策》共 12 条：1. 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优化种族；2. 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3. 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福利；4. 教育革命问题，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试和民主评议结合的择优录取制度；5. 知青下放问题；6. 医疗卫生问题；7. 干部问题；8. 限制干部特权和无能现象，确定人民政治主权；9. 刑法、定罪、治安问题：废除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的"恶毒攻击罪"，加强刑事执法，无罪释放和合理安置 1957 年大学生右派；10. 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乌托邦问题，大跃进祸国殃民问题；11. 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12.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8 月，他卖去仅有的蚊帐、箱子和铝锅等全部家产，凑齐路费上北京献国策。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副总理面呈一份，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押回四川。1976 年 3 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1979 年 2 月无罪释放出狱。后被安置在雅安汽车配件厂技工学校任教。因反映不正之风，遭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嫉恨，又被强加"七大罪状"，雅安地区公安局决定将其调往泗坪并限令其"长期在泗坪"。1983 年 3 月，李天德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反映自己所受迫害，得到批示。但主管负责人仍以"政治思想上有自由化倾向"的罪名被驱出属于公安部门的雅安汽车配件厂，1984 年元旦被调往雅安矿山机器厂。1984 年 3 月，他上书胡耀邦和王兆国，申诉自己的处境。得到胡耀邦的重视和亲自批示。在胡耀邦的关怀和过问下，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工作组前往调查，证实李天德被人罗致的"七大罪状"纯属诬陷。8 月，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变释放时的判决，为其彻底平反。1984 年 7 月，李天德被任命为雅安矿山机器厂副厂长。1985 年 4 月，《献国策》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收集并展出。李天德现在中共四川省自贡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朱锦多

朱锦多(1954 年 5 月～)江苏泰县人。1954 年上中国海员子弟小学，这是一所公费学校。1958 年上光辉中学。他自小对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有感恩之情。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曾以"忠于毛主席"的虔诚态度加入红卫兵。他 1968 年上山下乡，后被工厂招工，参加工作，又调入上海越剧团。1973 年 7 月至 1975 年 8 月，先后二次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揭露张春桥、江青等人的问题。

"文革"前陈毅曾任上海市长，在上海人心中地位很高。中共"九大"前后，张春桥到上海，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公然以"革命左派"自居，污蔑攻击陈毅。引起朱锦多的议论和不满。陈毅去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大会，朱锦多对此深为感动。但张春桥等人依然攻击陈毅"不会打仗，只会写几句歪诗，是常败将军。"并多次攻击其他没有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帮"在上海横行霸道，不可一世。

1973 年 7 月 28 日，朱锦多冒死上书，给毛泽东主席写了第一封信，揭发张春桥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陈毅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问题。1975 年春夏间，社会上到处流传着有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小道消息"，这触发了朱锦多内心的强烈共鸣和对上海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思考，尤其对他们在上海民兵建设中自立体系，与解放军部队对立，很有看法，他担心"上海帮"会拥兵作乱，祸国殃民。1975 年 8 月 3 日，他再次上书毛泽东，提出自己对张春桥一伙在上海所作所为的四点看法。就在这封信发出后没几天，8 月 23 日，上海越剧团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大家喜气洋洋，对江青的恶劣行径议论纷纷，朱锦多和同宿舍的邹建军一直谈到深夜：为什么工农兵都说《创业》好，有人偏给它加上十大罪状？毛泽东的批示打中了江青，为什么张春桥之流把江青捧上了天，还要我们文艺工作者为江青"争气"？联想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江青对汉朝吕后那么大的兴趣，对其大肆吹捧，这里面有没有阴谋？他们担心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党和

国家的命运。三天以后，朱锦多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对张春桥、江青等人的上述看法。同一天，他还把同样内容的另外三封信，分别寄给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他在前后六封信上，都写明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很快，他以"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罪被"依法拘留"，受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剧团里他周围的同事也受牵连被"严格审查"。

"四人帮"倒台后，1976 年 11 月 26 日，《文汇报》报道了朱锦多受政治迫害的情况，他很快被释放出狱，成为"四人帮"倒台后全国第一个得到平反的人士。此后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文联代表、政协委员、上海越剧团副团长等职。因他在 1981 年 8 月全国政协会议上，自动上台发言对决议表示不同意见，打破当时政协会议不发异议的惯例，次年被免去政协委员等职。1983 年秋，他辞去上海越剧团副团长的职务。现仍在该剧团工作。

迟群　谢静宜

迟群原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河南商丘县人，1953 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机要员。1968 年 7 月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接管各大、中学校领导权的高潮中，经毛泽东亲自点名，迟群、谢静宜参加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接管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并成为江青一伙把持清华和搞乱教育界的两大得力干将。

1975 年 1 月全国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四人帮"一伙企图由江青组阁的阴谋化为泡影；他们原想把教育、文化、体育三个部委全部抓到手的企图也没能完全如愿。"四人帮"提名迟群任教育部长，但教育部长由老干部周荣鑫出任；谢静宜当选为中央委员，迟群在四届人大没有捞到官职，因此心怀不满。

1975 年初，周恩来病重，邓小平担负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由于江青在同美国人维特克女士谈话的"维特克事件"中触怒了毛泽东，又由于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 1974 年 7 月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他们为"上海帮"，"四人小宗派"，批评江青设两个工厂("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又揭露和批评了江青"自己想当党的主席"、要组阁的"野心"。1975 年 5 月～6 月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批评"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王洪文等人做了检讨。历史出现了转变的契机。邓小平抓住时机，毅然领导进行了对各项工作的全面整顿。1975 年 2 月～5 月，首先整顿严重混乱的工业交通。6 月～9 月，整顿工作全面展开。7 月～8 月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业整顿问题。在 6 月～7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军队的整顿工作，军队开始精简整编，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结构。同时对科技工作和文艺界进行整顿。9 月～10 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对农业的整顿任务，并明确提出要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时特别点了教育问题。此后，自"文革"以来受到祸害最深的教育界也开始进行整顿。10 月，教育部在周荣鑫主持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界进行全面整顿。

清华大学是教育界整顿的斗争焦点。迟群身为党委第一书记，把持大权，工作上草包，作风上霸道，为所欲为，引起公愤。1975 年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0 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 4 人，先后给毛泽东两次上书，上书通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信中报告了"四人帮"的两大干将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揭露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大搞家长式封建专制统治的情况；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等人极为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与此同时，刘冰等人还给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向市委教育组负责人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

9 月底到 11 月初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对毛泽东转变态度发生了重要影响。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 1972 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义。10 月 20 日前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刘冰等人的上书作出批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迟群等人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有恃无恐。1975 年 11 月 3 日，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始对刘冰等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11 月 18 日召开全校大会，由迟群和谢静宜指使的 15 个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人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诬告信"，并叫嚷要"揪后台"。此后，迟群、谢静宜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人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组织活动，送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和邓小平。风起于清华大学，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由此刮向全国。全面整整工作被迫中断。

张天民

张天民(1933——)生于河北省涿县农村。及长，在北京四存中学和第四中学读书，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校前身)编剧编辑系。1956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长影从事电影创作已27年，1983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86年任农村读物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8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

张天民从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写过诗、小说、电影电视剧本，主要创作有诗集2部，短篇小说40余篇，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1部，电影电视剧本20余部，其中有14部电影电视剧本被摄录成影片和电视剧。曾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其他多种奖励。

张天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及吉林省五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1975年7月18日，张天民为影片《创业》受江青等人扼杀而上书邓小平同志转毛泽东主席，7月25日毛泽东对此信作出批示，在文艺界引起强烈震动，成为抗击“四人帮”的先声，并因此受到江青等人的调查和迫害。“四人帮”倒台后始获解放。

珍闻轶事

老九

也叫“臭老九”。是歧视和迫害知识分子的蔑称。

“文化大革命”中歧视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潮发展到了顶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越降越低，实际上被打入革命对象的行列。他们被放在“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这八种要批倒斗臭、实行专政、监督改造的革命对象之后，而被称为“臭老九”。当时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打倒知识分子”的文件和口号，但却打倒、批判知识分子的代表——专家、学者，把他们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送进“牛棚”，劳动改造。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下，大批教职员工、科研工作者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科研路线的推行者”，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培养的或在校就读的学生都列为在“旧学校”里培养的旧知识分子，是需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下厂、下乡劳动改造。搞得念过书，有知识的人名声臭，境遇苦，灰溜溜的。使得很多知识分子也自称“老九”以自嘲。

1975年5月3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借用京剧《智取威虎山》情节诙谐地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虽然有毛泽东这样的表态，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难有改变。粉碎“四人帮”以后，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的提出，使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根本变化。“老九”这一称呼，已成为历史的遗痕。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

《“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四敢”

即：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这是“四人帮”煽动揪“军内资产阶级”时，向基层干部战士提出的煽动性号召。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从地方到军队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煽动揪“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把矛头指向军队，叫嚷揪“军内资产阶级”。当时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指使亲信窜到上海著名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以搞调查研究为名，恶毒攻击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煽动说“当前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敏感些”，“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两位领导同志(指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要议一议”。当时八连的干部战士没有理睬他这一套。“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马天水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大人物”的所谓奇谈怪论，“要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这就清楚表明，“四人帮”所提倡的敢，矛头是针对邓小平等负责人的。随后马天水指使人在八连强行灌输他的讲话。这个讲话下达后，八连个别干部跟着重复讲了这些话。马天水听到后欣喜若狂，马上组织人“总结经验”，把他自己的话移花接木地变成八连干部的话。并别有用心地说：“如果军队系统不上报，我们上报”，还要其它连队听取“四敢”的经验介绍”。张春桥指使他在总政的亲信要宣传、要发报道。一时“四敢”成了连队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主要表现。显然这个所谓经验是“四人帮”强奸民意，把

他们自己的反革命黑货强加于连队的产物。

对于"敢"，从来是要做分析的。因为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我们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敢"。我们提倡要敢于革命，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危害革命利益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但绝不提倡敢于反对革命，敢于违反真理，敢于侵犯革命利益。"四人帮"鼓吹的"四敢"，目的是煽动下级对抗上级，以便从基层连队把人民军队搞乱，为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野心服务。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宁要……不要"公式

"四人帮"在"批邓"中提出的一类口号，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典型例证。

1975 年 11 月 8 日，张春桥针对邓小平在教育界为提高教学质量进行的整顿发表谈话。胡说："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之后，"四人帮"在各界的党羽纷纷紧随套用，提出一系列"宁要……不要……"式的口号。如针对农村落实经济政策，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针对工业、科技要上去的口号，提出"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针对交通运输上经过整顿出现的"安全正点万里行"，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结果，各条战线再度陷入混乱。这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四人帮"的蛮横霸道：凡是他们要推行的，只要挂上社会主义招牌，谁也不能反对；凡是他们要否定的，只要扣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帽子，谁也不得支持。1976 年 5 月，张春桥就铁路火车晚点问题对女儿张维维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怎么能比那个 "。可见"四人帮"虽然在口头上高喊社会主义，叫得比谁都响亮，而内心深处想的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永垂不朽

"文革"后期，教育革命吼得震天响。"教学质量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的高论随处可闻。有所小学戴帽初中班，一位教师给学生重讲"众寡悬殊"说："众是众多；寡是寡妇；悬是吊颈，殊是死。合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群寡妇去上吊寻死。"

无独有偶，另一位教师讲"永垂不朽"说："永是永远；垂是吊起；朽是烂。这句话合起来的意思是：永远吊起不烂。"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影逢乱世

《创业》蒙难纪实

——献给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十周年

乔　迈

序

这是十一年前一桩惊心动魄的影坛轶事。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是否有过任何一部别的影片，曾经像《创业》那样大起大落，忽而让人喜上眉尖，忽又叫人愁容惨淡，好就好得天堂上坐，坏就坏得地狱里卧，那导演于彦夫，那编剧张天民，两位文艺家，一会儿受命写总结经验的文章，一会儿被逼作检查认罪的发言，庆功喜报还没有来得及在手心握热，又早隐约听见了镣铐丁当……岂止他们两个，就连整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都被弄得昏头昏脑，陀螺也似转，风车一般旋，脚下无根，心中无主，身如飘絮，随人仰俯——空间物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失重"。这是艺术的"失重"，政治的"失重"，整个中国大平面倾斜了，艺术必须要随之倾斜，人又何能免！

"好极了呀，《创业》！"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大声拍手说。

"坏透了呀，《创业》！"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也大声拍手说。

于是，全中国就都愕然，茫然，昏昏然。

事情终于提到了最高领袖那里。

那是通过暗中的渠道，非常的手段，秘密的方式，地下工作的办法，而且冒了极大危险才送达的。其中紧张地动员起来的人虽只三五个，但那三五个人却有当时政局中相当重要的大人物，而下边则是蒙冤未解的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捷生是小个子的、柔弱的、说话细声细气、办事果断大胆、颇有大将风度的一位不寻常的女性。

唔，还有白桦，写过挨批评的电影剧本《太阳和人》的风流倜傥的才子。

然后是张天民！一介书生，然而竟敢作乱于天子脚下，不顾了爱妻弱子，舍却了身家性命，莽莽撞撞大告其"御状"！

哦！《创业》何幸，竟受到最高领袖的关照，除了罪孽深重的《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在中国，可还有别的电影有过这样的奇缘？

"此片无大错!"毛泽东一言而定乾坤。欢呼吧,跳跃吧,我们胜利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沸腾,独有张天民半是笑脸半是苦脸。

他知道事情断不会到此结束。

他是对的……果然转眼重又大祸临头。

《创业》的出现及其遇逢到的难以想象的危险成了一个象征,表明一场噩梦将要过去,一个清醒的新时代的黎明将要到来。谁能说,它同一年之后出现的"四五运动"、亦即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浪潮没有血肉渊源呢?"文革"的沉沉黑夜以文艺的批判为序幕,似乎也将以文艺的批判为报晓的鸡啼——这就是电影《创业》。

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

——刘庆棠于四月八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文科部会议室传达

通称"十条意见"

1.《创业》这部影片所表现的题材是好的,是重大的。是应该用各种文艺形式加以表现的。但现在这部影片并没有把这一题材表现好,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络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重大题材,所以不应等闲对待,应该特别严格要求,抓紧进行。

2.影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在报告文学中绝无这种含糊其词的提法,报告文学明确指出"石油会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王铁人的"两论起家",是在一九五九年全国群英会上奖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勤奋、认真,是自己搞起来的,不是影片所写的那样,什么中央送书给他们。

3.报告文学叙述了铁人光辉的一生,但同时写了王铁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大庆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并没有去着力宣扬活着的人,或把油田会战的胜利归功于大庆油田党委。影片《创业》较明显的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有的是原话,有的是据原话稍加修改而来的,如周挺杉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冯超说:"我们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华程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华程说:"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嗡嗡,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华程说:"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周挺杉说:"政委是想建设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队伍",周挺杉说:"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华程对周挺杉说:"要观大局,辨风向",(这是某某领导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二十一期《红旗》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此外,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可以找到大量的生活原型,如某某领导同志原是玉门油田的军代表,后来是大庆油田的领导人,与影片华程的身份相似;另一个例子,打龙二井,水落油出的情节,与某某领导同志打萨尔图66号井的情况相似;周挺杉买豆受批评的情景,与某领导处理过类似的事件相似。

影片中使用的这些语言,是否全部合乎毛泽东思想,塑造领导干部典型形象,是否一定要选择这些语言,需要研究。所指内容,与真人无关,是创作上的问题。其中有些话,显然是错误的。这种写真人真事的风气,如果以合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则是后患无穷。

4.影片虽写了创业上的艰苦精神,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而后者,在报告文学中是做为重点方面之一来表现的。例如,工人群众中本来有"天当房子,地当炕"这一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豪言壮语,但在影片中却把这句话从一个落后人物春生嘴里做为讽刺话说了出来,乐观主义的警句变成了悲观主义的话柄,完全颠倒了。

5.在周挺杉的性格刻画上,影片着重通过他爱冲动,爱发火一会儿甩石头,一会儿摔茶缸,一会儿又怒折树杈等一类行动,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基本上没有写他的智慧,他的政策观念和周密思考的方面。所以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

6.影片中有许多戏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抬高华程,如周说:"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而华程接着说:"……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周说:"我们工人阶级顶天立地的站着,自力更生的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华程接着说:"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再如,在报告文学中,写了铁人他们打了一口井,质量较差,而铁人让大家推倒重来,但在此影片中,则把周挺杉写成一个在质量问题上受到批评的对象。

7.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一号人物周挺杉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作用,他俩见面一谈就崩。在周受伤那场戏中,章的转变关键是章看到周腿部受了伤才转了情绪,这里

有人情感化的倾向。

8. 报告文学脉胳十分清楚，影片却有很多地方表述不清，让人看不懂。具体表现在：(1)情节上不清楚，如冯超因何被捕？老周师傅怎么被出卖的？冯超是怎样进行破坏，造成井喷的？龙富贵的来龙去脉不清，等等。(2)技术性术语太多，一般人无法懂。(3)有许多镜头组接上不清楚，有乱蹦乱跳的地方。

9. 报告文学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回述了铁人的过去，着力写他解放后的斗争生活，影片对周挺杉这个人物，也应该主要放在会战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但这里却用了很大篇幅去写他的解放之前，既造成浪费，又造成结构上的拖沓。

10. 主要人物的语言概念化。如华程的语言中，大量的生硬的使用了主席语录和国际歌的歌词。

刘庆棠在传达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之前谈到：

过去道听途说的不算数，要以此为准。

传达完意见之后又谈到：

这些意见里主要强调报告文学的长处，我们没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加了一些东西，有的加的妥当，有的不妥当，中央领导同志推荐“按报告文学搞”。

这部影片的颜色再拍时要注意，如工作服，在生活中井台上穿的衣服差不多，艺术嘛，就应该原于生活高于生活。

再一个景物，最早有吃野菜一段，还有一点显得颜色丰富，这场戏去掉之后，更显得单调。

还有一点，两位主要演员都是很好的演员，现在影片不是演员问题，主要是本子上的问题，对这两位演员不要批评，他们还是努力的，当然也要总结经验。

这两点不是正文，但是经过共同讨论过的看法，因不是主要方面，未写进正文。再拍时要做为考虑的方面。

下一段工作：

把部核心组根据有关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经过反复研究，做为建议，供省委、厂党委、全厂讨论做参考。下一步是否先讨论这些意见。讨论时实事求是，只要同志们认真的全心全意地想把报告文学的铁人形象，用艺术概括脱离真人真事地搬上银幕，我们错了就改，可以改的更好，不要有更多的压力。大家要比较仔细地讨论。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下我们的工作，各方面的同志都要总结，小组的同志总结一下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以摄制组或厂的名义写一篇总结性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其他同志要写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论，既说这个影片的长处，也说说这个影片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核心组让我转告这个意见，用两三天的时间进行总结写出书面意见。总结性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可以回去搞，写文章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总结文章的基础上，各种艺术形式都要表现，我们下决心把它搞好。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左派领袖的风姿

在去虎头山劳动以前，《创业》组奉命先听了江青对大寨社员的讲话录音。

别看江青常常不给知识分子好脸色看，可她在大寨农民面前却表现得又活泼又恭敬。“我是来学习的，来当学生的，你们欢迎我这个学生吧？”她满面春风地做出讨人喜欢的样子说。

“欢迎！”大寨人只好齐声喊，因为她在前边还说了一句：“我是主席批准来这里的，是政治局同意的。”她对社员们报给她的掌声很满意，不过，当讲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这个正题目的时候，恭敬、活泼的小学生就变成了杀气腾腾的斗士。她还宣布要把她的三种版本的《水浒》送给大寨的农民同志传着看。

江青也没有忘记表现她热爱劳动的本色，她很自豪地告诉她的听众，“我已经打个泡了。”好像特地印证她的表白，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了江青在大寨参加劳动的照片。读者们看到，这位久矣不见其肖像的政治局委员头系白羊肚毛巾，白衬衫扎在腰带里，正弯腰持掀掘土，又利落又潇洒——这就是昨天晚宴上她对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说的“我在这儿，还挖了战壕呢”，在现场留影。其时，已经有“深挖洞”的最高指示的发表，江青带头身体力行。

昨天晚上她还说：“明天你们参加劳动，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不爱劳动，不能在这儿吃闲饭呀。”

江青参加劳动的场面很威风。上山路上，她率领一大群老少不等的艺术家逶迤而行。江青喜欢骑马，不过今天没有骑，也许是警卫人员担心她的安全，没让骑马。从北京运来的四匹军马，由战士牵着，紧随其后。这些马都是又高又大又漂亮，善于驰行的，“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但今天它们的本事未得施展，便只“咴儿咴儿”地叫。人群和骏马后边，是一辆辆小车，共同组成了这支奇特的仪仗队。

“这地方好，照张像！”江青大声说。队伍便停下来，按照她的指点，摆姿势，此时，威炎炙手的女首长就又变成了技术高超的摄影家。

那天，江青兴致很好，照过几张像，就又叫，“张天民，过来！”张天民过去了。她说：“你那个《创业》——”一听谈

《创业》，苏云也跟过去听。江青看见苏云，把嘴角一撇，说："你这个导演不怎么样……"她把苏云当成了于彦夫。那时候，他们两个都穿又肥又大的蓝灰涤卡人民装，都剪小平头，个子也差不多，江青始终分不出他们哪个姓于哪个姓苏。后来，有一次开小会，江青还指着苏云说："站起来！你说，你那戏是怎么拍的？……"苏云赶紧说："我是苏云。"于彦夫也赶紧站起来，说："我是于彦夫。"江青也笑了，摆手说："你们两个我搞不清楚……"

合影之后，江青又和剧组每个成员单独拍照——这个炎威赫赫的女人身上的人情味从来没这样生动、丰富地流露过。她和每个人都说几句亲切的话。她对《创业》女支部书记曲伟说："将来我们要培养几个女导演。"她又对《创业》副导演华克讲："我们要培养年轻导演。"

虎头山上惊风不起，险云不生。大家席地而坐，摘花椒，有人递给江青一个小板凳，她就坐在上边摘，如果排除了政治上的不协调因素，局外人看了这个场面，也许会感到有点像一个和乐的大家庭——年过六旬、孤家寡人的江青一定很少享受这样的乐趣，所以她兴奋。但《创业》组的人对她隔阂难消，尽管江青此时表现得像一个温和的老太太，他们还是离她远远的。花椒看似好摘，但花椒树上的刺扎手也疼。他们必得分外小心些，才能保护自己。

"张天民，你过来！"江青又在叫了，不过声调里已经剔除了昨天那样的威势。"昨天那两部片子你看怎么样？"她的目光迎着慢慢走过来的年轻作家问，手里还在摘那种红红的小颗粒。

昨天晚上，江青给他们看了从北京带来的美国影片《鸽子号》和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

"拍得好，"张天民恭敬地回答，"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时候，于会泳和浩亮也凑了过来。管文化的首长同人谈话，他们有义务陪谈和陪听。但是，江青变了脸色说："滚蛋，滚蛋！今天我是和创作人员谈话。"于、浩一言未发，就悄悄离开，到土崖子底下抽烟去了。

江青如此粗暴地对待两位部长，使张天民十分震惊，因此他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了眼前这位温和老太太的真正身份，哪怕一小会儿也不要忘。

"《鸽子号》拍得好，"江青对张天民说，仍然态度和蔼，"摄影也不错，表演也好，两个演员都很年轻……《在那些年代里》的历史背景你清楚不清楚？"

"不清楚。"张天民老老实实回答，或者本来他很清楚却不那样说。

"哦，"江青循循善诱地说，"这部影片写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年代，因为这一点，我重视这部片子。"

这样闲闲的对话过去以后，江青把谈话转入正题，笑着说："小张呀，昨天我说要教训你，那是开玩笑，今天咱们平心静气地进行同志式的谈话，好不好？"

张天民自然不能说不好。

"那个《创业》，不是你的，是大家的，对吧？"江青笑着问。

"对，是大家的，集体创作。"张天民也笑着回答。

"坦白说，当初我让你们写《创业》，是要你们照《中国文学》那篇文章搞，《铁人的故事》你看过吧？那主要是围绕铁人写的，可你那油娃（指周挺杉）呢……你要搞一部新《创业》，如果有兴趣，不妨来个新的构思。"

谈到这个话头，江青的情绪越发高涨，不殚心力地替作者构思起故事来了，她说："再搞的时候，要写一个男主角。现在的周挺杉，作为二号人物，是一号的师傅——师傅这个词不好，你们片子里老是叫这个师傅那个师傅的，旧社会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孔孟之道——再写一个女主角，是地质员……可从抵制发奖金写起，演铁人的是第二号男主角，第二号人物说不要奖金，后又找一号，告诉他，他说我顶了。第二号人物牺牲后，一号继承他的精神，可以放在别的环境里写。回忆旧社会插在中间就可以了。你写中国石油工业几十年的历史，一部片子写不了那么多……"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天民干听不说话，频频点头答应，心里在想着别的。

"行了，行了，我编不下去了，"江青说，"我给你说个大路子，剩下的是你们的事了……"转身又对于彦夫说："昨天看的那部片子（指《在那些年代里》）只有二百三十个镜头，将来你们这部戏，不许超过三百个镜头。于彦夫，你们当导演的要学舞台啊，要搞沙盘，把中、近、全、推、拉、摇等镜头搞准，配合好。"

于彦夫就也含含糊糊答应。

就这样，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有一搭无一搭，其实也没干多少，倒是一帮记者围前围后地"啪啪"照了不少相。虎头山上空气清新，蓝天绿树金黄田野，大自然模糊了人们之间难以消除的隔膜，谁都觉得这一天过的还行。但是到了晚上，空气又骤然紧张起来。

被她召集到餐厅来的人很多，除长影以外，还有北影的创作人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法家著作注释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写作班子，词曲音乐研究组，还有陈永贵、吴桂贤二位副总理和李素文副委员长，以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这又是一顿令人难以咽下的工作晚餐。江青好像执意要让人们吃得不舒服，菜还没有上，她就冷着脸出语惊人，她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先讲一件事：在我们党内，路线斗争曲折得很，最近一个时期，居然有人——"她在"有人"两个字上加强了语气，提高了声音的力度，而且身子往上一挺，使人闹不清她要点什么人，说什么事，百十人的场面竟然鸦雀无声，端菜送饭的服务员也暂时停止

了走路，好像生怕那个“有人”会是她们自己。只听江青接着说：“……有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的一封信——主席让我到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还没讨论——就给传出去了！”结尾一句她又提高声音，愤怒、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江青指的是什么信，也许就是本文前边引述过的江青六月二十八日“致主席和在京政治局同志”，表示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的那个检讨书？

“现在社会上有人造我的谣言，”江青抓住这个题目不放，继续发挥着，“说我自杀了，说我到纺织厂劳改去了——你们听到这样的谣言没有？”

没有人吱声。

“你们听到没？”江青转向成荫和崔嵬问。北影的两个人直摇头。

“北影就有谣言！”江青说。

惊悸不安的工作晚餐不欢而散了，人们无精打彩地目送江青离场。她走到门口，突然转过身来，扬起一只手大叫：“你们不要挑拨离间……”这才气哼哼返身走了。

“这是对我来的吗？”张天民想，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夹在默然无声的人群里走到外面。

夜的天空灰蒙蒙一片，月色很淡。

张天民感觉得到，江青的无名火烧得很旺，她的气没有出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烧起来，自己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才行。

“我是天天有人骂，修正主义骂我——”次日下午，江青在小会议室单独召集长影、北影的人开会，王淮湘也应召出席了，大家刚一坐好，江青就接着昨天的话说起来，“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她冷笑一声，二十几个听众就不免紧张。

“他们上了台，我就得坐牢，就得杀我的头。主席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自杀……”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就挺起胸脯，挥动着拳头，大声说：“不，我不自杀，我要斗争！”

话说到这个程度，她还担心人们听不明白，又进一步进行“路线交底”，她说：“我给同志们透露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党内有两派，一个是温和派，一个是激进派——外国人讲，激进派就是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我！……”

室内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人们屏住了呼吸。一直在逐字逐句记录江青讲话的华克后来谈到当时人们的心情，说：“老说分裂党中央，她这不是公开在讲党中央的分裂吗？我们生怕她在这种场合点到周总理，要是那样就不好办了，看她当时激动的样子，是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怕听的那几个字点出来的。”

好在江青没有丧失理智到那个地步，她没有点周恩来，但却点了邓小平的名字，那是在她说到“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的时候，一下子就转到了邓小平，她影射攻击邓小平向毛泽东封锁文件，“文件不给主席送，都是我批了才给主席看的嘛”，她还讲到主席对邓小平是三七开，二八开。她又突然破口大骂，说四届人大“弄了一帮乌龟王八蛋进了政府”。

在座的人如坐针毡，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坐也坐不得，走也走不了。事后大家嘀咕，都觉得江青的这番话关系重大，苏云悄悄对于彦夫说，这事恐怕不简单，说不定上边以后要追查，一些事追记一下，以备万一。

张天民当时也像听到炸雷似地被震得懵了，他知道江青的话虽然不是说他，但也和他有关，今天的事情到这儿绝没有完。他估计得很对。江青一旦提到了邓小平，顺便就把他拉出来了。

“张天民，你写信是听到了什么小道消息？”江青指点着张天民问，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没听到什么消息。”张天民既有所准备，回答得就也比较从容。

“没听到消息你敢写信？”江青的面孔板着像一块生铁，“你斗胆？”

“我是没听到……”张天民说。

“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写的信？”

“七月十八日。”

“好嘛！”江青象一位决心治人以罪的法官抓到了证据似地叫着，“主席十四日刚找我谈完话，十八日你就写信，你不知道就敢写？”

“主席是谈《创业》问题吗？”张天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

“是呀，”江青居然把实情说了出来，“你说，谁给你送了什么消息？”

“没人送消息。”张天民还是这句话，这时，他完全明白了，刚才那番话才是江青此次召见他们的主旨，她要通过追查，寻找证据，好把“分裂党中央”的罪名加到邓小平头上。因此，他更下定了决心，什么话也不讲。

“我知道你不会说，”江青这话分量很重，她急于了解情况，但是她没有办法，只好说，“我不问你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张天民见她不追问，就更不说话。

“你不听我的话呀，”江青又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主席对我要求严格，你们一告状，主席就批评我。我怕主席生气，我都得听着。”说着，她做出一副受了委屈而又能忍辱负重的样子，同时，好像是在关心着张天民。她说：“你不要同他们搞到一块去。主席给你的信做批示，是爱护你，我接见你，也是爱护你。我不接见你，以后翻过来就不好办了。”

她没有讲以后什么“翻过来”，但是人们都懂得她的弦外之音。邓小平在大寨露了一下面，就回北京去了，江

青却在这里自由来去，随意讲话，而报纸上和电台里，对宋江和“投降派”的批判声日甚一日，虎头山上落叶惊秋，明眼人早窥见了中国政治局势的未来演变。但是，张天民已经没有退路可寻，“不好办”也得硬挺下去了。

九死一生献国策

“反革命”万言书存入革命博物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则短讯，像一星灿烂的火花，从我的眼帘中闪过：

本报讯，四川省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飞机。火车。汽车。千里迢迢，我从东海之滨的上海，赶到西南古城雅安——当年西康省的省会。

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我见到了刑二庭庭长杨正全。他曾为李天德平反冤案，熟知详情。他用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兴奋地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们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来信。信中说，李天德的《献国策》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他们要征集、收藏原件，希望得到我院的支持。我们经过研究，同意把《献国策》原件移交中国革命博物馆，让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磨难的青少年，从中得到教育。”

“你们手头有《献国策》影印件吗？”我赶紧问道。

“你可以在这儿看到原件。”杨庭长告诉我，“李天德当时把《献国策》抄写了三份。其中两份投邮寄往党中央，一份亲自送往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接待站。这三份原件都在——十年前，那是作为李天德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大罪证保存的。这次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只是其中的一份原件。”

就这样，我在封面上赫然写着“案由：反革命”的案卷里，有幸全文拜读了《献国策》原件。这是一篇以生命为代价写下来的征讨“四人帮”的檄文……

震聋发聩、力透纸背的《献国策》

笔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在和煦明媚的春日，读着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写成的万言书，，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作者的敬意。他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在挣脱了“四人帮”的禁锢后的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以至一九七九年，也未必为人们所接受。《献国策》的作者具有政治上的火眼金睛。

端端正正的字，写在二十二页五百字方格稿纸上。首页写着“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锋芒所向，直指那场“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互相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中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他还进而从“文革”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的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六〇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那犀利的笔锋，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迷信，要求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功与过，尖锐地指出毛主席晚年的严重错误。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他在万言书中，提出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在同一案卷里，我又读到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对现行反革命李天德审理总结》，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

刑，立即执行。"

人妖颠倒，明珠暗投，革命志士李天德险些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押上断头台。九死一生，劫后幸存，我终于找到了依旧健在于人间的李天德……

（叶永烈）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75年的社会主义文艺，仍处在一个萧条的时期。江青集团对文艺实行法西斯专政，使文艺成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在寥寥几部电影作品中，《反击》、《吹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等反动影片占了主要地位；描写海岛女民兵生活和战斗的《海霞》和描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影片《车轮滚滚》，虽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但基本倾向应当肯定。

电影《海霞》

1975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2本

根据黎汝清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

解放前，同心岛一对渔民夫妇，因无力扶养，将刚出生的女儿扔到大海里，幸得渔民刘大伯救回，取名海霞。海霞童年时代，因其父领头反抗渔霸陈占鳌的巧取豪夺，被陈勾结海匪打死在海上，破船屋被强占，妈妈被逼死。这一切在海霞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解放后，海霞在党的关怀、教育下，和同志们一起组建了同心岛的女民兵队伍。

解放前夕逃到台湾的陈占鳌派特务黑风潜入同心岛，骗取了乡长的信任。敌特千方百计破坏民兵建设，制造了摔伤女民兵的事故。轻视民兵工作的乡长不经调查研究，将出事故的责任推在海霞身上，撤了海霞民兵排长的职。海霞在复杂的斗争面前，冷静地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发动群众，查勘敌情，在民兵和解放军密切配合下，终于揪出了暗藏的特务，打垮了来犯之敌，击毙了陈占鳌，彻底粉碎了敌人侵扰海岛的阴谋。

电影《车轮滚滚》

1975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　10本

一九四八年冬，胶东解放区的一支民工小车队，在老民工耿东山及其养女——指导员耿春梅的带领下，运粮支前，途中与大地主郑子成为首的一股流窜的土匪进行了斗争。淮海大捷后，春梅与自幼失散的哥哥重逢。此时，毛主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耿又带领民工参加了水手连。在追敌中，耿家父女亲手击毙了郑子成。由于群众的大力支援，我军攻克南京，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电影《欢腾的小凉河》

1976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彩色（宽银幕）　11本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小凉河某公社有两个生产队，二队队长周昌林是"造反派"，他为发展集体经济，提出根治小凉河。九队队长徐振才提出"富了又富"的口号反对根治小凉河；县委夏副主任为了贯彻"三项指示为纲"，也对周昌林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分子白汉成则暗中破坏。周与夏副主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公开反对"三项指示为纲"，说"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不讲阶级不讲路线的修正主义发财计划。在这场斗争中，二队队长周昌林取得了胜利，县委夏副主任被批判成为"辛辛苦苦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关于《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的内容评析

《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反动作品

《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是江青反革命"阴谋文艺"的代表作品，是直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作为他们政治阴谋活动的产物以及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形象图解，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这三部作品，首先按照"四人帮"抛出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通通打成"走资派"，鼓吹对他们"层层揪"、"新的老的一块揪"！而且还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特别着重表现与那些"有权的"、"大的"、"旧社会吃过

糠、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走资派”的斗争。

《盛大的节日》写了五个领导干部，“走资派”占了四个，其中三个是由“民主派”到“走资派”（中央部门的计其木，厂党委书记严涵、厂长石陆），一个是叛徒（副厂长乔之慎）。在《反击》中，从省委第一书记到省报主编、大学革委会主任等等，统统写成“走资派”，而且都是“顽固不化”、“不肯改悔”。在《欢腾的小凉河》里，不仅县革委夏副主任是“走资派”，连对党一贯忠诚，勤勤恳恳，带领集体搞生产，走共同富裕道路、关心群众生活的老生产队长徐振才也被歪曲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家人，在他们眼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是“走资派”当权。对我国的现实生活进行了百般的丑化和歪曲，特别是把所谓的“民主派”的老干部，全写成“昔日的功臣，今日的敌人”，甚至连老干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艰苦创业的经历，也成了讽刺嘲笑的话题。在《盛大的节日》剧本中，有这样一段戏，厂长石陆穿着补丁的旧军装去接受“造反派”头头铁根、江火龙等人的批判时，有以下对话：

江火龙：原来你是想让我们看清楚，你扛过枪，打过仗，是革命的大功臣啊！批你斗你都错了，……。

石陆：是又怎样。在战争年代，我拼过刺刀，炸过碉堡，这你们都清楚。我接受这个厂的时候，是个什么烂摊子，今天又是什么规模，厂里哪条路线没有我的足印，哪个车间没有我的心血，这两鬓的白发可以作证。运动一来，我一切都错了，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大会斗，小会批。这为什么？为什么嘛？

铁根：对资产阶级这棵老树枯根，不发动群众，抖锄动镐，深挖猛刨能彻底拔掉吗？

石陆：我是资产阶级？我是枯树老根？

……

江火龙：你啊！两三百元一幢楼，汽车、沙发样样有，不想革命，反对革命了……

铁根：你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战士，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盛》剧作者的本意，是要嘲弄、批判石陆这个“走资派”，可是石陆这几段话说得非常理直气壮，使人心服，反而使剧本弄巧成拙，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只好大加修改，将这一段对话删去，让石陆乖乖地拜倒在“造反派”的脚下。欲盖弥彰，这恰好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他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鬼蜮伎俩。同样，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中，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打老蒋淌过血，搞土改流过汗，祖宗三代雇农，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到地主家里去吃喝的夏副主任，却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而电影《反击》中的韩凌也因为主张搞“四化”，主张教育要整顿，主张抓教育质量，就被扣上了“复辟派”、“还乡团”、“走资派”的帽子。他们制造这么多的“走资派”，就是妄图说明，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权力大，功劳大，工资多，待遇好，就必然不想革命，不想革命就是反革命。根据他们这套混帐逻辑，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必须统统打倒，由他们那帮“反潮流战士”来取而代之，“改朝换代”，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第二，根据“四人帮”“三突出”的原则，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美化作品中的所谓第一号英雄人物，把他们作为“四人帮”的化身，为他们树碑立传。为了把他们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完美”，他们竟不择手段，无耻地篡改历史、歪曲事实、厚涂脂粉。那个戴着“江式眼镜”、操着“江式腔调”被视为江青化身的野心家赵昕，竟然自我吹嘘说：“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过来了！”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江青不是正在敌人的狗洞里摇尾乞怜吗？“四人帮”的党羽拼命鼓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张春桥、姚文元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为了印证这一点，《盛》剧中那个卖身投靠的老干部井峰，就是张春桥的化身。剧本不惜用否定党组织的作用，丑化广大工人阶级的手法，来突出塑造井峰，充分表现井峰如何支持造反派，如何教育造反派……等等。他们狂呼“井峰不出场则已，一出场就要有光彩”。把叛徒、特务张春桥美化成“旗手”、“左派代表”。那个头上长角、混身长刺的“造反派”头头铁根，自然就是政治流氓王洪文的化身。他们丢掉过去高喊过的“反对写真人真事”的口号，把一切能够使人联想到王洪文的情节，都集中加到铁根身上。什么“安亭事件”、反经济主义、火线指挥部等，都是突出这个“工总司”的“司令”。“打倒一切”却推崇为“革命性最强”；反对党的领导，被吹捧为“反潮流”；搞打、砸、抢被封为“革命行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视为“革命豪言壮语”。“人妖颠倒是非淆”，在这些作品里真理变成了谬误，谬误说成是真理。《反击》中的江涛，实际上是为了吹捧“四人帮”在清华、北大的鹰犬迟群。这个江涛，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自封为“教育革命的旗手”，他四面伸手，八方策划，把个人凌驾于学校党委和省委之上，把一个学校的学报凌驾于党报之上，利用它来指挥整个运动。这明明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写照，却被他们美化成为“顶逆风斗狂澜”的英雄。

第三，人民群众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极大障碍，因此，在他们这些文艺作品中，对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极尽了丑化、攻击之能事。老模范、一直老老实实为社会主义劳动的工人丁志良，被他们打成“被既得利益蒙住了眼睛”的“保皇党”。他们有意通过丁志良之口给工人、老模范脸上抹黑。说什么：“拿我丁志良来说，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严书记让我当劳模、上观礼台，去杭州休养，带我出国考察，家里的缝

纫机、收音机、脚踏车，暖水瓶、被面，都是党给的奖励，亏待了我们吗？这样的日子还不满足吗？……"这不仅是对丁志良个人的丑化，而且是对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诬蔑。他们把我国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诬蔑成为仅仅是追求个人荣誉和报答私情，真是令人不能容忍。对于革命的新老知识分子，他们挥舞"黑线专政"和"两个估计"的大棒，统统打成"专政对象"。诸如作品中的老教授、剧作家，都是以反面人物出现的，都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阻挡历史前进的腐朽力量。江兰是一个老工人的女儿，解放后成长起来并且是党送进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被丑化成"早就丢光了工农子女本色"的修正主义苗子。他们通过剧本把搞"四化"、抓生产说成是反革命行为，大批"唯生产力论"，诬蔑农民发展集体副业是搞资本主义歪门邪道，他们拼命鼓吹"读书无用论"，说青年钻研业务是"整天啃书本、念洋经"，必要的文化考查是"吃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总之，他们用一套极左的假社会主义欺骗群众，其目的就是要人们不搞"四化"建设，不抓生产，不懂业务，不读书，无知识，专门跟着他们去捣社会主义的乱，当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应声虫。《欢腾的小凉河》的最后，通过他们树起来的"先进人物"周昌林之口，点穿了这一批毒草的中心主题："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是斗了还要斗啊！"这就是说，他们要无休止地斗下去，把党的各级领导统统斗倒，把社会主义完全斗垮，但是历史证明，这一切心计都是徒劳的。

他们炮制的这些作品，不仅思想反动，而且艺术上也极其低劣，歪曲生活，胡编乱凑，说假话，贴标签，完全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标本，也是人民群众绝好的反面教材。

口　号

一、"以三项指示为纲！"

二、"普及大寨县！"

三、"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四、"老九不能走！"

五、"反击右倾翻案风！"

历史档案

新　年　献　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元旦社论

团结战斗的一九七四年过去了，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入了一九七五年。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过去的一年，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一步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前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发展较快，毛主席倡导的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的空气在许多单位大为浓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革命推动了生产。农业在连续十二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全面丰收。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三年有新的增长。工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这同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衰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一年来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运动，使人们从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松懈自己的斗志。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又一次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这十年来，我们认真实践了毛主席这个教导。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继续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

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理论上批深批透，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批判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还需要继续努力。在批判中，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应当同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批孔应当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主要的军事著作，还要深入学习。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带领群众把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

学习和批判要紧密联系实际。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做到有的放矢。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系列指示，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进一步促进革命团结。要推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前进，继续搞好斗、批、改，注意总结各方面的新经验和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要联系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领导机关首先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并善于运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抓好典型，抓好重点，抓好三分之一，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联系实际时，要始终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切实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准确地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

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大办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基础工业，认真抓好国防工业。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群众运动。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认真搞好军事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充分发挥民兵的战斗作用。全国军民都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必须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成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增强“一班人”的团结，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要紧密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党支部要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党员要努力实践党章中规定的必须做到的五条，增强党的观念，遵守党的纪律。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工、农、妇、青等各种群众组织的作用。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日益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扩大。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两个超级大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特别是对苏美两霸的相互争夺和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广大群众和干部都回顾一下过去的工作，议论一下形势和任务，订出本单位的大体规划，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着新的胜利奋勇前进！

（1月1日《人民日报》）

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出土大批秦代兵马俑等珍贵文物

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这次出土的大批形体高大、造型生动的兵马俑，为研究秦始皇时代的武士、兵器和秦代的雕塑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这一陶俑坑是当地人民公社社员在去年抗旱打井过程中发现的。随后，考古工作者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进行了勘探清理。经探测，整个陶俑坑东西长二百一十米，南北宽六十米，深四点六米至六点五米，总面积为一万二千六百平方米。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坑的东端，已试掘清理了南北六十米、东西十六米、深四点六米约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发现从东面有五个斜坡门道，进门后，直达南北六十米的地面上排列着三列七十二路横队，共二百一十六个武士俑，脸面朝东。武士背后，整齐排列着人数壮观的四十路纵队。因现挖掘面积东西长只有十六米，四十路纵队武士俑只出土一小部分，计有三百一十四个，陶马二十四匹。

为了掌握整个坑的全貌，又在坑中部，即距东面一百米处局部试掘，所出土的兵马俑，似为现露面的四十路纵队的延伸部分。据估计，此坑出土和未出土的武士俑约有六千左右，排列了一个完整的军阵场面。从现已发掘的部分看，武士俑和车骑有规律地间隔并对称排列，阵容严整。武士俑形体高一米八二，身着战袍铠甲，挟弓挎箭，或手执剑、矛、弩机等锋利的实用兵器。雄骏的陶马，形体大小也与真马相似，以四匹为编组，拖一辆战车。这些生龙活虎的武士和骏马集结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千里驰骋，南北征战，横扫奴隶主残余势力，统一中国的雄伟壮丽的图景。

这座地下建筑的地面铺着绳纹砖，梁架棚木已被火烧为灰烬。根据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这批陶俑大体是秦始皇在世时制作的，距今两千一百多年。这个随葬的地下建筑可能在秦始皇死后，为项羽盗掘始皇陵时纵火烧毁的。

这批兵马俑的雕塑制作，显示了秦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雕塑技巧。这些雕塑珍品，艺术手法明快细腻，风格朴素，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陶俑、陶马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马大小相称，比例相宜，造型准确，俑、马各个细部雕塑极为精巧。俑发式多样，面容各异，姿态威武。马双耳直立前倾，额前两绺分鬃微向上翘，昂首嘶鸣，形象逼真。同时，俑、马骨肉质感很强，栩栩如生。这样大型的雕塑品，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以及从考古发现上看，都是举世罕见的。

现在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还有非常珍贵的各种兵器等，显示了秦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像铜兵器剑、镞、弩等，至今保存仍然完整。经光谱鉴别，其成分主要是铜锡合金，还含有镍、镁、铝、锌、铁、硅、锰、铊、钼、钒、钴、铬、铌十三种元素。特别是剑，至今不锈，锋光锐利。除各种铜器外，出土的还有许多铁器农具和金、玉、骨器，以及麻布、丝织品、皮革、木车等。

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林彪和苏修攻击秦始皇"毁灭文化"的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新华社讯，7月12日《人民日报》）

我国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为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

我国测绘工作者最近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进行了一次测量，精确测得珠峰峰顶的海拔高度为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可简注为八千八百四十八米）。这一精确数字是在中国登山队今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在登山队队员的大力协助下测定的，是我国测绘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新成果。

珠穆朗玛峰为地球之巅，有关它的海拔高度数据，历来为世界各国所注意。长期以来，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对珠峰的高度进行了多次测定。在这次我国精确测定珠峰高度以前，我国沿用的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珠峰高度数据，是本世纪初外国测定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测绘工作者进一步提高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自觉性，决心精确测定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他们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从今年三月至五月，同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运动员一起，顶寒风，攀陡坡，跨冰川，战胜重重困难，把国家大地测量控制网推进到珠峰北麓的东绒布，中绒布，西绒布三条冰川，在海拔五千至七千多米的高地进行了三角、导线、天文、重力等测量作业，同时复测了定日到绒布寺的精密水准，为精确测定珠峰高度建立了可靠的测量控制基础。当我国九名登山运动员胜利地登上珠穆朗玛峰，首次在珠峰峰顶竖立测量觇标、测量覆雪深度后，我国测绘工作者在距珠峰峰顶七公里至二十一公里，海拔高度为五千六百米到六千三百米的十个三角点上同时观测，胜利地完成了测量珠峰平面位置和高度的测量任务，取得了完整的测量数据。此后，测绘工作者对所得的数据进行了严密的计算和归算，求得以青岛验潮站黄海平均海水面为基准的珠峰海拔高度为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已扣除覆雪深度）的精确数据。

（新华社讯，7月24日《人民日报》）

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一批重要文物和一具保存基本完好的男尸

最近在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凤凰山发现一座距今二千一百四十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墓中一具男尸保存基本完好。

湖北江陵县纪南城，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郢都。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国"白起拔郢"后，楚都迁移，此地成为废墟。西汉时，城东南角凤凰山高地变为墓地。今年，湖北省纪南城文物考古工作队配合当地基本建设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座西汉早期墓葬，是凤凰山一六八号墓。墓坑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斜坡墓道。从地表至墓坑底部深近十米，葬具为一椁二棺，都保存得很好。椁室分头箱、边箱和棺箱三部分。木椁四周填塞青膏泥，其上用厚达五点二六米的青灰泥填实。椁室与外棺封闭不严密，有积水。内棺密封较好，棺内有绛红色棺液约十万毫升。内外棺盖都不在上面，而是在侧面，是一种较特殊的葬制。

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有五百多件。这些器物，主要放置在头箱和边箱内。头箱内放着木雕的车、船、马、牛等模型和木俑。边箱内放着漆、木、竹、陶、铜器等生活用具，还有竹简、竹牍、竹笥、铜钱（四铢半两钱），以及陶仓、灶的模型等。内棺、外棺还随葬有衣、冠、鞋、袜等丝麻织物。

漆器一百六十五件，绝大部分保存完好，都是在木胎外先上红漆，再上黑漆，先后用红、褐、金黄色漆描绘纹饰，色泽艳丽，图案优美，线条流畅。许多漆器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字样。经初步研究认为，当时成都以制作漆器著称，这些漆器很可能是出自成都市府所辖的手工业作坊。

竹器的竹笿、竹笥中存放着生姜、红枣、小茴香、牛肉、猪肉和鱼等。特别是竹器中有一件天平衡杆，长二十九点二厘米，宽一厘米，厚零点三厘米，正中侧连一小铜环，两端下侧各有一铜钉，杆身正面有墨写文字一行，要求严格遵守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同时，发现铜砝码一个，重一零点七五克。在一个竹笥中还发现一整套文具，包括：笔一支，用木制杆、竹制管，整支笔杆套在笔管里；墨五小碎块，墨色纯黑；石砚一个，附有研墨石一块，砚面和研墨石底部都有墨迹。

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件竹牍记载，墓主人生前为五大夫（五大夫系秦汉二十级军功中的九级爵，相当于当时县官爵位），入葬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年）五月。死者口中含有玉印一颗，印文为阴刻篆文"遂"字，有可能即是死者的姓或名字。

墓主人尸体身长一百六十五点七厘米，体重五十二点五公斤。估计年龄五十多岁。发现时，浸泡在绛红色的棺液中。外观形态基本完整。皮肤尚有弹性。四肢大小关节都可以活动。牙齿齐全。出土后，进行了解剖检查。发现脑髓相当丰满，占颅腔五分之四左右，体积比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的脑髓大。内脏器官保持着完整的外形。解剖后的男尸已作了防腐处理，妥善保存。

目前，有关单位正在对出土文物和这具男尸作进一步的整理研究。

（新华社讯，7月22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树立着鲜艳的红旗。大会选举了由二百一十八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吴德为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许世友、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朱德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幕，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乐队奏国歌。

会上，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从一月十四日起，全体代表认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上述两个报告。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全国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共选出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十二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许多代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

大会正式开幕前，从一月五日到十一日举行了预备会，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大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欣鼓舞、紧密团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气氛。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一月十七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张春桥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为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会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经过认真讨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当宣布选举结果和任命名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兴奋地表示，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选举和任命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底的共同愿望，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我国的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和勇敢捍卫新的宪法，努力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大会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大会指出，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对于世界大战必须有所准备。大会强调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新华社1975年1月18日讯，1月19日《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10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17日　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代表2,864名。1月5日～11日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会议的议程是：1. 修改宪法；2. 政府工作报告；3. 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大会于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朱德主持会议；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14日至16日全体代表讨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请会议讨论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上述两个报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设想。指出今后十年，从国内外形势看，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这就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7日举行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会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只发一张大会主席台和一张大会会场的照片，周恩来作报告和朱德主持大会的照片不准发。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意见，即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毛泽东认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还认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编者按要求各级党委充分理解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2月26日～3月20日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研究了为工、青、妇代表大会起草工作报告的问题，讨论了修改三个组织章程的问题，并商量决定了三个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产生办法。会议决定在适当的准备以后，召开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的领导机构。

3月1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同时，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造谣说毛泽东10多年来多次重复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还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3月21日，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提出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间，江青也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江青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给一些单位送“反经验主义”的材料。江青一伙借批所谓经验主义，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上的宣传计划上作了批示，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毛泽东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姚文元同王洪文扣压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不准向下传达。

3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18日公布了这个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日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名单，发放了特赦释放通知书。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包括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犯290名（内有蒋军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洲国的战犯2名，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4月13日，王秉钺等10人离开北京，途经香港去台湾。

4月1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4期登载的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在论证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认为所有制改变以后，还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文章编造了几点理由：“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所有制问题，都有

一个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曾说过“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 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据此，文章说“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文章危言耸听地说，“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认为“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5月3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泽东 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央政治局讨论“四人帮”的问题，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严肃的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使“四人帮”的活动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7月4日　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所作的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9月9日　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代表团，于8月31日离开北京前往拉萨。中央代表团在拉萨参观访问了人民公社、工厂。9日，拉萨各族人民5万多人冒雨举行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9月15日～10月19日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9月1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以热烈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邓小平强调指出，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提出了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正确主张。邓小平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从而着手恢复党的八大正确路线。但是，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错误地认为大寨的“根本经验”是抓“阶级斗争”，盲目地提出要在“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江青到会讲话另搞一套，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妄图改变会议主题。江青要会议印发她的评《水浒》的稿子并放评《水浒》的录音。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22日　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名蒋帮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至此，自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间捕获的美蒋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处理完毕。对被宽大释放的人员，每人都给公民权，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就业。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并给足路费提供方便。释放时每人还发了新制服装、被褥和零用钱。并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观学习。此外，被宽大释放的还有1965年捕获的蒋帮伪国防部情报局特务船船员日本人2人、南朝鲜人2人。在被宽大释放的美蒋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中，有的人要求回台湾同家人团聚，人民政府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这批人员于25日到达北京，27日公安部负责人接见了他们。接见以后，公安部设便宴招待了全体回台人员。回台人员在北京参观了工厂和人民公社，还参加了第三届全运会闭幕式。10月8日，这批人员中的60人，从福建厦门港乘船驶往台湾当局控制的金门岛；另外5人离开深圳，经香港回台湾。

9月底～11月初　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这些看法。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在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四人帮”的两个骨干分子工作作风和群

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这两封信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几名共产党员经过正当的组织手续，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他们所在单位负责人的一些情况，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原则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而毛泽东却认为刘冰等人的两封信攻击了那两个“四人帮”骨干分子，矛头是指向他本人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的。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11月3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的批示，围攻刘冰等人。从此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经　济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刘家峡水电站在甘肃省永靖县境内，地处西北高原黄河上游。这个电站是根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全议决议，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而建设的第一期工程之一。它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防凌、养殖等综合利用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从设计、施工一直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全都是由我国自己完成的。刘家峡水电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勘探、设计，于1964年正式开始进行建设，1968年筑成大坝蓄水，1969年4月1日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1974年底最后一台机组安装完毕，水电站全部建成。水电站大坝高147米，把上游水位升高，造成100米落差，推动水轮发电机发出强大电力。大坝的溢洪道、泄水道、泄洪洞每秒钟泄水7400多立方米，上游出现特大洪水时，仍能确保安全。大坝上游是一座大水库，能蓄水57亿立方米。厂房内有5台国产大型水轮发电机组，总发电能力为1225000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比解放前夕旧中国一年的发电量还要多。

2月25日～3月8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书记会议，以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由于江青一伙及其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昌、南京、太原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到1975年2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降为42900车，比计划欠装9000车，比实际需要差1.2万车，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及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会议期间，邓小平于3月5日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有25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讲话还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会议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和讨论意见，于3月5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规定加强集中统一，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派性，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的坏头头。会后，由于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秩序，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最先整顿问题最严重的徐州铁路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截至4月底，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铁路局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南昌局虽未完成计划，但情况也有好转；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上升，日装车量达到53700车，为历史最高水平。这次会议以后，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6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5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任务，要求歉产较多的几个大企业限期扭转生产下降的局势。5月29日，叶剑英、邓小平等接见了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的17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工业书记、常委和11个大钢厂的负责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指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4个问题：1. 从冶金部到各个厂都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工业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2. 发动群众坚决同派性斗争；3. 必须认真落实对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政策，把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 建立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和必要的规章制度。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6月23日　秦皇岛至北京的输油管道建成投产，大庆原油通过输油管道顺利到达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储油罐。至此，以大庆为起点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直通北京，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到华北，全长1507公里的“地下大动脉”。秦京输油管道是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的延伸工程，经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所属的13个县市，穿越河

流、铁路、公路100多处，全长355公里。秦京输油管道的建设得到全国240多个厂矿企业的支援，制造了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

7月1日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从7月1日起全线通车。宝成铁路全长676公里，全线实行电气化通车后，货物通过能力比电气化以前提高一倍以上，投资仅为修建一条新线的十分之一。由于实行电力牵引，全线机车牵引定数取得一致，沿途减少了列车的编组作业，加速了车辆周转，减少了列车检查和给水给煤人员；同时，电力机车运转效率比过去的蒸汽机车高，能节省几十台机车，乘务人员也相应减少。火车牵引动力的改革，也促进了铁路信号和通信的现代化。

8月18日　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邓小平首先明确指出："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邓小平讲了7点关键性的意见：确立以工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国务院起草的这个文件，虽然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但对实际工作却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年　工农业总产值为4505亿元，国民收入为2503亿元，钢为2390万吨，原煤为4.82亿吨，原油7706万吨，粮食产量为5690亿斤。

军　事

1月25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讲话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针对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6月24日～7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解决军队的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和要求。7月14日，邓小平作了题为《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邓小平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必须克服，其中军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懒"、"散"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邓小平还讲了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问题；军委的工作问题；整编中的干部问题；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邓小平还重新提出学习雷锋的问题，要求广大干部战士像雷锋那样为人民做好事，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叶剑英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存在；要提高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连队政治工作，要加强政治机关，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这次会议以及会议后对各级班子的调整，对于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的流毒起了重要作用。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军委确定将几十万超编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把压缩军队定额而省出的军费用到军工生产上去，这样军队既能变得比较精干，又有利于改善军事装备。

7月20日～8月4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邓小平于8月3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讲话针对许多军工企业领导不力、技术人员不受重视、职工生活有后顾之忧等问题，提出了3条整顿措施。1. 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配备好一，二把手；找能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请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人去休息。2. 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要解决质量第一的问题，除建立规章制度外，还必须抓紧科研工作，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给科技人员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3. 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解决职工吃肉吃菜问题，拿出5亿斤粮食发展养猪。强调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会后不少地区积极行动起来，着手对军工企业进行整顿，使军工企业的落后面貌有所改变，军工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外　交

1月6日　我国政府和博茨瓦纳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纽约签字，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月12日～17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费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访问我国。

1月31日～2月6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应邀访问我国。邓小平同威廉斯举行会谈。3日，中特两国政府关于互设大使馆的协议在北京签字。

2月20日～3月2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率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访问我国。邓小平同萨莫拉举行了会谈。3月2日发表《新闻公报》。双方同意，两国于1975年6月25日

莫桑比克宣布独立之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27日～3月8日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亨利·洛佩斯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邓小平同洛佩斯举行了会谈。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换文在北京签字。

3月12日～17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林登·福布斯·桑普森·伯纳姆访问我国。邓小平同伯纳姆举行了会谈。14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3月29日～4月7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访问我国，邓小平、朱德先后会见了他们。

4月1日～8日　突尼斯共和国总理赫迪·努伊拉应邀访问我国。

4月18日～26日　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邀请，金日成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于18日到达北京。毛泽东会见了金日成。邓小平同金日成举行四次会谈，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及革命团结，还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

4月19日～27日　比利时王国首相廷德曼斯访问我国。两国外长签订了中比海运协定和航空协定。

5月4日～11日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访问我国。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正式关系。8日，索姆斯在北京宣布达成协议，我国政府决定向该组织派驻代表。

5月12日～17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同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分别举行会谈，双方就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7日～11日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应朱德和周恩来的邀请访问我国。邓小平同马科斯举行会谈。9日，中菲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在北京签字，两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由周恩来和马科斯签署。同日，中菲两国政府贸易协定也在北京签字。

6月11日～17日　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访问我国。李先念同贾瓦拉举行会谈。

6月15日～7月4日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迪尔·查尔查尼率经济代表团到达北京。李先念和查尔查尼举行会谈。7月3日，中阿两国政府关于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的协定、提供成套项目的议定书、供应一般物资的议定书和关于1976～198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在北京签字。

6月30日～7月6日　泰王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应周恩来邀请访问我国。邓小平同克立举行会谈。7月1日，中泰两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北京签字，决定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27日～29日　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哈吉·奥马尔·邦戈访问我国。

7月4日～7日　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统塔哈·毛希丁·马鲁夫访问我国。邓小平同马鲁夫举行会谈。6日，两国政府关于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文件在北京签字。

7月12日　我国政府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自即日建起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代表于圣多美签署了联合公报。

9月6日～9日　6日，邓小平以周恩来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回国。朱德会见了柬埔寨贵宾。9日，首都数万群众热烈欢送西哈努克等返回祖国。8月27日，毛泽东曾会见西哈努克等人。

9月22日～28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邓小平、李先念同黎笋会谈。25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的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10月4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代表于纽约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6日～12日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访问我国。邓小平同比耶迪奇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建立两国贸易混合委员会。12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10月19日～23日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访问我国。毛泽东、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邓小平同基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并将根据这些原则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10月29日～11月2日　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访问我国。邓小平同施密特举行会谈。31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海运协定和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当晚，双方还就成立促进中国和联邦德国两国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进行了换文。

11月5日　我国政府代表团同斐济政府代表在堪培拉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和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6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西萨摩亚政府代表于阿皮亚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1月11日～15日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访问我国。邓小平同吴奈温举

行了会谈。15日发表了联合公报。

11月13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科罗摩国全国执行委员会代表于纽约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2月1日～5日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问我国。毛泽东、朱德分别会见福特，邓小平、李先念等参加了会见和谈话。双方认为，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富有生命力的。

12月21日～25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圣普解放运动总书记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访问我国。李先念同达科斯塔举行了会谈。25日，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

12月27日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通知苏联驻中国大使托尔斯季科夫，我国决定释放1974年3月14日越入我国境内的苏联武装侦察直升飞机机组人员并将飞机和机上一切装备、文件资料交还苏联方面。29日，3名苏联机组人员离开北京回国。

文化教育

7月14日、25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毛泽东明确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7月25日，毛泽东针对"四人帮"一伙给电影《创业》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在《创业》作者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有罪名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一年毛泽东过问了小说、戏剧、电影的创作，批准了关于研究和出版鲁迅著作的建议，批准出版《诗刊》、《人民文学》等文艺、学术刊物，批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邓小平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禁锢的电影。

8月13日　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一位教员作为学术问题谈论如何评价古典小说《水浒》。在此之前，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也曾评论过《水浒》。他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 。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毛泽东在8月13日的谈话中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8月14日姚文元得到经过记录整理的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歪曲原意，大作文章。姚文元提出了一个"贯彻"办法，定了一个所谓"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调子。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提出"开始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硬说"这是我国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这样"四人帮"就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策划和发动了"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反对毛泽东，要把毛泽东架空。

10月19日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伯承1959年发表的《回顾长征》。进入10月以来，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军区、军兵种文艺单位，演出了歌颂伟大长征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包括话剧《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英雄业绩，宣传了长征的伟大意义。9月时，除"四人帮"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常委等20多位领导人，集体审看了话剧《万水千山》，一致批准在纪念伟大长征胜利40周年的10月正式公演，并决定拍成电影。张春桥咒骂："《万水千山》那些东西，都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江青则说："这个戏有问题！"

12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12期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把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讲话，诬称为"奇谈怪论"，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文章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从此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

科　技

4月8日　北京无线电一厂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HMJ——200型混合摸拟电子计算机，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生产迈出新的一步。这台计算机是由两台主机、14台分机和输入、输出设备组成，全机共有80个积分器和1000个运算放大器。各分机可独立工作，又可以实行多分机并联运行。整个机器使用方便，控制灵活，解题速度快，效率高。

5月27日　中国登山队于北京时间14时30分从北坡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次登上珠峰的女运动员是

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藏族)。男运动员是:索南罗布(藏族)、罗则(藏族)、侯福生(汉族)、桑珠(藏族)、大平措(藏族)、贡嘎巴桑(藏族)、次仁多吉(藏族)。9名男女运动员在珠峰峰顶展开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竖立了一个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字样的3米高的红色金属测量觇标,拍摄了顶峰的照片和影片,并测量了顶峰覆雪深度,采集了冰雪样品和岩石标本,还做了无线电遥测心电图,为我国精确测定珠峰的高度和有关科学研究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9名男女运动员在顶峰逗留了1个小时10分钟。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登山队的配合下,在珠峰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科学考察活动,获得了丰富的特高海拔地区多种学科的第一手资料,考察项目有测绘、地质、高山生理、大气物理等学科,还进行了本底污染和重水方面的考察研究。测绘工作者完成了测绘珠峰平面位置和高度的控制测量。当登山队在顶峰竖起3米高的红色测量觇标时,坚守在距珠峰7至21公里,海拔5600米至6300米的10个控制点上的测绘工作者,立即同时对珠峰觇标进行了平面和高度的交会观测,全面、顺利地获得了测定珠峰高度的精确数据。经过对所得数据进行的严密计算和规算,求得以青岛驻潮站黄海平均海水面为基准的珠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已扣除覆雪深度,可简注为8848米)的精确数据。在这次我国精确测定珠峰高度以前,我国沿用的8882米的珠峰高度数据,是本世纪初外国测定的。6月28日,北京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登山队凯旋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接见了登山 队全体人员。

9月26日　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的说明。中共中央于7月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尽快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的《汇报提纲》讲了6个问题:1. 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2. 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3. 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4. 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5. 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6. 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肯定了汇报所提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等意见,邓小平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邓小平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同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教育,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学;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在这次汇报以后,这个《汇报提纲》形成为文件,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文件。

11月26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173公里,最远点483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3度,绕地球一周需91分钟。新华社在12月12日报道,这颗卫星在正常运行后,已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将卫星回收到地面。

社会生活

3月29日　福建省考古工作者在泉州湾后渚港一处海滩发掘出一艘我国宋代的木造海船,并在船上发现一批珍贵文物。发掘工作是从1973年8月开始的。海船除舱面损坏外,大部分保存比较完好。船身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船面近椭圆形,尖底。船板的结构是两层或三层叠合而成,船底板和舷侧板多属杉木、松木和樟木类,木质纤维和纹理还清晰可见。海船共有13个船舱。根据计算,载重量可达200吨左右。船内珍贵文物很丰富。其中香料、药材数量较多。还有铜钱、铁钱、陶瓷器、铜铁器、竹木藤器、象棋子、食用动物骨骼、水果核等。根据船的造型和结构特点以及船上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我国宋代福建造的一艘远洋货船。这艘海船的发掘,对研究泉州的海外交通史、我国造船发展史以及泉州湾的地理变迁,都有一定的价值。

3月29日　辽宁省南部地区营口、海城一带,19时36分发生强烈地震。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3级,震中在北纬40.6度、东经122.8度。由于震前作出了预报,震区党政军民在中共辽宁省委统一领导下,及时采取措施,使这次地震在人口稠密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大为减轻。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迅速进行救灾工作。

4月7日　瑞士航空公司开辟的苏黎世——日内瓦——雅典——孟买——北京——上海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7月10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自1974年发现后,经考古工作者探测,整个陶俑坑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0米,深4.6米至6.5米,总面积为12600平方米。从1974年7月开始,在坑的东端,试掘清理了南北60米、东西16米、深4.6米、约1000平方米的范围。发现从东面有5个斜坡门道,进门后,直达南北的60米的地面上排列着3列73路横队,共216个武士俑,脸面朝东。武士背后,整齐排列着人数壮观的40路纵队。因挖掘面积东西长只有16米,40路纵队武士俑只出土一小部分,计有314个,陶马24匹。为了掌握整个坑的全貌,又在坑中

部，即距东西100米处局部试掘，所出土的兵马俑，似为现露面的40路纵队的延伸部分。据估计，此坑出土和未出土的武士俑约有6000左右，排列了一个完整的军阵场面。从已发掘的部分看，武士俑和车骑有规律地间隔并对称排列，阵容严整。武士俑形体高1.82米，身着战袍铠甲，挟弓挎箭，或手执剑、矛、弩机等锋利的实用兵器。雄骏的陶马，形体大小也与真马相似，以4匹为编组，拖1辆战车。根据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这批陶俑大体是秦始皇在世时制作的，距今2,100多年，在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还有非常珍贵的各种兵器，显示了秦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象铜兵器剑、镞、弩等，保存完好。经光谱鉴别，其成分主要是铜锡合金，还含有镁铝等13种元素。特别是剑无锈，锋光锐利。出土的还有许多铁器农具、金、玉、骨器，以及麻布、丝织、木车等。

9月7日　由兰州至拉萨新开辟的一条航线正式通航。这是继1965年开辟的成都至拉萨航线之后，由内地通往西藏的第二条航线。这条航线全程1636公里，从兰州起飞，只要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拉萨。

数据。在这次我国精确测定珠峰高度以前，我国沿用的

是我国宋代福建造的一艘远洋货船，这艘海船的发掘，对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6年

导　言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年头。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些灾难到1976年达到了顶点，使命运多舛的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了空前严峻的考验。这一年，党和人民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也到了关键时刻，并最终在金秋十月胜利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动乱”。

1976年是巨星陨落的一年，党和国家的卓越领袖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1月8日，周恩来病逝。全国人民满怀悲痛，以各种方式悼念自己的总理。但是，“四人帮”公开阻挠、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并继续诬蔑攻击周恩来。这就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义愤，从而引发了四五运动。

3月下旬起，首先从南京爆发了学生市民自发举行游行、集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纪念周总理的活动。3月底至4月初，北京市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献花圈、花篮、挽联、悼词、诗歌、条幅、传单等方式，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4月4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多达200万人次。这就是所谓的“天安门事件”。其他许多城市也爆发了群众抗议活动。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4月5日，民兵、卫戍部队和公安人员带着木棍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并逮捕38人。4月7日，邓小平被解除一切职务。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基础。“天安门事件”后，全国大规模地公开“批邓”。

“树欲静而风不止”。7月28日，一场举世罕见的强烈地震在唐山、丰南一带发生。这场大地震，强度达到7.8级，震中烈度11度。震中为河北唐山，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非常关怀，积极调 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抗震救灾。

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民一起，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果断地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发表
- ●批“三项指示为纲”
- ●周恩来逝世
- ●清华大学“教育大辩论”
- ●“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
- ●公开“批邓”
- ●国民经济再遭挫折
- ●唐山大地震
- ●毛泽东逝世
- ●朱德逝世
- ●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发表

背景介绍

1975 年底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邓小平，并影射周恩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197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于 1965 年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配合两首词的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日报》刊登了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词二首和元旦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材料：

- ·水调歌头
- ·念奴桥

材料一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材料二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原载《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
（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批“三项指示为纲”

背景介绍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新阶段的重要内容，是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以国民经济为纲。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发布一系列指示，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指示，大批“三项指示为纲”，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材料：

· 毛主席重要指示（辑录）

材料　毛主席重要指示（辑录）

（1975年10月——1976年1月）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摘自《大动乱的年代》、《叶剑英在1976》）

周恩来逝世

背景介绍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于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使本就沉重的国内政治形势更趋困难。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材料：

-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材料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一月十五日下午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这一天，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人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

会场里还摆着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上海市总工会、广州、南昌、武汉、南京、重庆、西安、延安等市的党委和革委会送的花圈。

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参加追悼大会的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邓小平同志说："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同志说："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说，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后，全体同志向周恩来同志的遗像三鞠躬。

邓颖超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邓颖超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197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清华大学"教育大辩论"

背景介绍

周恩来逝世以后，"四人帮"公然阻挠和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并操纵舆论工具，继续诬蔑攻击周恩来、批判邓小平。所谓"清华大学'教育大辩论'"，就是他们抛出的一发"重磅炮弹"。

材料：

· 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节略）

材料　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节略）

——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紧紧抓住革命大辩论的斗争重点

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通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报道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大辩论，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浪前进。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通过学习和大批判，不但看到了一条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找到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这个风源，就是党内那个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从去年十一月三日起，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揭露和批判了本校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揭露和批判了教育界、科技界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都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有着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系。他们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如出一辙，总根子就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里。他们在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个个搬出"后台"来吓唬革命群众，这个后台就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锐利思想武器。清华大学党委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去年夏季前后的斗争形势和阶级营垒，进一步认识了右倾翻案风的来龙去脉。去年春天，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发表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大好形势，吓坏几个蓬间雀。他们害怕革命群众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害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害怕批判修正主义，害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尤其害怕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对林彪一类上台的警惕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慌慌忙忙抛出一个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全面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政治上，他以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否定毛主席历来关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上，通过推行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大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在组织上，以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为号召，纠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其要害就是要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

一股复辟倒退的右倾翻案风就这样刮起来了。在这股妖风甚嚣尘上的七、八、九三个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得意忘形，露出了复辟狂的本相，接二连三地叫嚷：复辟"好得很"，"还乡团""好得很"，为了复辟，"不怕打倒第二次"。在他的策划和鼓动下，教育、科技等战线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越来越疯狂，右倾翻案风越刮越起劲。甚至有人咬牙切齿，扬言要"克己复仇"。

铁一般的事实严峻地摆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面前，揭露和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势在必行。不批判他，就刹不住这股右倾翻案风，就不能打退资产阶

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就不能击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有的工宣队员说得好："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既是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强烈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带着剥削阶级深深的烙印，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触动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便同党分道扬镳，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他是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也是刘少奇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帮凶。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就代表资产阶级，代表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他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他之所以那样猖狂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批林批孔的案，要抵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原因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剖析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历史，把他在刮右倾翻案风时所作的恶劣表演，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表现联系起来批判，深刻地认识了他的阶级本性。他要刮右倾翻案风，决不是偶然的。他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搞修正主义，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揭露了他，批判了他，然后又挽救他，希望他能够改悔。但是，他却屡教不改，口头上说"永不翻案"，实际上，一旦大权在握，就全面地闹翻案，坚持推行那套"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黑货。

问题就在于，他头脑里的资产阶级王国长期没有触动。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风头上，他制造种种借口，掩盖自己的阶级本性，保护这个资产阶级王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犯过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接受了党和革命人民的批判和教育，改正了错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了。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屡教不改，明知故犯，这哪里是什么"好心办了坏事"？这只能说明，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愿改造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他那份"好心"，在地主资产阶级那里是能够博得连声喝彩的，而无产阶级看到的却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他硬是要搞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的最主要的经验是，发动群众，揭露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他搞修正主义，就要批判。顺着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那是绝对不行的。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正是以这种反潮流的革命气概，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就是要对症下药，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再向他猛击一掌，以观后效。"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讯，3月3日《人民日报》）

"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

背景介绍

"四五运动"是指1976年4月5日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是一次群众自发性革命活动。

"四人帮"借口"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大辩论"，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甚至下令不准带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等，妄图割断人民对总理的哀思。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纪念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其中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头版发表一篇以《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争》为题的新闻报道，公然以"孔老二"、"党内那个走资派"影射攻击周恩来。人民群众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运动首先在南京爆发。

3月底至4月初，抗议运动的中心转移到首都北京。群众从四面八方涌至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4月4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多达200万人次。"四人帮"歪曲事实，欺骗中央与毛泽东，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4月5日，群众运动被镇压，邓小平被诬为主谋而撤职。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 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材料一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

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材料二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讲演词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首都钢铁公司　李铁华

阳春三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八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清明时节的纷纷雪花——那是因为普天同哀！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您的忠诚的儿女，看望您老人家来了。我们来自工矿、来自农村、来自部队！

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大义凛然、横眉冷对；对人民父亲般地关怀，母亲样地慈爱！您老人家光明磊落、胸怀宽阔、任劳任怨、从无倦态。您一辈子工作、战斗，战斗、工作，不辞辛苦，不分昼夜，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斗争，鞠躬尽瘁。

您老人家是活活累死的呀，总理！！……（讲演者和群众一起失声痛哭，群众高呼口号：总理永垂不朽！）临死前对人民还是那样地热爱，您把骨灰都用来造福于人民。这样崇高的人格，这样无私的品德，古今中外，有谁能与您媲美！人类最好的品质您都具备，您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真正表率！因此，您老人家不需要人家歌功颂德，因为您老人家高大的形象，早已在人们心中树起来！因此，您老人家不需要人家给您立传树碑，因为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永远在我们八亿人民心中铭刻！人民心中的巨碑，永远砸不碎！人民心中的形象，万代放光辉！（群众高呼口号）

敬爱的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我们祝愿您老人家在马克思、列宁那里得到最好的款待。敬爱的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您和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信心百倍，永远战斗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大舞台！

（群众口号声："谁反对周总理就坚决打倒谁！""警惕中央出假马列主义者！""周总理永垂不朽！"）

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用生命保卫周总理！"）同志们，我是个工人。我们这里还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刚才有来自大兴县的农民，也有来自部队的同志，……爱总理的心情是一样的。今天成千成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口号声"人心所向"……）

总理得人心，人民敬爱周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同志们，解放军同志们，工人同志们，农民同志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彻底打垮！

（原载1978年11月19日《北京日报》）

材料三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4月8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吴德同志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4月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五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然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

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

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4月8日《人民日报》）

公开“批邓”

背景介绍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等两个决议，并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诬蔑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此后，全国大规模地公开“批邓”。“四人帮”活动更加猖獗。

材料：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材料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打开最近一个时期的报纸，人们不断读到一些基层单位的同志，在去年就自觉抵制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迹，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清华、北大、朝农的广大革命师生，一直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下面列举一些其他地方的材料：

当“三项指示为纲”传到辽宁北部山区的柴河铅锌矿时，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坚决顶住，并作出决定：今后不管是写文章、讲话，还是上报材料，不能用“三项指示为纲”，要提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见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去年夏天，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了上钢五厂。有人问二车间理论小组的一位同志：“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到底对不对？”这位同志果断地回答道：“不对，这和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不符合。”（见五月十三日《文汇报》）上海星火零件厂一位团支部书记，在去年七月全厂干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反对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见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天津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到“三项指示为纲”以后，觉得很不对味，既不向群众传达，更不去贯彻执行。当邓小平刮起攻击和污蔑小靳庄的歪风时，党支部脚步没有乱，贫下中农腰杆没有软。他们说：“‘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干，和它专开对头车！”（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武汉警备区某部六连一位二十二岁的战士，去年九月听了邓小平一个“讲话”的传达，感到他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却大谈什么“整顿”，宣扬什么打硬仗就是“打钢仗”等等，是同毛主席唱反调。联系邓小平过去鼓吹的“白猫黑猫”那一套，他觉得这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毅然决然地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见五月九日《长江日报》）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支持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现、总结和推广了许多新生事物，推动了整个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深刻揭示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证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了，识别真

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对于修正主义的免疫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了。有了这样英雄的群众，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大有作为，大有希望。

为什么这些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敢于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呢？因为他们坚定地实践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他们思想中。他们要革命，要前进，要求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求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不断铲除"旧社会的痕迹"，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他们懂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复辟，搞倒退，完全站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必须起来同他们斗争。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极其可贵，值得大家学习。

人民群众不但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而且善于识别修正主义。这是因为他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上面谈到的那些同志，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货色刚一出笼，就嗅出它的味道不对。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毫无例外，都是由于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人们的眼界宽阔了，目光敏锐了，不管修正主义如何乔装打扮，变换花样，都能扯下它的伪装，剥去它的画皮。路线斗争不可知吗？上当受骗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吗？不对。问题在于是否"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多次强调，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时，也强调"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号召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时，又强调"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拿到群众中，发动亿万人民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在当前的批邓运动中，我们要很好运用这个经验。这次批邓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领导要向群众学习，上级要向下级学习。要更充分地发动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

国民经济再遭挫折

背景介绍

1976年，是"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破坏最严重的一年。江青集团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批邓"等一系列手段，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却大肆宣传什么"生产建设蓬勃发展"。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材料：

- "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遭挫折（节录）

材料 "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遭挫折（节录）

（1985年5月）

柳随年 吴群敢

……

1976年，是国家多事之秋，也是"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破坏最严重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袖相继逝世，邓小平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遭受诬陷离开工作岗位，"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并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7.5%的速度。其中，农业增长2.5%，比计划要求低1.5%，工业增长1.3%，比计划要求低6.9—7.7%。主要产品产量，粮食5726亿斤，比上年只增长0.6%，完成计划的99%；棉花4111万担，减少13.7%，完成计划79%；钢2046万吨，减产14.4%，完成计划79%，还低于1971年的水平；原煤4.83亿吨，只增长0.2%，完成计划101%；原油8716万吨，增长13.1%，完成计划的低限指标；发电量2031亿度，增长3.7%，完成计划96.3%；棉纱1080万件，减少7.1%，完成计划88%；铁路货运量8.4亿吨，减少5.5%，完成计划93%。基本建设投资，国家预算内投资完成294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投资完成359.5亿元，比上年减少32.3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8.9%，比上年下降5%。全部建成的大中型项目85个，比上年少82个，是建国后投资效率最差的年份之一。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1339亿元，比上年增长5.3%；进出口贸易完成134.4亿美元，比上年下降9%。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引进项目长期不能建成投产或正式投产后达不到设计能力。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达6860万人，比上年增加434万人，超过计划304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6‰，比上年降低3‰。国民经济的衰退，动摇了财政基础。由于企业管理混乱，亏损严重，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177亿元，比1965年增加了2倍。财源枯竭，国库空虚，这一年国家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上年减收39亿元，比搞"批林批孔"运动的1974年还低，当年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更重要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局面。

从1974—1976这三年，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国民经济经历了"一起两落"的曲折进程。1973年周恩来主持经济调整后取得的好转上升的形势，由于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使国民经济重又下降；而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后刚刚恢复、发展的经济，又由于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遭到严重摧残。据有关方面估计，由于"四人帮"的破坏，1974—1976这三年，与国民经济的正常情况相比，工业总产值损失1000亿元，财政少收400亿元。应该指出的是，这三年中，如果不是邓小平主持工作而减少了损失，那么损失必将更大。

（原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

唐山大地震

背景介绍

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将灾难降临到本就命运多舛的中国人民头上。顷刻间，24万生命被吞噬，整座城市被毁灭。在危难中，党和政府调动了全国军民的力量，开展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10多万子弟兵急如星火赶赴唐山，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救灾队伍接踵而至，他们同唐山人民患难与共，重建新的唐山。

材料：

- 大破坏　大灾难
- 伟大的核心力量

材料一　大破坏　大灾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6秒，在唐山市区的地层深度12公里处，一种凝聚了约相当于800万吨黄色炸药的能量在石岩中猛烈释放，巨大的能量所产生的大地震及其震波威力惊人，其震害程度世所罕见，亘古未有。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是无法形容的。转眼之间成为地震难民的唐山人，个个衣不蔽体，到处是嘶哑的悲啼声，方圆几十里不绝于耳。遇难者的尸体遍地都是，受伤呻吟的人到处可见，重伤人员多达几十万。这里已成为当今人类史上最大的罹难地……

这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其强度达7.8级，震中烈度11度。主震位置呈东北走向的椭圆形，长轴约10.5公里，短轴约3.6至5.5公里，面积约47平方公里。其范围东起市郊区的越河乡、西至梁家屯、河北矿冶学院；南自女织寨，21中学，贾各庄、打靶场一带。地震烈度次于极震地域的10度区，呈东北窄，西南宽的瓢形，长36公里，宽15公里，面积为320平方公里。范围是：东自古冶、大庄坨，西达兰高庄；南起丰南县稻地镇，董各庄，北到付家屯和王辇庄。地震对地面破坏的程度向外围递减，但唐山地区都处于房屋损坏的7度区内。据中国地震局宣布，唐山发生的强烈地震，有感陆地范围约为217万平方公里，北到东北的满洲里，西至宁夏的吴忠，南到河南省正阳，跨越渤海达国界之外。

唐山这次强烈地震，使全区71座大、中型桥梁和160座小型桥梁及1千余道涵洞还有280多公里柏油路遭到严重破坏。唐山至天津、北京、承德、东北和沿海等主要公路干线路基塌陷裂缝。这些干线上的滦河大桥、爪村大桥、沙河桥、稻地桥、曲荒地桥、暗牛淀桥及唐山胜利桥等受到普遍毁坏。全区公路交通基本断绝。由于铁路轨道变形，桥梁震毁，切断了唐山铁路东西大干线的交通，京沈铁路处于瘫痪状态。

震灾使工业建筑遭到严重毁坏，高大的砖烟囱几乎全部倒塌，砖壁水塔从根部倾倒，厂房普遍塌坏。开滦煤矿被震毁，断电造成设备瘫痪，矿下被淹机电设备达三万多台，积水1.5亿吨，有38万米巷道被淹，井塔被震歪或下沉，350万平方米的生产和生活建筑几乎全部倒塌，百年的矿山被大地震摧毁为一片废墟。全国闻名的唐山陶瓷工业彻底被地震破坏，2千台生产设备只剩下300余台，4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只有1万平方米没有倒塌，能生产各种高、中档瓷器近4千种的北方瓷都陷于灾难的深渊。唐山钢厂有1万多吨机电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工业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民用建筑几乎全部震毁。

唐山大地震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全部毁坏的居民住宅。唐山市城乡民用建筑68万余间，约1千多万平方米，被地震摧毁和受到严重破坏的有65万余间，毁坏率达95%。在极震区域的火车站、小山、解放路、宋谢庄复兴路、新立庄和风井、梁屯一带的毁坏率达100%。

唐山市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0亿元，唐山地区总计损失约54亿元。

……

唐山地震（包括天津在内的所有受灾地区），共计242419人丧生（其中包括全国各地来唐出差及探亲等流动人口12103人），36万多重伤者，703681人受轻伤。

……

地震中核心家庭的解体数目：

总数共15886户，其中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

震后遗下孤寡老人有3675位，孤儿共4204人。

地震造成终生残废有：3817人失去机体功能成为截瘫患者；造成肢体残者25061人。

（陈永弟《唐山地震纪实——幸存者的自述》）

材料二　伟大的核心力量

——唐山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英勇进行抗震救灾斗争

在强烈地震震撼的唐山大地上，在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唐山市各级党组织，岿然屹立，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

在这严重的时刻，在突然之间面临的巨大困难面前，唐山人民是多么想念党、热爱党啊！强震过后，有多少人急切地盼望来自北京的声音。他们从广播中听到北京很好，千万颗心放下了。有多少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各级党组织的身边。他们深深懂得，有党的领导就有一切。党是我们的生命，党是我们的希望，党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有党的领导，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重建一个新唐山。

唐山市各级党组织，不愧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他们没有辜负唐山人民的期望，他们就在群众中间，他们是领导唐山人民抗震救灾的核心力量。

唐山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以后，立即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市委常委们丢下个人的一切，纷纷赶到书记身边，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举行了震后第一次常委会。许家信含着热泪，胸怀革命激情对大家说："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迅速援救唐山人民。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受党多年教育的干部，党在考验我们，人民在期待着我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人经得起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心，带领群众，英勇战斗，重建家园。"

市委第一书记的话，表达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决心，反映了全市人民的愿望。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纷纷建立起来，共产党员们一个一个昂首挺胸，率领群众，投入战斗。

清晨四点多，大震刚过，一辆大轿车风驰电掣般驰过烟尘弥漫、余震频繁的大地，直奔市委而来，这是第一个向市委报到的人民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和她的战友。她急切地抓住市委第一书记的手说："我们有一百四十辆车完好无损，整装待发。现在，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下命令吧！"许家信望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二十五岁的新干部，心情十分激动：我们党有多少这样的好干部，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不畏艰险，挺身而出。这一瞬间，许家信仿佛又回到了火热的战争年代。今天，正像毛主席当年所要求的那样，又一批新干部站在最前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唐山车站党委副书记刘绍璐，震后首先想到的是，抗震救灾必须有党的领导。他赤脚跑了十几里赶到车站，得知党委书记不幸牺牲，立即挑起重担，组织职工抢救阶级兄弟，抢救 各种设备，为迅速通车做好准备。

震后不久，在路北区西马路七十九号的向阳院里，共产党员、开滦煤矿运销处副处长于祖荣十分镇定地对大家说："共产党员站出来，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院里的六名共产党员，立即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他们身上带着伤，冒着生命危险，把全院十八户居民的抢救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群众是多么心疼这些为大家操劳奔忙的共产党员啊！他们把一碗碗珍贵的水递过去，说："喝一口吧，歇一会儿，你们可千万别累垮了！"

党中央的慰问电，送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极大关怀，它像一阵春风，温暖着灾区人民的心；它有如一盏明灯，为抗震救灾指明了方向。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救灾工作千头万绪，首先抓什么？唐山市各级党组织认为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他们回顾了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邓小平伙同刘少奇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单干也可以"。结果，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捣乱，资本主义严重泛滥。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唐山市委及时提醒各级党组织要清楚地看到，地震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是抓路线，抓批邓，抓思想，还是只埋头抓衣、食、住；是依靠党，组织集体救灾，还是靠个人"搞单干"；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还是"等、靠、要"，这是各级党组织领导这场抗震救灾斗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说，越是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越是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这是我们夺取抗震救灾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强震刚刚过去两个小时，市委第一辆宣传车开出来了。"把抗震救灾的现场作为批邓的战场"，"自力更生，排除万难，重建家园"，"提高警惕，保卫国家和集体财产"……一遍又一遍的广播，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狠狠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唐山发电厂党委书记彭宏、地

震后，亲自从几十里外抱回一台油印机，印的第一份文件，就是厂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推动抗震救灾”的决议。开滦煤矿党委召开的震后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在抗震救灾斗争中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在困难的时候，要识风向，辨路线，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冀东平原，燕山脚下，迅速展开了一场千军万马的抗震救灾的战斗。

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战斗中，唐山市各级党的干部、广大共产党员，接受了严重的考验，表现出共产党人大公无私、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英雄本色。

强烈地震刚过，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车振明刚从倒塌的房屋里脱险，十六岁的儿子和十三岁的女儿在瓦砾下喊着：“爸爸，快来救我！”车振明正要去救孩子，忽然听到一墙之隔的路北区委书记邱广玉一家呼救的声音。大地还在摇动，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办？车振明毅然决然地对爱人说：“我先去救老邱！”邱广玉一家安全脱险后，忙问：“你的孩子呢？”车振明说：“不要管他们，你是区委书记，赶紧组织全区进行抢救。”车振明回来，两个孩子已经死去。但是他不后悔，不悲伤，不气馁。为了全区人民，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子女，这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车振明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市武装部政委刘萍，被救出后，遍体鳞伤，但他第一句话就是：“赶快救市委书记，唐山人民需要他！”他不顾全身累累伤痕，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抢救书记，报告中央，转移伤员，组织民兵，保卫全市重点目标，保护国家的财产。上级领导一再叫他转移北京治疗，他坚持不下火线，斩钉截铁地说：“在这严重关头，我怎能离开唐山人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和唐山人民一块战斗。我相信唐山人民是绝对压不倒震不垮的！”

在唐山，像车振明、刘萍这样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共产党员，是数不清，说不完的。有多少人为了抢救阶级弟兄，几过家门而不入；有多少人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有多少人家属遭到伤亡不去救护处理，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大公无私，这样坚毅不拔？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八个字，气吞山河，力敌万钧。这八个字，包含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战斗中，唐山市各级党的干部、广大党员，接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百折不回的高贵品质。

多少个艰苦奋战的日日夜夜，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在大街上的一辆公共汽车里办公，为的是群众随时能找到他们。广大党的干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重温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坚持与群众三同。他们守着堆积如山的救灾物资，几天几夜不吃一块饼干。他们守着水塘，日夜为群众安排用水，几十个小时没喝一口。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又有多少领导干部三、四天没有睡觉呵！群众看着他们，热泪盈眶，都说有这样的领导，我们一定能排除万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在唐家矿七十四楼家属宿舍，八个共产党员组成临时党支部。他们深入批邓，狠抓抗震救灾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振奋了整个队伍的士气。他们办起公共食堂，坚持依靠集体救灾，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发动群众把压在地下的粮食、物资一点点掏出来。震后至今，他们没有吃国家一粒救灾粮食，把省下来的救灾物资让给别人，表现了灾区人民可贵的革命志气。有这样的党支部，有这样的党员，有这样的群众，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党，正在领导着唐山人民胜利地前进。在短短的时间里，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英雄人物大量涌现，奇迹一个又一个地创造出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不断传来，全国人民清晰地听到唐山人民前进的脚步声，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这威武雄壮的步伐。

请听开滦煤矿工人的歌声！八月十二日，在唐山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联欢晚会，一个又一个、一队又一队的煤矿工人，大步登上舞台，放声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信心的党，歌颂给了我们极大温暖、给了我们无限关怀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歌声飞越千山万水，表达了唐山人民要战斗，要前进，要胜利的坚定信心。

请看唐山自行车总厂门前的红旗！在震后的当天，厂党委就在废墟上竖起一面红旗。人们看到这面火红的战旗，心中象一团火在燃烧着。看到了红旗，就看到了党的领导，听到了党的召唤。看到了红旗，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唐山人民光辉的前程。

《人民日报》记者

(8月25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逝世

背景介绍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

的领袖，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

材料：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材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他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

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我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地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新华社1976年9月9日讯，9月10日《人民日报》）

朱德逝世

背景介绍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讣告，通告朱德委员长逝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首都30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遗体告别。9日和10日，首都工人、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生15000人，代表着全国各族各行各业的人民，怀着敬爱和沉痛的心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朱德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数百名外国朋友也参加了吊唁仪式。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台湾省同胞、海外华侨1万多人前往中国银行大厦参加了由新华香港分社举行的隆重吊唁朱德的仪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发来了唁电或唁函。唁电或唁函称朱德是“坚定和力量的化身”，“他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忠诚以及他在解放事业和反帝斗争中所发挥的英雄作用，将永垂青史”。他的逝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对正在为人民民族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和全世界人民，也是一个损失”。

11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5000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华国锋致悼词。悼词说：“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的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中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朱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和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以及“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192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1928年，他率领起义的部队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井冈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担任军长。193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起，当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乃至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逃脱林彪、江青集团的恶意诬蔑、诽谤和打击。他们视朱德为他们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的绊脚石，眼中钉，挖空心思，捏造罪名，妄图搞垮朱德。1966年5月，康生有意散布谣言说，朱德是空头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是个"党外人士"。林彪也随声附和，咒骂朱德是"假司令"，司令一直是别人替他当的，他"实际上一天司令也没有当过"。1996年9月以后，从林彪、江青集团的亲信口中，又传出朱德是"黑司令"、"军阀"、"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很大，想当领袖"等诽谤性言论。在江青的唆使下，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贴出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呼喊"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口号。1966年底，江青还对戚本禹讲："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戚本禹煽动北京高校"造反派"成立"揪朱联络站"、"批朱联络站"，四处搜集朱德的"罪行材料"，面对"四人帮"及其党羽的恶语中伤，朱德泰然处之，他在1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正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对出现的这些新问题，要注意解决。武斗制而不止，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事件发生，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

1967年2月，"造反派"从北京派出的"揪朱兵团"到朱德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召开"声讨"朱德的大会，他们砸烂朱德故居陈列室，煽动群众反对朱德。"造反派"2月10日准备在北京召开的"批斗朱德大会"，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坚决干预而夭折。但是不久，朱德却被当作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而遭到批判。5月，张春桥在上海对人放风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者，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在小组会上当面侮辱朱德："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谢富治也侮辱朱德"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是老牌机会主义者""搞夺权，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可恶之极"。1968年12月，林彪、江青集团还制造"伪党"假案，诬陷朱德等人组织了"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苏修"，"要搞政变"，而朱德则是"伪党"中央的"书记"，还"发现"了朱德等人联名签署了给蒋介石的"要求联合起来，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的电报。对这些危言耸听的诬陷，朱德听后嗤之以鼻，他坚信毛泽东、周恩来最了解自己，不会相信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在党的"九大"上，朱德严正声明：我和毛主席在一起40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9·13"事件后，朱德在1972年5月的批林整风会上说，我们党是有经验的、有力量的党，他(指林彪)是决不会成功的。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毛泽东的这番话，摘掉了扣在朱德头上的帽子，也表达了毛泽东对朱德的高度信任，同时，也改变了朱德以后的处境，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朱德还同"四人帮"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5年底，针对"四人邦"为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而掀起的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1976年1月，针对"四人帮"把抓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朱德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喝西北风！"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朱德仍念念不忘要抓生产，他在临终前，还断断续续地对周围的同志说："革命到底"。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品质。他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的一生是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无私奋斗的一生。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功勋卓著、热爱人民的领导人。

材料：

- 首都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在朱德同志

材料一　首都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追悼大会，7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朱德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当天，全国下半旗致哀。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四周挂着黑纱。会场入口的横幅上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会场里悬挂着朱德同志的遗像，安放着朱德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了

兰草和鲜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送了花圈，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南昌市、井冈山地区、延安市、晋东南地区、四川省仪陇县的党委和革委会。

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德同志的老战友、夫人康克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

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江东兴、吴德、韦国清、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首都工农兵代表和爱国人士，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和医务工作人员，共5000人。

康克清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康克清同志和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追悼会开始，奏哀乐，全体肃立默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同志说："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他说："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华国锋同志说，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学习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

华国锋同志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追悼会结束后，朱德同志的骨灰盒，由陈锡联、吴德、李素文同志等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朱德同志患病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前往医院探望。

朱德同志逝世讣告发布以后，首都新华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首都群众3000多人于7月8日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韦国清、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9日和10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朱德同志逝世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首都工人、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生1.5万人，怀着敬爱和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他们一致表示要学习朱德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里厅里摆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中共中央送的花圈，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各机关和群众团体，台湾省爱国同胞，港澳同胞和一些华侨送的花圈。

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外国友好团体和组织，外国驻中国大使、大使馆，正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实习生送了花圈。

材料二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工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976 年 7 月 6 日下午 3 时 1 分在北京逝世，终年 90 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1915 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 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 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0 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 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4 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 1930 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 1934 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 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选自《人民日报》1976 年 7 月 12 日）

粉碎“四人帮”

背景介绍

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9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材料：

- 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 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 上海军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同志主持上海市的工作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节略）

材料一　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

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决定性胜利。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信赖和衷心爱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重温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创造历史，包括了肯定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领袖和千百万群众的作用。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有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是无产阶级地真正代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没有这样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五〇五页）。否认党和党的领袖的领导作用，“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〇〇页）。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无比正确，证明了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党的领袖的伟大作用。

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正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经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重重艰难险阻，才确立下来，并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公认。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在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期间，灾情严重，“四害”横行，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华国锋同志顶住了逆流，排除了干扰，战胜了困难，正确地妥善地处理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毛主席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英明决定，揭露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更加显示了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进一步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产阶级捍卫自己党的领袖的地位，同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作斗争，几乎是每次路线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张国焘的自立伪中央，林彪的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不都是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么！这

种斗争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坚持革命，坚持前进，把中国引向光明；还是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反对革命，坚持倒退，把中国拉向黑暗。一句话，就是坚持红的，还是坚持黑的。当前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又一次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又一次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又一次战胜修正主义。我们对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无限信赖，我们对未来斗争的前途充满信心。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五一页)。

(原载10月29日《解放军报》)

(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

材料二　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首都一百万军民，十月二十四日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举 行隆重、盛大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广大群众表示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天，首都北京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天安门广场装饰一新，分外壮丽。巍峨的城楼上红灯高悬，红旗飘扬。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端挂在城楼的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两条醒目的巨幅标语："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了大会。当华国锋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出席了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大快人心的特大喜讯，使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英雄的首都人民今天一早就兴高采烈地从工厂、矿山、效区人民公社、部队营房、机关、商店、学校和居民区，涌上街头。城效的公路上，无尽的车队，满载着参加大会的群众驶向市区。他们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高举着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举着红旗、彩旗和标语牌，满怀胜利的喜悦，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东西长安街，涌向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和东西十里长安街上，红旗如林，人山人海，排满欢庆胜利的群众队伍。他们当中有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工人民兵，有身穿工作服的钢铁、煤炭、纺织等各个行业的工人，有郊区人民公社社员，有中央和北京市机关干部，有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有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有街道居民。广场上群情振奋，万众欢腾。"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表达亿万人民共同心声的激昂口号，如滚滚春雷，震天动地。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宣布大会开始。广场上锣鼓齐鸣，军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东方红》乐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胜利结束。华国锋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走到城楼东西两端，向广场上的群众再一次亲切招手致意。这时，广

场上锣鼓齐鸣，百万群众挥动彩旗，欢呼跳跃，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胜利的欢乐气氛。

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爱国人士和在京的台湾同胞。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也参加了大会。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1976年10月24日讯，10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上海军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同志主持上海市的工作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节略）

在上海一千万军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庆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喜讯传来，上海全城一片欢腾。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坚决拥护，热烈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衷心欢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来上海主持工作。他们一致表示，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是对上海军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乘胜前进，坚决地、深入地开展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这个英雄城市上空高高飘扬。

二十七日晚上，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同大家见了面。苏振华同志宣读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时全场欢腾，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高呼“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等口号。苏振华同志接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上海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对上海十分关心，曾多次亲临上海，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人民，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市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市，是全国人民和一千万军民的上海市，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英雄城市。“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把上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事实证明，上海广大党员、干部、驻沪三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的反党阴谋一经揭露，上海全市军民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奋起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四人帮”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他们罪恶累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

（1976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江　青

江青（1915－1992）女。原名李云鹤，又名李进。山东诸城人。早年曾读过中学。1929年春入济南山东实验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学戏。后到青岛，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参加海濱剧社演出话剧，参加进步的文艺宣传活动。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只身前往上海，入业余剧社等剧团演话剧，失掉党的组织关系。1934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12月被释放。此后以蓝蘋为艺名，在电影公司当电影演员，参加演出过《王老五》等影片，1937年秋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重新恢复中共党的组织关系，参加演出话剧等文艺活动。1938年同毛泽东结婚。此后曾到延安鲁迅文艺学校任教。解放战争前期仍在延安。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后，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过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1949年春随

中央机关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多年称病休养，极少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1963年起，她插手指导京剧改革活动，通过演出京剧“样板戏”，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夺取“文艺革命”的旗帜。1965年11月指使姚文元发表文章，攻击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历史剧。1966年4月受林彪委托，主持写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中国文艺界是“黑线专政”，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舆论准备。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抛头露面，四处活动，积极策划诬陷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她为首的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四人帮”，形成反党反人民、破坏分裂党和国家的反革命集团，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予以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她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2年去世。

张　春　桥

张春桥(1917－1991)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不变。

姚　文　元

姚文元(1931－　　)浙江诸暨人。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文人，后曾追随国民党进行过反共宣传。他自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1958年撰写评论文章否定著名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文革”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他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又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起在全党全国制造新的动乱。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　洪　文

王洪文(1932－1991)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1966年乘“文

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周恩来组阁、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暴乱。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1年去世。

珍闻轶事

华国锋升迁始末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2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1号文件。

毛泽东提拔华国锋始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他的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主席团和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1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到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他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死去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主席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他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注目而已。

（青辑）

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
——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

一

北京，9月的夜晚，是最喧哗、最闷热的时候，但在毛泽东的住处，却像一池清水似的静谧。近几年来，就连政治局委员中的多数人也很少来此地。而今晚不同，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来到这里，他们由华国锋领着进入毛泽东的病房，看望这位已经半昏迷的老人。大家从他身边走过，不敢多停留，生怕他激动，病情加重。当那个身材魁梧、满头银发的老军人，走到他跟前时，他的瞳孔突然现出亮光，他清楚地认出了他。

79岁的叶剑英，拄着拐杖，身穿灰便装，心事重重地

走近他身边。他满心想安慰几句，可是，他除了流泪，实在想不起该有什么宽心的表示。他蹒蹒跚跚地出了病室，走到另一间休息室。

这时，照顾毛泽东的护士走进来，径直到了叶剑英身旁小声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去。"叶剑英一怔，急忙站起，跟着护士重新走进病室，俯到毛泽东身边，哽咽地问："主席，您有什么吩咐吗？"

毛泽东使出全身力量，抽出手来，只抬了一下，便滑下来，再也无力抬起来。

"主席，你多加保重，你会健康起来的，中国不能没有你。"叶剑英悄声说。

毛泽东的嘴唇抖动了一下，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叶剑英慢慢地后退了几步，转身离开病室，重新回到休息室。华国锋、吴德、李德生等人围了上来，问他："主席有什么嘱咐吗？"

叶剑英稳住摇摇晃晃的身子，抿着嘴唇，摇了摇头："完了！"

"剑英同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冷不防，王洪文出现在屋里，面带愠怒说。

叶剑英就像没听见他的话似的，默默地坐到沙发上，闭起了眼睛。在场的其他几个政治局委员，早就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但他们觉得不好表态，谁也没说什么，都没理睬王洪文。

这时，张春桥和江青从外面走进来。江青以主人的口吻对人们说："大家都已经看到主席的身体状况了，中央就有必要再发主席的健康情况通报啦，以免被坏人钻空子。现在，这里没什么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

政治局委员们陆陆续续地站起身，向江青和华国锋等人握手告别，离开了毛泽东住地。

这时，一个秘书走到华国锋跟前，提醒他。"华总理，外宾还等着你接见。"

华国锋擦掉眼泪，对江青和张春桥说："我还有外事安排，这里你们多操些心，有事及时告我。"

华国锋刚走不久，病房里便传出一阵慌乱的传唤，医护人员紧张地出出进进，使江青立刻感觉到了什么。她也匆匆向毛泽东的病室走去。

半小时后，那边传来异常悲痛的哭嚎声，张春桥的脸色骤然一变，急忙向那边跑过去。但是，一切都无可挽救了。

医生们的努力并不能使伟人起死回生，噩耗终于传出：毛泽东逝世了！

历史记下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日子：1976年9月9日0时10分。

二

9月18日下午，阴云沉重地压抑着神州。

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笼罩在一片悲哀、沉痛的气氛之中。到了2点50分时，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普通群众一样戴着白花和黑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前临时搭起的主席台。

3点整，全国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均就地肃立，静默致哀。火车、轮船、军舰、工厂都发出了3分钟的鸣笛。随着哀乐的停止，广场上响起华国锋那浓重的带山西口音味的声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

华国锋用沉痛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悼词。悼词是经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他只不过是照本宣科。经过他和叶剑英的研究，悼词里没有那段"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当江青最后向他提出加上的要求时，他以"你们告知我太晚"为由，堂而皇之地拒绝了。

追悼大会在《东方红》和《国际歌》声中结束，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华国锋快要下台阶时，江青赶上来。她身后紧跟着王洪文和张春桥。"国锋同志，我郑重建议，明天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一些大事。"

王洪文赶紧说："主席的追悼会也开过了，党内的许多大事需要碰碰头，予以解决。"

"就算个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吧！"张春桥板着面孔，不冷不热地说。

华国锋犹豫了一下，低下头，说："那好吧，明天下午在人大会堂碰头。"

华国锋刚到家里，还没来得及换下外衣，汪东兴就跟着进来。华国锋叹了口气说："她刚刚逼着我，非要明天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不知又要耍什么名堂。东兴同志，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也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汪东兴说："你放心，到了会上，只要你态度坚决些，跟着江青、张春桥他们走的是少数。"听了这话，华国锋觉得似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汪东兴悄声说："你是唯一没有受过批评、没有犯过错误的，丝毫没有把柄儿，又是毛主席亲自确立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重权系你一身，这是最大的优势。其他，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内冤家很多，像叶剑英、李先念这些人，早对他们恨之入骨，解决他们的问题，老

同志打心眼里赞成。"

"好哇，通过你这么分析，我的胆气就壮多了！"华国锋拍拍汪东兴的手，又使劲捏了他一下，"今后你给我当助手，帮助我决断大事。另外，究竟采取什么办法解决问题，你给我好好想一想。我们商量的这些问题，不管成功与否，一定保密，决不能说出去！"

汪东兴离开后，毛远新来电话向华国锋请示："主席已经去世，追悼会也开完了。作为主席联络员的我，现在不知该干什么了，中央如果不需要我再办什么事的话，我是否就可以离京回沈阳？"

华国锋几乎不假思索："远新同志，中央没有什么事需要你办了，可以回辽宁去了。"

电话放下没多久，江青就来了电话。她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你为什么允许远新回去？你让他匆匆离京回去是何用心？中央还有许多大事要他做。"说罢"砰"地把电话扔下去了。

华国锋这一夜没睡着，早晨刚起床，秘书就走进来告诉他："张春桥来找你，已在客厅等候多时了。"

华国锋走进客厅，张春桥向华国锋打了个招呼，便坐在沙发上。

"让远新回去不妥当，很不妥当。他需要留下来帮助起草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接着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而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张春桥抓住了把柄："政治局会议还没有举行，你怎么能让远新回去呢？难怪江青同志很伤心呢？"

这下，华国锋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理论家的狡猾和阴毒。他不想和他争论什么，笑着说："那好，我看这个问题就上一次政治局会议，让大家讨论一下吧！春桥同志，你是不是也在这儿吃点东西？"

张春桥知道是在下逐客令，马上起身告辞。

三

华国锋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一份份有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毛远新等人最近活动的情况材料，特别是看到叶剑英、聂荣臻送来毛远新私调一个装甲部队进京的紧急报告后，他怒火中烧，站起来伫立在窗下，心中的愤怒越烧越大，再也抑制不住了……

很明显，一旦这些人上了台，他们绝不会轻饶了他。他想，现在没有别的路可选择，只能彻底依靠叶剑英，请他出马。时间紧迫，不容犹豫，他毅然决定给叶剑英打电话。

"请叶帅接电话，我是华国锋，什么？他不在？……查一下，叶帅现在在哪里？哦，在玉泉山！"

听到这个回答，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怎么同叶联系呢？他想：从城里到玉泉山，有很长的一段路程。他若乘车前往，必定会走漏风声，引起那些人的猜疑。

华国锋急得团团转，霎时便满头大汗。

蓦然间，他想起了李先念！

李先念这一段成了他和一部分老将帅之间的联络员，他和叶剑英是老战友，他们之间交往甚久，相互探望不会成为太大的目标，让他替自己给叶剑英送口信，叫他赶快决定行动的时间，岂不很好吗？于是，他马上给李先念通电话：

"先念同志吗？我是华国锋，噢，你正要找我！"

"是呵，有一篇极其重要的信号文章，说明人家要下手了。"听筒里的声音很弱，但华国锋听起来，比炸弹还响亮！

华国锋掏出手帕擦着头上的汗珠，脸都变了颜色："好，我马上到医院看望你去！"

满头灰发、神态安详的李先念，早就站在病房门口迎接他了。华国锋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身体好些了吧？"

"感谢总理的关心和探望。"

"只要没什么大毛病就好！"

"放心，不会很快去见马克思的，因为我的工作还没做好呢。"

"是呵，中国的革命还离不了你，还需要你出大力呢。"

"有紧急事？"李先念问。

华国锋给工作人员使了个眼色，屋里的人员知趣地都退了出去。华国锋这才坐到李先念跟前，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背说："先念同志，了不得啦！王洪文、张春桥到处找部队一些负责人谈话，他们磨刀霍霍，时间不容往下拖了！"

李先念收敛了笑容，问："你的意见呢？"

"剑英同志胸有成竹，请你马上转告他，让他马上决断，我听他的！"

"好，既然你下了决心，情况就好办了！"李先念站起来，边整衣服边果断地说："你给叶剑英同志写个便条，我给你送信去，让他组织力量。"

华国锋知道力量已经就绪，只等方案的实施时间了，他说："好！我马上就写"他从桌上拿起一页信纸，从笔筒里抽出铅笔，飞快地写道：

剑英同志：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迫在眉睫，事情太紧急了，一切由你下决心办。

华国锋

李先念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叶剑英住地玉泉山九号楼。

"叶帅，好消息！"李先念见了叶帅高兴得像个孩子，毫无顾忌地喊了起来。

叶剑英从他的神色中，已猜测到他说的“消息”是什么了。“华国锋催你赶快动手呢！”李先念从皮包里取出那封密信，交到叶剑英手里。看完华国锋的便信后，叶剑英皱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来回踱步，足足思忖了有5分钟后，才说：“他想让我一人决定时间？不，我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李先念很佩服叶公这种深思熟虑，遇事沉着冷静的大帅风度。当进攻还没有开始时，他焦躁不安地日夜做工作，调兵遣将，研究部署，促进时机，盼望早些歼灭上海帮；当时机成熟，决战即将摊牌时，他却又变得不慌不忙，抽时间吟诗作对，开始冷静地考虑起每个作战细节来了。

以收音机的噪音作掩护，这两位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战友，商量了对“四人帮”下手的办法。

叶剑英说：“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得迅速采取行动，以我们的‘快和准’，来打敌人的慢动作！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我同意！”李先念说，“我回去晚上和华国锋一块来，连夜研究行动计划。你组织部队和调拨人员，作好防范措施。”

“不！不！”叶剑英摇摇头，“此事宜精不宜杂，你不要再出头露面了，那样最容易走漏风声。你也不要让华国锋乘自己的车来玉泉山，我们干脆另选择一个地点来碰头。”

叶剑英伸出指头，在茶几上写了三个字，冲着李先念问：“看清楚了吗？”

李先念看了，高兴得连连拍着叶剑英的手背，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三个人，几乎同时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

这是间宽敞而又僻静的大会议室，墙上贴着一幅幅军用地图，桌上摆着十几架高频电话机。

屋里就他们三人，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他们。

华国锋坐在一张直背靠椅上，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坐在对面的叶剑英。过去，他虽然也和这位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帅常见面、常接触，但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的感觉：他是那么亲切，那么高大，那么具有伟大的力量，完全是个完美人格的完人。过去有关他的那些乌七八糟、下流污秽的流言，通通被他今日的光辉形象打得粉碎！

若是没有他，不仅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定会落到那四个人手里，而且自己的性命也很难保住，他又看了看坐在身旁的汪东兴，感慨万端地说：“对付江青、张春桥一伙，二位要出大力了。过去，我想采取开中央全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看来的确是很幼稚的。还是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法子好！”

叶剑英说，“认识他们，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嘛，像林彪一样，他们是反革命！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矛盾，所以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行。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嘛。”

“对，对。”华国锋不住地点头，突然又问，“把他们抓起来后，关在哪里合适呢？秦城监狱还有他们的人，万一让他们的死党获悉消息，又有一场麻烦。”

汪东兴说：“官园那里有几个地下室，把他们分别关在那里。”

“好！”叶剑英站起来，习惯性地边踱步边说：“等把他们断然采取措施后，再开政治局会议，要求表决。谁反对，那只能证明他也是死党，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喽。”

“江青我看不必请到会议室了，就在她的住地袭击！”汪东兴说，“她这几天一直住在中南海里，我们好下手，连那个东宫太子也一起干！”

“还有迟群、谢静宜也是他们的死硬分子，必须同时收拾。”叶剑英说，“那几个秀才好处理，交给卫戍区的人就得了，直接关监狱。”

华国锋这回彻底放心了，打趣地说：“将来，有人会编一出戏，就叫‘智取钓鱼台’。”

“对！是智取！我们这个方案就是让他们自己来投网！”叶剑英说。

“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你决定！”

“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

“那就后天！东兴同志安排好后，通知我们，也通知那几个人。”华国锋说，“我们要不要履行个手续？”

叶剑英把手一挥：“不啦，这些形式将来再补！”

“好，将来再补！”华国锋心服口服地说：“到底是老同志，经验丰富，计谋高强，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哪！”

“互相学习吧。”叶剑英说。

最后，他们又就实施这一行动方案的人选和具体办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决定由汪东兴安排，华国锋和叶剑英共同指挥。

第二天清晨，中联部部长耿飙接到华国锋秘书的口头通知，要他到华国锋办公室去，说有重要工作研究。

耿飙进了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和颜悦色地站起来，亲自给他倒了杯水，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要交给你一件任务，需要你很好地、不折不扣地完成。”

从华国锋亲自给他交待任务来看，这位老战士立刻猜出，这件任务事关重大，非同寻常。耿飙恭敬地表示：“我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是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如果出了差错，就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所以，剑英同志和我特意选择你来执行任务。”

耿飙这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呼吸也加快了。他说：

"请华总理下命令吧！"

一种至高无上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一字一顿，字字分明地说："命令你带领卫戍区的部队，去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给你安排。接管电台以后，所有的电台工作人员，都不准擅离工作场所，所有的广播内容，都要经过中央专门小组的审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请示！"

"请放心，我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

"那好，具体出发的时间，人员安排，采取哪些步骤，你和汪东兴同志再详细研究。"华国锋把一张由自己签发的接管命令交给他，很信任地握着他的手说："干吧，党和人民在看着我们呢。"

此时，耿飙才清楚地认识到，决定中国今后命运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四

九号楼的主人起床后，掀开了10月6日、星期三的台历，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天。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天中国将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

叶剑英吃饭后，照常散步。只不过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要注意电话，认真作好记录，不要遗漏一个字。"

直到下午3时30分，那台红色电话机终于响了。秘书接了电话，向他报告："今晚8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怀仁堂。"

18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坐上红旗大轿车，向城里急速开去。

此刻，提前到达怀仁堂的华国锋，忐忑不安地望着空空荡荡的会议室，焦急不安地踱着步，等候叶剑英的到来。

按照预先安排，宽阔的会议室，撤走了所有的桌椅。只是中间摆放一扇屏风，将大厅分为两半，对着正门的这一半前厅里，安置了两张罩着白色套布的高背沙发，只留给审判罪犯的人坐的。

"剑英同志出发了吗？"华国锋问。

汪东兴说："已打过电话，说叶副主席已经来了。"

华国锋长长地"噢"了一声。

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车，开进了中南海，来到怀仁堂门口。叶剑英和警卫参谋 下了车，刚要往里走，守卫怀仁堂的警卫拦住了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除首长外，任何人不得入内。"

叶剑英也吃了一惊，当警卫科长再次过来向他的随身人员说明是纪律后，他从他的警卫参谋手里接过文件包，大步迈进大厅。

华国锋看见他，急忙迎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可来了。"

华国锋身着合体的灰色中山装，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好像年轻了十多岁，只是神情有些紧张。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平头，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暗暗地计算着时间，等待着那个时刻。

汪东兴看时间快到了，安排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准备好的那两张椅子里坐下。叶剑英对汪东兴说："你也坐下嘛。"

汪东兴笑了："我不是常委，不能坐，我还另有任务。"说着便闪到屏风后面去了。

不错，汪东兴是负责这次行动的前线指挥官。

耀眼的车灯疾驰而来。伴随着轻微的刹车声，一辆又宽又大的红旗豪华型高级轿车，停在了怀仁堂的前门口，王洪文从车门里钻出来，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进了大门。

从横廊里前来迎接他的，是四个威武高大的穿军装的战士，他们齐声命令他："不准动，把手举起来！"

王洪文的头皮唰地一麻，像电打似地呆住了。他立即稳住身子，厉声喝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当警卫战士上去铐他时，他已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声朝外喊："来人哪！"飞起一脚，向冲上来的一个战士踢过去，撒腿就要往外跑。另一名战士冲过来，使劲抓住他的脖领子，差点把他摔倒。

王洪文站稳脚跟，要夺战士手里的武器。突然，一只大拳头击中他左侧的太阳穴，把他打得后退了好几步，脸朝上倒在地毯上。

王洪文毕竟体格强壮，他忍着疼痛，又跳起来，摆出一副格斗的架势，大声吼叫："你们要干什么？想造反？"

四名战士又冲过来，一齐上手，捉住他，把他摔到地毯上，有个战士又狠狠地给了他一拳。战士们给他戴上手拷，又把他提起来，推到叶剑英和华国锋面前。他虽然迷迷糊糊，但还清楚地看得见这里的一切。是的，这下他全明白了。

叶剑英从紧绷的嘴里吐出四个字："自作自受！"

华国锋淡淡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念道："……王洪文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经中共中央决定，对王洪文进行隔离审查！"

念完，华国锋向警卫战士使了个眼色，战士们一拥而上，把他从旁门押了出去。

张春桥接到开会通知后，带着文件准时来到了怀仁堂。当他下了车，见随身警卫被守卫门口的卫士挡在外面，瞪着眼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早已等候在门内的行动组人员迎出来，领他推开了怀仁堂的大门，走了进去。

张春桥四处张望了一下，没见他的位置，脑子轰地一声要炸裂了。刚要转身，后面跟上来的4名警卫人员中的其中一个，猛推了他一把："站好，不准动！"

如同炸雷击顶，张春桥的脸一下子变成蜡黄色。那焦灼而失神的眼睛瞪着华国锋连声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两名战士早已把他扭住，给他戴上了手铐。他长叹一口气，不由得垂下了脑袋。

华国锋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4名武装士兵，将他押了出去。

姚文元乘坐的上海牌轿车，正朝着中南海快速开来。

他比通知的时间晚到了20分钟。本来他想去江青处见一下她，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等开完会后再和她碰一下情况，也许会更妥当些。他走下轿车，忽然发现皮包忘在车里了，又拐回去拿了一次皮包。当他进了怀仁堂，抬头一看，好生奇怪。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正站在大厅里说着什么。他们旁边，威武地站着几名武装人员。他们看见了他，没打招呼，更没有和他握手的意思。两位军官迎面向姚文元走来，说："你先到东廊休息室里等候通知。"接着便把他领到了大休息室里。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闹崩了？怎么不见王洪文和张春桥？一种不祥之兆袭上了心头。他几次想站起来走出去问问。但一看守在门口的那几名武装人员，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自己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其实才几分钟，只见进来三四名军官。他隐隐约约认出其中的一个好像是中央警卫局的一名副局长。

"姚文元，你知道吗？"那名军官非常严厉地说，"王洪文、张春桥已经被隔离审查了！你和他们相互勾结，同样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我奉命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懵了，浑身不住地颤动，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后退了两步，想夺路逃跑，可是两腿根本不听使唤了。这时，站在旁边警卫的战士，朝他冲了过来。

"别，别，别动手。"姚文元立刻瘫倒在地，手里的皮包也扔到地板上了，警卫战士把他从地上拖起来，给他戴上了手铐。他慌得连忙对人们说："我有错误，我愿意检查！我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

华国锋从隔壁的小窗口里看着姚文元的狼狈样，心里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痛快。

负责保卫江青安全的警卫部队，接到中央办公厅和部队的紧急命令，让他们立即集合起来，听重要文件的传达。

战士们听到命令，很快上了车，被拉了出去。与此同时，另一支警卫部队，迅速接管了江青在中南海的201大院，开进了她的住宅区。

江青坐在写字台前，揉了揉眼睛，重新戴上眼镜，翻开了桌上的那本《自然辩证法》。忽然，另一张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江青握着话筒，满脸怒色："什么事情还非得要见我？我不见！你们有事，找秘书们去谈！有什么中央的决定，我也不听。我再说一遍：我现在谁也不见！"

"这恐怕由不得你了吧！"

随着话音，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5个警卫人员，其中有两名女战士哗地冲了进来，乌黑的枪口对准了她。

"你们是干什么的？"

江青吓得打了个激灵，手中的话筒"啪"的落地，眼镜也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她赶紧用手扶住，把眼镜推上去。又厉声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有什么手续？"

一个个头高大的中年军官走过来，把华国锋签署的一份中央决定给她亮了亮，说："我们是中央办公厅派来的。根据你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江青完全慌了，两手发凉，但她不甘心地质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江青，绝对错不了！"

"这是阴谋！这是阴谋！"江青忽然双手捂着脸，大哭起来。"毛主席刚刚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啊！你们怎么能跟着他们干这种事呢？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反共的右派政变！"

"算了！"那名军官微微一笑。嘲弄般地说："我看你别再演戏了吧！走吧，到你该去的地方，好好反省吧！"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请你们把华国锋给我叫来，我有话要当面问他！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竟敢对我如此无理？"

"放明白点！"中年军官决定对她不再客气了，把脸一沉，厉声说："现在不是你耀武扬威的时候了，你无权提这些问题！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这里是我的家，我哪里也不去！主席遗骨未寒，你们就要背叛他，这是没有好下场的！党和人民决不允许你们胡作非为！"

中年军官向身旁的武装女兵挥了一下手，那些女兵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她们冲上去，将江青拖下沙发，强行给她戴上手铐。将她连推带拉，押了出去。

华国锋听到江青被捉住的电话后，高兴得连声叫好。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叶剑英跟前，再一次紧紧握住他的手，许久不放开。过了半晌，才激动地说："剑英同志，多亏了你！你帮助我们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民族，我建议由你担任中央主席。"

"不！"叶剑英拍拍他的手说："我叶剑英和他们斗了整整十年，一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我叶剑英完全是为民除害。这个主席，还是由你当！你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将全力帮助你，辅佐你，完成这个历史时期的转变！"

华国锋激动半晌，才转身问汪东兴："毛远新怎么样

了？这家伙有武器，可要小心哪！”

汪东兴说：“放心，他跑不了！”

毛远新坐在沙发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简直入迷了。

突然，门口出现几个军人，而且带着武器。

毛远新认出领头的是李连庆，是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和自己也挺熟悉，但他们不召而至，神色很不正常，不禁有点目瞪口呆。

“老李，有什么事吗？”

“准备给你另外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

“那要收拾一下，还要带点东西。”

“不要了，什么也别带，现在就走！”

毛远新脸刷地变了，冷笑一声，“原来你是要抓我？”

李连庆也严肃了：“你说得不完全对，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向你传达一件事。”他拿出中央的决定，说：“中央对你隔离审查，我只能无条件地执行。”

没等毛远新缓过劲来，其余几个军人一起上手，从他身上搜出了手枪，命令他出门、上车。临上车时，他转过身，凝望了一下他的住地，轻轻说：“伯父，再见了！”

1976年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大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远非是寻常的。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个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当通过粉碎“四人帮”的决议后，叶剑英举起酒杯，同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碰杯相庆。整个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笑声。他们热烈地祝贺自毛泽东逝世以来，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胜利。

（师东兵）

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写的一首反动诗。

1976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此，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976年一号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决定充满怨恨的《二月三日有感》。文曰：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其中“又是一个一号文件”，是因为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过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一号文件。表明他在同时发泄对这两个一号文件的不满。“真是得志更猖狂”是借用《红楼梦》中说贾雨村“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语谩骂邓小平和华国锋。“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直接是对当时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邓小平，同时也是对刚刚上任的华国锋的诅咒。《有感》的末尾引用的是王安石当宰相以后写的《元日》一诗。是张春桥借以穷凶极恶地发誓，他是要“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不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决不罢休。

这个《有感》最终成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铁证和失败的可耻记录。

笑话五则

一　水浒和水壶

大巴山区开会，响应上级号召批判《水浒》，要求家喻户晓、人人上阵。一位没到会的老农民听了家人含含糊糊的传达，把《水浒》听成了“水壶”。他又急又气，背上儿子退伍时带回家的那只军用水壶，跑到公社找书记说：“听说你们要批‘水壶’，我带来了，不知这水壶犯了哪条法？”

书记一时也说不清楚，只得简单解释：“老人家，你的水壶没犯错误，我们要批的是宋朝的《水浒》！”

老头子放心了：“阿弥陀佛，亏得我家里没有那号水壶。”

二　喷气式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人时，采用的一种法西斯式的体罚形式。

“文化大革命”中开批斗会时，通常是由两个彪形大汉站在被斗人的两旁，用手按被斗人的头、脖子，同时各向后使劲拉被斗人的双臂，再向高举，扭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故被形象地称为坐喷气式。这种姿势使人十分难受，特别是对于年纪大、腹部隆起的领导干部是一种极不人道的体罚。

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愤怒地指责，甚至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但康生、江青一伙却一再煽动、纵容。1967年7月18日，戚本禹在同江青等人经过连夜的策划后，具体布置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时讲，批斗"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切不可怜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党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造反派们肆意揪斗，并搞"喷气式"，何况全国其他蒙冤受屈的人！这就是林彪宣称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在实际中的一个具体表现！

三　标语转了个九十度弯

1976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某地大楼的墙尾处出现一幅大标语，正面看是"邓小平打不倒"，见者都大惊，有人叫好，有人叫报公安局。待沿墙转过九十度弯，才见还有几个字在后接着："造反战士非好汉！"

见者慢慢体味这幅有意那样张贴的标语，才明白张贴者"一语双关"的含义，既为邓小平鸣不平，又谴责了造反者们。

四　"帽子"博览

"文革"中盛行扣"帽子"，对万事万物都要"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下面罗列一串曾见诸作品中的"帽子"，虽然是挂一漏万，却可以略见一斑。

1、被捕过的革命者——叛徒

2、从国外回国的人和地下党员——特务

3、旧军队的起义人员——军阀

4、对方针政策提过意见的人——反党分子

5、领导干部——走资派

6、曾经意见一致，后持相反意见的人——投降派

7、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人——野心家

8、与刘少奇等同志有过联系，意见一致的人——黑线人物

9、与刘少奇一起照过像的劳动模范——工贼

10、不满林彪、"四人帮"而有所表示的人——现行反革命

11、上级派下的，不合红卫兵、造反派意的人——黑手

12、红卫兵、造反派不喜欢的文人——黑秀才

13、提高人民福利——经济主义

14、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民主派

15、缓解矛盾，提倡各自作自我批评——中庸之道

16、受蒙骗而有所觉悟的人——变色龙

17、敢于说公道话的群众——小爬虫

18、保护革命干部的人——绊脚石

19、老实厚道的人——老好人

20、做好人好事的小朋友——小绵羊、小修苗

21、新干部——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22、批评上级——攻击领导

23、不说话——暗中盘算

24、闭上眼睛——怀恨在心

25、建立规章制度——管、卡、压

26、关心群众生活——搞物质刺激

27、实行按劳分配——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28、自觉遵守纪律——奴隶主义

29、钻研技术——走白专道路

30、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任务——唯生产力论

31、学习别人的长处——经验主义

32、劳苦功高——吃老本

33、本单位没有敌人——阶级斗争熄灭论

34、本工种只适应男同志干——大男子主义

35、火车安全正点——业务挂帅

36、保证正常生产——以生产压革命

37、戴红领巾——复旧

38、穿花衣服——低级趣味

39、烫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40、讲恋爱——黄色下流

41、梳小辫子——缺乏革命精神

42、梳小髻儿——政治上幼稚

43、梳鬈儿——封建残余

44、照逆光相——向往黑暗

45、文化考试——智育第一

46、作业评分——分数挂帅

47、将科学技术搞上去——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48、学雷锋——不搞阶级斗争

49、体育竞赛——锦标主义

50、发奖品——物质刺激

51、出国访问——里通外国

52、进口货物——洋奴哲学

53、循序渐进——爬行主义

54、收听外国节目——偷听敌台

55、自杀——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

五　白卷英雄

群众对交白卷、但却被"四人帮"树为"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的蔑称。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白塔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长。1970年，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以后，他一直想通过上大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院

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查。江青一伙出于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目的，合谋攻击这是“坚持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并让当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找一块打人的石头”。恰在这时，参加辽宁兴城考区的张铁生几乎交了白卷（语文得38分，理化得8分），眼睁睁录取无望，他便在理化考卷的背面抄录了事先备好的一封信。信中标榜自己是“为人民热忱忘我地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在发泄对文化考查极为不满的同时，又写道“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加以照顾”。

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的信加以修改，责令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样，《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再由全国其它报刊转载后，轰动一时。姚文元控制的宣传舆论界诬蔑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对”，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矛头指向对教育界着手整顿的周恩来总理。与此同时，江青吹捧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此后，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入了党，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广大群众气愤地说：“勤耕苦读多少年，不如白卷香又甜。”嘲讽地叫他“白卷儿英雄”。

张铁生从此忠实追随江青一伙，干了许多坏事。“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受到了应有的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选自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迎接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记1976年3月贵州街头“七人大字报”

寒流急时暖气吹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们国家的政治气候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倒春寒”。“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制造了一股又一股“寒流”，侵袭着祖国大地。

在这一股股“寒流”中，最使人感到寒凛和不能容忍的，就是“四人帮”疯狂破坏国民经济，扼杀四个现代化。他们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污蔑为“资本主义化”，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提出四个现代化蓝图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在四届人大宣布四个现代化蓝图的敬爱的周总理，指向积极实行四个现代化的敬爱的邓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

就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险恶日子里，仍然处处惊雷响，大地暖气吹。真理同谬论、正义同邪恶激烈地搏斗着。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贵阳街头贴出了一份标题醒目的长篇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它的中心论点和“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针锋相对。这是一张真正反潮流的大字报，它理直气壮地宣传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它勇敢地捍卫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亿万人民朝夕盼望的四个现代化。大字报大声疾呼：

——“现在，……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设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国在目前时期所应当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我们完全相信，崭新而强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一定会象巨人一样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说得何等的好啊！在“四害”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这种见解多么难能可贵！它反映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它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人们围着它，一层，又一层，轻读，默记，摘抄，批上支持的赞语。很快，这份大字报的中心论点传遍了工厂、机关、学校、家庭……

当人们读完大字报，总是满怀敬佩，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字报末七个堂堂正正的落款：贵阳制药厂李洪刚，贵州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制药厂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

这就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七人大字报”。

激流勇进七青年

“七人大字报”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贴出，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人们关心着这份大字报，更关心写大字报的七个青年。人们称赞着大字报的论点，更称赞这七个青年的大无畏精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郭成望、王大卫是下乡知识青年外，其余五人都是贵阳一中学生，不同班级，彼此也并

不熟悉。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战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锻炼、成长。就连本来不那么关心政治,在全班是唯一的一个既非团员又非入团申请人的黄维鸣,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也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六九年,根据国家的安排,七个青年先后进厂当了工人。在新的岗位上,他们仍然以同样的激情,关心着国家大事,继续战斗着。但是,斗争的发展,许多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特别是林彪自我爆炸,使他们震惊不已。震惊之余,他们问自己:"我为什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们开始冷静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看到:几年来,既有许多值得珍贵、需要继续发扬的东西;也有不少令人遗憾、发人深省的教训。激情,在他们身上保持着;理智,在他们身上增长着。

在工厂里,他们从周围工人、干部顶着干扰破坏,辛勤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平凡劳动中,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榜样,不禁脸红、心跳。在社会上,他们从某些"反潮流好汉"的拙劣表演中,依稀看到了自己过去盲目莽撞的影子,不禁懊悔、气愤。他们还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从中吸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他们开始懂得:怎样把自己的前途和党、祖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四届人大终于胜利召开了。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多么鼓舞人心啊!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青年人的未来,一片光明。李洪刚等七个青年,同全国人民一样,对现实充满喜悦,对前途充满信心,大家喜欢谈的是四个现代化,希望干的也是四个现代化。可是,三、四月间,相继出现姚文元、张春桥的两篇大块文章,通篇不提四个现代化。这是为什么?他们长久地深思着。

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许多事情更令人难以理解了。革命的真理,一夜之间变成了"奇谈怪论";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变成了"推行修正主义纲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被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

一月十二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五天,在贵州无线电厂的一间宿舍内,李洪刚、叶忠源、黄维鸣、陈明云、卢炎又聚集在一起。泪眼不干,忧愤焚心。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他在四届人大讲坛上那坚毅热情、震撼寰宇的声音,仿佛正在这小小的房间内回响。祖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四个现代化的事业,这些经常讨论、关心的话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严峻地、急迫地、集中地摆在这五个青年工人面前。他们从下午两点,一直交谈到夜幕低垂。

李洪刚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激情,严峻地说:"不管张姚他们要干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命运必然是可耻、可悲的!"停了一会,他接着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多次的看法,写信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向全国人民汇报。一定!"

他环顾同志们,他看到四双眼睛,回答是明朗的、坚定的。

耿耿丹心涌笔端

李洪刚等五人决定写一封阐明自己观点的信,报告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谁来执笔起草呢?李洪刚最先想到的,是那个今天没有到场的郭成望。厂里对郭成望的评价是:进厂工作以来能积极参加厂和车间的各项政治活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工作埋头苦干,强责任心,服从分配。当"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很多人把藏书当故纸卖出的时候,郭成望却跑到书店买来了《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郭成望没有辜负大家的委托,他欣然同意执笔起草。

狭窄的斗室,十五瓦的电灯,四百度的眼镜。案头,摆着省吃俭用买来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床上,堆着长年累月写下的读书笔记。面前,是铺开的稿纸。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又十分熟悉地回响在耳畔:"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是呵,"首先",首先应当拿自己学到的一点东西,为从理论上阐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服务。想到这里,他更感到了肩上的责任,他旋开了钢笔。

时间,在笔尖下悄悄流逝。稿子,一页页写出,在五个青年的手中传阅。后来,由于共同的志向,王大卫也积极加入了这个战斗的行列。他们以近乎于挑剔的认真的态度,对草稿反复琢磨。在黄维鸣新婚的小家庭里,一次又一次,他们阅读、讨论、争辩、改写、熬更守夜。有时,夜深了,寒气逼人,他们只好移到小灶房里,几个人你靠着我,我倚着你蜷曲着腿,借着炉温取暖,继续进行热烈的争论、推敲。

就这样,李洪刚几乎忘记了爱人即将临产,郭成望不知道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是怎样度过的。一稿、二稿、三稿……整整五十天过去,想说的话,已经痛痛快快地说了出来。终于定稿了!

三月三日晚上,厚厚的九十多页稿纸,静静地躺在黄维鸣家的桌子上。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凝聚着七个青年的智慧,七个青年的心血。

此刻,他们正在信稿的篇末,庄严地写下自己的誓词和姓名。

李洪刚第一个拿起笔来:"我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上，依据我国宪法和党章的具体规定，对党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新时期的有关任务提出几点建设性的看法，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最后审定。这封信的立场和内容，完全代表了我的思想和立场，我对它负完全责任。”

第二个写的是叶忠源：“……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提出这些看法，我对它负完全责任，敬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审定。”

接着，黄维鸣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伟大的祖国现阶段的发展，此篇文章的内容，代表了我的思想、立场和观点……”

第四个签字的是郭成望，这个执笔者的态度自不消说；王大卫、陈明云、卢炎都相继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和誓言，坚定的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

铮铮誓言，耿耿丹心。李洪刚站起身来，郑重地把稿子交给王大卫。他，将担负起繁重的抄写任务，让这份三万多字的信稿，变成大字报，贴上街头，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

斗争何须怕断头

三月九日起，黄维鸣的家里，八十多页大纸的大字报，装订成册的三百份油印材料，已经把他们的命运和党、祖国、人民、四个现代化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今晚，大字报就要上街！卢炎和陈明云就要携带油印材料北上散发；保卫四个现代化、向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公开挑战的战斗就要打响。战友聚首，此时此地，该有多少话语涌到嘴边，该有多少往事浮在眼前。

七个人，何尝没有想到过这场斗争的危险、艰难，思索过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六天前，当他们在大字报稿上写下自己的决心、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就清楚地看到了“四人帮”迫近的魔影。谁没有父母双亲，妻子朋友？六天来，在紧张抄写、刻印的同时，他们各自安排了“后事”——他们准备着大字报贴出后可能遭受到的最坏的境遇。

黄维鸣的妻子已经怀孕，他找到了两位女同学，说明情况，请代为照应。她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放心去干，出了事，我们住到你家里去，轮班照顾……”

为筹措北上路费，七个人每人要在不多的收入中拿出三十元。李洪刚家里仅有十元钱了，他找到厂里的桂师傅，说明情况，向他暂借二十元，表示一定归还。老桂说：“这种时候，还说什么还不还？你爱人刚生小孩，有困难，我知道。钱，下午上班，我给你送来……”

父母年老，郭成望给姐姐写信，说明情况，请她回来照顾老人。一位老同学知道后，主动找上门来：“不管你这个独子出了什么事，家里的两老，一切由我包了……”

在这样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来，使这些面临逆境的年轻战士，更加懂得了“友谊”、“同志”的含义，更加坚定地走向明天！

“请你记住：我不仅忠实于你，而且忠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郭成望正在给他的女朋友写信：

“……‘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马克思），我完全了解我们的民族需要我拿出什么，我没有任何理由感慨自己的个人不幸。

“假如我不幸离开人世，我给你的这最后一封信，就将是我留给你的遗言。你以这封信将为我证明：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青年，永远忠实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诗一样的语言，凯歌般的豪情，壮丽的青春！

当郭成望写完这封致女友的信时；当叶忠源、王大卫与自己的女友话别时；当陈明云、卢炎拿着简单的行装，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庭时——正如李洪刚所说：“已经是‘义无返顾’了！”

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青年工人郭荣、彭荣钦，一直关心着这份大字报的进展。当他们看完这份未贴出的大字报后，激动地说：“写得好！我们坚决支持！”

七个人的心更踏实，更坚定了。他们从贵阳矿山机器厂的两个工人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工人支持的态度，而且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心。

黄维鸣的母亲，从女儿那里得知儿子和几个青年在写什么文章，心里即刻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石，她担心孩子们超出了原则，卷进社会上的所谓“反潮流”里去。

她匆匆赶到黄维鸣家里：“你们在干啥？要是超出了原则，怎么得了啊？”母亲的两腮，挂着无比担忧的泪珠。青年们连忙围住母亲，安慰，解释。

李洪刚说：“黄妈，你别担心，我们写的，保证合你的意。你看，现在酱油都买不到……”

“这倒是，不生产，哪里有啊？”母亲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补充着李洪刚的话。

“是呀，我们写的就是讲要发展生产，实现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四个现代化呀！”李洪刚接着说。

黄维鸣立刻拿来了大字报稿，耐心地读给母亲听。

听着孩子们引用的一段段革命导师的教导，黄妈妈不禁想起自己跟随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读着读着，她慢慢理解了七个青年人的行动，心里的千斤重石坠地，眼前豁然开朗了。

是出发的时候了。

他们走向街头：抱着大字报，挑着浆糊桶。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郭荣、彭荣钦加入了这个行列；一个来自鸭池河畔的农村民校教师，了解到这张大字报为的是保卫四个现代化，立即表示支持，也毅然加入了这个行列……

三月十日凌晨，大字报贴出了。凛冽的朔风，迎面袭

来，令人发噱。但是，“七人大字报”的作者、支持者和广大群众，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不移地相信：现在既是残冬，春天也就不远了。

革命洪流无阻挡

大字报贴出了。犹如空谷一声呼喊，回响来自四面八方。

三月十二日，郭荣和彭荣钦贴出了第一份支持的大字报。接连几天，支持的、赞扬的大字报、小字报、批语、标语，不断出现；从长沙、武汉、郑州，从上海、甘肃、吉林等许多地方，给李洪刚等人寄来了上百封热情洋溢的信函。

一张支持的大字报上说：你们“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而不顾个人安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一张支持的小字报指出：“此大字报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表示支持、赞同。……一两个林彪式的个人野心家，打着各式各样的革命口号，妄图阻止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前进，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碰得粉身碎骨。”

《浙江日报》的一位同志，看到了邮寄到报社的油印材料后，满腔热情地连续几次来信，对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并寄来一些资料，鼓励李洪刚等人坚持斗争。他在来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已经把浙江搞得一塌糊涂，不堪言状了！……”

长沙一位工农兵学员给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来信说：“倘若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像你们那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帝国主义预言家的梦想就会象长江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

来自武汉的一封信说：“……我为你们的勇敢精神所激励，并支持你们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

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有一位工人来信说：“三月份，我从上海来贵阳办事，在火车站见到你们写的一封信，……内容很丰富，……深表支持和同情。”

一些革命老干部，冒着被打成“黑后台”、“走资派”的风险，对大字报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的支持。

当然，七人大字报像中流击水的岩石，在它的周围也激起了层层浊浪。它触动了“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干将、爪牙们虚弱的神经。他们甩出了帽子，抡起了棍子。张明阴阳怪气地说：七人大字报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说是反革命大字报，可以上这个纲；说反动大字报，可以说肯定。”有几个帮派同伙，大写什么耸人听闻的“紧急报告”，狂叫对几个革命领导干部要“立即拘留”、“审查”，要立即全部逮捕“七名炮制反动大字报者及其后台”。这张大字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一时间，乌云翻滚，浊浪排空。

“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的大头目收到大字报油印稿后，立即叫人摘要打印，第二天就报给了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一下子就嗅出了这封信所反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对他们是何等可怕的威胁。他半藏杀机、半是悲鸣地在上报材料上批了“看来修正主义（在“四人帮”的语言中，“修正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后继有人”之类的话。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严峻的真理。广大干部群众，总是和正义站在一起。这七个青年中，有四人在贵阳制药厂。不用说，这个厂的党委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党委的负责同志却始终关心着他们。为了摆脱社会上帮派势力的威胁，厂党委还对参与大字报的四个工人，采取了保护措施。有那么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厂里，声言他们代表“革命群众”，要调查李洪刚等人的政治表现等等。厂党委的同志严辞拒绝，坚决挡驾。后来，干脆请吃闭门羹。那帮人无可奈何，只得怏怏而去。贵州无线电厂的叶忠源同志，在参与贴出大字报之后，厂党委继续让他在厂里领导团的工作，后来厂里成立民兵营，又让他担任了民兵连的副指导员。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贵阳黔灵印刷厂，也都没有对黄维鸣、卢炎，组织什么“批判”。

热情的关怀、支持，来自各个方面，很多、很多……

李洪刚等七个年轻的战士，没有辜负广大群众的希望。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前进！

四月十二日，李洪刚和他的战友们，针对“四人帮”帮派同伙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阴谋，给中共贵州省委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我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地向党表示：关于这封信，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的几点看法，我们七个人对它始终负完全责任。”

一九七六年十月，大快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光明的中国，又大放光明。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

七个青年人为之挺身战斗的伟大事业，写进了金光闪闪的新宪法。

伟大的新长征已经开始，向四个现代化挺进的大军已经出发。党和人民，正期待着两年前写下了“七人大字报”的七个青年回答：今天，当你们曾经用战斗去迎接的光辉灿烂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时候，为了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们，将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将作出怎样的贡献？……

肖应荣　何光渝　张　克
邓洪泰　王保民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文革的最后一年，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尽管遭到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仍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性和生命力。

这一时期，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江青集团罗列罪名，将张扬投进监狱，残酷破害。

作为"四五"运动的产物和标志的天安门诗歌，在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集中显示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强大威力，不少诗歌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诗歌，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

诗歌《天安门诗词选》

（1976年清明节）

（选辑）

清明悼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
掏尽红心，
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
挥尽血泪，
难倾满腔悲愤思绪。
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
功高日月，声震环宇。
国际史上，
永载您的音容笑貌；
革命路上，
踏遍您的稳健足迹。
风云涌，鬼神泣，
巨星一陨天地哀，
四海五洲下半旗。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裙牵裾，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几个小丑嗷嗷叫〔儿歌〕

蚍蜉撼大树，摇又摇：
"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小说《第二次握手》

小说《第二次握手》是青年作家张扬的处女作。它通

过对我国老一代科学家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人解放前后曲折坎坷的遭遇和他们的科学工作、爱情生活的描写，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持正义、追求进步的可贵品质和他们忠诚、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的思想情操。小说深刻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他们才能找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归宿，个人感情上的创伤也才能得到完满愈合。小说以苏冠兰和丁洁琼之间长跨二十几年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关系为主要线索，其间又插入叶玉菡的爱情，从而展开了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作品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一版再版。继之，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话剧、歌剧、戏曲、电视剧、电影等也陆续上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小说最初萌发于一九六三年。当时作者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在北京一个化学家的家里，听到一些老科学家感人至深的故事，便悉心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写成了一个一万六千多字的提纲式的小说，题名《浪花》，得到很多青年学生的欢迎。十年动乱中，年轻的作者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六次修改原稿。先后题为《归来》、《归国》、《香山红叶》、《一代天骄》、《氢弹之母》等。每次手稿都不胫而走，在青年中广泛传抄，以至作者连底稿都未留下，每次不得不又从头写起。一九七四年手抄本传到北京，被某厂读者改名为《第二次握手》，辗转传抄，在当时北京青年中风行一时，以至惊动了"四人帮"一伙，被斥为"流毒全国"的"反党小说"。反动文痞姚文元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坏，而是"很坏"，是"搞修正主义"，下令围剿《第二次握手》和搜捕作者，企图通过这一事件，顺藤摸瓜，揪出一个反革命的"科学家集团"。次年初，作者被投入监狱，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因阅读、传抄这部小说而受牵累的人数以万计。作者在监狱中被关押四年之久，受到各种审讯拷问，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才平反出狱。

对这样一本普普通通的、并未直接涉及当时政治斗争的小说，"四人帮"为什么如此惊惶万状，大张讨伐呢？除了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外，主要是，这部作品热情地歌颂了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斗在科技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专政对象"，而这部作品却赞扬了一大批热爱祖国、爱科学、正直勤奋、为祖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四人帮"灭绝人性，不准写"爱情"，这部作品却大胆地表现了纯真、炽热的爱情，深入发掘了隐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人性美。正如作者所说：作品就是要有意识地唤起人美好的回忆和感情，促使人们向往被"四人帮"毁灭了的一切美好事物，激发人们的爱和恨。这种崇高的美的理解，对当时思想被"四人帮"禁锢得近于麻木状态的青年来说，正像那划过黑夜的闪电，使他们振奋、欣慰，感到如此亲切、吸引人。所以，这部作品在那样险恶的形势下，仍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丁洁琼是小说中写得相当丰满而有光采的人物。她不仅具有美丽绝伦的外貌，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纯洁、热情、忠诚专一的心。她幼年时代，曾随父母在海外生活过，因此养成了她开朗、奔放的性格；更由于她出身在革命烈士家庭，受到党组织和周总理的关怀、进步科学家凌云竹教授的抚养，她追求正义、追求进步、酷爱科学，具有非凡的钻研精神和毅力。在她身上，强烈的事业心、爱国心和对爱情的忠贞，紧密结合起来。她身处繁华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摒弃了一切灯红酒绿的生活，甘受孤独和凄冷，潜心学习。当她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获得了博士、教授的头衔，因发现"丁氏结构"而登上科学高峰时，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宁可不当科学大师，也决不放弃中国国籍。她参与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博得了世界声誉，但当她一旦得知战争贩子利用原子科学来屠杀和平居民的的时候，她坚决地揭露和谴责这种罪恶行径，甚至遭到五年的监禁迫害也毫不动摇。她和苏冠兰邂逅相遇，订情终身，从那以后，她一直坚守自己的诺言，对苏冠兰的爱，成为她历经人世沧桑的精神寄托，三十多年过去了，她的青春逐渐消逝，她的事业、名声也远远超出苏冠兰之上，但她却一直像初恋时那样，苦恋着苏冠兰。三十年后，她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祖国张开双臂热烈地欢迎她，她从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在爱情生活上，她却陡然坠入了痛苦的深海。苏冠兰已经建立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使她失去了本来应该属于她的幸福。她苦苦地思索：生活为何如此冷酷，命运为何如此不公？但当她想到祖国核子物理多么需要她去工作，想到这个悲剧是他们相识时那个社会造成的……。于是，她把个人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让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任意挑选一个角落，为祖国献出我的全部时光和精力。"

叶玉菡和丁洁琼同样有着热爱科学、追求正义、忠于爱情的品质，但她俩在性格上的区别，又是极其鲜明的。她纤弱、沉静、温柔、善良、默默无闻地工作，正正派派地作人，封建家庭和教会学校的影响，使她养成了一种近乎畸形的献身精神。她在苏家和苏冠兰一起长大，她半是感恩半是崇敬地爱着苏冠兰，她并不了解他，但她可以等他二十年而毫无怨言。另一方面，叶玉菡又不是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旧式的"温柔敦厚"的女人，有事关大节的时候，她是一个是非分明、行动果敢的人。小说中"暮色苍茫"、"东雅烈火"、"鲁宁将军"、"不速之客"等章节，出色地描写了她怎样见义勇为、掩护地下党员逃脱敌人追捕，放火焚烧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实验室而临危不惧，用自己的身体迎着特务的子弹，救了苏冠兰的生命。特别是小说的结尾，当她听说丁洁琼要离开北京远走他方时，她亲自赶到

机场，恳切挽留丁洁琼，以自己满布伤痕的心去抚慰丁洁琼的心，以她真挚的诚意感动了丁洁琼，极其感人地刻画了叶玉菡高尚无私的心灵美。使人感到她确是一支空谷幽兰，幽香浓烈而久远。

苏冠兰的性格较为复杂，他所走过的道路也更为曲折。青年时代的苏冠兰有理想、有抱负、体格健壮、思想开朗。“海上救人”、“车上显威”、“智救鲁宁”等情节都表现了他的正义感和侠义风度。在他第一次向丁洁琼打开了爱情的心扉后，他一直那样深情专注地等待着琼姐，但他最后没有得到她，而且铸成了终身难补的悔恨。造成苏冠兰爱情悲剧的原因，主要是黑暗的旧社会，具体表现为他那封建顽固、刚愎专横的父亲的淫威，和帝国主义分子查路德·卜罗米的助纣为虐。另一方面，这些人的阴谋诡计之所以能够实现，也与苏冠兰性格上的软弱分不开。他对违心的婚事也反抗过，但缺乏与旧势力决裂的勇气，因而也冲不破旧势力的罗网，使自己几十年中一直处于矛盾自责之中。他性格上的这些矛盾，也是社会环境、家庭教育给予他的。然而就是在他感情极度苦闷，生活极其清贫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减弱对光明的追求，仍然为了祖国，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甚至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为抗日军队配制、筹集药物，他几次放弃了出国与丁洁琼相聚的机会。对于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科学家来说，这正是他最可宝贵的高尚品质。

小说没有把这些人物的性格和造成他们之间的悲剧原因简单化，而是着意表现生活的多样性和思想的复杂性。小说描写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的爱情关系，绝不是旧小说中那种陈腐不堪的三角恋爱纠葛，而是为了展示主人翁对祖国、对科学、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优秀品质，为美好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第二次握手》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全书构思精巧，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曲折，悬念、倒叙、穿插、回忆等等安排得颇具匠心，富于传奇色彩，引人入胜。对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挖掘得比较深，描写感情细腻、善于通过细节揭示人物的心理。同时作品还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有助于表现主题。语言流畅，具有较浓的抒情味。

由于作者是第一次创作，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作品表现的时间跨度长（从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到五十年代的新中国）、空间大（从中国到外国）、人物多（从周总理到众多的中外科学工作者），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限，要把握住如此庞大的题材，还缺乏足够的生活阅历和艺术表现力。所以在人物、情节处理上，在对话的运用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概念化的影响，显得太直、太露。故事发展中还有些不近情理之处，例如丁洁琼和凌云竹夫妇过去情同父女，多年阔别重逢，却没有及时描写他们感情上的交流，等等。

流行口号

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二、“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三、“打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四、“深入批邓，搞好春耕！”
五、“粉碎四人帮！”

历史档案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

一九七六年来到了。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吟诵毛主席的诗词，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对夺取新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

悟。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努力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重新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千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乡村干革命，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百万干部奔赴农业第一线，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我国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专业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地面，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经胜利完成。我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这一切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二十多年来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正如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再次指出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列宁在批判那种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的折中主义观点时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什么是政治，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党的"九大"、"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的广大干部，要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认识这两个阶级和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地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它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要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象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撮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继续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

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搞工业也好，搞农业也好，搞其它工作也好，都要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都要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

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抓紧学习，教育和训练干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继续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彻底破产，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搞"声东击西"、玩弄"缓和"骗局最起劲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是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我们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加强战备，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指出了我们无限光明灿烂的前途和前进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曲折斗争，指引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披荆斩棘，奋勇向前。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向，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1月1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治丧委员会获悉有些国家的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吊唁活动，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活动。特此公告。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

（新华社1976年1月9日讯，1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公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特此公告。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新华社1976年9月9日讯，9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 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 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

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新华社1976年9月18日讯，9月19日《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编造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抬到吓人的高度，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鼓吹要继续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于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1月21日和28日　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此，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

务院代总理的决定充满怨恨的《1976年2月3日有感》，说中央的决定“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社论未点名地批判邓小平，诬蔑邓小平是所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邓小平还在搞“修正主义”。

2月下旬 江青、姚文元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江青私自召集参加打招呼会议的17个省、市、自治区和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并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讲话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姚文元背着毛泽东，在2月25日发出了“工农业方面要考虑扩大批判”的指令。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煽动迫害老干部。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3月初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在党内指名批判邓小平。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社论诬陷邓小平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

3月5日 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十三周年的文章，文中引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删掉。报纸出版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质问。对此，王洪文说删掉题词是“屁大的事！”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

3月25日 《文汇报》在一篇消息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文中写道：“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一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激起了南京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斗争。工人、学生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喊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

4月5日 “天安门事件”发生。4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每天有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最多时达到几十万人，自发地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汇集。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并表示对代表党的正确领导的邓小平的支持。4月4日是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声讨“四人帮”，革命义愤愈益高涨。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天安门前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当时毛泽东病重，联络员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5日，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当群众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了，听说还有人被抓了，异常气愤，于是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被打伤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晚上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声言“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时30分，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警卫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

4月6日 凌晨，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且决定继续组织3万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会议还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

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

料通报全国，以便各地了解情况，有所准备。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7日，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5日晚上吴德的广播讲话。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现场报道”，捏造罪名，诬陷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是“反革命活动”，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毛泽东表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这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毛泽东补充说：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还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和“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此后就在全国范围内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4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诬称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7月1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病逝，终年76岁。

7月6日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医治无效，于15时1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1975年，邓力群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邓小平主持制订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胡耀邦提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江青一伙诬称这三个文件是“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他们在《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中，对三个文件横加罪名，大动干戈。社论称“三株大毒草”集中反映了邓小平“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系统地表达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观点”。社论编造说《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说《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说《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从8月13日到10月6日的50几天里，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文章就有110篇。

9月9日　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0时1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9月中旬～10月初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背着党中央，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凡重大问题都要向他们请示报告。从12日起，“四人帮”一伙动员人们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23日夜，姚文元布置一个单位给江青写信，说“你们给江青同志写一封信，表示你们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信写好后经我转。”在写给江青的一些信里，有的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王洪文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9月末，江青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江青离开大兴分校时，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王洪文在10月2日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标准像”，第二天又到北京市平谷县发表言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张春桥派人去上海通知“四人帮”的死党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10月4日，“四人帮”在他们操纵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分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最后夺权，6日上午，江青也拍了上台用的标准像。

10月9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

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经 济

4月21日　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生产、施工的京沪杭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建成并投产。这条线路全长1700多公里，纵贯8个省、市，穿过黄河、长江等200多条大小河流，安装现代化通信设备数千部(台)，各种元件近1000万个。这条线路容量大，电路稳定，保密性能好，抗灾和抗干扰性强。在一条线路上，能供沿途主要城市之间数千人同时通话。北京、天津、济南、上海、杭州之间，已通过1800路载波通信设备，开通了部分用户长途电话自动拨号业务，打长途电话就同在市内打电话一样，一拨号码，即可接通。这条线路是1969年底开始研制，1973年冬季开始施工的。

6月6日　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级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投产。新港位于金县鲇鱼湾，有两个深水泊位，可以分别停靠10万吨级和5万吨级大型油轮。大连新港是1974年11月开始建设的重点港口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用了一年半时间，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

7月6日　滇藏公路胜利建成并正式通车。这条公路是继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之后，从内地到西藏的第四条公路干线。滇藏公路南起云南下关，北至西藏自治区芒康，全长716公里，横跨金沙江和澜沧江，同川藏公路的南线接头，通往拉萨。滇藏公路的建成通车，进一步活跃了沿线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7月　中共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得不好。“四人帮”利用这个机会，唆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同伙发难，炮制了20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材料，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追查所谓“风源”，在会上公然谩骂国务院领导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外 交

2月21～29日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我国。毛泽东、华国锋会见了尼克松，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华国锋同尼克松举行了会谈。

3月15～24日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凯山·丰威汉率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华国锋同凯山举行了会谈。中老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于18日在北京签字。

4月15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佛得角共和国政府代表签署关天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4月25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4月18～24日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胡尼斯·穆巴拉克率埃及高级代表团访问我国。华国锋同穆巴拉克举行了会谈。

4月28～5月5日　新西兰政府总理罗伯特·马尔登访问我国。华国锋同巴尔登举行了会谈。两国政府关于航运互惠问题的换文于5月1日在北京签字。

4月30日　我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关于西藏之间的通商、交通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协定，从1976年5月2日起延长10年的协议，在加德满都举行换文仪式。

5月10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率代表团访问我国。华国锋同李光耀举行了会谈。

5月26～30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访问我国。毛泽东会见布托，华国锋同布托举行了会谈。30日，双方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并签订了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5月28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代表于纽约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2～9日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应邀访问我国。华国锋同比兰德拉举行会谈。

6月11～15日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埃·拉齐拉卡应邀访问我国。华国锋同拉齐拉卡举行了会谈。

6月20～27日　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应邀访问我国。华国锋同弗雷泽举行了会谈。23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出土文物赴澳大利亚展览的协定。

6月30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塞舌尔共和国总统于维多利亚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15～20日　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率代表团应邀访问我国。华国锋和克雷库举行了会谈。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议定书。

7月26～8月9日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应邀访问我国。华国锋同卡马举行了会谈。8月8日，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8月20日　我国政府代表同中非共和国终身总统于班吉签署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9月2日～9日　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

努马菲利应邀访问我国。华国锋同马列托亚举行了会谈。8日，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科 技

4月23日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7002钻井队打成我国第一口6,011米的超深井，第一次钻穿了四川盆地的全部沉积岩层，获得了深部地层含石油和天然气情况的可贵资料。这口超深井的钻探，还积累了战胜深部地层高温、高压和复杂地质情况等技术难关的经验。

5月12日　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施工的，用晶体管960路和电子管600路微波通信全套设备，建成以北京为中心，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通信干线。

7月5日　我国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在太平洋成功地进行了首次远洋科学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多学科的第一手资料。这次远洋科学调查的项目包括：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化学、海洋重力、海底地质、海底地貌、远洋通信、航海等多种学科。这次科学调查所使用的多种仪器设备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和安装的。

7月25日　地质科学工作者采用古地磁方法首次测出1965年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人”的年龄为距今170万年左右，证明“元谋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这样就把我国过去发现最早的猿人年代推前了100多万年，从而将祖国的历史开端推前到距今170万年以前。

8月30日　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考古人员两年来先后两次到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考察，他们在当地政府和军民的支持协助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文物发掘工作，获得了数以千计的文物资料。大量的文物资料无可争辩地证明，西沙群岛同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社会生活

3月8日　吉林省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这天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星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磨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15时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稍大块的直落在金珠乡九座村、南兰村一带；最大的3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去，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最后一块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这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达480平方公里，其间包括吉林市郊区，永吉县、蛟河县的7个乡，人口10余万，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和损失。中国科学院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一系列科学考察工作。收集的陨石有100多块，总重量为2,600公斤。其中最小块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3块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比美国诺顿陨石重691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吉林陨石收藏在吉林市博物馆，设有展览专馆。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它对于天文学、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宇宙化学、天体史、地球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5月29日　20时23分在云南省西部龙陵，潞西一带发生7.5级地震，22时0分在同一地区又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置为北纬24.6度，东经98.7度。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并派出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迅速进行救灾工作。由于地震工作部门对这次强烈地震有预报，在中共云南省委统一领导下，采取了预防措施，大大减轻了伤亡和损失。

7月28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8级，震中烈度为11度。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损失重大，累计死亡242,000多人，重伤164,000多人。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极大关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派出了大批医疗队、工作队，运出大批救灾物资，支援灾区人民的抗灾斗争。“四人帮”一伙却认为：“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了唐山算得了什么！”同时攻击党中央是“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

8月16日　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一带22时6分发生强烈地震。成都市和甘肃省武都地区有强烈震感。据全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2级，震中在北纬32.7度，东经104.1度。由于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曾作了预报，中共四川省委在事前采取了防震措施，因而损失很小。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7年

导　言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标志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在举国欢呼粉碎“四人帮”，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恢复过程中，人们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工农业生产开始初步恢复，科技文教等各项事业开始复苏，社会局势也趋于稳定。然而，长时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依然严重。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抓纲治国，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这些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对此，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两个凡是”及华国锋的“左”倾行为予以批评和驳斥。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工作，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业绩，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粉碎、揭批“四人帮”
-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
-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和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复职
- 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
- 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
- 中共“十一大”的召开
- 新时代的“红宝书”——《毛选》五卷的出版发行

粉碎、揭批“四人帮”

背景介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10月21日，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也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

材料：

- 历史性的行动——“四人帮”被擒内幕
- “四人帮”爪牙的武装暴乱准备及其被粉碎
- 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材料一　历史性的行动
——“四人帮”被擒内幕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总参所在地西山，召开了除“四人帮”以外的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采取果断措施，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并决定具体计划由汪东兴执行。

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于10月6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内容事先发了文件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规定，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改动文字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

当晚，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叶剑英只带警卫参谋一人，悄然从玉泉山乘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正襟危坐，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华国锋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汪东兴紧张地注视着门口。

深夜11点，姚文元准时“到会”。他像往常一样，下了汽车，昂首阔步，趾高气扬地向怀仁堂走去。他看到怀仁堂周围有许多军人全副武装在走动，并没有引起他的怀疑，他用平静的口气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也是开会的吗？”

“不是的。”服务员边开门边回答说，“不过电影放完了。”

“哦，什么片子？”有恃无恐的姚文元，既没有想到片刻能发生什么意外，他又没有部队生活经验，他连想都没想到哪里有部队看电影是带枪的呢？

“《反击》”服务员边回答，边给姚文元带路。

“怎么，会议室变了？”姚文元心里纳闷：“根据我的记忆，再往前好像没有会议室了。”

服务员一声没吭，走开了。

房间不大，姚文元从来没进过这个房间。里面亮着一盏台灯。昏暗的灯光照着四堵光秃的灰墙。写字台旁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军人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连屁股都没抬。他感到诧异，这位军人怎么这样大的架子，见了一个政治局委员，这样傲慢。忽听身后的门关上了。

军人走到他面前，严厉地宣布：“姚文元，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

顿时，一向不可一世的姚文元，乱了方寸，脸色煞白，头上冒着虚汗，慌得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好大一会儿，才颤抖地说：“我是有错误。要好好检查，好好检查……”

王洪文迈着潇洒的步子，来到怀仁堂时，已经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半个小时前，他在电话里听取了上海准备“起义”的行动计划。他有一种稳操胜券的感觉。他来

参加这个会是想摸摸对方动态，以达到知己知彼。

"你迟到了，"一位军人在会议厅门口，毫不客气地挡住了他，冷冰冰地说："你该准时来才对。"

他猛丁一愣，好大的胆子，奉谁之命，敢这样无理地对待我这大名鼎鼎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但他又一思忖，宰相肚子能容船，用不着跟这些区区小吏一般见识，那太有失身份了。他不紧不慢地说："开门吧！历史会原谅我们迟到一会儿的人，历史总是原谅胜利者的么！"

王洪文对自己说出这句双关语，自我感觉良好，既得体地回击了对方，又意味深长地亮了相。

突然，军人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拘捕令，摆在他的面前。倾刻，他目瞪口呆。"警卫，警卫！"他大声呼喊，夺路而逃。他四周一看，荷枪实弹的军人，虎视眈眈地把他包围了。他立刻明白了，大势已去。反抗也好，逃跑也好，都是枉费心机，无法挽回了。他气喘吁吁，战战兢兢地说："不要铐我，我走，我决不反抗。"

张春桥近些天来，睡眠很少，他在策划怎样出其不意地把对手一网打尽。片刻，他正在一盏宫式台灯下，摊开日记本，考虑着行动计划，把自己的设想记下来。忽听走廊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远而近。一向多疑的张春桥，本能地警惕起来。他忽地站起来，没经敲门，战士们便进来了，一切都明白了，他板起阴森森的面孔，装出一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样子。他眼睛燃烧着仇恨的火焰，紧紧抿着嘴，像哑巴一样，一声未吭。"你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警卫战士命令道。他装作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两名战士火了，上去扭住了他的胳膊。"你们不要太猖狂了。"他挣扎着，狠狠地瞪着战士嚷道："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跟你们算账的！"

张春桥不像王洪文、姚文元那样惊慌失措，他紧锁双眉，从衣架上拿起一件中山装，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装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然而，他还是扣错了两个钮扣。他一进汽车，便瘫倒在座椅上。

这次逮捕的4个人中的核心人物，是江青，由中央警卫部队的赵营长亲自带队。江青的住宅，赵营长来过多次，都是因检查工作而来的。这里一向戒备森严，别说一般人，就是党政要人也很难进入。

赵营长下了汽车，先把江青的内卫周金铭叫了出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立刻逮捕江青。"赵营长传达道，"你也应该积极配合，坚决执行这个命令！"

"是，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周金铭没有显出一点迟疑，旗帜鲜明地表了态。这位奉命保卫江青的内卫，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正义和良心，促使他服从了更神圣的使命。

他下令撤去住宅里外的警卫后，带领赵营长进入前厅，转身进内宅去叫江青。不一会儿，江青怒气冲冲地出来了，嘴里嘟囔道："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把我叫起来不可？"

赵营长用一种严厉的语气，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读了党中央的逮捕令。

江青听了，不知是惊呆了，还是没反应过来，她瞪大了眼睛怔了一会儿。忽然，她好像是如梦方醒，又哭又闹，倒在法国沙发上赖着不走。她大喊大叫："这是阴谋，是政变，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她拍胸顿足嚎啕大哭，活像一个泼妇。

江青演了一会儿戏，她用眼睛瞥了一下周围，个个都冷冰冰地望着她，无人买帐，无人同情。她自觉没趣了，擦擦眼泪，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反剪着双手，抬起头来，叫号道："告诉他们，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没放一枪，没伤一人，"四人帮"被一网打尽了。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

10月7日凌晨1时许，中联部长耿飚奉命接管了新华社。到天亮4时50分，公安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要害部门都陆续被卫戍部队接管了。没有响一枪。北京的居民都还在安宁静谧的梦中，但天却变了，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被铲除了。

10月7日，晴。朝阳升起，红霞满天。繁华的北京大街上和往常一样，上工的、上班的、上学的、车水马龙，谁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异样……

（摘自《中国大悲剧人物》）

材料二　"四人帮"爪牙的武装暴乱准备及其被粉碎

"四人帮"被擒，但全国的形势仍然是险恶的、严峻的。江青的追随者并不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们有一批不可小看的实力。

10月7日晨，中央军委作战室里的高频电话不停地紧张地工作着，全国各地的各种情况源源不断地汇报上来。决策人在紧张地调动着千军万马，去平息江青爪牙们的叛乱活动。

东北。毛远新是东北三省的"王"，他说一句话，东北三省的头头脑脑，都当作"圣旨"一样对待。他早已奉江青之命，在东北组织力量，只要江青一声令下，他就准备闹事。

清晨6时多，军委高频电话接通沈阳军区。叶剑英明确果断地命令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把毛远新抓起来。"

上海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一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由于它远离中央所在地，因此要攻下这个堡垒必定要费一些周折。

10月7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

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赴京开会。按照惯例，每次去北京开会都有"四人帮"事先通气，这次却发生了异样。一种不祥之兆下意识地袭向每个人的心头。

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心急如焚，不停地打电话到北京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却毫无结果。马天水要回的电话也无音讯。

10 月 8 日，上海一伙人更加紧张，不断设法与北京联系。中午 12 时许，才与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接通电话，房只简单地用暗语回道："我的老胃病发了。"意即"右派得势了"。然而，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摸不清。

下午 3 时，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金祖敏的秘书廖文金立即去北京摸情况。当晚，廖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娘心肌梗死了，即"四人帮"完了。

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办公楼召集常委会，会上纷纷议论，"北京发生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因此要"决一死战"。徐景贤、王秀珍表示，"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经过酝酿，决定从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徐景贤下了第一道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晚上 10 时许，徐景贤又将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找到一块儿密谋警备部队参加暴乱之事。同时，徐景贤派人分别去报社、电台、写作组抓笔杆子，制造舆论，与中央抗衡。

10 月 9 日凌晨，王秀珍一行来到民兵指挥部后，制定了民兵行动方案，确定了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秘密指挥点。凌晨 3 时许，配带武装的民兵分派到市区各战略要地。还有一些头戴头盔，手持枪枝的民兵开始了昼夜巡逻。

10 月 9 日，中央发布了两项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反复琢磨，摸不透中央倒底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行动。他们在上海市区设立的各指挥点架设了 15 座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日夜不停地进行联系。一千多名武装民警开始秘密演习。二百二十余辆汽车、摩托车飞奔着，向各个据点运送人员和物资。当晚，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

10 月 10 日，当徐景贤、王秀珍到了北京后，他们知道了在首都发生的一切。然而，他们自知此时不过是瓮中之鳖，任何挣扎都将是徒劳的。

上海仍在紧张地准备暴乱。不过，由于南京军区的警告，上海警备区已不再参加活动了。

12 日，留守上海的一帮人，汇总各方面情况，对"四人帮"的垮台已确信无疑了，因此，他们准备进行暴乱的步伐迈得更大了。

傍晚，他们一伙人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大讲"四人帮"给予他们的"恩典"，激起与会者一一表态：坚决干！马振龙说："一月风暴我们是拎着脑袋干的，今天我们仍要拎着脑袋干。"朱永嘉慷慨陈词："现在干，在明天天亮 6 点前干，炸毁桥梁、破坏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要占领要害部门，战斗一打响，就拉出横幅，造舆论，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占领电台，发表《告全国、全世界人民书》""我们要决一死战，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来。只要坚持一个礼拜，就会得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的。"王知常声泪俱下道："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歇斯底里地大叫："马上暴乱！马上暴乱！"肖木狂呼："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最后，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未在，决定等他们回来再干。但是，马上要做准备，拟在上海市郊设立三道保卫圈，控制上海重要机关及交通要道，并打出口令、暗语。黄金海还布置拟定了 20 余条反动标语口号。各系统都在向下一级吹风，要"召之即来，血战到底"。发放枪枝弹药，武装基层民兵的活动也在紧张地继续进行。

10 月 13 日上午 11 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返回上海。他们虽然在中央都作了保证，也知道中央对上海可能发生的暴乱做了严密的部署，但是态度仍然暧昧。

当晚，上海市委在锦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宣布了"四人帮"的彻底覆灭，在座的无不有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预感，一个个抱头痛哭，发出一片"完了，完了"的喊叫声。

11 月 14 日，中央打招呼会精神开始传达到一般群众，然而，内容却被大大压缩了，有关张春桥和上海市委的问题全部删除了，同时，还宣布了"四不准"，限制群众对打倒"四人帮"进行庆祝活动。

正义的行动是扼杀不了的。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师生，冲破种种阻力，首先上街游行。整个上海逐渐投入到欢庆"四人帮"倒台的洪流中。当日，廖祖康、肖木被押送北京。不久，包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内的上海一大帮"四人帮"的党羽，都被群众揪出来了。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终于加入了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行列中。

从 10 月 21 日起，全国人民纷纷举行声讨"四人帮"，欢呼人民胜利的集会游行活动。中国人民经过十余年的磨难和斗争，终于赢得了重见天日的喜庆时刻。

（摘自《中国大悲剧人物》）

材料三 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首都一百万军民，十月二十四日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盛大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广大群众表示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天，首都北京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天安门广场装饰一新，分外壮丽。巍峨的城楼上红灯高悬，红旗飘扬。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端挂在城楼的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两条醒目的巨幅标语："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了大会。当华国锋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出席了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大快人心的特大喜讯，使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英雄的首都人民今天一早就兴高采烈地从工厂、矿山、郊区人民公社、部队营房、机关、商店、学校和居民区，涌上街头。城郊的公路上，无尽的车队，满载着参加大会的群众驶向市区。他们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高举着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举着红旗、彩旗和标语牌，满怀胜利的喜悦，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东西长安街，涌向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和东西十里长安街上，红旗如林，人山人海，排满欢庆胜利的群众队伍。他们当中有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工人民兵，有身穿工作服的钢铁、煤炭、纺织等各个行业的工人，有郊区人民公社社员，有中央和北京市机关干部，有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有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有街道居民。广场上群情振奋，万众欢腾。"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表达亿万人民共同心声的激昂口号，如滚滚春雷，震天动地。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宣布大会开始。广场上锣鼓齐鸣，军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东方红》乐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吴德同志说，一个半月前，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极其悲痛之中，都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心着我党中央能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也关心着这个问题。这种担心和关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在我国的上空，确实是出现过一股乌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乘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之机，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家变色的现实危

险。我们党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吴德同志在讲话中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吴德同志指出，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证明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斗争团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处交路线和政策，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吴德同志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彻底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全国各地亿万人民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首都北京百万军民昨天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喜事。毛主席无限信任、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华国锋同志作我们党的领袖，使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为我党消除了一大祸害。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由来已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一再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评王张江姚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同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警告他们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同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待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不仅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极大。他们完全背叛毛主席谆谆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肆意篡改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抱成一团，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到处插手，煽风点火，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颠倒是非，制造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捏造罪名，乱扣帽子，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采取种种手法，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人民将陷于严重的灾难之中。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是我们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我们党就能步调一致，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谁要是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不得人心，身败名裂。过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十次搞分裂，十次都失败。这次，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人心丧尽，极端孤立，同样遭到可耻下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在欢呼我们党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

除掉"四害"，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祖国大地到处莺歌燕舞。"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这样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的步伐。我们一定能够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宏伟规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原载 1976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

背景介绍

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经济成为当时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所以在 1976 年 12 月 10 至 27 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同时，又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19 日刊登了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的社论，并于 1977 年 4 月在大庆油田召开了全国工业学

大庆会议。这场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要求恢复和发展经济，是正确的，但是运动在许多方面继续坚持和重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继续推行过去的一套“左”的政策。

材料：

- ·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 ·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
-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油田隆重开幕

材料一　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

全国人民热切盼望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这次会议是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决定召开的，是在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以后召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对于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步伐，发展我国的大好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寨，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我国七亿农民的方向。“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反对学大寨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加疯狂。他们是亿万贫下中农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去年九月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标志着学大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思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在华国锋同志报告和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农村迅速兴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高潮，带动了各条战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十分喜人。“四人帮”对学大寨极端仇恨，从会议的第一天起，就大肆干扰，妄图转移会议的方向。会后更是变本加厉，进行破坏。“四人帮”一齐出动，互相配合，全面否定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全面否定大寨的根本经验。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诬蔑为“矛头向下”，把农村整党整风诬蔑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大干快上诬蔑为“唯生产力论”。直到“四人帮”覆灭前不久，江青还窜到大寨，挥舞砍刀，妄图吹倒大寨红旗，把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的矛头公然指向毛主席，指向华国锋同志。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农业这个基础，把国民经济搞垮，把无产阶级专政搞垮。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年来围绕着学大寨和反大寨进行的尖锐斗争，深刻地表明：走大寨的道路，就是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在农民这一部分最众多的人口中，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必然要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拚命反对。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这次大会，是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大会，是愤怒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大会。要通过这次大会，在广大农村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学习华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有关的文件，抓住“四人帮”完全背叛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个要害问题，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联系农村的实际，揭发批判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倒大寨红旗的“三反一砍”的罪行。对“四人帮”批得越深越透，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越高，走大寨的道路就越自觉越坚定。

这次大会是总结经验的大会。一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原有的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个县跨入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我国农业生产战胜了多种自然灾害，夺得了连续第十五个丰收年。许多地区、许多单位顶逆流，战恶浪，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新的成就。他们的经验十分宝贵。认真总结交流这些先进地区和单位的经验，是一种生动具体的路线教育，对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这次大会是一次动员大会。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一九八〇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战斗任务。当

前，全国形势很好，城市好，农村也好。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还要足，发展大好形势，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我们相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这次大会，七亿农民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必将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必将进一步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我们一定能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搞得更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得更好，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原载197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狠批“四人帮”
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

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程。全国亿万职工满腔怒火揭批“四人帮”，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在革命和生产一派大好形势下，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通过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动员全党，动员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党中央即将在明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作好充分准备。

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执行“鞍钢宪法”，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敬爱的周总理一直支持和维护大庆，高度赞扬大庆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大庆极为关怀。华主席高兴地对大庆石油工人代表说：“向大庆学习！”全国广大职工爱大庆，学大庆。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大庆却恨之入骨。多年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反大庆砍红旗，破坏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四人帮”否定大庆的根本经验，胡说什么“两论起家是假的”，攻击大庆搞“唯生产力论”，是“生产典型”。他们处心积虑地阻碍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他们丧心病狂地扼杀为大庆红旗高唱赞歌的电影《创业》。他们控制舆论工具，不宣传大庆，不登工业学大庆的经验，大刮反对大庆的妖风。他们到处插手，兴风作浪，破坏地方和企业党委的领导，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极力把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打下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四害’横行何所惧，乌云压顶不低头”。英雄的大庆工人是革命的硬骨头，骂不倒，压不垮，昂首挺胸，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阔步前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庆红旗更加鲜艳。大庆工人阶级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响亮地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战斗口号。大庆红旗高高飘扬，大庆经验普遍推广，“四人帮”那套修正主义黑货就没有市场。“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同刘少奇、林彪一样，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滚滚洪流更加波澜壮阔，奔腾向前。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鼓舞全国人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的大好形势和有利条件，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革命加拚命，把“四人帮”干扰和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备战、备荒、为人民。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已经召开，我国农村必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农业动起来了，工业也要动起来。要立即掀起一个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新高潮。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推广大庆经验，提出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我们要下定决心，放手发动群众，苦战几年，在全国普及大庆式的企业，从现在开始，就要抓紧这件事。

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首先要抓好阶级斗争。我们要在工业战线掀起一个深揭狠批“四人帮”的高潮。要抓住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推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路线的要害，结合工业战线的实际，揭发批判他们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罪行；揭发批判他们对抗“鞍钢宪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反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罪行；揭发批判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工业学大庆，反对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罪行。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办社会主义工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斗争，是坚持还是反对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我们必须把“四人帮”那套修正主义货色，那套反动谬论，一条一条进行分析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前进，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

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

育，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把企业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强阵地。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搞一个学习运动。要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把被“四人帮”搞乱的东西纠正过来。在工厂企业里，我们必须遵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作坚决斗争。如果让那些上窜下跳，煽动停工停产，为非作歹，伸手要党籍要官的人为所欲为，工厂企业怎能搞好？要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企业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建设。要清除“四人帮”煽动资产阶级派性造成的毒害，加强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的铁人式的队伍。要依靠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勤俭办企业，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把生产迅速搞上去，努力创造新的水平。要抓好后进单位的转化，限期解决“老大难”。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国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让我们把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化作自己的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发展大好形势，以优异成绩，迎接明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原载 1976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油田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下，于四月二十日在大庆油田隆重开幕。

当华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王震、余秋里、谷牧走进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欢呼“向华主席致敬！”“向党中央致敬！”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华主席满面笑容，同大家一起鼓掌，共同庆祝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几经“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召开。

华主席在会议开始前，为大庆油田亲笔题词：“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华主席还为油田党委机关报报头题词：《大庆战报》。当这个喜讯在大会上宣布时，全场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致开幕词时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贯彻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走向天下大治的重要部署。

李先念同志号召大家，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由华主席亲自提议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建国以来我国工业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工业战线的代表，共达七千人。

这次会议在大庆体育馆举行。这一片地方曾经是英雄的大庆人当年头顶青天、脚踏荒原开展石油大会战的现场。

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并排高挂在主席台正中，两边排列着十面红旗。会场门口两侧的高墙上写着醒目的标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

会议开幕以前，华主席亲自率领中央部门和各地的领导干部、工业战线的各路英雄模范，千里迢迢，来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工业战线的样板——大庆油田。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和纷飞的雨雪，走遍辽阔的油田矿区，深入到采油井站、钻井现场、油田建设工地等基层单位和工农村，进行参观访问。代表们住的是“干打垒”和帐篷。他们把油田当作大课堂，联系实际找差距，虚习学习大庆人革命加拚命的英雄气概，严细认真的革命作风，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为革命刻苦钻研技术的坚强毅力。他们认识到：办工业就要按照大庆的样子办；工业学大庆就是要走大庆的道路，也就是走毛主席指引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像办喜事一样，兴高采烈地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友。辽阔的油田上，到处呈现出一派欢腾的景象。油田的千家万户和各单位都贴上一幅幅大红对联。在高高的钻塔上，星罗棋布的油井旁，繁忙的油田建设工地，遍布油田的工农村，到处彩旗飘扬。

二十日下午三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开幕。全场欢声雷动，高唱《东方红》。

李先念同志致开幕词（全文见第二版）。他的讲话不断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中共大庆委员会书记、大庆革命委员会主任宋振明，

向大会介绍了大庆的基本经验。他在题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的发言中,介绍了大庆工人阶级同"四人帮"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大庆油田当前的大好形势,全面地介绍了大庆油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十七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全体代表认真地倾听了他的长篇发言,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原载197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和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背景介绍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就指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思想。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即"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这一方针的用意是为了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得以延续,大大妨碍了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所以受到了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和抵制。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此信。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指出"两个凡是"不对。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当时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材料:

- 学好文件抓住纲
-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

材料一 学好文件抓住纲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发表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衷心拥护,普遍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当前,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紧密地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把这两个重要文件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执行好,在两个重要文件的指导下,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华主席讲话中指出,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不要忘记虎狼在前,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必须按照这个决策去做。而要实现这个战略决策,就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处理各项矛盾,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

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

步调一致,必须认识一致。因此,要首先认真学好两个重要文件。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都应当自己带头学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着重领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同时,还应当亲自宣讲两个重要文件和中央其他有关文件,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组织领导好,用两个重要文件的精神来武装大家的头脑,统一大家的认识。

学好文件是为了指导实际斗争。各级党委都要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用极大的力量,把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好。一定要深刻懂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懂得搞好这场斗争对工作全局的影响，使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和领导，能够适应斗争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真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带领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一定要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有周密的部署和计划，有切实的措施和办法，有经常的督促和检查，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基层，抓点带面。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观点和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指导，及时了解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思想情况，经常研究政治思想动向，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向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解决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样，就能掌握领导运动的主动权，排除各种干扰，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一个浪潮推动一个浪潮地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扎扎实实引向深入。

通过四个月来的揭发批判，通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八十三周年和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无比痛恨，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党委一定要很好地向群众学习，充分反映和十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善于把群众的积极性化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实际行动。只要我们把各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一步有力地领导起来，围绕这个中心，把党内和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抓好，把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抓紧抓好，有什么困难，把情况告诉群众，同群众一起想办法去战胜困难，不断地用揭批“四人帮”的新战果，用生产和工作的新成绩，用克服困难的新进展，去鼓舞群众的斗志，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四个月来的大好形势，更好地去完成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各项战斗任务。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原载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摘自《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材料三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

当代中国人，包括关心中国政局的当代外国人，都已经十分熟悉1976年"十月的胜利"，知道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知道洋溢在每个手提4只螃蟹两瓶酒的中国人心头的喜悦。

紧接着11月呢？当抹去嘴上的荤腥，理好破碎的记忆，悄悄探询着毛著五卷的发行与纪念堂的选址，含泪听完"绣金匾"，又含情听着"交城山"的时候，中国人的心上，重又布满焦虑，英明领袖华主席怎么领我们往前走呢？

1个多月过去了。11月18日，捉拿"四人帮"立了大功的前中办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当时正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从今天观点看尚够载入史册之格的讲话。平心而论，如果汪东兴当时能够预见5年甚至1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大得民心的真正繁荣开端，他也许就不会把邓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为说得那么绝了："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也不至于那么斩钉截铁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那样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四人帮"炮制的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据说这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即照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构。1976年11月30日，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话："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就是狂欢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年底，人们的心紧紧地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不仅北京，几乎全国人民都对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记忆犹新。充斥人民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这一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当《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汪东兴的时候，汪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主席审查过的。他还质问《人民日报》写纪念社论的人，"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这一场面，童怀周是这样描述的：

"今年一月八日，天安门前，缅怀周总理的人民群众，自由地登上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花圈。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革命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激动人心的纪念场面。"

大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人民的要求，已经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对"四人帮"的批判碰到了麻烦。《红旗》杂志打报告向汪东兴请示，"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在这份报告上，汪东兴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这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首都其他报纸同一天用同样的规格转载。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社论中所谓抓住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往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最后，社论用了650多字的长段向全国发出号召：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了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

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可以奉告读者的是，这篇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他们的负责人不知道有这篇社论，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文革"中，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康生死后，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 月 4 日，汪东兴在这篇社论的清样上批示道："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当这篇文章发到中央宣传口后，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曾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耿飚在擒拿"四人帮"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又调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讨论中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 1977 年中央 3 月工作会议的前夕。当时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 1976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使人联想起毛泽东逝世后，10 月 4 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时间，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3 月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讲话基调虽然未变，但一种新的气息已经透出。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又一次重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次会议后，4 月 10 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在这封信里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5 月 24 日，邓小平在谈话里，则说得几乎不会使任何人产生误解："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 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那时，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在处于那样微妙的位置上的时候如此直率地讲话。中国人被"礼"束缚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邓小平其实 1975 年就已经表现过了，使亿万人的心头为之一暖。

（摘自陶铠、张义德《走出现代迷信——真理标准讨论始末》）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复职

背景介绍

1975 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借天安门事件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方针，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在党内外广大群众长达 9 个月 的强烈要求和呼吁下，1977 年 7 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终于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决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 历史性的会议
- 第三次重返政坛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出席了会议，也作了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同志出席了会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同志因病请假。

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一些地方和军队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开幕时，华主席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悼念十届二中全会以来逝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致哀。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的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中央政治局在我们党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激烈斗争的非常时期，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非常适时的，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个决议，不仅对当时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稳定全国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经过十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月，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全会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九个多月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全国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跃进局面。实践证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和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全会一致表示同意。全会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同林彪一伙勾结在一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大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他们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先后确定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仇视，疯狂反对，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他们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 政军负责同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阴

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决议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归功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决议指出，根据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已经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全会对"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表示极大的革命义愤。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全会一致通过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全会决定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届三中全会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全会遵照毛主席"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的教导，充分发扬了民主。全会自始至终在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全会认为，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一定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迎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 1977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历史性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了。喜讯传来，全国亿万军民纷纷集会游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呼这次会议的巨大成功，衷心拥护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十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去世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是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伟大胜利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华主席领导下，发扬民主，加强团结，集思广益，共同努力，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第十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们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在这以后的九个多月时间里,华主席又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消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十分令人鼓舞的成绩。斗争的实践证明,华主席英明果断,善破善立,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三千万党员、八亿人民在斗争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三中全会确认华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这对于我们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正确的全面的评价。华主席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再一次表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现在,有华主席做我们党的领袖,有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同心协力,我们党又有了如同列宁所说的"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我们党大有希望。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

三中全会以极大的革命义愤声讨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共反人民以革命的罪行,一致通过把他们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历史的判决,人民的判决。我们党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党的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把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党心大快,军心大快,人心大快。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清除了"四人帮",我们党更加坚强更加巩固。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任何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要搞垮我们党都不能得逞,而只能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我们要乘胜追击,继续做好清查工作,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但是,对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千万不可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要把运动的重点逐步转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我们既要取得组织上的胜利,又要取得政治思想上的胜利,才能说全胜。

三中全会还决定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十一大将要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政治和组织成果。大会将讨论和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大会,是我国走向大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国际都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不断深入,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学大庆、学大寨的高潮正在各条战线兴起,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群众运动正在发展,宣传、文化阵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国形势很好,越来越好,只要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努力,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我们要响应三中全会的号召,认真学习会议的文件,贯彻会议的精神,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迎接党的十一大的胜利召开!

(原载197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第三次重返政坛

1931年,由于邓小平忠实地支持毛泽东和他的游击战,曾受到王明集团的打击和降级。邓小平的第二次失意发生在1966年,他作为党的总书记被打倒7年;1973年得到平反,这显然是毛泽东的个人决定,并得到所有稳健派的支持。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重返领导岗位,这是个非常复杂演变过程的结果,许多关键问题与他的再次复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复出不可能不直接影响毛泽东的形象和华国锋个人在党内的地位。

首先,全国都知道邓小平1976年被打倒是毛泽东的错误,无论他是否受到了压力。为邓小平恢复名誉将会否定毛泽东的看法。仅仅几个月以前,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职务,到底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原因,只有毛泽东本人知晓。但是党并不准备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就指责毛泽东个人或毛泽东思想。其次,邓小平的复出会引起华国锋的支持者的反对,并明显地使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党指定的主席华国锋的地位复杂化。第三,鉴于邓小平在政府、军队、党内外的巨大影响,他在华国锋政府内的未来地位太使人棘手,不好安排。人们很清楚邓小平与"敬爱周总理"

的关系，他们想让邓小平重掌实权。党和政府的官员们也同样赞成邓小平复出。

在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几个月内，各种运动和庆祝活动在全国展开，以证明新的团结以及党对华国锋领导班子的认可。例如10月24日，北京近100万军民被动员起来，庆祝任命华国锋为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伟大胜利。赞誉华国锋"粉碎了篡夺党和国家政权的反党阴谋集团"。新组成的领导机构成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北京市长吴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拥护1976年10月7日中央委员会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华国锋同志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4月，毛主席个人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然后，在4月30日，毛主席又亲手为华国锋同志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和毛泽东的画像到处可见。为了证明在华国锋领导下团结一致付出了极大努力，从11月30日至12月2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已故副主席宋庆龄主持了会议，以示支持。类似的群众庆祝大会在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几个星期。与此同时，批判"四人帮"代替了批判邓小平。，然而，在公开场合第一次谈到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本人，他在1976年12月的大寨会议上坚持认为：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受到批判，任何人不能例外。1977年春天，越来越多的领导人谈到了邓小平的复出，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和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赞扬邓小平过去对国家的贡献，指出他仍然能够继续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希望邓小平在1977年5月1日之前恢复工作。报界亦反复报道邓小平复出，说他将重新回到他以前在党和政府所占的位置上。同时，报界也经常报道党已经否定了反对为邓小平翻案的意见。这表明，围绕邓小平重返政坛的一场激烈争论和讨论仍在进行。李先念副总理似乎经常谈到让邓小平早日复职的问题，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的确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邓小平也确实犯过这些错误。但是，四人帮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行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可以预料，由于邓小平作为一个竞争者复出会影响到华国锋的地位，邓小平本人亲自给华主席、叶副主席以及中央委员会写了两封信，并由中央委员会以通知的形式发给党的各级领导。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向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提议，最后在1977年4月21日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华国锋宣布，邓小平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据报道，华国锋对邓小平在两封信中的表示很满意。据透露，信的要点包括：(1)坚决支持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当选为党的主席；(2)他支持对四人帮采取果断行动，他们是国家、人民和党的危险敌人；(3)他对毛主席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坚决支持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委员会根据毛主席教导作出的决定；(4)尽管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1975年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5)他对断定他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表示高兴；(6)他准备接受党可能交给他的任何为人民和党服务的工作；(7)他要求把他的信在全国党员中间传阅。

因此，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10个月后，重返他在党、军队和政府的工作岗位。尽管出现过反对邓小平的狂风暴雨，但他的政治影响似乎一点也没有消除，相反，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开始按照他在1975年制定的政策，指导政府工作。一个月后，1977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的新团结。简言之，70年代的无常变化，以及对邓小平的指控，当毛泽东和"四人帮"从政治舞台上消逝后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华主席未能有效地制止全国上下请邓小平重返党和政府领导岗位的要求。因此说，毛泽东去世后，由于邓小平过去的经历、影响以及他在稳健派中潜在的领导地位，他的复出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邓小平似乎决心要为在暴虐的文化革命中被冤屈和遭清洗的受害者与同事平反昭雪。还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以本来面目是对毛泽东有关邓小平的评价以及撤销邓小平权力的直接冒犯。对这个事件重新进行了解释，并且宣布为群众的彻底革命行动。"四人帮"之所以称这个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其目的在于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毛泽东根据"四人帮"1976年4月8日打的假报告采取了这个措施。

（摘自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

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

背景介绍

面对"四人帮"对教育文化的摧残，为了排除"左"的思想干扰，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化考试很有必要》的文章。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考试，全国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新生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我们粉碎"四人

帮”后教育文化的一件大事。

材料：

·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 文化考试很有必要

材料一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讯　教育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今年将进一步改革招生制度，努力提高招收新生的质量，切实把优秀青年选拔上来，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九月二十五日，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到会代表，给了代表们极大的鼓舞。

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公室、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一些高等学校的代表，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大文件，学习了华主席、党中央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切体会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的宏伟遗愿，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实现四个现代化，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而且影响由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件大事。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招生工作，切实地把优秀青年选拔上来，快出人才，早出成果，加速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的重大战略任务，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与会代表回顾了建国以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情况。大家说，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战线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十八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招生工作和教育战线的其他工作一样，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实行了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大学招收的学生中工农及其子女的比例逐年增加，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现在各条战线，包括科学、教育、生产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制造“改朝换代”的反革命舆论，极力抹煞建国以来教育工作和招生工作的巨大成绩，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反对学生学习理论、文化科学知识。他们炮制交“白卷”的假典型，反对无产阶级选拔学生的标准，反对招生进行文化考查。他们极力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致使招生工作“走后门”的恶劣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们大搞形而上学、绝对化，利用在教育部窃取的权力，背着党中央、国务院另搞一套，否定中央在招生和分配工作上的领导权。“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质量逐年下降，破坏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造成了各条战线科技人员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提高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质量，广开才路，快出人才，尽速改变教育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严重不适应的状况。

根据会议提出的招生工作意见，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有了重大改革。

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

招收新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报名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二至三个报考志愿。考试分文理两类。今年，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将分别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科技积极分子。将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毕业后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会议对招收研究生的工作进行了讨论。今年招收的研究生将从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选拔，也可从应届大学毕业的学生中选留。招收研究生的条件，除政治表现与高等学校招生要求相同外，

要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有一定的研究才能和专业特长。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工农兵、在职职工不受学历限制，但须具有同等的文化程度。

会议还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的招生问题，以及有计划地招收“社来社去”学生，和举办进修班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新生将于明年二月底以前入学。

会议指出，教育战线和全国其他战线一样，形势大好。广大干部、教师热烈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培养人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亿万青年为革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兴起。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今年招生工作的领导，广泛宣传大学招生的重要意义，深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发展大好形势，把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青年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的过程。参加招生会议的代表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树立为革命努力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接受祖国的挑选。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录取的，要努力为革命而学习；没有被录取的，要坚守工作岗位，愉快地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不论上大学，还是在工作岗位，都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业务，精益求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做出贡献。

（原载 1977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文化考试很有必要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消息传来，人心振奋。粉碎“四人帮”，教育有希望。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就是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

恢复文化考试，是这次改革招生办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从“四人帮”炮制和吹捧“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后，大中小学的文化考试，或者干脆取消了，或者名存实亡。“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影响所及，在教育战线，确实是一场灾难。

这里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上海市革委会科技组对今年分配到上海科技系统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次考试。考题都是中学学过的基础知识。考试前还打了招呼，给了他们复习功课的时间。考试的结果，少数人成绩较好，多数都不理想。数学，不及格的占百分之六十八。物理，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化学，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六。最使人吃惊的是，有些人甚至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基本知识一个题也答不出，只能交白卷。

真是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

当然，一次考试未必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但不及格的人数如此之多，总是可以看出“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是多么严重！现在，科学技术要快上，科技队伍要扩大。如果我们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提高，甚至交白卷也能毕业，怎么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呢？教育拖科技的后腿，这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

能责备这些大学生在校时没有认真学习吗？不能。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最猖狂的时候。“四人帮”到处扣帽子，打棍子，鼓吹“闹而优则仕”，“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想认真学点东西，就给你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能责备大学教师没有好好教学吗？也不能。教师是张春桥“全面专政”的对象。你要认真教学，就给你加上“复辟倒退”的罪名。应该受到痛斥的，是“四人帮”及其干将迟群之流。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乱我学校，毁我教育。他们极力叫嚷要把学校办成所谓“政治大学”，只搞一个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不管你文化知识学得多么差，只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就可以当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至于对身受其害的学生，倒是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没有学到的知识学到手。他们吃过“读书无用”论的苦头，端正了思想，刻苦钻研，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竟打出毛主席的旗号，好像毛主席反对文化考试。这是弥天大谎！毛主席反对那种以学生为敌，用偏题、怪题整学生，对学生搞突然袭击的考试方法。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考试中一定要注意防止这种刁难学生的现象。但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对学生不要进行文化考试。必要的文化考试，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考核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改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大学招生来说，文化考试是保证招生质量，使我们的大学能够有效地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杜绝招生工作中“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的一个有力措施。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抓文化考试，真正把成绩优秀的青年选拔上来，再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左顾右盼了。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由于“四人帮”对教育革命的破坏，一度耽误了千万个青年的培养。这个损失，比少出几千万吨钢更为严重。把“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搞乱了的是非端正过来，是一个关系全局的艰巨的战斗任务。希望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周荣鑫同志的革命精神，全面地正确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搞好教育革命，早出人才，多出人才，为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

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

（原载1977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

背景介绍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家耗资约1亿元，于1977年8月底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建成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并将装殓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供中外人士瞻仰。修建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直接违反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1956年4月亲自签署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倡议。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纪念堂内增辟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三个纪念室，同毛泽东纪念室一起开放，以表达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缅怀之情。

材料：

- 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胜利完成
- 邓小平评说纪念堂
- 来自毛主席纪念堂的报告

材料一　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胜利完成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工程，已于五月二十四日多快好省地胜利完成，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一个奇迹。

从华主席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亲自奠基培土至今，只半年时间，这座凝聚着亿万人民心愿的毛主席纪念堂，已巍峨地屹立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堂四周庭院，苍松翠柏，鲜花盛开；古老的正阳门修饰一新，天安门广场显得更加气势勃勃。

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英雄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这样伟大的工程，是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以几个数字为例：他们挖运的土方量相当于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两倍多；完成的钢筋混凝土量相当于一般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三十多万平方米的总和；安装的花岗石、大理石等石料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建设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寒冬季节施工的。他们在边设计，边拆迁，边准备，边施工的情况下，使工程质量达到了罕见的高水平。纪念堂工程建设者们是亿万人民学习的榜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他们有能力，有志气。他们那股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拼命精神，正在激励着全国工农商学兵，乘长风破万里浪，为加快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奋勇向前。

六个月来，成万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把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化作一股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倾注到每一项工程中。他们以英雄的大庆人为榜样，斗风雪，战严寒，昼夜奋战，用自己的一颗红心两只手，战胜了重重困难，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工地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赛思想、赛速度、塞质量、赛节约、赛风格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各种类型的竞赛和红旗台上，一片火红，每天都有振奋人心的战果，每天都有先进标兵涌现。在工地办的“工程通讯”报和许多壁报、黑板报上，大量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登載在“喜报献给华主席”的专栏上，报喜和祝捷的人群敲锣打鼓、络绎不绝。这激励人心的动人场面，这万马奔腾的跃进气氛，推动着工程建设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英雄的建设者们自豪地说：“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对得起华主席、党中央，对得起全国人民，都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高速、优质地完成纪念堂的建筑工程，显示了现场指挥部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关于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的指示，工作方法很有创造性。开工以来，他们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建设过程中，他们以华主席奠基的这个日子作为巨大动力，发动群众连续三次攀登高峰。收尾竣工阶段，需要完成的大小工程项目总共达近千项。若按常规施工，最快也要半年时间。指挥部党委事先做了周密的调查和细致的准备工作，反复算了几笔帐，制订出一个大跃进的计划：决心在五月二十四日，即华主席奠基半周年的时候完成各项收尾工程。他们把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作为奋斗目标，向群众宣布，发动大家充分讨论，找差距，订措施，下决心，见行动，又在工地召开了几万人的誓师大会，提出了激励人心的战斗口号。广大群众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以气壮山河之势投入了这最后的战斗，结果按质按量按时地用六个月时间胜利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整个建筑工程。英雄的建设者们在施工过程中，从头到尾体现了毛主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工地上不断组织大会战和小战役。在会战过程中，从总指挥部到各分指挥部都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实行领导干部昼夜带班顶岗，深入第一线，做到情况明，指挥灵，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各个

战役顺利进行。工地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他们和群众一起大干苦干，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

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亿万人民用各种办法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把最珍贵的材料、最好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每个人都把自己作出的最微小的贡献，引为无尚的光荣。为了保证纪念堂施工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组成班子，具体负责抓供应工作，沿线运输一路大开绿灯，畅通无阻。半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北京市、驻京部队和来自全国各地共达七十多万各族人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代表八亿人民的心愿，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

目前，这支基本建设战线上的钢铁队伍，绝大多数已经撤离现场，正在开展总结经验和表彰先进的活动，即将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纪念堂建筑工程完成以后，仍将继续进行毛主席座像雕塑、水晶棺安装、特种工艺装饰和设备综合调试等项工作。建设者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团结战斗，乘胜前进，为全部建成毛主席纪念堂作出更大贡献。

（1977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邓小平评说纪念堂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摘自《邓小平文选 1975－1982》）

材料三　来自毛主席纪念堂的报告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于 1977 年 5 月落成，占地 5.72 公顷，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

从 1977 年 9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到 1989 年底，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总人数已达 5578 万人，其中外宾 170 万。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同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1977 年 5 月 24 日，仅半年时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

毛泽东同志遗体被保存下来，在世界上是继苏联的列宁、越南的胡志明之后的第三例。

毛泽东的遗体解剖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参加过毛泽东遗体卫生保护工作的著名实验病理学家、古尸研究专家刘雪桐研究员说：在此之前，毛泽东的遗体什么也不准动，连“解剖”这一术语也避讳，只宜说给主席动“手术”。在纪念堂落成前，毛泽东遗体的卫生保护是在北京的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进行的。当时负责遗体保护工作的除中央领导人外，还有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林均才教授和吴阶平教授，1982 年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当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徐静副博士。他们每人带两个业务人员，8 小时轮流值班，持续了一年。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共坚持了 4 年。

刘雪桐说：“毛主席遗体保存采用血管内灌注和浸泡固定的办法来防腐。用的药品器材是高纯度的、最优质的，水晶棺和有利于遗体长期保存的设施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密封系统。该系统恒温达 99.99％无氧，以防氧化分解蛋白。平时，遗体存于地下，瞻仰时升至水晶棺内一定的位置。人们瞻仰遗容后，大多数人认为与平常人的遗容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由于光学技术在特定条件下的统筹运用。”

毛泽东遗体的保存系统非常复杂和精细，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体身长定期精密测量，大量测试数据表明：遗体并未缩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测量身高为 1.78 米。个别瞻仰者为什么会有缩小的感觉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对此进行过研究和解释：人的视觉是有差别的，从视觉效果看，同样一个人的立姿比卧姿要显得更大。瞻仰厅空间高大，瞻仰者与遗体间的距离也会产生视觉上的差异。瞻仰前在室外等候时间较长，匆忙走过遗体也会产生视觉上的差异。并不是遗体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是，要求毛泽东遗体千秋万代不变，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根据现代科技预测，遗体保存一二百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纪念堂机电技术处处长罗文盛说，毛主席遗体保存所需机电、光源、通风设备等都是 70 年代的国产品；现在看来已不是很先进了，但是十几年运行所提供的参数比较可靠，没出现任何偏差（工作人员昼夜值班，定时作详

细记录,供科研之用)。现在这些设备开始部分更新换代。

1980年,国内外一些人士对毛主席纪念堂是否将被拆除产生疑虑。对此,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于8月21日和23日采访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

在谈到建毛主席纪念堂时,邓小平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倡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接着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邓小平曾两次来毛主席纪念堂,第一次是1977年9月9日纪念堂落成典礼时,第二次是198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时。

1984年4月,香港一家报纸说,"毛主席遗体防腐,每年要花上亿元人民币"。徐静局长说:这纯属无稽之谈。当年,国家确实为了遗体保护研究课题拨了科研经费,购置了必要的设备仪器。我们的最佳保护方案已于1983年形成。从1984年起,国家再也没有拨这方面的经费。我们通过为瞻仰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如存包、照像、出售纪念品等所获得的微薄收入,足以保证日常经费的支出,近年来已不需要花国家的财政拨款了。

(摘自《风云七十年》)

中共"十一大"的召开

背景介绍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我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这对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报告仍然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为十一大的指导方针;错误地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认定"四人帮"推行的不是极左而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继续贯彻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不适当地夸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等等。这就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九大、十大的党章作了不少修改,把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奋斗目标写入总纲,要求全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是积极的、正确的;但是,仍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倾错误理论和提法,没有否定党的"九大"和"十大"的党章,这就必然会给党的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即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总之,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响,党的十一大未能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1977年8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代表大会于八月十一日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选举二百二十三名代表组成这次大会的主席团。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同志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兼主席团秘书长。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汪东兴同志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审查，所有代表资格有效。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名，代表着全党三千五百多万党员。他们是各地区、各单位党组织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经过反复酝酿协商和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后，正式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包括从建党时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优秀党员，多数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代表中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四，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六点七，革命干部占百分之二十点九。代表中女党员占百分之十九，少数民族党员占百分之九点三，中青年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三点八。台湾省籍的党员也选出代表参加了大会。

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华国锋主席宣布大会开幕。乐队高奏《东方红》。

华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华主席首先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为悼念十大以来和在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致哀。

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主席指出，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宝贵的遗产。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我们一定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胜利保证。

华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时指出，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在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一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华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华主席指出，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准确地识别和彻底孤立、集中打击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华主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历史意义，指出：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

创举而载入史册。华主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国际的大好形势，并指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各国人民要提高警惕，紧密团结，进行不懈的斗争。华主席说，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华主席深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

华主席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势大好，人心思治。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科技战线的革命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正在向前发展。

华主席指出，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华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主要战斗任务：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华主席说，我们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同时，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党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

华主席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我们必须做出认真的努力，调动起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华主席历时四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

叶副主席指出，"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党。我们应该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吸取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新经验，对十大党章进行必要的修改。

叶副主席对党章修改草案，就以下八个方面做了重要说明：关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干部路线；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叶副主席指出，新党章强调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它强调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把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对于违反三项基本原则的潮流要有敢于反对的革命精神。它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规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人,应当受到查究和处分;强调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规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各级领导班子。它强调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它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

叶副主席指出,党章修改草案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贯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反映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成果。他指出,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将是加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武器。党的各级组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党章,并且同任何违反党章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

大会对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热烈的讨论。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反映了我们党的团结兴旺。

代表们在讨论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颂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挽救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功绩。大会认为,华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总结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准确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指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代表们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热烈欢呼我们党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取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大会完全赞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表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代表们讨论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国内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正广泛开展起来。工农业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不断创造历史新水平。大会表示,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创造更优异的成绩,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夺回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代表大会于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二百〇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一百三十二人。

邓小平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邓小平副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邓副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个一个困难,取得一个一个新胜利。

邓副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原载 1977 年 8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新时代的“红宝书”——《毛选》五卷的出版发行

背景介绍

197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同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977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4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15日起，《毛选》第五卷在全国发行。首批印发2800万册。这一卷收录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11月写的70篇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也包含了一些有“左”倾错误的东西。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文章认为，贯穿这本书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表明，华国锋所要坚持的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毛泽东晚期的“左”倾错误思想。

材料：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发行
- 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材料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发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出版，从四月十五日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发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华国锋主席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叶剑英副主席任副主任，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任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辑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它是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头八年中，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在国内反对地主资产阶级、高饶反党联盟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胜利记录和科学总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全卷共七十篇，其中有四十六篇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四人帮”，加强我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成果。“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目的，猖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卑劣的手段，千方百计干扰破坏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妄图夺取《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继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立即作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出版印刷发行部门以及有关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热爱的感情和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为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做了大量工作。印刷工人日夜加班赶印，高质量地超计划提前完成任务。发行部门的广大职工以最快的速度把印好的毛选第五卷送到祖国各地，保证广大干部和群众及时得到这部光辉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普及本、平装本和精装本三种版本，都用简体字横排。为满足部分读者的需要，以后还将有计划地出版繁体字竖排的平装本、精装本和大字线装本。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准备在全国各地印制二亿多册。第一批发行一千五百万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和英、法、俄、日、西班牙等外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不久也将陆续出版发行。为照顾盲人的特殊需要，还印制了盲文版本。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必将使我国人民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兴起新的高潮，必将

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革命，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原载1977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

在全国深入开展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斗争，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胜利形势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渴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我们怀着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热烈庆祝这部马克思主义光辉著作的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世，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四人帮"，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竭力阻挠和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即作出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用很大的精力来抓这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工作。这一伟大文献的出版，对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加强我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号召我们开展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的群众运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我们热烈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要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著作，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为完成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实现天下大治而奋斗。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汇集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主席高举马克思、列宁的伟大旗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领导我们同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斗，同党内的修正主义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当此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八年中，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记录，是这期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

毛主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是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后来，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光辉思想。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反对高饶、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历次重大斗争，反复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无比正确和无穷威力。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牢牢掌握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不断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把毛主席交给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担当起来，推向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世，对当前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贯彻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我们对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对高饶反党联盟、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一再指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并深刻地揭露了这些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和反革命策略。毛主席指出，高饶反党联盟"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由特务、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动军官为骨干组成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资产阶级右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地向党猖狂进攻，"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四人帮"同这些阶级敌人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要深刻认识，"四人帮"是一小撮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在这场斗争中，要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四人帮”的一切罪恶活动和鬼蜮伎俩，把他们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狰狞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坚决粉碎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夺取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要紧密联系当前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实际。我们要认真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用这个锐利的武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澄清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混乱，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要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要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揭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进一步提高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贯彻落实，实现华主席提出的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与我国广大人民见面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更加辉煌灿烂地普照大地，照耀我们前进的航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都是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将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让我们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原载197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风 云 人 物

华 国 锋

华国锋（1921－　）山西交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交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9年随军南下到湖南，任中共湘阴县委第一书记。建国后，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武部政委、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后，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政委。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被调到中央工作。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1976年2月2日任国务院代总理。4月7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7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80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上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和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材料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原载197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黄 华

黄华（1913－　）河北磁县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肄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北平学联中共党团书记、红军总部翻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干事、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外事组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秘书和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中共中央青委委员、青年团中

央委员、天津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建国后，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外交部欧非司司长、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政治顾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政治顾问、驻加纳大使、驻埃及大使、驻加拿大大使。1971 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三人小组成员，负责同基辛格谈判。后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83 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十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

材料　四届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提议任免名单的决定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提议任免名单的决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日通过）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任命黄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原载 1976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

刘　心　武

刘心武（1942—　）笔名刘浏等。四川省成都市人。中学时期开始写作。196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到北京第十三中学任教。1978 年调《十月》任编辑，后被聘为《儿童文学》编委。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75 年出版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1977 年发表优秀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先河，获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1978 年以来，相继发表揭露社会问题的短篇小说《没有讲完的课》、《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这里有黄金》等。《我爱每一片绿叶》获 1979 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其他作品有：纪实性小说《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有《刘心武短篇小说集》等。

材料　刘心武的“冲击波”

时代，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

十月的风云又洗净了祖国的天空。

“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盘根错节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那些尘封土掩的精神垃圾从哪里开始清除？

1977 年底，青年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班主任》、《没有讲完的课》、《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等几篇小说。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些尖锐而迫切的问题，激动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们的心。

刘心武，1942 年 6 月 4 日生于四川成都市。中学时代热爱文学。从 1958 年到 1966 年先后发表过散文、小学、杂文、影剧评等文章近七十篇。1961 年到中学任教，担任过十年班主任。他对于“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累累罪行，“有切肤之痛，心怀深仇大恨”。经过对大量生活素材的积累、分析和严肃思考，作者不但看到青少年中由于“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的野蛮分子，而且发现了所谓“思想纯正”而灵魂扭曲的麻木后代。这种灵魂的“畸形”，是一种精神内伤。“揭出这种容易被忽略的内伤，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引起疗救，这是刘心武的主要贡献，也是《班主任》能够激起巨大社会反响，成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或者十多年来第一篇影响最大的优秀短篇小说的重要原因。”（朱寨：《对生活的思考》）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正视现实的可贵勇气，发现并塑造了宋宝琦和谢惠敏这两个畸形儿的形象。

宋宝琦是一个文盲加流氓的典型。他“愚昧无知，自甘落后，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从而坠入犯罪的泥坑。作品借主人公张俊石老师的目光，从外貌、神情、动作、语言等几个方面，勾画了这个冥顽、颟顸、愚昧的年幼者可憎又可悲的形象。随着作者的笔锋，“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聚光灯下”，令人怵目惊心。作者没有正面展示他的犯罪劣迹，但从他上唇撕裂而又重新缝合的外貌特征和被没收的一堆赃物上可以想像得到。通过步步深入的询问，张老师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宋宝琦的堕落，并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不是。他有的倒是满脑袋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自从陷入犯罪集团以后，无时无刻不处在森严的约束之中。因此，他既无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行动，也无“成名成家”的观念和追求。“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些个思想特点，在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作家抓住对小说《牛虻》的态度这一细节，更深地剖示出宋宝琦的灵魂。当张老师问起这本书时，他却真诚地认为是“黄书”，认罪式地说“不该看”，悔过式地发誓“再也不敢看”。这种惊人的坦白使张老师发现：“宋宝琦同他流氓伙伴堕落的原因之一，出乎一般人的逻辑推理之外，并非是

由于读了有毒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能折腾就能'拔份儿'，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可见，这个人物正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造就的畸形儿。

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表面上看来与宋宝琦迥然不同。她体貌端庄、品行端正，出身劳动家庭，从小受到朴素的阶级教育，使她具备"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劳动者后代的气质"。她单纯而真诚，没有丝毫投机心理。"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但是，在"四人帮"的毒害下，她眼界狭小、是非模糊、思想僵化以致愚昧，习惯于用"左"的眼光看待一切，单纯地崇拜上级的律条。在她心中形成一种铁的逻辑："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她和宋宝琦一样，没有看过《牛虻》而一看男女恋爱的插图便认定是"黄书"。这不谋而合的结论使我们看到她也是一个受污的灵魂，一个封建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作者透过这个人物的端庄体貌，揭示了她灵魂里的黑色烙印，从而赋予这个形象比宋宝琦更深刻、更普遍、更典型的社会意义，在我们当代文学形象的画廊中增添了一个新的"熟悉的陌生人"。

《班主任》发表后，在文艺界，甚至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收到两千多封读者来信。当我们听到作者痛彻心肺地呼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谁不为之感动？作者的深广忧愤，和整个经受过一场浩劫的民族的心是相通的。

在那个"痛定思痛"的年月，刘心武对生活的思考，并未停留在宋宝琦、谢惠敏这样的孩子命运上，他的开阔的视野同时向着其他不同类型的青年。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主人公邹宇平被"四人帮"钳制下造成的一种"无形力量"推向一个典型的庸人道路，一件米黄色大衣成了他的差不多是全部的精神寄托，"下了班就张罗张罗自个儿"，自我欣赏，顾影自怜，辜负了一个人正在长知识、长身体以求成材的大好时光。这个青年的变态心理难道仅是他自身的弱点造成的吗？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品质、功课、纪律性都是中等水平的学生，是一个"本可以熔铸成丰富而美丽、激昂而奋发的灵魂"，但是，他没有遇到那种正常的社会环境，在学校里得不到严格训导，从社会上也得不到催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因此，一度沉入迷津。但这个青年还有一腔红色的血，在乌云翻卷的日子里，他开始觉醒。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那件一尘不染的米黄色大衣已经成了只有"使用价值"的工作服了。

这第一道冲击波，震动了千万个麻木的心灵，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帷幕，显露出一个崭新的舞台。在这新式的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活剧一个个涌现。

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继《班主任》之后，形成了第二道冲击波。

由于极左的文艺倾向所致，我们度过了十年使爱情成为"耻辱"的漫长年月，在那种"文学"里，往往是妻子没有丈夫，夫妻没有爱情，或者是机械化的人，或者是野蛮化的人。这篇《爱情的位置》，打破沉闷，冲进禁区，撩拨起多少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感情！作者说："《爱情的位置》播出后的听众来信十天内便达一千多封，这回是包括西藏在内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反应，来信者的职业也更加广泛。几个在黄海渔船上听了广播的青年渔民来信说，他们要到海滩上拾取最美丽的贝壳，寄给我以表示感激和勉励。"有的读者还以自己的家庭悲剧控诉"帮味文学"毒害、扭曲、压缩青年人灵魂的恶果。

品貌兼优的女工孟小羽，执著地爱上了小饭铺里烙火烧的厨工陆玉春，纯真的爱情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平凡的劳动，这本是生活里的正常现象，人们应当为他们祝福。可是，小羽的女伴亚梅知道后，竟惊愕得目瞪口呆，以致无法理解这个"又傻又怪"的姑娘，更不能理解才貌出众的小羽何以爱上一个"烙火烧的冠军"。其实，在那种情况下，对此不解的何止一个亚梅！无形的压力包围和冲击着小羽，这个自信的姑娘也茫然了。这时，老革命者冯姨倾吐了埋藏在心底的深沉爱情。一席肺腑之言，使小羽目朗神清，使她终于找到了"爱情的位置"。小说中两个并不锋芒毕露、而像默默的基石的青年人是平凡而崇高的形象。他们身上带着生活的清新露珠，闪耀着青春的火花，使人预感到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摘自杨树茂《新时期小说史稿》）

珍闻轶事

毛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

凌晨，噩耗传来

9 月 9 日凌晨 5 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广播局总编辑室值班员的声音："有紧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砰砰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 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台内做工作，又要准备宣传，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

保密，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辞世以后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鉴，无规定可循。

播好讣告。讣告的内容自然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就播音基调而言，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

选定哀乐。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 30 多秒，有的用 1 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哀乐，最长是多少？初定为 6 分钟。

播放《国际歌》。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 5 分 52 秒钟。

并机播出。当时，中央台有四套节目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运行，自成系统。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播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机广播。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要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补充。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准备的情况下，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

紧张，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 8 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 6 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台提出的播出方案。经请求，直到上午 11 点，才允许向中央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同志们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

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这是极其重大而又极其悲痛的事，与过去的重大宣传不同，必须精心做好工作；这又是工作量很大、极为复杂、极为紧张的宣传，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并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发播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节目和发播节目的播出。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周总理在世时，对中央台的广播非常重视，也非常熟悉。中央台的"全国联播"节目长年固定在晚上8点首播，周总理在世时常在一些重要稿件上批示："今晚8点广播，明天见报。"

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一个小时内，连续预告六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具体预告时间是：下午3点，3点5分，3点20分，3点35分，3点40分，3点55分。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半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性强。之所以提前四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以后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即使能通过，还须复制合成，还要为中央台的对台湾广播、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台》）的对华侨广播、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复制录音带，那时他们都用中央台的录音。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第二次录音时，我决定保留第一次录音，并着手复制，有备无患。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的好。由于事先有准备，赢得了按时播出的主动权。

原决定同时播出的内容和次序是：《告各族人民书》、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后又决定暂不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这样，准备首次播出《告各族人民书》23分钟，哀乐6分钟。《国际歌》5分52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36分钟。

四时播出，"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八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有的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据《参考消息》载，中央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报道的具体时间分别是：路透社：下午4点06分；美联社（东京电）：下午4点07分；路透社（香港电）：下午4点10分；法新社（香港电）：下午4点15分。他们都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主要事实，然后不断深化、完善。

《告各族人民书》在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竟会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出了什么事；中央台的领导和职工涌 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台的"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久，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将在最后部分向听众和读者详细说明。（节录）

（摘自《中国广播报》1993年第48期）

华国锋"钦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

报载，每年的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都会早早地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他们知道这是华国锋又来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在毛主席的诞辰或是忌日拜谒毛主席纪念堂成了华国锋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位当年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这感情绝难用语言和文字加以表达。当他神情肃穆地行走在纪念堂前笔直的甬道上时，他是否会眯起眼睛再一次仔细端详眼前这高大的建筑物？当他定定地站在毛泽东那富丽堂皇的水晶棺前，他又会想到什么呢？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无价承诺？还是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壮怀激烈？抑或是往事如烟，世事蹉跎的感慨？

当然，他不可能不会想到这座占地5.74公顷的巨大陵墓以及他为它做过的一切。因为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建筑史上，华国锋的名字与毛主席纪念堂已经难以分开。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金字匾额至今还高悬在纪念堂的风雨檐下。当年他拍板决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的旧闻也渐渐演绎为新闻，并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且让我们的文字回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刚刚开始破土动工时，全国29个省市都曾为它捐献过自己最具特色的物产，北京有上百万市民曾自愿到工地去参加义务劳动。翻翻当时的报纸，有多少整版对它的报道，赞美它如何壮丽辉煌，如何庄严肃穆，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一座伟大建筑。然而，当年夏天的某一个清晨，它四周高大的木板隔墙突然撤去时，围观的人们却都迷惑地眯起了双眼。没人说它的形状不好，可是又不知该说点什么，流过心底的是一阵长长的惆怅。当时参加纪念堂设计组的吴观张和马国磐苦笑着回答，它完全是那个年代必然中偶然的产物。

本来，按照吴观张的设想，应该像北大校园内的斯诺墓一样，在一个风景秀丽之地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朴素而又肃穆。然而，他的建议立刻就遭到了否定，毛主席是不能被埋在地下的，虽然他已经去世，也必须像活人一样，要住在房子里，而且还得住在人民中间，让老百姓常常见到他。

于是便决定建陵，这是最高的规格。可是陵该建在哪儿呢？十三陵不行，那里是皇帝的墓穴，况且离北京又太远。香山也不行，在那儿建陵将与中山陵过分相似。玉泉山也不行，那里中央首长的住房太多，地下还净是洞。景山也不行，虽说它地理位置适中，却是吊死崇祯皇帝的地方。

建陵不成，于是又决定降格一级，建堂。可堂又建在哪儿合适呢？有人建议建在午门前的空地内，这显然不行。有人甚至建议就建在天安门上……

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堂地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这里虽然不能造陵，但却符合两大政治条件：一是可以盖座房让老人家住，二是居于市中心，确实是生活在人民中间。当然，这中间也许还有一个潜在心理因素，那就是它相距故宫太和殿皇帝的宝座不过数百米，而且同在一条皇城中轴线上，南北相对。当然，也许最终批准它的人并没这样想过，可许多老百姓想到了，凭着朴素的感情，他们满意。

中国人反了一个世纪的封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可以说人人提起封建二字都咬牙切齿，但到了讲排场的时候，也只有封建所具有的规模和威严才能使大家默然。

堂址既定，那形状呢？中国的建筑师们充分运用了那个时代的想象力，有的设计成金字塔，有的设计成芒果，有的设计成文冠果或万年青……在一连串的否定之后，设计组的成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们后来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圆顶形建筑，顶上覆盖着火红的玻璃钢，白天放光，夜里也放光，简直就像半轮从地里钻出来的红太阳，可最终连它也被否定了，因为国内的建筑材料还不过关。

也就在同时，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按照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纪念堂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它是标准的正方形。那么答案也就别无选择，必须是正方形，他们只好赶制出两个同类模型送政治局审批。其中，多数人认为相对好一些的一个，被列为第一号。

第一号模型摆在桌子上，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赞同。等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进来时，桌上摆的已经是第二号模型了。

"这个好啊！"华国锋用他软软的山西口音称赞道。有人告诉他另外还有一个模型，他问："哪一个高呀？"论高，自然是第二号模型高，它高达33.6米。

"那就用这个吧！"

华国锋肯定，其他人自然也纷纷表示首肯。

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占地5.74公顷的毛主席纪念堂。

在这里，毛泽东——这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时代伟人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接受着千千万万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的瞻仰……

（摘自《炎黄春秋》）

刘雪桐谈毛泽东的遗体解剖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著名实验病理学专家刘雪桐研

究员在谈到毛泽东遗体保存时说：毛泽东的遗体解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抓“四人帮”之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封建迷信登峰造极，奉毛泽东为神，当然，对毛泽东的肌体什么也不准动，连“解剖”这一术语也避讳，只宜说给主席“手术”。毛泽东遗体的内脏取出后，自然不便便按科学的常规来处理，因为封建迷信思想绝不是仅仅把“四人帮”抓起来就能消除的。刘研究员说，毛泽东病逝于心血管疾病，其它内脏器官都是很好的。

毛泽东遗体保存的防腐措施与一般防腐措施差不多，也是采用血管内灌注和浸泡固定的办法。只不过是所用药品器材，要么是高纯度的，要么是最优质的。其中更多的是用来体现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从科学角度看，形而上学的内容也是有的。

刘研究员告诉记者，毛泽东遗体的保存系统，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它集当代有关科学技术为一体，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特需工厂，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遗体保护得很好，身长没有收缩，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测量为一点七八米。要求毛泽东遗体千秋万代不变，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根据现代科学技术来预测，保存遗体一二百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后人如何评议保存毛泽东遗体，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会有人感兴趣的。

（摘自《文摘报》1989年8月8日）

邓小平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

1976年下半年，当时毛泽东已逝世，四人帮面临倒台之际，社会上亦到处可见“批邓”的标语口号。这时邓小平来到了广州市，由许世友独自派了几十名剽悍的便衣负责保护。邓小平来到一个肉菜市场，他把帽沿压得低低的，把眉毛也给遮住了，所以没人认得出他。他来到一处国营的蔬菜摊前，只见摊档上的菜全是青黄色的，他便问这蔬菜部的职工说：“怎么卖这些黄叶菜？”这职工没想到是邓小平，便咬牙切齿地说：“还说黄叶菜？这样下去，树叶也无得食！”

邓小平一听，一言不发就走了。他在一个肉铺前站住，往柜台上一看，案板上只有三几斤老母猪肉，但后面却足足排了成百人，售货员小心翼翼地把小片小片猪肉按票卖给市民。邓小平问售货员：这么几斤猪肉，排了这百多人，每人能有多少？后面的岂非没得吃？

售货员一听，苦笑道：“你没看见连母猪也杀来卖了么！现在政府哪还管我们有没有的食！”

邓小平无言以对，正想走开，突然一阵风吹来，把他的帽子吹掉了，排队的市民一看，哈！这不是邓小平吗？于是“邓小平”，“快来看邓小平！”，“邓小平还在！”的声音吵了起来，市民纷纷涌了上来。

负责保护邓小平的便衣大吃一惊，连忙要邓小平迅速离场，但邓小平却笑着对便衣说：“我又没有干对不起他们的事，干嘛要溜走？”他索性停了下来。

群众把邓小平团团围住了，许多人都知道邓小平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便向他鼓起掌来，最后，更有人提议要他讲几句什么。邓小平想了想说：“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说完，他就大踏步地走了。

（摘自《经济展望报》92年12月1日）

“四五”英雄今安在

今年清明时节，《南风窗》特约记者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寻访当年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四五”勇士，现将记者发表的报道摘录如下。

童怀周大展雄才

1979年1月4日，首都西郊的京西宾馆门口，走来一位年近50的长者。他身穿蓝色布衣，怯生生地向卫兵请问：“同志，这里是京西宾馆吗？”

“干什么？”卫兵颇为警惕。

“到京西宾馆开会。”

“开会？”这位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可迷惑了。你知道京西宾馆是什么地方？来这里开会的，都有小轿车接送。哪有走着来开会的？

“有证件吗？”

长者赶紧掏出会议出席证。卫兵一见此证，赶忙双腿一并，一个敬礼：“首长请！”

这位长者就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汪文风同志，童怀周的“头”，编选《天安门诗抄》时期的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童怀周的16位成员中，有5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4人提升为正副处级干部，一人提升为正局级干部，一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漏网的“头号案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在凄风苦雨的1976年清明节，这首五绝短诗胜过万言鸿文，宣告中国人民将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展开总决战。这篇战斗的檄文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成为老少皆知的名句。

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四人帮”把这首诗作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的证据，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严加追查。

但是，“四人帮”直到垮台之日，也没有抓到这首诗的作者。

在这次采访中，我多方寻问，得悉这首诗的作者姓王

名立山，当时年仅 24 岁，文化程度仅初中一年级，却已有了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6 年的经历。

在“四人帮”全力追捕“头号案犯”时，王立山悄然离京赴晋，到太原铁三局建筑处机械厂报到，工作岗位是修理工。

听人说，王立山已于前些日子调回北京，在珠市口的五家饭店当管工，专修水暖管道。我赶往那家饭店询问，被告以“查无此人”。

“小平头”，你在哪里

在姚文元主持炮制的那篇诬陷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有那么一句恶毒的语句：“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的声音煽动。”

知情人告诉我，“小平头”在北京。

“在哪个单位？”

“他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我又一次大惑不解，“这位反‘四人帮’的英雄难道到今天还是无业游民？”

“不，他现在有一份工作，不过是临时工。”

又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小平头”。说实话，刚一见面，令我大失所望。这位当年号令几万群众而为姚文元钦点的人物，穿一身不怎么合身的工作服，头发长短参差，大概有些日子未进理发馆了。个子中等，略嫌瘦小，丝毫没有号令万众的威严气派和领袖风度。

谈起过去，他说，我这个人，最不爱赶热闹，也不大关心政治。文革开始时，我初中毕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参加过大串连。“四五”那天，我在插队 8 年之后，刚刚回到北京，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就这么碰上了，还坐了牢。

说到近况，他表示没什么可说的。

作为记者，我可以告诉读者的只有两点：一、“小平头”在北京；二、他确实是个临时工。

一个疑问

“四五”运动 5 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的 3 位记者集体采写、发表的一篇通讯中，谈到了‘四五’战士当时处境的艰难，不少人对‘四五’战士抱有偏见。

采访开始以后，我感到这种“偏见”确实存在。

因为我与“四五”战士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次采访一开始，难免要请新闻界同行提供一点线索。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我与他们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的近况，”“你不必来找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找一些“四五”战士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询问，回答也大多是：“早就远走高飞了”，“我不知道有这个人”。

找到一些“四五”战士采访，有几位也常常“环顾左右而言他”。有的干脆不见，不谈。有的谈了，但是要求千万别报道。有几位“四五”战士当面对我说：“不要把我们当成持不同政见者”，“不要把我们视作不安定因素”。他们沉重的语调，至今仍在我眼前浮现。

（摘自《南风窗》第 4 期）

数学家的婚事

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引起了上百名姑娘纷纷给数学家陈景润写信，还寄来许多照片，表示关心他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愿做他攀登科学高峰的终身伴侣。

当时陈景润已有一个心爱的女友叫由昆。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给这些情真意切的求爱者回信，对这些热情洋溢的求爱信该怎么处理呢？他很费思索。

有一天，陈景润拿着一大摞姑娘们给他的信和照片，要全部烧掉。由昆见了，连忙走过来说：“给我，我帮你去烧。”

“不行！这些信谁也不能看，我要自己去烧。”陈景润严肃地说。

由昆怪嗔说：“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

陈景润解释说：“这些姑娘还要恋爱、结婚的，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给我写过信。我要给她们保守机密。”

由昆走开了。他把信和照片点燃，直到全部化成灰烬才离开。

由昆由武汉赶到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陈景润忽然告诉由昆说：“今天我们结婚吧！”

由昆感到很吃惊：“什么也没准备怎么结婚？”

“这好办，咱们上午去领结婚证，下午买结婚用品，晚上举行婚礼。我只有一天时间，不能耽误了我的工作。”陈景润说着，拉起由昆就向外走。

这一天（1980 年 8 月 25 日）上午，陈景润和由昆双双去领了结婚证。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了几件旧家具和一对旧沙发，还买了十几斤糖果，在 14 平方米的旧屋中简单布置了一个新房，便草草地结婚了。

他规定，晚上的婚礼在新房举行，不举行仪式，不收任何婚礼。连华罗庚亲自送来的一只红色保温杯，也遭到他的拒绝。后来华罗庚为此发了脾气，陈景润才勉强收下。这算一次唯一的破例吧！

有人问陈景润：“你们结婚为什么这么节省？”

陈景润说：“若不是为了接待外宾，连那一对旧沙发我也不会买的。”

（摘自《名人传记》89 年 11 期）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在举国欢呼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欢庆“第二次解放”的日子里，人民的思想和文学艺术也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有人称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首先涌现的便是一大批充溢着革命义愤、旨在揭批“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如郭沫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表达了人民对“四人帮”的怒愤；歌曲《祝酒歌》吐露了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小说《班主任》揭露了“四人帮”对青年一代的摧残；……与此同时，人民胜利了，也更深切地怀念老一代革命家和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于是，出现了大量歌颂和描绘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作品。如《天安门诗抄》、《周总理，你在哪里？》、《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人月的哀思》等诗歌作品；还有如《绣金匾》等优秀歌曲。这两类文艺作品，往往交织在一起，被人们统称为“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代”的文学艺术。它们以人民的爱憎为爱憎，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标志着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道路。

然而，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当时的文艺也存在一些落后的东西。由于新的个人崇拜盛行，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出现了过多的歌颂华国锋的作品，如歌曲《交城山》、《歌唱华主席》等。在当时流行的口号中，也反映了“左”的倾向和个人崇拜倾向。

流行口号

1. 毛泽东给华国锋同志亲笔：“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2. 华主席挥手驱乌云，祖国大地气象新。
3. 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4.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5.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6. 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诗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作者　郭沫若）

诗歌《天安门诗抄》

《天安门诗抄》　诗集。童怀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收诗、词、曲、挽联；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祭词、誓词、散文诗等。“诗抄”是1976年清明节伟大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它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当时阴谋篡党窃国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像《扬眉剑出鞘》、《要真正的马列主义》等诗，就是人民声讨“四人帮”的愤怒的诗篇。另有像《民族之魂》等众多诗篇，是人民群众对于逝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的诚挚悼念，表达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光辉主题。“诗抄”流露出人民群众强烈的爱憎情感。它熔新旧诗词、民歌体于一炉，形式多样，手法新颖，语言犀利，比喻形象、生动，是古今罕

见的诗歌运动。

《天安门诗抄》选

其 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第159页）

其 二

晴天霹雳震人心，
地动山摇巨石崩。
中华突失擎天柱，
雷电难掩悲愤声。

（第24页）

其 三

这乾坤，
树雄诗利文，
要斩尽今日妖神。
你有三百斤，
我有亿万吨，
惧你高论?!
不上邙山，
何晓有龙门?
宁抛头献身，
你施袁氏刑法。
我持“五四”精神。
送汝下囚坟。
誓与恶魔争高下，
不向霸王让寸分，
古今中外何论?!

（第286页）

其 四

骨沃中原土，
魂入九垓舞。
英魂在人间，
长擂镇妖鼓。

（第9页）

其 五

清明时节人纷纷，
纪念碑前欲断魂，
借问怒从何处起?
红墙那边出妖精。

（第47页）

其 六

热泪滴滴解冻土，
悲歌阵阵惊暮鸦。
待到春来寒气散，
九州尽开带血花。

（第23页）

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松涛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上篝火红呵，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防战士回答：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我身上，
他亲手披上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音：
“呵，轻些呀，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会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呵，想念你
——想——念——你……

（作者　柯岩）

诗歌《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

夜啊，静悄悄……
静悄悄……
当祖国度过了沸腾的白天，
当人们从梦里发出甜蜜的微笑，
当熟睡的婴儿脸上现出幸福的酒窝，
当晶莹的露珠挂上嫩绿的幼苗……
同志呵，你可知道，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办公室呵，
灯光又亮了通宵！
啊！春风知道，夏雨知道，
秋霜知道，冬雪知道，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呵，
几十年如一日，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昼夜为我们操劳！
如果世界上真有不知睡觉的人，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呵，
一生睡得最少，最少！
看，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呵，
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这是一盏普通的灯吗？
不！它点燃的是他毕生的心血呵，
是敬爱的周总理的红心在闪耀！
不要说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安息，
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呵，
两眼炯炯发光，
永远不会睡着！
不要说敬爱的周总理的骨灰已撒满江河、大地，
这样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呵，
一生蓬蓬勃勃，
永远不会停脚！
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和启明星一起破晓！
韶山的朝阳照亮东方，
井冈的明月红了一角，
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化作燎原的一支熊熊火苗！
遵义城的一座砖楼里，
楼下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和楼上毛主席办公的灯光相照。
在二楼会议室的一盏吊灯下，
毛主席拨正船头，绕过暗礁；
周总理举起双手欢呼，
确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漫漫的长征路上，
雪山、草地、饥寒、疲劳，
天上飞机滥炸，地上敌军围剿……
艰苦的岁月，夜里哪有明灯照亮呵，
周总理在马背上指挥，膝盖上办公，
点燃的是松明、野蒿、古藤、灯草！
延安杨家岭窑洞里，
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和遍地抗日的烽火一起燃烧！
那地图上纵横交织的红色箭头呵，
是明灯射出的霞光万道！
在西安，在重庆，
在南京，在上海……
任凭国民党反动派窥探、盯梢，
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是插到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在碧波荡漾的中南海，
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呵，
闪耀着一个又一个通宵。
灯光下，苦读马列、毛主席著作，
灯光下，批阅文件、报告，
灯光下，接待四海宾朋，

灯光下，会见各地工农兵代表……
在出国访问的飞机座舱里，
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和星星一样闪亮；
在巡视祖国的列车上，
周总理办公的灯光呵
和车灯一起赛跑！
最难忘十年文化大革命呵，
周总理几乎没睡一分一秒！
频繁地接见，
耐心地指教。
向刘、林反党集团不停顿地进攻，
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
连续作战，
辛勤操劳，
从黎明直到深夜，
从傍晚又到明朝！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病了，
灯光和总理一起经受病魔的煎熬。
周总理带病日夜坚持工作，
强忍着病痛奋力把嘴唇紧咬；
身受鬼蜮陷害，
斗争不屈不挠。
眼——熬红了！
脸——消瘦了！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呵，
还在灯下默诵毛主席的诗稿！
人民的好总理呵，
您办公的灯光，
在八亿人民心中永照！
看啊！万里征途又亮起灿烂的明灯，
华主席挥动巨手，把舵轮稳操！
放心吧，毛主席！
放心吧，周总理！
我们衷心拥护，
无限信赖华主席的英明领导！
夜啊，静悄悄……
静悄悄……
当我们在月下漫步，
当我们在星下思考，
当我们在桌旁静坐，
当我们在灯前对照……
同志呵，你想过没有？
该怎样像周总理那样战斗不息，
永远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
阔步跨上那继续长征的大道！

（作者　石祥）

诗歌《一月的哀思》

——献给敬爱的周总理

一

我不相信
一九七六年的日历，
会埋着个这样苍白的日子；
我不相信
死亡竟敢和他的生命，
连在一起；
我不相信
迎风招展的红旗，
会覆盖他的身躯；
我只相信
即使把他交给火，
也不会垂下辛勤的双臂。
但，千山默哀，
万水波息，
微茫里，却传来
无尽的哀乐，
哽咽的汽笛。
声音，
这样悲切，
却又这样有力，
——似飓风掠过大海，
——似冷雨抽打大地。
报纸，披着黑纱，
电波，浸着泪滴；
每盏灯，都象红肿的眼睛，
每颗心，都在哀悼伟大的战士，
回来吧，总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中国，怎能没有你！
人民，怎能没有你！
革命，怎能没有你！
且忍住裂心的剧痛，
一任那泪眼迷离。
我要做一只小小的花圈，
献给敬爱的周总理。
但是，该把它放在何处？
几十年，你走遍大地，

偌大的国土呵，
哪里能容下它，
和我这一点赤诚的心意？
呵，今天
追念你——会受迫害，
哀悼你——将遭通缉，
我这小小的花圈呀，
只能把它悄悄地放在
我的并不宽敞的家里，
放在你的遗像前，
我想，这就是——
放在长天漠漠的风雪中，
放在黄河不息的涛声里；
放在旗飞鼓响的战场，
放在万木吐绿的大地……
并且，我要写一首诗，
暂埋进这冰封雪覆的土地，
待明天、春满人间，
我坚信，它会萌生，
迎着阳光，
长出绿油油，绿油油的
美丽的叶子……

二

敬爱的周总理，
我无法到医院去瞻仰你，
只好攥一张冰冷的报纸，
静静地
伫立在长安街的暮色里。
任一月的风，
撩起我的头发；
任昏黄的路灯，
照着冰冷的泪滴。
等待着，等待着，
载着你的遗体的灵车，
辗过我们的心；
等待着，等待着，
把一个前线战士的崇敬，
献给你。
呵，汽车，扎起白花，
人们，黑纱缠臂。
广场——如此肃穆，
长街——如此沉寂。
残阳如血呵，
映着天安门前——
低垂的冬云，
半落的红旗……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为什么有人，
不许我们缅怀你伟大的一生？
为什么有人，
不许我们赞颂你不朽的业绩？
但此刻，
长街静穆，万民伫立，
一颗心——一片翻腾的大海，
一双眼——一道冲决的大堤。
多少人喊着你，
扑向灵车；
多少人跑向你，
献上花束和敬礼；
多少人想牵动你的衣襟，
把你唤醒；
多少人想和你攀谈
知心的话题……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历史呵，请记着——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在中国，在北京，
一辆车，
辗过一个峥嵘的世纪。
车上——躺着一个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车上——躺着一个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车上——躺着一个
正正的生命，
车上——躺着一个
人民骄傲的儿子。
——一个为八亿人，
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的伟大的英雄；
——一个为三十亿人，
倾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的
伟大的战士！
敬爱的周总理，
你就这样
从你熟悉的长安街从容走过，
像生前，从不愿惊动我们，
轻轻地从我们身边走去……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呵，祖国——
茫茫暮霭中，
沉沉烟云里：
多少个家庭的
多少面窗子，
此刻，都一齐打开，
只为要献给你这由衷的敬意。
多少社员，肃立在梯田上，
瞩望你；
多少工人，攀登在井架上，
呼唤你；
千万名战士持枪站在哨位上，
悼念你。
这就是我们的丧仪呵；
主会场——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
分会场——
五大洲南北东西；
云水间，满眼翻飞的挽幛，
风雷中，满耳坚定的誓语。
江水沉凝，青山肃立，
万木俯首，星月不移……
看，这是何等
庄严、肃穆、伟大的
葬礼！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总理，敬爱的周总理，
泪眼，看不清你的遗容，
却只见你胸前
没有绶带，没有勋章，
只有一枚
你长年佩戴的徽章，
象你一颗火热的心，
跳动，跳动，
永不停息。
——那是“为人民服务”
五个金灿灿的大字，
辉映着你心头那
闪光的镰刀和铁锤；
辉映着你身上那
穿过无数次疾风暴雨的红旗；
辉映着你头上那
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
照彻五洲，
照彻天宇……

三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这是一副
永不休息的大脑呵，
这是一腔
熊熊燃烧的血液。
敬爱的周总理，
你在想些什么呢——
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斗争，
还是明天、或者下一个世纪……
呵，我们多么不愿告诉你，
几年来，我们无时不在
挂念你健康的消息。
亲友相逢，家人团聚，
总是怀着感激的深情谈起你。
报纸上，看见你
又一次接见外宾，
像听见你朗朗的言谈
回响在医院四壁；
看见你精神更加焕发，
我们是多么欢喜；
但，你的面容又清瘦了，
唉，比上一次……
却又像石头，压在心底！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那不是你吗？
敬爱的周总理，
人大会堂，
正传出你爽朗的笑声，
天安门前，
又走过你矫健的步履，
你刚听完
一个工地会战的汇报，
又问起灾区
每户人家的油盐柴米；
呵，国务院办公室的写字台上，
政府工作报告，
还等你起草；
呵，外出视察的列车上，
新年度的预算，
还待你审批……

那不是你吗？
敬爱的周总理，
时间，已过午夜，
街头，灯光疏稀——
你关怀着祖国，关怀着世界，
从又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
宏伟蓝图，
到文件上每一个
小小的标点；
从联合国大会上
我国代表的发言，
到北京舞台上
一句台词，一支歌曲……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
你仍在倾听毛主席的诗句……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那不是你吗？
敬爱的周总理，
今天，又和你的战友们一起，
来到我们喧腾的工地。
你开襟解怀，拉车挽绳，
采石运土，激情难抑。
每寸大坝，
都印下你的脚印，
每滴湖水，
都映出你的英姿……
为人民，
你洒的是汗，泼的是血，
捧的是心，拼的是力！
是呵，在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
哪里没留下你
永难忘怀的深切的记忆！
想起你吃的粗茶淡饭，
望着你身穿补缀的衬衣，
呵！磊落，纯朴，清贫，正直——
对我们是多么深刻的教育和激励！
你是总理，
又是公仆；
你是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
又是普通的战士！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难忘呵，
“文化大革命”中
你关心一个个受迫害的战友，
又耐心地劝解两派分歧；
你和我们一起总结教训，
又和我们一起研究新的课题。
呵，战友们告诉我，你昨夜
又是只睡了三个小时，
但却怎能阻止
磅礴的活力——
看，翻飞如海的红旗间，
你又站在台阶上
挥动双臂，
指挥我们
唱激情的歌曲……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怎能忘——
迷雾紧锁的重庆，
你深入虎穴，泰然自若；
怎能忘——
风狂雪猛的莫斯科，
你昂首挺立，迎击强敌……
谁也数不清，
你在敌特的枪口下，
曾几度出生入死；
谁也说不尽，
你在密探的跟踪下，
曾怎样临危不惧！
你炯炯的目光，
凌厉而坚定；
你浓俊的眉毛，
高扬着必胜的信念、斗争的勇气。
对人民，你比炭火更温暖，
对敌人，你比钢刀更锋利！
浩浩忠魂呵，铮铮硬骨，
纯洁的品格呵，不屈的意志！
今天，即使你闭上眼睛，
也仍使敌人胆战心悸！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不，现在你只是——
刚风尘仆仆地走下飞机。
还未来得及拍掉
北非的尘沙，南亚的云雨，

便又赶来迎接一位
非洲兄弟。
看，那不是你吗？
站在敞篷汽车上，
正挥手向我们致意。
呵，风凉了，警卫员同志，
请为我们敬爱的总理，
披上件大衣……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敬爱的周总理呀，
登庐山峰顶，
看烟雨流云，
临北戴河滨，
听大海潮汐。
呵，日月不灭，苍穹不老，
山河不死，生命不已……
你把心脏的每次跳动，
都献给了人民；
你踏出的每一个足迹，
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你不许我们为你写一篇传记，
你的生命却写进党史的每一页里；
你不许我们为你谱一支颂歌，
对你的传颂却响彻寰宇；
你没有一个亲生儿女，
全国人民却都是你的儿女；
你不要陵墓，没有碑文，
你的名字却镌刻在亿万人心里。
对人民呵，你不求——
半点享受，丝毫报偿，
对革命呵，你只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你——大智大勇！
因此，你——无私无敌！
你就是这样——
忠于党，
忠于人民；
忠于祖国，
忠于阶级；
忠于毛泽东思想，
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你如此
伟大、光辉、战斗的一生：
珠峰——显得太轻！
五洲——显得太小！
星月——显得太暗！
九天——显得太低！
如果谁不了解群众和领袖
该是怎样的关系，
就来看看我们的人民和你，
是多么亲密！
呵，此刻，灵车，
正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车轮呵，莫再转动，
马达呵，快快停息！
敬爱的周总理，
难道你真的再不能
回到我们中间？
假如可能，
哪怕只要一次，
我们就再不让你
做任何工作，
只要你和我们永在一起——
看我们上补青天，下填苍海，
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呼吸。
这就是我们——
最大的安慰，
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快乐和欢喜！

（作者　李瑛）

小说《班主任》

《班主任》系短篇小说，作者刘心武。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 年第 11 期，后收入《刘心武短篇小说集》(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获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班主任》最早触及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一重大主题，并展示了充满希望的前景。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准备接收一个学生来自己班上学习，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个名叫宋宝琦的学生是个曾被拘留的小流氓。老师们不解，劝张老师别背这个包袱；几个胆小的女同学表示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则把宋宝琦看作敌人，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张老师到宋宝琦家家访，了解到宋宝琦并不具备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受“四人帮”毒害，无知、愚昧。他去偷“禁书”——《战争与和平》、《牛虻》、《辛稼轩词选》，却连书名也认不下来，更不看内容，只想偷来卖，且以给插图中女子画胡子为乐。宋宝琦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看这些“黄

书”。对此张老师很痛心，可这能怪宋宝琦吗？谢惠敏不也把《牛虻》当作黄书、毒草吗？她是那么固执地认为凡是书店不出售的、报上不推荐的，便都是坏书；还把女孩子穿短袖衬衫、花裙子，传播“文艺消息”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发现石红看《青春之歌》这样让人“心跳神乱”的“黄书”，也坚决予以没收。石红想约她找来那些胆小、赌气的同学一起读一读《表》，启发大家正确对待宋宝琦这样的人，而她不但拒绝参加这个活动，还警告石红“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啊”。面对这些被“四人帮”愚民政策毒害的学生，张老师从内心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强烈呼声。这篇小说告诉人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施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心灵上给青少年一代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治愈这种内伤，则是我们在新时期中所肩负的一项严重而紧迫的使命。在当代文学史上，这篇小学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虽然有人认为它“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思想观点的流露过多地依赖于作者的叙述与议论，但更多的是认为这篇小说无疑是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只是在艺术上存在着叙述性情节较多，生活细节描绘不足的缺点。

材料　《班主任》的思想意义

刘心武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小说家。1977年11月，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这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最早触及“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心灵创伤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因此，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

这篇作品的主要的思想意义在于真实地塑造了两个历史“畸形儿”——宋宝琦、谢惠敏的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他们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如果说不足16岁的中学生宋宝琦是因为“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成为一个空虚、愚昧、野蛮的小流氓，那么本质纯洁、品行端正的谢惠敏成为一个教条古板、思想僵化，甚至连四肢关节也显得木僵不灵的畸形儿，则是因为她除了知道按“四人帮”在报纸上宣传的“章法”行事外，其余概无兴致。作家深刻地剖析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揭露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施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心灵上给我们的青少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必然会扼杀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生机，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林彪、“四人帮”反动面目的认识，增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一社会任务的紧迫感。作家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人们还习惯按照“左”的思想观点立言行事的时候，就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和胆识，从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身上，看到了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注意的内伤和潜伏的危机，从而唤起社会疗救的注意，具有振聋发聩的社会意义。

作品另一方面的思想意义在于：作家以提出社会问题的尖锐和人物塑造的深刻，扫除了文学中的“帮”气，为小说创作领域中革命现实主义的恢复，树起了一块丰碑。作家敢于直面现实和人生，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大胆地提出了反映人民心声、时代要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作家对谢惠敏这个形象的塑造，使人们在10年禁锢之后，又开始尝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魅力。作品既写到谢惠敏有着许多可贵的素质，又层层深入地剖析了她“左”得可怕的灵魂世界，还深掘了她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这样，使谢惠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典型人物，她无疑将以她的独特风采长留于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之中，《班主任》也将做为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路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小说《创业》

《创业》系长篇小说。作者张天民。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小说是作者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它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我国6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在解放前的裕明油田，小名十斤娃的周铁杉从小受尽了苦，遭尽了难。他的父亲、共产党员周老大为了保护油井而壮烈牺牲。解放了，油田成了人民的油田。苦大仇深的周铁杉成为一名石油工人。在党和领导的关怀教育下，他不断成长，当上了石油钻井队队长。周铁杉带领石油工人在西北的克拉玛依油田摆开了战场。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创造了月钻井五千米的奇迹。为了纠正中国没有石油的不科学说法，地质学家钟之光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远渡重洋，回到了祖国。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进行石油勘探，终于得出了中国含油丰富的结论。为了开发东北大草原的石油，周铁杉和他的伙伴们及其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人汇集东北、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行为没有使他们灰心丧气，井喷也没有使他们感到畏惧。经过艰苦的创业，大草原的石油终于喷了出来。小说以周恩来总理视察油田、接见石油工人的动人场面作结束。小说在着力塑造周铁杉的同时，也塑造了以华程为代表的党的好干部形象。章易之、姚云明等科学技术人员在这场艰苦的创业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志薄弱、叛党变节分子冯超和阶级敌人霍家根则是作者揭露和批判的对象。小说热情歌颂了我国石油工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场面宏伟，感情充沛。

历史档案

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在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亲笔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他们对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不满，妄图取而代之。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报导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在同某外国作家进行的几十小时的谈话中，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他们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亲笔写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戳穿了他们的伪造。十月四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肆意攻击党中央。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华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有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十月六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

…………

对待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教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他们不仅不作自我批评，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堕落成为阴谋家、野心家的反党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中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有关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中央将陆续印发。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

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对于我党今后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证明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他们妄图分裂我们党，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只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在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保护符合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那些态度不端正的同志，要进行教育。

（节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集》下卷）

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通知

材料之一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并组织阅读和讨论，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24号）

材料之二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0号）

材料之三

“《材料之三》的主题是，集中揭露‘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罪恶活动。这个材料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揭露‘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二部分，选择党的十大前后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揭露‘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其他渠道，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散布大量的反动思想和反革命谣言，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材料之三》汇集的‘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是学习党的十一大路线，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好的反面教材。”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37号）

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

《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在1977年10月5日由中共中央发出。10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决定》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努力澄清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彻底清除“四人帮”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危害，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切实办好党校。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各级党校有的被取消了，有的停办了，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四人帮”被粉碎后，各级党校，有的地方已经恢复，有的地方正在恢复。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校，都应从速恢复，切实加强领导，纠正目前有些地方党的委员会不管党校的现象。地、市、州、盟一级的党校，也应力争早日恢复或者进行整顿。至于县、市、镇一级的党校，有条件的也可以办。各级党校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要有计划地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就要求各级党校根据当时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根据学员的程度、学期长短和教学力量等情况，有计划地安排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应坚持阅读原著为主，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为了搞好党的理论工作，中央认为，各级党委要下决心，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造就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不断提高教学和辅导质量。《决定》还指出，各级党校都必须以整风精神搞好党的建设课程的学习，也要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做到每期学员结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党性和作风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提高。这一条，应该作为衡量党校办得好与不好的一个主要标志。根据《决定》精神，全国各级党校相继恢复。在此基础上，1983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党校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由中共安徽省委1977年11月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农村会议讨论通过。规定的主要内容有：(1)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强调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整顿和加强劳动管理。要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做到人心向农，劳动归田。外流人员要动员限期归队，手工业单干的要组织起来。对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民主评定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定期检查评比。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生产队要实行定额管理，搞好评工记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据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要切实加强生产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防止瞎指挥。生产队按照国家关于粮食和各项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指标的要求，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安排作物茬口，决定增产措施。要整顿和加强财务管理。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队企业都要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依靠贫下中农，搞好民主理财。(2)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积极创造条件，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社队企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四个服务”的办法，已办起来的，要继续办好；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积极兴办，所需要的劳动力，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与生产队协商解决；所需要的资金，主要靠发展多种经营逐步积累，不准采取平调的办法。社队企业人员，坚持亦工亦农的制度，平时做工，大忙务农。(3)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要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农村办学校要统一规划，一个村庄几个生产队就不一定要求队队办；几个村庄靠得很近，就不要硬性要求村村办。社队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体育队等，应当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民兵要坚持劳武结合，集中训练要在农事间隙进行，享受固定补贴的人要严格控制。任何单位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土地或发动社员投资捐献，不得挪用生产队在信用社的存款。(4)分配要兑现。要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搞好分配的基础；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好农、林、牧、副、渔的生产，认真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烟、果、药、杂的关系，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向国家多作贡献，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增加集体收入，尽快改变分配不能兑现、无现金分配和“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状况。要认真抓好超支还款，积累和分配比例要适当。(5)粮食的收购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粮食要“及时收购，及时安排”，在“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的原则下，力争多购一些。口粮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基本口粮部分应当按人分等定量，但分等不宜过多。(6)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应继续执行《六十条》规定，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应收归集体。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饲养适当的猪、羊、兔、鸡、鸭、鹅等畜禽，但要加强管理，防止糟踏集体庄稼。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在完成国家派购任务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又比如说，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四人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详细情形我就不讲了。怎样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这里面内容很多。比如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比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比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比如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比如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比如，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

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现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对是非的识别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动脑筋，想问题，关心国家，关心党。“四人帮”在那里危害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党员和人民，都是十分担心，忧心忡忡。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1977 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77 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是，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粮食产量达到 5655 亿斤，比上年减产 71 亿斤；棉花 4098 万担，比上年减产 13 万担。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本年 1 月，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这一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37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国民收入 26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财政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收支相抵，略有结余，扭转了过去连续三年收入完不成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

（摘自《新中国编年史》）

体育档案

1976 年我国破世界纪录统计

	世界纪录						世界青年纪录					
	项数		人(队)数		次数		项数		人(队)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合　计	3	3	3	3	3	3	1		1	1	2	
射　箭	3	3	3	3	3	3						
举　重							1		1		2	

1976年破全国纪录统计

	全国纪录						青少年全国纪录					
	项数		人(队)数		次数		项数		人(队)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合计	76	36	69	25	118	48	50	17	28	10	82	22
田径	14	7	17	8	20	11	5	1	5	1	5	3
游泳	22	11	19	8	47	13	19	11	13	8	44	12
举重	8		5		11		19		13		46	
速度滑冰	12	6	4	2	18	12	7	5	3	1	9	7
射箭	15	11	8	3	17	11						
射击	5	1	16	4	5	1						

注:田径、游泳、举重、速度滑冰人数应为人次(少年兼成年纪录)

1976年各级体委举办运动竞赛会次数

	合计	国家体委办	省、市、自治区体委办	地、市、盟体委办	县、区体委办
总计	20812	44	386	2273	18109
综合性运动会	1902	38	103	232	1529
职工运动会	4641		54	445	4142
农民运动会	2512		39	131	2342
学生运动会	10841	6	176	1329	9330
其他行业运动会	916		14	136	766

1976年各级体委训练体育干部人数

	合计	体委干部	教练员	裁判员	学校体育教师	基层体育干部	
总计	663198	4906	50983	98383	116110	392816	
厂矿企业	103083	1489	8653	22746	1301	68894	
农村人民公社	183064	1137	10369	12611	6634	152313	
大专院校	5254	34	132	1204	737	3147	
中学、中专	138293	654	11066	29959	39759	56855	
小学	187499	630	14098	19631	65475	87665	
机关	20293	636	2606	6696	873	9482	
商业	12909	110	1442	3532	55	7770	
其他	12803	216	2617	2004	1276	6690	

1977年我国破世界纪录统计

	世界纪录						世界青年纪录		
	项数		人数		次数		项数	人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计	计
合计	3	3	7	7	7	7	3	2	5
举重									
射击	2	2	6	6	6	6	3	2	5
射箭	1	1	1	1	1	1	1		

1977 年破全国纪录统计

	全国纪录						青少年(甲组)全国纪录					
	项数	人数	次数	项数	人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合计	77	27	107	40	161	57	41	12	41	15	65	19
田　径	16	7	26	13	35	19	12	5	12	7	16	8
游　泳	15	7	15	7	33	12	3	7	9	8	13	11
举　重	14		14			36		17		12		20
速度滑冰	10	4	12	7	25	15	4		8		16	
赛车场	3	3	6	6	3	3						
自行车												
射　箭	7	4	6	1	10	4						
射　击	12	2	28	6	19	4						

1977 年各级体委举办运动竞赛会次数

	合计	国家体委	省市自治区体委	地盟市体委	县区体委
总计	22380	47	467	3270	13596
综合性运动会	2043	38	89	328	1588
职工运动会	5388	1	97	659	4631
农民运动会	1779		14	180	1585
学生运动会	12157	8	222	2000	9927
其他行业运动会	1013		45	103	865

注：田径、游泳、举重、速度滑冰人数应为人次(青少年兼成年纪录)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976 年 10 月 6 日——12 月 31 日

10 月 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10 月 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10 月 8 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在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0 月 9 日　全国上下热烈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一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0 月 17 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10 月 19 日　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群众举行纪念鲁迅逝世 40 周年活动。

10 月 21 日　首都 150 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0 月 21 日～27 日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纷纷打电报给华主席党中央，热烈欢呼华国锋主席为我党领袖，热烈欢呼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

《人民日报》发表任平《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批判"狄克"，即张春桥）。

《人民日报》发表鲁迅《三月的租界》（批判狄克）。

10月23日　29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10月24日　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伟大胜利，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作了讲话。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出席了大会。

10月25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0月27日　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苏振华在会上宣读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把"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损失夺回来》。

11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平《光辉的历史文件》。

11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1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阴谋——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来是要干什么？》

11月17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1月19日　煤炭部召开全国煤矿采掘队"十面红旗"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罪行广播大会。

《人民日报》发表鲁迅研究室《江青30年代的3次反革命表演》。

11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徐逊《江青与吕后》。

11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农业部大批判组《农业学大寨的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罪行》。

1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撼山易，撼大庆红旗难——大庆油田标兵、模范人物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大庆的滔天罪行》。

《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11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一六六中革命师生的文章《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

11月24日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庄严举行。华国锋发表讲话并为纪念堂基石培土。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等参加了奠基仪式。

长沙县工农兵群众隆重集会，声讨"四人帮"滔天罪行，纪念杨开慧烈士英勇就义46周年。

11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11月30日～12月2日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京隆重举行。华主席、叶副主席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毛主席生前同意的关于邓颖超同志担任副委员长的提议。会议通过邓颖超为副委员长的决议，决定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指张铁生）。

12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三机部批判组《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前前后后》。

1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总参军训部理论组《斩断黑手——批判"四人帮"乱军反党的罪行》。

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大批判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批判"四人帮"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行》。

12月10日　中共中央批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此后，罪行材料之二、之三相继下发。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12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魏华等《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铁证——评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1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12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

《人民日报》发表李淑一《毛主席灿如红日光照人间》。

1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加编者按指出，这是五年前写的被"四人帮"扼杀的社论。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2月31日　解放军驻京文艺单位喜迎新年同时演出，纵情歌颂华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

1977年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乘胜前进》。

1月6日　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全国陆续上映。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磨不灭的光辉，砍不断的怀念——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诉》。

1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对外联络部批判组《“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激起天怨人怒》。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瞻仰红岩村，怀念周总理》。

1月8日　首都人民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隆重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1月10日～25日　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揭猛批“四人帮”，努力完成今年战斗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23日，华国锋接见了全体代表。

1月12日　山西省委、省革委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题词和刘胡兰英勇就义30周年。

《人民日报》发表杨志杰等《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剖析反动影片《反击》），并加编者按。

1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交通部大批判组《一出反革命闹剧——“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的真相》。

1月18日　中共中央委员、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逝世，终年60岁。

1月27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发出通知，要求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1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从清华北大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四人帮”两个心腹干将（指谢静宜、迟群）搞反革命的地下活动，私设反党秘密联络点，四出串联，煽风点火，罪恶滔天》。

2月5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2月7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观点。

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抓纲治国》。

2月10日　大庆开展“三大讲”（一讲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二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斗争的经历，三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深入揭批“四人帮”。

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要想打胜仗，就要常整党》。

2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露江青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罪行》，并加编者按。。

2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大庆革委会《岗位责任制度》，并加编者按。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恩格斯〈论权威〉（节录）》，并加编者按。

2月27日　华国锋会见李政道博士。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打倒“闹而优则仕”》。

《人民日报》发表北影《海霞》摄制组《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铁证——揭发批判“四人帮”围剿电影〈海霞〉的罪行》。

2月28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省同胞一起，隆重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30周年。叶剑英等出席。

3月1日～13日　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3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3月5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同时还发表了华国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题词。

同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向雷锋同志学习》。

同日　湖南省和长沙市、长沙县隆重集会，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和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50周年。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壮丽青春献人民——记雷锋式的好战士王彦修》。

3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湖南省湘潭地区妇联《华主席领导我们妇女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3月10日～2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讨论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重申“两个凡是”的观点。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公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受到华国锋的压制。

《人民日报》发表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节录）和巩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好——学习列宁〈怎样组织竞赛〉一文的体会》。

3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大庆油田政治部《加强基层建设的八条要求》。

3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向群《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3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

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3月26日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毛主席纪念堂的主体建筑结构工程胜利建成。

3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判组《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

3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交城县委《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

4月10日　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写信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大庆党委《大庆油田政治工作要点》。

4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批判“四人帮”》。

4月15日　在华主席、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亲自关怀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发行。全国准备印制2亿多册，第一批发行1500万册。

4月16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

4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跃进》。

4月21日～25日　华国锋视察东北三省。

4月26日　华国锋视察唐山市。

《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贵在鼓劲》。

5月1日　华国锋同首都群众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广大群众一起联欢。

《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5月5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上海市委大批判组《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5月13日　原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病故（他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于1980年7月改正。1982年5月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5月17日　《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最近在北京开幕。

《人民日报》发表《揭穿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老底——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大批判文章选编》。

《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评“三突出”》。

5月24日　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胜利完成。

5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向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题词“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

6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吴江《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批儒评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华主席、叶副主席关于向硬骨头六连学习的题词。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批判组《盖不住的丑史，抹不掉的罪恶——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命历史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

6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总政工作组《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按照毛主席军事路线建设过硬连队——“硬骨头六连”加强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6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上影大批判组《这笔帐一定要清算——从反党影片〈春苗〉的出笼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6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少数民族文版出版。

7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揭批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罪行》。

7月16日～21日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和《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七·三〇指示）。

7月31日　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大会，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叶剑英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八一起义旧址重新开放。

8月1日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建军50周年。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出席。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加速国防现代化——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

呼和浩特各族人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动工兴建，华国锋为纪念塔题字。

8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8月19日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了中央机构。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候补委员：陈慕华（女）、赵紫阳、赛福鼎，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同日　中共中央委员、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林李明同志逝世，终年67岁。

8月22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

8月28日　中央军委命令，授予梁忠孟同志“雷锋式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

8月29日　毛主席纪念堂胜利建成，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已移入瞻仰大厅，毛主席遗容像生前一样安详。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办公厅理论小组《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9月9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大会，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并举行纪念堂落成典礼。华国锋等出席。华国锋作重要讲话。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一万群众，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首都文艺工作者举行盛大文艺演出，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展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光辉生平》摄影展览和《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展出。

9月1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9月17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9月29日　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同志逝世，终年71岁。10月8日，在京举行追悼会，悼词中为他平反。

9月30日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

10月1日　华国锋等和首都人民一起游园联欢观看焰火，热烈隆重庆祝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群众一起参加庆祝活动。

10月5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

10月6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10月9日　中共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华主席、叶副主席等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副校长胡耀邦讲了话。

10月12日～18日　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举行。毛致用当选第一书记。

10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肃清“哈尔套经验”的流毒——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哈尔套大集”的滔天罪行》。

10月23日～24日　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明春召开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10月24日～27日　西藏自治区举行第二次党代会。任荣当选第一书记。

10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记中共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此风刹得好》。

10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10月27日　江西省1万军民在茨坪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50周年。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申涛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命罪行》。

10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清查工作要搞到底》。

10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杨益言《叛徒江青为什么扼杀〈红岩〉》。

1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11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揭“四人帮”死党于会泳（原文化部长）的老底》。

11月6日　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随即全部撤出学校。

11月7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11月9日～16日　湖南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毛致用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1月16日～2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

举行。乔晓光当选第一书记。

11月20日～28日　贵州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马力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1月21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1月24日～12月3日　北京市七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吴德当选市革委会主任。

11月25月～12月3日　河北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刘子厚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1月27日　华国锋到密云水库参加劳动,李先念、汪东兴等一起参加。华国锋指示"一定要充分利用水利发电","要在全国大大提倡植树造林"。

11月28日～12月5日　河南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刘建勋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1月29日～12月2日　西藏自治区三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任荣当选区革委会主任。

11月30日　优秀科学家、教育家、人大常委、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吴有训同志逝世,终年80岁。

1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总政办公室理论组等《毁我长城必自毁——清算张春桥在总政治部的反革命罪行》。

12月1日～5日　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许家屯当选第一书记。

12月2日～6日　天津市举行八届人大首次会议,解学恭当选市革委会主任。

1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最高人民法院理论组《牢牢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彻底砸烂"人民法院的罪行》。

12月8日　河南省委根据广大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作出决定,重新处理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四人帮"之流以一女学生自杀制造的冤案)。

12月9日～14日　山东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白如冰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9日～15日　山西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王谦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0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

12月11日～15日　广西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乔晓光当选区革委会主任。

12月12日～17日　广东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韦国清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3日～17日　云南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安平生当选区革委会主任。

12月14日　中共八届中委、三届人大常委、全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少敏同志逝世,终年75岁。

12月15日～20日　四川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赵紫阳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5日　毛主席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建成。

《人民日报》发表申涛声《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评"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

12月16日～23日　青海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谭启龙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8日～22日　浙江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铁瑛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9日～25日　吉林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王恩茂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9日～26日　宁夏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霍士廉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21日～28日　内蒙古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尤太忠当选区革委会主任。

12月23日～28日　辽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曾绍山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黑龙江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杨易辰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23日～29日　甘肃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宋平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扈世纲《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

12月24日～28日　江苏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许家屯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24　华主席、中央军委批准《星火燎原》选编出版。

12月25日～29日　陕西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李瑞山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25日～30日　上海市七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苏振华当选市革委会主任。

12月27日～29日　四届政协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华国锋等出席。叶剑英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二十多年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党要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四化作出贡献。

12月28日～1978年1月4日　福建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廖志高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12月30日～1978年1月5日　湖北五届人大首次会议举行,赵辛初当选省革委会主任。

经 济

1976年10月6日——12月31日

10月7日　我国又一座现代化深水油港——青岛港务局黄岛油港胜利建成投产。

11月25日　石化部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滔天罪行，提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

12月5日　又一艘国产长江大型客货轮“东方红十四号”试航成功。

12月10日～27日　在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并讲话，提出1977年的主要战斗任务。陈永贵在会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2月11日　中科院研制成功高速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

12月18日　国务院最近宣布，中央决定明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12月26日　山东拖拉机厂在兖州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一万台。

12月28日　大庆油田一座年产相当于100万吨标准化肥的大型化肥厂——大庆化肥厂建成投产。该厂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化肥厂之一。

上海大屯煤矿新建的姚桥矿投产，年产120万吨煤。

12月29日　我国农业连续夺得第15个丰收年。

1977年

1月1日　我国目前最长的公路桥——洛阳黄河公路大桥胜利建成通车。该桥全长3428.9米，位于孟津县和孟县之间。

1月11日　30万吨乙烯工程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建成投产。

我国又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山东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

1月19日　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找到我国北方第一个大型磷铁矿。北京第一机床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转子槽铣床。

1月28日　银川至青铜峡高压输电线路建成。

2月20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

2月25日　黄河上游建成一条高压输变电工程——西(宁)共(和)线。

3月13日～30日　全国林业、水产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19日　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打胜抗旱这一仗。

3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

3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

3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3月25日　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最近在昔阳召开。

3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大庆油田的“评、比、选、树”运动》(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

3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钢铁钻工”吴全清——大庆英雄谱之一》(之后，《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之二、之三……)。

3月30日　全国基本建设会议最近召开。

3月31日　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最近在京召开。

4月9日　我国建成第一座地下水封石洞油库。

4月10日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

4月20日～5月13日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油田隆重召开，在北京闭幕。华国锋亲自主持开幕式，并在会上讲话。大庆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宋振明介绍大庆基本经验。余秋里副总理受中共中央委托作题为《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的重要报告。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作题为“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为建设起10来个大庆而奋斗”的发言。

5月17日　河南找到大型优质天然碱矿——吴诚天然碱矿。

5月30日　江苏制成我国第一台大型宽银幕织布机。

6月28日　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最近在湖北省召开。

6月30日　我国又一座大型现代化铁路车站——长沙新车站胜利开站。

7月5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动员起来，加速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7月6日～8月5日　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在京举行。

7月28日　全国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最近在京举行。

8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省委要用很大的劲头抓农业》。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摘译)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发表。

8月1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

9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同日　我国西南目前最大的水电站——龚咀电站基本建成。我国又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碧口水电站建成发电。

10月4日　农林部召开华北、中原地区平原绿化现场会。

11月7日～12月4日　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京举行。

12月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

12月11日　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大庆式企业的检查评比和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按照六项标准评比验收大庆式企业。

12月19日　华国锋等视察农业机械化展览。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和《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外　交

1976年10月6日——12月31日

10月8日　中澳两国政府就中国人民在澳大利亚的有关问题达成谅解。

10月12日　我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建交。

10月30日　华国锋致电霍查同志，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11月7日　中共中央致电阿劳动党中央和霍查同志，最热烈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35周年。

11月18日　华国锋会见并宴请缅甸共产党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等。

11月27日　我国科学技术协会发表声明，揭露国际科联理事会领导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2月1日　华国锋致电老挝苏发努冯主席，最热烈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12月14日　华国锋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

1977年

1月2日～6日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拉赫曼应邀访问我国。

2月17日　我国与利比里亚建交。

3月6日　华总理致电祝贺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召开。

4月6日～10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问我国。

4月9日　华国锋会见英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

4月14日　我国与约旦建交。

4月27日～5月12日　缅甸总统吴奈温和夫人访问我国。

5月7日　华国锋致电齐奥塞斯库、曼内斯库同志，最热烈祝贺罗马尼亚国家独立100周年。

5月30日　我国与巴巴多斯建交。

6月2日　华主席、叶副主席会见越南军事代表团。

6月6日～16日　苏丹总统尼迈里访问我国。

6月8日　华国锋会见越南范文同总理。

6月10日　华国锋会见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

6月13日　我外交部就日本政府强使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在日本国会获得"自然批准"一事发表声明，对日本政府这一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严重抗议。

6月18日　我国和埃塞俄比亚关于中国民航开辟北京至非洲航线经停亚的斯亚贝巴的会谈纪要在亚的斯亚贝巴签字。

6月28日　中国民航开辟中国经卡拉奇至非洲航线备忘录在卡拉奇签字。

8月6日　华国锋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8月16日　邓小平副主席会见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教授和夫人。

8月17日　邓副主席会见美籍物理教授丁肇中。

8月17日～9月7日　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在希腊雅典举行。我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9月7日，我代表团提出的关于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地名作为国际罗马字母拼写的标准的提案，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8月22日～26日　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我国。

8月27日　华主席、邓副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

8月30日～9月3日　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访问我国。华国锋同他进行会谈。中南两党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9月4日　华国锋会见美籍物理教授丁肇中。

9月28日～10月22日　柬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访问我国。华国锋同他进行会谈(期中波还去朝鲜访问)。

9月29日　我国代表团团长黄华在联合国第32届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阐述我国对世界局势的原则立场。

11月20日～25日　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党政

代表团访问我国。

11月30日　中共中央致电泰共中央，最热烈祝贺泰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

12月27日　华国锋会见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

科技文化教育体育

1976年10月6日—12月31日

10月17日　《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出版发行。

10月18日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郭小川同志逝世，终年58岁。

11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11月9日　扫除"四人帮"，湘剧《园丁之歌》获新生。

11月22日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遗址发现10万年前古人类右顶骨化石。

12月7日　我国第七次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日，卫星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作曲家郑律成同志逝世，终年58岁。

12月11日　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的《万水千山》(话剧)再次公演。

12月24日　彩色纪录片《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在全国开始陆续上映。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刘白羽《红太阳颂》。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影展在京开幕。

《人民日报》发表陕北民歌《绣金匾》。

12月29日　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砸烂"四人帮"的冷宫，《东方红》、《洪湖赤卫队》等6部影片重见天日。

12月30日　一批新影片元旦上映(《征途》、《大庆战歌》等)。

1977年

1月1日　粉碎"四人帮"，评弹《蝶恋花》最近重演；舞剧《小刀会》又将公演。

1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造体系图》等三种地区图件最近将在国内外发行。

1月10日　安徽六安无线电厂研制成功核子旋进磁力仪，为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1月13日　湖北宜都建成我国第一个县内公用单路传真通信网。

1月20日　西藏昌都地区首次发现恐龙化石。

1月22日　优秀歌剧《洪湖赤卫队》在武汉重演，深受欢迎。

1月25日　适用农村县城的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吉林研制成功。

1月27日　青海乐都县发掘出原始社会晚期氏族公社公共墓地。

2月5日　我国研制成功大型多功能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

2月9日　现代京剧《六号门》在天津重新上演。

2月13日　我国邮电部门广大职工研制成功960路微波通信系统二型机。

2月15日　歌剧《白毛女》在首都重演。

2月16日　春节上映一批新影片(《金光大道》中集、《大浪淘沙》等)。

2月17日　春节期间首都舞台百花争艳。深切怀念毛主席、周总理、热情歌颂华主席、愤怒批判"四人帮"，是今年春节文艺演出的主要内容。

2月17日　我国考古工作者1976年在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这是继我国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湖北郧县之后，第五个发现猿人化石的地点。

2月25日　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

2月26日　广州发现一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3月22日　著名京剧演员谭富英同志在京逝世，终年72岁。

3月26日～4月5日　第34届世乒赛在英国伯明翰举行。中国男、女队分获男、女团体冠军，李振恃和梁戈亮获男双冠军，朝鲜女运动员朴英玉和我国女运动员杨莹获女双冠军。

4月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4月9日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博物馆联合考察队不久前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煤场古猿化石地点，发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据鉴定，这种从猿到人过渡类型的下颌骨，在国内外是第一次发现。

4月12日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殷代奴隶主贵族墓葬。

5月10日　山东临朐县山旺硅藻土矿发现一件十分完整的鸟类化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极其珍贵的鸟类化石。

5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化路线的伟大旗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

首都举行盛大文艺演出大会，隆重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35周年。

5月24日　我国天文台发现天王星也有环带。

5月28日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人造金刚石钻探新技术在我国研究试验成功。

6月14日　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人”洞穴遗址附近的石峡地区，发现了一处距今3000至5000多年的古文化遗址和氏族公社墓地，出土遗物近3000件，被称为古峡文化。

7月15日　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大会在京举行。

7月17日　我国最近制成新抗菌素——球红霉素。

7月17日～30日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举行。中国青年队获第一名。

7月19日　我国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十二号”最近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科学调查。

7月20日　国务院最近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

7月22日　辽河最大公路桥——日庄台辽河大桥建成通车，全长878.9米。上海试制成功80万倍电子显微镜。

7月24日　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逝世，终年65岁。

7月25日　我国登山队10名男女队员和一名电影工作者首次登上天山最高峰、海拔7435.3米的托木尔峰。30日，第二突击队的17名运动员再次登上该峰。

7月26日　全国肿瘤防治工作会议最近在京举行。

8月4日～8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邓小平主持并作重要讲话。

8月8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制定《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

8月13日～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决定高校招生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京汉公路上的主要桥梁之一——洛河大桥建成通车，全长355米。

8月26日　我国自行研制农林飞机成功。柳州制成我国最大的装载机——五立方米装载机。

8月28日　童第周、牛满江等研究细胞遗传学又有新发现。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9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陕南阳安(阳平关——安康)电气化铁路建成通车，全长356公里。

9月27日～10月31日　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规划和提出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案)。

10月3日　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中科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数学家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问题进行精心解析和科学推算，证明：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1+2”)，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10月12日　山西阳高县发现一处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址。在这里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被命名为“许家屯人”。

10月16日　陕西周原地区发现15000多片西周早期甲骨。

10月19日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京成立。

10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10月23日　危害我国数十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连续十几年没有发生蝗害。

10月27日　上海进行带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手术成功。这是我国显微外科技术在骨科领域中的新发展。

10月29日　著名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陈望道逝世，终年87岁。

11月8日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的第一个数字制卫星通信地面站建成，顺利开通，用来接收卫星双通道彩色电视节目。

11月11日　我国第一台鼻咽摄影仪研制成功。

11月15日　中科院和各高等院校开始招考研究生。

12月13日　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会议最近在沈阳举行。

12月13日　我国第一台脉冲感应式航空电话仪器在长春研制成功。

12月17日　国家体委颁发“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证书证章。

安徽省五河淮河大桥建成通车，全长1031米。

12月19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工作的步伐》，并全文发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2月21日　山东省临沭县岌山公社常林大队发现一颗特大的天然金刚石，重158.7860克拉，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颗天然金刚石。1978年7月，命名为“常林

钻石”。

12月22日　全国科协最近在天津举办盛大的学术讨论会。

《人民日报》发表刘梦溪《要给作品落实政策》。

12月26日　首都隆重举行文艺晚会，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84周年。

12月26日　文化部撤销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建制，恢复中央音乐学院等6所艺术院校校名。

12月28日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派出“实验”号科学调查船，对我国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北的海域成功地进行了考察。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在全国大力提倡植树造林》。

彩色纪录片《愚公移山》在京举行首映式（伊文斯、罗丽丹摄制）。

12月30日　上海、江苏、辽宁从明年元旦起试行“邮政编码”制度。

12月31日　我国工交战线发生可喜的重大转折。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那种生产建设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扭转过来了。1977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稳定上升、持续跃进的新起点，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4%以上。

我国目前最大的高炉在鞍钢投产，容积为2580立方米。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8年

导　言

岁月进入了1978年，这是光辉的一年，是划时代的一年，尽管当时在中央华国锋的“左”倾错误仍然存在，但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局部地展开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为酝酿和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许多工作。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两年徘徊的局面，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右派分子”的“摘帽”和改正工作**
- **中越关系的恶化与摩擦**
-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 **划时代的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背景介绍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会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在经济上急于求成地提出了许多新的过高的要求。

材料：

· 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材料　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今天宣告胜利闭幕。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一致选举叶剑英同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总理。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宋庆龄、聂荣臻、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出席了闭幕式，并在主席台前列就座。当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下午三时，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宣布大会开始。

大会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之后，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了国务院总理的人选；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人选。当宣布叶剑英同志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全场一片欢腾，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期间，代表们对华国锋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叶剑英副主席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中，大家对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报告以及宪法修改草案表示热烈拥护，并且积极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代表们对国家领导工作要员的人选，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协商。代表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努力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项战斗任务，为胜利实现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为胜利实现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为胜利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出席今天大会的代表有三千四百六十人。他们个个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下午四时，开始进行选举。万人大会堂里，华灯齐放。华国锋主席精神焕发、满面笑容地走到镶有国徽的大红票箱前，第一个投票。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和大会主席团其他常务主席接着在热烈的掌声中投票。在他们投票以后，代表们开始依次投票。这些来自祖国边疆海防、城市农村，来自工业、农业、科技文教等各条战线的各族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界代表，把他们的选票庄严地投进分设在会场各区的三十个票箱，代表全国八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选举国家领导人。

下午七时，大会完成了今天的各项议程以后，邓小平同志说，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各项任务。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宣布大会胜利闭幕。军乐团奏国歌。全体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6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背景介绍

在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涉及到真理标准问题。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该文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力，在全国范围展开。

材料：

- 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始末
- 1978年的大争论

材料一　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

1978年3月26日，在"两个凡是"指出一年以后，《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如一石击水，引起了社会反响。

同年4月上旬的一天，《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该报《哲学》专刊版第77期大样时，全神贯注地看完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作出极为重要的决定："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并要求报社理论部同志修改这篇文章，要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这篇文章，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于1977年10月约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稿的。

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决定请孙长江、胡福明一起来商讨。反复修改七八次，主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当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又作了重要修改。第十次修定稿送胡耀邦审完后，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1978年5月11日　这篇历经7个多月，前后修改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

《人民日报》及时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晚上11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5月13日，当时的《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一篇错误文章。并对别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8月19日，邓小平接见当时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到，《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邓小平在6月2日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之后，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火气很盛地说，党报要党性。个性服从党性。现在我们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几乎在同时，吴江应《解放军报》之约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即将此文送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很支持，亲自修改过两次，给军报打了5次电话，在他的支持下，此文在军报上发表了。有人称它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姐妹篇。

此时，只有《红旗》是沉默的。因为汪东兴对《红旗》杂志总编辑说过，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针对毛主席来的"，《红旗》不要表态。不久，谭震林同志应约撰写的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送到了《红旗》编辑部，文章的第四部分联系现实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红旗》杂志总编辑认为这部分要删掉，派人去见谭震林。谭震林当即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红旗》杂志总编辑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将谭文送

审。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红旗》才被迫打破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沉默，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

（原载1988年6月7日《文摘报》）

材料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始末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表了，信上说："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话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1977年底，中央党校讨论如何分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胡耀邦提出，分清路线是非，不能按党的文件，而应按革命实践。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意即检验真理只有实践这个唯一的标准。

《光明日报》收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题的文章虽然较早，但由于采取通信方式同作者商量修改，处理过程拖得较长。

1978年3月间，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西光被调来主持《光明日报》的工作，他参加了中央党校关于用革命实践分清路线是非的讨论，也知道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在酝酿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看到胡福明这篇文章后，杨西光特别重视，决定将已经拼到哲学版上的这篇文章抽下来，要求改得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一版重要地位发表。其时胡福明正来京开会，就请他来报社，并请孙长江一起参加讨论修改胡福明的文章。作者胡福明根据讨论的意见又对文章作了一次较大修改，编辑部也作了许多修改，然后把文章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他们再帮助修改。孙长江也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后来，经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文章于5月10日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载（文末署有"光明日报社供稿"），5月11日即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在《光明日报》公开全文发表。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表示赞成，也有的负责人坚决反对。一时间，同发表这篇文章有关的人受到很大压力。胡耀邦很有信心地表示：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时反复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在七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上，有的人主张应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导到学术的范围里去，这就抹煞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甚至到了1986年8月，有的报纸还在突出地位刊载了渲染所谓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对我们的侵袭，贬低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积极成果的新闻报道和标题。

（原载1988年5月1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1978年大争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一、真理是客观的，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具有把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二、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向前推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三、文章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述来说明，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人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四、文章号召人们敢于冲破思想的"禁区"敢于去弄清是非。号召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在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提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这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将它向全国转播了。12日，全国大报大多数加以刊载。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相互推荐阅读，因为它说出了诸多人多年想说而不能、不敢说的话。这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向坚持"两个凡是"的权威挑战的评论，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它明确告诉人们，凡经实践证明的错误，即使是最高领导人犯的也得纠正，因为这是马列主义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一再教导。这篇文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文章也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和责难。当时我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文章播发的第二天，接到我的一位朋友（宣传口副手）的电话，对我进行劝告和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也接到一位要人的批评电话。他们的

意见归纳起来如下：一、文章是错误的，新华社不应该转播，《人民日报》也不应该刊载；二、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观点是片面的，理论上是错误的；三、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是严重的理论错误；四、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向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上去。对于这些批评，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我们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维护了这篇文章的正确观点。

6月15日，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人召集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在会上提出党性与个性的问题，说他曾针对一个问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并就此大大发挥了一通他所谓的党性。批评了已经发表过的为群众欢迎的一些文章。倒如写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文章；要为冤案平反，指出不管谁批的也不管什么时间批的冤案都要平反的文章。他点名批评了好几位不在场的负责同志，甚至对新闻报道的标题也要横加指责。如报道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消息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他批评这个标题有错误，说难道华主席、叶剑英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事实是华、叶都没有讲这个问题。)？这个会上，除了个别人顺着他说几句外，其他人有的讲了不同意见，有的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有人干脆不吭声。会议开了几个小时，没有达到他希望的结果，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行为已经不起作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各条战线，“禁区”被打破了。各省、市负责同志也纷纷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联系实际，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具体部署。“两个凡是”更加没有市场了。

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按照议程，要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化”上来的问题。可是，参加会议的同志是带着许多问题和意见去的，他们急切地希望对“文革”中的一些无法解释，不可思议的问题得到答复，对揪出“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些怪现象找到解释，对实践中争论的问题希望有个结论。预定的议程被改变了，首先讨论政治问题。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他明确指出，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要平反；陶铸、王鹤寿等同志不应留“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从“反省院”出来时履行过出狱手续，但以后继续干革命的同志和在敌我边际地带“两面政权”中做过革命工作的多数同志，要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决定，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这篇讲话，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说出了大多数与会同志想说的话，于是，大量问题提出来了，有历史上的，但最多的是“文革”中的问题。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话，并且积极开展批评，明确地向一些同志提出问题请他们答复。最集中的是向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完全是民主的、平心静气的，而且允许反批评。在所有小组讨论中，讨论热烈的议题还有“天安门事件”中镇压群众的问题、所谓“右倾翻案风和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领导工作的问题、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问题、反对继续搞个人崇拜的问题和康生、谢富治的问题等等。会议气氛空前活跃。但要求得思想的完全统一，却是不容易的。

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了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以后，集中力量讨论了农业和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为三中全会将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准备。讨论这一《决定》草案时，发扬民主又进入一个高潮，批判了农村中所实行的“左”的政策，如乱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管、卡、压等等，致使农民的收入很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70元)，生活困苦。大家对如何搞活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决定》曾三易其稿，政策和正确的原则基本上都提出来了，供三中全会讨论。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同志讲了话，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了极为重要的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他还讲了民主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遗留下来的问题的原则和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意见。他的讲话实际上就是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内容。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

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由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十年“文革”的迷雾，走上了阳光明媚的大路。

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一切都在变。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在变革中反思，在变革中新生，在变革中奋进。而一切的变革都在受到实践的检验。人们再也不相信一切空话、高调，而只尊重现实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就信服；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人们就摒弃。人们相信自己的观察、相信自己的思维，再也不信奉某个神明了。中国人从天空回到地上，从信神而信人，从空想未来的幻影而追求现实中美好的东西，这不是思想解放又是什么呢？脚踏实地，把多灾多难的中国建设得更美好，这就是实践标准讨论所引发出的巨大能量，这个能量随着思想的不断裂变而无限地释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摘自曾涛《一九七八年的大争论》）

“右派分子”的“摘帽”和改正工作

背景介绍

1978年4月4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先后五批摘掉约30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78年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10万多人）。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仍继续进行。

材料：

-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摘录）
- 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材料一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摘录）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指出，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应认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好对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报告对“右派分子”摘帽以后的若干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在“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得歧视他们。（2）对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专长的要使用其专长；不能工作的可作退职、退休处理。原则上由所在单位安置。对已开除公职的人，也要给以生活出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可从社会救济中适当解决。（3）现在仍在劳动教养场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时解除劳教，分别情况，予以安置。（4）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5）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原在解放军中划为“右派”转业到地方的，不要回到军队。（6）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根据党的一贯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现，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都不应受到影响。（7）对过去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应按以上规定办理。（8）尊重1962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

（摘自《中国共产党大辞典》）

材料二 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在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时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志，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最近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的重要决定。这项决定，深得人心。决定下达后，广大群众称是道好，热烈拥护。这个重大的政策措施，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贯彻党中央的这项决定，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一些不甘心“共产”的资产阶级，妄图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无产阶级作一番较量。国际上的帝、修、反，这时也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就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为了捍卫我们的党，捍卫社会主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反右派斗争。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围绕着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亿万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开展了大辩论，击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给他们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事实证明，在一九五七年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我们给资产阶级右派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目的是教育改造他们，促使他们改变政治立场。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较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派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周总理曾考虑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未能实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经过二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全部摘掉帽子的条件已经更加成熟。因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自今年四月起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以后，我们就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了。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目前，摘帽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经过教育改造，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是我党无产阶级政策的伟大胜利。

宣布全部摘帽以后，还要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有用之才。做好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更重要的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规定统筹安排，根据不同情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工作，就业和工资待遇等问题。原来已经摘帽和改正的人，过去如果没有安置或者安置不当的，现在也应予以妥善安置。安置工作是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环节，必须认真做好，务使需要安置的对象包括退职退休和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人，都得到妥善安置。

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对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样做，过去被错查为右派而今天得到改正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属将会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做，并不否定反右派斗争，否定的只是那些背离毛主席正确政策的错误东西。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措施。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这个政策，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和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策。

贯彻党中央关于右派分子问题的决定，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是一项繁重、细致、复杂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它放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建立和健全专门的工作机构，抽调政策水平较高、经验较丰富的干部参加这项工作。各级领导和有关干部，要深入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深入学习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主动承担任务，认真解决问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党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党中央决定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对划错了予以改正的人，也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从严要求自己，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干革命，搞建设，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革命的力量，积极的因素，多多益善。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尽可能争取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千军万马，万众一心，

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原载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中越关系的恶化与摩擦

背景介绍

曾几何时，越南这一邻邦与我们亲密无间，胜似一家人。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这一小兄弟反目为仇，恶化中越关系。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与中国相连的省进行"净化"措施，并开始驱赶华侨。到1978年，越南大规模驱赶华侨，大肆反华，并不断骚扰、侵犯我云南、广西边境。1978年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申述了我国的原则立场，驳斥了越南方面无耻的谎言。之后，中越边境不断发生摩擦，南方边境紧张开了。

材料：

- 1977年6月10日李先念副总理同范文同总理谈话备忘录（节录）
- 中国外交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

材料一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李先念副总理同范文同总理谈话备忘录（节录）

近几年来我们两国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引起了我们的忧虑。为了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曾经不止一次地同越南同志谈过，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党中央又同越南同志谈过。当时越南同志都表示要维护越中友谊，不会做不利于越中友谊的事。本来我们认为，这样我们的关系会好起来。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问题越来越严重。看到两国关系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感到很不安。所以，我们趁你这次路过北京的机会，再次同你谈一谈。

一

越南方面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两国的友谊。越南的高级干部公开发表诋毁中国的言论。例如，黄松同志去年曾对一个叫埃里克·皮埃尔的瑞典记者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谈话。他说："在越战时期，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那么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严重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又如，一九七三年，黄国越同志答日本记者问时，也曾毫无根据地攻击过我们的对外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他们这些讲话登在不止一个国家的报纸上，在国际上是很引人注目的。起初，我们觉得这是西方记者的报道，或许是谣言，但是后来一直没有见到你们有任何否认的表示。黄松同志是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黄国越同志也是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还是越中友协会长，他们说的这些话，不能认为是没有来由的。坦率地说，以前越南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诽谤中国的言论，甚至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攻击我们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那时我们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但是现在看来，越南社会上出现这些流言蜚语，不是偶然的。这些言论，怎么能够同胡志明主席主席所说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相协调呢？又怎么能够同越南同志所作的要"维护越中友谊"的表示相一致呢？

二

越南同志不仅说了有损两国友谊的话，而且还做了不少有损两国友谊的事。

越南方面在陆地边界问题上不断挑起纠纷，使边界形势越来越紧张。中越两国的边界线是由过去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签约规定的。我们两国相继建立人民政权后，双方都表示愿意尊重这条边界线。尽管双方地方同志对某些地段界线的位置认识不一致，但问题不大，也不难解决。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中越两党中央曾换文确认了维持边界现状、边界问题应由两国政府解决、地方当局无权处理的原则。一九七四年以前，我们双方都是这样做的，边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纠纷。两国的边民和边防人员也一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条越中边界多年来一直是一条友好的边界。但是近几年来越方的态度有了变化，边界纠纷不断增多，边界问题在中越关系中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一九七五年，我们曾指出建议，两国政府边界问题在中越关系中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一九七五年，我们曾提出建议，两国政府尽早举行边界谈判，以中法条约为基础，通过友好协商，彻底解决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去年和今年我们又重申了这个建议。但你们一面迟迟不同我们举行谈判，一面却继续让下面的人非法进入中国境内，说这个地方是越南的，那个地方也是越南的，无理干涉和阻挠我边防人员的正常工作，干扰和破坏我国边民的正常生产活动，行凶打架，企图单方面强行改变边界现状，致使边境事件急剧增加，形势越来越紧张，甚至发生了越南边防人员在我们云南和广西边境开枪的事件。据我边防部门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七四年

边境纠纷事件有一百多起，一九七五年增至四百多起，一九七六年达到九百多起。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事件是我们下边的人员违反政策引起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并且准备进一步采取措施，教育有关人员和边境居民，要他们认真维护中越友谊，严格遵守边境政策，防止他们越境惹事。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做法，是不符合两党中央的协议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损害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使亲者痛，仇者快。为了维护我们两国的友谊，从根本上解决边界纠纷，现在我们再次建议尽早举行两国政府的陆地边界谈判。在谈判解决之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实际管辖范围。我们说的维持边界现状，并不意味着在将来的边界谈判中，就要按照双方实际管辖线来确定争议地区的领土归属，而完全是为了在谈判解决问题之前，避免冲突，维护团结友好的大局。

三

关于中越铁路接轨点中国一侧的铁路维修，也发生了不应发生的问题。这段铁路，按照中越国境铁路协定规定，应由中国方面负责管理和维修，越南方面无权干涉，正如由越方管理的铁路应如何维修中方无权干涉一样。而且这段铁路病害确实十分严重，已不具备安全行车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进行维修，就有发生列车颠覆或中断行车的危险。可是，当我们铁路部门，为了保障行车的安全和铁路畅通，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维修的时候，却遭到来自越南方面的一再阻挠和破坏。

越南同志甚至不惜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使我们五十一个同志受了伤，其中重伤六人。你们可能也有受伤的。

这条铁路是在越南人民抗法战争胜利之后建成的，从那时以来，它一直是联结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纽带，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日子里，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保卫了这条铁路，使它日夜畅通。我们没有料到，在越南人民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的今天，在这条象征着中越友谊的铁路上，竟发生了越南同志破坏我们维修铁路、酿成大规模的武斗的事件，我们怎么向人民解释呢？

这条铁路，现在还在为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服务。它不仅联系着我们两个国家，而且把越南同欧亚许多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条铁路运输的东西，去越南的多，来中国的少。如果中断行车，对中国不利，对越南更不利。我们不能理解，越南方面为什么硬是不让我们维修这段铁路，就是不怕列车颠覆和中断行车。我们怀疑，是不是有人有意要把这个问题闹大，闹到国际上去，好骂中国是“大国欺负小国”，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希望把问题闹大，万一违背我们的意愿，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中越铁路接轨点中国一侧铁路的维修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审慎的。我们没有轻易听信下面的报告，特地派了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会同铁路部门有关专家到现场进行过详细调查，并拍摄了电影。事实证明，中国方面多次向越方提出的意见，理由是充足的。我们诚恳希望越南同志能够改变自己过去的态度，不再阻挠和破坏中国方面维修铁路。至于越南方面对该地段国界线的认识同我们不一致，应该留待中越两国政府边界谈判时协商解决。如果通过边界谈判确定该地段确属越南领土，那么我们愿意把应属越南的地方，连同位于该地的铁路一起，无条件地交给越南方面。

对于这段铁路的病害情况，如果范总理愿意的话，我想请范总理看看我们拍的影片。这个问题比较紧迫，我们希望范总理尽快过问一下这件事，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四

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上，两年来越南同志的许多作法也是有损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这两个群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有大量的确凿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的。我国政府曾多次发表过声明。越南同志过去也承认这两个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就正式向我们表示过，“从历史上看，这些岛屿属于中国领土”。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中国领海的声明，其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同年九月十四日，范总理在给周总理的照会中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自己的声明中也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可是一九七四年以后，越南同志的立场就开始发生了这化，特别是一九七五年越南方面趁解放南方的机会，侵占了我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继而向我们正式提出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领土要求。并且在越南国内和国际上大造舆论，宣传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属越南领土。由于你们方面的这种作法，现在南沙、西沙群岛这个本来不存在的问题成了中越关系中一个重大的争端。苏联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一直都承认南沙、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在你们挑起这一争端以后，他们也立即改变了态度，竭力想利用这个问题破坏中越关系。我们希望，越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回到原来的立场。

五

关于北部湾海域划分问题，越南同志所持的态度也不能认为是友好的。这里的海域本来没有划分，你们硬是

说已经划分了，硬要把界线划到我们海南岛边上，把北部湾海域面积划去三分之二。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多次表示，双方应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北部湾海域划分问题。我们希望越南同志考虑我们的意见。

六

关于在越南的华侨问题，我们也想谈点意见，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百多万华侨在越南居住。一九五五年，我们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同越南党达成协议，确定应逐步教育华侨转为越南籍民。这只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采取强迫的做法。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双方共同协商，互相合作，问题处理得还比较好。可是越南南方解放以后，你们方面却采取强制手段，不顾华侨的愿意，把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都作为越南籍民，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采取征收高额税和准备不允许他们在越继续居住等措施。这不符合过去两国合作协商的一贯作法，更违背了两党关于逐步教育华侨转籍的协议。你们知道，一九五六年，吴庭艳傀儡政权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一九五七年，我国中侨委对此发表声明，提出了严重抗议。任何国家对旅居国外的侨民都负有保护其正当权益的义务。你们现在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采取措施，强迫华侨入籍，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困难的境地。这里，我还想谈到我国在越南设立领事馆的问题。在中国的越南侨民，总数约五、六千人，他们长期以来得到我国政府的良好对待和照顾，我们早就同意你们在中国设立了三个总领事馆，并给予了方便和优惠的待遇。而我们提出在越南设立三个总领事馆，你们拖了半年才答复，并且只同意设两个，不同意设三个。对待侨民的问题和设领的问题，我们对你们是采取友好的态度，给了特别的照顾，可是你们却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七

越南同志不仅在现实问题上损害中越友谊，而且利用历史问题做文章。多年来，越方不断以报刊、杂志、电影、戏剧和各种形式大量宣传所谓反对"北方侵略"的问题，借古喻今，在人民群众中煽动敌视中国的情绪，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有真心维护中越友好的人，都为此感到不安。国外别有用心的人则拍手称快，并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挑拨。苏联塔斯社就拿了你们这种宣传，挑拨离间，煽动反华。我们毫不讳言，中国封建王朝是侵略过越南的，我们历来谴责这种侵略。周总理曾经亲自到河内二征王庙，向越南反抗汉王朝侵略的二征王致敬。但是，你们知道，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是发生在我国人民无权的时代，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同样遭受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是没有责任的。列宁同志在俄国十月胜利后不久，曾经揭露，英、法、美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挑起波兰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旧仇夙怨，企图把波兰工人对地主和沙皇的完全应该具有的仇恨，转移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使波兰工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沙文主义者一样，梦想征服波兰。"（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六十页）我们认为，这是列宁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同志的这种做法，符合列宁教导的精神吗？我们希望你们能停止这种做法。

此外，关于援助问题，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范总理来信，提出了一个单子，我们没有能够满足你们的要求。这件事，我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同阮筝副部长谈过了，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和去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同时，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二十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一百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同志提供新的援助。请他向范总理报告。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阮筝副部长转达了范总理的回答，对此表示了理解。今天，对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原载 1979 年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国外交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

（1978 年 6 月 9 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所谓"在越南的华人"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歪曲事实，倒打一耙，妄图把驱赶华侨的责任强加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对此不能保持缄默。

一、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实际上否认越南存在大量华侨这一客观事实存在，并且恣意歪曲中越两党，关于旅越华侨问题的协议，企图以此为自己对华侨推行歧视、排斥、迫害、驱赶政策进行辩解，欺骗舆论。这显然是徒劳的。

人所共知，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几十万侨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约有百分之九十居住在越南南方。一九五五年，中国党和越南党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由，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规则。当时越南党和政府

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国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绝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并确认旅越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人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办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然而，近几年来，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当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中国。

在越南南方，越南政府背弃自己曾经公开宣布过的立场，竟然继承吴庭艳反动政权的作法，采取十分粗暴的手段对待华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吴庭艳反动政权颁布法令，强迫华侨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越南国籍。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南越反动政权又宣布华侨的华侨身证一律作废。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曾经发表声明，强迫烈谴责和严重抗议南越反动当局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无理作法。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表示赞同和支持我国的这一正义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曾发表文章，谴责吴庭艳集团的非法行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都曾在自己公布的政策和有关文件中规定："废除美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措施"，"华侨有选择国籍的自由权利"。可是，在南方解放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吴庭艳统治时期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现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什么，"在越南南方，早在一九五六年，几乎所有华侨都加入了越南国籍。他们不再是华侨，而是华裔越南人"。这样，越南南方的一百数十万华侨就一笔抹煞了。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的。

事实说明，越南南方方面早已把中越两党的协议破坏无遗，而现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却声言越方"一贯遵守和正确执行"这项协议。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采取诡辩和抵赖的手法，把大批华侨被驱赶回中国，说成是由于"华人中的一些分子"散布一些"消息"造成的，是"预谋的行动"。事态的演变充分说明，不是别人，正是越南自己出于对内对外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这是越南方面蓄意破坏中越关系、反对中国的严重步骤。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越南社会上的确流传着不少别有用心的、攻击中国的"谣言"，说什么"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等等。越南不少官员和公安人员，就把这些"谣言"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今年初，越南某些外交官员对中国进行过毫无道理的指责和攻击，也说中国边境上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中国"号召进攻越南"。这同越南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如此相似，绝不是巧合，它恰好说明这类"谣言"是越南方面蓄意制造和传播的。

自一九七七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十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莱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方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近两个月来，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数目逐日增加，四月初每天数百人，五月下旬每天增加到数千人。到五月底总数已超过十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和虐待是难以尽述的。一九七七年初，越方以人口普查为名，强迫华侨登记为越南国籍，不少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被剥夺就业和升学的权利，被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欧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至于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中国政府对他们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的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等方面，都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这是尽人皆知，不容歪曲的事实。

三、由于越南方面不断加剧排华，被驱赶回国的难侨急剧增加，突然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需要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近三十年来，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自己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向越南提供了各方面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甚至不惜作出巨大的牺牲来支援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一贯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对此，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是问心无愧的。

一九七五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连续遭到强烈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遇到了非常巨大的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亲自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现在，越方借机对我国援助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种以怨报德的作法，使中国人民感到十分痛心和忿慨。

四、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建议越中双方"举行会晤"，解决所谓"有关华人问题的分歧"。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纯系出于宣传的需要。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协商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对于越南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内部协商谋求及时解决，并且为此作了许多努力。我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希望越南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停止迫害和驱赶华侨。但越南方面竟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驱赶华侨，使事态更趋严重。现在，越南当局一方面继续驱赶华侨，一方面又提出举行会晤，讨论所谓"有关华人问题的分歧"。越南方面既然否认越南华侨，说明越方的"建议"完全是虚伪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五、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休戚与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同情和支持，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这种革命友谊和团结，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十分珍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近几年来，越南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分化两国关系的行动，用各种方式反对中国，但是中国方面仍一直照顾大局，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并且再三地向越南领导人诚恳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今天，两国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贯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希望，越南方面能够按照自己所表白的那样，言行一致，真正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为重，立即停止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错误作法，不要继续做损害中越人民友谊的事。

(原载197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背景介绍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异常悲痛。3月下旬至4月5日，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挽联、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逮捕群众388人。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1977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决定，伸张了正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各大报均相继发表文章，揭露事实真相，歌颂党和人民群众的伟绩。

材料：

-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 伟大的四五运动(节录)
- 天安门事件真相(节录)

材料一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新华社十一月十五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

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原载1978年11月16日《北京日报》）

材料二　伟大的四五运动（节录）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几天来，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地庆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欢呼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这是中国人民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的伟大胜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胜利。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北京的这个震撼全国、惊动世界的事件，是怎样的事件？就在光明与黑暗还在进行着剧烈搏斗的时刻，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就已把它命名为伟大的四五运动。

的确，它是完全可以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媲美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而它的规模，远远地超过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个地点爆发的五四运动。它是五四运动开创的人民民主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发扬。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开端，那么四五运动则是揭开了中国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序幕。

北京有天安门，连接着八亿人民的心。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和雨花台，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在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在西安的钟楼，在青岛的海滨，在杭州的街头，在全国各地，人民喊出了同一个声音，表达了同一个意志：声讨“四人帮”，审判“四人帮”！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

四五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中国人民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早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要牢牢地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像《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实践所启示的那样在极大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把我国的工农大众一步一步地真正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为了沿着这条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继续前进，我们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作出了许多的努力和尝试。四五运动正是在这种长期努力中应运而生的，是把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胜利终结的伟大高潮。这次运动最可宝贵的就是充分表现了人民要执行统治阶级权力的觉悟和坚强决心。四五运动由于充分显示了人民的爱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使我们感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能力。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告诫我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四五运动的经验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四人帮”横行霸道十多年之久，终于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社会主义民主战胜了“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有了四五运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宝贵经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满怀信心地宣告：中华民族大有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定能胜利实现！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发扬四五运动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把它贯穿到我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实际生活中去，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充分而切实地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创造出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局面！四五运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旗帜下的思想运动。“四人帮”控制了一切舆论工具进行了种种欺骗宣传，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达到愚弄人民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所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人民普遍觉醒的结果。人民表明不但能够识别以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而且能够识别以极“左”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能够洞察在种种神圣言词和革命姿态掩饰下的反革命阴谋。他们打破“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冲破思想的牢笼，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现实的斗争进行历史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四五运动标志着我国人民开始成熟了，懂得怎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了必须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神圣权利，真正当家作主，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我们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就是在四五运动影响下，人们解放思想深思熟虑所提出的。五四运动以后，几个重大问题的讨论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完全可是以相信，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封建社会主义，实践论战胜天才论，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四化现代化的加速实现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四五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继往开来的青年运动。和五四运动一样，在四五运动中，冲锋在前的也是青年。这里有数量众多的青年工人，有解放军战士，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刚刚来自田野的下乡知识青年，还有许许多多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这是一支已经比五四时大大壮大起来的青年运动大军。这些和新中国一道成长的青年，无愧于自己的生活伟大时代，无愧于培养和抚育了自己的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富于理想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勇敢地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和挫败敌人搞复辟倒退的重担，要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沿着五四运动所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与广大人民相结合，从人民中吸取力量，为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他们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坚不摧的力量，敢于为真理而斗争，无所畏惧地去迎击“四人帮”的棍棒，用自己的愤怒和鲜血，在豪迈的《国际歌》声中创造出英雄的业绩，在我国的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四五运动驱散了林彪、“四人帮”布下的重重迷雾，展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如果说，林彪、四人帮”的出现，是中国古老历史的特殊回声，那么，四五运动的爆发，则是我国现代革命的民主传统所放出的异彩，

它照亮了中国人民继续革命的道路，在四五运动所显示的人民力量的基础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四五运动所以能够为“四人帮”的最后垮台提供这种最重要的群众条件，就是因为人民群众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复锻炼，普遍觉醒了，成熟了。一次的大的革命运动，它的丰富的政治意义，总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为人们所消化。我们在今后的斗争中，将不断地从四五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吸取营养。正像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一样，四五运动的原则——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万岁，也将是永存的。

（原载 1978 年 11 月 21 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　天安门事件真相（节录）

——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

四五之夜　一片恐怖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数万名群众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人们又涌向纪念碑，向总理的英灵告别。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的口号，用呜咽的声音朗诵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新贴出的怀念总理的抒情诗《告别》：“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再听您那深情的教导，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把最醇的美酒，为你捧上……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飏；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当群众不断离开广场时，指挥部的一个头头正在四处打电话：“队伍集合得怎么样？要快，动作要快，再晚人都走光了。”九点三十五分，广场的灯一下都亮了，对人民的镇压开始了。

请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好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有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吼：“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过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那天晚上，二百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了。“四人帮”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蔓延到全国。

造假情况　欺骗中央

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同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有直接的关系。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种提法，最早是在《情况汇编》上出现的。

从四月一日到六日，“四人帮”通过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指挥记者突击采写、编发了十多期关于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情况汇编》。有时一昼夜出三期，有时搞“不宜印发”的手抄件。这些《情况》完全是按照“四人帮”事前定的调子采写、编辑，经他们的心腹挑选炮制，再送姚文元修改审定印发的。

他们把悼念周总理诬蔑为“借悼念总理为名，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竭力歪曲、掩盖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即使记者写的情况中涉及一些悼念的内容，姚文元也千方百计地砍掉，或者加以歪曲、诬蔑。四月三日《情况》中提到在纪念碑北侧的栏杆上，贴着不署名的标语，“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姚文元气势汹汹地加了一句批语：“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完全一样。”四月四日听《情况》，登了一首署名“敬周试作”的《满江红》：“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把“捍卫咱，周总理”以上的句子删去，在末尾加上：“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有一张署名“青年工人扬光明”的悼念总理的小字报，写道：“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而翻总理的案，损毁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

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姚文元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

四月三日《情况》清样里登了署名"青年工人丁亮"写的一份《倡议书》，充分揭露了"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面目，结尾指出："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明明是斥责"四人帮"的，但是，姚文元却把《倡议书》全文删去，恶毒地将"说共产主义空话"篡改为"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姚文元还就科学院一〇九厂写的那有名的"碧血再开革命花"的诗句，凭空加上一句"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广场上贴过一张题为《某公三哭新谱》的散曲，从全诗的内容来看，是反对刘少奇、林彪和江青的。姚文元及其心腹为了加人以罪，在四月四日的《情况》中，没有引用一句原文，就说它是"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这种卑劣的做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千方百计把天安门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的险恶用心。

他们蓄意歪曲天安门广场烧打真相。四月五日的《情况》中登的那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开头就说："今天清晨七点多钟，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聚众抗议"。这里，姚文元把"有人"改为"一小撮坏人"，"聚众"改为"煽动一伙人"。文中接着说："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可是，群众为什么砸广播车，《情况》只字不提。在谈到打人时，《情况》原来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是。姚文元公然把恶毒攻击周总理的这句话砍掉了。这样，打人的起因看不出来，事实真相完全被歪曲了，事情的性质根本改变了。结果，捍卫总理的革命群众变成了"一小撮坏人"，攻击总理的人竟成了受害者。在烧汽车、烧楼房问题上，他们也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法。提到烧汽车的《情况》，原稿写有"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被改为"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原稿还有一句："现场指挥部楼前都是青年人"，被改为"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姚文元及其心腹就是这样歪曲、颠倒事实真相的。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这样不择手段地编造假《情况》，为"四人帮"疯狂镇压群众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江青、姚文元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接见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等人时，连连赞赏说这个"小报"(指《情况》)"有时比几百万张(报)的作用大"；人民日报那个心腹也曾经那样得意地说，他们搞的《情况》"起了重大作用"。

拼凑黑文　流毒全国

在这些歪曲事实的《情况》的基础上，由"四人帮"亲自指挥，炮制了那篇臭名昭著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假报道。

那是四月七日上午的事。七时左右，姚文元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四人帮"这个心腹带着他手下的几个人到了人大会堂，一见面，姚文元就洋洋得意地对这个心腹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快到中午时，姚文元把他的心腹等人带到东大厅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见面，把这些"有功人员"一一介绍给他们。

姚文元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煞有介事地安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王张江姚及其心腹欣喜若狂。王洪文首先举杯说："都干一杯！"江青也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张春桥对如何写报道作黑指示。他杀气腾腾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为邓小平歌功颂德。"

"四人帮"有心腹立即带着那几个记者将近几期情况改编为报道。

姚文元又授意他们："春桥不是说了呀？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上去。还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姚文元还对报道的每个细节和提法都作了黑指示，他们都一一照办。

在编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王张江姚一直在直接指挥、亲笔修改，姚文元还对他的心腹说："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从上午开始到下午掌灯时分，在这帮"刀笔吏"的黑手下，一篇制造大冤案的黑文出笼了。

………

在编写这篇报道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出了些歹毒的主意，为了把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有"幕后策划者"指挥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姚文元说，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为他们打倒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

造反革命舆论。在所谓"冲人大会堂"、烧楼房问题上，张春桥看了稿子说："几百个民兵排着队伍走上大会堂干什么？去参观？目的性没有说清楚"，结果在报道中改成"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造成似乎有人要冲人民大会堂的假象。他还说："把烧楼房改为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结果将楼房改为"解放军营房"。经他们这一连串的篡改，捍卫周总理光辉形象的革命人民竟变成了"暴徒"，无辜的群众变成了冲击人民大会堂的罪人。张春桥、姚文元就是这样造谣欺骗、蛊惑人心，进行反革命煽动的。

四月八日报道发表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提出强烈抗议。四天之后，报社收到一位署名"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一封信。信封的正面写道："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信里装着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这位民兵同志在报上批了很长一段话，现摘录几句："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与(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人了，真理能封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阴谋家江、张、姚！！！"这就是革命人民对这篇假报道，对"四人帮"的最有力的回击。

四五运动 光照千秋

天安门事件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四五运动。它以鲜明的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过天安门事件，化为气壮山河的巨画，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谁是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人民。谁是天安门事件的指挥者？人民。百万人民群众表现了这样高的政治觉悟、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在天安门广场演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史剧，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它极其深刻地说明：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任何反动派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四五运动虽然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是真理的火种已经撒遍神州大地。人民觉醒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斗争的才干，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四月的斗争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为华主席领导的十月的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亿万觉醒了的人民。

四五运动的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前进！

（原载 1978 年 11 月 21—22 日《人民日报》）

划时代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背景介绍

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就提出，应该适时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在全党上下得到了响应。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这一重大的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解放了思想，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解放了我党从 1957 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而使我国进入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新时期。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节录）
- 划时代的里程碑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节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扔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八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

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帮、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一）

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全会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国防，随时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家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二）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的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

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三)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四)

会议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原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地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为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五）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有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建国三十周年的最好献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原载 1978 年 12 月 24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划时代的里程碑

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指出，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这一建议很快在全党上下得到了积极响应，甘肃省的一位中共县委书记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中心任务，这是关系到祖国兴衰、民族存亡的大事，要保证这个中心任务顺利进行，就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这就要求中央今后在全国范围内不要再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11 月，中央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在省内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全党的工作重心要不失时机地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折，全党都必须为这个转变，做好一切准备。

邓小平的建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也得到了一致赞同。但赞同的初衷却不尽一致。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主张工作重点转移，是要以此为开端，结束徘徊前进的局面，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社会主义的事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坚持"左"倾错误的少数人赞同工作重点转移，则存在着复杂情况，华国锋本不同意这一建议，但在政治局常委多数赞成的情况下，他也不能不表示接受。不过，他的同意，是为了使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提出的一系列急于求成的高指标尽快付诸实施，是企图在不纠正"左"倾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华国锋仍在继续坚持着"左"的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分清思想理论是非，纠正"左"倾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解决"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革"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就不可能使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顺利实现。而这种结果是与党和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也是与会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所要极大避免的。

这样，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势必把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引向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冲破了华国锋"左"的指导思想所宣布的议题的范围，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把原定要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的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重要会议。

11 月 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华国锋对会议原定的框框，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比较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则有所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接着列举了由中央给以考虑和决定的 6 个问题。即：

1. 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 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应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3.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也不是叛徒，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

4.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

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 关于天安门事件。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批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央文革的顾问，他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陈云提出的这6个问题涉及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革”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归根到底涉及到要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因而立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

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家的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包括：1.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了这一决定，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做了类似处理。2. 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3. 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文件。4. 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5. 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6. 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7. 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8. 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这些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说，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样，华国锋原来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认真讨论逐渐统一了思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逐步明确了。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会，根据大家所提的问题和会议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获得成功的重要总结，也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叶剑英和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叶剑英讲了3点意见：1. 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2. 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 勤奋学习，解放思想。华国锋在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表示要作自我批评。但他只是讲了一些情况，没有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12月15日，历经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共290人(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9人)。

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要讨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贯穿这次全会的中心思想，围绕这个主题，全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策，这就是：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会同志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必将促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新面貌，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决策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围绕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的转移，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3个转变的思想。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理、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和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围绕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之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充分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表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全面整顿的功绩。“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和天

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正式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公报指出，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围绕着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会议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会同志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为"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全会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并根据这一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这是党在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

围绕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

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命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

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得以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体与会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其特有的建树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划时代的里程碑。

（摘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

风云人物

邓小平

邓小平（1904～　　）四川广安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底动身回国。后任西安国民联军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1927年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同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等人在广西先后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8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后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工作，主编《红星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同刘伯承一道，领导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2野战军政委、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7年同刘伯承率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大别山区。1948年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任总前委书记，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南京和华东各省。后向西南进军，直至1951年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2年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失去一切职务。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1975年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向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76年被错误地撤销职务。1977年10月恢复原任党政军职务。同年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领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同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全会确定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着重阐述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论点。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常委。1981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1988年连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被推举为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1984年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作为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归还中国问题的设想。长期以来，他还为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外交新局面，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了不懈努力。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文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

材料　1978年和1985年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邓小平为1978年世界风云人物的原因：邓小平是历史上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他正从事着雄心勃勃的事业，主张对外开放，引导他的古老的祖国走向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他决心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世界风云人物的原因：邓小平正领导着10亿人民进行意义深远的勇敢而大胆的第二次革命。他敢于向传统的清规戒律挑战，力图调和那些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例如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治专制和给予经济与文化的一定的自由。改革具有很大的风险，国内一些人反对革命。但是如果他坚持改革，那么世界也会改变模样。

1976年，是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侵在极度的悲痛之中。10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长达10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要从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需要重新恢复和发展。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邓小平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他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和僵化的局面被冲破。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转折。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是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指出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一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摘自《世界风云人物》）

珍闻轶事

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人

1978年，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博士，以中国农学会创始人之一和理事长的身份，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术讨论第3次代表大会，并率来自全国的800名代表到大寨参观。

来到大寨，一行人竟大失所望。虎头山光秃秃；为了搞人造小平原，大寨人砍掉树林，把小麦种到山顶上，破坏了生态平衡。已近收割季节，麦苗只有五六寸高，麦穗

也抽不出来。偶有抽穗，也是几粒瘪子。大家去参观被报刊吹得神乎其神的“海绵田”。这竟是推土机推出的堆堆黄土。

农业部有两个干部知道内情，说大寨的面积和产量的比例，大旱之年大丰收是假的；谈到自力更生，国家每年支援那么多人、财、物力、怎么解释？

杨显东作为一个科学家、农业部老副部长，看了大寨现状，心里很难受，觉得对大寨的问题不能再捂盖子了。

1979年春，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揭露了大寨的5个问题，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它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大造山间小平原，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穷光蛋；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最后对陈永贵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我认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政协常委们听了，情不自禁地拍手喝彩，但都为杨显东担忧，因为当时陈永贵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杨显东的发言作为小组简报，发给了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个委员会委员。大寨代表宋立英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

陈记贵看了简报，大发雷霆，责令农业部党组要杨显东作检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农业部领导也严肃地说：“你的这个发言是错误的，未经党组同意，一切后果都由你个人负责”。还要杨显东向陈永贵副总理当面道歉，作检讨，杨显东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我讲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大寨的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

1980年在政协委员会上，杨显东坚持真理，继续揭开大寨的盖子，引起了大多数政协委员的共鸣。并坚决支持杨显东的发言，要求农业部党组给杨显东恢复名誉。1981年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问题，当着陈永贵面把大寨的盖子揭开了。

（摘自《春秋》第6期）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在从天安门广场鼓动的如火如荼的诗情引导下，1978年的文学艺术重新焕发出光彩。小说创新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兴起了所谓“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次浪潮，发轫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另外，刘心武所著《爱情的位置》大胆突破“禁区”，恢复了爱情在生活和文学领域中的位置，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话剧方面，批评“四人帮”，歌颂周总理的《丹心谱》和《于无声处》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这些面向生活、面向人民，坚持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掀起了亿万人民的心潮，开创了一个文学与人民紧密联系的新时代。然而，由于长期“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不少作品中仍有“左”的阴影。

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G $\frac{2}{4}$

聂　耳曲

集体填词

进行曲速度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任红举　贺东久词

朱南溪曲

坚定有力

1. 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长江奔腾，昆仑巍峨。毛主席缔造的崭新国家，处处盛开社会主义花朵。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2. 中国，中国，沸腾的山河，跃进浪潮，波澜壮阔。华主席率领我们继续革命，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3. 中国，中国，不屈的山河，巍然屹立，气势磅礴。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时刻准备消灭一切侵略者。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歌曲《伟大的祖国》

1=G 4/4

楚 征 词曲

伟大的祖国，壮丽的中华，革命的传统，灿烂的文化。党的阳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五星红旗卷起满天彩霞。各族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建设祖国，勇攀高峰；保卫祖国，不畏强霸。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共产主义迈开雄壮的步伐。

小说《伤痕》

《伤痕》系短篇小说。作者卢新华。原载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获第一届(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主人公王晓华是"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小将"中的一员，出于狂热的革命激情，毅然和定为"叛徒"的母亲划清界限，偷偷地提前毕业，去辽宁农村插队。离家时给母亲留下一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亲给她寄去的衣物和信看也不看就退回去。尽管她的"革命"态度如此坚决，还是因家庭关系影响了她的入团，甚至不得不和恋人分手。后来从信中她才得知母亲的叛徒罪名是"四人帮"为达到篡党夺权目的强加的。八年来，母亲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重病缠身。悔恨交加的女儿赶回上海看望母亲，母亲却在她赶到前几小时与世长辞了。这一切在王晓华的心头刻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伤痕。小说一发表，立即产生了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文汇报》编辑部和作者本人收到来信来稿一千多件。1978年10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期上分别报道了北京和上海召开座谈会上有关《伤痕》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小说对主人公王晓华的普遍性、典型性的认识与理解上。争论还波及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如社会主义文学能否暴露阴暗面，可不可以写悲剧？写骨肉之情算不算"人性论"等等。文艺界对《伤痕》的评价，总的倾向是：作品的思想认识价值应给予充分肯定，艺术上的粗疏也较明显。新时期文学创作上的第一次浪潮——"伤痕文学"便是从该小说发轫的。

小说《爱情的位置》

《爱情的位置》刘心武著。发表于《十月》1978年1期。青年女工孟小羽与饭铺饮事员陆玉春有着共同的志向和旨趣，一次偶然结识后，互相倾慕并产生了爱情。许多人都很不理解，连受人尊敬的车间主任魏师傅也用古怪的眼神看她。女工亚梅庸俗势利，找对象赤裸裸追求职务、工资和财富，然而，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魏师傅也积极为她帮忙。对爱情在青年人的生活中是否应当占据一席位置的问题，一直有着众多疑惑的孟小羽，拜访了过着独身生活但开朗乐观、积极工作的革命干部冯姨。岂料冯姨的心底深处正埋着深挚炽热的爱情。在她的启发鼓励下，孟小羽决心向所有人敞开心扉。作者大胆突破"禁区"，恢复了爱情在生活和文学领域中的"位置"，当时在青年中反响强烈。

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

《珊瑚岛上的死光》为童恩正所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8期。教授赵谦研究发明了高压原子电池，让学生、华侨陈天虹带回祖国，自己却被歹徒枪杀。陈携电池驾驶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被一种神秘的闪电击落，陈漂流在海上，被珊瑚岛上专心从事科研的马太博士所救。马太憎恨战争，但一直受同学布莱恩蒙骗，一系列发明都被用作杀人武器。陈以事实陈述某大国的丑恶行径。马太才如梦方醒。布莱恩领着某大国舰队的军官和六名士兵企图炸掉小岛，挟持马太到欧洲某地深山中继续从事科研。因马太心脏病发作只得抢走设计图离岛而去。陈天虹和奄奄一息的马太用激光器将军舰击沉。陈携电池驾驶摩托艇投奔祖国。珊瑚岛却在一片蘑菇状浓烟中消逝。作品歌颂了科学家们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高尚品质。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扣击心弦，寓意深刻。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话剧《丹心谱》

《丹心谱》系五幕话剧。作者苏叔阳。最初发表于《人民戏剧》1978年第5期，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出版单行本。该剧是粉碎"四人帮"后较早出现在舞台上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戏剧作品。剧中从描写北京新华医院科研工作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从四届"人大"召开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作者写出了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之情，同时真实地写出了当时"左"倾路线的统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剧中主人公方凌轩是一个有正义感、追随共产党多年的老知识分子，在他的生活信条是"干工作，要像春蚕吐丝，兢兢业业，到死方休；做人，要像点着的蜡烛，从头燃到脚，一生光明。"他带领"03"科研小组的科研人员，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研究治疗冠心病的有效药物，但被诬蔑为城

市老爷服务，致使壮志难酬。剧中人丁文中是戏剧舞台上鲜见的形象。他的性格诙谐爽朗，疾恶如仇，几十年行医养成的求实精神与当时流行的翻云覆雨、为我所用的歪风水火不容。他知人论事，入木三分，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描写非常成功。把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使之走上戏剧舞台，是我国二十多年来不多见的。他们刚正不阿，实事求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同"文革"时期舞台上的"英雄"迥然不同。剧中反面人物庄济生，作者并没把他"脸谱化"、简单化，而是揭露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内心世界。同时，吴愫心、梁晨等人物也都十分传神。该剧的语言锤炼准确，使人物富于个性。特别是丁文中的语言，诙谐幽默，辛辣尖刻，把一个倔强、正直、不与恶势力妥协的老中医的形象表现得维妙维肖。该剧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材料　光彩夺目的话剧《丹心谱》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丹心谱》，在广大热爱话剧的观众中间，在戏剧工作者中间，都引起了轰动。这是因为它的剧本和演出都比较出色，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具有值得重视的成就。它相当有力地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深情；也表现出人民对"四人帮的强烈仇恨的极度蔑视。整个戏剧演出，洋溢着我们时代的革命精神，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有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使人们的耳目焕然一新。

是从生活出发，还是"主题先行"？这是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四人帮"肆无忌惮地践踏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完全颠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先定主题，再找材料，"设置矛盾"，"设置人物"，按照"三突出"办法编排坐次，图解主题，把抽象的思想演绎为干瘪的形象，必然导致公式主义流行，"雷同化"猖獗，在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上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在演出方面，他们破坏话剧的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生搬硬套京剧表演程式，鼓励大喊大叫，把话剧艺术糟踏得不成样子。观众说这是"喊剧"，不是话剧。"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彻底扫荡这些污泥浊水，仍然是我们话剧工作者的迫切任务。话剧《丹心谱》的成功证明了，只要我们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的话剧就大有希望，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剧本作者苏叔阳同志是一位业余作者。他是在中医研究院的岗位上经历了这些年的重大斗争的，对生活熟悉，有真情实感，有真知灼见。我们从剧本可以看出，他努力学习和继承了老一辈剧作家郭沫若、曹禺、老舍、夏衍等同志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精心构思，勇于创造，才写出这样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充满着革命热情的作品。

《丹心谱》很注重刻划人物。全剧十二个人物，性格鲜明，各有特点，真实可信。可以说，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写活了。通过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冲突，剧本深刻地反映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革命医务工作者，为坚持、捍卫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的中医结合的道路，为研制治疗冠心病的新药，同"四人邦"的亲信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只是我们伟大时代的一个小小侧面，可是却被表现得那样深入细致，那样波澜壮阔，那样有声有色，这是难能可贵的。它深刻地暴露出"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在革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巨大"内伤"。这在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戏剧创作中，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深刻地揭露"四人帮"，正是为了有力地歌颂革命人民的伟大斗争风貌。在这场斗争中，作者着力地歌颂了方凌轩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片赤胆忠心，同时有力地鞭笞了投靠"四人帮"的"风派"人物庄济生的丑恶灵魂。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血肉饱满，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方凌轩对"四人邦"的阴谋破坏活动，有一个识别、抵制和斗争的过程，剧本对此刻划得比较细致，层次分明。第二场，在大字报问题上，方老"主动出击"，贴出启事，愿与大字报作者辩论，这是剧本中相当精采的一笔，典型地反映出这位热爱党、追求真理的老医生的斗争精神，突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以后，部里命令解散科研组，封上研究室，调走他的助手，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迫害接踵而至，在党委书记李光的启发下，他才逐渐认清了"四人帮"借题发挥，妄图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险恶用心。他毅然挺身而出，拚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敬爱的周总理。那一段对总理的深情回忆，那一次亲切的电话交谈，那一场会议上的交锋，那一席对女儿的嘱托，以及同女婿庄济生的彻底决裂，从各个不相同的侧面，精雕细刻地表现出方凌轩的独特性格。在剧本里，作者还精心塑造了丁文中这个人物，在强烈的对比中，使方凌轩、丁文中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互相衬托，相得益彰。

对于"风派"人物庄济生的描写，没有把他简单化，脸谱化。剧本真实地、具体地表现他投靠"四人帮"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思想混乱，有过心情矛盾，在路线斗争尖锐，营垒逐步分明时，他见风使舵，要寻求"保险系数"，出于个人的卑鄙目的，卖身投靠。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展示了"四人帮"亲信对庄济生的又拉又打；反映了庄济生时而虚伪狡诈，时而得意忘形，时而颓唐沮丧，时而凶相毕露，无情地撕去了这个"风派"人物的种种伪装，层层深入地剖析了他的肮脏的灵魂。同时，剧本还注意到表现庄济生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恰如其分，较有分寸，合情合理。应当说，写好这类"风派"人物，即写出他们的典型性，又揭示他们的不同道路与不同个性，无疑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丹心谱》还注意从现实生活中吸收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比较努力于运用简洁明快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使之鲜明生动。剧中的语言，富有时代特点，有生活气息，真实朴素，其中有些语言很有感情色采，生动传神，时有警句，妙趣横生。因此，在剧场中能够不时地激起笑声，引起观众的共鸣。当然，在语言性格化方面，还有一些可以加工的余地。

这个剧本运用精选的、独特的细节来表现人物，展开情节，也是处理得比较好的。方凌轩的一张"启事"；吴丽芳关于"猪心"的议论；郑松年向老师告别时深深的一鞠躬；为李光送行的一杯清茶；老太太的"约法三章"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构思、细心刻划的，使观众久久难以忘怀。这些生动的，别具匠心的细节描写，对于刻划剧中的人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们要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导演梅阡同志，老演员郑榕、于是之、胡宗温、杨宝琮、谢延宁同志等，把这个剧本在午台上展示得那么丰富、深刻、生动，是花费了巨大的艺术劳动的。我们这些观众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是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深厚的革命激情来演这出戏的，因而演得那么真切，那么动人，使整个戏剧闪闪发光，成为一出光采夺目的话剧。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20日）

话剧《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系四幕话剧。作者宗福先。1978年11月演出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该剧是我国动乱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最早出现的优秀剧目之一。它以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为现实背景，通过描写老干部梅林和何是非两家人之间复杂的矛盾纠葛，集中而深刻地再现了"文革"以来，特别是1976年我国人民在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爱情生活中所经历的严重斗争和考验，强烈控诉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热情歌颂了以梅林为典型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和天安门事件中与"四人帮殊死斗争的时代英雄。剧中的老干部形象梅林，饱经战争风霜，对党无限忠诚。在"文革"中，她被诬陷为叛徒，虽倍受迫害而矢志不移，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坚定的胜利信念，以自己特有的形式按时"交纳党费"（从微薄的生活费中定期积攒，等待时机交出）；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也还依然坚持与"四人帮"斗争。而同样是老干部的何是非，在"文革"中为了保住自己而放弃党的原则，向"四人帮"出卖灵魂；他明知梅林是党的忠诚战士，而且也是自己的恩人，却昧着良心诬陷梅林是"叛徒"，因此而暴露了他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叛徒的真实面目。两相形成尖锐对比，不仅实现了人物形象鲜明的性格和思想分格，而且有力地揭示和烘托出"文革"时期和天安门事件前后我国政治斗争的异常尖锐、复杂和险恶。梅林的儿子欧阳平是"四人帮"正在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位勇士，剧作者所要着意表现的时代革命的典型形象。欧阳平受母亲冤案的株连，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屡遭不幸；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是革命者的后代，在母亲的教育和鼓励下，他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魄，勇敢投入与"四人帮"的斗争，并愿为此而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剧中的其他人物，何是非的女儿何芸、儿子何为、妻子刘秀英的出现，都是为了突现梅林母子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四人帮"的斗争是人心所向。该剧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情节集中，结构严密，戏剧冲突激烈，人物个性鲜明，富有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因此上演以后，受到观众一致好评。不过，正如剧作者所说，该剧是学习了曹禺戏剧的创作方法，似有模仿《雷雨》的痕迹。

历史档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外相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其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两国关系有所发展的同时，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种交流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在此基础上，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该条约回顾了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

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条约共5条,主要内容是:(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二)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三)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四)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五)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条约有效期为10年。10年以后,在根据该条约第三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同年10月22日至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日本首脑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纠夫出席了互换仪式。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随着两国互换批准书,这一条约当天生效,邓小平在签字仪式上讲话。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福田首相在讲话中也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两个多年来不断进行紧密接触和交流的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还如条约前言中写明的那样,反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双边关系得到重大进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之间工、青、妇以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宗教各个领域的团体人员交流全面展开,民间友好往来日益发展,可以说是"官民并茂,渠道畅通,形式多样,内容广泛"。1982年,赵紫阳总理访日时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98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时,日本中曾根首相提出建议增加"互相信赖"一条,胡耀邦表示赞同,使三原则变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总的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但两国关系发展中也发生了如教科书、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日台关系等问题。

《工业三十条》

《工业三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是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1972年的《工业十条》和1975年的《工业二十条》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决定》于1978年4月20日作为草案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试行;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公布实行。决定总结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工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总章程,也是国内好的重点企业经验的具体化。其主要内容有:(1)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强调整顿企业的关键是整顿好领导班子,粉碎"四人邦"后,整个企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彻底清除"四人邦"长期破坏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整顿好企业和企业的领导班子,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尽快搞好企业生产。决定从企业的实际出发,总结了目前企业领导班子的状况,认为目前企业的领导班子大体上有四种状况;好的;比较好的;"软、懒、散"比较严重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这是极少数。决定针对上述情况指出:好的,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有问题的,要认真解决;对于犯错误,但可以争取的,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开;坚持不改的,要坚决调整;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要坚决夺回来。问题多的企业,要派工作组进去。重点企业和整顿,要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共同负责。决定提出,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必须由党性强、干劲大、作风好并且熟悉业务的干部担任。经调整后的各企业班子是精干、强有力,领导班子成员不能太多,那种"书记成班、常委成排"的状况必须改变。年老体弱不适宜在企业担任领导的干部。要适当安排。要逐步建立一支思想红、技术精、作风好、团结紧、纪律严的产业大军。老干部要搞好传、帮、带,热情培养青年干部。要重视、认真搞好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和车间班组的建议,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明确要求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决定》强调,企业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各企业都要恢复、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生活等重大问题,党委做出决定后,由厂长负责执行。企业党委要积极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并监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企业党委要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保证上级领导机构的决定和指示的贯彻执行。要求企业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必须认真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防止和

克服个人说了算或不负责任的不良倾向。党委要加强对工会、共青团群众组织的领导，支持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3)规定了企业的基本制度。企业实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使工程技术人员有职有权，让他们在技术上真正负起责任来；要求健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制度。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规定企业要定期举行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听取企业领导的工作报告，对企业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决定》还指出，工会要成为党在企业中联系群众有力助手，成为吸引全体职工参加管理的群众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4)提出了搞好工业管理、加快工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强调，按照专业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首先组织同一地区的本行业的专业公司，然后逐步地发展跨省、跨行业的联合公司；从上到下建立强有力的各级工业指挥系统，有秩序地组织生产建议活动。决定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提法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企业领导制度略有差异。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企业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等，与《工业七十条》的提法有所不同。这个决定是当时指导工交战线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文件，它对工交战线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积极作用。文件下达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组织实施，抓紧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过去一批“老大难”又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如鞍钢、包钢、郑州铁路局、上海港口等，经过整顿，比较好地改变了落后面貌。与此同时，1978 年以后，工业企业逐步取消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形式，重新任命了厂长或经理；同时取消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代会，重新恢复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开展活动，基本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工业企业领导制度的一些基本做法，具有初步拨乱反正的意义。

（摘自《中国共产党辞典》）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和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

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的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来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1 卷第 228 页）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9 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1 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全面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5 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久保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42 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

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级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工作方案的指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且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

（原载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

1978年经济建设的成就

1978 年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基本建设和财政收入也有大幅度的增加，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绝大多数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农业都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农业总产值 1459 亿元，完成计划 102.7%，比上年增长 9%。其中粮食产量达到 6095 亿斤，比上年增产 440 亿斤；棉花产量达到 4334 万担，比上年增产 236 万担。油料、糖料和猪牛羊肉产量都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工业总产值为 4231 亿元，完成计划 101.5%，比上年增长 13.5%。8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70 多种产品的产量比上年增加，其中三分之二多的产品比上年增长 15%以上。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全年财政收入 11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2%，支出 11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7%。收大于支 10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全年完成投资 501 亿元，比上年增加 119 亿元，即增加 31%。国内市场供应有所改善。社会商品零售额 15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多年来供应一直紧张的肉、蛋、糖等副食品的销量有较多的增加，比上年增长 10—20%。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增加。全年进口额 206.4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58.4 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175 元，比上年提高 5.1%。

但 1978 年国民经济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1)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农产品不足，为保证供应，全年进口的粮食、棉花、动植物油和食糖，用掉外汇 21 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 1/5。其次是重工业内部、主要表现在能源工业同其他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及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2)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70 年以来积累率一直保持在 30%以上，1970 年提高到 36.5%，这与我国经济比较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的状况是不相适应的。(3)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效益不高，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有 99 个，投产率仅 5.8%。(4)引进搞急了。引进项目总规模超过了我国的承担能力和消化能力。(5)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全国有 2000 万人要求安排，1979 年就有 800 万人急需安排。(6)经济效益较差。全国有 1/3 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够正常。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中 30 项主要质量指标，有 13 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 项主要消耗指标，有 21 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1979 年比历史最好水平低 1/3。

（摘自《新中国编年史》）

“洋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

第一，农轻重比例失调。从基本建设投资看：农业占 10.6%；轻工业占 5.8%；重工业占 8.7%。从 1978 年农轻重总产值结构看：农业占 27.8%；轻工业占 31.1%；重工业占 41.1%。

第二，基本建设规模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了国家物力财力的可能。1978 年形势发展较好，外国争先向我国提供贷款，大家头脑发热，基本建设投资 479.3 亿元，比上年猛增 114.9 亿元，增长了 31.5%，占当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5.9%和 40.7%；当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一下子增加 300 多个，达到 1700 多个。

第三，积累率过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 1976 年为 31%，1977 年为 432.3%、1978 年达 36.6%，仅次于 1959 年的 438%和 1960 年的 396%，为第三个高峰年。在积累率的使用上，又重生产、轻生活，生产性投资占 826%，而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所占比重，“一五”计划时为 283%，而 1978 年只有 174%，因而，多年来人民生活方面旗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日益严重。

第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过多，与我国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注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引进必须从我国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有准备、有步骤地并行，同时要讲经济效益。1978 年一年就签订了 22 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合同，共 78 亿美元，全部要用现汇支付。钢铁、化工项目的引进合同，只签订了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 50 亿美元。这样的引进规模，超过了我国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到 1978 年年底，我国的物质、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均发生了较大的不平衡，给经济造成新的失误和困难。

（节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

体育档案

第八届亚运会资料

1978 年 12 月 4—22 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团长徐寅生、副团长于步血、黄中、陈先、张之槐、李文耀率领，参加在泰国举行的第八届亚洲运动会。代表团离京和返京时，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到机场送迎。在各项比赛中，我国运动员获得金牌 56 枚(含 5 个举重单项金牌)，银牌 60 枚，铜牌 51 枚。运动会期间，亚洲田径联合会举行会议，接受我国田径协会为该联合会会员。

1. 比赛成绩得奖名次表

国家或地区	金质奖章	银质奖章	铜质奖章	总数
日本	70	59	49	178
中国	51	54	46	151
南朝鲜	18	20	31	69
朝鲜	15	13	15	43
泰国	11	12	19	42
印度	11	11	6	28
印尼	8	7	18	33
巴基斯坦	4	4	9	17
菲律宾	4	4	6	14
伊拉克	2	4	6	12
新加坡	2	1	4	7
马来西亚	2	1	3	6
蒙古	1	3	5	9
黎巴嫩	1	1	0	2
叙利亚	1	0	0	1
缅甸	0	3	3	6
香港	0	2	3	5
斯里兰卡	0	0	2	2
科威特	0	0	1	1
总计	201	199	226	626

注：我国还获得举重单项金质奖章 5 枚。据组织委员会规定，此数不计入金质奖章总数内。银、铜质奖章也如此。朝鲜等国也有类似情况。

巴林、孟加拉、卡塔尔、尼泊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获得奖章。

2. 1978年我国破世界纪录统计

世界纪录	青年世界纪录								
项数	人数		次数		项数		人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计	计
合　计	3	3	6	6	3	3	2	2	2
射　箭	1	1	3	3	1	1			
举　重							2	2	2
射击	2	2	3	3	2	2			

3. 1978年破全国纪录统计

	全国纪录						少年(甲组)全国纪录						
	项数		人数		次数		项数		人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合　计	113	40	263	103	514	193	52	23	74	35	35	144	81
田　径	20	10	46	26	71	46	12	7	20	16	16	24	18
游　泳	27	14	37	22	138	82	21	15	22	17	17	68	61
举　重	18		25		33		16		25			43	
速度滑冰	2	1	2	1	2	1	3	1	7	2	2	9	2
赛车场自行车	5	4	36	32	22	20							
射　箭	20	8	21	4	130	20							
射　击	14	1	40	1	33	1							
飞机跳伞	4	2	51	17	80	23							
航空模型	2		4		4								
航海模型	1		1		1								

注：田径、游泳、举重、速度滑冰人数应为人次(少年兼成年纪录)

4. 1978年在世界比赛中获得冠军统计

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庚耀东.

女子单打：张爱玲

男子双打：庚跃东　侯加昌

女子双打：张爱玲　李　方

5. 1978年恢复和新批准国家级裁判分项人数

总计　822

水球	1	冰球	7	田径	198	体操	79
游泳	37	击剑	6	举重	43	摔跤	6
速度滑冰	14	跳水	11	射箭	2	划船	1
篮球	104	花样滑冰	6	排球	80	滑雪	1
足球	53	射击	8	乒乓球	76	无线电	2
网球	15	摩托车	3	羽毛球	25	航海模型	4
手球	9	航海多项	1	撑垒球	26	摩托艇	1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2日　华国锋到唐山看望英雄人民。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

1月4日　廖承志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

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社会主义实干家李锁寿》。

2月7日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军民一起欢度新春佳节。

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黎烈《"白专"帽子决不能乱扣》。

2月16日～18日　四届政协八次会议在京举行。

2月18日～23日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化纲要(草案)》以及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五届政协常委会人员的候选人名单。

2月24日～3月8日　五届政协一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邓小平为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郭沫若、宋任穷、沈雁冰、许德珩、欧阳钦、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为副主席。

2月26日～3月5日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中国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通过华国锋所作《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有些指标订得过高，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就轻率决定，提出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良、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为副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为副总理。

2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严实之《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3月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

3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在新的长征中继续发扬雷锋精神》。

3月6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3月7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决定实行义务兵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并对现行义务兵的服役年限作了适当延长。

3月12日　上海市为万名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

3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叶剑英《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

同日　我国一次新的核试验成功。

3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论梁效》。

4月1日　在中共贵州四届一中全会上，马力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

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顾铁风等《〈顶风记〉是个反革命政治骗局》。

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4月6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责成辽宁省和沈阳部队处理旅大市大搞楼堂馆所事件。旅大市委原主要负责人刘德才、宣世明等严重违犯财经纪律，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4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大张旗鼓开展双打运动》。

4月10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

4月14～15日　五届政协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

4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

4月25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因病逝世，终年72岁。

4月27日～6月6日　全军政工会议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叶剑英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五十年来军队政治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邓小平6月2日再次针对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和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今年十月召开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

5月10日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了此文。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开始了全国性的大讨论。

5月15日　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欧阳钦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同日　商震先生因病在日本东京逝世，终年90岁。6月30日，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副主席参加。

5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申涛声《"四人帮"与林彪》。

5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军队和地方都要抓灭资兴无的斗争》。

5月30日　铁瑛当选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6月22日　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昭雪恢复名誉。

6月23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举行曹荻秋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6月24日　经华国锋、党中央批准，依法逮捕(原四川省委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

7月18日　中共中央批准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7月19日　中共中央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转发全党。

7月21日　"风庆"轮事件是反革命阴谋，为受迫害的李国堂、顾文广彻底平反。

8月1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发扬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传统》。

8月3日　我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五届人大常委罗瑞卿同志逝世，终年72岁。

8月10日　中共中央批准颁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

同日　中央团校在北京举行开学复校典礼。

8月13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8月16～18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技术合作的长期协定》。

8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同日　五届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结束，通过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变动和人事任免事项。

8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干部学科学技术是一项迫切任务》。

9月8日～17日　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确定了新时期妇女运动的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妇女彻底解放而奋斗。大会一致推选宋庆龄、蔡畅、邓颖超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当选妇联主席。

9月11日　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大会，宣读中共中央关于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的文件。

同日　《中国青年》杂志复刊。

9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物质利益》。

9月13日　北京市公安局遵照中央部门和市委的指示，为贺鹏飞(贺龙子女)等一批受迫害的干部子女平反。

9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击报复是犯罪》。

9月17日　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指出，对于过去划错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

9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9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

9月30日　华总理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9周年。

10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10月11日～21日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工会章程》。22日，全总第九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倪志福当选主席。

10月16日～26日　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27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选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和常委。韩英任第一书记。会议还通过关于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小学“红小兵”组织即行撤销。

10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正式恢复办公。

10月22日　原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同志逝世，终年71岁。

10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孙冶方《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10月24日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电，热烈祝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10月28日　华国锋视察北京维尼纶厂。

10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

10月31日～12月10日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方面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通过《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11月1日　中共甘肃省委最近作出决定，对无视国家法令、煽动纵容乱砍乱伐国有森林，给陇东子岭林区造成严重大破坏的合水县委书记牛维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11月4日　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在拉萨举行宽大释放大会，释放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部在押犯。

11月5日　《人民日报》转《辽宁日报》载：最近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彻底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假案，为遭受迫害的陈先舟等90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1月10日～12月13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做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为。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6日　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1月18日　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388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被捕的同志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2日　清华大学党委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已经证明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清华大学党委实事求是地公开纠正这一错案。

11月23日　廖承志接见并宴请即将回台湾和去香港、到国外的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

11月29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为保护阶级兄弟生命而牺牲的政治指导员程志国以“雷锋式的好指导员”光荣称号。

12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空军航空兵某师中队长陈修文以“忠诚战士”的荣誉称号。

12月12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五条标准。

12月18日～22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结束了1976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全会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2月24日　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副秘书长。会议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2月26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会议任命王任重为国务院副总理。

12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案、假案、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经　济

1月1日　开滦原煤产量达到震前水平。1月3日，国务院致电祝贺。

1月4日～26日　第三届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京举行。

1月5日　经华国锋批准，铁道部作出关于命名“周恩来号”机车的决定。

1月16日　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京举行。代表们决心以“攀高峰要攀珠穆朗玛峰，创水平要创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气魄实现全面跃进。

1月20日　唐山市战胜震灾，工业产值超震前水平。

1月22日～2月1日　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群众大会在京举行。

2月3日　《人民日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报道安徽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赞扬了安徽省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于1977年11月制订的省委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

2月5日　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对农田基本建设提出八项要求。

2月23日　中国农业银行重新恢复。

3月6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一、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二、认真抓好城市规划工作。三、加速住宅及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

3月7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职称恢复和提升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国务院没有作出新规定前，仍执行196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

3月11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在上海新建钢铁厂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

4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4月15日～23日　全国铁路学大庆会议在京举行。

4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

4月27日～5月23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

6月1日　襄渝铁路(襄樊—重庆)建成通车，交付国家使用，全长916公里。这条铁路是沟通我国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干线。

6月1日～10日　全国轻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京举行。

6月2日　鞍钢党委认真落实政策，为鞍钢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等人恢复名誉。

6月14日　安徽省撤销4个假大庆式企业称号。

6月20日～7月9日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在京隆重举行。华国锋为大会题词并讲话。

7月　我国第一座抗高烈度地震(10度)公路桥—河北滦河新桥通车，全长979米。

7月4日　《财贸战线》报在北京创刊。

7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

同日　全国石油化工第二次学大庆会议在大庆进行。

7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

7月6日～9月9日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7月20日　轻工业部举行全国服装质量评比鉴定会，上海服装质量总评获全国第一。

8月4日　鞍钢严肃处理炼钢厂领导谎报产量的错误。

8月16日　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万亩，排涝农田400万亩。

8月22日　全国机械工业学大庆会议举行隆重命名仪式，授予马恒昌小组“三大革命斗争英雄集体”称号。

9月2日　安徽省合肥市理发业恢复基本工资加超额奖办法。

9月3日　华国锋视察新疆石河子地区，对当前工作做指示。

9月4日　马鞍第一、第二炼钢厂的事实证明，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调动了职工们的积极性。

9月6日　上海总工会举行重新挂牌仪式。

9月7日　中共中央最近发出通知，通报河南省委严肃处理原驻马店地区苏华等负责人违法乱纪，大量侵占，挪用国家拨给当地的救灾专款、救灾物资和国家税收、上缴利润等资金的严重事件。

9月22日　最近国务院颁布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9月27日　纵贯我国南北的第一条输油管道——鲁宁输油管道本年7月胜利建成，今日正式输油。这条输油管道北起河北，贯穿山东、安徽，南到江苏，总长1000多公里。

10月2日　位于冀中平原的任丘油田建成。

10月11日　上海造船厂为中(国)波(兰)轮船股份公司建造的“绍兴”号万吨级远洋货轮，已交付给订货单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口万吨级远洋货轮。

10月15日　国务院最近颁发《会计人员职权条例》。

10月18日　广州拖拉机厂长期以来产品质量低劣而至今尚无改进，不能胜任的党委书记被撤换。

11月2日　上海第一印染厂党委切实保障工人的民主权利，支持职工代表建议，免除和重选车间主任。

11月6日　中共湖北省沔阳县委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要求，决定把曾经没收了的自留地退还给社员经营。

11月19日　为在1985年制服西北、华北、东北严重的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国家批准建设北方"绿色万里长城"防护林体系。

11月24日　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农林部、卫生部最近联合发出《关于重新印发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的通知》。

11月25日　江苏省淮河大桥建成通车。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公路、油管两用桥，位于盱眙、洪泽、泗洪三县交界处，全长1922.9米。

同日　辽宁清河电厂建成投产，发电能力为110万千瓦。

11月27日　攀枝花钢铁基地首期工程建成投产。

11月30日　由关中到延安的11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最近建成输电。

12月1日　全国社队企业展览在北京举行。

12月6日　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基本建成。这项从外国引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每年可轧制薄钢板300万吨。

12月10日　冶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冶金战线群众大会，隆重庆祝我国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

12月19日　国务院最近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

12月23日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举行动工典礼。

12月25日　黄河上游青铜峡水电站设计安装的8台共27.2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

12月26日　沟通我国南北的第二条交通大干线——枝柳铁路（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建成通车，全长885公里。

12月29日　江西德兴县发现一个特大型铜矿。

1978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

外　交

1月19日　法国总理巴尔等访问我国。

1月20日　中国和老挝关于中国向老挝提供成套项目援助议定书在万象签字。

1月21日　中法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在京签字。

1月26日～2月6日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尼泊尔。

2月14日　中西（班牙）友好协会成立。

2月15日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全部达成协议。

3月26日　马达加斯加政府为我国援建而因公牺牲的王恩同志授勋。

3月31日　中泰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定。

同日　北京—卡拉奇—亚的斯亚贝巴航空线正式开航。这是中国通往非洲的第一条国际航线。

4月16日　华国锋会见索马里西亚德总统。

4月30日　中国华侨旅行社总社、中国旅行社总社同在北京参观的旅居国外的华侨、中国血统外籍人、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一起欢庆"五一"节。邓小平重申了侨务政策。

5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5月4日～10日　华国锋应邀访问朝鲜。

5月11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苏联对我国的军事挑衅。

5月19日　华国锋总理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签署中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5月23日　中日《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及技术协作合同在北京签字。

5月24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负责人就越南驱赶华侨回国问题发表谈话，要求越南方面立即停止执行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错误政策。

5月26日　我国与阿曼建交。

同日　我国政府决定派船前往越南，接运被越南当局迫害的华侨回国。

5月27日　回到广州的难侨在三元里集会，控诉越南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径，强烈要求越南政府立即停止排华活动。

5月底　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华侨达10万余人。他们在祖国受到热烈的关怀和接待。

6月1日　纪录片《越南当局驱赶华侨纪实》(一)在全国上映。

6月8日　卢旺达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访问我国。

6月9日　我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严重抗议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

6月16日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来我国访问。

同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我被迫撤销驻胡志明市总领事的任命，并通知越方关闭越南在华3个总领事馆。

6月25日　我公安机关捕获越南派遣特务陈裕贵。

6月30日　中朝关于鸭绿江和图们江水文工作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7月3日　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由于越方不断加剧反华排华，我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在越

南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

7月7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被迫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接回我国专家。

同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教育部关于1978年开始接收华侨学生回国和港澳学生到内地报考高等学校的决定。

7月19日　我国政府建议举行中越副外长级谈判。

7月30日　邓小平会见宋成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

8月5日　华国锋观看朝鲜国立交响乐团演出。

8月8日　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在河内举行第一次会谈。

8月9日　我国与利比亚建交。

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4日　我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强烈抗议越南武装公安人员入侵我云南边境。

8月16日～9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总理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

8月20日　中罗商定建立政府经技合作委员会，并将就经济、科技合作签订一系列协定。

8月26日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签订关于建立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委员会等协定。

8月31日　我国政府和伊朗政府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9月5日　我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越驻华使馆参赞，抗议越单方封锁友谊大桥、中断铁路。

9月8日～13日　邓小平率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9月14日　我国和坦桑尼亚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9月26日　在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谈判第八次会议上，由于越方无意解决争端，致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谈判到此宣告暂时休会。

10月1日　我国和尼泊尔关于建设成套项目的协定在北京签订。

10月22日～29日　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互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于23日在东京举行。

10月25日　国家体操协会就国际体操联合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驱逐蒋帮发表声明。

10月26日　我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使馆，强烈抗议越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越南当局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和全部责任。

11月1日　越南武装人员在广西边境打伤我社员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杀害。

11月2日～14日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4日，回国途中在仰光停留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举行会谈。

11月29日　我国与孟加拉国两国政府海运协定在北京签字。

12月4日　中法在北京签署一项为期7年的关于发展经济关系和合作的长期协定。

12月13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当局不断侵犯我领土和制造一系列的严重流血事件。

同日　我国向国际民航组织交存我国参加1963年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条约”)的加入书。该公约将于1979年2月12日起对我生效。

12月15日　国务院最近通知各地和有亲部门，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外交部于12月1日通知各国驻我国的外交代表机构，从1979年1月1日起使用。

12月16日　中美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

同日　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华总理宣布我国政府对台湾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

同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越南当局抛出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发表声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正义立场，谴责越南当局侵略、颠覆民主柬埔寨的横蛮行动。

12月22日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在上海签订。

同日　廖承志副委员长、谷牧副总理会见并宴请美籍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和夫人等。

12月22日～28日　全国侨务会议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推举廖承志为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庄希泉当选为全国侨联主席。

12月29日　外交部发言人声明，重申南沙群岛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外国提出领土要求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科技文教体育卫生

1 月 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重新成立。

1 月 5 日　中国力学学会在黄山召开全国第一次爆炸力学学术会议。

1 月 7 日　北京图书馆开放大批中外图书。

1 月 10 日　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 1978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 1977 年、1978 年两年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 1978 年研究生。(据不完全统计，本年 210 所高等学校 162 所研究机构共录取研究生 10780 人。本年还有 26 所重点高等学校在港澳地区招收了研究生。)

1 月 13 日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勘查的结果表明，长江源头不在巴颜喀拉山南麓，应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应为 6300 公里。

1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攻关的人——访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

1 月 20 日　我国海洋科学工作者在东海海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

1 月 21 日　《山西日报》载：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最近发出通知，严肃处理刘铎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

1 月 22 日　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黑龙江右岸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

1 月 24 日　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

1 月 26 日　我国第 8 次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30 日，卫星按计划完成科学实验任务后成功地返回地面。

1 月 27 日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建都阳城遗址，在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附近发现。

1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陈大新“雷锋式模范军医”荣誉称号。

2 月 12 日　教育部最近颁发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2 月 16 日　我国第一张《可能最大暴雨等线图》基本定稿。

2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记述陈景润的事迹)。

2 月 18 日　衡水地委严肃处理故城县委书记马连宝等人破坏招生制度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

3 月 1 日　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学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3 月 2 日　教育部、国家计委发出联合通知，决定自 1977 届新生起在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增加高等学校的招生名额。

3 月 4 日　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 1978 年选派语言留学生、出国进修教师、进修翻译人员 300 名左右。

3 月 14 日　我国独创的“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研究成功，主要创造者黄潼年提升为工程师。

3 月 18 日～31 日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作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方毅作报告。郭沫若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邓小平作重要讲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大会制定《1978 年至 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

3 月 20 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各地七二一大学先后改称职工大学。

4 月　我国出版史上第一次用新式标点点校的“二十四史”全部出版。

4 月 1 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神州九亿争飞跃——欢呼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

4 月 3 日　我国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及旱涝等级分布图已在南京整理完成。它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份范围最大、年代最久的旱涝气候图集。

4 月 7 日　党中央批准，重新建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李先念任主任委员。

4 月 8 日，中央爱卫会举行首次会议。

4 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的方针》。

4 月 12 日　26 个重点高校决定在港澳地区招收研究生。

同日　文化部决定恢复所属艺术团体的建制和名称。

4 月 13 日　话剧《丹心谱》在京上演受到热烈欢迎。

4 月 14 日　广州黄埔港在斗争中坚持计件工资制。

4 月 15 日　白求恩大夫半身铜像安放在华北烈士陵园白求恩纪念馆。

4 月 17 日　第三届《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在北京正式开放。

4 月 19 日　体总向台湾省及旅居国外的台湾省籍运动员发出通知书，欢迎他们来京参加第八届亚运会全国选拔赛。

4 月 21 日　文化部为大批受迫害文艺工作者平反。

4 月 22 日～5 月 16 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隆重举行。邓小平作重要讲话。

4 月 23 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

5月1日　《光明日报》从即日起改版，作为一张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报纸。

5月3日　教育部批准景山学校的决定，提升马淑珍等人为特级教师。

5月20日　北京市东城区10所中小学联合向全国中小学提升倡议，在中小学生树立革命风尚。

5月23日～24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5月27日～6月5日　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宣布全国文联和作协、剧协、音协、舞协、影协等五个文艺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5月31日　我国第一台能量为300亿电子伏特500亿电子伏特的高等环形质子同步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在北京动工兴建。

5月底　两千年前鲁国都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工作基本结束。都城面积39.5平方公里。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宋庆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

6月3日　原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6月6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并规定主要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不再限定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

6月12日　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逝世，终年86岁。

7月13日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停办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

7月17日～2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

7月28日　严明党纪国法，维护新的招生制度。驻马店地区原教育局长路恒锋依仗职权，徇私舞弊，破坏招生工作，受到应有惩处。

8月3日　河北省平山县三级公社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遗址和墓葬，出土贵重文物一万多件。

8月7日　经华国锋和国务院批准，全国青少年航空夏令营在京隆重开幕。

8月11日　《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

8月23日　国务院通知各高校不得计划外接受“代培生”。

9月7日　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出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铜、金、玉器、漆器、竹简等贵重文物7000多件。其中有8种共124件古代乐器，是我国音乐史上空前的发现。特别珍贵的是64件编钟，埋在地下已有2400多年，出土后音乐性能仍然良好。

9月9日　首都各报刊登了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三首。

9月10日　华国锋会见丁肇中教授。

9月19日　国务院最近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

9月29日　新发现18篇鲁讯文稿。

10月　北京舞蹈学院成立。

10月1日　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北京市革委会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9周年晚会。

10月6日　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在北京复刊。

10月7日　《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复刊。

10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科委党组织提出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10月9日　现代化大型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折合标准化肥114万吨。

10月10日　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继续大打产品质量进攻战的通知》。

10月1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10月12日　长沙铁道学院教授、青年数学家侯振挺由于解决了数学家们40年一直探求的Q过程唯一性准则问题，获1978年度戴维逊奖。

10月17日　国家体委系统在北京举行命名授奖大会，国务院批准命名国家乒乓球队为“又红又专、勇攀高峰运动队”。

10月17日　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

10月19日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召开座谈会讨论党的工作问题，指出科研机构党的工作要以科研为中心。

10月31日　我国印学史上最早的一个学术团体——杭州西泠印社，最近经国家出版局批准正式列为出版单位。

11月4日　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

11月4日～7日　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泰国曼谷举行。我国运动员庾耀东、张爱玲分获男、女单打冠军，侯加昌和庾耀东获男双冠军，张爱玲和李芸获女双冠军。

11月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

11月9日～16日　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方毅做重要讲话，周培源做工作报告。会上宣布为范长江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1月13日　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11月29日　国务院批准将华北农业大学的校名恢复为北京农业大学，迁回北京原址。

12月11日　中国体操队在第八届亚运会上获十枚金牌，这是中国体操史上第一次。

12月28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

12月30日　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最近发出《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79年

导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各条战线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制定新时期的战斗纲领作了物质条件的准备。

在经济建设中，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经济工作中“左”的失误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党中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此同时，党首先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广大农村推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显著增长。农业经济的迅速好转，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党中央在工业企业中试点并逐步推广扩大自主权。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确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经过调整和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步地向前发展。198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291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2.6％ 。其中，轻工业所占比重由 31.1％提高到 33.4％；农业所占比重由 27.8％提高到 33.6％。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2％。其中，轻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1.8％，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3.4％。这些，说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变，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1982 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达 882 亿元，比 1978 年增加 55％。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在 300 元以上的农户所占的比重，已由 1978 年的 2.4％上升到 1982 年的 36.2％。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思想活跃，大胆探索，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此同时，党中央及时指出要注意防止右倾思想的抬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党中央公开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公开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在各地区、各部门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中央十分重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着手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党中央调整和加强了统战工作。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工作恢复和活跃起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我国的统一战线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此外，在外交、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全面拨乱反正和调整、改革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胜利，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以往深刻得多，经验丰富得多，主要表现在：

第一，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党的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

误”。那么，党的一切工作只能围绕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是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第二，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的基础。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实现“四化”的根本前提，主要体现在它的根本保证作用上，这就是：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的基础，则是要求我们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必须遵循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向，必须依赖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持和保证，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鲜明地提出来，深刻地阐明了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随后，这四项基本原则分别载入宪法和党章，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第三，改革、搞活、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政策。在1980年1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把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确定的一系列政策，概括为改革、搞活、开放的方针。以后，这个方针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成为我们党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政策。邓小平同志后来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他所以要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并使之成为党的基本政策，是因为他从历史的教训和实现的经验中，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虽是好的，但一些具体制度却存在着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等重大缺陷。同时，由于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正是“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绩说明，我们要把经济搞上去，要从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根本的出路就在改革开放。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就没有“四化”大业的实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

上述这些，为我们党制定新时期的战斗纲领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平反“冤、假、错”案**
- **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
- **我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 **中美建交**
- **对越自卫反击战**
-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背景介绍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是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召开的。鉴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引起了一场争论，开始了一场全党、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了引导这场讨论深入、健康地开展下去，1978年9月，叶剑英曾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认识，弄清理论是非的目的。

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月18日到2月12日。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100多人参加，各省市也派来一位联络员。第二阶段，从2月12日以后到4月3日，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士参加，扩大到400～500人。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一个以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的领导小组，同时还邀请了21位长期在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与会进行指导。会议期间，部分省、市、自治区也召开了同样内容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收到了上下呼应、互相交流的效果。

1月18日，会议开始时，胡耀邦首先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讲话。他说，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是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是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我们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召开的，应当着重讨论一下理论宣传工作怎样适应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今天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的，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我们要议一议，在思想理论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讲话以后，与会代表就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为了澄清思想理论上的一些模糊问题，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会议还印发了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意见。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涵义不清，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故不宜再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说法，其中“始终”二字是康生所加，逻辑上不通，提法也错误，迫切需要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党内斗争并不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与会代表对胡乔木的这些意见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并形成了比较

一致的看法，认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过去的一些错误提法应停止使用。

会议进行期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或歪曲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思想动向。当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解决新出现问题的形势下，有些人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有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帜，歪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散布一种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他指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会议对邓小平的讲话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当前重新提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非常及时的，必要的，宣传和坚持贯彻这四项基本原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会议要求全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克服思想僵化现象，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次会议，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促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贯彻。

材料：

-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材料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胡乔木

现在，思想理论工作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有些旧的说法需要继续清理。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理论上的勇气，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有远见，能够看到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将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适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对有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提法，要继续进行讨论和研究，弄清楚它们的客观意义和科学涵义。

比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涵义，它的科学根据是什么，继续使用好不好，就值得重新研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公开见之于文字，最早是在一九六七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后来康生把它写到了“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在向中直机关干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作了发挥。这个口号提出以来，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始终没有严格推敲，把它的科学涵义和根据讲清楚。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通常讲的政治革命，总是指推翻一个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口号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提出来的，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个口号，竭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制造了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口号还作过一些宣传。但是究竟它的涵义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它与如何估计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有关，也与如何解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有关。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无论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正确处理的，这种正确处理是否要叫做“继续革命”？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要的意义。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讲清楚，那需要考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的认识，也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

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正式决定，采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什么范围、什么条件下存在？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能不能始终作为动力？它对社会前进究竟起什么作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是也推动社会前进？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

又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发展问题，党的历史问题。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党内存在路线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如果任何斗争都是路线斗争，那末，党内就几乎天天存在路线斗争。党内斗争的情况很复杂，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一次地排列起来？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同志中间形成这么一种心理，似乎党内的任何斗争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就没有重要意义，就像吃饭没有吃饱似的，总不过瘾。这种考虑问题的习惯是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对党内生活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大家认为，谁犯了路线错误，这个人就一切都错了，就宣布了政治上的死刑，在相当时间内同反革命差不多，因而造成党内生活的紧张状态和不正常状态。这种简单化的提法对党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必要，究竟是否有利，究竟是否合乎实际，当然也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加以科学的探讨，否则会搞得不能自圆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进行过不少的党内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进行过多少次路线斗争，别人也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必要这样来归类和计数。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们以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总之，需要重新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们一定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提出来仅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这是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曾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印发。

平反“冤、假、错”案

背景介绍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内，虽然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阻碍，这项工作进展很慢、范围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路线之后，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首先，大规模地为党和国家以及各部门领导人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彭德怀、陶铸等同志彻底平反。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平反。从1979年到1982年，周扬、邓拓、吴晗、夏衍、周小舟等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做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其名誉，从而纠正了这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最大冤案。

其次，为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根据中央决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投义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比如为1949

年 11 月国民党“两航”起义人员落实了政策等等。全国共为 454000 名国民党起义人员落实了政策。

第三，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比如，撤销了所谓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文化部被诬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平反。此外，中央还撤销了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了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推翻了“四人帮”强加给建国后 17 年教育战线的所谓“两个估计”，等等。

第四，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对在此期间被错判的反革命案、错杀案等进行改判或平反。中央和各地先后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等进行了复查平反。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惨遭杀害的人，如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史云峰等，得到了平反昭雪。

第五，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乃至建国以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中央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了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得到平反昭雪。中共中央还为 1955 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平反，为 1958 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而受株连的人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潘汉年等平反，等等。此外，还复查和纠正了 30 年代、40 年代的一批冤假错案，如地下党问题、根据地肃反、肃托问题上的错案得到了纠正。

第六，实事求是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如 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使至少有 2000 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1979 年 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促使这一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外，中央还决定，对在 1959 年以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 1982 年底，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勇于和能够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

材料：

材料　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四类分子摘帽问题

最近，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各级公安机关正在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为此，本报记者走访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请他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问：首先，想请你讲讲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一英明决定有何重大意义。

答：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历来采取把他们放在群众之中，通过集体生产劳动监督改造的方针，目的在于把他们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的重大政策。在这方面，我们的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经过努力改造，已经陆续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现有的四类分子，经过长期改造，绝大多数是老实守法的，在林彪、“四人帮”掀起反革命的疾风恶浪中，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为数极少，充分证明了党的改造四类分子政策的正确和成功。现在，党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已经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类分子改造的实际情况。解决好他们的摘帽问题，不仅解放了这部分人，而且使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轻装前进。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将起极大的积极作用。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决定采取这一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热烈拥护的，必将进一步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问：中央决定中提到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改造。这里讲的“极少数”，应当怎样掌握？

答：中央提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一律摘帽。应当说，目前绝大多数四类分子，都具备了这一条件。遵守政府法令，含意是很清楚的，不需要解释。老实劳动，是指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四类分子，能够做到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至于有些年老体衰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四类分子，就不能因为他们不参加劳动而影响摘帽。不做坏事，这是一个严格的政治标准，就是指没有搞阶级报复、没有搞打砸抢以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不要搞土政策，不要抓小辫子，例如把搞家庭副业说成“搞资本主义”，把提意见说成“乱说乱动”，等等。因此，不能摘帽、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应该是极少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确实做坏事的人。这个极少数，是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

具体地方、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办事，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是具备摘帽条件的四类分子，就应当一律给他们摘掉帽子，这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不要顾虑重重，怕这怕那。

问：本报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进行纠正，请你讲讲这个问题。

答：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确实有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些年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破坏党的政策造成的，也有少数是定性不准、工作中的差错。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不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负责地予以纠正。即便是已经死亡了的，如果确实是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也应给以纠正。

问：对于摘了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应当怎样对待？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违法犯罪，是否需要重新戴上帽子？

答：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社员、工人、教员等。他们应当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帽坏分子"，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他们之中如果有人犯了错误，也应当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给予批评教育。至于有人犯了罪，那就应当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而不应当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

问：对于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之后，现在还戴着反、坏分子帽子的人，应当如何处理？

答：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的人，有的戴着反、坏分子的帽子，有的没有戴帽子，情况不尽一样。这些人中，现在还戴着帽子的，应当同其他戴帽四类分子一样，按照中央规定的条件，评议他们的摘帽问题。今后，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之后，一律不要再戴反、坏分子的帽子。

问：对于极少数需要继续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的地、富、反、坏分子，如何实行给出路的政策？

答：对地、富、反、坏分子给出路，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对于这次还不能摘掉帽子的极少数四类分子，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同工同酬，按照他们参加集体生产中所付出的劳动，与同工种的其他社员、职工一样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得让他们搞无偿劳动。对于在生产劳动中做出成绩的四类分子，除不能享有荣誉奖以外，可以享受与其他社员、职工同样的超产物质奖励。在政治上，只要他们努力改造好了，就应摘掉他们的帽子。总之，对于这次还不能摘掉帽子的极少数四类分子，只要他们老实守法，加紧改造，他们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问：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落实政策，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

答：对四类分子的子女，重在本人表现，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出身于地、富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的人，他们的父辈属于剥削阶级，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反、坏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辈犯了罪，他们自己是无辜的。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社会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纠正。要按照党中央决定，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地、富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问题。今后，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重在本人表现的政策，使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问：你是否可以讲一讲，今后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

答：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它的主要任务历来就是做好防特、防盗、防火、防其它灾害事故的"四防"工作。广大基层治保人员过去在监督改造四类分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绝大多数四类分子能够得到改造，摘掉帽子，是与基层治保组织长期的帮助教育分不开的。今后，有些基层单位虽然没有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任务了，但是基层治保会"四防"工作的任务仍然是很重的。从全国来看，即使原来的四类分子全部没有了，也还会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我们还要同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作长期的斗争；还要加强治安管理，维护好公共秩序；还要花很大力气去同火灾、车祸等各种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继续贯彻在党委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治安保卫工作，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

背景介绍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

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上述决策，已包含了调整、改革的内容。

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根据三中全会的决策，对我国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进一步看清了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错误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影响，看清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性，并逐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些重要意见最后形成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有很大缺口的问题，陈云于1979年1月1日和5日作了两次批示，认为不要留缺口，主张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上述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3月8日，陈云在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指出：(1)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来之于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2)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3)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计划经济部分，这是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这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5)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6)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财经工作给中央写信，提出以下意见：(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6)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经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和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陈云指出，(1)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我国有9亿人口，80%在农村，现在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2)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不能认为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下来是修正主义。在一定情况下，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3)用三年时间来调整。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调整的目的，是要达到比较按比例地前进。(4)到2000年钢的产量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陈云和邓小平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会议的赞同。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并准备将这一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最后形成作了充分准备。

经过一系列酝酿，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这篇讲话全面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阐述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方针任务。讲话中提出，从1979年起，要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大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工业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更好地按客观规律办事。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整顿现有企业；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其中心任务是调整。实行八字方针的目的是纠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失误，消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影响，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至此，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并在实践中逐步贯彻。

材料：

-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 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材料一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李先念 陈 云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〇〇〇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李先念 陈 云

三月十四日

材料二 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比较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比例失调。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业内部，农林牧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也不相适应。工业内部原材料、动力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不平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超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可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适应，影响人民生活，等等。根据这个情况，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搞好综合平衡，逐步调整好国民经济的各项基本比例关系，以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除了大力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以外，就是坚决把那些脱离实际可能的长线压缩下来。一句话，就是该上马的就上马，该下马的就下马。然而，长时期以来，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却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讲上马，争投资，争项目，一马当先；讲下马，压投资，减项目，噤若寒蝉，寸步难移。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原因之一，就是“四人帮”把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贯彻执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诬蔑为“下马风”，这一是非不搞清楚，严重阻碍着我们的综合平衡工作。对于“四人帮”炮制的这个精神枷锁，必须彻底打碎。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八字方针的由来。大家知道，解放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点九，其中工业为百分之十八，农业为百分之四点五。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制订的。他指示要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各项比例关系，以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地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计划是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工业发展很快，农业形势也很好。可是，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不切实际地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基本建设投资猛增。结果，农轻重比例失调，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也失调，钢铁生产也不能不大幅度地掉下来。一九六〇年底，当时主持计委工作的李富春同志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要财经小组写了一个”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后经周恩来同志概括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个报告。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同志又要财经小组起草一个如何执行八字方针的文件。这个文件经周恩来同志亲自修改、并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后报中央批准。文件提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重工业战线，对重工业企业要“保一批，停一批”，太落后的或一个时期没有生产任务和生产条件的工厂要采取“关、停、并、转”的办法进行调整。这就是八字方针和所谓“下马风”的来龙去脉。

究竟八字方针是不是正确的呢？回答是完全肯定的。首先，这是恢复农轻重适当比例、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需要。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〇年的钢铁高指标，把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重工业主要是钢铁部门，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必然要严重损害农业和轻工业。同时，人首先是要吃饭穿衣的。重工业归根到底

不能脱离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而发展。随着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下降，重工业最后也不能不下降。所以，当时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重工业战线，某些基本建设项目下马，特别是停办一大批小高炉是完全必要的。例如，当时煤炭供应紧张，鞍钢的大高炉有一半停产，而几万个小高炉，却消耗着大量焦炭。炼一吨铁，小高炉消耗两吨焦炭，铁的质量也差；鞍钢只要六百多公斤，铁的质量好。究竟是保鞍钢大高炉，还是保几万个小高炉？显然，从经济效果看，要保鞍钢，停一些小高炉。这是完全合理的。

其次，这是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需要。那几年，从农业抽调出来搞重工业和其它事业的农村劳动力太多，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大家知道，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劳动生产率很低，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粮食，除本人外只能养活两个人。这就决定了我国绝大部分劳动力要从事农业生产，几亿人搞饭吃。而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间，一下子从农村抽调很多人去搞工业，而且都是壮劳力，这怎么能不大大削弱农业生产战线呢？因此，坚决精简职工队伍，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村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这是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间，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农村缺粮严重；为了保证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片面强调"苦战"，搞得人们体质严重下降。这种状况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不能继续下去了。

总之，八字方针是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而采取的英明果断的措施。应该指出，八字方针并不是单纯"下马"，对某些关键部门，仍要"上马"，而且是作为重点来保证的。大庆油田就是在这个时期搞上去的。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八字方针，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下降的趋势制止住了。一九六三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到一九六四年基本上恢复到或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国民经济又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几年是我国经济又一个高速度发展的时期。八字方针不是消极地下马，而是为更快的发展创造条件。

上述情况说明，八字方针在当时国民经济基本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其实，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上马和下马，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常有的事。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在各个生产部门、各个行业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经常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要求人们自觉地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制订出能反映客观比例的计划，以指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我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存在之间存在着矛盾，计划规定的比例往往不能完全正确反映实际。同时，也由于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原有的比例关系也会经常发生变化。某些部门发展快一些，出现了"长线"；有些部门发展慢一些，出现了"短线"。这就要求搞好综合平衡工作。或者加强"短线"，或者把"长线"缩减下来，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这样的上马、下马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准上马，不准下马，或者只准下马，不准上马，都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实际上就是取消综合平衡，回到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当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而严重失调时，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该下马的就下马，该上马的就上马。"四人帮"把八字方针斥之为"下马风"、"反动路线"，就是只准上马，不准下马，这是他们的极左路线在计划经济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高速度发展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我们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可能性，大干快上。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好综合平衡，计划不能留缺口。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上马容易下马难。除了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以外，从思想认识上来说，上马被认为是有干劲、要革命的表现，不管这种上马是否符合客观需要；而下马，则容易被认为是"消极平衡"、"右倾保守"。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需要下马的时候，敢于提出下马或支持下马。这里需要具备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无私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原载于 1979 年《人民日报》）（何建章）

我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背景介绍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最早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当时称"出口特区"。198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推动两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会上，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同年 5 月，中共中央下发 41 号文件，对《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做了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根据两省的有利条件，中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特区建设和发展又陆续批发了一系列文件和会议纪要，规定了政策措施和发展方向，从而保证了经济特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材料：

· 特区始创纪事

材料　特区始创纪事

“经济特区”就这样定下来了

“经济特区”一词，早已为世人所熟悉。但知道它最初并非如此 称谓的人并不多。至于经济特区的由来，了解的人则更少。

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我随广东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到汕头市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动的中国，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事项的意义是震撼性的。在被唤醒的希望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使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汕头曾经是南部沿海享有盛名的港口城市。然而，如今映入眼帘的却是破蔽的街巷，昏暗的夜晚，在待业中挣扎的人群。此情此景，令人感慨系之。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既已确定，能不能从中探索出一条路子，振兴困境积重的社会经济？象汕头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只是因为闭关自守才逐渐式微的港口城市，能不能在再一次对外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问题提出来了，答案很快也有了。我们设想，可以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这个现在看似寻常的思路，在当时无异于头一个“吃螃蟹”。所庆幸的是，竟得到广东省领导层的赞同，一致认为只要中央授权，实行对外开放，广东完全可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且提出，不光是在重要侨乡的汕头进行试验，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也可以进行试验。同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广东汇报了这个设想，并获首肯。于是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权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特区。邓小平同志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广东的报告中，对上述设想予以正式确认，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被指定负责筹划特区的几位同仁，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包括对特区的模式、目标、任务和地址选择等，都反复进行了商讨研究。“大家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冲破闭关自守的桎梏才有出路，要充分利用特区这个窗口，加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二是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宜照搬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应该从工、农、商等各个经济领域进行综合性试验；三是特区区域范围不妨划得大些，按高标准分期分批进行开发。议论之余，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给我们的特区定个更贴切的名称。十多个可供选择的名称提了出来，经过一番筛选，最后提议似可改称为“经济特区”。1980年4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时，采纳了这个提议。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是：“经济特区”成了中外辞典中的一个新词汇。它的出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办的是在经济领域多方面进行改革试验的特区，不是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是吸取海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所用的经济特区，不是全盘西化的政治特区。

试办特区的初衷

兴办特区，意味着要同外部世界打交道，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少。打开大门一看，确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我们在描绘、设计经济特区的时候，根据中央意图，始终强调两点：一是向海外一切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法令、法规和政策措施学习，力争使我们的特区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坚持从国情、省情出发，不甘落后，奋发图强，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点贡献。基于这两点，曾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首要的一个话题是“资为社用”。这一命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查看了不少经典籍和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线，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管理方法来建设和发展自己。列宁著作中有一段风趣盎然的话，他说：“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列宁的话，深刻的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思想武器。

另一个话题，是办个什么样的特区。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理所当然地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达到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目的。但如果仅止于此，未免没有抓住举办特区的根本。我们国家那么大，小小几块地方的经

济再发达，出口创汇再多，但对改变整个国家穷困落后局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我们把特区的任务和作用概括为“观察、学习、试验”六个字，即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部世界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变化；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在这个基地上试验各种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基于这个设想，应该把特区办成为世界各地技术装备和科学管理的“博览会”，最富活力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培养各种有用人才的大学校。我们理解，这才是中央决定举办特区的重大意义所在。

还有一个话题，特区怎样办好。特区始创时期，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实践，讨论难以充分展开，但主要思路还是明确的。例如：市政设施作为特区的载体，规划设计要先行，并力求现代化，在作好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分期分批组织实施；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准则和惯例，简化对投资者的行政管理，逐步加强法制建设，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特区是联结国际市场的枢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应比内地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便较好地实行“接轨”；对于外来的文化，亦应采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态度，凡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应积极地吸取、创新，凡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潮和伤风败俗的生活方式，我们则坚决抵制。特区建设十年的事实证明，上述思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应该制订一个很有权威的法规

这是筹划特区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坚持认为，特区同国际社会打交道，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法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规，仍旧是无法可依，特区宁可缓办甚或不办。我们国家高度集中而法制极不健全，过去随心所欲、办的蠢事实在太多了，现在总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基于这一认识，从1979年8月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按照我们设想的框架，全力以赴地从事特区基本法规的起草工作，即后来形成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条例从研究起草，征求海外人士意见，到省人大审议，国务院讨论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制订涉外经济法规无疑是十分严肃的事，在一年时间内能够完成立法程序，在当时条件下，算是很快的了。但现在人们却很难想到，这个只有一千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炉火中炼出来的，可以说字字千金。艰难之处在于：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以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三是囿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斟字酌句地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冥思苦想，只好改为“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可算得上是个“发明”。录用职工需签订劳动合同的规定，也有忽视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地位之嫌，费了不少唇舌才勉强说服了人家。这个“特区条例”，本来是吸收海外出口加工区的基本法草拟的，后来又邀请海外人士举行座谈，征求意见，并从鼓励外商投资的角度再作认真修改，前前后后搞了十三个草案的版本。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件》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不平凡的一天，意味着我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

广东几个特区的筹建工作，包括草拟“特区条例”，始终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进行的。谷牧副总理多次亲临视察、指导，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江泽民副主任率领的考察组，于1980年9—10月间对世界各地几个著名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几位领导同志对我国举办特区如何统一认识、发展方向和经营方针、管理体制和经济立法等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指导性意见，为特区的起步和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深圳特区从何处起步

经过勘测规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确定深圳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约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原来设想，最好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土地进行开发，并作出了详尽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作任何可行性研究，因而此方案不久自然告吹。于是，唯有面对现实，最终选定在通往香港的罗湖、文锦渡两个口岸之间一带，搬山填地，先行开发。

这个决定却招来了一些指责。有人认为，罗湖一带地势低洼，年年暴雨成灾，在这里搞开发，无异于将大把钞票抛进湖里！罗湖本来不是湖，也许数百年前这里是一个海湾，至今确实比别的地方低洼，但是挖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地，总土方量80多万立方米，并不是花费很多的难事。1980年7月27日夜一场暴雨，坚定了我们先开发罗湖的决心。那一次，我们的住地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工程师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被洪水毁掉了。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在祖国的南大门见到此情此景，令人羞愧难当。怀胎中的深圳特区，决不能容许这种任由大自然肆虐的情形再现。不久，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罗湖呈现了一派移山倒海

的气势。尽管还有争论，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而今广厦林立的罗湖，说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这在深圳建设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联想起其他方面的一些无休止争论，不能不使人感慨良多。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足，是我们举办特区的重要教训之一。这倒不光是在于特区建设从何处起步的争论问题上。狭隘的农民意识，陈旧的观念，这同建设特区的整体设想和长远利益的取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深圳特区一起步便波澜迭起。在珠海、汕头特区，当然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个中的细节，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借鸡生蛋"与"滚雪球"

建设具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特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土地，搞好"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电讯、通排水、通道路和平整土地)，为外商投资办企业提供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这是吸引外商的起码条件。在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或由国家拨款，或委托某家企业承包经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特区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主要靠特区自己筹措，这就迫使我们想方设法，另谋出路了。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1979年1月，早在国家决定试办特区之前，就批准香港招商局开发经营蛇口工业区。招商局是家百年老企业，为谋求新的发展，打算在"船"字上做文章，包括拆船轧钢、船用油漆、锚链制造等，但是苦于在香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方，于是提出了在靠香港最近的蛇口开辟工业区的设想。他们要求利用招商局留成的部分利润，首期开发1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通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变电站、供电线路、自来水厂和引水工程、直拨香港的微波电话系统，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商业服务设施。在施工过程中，他们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人们新奇而又疑惑的目光注视下，破天荒地创造了"蛇口模式"。

深圳罗湖的开发经营，实际上参照了"蛇口模式"。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和部分地方财政投入只是作为"酵母"，在罗湖先从0.8平方公里着手进行土地开发，主要提供给外商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等服务设施，我们收取土地使用费。基础设施投资当时每平方米约120元人民币，土地使用费每平方米收5000港元，特区就用从中赚得的钱，继续进行罗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开发上步工业区。上步工业区当时规划占地2.7平方公里，计划建设以电子、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区。这种利用银行贷款"借鸡生蛋"，以及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办法，解决了深圳特区建设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条量力而行、讲求效益的路子，为稍晚一点起步的珠海、汕头特区建设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经验。

老朋友总难忘却

广东几个经济特区从筹划到创办，得到港澳和海外各界朋友的热忱支持，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试办特区的消息早在1979年秋就有所披露。从那时开始，不少有志于中国经济振兴的人士纷纷来访，或交换意见，提供资料，或试探投资事宜，帮助开发建设，拳拳赤子心，感人至深。

诸多关注特区的老朋友，而今难以一一列举。我想，不能不提及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原董事长庄世平先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家事务的批评往往慷慨陈辞，甚至尖锐刻薄，而为国家办事尤其是对试办特区，又是倾注一腔热血，竭尽全力，以年迈体弱之躯，不辞劳苦地来往奔波。他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性特区的资料，难以数计。深圳建设开始后，他坚持要求南洋商业银行进入特区设立分行。在当时国家金融体制僵化模式的框囿下，这无异是一种自吞苦果的冒险。尔后数年间，南洋商业银行驶入特区之船一直在暗礁中挣扎，苦果的滋味难以言喻，以至庄老先生亦曾慨然长叹：我平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深圳设立分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特区事业的发展，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的业务日益扩展，这该使庄老先生宽慰释然了。

前来商洽经济合作的人多了起来。除了与我们合作经营房地产外，开发小梅沙旅游区、福田工业区、沙河工业区等，都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已故的港商黄振辉先生在香港曾经成功开发了康乐园和锦绣花园，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实业家。根据几位朋友的建议，他于1979年10月踏进深圳的土地，花了几个月时间，亲自勘察地形，选择了福田北部一片丘陵地带，按照建设工业园区的设想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并表示愿意投资开发。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幅蓝图未能付诸实施，但黄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却难以磨灭。

最使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东南亚某国一位华裔高级官员，也抱着惊喜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特区。1980年11月，他专程来到香港，约请我方负责人前往交谈，阐述他的一些看法。他对中国包括试办特区在内的开放政策是衷心赞同的。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繁荣昌盛，有利于改善华人在海外的处境。但是他强调，西方的资金、技术、文化可以引进，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决不能丢，恰恰相反应该发扬光大。这位不便署名的先生一席话，至今忆起，仍发人深思。

可以这样说，没有诸多海外朋友的关注、帮助和支持，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步就难以顺利开展，也不会取得像今天这样显著的成功。

原载《广东经济特区十年》

（丁励松）

中美建交

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美国政府当局的原因，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当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考虑改变对华政策。

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试探性地提出了愿意访华的问题。1971年7月6日，尼克松表示美国的政策目标从长期来看，必须是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反霸斗争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策。通过“乒乓外交”，使事情有了进展。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通过斯诺，表示了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意愿。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方商讨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的消息。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来华访问，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2月28日，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双方阐明了各自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3年2月15日至19日，基辛格再次访华，达成了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等协议。4月至5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分别赴任。1978年5月开始，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多次会谈。10月28日，邓小平副总理重申中国提出的美国同台湾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同台湾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三条。12月中旬，中美两国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12月16日，双方同时公布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重申上海公报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同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就中美建交发表声明。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台湾当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于1980年1月1日终止。1979年内，美国暂停与台湾签订新的销售武器的协议。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3月1日，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正式建立大使馆。同月，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和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赴任。

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使对峙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统一大业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材料：

- 小球转动了地球

材料　小球转动了地球

在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开辟了道路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用小球转动了地球，被世界舆论称为“乒乓外交”。这使我们想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后，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一）

时间回溯到一九七一年。

春天，在北京中国乒乓球队驻地，集训刚刚恢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运动员的训练已经停顿多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三月二十八日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日本乒乓球界的朋友热情地邀请中国队参加，各国朋友也期待着中国运动员到名古屋去。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也希望重登世界乒坛，与各国朋友欢聚。可是，林彪、“四人帮”竭力阻挠。当时，国际上的斗争也比较复杂。到底去还是不去?周总理鼓励运动员参加这届锦标赛，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同时亲笔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了情况。

“我队应去。”毛主席亲自批准了我国乒乓球队参加这届比赛。

运动员临行前，周总理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大厅里，运动员们围着周总理，周总理谈笑风生，谆谆嘱咐大家：“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做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里就有辩证关系。你们的球艺不行，人家也不欢迎你们去，但是首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总理的话说到运动员们的心里去了。直到凌晨一时半，年轻人才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

第二天，运动员们又接到了周总理的鼓励信。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浑身的力量，登上了征途。

三月二十一日，代表团飞抵东京羽田机场。二千多名日本各界朋友和旅日爱国华侨，热烈欢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

（二）

名古屋市樱花如锦，春光明媚。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在爱知县体育馆隆重开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得到了各国朋友的热烈响应。在这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里,比赛场上银球飞舞,争夺激烈,而在会议厅、休息室里,友好交往更为忙碌。许多国家的乒乓球队表示希望能访问中国。这里特别令人注目的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成员和美国记者常常热情地同中国代表团成员寒暄:

"很高兴会见你,我们有机会的话,想到中国访问,也欢迎中国队来美国访问。"

"美国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中国是否允许我们到你们伟大的国家看看?"……

这友好的信息迅速飞越海洋,传到北京,汇集到周总理办公室,汇集到毛主席那里,等待着毛主席、周总理作出重要的决策。

就在这个时候,名古屋又发生了一件看来似乎十分平常的事。四月四日,比赛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从训练馆向比赛馆走去,一辆急驰而来的大客车在他身边刹住,中国运动员友好地请他上车,和他一起聊了起来。中国运动员们送给这个十九岁的洛杉机圣莫尼卡学院学生一幅杭州西湖织锦。

"谢谢,回家后,我将把这件礼物挂在我的墙上!"

由于中美两国人民已经隔绝了二十多年,当时这件小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科恩也成了令人注目的新闻人物,一群新闻记者围着他向他提问。科恩说:

"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意去中国。"

这个消息,路透社、美联社都向全世界广播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迅速作出决策:邀请美国队访华。

银球飞舞的名古屋爱知县体育馆,爆出了一条特大的政治新闻,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墨绿色的球台上转移到了世界政治舞台上。

(三)

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闭幕,这是新闻中心最忙碌的一天。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和美国乒协主席一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各国记者急忙摄下这个历史性的镜头。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在东京,共同社在播发新闻:

"在最后一天,终于又传来了一条特大新闻:美国的体育队访问中国。……乒乓球所产生的友谊之环将会把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离得最远的国家连结起来吗?"

《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指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中国灵活外交路线的'回头球'。"

在巴黎,法国外交人士发表评论:

"可以肯定,这是中国对尼克松总统多次发出的改善美中关系的呼吁所作出的答复的善意表现。"

在伦敦,路透社记者播发新闻:

"观察家们认为,给美国记者签证这件事也许比对美国运动员进行的空前的邀请意义更重大。"

在波恩,西德政府发言人说:

"波恩对大陆中国的'乒乓外交'和它向美国作出的和解姿态非常感兴趣。"

在纽约,《纽约时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指出:

"北京邀请美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是复杂的外交棋盘上的巧妙和老练的一着。"

在华盛顿,美官方发言人对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表示欢迎。

……

世界轰动了,正如美国《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小小银球转动了地球。这在外交史上是一个创举:毛主席和周总理运用人民外交的思想作出英明决策,弹指一挥间,"乒乓外交"震撼了全球!

四月十日,在中美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第一个美国人民的代表团到达了北京。首都机场上美国客人受到中国乒协代表热情友好的欢迎。

在新侨饭店里,中国主人以可口的美式早餐接待美国朋友。

在首都体育馆里,中美运动员一起练球,中国运动员热情地帮助客人们提高技术。

在八达岭上,中国乒乓健儿和美国客人一起兴致勃勃地眺望万里长城。

在首都体育馆,一万八千名观众观看了中美友谊比赛,为中美两国运动员的精彩球艺热烈鼓掌。

四月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会见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周总理走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跟前,对美国朋友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运动员,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北京的"乒乓外交",引起了美国的"乒乓热"。

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总统会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领导人。尼克松也试着玩乒乓球,很自然地用中国式的直握球板。美国掀起了一阵"乒乓球",美国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利用星期六晚上的"黄金广播时间",播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实况,美国全国人口达二千万。……

(四)

五月三十日,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敬爱的周总理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而还发出爽朗的笑声:

"四月七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地球,震动世界嘛!连锁反应,特别是美国国内纷纷响应。……结果,他们来了,转动了世界。我们还得准备回访哪!"

"乒乓球队有人来吗?"总理关切地注视台下的座位,寻找到会的乒乓球运动员。总理发现了林慧卿:"林慧卿同志前头来坐啊,郑敏之、张燮林、梁丽珍同志来了吗?(答:来了。群众鼓掌。)值得给他们鼓掌,(群众又热烈鼓掌),可别骄傲,掌是鼓了,责任重。"总理亲切地请几位乒乓球运动员坐到前边。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运动员们腼腆地相互谦让着。"不好意思了,勇敢嘛!勇敢上前线。还有梁戈亮,来了吗?(答:没来,李富荣来了)你们有没有勇气到美国去?林慧卿、郑敏之你们说呀!"运动员们高兴地用笑声答复总理的询问。

"乒乓球弹出去,它要弹回来,既要震动世界就继续震动。中美两国人民来往嘛。在名古屋的乒乓球赛,我们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人民外交,拿小球来推动地球!"

周总理进一步阐明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深远意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运动队伍遵循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成为"友谊的使节",人民外交会产生巨大的威力。就在几天的时间里,全世界听到中国"乒"的一声把球打了出去;接着,美国"乓"的一声把球打了回来: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乒乓乓乓,穿梭般的银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的大门,出现了更多的交往。

"我们的友谊是从小球开始的,现在从乒乓球到篮球,'球'越来越大,友谊也越来越深了。"美国篮球队的朋友们这样说。

"我们两个国家都有海洋连结着,我们的友谊就像海洋那么深。我们运动员就在这友谊的海洋里游泳。"美国游泳队的朋友也这样说。

是呀,以乒乓外交为开端,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相继而来。毛主席、周总理的人民外交思想,继续推动着地球的转动。

(《体育报》记者　马信德)

对越自卫反击战

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自1979年2月17日开始,对越南侵略者进行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经过16天的英勇奋战,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完满地达到了预期目的。这次参战的广大指战员、民兵和支前民工,为保卫祖国的边疆、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写下了新的壮丽的篇章。

中国援助越南逾二百亿美元　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的。中国人民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节衣缩食,流血流汗,曾给予他们巨大的援助。近三十年来,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但是,越南当局在苏联的唆使和支持下,入侵柬埔寨,军事占领老挝,加紧拼凑"印支联邦",竭力为苏联策划的"亚安体系"效劳,并且把中国看成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越南反华愈演愈烈　早在抗美战争进行期间,越南当局就利用历史问题,宣传所谓"北方侵略",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情绪。抗美战争刚一结束,它就迫不及待地改变对华政策,把中国当作"新的作战对象",反华排华愈演愈烈。他们在越南各地加紧驱赶迫害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二十多万人强行赶入中国境内。他们对中国无理提出领土要求,把历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宣称为越南的领土,并出兵侵占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他们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越南武装挑衅半年达七百多次　在半年中,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七百多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三百余人。对于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的这种蛮横行径,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劝告和警告,规劝他们要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要做不利于两国人民团结的事,并一再提出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的争端。但是越南当局却置若罔闻,一概当成耳旁风,把中国方面的忍让克制与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边境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并且危及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自卫还击。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有限度还击　中国边防部队奉令在有限的地区、时间和规模内,进行了有限度的还击,在任务完成之后,从3月5日～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中国的这一严正立场,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赢得了东南亚、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一切支持正义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参战部队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继承了老红军、老八路的战斗作风。各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仓济贫,救伤治病,宽待俘虏,扩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广大民兵、支前民工和边防公安干警踊跃参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给越南侵略者以严厉教训　由于中国边境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先后打下了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浓、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二十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给越南侵略者以严厉的教训和惩罚。在战斗中,涌现了一大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攻必克、守必固、出色完成作战任务的战斗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各参战部队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边防部队授予英雄模范称号的单位共达160个，英雄个人218名，为祖国为人民争了光。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说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强支柱，是祖国的钢铁长城。

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打破了越南当局自我吹嘘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永远百战百胜”的神话，保卫了中国神圣的边疆，鼓舞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这对于团结各国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材料：

- 攻克谅山“要塞”(通讯)
- 透过正在散去的硝烟

材料一　攻克谅山“要塞”

我广西边防部队一举攻克同登，扫清残敌之后，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兵分数路，以迅雷闪电之势，直扑谅山。

重镇谅山，北临山岳，南接平原，是越南北方的战略要地，河内的大门。越南当局视谅山为“要塞”，气势汹汹地叫嚣要在这里与我“决一死战”。他们命令敌“王牌”第三师精锐部队，沿谅山城外的山岳丛林一线摆开，妄图阻止我边防部队乘胜还击。

二月十七日奋起自卫还击以来，我前线官兵英勇作战，给了越南侵略者沉重打击。可是，勇士们谈起侵略者的暴行，仍然余怒未息，都想早日打进谅山城，严惩“小霸王”！

劈开屏障　雄师直逼城下

二月二十七日，我边防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步兵与坦克密切协同，开始向谅山挺进。攻打七溪和禄平的部队，迅猛推进。主攻谅山的边防某部红军团，紧逼谅山西北五公里处的扣马山下。

扣马山标高八百多米，山险坡陡，草深林密。山前和左右两翼有八个高地，与主峰相呼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谅山城的主要屏障。敌人经过多年经营，在这里构筑了几十座明碉暗堡。盘踞在扣马山的越军，曾经向我友谊关一带发射上千发炮弹，给我边境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我边防战士早就对这个反华巢穴恨得咬牙切齿了。一到扣马山下，要求担负主攻任务的请战书便纷纷飞向团指挥所：“拿下扣马山，打进谅山城！”“为祖国立功劳，为团队添光辉！”铮铮誓言，表达着勇士们克敌制胜的决心。

清晨，战区大雾弥天，细雨蒙蒙，我红军团待命出击。八时整，随着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我英雄战士形成四道铁流，直向扣马山下的八个高地冲去。顷刻间，扣马山前烟雾滚滚，弹雨纷飞。由于烟大雾浓，一时看不清目标，我攻击三〇三高地受阻。在这紧要关头，坦克二连连长黎德才率先驾驶战车，直闯敌阵。他看清一个目标，便高喊着：“注意我的弹着点！”随即打出一梭子曳光弹。步兵战士根据他指示的目标猛烈开火，成串的枪弹飞向敌火力点。我炮点部队更是随叫随应，指哪打哪，配合得十分有力。他们开设了前进观察所，随第一线步兵一起前进。炮火逐步向前延伸，我步兵分队随着弹着点冲击。红军团的一〇〇炮连，当年在著名的黄土岭战斗中，曾击毙过日本侵略军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这次还击越军，又大显神通。侦察班战士卿度松，连续观测十几个目标，个个准确无误。一班一炮手刘金云，带伤连发二十发炮弹，发发命中目标。榴炮班副炮长罗永荣，战斗打响不久，头负重伤，战友们要抬他下去，他说：“不，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灭亡！”硬是留在阵地上。在攻打二号高地时，二炮手刚刚把炮弹送上膛，突然中弹倒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永荣霍然站起，扑向炮位，准备向敌人射击。不料一发敌弹飞来，又一次打中了他。罗永荣深情地向北方眺望一眼，牙关一咬，又一次扑向炮位，用生命的最后一息，终于把这发炮弹射向了敌火力点。

多么英勇的战士，何等壮烈的场面！

此时此刻，在五三六高地，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这个高地在扣马山主峰东侧，是扣马山守敌南逃谅山的必经之路。越军在这里配备了很强的火力，龟缩在明碉暗堡之内，借着雨雾的掩护，轻重机枪、高射机枪、火箭筒、六〇炮一齐向我开火。然而，他们遇到的对手，是红军长征途中威震敌胆的“大渡河连”。勇士们拿出革命前辈强渡天险的雄劲，直打得敌人一个个火力点变成哑巴。激战到下午，高地上只剩下东北侧一个火力点了。这个火力点缩在一块突起的石崖下，炮弹和坦克对它都难以发挥作用。连队发起攻击，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在阵地前沿。这下子惹恼了四班副王成富。他找到排长说：“咱大渡河连怎能受这个窝囊气！我去炸掉它！”说罢，提起爆破筒，带领突击组，犹如离弦之箭，跃出掩体。在敌人的弹雨中，他和突击组交替掩护，转瞬间就迂回到敌火力点侧翼，扑向了这个罪恶的暗堡。敌人发觉堡旁有人，刚要甩出手雷，只见王成富斜刺里腾地跃起，一下子将爆破筒塞进了敌堡。随着一声巨响，浓烟弥漫，乱石横飞，这个“钉子”被彻底拔掉了。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激战，扣马山下八个高地的敌人全部被我歼灭。胆战心惊的扣马山主峰守敌，还想凭借天险，继续顽抗。

“坚决消灭敌人，提前拿下主峰！”我指挥员一声令

下，红军团的健儿们迎弹雨，踏荆棘，一径直上，锐不可挡！四十四分钟之后，主峰上就升起了两发宣告胜利的白色信号弹。

在谅山西北部的七溪，我边防部队以卷席之势，猛打猛插，一举歼灭守敌，占领了飞机场，切断了交通要道。

在谅山东部的禄平、横模地区，我边防部队长途奔袭，一鼓作气，斩关夺隘，连克守敌，控制了援敌之路，使谅山之敌更加孤立。

谅山城的道道屏障被我劈开了！我军雄姿英发，直逼谅山城下。

拿下省府　大显我军威风

兵临城下。又是一顿猛烈的炮火袭击。一门门大炮直指谅山，一发发炮弹倾天而泻，刚刚盖起的敌军营房顿时化为平地，城内坚固的军事目标、弹药仓库，顷刻间房倒屋塌，连续爆炸。谅山守敌指挥官们犹如丧家之犬，狼狈南逃，留下一群替死鬼负隅顽抗。

谅山城西北角的三星洞，本来是山明水秀的疗养胜地，越南当局穷兵黩武，硬把这里修成了一座坚固碉堡群。里面山洞相通，坑道相接，有粮库、水库、弹药库，上下左右二十三个暗火力点，都可以扼守通往谅山的铁路、公路。几百名守敌龟缩在三星洞中，妄图作困兽之斗。

三月一日，我某团一营接受了攻打三星洞的任务。年轻的营长许远然带领连排干部看过地形，定下了巧妙的战法。他先组织部队，以猛烈的火力，轮番向三星洞发起攻击。敌人已成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拼命向外打枪。打到晚上，三星洞守敌的实力终于被我侦察清楚了。这里共有三道火网，山脚下是地雷、坦克和装甲车，山腰里是轻重机枪，山顶上是高射机枪，火力密集，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黎明前，许营长把三连留在正面迷惑敌人，一、二连却神速地迂回到三星洞旁的疗养院一带，做好攻击准备。守敌盲人瞎马一般，胡枪乱炮打到天亮，山下突然不见了人影，正在迷惑不解，我军神兵天降，一个勇猛冲击，占领了疗养院旁的小石山，接着就直插三星洞口。在我强大火力掩护下，爆破手把一个个爆破筒、炸药包送进了洞里。刹时间，烟火冲天，山鸣谷应，崩塌之声，不绝于耳。洞中守敌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憋得喘不过气来，惊呼着刚挤出石缝，就被我活捉。战士们在硝烟中冲进尚未炸塌的坑道，肃清残敌。

我数路精兵，在歼灭城郊残敌之后，从东、北、西三面，直扑谅山北市区。某团六连刚刚冲到北市区奇穷河桥头，突然和从三星洞败退下来的两辆敌坦克、一辆装甲车遭遇了。敌坦克开足马力，想越过奇穷河南逃。十班副班长黄炳培眼明手快，端起火箭筒对准第一辆坦克的屁股，一炮正中油箱。只听一声巨响，火光冲天，一堆废铁堆在桥上。第二辆坦克一见大桥被堵，立即掉转头来，绕到铁桥下面，企图从水下逃跑，正碰上班长庄玉成。只听他喊了声"往哪跑！"又来了个首发命中，坦克顿时在河边燃起大火。装甲车眼见逃脱不掉，便开进一个洼地，企图顽抗。这时，新战士叶木火一把从班长手中夺过火箭筒，大吼道："我来收拾它！"说罢，一扣扳机，正中敌车的连接部。"轰"的一声，连车上的高射机枪都被抛上了半空。

"拿下省府楼，壮我英雄志！"这是某团三营指战员的共同心声。他们一冲进市区，就直扑省府大楼。城南高地上的守敌以密集的火力封锁路口，炮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八连七班长谢中清带领战士，在敌人的火网里灵活跃进，只用五分钟就冲进了省府大楼。在弥漫着硝烟的办公室里，省府官员们南逃时丢下的大印摔在屋角，文件、纸张随风飘零。望着这幅景象，战士们不由得发出了鄙视的笑声。

奇穷河上　任我自由来去

谅山城分为南北两个市区，中有奇穷河相隔。河上有一座长一百一十八米，宽四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桥下水深流急。市区南侧的四二八、三九一和文庙三个高地，居高临下，俯瞰全市。越军在这三个高地上配备了强大火力，严密封锁着大桥、渡口和市区，企图凭借天险阻挡我边防部队继续南进。

三月四日清晨，在弥漫的浓雾中，攻打南市区的战斗开始了。高地上的敌人拼命抵抗，奇穷河里，炮弹掀起高高的水柱，高射机枪子弹激起层层浪花，弹片发出刺耳的啸音。我步兵战士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分多路从大桥和桥侧的水面抢渡奇穷河，直插南市区。

副班长胡祖贤带领的一个战斗小组，刚冲进南市区，就与越军一个班遭遇。胡祖贤一声喊"打！"三个人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见势不妙，各自逃命。胡祖贤三人分头追击，把七个敌人全部击毙。这时，我某团二营、三营的指战员，沿着南市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以泰山压顶之势，一齐压向市区南侧的三个高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四二八、三九一和文庙高地全部落入我边防战士之手。当我边防部队冲上敌阵地时，敌火炮的炮管炽热炙人，上了膛的炮弹还没来得及打出去。在四门五七高炮旁边，堆放的弹药竟达五卡车之多。叫嚷要与我"决一死战"的敌人，大概没想到他们竟会覆灭得如此之快。

三个高地被我攻占之后，"谅山要塞"全线崩溃。这时，我边防部队指战员火速兵分两路，一齐向南追歼残敌。敌人已经毫无招架之力，急不择路，狼奔豕突，拼命逃窜。路旁、溪边和山坡上，到处是丢弃的枪支、弹夹、背包、男式和女式的军装，一片丢盔卸甲的景象。

某部七连连长黄培旺带领全连战士边追边打，击毙多名逃敌，一直追到谅山城南三公里的四六五高地。举目南眺，只见山下残敌还在鬼哭狼嚎地向南溃逃，远处丛林里坦克的马达声也由近而远地向南遁去。

七连的指战员们回转身来，望着脚下薄雾笼罩的重镇谅山，抹掉额上的硝烟和汗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要塞”陷落了。这时，河内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十一时二十分。

整个谅山之战，我军战绩辉煌，不可一世的越军“王牌”第三师主力基本被歼。

（原文载《解放军报》，通讯员　刘良凯　记者　王建国　吴顺祥　刘　波）

材料二　透过正在散去的硝烟

——评中越边境冲突的背景

中越边境地区的硝烟正在散去。然而，人们却不能不透过硝烟，去探索这场冲突的深刻背景。

许多人心头早就存在着种种疑团：曾经是越南人民抗美战争的后方的中越边境，为什么今天变成了中越武装冲突的前线？

为什么从一九七五年，也就是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实现南北统一的那一年开始，中越边境的形势就逐步紧张起来？为什么越南武装侵犯中国边境的事件急剧增加，从一九七五年四百多起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一千一百多起，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中国边境居民和边防人员？

为什么多年来同越南人民同生共死的越南华侨、华裔居民，成了越南“净化边境地区”的对象，而受到骇人听闻的残害和驱逐？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是中国方面的责任吗？翻开几十年的历史记录，找不到中国人民对不起越南人民的事例。相反，中国给了越南大量的难于用物资、金钱来估算的支援，对这些援助，中国从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也从未要求甚至希望得到任何报偿。而且，如果不是越南当局背信弃义，中国也决不会向世界公布究竟给了越南多少援助的。

中国人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受到越南方面这样令人痛心的背信弃义的对待。甚至在这次中国边防部队还击作战以前，也还没想到，越南当局早在抗美战争的炮声刚刚停下来的时候，就在老街、同登和整个中越边界越南一侧构筑起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事，利用中国援助的武器、大米和各种物资暗暗做着各种打仗的准备。

显然，这场冲突是无法从中国方面寻求答案的，而只能从越南当局的战略、国策和苏联的全球战略中去寻求答案。

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越南在中越边境的武装挑衅，既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苏联世界霸权主义战略上的一个环节。

越南的需要

越南领导人在抗美战争结束后，立即把建立它在东南亚的霸权作为国策。

首先，越南当局在抗美战争结束后，头脑发胀，以“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自居，疯狂向外扩张领土。它在中越边境武装挑衅的加剧，正是它向外扩张领土的一个方面。早在一九七五年抗美战争结束前后，越南一面派兵侵占柬埔寨领土威岛，进驻老挝，一面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接着又背弃了过去越南政府公开宣布过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立场，硬说这些岛屿是越南领土。越南还要求把北部湾海域的边界线划到中国海南岛附近，妄图把北部湾海域的三分之二攫为己有。中越陆地边界，本是一条由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签约划定的边界，并且由双方会勘立碑。长期以来，中越两国政府都表示尊重这条边界线，没有发生什么纠纷。但是最近几年来，越南单方面改变边界实际管辖状况，提出所谓“争议地段”，移动或毁坏边界标志，在边境制造事端，一直发展到开枪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且采取挖战壕、埋地雷、架铁丝网、插竹尖桩等办法，得寸进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仅从去年八月底越南制造友谊关血案到十二月越南向柬埔寨大举进攻前，越南当局就出动武装人员两千多人次，侵入中国我广西境内一百多处地段，无理霸占了中国许多土地。

中越边境冲突虽然也反映了越南民族扩张主义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但是，却远远超出了领土争端的范围。它是在更广泛、更深刻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越南当局把中国当作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随着越南霸业的发展，它的反华仇华政策也不断升级。它在中越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正是越南反华急剧升级的必然结果。越南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反对越南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这使河内极为愤怒。河内向东南亚地区伸出了扩张之手，引起了东盟国家的警惕。而河内把它的扩张行为所遭到的理所当然的抵抗都归咎于中国，迁怒于中国，大嚷大叫中国是越南的“头号敌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河内迅速加剧了在边境的武装挑衅。河内的如意算盘是，它在中越边境的武装挑衅，只要中国不还手，它就不仅可以在北边占中国的便宜，而且向东南亚国家示威，使这些国家慑于它的军事力量，它就可以在东南亚为所欲为，推进它的扩张步骤。

第三，越南加剧在中越边境的武装挑衅，也是加强它对越南人民的压迫、要求越南人民做出更大牺牲的需要。越南当局派大军进攻柬埔寨，师出无名。要求越南人民为这场肮脏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勒紧裤带，越南人民是不答应的。多年的战争创伤、去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和越南当局这几年的掠夺政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使民不聊生。现在越南当局又要把这个破烂的经济转上战争经济的轨道，也是越南人民反对的。越南当局加紧在中越边境的武装挑衅，就是企图制造一个“对付中国侵略”的

借口，把越南人民对其内外政策的不满和反抗压下去。

苏联的需要

越南当局挑起这场边境冲突，确实有它自己内外政策的需要。然而，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唆使，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越南要在一个破烂的经济基础上建立野心勃勃的霸业、扩大同中国的武装冲突，必须寻求一个强大的靠山。事实上，正是在一九七八年，越南正式加入了"经互会"，接着又签订了军事性质的苏越条约以后，河内的胆子才越来越大起来。而苏联恰恰利用了河内的扩张欲望。

首先，苏联需要利用越南做为它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马前卒。苏联正是借口中越边境冲突，把军舰开进了岘港和金兰湾，开进了南中国海，从而构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威胁，也加重了对日本石油供应线的威胁，加强了它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争夺态势。

其次，苏联也需要利用越南充当一名反华的急先锋。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军，使莫斯科坐立不安。一个支持世界各弱小民族捍卫独立、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国，如果还是贫穷落后的，它对世界人民的贡献就是有限的，对苏联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所造成的困难也就是有限的。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上，需要破坏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它特别需要一个"东方的古巴"在中国的周围制造点"乱子"。这就是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加剧挑起冲突的更加深刻的背景。一九七七年末，在一位越南高级大员的陪同下，苏联"顾问"视察了中国云南河口对面的老街地区。在这以后，沿中越边界的越南一侧，实行"净化边境地区"的大规模行动开始了。一九七八年一年当中就驱赶了二十万华侨、华裔和越南边民到中国，其中绝大部分是住在邻近中国的越南北方各省的居民。开始，还有不少人（包括中国人）更多地是看到越南当局的迫害华侨的政策，但不久就查明，"净化边境"是一个为了同中国打仗的地地道道的军事部署。

因此，越南在中越边境加剧武装冲突，不仅反映了河内的意志，也反映了莫斯科的意志。

如果按着莫斯科和河内的意志办事，中国的南部边境就永远不得安宁，领土、主权也是遭到蹂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受越来越多的干扰；越南扩张的势头就更加猖狂，到处横冲直闯而不受惩罚，不仅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要直接承受侵略的苦果，而且东南亚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也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威胁。

然而，事情并非按着他们的意志发展。全球霸权主义也好，地区霸权主义也好，只能吓倒一些神经衰弱的人。既然越南不断挑起中越边境的武装冲突，就不能指望中国边防部队永远不作出反应。挑衅越厉害，反应越强烈。河内已经尝到中国边防部队还击的滋味。

正是由于这场边境冲突的更为广泛和深刻背景，世界上一切关心东南亚以至世界和平的人们对中国边防部队这次还击作战的胜利都会由衷地高兴。

（新华社记者）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背景介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如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这已经成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当中的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正是为了讨论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各民族的文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及其他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共3200名。

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新时期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报告回顾了30多年来社会主义文艺的历程，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者要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出积极的努力和最大的贡献。报告指出，能否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艺成败兴衰的关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代表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着重强调了加强和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更多更好地描写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应当继续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提倡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文艺路子要越走越宽，要敢于创新。他特别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为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服务，而是根据文艺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艺事业，提高文艺水平。衙门作风要抛弃，在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解决，不能横加干涉。与会代表一致拥护邓小平的祝词。会议通过了周扬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全国文联的新章程，通过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决议》。大会期间，文联所属各协会分别举

行了会员代表大会，并选举了各自的新领导机构和新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需要，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活跃了文坛，活跃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文艺界安定团结的局面。

材料：

· 文艺创作之泉在奔涌

材料　文艺创作之泉在奔涌

——记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几位代表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大会会场上和小组会议室里，我们眼前有白发苍苍老一辈文艺家，还有更多的中年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倾听他们的发言，获得的振奋、鼓舞，仿佛感受到他们喜悦、奋激的心在跳动，感受到他们沸腾的胸间的热力在扩散。一位作家讲得好："粉碎四人帮，打开了文艺工作者身上的脚镣和手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打开了文艺工作者的眼界和心扉，我欢呼：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

这三年，确是中国文艺史上丰收的三年，是文艺空前活跃的三年，是文艺家们奋发有为的三年。

"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诗人艾青告诉我们，从去年四月底他又开始发表诗作以后，已经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人们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盼望他写出更多的好诗，关切地询问他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和近况。"这一年多来，我创作的产量可以说是空前地多。从去年重新拿起笔来，到目前大约已经发表了一百多首诗，多数是短诗，也有几首长诗，象《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歌唱"四五"英雄的《在浪尖上》，还有为歌颂张志新烈士写的《听，有一个声音》……"艾青说得兴奋起来了，他起身到书柜前取出两本书递给我们。这是刚刚出版的《艾青诗选》，包括旧作，也收进了他的新作。生命的新的航程，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与活力。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塞北岭南。他去了大庆，去了鞍钢，去了海南前哨，去了东海之滨，去了北方边城，还随同对外友协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西德、奥地利和意大利，所到之处，都有诗作。多产的原因，一是生活的丰富多彩，许多新鲜的感受使他诗情勃发；另一个原因，艾青说，政治局面好转了，有了政治的和艺术的民主了，作家思想解放了。

我们访问了作家王蒙。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两年前，他才重新回到文艺队伍中来。他的兴奋和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他说："一拿起笔，我感到自己年轻了很多、很多！"短短的两年间，王蒙已经修改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布礼》，还创作了短篇小说、散文、杂文三十多篇。当前，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道路坎坷的生活里程，没有使这位有才华的作家衰颓，他胸间跳动着一颗忠于人民事业的心，燃烧着对人民炽烈的爱。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劳动、生活在人民中间，他说："我感到心里有说不完的话，笔下有写不完的文章。为人民进行创作，这就是幸福。我们要十分珍惜这可喜的形势、宝贵的时光，要把最好的精神粮食贡献给人民哪！"

我们面前是新出版的一本画册。打开画册，许多栩栩如生的狗、猫、狐狸、象、骆驼……，出现在你面前。它们千姿百态，娇憨可爱，把人引入一个童话般的美妙境界，许多人爱不释手。这些精美作品出自一位青年画家之手，他的名字叫韩美林。他对生活充满着信心，充满了爱。他把这样的深情和信念，都浇注在自己艺术作品之中。韩美林画的动物，独具风格，生气蓬勃，形神动人，给人以喜悦和美的享受。

话剧《未来在召唤》的作者赵梓雄也到文代会上来了。他是文艺界的又一个崭露头角的新人。谈到创作，他说："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地尝试为四个现代化呐喊，为人民的理想、愿望高呼。现在，这位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在做什么？他在着手进行新的创作。什么内容？还是为四化扫路，为新长征谱写进行曲。

读一读《人妖之间》那篇报告文学吧！作者刘宾雁坐在我们面前。刻在他眼角几道深深的鱼尾纹，隐埋着他二十年的经历。他曾经下决心与文学绝缘，但是，生活却以无可抗拒的魅力，将他拉回到文学的"领地"里。文化大革命中那几年，他是和脚踩着坚实的土地的乡亲住一个屋，吃一锅饭的，听到的是真实的呼声，感受到的是人民的忧患、喜乐。他苦闷、徬徨，于是埋头到马列书籍中去。多少个夜晚，在简陋的小屋，他拿起放大镜，一章一节地细读。人民把生活中的矛盾提到他前面，他又和人民一道思索、探求。作家决定用笔来回答问题，他不回避矛盾，将真实披露于人前，笔触所及，不在一桩实事、几个丑角，而是勾画出产生、发展这一事件的社会背景。他提醒人们注意前进路上的沟坎，同心同德地奔向光明的未来。

让我们走进剧场，和观众一起感受《报春花》给人的启示。它的编剧崔德志在一次座谈会上颇有感触地说过："是生活本身，给我滋养，供我素材。"这位勤勉的剧作家长年生活在工厂，周围有叫你深思、也有令你感奋的事。

他认识那些可敬可亲的人，也接触过套在“框框”里的人。剧作家说：“我要用笔赞颂新的、美的事物，鞭挞那些阻挠实现四化的人和思想。”是的，当你离开剧场时，不会将泪痕留在眼角，你会感到尽管困难还很多很多，生活前景却是那样美好，也就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当文艺家在生活的漩涡中挖掘新的主题、题材时，一批社会主义创业者形象的出现，尤其是可喜的现象。

翻开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新长征中的闯将，便迎面向你走来了。作者蒋子龙目前还在一家工厂管理着一个锻压车间。他正视十年灾难给生活投下的阴影，也望见阴影以外的光亮，党拨乱反正的决心，工人为民族强盛繁荣的那股劲。作家敏锐的目光射向现实中各式人物，在编写过程中，作家找到了思想人物的影子。乔光朴的形象，蒋子龙幽默地把他称作一种“合金”，其中，有熟悉的身影，也带着理想的色彩。即使这样的人还是少数，也还并不成熟，但代表着时代的主流、趋向。“四化”需要这样的实干家。文学走到人民中来了，作家和读者的心沟通了！

老作家、理论家肖殷正在聚精会神地给文学青年复信。案头上是一叠厚厚的来信、来稿。有广东省内寄来的，也有外省的，作者大多是刚刚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尽管这位老人患着严重的肺气肿，每天都要花时间阅读手稿和复信。从新中国诞生起，肖殷就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在文学青年的身上。文化大革命前十多年，他坚持每天写两三封信给文学青年。这些信，长的近万字，短的几百字，累计起来有几百万字。他的《论生活、艺术和真实》、《与习作者谈写作》、《鳞爪集》和《习艺录》等书，里边所收的文章大部分是给文学青年写的回信。在肖殷扶助下，许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逐步成长起来。肖殷现在已到了暮秋之年，而且常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还是把晚阳的每一缕光丝都洒在文学青年的嫩苗新枝上。

我国文学艺术家，以焕发的精神，奔放的热情，以勤奋、智慧和技巧，已经向新长征中的人民奉献上丰满的艺术新果，他们还将奉献得更多更多。

新时期的总任务激励着中国文艺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之泉，在喷发、奔涌！（新华社记者）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背景介绍

中国奥委会早在二十年代就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新中国成立后，曾派体育队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但在一九五八年，中国奥委会被迫中断了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和斗争，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代表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重新取得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

材料：

- 洛桑维迪堡传来的喜讯
- 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材料一　洛桑维迪堡传来的喜讯

——记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前前后后

洛桑的诚意

三月的洛桑，远处阿尔卑斯山脉还白雪皑皑，城畔日内瓦湖一池碧水，春意盎然。奥林匹克总部所在地维迪堡内，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在举行，热烈讨论恢复中国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这个问题已拖二十年了。把九亿人口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大运动员排挤在外的不合理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三月十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听取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的发言。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愈来愈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代表权长期未获解决，不利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他表示，愿意和台湾体育界代表就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问题进行具体的商谈。“如果他们不愿前来北京，我们也可以前往台北或其他地方和他们进行商谈。”

中国代表的发言，引起与会执委们的很大兴趣，执委会建议：由基拉宁勋爵主持，双方在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举行圆桌会议。

洛桑这个日内瓦湖畔的美丽城市，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中心，各国记者饶有兴味地等待爆出大陆和台北坐在一张圆桌上“会谈”的特大新闻。嘀嘀嗒嗒……电波从洛桑总部传到北京，同时也传到台北。

三月十四日，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就复电同意了。表现出对国际奥委会建议的支持和对这次会谈的诚意。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到三月二十日才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主席沈家铭主持，会后在给基拉宁的复电中却说：

“准备派一个代表团赴洛桑单独和您本人就基本原则问题和其他有关安排进行初步商谈。任何进一步的会谈将取决于这些商谈的结果。”

就这样，仅仅是一线希望的会谈失去了。基拉宁勋爵只好致电在台北的奥委会主席沈家铭：

“执委会已同意台北和北京的代表应一起会晤。你不

认为这种会晤有可能，我表示遗憾，既然你不同意一起会晤，因此，三月二十七日的洛桑会晤取消。”

蒙得维的亚泛起的浪花

四月初，国际体坛观察家的视线转移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注视着在这儿将掀起多大的风浪：第八十一届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将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一开始就阐明各自的观点。中国奥委会代表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

“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只要双方均有诚意，是不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的，目前，大陆和台湾的人民和运动员迫切希望结束双方断绝往来的不正常状况。……我们相信，我国大陆与台湾的体育健儿终将汇合在一起，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对方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响应，反而……

会上会下的斗争是激烈的。个别对正确解决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持不同看法的人士，用种种办法为两个中国制造舆论。长时间的争辩、游说、活动，泛起一层小小的浪花，会议通过一项令人失望的决议，当时，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声明：这个决议，“按其现在的内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确认我会为全中国的全国性奥委会，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台湾的体育组织可以用‘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一切有关所谓‘中华民国’的象征，均不得使用。”

其实，决议案上还留着一条：所有关于章程、名称，旗帜和歌曲等事宜应尽快研究确定。

这，又转到执委会上来了。这位六十六岁的爱尔兰勋爵基拉宁为此而奔波，他和国际奥委会总部的领导成员磋商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他希望在退休以前，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看到全部中国运动员。从四月蒙得维的亚会议到六月圣胡安会议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渡过的：探索各式各样的方案、计划、措辞………，终于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的执委会上通过一项建议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找到一个有利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的全体中国运动员参加普莱西德湖和莫斯科的奥运会的途径，因而受到国际体坛舆论广泛欢迎。是的，公正一定会战胜偏见。

名古屋在欢呼

名古屋执委会前夕更是交往频繁，紧锣密鼓，一阵紧似一阵。

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获得成功，外电报道，这是参加奥运会的一次演习。国际奥委会的一些友好人士相继访问北京，反应热烈。过不多久，台北也举行台湾省运动会。基拉宁勋爵应邀访问台北。

这次台湾方面接待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勋爵访问的礼遇规格很高，蒋经国、孙运璇和朱准森都亲自接见，举行会谈。为了让基拉宁勋爵参观台湾省运动会，把每年“光复节”举行的运动会，提前五天。开幕典礼上，台北市长在六千名运动员面前，把一枚“台北之钥”送给基拉宁勋爵。

台湾奥委会派遣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名古屋，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台湾奥委会副主席丁善理，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还有一九六〇年罗马奥运会田径十项全能银牌获得者杨传广和亚洲最佳短跑女将纪政，称为“台湾体育爱好者的代表”，也到了这里。

这些天，名古屋市吸引了体育界、新闻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国际奥委会执委陆续到达，大批日本记者和其他各国记者蜂拥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名城。八年前在这儿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人民交往的大门，被称为“乒乓外交”的开端。八年后的今天又在这儿举行奥委会执委会，有可能作为大陆和台湾的全体中国运动员共同参加奥运会的起点而载入史册。

看来执委会的气氛并不轻松，从十月二十三日开始，一连两天闭门开会，“无可奉告”。第三天，终于圆满解决了。基拉宁向新闻界宣布，执委会到会的七名执委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称为中国奥运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会徽已批准，章程也符合规定。设在台北的奥运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它的歌、旗和会徽，必须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且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章程也须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前进行修改。这个决议将以通讯投票方式，提交国际奥委会委员表决批准。

名古屋在欢呼。欢呼“乒乓外交”从这儿开始，中国重新参加奥运会将从这儿“起跑”。爱知县知事立即表示，国际奥委会通过后，他要亲自率领代表团到北京祝贺。日本各大报纸以显著地位发表社论、专文和新闻。

奥林匹克运动更加壮大了。古希腊奥林匹亚宙斯祭坛上点燃的火种，将走遍人间，和平鸽与橄榄枝花环将撒满运动场上。奥林匹克精神啊，你将进一步得到发扬，以五个圆环为标志、象征着和平与友谊的奥林匹克旗帜，发出更为鲜艳的光彩。朋友们，明天，居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全体中国运动员都将有机会和大家在普莱西德湖和莫斯科比赛场上并肩迅跑。………

材料二　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早在一九二二年，中国奥委会就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中国奥委会曾于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八年，派队参加了第十届、十一届和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九二二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七年，董守义等三人曾先后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十分重视体育运动的发展。当年十月，中国奥委会决定进行改组，会址迁至北京。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国奥委会重新同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并要求继续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承认。

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国奥委会派队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表示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将在以后作出"最后决定"。

一九五四年五月，国际奥委会在雅典举行的第四十九届全体会议，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了"最后决定"，正式承认我会为中国奥委会。但是，台湾的体育组织又在未经任何会议和表决的情况下被列入了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各国奥委会名单之中，从而造成了混乱。在多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奥委会不得不于一九五八年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一九七五年四月，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重新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权利。同年，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全体会议决议，由现任主席基拉宁来中国访问，然后向全体会议就这一问题提出报告。

一九七七年九月基拉宁主席来华访问，同中国奥委会就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商谈。

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洛桑举行的会议建议中国奥委会的代表和位于台北的奥委会的代表在基拉宁主席的主持下于洛桑会晤。我奥委会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会晤因台湾方面的拒绝而未能实现。

一九七九年四月，国际奥委会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八十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两个中国奥委会，关于名称、旗帜、歌曲、章程等事项应尽快研究确定。我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声明不能接受此决定。

一九七九今年六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会议，提出一项决议，确认以"中国奥委会"的名称承认我会，并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维持对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承认。条件是后者的旗、歌有别于其现用的旗、歌。

一九七九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通过决议：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奥委会内，用"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它所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应"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旗、歌和会徽，并需经执委会批准"。这个决议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符合国际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照顾到我国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使居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所有中国运动员都可参加奥运会。

上述决议将于一个月内以通讯表决的方式提请全体委员批准，表决结果将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如获简单多数通过即生效。

（德　迁）

风云人物

童第周

童第周（1902～1979）浙江省鄞县人，教授，生物学家、教育家和实验胚胎学家，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去比利时、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先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致力于文昌鱼和鱼类胚胎学研究。早期对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卵子发育能力方面有独特发现。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山东大学。为了抗议反动派对教职员工的迫害，他第一个在"反饥饿、反内战"抗议书上签名。全国解放前夕，他应邀正在美国讲学，听到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立刻远涉重洋回国。解放前，他曾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解放后，他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主任、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动物研究所所长，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7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在研究文昌鱼的卵子发育规律，脊索动物鱼类和两栖类的细胞核和细胞质在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文献和证据，取得创造性成绩。在近五十年中，和他的夫人叶毓芬，一直从事发育生物学研究，发表论文和专著七十余篇，使中国这项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魏　京　生

魏京生(1950—　　),安徽省巢县人,曾参过军,被捕前是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由于他进行反革命活动,北京市公安局在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批准后,于1979年3月29日将他依法逮捕。10月16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共有首都各界四百多人出席旁听。魏京生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不服判决,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1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魏京生上诉案。该庭审查了魏京生的全部案卷材料,听取了上诉理由和公诉意见,以及魏京生本人与其律师的辩护意见后,宣布原审法院对魏京生向外国人供给我国军事情报和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行的认定,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一项,第十条第二、三项,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所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因此,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魏京生的主要罪行事实如下:1979年2月20日,即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作战的第四天,魏京生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国参战部队的指挥员姓名,出兵数目,战斗进展和伤亡人数,以及军委会议日期等军事情报。1978年12月5日、21日和1979年1～3月,魏京生在西单墙上,与他主编出版的《探索》刊物上,多次发表反动文章,诬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诬蔑五届人大及经其产生的政府、总理和副总理。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向群众进行反革命煽动。

材料一　严正的审判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魏京生反革命案旁听记

因反革命罪被逮捕的魏京生,十月十六日在人民法庭上受到严正的审判。

这次审判是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公开进行的。首都各方面的干部和群众四百余人,旁听了这次审判。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围绕魏京生所犯的背叛祖国,向外国人供给我国军事情报和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主要的罪行,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

整个审判以确凿的证据和充分的法律依据,驳斥了被告为开脱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所作的辩护。

背叛祖国的罪人

法庭在调查被告人魏京生向外国人供给我国军事情报的过程中,宣读了被告人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即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的第四天,同某外国人谈话的部分内容。魏京生将写有军事情报的一张纸条交给这个外国人,并说:“你自己拿笔记一下。看完了还给我销毁。”某外国人要魏京生口述我军参战部队的情况,魏随即告诉他:“总指挥是×××,副总指挥是×××,总参谋长是×××。”“兵力呀,不止,不止,是增兵××万。”“中国方面伤亡×千至×千人。”

当这个外国人问“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魏京生说:“主要是缺钱。”

法庭宣读了上述证言后,审判长问魏京生:“这是你和某外国人的谈话吗?”

魏京生答:“是,曾经有过这样的谈话。”

审判长宣布:“经过查证,被告人魏京生向某外国人供给军事情报的事实,证据确凿。”

审判长责问魏京生说:“我军指战员在前线浴血奋战,你却向外国人供给这些情报,你认为这是什么问题?”

当魏京生辩解说他不知道这些情况涉及国家机密时,陪审员当即指出:你参过军,保密是起码的常识。涉及我军那么重要的情况是军事机密,你不是不知道的。

公诉人指出,早在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向全国公布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密包括,一切国防及军事的计划和建设措施;一切武装部队的编制、番号、实力、装备、驻防、调动、部署及后勤兵工建设等机密事项。

公诉人还指出,被告在我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向外国人提供绝密军事情报,本身就构成了犯罪。不管这种机密是直接供给敌人,还是间接供给敌人,被告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六条规定:“为国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就构成反革命罪,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魏京生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只好说:“那我承担罪责。”

反革命的煽动者

法庭在调查被告人魏京生所犯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罪的时候,审判长和陪审员一一审问了被告人这方面的大量言行。魏京生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二十一日,一九七九年一月至三月,在西单墙上和他主编出版的名为《探索》的反动刊物上,多次发表反动文章,进行反革命煽动。他诬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诬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团”,煽动人们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

审判长向被告人出示了物证《探索》,宣读了被告人

在文章中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诽谤和煽动夺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的一些段落。

被告人魏京生对这些事实供认不讳。

和魏京生一起编印、出售、散发过《探索》的刘京生(北京市人民汽车四场工人)、杨光(原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在押),先后出庭作证,叙述了《探索》进行反革命煽动的情况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杨光在证词中说,《探索》煽动人们推翻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魏京生曾向他表示,要扩大人员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杨光的证词还说:"《探索》污蔑诽谤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审判长问被告人:"你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独裁暴政、封建君主制',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这是不是在公开鼓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时,魏京生只讲外国,不讲中国,企图回避这些话是指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审判长追问下,魏京生不得不承认:"当然包括中国!"

在辩论过程中,魏京生重复他在《探索》号外上的一篇反动文章中的反革命叫嚷,竟然说什么"我仍然认为现在的领导人(指总理和副总理)是不合法的"。审判长当即严词责问魏京生:"我们的总理、副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的程序决定任命的,难道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吗?难道人大通过的宪法也不合法吗?我们这个法庭也不合法吗?"善于诡辩的魏京生,被问得瞠目结舌。

被告人在《探索》第一期的另一篇反动文章中,对我国领导人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胡说什么"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只有那些吃饱了没事、看书写字过神仙日子的人,才有支配的权力,人民难道没有最充分的理由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吗?"审判长要被告人证实:"这是你写的吗?"魏京生更加惶恐心虚了,他为了赖掉自己的严重罪行,辩解说:"我承认这些话是说得过分了一些!"

魏京生的供词和证人的证词,都表明魏京生不是什么一般思想上持不同见解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有背叛祖国、煽动人们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行为的罪犯。魏京生对抗宪法,触犯刑律,被依法治罪,这是深得人心的!

(新华社记者)

材料二　人民的最终裁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反革命犯魏京生上诉案

反革命分子魏京生上诉一案,今天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当审判长宣布魏京生犯罪证据确凿,上诉无理,维持原判时,法庭旁听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今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魏京生反革命案,并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魏京生对判决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今天的审判中,法庭听了魏京生的上诉理由,听了公诉人 支持公诉意见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进行严肃认真的审理。同第一审时的情况一样,魏京生今天在法庭上继续为开脱他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辩护,硬说他向外国人供给的"不是军事情报",把当时国家未予公布的军事机密说成是"属于尽人皆知的事情";还说他进行的反革命宣传,"不是反革命煽动",而是"革命的",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等。

法庭以事实为根据,驳斥了他的种种狡辩,提出了魏京生所犯罪行的更多证据,经过合议,宣布终审裁定,不得上诉。

确凿的军事情报,不容狡辩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庭这次审理,是从调查魏京生向外国人供给我国军事情报的罪行开始的。审判长详细地调查了上诉人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即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的第四天,同某外国人谈话的部分内容。

上诉人对于第一审时提出的关于他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时向外国人供给军事情报的种种事实,都供认不讳。但是他说,他过去给外国人提供的是征兵数字,而不是增兵的数字。审判长根据物证证明他当时向外国人说的是增兵而不是征兵。当时外国人问:"前线兵力是×万?"魏京生回答:"兵力呀,不止,不止,是增兵××万。"

审判长谈到这里,魏京生说:"我想起了,当时是××(外国人的名字)拿了我写的纸条看,上面写了那个数字。"

审判长问:"你为什么要把那张纸条要回销毁呢?"

魏京生心虚地回答:"销毁的目的是为了怕找麻烦。"

魏京生在事实面前还要狡辩,审判长严辞指出:"经过科学的鉴定,物证是准确无误的。在双方交战的时刻,你向外国人提供我前线增兵数目,这还不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吗?"

审判长接着又提出了魏京生向某外国人谈话物证。魏对某外国人说:"×××(我中央某领导人)在×月×日召开了军委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开到××日才完。"

这是魏京生向外国人供给军事情报的另一个证据。审判长问魏京生:"这算不算军事情报?"魏京生只好狡辩说:"开会不是军事机密。"

对魏京生的狡辩,公诉人发表意见予以驳斥。他指

出，在中越双方正在激战的时刻，上诉人魏京生便向外国人供给我军参战部队的指挥员姓名、增兵数目、战斗进展情况和伤亡人数，以及召开军委会议的情况等重要军事情报。上诉人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反革命罪。上诉人辩解说，供给情报的内容不是机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一年六月八日公布实施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一切武装部队的编制、番号、实力、装备、驻防、调动、部署等都属国家机密事项。十三项规定了内务和人事的机密事项，作战部队指挥员理所当然的包括在内。魏京生提供军委会议的情况、前线作战指挥员的姓名、兵力情况等，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机密。在战争时期，向外国人供给这样的军事情报，就是资敌叛国的犯罪行为。我们如果了解了敌方的兵力、伤亡情况、装备、指挥员的特点，我们就可以利用敌人的弱点来消灭敌人。如果敌方了解我方这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发生同样的后果。在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的时候，魏京生提供这样的情报，直接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根据我国的法律，完全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罪。

是"提批评意见"，还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魏京生在上诉中狡辩说，他办刊物、写文章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推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求民主"，是"向共产党和政府提批评意见"，是"言论自由"。对此，审判长和审判员又一次认真地进行了法庭调查，宣读了魏京生所写的反动文章中的一些主要段落。

魏京生于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后，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在他主编出版的反动刊物《探索》上连续撰写十篇反动文章，在北京、天津张贴、散发、出售，借以扩大反革命影响。他在这些反动文章中肆意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君主制"，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他要人们"不要做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并"号召"人们"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

公诉人严正指出，从魏京生的这些杀气腾腾的反革命行动中，谁都可以看出来他的反革命的真实目的。大家都很清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指导思想，这是载入宪法的。宪法还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魏京生公然用"四人帮"的语言煽动要夺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哪里是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哪里是在"向共产党和政府提批评意见"，这是在进行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煽动。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魏京生公然利用法律给予他的合法辩护权利，在辩解中，大肆诬蔑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五届人大是"不合法"的。诬蔑经五届人大产生的政府、总理、副总理是"不合法"的。公诉人驳斥了魏犯的这些反动言论，指出在魏京生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都是"不合法"的，魏京生公然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说"他们把人民手中最宝贵的权力骗走了好几十年"。这恰恰证明他根本不是为了完善现存制度而提出什么"批评意见"，而是要从根本上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这也就是他进行反革命煽动的根本目的。

公诉人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魏京生却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继续搞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制造新的动乱，以便乱中夺权。这是全国人民绝对不能许可的。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安定团结，保卫四化建设顺利进行，对魏京生这样的反革命犯必须依法判处。

魏京生坚持与社会主义为敌，与人民为敌的罪行，引起了参加今天公审的旁听者的极大气愤。他们说：有了魏京生这号人的民主和自由，就没有九亿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必须加强对魏京生这号人的专政。否则国无宁日，四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华社记者）

王 守 信

王守信（1920—1979），女，黑龙江省松花江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靠投机钻营，打倒干部和群众，"造反"上台，当上黑龙江宾县燃料公司经理。上台后，一手抓权，一手抓钱，大量鲸吞国家财富，从 1971 年 10 月起，到 1978 年 6 月止，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 50077002 元。其罪行败露后，多次与被告马占清等人订立攻守同盟，指使马占清灭证转赃，负隅顽抗。案后缴获赃款 41332543 元，缴获赃物折价 70014.38 元。上述事实证明，王守信是一个典型的新剥削分子，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属罪大恶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规定精神，贪污犯王守信被判处死刑。

材料 黑龙江破获一起严重贪污集团案件

1978 年年底，黑龙江省破获了一起该省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集团案件，首犯王守信（女，现年五十八岁）是文化大革命中投机起家的、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原任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据初步查证，这个贪污集团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共贪污人民币五十三万六千余元，相当

于该公司现有固定资产的两倍。

王守信原系宾县燃料公司收款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在家泡病号的坏家伙，认为时机已到，成立了"捣黑窝战斗队"，自任队长。她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拉山头，立队伍，并在县委一个领导干部支持下，夺取了公司领导权。王守信夺权以后，把公司支部书记和经理都打成走资派，撵送农村劳动，又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样她就成了当时全县"响当当的造反派"。在那个领导干部的授意和支持下，王守信一九六八年十月被突击提干，第二年十月突击入党，由收款员一跃而擢升为县商业局革委会副主任、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她的长子、长媳、次子、弟弟、妹妹也都先后突击入党、升官。在公司内部，她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又打又拉，用小恩小惠拉不过去的，就借题整人，加以排斥。全公司职工五十一名，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先后调出十五名，另调入二十二名，其中不少是她的亲属或有关单位领导人的子女。在公司和所属三个营业部，她都安插上心腹，分掌业务、财务、"外交"大权。她对一个司机说："整天抓个舵把子有啥出息，你跟我好好干，将来给你个官当。"不久，便提升这个司机为业务主管，后又提升为副经理。保管员马占清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也被提为白石营业部主任，自称"白石山寨主"。群众说，燃料公司已经变成了"王记公司"、"马家煤店"。这些年来，王守信一伙伪装积极，写假报告、搞假经验，欺上压下，骗取荣誉。从一九七二年以来，燃料公司四次被评为地、县"先进单位"，公司领导班子被列为"一类班子"。这个贪污集团的老巢白石营业部，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三次被评为县的"先进单位"，"寨主"马占清被称为"红管家"。

王守信一伙窃取了领导权，捞到了政治资本，乘机搞乱企业管理，浑水摸鱼，大量贪污国家财产，成了典型的暴发户。他们贪污的主要手段，一是利用经营计划外小窑煤，将计划内的国矿煤充当小窑煤任意加价出售，将多收的加价款，单开凭证，不入帐，不上缴，私设黑金库，从中贪污；二是虚报冒领临时工的工资；三是伪造理由，随意从黑金库中提取巨额现金直接贪污。王守信到白石营业部黑金库取钱，不用开口，只须伸出几个手指示意，就可以取出几万元现款。一九七四年以来，仅在这一处，她就贪污现金四十二万余元。

王守信把巨额现金、票证捞到手后，购置了大量高级商品，供其挥霍享受和行贿。其中包括电视机、电唱机、录音机、电风扇、鸭绒被、各种皮货和高级家具、烟酒、海味、罐头食品等。她还分赃给两个儿子每人十六万余元，分给其姐、妹、弟、侄、外甥等亲属四万余元现金和物资。为了给子女、亲属经营安乐窝，她还用二万八千多元在七处修建和购置了房屋。

王守信一伙为了给自己的违法活动创造条件，寻找保护伞，千方百计利用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采取各种手段，上下串通，投机钻营。

手段之一是请客送礼、施放糖衣炮弹。自一九七二年以来，请客送礼金额多达六万六千余元。为了能够经常掌握大量的行贿物品，他们还以建立职工副食基地为名，非法占用农田三百亩种粮种菜，搞了一个打鱼队和养猪场，又建了一个地下冷库，以保证一年四季鱼肉不断。凡是王守信认为有用的人，她都要"看人下菜碟"，分等论级，想方设法送礼结交。有时集中送，有的个别给，逢年过节还派专人专车送，从县送到地区和省直机关，一送就是几十份。这些外送的"礼品"，职工不准打听不准看。据不完全统计，接受其"礼物"的涉及省、地、县以及部队共九十多个单位、二百多人。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贿之后，有的与王守信同流合污，有的为其违法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省燃料公司一个副经理，不但接受了大量的鱼、肉、蛋、酒、油、蔬菜等，还多次索贿近二千元。省经委一个管煤炭调度的负责人以权谋私，同王守信相互利用，甚至在案发之前，还乘小车到宾县看望王守信。

手段之二是安插知识青年，利用儿子牵住当干部的老子。一九七五年，王守信用公司名义建了一个知青点，以安排知青为名，到处拉关系，先后安排五十名青年。其中本系统职工子女仅八名，本县其它单位职工子女十名，大部分是省直、地直机关和哈尔滨市的干部子女。王守信利用帮助这些青年升学、当工人、参军、学技术等，牵着他们家长的鼻子走，拉着一些干部为她出力。

手段之三是利用帮派势力作为支撑点。在宾县有一伙与王守信一样靠造反起家的人物，他们掌握着财政、粮食、纪检等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权，有的还当上了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这些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王守信给他们送鱼送肉，送烟送菜，安排子女，他们则为王守信的犯罪活动大帮其忙。县财政科一个副科长，几年来吃菜烧煤几乎全由王守信包下来，孩子也由王守信安排升了学，他就给王守信立了一个黑户头，非法存入十二万余元。县粮食局一个副局长得了王守信的好处，对王守信有求必应先后批给燃料公司饲料粮二万五千斤，又将粗粮换了四千多斤细粮，其中大部分供王挥霍和送礼。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副主任，甚至把群众揭发王守信的控告信交给王本人，使她明目张胆地进行打击报复。

去年八月，群众公开揭发了王守信的问题，王立即组织人贴大字报反扑，气焰十分嚣张。当县委派出工作队到公司调查时，王守信又与同伙密谋，订立攻守同盟，下令同案犯："刀按脖子也不能讲"，"整成肉泥烂酱也不能承认"。她还伙同马占清秘密转赃灭证，甚至要马占清把藏有小窑煤票据的房子放火烧掉。在宣布对王守信进行审查后，王的态度极为顽固，拒不交代罪行。其家属子女和有关亲属数十人到处为她窝藏和转移赃款赃物。县委工

作队在深入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清事实,掌握罪证,终于破获了这一贪污集团案件,查获和追回了绝大部分赃款赃物。按照法律程序,罪犯王守信等人已全部落网、依法逮捕,参与分赃、窝赃、转赃犯罪活动和与此案有牵连的重点人,也都分别进行审查。

黑龙江省、地、县党政领导对这起贪污集团案件的破案工作很重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组织省、地有关部门与县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在破案过程中,地委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具体帮助县委破案、审查罪犯。县委领导亲自动手并抽调了一大批干部组成强有力的破案班子,分别开展内查外调,追捕审理罪犯,搜缴赃款赃物。经过紧张的连续作战,工作进展很快,取得显著战果。

这起贪污集团案件,由于时间长、涉及面广,贪污金额多,案情复杂,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继续清查。黑龙江省委决定由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抽调力量,同地、县政法机关一起,抓紧调查研究,审理罪犯,按照法律程序,做好结案工作,并准备对罪犯公开宣判,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原文载《人民日报》)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79年是我国建国三十周年,是思想解放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一年。由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文艺工作面临着新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也由于党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方向下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艺界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艺创作的繁荣。这一年,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电影等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短篇小说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引起广大读者注意和欢迎的《乔厂长上任记》触动了当前社会上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带头人?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等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响,反映了由于广大群众急切期望早日迈开步伐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特权思想、官僚主义、青少年犯罪等等阻力与障碍,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感、愤慨。

中、长篇小说

在中、长篇小说创作上,1979年文学界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个可喜收获,是中篇小说的崛起。作者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观察力,面向生活,真实地描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风云变幻的激动人心的各种斗争,深刻地通过各种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的风暴,从党和国家的命运,从人民和忠实于人民的干部的命运中探索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教训,接触到我们生活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普遍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第2期)和《第十个弹孔》(《十月》第1期),分别描绘两个老干部在不同的遭遇中所进行的动人心魄的思想搏斗;青年作家冯骥才的《啊!》(《收获》第6期)则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中所受到的严峻考验和残酷迫害,控诉了极左路线对人们心灵的戕害;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清明》第1期),是一部以反映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艰巨复杂的斗争生活为题材,并把笔触伸展到现实斗争的内容丰富的作品;《永远是春天》(《收获》第3期)的作者谌容以一种细腻的女性特有的缠绕人们心灵的柔情,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完韩腊梅的故事后,向我们叹息地宣告:"在这洁白的世界里,一株鲜艳的腊梅正在雪中盛开。"为永葆革命青春的人们谱写了一曲颂歌。

在长篇小说的作者中,也出现了一批才华初露的文学新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取材于知识分子的斗争生活和感情纠葛,曾以"手抄本"形式在群众中流传,作者因此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成为1979年度的畅销书之一。《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红岩》第2期)的作者周克芹的创作才能也获得人们的赞赏。老作家沙汀认为这部小说:"不止是三年来反映在'四人帮'阵阵妖风横扫下四川农村生活的佳作,就从三十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也相当难得。"

诗 歌

1979年在诗坛中最集中的是对女共产党员、革命烈

士张志新的颂扬。全国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诗篇。诗人们以最大的愤怒，鞭挞那些践踏真理、民主和法律的罪人，同时对烈士倾吐出无限的崇敬心情。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诗刊》第8期)就是如此。歌颂"四五"精神的诗作，数量也占很大比重，诗人们热情地歌颂了天安门事件中斗争的勇士。在讴歌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中，刘真的散文诗《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诗刊》第1期)，张志民的《你与太行同高》(《人民文学》第7期)，胡平的《请你欣慰地闭上眼睛》(《上海文学》第5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老诗人艾青重新出现于诗坛以后，他的诗作仍然受到读者欢迎。1979年，他的《光的赞歌》(《人民文学》第1期)，《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人民日报》8月12日)和骆耕野的《不满》(《诗刊》第5期)，邵燕祥的《中国汽车呼唤高速公路》(《人民文学》第1期)，白桦的《春潮在望》，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诗刊》第5期)等都引人注目。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诗刊》第8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报告文学

1979年，中国报告文学涌现出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如《人妖之间》、《船长》、《大雁情》等。

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人民文学》第9期)，通过对王守信贪污集团的解剖，分析王守信发迹和犯罪原因，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作了一些大胆的探索，受到读者注意。

柯岩的《船长》(《人民文学》第11期)，写一名远洋船长勇于承担重任的事迹，激励人们在四化的征途上，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前两年描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取得较好成绩的基础上，1979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品。如黄宗英的《大雁情》(《十月》第1期)、徐迟的《结晶》(《人民文学》第10期)、李蕤的《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人民文学》第2期)、理由的《她有多少孩子》(《当代》第1期)等。这些作品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各条战线的科技人员的生活经历，治学态度和科学贡献，展现出建国三十年来广大知识分子思想面貌的巨大变化。其中，《大雁情》描写一名平凡的女科学家，为了祖国的需要，尽管遭受不公正的责难和非议，依然坚守科学岗位的可贵品质。

反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作品更是大量的。一大批激越高昂作品分别载于《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报章杂志。

另外，杨匡满、郭全臣的《命运》(《当代》第2期)，热情地歌颂了"四五"运动。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话剧

我国人民开始向四个现代化前进，成为这一年话剧创作比较集中表现的新题材和新主题。舞台上出现了现实生活广阔的画面和矛盾冲突。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四化、要求前进的强烈愿望，敢于正视阻碍四化的陈腐落后的事物，敢于摒弃极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敢于揭露和鞭笞思想僵化者和官僚主义者的灵魂。一年来涌现的一批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话剧，如《报春花》、《未来在呼唤》、《权与法》、《救救她》以及《向前、向前》、《这里涌向云端》、《在新的生活中》、《爱情之歌》、《让青春更美丽》、《撩开你的面纱》、《她》等等，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新作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它们突出地体现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时期的鲜明特征，较之前两年的作品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更带政治尖锐性的主题。《报春花》可以作为这一年的优秀代表作。作者崔德志塑造了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受着不应有的政治歧视，但全心全意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在屈辱中默默为人民辛勤劳动而有杰出贡献的女工白洁的艺术形象。作品还赞扬了一位深受"四人帮"迫害、刚刚回到领导岗位来的厂长李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通过李键同党委副书记吴一萍围绕白洁能不能树为劳动模范而展开的激烈冲突，把批判的锋芒针对着那个曾经广泛流行、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的以封建血统论为核心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性。

另一个引起热烈反响的剧本《未来在呼唤》，尖锐地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严峻斗争，猛烈地抨击了把领袖当作神的现代迷信，塑造了一个使观众深受鼓舞的共产党员梁言明的生动形象。

话剧《权与法》通过一位正直善良的女干部丁牧遭受的冤屈和诬陷，猛烈抨击了至今仍在腐蚀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封建特权思想，响亮地呼喊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塑造了为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坚持正义而英勇斗争的市委第一书记罗放这一很有光彩的艺术形象。

话剧《向前，向前》，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拨乱反正时期激烈的思想冲突，批评了一位老干部因为因循守旧而成为新长征路上的严重阻力，但是通过斗争，他终于觉悟过来，思想得到解放，重新迈出前进的步伐。

在这一年的话剧舞台上，许多老演员创造出动人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李默然在《报春花》中扮演的李健，冀淑平在《权与法》中扮演的丁牧，王尚信扮演的罗放。辽宁人艺的李红和长春话剧院的刘长

松，这两位初展才华的青年女演员，分别在《报春花》中扮演女工白洁和《救救她》中扮演犯罪少女李晓霞，博得了观众的赞赏。

电　影

1979年，我国电影工作者解放思想，创作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改变了前两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全国10家故事片厂一共完成了故事片和戏曲片65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有：《啊！摇篮》、《泪痕》、《归心似箭》、《曙光》、《傲蕾·一兰》、《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她俩和他俩》、《小花》、《保密局的枪声》、《苦恼人的笑》、《樱》、《向导》、《铁弓缘》等。其主要特点有：

过去，反映我国革命历史的影片，从未接触过党内路线斗争。《曙光》、《吉鸿昌》、《赣水苍茫》都在这方面作了真实的反映。它们揭示了极左路线对革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其中，影片《曙光》尤其尖锐地展示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它以愤怒的笔触，描写了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倒在极左路线枪口下的惨痛史实，让人们从中吸取这血的教训。

这一年，拍摄了较多以揭露"四人帮"为内容的影片。它们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这血泪10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不同觉悟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四人帮"进行的曲折斗争。《泪痕》通过一个小县城发生的故事，揭露了"四人帮"这一小撮野心家、社会渣滓的凶残面貌，以及他们盘根错节进行垂死挣扎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苦恼人的笑》则通过一个普通人的苦恼，揭示了"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对广大人民的精神摧残。

这一年，很多影片都力求在银幕上塑造具有独特性格的艺术形象，努力展示人物的内在感情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片，如《曙光》中的贺龙这个形象，就突破了过去描写领袖人物的程式，表现了他生活在群众之中，与之同甘共苦的平易近人的本来面貌。《从奴隶到将军》的罗霄，则反映了我们很多老一辈革命家走过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和他们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描写普通革命战士的影片，《归心似箭》塑造了魏德胜这个艺术形象。影片描写魏德胜经过异乎寻常的出生入死和爱情的考验，表现了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他的崇高的精神世界。影片最后描写爱情的一段，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内心美。影片《啊！摇篮》更着力展示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上的人性美。它通过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一个保育院护送孩子们的小故事，表现了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从领导到炊事员、小战士，无处不在为革命、为下一代勇于牺牲的精神。

这一年出现了一批受观众欢迎的演员：《归心似箭》的女演员斯琴高娃、《小花》的女演员陈冲、刘晓庆、《樱》的女演员程晓英，都以其真挚、朴实的表演，得到观众的热爱。《泪痕》中的男演员李仁堂，则以其深刻掌握人物性格的表演，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赏。

歌　曲

1979年，抒情歌曲创作有了可喜的收获，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

歌颂粉碎"四人帮"胜利的《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以明朗欢快的曲调，表现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开怀畅饮舒心酒的动人情景。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是这一时期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有许多优秀之作。其中如《请允许》(柯岩词，傅庚辰曲)、《歌唱敬爱的周总理》(王晓岭词，晓藕、魏群曲)、《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词，施光南曲)、《我爱梅园梅》(瞿琮词，郑秋枫曲)等歌曲，以纯挚的感情、生动的音乐形象，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深切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反映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生活的一批成功之作，是抒情歌曲向更广阔的题材领域扩展的新收获。如《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诚曲)，以深情动人的旋律，表现了人民战士向母亲告别奔赴战场的形象；《北仑河水啊你见过》(章明词、毕庶勤曲)以满怀激愤的感情，揭露越南统治集团背叛中越人民兄弟友谊的罪恶；《怀念战友》(高峻词，徐锡宜曲)表现人民战士之间的崇高的无产阶级感情；《歌唱老英雄李培江》(瞿琮词，郑秋枫曲)等歌曲，热情歌颂自卫还击作战中涌现的英雄。

此外，如反映军民亲密情谊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凯传词，王酩曲)，表现祖国人民对台湾省同胞的怀念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表现真挚纯洁爱情的《泉水叮咚响》(马金星词，吕远曲)等歌曲，以富于抒情性的艺术形象，深受广大听众喜爱。

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作者：蒋子龙

故事梗概

"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而拥有八千九百人的重型电机厂仍然是年年亏损，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整个机电局也快被它拖垮了。需要派个硬手去当厂长。派谁去呢？

在局长霍大道主持的局党委扩大会上，文革前电机厂的老厂长、现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再回到这个“老大难”单位去当厂长，而且立下“军令状”：“如果去电机厂以后仍然不能完成国家计划，就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出现在他面前的电机厂是个什么样子呢？产品大部分磕碰，机床保养极差，操作不合规程，管理更是“一粗二松三马虎”，工人思想混乱，干部则是三套人马，一把手冀申是升官有术、生产无方，只会在政治舞台上当导演的投机家。

乔光朴一上任，首先在局党委的支持下调整了领导班子：调回原电机厂党委书记、现在干校养鸡的石敢重任党委书记；任命一位很有才气的机电设备专家、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女工程师童贞当副总工程师；提拔服务大队队长李干任总会计师；又提拔文革中曾带头批判过自己的青年干部郗望北当抓生产的副厂长。然后大刀阔斧地实施着自己的雄心和计划。

进厂头半个月，乔光朴不动声色，一头扎进车间去摸情况。五十年代，乔光朴曾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他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大工业的管理。他以一个行家的眼光，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摸，很快摸准了病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电机厂动了大手术：先是抓了“鬼怪式”操作法的创造者——杜兵的典型，接着把全厂干部、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比的战场。通过考核评议，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汗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都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全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一大截。

乔光朴泼辣大胆，雷厉风行的作风和铁的手腕与魄力，赢得了工人的信赖。而那些在大考核中被淘汰的编余人员却恨死了他。这些人在被淘汰下来的原副厂长冀申的唆使下，常常给乔光朴制造一些麻烦，处处刁难他。同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使他在外交方面遭到了惨败。副厂长郗望北以他灵活的手腕和极大的工作热情，帮他打开了与兄弟厂合作的道路。老搭档石敢和妻子童贞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他积极配合，这就更加坚定了他搞好电机厂的信心和决心。

电机厂起死回生了，乔光朴却得到了一封又一封控告信的“报酬”，石敢不敢给乔光朴看，局长霍大道却不以为然，他淡淡地对乔光朴说：“几封控告信算得了什么，”“宁叫人打死，不叫人吓死。”“搞现代化不只是个技术问题，还要得罪人，我们当主角的，就不妨放开手脚来大干一场。”

乔光朴大为振奋，又一次唱起了很有点裘派味道的京剧：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

新时期文学中第一篇写工业改革的优秀作品是《乔厂长上任记》，它以刀劈斧凿般的笔力，塑造出了乔光朴这个光彩照人的工业改革者形象，开拓了一片新的文学领域，从而成为新时期工业题材文学的开山之作。

（原文载《人民文学》1979 年 7 期）（李少泳）

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

作者：鲁彦周

故事梗概

宋薇是天云山地区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这位四十多岁的女部长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仔细翻阅，她恨不得把这些问题一下子全解决了，可她的这些想法、做法却常常遭到丈夫吴遥的嘲讽。她正对着卷宗发愣，周瑜贞来了。由于宋薇和吴遥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因而周瑜贞每次来都受到宋薇的热情欢迎。周瑜贞这次向宋薇讲起了她在天云山遇到的一个赶车的怪人的经过。

“我这次到天云山出差，是为了寻找二十年前关于天云山规划的书籍。下了火车搭乘一辆马车，那位马车夫的谈吐很不一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他与农民的关系特别融洽，我问他贵姓，他说他叫‘罗赶车’。后来问起镇子上的人，人们说他是反革命。”

这些话触动了宋薇，她意识到周瑜贞讲的这个人就是罗群。

宋薇跑进屋里，拿出一张二十余年前和罗群的合影，回忆起五十年代的生活。那时她和好友冯晴岚一起从技术学校毕业，分到天云山综合考察队。她们的新政委罗群对生活有独到见解，又有领导才能，兴趣广泛，谈吐落落大方，宋薇对他暗暗倾心了，不久两人都沉浸在幸福的初恋中。然而风云突变，罗群被打成“右派”，她突然被调回省委党校学习，两人就此永远分手了。

宋薇从里间出来，周瑜贞又讲起在天云山一个林子里见到了冯晴岚。她在罗群最困难的时候和他结为夫妻，并且帮助罗群完成了《论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这部著作。病中的冯晴岚把稿本拿给周瑜贞看，周瑜贞为书中深刻的见解和科学的预见感到惊奇。她简直不能想象这是一个顶着反革命的帽子、常常是饿着肚子的人写的。

从周瑜贞的话里，宋薇才知道冯晴岚写了三份申诉材料，而宋薇却一份也没有见到过。她想起当初不得已与罗群断绝关系和吴遥结婚的经过，难道是吴遥压下了罗群的申诉信吗？

第二天，宋薇果然从吴遥抽屉里找到了申诉信。原来

罗群被打成右派仅仅是因为保护了一位工程师。信中还说，当时许多同志不同意定罗群为右派，是路遥一手造成的。宋薇回到家里又收到冯晴岚的一封信，告诉她自己和罗群结婚的经过，信中流露出自豪和幸福。

宋薇终于明白了一切。她决定亲手处理罗群冤案的平反。可是宋薇的努力受到吴遥、朱科长的反对、阻挠。吴遥发现宋薇已让人打印了罗群的材料，就召开组织部会议批评宋薇。宋薇回到家，女儿又告诉她周瑜贞来过了，说冯晴岚已奄奄一息。她决定与周瑜贞一起去看望冯晴岚，吴遥大发雷霆并诬蔑宋薇是去找罗群的，宋薇气得晕倒了。

宋薇在医院接到周瑜贞的信，冯晴岚已经去世，希望她去天云山看看。这时罗群已被任命为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宋薇病好后和吴遥离了婚。她终于又回到了天云山。她渴望马上见到罗群。在冯晴岚的坟旁，她看见了罗群和周瑜贞在一起。她祈祷冯晴岚安息，并为罗群、周瑜贞二人献上虔诚的祝福。

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作者：周克芹

故事梗概

一九七五年冬，县委工作组组长颜少春、组员齐明江到葫芦坝搞整顿试点工作。大队代理书记把颜少春安排到许茂老汉家。这许茂有九个女儿，人称“女儿国国王”。老二、老五、老六嫁到了外村，老八参军走了，在葫芦坝的有老三秋云、老四秀云、老七许贞、老九许琴。老大已经病故，大女婿金东水原来是大队支部书记，现在带着一对小儿女住在看水员的小屋里。老四秀云和葫芦坝的红人郑百如离了婚，这郑百如用卑劣的手段把金东水打下去，自己掌握了葫芦坝的大权，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还偷偷放火烧了金东水的房子。但是，许茂和秋云等由于封建思想作怪，总以为离了婚的秀云给许家丢了脸，想赶紧给她再找个婆家嫁出去了事。前不久，由三姐夫罗祖华张罗，给秀云在耳鼓山找了个死了女人的男人。就在工作组进村的前一天，秀云突然向父亲说她决定不去耳鼓山了，就在娘家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过。这消息成了葫芦坝当天的头条新闻，许茂和秋云也火冒三丈，摸不清秀云打的啥主意。郑百如由于心怀鬼胎，怕秀云向工作组揭发他干的坏事，便突然一反常态，在许茂和秋云面前恳求与秀云复婚。秀云是十年前被郑百如用流氓手段威逼成婚的，十年来看透了郑百如的丑恶灵魂，所以坚决不肯复婚。郑百如为了实现复婚阴谋，保住自己在葫芦坝的地位，一方面利用工作组齐明江对秀云施加压力，一面夜伏许秀云屋，企图用软的一手使秀云就范。秀云表现得非常坚定、勇敢。为了使大姐夫在父亲生日那天来许家拜生日，与父亲和解，她用自己的钱到连云场赶场，给金东水备办礼物。与金东水父子三人路遇后，她当着郑百如的面，“在连云场的街头，手臂上挽着个布包，牵着小长秀，一边走着长生娃，身后跟着老金。这个情景，可以说是一份宣言书，在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的家庭组织起来了！”对金东水和小长秀、长生娃的爱，是她生活的希望和精神支柱。她也不肯象过去那样听凭别人来摆布自己的命运了，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郑百如气急败坏，又生一计，伙同她的姐姐郑百香放出谣言，把自己夜伏秀云家露出的蛛丝马迹，栽到金东水身上，向秀云射出了诬陷、中伤的子弹。人言可畏，秀云孤独了！连自己的亲人也不理解她，把她看作坏女人。当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走向金东水的小屋时，听到屋里的人正在给金东水介绍对象。许秀云绝望了，反转身子向柳溪河跑去，纵身跳入柳溪河的怀抱。金东水等闻声赶来，许秀云得救了。在颜少春的启发教育下，她认识到个人幸福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金东水恢复了大队支书的职务，带领社员改造葫芦坝，许秀云报名参加了修渠劳动，等待着云消雾散的日子与金东水一起创建自己的生活。

许茂是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种庄稼的老把式，葫芦坝有声望的作业组长，得过“爱社如家”的奖状。那时，他正当中年，告别了私有制，站在集体化的土地上，作过许多美好的梦。现在，这些梦被现实粉碎了。他变得自私、孤僻、固执，有时甚至是残酷了。他在自留地上苦心经营，到自由市场上卖菜，为了多赚几个钱，带着很长的根子不掐。他可以忍心从一个抱着孩子的农村妇女那里买油，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而这个妇女是等着用卖油的钱给孩子治病的。颜少春听到他夜里咳嗽得挺厉害，让许琴给她送几片药，他立即拿出两毛钱来，意思是提醒颜少春不要吃他的白饭。他对当时颠三倒四的政治和政策看得很透，认为就是要“想出种种办法不让庄稼人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别的什么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凭着自己的劳动，他一毛一毛地积攒钱财，以防将来挨饿逃荒。许茂的变化，“是生活教给他的”，是生活逼着他走上了一条违反自己心愿的路，所以他的心情是矛盾痛苦的，整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常常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想心事。当生活出现了转机时，许茂的思想也出现了新的转机。郑百如二次潜入秀云屋里，许茂老汉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悔恨交加。颜少春的实际行动，又使他恢复了对党的信任。过生日的前夕，老汉将平时积攒的钱财分成九份赠送给九个女儿。大女儿那份其实是给金东水的。老汉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金东水表示和解，并默许了秀云和金东水的婚姻。他步履蹒跚地向金东水的小屋走去，对大女儿的遗孤长秀、长生说，要把他们接到家里住，“都是你们的”！

正当葫芦坝人民在金东水领导下修渠改建时，工作组奉命撤退，历史又将经历一段曲折。但颜少春坚信：葫芦坝的党支部很坚强，能够经得住风吹草动，葫芦坝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原文载《红岩》第2期）

报告文学《大雁情》

作者：黄宗英

故事梗概

作家以记者身分列席了一九七八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会议期间，遇见了一位中年女科学工作者、陕西西安植物园研究实习员秦官属。由于她朴朴实实、直爽泼辣，激起了作家要采访她的愿望，但是遭到了拒绝。几个月后，作家到了西安植物园，在与领导和干部的接触中，他们对秦官属的成绩都作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象这样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报道呢？作者犹豫了。后来，在省科委的支持下，作者决定到秦官属工作和科学试验场地——洛南山区去看个究竟。

到了洛南县药材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老王同志一见面就高兴地说："作家来咱洛南，好好儿地把老秦的事写一写，表扬表扬。"接着他就指着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圆点的洛南县地图讲了老秦的事迹：洛南县历史上是个药材产地，山上野生着许多名贵药材。老秦来后，和我们一起艰苦创业。我们没去的山，她去了；我们吃不了的苦，她吃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解决了。所以我们都敬佩她。

经过参观访问，秦官属来山区前前后后的活动的"底片"在作者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地"感光显影"了。谢底大队是一个地薄人穷山富的地方。光叫得出名的野生资源就有一千多种。"认识是宝，不认识是草。"因缺乏科学知识，人们把能治心脏病的名贵药材丹参当成草喂了牲口，结果不到三冬两春，在万绿丛中的丹参越来越罕见，其他野生药材也越来越少。一九七二年老秦和植物园其他同志一起搞"七叶一支花"的栽培。初来时"她住在破庙里，柯拉叶子的酸菜，她咽得下，腰里揣上橡子面窝头，大旱上山，一天没水喝，不叫苦，不埋怨"。她撂下三岁的娃子，五岁的妮，顾不上孩儿他爹，整年整月在山沟里奔跑。她用超声波处理桔梗种子，出芽快，苗齐壮；她搞无性繁殖，普遍扩种丹参，使村民"换来手扶拖拉机进村"。谢底大队的药材，从半亩杭芍，发展到五百多亩药材地……

通过作者深入谈心，老秦终于敞开了掩着的心扉。解放初，她抱着改造沙漠，绿化祖国的理想考入西北农学院林学系。大学期间逐渐对杨树的优选育种专题产生了很大兴趣。一九五七年四月来到刚刚建园的西安植物园，"文革"期间她从重点培养、使用对象转瞬间变成重点批斗对象。她看着一百多种的杨树种植圃一大半被刨掉了，外国杨树种也不让种了，植物园里杨树研究课题被取消了，她万分悲痛。当她看到周总理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本书时，便把它紧紧地贴近火热的胸膛，嚎啕大哭起来。她说："我坚决相信党不会抛弃我们知识分子的。相信社会主义不会不要科学文化……"药科她没学过，开始让她搞野生药物训化课题，她不愿干。但想到"我不能与人民赌气，不能和党赌气。没有党，我能上大学？"因此，又决心学下去了，而且干出了出色的成绩。

作家兴冲冲地从山区回到西安，想从西安植物园干部那里再核实一下情况，但又出了枝杈。他们说，秦官属改行不算用非所学；说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而她把自己的助手介绍给自己的女儿作对象，是作风不大正派的表现；她的研究项目算不上什么科研成果……这些问题再次使得人物形象模糊起来。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写她会不会起反作用？最后经省科委和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明了上述意见是不实之词、偏见。迷团解开，真相大白，秦官属这个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科学工作者，这个被歧视、备受打击、埋头苦干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诗歌《双桅船》

作者：舒婷

雾打湿了我的双翼
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岸呵，心爱的岸
昨天刚刚和你告别
今天你又在这里
明天我们将在
另一个纬度相遇
是一场风暴、一盏灯
把我们连系在一起
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
使我们再分东西
不怕天涯海角
岂在朝朝夕夕
你在我的航程上
我在你的视线里

1979.8

电影《归心似箭》

彩色故事片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李克异

导演：李俊

摄影：杨光远　陈振中

美工：寇鸿烈

主要演员：赵尔康、斯琴高娃、马志刚、李风秋

故事梗概　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始终保持必胜的信心，历尽千辛万苦、重重艰险，不为金钱诱惑，不惧怕死亡威胁，战胜日寇、伪军和叛徒等形形色色的敌人，并正确对待和处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最后终于找到了部队。

电影《泪痕》

彩色故事片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孙谦　马烽

导演：李文化

摄影：吴生汉　陈佑群

美工：莫克展

主要演员：李仁堂、谢芳、杨威、邵万林

故事梗概　"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克实到金县任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发现了许多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是，一时还不能受益的土石岭工程还在进行；原曹毅县长是怎么死的？他的妻子孔妮娜为什么疯了？等等。对以上这些问题，朱克实决心深入调查研究。首先，他经上级批准将土石岭工程下马，并启用两名原县委领导干部。然后，在公安局长的帮助下，查明原来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张伟一伙诬陷曹毅，将他害死，又逼死了为曹毅看病的医生苏婉。案情大白，张伟畏罪自杀。装疯多年的孔妮娜也重新获得了做人的权利，擦干泪痕，走向新的生活。

电影《啊，摇篮》

彩色故事片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徐庆东　刘青

导演：谢晋

摄影：陈震祥

美工：何瑞基

主要演员：祝希娟、张勇手、村里、倪以临

故事梗概　延安保卫战时期，一支保育队伍在撤退途中，跋涉千里，历尽艰险，有牺牲，有痛苦，但也有欢乐和胜利。通过萧旅长，女教导员李楠，孤儿亮亮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之间的感情发展，揭示了爱孩子就是爱明天，革命战争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的主题思想。

电影《樱》

彩色故事片　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詹相持

导演：詹相持、韩小磊

摄影：曹作宾

美工：吕志昌、王砚缙

主要演员：许还山、程晓英、欧阳儒秋、石羽

故事梗概　工程师陈建华因为有个日本妹妹松下光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日本特务"。一九七五年，陈建华恢复工作，参加大型化纤工程的设计，日本专家小组前来协助。此时，光子作为日本专家来到中国。在"四人帮"的魔爪下，兄妹近在咫尺，不敢相认。粉碎"四人帮"后，光子又一次来到阳光明媚的中国。这一次，再也没有阻挡他们相认的障碍，母女、兄妹幸福地团聚了。

话剧《报春花》

崔德志

故事梗概　初春，一个节日的午后，重新走向某纺织厂领导岗位的李健正在家里读英语，他的女儿李红兰为了庆贺他重新工作和迎接吴晓峰的到来，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第一个登门的是吴晓峰的妈妈，厂党委副书记吴一萍，她在老战友李健面前夸奖了未来的儿媳李红兰，并说"这次我推荐她当市劳动模范"了。厂推销员田贵来向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李健反映了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次布，并告诉李红兰不要等吴晓峰了，他正在车间总结白洁的操作经验。接着厂报道组长韩卫东提醒李红兰要在她的发言稿上谈谈产品质量问题，李红兰生气地把他哄走了。好不容易盼来了吴晓峰，他却吃过晚饭了，并把一字未改的发言稿退给李红兰。李健要他重写一个，他说"事迹不突出"，李红兰十分恼火，晚餐不欢而散。

第二天，吴一萍在厂长办公室让李红兰填写劳模登记表。吴走后，韩卫东来到厂长办公室，李红兰表示和他断绝过去的爱情关系，韩十分痛苦。韩在李健面前承认了过去搞假报道的错误。李让她下到车间发挥她的技术特长，李红兰极为不满。吴晓峰总结白洁的先进经验，遭到了吴一萍的反对。吴给他一个被面，让他送给李红兰，吴晓峰却把被面送给了白洁。全厂群众同意把白洁"当红旗

树起来”，吴一萍却认为她家庭有问题，坚决反对。李健认为白洁四年干了五年的活，连续几万米无次布，这在全国是个奇迹，尽管她家庭有问题，但她本人表现好，向四化进军就需要这样的排头兵，于是他收回了女儿的劳模登记表。

当天晚上，李红兰在家里又哭又闹，并提醒李健，她妈妈正是重用了反革命才被整死的。吴一萍要李健坚持党的原则，“要为女儿留条路”，并告诉李健，红兰她妈重用的不是别人，正是白洁的母亲。李健坚信“那段历史不会重演”。正在这时，吴晓峰提着一包李红兰出的次布和白洁一道来了，不料，吴一萍无礼地赶走了白洁。田贵又来报告用户开始退货了。一个个问题，摆在李健面前，他陷入了沉思。

次日，工厂院内，墙上贴着“向白洁学习”的大标语，全厂开展了万米无次布的竞赛运动。光荣榜前，白洁凝视着自己的照片，心情非常激动。吴晓峰请求白洁答应他的爱情，白洁也深爱着吴晓峰，她担心自己出身不好会使吴晓峰受到牵连。李红兰对李健表示，如让白洁当劳模，她就和他划清界限，丢下钥匙，宣布不回家了。白洁走后，刘小英告诉李红兰：“白洁出了次布！”吴一萍立即宣布停止对白洁的宣传。吴晓峰不顾母亲的反对和李红兰的讥讽，宣布很快就要和白洁结婚，并对那些歧视白洁的人进行了批评。

当晚，女工宿舍，验布工魏大姐已查明了真相，证明次布是刘小英出的。原来白洁为了使厂长不再重犯“错误”和全厂的安定，故意把刘小英的次布记在自己的名下。李健来找白洁，白洁故意说了些消极话。吴一萍劝白洁与吴晓峰断绝关系，白洁陷入痛苦之中，准备一个人吞掉“爱情”的苦果。当吴晓峰来看她时，她没说什么，只是让他把被面拿走，送李红兰回家……

在李健家里，李健与吴一萍在该不该树白洁为劳模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警告吴“不要变成新长征路上的绊脚石”，吴认为李危害了党的利益，“最后劝告你一次”。李红兰在吴晓峰护送下回到家里，当她听说次布是刘小英织的，爸爸仍坚持树白洁为劳模时，她气极了，宣称“我不是你的女儿，永远不回家了”。李健心脏病突发晕了过去，正好白洁及时赶到，迅速给他服了急救药。在刘小英的证实下，白洁最后才承认了错记次布的事实。经过李健的教育与鼓励，白洁激动地跪在李健膝下，发誓“党啊，在新长征路上，我永不变心”。

一年后，工厂院内。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白洁将代表全厂去省里参加学大庆会议，吴一萍还没想通，李健希望她从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李红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和白洁成了知心的姐妹，取得了韩卫东的谅解，两人重归于好。刘小英当上了质量标兵。白洁和吴晓峰也结为亲密伴侣，人们给他们送来了结婚的礼物，祝贺他们幸福。最后，李健高兴地同大家一道欢送白洁赴省里参加劳模大会。

话剧《陈毅出山》

作者：丁一三

故事梗概　“西安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曾在赣南山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同志，为了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来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便出山赴见龙潭，与国民党江西当局和赵亚龟等谈判。

一九三七年九月，赵亚龟在他的客厅里命令他的家人通知各位县长，务必于第二天上午八点到此来迎接陈毅代表。赵的女儿赵之乔（新闻记者）告诉他，蒋介石特地派来了冯子焕中将，并劝他爸爸要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唤起舆论，促商谈成功。这时他的儿子赵之楠（保安司令）已领着冯子焕来了。冯持着蒋介石的密信，要赵亚龟趁此机会铲除江南各省游击队，并下令命各县保安团围剿卧虎岭韩山河游击队。夜里，韩山河部下的游击队员捉走了赵亚龟。第二天，冯子焕大放厥词，要赵之楠“当机立断”，扣留陈毅作人质。这时，陈毅带着肖三郎来到客厅，他大义凛然，从容镇定，无所畏惧。冯子焕之流以游击队捉走赵亚龟为借口，指控韩山河部破坏抗战，声称要围剿卧虎岭，县长、保安团长杨国栋也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遭到陈毅的斥责，并当众揭露了冯子焕历史上的卖国行径。陈毅促成双方达成了停止敌对军事行动的协议，宣布立即赴卧虎岭传达党中央的指示。

冯子焕向赵之乔求婚，遭到赵的痛骂。冯子焕在谈判席上遭到失败后，仍继续耍弄阴谋诡计。他命令报纸撤下赵之乔的稿子，换上陈毅投诚的所谓新闻。然后又阴险的派叛徒刘为久代表江西当局先陈毅一步上卧虎岭劝说韩山河下山缴械，听候收编，同时散布陈毅投降的谎言，为陈毅上山设置障碍，挖一个陷阱。

远处巍峨山中，背运钨矿石的人们唱着“穷人面前路三条”的山歌。生死坡前，交通员王明天、王带弟兄妹二人机智地盘问着叛徒刘为久，刘扬言限卧虎岭游击队二十四小时内下山接受改编，并给韩山河带来“将官制服”，散布陈毅投降的谎言。韩山河非常恼火，他命令刘为久把这套“将官制服”穿起来，让宣传干事吴静石在《列宁选集》里找到惩除叛徒的答案，枪毙了刘为久。

仍在生死坡。陈毅穿长衫，提手杖，戴太阳帽、墨镜，随一顶轿子，七、八个白军走来，陈毅叫肖三郎给轿夫、白军每人两块光洋作谢，然后向交通员王明天报了姓名，兄妹二人不敢相信。山崖下，随着阵阵歌声，走出背运矿石的人们。陈毅脱下长衫，挽起裤脚，蹬上草鞋，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时，正有一个女孩引着双目失明的老奶奶背着

矿石走来，陈毅忙扶住，当他知道她是罗道天的母亲罗奶奶时，就半跪在她面前，让罗奶奶摸他的头和手，并说："我是你的儿子啊！"远处，"穷人面前路三条"的山歌又起，陈毅接过罗奶奶的矿石，高声朗诵："哪条长，哪条短，还有一条是造反。"肖三郎也接过女孩的矿石，他们向江岸走去。

陈毅和肖三郎在生死坡等了两天，仍不见韩山河，经过陈毅的开导，王明天才发了信号，叫来了在石头后面等了两天的韩山河等人。韩设宴款待陈毅。由于敌人的长期围剿封锁，使得韩山河等人和外面长久隔绝，对整个抗战形势茫然无知。一听陈毅说要国共合作，包括蒋介石在内，便勃然大怒。他指斥陈毅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用烟管打陈毅的头，下令把陈捆起来，并要砍陈的脑壳。陈毅要求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在死之前让他把话讲清楚。在大会上，陈毅首先对游击队员们致革命的敬意，他说："在革命的低潮当中，你们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很了不起！"接着，他讲"西安事变"，讲当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新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在这非常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陈毅的讲话引起了战士的共鸣，战士们高喊："老韩，不能杀他呀！"王带弟拿来几张报纸，韩山河看了陈毅投降的消息和照片，执意要杀陈毅。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马英才也觉察到"问题很不简单"，不能贸然行事。罗奶奶听说要杀陈毅，急得给韩山河下跪。韩把陈毅押回山洞。别人走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想不通，他那么坚强的老革命，为什么这样搞呀！"他徘徊着，抽泣着，就地躺下，望着天上的星星……

卧虎岭。陈毅立于月光之下，仰望云海星河。韩山河为了弄清事实，暗中安排了陈毅与赵亚龟会面。陈毅仍坚持说服韩山河。这时赵之乔骑马赶来告诉陈毅，冯子焕与赵之楠已分兵两路来围剿卧虎岭了，还说冯子焕已与日本人谈妥，把矿山夺到手就向日本出口。赵亚龟听后，非常吃惊。陈毅揭穿了冯子焕企图借游击队之手消灭赵之楠的阴谋，提出要"联赵打冯"。赵亚龟表示："唯陈将军之命是从。"这时，韩山河完全相信了陈毅，并向全体战士承认了错误，带着队伍截击冯子焕去了。陈毅点上烟，与赵亚龟下棋。

生死坡，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赵之乔向记者讲述"陈毅在卧虎岭上布局、移子，决胜却在这重山之外的生死坡前"的故事，记者们赞叹不已。杨国栋告诉赵之楠，蒋介石派蒋经国来了，要赵之楠搞清陈毅东进路线，赵之楠劝他留个后路。冯子焕被绑上来，向韩山河提出抗议，陈毅警告他如硬要去当汉奸，待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要把他送上断头台。陈毅向记者们宣布：南方各省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改编成新四军。然后向大家告别，率师东进。

歌曲《人民前进我前进》

1=G　2/4
亚林、洪源词　田　光曲
稍快　欢腾地
整军备战气象新，军心向党向人民，新的长征党指引，人民前进我前进。搞好思想革命化，火红的旗帜，火红的心。加速我军现代化，先进的装备，先进的人。建设祖国当闯将，保卫祖国立功勋。建设祖国当闯将，保卫祖国立功勋。嘿嘿！嘿嘿！嘿！保卫祖国立功勋。

歌曲《怀念周总理》

此歌是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作者佚名。
1=G 3/4
夜献黑纱星做花，总理光辉照万家。仰望遗像手捧起，难眠长夜泪滴答。啊！周总理啊日日夜夜怀念您，写下一腔心里话。
一身骨灰撒中华，神州开出亿万花。人民爱戴周总理，万水千山中安息吧。啊！周总理啊总理回眸应笑慰，您的遗愿正开花。

歌曲《慰问歌》

1=2/4
陈克正词
稍快(热情地)
陆祖龙曲
青山绿水传捷报，英雄从前线凯旋归来了，满怀深情我唱起歌，先向同志们问声好，先向同志们问声好。
献上一束马樱花，感谢亲人保国家，好象秋风扫落叶，英勇战斗把敌杀，英勇战斗把敌杀。
丰功伟绩记心上，学习你们好榜样，军威震撼了全世界，严惩侵略者保边疆，严惩侵略者保边疆。
唱一支慰问歌情谊深，献给前线英雄军民，祝愿你们团结一心，再为祖国立功勋，再为祖国立功勋。

历史档案

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发给你们，请立即向县、团级党委、同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传达，然后向全体城镇居民和有关边境居民传达。有什么反应，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民族牺牲，战后，又积极援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但是，黎笋集团由于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受到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反对，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昨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柬埔寨当作鲸吞的对象。近几个月来，黎笋集团又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同时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步步升级，越来越猖狂。他们侵我土地，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其险恶目的，是长期骚扰我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破坏我领土安全和国家威信，配合苏霸在我北方的威胁和在印支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扩张，危害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屈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他们最近所散布的所谓和平谈判完全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都是根据这一目的确定的。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的这个宗旨，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和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冲突中得到确实无误的证明，为全世界所周知。本来，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胜利以后，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黎笋集团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甘当亚洲的古巴，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是违背越南人民的愿望的。中越之间有个和平安定的边界，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战斗的性质是正义的。我们的战斗，不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将得到世界人民（最后也将包括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二）

我们的战斗，势必引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无非是：（一）恶骂；（二）恐吓；（三）局部入侵。中央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打不垮的。但是战斗中间，由于各种具体条件，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某些小的挫折和损失。中央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党政军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沉着，坚守岗位，听从指挥，不要惊慌失措。

苏联如果侵入我国北部边境，他们必将陷入我国边境全体军民坚决抗击的汪洋大海，并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谴责。我国人民的自卫斗争是完全正义的，这一正义斗争是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的。

（三）

各级领导、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必须遵循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努力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坚守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原定的任务，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开声讨会。不要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口号、写大字报。总之，不要搞形式主义，而要扎扎实实地在全体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政治教育，号召和组织全体人民艰苦奋斗，用优异的成绩，支援我光荣的边防部队和边境同胞，夺取自卫战斗任务的胜利。

（四）

中央将及时通报我军自卫反击和中越边界战斗的主要情况。报纸广播也将陆续报道有关文件、评论和消息。地方报纸、电台都不要发表自己编写的消息和评论。党、政、军、民各级组织，要根据中央的指示、通报和报刊公开发表的材料，教育干部、群众坚定地相信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对于个别乘

机制造混乱、造谣破坏而有确证者，必须依法严厉惩处。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邓小平

一　（略）

二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现在我们要调整，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我今天不说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

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的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象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象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

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以下部分从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的讲话。讲话分三个部分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的历程和今后的任务。在第一部分中，叶剑英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30 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在过去 3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在第二部分中，叶剑英回顾了粉碎“四人帮”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党和人民胜利了，社会主义胜利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林彪、“四人帮”所以横行如此长的时间，与我们的制度还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它从反面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1)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是我们工作中不能偏离的重心。(2)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3)必须正确理解群众、政党、阶级和领袖的相互关系。(4)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叶剑英在讲话的第三部分中号召全国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叶剑英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经济方面，要集中三年的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工作，同时进行深入地、持久地、大规模地增产节约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要做一系列工作，以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要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各级干部必须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维护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全国人民都要积极负责、共同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都要共同努力，恢复和发扬发愤图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舍己为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的社会风尚。叶剑英在讲话最后，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每个人把个人的利益同祖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关于地富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作出。我国在完成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后，党和政府对地主、富农分子，及反革命和坏分子采取了依靠群众进行监督改造，使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方针、政策。经过 20 多年的劳动改造，这些地、富、反、坏分子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多数都接受改造，放弃了反动立场，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劳动者。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从这一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指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其本人成份一律是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权利，不得歧视。他们的子女一律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在此基础上，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做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是：(1)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2)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

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3)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4)各地应把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订成份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做好。对确定摘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新订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产大队范围内张榜公布，等等。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新的情况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人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对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保持社会政治安定，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转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国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央这一决定的过程中，约有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帽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出席了会议。另有十六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全会，是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前夕，在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在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情况下举行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全会一致通过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全会认为，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这个决定草案，经过九个月来全国范围的学习、讨论和试行，深受亿万农民群众的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会根据全国讨论和试行情况，集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对决定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的，是顺乎民心的。全会相信，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实行，对广大农村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请求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密切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批判他们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和影响，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为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而努力奋斗！

告台湾同胞书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共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的长期不正常状态。这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良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于1979年1月份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 当 年 的 日 历 上

政 治

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双方通航通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工艺观摩。同日，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讲话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同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1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并同意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对在"一月革命"中被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1月4日～22日　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问题；拟定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陈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1月5日　西藏自治区成立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和参观委员会，希望在国外的藏族同胞，包括达赖喇嘛在内，回到祖国怀胞，或参观访问、省亲会友。

1月7日～11日　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胡耀邦部长在会上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践工作的前头。他还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宣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1月1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耿飚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

1月17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

1月18日～4月3日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提

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③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④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1月22日～24日 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乌兰夫在会上就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讲了话。

1月24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悼词。张际春是湖南宜章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8岁，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徐海东是湖北大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0岁，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吴芝圃是河南杞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1岁，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刘长胜是山东海阳人，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4岁，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霖之是河北南宫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59岁，曾任三机部部长、煤炭部部长。王世英是山西洪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3岁，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长。南汉宸是山西洪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2岁，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刘裕民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

1月25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廖鲁言是江苏南京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59岁，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办主任，农业部部长。徐子荣是河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2岁，曾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常务副部长。胡锡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刘锡五是河南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6岁，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王其梅是湖南桃源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53岁，曾任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的子女，家庭出身一律为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2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在北京逝世。15日，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苏振华是湖南平江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67岁，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2月14日 叶剑英委员长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在着手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研究拟定或者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规等等，然后按照立法程序，分别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它的常务委员会审议，尽快完成我国的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面前，必须进一步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

同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2月17日～23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黄华关于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情况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役条例》；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决定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决定设立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2月19日～24日 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胡耀邦讲话指出：团的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作风，面向青年，面向基层，面向实际，到实践中找办法，在工作中增长才干。

3月2日～5日 共青团中央和林业部在延安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动员亿万青少年站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最前列。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到会讲话。党中央、国务院发电祝贺。大会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关于开展植树造林竞赛的倡议书。

3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肖劲光彻底平反。

3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批准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平反。

同日，中联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

灾"问题平反的通报》。

3月16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3月29日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加强保卫儿童的工作，并积极支持联合国关于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的决定。

4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军委决定为郭兴福平反。郭兴福原是南京部队一位基层指挥员，于1961年至1964年期间，创造了一套先进的练兵教学方法，被称为"郭兴福教学法"，向全军推广，受到中央军委的赞扬。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平反后，郭兴福被任命为南京部队步兵学校战术教研室副主任。

4月1日～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此条约是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同年4月11日生效，将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

4月3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4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扬天安门精神》的社论。社论说：去年，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肯定她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四月五日，是一个战斗的、光辉的节日。

4月20日　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北京举行。高崇民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1971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4月26日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5月3日～9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胡启立代表青联常委作工作报告，并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

5月3日　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平反；对过去曾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

5月3日～9日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9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伍绍祖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5月25日　《人民日报》以《要为真理而斗争》为题报道了被杀害的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6月4日～7日　五届政协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许德珩作工作报告；增补陆定一、刘澜涛等109人为政协委员；听取荣毅仁关于访问西藏的报告和霍士廉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6月7日～12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请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等法律草案；通过关于设立国务院秘书长、农垦部、粮食部的决定。

6月8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决定为陆定一彻底平反。

6月15日～7月2日　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增选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五届政协副主席。

6月18日～7月1日　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我国，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但是，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但目前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提高生产力水平，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实现四化的部分，是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会议还提出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余秋里作《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关于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作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增选彭真、肖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律予以平反改正。

7月29日　邓小平在接见海军扩大会议代表时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组

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8月2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已正式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

8月15日～9月3日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会议认为，只要赞成统一祖国，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也要团结。只要台湾当局同意换上五星红旗，连蒋经国这些人也可以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10月14日，中央批转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8月18日　交通部长曾生就恢复和发展大陆与台湾间的海运业务问题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交通部门愿意就此问题同台湾交通部门进行协商。

8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他们因受迫害，于1967年至1972年先后逝世。李先念主持追悼大会，胡耀邦致悼词。徐冰是河北南宫人，终年69岁，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张经武是湖南酃县人，终年65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吴溉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和中监委常委。邹大鹏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他忠实地、全面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在党分配他的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伍云甫是湖南耒阳人，终年65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卫生部副部长、中监委候补常委等职。

9月5日～17日　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9月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

9月10日　中共中央对云南"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9月11日～13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的决议》。会议任命姬鹏飞为国务院副总理，决定设立司法部、八机部和地质部。国务院于10月8日印发《环境保护法(试行)》。

9月11日　中共承德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而遭受残酷迫害的董秀芝彻底平反。

9月19日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胡启立主持会议，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祝贺。

同日　中共中央批转《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1958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赖若愚是山西五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9月21日　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祝贺。康克清在会上讲话。

9月25日～28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出席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全会一致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12人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29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10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平反。

10月11日～22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19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晚，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举行记者招待会。邓小平讲话强调，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

10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决定: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按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26日　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做好信访工作的几条原则:①凡属群众中合理而又能够解决的要求,要主动地办;②凡属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各级组织要向上反映;③凡属广大人民呼声一定要听,但对社会上那种违法乱纪、捣乱破坏的行为,必须坚决斗争。

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的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

同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魏京生上诉案。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原判。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11月21日～12月5日　全国人事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级人事部门要协助党委组织部门建立和完善干部的选举、考核、奖励、退休等制度,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的改革。

11月23日～29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余秋里作华国锋总理访问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会议期间,委员们就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整顿城市社会秩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西单墙”问题,应由北京市革委会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12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同日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对在本市张贴大字报问题作出暂行规定。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城市治安应集中目标打击现行犯的通知》。

12月17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部门《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规定》指出:原工商业者中,从1979年7月起,在填写成份时,是干部就填“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劳动的就填“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12月25日～1980年1月7日　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党校过去的成绩必须肯定。要实现四化伟大任务,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是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化知识的宏大干部队伍。

12月27日　总政治部发出《1980年政治工作要点》。强调切实把我军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建设现代化军队上来,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

12月29日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芳和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徐向前主持追悼会,姚依林、王鹤寿分别致悼词。马明芳是陕西米脂县人,终年69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1974年8月13日被迫害逝世。王维舟是四川东乡人,终年83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0年1月10日被迫害逝世。

经　济

1月5日　新华社报道:现代化大型化肥厂——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建成投产。这个厂日产合成氨1000吨,尿素1620吨,全年产量折合标准化肥100万吨。

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1977年增长39%,其中出口增长28.6%,进口增长50%。

2月1日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这表明我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第一次以组织形式出现在我国经济理论舞台上。

2月4日～3月12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农村集贸市场的管理工作,要着眼于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要保护正当交易,取缔非法活动。4月9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

2月5日～28日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银行贷款工作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政策和试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的办法。对那些执行合同好,经营管理好的企业按优惠条件贷款;对积压物资多、资金周转慢的企业从严掌握贷款等项意见和措施。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

2月5日～3月1日　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决定：加强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大力发展养殖，认真落实渔业政策。4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水产总局《关于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2月9日　新华社报道：财政部确定，从今年起进一步减轻农村社队的税收负担，并规定了实施办法。新的减免税收办法实施后，预计全国农村每年将增加收入10亿元以上。

2月15日　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宝安和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并从国家预算内投资15000万元。

2月23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从1979年起到1985年，对农垦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亏损不补，有利润自己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可以贷款的财务包干办法。

同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告》。中国农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3月1日　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平均提价50%；油料平均提价25%，超购加价50%；生猪平均提价20%等。4月11日商业部、国家物价总局发出了《关于调整粮食和油脂油料统购价格的通知》。此次调价格，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4.8%，预计当年可使全国农民增加收益约70亿元。

3月3日～25日　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今后两三年内，基本建设战线的重要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认真搞好基本建设的调整、整顿和改革工作。

3月10日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决定从1979年4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和华侨人民币储蓄的存款利率，并增加储蓄种类和利率的档次，以及开办半年的定期储蓄、五年的长期储蓄存款。

3月12日～24日　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的负责同志，就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议论。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大问题。座谈会就是否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和如何具体实行这种责任制，大体取得一致意见。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

3月13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建议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受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　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给中央写信，提出6条意见：①前进的步子要稳，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②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③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是严重的。④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其发展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⑤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大体上调整过来。⑥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3月17日　国务院成立进出口领导小组，余秋里任组长，王任重、王震等任副组长。

3月21日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讲话指出：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证明不能持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基建项目搞不了的丢掉一些。到2000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邓小平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降下来搞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5日　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注意粮食。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一定数量就要发警报。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些粮食。

3月26日　国务院转发《以进养出试行办法》。指出：要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必须大量地增加进口。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在充分挖掘国内出口货源潜力的同时，积极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大力发展以进养出业务，把出口贸易做大做活，以增加外汇收入。

4月3日～7日　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和修订了《1979年至1985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计划要点(草案)》。成立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王任重任主任。6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纪要》。

4月4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扭亏增盈和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报告》。决定从1979年起，在全国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并成立国务院清产核资、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康世恩任组长。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先念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状况认识得很不够，发展经济的步子迈得不稳，基建规模搞大了，引进工作搞急了。从1979年起要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

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种足种好棉花及实行棉花超购奖励的通知》，规定了棉花收购实行超购奖励的办法。即在原规定的基础上，再加价30%；也可以实行每超购1斤皮棉，奖给1斤商品粮的办法。

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以便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协调起来。

4月13日～5月6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安排了1979年计划调整后的预算盘子。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

5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家农业委员会的任务和机构的通知》。规定：国家农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发展农业的路线，调查和研究国内和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及时了解农业生产建设的情况和问题，并就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和提出建议，并协调农业各部门之间，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中央农业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工作配合。

5月1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下达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指出：国家计委对原订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农业增长速度由原订的5～6%，调整为4%以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由原订的10～12%调整为8%，其中轻工业增长8.3%，重工业增长7.6%。粮食由6395亿斤，调整为6250亿斤。棉花由4834万担，调整为4800万担。钢由3400万吨，调整为3200万吨。财政收支由1260亿元，调整为1120亿元。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由457亿元，调整为360亿元，加上利用外汇贷款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为400亿元。外汇收入由128亿美元，调整为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外汇支出由176亿美元，调整为1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调整后的计划，要求农业和轻工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实现财政平衡和市场平衡。

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副总理兼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兼副主任，姚依林副总理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7月3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规定》指出：社队企业的发展方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今后新办的小铁矿、小煤窑、小电站、小水泥厂，从开办起免税3年，其他新办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经省、市、自治区确定，可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2至3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5年；灾区社队从事自救性的生产，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或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

7月6日～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会议指出，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一定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究实效。互相协作，一定要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搞一平二调。

7月8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

同日　国务院下达《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金额信贷的暂行规定》5个文件，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工业、交通系统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试点。

同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金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决定从1980年起，试行这一财政管理办法。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意两省实行对外经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地方有更多的主动权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包干的经济管理体制方式。

7月23日　国务院转发农垦部《关于尽快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座谈纪要》。提出：①联合企业可以是一个农场单独试办，可以几个农场联合试办。②联合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③联合企业所需资金来源，一是靠自己积累，二是国家每年给农垦部门的基建投资应包括以农场为基础建立的联合企业，三是国家增拨对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长期、微息贷款。

7月26日～8月9日　全国物价工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后，合理调整销价，同时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并适当增加工资及调整工资区类别等问题。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决定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24.8%）；

从 11 月 1 日起适当提高猪肉、牛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主要 8 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补贴。

7 月 28 日　青藏铁路铺轨到第一期工程终点——昆仑山下的格尔木车站。

7 月 30 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谷牧任这两个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7 月 31 日　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8 月 13 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力争到 1985 年外汇总收入比 1978 年增长两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出口任务放在重要位置上，恢复"五先"原则，即在国家计划范围内，安排任务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包装物料供应在先、收购在先、运输在先，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8 月 28 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并颁布《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9 月 2 日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 1980 年和 1981 年计划的安排。陈云提出，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必须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

9 月 9 日　国务院发布命令，授权中国银行办理有关被美国政府冻结资产的收回或提取事项。

9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整顿和发展社队企业》。指出：最近 3 年间，全国社队企业蓬勃发展，1977 年社队企业总产值比 1976 年增长 43.7%，1978 年又增长 25.4%。1978 年，社队企业直接支援农业的投资达 26 亿多元，相当于全年国家农业投资的 60%多。全国参加社队企业的农民，已达 2800 多万人，占农村总劳力的 9.5%，比 1977 年增加了 400 多万人。

9 月 13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已找到 140 多种矿产资源，成为目前世界上已知矿种比较齐全的少数国家之一。其中钨、锡、钼、锑、汞等矿产的储量，居于世界前列。

9 月 17 日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确定旅游业的发展规划是：1983 年接待外国旅游者达到 100 万人，1985 年达到 300～350 万人；外汇收入达到 20～25 亿美元。

9 月 28 日　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授奖仪式，嘉奖工业、交通、基建战线的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祝贺，并颁发嘉奖令。118 个先进企业和 222 名劳动模范受奖。会上宣读了《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倡议书》。

10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平均每天增加 21 个工业企业。现在拥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 35 万个，比 1949 年的 12 万个增加近两倍。1949 年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 124 亿元，平均每个企业 10 万多元。现在仅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就有 3200 亿元，比 1949 年全部工业固定资产增长 25 倍。1949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0%，1978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4231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38 倍，在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中提高到 74%以上。

10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1979 年 2 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累计发放农业贷款 1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0.8%，累计收回到期贷款 83.5 亿元，比 1978 年同期增长 34.2%。

10 月 4 日～10 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工作和 1980 年的计划。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经济问题，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10 月 16 日～11 月 9 日　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座谈了粮油的生产和购销情况，讨论了有关政策和财务问题。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粮食会议纪要》。指出：目前我国粮食一年增产约 100 亿公斤，进口约 1000 万吨，国家粮食收支平衡仍然紧张。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在最近几年内，进口一部分粮食是必要的。

11 月 10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现代化大型煤矿——桑树坪煤矿，在陕西省韩城矿区建成投产，这个煤矿可年产原煤 300 万吨。

11 月 12 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1956 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现在决定将这一部分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份。

11 月 19 日～27 日　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召开。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从 1980 年开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11 月 20 日～12 月 21 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王震、谷牧、康世恩等到会并讲话。会议讨论并拟定了 1980 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确定了财政体制的改革。1980 年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 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3.8%；工业总产值增长 6%。1980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和李先念同志《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外经部等部门《关于经援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应进一步调整援外支出比例，改进援助方式，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技术合作，逐步改革体制，大力加强管理。

12月3日　国务院批转《关于省市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指出：各级供销社要促进农副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要大力组织多种经营生产。强调开展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是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场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要根据供求情况，价格有涨有落，高进高出，低进低出。

12月9日　新华社报道：江苏省今年棉花总产量突破1000万担，成为我国第一个棉花总产达到1000万担的省。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兴化县今年粮食产量达18.5亿斤，成为我国产粮最多的一个县。

12月28日　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第二次授奖仪式，嘉奖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贺词。大会向全国发出了《农业战线全国先进社队和全国劳动模范倡议书》、《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倡议书》。

军　事

2月10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当局从1月15日至2月7日出动大批武装人员疯狂向我境内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70多人。

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16日，中共中央召集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报告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作战问题的报告。

2月17日～3月16日　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2月17日，新华社奉我国政府之命就越南当局不断侵犯我国领土，我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发布声明。同日，我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奉我国政府之命，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递交了新华社声明。3月5日，新华社奉我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宣布我自卫还击已达预期目的，从即日起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并再次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3月16日，我边防部队全部撤回我国境内。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胜利结束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3月23日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作战中的英雄模范和有功人员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

3月25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参加对越自卫反击部队、民兵和支前民工发出慰问信，并派出以王震、方毅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分赴广西、云南边境慰问。

4月14日　以韩念龙副外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同越南方面进行副外长级谈判。韩念龙在谈判中就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提出了原则建议。并阐明，中越两国关系恶化，完全是越南当局造成的。

5月28日　首都居民万余人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英模报告团。徐向前等领导人出席大会，韦国清讲话。31日，华国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英模报告团全体成员。

7月26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联全副武装边防军人，在新疆塔城铁尔沙地区中苏边界设伏，开枪打死打伤我国视察草地进行正常生产活动的干部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外　交

1月3日～8日　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访问我国。

1月5日　邓小平在会见中美建交之际来访的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

1月7日　我国政府就越南当局向柬埔寨发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越南政府，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将民族自卫战争进行到底。

1月8日　我国政府和吉布提共和国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月9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院代表团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向民主柬埔寨提供援助，帮助民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反对越南的侵略，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月23日～29日　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访问我国。

1月29日～2月5日　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在华盛顿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他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

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 月 31 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还签署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的协议。双方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

2 月 6 日～8 日　邓小平副总理在访美归国途中，对日本进行了访问。

2 月 8 日　我国和葡萄牙政府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 月 21 日～3 月 1 日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访问我国。

3 月 17 日～20 日　布隆迪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访问我国。

3 月 26 日～4 月 4 日　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访问我国。邓小平会见麦理浩爵士一行。

4 月 24 日～28 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问我国。邓颖超、华国锋、邓小平分别同他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交换了看法。

4 月 29 日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问我国。

5 月 2 日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访问我国。

5 月 7 日～6 月 5 日　以廖承志为团长、粟裕为最高顾问的"中日友好之船"访问团访问日本。

6 月 16 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老挝驻华大使馆，谴责老挝当局无理限制我驻老挝使馆人数，蓄意恶化两国关系。

6 月 2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爱尔兰政府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7 月 5 日～31 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访问我国。

7 月 6 日～12 日　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问中国。8 日，李先念副总理同马科斯夫人签署中菲两国长期贸易、文化、民间航空运输协定和关于合作建造旅游饭店谅解备忘录等文件。

7 月 9 日～13 日　缅甸总理吴貌卡访问我国。中缅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

8 月 13 日～20 日　斯里兰卡总理普拉纳辛哈·雷马达萨访问我国。

8 月 26 日～29 日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特拉姆·沙阿·德瓦访问我国。

9 月 12 日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亨里克亲王访问我国。中丹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京签订。

9 月 26 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9 月 26 日～10 月 5 日　卢森堡大公让访问我国。中卢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和定期货运航班协议在北京签订。

11 月 12 日～16 日　希腊总理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访问我国。15 日，中希两国政府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1 月 18 日～24 日　由哈立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我国。

12 月 5 日～9 日　日本国总理大臣大平正芳访问我国。6 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

12 月 9 日～15 日　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访问我国。11 日，中吉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定。

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生活

1 月 4 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1978～1985 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1 月 8 日～19 日　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在京召开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62 年经中央批准的对外国留学生"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政治上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生活上适当照顾，严肃管理"的管理教育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5 月 3 日，国务院批转了《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报告》。

1 月 26 日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争取 1980 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 1%以下的具体措施，研究了有关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

2 月 12 日　国家体委召开大会，宣读党中央批准的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建议撤销 1968 年 5 月 12 日对全国体育系统的命令的报告，全部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2 月 19 日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李琦任主任委员。

3 月 5 日～9 日　全国体育总会四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成员，钟师统当选体总主席；讨论修改了体总章程意见，批准了各单项协会组织机构，并通过了致台湾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的信。

5 月 13 日～2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届体育大会在北京举行。年轻女选手高庆在女子小口径标准手枪、60 发慢加速射中成绩超过世界纪录。杜宁生平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7 月 9 日　江苏省溧阳县发生 6 级地震。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地震灾区发出慰问电，并派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

8 月 25 日　内蒙古五原县发生 6 级地震。28 日国务

院副总理薄一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赴地震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

9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 17 岁女运动员陈肖霞，在第 10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 10 米跳台跳水比赛中，获得冠军。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赢得第一块金牌。

9 月 15 日～30 日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在 34 个比赛项目中，有 5 人 5 次打破世界纪录，2 人 3 次打破 3 项青年世界纪录，3 人 3 次平 3 项世界纪录。

10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修订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1979 年版(三卷本)正式出版。修订和出版《辞海》的工作，是 1957 年 9 月毛泽东建议的。

10 月 8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以协调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国家科委三个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聂荣臻任书记。

10 月 11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三位肿瘤医师——孙宗棠、汤钊猷、朱源荣，因发明能应用甲胎蛋白早期诊断肝癌的简便方法，获美国 1979 年度癌症免疫学奖金。

10 月 30 日～11 月 16 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他说：对实现四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标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周扬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大会通过第四次文代会决议。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等 11 人为副主席。

11 月 11 日　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建院 30 周年茶话会。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邓小平在会上说：要认真地注意培养和发现人才，对人要使用得当，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要把学位制度和技术职称赶快建立起来。

11 月 26 日　国际奥委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不能使用目前的歌、旗和会徽。今后使用的歌、旗和会徽须经国际奥委会批准。

11 月 28 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国防科委在这次会议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科研工作、扩大科研单位的自主权、实行合同制等，都是有力的措施，应该积极试行。

12 月 9 日　在美国沃思堡市举行的第 20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我国女运动员马艳红，获女子高低杠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中夺得冠军。

12 月 10 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等单位制定的《工程师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定为：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技师。

12 月 15 日～20 日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成都召开。陈慕华强调指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

12 月 27 日　我国成功地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 41 个核苷酸组成核糖核酸半分子，为天然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打开一条通路。这是我国人工合成核糖核酸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月 28 日　《体育报》报道：我国首次举办的 1979 年度全国“最佳运动员”评选活动揭晓，陈肖霞、陈伟强、葛新爱、吴数德、容志行、聂卫平、栾菊杰、邹振先、宋晓波、吴忻水等 10 人当选“最佳运动员”。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0年

导 言

1980年，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为制定新时期的战斗纲领作准备的一年。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于1980年2月23～29日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在会后公布，在全党执行。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个讲话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11月5日，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十名主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是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制裁，是我国在民主和法制道路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这充分表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的决心。

在经济领域。党在农村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强调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稳定了各地群众欢迎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国务院作出决定，处理"渤海二号"事故，对在这一事故中负有重大责任的石油部领导同志，对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这一事故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给予了处分。它表明了党和政府对人民、对国家、对四化建设的高度负责精神，对整顿党风、维护法纪的坚强决心。

在对外交往上，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首次会议于1980年12月3～5日在北京举行。经过3天富有成效的会谈，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中日两国政府间举行这样规模的实务性质会议，表明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政府支持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的做法，以及美国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的一些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论和美国政府在1980年进一步恢复按新货单向台湾出售武器，背弃了自己承诺的义务，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原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
-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 ●严肃处理"渤海二号"事故
- ●发射运载火箭圆满成功
- ●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首次会议
- ●美国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

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980年2月23～29日在北京召开，是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一.讨论和通过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和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三.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五.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另有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三十七人列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

五中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部分议程包括：（一）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和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三）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全会认为，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广泛地深入人心；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他们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和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受到进一步的揭发批判；历史上遗留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广泛地得到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艰苦奋斗，使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在发展。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基本上转变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这是我们党克服了巨大困难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都要求中央委员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五中全会认为，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

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增选，中央书记处的建立，是党的重要决策，它表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生机蓬勃，人才辈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将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巩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这个文件，根据全会意见修改以后，即将发到全党广泛讨论，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加修改，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党章修改草案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党章修改草案总结历史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需要，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

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共有十二条，它的草案在一九七九年二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三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全会认为，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全会决定在会后公布这个《准则》，并在全党执行。全会要求，在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凡是违背准则的规定的，必须及时地、切实地纠正过来，个别党组织和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继续闹派性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全会重申，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就能使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此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

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并教育党员和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全会认为，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对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和进行批评，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经验证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四大"，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好方法。"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的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会议没有专门讨论经济工作，这是因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已经制定了一九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并且在今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以后，李先念同志又在二月十日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现在全国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很明显，一九八○年全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完成这些任务，将对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发挥巨大的作用。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背景介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特别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会议决定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公安部移送的案卷材料、证据进行审查，并讯问了被告，确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严重，证据确凿。11月5日，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特别检察厅确认十名罪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判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起诉书还指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对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不再追究刑事责任。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十名主犯。在两个月零五天里，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第二审判庭先后开庭四十二次，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有四十九人出庭作证，对八百七十三件证据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做到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的确凿的证据。1981年1月25日，经过对十名主犯的量刑逐个评议，逐个进行表决后作出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陈伯达十八年、黄永胜十八年、吴法宪十七年、李作鹏十七年、邱会作十六年、江腾蛟十八年，以上七名罪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是人

民的审判、历史的制裁，是我国在民主和法制道路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这充分表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的决心。

材料：

- 开庭第一天
- 《半月谈》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

材料一　开庭第一天

——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案主犯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特别法庭银灰色帷幕正中，悬挂着巨大的国徽，右侧墙上，挂着一幅投映罪证材料用的长方形白色屏幕。在审判席的下面，竖着一排灰白色的铁栏杆，栏内放着十把木椅，这就是被告席。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把中华民族推入苦难的深渊，用人民的鲜血和眼泪来浇注他们封建法西斯王朝的大厦，然而他们的野心终于被我们久经锻炼的党和人民所粉碎。这伙欺弄历史的罪人，今天将要在这里受到历史的审判。

下午3时正，铃声骤响。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下令传被告到庭。

法庭书记员开出传票，交法警去候审室带被告人。接着，被告由法警押解，从右侧中门进入法庭，穿过中间过道，一个个地被押上被告席。

顿时，水银灯齐明，场内气氛肃然。电影摄影机和电视录相机同时发出"滋滋"的启动声。一阵耀眼的闪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情景，被一一摄入了镜头：

王洪文，穿一套灰色衣服，推了平头，脸色发黄，双目无神，眼睛机械地眨动着，当年上海滩上"造反司令"耀武扬威的神气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他那庸碌无能的本色。

姚文元，头顶更秃，由于肥胖，两只金鱼眼愈加鼓出。他看起来道貌岸然，甚至在走上法庭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钢笔。但是目光却透露出惶恐和颓丧。

江腾蛟，穿着淡咖啡色的上装，身板挺直，双手合拢着垂放在小腹上。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而今，在他的黑边眼镜后面，现出的是木然的眼光。

邱会作，灰白的头发直立着，双手垂在身后。步履迟缓，神色阴沉。

吴法宪，蓝衣服罩着肥胖如故的身躯，厚厚的嘴唇外翻着，双眼有两个明显的黑圈。他象笨鸭般一摇一晃地蹒跚而行。

黄永胜，背微微佝偻，长着不少老年斑的头不时颤动着，显得特别苍老。

陈伯达，衰弱老朽，行不成步，在法警的扶持下，蹒跚地向前挪动。他着灰色棉罩衣，光头，仍然象过去那样在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满面是慄慄危惧的神色。

李作鹏，脸色灰黄，皮肉松弛，取掉了过去公开露面时总戴着的那副装腔作势的墨镜，眼光黯然，神情沮丧。

张春桥，身穿一件黑色中式对襟上衣，领口敞开。他推了平头，灰白的胡子足有半寸长，脸阴黑，嘴紧闭，头歪斜，还是那样阴阳怪气，眼睛透出敌视的凶光。他站在被告席上，扬起脑袋，向审判席上扫视。

江青，穿着一件低领黑色上衣，没有像过去那样穿戴风衣风帽，也没有用大围巾把头裹起来。她走进法庭，做作地挺直身子，左右张望，苍白的脸上残存着往昔那种神经质的傲气，也现出一种故作的镇静。在无数双愤怒的眼睛逼视下，她被两名女法警押上了被告席。

十名犯人站在铁栏里，从左至右：张春桥、李作鹏、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江青、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姚文元。

当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开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时，江青、黄永胜、吴法宪先后戴上了助听器的耳机。在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张春桥时而耷拉下脑袋佯装打瞌睡，时而扭过头去，向右边江青等人的座位上张望。江青不时地左顾右盼，还矫揉造作地用手梳理头发。

旁听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屏息静气地听着黄火青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指控。他们之中，在十年浩劫期间，不少人遭受过诬陷、迫害和株连，他们既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罪行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见证人。

起诉书宣读完毕。法警把被告押下。5时20分，江华庭长宣布休庭。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判，从11月20日起正式开始了。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主犯，已经被历史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无论他们怎样狡辩、抵赖，也永远不得解脱！

《解放军报》记者
孙浩刚　钱钢

材料二 《半月谈》杂志发表编辑部文

关于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问答

新华社 12 月 21 日讯 将于 12 月 25 日出版的《半月谈》杂志第 16 期，刊登编辑部文章《关于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问答》，全文如下：

问：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强调必须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

答：实事求是地区分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反革命帮派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法庭只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后者不是法庭能够处理的问题，而是需要另行处理的问题。

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是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严格地从本质上加以区别，势必扩大打击面，误伤好人。干革命，做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正确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路线错误，都应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团结——批评——团结"加以解决，并且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吃一堑、长一智"，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

问：党内路线错误如何处理？

答：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时处理王明路线问题，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是一个典范。王明路线也造成了一场浩劫，苏区差不多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差不多损失十分之十，灾难还不大吗？但因为那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我们党并没有为此追究谁的刑事责任，而是通过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于总结经验教训，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原来预计五年，实际仅三年半，就消灭了 8 百万国民党军队，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证明，当年处理党内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问：林、江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帮派，还是两个帮派，应按一案，还是两案起诉、审判？

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两个帮派。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所列的大量材料，对这两个反革命帮派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处，比较容易审理。因为在林彪等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篡国失败，随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以前，林、江等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是林彪、江青，"军师"是康生、张春桥。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1 年 9 月被粉碎后，"四人帮"竭力掩盖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罪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把"两案"合在一起审理，就很难搞清他们整个的反革命阴谋和罪行。

问：反革命罪行同工作、政治错误能不能分得开？

答：难是难，但只要认真研究事实，还是可以分清的。从起诉书看，谋杀毛主席，策动武装叛乱，阴谋分裂国家，怎么同错误分不开？康生等捏造罪名，诬陷那么多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监委委员、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林、江一伙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迫害那么多党、政、军领导骨干和干部、群众，这么大量确凿的罪行怎么同错误分不开？

有人提出，给刘少奇同志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是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怎么能把领导上的错误同林、江一伙对刘少奇同志的诬陷、迫害分得开？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在法律上并不难分。首先，制造伪证、诬陷迫害同偏听轻信、错误判断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从时间看，早在 1966 年 8 月，也就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前两年零两个月，当刘少奇同志仍担任国家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林彪、叶群就施展阴谋手段，指使雷英夫制造伪证，进行诬陷。江青为了把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早在 1967 年 5 月至 10 月，也就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前一年多，就擅自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等 11 人，并指使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杨承祚等二人因此被迫害致死。从起诉书看，很清楚，制造伪证、诬陷迫害的是林、江反革命集团。透过"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透过现象看本质，哪些是好人犯错误，哪些是反革命罪行，是可以划分清楚的。

问：人们常说，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两面派。"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凭借着地位和权力，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可是，既然是反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答：反革命，是讲他们的本质、原形；合法、非法，是讲他们采用的手段、方法，他们的活动形式。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是搞阴谋的，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不注意研究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两面派特点，很多问题就搞不清，就要上当。"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甚至盲目追随，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或坏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对林、江一伙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认识不清，缺乏警惕。这个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问：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要严格依法办事。依什么法？

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法，而不是依外国的法。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论什么外国的法，在中国一律无效。司法工作和立法工作不同，我们在立法时，不论外国的法律、法理，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法理，都要研究，对我们有用的好东西要吸取，各种意见都可以"百家争鸣"。但是，执行法律，就只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

问：我们的审判原则是什么？

答：一条，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再一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判刑；没有口供，被告不承认，但证据充分确实的，也可以定罪判刑。不管被告是否认罪，可以按照证据依法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对江青等当然同样适用。

问：黄火青、江华、伍修权都是起诉书中列举的受害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们是不是应该回避？

答：不回避。道理很简单，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他们给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受害者。如果回避，就都要回避，就只能让江青等"四人帮"和黄、吴、李、邱等自己审判自己了。那怎么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代表国家对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起诉、审判的，不存在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

问：为什么这次只审理十名主犯？

答：起诉书列的主犯有16名，其中林彪等六人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起诉书中也列了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是集团犯罪，又是主犯，如果不列他们的罪行，整个案情就无法弄清。其他人犯怎么办？这十名主犯审判了，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其他人犯，不是不审，而是该审的依法另审，分别由最高法院、军事法院、地方法院陆续去审。

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共48条，有人说列的少了。林、江反革命集团确实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但起诉书不是政治声讨书，是要用犯罪事实和法律讲话的，应采取少而精确的原则，只列举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容易认定他们的罪行的和证据确凿的就足够了。

有一类问题，没有列入起诉书。因为在这些事件中，林、江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和领导上的错误纠缠在一起，不易划清。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上的错误、功过是非，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党要做的另一件事，不是法庭审判中的事。江青等主犯就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与领导上的错误扯在一起，把水搅浑，把问题搞乱，借以逃避他们的罪责。我们不要上当。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党中央正在进行。

原文载于《解放军报》
80年12月22日第4版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背景介绍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一项主要议程，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

五中全会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决定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举行追悼会。

刘少奇治丧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宋庆龄等108人组成。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追悼会前，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专程前往郑州迎接刘少奇的骨灰，并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赵文甫一起于5月14日将骨灰护送到北京。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将撒在祖国的大海里。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同时在收音机、电视机旁收听或收看了追悼大会的实况。

3月，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在全国各地发行。在此期间，全国报刊还重新发表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1940年7月1日)《答宋亮(即孙冶方)同志》(1941年7月13日)《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941年)等。中共中央并决定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

5月21日，《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展览》陈列了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史料和实物；《展览》还展示了刘少奇担任党的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期间，参与党和国家的各项领导工作，进行广泛国事活动的大量照片、文献和文物，重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

少奇的光辉历程。

为了表示对刘少奇的深切的悼念，全国各大报刊还陆续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和回忆录，从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叙述了刘少奇的光辉的革命的一生。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节选）

· 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节选）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〇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一）、（二）、（三）、（四）部分从略）

（五）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原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实践证明，建国以后十七年，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样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期间，尽管我们党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刘少奇同志也犯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外事活动方面，刘少奇同志一向是按照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路线行事的。所谓“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纯系罗织“罪名”。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

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材料二　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青年时代参加了“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刚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二年，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后参加领导过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及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英勇斗争。一九二七年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到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了顺直省委（即河北省委）的领导，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秋，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一九三二年冬，刘少奇同志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在华北地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初期，他深入敌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刘少奇同志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年五月任华中局书记，同陈毅同志等一起，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

刘少奇同志长期以来，是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四三年，他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四七年春，敌人进攻延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彭德怀同志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同志一起，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刘少奇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为止。

刘少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贯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勤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并且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他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国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的工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重要的建树。他在这几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是党和人民几十年英勇奋斗的经验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有力的宣传。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少奇同志长期以来，是我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组织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他在我国早期职工运动中竭力倡导的重视工会组织作用、提高职工群众觉悟、关心广大工人切身利益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镇压，党内一部分干部的盲动反抗情绪有所滋长。刘少奇同志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地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并且注意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和发展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当时虽然受到压制和诋毁，但是抗日战争前夕他关于白区工作的经验总结，却受到了全党的重视，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白区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几次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他曾经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的罪恶活动以及王明在抗日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作过坚决斗争。历史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不愧为坚定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国以后，刘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主张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并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一样，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他总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和对内对外的政策，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态度。

刘少奇同志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强调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纠正，勇于承担责任。在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对党对人民无限信任的革命品质。

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

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反动统治阶级逮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摆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面前。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实现这个历史任务的根本保证。我们悼念刘少奇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他的遗愿，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全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

心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严肃处理"渤海二号"事故

背景介绍

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1979年11月25日在渤海湾内翻沉，造成船上职工72人死亡和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这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责任事故。

造成这次严重事故是与石油工业部领导人严重违章，强行下达任务瞎指挥分不开的。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人在接受石油部命令"渤海二号"紧急迁移井位的难于完成的任务以后，严重违反科学，违章指挥，置工人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损失于不顾，采取了违反拖航安全的错误做法，冒险降船、拖航，是导致"渤2"事故的直接因素。海洋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马骥祥和副局长王兆诸，在听取"渤2"拖航会议所做错误决定的汇报时，对"渤2"钻井船队长刘学的合理建议不认真考虑，没有组织有关人员对拖航决定进行审查研究，尤其是在事故发生前一天，在天津、河北、山东的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警报之后，没有引起警惕，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海洋石油勘探局副总调度长张德经不采取刘学的合理建议，在制定拖航计划时也不按照有关规定办事。海滨282号拖轮船长蔺永志，在钻井船翻沉后，没有及时发出遇害国际呼救信号，也没有及时测报"282"号拖轮和"渤海2号"船的准备位置，抢救落水人员不力。

这一严重事故发生后，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事故发生8个月后，石油部仍然没有严肃对待。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严格督促，全国总工会和社会舆论同声指责，石油部才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比较深刻的检查。

为了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石油工业工作的管理，1980年8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1980年9月2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公开审判了"渤2"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材料：

- 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
- 就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宋振明向国务院作的检讨报告

材料一　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

（1980年8月25日）

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1979年11月25日在渤海湾内翻沉，造成船上职工72人死亡和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这是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我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经国家经委、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天津市劳动局、天津市经委、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总工会、塘沽区劳动局、塘沽区公安分局、塘沽区人民检察院共同组成的检查组查明，海洋石油勘探局在接受石油部命令"渤海二号"紧急迁移井位的难于完成的任务以后，采取了违反拖航安全的错误做法，冒险降船、拖航，是造成这次不应有的惨痛事故的主要原因。

这一严重事故发生以后，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事故发生八个月以后，石油部仍然没有严肃对待。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严格督促，全国总工会和社会舆论同声指责，石油部才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比较深刻的检查。

"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石油部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石油部领导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国务院领导对这一严重事故处置不当，也是重要的失职，应当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国务院会议在听取石油部和其他有关各方的报告以后决定：(一)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提请人大常委会批准。(二)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三)国务院对"渤海二号"死难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石油部的全体职工，尤其是大庆油田的职工，在艰苦条件下开发我国石油事业，作出了中外周知的光荣贡献。石油部在组织领导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辛勤工作。石油部提倡的"三老四严"作风，"二分法前进"原则，"岗位责任制"等管理制度，对全国工业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今后也仍然适用。但是，由于石油部主要领导同志在成绩面前逐渐骄傲自满，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以致一些石油企业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多次发生重大事故，而且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国务院严肃处理这次事件，既是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必需，同时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我们的石油工业所必需。希望石

油部及所属单位各级负责同志振奋革命精神，切实总结教训，作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决定。希望石油部门全体职工团结一致、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要停步，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要气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石油勘探和生产任务继续积极努力。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和石油部其他企事业单位均应认真吸取"渤海二号"事件的教训，改善领导，尊重科学和民主，尊重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坚持正确指挥，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显著的进步。

"渤海二号"的事故不仅是对石油部门的一个重要警告，也是对全国其他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一个严重警告。安全生产是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头等大事。各企业和主管机关的行政领导同志和各级工会，都要十分重视安全生产，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职工的安全，努力防止事故的发生，绝对不应采取任何粗心大意、漫不经心的恶劣态度。在生产斗争中，发生某些确实不能预料和不能抵抗的不幸事故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任何对职工安全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借口。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尽一切努力，在生产劳动中和其他活动中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伤亡事故，否则就是违背了我们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一切重大的责任事故，必须严肃处理，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不得姑息宽容。各级劳动部门和各企业都要大力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保卫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组织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作用。对工人、技术人员和专家关于安全情况安全措施的建议和批评，必须认真对待。对于揭发控告忽视安全生产现象的职工，决不允许打击报复，如有打击报复者必须法办。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国务院相信，通过上述各种措施，全国各部门职工和领导机关，一定能够齐心协力，使我国整个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状况得以巨大转变，从而大大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作出重要保证。

材料二　就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宋振明向国务院作的检讨报告

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明8月23日关于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向国务院作的检讨报告，全文如下：

国务院：

我部接到国务院关于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决定事项的通知以后，进行了多次学习讨论。大家完全接受国务院、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一致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教育极深，震动很大，决心端正态度，从思想作风上深刻检查，坚决改正我们的严重错误。

我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是一起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也是建国以来石油生产建设上一次最严重的事故。这次事故死亡职工72人，直接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我们心情十分沉痛，深感有愧于党和国家的委托，对不起殉难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国务院、党中央的严肃批评，广大群众包括报纸和其他方面的严肃批评，都是对我们的深刻教育。

"渤二"翻沉事故的根本原因，正如国务院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是我部领导在成绩面前骄傲了，不那么尊重科学，不那么尊重工人群众、专业人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并影响了下面某些领导干部。这个批评十分中肯，非常正确，打中了我们的要害，指出了我们思想作风上的主要问题。

多年以来，我们部领导上确实存在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石油工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各地区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依靠广大职工努力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适当地估高了自己的作用。以"先进"自居，爱听赞扬，不爱听批评，讲成绩沾沾自喜，讲缺点轻描淡写，不能虚心学习别人的好经验。说话口大气粗，盛气凌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往往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在有些问题上搞得上下左右关系紧张。这种思想作风在"渤二"事故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一）由于骄傲，我们容易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主观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做了一些超越客观可能性的计划。

这些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往往是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实际，用过去搞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不适当办法来搞生产建设。安排生产计划，考虑需要多，考虑可能少，不量力而行，不留有余地，储量没有搞清就定产量指标，搞地面建设。组织生产建设，习惯于大轰大嗡，动不动搞人海战术的"大会战"，"打擂比武"，说大话，说空话，图形式，走过场，搞了一些不求实效的事情。在生产任务紧的时候，往往不对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片面强调"苦战""恶战"，不适当地提倡加班加点等等。这些都是我部领导工作中"左"的思想的反映。

这次"渤二"事故就是我们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去年部里规定渤海新增储量两千万吨，到10月底还没有完成。虽然那时离上冻时间已经很紧，我们仍然安排年底前再打一口探井，并提出了进尺、取芯任务。这就促使海洋局仓促上阵，不顾安全抢时间，使"渤二"冒险降船、拖航，终致酿成大祸。这个深刻教训说明，上面主观规定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助长下面的"瞎指挥"，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

（二）由于骄傲，我们往往不讲科学，盲目蛮干，只强调革命加拼命，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

在有些工作中，我们没有很好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甚至把一些违反科学、冒险蛮干的事情看成是“解放思想”、“有干劲”，把一些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做法看成是“害怕困难”、“没有干劲”。猛打猛冲、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是宝贵的，必要的，但是它只有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才能办成好事，否则就会走向冒险蛮干，忽视生产安全。我们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作细致的科学分析，经常喜欢一个“大”字，用大动员、大学习、大检查、大评比、大总结等办法代替扎扎实实的工作。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常常搞突击，拼设备，拼体力，钻机超负荷打井，油井超能力生产，地面工程不完善就凑合投产，有些油田甚至连开发方案都没有就匆匆忙忙投入开发，给生产建设留下隐患。平时布置工作任务，讲生产指标多，抓安全措施少，解决生产问题急如星火，解决安全上的问题一拖再拖，造成安全管理工作十分薄弱，规章制度未能认真执行，“学费”一掏再掏，教训没有认真吸取，重大事故连续发生。

我国海上石油勘探是一个新的事业。海上作业比陆上复杂得多，危险性也大得多，应当更讲科学，更讲安全。但是，我们没有认真这样做，不重视科学管理。许多海上安全的规章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自己不懂也没有认真去学，多次出国考察对安全问题了解得很少。明知海上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我们没有下决心严格训练，培训工作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对海上技术装备，包括采油平台、钻井船等，缺乏严格的安全质量标准，以及船舶入级、定期检修等制度，许多都是凑合上去的，隐患很多。

渤海二号钻井船从国外购买时，带有技术资料和操作规程，对拖航作业有明确的技术要求。但引进7年来，稳性计算书等一些资料一直没有翻译过来，有些翻译出来的资料也没有组织职工学习掌握。我们自己虽然订了使用暂行规定，但没有严格执行。这次长距离拖航，既没有分析预测气象情况，又没有按规定排压舱水和卸载，连掉入沉垫箱上的潜水泵也没有打捞，致使该船吃水深，干舷低，稳性差，在拖航途中受风浪袭击而倾覆。这是违章指挥，冒险蛮干，不讲科学的恶果，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三）由于骄傲，我们常常自以为是，缺乏民主，缺乏商量办事作风，不尊重工人群众、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不尊重兄弟部门和地方同志的意见。

这些年来，我们没有认真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作风，自恃高明，“一贯正确”。在与兄弟部门和地方的交往中，不能平等待人，口气大，说话冲，态度生硬，容不得不同意见，动不动就把人家顶回去。在石油工业内部，我们也缺乏民主作风，不注意发挥企业干部积极性，不注意听取下面的意见，对一些与我们不同的意见更是不容易听进去，因此容易作出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而且不容易得到纠正。这种思想作风也直接影响到一些石油企业的领导干部，造成很不好的后果。

在渤海安全作业问题上，过去天津市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外国专家，都给我们提出过建议和意见。但我们强调客观条件，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直未予重视，一些能办到的事也没有办好。这次确定“渤二”打井任务时，海洋局有些干部和技术人员提过不同意见；在“渤二”拖航前，钻井船队长刘学同志又三次提出合理建议，但都没有采纳。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民主作风好一些，这起事故是有可能避免的。

（四）由于骄傲，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滋长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在对待工人群众的生命安全上，一些问题更是不能容忍的。

1975年以来，直到这次“渤二”事故前，海洋局曾经发生各类大小事故1042起，其中重大事故33起，死亡职工33人。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严肃对待，在要求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没有把保障安全放在首位。对安全作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没有抓紧建立健全。对一些能解决的防护、救生设备（如防水工作服、防水耐寒救生衣等），没有抓紧解决。对已有的一些救生设备，没有组织严格的使用训练。对影响安全的各种隐患，没有认真检查、消除。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没有认真查明原因，严肃处理，总结教训。这就使问题越积越多，以致发生“渤二”翻沉这样的恶性事故。在群众生活问题上，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认真解决。

（五）“渤二”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对事故严重性缺乏认识，强调客观，开脱责任，态度是恶劣的。

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安排善后工作的同时，和在善后工作告一段落后，没有认真查明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而把这次事故作为遇到强大风浪袭击造成的意外事故。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急急忙忙地想表彰先进，这实际上是在掩盖错误，推卸责任。我们这种思想也影响海洋局领导干部，给中央有关部门和天津市调查组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天津市调查组的深入工作，在大量事实面前，我们虽然承认是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但总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存在不少原谅情绪，错误地强调海上人员技术水平低，没有经验，装备差，许多条件不具备，发生一些事故是难免的，而且海洋局许多干部找油心切，出发点是好的。因而在事故责任者的刑事处分问题上，总是思想不通，向有关单位说情，借口不要影响干部积极性，想大事化小，开脱罪责。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5月底向中央、国务院的检讨报告就不可能深刻。这也影响了海洋局一些同志，使他们对错误的认识上有反复。

今年6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全国第三次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上，对我们提出批评，以及报纸上公开批评以后，我们对追究事故责任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仍然没有想通，

抱着消极等待处理的态度。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对事故责任者的原谅，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原谅，袒护他们的错误，实质上是不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不严肃处理少数犯错误的干部，是对广大群众生命安全不负责任，这才真正影响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实践再次证明，骄傲了就要犯错误，就要摔大斤斗。我们在"渤二"事故问题上，错误是严重的，影响是很坏的。我们定于25日召开石油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指示，检查我们的错误，听取企业同志的批评，并在他们回去以后，进一步征求群众意见，切实改变我们的思想作风。

为了挽回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请求给予撤销我的部长职务的处分。

我们请求把"渤二"事故和我们的错误通报全国，把我们的检讨在报纸上公布；并希望中央、地方有关部门和报刊继续给我们批评帮助，以更好地教育我们。

我们要把"渤二"事故的沉痛教训变为动力，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团结广大职工，为发展石油工业做出贡献。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石油工业部部长　宋振明

1980年8月23日

发射运载火箭圆满成功

背景介绍

1980年5月18～21日，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向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和一切从事试验的有关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贺电指出，这次试验，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这对于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为四化建设而忘我劳动的各族人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材料：

- 飞向太平洋

材料　飞向太平洋

——我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目击记

天刚黎明，火箭发射场区一片紧张的战斗气氛。人们盼望已久的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就要开始了。

高大的发射塔架，环抱着乳白色的巨型运载火箭，耸立在发射场上。各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对火箭起飞前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操作，随即撤离现场，满怀激情地等待着发射时刻的到来。

在地下发射控制室里，指挥员凝视着电子钟的时间指示，听取各操作手报告的每一个字，作出决断，发出口令："十分钟准备"……"五分钟准备"……"一分钟准备"……。随着最后几秒钟的到来，场区上的各种跟踪测量设备开机，高速摄影机、磁带记录仪等记录设备启动起来。

"点火！"令下。发射控制台上年轻的操纵员沉着果断地按下了电钮。火箭发射场立即传来连绵不断的巨大轰鸣声。这声音像山崩，像海啸，震颤大地。巨大的火箭拔地而起，冉冉上升，尾部喷着辉煌的火焰，直上云天。

"发射成功了！"人们欢呼着、目送着腾空而去的火龙，心潮象海浪一样翻滚。

多少个日日夜夜，无数战斗在国防科研阵地上的尖兵，为研制、发射大型运载火箭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火箭在蓝天扶摇直上。几秒钟后，垂直上升的火箭开始拐弯；几十秒后，火箭排出的燃气在空中凝成烟雾，宛如一条白练在长空向东南方向延伸；最后在茫茫的天际里，渐渐变成了一个小亮点，穿出了大气层，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然而，从我国本土到远洋测量船队，几百套我国设计制造的现代化测量通信设备，却紧紧"咬"住人们肉眼看不见的小亮点，精确地测定、记录和报告着火箭在每瞬间的飞行速度、高度和姿态。每一秒钟都有大量的测量数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测控数据交换中心。测控中心通过各种精密设备和线路，把所有参试单位联接成一个紧密的战斗集体，及时地汇集、交换各参试单位之间的数据资料，不断地向各测量台站报告着火箭飞行数据，引导它们准确地跟踪火箭；并且把各台站所测信息和火箭飞行情况及时转送给发射场区的计控中心和指挥中心。喜讯不断传来："跟踪良好！""工作正常！""飞行正常！"

在飞行控制中心，一排排电视屏幕上，频频变换着五颜六色的数码，自动记录仪在显示板上轻轻地描下了火箭飞行轨迹的曲线。这条曲线，与事前标上去的理论弹道曲线紧密地吻合在一起，它形象地告诉人们：火箭内部仪器工作正常，火箭飞行正常！

火箭在太空飞行了一长段时间后，再次进入大气层，直向太平洋预定海域飞来，一切正常，胜利在望了。人们个个喜形于色。

太平洋上，波光粼粼。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一艘艘测量船、打捞船，宛如迎宾的仪仗队，整齐地排列在火箭预定落区的两侧。人民海军的一艘艘驱逐舰在船队周围巡逻。一架架遥测直升飞机飞上了蓝天，配合测量船上的各种测量设备，捕捉着它的踪迹。

火箭高速向预定溅落海域飞来。

"发现目标!"人们纷纷拥上甲板,目不转睛地向船队西北上空望去。不一会,一个亮点钻出云层,拉出一道耀眼的白光,直向预定海域飞来。亮点越来越大,在距离海面还有几千米高度时,装有火箭飞行重要参数的仪器舱,自动从火箭头部弹射出来、打开降落伞,徐徐飘落洋面。火箭头部则"扑通"一声入海,激起冲天的水柱。仪器舱落水时,荧光染色剂把蔚蓝色的海水染成翠绿色,象一条数百米长的锦带漂浮在洋面上,绚丽多彩,好看极了!

这时,早就在附近等待的一艘工作快艇如离弦之箭向落区开进。我打捞直升飞机迅速向落点飞去。飞机到达仪器舱上空,垂直悬停在离洋面三十米的空中。潜水战士沿着悬梯,跳入海洋,仅用五分二十秒就把仪器舱胜利打捞上来。直升飞机载着仪器舱,安全飞回打捞船的飞行甲板。

至此,我国从本土向太平洋海域发射的运载火箭,飞越万里长空,获得了圆满成功。

"火箭落入预定海域!""测量回收任务完成!"这胜利的消息,通过测量船上强大的通信电波,迅速传到祖国各测控台站,传到发射场,传到首都北京。船队汽笛长鸣,彩旗飘舞,远离祖国的人们在甲板上欢呼、跳跃,争相握手庆祝。

"我们胜利了!"从陆地到海洋,各参加试验的单位,直到总指挥部的人们,顿时掌声雷动,欢庆胜利。

新华社记者

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首次会议

背景介绍

中国国务院成员和日本国内阁成员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0年12月3～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举行是同年5月中国总理和日本首相在东京商定的。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姚依林、黄华等,日本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外务大臣伊东等6位内阁大臣。

两国政府成员就国际形势和两国的外交政策,双方的经济、财政政策和两国间的合作关系等问题坦率地、认真地交换了意见。会上,谷牧副总理强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以及为此采取的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中国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往来和技术合作的政策将会长期实行下去,中日两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是很宽广的。黄华副总理介绍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姚依林副总理介绍了中国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措施和取得的成效。伊东外务大臣强调,柬埔寨问题、印支难民问题、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是当前国际局势中不安定的因素。他说,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亚洲的稳定是个重要因素,日本政府期待着这一良好关系的发展。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河本敏夫介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方向。大藏大臣渡边美智雄介绍了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

12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分别会见了参加会议的日本6位大臣。邓小平说,中日两国的合作,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是长期的事情。

会议期间,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日本政府给中国政府1980年度560亿日元贷款的换文在北京签字交换。

经过3天富有成效的会谈,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中日两国政府间举行这样规模的实务性质会议,表明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正如赵紫阳总理所指出的,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材料:

· 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第一次会议联合新闻公报

材料 中日政府成员会议
第一次会议联合新闻公报

(1980年12月5日于北京)

一、中国国务院成员和日本国内阁成员级会议(简称"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第一次会议自1980年12月3～5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对外贸易部长李强、煤炭工业部长兼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高扬文、铁道部长郭维城、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仪、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及驻日本大使符浩等。余秋里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会见了日本方面有关政府成员。

日本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外务大臣伊东正义、大藏大臣渡边美智雄、农林水产大臣龟冈高夫、通商产业大臣田中六助、运输大臣盐川正十郎、经济企划厅长官河本敏夫及驻华大使吉田健三等。

二、日本方面政府成员于12月4日拜会了中国共产党副主席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日本方面转达了铃木总理大臣对赵紫阳总理的访日邀请。赵紫阳总理表示中国政府邀请铃木总理大臣访问中国。

三、会议以下列事项为议题进行了讨论:

1. 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总的评价;
2. 双方的经济、财政政策;
3. 两国间的合作和交流问题。

四、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柬埔寨问题以及亚洲地区的形势，坦率地、认真地交换了意见，确认中日两国要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作出努力。

五、双方认为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正在愈益扎实地发展，并对首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在这种中日友好的高潮中召开表示满意。双方确认，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应该进一步增进交流，不断加深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发展和加深两国间的持久的、不可动摇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

六、双方就两国的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

中国方面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的方针政策，以及今后发展的重点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日本方面就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最近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运用、财政政策、中期经济计划等进行了说明。

七、双方对迄今两国间贸易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并确认今后继续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扩大贸易的重要性。

双方对两国间在开发石油、煤炭等能源领域中的合作正在进展表示欢迎。日本方面希望中国方面长期稳定地对日本供应能源，中国方面说明了目前努力加强石油和煤炭开发的实际情况，表示愿尽量做出努力。

八、双方高度评价两国间迄今为止的经济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作出了贡献。双方对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进行的关于1980年度提供不超过560亿日元贷款份额的换文，以及“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计划的顺利执行表示满意。

双方并且确认迄今在铁道、港湾等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在医疗保健、企业管理、水力发电等方面进行的各种技术合作的成果，希望这样的合作关系今后继续得到发展。与此相关联，日本方面认识到农业在中国经济建设上的重要作用，表示准备在农业领域中对中国东北地区三江平原开发计划进行新的技术合作。

中国方面高度评价日本方面在这个领域中的积极态度。

九、双方认为，为了中日间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顺利发展，缔结租税条约及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是有意义的，一致认为应早日开始为此目的的谈判。

十、双方对中日间海运关系的扎实发展表示满意，并同意今后继续为促进中日间货运定期航线的开设而努力。

十一、双方高度评价中日间文化交流近年来正在广泛的领域内扎实、活跃地进行，并一致认为应充实在此领域内的交流和合作，以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各阶层人民间的友好和相互理解。

十二、日本方面对中国方面为至今在中国居留的许多日本孤儿寻找亲人，为实现他们的临时回国所作出的合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今后进一步给予照顾。对此，中国方面表示理解，并表明今后也将给予合作。

十三、双方同意，下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在日本召开，具体时间今后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日本方面对中国方面为召开首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所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

美国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

背景介绍

1980年6月21日，针对美国总统竞选中发表的一些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论，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指出，不要做有损于中美关系的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长远的战略全局观点出发的，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事情，不只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违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利益。

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1980年进一步恢复按新货单向台湾销售武器。美国国会批准向台湾出售的军事装备包括“隼式”防空导弹、“陶式”反坦克导弹、舰载武器发射控制系统和经过改进的电子识别系统等。美国国务院还允许美国公司同台湾讨论出售新式FX型中程战斗机等问题。美国政府违背中美建交协议的原则，进一步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装备，这是有损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行为。

10月2日，“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这两个非官方机构竟签订互给对方以外交权和豁免的协议，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这是完全违背中美建交协议的。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上，美方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向美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林兆南分别就此事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了交涉。

材料：

- 里根坚持要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
- 美国公然违犯中美建交原则

材料一　里根坚持要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

洛杉矶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昨天在洛杉矶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表明，他仍然坚持他在对中国关系上的错误立场。

里根在这项声明中谈到他处理美中关系的5条"指导原则"时，一方面说他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说"正常化是一种良好的政策抉择"，说美中关系"对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是重要的"，他愿意"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但另一方面他又指责美国现政府在同中国建交时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3个条件。他在声明中绝口不谈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所确认的各项原则，却以执行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为借口，再次宣称他主张在台湾设立"联络处"，并说他"打算使美国和台湾关系依照台湾关系法得到发展"，他还硬说"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说他不会"声称得到国会通过的我们现在同台湾建立的关系不是官方关系"。这表示里根仍旧坚持他的"两个中国"的错误主张。

（新华社）

材料二　美国公然违犯中美建交原则

非法授予台湾驻美非官方办事机构以外交特权

昨天在这里签署的一项协议规定台湾在美国的非官方办事机构可以享受外交特权，从而公然违犯了中美建交的原则。

这项协议是由"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签署的。

当新华社记者向美国国务院询问此事时，国务院负责官员回答说，美国政府"很清楚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协议"，它"对此没有表示反对"。

"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美国和台湾在中美建交以后互相在对方设立的非官方机构，用以处理贸易、商业等民间关系。这项协议的签订，事实上使这两个机构的人员成了正式的外交人员，只是没有这样的名义而已。

一位美国观察家在评论这项协议时指出："从理论上说，美国和台湾只有非政府级的联系，但实际上，正式外交关系的各种标志现在几乎全都存在。"

美国方面的这一行动公开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众所周知，"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民间机构，它们无权授予对方以只有外交人员才能享受的特权。为什么它们可以享受这些特权呢？当记者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国务院时，国务院官员搬出了《台湾关系法》，用它作为美国政府支持这项协议的借口。但是，《台湾关系法》本身就是同中美建交公报背道而驰的，而且它是美国的国内法，怎么能用来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法律基础呢？

人们记得，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方面曾一再申明，美台关系是"非官方的、非政府间的关系"。现在美国政府竟然自食其言，这实在令人吃惊。

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9月22日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将5艘海军舰只卖给台湾。

美国方面的这些做法，严重损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广大中国人民正以愤慨的心情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

风　云　人　物

赵　丹

赵丹（1915——1980），山东省肥城人，人民艺术家。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国画。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话剧活动，并进入电影界。从《琵琶春怨》开始，几年里他先后参加拍摄了二十多部影片。特别是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中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1937年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他赴新疆开拓戏剧工作，遭到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残酷迫害，入狱五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昆仑影片公司，主演了《遥远的爱》《乌鸦与麻雀》等影片。解放后，他成功地塑造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艺术形象，为中国电影的表演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四人帮"对他进行迫害，关押了五年多。逝世后，文化部、中国文联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

材料　明星陨落

我国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赵丹这一颗明星陨落了。

10月9日午夜，我因为发风疹，折腾到10日凌晨两点半，才稍稍平复。仿佛朦胧入睡，又仿佛听见电话铃声，我跳下床接电话，电话铃中断了。起初以为是自己神志恍惚听错了，但又放心不下，想到8日晚上接到他病危的电话，当时正有外事活动，无法分身，清晨，听说他病情好转，我怕现在再出现危险情况，所以连忙打电话到北京医院病房探问，没想到阿丹已于2时40分逝世。这时，差不多已将近4点钟了，我急忙赶到医院，阿丹的一些老朋友丁峤、袁文殊、黄宗江等同志已经伫立在他的床前，接着，司徒慧敏、童大林等同志也赶来了。我看见阿丹安详地躺在床上，周围围着他的孩子：赵青、赵矛、周民、(还有周伟没有赶到)、赵桔、赵左和赵劲。孩子们有的抓着他们爸爸的手，试看还有没有脉搏；有的将电筒的玻璃片放在他们爸爸的鼻孔前，试看还有没有呼吸。宗英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说，孩子们不相信爸爸已经死了。他们执拗地以为他们亲爱的父亲仍然活在世上。

我坐在阿丹的床边，捏着他的左手，也寻找他的脉搏。谁也不肯相信他的生命之火就此熄灭，他那富于表情的、聪慧的眼睛不再睁开。

我看他躺在床上，像静静地入睡了一样，那么稚气，又恢复了年轻时候的样子。在他的枕边放着一束干枝梅。宗英说，这束干枝梅是宗英的堂兄植物学家黄宗甄同志从内蒙古带来的。他说，干枝梅被摘断以后，没有水，没有土，两年花不落。他希望阿丹也能像干枝梅一样再继续开放艺术之花，并且还要开得很旺盛。但是，残酷的癌症夺去了人民艺术家赵丹的生命，他不能再在银幕上创造艺术形象了。可是我想阿丹的艺术生命又岂只像干枝梅一样，枝断后才活两年呢，不，阿丹虽已去世，但他的艺术生命将长久活下去。我劝宗英，要她保重，她说："我知道我的责任，阿丹的书还没有写完。"宗英将在《到天堂之路》中继续为阿丹总结电影艺术创造的宝贵经验。

我坐在阿丹的床边。病房里，轻轻地响起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这是孩子们按照他弥留时的要求放的音乐。阿丹曾说，他不喜欢听哀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宗英说，人停止呼吸之后，脑子最后才死去。他们让阿丹在音乐声中安静地长眠。

我坐在阿丹的床边，长久地捏着他的手，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的手心还有一点热，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手是热的缘故。赵青靠在我的身边，我想起和阿丹近半个世纪的友谊。1936年他的女儿赵青将要出世时，阿丹正害着肺炎，当时我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受阿丹之托，设法把赵青的母亲叶露茜送进医院，在医院里等着阿丹的第一个婴儿呱呱堕地。这个新的小生命，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舞蹈艺术的花朵。当我正在想着这件往事时，宗英哭着说："金山，1948年我和阿丹的婚事是你给办的。你看看，现在成了这么一大家子了。"当时我是他们的证婚人。我又看了看阿丹的几个儿女，个个英俊、可爱，又看到阿丹和宗英抚养的周璇的儿子周民，样子很忠厚。是啊，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文学家组成的这个家庭是美满、幸福的。阿丹呀，我们怎么这样分不开！由于工作、斗争的需要，我们常常多年不见，但是生活又把我们捆得那么紧，人生的生老嫁娶又偏偏要我在你的身旁。你从上海到北京治病后，我只要能抽出时间，总要来看你，不来时，我心中老想着你躺在病床上的情景。每当你看见我时，又都那么高兴，好像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似的，有时简直像个孩子一样，露出真挚的眼神，紧紧地握着我的手。10月3日那天，我去看你，你已经昏迷过几次，你的右手正在输液，你的嘴唇在动，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宗英说："他要给你写，他要给你写。"孩子拿了一本阿丹的新著《银幕形象创造》送到他眼前，他用左手颤颤巍巍地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老金至友　阿丹"。阿丹，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保持着青年时代的满腔热情，保留着一片纯真。

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常常天各一方，但我对你的艺术创作一直是关心。虽然 我们不能像年青时一样，在演出时为着一点化装、一个表情都要彼此"干涉"，那时，我们曾经为着每一次成功的表演而高兴，有时彼此也曾对演出不满意，甚至争吵。后来我看了你在银幕上创造的李时珍、林则徐、聂耳和许云峰等艺术形象，看到你在艺术上不断取得的卓越成就，——尽管我们多年不见，也没有通信——但我心中为有你这样的老友而感到骄傲。

今年春节时，我正在国外，没有看到春节的电视，回国后，听到一些同志不满意你在春节电视中的演出 。不久，得知你患了重病，七十多天没有好好吃东西，可能是患了癌症，特地从上海到北京来求医确诊。我到东方饭店看望你时，宗英对我说："阿丹受叛徒江青长期迫害，白白地失去了十余年的艺术生命；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为阿丹平反，阿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迫切地想重上银幕，继续创造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阿丹曾想在银幕上创造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但没能如愿；又想创造李白、闻一多等艺术形象，也都未能如愿。特别是阿丹对鲁迅的艺术形象已经酝酿了20年，也没有得到创造的机会。阿丹酷爱电影艺术，离开它便无法生活，因此内心痛苦，积郁成疾。"春节的电视我没有看过，不能妄加评论，但我想春节电视上出现的阿丹，很可能没有把他深厚的感情和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表达出来，相反，他把它们深深地隐藏在一般的谈笑之中。这就难怪有的同志不能理解他了。

阿丹，我知道你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你在40年前，

就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关在新疆的监狱里，而到了"四人帮"横行时，又落入祸国殃民的江青的冤狱，她长期剥夺了你进行艺术创造的权利。即使这样，你一生还演了六十多部电影，如果你的艺术生命不被剥夺，按照你对艺术的热爱，你的天才，你的勤奋，你一生该演出多少部影片啊！

在你发病之前，组织上决定请你和日本艺术家合作，拍摄一部电影，叫作《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是多么为你高兴！但愿从此以后，阿丹又将在银幕上接二连三地创造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但可惜这个创造角色的机会来得太晚了。正当日本电影界派专人来我国商量具体的拍摄计划时，阿丹已经一病不起。连同这个晚到的机会一道，你的许多的艺术创造，统统变成了"没有下完的棋"了。

想起今年6月下旬我们在东方饭店的那次见面，你是那么兴高采烈，热情地拥抱了我。你那欢乐的表情，哪里像七十多天不怎么吃饭的人呢？我们似乎又回到天真无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时代了。你还在饭店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但当时的欢乐是假象。晚餐时，你因身患重病，几乎没有吃东西，我因担心最后的确诊，怕至今还没有被医学征服的恶魔出现，又想到你第二天即将飞沪，此去吉凶未卜，不知能否再见，所以也难以下咽。那次相见时的像片记下了我们表面上的欢笑，从像片上又哪能看得出你内心的向往和我心中的焦虑呢。

你病危时在医院里，曾问过我有没有你的画，你说要送给我一幅做纪念，等你好一些，要亲自选一张送给我，你来题上款。但是你的病一天重似一天，连这也没能实现。讲到画，许多观众还不知道你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画家呢。宗英讲，前两年你在柳州时，常常彻夜不眠，画了大量的画。我想，当时你还没有得到在银幕上创造你所希望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机会，不愿意蹉跎岁月，只得把满腔的激情沉浸在水墨丹青之中。你说要给人民留下"美"。你的一生也正是为此而奋斗的。

我长久地坐在阿丹床边，仔细地看着他，他的左颊上有6个很小很小的老人斑，右颊上有1个，鼻梁上3个。阿丹，你才65岁，还没有老，老人斑还这么细小，你生命的里程应该是远远没有走完，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你，还应该有新的飞跃……

我又仔细看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眼皮没有紧闭，我一面用手轻轻地抚摸他的眼皮，想让他将眼睛闭紧，一面联想到一个值得反复思考，认真总结经验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渴望创造艺术形象，却长时期得不到创造的机会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对我们说来，对待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的最大的爱护，应该是及时地给予他进行艺术创造的机会，不仅如此，还应该为他创造条件，使他能够充分地进行艺术创造。

阿丹，你弥留时曾表示，不要开追悼会。我懂得，你要的不是死后的哀荣，而是生前的工作！

1980年10月10日午夜写成

（金山）

王立山

王立山（1952～　），北京人，1969年，他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劳动，后来调到太原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建筑处当修理工人，1976年4月5日，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周总理群众运动，写下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后来，"四人帮"歪曲、颠倒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立山的这首诗，被当作重要的"罪证"加以引用，而追查、通缉这首诗的作者，便成了所谓"〇〇一号反革命案件"。1979年12月，王立山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中共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建筑处委员会发出号召学习王立山同志，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张扬

张扬（1944～　），1963年，他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小说，题名为《浪花》。此后，他进一步搜集材料，重新构思，1964年他作了较大修改后，取题叫《香山叶正红》，小说从此定型。1965年张扬到山区插队，以后的八年中又写了三稿。1973年前后，他不满"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于是，再一次增补润色自己的作品，定名为《归来》。后来这本书传了出去，在传抄过程中，北京一名读者把它改名为《第二次握手》。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亲自布置要公安部门追查这本书和作者。姚文元妄图借这本书，攻击周总理和打击、迫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致使张扬受到严重迫害，把《第二次握手》打成"反动小说"。1980年1月，张扬得以平反出狱，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这本书改编为故事片。

材料　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

——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

回想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文苑遭浩劫，百花尽凋零。广大群众没有戏看，缺少书读，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大灾难里挣扎。就在这样的时候，绽开了一枝傲雪凌霜的腊梅——它就是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当时叫《归来》，又名《归国》）。

一九七三年前后，这本小说便开始在青年群众中流传了。它竟然有那么的魅力，到处抄传，不胫而走。许多手

抄本被读烂了，于是再抄。唐山市有个青年，连续八昼夜抄了两份，他说："这本书生动感人，读了给人向上的力量。"湖南某学院，有近半数学生传看这本书，有的人躲要岳麓山树林中抄写它，有个学生在读后感中写道："这本书告诉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才是建设祖国的根本。可是，为什么不准我们上好文化课呢？"

一九七四年底，开始到处清查和收缴这本书，广大群众不服。北京市某街道有个女同志对追查者质问道："歌颂纯洁的爱情、崇高的事业心有什么错？"上海有个工人，花了好多个日夜，把它刻在蜡纸上，没地方去油印，厂里医务室的同志悄悄地帮他，在诊疗室里从日落印到日出。他们印的许多本《第二次握手》，更广泛地在工人、学生、干部中流传。不识字的老工人偷偷听人念完后，愤愤地说："这本书引人走正道，是哪个天煞的不准读？"小青年打趣地说："这是'民间出版社'出版，'群众书店'发行，天煞的挡不住罗！"这本书在群众中扎了根，谁能禁得住、收得净呢！

群众如此喜爱《第二次握手》，为了读它、抄它，甚至不惜冒政治风险，这种情况是很感动人的！但是，在"四人帮"的淫威下，群众公认的好作品，非但不能出版发行，反而被打成"反动小说"，并且强行收缴，加罪读者，他们完全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思想文化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民主权利。

《第二次握手》的厄运是怎样开始的呢？

一九七四年秋，这本小说在首都的群众中间流传开以后，有一个宣传单位，把它整理成了内部材料。姚文元看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十月十二日姚文元批示，叫人赶紧找这本书给他看。十月十四日下午又打电话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和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这是"四人帮"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随心所欲地动用人民公安机关去制造文字狱的铁证。反动文痞姚文元给这本书加如此大罪名，是施展他们一贯的卑劣手法，妄想从中揪出一个反动的"科学家集团"，并借这本书攻击周总理，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彻底摧残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

《第二次握手》的作者终于查到了。他叫张扬，当时只有三十岁，是一个在湖南大围山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他被关进了监狱。

事实是铁面无私的，张扬写这本小说的经历，完全粉碎了姚文元的鬼算盘。既没有谁鼓动他写，也压根不存在什么"科学家集团"。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这个聪明好学、腼腆寡言的青年，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他憧憬祖国美好的未来，他热爱为祖国作贡献的人。早在一九六三年他只有十八岁时，在高中读书到北京来度假，住在在药物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舅舅家里，他听到了一些科学家从国外归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周总理接见和关怀科学家的情景，使这个中学生心里很感动。于是，他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小说，题名为《浪花》。此后，他进一步搜集材料，重新构思，一九六四年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后，取题叫《香山叶正红》，小说从此定型。一九六五年张扬到山区插队，以后的八年中又写了三稿。一九七三年前后，"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桎梏越箍越紧，优秀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遭到禁锢，特别是反映知识分子题村和描写高尚爱情的作品，更有被斩尽杀绝之势。张扬曾忿忿不平地对一个朋友说："太无书可读了，样板样板，不是寡妇就是光棍。爱情，本是人类灵魂的一种财富，生活诗意的一个源泉，现在一提爱情就是资产阶级的，恐怕这些人心理变态了吧。"于是，他再一次增补润色了自己的作品，定名为《归来》。开始是借给挚友看的，不知是谁传了出去。在传抄过程中，北京一名读者把它改名为《第二次握手》，这就是在社会上广为传抄的、约有六万字的那一本。

张扬是个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喜欢观察和思考。他对"四人帮"横行期间摧残文化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的怪现象，是很反感的。他曾想过："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岂不要毁了？"这个年轻人把自己心里的郁闷、焦灼，变成了一种力量。尽管疾病缠身，农活忙碌，他仍坚持改写这部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作品。他要鞭笞旧社会的黑暗，要真实地反映新中国的科学家们的生活和事业，歌颂周总理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热情关怀。他终于写出了小说的第五稿，约二十万字，并且配了插图。朋友看了好心劝他："这本书不要拿出去了，知识分子被批臭了，沦为专政对象，小心你会出问题。"张扬说："怕什么，我又不想拿去出版。我就是不相信文盲能制造原子弹。要建设现代国家，没有知识分子行吗？"想不到啊，就在这时姚文元把魔爪伸到了他头上！这部小说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在森严的铁窗里，在紧张的审讯中，这个瘦弱的青年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据理而争，常常把审讯者驳得哑口无言。张扬知道他写爱情、写爱国科学家、写周总理关心科学事业，都是触犯"四人帮"的"天条"的，有人强行要他认罪，他毫不隐讳地回答："我就是通过爱情来写政治，我喜欢我的书，我不向你们投降。"

从读者的反映，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到成书内容，也从审讯情况来看，人们找不出哪里有一点是反动的。然而，有关公安单位不但没有及时了结此案，反而向法院对张扬提出起诉，并且在"起诉书"中写道：张扬"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

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如此等等，这真是典型的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欲加罪而何患无辞！这里应当特别提到，法院审理此案的有关同志，是维护法制、坚持正义的。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研究《归来》，认为它算不上"反动小说"，因此不能判罪。但这个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张扬也未能获释，继续被关押到今年一月才得以平反。

从《第二次握手》这本书和作者的厄运，联想到其它有过同样遭遇的文艺作品和作者的受害情况，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随便扼杀一部作品和一个作者容易，而大胆保护一部好作品和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却难。所以造成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形，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和猖獗的形而上学，对一些文艺作品总是动不动就从中找"影射"追"后台"，往政治问题上生拉硬扯，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横加罪名，使许多好作品和作者祸从天降，有口难辩，受到"莫须有"的迫害。这种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否则，搞文艺创作的同志总是战战兢兢，思想解放不了，怎么能写出人民需要的新鲜作品来呢？有关的同志也应从中记取教训。应当学会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评断文艺作品的是非，对姚文元那样的"批示"决不能唯命是从，违心而为；而助纣为虐，加害于人，则更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勇于坚持真理，维护革命正义，有胆有识地去保护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和作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真正得到繁荣！

中青报记者　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　邝夏渝

李　国　才

李国才　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加工班班长，十年动乱时期，他是"红色造反司令部"及"赤卫军"的头头之一，先后被提拔为吉林市民兵总指挥、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化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1972年前后，李国才所在的加工班设计、制造了一种锅炉，称"国才式锅炉"。他在技术上招摇撞骗，大肆宣传推广，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1980年9月20日，"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揭穿，11月11日，国务院决定解除他的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中国的文学艺术在跨入80年代春天的门槛后，没有淹没在漫长冬夜苦难的泪水中，而是以雄健的步伐继续开拓和扩大题材领域、打开创作禁区的同时，把较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刻画人物性格和塑造既是个性化又是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上来，并在艺术上作了一些探索。

小　说

短篇小说　1980年短篇小说塑造了许多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人物形象，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第2期)中的陈奂生，何士光《乡场上》(《人民文学》第8期)中的冯幺爸，刘真《她好象明白了一点点》(《青春》第8期)中的杜大柏，锦云和王毅《笨人王老大》(《北京文艺》第7期)中的王老大，写出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不同命运和鲜明个性。徐怀中在《西线轶事》(《人民文学》第1期)中塑造的当代军人刘毛妹和陶珂的形象，李斌奎在《天山深处的"大兵"》(《解放军文艺》第9期)中刻画的青年指挥员郑志桐的形象，蒋子龙在《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新港》第5期)里写了一个沾染市侩习气的金凤池，张贤亮在《灵与肉》(《朔方》第9期)里写的饱经忧患的许灵均等等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年度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得到发扬与深化，作家们广泛而深刻地探讨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进行深沉的思考。作家们在探索中国知识界和政界人士面临的"两代人"矛盾，如茹志鹃的《儿女情》(《上海文学》第1期)、戴晴的《沟》(《十月》第5期)等。爱情、婚姻与道德的矛盾引起了短篇小说家们的关注，出现了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第1期)、陈可雄和马鸣的《杜鹃啼归》(《青春》第6期)等小说。反对封建残余(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特殊化、封建思想)，为现代化扫除障碍，成为许多小说的主题，如贾庆军的《坟草青青》(《青春》第5期)、榴红的《燕子啁啾》(《四

川文学》第5期)等。

艺术形式的创新也冲击着短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不同风格和不同流派。贾大山和贾平凹各自运用不同笔墨描写农村的人情风貌,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吸收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方法,力图克服短篇小说时空的局限并在心理分析方面取得了突破。写得较好的作品有王蒙的《风筝飘带》和《春之声》。

中篇小说　在1980年中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塑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谌容在《人到中年》中刻画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焦副部长的夫人秦波的形象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马列主义老太太"已经成为生活中那些对别人满口马列主义词句、对自己极端个人主义、很有社会地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高干夫人的"共名"。另外,一些强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像北大荒劝农河农管局局长黎白(张笑天:《春之烦恼》),决心搞经济改革的省委书记车篷宽(蒋子龙:《开拓者》)等等。

恢复人的尊严这一主题的出现,是揭露林彪、"四人帮"滔天罪行的小说的合理发展。在一些中篇小说里,作者们描绘了我们社会的某些制度和社会思潮的悲剧性,比如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特别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导致了人的性格的被扭曲,人的尊严的被侮辱,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兽性的大发作,仇视理智的暴力的大普及。刘心武的《如意》(《十月》第3期)就是探讨这一主题的作品。它写一所中学的工友石义海,外形是丑陋的,内心却是美好的,他爱着一个被称作"封建余孽"的女人——格格金绮纹,而且多年来一直保存着她赠的信物——如意;在十年浩劫中,每当夜阑人静时就偷偷地扛着扫帚到竹叶胡同替她清扫那罚她清扫的地段。宗璞的《三生石》(《十月》第3期)追求生活中早已失去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爱慕、友谊与支持。主人公菩提在危难丛生之时(政治上是现行反革命,肉体上患了致命的癌症),得到了陶慧韵无微不至的关切与同情,得到了外科大夫方知的真挚的爱情与信任,使这个38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在黑暗之中看到了活下去的一线光明。王蒙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社会的异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蝴蝶》(《十月》第4期)中的张思远,就是一个异化了的老干部。从年轻的"老革命"张思远,到市委书记的张思远,到张老头的张思远,到副部长的张思远,写出了一个生动的异化和反璞的过程。

长篇小说　1980年长篇小说尽管出现了几部较好的作品,但大部分仍旧平平,引不起读者的兴趣。长篇小说不能改观,关键问题是作品没有能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来。

创作的90多部长篇小说中写解放后生活的31部,其中写10年动乱的又占了一半。崔巍、钮宇大的《爱与恨》,木青的《不许收获的秋天》,冯育楠的《山林深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面貌。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写了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可歌可泣的斗争,吴因易的《梨园谱》写了川剧艺人解放前的悲惨遭遇。

诗　歌

1980年的中国诗坛,不像上一年的诗歌集中在某几个事件和场面弹拨琴弦,众多的诗人的艺术触角,几乎涉及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有战斗的呐喊,更见深沉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诉诸于浓郁的感情和鲜明的形象。流沙河的《太阳》(《诗刊》第8期),借"太阳"的形象,歌颂了代代相传的生命之火,展现了中国人民向着未来、向着希望的心灵。杨牧的《站起来,大伯!》(《星星》第1期),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命运生发开去,发出了中华民族应从现代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自强不息的热切呼唤。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长江文艺》第1期),敢为人民大声疾呼,揭发个别地方政权机构中至今还存在的违背党和人民意志的倒行逆施,起到了诗歌的批判作用。

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美学兴趣的诗人,把艺术个性唤回到抒情诗的领域,出现了各种形式和风格的探索与竞赛,是1980年诗坛的又一特点。老诗人艾青融睿智与洒脱于一炉,写出了《花与刺》(《人民日报》7月10日)、《蛇》(《新港》第3期)等富有哲理的诗章;白桦的《爱您的儿子吧!在我活着的时候》(《羊城晚报》7月3日),以充满政治色彩的诗句抒发了爱国主义主题。

这一年,在诗坛上涌现出一批新秀。发表于《诗刊》第10期上的张学梦的《前进,二万万!》、舒婷的《暴风过去之后》、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徐敬亚的《致长者》、叶延滨的《干妈》等青年诗作,写得情真意深,联想不凡,对生活有相当的概括与思考,结构上力避平铺直叙,显示了一定的艺术才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电　影

1980年为大家称道的影片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法庭内外》、《燕归来》、《枫》、《迟到的春天》、《花枝俏》、《神女峰的迷雾》等。

由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近二十余年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充满激情地创造了动人的银幕形象,发挥了电影作为综合艺术的丰富表现

力，获得第一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同时获得最佳故事片奖的是由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这部影片以独特的创作构思和抒情诗般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人物群像，表现了我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美好的心灵。

小说《陈奂生上城》

作者：高晓声

故事梗概　"漏斗户"主陈奂生摘掉了"漏斗户"帽子，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便想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零花钱，买一顶真正的帽子。他到自由市场去卖油绳，然后用卖油绳的钱买帽子。想不到偶感风寒、额头滚烫、浑身无力，便躺在车站候车室的躺椅上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县委招待所高级房间内的棕床上。原来昨晚他躺在候车室，正碰上县委书记吴楚候车，吴楚过去在陈奂生的村子里蹲过点，还在他家吃过派饭，所以认得陈奂生。他看陈奂生烧得不轻，便吩咐司机用自己的车送他去看病，看完病再送他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说。陈奂生想起吴书记送他上车时的情景，心头暖烘烘，眼里涌出了泪水。再细细打量这间屋子，天花板白得耀眼、家具被褥新崭崭，何等阔气！陈奂生心想吴书记对我太好了，只是不知要多少钱？这哪是我住的地方？于是连忙到柜台算账。接过大姑娘递过来的发票一看，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困一夜竟要五元钱！贵死人！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一夜把两顶帽子钱困掉了！

回到屋里，他再也不怕把东西弄脏、把"太师椅"坐坏了，"管它，不关我事，我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猪圈也不值！"他原先想住到过十二点再走，又一想中午饭没着落，弄不好再住一夜，又要五元钱，于是开门便走。虽然还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

他出得门来，直奔百货公司，用油绳本钱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飘然而去。一路上想起吴书记人是好人，可想不到我陈奂生经不起他的高级关心。想到这一趟丢了五块钱，回去怎么向老婆交账？忽然，他心里一亮，想到此番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化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一夜的高级房间？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有谁还瞧不起他？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提高了，连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好得多。陈奂生从此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陈奂生上城》写的是陈奂生在新的农村经济政策贯彻之后的性格变化和心理状态。在陈奂生的阿Q式的精神满足中，包含着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丰富内容。他在吃穿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之后，又萌生了朦朦胧胧的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引人深思的是，这种正常而合理的需求，却以带有等级色彩的自轻、自贱与自尊的混合形式得到了满足。（原文载《人民文学》1980年2期）

小说《人到中年》

作者：谌容

故事梗概　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昏迷不醒，身子像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

她今年才四十二岁，怎么会病成了这个样子呢？

她是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加之生活困苦、身心交瘁而突然"断裂"的。十八年前，陆文婷从一所全国知名的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大医院做住院医生。她勤奋好学、刻苦自励，心甘情愿遵守院规，整整四年没有恋爱结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顽强地向眼科医学高峰攀登。二十八岁那年，傅家杰突然闯进了她宁静、刻板的生活中来。她用整个纯洁的身心迎接这迟到的爱情。傅家杰是大学冶金专业毕业的，但他懂得爱情和生活，喜欢文学。他们的婚后生活虽然清苦，但却幸福和甜美。由于长期工作繁忙，生活负担沉重，再加上工资低微、住房狭小，陆文婷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默默地为病人献出了她的一切。孩子病了，她没有时间照顾，有时连做饭的时间都被病人的眼睛挤掉了。她一年四季奔波往返于医院和家庭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衣服足以御寒，三餐粗食足以充饥，一张书桌就可以研究学问、撰写论文。她把自己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把自己心血的点点滴滴，把青春和生命，都用来为病人造福。每治好一个眼睛，就是她生活中最大的慰藉和快乐。

就在她突然病倒的那天上午，她还一连做了三个手术：一个是焦成思副部长的白内障切除手术，一个是王小嫂的斜视矫正，一个是张老汉的角膜移植。在手术进行中，不论是焦部长夫人秦波的无理纠缠，还是突然发生的意外情况，她都冷静、果断地处理了。她不卑不亢、对病人一视同仁。手术是成功的、漂亮的，但她却突然垮了。豆大的汗珠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眼前冒金星，脸色十分难看，青白的脸上两个乌黑的眼圈，上下眼皮都肿了起来，完全是一副病容。可是她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多少年来不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吗？三个手术都做完了，她却突然沉疴不起。丈夫在马路上拦了一辆卡车，把她送到医院，她的病历上写着"心肌梗塞"四个大字，象一根瘦草，陆文

婷静静地躺在那里，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陆文婷的老同学姜亚芬、与她同窗共事二十余年的好朋友申请出国获准，就要与她的丈夫和女儿一起离开祖国了。他们不愿意走，却又不得不走。在机场上，姜亚芬给陆文婷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自己由于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业务专长得不到发挥而不得不忍痛离开祖国的苦衷。她承认，和陆文婷相比，自己是软弱的，她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一件错事。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走了。她衷心祝愿陆文婷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从死亡的边缘上又活了过来，被允许出院了。她的身体还很虚弱，扶着墙壁，艰难地、一步步地朝前走去……

《人到中年》通过眼科大夫陆文婷年复一年地超负荷运转而几乎造成死亡这一悲剧故事，尖锐地提出了四化建设中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作品一出，社会反响强烈，两年后改编成电影在全国上映，社会反响仍很强烈，对于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小说采取了多视角的叙述角度，结构形态纵横交错、舒卷自如。(原文载《收获》1980 年 1 期)

小说《蒲柳人家》

作者：刘绍棠

故事梗概　中伏大热天，热得像天上下火。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

那一年是一九三六年，何满子六岁，爸爸妈妈住在通州城里，他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中过着无忧无虑的嬉游生活。这次是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

奶奶一丈青大娘，人高马大，为人正直泼辣，敢怒敢骂，威镇八方，却管不了满子。满子是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爷爷去口外赶马，一回来，一丈青就跟老头子叫苦，顺口告了状。爷爷一怒之下，把满子系了个拴贼的扣儿。

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爱喝酒，脾气大，却重义气讲交情，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没进过一天学堂，指望满子能成为何家真正的“大学问”。他请了一位前清的老秀才教满子念书。何大学问也非常溺爱孙子，每趟赶马回来，总爱给满子捎吃的。这次回家却一反常态，阴沉着脸发脾气。原来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汉奸殷汝耕投靠日本，在口外立了个德王的蒙疆政府。何大学问被蒙疆军扣住，差点丢了性命。不想爷爷把怒气撒在满子身上，把他拴起来，还逼他在石板上写一百个字。

正当满子走投无路时，他的救星望日莲姑姑来了，他哇地一声哭了。哭声打动了爷爷奶奶的疼爱之心。何大学问伸出一根指头抖落了绳索，原来他玩了个“空绳计”。望日莲十九岁，奶名可怜儿，是何家的隔壁邻居花鞋杜四从一个逃荒的饥民手里买下来的童养媳妇。十岁那年，军阀隔着北运河开仗，望日莲被倒栽葱埋进了一个大弹坑，一丈青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她。以后杜四的儿子二和尚被抓壮丁，杜四的老婆豆叶黄硬说她是克夫的命，百般折磨她。何大学问夫妇打抱不平，教训了杜四夫妇一顿，又把望日莲认作干女儿，改名贵莲，从此充当了她的保护人。何家西隔壁的周檎和她十分要好，管她叫望日莲。

周檎是个深沉文静的青年，他父亲九年前领导京东农民大暴动被害，母亲哀伤过度而亡，从此跟舅舅柳罐斗相依为命，眼下他是潞河中学的学生。他和望日莲青梅竹马，产生了极深的爱情，满子总爱亲近这一对十分疼爱自己的情侣。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望日莲姑姑用她那油亮粗黑的大辫子缠绕着周檎的脖子。七夕之夜，满子爬在葡萄架下，又听到望日莲和周檎海誓山盟，还听到周檎动情地讲出这次建立抗日武装的秘密。当周檎和望日莲发现他的时候，紧张地追问他听到了什么，并嘱咐他不能讲出去。满子委屈地哭了：“原来……你们信不过我呀！”“你把辫子绕到周檎叔脖子上，我跟别人讲过吗？”望日莲激动地把满子贴在心窝上。

周檎在村子里秘密进行抗日活动。一天，他带满子去钉掌铺和吉老称商量建立抗日武装的事，满子在外边巡风放哨。吉老称是给牲口钉掌的老把式，他不娶亲，不信鬼，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忠心义胆。当年曾跟周檎父亲参加京东大暴动，如今又泼下性命跟周檎抗日。从钉掌铺出来，他们又去看端午爷。老木匠郑端午，人称活鲁班，被汉奸殷汝耕迫害致残，如今靠种瓜为生，儿子郑整儿和媳妇荷妞接下了他的木匠工具。这小两口儿结婚三年，膝下没个一男半女，就把满子认作干儿子。在干爹干娘家吃过饭，满子和柳罐斗的情人云遮月姑奶奶放哨，周檎组织乡亲们秘密聚会去了。

摆渡船的柳罐斗是周檎的舅舅，高大魁梧，仪表堂堂，是个顶天立地、正气凛然的好汉子，三十八九岁了仍矢志不娶，为的是把外甥养育成材，以告慰为革命牺牲了的姐夫和苦命姐姐的在天之灵。几年前，从通州下来一个唱京东大鼓的女艺人云遮月，对他一见倾心，尽管他一再拒绝，云遮月仍然对他一往情深，柳罐斗终于被感动了，两人成为相好。

有一天，小满子在外边转着玩，忽然看见河防局的巡长麻雷子，骑着一辆贼光闪亮的自行车来了，他好奇地跟到杜四家，意外地听到他和杜四夫妇正策划一个大阴谋：他们为了一笔赏钱，要缉拿京东共产党领导人周文彬，逮捕周檎，并加害何大学问和柳罐斗，还要把望日莲卖给大地主董太师作小。满子又气又怕，赶快告诉周檎，周檎和乡亲们想出了对付的良策。

第二天，望日莲装病，不起炕。一丈青、何大学问找豆叶黄，要望日莲"住几天娘家"，正在这时，吉老称闯进来要给望日莲保媒。豆叶黄和杜四要赖阻挠，吉老称软硬兼施，逼迫他们立下了文书，何大学问给杜家三十块钱和二亩地为望日莲赎身，又拿出二亩地给干闺女陪嫁。与此同时，柳罐斗与云遮月巧使"美人计"，使麻雷子作了水鬼。

在乡亲们的共同操持下，周檎和望日莲结了婚。

喜日前一天，满子的父亲何长安赶回来，带来周檎考中燕京大学的喜讯，同时想把满子带回城里上学，一丈青闷闷不乐。满子见势不妙，逃向河滩。偶尔间听到低低的谈话声。这是周文彬向地下工作者、新任河防局巡长布置任务。望日莲找到满子，告诉他爸爸不带他走了，周檎也不进京上学，在村里办小学堂，让满子跟姑父念书。原来周檎奉命留在村子里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蒲柳人家》是一部讴歌我国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作品。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何满子一段童年嬉游生活为主线，交织着周檎和望日莲的爱情和村中几户劳动人民同地主董太师、巡长麻雷子的明争暗斗的情节，勾勒出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上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原文载《十月》1980年3期)

诗歌《父母之河》

作者：雷抒雁

那只雁是我

那只雁是我，
是我的灵魂从秋林上飞过；
我依然追求着理想，
唱着热情的和忧伤的歌。

那只雁是我，
是美的灵魂逃脱了丑的躯壳；
躲过猎人和狐狸的追捕，
我唱着热情的和忧伤的歌。

飞过三月暮雨，是我！
飞过五更晓月，是我！
一片片撕下带血的羽毛，
我唱着热情的和忧伤的歌。

琴

我紧紧地抱着你，
我轻轻地弹着你；
啊，你是我燃烧的心，
是我颤抖的灵魂。

我向你诉说着积久的痛苦，
我向你诉说着突然的欢欣；
啊，在这个多风多雨的人间，
只有你，是我的知音。

我不乞求，也不叫苦，
我只愿你的弦上不要蒙上灰尘；
啊，你是我的清甜的泉水，
带着你，我要高唱着走过沙漠和乡村。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死去，
或者变得衰老，失去声音；
琴啊，我的琴，
你还唱吗？像现在一样快活和纯真！

突　然……

我会突然变成一朵迎春花，
四月的清晨，
在你面前摇曳；
你把那金灿灿的花朵，
夹在一本谜一样的诗集里，
你会知道吗，那花是我变的？

我会突然变成一颗雨滴，
在六月的黄昏，
沿着嫩白的面颊，
流进你的嘴里；
那苦涩的雨是相思泪，
你会知道吗，是我变成了雨滴？

我会突然变成一束灯光，
在华丽的舞台上，
照耀着你，拥抱着你；
追随你轻盈的步履，
你的舞蹈会像梦幻一样神奇，
你知道吗，那灯光是我变的？

1980年北京

诗歌《现代化和我们自己》

作者：张学梦

萌　芽

一座山丘被掀起，
从下面探出两条
　　嫩绿的触须……
你伏在春天的田野上
就会看到
　　那萌动的强劲的叶子
　　　　悄悄地推开土砾。
啊，这就是果实与收获的原因哪！
碧绿的大千世界的胚，
这稚弱的哲学的信息，
象还没破译的生命密码
包涵着全部未来的秘密。

1980.12.

祖国，我理解……

祖国，我理解你对这一代的内疚和苦楚
但请相信，我不是债券，是财富
我会碧绿，走向秋天
不辜负每一缕阳光、每寸土
我会献出苦思
用我畸形的早熟
使你肥沃，使你富足
让汗水涤净泪迹吧，祖国
我是积极的因子，不是被动的函数。

1980.12.

电影《巴山夜雨》

彩色故事片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叶楠
总导演：吴永刚
导演：吴贻弓
摄影：曹威业
美工：薛建纳
主要演员：李志舆　张瑜　强明　仲星火　欧阳儒秋　林彬

故事梗概：被“四人帮”关押了六年的诗人秋石，由李彦、刘文英乘船押送到武汉去。旅途中，秋石的遭遇，引起了旅客和船员们的同情和关注。在短短的一天一夜航程里，这些善良而正直的人们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各个表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观点和态度。在现实教育下，刘文英这个受骗的“造反者”开始觉醒，终于在船长等人的帮助下，中途放走了秋石。

电影《法庭内外》

彩色故事片　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陈敦德　宋日勋
导演：从连文　陆小雅
摄影：冯世林
美工：吴绪金
主要演员：田华　周楚　林默予　陈佩斯　黄月美　刘旭凌

故事梗概：围绕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尚勤审理一起掩盖在“交通事故”后面的强奸杀人案，揭露了某些干部的封建特权思想。女法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甘冒风险去维护法律尊严，终于使法律战胜了特权，真理得到了伸张。

电影《花枝俏》

彩色故事片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陆柱国　鲍梦海
导演：景慕逵
摄影：杨光远
美工：李健
主要演员：宝珣　穆怀虎　赵娜　王憧

故事梗概：新战士黄永亮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身上遗留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习气。但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由于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和热心帮助，这个被“四人帮”摧残过的青年，终于成长为新时期的忠诚捍卫者。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他勇敢顽强，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电影《第十个弹孔》

彩色故事片　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从维熙　艾水
导演：艾水
摄影：曹金山
美工：刘兴厚
主要演员：曹会渠　陈立中　尹达　宝珣　曹景阳

雷鸣

故事梗概："四人帮"垮台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公安局长鲁泓，在审理一个遗留的重大案件时，发现离别多年的独生爱子是参与炸桥案件的罪犯之一。面对着确凿的证据和妻子悲恸的眼泪，他抑住内心的痛苦。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说服了亲人，教育了干部，毅然下令将儿子逮捕归案。

话剧《陈毅市长》

作者：沙叶新

故事梗概 《陈毅市长》描写了陈毅的十个故事：

丹阳报告。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简陋的会场上，陈毅同志身穿军装向战士们作了激动人心的动员报告，要求全军指战员必须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为把上海这一黑染缸变成红染缸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试看明日之上海，竟是谁的天下。陈毅同志严肃而风趣的话语，赢得了战士们的阵阵掌声。

接受投诚。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的炮声隆隆作响，《解放区的天》的歌声在街道上空回荡。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夏灏及其随员惶惶不可终日，急不可奈地等待着共产党市长的到来。当他听说未来的上海市长竟是声名显赫的陈毅时，不能不为之震惊。在下午三点的投诚仪式上，他又为陈毅市长的宽厚和礼让而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并决心重操旧业，要为上海的城市建设规划做出贡献。

傅家赴宴。上海解放后，上海国华纱厂总经理傅一乐虽然对共产党抱一线希望，又舍不得自己的财产而逃往香港。但由于顽固守旧的商人表兄从中破坏，在"走""留"的问题上，一时拿不定主意。为了弄清真相，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邀请新工业局长顾况来家作客。陈毅获悉后，立即携同尚有顾虑的顾况一起赴宴。在傅的妻子还不明陈毅的身份的时候，陈毅市长将计就计，大谈共产党的生意经，使资本家傅一乐夫妇口服心服，欣然同意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继续开办工厂。

药店视察。上海解放后最早建立的第一家百货商店刚刚开业。一天上午，在一个僻静角落的医药用品柜台前面，顾客来来往往，但都不买药，青年营业员大为失望，只好一个人练习接待顾客，私营商店的关老板带着嘲讽的口吻私访了这家连盘尼西林都没有的国营大药店，使营业员更加苦恼。这时，陈毅及其秘书一起来到了这家药店，帮助顾客解决了急需药品，了解到了一些实际问题，也深深感到了私营药店的威胁性。

夜访齐老。秋去冬来，为了使上海尽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制药厂，陈毅市长夜访化学家齐仰之。然而，这位老人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城过着深居简出的书斋生活，室外的变化已经引不起他的任何兴趣。开始他对陈毅市长的来访没有表示出多少欢迎，反而使陈毅吃了个闭门羹。后来在陈毅的开导、教育和帮助下，这位隐居几十年的化学家终于愿意出来为发展上海的医药工业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劝通岳父。新上海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各方面的变化，敌人为之恐惧，阴谋派飞机轰炸电厂。在陈毅市长的家中，亲友们的思想也有变化，刚从外地接来的岳父为市长女婿不能挽留他而生气，小妹妹也为市长哥哥不能给她写封介绍信而埋怨。对此，陈毅市长申明大义，以理服人，使岳父高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

保童赔礼。送走了岳父，还有更复杂的政务急待解决。敌人轰炸电厂时，我们的八门高射炮竟有六门出了故障，全市五百多人被炸死，一千多人受伤，电厂停电四十八小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也难怪陈毅市长对军长童大威大发脾气，真想把他送上断头台。然而陈毅市长毕竟不是那种鲁莽之士，当他听说真的要交军法处判刑时，他又主动承担刑事责任，并给童大威严厉的纪律处分。当他知道对党外人士魏里气后失言时，就主动向魏赔礼道歉。使同志们颇受感动。

春节拜年。上海的建设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华纱厂已有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傅总经理看时局困难，竟想一走了之。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春节这天上午，国华纱厂工人徐根荣家已经揭不开锅了，邻居金海在大年初一这天送来了一盆豆渣，两人相对而坐，愁容满面，还不时地发些牢骚。这时陈毅市长带着傅一乐一同来到了徐家。陈毅市长谈笑风声，机智地迫使傅总经理和他一起品尝工人们的豆渣饭，言谈之中，教育了徐、金二人，更教育了资本家傅一乐。

严词训彭。一九五〇年初夏，随着一些必要的人事变动，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误的思想情绪，为了统一思想，在党内开展了一次整风活动。师长彭一虎进城后名利思想严重，军阀作风仍有所存，吓得战士们不敢提意见，而且他还牢骚满腹，埋怨自己没有当上军长。陈毅市长对他这种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下令他停职检查，去征求广大干部和战士们的意见，改正后，再"官复原职"。

亲临盛会。一九五〇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市委礼堂里，我国第一个交响乐团进行慰问演出。各方人士在此聚会，畅谈着当前的大好形势，陈毅市长前往助兴，得知交响乐团连一个起码的工作地点还没有，便立即责成秘书周放曙于明天给予解决。这时中央来电，陈毅市长将到南京主持华东军区的工作。人们畅谈着、评论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奏出了对陈毅市长的颂歌。

《陈毅市长》采用了"一人多事"，即"冰糖葫芦"式的结构方式，通过陈毅市长这一中心人物展开一系列情节，成功地塑造了陈毅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毅同志的雄才大略和高尚品德，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刚刚解放的上海面貌。

（原文载《剧本》1980年第5期）

历史档案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节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认真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党同志遵循这些准则，空前团结，步调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是，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条反映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林彪、"四人帮"长期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它的精神实质，离开实践标准，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我们看形势、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一定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解决当前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

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障；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各级组织、各部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3）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现在，必须严肃地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事，必须顾全党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大局，并且用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教育群众。这是共产党员革命觉悟的重要表现，也是巩固全国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

（4）坚持党性，根绝派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党性，为根绝派性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5）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

（6）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路、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

（7）保障党员的权力不受侵犯。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8）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或者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要坚持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利，使选举流于形式，妨碍选举人体现自己意志的现象。

（9）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中，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挺身而出，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不怕受到打击迫害。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倾向得到克服和纠正，使犯错误的人得到挽救，使坏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10）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可采取一哄而起的围攻、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对人的处理应十分慎重。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更要慎重。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11)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12)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同时要把适合于这个要求的中年和青年干部(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处，弥补短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迫切、重大的政治任务。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必须大大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①（节选）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同志们：

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

(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建议，对国务院的领导成员进行调整。调整的考虑是出于下列原因：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中央的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已经迈出第一步。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1)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邓小平在这里着重讲了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他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详细论述了这些现象的危害，并从制度上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

①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认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在分析了上述现象之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四)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对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五)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现在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有如下几项:(1)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2)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3)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4)有准备有步骤地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5)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6)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邓小平最后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现在提出这个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198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中共十三大确认这个讲话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本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

上的讲话。讲话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邓小平讲了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进入80年代的国内形势。邓小平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从8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接着邓小平讲了我们的国内形势。他说，我们进入80年代的形势是好的。我们从各个方面准备了胜利前进的阵地。我们是满怀信心进入80年代的。对于国内的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抱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没有根据的。第二部分，邓小平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20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有了、或者说基本上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很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邓小平在这里批评了影响安定团结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第四，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邓小平批评了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决不能再浪费人才，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级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第三部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60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要看到，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邓小平还谈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指出，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只有坚决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各项任务。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出并原则解答了党在20世纪80年代工作中的许多重大迫切问题。本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十二月五

日连续开了九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同志因病未参加(聂荣臻同志来信表示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同志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委员一人。中央书记处书记七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到会的二十九人都讲了话。

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这一会议的不少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同志不适宜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一九八〇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同志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华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华国锋同志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 和毛泽东同志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了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认为在六十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当然，只有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华国锋同志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他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同志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还指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中央政治局会议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始终进行得平心静气，所有发言都没有强加于人的气氛。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一)(二)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军级常委以上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讨

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四千同志传达。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将仍在四千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三中全会决定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随后在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二条就此作了一些正式规定。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三中全会以来执行这个方针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纪念文章多了一些；一部分纪念文集重复积压；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有的甚至为了收集个人文物，成立专门小组，跑遍全国。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决定：

(一)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有关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正在建设的和虽已建成但尚可改造的，应尽可能改建为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福利设施。毛、周、刘、朱等少数领导人和一些革命先烈的纪念设施，以及革命历史的纪念设施，应当有，应当管理好，但是必须严格控制，防止多建滥建。各地已设者均应向中央报告，以便作出统一规定，并一律不许任意增设。其中很少历史价值特别脱离群众的，如一时不能改建，宁可先行封闭。各地如有有历史意义而适宜集中保存的革命文物，应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一级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利长期保存。至于现尚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的场所，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布置，已有的布置一律撤销，并须将撤销情况向中央报告。

(二)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斗争史，以及革命战争、革命运动、革命工作的历史，写成不事夸张的回忆录发表或保存，对于教育后代和研究历史，都是必要的。但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则应比较慎重。今后这类传记和文集，有全国影响的应经中央宣传部核准，属于地方范围的应经省一级宣传部核准，不要随便编辑出版，或为此随便成立各种组织，未经中央或省核准而成立的组织应当撤销。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

(三)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

(四)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其他领导人像和题词也按同样原则处理。毛主席像章要尽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

(五)过去几年为许多受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昭雪平反，追悼会开得较多较隆重，现在这种情况已基本结束，不应再消耗过多的人力物力和分散群众建设四化的注意力。因此，除特殊情况中央另作规定者外，一般高级干部丧事应力求简化和节约。例如，向遗体告别的仪式一般可取消；追悼会规模要缩小，送花圈和出席追悼会的负责人要减少；悼词要缩短和避免溢美之词；逝世后可即发表简短消息，追悼会新闻要减少和缩短。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省委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查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好的。现将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在县委召开的农村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认真总结一下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包括最近在中发〔1980〕75号文件中规定的政策。

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

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不要登报点名批判)，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够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二、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而且，为要全面地进行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农业建设，还要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确定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不一定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业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家作主、做出决定。

三、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凡未经群众同意，采取强制手段，搞瞎指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者，农民有权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判处有关负责者给予一定的赔偿。

四、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验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进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五十年代我们把一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劳动模范抽调出来进工农速成中学，又从中选一些学得好的同志进大学，受正规教育，曾经收到良好的效果。后来我们把这套做法丢掉了。现在，我们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提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拔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例如当了党代表的，就不要再当人民代表，担负了基层领导职务的，就不要再担负县级和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请各地收到这个文件以后，检查一次劳动模范工作安排的情况，按照上述原则适当地加以调整。劳动模范本人所属单位和上级领导机关，都要切实保证执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

同样适用于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科研等单位中间的有成就的先进人物和专业人才。

中共中央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当选作品

西线轶事	徐怀中	《人民文学》第1期
乡场上	何士光	《人民文学》第8期
月食	李国文	《人民文学》第3期
三千万	柯云路	《人民文学》第11期
笨人王老大	锦　云　王　毅	《北京文学》第7期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蒋子龙	《新港》第5期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人民文学》第2期
灵与肉	张贤亮	《朔方》第9期
夏	张抗抗(女)	《人民文学》第5期
南湖月	刘富道	《人民文学》第7期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	《解放军文艺》第9期
你是共产党员吗	张　林	《当代》第3期
空巢	冰　心(女)	《北方文学》第4期
春之声	王　蒙	《人民文学》第5期
结婚现场会	马　烽	《人民文学》第1期
丹凤眼	陈建功	《北京文学》第8期
红线记	罗　旋	《人民文学》第8期
小贩世家	陆文夫	《雨花》第1期
西望茅草地	韩少功	《人民文学》第10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	《上海文学》第1期
活佛的故事	〔蒙古族〕玛拉沁夫	《人民日报》7月12日
镢柄韩宝山	张石山	《汾水》第8期
心香	叶文玲(女)	《当代》第2期
勿忘草	周克芹	《四川文学》第4期
最后一个军礼	方南江　李　荃	《解放军文艺》第11期
手杖	京　夫	《延河》第1期
彩色的夜	王群生	《红岩》第2期
美与丑	〔藏族〕益希卓玛(女)	《人民文学》第6期
海风轻轻吹	吕　雷	《作品》第10期
卖蟹	王润滋	《山东文学》第10期

1980年优秀影片

一、获得一九八〇年优秀影片奖的故事片有八部：

《巴山夜雨》
《天云山传奇》
《法庭内外》
《花枝俏》
《第十个弹孔》
《残　雪》
《苗　苗》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二、获得一九八〇年优秀影片奖的舞台艺术片一部：

《白蛇传》

三、获得一九八〇年优秀影片奖的美术片两部：
《三个和尚》
《雪孩子》

四、获得一九八〇年优秀影片奖的纪录片四部、新闻杂志片两本：
《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黄山观奇》
《他们怎样富起来》(第三辑)
《青春的闪光》
《祖国新貌》(34号)
《今日中国》(12号)

五、获是一九八〇年优秀影片奖的科教片七部：
《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
《遥　感》
《绿化祖国》
《试管苗》
《遗传工程初探》
《119与911》(代制片)
《蓝色的血液》

六、获得一九八〇年翻译片优秀配音奖的两部：
《啊！野麦岭》
《永恒的爱情》

电影“金鸡奖”第一届评奖结果

最佳故事片奖

获奖者：《巴山夜雨》(上影)
《天云山传奇》(上影)
(两片并列)
评委会提名：《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法庭内外》(峨影)

最佳戏曲片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缺

最佳新闻纪录片奖

获奖者：《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新影)
评委会提名：《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网上群星》；《喜浪藻》；《黄山观奇》(以上新影)；《跨征途》(八一厂)

最佳科教片奖

获奖者：《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北科)
评委会提名：《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试管苗》(上科)；《蓝色的血液》(农影)

最佳美术片奖

获奖者：动画片《三个和尚》(美影)
评委会提名：《三个和尚》

最佳编剧奖

获奖者：叶　楠(《巴山夜雨》)
评委会提名：叶　楠；鲁彦周(《天云山传奇》)

最佳导演奖

获奖者：谢　晋(《天云山传奇》)
评委会提名：谢　晋；吴永刚、吴贻弓(《巴山夜雨》)；谢铁骊(《今夜星光灿烂》)

最佳男主角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李志舆(《巴山夜雨》中饰秋石)

最佳女主角奖

获奖者：张　瑜(上影《庐山恋》中饰周筠、《巴山夜雨》中饰刘文英)
评委会提名：张　瑜；王馥荔(《天云山传奇》中饰宋薇)；田　华(《法庭内外》中饰尚勤)

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

获奖者：石　灵、欧阳儒秋、茅为惠、林　彬、仲星火、卢　青(《巴山夜雨》)
评委会提名：石　灵、欧阳儒秋、茅为惠、林　彬、仲星火、卢　青

最佳摄影奖

获奖者：许　琦(《天云山传奇》)
评委会提名：许　琦

最佳美术奖

获奖者：丁　辰、陈绍勉(《天云山传奇》)
评委会提名：丁　辰、陈绍勉

最佳音乐奖

获奖者：高　田(《巴山夜雨》)
评委会提名：高　田；吕其明(《庐山恋》)

最佳录音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缺

最佳剪辑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周鼎文（《天云山传奇》）

最佳特技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姜亦素、董　蕾、戴胜潮、秦孝成、蒲维中（上影戏曲片《白蛇传》）

最佳服装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缺

最佳化妆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缺

最佳道具奖

获奖者：缺
评委会提名：缺

特　别　奖

一、授予儿童故事片《苗苗》（北影）
二、授予译制片女演员向隽殊（长影）

《大众电影》第四届"百花奖"获奖名单

最佳故事片：
《庐山恋》
《天云山传奇》
《七品芝麻官》
最佳女演员：
张　瑜（在《庐山恋》中饰周　筠）
最佳男演员：
达式常（在《燕归来》中饰林汉华）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指出：80年代是实现四化的重要年代，国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根本一条。

1月7日～25日　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即将提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的三个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

1月16日　中共中央召集干部报告会，邓小平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我国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②实现祖国统一。③实现四个现代化。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他指出：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前提是：①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③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④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他还指出：到本世纪末，要争取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1000美元，成为一个小康社会。

1月23日～28日　共青团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韩英作的《团的十大以来的工作和1980年的任务》的报告。通过《关于开创先进团支部活动的决定》和《关于恢复少年先锋队队长、队委标志的决议》。

1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彭真为书记、刘复之为秘书长。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浪费的通知》。《通知》提出了节约公用经费，精简各种会议，控制差旅费，压缩购买费开支等要求。

1月2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在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胡乔木任主

任。

1月30日　我国外交部发表题为《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的文件。

2月5日～12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委员们讨论了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草案的决议》、《关于设立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的决议》；任命薄一波副总理兼任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姬鹏飞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2月23日～29日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印发全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向全国人大建议，把宪法中第45条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书记处书记；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4人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还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决定，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

3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1940年7月1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文章。14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重新出版发行。

3月14日～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并提出西藏的建设方针：以发展农、牧业为主，逐步调整好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布局，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企业的作用，努力发展商业、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3月15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准则要求：①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②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③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④坚持党性，根绝派性。⑤要讲真话，言行一致。⑥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⑦保障党员的权力不受侵犯。⑧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⑨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⑩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⑪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⑫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3月20日　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拓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南昌起义。六大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中央农委书记。1930年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即"立三路线")，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八大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逝世，终年68岁。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国务院四办主任兼轻工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1967年5月7日逝世，终年54岁。

3月24日　吉林省暨长春市召开大会，为青年工人史云峰平反昭雪。史云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被逮捕关押杀害。大会为史云峰恢复名誉，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3月28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要求采取业余党校、短训班和集中上课、分散讨论等多种办法教育训练党员。争取在两、三年内把党员普遍轮训一遍。

4月8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外宣传小组。9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并转发了对外宣传小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

4月8日～1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召开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建议修改宪法第45条的议案、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划问题的决议、关于婚姻法修改草案的决议。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接受吴德辞去本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4月20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集会，反对台湾当局蓄意制造高雄事件迫害台胞，要求取消对黄信介等人的无理判决，释放被捕人士。

4月21日　中央书记处听取北京市的汇报后，作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方针的指示：①在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方面，北京要成为全国的模范，在世界也应是

最好的；②把北京建设成为优美、清洁、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市；③使北京成为全国文化科技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④经济要不断繁荣，人民生活要安定方便。

5月2日　团中央决定授予曹振贤等11名青年“学雷锋树新风模范青年”光荣称号。

5月17日　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追悼大会举行。华国锋主持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刘少奇是湖南宁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抗战期间，他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等职。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中共八届中央副主席，并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遭到残酷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名誉。

5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消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22日～30日　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提出：西藏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所有经济战线上，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和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上来；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加强藏汉干部的团结。

6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但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6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对“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6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电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宣布一律平反。

7月5日　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制定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

7月21日　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迅速建立省属市（地区）、县司法行政机构的请示报告》。提出：各省属市、地区（自治州盟）应设立司法局（处）；各县应设立司法局（科）；各省属市和地区（自治州、盟）所在地的市、县及人口众多、地处交通沿线的重点县，有条件的应立即设立法律顾问处；各省属市、侨乡逐步设立公证处。

7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肖华同志平反的通知》。

7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布“遇罗克无罪”。遇罗克原是北京一名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撰写了《出身论》一文，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被逮捕入狱，1970年3月5日被杀害，年仅27岁。

7月28日　中共中央批转总政《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宣布给黄克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解放后历任湖南省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纪委常务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7月30日　中共中央就“少宣传个人”问题发出指示：从现在起，除中央有专门决定外，一律不得新建个人的纪念堂等建筑。公共场所毛泽东像、语录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高级干部的丧事力求简化和节约。

7月30日～8月9日　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强司法干部培训工作，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建立和推行律师制度，开展公证工作，加强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的法制观念。开展法学研究与国际交往活动。建立健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12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的报告。

8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决定：把西藏解放以来从内地先后派去的干部、工人和文教、卫生、科技人员中的大部分人，分期分批调回内地。

8月8日　国务院发布《革命烈士褒扬条例》。

8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决定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

8月18日～23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官僚主义、权力过份集中、家长制等现象；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8月20日　新华社报道：鞍山冶金矿山公司方长岭铁矿党委，为揭发鞍钢党委副书记王君绍虚报产量，而遭打击迫害的杨晓光、王少华平反。王君绍被免去党委副书

记等职务。

8月21日～2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决定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兼主任，姚依林兼国家计委主任，万里为国家农委主任，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

8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

8月30日～9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彭真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华国锋就政府工作讲了话。姚依林和王丙乾分别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和《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1981年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工业总产值增长6%。粮食6850亿斤，棉花510万担，棉纱1600万件，煤炭6.2亿吨，石油10600万吨，发电量3120亿度，钢产量3500万吨，水泥7800万吨，化肥123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控制在550亿元左右。进出口总额559亿元，比1980年增加42亿元。城镇安排就业600万人，财政收入1155亿元（包括借外国资金80亿元），财政支出1205亿元，支大于收50亿元。1981年计划安排的有些指标高了，财政收支不平衡。因此，在11日全国计划会议上，对这个计划进行了调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会上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黄火青作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的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大会通过决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健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9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才式锅炉"是骗局，它的制造者——化工部副部长李国才在技术上招摇撞骗。11月11日，国务院决定解除他的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9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全部进行复查。

9月26日～29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任命黄火青检察长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院长兼任特别法庭庭长。会议决定特别法庭公开审判。

9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决定给"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

10月19日　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把瞿秋白当成"叛徒"进行批判，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0日　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0月23日　中央办公厅发出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李达是湖南零陵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终年76岁。

11月6日　中央党校宣布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决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杨献珍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工作多年，但多次遭到康生等人的打击迫害，在"文革中"，继续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并于1975年被开除党籍。

1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查了最高人民检察厅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决定受理此案，并将起诉书副本送交江青等10名被告。

11月10日～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①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③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11月14日～29日　中纪委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陈云在会上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审判。1981年1月25日作出判决：判决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陈伯达有期徒

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2月16日～25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团结。赵紫阳指出: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果。邓小平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基本建设要退够。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的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还要尽可能的继续发展。并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经　济

1月4日～23日　全国物价会议确定:今年的物价工作方针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基本稳定。1980年全国农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要严格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

1月5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维护人民币统一市场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流通的报告》。批语指出:要把收取外币的单位压缩到最小限度,极少数单位有必要直接收接外币的,应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并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本年内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后,应即停止直接收取外币。

1月7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召开的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座谈会指出,全国社队企业目前已发展到150多万个,平均每个公社有30多个,年产值占公社经济收入的近⅓,从事社队企业的职工达2000多万人,产品有7000多种。会议提出要继续加强社队企业的经营管理。

1月7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决定1980年对轻纺工业实现"6个优先":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按以上原则,发放20亿元中短期贷款,以扩大轻纺生产的能力。

1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从1977年以来,陆续打出三口高产油气井。每口井每天喷出数百吨原油和上百万立方米天然气。

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1979年我国食油收购量大幅度增加。到1月5日止,全国已收购食油10.3亿公斤,比上一年多收购2.65亿公斤。

1月14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发现大煤田——筠连煤田,探明储量在24亿吨以上。

1月2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在扩权企业中试行。规定:把原定的金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工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4项计划指标,才能按照核定和规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润留成资金。

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彬县发现大煤田,储量达90多亿吨,煤田面积1170平方公里。

1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全国建成职工住宅5640万平方米,比前年增长50%。

1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座大型地下水库在河北省南宫县初步建成,总蓄水量为4.8亿立方米。

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一个新的大型油气田——辽河油田建成投产,目前年产原油500万吨,天然气17亿立方米。它是全国主要油田之一。

2月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要求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除京、津、沪3市实行统收统支外,江苏按自定办法实行,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办法,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贵州8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其余15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地方财政收支的包干基数,以1979年的财政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计算确定。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按一定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不足部分从工商税中按一定比例留给地方;工商税全部留给地方,收入仍小于支出的,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分成比例或补助数额原则上5年不变。

2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和李先念、彭真给中央的信。中央原则同意:合资企业应实行董事制度;合营企业的管理应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合营企业中外国合营者的资产不没收、不征用;合营企业有雇用职工的自主权;企业所得税,国家规定是在扣除储备基金、发展基金、奖励和福利基金之前按率征收的,税率可定为35%;职工工资应以国内工资的平均先进定额为准。

同日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决定:今年要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争取多发电100亿度、多装机100万千瓦。

2月8日　财政部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规定:凡属治理污染,开展"三废"综合利用生产的

产品利润，可以几年内不上交。利用"三废"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减免税收。

2月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全国海关建制收归中央统一管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各地海关受所在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监督指导；关税收入统一归中央。

2月10日　李先念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经济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提出要努力争取农、林、牧、副、渔五业有一个全面的增长，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左右，轻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或者更多一些。合理调整重工业生产，使之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

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安徽省1979年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加强生产责任制，有10个穷县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35.1%，向国家交售粮食比1978年增长50%，交售油脂超额1倍以上，完成国家统购任务，社员口粮比上年增加10%。

2月14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六个部门《关于开办长江对外贸易运输港口的报告》。同意1980年3月开办江苏张家港、南通、南京3港；4日开办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湖北武汉、湖南城陵矶、四川重庆5港办理外贸运输，并同意先对国轮办理外贸运输业务，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对外轮开放张家港、南京港、南通港。

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农民科学家、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陈永康，去年用1.5亩试验田进行稻麦两熟高产试验，平均亩产达到2320.7斤，创这项试验的新记录。

2月19日　国家经委提出做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意见：①把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同整顿企业结合起来。②试点企业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关系，保证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③进一步搞好利润留成的试点工作。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新近发现一个大煤田，已探明储量146亿吨，远景储量超过360亿吨。

2月21日　国家经委确定，1980年企业整顿要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建立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普遍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开展全员培训工作；改进奖励制度。

2月25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工办《关于国防工业部门对外开展进出口工作的报告》，原则同意《关于国防工业部门进出口工作若干暂行规定》。国防工业各部门要组成"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直接对外经营国防工业的进出口业务。各公司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防工办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

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到1979年底，我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已达6000多亿吨，可供开采500年。

2月2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将外贸部所属的商品检验管理局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为国务院直属局。由外贸部代管；各地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收归中央建制。

3月4日～15日　全国对外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阶段对外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作好双边援助工作，逐步改革对外经济援助管理制度和办法，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其他收费项目业务，逐步扩大生产技术合作，搞好多边合作。

3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2.7%，在全世界占120位。到本世纪末，覆盖率要力争达到20%。为完成上述任务，要坚持贯彻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并鼓励社员个人植树的方针。10日，首都召开植树造林动员大会。

3月6日　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必须加快农业的发展，使农村尽可能快的富裕起来；必须全面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整顿经营管理，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必须坚持搞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方针；必须改进计划管理，逐步推行合同制；必须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定额计酬制，实行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3月10日　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目前我国农村集市贸易已达3.6万多个，接近1965年的数量。1979年全国各地集市成交金额已达170亿元，比1978年增加36%。

3月12日　国务院在批转财贸小组《关于成立丝绸公司的意见》中提出，公司不受地区和部门的限制，按产供销内在的经济联系，实行产供销一体化。

3月17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成员，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时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

3月21日～4月14日　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缩短基建战线，压缩基建规模；要做好基建战线管理体制的改革，抓好基建战线投资由拨款改贷款的试点，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要加强各类建设资金的管理。

3月22日　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加速发展畜牧业的报告》。提出：我国牧业生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3.3%，每人平均占有肉类18斤，奶2斤，蛋4斤，大大低于世界水平。为此，要充分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加快发展畜牧业，鼓励个人和集体饲养；确定并建设牧业县和半牧业县；调整现行粮食征购和供应指标；开放牲畜市场，

取消禁宰牛的政策；建立良种繁育推广体系。

同日　安徽省委批转省供销社《关于扩大供销社自主权的试点意见》，同意试办生产性的农商联营，试行跨区联营和改进对合作商店的领导管理。

3月30日～4月24日　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姚依林等讲了话。指出：国民收入中积累比重降到25%左右，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基建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或5%－6%；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比较；要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3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甘肃华亭县境内发现大煤田，煤田面积达100余平方公里，储量达33亿吨。

3月30日　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从4月1日起在国内发行外汇兑换券。

3月31日　中共中央批转新华社报道的《辽宁省大抓蔬菜生产安排好城市吃菜问题的几点经验的通知》。指出：城市蔬菜问题，要坚持城市近郊区农业生产以菜为主的方针，坚持以需定产，产大于销的原则，大中城市蔬菜面积要保证种足，要使农民增产能增收。

4月1日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国营企业计件工资暂行办法（草案）》，要求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计件工资制。

4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转农业部、商业部、粮食部《关于当前生猪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生猪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不要随便改变政策，国家收购生猪的奖售粮要按原规定执行，要正确执行价格政策，既不能压级压价，更不能限购停收。

4月2日　我国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有关海关手续、征税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对向台湾公、私商企业及其在港澳和国外分支机构直接购买台湾商品，直接从台湾起运等，不征收进口关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出口商品均免征出口税。

4月3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把集市贸易管好搞活。对转手贩卖农副产品要区别对待，集体商业和有证商贩，可以按其经营范围，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社队集体可以收集本社队社员的产品进城出售，但不准搞转手贩卖活动；对从事掮客和欺行霸市活动的要坚决取缔；国营农场的三类产品，在履行收购合同后，可以在农村集市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出售。对手工业品上市也不要一律禁止，国家允许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多余部分，持主管部门证明，可在集市上出售。

4月4日　全国农垦局长会议指出，为把国营农场真正当成企业来办，提出以下措施：继续调整经营方针和作物布局；把现有耕地种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坚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方针；扩大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点；抓好职工生活。据统计，1979年我国农垦系统由上一年亏损9000万元变为盈利3亿多元，从而扭转了全国农垦多年亏损的局面。

4月5日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确定：要努力搞好货币回笼，严格控制信贷支出和不合理的货币投放，优先支持短线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大力支持轻纺工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

4月6日～21日　全国物资局长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确定，进一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把物资流通搞活。

4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

同日　国务院批准颁布《农业技术干部职称暂行规定》。其职称定为：高级农艺师、农艺师、助理农艺师、农业技术员。

4月9日～19日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和落实了全年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任务；研究了有关把企业搞活的政策。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4月10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共有3358个，占全国预算内企业总数的8%，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⅓，利润大约占40%。

4月10日～27日　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多办和办好中等专业学校；讨论修改了《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领导管理体制暂行规定（草案）》、《关于办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的意见》、《关于中等专业学校确定与提升教师职称试点工作的通知》。10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4月17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决定恢复我国在该组织的代表权。

5月1日　北京至通辽的京通铁路建成通车，这是华北通往关外的第二条铁路干线，全长806公里。

5月4日　国家建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国家物价总局发出《关于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济管理自主权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允许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前提下，自行承揽部分施工任务或发展为施工服务的多种经营。

5月15日　世界银行董事会决定恢复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权。

5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

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5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到去年底为止，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9万公里，除西藏墨脱县和四川得荣县外，全国2000多个县目前已通了公路。

5月21日～6月4日　全国医药管理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医药生产、供销、使用的统一管理体制。8月26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医药管理局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5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1979年全国银行、信用社累计发放各项农业贷款193.9亿元，累计收回到期愈期贷款172.7亿元。

5月28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委关于京、津、沪三市第二次出口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指出：对外经济工作要统一，在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在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协调行动；要在"活"的基础上统一，不能统死。

5月31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人员谈农村政策时指出：①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②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哪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

6月5日　《人民日报》就山西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发表社论指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这项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500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劳民伤财，收益很少。

6月20日　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布布告，决定在全自治区放宽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废除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各级政府不再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产量计划和种植计划，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6月21日　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交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暂行办法》。

6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决定压缩建设规模，调整投资方向。

6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制定出改革银行体制方案，在全省试行，将过去信贷计划中统收统支制度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基层银行有权自行运用多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有权灵活调剂使用各项贷款指标；用经济办法管理银行，把银行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

6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3年来，国家共安置近2000万人就业。

6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棉纱、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政策的〈通知〉》，再次重申棉纱、棉布继续实行统购统销的原则。

6月30日～7月11日　国务院召开海南岛问题座谈会。会议确定：海南岛应以加速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为重点，大力营造热带林木，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逐步建立适应海南岛特点的新的生态平衡和农业结构。

7月1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推动原料产地和加工地区的联合；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

同日　重庆长江公路大桥竣工通车。大桥全长1121米，桥面总宽21米。主航道跨径174米，是目前我国已建同类桥梁中最大的跨径。

7月2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财政监察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县以上的财政部门设财政监察机构。

7月3日　财政部召开的全国农业税工作会议决定：对长期低产缺粮、收入水平低的穷队，从1980年开始，给予免税，一定3年不变；对1979年国务院已批准核减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税额，从1980年开始，一定5年不变。已减免的农业税粮食达23.6亿公斤，折合人民币7.46亿元，约占1979年全国农业税征收任务的18%。

7月4日～12日　国家农委召开棉花、糖料生产座谈会。确定：1985年全国棉花总产将由1979年的4415万担增加到6000万担，食糖总产将由1979年的250万吨增加到400万吨。9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关于召开棉花、糖料生产座谈会的情况报告》。

7月14日　煤炭工业部决定，逐步在全国统配煤矿井下采掘工人中推行四班六小时工作制；同时对井下作业职工实行免费供应一顿饭。

7月17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对华侨、港澳、台湾同胞进口物品管理和打击走私、投机倒把活动的报告》。要求各地海关执行暂行海关法的规定，依法查处走私案件；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迅速制定打击投机倒把和金融管理办法。

7月18日　第18次全国邮电会议提出，要走联合的道路加快发展邮电通信事业。

7月1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检查企业长期经营性亏损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检查长期经营性亏损企业的问题，帮助他们扭亏为盈。

7月26日　国务院作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合营企业职工的雇用、解雇和辞职，生产和工作任务，工资和奖惩，工作时间和假期，劳动保险和生产福

利、劳动保护、劳动纪律等事项，通过订立劳动合同加以规定。

7月30日　新华社报道：1979年我国人民公社中，有1622个生产大队每人平均分配收入超过300元，最高达到千元以上。

8月2日～7日　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广开就业门路，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8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抽调干部、组成28个工作组，到各省、市、自治区协助当地党委和政府对1979年财政收支情况进行核查。并要求各地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

8月9日　中纪委就上海毛麻、丝绸公司仓库积压大量原料造成霉烂变质一事发出通报。强调要加强经济战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对严重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的官僚主义，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8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大中城市已开放农副产品市场2300多个，上市商品品种达一、二百种。成交总金额上半年达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倍以上。粮、油、肉、禽的价格持续下降，有的低于国家牌价。

8月2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接受宋振明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给予负责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的处分。

8月30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银行《关于要求批准短期外汇贷款办法的请示报告》。指出：外汇贷款的重点是扶持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盈利大的轻纺项目；支持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使用贷款要讲究经济效果，保证按时偿还贷款本息。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随后，此项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到年底，全国除西藏外，28个省、市、自治区试点工业企业达到6000多个，大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9月14日～22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座谈会纪要，即中央1980年75号文件。文件指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9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据28个省、市、自治区（缺西藏）的不完全统计，到6月底，社队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0%。目前共有社队企业148万个，90%以上的公社、80%以上的大队都办有多种企业，全国农村从事社队企业的专业劳动力将近3000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4%。

10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决定：从即日起3年内，对全区农牧业、手工业贷款，实行免息政策。

10月10日～29日　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协商了1980年度粮食购销调拨计划，讨论有关政策和体制改革问题。11月13日，国务院转发了《全国粮食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按政策，搞好粮食购销工作。

10月29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

11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做出过贡献；但是，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有害的。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全国净减少耕地1.8亿亩，相当于四川、广东、广西耕地面积的总和。平均每年减少的耕地，大约和福建省面积相等。

12月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

12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规定：凡是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零售价不得提高，各种议价商品一律按1980年12月7日的价格出售，只能降低，不能提高。一、二类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前不许议价成交。

12月10日　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施行细则》。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批准厦门成立经济特区。

12月18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

12月24日　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座谈会。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等出席。1981年1月21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指出：在调整时期，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但是，中央在广东、福建实行这一方针不会动摇。

12月30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进出口商品免征工商税收的规定》。

军　事

1月11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为抢救两名落水壮族儿童英勇献身的广州部队某部炮连班长戴志敏以“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

3月2日　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从3月15日起，民航总局不再归空军代管。

3月7日　中央军委授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出色完成抢救伤员任务的吕士才“模范军医”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在北京召开。

3月26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空军航空兵射击副主任孙安定“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光荣称号和一级英雄奖章。

5月18日　我国成功地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贺电。6月10日，在北京举行庆功大会。

7月20日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牡丹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两起苏联派遣间谍案进行公开审判，判处苏联间谍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有期徒刑7年，判处苏联间谍王嘉胜死刑。

外　交

2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决定自2月7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9日～11日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访问我国。

3月24日～31日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对我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中扎两国政府签署了文化协定。

4月9日～15日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访问我国。11日，中赞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书和文化协定。

4月14日～23日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对我国进行访问。双方一致同意恢复两党关系。

4月17日　中国和津巴布韦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月2日～6日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访问我国。

5月3日～6日　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访问我国。

5月6日～9日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我党和政府致电哀悼铁托逝世。

5月12日～18日　毛里塔里亚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穆罕默德·库纳乌尔德·海德拉访问我国。

5月27日～6月1日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日本。这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政府首脑。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6月5日～10日　阿根廷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访问我国。7日，中阿两国政府签署经济合作和科技协作协定。

6月11日～18日　巴巴多斯总理约翰·亚当斯访问我国。13日，中巴两国政府签署文化协定。

6月17日～23日　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访问我国。19日，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6月22日　中国和基里巴斯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6日～11日　刚果共和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访问我国。8日，中刚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

7月8日～10日　华国锋总理到东京参加日本国前首相大平正芳的葬礼。

7月21日～24日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访问我国。24日，两国政府签署贷款和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7月22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苏越签订所谓在“越南南方大陆架”合作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协定发表声明，重申西沙、南沙群岛和东沙、中沙群岛一样，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国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进入上述区域从事勘探、开采活动都是非法的，它们之间为此签订的协定和合同都是无效的。

8月21日～23日　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毛泽东主席过去有段时间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永远不能抹煞。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夺取革命的道路。

9月11日　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访问我国。

9月14日～19日　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访问我国。16日，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

9月18日～26日　意大利总统山德罗·佩尔蒂尼访问我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元首。

10月15日～21日　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我国。

10月27日～31日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上将访

问我国。

10月28日～11月4日　荷兰首相安德烈亚斯·范阿赫特访问我国。10月30日，两国政府签署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11月6日～10日　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访问我国。

11月10日～25日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访问我国，胡耀邦同他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这次访问，中西两党关系进入正常化。

11月25日　罗马尼亚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访问我国。

12月1日～16日　希腊共产党(国内派)总书记班比斯·德拉科普洛斯访问我国。

12月3日～5日　中日两国政府成员级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签订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日本政府给中国政府1980年度560亿日元贷款的换文。

文化教育体育

1月23日～2月13日　中国剧协、作协、影协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与会同志认为，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衡量一个作品的社会效果，不能凭一时的反应和票房价值来判断，还得经得起比较长时期的检验。

2月9日　中国第一批国际象棋大师在瓦莱塔结束的第四届马耳他国际象棋等级赛上诞生。39岁的刘文哲和19岁的梁金荣，都以9.5分的总成绩，取得国际象棋大师称号。

2月13日～24日　第13届冬季奥运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

2月15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的在我国较有影响的两家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今起复刊。

3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等部门《关于抵制外国教会对我进行宗教渗透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对外来的宗教渗透的危害性，应予充分估计，要作好对内外两方面的工作，尽可能地防止限制其影响。

3月15日～23日　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是关系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

5月8日～12日　中央书记处听取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后指出：现在的教育状况不适应四化的要求；力争在80年代使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把重点抓好，教育经费的投资和师资要集中，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劳动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要多种途径办教育；要改善教师待遇和办学条件；要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

6月1日　中央书记处举行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茶话会，号召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辅导员》杂志的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7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近年来吸收了一批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科学家和有造诣的青壮年科学家入党。其中包括：严济慈、童第周、华罗庚以及杨乐、张广厚等。

7月15日　中央书记处听取图书馆工作汇报，并通过《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

7月15日～26日　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暂行条例》。9月22日，国务院批转《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

8月7日　我国首次研究成功人造血液，并在临床应用取得满意效果。

8月14日　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听著名物理学家吴仲华、王淦昌和化学家鲍汉琛讲能源科学。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得到全部改正。

8月18日　文化部发出通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受到"二流堂"问题牵连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所谓"二流堂"是我党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

9月5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指出：要把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纳入高等教育事业计划，本科和专科的函授教育和夜大学学生，考试成绩及格的，国家承认其学历。

9月17日　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单位《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

10月7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指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应当实行普遍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方针。适当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

10月10日　著名人民艺术家赵丹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27日，文化部、中国文联举行悼念赵丹大会。赵丹是中共党员，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话剧活动，并进入电影界，曾主演过多部进步电影。建国后，他又成功地塑造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许云峰

等人物，为中国电影的表演艺术留下了宝贵财富。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陈国良等7位中年科技工作者，在晶界微量析出相对高温合金性能影响的研究方面，取得新成果。

12月1日　在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发掘出腊玛古猿人头骨化石。这一发现，证明人类起源时间是在800万年前，起源地点是在亚洲。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12月1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方毅为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

12月25日～1981年1月5日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社会生活

2月2日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会议指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

2月6日　邮电部决定从今年的七月一日起，在全国推广"邮政编码"制度。

3月27日　经国务院批准，并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理事会执行局通过，我国长白山、卧龙、鼎湖山三处自然保护区被划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4月4日　新华社报道：在西德货轮上工作的我国大陆17名海员，在货轮到达台湾基隆港时，应邀到台北市参观游览，受到台湾同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同日，我海员工会副主席丘金就此事发表谈话，希望今后这种交往越来越多。

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达68.2岁(1949年为32岁)，其中男性为66.96岁，女性为69.5岁。

5月4日　国务院确定祁连山、贺兰山、罗山、六盘山、子午岭、乔山、黄龙山和天山等林区为水源涵养林区；内蒙古潮格旗的天然棱棱林、克什克腾旗的红皮云杉林、大青沟珍贵阔叶林、新疆塔里木河中游的胡杨林为自然保护区。要求有关省(区)人民政府制定管理办法，予以认真保护，严禁毁林毁草。

5月4日～24日　由日本回国巡展的鉴真大师像在北京展出。

5月1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规定：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统属国家财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古墓、古遗址；一切历史文物都不得进行黑市交易；珍贵历史文物一律不准出口。

6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收回文化革命期间散失的珍贵文献和图书的规定》。指出：被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一伙非法掠夺的坚决追回；我们的同志私自拿去或低价"购买"的，应自动退回。

6月17日　国务院转发《"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提出："三北"地区要力争在三、四年内，将风沙区1亿多亩的农田防护林建成。

6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分两批进行的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结束。第一批试点单位有92个，第二批有460个。

7月8日　西藏拉萨举行詹东・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顿吉・索朗多吉3位爱国上层人士的追悼会。自治区领导郑英宣布为他们平反昭雪，并给家属落实政策。

7月14日～30日　康克清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席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并发表讲话，赞助并支持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的联合国十年的活动，同时在《消除对妇女的任何形式歧视公约》上签字。

7月16日　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宗教团体房屋的产权全部退还给宗教团体。

7月24日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邀请中国科学院专家到中南海讲课。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讲第一课，题目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简介》。

8月6日　国际世界语协会执委会通过一项决议，接纳我国世界语协会为该协会团体会员。

8月8日　国务院发布《革命烈士褒扬条例》。

8月9日　新华社报道：武汉第一医学院使用天津第一中药厂生产的中药针剂注射液蟾力苏成功地抢救了一个出生后窒息20分钟的新生婴儿。

9月22日　全国首次自然保护区划工作会议在成都结束。我国自然保护区由72个增至300多个。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

同日　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10月29日　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炸死9人，炸伤81人。经公安部门查明，此案罪犯是山西运城拖拉机厂工人王志刚。王犯已被当场炸死。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1年

导　言

198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风云激荡的一年。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在党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年的热点也都体现出这一时代特征。

政治方面。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得以保持并进一步发展。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统一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这次会议是一次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四次会议则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另外如建党六十周年纪念和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也较引人瞩目。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是又一热点，在叶剑英提出"九点方针"后，全国上下热烈响应，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和崭新的局面。

军事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演习，展示了军威，受到国内外一致注目。

经济方面。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在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业生产取得了全面的增产。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标志着我国水利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文学艺术方面。贯彻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的精神，对以电影剧本《苦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深刻批评。此外，围绕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形成了又一个热点。

社会道德风尚方面，全国上下开展了深入、持久的"五讲四美"活动，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崭新的社会风尚。

社会治安方面。各地公、检、法机关切实进行综合治理，坚决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整顿治安工作有了较大进展，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拥护。

体育方面。中国体育健儿们取得了令举国上下振奋不已的好成绩。中国乒乓球选手囊括了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所有7个项目的冠军和所有单项亚军。而更令人激动的是，中国女子排球队奋力拼搏，七战七捷，首次夺得世界冠军——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向女排学习的热潮。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四次会议
- 台湾回归祖国问题
- 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演习
- 葛洲坝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 农村多种经营迅速发展
- 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
- 关于《苦恋》的批评
- “五讲四美”活动
- 中国女子排球队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 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　整顿社会冶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议，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三中会会之后，又一次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会议，是一次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它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阐明了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全会还对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和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对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保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的充分实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把中国逐步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材料：

- 总结经验、团结前进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

材料一　总结经验　团结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耀邦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副主席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习仲勋为中

央书记处书记。

材料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加强团结，振奋革命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伟大而深远的影响。

《决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1978 年底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功绩是，重新确立了党的三条正确路线，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为全面地、认真地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科学的考察国内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的战略决策。同时，根据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必须立即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问题。这次全会，还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并认真地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文革”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1979 年 9 月党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是，通过了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叶剑英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深刻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为《决议》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1980 年 2 月党又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恢复了刘少奇的名誉。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并制定了各项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决议》的制定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邓小平在起草工作开始时就明确地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次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基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决议》从开始起草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总共用了 1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文件起草的整个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

1979 年，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已经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并指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之后，党中央从 1979 年 11 月起，就集中了一些同志，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从 1980 年 3 月正式开始起草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在起草过程中多次听汇报，提出具体意见，直到动手修改。党中央还决定，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反复修改，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比较大的几次讨论和修改是：1980 年 10 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 4000 人，集中 20 天时间进行讨论和修改；1981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部分老同志共 50 多人进行了修改；1981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举行为期 12 天的扩大会议，有 76 位同志参加讨论和修改；1981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130 多人，在中南海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文件的意见；在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决议》的同时，还在中央党政军机关 1000 名党员领导干部中征求意见。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 1981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决议》，并于 1981 年 7

月1日发表。

总之，从《决议》起草到六中全会通过为止，起草小组先后正式提交几次会议讨论的文稿本有7次之多。我们党对待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采取了极为郑重、严肃的态度。它的起草过程，是党中央走群众路线的典范，生动地体现了《决议》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共分八个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决议》的全部内容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三十二年来的是非功过。

《决议》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就会迷失方向。《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造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翻身和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决议》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在过去指导我们夺取胜利，也是当前和今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保证党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

《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基本估计，指出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建国三十二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决议》同时指出，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和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以致一度在经济建设上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因而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成就。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克服了"左"的东西，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虽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但我们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日益兴旺发达。

总之，《决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它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全党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它将永远载入我们党的史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四次会议

背景介绍

1981年11月24～25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如何开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举行民主协商会。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托，就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作了说明，并提出了增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建议。与会各方面人士进行了热烈充分的讨论。

11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了会议。

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大会作了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当前的经济形势；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三、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在11月30日的全体会议上，赵紫阳作了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国务院向大会提出了198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点的书面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了关于代表情况和补选的代表资格审查的书面报告。自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逝世的代表有35人，由原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有14人，辞去代表职务的1人，补选代表25人，现有代表3453人，出席这一天会议的代表3154人。

各国驻发使节和外国在京记者旁听了大会。

12月1日上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听取赵紫阳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三部分和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在会上提出一份书面说明，建议将修改宪法完成期限推迟到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12月7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杨尚昆副委员长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关于几个法律草案的说明；江华、黄火青分别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林业部部长雍文涛受国务院委托作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运动议案的说明。

会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顾明、财政部副部长谢明、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高克林，分别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提出了书面说明。

通过两个法律　12月13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决议。决议说，这个报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量是符合实际的，报告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是符合国情的，是可行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国务院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推迟审议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进行。

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令第12号公布，自1982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令第13号公布，自1982年1月1日起施行；原则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意见，修改后公布试行。会议还批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责成国务院制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并公布施行。

补选朱学范为副委员长　会议还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截止12月8日，代表们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提案共2318件。在这些提案中，属于工业交通方面的941件，属于农业方面的228件，属于财贸方面的164件，属于文教方面的458件，属于政权建设、政法、国防、民族、外事、法制建设、社会治安、拥军优属、宗教事务、侨务、旅游等方面的527件。提案中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有：整顿企业，改革工资制度和奖金办法；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和稳定物价；广开就业门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待业青年；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等。提案对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各项提案已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完毕，分别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办理。

会议补选朱学范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大会于12月13日胜利闭幕。

出席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的委员列席了大会的各次全体会议。

材料：

-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 我国经济建设十条方针
- 我国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 我国财政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

材料一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下午三时，大会执行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大会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国歌。

赵紫阳总理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他向人民代表们汇报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整个经济形势比预计的好得多，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赵紫阳的报告分三部分：（一）当前的经济形势；（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三）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赵紫阳在说明我国经济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时着重指出，我国经济稳定，首先表现在实现了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在很短时间里，财政收支从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证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

赵紫阳说：在取得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同时，我国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农业全面增产，轻工业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重工业生产已由下降开始回升，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投资的使用比过去合理多了，科学研究工作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对内对外贸易都有了扩大，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事实说明，今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经济全局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赵紫阳说，一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他代表国务院，对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

谈到今后的经济建设时，赵紫阳提出要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为此，他代表政府提出十条方针，请人民代表们审议。

赵紫阳在作完报告的第二部分后，大会于下午六时十分休会。明天将由赵紫阳继续作报告，报告过程中，会场里不时响起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国务院今天还向大会提出了 1982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点的书面报告。

在大会开幕前和会间休息时，代表们围坐在人大会堂休息厅的一张张圆桌旁，互相传告各条战线的胜利消息，热烈交谈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参加五届政协四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列席了今天的会议。

在今天的大会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了关于代表情况和补侯的代表资格审查的书面报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三千四百五十三人，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为三千一百五十四人。

今天的大会执行主席还有彭真、乌兰夫、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彭冲、赛福鼎、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胡厥文、肖劲光、史良、习仲勋、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列席今天大会的还有：国务院组成人员、全国人大各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正在北京的我国驻外使节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国在京记者旁听了今天的大会。

（摘自 1981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这次会议自 11 月 30 日开幕以来，代表们就各项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审议了会上的报告、议案和法律草案。今天的全体会议就这些报告、议案和法律草案作出了决议。

出席今天大会的代表共三千一百二十三人。

会议就赵紫阳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通过了决议。决议说，这个报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量是符合实际的，报告提出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可行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决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斗。

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国务院 1980 年国家决算和 1981 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推迟审议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也在今天的会上获得通过。会议还原则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在修改后公布试行。

今天的会议还分别通过决议，批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就国务院提出的议案，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中责成国务院制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并公布施行。

会上还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

今天的会议补选朱学范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议程全部进行完毕，大会在国歌声中闭幕。

今天的大会执行主席还有彭真、乌兰夫、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彭冲、赛福鼎、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胡厥文、肖劲光、史良、习仲勋、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摘自 1981 年 12 月 13 日《工人日报》）

材料三　我国经济建设十条方针

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今后的任务时，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这十条经济建设的方针是：

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

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

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

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

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

六、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

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

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

人民生活。

赵紫阳指出，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积累，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我们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材料四　我国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赵紫阳总理今天在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赵紫阳说，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向大会报告：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他说，今年进行这么大幅度的调整，又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总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整个经济形势比预计的好得多。他说，今年的经济情况是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明年和今后的经济发展，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赵紫阳在阐述我国经济稳定的表现的时候，提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了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市场物价基本稳定。财政赤字从一九七九年的一百七十亿元，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二十七亿元，预计降低到今年的二十七亿元。物价总指数的上涨幅度今年比去年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

今年，在不少省、区遭受到严重水旱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预计接近一九七九年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产年；棉花生产继去年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之后，又有新的突破；油料在连续三年大增产的基础上，又增产百分之十七左右；糖料产量将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林业、畜牧业、渔业也都取得了生机勃勃，广大社员喜气洋洋，农业发展方兴未艾。

——轻工业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今年，轻纺工业的总产值预计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二。轻纺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质量有所提高，日用百货日益丰富多采，使我国市场比前几年有了很大变化，

——重工业在调整中出现的下降情况已好转，从今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回升。

——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为三百八十亿元，投资的使用比过去合理得多了。原定今年全部投产的项目，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按计划实现，这是多年以来没有能够做到的。

——农业、工业、国防和其他方面，应用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推广新技术，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步伐加快，效果更加显著。一九八〇年，全国涌现出重大科研成果二千六百多项，今年又继续增加，已经应用于生产的项目达到百分之五十。今年，工业部门试制的新产品和试验的新工艺有上万种，其中半数已投入生产。

（摘自 1981 年 11 月 30 日《工人日报》）

材料五　我国财政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

我国财政在两年每年发生一百几十亿元赤字的情况下，今年预计赤字可降低到二十七亿元，做到收支基本平衡。

赵紫阳总理今天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上述情况时指出，在很短时间内，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对政府的高度信赖，艰苦奋斗，比较顺利地做到了财政基本平衡这一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赵紫阳在报告中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国务院分析当时的经济情况发现，由于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种支出大大增加，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没有按计划减下来，行政费用还继续增加，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1981 年财政上还会有一百几十亿元的赤字。

赵紫阳指出，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去冬以来，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加强集中统一，严格对财政金融和物价的管理，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各项行政费用，增收节支，开辟财源，使今年的财政收支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摘自 1981 年 11 月 30 日《工人日报》）

台湾回归祖国问题

背景介绍

1979 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的气氛。为了促使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

嫌，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于1981年国庆前夕，再一次向台湾国民党发出呼唤，提出九条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议还提出了合作的方式，和开拓海峡两岸各族人民实行广泛接触的渠道。

九点方针发表以后，中国党、政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纷纷发表谈话，认为九点方针合情合理，呼吁台湾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两岸携手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共同奋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更进一步指出，九条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的最高国策，是长久的战略方针和目标。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此也反应强烈。政协全国委员会10多位副主席举行座谈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叶剑英的谈话，表示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尽全力。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及早作出令人满意的反应。

为贯彻执行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有关机关团体、东南沿海省市分别提出相应措施和有关决定，准备对台湾各方面人士归来予以优厚的接待。与此同时，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同学会等团体、组织也纷纷成立，还召开了大陆首次“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也作出积极反应，继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之后，又有马璧教授等知名人士由台湾回到大陆定居。

材料：

- 廖承志说九条是最高国策
-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反应强烈
- 为“三通”大开方便之门
- 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
-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

材料一　廖承志说九条是最高国策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1981年10月间在接受《瞭望》杂志记者访问时说：“需要指出的是，这‘九条’，不是权宜之计的‘九条’，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九条’，也不是作为一种宣传攻势的‘九条’，更不是将对方的军的‘九条’，而是从国家民族大计大利考虑的‘九条’，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利益，需要这样做。”他强调说：“‘九条’是我国的最高国策，是长久的战略方针和目标，这是不会变的。”“我们要做的是，把‘九条’不仅仅有利于大陆，也确实有利于台湾当局的道理反复讲清楚。”廖承志详细分析了台湾的经济状况，具体说明台湾只有和大陆合作才有出路。在谈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前景时，廖承志说：“历史车轮转动得往往会比人们预想的要快。”“我们党是乐观的。包括台湾在内，消极悲观的人，最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是有信心的。没有可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正因为有实现的可能性，才提出了这‘九条’。”“台湾人和大陆人是骨肉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骨肉情亲，这是根本的。台湾当局现在虽然要点小孩子脾气，但是他们一直坚持两条：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从这两个共同点出发，双方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是乐观的。”

材料二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反应强烈

政协全国委员会10多位副主席举行座谈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叶剑英的谈话，表示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尽全力。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谈话，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及早作出令人满意的反应。民革中央代主席王昆仑说，叶委员长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也照顾了台湾的现实及台湾当局的处境，通情达理，言词恳切，感人至深。殷切希望台湾当局本着爱国良知，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民心，捐弃前嫌，使国共通过谈判再度合作，共同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历史任务作出贡献。

民盟中央主席史良说：叶委员长的谈话，方针明确，态度诚恳，措施具体，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和愿望。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说：我们知识分子愿与台湾的科学文教界的朋友们一道，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共同努力，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

民主促进会主席周建人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推动了时代的前进，现在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不再固执己见，早日回归，必将受到全国各族同胞的欢迎。

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说，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豁达大度、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希望台湾当局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为实现台湾回归、和平统一祖国尽力，使自己无愧于炎黄的子孙。

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说，叶委员长的谈话，深得民心，顺应潮流。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台湾工商业者不必再有什么顾虑。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尽自己神圣的责任。

致公党主席黄鼎臣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具体明确，既符合

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又照顾到台湾的现实,合情合理。

台盟总部副主席李纯青认为,现在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员中,台籍人占半数以上。在台湾各机关团体中,台湾籍同胞不乏有力之士。台湾100家重要的企业集团,台湾人占79家。1978年,台湾民营工商业产值占台湾全部企业总产值的80%以上,远远超过了官僚资本。台湾新生一代人才辈出。在国外,有名的台籍学者教授数以千计。台籍华侨遍布全世界。如能将台胞力量发挥出来,它对统一祖国、建设祖国必将有重大贡献。台湾同胞要和大陆同胞一起,为促进和谈的实现,共同努力。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全国青联代主席刘维明、全国学联主席林炎志联合发表谈话,要求青年做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先锋。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说,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是大陆各族人民,也是台湾各族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完全符合海峡两岸广大妇女的根本利益的。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胡子昂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工商界人士组成的人民团体。我们愿为台湾工商界朋友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经济事业提供一切可能的服务。

全国侨联主席庄希泉说,爱国华侨热望祖国的和平统一,许多侨胞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亲戚朋友,同双方都有往来接触,是促成双方互相了解和合作绝好桥梁。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委会主任林丽韫说,我们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籍同胞都受到巨大的鼓舞,决心和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团结一致,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不幸的分裂局面,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而努力。

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说,叶剑英委员长阐明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方针政策,很得人心。蒋经国先生如能积极响应,他就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这是他最好的出路。希望蒋经国先生能够接受叶委员长的建议,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做流芳后世的人物。

材料三　为“三通”大开方便之门

为贯彻执行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交通部、中国民航总局、邮电部、外贸部、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中央气象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商品检验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水产总局、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笔会中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团体,以及厦门和上海港务局分别作出决定和建议。

交通部:准备从上海、厦门、广州开往台湾基隆、高雄港的客运班轮,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旅游、探亲、访友等交往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准备货运班轮从沿海港口开往台湾港口,发展海峡两岸的商业往来和物资交流;并随时准备同台湾交通部门和航运界协商大陆与台湾通航事宜。

中国民航总局:已准备好随时可以飞往台湾各城市的航机,为台湾海峡两岸人民进行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探亲、访友、旅行以及发展贸易提供方便条件;台湾民航飞机在飞行中如遇有紧急情况,可到大陆各民航机场降落、起飞,大陆机场将提供一切安全保障和服务设施;准备随时与台湾航空当局进行通航谈判。

邮电部:准备通过海运和空运,开通大陆到台湾的直达邮路,实行直接交换邮件;随时准备通过卫星开通北京至台北的直达电信电路;准备随时同台湾邮电部门就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通邮,通电事宜进行谈判。

外贸部:欢迎台湾工商界同胞来大陆参观考察、洽谈生意、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商品展销会、设立公司代表机构;大陆各进出口公司愿意派代表前往台湾,同台湾工商界同胞洽谈贸易;对台湾需要的祖国大陆产品,愿以优惠价格安排供应;对台湾能够供应而我又有需要的产品,我将以积极的态度洽购。热烈欢迎台湾经济部官员同我外贸部有关官员会晤,商讨通商事宜。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已经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同台湾主管旅游工作的部门共同协商,议定有关旅游事宜,使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旅游渠道早日恢复和畅通。

中央气象局:随时准备与台湾气象当局商谈建立气象通信联系有关事宜,以便直接地及时地交换气象情报,并欢迎台湾气象当局派官员来大陆考察气象工作,交流气象工作经验,共商全国气象工作的发展大计。

中国人民银行:建议大陆,台湾两地金融、保险部门和金融界、保险界人士互相访问和举行会晤,洽谈开展业务往来事宜和进行学术经验交流。台湾各界人士回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各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中国银行:建议大陆、台湾双方建立业务关系,直接办理一切贸易与非贸易汇兑业务。在双方尚未建立直接业务关系期间,建议各自通过在香港的银行办理结算。中国银行还愿为台湾同胞提供存款服务,保证存取自由。

国家商品检验局:愿为台湾商品检验局和其他检验单位建立业务关系,进行检验合作,开展相互委托检验业务。对直接输入大陆的台湾产品,凭台湾商品检验证书验放免行。从大陆直接输往台湾的产品,欢迎台湾提出检验要求,如愿意派检验人员来共同检验,也热烈欢迎。国家商检局随时准备与台湾商检局的有关官员会晤,商谈检验合作问题。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欢迎台湾医药界同行与祖国大

陆积极开展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品等的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发扬祖国医药遗产。

国家海洋局：随时准备与台湾海洋工作部门建立联系，交换海洋调查和科学研究的资料；欢迎台湾海洋科学家来大陆参观、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共同研究发展祖国海洋事业的方针；随时准备与台湾海洋工作部门商讨，共同组成代表团，参加国际有关海洋方面的组织和学术团体召开的会议和活动。

国家水产总局：欢迎台湾水产科学界同仁与大陆开展水产科学技术交流，共同探讨发展祖国水产事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同时，欢迎双方互派渔业代表团和渔业工作者参观访问；欢迎台湾水产界和工商界来大陆投资兴办水产生产和加工事业。对台湾需要大陆供应的渔需物资，国家水产总局愿意优惠安排供应，开展大陆与台湾之间水产品贸易。

文化部：欢迎台湾文化界人士、艺术团体和美术家，到大陆来演出、拍摄电影和举办展览或参加大陆的各种展览会；愿意和台湾文化界一起进行各种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共同研究祖国的民族文化。

中国科学院：欢迎台湾学术界通过适当方式推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中国科学院各学部为台湾科学家保留了学部委员增补名额；欢迎台湾学术界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其他学术活动。从1982年1月1日起，中国科学院将设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欢迎台湾的科学家提出申请，凡符合"基金条例"规定的课题，均给以基金支持。

全国总工会：热忱欢迎台湾各业职工兄弟姐妹们和工会人士来大陆参观、度假和探亲访友。大陆各地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随时准备热情接待和提供各种方便条件。

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及各地工商联组织，准备随时与台湾工商界有关组织建立联系，互通商情。全国工商联并在第四届执委会委员中，给台湾同仁保留了名额，随时欢迎台湾派代表参加，以利于通力合作，发展祖国的经济建设。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欢迎台湾各有关协会派队参加1982年举办的各个项目的全国性比赛。1983年将在上海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欢迎台湾体育界派出代表团参加，也欢迎台湾体育爱好者前来观察。邀请台湾地区水平较高的棒球、柔道、田径等项目的教练员来大陆任教，大陆也愿派教练员前往台湾任教；建议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分别组成代表队，参加1982年举办的国际田径、足球、男子排球、曲棍球、射箭5个项目的邀请赛。

中国笔会中心：欢迎同台北笔会中心和其他台湾作家组织及个人建立通信联系，交换作品和刊物。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两个笔会中心的联席会议，就发展祖国文化事业交换意见，讨论问题，交流经验。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愿意同台湾红十字会就查人转信进行合作，为台湾同胞与祖国内地的亲友联系、团聚提供帮助。如果台湾红十字会在这方面感到不方便的话，中国红十字会可以接受、安排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的个人和团体来大陆探亲、访友，并负责保证来去自由。

厦门港务局：决定做好厦门至台湾基隆港、高雄港的客运班轮业务的准备工作，为货运班轮从厦门港口开往台湾港口，落实好码头、泊位、库场、装卸、理货等的一切必要设施，为发展海峡两岸的商业往来和物资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

上海港务局：已做好各种准备，尽快恢复中断了33年的上海至台湾的水上运输航线。台湾船只来沪，上海港口将优先安排进港、靠泊、装卸。港口客运站也将为台湾骨肉同胞来祖国大陆旅游、探亲、访问等，优先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东南沿海省、市的决定：东南沿海福建、上海、浙江、广东4省、市，为了响应和落实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除欢迎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定居提供方便条件，保证来去自由外，并分别作出决定。

福建省：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福建投资，发展经济，享受祖国的各种优待。

上海市：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来上海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台湾文教界、科技界、体育界人士来沪进行学术交流、体育比赛和艺术演出等活动；建议台湾和上海的航运部门迅速接触商谈，早日恢复上海与基隆等港的客货轮通航。

浙江省：热情接待海上遇难的台湾渔民；欢迎台湾的浙江财团和实业界人士到浙江投资，兴办旅游等各种经济事业，切实保障各种合法权益和利润。

广东省：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广东投资，特别是到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在特区内划定一定的土地面积，由台湾工商界人士投资或合资开发经营，保障其享受特区的各种优惠待遇。

材料四　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

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1981年8月8日9时28分在福建某机场降落。

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县(原永淳县)，1952年出生在台湾。他家中现有母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嫂嫂，还有叔婶等亲友。他高中毕业后进国民党空军官校受训4年，后到部

队飞行8年，由于技术熟练，成绩优异，多次受到奖励。黄植诚热爱祖国，富有民族自豪感，渴望国家尽快统一、强盛。他曾收听过祖国大陆的广播，看过大陆散发的传单，还从外国报刊上了解到一些大陆的情况。他拥护祖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主张，不满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阻挠统一的言行，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8月8日上午8时20分，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F－5F型飞机起飞，同机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任务是对许进行仪表飞行的考核。起飞后不久，黄植诚叫许秋麟打开盲目罩，问现在到了哪里，许说到了大陆。黄植诚告诉许秋麟："我就是要到大陆，"并问许愿意不愿意回大陆，许说不愿意。于是黄植诚将许秋麟送到东引岛上空叫许跳伞。黄植诚看许秋麟的伞打开，便急速把飞机下降，沿着海面飞行，飞进大陆上空，在福建前线某地机场安全降落。当机场站长为他解开伞绳时，他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黄植诚回到大陆后，受到祖国政府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赞扬。福州部队和空军领导机关先后召开欢迎大会，表彰黄植诚的爱国、正义行动，奖励他人民币65万元，并批准其参加人民解放军，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邓颖超、张廷发、耿飚、杨得志、廖承志等分别接见了他，勉励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黄植诚还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说明自己驾机起义的动机和经过，断然否认了台湾当局所谓他是由于飞机故障才在大陆降落的说法，指出他是为了响应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而飞回大陆的。

黄植诚先后在北京、沈阳、西安、广州、桂林、杭州、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并到成都看望了3位亲姨妈，回广西老家会见了叔伯亲友。在此期间，黄植诚接触了许多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亲眼看到祖国大陆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亲身感受到全国安定团结。他说，大陆的实际情况，同台湾当局宣传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好得多。虽然目前经济落后，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我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基础很好，前途远大。自己今后要从头学起，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全部技能报效国家。

9月30日，黄植诚听了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以后又出席了首都各界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他表示拥护祖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希望台湾当局积极响应。

材料五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

1981年12月22～29日，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台湾同胞代表出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它的宗旨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广泛联络国内外台湾同胞，增进乡亲情谊，同心同德，积极促进全民族的大团结，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繁荣富强的伟大祖国而贡献力量。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任务是：团结和联络国内外台湾同胞及其民众团体，帮助他们了解政府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祖国大陆的情况。向政府反映国内外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建议。积极促进在台湾和海外的台湾同胞同祖国大陆同胞开展经济、文化、学术、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增强台湾各族同胞同祖国大陆各族同胞的爱国大团结。密切联系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向他们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鼓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多作贡献。主动了解和反映台湾同胞有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配合有关部门按政策予以妥善处理。对于前来祖国大陆寻祖、探亲、访友、寻人、旅游、升学、定居的台胞，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接待、服务、安置等各项工作。积极协助愿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台胞，来祖国大陆进行贸易、投资、建厂、办校、讲学、做研究工作等活动。

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演习

背景介绍

1981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了规模较大的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观看了演习，并检阅了参加演习的陆军、空军及部分海军部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观看了演习并检阅了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野战军和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以及当地干部和人民群众代表，也观看了演习和阅兵。

反映现代国防科技条件下的作战特点：这次演习，立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有装备，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把

研究现代战争放在突出位置，着重提高用现代化战争手段实施防御敌人入侵的能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参加演习的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演习是在经过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沙盘推演、图上作业和实地研练的基础上，以"红"、"蓝"两军从空中到地面展开对阵"激战"的方式进行的。

表现高度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娴熟的战术素养：演习中，各部队在合成军首长的统一指挥下，撒得开，捏得拢，联得上，合得成，行动迅猛及时，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纪律观念和时间观念。整师、整团的多军兵种协同动作，无论陆空之间，步坦、步炮之间，前后方之间，还是部队的集结、开进、冲击、穿插、坚守，以及各种保障工作，都能按照协同预案准确地进行。参加演习的人员和车炮，攻守进退，按令行止；所有火力击袭，炸点准确；各类型、各批次的飞机，在不同机场、不同距离、不同速度和不同气候条件下，都做到了按时到达"作战"空域。整个演习，各个方面的协同都比较成功，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娴熟的战术技术素养。这次演习，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提高合成军队作战能力、运用现代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

探索现代条件下战时政治工作和特点：演习中，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作指导，全面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战斗士气。演习中，政工干部还注意探索了现代条件下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内容和方法，为政治工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各级政工干部在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军事素养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

后勤以临战姿态积极配合：在这次近似实战的大规模演习中，各级后勤机关、保障部门，都以临战姿态，积极配合，按照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要求，从吃、住、用等各方面，保证部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演习。空军的优良场次率，油料合格率、航材合格率，均达到了百分之百。各部队还演练了现代条件下作战的保障指挥，摸索了合成军队与加强兵种统一组织保障的方法，试验了一些现代化保障手段和野战饮食、医疗救护、装备修理、输油加油等革新器材，取得了一些新的保障数据和经验。这对提高平时和战时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能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演习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爱护人民利益。演习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人群众，也发扬了战争年代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从各方面为演习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演习，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军民闭结。

盛大的阅兵式：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分列式。

陆海空三军指战员排列成53个整齐的方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军委主席邓小平向受阅部队发表了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等，于9月24日在北京接见了参加军事演习的军队领导干部和参观这次演习的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邓小平主持召开大会，胡耀邦、赵紫阳在会上讲了话，热烈祝贺这次演习的成功，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就。国防部长耿飚、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也讲了话。

材料：

- 我军向国防现代化挺进

材料　我军向国防现代化挺进

——记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参加演习的陆、空军部队和部分海军部队

1981年9月19日，这是我军建军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华北某地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胜利完成军事演习任务的陆、空军部队，以及部分海军部队，代表全军广大指战员，在这里光荣地接受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检阅。

秋阳灿烂，金风轻拂，群山苍翠。整个阅兵场沉浸在欢乐肃穆的气氛之中。高高耸立的检阅台屏风正中，巨大的"八一"军旗在阳光下闪耀。一个个整齐威武的方队，依序排列，一眼望不到头。指战员们英姿勃发，满怀赤诚，万分喜悦地凝望着主席台。党啊，祖国啊，请检阅吧！检阅您哺育的无比坚强的人民子弟兵吧！

九时整，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检阅台。这时，已在检阅台和参观台上的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党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向他们热烈鼓掌。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身穿军装，神采奕奕的邓小平同志乘一辆红旗牌敞篷汽车，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陪同下，缓缓地行驶，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邓小平同志向全体指战员频频发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问候，队列里立即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亲切的问候，响亮的回答，汇成阵阵声浪，在空中回荡。

阅兵式完毕，邓小平同志站在敞篷车上，向受阅的陆、海、空三军讲话。当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胜利完成演习任务的部队致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的时

候，队列里和参观台上爆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和掌声。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说出了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极大地振奋了军心，许多人的眼里满含着激动的泪花。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统帅和士兵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战斗意志，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完全融合成一体的。

隆重的分列式开始了。

鲜红的"八一"军旗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护卫下，作为受阅部队的先导，通过检阅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参观的各界代表，肃然起立，庄严地向军旗行举手礼和注目礼。战旗呵，光荣的旗！为中华崛起，南昌城头举起您。半个多世纪，您记载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战旗呵，英雄的旗！人民军队高举着您，浴血奋战，一往无前，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您。战旗啊，胜利的旗！今天，您又指引着我们在国防现代化的征途上胜利进军。

看！绿色的钢盔映出一片片田野，水兵的飘带跳动着大海的浪花，白色的头盔系着蓝天的云霞。走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是陆、空军军校和海军某训练团学员组成的方队。要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懂得现代战争，能够带兵打仗的又红又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建国以后，我军的院校建设经历过大起大落，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恢复和筹建了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今天参加检阅的某陆军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校长袁捷告诉记者，短短三年，他们已发展成为我军目前规模较大的一所初级指挥学校，为部队培养和输送了五千四百多名初级指挥员。海军某舰队训练团，自组建以来，已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为海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连续三年被空军评为学习航空兵一师先进单位的空军某学校，是培养飞行员的"摇篮"。参加这次受阅的的学员，年纪都只有十八、九岁，这些将翱翔在祖国万里蓝天的勇士，正在经受严格的训练，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贡献青春。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在响彻云天的口号声中，由步兵、空降兵组成的一个个徒步方队走过来了。整齐的步伐，足音如鼓，雪亮的枪刺，闪耀寒光。远望，队伍象汹涌的海洋在波动；近看，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格外鲜明。紧跟着徒步方队的是摩托化部队，车轮飞转，不可阻挡，骁勇的步兵好似猛虎插上钢铁的翅膀。这些都是我军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他们之中，有创建于红军时期，参加过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部队；有抗日战争中，参加百团大战的部队；有在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奔袭清风店，进军大西北的部队；有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为扭转战局作出重大贡献的部队。黄继光、邱少云，这些部队涌现的英雄人物至今仍是我们的学习楷模。

这一支支战功显赫的英雄部队，如今以高昂的斗志和崭新的姿态，向着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大批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年富力强，懂得现代战争知识的优秀干部，被提拔到各级主管岗位上来。各级指挥员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刻苦钻研现代战争的理论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略战术，不少中高级干部写出有价值的军事学术论文。各部队把教育训练真正摆到了战略位置上，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全军涌现大量的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和一专多能的战士，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各种"全优连"、"全优团"、"全优师"不断涌现。空军甲类战斗团成倍增长。海军不少舰艇进行了远航太平洋训练。我军后勤保障工作也逐步向适应现代化作战的要求迈进。

铁流滚滚，机声隆隆，大地在颤抖。英雄的炮兵、地对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工程兵、坦克等特种兵方队，排列整齐气势磅礴地缓缓驰过阅兵场。看吧：

——各种口径的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在不同型号的牵引车牵引下，依次通过检阅台，显示出"战争之神"的威严气概。

——一排排轻便灵巧的反坦克导弹，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是在叶剑英同志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的号召下，新近装备我军的现代化反坦克武器。

——由大型运输载填车装载的银灰色的地对空导弹，在阳光的照射下，象一片钢铁的波涛，汹涌澎湃。

——由火箭布雷车和重型舟桥组成的工程兵方队，踏着胜利的通途，临近检阅台。

——由几百辆坦克、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在履带的轰鸣声中，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

一个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方队，显示给人们的难道仅仅是钢铁和机械的排列？不，它所显示的，是我军严密的、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是无坚不可摧、无险不能克的坚强的战斗意志，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强大力量！

看到我军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迈出雄伟步伐，主席台和参观台上情绪活跃。胡耀邦主席、邓小平副主席、赵紫阳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神贯注地望着通过的一个个方队，他们一面向部队敬礼致意，一面高兴地不时交换着赞扬的目光和话语。记者访问了阅兵导演组的组长、曾参加当年开国大典阅兵组织工作的某省军区副司令员，请他就两次阅兵的情况谈谈感想。他兴奋地说：开国大典那次阅兵，我军基本上还是单一陆军，受阅的主要是步兵、骑兵，还有少量的重炮和榴弹炮。这次阅兵，显示出我军的装备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不少新的兵种，已经是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了。

建国三十二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防工业从小到大，已具有相当规模。我军不仅装备了自己生产的优良的常规武器。而且开始拥有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战略武器。可以预期，在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我军的武器装备必将进一步改善。

我军之所以无比强大，除了掌握现代化武器，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以外，还依靠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军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有较大的提高，坚信党中央领导正确，坚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我军是党绝对领导的，干部战士最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我军就打到哪里；哪里最危险、最艰苦，指战员就战斗在哪里。最近，四川、辽宁、陕西等省区先后发生洪灾，部队全力以赴，奋不顾身地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赞扬。就在这次演习中，各部队普遍制定了“爱民公约”、“驻训守则”，积极为群众做好事，为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祖国，与人民休戚与共，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土壤里，这正是我军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最后接受检阅的，是空军航空兵一百五十一名飞行健儿。当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组成的六个飞行梯队，发出雷霆般轰鸣，一批批地呼啸着掠过阅兵场上空的时候，检阅台和参观台上的全体同志，都翘首仰望，高兴地向英雄的航空兵鼓掌致意。在间有浮云的蓝色天幕上，九架特技表演的彩色战鹰，作了各种高难度的特技飞行，表现了航空兵高超的战术技术水平。这时，扩音喇叭里传出解说员激动的声音：“有这样的勇士守蓝天，人民请放心，祖国春常在。”检阅台上人们都为我人民空军不断发展壮大，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战鹰就是闪电，就是霹雳！祖国的神圣领空，绝不容许空中强盗侵犯。

振奋军威的检阅胜利地结束了。这是我军贯彻执行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向党和人民汇报军队建设成果的一次检阅。通过这次检阅，将进一步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大大提高我军的的战斗威力。我军建设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令人注目的成绩，完全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和人民支持的结果。党中央为我军建设制定了正确的大政方针。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抽出时间到部队看望指战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对我军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武器装备、院校建设等等，都作了大量指示。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不久前视察济南部队，号召我军成为保卫伟大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精神文明的光荣标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在外出访问回国途中，专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勉励大家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参与缔造人民军队的叶帅、徐帅、聂帅，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关怀备至，作了许多亲切的指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参加演习的陆、空军部队，以及部分海军部队，对全军广大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已经以稳健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贯彻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发扬光荣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党的指挥下，不停顿地向着国防现代化的高峰挺进！

（摘自 1981 年 9 月 27 日《工人日报》）

葛洲坝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背景介绍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分两期施工。第一期工程布置在二江、三江上，主要建筑物有左岸土石坝、三江的 2 座船闸和冲沙闸、二江电厂和泄水闸。第二期工程将布置在主河道大江上。一期工程于 1970 年 12 月开工，经过 10 年的努力，已基本建成，并开始发挥效益。1981 年内取得了截流、通航、安全度汛和发电等重大胜利。

1981 年 5 月，经国家检查和中间阶段验收，水库开始蓄水到初期通航运行水位，三江 2 座船闸经过试航后，于 6 月 27 日投入使用，运行情况正常。到 1981 年底，已累计运行 2909 闸次，通过各种船只 1.3 万艘，货物 147 万吨，旅客 64.6 万人，基本满足航运要求。

7 月，长江上游出现特大洪水，二江 27 孔泄水闸和三江 6 孔冲沙闸均先后开闸泄洪。7 月 19 日凌晨，洪峰到达葛洲坝，入库流量达 72000 秒立方米，相当于宜昌水文站有记录以来实测最大洪峰流量（1896 年的 71100 秒立方米），各建筑物均安全无恙，取得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

二江电厂装机 7 台，总容量 96.5 万千瓦。一、二号机组单机容量 17 万千瓦，是中国最大的低水头轴流式小轮发电机组，已先后于 7 月 30 日和 12 月 15 日并网发电。试运行中一、二号机组在设计水头下均能达到额定出力。12 月 27 日经国家启动验收委员会验收，正式移交生产单位。截至 1981 年底，一、二号机组已累计发电 2.24 亿度。三号机组容量 12.5 万千瓦，也已提前安装，于 12 月 31 日并网发电。

葛洲坝水利枢纽一期工程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的水利水电建设和机械制造已达到新水平。

材料：

- 葛洲坝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电热烈祝贺

·长江特大洪峰顺利通过葛洲坝

材料一 葛洲坝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电热烈祝贺

新华社记者自葛洲坝工地报道：今天下午七点五十三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奔腾不息的长江，今天第一次按照人们的意志从两天前开闸的泄水闸滚滚东去。

在每秒4720立米流量的大江上截流，从开始到合龙仅仅用了36个小时零23分。这在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它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征服自然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夜晚，葛洲坝十里工区大江两岸一片欢腾，人们的欢笑声，江上祝贺合龙的汽笛声和合龙后继续施工的机械的马达声，汇成欢庆截流的大合唱，响彻夜空。

截流后，随着大江围堰的建成，坝内江水水位逐步抬高，去年11月开始断航的葛洲坝航道将在几个月内恢复通航，二江电厂的大型机组也将陆续发电。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长江江宽、水急、流量大。我国过去在黄河三门峡截流，最大的流量是每秒2030立米。而这次是每秒4720立米。因此，这次截流，设计和施工都面临许多没有经历过的考验。截流设计的合龙时间是13天。现在，合龙得这样迅速，这样干净利落，而且从设计到施工，除部分施工机械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据截流指挥部统计，这次截流中，210米宽的龙口已测出的最大流速是每秒7米，最大落差是3.23米，截流料物的最大日抛投量是88000多立米，总抛量为107741立米。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怀葛洲坝工程的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来工地视察。指导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昨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同志都来到了葛洲坝截流施工现场。

中共中央、国务院贺电

葛洲坝工程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及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同志：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关键项目大江截流于元月4日胜利合龙，这是在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以及全国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勘测、设计、施工、科研和设备制造工厂密切协作的胜利成果。特向参加工程建设的各级领导、全体科技人员、干部、工人、民工和家属致以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并希再接再厉，继续奋进，确保今年安全渡汛和通航发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81年元月4日

（摘自1981年1月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长江特大洪峰顺利通过葛洲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经受住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考验，长江上游的洪峰于今日凌晨顺利通过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工程安然无恙。

凌晨两点，通过葛洲坝的长江洪水流量达到每秒七万二千立方米。据水文记载，这是1896年以来是最大的一次。为了迎战特大洪峰，18日晚，葛洲坝的建设者用数百盏巨大的太阳灯、碘钨灯把汛期大坝上下游的江面照得如同白昼。抗洪抢险大军，上坎巡逻，密切注视水情变化和工程建筑物的情况。他们关闭了船闸，打开了一期工程二江的27孔泄水闸和三江的6孔冲砂闸。19日凌晨4时，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的洪峰，驯服地通过人工泄洪道，宣泄下去。

根据监视情况，尽管这次洪水来势猛，历时长，但横锁长江的5华里多长的葛洲坝一期工程各种建筑物、大江上下游围堰和二、三江护坡等挡水工程都符合设计要求，安然无恙。洪峰通过大坝时，三江冲砂闸闸门还有2.5米高的余量，事实证明，我国依靠自己力量设计、施工的这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质量是好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征服大江大河的能力。

到今日上午，通过葛洲坝的长江洪水流量削减到每秒七万立方米，葛洲坝的建设者们正在通力合作，严密注视长江水情的变化和工程变化情况。

（摘自1981年7月19日《工人日报》）

农村多种经营迅速发展

背景介绍

1981年的农业生产，在上一年增产的基础上，持续全面增长，许多农作物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1981年农业生产夺得全面增产，主要是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快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多种经营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8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

通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多种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1981年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各地各级农业部门普遍成立了多种经营的领导机构,从组织、行政和技术措施上加强了对开展多种经营工作的领导。

二、开始重视正确处理抓紧粮食生产与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各地在努力落实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农作物布局,通过协调劳动力的投放方向和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基本上保证粮食稳定增长,林、牧、副、渔和经济作物迅速发展。农业总产值从三中全会以来保持5%的增长速度。

三、注意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不少多种经营发展较好的地方,按照统筹兼顾、分工协作的原则,把宜于统一经营的生产项目安排集体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生产项目安排社员个体经营或社员合伙经营,并通过农业生产责任制,把经营者的劳动好坏同经营所得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农村多种经营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局面。

四、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逐步完善,各地在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出现了专业队、专业组、专业人,实行联产计酬。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组织。

五、银行信贷部门加强了对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扶持。农村信用社为支持社员发展多种经营,1981年1~11月累计发放贷款28.9亿元,比1980年同期增加2.7倍。

1981年中国农村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的实绩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牧业、渔业、特别是副业产值,在整个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偏低的状况,又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种植业内部,经济作物产值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多种经营都有可喜的发展。如:黑龙江省多种经营产值由1980年的15.4亿元增加到1981年的16.9亿元,增加10%,多种经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3.9%增加到25.4%。安徽省1981年在农业全面丰收的情况下,多种经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52%。

二、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种经营的发展为农业基本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力水平。1981年,全国粮食总产在播种面积比1978年减少近1亿亩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丰收,比1978年增产400多亿斤。

三、农村劳动力的组合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使各种专业经营的项目越来越多,全国农村大约有1/3的剩余劳动力,从田间生产转向多种经营。山东烟台地区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动力,已由1978年前后的33%上升到1981年的55%。

四、向国家提供的农副产品增加。1981年粮食的征购量,油料、糖料以及猪牛羊肉的收购量比198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81年供销系统收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中,棉花、黄红麻、苎麻、烤烟、名晒烟、茶叶、绵羊毛、绵羊皮、山羊皮、柑桔、黑木耳、黄花菜等12个品种,超过历史最高年的收购量。1981年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农副产品总额764.7亿元,比上年增长13%(扣除收购价格上升因素,比上年增长6.7%)。

五、社队集体、社员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过去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安徽省,1981年粮、油、麻、茶、烟、果的产量和大牲畜、长毛兔、家禽、养蜂等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平均每个社员收入比1980年增加50多元。

材料:

- 发展多种经营是农村致富的必经之路
- 把多余劳力组织起来发展多种经营

材料一　发展多种经营是农村致富的必经之路

一、我国农业生产从过去单一经营只抓粮食,转变为既抓粮食生产,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这是振兴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决策。自从1981年3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文件后,全国各地开始了这个转变,并取得显著成绩。据初步计算,从1979~1981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5.3%,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23%左右,但1981年粮食总产量比1980年仍增加1.4%,棉花、糖料、烤烟都大幅度增产。家庭副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各种家禽,都是家庭喂养的。集体分配给社员的收入比1980年增加11%,比1978年增加28.6%,如果加上个人生产和其他方面的收入,跟1980年同范围相比约增加16%以上。山东省潍坊地区1981年集体投入多种经营的劳动力占集体总劳动力的42%,其收入占农工副总收入48%,比1978年增加84.5%,按人平均增加92.4%。这说明农村多种经营有了发展,农民收入就大幅度增加,生活显著改善;同时也看出,根据我国基本情况和当时条件,重视粮食生产是对的,但过去只注意种植业,只片面地强调种粮食,甚至一度竟把多种经营当"资本主义"来批,致使农业生产的路子越走越窄,油、糖、棉、粮市场供应全面紧张,这是不可取的。

二、农业是综合性的生产部门,农、林、牧、渔各业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农业为其他各业提供粮食、饲料和劳力;其他生产又为农业提供肥料、资金;林业还为农业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产资料。广东珠

江一带有些生产队在田边挖塘，塘塍种桑，塘头养猪，用蚕屎、猪屎喂鱼，塘泥肥田，就说明我国农民早就懂得利用生物界自然循环规律来促进生产。农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农忙时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其他时间只需很少人照管，合理利用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农村工副业的发展，给农业提供大量资金，给农民带来补充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又将转成生产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来源。忽视多种经营，无异于抑制了扩大再生产。

三、我国人多、劳动力多、资源丰富，但耕地相对缺少。现在就有3亿多劳动力，还有更多的辅助劳动力。今后20年内，会有一些人吸收到城市就业，但不会太多。假定主要劳动过程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这时剩余劳动力有50%，10～20年内要开辟容纳相当于现时城市人口这么多的城市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就地安排就业。除了在全部耕地上搞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经营，精耕细作，讲求效益，提高单产外，必须把众多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结合起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广开门路，实行多种经营，并且积极发展家庭经济。我国可开垦的土地数量不多，而且随着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山地、草地、滩涂、水面及其他资源都相当多。就耕地而论，各地区都有不少边地、坡地、荒地、洼地、房边屋后零星土地未曾利用，只要实行"权、责、利"相结合的政策，让大家精心经营利用，就一定能创造出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此外，还必须因地制宜，在地区统一规划下，发展一些小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各种服务业。乡村工业的发展，对缩小城乡差别，建设农村物质文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实具有重大的作用。

四、为满足全国人民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要求农业开辟新的、扩大原有的生产门类，生产更多的产品，并提高商品率。粮食的需要当然更是迫切的。这方面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创立新的商品粮基地，保证供应的不断增长。但由于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粮食大部分在农村中消费，就全国来说，净商品率只有15%，所提供的货币收入也受到限制。经济作物和工副业产品的商品率很高，其市场容量很大，还会日益发展。这将形成城乡商品交换的主流，冲破自给性生产的局限。农民多卖，才能多买；能实现多买，才可使工业技术和其他资料输入农村，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也才能开发八亿人口的农村市场，为国民经济发展建立起坚实的国内交换的基础。

五、1979年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后，原来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已有所缩小，但和另一些经济作物相比，粮食价格还相对偏低，粮农纯收入较少。有些长期高产和征购任务较重的地区，甚至还要亏本，远不如种棉花、烤烟等作物有利。但在目前的经济调整时期，不宜大幅度地调整价格，应保持基本稳定。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多种经营，以价格优惠产品多得的收入抵补盈利较少的产品，保证农民在总体上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江苏省无锡县1980年每人平均分配146元，其中来自社队工业的93元，来自副业的45元，来自种植业的只有8元。山东省德州地区，1980年、1981两年，靠棉花总产量增长使社员收入达120元，比1979年增加了140%，很快摆脱了长期困难的状态。据1980年度调查，集体分配给社员的收入每人平均300元以上的生产队25340个，除个别外，绝大多数是靠多种经营的盈利达到的，这是一个使国家、集体、农民三方面利益都得到照顾的办法。

六、从1979年以来，全国各地把一些不宜种粮的耕地改种适宜而又为国家急需的经济作物(如把盐碱地改种棉花、甜菜等)，把一部分不宜耕种的土地退耕还林或还牧，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估计到，粮食是多种经营的基础，粮食有保证，多种经营才能稳步发展，反之，就受到限制。回顾解放以来种植业的历史，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变动往往和粮食总产量增减有直接关系。1960年粮食总产量跌到解放以来的最低点，跟着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在1961年、1962年也跌到最低点；这几种粮食增产，又增加了进口，粮食供应量上升，后者也随之上升。我国人口众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下不易压下来，城市、工业的发展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更多地进口粮食是不可能的。粮食的供应必须基本立足于国内生产，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根据以往教训：不宜种粮的耕地不要强制种粮，不要鼓励在高坡度山地上垦荒、在水域上围田。要提倡在山地发展木本油粮，山坡种牧草，发展蛋白质含量较高的作物，利用盐碱地种植饲料作物，兴办饲料工业等，这些都有利于节粮、代粮，减轻食物供应压力。在山区、平原、宅旁积极造林；搞好草原、草山建设，发展牧业；合理利用水面发展渔业和水生植物；发展各种土特产；搞副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建筑、运输业、农村商业、修理服务行业、家庭工副业等。很多地方发展猪、牛、羊、兔、鹿、貂、鸡、鸭、鹅、鸟、蜂、蚕、虫、鱼、虾、鳝、蛭、蛎、珠，种植树木、竹子、水果、花卉、油料、药材、漆树、蘑菇、香菇、咸草、席草，搞绣衣、花边、编织、羽毛、石雕、宝石、石灰、石块、陶器等等。所有这些项目并不与粮争田，可以并行不悖。

七、为了防止可能由于市场、价格因素不易控制而带来的盲目性，必须对农民加强计划指导。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市场调节为辅助的经济体制，农村也不例外。任何地区讲因地制宜的同时还须讲因国制宜，注意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协调。一些关系不大的生产项目，自由度可以大一些，而关系重大的项目，如粮、棉、

油、糖等等，就需要统筹协调，既完成国家计划，又保障集体和农民的自主权。我们可以指望通过实行收购合同制来处理好这些关系，各地应逐步推行，逐步完善。但是合同制只是商品交换的一种经济形式，不能离开生产计划性这个基础而自行完善起来。

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要靠现有耕地充分满足全民对粮食和经济作物两方面的需要，是有困难的，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是：无论粮食或经济作物都必须从提高单产方面去增加总产，注重从内涵方面挖掘生产潜力。要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增加粮食产量；同样，经济作物也不要与粮食争地，要注意强化技术管理，提高单产。畜牧业除了搞好草原、饲料建设外，要从改良牲畜品种，改善畜群结构，改进饲养方法，提高出栏率、出肉率、出毛率。其他各业都应该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提倡多种经营，必须重视经济效果。首先，在使产品转变为商品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市场供求平衡，不可盲目倡导，否则会使农民吃亏。对市场要抱积极的态度，市场有待努力开发，在这里，流通领域、供销方面应做的事情很多。如资金、种子、原料、工具、技术、化肥、农药、燃油等等的供应，产品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问题的合理解决，都是迫切的问题。过去提倡什么事，开始一哄而起，随后一哄而散，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讲经济效益，特别是忽视产前部门和产后部门的互相衔接和有关方面的系统组合。商业部门，特别是供销社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保障生产资料、生活消费品及时供应，生产品及时销售。同时应该允许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集体商业、运输业、实行多渠道流通。社队企业部门应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和综合利用。这可以增殖价值，以赚补赔。

八、在指导农村生产方面，必须树立保持环境和生物基础的观念，也就是人们所讲的注意生态环境的改善。土壤、水域、林木、草原，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生物基础。为了今天而毁灭明天，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错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可能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策。要制止乱砍乱伐，滥垦滥种，保持、发展和合理利用资源，特别是保持和发展森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水源林、灌木林)，建设草原，护理草山草坡，防治水土流失，防止水资源和环境的污染，积极进行人工生态环境的基本建设，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为农村居民的康乐和富裕造就良好的自然基础。

九、广大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已经普遍激发起来，为使群众积极性保持下去，需要国家制定一种稳定而完善的政策，要旨在于鼓励"集体、个人一起上"，并有利于动员各种人才、物力向那些资源闲置而少人利用的山区、水域，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除了解决价格领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外，要搞好责任制，巩固原有的集体企业。如何积极鼓励和扶持家庭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情。目前在家庭副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户。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带起了一大批专业承包户，户与户间形成一种自愿的联合；它不同于过去那种合并财产的办法，而是在资金、技术服务、供销及某个生产环节的联合。应该密切注视这些经济活动的发展趋向，因势利导，分别给予扶持和指导，使多种经营获得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

材料二　把多余劳力组织起来发展多种经营

农村中建立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把多余劳力组织起来发展多种经营？广东省梅县各级党组织鼓励社队集体和社员，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中，搞经济联合。

目前这个县的经济联合，形式多样，有社队联营、集体与个人联营，也有由农户之间凑股经营。为了搞好这些经济联合，县社各级领导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同干部社员共同商量联合的具体办法和经营项目，并且协同有关部门，从各方面给予扶助，解决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问题。据统计，全县目前已有17个公社、420个生产队和250个农户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经营的生产项目有124个。其中属公社和大队、生产队联营的有27项，队与队联营的有52项，队与户联营的有12项，户与户联营的有51项。如丙村公社利用本地石灰石、煤炭的丰富资源，去年初便与生产队合股办起了一间年产5000吨水泥的厂房，共有股份200个，其中生产队占有130股，合资50多万元，去年10月投产，到年底，生产队共得红利14000多元(除上交和留成作生产发展基金外)。瑶上公社新江二队有四户社员，从去年10月起，自筹资金1000多元，向国家贷款6000多元，联办起一间养牧场，有耕牛29头，羊32头，现在已出售耕牛22头，纯收入2000多元，平均每户分益500多元。还有联合经营果林园的，有联营加工业的，项目多种多样。

经济联合是个新生事物，梅县总结出五大好处：一是可以发挥集体与个人的积极性，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二是可以充分挖掘利用本地资源，做到地尽其力；三是可以更好地发挥个人技术专长，做到人尽其才；四是扩大农村生产门路，解决多余劳力问题；五是可以利用闲散资金，解决发展生产中资金不足的困难，增加社会财富和社员收入。

(摘自1981年《农民日报》)

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

背景介绍

1981年9月25日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日，在中共中央及各地有关领导的直接领导和筹划下，全国各地开展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

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委员会由邓颖超任主任委员，周扬任第一副主任委员，胡乔木、王任重、廖承志、陆定一、周建人、胡愈之、巴金、叶圣陶任副主任委员，丁玲等175人任委员，陈荒煤任秘书长，林林、朱子奇、陆石、张僖、秦牧、华君武、李英敏、周海婴任副秘书长。

9月25日，首都各界6000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会议由邓颖超主持，胡耀邦作重要讲话，周扬作《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专题报告。

上海、广州、厦门、绍兴等地也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

中央及地方各种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9月17日～25日，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为开好这次讨论会，鲁迅研究学会和纪念鲁迅100周年学术组，早在4月和6月分别在扬州和大连召开撰稿座谈会。

文艺界根据各自的专业特点，将鲁迅作品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芭蕾舞剧和各种地方戏。美术界、出版界举办各种展览。

上海在内山书店旧址勒石纪念。杭州在西子湖畔举行鲁迅塑像奠基典礼。中国人民银行于8月份发行鲁迅纪念银章。

在纪念活动期间，北京、上海、广州、绍兴、厦门等地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室)、鲁迅故居经整修充实后，重新开放。上海鲁迅墓也整修一新。绍兴长庆寺、土谷祠、恒济当等处也部分修复。

材料：

-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材料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1981年9月2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陈云、华国锋、彭真、邓颖超、王震、方毅、倪志福、彭冲、陈慕华、赛福鼎、万里、王任重、谷牧、廖承志、胡厥文、杨静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陆定一、康克清、季方、周建人、胡子昂、荣毅仁、王昆仑、杨秀峰出席了纪念大会。

参加纪念大会的外国朋友有：内山真野、路易·艾黎、井上靖和夫人、许与极、康斯坦丁·基利兹、哈桑·迈库利、乔希、内山嘉吉和夫人、饭岛春敬和夫人、露阿夫人、卡什费、瓦尔特·考尔、威廉·莱伊尔、万徒勒里，以及各国驻华使节、专家、记者。旅日台湾籍著名作家陈舜臣、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曾敏之，也出席了纪念大会。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鲁迅的巨幅画像，主席台对面的横幅上写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纪念大会由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颖超主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邓颖超首先代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对参加纪念大会的各国朋友，对参加纪念大会的各方面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对各国朋友和人民团体发来的贺电表示衷心感谢。

邓颖超说，这次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规模之大，地区之广，是空前的；纪念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这充分说明了鲁迅的深远影响和纪念他的伟大意义。我相信通过纪念活动，将进一步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对鲁迅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激起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扬在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长篇报告。

出席纪念大会的还有傅钟、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廖井丹、张香山、贺敬之、王惠德、蒋南翔、王炳南、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夏衍、阳翰笙、吴作人、俞振飞、陶钝、叶圣陶、张光年、以及各界的代表共6000多人。

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举行了纪念大会或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

关于《苦恋》的批评

背景介绍

白桦编剧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发表于《十月》杂志1979年第3期，1981年摄制成电影《太阳和人》，由彭宁

导演。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批评《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认为《苦恋》的出现,“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文章发表后,数家报刊转载。

8月上旬,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在作题为《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认为,对于《苦恋》以及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评,正是一种关于早已确实存在的重要政治倾向的批评。并表示:中央已经再三声明不进行围攻,不搞运动。(《红旗》23期)

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第19期发表的唐因、唐达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认为《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这种政治思想错误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十年内乱中社会上滋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当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创作中的反映。文章认为白桦曾写过话剧《曙光》等一些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希望他总结经验教训,今后再写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作品。

11月25日,白桦写了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关于<苦恋>的通信》,白桦在通信中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到由衷的感激之情,从对《苦恋》的批评中,体会到“党对一个普通的党员作家,像面对面谈心那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充分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关怀”,“这股巨大的热流是温暖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开始认识到剧本中“没有严格划分‘四人帮’和社会主义祖国、党、人民的界线。因而愈是渲染这种爱恋,愈是歌颂赞美知识分子这种不健康的孤独感,其结果是‘爱’都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怨。”白桦分析了自己的世界观的矛盾和迷乱,从中总结了《苦恋》创作上的教训。(《解放军报》12月23日,《文艺报》1982年1期)

白桦在1981年中继续写作,他的诗歌《春潮在望》于5月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奖”。

1981年12月27日,胡耀邦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说,有些作品政治情绪不健康,主要地是忽视和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而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都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比如白桦的《苦恋》就需要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的问题就完满地结束了。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是要继续写作。(《人民日报》12月30日)

材料:

- 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材料　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唐　因　唐达成

白桦、彭宁同志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剧本的思想错误,是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作品的基本情节:以画家凌晨光的所谓“苦恋”,来表白他如何热爱祖国,但祖国却毫不怜恤他,他遭受百般凌辱,最后含冤死去。作者在描写中,把“四人帮”和祖国相混同,从而把“四人帮”暴政下受难的祖国,当成了控拆的对象,使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今年四月,《解放军报》带头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十年动乱的余悸,以及一个时期以来,文艺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因而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一出来,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众说纷纭;甚至成为国外舆论界的一个议论或猜测的话题,似乎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又要降临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国内外少数不怀好意的人,也乘机造谣挑拨。《文艺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艺评论刊物,没有及时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发表评论,有负于广大读者的期望,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一

《苦恋》表现的是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侧重描写了他在十年内乱中的不幸遭遇。作品从一开始就介绍他是“一个痴恋着祖国和人民的苦苦的恋人”;在情节的进展中,又在多处点出他如何“苦恋”祖国,如何不后悔回到祖国,如何不愿意自己的女儿离开祖国,似乎作者要赞颂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如果是这样,那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然而,从整个作品的构思、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以及它实际上给读者造成的强烈印象来看,就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并不是这样的内容,却恰恰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暴露出严重的迷乱和错误。

剧本题名《苦恋》,这爱恋之“苦”,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凌晨光受“四人帮”追捕,亡命苇荡,曾与也来避难的史学家冯汉声交谈。冯在讲到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时,叹息着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单恋,单相思……”凌对此深表同感,答道:“您的比喻太对了!单恋,单相思……”在凌后来的回忆中,他们的这段对话,又作为画外音重复出现。可见,这所谓的“单恋,单相思”之苦,正是作者所赞颂的凌、冯的那种“苦恋”的真正含义,它贯串于剧本的全部构思中。但是,人们要问:这所谓“单恋,单相思”,果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爱国主义感情

吗？

所谓“单恋，单相思”，意思无非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作品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画家凌晨光对祖国始终“苦恋”，而祖国对他却总是无情，因而他陷入了“一辈子都在单恋”的痛苦。作品正是想以此博得读者的同情和赞美。然而，这是无法令人同情的。

以凌晨光个人的遭遇而论，他在旧社会曾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十年内乱中，又受到“四人帮”的摧残，但是，那些反动势力并不代表祖国，而恰恰是祸害祖国的凶恶的敌人；当凌晨光遭罪之时，也正是祖国蒙难之际；怎能说成是祖国对他无情，他只好“一辈子都在单恋”呢？祖国对她儿女的爱，无比深厚，无比博大。儿女对祖国的爱，也应该是肝脑涂地，生死不渝。鲁迅诗曰：“我以我血荐轩辕”；周总理诗曰：“难酬蹈海亦英雄”。多少革命先烈，多少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祖国英勇献身而义无反顾，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许多由于种种原因而受过挫折的同志，他们始终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忠贞不二，这才是一种可贵的品格。他们绝对不会把个人和祖国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等价交换”，由于个人受到委屈，就埋怨祖国无情，或嗟叹什么“单恋”、双恋之类。

正是从这个混乱的逻辑出发，整个剧本都在申诉自以为“苦恋”祖国而没有得到“报偿”的“单恋”之苦，嗟怨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感情，很难说成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作者看来，凌晨光、冯汉声以及诗人谢秋山等人越是不幸，而他们却越是“苦恋”就越能显出他们那种宗教殉道者式的“高洁”和所谓“九死不悔”的精神，但作者却恰恰忘记了，把“四人帮”的罪恶算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账上，以凌晨光们的所谓“苦恋”、“单恋”来衬托和渲染祖国的“无情”，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作者对于事物的颠倒的认识，必然导致作品对社会现象的错误评价；剧本写凌晨光等人在十年内乱中的悲惨遭遇，正是为了图解作者的这个所谓“单恋”的颠倒认识。剧本写到，凌晨光的女儿星星要随未婚夫出国，凌晨光表示反对，但当星星向他发出这样的质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他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在动乱中思想迷惘的青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凌晨光的无言以对，却是因为女儿的问题正好击中了他的所谓“单恋”——即深感祖国对他“无情”的痛苦。剧本还写到，谢秋山的妻子云英从海外归国时，身患疾病，她曾在船上欣喜地说：“就会好的，回到祖国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十年内乱中，谢氏夫妇被分别驱赶到两地，当谢秋山从干校回到自己的旧居时，只有一纸妻子的死亡通知书在等着他。于是，“秋山的脸抽搐着，似笑似哭，手里的信象秋风中的树叶那样抖起来”，这时，响起了死者在船上的那段话的画外音。这强烈的对照，真可谓“震撼人心”，但是，对祖国的谴责，也真可谓无以复加了。也许作者会说，这些描写是在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是的，这些悲剧是“四人帮”造成的，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作品没有把控诉的矛头对准“四人帮”，没有把这些描写作为“四人帮的暴虐和罪行来表现，却反而把它作为知识分子”单恋“祖国的悲剧命运来表现，试问：这在形象的实际感受中，怎么能不给人们以祖国无情的强烈印象呢？剧本最后给凌晨光一个悲惨的、在逃亡中冻馁以死的结局，作者还特意让他临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以示他（也是作者）对这种”单恋“命运的巨大疑问和强烈控诉。在剧本的许多描写和这个大问号中，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消失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四人帮”的罪行被混同起来；于是剧本把本来应该指向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控诉，变成了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严重怀疑和嗟怨。在颇能打动一些人的“苦恋”的面纱掩盖下，竟是这样的是非不辨，黑白混淆，还能说剧本抒发的是一种值得赞美的“爱国之情”么？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作者这种偏见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作品的构思中看到它分明的脉络。作者把凌晨光这样的知识分子与祖国的关系，看成是所谓“单恋”，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是把凌晨光的命运同人民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却仅仅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样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一叶障目，所看到的就只是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以为人间苦恼，萃于一身，命定是历史的受难者。在《苦恋》中，作者就是用这种偏见来概括、图解凌晨光的命运的。例如作者在剪裁和拼凑他的素材时，把凌晨光在“四人帮”肆虐以前的十几年中分明沾受到的祖国的温暖和党的雨露春风，统统推到作品的后景上去，或作为陪衬，或作为点缀。凌晨光从海外归来，本是他命运的巨大转折，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对他从建国初期到十年内乱以前这一段新生活，剧本只以几个一瞬即逝的镜头和一段感叹式的旁白一带而过。推到作品前景上来的，则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苦难。似乎这就是他在新中国生活的写照，足以证明他“单恋”之苦，这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也未免太不公正了罢？这怎能不在一些读者中造成这样混乱的印象：我们整个社会的面貌是黑暗和可怖的呢？

更耐人寻思的是：在凌晨光归国之前，作品还写了一段他在国外的生活。他的出国本来十分隅然，然而一出国就立刻奇迹般地变成大画家，不仅生活十分豪华，而且备受外国公众的崇敬。莫非那个美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艺术家的奥林匹斯山么？在艺术上，这纯属是凭空的编造。然而，编造这种突然发迹的神话，看来是颇有用意的：它一方面是以凌晨光在国外的空前幸运，来对照他归国后遭遇的不幸和不公正，另外是要

表明，凌晨光在国外如此荣华尊贵，居然能抛弃一切，投奔祖国，可见他是作出了何等巨大的牺牲，何等施惠于祖国。按照作品的思想逻辑，既然他牺牲得多，理应被“报偿”得多，如今祖国给他的却只是苦难，更可见这是多么无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凌晨光对所谓“单恋”的嗟怨，与作者所标榜的屈原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屈原挚爱自己的祖国，怨怀王之无道，哀生民之不幸，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诗人，他也决非仅仅着眼于一己的荣辱。而人们从《苦恋》中感到的，却分明只是一种用“爱国”的油彩装饰起来的怨恨情绪而已。

人们都明白，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知识分子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不同的命运。今天的爱国主义，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当然，由于环境、教养不同，认识水平不同，觉悟程度高低不同，有的爱国者，他们对于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能还不完全理解，其中少数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不能接受，但事实证明，如果他真心爱自己的祖国和历史，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最后总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救民于水火的党和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许多像凌晨光一样离开祖国多年（多数比他更久）的海外同胞就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呼：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最近几年他们对于祖国“四化”建设的热情关注，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作家在描写凌晨光这类“苦恋者”命运的时候，如果不把他同人民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考察，反而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他们在旧中国、新中国和十年浩劫前后的遭遇混为一谈，大肆渲染，那就只有使人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怀疑、失望甚至否定的思想情绪，根本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了。

二

《苦恋》不仅展示了凌晨光的悲剧，并且想揭示这悲剧产生的原因。剧本两次出现的关于佛像的隐喻式的描写，就表现了这种意图。

幼年的凌晨光有一次来到寺庙的禅房，看见了神龛中的佛像，他问长老：“为什么这个佛像这么黑呀？”长老“深沉地”答道：“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了。”又说：“奇怪吗？孩子，在世间有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往往相反……”一个虔诚的老和尚忽然和初次见面的小孩作这种亵渎神明的“哲理性”谈话，是很奇怪的，但这自有作者的寓意在。

当凌晨光亡命于苇荡时，这个场面与对话又重现了一次，但这次的再现与第一次有很大不同。这是紧接着关于凌晨光回国后的生活的一些匆匆闪过的镜头之后，身处苇荡的凌晨光在幻觉中，“出现了长长的台阶”，他不断地拾级而上，“在这样大的台阶上，一个人显得那样小……他看见了金碧辉煌的庙堂，……他走进黑沉沉的大殿，大殿里香烟缭绕，高大的佛像已经不是金色的了，而是黑色的。”这时传来了童年时长老与他的那段“哲理性”对话和凌晨光“百思而不可解的面部特写”，接着，画面上出现了“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

作品写老和尚的“哲理”和凌晨光的幻觉，寓意何在呢？不言而喻，这是在将革命领袖喻为佛像，意在讽喻由于“神”的统治，才发生了十年内乱。

诚然，林、江反革命集团曾极力推行个人崇拜，这是他们篡党乱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造成的恶果极为深重。文艺作品中触及个人崇拜现象，对此有真实准确的反映和批判，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应该指出：个人崇拜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的信赖和崇敬，决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崇拜。毛主席的威望是和他长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相联系的。当然，由于我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人们思想上还存在着封建余毒的影响；同时在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等等，也是出现个人崇拜现象的社会原因。林、江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煽动、制造个人崇拜，使之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因此，一个作者在触及这种曾经泛滥于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时，首先有必要认真地对它的历史、社会根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有可能在作品中作出正确的反映和评价，才能如实地揭露出林、江之流如何极力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实质，也才能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历史的教训。

但是，《苦恋》却并没有这样做。它企图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这比喻本身又是不正确的。它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反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林彪、“四人帮”是十年内乱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出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神化革命领袖。在我们的作品中，怎么能把革命领袖直接比作“黑色的”神呢？人们可以追问：难道未经香火熏黑，革命领袖就是愚弄群众的金光闪闪的神么；把革命领袖当作佛像，当作封建迷信的象征来比喻，其本身就是至为荒谬的。

其次是，作品通过老和尚的“哲理”，把个人崇拜现象简单地、笼统地归罪于“善男信女”即人民群众的愚昧，似乎党员和群众都不过是浑浑噩噩、盲目迷信的“群氓”，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的陈腐观点。作者只看到人民群众中曾经有过个人崇拜的现象，却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正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过程，痛切地感受到了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性，从而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对这种历史的落

后现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1976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一个伟大的例证。但是，剧本《苦恋》的上述描写，不仅客观上成为对林彪、"四人帮"制造个人迷信的罪责的开脱，而且伤害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正常的信赖和崇敬的感情。诚然，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他的个人专断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曾给林、江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这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但这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由于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党和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伟大的领袖，并对他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怎么能像《苦恋》这样，用荒唐的比喻，来全盘否定党的领袖，嘲弄和贬低人民群众呢？

人个崇拜当然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用虚无主义的态度，用十年浩劫中遗留下来的否定一切的那种盲目性和偏激性，来对待这种现象，那就不但不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必然要导致对于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的全盘否定，导致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的全盘否定，这是十分有害的。众所周知，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鼓动所谓"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那就是否定党，否定党的各级组织，否定新中国十七年中的一切建设成就；而当前社会上那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潮，正是十年浩劫的后遗症，也是在少数青年群众中泛滥成灾的病态思潮的一个重要祸根。作家本来应当运用艺术形象的强大说服力，对这种病态思潮进行正确的疏导。《苦恋》的作者没能这样做，却反其道行之，对这种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令人痛心的。

三

文艺界不少同志们谈到，《苦恋》在艺术上也是不真实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导致了对生活的不正确的反映。

作品中虽然用了许多时空跳跃、回忆、幻觉和现实相交错，隐喻与旁白相交织等电影手法，似乎意在"创新"，但不能掩盖它在艺术上的致命缺陷：即图解概念。作品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就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艺术的加工，却是从作者预先设定的某些观念出发，主观随意地设计出某些人物和情节，以图解自己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是混乱和错误的。比如，作者为了表达所谓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单恋"的观念，就不惜把凌晨光归国后得到的温暖，匆匆带过，却一味渲染他的苦难；凌晨光在蚊蚋密集的苇荡中藏身，达六个月之久（从他的老难友可以随时替他偷到油画材料、各种食品来看，这个苇荡是离市镇不远的），以吃生鱼和田鼠藏粮为生，与群众相隔绝，并且居然不问世事，甚至对"四个帮"被粉碎也毫无所闻，这种描写已完全不顾及有无生活真实的依据。为了表现"祖国"总是对知识分子"无情"，就把分明是"四人帮"造成的种种罪行，硬与祖国相混同，硬让一个年逾古稀的历史学家变成一个超级的偷窃能手，让凌晨光临死前也要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问号；而为了形成强烈对比，使祖国"无情"的观念更为突出，就编造出凌晨光顷刻之间在国外发迹的神话。为了表现个人迷信是十年内乱的根源，就生硬地搬出关于佛像和善男信女的比喻，作为注解……。总之，一切都围绕于、服务于作者规定好的那些错误观念，至于是否合乎生活的真实，是宁可弃之不顾的。

正是由于在这种完全背离艺术法则的创作方法支配下，整个作品既不尊重生活逻辑，也不尊重性格逻辑，人物活动往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例如凌晨光寄居美洲某地，远在黄浦江上的船家女绿娘和远在欧洲的娟娟，忽也无缘无故地先后到来，并都准确无误地到了展览会上，真是匪夷所思。绿娘本为船娘，在国外奇遇凌晨光之后，立刻摇身一变，谈吐儒雅，也成了知识分子。凌晨光与娟娟相识时，她不过是个幼女，却居然对凌大唱爱情之歌，这"爱情"还居然历久不衰，为了追逐凌晨光，从欧洲赶到美洲，又飞向祖国，满世界寻找。至于剧中场景和细节的失真，就更多了。例如十年内乱中，他正遭批斗，而一家人却能分食有英文"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娟娟从海外来访，正值"四个帮"肆虐之际，却无人控制监视，竟能叩门直入……。凡此种种，都说不上有什么时代感或真实性，只能使人觉得，人物如提线木偶，事件如海外奇谈，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完全被抛诸脑后了。从这里不难看出：错误的思想和观念，是如何阉割了生活和艺术，而不尊重生活真实的主观图解，又如何加深了思想上的谬误。

据说，有人把这种完全不足为训的手法，称之为"电影诗"手法，或浪漫主义手法，这是很奇怪的。任何富有诗意或浪漫主义感染力的作品，难道能与曲解生活或编造生活相容么？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家努力开掘生活的真实，是为了深刻地显示真理的力量，而不是模糊或歪曲真理。任意曲解生活，甚至以随意的编造来图解错误的观念，必然窒息了艺术的生命。《苦恋》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也在这里。

四

《苦恋》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错误；而最根本的，是对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从作者之一白桦同志的创作生活以及《苦恋》的教训中，不能不使人感到作者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白桦同志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军队，在党和军队的哺育下成长，对党、对社会主义是怀有感情的。他早年写过《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样受欢迎的小说，粉碎"四人帮"后，在短短的几年里，白桦同志又创作了包括话剧《曙光》、诗歌《春潮在望》这些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可以说，这正是他思想上积极健康的因素推动的结果。但是不容讳言，当我们面临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同时也面临艰巨的拨乱反正任务的时刻，作者却往往不能站在

正确的立场上来观察、判断和评价复杂的社会现象，并给以艺术的概括。在《苦恋》中，除了一些错误的观点，还流露着一种强烈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思想情绪，这就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凌晨光、冯汉声、谢秋山的迷惘、怀疑和那种所谓“单恋”的孤独感，固然和当时动乱的状态不可分，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的，但是难道没有他们自身弱点的因素吗?许多知识分子，都曾由于党的政策上“左”倾的失误，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十年内乱时期更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但是，他们难道不正是由于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才没有陷入绝境，而终于在困厄中顽强不屈地生活下来吗?作者写历史学家冯汉声遭“四人帮”迫害后，变成了一个惯窃，这实在是向持躬正直的知识分子身上泼污水。实际上，我国一切正直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的，凌晨光虽然得到过人民的救助和爱护，却依然陷于迷惘怀疑和孤独而不能自拔，正是由于在一定条件下，思想感情脱离了人民而形成的，这只有在人民的斗争中，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中，才能得到解决。作者不去揭示这个真理，反而无条件地同情、赞美并装饰这种孤傲与苦闷，以为这才是“遗世而独立”的“高洁”，这不仅没有正确地反映有觉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实际上，这不过是作者世界观深处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思想情绪的流露。作者从反对个人崇拜，到自我崇拜或对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的崇拜，到陷入虚无主义，这看起来奇奇怪怪的矛盾现象，并非偶然失误，都可以从世界观的矛盾中探寻到它的轨迹。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苦恋》这种政治思想错误，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恰恰是十年内乱中社会上滋生的那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当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创作中的反映。这样的作品，不是帮助党和人民在为实现四化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对当前尚待克服的错误社会思潮起助长传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有负于文艺家的职责的。

十年内乱中，林、江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在人们中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有些青少年，更是深受戕害，使他们黑白俱紊，真伪莫辨，迷惘和动摇的情绪滋生，旧社会的种种思想余毒就在他们头脑中繁衍起来，再加上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发展到对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的地步。这是党的思想工作、文艺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的问题。因此，对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积极主动的、理直气壮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引导，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艺家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在写于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的作品中，对已经分明的重大历史是非，不仅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反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陷于迷乱，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和某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发生共鸣，使自己的作品产生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影响。

邓颖超同志不久前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优秀作品评奖的茶话会上，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文艺家们说，作者、艺术家，应该首先是革命家。革命前辈对我们的教诲，真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斗争中，文艺家应该首先是革命家，是党的思想战线的坚强战士。共产党员的文艺家，更应该坚决地站稳党性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勤奋工作。

当前，我们整个文艺战线的形势是很好的。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应该珍惜、爱护这个新局面。但要使这个新局面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应该开展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前，尤其要着重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我们希望对《苦恋》的批评能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和开展，有助于改变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而对《苦恋》的作者，希望他们能总结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后再写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作品。

（原载《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五讲四美”活动

背景介绍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卫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发出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心灵美，就是要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到“爱国、正直、诚实”，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语言美，就是要使用和推广礼貌语言，做到“和气、文雅、谦逊”，不讲粗话、脏话，不强词夺理，不恶语伤人。行为美，就是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做到“勤劳、友爱、守纪”，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公物，不危害社会秩序。环境美，就是要搞好个人、家庭和工作场地、公共场所的卫生，做到“卫生、整洁、绿化”，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破坏树木、花草。

9个单位的倡议，得到了党、政部门大力支持，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卫生部发出通知，提出要把“五讲四美”“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中央其他各部、委、局和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发展通知或召开会议作了传达、部署。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五讲

四美"活动。

举办讲座、展览，举行报告会：不少单位举办有青少年工作者、共青团干部和少先队辅导员参加的美学专题讲座，请伦理学、美学专家和学者作报告。基层单位组织"人人懂礼貌，生活更美好"等主题活动，组织发型、服装评美活动和举办美术、摄影展览等，陶冶了青少年审美情操，促进了"五讲四美"活动的普及。

开展公益活动：各地以清洁卫生为突破口，普遍开展了绿化、美化、净化活动。围绕改造社会风气，美化环境，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好事，青少年中开展了"我为祖国添光彩"、"我为'五讲四美'唱赞歌"、"我为美化环境出力"、"让团徽在文明礼貌活动中闪光"等主题活动。各地把"学雷锋、树新风"和"五讲四美"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各种公益活动。上海青年服务队的形式，普及到全国大中城市和小部分农村。年底，北京市学雷锋小组、青年服务队已达2万支，20多万人参加服务活动。

在工作岗位上落实：财贸系统开展了"礼貌待客、优质服务"活动，工交、基建系统把文明生产、文明操作、文明施工的要求和"五讲四美"要求相结合。武汉市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经验，进一步影响到全国。医务人员、营业员、服务员、驾驶员、乘务员、人民警察中，普遍制订了各种守则、规范，开展了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组织竞赛、评比：小学开展"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大中学校开展"学雷锋、创三好"和三堂、一馆、一舍（课堂、食堂、会堂、图书馆、宿舍）文明新风赛活动。一些地区还划分赛区，对口检查或抽查。同时，命名一批文明单位，有车组、班级、车间、交通岗、宿舍等。一些大中城市召开了"五讲四美"表彰会，命名表彰了一批"五讲四美"先进集体和个人。

"五讲四美"活动开展以来，凡是认真抓紧、注重落实的地方，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各地反映，有这样4种风气：一是助人为乐、争做好事的风气。仅吉林省8个城市统计，1981年上半年共做好事64.4万多件。一年中，各地涌现了不少舍生忘死、见义勇为、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好青年、好职工和好社员。二是清洁卫生，种树、种草、种花的风气。山东省5、6两个月中，有158万多人次参加统一组织的美化环境活动，清除垃圾45万多吨，清理污水沟850多道，整修马路、街道1,700多条，城市卫生面貌有所改观。三是讲究文明、礼貌待人的风气。一些文明礼貌用语开始普及，污言秽语有所减少，乘车让座、扶老携幼、邻里和睦等现象不断增多。四是文明生产、文明服务的风气。许多单位把"五讲四美"的要求，订入立功标准、竞赛条件和职业道德规范之中，促进了生产、工作和各项业务活动。

材料：

- 让伟大祖国以高度精神文明的新风貌出现在世界前列

材料　让伟大祖国以高度精神文明的新风貌出现在世界前列

通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达到：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二月二十五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倡议全文如下：

最近党中央号召我们：在进行四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促进经济调整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使我国城乡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有一个根本改观，让伟大的祖国以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新风貌出现在世界的前列。

讲文明礼貌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

讲究文明礼貌，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风气的现实反映，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从根本上废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铲除了不文明的祸根，剥削阶级意识和旧道德观念也受到了有力的荡涤。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大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互相合作和团结友爱的关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良好道德风尚，是举世公认，可以引为骄傲的。但在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煽动，是非颠倒，荣辱易位，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被打上修正主义的印记。而"打、砸、抢"的野蛮行为，却被戴上："英雄"的桂冠。"四人帮"覆灭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

为清除林彪、"四人帮"对我国社会风气的污染做了大量工作。然而,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历史的破坏,不仅要恢复我们民族优良的文明传统,而且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来,这就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当前,广泛开展以"五讲"、"四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四美"的具体要求

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大兴"五讲"之风,达到"四美",当然在经过一个努力实践的过程,但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要我们根据"五讲"、"四美"的基本要求,确定自己的目标,不断地身体力行,是能够达到的。"五讲"、"四美"是有机联系的,通过"五讲"达到"四美"的要求。"四美"的一般要求是:

"心灵美",就是要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到"爱国、正直、诚实",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

"语言美",就是要使用和推广礼貌语言,做到"和气、文雅、谦逊",不讲粗话、脏话,不强词夺理,不恶语伤人。

"行为美",就是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做到"勤劳、友爱、守纪",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公物,不危害社会秩序。

"环境美",就是要搞好个人、家庭和工作场地、公共场所的卫生,做到"卫生、整洁、绿化",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破坏树木、花草。

讲文明礼貌要纠正几种误解

要达到文明礼貌这样一些要求,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人把说话粗鲁,对人粗暴,当成劳动人民朴素憨直的秉性。这是一种误解。一个人的憨厚、善良的心地,一般要表现为礼貌的言行举止,待人亲切、直率,说话和气、讲理。粗鲁和粗暴与劳动人民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他们的秉性。还有人把讲文明礼貌,说成是"资产阶级虚伪作风",这同样是不对的。资产阶级中确实有不少人道貌岸然、彬彬有礼,骨子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这和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共通之处。我们讲文明礼貌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是建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的,是以共产主义精神、原则为指导的。还有人认为,在我国物质条件还不够丰富,一部分人文化教养不足的情况下,讲精神文明是困难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延安时期,当时军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不太好,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高尚的。从延安到新中国的建立,我们就是依靠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依靠精神的力量,吸引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投身革命斗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又有做人的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有志气也有信心一步一步地恢复和树立起一代文明礼貌的新风。

讲文明礼貌要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从现在抓起

树立文明礼貌新风,要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从现在抓起。小孩从学话开始,就要教育他们使用文明语言。在家庭、幼儿园,要对孩子进行文明、懂礼貌的教育。儿童上小学,青年进厂、进店、跨进工作大门的第一次教育,都要使他们明了文明礼貌行为准则。在日常的学习、劳动、工作和生活中,都要点点滴滴地潜移默化,逐渐形成讲究文明礼貌的风气。

各行各业都要把自己的业务活动和日常工作同"五讲","四美"联系起来。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这些部门的职工要把"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方便群众"作为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标志,使人民群众处处感到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并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各级各类学校应该成为倡导文明风尚的主要阵地,不仅要教育青少年懂得讲文明礼貌的意义、要求和知识,而且教师要为人师表,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新人。家庭是培养青少年文明行为的摇篮,每个家长都要把教育训练子女讲文明、懂礼貌作为自己的职责。广大成年人、老年人更要以身作则,成为青少年文明行为的表率。总之,讲究文明礼貌人人有责,都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培养文明礼貌行为和习惯,不仅要依靠人们的信念和道义的力量,还要依靠社会舆论和宣传的作用。我们希望各个宣传教育单位和各种报刊,积极为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恢复和树立文明礼貌新风尚开路。热望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摄影工作者,把"五讲"、"四美"作为创作和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用人民群众中闪烁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火花,去鼓舞人民和青少年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前进。

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爱卫会、学联组织,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有关部门配合、协作,共同做好工作。各地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遵纪守法、文明生产"活动,"五好家庭"和"好妈妈"活动等,都要和"五讲"、"四美"活动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评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和三好学生,都应把文明礼貌作为基本要求。

同志们,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恢复和树立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新风尚,努力按照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要求,争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实行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实现社会进一步安定,为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摘自198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中国女子排球队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背景介绍

中国女子排球运动于七十年代末开始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在取得了亚洲冠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等优异成绩之后，中国女排开始发起向世界顶峰的强有力冲击。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东京拉开了战幕。来自八个国家的巾帼英雄们云集于此，都欲使出看家本领，一决高下。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教练袁伟民的指挥下，以杰出的二传手孙晋芳和“铁榔头”郎平为核心，发挥整体配合的优势，开赛以后连克曾八次获得世界冠军的苏联队和一九七八年世界锦标赛冠军古巴队等多支世界劲旅。然后以慢制高、以巧制快，在关键的一场比赛中制服了“拦路虎”——美国队。在最后一场与日本队的比赛中，也是戒骄戒躁、寸土不让，并取得了胜利。这样，气势如虹的中国女排势如破竹，七战七捷，终于令人心悦诚服地站到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这是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也是我国在三大球项目中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对于中国女排所取得的成绩，国家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女排勇攀高峰、奋力拼搏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炎黄子孙，全国各地也由此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材料：

· 中国女排荣获第三届世界杯赛冠军

· 我女排健儿满载荣誉凯旋归来

材料一　中国女排荣获第三届世界杯赛冠军

历时十一天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今天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闭幕。

当本届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结束后，举行了闭幕式和发奖仪式。荣获本届冠军的中国队、亚军日本队、第三名苏联队在乐曲声中依次进入大厅，登上领奖台。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利博在身着美丽和服的日本女青年陪同下，把世界杯和大会奖杯递给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并给每个队员挂上奖牌。这时，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赛组织委员会还向日本队和苏联队颁发了奖品。

接着，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场内冉冉升起。日本和苏联的国旗同时升起。

随后，比赛委员会宣布了这届比赛获奖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名单：

最佳教练员奖：中国队袁伟民，

最佳运动员奖：中国队孙晋芳，

敢斗奖：古巴队梅·佩雷斯，

优秀运动员奖：美国队里·克罗克特、中国队郎平、苏联队柳·契尔尼舍娃、日本队广濑美代子、美国队弗·海曼、中国队孙晋芳，

扣球奖：美国队弗·海曼，

拦网奖：苏联队叶·阿柯哈米诺娃，

发球奖：日本队水原理枝子，

一传奖：日本队广濑美代子，

二传奖：中国队孙晋芳。

比赛组织委员会向这些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发了奖

新华社东京11月16日电　中国女子排球队今天下午在大阪举行的世界杯女排赛最后一战中，经过艰苦奋战，以三比二胜了日本队。中国队终于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这是我国体育健儿在世界篮、排、足三大球比赛中，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

中、日两队近几年来交往较多，互相熟悉球路，所以这场比赛打得紧张、激烈，扣人心弦。

前两局，中国队凭借网上优势，以郎平的超手扣球、张蓉芳、孙晋芳、周晓兰等人组成的各种配合和出色的拦网，打乱了日本队的防守，以十五比八和十五比七，先胜两局。这时，中国队由于胜局数超过日本队，已实际上取得世界杯冠军。

第三局，中国很快就以五比一领先。但是，日本队没有气馁，继续发挥她们特有的顽强战斗的精神，她们在加强拦网的同时，调整进攻战术，针对中国队网上实力强的特点，采取短平快和打时间差快球，把比分从一比五、四比十一直追到十平。由于中国队接球失误和扣球出界，日本队以十四比十领先，张蓉芳两次扣球得手，把比分追成十二比十四。日本队扣球奏效，以十五比十二扳回一局。

第四局，日本队士气大振，充分发挥了防守好的特点，频频接起郎平、张蓉芳等的大力扣球。而中国队打得有些松散，一传失误多，被日本队连拿六分。日本队的水原理枝子、江上由美、广濑美代子和三屋裕子等人，配合默契，多次打出漂亮的短平快，连连得分，最后以十五比七又胜一局。

决胜局第五局一开始，日本队三次拦网、一次扣杀成功，以四比二领先。中国队教练袁伟民叫暂停，稳定队员的情绪，安排对策。只见中国队场上六名队员互相鼓励，互相提醒，士气大振。郎平、张蓉芳、曹慧英等频频得手，

对方又三次接球失误，连夺八分，反以八比四领先交换场地。日本队在四比八、六比十二的不利情况下，毫不手软，通过交叉变化、短平快和打时间差等战术，进攻十分顺手，不断攻破中国队的防线，光是广濑美代子一人就四次重扣成功，把比分追成十三平。这时赛场上气氛十分紧张，观众不停地大声叫喊，为运动员打气。中国队毫不放松，每球必争，一次拦网成功，十四比十三。日本队两次猛扣，以十五比十四超出。就在这关键时刻，郎平超手斜线高扣成功，十五比十五。此后，中国队两次拦网成功，终于以十七比十五拿下了关键的一局。

比赛结束以后，中国队的姑娘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陈先在赛后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次世界杯赛的胜利，是我国运动员无私、无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胜利。她们这个力量的来源是人民。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排球运动的发展提高，给女排夺标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中国教练袁伟民在赛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排球界朋友对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帮助很大。今天中国队所以能夺得冠军，是与中日两国排球界的交流、日本排球界对我们的帮助分不开的，这是中日友好的结晶。今后，中日两国运动员还应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在发展世界排球运动中作出贡献。

获得本届比赛最佳运动员、优秀运动员和优秀二传手的孙晋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我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感到意外"。"我认为世界各强队中好多选手都比我强。"

被评为优秀运动员的郎平说，排球是集体项目，中国队所以能取得胜利，这是全体队员努力的结果。

（摘自1981年11月16日《中国体育报》）

附：

1、我女排在世界各届比赛中的成绩

1956年在第二届世界锦标赛中获第六名；

1962年在第四届世界锦标赛中获第九名；

1974年在第七届世界锦标赛中获第十四名；

1977年在第二届世界杯赛中获第四名；

1978年在第八届世界锦标赛中获第六名；

1981年在第三届世界杯赛中获得冠军。

2、女排教练员、队员名单

教练：袁伟民　邓若曾

队员：孙晋芳　张蓉芳　周晓兰
郎　平　陈亚琼　陈招娣
曹慧英　杨　希　朱　玲
梁　艳　张洁云　周鹿敏

材料二　我女排健儿满载荣誉凯旋归来

中国女排今天晚上载誉凯旋，回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和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等数百人的热烈欢迎。

晚九时四十分，当手捧闪闪发光奖杯的女排健儿孙晋芳、郎平、张蓉芳、周晓兰、陈招娣、陈亚琼、曹慧英、杨希、朱玲、张洁云、梁艳、周鹿敏，教练员袁伟民、邓若曾，在领队张一沛的率领下走进机场大厅的通道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十多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原中国女排的老运动员，把一束束花束献给这些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英雄们。姐妹们互相握手、拥抱，笑脸上滚动着激动的泪花。一个老运动员拉着陈亚琼的手说：我们几代的夙愿，到你们这一代终于实现了！我们感谢你们，全国人民感谢你们！陈亚琼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为我们铺了路啊！

许多摄影记者拥上前去，拍下了动人的场面。

通道两旁几百名群众高呼："热烈欢迎中国女排胜利归来！""向中国女排学习！"

英雄们来到了休息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她们热烈握手，亲切交谈，欢迎她们胜利归来。万里、习仲勋、杨静仁同志先后讲了话，祝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和各行各业都向中国女排学习，搞好工作，搞好四化建设。中国女排队长，荣获最佳运动员奖、优秀运动员奖、二传奖三个奖杯的孙晋芳代表女排讲话。她说，我们中国女排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和党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们虽然取得了世界冠军，但还有不足的地方，比赛经验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刻苦训练，争取今后在世界比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前往机场欢迎中国女排的还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梦华、钟师统、宋侃夫、高占祥、林丽韫、陈昊苏、沈图、宋一平、王仲方、吕正操、荣高棠、薛明等。

（摘自1981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　整顿社会治安

背景介绍

1979年冬全国城市治安会议后，整顿城市治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相当严重，有的地方对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不及时，群众很不满意。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

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要求尽快改变目前的不良状况。对于极少数进行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特别是教唆犯和主犯、惯犯，必须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切实纠正打击不力的现象，使坏人怕好人，怕群众，使群众有安全感。

当前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多数是青少年。他们犯罪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主要的是在十年内乱中受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严重毒害，把打砸抢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不当一回事。会议要求对待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不能单靠打击、惩罚，要热情、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

争取社会治安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在于全党动手，进行"综合治理"，即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其中心环节应是对青少年加强教育。

为了迅速、及时打击严重的现行刑事犯罪活动，6月5～10日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3个决定。（参见《法律·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等三个决定》）

各地公、检、法机关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迅速落实"综合治理"的措施，积极宣传和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3个有关法律的决议、决定，建立和健全了整顿社会治安的领导机构，扩大和整顿了政法队伍，加强了治安联防组织，限期收缴私藏凶器，对在逃人员限期报到，并公开判处了一批重大案件。据18个大城市统计，3个有关法律的文件公布后一个月内，投案自首的违法分子有4000多人，自动回归或经家长送回劳改、劳教场所的逃跑分子有800多人，政法部门追回外逃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1600多人。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1981年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犯罪线索168000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68000多名。同时，涌现出一批挺身而出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

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以后，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好人怕坏人的情况有了改变。好转的具体表现是：1、群众的安全感有所增强。许多城市的繁华街道和公共场所治安秩序明显好转，流氓滋扰、盗窃抢夺、打架斗殴的现象大为减少；2、犯罪分子受到震慑，坦白交代、投案自首的增多，不少在逃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主动返回改造场所，北京市有的犯罪分子把盗窃的手表、自行车偷着退还失主，并补偿"磨损费"，有的将偷盗的高档收录机偷偷放回失主家门口；3、好人怕坏人的局面开始扭转，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动人事迹不断出现；有些地方刑事案发案率有所下降；4、群众性闹事减少；5、灾区治安秩序稳定，四川、辽宁、陕西等省遭灾后秩序良好，人心安定。

由于加强了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感化、挽救、改造工作，1981年有3500多名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教。他们弃旧图新，走上了正道。有的在工作和生产劳动岗位上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中国社会治安情况虽有好转，但远未根本好转。治安问题还很多，社会秩序仍不够稳定，且各地也不平衡。目前，各地都在根据社会治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和部署今后继续加强整顿社会治安的工作。

材料：

- 确定整顿治安的任务政策和措施
- 各地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

材料一　确定整顿治安的任务政策和措施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五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彭冲出席了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座谈会的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的负责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市和广东、湖北两省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市委或省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和公、检、法部门的负责人。

座谈会分析了形势，统一了认识，讨论并确定了当前整顿治安的任务、政策和措施。会后，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纪要，要求各地联系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必须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

座谈会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冬季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以来，整顿城市治安还没有根本好转。目前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有的地方对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不及时，群众很不满意。为了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全党动手，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以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设良好的治安秩序。

座谈会指出，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放火犯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特别是教唆犯和主犯、惯犯，必须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第一是从重，第二是从快。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内从重，不是在法律的量刑幅度以外加重判刑。从快是按照法律的诉讼期限从快，不要拖拖拉拉。如果对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宽容姑息，那就等于对奉公守法的群众的残忍。因此，必须切实纠正打击不力的现象。

维护好城市的秩序，首先要求把坏人、邪气压下去，使坏人怕好人、怕群众、怕犯法，使群众有安全感。政法部门是管治安工作的，首先要切实负起责任。

座谈会指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主要的是把犯罪的基本事实、判刑的根据查清楚，主要罪行的证据确凿就可以依法判刑。要求把每个罪犯的全部犯罪细微末节都搞清楚，每个证据都拿到手，这是极难办到的。一些细节对判刑也是没有用处的。

要满腔热情地教育、感化、改造好违法的青年

座谈会指出，当前治安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人绝大多数是青少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他们犯罪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主要是在十年内乱中，受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严重毒害，把捅刀子、打砸抢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不当一回事。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毒的受害者。对待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不能单靠打击、惩罚，而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对于违法情节轻微或年龄很小的违法青少年，首先应该尽可能地责成他们的家庭和所在单位（包括街道居民组织）教育帮助他们改好。这一部分是大量的。对于被劳改、劳教和送工读学校或少年管教所的扰乱社会治安的其他分子，要继续坚持党历来的方针，即"教育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满腔热情地、耐心细致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要关心他们的吃、住、健康、学习，组织帮助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使他们感到有出路，有前途，懂得政府是为他们好。工读学校要普遍办，真正当做学校来办。对经过工读学校和劳教场所改造，表现较好的青少年，有关部门在安排他们就学、就业时，绝不许嫌弃、歧视。这也是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座谈会指出，我们这样来确定任务和规定政策，是为了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多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恢复和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

全党动手，发动群众，进行"综合治理"

座谈会认为，争取社会治安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在于全党动手，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综合治理"。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各方面、各部门的力量组织起来，把任务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同时，要加强内部的整顿。公、检、法部门要和工厂、学校、商店、机关等单位密切配合，主动向他们提供情况，提供犯罪线索，联系和指导各单位保卫部门的工作。如果在职工人、在校学生在社会上作案，所在单位要认真查原因，堵漏洞，整顿内部。

座谈会还强调，要加强防范工作，把发案率降下来，要收缴私藏的各种凶器，要制止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继续活动，要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抓紧把居民委员会、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全面恢复起来并不断加强。

座谈会认为，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党也领导人民执行法律。我们是主权国家，执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不能让外国的资产阶级法律思想来影响、扰乱我们的司法工作。政法机关是国家的专政机关，必须严格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领导下，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的三道工序，必须主动互相配合，同时实行互相制约，更好地保证三机关都能正确地依法办事。要继续发扬党委领导下，专门机关和依靠群众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只有广大群众作政法、公安部门的坚强后盾，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制止犯罪活动。

（摘自 1981 年《法制时报》）

材料二　各地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

1981 年，全国各地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如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3 月 26 日判处强奸犯张远根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6 月 6 日对严重摧残少女犯李煦等 14 名罪犯分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7 月 18 日判处流氓、强奸犯阎晓翔，强奸、抢劫、盗窃犯王鹏元、张春启，杀人，抢劫；盗窃犯刘世国、卢均玲 5 名罪犯死刑，流氓强奸犯马克林死缓（马本应依法处决，鉴于捕后揭发同伙及其他案件线索有立功表现而从轻）等。

这些罪犯的共同特点是，屡次犯罪，气焰嚣张，无视法律。例如张远根（1963 年 11 月生），捕前是马鞍山市江边街道的临时工，1981 年 2 月 4 日（农历除夕）晚 8 时许用暴力将一女青年挟持到 3 个地方强奸。女青年挣脱逃进居民家，张犯竟闯入民宅拖出女青年，肆意辱骂毒打。张犯还在作案过程中对上前制止的群众进行恫吓威胁。当晚 11 时许，张犯被公安人员和民兵抓获，押送途中被其逃脱。以后张犯又冒充公安人员到 7 户居民家中搜查那个女青年，并对一工人强行搜身，抢走工人的钱和衣服。审理中查明，张犯过去多次奸污女学生，盗窃群众和国家财物。

1981 年初以来，承德市的流氓犯罪活动猖獗，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3 月 7 日，营子矿区有 2 名少女被流氓徐景龙等劫持，带到流氓头子、教唆犯李煦住处关进密室。这 2 名少女遭到李煦、李宝荣、韩宝生等流氓轮奸和蹂躏达 10 天之久。她们进行反抗，这伙流氓竟用钢丝蘸凉水抽打，用带尖的铁器扎，在伤口上撒盐面，在嘴里勒上铁丝嚼子，手段极其残酷。承德市

人民强烈要求专政机关维护国家法纪，打击犯罪活动。承德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迅速破获此案。5月21日在营子矿区召开宣判大会，判处流氓教唆犯李煦死刑；罪犯韩宝生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犯李宝荣、张和平、徐景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犯罪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被告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进行了审理和裁决，迅速予以驳回，使这批罪犯很快受到法律制裁。

北京市的流氓、强奸犯阎晓翔、马克林都是多次犯罪、多次被劳教过的；强奸、抢劫盗窃犯王鹏元、张春启，都是劳教人员。从1980年4～10月中旬，王、张两犯先后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流窜作案，共盗窃吉普车9辆，驾车乱窜，进行抢劫、强奸和轮奸妇女等罪恶活动。1981年4月2日下午4时许，罪犯阎晓翔、马克林伙同其他犯罪分子在北海公园围追、威胁正在划船的3名女中学生，调戏她们达2小时之久。上岸后，阎、马两犯又用暴力各挟持1名女学生在两个同案犯住处将她们强奸。北京市公安机关破案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6日进行审理，7月18日在18000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宣布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阎晓翔等5名罪犯执行死刑的命令以及对罪犯马克林判处死缓的判决。

各地召开万人以上的宣判大会，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一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严重刑事犯，开始扭转了过去对重大现行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和打击不及时的情况，整顿治安工作有了较大进展，好人怕坏人的情况有了改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风 云 人 物

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茅盾）（1896～1981），浙江省桐乡县人，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中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他在1913年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新思想。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一批党员之一，参加党的早期筹备工作。1926年，他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汉口主编左派喉舌《国民日报》。1928年以后，他同共产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他曾于1931年和1940年两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第一次没有得到“左倾”领导的答复，第二次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对人民更为有利。在他病危之际，为了表达对党无限忠诚与热爱，再一次向党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关于他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活动，早在1920年他同郑振铎、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他接办和改革了《小说月报》，使这个月报成为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对新文学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1930年，同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发展革命文艺，团结、壮大革命文艺队伍，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并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讲过学。抗战胜利后，不顾国民党的压迫，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全国解放前夕，他不顾艰险，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历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几十年来，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在文艺创作方面，从1916年开始，他始终以满腔热情歌颂人民和革命，鞭挞旧中国黑暗势力，创造了《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的文学宝库创作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还撰写了大量文学论著，翻译介绍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并极力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为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在他病危之时曾嘱咐将他自己积存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

材料一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沈雁冰逝世

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4月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京各界人士两千人在人民大会堂西厅隆重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人大常务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送了花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叶剑英、陈云、宋庆龄、聂荣臻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

悼词对沈雁冰给予高度评价。悼词说:沈雁冰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沈雁冰从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漫长的60余年中,他始终不懈地以满腔热情歌颂人民、歌颂革命、鞭挞旧中国黑暗势力,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财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沈雁冰从青年时代起,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早在1921年,他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在他病危之际,为了表达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他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贞的崇高的信念,他仍再一次向党中央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根据他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沈雁冰生前曾决定捐献稿费25万元,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4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由中国作协主席团全体成员担任委员,巴金任主任委员。

材料二　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

党龄从1921年算起。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讯:中共中央收到了沈雁冰同志病危时给中共中央的信,于3月31日作出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沈雁冰同志给中共中央的信

耀邦同志　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宋庆龄

宋庆龄(1893～1981),广东省文昌县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从青年时期起,她就追随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她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1925年孙中山逝世,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谴责国民党右派,并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她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对叛变的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声讨,并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汪叛变行为。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她在苏联和法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1929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30年代,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和《八一宣言》,都率先响应,积极宣传。抗日战争期间,她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重庆期间,她还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等国际友人共同为推进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而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她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为解放战争

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帮助。北京解放后，她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7 年，她随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1959 年和 1965 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员委长。在这期间，她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取得很大成功。她一贯关心妇女工作和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的故旧友朋，翔台湾的前途，殷切期待国共和谈早日进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作出了宝贵贡献。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 月 1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她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1950 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1952 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她被国际上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材料一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病逝

中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经抢救无效，于 1981 年 5 月 29 日 20 时 18 分，在北京住所不幸逝世，终年 90 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于 5 月 29 日发布公告，沉痛悼念宋庆龄逝世，并决定为宋庆龄举行国葬。

先后从美国旧金山和澳门专程赶来北京的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女）、陈志昆、黄寿珍（女）、陈燕（女），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临终前，她的表外甥女倪冰也来到她的的身边。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得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不幸逝世的噩耗，立即赶往她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的遗体致哀。并向守候在遗体旁的宋庆龄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向宋庆龄遗体致哀的还有黄文欢和在北京的各国友好人士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宫崎世民、艾德乐、爱泼斯坦、柯如思。

治丧委员会由 393 人组成。委员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的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的生前友好、亲属和国际友好人士。

在此以前，根据宋庆龄的多次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5 月 15 日一致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 月 1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北京各界 12 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缅怀她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6 月 2 日下午，宋庆龄的遗体由廖承志、宋任穷、杨尚昆、杨静仁、康克清等和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等护送，从人民大会堂移往八宝山火化。沿途 20 多里，近百万人肃立在路旁，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目送灵车，缓缓地在面前驶过。

6 月 3 日下午，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近万名首都各界群众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深切悼念这位受到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卓越领导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宋庆龄的巨幅遗像挂在主席台正中，遗像下面安放着她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放着鲜花和长青松柏。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的花圈摆放在宋庆龄同志遗像两侧和大礼堂周围。

人民大会堂一楼大厅里，摆着一些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和人民，各国驻华使节，一些国家的社会团体，友好人士，在京访问的外宾送的花圈；还摆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大军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台湾爱国同胞，广东省文昌县领导机关献的花圈。

宋庆龄的亲属儿媳陈淑英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她的遗像前。

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参加追悼大会的有华国锋、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许世友、李德生、余秋里、耿飚、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姚依林、黄克诚、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肖劲光、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

赞、康世恩、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黄华、江华、黄火青、韩先楚、杨勇、王平、陈锡联、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康克清、季方、王首道、胡子昂、胡愈之、王昆仑、何长工、肖克、程子华、杨秀峰、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

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倪冰等，肃立在她的遗像旁。

6月2日从檀香山赶来参加丧礼的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芳，也参加了追悼大会。

参加治丧委员会的黄文欢和其他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宫崎世民、艾德乐、爱泼斯坦、柯如思、耿丽淑等也参加了追悼会。

下午4时，胡耀邦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哀乐，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接着，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邓小平致悼词。他说，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悼词最后要求全国人民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追悼会最后由军乐团奏《国际歌》。

参加追悼大会的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宋庆龄生前友好、身边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警卫战士，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指战员，在京的华侨和港澳同胞，首都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

6月3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赵紫阳总理一行，6月3日下午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

宋庆龄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右边，把已经故去的伴随她50多年的李妈（李燕娥）埋在墓的左边。

6月4日上午，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和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戴成功、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倪冰乘专机从北京护送到上海安葬。护送骨灰随机飞往上海的还有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宫崎世民、艾德乐、爱泼斯坦、柯如思、耿丽淑和宋庆龄的生前友好廖梦醒、伍竞仁和夫人、郑恩基，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有关人员。

治丧委员会曾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侄孙满、孙乾，蒋经国，蒋纬国，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绩，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宋子文夫人5月30日从美国旧金山发来唁电，对宋庆龄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宋子文的长女6月2日从美国纽约打电报给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对不能前来参加宋庆龄的葬礼表示惋惜。唯独台湾省台北电报局于6月1日向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急业务公电”，竟称“拒绝收受”治丧委员会打给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的电报。

5月22日，宋庆龄患病期间，收到了她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纽约州发来的慰问电。

材料二　党中央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讯，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

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材料三　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决定全文如下：

“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建国伊始，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继续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70年来，她一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定地和中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在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发扬进步文化、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会上，邓颖超副委员长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建议，介绍了宋庆龄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入党要求以及党中央接收她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情况；廖承志副委员长介绍了宋庆龄同志的病况。

（摘自《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一九八一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五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年，这一年我国政治局面更加稳定，经济形势继续好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八一年的中国文艺蓬勃发展，日益繁荣兴旺。同时，它又带着大变革新时期的特点，除旧布新，继往开来，在探索中前进，在争鸣中发展，这也就构成了当年的"流行色"。

一九八一年的中国文坛，创作兴旺，思想活跃，人才辈出，演出、展览活动丰富多采，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学艺术各个门类，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和有关名著的改编也大大增多。一些优秀作品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总结历史经验，真实地反映时代的脉膊和人民的心声，对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提广大读者的精神境界和审美趣味，起了重大的作用。

小说方面。中篇小说在题材、人物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在小说林中跃居为突出的地位。优秀作品有《祸起萧墙》、《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短篇小说则在人物的塑造，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上有所发展，涌现出《内当家》、《山月不知心里事》等好作品。长篇小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数量、艺术质量、创作者的广泛性等方面跟上了中短篇小说迅速前进的步代，优秀作品有《芙蓉镇》、《星星草》、《李自成》、《沉重的翅膀》等。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诗歌方面，在时代精神、锐意创新上深入发展，朦胧诗的"崛起"令人注目，优秀作品有《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第五十七个黎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

话剧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创作实绩，其中如《谁是强者》、《北上》等在创作、表演上为话剧艺术积累了新的经验。

电影方面，生产故事影片105部，是建国以来故事片生产数量最多的一年，而且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影片，如《喜盈门》、《邻居》、《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西安事变》等等。其中《喜盈门》以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厚的感情色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地反映了新的农村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受到国内外观众的赞扬。

音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各地音乐刊物上发表的歌曲达3,000首以上。反映农村题材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流传全国，受到群众的欢迎。交响音乐创作也获得丰收。

另外，其他如舞蹈、美术、摄影等艺术门类，也都创作了大量反映新时期生活的作品，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九八一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还出现了许多流行的新名词、新口号，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时代风貌。

小说《芙蓉镇》

长篇小说。作者古华。最初发表于《当代》1981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小说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曾被改编为同名影片。

【内容梗概】　作品以湖南山区芙蓉镇上的青年妇女胡玉音的命运为主线，在长达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下揭露了"左"倾思想的谬误和危害，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给人民带来的光明前途，展现了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图画。1963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在湘南的

芙蓉镇上，有个生意兴隆的米豆腐摊子经营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叫胡玉音，人称"芙蓉姐"。她不仅生得俏丽，待人和气，而且货好价廉，所以吃客很多。镇上的国营饮食店新来了个叫李国香的女经理，这个老姑娘为人阴险歹毒而又伪善矫情，舅舅是县委管财贸的杨民高书记。因本店生意冷清，李国香对胡玉音的米豆腐摊子十分恼恨，总想找点岔子。可是，极受本镇人敬重的粮站主任、"北方大兵"谷燕山，是胡玉音的老主顾，镇上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曾是胡玉音的初恋情人，现在又是发誓要永远保护她的干哥，都不会帮李国香什么忙。人称"运动根子"的王秋赦，对李国香有用，他雇农出身，又懒又馋，长年靠政府救济粮和吃白食过活，但他头脑中不乏"革命"思想，是每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李国香与王秋赦联合起来，想从胡玉音开刀，打击本镇的"资本主义势力"。1964 年春，胡玉音和丈夫黎桂桂用积攒下的钱盖起了一座新楼房。落成之际，恰逢"四清"运动开始。这座新楼屋被以县委社教工作组组长身份出现的李国香和王秋赦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予以查封。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桂桂饮恨自杀，黎满庚被撤职，谷燕山被停职反省。1969 年芙蓉镇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秋赦成为大队党支书兼圩场治安主任，李国香成为县革委常委，谷燕山成了无官一身轻的"逍遥派"。胡玉音戴着"新富农"的帽子，每天打扫青石板大街，受尽人间的屈辱。在悲惨的处境中，胡玉音得到了外表自轻自贱而内心纯洁正直的"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在患难中相濡以沫，结为"黑夫妻"，秦书田因此被打成坏分子，判弄十年，遣往千里之外的洞庭湖畔劳动；胡玉音也被判三年徒刑，因怀有身孕，临外执行。孤苦无依的胡玉音分娩时险些死于难产，又是谷燕山及时援救，才使她母子转危为安。1979 年胡玉音、秦书田的冤案得到反，芙蓉镇的人们恍如隔世，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芙蓉镇出现了勃勃生机。这儿又成为商贩去集的市场，人们的生活和命运都发生也根本性的变化。谷燕山当了镇委书记，忙着治理标志着本镇风光的芙蓉河，秦书田当了县文化馆的副馆长，胡玉音成了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的服务员。只是王秋赦疯了，他总是在镇上游来荡去，高喊着那个年代的政治口号。作品具有精湛的结构艺术。在构思方式上以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统帅故事情节的发展，即以胡玉音和与之相关的一组人物为主体骨架，并由他们在相互关系中所组成的社会事件为实际材料，构筑起小说的艺术大厦。在布局设计上，选择了四个不同的年代，1963 年调整以后农村经济的活跃，1964 年"四清"运动的开展，1969 年的社会动乱，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让人物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舞台上表演亮相，展现了风云变幻的农村生活，从而巧妙地透过特定的小社会，表现了变化着的大社会、走动着的大时代，并于整体的顺叙中，间以少许的补叙，使剪裁配置显得重点突出而又疏密有致。小说塑造了一组血肉饱满、各具特色的人物，温顺善良而又刚烈坚贞的胡玉音，忍辱负重、佯装癫疯、洒脱处世的秦书田，阴险歹毒的"政治女将"李国香，愚蠢顽劣的"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有耿直义气的"北方大兵"谷燕山等，无不真实、深刻，富有社会内容。小说就是从变化多端的生活现状中，显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体现出时代曲折前进的脚步，深刻揭露了"左"倾路线的谬误，热情赞美了山里人善良的心灵和纯真的爱情。作品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中，借人物命运演绎乡镇生活变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小说《祸起萧墙》

中篇小说。作者水运宪。原载《收获》1981 年第 1 期，后收入《1981——1982 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作品获 1981－1982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同名影片。

【内容梗概】 作品描述的是四化建设中，某省佳津地区电业局由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所引起的一场灾祸。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省水电局对所属地区的电业局实行专业化改组，建立强有力的专业对口管理体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省水电局副局长傅连山毛遂自荐，到老大难地区佳津挑头改革。具有特殊权势与优越感的佳津地委，对于傅连山等省局派来的人员极不欢迎，不接受他们报到，生活上给以刁难，傅连山等人只好撤回。但是，傅连山不甘心，不气馁，重整旗鼓，在取得省委的支持后，他再次发兵佳津，被任命为佳津地区电业局党委副书记兼局长。他看到这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为了削减干部，压缩编制，把真正搞四化的人调到领导岗位上来，他实行了干部的业务考核。不料这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尤其是他提出改变当地的金沟水电站电网线路，把它完全和大电网联在一起，更被认为是动了"自留地"挖了"祖坟"，危害了本地区的利益。因此，污言秽语接踵而来，坚持改革的干部被排挤调走，傅连山也接到地委的通知，要他去参加干部轮训班。轮训尚未结束，在狂风暴雨的危急关头，在本区系统内电网如金蛇狂舞、招架不住的关键时刻，傅连山奉命回兵解围，赶到了混乱不已的调度室。他准确果断地指挥操作，排除了一连串的事故。气氛刚刚缓和，中调又来了紧急，主力电站水泵房进水，需暂退出网络，佳津地区二、三级负荷全部拉闸。地委郭书记、电业局郑义桐等人步步紧逼，要他不顾一切维护本地区利益。傅连山被推到了矛盾冲突的顶峰。他违心地服从了地委的意见，结果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土崩瓦解，成了制造事故的"罪犯"，被带

上了法庭。作品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傅连山这个为四化顽强奋斗的改革者形象，揭露了佳津地委这个封建特权与地方主义根深蒂固的“独立王国”的黑幕。作品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傅连山最后牺牲全局利益，造成全网崩溃，损伤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有人认为这种结局是人物性格和环境冲突的必然结果，起到了强化作品主题的作用。

小说《内当家》

短篇小说。作者王润滋。发表于《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一等奖。

【内容梗概】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具有强烈主人翁意识的新时代农村妇女形象。“内当家”李秋兰住的是土改时分得的东家刘金贵的房产，眼下正在院中打井。侨居日本的刘金贵恰在这时回乡探家，想“看看老住屋”。“内当家”的丈夫，“一辈子心眼窄巴，经不住个大事”的锁成老汉本来就在疑惑：现在地富成分变了，自己住的这青砖黑瓦高门楼的果实房还保不保险？一听说刘金贵回来了，顿时手足无措。县府办公室孙主任为了让刘先生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幸福生活，运来了大批新式家具，并责令“内当家”填井迎客。性格泼辣，心性刚强的“内当家”不卑不亢，“刘金贵要回来，回来就回来呗，能不让进来？”“可让俺低三下四，没那步天地！”李秋兰没有忘记当年刘金贵对自己这个使唤丫头的欺侮，没有忘记他的水烟袋在自己额头上留下的伤疤。但是，已经里里外外都作主的“内当家”深明大义，她坚信共产党的天下不会翻个个儿，理解党的新时期政策，也懂得刘金贵“故土难离”的心情。她用炮声轰走了孙主任和新家具，打井照常进行。李秋兰以主人的身份真诚待客，将刚刚打出的第一瓢井水端给了刘金贵。作品构思巧妙，在富于典型意义的戏剧冲突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内当家”李秋兰的高尚品格。语言质朴，富于乡土气息。人物对话和行动都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邓小平

前些时候我同胡耀邦同志说了，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

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象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

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我刚才提出的需要进行批评的作品、观点，只是一些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文章，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不一一列举了。《苦恋》和那个青年诗人的讲话，为什么还有那么一些人支持？这值得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深思。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的思想界比较清醒了一些，再加上对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措施，所以情况有了好转。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要保持警惕。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

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总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原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4—348 页）

历 史 档 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

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时只有五十多个赏党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领导下,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

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〇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

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〇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〇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和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销统一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

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相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笔记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

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〇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

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

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

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间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和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

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纪律和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点头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了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

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副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

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囚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

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

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事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务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3日　邓小平、赵紫阳分别会见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说，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是60年代以来最稳定的。1981年中国的经济方针是，要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我国进行四化建设的路线不会改变，对外开放政策不会改变，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也不会改变。

2月11日　中共中央批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说，大寨和昔阳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错误是：①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②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③不断地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④不断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中央批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2月12日　邓小平在分别会见日本政府代表团和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时说，中国经济调整是为前进打下牢固基础。并指出：只要大家联合起来，就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

2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对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加以严肃处理。

2月24日～3月4日　中纪委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强调要把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放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来。

2月25日～3月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收支的报告。报告指出：在1981年进一步调整比例关系的过程中，首先争取做到基本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停止财政性货币发行，把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下来；进一步压缩基建投资：压缩国防费和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认真抓好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力节约能源。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情况报告；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情况报告。

3月9日　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中央认为邓子恢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3月31日　前国民党第五补给区中将司令耿幼麟和夫人徐梅如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

4月20日　中共中央批转《彭真同志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是我国地方政权组织的一项重要改革。

4月29日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联合召开首都劳模座谈会。

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5月11日，举行追悼会。朱蕴山是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他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老朋友。

5月7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著名爱国人士杜聿明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25日在北京召开追悼会。邓小平、邓颖超等出席追悼会。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和抗日战争，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淮海战役后，经中国共产党教育和帮助，走上爱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道路。

5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18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5月15日　哥伦比亚国会通过决议，授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金质特级十字勋章。

5月22日　拉萨各界代表1600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30周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会上讲话。

5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宋庆龄是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早年在美国读书、获学士学位。1913年回到祖国后，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1915年10月25日，她与孙中山结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始终是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最坚决的捍卫者和继承者，作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在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并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和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及中国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她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1949年9月，她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先后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6月5日～10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等。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彭真辞去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和任命习仲勋兼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决定。

6月27日～29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和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党的正确路线，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对建国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功与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

论的观点作了科学的评价。《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后党在农村中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7月1日　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胡耀邦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月2日～4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说: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7月6日　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的工作问题。7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指出: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要把新疆工作做好,汉族干部离不开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也离不开汉族干部。

7月1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就对黄克功处以极刑问题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注:黄克功少年时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岗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任抗大第六队长,因对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逼婚未遂,将刘茜开枪杀死。)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之后,收到了达赖喇嘛的贺电。

7月17日　邓小平就思想战线的问题,对中央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当前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就有人说是打棍子。目前出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主义。

7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天主教爱国常委会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强烈抗议罗马教廷无视中国教会主权,非法任命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国神长教友书》。

8月8日　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回到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空军批准黄植诚入伍。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黄植诚,赞扬他的爱国行动,勉励他为祖国作出贡献。

8月26日　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时说:我们要力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采取独特的模式,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9月3日～10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将第八机械工业部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合并的决议》。

9月8日　叶剑英会见从香港回来探亲的原国民党中将贾桂藩。

9月9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竹入义胜时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人民的生活只能逐步改善。在谈到农业生产责任制时他说:实行生产责任制,不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

9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要求:对居住大陆台胞一视同仁;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把落实台胞政策的工作列为1981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9月30日　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①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②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协议;③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④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经济、文化关系不变;⑤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⑥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⑦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⑧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到祖国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⑨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10月4日　胡耀邦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加团时说,我国当前有两项政治任务:一条是大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一条是大团结,加强民族团结。

10月9日　北京举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彭真、邓颖超出席。胡耀邦讲话时以共产党负责人身份邀请蒋经国等先生回大陆和故乡看看。26日,叶剑英会见了从美国专程来京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和夫人。

11月9日　新华社报道: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长马璧教授由台湾回大陆定居。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

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因台属关系被错误处理的要平反；对解放初由政府代管去台人员的城市私人房产，要落实政策。

11 月 30 日～12 月 13 日　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赵紫阳作的《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自 198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自 198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要求每人每年植树 3—5 棵；补选朱学范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会员长。

12 月 15 日　原老挝卫生局长、老挝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秘书长辛沙堤博士，不满越南黎笋集团对老挝的控制，在前往阿富汗出席会议途中毅然脱离老挝现政府，到达我国。根据本人要求，我国已同意他在中国居留。

12 月 15 日～23 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说：1982 年的工作，第一，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的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二，在经济上，要努力争取一个扎扎实实的速度；第三，要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我们的党风有一个决定性的好转。

12 月 16 日　十一届中央委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73 岁。张鼎丞是福建永定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与邓子恢等领导闽西龙岩、永定、上杭等农民暴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解放后历任福建省委书记、华东局第四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4 年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根据他生前遗愿和他亲属的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会。

1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指出：过去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在宣传和推广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责任不在大庆。必须肯定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求继续发扬大庆艰苦创业精神，推进四化建设。

12 月 21 日～1982 年 1 月 6 日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快落实各方面的统战政策，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三大任务作出积极的贡献。

12 月 22 日～29 日　全国台湾同胞首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林丽韫当选为会长，一致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

经　济

1 月 3 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对 10282 户农村社员家庭的调查表明：1979 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160.2 元，比上年增加 26.6 元，提高 19.9%。在纯收入中，来自集体的收入为 102 元，比上年增加 13 元；来自家庭副业收入为 44 元，比上年增加 8.9 元；其它收入由 9.6 元增加到 14.2 元。另外，户平均每人纯收入在 80 元以下的有 10%，户平均每人纯收入不到 60 元的有 3.7%

1 月 4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水利史上最雄伟的截流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今天开始大江龙口截流。截流量是每秒种 4720 米。

1 月 7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第一条有"防雪走廊"的公路，最近在天山深处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北起独山子，中经哈希勒根冰大板，向南延伸到天山腹部乔尔马草原，全长 135 公里。

1 月 16 日　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 1981 年起，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国库券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利率定为年息 4 厘，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利。1981 年共发国库券 48.7 亿元，主要用于弥补 1980 年财政赤字。

同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正确实行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所属企业，全年发放奖金总额控制在本企业职工 1 至 2 个月标准工资总额之内。

1 月 26 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指出：要维护国家税收制度，不许随便改变税种、税率和减免税收；努力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保证企业利润及时足额上缴国家；压缩超储积压物资，节约流动资金；节减事业和行政经费。

1 月 29 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指出，要保证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坚持财政信贷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严禁把银行信贷资金移作财政性支出。

1 月 30 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下达 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意见的通知》。要求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0 年预计增长 3.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5.6%，工业总产值增长 3%；财政收支各为 976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300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220 亿元，比 1980 年预计增长 8.3%。

同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从 4 月 1 日起执行。取消现行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 2～3 年的规定。

1月31日　新华社报道：1980年我国用于住宅、文教、卫生、生活福利设施等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170多亿元。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33%，是1955年以来投资比重最大的一年。

2月1日　我国第一个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军工企事业单位联合产销民用产品股份公司——江苏省新时代工业公司在南京成立。

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云南放宽农村政策，贫困地区恢复生机。1000万人口地区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1980年我国有60个大中型项目和183个单项工程建成投产，增加了能源、轻纺、交通、建材等薄弱环节的生产能力。

2月23日　国家海洋局召开的海洋工作会议提出：近期要全面地对中国海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有步骤地对邻近大洋进行调查。

2月2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环境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3月2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规定：全国和地方的基本建设规模，都要进行严格控制；各种渠道安排的基建资金，必须有利国民经济调整原则，明确使用方向；银行发放基建贷款，必须切实做好信贷平衡，量力而行；严格基建项目的审批制度和责任制度，严肃基建纪律。

同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人事局制订的《会计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职称分：高级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和会计员。

3月4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关于机械工业调整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机械工业要调整服务方向，改变生产结构，改造落后技术和改革管理体制。

3月5日　全国农垦局长会议提出：国营农场要搞生产责任制。

3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木材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加紧林区的恢复和建设；大力造林育林、发展林业科学技术和教育。

3月10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试行以税代利的几项规定》。指出：试点企业原向国家交纳利润改为征收资源税、收入调节税、所得税、固定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

3月11日　新华社报道：粮食部举行全国议价粮油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开展粮油议价议销，调节社会需求。但没有完成征购超购任务的，集体的粮油不准上集市，不许卖议价，也不许把集体粮油分给个人出售。

3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农垦系统1980年的粮食总产量、上交商品粮、工农业总产值和经营利润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共盈利4亿多元。

3月20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处理农贷积欠加强农贷管理的报告》。规定：处理农贷积欠不采取豁免的办法，要加强农贷资金管理，更好地发挥信贷支援农业的作用。

同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食糖收购调拨工作严格控制销售的通知》。指出：食糖仍坚持"统一收购、集中管理"原则；地方一律不准在计划外出售食糖；各地区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调拨计划。

3月27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意见》提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统一经营，联产到劳是适应中间社队采用的一种责任制形式；在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适当扩大自留地的数量。

3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批语提出：发展农业要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持；开展多种经营，还要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切实解决产供销和技术指导等方面的问题。

4月1日　经国家经委批准，全国铁路自今日起对货运试行经济制约办法。

4月3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地方煤炭出口问题的请示》。规定：今后各省、市、自治区凡需出口地方煤炭的，都应先搞好本地区内部的综合平衡，然后报国家计委、能源委、进出口委共同审批，然后再纳入国家统一出口计划。

4月3日～16日　全国基本建设会议提出：没有列入当年计划的大、中型、小型基建项目，从4月15日停止拨款，立即停下来进行清理。

4月6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机关工作人员病假在2个月内，发给原工资；超过2个月的按规定标准发病假工资。

4月15日～25日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4月1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要求，农村建房用地，必须统一规划，对于任意侵占耕地建房者，要严肃处理。

5月4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提出：凡不与现有大厂争原料，产品有销路，经营有盈利的企业，均不应强行关停；要因

地制宜，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基础，发展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小城镇建设、为大工业、为外贸出口服务的生产性行业和服务性行业；要组织社队企业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联合；要整顿经营管理，加强劳动保护。

5月6日　国家劳动总局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解决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所需场地问题的通知》。指出：对于新增设经济网点和厂房，所需场地要由当地劳动、房产管理、城市规划、公安和工商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统一规划，作出安排。

5月8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规定：允许集体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正当借贷存在；社队集体向社员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当地信用社放款的最高利率；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利息偏高的，不能视为高利贷者。

5月13日　中共中央转发《赵紫阳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提出：提高经济效益，一要调整，二要改革；必须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体制合理化，企业组织合理化。

5月16日　《人民日报》题为《在调整中办好社队企业》的社论，公布：1980年底，全国有社队企业143万个，从业人员3050万人，总收入614亿元，比1979年增长22%，创造的收入占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总收入的34%。社队企业的利润，用于支农的资金22.6亿元，向国家交纳税金25.6亿元。

5月2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棉粮、糖粮挂钩奖售粮几个问题》的通知。

5月27日　国务院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决定：两省的计划实行条块结合、以省为主的体制；财政上实行大包干办法：两省银行起地方银行的作用；对外经济贸易有较大的自主权；以1980年实际生产、调出为基数，实行生产增长部分省留七成、上调三成的办法。

6月2日　国务院批转粮食部《关于当前食油问题的一些意见》。指出：1980年油料折油产量达到27亿公斤，比1977年增产11亿公斤，增长2/3，结束了吃进口油的历史；今后油脂工作要支持生产，积极收购，扩大销路，组织出口。

6月3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关于当前对外经济贸易为国民经济调整服务的报告》。提出：外贸改革要坚持统一对外，进一步推动工(农)贸结合，抓紧按行业建立出口联营，出口协会，适当扩大外贸企业自主权。

6月3日～11日　全国劳动服务公司工作座谈会提出：今后解决城镇劳动就业的主要门路，必须是积极扶植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劳分配和民主管理等特点的集体经济和经营灵活、方便群众的个体经济：大力发展有关吃、穿、住、行、用以及教育、保健和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行业。

6月15日　据国家统计局对27个省、市、自治区的15914农户的调查：1980年家庭副业总收入达770万元，比上一年增长37.3%，平均每人纯收入为62.6元，比上一年增长42.2%。家庭副业发展较快的原因在于扩大了自留地；开展了多种经营；允许社员安排必要的劳力从事家庭副业。

同日　新华社报道：葛洲坝船闸首次试航成功。东方红51号、向阳红1号客货轮顺利从南津关到达宜昌港，船闸主要设备运转正常。

6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朝着“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向转变。据统计，1980年国内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已由1978年的460亿元增加到67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31.5%上升到41.6%，平均每个劳动力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价值由148元增加到215元左右。

6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省邛崃县前进公社17大队，积极调整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2年时间，农副业总产值增加了4倍多，由长期贫困落后，转变到总产值每人平均1590多元。

同日　国家工商总局、商业部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对城镇个体工商业户货源供应等问题的通知》。指出：个体工商业户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个体商业户要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一视同仁。

6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要求各地相应地建立健全水利管理责任制，以保证农田水利工程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6月26日　新华社报道：1980年我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324公斤。同1949年相比，在人口增加81%的情况下，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增加了115公斤。

6月29日　农业部对1980年度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情况的调查表明，全国有12个省、市、自治区的社员集体分配每人平均达到100元以上。有343个县人均分配150元以上，比上年增加了120个县。人均分配在300元以上的大队达到5569个，比上年增加了2.4倍，其中人均分配400～1000元的大队有1700多个，1000元以上的有27个。

7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书记处要求建委和农委配合，搞好我国的国土整治。建委的任务除管基建项目外，要管土地利用、土地开发、综合开发、地区开发、整治环境、大河流开发；要搞立法、搞规划。

7月7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

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采取消极态度，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都是错误的。

7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省对解决林业问题提出措施：解决山区群众的口粮；从地方财政拨款，扶植发展林业生产；制止毁林之风。

7月11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提出：稳定山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是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森林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

7月11日～24日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旅游业要积极发展、量力而行、稳步前进。

7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并发出通知。提出：要改革企业领导制度；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由厂长（经理）负责统一指挥。

7月1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

7月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汇报。8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确定：内蒙古今后的目标，第一步，在五年内，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总产值恢复到内蒙古历史上最好水平；第二步，在10年内，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总产值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7月21日 我国黄土高原上最长的一条公路，横贯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从陕西宜川到兰州市的宜兰公路正式通车。公路全长949公里。

7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第一条横跨长江的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由湖北省电力工程公司架通。

8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朱德关于发展手工业问题的三次讲话：《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发挥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

8月4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委召开企业整顿座谈会。要求：抓紧整顿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推行全面经济核算、经济管理；加强民主管理；加强思想工作；整顿财经纪律。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

8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总局等单位规定的《农副产品议购议销价格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在各地试行。

9月1日 我国自己设计并施工的第一座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斜拉桥——红水河大桥建成通车。全桥总长398米，是世界上已经建成的同类桥梁中的第4座。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决定增拨100亿斤粮食发展食品工业，安排市场急需的食品和城市饮食行业用粮。

9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最大的石油化纤联合企业——辽阳石油化纤工业总公司建成并投入全面试验生产。

9月15日 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正式交付北京市管理和运营。地铁第一期工程从北京站到西郊苹果园站，全长23.6公里，从1965年7月动工，1969年10月基本建成开始试运行。

9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完成了100万平方公里近海石油地质调查，发现6个大型含油气盆地，海上油气资源前景广阔。

9月：中国人民银行作出《关于城镇集体、个体社会服务行业贷款暂行规定》。规定：贷款限于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持有正式营业执照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修理等行业集体单位和个体营业户；贷款户要有一定资金，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经营正当，有偿还能力，有经济担保。

10月1日～2日 赵紫阳视察潘家口水库工地，看望在这里担负引滦重点工程的基建工程兵指战员。

10月5日～21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调整农村政策、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会议强调，坚持农业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

10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1981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从1981年10月份起，给中、小学教职工、医疗卫生单位部分职工、体委系统优秀运动员、专职教练员及部分从事体育事业的人员调整工资，并增加中、小学民办教师的补助费。

同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当前国土整治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国土资源。

同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部门《关于工矿企业要进一步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指出：在远离城市的林区、矿区、油田和化工、交通运输、军工、地质和储备等部门的企事业单位，要自己动手办农副业生产；要注意搞好工农关系，不与民争地，照顾农民利益。

10月1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木材变相议价和随便加价的通知》。规定：林业部门为社、队或社员代销木材的价格，不得超过收购价格的30%；有的地方规定国营林场抚育间伐材每立方米加价130元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执行；有的省定价高出国家控制幅度30%的，应降下来。

10月1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涤棉布和烟酒价格的通知》。决定：从11月中旬起，降低涤棉布的价格；提高烟酒的价格。

10月15日～17日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赴华盛顿参加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筑和城市规划、地表水水文和核安全技术的三个附加合作议定书。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对个体户允许请两个以内的帮手；建立健全劳动服务公司；开展对城镇待业青年就业的培训；对农村多余劳动力，就地安置，不使其涌入城镇。

10月26日～29日　我国第一个行业管理组织——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在北戴河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章程》。

10月27日～11月8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确定：1982年要进一步搞好调整、整顿、改革、提高工作；继续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调整企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的一定发展速度。

10月29日　国务院转发国家经委、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在企业内部采取指标分解，计分计奖，计件工资，超产奖，定包奖，浮动工资；对第二轻工业集体企业、由统负盈亏改为自负盈亏；增长部分按一定比例减征所得税；税后利润大部分留给企业。

11月6日　林业部提出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调减采伐量，保护好现有森林；改变采伐方式，扩大防护林比重；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建立健全国家保护和发展林业基金制度。

11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严格掌握退休、退职的条件；加强对退休、退职工人的聘用管理的受聘待遇的管理，控制招收退休、退职工人的子女。

11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加快工业品下乡；商业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做到经营方向正，责、权、利结合、业务质量高、经济效果好。

1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简称林业"三定"）工作，已在全国26个省区1446个县展开。

12月2日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决定海南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生产建设兵团受自治区和农垦部双重领导。

12月6日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胜利合拢。这是我国自己设计施工的一座预应力斜拉式大桥。全长2022.8米，最大跨径达220米。

12月8日　邓小平会见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和副主席李伯忠，双方就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交谈。

12月9日　赵紫阳会见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赞赏他把大量资金用于国内现代化建设。

12月1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能源委《关于地方国营煤矿若干经济政策问题的请示》。规定：对地方配煤实行亏损补贴；减免税收；增加基建投资和技术改造资金；提高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这些政策对公社和生产队集体所有制的煤矿也可参照实行。

同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是：①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②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③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④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⑤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⑥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⑦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⑧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⑨大力组织科研攻关。⑩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12月21日　我国首次自行设计、施工的特大型矿井——山东兴隆庄煤矿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12月2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限制发展小炼油厂和取缔小土炼油炉的通令》。规定：取缔小土炼油炉；实行油田落地油的统一管理，提高原油商品率，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和处理落地油；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准再搞土法炼油，不准加工和制造土炼油设备；任何地区和单位，都不准再批准建设小炼油厂，不准再扩大现有小炼油厂的规模；目前正在建设的一次加工能力的小炼油厂，应立即停止建设。

12月30日　国务院发出《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

12月3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机械委《关于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报告》。指出：公司是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并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独立从事生产经营业务和核算的经济实体。

军　事

2月19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进一步开展学雷锋，学英模活动，掀起一个人人讲精神文明，个个争当雷锋式革命军人的热潮。

3月2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军人誓词》，要求全军从今年起新兵入伍后要举行入伍宣誓。

3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调整民兵组织问题的报告》。决定：缩小组建民兵的范围；压缩参加民兵的年龄；简化民兵的组织层次；严格民兵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把民兵制度与预备役制度结合起来。

3月27日　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对"三支两军"问题，一定要讲两句话。①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是起了积极作用的。②"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性很大，带来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坏很大。

4月26日～28日　解放军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要求青年做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三讲"（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二不怕"（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9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了进行军事演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华国锋一同参加检阅。这次演习检阅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果，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分别授予广西边防部队某部二营、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一营以"法卡山英雄营"和"扣林山战斗英雄营"荣誉称号。

11月5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雷锋式干部"李俊甲学习，做建设精神文明的光荣标兵。

11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农委和民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凡是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地方，对解放军战士（包括孤儿、单身入伍的战士）、应同社员一样，划给一份承包土地（现役干部不划），以保障他们退伍回乡后的生活。

11月28日　河南省政府在禹县召开大会，授予子弟兵母亲赵趁妮"爱国拥军模范"的光荣称号。

外　交

1月10日～14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钟玉访问我国。

1月18日　我外交部就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驳斥荷兰首相范阿赫特的遁辞。19日，我外交部照会荷驻华使馆，要求把中荷关系降为代办处级。

1月26日～2月2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缅甸和泰国。

2月9日～16日　应胡耀邦邀请，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由弗郎索瓦·密特朗率领访问我国。中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正式建立友好关系。

3月22日～26日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访问我国。

4月2日～9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利）主席爱·弗·希尔访问我国。

4月7日～14日　瑞典首相费尔丁访问我国。

4月25日～29日　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访问我国。

4月27日～5月2日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访问我国。

5月5日～16日　我国外交部两次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对我边境地区的军事挑衅和入侵，严正要求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一切侵犯和各种武装挑衅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越南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5月12日～17日　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访问我国。

5月25日～6月5日　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访问我国。

6月1日～8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三国，先后同哈克总统、塔帕首相、萨塔尔代总统会谈。2日，在参观白沙瓦附近的阿富汗难民营时，赵紫阳重申：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抗击苏联侵略军，并代表中国政府将一张50万元人民币支票捐赠巴基斯坦救济阿富汗难民总统基金会。

6月10日～15日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问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欢迎会上致词，提出中国政府主张解决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必须遵循三条原则：①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出侵略军队。②两国人民在排除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其命运。③无条件地恢复和尊重两国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

6月14日～17日　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我国。邓小平、赵紫阳分别会见黑格。黑格向赵紫阳转交了里根总统的信件。

7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郑重声明，1981年6月6日苏联和阿富汗之间从佐尔库里湖西岸到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地（中国称克克拉去考勒峰）的边界走向条约，涉及中苏帕米尔争议地区。苏联单方面同第三国签订涉及中苏帕米尔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

8月6日～13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同三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东南亚形势、柬埔寨问题及共同关心的国际

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20日～25日　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访问我国。

8月28日～29日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访问我国。

9月14日～23日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访问我国,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位来中国作国事访问的瑞典国王。

9月25日～29日　多哥人民联盟主席和创始人、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访问我国。27日,两国政府文化协定在北京签订。

10月7日～10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西尔。阿拉法特访问我国。

10月19日～29日　丹麦王国首相安高·约恩森访问我国。22日,中丹两国政府签署1982年至1983年科学、教育和文化合作计划。

10月24日～27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墨西哥。

10月31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致电维尔·伯德总理,祝贺安提瓜和巴布达独立,并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安提瓜和巴布达。

12月20日～24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文化教育体育卫生

1月1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开始在全国发行。上卷收集了周恩来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

1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改建,已获得成功,各项技术参数达到设计指标,预计可运行15年。这是依靠我国科技人员和工人在原子能科技方面取得的一项新的重大成就。

1月2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必须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允许发表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

2月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高容量原子反应堆在西南建成。

2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建立比较正规的职工教育制度。

2月21日～3月4日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主任会[illegible]要求加强运动队的思想[illegible]建设,提高训练水平;体育工作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月28日　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以"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

3月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同意中国科学院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以及实行财政包干,自行调剂、节约归己、收入留用、财政监督的经费管理办法。另据报道,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从1979年到1980年共取得科研成果近4000项,其中重大项目有400个左右,不少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月27日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31日,党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4月11日,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沈雁冰是浙江桐乡人。他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之一,他的大量作品成为我国文学艺苑中的宝贵财富。他生前留下遗言,将他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4月20日,作协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由巴金任主任委员。

4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和任务,要体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和十年规划设想中;科学技术现行体制要逐步加以改革。

4月20日　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巴金为代理主席。

同日　在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我男女乒乓球队双获团体冠军及全部单项比赛的冠亚军。5月7日,国家体委、团中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集会,祝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战绩。

4月27日　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到一次持续2小时的特大太阳爆炸。

5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科技人员袁隆平等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杂交水稻,这是我国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大发明。

5月8日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外友协名誉会长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5月11日～20日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并由主席团推选了执行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卢嘉锡当选院长。

6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准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7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近批准任命4位中年教师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任期4年。大学校长实行任期制，这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是第一次。

7月26日～8月2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我国首批博士授予单位的专业点805个，可以指导博士的导师1143人；硕士授予单位专业点2957个。赵紫阳在闭幕会上说，这是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

8月1日～8日 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要改变软弱无力涣散状态，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和倾向进行斗争，引导青年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8月3日～8日 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议讨论了邓小平7月17日谈话。胡耀邦在会上讲话说：全党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

8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要求：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使之走上更加丰富、健康的轨道。

8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研究制成功“喉癌切除硅橡胶喉成型”，经鉴定认为是100多年来的重大突破，是一项有国际水平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9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决定由有关单位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9月20日 我首次成功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9月22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论鲁迅》。

9月25日 首都隆重举行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由邓颖超主持。胡耀邦讲话，高度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

10月13日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恢复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10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科学家彭加木于1981年6月17日考察罗布泊时以身殉职。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光荣称号。19日，在上海举行追悼会。同日，中国科学发出通知，号召向彭加木学习。

10月20日 《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我国评委会召开发奖大会，向获得国际评选第一名的我国新疆伊宁八中14岁女学生赵爽颁发国际金质奖章和获奖证书。

11月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著名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龚祖同教授最近荣获美国福托——苏尼克斯1981年度成就奖，并获得金质奖章。

11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首次人工合成人胰岛素原C钛，并建立了放射免疫分析技术，填补了国内生物化学和医学科研的一项空白。

11月16日 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七战七捷，首次荣获世界冠军。这是我国在篮、排、足三大球比赛中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国家体委作出决定，授予中国女排“勇攀高峰运动队”称号。

11月23日～27日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给全国青年的倡议书。

11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从今年起将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社会生活

1月21日 新华社报道：1980年城镇建成住宅780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24.8%。

1月24日 四川道孚县发生6.9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致电灾区慰问。

5月3日 全国妇联等单位联合发出《全社会都来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好事》的倡议。

6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要求在争取全国社会治安情况的根本好转中，首先要把城市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搞好。

7月12日～19日 四川省大部地区暴雨成灾。18日，党中央、、国务院致电慰问。19日，洪峰顺利通过新建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8月22日至27日，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受灾人民。

7月29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请示解决救灾款的报告》和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322期《卢龙县有些基层干部发“唐山地震财”》反映：一些地方救灾中浪费惊人和一些基层干部有贪污行为。因此胡耀邦写信给民政部、财政部的领导人，要他们注意此事，总结经验，切勿把好事办成坏事。

9月18日 湖北孝感应城农民杨小运，当年自愿向国家交售2万斤粮食。国庆前夕，应城县政府召开奖售兑现大会，给杨小运奖售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12月13日 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2年

导　言

1982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经济、政治和其它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在全国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特别是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在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有了初步成效。宽大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原国民党军特分子，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打击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起了保证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全面贯彻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方针，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通过初步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军队的编组、指挥向合成军方向迈进了一步。部队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院校建设、后勤保障和军事学术研究有了加强，干部的指挥能力和专业水平有了领域上的突破。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军政、军民关系日益密切。国防科研和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新型战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国防实力的不断加强，是我国各族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经过这几年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结合着积累与消费和农轻重这两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曾经出现的较大财政赤字问题，实现财政支出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

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涨。国务院执行一系列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村政策，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一些地区的征购业务，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与此同时，调整了作物布局和农业结构，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了多种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重大的发展，克服了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从而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统一了起来，并且使集体所有制的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得到解决。

消费品工业扭转了长期落后的局面，重工业逐步端正服务方向，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日用工业品绝大多数供应充裕。过去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现在已大部分敞开供应。人民群众购买消费品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在世界经济萧条、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持续上升和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我国在城镇发展多种经济形态、扩大工商企业的自主权、改进城乡流通体制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八二年止，绝大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一批国营小商业、饮食服务业和小型企业开始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者由职工集体或个人承包经营。许多原来由国家统一

分配的工业生产资料，现在实行了方便用户的灵活多样的供应方法。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办法和外贸体制，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

一九八二年我国普通高校增至715所，在校学生增至115万4千人。单一化的中等教育结构初步有所改变，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总计2.7亿人。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文化艺术战线的思想活跃，创作繁荣，作品质量逐渐提高。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发展。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增强人民体质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了同各国的关系，与我国建立外交的国家增至129个，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和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我们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
- ●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
- ●五人劫机案
- ●日本小学教科书问题
- ●第三次人口普查
- ●廖承志致信蒋经国

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

背景介绍

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过程中，一些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出现了严重的内外勾结大量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窃取国家资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党中央一面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内、对外的正确经济政策，一面领导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一九八一年初，中央发出了《关于坚决打击走私活动的指示》。二月底，国务院在福州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粤、闽、浙）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七月，国务院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检查和进一步部署了工作。八月三日，党中央、国务院转发这次会议纪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这场经济领域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统一认识，严肃党纪，整顿内部，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九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对外经济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违纪、犯法的重大案件进行查处。

一九八二年一月，党中央常委鉴于其他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甚至有的负责干部，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走私贩私、贪污受贿、侵吞大量国家资财等违法行为，在一个批语中严肃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有的特大案件的处理结果还要登报。"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批示后，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发出《中共中央紧急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负责同志以党性保证贯彻执行中央常委的批示，军队系统要保证全军坚决带头贯彻执行。同时派中央、国务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军队负责干部去粤、闽、浙、滇四省传达中央常委批示，采取措施。中纪委派出大批干部协同有关部门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全国范围的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迅速开展。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党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研究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斗争，并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胡乔木在会上指出，对走私贩私的斗争，是当前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的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赵紫阳指出，要清醒地充分地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性、长期性，并认真对待。胡耀邦要求全党干部："必须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不移地对党内特别是某些党员负责干部的腐败现象，作严肃认真、顽强到底的斗争"；"必须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月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犯罪分子凡在一个月以内投案自首的，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四月十三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由于党中央对进行这场斗争认识明确、态度坚决、政策正确，部署得当，斗争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仅半年中，全国揭露出经济犯罪案件十万多起，投案自首的将近四万起，追缴赃款、赃物达一亿二千多万元。这场斗争也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次实际的反腐蚀斗争的教育，对端正党风、整顿党纪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材料：

- ·程占彪腐化变质被清除出党
- ·杨义邦案的处分
- ·北环公司诈骗案

材料一　程占彪腐化变质被清除出党

云南省参事室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程占彪，利欲熏

心，追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采取卑劣手段欺骗组织，纵容女儿耿红和香港资本家张某姘居、做张的姨太太。程占彪已腐化变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和条件。最近，经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将他开除出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此通报全党。

程占彪是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的老干部，曾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长期不重视思想改造，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千方百计要把女儿耿红送到香港去。一九八〇年二月，他由四川调云南工作后，以身边无子女，要求把耿红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调来云南。当时二十七岁的共青团员耿红，在他的指使下，便来到昆明，不久结识了香港资本家张某，接着程占彪即为她去香港进行活动。他先借口有个亲戚拟在香港开设公司，"要耿红去助理店务"。云南省公安厅了解到耿红在上海表现很不好，其夫坚决不同意她去香港，就没有批准她的去港要求。程占彪居然让他的妻子耿时光出面活动，并让耿红去上海催逼丈夫同意她去香港。这些活动未能奏效，程占彪竟直接求助于香港资本家张某，让他陪同耿红第二次飞赴上海。耿红持程占彪的亲笔信再次逼迫丈夫离婚，同时公然和张某一起住在上海大厦。由于手续不全，当地有关部门对离婚提出异议，程占彪便用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名义，编造谎言，亲笔写出假证明，胡说"耿红因工作需要去香港"，"与丈夫××一致同意自愿离婚"，并盖了参事室的公章，终于使耿红达到了离婚的目的。

香港资本家张某早已结婚，除有妻室儿女外，还有一名姘妇，这些情况程占彪是清楚的。耿红与张某在上海、昆明的种种行径，曾引起旅馆和有关部门强烈不满，几次告诫程占彪要对耿红严加管教，程对此置若罔闻，致使耿红更加放肆，竟在大庭广众之中扬言：她和张某的结合是"光明正大的"。程占彪也俨然以"老丈人"的身份，为张接洽商务活动，为他们的非法关系制造合法气氛。程占彪一家自从和张某建立不正当的关系以来，先后接受了他送的彩色电视机、收录机、衣料、港币等财物。

一九八一年三月，耿红和张某以"正式夫妻关系"的身份，到广州招摇撞编。在程占彪和一些人的协助下，耿红终于编取了去港手续。耿红去港前夕，程占彪还亲笔为她写了退职申请，办理了退职手续。

对程占彪的腐化变质问题，党内外群众早有意见，强烈要求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严肃处理。最早起来揭发程占彪的是北京工业学院学生、共产党员邬向东，他在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一名香港人士谈及程占彪和耿红的丑事，就写信给有关部门进行揭发。云南省参事室党支部在讨论程占彪的错误时，认为程的所作所为说明他已经蜕化变质，丧失了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为了纯洁党组织，必须把他清除出党。但是，也有人认为，程占彪是老红军、老干部，可以从轻处理，主张给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中央纪委过问了此事，认为程占彪已腐化变质，必须清除出党。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坚决清除腐化变质分子》为题，发出通报，通报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同一切经济犯罪活动和腐化[illegible]行为作坚决斗争，绝不能姑息养奸。"

材料二　杨义邦案的处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广大党员的意见，对化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原北京市燕山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杨义邦同志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进一步核实材料后做了处理，决定给杨义邦同志以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原任的各种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在此之前，中纪委曾于今年二月一日对杨义邦同志在外事活动中一再违犯外事纪律的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这次进一步处理时，决定将二月一日的原处分撤销。

中纪委的决定，还给在同一案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兼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总经理肖秧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以记过处分。

中纪委的处分决定指出：杨义邦同志是同香港某公司寻求贷款，搞补偿贸易的主要执行者。这家公司本是毫无经济实力的皮包商，可是它的负责人在同杨义邦同志开始接触时却冒充为拥有巨资的什么国际财团代表，并且空口许诺可以提供长期无息的、上百亿美元的巨额贷款，这是明显的欺骗。然而，杨义邦同志却既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不加分析地向上报告，在未弄清对方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同那个公司负责人签订了六亿美元的贷款备忘录。可是不久，那个公司的负责人就向杨义邦同志提出，没有燕山公司委托的名义，他在外面难以活动，这实际是他揭穿了自己的伪装、骗局。在这种情况下，杨义邦同志竟不顾后果，建议给那个公司的负责人以燕山公司顾问的名义，使那个香港商人得以用我国一个大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在国际上招摇撞骗，给我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杨义邦同志是政府的副部长，在到达香港以后，为出国考察和寻求贷款，却一再违犯国务院和外交部的规定，不通过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办理出国手续，而由那个香港商人替他办理去日本和比利时的签证，这种违反外事活动常规的行为，引起了外国驻华使馆的怀疑，并在国外造成了很坏影响。他在国外的主要活动，都不通过我有关的驻外代表机构和使馆，而是听从那个香港商人的安排，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给人家做了招摇撞编的招牌。他还违犯国家保密规定，委托那个香港商人递送我内部信件。他在

同那个香港商人的交往中,接受了为他定制的两套西装和其他衣物,又以代表团每人的零用费二十元交与那个香港商人为每人索要了收录两用机,这是变相受贿索贿的行为。他用不正常的方式私自为那个香港商人从烟台医院要走了一个初生女婴。所有这些都是党纪、政纪所不能容许的。

杨义邦和肖秧同志提出和指定把燕山公司的一批塑料原料(高压聚乙烯六千吨聚丙烯八千吨),由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出售给上述那个香港公司。在这批塑料原料出售之前,新的世界性石油危机已经显露,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化工产品的行情不断上涨。这种国际行情,我国在香港的贸易机构,已经具体通知了燕山公司驻港人员。我外贸部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香港签订的几笔合同中,高压聚乙烯售价每吨已达八百八十五到九百五十二美元,聚丙烯每吨八百美元。在价格正在上涨的情况下,本来是不宜于订长期出售合同的。然而,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在四月四日同香港那个公司的负责人签订成交确认书时,却将两个品种、七种规格的塑料原料的价格一律订为八百美元一吨,这种不顾商业常识又不顾有关单位通知的国际行情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由于国务院的干预,后来塑料原料的实际交货量减缩到九千五百吨,香港那个外商从中获利达七十五万美元之多。不仅如此,香港那个外商还一再以低于我华润公司和外贸公司的价格,将这批塑料原料在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地抛售,以扰乱我国进出口贸易。在香港,迫使华润公司不得不两次应客户的要求将原已售出的塑料原料价格调低,使国家少收外汇四十八万多美元。杨义邦同志对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应负一定的责任。

材料三　北环公司诈骗案

北京市最近查获"北环企业服务公司"投机诈骗近三百万元巨额货款一案。这个"公司"的"经理"钟家轮、"副经理"任庆生犯有诈骗罪和投机倒把罪,四月十三日已由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钟家轮原是交通部行政管理局基建办公室的工人,任庆生原是北京市电化教育录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九七九年两人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非法开设了一家汽车修理厂。这个修理厂停办后,一九八〇年六月,他们通过北京市朝阳区生产服务联社某副主任的私人关系,借用左家庄街道联社的公章和银行帐户,非法成立了一个"北环企业服务公司"。这个"公司"既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又无资金和物资保证,完全是一个投机诈骗、买空卖空的"公司"。

在"北环企业服务公司"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钟家轮、任庆生采取欺骗和行贿手法,先后与国家机关、部队、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了三十余份供货合同和协议书,骗得货款二百九十五万二千多元。在此期间,他们提供给对方的货物总值仅占预收货款的百分之十多一点,绝大多数合同,他们根本没有履行,却长期占用对方的资金进行投机诈骗活动。除因购货单位一再追索而不得已退还的货款外,至今尚有六十二万多元货款,既无货可供,又无款可退。钟家轮、任庆生的这种投机诈骗行为,给购货单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例如,去年九月,太原某单位希望"北环"帮助推销积压产品。钟家轮乘机提出要对方购买他们的进口电视机,作为交换条件。接着,他就以低价和其他骗术,引诱对方同他签订了购买五百台"三洋牌"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合同。之后,钟、任多次谎称货已备妥,骗得对方预付了四百台电视机的货款十五万四千元。等到对方派车前来提货时,钟家轮就以花言巧语拖延交货日期。两个月后,对方发现被骗,立即来京索款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控告。钟家轮等害怕他们的行骗行为暴露,又以空头支票骗取了北京某进出口分公司二百五一十台电视机的提货单来抵债。当这个分公司发现"北环"在银行无钱时,电视机已被提走。

钟家轮、任庆生利用骗取的巨额国家资金,非法套购国家统配物资,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他们仅倒卖汽车七辆,就获暴利七万二千七百多元,有的汽车卖价高出进价一倍以上。为了套购各种紧缺物资,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贿赂。他们用以行贿的现金和实物折价等,已查实的就达一万三千多元。他们大肆挥霍骗得的国家资金,仅"公司"存在的一年半时间里,各项费用开支就高达二十一万多元。钟、任两人以出差等名义私占的公款就达一万多元。

北京市有关部门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终于弄清了钟家轮、任庆生进行投机诈骗活动的事实。现在,这一案件正由司法部门依法审理中。

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

背景介绍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上海公报》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的《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之后,里根政府上台,并未遵循以前的几点承诺。

美国在台北和北京之间仍然扮演调停人作用的角色,仍然向台湾出售武器,八二年初几次向台湾出售武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向台湾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所谓防御物品,八二年又恰逢中美两国上海公报十周年,三月十五日中国外交部向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发出照会,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允许台湾设立甚至同台

湾互设带有官方性质的代表机构。其意就在警告美国。四月十四日，我国外交部就美国政府十三日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与军事有关的价值6000万美元的用于台湾的美制战斗机零配件，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五月七日，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正式访问我国。两国政府就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8.17"公报》是继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之后的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重要公报。不难看出，中美双方体现在公报中的各自坚持的原则和一定的妥协。中国明确表示，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因素，中国同意，美方承诺将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材料：

- "八·一七"联合公报正文
- 美少数右派议员攻击中美联合公报
- 美国一小股反华势力又活跃起来

材料一 "八·一七"联合公报正文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明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双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因而在赵紫阳总理与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及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与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于1981年10月会见时以及在此以后，双方进一步就此进行了讨论。

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1979年1月1日生效的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

四、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

五、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策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六、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七、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八、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

九、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两国政府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中方声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过商谈，已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在今天同时发表了联合公报。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关系到中国主权的问题。早在1978年中美两国谈判建交期间，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这个题当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方面提出双方在建交后继续进行商谈。事情很明显，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严重损害两国之间的关系。

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和排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赵紫阳总理于1981年10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会议期间同里根总统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了会谈。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也随后在华盛顿同黑格国务卿继续进行了会谈。从1981年12月起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进入具体会谈。其间，美国副总统布什受里根总统的委托，于1982年5月访问我国，同我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商谈。双方今天发

表的联合公报是中美双方十个月来反复谈判的结果，它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规定了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

二、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双方并强调声明，这些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这就是说，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上，必须以这些原则为依据。无须说明，只有严格遵循这些原则，处理两国间存在的或新出现的问题，两国关系才有可能健康地发展。

三、根据上述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美国售台武器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由于考虑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分步骤予以解决。美国方面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两国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最后解决，其含义当然是指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也只有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排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四、在公报中中国政府明确重申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立场。美国方面也表示了，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中国方面在公报中提及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曲解或外来干涉。

五、需要指出，本公报是以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的，与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毫无关系。《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的。任何试图把本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

六、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的这个协议，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公报的有关规定能得到认真履行，以早日彻底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材料二　美少数右派议员攻击中美联合公报

美国一些右派议员对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中美联合公报大肆攻击，企图否定这一协议，破坏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据报道，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把美中联合公报说成是“一项糟糕的协议”。他说，公报规定美国今后向台湾出售武器要受“数量和质量”上的限制，从本质上说是违反《与台湾关系法》的。

美国少数保守派参议员在 17 日为听取美中联合公报介绍而举行的一次参议院外委会会议上也发泄对公报的不满。

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格伦在会上埋怨里根总统“让步”太多，使他们“处境倒霉”，“无法忍受”。格伦本人就是那个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的起草人之一。他认为美中联合公报达成的协议中所宣布的种种限制是“违背《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和宗旨的”。他埋怨说，当初他们提出这个法案(指《与台湾关系法》)就是为了抵抗中国要限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压力，而今天的公报把“这个保证丢掉了”。他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节目中说，“我们显然向中国屈服了”。他说，联合公报的签订意味着美国最终放弃它作出的“照顾台湾防御需要”的承诺。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说，公报的发表，在台湾看来只不过是他们的又一次失败。他仍然坚持“两个中国”的观点。说什么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要“由第三国来支配”，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19 日，美国几个不知名的议员在国会山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不到 20 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反对里根政府同中国发表的联合公报。

他们对美国承诺对台湾提供武器要逐步减少这一点，特别恼火。一个名叫约翰·伊斯特的参议员在会上说，“美中联合公报不幸地削弱了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制造了一种继续孤立台湾的政治气氛。这是一个大悲剧。”他还说，“我们保留着以后可能不得不通过法庭或者通过国会来对付这件事情的一切选择办法。”这几个议员说来说去，无非是死抱着那个《与台湾关系法》不放，力图按照这个由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以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 的美国国内法，来处理美中两国的关系。他们连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都不懂，居然也站出来对中美联合公报乱加指责。

材料三　美国一小股反华势力又活跃起来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一个月来，美国各界不少有见识的人士都表示赞许和支持。他们对中美关系危机由此得到缓和感到高兴，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比几个月前显得乐观。但是，有那么一股右翼顽固势力，从联合公报发表之日起便不时发议论、写文章，加紧反华，并一再向里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人数不多，但态度顽固，气焰嚣张。9 月 16 日晚上，一个受某些国会议员支持的“美国保守主义联盟”在参议院办公楼里公然举行所谓支持“中华民国”的“讲座”。第二天上午，参议院一个叫做“分权”的小组委员会就中美公报举行听证会。在这两个场合出头露面的大多是近几个月来一再出面反华的人物。其中有参议院的几个右派议员，也有以学者自诩的前中央情报局驻台

外国旅客安全地走下飞机时

夺政治权利终身。

湾的头目克莱因。他们在发言中罗织"罪状",攻击中美联合公报,竭力反对联合公报中关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声明,重弹"两个中国"的滥调,妄图使中美关系开倒车。但是在两天的会上,他们更多的还是为那个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辩护,坚持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对待,鼓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们口口声声指责中美联合公报"无视"《与台湾关系法》,扬言要在国会搞一个反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决议。据报道,这些右翼势力正在盘算如何迫使国会作出中美联合公报从属于《与台湾关系法》的解释,以阻挠美国政府履行联合公报,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

这些反华人物对中国的统一事业和反霸政策指手划脚,蛮横地干预中国的事务。他们甚至从根本上反对承认中国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一切表明,这些人仍想重温旧梦,控制中国的领土台湾。

可是,美国顽固势力的这些活动和言词看来并没有多大市场。虽然他们提前几个星期就为这两天的会议做广告、发通知,但是与会者稀稀拉拉。"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讲座"只有五六十个听众,而且在会议没开到一半时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人退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右派人物的频繁活动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据报道,在参院小组委员会开会前夕,国务院曾写信给该小组委员会主席伊斯特,说中美联合公报只是"总统的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上作的承诺"不是一项行政协定,并不具有国际法所有的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倒是联合公报的执行要受《与台湾关系法》的约束。这些话明显违背中美联合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究竟如何动作,人们正密切注视。

五人劫机案

背景介绍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五名罪犯劫持飞机,企图外逃,被机组人员与旅客制服,未能得逞。

反革命劫机犯孙卫平、杨锋、高克利、谢智敏、魏学利于四月、六月多次共谋劫持飞机外逃,五名罪犯利用各种手段筹集了犯罪活动的经费和工具。上机前,五名罪犯对劫机犯罪活动作了分工。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于八月十日开始审理反革命劫机一案,八月十一日下午,判处孙云平五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八月十九日下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已将孙云平等五名反革命劫机犯执行枪决。

材料:

· 粉碎劫机阴谋始末

· 五名反革命劫机犯在沪伏法

材料一　粉碎劫机阴谋始末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一架架银色的大型客机不时地在上海虹桥机场起飞、降落,一批批旅客来来往往,欢声笑语不绝,机场一派繁忙景象。

当时针指向十点零三分的时刻,突然,一个急促的声音传到调度室:"我是二二〇,我是二二〇","机上发现五个坏蛋!要劫持飞机!"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机场总值班室,又传到正在值班的民航上海管理局局长袁桃元那里。他马上快步来到机场大楼指挥塔台,一面吩咐立即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一面下令用雷达监视即将进入上海上空的这架飞机。从这之后,无线电话联系中断了。情况紧急!

这是从西安飞向上海的"二五〇五"班机。机号:"B——220",机型:伊尔十八,载有七十二位中外旅客,于早上八时零七分起飞。九时五十八分,飞机到达无锡上空时,乘务员许克敏从后舱来到驾驶舱收毛巾,拿水瓶,开始做飞机降落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有五个歹徒突然夺门闯进驾驶舱。他们凶相毕露,三个人封锁了驾驶舱的拉门,威胁说:"不准在上海降落",边说边用匕首对着机长杨继海和副驾驶阎文华等人的头部,歇斯底里地叫嚷道:"如果敢在上海降落,我就要你们的命,同归于尽。"

中共党员、五十二岁的老机长杨继海,是民航兰州管理局第八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眼看这批歹徒企图用暴力劫持飞机,他满腔怒火,但十分镇静。他回头朝身后的五个歹徒瞟了一眼,只见他们有的手里紧握匕首。他想,保护中外旅客和飞机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民航事业的声誉,是自己的光荣职责,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企图得逞。他一面低声向虹桥机场报告:"机上发现五个坏蛋,要劫持飞机",一面镇静地同歹徒周旋。同时示意他的同伴,设法走出驾驶舱。可是,这五个歹徒一面强行将机组人员戴在头上的无线电通话工具全部摘下,一面抓住驾驶舱的拉门不放。一场紧张的搏斗即将爆发。

飞机进入上海上空后,降至六百米到一千米高度,在空中盘旋。在空中已经盘旋了两个多小时的二五〇五班机机组人员们考虑:一定要在飞机上击败歹徒,保证旅客和飞机安全着陆。杨继海连忙示意领航员黄振江等,再次设法离开驾驶舱。机械员刘兆贤、报务员苗学仁机警地迅速冲出驾驶舱,来到旅客后舱。阴谋劫机的歹徒有三人也跟着追了出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决斗的时刻到了。这时,

在后舱的刘兆贤、苗学仁轻声对乘务员许克敏说："赶快组织旅客同他们干！""要立刻准备跟他们拼！"只见刘兆贤、苗学仁手持打扫飞机用的拖把，高声喊道："歹徒要劫持飞机，共产党员跟我来，大家一起跟他们干！"

他俩一声令下，中共党员、副驾驶员阎文华，中共党员、领航员黄振江站在驾驶舱的前舱部位；中共党员、机械师刘兆贤，中共党员、报务员苗学仁拿了两把拖把，站在驾驶舱的后舱部位，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把五名罪犯紧紧地包围在中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开始了。乘务员许克敏、共青团员贾志梅、共青团员盖生兰和一部分旅客，纷纷拿起汽水瓶、雨伞、酒瓶、铅桶、皮带等，向这批歹徒冲上去。拖把、雨伞、汽水瓶雨点般落在这些歹徒身上。刘兆贤发现一个歹徒控制驾驶舱的拉门准备行凶，就一个箭步上前，将这个手持匕首的歹徒紧紧抱住，苗学仁对准歹徒腰部猛击一拳，将他打倒在地。窜入驾驶舱内的另一个歹徒正要动手行凶时，阎文华转身将他抱住，黄振江找来消防斧，狠狠地击倒歹徒。五个歹徒当场被全部活捉。

盘旋在六百米上空的二二〇飞机机舱里，顿时响起"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

一起劫持飞机的阴谋被粉碎了。

经过紧张的空中搏斗，油将耗尽，飞机和旅客的安全仍然面临严重威胁。为了节省燃料，杨继海作出了果断的决定："马上将第四台发动机关掉"，"准备滑降"。接着，他们又把第一台发动机关掉。八名机组人员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飞机以时速四百五十、三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徐徐在虹桥机场跑道上安全着陆。

外国旅客安全地走下飞机时，高度赞扬机智勇敢的机组人员的英雄行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样的胜利，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看到！"

下午二时许，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汪道涵，副市长王鉴，驻沪部队领导同志和公安、民航局的领导同志，在机场接见机组人员，对他们进行亲切慰问，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彰他们为党为祖国的荣誉作出了贡献！

在粉碎这起劫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上海虹桥机场的运行秩序正常，一架架银色飞机也照常在这里顺利起落。社会主义祖国的民航事业将在这一胜利的凯歌声中继续前进！

向机智勇敢为祖国为人民立下大功的二五〇五班机机组人员致敬！

材料二　五名反革命劫机犯在沪伏法

反革命劫机犯孙云平、杨锋、高克利、谢智敏、魏学利，今天下午在上海被枪决。

这五名罪犯于七月二十五日劫持从西安飞往上海的二五〇五次班机，犯了反革命劫机罪。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于八月十日开庭审理孙云平等反革命劫机一案。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出示了现场查获的孙云平等的犯罪工具，宣读了证词；二五〇五次班机机长杨继海、机械员刘兆贤到庭作证。

法庭的审理查明，今年四月，孙云平、杨锋、高克利多次共谋劫持飞机外逃。今年六月，孙云平、杨锋又纠集谢智敏、魏学利参加这一反革命活动。五名罪犯通过各种手段筹集了犯罪活动的经费和工具。上机前，五名罪犯对劫机犯罪活动作了分工。

二五〇五次班机于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零七分从西安起飞。十时零三分，当飞机飞抵无锡上空时，孙云平、杨锋等五名罪犯先后冲进驾驶舱，以暴力威逼机组人员改变航向外逃，并行凶伤害机组人员和旅客多名。机组人员和旅客奋起同他们搏斗，这伙反革命暴徒终被制服。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孙云平等五名罪犯对所犯罪行均供认不讳。

八月十一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继续开庭，对孙云平等以反革命暴力劫持飞机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法庭确认，孙云平等五名罪犯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反革命为目的，用极其阴险的手段劫持民航客机，妄图外逃，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危害极大。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共安全，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反革命劫机罪，判处孙云平等五名罪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布判决后，孙云平等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审理，确认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维持原判，驳回了孙云平等五名罪犯的上诉，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已将孙云平等五名反革命劫机犯执行枪决。

日本小学教科书问题

背景介绍

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肖向前七月二十六日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一事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篡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把"侵略华北"改成"进入华

北”，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成“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甚至把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这种做法很明显是歪曲历史事实的真相，是不能同意的。

中国政府一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我们应当永远汲取这个历史教训，使这段历史不再重演。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政府的职责。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也强调，“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认为只有如实说明这段历史，才有助于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牢记这个历史教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日本文部省在这次审定课本中所采取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动机何在是令人怀疑的。鉴于此事背离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不利于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也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关切。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材料：

-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罄竹难书
- 双方外交部门交涉
- 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不得人心

材料一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罄竹难书

最近，日本文部省公然在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史实，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要以自己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

“八・一三”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上海后不久，我所在的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就被调到上海抗日第一线。当时我才二十四岁，任少校营长。我们一到南翔，只见火车站和杨行、刘行一带都成火海，老百姓的房屋全被炸光、烧光，一片凄惨景象，使我至今难忘。日本侵略者为了迅速侵占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穷凶极恶，哪里有中国人就往哪里打。他们的军舰在黄浦江上横冲直撞，向我阵地猛烈炮击，空军从早到晚狂轰滥炸，陆军的大炮坦克更是肆意残杀，无数人民死于非命。那时我率领的那一营，坚守在蕴藻浜一带，同日军作战，战斗空前激烈，先后补充人员达六、七次，但我们始终坚持战斗，不下火线。在守卫北新泾附近一座桥梁时，我们把机关枪隐蔽在岸边近水面处。日本侵略者为探虚实，极其恶毒地驱赶中国的一些老人先过桥，见无动静，才用橡皮艇大批渡河。当他们渡至河中间时，我们机枪齐放，一下打死他们几百人，这才出了一口气，使敌人渡河计划不能得逞。

以后，大批日本侵略者又从金山卫登陆，切断了我们的后路，我们被迫撤退。在撤到虹桥附近时，无数军民都挤到一起，突然遇到日本大队飞机尾追轰炸。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她肩挑两个小孩，背着一个小孩，怀抱一个小孩，日军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正落在她身边，大人小孩全部炸死，妇女腹部被炸开，腹中胎儿还在蠕动，真是惨不忍睹。每每想到此事，不禁怒火中烧，悲恸难已。以上仅是我当时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至于日本侵略者在全中国所犯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拙劣行径，只能激起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和日本有识之士的义愤。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民革中央副主席　贾亦斌）

材料二　双方外交部门交涉

九月八日，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代表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九月六日提出的关于解决教科书问题的进一步措施，作了答复。吴副外长对日方这次提出的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给予评价，指出，尽管还有一些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同过去所作的说明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吴副外长说，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承认还是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日方在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篡改这个史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理所当然要表示坚决反对。

吴副外长说，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重申，愿意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日本政府要充分倾听中方对教科书表述的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今年九月召开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十一月底前作出修改作为制定教科书指导思想的教科书审定标准的结论。根据新的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南京大屠杀”等部份的表述作出纠正。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由文部大臣在十一月底前后发表见解，刊登《文部公报》，下达到所有中小学和各级教育委员会。这样，中方的要求实际上将得到满足。

吴副外长指出，日方这次提出的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尽管还有一些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同过去所作的说明相比，是前进了一步。对此，我们给予评价。对于铃木首相表达的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和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这个问题的决心，表示赞赏。

吴副外长说，必须强调指出，日方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能不能切实得到纠正，我们还要看今后采取的具体行动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此保留评论的权利。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继续作出努力，尊重历史事实，履行诺言，以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

九月六日，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约见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奉日本政府之命表示，日本政府根据铃木首相早日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指示，对教科书问题的解决办法再次作了研究，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特别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通过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刊登《文部公报》下达，在教学中实际上满足中方的要求；今年九月召开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十一月底以前作出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的结论，十一月底前后，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在明年四月教科书使用前贯彻落实。鹿取大使对日方的措施还作了一些补充说明。

材料三　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不得人心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董纯才今天就日本文部省最近在教科书中篡改日本侵华史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

董纯才说："日本文部省最近在教科书中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他们审定教科书时，竟将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中国的'进入'。对于日本文部省的这一行为，中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我本人，都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

他说："日本过去侵华的历史，中国人民、特别是在中、老年人中都有着深刻记忆。这些血腥的罪恶史实，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本着实现中日两国中人民之间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经常教育自己的人民和后人，不把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记到日本人民头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贯正义立场。"

董纯才表示相信：一切正直的日本人民、政治家和教育界的同行，也会感到日本过去的侵华历史是极端可耻的。他们也认识到，日本必须把这些史实告知自己的后代，才会真正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友谊，才会真正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起牢固的睦邻关系。

他指出："日本文部省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的行为，不只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对广大日本人民的欺骗。这样做是完全不得人心的，是极端愚蠢和徒劳的。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文部省以中日友好事业为重，改弦易辙。"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代主席刘维明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文部省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篡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是违背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和两国青年的意愿的。它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青年的感情，我们对此十分愤慨。"

刘维明说，目前，中日两国青年的交往日益增多，中日两国青年的友谊日益发展。在我们和日本青年的友好交往中，许多日本青年都谴责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珍惜中日人民友谊的两国青年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既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身受其害。为了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我们应当向前看。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牢记过去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才能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刘维明说，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无数的中国人民被杀害，许多日本青年也被驱赶作为炮灰。

第三次人口普查

背景介绍

人口的情况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生产的目的，是在技术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人口普查是调查全国人口许多方面的情况，因此，人口普查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次大规模的国情调查。

这次人口普查，有19个普查项目，工作任务繁重，质量要求高，花费的力量比较大，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切切实实地去作辛勤的工作，将换来丰硕的成果。通过这次普查，我们将得到全国人口的总数，人口的地理分布、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婚姻状况和妇女生育状况等各方面的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交叉比较和演算，取得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了解国情、省情、县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通过普查，我们就可以取得1982年7月1日零时有多少一周岁孩子的资料，从而还可以预测出：到若干年后有多少孩子要上小学，有多少人上中学、上大学；有多少人要就业，要结婚、要生育，等等。根据这些资料，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如何合理地兴办各种各样的学校、妥善安排就业等问题。总之，人口普查所取得的人口资料是十分宝贵的。它可以为从我国国情出发，调整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依据；可以为妥善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提供重要依据；可以为正确制定人口政策和规划

提供重要依据。进行这次人口普查，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其次，联合国1974年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建议世界各国在1975年至1985年进行一次新的人口普查。我国是联合国成员国，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接近四分之一。因此，我国这次人口普查，不仅是我国人民所关心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世界人民所注目的一件大事。

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各级普查机构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的精神，做了大量细致的普查准备工作，层层建立了普查机构，进行了中央一级和省、地、县、市一级的普查试点，培训了普查骨干，整顿了户口，安装调试了29台用于人口普查的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员经过培训和处理试点资料，基本掌握了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人口普查数据的技术，为普查登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向积极努力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工作作出贡献的各级领导干部，全体普查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

我国于1953年和1964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年7月1日开始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比前两次普查的规模大，项目多，又是第一次使用电子计算机。所以任务是史无前例的艰巨，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口普查。

材料：

- 李成瑞答中外记者问
- 新疆六县百岁老人健康状况跟踪调查

材料一　李成瑞答中外记者问

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成瑞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李成瑞指出，这次人口普查的目的，是准确地掌握我国人口的数字、地区分布及构成情况，以便从我国实际出发，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安排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制定人口政策和规划。

李成瑞说，这次人口普查的全部工作，是按三个阶段安排的。准备阶段从1980年1月起至1982年6月底止，为时两年半。到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以下准备工作：

——县以上的各级普查机构已全部建立起来。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于1980年7月1日在江苏省无锡市和无锡县的94.6万人口中进行了普查试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343万人口中进行了省一级的普查试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国务院颁布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工作规划、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文件，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各项工作细则和手工汇总、机器汇总的表格。

——国务院于今年1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人口普查工作会议，传达和落实了国务院的指示。

——电子计算机安装工作接近完成。这次人口普查，除我国自己购置了8台电子计算机以外，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援助电子计算机21台，已全部到货。预计可在5月21日安装调试完毕。

——逐级负责、分期培训人口普查工作人员。正在陆续培训的干部，包括近1000名计算机技术人员，4000名数据录入人员，10万名编码人员，400万名普查员，100万名普查指导员。

李成瑞还介绍了另两个阶段的工作安排。1982年7月1日至7月15日为普查登记阶段，将完成登记和复查工作；8月底以前完成调查登记的质量抽样检查工作。1982年7月16日至1984年底，为普查资料处理阶段。1982年9月底以前，用手工逐级汇总出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户数、男女人数、民族、文化程度等主要数字，经国务院审批后发布公告。1984年底以前，用电子计算机汇总出全部普查数字，编成各种汇总表，经国务院审批后公布。

李成瑞还谈到，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技术合作部、联合国统计司对我国这次人口普查给予了物质技术援助，并派遣了专家来帮助工作。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近百名中外记者出席了今天的招待会。李成瑞在介绍情况以后，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材料二　新疆六县百岁老人健康状况跟踪调查

1.健康状况良好的百岁老人有508人，占百岁老人总数的58.73%，这部分百岁老人步履稳健、视觉听觉俱佳，饮食正常，并能从事一般轻体力劳动。如维吾尔族百岁老人力提甫·克日肯·巴依，视觉听觉都很好，每天看电视，睡眠也好，每日三餐，早上半公斤牛奶，一个馕，中下午吃羊肉拉条子或抓饭，1981年还能赶大车。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来姆·米沙·乌斯满（女），在家喂牛羊，还可以步行到数公里以外去赶巴扎。101岁的蒙古族老人叶杰（女）在转场时不仅能骑马，还能在马背上带小孙子，她步履稳健，视力很好，能穿针补鞋袜，捻毛线。109岁的

维吾尔老人吐哈提·尼牙孜和115岁的维吾尔族老人玉素甫·买托合提，他们虽年过百岁，还经常干一些家务劳动，还能独自步行6至7公里。

2.行动尚可，视觉或听觉欠佳，饮食一般的百岁老人有270人，占百岁老人总数的31.21%，这部分百岁老人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有些还可以搞一些轻微的家务劳动。

3、局部瘫痪，耳聋、双目失明，或有病长期卧床，生活需要别人护理的百岁老人有65人，占百岁老人总数的7.51%。

4.从1982年人口普查登记后到同年9月底以前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百岁以上老人共死亡22人，占百岁老人总数的2.54%。

从总的情况看，健康状况良好和较好的百岁老人，占百岁老人总数的89.94%。

廖承志致信蒋经国

背景介绍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希望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共竟祖国统一大业。

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发的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全文。这封信已用电报发往台北。

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从7月27日到31日每天刊登该报和新华社关于各方面对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反应的报道。

7月26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信报》、《新报》、《天天日报》、《澳门日报》、《香港商报》、《晶报》、《明报》等报纸纷纷发表社论、社评、短评或署名文章，对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表示欢迎，希望蒋经国先生"最好摒弃前嫌，共图振兴中华大业"。《大公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廖承志的函件引起如此强烈反应，主要在于十亿人民，人同此心，均望祖国和平统一的千秋功业早日实现。"文章说，"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其理至明。台北当局昨天虽保持缄默，拒绝评论此事，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况且大局当前，形势所迫，面对着这份情深意切的函件，蒋经国不能不有个交代。"《信报》发表题为《分久必合，历史规律》的短评说："中共对和谈的诚意绝不能抹煞。因此，我们认为国共双方应从谈判或非官式接触中互相了解，以重建彼此的信心。'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规律，我们对中国的统一是不必悲观的。"《天天日报》在题为《统一有一线机会，同胞应尽一百分力》的社论中说："希望大家不要过早否定任何努力，……而我们同胞所应尽力之处，也就是积极鼓吹促成，使台北接受廖承志到访"。

台盟总部在京理事7月26日聚会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大家认为，这封入情入理的信，对促进和谈，实现国家统一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影响。台盟总部主席蔡啸在发言中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从私情开始，讲到国情、政情，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凡是有识之士都会表示赞成。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只有依靠祖国才有前途和希望。我们希望蒋经国先生接受廖承志信中的劝告，早下决心，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为国家的统一，为民族的团结，为海峡两岸亲人早日团聚，做出抉择。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7月26日在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时指出，这封信通情达理，敦厚有情，希望蒋经国依时顺势，择善而从。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是国共两度合作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他以亲身经历说，"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乃是至理名言。他说，蒋经国先生应该深明民族大义，努力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千秋功业。

7月27日，在京的民革中央常委举行座谈会，畅谈他们对《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感想。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王昆仑在一份书面发言中说，我们衷心希望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实现第三次合作，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负责人和在京的台湾同胞，在7月2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希望蒋经国诠察廖承志致信的诚意，早下决心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作出贡献。全国台联会会长林丽韫说，我们台湾同胞殷切期望蒋经国能顺应民意，接受和谈，促使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共图振兴中华。全国台联会副会长彭腾云说，台湾资源缺乏，原料要从外国进口，技术受外国控制，市场也要依靠外国。大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市场辽阔。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民盟中央7月27日举行在京常委扩大会，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情与诚意。

7月27日，在纽约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筹委会举行的座谈会上，旅居纽约的国民党前高级将领和知名人士宋希濂、沈策、赵子立、潘维疆等在发言中指出，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意义重大，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7月29日，50多位归国华侨和正在北京访问的海外侨胞在全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举行的座谈会上指出，廖承志给蒋经国先生的信是一封意真情深的信，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中国人民要求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采取国共合作这种办法解决台湾问题，是一条合适的道路。

7月30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些知名人士认为，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情挚意切，理透义重，蒋经国先生如果仍然置若罔闻，再持"不接触"、"不和谈"的态度，于国于己都不利。从台湾回祖国大陆定居的马璧教授、梁容若教授以及民革中央副主席吴茂荪、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等在会上发了言。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表后，首都党政军各机关反应热烈。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见报的当天，一些干部即座谈讨论。首都各界群众普遍认为，国共三次合作，蒋经国先生大责难谢，应该三思利弊，善为抉择。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表后，上海各界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表示希望蒋经国先生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受外人蛊惑，勿伤民族元气，依时顺势，下决心和共产党谈判，共同负起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责任。解放军驻京某连指战员看了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后认为，"万事宜早不宜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蒋先生应以全民族利益为重，为祖国和平统一，早日举行和谈！

材料：

-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 相逢一笑泯恩仇
  ——费彝民谈廖承志给蒋经国的信

材料一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蒋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哎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材料二　相逢一笑泯恩仇
——费彝民谈廖承志给蒋经国的信

"如果廖公去台湾，我愿自告奋勇，报名随行，把我心里的话，向台湾挚友倾吐。实现祖国统一，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而且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大事，我愿以晚年有限的时光，和台湾同胞一起，共同为完成这一伟业，

作出贡献”。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同记者谈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开始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费彝民提到彭真副委员长最近的一句话：“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展望未来”。他希望台湾朋友好好想一想当前和今后的世界局势。他说，未来的局势将是天下大乱，烽火燎原。从中东到欧洲、拉丁美洲，都是这个形势。只有中国，如果我们实现和平统一，同东亚的左邻右舍搞好关系，就会成为世界的安定力量。十万万中国人，成为一种和平的力量，建设的力量，我们发言，更是举足轻重。所以，我们争统一，不仅是为自己，而且是为世界，为人类，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这样展望未来，就容易把个人的恩怨丢开。廖公这封信，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希望蒋经国先生也有这样高瞻远瞩的雅量。

费先生说，他在台湾有很多朋友。他提到孙越崎、黄朝琴、林献堂、肖同兹、谢东闵……。“我很想念这些老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健在的人还不少。”他想去看看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同这些老朋友谈谈。“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雅事，原来象仇人一样，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杯酒释前嫌，把个人恩怨全忘了。鲁迅的诗句正是这种情况最好的刻画。有些事情，我们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去求外国人呢？

“我是个报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文人办报，只是为救国，大家知道，我是怎么个人，我觉得我能出一把力。”费社长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

（周毅之）

风云人物

沙千里

沙千里(1901—1982)沙千里于1901年生于江苏吴县。青年时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运动后，曾创办《青年之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32年后在上海、重庆执行律师职务。1935年冬创办《生活知识》，宣传抗日救国。

193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御侮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为了集中救亡组织的力量，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和联合，他于1936年1月参加发起组织了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同年2月领导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总务部工作。1936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便将全国各地救亡力量团结起来，更有效地从事救亡运动。1936年5月，他作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救会成立后，他积极领导和亲自参加全救会的爱国救亡宣传活动和募捐活动，并结合各种纪念日举行爱国救亡集会和示威游行。193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组织全救会在上海举行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批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孙中山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全救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相对抗，因而被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以支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为借口，在上海逮捕了沙千里及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救国会七领袖，制造了七君子冤狱。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义正辞严地申述了救国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镇压民主的阴谋。在狱中写了《七人之狱》一书，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始末。由于在狱中坚强不屈的斗争，以及救国会和抗日团体的营救，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于7月31日被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创办了《大众报》，宣传抗日思想。还接待全国各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一些人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并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同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保持密切的联系，许多工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武汉失守后去重庆，针对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众运动，破坏民主和人权，实行军事独裁的行为，于1939年9月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宪政运动。为批判国民党政府虚伪的“五五宪法草案”，参加撰写了《五五宪草》一书。1942年在重庆和沈钧儒联合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法律顾问，利用律师的合法身份，为受迫害的进步人士、进步团体和刊

物进行辩护，从事合法斗争。为了团结工商界人士进行抗战，1943年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一直坚持到1946年下半年。1944年9月，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2月离开重庆返回上海。在上海期间，重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还与马叙伦、林汉达等人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于11月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到哈尔滨后，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海解放后，参加了对上海的接管工作。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大会作了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地方工业部部长。地方工业部撤销后，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部长。1958年2月，被任命为粮食部部长。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1979年7月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第二、三、四届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4月26日在北京病逝。

赵春娥

赵春娥(1935～1982)女，河南偃师人。生前是河南省洛阳市老焦煤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实干精神结合起来，干一行，爱一行，不为名，不为利，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积极帮助青年成长，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高尚风格。被树为全国职工学习的楷模。曾被选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商业特级劳动模范，并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被全国妇联追授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蒋筑英、罗健夫

蒋筑英(1939～1982)浙江杭州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当研究生，开始进行科研工作。1964年，他首次研究成功对光学传递函数的测量。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我国光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对光学检验、色度学及软X射线检测技术等作出了贡献。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严于克己，工作勤奋，终因积劳过度而病逝。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和全国劳动模范。

罗健夫(1935～1982)湖南湘乡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转业后刻苦学习了中学全部课程，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1965年从事微电子的科研工作，为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他二十年如一日，带领研制组人员于1972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中国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1975年又研制成功Ⅱ型图形发生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为中国的航天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秋，他身患低分化恶性淋巴瘤，仍抱病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6月16日去世。根据他生前的表现，航天工业部追授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1982年11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向罗健夫学习。同年被追授为陕西省特等劳动模范。

张华

张华(1958—1982)黑龙江省虎林县人，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一九七七年入伍，一九七九年考进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军医学系，在校期间，刻苦认真、乐于助人，是一个雷锋式的优秀青年。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因救落入粪坑的老农民魏志德而英勇献身。被授予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流行风

背景介绍

在1982年的文艺创作中，文学仍然走在领先的位置，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都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进步很显著，成绩是很突出的。

1982年共拍摄112部电影故事片，数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据文化部负责电影的同志分析，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约占四分之一，较差的也占少数，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比起1981年来，电影虽然没有质量上的大幅度提高，但在许多方面是有所前进的。应该说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要求。其中几部得奖的作品，如《人到中年》、《牧马人》、《骆驼祥子》、《春晖》、《风雨下钟山》、《飞来的仙鹤》、《布谷催春》，都是一致称道的优秀之作。基础比较薄弱的电视剧，在这一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数量上增加了一倍多，全年达309部，涌现出不少表现历史题材和当代生活的好剧目。如《蹉跎岁月》、《武松》、《吉庆有余》、《周总理的一天》、《家风》、《小不点儿》、《赤橙黄绿青蓝紫》等。

这一年的话剧是以勇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特色的。许多新剧目批判了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提出了种种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因而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儿童剧在这一年中有较快的发展，文化部举行的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分南北两片在南昌和长春集中演出了四十三个各种形式的儿童剧。

戏曲、美术、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民间文艺、书法，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成就、新收获。不仅个别佳作有所突破，而且一些新作的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

文艺新军在这一年继续成长，大批新秀崭露头角。以1982年短篇小说获奖作者为例，20人中有11位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最小的只有20岁。这一年的电影中，近一半电影故事片是中青年导演拍摄的。戏曲、电视剧中，青年一代演员的成长也是令人欣慰的。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在这一年的文艺生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1982年4项文学评奖中，有5位少数民族作者获奖。

粉碎“四人帮”初期，大量作品揭批林彪、“四人帮”，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谓的“伤痕文学”适应历史的需要，大量涌现出来。近几年来，文艺创作的主题和题材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在1982年的文艺创作中表现得很突出，写新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大大增多起来。以当年的电影故事片为例，据统计，112部故事片中，有一半是反映当代生活的。许多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展现了当代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当代人的生活形象。像小说《拜年》，话剧《吉庆有余》，影片《人到中年》，电视剧《云霞》等，它们以鲜明的时代精神拨动了读者、观众的心弦。过去比较薄弱的当代军事题材创作，在这一年也有了可喜的收获。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话剧《宋指导员的日记》的出现，被认为是军事题材创作的新突破。这年出现的写“文化大革命”，写过去历史的作品，也表现出和过去同类创作的不同姿态。许多作者在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不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揭示伤痕上，小说《洗礼》、《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都努力显示人物的美好心灵，写逆境对于人的灵魂的磨练，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探索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文艺是通过写人来表现社会的。要表现当前的新时代，就要塑造各种各样的当代人形象，特别是塑造当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一年的文艺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作了很多努力，给文艺画廊增添了一批动人的典型。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英雄的集体，塑造了一组各具个性、光彩夺目的英雄形象和新人形象；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梁大娘、韩玉秀、小北京、雷军长。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塑造了一个可亲的农村领导干部形象——牛六斤。他身上闪烁着革命传统的光辉，但又不雷同于过去时代的先进人物，是带有新时期特点的优秀领导干部形象。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不仅反映了在农村大变革中一些党员干部的缺点，更显示出他们在改造自然中如何改造自己，赢得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在斗争中写出了王才等一批有血有肉有缺点但有更多优秀品质的生动形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注意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象影片《骆驼祥子》中的虎妞，中篇小说《那五》中的主人公那五等，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无疑都为社会主义文艺增添了新的光彩。

1982年的文艺在主题、题材、形式、风格上有不少新开拓。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年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那种廉价的开拓——仅凭主观臆造，任意编写出的新题材，例如臆造种种海外人士回归的故事，臆造种种离奇的爱情纠葛，臆造种种地下工作者的“奇遇”等，这一类创作大大地减少了。严肃的作家努力把题材的开拓和表现的深化结合起来，通过广泛地开掘生活素材、努力更多样、更深入地反映我国的现实和历史。文艺接触到的生活面之广，是

建国以来少有的。当代生活是作家注意的中心。有的作者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勾勒出时代的风云，有的作者从平凡的小事中发掘出深邃的人生哲理。写边疆生活、写少数民族生活、写家庭伦理道德的作品为数不少。电视剧《家风》生动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新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云霞》表现了在工业调整的困难处境中，"乔厂长"式的干部怎样处理公与私，国家、集体与个人的矛盾；西藏的第一部电视剧《还愿》，则揭示了当地群众生活中很尖锐的矛盾——宗教迷信问题，引起了很大反响，表现了藏族艺术家的胆识。其他一些表现近现代生活题材的，也不乏佳作。像电影《骆驼祥子》、《城南旧事》，电视连续剧《鲁迅》，戏曲《恩仇恋》、《朝阳沟内传》，话剧《泥人常》，评弹《真情假意》等，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作家、艺术家们以极大的兴趣探索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革新。那种脱离内容专门在形式上追求新花样的风气，虽然仍在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着，但更多的作者走的是另一条路——从内容出发来探索形式和手法的创新。现实主义是这一年文艺的强大潮流，浪漫主义也逐步引起了注意，获奖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人们注意从外国文艺中汲取表现技巧，也注意从民族民间文艺中挖掘艺术宝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初期在部分人身上存在的饥不择食的状态，逐步引起了文艺工作者的警觉。不少同志努力采取有分析、有选择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东西。文艺的民族性问题也引起了不少作家、艺术家的重视。去年陕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仿唐乐舞》，是一台别具一格的音乐舞蹈节目，它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家的发展和创造，努力再现唐代的宫廷乐舞。这台节目以别致的构思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受到国内观众的好评，也受到国际朋友的赞赏。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

作者：叶辛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作品。1970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暗流大队湖边寨生产队的上海知青差不多都赶场去了。集体户里只剩下落落寡合的男知青柯碧舟，他一个人在埋头写小说。快到中午的时候，屋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喧闹的雨声和流水声将柯碧舟的文思打断，他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漫无目的地在屋中走来走去。这时，屋里猛然闯进一个浑身湿透的躲雨的女知青。女知青大大咧咧地自我介绍叫杜见春。杜见春像见到老朋友似的无拘无束地问了柯碧舟许多话，而柯碧舟却一脸惶恐，支支吾吾。柯碧舟与杜见春的这次邂逅相遇在一种并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冬天的一个晚上，柯碧舟代替女知青华雯雯上山看林子。在防火了望哨里柯碧舟与杜见春意外相遇，原来杜见春这天晚上正好也被派出来看林子。那天夜里，在明亮的篝火旁，这一对男女青年谈人生、谈理想。两人都朦朦胧胧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感情和希求在内心深处萌芽和涌动。然而，没等两人心中爱的溪流涨成春潮，事情就起了意外之变。有一天，杜见春由镜子山大队赶来湖边寨看望柯碧舟。与柯碧舟同一宿舍的"花花公子"苏道诚看杜见春生得健壮漂亮便不尴不尬地走过来与杜见春搭讪。在柯碧舟忙着淘米做饭的当儿，苏道诚不怀好意地告诉杜见春柯碧舟的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出身军人干部家庭的杜见春闻听此言，颜色剧变。她冷冷地告别了柯碧舟，匆匆离去。不久，杜见春离开山寨，回上海探亲去了。柯碧舟无端被杜见春冷落，心灰意懒，神情更加沮丧、忧郁。祸不单行，杜见春走后不长日子，柯碧舟为队里放牛时又从山崖上摔了下来，大腿严重骨折，卧床不起。住在湖边寨的大队贫协主席邵大山和女儿邵玉蓉把柯碧舟接到自己家里，精心照料柯碧舟的伤情。柯碧舟插队三年来第一次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他禁不住流下欣喜和感激的泪水，柯碧舟很快便痊愈了。邵氏父女的深情以及邵玉蓉的大伯邵思语的开导使柯碧舟逐渐从悒郁寡欢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沉湎于个人悲欢的小天地，而应该为改变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决定先为黑暗的山村拉上电灯。柯碧舟从报纸上得知国家正缺纸张，就在社员大会上提议把湖边寨的"八月竹"砍下来，运出山去卖给造纸厂，然后用卖竹子的钱兴办小水电。柯碧舟的建议得到队干部和社员的大力支持。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县里造纸厂，联系卖竹之事。湖边寨男女老少上山砍竹，电灯照明的日子指日可待。湖边寨回乡知青邵玉蓉在与柯碧舟的交往中，渐渐发现这个一向沉默忧郁的上海知青是一位心地善良、踏实肯干的好青年。少女的心像春天的花朵一般开放，邵玉蓉陷入如醉如痴的初恋。邵大山察觉了女儿的心事。他虽然打心眼里喜欢柯碧舟，但柯碧舟的家庭出身却使他这个"贫协"主席疑惧重重。这一天他找到柯碧舟，态度生硬地告诉柯碧舟，像他这样出身的知青根本配不上邵玉蓉，还是趁早打消与邵玉蓉相好的念头。柯碧舟忍住即将滚出眼眶的泪水，答应邵大山，他再也不会去找邵玉蓉了。柔情似水的邵玉蓉情意绵绵之际突然被柯碧舟冷落，顿感愁苦、激愤。她觉得柯碧舟似乎欺骗了她，有一天，邵玉蓉将柯碧舟堵在山道上，追问他为什么避而不见自己。柯碧舟平静地把邵大山找自己谈话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邵玉蓉。邵玉蓉回家后与邵大山大吵一场，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她的心已经交给柯碧舟了。杜见春的命运却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的父亲——一个老干部因为对造反派十分反感而被造反起家的一伙人罗织罪名，打成"复辟狂"，关进了黑屋子。已被推荐回上海

读大学的杜见春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县上专政队一天夜里突击搜查了杜见春的宿舍，将她的一应生活用品捣得稀烂。杜见春奋起反抗，被专政队队长白麻皮用铁棍击昏在地。曾经缠绕过柯碧舟的噩梦这时又降临到杜见春的头上。命运的突然转变使这个心性刚强、高傲的姑娘精神趋于崩溃。邵玉蓉为了使杜见春不再遭受第二次毒打，在山道上挺身喝住准备偷袭的县专政队一帮人。白麻皮恼羞成怒，用铁棍猛击邵玉蓉头部，邵玉蓉猝不及防，惨死在白麻皮手中。柯碧舟心灵再遭重创，痛不欲生。转眼到了1973年，暗流大队和镜子山大队的知青集体户由于一部分知青的返城和被招工而名存实亡。公社决定让这两个大队的知青点合并。杜见春被合并到了暗流大队。但是暗流大队革委会主任左定法并没有让杜见春住进集体户，而是别有用心地让杜见春搬进队上早已弃置不用的粉坊。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左定法闯进破旧不堪的粉坊，对杜见春欲施强暴。杜见春恍然惊醒，抄起顶门杠将左定法打出粉坊。这天晚上，暴风雨肆虐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地势低洼的粉坊便淹没于大水之中。肉体的几乎被蹂躏以及住所的彻底失去使杜见春万念俱灰，她想到了自杀，正当她将脖子伸进树上的绳套时，柯碧舟突然出现，将杜见春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在柯碧舟的真诚劝诱和无私帮助下，杜见春重新恢复了生活的勇气。柯碧舟的宽厚和善良以及他对杜见春的真诚爱护与关怀使杜见春开始认真审视自己以前对柯碧舟感情的伤害。她第一次真正发现，爱上柯碧舟已不可避免。遭受过杜见春的拒绝又刚刚失去邵玉蓉的柯碧舟却不再有往日的蓬勃激情。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使他担心一旦杜见春的父亲东山再起，也许杜见春会再一次不辞而别。他心烦意乱，害怕再一次陷入感情的罗网。没过多久，柯碧舟的母亲突然从上海来信，告诉柯碧舟根据新政策他可以回沪重新安排工作。柯碧舟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征询杜见春的意见，杜见春按捺住满腔的失望痛苦之情劝告柯碧舟珍惜机会，回到上海去。柯碧舟从杜见春黯淡失神的眼光中终于感到姑娘是真心爱着自己的。他告诉杜见春为了她，他宁愿留在小山村，杜见春泪如泉涌，扑进了柯碧舟的怀抱。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杜见春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他来信询问杜见春的情况。杜见春向父亲公开了自己与柯碧舟的恋情。杜见春父亲不久给暗流大队党支部邵大山去了一封信，询问自己的女儿为何爱上了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后代。柯碧舟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事隔不久，柯碧舟与杜见春一起回上海探亲。在家中，杜见春与母亲和哥哥有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杜见春的母亲答应见见柯碧舟。杜见春的哥哥却偷偷找到柯碧舟逼迫柯碧舟答应不再见杜见春。柯碧舟自知出身不好，好梦难成。数天后独自一人，凄然离开上海。就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杜见春飞奔而来，冲进月台，跳上火车。她眼含热泪，深情地告诉柯碧舟她将永远跟他在一起。《蹉跎岁月》以柯碧舟与杜见春和邵玉蓉的爱情纠葛作为情节主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七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插队生活：他们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感情生活的起伏波动以及心灵的苦闷与徬徨，追求与奋起。全书描写生动、细腻，格调明朗、清新。它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对于过去的不无感伤的追怀，是一种弥漫温情的心灵的回忆。这部长篇小说曾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上映后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好评。

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

作者：冯苓植

故事梗概

作品描述的是母驼阿赛对两个孩子——吉尔和塔娜深沉的爱。母驼阿赛失去了心爱的驼羔儿，炽烈的母爱使它神情失常。放驼人九岁的儿子小吉尔与邻居牧马人八岁的女儿小塔娜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姑娘天天唱着歌，以她那轻柔的动作，挤阿赛那憋胀的奶。几天以后，阿赛由疯狂恢复正常，它仿佛忘记了忧伤的往事，一见小塔娜就温柔地呻吟着垂下头。每天小塔娜放学时，阿赛准时跑到荒原的翠岗上，望着、等着，迎塔娜归来。小女孩与大骆驼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感情。一天，荒原上来了黄胡子采购员，硬逼着酒醉才醒的放驼人卖掉阿赛。晚上吉尔和塔娜偷偷骑上一匹骏马，去寻找和解救阿赛。当吉尔拔出蒙古小刀，割断了驼缰的时候，黄胡子提着哨棍冲了出来，步步逼近这对奇怪的“小偷”。阿赛猛地冲到黄胡子和孩子们中间，用巨大的身躯保护着两个孩子。阿赛战胜了黄胡子，驮上两个孩子，逃出这黑沉沉的荒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逃去的地方却是死亡绝地。两个孩子在饥渴难耐的情况下，吮吸着阿赛的乳汁，艰难地前进。他们终于来到地面潮湿的沙丘下。阿赛用头颅拱动着灼人的热沙，刨出一个水坑，它伸着长长的脖子，在吸取坑里的水，一次又一次地往那两个昏倒在沙丘上的孩子脸上喷洒。作品颂扬的是阿赛深沉无私的母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放驼人夫妇。放驼人的妻子从家出走，使吉尔从小失去母爱。沙原盛会上她痛苦地与儿子相会、亲吻、送别，更激起了吉尔对母爱的渴求。放驼人失去家庭的温暖，苦恼、懊悔，每天借酒浇愁，整日酩酊大醉。他们站在那峰为两个孩子奉献出一切的母驼面前，流出了内疚、忏悔的泪水。“人们啊，为了未来，要珍惜纯真的感情。”这是作品的结尾，也是作品的主题所在。作品在艺术上采取了拟人化的写法。母驼阿赛，实际上是爱的化身，它对塔娜的感情，对两个孩子的保护，尤其是在死亡地带它，为两个孩子而作出的自我牺牲，都具有人的特性，甚至是人所

不及的。

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作者:李存葆

故事梗概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以赵蒙生的回忆、追述为线索,展示了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军一支普通步兵连战前、战中和战后的生活情景,通过指导员赵蒙生母子与连长梁三喜一家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示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三年前,将军之子赵蒙生离开军政治部宣传处,下到九连任指导员,目的是"曲线调动",指挥这场调动的是他那位在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的母亲吴爽。连长梁三喜是个"顶着满头高粱花子"入伍的沂蒙山区农民的儿子。对赵蒙生这样有文化的干部子弟,梁三喜怀着满腔诚笃和热忱,处处尊重体谅,团结合作。在战备训练中,梁三喜身先士卒,他技术过硬,作风朴实,生活节俭,谦虚谨慎,深得战士的拥护和爱戴。炮排长靳开来也是农民出身,为人正派,技术过硬,性格耿直,说话莽撞,是全团有名的"牢骚大王"。赵蒙生打心眼儿里看不起这些"乡下佬"出身的土大兵,又承受不住部队生活的艰苦,便催促母亲加紧"曲线调动"。梁三喜得知了赵蒙生下连的真相后,尽管十分惦念老家快要临产的妻子,但为了连队的管理和建设,放弃了几经推迟的探家休假。吴爽施展她的"外交才能",赵蒙生终于拿到了正式调令。与此同时,部队也接到了开拔上前线的命令。一向忠厚的梁三喜忍无可忍,怒斥赵蒙生的临阵逃脱。赵蒙生进退两难,最终还是揣着调令随部队开赴云南前线。在前沿阵地上,赵蒙生仍然幻想神通广大的母亲能通过雷军长调他去军部机关,以避开战场上的厮杀。要知道,吴爽对雷军长有救命之恩。想不到号称"雷神爷"的雷军长接到吴爽要为儿子开后门的电话时,怒发冲冠,当众"甩帽"。这一正义之举,打碎了赵蒙生的梦想,也使将军的后代猛醒了。战斗打响后,九连受命担任尖刀连,任务是打穿插,攻占364高地。靳开来被提升副连长,他率尖刀排为全连开道。穿插的路上,草深林密,坡陡难行。靳开来手抡傣家大刀,左右横飞,砍出一条通道。战士们紧跟在后,豁出命来赶路。当到达指定位置时,十七岁的司号员小金为了帮助炮排的战友背炮弹,竟累死在这异常艰苦的穿插中。364高地前,布满敌人的地雷和明碉暗堡,梁三喜采纳了战士"北京"提出的"在50米左右的近距离内用火箭炮杀伤敌人"的建议。靳开来和"北京",肩扛四〇火箭炮,机警地躲过敌人的枪弹扑向目标。声声巨响后,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九连迅速攻克了敌军阵地。敌人组织反扑,战斗更加残酷。主峰上敌人的炮弹雨点般泄在九连的阵地上,全阵伤亡已近三分之一。严重的缺水更加重了战斗减员。面对断水的威胁,靳开来又一次首当其中,带领战士四处找水,不料在回来的路上踏响了地雷。他用生命换来的一捆甘蔗,解救了战士的干渴和生命,为赢得胜利提供了保障。为了占领364高地主峰,九连发起新的进攻。战士"北京"继续担任炮手,不幸的是两发臭弹引来敌人一串子弹,战士"北京"无声地倒地血泊中。梁三喜接过血染的炮身冲了上去,赵蒙生带领战士一齐冲上364高地的主峰。就在胜利的一瞬间,梁三喜为了掩护赵蒙生被暗堡中飞来的子弹射中。赵蒙生不顾一切冲进暗堡,消灭了最后的顽敌,他用自己的行动洗刷了战前临阵脱逃的耻辱,捍卫了将军后代的尊严。梁三喜牺牲了,留下一张血染的"欠帐单"。小说的后半部分围绕这张"欠帐单",引出了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和妻子韩玉秀两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战斗结束后,在善后工作的处理中,所有烈士的亲属都得到了一枚军功章,唯独没有靳开来的亲属的。就因为那捆甘蔗和平日的牢骚话,这位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英雄竟没有被批准立功受奖。他的遗妻带着四岁的儿子抱着烈士留下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不声不响地走了。烈士的亲属们一个个离开部队,却始终不见梁三喜亲属的音信。赵蒙生焦急地盼望着,却等来了劝他转业回家的母亲。吴爽来队的第二天,梁大娘、玉秀带着出生三个月的女婴翻山越岭步行一百六十多华里来到部队驻地。赵蒙生万万没有想到,梁大娘竟是养育他成人的母亲。1947年,赵蒙生出生第三天,生母吴爽因患病断奶,组织上把她和刚出生的儿子送到沂蒙山蒙山脚下的山村,由当时的"支前模范"妇救会长梁大娘负责喂养小蒙生。吴爽病好后随军南下,赵蒙生和梁大娘的儿子梁三喜喝着同一母亲的乳汁长大。直到他五岁时,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两位母亲在云南边防部队相遇了。岁月的流逝使她们已很难相互确认。望着满脸皱纹绽出笑容的梁大娘,颇具外交辞令的吴爽竟显得笨嘴拙舌。意外的重逢震撼着赵蒙生母子的心。他们越是了解梁大娘为革命献出三个儿子的巨大贡献,越是看到眼前孤儿寡母的生活困境,就越感到内疚和不安。母子俩极力想在经济上帮助梁大娘,却遭到老人执拗的拒绝。几经周折,战士"北京"的名字和亲属查到了,他叫薛凯华,是雷军长唯一的儿子。按照沂蒙山区的风俗,梁大娘和玉秀在梁三喜烈士的墓前祭奠了英灵后,准备启程回家。临行前,梁大娘从衣服缝里取出六百二十元钱,玉秀拿出丈夫的遗书。遵照烈士的遗愿,她们把550元抚恤金连同卖猪得来的70元钱一并带来还清了那张"欠帐单",祖孙三代人依旧穿着那身破旧衣裳踏上了回家的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雷军长、薛凯华、梁大娘、玉秀等人形象。小说以浓烈的生活气息、真挚的感情,以及对生活矛盾的深刻描写而扣人心弦。文字间自始至终回荡着

一股浩然正气、悲壮旋律。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

短篇小说《哦，香雪》

作者：铁凝

故事梗概

烟雾萦绕的大山深处，重岩叠峰的皱褶里，座落着一座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台儿沟。

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弯弯曲曲绕过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铁路的正式营运，打破了台儿沟往日的宁静，虽然旅客列车只在这个五等小站停留一分钟，却搅乱了山民们的心绪情感。

台儿沟几个土生土长的姑娘香雪、凤娇和朵儿相约傍晚一起去看火车。文静内秀的香雪换上了新做的红格布鞋，俏丽洒脱的凤娇用珍藏的香皂仔细地擦过脸，调皮机灵的朵儿大大咧咧地穿上了花汗褂……。她们嬉笑欢闹地向车站走去；没想到，刚到小站就错过了火车进站时间，眼巴巴地望着绿色的长龙疾驰而过，她们感到十分沮丧和怅惘。

从此以后，姑娘们天天按时去小站站台上看火车；川流不息的上下车旅客，衣冠整齐的列车员的动作，都引起了她们浓厚的兴趣……；由好奇、恐惧到越来越大胆地向列车靠近，她们和年轻的列车员攀谈，用自己生产的山中特产和旅客进行诚实的交易。火车车厢向姑娘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她们感受到了迎面拂来的现代文明气息。每天一分钟的停车时间，给姑娘们带来了短暂的欢乐；当隆隆的火车头喷着白雾，长鸣一声，消逝在远方，又给姑娘们带来了长久的企盼。

姑娘们的心中，都萌动着五彩缤纷的遐想：渴求文化知识的香雪十分羡慕新式的书包和自动打开的铅笔盒，还向车上的旅客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的学生；泼辣而又娇媚的凤娇姑娘和一个操北京话的年轻列车员，在频繁的接触中情窦初开，编织起美丽的青春梦幻；粗中有细的朵儿则热衷于用山货换各式各样的头饰和胸花，不断地"武装"和"充实"自己。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趁着一分钟的珍贵停车时间，凤娇照常去3号车厢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突然发现车窗里的茶几上有一个彩色塑料自动铅笔盒，她朝车厢门跑去，轻巧地跳上踏板，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用一篮子40个鸡蛋换回了铅笔盒。这时，火车启动了；车下的凤娇和朵儿惊慌地喊叫着，追着火车，无可奈何地看着火车带着香雪远去。香雪拍打着窗上的玻璃，冲着凤娇喊叫……

在列车上，香雪被意想不到的情况吓懵了，她泪水涟涟而不知所措。在列车员和旅客的热情帮助下，姑娘才渐渐镇定下来。

火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被抛在身后，到了西山口站，香雪谢绝了列车员的挽留下了车。

从西山口到台儿沟三十里山路。月黑风疾，峰悬岭陡。年仅16岁的香雪，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又是深更半夜回家，她有些害怕。然而，故土给了她力量，越过树林，涉过小溪，穿过隧洞，手中举起铅笔盒，……她仿佛听到姐妹们和大山在一齐呼喊：哦，香雪！《哦，香雪》通过火车开进偏远山村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展示了我国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初期，山民们伴随着封闭状态的日益突破，对大山以外的世界那种朦胧的新奇和向往，以及变革大潮对传统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冲击后农民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尤其是青年一代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诗歌《会唱歌的鸢尾花》

作者：舒婷

我的忧伤因为你的照耀
升起一圈淡淡的光轮
——题记

一

在你的胸前
我已变成了会唱歌的鸢尾花
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
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

用你宽宽的手掌
暂时
覆盖我吧

二

现在我可以做梦了吗
雪地。大森林
古老的风铃和斜塔
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
上面挂满
溜冰鞋、神笛和童话

焰火、喷泉般炫耀欢乐
我可以大笑着在街上奔跑吗

三

我那小篮子呢
我的丰产田里长草的秋收啊
我的旧水壶呢
我的脚手架下干渴的午休啊
我的从未打过的蝴蝶结
我的英语练习：I love you love you
我在街灯下折叠而又拉长的身影啊
我那无数次
　　流出来又咽进去的泪水啊
还有
还有

不要问我
为什么在梦中微微转侧
往事，像躲在墙角的蟋蟀
小声而固执地呜咽着

四

让我做个宁静的梦吧
不要离开我
那条很短很短的街
我们已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

让我做个安详的梦吧
不要惊动我
别理睬那盘旋不去的鸦群
只要你眼中没有一丝阴云

让我做个荒唐的梦吧
不要笑话我
我要葱绿地每天走进你的诗行
又绯红地每晚回到你身边

让我做个狂悖的梦吧
原谅并且容忍我的专制
当我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亲爱的，不要责备我……
我甚至渴望
涌起热情的千万层浪头
千万次把你淹没

五

当我们头挨着头
像乘着向月球去的高速列车
世界发出尖锐的啸声向后倒去
时间疯狂地旋转
雪崩似的纷纷摔落

当我们悄悄对视
灵魂像一片画展中的田野
一涡儿一涡儿阳光
吸引我们向更深处走去
　　寂静、充实、和谐

六

就这样
握着手坐在黑暗里
听任那古老而又年轻的声音
在我们心中穿来穿去
即使有个帝王前来敲门
你也不必搭理
但是……

七

等等！那是什么？什么声响
唤醒我血管中猩红的节拍
在我晕眩的时候
永远清醒的大海啊
那是什么？谁的意志
使我肉体和灵魂的眼睛一齐睁开
　　“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
　　跟我来”

八

伞状的梦
蒲公英一般飞逝
四周一片环形山

九

我情感的三角梅啊
你宁可生生灭灭
回到你风风雨雨的山坡
不要在花瓶上摇曳

我天性中的野天鹅啊
你即使负着枪伤
也要横越无遮拦的冬天
不要留恋带栏杆的春色

然而，我的名字和我的信念
已同时进入跑道

代表民族的某个单项记录
我没有权利休息
生命的冲刺
没有终点，只有速度

十

向
将要做出最高裁决的天空
我扬起脸

风啊，你可以把我带去
但我还有为自己的心
承认不当幸福者的权利

十一

亲爱的，举起你的灯
照我上路

让我同我的诗行一起远播吧
理想之钟在沼地后面敲响，夜那么柔和
村庄和城市簇在我的臂弯里，灯光拱动着
让我的诗行随我继续跋涉吧
大道扭动触手高声叫嚷：不能通过
泉水纵横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朵

十二

我走过钢齿交错的市街，走出广场
我走进南瓜棚、走出青稞地、深入荒原
生活却不断铸造我
一边是重轭，一边是花冠
却没有人知道
我还是你的不会做算术的笨姑娘
无论时代的交响怎样立刻卷去我的呼应
你仍然能认出我那独一无二的声音

十三

我站得笔直
无畏、骄傲，分外年轻
痛苦的风暴在心底
太阳在额前
我的黄皮肤光亮透明
我的黑头发丰洁茂盛

中国母亲啊
给你应声而来的儿女
重新命名

十四

把我叫做你的“桦树苗儿”
你的“蔚蓝的小星星”吧，妈妈
如果子弹打来
就先把我打中
我微笑着，眼睛分外清明地
从母亲的肩头慢慢滑下

不要哭泣了，红花草
血，在你的浪尖上燃烧

…………

十五

到那时候，心爱的人
你不要悲伤
虽然再没有人
扬起浅色衣裙
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
来敲你的彩镶玻璃窗
虽然再没有淘气的手
把闹钟拨响
着恼地说：现在各就各位
去，回到你的航线上
你不要在玉石的底座上
塑造我简朴的形象
更不要陪孤独的吉它
把日历一页一页往回翻

十六

你的位置
在那旗帜下

理想使痛苦光辉
这是我嘱托橄榄树
留给你的
最后一句话

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
在早晨来找我
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
找到我

诗歌《飞临台湾上空》

作者：卞之琳。

一九八〇年应邀访美，九月二十三日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机直飞旧金山。铁鸟有情，忽然降低高度，让我们大陆乘客得以一瞥我们的台湾岛。这对我是一大兴奋，也激发我断念写诗二十多年后，起意写一首新诗。文思枯窘，将近一年半后，由于局势复杂化了，才拉杂写出，不顾生涩，略表心迹而已。

可是为鸟瞰异国风光，
一探头穿出了层层的白云？
是岛！我们的岛！还想望
见一下应该是熟稔的人群，
我们飞开了；还历历在目
是河流、葱茏的山顶山坳，
是一个手掌，久经爱抚！
我可以辨认道路——甚至桥！

难道一片水真能分隔
大陆和它的岛？试想海底
深藏着浑成的岩石胶合，
血浓于水，再加上印记，
更有了人间的千丝万缕！
我冥想有一天，任波涛汹涌，
像一条输水道让水流来去，
把一条海底隧道凿通！

心不能永远裂成两半；
割掉又恢复，是我们的血肉！
我可为什么不能对这片
怀乡的苍翠伸手一摸？
人因水相隔也凭水相依，
看点点渔帆却早已明晓；
我们要自由，该顺应天理：
"生生之谓易"，是世间常道。

感谢"泛美"驾驶员利索，
给我们一瞥和一个信心：
一滴坏水毒不了美国，
在我们岛上也休想去寻
自杀性基地，从那里投掷
炸弹来擦伤它根柢！从长看：
四海为家总有此一日；
崎岖的尘寰总归于浑圆。

1982年2月25日

歌曲《振兴吧！中华》

1=E 2/4
王 晓 岭 词
刘庄、延生 曲
进行曲速度 热情地

忠诚的儿女，谁不爱自己的妈妈，正直的公民，谁不爱自己的国家！当妈妈有了忧愁，我们也含着泪花，当国家遇到困难，我们也挺起肩胛。千般情，万般爱，化做一个愿望，振兴吧中华，振兴吧中华，振兴吧中华！

忠诚的儿女，谁不爱自己的妈妈，正直的公民，谁不爱自己的国家！为妈妈青春焕发，我们把汗水抛洒，为国家兴旺发达，我们把宏图描画。千颗心，万股劲，汇成一个力量，振兴吧中华，振兴吧中华，振兴吧中华！中华！

歌曲《社会主义好》

1=G 2/4
希 扬词
李焕之曲
稍快 满怀热情地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二部轮唱）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注：轮唱时，第二部迟起一小节。第一部唱到末尾要把"来到"两字重复一下，使与第二部同时结束，即将第一部最后一句唱成这样：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来到！

电影《城南旧事》

上海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制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

20年代的旧北京，那些使我无法忘怀的过去——童年的生活历历在目……

我，小英子，当时还是一个女孩子。在我居住的胡同中，有个惠安会馆，年轻的女人秀贞经常蹲在门口，叫我小桂子。我感到很奇怪，宋妈对我说，她是一个疯女人。

一天，我和小伙伴、学唱戏的妞儿在一块玩耍，发现她脖子后面有一个指甲大的青记，莫非她就是秀贞的女儿小桂子。我拉着妞儿，冒雨跑到惠安会馆，来找秀贞。秀贞看着妞儿，便自言自语地说："小桂子，我的小桂子。"妞儿一听就哭了。母亲找到了女儿，女儿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小桂子是秀贞和一个大学生爱情的结晶，后来因大学生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遭到警察的追捕，从此再没回来过。

多少年来，秀贞第一次高兴地哭了，她带着小桂子赶夜班火车去天津，还要转乘轮船，寻找桂子的爸爸。她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雨夜中。

我们的家搬进了新帘子胡同，换了新环境，周围的空气依然像铅一样沉重，人们的心情也是忧郁的，而我也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怅惘。

一天，我放学回来，听宋妈讲起胡同口张家闹贼的事，心里很害怕。有一次在胡同里玩耍，为捡一个球，在附近的荒草地遇到一年轻人。他看我是个女孩子，便高兴地和我攀谈起来，谈他的小时候贪玩，没念书，他把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他弟弟和我在一个学校读书，年年考试在班级都是第一名。不过，我有些好奇，他一个人在荒草地里干什么，又东躲西藏的，好像很怕见到别人。以后，我们在荒原地见了多次面，他很和蔼、善良。有一次，他心事重重地问我动过他埋藏在地下的东西没有，我说没有动过。分别时，他嘱咐我近几天别到这儿来，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

一天黄昏，胡同里的人们议论纷纷，说是抓住了一个小偷。他低着头，被捆着手，在暗探和巡警的押送下，从断墙残垣的荒草丛中走过来，我惊呆了，原来他就是小偷。我紧紧地拉着宋妈的手挤在人群里不敢动。发现我时，他那沉着而凝重的目光停留了一下，还对我微笑着，好似在安慰……

我真想不到，第二个"朋友"也是不知去向。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当时，我是无法判断清楚的。

宋妈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她既管全家的事，又把我拉扯大，像位慈祥的母亲。她家住顺义县牛拦山冯村，是贫苦人家出身，丈夫冯大明，也住在农村，每次到我家来他都牵着一头小毛驴，宋妈总得把积攒的钱交给他。

有一次，宋妈让我帮助她写封家信，寄给丈夫，叮嘱小栓子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宋妈说一句，我就写一句。突然，我停住了笔，越听越心酸，想不到宋妈在我家干活，竟无法照顾自己的亲生孩子。同样是孩子，为什么有的人得不到母亲的爱抚呢？宋妈在哄我弟弟喝芦根汤时，一边掉眼泪，一边唠叨着小栓子。后来，父亲好意让宋妈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宋妈说，不用回去了，栓子已经死了，女儿也已经送人。夜晚，我来到了灶房，看到宋妈满面愁容，冯大明蹲在一边，默不作声。我心想，像冯大明这样的爸爸也太狠心了；于是跑过，一头扑在宋妈怀里。心中默默念叨："宋妈呀，你就是我的母亲，我就是你的丫头子。"宋妈仿佛听到我的心里话，用手擦了擦眼睛，脸上挂着一丝笑意，把我紧紧地揽在怀里。

后来，我的父亲积劳成疾去世了。我们全家不得不离开北平返回台湾。妈妈、弟弟、我和宋妈、冯大明打扫了父亲的墓地。在北平郊区西山的墓地，宋妈和我们分手，要重新回到她那破碎的家中。秋风瑟瑟，枫叶殷殷，在蜿蜒的山坡小路上，我们坐上一辆马车，宋妈骑着一头小毛驴，各奔前程。

电影《人到中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制的彩色故事片

1979年秋，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医务人员正在集中精力抢救因心肌梗塞急性发作的眼科女大夫陆文婷。院长孙逸民教授清楚地记得，陆文婷是十八年前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医院来的。当时，她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但对祖国的医学事业有独特的见解，陆文婷在眼科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多年，曾使千百双即将失明的眼眼重见光明。

28岁的陆文婷，与被她治愈眼疾的一位患者——金属力学研究机关的青年科技人员傅家杰相爱了，很快结了婚。如今，陆文婷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膝下一儿一女，家庭生活和谐而充满了烦恼。

人到中年万事忙。陆文婷从早忙到晚，在医院，她要为那么多病人看病、动手术；下班后要烧火做饭；晚上还要给上小学的儿子园园、上托儿所的女儿佳佳缝缝补补；还经常在夜晚去医院查看病人的病情有无变化。就在陆文婷病倒的当天上午，她还一鼓作气地做了三个眼科手术：来自农村的眼病患者张大爷、女孩王小曼和为一位副部长焦成思做白内障摘除……

焦副部长的夫人秦波对陆文婷做手术原来是很不放心的，因为她了解到陆既不是主任，又不是主治大夫，而且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她哪里知道，在"文革"期间，正是

陆文婷甘冒风险，为当时被打作"走资派"的焦成思做了眼科手术。一天上午，秦波找到了正在给患者看病的陆文婷，落实给焦做手术的方案。突然，从托儿所打来电话说陆的女儿佳佳病了，请家长赶快去一趟。陆给丈夫打电话，未通；等她把最后一个病人送出门诊室，匆忙赶回时，托儿所只剩下发高烧的孩子。陆文婷把女儿背回家，心中还惦念着病人……陆文婷感到生活的负荷太重，觉得自己既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

妻子住进医院，傅家杰日夜守候在病床边。一天，陆文婷的病情恶化，她仿佛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想起了孩子以前的要求，嘱咐家杰一定给儿子园园买一双白球鞋，给女儿佳佳扎小辫。经紧张抢救，陆转危为安。

陆文婷的好友姜亚芬，既是大学同窗，又是一起分到医院工作的。姜的爱人刘学尧是位高明的外科医生，"文革"中被当作"里通外国"的特务，受尽了折磨与迫害。他们准备出国去加拿大定居；申请批准了，他们来陆文婷家中告别。陆办了一个家庭宴会，陆劝他们不要走，而姜、刘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苦太累，而且还不为社会所理解。……当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陆文婷正病倒在医院，姜亚芬含着热泪给陆写了封充满依恋故国之情的信，并明确地表示：请相信我吧！我还会回来的。

傅家杰在病房里念完了姜的信，陆文婷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她对自己的女友是最了解和熟悉的。

领导的多方关心，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护理，住院病人的密切配合，终于把陆文婷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在丈夫的搀扶下，她走下了病床，又将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工作。

流行语

一、三热爱　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

二、四提倡四反对　即提倡节俭，反对大办婚事；提倡男女平等、敬养老人，反对歧视虐待妇女、老人；提倡相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的文化娱乐，反对赌博。

三、铁饭碗　指劳动人事制度上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用人单位没有多少自主权。一个干部或工人，只要分配到一个单位，无论干好干坏，无论工作需要不需要，都可以一直干下去，好比捧了个铁饭碗一样。

四、大锅饭　是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的一种比喻。指在分配上不区别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不区别各个人贡献的大小，一律对待，给予大体相同的报酬；同时也泛指不区别企业的经营好坏，效益高低，一律对待，造成企业间苦乐不均、"旱涝保收"、平均主义的不合理现象。

五、利改税　即以税代利，就是国营企业由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缴纳税金。

六、三种人　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进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去。此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七、明白人　原是人民群众对一些知事明理者的通俗的说法。在企业进行整顿、改革中，要求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又赋予了"明白人"以新的内容，主要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敢于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正之风；能吃苦，有干劲，懂业务，会经营；有胆有识，敢于创新，能够团结人，打开新局面。

八、职工中的"双补"工作　就是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在职工中进行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的工作。

历史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82年人口普查主要数字的公报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我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工作，从1979年年底着手准备，1982年7月1日开始全面登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广大普查工作人员深入细致的工作，到7月10日，除个别遭受水灾的地区略有推迟外，全部完成了普查登记，并在7月底以前全面进行了复查核实工作。经过事后抽样检查，证明普查登记达到了高质量的要求。这次人口普查的全部资料，正在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现将手工简易汇总的主要数字公布如

下：

一、总人口：全国人口为1031882511人。

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下同）人口和现役军人共1008175288人中，除西藏自治区交通极为困难的个别地方（28,601人）是利用行政记录材料进行估算的以外，全部以1982年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进行了直接调查。

台湾省人口和福建省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是按台湾当局公布的数字计算的。①香港、澳门地区同胞的人数，是按香港当局和澳门当局公布的数字推算的。②根据国务院颁发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的规定，这次普查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人"。所以，没有对国外侨胞的人数进行调查。

29个省、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64年7月1日0时的694581759人相比，18年间共增加313593529人，增长45.1%，平均每年增加17421863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1%。

二、性别构成：29个省、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519433369人，占51.5%；女性488741919人，占48.5%。性比例（以女性为100对男性的比例）为106.3。

三、各民族人口：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汉族人口936703824人，占93.3%；各少数民族人口67233254人，占6.7%。

同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汉族人口增加285407456人，增长43.8%；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27309518人，增长68.4%。

29个省、市、自治区的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由1964年人口普查时的10个增加为15个。

四、各种文化程度人口：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中，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4414495人，具有大学肄业文化程度的（包括大学在校生）1602474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66478028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78277140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355160310人。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分别包括高中、初中、小学的毕业生、肄业生、在校生。

同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每十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416人上升为599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由1319人上升为662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由4680人上升为17753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8330人上升为35377人。

29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12周岁以上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为235820002人。同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8.1%下降为23.5%。

五、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29个省、市、自治区1981年出生人口为20689704人，出生率为20.91‰；1981年死亡人口为6290103人，死亡率为6.36‰；1981年自然增加的人口为14399601人，自然增长率为14.55‰。

六、市镇总人口：29个省、市、自治区中，居住在市（不包括市辖县）、镇的总人口为206588582人。其中236个市的总人口为144679340人；2664个镇的总人口为61909242人。与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相比，市镇总人口共增加79485541人，增长62.5%。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64年的18.4%上升为20.6%。

七、人口的地区分布：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如下：

北　京　市　　9230687人
（其中9个市辖县的人口3632715人）
天　津　市　　7764141人
（其中5个市辖县的人口2621576人）
河　北　省　　53005875人
山　西　省　　25291389人
内蒙古自治区　　19274279人
辽　宁　省　　35721693人
吉　林　省　　22560053人
黑龙江省　　32665546人
上　海　市　　11859748人
（其中10个市辖县的人口5538876人）
江　苏　省　　60521114人
浙　江　省　　38884603人
安　徽　省　　49665724人
福　建　省　　25931106人
（其中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57847人）
江　西　省　　33184827人
山　东　省　　74419054人
河　南　省　　74422739人
湖　北　省　　47804150人
湖　南　省　　54008851人
广　东　省　　59299220人
（其中东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人口暂缺）
广西壮族自治区　　36420960人
四　川　省　　99713310人
贵　州　省　　28552997人
云　南　省　　32553817人
西藏自治区　　1892393人
陕　西　省　　28904423人
甘　肃　省　　19569261人
青　海　省　　3895706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　3895578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081681人
台　湾　省　　18270749人
香港、澳门地区　5378627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4238210人

八、人口普查登记质量的抽样检查结果：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普查登记和复查工作完成后，根据《人口普查登记质量抽样检查细则》的规定，进行了质量抽查，其结果如下：

人口数：重报人口占0.71‰，漏报人口占0.56‰，重漏相抵，净差人口占0.15‰；

性　别：误差率为0.03‰；

年　龄：误差率为6.15‰；

1981年出生人口：漏报率为1.83‰；

1981年死亡人口：漏报率为4.40‰。

①台湾省人口，是台湾当局公布的1982年6月底的数字；福建省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是台湾当局公布的1982年5月底的数字。

②香港地区同胞的人数，是按香港当局公布的1982年6月底的数字推算的。

澳门地区同胞的人数，是按澳门当局公布的1981年人口普查人数推算的。

1982年工业交通建设九大成就

一、大屯洗煤厂是江苏大屯矿区的中央洗煤厂，年设计洗煤能力一百八十万吨，采用原煤混合跳汰和煤泥浮选联合工艺流程。这个厂于1979年4月开工，1982年9月1日建成投产。

这座大型洗煤厂的工艺设备，均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这个厂投产后，每天可供上海和华东地区四千多吨洗精煤。

二、显德旺煤矿是今年建成投产的大型矿井之一，位于河北省沙河县境内，是邢台矿区今年投产的第二对矿井，年设计能力九十万吨。这个矿井于1976年12月动工兴建，到1982年11月10日建成投产，比近几年投产矿井的平均建设工期缩短了两年左右，吨煤投资为一百一十元左右，比同类矿井节省投资10%以上，这个矿井田面积二十三点五平方公里，地质储量二亿多吨，主要生产优质化肥原料煤和动力煤。

三、乌江渡水电站建设在贵州乌江干流上，装机六十三万千瓦，已按计划全部提前建成投产，是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最高混凝土拱型重力坝。

乌江渡水电站是我国西南地区一座大型水电站，装有三台单机容量为二十一万千瓦的水力发电机，年平均发电量三十三亿四千万度。这项工程于1970年开工，一、二号机已分别提前投产发电；第三号机于今年12月4日投产发电。它的电力可供黔川两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使用。

四、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于1982年12月3日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这项工程全部建筑面积三十六万平方米，1979年4月破土动工，1982年6月厂区基本建成，10月即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彩色显像管。这项工程建设速度快，质量好，基本上做到了试车投产一次成功。国家验收投产时，已生产出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的十二万只彩色显像管供国内整机厂装机使用。日本朋友称赞这是“一座集世界电子技术精粹的第一流先进工厂”。

五、青藏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高原铁路，这条铁路的哈柯段(哈尔盖至格尔木)六百五十三点五公里，1982年经有关部门验收，工程质量良好，明年1月即正式交付运营。这段铁路东起青海省西宁市，沿青海湖北岸，经过天峻大草原、柴达木腹地和察尔汗盐湖，到达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它是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的终点站。将来，要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进入西藏自治区到达拉萨市。

六、济南黄河大桥是我国目前跨径最大的公路桥梁。这座位于济南市北郊的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于1978年12月15日开工，1982年7月14日正式通车。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由主桥和引桥构成，总长两千零二十三点四四米，共五十六孔，其中主桥五孔，最大的跨径为二百二十米，桥面全宽十九点五米，除两侧的人行道外，可并排通行四辆汽车。

济南是我国南北交通干道的咽喉。这座大桥的建成，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流畅南北交通，有着重要意义。

七、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技术改造是1982年7月完成的港口技术改造的一项重点工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改造后的八号码头年吞吐能力，由六十九万吨提高到五百多万吨。今年这个港的煤炭输出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秦皇岛港是我国最大的煤炭输出港。我国北煤南运的装船任务有60%是这个港担负的，80%的出口煤炭从这里起运。这个港煤炭码头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扩大了煤炭堆存场地，增加了卸货机、皮带运输机和装船机等设施，成为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煤炭专用码头。在技术改造前，装一条万吨级煤船需要三昼夜，现在只要三个多小时，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收到了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的效果。

八、云南磷肥厂扩建工程，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套大型湿法生产重过磷酸钙装置，最近试车成功，12月25日生产出了合格产品。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增产高效磷肥十万吨。

云南磷肥厂主要生产重过磷酸钙、硫酸、水泥等。这个厂扩建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磷肥供应紧张的状况将有所缓和。

九、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于今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产。这个大型石化联合企业每年生产化纤原料十三万吨。

1982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

一、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这是胡耀邦同志1982年9月1日宣布的。

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第六个五年计划。（略）

三、陈云同志强调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1982年1月25日上午在约请国家计委几位负责同志进行座谈时提出来的。

四、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超过十亿，这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1982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人口普查的结果，并指出这对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安排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

五、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又获大丰收。据赵紫阳总理1982年11月30日宣布，粮食总产量预计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1981年增产一千万吨，超过了大丰收的1979年。棉花总产量将超过六千六百万担。

六、198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上年增长7%，这是国家经委负责人去年12月29日宣布的，并指出1982年工业生产均衡发展，总产值预计完成5,540亿元。

七、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推广天津市发展集体商业网点的经验。这个经验的主要精神是敢于冲破繁琐制度束缚，大刀阔斧改革工作方法，市长到现场办公，就地解决实际问题。

八、13项科技成果每年创造价值30亿元。这是在1982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宣布的。

这13项发明是：

籼型杂交水稻；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高炉冶炼新技术；鲁棉一号；徐薯18；优良玉米自交系330；柴油机复合式燃烧系统；高炉喷吹煤粉新工艺；洛阳浮法玻璃工艺；玉米自交系“原式02”；伪倾斜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BY—2电接触固体薄膜润滑剂；橡胶防老剂IPP制备新工艺。

九、常州等28个城市由于经济发展，历年积累下来的待业人员全部就业。这是国家统计局截至1982年11月的统计。这些城市是：

江苏省的常州、无锡、南通、苏州、泰州、徐州、扬州、镇江；

安徽省的安庆、淮北、蚌埠；

山东省的潍坊、烟台、威海；

湖北省的沙市、襄樊、宜昌、十堰；

湖南省的湘潭；

广东省的潮州、佛山、江门；

河北省的石家庄、张家口；

山西省的长治；

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双鸭山；

吉林省的四平市。

十、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获很大战果。

据1982年1月至9月的统计，全国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有三万二千六百零五件，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二千五百一十二件，已逮捕一万二千六百九十八人。同时向各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六件。在此期间，全国投案自首、坦白交待违法犯罪行为的就有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四人。

（原载1983年1月3日《经济日报》）

正告台湾特务机关

正当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统一祖国的伟业尽心尽力，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台湾特务机关仍然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制造种种谣言，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煽动策划反革命活动，妄图在祖国大陆制造动乱，更有甚者，他们还直接向祖国大陆派遣特务，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危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接着，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又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这个重大决策完全符合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国外侨胞的根本利益。对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我们始终如一，坚持不渝。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就是从统一祖国的大局出发所采取的又一重要步骤。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做任何不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对于台湾方面出现的有利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气氛，我们都表示欢迎；对于台湾当局坚持分裂、反共拒

和的言行，我们虽然感到痛心，但一直采取克制态度。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即使是特务机关的人，只要不是到大陆来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特务间谍破坏活动，我们也同样热情接待，不念旧恶，不算旧帐，来去自由，保证安全。但是，我们决不能容许台湾特务机关向大陆派遣特务，搞什么勾联策反、窃取机密、杀人放火的勾当，以及通过电台广播等渠道，进行煽动和破坏。在这里，我们要正告台湾当局：靠特务活动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你们派来的特务难道还少吗？他们的结局又如何呢？殷鉴不远，应当自重。

我国刑法规定：凡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包括接受台湾特务机关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唆使，进行杀人、放火、爆炸和其他特务活动的，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按反革命罪惩处。我们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历来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于主动坦白自首的分子，我们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有立功表现的，还给以奖励。对于执迷不悟、有现行犯罪活动的分子，我们坚决依法处理，严惩不贷。

自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祖国大陆出现了空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广大青少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朝气蓬勃，积极向上。他们努力学习，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代表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台湾特务机关要想在我们年轻一代的身上打主意，纯粹是痴心妄想。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公民，既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民主权利，也有同危害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义务。他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明辨是非，同台湾特务机关和国外敌对势力的诱骗、腐蚀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祖国大陆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容破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不容侵犯。台湾特务机关如果冥顽不灵，一意孤行，一切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如果胆敢以身试法，必将在全国各族人民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粉碎！

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篇名	作　者	登载报刊
拜年	蒋子龙	人民文学 3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北方文学 8
八百米深处	孙少山	北方文学 2
明姑娘	航　鹰	青年文学 1
哦，香雪	铁　凝	青年文学 5
不仅仅是留恋	金　河	人民文学 11
种包谷的老人	何士光	人民文学 6
敬礼！妈妈	宋学武	海燕 9
女大学生宿舍	喻　杉	芳草 2
三角梅	王中才	解放军文艺 6

篇名	作　者	登载报刊
赔你一只金凤凰	李叔德	长江文艺 1
火红的云霞	吕　雷	人民文学 1
七岔犄角的公鹿	乌热尔图	民族文学 5
第九个售货亭	姜天民	青春 8
漆黑的羽毛	石　言	雨花 9
芨芨草	鲍　昌	新港 8
声音	张　炜	山东文学 5
母亲与遗像	海　波	人民文学 4
老霜的苦闷	矫　健	文汇月刊 1
远处的伐木声	蔡测海	民族文学 10

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篇　　名	作　者	登载报刊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十月 82⑥
洗礼	韦君宜	当代 82①
人生	路　遥	收获 82③
黑骏马	张承志	十月 82⑥
相见时难	王　蒙	十月 82②

篇　　名	作　者	登载报刊
那五	邓友梅	北京文学 82④
太子村的秘密	谌　容	当代 82④
燕儿窝之夜	魏继新	青年文学 82⑤
苦夏	汪浙成、温小钰	小说界 82①
射天狼	朱苏进	昆仑 82①
流逝	王安忆	钟山 82⑥
普通女工	孔捷生	小说界 82③

张铁匠的罗曼史	张一弓	十月 82①
驼峰上的爱	冯苓植	收获 82②
远去的白帆	从维熙	收获 82①
共产党人	陈祖芬	人民日报 6.28
还是那双眼睛	孟晓云、从林中	人民日报 9.13
癌症≠死亡	柯 岩	北京文学 7
刑天舞干戚	徐 迟	人民文学 5
审丑者	祖 慰	82.8 人民文学
啊,龙!	李君旭	82.3 当代
海河边的一间小屋	肖复兴	82.9 文汇月刊
足球教练的婚姻	李玲修	82.3 人生
继母	韩少华	82.6 当代

第三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金像奖

获奖作品(个人)	奖名
蹉跎岁月	连续剧一等奖
武松	连续剧一等奖
吉庆有余	连续剧三等奖
周总理的一天	单本剧一等奖
家风	单本剧二等奖
奖金	单本剧二等奖
弯弯的石径	单本剧三等奖
新来的女售货员	单本剧三等奖
矿长	单本剧三等奖
小不点儿	儿童剧一等奖
杨老师	儿童剧二等奖
人之初	儿童剧三等奖
司机王宝	电视小品一等奖
第五家邻居	电视小品二等奖
卖瓜不说瓜甜	电视小品三等奖
蔡晓晴	优秀导演
肖雄	优秀女演员奖
鲁迅(1~4集)	特别奖
上海屋檐下(1~3集)	特别奖
还愿	特别奖
史践凡(《鲁迅》导演)	特别奖
蒋宝英(《懿贵妃》主演)	特别奖
祝延平	鼓励奖
赵越	鼓励奖

1982年中国运动员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平世界纪录一览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比赛名称	日期	地点
〔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					
飞机跳伞男子个人特技	5″6	张建中	奥地利、西德、中国跳伞友谊赛	6.22	河南郑州
航空模型 F2A-27	200.055 公里/小时	赵济和	全国航空模型比赛	4.16	山东济南
F3A-54	123.34 公里/小时	南雍	河南省第5届运动会	8.4	河南南阳
F3A-54	138.195 公里/小时	南雍	河南省第5届运动会	8.8	河南南阳
F1C-44	2:23′52″	张桂生	河南省第5届运动会	8.7	河南南阳
F1C-7	6468.9 米	尹承伯	江苏省第10届运动会	8.8	江苏南京
F1C-45	117.160 公里	许兴和	安徽省第5届运动会	8.15	安徽合肥
F1C-46	4600 米	董春来	河北省第6届运动会	8.17	河北保定
F1C-45	130.904 公里	姜杰	云南省航空模型比赛	8.29	云南昆明
F3A-54	151.387 公里/小时	刘汉茂	广东省第6届运动会	9.8	广东肇庆
F3A-55	185.567 公里/小时	刘汉茂	广东省第6届运动会	9.12	广东肇庆
射击 女子手枪慢加速	593 环	高建敏	美国、埃及、中国军队射击赛	9.22	北京

	女子多向飞碟团体	400 靶	李　莉　张喜兰　刘艳香	全国射击分项赛　9.25　四川成都
	女子双向飞碟团体	436 靶	冯梅梅　巫兰英　邵伟萍	第 43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　11.13 委内瑞拉
	女子双向飞碟个人	194 靶	冯梅梅	第 43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　11.13 委内瑞拉
〔平世界纪录〕				
射击	男子小口径步枪卧射	400 环	徐小广	全国射击分项赛　9.25　山东潍坊
	女子双向飞碟个人	192 靶	邵伟萍	第 43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　11.13 委内瑞拉

（国家体委资料室供稿）

1982 年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冠军统计

项目	冠军获得者	比赛名称	日期	地点
围棋	曹大元	第 4 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3.16～20	日本东京
羽毛球男子团	中国男子羽毛球队	第 12 届国际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	5.10～21	英国
技巧男子四人单套第一套	梁建坤　陈　铁　何继东　林远向	第 5 届世界技巧锦标赛	9.8～11	英国伦敦
女子排球	中国女子排球队	第 9 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	9.12～25	秘鲁
乒乓球男子单打	郭跃华	第 3 届世界杯乒乓球赛	10.5～9	香港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	李　宁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鞍马	李　宁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吊环	李　宁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男子自由体操	李　宁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男子跳马	李　宁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单杠	李　宁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单杠	童　非	第 6 届世界杯体操赛	10.22～25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女子双向飞碟团体	冯梅梅　巫兰英　邵伟萍	第 43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	11.1～14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国家体委综合处供稿）

1982年破全国纪录分项统计

	项数		人(队)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合计	120	34	209人37队	64人20队	403	138
田径	21	8	35人3队	13人1队	60	20
游泳	14	6	18人5队	9人4队	33	14
举重	15		11人		27	
速度滑冰	4	1	6人	2人	6	2
射击	13	3	53人10队	12人4队	54	11
射箭	6	3	5人1队	1人1队	7	3
赛车场自行车	2	1	2人1队	2人	7	6
飞机跳伞	4	2	3人2队	2人1队	5	3
滑翔	1		1人		1	
航空模型	13		25人		36	
摩托艇	2		7人	5人	15	5
航海模型	4		6人		6	
潜水	21	10	37人15队	18人9队	146	74

《八十年代新一辈》获奖歌曲30首

青春进行曲	郭兆甄词		孟宪斌曲	为建设农村献青春		龚爱书词	王冠群曲
振兴中华	雷凤鸣词	赵玉枢	王锡仁曲	我穿上了新军装		仲昭理词	葛礼道曲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	郑 南词		宗 江曲	我们是千里海防的巡逻兵		何兆华词	何 仿曲
清晰的记忆	田 农词		践 耳曲	雨打芭蕉淅沥沥		任红举词	张卓娅曲
啊！闪光的团徽	秦庚云词		李承道曲	美丽的白莲		曾宪瑞词	王俊杰曲
母亲的歌	李幼容词		肖 江曲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叶延滨词	刘天礼曲
我爱祖国			吕远词曲	年轻的留学生去远行	童立奎	邵凯生词	王成瑞曲
火红青春献祖国	孙恩林词		张建国曲	网上流星		茅晓峰词	王更茂曲
年轻的朋友唱一支歌	瞿 琮词	沙 石	治 中曲	浪花，请你告诉我		曾泉星词	吴 贤曲
汗水浇出新生活	高 深词		徐肇基曲	彩色的河流		任卫新词	张丕基曲
什么是美	钟国杰词	陶 克	贺志怀曲	辽河从我家门前流		胡宏伟词	龚荣光曲
礼貌歌	夏劲风词	李 正	雪 冰曲	家乡的小河		义·巴德荣贵词	任义光曲
我是个采煤的黑小伙	张枚同词		刘德坤曲	我爱大自然		晓 光词	白诚仁曲
你说这该感谢谁	夏劲风词		孙承骅曲	草原唱晚		张东辉词	杨正仁曲
人到山寨不想走	韩乐群词		陈小沛曲	在希望的田野上		晓 光词	施光南曲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3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讲话："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1月10日　《刘少奇选集》上卷在全国发行。选集收入了刘少奇建国以前重要的讲话、文章、书信和电报38篇。

1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查处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国家财产窃为己有违法犯罪行为。指出对其中情节严重，担负重要职位的，必须依法逮捕，加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在内外销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出口比重；大胆利用外资，积极引进技术，对现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展沿海同内地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改革沿海省、市、自治区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1月19日　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部顾问组组长王观澜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就婚姻家庭问题在一份材料上写的批语道：家庭仍是我国社会的细胞，我们对婚姻家庭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发展。对婚姻家庭问题不但要用正确的法律去约束，还靠社会舆论去引导。社会舆论，即社会的道德风尚力量，比起法律来，大得不可估量。建议妇联联合共青团、工会、文化团体、教育界把这件事抓起来。抓它十来年，出现一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家家和睦、人人相爱的新局面。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妇联十八日约请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新闻机关等三十六个单位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研究在婚姻问题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月24日　李先念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致祝词说，1982年要抓好两件事：一是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要严肃处理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重大犯罪案件，首先要认真查处那些与负责干部有牵连的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

1月31日　共青团中央作出决定，今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队章学习，让年满七周岁并愿意加入中国少先队的小朋友，全部戴上红领巾。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报告》中规定：每年三月为"文明礼貌月"。报告说，"五讲四美"活动，一九八二年主要抓好三件事：(一)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二)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三)服务质量要提高，解决一个"差"字。

2月1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说，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2月24日　赖际发逝世，终年七十一岁。赖际发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共党员，生前曾任建设材料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国家建委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2月2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十六个单位发出《动员起来，扎扎实实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搞好》。二月十二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在中央电视台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人人讲清洁，人人讲秩序，人人讲礼貌，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清洁美丽。同日首都党政军民学二百多万人走上街头，打扫卫生，维持交通秩序，宣传文明礼貌，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以浩大的声势和扎实的行动揭开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序幕。三月一日全国各大城市分别有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参加了这项活动。

3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八〇年六月决定，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开始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国务院颁发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办法》。

3月8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决定国务院设国务委员若干人。国务委员的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是国务院常委会议组成人员。决议决定，将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将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并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主任。

同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三月九日发表)、《关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决定》(同日发表)，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三月十日发表)，决定从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起执行。

3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颁发了《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规定要求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遵守，并动员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来监督、检查本规定的执行。

同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并于四月十日公布实施。

3月25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招摇撞骗、伪造公文案主犯陈梦彪有期徒刑十二年，分别判处从犯冯云鹤、秦奎云有期徒刑三年、二年。陈梦彪自一九七八年二月以来，伙同冯云鹤、秦奎云采取欺骗手段，成立所谓"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糠醛综合利用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等机构，自任负责人，冒充"共产党员"、"司、局级老干部"，私刻公章，伪造公文、信件，大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

3月27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中国财贸报》前负责人李光诒的上诉，维持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李光诒犯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原判决。一九八二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和会议之间，李光诒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程以及提交会议审议的文件内容和讨论修改情况的重大机密，泄露给外国人。他还向外国人泄露了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的一些机密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重要机密，使国家蒙受了损失。

4月2日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阴法唐在西藏统战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国参观、探亲和定居，保证行动自由。

4月3日　原中共广州市电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维经，伙同其妻王敏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王维经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王敏病亡，依法终止审理，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五日就此事发表题为《发人深思的教训》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要争取党风有个决定性的好转，就一定要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越是涉及大人物、大机关的大案件，越要抓住不放、从严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特别是占据重要职务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予以严厉制裁。

4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和组织，包括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论他的职位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决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

同日　我国第一个公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由国务院正式发行，同日起施行。

4月18日　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86岁的范寿康，由台湾经美国飞抵北京，回国定居。

4月22日～5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审议了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决定：将国家经委、国家农委、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总局、国家计量总局、专利局合并，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将农业部、农垦部、国家水产总局合并，设立农牧渔业部。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国家测绘总局合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将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合并，设立机械工业部。将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国家编制委员会合并，设立劳动人事部。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合并，设立文化部。设立广播电视部，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

4月26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沙千里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4月27日～5月2日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通过了《全国职工守则》，以此作为全国职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5月2日，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与会全体代表。

4月28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企业职工从事不正当经济活动牟取额外收入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职工不得借故请假，甚至旷工或利用业余时间私揽外活，私自受聘承担外单位工作；不得使用企业的设备、能源和原材料，或利用企业的供销关系和科研成果，从事本企业规定以外的任务；不得从事个体经营、贩运、倒卖工农业产品等活动。

4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第一所集体所有制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最近在北京成立。

5月4日　国务院提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制订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强对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5月6日　《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共产党员腐化变质的部分论述》发表，《人民日报》为此加了编者按语。

5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参事室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程占彪，追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欺骗组织，纵容女儿和已有妻室儿女的香港资本家姘居，做资本家的姨太太；并利用职权，为其女儿骗取去港手续。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将他开除出党。中纪委就此事向全党发出通报，号召共产党员同一切经济犯罪活动和腐化变质行为作坚决斗争。

5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安机关近年来破获一批国民党特务案。被台湾当局派遣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先后落网，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同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正告台湾特务机关》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正当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统一祖国的伟业尽心尽力，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的时候，台湾特务机关向祖国大陆派遣特务，从事颠覆活动，危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安全，很不得人心。台湾特务机关如果冥顽不灵，一意孤行，一切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如果胆敢以身试法，必将在各

族人民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粉碎!

5月26日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沿海和内地划分问题的通知》。指出沿海地区的范围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西、广东11个省、市、自治区(台湾回归祖国后也应包括在内)，其余18个省和自治区则称为内地。

5月29日　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邀请回国访问。邓小平、叶剑英于5月31日会见了他们。

6月1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准了武汉、合肥、南宁三个城市提出的总体规划，原则同意这三个规划中提出的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国务院在此以前曾批准了唐山、呼和浩特、兰州、长沙和沈阳市的总体规划。

6月16日　四川省甘孜县西北地区发生一次六级地震。

6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国务院决定，由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经济合同。

6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完毕。各地人民政府给每个被宽大释放人员发了钱和衣物，回家的发足路费;无家可归的，有关部门已妥善安排。

7月1日　今日零时，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正式开始。五百万人口普查人员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人口普查登记。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征集党史资料和革命历史文件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到目前为止，已征集到革命历史文件资料一万多件，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书信、起草文件的手稿和日记等两千多件。征集到的文件中还有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手稿、信件。

7月10日　第三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沈阳闭幕。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好将从十月一日开始试行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把民事审判放在和刑事审判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适当充实民事审判干部，采取各种方法提高他们的水平，以进一步作好民事审判工作，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四化建设服务。

7月10日～24日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指出:新时期的政法工作，必须在加强维护人民民主职能的同时，坚持和加强专政的职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他说，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归根到底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当前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是要坚决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7月24日　全文公布廖承志致蒋经国信，并用电报发往台北。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信中最后说:“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湾探望。”

7月25日　从西安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505班机，在飞临无锡上空时，遭到5名歹徒暴力劫持，机组人员在旅客的协助下，机智勇敢地战胜了劫持者，使飞机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5名歹徒全部被抓获。8月19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将5名反革命劫机犯执行枪决。

7月27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广大党员的意见，对化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原北京市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杨义邦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核实材料后作了处理，决定给予杨义邦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在党内的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原任的各种职务，另行分配工作。8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给予杨义邦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决定，撤销其化学工业部副部长职务。

7月31日　朱德的文章:《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九六二年六月)发表。

8月6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全会通过了分别给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表达全党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同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职工广泛、深入地开展向赵春娥学习的活动。赵春娥是全国商业特级劳动模范、河南省劳动模范、模范共产党员、洛阳市老集煤场工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很不平凡的事迹。

8月12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海军西沙中建岛守备队以“爱国爱岛天涯哨兵”的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中建岛守备队的同志学习，同心同德，保卫边疆。

8月17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1950年5月至1957年6月间给亲友等的5封信。这些信的中心内容，着重说明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亲友以及家乡谋取私利和特殊的照顾。

8月25日　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原台湾国民党空军U－2型飞机少校飞行员叶常棣、张立义回台湾探亲，与亲人团聚。叶、张分别于1963年11月和1965年1月驾驶U－2型飞机窜入大陆，为美蒋搜集情报，被我空军部队击落生俘。他们被俘后，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叶常棣是某工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张立义是某航空学院工程师。

经 济

1月1日　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农业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产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政策问题作了规定。强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决定自1982年起，用二、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完善经济责任制；加强劳动纪律；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并发出通知，指出《条例》的根本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

1月8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要求：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的零售价不得提高；一、二类日用工业品不搞议价；一、二类农副产品，在未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之前，不议价成交或上集市出售。

1月1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1月13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粮食管理办法》。自1982年粮食年度起实行。办法规定：参照最近几年的实绩，结合今后粮食生产发展和征购、销售变化等因素，协商确定各项包干数字；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确定以后，一定3年不变；在正常年景下，国家基本上不再向农村供应粮食。

1月18日　国务院发布1982年国库券条例。决定1982年国库券发行总额40亿元，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国库券的还本付息，自发行后的第6年起办理。1982年实际发行国库券43.8亿元。

同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的决定》。提出：技术改造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适合我国资源条件、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又能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先进技术，不能片面求洋、求新。

1月20日　开始于上年10月中旬的引黄济津任务，胜利完成。天津收黄河水4.5亿立方米。这是在豫、鲁、冀、津三省一市军民团结协作下完成的。

1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有计划地全面整顿企业》。指出：全面整顿，是对企业进行综合治理，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端正党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

1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经济效益提高。1981年，钢铁产量比1980年减少36万吨，全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9%，但上缴利润却比1980年增长8.7%。1981年8～12月，每月利润都在3000万元以上，比实行经济责任制前增加28%。平均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增长10%，达到38.2元，产值利润率由1[illegible]年创造的历史最高水平34.3%上升到38.3%。在国内10大钢铁联合企业中名列第一。

2月1日　国家计委等单位印发《1982年更新改造措施计划安排意见》。提出：从1982年起，把更新改造措施纳入国家计划；"六五"期间，继续实行由中央财政集中企业30%折旧基金的办法；采取措施使企业掌握的折旧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能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2月10日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二江电站第3号发电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单机容量为12.5万千瓦。这个机组的投产，使葛洲坝二江电站的装机容量达到46.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24亿度以上。

2月11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指出：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是有利的。

2月13日　国务院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制定实施办法，对村镇建房用地限额和审批权限作出规定，及时订出宅基地面积标准，坚决刹住乱占滥用耕地之风。

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的社论。指出：这场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大问题，非搞不可。在此之前，广州、福建、辽宁、河南等地都查出了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2月20日～3月4日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确定1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为首批全面调整企业单位。会议提出要把完善经济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赵紫阳在会上发表题为《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强调提高经济效益是根本出发点，从指导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3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和有关政法部门，在安阳查获一起倒卖汽车的重大案件。主犯陈希海、曹振山从1979年12月至1981

年3月，先后倒卖汽车758辆，摩托车72辆，拖拉机29台，牟取暴利130多万元。陈、曹等从中贪污、挥霍48万元。陈、曹二人已于1981年9月10日被依法逮捕。

3月4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清查偷漏欠税情况和加强税收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要强化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不得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减免税收。

3月9日　《人民日报》介绍常州市发展工业的经验。1966—1980年的15年中，江苏常州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3%；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0.3%。

3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从1979年到1981年3年间，国家用于粮油补贴的支出共300多亿元。国家每向城市居民供应1斤粮食，要补贴约1角钱；每供应1斤食油，要补贴8角钱左右。

3月1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性专业公司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指出：全国性专业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实体。不套用行政管理级别、不列入国务院行政机构序列。

同日　国务院发布《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

3月20日　据财政部初步统计：从1979年至1981年的3年间，国家用于增加城乡人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已达1400多亿元，占这3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1%。其中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442亿元；减轻农村税收负担78亿元；农用柴油、农业用电和肉、蛋、禽等价格补贴341亿元；增加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300亿元；城镇职工住宅竣工面积2.2亿平方米，增加开支152亿元；大中城市从工商企业利润中提取5%的资金用于城市公用设施的维护和建设28亿元。

3月29日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三年来城乡人民购买力提高43%。农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但绝对金额城镇仍高于农村3倍。

4月1日　经国务院批准，从本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储蓄存款利率，主要为扩大存款计息范围，提高定期存款利率，增设8年长期储蓄存款的档次以及提高贷款利率。

5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实行联合和改组的专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最近在北京成立。同时，原来主管造船工业的第六机械工业部即行撤销。7日，第二个跨行业跨地区的专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在北京成立。

5月14日　国务院公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禁止直接向农村社队购地、租地或变相购地、租地。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同时对征用土地的程序、审批权限、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5月28日　新华社报道：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特区最近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筹措资金建设赤湾港。

6月2日　新华社报道：据国家统计局对28个省、市、自治区(缺西藏)568个县的18529户社员家庭收入的调查表明，按人均纯收入计算，1979年比1978年增加26.6元，1980年比1979年增加31.1元，1981年又比1980年增加32.1元，达到223.3元，三年增加收入89.8元，相当于1957年到1976年20年中所增加收入的2.24倍。

6月16日　我国第一个跨部门的仓储公司——大连仓储联合总公司成立。它将改变过去由于分散管理造成的库场利用率低的状况。

同日　我国第一座跨径为200米的斜拉桥——上海泖港公路大桥正式通车。该桥位于上海市松江县黄浦江上游支流泖上，桥长391.8米，只有1孔，跨径达200米，桥面宽12米。

6月17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指出：要继续发挥基层供销社的作用；继续执行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的原则。积极开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新途径。

6月18日　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确定，今后在不改变现行征订包销形式的情况下，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允许出版社开设自办与合办的图书门市部，设立特约经销处以及开展邮购和流动供应图书的服务工作。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以方便读者购书。

6月19日　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20年设想和"六五"计划》的汇报。关于今后20年的设想，前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达到5%至6%的速度；后10年达到8%至9%的速度。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8000亿元，比1980年的7000亿元翻两番。

6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正式批准我国第一个部分利用世界银行无息贷款的农业建设项目——华北平原农业项目。项目包括治理山东齐河、陵县、禹城，河南商丘、宁陵、民权，安徽涡阳、濉溪、蒙城9个县的约300万亩盐碱、易涝地，共投资3.5亿元。其中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提供无息贷款占全部投资的34%，其余由省、地、县的地方资金及社队的劳力解决。

6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商业部为满足农村市场需要，决定对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15种工业品，自今年起从上到下单列指标供应农村。

7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国外历来认为不能种植橡胶的北纬17度以北的地区，我国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获得橡胶树北移种植成功。现已建成以海南岛、西双版纳为主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1981年全国橡胶总

产量达12.8万吨，居世界第6位。

7月11日　新华社报道：铁道兵部队从1954年开始投入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以来，28年共建成铁路1.3万多公里，相当于全国解放以来新建铁路总长的三分之一。

7月14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的请示》。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各专业总行在有关业务方面受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

同日　我国目前跨径最大的桥梁——济南黄河公路大桥正式通车。大桥总长2023.44米。主桥长488米，有5个孔，其中最大跨径为220米，桥宽19.5米，其中行车道15米，可并行4辆卡车。桥面能够通过218吨的大型平板拖车。

8月8日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情况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晋西北、鲁西北、豫东、豫西、鄂西、陕北、陕南和四川边远地区、贵州边远地区、云南边远地区、甘肃中部地区、宁夏西海固地区等12片低产缺粮的贫困地区，社员收入水平稳步上升。1978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为51.5元，1981年达到82.6元，增长了60.4%。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重型机器厂和北京钢铁学院通力协作奋战十年，建成世界上最大的200吨级大型电渣重熔炉，表明我国的电渣重熔技术已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同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我国农轻重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①在发展速度上，农业、轻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其中农业年均递增5.6%，轻工业递增14%，都远远超过同期重工业年均递增1.4%的速度。②在比例关系上，农业、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7.4%上升到1981年的63.5%，而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由42.6%下降到36.5%。③在产品结构上，轻工业、重工业适销对路的产品连年增产。农业进步更快。

8月9日　国务院发布《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废止1962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8月17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广东、福建两省进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货内流的暂行规定》。

8月19日～2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1981年国家决算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通过并批准了关于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

8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前期建设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这座核电站的装机容量为电功率30万千瓦，采取压水型反应堆，各个系统和设备参数与国外同类型同规模的核电站相当。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1981年度，共有560个商品粮县交售商品粮在5000万公斤以上，占全国县级单位总数的1/4强。其中250多个县是近几年新涌现出来的。

8月28日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1年每百元费用支出得到的纯收入为218.4元，比1977年增加37.4元，而经济效率提高20.7%，扭转了我国农业经济每百元费用支出得到的纯收入一直下降的趋势。

外　交

1月1日　中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定，铁路合作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

1月12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11日单方面向台湾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所谓防御物品的决定提出强烈抗议。

1月15日　中国政府同布隆迪政府文化协定在京签订。次日和赤道几内亚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在马拉博签订。

2月2日　中国代表团团长梁于藩在联合国大会第九次紧急特别会议上，谴责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敦促联大宣布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的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并给予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

2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条约》在京签订。

2月10日～3月16日　中国和苏联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我国黑龙江省黑河市举行第24次例会。双方就讨论的大部分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会议纪要。

2月11日　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方面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挑衅和入侵运动。

2月17日　赵紫阳总理在会见包玉刚先生时说，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下来了，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当前关键的问题是提高工作效率。所以，我们要进行机构改革。

2月18日　中国代表团团长顾以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强烈谴责苏联、越南侵犯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的人权的罪行。

2月22日　中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潘寿昌在“新德里磋商”（南南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努力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

2月22日～28日　摩洛哥王国政府首相马蒂·布阿比德对我国正式访问。邓小平在会见布阿比德时说，我

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建设精神文明，消除外来不利影响。赵紫阳总理同布阿比德举行了会谈。两国政府签订了文化协定。

2月23日　中国代表团顾问申健在“新德里磋商”会议(南南会议)上提出开展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第一、南南合作应该坚定不移地朝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向努力，并按照平等互利、互相照顾的原则进行。第二、南南合作的总规划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使参加合作的各方面都能受益，并且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困难，给予优惠照顾。第三、合作的项目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力求切实可行，讲究实效，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共同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第四、区域性和全球性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应该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第五、南南合作应该有助于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1月23日　第三十二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闭幕。中国动画片《三个和尚》在短片电影比赛中获柏林银熊奖。中国的彩色科教影片《蓝色的血液》，在柏林第十二届农业电影比赛中获金穗奖(金质奖)。

2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就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互致信件。

3月5日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关于互免海运、空运企业运输出入税收的协定在京签订。

3月8日　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最近出动炮艇袭击中国渔船，酿成严重流血事件。照会要求越南当局立即交还被劫走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停止挑衅活动。

3月15日　中国外交部向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发出照会，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允许台湾设立甚至同台湾互设带有官方性质的代表机构，以及同台湾进行官方性质的来往。照会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把台湾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活动。

3月26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3月24日在塔什干群众大会上攻击中国的政策的同时，声称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指出：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同日　中国同瓦努阿图共和国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4月14日　我国外交部就美国政府13日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与军事有关的价值6000万美元的用于台湾的美制战斗机上的零配件，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4月12日～17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访问我国。16日，中罗两国签订了关于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合作的长期纲领协定。

4月17日～24日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革命委员会主席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一行访问我国。赵紫阳总理与其会谈时介绍了我国对外政策的三个基本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协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5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利比亚国家元首多伊时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现在要发展经济，还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

5月7日～9日　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正式访问我国。两国政府就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开诚布公地进行了讨论。

5月31日～6月5日　赵紫阳总理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日本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同日本总理大臣铃木善幸举行了会谈。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赵紫阳总理提出并阐述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地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得到铃木总理和日本政府的积极响应。

6月3日　荷兰共产党主席亨克·胡安斯特拉和夫人应邀来我国访问。胡耀邦在会见他们时重申发展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6月5日～13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抵纽约出席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11日，黄华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提出了有关制止核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的主要措施。

6月12日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艾蒂安·达维浓一行访问我国。16日，赵紫阳总理会见他们时说，继续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既定方针。

7月26日　我国外交部肖向前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在审定历史课本中篡改侵华历史的错误。29日，日本文部省官员约见我驻日公使王晓云，为日本篡改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辩解，王公使当即予以驳斥。8月28日，中国吴学谦副外长又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纠正错误。9月18日，吴副外长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时指出，日本政府6日提出纠正教科书错误的措施同过去相比前进了一步。对于铃木首相表达的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和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这个问题的决心，表示赞赏。

8月6日　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邓小平向客人介绍说，最近两年半的实践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以农村形势的变化，说明我国的政策在很大范围内见效了。其次，在工业、商业等方面也取得了好的效果。现在关键是培养人才问题。近来还抓了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事，要把我国人民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8月23日　胡耀邦在会见亨利·华雅社长率领的法新社代表团时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两条基本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文　化

1月12～17日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到7月1日止正式进行普查。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报：1982年全国人口为1031882511人。男性519433369人，占51.5%；女性488741919人，占48.5%。汉族人口936703824人，占93.3%；各少数民族人口67233254人，占6.7%。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高等院校从今年起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国务院批准首批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共458所。

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的电火箭首次进行空间飞行试验成功。这是继美、苏、日之后，我国也有了这种新型空间微推力电火箭。

2月3日～5日　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会议表彰了449名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52个先进集体，并向他们颁发了奖状、奖章和证书。会议给全国大、中学生发出了《争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的倡议书。

2月13日　卫生部召开的绒癌研究成果鉴定会宣布：我国在治疗恶性程度很高的一种妇科肿瘤——绒癌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3月15日　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布《聘请科学技术人员兼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凡中、高级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接受外单位的临时聘请。同时，还颁发了《实行科学技术人员交流的暂行办法》。

4月2日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接受1982年“但丁国际奖”。“但丁国际奖”是1979年意大利卡森蒂诺研究院为纪念意大利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而设立的荣誉奖，每年评选一次。

4月3日　国家农委、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授奖大会，授予220项重大农业科技项目“农业科技推广奖”，并颁发了奖状、奖励证书和奖金。

4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首次研制的中短程运输机——“运七型”客机，最近完成了全部试验、试飞项目。该机装有两台涡轮桨发动机，最大航程为1900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为478公里，起飞总重量为21.8吨，可坐48～52名乘客。

4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证明：我国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是我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奠基者。他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公元263年对东汉初期著名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所作的注，他的数学理论是完整的。晚于刘徽约200年的南朝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在数学上的重要成就，是在刘徽建立起来的数学理论的基础上获得的。

5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不久前，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了距今40—50万年的猿人化石，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的空白，而且对了解北京猿人，安徽和县猿人同东北古人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研究第4纪哺乳动物群的分布和古地理、古气候也有重要意义。

5月21日　中国羽毛球队在伦敦夺得第12届国际羽毛球锦标赛(汤姆斯杯)冠军。

5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于1939年至1949年给文艺界人士的15封信。信中谈到文艺的战斗作用，文艺工作者应多参加群众性活动，谈到文艺的普及、旧剧的改革。

5月31日　我国地学工作者杨联康，徒步考察完黄河全程后到达黄河入海口。杨联康是从1981年7月21日开始从青海省黄河发源地徒步考察黄河的，历时315天，行程5500多公里，是我国徒步考察黄河全程的亘古一人。考察中，他收集了有关黄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6月1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最近发布命令，授予为保护遇险民兵而英勇献身的人民武装干部郭俊“舍身救人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6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首次在世界上成功地把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一种乙型肝炎病毒——ADR亚型基因组转移到细菌中无性繁殖，并一次获得158株带有乙型肝炎病毒

ADR亚型基因组的菌株。这一成功,为我国今后独立自主地用遗传工程手段进一步研制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进而生产乙型肝炎疫苗,打下良好的基础。

6月19日～25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作的关于文联会务工作的报告。讨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草案)。讨论并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公约》。胡乔木在会议结束时重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会议决定增补朱穆之、吴冷西、舒同、胡风等九人为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同时决定设立中国文联书记处,由赵寻任常务书记。

6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科研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同外省市进行科技协作和科研成果有偿转让。其主要形式:①向外省市直接转让科研成果;②承接外省市委托的科技攻关、试制新产品的任务;③向外省市提供新设备和成套技术;④向外省市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

6月30日　国务院发布《水土保持工作条例》。对于水土流失的预防、水土流失的治理、教育与科学研究、奖励与惩罚等问题作了规定。

7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工作最近结束,有8562人荣获硕士学位。其中高等学校培养的有6992人,科研机构培养的有1570人。

7月22日～29日　国家劳动人事部召开全国社会科学各种业务技术职称评定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指出,到目前为止,国务院颁发了编辑、外语翻译、新闻记者、经济、统计、会计、图书档案资料、研究人员、体育、播音10个职称条例,还有一些条例正在制定中。全国已有9000多个单位进行了试点,初步评定或正式授予了近12万名社会科学各类业务技术干部职称。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空间科技,20多年取得显著成绩,先后发射11颗不同类型的试验卫星,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卫星发射场和地面观察控制网。

8月1日～10日　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订了《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条例(试行)》和《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给417个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和24名先进个人颁发奖状。

8月10日～16日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8日,赵紫阳总理在接见会议代表时指出,控制人口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8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从去年11月底开始进行的我国首次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工作最近结束。全国共有54所高等学校、15所科研机构,招收了420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3年

导　言

1983年，中国人民乘着十二大的东风，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党内出现了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深入进行整党斗争。与此相配合，全国掀起了一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斗争。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美关系中的湖广铁路债权案与胡娜事件**
- **卓长仁劫机事件始末**
- **邓小平纵论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
- **《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
- **中英谈判香港问题**
- **严打斗争深入开展**
-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整党**
- **击毙二王始末**
- **中国男子体操队艺震布达佩斯**

中美关系中的湖广铁路债权案与胡娜事件

背景介绍

中美建交以来，关系发展较为平稳。但里根总统上台后，执行其所谓对华强硬政策，先后制造了“湖广铁路债权案”、“胡娜事件”等一系列不友好事件，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障碍。

材料：

- 湖广铁路债权案
- 胡娜事件

材料一　湖广铁路债权案

1979年11月，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人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清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竟然受理此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并向我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判决”。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照会美国务院，申明中国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豁免，不受任何外国法院审判；中国政府对历届反动政府的旧债概不承认，也不承担偿还的义务。但该美国地方法院置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于不顾，竟于1982年9月1日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偿还4100多万美元。美方并声称，如中国政府对美国法院的判决置之不理，原告将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上述判决，扣押中国政府在美财产。

1983年2月2日，吴学谦外长向美国务卿舒尔茨递交备忘录，指出，恶债不予继承是国际法久已公认的一项原则。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是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的产物。对于这类旧外债，中国政府理所当然不予承认。

备忘录指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美地方法院对另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的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完全违反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国政府坚决拒绝。如果美方无视国际法，强制执行上述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材料二　胡娜事件

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以所谓“政治庇护”。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于4月6日向美驻华大使递交照会，对美方经过长期策划、蓄意制造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指出，中国方面对胡娜过去不存在、即使她回国后也不存在进行迫害的问题，至于强迫胡娜加入共产党之说更纯属谎言。美国政府这次宣布的决定，以根本不存在的胡娜受迫害为借口，从而使胡娜父母无限期地遭受骨肉离散之苦，不仅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在道义上也应受到谴责。

4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由于美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中美两国体育交流的正常气氛，决定停止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同日，文化部宣布停止执行1982年和1983年中美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

卓长仁劫机事件始末

背景介绍

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飞机在沈阳飞往上海途中，被卓长仁等六名武装暴徒劫持。机上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飞机被迫于当日在南朝鲜汉城附近的春川美军军用机场降落。

材料：

- 中国代表团赴汉城谈判劫机问题
- 卓长仁劫机案的同案犯被判徒刑

材料一　中国代表团赴汉城谈判劫机问题

当日，我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南朝鲜当局应立即把飞机连同全体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交还中国民航，将劫机犯交给我方处理。他并宣布，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拟前往汉城处理此事。

5月7日　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领工作组抵达汉城，接运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处理这一劫机事件。

5月8日　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在汉城发表声明说，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上的旅客、机组人员和被劫持的飞机即将返回中国。并指出六名劫机罪犯理应交还我方依法惩处。

5月10日　被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共95名，本日下午由汉城回到上海。中国方面对六名罪犯未被交还保留进一步交涉权利。

5月11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民航局本日在虹桥国际机场大礼堂联合举行慰问大会，慰问296号客机旅客和机组人员，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赞扬他们热爱党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是非分明，立场坚定。

5月18日　被武装暴徒劫持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本日中午由汉城返抵北京。被暴徒枪击重伤的机组人员王永昌随机回国，他愤怒控诉暴徒劫机杀人罪行，要求南朝鲜当局把劫机罪犯交我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国务院发布嘉奖令，授予中国民航296号机组以“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分别给予机组9名同志记功、晋级。

南朝鲜汉城刑事地方法院于8月18日宣判，判处卓长仁6年徒刑，姜洪军和王彦大各5年徒刑，安子建、关云飞、高东萍各4年徒刑。汉城检察院认为判决过分宽大，要求对卓长仁为首的6名罪犯判处7—10年徒刑，并正式提出抗诉。汉城高等法院于12月20日再次开庭，审判结果，维持汉城刑事地方法院的原判。根据南朝鲜法律，大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中国有关人士对南朝鲜当局不按照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严惩劫机罪犯表示不满。

在这次事件中，台湾方面积极活动，力求保护卓长仁等六犯。竟对此判决感到“过重”。时过不久，台湾与南朝鲜方面秘密勾结，于1984年8月13日提前释放了卓长仁等六犯，并以所谓政治原因把六犯送到台湾。卓长仁等到台后，受到台湾党政要人的“热烈欢迎”，并被冠以所谓“反共义士”称号，得到了金钱、“名誉”。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两岸关系缓和，“反共义士”再也不吃香了，卓犯等人好逸恶劳，竟以绑票勒索钱财，终被抓获并判无期徒刑。台岛上下闻此无不愕然。真是：卓长仁等贼心不死，台湾方面自作自受。

材料二　卓长仁劫机案的同案犯被判徒刑

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逃往南朝鲜的犯罪集团的另外3名共犯吴英俊、杨杰、关键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吴英俊，男，22岁，原是沈阳市电表厂工人。杨杰，男，28岁，原是辽宁省标准局汽车司机。关键，男，26岁，原是辽宁人民剧场汽车司机。3名罪犯于1983年2月至5月先后数次与卓长仁、姜洪军、安子建、吴云飞、王彦大、高东萍6犯共同策划劫持中国民航客机，积极参与劫机出逃前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为了把枪支带上飞机，吴、杨、关3犯于3月24日随同卓长仁等人进行了一次登机试验。3月27日，杨杰驾驶汽车载着卓长仁等人携带盗窃来的4支手枪、50余发子弹，到由杨杰联系的某靶场打靶，试验枪支。4月初，王彦大把骗来的剧毒品氰化钠交给卓长仁，卓又分别把准备实施投毒杀人的氰化钠交给姜洪军和吴英俊。姜洪军、安子建临出逃前将一部分氰化钠投入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院长办公室内的暖瓶、水杯和食品中。5月5日凌晨7时，关键按卓长仁的授意，用轿车将高东萍送往机场，卓长仁在机场将他开去的另一辆轿车和一支手枪交给关键藏匿。卓长仁一伙检票登机后，关键才离开机场。之后，关键、杨杰共同把手枪隐匿在关键家的组合录音机内。

吴英俊、杨杰、关键3名罪犯积极参与劫机犯罪活动，致使卓长仁等6名罪犯劫机犯罪得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和极坏影响。

1983年5月，3名罪犯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10月

1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文，以破坏交通工具、投毒罪，判处吴英俊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破坏交通工具罪，判处杨杰、关键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柯葛壮）

邓小平纵论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

背景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确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对台的"九点建议"。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具体阐述了对台政策。

材料：

· 邓小平与杨力宇谈台湾统一问题

材料　邓小平与杨力宇谈台湾统一问题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1983年6月26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到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邓小平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邓小平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他说：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利，条件是不能损害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邓小平指出，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邓小平说，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九条"的内容和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消除误解。

邓小平对杨力宇教授1983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表示称赞，说：你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邓小平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的。如果他们能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以及一切致力于中国统一事业的人，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

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安定团结。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邓小平同杨力宇教授的谈话发表后，在国外和香港等地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各大通讯社和美国、日本、泰国、印度以及香港的许多报纸，在谈话发表后的几天内相继发表评论，普遍认为这是关于台湾问题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它表明中共真诚希望大陆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这是继叶剑英于1981年9月发表"九点建议"之后，北京方面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完整的见解，将"九点建议"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了，是至今为止阐明北京对台湾问题最权威、最明确的谈话，它将加强对台政策的号召力。同杨力宇这样的亲台湾国民党的著名学者交换意见，证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要探索大陆同台湾和平统一的途径；要不是杨力宇先对报界公开了谈话内容，北京方面还不见得会发表。所以说，发表这次谈话不含宣传用意，更谈不上什么"统战阴谋"。各国和香港舆论认为，邓小平的最新谈话，充分表达了北京的诚意。为了民族利益，实现国家统一，台湾的疑虑可以消除了。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发表关于台湾回归问题的讲话，引起台湾公众强烈反响。一些报刊先后以不同方式详细披露了邓小平讲话的全文。9月5日台湾民社党办的《民权通讯》，根据杨力宇的谈话，逐条刊载了邓小平提出的"和谈六方案"；9月号地方势力主办的《公论月刊》，按照《人民日报》7月30日所载，以"研究分析"的形式逐段登载邓小平的讲话；9月号国民党党外人士办的《夏潮论坛》，以《中共和平统一新构想》为题，报道了杨力宇所阐述的邓小平讲话的主要内容。

1983年12月《中国导报》周刊，刊登了署名鲁法周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国事提出几点建议》。文章说，中国统一问题已到了非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台湾各界都在为国家统一而着急，不能一拖再拖，希望早日完成统一是台湾民意。文章对"国事"共提出8点建议。作者首先建议台湾当局对中共的称呼，不要再谩骂。"应该礼尚往来，不要再以不当词句相称了"。文章着重建议"时机成熟，早

日统一”。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统一的问题，全岛上下，都在为国家统一而着急。可说是中国统一这个问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走到社会各阶层，大家都在说，‘早该统一了，不能再拖了！拖不下去了！’”

《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

背景介绍

为了用正确的思想指导四化建设，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于7月1日出版发行。

材料：

·《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

材料 《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

《邓小平文选》于1983年7月1日在全国发行。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我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光辉论著，对于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文选》收入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到1982年9月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

《文选》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统战、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1)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2)排除干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3)认识国情，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4)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视科学和教育事业；

(5)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6)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7)建立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

(8)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10)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文选》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选》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

二、《文选》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决策作用。《文选》是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突出作用的纪录和佐证。

三、《文选》汲取了集体的智慧和总结了群众的新鲜经验。在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和阐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集中了党的集体智慧，反映了群众的利益。

四、《文选》对当前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有助于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更好地从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提高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自觉性。

五、《文选》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新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全国各地群众踊跃购买、阅读“邓选”。截至7月1日，“邓选”印数已达1221万册。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各级党委要坚强对学习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的出版引起海外舆论的重视。各国报刊普遍对《邓小平文选》给予高度评价。许多评论指出，近几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改革者”，“是中国毫无争议的领袖”。他“有一项有条不紊的、有说服力的计划来使中国具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见解使中国摆脱了一些僵硬的做法，“决定着中国所采取的方向，已载入中国的宪法”。因此，《邓小平文选》的出版“对当今中国的政治有着直接影响”。

中英谈判香港问题

背景介绍

自从1842年《南京条约》后，英国强占、强租我香港、九龙和新界。建国后，中国多次表示，要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收回香港。“一国两制”的提出，为中英谈判打开了大门。

材料：

·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

材料　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

7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英双方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于7月12日在北京开始。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引起香港报纸和英国朝野不少议论。其实，香港问题很简单，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不受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过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同英方人士和其他外宾谈到香港问题时，以及1972年3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主席的信件中，都一再重申了上述立场。

最近几年，特别是1982年以来，我国领导人在会见英国朝野人士和香港各界人士，以及1982年9月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重申我国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并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一、到1997年，我们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二、在收回主权后，我们将充分照顾香港的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政策，以继续保持其稳定和繁荣。

但是，1982年9月27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一再强调，上个世纪英国同中国签订的关于香港地区的三项条约是“有效的”。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28日，香港爱国学生连日举行示威和发表声明，反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坚持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的言论。指出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1983年，我国就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同英国举行了多次会谈。7月12日至13日，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7月12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将在适当的时候收回香港的主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持香港的繁荣。我国政府将按照这个方针去做。

1983年，英国、香港以及国际上围绕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有不少议论。有些是合情合理的，有一部分则是极其错误的。诸如续约、托管、共管、轮流坐庄以及“中国主权，英国管理”等等，其实质都不过是为了延长英国在香港的统治，都有损我国主权，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有人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论调，也显然是违背国际法根本原则的。主权和治权从来是不可分的。治权是主权的体现，不收回治权，收回主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把主权和治权分开的这种主张，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和答应。

香港主权收回后，根据我国政府将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可以继续办厂、做生意、保持同国外的联系。并采取措施鼓励和吸引外国人来香港投资、旅游。长期以来，我们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了大量的主食、副食、日用必需品、食水、工业原料、燃料，使香港得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持稳定。收回主权后，这方面的工作将会更加加强。目前香港有520万人口，我国同胞占98%。香港的繁荣是同香港广大同胞的辛勤劳动、刻苦经营分不开的。收回香港主权以后，香港同胞一定能把香港管理得更好。

7月12—13日和25—26日、8月2—3日、9月22—23日、10月19—20日、11月14—15日、12月7—8日，中英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7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第8轮会谈定于1984年1月25—26日在北京举行。

严打斗争深入开展

背景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一些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阻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材料：

· 严打斗争深入开展

材料　严打斗争深入开展

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两个《决定》，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两项重要决定，是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这两个《决定》公布之后，各级政法公安部门充分运用法律武器，采取果断措施，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地予以打击，初步清扫了社会

丑恶现象，破获了大批刑事犯罪案件，包括一批重大积案，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开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中，不少群众积极协助公安干警搜捕、堵截犯罪分子，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罪行。

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刑事案件发案数大幅度下降。一般案件1983年9月份比3月份下降46.7%，10月份又比9月份下降11.5%；重大案件9月份比8月份下降35.7%，10月份又比9月份下降28.5%。各地城乡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增加了，公安工作开始主动了，人民群众殷切期望政法公安战线的同志继续打击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争取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这次斗争主要打击的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犯罪分子，包括流氓犯罪团伙，流窜作案分子，杀人犯、放火犯、爆炸犯、强奸犯、抢劫犯、重大盗窃犯等等。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和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分子，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劳改逃跑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等。这些犯罪分子对社会危害大，对人民安全威胁大，因此，着重予以打击。

在这次斗争中，政法公安机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促使我国社会秩序、社会治安正在显著而稳定地向着好的方面转变。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整党

背景介绍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不良影响，各级党组织中存在着一些抵制改革开放的左倾分子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分子，一些三种人仍存在于党内。为了切实解决"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严重破坏，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整党的任务。十二大以后，在全国开展了以学习新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抓了580多个单位约16万党员的整党试点工作，为全面整党创造了条件。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节选）

材料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1983年10月11、12日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举行了预备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出席并主持了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201人，中央候补委员136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5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4人，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11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体现了党的十二大精神，明确规定了这次整党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全会认为，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必将保证整党工作正确地顺利地进行。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共分九个部分：（一）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整党的任务；（三）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要求；（四）整党的步骤和基本方法；（五）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六）必须防止走过场；（七）整党工作的领导；（八）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九）各级党组织要坚决地、创造性地执行本决定。《决定》指出，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决定》阐述了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宣布，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这次整党必须走群众路线，首先要充分听取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整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充分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

《决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为了保证整党工作的日常领导，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就整党问题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决定》，积极参加整党。全会表示相信，经过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次整党的伟大任务，一定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一定能够把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

这次整党工作，纯洁了党的思想和组织，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击毙二王始末

背景介绍

“二王”，即王宗霈、王宗玮兄弟，在辽宁作案后，一路南逃，杀人如麻，作案累累。终在江西被我公安干警击毙。

材料：

· 击毙二王始末

材料　击毙二王始末

“二王”，就是公安部在全国通缉追捕的持枪杀人犯王宗霈、王宗玮兄弟。王宗霈，30 岁，原是沈阳市大东区辽沈卫生院的药剂员，1979 年因扒窃被判刑 3 年，1982 年 3 月刑满释放。王宗玮，26 岁，原是沈阳 724 厂六车间材料员。两犯于 1983 年 2 月 12 日（农历大年三十）在沈阳抢劫枪支，持枪行窃、杀人作案后，向南方仓皇逃窜。一路昼伏夜行，继续盗窃枪支，行凶杀人，罪恶累累，最后窜到了江西省广昌县山区。9 月 13 日上午，广昌县工作人员刘建平发现王宗霈、王宗玮二犯窜到广昌县城内买香烟、食品，就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并带领公安干警进行追捕。在离县城 3 公里远的通往赣州的公路上，二犯开枪拒捕，并潜入附近山中。当地驻军、公安干警和民兵紧急部署进行搜山围捕。9 月 18 日凌晨，二犯窜到尖峰公社观前大队曾家生产队，被社员发现。后二犯窜到水南公社水南大队南坑生产队的山中继续顽抗，开枪拒捕，于下午 6 时 40 分被追捕的军警击毙。

10 月 15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南昌市召开庆功大会。省政府和省军区分别向江西省公安厅、江西省武警总队、广昌县人民政府、广昌县公安局、广昌县人民武装部、省军区独立营二连八班等单位和 53 名有功人员颁发了嘉奖令。授予报案有功的广昌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建平、广昌县尖峰公社观前大队社员曾水秀、曾文泉、何冯金 4 人“治安模范”的称号。人民武装警察总部还分别授予吴增兴、甘象青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吴增兴是江西省武警总队二支队通讯参谋，在围歼“二王”时负重伤，抢救无效，英勇牺牲。甘象青是江西省武警总队二支队二中队副班长，在战斗中负伤。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王家林是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第三中学教师，55 岁。王宗霈、王宗玮于 1983 年 2 月 12 日下午 1 时许窜至空军沈阳医院小卖部盗窃人民币 1000 余元，开枪打死 4 人，打伤 3 人，逃回家中，向王家林讲明了杀人经过。王家林既不向公安机关报告，也不规劝其子投案自首，反而在二犯外逃时给予资助。王家林包庇罪犯，证据确凿。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家林有期徒刑 7 年。

中国男子体操队艺震布达佩斯

背景介绍

中国体育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进步。对于中国男子体操队来说，1983 年的布达佩斯是他们独霸世界体操奖台的起点。

材料：

· 中国男子体操队获世界冠军

材料　中国男子体操队获世界冠军

1983 年是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年。10 月 23～30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 22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中国男子体操队首获世界团体冠军，获得中国体操运动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中国男子体操队过去曾参加过 5 次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团体项目中，获得过第 4 名（第 15 届）、第 5 名（第 20 届）、第 3 名（第 21 届）的较好名次。在本届比赛中的获胜，使中国成为继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瑞士、苏联之后获团体金牌的第 6 个国家。

近几年来，中国体操运动员在个人项目上取得了不少最高荣誉的桂冠——尤其是李宁在 1982 年世界杯比赛中一人独得 6 枚金牌，曾震动世界体坛——但在世界性团体赛中却一直未能问鼎。中国男子体操队为了夺取世界团体冠军，两年来及时地调整队伍，不断充实新生力量，狠抓规定动作质量，努力创造难新动作，1983 年终于实现了这一宿愿。

中国获得男子体操世界团体冠军，打破了苏、日两国对这个项目 30 多年的垄断，在世界体坛乃至国际体育界都激起很大反响。日本时事通讯社发自布达佩斯的电讯稿称：“日苏时代已变成了中苏时代。”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致电祝贺中国男子体操队的胜利。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夺冠之日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是薇弱的，要想保持住，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严　平）

风 云 人 物

廖 承 志

廖承志(1908～1983),广东省惠阳县人,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他出生于日本东京。青年时代在孙中山、宋庆龄和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入大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2年,党派他到国际海员工会工作,曾领导海员罢工并取得胜利。1930年,国际工会派他到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加入红军,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1934年任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党中央派他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1949年,历任中共南方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宣传部部长,新华社社长等职。建国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青年团中央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他在党的第七、八、十、十一、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承志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他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广交海内外朋友,共促世界和平,同倡祖国统一。这方面尤其表现在他对中日建交和对台工作上。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同志致函蒋经国先生,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力促国共谈判,引起海内外高度重视。

朱 建 华

朱建华(1963～　　)中国著名跳高运动员。他从1973年起开始练习跳高。1979年打破全国少年男子跳高纪录。1983年,两次打破世界纪录,创造了田径史上的奇迹。

材 料

上海田径选手朱建华,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9届亚运会男子跳高角逐中,跃过2.33米的高度,成为当年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1983年在第5届全运会上,又两破世界纪录,蜚声国内外。

年仅20岁的朱建华,10岁开始跳高训练,在胡鸿飞教练的精心指导下,经过10年的科学训练,终于刷新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从他开始出成绩的1979年(在法国举行的中学生"国家杯"田径赛中跳过2.13米,打破全国少年男子跳高纪录)算起,仅用5年时间,便创造世界新纪录,这在世界男子跳高史上也是罕见的。

1983年6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运会田径预赛中,朱建华以2.37米的优异成绩打破了3年前由民主德国选手韦西格创造的2.36米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同年9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决赛中,又成功地跃过了2.38米的高度,打破了他本人创造的世界纪录。前后两个世界纪录,仅仅相隔百日,这在中国跳高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朱建华的成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田联主席在贺电中说:"这一优异成绩证实了我们在亚洲所看到的巨大进步。"国外多家报纸也纷纷报道和评论。《自由比利时报》评论说,朱建华创世界纪录"证明了中国近几年来在大多数体育项目中取得了迅速的进步";法国《队报》把朱建华的成绩称为"世界奇观";由38个国家的报纸编辑部评选出的1983年世界10名最佳选手中,朱建华名列第4;数家外国通讯社评出的1983年世界体育明星中都有朱建华,南斯拉夫《世界》周报评选朱建华为第1号世界最佳运动员,中国评选出的1983年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中,朱建华名列首位。

为了表彰朱建华取得的优异成绩,国际田联和亚洲田联分别向他颁发了奖章。

(阎树文)

李 大 维

李大维(1950～　　)国民党空军少校。他在台湾期间,一心想飞回大陆,以尽赤子之情。1983年4月22日,

他驾驶一架军用飞机降落在福建省。

材料 李大维驾机起义

台湾国民党陆军航空队第一大队观测中队一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1983年4月22日9时50分，从花莲机场驾驶U—6A型效用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于12时25分安全降落在福建省三都岛海滩。

李大维原籍安徽省阜阳县，1950年生于金门，同年随其父母去台湾，1968年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后进陆军航空中心接受飞行训练，结业后到部队执行观测任务，先后飞行2600多小时，两次被选为"克难英雄"。李大维生活在台湾上层社会中，生活条件优越，还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儿。但是，对台湾社会愈是接触得多，接触得深，就愈加使他感到台湾社会的黑暗、腐败、没有前途。在白色恐怖下，他冒着风险，坚持收听福建前线等电台的广播，从祖国大陆的发展变化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大陆。他怀着赤诚的报国之心，毅然驾驶飞机回归祖国大陆。李大维说："我忍受与家人分离之苦，不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强大而来的。只有祖国大陆政府才能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李大维回祖国大陆后，受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4月30日，福建军民召开了欢迎大会，表彰他的爱国行动。福州军区领导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奖励他人民币15万元。空军领导机关根据李大维的意愿，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领导人分别接见了他。全国政协举行茶话会，政协副主席肖克致欢迎词，政协副主席钱昌照、董其武，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政协常委、台盟副主席苏子蘅，政协常委缪云台、马璧、李铁铮，政协委员黄植诚等，先后发言，热烈赞扬李大维驾机起义表现出爱国军人的英勇气概。希望台湾当局为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着想，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祖国和平统一的道路。出席茶话会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以及在京的部分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原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徐廷泽、黄文刚等。

李大维先后到福州、北京、西安、重庆、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参观访问，回徐州、阜阳探望了亲友，游览了北京故宫、万里长城、西安兵马俑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首都地铁、长江葛洲坝工程、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成就，广泛地接触了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和各界知名人士，亲眼看到了城乡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加深了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和认识。他说，大陆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都有很大潜力，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大陆同胞的生活水准虽然稍低一点，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社会风气纯朴健康，人与人之间都很坦诚，大家对祖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特别是青年人的爱国心，向上心，实在令人敬佩。这一切都显示着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而在台湾，有钱乃大，人欲横流，人们心灵空虚，感情淡漠，生活非常无聊。李大维说，我在各地会见了许多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参观了辛亥革命遗址、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故居，以及抗日将领张自忠的纪念碑等，没有想到大陆保留了那么多东西，和台湾宣传的完全不一样。今天，祖国政府提出同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确是诚心诚意的。如果台湾当局能够响应祖国政府的号召，替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为海峡两岸同胞的感情交流和经济交流做出贡献，将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否则，是不得人心的。

（荆 尧）

侯德健

侯德健(1956～　　)台湾高雄人。

5月中旬，台湾校园歌曲《龙的传人》作者侯德建自台湾到香港，6月4日飞抵北京。侯德建祖籍四川巫山，1956年出生在台湾高雄，先后在淡江文理学院和台湾政治大学学企业管理和会计，毕业于政治大学中文系。他是台湾校园歌曲的倡导者之一。6月13日和7月1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全国青联分别举行茶话会，欢迎侯德健。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他说，你创作的《龙的传人》，体现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深厚的人民感情，我们听了非常亲切。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广泛采集民歌素材，创作出更多为广大人民欢迎的音乐作品。侯德建回大陆半年中，曾到四川老家寻根访亲，并游览了大江南北、陕西、新疆、内蒙古和广州，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写了《你和我的明天》《新鞋子、旧鞋子》和《归去来兮》等9首歌，是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产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会见了他。侯德健对杨静仁谈了他回大陆以来的感受。他说，大陆老家是全世界搞创作最好的地方，这里要什么素材有什么素材，创作天地广阔。12月底，他决定在北京定居，从事音乐创作。

后来，侯德健与在台妻子离婚，并和大陆著名歌手程琳结婚。1989年"六·四"风波中，曾支持学生，并参加了所谓"四人七十二小时绝食"活动。

修瑞娟

修瑞娟(1936～　　)中国著名女科学家。

1983年12月，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像修

瑞娟这样作出了突出贡献，又坚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各级领导要敢于打破平均主义，予以破格提拔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不要怕那些闲言碎语，也不要理睬那些从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妒贤忌能的言论。否则，我们就不能任用人才，也不能留住人才，四化就没有希望。”

修瑞娟，47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女医学科学家、助理研究员。她长期从事微循环研究。1981年，修瑞娟到美国留学，继续研究微循环理论。微循环研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许多课题仍是未知数。她勇敢地向这个深奥的王国冲击，在这项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修瑞娟在医学研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发现了国产药物山莨菪碱能够抑制血液中粒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同时能够成功地抑制血栓素的合成。二、发现并首先证明了各级微动脉血管（管循环）的自律性运动是以波浪形进行传播的，提出了微循环对人的器官和组织的灌注的新论点——海涛式灌注。美国和欧洲的微循环界权威称这一论点为“修氏理论”。

她的研究成就引起了国内外专家们的强烈反响，称她为“修瑞娟博士”和“修氏理论”的创造人。1983年6月，她被选为国际微循环研究所5位主要领导人之一，“修氏理论”被列为中国评出的1983年世界科技十大成就之一。

（高明岐）

孙冶方

孙冶方（1908～1983），江苏省无锡县人，模范共产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他15岁时就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毕业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1937年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以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他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77年以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撰写和整理了《社会主义经济论》等三本著作，还写了20余篇论文和文艺评论。

肖三

肖三（1896～1983），湖南省湘乡县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文化战士，国际活动家，著名诗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早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为毛泽东举办的《湘江评论》撰稿。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葬礼和护灵活动。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曾出席党第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国后，先后出席了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早在1928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时就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作为中国作家常驻代表，出席在苏联举行的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1934年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编著有《革命烈士诗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主要诗集有《和平之歌》《肖三诗选》《伏枥集》；译有《前线》《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

他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1939年在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1946年任华北文协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顾问，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

他又是著名国际活动家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

张大千

张大千（1899—1983）是著名的当代中国画画家，于4月2日在台湾省台北市逝世。张大千，四川内江人，生于1899年。早年致力于石涛、八大山人、青藤、白阳诸家的研究，继及宋元各家，又曾在日本京都研习绘画染织；1941～1943年，领导了去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临摹和研究

工作；其足迹遍历国内外名山大川。故他的作品能博采众家之长，融会工、意笔于一体，具有独特的风格。近十余年更用泼墨、泼彩法于山水画，著名作品有《长江万里图卷》等。张大千长期旅居海外，1979年寓台北外双溪。近年与大陆亲友、故交常常通讯，互致问候和交换作品。

张大千患病期间和病逝后，中国美协曾去电慰问和吊唁。中国美协等单位于6月在北京举办张大千画展，展品近200件。展出期间举行了张大千艺术成就讨论会。成都、上海在4、5月间也举办张大千遗作展览，共展出张大千1921～1982年作品150余件。

大千先生生于1899年，因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83年逝世台湾。4月16日在台北举行葬礼。葬礼结束后，遵照张大千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安厝在他生前住所“摩耶精舍”梅丘的石碑下。张大千逝世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于4月4日发出唁电，张大千生前友好和学生吴作人、刘开渠、刘海粟、叶浅予、李苦禅、何海霞、黄永玉于4月5日联名致电台北张大千家属，对国画大师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张大千在四川重庆、成都的女儿张心瑞、张心庆、张心裕和儿子、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张心智于4月4日也致唁电给在台湾的母亲徐雯波，对父亲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张大千于1899年生于四川省内江县，1948年侨居国外，后回台湾居住。

张大千曾在1979年4月12日立下遗嘱，将他自作的书画全部分为16份，由他的妻子和子女，包括留在大陆的妻子和子女均分。5月13日，张大千夫人徐雯波遵照张大千遗言，将其所属历代名画69件，书法6件，4件奇石，1件鱼化石，1座木雕观音像，还有笔、墨、砚等文物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院”。10月3日，坐落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生前住所“摩耶精舍”作为“张大千先生纪念馆”正式开放。

安　珂

安珂(1960～1983)，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政法记者，为维护治安抓窃贼，临危不惧救青工，与歹徒搏斗英勇牺牲。1983年3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称号。

安珂，23岁，1978年应征入伍，曾任侦察班长，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6次受到嘉奖，荣立三等功。1981年当记者以后，勤奋好学，积极工作，关心同志，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坚决同各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1983年3月8日，3名歹徒闯入广州长堤路小食店盗窃顾客皮包，被正在这里吃晚饭的青年工人何深和安珂发现。安珂和何深冲上前去追赶。1名歹徒抽出匕首猛刺何深。安珂见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上前，用身体护住何深，赤手空拳同歹徒搏斗。这时另外两名歹徒从侧面和背后向安珂袭击。安珂终因寡不敌众，背部和肋下多处受伤，不幸英勇牺牲。为了表彰安珂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共产主义精神，广东省广播事业局曾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中共广东省委在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以后，还作出决定，在全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开展学习安珂的活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授予安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1983年5月26日上午在广州体育馆举行的宣判大会上，对杀害安珂的4名罪犯作出了终审裁定和判决。凶犯王锦涛、周杰荣、唐冬仪被判处死刑，同案犯赖少昌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朱　伯　儒

朱伯儒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多年来，以雷锋为榜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次立功受奖。中央军委于1983年7月22日授予他“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荣誉称号。他工作多次变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原来是飞行员，因耳疾停飞后，曾在两个条件较差的临时施工单位工作8年多，后又被调到油库当管理员。他不计较职位高低，尽心尽职，取得了出色成绩。他竭尽所能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曾义务服侍、赡养过两位孤独老人，先后解救过5名遇到危难的群众，资助过40多名生活困难的群众和战友。出差途中帮助一位突患重病的老大爷住进医院，并献血300cc，护理3昼夜，又代付医药、住院费，护送老人回家。曾卖掉自己的手表，取出仅有的500元存款，帮助一位身患重病的民工。他帮助和挽救了一些思想彷徨和失足的青年，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上了生活的正路。他以高度的自觉性，坚持党性原则，保持共产党员纯正无私、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的品格。从当民工队长到油库副主任，经管过大批物资，从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并抵制和纠正了一些不正之风。群众称赞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那党叫干啥就干好啥的“螺丝钉精神”、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的“炭火精神”、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大树精神”和模范事迹，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华明珍　孙世德）

张　海　迪

张海迪(1955～　　)被人们称作“当代的保尔”。

张海迪是山东省莘县广播局职工，被誉为“80年代

新雷锋”。1983 年 2 月 3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她省劳动模范称号，3 月 7 日，共青团中央授予她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张海迪，女，28 岁，童年时期患高位截瘫症。她身残志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对人生充满信心，顽强地同疾病进行斗争。她十分珍惜时间和自己的生命。为了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开拓出一条病残青年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她在病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刻苦自励，顽强学习，阅读了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 1000 多册，翻译了 16 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饱尝了疾病的折磨，深知病痛给人造成的不幸，她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本领，拖着病残之躯，满腔热情而又不要任何报酬地为群众针灸治病。她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吸引和带动周围青年共同前进，勤勤恳恳地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张海迪的事迹处处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体现着时代精神，成为青年学习的榜样。中共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学习张海迪的共产主义精神。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山东省委分别作出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向她学习。

3 月 7 日，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和向张海迪学习的决定。同日，团中央举行命名表彰大会，王震等到会祝贺。5 月 9 日中共中央在对共青团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的批复中，殷切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深入地向张海迪学习，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11 日，新华社报道：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最近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张海迪。叶剑英的题词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邓小平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李先念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的顽强奋斗精神，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去。”陈云的题词是：“以张海迪为榜样，勤奋学习，热心助人，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彭真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同志顽强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邓颖超的题词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徐向前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同志的不怕困难，坚强奋斗的革命精神。”聂荣臻的题词是：“要象张海迪同志那样顽强地学习、工作和生活！”12 日至 14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张海迪学习。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83 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崭新年代。到处是改革的呼声，到处是改革的影响。

小说中，改革小说纷纷涌现，成就很高。如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今夜有暴风雪》等反思小说和《迷人的海》等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小说。

在诗歌创作中，歌颂祖国和人民成为创作的主旋律。较著名的有罗济的《海之歌——献给张海迪》、李钢的《蓝水兵》。

影视创作方面，《咱们的牛百岁》、《乡音》、《女记者的画外音》等反映改革的作品收看率很高。此外，《城南旧事》、《西游记》等影视作品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这一年，一些优秀影视歌曲和台湾校园歌曲风靡大陆。

流行口号

一、三热爱　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

二、四提倡四反对　即提倡节俭，反对大办婚事；提倡男女平等、敬养老人，反对歧视虐待妇女、老人；提倡相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的文化娱乐，反对赌博。

三、铁饭碗　指劳动人事制度上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用人单位没有多少自主权。一个干部或工人，只要分配到一个单位，无论干好干坏，无论工作需要不需要，都可以一直干下去，好比捧了个铁饭碗一样。

四、大锅饭　是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的一种比喻。指在分配上不区别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不区别各个人贡献的大小，一律对待，给予大体相同的报酬；同时也泛指不区别企业的经营好坏，效益高低，一律对待，造成企业间苦乐不均、“旱涝保收”、平均主义的不合理现象。

五、利改税　即以税代利，就是国营企业由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缴纳税金。

六、三种人　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进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去。此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七、明白人　原是人民群众对一些知事明理者的通俗的说法。在企业进行整顿、改革中，要求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又赋予了"明白人"以新的内容，主要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敢于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正之风，能吃苦，有干劲，懂业务，会经营，有胆有识，敢于创新，能够团结人，打开新局面。

八、职工中的"双补"工作　就是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在职工中进行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的工作。

小说《人生》

作者路遥。小说通过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悲剧揭示了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年的巨大心理震颤。

高加林高中毕业在村里任民办小学教师。谁知过不多久，便被党支部书记的儿子给顶了，又回家作起了农民。他不堪忍受农村生活的窒息，与巧珍恋爱了。

然而，自加林的叔叔在地区当官后，他被调进城内，与另一个干部女儿好上了。他并不一定真爱她，或许只是想跳出农门。在痛苦的抉择中，他放弃了巧珍……

叔叔到县里，让加林回家种田。回村的那天，正是巧珍结婚的日子。

材料　《人生》的讨论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收获》1982年3期，获第2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文汇报》《作品与争鸣》等报刊，都先后展开了讨论。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评价高加林形象和小说中的爱情悲剧进行的。

一种意见认为，《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不满于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向往着五彩缤纷的现代文明"，"不仅对于新生活有美好的愿望，更透发出为实现新生活而奋斗的进取精神"，因而堪称"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其爱情悲剧，也"体现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与文化建设的复兴，旧的婚姻恋爱观正在动摇，而以精神的契合为基础的爱情正在出现"，"放射着他追求新生活的光彩"。(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加林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他在处理"个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时，"没有看到千百万青年正从事着的伟大事业"，想到的"只有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成功时神采飞扬，失败时沮丧绝望"。他在解决"个人愿望与爱情的矛盾"时，也是"为个人目的而把恋爱当作工具"，"暴露出了心灵深处的利己主义倾向"。小说"对高加林同情有余，批评不够，这是令人遗憾的"。(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同上)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高加林既非"一个农村新人的形象"，也非"一个利己主义的孤独奋斗者"。因为作为"新人"，他缺乏必备的"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而笼统地用"利己主义者""这样一些对于有确定世界观和一定思想体系的人才适用的断语去概括"他，也"是不恰当的"。(谢导宏：《评〈人生〉中的高加林》，《作品与争鸣》1期)"他有文化、有知识，对现代文明怀着热烈的向往，比一般的农村青年有更多的追求、更大的抱负，但他却没有找到实现这些追求和抱负的正确的道路，客观现实也使他难以实现这些追求和抱负，于是，他感到苦闷、抑郁，一直徘徊在人生的岔道口。"他"是一个多种矛盾的性格统一其身的完整的活人"，是一个"圆形"形象，"对他不能完全肯定，但也不能简单否定"。这一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的艺术形象启示我们，"应该采取有力的步骤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并对农村中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给予正确的引导，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为农村的改革事业贡献力量；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克服他们的盲目性。"(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作品与争鸣》2期)而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中，除了"个人的道德因素"外，也的确"更多地汇聚了今天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因素"，即"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差别、城乡的差别"等等，需要具体分析，全面认识。(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作品与争鸣》2期)

(仲呈祥)

小说《围墙》

作者陆文夫。小说通过一个研究所要拆除围墙所引发的争论，批驳了那种只说不干的工作态度。

拆除围墙后建什么样的围墙，所里有三派意见：一古典派，要求体现传统风格。二现代派，要求突出现代意识。三折中派，即将以上两种意见综合起来。就这样，一天天地争论。旧墙没有拆，新墙也终于没建起来。

《围墙》，虽以讽喻性的喜剧面目出现，它的主题却严肃而深刻，显示了一种高度概括的艺术力量和清醒的认识。它所抨击的已不限于坐而论道、清谈误国之类的积

弊，其中关于所谓“三大派”人士嘴脸的勾画，包含着作者正视现实的深意。

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张枚同　词
谷建芬　曲
稍快　热情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
卢国沾　词
黎小田　曲
啊啊！啊！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啊！
1.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
2. 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啊！啊！这睡狮渐已醒。

歌曲《上海滩》

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主题歌
黄　霑　词
顾嘉辉　曲
1.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2.（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是看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转千湾，转千滩，亦未平复此中争斗。
3.（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又有心中起伏够！

歌曲《我的中国心》

黄　霑　词
王福龄　曲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歌曲《牡丹之歌》

——影片《红牡丹》插曲
乔　羽　词
唐诃、吕远　曲
热情、赞美地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
1. 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啊！牡丹，啊！牡丹，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
2. 冰封大地的时候，你正蕴育着生机一片，春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啊！牡丹，啊！牡丹，你把美丽带给人间，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歌曲《小草》

歌剧《芳草心》主题歌
向　彤、何兆华　词
王祖皆、张卓娅　曲
中速　纯朴地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历史档案

1983年中国运动员获世界冠军统计

项目	冠军获得者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围棋	马晓春	第5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2.15～18	日本大阪
跳水男女团体	中国男女跳水队	第3届世界杯跳水赛	4.27～30	美国休斯顿
跳水女子团体	中国女子跳水队	第3届世界杯跳水赛	4.27～30	美国休斯顿
女子跳台跳水	周继红	第3届世界杯跳水赛	4.27～30	美国休斯顿
女子跳板跳水	李艺花	第3届世界杯跳水赛	4.27～30	美国休斯顿
乒乓球男子团体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28～5.9	日本东京
乒乓球女子团体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	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28～5.9	日本东京
乒乓球男子单打	郭跃华	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28～5.9	日本东京
乒乓球女子单打	曹燕华	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28～5.9	日本东京
乒乓球女子双打	沈剑萍　戴丽丽	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28～5.9	日本东京
乒乓球混合双打	郭跃华　倪夏莲	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28～5.9	日本东京
羽毛球女子单打	李玲蔚	第3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5.2～8	丹麦哥本哈根
羽毛球女子双打	林　瑛　吴迪西	第3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5.2～8	丹麦哥本哈根
双向飞碟女子团体	巫兰英　冯梅梅　邵伟萍	世界飞碟、移动靶射击锦标赛	6.16～26	加拿大埃德蒙顿
航海模型F1－V2.5级	苏健翔	第3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	7.4～11	保加利亚旧扎戈拉
航海模型F1－V5级	谭立锋	第3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	7.4～11	保加利亚旧扎戈拉
航海模型F2－B级	魏毓明	第3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	7.4～11	保加利亚旧扎戈拉
航海模型F2－A级	王谷平	第3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	7.4～11	保加利亚旧扎戈拉
航海模型C2级	李天真	第2届世界外观航海模型锦标赛	8.14～20	比利时列日
羽毛球男子单打	韩　健	世界杯羽毛球赛	8.16～21	马来西亚吉隆坡
羽毛球女子单打	韩爱萍	世界杯羽毛球赛	8.16～21	马来西亚吉隆坡
羽毛球女子双打	韩爱萍　李玲蔚	世界杯羽毛球赛	8.16～21	马来西亚吉隆坡
跳伞女子全能	李荣荣	第2届世界杯跳伞赛	9.3～11	意大利锡耶纳
竞走女子团体	中国女子竞走队	世界杯竞走赛	9.24	挪威卑尔根
竞走女子个人	徐永久	世界杯竞走赛	9.24	挪威卑尔根
航空模型F1B级团体	吕济发　张文义　王国才	第21届世界自由飞航空模型锦标赛	10.1～4	澳大利亚墨尔本
技巧男子四人全能	陈　驰　李富良　万迪中　梅建平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四人第一套	陈　驰　李富良　万迪中　梅建平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四人第二套	陈　驰　李富良　万迪中　梅建平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双人全能	黎少文　胡富芬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双人第一套	黎少文　胡富芬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双人第二套	黎少文　胡富芬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单人全能	胡星刚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男子单人第一套	胡星刚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女子双人全能	梁梅芳　李小燕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技巧女子双人第二套	梁梅芳　李小燕	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	10.20～23	美国塞达拉皮兹
体操男子团体	中国男子体操队	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	10.23～23	匈牙利布达佩斯
男子自由体操	童非	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	10.30～30	匈牙利布达佩斯
双杠	楼云	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	10.23～30	匈牙利布达佩斯

第5届全运会各代表团获奖统计

单位	金牌	银牌	铜牌	单位	金牌	银牌	铜牌
广东	36	25	24.5	天津	6	5	11
上海	33	35	30	吉林	6	4	4
辽宁	22	18	21	河北	5	8	11
北京	17	24	22	新疆	5	5	8
解放军	16	28	20	山东	4	10	12
江苏	13	17	11	云南	4	7	2
浙江	11	15	10	青海	4	6	3
广西	11	12	6	河南	3	7	3
山西	11	9	9	湖南	3	4	2
福建	11	5	10	陕西	3	0	4
四川	10	4	8	火车头	1	1	1
江西	9	5	8	甘肃	1	0	0
黑龙江	9	3	10.5	宁夏	0	1	1
湖北	8	7	16	西藏	0	1	0
内蒙古	8	7	7	贵州	0	0	1
安徽	7	6	6				

十佳运动员

由首都20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1983年全国评选最佳运动员活动，有近60万人参加评选。当选的10名最佳运动员是：

朱建华 上海市田径运动员，男，20岁，身高1.94米。1982年以2.33米的成绩成为当年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3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第5届全运全田径预赛中，越过2.37米，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田径决赛中，以2.38米的成绩再破世界纪录。

郎平 北京市排球运动员，女，23岁，身高1.84米。中国女排主力队员，快攻变化多，扣球力量重。1980年、1981年和1982年连续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3年在香港举行的中、美、日三国超级女排锦标赛中，与队友合作争得冠军；同年，中国女排在第3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中获亚军，她本人获优秀选手奖和优秀扣球手奖。

吴数德 广西举重运动员，男，24岁。1979年、1980年、1981年连续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举重比赛中，以128公斤的成绩打破56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宋晓波 北京市篮球运动员，女，25岁，身高1.82米。中国女篮队长，主力队员，主要得分手。1979年和1982年两次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3年在第9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与队友合作，为中国首次夺得女篮世界第3名。她本人被评为世界女篮最佳阵容队员之一。

徐永久 辽宁省田径运动员，女，21岁。曾在业余体校练习长跑，1981年开始竞走训练。1982年，全国比赛中首次设立女子竞走项目，她以26'24"09的成绩首创5公里竞走全国最好成绩。1983年在第5届全运会竞走比赛中，以49'4"的成绩获10公里竞走冠军；同年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世界杯竞走比赛中，以45'13"04的优异成绩获10公里竞走冠军，创世界最好成绩，她还与队友一起获该项团体冠军。

曹燕华 上海市乒乓球运动员，女，21岁。直拍快攻结合弧圈打法。是第35届、36届、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成员。在1981年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与张德英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在1983年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女子单打冠军，与队友合作获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第3名。

童非 江西省体操运动员，男，22岁。1979年在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获单杠第5名。1981年在第2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是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第3名的主力队员之一，并获个人全能和吊环第4名。1982年在第6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获单杠冠军（并列）、全能亚军和自由体操、吊环、跳马第3名。1983年在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他是主力队员之一，并获自由体操冠军和双杠第3名。

栾劲 福建省羽毛球运动员，男，25岁。打法积极，速度快，扣球力量大。1981年在英国举行的第3届国际羽毛球精英大奖赛中，获男子单打冠军。1982年举行的第12届国际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赛），中国队首次夺得冠军，他是主力队员之一；同年还获得全英羽

毛球公开锦标赛男子单打亚军。1983年获全英羽毛球公开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同年在印尼举行的羽毛球精英大赛中，连胜世界名将弗罗斯特(丹麦)、林水镜(印尼)、普拉卡什(印度)而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郭永林 八一男子篮球队队员，29岁，身高1.91米。国家男篮主力前锋，主要得分手。1979年和1981年，他参加第10届、第11届亚洲男篮锦标赛，为中国队获冠军立下了战功。1983年他又参加第12届亚洲男篮锦标赛，中国队又一次蝉联冠军，取得代表亚洲参加1984年第23届奥运会男篮决赛的资格，他本人被评为本届比赛的最佳运动员，并被评为亚洲男篮12名明星队员之一。

郭跃华 福建省乒乓球运动员，男，27岁。直拍快攻结合弧圈打法。1980年、1981年和1982年连续3次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3年在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是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之一，并获男子单打冠军，又与倪夏莲合作获混合双打冠军。

(迎　春)

1983年中国运动员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平世界纪录分项统计

	项数		人(队)数		次数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计	其中:女
【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						
合计	13	1	21人1队	1人	18	1
田径	1		1人		2	
举重	1		1人		1	
射击	6	1	11人	1人	6	1
潜水	1		1人		1	
航海模型	2		4人		4	
跳伞	1		1队		1	
航空模型	1		3人		3	
【打破世界青年纪录】						
合计	1		1人		1	
举重	1		1人		1	
【平世界纪录】						
合计	4	2	5人	3人	6	3
射击	4	2	5人	3人	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1983年6月18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乌兰夫

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1983年6月18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委员长 彭　真

副委员长 陈丕显　韦国清(壮族)　耿　飚

胡厥文　许德珩　彭　冲　王任重　史　良(女)

朱学范　阿沛·阿旺晋美(藏族)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藏族)

赛福鼎(维吾尔族)周谷城　严济慈　胡愈之

荣毅仁　叶　飞　廖汉生　韩先楚　黄　华

秘书长 王汉斌

副秘书长 有 林 高登榜 王厚德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光训 马木托夫·库尔班(维吾尔族) 马 璧
王永幸 王兆国 王 甫 王国权 王炳南
宋承志 张子斋(白族) 张友渔 张文裕
张秀龙 张 杰(回族) 张贤约 张秉贵
张承先 张 珍 张致祥 陈永康 陈宗基
陈惠波 陈鹤桥 武 衡 茅以升 林一山
林月琴(女) 林丽韫(女) 林 雨(女)
欧阳毅 罗叔章(女) 罗 琼(女) 季羡林
周占鳌 周礼荣 郑伯克 赵忠尧 郝德青
荣高棠 胡克实 胡荣贵 胡绩伟 段苏权
侯学煜 俞霭峰(女) 洪丝丝 宦 乡
费彝民 秦宝兴 袁雪芬(女) 莫文骅
顾大椿 钱 敏 钱端升 徐运北
爱新觉罗·溥杰(满族) 高登榜 黄志刚
黄荣昌 梅 行 梅 益 曹龙浩(朝鲜族)
曹 禺 符 浩 章瑞英(女)
清格尔泰(蒙古族) 彭迪先 董建华
韩哲一(回族) 曾绍山 曾 涛 谢怀德
谢铁骊 楚图南 裘维蕃 雷洁琼(女) 解 方
裴昌会 廖海光 熊 复 潘 焱 薛暮桥

民族委员会

主任委员 阿沛·阿旺晋美(藏族)

副主任委员 王国权 爱新觉罗·溥杰(满族)
李 贵 平错汪阶(藏族) 吴向必(苗族)
巴 岱(蒙古族)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木托夫·库尔班(维吾尔族) 王 甫
扎喜旺徐(藏族) 白寿彝(回族) 关山复(满族)
许涤新 迪牙尔·库马什(哈萨克族)

法律委员会

主任委员 彭 冲

副主任委员

张友渔 沈 鸿 雷洁琼(女) 钱端升 王涂昌
扎喜旺徐(藏族)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荫冠
孔从洲 邓家泰 艾 青 古耕虞
平错汪阶(藏族) 叶 林 史来贺 白寿彝(回族)
吕 骥 伍觉天 任新民 华罗庚 刘大年
刘东生 刘有光 刘 达 刘 伟 刘念智
刘瑞龙 刘靖基 江家富(壮族) 许 杰
许涤新 孙敬文 苏步青 李一清 李文清
李 贵 李桂英(女,彝族) 李 琦
杨乃俊 杨立功 杨克冰(女)
杨初桂(女,侗族) 吴世昌 吴仲华
吴作人 吴茂荪 吴 波 吴桓兴 何 英
何 贤 谷景生 沈 鸿 宋一平 宋劭文 项淳一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石 山 邢亦民 刘卓甫 严佑民 罗 琼(女)
费彝民 顾大椿

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任重

副主任委员

吴 波 叶 林 韩哲一 古耕虞 刘念智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牛荫冠 杜润生 张 珍 侯学煜 钱 敏
徐运北 梅 行 薛暮桥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谷城

副主任委员

张承先 胡克实 胡绩伟 苏步青 吴世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涂昌 吕 骥 刘大年 刘东生 刘 达
吴仲华 吴桓兴 胡德华(女) 曹 禺
董建华 裘维蕃

外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 耿 飚

副主任委员

宦 乡 符 浩 曾 涛 楚图南 吴茂荪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炳南 区棠亮(女) 张致祥 郝德青

华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叶 飞

副主任委员 何 英 司徒慧敏 陈宗基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伍觉天 庄世平 李 普 洪丝丝 徐大同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和其他组成人员

1983年6月18日、6月20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总　理 赵紫阳

副总理 万 里 姚依林 李 鹏 田纪云

国务委员 方 毅 谷 牧 康世恩 陈慕华(女)
姬鹏飞 张劲夫 张爱萍 吴学谦 王丙乾 宋平

秘书长 田纪云(兼)

外交部部长 吴学谦(兼)

国防部部长 张爱萍(兼)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宋　平(兼)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张劲夫(兼)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赵紫阳(兼)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方　毅(兼)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　陈　彬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杨静仁
公安部部长　刘复之
国家安全部部长　凌　云
民政部部长　崔乃夫
司法部部长　邹　瑜
石油工业部部长　唐　克
化学工业部部长　秦仲达
纺织工业部部长　吴文英(女)
轻工业部部长　杨　波
铁道部部长　陈璞如
交通部部长　李　青
邮电部部长　文敏生
劳动人事部部长　赵守一
财政部部长　王丙乾(兼)
审计署审计长　于明涛
人民银行行长　吕培俭
商业部部长　刘　毅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陈慕华(女)(兼)
农牧渔业部部长　何　康
林业部部长　杨　钟
水利电力部部长　钱正英(女)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　李锡铭
地质矿产部部长　孙大光
冶金工业部部长　李东冶
机械工业部部长　周建南
核工业部部长　蒋心雄
航空工业部部长　莫文祥
电子工业部部长　江泽民
兵器工业部部长　于　一
航天工业部部长　张　钧
煤炭工业部部长　高扬文
文化部部长　朱穆之
新华通讯社社长　穆　青
广播电视部部长　吴冷西
教育部部长　何东昌
卫生部部长　崔月犁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李梦华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钱信忠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

1983年6月18日、6月20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分别通过

主　席　邓小平
副主席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臻　杨尚昆
委　员　余秋里　杨得志　张爱萍　洪学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83年6月20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郑天翔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易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1983年6月17日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通过

主　席　邓颖超(女)
副主席　杨静仁　刘澜涛　陆定一　程子华
康克清(女)　季　方　庄希泉
帕巴拉·格列朗杰　胡子昂　王昆仑　钱昌照
董其武　陶峙岳　周叔弢　杨成武　肖　华
陈再道　吕正操　周建人　周培源　包尔汉
缪云台　王光英　邓兆祥　费孝通　赵朴初
叶圣陶　屈　武　巴　金
秘书长　彭友今
副秘书长　杨拯民　陆　平　罗涵先　程思远
叶至善　方荣欣　樊陶斋　孙轶青　宋德敏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　玲(女)　丁声树　万国权　千家驹　马　信
马万祺　马海德　马腾霭　王　力　王　匡　王　序
王一帆　王玉清　王光美(女)　王艮仲　王克俊
王宽诚　王雪莹(女)　王耀伦　韦章平　巨　赞
瓦扎木基　方荣欣　孔　飞　孔祥祯　正　果
龙泽汇　卢嘉锡　叶至善　叶笃义　叶恭绍(女)
叶桔泉　叶道英　冯友兰　冯素陶　冯德培　兰　江
兰志流　戎子和　尧西·贡保才旦　吕　东　朱光潜
陈　宇　陈伯村　陈岱孙　陈建晨(女)　陈荒煤
陈铭德　陈维稷　陈锐霆　陈舜礼　陈逸松　陈邃衡
林默涵　易礼容　罗　明　罗涵先　金如柏　金显宅

周　颖(女)　周士观　周化民　郑兆荣
郑守仪(女)　郑绍文　郑洞国　郑敏之(女)
宗怀德　项朝宗　赵子立　赵伯平　赵君迈　赵宗燠
赵复三　赵得贤　胡　风　胡锦涛　柯　麟　钟师统
钟惠澜　侯祥麟　侯镜如　俞大绂　闻家驷　姜椿芳
贺敏学　贺绿汀　秦振武　袁隆平　袁翰青　聂　真
贾亦斌　钱三强　钱伟长　钱俊瑞　钱福星　徐以枋
徐以新　徐迈进　徐伯昕　徐彬如　徐逸樵　徐斌洲
爱泼斯坦　凌其翰　高　天　郭秀珍　(女)
郭维城　郭维藩　郭棣活　郭增恺　唐　哲　唐生明
乔明甫　庄明理　刘　寅　刘　鼎　刘开渠　刘元瑄
刘宁一　刘亚雄(女)　刘向三　刘延东(女)
刘良模　刘尊棋　关瑞梧(女)　汤元炳　汤定元
汤蒂因(女)　汤德全　安士伟　安子介　许志猛
许宝骙　孙兰峰　孙廷芳　孙作宾　孙孚凌　孙承佩
孙起孟　孙晓村　孙越崎　阳翰笙
买合苏德·铁衣波夫　玛高维亚　严信民
苏　进　苏子蘅　苏鸿熙　苏谦益　李　立　李　觉
李　毅　李人林　李子诵　李文宜(女)　李水清
李世济(女)　李世璋　李步新　李伯钊(女)
李纯青　李铁铮　李雪峰　杨士杰　杨石先　杨西光
杨克成　杨放之　杨拯民　杨秋玲(女)　吴　钰
吴文俊　吴廷璆　吴贻芳(女)　吴觉农　吴雪之
吴鸿宾　吴羹梅　何柱国　启　功　汪德昭　沈从文
沈其震　宋希濂　宋季文　宋养初　罕富有
张　权(女)　张文舟　张光斗　张仲实　张毕来
张孝骞　张志公　张含英　张君秋　张国声　张明远
张明养　张香山　张家树　张敬礼　张瑞华(女)
张磐石　陆　平　陆士嘉(女)　陆镇藩　陈　光
谈家桢　陶大镛　黄　昆　黄　维　黄　翔　黄正清
黄汲清　黄药眠　黄逖非　黄凉尘　黄鼎臣　萨空了
曹钟梁　曹鹤荪　龚子荣　章夷白　章师明　梁尚立
梁漱溟　彭　林　彭秀模　葛志成　董　边(女)
蒋丽金(女)　韩幽桐(女)　覃异之　程思远
程星龄　程裕淇　傅学文(女)　焦实斋　章小鹏
童少生　曾传六　曾涌泉　谢立惠　谢冰心(女)
雷天觉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　蔡啸
蔡子伟　臧克家　裴丽生　管文蔚　谭惕吾(女)
熊　晃　熊天荆(女)　黎　玉　德格·格桑旺堆
潘　菽　潘锷镩　薛　明(女)　霍英东
霍懋征(女)　戴爱莲(女)　魏龙骧　魏传统

1983年国内十件大事

1. 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恢复设立国家主席，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 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党决定。

3.《邓小平文选》出版。

4. 全国省级机构改革基本完成。

5. 邓小平在会见美籍教授杨力宇时谈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中国就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同英国举行谈判。

6. 开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7. 国营企业普遍推行利改税制度。国家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

8. 农业战胜严重灾害，粮棉获得创历史纪录的大丰收。

9. 国家组织实施38个重点科研攻关项目。

10. 第五届全运会举行，朱建华两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原载《半月谈》杂志1983年第24期)

1983年中国十大体育新闻
(人民日报评选)

1. 朱建华以2.37米和2.38米两次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2. 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这是首次在北京以外举行的全国运动会。

3. 中国奥委会正式申请1990年在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

4.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首次战胜苏联队，夺得团体冠军。

5. 中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夺得第三名，成为大球项目中第二个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队。

6. 在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选手又夺得6项冠军，女队优势明显，男队受到新的挑战。

7. 中国女子竞走队在1983年世界杯竞走女子10公里比赛中夺得团体和个人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获田径比赛的世界冠军。

8. 中国女子排球队自1979年以来，同日本女排较量15场，首次失利，比分为0：3。

9. 中国女子垒球队在具有世界水平的香港国际邀请赛中，10战9胜，夺得冠军。

10. 中国足球队在奥运会亚太区预选赛上，再度失利，未能冲出亚洲。

(原载1983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1983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数量
一．总人口	万　人	102764
市镇	万　人	24150
乡村	万　人	78614
二．社会劳动者	万　人	46436
职工	万　人	11515
城镇个体劳动者	万　人	231
乡村劳动者	万　人	34690
三．社会总产值	亿　元	11125
工业	亿　元	6461
农业	亿　元	2750
四．国民收入	亿　元	4730
工业	亿　元	2136
农业	亿　元	1921
五．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	万　吨	38728
棉花	万　吨	463.7
油料	万　吨	1055.0
糖料	万　吨	4032.3
黄红麻	万　吨	101.9
烤烟	万　吨	115.1
茶叶	万　吨	40.1
蚕茧	万　吨	34.0
水果	万　吨	948.7
大牲畜年末头数	万　头	10350
猪牛羊肉	万　吨	1402.1
水产品	万　吨	546
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亿　米	148.8
糖	万　吨	377
自行车	万　辆	2758.2
缝纫机	万　架	1087.2
手表	万　只	3469.0
原煤	亿　吨	7.15
原油	万　吨	10607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3514
钢	万　吨	4002
水泥	万　吨	10825
木材	万立方米	5232
七．运输邮电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14054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3095
邮电业务总量	亿　元	22.26

指　　标	单位	数量
八．国内商业		
1.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　元	2849.4
2. 社会消费品零售量		
粮食	万　吨	7095
食用植物油	万　吨	260.0
肉猪	万　头	14046.0
鲜蛋	万　吨	103.0
水产品	万　吨	225.4
食糖	万　吨	443.9
各种布	亿　米	105.4
自行车	万　辆	2620.7
缝纫机	万　架	1019.1
手表	万　只	3898.0
3. 农产品社会收购总额	亿　元	1265.0
4. 主要农产品社会收购量		
粮食	万　吨	10249
棉花	万　吨	458.6
食用植物油	万　吨	273.0
肉猪	万　头	14314.7
鲜蛋	万　吨	117.7
水产品	万　吨	270.5
九．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436.2
出口额	亿美元	222.3
进口额	亿美元	213.9
十．财政		
国家财政收入	亿　元	1249.0
国家财政支出	亿　元	1292.5
十一．物价指数(以上年为100)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	101.5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	104.4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	102.0
十二．教育文化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所	805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　人	120.7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　人	114.3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　人	4397.8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　人	13578.0
十三．卫生		
卫生机构病床数	万　张	234.2
卫生技术人员	万　人	325.3
其中：医生	万　人	135.3

1983年中国电影界十大新闻

——《大众电影》编辑部评定

一、中国电影家协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号召电影工作者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做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派。

二、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二十——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回顾”活动在京举行，展映影片四十三部。

三、影片《人到中年》放映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引起深刻反响；这部影片与另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骆驼祥子》同时获《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这两部影片的女主角潘虹、斯琴高娃也同时获金鸡奖、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四、我国二十二个兄弟民族有了本民族语的译制影片。

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举行纪念会，纪念延安电影团诞生45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35周年。王震在会上讲了话，杨尚昆等到会祝贺。

六、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第七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及文化部电影评奖的特别奖。

七、《中国青年报》举办“我最喜爱的十个当代青年银幕形象”读者评选，百万青少年踊跃投票，当选的是：李秀芝、水莲、韩苗苗、沙鸥、荒妹、刘思佳、解净、金明露、张岚、廖星明。

八、一百多所大专院校的教师参加了中国影协等四单位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评论界认为：电影进入大学课堂，是提高电影文化的战略性措施。

九、西安市一千多所中小学经常开展青少年电影评论活动，六十万青少年参加“影评希望奖征文”。

十、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影片《城南旧事》获“金鹰奖”（最佳故事片奖），谢晋获“金鹰荣誉奖”。

被提到的还有：首都电影界集会纪念国际知名的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影片《陌生的朋友》获第3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由中国电影合拍公司和香港新昆仑公司联合摄制的影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突破近年来国产片在港卖座纪录；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世界电影》杂志举办现代文艺思潮与现代电影讨论会和苏联电影讨论会。

（原载《大众电影》1984年第1期）

1983年中国文艺在国际获奖名单

获奖者	获奖作品	类别	月份	获奖地点	比赛名称	奖名
冯　至		文学	3	联邦德国		歌德奖章
陈冠商	《十字军骑士》中译本		3	波兰		波兰文化荣誉奖章
杨延文	江春疏雨	中国画	10	意大利	第5届曼齐·亚诺国际美术展览	金质奖
汪　澄	梦	中国画	3	美国	第21届阿蒙娜艺术展	州政府文化基金奖
	渔村	中国画	3	美国	第21届阿蒙娜艺术展	展览会评判奖
吴可南	琵琶舞	工艺美术	11	香港	第10届东南亚地区钻石首饰设计比赛	优秀设计奖
白静宜	凤钟	工艺美术	11	香港	第10届东南亚地区钻石首饰设计比赛	优秀设计奖
青海歌舞团		器乐	7	突尼斯	第12届迦太基国际民间艺术联欢节	器乐演奏特别奖
杨向东	雪山雄鹰	舞蹈	7	突尼斯	第12届迦太基国际民间艺术联欢节	男演员特别奖
吴民等6人	转碟	杂技	1	法国	第6届国际明日杂技节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王　虹	蹬技	杂技	1	法国	第6届国际明日杂技节	法国文化部长奖
高　进	高车踢碗	杂技	1	法国	第6届国际明日杂技节	巴黎市长奖
李莉萍	顶碗	杂技	12	摩纳哥	第9届摩纳哥国际杂技节	金小丑奖
崔凤云等3人	水流星	杂技	12	摩纳哥	第9届摩纳哥国际杂技节	蒙洛卡洛电台奖
朱　涵	千排麋集	摄影			联合国国际工业开发摄影比赛	金质奖
刘大可	古枫	摄影		英国	英国布里斯托尔沙龙	银质奖
林庭松	瞧姑娘	摄影		比利时	比利时尼威尔市摄影沙龙	第1名（彩色）
吕厚民	放鸭图	摄影		比利时	比利时尼威尔市摄影沙龙	第1名（黑白）
李英杰	元宵佳节庆丰收	摄影			联合国教科文第8届“节目”摄影比赛	精工奖
张桐胜	炼钢工人	摄影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第14届国际摄影沙龙	沙龙奖
陆开蒂	聚精会神	摄影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第14届国际摄影沙龙	沙龙奖
林庭松	渡口	摄影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第14届国际摄影沙龙	沙龙奖
戴洪祥			11	联邦德国	首届卡赛尔国际高级提琴制作比赛	音质金奖

1983 年中国电影奖

文化部奖

故事片　一等奖：《咱们的牛百岁》《大桥下面》《在被告后面》

二等奖：《血，总是热的》《不该发生的故事》《16 号病房》《廖仲恺》《没有航标的河流》《女大学生宿舍》《乡音》《四渡赤水》《道是无情胜有情》《武林志》

荣誉奖　《特急警报 333》《不当演员的姑娘》

特别奖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戏曲片　《火焰山》

译制片　《国家利益》《金牌》

美术片　《鹬蚌相争》《蝴蝶泉》

科教片　《灰喜鹊》《拱的建筑》《黄河与森林》《消灭野鼠》《计划生育》《细纱工作法》《棉花麦后移栽》《绿色世界》《凤尾菇》《蚯蚓》《家庭笼养鸡》《兔病防治》

纪录片　《毛泽东》《赤子心——怀念廖公》《春风从这里吹起》《草原的儿女》《海峡恩情》《祖国新貌》8302 号、《叶剑英》

金鸡奖（中国影协举办）

最佳故事片　《乡音》

最佳纪录片　《我们看到的日本》

最佳科教片　《灰喜鹊》

最佳美术片　《鹬蚌相争》

最佳导演　汤晓丹（《廖仲恺》）

最佳男主角　董行佶（《廖仲恺》）、杨在葆（《血，总是热的》）

最佳女主角　龚雪（《大桥下面》）

最佳男配角　于是之（《秋瑾》）

最佳女配角　宋晓英（《16 号病房》）

最佳摄影　杨光远（《再生之地》）

最佳美术　王兴文（《李冰》）

最佳录音　史平一（《再生之地》）

最佳特技　陶世恭、纪景春、王大雨、董振声、才汝质、雒廷富（《火焰山》）

最佳服装　费兰馨、朱凤堂、李琴（《再生之地》）

最佳化装　王玢瑞、纪伟华（《李冰》）

最佳道具　徐国梁（《秋瑾》）

特别奖　《毛泽东》（文献纪录片）、《四渡赤水》（革命历史片）、《不该发生的故事》（故事片）、《候补队员》（儿童故事片）、陈立洲（《路》导演）

百花奖（《大众电影》举办）

最佳故事片　《咱们的牛百岁》《16 号病房》《不该发生的故事》

最佳男主角　杨在葆（《血，总是热的》）

最佳女主角　龚雪（《大桥下面》）

最佳男配角　刘信义（《快乐的单身汉》）

最佳女配角　王馥荔（《咱们的牛百岁》）

中国作家协会 1983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篇名	作者	登载报刊	篇名	作者	登载报刊
围墙	陆文夫	人民文学 2	条件尚未成熟	张　洁	北京文学 9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青年文学 1	树上的鸟儿	王　戈	飞天 9
抢劫即将发生……	楚　良	星火 8	沙灶遗风	李育杭	北京文学 5
阵痛	邓　刚	鸭绿江 4	肖尔布拉克	张贤亮	文汇月刊 2
秋雪湖之恋	石　言	人民文学 10	雪国热闹镇	刘兆林	解放军文艺 7
兵车行	唐　栋	人民文学 5	逍遥之乐	陶　正	北京文学 4
琥珀色的篝火	乌热尔图	民族文学 10	除夕夜	达　理	人民文学 5
那山　那人　那狗	彭见明	萌芽 5	旋转的世界	陈继光	人民文学 11
亲戚之间	林元春	民族文学 9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胡　辛	百花洲 6
	清　玉译		船过青浪滩	刘靓平	萌芽 7
公路从门前过	石　定	山花 7			

第4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获奖作品及个人（1983年）

获奖作品及个人	制作单位	奖名	获奖作品及个人制作单位	奖名
高山下的花环	山东电视台	连续剧一等奖	小龙和小丽（6～10集） 电视剧艺委会、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	优秀儿童剧奖
生命的故事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连续剧二等奖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五二七级台阶）录制组	鼓励奖
华罗庚	浙江电视台	连续剧三等奖	欧阳山尊	荣誉导演奖
女记者的话外音	浙江电视台	单本剧一等奖	滕敬德、席与明（《高山下的花环》导演）	优秀导演奖
燃烧的心	广东电视台	单本剧一等奖	位北原（《燃烧的心》中饰王雨清）	优秀男主角演员
道是无情却有情	电视剧艺委会、河北电视台	单本剧二等奖	田成仁（《道是无情却有情》中饰陈岩）	优秀男主角演员
走进暴风雨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单本剧二等奖	相虹（《生命的故事》中饰玲玲）	优秀女主角演员
她从画中走出来	湖南电视台	单本剧二等奖	范艳华（《她从画中走出来》中饰高秀英）	优秀女主角演员
燕儿窝之夜	上影厂电视剧部	单本剧三等奖	廖冈（《红叶在山那边》中饰老吴头）	优秀男配角演员
紧急起飞	空政话剧团	单本剧三等奖	迟逢（《红叶在山那边》中饰吴月）	优秀女配角演员
亲家卖粮	内蒙古电视台	单本剧三等奖	王[illegible]（《高山下的花环》中饰梁大娘）	优秀女配角演员
行路难	安徽电视台	单本剧三等奖	王[illegible]（《女记者的画外音》）	优秀摄像
老梅外传	武汉话剧院	短剧、小品一等奖	闵宗泗（《华罗庚》）	优秀美术设计
水啊，纯洁的水	云南电视台	短剧、小品二等奖	何惠明（《燕儿窝之夜》）	优秀灯光照明
春雨	内蒙古电视台	短剧、小品三等奖	励定芳（《燕儿窝之夜》）	优秀灯光照明
小佳佳游园	四川电视台	优秀儿童剧奖	沈国桢（《燕儿窝之夜》）	优秀灯光照明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7日　建国后首次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

1月15日　杨勇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主持追悼会，杨尚昆致悼词。杨勇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副总参谋长。他于本月6日1时35分在京不幸逝世。

1月20日　胡耀邦总书记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重要报告。

1月25日　首都居民7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延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40周年。万里、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38年前在莫斯科病逝的冼星海的骨灰由中国驻苏大使馆专人护送回国。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原判处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月27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兰夫、廖承志等同首都少年儿童一起，在宋庆龄故居纪念宋庆龄诞辰九十周年。

1月30日　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的报告。

2月6日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题词。

北京、郑州、福建分别隆重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韦国清、倪志福、邓力群、胡启立参加了在北京长辛店举行的纪念会，并出席了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奠基典礼，铲土奠基。

2月26日　赵紫阳总理就开展1983年“全国文明礼貌月”活动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

3月4日　党中央决定重新发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向雷锋学习的题词。

3月6日　首都各界举行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二十周年大会。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题为《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的报告。

3月7日　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本日起在北京举行。王震、邓力群和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周扬在会上宣读了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团中央举行命名表彰大会，授予被誉为“八十年代新

雷锋"的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王震等老同志到会祝贺。

3月10日　任仲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3月12日　陈国栋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月13日　中共中央举行万人大会，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报告。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3月20日　毛致用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3月21日　安平生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3月22日　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3月23日　王恩茂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王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李立功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3月24日　陈希同当选为北京市市长，赵鹏飞当选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杰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李子奇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李力安、陈雷、陈俊生、侯捷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关广富、王全国、黄知真、沈因洛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白栋材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周惠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3月25日　阴法唐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李学智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项南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苏毅然、梁步庭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3月26日　高扬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池必卿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3月28日　乔晓光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3月30日　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正式成立。万里任主任，邓力群、黄玉昆任副主任。

3月31日　陈伟达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黄璜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4月1日　韩培信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本日在北京成立。李刚任司令员，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兼任政治委员。

4月9日　李瑞环任天津市市长，张再旺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4月10日　张晓初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罗天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灵光任广东省省长。

4月12日　赵海峰、黄静波、马万里当选为中共青海省委书记。

4月18日　马文瑞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4月23日　天津公安局抓获台遣特务姜炳琨等7人。

4月30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万里等本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同首都两万多群众举行联欢，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叶剑英、王震在广州，陈云在杭州，参加了当地的庆祝活动。

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本日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适应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化农业的形势，切实抓紧抓好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的工作。

5月12日　中央领导同志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题词，号召向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学习。

5月13日　原国民党陆军航空队第一大队观测中队第一分队队长李大维被任命为人民空军某航校副校长（副师职）。他是于4月22日驾驶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的。

5月19日　许家屯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5月26日　中国民航本日在首都机场举行大会，嘉奖在5月5日发生的劫机事件中保证中外旅客安全，捍卫祖国尊严的296号飞机机组。

6月3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本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席团会议由邓颖超主持。会议通过了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

6月4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邓颖超致开幕词。胡子昂主持大会。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祝贺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会议议程和日程，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大会议程，决定大会6月6日开幕。大会主席团首次会议本日举行，推选彭真等十六人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6月6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彭真致开幕词。赵紫阳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六届政协委员列席大会。

6月7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王丙乾关

于198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大会通过本次会议选举、表决和通过议案办法；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杨尚昆、江华、黄火青分别向大会提出五届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书面工作报告。

6月8日　我国本日加入南极条约。

6月10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本日沉痛宣告：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83年6月10日5点22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6月1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会议还选出了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其他领导人。

6月18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日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彭真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0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为国务院副总理，郑天翔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6月21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李先念主席和彭真委员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六项决议。

首都各界人士1200多人本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集会隆重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6月22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乌兰夫等本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六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

6月23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两千多人，本日来到北京医院吊唁厅，沉痛地向廖承志同志遗体告别。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乌兰夫等同志向廖承志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6月24日　首都隆重举行廖承志同志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廖承志同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侨胞、国际友人及各界群众3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彭真主持追悼会。李先念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廖承志同志为党为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6月25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本日在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

7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日起陆续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正式成立。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从本日起在全国试行。

7月8日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中共优秀党员李顺达同志追悼会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

7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邓小平文选》是1983年冬季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

7月2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7月7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认为《邓小平文选》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会议确定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是今后宣传工作的重点。

7月27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朱伯儒“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的荣誉称号。

中央领导同志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题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朱伯儒同志，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月29日　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发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6月26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的谈话摘要。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邓小邓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8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并作出关于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的决定。

8月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7月下旬在青海

省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察访问，并向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干部作了题为《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的长篇重要讲话。

8月17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

8月23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同志会见出席全国青联六届一次会议和全国学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青联委员、学联代表。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六届全国青联主席。

9月1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8月8日到22日在新疆进行了考察访问。

9月2日　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六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结束。大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九个决定。

国家主席李先念发布命令，公布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及其他各项决定。

9月11日　全国妇联第五届执委会选举康克清为主席。

9月12日　第五届全国妇代会胜利闭幕。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亲切会见出席五次全国妇代会的全体代表。

9月22日　原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乔冠华逝世，终年70岁。

9月23日　"现代花木兰"、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逝世，终年54岁。她于1945年女扮男装参军，屡建战功。

9月30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9月30日8时零2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10月4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邓颖超、徐向前、乌兰夫、薄一波等以及首都各界代表两千多人，本日前往北京医院向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同志遗体告别。

10月5日　首都隆重举行谭震林同志追悼大会。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邓颖超、乌兰夫、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3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

10月1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0月11、12日在北京举行，并发表公报。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就整党问题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10月16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16两日在北京举行。

10月17日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日判处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三名罪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

10月18日　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10月25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0月17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

10月29日　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本日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本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

11月4日　李先念主席10月25日至11月4日视察了福建各地。

11月5日　中国文联主席周扬本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衷心拥护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并就自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章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1月7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恢复。

11月8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本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一起开幕。

11月9日　赵紫阳总理从10月27日起在福建就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为期9天的调查研究。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

11月10日　中国文联本日召开在京部分著名文学艺术家座谈会。文联主席周扬在会上强调，文艺界搞好整党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本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6岁。

11月16日　人民日报本日刊登新华社的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并发表了新华社编者按。

11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1984年年底完成建立乡政府工作。

首都聚会庆祝卫生部顾问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邓小平、邓颖超、万里、王震、杨尚昆、薄一波等同志出席了招待会，并会见了马海德同志。

民主促进会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新领导机构，周建人

任民进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23日 刘少奇故居陈列室作了调整并充实了展品内容。邓小平同志为故居题写了匾额“刘少奇同志故居”。

11月24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次全盟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

11月25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

11月26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集会，纪念杰出的爱国民主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西安事变”主要发动者之一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邓颖超主持会议，王震在会上讲话。

11月28日 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陈丕显宣读中共中央贺词。伍禅致开幕词。黄鼎臣作工作报告。

12月2日 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严济慈主持大会。许德珩致开幕词。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宣读贺词。周培源作工作报告。

12月5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次全盟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闭幕。

12月6日 致公党、台盟选出新领导机构。黄鼎臣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子蘅当选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主席。

12月6日 陕西省和西安市各界人士本日集会，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九十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开放仪式剪彩。

12月7日 农工民主党选出新领导机构，季方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8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本日闭会。彭真委员长就这次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问题暂不作决定作了说明。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李先念主席、彭真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唁电，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港澳知名人士何贤逝世表示哀悼。叶剑英同志电唁何贤逝世。

12月12日 九三学社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负责人，许德珩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孙承佩当选为中央执行局主任。

12月14日 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习仲勋宣读中共中央贺词。史良致开幕词。费孝通作工作报告。

12月2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宣读中共中央贺词。王昆仑致开幕词。屈武作报告。

12月23日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这四个纪念室业已筹备就绪，将于12月26日正式开放。

12月26日 本日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与首都各界人士3000多人，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们还参观设在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中纪委、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也前往瞻仰参观。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同志发表文章《最好的怀念》。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本日开始发行。《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即将出版。

12月27日 民盟五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史良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28日 民革六届一中全会选出新领导机构。王昆仑再次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经　济

1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本月20日起，较大幅度降低化学纤维织品的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的价格。

3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批准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3月26日 国务院批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继续建设，并要求第一期工程在1985年9月建成投产。

4月11日 由著名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民间性质的光大实业公司，本日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王光英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

4月14日 国务院颁发《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4月26日 广州市黄埔港集装箱码头正式开业。

4月27日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制订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本日发往各地，征税工作从6月1日起开始办理。

4月23日 国家统计局本日发布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公报说，1982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为9894亿元，比1981年增长9%。其中工农业总产值为8291亿元，比1981年增长6.7%。国民收

入初步计算为 42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粮食总产量第一次突破 7000 亿斤大关，比历史上最高年的 1979 年还多 426 亿斤。

5 月 16 日　国务院决定扩大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的管理权限，使上海市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劳务出口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

5 月 21 日　上海市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出口工业区——闵行开发区，主要兴办电子、仪表、钟表、玩具、服装、食品等现代企业，产品以外销为主。

7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政策上放宽，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自主权，以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从人、财、物上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7 月 12 日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本日在北京成立。

8 月 22 日　国务院公布《经济合同仲裁条例》。

8 月 26 日　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9 月 23 日　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国务院决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国统一征收建筑税。

9 月 26 日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经过四年的调整，现在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0 月 4 日　国务院决定建立烟草专卖制度，设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并发布了《烟草专卖条例》。

10 月 17 日　国务院决定从 10 月份开始在全国开展财务大检查。

10 月 22 日　商业部本日发出通告，从 12 月 1 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1984 年不发布票、絮棉票。敞开供应的絮棉从 12 月 1 日起执行新价。

12 月 4 日　李先念 11 月 24 日考察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和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提出要重视职工技术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注意经营管理，采取措施控制污染问题。

12 月 20 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秦铁路双线提前一年全线铺通。祝捷大会本日在河北省抚宁车站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胡启立、李鹏等参加了祝捷大会。

12 月 22 日　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兴建的最大运煤码头，秦皇岛港煤码头第一期工程投产。

1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订 1984 年农村工作方针，向中央提出建议，以便进一步适应、保持和发展农村新局面，进一步完善责任制，进一步搞活经济。万里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军　事

1 月 3 日　人民解放军全军参谋长会议结束。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会前和会中就加强军队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4 月 16 日　我广西边防部队本日开始向连日对我边境武装挑衅的越军猛烈开火还击，保护我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春耕生产。

5 月 4 日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加强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

外　交

1 月 1 日　赵紫阳总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下午抵达利伯维尔，对加蓬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和安提瓜和巴布达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 月 2 日　赵紫阳总理抵达金沙萨，对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月 3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法国社会党代表团。

1 月 4 日　赵紫阳总理抵达布拉柴维尔，对刚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月 8 日　中国共产党和墨西哥统一社会党正式建立友好关系。

1 月 9 日　赵紫阳总理抵达哈拉雷，对津巴布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月 11 日　赵紫阳总理飞抵达累斯萨拉姆，对坦桑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月 12 日　中国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 月 13 日　赵紫阳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1 月 15 日　赵紫阳抵达内罗毕，对肯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1 月 16 日　胡耀邦总书记会见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主席迪兹达雷维奇。

1 月 25 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打电报给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热烈祝贺他六十五岁寿辰和从事革命运动五十周年。

1 月 30 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并宴请民主柬埔寨主

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2月4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赵紫阳指出，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要建立相互信任。

2月23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由总书记翁贝尔托·巴鲁利为团长的圣马利诺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3月1日　中共中央最热烈地祝贺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就解决柬埔寨问题提出了五点重要建议。

3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象牙海岸共和国政府决定自本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赵紫阳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象牙海岸外交部长西梅翁·阿克一行。

3月6日　赵紫阳总理本日打电报给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会议表示热烈祝贺。

3月12日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克斯·伊费尼丘库·埃奎梅博士和夫人访华。

3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正式建立关系。

3月29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比利时对外关系大臣莱奥·廷德曼斯。在会见时赵紫阳指出，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同比利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

4月2日　赵紫阳总理举行仪式欢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夫人访华。

4月3日　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和党中央书记胡耀邦分别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4月4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第三世界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北京“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及合作讨论会”本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赵紫阳总理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26个国家的68名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

4月5日　我国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发表谈话，强烈抗议荷兰政府批准荷兰台湾通航协议。

4月6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所谓“政治庇护”。

4月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本日下午会见由主席拉尔斯·韦尔纳率领的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中央代表团。

4月12日　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总理邀请，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这两个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访南太平洋地区。

4月13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日抵达克赖斯特彻奇，开始对新西兰进行为期五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4月17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结束对新西兰为期五天的访问以后，应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邀请，本日下午从新西兰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本日宴请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李先念强调中国坚决支持民柬抗越救国斗争。

4月24日　胡耀邦总书记设宴欢迎由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领访华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双方同意通过磋商恢复中印两党关系。

4月30日　中国与莱索托建交。

5月3日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应我国政府邀请本日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月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本日会见了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5月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本日乘专机抵达布加勒斯特，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本日会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本日被数名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机上载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拟前往汉城处理此事。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本日就中国民航班机被劫持在南朝鲜降落一事发表谈话，要求南朝鲜当局立即把飞机连同全体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交还中国民航，将劫机罪犯交给我方处理。

5月7日　彭真委员长本日晚会见由姆克瓦瓦议长率领的坦桑尼亚国民议会代表团。

5月9日　应我国政府邀请，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夫人本日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月13日　莱索托王国首相莱布阿·乔纳森应我国政府邀请本日到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月19日　毛里求斯总理阿内罗德·贾格纳特访华。

5月24日　南朝鲜汉城地方检察院本日宣布，正式逮捕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六名罪犯。

5月25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时指出，中美双方应采取实际行动建立相互信任，使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5月26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日分别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一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主席路易·范盖特及其率领的比共中央代表团，双方一致同意恢复中比两党关系。

6月3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抗议蒙古迫迁和驱赶华侨。

6月5日　赵紫阳总理致电热烈祝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召开。

6月8日　赵紫阳总理致电非洲统一组织第19届首脑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6月10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本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处死三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由战士。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本日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大会上发言，强调指出，第六届贸发大会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推进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

6月12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里佩尔和夫人。

6月13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秘鲁参议院议长桑德罗马里亚特吉·奇亚佩。

6月14日　赵紫阳总理本日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贸易部长拉比·纳马柳一行。

6月16日　我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大使馆，对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主权，坚持批准泛美航空公司经营台湾航线提出强烈抗议。

6月23日　彭真委员长、赵紫阳总理分别会见日本政府特使古井喜实，对日本政府派古井喜实一行前来参加廖承志副委员长吊唁活动表示感谢。

6月25日　日本政府特使古井喜实转交日本天皇授予已故廖承志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的仪式，本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接受了勋章。

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本日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先生，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7月4日　中非共和国国家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安德烈·科林巴上将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月6日　应我国人大常委会邀请，由杨亨燮议长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本日到达北京。

7月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杨亨燮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在会见时胡耀邦说，金正日同志6月对中国的内部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向前发展。

7月13日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第一次会议于本日开始举行。

7月14日　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哈尔特·哈迪·利尼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月17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乍得外交合作部部长伊德里斯·米斯金。

7月21日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伯德访华。

7月23日　我国驻美大使章文晋本日就美国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5.3亿美元武器一事，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

7月28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访华。

8月5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见三位正在中国访问的77国集团知名人士。

赵紫阳总理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廉·海登。

8月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国际知名人士、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和夫人等。胡耀邦说，外国石油公司同中国合作很有意义，一可以取得合理报酬，二可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

8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会见由下议院议长乌泰·屏猜春率领的泰国下议院议员团。

8月15日　我国政府本日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卡南·巴纳纳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日本《每日新闻》社代表团。胡耀邦说，我们对香港的主权到1997年是要收回的。现在举行的中英谈判只是讨论如何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以及从现在到收回如何逐步过渡的问题。他说，对于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是有一套系统的政策的。

8月18日　南朝鲜汉城刑事地方法院本日分别判处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6名罪犯4至6年徒刑。

8月24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见美国埃克森公司董事长加文和壳牌公司集团董事会主席巴克森代尔。赵紫阳总理说，同外国合作开发我国资源是我国确定的长期政策，不会改变。

8月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卡里略，中央执行委员、书记处书记马林和蒙特罗。

8月31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爱德华·佐林斯基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一行。

9月1日　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和王后陛下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9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本日离开北京前往朝鲜，参加朝鲜35周年国庆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胡耀邦、赵紫阳分别会见参加第三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等六位大臣。

9月8日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李先念、彭真、赵紫阳打电报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李钟玉，最热烈地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9月10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9月14日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沙群岛的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宣布任何外国占据南沙群岛的岛屿,以及在这些地区进行开发或其他活动都是非法的。

9月27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

9月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分别会见由石桥政嗣委员长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

10月6日　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访华。

10月11日　中国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第29届大会接纳为成员国。

10月23日　李先念主席会见前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五周年庆祝活动的日本朋友。

10月26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本日强烈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格林纳达。

10月28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今天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说,中国强烈谴责美国出兵入侵格林纳达。

11月1日　万里副总理设宴欢迎来我国访问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执委会主席加斯东·托恩。

从本日起,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关系。至此,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共同体。

11月5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日分别会见欧洲共同体执委会主席托恩。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切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

11月13日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奎特·马西雷访华。

11月18日　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祯本日向美国驻华大使递交抗议照会。朱启祯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1月15日通过的所谓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案,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11月21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克列斯库应赵紫阳总理邀请本日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赵紫阳总理主持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本日晚会见了德斯克列斯库等罗马尼亚贵宾。

11月2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日本国的邀请,本日乘专机从北京到达东京对日本进行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赵紫阳、万里、王震、杨尚昆、余秋里、胡启立、郝建秀等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11月24日　中曾根首相举行隆重仪式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胡耀邦总书记和中曾根首相本日举行会谈,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诚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愿意为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努力,愿为亚洲与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11月25日　胡耀邦总书记本日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阐明我国基本国策,展望中日友好关系前景,受到热烈欢迎。

日本天皇裕仁本日在皇宫会见胡耀邦总书记,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祯向美国驻华大使递交抗议照会,就美国会在通过的一项拨款法案中制造"两个中国"一事,代表我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月26日　日本青年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胡耀邦总书记访日。胡耀邦总书记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宣布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访问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会见并宴请秘鲁人民行动党总书记、秘鲁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哈维尔·阿尔瓦·奥兰迪尼和由他率领的秘鲁人民行动党代表团。

11月28日　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主席、彭真委员长、赵紫阳总理分别致电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最热烈祝贺南斯拉夫国庆四十周年。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本日到达北京,应我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工作访问。

11月29日　赵紫阳致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会主席。电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宾主就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交谈。

12月1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美国大西洋富田(阿科)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一行,就莺歌海合同区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14日　中共中央写信给12月14日开幕的西班牙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

12月14日　李先念主席,赵紫阳总理分别会见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12月15日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本日抵达北京。李先念主席主持隆重仪式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

12月16日　李先念主席本日在会见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一行。

社会生活

1月1日　首次全国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全面展开。

1月28日　1982年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揭晓。他们是:李宁、朱建华、韩健、孙晋芳、郎平、宋晓波、邹振先、吴佳妮、刘适兰、郭跃华。

2月13日　新疆乌恰县托云公社发生6.8级强烈地震。

3月19日　我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信忠获1983年联合国人口奖。

3月21日　我国短跑宿将、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刘长春逝世,终年74岁。他是我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3月26日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共产党员安珂,在一宗盗窃行凶案发生时,挺身而出,保护同志,捉拿凶手,光荣牺牲。广东省广播局机关党委授予安珂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3月28日　1983年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在伦敦结束。在全部五项比赛中,我国选手夺得男、女单打和女子双打三项冠军,并获得两项亚军和五个第三名。

4月4日　由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中国公司租用的一架"空中国王—200型"飞机(机号FBVBP)本日上午10时47分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后4分钟坠毁,机上乘客5人、机组3人全部遇难。

4月8日　我国第二个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孕育的婴儿在湖南长沙诞生,第一个是1月16日在湖南常德市诞生的。

4月11日　福建省龙阳县遭龙卷风袭击,群众死54人,重伤163人。

4月13日　国务院本日发布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

4月28日　28日夜23时起,我国黑龙江西部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春季暴风雪,雪深一尺多,铁路、输电和通讯线路中断。

4月30日　第三届世界杯跳水比赛本日在休斯敦结束,中国队在总共七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四项冠军。周继红、李艺花分获女子跳台跳水和跳板跳水冠军。

5月3日　在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我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蝉联冠军。这是男队第八次、女队第六次获得世界冠军。

5月8日　中国羽毛球选手李玲蔚本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女子单打冠军;林瑛和吴迪西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5月9日　在日本举行的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本日结束,我国运动员获得六项冠军。

6月11日　我国优秀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本日在北京跳过了二米三七的高度,刷新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7月11日　连日暴雨,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上涨,沿江水位普遍超过警戒水位。汉口以下沿江水位超过1980年洪水位,仅次于1954年的第二次大洪水。沿江省市组织了上百万军民巡堤防洪。

7月29日　规模宏大的引滦入津工程经过广大军民一年多的努力本日宣告胜利竣工,长达234公里的工程全线都具备了通水条件。

7月31日　7月28日至31日汉江上游连降暴雨,汉江发生特大洪水,安康县被淹。

8月7日　第九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在圣保罗闭幕。首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我国女子篮球队荣获第三名。

8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前往陕西安康灾区,亲切慰问受灾群众和奋勇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8月15日　我国目前最大最长的城市引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本日上午开始全线试通水。

8月21日　第三届世界杯羽毛球赛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结束。我国选手韩爱萍获女单冠军,韩爱萍和李玲蔚获女双冠军,韩健获男单冠军。

8月31日　吴数德在五运会举重56公斤级抓举决赛中,以128公斤成绩打破127.5公斤的世界纪录。

9月3日　第五届全运会"振兴中华火炬接力"点火仪式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广场举行。国家主席李先念亲手点燃了火炬。

9月14日　中国民航264号三叉戟客机本日上午9时34分,在桂林机场地面滑行时同一架军用飞机相撞,机上有中外旅客100人,死亡10人,受伤19人;机组人员受伤2人。

9月16日　国际奥委会向荣高棠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手将勋章及证书授给荣高棠。

9月18日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本日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隆重开幕。乌兰夫、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火车头体协等31个体育代表团和上海四万多名观众一起参加开幕式。

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玏、王宗玮本日在江西广昌县开枪拒捕时被击毙。

9月22日　我国优秀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本日在第五届全运会田径决赛中,跳过2.38米,打破由他本人保持的2.37米世界纪录。

9月24日　中国女子竞走队在世界杯竞走女子10公里比赛中夺得团体冠军,徐永久获个人冠军,这是中国

第一次获世界田径比赛冠军。

9月25日　1983年北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本日举行。美国选手罗尔·艾伦·塔布获第一名。我国选手单长明获第八名。

10月1日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本日在上海胜利闭幕。

10月11日　第一届亚洲杯乒乓球赛本日在无锡圆满结束。我国选手蔡振华获后藤杯，曹燕华获城户杯。

10月21日　第四届世界杯技巧赛本日在美国赛达拉皮兹结束。我国运动员夺得四项冠军。

10月25日　美国"瓜哇海"号钻井船在莺歌海遭强台风袭击沉没，中外人员81人全部失踪。

10月26日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我国男子体操队首次荣获团体冠军。

10月28日　卫生部发言人本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国对40种精神药物(包括原料及其制剂)的进出口实行准许证制度。这个规定已于10月中旬开始执行。

10月30日　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各项比赛本日全部结束。中国队获男子团体冠军，童非获男子自由体操冠军，楼云获双杠冠军。

12月23日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本日正式宣布，中国将派出代表团参加1984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14届冬季奥运会和在美国举行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

文化教育

1月17日　中科院生物学部决定授予研究生徐巧巧理学博士学位。这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

1月28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组长，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任副组长。

2月4日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文化战士、国际活动家、著名诗人萧三同志，上午9时5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2月20日　国务院决定授予赵春娥、罗健夫、蒋筑英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2月23日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因肝癌医治无效，本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

3月15日　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结果在北京揭晓。《人到中年》《骆驼祥子》同获最佳故事片奖。

3月17日　全日制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将进行较大的改革。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83年全日制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教育部已将此报告连同《1983年全日制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发给各地执行。

3月28日　第三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金像奖)评选揭晓。《蹉跎岁月》《武松》等18部电视剧获奖。

4月1日　全国教育工作者"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先进代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4月2日　著名的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因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和心脏病复发，本日晨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

4月15日　我国锗酸铋晶体研制成功，居世界先进水平。用它的爱克斯射线照像两秒钟就可诊断出各部位肿瘤。

4月22日　本日上午12时47分，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终年82岁。

5月7日　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

5月17日　建国以来第一次盛大的全国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和儿童少年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本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彭建秀、李先念、邓颖超等会见出席大会的代表。

5月27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向18位博士学位获得者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给他们的指导教师发了纪念品。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方毅、胡乔木等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乔木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5月29日　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本日在西安召开。会议呼吁：要重视两亿在校学生的健康，加强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

5月30日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彩色电视制作播出中心——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工程本日上午在北京破土动工。

6月1日　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5月25日至6月1日)。会议决定加快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全国新闻专业点要从目前的16个发展到30个左右。我国第一所新闻学校将于明年初步建成，作为全国新闻教育的中心。

6月11日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画家李苦禅因患心脏病本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6月13日　张大千画展本日在北京开幕。

6月16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歌舞剧场本日在北京西郊动工。

7月16日　李先念主席本日下午通过"天狼星"卫星与意大利总统山德罗·佩尔蒂尼直接通话，祝贺中意两国科技人员通过这颗卫星进行的联合科学试验，并希望两国科技人员在联合试验中取得丰硕成果。

8月11日　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经过近30年辛勤

劳动，终于揭开了又一个科学之“谜”：发现对农作物危害严重的粘虫每年从南往北迁飞，又从北往南飞回。对这一规律的发现，许多国家昆虫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研究工作走在世界前列。

8月24日　我国发射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本日中午12时46分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这颗卫星是8月19日发射的。

9月5日　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这一重要的研究工作，预示我国小麦育种将有重大变革。

9月23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北京图书馆新馆本日奠基兴建。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图书馆新馆题写馆名“北京图书馆”。

9月26日　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10月1日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董志伟等中青年科研人员，培养成功我国第一株抗胃癌杂交瘤细胞株。

10月11日　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发奖大会本日在北京举行。我国北京学生王忠群获第一名。

10月18日　李先念同志本日题词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70周年。题词是：“学习陈嘉庚先生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11月2日　北京提琴厂技师戴洪祥制作的小提琴，在第一届联邦德国卡赛尔国际高级提琴制作比赛中获金奖。

11月5日　著名国画家刘继卣本日凌晨辞世。他临终前把巨幅国画《双狮图》献给国家。

11月13日　中国儿童电影《泉水叮咚》获第三届印度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像奖。

11月15日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第一个大型向量计算机系统（简称“757”机），在北京通过国家鉴定。方毅等领导同志本日出席了鉴定签字仪式。

11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和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谈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政策和界限。邓力群指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并指出优秀文化遗产要继承，文化生活要丰富多采，经济体制要继续改革，对外要继续执行开放政策，要更好地美化人民生活。

12月9日　自1978年以来我国已向国外派出近18500名公费留学人员和7000名自费留学人员。

12月15日　田汉诞辰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邓颖超等出席纪念会。朱穆之、周扬在会上讲了话。

12月17日　198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本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医学院营养卫生教研室主任宋圃菊副教授取得的用猕猴桃汁阻断致癌物质在人体内合成的科研成果，受到国际营养学界和肿瘤研究机构的重视，为祖国赢得荣誉。

12月18日　国务院批准在科技界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限。

12月19日　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第14次会议本日在北京举行。马传染性贫血病弱毒疫苗、水稻新品种“原丰早”、棉花高抗枯萎病的抗原品种、猪瘟免化弱毒疫苗等四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一等发明奖。

12月20日　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教师陆家羲攻克世界数学难题“斯坦纳系列”和“寇克满系列”，完成了两项在组合计算领域内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流工作。

12月22日　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银河”巨型计算机系统已研制成功，并通过了国家鉴定。方毅等同志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银河”亿次机国家鉴定会。

12月30日　新年前夕，胡耀邦、赵紫阳、彭真和邓颖超向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员发表录像讲话，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勉励他们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知识学到手，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力军。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4年

导　言

1984年，正值国庆三十五周年之际。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

自年初以来，越南当局屡屡犯我边境，杀我军民，扰我生产，挑起纷争。我国在屡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七月到八月，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是自1949年后首次参加奥运会，并且一举得了15枚金牌，震惊了世界体坛。振奋中华精神，雪病夫之耻。从此，中国体育事业便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十月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花如潮。建国三十五年国庆阅兵式在这里隆隆举行。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举国欢腾，万众一心。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誓言；小平您好，是人民的心声……十一月，我国首支南极考察队启程，远征那神秘的南极大陆。八五年二月，中国长城站正式落成。冰天雪地之中，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国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
- 越南小霸屡犯境，中国军民惩敌顽
- 我国同步定点卫星发射成功
- 23届奥运会，神州扬威美国洛杉矶，健儿雪耻
- 三十五周年国庆，举国欢腾，改革开放誓到底，十亿中华儿女，群情振奋，振兴中华，斗志昂
-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 江南惨遭害，华人共激愤
- 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一国两制、各方齐欣然。和平统一，明珠重耀彩
- 首次南极考察，探索神秘大陆

中国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

5月15日，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说：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这批沿海港口城市共有14个。

国务院决定，扩大这些城市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权力，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对来华投资办厂的外国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公司、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待遇，使这些城市同4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越南小霸屡犯境，中国军民惩敌顽

背景介绍

自七十年代以来，越南黎笋集团屡次犯我边境，杀我军民。1984年，越南当局为了逃避国际谴责，又入侵我滇、桂边境，我边防军民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

材料：

-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
- 越南反华武装挑衅的国际背景

材料一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

长期以来，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事端。1984年入春后，越军的挑衅和扩侵愈益加剧。越南不仅向中国边境地区开枪开炮，杀害和平居民，并且派出大批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加紧反华叫嚣，甚至散布中国部队入侵越南领土的谣言，以转移国际舆论视线，掩盖其侵略行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84年1月11日、4月4日、4月29日、5月26日和11月21日多次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边境的挑衅，并表明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云南、广西边防部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对在边境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和入侵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还击。发言人同时指出，如果越南当局仍然无视中国方面的严正警告，蓄意进一步加剧边境紧张局势，那么越南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全部后果。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中国云南边防部队于1984年4月2日～27日，对入侵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者阴山地区的越南侵略军，进行了炮火还击；于4月28日、30日和5月15日，进行了收复失地的战斗；转入防御后又粉碎了越南侵略军多次偷袭和强攻；7月间，击退了越南侵略军一个师规模的猖狂进攻。越军不甘心失败，不断骚扰破坏，伺机进行反扑。中国云南边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歼灭来犯之越军，以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保卫边境各族人民的和平劳动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1979年2月以来，发生在中越边境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越南当局蓄意制造边境事端，破坏中越两国关系，指使其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侵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边民。正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云南边防部队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本着“我们不要别人侵占我国一寸领土”的原则，奋起进行了自卫还击的正义之战。

这次自卫还击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云南边境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军民紧密团结，各部队密切协同，

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云南边防部队发扬光荣传统,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英勇奋战,为祖国为人民创立了新的功勋。

(朱渊元)

材料二　越南反华武装挑衅的国际背景

7月12日,越南当局出动师级规模兵力向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地区发起猖狂进攻。这一进攻被击退后,尽管中国劝告越方立即停止向中国武装挑衅,使中越边境局势平静下来,但是越南方面并未收敛,继续疯狂炮击中国老山地区,仅7月13、14日两天就打炮七千多发,而且不停调兵遣将,蠢蠢欲动。

越南当局如此一再在中越边境制造紧张局势,进行反华煽动,除了借此加强对国内人民的控制外,还有其对外需要和国际背景。

首先,是为了转移国际舆论的视线。越南当局顽固坚持侵略柬埔寨,对抗联合国要求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的决议,在国际上遭到越来越广泛的谴责,处境十分孤立。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四出游说,玩弄各种外交花招的同时,加紧反华武装挑衅,企图分化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国际力量,把世界舆论的视线从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引向中越边境。然而,他们的外交花招接连破产,他们的"中国威胁"的反华宣传,尽管得到莫斯科的极力帮腔,但市场越来越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不相信。相反,国际上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呼声和压力越来越强烈。特别是最近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重申了要求越南对柬埔寨的非法占领"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再一次拒绝了越南的所谓"印支国家集团同东盟国家集团对话"的建议。

河内外交上的挫折,使越南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孤立、被动。而下届联大即将于9月召开。越南当局对此焦虑不安,担心在联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辩论和表决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些背景下,越南当局的反华进一步升级,在中越边境挑起了这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目的无非是为他们的"中国威胁"的谬论制造新论据,转移人们的视线,缓和世界舆论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压力。

其次,是为了牵制和影响中苏关系。自从中苏两国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副外长级磋商以来,怀有地区霸权鬼胎的河内领导人对此十分害怕。他们拼命攻击中国要求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主张,极力阻挠中苏关系正常化。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今年年初公开承认:"我们当然要阻止他们这么做",声称:"今天,没有苏联,越南将一事无成。"黎笋更声称:"在越南的路线上,同苏联紧密团结和全面合作,是原则,是战略。"这些谈话表明,河内领导人要紧紧地把苏联同他们拉在一起,以便继续领先苏联,推行地区霸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原定5月访华。恰恰在这之前,他们于今年春季进一步加紧向中国边境武装挑衅,制造紧张局势。今年五、六月间,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等,接踵访问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商讨东南亚局势和两国"全面合作"的问题,向苏联索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6月、7月初,中苏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会谈。会谈结束不几天,就发生了这次武装挑衅升级事件,也绝非偶然。

其实莫斯科支持越南是出于它自己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在中越边境问题上它同河内遥相呼应,攻击中国,苏联领导人还向河内领导人表示,给予越南以"声援"和"全面支持""是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始终不渝的方针"。越南当局的这次反华武装挑衅升级,正是在得到了莫斯科"全面支持"的保证以后发生的。越南《人民军队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证实:苏联领导人"完全支持越南反对中国"。中国方面从中苏磋商以来一再指出,苏联不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不排除这个障碍,中苏两国关系难以实现正常化。不幸,目前莫斯科还不愿消除这些威胁中国的障碍。

(1984年7月23日新华社记者黄远)

我国同步定点卫星发射成功

背景介绍

中国自1971年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卫星事业蓬勃发展。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同步定点通信卫星于1984年4月8日发射成功。

材料:

- 中国第一颗同步定点卫星发射成功

材料　中国第一颗同步定点卫星发射成功

我国于4月8日19时20分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于4月16日18时27分57秒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这颗与地球同步定点的通讯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4月18日就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给参与研制、试验的全体同志发了贺电。贺电指出,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我国航天技术有了新的飞跃。这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全国人民也是极大的鼓舞。4月

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胡耀邦、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赵紫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第一次进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赵紫阳说，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解决重大科技课题的有效形式。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使广大科技工作者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23届奥运会，神州扬威美国洛杉矶，健儿雪耻

背景介绍

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的一声枪响，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的零的突破。从此，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世界体育大国，"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扔进了滔滔太平洋。

材料：

- 中国参加23届奥运会
- 从零开始

材料一　中国参加23届奥运会

本届夏季奥运会于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该城曾在1932年举办过第10届奥运会。原估计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加，最后参加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和地区，仍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届奥运会的规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共7616人(其中女子1719人)。大会于7月28日开幕。

我国派出353人的大型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225人)参加了22个项目中的16项比赛和1项表演赛，赢得了78个前8名，其中金牌15枚、银牌8枚、铜牌9枚。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获得金牌，被誉为"零的突破"。这标志着我国已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在第23届奥运会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应该得到最大的赞誉"。新芬兰报指出："中国在奥运会崭露头角，预示着它将成为世界体育大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表现出来的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胜不骄、败不馁，重友谊、守纪律，虚心学习、奋勇进取的良好风尚，也赢得了各国人士和美国人民的热情赞扬。法新社指出："中国通过奥运会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变化，中国向世界显示了爽朗、友好和开放的形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中国人获得外交金牌。"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在给我国外长的信中写道："友好的中国运动员不愧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我们同你们的人民共享欢乐和自豪"。尤其是射击选手许海峰首获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一次壮举"；女排在分组预赛中以1比3负于美国队后，败而不馁，在决赛中直落3局挫败美国队，登上冠军宝座，实现了"三连冠"的宏愿；体操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沉着应战，取得多项优胜，李宁成为本届奥运会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这些动人事迹，使海内外炎黄子孙抚今追昔感慨万千。1932年，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只派出一名运动员，连决赛也未能进入，被当时的美国报纸揶揄耻笑，受尽屈辱；今天，中国体育健儿的胜利，激发了亿万同胞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许多华侨、外籍华人高兴地说"好政府，好选手，好成绩。雪耻辱，获金牌，扬国威。""祖国此次选派健儿参加洛城奥运会，连获奖牌，成绩辉煌，振我中华雄风。祖国积弱百余年，侨胞寄居异邦多受压抑，今日一舒积抑"。

台湾遵照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决议，派出67人组成的中国台北奥委会代表团参加本届奥运会，获举重比赛和棒球表演赛的铜牌各一枚。这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一起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上，双方代表团同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声中踏步入场；举重场上，出现了双方选手同台领奖的感人场面；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同胞之爱，汇成了一股推动祖国统一的热流。美国一些华人、华侨报纸纷纷呼吁"中国统一和强大自体育始"，"希望早日统一"，"台北体育应学大陆"。这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台湾当局正是迫于广大台胞不可逆转的心愿，从比赛第5天起开始电视转播大陆运动员的比赛情况。一位台湾学者说："平生两大快事，一是日本投降，二是女排打败美国"。还有的台胞来信说："你们的胜利对沟通两岸人民的来往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零的突破"。

材料二　从零开始

中国体育健儿从洛杉矶奥运会凯旋归，受到祖国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在欢迎中国体育代表团胜利归来的宴会上，赵紫阳总理的讲话和昨天的欢迎大会上，乌兰夫同志的讲话，对我国体育健儿和体育工作者是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昨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亲自给获得金牌的健儿发奖。这是体育健儿们的巨大荣誉，也是整个体育战

线的巨大的荣誉。

"零"的突破，又是从"零"开始。

中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一大功绩，就是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以赢得运动成绩金牌数第四位和赢得精神文明这块无形金牌的丰硕成果，雪洗了中华民族在奥运会上的屈辱史，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零"的突破，表现了一种精神。这就是不畏困难，不怕挫折，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就是坚定信念，团结一心，开拓前进，艰苦创业的精神，用这种精神搞体育，体育必胜；用这种精神干四化，四化必成。

中国体育实现了历史性的"零"的突破，对于参加这届奥运会来说，已成过去。现在，一个新的起点又开始了。新的起点，就是中国开始从亚洲体育强国向世界体育强国进军。怎样进军?这里用得着中国乒乓球队的一著名口号：从"零"开始。

在这届奥运会上，我国虽然夺得十五枚金牌、八枚银牌和九枚铜牌等好成绩，但在奥运会奖牌总数中还是很少的。就是夺得金牌的项目，有些也并不占绝对优势。在世界运动技术日新月异，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只有从"零"开始，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才能巩固荣誉，发展荣誉。何况，我们在田径、游泳等重点项目及一些其他项目中，除个别单项外，在奥运会奖牌上仍然是"零"的纪录，还有待于争取"零"的突破呢。从"零"开始，就是胜利了也不踌躇满志，不趾高气扬，不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相反，要看到不足，承认差距，胸怀远大理想，提出新的奋斗目标。这样，我们才能奋发图强，不断进击，把我国体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赵总理说，建国三十五年来，体育战线有很多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在迎接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的时候，我们体育战线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彻底否定"文革"，消除"左"的流毒，锐意改革，不断创新，为在本世纪末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努力奋斗！

(1984年8月20日体育报社论)

三十五周年国庆，举国欢腾，改革开放，誓到底。十亿中华儿女，群情振奋，振兴中华，斗志昂

背景介绍

伟大的祖国，自她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遭到孤立、封锁、包围……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三十五年来，人民共和国战胜了艰难险阻、内外困难；

三十五年来，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的祖国。

全国各族人民在十月一日以各种形式庆祝国庆。

在北京，开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阅兵仪式和焰火晚会；

在全国其他各地，广大群众纷纷以游行、游园、晚会等多种形式庆祝国庆。

材料：

·全国各地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

材料　全国各地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

1984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有50万人参加了广场上的庆祝活动。

这一天，首都全城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城楼红墙中央，高悬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竖立在广场的南面。城楼对面的东西两侧，竖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广场东西两侧，林立的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空14个大红宫灯气球高高地并排，标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横标两边的两个气球上，挂着两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大花篮。广场上10万名身穿鲜艳服装的少先队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一早就排成了整齐的队伍。他们手持着花束轮番变换出5个巨大图案：金色的国徽和年号"1949－1984"；绿底白字的"祖国万岁"；红底白字的"振兴中华"；绿底白字的"保卫和平"；红底黄字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整个广场从空中到地面，色彩缤纷，蔚为壮观。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一起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联合政府总理宋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及黄文欢，正在中国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宣布庆典开始。广场上12000人组成的军乐队高奏国歌，28响礼炮响彻云霄，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心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走下天安门城楼，由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乘坐敞篷检阅

车检阅了受阅部队。检阅车驶过一个个方队时，邓小平频频向指战员们挥手致意，不断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们齐声高呼："首长好！""为人民服务！"

检阅完毕后，邓小平回到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向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保卫祖国安全而奋斗的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致最热烈的节日祝贺。他在讲话中谈到了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对外政策。他满怀信心地宣布，最近几年的情况说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他说，中国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中国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一样。

邓小平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全场不时为邓小平的讲话热烈鼓掌。

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人民武装警察以及首都民兵的一万多名优秀儿女，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接受祖国、党和人民的检阅。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游行队伍，兴高采烈的心情和队伍中的各种彩车、模型，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团结奋斗的坚强信念。生动地表现了35年来全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北京大学学生还举起写着"小平您好！"的横幅走过检阅台前。引起观礼台上下一片欢声。

当天晚上，首都各界群众1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联欢点，举行了盛大联欢晚会。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联欢晚会，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联合政府总理宋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黄文欢，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等贵宾，也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晚会。

应邀来华的3000名日本青年和在京的外国专家、留学生等，同首都工人、学生一起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尽情联欢。

9月30日晚，赵紫阳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会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同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宾客欢聚一堂，共庆中国人民的这个光辉节日。

一些国家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分别致电中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在此前后，中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也分别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9月30日和10月1日，全国城乡各族人民举行各种活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1984年国庆节日的一个特色是不少地方的农民进城参加庆祝活动，有的组成各种舞蹈队进城表演，歌颂党富国富民的政策。

1984年国庆，适逢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双喜临门。香港各界同胞喜气洋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香港、九龙和新界，五星红旗到处迎风招展；入夜，许多楼房前面，大红灯笼和霓虹彩饰相互辉映，光耀夺目。

澳门同胞近千人10月1日举行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会后，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发了致电敬电。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背景介绍

中国的高科技物理自建国以来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加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决定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材料：

·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材料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及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奠基典礼。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奠基石培了土。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台可以使正、负2个电子束，在同一个储存环里沿相反的方向加速，并在指定的地点发生对头碰撞的巨型机器。正负电子的能量各为22～28亿电子伏。这台机器由注入实验区和注入器、储存环、探测器、同步辐射实验区和计算中心组成。

注入器是一台长约200米的能加速电子和正电子的直线加速器，它的头部旋转能产生脉冲电子的电子枪，电子束被加速到设计的注入能量，然后沿着近100米长的束流输运线被送进储存环，按照预定的运动方向在储存环内储存。当正电子束团强度达到设计值后，撤去正电子靶，就可以使电子束被加速到注入的能量，沿着一条束流输运线送到储存环内加速并储存起来。然后，正电子和电子束同时被加速到最后能量，对撞机发生高能反应。电子束被加速后，同时发出同步辐射光。储存环是个环形跑道

式的加速装置,沿环旋转各种磁铁、高频加速站、检测和控制系统、真空系统。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并保证正负电子束团在储存环内按指定的轨道运动。探测器是台通用性较强的大型谱仪,放置在储存环的对撞区域内,对带电粒子有良好的分辨能力。电子对撞机的同步辐射区,将建造5米条光束和7个实验站,利用高能电子放出同步辐射光,可进行多方面的应用研究。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开工建设,不仅表示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的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正在向新的高峰发展。

(泉松)

江南惨遭害,华人共激愤

背景介绍

美籍华人江南因写了《蒋经国传》,触怒了某些人。于1984年10月被暗杀在美国旧金山住宅前。江南命案,震惊了美国华人社会、台湾和大陆各界。

材料:

- 江南被谋杀
- 江南被害引起公愤

材料一　江南被谋杀

以江南笔名撰写《蒋经国传》的美籍华人刘宜良,1984年10月15日上午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德利市,被预先埋伏的凶手开枪刺杀,身中3弹遇害。江南命案使美国华人社会大为震惊,成为1984年美国华人社会10大新闻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江南的《蒋经国传》等著作犯了台北的大忌,他在吴国桢去世前曾到美国乔治亚州访问吴氏,发表了涉及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的访问记,并准备撰写《吴国桢传》。江南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到过浙江奉化,为了给正在写作的《龙云传》搜集材料,1984年9月,他访问了北京、云南等地。江南遭暗杀后,他的朋友组成了"江南事件委员会",要求美国当局查清此案。对江南命案新闻,台湾起初均作淡化处理,《中央日报》说这是"华人社会中很平常的一则社会凶杀新闻"。国民党在香港的喉舌《香港时报》,居然发表社论《江南命案是共产党制造的》。11月29日,美国警方宣布:江南命案已被侦破,疑凶手是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头子陈启礼等人"。台湾报纸均以显著地位刊登此消息,《中央日报》的标题更强调:"此案证明非政治性",但江南夫人崔蓉芝证明,江南生前与"竹联帮"毫无瓜葛,要求查清疑凶的幕后指使者。11月12日,台湾实施"扫黑"行动,疑凶陈启礼、吴敦被捕。12月4日,"江南事件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司法部立即组织联邦陪审团,对谋杀江南的嫌疑犯提出控告,并将他们从台湾引渡到美国。声明指出,美国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江南命案乃属一桩政治谋杀,主谋乃属台湾之有力人士,其目的在于堵江南之口,以阻其发表有关蒋氏父子的史学著述"。美国国务院也正式向台湾当局提出引渡凶嫌的要求。

材料二　江南被害引起公愤

刘宜良是著名的美籍华人作家,曾以"江南"的笔名撰写《蒋经国传》,10月15日上午在美国旧金山被埋伏在他车库的的凶手杀害。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工商联、全国台联11月5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集会,沉痛悼念在美国被暗杀的刘宜良。会上,大家愤怒谴责杀人凶手的暴力行径,希望美国有关当局采取措施,严惩凶手。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担任这次集会的主席,他在讲话中说:刘宜良为人正直,著述丰富,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他惨遭杀害,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愤慨。我们强烈谴责卑鄙的谋杀暴行,坚决支持美国华侨、美籍华人的正义要求,迫切希望美国有关当局采取果断措施,查明真相,缉拿凶手归案,以平公愤,伸张正义。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无党派民主人士程思远、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进中央副主席雷洁琼、全国台联会长林丽韫、台盟总部主席苏子蘅、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古耕虞、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陆榕树、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郝诒纯、民进中央副主席陈舜礼、台盟总部副主席林盛中等,先后在集会上讲了话,他们都强烈谴责了凶手和暴行。集会还通过了致刘宜良夫人崔蓉芝女士的慰问电报。

座谈会表现了中国各方面代表人物对江南被害的愤慨,并严密注视台湾当局对江南被杀害作出合乎事实的交代。

有关方面人士和应邀来北京大学讲学的台湾知名学者、美国柏克莱大学研究员陈鼓应等共200多人参加了集会。

(李清池)

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背景介绍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要求党在理论上作出更明确的回答。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了我国今后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材料：

· 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材料　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叶剑英因病未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二、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十二届三中全会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作出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这对中国的前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决定》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指出：改革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是为了建立有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强调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休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的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全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决定于1985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和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1000人左右，代表都有表决权。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充分的信心和勇气，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努力夺取改革的全面胜利，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为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华世俊）

一国两制，各方齐欣然。和平统一，明珠重耀彩

背景介绍

自1982年中英双方进行谈判以来，经历无数次唇枪舌剑，终于签署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伟大祖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佳证明！

材料：

· 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材料　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2年9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应邀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进行了讨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在此以后，双方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于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开始。是年双方进行了7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1984年1月25～26日、2月22～23日、3月16日～17日和26～27日、4月11～12日在北京进行了第2阶段第8～12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4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到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全面深入地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进行了友好的讨论，双方回顾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会谈进程，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可贵进展。

4月27～28日、5月9～10日和30～31日、6月12

～13日和27～28日、7月11～12日和24～25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第13～19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7月27日，杰弗里·豪应吴学谦的邀请再次抵达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同吴学谦就香港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深入会谈，并同邓小平、赵紫阳、姬鹏飞进行友好的交谈。邓小平对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取得重大进展表示祝贺。杰弗里·豪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保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与稳定。

8月8～9日和21～22日、9月5～6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第20～22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9月18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就香港全部达成协议。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4年9月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草签。

上午10时，草签仪式在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前任团长姚广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政府代表团长、英国驻华大使理德·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据了解，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11月6日，赵紫阳提请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联合声明》，吴学谦受国务院的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的报告。

14日，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英两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决定在双方正式签署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12月5～10日，英国议会下院和上院经过辩论后，分别一致通过《联合声明》。

12月18日，应邀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厅隆重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在讲话中对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顺利地解决了香港问题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指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其他国家在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问题上树立了榜样。赵紫阳着重指出，确保联合声明不受干扰地全面贯彻实施，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双方的共同责任。中国政府愿继续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同英国政府一道，力促这一目标的实现。并希望香港同胞和各界居民同心协力，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撒切尔夫人说，总理先生和我签署这项协议，显示出我们坚定地对协议承担了义务。她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其他英国贵宾以及应邀专程来京观礼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联合声明的签署，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为了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当代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英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联合声明签署后，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双方重申，两国政府将不折不扣地执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便中国能顺利地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将会进一步发展。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同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联合声明》受到了包括5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普遍支持。也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赞扬和欢迎。

首次南极考察，探索神秘大陆

背景介绍

南极大陆，世界上最后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充满了神秘，也蕴含丰富的宝藏。一些发达国家纷纷登上这片土地，进行科学考察、矿藏探测。中国政府于1981年成立南极考察委员会，积极进行考察准备。

材料：

- 中国南极考察队启程
- 南极考察史上光辉的一页

材料一　中国南极考察队启程

10月8日，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在北京成立。11月20日，我国首次赴南大洋、南极洲考察队从上海启航出征，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和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举行隆重的启航仪式。海军政委李耀文、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分别将五星红旗、镌有邓小平同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题词的铜匾和"中国南极长城站"铜质站标授给考察队。

12月26日，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胜利抵达南极洲，"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J121"打捞救生船先后驶进乔治岛的民防湾内。12月27日，我国首批考察队员登上南极洲的乔治岛，开始进行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站址选择和勘察工作。

我国进行的首次南极考察编队胜利到达南极洲，包括两大部分：南极设站及考察、南大洋考察。担负南极登陆建站及科学考察工作的南极考察队由五十人组成，其中年龄最大的五十五岁，最年轻的仅十九岁，他们绝大多数是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按照计划，我国南极考察队将在南极洲建立起两幢钢结构防风防寒考察用建筑物——"中国南极长城站"。

12月29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站址定于菲尔德斯半岛上。1985年2月20日，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

3月21日，长城站由世界气象组织接纳入全球气象台站网中，并授予国际台站代号为"89058"。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成，使我国在南极的考察事业有了一个依托和基地，标志着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材料二　南极考察史上光辉的一页

如果编纂1984年中国10大新闻，其中重要的一条，肯定要包括中国首次赴南极考察，并建立南极长城站。这次中华儿女到地球最边缘、最寒冷的南极洲远征，不仅是建国30多年来，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它为中国在南极考察史上填补了空白。

前赴后继的探险史

南极洲是地球上最晚被人们发现的大陆，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定居人口，没有国家的大陆。

早在3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历士多德根据逻辑推测，地球的南端必定有一巨大的陆块才能使地球保持平衡，否则北半球的欧亚大陆会把地球压得翻过来。公元2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依据想象在地图上加画了一块跨越地球底部的大陆，起名叫"未知的地方"。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地图上都出现了这块假想的大陆。

真正对南极洲作实际的探索，始于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盛时期。1773年，英国著名航海家詹姆士·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果敢"号帆船驶入南极圈。1820年前后，俄国的别林斯高晋、美国的帕尔莫、英国的布兰斯菲尔德率船队探险，相继发现了南极大陆和南极半岛的海岸。此后，西方国家纷纷派出探险队对南极进行更多的探索。到20世纪初，英国人罗伯特·斯科特和挪威人路尔德·阿蒙森分别率队，展开了一场抢先抵达南极极点的竞赛，结果阿蒙森早35天到达，斯科特队在归途中，因暴风雪而全军覆没告终。1929年，美国海军的理查德·伯德第一个驾驶飞机抵极点，自此南极考察进入航空时代。

近几十年来，各国派往南极的科学考察队已有100多个。特别是在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由12个国家共同派出上万名科学工作者去南极，建立起62个考察站。1960年签订"南极条约"。

相比之下，中国南极考察事业起步较晚。1980年1月，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受澳大利亚政府邀请，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1981年5月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1983年宣布参加南极条约的规定，但根据南极条约的规定，中国尚未取得协商国地位。目前拥有这一地位的有苏、美、英、法、日、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比等16个国家。

为了发展中国南极考察事业，填补中华民族在世界这一领域里的空白，1984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决定进行首次南大洋考察和在南极洲建立第一个科学考察站。

远航4.8万多公里

中国南极考察队由来自23个部委、60个单位的总共591人组成。1.3万吨级的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除负责运载人员、物资和打捞救生外，还协助建站考察。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两艘船只从上海正式启航。它们斜向横跨太平洋，航行27天半，1万余海里，直抵南美大陆的顶端、阿根廷乌斯怀亚港。然后又用两天时间，穿越急流咆哮的德雷克海峡，12月26日驶抵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的乔治岛民防湾。

这是一条开拓性的新航线。它的开辟，不仅对南极事业，而且对于加强中国与南美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往返两次驶过东西南北半球；从天气系统而言，经过了北半球的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

带、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西风带和南极极风带，还经过广热带、北温带、南温带和南寒带4个气温带，历尽炎暑酷寒。

在漫长的航行中，两船曾遇到台风、两船主机的机械故障等一系列十分复杂艰险的情况。特别是后来在南极海域航行和考察中，多次遇到极地气旋风暴，风速可达每秒34米，海浪高12米，怒涛巨涌使船体严重震动颤响，主机出现飞转，舵时而失灵，由于严密组织，精心指挥，齐心协力，顽强拚搏，才闯出风暴圈，转危为安，

从1984年11月20日启程至1985年4月10日返抵上海港，整整经历了142天。其中航行75天，行程达48955.2公里，比绕地球一周还多8950公里。两船准确、安全的航行，为中国首赴南极考察建站的"万无一失、初战必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建立中国南极长城站

中国南极洲考察队在抵南极总共67天的时间里，在气候异常恶劣的条件下，首先对乔治岛诸湾沿岸的9个地段进行了精心勘察，反复比较，选定该岛考察站的站址。该地三面环山，，岸滩开阔平坦，附近有3个淡水湖，水源充足，生物资源丰富，而且与岛上其他7国考察站有一定的距离，独门独户，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考察研究基地。南极洲考察队克服了浓雾、冰山、雨雪、和暴风不时封锁海湾，以及吊运时大船、吊车、小艇时时随涌颠簸摇摆的困难，昼夜奋战17天，终于把500吨物资和设备安全无损地运送上站。随后，他们在荒滩上风餐露宿，卧冰御雪，只用了20天，于1985年2月15日便胜利建成了长城站。这个惊人的速度，使前来参观的岛上各国考察站人员无不赞叹、佩服。

中国南极考察站是一个越冬常年站、永久性考察基地。它精确的地理位置是南纬62°12′59.3″，西经58°57′51.9″，距离首都北京17501.9495公里，区域面积为0.8平方公里。站内有两幢钢结构高架式主体建筑，总面积为350平方米；有一个拥有卫星云图接收器、气象通讯环形天线阵和气象观沿塔等设施的气象观测场（它已被世界气象组织所承认，吸收加入世界天气监测网，国际台站代号为：89058）；有两组大型的铁塔式通信天线网，能与极地国际站、北京国家海洋局通信联络；还有高层大气物理记录场，卫星多普勒定位点，地震记录平台等科研设施。

在建站的同时，南极洲考察队还对乔治岛展开了地质地貌、生物、气象测绘、地球物理、海洋环境和高空大气物理等学科的考察。他们探测记录了60小时的宇宙大气"哨声"；监测记录到18次南极半岛的地震信号；经过精心测绘，把站区淡水湖、濒海湾和站址环山第一次用中国的名字，分别命名为"西湖"、"长城湾"、"龟山"、"蛇山"等。

长城站的胜利建成，标志着中国南极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使中国南极考察有了一个落脚点。对于今后进军南极洲大陆、更好地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站长郭琨在落成典礼上宣布，长城站将欢迎国内外科学家、特别是台湾科学家到站上进行考察活动。

南大洋考察硕果累累

中国首次南大洋考察从1985年1月19日开始，至2月12日圆满结束。中间分两个阶段进行。测区主要是南极半岛西部海域，即自南纬60°～66°55′，西经55°～69°30′，包括南设得兰群岛周围、阿得雷德岛西北海域，南北跨距达7个纬度，东西跨距达14个经度，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这些海域包括有海峡海湾、浅海陆架、次深海陆，次深海陆坡和深海洋盆等各个不同特点。考察项目有以磷虾为重点的海洋生物、气象、化学、地质、地球物理等6个学科，23个项目。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数据、样品和资料，填补了中国南极考察上的许多空白。

这次南大洋考察共取得14项突破性成果：1、1月24日历史性地挺进了南极圈，并取得综合观测植被样品；2、国产重力仪、磁力仪连续运行和拖曳3个多月，取得了第一手完整资料；3、填补了极圈附近和南设得兰群岛西北海域上的一些空白水深值；4、测得太平洋——南极海洋中磁力异常区、异常值，重力异常值；5、对捕获的109公斤磷虾进行了3个多月的活体饲养和食性研究，并将活体带回国内；6、获得了从水深100～1500米的上百种底栖生物；7.从水体、沉积物和磷虾体内分离和培养出上千株不同门类的细菌、霉菌和酵母菌；8、获得了数十站位不同层次高浓度的浮游硅藻；9、获得了数十站位不同层次的高营养盐和高叶绿素的含量；10、国产3000米深自记仪实测突破3000米指标，获得3080米水深的完整资料；11、国产抛弃式浪高仪测得极圈附近10级风的浪高8.6米；12、柱状地质取样管在4120米深海取得入土6.3米的沉积物样品；13、测得了极区两个多月、包括五个12级以上风力强气旋风暴的气象资料；14、获得了10万平方公里测区完整、准确的综合性海洋学观测资料。

（本文作者陈可雄系上海、香港文汇报随团记者）

风云人物

李宁

李宁(1963年—)是中国体操运动员，在第23届奥运会体操比赛中，获得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为本届奥运会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李宁，21岁，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他7岁时看到大孩子们练体操，就在一旁悄悄地模仿，居然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翻跟头，竖倒立。这就成为一个日后声名远播的体操名将迈出的第一步！10岁时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少年自由体操冠军，第一次登上领奖台。1980年，李宁进入国家队。他的动作特点是惊险、高难、独特。不到一年，他就在被称为"小奥运会"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夺3枚金牌。次年，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男子7个项目中他一人独获6项冠军，为世界体操比赛中前所未有，震动了国际体坛。在1982年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的评选中名列第一。1984年，被评为建国35周年杰出运动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次给他记特等功。李宁进入国家队以来，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共获得金牌近50枚。

廖锡龙

廖锡龙(1941—)中国云南边防部队某师师长。1984年7月，在还击入侵越军战斗中表现了突出指挥才能，被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为某军副军长。最近，他又被任命为军长，成为目前我军最年轻的军长之一。

廖锡龙，43岁，1959年入伍，当过战士，任过排长、连长、副科长、团长等职。当战士时，他是一名优秀的义务兵，各项军技术都名列前茅。在军事学院深造时，7门功课6门优秀，1门良好。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三等功。他指挥战斗，讲求"战斗效益"：伤亡小，消耗少，战果大。1984年，云南边防部队对入侵者阴山越军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担任师长的廖锡龙在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入侵之敌又在阵地上修筑了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战前组织干部对敌情进行反复调查研究，7次修订作战方案，出色地指挥部队进行山地攻坚战，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

袁伟民

袁伟民(1938—)中国女排主教练，中共十二大代表，曾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建国35周年全国10个杰出教练员之一，1984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袁伟民，46岁，当排球运动员的历史长达16年，直到35岁时仍作为中国男排队长上场参加比赛。1976年，他受命接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以严字当头，从基本功开始对这支队伍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训练。5年的时间里，他同女排队员一起，含辛茹苦，历经磨难，终于在1981年的世界锦标赛中夺得冠军，使中国女排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1982年又获世界锦标赛冠军，1984年又获奥运会冠军，取得了"三连冠"的殊誉。在这条通向荣誉高峰道路上，女排曾遇到过种种挫折。袁伟民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从女排的每一次胜利中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伟民的智慧。

王亚忱

王亚忱(1932—)1984年，辽宁省政府授予王亚忱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王亚忱，吉林双辽人，是辽宁省朝阳重型机器厂厂长、党委书记。朝阳重型机器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小厂，基础很差。尤其是经过十年内乱的破坏，产品质量低劣，长年亏损。1978年王亚忱担任了这个工厂的厂长，这时正值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机械工业"吃不饱"，再加上面对着沈阳、上海等实力雄厚的同行业竞争对手，这个厂十分被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王亚忱率领全厂职工冲破"左"的思想的的束缚，针对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发展、压抑职工积极性的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改革。他按照"产政一致"的原则，创立了"十字形"的工厂管理模式，改变了这个工厂的面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1979～1984年这个厂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20.3%；产品产量递增20%；实现利润递增27%；上交利润递增29.%，连续2年受到国家的表彰。

韩余娟

韩余娟(1972—1983)1984年7月3日,共青团中央授予江苏省宿迁县塘湖乡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少先队员韩余娟"舍己为人小英雄"的光荣称号。

韩余娟是在1983年14日夜,家乡因连日暴雨,许多房屋倒塌,在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为了保护74岁的五保户老人傅王氏,献出了年幼的生命,牺牲时年仅12岁。

1984年7月9日,教育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国小学生向"舍己为人小英雄"韩余娟学习。1984年11月6日,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少年英雄韩余娟题词"向少年英雄韩余娟学习"。在此之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也题词赞扬:"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小红花"。民政部授予韩余娟以"革命烈士"称号。同年11月13日,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开展"学英雄、建丰碑"的教育活动,号召广大少先队员以行动学习韩余娟。

倪征奥

倪征奥是江苏省吴江县人。,生于1906年。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获法学学士位,次年获得美国史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长期从事国际法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二次大战后曾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解放前后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系主任,1981年在联合国第36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1年被中国政府推荐为国际法院法官候选人。倪征奥的顺利当选,引起了世界各国及法学界的普遍重视。

周建人

周建人(1883～1984年)浙江绍兴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鲁迅先生的胞弟。幼年辍学,自学成才,著译甚丰。早年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交往,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同反动势力作斗争。1932年,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筹备工作;抗日时期,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民进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于1950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成仿吾

成仿吾(1897～1984年)湖南新化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他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参加创办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多种文学刊物,是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1925年参加中国国民党,1928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省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兼中共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到达瑞金中央苏区,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干部团政治教员。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后又奉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职。建国后,他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的代表,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李维汉

李维汉(1896—1984年)湖南长沙人。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1918年同毛泽东、蔡和森一道组织新民学会,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是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临时中央局成员,并是著名的"八·七"会议的主席。江西苏区时期,曾任组织部长;长征中,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校长和党团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1948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直至1964年。建国后,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委主任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等。

茅以升

茅以升(1896—)江苏镇江人。现任九三学社副主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17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1年获得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程博士学位。1920年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校长。1933年后,任杭州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9年后,任上海科联主席,中国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国际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84年被选为加拿大士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第一、二、三、四、五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84年,时值建国三十五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年。文学作品中讴歌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成就的作品大量涌现。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等是当时代表作。

这一年,文化寻根热在中国兴起。以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为代表的寻根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

《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雪》等大批影视作品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小说《沉重的翅膀》

作者张洁。叶知秋病了。她暂且逃离了那纷繁的现实生活,享受着充分自由的精神生活。

楼上的哭闹时时提醒着她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地道的法国红菜汤不是生活全部,记者证又带着初愈的她东奔西跑了。这不,她现在竟然闯进了重工业部郑子云副部长家里。

总还算顺利,没有被撵走,而且最后还赢得了部长小女儿郑圆圆的好感。一场以当前工业改革为主体的热烈讨论后,郑子云由衷地佩服了这个女记者。而叶知秋则隐隐感到,这个在改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似乎处处存在着危机。

叶知秋的老同学贺家彬此时正处于忙乱与烦闷中。有人打出局长的招牌走后门,惹得他肝火上升;水轮机订货也有了问题,部里计划工作的模式化已经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他感慨万端:经济体制急需改革!他决心写信向国务院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不过,在何婷处长和具有善察风云的"马列主义水平"的冯局长面前搞这些小动作,是不那么容易成功的。

经济界要求体制改革,预示着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彻底变革。每个正直、热情、有责任心的人都在积极地工作着,而一些丧失了党性原则的人和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家,却在时时考虑着自己的荣辱得失。

矛盾!斗争!充满着重工业部。

"郑子云派"的汪方亮不避众难,解决了黎明拖拉机厂的质量问题。为了扭转曙光汽车厂连年亏损的生产,郑子云起用了虎将陈咏明。曙光汽车厂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设备完好百分之三十五,材料堆积,浪费,无计划生产,一千多职工无房子住,生活条件相当差,上百人待落实政策,几百人待安排工作……已换过几任局长,全都灰溜溜地卷了行李。

陈咏明取得了郑子云的支持,果敢地投入了工作。一场大的变革展开了,一个多月后,各处室的领导班子首先得到了调整。接着,陈咏明听取了群众意见,开始着手生产方面的改革、调整,实行了生产上的责任制和奖罚制度。这一切大大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杨小东的十四人班组团结一心,首先创造出好成绩,成了众所瞩目的好样板。内行领导生产,革新思路出现,企业收入大幅度上升,工人宿舍与职工家属大楼拔地而起……曙光厂以全新的姿态挺立于人们面前。

然而,阻力是十分强大的。李瑞林式的僵化干部看不惯了,吴国栋等人的老式做法被取消,不能适应所产生的

本能的反感充斥着他们的心理。这样一些"基本群众"的阻力是有相当势头的，而陈咏明尤其明白，更大的阻力来自上头。

贺家彬上寄国务院的信和他与叶知秋合写的反映曙光厂改革的报告文学，使斗争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反对改革的人们紧紧地抓住它大做文章。这些加上夏竹筠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令人厌恶的角色，使郑子云感到了很大压力。但他必须挺住，他要把精力用到最关键的地方，田守诚部长为首的一批人的态度使郑子云深感改革的艰难。

立志改革的人各有各的重负，生活上的、工作上的、精神上的；而阻挠改革的人也有自己的苦恼，孔祥为保乌纱帽费尽心机，何婷为儿女不惜磨破嘴皮。只有圆圆和莫征那样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才显得举重若轻，应付自如。他们相爱了，同时也更好地工作着、学习着。

针锋相对，郑子云当选为重工业部十二大代表，取得了初步胜利。但事情决不会那么顺利。田守诚开始了阴狠沉稳的反攻，他还要再争一争，说什么也不能让郑子云上去。即使自己注定要沉下去，他也得拽着郑子云一块沉下去。无毒不丈夫，这才是田守诚的本色。一份见不得人的"绝密"文件，就差没有公开写上：不准选郑子云为十二大代表。这一着就够郑子云受的了，然而，田守诚没有料到，身边有人背叛了他。于是，郑子云被激怒了，终于和他面对面地干了一仗。

圆圆与莫征恋爱的事情被夏竹筠和郑子云知道。这个小小的家庭立刻爆发了一场"战争"。圆圆走了，把家庭的隐私揭露罄尽以后走了。郑子云第一次回顾自己的感情生活，心中充满了愧疚，他决心用行动表现自己的忏悔。当天晚上，他晕倒在叶知秋和莫征家的楼梯上。

郑子云住进了医院。田守诚也喜出望外，想不到生活来了这样一个逆转。

但实际情况仍然不是那么简单，值班大夫告诉田守诚，郑子云可以闯过这一关。

前面还是鏖战难休！

小说《燕赵悲歌》

作者蒋子龙。夜深，大队支书武耕新还在野地里游荡，思索着大赵庄的历史和现状，寻找治穷致富的道路，终于在反省中悟出：

要想富，就得走"农牧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的道路。

群众会上，武耕新流泪承担了不该由他承担的——使乡亲们"年年忆苦年年苦"的责任，立下了军令状，决定背水一战，改变大赵庄面貌。

武耕新重整旗鼓，进行一系列大胆改革：变生产队为专业承包组、办养殖场、搞副业、筹集资金经商办工厂。他顶着社会、家庭的种种压力，领导大赵庄群众艰苦创业，办起十几个工厂，四年经济翻五番。每人年收入上万元，农民的形象和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一反过去封闭落后状态，聘请专家顾问、培养自己的大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合作联营，加强、巩固自己的竞争能力，并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为大赵庄插上腾飞的翅膀。

富裕起来的大赵庄，在全县引起震动，谣言四起，不胫而走，磊餐庄的县委副书记被工作平庸、善于弄权的书记李峰挤走，县委组织清查组下到大赵庄……这一切，大赵庄顶住了。然而，不久，在发给各单位的文件里，有一份以《"土皇上"自向钱看》为题的内参，这是和武耕新同过病房的权威理论家的文章，一场新的思想风暴正在酝酿。改革，谈何容易！每迈一步，都要有巨大的勇气，付出巨大的代价。

小说《棋王》

作者阿城。火车要开了，人们在忙着告别。棋呆子王一生躲开送行的妹妹，在一个车厢角落里找人下棋。

王一生的棋很神，曾在一位国内名手家里走通一盘宋代残局。后来，他心甘做了一个捡烂纸老人的弟子，棋道更为精湛。

到了插队地方，王一生仍到处找人下棋。半年后来到我们分场，杀败了据说是倪云林的后代的高手"脚卵"。惺惺相惜，"脚卵"建议他参加本地区举行的象棋选拔赛。"脚卵"的父亲跟地区文教书记熟识。

王一生的分场因他常请假出去下棋，认为他不好，不让他参加比赛。直到地区决赛快开始时他才赶到。"脚卵"要用祖传的一副乌木棋和家藏的一些名贵国画，为他换回一个决赛资格，被他拒绝了，他决定先观摩一下，然后登门找高手们下。

一场旷世难逢的鏖战，王一生一人对九个高手，地区赛的前三名都上了。赛场上万头攒动，黄尘遮蔽了半边蓝天。决战到最后，除那位世家出身的冠军老人自知难敌，恳求罢手言和，其余人全部大败而归。

大展神威的棋王王一生，这时却仿佛真的呆了。直到众人散去，我把他母亲死前用牙刷把为他磨的无字棋展给他看，他才慢慢清醒过来，流看泪，呜呜的哭着道："妈，儿今天……妈—"

夜里，望着身边已经睡熟了的王一生，我痴痴地觉得，做俗人，脱离了某种氛围的困扰，才终于有点像人了。

小说《新星》

作者柯云路。县委书记李向南一到任，便迅速揭开了古陵县全面改革的战幕。历时三天的提意见、提建议大会首先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睡局面，一场大较量前的特殊的气氛压迫着、推动着三十二岁的李向南。他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和雷厉风行的干练作风，迅速查处了以县长顾荣的儿子为首的重大走私案，处理了多起多年拖而不办的上访积案，严格制定并立即执行了各种为改革开道的规章制度，接着又带着常委一班人走访全县各地，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制定计划，调整不得力的基层班子机构。撤销了因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拖沓而造成学校窑洞塌方，使红师受到伤亡的横岭峪公社代理书记潘敬世的职务，又以成熟的政治家的襟怀和气度，充分肯定了对自己有偏见但又很有才能的胡小光的工作成绩，并委以重任。重新启用曾经当过古陵县委书记、有经验、有才干的朱泉山，表扬了自学成才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屠秀秀的技术辅导承包，制止了严重乱伐滥砍森林事件，还特意去看望了为保护集体山林而付出生命代价的闷大爷……这一切，使人从冷峻的现实和历史的俯瞰中，更坚定了必变古陵面貌，为中国闯出一条改革新路的决心和信心。

李向南的对手顾荣是一个“标准型”的干部。他根基稳，城府极深，又富于某种相当高明的政治心机。对一切“特殊关怀”使他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任，俨然成了古陵县的一号人物。

李向南的到来，打破原来宁静沉寂的古陵局面，也动摇了他的根基和地位，在许多事情上使他难堪。他不能容忍李向南无视自己的存在而对古陵的事情任意决断。但他是李向南的副手，这是客观现实。而主观上他又难以与李向南在民心所向的基础上老练相抗衡，这一点他完全没有料到。对手实在太年轻了。他只好顺水推舟，进“贵宾院”养病，认真地施展起他特有的政治手腕，唆使被李向南调离县委办公室的胡小光当面与李向南对抗，让县委副书记冯耀祖在常委会议上专门给李向南出难题，指示潘敬世在李向南检查工作时好好“迎接”……

这一切，都没有难倒李向南，倒往往让他先抓住问题的焦点，争取了主动。

顾荣步步失利，摊牌越来越大，最后甩出了王牌，给自己的老上级、李向南的父亲写信告状，历数李向南的“越轨”之举，致使身居高位的老冼知决心把自己的儿子调离古陵。同时，顾荣又搬来了地委书记郑达理调查处理古陵的问题。在常委扩大会议上，顾荣、冯耀祖他们不仅自己给李向南提了一大堆“意见”，而且又唆使因大吃大喝被罚过款的局里的几个人去找郑书记告状、借钱。但是，所有这些，都遭到了胡小光、庄文伊、典古城等人的回击。尤其是曾受过李向南处理的典古城的话，更出于郑达理和顾荣的意料之外，因而也更具有强大的力量。他们认为李向南是历年来古陵县委书记中最有才干的一个，是古陵，也是神州大地出现的一颗难得的改革新星。

李向南的政治魄力和办事效率，深得顾荣的侄女、省委书记顾恒同志的女儿顾小莉的赞赏并爱上了李向南，而李向南却属意于过去的女友林虹。林虹在生活中备受蹂躏，对一切都似乎麻木了，他决心变她的生活。但林虹并不是那么好改变的。

李向南要调离古陵县的舆论充满着每一处空间，而李向南则胸有成竹地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动。他要争取父亲的支持，争取省委书记的支持……

省委书记顾恒同志的来信，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李向南这颗新星毫无疑问要发出最充分的光和热了。

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作者李存葆。一九六八年元旦，D 师派出部队到 S 军区所辖半岛将原彭德怀布置的岛北雀山工程一举炸毁，与此同时，按林彪的指示，在半岛南部，与雀山工程同等规模的龙山工程破土动工。

担负一号坑道开掘任务的一连——“渡江第一连”，在营长郭金泰的带领下，在石质恶劣的山体内打洞，修筑荣誉室。龙山是风化岩石，随坑道向深处开凿，塌方日益频繁，尤其是超高速开挖“荣誉室”，更面临极大的危险。“九大”代表秦浩，是一个靠“突出政治”、“善于总结经验”而往上窜的师政委。从北京开会归来后，他就指令一连指导员一定要“抢时间，创新纪录”。精通业务的营长郭金泰熟悉这里地形，向秦浩提议，要采取措施，以防塌方。于是，他被停职检讨，下放到班里当兵。

为了“九大”献礼，秦浩下令要大家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半个月内完成掘进任务，并召开誓师大会，派来四位宣传员，捧着所谓林彪用过的“金杯和宝椅”鼓舞大家。很快当过秦浩警卫员的王世忠干活像玩命，违背安全措施，被石块砸死了。没有文化的大壮发烧七天，带病干活累死在工地上。

入伍九年，一直没有提干的班长彭树奎，为了提干偿还债务，保护自己被家乡革委会主任逼婚而逃到部队的未婚妻菊菊，忍气吞声掩埋了两位死难的战士，并违心揭发了原营长郭金泰的“罪行”。雨季到来，龙山的开掘工作面临崩溃的危险。但秦浩要的是“奇迹”，好以此向上请功。于是，他指令指导员在连里重新召开誓师大会，面对林彪的“宝座”宣誓：“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接着钻机又响，被雨水泡酥了的岩石，顷刻间大面积塌方了。“右派”的女儿，因长得漂亮而被派来当宣传员的刘琴琴，为

了保卫"宝座"倒在血泊中,郭金泰为了保护战友,也和十几位战士葬身山腹,使龙山崖上出现了十九座坟茔。

接着,秦浩亲自挂帅,展开"立体"宣传战,把龙山说成是"哺育英雄的摇篮",并因此而爬上军政治部主任的"宝座"。受伤的陈煜,因大骂林彪而被推上军事法庭。指导员看清了秦浩的真面目,申请转业了。彭树奎将多年盼望的提干表撕得粉碎,和菊菊一起闯关东了。

小说《黄河东流去》

作者李准。一九三八年夏,老艄公梁恩和他的徒弟海天亮、女儿梁晴,驾着一条木帆船来到郑州以东,忽然发现鬼子要过黄河。天亮立即向河防军报告,却反被诬为汉奸,抓了起来。在这里,他发现了国民党政府扒黄河、"以水代兵"的行动。后来他逃出虎口,急速向家乡赤杨岗奔去。一路高喊:"老蒋扒黄河了!"

这时的赤杨岗一带,新四军豫东抗日支队正向群众展开抗日宣传活动。李麦结识了女战士宋敏。随着战事吃紧,赤杨岗陷入兵荒马乱之中。陈柱子开的饭店停止营业,海老清在保长海螺子威逼下去出差车。曾和宋雪梅"私奔"而获罪入监的吹鼓手蓝五,沦落在赤杨岗,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而海长松却正做着买地发家的美梦。麦子成熟的季节,天亮突然归来,把老蒋扒黄河的事告诉给乡亲们。李麦慌忙敲锣叫喊:"黄河大堤开口子了!……"村民们纷纷逃向沙岗。

洪水不断上涨。六七天之后,各家都断了吃的,村民们便逃难到寻母口。因道路不通,他们都在寻母口落难,暂时住在一座龙王庙里。不久,梁晴随着一帮妇女背盐,也来到寻母口,但他们在"福兴盐行"被盗。徐秋斋挺身而出,带领她们大闹盐行,终于迫使盐行掌柜答应赔钱。后来,王跑去赶脚驴子被汉奸队抢去,徐秋斋又设计为他要回了驴价钱。这时,又当了汉奸的海螺子,要在难民中为日本招募华工。李麦揭破了他的阴谋,他便企图借用武力抓人。为粉碎敌人的毒计,李麦和徐秋斋鼓动难民们抢夺鬼子的粮船逃跑。由于新四军的配合,他们顺利完成了抢粮夺船的计划。难民们分得粮食后,各自远逃。而李麦和天亮因去执行任务,迟迟未归,徐秋斋只好带着梁晴和嫦娥(李麦之女)去逃荒。

秋天,长松和老清婶两家在洛阳落户。不久,老清婶的大女儿爱爱被洛阳名优徐韵秋看中,就跟徐去学说书。第二年正月,海老清在洛阳寻访到老伴和两个女儿爱爱、雁雁,一家人才得团聚。但他听说爱爱是个学说书的,入了"下九流",就一怒离开洛阳,到伊川县找长工去了。后来因天灾人祸,饿死他乡。长松一家始终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不得不一连卖掉三个女儿。他想做个干净、正派农民的幻想破灭了。王跑一家也在洛阳,寄居在白马寺,帮老和堂经营菜园。在掏井时挖出了一块宝贝石头,王跑便想发个大财,但不料自己锒铛入狱,石头被骗而去,空做了一场石头梦。

徐秋斋带着梁晴和嫦娥来到西安,因工作难找,生计十分艰难。嫦娥为找工作,只身到了宝鸡。后来,徐秋斋和梁晴在西安找到蓝五。蓝五见他们生活无着,便设法帮他们谋取生路。不料蓝五这时在西安同长期离散的雪梅重逢。这时的雪梅虽然早已做了官太太,但他们旧情难舍,二人又立刻开始了纯真爱情的狂热追求。雪梅的丈夫孙楚庭要害蓝五,蓝五便逃离西安,到咸阳去找开饭馆的陈柱子。雪梅闻讯尾追而去,结果半路上被孙杀害。蓝五抱尸痛哭,然后也自缢而死。

陈柱子和他的老婆在咸阳开饭馆站住了脚。后来,春义和凤英这对新婚的青年夫妻,也来到咸阳,陈柱子便劝他们在咸阳谋生。于是,凤英到陈家饭馆去打杂,春义去做零活。凤英勤快能干,不久就暗中学会了做饭的手艺,同春义商量,要自己另开饭铺。春义觉得这样做是不仁不义,而凤英却说他是个"死心眼"。经过一番努力,凤英经办的饭铺终于开业了。但春义却看不惯凤英对顾客那种殷勤劲儿,俩人经常闹别扭。最后,他们终于感情破裂,各走各的路去了。

一九四三年,新四军一个团来到黄泛区成立水立东地委。天亮也随军回到自己的家乡。原来李麦、宋敏和一些老弱同志,一直坚持在水荡里。这时,李麦和天亮母子重新团圆。不久,李麦为了寻找女儿嫦娥,亲自西行到了洛阳和西安。她虽然没找到嫦娥,但在洛阳却见了长松和老清婶两家人,又在西安找到了徐秋斋和自己未过门的媳妇梁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后,全国一片欢腾,并且从家乡传来消息:黄河口打住了,可以回去种地了。李麦、徐秋斋、春义、梁晴等人,就从西安出发,到了洛阳,又带长松和四圈,一道返回家乡。当他们回到赤杨岗时,早已还家的王跑高兴得哇哇直叫。荒村里又出现了欢声笑语。他们在新四军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迅速掀起了开荒地、重建家园的热潮。

小说《绿化树》

作者张贤亮。《绿化树》是张贤亮计划撰写的九部系列中篇小说中的一部,其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部系列中篇的主旨在于:"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这个青年,就是《绿化树》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青年

诗人，他刚满二十岁就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西北农场劳改，经过四年的“炼狱生活”之后，解除劳教，被分到附近农场就业。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这是一九六一年。饥饿，像瘟病似地，严重威胁着人们。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主人公和同伴们到就业农场去，一路上都在找吃的。过去他们就为能多吃一口而感谢“祖宗有灵”，并不惜谄媚、讨好。饥饿把人变成光为活着而活着的“狼孩”。到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夺“生存空间”——住处。之后，仍是千方百计搞吃的，甚至昧着良心骗老乡的黄萝卜……在这场“生存危机”中，主人公为求生的本能所驱使，在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这种堕落，在“饼子风波”这场“荒诞的丑恶剧”中发展到高峰。正是同场女工马樱花拯救了他。这个“中国的吉卜赛女郎”把他带到自己家里，给他吃食、衣服；给他同情、安慰，甚至爱情。他又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为适应它，他有意识否定文化知识，追求做一个“筋肉劳动者”，并用强力征服“情敌”。海喜喜试图占有马樱花，遭到对方深情的拒绝。悔恨中，一颗失落的心呼唤他“超越自己”，“扼住命运的咽喉”。精神的主人公战胜了作为生物存在的“自我”，在爱与忏悔中复活，他怀着“超越自我”的渴望阅读《资本论》。读书也使他接续上过去的回忆，意识到马樱花和自己知识与精神的不能拉齐的距离。后来，海喜喜因失恋离开农场，走时劝他和马樱花结婚，给他们留下粮食和家具，善良的谢队长也真诚劝说他，劳动者身上最美好的感情打动了他，他深深地爱上他们，准备同马樱花结婚。但求婚以失败告终，马樱花不忍使她所爱的人受家庭拖累，为让他好好读书宁可等待。不料，主人公突然被调到管制最严的队去，此后颠沛流离，二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见到马樱花。

材料　关于《绿化树》的争论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在《十月》第2期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瞩目。邵燕祥在《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张贤亮〈绿化树〉读后》(《文艺报》5期)中对小说的思想尝试和内涵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还没有一篇像《绿化树》这样发自内心的，寓于生活底蕴的，又是有血有肉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颂赞。”它“虽然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中的扬充和转变为主线的小说，但它首先以黄萝卜高粱面，揭穿了一切‘左’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高论。”朱寨指出，《绿化树》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中之一部，而《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将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为“系列中篇”之一的《绿化树》，其“独立成就”还表现在：透过对“农场一分队”的地理风情、世态人情的描写，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生活世界，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环境”，从而匡正了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只偏于‘典型性格’而忽视‘典型环境’的毛病。”(《〈绿化树〉预示着什么?》，《作品与争鸣》6期)蓝翎也称赞《绿化树》“是结出了硕果的‘反思树’”，其启示正在于要在一切领域里坚持唯物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一切、指导一切，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小说选刊》8期)

也有一些评论认为《绿化树》存在严重不足。其一，“很难同意《绿化树》中所揭示的这样一个内容：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知识分子，要走入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就必须经过痛苦的生活磨练，承受沉重的精神负荷，并要无条件地、被动地接受工农兵的思想改造。”(廖达天：《简论马缨花》，《作品与争鸣》10期)其二，“马缨花的艺术形象，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妇女里面是缺乏典型性的。这个形象倒有几分像欧洲17、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型的风骚的资产阶级贵妇人形象，这是一种有着变态心理的性解放的女人形象。因此，我们认为作家对马缨花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不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个扭歪了的女人形象。”(远铃：《浅谈马缨花的形象塑造》，《朔方》7期)但另有评论不同意这种否定马缨花形象的观点，认为“如果抛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环境，去奢谈马缨花式的生活方式的不道德，都只能陷入虚伪的道德泥淖中，变成空洞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帮助读者认识历史生活”的。张贤亮在《关于〈绿化树〉》(《小说选刊》7期)中也希望读者能“从主人公特定的教养、素质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出发”去评价。

(仲呈祥)

电影《人生》

原著路遥。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在民办小学教了三年书，突然被大队书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教师职务，又回到了高家村。面对猝然到来的命运打击，他苦闷、愤怒，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父亲让他到集上去卖馍，他提着馍篮硬是张不开口叫卖，一个馍也没卖就往回走。早就悄悄爱恋着他的同村姑娘刘巧珍在桥边等着他，接过馍篮返回去替他卖完了馍，并向他吐露了心中的爱情，加林被巧珍的深情打动了，他接受巧珍的爱，可又有一点后悔。他觉得这等于是把自己拴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他躲着巧珍又时时刻刻想见到巧珍，终于还是冲破了自己设置的防线，和巧珍开始了炽热的初恋，难舍难分。

事情在村里传开了，巧珍的父亲刘立本觉得女儿给自己丢了脸，把她关在屋里打了一顿，又去找高加林的父亲，他让加林和巧珍断绝关系。这种粗暴的干涉、压制反

倒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加林故意高声叫巧珍，骑车带着巧珍进城买漂白粉，搞了场轰动高家村的“卫生革命”，招来了风言风语。正在这时，加林的叔父从新疆转业到地区劳动局当了局长，给高加林的命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当初撤掉高加林的公社干部马占胜现在又主动把高加林送进了县委大院，让他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县委通讯干事。高加林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工作干得很出色，成为县城里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黄亚萍，过去就爱慕他的学识和才干，后来和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张克南确定了爱情关系，现在对高加林旧情复发，常常主动去找高加林，言语中流露出爱慕之意。高加林对巧珍的印象渐渐淡了，身不由己地和黄亚萍开始了“现代化”的恋爱。有时巧珍进城来看他，他变得冷冰冰的，只是觉得巧珍挺可怜，才勉强热情一些。正在这时，黄亚萍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南京，他向加林表示如果确定了关系就可以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南京，高加林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五颜六色的未来迷住了。他狠心断绝了与巧珍的关系，答应了黄亚萍的要求。

张克南的母亲恼羞成怒，她不能容忍高加林这个乡下人抢走了自己未来的儿媳妇黄亚萍。趁高加林去省城学习之机，她调动了自己的社会势力，查清了高加林进县委机关的内情，趁着“反对不正之风”的机会，使县委做出了将高加林退回农村的决定。当高加林踌躇满志地从省城回来，一切都成为事实。他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和黄亚萍断绝了关系，卷起铺盖踏上了回乡的路。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爱巧珍的，可是晚了，巧珍在被加林遗弃之后，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场美丽的梦，现在梦醒了，她忍痛割舍了对加林哥的爱，嫁给了一直在追求她的马拴。

高加林悔恨交加，面对生他养人的家乡土地，他开始了痛苦的思考和新的人生之路。

歌曲《妈妈的吻》

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2. 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小小心愿，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吻干她那思儿的泪，安抚好那孤独的心，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她晚年得欢欣。
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她晚年得欢欣。

歌曲《三月三》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
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走回到童年。
记得那年三月三，一夜难合眼，
望着墙角糊好的风筝不觉亮了天。
叫醒村里的小伙伴，一同到村边，
怀抱画着小鸟的风筝人人笑开颜。
抓把泥土试试风，放开长长的线。
风筝带着天真的笑声和白云去作伴。
如今每逢春风暖，常念三月三，
还有画着小鸟的风筝和那小伙伴。
风筝懂得我的心，朝我把头点，
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永把我陪伴。
风筝懂得我的心，朝我把头点，
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永把我陪伴。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我们的家乡在
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
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
旁流淌。一片冬麦，
那个一片高粱，
十里哟荷塘，
十里果香。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呀儿咿儿哟，呀儿咿咳哟咳！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2. 我们的理想在
希望田野上。禾苗在
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
中成长。西村纺纱，
那个东港撒网，
北疆哟播种，
南国打场。
呀儿咿儿哟！咳！呀儿咿儿哟，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
为她打扮为好梳妆。

3. 我们的未来在

希望田野上。人们在
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
中变样。老人们举杯，
那个孩子们欢笑，
小伙儿哟弹琴，
姑娘歌唱。
呀儿咿儿哟，呀儿咿咳哟咳！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歌曲《军港之夜》

军港的夜啊
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
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幸福的微笑。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水兵远航多么辛劳，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待到朝霞映红了海面，
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锚。
嗯，嗯！

历史档案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84年10月20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经过了几年的酝酿才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那次全会以后，全党在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近两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广泛深入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农村的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同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发展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城市企业经济效益还很低，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损失和浪费还很严重，加快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坚决、系统地进行改革，城

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真正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还应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国家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大为增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特别是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全面整党的健康发展，和已经正在端正各条战线现代化建设的业务指导思想，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现在，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提出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利于统一和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使改革更加卓有成效地进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央希望并且相信，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100多年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世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各族人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培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35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前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必要措施。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期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涉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现在，我国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100多万个，职工共达8,000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8,000多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就是说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我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了使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转、迁。但是，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繁复，任何国家机构都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样做，既在全体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又在局部上保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进取性，不但不会削弱而且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力量。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生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真正做到职工当家做主，做到每一个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利益密切相联。现代企业必须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生产指挥，必须有高度严格的劳动纪律。因为我们的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行这种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的时候，又必须坚决保证广大职工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同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统一的，同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发挥的必要前提。

国家和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实现这个基本要求，势必牵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中央认为，这些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另行部署。

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建国以来，我们实行计划经济，集中

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考虑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改变，考虑到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计划体制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在制订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追求这种空想"，今天我国同当时俄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实践经验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当时条件下的俄国，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是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和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一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应该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一步作出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动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原因，存在着相当混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不能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显著，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更为急迫。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改革。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括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当前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主要表现是：同类商品的质量差价没有拉开；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特别是某些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销价低于国家购价。必须从现在起采取措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价格体系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

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的原则是：第一、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第二、在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时候，加工企业必须大力降低消耗，使由于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成本增高基本上在企业内部抵销，少部分由国家减免税收来解决，避免因此提高工业消费品的食品价格；第三、在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的时候，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工资还要逐步提高。必须向群众广泛宣传，我们在生产发展和物资日益丰富的条件下，主动改革价格体系，解决各种比价不合理的问题决不会引起物价的普遍轮番上涨。这种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的。一切企业都应该通过大力改善经营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而决不应该把增加企业收入和希望寄托在涨价上。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任何人趁改革之机任意涨价，人为地制造涨价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动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问题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代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我们过去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推动经济运行，而长期忽视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并且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点以这一方面来，应该成为各级经济部门特别是综合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

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后，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就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建国30多年来，总的来说，我们的国家机构履行了这方面的职责，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过去由于长期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又未能管好。加上条块分割，互相扯皮，使企业工作更加困难。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发挥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有效地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和竞争，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而且势必严重削弱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应有作用。因此，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

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订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掌握和动用经济调节手段；制订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这些职能，需要各级政府付出极大努力来履行，而过去有些没有做好，有的还要做。但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至于少数由国家赋予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政府经济部门，也必须按照简政放权的精神，正确处理同所属企业的关系，以增强企业和基层自主经营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司，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联合经济组织，它们必须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机构，不能因袭过去的一套办法而必须学会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在进行这种改革的时候，有必要提醒各城市的领导同志们注意，城市政府也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不要重复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老做法，以免造成新的条块分割。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指导和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改组联合、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现代化，指导和促进物资和商品的合理流通，搞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搞好社会治安。同时，城市政府还应该搞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排斥竞争。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比和检验，优胜劣汰。这样做，有利于打破阻碍生产发展的封锁和垄断，及时暴露企业的缺点，促使企业

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各级有关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教育和管理，认真注意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经济立法，法院要加强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检察院要加强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检察工作，司法部门要积极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体制改了，组织机构和思想作风也要改。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为人民服务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造机关作风，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改变那种长期形成的领导机关不是为基层和企业服务，而是让基层和企业围着领导机关转的局面，扫除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积弊，使各级领导机关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切实转移到为发展生产服务，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服务的轨道上来。

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表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在把农村经验动用到城市中来的时候，必须考虑城市企业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农村的具体做法。由于行业性质、企业规模和生产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企业实行责任制也不可能有划一的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

现代企业分工细密，生产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技术要求严格，协作关系复杂，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只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企业中党的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企业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必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忽视和削弱。

随着利改税的普遍推行和企业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的普遍建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这方面已经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企业职工奖金由企业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国家只对企业适当征收超限额奖金税。今后还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当前首先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原则是使职工工资同本人肩负的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在企业、国家和事业单位改革工资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快劳动制度的改革。

长期以来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当然，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传统。在新时期坚持这个传统，主要是发扬不怕任何困难，为祖国为人民顽强奋斗的献身精神，在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中十分注

意节约，反对挥霍国家资财的行为，而不应该把坚持这个传统错误地理解为可以忽视人民消费的应有增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整个经济的起点和于支配地位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是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决定生产。我们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我国职工的工资收入逐步有较大的提高，使人民的消费逐步有较大的增长。不顾生产发展的可能过高的消费要求是不对的；在生产允许的限度内不去适当增加消费而一味限制消费，也是不对的。

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我们要迅速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较快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蒸蒸日上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守信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主导力量，对于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领域的生产建设事业都可以放手依靠集体来兴办。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特别是在以劳务为主和适宜分散经营的经济活动中，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同时，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尽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仍然很密切，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对外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互相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沿海、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以及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交流，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企业管理干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的状况同这个要求很不适应。这支队伍中的大批老同志，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组织才能和恪守党内生活准则的坚定性，教育和影响着广大中青年干部。但是，他们大都已到老年，不能要求他们再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胆起用和积极培养成千上万中青年经济管理干部。

应该看到，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整党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和正在成长大批优秀人才。各级党委一定要细心地深入地去发现他们，务必不要为那些过时的老观念老框框所束缚，务必不要搞烦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大批优秀干部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中青年干部有缺乏领导经验的问题，但这种经验可以而且必然能够在实际锻炼中逐步取得，决不能以缺乏经验为理由压抑年轻干部。对经验应该采取分析态度。我们的同

志在过去革命和建设中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新时期的崭新任务面前，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新经验，都要重新认识自己，都要重新学习。那种抱残守缺，老是停留在过了时的经验上的态度，是不对的。

中央要求在1985年底以前完成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任务，并且订出规划，采取切实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造就出大批能够卓有成效地组织和指挥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厂长(经理)，能够有力地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推动技术进步的总工程师，能够切实加强企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总经济师，能够严格维护财经纪律、精打细算、开辟财源的总会计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团结企业广大职工的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人才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宏大队伍。

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广大青少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对有重大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要给以重奖。

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和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展开。这个改革，关系国家的前途，关系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要站在改革这个时代潮前列。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和各级领导机关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精心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失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要尽一切努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当发生失误的时候，必须力求及时发现，坚决纠正，吸取教训，继续前进。改革的步骤要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全国性重大改革的实施，由国务院统一部署。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改革和试验，但一切涉及全局或广大范围的改革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进行。

明年将有更多地方和大批企业的党组织进入整党。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起来，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整党的领导，切实保证整党不走过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对于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5年时间，许多原来抱怀疑态度的同志都在事实的教育下转变过来。中央在指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耐心教育的方针，保证了改革和顺利进行。这是在重大政策问题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今后一定要坚持这样做。要结合改革的实际，对广大党员和进行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和生动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自觉投身于改革的伟大实践。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且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自然界发展的事实。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生动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中国人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反动统治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为推翻旧制度而奋斗。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进行改革，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当前改革的形势很好。广大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有伟大的创造。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近年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致认为通过协商妥善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有助于两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方针政策如下：

（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三）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和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五）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等各项权利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地位。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十）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十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十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联合王国政府负责香港和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为求本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并保证一九九七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联合声明附件二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政府声明：关于香港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三的规定处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本联合声明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八、本联合声明须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应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代表
（签字）	（签字）

第23届奥运会各国（地区）获奖情况（前十位）

国家或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合计
美国	83	61	30	174
罗马尼亚	20	16	17	53
联邦德国	17	19	23	59
中国	15	8	9	32
意大利	14	6	12	32
瑞士	0	4	4	8
丹麦	0	3	3	6
挪威	0	1	2	3
牙买加	0	1	2	3
希腊	0	1	1	2

中国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获奖者名单

金牌十五枚：

排球　中国女子排球队；
射击　男子自选手枪：许海峰；
射击　男子移动靶：李玉伟；
射击　女子标准小口径步枪：吴小旋；
举重　52公斤级：曾国强；
举重　56公斤级：吴数德；
举重　60公斤级：陈伟强；
举重　67.5公斤级：姚景远；
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李宁；
体操　男子吊环：李宁；
体操　男子鞍马：李宁；
体操　男子跳马：楼云；
体操　女子高低杠：马燕红；
击剑　女子花剑个人：栾菊杰；
跳水　女子跳台：周继红。

银牌八枚：

体操　团体：中国男子体操队；
体操　女子自由体操：楼云；
体操　男子跳马：李宁；
体操　男子单杠：童非；
举重　52公斤级：周培顺；
举重　56公斤级：赖润明；
跳水　男子跳板：谭良德；
射箭　女子双轮个人全能：贾玲娟。

铜牌九枚：

体操　女子团体：中国女子体操队；
篮球　女子：中国女子篮球队；
手球　女子：中国女子手球队；
射击　男子自选手枪：王义夫；
射击　男子移动靶：黄世平；
射击　女子气步枪：吴小旋；
体操　男子个人全能：李宁；
田径　男子跳高：朱建华；
跳水　男子跳台：李孔政。

全国最佳运动员

由首都20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1984年全国最佳运动员活动，有160多万人参加评选。当选的10名最佳运动员是：

李宁　广西体操运动员，男，22岁。1982年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3年在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中国体操队首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李宁是中国男子队主力队员之一。1984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体操邀请赛中，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与队友合作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与队友合作获男子团体冠军；同年在第23届奥运会体操比赛中，获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项冠军，跳马、男子团体2项亚军，个人全能第3名；11月在中部日本杯国际体操赛中，获鞍马、自由体操两枚金牌。他独创的难新动作吊环“正吊臂后悬垂前摆上接直角支撑”和双杠“大回环转体180度成支撑”已被国际体联命名为“吊环李宁”和“双杠李宁”。

郎平　北京市排球运动员，女，24岁。中国女排现任队长，主攻手。技术全面，擅长4号位高点强攻，高压拦网严密。1980、1981、1982、1983年连续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4年，中国女排夺得奥运会冠军，荣获"三连冠"。她在三次夺魁战中均是主力队员。

许海峰　安徽省射击运动员，男，26岁。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场落成国际比赛中，以568环的成绩夺得手枪慢射60发项目第1名；同年7月在第23届奥运会男子自选手枪比赛中，以566环的成绩，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打破了中国运动员奥运会金牌"零"的纪录。

朱建华　上海市田径运动员，男，21岁。1982、1983年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4年在联邦德国埃伯斯塔特举行的国际跳高赛中，越过2.39米，打破了他在1983年9月创造的2.38米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同年在第23奥运会上，以2.31米的成绩获铜牌。

栾菊杰　江苏省击剑运动员，女，27岁。1979年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1年在第36届世界击剑锦标赛中获女子花剑亚军；1983年在莱比锡国际女子花剑比赛中获冠军；1984年在格平根举行的世界杯施陶费尔兰德女子花剑邀请赛（A级）比赛中，赢得冠军；同年在第23届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中获金牌，成为奥运会击剑史册上第一个亚洲籍冠军。

张蓉芳　四川省排球运动员，女，28岁。身高1.74米，原中国女排队长。技术全面，战术多变，被国际排坛誉"怪球手"。她是女排三次夺魁战的主力队员。1984年12月光荣引退，被任命为四川省体委副主任。

吴数德　广西举重运动员，男，25岁。1979年、1980年、1981年、1983年连续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4年在第23届奥运会举重比赛中，以267.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56公斤级的金牌。

李玲蔚　浙江省羽毛球运动员，女，21岁。1982年在全英羽毛球公开锦标赛中，获女子单打亚军。1983年在第3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女子单打亚军；同年在世界杯羽毛球赛中与韩爱萍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1984年在全英羽毛球公开锦标赛中，获女子单打；同年，她参加第10届国际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尤伯杯），与队友合作获冠军；在第4届世界杯羽毛球赛上又获女子单打冠军。

阎红　辽宁省田径运动员，女，19岁。1983年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世界竞走赛中，与队友合作获10公里竞走赛中，与队友合作获10公里竞走女子团体冠军；1984年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竞走邀请赛中，以21'40"3的成绩，打破女子5,000米竞走世界纪录；同年在丹麦举行的第50届哥本哈根体育协会竞走公开赛中，又以45'4"的成绩打破女子10,000米竞走的世界纪录。

吴小旋　浙江省射击运动员，女，27岁。1980年在第4届亚洲射击锦村赛中，参加男子比赛，以385环的成绩获得男子气步枪项目冠军；1982年在第9届亚运会上，以584环的成绩获得男子气步枪冠军；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射击比赛中，又以581环的成绩，夺得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3×20项目的金牌，并获女子气步枪铜牌。

（黄惠桂）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3日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通令嘉奖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和工作人员在华山救人的模范行为。

2月1日　邓小平视察广东省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1月24日至29日），本日在广州与军民一起欢度春节。

2月5日　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粟裕因病逝世。

2月10日　邓小平视察福建省厦门市和厦门经济特区（7日至10日），并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2月16日　邓小平视察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并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2月26日　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3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结束（2月27日开始）。胡耀邦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3月7日　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宣布，对可能由大陆出口1157种货品解除不得自港澳等地进口的管制。

3月18日　胡耀邦宣布，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为整个厦门市。若干沿海城市采取某些特殊政策。

3月20日　赵紫阳总理于3月上旬至中旬考察访

问了湖南贵州两省和四川重庆市，对这些地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4月5日　我国自行编译的第一部《列宁全集》开始出版。

4月6日　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结束(3月26日开始)。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

4月6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

4月13日　胡耀邦总书记本月3日至13日先后到河南、湖北考察工作。

5月15日　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31日闭幕)。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会议、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的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5月25日　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仿吾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成仿吾同志是5月17日在北京病逝的。

6月16日　黄埔军校六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会宣布正式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并通过同学会章程，徐向前为会长。

7月3日　团中央授予韩余娟“舍乙为人小英雄”称号。

7月25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8月4日结束)。

7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周建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8月4日　国务院最近讨论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1981－2000年全国仪器工业发展纲要》。

8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不幸于本日三时零一分在北京逝世。

8月16日　万里、谷牧、李鹏8月12日至8月16日在大连视察工作。

8月17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李先念、邓颖超等首都各界人士五百多人沉痛地向李维汉同志遗体告别。

8月23日　胡耀邦同志8月23日至26日到河北省抚宁、乐亭、滦县、迁安、迁西、兴隆八个县进行考察。

8月29日　邓小平同志最近为中国国际信托公司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8月31日　胡启立、田纪云8月19日至31日在西藏进行了调查研究。

9月11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开始举行(21日闭会)。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领事条约》的决定、关于我国加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

9月13日　赵紫阳总理8月29日到9月6日实地考察了安徽淮河流域和煤炭钢铁基地。

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尹林平同志的遗体告别。尹林平同志9月8日在北京病逝。

9月18日　国务院批准颁布了财政部制定的《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办法》。

9月30日　赵紫阳总理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五大洲宾客出席。

10月1日　首都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10月2日　邓小平在会见华人科学家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城市的改革。这个改革很迫切，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邓小平说，国家的统一从香港问题做起，对香港的政策没有理由改变。

10月13日　万里、胡启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将要出征的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全体队员和南大洋考察队的在京成员。

10月27日　胡耀邦总书记21日到27日在广东视察工作。

11月14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闭幕(6日开始)。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议案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和关于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决定。

11月27日　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出的三人代表。

11月30日　习仲勋接见达赖喇嘛派出的三人代表，说明胡耀邦总书记1981年提出的五条方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意见。

12月3日　邓颖超11月21日至12月3日到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参观。

12月6日　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作为世界领袖丛书，由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并向世界各国传播。

12月8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成新领导班子，周惠当选为自治区党委书记。

12月14日　共青团十一届三中全会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胡锦涛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12月18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七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22日结束)，叶圣陶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

12月20日　邓小平主任和胡耀邦总书记分别会见香港环球航远集团主席包玉刚。

12月25日　赵紫阳总理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考察。

12月29日　安徽省委组成新领导班子，黄璜当选省委书记。

12月31日　中共中央于12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农村工作任务，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促进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经　济

2月23日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结束(10日开始)。会议强调，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5月10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规定。

6月3日　国务院最近正式作出决定，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

7月11日　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沈阳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7月13日　国务院同意在大连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并赋予大连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7月30日　我国第一条高原铁路干线——青藏铁路的第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经过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于本日在西安举行签字仪式，决定自即日起交付兰州铁路局使用。

8月2日　赵紫阳总理最近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改造和振兴老工业基地，这是关系经济建设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8月7日　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段通过国家验收委验收，本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签字仪式，决定交付乌鲁木齐铁路局使用。

8月31日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露天煤矿——霍林河南矿移交投产。

10月6日　广(州)深(圳)公路改造工程全面完成，从广州至深圳的行车时间缩短2.5小时。

军　事

2月1日　胡耀邦视察广西边防部队，本日向部队指战员发表讲话指出，如果越军胆敢来犯，就给予坚决的回击。

4月2日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自本日起开炮还击越军武装挑衅。4日，我国政府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我国边境的一切挑衅活动。

4月28日　云南边防部队向侵占我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地区的越南军队发起还击，消灭入侵之敌，保卫祖国领土。

9月4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授予在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战功卓著的云南边防部队六个英雄单位和十名个人荣誉称号。

9月10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嘉奖令，表彰参加云南边境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为祖国建立的功勋。

9月15日　云南边防部队还击入侵老山、者阴山越军作战胜利庆功大会在昆明市举行。总参谋长杨得志代表中央军委和三总部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的嘉奖令和命令。

外　交

1月1日　中国政府决定承认文莱苏丹国政府。

1月10日　赵紫阳总理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6日结束)。

1月12日　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

1月17日　赵紫阳总理抵达渥太华，开始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22日结束)。

2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达成协议，两国外交关系自本日起由代办级恢复为大使级。

2月7日　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2日结束)。

2月11日　李先念主席、彭真委员长打电报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深切哀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波夫逝世。13日至15日，万里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

3月5日　李先念主席抵达伊斯兰堡，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8日结束)

3月8日　李先念主席抵达安曼，开始对约旦哈希姆王国进行国事访问(13日结束)

3月13日　李先念主席抵达安卡拉，开始对土耳其

进行国事访问(18日结束)

3月19日　李先念主席抵达加德满都,开始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23日结束)

3月23日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乘专机到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访问(26日结束)。本日,赵紫阳总理和中曾根首相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设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并就两国经济合作等问题坦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24日,胡耀邦总书记设家宴款待中曾根首相一家。彭真委员长会见中曾根首相。中曾根首相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朝向二十一世纪》的演讲。25日,邓小平主任会见中曾根首相。

4月2日　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第134次会议宣布正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该联盟的成员。彭真委员长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

4月26日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31日结束)。李先念主席本日主持隆重仪式欢迎里根总统。

4月29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由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美国基威特公司代表团。邓小平祝贺中美共同开发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合作获得成功。

5月4日　胡耀邦总书记抵达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1日结束)

5月5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亚西尔·阿拉法特率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7日结束)。

5月10日　尼日尔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准将和夫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3日结束)。

5月14日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乌乐塔多博士和夫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19日结束)。

5月18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4日结束)。

5月20日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和夫人一行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30日结束)。

5月27日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昂·巴普蒂斯塔·德奥利维拉·菲格雷多和夫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3日回国)。

5月29日　赵紫阳总理出访西欧。赵紫阳总理先后访问了法国(5月30日至6月2日)、比利时和欧洲共同体(3日至6日)、瑞典(6日至8日)、丹麦(8日至10日)、挪威(10日至13日)、意大利(13日至16日)。

6月1日　哥伦比亚参议院议长卡洛斯·奥尔金·萨尔迪和众议院议长塞萨尔·加维里亚·特鲁希略率领的哥伦比亚国会代表团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6月11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林登·福布斯·桑普森·伯纳姆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15日结束)。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意共中央,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不幸病逝表示深切悼念。

6月20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C－130军用运输机。

6月21日　欧洲议会议长彼·丹克尔特和夫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25日结束)。

6月26日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和夫人一行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7月1日结束)。

6月30日　由议长加里·埃斯帕萨·法维亚尼率领的厄瓜多尔国民议会代表团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7月7日结束)。访问期间,李先念主席、彭真委员长分别会见埃斯帕萨议长。

7月4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和夫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9日结束)。

7月17日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国家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元帅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2日结束)。访问期间,李先念主席、赵紫阳总理、胡耀邦总书记先后会见了萨莫拉总统。

7月30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双方讨论了香港问题的主要方面,富有成效。31日,邓小平主任会见杰弗里·豪外交大臣,祝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8月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姜成山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日结束)。

8月12日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上校和夫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1日结束)。

8月17日　乌干达共和国副总统兼国防部长保罗·穆万加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1日结束)。

8月19日　赵紫阳总理会见正在北京的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

8月20日　李先念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国庆四十周年活动。

8月29日　李先念主席抵达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9月5日结束)。

9月8日　意大利参议院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前来我国访问(16日结束)。

9月10日　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会议

在东京隆重开幕(12日闭幕)。中曾根首相出席开幕式并致词。王兆国和石川忠雄分别作基调报告。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联名打电报给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会议,热烈祝贺会议取得成功。

9月17日　坦桑尼亚总理萨利姆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5日结束)。访问期间,赵紫阳总理、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主席先后会见了萨利姆总理。

9月21日　胡耀邦总书记会见由保尔·斯泰根率领的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李先念主席、赵紫阳总理分别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中经济协会顾问稻山喜宽和由他率领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

9月28日　以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团长、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为副团长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我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9月30日　首都各界青年一万五千人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欢迎三千名日本青年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出席了大会。胡耀邦总书记在大会上讲话。

10月7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夫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13日结束)。访问期间,赵紫阳总理、李先念主席、胡耀邦总书记、邓小平主任先后会见了科尔总理。

10月8日　中日青年友好联合活动圆满结束。本日中午,三千名日本青年中的最后一路——第四路七百多人,分乘四架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10月18日　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15日在旧金山惨遭暗杀。

10月20日　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姆扎利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3日结束)。访问期间,赵紫阳总理、李先念主席、邓小平主任分别会见了姆扎利总理。

10月24日　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到北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28日结束)。赵紫阳总理联名打电报给美国总统里根,对他在大选中获胜,将连任总统表示热烈祝贺。

11月12日　李先念主席和夫人林佳楣结束了对西班牙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开始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15日结束)。

11月16日　李先念主席偕夫人林佳楣结束了对西班牙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开始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20日结束)。

11月17日　挪威王国首相科勒·维克和夫人到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24日结束)。

11月19日　中共中央热烈祝贺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李先念主席和夫人林佳楣结束了葡萄牙的访问,本日抵达瓦莱塔,对马耳他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22日结束)。

11月28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于26日至28日对我国进行了内部非正式访问。

11月30日　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倪征奥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12月10日　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和夫人一行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15日结束)。

12月18日　应邀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乘飞机到达北京(20日离开北京抵达香港)。

12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本日下午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

赵紫阳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双方重申,两国政府将不折不扣地执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今后将会进一步发展,就中英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问题问题交换发表意见,希望美苏就裁减核军备等达成协议。

邓小平主任、李先念主席、胡耀邦总书记分别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教育科技文化

4月11日　第四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揭晓。

4月15日　全国优秀班主任发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5月8日　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四届评选结果揭晓。

6月20日　林才松最近研制成功了中文语词处理机－FMB微型中文语词处理机。这标明我国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7月5日　文化部表彰奖励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定位法舞谱"的创造者－武季梅和高春林。

8月10日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8月15日　文化部向在第三届维也纳国际歌剧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和抒情花腔女中音歌唱家詹曼华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8月22日　中国女中音歌唱家梁宁在赫尔辛基结

束的第一届玛扎姆·海伦国际歌唱比赛中荣获女声组一等奖。中国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和男中音歌唱家傅海静分别获得女声组和男声组的二等奖和三等奖。

9月1日　我国第一座微型核反应堆最近在核工业部原子能所研制成功并于本日通过部级技术鉴定。

9月28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首都新建现代化剧场中国剧院首次公演。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等观看了演出，并祝贺演出成功。

10月7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参加奠基典礼。

10月12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在北京成立。

10月26日　文艺界在北京集会，隆重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诞生九十周年，习仲勋到会讲话，梅兰芳研究学会成立，周扬任会长。

11月6日　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座受控热核聚变研究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HL－1)，已在核工业部西南物理研究所建成。

11月20日　我国首次赴南大洋、南极洲考察队从上海启航出征。

12月10日　由中国山东杂技团演出的节目《登板凳》，在第十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节上获得了最高奖—"金小丑奖"。

12月27日　中国首次考察队26日胜利抵达南极洲。本日下午，我国南极考察队的第一批登岛人员登上南极洲的乔治岛。

12月29日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首都隆重开幕。

社会生活

2月8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十届冬季奥运会。中国台北代表队也参加本届冬季奥运会。这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首次同时参加奥运会。

2月18日　1983年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评选揭晓发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3月12日　中国奥委会宣布、中国奥委会已于本月7日向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发出正式函件，申请在北京举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3月15日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北京宣布成立。

5月17日　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尤伯杯赛决赛中战胜英格兰女队，首次夺得尤伯杯赛冠军。

6月10日　我国选手朱建华在联邦德国埃伯斯塔特举行的国际跳高赛中，成功地越过二米三九的高度、打破了他本人在1983年9月在上海第五届全运会上创造的三米三八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7月5日　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联合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征求社会赞助活动。

7月28日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市隆重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式。

7月29日　我国27岁的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这也是本届奥运会决出的第一枚金牌。

8月8日　中国女排荣获奥运会金牌，成为世界女子排球运动史上第三个连续夺得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冠军的队。

8月13日　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胜利闭幕。我国体育健儿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十五枚金牌。

8月15日　天安门整修工程全部竣工(4月10日开始动工)。

9月1日　邓小平同志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9月23日　第四届世界杯羽毛球赛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结束，我国选手获得三项冠军和三项亚军。

9月28日　第三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代表大会决定，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

10月23日　中日友好医院开院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赵紫阳、王震、陈慕华、谷牧、铃木善幸和夫人、大平志华子等出席了开院典礼。

11月14日　第四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运动会在合肥市闭幕(6日开幕)。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5年

导　　言

198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九月三日，中国大陆和台湾各界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中华民族百年反侵略史上的首次辉煌胜利——抗战胜利。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于八五年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新认识，中国政府作出了人民解放军裁兵一百万的决定，这无疑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 ●美国客火烧"天鹅饭店"
- ●北京工体球迷骚乱事件
- ●百万大裁军
- ●六年案终解决　杀人犯死有余
- ●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 ●对越自卫还击　保卫祖国边疆
- ●苏联客机被劫至我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背景介绍

1984年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香港回归祖国只剩下十几年的时间了。为了体现联合声明精神，反映香港民意，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

材料：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材料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4月10日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该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

根据这个决定，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和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59人的起草委员会名单草案，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15人，各界知名人士10人，法律界人士11人；还包括香港各方面（工商、文化教育、法律、工会、宗教等）人士23人。其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和香港法院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于1985年6月18日通过了起草委员会名单。

7月1～5日，在北京举行了起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姬鹏飞主任委员在7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宣布起草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并就起草工作的大体规划和步骤、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等提出了初步意见。经过讨论，委员们同意姬鹏飞提出的关于起草工作的大体规划和设想，认为1990年上半年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适宜的。会议一致认为有必要在香港成立一个民间性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并决定委托在香港地区的25位委员共同发起筹组。

7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会见了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

美国客火烧"天鹅饭店"

背景介绍

4月19日，因美国公民理查德・斯・安德里克将燃着的烟头扔到床上，致使哈尔滨市天鹅饭店11层失火，火烧死中外宾客及职工10人，伤7人。8月13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理查德・斯・安德里克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万元。

材料：

・天鹅饭店失火经过

材料　天鹅饭店失火经过

1985年4月19日零点，哈尔滨市新建的主楼为15层、有262个房间的大型旅游宾馆——天鹅饭店，第11层楼失火，烧及21间客房，其中重毁的6间，死伤17人。在死亡的10人中，有朝鲜客人5人，美籍华人1人，饭店服务人员4人；受伤的7人中，有朝鲜客人4人，美籍华人1人，饭店工作人员和旅客各1人。

造成这场火灾的直接责任者是理查德·斯·安德里克，美国人，能源工程（东南亚）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他于4月18日来哈尔滨市洽谈业务，当夜酒后在房间吸烟入睡。燃着的烟头落到床上阴燃，渐将其西服上衣右肩和右臂外侧烧成条形焦糊状并粘有床罩纤维。右耳下侧的头发被烧焦。理查德被烟呛醒后跑出房间。由于房门大开，形成空气对流，使火势迅速蔓延成灾。消防队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扑救没有波及其他楼层。

以上犯罪事实经现场勘查、技术鉴定和证人证物证实，确凿无疑。8月13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犯有失火罪的理查德·斯·安德里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责令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万元。理查德对判决不服，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9月12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查德收到裁定书后，在送达证上签了字。

在这场重大火灾中严重失职的饭店经理及其他有关责任人员，也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和刑事处分。

（景阳）

北京工体球迷骚乱事件

背景介绍

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足球赛预选赛的比赛中，1比2负于香港足球队。比赛结束后，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秩序大乱，一些球迷乘机闹事，制造了少数打砸事件。

材料：

- 五·一九球迷骚乱事件

材料　五·一九球迷骚乱事件

1985年5月19日晚，中国国家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东区第2大组A组比赛中，以1比2负于香港足球队，被淘汰出局未能小组出线，这就使对中国足球冲出亚洲寄予热望的观众感到失望、惋惜和愤怒。比赛结束后，大批观众留在看台起哄，当中国队退场时，一些人向他们投掷汽水瓶等杂物，使随后退场的一名香港球员左眼和手指被打伤。随后，少数人到场外任意毁坏车辆，殴打司机，破坏交通岗亭、垃圾箱，推倒一辆出租汽车，还辱骂和打伤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有的竟然故意拦截外国人汽车，姿意辱骂。

为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120多名肇事者。经过审查，在这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事件中，触犯刑律的7人，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于6月18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有的并处赔偿经济损失；有38人因在比赛进行中和比赛结束后在场内外捣乱起哄，投掷杂物，辱骂民警，分别给予治安拘留12天或15天的处罚；比赛结束后，还有78人在场内外滞留不走，不听劝阻并参与起哄，情节轻微，经教育后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已由家长或单位领回。

事后，北京市和国家体委认真总结教训，切实改善了体育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在全市进一步开展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理想、纪律教育，已收到效果。

（景阳）

百万大裁军

背景介绍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当前国际形势作了重新估计。我党认识到，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和平力量的增长已大大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为此，中央决定我国进行百万大裁军这一行动。

材料：

- 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员100万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

材料一　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员100万

中央军委于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问题。会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减少军队员额100万。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的根据和意义。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暴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强调，中国人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

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 100 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 10 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着重讲了 5 个问题：(1)要进一步统一对中央政策的认识；(2)要顾全大局，识大体，一切行动听指挥；(3)要花大力气做好干部工作；(4)要严格管好装备和军产、物资；(5)要切实加强领导。要求全军指战员响应中央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事业中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杨得志作了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报告，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在会上就部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中的有关问题分别讲了话。参加会议的全军高级干部坚决拥护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认真讨论了如何搞好部队精简整编的工作。决心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在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完成这一任务。

6 月 4 日，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接见了各单位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这次会议是个思想水平很高的会议，开得很成功。他说，我们要集中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加强国防建设也就好办了。他赞扬军队许多老干部以军队建设大局为重，服从大局，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他要求地方干部尊重军队，爱护军队，支持军队，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白舸)

材料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

198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员裁减多，组织变动大，改革与精简结合进行，是我军建设的一次重大变革。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为在和平时期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重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保卫祖国安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裁减员额 100 万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按照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针对军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1985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研究了落实措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主要原则是：既要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又要不断研究、探索现代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新路子；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加强合成；精简人员与调整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结合进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人员素质，实行科学编组。精简的重点是各级机关、直属单位，尤其是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中央军委确定把这一工作列为全军 1985 年和 1986 年的中心任务。

二、可喜的成果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从 1985 年下半年开始，依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截至年底，全军军以上机关、直属单位和第一批部队已按中央军委的规定基本完成整编任务，军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精干机构，减少了人员。各总部、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撤并业务相近的部门和重叠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的等级，减少层次，人员精简 40%左右。大军区通过机构调整，机关、直属单位的人员有较大幅度的精简。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机构设置作了相应的改革。军以下部队也裁减了一些建制单位。(二)提高了合成程度。调整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特种兵部队，保留的陆军军全部整编为合成集团军。(三)改善了武器装备。列编的武器装备得到充实，反坦克、防空武器有所加强，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建设有较大进展。(四)组建教导团，改革了部队训练体制。(五)改革部分规章制度，初步理顺了一些工作关系。(六)提高了干部素质，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富有朝气与活力。减少干部数量，改变了干部、战士比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调整配备干部，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使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结构得到改善。

这次精简整编虽然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但进展比较顺利。这首先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和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措施，是进行反复论证后制定的，符合军队实际，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拥护。其次是各级领导决心大，抓得紧，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像指挥打仗一样抓整编工作。特别是总部和大军区先行整编和调整领导班子，为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做出了好样子。三是加强整编中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军委的决策上来，自觉做到讲党性、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正确对待单位的撤、并、降、改和个人的进、退、去、留，为精简整编打下了良好基础，对国家经济振兴，对军队建设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军备竞赛，我们主动大规模裁军，表明

我国政权稳固，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也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真诚愿望，对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推动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我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军队改革精简，不仅可以节省经费开支，减轻国家经济负担，而且可以使精简的人员，直接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中去，为国家创造财富。还可以腾出部分军用设施，支援国家建设。这些，都有益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振兴与腾飞。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也是从军队建设的全局出发，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是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积极方针，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使军队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等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有益的启示

回顾前一阶段的精简整编工作，使我们对和平时期如何加强军队建设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一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军队建设必须以国家经济力量为基础，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和平时期，必须使军队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与国家经济力量相适应，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50年代初期，军队抓住和平时期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精简整编，不仅对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加速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促进了军队的建设。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军队服从国家四化建设大局的实际行动，既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又将使军队建设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

（二）和平时期的军队，要建设成为一支精干的常备军。这是在国际和平环境中加强军队建设的正确方针，也是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世界各国尽管由于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经济力量、地理环境不同，在建设军队的具体做法上各有特点，但总的趋势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使常备军精干化。即使是超级大国，为了争夺霸权，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军费一再增加，他们的总兵力也没有明显变化，主要是搞技术装备的竞争。我军自60年代以来，规模偏大、人数偏多、机构臃肿的状况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除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主要是对国际形势分析判断不够科学准确，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应是一支精干的常备军认识不深。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后备力量建设的基础上，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有实践经验，大力挖掘军队建设的潜力，善于吸取外军建设的有益经验，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精干常备军的道路，就一定能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三）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人员素质、改善武器装备和科学编组上。军队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战斗力。人的因素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物质基础，而科学合理的体制编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和武器的作用，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古今中外的战争一再证明，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编制精干的军队，较庞大而落后的军队更有获胜的把握。我军必须在这次精简整编的基础上，针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立足现实，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确实把握军队建设的重点。在提高人员素质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上，更加广泛地开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专业技术的学习，深入进行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改革，大力培养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需要的合格人才，不断提高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在各种条件下的实战能力。在改善武器装备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国防经费的经济效益，根据国家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可能，加强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现有武器装备的改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进程。在体制编制方面，要巩固和发展这次精简整编的成果，动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根据武器装备的结构和发展趋势，继续研究、改革我军的体制编制，使之日益趋向科学合理、不断完善，使人和武器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

六年案终解决　杀人犯死有余

背景介绍

1979年，青海西宁市的杨小民杀害了其邻居王强。青海高级人民法院却徇私枉法，只判决杨小民为无期徒刑。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王强亲属的抗争下，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5年7月30日判处杨小民死刑。

材料：

- 青海纠正了重罪轻判的杨小民故意杀人案

材料　青海纠正了重罪轻判的杨小民故意杀人案

杨小民于1979年2月27日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邻居王强。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杨小民死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一审判决，并于当年10月

3日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某些负责人因杨小民的父亲是省厅级干部，便于同年12月7日改判杨小民死缓，又于1982年进一步改判为无期徒刑。被害人王强的家属对于上述徇私枉法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西宁市数千群众签名声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对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下达6次指示，要求他们对杨小民案件依法重新审理，纠正错判，但均未能得到贯彻执行。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活动，以及党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最高人民法院对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示终于得到了贯彻执行，使这起重罪轻判、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大恶性案件得以重新审判。1985年7月30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火车站广场召开了公判大会，宣布对故意杀人犯杨小民执行死刑的命令，10万余市民涌向街头，人们用掌声、鞭炮声和口号声来庆贺社会主义法制的胜利。中共青海省委通报表扬了在审理杨小民案件中秉公执法的单位和个人。

（庄问渔）

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建国以来，中国的钢铁事业取得了飞跃进步。然而，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已有的钢铁产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此，中央决定在上海建设宝山钢铁公司。宝钢是建国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材料：

- 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材料　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中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上海宝山钢铁厂，已经巍然耸立在长江之滨。宝钢一期工程从1978年12月23日开工，经过6万多名宝钢建设者7年精心施工和建设，于1985年9月胜利建成投产。同年11月26日，宝钢举行一期工程投产仪式，党中央、国务院发了贺电，赵紫阳总理亲临剪彩并讲了话。宝钢一期工程的建成搞产，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丰硕成果。投产后便于加强专业协作，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宝钢临江靠海，便于发挥水运优势，降低成本，减轻铁路运输压力。

宝钢是建国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总厂由焦化、炼铁、炼钢、初轧、钢管等5个主要生产厂以及自备电厂、能源中心、水运码头、中央机修等辅助设施组成。一期工程生产规模为年产铁300万吨、钢312万吨、无缝钢管50万吨、商品钢坯214万吨。

宝钢采用世界70年代末钢铁工业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全厂主要生产过程采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一期工程拥有电子计算机30台、微处理机60多台、自动化控制仪表6万多件，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宝钢从原料输入、炼铁、炼钢到轧钢等各个环节，都采用了国外钢铁工业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如原料场采用矿石分层平铺混匀堆料等综合处理新工艺；炼铁采用高风温、脱湿鼓风、超高压炉顶；炼钢采用铁水预处理、真空脱气等新技术。

宝钢采取综合利用能源的措施，由能源中心对全厂水、电、风、煤气、汽、油的生产和供应进行遥测遥控集中管理，使能耗大大降低。一期工程吨钢能耗为0.89吨标准煤，全部建成后吨钢能耗可降到0.85吨标准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宝钢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污水多级净化处理、烟尘控制、废气净化、吸声消音和工业废渣资源化等一系列先进环保措施，整个一期工程共有环保设施165项。投产后的排水、废渣、噪音等各项环保指标都达到或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厂区内绿化面积达140公顷，绿化覆盖率达12.8%；全部建成后，绿化面积将占全厂总面积的20%。

宝钢总体布置合理，完全按生产流程直线型布置，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是顺向运输。外部运输以水运为主，厂区建有原料码头、成品码头、重件码头、江运和内河水运码头，年吞吐量可达3000多万吨。厂内运输以皮带机运输为主，少量采用铁路运输。

宝钢劳动定员精简，劳动生产率高。宝钢生产系统基本上参照日本钢铁企业定员编制，一期工程投产定员为2.52万人。全部建成投产达到设计要求后，年人均钢产量可达216吨。

宝钢一期工程从1985年9月投入试生产以来，设备运转正常，生产水平稳步上升，产品质量良好，主要产品产量超额完成了投产第一年的生产计划。

现在，宝钢二期工程已经陆续开工。二期工程共有25个单元工程，其中生产设施21个。二期工程由国内总体设计，70%的设备由国内自行制造，计划于1990年基本建成。

宝钢的建设，对提高中国钢铁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对越自卫还击　保卫祖国边疆

背景介绍

越南小霸贼心不死，今年又连续在中越边境制造骚扰、入侵事件。越寇的侵略行径，受到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我军在2月、5月、7月、9月、11月、12月，多次打跑了入侵越军，保卫了祖国边界，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正是："国威、军威看西南！"

材料：

· 对越自卫还击

材料　对越自卫还击

1985年，越南当局坚持扩张政策，继续派遣军队在中越边境制造骚扰、入侵事件。仅2月6、7、8日三天，向云南省麻栗坡县境内发射大口径炮弹1500多发。11日凌晨，又发射炮弹5000多发，并向中国边防部队阵地发起冲锋6次。中国边防部队为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奋起自卫还击，打退了进犯的越军。

5月下旬，越军又对中国境内老山八里河东山地区进行炮击和偷袭，并发动连以下规模的进攻达60余次。31日凌晨，越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一个团规模兵力，发动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英勇还击，给进犯的越军以重大杀伤，守住了阵地。

7月中旬，越军用大口径火炮轰击麻栗坡县人口较稠密的村寨，其中猛峒、马林、铜塔三个地区多次遭受越军的炮轰。19日，越军在密集炮火掩护下以2个营的兵力向老山前沿阵地发动进攻。20日，又以2个连的兵力连续次发起攻击。中国边防部队奋勇抗击，粉碎了越军的多次进攻。9月中下旬，越军对老山地区平均每天发射炮弹2000余发，并多次派出步兵、武装特工人员进犯边境，骚扰村寨。中国边防部队于9月23日奋起还击，在50多分钟内全歼越军一个加强排，打退了越军的进犯。

11～12月，越军对老山地区持续地进行炮击和袭扰，有时一天发射上万发炮弹，造成几十名群众伤亡，上千亩农田荒芜，大批住房和生产设施被毁坏。12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和边境民兵给入侵越军以有力的还击。

在广西边境，9～12月，越军的武装挑衅和袭扰达500多次，打死打伤边民38人，毁坏房屋100余间，并3次入侵龙州地区，绑走中国边民，劫去耕牛粮食等财物。中国边防部队于12月对越南侵略军进行了有力还击。

中国边防部队在对越自卫还击中，英勇顽强，团结奋斗，保卫了祖国边境的安全和人民的和平劳动，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赞扬。

（刘克奇　朱渊元）

苏联客机被劫至我国

背景介绍

1985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架苏联民航客机安——24于19日被劫持到中国，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降落，机组成员和全部乘客安全返回苏联。这次劫机事件，是首例境外民航客机被劫持到中国大陆的事件。其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但中方积极配合，圆满解决了这次事件，并保证了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材料：

· 苏民航客机被劫至我国

材料　苏民航客机被劫至我国

1985年12月19日，苏联一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到中国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降落。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该机及所载人员的安全，并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协助，使机上的42名苏联乘客、机组人员和被动持的安－24型苏联民航国内班机于12月21日迅速安全返回苏联。该机副驾驶员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因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被中国有关当局扣留审查。

经过对事实的调查，确认哈吉－奥格雷劫机行为，不仅为国际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及《蒙特利尔公约》所禁止，其所劫持的民航飞机进入中国境内，也同时独犯了中国的法律，判处劫机犯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有期徒刑8年。

（景阳）

风　云　人　物

许　世　友

许世友(1905～1985)河南新县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常委等职。曾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党的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　朴　方

邓朴方(1943-　)　1985年3月5日,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1周年之际,原基金会副理事长邓朴方被推选为理事长。

42岁的朴方,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遭迫害,他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残,脊椎和盆骨受到严重的损伤,造成胸以下肢体瘫痪。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萌生了献身于残疾人福利事业的理想。他在1982年初从加拿大接受手术治疗回国后,就全身心地致力于这项工作。邓朴方等人在社会各方的支持下,在北京兴建了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这个机构不仅限于治疗,还将学术研究、教育和治疗结合起来,成为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大型机构。邓朴方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职完全是义务,不拿工资,但他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为残疾人呼吁,一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顾玉祥)。

王　赣　骏

王赣骏(1940—　)美籍华裔科学家王赣骏博士,1985年4月29日作为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7名机组人员之一,随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炎黄子孙。

王赣骏1940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去台湾。他从小酷爱科学,尤其喜欢物理。1963年高中毕业后,赴美国深造,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专门研究液体物理学,不久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喷气推动实验室主任。

1976年,美国决定大力发展太空科学活动,并公开征求实验项目。早就有志于此项科研的王赣骏,提出了有关零地心吸引力的实验计划。在500多件应征的实验方案中,他的题目是获选的14件之一。经过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严格挑选,王赣骏在资历、经验以及身体素质诸方面都胜过他人,于是脱颖而出,成为当选者。

王赣骏这次在太空轨道上共绕地球110圈,他曾14次飞过中国大陆,最后一次经过时他特地拍了一张上海的照片。

马　胜　利

马胜利,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中国工业战线上著名的改革家。

石家庄造纸厂原先是一家长期亏损的企业。马胜利于1984年自荐当厂长,要求承包工厂。他的改革要求,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为此,他提出了"管理上从严、生产上抓紧、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的办厂宗旨,并立下了当年实现利润70万元的军令状。1985年,这个厂利润达到100万元。马胜利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变"的办法:变懒为勤——实行责利挂钩;变"虫"为"龙"——选拔优秀人才;变松为严——整顿厂风厂纪;变差为好——提高产品质量;变旧为新——开拓新型产品等。

马胜利自荐当厂长后,还正确处理好厂长的职权和企业的自主权的关系。他对待国家,尽力尽责,多作贡献;对待消费者,让他们对产品感到上算、方便、满意;对待党组织,把它作为自己的靠山;对待职工群众,甘当他们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他把党和国家交给的权力用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党和国家对马胜利勇于改革的精神极为重视,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河北省委、石家庄市委分别作出决定,号召全省人民向马胜利学习。河北省政府授予他省劳动模范称号,全国总工会向他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高明岐)

曲 啸

被称为“真正牧马人”的曲啸，是由党用助学金培养起来的大学生。1957～1979年，他先后被错划为“右派”和打成“现行反革命”。在蒙冤22年中，他两次妻离子散，但他从未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祖国也没有丝毫怨言。

他过去放过马，种过地，教过书，还经历过铁窗生活。1979年，曲啸的冤案平反后，他不仅不计个人恩怨，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而且立即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担任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后，主动从农村接回被迫离散的妻儿。1985年，他的6人5个姓的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他还结合自己曲折、坎坷的经历，在全国各地向人们讲理想、讲道德。他的高尚情操和生动报告使千百万人受到了教育。

盛 其 顺

盛其顺(1963—)　22岁的青年战士盛其顺参加了老山前线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被共产党员那种乐于吃苦、抢挑重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改变了过去一些错误想法，重新燃起了共产主义理想之火。他利用战争空隙，在猫儿洞里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从这以后，他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苦活争着干，危险的任务抢在前。他是连队中下山背粮、背菜、背水次数最多的人；是全排下前沿阵地埋雷最多的战士。作战中，他先后歼敌10名。在一次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勇敢战斗，为掩护战友受伤致残，荣立一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盛其顺是解放军英模报告团的一位成员，他的“和同龄人谈理想”的报告，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鼓舞了青年一代。

聂 卫 平

聂卫平(1952—　)聂卫平是1985年11月结束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的主将。在历时一年的比赛中，他力挽狂澜，先后击败了号称日本模仿阵“双保险”的小林光一“十段”和加藤正夫“王座”，继而在最后的决战中，又战胜了日本“终身棋圣”藤泽秀行，为中国队夺取最后胜利立下战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聂卫平生长在北京一个“围棋世家”。他7岁开始学棋，1962年与陈毅建立友谊，成了陈帅的“小老朋友”，并受到围棋前辈过惕生、雷溥华的精心指导。他的格言是：不相信那些不愿做出牺牲的人会有成就。

为了实现陈老总围棋“要超过日本”的遗愿，聂卫平勤学苦练，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缍集百技于一身，并创立了自己“反应敏锐、灵活多变、攻守兼备”的风格，人称“聂旋风”。(顾玉祥)

辛 福 强

辛福强(1965—1985)　1985年3月，个体户辛福强病逝了，年仅20岁。他的生命虽短暂，工作虽平凡，但在人民心中却留下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他逝世的时候，大连市无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表示了深深的悼念之情。

1981年，辛福强初中毕业后，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去寻找“光彩”的职业，而是抱着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态度，3次放弃进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机会，当上了一名走街串巷的个体镶装玻璃工。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行程数万里，把温暖和方便送到了4000多户人家。为给用户镶一块玻璃，他常常跑三、四里路却不多收一分钱；有时路太远，他就背着玻璃箱坐公共汽车去，往往花的路费比镶玻璃的收入还多。他还免费、减费为400多户烈军属、五保户镶配玻璃，受到群众的高度赞扬。

辛福强病逝后，中共大连市委追认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团中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号召全国青年个体劳动者向辛福强学习，做一个人民信得过的个体劳动者。

袁 隆 平

袁隆平，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他是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的主要研究者、培育者。

1964年，他通过几年的细心观察，根据玉米、高粱等作物杂种的先例，肯定了水稻杂种的做法，并参阅了国外的有关资料，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来进行杂种的设想。这是国际上从1917年有人发现水稻雄性不育现象以来，一直没有研究成功的课题。转育成第一代雄性不育系材料。他还对470多对不同品种进行测交，并在1968年筛选出了有保持能力的青小金一号，为培养籼型杂交水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1973年，他又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良种。这种水稻产量高、米质好、抗旱涝、抗倒伏，1975年作双季晚稻种植，亩产511千克。

1979年籼型杂交水稻作为中国的专利转让给美国

圆环种子公司，为国家赢得23万美元的外汇。不久，这个深受人们欢迎的“天子骄子”很快被世界上许多盛产稻米的国家采用。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召开的一次学术专题报告会上，袁隆平被命名为“杂交水稻之父”。

为了表彰袁隆平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1978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9年又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1年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向他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1985年10月，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高明岐）

钱钟书

钱钟书（1910—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得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考取英国退回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得副博士学位，接着又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进修法国文学一年。1938年归国后，先后担任过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40年代，这一时期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作品精细入微地描绘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界的众生相，调侃、奚落、讽刺，其针砭都在那令人窒息的社会世态。这些作品机智隽永，风格独特，生气勃勃。同时他还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在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等方面造诣很深，力图从比较文学、心理学、哲学等各种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他的文学评论集《谈艺录》在沟通中西、广征博引的基础上，包含着对中西诗论中貌异实同的诗心精微辨析、比较和阐发，是中国最早的丰富而精深的比较文学专著。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的工作。1953年院系调整后，任文学研究所（初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另有《管锥篇》等著作多种。

华罗庚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学部委员，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早年自学数学，后出国深造，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先事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5年6月12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正在东京大学为日本数学会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当晚不幸逝世。终年74岁。

1985年7月12日，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和数学家聚集在北京科学会堂，缅怀华罗庚一生光辉的业绩。

华罗庚是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在许多数学领域中都有不朽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数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开拓了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多元复变函数论在中国的研究，建立了中国的研究传统。他的许多卓越成果，已成为这些学科的基本结果，并用华罗庚来命名。例如，华罗庚得到了高斯完整三角和问题的最佳阶估计，被称为华氏定理；华罗庚关于指数和积分平均估计，被称为华氏不等式。这些都是堆垒数论中最经常与必须用到的定理。华罗庚解决了体论的半自同构问题，被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又如他从一个简单的恒等式出发，导出了所谓朴劳威尔—嘉当—华氏定理。华罗庚关于典型域上调和分析的研究，开辟了典型域上的函数论的研究，这一方向与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群表示论等有普遍关联。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多个复变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与《数论导引》等，均有各种文字翻译，影响广泛。有的可列为本世纪的经典著作。他共发表学术论文300篇，专著10本。

华罗庚对应用数学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有广泛而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在工交部门中推广使用“优选法”与“统筹法”，为此他十多年来，亲自去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工厂与矿山蹲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华罗庚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家，有的已国际知名。这些人在发展中国数学事业中，担负着各种领导职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华罗庚还注意教学改革与数学竞赛活动，为青少年撰写了不少良好的科普读物。（王元）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85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股“张贤亮”热。张贤亮的几部小说《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出版即引起轰动。他的小说，深刻揭示了人的本性，具有巨大的震颤力。

同一时期，以莫言、刘索拉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群崛起。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旋风。

老的作品中，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久被埋没后重放异彩，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1985年，电影《少年犯》和根据老舍先生同名长篇巨著改编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85年流行术语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对外开放，包括创建经济特区、扩展对外经济贸易、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内搞活，就是动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包括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广承包责任制、建立开放的商品流通市场、采取多种价格形式等内容。

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陆实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精神污染　指思想战线上理论界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消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压缩空气　压缩投资规模、财政开支和消费基金的膨胀空气，使之与国力相适应，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协调发展的轨道。中共中央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过热”现象，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重大措施。

经济特区　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公司和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在中国进行投资活动，而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的地区。

全盘西化　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全盘西化”又叫“全盘欧化”。就是中国一切东西都要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短平快　排球术语，指一种快攻战术。现常借用以指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效果显著的新技术，或高效率的工作作风。

“三资”企业　指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在中国境内开办的侨资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技术水平较高，产品主要用于外销。

“老、少、边、穷”　地区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穷困落后地区的简称。

小说《围城》

作者钱钟书。小说描写主人公方鸿渐和已故未婚妻家、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之间的一场又一场“围城”之战，用方鸿渐这个不学无术的留洋学生回国后恋爱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讲了一个男女之间爱情转困与逃脱的故事。小说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上层知识分子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精妙入微地刻画了战时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这是在旧中国的土壤上孳生起来的而又接受过一定的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群，有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高松年、李梅亭、韩学愈、汪处厚等，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双关的语言，鞭挞了他们落后、丑恶的风习，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贫乏、空虚与卑微。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具有复杂而丰富思想性格的形象，他追求纯真、朴实的爱，厌恶爱情生活中的市侩气，却又因循苟且、胆小怯弱，成为爱情生活中的不幸者；他还有正义感，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有不满和怨愤，却又常常屈服于环境的压力，摆脱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束缚，过着一种庸俗无聊的生活。他不停地寻找精神依附，但每一次找到新的归宿后，就发现这归宿其实不过是一种束缚而已。这部小说的讽刺辛辣犀利，心理描写细腻深刻，语言生动机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曾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

小说《灵与肉》

作者张贤亮。　许灵均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他

虽然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却没有受到过父母的抚爱。十一岁时，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母亲病死在医院时，他成了孤儿。资产阶级家庭只留给他一张履历表上的"资产"，而共产党收留了他、人民收留了他，他靠人民助学金上完了中学，走上了人民教师这神圣的岗位。正当他拿着粉笔在教室里给学生传授知识、把美丽的梦变成了现实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又把他推到父亲那边。好象肉体的血缘关系必然决定阶级的传宗接代，他成了"资产阶级右派"，成了资产阶级一分子。他被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农场运劳动改造。解除劳教后，因为无家可归被留在农场当放牧员，每天与马群为伴。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前遗弃了他的父亲忽然回来了，要把他接到国外去继承他的产业。这好像又是一场梦，然而又是确确实实的事实。父亲现在就睡在隔壁，而他身下的席梦思床和农场硬梆梆的木床完全不同。

然而他觉得这一切都很陌生、很隔膜。父亲所代表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的世界在农场、在农村小学校、在相濡以沫妻子秀芝和他们的小女儿清清那里。他想起现在正在热得发烫稻田里收割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不停地摆动着肢。他想起秀芝的家庭温暖。她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说他是"右派"也好，又不是也好，在她眼中，他还是他。信赖他，相信他是好人、老实人，正是这种庄稼人朴实的理智所带来的信赖，支持他度过了最限难的日子，没有在精神上垮下去。这二十多年来他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了最宝贵的东西——劳动者的情感。他没白白走过这艰苦的道路。

他终于又回来了。他家门口站着的几个人看出了他，奔跑着迎接他。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飞也似地向他扑来……

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作者张贤亮。

两个月前，我从劳改队大组被抽调出来，去管水稻田。

我管的二百亩田紧靠水渠，趁犯人们吃午饭，我检查田埂和田口。这时在我前面的芦苇丛中传来了像野鸭划水时的泼刺波刺的声音，我好奇地拨开芦苇秆，看到了个赤裸裸的女人！她发现我，并且她毫无准备防御的姿态呼唤我时，一阵强烈的冲动过去，习惯性的克制占了上风，我心中涌起一阵温柔的怜悯。正在这时，尖利的哨声使我解脱了尴尬的局面。

我们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之后了。我刑满后被分到农场放羊。黄香久意外地出现在此地。于是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边干活边聊话。这八年她结过两次婚，离了两次婚；而我这八年蹲了两次监狱。这就是命运！

为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划出几平方公尺的净土，我认真考虑起和黄香久结婚的事来。我忽然有了个家！然而，新婚之夜的一切，使我明白无误地知道了由于长期压抑的结果，我已失去了性功能。于是我成了她所称的"废人"、"半个人"！我无法掩饰我的羞愧、内疚和懊丧。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傍晚，我放马回来的路上，坐骑大青马深深地陷入了泥潭。于是我与大青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对话。

一次曹支书派我随小李的拖拉机去火车站拉化肥，车坏在半路，我决定返回了生产队报告。远远地我正好看到曹支书钻进了我的家，屋里的灯随即熄灭了！我瘫倒在枣树下，静谧的月光下，宋东、奥塞罗、庄子、马克思等先哲们的灵魂先后来我的面前侃侃而谈……

一天一夜的暴雨使山洪暴发。在大坝穿水的危急关头，我潜入水底堵上了漏洞，受到人们的赞扬。但一想到我是"废人"，便更冷得发抖。回到家中，黄香久让我喝了姜汤之后又敞开了胸给我取暖，我遽然产生了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冲动，从此我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然而我对她的爱情夹缠着许多杂质，互相矛盾的情感扭合在一起难分难解。

终于我跟黄香久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争执。后来，黑子来告诉我们：周总理逝世了！我把日记本烧了，对香久说："我们两个也完了！"我预感到要有一场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爆发。我将告别这块可爱又可诅咒的土地！

曹学义在我们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回到家中香久把它撕成两半。她分开我们的衣裳，又给了我两进块钱。她用泪眼柔情地看着我，却撇着嘴狠毒地诅咒我。最后她催我上炕，让我永远记住她。好大好圆的月亮啊！春天来了，再有一个月便是清明。

纪实文学《5·19长镜头》

作者：刘心武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子夜之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抢先发出了关于当晚中国队与香港队足球赛结束后发生"骚乱事件"的消息。第二天，香港报纸也纷纷以头版报导这条消息，连台湾中央社也行动起来……我国有关部门极度重视。五月二十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一百二十七名肇事者。"

滑志明本来并非一定要去看那场足球赛。十八日下午他兴冲冲地提前完成工作定额，去和女朋友小瑛约会。他借了一部录相机要请小瑛子看录相，一进家门，便遭到了父亲的一顿严厉斥骂。小瑛子走了，他又于烦乱无意中把借来的录相带给洗掉了，借主当然要他倍；第骑车在街

上，又撞了一个人，又被人撞了一下，等拐到三环路上时，他的心情已经坏透了。

滑志明进了足球场，双方的力量估计使他心里轻松了一些，他还想借中国队的胜利把自己应当发泄的淤气发泄出去。赛场看台上群情激昂，人人都以为中国队必胜。不料场上的局面却越来越有利于香港队，使巨大的心理落差迅速酿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凝滞、高潮、阵雨后的狂躁、喧嚣……当中国队以一比二败北，香港队欢呼庆贺时，看台上壁立的凝固的“怒涛”便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地地道道的球迷”们汇成一支悲壮的队伍涌向国家队出场口，恳求教练回答问题；外围看热闹的人们则开始起哄，个别狂热分子狂呼乱掷。香港队员张家平的手指和嘴唇被玻璃汽水瓶划破，民警们也受到了冲击。滑志明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狂热的人流，在一阵阵被扭曲的《国际歌》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胸中的郁气彻低勃发出来了。他随二三十个被愤怒、嫉恨、狂暴包裹起来的小伙子，接连拦截了几辆出租汽车，最后又把一辆小轿车拥立起来。民警们冲来，抓住了并不想反抗、逃跑的滑起明。

事实证明：“五·一九事件”既不算“排外暴乱事件”，也影响不了香港的光明前途；更算不上某些人认为的是“义和团精神的总爆发”。香港队教练郭家明就说：“五·一九当天场内的骚乱并不算大事，这类事在国外更普遍。……”

倒是我们自己太过分地重视“国际舆论”了。我们应该冷静，需要更加重视“国内舆论”，需要重视一般群众尤其是一般小青年的不同方式的反应。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不致于迅速老化。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足球队暂时解散；三十一日，教练曾雪麟辞职；六月一日至四日，被拘留的青年人大部释放。

小瑛子下定了决心，默默地等滑志明。

纪实小说在我国还不多见。刘心武这篇小说把“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组成了一种新颖的结构形式。把外界的反应、主人公的行为与心理、作者对事件的客观与主观分析评判揉合在一起，既有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又有了报告文学的尖锐、明晰的思辩特点。虽然是一种尝试，却也是一个可喜的成功。

歌曲《十五的月亮》

石祥词

铁源、徐锡宜曲

稍慢真挚、深情地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孝敬父母任劳任怨，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着家田，我在献身祖国不惜流血汗；你肩负着全家的重任，我在边疆站岗值班。啊！丰收果实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贡献。啊！祖国昌盛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也是你的心愿。

歌曲《小城故事》

庄奴词

汤尼曲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

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

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作客。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及其作者简介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于1985年12月公布，下列三部作品获奖。它们是从1982～1984年三年间的三百多部长篇小说中，经过反复遴选，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由评奖委员会认真讨论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黄河东流去》通过1938年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一千多万人死伤或在洪波中挣扎的悲剧，描写了李麦、徐秋斋、海长松、海老清、春义、蓝五、王跑这七个农户悲欢离合的故事。上集写他们离乡背井，流入洛阳、西安等地后互相搀扶，相濡以沫、在历史的风涛中表现了黄河儿女坚韧的团聚力和伟大的生命力。下集写他们在受难和谋生中，在城市经济生活中，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并逐步意识到妨碍他们迅速觉醒的因袭负担，不同程度地摆脱和克服着自身古板狭隘的性格，终于在1948年解放前夕，纷纷回到故乡重建家园，显示了我们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因。上集于1980年、下集于1984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作者李准，蒙族，1928年生于河南洛阳。自幼生活在农村，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1943年起独自谋生，当过盐号学徒、邮递员和银行职员等。1952年开始创作，写有《李双双小传》和《老兵新传》等许多小说和电影剧本。粉碎“四人帮”后，除小说创作外，他还改编了电影《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沉重的翅膀》描写1980年时重工业部领导之间围

绕工业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副部长郑子云、厂长陈咏明和车工组长杨小东等老中青三代改革家的艺术形象，批判了田守诚、冯效先、何婷等反改革派，并把议论带进了小说的描写之中，表现了抵近现实的锐气和强烈的参予意识，热情地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第一部正面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它最初发表在《十月》1981年第4、5期上，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四次修改本。作者张洁，女，1937年生于北京。196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她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和《条件尚未成熟》，分别获得1978、1979、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现为北京市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钟鼓楼》仅仅是写1982年12月12日从早到晚的十二小时里，北京钟鼓楼下一个四合院内九户人家的生活。但它却通过"花瓣式"的放射结构，描绘了修鞋匠、炊事员、营业员、老编辑和街道工厂工人等三、四十个人物，描写了他们及其父辈几十年的心态变化和生活变迁，构成了一幅北京市民生活缤纷和流动的社会生态群落图。是一部新颖、独特、厚实的作品。它先发表于《当代》1984年第5、6期，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作者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成都。1961年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北京第13中学任教十余年，1978年调任北京出版社编辑。他的《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先后获1978、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为北京市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蔡葵）

历史档案

1985年国内十件大事

一、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局部调整了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就制定"七五"计划建议（草案）作说明。胡耀邦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七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领导班子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年轻化，对于使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班子更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大意义。赵紫阳指出："七五"期间主要任务是，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在22日的全体会议上，宣读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代表们一致赞同四中全会的这个报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增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56人，候补委员35人；增选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增选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64人，他们中有中央委员29人，中央候补委员35人。另有27位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在23日的闭幕会议上，首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邓小平、陈云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改革，奋发进取，为完成"七五"计划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第六个五年计划，经过十亿人民的团结奋斗，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五年前，我国的农业仍然处于困境，粮食、棉花等主要产品还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能源生产停滞不前，轻工业生产严重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市场商品货源不足；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下降，存在巨额赤字；上千万的待业人员等待安置……仅仅经过短短的五年时间，我们的党领导人民就改变了这一切。概括起来有如下成就：

（一）国家财政状况好转。从1982年起，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持续上升，改变了前几年较大赤字状况，保持收入基本平衡。1985年国家财政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收入总数将超过三千亿元，比1980年增长一倍，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二）能源工业发展迅速。国家投资七百多亿元，兴建大中型火力、水力发电站42座，新增发电机组容量二千万千瓦；建成大中型煤矿68座，新增采煤能力八千四百六十万吨；原油开采能力新增近五千万吨。现在我国原煤

产量居世界第二位，钢居第四位，原油和电居第六位。

（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均衡发展。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于重工业发展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农业生产从1981年起，以平均每年增长10%的高速度向前发展，各类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1984年粮食总产量突破八千亿斤大关，位居世界第一。粮棉不仅可以自给，还可以出口。第三产业有了较快发展，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有改状况。

（四）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六五"期间新就业的城镇劳力达三千多万人，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增长五成，职工平均工资增加20%，农民平均纯收入增加80%。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

（五）科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六五"期间，我国成功地向太平洋深海特定海域和水下的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研制成功"银河"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发射试验通信卫星定点成功。教育事业取得新成就，1985年我国共招收研究生四万四千人，在校研究生四万八千人，普通高校招生六十万人，在校生一百六十八万人，这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基本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消除赤字　国家财政状况，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这是我国经济顺利调整、积极改革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经济的发展，不仅彻底扭转了前些年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下降、出现较大赤字的局面，1985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消除赤字。我国的财政收入已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新时期。而且，财政支出结构日益改善，财政收入有了可靠的基础。这几年，国家财政支出的分配，坚持了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支出结构日趋合理。1981年，为了进一步调整经济，缩小财政赤字，国家不仅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而且紧缩了国防费用的支出。从1982年起，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集中资金的措施，以保证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对资金的需要。至于文教、科学、卫生方面的经费，则一直是逐年增长的，教育经费从1979年到1984年这六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4.6%。远远高于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每年递增5.7%的水平。这几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为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财源。从1980年开始，国家对地方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对国营企业先后实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利改税的两步改革。利改税，不仅使国家增加了收入，也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增多了企业留利。这就大大增强了做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营企业的活力，为企业今后上交越来越多的税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中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3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邓小平出席了6月4日的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们都强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国防建设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与会的陆海空三军高干部，坚决拥护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保证在今后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完成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已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协助军队完成这一任务。

五、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革教育体制和改革科技体制两项重要决定　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讲话。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决定》全文分五个部分：（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二）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三）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根本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3月2日至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方毅在开幕式上讲话。赵紫阳作《改革科技体制，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讲话。胡耀邦、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讲话。邓小平指出：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问题，把生产力搞上去。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并于20日公布。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革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克服"左"

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六、农村开始第二步改革，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初步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在打破集体经济的“大锅饭”、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从今年起又踏上了第二步改革的征程，开始向“小康”的目标攀登。以改革农副产品购销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开始，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农村经济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农业生产由主要面向国家计划转到按市场需求发展商品生产的新阶段。原实行统派购的 39 种农副产品，除个别品种外都已先后退出。肉、蛋、菜等副食品的价格也已全部或部分放开，实行多渠道经营。至此，我国农民三十多年来为完成统派购任务而生产的历史基本结束，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机制开始指挥农民的生产。农民把这一变化看作是继大包干之后在经济上的又一次解放。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今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在基本合理的范围内减少约七千万亩，经济作物面积扩大五千三百万亩，粮食同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有较大改善。种优质粮、增加作物品种已成为农民追求的新目标。短腿的林业、牧业、渔业是今年农民投资投劳的热点。今年全国退耕还林还牧还渔八百多万亩，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三）城乡之间由单一的产品交换转到共同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横向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城乡之间互开大门，广泛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成份的经济技术合作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农民主动进城兴办各种事业，既活跃了城市经济，又使自己增加了收入，并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这同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农民被迫流入城市变成一无所有的失业大军形成鲜明的对照。城乡关系的新发展，展示了我国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美好前景。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后劲”的主要标志，预示着农村经济将会有新的腾飞。

七、价格体系的改革迈出勇敢的一步，对促进生产、搞活流通、活跃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已见成效 1985 年是我国进行价格体系改革的起始年。过去几年，虽然我们对价格作了一些调整，但是作为价格体系的改革还没有系统地展开。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为了把价格理顺，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健康、协调地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今年，我国价格改革迈出的步子比较大。主要是：（一）基本理顺农村粮食购销价格，取消了粮、棉、油的统购制度，改为实行合同定购；（二）调整生猪购销政策，逐步放开了生猪、蔬菜等鲜活副食品的价格；（三）调整了铁路短途运价；（四）在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小商品价格放开，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价格改革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国家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加以控制，进入第四季度，市场物价渐趋平稳。总的看来，价格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显著，已经并将继续对发展生产、搞活流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保证了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四十五元左右。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包括发给职工的物价补贴）一千三百七十亿元，比上年增加 20.9%；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一千一百四十二元，比上年提高 17.2%，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升因素，实际工资提高 4.7%。但由于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少数职工的实际收入略有下降。到年末，居民储畜存款余额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33.6%。其中，农村储畜余额七百二十亿元，比上年增加一百八十一亿元。

八、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我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同我国现有钢铁企业相比，宝钢作为现代化企业有六大特点：（一）设备大型化，自动化程度高；（二）产品质量好，填补了一些缺门和短线产品品种的空白；（三）能源自动管理，能耗低；（四）厂外运输以水运为主；（五）环境保护好；（六）劳动定员精简，劳动生产率高。11 月 26 日，工厂举行了投产仪式。党中央、国务院发去贺电。赵紫阳总理专程前往祝贺，并在投产仪式上讲了话。

九、老山项模报告团在全国各地作报告，英雄事迹产生强烈反响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解放军英模汇报团，10 月初开始先在北京作报告，以后组成七个分团赴各地巡回报告，先后到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群众赞扬英模报告是生动而有说服力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这次英模汇报团活动历晚两个多月，到 12 月 16 日结束，其规模之大，效果之好，影响之深，是多年来少有的。据统计，英模们作报告将近一千场，听众超过五百万，还有亿万群众围坐在收音机、电视机前收听收看。英模所到之处都是生活在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真诚情意之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十、中国女排获得第四届世界杯赛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四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女队 中国女子排球队11月中旬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以七战七捷的成绩，蝉联世界杯赛冠军，从而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四次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女队。前三次冠军是于1981年在第三次世界杯赛、1982年第九届世界锦标赛、1984年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获得的。

十年十六件大事

（1975～1985年）

一、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报刊、学术界、各地各级党委以及许多实际工作部门先后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讨论历时两年之久。大讨论使许多人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来面目。这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由这次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三、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1980年11月20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宣判，对上述十名主犯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它表明，不管道路多么艰难曲折，人民的意志终将胜利，正义终将伸张，邪恶终将铲除，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四、中共中央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81年6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五、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自1978年起，我国农村陆续出现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我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1982年起，党中央对农村改革连续五年发布了五个“一号文件”，不断总结、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且作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专业户，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农副产品购销制度，以及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等重要决策。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几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十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六、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经验后，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改革经济体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两年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单一所有制经济形式，实行简政放权，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初步改革价格体系，打破两个大锅饭，使企业活力明显增强。改革初战告捷，使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

务基本实现，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自1980年起，我国设置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1985年又先后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逐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些特区和开放城市已成为我国沟通内地和世界的“窗口”。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打破了长期闭关锁国的局面，使我国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经济条件，博采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获得巨大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八、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

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提出，激发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热情，增强了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

按照二十年翻两番的规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即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头五年执行结果，1981年到1985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

九、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解决了恢复中国对香港的主权问题

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圆满地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党中央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据此构想，我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经过谈判，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步骤，对解决台湾问题、澳门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

十、制定新宪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鉴于“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严重教训，全国人民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全国上下两年的反复讨论修改，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建国以来的第四部宪法。新宪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根本大法。

1979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还先后制定了五十多个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四百多个行政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七百多个地方性法规。现在，我国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

十一、中国共产党进行整党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当年冬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作一次全面整顿，达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目的。到目前，中央、省、地、县级领导机关和相当地县两级的企业事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整党已经结束，区、乡、村基层单位的整党正在进行。整党促进了团结，促进了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

1986年1月6日到9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工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十二、一代新人走上领导岗位，顺利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

198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在全国普遍推行离休制度。

1985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131位老同志分别提出的不再担任中共中央三个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请求。现在，全国因年龄过大退下来的干部已超过200万。

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部委，从各省、市、自治区到各地县，从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到各师团，一代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新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目前，全国从文化水平较高的中青年人里面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在200万以上。

十三、改革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澄清了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是非。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部分”。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社会上更加

得到人们的重视。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后，为了适应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85年3月13日和5月27日先后决定改革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前者的目的是使科技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后者的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两项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和教育的高度重视，将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十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创造民主、和谐、融洽的环境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文艺界、思想界、理论界，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不搞运动，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人。

1984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文学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同志座谈时又说，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有一个民主、和谐、融洽的环境。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创造民主、和谐、融洽的环境，有利于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文化艺术和学术的繁荣。

十五、中国边防部队胜利进行对越自卫还击

自1978年8月起，越南当局不顾我国的多次呼吁和警告，派遣武装力量，侵犯我国边境地段，不断地向我国进行武装挑衅。进入1979年2月以后，越南当局对我国的武装侵犯步步升级，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奋起还击越南侵略者。在自卫还击战斗中，我边防部队打击了越南侵略者的狂妄气焰。1979年3月16日，我国政府宣布，对越自卫还击战斗达到了预期目的，我边防部队当天从越南全部撤离完毕，回到我国境内。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涌现出一大批热爱祖国、英勇善战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在人民中广为传颂。

十六、人民解放军减员百万，军队建设实现战略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对国际形势作了重新估计。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现在认为战争危险虽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所以，1985年，中央决定裁军100万，并加强军队的正规化、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午在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300多位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贺新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十一号通知，对第一期整党单位提出要求。

同日　中央国家机关100多名青年在北京科学会堂集会，讨论人事制度改革问题。

1月10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下午在人大会堂举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转中组部、中宣部《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报告》。

1月14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继续举行分组讨论，审议召开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提出今后人大会议安排在首季举行。

1月15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午在人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同意将赵紫阳总理提请审议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列入议程。

1月17日　中共中央下午在人大会堂召开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会。

同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午在人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几个报告的说明。

1月21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下午在人大会堂闭幕。会议决定：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人大常委会议决定，9月10日为教师节。

1月23日　彭真在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

1月25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歪风，各地要及时检查，做到令行禁止。

1月30日　全国县、乡直接选举工作基本结束。

1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人大代表将视察各地工作。

2月6日　全国法院院长会议提出今年工作任务，继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加强经济审判、民事审判工作，从重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2月8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党严格纪律，执行各项政策规定，坚决处理违法乱纪者，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方面做出表率。

2月12日　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活动，北京市着手清理整顿各种公司。

2月19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地群众欢度春节。

2月20日　首都各界举行春节团拜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来自各条战线的4500多人参加，李先念致春节祝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要加强纪律性。

2月28日　中纪委再次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严格党纪政纪，各地部门必须坚决制止新的不正之风。

3月8日　中指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二期整党工作。

3月15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

同日　政协六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政协礼堂开始举行。

3月18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讨论《继承法》。

3月19日　政协六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政协礼堂闭幕；六届人大常委会继续分组讨论《继承法》草案。

3月20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基本同意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稿。

3月21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决定3月27日在北京召开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3月25日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邓颖超主持开幕式，彭真、乌兰夫等出席会议，热烈祝贺大会召开。

3月27日　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彭真宣布大会开幕，赵紫阳作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

4月1日　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讨论邓颖超的讲话和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

4月3日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听取吴学谦、王汉斌、陈丕显、郑天翔、杨易辰就有关议程作说明和报告。

4月5日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通过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和关于1985年国家预算的决议草案，决定将关于批准中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草案，关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印发各代表团审议修改。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精心指导，力争58个试点城市改革有新突破。

4月8日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闭幕，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邓颖超希望委员们积极贯彻大会精神，会议通过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增选华罗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4月30日　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会聚北京，首都集会庆祝"五一"节，纪念"全总"成立60年，《人民日报》发表《继承和发扬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荣传统》社论。

5月1日　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两代会青年代表殷切寄语当代青年，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奋发进取建功立业，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社会主义强国。

5月3日　团中央举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大会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闭幕式。

5月5日　深入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铁道部机关清查"三种人"工作结束。

5月7日　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卫生事业发展，提高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利于防病治病。

5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紧迫任务》，纪念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

6月18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闭会。会议通过《草原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通过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撤销教育部等项决定，决定了有关任免事项。

6月22～30日　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同志发表了书面讲话。王鹤寿要求把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作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

7月14日　胡启立在中指委召开的六省、区第二期整党工作汇报会上讲话，指出整党离开改革就会失去现实意义，改革没有整党作保证就不能顺利实施。

7月16日　中纪委批复晋江地委和行署党组关于贯彻公开信的报告，指出对有关党组织和领导人必须追究责任。

7月18日　中纪委发布关于撤消刘愚平陕西省公路局党委副书记职务的通告，指出全党严禁动用公款请客送礼。

7月21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查处变相买卖、逃套国家外汇的案件。

7月31日　海南岛大量倒卖进口汽车等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已经查清，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海南区

党政主要负责人受到处分。

8月6日　中纪委发布关于黑龙江省北安市部分领导干部纵容、包庇子弟犯罪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通告。

8月9日　在河北省魏县查获九个省、市、自治区的20个医药经销部门非法出售国家明令淘汰药品的重大案件，中纪委、卫生部、河北省等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魏县，正的抓紧查处。

9月3日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彭真发表重要讲话藏人民对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

9月8日　全国省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29个省、自治区、市的党委书记、主席和市长均已确定。

9月16日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中共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叶剑英等64位老同志致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李井泉等37位老同志致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黄克诚等30位老同志致信中共十二届四中会全，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

9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就制订“七五”计划建议（草案）作说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

9月22日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增选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

9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邓小平、陈云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9月24日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顾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10月12日　全文发布《中罗联合新闻公报》。

10月25日　首都各界在政协礼堂集会，隆重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乌兰夫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趋势和民族愿望。

11月8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次；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在新的起点上再展宏图》。

11月14日　人大常委会委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外国人入境和我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草案。

11月16日　人大常委分组审议《民法通则》草案，认为制定民法通则有利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

11月24日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交流经验，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工作。

12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各地各部门组织实施全民普及法律常识规划；《人民日报》刊登中宣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摘要。

12月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出现的六个严重问题发出通知，要求改进作风，清除一切腐败现象。

12月14日　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中宣部、国家经委、全总联合表彰43个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中纪委要求省、市、自治区纪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厅通知精神，坚决纠正当前机关中的不正之风。

12月16日　北京严肃查处市煤气公司重大经济案，马学亮等9名领导干部被逮捕法办。

经　济

1月19日　邓小平会见以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祝贺广东核电站合同正式签字。

1月20日　华北油田天然气管线敷设到京，全长70公里，设计能力为日供气40万立方米。

1月24日　核工业部副部长赵宏宣布：秦山核电厂主厂房动工。

1月31日　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州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三个“三角”将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2月2日　百名优秀青年厂长（经理）在京受奖，其中10名被命名为“优秀青年企业家”。

2月5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优秀青年厂长、经理。

2月6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

2月7日　吕东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搞活大中型企业11条政策措施。

2月14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五项工作，围绕搞活企业安排今年经济工作；国家取消统购，实行议购议销，集体林区木材市场全部放开，林农收益将会大幅度提高。

2月16日　国务院就上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发出通知，改造振兴上海关系四化建设，国家给予上海必要支持，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援帮助，力争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技先进、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2月22日　石化总公司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初步显示经济实体优越性，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去年产值、税利，上交税利同步增长，实现税利名列各行业前茅。

2月25日　支持发展农村运输事业，国务院决定今年内销农村汽车7万多辆，70%售给运输合作组织，30%售给个体户或联户。

3月9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月10日　北京市召开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为适应进一步搞活经济的要求，北京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

3月1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田纪云在大连召开的东北三省粮食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千万不因一时“卖粮难”，就去限制粮食的生产。

3月31日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在京闭幕，李鹏到会指出：交通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行，鼓励全民、集体、个人共同办交通。

4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调整部分存款贷款利率。

4月4日　人大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和主席团成员会议听取关于去年信贷和预算执行问题的说明。

4月26日　为加快公路建设，稳定资金来源，国务院决定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

5月12日　实行利改税后急需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偷漏税情况严重，有关部门要求加强领导，严明纳税纪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5月29日　赵紫阳、万里先后参观了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称赞交易会办得好，通过技术市场把科研生产沟通了。

6月3日　国务院颁布中华人国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6月7日　中纪委发出通报，要求加强对物价监督检查，坚决制止乱涨价歪风。

6月20日　国家经委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集中精力抓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严格执行指令性计划及合同，保证上交税利和出口任务的完成。

6月24日　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全局出发，加强电冰箱行业管理，控制盲目引进，将现有的116个厂、点减少到41个。

6月26日　我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环境保护最好的炼钢厂——宝钢炼钢厂全部建成。

7月6日　宝钢一期工程基本结束。

7月12日　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和国家经委召开紧急会议，迅速解决进口钢材压港压船问题。

7月16日　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召开的11个城市蔬菜座谈会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田纪云强调，大中城市领导要过问“菜篮子”。

7月23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说，国务院决定，今年将在全国开展税收大检查。

8月7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强化税收工作，确保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8月13日　全国财政会议在京召开，王丙乾提出增收节支的7项措施。

8月25日　国务院通知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并开始施行。

8月28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计量法草案，建议通过施行《计量法》。

8月29日　人大常委会十二次分组审议《矿产源法》草案。

9月5日　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措施，防止借节日之机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

9月6日　国务院要求各地部门着眼全局，不再扩大今年基建投资规模。

9月7日　田纪云在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组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地、各部门抓紧抓好大检查工作。

9月15日　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投产。

10月4日　国务院发布《事业单位奖金暂行规定》。

10月19日　国家经委、计委和经贸部15日至19日在京联合召开“发展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工作会议”，李鹏说，中国将发展与东欧国家经济技术合作。

10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

11月1日　国家计量局宣布，我国目前使用的市制计量单位，将从1986年1月1日起逐步进行改革，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11月6日　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取得初步成果，查出违纪金额35亿元。

11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宏观管理措施，我国工业生产速度下半年起趋向正常。

11月12日　我国农村以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格局，改变了“集中劳动、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单一集体经济旧模式。

11月26日　宝钢一期工程举行投产仪式，赵紫阳为投产剪彩。

12月10日　我国市场紧俏轻工产品大幅度增产，24种主要产品产量提前完成计划。

12月11日　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进展顺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税物、财务、物价大检查要善始善终》。

12月24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六项关键设备研制成功，方毅、胡启立在京视察对撞机工程。

军　事

1月6日　沈阳军区党委、辽宁省委，以诚恳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消除“文革”影响，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2月18日　胡耀邦同杨尚昆、余秋里视察云南边防部队时谈我国一项重大决策，消除越南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威胁，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高度赞扬边防部队痛击来犯越军，向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2月23日　地方大专院校支援部队培养人才，辽宁同部队签订办学协议。

3月2日　中央军委发出命令，给在医学科学战线上取得突出成绩的姜泗长记二等功。

3月8日　云南边防部队对武装挑衅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清除入侵越军及其据点。

3月28日　应我方要求，南朝鲜在公海上把失去联系的我海军一艘鱼雷艇及全部人员交还我方。

3月31日　全军第二期整党工作集体会义结束，杨尚昆、余秋里指出，认识新情况、新特点、增强党性教育，从思想教育抓起，搞好部队精简整编，纠正新的不正之风。

6月9日　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老山参战单位个人荣誉称号；

6月10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100万；

7月6日　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结束。

7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爱护军队的良好风尚。

8月22日　杨尚昆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军队精简整编形式越好，工作越要扎实细致。

9月26日　全军高级领导层调整完毕。

10月11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参加云南老山地区对越南防御作战的侦察大队有功单位和个人荣誉称号。

10月29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征兵工作条例。

12月18日　杨尚昆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强调，端正党风要从高级干部做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京成立。

外　交

1月3日　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上午从巴黎抵达北京。

1月5日　赵紫阳会见哈里法，宾主对中科两国友好合作表示满意。

1月9日　外交部新联发言人透露，李先念主席将访问缅甸和泰国，赵紫阳总理将访问英国和联邦德国。

1月13日　由议长埃尔基·皮斯蒂宁率领的芬兰议会代表团抵京，对我国进行访问。

1月18日　赵紫阳致函尼雷尔，中国准备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粮食等。

1月23日　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军事挑衅和入侵活动。

2月13日　斐济和瓦努阿图遭受风灾，我国政府分别捐赠救灾款项。

2月17日　彭真委员长电贺各国议会联盟东南亚与西太平洋地区卫生与发展会议召开。

3月4日　李先念主席离开北京，前往缅甸、泰国进行访问，赵紫阳、乌兰夫、杨尚昆等到机场送行。

同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

同日　赵紫阳会见英国经济贸易代表团。

3月13日　李先念主席在曼谷举行答谢宴会，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应邀出席。

3月16日　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美国伊利诺斯州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他说，中美应多层次多渠道发展友好关系。

3月26日　李主席主持隆重仪式并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

4月3日　外次部新闻发言人重申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4月6日　英国女王签署法案将香港归还中国。

4月11日　胡耀邦同志应澳大利亚，新西兰、西萨摩亚、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五国政府的邀请，今天对五国开始进行正式访问。

4月14日　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访问中国。

4月20日　应日本国众、参两院议长的邀请，彭真委员长今天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9天的友好访问。

5月19日　斐济总理对我国正式访问。

5月21日　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埃亚内斯到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6月2日　赵紫阳总理访问英国。

7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首次全会在京举行。

7月22日　李先念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月25日　中央联合联络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伦敦结束，会议发表新闻公告。

9月4日　应赵紫阳邀请，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抵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9月11日　应李先念主席邀请，奥地利共和国总统基希施莱格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访问。

9月26日　卢森堡首相桑特抵京，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10月7日　应胡耀邦和李先念邀请，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到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10月21日　赵紫阳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访问南美四国。

文化体育

1月5日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下午胜利闭幕，通过新的作协章程、理事和顾问名单。

1月7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和《周恩来教育文选》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1月11日　国科院对自费出国留学作出新规定。

1月13日　在香港羽毛球公开锦标赛中，杨阳、韩爱萍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1月29日　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明日杂技节”比赛中，“狮子舞”和“顶碗”双获金奖。

2月9日　中国参加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代表团离京。

2月10日　“十佳”运动员评选揭晓，授奖大会在沪举行，李宁、郎平等10人当选。

3月15日　全国各类高等学校今年计划招生116万多人。中专、农中、职高将招生175万多人。

3月24日　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结束，赵剑华、韩爱萍分获男、女冠军。

4月2日　第38届世乒赛团体决赛我国男女队以5：0和3：0战胜对手双双蝉联冠军。

4月6日　支持教育，培育英才，霍英东向教育部提供100万美元作出国留学生奖学金。

4月7日　第3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降下帷幕，我国选手一共夺得6项冠军。

4月12日　中国女排夺得日本杯赛冠军。

4月28日　第六届世界杯跳水赛在上海结束，中国选手共夺得6枚金牌。

5月17～20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重要讲话，搞好体制改革，推动教育事业更加蓬勃发展。邓小平作了题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5月25日　胡耀邦指出艺术最重要的任务是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一切轻松活泼有益于增进人们身心健康的东西都要继续提倡。

5月26日　中日联合登山队登上纳木那尼峰。

6月16日　中国羽毛球队在第四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获三项冠军，三项亚军。

7月20日　西藏大学在拉萨正式成立。

7月31日　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级足球赛——第一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

9月7日　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万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表示热烈祝贺，倪志福致开幕词；

9月9日　赵紫阳前往北京一些大、中、小学，同广大师生员工一起欢庆教师节，赵紫阳在北师大庆祝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李鹏会见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谈话祝贺教师节。

11月11日　第2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结束，童非、李宁夺得3枚金牌。

11月20日　中国女子排球队获世界杯女排赛冠军，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四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女队；持续一年多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结束，中国队以8：7获胜。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6年

导 言

1986年可谓多事之秋。

10月7日，刘伯承元帅逝世；10月22日，叶剑英元帅与世长辞；12月28日，黄克诚大将离开人间。

这一年，其他辞世的知名人士有：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作家丁玲，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著名语言学家王力。

这一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正式颁布。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沈阳防爆器械厂正式破产倒闭。

这一年，几件大案震惊全国。先后有上海陈小蒙等的强奸案、首钢的赵剑云案、上海余铁民受贿案、云南特大贩毒案。

这一年，我国也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始投资立项；中国蝉联第10届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大陆、台港等地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

这一年，全国一些大学生由于对一些现实状况的不满，于年底举行了游行示威。

这一年，在对外关系上，与发达国家和平相处。印度政府却悍然侵我领土，并宣布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特大强奸流氓犯伏法
- ●王锡爵驾机返回大陆　两岸航空公司首次接触
- ●北京中院改判赵剑云案　首钢固执己见坚持错误
-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受贿被判无期徒刑
- ●首家破产企业倒闭记
- ●我国侦破特大过境贩毒案
- ●中国正式决定建设大亚湾核电站
- ●中国在第10届亚运会上蝉联金牌总数第一
- ●大陆、台湾等地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
- ●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 ●印度在我领土成立"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特大强奸流氓犯伏法

背景介绍

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均系上海市高干子弟，他们的职业也很令人羡慕。然而，他们却一味放纵自己，丧心病狂地进行强奸和流氓犯罪活动，共奸妇女51人。陈小蒙作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知法犯法，其所作所为与其职业构成强烈的反差。"多行不义必自毙"。1986年2月19日，这三名主犯及其他罪犯被依法处以极刑。

材料：

·强奸、流氓主犯陈小蒙等被枪决

材料　强奸、流氓主犯陈小蒙等被枪决

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当众宣布了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丧心病狂地进行强奸和流氓犯罪活动的3名主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的罪行，宣读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这3名罪犯执行死刑的命令。并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以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为主犯的强奸、流氓案，共有6名罪犯，他们是：陈小蒙，男，36岁，蒙古族，安徽省巢县人，原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男，30岁，汉族，江西省吉安县人，原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社记者。葛志文，男，24岁，回族，江苏省江都县人，原系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男，原中国民航一〇二厂工人。陈丹广，男，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男，原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这6名罪犯都是干部子弟，其中有的还是高级干部子弟。他们有恃无恐，自1981～1984年的3年时间里，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黑灯舞，贴面舞和帮助工作等为幌子，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强奸、奸淫、猥亵犯罪活动，被他们糟踏过的职员、教师、护士、演员、大学生等青年妇女有51人。其中陈小蒙轮奸妇女2名，强奸妇女2名（其中1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1名（未遂），并奸淫妇女13名，猥亵妇女5名；胡晓阳轮奸妇女1名，强奸妇女3名（其中1名未遂），奸淫妇女12名，猥亵妇女10名；葛志文轮奸妇女2名，奸淫妇女8名，并诱骗10多名妇女供同案犯强奸、奸淫和猥亵；陈冰郎轮奸妇女1名，强奸妇女1名（未遂），奸淫妇女7名，猥亵妇女1名；陈丹广奸淫妇女2名，猥亵妇女1名并多次提供犯罪活动场所；康也非奸淫妇女4名。这伙罪犯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对社会危害极大。

1985年10月1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11月4～9日进行了审理。1986年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陈小蒙、胡晓阳和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陈冰郎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以流氓罪处汇陈丹广有期徒刑5年；以流氓罪判处康也非有期徒刑3年。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陈冰郎和陈丹广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驳回上诉。

王锡爵驾机返回大陆 两岸航空公司首次接触

背景介绍

台湾华航波音 747 货机机长王锡爵于 5 月 3 日驾机返回祖国大陆，受到热烈欢迎。中国民航两次致电台湾华航，提出商谈有关事宜。5 月 17 日，两岩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首次接触，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材料：

- 从台湾驾机飞回祖国大陆的王锡爵飞抵北京
- 华航货机事件始末

材料一　从台湾驾机飞回祖国大陆的王锡爵飞抵北京

驾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 747 货机飞回祖国大陆定居的王锡爵机长，5 月 6 日上午驾驶这架飞机从广州飞抵北京。

王锡爵机长驾驶着这架货机上午八点四十九分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在祖国大陆蓝天翱翔两个多小时后，十一时零七分在首都机场着陆。身穿台湾"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先生走下飞机时，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他回祖国大陆定居。在欢迎的人群中，王锡爵见到了他久别的父亲王伯熙和三个弟弟王明安、王平安、王锡寿。他握着父亲的手，激动地说："你们也来了！"王伯熙告诉他："我们是昨天从四川赶来的。"

王锡爵手捧鲜花，走向话筒，对前来欢迎的人们以及一百多中外记者说："谢谢大家的欢迎！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他说："祖国提倡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友。希望海峡两岸统一尽早实现。"

胡逸洲局长也讲了话。他说："王先生的行动，充分表达了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再次说明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以到进一步和平统一祖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次到达广州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先生。我们主张'三通'、来去自由，对他们，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

胡逸洲说："中国民用航空局已发电邀请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飞机、货物及其他人员的处理问题。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好。"他在讲话中欢迎王锡爵到四川老家和各地去看看，欢迎他为发展祖国的民航事业和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今年八十二岁的王伯熙在机场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天见到了大儿锡爵我很高兴，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父子能见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好。我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希望锡爵将来要多为祖国作贡献。"

中午，胡逸洲局长宴请了王锡爵和他的亲属。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月 6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 747 货机机长王锡爵和他的父亲王伯熙，弟弟王明安、王平安、王锡寿。

材料二　华航货机事件始末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 747 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飞回祖国大陆，于 5 月 3 日 15:10 时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 2 人以及货物 22 万磅。王锡爵本人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飞机降落几小时后，中国民用航空局电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及其他人员的处理问题。10 日，中国民航局再次致电台湾华航，请他们尽快派人办理接回 747 货机及人员的事宜。电报强调，"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到北京来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但截至 12 日，台湾当局在处理此事时仍顽固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拒绝与我直接谈判。台湾当局这种僵化态度和作法，激起了台湾内部的不满。13 日，在当局的授意下，台湾华航同意与中国民航在香港进行会谈。17、18 日上午，中国民航代表同台湾华航的代表在香港就交接华航波音 747 货机、两名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进行了商谈。20 日下午，双方代表就在香港交接货机、两名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会谈纪要。23 日上午，中国民航和台湾华航在香港顺利完成交接，双方代表在启德机场签署交接书。华航货机事件和两航就此举行的商谈，受到台湾岛内外极大的重视与关注。台湾《中国时报》社论中说，华航能派人与中航"洽商有关交还 B—198 号波音 747 货机机员、飞机和机上货物手续事宜"，"显然是一项重大突破"，"深具意义"。旅美学者丘宏达亦认为，"就中共而言"，此次谈判已使其"成功的突破"台湾所坚持的"不接触原则，并为其步步为营的统战技术，扫除了初步障碍"。台湾立法委员江鹏坚说，国民党的"三不政策"中，"'不接触'较难坚持，目前已出现探亲、通信、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接触，导致政策与实际间出现矛

盾”。如今当局“决定由华航在香港与中共民航当局进行洽谈，看起来是一小步，但事实上在政策的转变上，却是一大步”。还有一些“立法委员”在质询及谈话中，要求台湾当局“在更多层面有所突破”，“三不政策应”当“重估”和“打破”。

北京中院改判赵剑云案　首钢固执己见坚持错误

背景介绍

1985年，我国的一些体制改革尚未进行彻底。首钢的高级工程师赵剑云和几名同事因业余时间从事技术服务，收取一万元报酬，被判“诈骗罪”，于85年11月被石景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86年5月17日，在赵剑云等人的申诉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纠正了石景山区院的错判，公开宣判赵剑云无罪。然而，首钢有关部门却置法律于不顾，不仅不予平反，而且维持原处分决定。这情况，引起民中央和北京市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

材料：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赵剑云无罪　首钢固执己见坚持错误处分

材料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赵剑云无罪　首钢固执已见坚持错误处分

在首都钢铁公司，许多人都在关注着一位工程师和他的“同伙们”变幻不定的命运。这位工程师是赵剑云。

1985年11月29日，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赵剑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赃款”一万元被没收。

1986年2月29日，首钢纪委批复特钢党委的报告，开除赵剑云党籍，并建议行政上给予留厂察看一年处分。浮动工资和奖金等一律被取消。几个合作的科技人员，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上，也受到了影响。

1986年5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纠正了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错判，宣判赵剑云无罪，并撤销了一审判决。

然而，一起在法律部门已经终结的案件，在首钢却没有终结，反而引起了新的波澜……

政策与执行政策

赵剑云为何蒙受此不白之冤？事情就出在业余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上。

1985年初，石景山区政府的领导同志，请来了包括赵剑云在内的首钢特钢公司的几位工程师，希望他们能利用业余时间为区办企业的技术改造献策献力。其时，中央关于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公布，其中明确提出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可以从事技术咨询和服务，收取的报酬归已。中央的政策和石景山区政府的期望，使赵剑云等人深受鼓舞，于是，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为石景山区房管局综合修理所进行技术服务的活动之中，几个月的时间里，帮助该所研究了农村预制组合房屋、组合钢板暖气片和两用取暖炉等；同时，还帮助修理所改造电源系统，增加容量。他们为综合修理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共有十二项。一切顺利，看来这些工程师并不像是骗子。但是，没想到一台电弧炼钢炉，却把赵剑云打翻了。

事情很简单：河南省安阳市第一机修厂急需一台一点五吨电弧炼钢炉，沈阳低压开关厂有一台同类型号的电炉，闲置多年，已经报请上级部门批准报废处理。赵剑云把这双方的信息告诉综合修理所所长李洪斌，并建议由综合修理所出钱购买，由赵剑云等几位工程师在检修、配套、更换部件方面提供技术服务，然后卖给安阳。经李洪斌请示房管局领导批准后，事情就这样做了。结果是综合修理所以六万多元买进，检修合格之后以十三万元价格卖给河南安阳市第一机修厂。赵剑云从综合修理所收取两万元技术服务费，其中一万元按原协议付给提供信息和合作服务的沈阳方面有关单位的技术人员，另一万元作为在京参加技术服务的人员的报酬。

所谓“诈骗罪，”指的就是这两万元中的一万元。

两万元确有其事。第一，其中一万元是沈阳方面参与合作的技术人员提出的；第二，另一万元作为技术服务的报酬，是赵剑云等几位工程师共同商量过的，参加分配的共有二十多人；第三，这两万元开支，是经综合修理所所长李洪斌报请石景山区房管局领导批准了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赵剑云和几位工程师因业余技术服务而收取了一万元的服务费，是否允许？是否就是犯罪？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赵剑云等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沈阳低压开关厂的报废电炉，是该厂十几年前购进的，由于一直未能安装，散放现场保管不善，一些部件锈蚀损坏。后经上级部门批准，作价处理给综合修理所，所得六万七千元上交了国库。河南安阳市第一机修厂当时急需电炉建炼钢车间，而购新电炉要花十七万元，并搭配

二十吨钢材指标，还得等一年之久。石景山区房管局综合修理所是个长期亏损单位，全所工人在赵剑云等科技人员的帮助下，加工修理好这台电炉，也取得了三万余元的利润。这是一起三方得利的好事，对国家、集体和社会也有利而无害，何罪之有？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已将收的一万元还给了赵剑云等人，就是一个证明。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力主真理和正义，纠正了一起错案，支持了改革，保护了科技人员的正当权益，使本案在法律上得到圆满解决。

法律与权力

照理说，赵剑云的所在单位首钢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法律，执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撤销赵剑云因一审误判而被开除党籍、取消浮动工资和奖金等处分。遗憾的是，首钢有关部门于法律之外另立章程，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赵剑云无罪后，一直不予平反，反而在三个月之后，提出一份重新审查的“汇报材料”，其中明确指出：“赵剑云所犯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决定维持原处分决定，赵剑云所在党支部大会绝大多数党员认为赵剑云申诉无理，维持原处分决定。”

9月10日，首钢有关部门又下发了向全体党员“交底”的《赵剑云的错误事实》的材料，“以期统一认识，增强辨别能力”。这种用词和做法，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交底材料”中仍然指控赵剑云“背着组织打着技术咨询服务的幌子搞不正当经济活动，以一系列欺骗手段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这难道是党章所允许的吗！当真能说是无罪也无过吗？”

很显然，在基本观点和对事实的认定上，首钢有关部门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查和终审判决，仍坚持被纠正了的原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此证明，原来对赵剑云所作的一切决定也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需要改正之处。

国家法律，在首钢那里宣告无效了。

这样做对吗？

（10月29日《人民日报》）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受贿被判无期徒刑

背景介绍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我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被“糖衣炮弹”击中了，而且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身为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的余铁民，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市里领导人的名义，为向其行贿的港商大开方便之门，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材料：

-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因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材料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因受贿罪判处无期待刑

原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从中收取价值三万多元的贿赂，最近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部分财产。他受贿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

余铁民，现年五十四岁。1984年9月下旬，当一名港商与上海市外贸总公司洽谈向上海出口钢坯的业务时，余铁民按照这名港商的要求，多次要求市外贸总公司在价格上给这名港商以照顾。结果，成交的钢坯每吨价格比原报价提高，使市外贸总公司为此蒙受很大损失。在上述活动中，余铁民收受这名港商贿赂计人民币四千元、外汇兑换券三百元、港币三千三百八十元，以及呢衣料等价值人民币一百四十四元的物品。市委办公厅发现余铁民有受贿行为后，于1985年3月责令他交待问题，他不仅拒不交待，而且在同年6月又收受这名港商的贿赂人民币两万元。

1983年夏天，余铁民应另一名港商的要求，把这名港商介绍给上海市外贸部门的负责人，要外贸部门对这名港商的贸易活动给予照顾，后来又多次打招呼，让外贸部门不要减少拨给这名港商的腈纶衫出口配额。1983年5月，余铁民还利用职权、并假借市委领导同志的名义，要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人“亲自督办”，为这名港商的岳父分了一套住房。1984年初，这名港商为了让已被他拉拢腐蚀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针织品分公司副科长陆为群能更方便地为他谋利，要余铁民向外贸部门施加影响，推荐陆为群提任科长。余铁民也照办。余铁民从这些活动中共收受这名港商贿赂计人民币一千四百元、外汇兑换券四百元以及照相机、呢衣料等价值人民币七百多元的物品。

在1981年至1984年期间，余铁民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为四名申请出境的人批转信件，或电话催办，并授意其中三人给市委主要领导人写信，然后，余铁民假借领导名义，把信件批转给市有关部门办理。余铁民从中收受了这四人价值人民币二千一百多元的财物。

余铁民在受审查期间，为了掩盖罪行，于去年9月指使他的妻子、原上海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

王佩玲把绝大部分款赃物转移到北京亲友家藏匿。去年12月，余铁民被责令停职检查后，还反诬这是有人对他"下毒手"。

上海市公安、检察机关对余铁民等人的犯罪活动进行了周密细致的侦查，掌握了确凿、充分的证据。余铁民、陆为群、王佩玲和两名港商于今年3月至5月被依法逮捕归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于1986年5月29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6月9日到13日进行了公开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检察员到庭支持公诉。上海市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律事务所和南市区律师事务所的十名律师出庭为余铁民、陆为群和两名港商辩护。王佩玲没有委托辩护人，也不要法院指定辩护人。在法庭上，好自己依法行使辩护权。

6月24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布判决，认定余铁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从中收受贿赂，已构成受贿罪。他受贿的数额巨大，作案手段恶劣，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情节特别严重，决定依法以受贿罪判处余铁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部分财产。受贿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

陆为群在1983年5月至1985年8月期间，在与港商进行贸易中，利用职权为港商谋取利益，从中受贿的钱物总价值为人民币一万二千九百余元，被依法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部分财产。受贿赃款赃物予以没收。两名港商犯有行贿罪，被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和六个月。王佩玲犯有窝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余铁民、陆为群和一名港商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确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无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各项原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7月8日开庭，宣布了这项终审裁定。

（新华社讯，7月9日《人民日报》）

首家破产企业倒闭记

背景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有企业一直在国家的帮助下生产。"大锅饭"、"铁饭碗"成为一些企业生产状况不好的直接原因。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倒闭，给那些仍在搞大锅饭的工厂当头棒喝：市场不让人，效益不白来。该进行彻底的改革了。同年十二日，六届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通过《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

材料：

·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

材料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时刻，8月3日上午9时整，在沈阳一间会议室里，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王刚沮丧地把该厂的营业执照交还给工商管理部门，至些，这家连续亏损、常年靠借债为生的市属集体企业，正式破产倒闭了。

此时此刻，该厂的这位最后一任厂长心情十分沉重，他说，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但愿人们从我们的破产倒闭中汲取教益。沈阳市政府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企业破产后的职工作待业处理，待业期间，由政府发给生活救济金。

记者于当天上午来到防爆器械厂，只见大门紧闭，车间上锁，帐目封存，一切财产等待处理，在厂供销办公室，记者见到当年创办该厂的老工人宋玉珠，不无忧伤地说："想不到我们一把水一把泥建起来的这个厂子，被'大锅饭'折腾到这个地步"这位老工人满含热泪地告诉记者：这个厂子是1965年办起的，大家越干越红火，厂里年年有积累，可是到了1979年，厂子上收到市里后，人人都端上了"铁饭碗"，干部得捞就捞，工人能少干就少干，慢慢地，企业由盈转亏，由亏损到借债，债主多到240家，欠债50多万元，等于全厂家底的10倍。

破产倒闭，给那些长期只包盈不包亏的"不倒翁"企业，敲响了警钟。对此，人们议论纷纷，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令人震惊，发人深省"。去年和防爆器械厂一起被"黄牌"警告的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说：以前，没想到企业会倒闭，工人会失业。现在，这些都成了现实。这说明，改革到了今天，是动真格的了。

（1986年8月4日《辽宁日报》）

我国侦破特大过境贩毒案

背景介绍

由于国际缉毒工作的全面展开，一些国际贩毒渠道被堵塞。于是，国际贩毒分子便把中国大陆作为他们的"生命线"……

材料：

· 云南侦破特大过境贩毒案

材料　云南侦破特大过境贩毒案

云南省公安机关于1986年8月16日破获一起自泰国到香港，经由昆明、广州过境的特大贩毒案。贩毒分子温源和（泰国籍人）、戴文煊、余锡宽（两人均为香港居民）已在昆明市被依法逮捕，他们贩运的海洛因22768克被当场缴获。

温源和，男，60岁。长期从事国际贩毒犯罪活动。在这次贩毒活动中，他从泰国3次潜入昆明市，组织、监督毒品的交接活动。戴文煊，男，35岁，在香港以赌博、贩毒为业，1983年7月与泰国贩毒分子结识。余锡宽，男，32岁，是戴文煊贩毒活动的帮手。在这次贩毒活动中，温源和负责与卖主成交，戴、余二犯负责接运毒品，共同策划由泰国贩运海洛因经昆明、广州转运香港。8月16日下午6时许，戴、余二犯到昆明火车站接收毒品时，被张网以待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缴获了全部毒品。当晚在昆明一家旅社将温源和抓获。

该案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温源和死刑；判处戴文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从犯余锡宽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温源和、戴文煊的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987年2月17日执行。

公安、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的侦破和审理，给了敢于向中国渗透的贩毒分子以有力打击。

（邢珍）

中国正式决定建设大亚湾核电站

背景介绍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广东等地的用电严重紧张。为了缓解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决定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以解决广东、香港等地供电问题，从而促进两地的经济建设。

材料：

· 中法英三国有关银行和公司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大亚湾核电站贷款协议等七个文件

材料　中法英三国有关银行和公司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大亚湾核电站贷款协议等七个文件

有关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贷款协议的供货合同等七个文件9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签字。

这些文件是中国银行与法国七家银行的贷款协议、中国银行与英国十家银行的贷款协议、中国银行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的项目贷款协议、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法国法马通公司核岛设备供应合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法国法马通公司核燃料组件供应合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常规岛设备供应合同、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公司工程服务合同。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席了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全国，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法国和英国的驻华使节，上述法英两国银行和公司的有关负责人等。

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副行长杨惠求和七家法国银行、十家英国银行以及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上述三个贷款协议。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昝云龙和法国法马通公司、英国通用电器公司以及法国电力公司的负责人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三个设备供应合同和一个工程服务合同。

签字仪式是下午五点开始的。延续半个多小时的签字仪式结束时，人们热烈鼓掌，互相举杯祝贺。

大亚湾核电站场地准备工程从1984年4月开始。核电站建成后将为广东和香港供电，这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东的经济建设将起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讯，9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国在第10届亚运会上蝉联金牌总数第一

背景介绍

中国自参加亚运会以来，连续几届获得优异成绩。这次，在汉城第1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蝉联金牌总数第一，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作为亚洲体育大国的基础，形成了亚洲体坛上“中、日、韩”三强鼎立的局面。中国健儿的出色表演，也为我国在1990年举办第11届亚运会树立了良好形象。

材料：

· 第10届亚洲运动会

材料 第10届亚洲运动会

1986年9月20日至10月5日，第10届亚洲运动会在南朝鲜汉城举行。2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4870人(其中运动员3345名)参加了这一亚洲体育盛会。比赛共设25个项目，269个单项，超过历届亚运动。

经过半个月的比赛，22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了奖牌，1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获得金牌。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阿曼首次获得奖牌，卡塔尔和巴林首次获得金牌。中国蝉联金牌总数第一。本届亚运会由于南朝鲜的崛起，出现了中国、南朝鲜、日本三强竞争的新格局，三家共获金牌245枚，占91%，其余25枚由10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三强共获银牌213八，占银牌总数的79%；铜牌也被三强占有64%。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名次，面比较宽。在这届亚运会上，各国选手共3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2次平2项世界纪录，97次打破47项亚洲纪录，223次打破85项亚运会记录。在过去的4年中，亚洲体育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亚运会期间，中国奥委会和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于9月28日在汉城举行招待会，热情款待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亚奥理事会会议、亚洲单项体育组织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第10届亚运会各代表团团长。国际奥委会执委、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何振梁，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分别发表讲话，对亚洲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及其运动员准备参加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表示热烈欢迎。何振梁说：我们希望下届亚运会时，亚洲体育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

(从文)

大陆、台港等地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

背景介绍

1986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作为国父，孙先生受到了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广泛尊敬。11月12日，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相继举行集会隆重纪念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材料：

- 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

材料 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

198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1985年10月4日全国政协六届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届时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11月1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海内外来宾和首都各界人士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胡启立、陈慕华、陈丕显、王兆国参加了纪念大会。邓颖超主持大会。她说，纪念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共同缅怀他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要学习他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贡献毕生精力的革命精神。彭真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始终对孙中山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彭真指出，孙中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能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努力站在时代的前列。孙中山追求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孙中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思想和主张，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精神遗产，成为激励我们全民族继续前进的力量。彭真强调指出，孙中山一贯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今天，台湾同祖国大陆仍然令人痛心地处于分离状态，尽早结束这种不幸局面，实现祖国统一，已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民革中央代主席屈武、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周谷城，民族宗教界代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台湾同胞代表林丽韫，在讲话中都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思想品德，呼吁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携起手来，早日结束祖国分裂的局面，共同为建设一个孙中山毕生所追求的繁荣、民主、统一、强盛的中国而奋斗。日本朋友、宫崎家族的代表宫崎，在回顾祖父宫崎滔天和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情谊后，希望中日两国人民都象先辈那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英代表孙氏亲属对邀请他们参加这个盛会表示由衷的感激，希望同胞们，为建设一个强大、统一、先进的新中国，像孙中山那样，大公无私地努力奋斗。参加纪念大会的还有中顾委、中纪委、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的领导人；黄文欢同志以及应邀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孙中山先生的亲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国际友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各界知名人士，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各国驻华使节和在京记者。大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了参加活动的孙中山先生的亲属和海内外来宾。

为纪念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各地纷纷举行纪念大会，开展纪念活动。11 月 11～12 日，上海市、江苏省暨南京市、广东省、武汉、福州、太原等地各界人士举行了纪念大会。11 月 8 日，民革中央 150 多人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敬谒孙中山衣冠冢。11 月 11 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展在北京开幕，乌兰夫等出席了开幕式。

11 月 10 日下午，在京的 100 余名民革中央委员在北京铁狮子胡同 11 号(现张自忠路 23 号)举行了晋谒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仪式。

铁狮子胡同 11 号宅共有房 37 间，原为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私人房产。1925 年 2 月 18 日孙中山先生从北京协和医院治病出院后，曾在这里养病，直到 3 月 12 日 9 时 25 分逝世。临终前，孙中山先生曾在病榻上亲笔签署了 3 份遗书。现在 3 份遗书手迹仍保存在这里。

11 月 12 日，首都举行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一尊身高 3.4 米的铜像座落在北京中山公园广场，由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17 个大字，雕刻在花岗岩基座正面；上海各界人瞻仰孙中山故居；武汉、澳门举办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上海举办纪念孙中山邮标钱币展览；香港举办“孙中山先生墨迹展”。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各界举行各项活动，纪念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台北市各界 400 多人 11 月 12 日举行纪念会，“行政院长”俞国华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台中市、高雄市等地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一项名“国父领导革命建国史绩大展”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开幕。

11 月 4 日，在广州召开主题为《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民主德国、朝鲜、日本、菲律宾、苏联、美国、中国和香港地区的学者 139 人出席了讨论会。11 月 11 日，民革中央于北京举行了孙中山学术研究讨论会。从 11 月初起，许多知名人士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邮电部于 11 月 8 日发行一套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纪念邮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南京 5 大城市先期上映纪念中山的影片。

（周尚文　李清池　施鹏飞）

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背景介绍

1986 年底，全国高校集中的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党内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次学潮，反映了大学生们的良好愿望，但他们的作法是不妥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材料：

- 何东昌谈部分学生上街游行
- 上海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杨巍徒刑

材料一　何东昌谈部分学生上街游行

1986 年 11、12 月间，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引起各界群众的关注和不安。他们热切希望学生们以安定团结的大局为重，牢记四项基本原则，不忘自己为中华腾飞刻苦学习的责任。

《人民日报》于 12 月 23 日、25 日、29 日分别发表了题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北京日报》于 12 月 29 日发表了《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12 月 30 日下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部分城市一些高等院校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何东昌说，最近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 200 万人，参加游行的只占大学生总数的 1、2%，许多人是围观的。参加游行的主要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关心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大多数没有明确的目的与要求。参加游行的绝大多数学生是热爱祖国、支持改革，愿意为振兴中华而努力的，他们希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更快些。何东昌说，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的党中央和政府，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代表了 10 亿人的共同原望，但这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不受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限制，人民实行民主权利也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何东昌说，我们也发现极少数人有违犯宪法的言论和行动，他们想利用学生的热情。我们是把这些极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学生区别开来的。

何东昌指出，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经济方面协调和

稳定地增长已经持续了8年。政治形势也是很好的，全国安定团结。发生学生游行的事情，我们要重视，但并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有记者问到有无学生因参加游行被捕的问题。何东昌说，我可以负责地讲，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因为贴大字报和游行而被逮捕。确实有些人混在学生中间扰乱社会秩序，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上海、南京等地出现了汽车被推翻和其他违犯治安规定的问题，这些行为触犯了法律，所以有些人被拘留，但是这样的事没有一件是学生干的。

有记者提出，学生游行是否反映了对学生思想教育不够。何东昌表示同意。他说，参加游行的大部分是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懂得不多，对外国了解不够。我们认为，确有一部学生受了错误思潮影响，就是他们要照搬西方的民主，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宪法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将成为一盘散沙，便会混乱。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人民不会同意再有动乱。不少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时还年幼，要告诉他们经验、这些教训。

他说，青年学生是新中国的儿女，我们是爱护他们的，要教育引导他们，让他们接触实际，了解社会。

（华世俊）

材料二　上海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杨巍徒刑

杨巍，男，32岁，被捕前曾经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1983年8月前往美国留学。1985年夏季，他在美国参加了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政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并用"李标"、"桑兰"等笔名，在这个反动组织主办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上，多次发表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文章。1986年5月，杨巍回到上海。年底在上海部分高等学校少数学生闹事之机，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处，收集学生闹事情况，写成材料后托人秘密投送"中国民联"总部，以提供被歪曲的事实和造谣诬蔑的材料。1986年12月22日，杨巍以"中国民联"（中国之春）名义在复旦大学内张贴反动标语。杨巍还将"中国民联"的反动纲领写成传单，准备散发，后因被公安机关及时破获而未遂。上海市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掌握了杨巍的犯罪事实后，报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将杨巍依法逮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依法逮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依法对杨巍提起公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于1987年12月21日对杨巍反革命宣传煽动案进行公开审理。法庭确认杨蓄意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犯罪事实，有查获的反动标语、传单和信件、文稿，有证人证言和笔迹鉴定等证据，证明属实，证据确凿。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和第52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杨巍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杨民）

印度在我领土成立"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背景介绍

1914年，英国殖民者炮制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此作为中印边境。1947年到1954年，印度不顾中国反对，向北侵占我大片领土，一直扩展至"麦克马洪线"。1986年12月8日、9日，印度国会通过法案，将侵占我国的领土设为所谓"阿鲁纳恰尔邦"。1987年4月，印度政府又集结军队，入侵我国领土。

材料：

· 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的由来

材料　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的由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86年12月11日就印度将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一事发表谈话后，有读者询问，印度炮制的"阿鲁纳恰尔邦"是怎么回事？现答复如下：

中国和印度边界全长约二千公里，从未正式划定。但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范围，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

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这条传统习惯边界的东段大体沿着喜马拉雅山脉麓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印度之前，中印边境地区一向相安无事。

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包括门隅、洛渝、下察隅三个部分，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是藏族或是同藏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民族。西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门隅。该地区大部分地名以藏语命名。从中国明代以后，西藏地方当局曾在上述三个地区设置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行使司法权力。

1914年，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者在西姆拉会议之外

秘密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企图把这一地区约九万平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直到1936年,殖民主义者才首次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未标定界"画在英印地图上。1938年,它又篡改了《印度与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中有关西姆拉会议的记述,把会议没有讨论过的所谓"印藏边界"问题,硬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谈判"。

尽管如此,在长时间内殖民主义者一直没有敢越过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派兵越界侵占了中国西藏的一小部分地区。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而且又向北推进,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继续这种侵占行径,至1953年前后将其控制逐渐扩展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54年,印度当局在非法占领的这块中国领土上成立了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把"麦克马洪线"标为中印边界东段"已定界"。1972年印度又将该特区改为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

中国从不承认印度在非法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或"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印度的这一做法,又一次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印度议会通过的这一法案完全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众所周知,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在历史上,按照中印双方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为两国人民所尊重的传统习惯边界。1914年殖民主义者在统治印度期间一手炮制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

风云人物

叶剑英

叶剑英(1897—1986)。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与世长辞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叶剑英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兢兢业业,英勇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

刘伯承

刘伯承(1892—1986)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刘伯承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优良品德将永远彪炳史册。

刘伯承同志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他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的刘伯承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他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1924年起,他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刘伯承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一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他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

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他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为全军开路。接着，率红军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同志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役，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他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他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现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他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占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他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他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挺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困，与、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他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刘伯承同志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过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设，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城，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刘伯承同志出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他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他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他一贯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重视合同作战的训练，在军事学院陆续开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中级军事指挥员，并为后来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他十分关注国防建设事业，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进行调查研究，从未来反侵略的战场准备，到单兵负荷的减轻，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考虑。他提出的许多战略性的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伯承同志是党的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连任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党乱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虽然身患重病，仍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刘伯承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新华社讯，10月17日《人民日报》）

王　力

王力（1900—198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和翻译家，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王力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6年5月3日上午九时三十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王力教授，字了一，1900年生，广西博白人。幼年家境贫寒，刻苦自学。1924年经亲友资助，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第二年转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留学法国，1931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任教，并曾任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等职。

王力教授在五十多年的学术活动中，写了近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种，论文近二百篇。他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三十年代写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中国音韵学》，四十年代写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六十年代写的《中国语言学史》和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著作，涉及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大都具有开创的性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不少著作被译成日、英、法、俄、捷克等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种种摧残迫害，但只要有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坚持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同源字典》。他说：“一息尚存，研究工作就不能停止！”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心情舒畅，耋耋之年，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对《汉语史稿》进行了全面修订。他表示：“要用我的余生把我知道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子孙后代，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李　远　哲

李远哲（1936—　）美籍华人，是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他是继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籍华人。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项奖金的原籍为台湾省的科学家。

这位化学家，现在是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同时，他还接受了两岸的聘请，担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的名誉教授。又是台湾研究院的院士。从1978年以来，李远哲曾6次来中国大陆。在北京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室中。李远哲1936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在台获硕士学位后，于1962年赴美国深造，不久获博士学位。1974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由于在他在科研上取得卓越成就，1979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初，他获得了由里根总统亲自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界最高荣誉奖—国家科学技术奖章。此外，他还获得了美国化学会最杰出的物理化学纪念奖。

这次李远哲获奖，是由于他对交叉分子束方法的研究，对了解化合物相互反应的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突破，为化学动力学开避了新领域。分子束是一门新学问，近20年来才试验成功。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86年，中国文坛一片沉寂。在小说创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传世之作。

报告文学却一枝独秀。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记叙了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党、政府和人民在抗震救灾

中的悲壮事迹……

电影创作方面，谢晋导演、刘晓庆主演的《芙蓉镇》震动了中国影坛。《芙蓉镇》描写了文革中扭曲的人性，善良的人们，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颤。

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

作者：钱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中国河北省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点八级大地震，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二十四万余人在这场灾难中毙命，十六万余人被砸成重伤，全市百分之九十六的房屋倒塌，可直接计算的经济损失达三十亿元。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震后三个多小时，当国务院得知地震的确切消息后，立即着手组织救灾。当日，就从全国各地调来十万救灾部队，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因陋就简，就地抢救伤员。来不及抢救的十多万名重伤员，被及时转送到全国十一个省市。解放军数万官兵用自己的双手，扒开废墟，救出被压在废墟下的群众一万多人。唐山市幸免遇难的同胞也展开紧张的自救。被埋在废墟下的蒙难者，他们渴望生存，仍在奇迹般地坚持着。他们或靠喝葡萄糖盐水，或靠喝地心水和自己的尿，维持生命最长者达十五天之久，在人类生命史上创造了奇迹。

在这场惨重的自然灾害中，一部分人的灵魂重新经受了检验：此时居位在唐山的几十名外宾被中国的普通百姓从废墟中救出，立即又投入救人的行列；在看守所关押的犯人主动请求组成救灾队伍，在废墟上奋力抢救普通人的性命；精神病院的领导遇难，一名普通医护人员主动挑起救护精神病患者的生命安全的重担；盲人居住区的残疾人组成一支奇异的队伍，他们摸索着救出自己的同伴，然后背起从废墟里扒出的残破了的乐器，用他们音调不准的合奏去宣传、去鼓舞唐山人民的抗震救灾。

但是，在生活的另一方，人们也看到了大灾难中罪恶能的释放。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三日一周内，唐山废墟上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抢劫风潮。成百上千的灾民在废墟上奔跑，疯狂地抢劫食物、衣料、药材、现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立即派专家前来协助维持治安，靠警察、民兵和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制止了抢劫风潮。

震后对唐山威胁最大的是瘟疫。二十四万具尸体正在腐烂，粪便、呕吐物堆积，令人窒息的臭气弥漫在整个市区。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日趋上升。中央抗震救灾小组采取紧急措施，从全国调来防疫队和消毒药品、器械，飞机和各种喷洒机车昼夜不停的喷洒药物。解放军战士承担了最险恶、最繁重的埋尸工作，他们终于赶在瘟疫前头，掩埋了数万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使唐山成功地推开了瘟疫！

面对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失的自然灾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美、英、日等友好国家，纷纷打电报表示愿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但是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一切外援。而在清理废墟下的银行金库时，解放军战士可以为了二分硬币而置生命于不顾。这种发生在“政治的一九七六年”的“超人”精神，历史不知将作何解释与评价。

在震后的唐山，境遇最为难堪的，莫过于国家地震局的地震测报工作者了。他们在废墟上没日没夜地工作，灾民们却报以雨点般的石块、唾沫和脏话，好像唐山的毁灭、二十四万生灵活的惨死，全是他们的过错。的确，对于一场毁灭性强震没有作出任何临震予报，是够被动的了。然而，这并不是地震工作者的失职。我国的地震测报队伍自从建立以来，曾成功地对一九六六年邢台六级地震和一九七五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作出临震予报。对唐山大地震，早在十年前就引起了注意，并成功地作出了中期予报。仅震前头年时间里，他们就对京、津、唐一带的震情调查分析达十七次之多。可是，由于我们的测报队伍还很年轻，地震的奥秘还没有被真正掌握，再加上当时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技术的种种原因，终于未能战胜这个潜藏十年之久的恶魔。

唐山毁灭了，地震工作者的艰苦劳动与不懈努力不应跟着被一笔抹煞。历史将记着这些“失败的搏斗者”。在自然科学的浩瀚大海里，人类经过一代代“失败的搏斗者”的艰苦探索，总有一天会彻底掌握地震的奥秘的。

诗歌《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作者　北岛）

诗歌《风流鸟：鸽子》

从铜版和大理石上起飞
啄食广岛和长崎的
泪水，啄食红豆
雪白雪白的云团，遮住
硝烟。遮住 1939

鸽哨、宣言和祈祷
和谐的三重奏
覆盖溅血的火光，覆盖
仇恨和呻吟、演奏
和平。演奏 1986

鸽子，今天这样顽强
在烧红的炮筒上，栖息
也不会烫伤
墨西哥炽热的六月
在疯狂的足球和鞋钉
之间，也有鸽子徜徉

世界流行蝙蝠衫
也会流行鸽子外套
鸽子大褂
一边思考"星球大战"计划
一边——千万别忘了
用宁静慈祥的绿油漆
把门前的鸽子笼粉刷

刺刀和舌头都能栽种鸽子花
1986，毕加索的鸽子——涨价

（作者　边国政）

电影《芙蓉镇》

晨曦洒落在碧绿的池塘，轻风摇着洁白的荷花，芙蓉镇像一朵出水芙蓉，显得十分清丽而恬静。

胡玉音，芙蓉镇上的芙蓉花。她和丈夫黎桂桂摆了个米豆腐摊子，小本经营，和气生财，凭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屋。在新屋落成那天，他们摆下酒席，招待前来贺喜的街坊邻里，同行小贩，至友新朋。粮站主任谷燕山也来祝贺，希望芙蓉镇都能盖上新屋。

风云突变

蓝蓝的天空浮动层层乌云，芙蓉镇人们的心头也笼罩着丝丝阴影。镇上来了"四清"工作组，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说不定哪一家会当上靶子，个个都胆战心惊。

从镜子的折射中，胡玉音看到李国香正跨进门来，不由神色一变，她猜不透李国香的来意，只得像往常一样笑脸相迎。但李国香神情严肃，慢慢地掏出一个小本本，一句一句，照本宣读。

从 1961 年开始，芙蓉镇开始五天一圩（集市）到现在为止，一共两年零九个月，一百九十八圩，每圩做五十斤大米的米豆腐，一斤大米可做十碗，每碗一角，五十斤五百碗，就是五十块钱，一个月三百块钱，除去一百元成本，每月纯收入二百元，两年零九个月，累计纯收入六千六百元，还有粮站去任谷燕山，每圩批给大米六十斤，两年零九个月，共批大米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李国香念完了，将小本本一合，走了。

胡玉音听后，脑子发胀，眼睛发花。天哪，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玉音以为自己靠劳动发家，算什么资本主义，很不服气。她向桂桂提出，干脆把新屋卖掉，再想个应变的办法，两人合计下来，还是玉音先去广西，到桂桂的一门亲戚家避避风头，再将一千五百元积蓄转到黎满庚那里，请他代为收藏。不久，待玉音从广西归来，眼前的一切，全变了模样。

胡玉音来到自己家门口，只见新屋已挂上芙蓉镇阶

级教育展览会的牌子，而“胡记”老客栈，也是大门紧锁，贴了封条。她跑到粮站支找谷燕山，看门老人告诉她，他被关了起来。再找黎满庚，同样不见人，五爪辣嫂子非常伤心，说他已去县里反省。那么，自己的男人呢，也因他要杀李国香，一个月前被埋进了坟地。胡玉音晃着身子，去坟岗四处寻觅，孤坟累累，哪里去找桂桂的葬身之地。朦胧中只听得有人呼唤芙蓉姐子，这不是右派、五类分子秦癫子秦书田么，深夜他来这里干什么呢。秦书田上前相劝胡玉音，你已划为新五类分子，要想开一些，在这个世上，还得要学着做鬼……

相濡以沫

“文革”旋风席卷芙蓉镇，王秋赦当上了支书。李国香被拉下台来，放在秦书田和胡玉音一块扫街。李国香心里不服，她蹲点芙蓉镇说是为“巩固”成果，她自称从未做过右派。不久，她的问题又忽然解决了，仍然身兼数职，继续留芙蓉镇蹲点。掌握运动。

一天，秦书国走过胡玉音家门，很是诧异，为什么大门紧闭，没有动静，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他急忙夺门进屋，只见胡玉音正卧病在床，发出轻轻的呻吟。秦书田扶起她，给她喂了几口热汤。胡玉音诉说着自己心中的怨恨，不如死了的好。秦书田劝她，在这种时候，只有自己看重自己。

心儿在苦难中撞击，感情于扫街中滋生。在小巷深处的一角，胡玉音为秦书田磨起了米豆腐。两把扫帚已靠在一块，两个人儿，也该合在一起。胡玉音内心颤怵，自己是什么人呀，还胡思乱想，岂不是自食苦果。而秦书田呢，却另有见地，他认为，他们犯的不是不能结婚的法，谁都奈何他们不得。多少回，他们扫罢街，将扫帚一放，悄然闪进屋里，呆在一起，长期压抑的感情一旦爆发，常常表现为不可思议的狂热。但他们的心就像踩着薄冰行路那样，总感到随时都会伸出一只巨手，将他们分开。

胡玉音怀孕了，秦书田写了“认罪书”，请求支书王秋赦办理结婚登记，王秋赦火了，怎么，专政对象搞恋爱，还敢偷鸡摸狗，他让人写了副对联，叫秦书田贴在自己门上，对联上写着：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横批是——鬼窝。对这副强加于他俩身上的对联，他俩另有想法，岂不是承认他俩已是夫妻。至于是红、是黑、无关紧要。于是，胡玉音和秦书田，择日完婚。花烛之夜，他俩按照传统的习俗，同饮“交杯酒”，祝愿心心相印，白头偕老。

正当他俩举杯欲饮的时刻，突然听到嘭嘭的敲门声。门里问，门外答，来人原是谷燕山。他手里提着纸盒盒，腰间吊着酒葫芦。他俩请老谷入席，为老谷斟上满满的一杯葡萄酒，谷燕山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老谷说，除了他，恐怕没一个人敢来喝这杯喜酒了。在他看来，胡玉音和秦书田算什么五类分子。谷燕山拿出自己的贺礼，两块布料，一辆小汽车，一个布娃娃，愿他们早生贵子，生活幸福。胡玉音听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她不禁“嗵”一声双膝跪地，“谷主任，请受我一拜，为了碎米谷子你受了冤枉，是我害了你……”

谷燕山，这个曾经在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的燕赵大汉，“文革”中受尽折磨的共产党员，含着眼泪，拉起胡玉音：“别讲这些了，今晚，咱喝个痛快……”

秦书田、胡玉音是不可能过舒心的生活的。秦书田突然被绑走，公社广场召开了宣判大会，秦书田被判处十年徒刑，胡玉音怀孕在身，判处三年徒刑，监外执行。会场的角角落落，人们在流泪、抽泣。令人意外的是，胡玉音挺起腰杆，秦书田目光坚毅。“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共同的心声成了临别前的山盟海誓。

胡玉音要分娩了。谷燕山听到她凄惨的呼救，赶忙拦住一辆军车，将她送进解放军医院，因为难产，需要家属签字。在一张单子上，谷燕山毫不犹豫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谷燕山。

雨过天晴

动乱的年代终于结束。芙蓉镇重新逢圩，胡记米豆腐店正式开业，镇上老老少少，又吃上味道鲜美的米豆腐啦。胡玉音热情地招呼顾客，声音还是那么清脆悦耳，模样还是那么清秀。王秋赦疯疯癫癫地挤了过来，胡玉音给她盛上一碗米豆腐。人们不无议论，这个世道真有意思，叫癫子的人不癫，不叫癫子的倒是癫了。王秋赦敲着破锣远去，那“七八年一次”嘶哑无力的呼喊，逐渐被繁闹的市声所淹没……

歌曲《望星空》

1＝F　2/4

石　祥　词

铁　源　曲

夜朦朦，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一颗星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深情，那是我早已熟悉的眼睛。我望见了你呀你可望见了我？天遥地远，息息相通，息息相通。无论你顾不上看我一眼，看上我一眼，我也理解你呀，此刻的心情，在我的心中。噢！

夜深沉，难入梦，我在凝望那颗星。那颗星它是那么灿烂，它是那么晶莹，那是我敬慕的一颗心灵。我思念了你呀你可思念了我？海誓山盟，彼此忠诚，彼此忠诚。即使你化作流星毅然离去，毅然离去，你也永远闪耀在我的心中。我的心中。噢！

歌曲《血染的风彩》

1=G　2/4

陈　哲　词

苏　越　曲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远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情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起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付出的爱。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3日　公安部、交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沿海港口城市认真整顿港口口岸治安秩序，集中力量对目前存在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严厉清查取缔。

1月4～8日　全国职称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国将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已经成立。职称改革工作将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实施。

1月6～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中央机关干部8000人大会。号召中央党政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纠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引向胜利，为完成“七五”计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9日，胡耀邦作题为《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讲话。赵紫阳、田纪云、杨尚昆等在会上也讲了话。

1月7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86年度施行。

1月8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关于通用航空管理暂行办法。

1月10～20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通过关于批准长江南京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的决定、关于将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决定。

1月14日　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出通知，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投机诈骗罪犯，对因上当受骗而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单位必须追究其领导者的责任，对索贿受贿、支持参与投机诈骗活动或严重渎职触犯刑事的追究刑事责任。

1月16日　六届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代主席胡愈之因病在京逝世，终年90岁。

1月17日　邓小平主任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了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重要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出通知，改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办法，将集中统一组织代表视察逐步改为分散的经常的视察。

1月28日～2月1日　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当前端正党风是党的一项紧迫任务。1986年要着重抓好三件事：一是集中力量，狠刹不正之风；二是抓好党性教育；三是严格整顿纪律。在狠刹不正之风的同时，要严厉打击投机诈骗、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同时要密切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须坚决反对。

2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通知，坚决制止干部用公款旅游。

2月5～14日　赵紫阳等深入海南岛两市、八县、强调搞活的方针可以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2月6日　航天部广宇公司走私大案被中纪委、最高法院、海关总署等部门查处。公司副总经理朱涵澄等4人被逮捕，原部长张钧、副部长程连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进口彩电全部被没收。

2月20日　胡耀邦总书记率领三个考察访问组在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的贫困地区实地考察后回到北京。

2月20～27日　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到会讲话。

2月21日～3月4日　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坚决取缔和制止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实现今年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邓小平最近指出的“搞好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四个坚持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认为这些意见是在新形势下搞好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

2月2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批转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关于全国开发使用退伍军人两用人才现场经验交流会情况的报告》。

2月22日　中央书记处决定每年进行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3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香港举行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

3月3日　对外友协副会长周而复在1985年10月20日至11月12日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日期间，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格，不听劝阻，擅自参观了供奉有战犯亡灵的日本靖国神社，丧失民族气节，损害了我国的尊严；对待日本友好组织傲慢无礼，损害友好关系；在生活作风上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影响恶劣，经中纪委决定，已被开除党籍。有关领导部门已撤销了他的对外友协副会长的职务。他担任的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也已由文化部予以解除。

3月5日　董必武、林伯渠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

3月11～19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5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同日公布，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等，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

3月12日　陈光毅出任福建省委书记。

3月13～18日　全国政协六届常委会第11次会议在京举行。

3月15日　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发布施行新的《婚姻登记办法》。1980年11月11日发布的《婚姻登记办法》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向地方高级法院、海事法院发出《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和《关于诉讼前扣押船舶的具体规定》的通知。

3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地区部队发言人宣布：我部已奉命于1985年停止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飘海漂宣传品。

3月23日～4月11日　六届政协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增选王恩茂、钱学森、雷洁琼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3月25日～4月12日　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和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通过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通过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大会分别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决定任命乔石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宋健为国务委员。补选楚图南为六届人大副委员长。

4月1日　中顾委委员、原总政副主任甘谓汉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4月2日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土地管理，迅速制止乱占耕地。

4月4日　首都群众集会纪念1976年“四·五”运动10周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延续的历史强音—纪念“四·五”十周年》。

4月6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

4月7日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委员长会见港澳记者时说，西藏问题不属一国两制问题，达赖回国我们欢迎，但他必须放弃搞西藏独立。

4月9日　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第二部分要点题为《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

4月13日　财政部新近作出《关于对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收入征税的暂行规定》(4月1日起施行)。

4月17～20日　胡耀邦视察太行山区。

4月18～22日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2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结构(草案)。

4月19～28日　赵紫阳、李鹏、王任重等考察鄂西北、鄂西和川东10多个山区县、市。

5月3日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飞回祖国大陆。

5月4日　解峰被选为河北省省长。

5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中文版全部出齐，收入2000多篇著作，4000多封书信，400多件文献资料。

5月7日　国务院发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税的暂行规定》(1986年7月1日开征)。

5月10日　经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

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开始在北京颁发。

5月21日　国务院设立国家核安全局。

5月22日　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调查了农牧渔业部所属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一起重大投机倒把案。

5月23日　中国民航代表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启德机场办理了中华航空公司B198号波音747货机、两名机组人员和货物的交接，签署了交接书。

5月25日　国务院最近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

5月29日　宋庆龄纪念碑在上海宋庆龄陵园落成。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为此举行典礼。纪念碑正面是邓小平的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碑文记载着宋庆龄伟大的光荣的一生。

6月1日　多吉才让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

6月10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争取在"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

6月15日　《陈云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至此，《陈云文选》全部出齐，共载有1926年至1985年的157篇著作。

6月16～25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审议了土地法、破产法和外交特权豁免条例等草案。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会议通过《1985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决定任命王蒙为文化部部长。

6月18日　邓小平会见200多位荣氏海内外亲属，并说"荣家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是一个贡献"。

6月22日　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审理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勾结原海口市物资供应总公司采购员李玉林倒卖进口汽车的重大投机倒把案。林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非法所得36000元。

6月27日　《中共党史人物传》前30卷出版发行。

7月1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公布废止、失效法规目录的通知》，明令宣布建国以来先后制定的2091件财政法规停止执行。

7月5～7日　首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邹瑜任会长，刘复之任名誉会长。

7月8日　黄埔军校同学会在京座谈，纪念北伐战争誓师60周年。

7月18日　李长春任辽宁省代省长。

8月1日　国家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办公。

8月27日～9月5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间的决定》；通过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的决定。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国营企业破产法(试行)》(草案)的实况。

9月1～6日　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就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审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稿征求意见。

9月3日　国务院发布能源、交通运输、通信、农业、消费品工业、机械工业、材料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城乡住宅建设和环境保护12个领域的技术政策。

9月9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新编《毛泽东诗词》、《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同时发行。

国务院公布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0月1日起实行)。

9月19日　山西省长治市副书记何之堂严重以权谋私，利用职权插手子女调动、提拔入党，破坏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被撤消党内一切职务。

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29日　中顾委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六届全会的两个决议。

10月3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先楚同志逝世，终年73岁。

10月7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同志逝世，终年93岁。

10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

10月22日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的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10月23日　江西省第六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罢免任职期间犯有严重错误的倪献策省长职务。

10月24日　吴官正当选江西省省长。

10月26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由公安机关对城乡道路交通的管理统一负责。

10月28日　我国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11月1日　天津市长同人民代表对话形成制度。

11月7日　邵阳县人大代表对政府发表意见，县委书记竟当作反党言论进行追查。

11月11日　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展览在北京开幕。

11月12日　彭真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上讲话指出：当前是祖国统一大好时机，希望台湾派代表同大陆接触。

11月15日～12月2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3个月之日起试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1987年1月1日施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选举法〉的决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1987年5月1日施行)。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撤销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部；决定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公约》。

11月19日　胡耀邦总书记两次考察江苏省城乡。

11月20日　"中美合作所"遇害人员身份全部查实，原83名身份不明者有64名被追认为烈士。

11月26日　全国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事迹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

11月27日　全国统战会议强调，"一国两制"使统一战线出现新格局，凡是赞成祖国统一的人都是团结对象。

11月28日　公安部公布施行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

12月1日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朱德百年诞辰。胡耀邦在会上高度评价朱德同志的伟大功勋。

12月5日　中纪委就杨敏谦被诬陷一事发出通报，对刁难改革的人必须彻查严办。杨敏谦错案有关责任者已受到处理。

12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首先出现了大、小字报。此后，北京、南京、西安等地校园内相继出现大字报，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提出了关心改革的口号，出现了一些过激言词。极个别人利用学潮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12月18日　江泽民市长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和学生对话，希望大家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珍惜当前的大好形势，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12月24日　上海各界群众对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表示关注，希望大学生们以安定团结大局为重，牢记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华腾飞刻苦学习。

12月25日　上海两名肇事者混入学生游行队伍，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逮捕。

同日　公安部公布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12月26日　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同日　北京市发布关于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

同日　我国破获两起南朝鲜间谍案，充当间谍的李琪焕等相继落入法网。

12月27日　公安部、外交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法则实施细则》。

同日　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卫民党"首要分子史关福。

同日　南京一些大学生上街游行引起群众围观，极少数不法分子乘机闹事扰乱社会秩序。各界群众希望学生以安定团结大局为重。

12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同志逝世，终年84岁。

12月29日　个别人煽动北师大学生游行，并先后进入北大、清华大学鼓动。但三校学生拒绝参加。北京市有关部门指出，将依法追究主要责任者。

同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

12月3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捣乱。一小撮敌对分子胆敢在首都捣乱，必然遭到严惩。

12月30日　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少数大学生上街游行，只占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二；少数人利用学生热情，有违反宪法言行。没有一个学生贴大字报和游行被捕。

同日　冒充学生混入高校进行煽动破坏活动的薛德之被北京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12月31日　王震在中央党校辞旧岁迎新春大会上讲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历史潮流。对于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和事要坚决斗争。

经　济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的文件。

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

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宣布，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正式开始。

1月11～20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月15日　国务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00条，规定某些项目合营期限延长到50年。

1月29日　外贸部新闻发言人宣布，到1985年底，全国已兴办中外合资企业2300多个。去年，我国签订对外借款协议额达35亿3千万元，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58亿5千万美元，商品信贷合同3亿6千万美元，是近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

2月28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月1日　我国"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京汉广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使用。

3月10日　我国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员。

3月10～16日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3月23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

4月5日　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7月1日起施行)。

4月15日　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又一项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引黄济青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5月8日　我国最大港口——上海港改由上海市政府为主管理。

5月20日　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同江港正式对外籍船舶开放。

5月26～29日　被称为我国北方"金项链"的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惠民、东营、潍坊、烟台、青岛等14个环渤海的市(地区)在天津举行市长联席会，确定建立环渤海经济区。

6月4日　国务院修订公布《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

6月20日　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关于纠正平调二轻集体企业事业资产问题的报告》。

6月28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大庆30万吨乙稀一期工程建成竣工。

7月16日　国务院提出先进工业企业分级标准，产品质量、物质消耗、经济效益是考核的主要指标。

7月23日　国务院新近下达了《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

7月25日～8月10日　我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自1953年以来，我国首次在苏联单独举办的经济展览。

7月30日　锦西成为全国最大债权人，企业待收款5000万元，全市人均80元。

8月10日　改变旧的国营商业所有制形式，北京试办第一家商业股份公司——天桥有限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8月14日　上海兴建30万吨乙稀工程，向社会发行53000余万元债券用于建设。

8月22日　由国家经委公布的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公报表明，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依然存在。

8月28日　为全国转变政府管理经济职能探路，16个中等城市试行机构改革。

9月2日　杭州企业全部实行浮动工资制，经济效益和生产水平上升，一举扭转上半年被动局面。

9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9月20日　我国首座现代化海洋采油平台建成。

10月1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10月31　农牧渔业部首次颁发国际科技合作奖。

11月6日　南昌市菜店全部实行股份制。

11月11日　中国成为手表生产大国，年产量突破5000万只。

11月12日　走向2000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开幕。

12月3日　我国煤炭工业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平塑露天煤矿贷款协议在北京签字。

12月11日　国务院发布暂行条例，明年元旦起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军　事

1月15日　国防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它是以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的。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干部培训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将成为当代第一流的具有我国我军特色的高等军事学府。

2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县(市)人民武装改归地方建制交接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后有关问题的规定》。内地人武部于1986年6月底以前交接完毕，陆海边防一线县人武部，除暂缓移交的外，在1986年底以前交接完毕。全国县(市)人民武装部由军队建制改归地方建制，是精简常备军、加强国防后备

力量的重要决策。

3月21日　解放军总部有关负责人说，我军大批军马已退役，团以上的骑兵建制已经取消。人民解放军伴随着集团军的出现，汽车、坦克、直升飞机已成为主要机动力量，铁马代替了军马。我国军队挥舞马刀驰骋疆场的时代已经结束。

3月22日　目前，全军以训练新兵、培训班长骨干为主要任务的教导团已组建完毕，并且训练出第一批新兵。这一措施，将使我军的训练体制更趋科学合理，训练质量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

4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合同战术训练中心在华东某地正式成立。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训练基地，是中央军委为适应野战军改编成集团军新体制后开辟的新的训练场地。

5月14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云南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有功单位及个人荣誉称号。

7月12日　我国建造的第一艘海军训练舰下水。

8月10日　总政主任余秋里提出，全军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要执行“八个不准”：不准打骂体罚战士；不准接受战士的礼物；不准干部侵占战士的利益；不准对战士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11月19日　我国首次制定军事科研五年规划。

11月20日　华北某地进行了一次机械化集团军演习，表明我军陆军合成作战能力更加强大。

11月22日　赵紫阳看望广西边防部队，赞扬指战员经受住苦乐生死考验。

12月29日　百余名大学生接受老山战火磨炼，有47人荣立战功。

12月31日　我核潜艇首次远航告捷。

外　交

1月29日　李先念主席打电话给美国总统里根，对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1月28日升空爆炸、7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2月26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欢迎菲律宾新政府（科·阿基诺为总统）成立。

3月8～27日　李先念主席访问孟加拉、斯里兰卡、埃及、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

3月17日　赵紫阳就“国际和平年”向世界各国听众发表广播讲话，表示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共同负起责任，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3月18日　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议，重申全力支持民柬的救国斗争。

赵紫阳总理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双方代表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里的合作达成协议。

3月20日　中国和波兰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在北京签字。

3月21日　中国航天工业部与瑞典空间公司签订的利用中国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载发射瑞典邮政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正式生效。它标志着中国的运载火箭即将进入国际市场。

3月22日　中国共产党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4月7～14日　中苏第8轮磋商在莫斯科举行。

4月23日　邓小平主任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5月1日　经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决定，红其拉甫口岸正式向第三国国民开放。

5月20日　邓小平主席在京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他说，我们在本世纪末的目标是翻两番。到下一个世纪，再花30年至50年，确切地说，是50年时间，争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再翻两番，即国民人均收入4000美元。如果这个目标达到了，中国可以算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

5月24日　胡耀邦总书记会见戈登·麦克伦南总书记率领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5月30日　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由总书记吉·迪亚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中巴两党恢复交往。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在京成立。

6月7日　我外交部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贯彻中日联合声明精神。

6月7～2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次访问西欧。

6月12日　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瓦尔访华。

6月12～15日　中国和不丹举行第三轮官员级边界会谈。

6月15日　菲律宾共和国副总统兼外长劳雷尔来华访问。

6月30日　民航北京至罗马航线开航。

6月30日～7月1日　中国和葡萄牙关于解决澳门问题首轮会谈在京举行。

7月2～26日　赵紫阳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和突尼斯。

7月4日　北京、温哥华两地实况同显对方荧屏，我国首次利用卫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7月23日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负责官员宣布，持英

国护照的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伯恩斯违反我国法律，进行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驱逐出境。

9月6日　我国释放29名越南入侵武装人员和特务。

9月29日　胡耀邦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高雅鲁泽尔斯基。这是中波两党最高领导人之间20多年来的首次会晤。

10月12～18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这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

10月23～25日　中国人民全国政协代表团在副主席杨静仁率领下，首次访问比利时。

11月8日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礼在北京举行。胡耀邦总书记、中曾根首相出席并为基石培土。

11月9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时谈“四有教育”(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他强调，有理想和纪律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12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印度非法通过法案企图永占我国领土，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12月14日　邓小平会见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一行时说，中国当前最大的政策是改革和开放，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一句话：要发展自己。

12月31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我2000年前坚决收回澳门。

文化教育

1月6～13日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讲话。会议提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1月12～16日　国家科委、中国科协联合召开全国地方科技工作经验交流会。万里在会上作《加强科技支援，发展乡镇企业》的讲话。

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创刊。

1月25日　国家教委发出《关于1986年普通高等学校试招中学保送生的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接受委托培养学生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1月28日　中国科学院“实验3号”海洋科学考察船圆满完成首次赴西太平洋热带海域的综合考察任务，回到广州。这次考察的成功，表明我国已有能力探索研究海气交换这一国际前沿科学课题。

2月1日　我国在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颗实用通讯广播卫星。这颗卫星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按预定计划于3日进入准同步轨道，2月20日准确定点于东经130度赤道上空。

2月11日　上海工业系统兴办起1400多个政治学校和政治轮训班，开始对200万产业大军系统进行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2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2月1日陈漱渝《不要恣意贬损鲁迅》，抨击《杂文报》等报刊以轻浮的态度随心所欲地贬损鲁迅。指出鲁迅在他一生不疲倦的战斗中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宝贵贡献。

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唐敖庆为主任)，以加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

3月3日　中国新闻学院经国家批准在京成立。穆青任院长。

3月6日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朱光潜教授逝世，终年88岁。

3月9日　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辞书《汉语大字典》编纂完成。这部大字典是周恩来、邓小平批准组织编写的，经四川、湖北两省400多名专家、学者和教师10年努力，收楷书单字56000多字，分8卷，印刷字数为2000万汉字，超过了《康熙字典》。1986年10月起陆续出版发行，预计1989年出齐。

3月12～16日　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按照岗位职务的需要，实行定向培训。

3月17日　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皮肤病性病学家、医学教育家胡传揆在京逝世，终年85岁。

4月1日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开始每天定时发布中央气象台提供的我国责任海区的海洋气象预报。

4月10～23日　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上海举行。

4月15日　著名画家蒋兆和在京逝世，终年82岁。

4月20日～5月4日　全国图书展览在北京举行。共展出各类图书35000多种。它们是从建国以来出版的60多万种图书中精选出来的，80%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新书。

4月21日　国家教委提出要求，大力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建成一支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教师队伍。

5月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使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成为自主的开发实体。

5月9日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县内探明2500年前秦都雍城遗址。

5月10日　我国第一台大型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核

物理实验室最近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成。它标志着我国核物理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5月11日　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在京逝世，终年87岁。

我国首次发现隋唐殉人墓葬。

5月31日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50周年。

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开馆典礼。

6月1日　我国第一部进行远程信息处理的大型中西文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在锦州市通过签定。

6月4日　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决定扩大高校管理权限。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放射学家、临床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汪绍训在京逝世，终年79岁。

6月6日　刘亦铭访美期间研究相对论重离子物理学，获第一流科学成果，哈佛大学破格晋升他为教授。

6月10日　我国第一台水下超声探伤仪研制成功。

6月13日　中纪委、国家教委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设立纪检组，坚决纠正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

6月14日　由巴金担任会长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6月21日　中国第一台大功率长波授时台最近在陕西建成。它标志着中国授时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6月23～27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协主席。

7月8日　国内卫星通讯网开通，北京、拉萨等5个城市联网可覆盖我国全部版图。

7月9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

我国第一个机器人示范工程在沈阳举行奠基。

7月1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改革现行普通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的报告》并发出通知，规定在普通高等学校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

7月19日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同意，国家教委向全国发出通知，今年全国将选派一万名左右的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参加支援中小学工作一年，作为他们的见习期。

7月21日　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成立。

7月29日　我国进行首例脑内移植手术成功。

中共中央委员、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物理学家邓稼先同志逝世，终年62岁。

8月6日　甘肃出土五千年前殿堂遗址，提供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线索。

8月9日　西藏藏学学会成立。

8月16日　包拯遗骨35块，专家鉴定予以确认，将移葬于合肥市区新建的陵墓。

8月19日　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级大型采血车通过技术鉴定。

8月25日　中国医科院给人类攻克癌症带来新希望，抗白血病“生物导弹”研制成功，具有定向性选择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

8月26日　建国以来首次发表胡适、陈独秀传。

8月30日　我国最大的书店营业大楼在长沙落成，正式开业。

9月2日　巴金《随想录》五集全部完稿。文艺报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一致称它是“一部讲实话的大书”。

9月5日　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

9月9日　我国第一部《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第一号》公开发行。

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9月16日　治疗内膜心肌纤维化心脏病，我国首次施行直视手术成功。

9月24日　秦皇岛得名传说有了确凿依据，北戴河发掘出秦始皇父子行宫遗址。

9月27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10月1日　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制度开始在全国实施。今后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考试合格证书的人才能任教。

10月9日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召开。

10月11日　我国又成功收回一颗卫星，迄今8次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率达100%。

10月17日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李政道任主任。

10月19日　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10月30日　我国决定从今年起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1月2日　“当代中国画展”在北京开幕。

11月4日　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数学竞赛揭晓，北京人大附中陈昱在“华罗赓金杯”上镌名。

11月23日　国务委员宋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透露，允许、支持以至鼓励一部分科技人员到中小城市和农村承包和领办集体乡镇企业、创办股份企业和个体企业，允许他们先富起来。这是今后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容。

12月1日　我国第一个专门的舆论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最近在北京成立。

12月19日　由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科技合作项目——我国第一个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

复旦大学青年助教朱培坤实现一项重大创举，不同

纲植物无性杂交获成功。

12 月 20 日　国家中医管理局公布重大中医科技成果奖。

我国创一项血癌治疗世界纪录，一名患者移植胎儿肝脏血液细胞，存活超过一年。

12 月 22 日　全国 16000 名老新闻工作者荣获中国记协颁发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12 月 25 日　我国两名中学生学生设计方案，入选参加美航天飞机实验。

12 月 28 日　我国“极地”号考察船到达南极。

社会生活

1 月 5 日　徐霞客诞辰 400 周年纪念活动在江阳县举行。

1 月 11 日　优秀基层干部傅永先舍己救人光荣牺牲，中央军委授予他“勇于献身的好连长”称号。

1 月 25 日　卫生部长崔月犁宣布，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

1 月 31 日　1985 年“十佳”运动员评选揭晓，郎平、聂卫平、韩健、童非、阎红、曹燕华、杨锡兰、江加良、李玲蔚、李宁当选。

2 月 12 日　国际奥委会授予万里金质奥林匹克勋章。

2 月 15 日　唐山市重建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建房 1700 多万平方米，取得重大成就。95％居民住户搬进新居，全市 1985 年工业总产值比震前的 1975 年增长近 70％。

2 月 28 日　广播电影电视部等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录音录像制品市场进行整顿，坚决制止和打击违章翻录、销售音像制品的活动。

3 月 1 日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表彰大会在京举行。31 个红旗单位、16000 个先进集体和个人获奖。

3 月 6 日　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宣布，世界上规模最空前巨大的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已胜利完成。通过普查取得的准确、丰富的国情资料，对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制定和执行人口政策，安排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和长期有益的作用。这项普查对世界人口情况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贡献。

1985 年 10 月遭受严重雪灾的青海省牧区，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和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援下，经过四个多月艰苦奋斗，取得了抗雪救灾的基本胜利。灾区牧民无一人因雪灾死亡。

同日　我国第一尊周恩来铜像在江苏淮安其故居内揭幕。

3 月 9 日　我国运动员王妍破女子 5 公里场地竞走世界纪录。

3 月 16 日　李梦华当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和中国奥委会主席。

3 月 21 日　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 月 23 日　中国货船“石嘴山”号(吨位 4114 吨)在日本神子供岛东南 13 公里附近海面失事。20 名船员有 19 人被救起。

3 月 26 日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昔阳县大寨党支部书记、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在京逝世，终年 72 岁。

3 月 27 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重大泄密和收受贿赂案，张常胜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叶之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3 月 31 日　徐永久、王妍、崔英姿破万米场地竞走世界纪录。

4 月 6 日　党中央领导同志和首都百万军民一起植树。

4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通知，决定 5 月 4 日早晨二时把时针往前拨一小时，9 月 14 日晨二时把时针后拨一小时还原，以充分利用自然光源，节约照明用电。

4 月 23 日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康复协会成立。

4 月 25 日　黄自平高位截瘫后奋起自学成才，辅导 132 名青年考上大学，获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4 月 26 日　全国 1000 多名先进模范人物在节日前夕获“五一”劳动奖章。

4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向优秀政工干部熊元启学习的通知。

4 月 30 日　首都集会纪念“五·一”一百周年。

5 月 5～5 月 8 日　全国首届护理工作会议在南京举行。

5 月 26 日　邓小平将《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初版稿费 4025 英磅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

5 月 31 日　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隆重举行。

6 月 1 日　首都 4000 名儿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少年先锋岗”建岗仪式。

6 月 4 日　中国武术研究院成立，徐才任院长。

6 月 7 日　在第 11 届亚洲女篮棉标赛上，中国女篮击败南朝鲜队，夺回亚洲桂冠。

6 月 25～30 日　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在京举行。

6 月 26 日　我国首次公布城市人口统计资料，到 1985 年底，城市总户数为 5351 万户，总人口数为 21,187 万，城市数为 324 个。

6 月 27 日　新成立的中国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著名核工程专家姜圣阶担任主任。

7 月 4 日　全国首次计划生育科技表彰大会召开，21 项计划生育科研成果获奖。

7 月 25 日　京津沪 16 所大中学校学生倡议，开展援助非洲灾民活动。

8 月 6 日　我国第一场由农民足球队参加的国际比赛在前关村举行。大连前关村队与联邦德国英格尔达斯特青年队 2：2 握手言和。

8 月 16 日　我国田径新秀梁学仁奋力跃过 5.55 米，打破日本选手长期垄断的撑竿跳亚洲记录。

9 月 7 日　在女子 5000 米场地竞走比赛中，李素杰破世界纪录。

9 月 10 日　第 11 届亚运会工程揭开序幕，北京一批体育场馆奠基。

9 月 11 日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成立。

9 月 12 日　河南许昌大政村小学一所教室倒塌，学前班幼童 11 名被砸死，35 名被砸伤。

9 月 14 日　中国女排在第 10 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夺得世界冠军，创五连冠。

9 月 21 日—10 月 5 日　第 10 届亚运会在南朝鲜汉城等在举行。中国队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共计 94 枚)。

10 月 4 日　中国男排首次荣获亚运会排球赛冠军。

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开馆。

10 月 30 日　卫生部有关方面负责人申明，我国没有艾滋病发生。

11 月 6 日　首届环球火炬接力跑在北京点燃火炬，李先念主席出席并传递火种。

11 月 9 日　我国目前最大最长的公路隧道在深圳桐山贯通，全长 2260.7 米。

两支省女篮队在江城比赛中出丑，不思取胜争相输球。国家体系将对山东、安徽女篮作出严肃处理。

11 月 15 日　中国台球协会成立。

11 月 16 日　中宣部等部门组织先进人物汇报讲演会，普通劳动者在怀仁堂畅谈理想。

11 月 25 日　中国长江科考漂流队征服长江，洛阳漂流队已于本月 12 日抵达吴淞口。

11 月 29 日　我国首次实行夏时制，全国节电 6 亿度。

12 月 2 日　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公布，人均居住面积 6.36 平方米；解放后新建房 91%。

12 月 3 日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

12 月 5 日　李涛刷新男子百米跑成人亚洲纪录。

12 月 12 日　首都集会纪念西安事变 50 周年。

洛阳公交公司领导人受到报纸批评后，泄私愤策划全市停车。

12 月 15 日　我国首次进行精神文明社会调查，涉及心理健康、价值观念等 10 个方面。

12 月 16 日　我国首次公布全民营养调查结果。

12 月 23 日　我国女子足球队获第六届亚洲杯赛冠军。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7年

导　　言

一九八七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一月，中央号召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开除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的党籍。

二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竟然把属于中国的、由中国留学生居住的、设在京都的“光华寮”判给台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中日两国的建交公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为此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抗议。

二月，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发现的液氮温区100K以上条件下的超导体，使我国的超导体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

四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就澳门问题达成共识，规定中国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祖国统一大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五月，由于管理不严，工人违章操作，我国大兴安岭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这场大火整整烧了近一个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十月，国民党原则同意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在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世界中引起巨大反响。

九、十月间，由于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挑动，在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历史遗留光华寮　日本重新挑纷争
- ●中葡共努力　澳门指日归
- ●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 ●达赖美国共跳梁　分裂西藏造骚乱

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指出9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报告》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职能分开，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党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必须从严治党，坚决清除党内腐败分子，提高党员素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修正案对十二大党章50条中的10条进行了修改。大会选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175名，中央候补委员110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9名。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背景介绍

1986年年末的学潮，暴露了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企图制造动乱，严重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材料：

-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与中央几位领导人的谈话
- ·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 ·怎样看待学潮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材料一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几个城市少数学生上街，折腾了一阵子，渐趋平静了。在中国，没有发生大动乱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得人心的。党中央是团结的。人心思定，思"四化"，谁也不希望动乱。"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搞起来，是因为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这才有十年动乱。现在形势不同了，不存在发生大动乱的基础。这个基本估计，是无可置疑的。

学生上街，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从问题的性质来看，应该说，又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它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在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同时，也要批判从右面来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当时，小平同志就指出："社

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1981年，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批评了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指出有的人"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年来，思想战线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旗帜是不鲜明的，态度是不坚决的，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讲得很明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并指出，这"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现在，确实有那么少数人，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把资本主义那一套都搬过来。我们讲经济体制改革，他们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却要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实际上，这就是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有些同志，对"左"的思潮深恶痛绝，非常敏感，斗争性很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好的，因为"左"的错误确实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这些同志却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现在，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一种思潮，它正在毒害我们的青年，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干扰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难道我们还能够若无其事吗？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坚持改革、开放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畅行无阻，改革开放势必要受到严重的歪曲甚至遭到严重的挫折。正如本报今年元旦献词所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鲜明，态度要坚决，但也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文艺、教育工作中加强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应该把这一问题摆在重要地位，列入议事日程，要把思想理论队伍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这样，才能把青年引上正确的轨道，才能有持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原载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与中央几位领导人的谈话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邓小平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全体人民。中央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正确地阐明中央处理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方针，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各级党、团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与中央几位领导人谈话中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个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10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根本无法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设。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1/4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四项基本原则。

（嘉　平）

材料三　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1 月 17 日作出了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

方励之原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 月 12 日被撤销副校长职务。

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指出，近几年，方励之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主要错误事实是：

一、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方励之攻击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所谓的这些指导只会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功"；"对我国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多的涵义就是领导的指导，实质就是政府的指导，或当权者的指导，或者是党的指导。这更不需要"。

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诬蔑说："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他主张"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他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是"打个民族主义招牌，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

三、公开提出要"改变党"，否定党的领导。

他攻击说："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我想是所谓权力的中心和道德的中心是合二为一的。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党现在是黑的"。"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我刚才说了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他对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写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很不满意"，在公开场合说："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为棒子用的。"

四、主张大学摆脱党的领导，鼓吹大学"完全独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他主张："大学跟政府的一种关系就是要钱关系"，"你政府要给大学校长钱，其它最好你都不要来干涉"。"大学完全是独立的"，"应独立于政府，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在这里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的、超越大学之上的一个什么指导者。"他挑拨说："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改革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五、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煽动学生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他在一些高等学校煽动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他鼓吹"学生是民主化的进步力量"，鼓动"学生冲击社会"，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他还煽动说，对民主"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1986 年 12 月 4 日晚，当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酝酿闹事时，他进一步煽动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第二天，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

中共安徽省纪委的《决定》指出，方励之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他完全背离了党章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针对他的错误，党组织曾对他进行过多次批评教育，但他采取阳奉阴违 的态度，坚持不改，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事实证明，方励之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根据党章的规定，决定开除方励之的党籍。

按照党章规定，《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已与方励之本人见面，并已在方励之所在的党支部宣布。

（新华社讯，1 月 20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上海市纪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1 月 13 日作出了关于开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党籍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王若望党籍的决定》指出，王若望自 1979 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经常借作报告、发表文章的机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屡教不改，严重违背了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纪，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

市纪委决定开除王若望的党籍。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王若望的主要错误是：

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说成是“空洞无物的幻想”，“实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不过抹上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一层油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中国紧迫需要的”，要“回过头来再补课”，主张引进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意识形态。

丑化和否定党的领导。他污蔑共产党就是喜欢权力斗争，“共产党书记什么也不懂，靠整人吃饭”。他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认为“有创作自由，看戏自由，还要你管什么。”他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他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文化、思想基础并没有改变，对‘左’的一套纹风不动”。他把反对精神污染和打击经济犯罪说成是一场没有标签的政治运动，说“‘打击办’(注：指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办公室)比‘四人帮’的‘清队’还要吓人”。他造谣说从事改革的人“大部分被打下来了”。他攻击国家对个体户的征税是“敲诈勒索”。他把党提出的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说成是“恐资病”。他诋毁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声称“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辩护，我就是要自由化，不给我自由，我就要斗”，公然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自居，鼓动青年和大学生“跟着自由化走”。

《决定》指出，对于王若望的错误，中央和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曾多次给以严肃的批评教育，但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检讨不久，又故态复萌，以致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王若望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与党对立，公开对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重违背了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严肃党纪，根据党章规定，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若望的党籍。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4日向王若望及其所在党支部宣布了这一决定。

(新华社讯，1月15日《人民日报》)

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1月23日根据刘宾雁的严重错误事实，按照党章的规定，决定开除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的党籍。

《关于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决定》指出：刘宾雁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在许多地方发表讲演、文章，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陈腐的、曾经把中国几次引向灾难的过时观念，僵硬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词句很好，内容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攻击我们现在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意识形态”。

刘宾雁诋毁共产党“堕落”，说他写《人妖之间》、《千秋功罪》“都是为了展示一个真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腐败”。他诬蔑学习好八连和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曲啸等，都是为了把人变成党的“驯服工具”，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

刘宾雁违背党中央关于报刊新闻广播宣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纪律，违反批评的事实一定要核对清楚的宣传纪律，把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接受党的领导说成是当“三孙子”。他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里由于不核对事实、不尊重事实而颠倒是非、造谣中伤的问题是严重的。他的这些作品在社会上造成大量混乱，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误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腐败”“堕落”了，而刘宾雁是真理的捍卫者。对于他的这种严重错误，地方和中央的有关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批评，但他始终拒不接受。

《决定》指出：刘宾雁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严肃党纪，按照党章规定，决定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决定》已与刘宾雁本人见面，并于24日在刘宾雁所在的党支部宣布。

(1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怎样看待学潮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刘吉同志与中国科技大学同学对话录

4月24日，中国科技大学一场精彩的对话。发问者是科大学生记者团等社团组织的50多名学生代表，问题提得大胆、直率、尖锐。答问者是今年年初才担任科大党委副书记的刘吉同志。刘吉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中共无锡市委研究室主任兼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后任国防科工委某基地政治部主任，以善于做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闻名。他这次同学生对话，从容坦率，对答如流，既旗帜鲜明，又含蓄风趣，充满哲理。对话始终在认真而又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进行。

下面是刘吉与学生对话的部分内容。

问：在去年闹学潮时，社会上许多人谴责大学生，对

此你怎么看？

答：在你们很热的时候，请父老兄妹给你们泼点冷水，使你们冷静下来。华罗庚教授曾对我校校友说过：要给青年泼冷水，不要浇温水，更不要浇热水。说你们什么都好，这不是事实，实事求是地指出你们的问题，对你们成长有利。你们要理解父老兄妹的一片心。

问：现在社会上对学潮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学潮值得同情但不值得推崇，学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太幼稚，没有达到学生想要达到的目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农业国，要治理这样一个国家，不能用西方的民主办法。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答：绝大部分同学的目的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从主观动机去看还要看客观效果，这次学潮所造成的后果，是安定团结受到了影响，领导同志的精力被分散了；我们的国际声誉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应更多地看客观效果，只看主观愿望可能不理解，看看客观效果就能理解了。我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但民主只能逐步实现。

问：参加学潮会影响考研究生和出国吗？

答：在今年初国家教委工作会议上，李鹏同志指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已明确规定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态度，应视为考核学生政治品德的重要标准。今后，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拔和研究生的录取，都必须掌握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取，二者不可偏废。"

问：这次学潮对科大与国外的各种联系有没有影响？听说出国人员减少了。

答：科技大学今年以来没有因为学潮而取消或改变对外的学术交流项目，也没有减少与国外的学术联系。今年第一季度出国人员和学术活动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以上。

问：我校有没有因为发生学潮而减少研究生的招生人数？

答：今年我们学校招收硕士研究生比去年增加32人。

问：假如你是二十几岁的科大学生，又具有你现在这样明确犀利的思想，在学潮来时你该怎么办？大声疾呼反对？明哲保身？积极参加？其它？

答：我现在不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假如"只能是一种设想，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是公民，要遵守宪法；我又是学生，要遵守校规；我还是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章。三位一体，我都不能违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将做我应该做的一切。

问：请问我们科大到现在有没有开除闹学潮的学生？为什么外面谣传很多？

答：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因为闹学潮开除一个学生，事实是对谣言最有力的回答。

问：上街游行的人都要进行反思吗？

答：没有这个要求。

问：那为什么听说，科大带头闹学潮的人都写了反思呢？

答：一场动荡过去了，不少同学特别是带头闹学潮的同学自觉反思是正常的现象，这也是一种自我总结、自我教育，达到你们常说的"自我完善"。

问：上街游行的人都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答：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看，上街游行的人不能说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他们的确是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问：这次学潮带头的人，是否今后政治生命就完了？

答：上帝也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你们年轻，允许犯错误。欢迎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今后的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怎么能说完了呢！

问：你作为党委副书记，怎样看待某些党员带头闹学潮？

答：某些党员在这次学潮中带了头，作为党组织感到痛心。这说明这些年我们科大党的发展工作中忽视了现实的政治表现，忽视了党内政治纪律教育。有些人自己努力也不够。这件事教育了我们。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主要解决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带头闹学潮的党员，至少应该对自己在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上的态度，向党组织有个交待。

问：如果他还没认识到自己错了怎么办？

答：对党员要讲道理，更要讲纪律，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不和党站在一起，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问：学潮之后，科大还有同学申请入党吗？

答：据不完全统计，到3月底申请入党的人数又增加98人，其中教师15人，研究生13人，本科生70人。

问：听说你最近给全校预备党员上党课讲得很严厉？

答：从严治党，这是党有战斗力的表现。对预备党员在预备期要向他们提出要求，进行考察。我们党委要求全校预备党员做到"五个一"，即：对学潮写一份总结；交一个党外朋友，互相帮助；上好一堂课，形势政治课；学好一本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党争光，"七一"前每人为学校做一件好事。并要求预备党员在申请转正时，同时向党组织汇报这"五个一"。

问：你认为科大广大教师在这次学潮中表现如何？

答：我认为表现不错，特别是基层领导和班主任、导师们。他们对方励之鼓动学生闹事是不满的、抵制的，好多老师这段时间非常辛苦，做了很多工作。对这些老师，

党组织要感谢他们，同学们要感谢他们。

问：你认为同学们目前对学潮造成的影响认识一致吗？

答：还不能说完全一致。但我们科大多数同学认为：第一，搞改革、开放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第二，这次学潮我们科大带了个不好的头；第三，不管当时我们主观动机如何，现在看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三点比较一致。

问：本学期学校搞了很多活动，这是不是对学生实行“软化”政策？

答：科大的同学在中学都是优等生，来科大后学习抓得很紧。同学们反映，觉得学校生活太枯燥，希望能多开展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和团委、学生会商量，尽量多搞活动。希望同学们不要把这些活动看作是对着你们来的，不要有对立心理。软化你们干吗？我看不能助长社会上的某些逆反心理。

问：科大最近请张一、徐良、彭清一同志来校作报告，你觉得效果如何？

答：全校近6000人听了张一讲课。2000个座位的礼堂挤进3000人听徐良报告。一位细心的同学告诉我，彭清一讲《艺术生涯和人生》时，两个多小时听众鼓掌50多次，我认为这能从数量和质量上说明效果。

问：有的同学认为学校请张一、徐良、彭清一来校报告，目的是想“语重心长”地说服同学们，是这样吗？

答：有的同学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请人讲一堂课，作一场报告，他却认为是对付他的。我听到有的同学说：校领导真有高招，咱们不愿听政治课，他们就请能讲的张一、能唱的徐良、能跳的彭清一来校报告。我们的目的是使同学们通过名人走过的道路，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社会，懂得人生的真谛。

问：你认为徐良的道路是大学生成才的唯一道路吗？

答：徐良从大学生成为英雄的道路是值得每个大学生借鉴的，他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但不能说徐良的道路是每个大学生的唯一道路。事实上国家不要求我们每个大学生都上前线，如我们科大校友赵忠贤、陈立泉同志的超导研究，他们就是在实验室中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英雄。

问：请谈一下科大的民主办学问题。

答：1985年5月，中共中央有一个《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增强民主气氛。但方励之提出的民主办学的八字方针，即“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意思是大学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校决定，国家无权干涉。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样不行。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办学的经验。全校师生应共同努力。我们的这种对话就是扩大民主的一种形式。和谐不是没有分歧，分歧可以保留，最后在实践中检验。

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会不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民主气氛？

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是反对民主。学校“大民主”不能搞，但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主动疏通正常民主渠道，扩大对话，摆事实，讲道理。特别要善于联系中国实际国情讲道理，引导同学立足中国想问题。

问：有的同学在宿舍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国事党事天下事，事事不问；下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闻。横批：莫谈政治。你认为这是同学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抗吗？

答：不能这样说。个别同学对有些问题思想不通，写副对联，说两句幽默俏皮话。有人说这是“表现欲”，我说是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前几天我到同学宿舍去，可能有人看见我来了，一个房间唱起“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它宿舍有人也随着唱起“火光熊熊照亮我”。你们都是大学生，应该知道怎么做才对，怎么做不对。

问：用切断错误思想来源来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是否可靠？

答：我们不是用切断同学们与西方思潮联系的办法来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封闭只能使人愚昧。我们是要通过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的问题是只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大家，而没有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现在要弥补这个缺陷。

问：你知道大学生都想怎样立业吗？

答：听说许多大学生说，成才之路有三条：第一条是黑路，即攻读硕士，出国攻读博士，戴黑方帽子；第二条是红路，即入团、入党、参政，毕业当干部；第三条是黄路，即黄金之路，学管理搞企业，将来捞实惠。这三条路都是成长之路，但都要正确引导。要成长就要有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要处理好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前途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三要处理好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问：你怎样评价当代大学生？

答：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同学立志成才，但缺乏艰苦创业的准备；勇于探索，但有时良莠不分；敢于创新，但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缺乏警惕；独立意识强，但有点自由主义；知识面广，但有点傲气或叫“狂”。

问：你怎样看待青年学生不了解社会，却喜欢评论社会的短长？

答：我读过一首小诗：“小溪不知自己浅，还在到处游乐。大海不知自己深，还在凝神思索”。当然，议论也是一种关心的表现。

问：有人说，人生是漫长的，你说我们应该怎样走？

答：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

有几步，而且这几步就在青年时期。请同学们切记，不可一失足成千古恨。

问：你对我们大学生的期望是什么？

答：未来属于你们，谁也不能代替你们走明天的路。你们今天的行动方向、社会价值观，将决定着中国的明天。所以你们今天有什么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带到明天去。

问：青年们喜欢"异想天开"，好吗？

答：不会"异想天开"要僵化，只会"异想天开"要退化，"异想天开"和"脚踏实地"结合才能"进化"。

问：青年人有点野心难道不好吗？

答：野心不可有，雄心不可无。

问：对徐良报告为什么反映那么强烈呢？

答：同学们最信服的是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道德的人讲道德，有纪律的人讲纪律。现身说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问：徐良的报告，难道不能给那些至今还简单空洞说教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点启示吗？

答：由此我想到应该大力提倡同代人教育同代人，同行人教育同行人，同龄人教育同龄人，身边人教育身边人。

问：什么是人生最高境界？

答：我赞赏恩格斯说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有所作为"。

问：有人看破红尘，一切都无所谓，这好不好？

答：同学们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切都无所谓，会导致你感情的贫乏，生活的忧伤，心灵的空虚，决不能导致你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增强。

问：历史会亏待好人吗？

答：历史从来不会亏待和厚爱任何人。

问：为什么同学们恨"左"不恨右呢？

答：你们生活在极"左"盛行时期，你们懂事时正逢我们党反"左"，进行拨乱反正，所以你们对"左"极为憎恨，而对右恨不起来，现在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问：怎样看待大学生的弱点和不足？

答：既不能忽视大学生的弱点和不足，采取放任迎合态度，更不能因为同学们有弱点和不足而否认同学们的主流和本质。

问：你认为大学生的人生态度应是什么？

答：我认为应该是：自尊，自强，自主，自信，追求，奋斗，开拓前进。当代大学生从总体上说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但具体到每个人，却有两种可能性，谁如果不清醒地、客观地认识自己，放松思想上的严格要求，使自己的弱点膨胀起来，谁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问：人生的暗礁是什么？

答：自满，轻信，坚持错误。

问：讨论会上提搞不懂的尖锐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吗？

答：我们提倡在民主、团结、和谐的气氛下开展亲切、活泼的讨论，对待有错误观点的同学也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记本子，不装袋子。对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用讨论的方法，即教育与疏导的方法去解决。

问：中国人均产值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占第130多位，同学们希望中国尽快富起来，对目前这种落后状态不满意，你认为这不是好现象吗？

答：想富、盼富、快富，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但中国的现实又迫使我们期望值不能太高。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均产值达800—1000美元，到下个世纪50年代，人均产值4000美元，也只能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使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说历史注定老一代革命家流血牺牲，那么历史也注定了我们这一代、同学们这一代以及你们的后代都要奋斗和吃苦。国家选送我们一批一批同学出国深造，目的是报效目前还贫穷落后的祖国。有人学成就不回来了，那实在是"情理难容"。

问：科学无国界，只要在科学上突破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何拘于国内国外，不要狭隘地理解爱国。

答：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当抚养他的祖国最需要他做出贡献时，他以种种理由拒绝祖国的呼唤，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难以容忍的。

问：你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专家化吗？

答：我主张，这也是客观的要求，在大学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科学技术、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培养同学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问：你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前途怎样估计？

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又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或改进。我主张要继承、借鉴、创新。

问：请问搞自由化与搞不正之风哪个更不得人心？

答：搞不正之风不得人心，搞自由化也不得人心。

问：你说处理得左点好还是右点好？

答：我们常说的"左"或右，是指思想路线，不是指处理具体问题严点还是松点。我认为"左"与右两个东西是相通的。用一个片面对另一个片面，用一个极端对另一个极端，过头和不及都会把事情搞糟。对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既不能走过场，也不能扩大化，更不能用简单化反对自由化。

问：科大实行校长负责制，党应该只管党组织和党员，现在怎么对学生什么都管了，你们没感到"越位"吗？

答：党要管党，党也要管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等，况且

本人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又是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系总支副书记也是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又是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所以对学生什么都管，名正言顺，没有越位，也不犯规。其实所谓管就是为你们服务，同学们没吃好饭，没睡好觉，写信给我们，这些我们都得管，还得管好，你们说不管行吗？

问：方励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了反对党纲的言论，共产党开除他党籍，这是党内的事，我们党外人士（指非党员学生）无权干涉，但是他为什么不可以做科大副校长呢？

答：我们党和政府选择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既然同学们也认为"方励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反对党纲的言论""这就说明他少些德吧。另外，科大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方励之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样的人怎能做科大的副校长呢？

问：自由就不应该受那么多约束。

答：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电子也要在场的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氘氚在磁约束下发生聚变才能放出大量能量。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自由演讲，但不许攻击英国女王，不许鼓动暴力革命。可见所谓自由都是有约束的。

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引起政策的政变？

答：邓小平同志说四个不变：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第二，一心一意搞"四化"不变；第三，对内对外开放搞活不变；第四，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变。

问：我认为大学校长是学术的象征，而党委书记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权力象征，刘书记想用怎样的行动改变我们的看法？

答：我们国家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是受党和人民委托共同负责办好大学，其首要任务是把握住办学方向，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合格人才。他们都需要有这样的领导素质。只讲"学术象征"和"权力象征"不妥。至于我怎样做，我愿为同学们热情服务，做你们的一个诤友。

（5月24日《人民日报》）

历史遗留光华寮　日本重新挑纷争

背景介绍

日本京都市的"光华寮"是中国政府在二战后为中国学生购置的。但在1967年、1977年，台湾"驻日大使"向京都地方法院控告中国留学生，要求将光华寮判给台湾。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竟然维持京都地方法院作出的把光华寮判给台湾的判决，严重违背了中日建交联合声明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材料：

-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朱奇武就光华寮问题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 光华寮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材料一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朱奇武就光华寮问题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记者：朱教授，您是否先介绍一下光华寮问题的大概情况？

朱奇武教授（以下简称朱）：据我所知，光华寮是位于日本京都市的一所五层楼房，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于1931年，原为洛东公寓公司所有。二次大战后期，当时日本政府的"大东亚省"为了对中国留学生施行所谓"集中教育"，委托京都大学租用这座楼房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京都大学也丧失了对该宿舍的管理权。中国留学生遂将该楼取名为"光华寮"，并组织了自治委员会，对该寮进行自主管理。

1947年，旅日侨胞发现了日本侵略军在战争期间从中国大陆掠夺到日本的大批物资，如羊毛、桐油等等。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往日本处理战后事务的"驻日代表团"下属的"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接管了上述物资，后经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同意，将其就地变卖，获款约20万美元。1950年，驻日代表团从这笔钱中抽出一部分（250万日元），从房主手中买下光华寮，继续用作中国留学生的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办理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但该寮一直由光华寮自治委员会管理，台湾当局从未参与过该寮的管理工作。

1967年9月6日，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下令光华寮自治会成员从该寮搬出。京都地方法院直到1977年才作出判决。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该法院认定，光华寮"从其资金来源和使用目的看，系中国为在日中国留学生继续作为宿舍设施使用而买下的公有、公共用财产"，"既然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则属于中国公有之本案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疑，这一判决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但台湾当局对此不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并由"财政部国有财产局长"作为代表上诉大阪高等法院。该法院无视中日联合声明和国际法准则，竟受理了这一非法上诉，于1982年4月14日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京都地方

法院重审。大阪高等法院在判决中声称："中华民国""在国家性质的体制下现实地统治、支配着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中华民国"仍是"没有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使被日本承认为合法政府之后，对于第三国领域内的前政府所有的财产，"不能援用它的继承权利"，"与不完全继承相同"。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根据上述理由居然将光华寮改判为台湾当局所有。光华寮住宿生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1987年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维持原判，从而再次严重损害我国的合法权益。

以上就是光华寮案的大体经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一房产一直由自治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加以管理使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和驻大阪总领事馆对光华寮一直给予了经常性的监督和指导。我国政府还拨出专款对该寮进行修缮，并继续安排中国留日学生在光华寮住宿。而且，自1974年以来，我国政府就此案向日本政府先后交涉了20余次，严正指出，光华寮是中国国有财产，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并敦促日方履行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担的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处理，尽快协助中方办理产权登记变更手续。但日本政府却以三权分立为由，一再推卸责任，致使这个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一严重地步。

记者：据了解，日本方面认为光华寮案只是一件普通的民事诉讼案，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日本方面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个案子从表面上看是一件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即房地产的所有人向法院要求，让光华寮内的住宿生迁出。用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的话来说，"被上诉人（在此是指所谓"中华民国"）对本案的要求是基于其房产所有权请求排除障碍。"但是，稍加分析，此案明显涉及到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问题。就拿所引用的上述法院意见来说，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即作为被上诉人的"中华民国"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否存在？对此，日本法院是持肯定意见的。这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早已在1949年被中国人民推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载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根据国际法上承认具有追溯力的理论和上述联合声明，日本国负有义务承认，"中华民国"自1949年就已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复存在。现在，作为日本国家机关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法院又怎么可以无视日本国所负的这一国际义务，转而承认所谓"中华民国"的存在呢？这无疑是对国际法和中日联合声明的严重违反，是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

另外，如前所述，既然"中华民国"已不存在，那么就引起另一个问题，即台湾当局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当局是否能以国家或政府的资格对中国国家财产进行支配和提出主张？前面所引用的日本法院判决说，本案是台湾当局"基本其房产所有权请求排除障碍"。这表明，承认台湾当局对光华寮这一中国国家财产具有所有权，是日本法院作出判决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否成立？我看大有问题。根据国际法，在一个国家对某外国新政府作出承认后，这个国家就应承认该外国新政府有权接管位于这个国家境内的原属于该外国旧政府的一切国家财产，同时承认，该被推翻的旧政府被剥夺了对上述财产的所有权。这就是国际法上所讲的承认的法律效果之一。此外，台湾当局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当局，未经中央政府的授权，根本无权对中国国家财产主张所有权并对其进行支配。这是一般的法律常识。

总之，完全有理由认为，光华寮案根本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而是关系到日本是否遵守两国间的协议和国际法准则的重大政治、法律问题，是一个国际法案件，涉及到另一主权国家的利益的原则问题。

记者：日本方面说，在国际实践中，未被承认的政府可以被外国法院认定并享有诉讼权利，另外，日本和台湾之间至今保持着人员和贸易往来，这些都表明，日本法院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并受理其提起的诉讼是正确的。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朱：查阅一下国际法论著，不难发现，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一外国新政府未被本国政府承认时，法院可以认定该外国政府的存在，并承认它的法律地位和诉讼权利。这样做的理由是，一般来说，一个政府的存在以及它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地位是独立于他国政府承认的客观事实。法院为解决当事人之间在权利义务问题上出现的纠纷，可以在本国政府未承认某外国新政府的情况下，去认定该政府的客观存在，并承认它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在一些国家法院的实践中，也可以找到这方面判例。最典型的就是苏联政府。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33年美国政府最终对其予以承认这一期间内，苏联政府国有化法令的法律效力以及苏联政府在海外的权益等等，在不少案件中，都得到了美国法院的承认。

现在，日本方面，包括一些日本国际法学者，认为上述理论和案例为日本法院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并受理其提起的诉讼提供了"有力的"先例和根据。我认为，上述有关理论和法院实践与本案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首先，上述国际法学者讲的是在本国政府未承认某一外国新政府时，法院可以认定该外国政府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但在本案中，中日间不存在着不承认状态，也不存在着未被承认政府这一客观事实，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却是，日本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早已在1949年被中国革命推翻，不复存在。现在，

日本法院怎么能在为本国政府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之外再去认定什么另一个"政府"的"事实"呢?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实上,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当局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当局,根本不能与主权国家的政府同日而语。如果日本法院坚持将台湾当局视为一个"政府",那它就不是在认定事实,而是在创造所谓"事实"了。这与上述国际法理论大相径庭。

其次,日本同台湾间的关系也根本不同于上述案例中处于相互未承认状态下的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在后一情况下,苏联政府虽未得到美国的承认,却有效统治着苏联国土,因而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享有国际法上的地位和权利。而前一情况则不同。日本于1972年郑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宣布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一断交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断交。日台断交是日本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的必然结果。因此,对日本说来,台湾当局自称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就是非法的,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日本的视其为代表国家的政府,就是一种擅自毁约的不义行为,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另外,根据中日间达成的谅解,日台间只能维持民间往来的关系。这种民间关系本身就说明了台湾的实际法律地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外相立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终止日台间1952年签署的所谓"日华条约"。后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外,日本政府在中日航空协定签订时发表的政府声明中也明确表示:"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航空运输协定是国家间的协定,日台之间是地区性的民间航空往来。"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台湾当局根本不具有与外国政府缔结国际条约的能力。

以上分析,我想,有助于人们了解日本方面的主张是否真有道理。不难看出,日本方面借用未被承认的政府和日台民间经济关系来为其错误行为辩解,是一种牵强附会和混淆视听的作法。

记者:日本方面说,光华寮是所谓"中华民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购买的,因此,中国政府不应当继承。您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朱:我在一开始介绍情况时就已指出,光华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从大陆掠夺的物资所取得的公款而购买的国家财产。这意味着,就光华寮的财产来源而论,它在本质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资财。因此,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应继承这一财产,而不论该财产的实际购买手续或产权登记手续为何时办理。

记者:日本方面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应完全继承前中国政府的财产,而只能部分继承或不完全继承。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我认为,日本法院在这里犯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有意混淆了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的区别。不完全继承或部分继承只发生在国家继承的场合,即一国的国际人格发生部分变化的时候。比如,前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取得独立后,英、法两国的国际人格便发生了部分的变化。这些新独立国家因取得了新的国际人格,从而部分地继承了位于本国境内的原属于英国或法国的国家财产,但不是全部继承英、法的国家财产。但是,一国国内的政府更迭丝毫不影响该国的国际人格,因此不发生部分继承问题。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常识。历史上,英国的国际人格没有受到1649年、1660年和1688年革命和复辟的影响。法国经历了1815年、1830年、1848年、1852年、1870年、1940年和1946年等历次政府的变化,法国仍是同一个国际人格。中国革命的胜利,导致中华民国政府被推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立,但是,中国的国际人格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只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

在发生政府更迭的情况下,新政府当然继承旧政府所拥有的无论位于本国境内或境外的一切国家财产。这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并得到国际实践的充分证实。通过对你提出的前几个问题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方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能部分继承前中国政府的财产的主张,实际上是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前提的。这不但是对国际法理论的歪曲,更是无视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不法行为。

记者: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光华寮问题承担责任,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中方没有理解日本三权分立的法律制度所致。您认为是这样吗?

朱:我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的托辞。什么是三权分立?我们并不陌生。它是一国国内关于国家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平衡、调整各国家职能机关相互间关系的国内法律制度。而光华寮案是一个涉及重大国际法原则、事关中日间协议和条约是否遵守的政治性法律案件。光华寮问题的正确解决只能依据公认的国际法和两国间的协议和条约才能实现。同样,如果日本方面错误地处理本案,中国方面自然要根据国际法和两国协议,而非日本国内法,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日本的国内法对中国不具有约束力。另外,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一国不得以其本国国内法的规定为借口,来为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辩解。这一点已为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认。日本是该公约的当事国。所以,日本方面以三权分立为由拒不履行国际义务的作法完全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再者,即便按照日本的三权分立制度,日本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国宪法第73条明确规定,处理外交关系的权力属于日本内阁。对于光华寮这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财产产权和涉及中日双边关系的问题,中国

政府当然要向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若拒绝采取措施，不加以妥善处理，实际上是在推卸日本宪法所赋予它的法律责任。

（3月16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光华寮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今年2月26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无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国际法准则，坚持将中国国有财产"光华寮"判归已被中国人民推翻、并被日本政府取消承认、法律上不复存在的"中华民国"所有。这一判决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法理上也漏洞百出，而且直接侵害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权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然而，近来，日本方面却不断宣称光华寮问题只是一般的"民事诉讼"，以图掩饰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并借机散布中方在此问题上"小题大作"、"干涉日本内政"等等很不友好的言论。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再次以历史和事实来说明光华寮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光华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变卖侵华日军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取得的公款购置的中国国有财产。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之前20多年，一直由中国侨胞自主管理使用，恢复邦交后至今，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中国政府还曾拨出专款予以修缮。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实践，一国发生政府更迭时，新政府理所当然地继承旧政府所拥有的该国在境内境外的一切国有财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根据两国政府就日台关系达成的有关原则和协议，日本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就有义务不再与所谓"中华民国"发生任何关系，台湾当局也理所当然丧失在日本法院以政府的资格就中国的国有财产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中国政府早自1974年开始，就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承担应负的国际义务，维护中国政府的合法权益，尽快采取妥善措施，变更光华寮的产权登记。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一直以"三权分立"的国内制度为由搪塞拖延，日本司法机关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1977年接受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提出的非法上诉，并做出错误的判决。尤其是大阪高等法院在今年2月的二审判决中，竟然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于不顾，故意歪曲引用国际法的案例，编造出一些国际上闻所未闻、似是而非的所谓法律根据，为台湾当局继续在已对其撤销承认的国家中以政府资格行使权利进行辩护，致使事态发展到目前这样的地步。

十分明显，光华寮问题决不是一般的民事诉讼，而是以司法裁判的形式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治问题，其实质是日方有那么一些人仍然坚持早已经被历史抛弃的"台湾归属未定论"，企图借光华寮问题在国际上开创一个"先例"，突破1972年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日台之间关系只能维持民间、地方性往来的协议。

中日两国政府1972年签署的联合声明载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当时的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签署联合声明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郑重表示："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我国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具体地说，公告第八条为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上述历史经纬清楚地表明，日本政府已经承认台湾应当归还中国，并承担了不得违背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台湾地位的协议的国际义务。日本的某些人，如果要在事关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台湾当局以某种国家形态，使其在已对其撤销承认的国家里取得国际法主体的资格，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背道而驰的，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鉴于历史上的原因，我们对这一动向不能不予以严重的关注。

在光华寮问题上，日本有一些人竭力利用人们不太了解真相的情况，以日本的"三权分立"为借口，指责中国"干涉日本内政"、"小题大作"，以阻挡中国方面的严正要求。

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日本国内采取何种体制是日本内部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光华寮一案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国家财产，关系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两国政府曾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就两国关系签订和达成了共同应当遵守的国际协议。在此情况下，怎能以一国的国内法不容干涉为口实而凌驾于国际协议之上，置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准则于不顾，强要别国容忍这种违反国际协议的所谓国内法裁判呢？日本国宪法规定"处理外交关系"权力属日本政府；还载明："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对于光华寮这样一个事关是否履行国际协议的双边问题，中国政府不找代表日本国家的日本政府交涉又去找谁呢？"三权分立"是日本内部的制度，而日本国对外应当是统一的。应该指出，真正干涉别国内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借光华寮案来制造"两个中国"，从而阻碍中国实现统一的人。

诚然，光华寮只是中国留日学生居住的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宿舍，但是，此案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对其予以容忍，就是容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是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尊严的大事，是关系到中日联合声明及和平

友好条约能否继续得到实施和贯彻的大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此维护主权，伸张正义，决不是什么“小题大作”。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友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两国亿万人民的友好愿望，两国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以及邦交正常化以来共同培育的友谊硕果，都是值得永远珍惜和精心维护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衷心希望日本方面能够认识到光华寮问题的严重性，切实加以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危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我们相信，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对损害中日友好关系政治基础的言行是不会允许的。中日友好的潮流必将不断前进！

（6月4日《人民日报》）

中葡共努力　澳门指日归

背景介绍

自从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以欺诈手段占领澳门后，中国人民就为恢复澳门主权进行了不懈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与葡萄牙政府共同合作，自一九八六年开始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政府达成共识。一九八七年三月，两国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赵紫阳总理和席尔瓦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国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材料：

·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
· 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

材料一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4月13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夏令时）在北京正式签署。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代表各自政府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正式签字仪式1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

今天，签字大厅里摆着一张铺有墨绿色绒布的长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葡两国国旗。在一片庄重的气氛中，赵紫阳和席尔瓦在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入座，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签字后，两位领导人交换了声明文本，并热情握手。这时，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早在签字仪式前一个半小时就开始在西大厅的五层金属架上占据有利位置的近200名北京、香港、澳门和一些外国记者，用录音机、照相机、电视录像机和笔记本记录下了这个庄严的时刻。

接着，赵紫阳和席尔瓦发表讲话，祝贺两国政府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圆满地解决了澳门问题。他们指出，联合声明的签署开辟了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新的前景。

赵紫阳说，在中英两国政府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政府在较短的时间里又就解决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为在当今世界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树立了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他说，联合声明解决了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同时也为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澳门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也博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赵紫阳说，《联合声明》的签署，是中葡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两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都能以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为重，并从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充满了认真和合作的精神。他对席尔瓦总理本人对促成协议达成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赏，还对中葡会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葡萄牙朋友和中国同事致以诚挚的谢意。

赵紫阳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也是完全行得通的。

他说，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遵循这一方针，为全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赵紫阳说，协议是中葡双方经过认真谈判达成的，它体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他确信中葡双方对这一协议将会全面和认真地贯彻执行。他希望广大澳门同胞和各界人士同心协力，为促进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及其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席尔瓦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刚刚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在友好、融洽和谅解的气氛下进行的谈判已经结束。他说，“为了澳门及其居民未来的处境，并尊重我们两国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彼此都一直十分注意寻找最佳的解决办法。”

他强调指出：“联合声明的签署，庄严地确定了我们两国就移交葡萄牙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的时间和条件所作的承诺。在维持现状和现有责任期间，葡萄牙将竭尽一切努力来保持澳门的稳定并促进澳门及其居民的经济发展。”“除了已有的高级政治接触和外交渠道，还建立了磋商和交换情况的机构，它们将使政权移交得以顺利进行。”

他说，“我还要特别强调，我们签署的联合声明还具有另一种意义，这就是它为葡萄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前景。”

席尔瓦说，“我相信，我们签署的协定是我们两国人民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我们懂得如何作出和平、谅解和进步的榜样。”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葡萄牙外交部长皮雷斯·德·米兰达等。

参加中葡澳门问题会谈的两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专程前来参加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观礼的50位澳门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持续了12分钟。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了仪式的全过程。

（新华社讯，4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

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谈判，昨天在北京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我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同时，还作出了使澳门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安排。这是继香港问题解决之后的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当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之际，传来这个喜讯，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人民处于被压迫、受屈辱的地位。从1557年算起，澳门在外国统治下长达400多年。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能解决澳门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主任提出三大任务之后，我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终于使这一问题获得解决，恢复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洗刷了民族耻辱。解决澳门问题，我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大道上又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无疑将永垂史册。

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又一次证明邓小平主任关于“一国两制”的方针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方针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根据这个创造性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方针，我们在1984年已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两年多来，香港不仅保持了稳定、繁荣，而且经济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今中葡两国政府又解决了澳门问题。澳门在过渡时期以及中国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同香港一样，仍将保持资本主义的制度，以利于它的稳定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将继续发挥在统一祖国大业中的作用。“一国两制”作为我们实现祖国统 一大业的既定国策，是决不会改变的。中国政府贯彻“--国两制”方针是有诚意的，是充满信心的。

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是中葡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已就澳门问题达成谅解。两国建交以来，友好关系不断发展。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主任会见前来我国访问的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埃亚内斯总统也表示，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中葡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坦诚友好的接触，为顺利解决澳门问题铺平了道路。两国政府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于达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协议。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草签，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希望两国政府继续本着友好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好过渡时期中的各种问题，共同为全面贯彻《联合声明》，为进一步推进中葡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努力。

澳门问题的解决，完全符合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中国在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管理，实行高度自治。这充分表明，中国政府考虑了澳门的实际情况，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因而为各方所接受。我们认为，这些政策的制定，既有利于澳门的稳定发展，有利于澳门居民，也有利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澳门同胞，爱祖国，爱澳门，拥护祖国统一。我们相信，澳门同胞有能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祖国的强大后盾，把澳门管理好，建设好，为澳门在1999年的顺利移交作出贡献。澳门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一样，充满希望，无限光明。

（3月27日《人民日报》）

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背景介绍

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至六月二日，大兴安岭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大火是由于林业职工违反操作规定引起的。大火持续燃烧近一个月，横贯漠河、塔河两县；烧毁森林87万公顷，民房40万平方米，死亡193人。

在救火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奋不顾身，与火魔搏斗，终于制止了大火的蔓延。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纷纷援助灾区，帮助灾区重建工作。

火灾过后，国务院撤换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林业部主管领导。

材料：

- 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 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

材料一　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火灾。

5月6日，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有6处起火。漠河县的西林吉林业局的河湾、古莲林场和阿木尔林业局依西林场因野外吸烟和使用割灌机时违反操作规程跑火而引起山火，塔河县塔河林业局的盘古林业公司也在5月6日发生山火。经过白天和当晚的扑打，火情有所控制。由于7日傍晚刮起了8级以上的偏西风，火势复起，迅速蔓延，火头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向东推进。7日午夜时分，漠河县古莲的火头向东推进了100公里，越过了铁路、公路、河流，先后烧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所在地和这3个局的7个林场、4个半贮木场。同天夜里，塔河县盘古的火同样猛烈异常，火头在4个小时内向东北方向推进60多公里，相继烧毁盘中、马林两个林场所在地。5月8日，风力减弱，这时漠河县境内和塔河县境内已分别形成面积为30万和20万公顷的大火场，损失伤亡惨重，通信、交通中断，当地已无力控制火场，火势继续向四外蔓延。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这次森林大火的扑救工作十分重视。自5月7日起，人民解放军迅速调集兵力投入扑火救灾战斗。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扑火领导小组，林业部也成立了扑火救灾领导小组，随时研究扑火救灾工作。5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扑火救灾塔河前线总指挥部。5月12日，李鹏副总理、陈俊生秘书长到火场视察，研究部署了扑火救灾的工作。5月25日，在火场形势发生转折的时候，田纪云副总理和陈俊生秘书长又到火场视察，并对灭火后的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作了明确部署。

这次扑火救灾，得到了很多省区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援和有力配合。参加这次扑火的军警民共58800余人，汽车1300多辆、飞机96架，在运输、通信、医疗卫生、物资供应等方面采取了军地一体化的保障措施，有效地保障了扑火前线的需要。采用的扑火方法是现代化技术与传统方法相结合，部队、群众和专业队相结合。除了就地取材打火，也采用了现代化技术手段，主要是：一、人工降雨、化学灭火、风力灭火机、工兵爆破开辟防火隔离带，以及以火攻火、坦克开路、推土机翻土等办法。在侦察火情方面，用装备有红外线深测仪的飞机侦察火情，用飞机照相、卫星照片分析火情。

经过顽强扑打，东部塔河县境内火场5月19日基本控制，西部漠河县境内火场25日也基本得到控制。26日，东西两大火场的明火全部扑灭。5月31日以后，由于铁路机车甩瓦飞火，又在火区外秀峰与塔河之间发生火灾，再度威胁塔河县城，经过2天扑打，于6月2日凌晨将大火扑灭。6月2日下午至3日上午，整个火区普降中雨，全体军民冒雨清理火场，消灭一切暗火、残火，终于取得了扑火的彻底胜利。在连续28个日日夜夜里，军警民扑灭火点达1700余处，开辟了总长达891公里的3条防火隔离带，转送灾民9万多人次。

这次森林火灾，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受害森林面积达87万公顷，森林蓄积量7360万立方米，其中被烧毁的3770万立方米，价值约40亿元。烧毁了城镇、民房、贮木场、仓库和其他许多设施，据统计，这次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达526661658元，占1987年全国火灾总损失的65.4%。大火使5万多人受灾，死亡193人，受伤170人。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乱、纪律松弛、违反规章制度、违章作业和领导上严重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为了严肃认真地处理这次火灾事故，1987年6月6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撤销了杨钟的林业部长职务；接着，国务院又撤销了林业部主管森林防火工作的副部长董智勇的职务，并责成林业部和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林业企业的防火制度、防火组织进行认真整顿，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

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4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来慰

问电，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和香港地方政府分别提供了援款和物质、技术帮助，一些国家的红十字会和商业公司也提供了援助。到1987年底，林业部通过各种途径为大兴安岭灾区筹集了国外援助及捐献2670万美元。国外援助捐赠的物资已全部用于灾区生产恢复和建设。

大火扑灭后，国务院迅速部署了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林业部和黑龙江省积极组织实施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使灾区人民在入冬前基本安了新家。

（吴富春）

材料二　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

国务院秘书长　陈俊生

（1987年6月16日）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作如下汇报：

（一）

大兴安岭是我国重点林区和主要木材生产基地，总面积2268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1344万公顷，森林蓄积量12.5亿立方米。这个林区有两个林业管理局，一个隶属内蒙古处处在治区，一个直属林业部。

这次森林大火发生在林业部所属管理局的北部林区。这个管理局所辖林区面积964万公顷，森林总蓄积量5.5亿立方米。从1964年起开发建设，到现在共建成8个林业局，年产木材450万立方米。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来势很猛，东部塔河、西部漠河两线同时起火。在西部，5月6日起火，到7日晚刮起了八级以上大风，5个小时火头推进100公里，铁路、公路、河流，甚至500米宽的防火隔离带都阻挡不住。一个晚上就烧毁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所在地和7个林场、4个半贮木场。当天夜间，东部塔河县盘古林场的火势也迅猛异常。到8日，从西部漠河县到东部塔河县境内已经形成面积为几十万公顷的大火海。此后，火势继续蔓延。经过25天的顽强扑打，于6月2日彻底扑灭。

这场森林大火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据统计，直接损失为：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70万公顷。烧毁贮木场存材85万立方米；各种设备2488台，其中汽车、拖拉机等大型设备617台；桥涵67座，总长1340米；铁路专用线9.2公里；通讯线路483公里；输变电线路284公里；粮食325万公斤；房屋61.4万平方米，其中民房40万平方米。受灾群众10807户，56092人。死亡193人，受伤226人。

森林资源的损失以及扑火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停工停产的影响，还没有计算出来。至于这场大火给周围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更不是用金钱能够计算出来的。

（二）

这次大火来势猛，面积大，灾情重，需要一面组织扑火，一面疏散安置灾民，任务十分艰巨。

在整个扑火战斗中，国务院始终把坚决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损失，作为总方针。

参加这次扑火的军民共58800多人，其中解放军34000多人，森林警察、消防干警和专业扑火队员2100多人，预备役民兵、林业工人和群众2万多人。

参加这次扑火的队伍是多层次、多兵种、地空结合的。在扑火中综合利用了多种手段。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凡能利用的手段都尽可能地利用了，较好地发挥了综合的灭火效能。

在组织指挥上，针对火场面积大、扑火人员多的特点，强化了第一线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根据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前线总指挥部，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任总指挥，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石宝源、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周文华、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白俊卿、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徐有芳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下面设立了五个分指挥部，实行分片指挥。事实证明，前总指和各分指的工作是得力的、富有成效的。

这次扑火实行了军警民三结合，在扑火行动中，解放军、专业队伍和职工群众三方面力量协同动作，显示出了较强的战斗力。

这次扑打大面积的山火，整个队伍的行动，既坚决、迅速，又没有蛮干。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国务院领导同志反复强调既要扑灭大火，又要保障扑火人员的生命安全。扑火中，不打顶风火、不打上山火、不打树冠火，也不是只打无防，只打不清，而是宜打则打，宜防则防，有打有防，打防结合。当火势较弱时，就主动出击，及时扑打。当火势过猛，火头过高，难以控制，又逼近预定防线时，就巧用风向和有利地形，迎面烧火，以火攻火，将火头堵住。舍小保大。当火线较长，火势较猛，森林较密时，就先切断火线，小块封闭，并后退一段距离，开通一条隔离带，将火截住。这次扑火中共打出隔离带总长达8891公里，它凝结着参加扑火的58800多人的血汗，不仅对围隔这场森林大火起到了控制作用，而且如果继续整修对防止今后发生类似大火也会起作用。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在这次扑火中尽管有58800多人参战，但火场上没有烧死一个扑火人员。

这场森林大火，是通过四个战役逐步消灭的：

(1)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镇烧毁后，有5万人口的塔河县城距火头只有20多公里，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第一仗就是"死保塔河"。到5月12日，在火头和塔河县城中间打通了一条隔离带，使塔河县城转危为安。

(2)到5月19日，东部火区的明火被消灭，并开通了300公里长的隔离带，东部火区危险基本解除。

(3)5月20日以后，集中扑火力量于西部火区，经过6个昼夜奋力扑打，到5月26日凌晨，西部火区明火也全部扑灭，并围绕这个火区开通200多公里长的隔离带，扑火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4)5月26日以后，集中力量消灭余火、残火、暗火，防止死灰复燃，并继续开辟隔离带。到6月2日，按计划891公里防火隔离带全部开通。同日整个火区普遍降雨，全体军民冒雨清理火场，消灭一切暗火、残火，终于取得了扑火战斗的彻底胜利。

大兴安岭这次大火虽然彻底扑灭了，但是发生森林火灾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因此，绝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还要尽力消除各种火灾隐患，发现林火要及时组织优势兵力迅速扑灭，防止小火酿成大火。

(三)

这场森林大火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扑火斗争的彻底胜利，充分显示了全国人民的向心力，充分显示了广大军民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高度责任感，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动员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人民解放军是这次扑火救灾的主力军，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大火发生后，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雷厉风行，迅速组织兵力赶到现场，全力以赴、奋不顾身地投入扑火战斗。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同志两次亲自到火场前线视察部署，及时调集力量。449名团以上干部在第一线组织指挥扑火。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连续奋战，扑灭了1700多个火头，开辟了数百公里防火隔离带，抢救疏散群众一万多人。很多指战员带病带伤不下火线，涌现出很多可歌可颂的英雄集体和模范人物。解放军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顽强战斗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武装森林警察和公安消防干警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由于他们装备较好，手段比较先进，有丰富扑火经验，因而在打火头，消灭大火、险火上起到了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

林区职工、群众是扑火的重要力量。他们熟悉山区地势和气候特点，富有扑火经验，同解放军、专业队伍密切配合，为赢得扑火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空军、民航打破常规，超强安全飞行1500多架次，空运2400多人次，配合气象部门人工降雨作业18次，降雨面积2万平方公里，出色地完成了侦察火情、空降、空投和运输任务。

铁道部门承担了扑火救灾的繁重运输任务，开出了大量专列，以最快的速度把部队提前运输到火场；安全周到地转移疏散灾民5万余人次；扑火救灾物资随到随运；领导干部亲自到一线调度指挥，保证了通往灾区的铁路运输畅通无阻。

气象部门成立专门小组，严密监测大兴安岭森林火情，及时提供火区卫星资料和天气预报，开展了人工降雨作业，同地方高炮部队配合发射降雨弹4700发。

邮电部门争分夺秒地抢修被毁的通讯线路和设施，派出专门通讯车到第一线服务，保证了通讯联系。

地矿部门主动派出装有红外线扫描装置的专用飞机，协助解决因烟雾弥漫难以侦察火情的困难。

民政部门及时救济和疏散安置灾民，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合作，使5万多灾民有吃、有穿、有住。

公安部门积极侦察火灾原因，采取了封山、清山等措施，加强治安管理，维护了灾区社会秩序的安定。

教育、商业、医药、卫生、物资、机械、化工、轻工、煤炭、交通、文化等部门和保险公司、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单位等，都为这次扑火救灾作出了贡献。

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上下动员，全力以赴，为扑灭大火和安置、救济灾民做了大量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参加这次扑火救灾的广大军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参加扑火救灾的全体指战员；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分别致电，亲切慰问扑火救灾的全体人员。

吉林、辽宁、广西、宁夏、北京、天津、上海、陕西、江西、安徽、广东、青海、贵州、福建、山东、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援藏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中国军事科学院，第一第二汽车厂、大庆油田、石化总公司、光大实业公司、鞍山钢铁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和驻外机构，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科技人员、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青年学生、少年儿童、留学生、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国外侨胞等纷纷来涵、来电，捐款捐物，提供建议，对这次扑火救灾给予了积极的支援。

许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发来慰问电。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我国灾区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并捐赠资金、物资，提供援助项目。联邦德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等国家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日本、瑞典、挪

威、英国、芬兰、意大利、法国等国的红十字会，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外国企业驻京办事处、外国专家等都提供了物资或资金的援助。

港英政府对这次特大火灾十分关注，捐赠了救灾物资和资金。

国内外为灾区提供的各项捐赠，都及时地转运到灾区，对扑火救灾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政府对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发来慰问电，对向我国提供捐赠的国家（地区）政府、国际组织和团体、企业、个人深表感谢。

（四）

这次森林大火的发生，教训极为深刻。

一、林业部领导思想麻痹，防火观念淡薄。今年2月5日，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今年春季干旱严重，林业部要注意护林防火工作，确定一位部领导抓防火，加强值班；要对今春护林防火加强检查，派出检查组检查护林防火设施及工作落实情况；指出要注意各大林区的护林防火工作。国务院这些指示，没有引起林业部主要负责同志应有的注意。

大兴安岭林区今春特别干旱，火险级高，很容易发生火灾，但林业部却没有重视抓这个林区的护林防火工作。

事实表明，林业部主要负责同志对护林防火工作很不重视，官僚主义严重，对酿成这次特大森林火灾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

这里应当指出，多年来，林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包括林业部的职工，在艰苦条件下，为我国林业资源的培育和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要充分肯定的。在这次大兴安岭扑火斗争的关键时刻，林业部的扑火救灾领导小组和派到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以及火区的广大林业职工，为扑灭这场大火同样做出了贡献。

二、企业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废弛，职工纪律松懈，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作业。现已查明，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这个林区防火制度废弛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比如，在防火期，从外地流入林区的人员随便进进出出，对进山人员发许可证的管理制度被取消，防火期封山、搜山制度也废弛了。在流进人员中，也没有进行护林防火、安全生产、法制的教育。林区管理松松垮垮，有章不循，有禁不止。进山人员随便抽烟弄火。就在这场大火扑灭之后，目前一股又一股的明火仍时有发现，可见这一地区火灾的隐患、漏洞很多。这种状况说明，不从思想上、制度上、纪律和法律上加强管理和教育，林区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

三、防火力量薄弱，专业队伍很不健全。这次扑火战斗证明，森林警察对护林防火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支队伍的建设被忽视了。在这次火灾中遭受惨重损失的漠河县，竟然在今年防火期之前的3月份撤销了一个有76人的森林警察中队，人为地削弱了专业消防力量。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目前森林警察队伍无论从数量上、素质上都远不能适应需要。应该有计划地加强，力争做到一旦发生火情，就能够依靠自己的专业队伍就地扑灭，打早打小打了，不使小火酿成大祸。

四、林区防火的基础设施很差，远远不能适应护林防火的需要，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面积是伊春林区的两倍，而瞭望台仅31个，不足伊春的1/3。陕西渭南林业机械厂生产的风力灭火机是有效的灭火工具，一个灭火机的灭火能量可顶十几个人。而大兴安岭林区风力灭火机只配备301台，是伊春的1/3，控制火灾能力很差。大兴安岭林区道路很少，目前每公顷平均只有1.1米，防火隔离带也很少，着了火就连成一片，人、车都很难上去。这是造成这次扑火难度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之，林区防火基础设施必须相应加强。对这个问题，各省、区、市要注意，林业部门要注意，有关部门也应考虑给予应有的支持。

五、“柈子城”是林区的一大隐患。林区许多住房都是“板夹泥”的，而且到处都是板杖子、木栅子、劈柴柈子。据调查，平均每户有30立方米的木柈子，可供做饭取暖烧几年。全大兴安岭地区职工群众每年要烧掉60万立方米木柈子。这不仅是资源上的浪费，而且给城镇安全带来隐患。这次大火所以烧毁了城镇，“柈子城”是个重要因素。因此，应当下决心清理“柈子城”，可以采取集中管理的措施，制定相应的政策，实行以煤代木等办法解决。

（五）

对这次特大森林火灾，国务院是很重视的，对扑火工作的指导是及时的。赵紫阳总理随时掌握重要情况，明确提出要大力组织扑火救灾，迅速查明起火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5月8日国务院接到火情报告后，李鹏副总理立即告林业部尽快摸清火情，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9日上午，李鹏副总理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火情，与解放军领导机关商定调集部队参加扑火，并决定成立国务院大兴安岭森林扑火领导小组。同时在林业部成立由副部长刘广运同志负责的扑火救灾领导小组，做具体工作。

5月12日，李鹏副总理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了塔河，察看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和东西两线火场，看望和慰问了扑火第一线军民，并在塔河召开现场会，听取了第一线指挥部的汇报，研究和部署了扑火救灾的全面工作。根据火势越来越大的形势，同刘精松司令员一起，决定增调部队指战员20000名，确定把扑灭明火作

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肯定了"三结合"、打防结合、以火攻火、打隔离带的经验。提出要安置好受灾群众，确保他们有吃、有穿、有住，生病的有医有药。要大力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5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同志牵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大兴安岭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随后，领导小组到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提出了具体方案。

5月19日，万里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李鹏副总理和林业部扑火救灾领导小组的汇报。提出要抓紧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特别要保证灭火工具的供应，尽快将火扑灭，并妥善安置好受灾受伤群众。会议严肃批评了林业部领导上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

5月25日，田纪云副总理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大兴安岭灾区，检查了解扑火救灾情况，慰问扑火军民和受灾群众，看望了伤病员，察看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受灾现场和防火隔离带等设施，并在塔河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现场办公会，听取了前线总指挥部的汇报，对如何夺取扑火战斗的彻底胜利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作了研究和部署。会议要求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余火、残火、暗火；要大力宣传和表彰扑火斗争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要足够估计这场火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尽一切努力安置好灾民，确定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原则，对多渠道筹集资金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再一次强调要坚定地完成开通防火隔离带的任务。

在整个扑火救灾过程中，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扑火前线日夜保持联系，直接了解和掌握火场的情况，及时作出部署，并帮助前线总指挥部解决问题，组织各有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进行支援，保证了前方、后方协同动作，共同为扑火第一线出力。

在扑火斗争取得胜利后的6月6日，万里代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了孙维本和刘精松同志的汇报。田纪云副总理对这场大火产生的原因、严重危害、深刻教训和今后在受灾林区重新植树营林等工作讲了话。会议作出了《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决定》。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对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也必须严肃处理。会议要求，各级林业部门和有关地区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执行森林法和消防条例有关护林防火制度的规定，严防和及时扑灭森林火灾。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把安全生产当做头等大事，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国家和职工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防重大事故的发生。会上，万里、薄一波同志就在国家机关中反对官僚主义问题讲了话，指出了官僚主义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害，要求林业部门要反对官僚主义，国家机关所有部门都要反对官僚主义。

目前，国务院各部门都在联系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决定，找出自己的问题，制定改进的措施。

以上汇报，请审议。

（新华社讯，6月17日《人民日报》）

达赖美国共跳梁 分裂西藏造骚乱

背景介绍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然而，自达赖喇嘛叛逃国外之后，与美国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一直欲把西藏分裂出去。六月到九月，美国参众两院大肆宣扬"西藏独立"论调，干涉我内政；达赖喇嘛趁机大肆活动。在他们的挑唆下，九日、十日，拉萨先后发生两次由少数分裂分子制造的骚乱，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材料：

- 极少数分裂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
- 外交部、国家民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拉萨骚乱事件及有关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 班禅副委员长在青海发表讲话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

材料一　极少数分裂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

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拉萨先后发生极少数分裂分子制造的骚乱。现已查明，这两起骚乱是在达赖集团煽动和策划下搞起来的，目的是破坏祖国的统一，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局面，以配合达赖正在国外进行的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

9月27日的骚乱发生在上午10时。拉萨市中心闹市区有21名喇嘛和其他5人举着"雪山狮子旗"，嘶喊"西藏要独立"的反动口号进行游行，还向围观的群众发表煽动性演说。公安人员为维持秩序，制止这种非法活动，这伙人竟然辱骂和殴打公安人员，有意制造事端，但骚乱不到一小时即被平息。

10月1日上午10时50分，拉萨大昭寺广场出现10余名身披袈裟和数十名身份不明的人，打着9月27日同样的旗子，呼喊"西藏要独立"的口号，，绕八角街游行，并强拉过路人参加。还挨家挨户威胁说："达赖喇嘛要搞西

藏独立,我们都要跟着干,谁不参加游行就砸烂谁的家。”当公安人员和欢庆节日的群众劝阻他们不要进行违法活动时,这伙人一哄而上,围攻殴打公安人员,抢夺枪支,抛石块打行人。为对行凶暴徒进行法制教育,公安人员即将挑动闹事最凶的41名喇嘛带离现场,到附近八角亭公安派出所问话。这时,其余的暴徒便尾随其后,煽动群众围攻派出所,并占领了派出所对面的学校高楼,用石块砸打派出所,还有的去附近抢掠商店、摊贩,把抢来的一批毛衣、毛毯、大衣等易燃物品堆放在派出所门口,用汽油点燃焚烧派出所。八角亭派出所被大火烧着后,他们又用石块抛打赶来灭火的消防车辆和队员,阻止救火工作,造成车辆损坏,消防队员多人被打伤。在这场持续五六个小时的骚乱中,群众和新闻记者被殴打致伤的数十人,有数人被暴徒开枪射击或被石块打死;公安人员负伤的300余人;被暴徒掀翻、砸打、烧毁的汽车、摩托车40余辆;八角亭公安派出所及相连的2座楼房被烧毁,对面一座小学的部分窗户被打碎,几百张课桌椅被砸烂。骚乱于当晚平息。

(石聿)

材料二　外交部、国家民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拉萨骚乱事件及有关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李金华和国家民委政法司副司长范培廉10月7日下午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西藏拉萨10月1日发生的骚乱,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为配合达赖集团在国外分裂祖国的活动而制造的一次政治事件。这次骚乱与达赖喇嘛不久前访问美国要求西藏独立有关,而不是偶然的巧合。

李金华说,达赖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妄想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来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但他的目的是绝不可能得逞的。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涉。

有一名外国记者问,根据外电报道,这次拉萨骚乱事件中有19人死亡,但中国官方报道只有几个人死亡,实际情况如何?范培廉回答说,据目前查明,在骚乱过程中死亡6人,19名公安人员受重伤,还有更多的人受了轻伤。发生伤亡的原因是,有的暴徒抢了公安人员的枪支,并在人群中开了枪,还抛掷石块。6个人就是在这种骚乱中死亡的。维护秩序的公安人员严格遵守上级命令,没有开枪,没有还击,因此不少公安人员受伤,有的还受了重伤。

范培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指出,我们也注意到,国外有的新闻机构对这个问题的报道是失实的。有的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不全部了解情况,道听途说;有的是有意夸大甚至歪曲。例如,10月5日在西藏日喀则有1000多藏族群众集会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闹事,有的外国通讯社却把这件事歪曲成在日喀则也发生了骚乱。

有记者问:“达赖说,希望在这次事件中西藏政府不要使用暴力,使用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

范培廉说,我们注意到了达赖讲的这些话。但使用暴力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受达赖集团煽动的搞分裂活动的暴徒。他们烧汽车,烧房屋,乱打人。相信诸位从我国报纸所登的照片和电视新闻中已经看到,一些外国新闻机构也发表了类似的图像。反诬我们使用暴力,这是十分荒谬的。

范培廉对记者说,这里,我顺便告诉诸位,达赖和一些外国舆论说什么我们在西藏杀害100万藏族人,并且向西藏大批移居汉民,现在已达到750多万,这纯属造谣。

范培廉向记者们介绍了如下的数字:1951年西藏藏族人口为110万,1959年为120.6万人,到了1987年已增加到近200万人。他指出,说过去在西藏杀了100万藏族人民,是十分荒谬可笑的。据统计,西藏自治区目前的人口总数是202万多,其中藏族人口为193万多,占总人口数的95%以上,汉族仅有7.3万多人。这些汉族人大多是前去支援那里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除此之外,还有7000多门巴族、2000多珞巴族以及回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居民。把7万多汉族人说成750多万,这种谣言不值一驳。

在回答一名记者提出的“你们将如何处理闹事的西藏人”的问题时,范培廉说,对在这次事件中少数制造事端、触犯刑律的人,将查明情况,依法处理。

范培廉在回答记者提出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对拉萨少数人的骚乱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时说,据我所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现在正在青海省视察工作。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骚乱以后,他对此十分关心,非常气愤。他多次给中央打电话表示坚决谴责少数人分裂祖国的行径。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反对破坏民族团结,这是他的一贯立场。

一名记者问:“你们最近十分严厉地批评了达赖,是否说明你们对达赖的政策有变化?”范培廉回答说,中央对达赖采取的态度和5条方针没有变。这不是哪一个人制定的,而是中央的一贯方针。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多少外国人卷入拉萨的示威,你们是否拘留了外国人”的问题时,李金华说,有极少数外国人参加了这次旨在破坏我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骚乱。没有任何外国人遭到逮捕。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坚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朋友来中国观光、旅

游、访问或进行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同时，在华的外国人必须尊重我国的主权，遵守我国的有关法令，特别是《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在中国进行违法活动和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的活动。

一记者问："外国记者是否还可以去拉萨采访？"

李金华说，外国驻华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须提前10天书面或电话直接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办提出采访的具体要求，并征得同意。拉萨是开放城市，可是鉴于目前拉萨的实际情况，外国人现在还是不去为好。

一名外国记者问："今天西方报界将在印度采访达赖，你们是否有什么话要对达赖说？"李金华在答复时严正指出，我们反对达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从事分裂祖国和民族的活动；我们也反对任何外国组织以任何形式为达赖发表有损于祖国和民族团结的言论提供讲坛。

（新华社讯，10月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班禅副委员长在青海发表讲话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0月8日下午在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欢迎他到青海视察访问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破坏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的罪恶行径。他指出"要依照法律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它藏区的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作出贡献"。

班禅副委员长说："1980年到现在，我去过除西藏阿里、青海玉树、果洛以外的所有藏区，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西藏及其它藏区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民族和统战政策，平反了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妥善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藏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有了发展，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开放和修复了西藏著名的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四大寺等相当数量的寺庙，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传召'大会。广大藏族同胞心情舒畅，热烈拥护、衷心感激党的政策。大家都说怕政策变，怕变，就说明现在的政策好。现在，西藏及其它藏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各阶层人民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外的分裂主义集团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支持下，策动、唆使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骚乱，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这一罪恶行径决不会得逞。"

班禅副委员长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自元朝以来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汉族、藏族及其它民族一道，经过长期英勇奋斗，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祖国，组成了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西藏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他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西藏的安定团结，为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作不懈的努力"。

班禅副委员长指出："国外分裂主义集团策动在拉萨搞骚乱有两个险恶的目的：第一，与他们在国外进行的分裂主义活动相呼应、相配合，妄图向世界表明国内有支持他们的力量；第二，唆使极少数喇嘛在骚乱事件中当先锋，妄图诱使我们党和政府收起藏族群众最满意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重犯'左'的错误，对宗教采取压的办法，使广大信教群众同党和政府对立。但是，参与骚乱事件的极少数喇嘛，根本不能代表广大的活佛、喇嘛。绝大多数的活佛、喇嘛是反对这次事件的，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班禅副委员长殷切寄语藏族宗教界人士，要通过这次骚乱事件，提高识别能力，做到爱教先要爱国。他说："搞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

班禅副委员长说："党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定、稳妥地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现在拉萨日趋平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得人心，十分孤立。

我高兴地看到，西藏人民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这次骚乱异口同声地进行谴责，这说明党的现行政策深得人心，说明绝大多数人是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是维护安定团结的。西藏和全国各地一样，前途光明，大有希望。"

班禅副委员长是9月24日到达青海省视察工作的。他在视察了海东地区的循化等地后，于10月8日上午返回青海省省会西宁。

（新华社讯，10月9日《人民日报》）

风 云 人 物

徐 良

徐良(1961～　)北京人。1979年毕业于玉渊潭中学,未能考上大学。待业时,学习音乐知识。1982年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本科。

1985年,徐良受老山英雄事迹的影响,于12月毅然参军入伍。在部队中,刻苦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1986年5月2日,在云南前线对越作战中英勇负伤。回国后,被锯掉因受伤而不能保全的左腿。但是,他仍然以一个英雄的所作所为激励着当代大学生,鼓舞他们为祖国而奋斗。

赵 紫 阳

赵紫阳(1918～　)

在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今年69岁的赵紫阳去年11月初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不久,他出任党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今年初,赵紫阳视察了驻扎在华东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的3月21日,赵紫阳出席了军委召开的"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座谈会,并向到会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讲话。

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十三大之后,统揽全局,致力于贯彻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任务,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指导、督促各方面深化改革、加快对外开放,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推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年前年后他两下江南考察,随后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和七届全国人大本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势将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赵紫阳从18岁起在豫北家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0多年里,他在华中地区先后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和担任县、地区党委的领导职务。六十年代前期,他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段时间在工厂劳动。

从1971年起,赵紫阳先后担负内蒙古、广东、四川这三个省、区的领导工作,还先后出任过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委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赵紫阳从1973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是历届中央委员,在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82年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7年1月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从1980年起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赵紫阳担任总理后多次出国访问。1985年10月他在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西方新闻界以"从容不迫"、"显示了惊人的自信心"来形容赵紫阳在外交活动中的风度。

赵紫阳坚持每天跑步,善游泳,喜欢打乒乓球,有时还打高尔夫球。

在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因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李 鹏

李鹏(1928～　)担任了近5个月代总理的李鹏在1987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他是1949年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四位总理。

59岁的李鹏是一位电力专家。1948年,即建国前一年,李鹏去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期间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1955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回国后,任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吉林丰满发电厂总工程师。六十年代担任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辽宁阜新发电厂厂长和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1966年后,他历任北京供电局负责人、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京津地区的正常供电作出了贡献。

1979年后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在担任这些职务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察看了分布在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电站和建设工地。

李鹏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85

年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去年11月初他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从1983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主管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工业部门。从1985年起兼任国家教委主任。

李鹏常常出现在救灾第一线。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他到抗震救灾第一线，领导了电力修复工作。1982年夏天，黄河上游出现洪峰，他到西北青海省参加保护正在建设的黄河上游最大的龙羊峡水电站的指挥工作。去年5月他在中国最北部黑龙江省参加了指挥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

他亲赴浙江秦山和广东大亚湾考察中国第一批核电站的厂址。

李鹏1928年10月出生。父亲李硕勋是中共早期党员，是1927年著名的南昌起义的参加者。1931年秋，李硕勋赴海南岛主持游击队军事会议，途经海口时被捕英勇就义。母亲赵君陶也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位教育家，1935年去世。

1939年，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将这位当时只有11岁的烈士后代接到重庆，送到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读书。1941年后李鹏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读书。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熟悉李鹏的人士介绍，他平易近人，好友善交。和他往来的人中，既有政要、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也有普通人。他在家中有空还做家务，洒扫庭院。他通晓俄语，自学英语，爱好读书，知识广泛。

倪献策

倪献策，1966年9月入党。但他入党以来，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在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省长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于1987年被开除党籍。

材料　原江西省长倪献策被判徒刑

1987年3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对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所犯的徇私舞弊罪连同他所庇护的走私和行贿、受贿犯罪分子郭勇等人，作为一案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于同年3月19～21日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倪献策为徇姘妇郭晓红的私情，庇护郭晓红的弟弟郭勇走私犯罪，构成了徇私舞弊罪，于同年4月14日公开宣判，判处倪献策有期徒刑2年。对本案的其他犯罪分子，也同时依法作出了判决。倪献策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7年5月27～30日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法庭调查证实：1985年初，江西洪海电子有限公司和福建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违反国家限制进口录像机等产品的有关规定和海关法规，采取化整为零，伪装、隐报等欺骗手段，共同走私进口价值60万元的录像机2000台。当这批走私货物运至深圳文锦渡后，被文锦渡海关查获，认定已构成走私行为，决定没收全部走私货物，并课处罚款人民币150万元。洪海电子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郭勇便通过其姐姐郭晓红求助倪献策。倪献策为了徇郭晓红的私情，先后亲笔写信和打电话给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要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向海关疏通说情，要洪海电子有限公司委托的非诉讼代理人以其省长的名义，给海关总署打电话，向海关施加压力。尤为严重的是，当海关总署作出维持文锦渡海关的处分决定后，倪献策还一再利用职权，在单证不符、信用证过期、银行拒付款项的情况下，仍批准拨60万美元外汇额度为洪海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走私货款给港商。由于倪献策的上述行为，致使这次数额特别巨大的走私案件的直接责任者郭勇等人的罪行未能得到及时追究。倪犯已触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8条的规定，构成徇私舞弊罪。据此，认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倪献策一案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并当庭宣判：倪献策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审人民法院以徇私舞弊罪判处倪献策有期徒刑2年的判决。

（汪纲翔）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1897～1987)1987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因脑血管栓塞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艾黎同中国人民一起奋斗了60个春秋。他一生襟怀坦荡，正直无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终生未婚，却收养和照顾了一些革命烈士的遗孤。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艾黎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邓小平主席在1977年出席了艾黎80大寿的宴会，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北京市政府在1982年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3年后，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

1980年，艾黎立下遗嘱，要求后事一切从简。他要求把遗留的文物赠送给他长期战斗过的甘肃山丹县，把他的个人档案留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根据艾黎的遗嘱，他逝世后丧事尽量从简，除应各方要求向遗体告别外，不举行葬礼和追悼会。告别仪式后，艾黎的遗体由对

外友好协会负责人和他的亲属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遵照艾黎的遗愿，他的骨灰在北京存放一段时间后，送往甘肃山丹，撒在他当年带领培黎学校师生开荒种地的四坝滩上。

张兴让

张兴让（1937～　）河南宁陵人，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中国优秀企业家、“满负荷 工作法”的创造者。

他先后担任过石家庄市东风塑料厂生产科长、副厂长，1984年1月担任第一塑料厂厂长，创立了石家庄东方塑料联合公司，被人们誉为“张联合”。

从1985年起，他综合国内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方法，创立了“满负荷 工作法”。这种工作法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奋斗目标，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在实行承包经营和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围绕“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这个核心，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在发展横向联合、推行满负荷 工作法的同时，他还推行了企业资产股份制。满负荷 工作法和股份制的实行，增强了广大职工主人翁责任感，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保证了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1987年与1984年相比，该厂人均产值由28705元增加到51998元，提高80%；人均利润由3164元增加到6100元，增长了92%；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132.93天降低到61.2天，加快了71.73天。先后荣获“省轻工企业管理优秀单位”、市“明星企业”等称号，他本人先后被评为市、省、轻工业部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满负荷工作法在国内受到普遍欢迎，赵紫阳给予很高评价，赞扬这种工作法，“是系统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它符合中国的现状”。

张秉贵

张秉贵（1919～1987）北京人。生前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商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1955年他参加商业工作以来，在30多年的柜台生涯中，始终把本职工作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紧紧结合起来。在柜台上，他热情洋溢地为顾客服务，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精神，温暖了千百万顾客的心。他创造了一整套服务经验，练就了拿糖“一抓准”、算帐“一口清”等过硬的服务本领。晚年，他又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技术无私地传授给青年一代。

他的模范事迹曾在全国商业战线上广为流传，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本人曾多次获得党和国家授予的崇高的荣誉称号，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历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并获得了全国第一个特级售货员称号。由于长期积劳成疾，9月18日不幸病逝，终年68岁。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中共北京市委在他的病榻旁向他颁发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9月19日和20日，商业部和全国总工会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商业系统和全国职工认真学习他的“一团火”精神。

流行风

背景介绍

由于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开展，文学创作上的作品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为主，其他的则是反映改革的作品，但艺术成就均不高。

这一年，影视文学作品却异常火爆。喜剧片《父与子》受到热烈欢迎。《老井》、《红高粱》两部影片以新奇的角度获得了广大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并获得国际大奖。《末代皇帝》也一举夺得第60届奥斯卡电影节的九项大奖，震惊了世界。《西游记》、《便衣警察》、《乌龙山剿匪记》等一批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相应地，《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也在广大群众中传唱不衰。

流行口号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逐步

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到。以后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政治体制改革 指具体的政治制度或体制的改革。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改革措施有：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制度的形式确保领导与群众之间、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群众之间以平等的身份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商议，以便沟通信息，协调关系，促进整个政治系统的完善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之一。

透明度 原指物质透过光线的能力。也指水质指标，用以表示水的清澈程度。现引申指社会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即如何使党和国家的重大情况、领导机关的重要活动及时真实地让人民群众知道。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提出的一项全国性经济发展战略。即把整个沿海地区推向国际市场，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

国际经济大循环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即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转换机制，沟通我国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二头在外，大进大出 指原材料来源在外和产品销售市场在外，经济活动规模由小进小出到大进大出。是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内容之一。

三来一补 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易上马的企业创汇业务。"三来"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是对外贸易中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业务。"一补"是补偿贸易。指从国外购进设备和有关技术，再用该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作偿还。

两权分离 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经济体制上说，就是政企分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在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实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丰收计划 国家农牧渔业部、财政部于1987年起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经济技术战略措施。主要内容：把国内外农牧渔业的科研成果、先进技术，综合配套应用于生产，实现农村大面积、大范围、大幅度的增产增收。

高技术 是若干个技术非常密集的新兴产业。具有高增值作用，能带来高经济效益，并能广泛渗透到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如：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光纤通信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共同体的"尤里卡计划"，中国的"新技术革命的对策"都属高技术经济发展战略。

外向型经济 指一国或一地区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面向国际市场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大量出口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引进设备、技术。把对外经济贸易作为异向性的行业，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滑坡 原指地表斜坡上大量的土石整体地向下滑动的物理地质现象。现引申指社会某一领域的质量、水准或指数的下降现象。

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小说梗概：

1975年的黄土高原上，到处是灾荒和饥馑。家境穷困的孙少平考上了县高中。他忍饥挨饿，吃的是最次等的黑窝窝头。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吃低等伙食的郝红梅，贫穷的命运使他俩互相同情，建立了友谊。

孙少平的哥哥孙少安是生产队长。他与大队支书田福堂的女儿润叶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润叶高中毕业后到县城当了小学教师，住在她的二爸、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家里。而少安则因家贫中途辍学，回乡当了农民。县革委会另一个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看上了润叶，但润叶心里只想着孙少安。当她向孙少安袒露出爱心时，却遭到少安的拒绝。其实少安的心里也深深爱着润叶，只是身分、地位、经济的差异，使他忍痛割断了爱情。田福堂为了让润叶死了这条心，向公社揭发了少安给社员多分饲料地的事，少安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挨了批斗。羞辱、愤恨之下，少安经人介绍，迅速与外乡的一个姑娘成了亲。痴情的润叶得到消息，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不久，她与李向前勉强成婚，但从此精神几近崩溃。

严重的旱灾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东拉河上游的人们

纷纷堵坝截水浇地，地处下游的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经过周密的组织，一个月黑风高夜，双水村的干部们带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到上游毁坝偷水。他们组织了十几个腰圆膀壮的后生，像敢死队员一样，准备随时与上游的人拼命。但乐极生悲，由于金富、金强太贪心，把坝的口子挖大了，水像山洪暴发一样，冲毁了双水村的堤坝，人们的希望一扫而空。不久，又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金俊斌给洪水冲走了，噩耗传遍了双水村。事情闹大了，公社要追究责任，田福堂却病倒了。过去双水村做下成绩，都是田福堂在广播上介绍经验出风头，而这种不光彩的倒霉事，却轮上副书记金俊山，他在公社广播室里，向全公社人民检查了他们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

寒风凛冽的1976年初，“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进入了高潮，田福堂心血来潮，想用几千吨炸药把神仙山和庙坪山炸下来，拦成一个大坝，把哭咽河改造成米粮川。于是，双水村里鸡犬不宁，金俊山、金光亮等六户人家被连强迫带动员地搬迁出旧居，并要卖掉几万斤粮食买炸药。

孙少平好容易熬到高中毕业。在这期间，他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郝红梅看上了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顾养民，孙少平被冷落了。但他也成熟了。后来他参加了学校宣传队，到地区演出，从此结识了新的同学、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的女儿田晓霞。她把他带进了新的天地，他看了许多书。晓霞还让他有机会阅读《参考消息》，并偷偷传抄《天安门广场诗抄》。少平的眼界开阔了，懂得了许多天下大事，也获得了友情，抛弃了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他已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国家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使他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天生的气质和知识的力量，使孙少平的身上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吸引力。回乡后，他和田福堂的儿子一道，当上了民办教师。但是他的青春的血躁动着，他不甘于这种沉寂、落后的环境。

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了，孙少安几经磨难，开始重新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他痛切地感到生活的沉重，自觉地寻找贫穷落后的原因。在日渐开放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他已意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他决定实行承包责任制。这些没文化的农民，草拟了一份“承包合同”。这件事如同一颗炸弹，顿时使大队、公社，以及原西县革委会炸了窝！县委马上召集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情况汇报到地委，地委指示：坚决制止。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上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1978年新春，双水村里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的禁忌，闹起秧歌转九曲。双水村人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这一来，邻近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东坝河和哭咽河西岸到处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他知道，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新春的雷声即将震醒山野，黄土地即将解冻了……

（刘剑星据《花城》1986年第6期小说缩写）

（原载《文艺报》1987年2月21日）

材料　历史卷轴的初现

——读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南山　生民

在人们还未淡忘高加林、巧珍的悲剧，小说《人生》、电影《人生》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泯时，路遥又推出了他的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把历史推向比《人生》更远一些的时代，那是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期间，浩瀚盘桓的黄土丘谷上农民们的贫困和痛苦，新生活降临前朦胧的喜悦全景式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作品一方面写出了当时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濒临尾声而更加肆虐的政治灾难极其严酷的后果——那一次一次无谓的“阶级斗争”，那不让庄稼人自己整治土地的生产上的瞎指挥乱折腾，那在“打击资本主义”旗号下推行的完全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路线，结果使黄土地上勤劳聪慧的人们陷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境地。作品另一方面又着力落墨于几个农民家庭的描写，尤其是几个成长中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刻画，深沉感人地写出了城乡差别和极端贫困给他们的爱情生活带来的辛酸和凄恻。荒唐的政治、愚昧的传统、善良的人情，从县、社的干部群到村落里的宗族家庭，作品展示了立体错综的社会结构和巨大的文化空间，气魄十分宏大。

和《人生》一样，作品渗透了对这块黄土地——中华民族摇篮的全部炽烈的深情，回旋着渴待变革历史、改变命运的雄浑基调。作者仍然沿用现实主义的笔触，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推演着人物的遭际、性格的发展。能干的青年农民少安纵然和善良的女教师润叶青梅竹马、一往情深，也终难成为幸福的伉俪，少安弟弟少平和同样穷苦的女同学郝红梅之间的感情纠葛更是既动人肺腑又不得不遵循着沉痛的现实生活法则而变化。郝红梅的情感上的背叛显示了她性格的弱点，但更呼唤着人们的同情。作品对这两对青年之间曾有过的恋情渲染得越美好、越动人，其悲剧结果的感染力量也就越强大。婚姻越不能以爱情为基础，就越昭示出社会的落后程度。当然，这部小说比《人生》内容更广阔的是，不仅用婚姻爱情的内容来折射社会形态，还直接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多种角度深入地揭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巨变的必然性、急迫性及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给人以思想蕴藉的厚重感。小说的后面部分写到了可怕年代的结束，但是历史与政治的车轮却还保持着以往十年的惯性，只是人们已经

感觉到了惊蛰雷鸣、春潮汇聚的信息，卷已终，思未终，盼能继续看到黄土地大蜕变的描绘，这便足以说明小说的魅力。

这部长篇巨制也出现了一批栩栩动人的人物形象，有本色淳厚的老农，刚强的青年"硬汉"。贤淑的农家姑娘，也有一群流失在"左"的政治旋涡中的人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队干部孙玉堂，这是一个特定的荒诞时代产生的怪物，政治上天真稚拙，人格上卑下猥琐，日子已经穷得"一烂包"，却还一心一意干着更使日子"烂包"下去的"革命"。这个人物描绘的独特和深刻为文学画廊中少见。还有少安、少平兄弟既共有善良、正直秉性，但在人生与思想境界的追求上，弟弟具有更新颖的历史意识，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好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这就使人物性格的塑造具有较大的深度。当然，作者对自己钟爱的人物有一种过分的道德美化的倾向，不少人物在亲友家庭、爱情婚姻等关系的处理上，从伦理准则到方式态度都十分完美又彼此雷同，缺乏更个性化的透视。还有一个较明显的缺憾是，作品的节奏前后不谐调，整个结构是人物、事件头绪渐多，而描述却渐快渐粗、越写越匆忙，甚至大段的过场叙述代替了形象细腻的描绘，仿佛由工笔画转入了速写。因此有些人物后来就显得疲软无力，缺乏光彩。武惠良、贾斌一晃而过，他们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说一下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包括莉莉等，似乎是些多余人物。这可能同作者为了追求"史诗"的意识有关，他刻意让作品展示整个历史的流程，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包容进这部"卷轴"式作品里，但又不可能妥贴地写出这些重大事件同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和平凡生活的有机联系。于是他的审视不得不从形象的立足点转到意念的立足点上去，导致了有些内容的空泛和粗疏。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成败得失，自会有不同见解。但是作者一如既往深情地关注和思考着中国农村的过去和今天，中国农民的欢乐和痛苦，就首先使人感叹肠热。仅由此，我们就期待着路遥的历史卷轴式的系列长篇继续问世。

（原载《文汇报》1986年12月29日）

小说《第二个太阳》

作者刘白羽。小说主要描写了解放军某兵团攻占武汉到进军湖南6个月的战斗经历，却包含了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20多年的革命历程，刻画了兵团副司令秦震及其父母、女儿三代人的奋斗史，昭示人们新中国这辉煌于人间的第二个太阳，正是革命志士热血所铸就。作品抒情与思辨结合、历史与现实交融，是礼赞英雄的诗篇。

小说《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是以长篇小说形式正面表现长征壮举的第一部作品，作者不顾自己高龄两次重走了长征路线，史料翔实，意义重大，小说充满激情，用诗的语言再现了红军过湘江到抵达哈达堡这长征的主要部分，是一部成功之作。

电影《父与子》

《父与子》是喜剧系列故事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一集。

北京一个大杂院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段工程师（方子哥饰）夫妇家，经常为一些家务琐碎小事闹别扭；个体户顺子母子俩（张岱宗、刘佩琦饰）倒是亲亲热热，相依为命；一对刚迁来的年轻新婚夫妇，新娘已是大腹便便。大院内还有二子（陈佩斯饰）、他的父亲（陈强饰）、母亲（黄玲饰）、妹妹三丫（剧雪饰）一家。二子是个浑小子，数他的笑话最多……

二子年纪轻轻，却不求上进。整天，他不是晃着脑袋荡荡马路，便是两手插进裤袋溜溜市场。他的父亲老奎，已是六十开外，原是一家厂的厂长。现已退休。他爱子心切，望子成龙。老奎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大事，就是督促二子进屋温课，准备考大学，还特地为二子添置了一台录音机，还经常花钱督促二子去买参考书籍。偏偏二子不争气，不想读书，所以身在屋里心在外，一个字也印不进脑海里。好心的妈妈奎婶"体谅"二子，乘老奎不留意，悄悄地打开门锁，让二子出来"放放风"。

同住的个体户顺子，眼看二子整天闲逛，有心拉他一把，要二子入伙做个帮手，也比现在强。二子不敢违抗父命，这事就没有下文。

一天，二子路过街头，看见自己的女友妞子（李莉饰）为推销蔬菜，设摊加班叫卖。为了让女友提前下班，和他一起去看电影，二子把蔬菜全部买了下来，带回家去。老奎不得不把这批烂菜坏叶倒进垃圾箱，弄得疲乏不堪。

二子要去看电影，恳求妹妹作替身，呆在屋里"读书"，自己却溜之大吉。谁知西洋镜被拆穿，老奎一怒之下，赶紧到影院寻觅。在黑黑的观众厅里老奎误把一位同二子身穿同样服饰的观众扭住，引起全场骚动，结果被影院工作人员逐出场外，还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处以罚款十元。

一辆"的士"来到大杂院的面前，走下了一个手拎皮包、头戴呢帽，鼻架墨镜，身穿西服、足登革履的"港客"。

“港客”并非别人，正是个体户顺子。这次他从广州满载而归，不仅带回大批的款式各异的服装，还批进了大量的电子计算机。顺子一心帮二子的忙，把带回来的彩电“孝敬”老爷子，同时要求老爷子让二子帮助他干这买卖。谁知老爷子闻言火冒百丈，退回彩电，断然拒绝顺子的请求。

顺子将批来的时装在摊档上展销，由于式样繁多，反使顾客眼花缭乱无从着手。二子灵机一动，把女友妞子拉来当个临时时装模特儿。这一招果然有效，顾客纷纷掏钱购买。最后女友穿上了裸胸露背的时装，这可使二子惊愣起来。二子硬是把妞子拉进后台，引起了女友的不满，结果，闹得鸡飞蛋打，一片混乱。

顺子的买卖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他出售的一批电子计算机，原来是冒牌货，法院向他发出传票。顺子要求二子好好照顾他的老母，自己则走进了法院的大门。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清晨，父子俩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考场。临进考场，老奎端上一杯浓咖啡，要二子喝下，以便醒醒脑。可是这些天来，二子因为死啃硬记书本，搞得脑袋昏昏沉沉。临场，身子疲倦不堪，无法支持，竟然伏案打盹。老奎爷不得不借了辆手拉两轮车，拖着儿子归家。至于二子今后的岁月怎么样？且听第二集分解。

编剧：众　力　导演：王秉林

摄影：杨文庆　美术：程荣远

作曲：马　丁

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歌　林汝为词

雷　蕾曲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歌曲《敢问路在何方》

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　阎　肃词

许镜清曲

中速　稍快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啦啦！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歌曲《枉凝眉》

电视剧《红楼梦》插曲　［清］曹雪芹词

王立平曲

稍慢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啊啊一个枉自嗟呀，一个是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啊啊。

歌曲《烛光里的妈妈》

王健　李春丽词　　谷建芬曲

（毛阿敏演唱）

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脸颊印着这多牵挂。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妈妈呀女儿已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噢妈妈相信我，女儿自有女儿的报答。噢妈妈相信我，自有女儿的报答。

歌曲《橄榄树》

三　毛词

李泰祥曲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2.（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历史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草签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一致认为，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有利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对澳门执行如下的基本政策：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均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担任主要职务的官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澳门任职的中国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公务（包括警务）人员可以留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任用或聘请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某些公职。

（四）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澳门居民和其他人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和迁徙、罢工、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宗教信仰和通信以及财产所有权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五）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并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

（六）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同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

（七）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签发出入澳门的旅行证件。

（八）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资金进出自由。澳门元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

（九）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征税。

（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十一）澳门特别行政区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使用区旗和区徽。

（十二）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所作的具体说明，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葡萄牙共和国政府负责澳门的行政管理。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促进澳门的经济发展和保持其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为保证本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1999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关于澳门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作为本联合声明组成部分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七、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将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

束力。

1987年　　月　　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

第6届全运会各代表团获奖统计

单位	总分	金牌	银牌	铜牌
广东	1235	54	35	36
上海	860	32	29	25
辽宁	747.5	32.5	30	19
北京	683	17	23	25
山东	529	12	17	19
四川	509	17	19	14
湖北	488	15	13	20
江苏	463	9	15	16
浙江	442.5	17.5	13	8
河北	426	11	12	15
解放军	418	13	11	15
湖南	342	8	15	10
河南	331	11	12	12
安徽	320	7	12	16
广西	298	3	11	17
云南	293	8	7	11
黑龙江	290	13	8	7
福建	285	11	10	10
天津	269	7	9	7
内蒙古	258	14	10	4
吉林	196	5	5	7
陕西	193	8	5	3
山西	166	6	5	6
江西	153	3	4	6
甘肃	106	4	4	1
新疆	90		4	4
贵州	70	1	3	3
青海	50	1		3
火车头	46	1		2
银鹰	28			3
宁夏	23	1		
前卫	21		1	1
石油	17		1	
西藏	13	1		1
煤矿	9		1	1

全国最佳运动员评选

首都20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1987年评选全国最佳运动员活动，于1988年1月29日在北京揭晓。这次评选有25万多人参加。当选的10名运动员是：

何灼强　广东举重运动员，男，21岁。1985年在第1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获48公斤级1枚金牌，并5次打破3项全国青少年纪录；同年10月参加全国举重冠军赛，获52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2项冠军，并以141.5公斤打破挺举亚洲纪录。1986年在第12届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中，以116公斤的成绩打破52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并以252.5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同年在第10届亚洲运动会举重比赛中获52公斤级总成绩金牌。1987年他取得重大成就，在52公斤级比赛中，4次打破世界纪录，获得1项世界冠军，超过1项世界纪录。4月，

在第19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中，以116.5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并获3枚金牌；9月，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以153公斤打破挺举世界纪录，并获挺举冠军，抓举和总成绩亚军；11月，在第6届全国运动会举重比赛中，以117.5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以265公斤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12月，在中国、日本举重对抗赛中，以118公斤的成绩超过抓举世界纪录。在全运会期间，被评为4名新星之一和最受欢迎的6名运动员之一。1987年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并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楼　云　浙江体操运动员，男，23岁。1983年在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是首次荣获男子团体冠军的中国队成员，他还获得双杠冠军和个人全能第3名。1984年在第23届奥运会体操比赛中，他作为中国队成员，获得男子团体亚军，并获自由体操亚军和单杠第4名。1985年在第2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他是获得男子团体亚军的中国队成员，并获跳马第2名。1986年在第10届亚洲运动会体操比赛中，中国队获男子团体冠军，他是成员之一，并获跳马金牌和个人全能、吊环、双杠铜牌。1987年，他的技术有了新的提高，在第2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获得自由体操和跳马2枚金牌，也是获得男子团体亚军的中国队成员；同年在第6届全国运动会体操比赛中，获得个人全能、自由体操、跳马和双杠4项冠军。1985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黄晓敏　黑龙江省游泳运动员，女，17岁。1985年在全国第1届青少年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得100米和200米蛙泳、200米个人混合泳3项冠军，同年打破100米和200米蛙泳全国纪录。1986年在第10届亚洲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100米蛙泳冠军，同年在全国春季游泳分级分区赛中破100米和200米蛙泳全国纪录。1987年在第6届全国运动会游泳预赛中以2'29"58的成绩打破她自己保持的200米蛙泳全国纪录；在决赛中又以2'27"78的成绩破亚洲纪录，距世界纪录只差0.38秒，是当年世界第2位的好成绩。两年多来，她的200米蛙泳成绩提高了8秒多，进步突出，国家体委授予她体育运动一级奖章。被评为1985、1986和1987年全国10名最佳游泳运动员之一。

聂卫平　北京围棋运动员，男，35岁。1982年获九段棋手称号。1979年和1985年两次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在3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连任中国队主将。第1届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王座战冠军加藤正夫和终身棋圣藤泽秀行；第2届连克片冈聪、山城宏、酒井猛、武宫正树、大竹英雄五城，使中国队反败为胜；第3届迎战日本队主将加藤正夫，中盘取胜，为中国队的"三连胜"立下赫赫战功。1986年起任国家围棋队总教练。1987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并被选为全国20名最佳教练员之一。1988年3月荣膺中国围棋"棋圣"称号。

杨　阳　江苏羽毛球运动员，男，24岁。1984年他作为中国羽毛球队的成员，参加了第13届国际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获亚军；同年获第4届世界杯羽毛球赛男子单打亚军。1985年获第4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3名。1986年中国队获第14届国际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冠军，首次捧得汤姆斯杯，他是中国队成员；同年获得国际羽毛球系列大奖赛总决赛男子单打冠军。1987年在第5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同年获第7届世界杯羽毛球赛男子单打亚军。1985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1987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高凤莲　内蒙古柔道运动员，女，23岁。是1986年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她1986年首次为中国在世界锦标赛中夺得第一个女子柔道世界冠军以后，1987年又取得新的成就：在第5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中，一举夺得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2枚金牌；同年又在日本第5届福冈国际女子柔道邀请赛中获72公斤以上级冠军。1986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1987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江加良　广东乒乓球运动员，男，23岁。被评为1985年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6年获第7届世界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亚军。1987年在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是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的成员，并获男子单打冠军，还与焦志敏合作获混合双打亚军；同年获第8届世界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亚军。1985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1986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

李玲蔚　浙江羽毛球运动员，女，24岁。1984、1985和1986年3次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7年在第7届世界杯羽毛球赛中获女子单打冠军，与韩爱平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在第5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女子单打亚军和女子双打亚军；在第6届全国运动会羽毛球比赛中获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1987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同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

何英强　广东举重运动员，男，22岁。曾被评为1986年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7年4月在第19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中，获56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冠军，9月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中以160公斤的成绩获56公斤级挺举亚军；11月在第6届全国运动会举重比赛中，以133.5公斤的成绩打破56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同时打破这个级别的3项亚洲纪录，被评为第6届全运会6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之一。

柳海光　上海足球运动员，男，24岁，身高1.86米。

1981年入选国家青年足球队，1983年被选入国家足球集训队，任前锋，头球功夫好。1986年，他在比赛中共进球34个，获“金鞋奖”。1987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24届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东亚区的比赛，10月26日，在东京与日本队进行最后一场决定能否出线的比赛中，在对方禁区接队友的传球顶入球门，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实现了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夙愿。1988年初，根据中国和南斯拉夫体育合作协议，他加盟南斯拉夫“游击队”体育俱乐部踢足球。

（陈荫生）

“新时期10年电影奖”获奖名单（1987）

最佳故事片奖

《高山下的花环》《人到中年》《少年犯》《人生》《野山》《喜盈门》《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孙中山》《红衣少女》

最佳导演奖

谢晋　赵焕章　凌子风

最佳男演员奖

杨在葆　达式常　周里京

最佳女演员奖

刘晓庆　潘　虹　王馥荔

最佳处女作导演奖

史蜀君（《女大学生宿舍》）陈凯歌（《黄土地》）黄建新（《黑炮事件》）

导演荣誉奖

吴贻弓　张　良　吴天明　严寄洲　谢　飞　丁荫楠　王好为

男演员荣誉奖

严顺开　郭凯敏　吕晓禾　唐国强　许还山　陈裕德　孙飞虎

女演员荣誉奖

龚　雪　斯琴高娃　方　舒　李秀明　王玉梅　张　瑜　丛　珊

处女作导演荣誉奖

张暖忻（《沙鸥》）郑洞天（《邻居》）石晓华（《泉水叮咚》）杨延晋（《苦恼人的笑》）王君正（《苗苗》）常　彦（《保密局的枪声》）韦廉（《道是无情胜有情》）

注：各奖均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列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施行。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族人民祝贺佳节，指出改革和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前要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教育。

1月4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的职务。

1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首都法学界在座谈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时强调，要加强政治和法律教育，对违法犯罪的要依法处理。

胡乔木在《中华英烈》创刊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否定大公无私的观点是错误的。

1月7日　全国学联发言人揭露假冒信件，指出中国广大学生十分珍视同非洲在华留学生友谊。

首都各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座谈会指出，各民族人民享有历史上的空前民主和自由，青年学生要明辨是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任命滕藤为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批准彭佩云兼党委书记。免去严重失职的管惟炎校长、党委副书记和研究生院院长职务；撤销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言论的方励之副校长职务。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3月25日召开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的决定和海关法。批准《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三附加议定书》。任命周光召、滕藤为中科院正副院长。

1月13日　中纪委向各地党的组织和纪检组织发出通知，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

1月14日　上海市纪委开除王若望党籍。王若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屡教不改，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江西省府部门推行目标管理，有失职行为者将受到严肃的行政处分。

1月17日　李鹏在全国勘察设计工作会上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特定含义，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会改变。

胡绳等10多位社会科学家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宣传马克思主义要理直气壮。

中共安徽省纪委开除方励之党籍。方励之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造成严重后果，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

1月18日　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外宾时强调，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不会改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根本保证，中央人事变动是为了更正确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1月23日　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刘宾雁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1月29日　中央领导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搞政治运动。

1月31日　《计量法实施细则》发布施行。

2月4日　王忍之任中央宣传部长。

2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干部和群众中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

2月9日　我国签署《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议定书。

2月11日　海峡两岸的公证机关同出公证书，重庆台属领到原民生公司股息。

2月13日　李先念在上海视察，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的根本，希望上海工人阶级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

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全国成立六大骨干航空公司，民航局不直接经营航空企业。

2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发布实施。

李鹏指出教育战线今年要抓好两件大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继续进行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

2月20日　吉林蛟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公义被授予“模范检察长”称号，成为全国检查机关重建以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命名的第一个“模范检察长。”

2月23日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宣布，十年动乱对佛教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基本消除，中国佛教开始走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道路。

2月24日　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城市企业主要是正面教育，着重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允许压制群众对经济工作中缺点的正当批评。

2月26日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重申我对香港政策，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不变，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2月27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招待出席佛协五届代表会议代表的茶话会上说，宗教界不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宗教政策不因中央人事变更而改变。

3月4日　全国纪检工作会议要求全党共同努力，严肃政治纪律，加强党内监督。共产党员绝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

3月5日　中央领导同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得出共同结论，雷锋精神具有强大生命力永不过时。

3月9日　李长春当选辽宁省省长。

3月14日　中纪委要求共产党员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月15～19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多项决议。会议认为企业法草案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决定不提交五次全体会议审议。

3月20日　邓小平同志重要著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发行，增加22篇文稿，包括一些首次公布的内部谈话，全部经本人审定。新增文稿突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开放。

3月21日　赵紫阳会见外宾时说，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建设要符合我国自己国情。

3月24～4月8日　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增选汪锋、钱伟长为政协副主席。

3月25～4月11日　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9项决议、决定。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巩固发展安定团结，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3月27日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三条标准：第一看

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

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

3月28日　姚依林、李鹏、田纪云在中外招待会上，回答国内外舆论关心的问题。

4月1日　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两本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4月9日　中纪委发出通报，立即刹住用公款请客送礼、吃请受礼歪风，要求着重追究出主意者、组织者、领导者和屡犯此类错误人的责任。

4月11日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佛山公安干部区楚杰被处决。

4月15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

4月16日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强调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从严从紧控制行政经费。

4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查处偷税抗税案。

4月22日　北京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开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基层投票。

4月29日　乔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法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

4月29日　白立忱当选宁夏人民政府主席。

5月4日　团中央召开全国先进青年代表座谈会。

5月11日　采用非法手段窃取我国重要机密，日本记者边见秀逸被限期离境。提供机密的我国机关工作人员唐大堤被拘留。

5月12日　射洪县连续干旱，缺水，缺电，缺资金；县水电局长竟率百人出省公费旅游，玩了五天半，花销万余元。

5月26日　中指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上宣布，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会议于30日结束。

5月28日　中纪委决定开除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党籍，通告全党，要求党员干部做遵纪守法模范。

5月29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6月6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长职务，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公安部决定设立“金盾奖”。

6月10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作出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党组书记职务。

6月11～23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技术合同法(11月1日施行)；批准《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6月12日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强调，我国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6月13日　国务院紧急通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6月14日　高院设交通运输审判庭，监督指导铁路运输各中级法院工作和海事法院业务，审理有关案件。

6月30日　中纪委作出一项决定，共产党员今后再有索贿行为，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清除出党。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纪念建党66周年，薄一波答记者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7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发布。

中央领导会见外宾时说，中国政府决定聘请一些外国专家来华当厂长或顾问。

7月16日　我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香港发现台湾空飘的炸弹气球，各地群众不要私自拣收空飘物。

7月18日　山东通报处理苍山“蒜苔事件”责任者，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县长李常存被撤职，县委书记杨国胜停职检查。

7月22日　中纪委发出通知，党员干部须严守组织人事纪律。

7月29日　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严格控制到旅游城市风景胜地开会，制止公费旅游。

7月31日　首都隆重集会庆祝建军60周年。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讲话。

8月1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电，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

破除“低房租高补贴”，实行“多住房多出钱”。烟台试行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全市开始出现大房换小房，无房买房的新气象。

8月7日　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成立，田纪云任总指挥。

大兴安岭特大林火事故责任查清，17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国法惩处，直接造成火灾的6名外地流入人员和工人被依法逮捕。

8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各级检察机关，严肃查处重大责任事故案。

8月12日　首都着手整治“倒爷”。

8月17日　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在京发布的“政治体制改革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广大人民群众对8年多的改革总体评价较高，同时直言批评了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对党中央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深表拥护。

8月19日　临猗县30多万公斤小麦霉烂，有关责

任者受到党纪国法制裁。

8月21日　国家总监察部部长尉健行强调，尽快建立国家行政监察体制，检查对外经济活动中的问题是监察部近期工作重点。

8月26日　国家计委负责人强调，坚决纠正擅自争取基建项目倾向，对违反国务院规定的将追究建设单位责任。

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爆炸事件的罪犯邓麒麟被判处死刑。

8月28日～9月5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档案法；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

8月30日　建设部民主选拔司局级干部。

8月31日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体改委、劳动人事部的新布置，推进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

9月1日　王兆国任福建省代理省长。

9月2日　十三大筹备工作正加紧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大会于10月25日在京召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城镇住房改革试点工作座谈纪要，改革住房制度，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基本构思：提高房租，增加工资，鼓励职工买房。

百名优秀农民企业家受表彰，田纪云等出席表彰大会，颁发证书。

9月3日　国务院领导强调树立全局观念和法制观念，制止乱涨价，必须管好国营企业。

9月4日　李瑞环任天津市委书记。

9月9日　张勃兴任陕西省委书记；王群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苏星主持《红旗》杂志社工作。

9月14日　国务院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结束。

9月17日　破除不犯错误不下台的旧观念，武钢300多干部任期内不称职被免。

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9月18日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张秉贵病逝，终年68岁。

9月19日　我国第一部物价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颁布。

9月22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9月25日　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广泛征求对十三大报告稿的意见。

改革开放8年制定60个法律，我国法制建设获重大进展，无法可依状况有根本改变。

9月26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侨联名誉主席庄希泉盛世喜迎百岁，党中央热烈祝贺。

拿救灾款营造办公楼，上级令停止只当耳边风，师宗县民政局长卢德先被撤职。

9月27日　结束在大陆的采访旅游，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回台北。这是台湾记者第一次来大陆。

9月28日　中央军委严肃处理学生被殴致死事件，撤销一师长职务，逮捕两名凶手。

拉萨一伙人制造事端搞分裂活动。

10月1日　少数分裂分子配合达赖制造事端，拉萨街头发生严重骚乱，6人死亡，19人重伤。公安人员严守命令没有开枪。

10月3日　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发表谈话，谴责拉萨少数分裂分子制造骚乱，希望僧俗群众明辨是非，珍惜当前大好形势。

10月4日　邓颖超寄语广大青年与祖国一道走向未来。

10月5日　民航30年实现3个飞跃：由小型到大型，由国内到全球，由亏损到盈利。

10月6日　鼓励检举揭发价格违法案，国家物价局发布奖励办法。

10月8日　班禅副委员长在青海发表讲话，依法严惩制造拉萨骚乱的首恶分子，坚决维护汉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10月12日　中央领导在省市区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围绕改革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新时期宣传工作要学会用民主对话方式进行。

10月14日　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欢迎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

10月16日　为接待台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七条办法，与大陆旅客享同等待遇，可到各地自由参观旅游。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公报发表。全会决定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5日召开，讨论通过中央向十三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并决定将主要内容写入大会报告；确认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请辞总书记职务和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决定。

同日，中顾委举行第7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工作报告，提请党的十三大审议。

经　济

1月16日　国家经委负责人指出：搞活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企业可采用多种经营形式。

1月22～25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鹏指出，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对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负

有全面责任。会议提出1987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2月1日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采取一项便民措施，发行人民币“长城信用卡”。

2月20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统计公报，“七五”第一年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总产值达18700多亿元，比上年增9.1%。

3月2日　首期大型企业厂长(经理)岗位职务培训班开学。我国开始全面培训企业领导干部。

3月7日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昌地下商场破产案，宣告南昌地下商场因资不抵债破产。

3月17日　国务院成立关税税则委员会。

3月18日　上海一批“星期日工程师”帮助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解决技术难题，培训业务骨干，取得显著效果。

3月22日　农牧渔业部召开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薄一波强调提倡集体致富，劳动致富，守法致富，共同富裕。

4月1日　谷牧就对外开放等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我国尽力为外商投资创造适应气候，深圳的试验是成功的，目前经济发展情况很好。

国家开始征收耕地占用税。国务院发布暂行条例作出具体规定。

4月16日　今年起设立建筑工程鲁班奖，奖励质量特别优良的工程。

4月28日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答记者问，发行新版人民币是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影响人民生活水平。

5月8日　国务院发布《加强生产资料价格管理，制止乱涨价、乱收费的若干规定》。

5月20日　中央组织部和劳动人事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控制编制、调查干部结构工作会议。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控制干部队伍盲目膨胀，中央决定调整干部部分结构，充实政法、经济监督调节部门。

7月15日　一汽完成产品换型技术改造，通过国家验收。

7月18日　我国第一部经济法大型系列电视教学片摄制完成。

7月20日　维护国家利益，自觉查找漏洞，武钢主动补交税金82万元。

7月24日　上海将轿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通过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建立起先进水平的零部件配套生产体系，为我国民族轿车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8月5日　全国市场管理会议强调加强监督管理，严禁倒卖紧俏商品和重要生产资料。

国务院发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8月7日　石家庄一塑厂实行满负荷工作法，改变了管理落后、生产松松垮垮的局面；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收入明显提高。

8月8日　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搞活中创造巨大财富，国家财力9年增加一倍半，去年总财力达到3854亿元。

8月15日　“满负荷工作法”对企业普遍适用，河北党政领导提出要在全省推广。

国务院发布施行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8月16日　32万农民进入长江水系运输市场，水运专业户拥有船舶14万多艘，运力180多万吨。

8月23日　国务院发言人就物价问题发表谈话，重申凡属国家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任何单位无权擅自改变，必须坚决打击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法分子。

8月25日　国家经委、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提出，大中型工业企业年内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要在明年底以前完成。

8月26日　我国最大农机企业集团在洛阳成立。

9月10日　我国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平朔太堡露天煤矿投产。

9月12日　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举办的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成立。

9月15日　全国下月开始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今年突出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财政上的跑冒滴漏；二是滥涨价乱收费；三是用公款游山玩水，吃喝浪费。

国务院发布《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9月16日　全国首次投入产出调查开始，涉及101个物质生产部门、17个非物质生产部门。

中国技术市场联合开发集团首次举办交易会。

9月22～29日　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改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强调搞好企业承包经营深化改革，推动双增双节活动稳定经济，当前必须首先稳定物价，控制预算外投资项目。

10月1日　南京首次发出“就地封关”出口物资专列，成为立体开放口岸。

10月17日　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以强大动力，上海9年实现4个翻番：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市政建设投资和城乡人民收入。

10月18日　工商银行首次发行10亿元累进利息和贴水金融债券。

军　事

2月3日　海军部队树立献身海防精神，选出10名大公无私人物。

2月25日　党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并发出通知，望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运用。

5月17日　我气象兵编入陆军集团军，在我军建军史上是第一次。

7月11日　人民解放军作出新规定，严格按需要培训和提拔干部。

7月21日　我国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完成加装直升飞机舰面工程。

7月27～31日　全军英模代表会在京隆重召开。

9月13日　空军首次举行模拟海上航空救生演习。

外　交

1月13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一行时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和开放政策，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

2月11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谈蒙古的一项邀请说，当前举行共产党多边会晤条件不成熟。

2月18日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强调指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如果只说四个现代化，而不讲社会主义，就离开了问题的本质，也就是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2月21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印度正式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我绝不承认。

2月25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中苏同意核定两国边界全线走向。

2月26日　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就光华寮问题约见日大使，大阪高院错误判决站不住脚（日法院将这一中国财产判给台湾）。

3月4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批驳印度《政治家报》所谓"中国参与'廓尔喀民族解放运动'"的报道是别有用心。

3月23日　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共同举办的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区域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3月26日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4月6日　邓小平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时说，对话比对抗好，缓和比紧张好。目前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发展，和平是有希望的。

4月8日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越南外长讲话时重申，中越关系核心问题是越南侵柬。

4月13日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京正式签署，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赵紫阳和（葡总理）席尔瓦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字。

4月15日　越南非法侵占我南沙群岛部分岛屿，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4月21日　中苏第10轮磋商结束，双方重申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

5月6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光华寮问题日方如一意孤行，中国方面将作出强烈反映。

5月7日　邓小平亲切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双方表示过去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这是中保建交以来第一位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保加利亚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5月10日　中央领导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工业国需要改变工业结构，为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

5月19日　邹竞蒙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这是我国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中第一次担任主席职务。

5月21日　金日成主席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

6月3～26日　赵紫阳代总书记、总理访问东欧5国和巴基斯坦。

6月5日　中英历史遗留资产问题全面解决，中国同西欧国家达成第一个资产要求协议。

6月28日　邓小平会见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日方人员时说，中日双方要立足长远处理两国关系，中国不会改变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的政策。

7月4日　胡启立会见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

7月7日　李先念会见日中友协等日本朋友，指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需要"官民并举"、"以民促官"。

7月16日　京沪僧伽法务团赴美举行水陆法会。

8月21日　中央领导向波兰客人介绍我企业改革情况，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承包，有利真正企业家能人涌现。

8月29日　邓小平向意共领导人约蒂介绍国内情况时说，十三大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层将更年轻化。

9月3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时说，全党赞成改革，全民拥护改革。

9月14～18日　50多个国家近400专家聚集北京，第三世界科学院二次大会举行。李先念代表邓小平接受

特别荣誉勋章。

9月18日　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就东芝机械事件发表谈话，日本政府的决定使我蒙受经济损失，希望尽快妥善处理好未能如期执行的合同。

9月23～25日　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大会在京召开。

9月24日　李先念会见外国客人时说，中国人口政策符合自己国情，美国会少数人攻击我人口政策毫无道理。

10月5日　越南作战飞机侵入我领空被击落。我国政府向越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10月7日　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美参院通过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严重事件。

10月11日　李先念主席会见外宾时谈西藏形势，美国会无权干涉我内部事务，达赖分裂祖国活动不得人心。

社会生活

1月2日　张汇兰一生致力发展体育，九十高龄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荣誉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项特殊荣誉的中国人。

1月18日　我国首届铁人马拉松赛圆满成功，北京教师关宇第一个到达终点。

1月23日　1986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揭晓，李宁、阎明、李玲蔚、许海峰、关平、杨锡兰、梁艳、何英强、陈翠婷、高凤莲当选。

1月26日　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俭办婚事，太原16万多人签名抵制不正之风。

1月29日　厦门、金门齐放焰火，百姓隔岸观景，共度佳节良宵。

2月5日　国家气候委员会成立。

2月8日　国际短池游泳比赛，我国选手黄晓敏夺取三枚金牌。

2月17日　云南宣判一起重大贩毒案，泰国籍人温原和、香港居民戴文煊伏法。

3月1日　第39届世乒赛结束，中国选手夺得6项冠军：男女团体；男单江加良；女单何智丽；男双陈龙灿、韦晴光；混双惠钧、耿丽娟。

3月9日　全国首届乒乓十佳揭晓：江加良、陈龙灿、滕义、惠钧、韦晴光、戴丽丽、李惠芬、焦志敏、何智丽、耿丽娟。

3月14日　浙江省部分地区两次遭受龙卷风和冰雹袭击，使6个地区10多个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3月6日至14日)。

3月27日　首届特殊奥运会在深圳举行。

3月29日　阎红打破女子五千米场地竞走世界纪录。

4月3日　我国发现一艾滋病传入病例。

4月5日　首都百余万军民义务植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坛公园挥汗栽下170棵松柏。

4月17日　中国烹饪协会在北京成立。

4月22日　黑龙江一旅客列车爆炸，11人死亡，45人受伤。

4月24日　赵成顺、于敏、艾有勋、李国桥、熊汉仙贡献突出，国务院授予五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4月27日　全国"五一"劳模授奖大会在京举行。

4月29日　中国戏曲学会在京成立。

5月3日　首届长城杯健美邀请赛结束，何玉珊、田卫平分获男女全场冠军。

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成立。

5月5日　北京成立吸烟与健康协会。

5月6日　京广复线上的大瑶山隧道胜利贯通，工地举行隆重庆祝大会。万里、胡启立专程赶赴参加。国务院致电，向广大职工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严重火灾。

5月11日　国务院成立扑火指挥小组，陈俊生任组长，统一指挥大兴安岭灭火行动。大兴安岭林火肆虐未已，各路灭火大军奋力扑救。死伤二百多人，漠河城已被吞噬；威胁塔河县城。火情已基本控制。

我国首次用直升飞机跨江架线。

5月13日　李鹏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到漠河看望灾民，慰问子弟兵，勉励灾区人民振作精神重建家园。

5月14日　年仅18岁的巾帼力士李红玲，在我国首届女子举重锦标赛75公斤级的比赛中超三项世界最好成绩。

5月1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部署，集中全力扑灭林火。大兴安岭东部火情基本得到控制，东西线部分地段大火已连成一片。

5月24日　第五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北京结束，中国选手囊括五项冠军。男子单打冠军杨阳、女子单打冠军韩爱平、男子双打冠军李永波和田秉义、女子双打冠军林瑛和关渭贞，中国队首次获得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双金牌(王明仁、史方静)。

5月27日　大兴安岭火灾五处起火原因已查明四处，违章作业吸烟闯大祸，五名肇事者被公安机关抓获。

6月1日　入伍20余年，扑火800多次，张平获"灭火战斗英雄"称号。

6月2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参

加扑火救灾全体指战员。

6月4日　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宣布，五万军民奋战25昼夜，大兴安岭扑火取得彻底胜利。

6月4日　西藏原始森林区，首次捕到小熊猫。

6月7日　杨广长副市长离休当“保姆”，与老伴开办“育秀托儿所”，在双鸭山传为美谈。

李梅素成为第一个突破20米大关的亚洲铅球选手。

6月10日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邓颖超任名誉会长，王首道任会长。

6月12日　我国饱和潜水技术跃入世界先进行列，首次进行300米氦氮氧饱和潜水实验圆满成功。

6月16日　民航一客机降落时与空军飞机相碰，客机安全着陆，空军飞机坠毁。

6月17日　大兴安岭森林财产受火灾，保险公司兑现赔款一亿多元。

6月23日　继续追究大兴安岭特大林火事故责任，国务院撤销董智勇的林业部副部长职务，并责成黑龙江省政府作出认真的深刻的检查。

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赵梦桃塑像在咸阳落成。

6月25日　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成立。李鹏说，汽车工业要走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道路。

中国长城学会成立。黄华当选会长。

6月26日　四面八方敲竹杠，租赁企业经营难。唐山市一酒家承租人吃尽苦头，市委领导表示要查处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

6月27日　成都破获一起利用“部队车”、武装押运的特大非法贩烟案。

全国首次武术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7月4日　成都女学生张歆黔不慎溺水，围观者无动于衷，有的人提出，要先付钱后救人，致使她在众目睽睽下惨死。

7月6日　芦沟桥畔永世吊忠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揭幕。

7月7日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

7月9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举行“世界五十亿人口日”座谈会。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惠及全人类，使世界50亿人口日推迟2年。

7月24日　董玉萍成为亚洲第一个突破女子七项全能6000分大关选手。

长江当年第三次洪峰通过沙市，洪峰水位高达40多米，高出沙市地面10多米。

7月25日　何增生荣获亚洲田径最佳教练员称号。他训练的女子铅球运动员李梅素一年内6破亚洲纪录。

我国最长的双线公路隧道福建鼓山隧道竣工通车。

7月31日　龙卷风袭击黑龙江海伦、拜泉、讷河三县，伤亡450余人，倒塌房屋1800间。

8月1日　五十六个民族儿童作客中南海，邓颖超勉励孩子们做四有新人。

8月2日　滕义获第八届世界杯乒乓球赛男单冠军。

8月5日　凶犯张牙舞爪，警民前赴后继，成都生擒一名持枪杀人犯。

8月8日　第七届国际特殊奥运会落下帷幕，我国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弱智选手获18枚金牌。

8月10日　余平获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冠军。

8月11日　我国首次评选冰雪十佳：李金艳、王秀丽、张青、刘陆阳、赵晓雷、唐玉琴、张述滨、王永金、田玉杰、金飞雪。

8月16日　钱红在第三届泛太平洋地区女子一百米蝶泳决赛中夺得金牌，成为近两年在高水平的世界大赛中夺得金牌的唯一的中国游泳运动员。

8月22日　南通船舶碰撞和重庆天然气漏失燃烧事故责任查清。负重大责任者，有的被依法逮捕，有的被撤销领导职务。

8月23日　第二届全国伤残人运动会在唐山开幕。

8月29日　上海天文台发言人谈27日晚空中怪客，不明飞行物可能是火箭残骸。

8月30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制止乱捕滥猎和倒卖走私珍稀野生动物。

9月1～5日　第一个名酒节在泸州举行。

9月9日　石玉杰超过男子中心发火手枪60发世界纪录；石召礼、刘长云、江勇超过男子中心发火手枪团体世界纪录。

9月13日　中国队蝉联世界超级女排赛冠军。

9月15日　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成立，荣毅仁任会长。

9月27日　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结束，赵长军、张玉萍分获男女全能冠军。

10月2日　西藏建成第一座室内游泳馆。

10月5日　第七届世界杯羽毛球赛落幕，中国选手获得四项冠军。

10月6日　全国体总致电台湾省体育协会，邀请台湾体育界人士出席第六届全运会。

10月7日　偷秦俑头丢了自己脑袋，盗窃国宝主犯王更地被判处死刑，其他同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10月9日　包庇犯罪儿子，干扰司法公务，原太原市委副书记仝云被开除党籍。

10月11日　第六届世界杯技巧赛结束，中国队共夺6枚金牌。

10月12日　首次全国国产汽车竞技角逐。

10月17日　云南判决高价进口国产旧设备案，犯

有渎职罪的厂长和局长被依法判刑。

文化教育

1月8日　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能源数据库的可行性论证方案在北京通过评审。

1月12～22日　赵紫阳、万里等亲切会见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1月20日　文化部长王蒙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变。

1月21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新闻出版署。

1月24日　在第三十五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我国新型心脏急救起搏装置获金奖。

1月27日　彭真勉励文艺老战士发扬延安精神，强调要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月28日　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服务社会，上海高校学生踊跃参加社会考察。

我为外国发射卫星第一个合同签订，“长征三号”将载美卫星游太空，于1988年在西昌发射。

2月1日　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向全国播放。

2月3日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放活科研机构，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

2月9日　沈阳市10多所高等院校办大学生业余党校。

全日制中小学教学大纲颁发，国家教委通知今春开始执行。

2月12日　我国第一部自然保护地图集——《中国自然保护地图集》已于最近编纂完毕，并通过专家教授审定。

2月17日　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

我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有关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向国际用户提供卫星试验服务，出租整个可回收的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

2月18日　我科学家联合攻关4年，在世界首次发现玉米小斑病菌C小种。

2月20日　《人民文学》发表侮辱藏胞小说，影响恶劣。国家民委、中国作协召开座谈会严肃批评。作协书记处宣布刘心武主编停职检查，编辑部公开检查。

2月21日　蔡一磊获瑞士国际舞蹈比赛最高奖“洛桑金奖。”

2月24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首次发现在液氮温度100k以上条件下的导体，在超导材料研究方面获得新的重大突破。

3月2日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影响艺术上创新。

3月5日　中央领导会见参与研究超导体科技人员时指出，努力创造民主团结融洽活跃气氛，使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条件越来越好是确定不移的方针。

3月9日　上海大学毕业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促使学生勤奋读书，不断进取。

3月12日　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著名画家范曾决定向南开大学捐献义卖所得120万元。

3月13日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药学会已于近日正式成立。

4月18日　我国首例食道重建手术成功。

首届吴健雄物理奖在京颁发，张泽、王大能、解金春三人获奖。

4月23日　李鹏在重庆大学考察时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组织学生接触社会，开展自我教育。

北京石景山发现两粒佛舍利。

5月6日　我国首次运用平台遥感试验，在长沙通过评审。

5月16日　我生物工程技术获重大突破，首创世界植物细胞穿壁手术，利用远缘杂交创造出新物种。

5月17日　邓颖超写信勉励全国少先队员培养优秀品质，要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5月18日　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与会代表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学生成长。

5月19日　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5月26日　国务院通告，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活动。

6月12日　新疆历史上第一座伊斯兰教高等学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经学院开学。

6月17日　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成立。

中国人口五大死因，已被专家调研查证。五大死因依次是：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意外死亡和消化性疾病。

6月20日　维护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杭州大学严肃处理33名违纪学生。

7月12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立即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

7月14日　经过国家评审委员会议评定核准，1987年度科技进步奖818项。

7月20日　党中央体现对知识分子关怀，邀请中年科学家到北戴河休养。

7月24日　新闻出版署等在京通报情况，当前非法出版活动空前猖獗，各地正在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我国第一所县办乡镇工业大学——江苏省沙洲职业工学院举行首届毕业典礼。

7月27日　国家教委通知各地教育部门与社会配合，制止有害书刊在中小学流行。

8月2日　“首都老战士”、“文化部老干部”、“老同学”在北京音乐厅举行音乐会。

8月3日　天津大学姚建铨教授研究成功高功率激光器，输出绿激光功率达34.2瓦，取得国际最高水平成果。

我国收集到30多万份种质资源，居世界第三位。正在建设能贮存40万份的种质库。

8月6日　山西偏僻山乡一村童智力超常，武剑锋不满12岁考上清华。

8月8日　医学巨星、我国西医学先驱张孝骞教授逝世，终年90岁。

8月10日　青年王振国自学成才攻难题，中药天仙丸治晚期消化系统癌症有效率达81%，在吉林通化市通过鉴定。

我国又回收一颗试验卫星，首次为国外公司提供卫星搭载服务。

8月14日　我首创一项男性节育新技术，山西人民医院院长赵生才研究成功输精管可复性注射栓堵法。联合国派专家考察后计划近期向全球推广。

8月15日　我国著名控制论专家宋健获艾伯特·爱因斯坦奖。

8月19日　部分作家、评论家呼吁，把改革题材文学创作引向深化。

8月21日　我国首次太空微重力下材料加工技术试验获成功。

8月22日　我国首次建立小冰麦异附加系列，对培养抗病性抗逆性品种有重要意义。

9月1日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成立，班禅任院长。

首都一些演员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税务部门提醒偷税漏税者：声誉比金钱更重要。

9月5～25日　首届中国艺术节在京隆重举行。万里讲话，希望文艺工作者更自觉投身时代洪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自由讨论，在三中全会路线两个基本点基础上团结起来，勇于创新。

9月5日　中国医学基金会成立。

9月7日　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教师奖励基金，基金会已收到款项2700万元。

9月8日　著名翻译家、作家曹靖华逝世，终年90岁。

9月9日　我国出版界最高荣誉首次颁发，十位出版工作者获韬奋出版奖。

9月14日　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在北京开幕。

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逝世，终年84岁。

9月16日　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教师庄志荣研制出新型通用汉字处理模块，通过国家鉴定。

9月17日　我国又成功回收一颗卫星，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按计划运行8天。

9月18日　我国首座审计学院在南京建成开学。

9月20日　我国第一所培养能从事现代化、高层次金融管理和决策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国金融学院在北京成立。

9月21日　首届敦煌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9月29日　我研制成第一套雷暴预报系统。

10月3日　我国开放实验室，推动科研新突破，两青年首次发现8次对称准晶。

10月5日　全国首届“当代农民”小说征文发奖。

10月9日　指导高校科技工作的高级咨询参谋机构——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吴玉章奖金”首次评奖。

10月16日　鲁讯、周作人比较研究讨论会在北京举行（14日至16日）。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8年

导　言

1988年是中国的龙年。在这一年里，许多在以前不可想像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高级干部的丢官，奥运军团的溃败，女模特儿被逼疯……龙的子孙从祖先身上承继的固有的躁动，使1988年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年。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夏斐之死
- ●张兴让与“满负荷工作法”
- ●新“模特儿风波”
- ●严处两起重大交通事故
- ●海南建省
- ●南沙中越武装冲突
- ●实施新军衔制度
- ●兵败汉城

夏斐之死

背景介绍

一个小学生因为学习问题竟然被亲生母亲活活地打死，一石千浪，这一悲剧震惊了各界人士，教育界反响尤为强烈。社会上再次响起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材料：

- 青海一小学生因两门功课低于90分竟被母亲打死
- 夏斐母亲追悔莫及含泪投案，青海各界座谈反思，认为教训深刻
- 悲剧制造者的悲剧，夏斐之母自缢身亡

材料一　青海一小学生因两门功课低于90分竟被母亲打死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12月21日发生一起惨痛事件，年仅九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夏斐因期末考试两门课成绩低于90分并隐瞒了家长，竟被亲生母亲活活打死。

今年期末考试，夏斐数学得82分，名列全班第二；语文得79分，列第五。当他的母亲问及考试情况时，夏斐怕挨打，就谎称都在90分以上。12月21日，夏斐被母亲拉着一起到学校向老师询问考试情况，班主任将考试情况如实相告。尽管夏斐当场哭着向母亲承认了说谎的错误，但一回到家中，还是被母亲扒光衣服用铁制的三角形木锉一顿殴打，从中午12点一直打到下午点，直到夏斐被打得奄奄一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狠心的母亲才停住手洗衣服去了。下午五时许，夏斐母亲见儿子不出声气，才去叫丈夫。丈夫来后见孩子情况危急，赶忙吩咐送医院抢救，但等送到医院时，孩子已死去。

夏斐的母亲吴玉霞，今年35岁，高中文化程度，是职工家属。她望子成龙心切，苛求夏斐门门功课得分必须在90分以上。夏斐平时在家里没有娱乐玩耍的时间，母亲稍不如意，便对他拳打脚踢。小小年纪的夏斐，精神常处于恐惧状态。夏斐惨死后，医院对他的尸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他浑身发青的尸体上伤痕斑斑。

夏斐在学校学习认真，成绩优良，是少先队中队长。他死去后，班主任杨桂梅泣不成声地说：“夏斐是个好学生，昨天上午他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呀！”

夏斐之死在青海引起了强烈反应。人们认为，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积弊。

材料二　夏斐母亲追悔莫及含泪投案，青海各界座谈反思，认为教训深刻

1987年12月21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府大武镇年仅9岁的小学生夏斐，只因期末考试两门功课成绩低于90分并向家长隐瞒，就被亲生母亲活活打死。这一人间惨剧，震动了许多人，严重违法的夏斐母亲吴玉霞对自己的愚昧行为追悔莫及，在案发的第二天晚上，她含着眼泪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公安机关已将其依法拘留。

9岁学童夏斐被生母毒打致死一事，使青海省教育界深感震惊。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为此相继举行座谈会。省教育厅厅长马玉麟说：夏斐惨死事件向广大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它告诫人们：狭隘的人才观、传统的就业观以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重轰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要下决心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中解脱出来，使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衡量和评估学校的标准单纯看升学率高低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除教育工作者身体力行外，还应当得到家长、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青海省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指出：夏斐惨

死事件听来似乎难以置信，但从前一阶段对西宁地区十几所小学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件事的发生并非偶然。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在家庭教育中信守“棍棒底下出高分”的信条，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在调查中问到学生平时在家挨打的原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回答是因为作业没完成或成绩不好所致。而犯罪青少年中百分之四十的人犯罪原因与“棍棒教育”有关。青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卢承业、王骧业、吴筱珍三位副教授认为：夏斐的悲剧告诉人们，提高年轻父母的素质，广泛宣传家庭教育知识，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他们建议各地城乡都应推广建立家长学校的好经验，促使孩子健康成长。

夏斐惨死的悲剧在青海省司法界也引起了反响。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林阳同志深有感触地说：青海省早在 1984 年就颁布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地方法规，夏斐事件说明，死者的母亲缺乏起码的法律观念，也反映出在宣传、普及这一法规上还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普及法律常识，抓好法制教育，才能真正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材料三　悲剧制造者的悲剧，夏斐之母亲自缢身亡

将儿子夏斐毒打致死的吴玉霞投案后于 2 月 12 日在青海省果洛州的一个看守所自杀身亡。

据了解，2 月 12 日下午，看守员在巡视关押吴玉霞的房间时，发现她用一段旧麻绳上吊自杀。

在吴玉霞死前，公安部门已结束了对夏斐之死一案的侦察，将案卷移送玛沁县检察院。检察院已决定对吴玉霞提起公诉。

吴玉霞在遗书中对自己因望子成龙心切，用打骂方法教育孩子最后酿成悲剧表示十分悔恨。

张兴让与“满负荷工作法”

背景介绍

张兴让的“满负荷工作法”被认为是一项改革中的新创见。1988 年 2 月 1 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会见张兴让并盛赞他发明的这一方法。之后，这种工作方法在全国广为宣传并获得了一定的推广。

材料：

-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满负荷工作法”发明者张兴让
- 张兴让与“满负荷工作法”

材料一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满负荷工作法”发明者张兴让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满负荷工作法”发明者、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时，赞扬满负荷工作法是张兴让的一大创造，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创造，应该受到奖励。他对张兴让说，我们要宣传、推广你创造的这个工作方法。

时钟指向 9 点。赵紫阳一走进勤政殿会议室就高兴地握着张兴让的手笑着说：我们 1985 年见过面。他把张兴让拉到自己的身旁坐下，问张兴让多大岁数了，什么时候到厂里工作的。张兴让回答说，他今年 50 岁，1984 年初到厂里工作，到现在已四年了。

赵紫阳给张兴让出了三个题目：请你讲讲为什么要提出“满负荷工作法”，这个“工作法”主要内容包括些什么，实行两年效果怎样。

张兴让详细地作了回答，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赵紫阳聚精会神地听着。当张兴让汇报到他们厂过去人力、物力、财力和设备浪费严重的情况，谈到 1984 年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每人每天有效劳动时间只占应有的有效劳动时间的 32.4%，设备开动率只有 40%时，赵紫阳说，职工有效劳动时间只有⅓，设备开动率还不到一半，这是很大的浪费。讲企业潜力，这是最现实的潜力。

赵紫阳听完张兴让的汇报后强调说，“满负荷工作法”是系统、科学的管理方法。它符合中国企业的现状。我国企业在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推广“满负荷工作法”，对于加强企业管理，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发挥承包责任制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说，张兴让同志创造的这个工作法非常适合时宜，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赵紫阳说，“满负荷工作法”还要发展，可以把实行厂内银行制作为内容之一。我们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推广“满负荷工作法”。他说，所以要实行“满负荷工作法”，就因为现在负荷不满，生产要素还没有处于最佳状态，存在着浪费和潜力。而这是普遍情况。因此，满负荷工作，应是当前加强管理总的提法。他说，目前，我国许多工业企业技术设备固然落后，但经营管理落后是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一些先进设备的技术，这是我们早已确定的方针，而且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我们更要重视企业现实的潜力。只要加强管理，做到满负荷工作，使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不用增添新的技术设备，就能挖出很大的潜力，这是最现实的。承包为搞好管理提供了条件和动力，但不等于就搞好了管理，不能代替加强管理。因此，在承包的基础上，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推广“满负荷工作法”，并在推广中继续发展和丰富它。赵紫阳强

调说、发展和丰富它，不仅是石家庄第一塑料厂的任务，也是全国所有企业的共同任务。

材料二　张兴让与“满负荷工作法”

一说“满负荷工作法”，有人误以为像喜剧大师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饰演的工人紧螺母一样，紧张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其实，这是误解。

释疑：秩序井然　眼见为实

记者参观了闻名全国的石家庄第一塑料厂——“满负荷工作法”的发祥地。

在人造革车间，一台长如列车的庞大机器安放在厂房里，这是从日本引进的人造革生产线。整个车间 1800 平方米，只有 12 个工人干活。他们全神贯注地操作，但一点也不手忙脚乱。

塑料印花车间是从台湾转口贸易引进的先进设备，有 8 个人在干活。记者问一位青年工人：“紧张吗？”他轻轻一笑地回答：“还行。”

“满负荷”本是一个物理名词，它的意思是动力设备在运行时所产生、转换、消耗的负荷达到额定的标准。小于额定标准为“低负荷”，超过额定标准为“超负荷”。“满负荷工作法”正是借用“满负荷”这个名词提出来的。它一反过去的“低负荷”，又绝不是“超负荷”。因此，“满负荷工作法”受到职工的欢迎，并引起全国企业界和经济理论界的关注。

许多事情往往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的同志工作不好，谁也不乐意承认。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同志工作没有满负荷，则谁也不能否认。

1984 年 5 月，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开始实行经济承包，企业利润以 1983 年的 136 万为基数，每年递增 100 多万元。不久，他们又以本厂产品为龙头，率先在石家庄走企业横向联合之路，受到赵紫阳同志的赞扬。对于一个拥有 800 名职工的中型集体企业来说，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但是，当厂长张兴让参观了上海、北京、武汉、佛山等国内同行业先进企业，他感到了差距。特别是 1985 年 5 月，他在日本进行了 20 天的考察学习，参观了日本 9 个塑料制品对口厂，更令他大出冷汗：日本的一个规模与自己相当的塑料厂，二三线人员不到职工总数的 10%，而自己的二三线人员却在 40%以上；同样的四辊压延机，人家每班定员 6 人，班产量平均 8 吨，我们每班要 18 人，班产量平均只有 6 吨；人家的设备无闲置，运转满负荷，我们的设备运转率还不到 50%；日本厂家的资金周转天数很少超过 30 天，而自己厂 1984 年的资金周转天数高达 123 天。至于人均效益，更是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强烈的对比，使张兴让脸上发烧。他问日本人：“你们生产效率为什么这样高？”回答是：“设备运转满负荷。利用节假日，把设备维修好，保证运转率 100%。”

张兴让“心有灵犀一点通”。

出台：现实严峻　高枝起飞

张兴让现年 50 岁，16 岁参军，上过朝鲜战场。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背了整整 22 年的“黑锅”。他当过工人，干过出纳、计划统计，但从未懈怠过。1979 年彻底平反后，他由生产科长提为副厂长、厂长。

从东瀛归来，张兴让更忙了。经过与国内外先进行业的深入对比和反复琢磨，反省出我们企业的管理混乱、效益低下、技术落后、产品粗糙，纪律松懈和工作不负责任六大通病，以及人浮于事、设备闲置、物料浪费和资金周转缓慢等四大漏洞，其中以管理混乱、纪律松弛为关键。

张兴让在与其他厂领导的反复研讨中认识到，企业的差距大、浪费大，潜力也大。要搞活企业，一是要创造外部条件，二是要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要在深化企业内部的改革上下功夫。他提出了“满负荷工作法”。

“满负荷工作法”包括 9 项内容。即：质量指标满负荷、经营工作满负荷、设备运转满负荷、物资使用满负荷、资金周转满负荷、能源利用满负荷、费用降低满负荷、人员工作量安排满负荷、8 小时工作满负荷。

“满负荷工作法”的基本含义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机（设备）尽其速，资（金）尽其活，时尽其效。”说白了，就是让每个职工、每一分钱、每一克料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尽其力。

过去，厂里一些车间上班松松垮垮，看小说、打毛衣、办私事，干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跑到外边逛商店的。显而易见，这些职工没有尽其所能。厂里为人造革车间算了一笔帐：全车间 38 人，平均每人每班实际工作时间只有 2.5 个小时，生产人造革 41 平方米，创利税 11.4 元。如果每个人都能干满点，每班产量就能增加到 123 平方米，可创利税 34.2 元。可见漏洞之大！

“满负荷工作法”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提高企业的人均效率和人均效益。张兴让是要大家去拼体力、拼设备，也不是要大家加班加点，24 小时连轴转，365 天不休息，而是限于在 8 小时内的工作满负荷，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使职工的报酬“水涨船高”。

步骤：循序渐进　切实可行

“满负荷工作法”的指标，是以本厂历史最好水平为基数，以省、市、国标为依据，参照国内外先进水平，根据科学测算出来的，因此具有先进性、可行性。

满负荷工作的各项指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步步、分阶段完成的。

厂长张兴让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满负荷标准的实现，要像运动员举重一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只有一点一点地增加重量，才能不断刷新，最后打破世界纪录。"

工厂把每项工作都指标化、数据化，然后层层落实到车间、科室、班组、个人，并建立满负荷奖。由于各项指标简单明确，切实可行，到 1987 年底，打基础阶段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满负荷指标。

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张兴让在厂里动的第一刀，就是调整人员结构。占全厂职工总额 40%的二三线人员，人浮于事，尾大不掉，显然不符合"满负荷"的要求。对于这一决策，全厂上下一片叫好声。

然而，当调整的名单一公布，埋怨声立刻夺过了叫好声。有的哭哭啼啼，有的骂骂咧咧，有的说情、批条子，还有人甚至给张兴让写匿名信，扬言要对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开始，有些人以为精简只是一阵风，过去了就没事了。经过一批又一批的精简，他们逐渐看清了形势，不再向领导说好话请求留下，而是主动要求下去。他们看到，人员越减越少，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留下来自己也干不了。而且晚走不如早走，早走还有选择适合自己工作的余地，晚走反而会使自己更加被动。有人干脆地说："中央都破除了终身制，精简多余人员还有啥想不通的。"

工厂坚持成熟一批，精减一批。精简下来的人员都是在有了新的安排后才与本人见面。厂里尽量考虑每个人的年龄、特长和身体状况，知人善用，适当照顾，因此，重新安排工作的 85 人无一人调走，无一人提出新的要求。

保障：生活上"减负荷"

工厂在实行"满负荷工作法"的同时，还重视从实际出发，尽力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过去职工下班回家，现捅煤炉做饭，弄得手忙脚乱，工厂就给每户添置了一套液化气炉具；带小孩的女职工乘公共汽车不方便，工厂安排了交通车；缺房的职工盼望早日分到新房，工厂积极增建宿舍。去年，80%的职工住上了新房，今年再竣工二幢，全部可以解决；厂里还整修了托儿所，并决定扩建幼儿园，为小学输送高质量儿童；厂里还在技术培训、文化娱乐上采取一些措施，使职工的"房子、孩子、肚子、身子、脑子"这些基本的东西"五子登科"。

厂里还于去年实行了经营与服务分离，变职工食堂、澡堂、托儿所、医务室等部门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改变了长期被称为大锅饭式、铁饭碗式的被动服务，提高了服务质量，更有利于职工思想集中地安心工作。

"满负荷工作法"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在人们的心理上自然会带来一些反映。当初，有些人确实担心自己"将要变成机器人"，害怕"受不了"。现在养成了快节奏的好习惯。工人回家还常常看书学习、参加文体活动。

"满负荷工作法"的实行，改变了过去"工作低标准、生产低效率、成果低效益、劳动低收入"的状况。工人主动提出增产不增人，增设备不增人；二三线人员则减人不减工作量，加任务不加入。因为多干活，多收入。

三年来，工厂的投资和人员没有增加，经济效益却大幅度增加。1987 年与 1984 年相比，人均产值由 28705 元增加到 51999.8 元，提高了 80.9%；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 123.93 天，降低到了 61.2 天，加快了 62.73 天。职工的人均工资也由 1984 年的 80.68 元，增加到 1987 年的 163.54 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模特儿风波"

背景介绍

70 年前在南京艺术学院发生过一起模特儿风波，被认为是封建意识对艺术的阻挠；但是，在 80 年代，这类悲剧的重演，却不能不引起人们更深一步的思索了。

材料：

· 女模特陈素华被愚昧人言逼疯

· 一石千浪——一个女模特儿被逼疯之后

材料一　女模特陈素华被愚昧人言逼疯

长篇通讯《一个女模特儿的悲剧》去年 11 月 14 日在南京《周末》报发表后，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人们对至今仍缠绕着人们头脑的封建意识大加挞伐，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许多人在来信中这样疾呼："刘海粟先生于 70 年前曾为之困扰、抗争的模特儿风波，还要在中国大地上延续到何时？""八十年代仍接连不断地发生模特儿的悲剧，这是愚昧无知向现代文明的严重挑战！""美术家的成就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为什么模特儿往往成了牺牲品？"

这又一个惨遭厄运的模特儿名叫陈素华。1985 年初，19 岁的她经人推荐，被招进南京艺术学院当模特儿。1986 年 5 月 8 日由于气候多变和过度劳累、经常感冒、发烧的陈素华突然昏倒，被学校送到医院，由病毒性感冒发展到散发性脑炎伴发精神障碍，住院 108 天。1986 年 8 月下旬，小陈病愈出院，回到六合县农村家中养病。

一次，她到邻居家看电视。人们从电视里看到画家画

模特儿的场景，追问她是不是也这样给人画的。她惊惶地点头。这下糟了。鄙夷的哄笑，放肆的羞辱立刻向她袭来。一位老奶奶抱怨说："姑娘，你就是去要饭，也不要去卖身呐！"父母和家人没有一句安慰话，他们也认为当模特儿就是卖身，就是当娼妓。村子里出了"大新闻"，远近轰动，天天有人跑到她家指指戳戳。

陈素华又一次发病了。她颠来倒去只说一句话：这是艺术，艺术！她跑上公路不顾死活地拦汽车，凄厉地喊："我要去南艺！南艺！"

已经与陈素华中止合同关系的南艺，从她回家后停发工资。她的生活费没有了着落。

正在香港访问的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海粟，听说在南艺当模特的陈素华被逼疯，十分惊讶，十分激动。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关于模特儿的斗争，70年前就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70年后的今天，模特儿的处境仍是这么艰难，说明反封建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刘海粟解释说，画人体模特儿是学美术的基本功。它能表现活泼泼的一个"生"字。人体的曲线自然和谐，人体的颜色能完全表现出一种不息的流动，变化很微妙、很复杂，所以就有美的意义，美的真价。

刘海粟还立即向南京汇寄1000元港币，为陈素华治病尽微薄之力。

近日来，全国各地的人士也纷纷来信，从道义上支持陈素华，从经济上帮助她。一对退休的夫妇写信说，愿收养她做女儿，供她读书。

然而，大批来信中也有人对美术教学要用人体模特儿很不理解。有人认为模特儿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人提出模特儿为什么不可以穿上健美服，为什么不可以让女性摄影者先摄下模特儿的照片，然后让学生照着画。

当然，也有人和70年前一样，大骂刘海粟，大骂南京艺术学院。历史的重复，不是很值得人们深思么！

材料二　一石千浪——一个女模特儿被逼疯之后

这是一出人间悲剧。

一名女模特儿硬是被家庭、社会舆论逼疯了！而我们还只能说，她是被愚昧、无知封建的僵化逼疯的，没有谁能对她的疯负法律责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惶惑、令人沉思的悲剧。

姑娘叫陈素华。1984年底经家乡六合县农村芦席厂的小姐妹介绍，被招进南京艺术学院。南艺的一位女教师曾向她讲明了人体模特儿是怎么回事。18岁的姑娘答应了，但她要求保密。她与南艺签订了临时工合同。

1986年5月，她因病返乡休养。一次，人们从电视里看到画模特儿的场景，追问她是不是也这样给人家画的。她惊惶地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这下糟了。鄙夷的哄笑，放肆的羞辱立刻向她袭来。村子里出了"大新闻"，远近轰动，天天有人跑到她家指指戳戳。她不敢迈出大门一步，像被关在铁笼子里的怪物似地任人围观，戏弄。她疯了。整天只念叨着一句话："这是艺术！"

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开报道之后，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在信中疾呼："刘海粟先生70年前曾为之困扰、抗争的模特儿风波，还要在中国大地上延续到何时？""美术家的成就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为什么模特儿往往成了牺牲品？"

三位海军战士联名写信说：许多人爱维纳斯，为什么不爱我们自己的模特儿？一对退休夫妇在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自告奋勇站到徐悲鸿先生画架前的少女们也没有像陈素华今天这样的遭遇。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许多人在给报社和作者的来信中，对封建遗毒大加鞭挞。然而，它仍然幽灵似地缠绕着人们的头脑。一个读者将模特儿和性开放、性病、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加以反对。对美术教学要用人体模特儿不理解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认为模特儿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人提出模特儿为什么不可以穿上健美服，为什么不可以让女性摄影者先摄下模特儿的照片，然后让学生照着画。

美术家理所当然地对此事特别关注。他们在报纸上撰文论述画人体模特儿为什么要全裸的道理，这种美育启蒙看来十分重要。现在美术院校已普遍将人体模特儿用于教学。但同时模特儿处境艰难，有的被爱人抛弃，有的迫于舆论压力避走他乡，甚至有的被逼疯。冷静的法律工作者认为，模特儿的问题光强调反对封建思想残余是不够的，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李固平说，我们社会主义法律绝不允许像小陈姑娘这样无辜遭受伤害。我愿作小陈姑娘民事诉讼的代理人，只尽义务，不要报酬。他认为南京艺术学院负有"无过失责任"。模特儿职业在现阶段应属于高度危险性的职业，它的危险不是来源于这种工作的自然属性，而是来自这种工作的社会属性。

新疆的读者也认为单靠社会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经济和法律上的保障。使用模特儿的单位应以小时计算、支付模特儿比较优厚的写生费，还应给模特儿进行人身保险，一旦发生意外，就不至于像南艺那样"因无财务规定"而对临时合同工的模特儿"爱莫能助"了。他们还建议美术家在出版人体美术作品前，应征求模特儿的意见，付给一定的稿酬。

《民法通则》起草人之一的刘齐珊教授则认为，那些聚众嘲讽、羞辱模特儿的人虽然出于无知，实际上侵犯了小陈姑娘的名誉权，属违法行为，应责令他们停止侵犯，为小陈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其中如有情节严重者，应赔

偿经济损失。刘齐珊也愿担任陈素华的法律顾问。

有人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才能在遇到困扰时不为所动。模特儿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不仅对形体有特殊的要求，对思想素质也有特殊的 要求，目前招收模特儿的单位往往是忽视了后者，即模特儿的艺术修养、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这是必须接受的教训。

医务工作者关心的是小陈姑娘的病情。广西、北京、南京、扬州等地医务工作者表示愿免费为陈素华治病，有的还寄来了治病的偏方。

有的信在信封上写着"急件"、"救人"的字样，表达了许多读者的心情。江苏省六届人大代表黄力行建议成立一个拯救小组，开展社会募捐活动，帮助小陈姑娘治病。他还寄了 20 元作为资助。他认为这场拯救人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的较量。更多的人给小陈寄钱，支援她治病。有些单位不但愿资助她治病，还愿在她病好后给她安排工作。更为感人的是一对没有儿女的夫妇在信中说："如果做父母的不懂得自己女儿的价值，如果没有人肯对小陈姑娘负责，我们愿收养她做女儿，以我们微薄的工资给她治病，供她读书。"

模特儿悲剧的重演，正引起人们越来越深的思索。

严处两起重大交通事故

背景介绍

1988 年是我国交通事故的高潮年，交通部门的种种弊端在这一年里暴露无遗，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重点处理了两起事故，其中，对两位高级干部的处分尤其令人注目。

材料：

- 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
- 昆沪客车发生颠覆事故
-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严肃处理 222 号客机空难事故和 80 次特快列事颠覆事故

材料一　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

一月十八日，中国民航西南航空公司 222 号伊尔 18 型客机从北京飞往四川重庆，北京时间二十二时十五分时，在距重庆白市驿机场直线距离约五公里，大约东经一百 0 六度十八分，北纬二十九度三十三分处不幸坠毁。十名机组人员、九十八名乘客(其中有三名来自日本、一名来自英国)全部不幸罹难。

空难发生后一个半小时，重庆市政府及公安部门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国务院领导极为重视此次空难事件，李鹏代总理即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飞抵重庆组织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

一月十九日北京时间十四时四十二分，王书明副秘书长一行乘坐的专机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降落。同时抵达重庆的有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四川省副省长马麟、重庆市市长肖秧以及公安部等部门有关人员。王书明一行在机场听取了简短的汇报后立即赶赴空难现场。王书明说：这次空难是很大的不幸，国务院领导同志极为重视，李鹏代总理指示要组织好各方面力量，调查出事原因，做好善后工作。王书明还代表国务院对死难人员亲属表示慰问，对参与抢救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慰问。

空难发生后，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及重庆市党政军领导十分重视和关心，立即成立了现场总指挥部。一千名公安干警和驻军战士，以及当地农民、市内医务、消防、民政等人员积极维护现场，做好善后工作。重庆白市驿机场没有关闭，飞机照常起落。

材料二　昆沪客车发生颠覆事故

1 月 24 日凌晨 1 时 35 分，由昆明开往上海的 80 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至昆明贵阳线的且午至邓家村间，发生严重颠覆事故，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到目前为止，已死亡 90 人，重伤 66 人。

国务院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后，对此十分重视。李鹏代总理立即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当地政策，并商请部队：一、全力以赴抢救伤员，并做好善后工作；二、派部队和公安干警维持好秩序；三、尽快恢复通车。

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乘机赶赴现场。云南省、贵州省和成都军区、云南省军区及当地政府和驻军负责同志带领救护人员已先期到达现场。

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受李鹏代总理委托，于下午 6 时到达现场，看望了受伤旅客和参加抢救工作的人员。陈俊生指出，这是一起重大的铁路客车颠覆事故，领导小组要认真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抢救伤员；恢复交通运输；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者，严肃处理。

陈俊生宣布，国务院决定：由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云南省省长和志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马秉臣组成处理事故领导小组，负责全权处理。

领导小组已在现场工作，并采取了十项措施。丁关根说，由于铁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如此惨重的客车伤亡事故，我们心情极为沉重，务必竭尽全力抢救事故，做好善后工作。

当地部队和铁路的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伤员。现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医院治疗。旅客转运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列车开通方案已经拟定，争取尽快通车。

材料三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严肃处理222号客机空难事故和80次特快列车颠覆事故

国务院代总理李鹏3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航222号客机空难事故和80次特快列车颠覆事故调查委员会调查情况的汇报，讨论和决定了对这两起重大交通事故的处理。

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在事故发生以后，曾多次表示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给予处分。3月5日，他们又分别在会上作了检查。丁关根提出引咎辞职；胡逸洲请示国务院给予处分。

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严肃政纪，教育干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定接受丁关根辞去铁道部长职务的请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决定给予胡逸洲记大过处分。

会议对两起事故发生后在救援和善后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医务人员、职工、农民以及各有关党政军机关，表示高度的赞扬和崇高的敬意；对这两起重大事故中的不幸罹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罹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的慰问。

这两次重大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决定成立由国务委员、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张劲夫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负责查清事故的原因、责任和提出处理意见。

在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张劲夫代表调委会作了关于这两起重大事故调查情况的报告。80次特快列车颠覆事故调查组组长叶青、222号客机空难事故调查组组长李伯勇分别作了说明。

张劲夫说，从1月下旬起，事故调查委员会的两个调查组通过对事故现场和当事人的调查、取证、计算、化验和分析论证，一致认为这两起重大事故的性质都属责任事故。关于80次特快列车颠覆事故的直接原因，一种意见认为是列车在下坡弯道上超速行驶，受到前方瞬间重大阻力所造成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电力机车的接触导线自然断落后缠绕车体造成的。222号客机空难事故，是由于第四发动机内起动电机的零件，因维修、使用不当，引起电机起火，导致第四发动机坠落，进而使飞机失控造成的。

张劲夫说，222号客机空难事故原因已基本查清，80次特快列车事故调查工作也获得初步成果。由于对肇事具体原因尚有分歧，建议由铁路、公安、监察等部门派员参加进一步查明事实。

李鹏代总理在会上说，民航222号客机空难和80次特快列车颠覆两起重大事故发生后，全国人民极为关心。当时，国务院确定了对这两起事故处理的方针：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尽快恢复正常交通秩序；稳定情绪，振奋精神，保证春节运输安全；认真调查事故原因和责任，从中吸取教训，对有关责任者作出必要的处理，总结经验，采取措施，整顿和改进交通运输工作。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认真工作，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交通运输恢复畅通，较好地完成了繁重的春运任务。这证明我们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

李鹏说，两起重大事故调查委员会特别是参加调查的各方面的专家做了大量的调查。他们的工作是认真负责和卓有成效的。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我们作出的结论是要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的。这两起事故的性质已经查清，都是责任事故。这些事故暴露了铁路、民航部门存在着管理不善，规章制度执行不严，劳动纪律松弛，人员素质差，设备管理、维修跟不上等问题。这是酿成这几起重大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严肃政纪，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次会议就丁关根、胡逸洲同志领导责任作出的处理，是必要的，也是恰当的。鉴于事故尚未彻底查清，国务院责成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继续工作，在有关部门配合下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分清责任，以便对事故其他责任者作出正确的处理。

李鹏指出，我国铁路、民航担负的运输任务十分繁重，广大干部、职工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希望铁路、民航系统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从事故中吸取教训，振作精神，进一步做好自己肩负的工作。他要求各部门，特别是交通、电力、化工、煤炭、冶金、纺织等部门，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从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改善领导，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努力加强管理，严格纪律，遵守制度，同时要加强对设备的维修和管理，保证设备在良好状态下运行，以确保安全生产。

李鹏代总理宣布，丁关根辞职后，铁道部的工作由副部长李森茂主持。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田纪云，国务委员陈慕华、姬鹏飞、王丙乾、宋平、宋健，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出席会议并发了言。他们认为，国务院对这两起重大事故的处理是严肃认真的，充分体现了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们指出，丁关根、胡逸洲同志的检查是诚恳的，国务院对丁关根、胡逸洲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列席了会议。

3月2日，李鹏代总理还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专门听取了两起事故调查情况汇报，为这次常务会议作了准备。

海南建省

背景介绍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并把它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挂牌，这艘巨大的航船以崭新的姿态起航了。

材料：

- 崔乃夫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设立海南省议案的说明
- 谷牧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议案的说明
-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
-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 海南省委省政府举行挂牌仪式

材料一　崔乃夫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设立海南省议案的说明

民政部部长崔乃夫3月31日在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的说明时说，海南岛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建省后能使各项优势充分得到发挥。目前建省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崔乃夫说，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连同南海诸岛，面积34000多平方公里，气候温和，海洋水产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据调查，可供开发的旅游点有123个，其中40多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全岛现有60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99万。

崔乃夫说，解放以后，海南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和广东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予海南较多的自主权，加快了海南的发展速度。"六五"计划期间，海南的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都有显著增加。但是，由于受许多条件的限制，海南岛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其他沿海地区相比，海南还有较大差距，但发展潜力很大。

崔乃夫说，近几年来，为了加快海南建设的步伐，国务院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开发海南，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建议撤销海南行政区，将其所辖区域从广东省划出来，单独设立海南省。海南建省后，由中央直接领导，更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海南，有利于海南比较独立自主地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特殊政策，有利于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统一组织领导全岛的开发建设，使海南的各项优势充分得到发挥。

他说，海南建省后简称"琼"，省人民政府驻海口市。海南省管辖海口市、三亚市、通什市；琼山县、琼海县、文昌县、万宁县、屯昌县、定安县、澄迈县、临高县、儋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黎族自治县；西沙、南沙、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崔乃夫说，目前，经过海南建省筹备组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工作，建省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国务院建议批准设立海南省。

材料二　谷牧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议案的说明

国务委员谷牧3月31日说，国务院建议把海南岛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

谷牧在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议案的说明时指出，海南单独设省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需要采取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措施，大力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拓展对外贸易，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在国际大循环中加快经济发展。

谷牧说，香港地区的和外国的许多客商都表示有参与开展建设海南的意向。因此，国务院建议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现有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以便创造对外商有较大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速开发建设。

谷牧说，国务院建议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政策的实际需要，制定各项有关的单行经济法规，使海南经济特区的经济管理充分适应开发建设的需要。

材料三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决定：

一、批准设立海南省，撤销海南行政区。海南省人民政府驻海口市。

二、海南省管辖海口市、三亚市、通什市、琼山县、琼海县、文昌县、万宁县、屯昌县、定安县、澄迈县、临高县、儋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黎族自治县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材料四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决定：

一、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二、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材料五 海南省委、省政府举行挂牌仪式

26日上午，中共海南省工委和省政府召开全省县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第七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精神，并随即布置工作研究解决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大会由梁湘同志主持。会后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悬挂衔牌仪式。

记者注意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没有邀请来宾，没搞庆典。但庄重简朴的仪式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海南人以认真务实的精神跨入了新纪元。

中共海南省工委书记许士杰在会上针对建省后的任务，向全省县级以上干部提了5点要求。许士杰说：海南建省后首要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目前重要的是搞好改善外引内联的投资环境，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效益突出的事情上。因此，要把发展、建设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放在第一位。其次要大力发展农业。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要适应海南经济发展的大势，将工作重点放在农业和“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上。第三要努力搞好办好现有企业。第四要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第五要尽快定机构定班子，按现定的新机构设置方案，所有的干部马上就任工作。

许士杰强调指出：海南建省后面临着目标高、要求急、起点低、新旧体制转换的一系列矛盾，因此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扎扎实实、艰苦奋斗，为办好大特区和海南的光辉前景努力工作。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海南省从一开始就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建立一套适应海南形势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据悉，海南省直属党政机关机构设置与在陆各省颇为不同。省委、省人大和省人民政府只有36个机构，不及内地省直属党政机关机构的一半。

南沙中越武装冲突

背景介绍

陆上的战斗稍息，海上的争端又起。中国人一向奉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捍卫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是，关于南沙的归属问题现在仍是各执一词。

材料：

- 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武装舰船侵入南沙群岛海域袭击我船只
- 我军有关方面负责人披露南沙中越武装冲突真相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问题的备忘录

材料一 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武装舰船侵入南沙群岛海域袭击我船只

中国外交部3月14日强烈抗议越南武装舰船侵入中国南沙群岛海域，袭击中国船只。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披露，中国外交部14日向越南驻中国大使馆送交了一份抗议照会。这份照会指出，“1988年3月14日，非法侵入中国南沙群岛海域的越方武装舰船悍然向正在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域进行正常考察作业和巡逻的中国船只发起武装袭击，中国船只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照会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声

明，继续派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现越南舰船又首先向中国船只进行军事挑衅，蓄意在这一海域制造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抗议。”

照会严正指出，“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在南沙群岛海域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从侵占的中国岛礁及其附近海域撤走，否则，它必须对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材料二　我军有关方面负责人披露南沙中越武装冲突真相

连日来，越南方面就3月14日发生在中国南沙如岛赤瓜礁海域的武装冲突，不断制造谎言，歪曲事实真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予驳斥。记者特就此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方面负责人，请他介绍这次事件的始末经过。

这位负责人首先指出，这次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方面一手挑起的。3月13日，中国海军舰船来到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海域对部分岛礁进行考察。下午2时25分，我海军舰船在赤瓜礁附近海区停泊抛锚。随后，组织人员登上赤瓜礁考察，并建立观察点。

3月14日6时25分，越南海军604、605运输船和505登陆舰突然窜到我赤瓜礁海区进行挑衅活动。他们派出43名武装人员携带轻机枪、冲锋枪，强行登上赤瓜礁。我考察人员立即向登礁越军喊话，声明这里是中国领土，越南武装人员必须离开。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撤离赤瓜礁，反而在14日8时47分首先使用冲锋枪向我礁上人员开枪，打伤我考察人员杨志亮。与此同时，越南海军604运输船上的多挺轻机枪也一齐向我礁上和舰船人员射击。随即，越南海军的其它舰船也使用舰炮向停泊在赤瓜礁附近海区的我海军舰船开炮。在这种情况下，我海军舰船才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战斗持续28分钟，越方604运输船被我击沉，605运输船和505登陆舰被击成重伤。我方舰船未再追击。事件发生后，我海军舰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营救、打捞越方落水人员；同时，允许越南船只悬挂红十字旗帜，前来营救。

这位负责人说，越南方面采用制造谎言的惯用伎俩，在国内外大肆进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他们污蔑中国海军舰船首先打伤了他们的运输船，枪杀落水人员，并阻挠他们营救，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值得指出的是，营救活动结束后，越南舰船依然打着救援的旗号，千方百计地继续对我方在南沙海域的正常活动进行侦察、监视。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问题的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5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问题的备忘录。

备忘录全文如下：

最近，越南当局接二连三地发表外交部声明及其它官方文件，一再声称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硬说中国在1987年以前从未在南沙存在过，攻击中国不愿和平解决争端等等，并极力为其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归属问题上出尔反尔的立场辩解。然而，历史事实不能伪造，国际法原则不容践踏。越南当局随心所欲拼凑的“材料”和对中国进行的种种诬蔑攻击，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无可争辩的主权。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不仅有古今中外的大量史料、文件、地图和文物可作证明，而且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广泛国际舆论所承认。中国外交部1980年1月30日发表的文件已对此作全面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阐述。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代，中国人民就先后发现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陆续来到这两个群岛，辛勤开发和经营。唐、宋以后，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生活和从事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的中国海军也进行过相应的巡海活动。宋、元时代，中国已将这些岛屿命名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明、清时代，中国政府已明确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琼州府(今海南省)管辖。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曾一度为外国列强所侵占，但侵略不能产生主权，这是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准则。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46年11月、12月先后指派高级官员分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接收，在岛上举行了接收仪式，并立碑纪念，派兵驻守。日本政府也于1952年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从而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正式交还给中国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今天，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太平岛仍一直由中国台湾方面派军队驻守着。越南当局置最起码的事实于不顾，硬说中国在1987年以前从未在南沙存在过，这岂不是弥天大谎吗？

必须强调指出，针对外国对西沙、南沙主权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这两个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所有地图都标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早在1959年3月，中国海南行政区就在西沙群岛永兴岛设立了“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1969年，该办事处改

称"广东省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革命委员会";1974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驱走了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长期以来中国军队、渔民及科学工作者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巡逻、考察和进行渔业生产的活动从未间断过。

与中国的有效管辖的情况相反,越南方面过去不仅从未在南沙群岛存在过,而且直至 1974 年以前它所发表的政府声明、正式照会和公开出版的地图的教科书中,都一直正式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例如,1956 年 6 月 15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在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时曾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材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进一步具体介绍了越南方面的材料,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属于中国了。"1958 年 9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并且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同年 9 月 14 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 年 9 月 4 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 1960 年、1972 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及 1974 年出版的教科书都承认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所有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的。人们注意到,1988 年 4 月 25 日越南外交部公布的文件也不得不承认上述事实。然而越南方面却公然编造谎言为其出尔反尔的立场进行诡辩,说什么越南过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寻求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需要等等。这种自欺欺人的解释恐怕连越南当局自己也是难以相信的。事实上,越南当局很清楚,当年中国支援越南,完全出于正义的目的,从未向越方提出过任何要求和条件。稍有国际常识的人都知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领土主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能拿来做"交易"。更何况 1956 年和 1958 年越南方面向中国方面确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的时候,在越南还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抗美战争。越南当局在西沙群岛和南少群岛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顾事实、背信弃义的态度,只能使人们进一步看清它为了实现领土扩张野心,已经到了何等不择手段的地步。

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南沙问题上也是如此。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中国主张将南沙群岛问题暂时搁置一下,将来商量解决。对于越南,就在它刚刚开始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的时候,1975 年 9 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向正在中国访问的越南领导人黎笋指出,中国方面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但本着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表示"以后可以商谈"。令人遗憾的是,越南当局野心膨胀,把中国方面的善意视作软弱可欺,在此后十几年时间里,有恃无恐地派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并在上面修筑各种军事设施,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长期霸占。特别是今年以来,越南当局进一步加快了抢占南沙岛礁的步伐,先后又侵占了中国的九个海礁。同时,越南还不断向南沙海域增派舰船,对中方的科学考察活动进行骚乱,并蓄意挑起了 3 月 14 日的武装冲突事件。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南沙群岛诉诸武力、非法侵占别国领土,制造紧张局势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越南当局自己。

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严正要求越南当局彻底改变穷兵黩武的侵略扩张政策,停止一切侵占中国领土和制造紧张局势的活动,赶快从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岛礁撤走,以恢复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实施新军衔制度

背景介绍

我国曾实行过军衔制度,但不久便被取消。1988 年,我国重新实行这一制度,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向着正规化迈出了一步。

材料:

- 我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 中央军委举行上将授衔仪式
- 敬礼,共和国新一代将领

材料一　我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业已颁布。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是军队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步骤。

军衔制度,是一项国际性的现代军事制度。我军曾在 1955 年开始实行过军衔制,但仅仅实行了 10 年,便于 1965 年取消了。这次不是简单地恢复军衔,而是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那么,新的军衔等级是怎么设置的?新的军衔制度有什么特点呢?

新的军衔等级划分比过去实行的军衔简化了。新颁布的军官军衔条例规定，新的军衔等级共设将、校、尉3等11级。不设元帅、大将，最高军衔为一级上将。而过去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

军衔等级的划分，是军衔制的核心。据悉，当前国外军队的军衔等级逐渐趋向简化。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谈到我军实行新的军衔制时明确指出：和平时期军衔等级要设得简单一点，最高设到上将。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说：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不同，军衔等级简单一点好，不设元帅、大将。

新的军衔条例对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不是设单一的一职一衔，而是设一职两衔或三衔。例如，正军职可以由中将、少将、大校担任。同时，条例还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例如，正军职的基准军衔为少将。军衔是军官的德才、资历、责任、贡献等综合因素的体现。现在，同一职务上的军官资历、贡献及担负的责任等方面差别较大，如果单一设一职一衔，这种客观上的差别就难以通过制度体现出来。因此，在确定各级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时，既有一个基准军衔，又有一个适当的幅度，拉开档次。

军官军衔制度，是我军干部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有利于理顺干部工作关系。军衔条例对各级军官职务的编制军衔和晋升年限作了明确规定，通过职、衔的相互制约，军官按一定的年限晋升职务和军衔，进出流量就能够控制在相对稳定的比例之内，避免大进大出，使军官的进出逐步走向正规化。

由于军衔是区分军官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和标志，它使军人相互的关系更加明朗化和规范化。又因为军衔是国家给军人的一种荣誉，还能有效地增强军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激励军人奋发向上，促进优秀人才成长。军衔制度是一个被世界各国普遍确认的军人等级形式，在国际交往中也便于明确军人的身份。

在实行新的军衔时，已离休的军队老干部将不授予军衔。根据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将确认他们在1955——1965年期间所授予的军衔。为表彰他们的历史功绩，中央军委将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八·一”期间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发给荣誉金。功勋荣誉章分三种，分别授予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

（易俭如）

材料二　中央军委举行上将授衔仪式

9月1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仪式上，17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军官，穿着威武的新式军服，佩带引人瞩目的军衔肩章、符号，在主席台上同大家见面，会场上一次又一次响起了向他们祝贺的掌声。

仪式自始至终气氛热烈，隆重庄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宣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的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和杨尚昆向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军官授衔。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高级军官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座。他们是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

赵紫阳同志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同志，都是担任我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军官。这些同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贡献和才能的肯定，也体现了国家对军队的关怀，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同志肩负责任的重大。这是被授衔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他强调指出，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他希望全军在实行新的军衔制以后，展现出新的雄姿和新的风貌，把我军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新的卓越贡献！

材料三　敬礼，共和国新一代将领

中南海怀仁堂。

33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为共和国10位元帅授衔；

1988年9月14日，还是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赵紫阳、杨尚昆又为17位上将授衔。上将们和一大批人民解放军中将、少将一道，光荣地成为我们共和国新一代将领。

敬礼，战功显赫的上将

人们也许听过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但很少有人目睹过他们驰骋战场的风彩。当17位上将站在怀仁堂主席台上接受党和人民检阅的时候，他们的威仪，他们的气质透出了他们那不平凡的经历。

在他们中间，有12人在建国后第一次授衔时曾被授过将军军衔。他们中有20年代入伍的老将军，也有40年代入伍的，在解放军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新将领。

一代英豪，战功显赫。迟浩田，曾在胶东地区和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上海战役中参加过上百次战斗，5次负伤，9次立功受奖，20岁就成了"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王海，在朝鲜战场上，驾机出征，击落击伤敌机5架，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李耀文、刘振华，不仅戎马生涯建奇功，而且在外交舞台上大显身手，二人皆出任过外交部副部长。……

风云人物多坎坷。这些曾叱咤风云的将军们在十年动荡的日子里，经受的考验绝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的残酷程度。有因"彭德怀事件"而被迫转业者；更有因"莫须有"身陷囹圄，遭尽非人待遇。

但是出于将军的胸怀，更是出于将军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之心，他们回到军事岗位上后，立即就担负起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他们从事着军事思想的研究，军队后勤工作的管理，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开发，和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昔日在战场上建立功勋的将军们，在和平时代我军建设上又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

中断了23年又恢复的军衔制对于大多已逾花甲的将军们来说，令人感慨的实在太多太多。迟浩田上将在被授衔后，引用了三国时期军事家诸葛亮的一句话来表述自己的心情："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人们至今还记得33年前被授衔的10位元帅，今天让我们珍重地写下新被授衔的这17位上将的名字吧。他们是：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徐信、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

（刘回年、徐京跃）

兵败汉城

背景介绍

1988年的夏天，寄托了10亿中国人的热诚期望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在汉城受挫，与历次参加奥运相比成绩惨跌，"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一座不倒的长城也严重失利。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

材料：

- 中国女排惨败给苏联队，失去决赛权
- 一次不成功的表演
- 一个真实的起点——奥运归来的思索
- 天上掉下来的炸弹

材料一　中国女排惨败给苏联队，失去决赛权

0：3，中国女排输给苏联队，再也无法把六连冠的愿望在汉城奥运会上变成现实。

当中国代表团好几支队伍水平发挥欠佳，成绩不甚理想之后，关注中国选手后半段赛程表现的人们都把注意力盯准了女排和乒乓球赛场，期待着从那里传来意料之中的得胜消息。但是，今晚女子排球半决赛开始不几分钟，中国队便挨了对手三记扣杀，两次进攻被拦死。身穿红底蓝花球衣的苏联姑娘毫无顾忌地向球网对面发动攻势，短短十几分钟便了结了第一局，比分竟是15：0。

9：15和2：15，起死回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不到一个小时，苏联人便在中国女排毫无反击能力的对抗中轻松地取得了奥运会女排的决赛权。

苏联队将同秘鲁队争夺金牌。秘鲁队今天中午以3：2险胜日本队，进入决赛。中国女排只能与日本队竞争铜牌。不过，此间舆论认为这块铜牌中国队也不会轻易得到。

材料二　一次不成功的表演

——中国代表团参加第24届奥运会杂谈

似乎一切都已过去，似乎又蕴育着新的什么。第24届奥运会留给中国体育界的巨大烙印，应该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抹掉的。因为，我们不能再失去机会了。

上次机会，出现在4年前的洛杉矶。中国人初次全力参加奥运会，一下夺得15枚金牌，举国欢庆，夺得金牌的运动员成了民族英雄，他们的一些教练员也走上了体育工作的领导岗位。

欢庆胜利，激发民族精神，增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凝聚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积极的。但这种精神力量，常常是无形的，可以长久地默默地存在，也可以稍瞬即逝。

而因为胜利引起的人事变化、地位变化，却铮然显示着我们是怎样对待、消化洛杉矶奥运会所给我们的。这是无形的、凝固的，它开始左右我们的体育主导方向。

一直不太清楚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曾经，谁也不怀疑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后来有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再后来，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标。如果从文字概念上去翻译、理解，这些可以是完全统一、一致的，但这毕竟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缺乏实施纲领和细则。

对大而概之，笼而统之的东西，中国人的聪明足可以

消化。于是，在没有批准、审查、监督的情况下，我们的体育机构得以自行其是，体育金牌战略应运而生。有了金牌，体育部门便成了最受欢迎和尊重、最有成绩的地方，其他一切都不必担心。

我们就是这样消化了洛杉矶奥运会，同时也注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汉城奥运会的命运。

一般认为，汉城奥运会是奥运史上最为昌盛的一次。世界本来发展很快，又是相隔12年，东西方体育集团终于在竞技场同场比赛，其争夺的激烈，赛事的精彩，成绩的优异，都是自然的。

汉城奥运会共刷新27项、平5项世界纪录，打破86项奥运纪录，世界各国、各地优秀运动员的一个个进步，令人久久不忘。人类为"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感召，为使自身"更快、更高、更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

比较之下，中国运动员的表现，确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

上届奥运会，我们的体操有5枚金牌，今届只有老将楼云拼到1枚跳马金牌，数目大跌。可悲的是，出发前，体操队尽管放弃了女子项目夺金牌，却直言男子依然具有世界第二的实力，确信团体银牌不会失去。结果，在奥林匹克体操馆，不仅苏联的年轻一代运动员水平大大高于我国，民主德国、日本那些不被我们瞧得起的选手，技术长进大，斗志更旺盛，迫我们一误再误，只得了团体第四。当这一成绩在电子显示屏上公布的时候，无数面民德、日本国旗在看台上舞起，人们很难找到一面五星红旗。

上届奥运会，中国举重得到4枚金牌，可谓大户。此次赛前，举重队的教练们已认识到，汉城我们已没有再现这一成绩的可能，但"神童"何灼强的1枚52公斤级金牌，当归入囊中。到9月18日晚，何灼强终于同他的劲敌马林诺夫同台出现在奥运会场上的时候，他却没有自信了，慌乱中，6次试举4次失败，得铜牌。马林诺夫6举6成功，稳稳地夺得金牌。一位南朝鲜选手顺势摘去了银牌。中国只得一下退到没有奥运会牌的境地。赛后，中国举重队一位教练责怪新闻界事先把何灼强吹得太高，使何灼强负担过重，反而发挥失常。

上届奥运会，中国射击选手获3枚金牌，本届奥运会人们十分希望他们保持荣誉。因为射击运动员相对运动生命较长，时间往往能使运动员积累更多的经验，创造新的成绩。汉城赛后，中国射击队的一位教练心情沉痛地说：不能怨运动员，他们是尽了努力的。责任在教练，我们没有估计到比赛这么紧张、这么激烈，是赛前训练没有搞好。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的当事者的追悔。

比起上届奥运会奋斗不息的中国女排得到"三连冠"，本届奥运会中国女排的表现，实在差距太遥远了。

其实，赛前早有人指出，中国女排有可能在汉城翻船，但相信的人不多。从女排得以"五连冠"后，她便保守了。没有人能批评她，没有人能把已经老化、不能适应新的竞争的主力队员撤换下来，只有在没有优势和冲击力的旧格局中做文章，至使李耀先等富有经验的教练去吞下失败的苦果。

我们曾经那样为中国足球队进军奥运会欣喜，但足球队毕竟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太大，在小组赛中不要说胜一场，就是进一球的愿望也没有实现。面对残酷的现实，领队年维泗独自坐在釜山足球场边低垂着头，当他抬起头后，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真想涮一锅。

还有男篮、女篮，成绩与近年的最好成绩都有下降。美国女队教练随随便便地指出：中国队的训练不行，因为她们对篮球理解不深。果真如是，我们的篮球界简直该无颜见人了。但我们并没有什么危机感，我们依然在亚洲有着很高的地位，常得冠军。

到奥运会后期，中国代表团的金牌重任几乎全落到乒乓球身上，乒乓队的教练们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一位教练私下里说，如果我们真的拿不到金牌，全会骂我们，但×××（指代表团某领导）赛前到乒乓馆来过一次吗？看过一次训练没有？有人"恶毒"地想象、甚或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在汉城来个最后的翻船，一块金牌也不拿，使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就留在3枚上，从而一举彻底显露中国体育的危机。并且指出两年前汉城亚运会上，如果不是田径队最后拿了2枚金牌，勉强以94比93胜了南朝鲜，保住了亚洲第一，也掩盖了许多，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日子不会这么难过。

难道金牌的多寡真是那么重要，真的能掩盖、也能暴露问题吗？我们的体育机器真的只有金牌才能充当润滑剂，使之旋转或使之停转吗？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境界，究竟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呢？

自然，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在游泳、跳水、田径、赛艇等方面，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的成功，乃是不迷信、不保守、依靠科学、艰苦奋斗的结晶。在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成绩下降的比较下，这些成功后面埋藏的经验和财富尤其显得珍贵。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队所具有的精神和经验，并不能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共同财富，他们是他们，别人是别人。

一位记者在汉城奥运会后期，发表感慨：国家体委在国家机关各部委中，是素质最差的。

笔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法对这种感慨加以评价。但体育竞赛，特别是奥运会这样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体育竞赛，确是对体育领导部门一次全面的、公开的检查。如果要谈素质的话，那么这种检查当然要查出文化科学素质、思想品德素质、信息反应消化素质、组织协调素质等等一系列的素质。

当我们能够适应体育竞争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就

取得金牌、成绩的进步，反之，我们便丢金牌、丢成绩、没有进步，甚至落后。这种情况摆在体育的主管部门面前，使人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的一些体育部门，很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一纸措辞恳切的《强国梦》也要大动干戈。当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大舞台上，最终有了一些不佳表演之后，应当说认识自己，提高自我的良机来了。从上届奥运会之后，4年时间，别人显然跑得更快。汉城奥运之后，我们该怎样体现自己的素质？在1990年亚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有所造就？谁也没有资格只是站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品头论足。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历史责任。但体育部门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抓紧改革，认真整顿，切实总结，则是当务之急。

（严言）

材料三　一个真实的起点
——奥运归来的思索

熊熊圣火熄灭了，第24届奥运会落下了它庄严的帷幕，而我们的思索之犁却刚刚插入中国体育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

中国运动队没有捧回人们认为“应该”得到的那么多金牌，人们叹息、失望、不满，然而此时需要的是不发热的大脑，去进行冷静、冷峻的思索。

无庸讳言，这是一个黯淡的现实，但是，它又是一个真实的起点。

一个大弧度的曲线

奥运会之前，我国体育界、特别是决策机构已形成“奥运战力”的方针，他们以1984年奥运会的15枚金牌为基础，对今年的奥运会作了细致的部署，绝大部分运动员作了竭尽全力的奋战。权威的和不权威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将不出8—12枚。然而，奥运会一开赛，曲线却大幅度下滑，轻量级举重失利！射击失利！男子体操失利！外国记者惊呼：“中国选手怎么啦？”接着，女子射箭，女子花剑优秀选手纷纷折帆断桨。尽管这个局面一度被跳水的两枚金牌、游泳的突破和赛艇的意外奖牌所稳住，但以后的赛事中情况仍不见有好转趋势。体操和乒乓球的三枚金牌的愉悦，也很快被女排以0：3惨败于苏联以及南朝鲜金牌数急剧上升的激流冲得干干净净。国内舆论大哗，语词激烈，体育界有点受不住了。

不同花，相同果

成功的原因大致是相似的，失败的因素却各不相同。

有些项目，运动员做了顽强拼搏，但技不如人，实力欠佳，败下阵来。如男子乒乓球、射箭、击剑、女子手球、足球等。乒乓球技、战术的陈旧，足球体力、技术、战术全面不如强队都是显而易见的。

有些项目是心理训练的问题：如射击、体操。一些优秀射手由于压力过大或现场出现未预料的情况而无不使自己平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体操则由于开头的失误造成了全场的失误，由于优秀选手的落马而纷纷落马。

有些项目的失利原因则近乎可笑，某运动员因一件比赛服未带而疑神疑鬼，简直无法上场比赛；女排在对苏联队的比赛中所表现的缺乏自信和斗志则令人吃惊。

心理素质本是运动员水平的一部分，选手的运动水平应是在比赛现场表现的竞技水平，而不是训练中的水平。训练水平如果在比赛中不能表现出来，就算不上真正的水平。美国、苏联、民主德国等体育强国均派了运动心理学家随队到汉城，我国体育中的心理训练应该提上日程了。

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应该被理智接受的，即我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的成绩，正是他们整体水平的实际表现。所谓偶然性、种种客观原因，都非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似乎陷入了这种境地：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

动乱结束，民族振兴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在国人的观念中，体育仿佛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民族荣辱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体育就在这样的民族心理下，与经济发展同步，出现了一股上升的氛围。乒乓球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女排崛起，体操、跳水臣服人国，举重、射击、女子篮球、女子手球各领风骚。1986年第十届亚运会以金牌总数第一而雄视亚洲。

但是，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却潜伏着体育界的危机。

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在叫：“后继乏人！”朱建华后面是谁？李宁、楼云后面是谁？郎平后面是谁？栾菊杰后面是谁？

人们发现，在“奥运战略”后面隐藏着一个“全运战略”。全国提“奥运战略”，许多省、市实际目标是在全运会上拿金牌。由于经费等各方面的困难，体育运动不能普及，这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一大障碍。

青少年训练的薄弱，教练员素质和水平的不足、人才外流、体育科研和信息工作的落后，以及整个体育体制的陈旧，已成为制约我国体育大踏步前进的重要因素。

真正的起点

问题多而不丧失信心。24届奥运会将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真正起点。

其中不乏好的信息：体育的基础项目田径和游泳有了新的起色。这是我国前几年重点抓这两个项目的结果。

游泳，过去我们从未进过世界前16名，而这次得三枚银牌、一枚铜牌；田径，尽管仅得一枚铜牌，但也有九项打入前8名。

5枚金牌，与10亿人之众，是一个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比例，但却是和世界上所有体育强国较量之后取得的。

这就是我们的起点。中国体育的振兴，第一脚必须踏在这个起点上。

清醒地认识成绩和差距，正确对待失利，正确地对待运动员，胜了不忘乎所以，捧他们上天，输了不无端指责，打他们入地。

也许还应该反思我们的体育观，重新理解体育，剥掉附加在体育上的不属于体育的东西，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体育竞赛。路正长，从一开始。

（毕靖）

材料四　天上掉下来的炸弹

汉城体育场的奥运圣火熄灭了，却也给一个十亿人口大国的又一次狂热和盲目乐观降了降温。当中国队捧着5块金牌从天上落到地面时，并没有看见如同4年前那样热烈动人的欢迎场面，他们明白：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依靠政治热情为动力拼搏出体育的胜利的时代，随着竞技场上的纷纷失利，已经划上句号了。

输了也不必过于悲伤，不是还有人民大会堂降重的筵宴？不是还有领导人关心温暖的话语："成绩是主要的，银牌、铜牌都是香的"？可输了一定要明白输在哪儿，倘若还是仅仅悟出"某某项目训练还不够，运动员身体素质还要提高"的老话，那就说不定今后会输得更惨。

输了未必是坏事，不是有许多人（多少？多到可能令人见"怪"的程度）听到女排输了的消息后都说"好"吗？熟谙排球人士亦说：中国队打巴西时就该输！怪哉？如果知道中国女排赛前人心不稳，便一点不怪了。这心情就好比看一位吃错药的病人，他越自认为身体强壮而不以为然，就越危险，越让人着急一样。既然吃错药了，倒不如病发得越快越好。多棒！中国队的病终于在汉城发作了。据查，是中国体育吃了人为的、即政治上的兴奋剂，结果越吃越胖，越胖越虚，终于抗不住了。奥运会失利的好处恐怕就在这里了：它证明了我们的忧虑——中国体育的繁荣究竟是靠什么？它也使我们善于乐观的官人和百姓们终于承认了落后——尽管仍是羞答答的。

失败恰恰是纠正旧体制的代价，也是逼迫我们反思和改革的契机。我们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我们究竟应该把体育放在一种什么位置上？是真正提高全民的体质和体育竞技水平，还是把体育当作政治的胸花？我们的体育在过去的30年中的确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可我们的做法是牺牲全民族的锻炼来促成几项尖子项目的夺标。就全民族的体育水平和运动员、教练员的文化素质来说，5块金牌似乎已经超前了。我们必须把体育真正当作世界文化意义上的体育来看，体育就是体育，体育竞赛就是体育竞赛，而不是关系政治输赢得失的赌注。如果我们不能沉下决心，踏踏实实地提高全民族的体育和文化水平，再多有几个畸形的世界冠军，又有多大意义呢？我们需要的是能代表中华民族素质的冠军。当我们看到我们运动员躲避着采访的话筒，或是半天说不出什么时，难道不感到一种悲哀吗？像我国现在这样，从小就进专业队训练却没有充分的文化教育，真正是违背了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必须明白：奥林匹克精神需要的不是体育动物，而是健美而全面发展的人。我们何时才能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明星？

奥运神话毕竟是吹破了，不论是吹得太猛还是本来就没力量吹好。总之，破得及时。当我们从自我陶醉盲目乐观中清醒和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好大喜功的积习、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决定着这些因素的政治化的体育体制和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实在应当很好地清理一下了。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去查查还有别的什么球也快吹破了？有那些旧的残气没有吹干净——新气旧气在一起早晚要炸的。不下决心不行。正像一位体育界的老记者说的：奥运会的失败对全国人民来说可能像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炸弹，当然有人悲伤，而我们却发现，原来爆炸的是一颗定时炸弹，为什么不庆幸呢？炸掉了几块金牌，或许能使我们提早排掉几颗政治、经济上的炸弹呢！

（傅雅）

风 云 人 物

张 艺 谋

张艺谋(1951—),广西电影制片厂电影演员、摄影师、导演。

1951年11月生于西安市。"文化在革命"期间,先后在农村及棉纺织厂当农民、搬运工,业余从事摄影创作,曾获全国摄影比赛一等奖。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后入广西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工作。1983年与同厂3位同学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摄制完成被称作"第五代电影创作者"的首部影片《一个和八个》。随后又与陈凯歌合作,拍了《黄土地》,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和瑞士鲁卡诺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1985年再次与陈凯歌合作拍了《大阅兵》,获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奖。1986年与吴天明合作完成故事片《老井》并在影片中饰演男主角,获第8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1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以及第2届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男主角奖。1987年任导演,执导处女作《红高粱》。1988年2月,影片《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金熊奖";同年7月分获第11届"百花奖"和第8届"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

材料　张艺谋笑捧"金熊"归

今天下午3时50分,中国民航一架波音747客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刚刚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熊"奖的张艺谋走出机舱。

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他毫无倦意。与平时在国内不修边幅的形象不同,他这次身着新装——石磨蓝上装,灰黄工装裤,一双新旅游鞋。获得特许等候在机舱出口处的本报记者接过他的行李。张艺谋腾出手来打开旅行袋,从一个方形小红盒中取出了那尊二十几厘米高的金熊。他"嘿嘿"一笑,与小金熊一样憨态可掬。

广播电影电视部陈昊苏部长等几十位电影界人士迎候在卫星厅通道入口处。一位细心的姑娘向张艺谋献上一束花,花中插着一张刚从报上剪下来的传真照片与张艺谋本人笑脸相对。陈昊苏在致贺并道过辛苦之后,接过张艺谋的旅行袋背到自己肩上。正在机场海关等待入关的100多位和张艺谋同机到京的外国旅客也向手捧金熊的他鼓起掌来。

西柏林电影节与戛纳、威尼斯电影节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影节,在以往的37届中,"金熊"从不曾被亚洲人捧走。这次参加电影节的21部影片来自十几个国家,其中大多是国际知名导演的作品,如美国刚刚获得奥斯卡奖7项和6项提名的《广播新闻》和《月亮玉》,苏联曾禁映20年的《女政委》等。西方记者评价说:这是在欧洲举行的世界级大赛。张艺谋向记者介绍了评奖情况。这次的11名评委都是国际电影界知名人士,评委会主席、意大利著名影评家德·哈登也是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评委们来自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苏联等国。他们像以往一样没有任何商量,却破天荒地没有任何争吵,11张选票一致投给了《红高粱》。

与张艺谋同行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黄健中说:"《红高粱》轰动西柏林电影节。联邦德国总统宴请各国代表团,每个国家只限一人,而中国代表团都被邀请参加。西德电视一台为《红高粱》播出了一个半小时的专题节目。张艺谋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包围圈。"陈昊苏说:"《红高粱》获'金熊'奖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说:"中国电影界几代人长期盼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

《老井》、《红高粱》在有影响的国际电影节上接连获奖的事实证明:中国电影已经走向世界前列。正像张艺谋在西柏林领奖后致答词进所说:"这个奖不仅是对我的影片的奖励,而且是对中国电影的鼓励。这奖激励中国导演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来。"

杨 尚 昆

杨尚昆(190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位国家主席(1988—1993),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一,也曾长期担任军队职务。

材料　国家主席杨尚昆

4月8日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位国家主席。

杨尚昆1907年生于四川省潼南县。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7年至1931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从苏联回国后，他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参加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由彭德怀任军团长的红三军团政委。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他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列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到达陕北前，杨尚昆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杨尚昆任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49年建国后，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文化大革命”前夕，杨尚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被撤销一切职务，长期监禁。1978年，杨尚昆被恢复名誉，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市长)。1980年9月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翌年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他是中共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年11月他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军委邓小平主席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在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裁军百万、整顿体制编制和进行军队各项改革等重大决策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军队已从随时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转入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军队教育训练得到加强，武器装备有了改善，院校分级培训体制逐步确立，指挥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水平有了提高，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开始走上“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道路，大批军工厂转产民用品。杨尚昆表示，将继续努力把军队改革引向深入。

杨尚昆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新闻工作者之一，1933年后曾任《红色中华》报编辑。他爱好游泳和爬山。

万 里

万里(1916—　　)，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一，1988—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材料　新任人大委员长万里

4月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多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在前总理赵紫阳出国访问期间几次担任过代总理。

万里10年前担任中共安徽省第一书记，以领导安徽省农民在全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而闻名。赵紫阳同时在四川省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当时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建国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万里长期从事城市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担任过中央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央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起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仍分管市政建设。他协助周恩来总理领导了50年代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以及其他重要建设项目的规划与组织工作。

1975年，万里作为铁道部长坚决地贯彻执行了邓小平提出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的方针。他顶着“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逆流，发动和依照铁道部系统的干部和群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清除在一些铁路枢纽领导班子中捣乱的极左分子，从而使铁路状况很快扭转，火车正点，阻塞消除。人民群众赞扬他雷厉风行的领导风格。当时流行一句话说：“安全正点万里行”。1976年4月当邓小平同志再次受到迫害时，万里也受到批判并被解职。

万里1980年由安徽调到中央任国家农委主任，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的改革。他也是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从1980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

他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十二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去年十三大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万里1916年生于山东省东平县，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东平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长、建设局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

万里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网球爱好者。198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把一枚奥林匹克金质勋章授予万里，表彰他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作出的贡献。万里也是桥牌的爱好者，曾获1984年世界最佳桥牌——所罗门奖。他现在是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

皇甫可人

皇甫可人(1950—),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88年6月因成为我国第一位独立制片人而在电影界引起哄动。

材料 北影诞生中国电影界第一位独立制片人

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皇甫可人和厂长胡其明郑重地在一份协议书上签上各自的姓名,从而宣告中国电影界在改革浪潮中推出了第一位独立制片人。

38岁的皇甫可人从海南两个企业集团筹集到60万元资金,准备投拍剧作家江浩创作的警匪片《荒原杀手》。皇甫可人在和北影的协议书中规定:本片使用北影厂标,占国家规定给的拍片指标(北影每年可拍18部故事片),影片受电影局审查,版权归北影。无论发行情况如何,皇甫可人先拿出10万元作抵押,并在影片发行后交北影30万元利润。如发行拷贝越过150个,北影则在150个拷贝之后与皇甫可人四六分成。独立制片人有权选择摄制组人员,在财务制度上只向资方负责。

据了解,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年一年利润只有130万元。这个拥有1800人的大厂,今年上半年没能给职工发出一分钱奖金,胡其明厂长等一直在苦苦思索本厂的出路。胡其明说:片子的剧本我看过,皇甫可人我了解,相信他会成功。"

曾导演《净土》、《天国》等影片的皇甫可人已挑选好他的27名合作伙伴。依国家现行规定,他可以选择34.5个人(会计只占半个人指标)。皇甫作为导演,同时和摄影一起兼美工,而在片中的剪辑还要兼场记。"影片的外景地在云南元谋的土林,少去一个人就可以少一个人的路费和住宿费",皇甫对记者说。"我打算用40天拍完外景,60天完成后期制作。"

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今天也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他希望皇甫可人成为既是企业家,又是事业家、艺术家这样一身三任的社会主义的独立制片人。当然,他也认为,实行独立制片人制度是一种探索和努力,能否成功现在说话还为时过早。

皇甫可人这一举动,在北影激起不小的波澜。即将投拍《女贼》的北影导演于晓阳马上表示,也要以独立制片人方式拍片。北影的一些老电影工作者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电影发行体制。陈昊苏说,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完善形态的社会主义电影市场。

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1958—),藏族,我国著名登山运动员。1988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跨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中成为跨越珠峰第一人。

材料 跨越珠峰第一人

5日,次仁多吉第一个登上顶峰已经等了30多分钟,他的氧气在登顶几分钟后就用光了。但是,预定参加会师的南侧队员大次仁、仁青平措、安格·普巴还在南侧齐腰深的雪坡上艰难地向上爬。

"次仁多吉,你有什么问题吗?还能坚持吗?北京总指挥部问。

"能!但手和脚冷极了!"

"再坚持一下,多活动活动手脚,李致新马上就要登顶,他背着两瓶氧气,你拿去一瓶,至少也要把他用过的那半瓶氧气拿去。"总指挥部下达命令。

"我什么都不需要!那瓶氧气还是留给大次仁他们用吧!"在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北侧大本营帐篷里的人们听到次仁多吉的话后,都禁不住抽泣了。次仁多吉为了那珠峰顶上的伟大会师,创造了在珠峰顶上停留99分钟的世界纪录。他的双手因为严寒开始发黑。如果他再不下撤,双手甚至双脚都有可能冻断,更严重的是因此也就无法跨越,后果不堪设想!

2点12分,由于李致新还未登顶,总指挥部只好下死命令:"次仁多吉,我们命令你与日本、尼泊尔登顶队员一同跨越!"

次仁多吉没有走,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李致新。2点23分,李致新登顶了,次仁多吉向北京、向大本营兴奋地报告,"李致新登顶了!"

这时,人们才知道次仁多吉还没有走。

"次仁多吉跨越!立即跨越!"大本营再次发出命令,语调万分焦急。

2点23分,次仁多吉与日本的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迈出了跨越珠峰的历史性第一步。但是他仍然没有带上氧气瓶。

尽管次仁多吉不愧为跨越珠峰第一人的称号,但人们感到无比惋惜,由于南侧遇到巨大的风雪障碍,次仁多吉未能实现与南侧队员会师的愿望。

次仁多吉出生在中国登山运动摇篮的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今年30岁。他1980年从事登山运动,不久就达到了国家健将运动员标准。次仁多吉在第三次行军开始之前表示过,他考虑这次登山结束后,继续上学读书充实

自己的知识。(张抒)

许艳梅

许艳梅(1971—　　),我国著名跳水运动员,多次夺得世界和全国比赛冠军。1988年在汉城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24届奥运会金牌。

材料　许艳梅——争得金牌第一枚

9月18日,17岁的江西南昌姑娘——许艳梅,技压群芳,在汉城登上了女子跳台跳水领奖台的最高层,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24届奥运会金牌。

本届奥运会女子跳台跳水决赛竞争激烈,扣人心弦,直到最后一个动作跳完才排定名次。凭着最后一个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屈体的出色完成,许艳梅打破了美国老将米切尔的冠军梦。"观众为美国选手鼓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表现得很出色。但我要跳得更好,让观众也为我鼓掌。"她做到了,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7年前被选入江西省跳水队时,10岁的小艳梅,还是个体弱、胆小、不会水的旱鸭子。

在这之前她在市业余体校体操班的一段生活,为她练习跳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不识水性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更多地还靠她那股不怕吃苦的拼劲儿。启蒙教练欧阳蕊那套"高强度、大运动量、狠扎基本功"方法,她很快适应了。每周加练16个小时,连星期日也搭进去了。1984年进国家跳水集训队,她又多了一份"野心"——拿世界冠军。为了这心愿,训练再苦,伤病再难忍,她都咬牙顶过去。

梅花香自苦寒来。许艳梅埋头苦练,羽毛逐渐丰满,她飞起来了。1984年11月,在上海与民主德国跳水选手进行的对抗赛中,年仅13岁的许艳梅初露头角,摘取了女子跳台的桂冠。第二年在全国青少年运动会跳水预赛中又名列女子跳台榜首。

1987年对许艳梅来说,是喜获丰收的一年。她1月蝉联新西兰国际跳水赛女台冠军,4月登上了第五届世界杯跳水赛冠军的宝座。8月又扬威世界分龄跳水锦标赛女子跳台,11月摘取了第六届全运会的女台桂冠,年底被评为1987年全国跳水十佳之一。

许艳梅腾飞了。但未来,对于她来说,征途远,道更艰。

(王道源)

马海德

马海德(1910—1988),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1933年来中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入中国籍。他是著名医学专家,为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0月3日逝世。

材料　马海德同志生平

马海德同志1910年9月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1933年毕业于日内瓦医科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同年来上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现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会长,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历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 政协常委,是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

马海德同志1933年11月从美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革命。开始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随后参加上海国际友人组织的马列主义小组,协助我地下党开展工作。1936年经宋庆龄同志介绍到陕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时正值中国革命最艰苦时期,他一直战斗在陕甘宁边区的前后方。解放战争时期,他随中共中央转战到西柏坡。马海德同志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解放区军民服务,并在对外交往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称赞和关怀。毛泽东同志亲自委任他为军委卫生部顾问,同时又担任中央外事组和新华社等有关部门的顾问。后来还担任军调部医疗组顾问。马海德同志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从事党交给的各项工作,并以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模范行动,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马海德同志又积极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1950年他担任卫生部顾问以来,经常深入到医疗科研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带领医疗队到边远地区、牧区防病治病,为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特别是马海德同志以满腔热情从事性病和麻风病防治工作,为我国60年代初基本消灭性病和麻风病做出了巨大努力。80年代以来,为实现1997年在中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他辛勤奔走,争取到了国际上的多方支援。他对医学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扬。马海德同志曾先后荣获比利时"达米恩杜顿麻风协会"授予的1982年度奖章、黎巴嫩总统授予的德科芒德尔国家勋章和美国1986年艾伯特—腊斯克医学奖、印度1987年甘地国际麻风奖。1987年,他的母校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授予他名誉理学博士称号。

马海德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和改革的各项方针。他利用出国访问和同外宾往来的机会，积极宣传我党的对外政策，宣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大好形势，为发展我国对外联系、增进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他不顾晚年身患癌症，壮心不已，为我国四化建设忘我地工作，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1983年，在庆祝马海德同志来华工作50周年之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他，对于马海德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紧张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海德同志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战斗不懈。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为表彰马海德同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卫生战线全体职工学习马海德同志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马海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为我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国际共产主义典范。马海德同志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钱　易

钱易（1939—　　），清华大学教授，我国现代大儒学家、历史学家钱穆长女。1988年11月14日成为大陆赴台湾探病的第一人。

材料　赴台探病第一人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正在荷兰一所大学访问学习的钱易，没有想到她竟能如此幸运。在台湾当局今年11月9日正式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政策后的第5天，她便与93岁高龄的患病父亲在台北相聚。她成为大陆赴台探病的第一人。

钱易是我国现代大儒学家、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长女，现任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父亲离开大陆时，她年仅10岁。

钱穆39年前离开大陆后，曾在香港白手起家办起"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定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等职。70多年从教，事业上的成就令人羡慕，而这终难抹去他孤寂的苦痛和对儿女的思念。5个儿女都在大陆，如今可谓儿孙满堂，仅孙辈就有10人。可是，他在台湾，只能与儿女们的继母冷冷清清地相对在空楼。

十年动乱后，钱易兄妹辗转与老父取得联系。1980年以后，他们兄妹也曾两次在香港与父亲会见。但短暂的一周半月，难以尽述两地相思之情，又怎能尽几十年来未能尽的对老父亲的孝顺之心呢？

今天，钱易带着兄妹对父亲的一片深情，终于偎依在父亲膝下。听不够的吴语乡音，诉不尽的亲情离愁。尽管此次钱氏父女仅有一个月的团聚，但长女到来的天伦之乐，使钱老先生"兴奋得像个孩子，眼睛亮了，嗓门也提高了"。在大陆儿女们的每一件琐事，婚姻、生活、工作、外孙，无一不是感兴趣的话题。

一个月与40年相比，这补偿微不足道。但这毕竟是一个希望。咫尺一海峡，40年隔阻，多少情思多少企盼。愿这一页历史，永远翻过去吧！

（张景媛）

珍　闻　轶　事

广州一例连体儿手术世上罕见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最近成功地进行了我国大陆首例"坐骨连体三足畸形"儿分体手术。术后一个月以来，分体儿姐姐越金宝身体状况一直良好，妹妹越金秀因患心脏病夭折。

这对一岁多的连体幼儿是1月20日接受手术的。连体分开后，两幼儿腹壁缺损严重，内部脏器相连复杂。循环系统方面，一女为右旋心，另一女心脏为三尖瓣闭锁不

全，血管走向交错不清；消化系统方面，两幼儿各有一叶肝脏融合，各有一副小肠，共用一副大肠和一个肛门；泌尿系统的四个肾脏，大小不一，而且其中一个肾功能不全。有四条输尿管，但只有一个膀胱；生殖系统有两个子宫、两副卵巢及两个阴道；骨贫连成环状。

据文献报道，这种罕见的复杂手术，1968年在美国首次获得成功。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手术成功双婴儿存活的为6例，一婴存活的为4例。

（吕毅子）

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万里行

1988年5月的一天，广州街头上出现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14位姑娘，斜挂着红色绶带，身着海蓝色套裙，款款穿过火车站宽阔的门厅。红色的毡帽下衬着可掬的笑容，黑色的高跟鞋移动着轻盈的步履。她们的仪表、动作、神态，都给人"训练有素"的感觉。

街上的行人站住了，骑自行车的停下了，连"的士"司机也探出头来……无数的人被吸引了。

"这是一支什么队伍?"人们啧啧议论的同时，发现了大红绶带上写着的各个企业的名字。

"原来是甘肃的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有人大声喊起来，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于是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小伙子干脆跟在队伍后面边走边看。

人们说，大西北的黄土地尽爆冷门，这话一点儿不假。一出《丝路花雨》轰动海内外，一本《读者文摘》吸引了男女老少，一支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走遍中国。

什么是人体活动广告模特?对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为此，我采访了这支队伍的总领队、人体活动广告模特的发起人米兰。

1987年，35岁的《兰州青年报》记者米兰调到了甘肃省广告美术公司任信息部主任。在这之前，这位富于创新精神的"京华拳击协会"副秘书长，想在信息传播上"冒"一下，准备成立一个"信息沙龙"，为各企业之间交流信息提供一个场所；同时由模特儿披着广告绶带在大厅内表演。

后来，他又萌发了更大胆的设想：让"沙龙广告"模特儿走上社会!在兰州皮鞋厂厂长的热心支持下，去年国庆节，身披写有"兰州皮鞋厂"字样红绶带的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第一次在兰州街头"亮相"。接着广告模特队两次在《甘肃日报》上刊登广告，征集客户，然而却没有一家上勾。米兰并不气馁，他领着队员跑了40多家企业，宣传这种广告形式的独特之处，最后终于有6家企业成为他们的广告客户。

去年11月，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乘此机会，甘肃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首次远征，来到广州市进行活动广告宣传。全运会开幕那天，全体模特队员站立在天河体育中心西门两侧，引起了上万观众的注意，尔后，米兰又带着这支队伍奔赴韶关、长沙、武汉、郑州、西安进行活动宣传。

党的十三大召开，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再次征集广告。姑娘们的胸前挂着"庆祝十三大召开"的红绶带，后绶带挂着企业的名字，在闹市区、商业中心、娱乐场所进行活动广告宣传。一下子就有200多家企业报名参加。

龙年春节过后，米兰和他的队员们第二次远征，先后在北京、哈尔滨、上海、海口、乌鲁木齐等23个城市进行活动广告宣传，为期两个多月，行程二万多公里，直接见面的观众达100多万人。每到一个城市，他们都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散发介绍客户企业情况，经营项目的卡片，以扩大影响。这次仅甘肃省就有23家企业成为他们的广告客户。

当记者采访模特队员对这个职业的看法时，她们都爽快地回答："我们挺喜欢的!"原因是她们通过长途跋涉，活动宣传，让全国更加了解甘肃、兰州，为自己的家乡争了光。姑娘们来自不同单位，有的是焊工，有的是售货员，有的还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护士，她们都为自己现在的职业感到自豪。

但是社会上的评价可不一致。一位老人气愤地说："怎么在人身上做起广告?要是我的女儿，就是养着也不让她干这行。"一位军人说："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这是对人格的污辱。"

然而，支持、理解的毕竟是多数。

在海口市，一位男子骑着摩托车从后面看到前面，又由前面看到后面，总也舍不得走。他十分激动地对米兰说："这是中国的骄傲。"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支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也是世界第一支。

在厦门，一位老记者对模特队员说："你们大西北的姑娘真了不起，不仅勇敢而且漂亮。这种人体活动广告宣传的手段已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实际上是代表新观念向旧观念的冲击和挑战。"

在上海，南京路的人群自动闪开一条路来让模特队员通过。不少人主动地向队员们招手致意，微笑点头。

在广州，一些青年由衷地赞美："好靓(好漂亮)的北方姑娘!"顺便问候一句："小姐辛苦了!"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广告形式也在不断更新。人体活动广告模特与时装模特的区别在于：时装模特活动在舞台，而人体活动广告模特的出现，无疑是对固定性广告的冲击。她首先是活的，没有局限性，哪里人多热闹，她就

可以出现在哪里。既给城市带来了艺术的美，活动的美，人体的美，又给人们带来新鲜奇特的直观感。

现在，这支来自大西北的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已经凯旋。在与米兰谈到今后打算时，他风趣地说："继续提高队伍素质。即使今后出现第二支人体活动广告模特队，我相信我们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深刻的，就像男女初恋一样。"　（江扬）

少林和尚也经商

最近，笔者有机会到河南嵩山少林寺一游。

少林寺是我国素负盛名的佛教寺院。旅游旺季，少林寺一天就接待内外来宾6万多人，车辆4千多车，可谓盛况空前！

进了少林寺，我看到无论是方丈室的僧人，抑或是千佛殿的和尚，都是一边念经，一边兜售旅游纪念品，什么"金项链"、"玉石项链"、"十二生肖项链"、"珠子项链"，等等，真是应有尽有。和尚们刚念完"阿弥陀佛"，就唱起了生意经："施主请买金项链，物美价廉！""玉石项链消灾除难，长命百岁！""看呀！十二生肖栩栩如生！""您生于丙寅，还是诞于戊辰？虎跃龙腾，善哉！善哉！……"若买一件，他们就敲起木鱼，击响金钵，诵经一遍，好话说了一大箩，逗得你乐不可支！游览者往往经不起这番游说，同时也为了图个吉利，就慷慨解囊。

在购买纪念品的过程中，我发现同一种小商品，方丈室的价格却与千佛殿的售价不一样，少者5角，多者1元。正在纳闷之际，忽听旁边一位游客在发议论："怪哉！怪哉！和尚经商，也搞承包，商品相同，价格差异，竞争之风刮到禅宗祖庭！"虽是几句戏言，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和尚只是坐禅诵经，哪有经商之先例?!少林寺因历史上发生过十三棍僧救唐王，李世民感激之至，曾赐地40顷，特许招收僧兵500名，那也只是耕田练武而已！而今，改革和开放的春风也吹进了佛门净土，使这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佛门弟子更新观念，拓展新业。

在紧罗那殿，还有一件事使我惊讶不已。你看，就在那瞪眼咧嘴的紧罗那金身前，有位年青和尚在看书。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他却悠然自得，全神贯注，简直看到入了迷。我很想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书，便使劲往前挤。到跟前一看，我顿时明白了：这位和尚读的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由此想到少林寺和尚经商原来还有理论指导呢！

（张德民）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88年是一个活跃的年份，传统文化与现代色彩相得益彰。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获得美孚飞马奖而在文坛上受到重视；电影《红高粱》更是出尽风头，赢得国内外观众的青睐。1988年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压轴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最令人注目的是流行歌坛上刮起"西北风"。从中华民族发源地黄土高原上吹来的这股劲风，席卷中国大地，令人回味深长。总之，轰动效应是这一年的显著特征。

小说《浮躁》

贾平凹的这部小说发表于1987年，但在1988年却引起了轰动。因为，在11月26日，这部作品获得了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

小说写商州地区青年金狗、雷大空为摆脱贫困、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努力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金狗当兵5年复员回乡后，从撑梭子船致富，进而当记者叱咤政治风云，最后重操旧业，以宏大的气魄搞机械化运输，在改革现实中走向自我完善。雷大空为了致富，不择手段卖假老鼠药，贩卖银元，开商店，办公司，最后终于触犯国法，被人害死在狱中。作品通过两个主人公所走不同道路的描写，反映农村经济改革中农民复杂的浮躁心理，揭示了在改革社会过程中应不断调整自身农民意识的主题。作品内涵深广丰富，人物性格复杂而鲜明，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的反思色彩和时代精神，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巴金曾评论说："要了解当今中国社会，不可不读《浮躁》。"

电影《巍巍昆仑》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以后，又对山东、西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敌人攻占的首要目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决定主动撤离延安，率领昆仑中队转占陕北，在外线与敌人周旋，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给主力部队创作了有利战机，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昆仑纵队在十分艰险的境遇中与敌人周旋，历尽艰难，几经遇险，但又都化险为夷，并在转战中指挥全国各大战场的战斗，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为迎接全国战略大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电影着重表现了敌我营垒最高统帅部的斗智斗勇，成功地再现了我党领袖人物的神采。

电影《红高粱》

近年来上映的国产新片，还没有哪一部像《红高粱》如此走红：观众甚多。看过之后，人们议论纷纭。说好的与说坏的距离之大，简直有十万八千里！

继《老井》在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夺标不久，《红高粱》又在今年二月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长故事片大奖——金熊奖。西柏林的报纸赞颂它是“一首具有特殊的和高超的艺术魅力的歌颂自由的史诗”；“一部有着浓郁生活色彩的五彩缤纷的影片，很像是薄伽丘《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一位英国评委说：“这是我近年来见到的第一部称得上是电影的影片”。它在电影节放映时，盛况空前。放映完毕，会场爆发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人甚至欢呼起来。熟知柏林观众欣赏趣味和水平的人讲，这种场面发生在东方影片放映中，实属罕见。柏林是国际性城市，极易看到各国影片，因而观众相当挑剔，赢得此种掌声说明影片在观众心中的份量。

不少人将《老井》、《红高粱》的获奖与1951年日本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在威尼斯国际电影片节大奖相提并论。那是日本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当时举国欢腾，民族精神高扬。对比之下，我们对自己的影片获奖未免有些冷落。甚至有人认为《红高粱》参展是“献丑”，获奖是民族的耻辱。

《红高粱》5月陆续在全国上映以来，引起了众多的议论，既有交口赞誉，也不乏激烈的批评。

赞扬者说：影片具有“丰厚的社会内涵，浓郁的民族生活色彩和民族精神气质以及带有普遍性的主题，既给予新奇的审美愉悦，又能激发理智和情绪的认同”。“《红高粱》为什么得以获奖？我们认为一因其浓郁的民族风格，二因其充分发挥了电影视觉艺术的特长，而以上两点的结合不但使《红高粱》获奖，还使人们思考什么是典型的中国电影”。“《红高粱》以较强的观赏性、较新的造型意识，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浩茫的大自然的陶醉和搏斗中喷薄出一种新的生命活力和崇高的民族精神，观后令人心旷神怡”。“在这部悲喜剧的滑稽与崇高相结合的影片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澎湃的心声，一种深沉的思想内涵，那就是火红的、浓烈的、对自由自在生活的无限热爱，而这种感情是任何人，用任何力量都不能挡住的。”

赞扬者也提出影片的一些不足，如：剧作结构不够和谐统一，似乎由两个割裂的故事组成；剥皮场面过实；主人公往高粱酒里撒尿的镜头令人不大舒服，等等。

激烈的批评者对影片的主旨作出了否定：“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踏、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同时也是一部矛盾百出、胡编滥造的影片。”“整个影片就像一场膜拜原始冲动的宗教仪式，只有硬装出来的生命（为了娱神），而没有真实的生命。”“《红高粱》在实际的创作中，是受到了以十九世纪德国尼采为代表的欧洲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而萌生的神话式的嬗变。”

截然不同的评价，表现了不同的电影观和神美趣味。对于它的获奖，有人说西方人是出于猎奇。37年前，《罗生门》获大奖时，日本国内也曾有人这么说。这是一种奇妙的重复。争鸣仍在继续。看来，《红高粱》给人们带来的思索，已不局限于电影艺术的本身。（付鸣）

话剧《天下第一楼》

这是一部三幕四场话剧，由何冀平编剧。

1917年夏，京师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传至第三代。两个少爷花钱如流水，唐茂昌迷恋京剧，唐茂盛酷爱习武，眼看“福聚德”一天不如一天。老掌柜唐德源怨怒两个儿子不成器，在临终前将店业托给外姓人卢孟实经营。出身贫寒而精明能干的卢孟实兢兢业业，想干一番事业。三年后，他顶着亏空，给烤鸭店盖起了大楼；八年后，“福聚德”名声大噪。正当卢孟实准备扩大店业修盖过街楼时，两个少东家提出收回经营权。卢孟实只好怆然离店。行前，他托人给“福聚德”送来一副含义深刻的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

这部话剧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和现实意义，通过“福聚德”这个老字号的兴衰变迁，表现了创业的艰辛与革新的必要。

1988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压轴年”

若以北岛在1979年3月号的《诗刊》上发表《回答》一诗来计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自1949年建国开始中断30年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到1988年已经圆满完成了它长达十年的征服中国诗坛的历史。

在这十年中，卷进一大批自1949年至1965年出生的从事诗歌创作的中国青年，也卷进一大批对此持有怀疑情绪的各界人士，当然还有一批为数不多的为推动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而与青年诗人们一起悉力奋斗的老一辈和中年的文学志士。

不容否认，现代派诗歌经过十年奋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主流。纵然不愿接受，但事实铁定。任何一位自1966年以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只要他企图从事诗歌创作，就必须读这十年中的现代派诗人给他们留下的文字。当然，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与台湾这几十年的现代派诗歌也会对他们产生同样的诱惑。

那么，1988年——作为十年现代派诗歌发展的最后一年，献给我们的压轴戏又是如何呢？

在这一年中，几乎所有应该成为十年现代派诗歌历史中一员的诗人都露面了。根子(越仲)，这位现代派诗歌的先驱之一，他的那首早年曾风靡北京"黑道诗坛"的《三月与末日》，被埋葬十多年之后终于在去年《开拓》文学第3期上破土见阳光。久违的田晓青也在沉寂多年之后，赫然出现在去年《开拓》文学第4期上，我们终于得见在中国现代派诗歌中传颂多时而异常神秘的长诗《闪暇》。名震"黑道诗坛"的怪才张弛也终有机会在去年《巴山文学》第3期上目睹他的作品变成铅字了。不公正的历史在1988年终于网开一面……

在这一年中，早已锐气逼人的中国现代派诗人以《人民文学》、《开拓》、《中国作家》、《十月》、《诗刊》、《星星》、《诗歌报》、《花城》、《巴山文学》、《关东文学》、《作家》为一翼，以《幸存者》、《倾向》、《黑洞》、《和平之夜》、《飞地》、《非非》、《他们》、《红旗》等民间诗歌团体为另一翼，为下一个十年完成中国现代派诗歌大会师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

《人民文学》的诗歌版已赫然成为中国诗歌的"黄金版面"，推出了邹静之、徐虹、海男、翟永明、伊蕾、王小妮、陈虹等现代派诗人的力作。《开拓》文学虽然处在草创阶段，但只寥寥四期已蔚然成大气，根子、芒克、多多、田晓青、菲野、一平等现代派诗人的佳作为《开拓》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阵容。《中国作家》的诗歌版面依然生机盎然，西川、维维、雪迪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十月》以老诗人昌耀的《庄语》和青年女诗人阎月君的《点燃灰烬》构成了雄壮的"二重奏"。骆一禾的《辽阔胸怀》和童蔚的《河滩上的家》雄居《诗刊》的"青春诗会"，而邹静之的《建筑·建筑》成为《诗刊》全年的"压卷之作。《花城》亦不甘示弱，去年中国诗坛难得的名作——西川的《黄金海岸》就是在此出台。其余像石光华的《大师》之于《星星》、周伦佑的《自由方块》之于《作家》、西蒙的《玻璃花园》之于《巴山文学》、陆忆敏的《请为我准备好手帕》之于《关东文学》，现代派诗人的作品皆成为这些刊物的砥柱。《诗林》在广大读者的迫力下办起了"探索诗"专栏，暂剧海外的顾城即将他的新作奉献给这个栏目。《诗歌报》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探索诗大奖赛"。

在另一翼，北京的现代派诗人们正开始为下一个十年做准备，结成许多自由的诗人民间团体。而十年前，现代派发轫之际，北京只有《今天》一家。而现在，以芒克、杨炼、唐晓渡为首创建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以拒绝死亡的能力来提倡诗人的生命意识。由西川、老木、陈东东、欧阳江河、张枣、张真等人结盟促成了跨省市、跨海外的《倾向》诗人团体，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为拯救中国文化而努力。以黑大春、刑天等人组成了《黑洞》"新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宣称要靠诗人自己的朗诵将诗歌从印刷术中解放出来。以马高明、阿曲强巴等人为首举办了《和平之夜》诗歌朗诵会，亦是对现代派诗歌的朗诵方式实行新的探索。被称为"国关三杰"的西蒙、王烨、水鸟汇同一平、刘长缨、殷龙龙等人成立了《飞地》诗人艺术协会，以全部为英语的交流方式与国外诗歌界展开对话。

所以说，1988年对于十年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是总结的一年，同时对下一个十年又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中国的现代派诗人将以什么样的姿势进入第二个十年呢？请中国诗坛作"壁上观"。

(王俊)

歌坛劲吹"西北风"

由《信天游》(解承强曲)、《一无所有》(崔健曲)作始，继而《你会爱上它》(士心曲)、《黄土高坡》、《偶然相遇》(苏越曲)等紧随其后，于是，一种风格独具的流行歌曲——中国西部歌曲产生了，它无疑给中国的歌坛带来了一股新风。

中国的西部歌曲之所以能逢时而生，有其主、客观上的原因：其一是寻根思想。在当今的世界范围内，"寻根热"方兴未艾，自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莱的名著《根》发表并改编为电视剧系列片后，先是在美国，后及欧洲，最后是全世界，都掀起了寻找自己民族、家族历史及文化之根源的热潮。这种热潮也一定程度地冲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呢？它的民族溯源地，它的古老文明、灿烂文化发祥地在哪里呢？不正是在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地吗？反映之于音乐创作，就必然会追寻到这些地区的古老的地方音调上去了。原因之二是人们心理追求的改变。当通俗歌曲这一歌曲种类一下子以迅猛之势闯入中国大陆时，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新鲜、刺激。尤其是对柔美、轻松、平稳的以旋律见长的通谷歌曲，几乎到了首首不拒的程度，这可能是对多年来文艺禁锢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

着阴柔歌曲的泛滥，人们的心理追求发生了相对的逆转，高吭粗犷、奔放热情的歌曲逐渐有了市场前进而占了上风。反映到创作上，便是选用符合这一特点的民间音调作为创作的基础。而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又正好是粗犷、热情、奔放的。于是中国的西部歌曲应运而生了。原因之三是与美国西部歌曲有关。无可非议，我们的通俗歌曲在相当程度上受了欧美通俗歌曲的影响。一些有头脑的通俗歌曲的探索者，不再去借鉴港台通俗歌曲，而是极力去寻通俗歌曲之"根"，这样，他们追寻到了美国的西部歌曲。美国的西部歌曲虽不完全是现代通俗歌曲唯一之源，但确曾起过绝大的作用。笔者曾亲耳听得一位作曲家阐述过："美国有西部歌曲，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自己的西部歌曲呢？"当初，美国的西部交通、文化都不发达，处在贫困、落后、孤寂的境遇之中，为了排遣内心的痛楚，人们便用粗俗而忧郁的歌声来自我消遣，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西部乡村歌曲。中国的西北部又何尝不是如此？陕甘晋一带由于交通、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比较贫困落后，这些地区的民间音调自遣性很强，为中国西部歌曲对美国西部歌曲的借鉴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中国西部歌曲之所以成功，还有另一个也属于人们心理追求、欣赏变化上的原因，即这些歌曲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写意式的表达和哲理性的启迪。歌曲是与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美术、建筑、电影等在时空上是大体同步发展的。拿美术来说，人们已不特别欣赏那些规规矩矩、详详细细，讲究形似的美术作品了，喜欢的倒是那写意的、以简单的画面构思来揭示深宏的哲理的画作。音乐也是如此，委婉、华丽、感情细腻的旋律固然仍有较大的市场，但粗线条的、情绪上大起大落的、含有哲理的歌曲却给人们以新奇、不拘形式的感觉。现时的人们，既反感于"假大空"的政治宣传，也反感于无病呻吟式的矫揉造作。"一无所有"就是一无所有，"我的家乡并不美"就是不美，这不更让人觉得可信吗？不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感吗？自然，听众对这首歌有了同感，这首歌也就容易流传了。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西部歌曲的特点。这特点便是：一，源于西部民歌，又别于传统的古老的西部民歌；借鉴了欧美通俗歌曲，又具有时代的新意。二，旋律性很强，又充分体现了节奏上的灵活性，形成了既是非纯旋律型又非纯节奏型的"中和"歌曲。三，既有优美的抒情性成份，又有一定的刚劲的气势，形成了既柔且刚的特色。四，其内容特色为甜中带苦、爱中夹怨，虽是实话实说，却也充满了浓烈的哲理。五，演唱风格多为粗犷、质朴的音色，用横而野与竖而文相结合的发声方法。绝少细腻的修饰，无论是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还是陈静美演唱的《黄土高坡》都是如此，即使程琳演唱的《信天游》，彭丽媛演唱的《你会爱上它》也不同于她他对其他歌的处理，而是加进了"平直"的成份。六，在创作素材的运动上，是综合了中国西北所有民间音调的因素重新组合而成，而不是以哪一首具体民歌的一些基本特点，如运用商调式征调式、或商征、商羽交替调式，运用四度、五度、八度的跳进等都被做为特征保留下来了。

由于中国西部歌曲的出现，使得我们的通俗歌曲进入了一个复杂多向的探索阶段，几年来，我们的通俗歌曲的创作和演唱经过了模仿、探索、形成自己风格这三个阶段。模枋阶段属于引进、吸收、借鉴的过程，探索阶段则既有模仿的影子，又有中国特色的萌芽，是个中介过程，而歌坛上强劲的"西北风"吹来，是否意味着我国通俗歌曲业已形成自己风格了呢？"

然而形势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中国的可用的音乐资源很丰富，西部民歌可以构成西部通俗歌曲，其他地方也可构成东部歌曲、北部歌曲、南部歌曲吧？

（郭丰润）

歌曲《黄土高坡》

1=E $\frac{4}{4}$　陈　哲词　苏　越曲

自由地　　每分钟 124 拍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照着我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
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
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噢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四季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1988年流行顺口溜"十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
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公民搞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
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子要红包；
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也来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
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赚钱；
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

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现在盛行"V"型装束

在当代此起彼落的时装潮流中，青年女性中有一种装束颇为盛行，这就是上身着宽松舒展的上衣配以较少约束的蓬松型发式，下身着紧身裤，配以高统窄底的皮靴或半高跟、中跟皮鞋。这种装束，上宽下窄，上松下紧，使整个人体呈"V"形。V 形装束能够赢得富有审美眼光的当代青年女子的青睐，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能使人显示出充满生命力的健美感。

V 形装束的健美感主要来自于人们视觉感受中的向上感和力量感。这种装束在人们眼中的印象是重心在上身，支撑点则在下身。要使此种上重下轻的体型保持平衡感和人的活动的自如性，作为支撑点的下身势必要显示出一种力度。这种力度外现，就使人们感觉到一种力量的美；而作为重心的上身在显示平衡态势的时候，在人们的视觉中就显示出一种向上律动的形态。这样上下一结合，再加上衣着主人本身的体型美、健康美和气质美，就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综合性的健美体态。

女性 V 形装束的健美感当然并不是单一的、静态的，在人们自身运动中会产生丰富的变化。例如，当着这种装束的女子在踱步慢行时，由于上下身的运动状态比较一致、协调，再加上动作的频率不快，步幅均匀，在原有的健美感中，就会生发出高雅、稳健的气质，显示出娴静、沉稳的美感，此时若将双手插入上衣袋中款款而行，效果则更佳。再比如，当着这种装束的女子碎步小跑时，由于上下身运动节奏的互相参差，时而上身（重心）向前倾斜，时而朝后稍仰，在人体重心和支撑点的不断调查和变化之中，整个人体就形成了一种不断变换频率的跃动态热，从而形成了充分向上的运动感和活泼感，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潘有炜）

历史档案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名单

委员长　万　里
副委员长　习仲勋　乌兰夫（蒙古族）
彭　冲　韦国清（壮族）　朱学范
阿沛·阿旺晋美（藏族）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藏族）
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　周谷城
严济慈　荣毅仁　叶　飞
廖汉生（土家族）　倪志福
陈慕华（女）　费孝通　孙起孟
雷洁琼（女）　王汉斌
秘书长　彭　冲（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选举通过）

主　席　李先念
副主席　王任重　阎明复　方　毅
谷　牧　杨静仁（回族）　康克清（女）
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　胡子昂
周培源　王光英　邓兆祥　赵朴初
屈　武　巴　金　马文瑞　刘靖基
王恩茂　钱学森　钱伟长　胡　绳
孙晓村　程思远　卢嘉锡
钱正英（女）　苏步青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秘书长　周绍铮

1988 年新一届的国务院人员名单

总　理　李　鹏
副总理　姚依林　田纪云　吴学谦

国务委员　李铁映　秦基伟　王丙乾
宋　健　王　芳　邹家华
李贵鲜　陈希同　陈俊生

秘书长　罗　干(1988年12月29日任命)

外交部部长　钱其琛

国防部部长　秦基伟(兼)

国家计委员会主任　姚依林(兼)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　鹏(兼)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铁映(兼)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宋　健(兼)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　丁衡高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公安部部长　王　芳(兼)

国家安全部部长　贾春旺

监察部部长　尉健行

民政部部长　崔乃夫

司法部部长　蔡　诚

财政部部长　王丙乾(兼)

人事部部长　赵东宛

劳动部部长　罗　干(1988年12月29日免职)

地质矿产部部长　朱　训

建设部部长　林汉雄

能源部部长　黄毅诚

铁道部部长　李森茂

交通部部长　钱永昌

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　邹家华(兼)

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　林宗棠

冶金工业部部长　戚元靖

化学工业部部长　秦仲达

轻工业部部长　曾宪林

纺织工业部部长　吴文英(女)

邮电部部长　杨泰芳

水利部部长　杨振怀

农业部部长　何　康

林业部部长　高德占

商业部部长　胡　平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郑拓彬

物资部部长　柳随年

文化部部长　王　蒙

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　艾知生

卫生部部长　陈敏章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伍绍组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彭珮云(女)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李贵鲜(兼)

审计署审计长　吕培俭

1988年调整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名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　席　邓小平

副主席　赵紫阳　杨尚昆

委　员　洪学智　刘华清
秦基伟　迟浩田
杨白冰　赵南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迟浩田

副总参谋长　徐　信　徐惠滋
韩怀智　何其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杨白冰

副主任　郭林祥(兼)　周克玉
周文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部长　赵南起　政委　刘安元

副部长　刘明璞　张　彬　宗颜留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　郭林祥　第二书记　尤太忠

国防科工委

主任　丁衡高　政委　邢永宁

军事科学院

院长　郑文翰　政委　王诚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校长　张　震　政委　李德生

沈阳军区

司令员　刘精松　政委　宋克达

北京军区

司令员　周衣冰　政委　刘振华

兰州军区

司令员　赵先顺　政委　李宣化

济南军区

司令员　李九龙　政委　宋沮渭

南京军区

司令员　向守志　政委　傅奎清

广州军区

司令员　张万年　政委　张仲先

成都军区

司令员　傅全有　政委　万海峰

海军

司令员　张连仲　政委　李耀文

空军

司令员　王　海　政委　朱　光

第二炮兵

司令员　李旭阁　政委　刘立封

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名单

《西游记》等8部电视剧获优秀奖，孙悟空饰演者章金莱（艺名六小龄童）、严凤英饰演者马兰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同时获得优秀奖的有电视连续剧《雪城》、《便衣警察》，单本剧《军魂》、《血染的风采》、《动物王国窃案》，儿童电视剧《跑跑的天地》，戏曲电视剧《西厢记》。

获最佳男女配角奖的是：《乌龙山剿匪记》中“钻山豹”的饰演者申军谊、《雪城》中“姚玉慧”的饰演者倪萍。《爱新觉罗·浩》和《秋白之死》同获特别奖。

第八届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名单

经过数十位国内影视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反复争议，激烈辩驳，第八届（1987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的获奖名单，终于以得票的多寡而确定。7月4日上午，这一名单在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向首都新闻界正式公布。《严凤英》（连续剧）、《秋白之死》（单本剧）、《跑跑的天地》（儿童剧）、《九斤姑娘》（戏曲电视剧）等作品荣获一等奖。《秋白之死》的编剧和导演虞志敏获优秀编剧奖及优秀导演奖；《严凤英》中的严凤英的饰演者马兰获优秀女主角奖。另外，还公布了男女配角、摄像、照明、音乐等方面的获奖名单和获二等奖、三等奖的电视剧。以耗工巨大、制作精美、拍摄难度甚高而知名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被授予特别奖。

第9届电视剧“飞天奖”主要获奖者

连续剧特别奖　《末代皇帝》
　一等奖　《师魂》
　二等奖　《裤裆巷风流记》《家教》
　三等奖　《篱笆、女人和狗》《绿荫》
单本剧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白栅栏》《白色山岗》
　三等奖　《花鸽子》《汪老师的婚事》《塔铺》《汉家妇》
儿童连续剧
　一等奖　《好爸爸、坏爸爸》
儿童单本剧
　一等奖　《病毒、金牌、星期天》
戏曲片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朱熹与丽娘》
优秀编剧奖　诸葛怡（《师魂》《好爸爸、坏爸爸》）
　王树元（《末代皇帝》）
优秀导演奖　冯小宁（《病毒、金牌、星期天》）
优秀男主角奖　陈道明（《末代皇帝》中饰青年溥仪）
优秀男配角奖　牛星丽（《末代后帝》中饰张谦和）
优秀女主角奖　空缺
优秀女配角奖　顾艳（《家教》中饰亚芹）
优秀摄像奖　谢平（《病毒、金牌、星期天》）

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八届“金鸡奖”名单

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八届“金鸡奖”7月4日揭晓。张艺谋在此间再度成为新闻人物，他由于塑造了《老井》中的孙旺泉而一人捧走了“百花奖”和“金鸡奖”两项最佳男主角的桂冠。

在由17万名《大众电影》的读者投票产生的“百花奖”中，《红高粱》、《老井》和《原野》获最佳故事片奖；刘晓庆则以《原野》中的金子形象摘走最佳女演员奖。百花奖的最佳男、女配角则分别由陈佩斯和吕丽萍夺得。金鸡奖的最佳女配角也由吕丽萍获得。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闪电行动》获得了“百花奖”的特别奖。

以谢晋为首的、由23名中国电影界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投票产生了本年度的“金鸡奖”。《老井》、《红高粱》并列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科教片奖授予了北京科影厂的《轰击原子核的大炮——粒子加速器》。以改革家而著称的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执导《老井》而获最佳导演奖。潘虹扮演《井》中的徐丽莎而获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由李保田得到，他扮演了《人·鬼·情》中的秋芸父。曾给《红高粱》和《孩子王》担任摄影的顾长卫获得了最佳摄影奖；黄蜀匠、李子羽、宋国勋因《人·鬼·情》而获得最佳编剧奖。

知名度颇高的《红高粱》还夺得了最佳音乐奖和最佳录音奖。最佳美术奖则由《孩子王》的美工陈绍华夺走。“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陈凯歌被专家们授予了特别奖。同时获得特别奖的还有《最后的疯狂》、《买买提外传》，以及《死神与少女》的男主角刘琼。

中国健儿参加 24 届奥运会奖牌榜

金　牌

跳　水：女子跳台　许艳梅
　　　　女子跳板　高　敏
体　操：男子跳马　楼　云
乒乓球：男女双打　陈龙灿　韦晴光
　　　　女子单打　陈　静

银　牌

举　重：56 公斤级　何英强
游　泳：女子 100 米　自由泳　庄　泳
　　　　女子 200 米　蛙　泳　黄晓敏
　　　　女子 50 米　自由泳　杨文意
赛　艇：女子四人　李荣华　杨　晓　张得花
　　　　单桨有舵手　胡亚乐　周守英
跳　水：男子跳板　谭良德
　　　　女子跳板　李　青
　　　　男子跳台　熊　倪
乒乓球：女子双打　焦志敏　陈　静
　　　　女子单打　李惠芬
射　击：男子移动靶　黄世平

铜　牌

举　重：52 公斤级　何灼强
　　　　56 公斤级　刘寿斌
　　　　60 公斤级　叶焕明
　　　　67.5 公斤级　李金河
游　泳：女子 100 米蝶泳　钱　红
体　操：男子自由体操　楼　云
跳　水：男子跳板　李德亮
射　击：男子气手枪　许海峰
田　径：女子铅球　李梅素
乒乓球：女子单打　焦志敏
赛　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李荣华　张亚黎　韩亚琴　何燕雯
　　　　杨　晓　周秀华　张香花　胡亚东
　　　　周守英
女子排球：李国君　赵　红　侯玉珠　汪亚君
　　　　杨锡兰　苏惠娟　姜　英　崔咏梅
　　　　杨晓君　郑美珠　巫　丹　李月明

1988 年获国际电影奖的中国影片

1988 年，我国先后参加了 92 个国际电影节，选送影片 140 部次，其中 35 部影片在 32 个国际电影节上荣获 46 个奖项。具体获奖情况如下：

1 月 18 日，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 10 届基多城国际电影节上，上影厂摄制的故事片《城南旧事》获二等奖——“赤道奖”。

1 月 20 日，在瑞士举行的第 4 届第三世界国际电影节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盗马贼》获头奖——“弗里堡市大奖”。

1 月 28 日，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 15 届西柏林国际农业电影节上，中国农影厂摄制的科教片《植物内生菌》获“金穗奖”；科教片《一人一亩地》获“铜穗奖”。

2 月 7 日，在荷兰举行的第 17 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执导《大阅兵》和《孩子王》的我国北影厂青年导演陈凯歌获“1988 年鹿特丹奖”。

2 月 23 日，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 36 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红高粱》获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大奖”。

2 月 26 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 15 届贝尔格莱德国际科教片电影节上，北京科影厂摄制的科教片《化石宝库》获“科教纪录片金奖”。

2 月 29 日，在法国举行的第 4 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上，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湘女潇潇》获“金熊猫奖”。

3 月 20 日，在法国举行的第 3 届巴黎国际妇女电影节上，天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合拍的宽银幕故事片《江南书剑情》、《戈壁恩仇录》获“特别奖”。

4 月 21 日，美国第 60 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揭晓，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与意大利、英国合拍的宽银幕故事片《末代皇帝》获九项大奖，我国青年作曲家苏聪获“最佳音乐”金像奖。他是电影史上第一个获奥斯卡奖的中国人。

4 月 16 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第 11 届沙尔索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老井》获一等奖。

4 月 17 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第 43 届都灵国际体育电影节上，南海影业公司与香港合拍的宽银幕故事片《南北少林》获一等奖——“都灵市头奖”；新影厂摄制的纪录片《乒乓》获“意大利大众体育联盟杯奖”；北京童影厂摄制的故事片《五虎奖》获“最佳综合选片奖”。

5 月 23 日，在法国举行的第 41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孩子王》获“教育贡献奖”。

5 月 30 日，在苏联举行的第 10 届塔什干亚非拉国际电影节上，八一厂摄制的故事片《远离战争的年代》获

二等奖——“在电影艺术中保持和发展民族传统奖”。

6月13日，在津巴布韦举行的第3届哈布雷国际电影节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红高粱》获电影节最高奖——“最佳影片奖”、“杰出导演奖”（张艺谋）和“最新颖创作奖”。

6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影电视和视听交流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电影评奖会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孩子王》获“国际电影电视委员会奖”。

6月2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39届国际科教电影节上，上海科影厂摄制的科教片《朱鹮》获“荣誉奖”；科教片《人体泌尿系统》获“特别奖”。

6月29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红高粱》获“悉尼电影评论奖”。

7月15日，在瑞士举行的第2届洛桑国际能源电影节上，北京科影厂摄制的科教片《生命的能源》获“最佳影片奖”。

7月1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上影厂摄制的宽银幕故事片《芙蓉镇》获电影节最高奖——“水晶球大奖”；该片女配角李国香的扮演者徐松子获捷克戏剧家协会颁发的“评委会奖”。

7月24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第19届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峨影厂摄制的故事片《井》获最佳影片二等奖“银质奖”；该片女主角徐丽莎的扮演者潘虹获“演员银质奖”。

7月25日，在比利时举行的“88国际探索电影评奖会”上，西影厂摄制的故事片《孩子王》获“探索影片奖”。

10月9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1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电视录像节上，西影厂摄制的《红高粱》获制片“大阿特拉斯金奖”和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

10月27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第41届沙莱诺国际电影节上，北影厂摄制的故事片《月牙儿》获“银奖”。

10月29日，在西班牙举行的第23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上，上影厂摄制的宽银幕故事片《芙蓉镇》获评委会特别表彰奖——“人民奖”。

11月5日，在中国举行的第1届无锡国际旅游电影节上，新影厂摄制的旅游片《中国黄山》获“公众奖”；上海科影厂摄制的旅游片《丝路情》获摄影单项奖。

11月13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第2届桑德里沃国际国家公园纪录片电影电视节上，中国农影厂摄制的科教片《竭马鸡》获“优秀影片奖”。

11月14日，在中国举行的第1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上，上海美影厂摄制的动画片《山水情》获电影节最高奖——大奖；动画片《鱼盘》获A组第一名；动画片《螳螂捕蝉》获F组第二名；动画片《不射之射》获“特别奖”；已故动画电影家阿达制作的动画片《新装的门铃》被授予特别证书。

11月22日，在法国举行的第10届南特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苦藏的恋情》获“最佳音乐奖”。

11月26日，在巴西举行的第5届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电视录像节上，上影厂的故事片《人鬼情》获最佳影片大奖——“金鸟奖”。

11月29日，在西班牙举行的第36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湘女潇潇》获“唐·吉诃德奖”。

12月3日，在美国举行的第8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上影厂摄制的故事片《女人的故事》获“观众评议最佳影片奖”。

12月14日，在伊朗举行的第18届德黑兰国际教育电影节上，上海科影厂摄制的科教片《黄猄蚁——柑桔卫士》获“银奖”；科教片《珊瑚》获“铜奖”。

（朱杰君）

1988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单　位	数　量	指　　标	单　位	数　量
一. 总人口	万　人	109614	八. 国内商业		
市镇	万　人		1.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　元	7440.0
乡村	万　人		2. 社会消费品零售量		
二. 社会劳动者	万　人		粮食	万　吨	
职工	万　人		食用植物油	万　吨	
城镇个体劳动者	万　人		肉猪	万　头	
乡村劳动者	万　人		鲜蛋	万　吨	
三. 社会总产值	亿　元		水产品	万　吨	
工业	亿　元	18100	食糖	万　吨	
农业	亿　元	5618	各种布	亿　米	
四. 国民收入	亿　元	11533	自行车	万　辆	
工业	亿　元		缝纫机	万　架	
农业	亿　元		手表	万　只	
五. 主要农产品产量			3. 农产品社会收购总额	亿　元	
粮食	万　吨	39401	4. 主要农产品社会收购量		
棉花	万　吨	420.0	粮食	万　吨	
油料	万　吨	1320.0	棉花	万　吨	
糖料	万　吨	6237.0	食用植物油	万　吨	
黄红麻	万　吨	108.0	肉猪	万　头	
烤烟	万　吨	233.0	鲜蛋	万　吨	
茶叶	万　吨	54.0	水产品	万　吨	
蚕茧	万　吨	44.0	九. 对外贸易		
水果	万　吨	1662.0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027.9
大牲畜年末头数	万　头	12500	出口额	亿美元	475.4
猪牛羊肉	万　吨	2188.0	进口额	亿美元	552.5
水产品	万　吨	1046	十. 财政		
六.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国家财政收入	亿　元	
布	亿　米	176.0	国家财政支出	亿　元	
糖	万　吨	455	十一. 物价指数(以上年为100)		
自行车	万　辆	4122.0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	118.5
缝纫机	万　架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	
手表	万　只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	120.7
原煤	亿　吨	9.70	十二. 教育文化		
原油	万　吨	13700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所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5430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　人	206.6
钢	万　吨	5918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　人	555.7
水泥	万　吨	20300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　人	4015.5
木材	万立方米	6300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　人	12535.8
七. 运输邮电			十三. 卫生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23355	卫生机构病床数	万　张	250.3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6060	卫生技术人员	万　人	372.4
邮电业务总量	亿　元	49.10	其中:医生	万　人	161.8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治治官“倒”》

1988 年人们最恨的是哪种人？官倒。官倒是那一年腐败的核心之一，惩治腐败，当然必须从惩治官倒入手。《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吹响了“治治官倒”的号角。

轿车未出仓库，“旅行”了大半个中国，价格暴涨 1 倍；企业急需的橡胶，被倒来倒去，到了企业手里，中间却获暴利。一些公司怎样倒腾紧俏物资、产品，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损害国家，坑害用户，从本报今天披露的两个案例中可见一斑。

群众把这些官商结合、倒腾紧俏物资和产品的公司称之为“官倒爷”、“大倒爷”。它们比起形形色色的没有“官”色彩”的“小倒爷”来危害更大。“官倒爷”的要害是官商结合。有的是政企不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经营权，有的是政府官员与一些公司搅和在一起，挂个董事长、顾问的头衔，明作靠山，批条子、通路子，暗当后台；有的是离退休干部办起的公司、说是发挥“余热”，实际是发挥“余权”。这些官商结合的公司凭借手中的权力，倒腾紧俏商品，层层加价、一夜暴富。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行贿受贿、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勾当。

“官倒爷”也打着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旗号，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不创造物质财富，还增加流通环节，延长流通周期，掀起助长物价乱涨，加重企业和消费者负担，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只能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官商不分，也严重腐蚀了干部队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挫伤人民群众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改革和建设大局。

官商合一，弊病百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党中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不许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而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借口发展商品经济，见利忘义，有禁不止。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当是廉洁的政府。尤其是在改革时期，共产党员、机关干部更要清正廉洁，才能团结人民同心同德，战胜险阻，度过难关。

“官倒”是改革进程中斜刺里冒出来的一种消极现象。价格双轨制，市场发育不全，法纪监督不力，给了“官倒爷”可乘之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推进价格改革，逐步理顺价格体系，健全法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就是说，要通过深化改革，清除“官倒爷”滋生的土壤。这是治本的，但需要时日。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法纪教育，严明法纪，坚决清理官商结合的公司，依法打击非法倒卖活动。这是当前就可以，并且应当着手进行的。

《1988 年城市职工心态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从 1988 年 8 月开始对 16 个大中小城市的 1.2 万名职工进行了一次有关政治社会生活态度的问卷抽样调查，目前共回收有效问卷 9939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这次万名职工调查对象包括工厂、商店、饭店、医院、科研机构、学校、党政机关等单位不同类型的工人、售货员、服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政工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政工干部。在 9939 人中，大致是体力劳动者占 36%，脑力劳动者占 6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32%，中学占 64%，小学、无学历占 3.6%；中共党员占 45%，共青团员占 20%。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大致了解到城市职工对当前社会安全、法制建设、社会和政治生活等方面较突出问题与急需解决问题的判断，以及对当前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等。

社会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
——工作人员贪污、受贿

在回答什么是当前社会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时（选两个问题，下例同），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占 46.1%，居第一位；认为“坏人在公共场所行凶无人敢管”的占 35.4%，居第二位；认为“重大经济案件增加”和“杀人抢劫重大刑事安件增加”的各占 27%。

从调查对象不同群体看，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是最突出的问题，在民主党派成员和非党群众中分别占 51%和 49%；分职业看，在企业政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比例较高，分别占 54%和 50%；从单位看，在学校、企业和科研单位中比例较高，都占 50%以上。这表明城市职工对贪污、受贿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也说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急迫性。如何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看来是现阶段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政治生活方面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党风不正

在选择什么是政治生活方面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时，“党风不正”被排在首位，占 63%。“社会风气不良”居第二位占 55%。排在第三位的是“民主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占 28.1%。分年龄看，认为“党风不正”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的，50 岁以上的老职工有 71%，明显高于 25 岁以下青年职工（占 51%）的意向；按单位分，在学校、党政机关、科研单位中占的比例较大，分别占 70%、67%和 65%；按职业分，在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中分别占 67%和 64%，比例明显高于工人和商业人员。

党风不正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和声誉，这从城市职工对党风状况的评价和要求入党的人的多少可以看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党风比以前好转的只占22%；认为变化的占50.4%；认为比以前更差的占24.4%。认为要求入党的人比以前多了的，只占24%，认为比以前少了和无变化的各占35%。

党内腐败现象和贪污受贿的产生，与法制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城市职工对执法人员评价较低，对领导干部以权代法意见较大。在回答"你认为法制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时，认为"某些领导干部以权代法"，占61%；认为"执法人员素质差"，占35%；认为"法制不完善"占31%。

在回答应加强哪方面的法制教育的问题时，占第一位的是认为应加强国家公职人员反渎职受贿教育，占68%；占第二位的是加强各种经济法规教育，占56%。

调查情况表明，群众对执行人员的评价较低。认为执法人员好的和较好的只占19%；评价一般的占48%；认为较差和很差的占30%。

社会生活方面最关切的问题——物价上涨过快

1988年各城市物价上涨较猛，是城市职工感受最强烈的问题。在回答社会生活中什么问题最急需解决时，居第一位的是"物价上涨太快"，占94%；其次是"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不良"，占35%；"消费品质量不好"，占28%；"住房分配不公"，占20%。对"服务态度不好"、"看病就医难"、"交通事故多"的反映比例相对较小。

因调查时间恰逢物价大幅度上涨，各地抢购风正盛之时，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政治面貌、不同年龄的各层次职工中，对物价上涨的反映较为一致，各阶层的意向差别不大。对"社会秩序不好"反映较大的，党员中占41%；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占38%，高于工人和商业人员中占29%原比例。对"住房分配不公"的反映，工人和商业人员中占24.5%，高于技术人员和干部中占17.4%的比例。对"看病就医难"，也是工人意见多于干部。

个人生活方面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分配不公

选择"你在个人生活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中，认为"收入太低"的占82.3%；认为"住房紧张"的占36.5%；认为"保留福利太少"的占22.7%；认为工作不称心、无择业自由的占17.8%。

收入太低与物价上涨过快有密切联系，各种不同层次职工的反映差别不大。认为"收入太低"的职工，26—49岁的中青年中占的比例稍大，占84%；按单位分，以党政机关中占85%的比例为最高，科研单位和学校中分别占79%和76%，按职业分，以工人和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中比例最高，占84—86%。认为"住房紧张"的，以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中占40%的比例为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中平均占34%左右。这表明工人的住房紧张程度高于干部。反映"家务太多"的，脑力劳动者中占14.1%，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者中占7%的比例。

（朱庆芳）

1988年国内十件大事

（《半月谈》编辑部推选）

1. 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政策措施。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和士兵实行军衔制。部分现役军官改为文职，实行文职干部制度，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 全国七届人大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人。

4. 海南岛建省，实行比特区更加开放的政策。

5. 云南发生强烈地震。

6. 全国出现抢购风和挤兑风，引起人们对严重通货膨胀问题的注意。

7. 铁路接连发生翻车、撞车事故，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

8. 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并对撞成功，我国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建成出束。这是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和人造卫星上天后，我国高科技领域两重大突破。

9.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致祝词，强调必须"保障作家、评论家的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

10. 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员双跨珠峰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首次实现珠峰现北大跨越。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日 李鹏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致词，指出当年应首先抓好三件大事：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进行中央机关的机构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经国务院批准，从即日起提高伤残的军人、人民警察、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的抚恤标准。

1月7日 我国上一年新设城市30个，至此共有381个设市的城市。

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三次会议，原则同意《企业法(草案)》。

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基本完成，许多县乡正职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

1月11～21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24次会议，决定七届人大3月5日召开，通过水法等法规。

1月13日 中国国民党主席、台湾“总统”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总统”。

1月14日 中共中央电唁蒋经国逝世。

经国务院批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施行。

1月21日 拉萨召开宽大处理会，依法对59名骚乱事件参加者宽大处理。

1月25日 王朝文再次当选贵州省长。

1月26日 韦纯束再次当选广西区人民政府主席。李长春当选辽宁省长。

1月27日 王森浩当选山西省长。

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1月28日 熊清泉、叶选平、王兆国分别当选湖南、广东、福建省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再次当选新疆人民政府主席。

1月30日 陈希同再次当选北京市长。何竹康、程维高分别当选吉林、河南省长。

原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同恩贪污巨额团费和公款，被处决。

1月31日 侯崇宾、贾志杰、张皓分别当选陕西、甘肃、四川省长。

2月1日 中央领导会见张兴让，赞扬“满负荷工作法”能带来巨大利益，要逐步推广。

沈祖伦、宋瑞祥分别当选浙江、青海省长。

2月2日 顾秀莲(女)当选江苏省长。

2月3日 卢荣景、吴官正分别当选安徽、江西省长。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四次全会，讨论经济形势和当前的经济工作。去年经济发展相当好，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今年要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2月26日 中共中央最近决定设立中共海南省(筹建)工委会，许士杰任书记。

2月27日 中共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鲍彤任主任。

2月28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直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分别成立，作为中央派出机构领导中央党政机关党的工作。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个别条款：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发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3月5～12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个别条款建议等。

3月5日 国务院严肃处理两起重大交通故事，接受铁道部长丁关根辞职请求，给予民航局长胡逸洲记大过处分。

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市闹事，蓄意制造骚乱，很快被平息。

3月11～15日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朴方当选主席团主席。

3月14日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表公告，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建国前罪行。

3月15～19日 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举行。审议通过赵紫阳代表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和拟向七届人大、政协推荐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

3月24日～4月10日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原则通过政治决议。选举李先念为全国政协主席，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钱昌照、周培源、缪云台、王光英、邓铭祥、赵朴初、屈武、巴金、马文瑞、刘靖基、王恩茂、钱学森、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卢嘉锡、钱正英、苏步青、司马义·艾买提为副主席。

3月25日～4月13日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七项决议、关于设立海南省的两项决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两个法律。选举杨尚昆为

国家主席、王震为国家副主席；万里为委员长；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4月4日　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拉萨骚乱直接的危害者是西藏人民，达赖放弃分裂立场就欢迎他回国。

4月9日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精简合并后国务院组成部委41个。

4月26日　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

4月28日　党中央最近调整四个省委主要负责人，毛致用、熊清泉、何竹康、卢荣景分任江西、湖南、吉林、安徽省委书记。李瑞环当选天津市委书记。

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

5月3日　国务院确定行政机构设置，包括41个部委、办公厅、19个直属机构、5个办事机构、16个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5个事业单位、42个非常设机构。

5月4日～8日　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团中央。会议通过实行团员证制度等决议，将《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定为代团歌。10日～11日，共青团十二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宋德福当选连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5月5日　张勃兴当选陕西省委书记。

5月22日　李瑞环再次当选天津市长。

5月25日　何竹康、尹克升当选吉林、青海省委书记。侯宗宾当选陕西省长。

5月29日　白立忱当选宁夏主席。

6月6日　孙维本当选黑龙江省委书记。

6月16日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案，11名被告依法判刑。

6月22日　国家能源部正式成立。

6月25日～7月1日　七届人大党委会举行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关于确认1955年至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的决定等。以上决定、条例，7月1日由杨主席、邓主席公布施行。

6月29日　国家物资部正式成立。

7月1日　《求是》杂志创刊，邓小平题写刊名。《红旗》杂志停刊。

沈达人当选宁夏区委书记。

7月5日　航空航天工业部正式成立。

7月8日　李登辉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当选主席。赵紫阳总书记致电祝贺。

7月13日　机械电子工业部正式成立。

7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治治"官倒"》。

7月19日　为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作准备，国家公务员制度培训班开学。

7月22日　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中纪委《关于逐步撤销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纪检组和中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关问题的意见》。

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中组部《关于逐步撤销国务院各部门党组有关问题的意见》。

8月1日　国务院最近作出《关于加强交通运输安全工作的决定》。

国务院要求控制新闻发布会和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今起施行。

8月6日　多吉才让当选西藏区人民政府主席。

《人民日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并加编者按。由此展开如何做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

8月13日　北京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准备用5年时间把固定职工全部改为合同制职工。

8月15～17日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原则通过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决定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

8月23日　中纪委公布《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试行)。

8月29日～9月5日　七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保密法》、《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同时批准有关公约、议定书和协定。

8月30日　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贵州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45人)，要求加强整顿管理，确保乡镇煤矿安全。

8月31日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重申严格控制建立纪念设施的通知。

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内容包括明确社会职能等8个方面。

9月1～6日　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了妇联体制改革方案，选举产生全国妇联新的领导机构，康克清担任名誉主席，陈慕华当选妇联主席。

9月2日　国家决定实施"燎原计划"，培养大批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9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惩治"官倒"》。

9月5日　杨主席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9年5月1日起施行)、公布施行《关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正式建立。

9月6日　中纪委公布《处理检举控告申诉的规定》。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生产力标准也是选拔干部的根本标准》。

9月13日　李先念会见并宴请台湾"立法委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

国务院发布施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

9月16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接待中不摆烟酒等问题的通知》。

9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治理经济环境要除"三害"——首都部分厂长经理的建议》(三害指政企不分、摊派、"官倒")。

9月22日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京成立。

9月23日　银川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电祝贺。

9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举行第12次全会,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9月26日举行。

9月26～30日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赵紫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报告,批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10月3日　政协常委、著名医学专家马海德(美国人)在京逝世,终年78岁。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作出若干规定,严禁县以上党政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

10月14日　政协副主席钱昌照逝世,终年90岁。

10月22～28日　中国工会十一大在京举行。在十一届执委会上,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厚泽任第一书记。

10月29日　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2次全会,讨论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农业发展。

10月31日～11月8日　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四次会议,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同日公布,1989年3月1日起施行)和其他决定、报告。

11月2～5日　全国扫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建国以来扫盲1.5亿,全国尚有文盲2.2亿。

11月6日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中央军委原顾问谭政同志在京逝世,终年82岁。

11月8日　国务院发布《土地复垦规定》(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杨主席命令公布施行《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11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行政诉讼法草案,征求各界意见。

11月17日　在京老同志纪念刘少奇90诞辰。刘少奇画册发行式同日进行。

11月21日　李子奇连任甘肃省委书记。

11月29日～12月4日　全国人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我国地方机构改革明年相继展开。公务员制度明年开始试点。

11月30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5日　中央书记处最近原则同意,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监督。

12月8日　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在京逝世,终年82岁。

12月10日　拉萨几十名喇嘛尼姑游行闹事。民警被迫鸣枪示警,将游行者驱散。混乱中1人死亡、13人受伤。

12月11日　南宁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电祝贺。

12月18～22日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赵紫阳作题为《用十三大的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的讲话。

12月19日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去世,终年83岁。

12月23～29日　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五次会议,通过标准化法(同日公布,1989年4月1日起施行)和有关报告等。

12月24日　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4次全会,讨论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南京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发生冲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与种族歧视无关。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通知》。

姜春云当选山东省委书记。

12月26日　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首都数千群众满怀深情瞻仰毛泽东遗容。

12月28日　李泽民当选浙江省委书记。

12月29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锦涛为西藏区委书记,刘正威为贵州省委书记。

12月30日　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廉政建设。强调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决定集中力量查处一批严重经济犯罪案件。

关广富连任湖北省委书记。

经 济

1月4日　我国全面推行法定计量单位，改革市制、废除旧杂制、限制英制。

我国城镇新型集体企业逾23万家，从业人员1200多万，年生产经营额600亿元。

1月5日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扩大，从原来的"小三角"变为"大三角"，包括28个县市。

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接管一大型军工厂，将政府部门直属的大型企业移交给企业集团，这在我国还属首次。

1月10日　我国能源工业步入发展新天地，1987年电力装机总容量跨入世界前列，原煤产量首次超过9亿吨。

我国最大硫铁矿生产基地——广东云学硫铁矿正式投产。

北疆铁路第一期工程开通客运。

1月12日　福建列为我国超前改革实验区，厦门、深圳特区将实行计划单列。

1月15～18日　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在京举行。住房制度改革从即年起正式在各地推行。

1月17日　我国黑白电视机生产为世界之首，彩电居第三，城乡电视机总数突破一亿。

1月20日　我国开始进一步放开外汇市场，取消用汇控制指标。

1月28日　国家发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首批贷款14亿元，已有180万户农民解决温饱。

2月2日　今年发行国库券90亿元。

2月13日　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评出，张兴让等获金杯奖。

2月23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民生产总值首破万亿。

国务院发出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的紧急通知。

3月12日　国务院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制。

全国各种成份工商企业发展迅速，个体工商户逾1372万。

3月19日　外国专家首次承包中国企业。澳专家海斯与武汉长虹模具厂签订三年合同。

4月8日　我国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扩大到288个市县，面积增加以32万平方公里。

5月10日　新版人民币壹佰元、贰元、壹元、贰角券发行。

5月17日　北京最大市场——隆福大厦建成。

5月29日　我国企业首次试行跨国承包多哥糖厂经济效益创历史纪录。

6月7日　河南机械电子工业厅长苗万和辞官经商。

6月13日　上海首办国内抵押贷款。

7月1日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正式成立。

7月7日　农业部宣布组织实施"菜蓝子工程"，保障我国城乡副食品供给水平逐步增长。

我国电子产品开始走向世界，出口一百多国家地区。

7月8日　上海市通过国际招标，有偿出让第一块土地。

7月9日　我国将取消国营企业调节税，开征筵席税、印花税等。

7月11日　我国粮食购销体制酝酿重大突破，压缩平价粮，实行价格补贴，改暗补为明补。

7月12日　国务院决定13省市今年起财政包干。

7月15日　国家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6个专业投资公司成立。

7月18日　全国利率改革率先在温州试行。

7月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

国家改革沿用30多年的单式预算法，采取复式预算法试编1988年国家预算，把"吃饭钱"和"建设钱"划清。

7月28日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各地放开名烟名酒价格。适当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价格。

8月6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8月7日　我国境外承包劳务发展迅速，承包工程遍及117个国家和地区，在外劳务人员达57000。

8月9日　国务院最近改进地方财政包干办法，强调严肃财经纪律，各级政府不得越权行事。

8月19日　海南洋浦开发区将建成"自由港"，按世界自由港模式实行自由对外贸易政策。

8月31日　广西贵县出现200多"庄园"。农民聘请技术人员和雇工，自己当起"庄园主"。

9月1日　我国提高存款贷款利率。

9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分布关于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的公告。从本月10日起对城乡居民三年以上定期存款均予保值。

9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逐步推行住房私有化》。

9月8日　国务院发布《现金管理暂行条例》(10月1日起施行)。

9月10日　上海市第一家房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营业。

9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新版人民币拾元、伍元和壹角券今日起发行。

9 月 22 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宣布茧丝收购出口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9 月 23 日　轻工部不再评“部优”，将定期公布产品等级。

9 月 25 日　国务院为开展 1988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发出通知，重点是中央和地方大型企业、各类公司。检查 10 月开始。

9 月 27 日　国务院发布《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11 月 1 日起施行)，发布施行《基金会管理办法》。

9 月 28 日　我国试行羊毛拍卖销售制度。

10 月 3 日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解决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问题。

10 月 15 日　康华总公司开始全面清理整顿，与残疾人基金会彻底脱钩，不再享受特批的减免税待遇。

首届中国对外技术交易会在深圳开幕。

10 月 23 日　我国又有 38 个市县对外开放，至此开放地区已达 542 个。

10 月 28 日　国内最长最先进的轿车生产流水线在中外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建成投产，7 分半钟装配一辆桑塔纳。

10 月 31 日　“厂内银行”在全国逐步推广。

11 月 3～4 日　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在京举行。

11 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治理、整顿务必抓紧》。

11 月 21 日　天津大邱庄以工养农，粮食 10 年翻番。9 人种地，人均产量 26 万多公斤。

11 月 28 日～12 月 5 日　国务院在京举行全国计划会议、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李鹏强调明后两年改革建设突出治理整顿，确保明年物价涨幅明显低于今年。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确定明年财政实行紧缩政策。26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过两三年紧日子》。

12 月 31 日　我国最大现代化化纤工业——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建成投产。

我国最新工艺浮法玻璃生产线——上海耀华玻璃公司建成投产。

军　事

1 月 8 日　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初具规模，陆军集团军第一个直升飞机大队今日成立。

1 月 13 日　我国建成第一艘专用布雷舰。

2 月 4 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森林警察列入武警序列。

4 月 27 日　邓主席发布命令，颁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5 月 11 日　中央军委最近发布命令，授予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有功单位个人荣誉称号。

7 月 25 日　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我军军歌。

7 月 30 日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授予(8 万多)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仪式。

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文职干部大会。我军历史上首次出现一支 10 多万人的文职干部队伍。

8 月 12 日　解放军实行新的士兵军衔制度。

9 月 14 日　中央军委举行授予上将军衔仪式，赵紫阳、杨尚昆为 17 位上将授衔(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徐信、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 17 位上将。

9 月 16 日　5 名女军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聂力、廖文海、吴晓恒、李希楷、胡斐佩)。

9 月 23 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10 月 1 日　我军官兵今日起佩戴军衔和新式军服服饰。

12 月 12～20 日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

12 月 17 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施行《武警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具体办法》。

外　交

1 月 15 日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生效，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京举行。

2 月 3 日　我国与乌拉圭建交。

2 月 22 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舰船考察南沙群岛纯属主权，越南阻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3 月 14 日　越方在南沙海域武装挑衅，我方被迫有限还击，击沉击伤越南三艘舰船。我外交部照会越使馆，强烈抗议越武装舰船侵入南沙群岛袭击我船只。

3 月 28 日　中国印度两共产党中断关系 24 年后恢复关系。

4 月 14～16 日　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访问我国。

5 月 13～16 日　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问我国。

6 月 5～11 日　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访问我国。

6 月 20～26 日　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访问我国。

7月1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办事处在香港成立。

外交部就柬埔寨问题发表声明，赞成建立四方临时联合政府。

7月3～8日　巴西总统萨尔内访问我国。

7月9日　我国与卡塔尔建交。

7月15～17日　美国务卿舒尔茨访问我国。

8月25～30日　日本首相竹下登访问我国。

9月3～8日　捷克总统胡萨克访问我国。

9月7～11日　杨尚昆主席率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国庆40周年活动。

9月13日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我国。

9月19～26日　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访问我国。

11月11～17日　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访问我国。

10月14～18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我国。18日，中罗发表联合公报。

10月20～24日　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访问我国。

11月1～2日　孟加拉国总理艾尔沙德访问我国。

11月10～23日　李总理访问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11月20日　我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承认巴勒斯坦国。

11月28日　中蒙在北京签署处理边界问题条约。

12月1～3日　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苏联。2日，苏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他。

12月2日　邓小平倡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2月13日　中联部发言人强调，中共以独立自主原则处理党际关系，目前与250多个外国政党接触往来。

12月19～23日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我国。23日，中印联合公报发表。

文化教育

1月1日　《天津日报》在省市报纸中率先开始自办发行。

1月2日　清华大学出了第一位“论文博士”(哈尔滨汽轮机厂徐大懋)，开在职科技人员获最高学位之先河。

上海考古发现“良诸”古墓有陪葬奴隶，表明夏王朝前南方已出现奴隶制。

1月6日　刘猷枋教授研究泌尿系统结石，获世界科学奖。

1月11日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骊山发现秦汉宫殿和“骊山汤”遗迹。

1月14日　河南农民王立民自费设立“农民文学奖”。

1月15日　第七届电影“金鸡奖”评选揭晓。

1月17日　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进入新领域，低温核供热反应堆主换热器研制成功。

1月23日　中意英合拍的影片《末代皇帝》获第45届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金球奖”。

1月24日　山西省人民医院院长赵生才首创可复性非手术节育。

1月26日　国务院最近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8处，连同前两批共500处。

2月4日　我国教育领域开始实行督学制度。

2月14日　同济医院实行异体脑移植手术成功。

辽东发现大规模原始文化遗址。

2月23日　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

2月26日　《邓小平》画册发行仪式在京举行。

2月28日　我国首台两足步行机器人出世。

3月4日　我国细胞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科院陆文梁)控制外植体形成性器官首获成功。

3月7日　我国又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成功。22日定点成功。

“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查明实为北朝大型古墓群。

3月10日　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诞生。

3月28日　我国已培养出1200多博士。

4月11日　中意英合拍影片《末代皇帝》获9项奥斯卡奖。

4月21日　赵章光的“101”毛发再生精获得日内瓦本届展览会唯一的奥斯卡发明奖。

5月6日　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揭晓，《西游记》等8部电视剧获优秀奖，章金莱、马兰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5月10日　我国首家服装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在京成立。

5月31日　我国突破一项生物工程研究世界性前沿课题，首次实现人类基因在植物中表达。

6月6日　我首家民间影视企业——海南影视公司在海南问世。

6月8日　我国数学家攻破一道世界难题——等熵气流问题。

6月11日　电视片《河殇》开播。

7月4日　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8届“金鸡奖”揭晓。

7月23日　我国培养出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取得突破性医学研究成果。

8月3日　国家教委透露，明年起改革研究生招生办法，分国家计划招生和委托培养招生两种形式。

8月9日　我国教育事业10年稳步发展，共培养高级专门人才624.7万，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1%。

8月22日　峨影导演米家山独立承包制片。

9月1日　国家教委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中小学普遍试行日常行为规范。

9月7日　我国启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一颗气象卫星。

9月14～27日　我核潜艇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9月17日　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率先改革分配办法，明年研究生分配实行双向选择。

9月22日　中国科技馆在京正式开放。

10月6日　我水稻遗传育种研究重大突破，首次运用无融合生殖基因选育成功。

我国电视机逾一亿台，现有电视观众6亿人。

10月14日　我国高科技领域又获重大突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

10月27日　首届电视十佳歌手评选揭晓，刘欢、蒋大为、陈力、郭峰、李谷一、何纪光、骆玉笙、殷秀梅、李双江、郑绪岚当选。

11月5日　中科院长周光召提出"一院两制"建院模式。

11月7日　夏衍等就文代会答中外记者问，强调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也不再对文艺加以行政干预。

11月8～12日　中国文联五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胡启立代表中央、国务院致祝词。邓小平等会见与会代表。通过五届全委会名单和中国文联新章程。13日，曹禺当选文联执行主席。

11月19日　我国发现200万年前人类化石，为揭开人类起源之迷提供了新依据。

11月28日　首届中国戏剧节在京举行。

12月8日　我国探空火箭发射场在海南建成。19日，成功发射探空火箭。

12月12日　我国最大重离子加速器在兰州建成出束。

12月13日　首届国家星火奖举行授奖大会。

12月20日　我国研制成微电脑双全臂假肢。

12月22日　我国又成功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卫星。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引起不同反响。

社会生活

1月1日　天安门城楼开始向中外游人开放。

1月7日　湖北麻城农家女熊再定十年粒米未进，言行自如。

由广州开往西安的272次客运列车在湖南马田墟车站发生特大火灾，两节车厢被烧毁，死34人，伤30人。

1月18日　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在重庆失事，机上108人全部遇难。

1月24日　昆沪客车发生颠覆事故，目前已死亡90人。

2月1日　邮电部开办礼仪业务，先在部分城市试办。

2月16日　政协副主席、民进名誉主席、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逝世，终年94岁。

2月18日　上海已采取措施控制甲型肝炎流行疫情。

2月25日　我运动员李琰在15届冬奥运会表演赛中破女子千米速度世界纪录。

3月14日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方获胜(聂卫平最后胜日方主帅加藤正夫)。

3月22日　卫生部公布上海甲肝疫情，累计发病29万多例，死亡11例，疫情已经控制。

3月24日　沪郊旅客列车相撞，死亡28人，其中日本旅客27人。

3月26日　聂卫平荣称中国围棋棋圣。

4月11日　我游泳女将杨文意刷新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4月25日　北京急救中心试开全国统一使用的急救电话"120"。

5月5日　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双跨峰成功。

5月12日　民航厦门一客机被劫持到台湾，13日返回。民航局长电谢台湾民航局长。

5月21日　蛮横无理妨碍公务，不接受传唤，保定地区交通局长周志远被拘传到京，后被逮捕判刑。

5月23日～6月4日　汤姆斯杯尤伯杯羽毛球大赛在新加坡举行，我男女羽毛球队双获冠军。

5月24日　上海出现私人律师事务所。

6月1～12日　国际足联倡办的1988年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广州举行。我国女队获第4名。

6月16日　在第20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何灼强、何英强破三项世界纪录。

6月23日　柳洲铁路局获我国铁路第一个千日安全奖杯。

7月16日　上海甲肝流行完全平息，发病人数31

万，直接死亡32例。

7月21日　南京南昌等地气温高达40℃左右，中暑死亡数百人。同日，岷江一客轮触礁翻沉，已有10人死亡，近百人下落不明。

7月26日　辽宁优秀女企业家王淑琴被杀害。30日，凶手李丹被处决。《人民日报》发表短评《保护企业家》。

7月30日　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鹰厦线永安、漳平段(105公里)建成通车。

京石高速公路第一桥——六里桥立交工程建成通车。

8月20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9日起正式接待各国旅游者。

8月25～31日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南京举行。

8月27日　国宴开始不用茅台酒。

8月28日　珠江口流域首座长桥——洛溪大桥通车，总长1916.04米。

8月31日　民航一客机在港着陆时冲入海中，6名机组人员和1名乘客遇难。

8月31日～9月4日　1988年555世界杯羽毛球赛在曼谷举行，我选手囊括五项冠军。

9月17日～10月2日　第24届奥运会在南朝鲜汉城举行，我国金牌总数列11位。我运动员许艳梅获女子跳台、楼云获男子跳马、高敏获女子跳板、陈龙灿和韦晴光获乒乓球男双、陈静获乒乓球女单金牌。

9月20日　大诈骗犯(福建漳州农民)高卫邦等3人落网，百余合同无一兑现，骗得260多万元。

9月30日　兰州至西安电气化铁路通车。

10月1日　天津铁路枢纽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正式启用通车。

10月9～16日　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京举行。

10月15～24日　第8届国际伤残人奥运会在南朝鲜汉城举行。我运动员夺17枚金牌，位居14。

10月23日～11月2日　全国城市运动会在济南举行。

11月4日　我国交通事故触目惊心，每10分钟1人丧生，10年来共死亡39万人。

10月6日　云南南部澜沧发生7.6级强烈地震，并连续发生强烈余震。死亡700多人，塌房20多万间，损失超过10亿元。

12月10日　我国目前最大水电工程——长江葛洲坝电厂基本建成。

12月16日　衡广复线通车典礼在韶关隆重举行，李鹏剪彩。国务院致贺电。

12月23日　辽宁一大客车与297次列车相撞，死亡46人。

12月25日　北京市一条贯穿南北的骨干道路——“东厢”道路工程今日通车。

12月28日　大秦铁路一期工程(山西大同至河北三河)在北京举行通车典礼，李鹏剪彩。国务院电贺。全长410.8公里。

陇海铁路西线(郑州——宝鸡)实现电气化，全长1187公里。

12月30日　大连造出我国最大出口油轮——11.8万吨的“埃维塔”号，交付选用。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89年

导　言

1989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政治上，发生了两次戒严，之后是痛定之后的整肃；在文化界，毛阿敏逃税案弄得满城风雨，电影分级制在千呼万唤中露面并带来了《寡妇村》的轰动一时效应；在外交方面，中苏两个老冤家重聚首是一大成就，但三个小国却又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扑朔迷离，惊心动魄，正是这个年代的特点。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拉萨的骚乱与戒严
- ●毛阿敏走穴、逃税反响强烈
- ●1989年风波
- ●中国因台湾问题与三国断交
- ●中苏关系正常化
- ●全国大"扫黄"
- ●反腐败运动
- ●邓小平退休

拉萨的骚乱与戒严

背景介绍

1988年拉萨曾发生过一系列骚乱，到1989年发展到了非戒严不可的程度。由于西藏问题的敏感性，戒严又引起了一系列外交上的纠葛。

材料：

- 拉萨发生严重骚乱事件
- 国务院关于在拉萨市戒严的命令
-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决议发表声明
-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材料一　拉萨发生严重骚乱事件

3月5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蓄意制造了一起严重骚乱事件。他们对一些机关单位和商店进行了打、砸、抢、烧，并公然向公安武警开枪射击。

5日中午12时，13名喇嘛、尼姑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帜，沿八廓街游行。行至第二圈时，游行及尾随者增至数百人。他们边走边呼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向八廓街派出所公安人员砸石头。

下午3时左右，骚乱分子更加猖狂。600多人在北京东路继续游行，并沿途进行打、砸、抢、烧，打坏了沿途一些机关单位的门窗玻璃，并抢、砸了20多家商店、饭馆和旅店，放火烧了一些商品和用具。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纠集了数百人，4次冲、砸城关区委和区政府机关，摘下了城关区机关的牌子砸毁，并砸毁了交通警岗和指示灯，还砸坏了公安、武警、消防20多辆车子。

医务人员赶往现场抢救伤员，一些骚乱分子竟然砸碎救护车的玻璃，打伤了司机。吉日小学的门窗也遭到破坏。

2月13日以来，分裂主义分子曾在拉萨制造了4次游行，有关方面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进行劝阻和教育，维护了社会治安，避免了正面冲突。3月5日，在骚乱分子一意孤行、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公安干警被迫开枪，并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骚乱中，一名武警战士牺牲，40多名公安武警受伤，其中，11名重伤住院。在混乱中，60多个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受伤，10人死亡。

材料二　国务院关于在拉萨市戒严的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

鉴于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制造骚乱，严重危害社会安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根据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　鹏

1989年3月7日

材料三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决议发表声明

1989年3月1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3月19日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一、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一决议歪曲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历史和现实，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镇压"和侵犯

人权，公然支持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暴行，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和国际组织插手西藏事务。对美国国会参议院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的抗议。

二、最近在拉萨发生的事件，既不是民族、宗教问题，更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预谋和蓄意制造的分裂祖国的暴力活动。这些人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帜，到处打、砸、抢、烧，甚至向执勤的公安武警开枪射击，破坏了拉萨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宗教活动，造成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而对于这种分裂主义的暴力行为，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为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安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中国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是完全正当的主权行为。拉萨实行戒严后，那里的局势很快平静下来，恢复正常，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事实证明，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暴力行为是不得人心的。

三、必须指出，少数人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制造分裂活动，企图得到外国的同情和支持，其目的是要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农奴制下的西藏人民，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哪里有什么“人权”可言。正是实行民主改革、摆脱了农奴制之后，西藏人民才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广泛民主和自由。在民族大家庭中，西藏人民的正当权益和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宪法的保障。三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对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制造骚乱表示同情和支持，不能不使人认为实际要支持他们在西藏恢复黑暗的农奴制度。

四、众所周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议会或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任何分裂中国、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活动，无论来自何处，都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我们愿意并准备同达赖喇嘛举行谈判，但要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进行，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美国参议院的决议竟然要求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插手中国西藏事务，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五、中美建交十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进一步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98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希望美国国会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材料四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外交部发言人10月7日在北京说，中国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他说：“西藏是中国领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干涉。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这是对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活动的活动的公然支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发言人说，还必须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这一错误决定也是直接背离了该委员会关于为“民族间的和睦亲善”作出努力和贡献的颁奖宗旨的。发言人是在回答记者问及中国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喇嘛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一事有何评论时说这番话的。

毛阿敏走穴、逃税反响强烈

背景介绍

歌星走穴、逃税现象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但自从毛阿敏被曝光后，社会各界开始对此注意起来，并从税务制度、文化活动管理、社会分配等角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材料：

- 歌女何以疯狂——毛阿敏逃税纠葛透视角报告

材料一　歌女何以疯狂——毛阿敏逃税纠葛透视角报告

“时下人们常常把文化与娱乐混为一谈，这种倒错，在观众认识观念上尚属次要，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市场的作用，产生极不正常的收益倒挂，毛阿敏的新闻产生很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即源于此，不管她的付税实情如何，收益倒挂，分配不公，是为千夫所指。”

这段值得社会深思的警世之言是我国著名剧评家郑拾风先生在七届政协二次会议闭幕前郑重提出的。

由“走穴”演员撑台的组台演出成了近年文艺表演的一种时髦的形式。数不尽的组台营业演出管理混乱，演出

水平低劣，相当一部分演员索要高额报酬而不依法纳税，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引起了群众强烈的愤慨。

人们难以想象出，八年前上海的一位普通女工，竟一跃而成为海内外瞩目的歌星、影星。

一曲《思念》牵系多少离愁别绪。

一首《绿叶对根的情意》轰动了他乡异国。

解放军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毛阿敏在哈尔滨"走穴"5天挣了6万元人民币，并逃税3.6万元的消息在全国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们拭目以待，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毛阿敏是怎样"走穴"的呢？

扑朔迷离的备忘录

毛阿敏走穴哈尔滨市的消息曝光之后，4月14日愁眉苦脸的毛阿敏在北京向新闻界披露所谓"真相"，矢口否认她哈尔滨之行曾获利6万元，并正式委托北京经济律师事务所徐京生律师，对这种"诽谤"行为提出诉讼。

毛阿敏谈到，临近春节，哈尔滨黑天鹅大酒家一负责人李杰打来长途电话，词恳意切请她去演出，并负责代扣应交纳的税款，出场劳务费每场4000元也是对方拟定的。正月初五，即演出第五天，她与"未婚夫兼代理人"张勇向主办单位提出付部分劳务费，当时对方以正值春节放假，银行提不出款为由表示凑钱困难。这时李杰说他开有装修室内的店铺可以将店铺内价值6万元的物品充作劳务费给她。但至目前她并未见到任何东西，言下之意，她分文未取。

毛阿敏的谈话立即引起黑天鹅大酒家的强烈反应。负责人李杰断然驳斥毛阿敏的这种说法，认为毛阿敏拿了钱想赖帐是不行的，他断然准备到法院起诉毛阿敏。

李杰向新闻界披露了事情的真相。

春节前，我们打电话给毛阿敏，她表示可来哈尔滨演出，但条件是让我带35000元来北京面谈。当时正值元旦与春节之间，银行提不出钱，于是我就动员本店职工，向他们借了26500元，自己拿出8500元，总算凑齐35000元。

1月26日，我与哈尔滨市话剧院演员朱力威，哈尔滨电缆厂田刚携35000元巨款来到北京毛阿敏家，当时毛阿敏的夫婚夫张勇也在场。说完演出的事后，就把用无线话筒箱子装的35000元现金交给了张勇，张勇从房间组合柜里，拿出蓝色大兜子，有意将门插上，然后把钱一捆一捆放进去，后又放到组合柜附近的吉它后面。我们当时请毛阿敏打个收条，以便下帐，她坚决不肯，并说可以写个表示信："哈尔滨的观众朋友，新年好，上次因病没能来哈演出，深表遗憾！这次应黑天鹅大酒家的邀请，在春节之际来哈演出，我将用我最大的热情为各界朋友演唱，从而也为'黑天鹅'的繁荣尽我一点力量，谢谢！"张勇在身边可谓字字推敲的。（后来刊登在哈尔滨报纸的演出广告上）。就这样，35000元换来一张"安民告示"。

同李杰一同去北京送款的话剧演员朱力威讲了一个插曲。

1月29日，我与同伴到北京给毛阿敏和张勇送机票。一进屋，张勇就说："我很生气，你们送的35000元少了壹仟元钱。我昨天到银行存款时，银行查出了，弄得我下不了台。如果你们不补上这1000元，就把34000元拿走，哈尔滨我们也不去了！告诉你们，毛阿敏演出，我是不收这些零票子的。"

当时我就被弄糊涂了，明明是毛阿敏、张勇、李杰和我在场时交换点清的35000元现金，当时毛、张没有提出任何疑义，怎么会少1000元呢？我们3.5万元都送来了，还差这1000元吗？当时我唯恐影响演出，没法跟观众交待，便从兜里将仅剩下的1100元中忍痛拿出1000元"补交"给张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切准备就绪，《天鹅展翅》音乐会的广告于2月1日在《哈尔滨日报》正式刊出，主唱：毛阿敏。

2月5日，毛阿敏、张勇乘飞机抵哈。

李杰经理万没想到，戏没开场，张勇又提出了条件："你们走后，北京有很多人请毛阿敏，我觉得你们挺实在的，才来了哈尔滨。不过，还要再给2.5万元。少于每场4000元，我们把这3.5万元给你，马上就走。"

李杰匆匆赶到毛阿敏住处问个究竟，毛阿敏淡淡一句话："他（指张勇）代表我，他说了都算。"

广告已登，票已卖出，晚会"泡汤"怎么向观众交待？李杰无奈，只好答应再给2.5万元人民币。

几经周折后，《天鹅展翅》音乐会于2月6日拉开了序幕，毛阿敏自然成了"压轴"演员。这一天，一切还算顺利。

7日，就是毛阿敏演唱的第二天，她提出太累了，不想唱了，要放录音带。李杰没有接受。

这样，演出到10日，已演完了13场。按签约规定，还有11日的两场，整个晚会可以结束了。就在李杰交给张勇的2.5万元的同时，李杰提出要交税。10日，李杰又向他们说："税务部门要来收税。"没想到，毛阿敏、张勇闻此，决定匆匆离哈。

2月10日，黑天鹅大酒店为毛阿敏、张勇买好了去大连的火车票。当日晚，一位40余岁的中年男人把他们接走了。黑天鹅大酒店的工作人员苦笑地拉出了这样一份清单：

从北京来哈尔滨飞机票2张×204＝408元

住宿费75元×5天＝375元

从哈尔滨至大连的卧铺票2张×63元＝126元

餐费每天标准25元×6天×2人＝300元

演出劳务费：6万元（第一次付3.5万元，第二次付

2.5万元)

后来称3.5万元少1000元,又索要1000元。

最后,李杰怀着义愤的心情说道:在北京时,他就跟毛阿敏提出交税问题,但毛说:你们就说没给我钱,说我们是好朋友,送了我一条地毯,到哈尔滨后我把买地毯的收据给你,这样就可不交税了。

此伏此起,扑朔迷离。不过毛阿敏走红后,重钱而不重名声的举动,社会早在公论。人们常常把毛阿敏现象同张明敏的爱国热情进行类比,也就是所谓来自社会的:"二敏"反差。

张明敏在全国20多个城市义演10多个月,为亚运会捐款60余万元。同是炎黄子孙。一个是来自充满金钱效应的香港歌星张明敏,一个是从小沐浴党的阳光成长的大陆歌星毛阿敏;一个热爱中华慷慨捐献,一个极端自私搂钱逃税,二敏反差,发人深思!

1989年4月29日,中新社、《中国日报》等报刊发了消息,流行歌手毛阿敏同意缴纳6万元收入所应交的税款,而早在几天前她曾矢口否认为哈尔滨黑天鹅酒家演出所得的这笔收入。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自相矛盾。国家税务总局一位人士说:"毛阿敏还表示申报1987年以来她在南京以外地区各类演出中收入并交纳相应税收。据透露毛阿敏至少已拖欠税款15余万元人民币。

1989年风波

背景介绍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广大学生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和反腐败的愿望,挑起了一起反革命暴乱。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这一风波。

材料:

- 《人民日报》4·27社论(节录)
- 1989年5月风云录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
- 国务院戒严令
- 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进驻天安门广场
- 侯德健谈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经过
- 平暴后的北京
-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对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
-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
- 美国之音的辩解是徒劳的

材料一 《人民日报》4·27社论(节录)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持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

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材料二　1989 年 5 月风云录

2 日,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 12 条要求和 4 点声明。3 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北京部分大学生递交"请愿书"一事答中外记者问,指出政府与学生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4 日,赵紫阳会见出席亚行年会的客人时分析当前国内形势,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同日,首都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并宣布 5 月 5 日起,北京市所有学校全部罢课。津沪等城市部分学生也举行了纪念五四游行活动。5 日,李鹏在会见亚行会议的客人时说,中国的政局稳定,政府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认真消除腐败现象。7 日,农业部、机电部负责人同北京农大和北京农工大 20 余名学生,就农业生产、农业教育和农民利益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8 日,中共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答复 4 名递交关于对话的"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将同各界对话。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负责人作出了同样表示。9 日,首都千余名新闻工作者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一份请求对话的联名信件。1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共同维护稳定的大局》评论员文章。11 至 13 日,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王忍之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同编辑、记者和领导干部座谈对话。13 日,赵紫阳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时说,党和政府正抓紧研究解决学生、工人等提出的合理要求,希望有爱国心的公民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情。同日,李鹏同首钢工人就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和当前形势等问题座谈对话。同日下午,首都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并递交"绝食宣言",说,绝食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冷淡态度和拖延与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当晚,阎明复邀请部分学生,教师座谈。14 日凌晨,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回校。下午,李铁映、阎明复等与首都 30 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出的对话代表对话。当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有十余人晕倒,北京市政府立即安排医护人员救护。15 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表广播讲话,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同日,李铁映、阎明复同首都部分学生对话。阎明复再次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一些学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正确评价这次学潮。16 日,数十万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下午,阎明复来到广场,诚恳劝说绝食学生返校。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已有 600 余人被送至急救中心和协和、同仁等 19 家医院抢救。17 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肯定了广大学生爱国热情,表示绝不"秋后算帐",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当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及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城市高校师生举行集会游行,表示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学生。民盟、民进、民建和九三学社负责人致函赵紫阳,要求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希望绝食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晚上,李铁映到协和、北医、同仁等医院看望绝食病倒的学生。18 日,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医院看望绝食病倒的学生。上午,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建议尽快把绝食的同学安全送到各个医院去。当日,各界百余万人继续上街游行,朱学范和 12 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全国工商联、农工民主党、致公党、台盟、团中央等也接连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央主要领导速与学生对话,恳请学生停止绝食。19 日里,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晚上九点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七天的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宣布停止绝食。同日晚,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乔石主持大会。李鹏、杨尚昆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材料三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 5 月 19 日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坚持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

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全国政协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讲话。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杨尚昆也讲了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学潮的发生和发展的情况，说明了已经出现的动乱对北京市各方面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李鹏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作出贡献。

杨尚昆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完全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讲话。最近，北京的正常工作秩序，生产、生活秩序，都发生了混乱，实质上在许多方面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材料四　国务院戒严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89 条第 16 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　鹏

1989 年 5 月 20 日

材料五　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进驻天安门广场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称：从 6 月 3 日开始，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近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已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采取坚决措施平息这场暴乱。4 日晨五时左右，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同时撤走。

3 日凌晨，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入城进驻一些重点保卫目标。在极少数人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各处设置路障，使一部分入城部队暂时受阻。暴徒们公然袭击、殴打、绑架解放军指战员。在六部口，一伙暴徒拦截了一辆解放军运送武器装备的汽车，并企图抢劫武器弹药。为了保护武器弹药不致落入暴徒之手，下午二时，北京市公安干警、武警在部分学生的配合下，驱散了暴徒，夺回了这辆汽车和武器装备。随后暴徒们又纠集了一些人冲击或围堵中南海新华门和西门以及人民大会堂。一些暴徒闯入一处工地，抢走大量钢筋和砖石，准备制造更大的暴乱。入夜，他们四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围堵各路入城的戒严部队。暴徒们用砖头、石块和凶器打伤数百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和维护秩序的群众。在民族文化宫门口的一名战士和建国门桥上一名战士被暴徒们活活打死。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挂在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崇文区的工人和群众纠察队，在营救被打伤的战士时，遭到从前门饭店附近窜出的一群暴徒的袭击。武警 1 支队 1 辆救护车拉了 8 名受伤的战士送往人民医院门口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位战士，暴徒还叫嚷要把其余 7 战士一个个打死。有 4 名受伤的战士在医院急救后，乘救护车在东单被一伙暴徒拦截，其中 2 名战士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在前门一家自行车行门前，有 3 名解放军战士被打伤，暴徒们竟叫嚷："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府右街，暴徒们拦住一辆北京吉普，车上的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们剥光衣服肆意侮辱。在翠微路附近，一辆军车被暴徒们烧毁，十几名战士被烧伤，一辆消防指挥车也被砸毁。还有一伙暴徒哄抢西单的一个商店，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打，前往驱散暴徒的武警战士有几十人被打伤。一群暴徒甚至越过栏杆，冲进广播电影电视部院内，烧毁汽车 1 辆，砸毁汽车 7 辆。据初步统计，暴徒们昨晚共烧毁、砸毁军车 31 辆、警车 23 辆、装甲车 2 辆、公共电汽车 31 辆，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天安门广场上，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向广场上一些人发了菜刀、匕首、铁链等凶器，并通过他们架设的喇叭，公然鼓噪人们"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人继续发表煽动性反动演说。气焰十分嚣张。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伟大祖国首都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保卫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戒严部队奉命连夜从四面八方的郊区入城，采取强制措施平息暴乱。在有些地段发生了冲突。

3 日凌晨一时半，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

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广场上反复播放紧急通告后，大批围观群众迅速离开。但仍有一部分人盘踞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

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国举行政治性集会和迎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新中国的象征。但是，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传播谣言的市场。为了尽快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根据首都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一号令，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

“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

“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告，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

“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

“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约五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到五时半，整个过程结束。

材料六　侯德健谈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经过

反革命暴乱发生后躲进某一个国家驻华机构的作曲家侯德健已于8月16日返回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寓所。他是6月4日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

8月17日下午，侯德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身穿深灰色的T恤衫，戴黑色丝边眼镜。

记者问：“当时一些海外报纸说你被打伤了，是真的吗？”侯德健说：“我很好，没有受伤。”随后，他向记者谈起了他6月4日撤离广场的经过和他看到的情形。

侯德健说，6月3日那天夜里，广场上情况很混乱，学生们对是否撤离广场意见不一。零时以后，学生们聚集到纪念碑周围。侯德健和另外三名参加“72小时”绝食的人也在内。

侯德健说，当时包括他们几个30岁的人在内，很多人都不冷静。这时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他们去和戒严部队交涉。6月4日凌晨三时许，侯德健和另外一名参加绝食的人在两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搭乘一辆救护车去戒严部队。

侯德健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被戒严部队拦住。戒严部队一位政委前来和他们会面，告诉他们广场的东南角留有让学生撤离的通道。

随后，侯德健返回到纪念碑劝说学生撤离，当时学生们正用喊声的大小来决定撤还是不撤。侯德健说，当时他也听不清楚哪种声音更大，但他管不了那么多，见到学生就拉起他们，劝说他们撤离。这时，已有许多学生开始向广场的东南方向撤离了。

他说，当时学生和部队战士的情绪都很紧张，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有些战士平端着枪，但当侯德健打手势要求他们把枪口朝上时，大部分战士这样做了。

侯德健说，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市民或解放军战士被打死，也没有见到坦克或装甲车压向人群。他见到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他说，他在广场上听到了枪声，并且看到在广场西南角施放了催泪弹。但是他说，枪是朝天开的，有的是朝纪念碑上的喇叭放的。

侯德健说，他是躺在担架上和一些人一起最后撤离广场的。他说：“当时我被蒙在大衣里，听到枪声后很害怕，但医生告诉我不要怕，枪是朝天放的。”

当记者问到当时那几个“学生领袖”的情况时，侯德健说，吾尔开希在广播时说他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大约一两点钟他被广场上的医护人员抬到纪念碑座上，当侯德健和部队交涉后回来就不见吾尔开希了。柴玲等人当时也在广场上，但当侯德健去找柴玲要她一起与戒严部队谈判时，柴玲说：“我是广场总指挥，应留在广场。”后来听说，柴玲随第一批撤离广场的人走了。侯德健说，他不认识王丹，只听说王丹6月3日晚上曾来过绝食棚一次，但他没有见到。

侯德健说，他曾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那一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这份材料的原稿现仍留在那家外国驻华机构里，并准备最近在海外发表。同时，他也同意在国内发表。侯德健说：“我的这份材料写出来后，当时很多朋友都很吃惊，说这份材料与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我写的确实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

侯德健于6月4日躲进某一个国家的驻华机构后，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提出交涉，强调指出：外国驻华机构收留中国公民是不合法的，应及早让他出来。

侯德健8月17日对记者说，他在这期间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逐渐了解了外界情况，决定离开这家外国驻华机构。昨天下午他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材料七　平暴后的北京

疯狂的暴行、燃烧的车辆、扭曲的路障、混乱的人群……一切都过去了。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首都又重现了往日的安定与繁华。

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公共电汽车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各条大街又热闹和拥挤起来。身穿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在路口从容地指挥着交通。

前些日子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天安门广场，已恢复了整洁、庄严的容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守卫在广场四周。出于安全考虑从5月20日以来一直关闭着的故宫博物院，6月13日上午开北门接待中外游客，当天就卖出门票近4000张。

街头的反革命暴乱标语、传单、大小字报都被清洗干净。街头公园里又出现了往常的情景：退休工人三五成群地下棋、打扑克；早锻炼的人们在打拳、舞剑、练气功；挂在树枝上的鸟笼，传出了小鸟鸣叫声。

戒严部队6月4日凌晨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之后，在继续打击暴乱分子破坏活动的同时，大力协助北京市政府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

由于暴乱分子设置路障，阻塞交通，烧毁公共电汽车，北京市内交通一度陷于瘫痪：职工无法上班，车辆不能通行，粮、盐和肉、蛋、菜等副食品以及液化气罐运不进城，引起市民的抢购和恐慌。为了迅速恢复交通，大批戒严部队和公安干警走上了街头，与各区政府组织的群众一起清除路障，拖走被烧毁的各种车辆。公共交通部门的职工在大量车辆被烧毁和破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逐步恢复了运营。

6月13日清晨5点，全市170条公共电汽车和地铁的头班车全部按时正点发出，地铁和城区公共电车汽车的末班车收车时间，也延长到晚上11点。除行人外，各种车辆和自行车都可以在天安门前及广场东西侧路自由通过。这标志着首都的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

反革命暴乱刚刚平息之后，一些市民由于存在恐惶心理，纷纷抢购粮食，而加工好的粮食又因交通阻塞压在粮库和面粉厂里，运不出来，造成一些粮店脱销。市政府6月7日组织粮食、运输部门出车，甚至租用近郊农民的马车抢运粮食，戒严部队从6月8日起也派出大量汽车和战士，给粮店送粮，使抢购粮食的现象很快烟消云散。戒严部队还派出车辆、人力帮助运送食盐、蔬菜等，为保证市场供应出力。

到6月9日，全市大部分中小百货店、饮食服务业、银行营业部和储蓄所都相继开门营业。6月10日，为保证安全，关门6天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大厦4家全市最大的百货商场都向顾客敞开了大门。

随着道路的开通，从6月4日起中断4天的垃圾清运工作也开始恢复。各区政府组织环卫职工日夜抢运，戒严部队也出动车辆和人员支援，仅用4天时间，城区积存的垃圾就基本清运完毕。

发生暴乱以后，城区一些中小学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一度中断。6月12日，全市4800多所中小学的140多万名中小学生，全部恢复正常上课。毕业班的中小学生，更是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有关部门已经发出通知，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招生考试，一律按计划进行。全市的影剧院也陆续恢复了演出。

发电厂、焦化厂、自来水厂等企业，在不少工人不能按时到厂接班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下车间顶岗，许多工人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有些职工步行几个小时到厂接班，保证了全市电力、煤气、自来水一直供应正常。

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公司、北京矿务局和北京火柴厂、日化一厂等一批大企业和生产群众日常必需品的工厂，粉碎了少数坏人煽动罢工的阴谋，生产一直没有间断。

在北京发生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期间，中日最大的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直没有停止，38名日本专家始终坚守岗位，中方职工的出勤率保持在90%以上。在中日双方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公司已试生产出彩色显像管，预计正式投入生产的时间，可能比原计划提前2个月。据了解，北京的大多数中外合资企业一直坚持生产或已恢复了生产。

随着公共交通的恢复，工厂的出勤率逐日提高，越来越多的工厂恢复了生产。据6月12日市经委对工业系统534家企业的统计，已有91.2%的工厂基本恢复了正常生产，仍然全部停产的企业只剩下0.8%。已复工的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出勤率达到90%以上。为了把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早日夺回来，雪花电器公司等许多企业的职工准备放弃这个月的公休日，加班生产。

在世界瞩目的亚运会工程和全市大多数建设工程的工地上，一片热气腾腾。伴着指挥吊车的哨子声和搅拌机的轰鸣声，建筑工人们在紧张地施工着。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6月12日致电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宣布中国将如期举办已安排的亚洲比赛和明年的亚运会。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表示，原定在北京举行的各项国际比赛，不仅要按期举办，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办好。

据北京市旅游局宣布，暴乱期间，北京没有一名外国游客发生伤亡。北京市旅游局已发出通告，要求旅游部门做好准备工作，以优质服务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北京观光旅游。

反革命暴乱发生前后，首都与国内外的电信、民航、铁路联系一直畅通。首都机场没有一刻关闭，国内外航班班机正常起落；北京火车站的客车照常进出。6月4日凌晨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北京市各邮局收发的电报成倍增加，大都是各地群众向北京的亲友问平安和北京市民向各地亲友报平安的。邮局职工从6月7日起恢复了对报纸和邮件的投递工作。

随着反革命暴乱真相的被曝光，“美国之音”等国外

宣传机器和国内少数人散布的种种谣言日益失去市场，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认清了暴乱分子的真面目和这次反革命暴乱的实质；戒严部队官兵以他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恢复首都社会秩序中的实际行动，赢行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的理解、爱戴和拥护。打、砸、抢、烧、杀的暴乱分子一个个被揭发、检举并落入法网；在暴乱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保护解放军的好人好事被广泛传扬。包括对戒严部队有过过激言行的大学生在内的各界市民，连日来纷纷慰问戒严部队和武警战士。首都到处都呈现着拥军爱民的动人景象。

目前，首都人民与戒严部队相配合，正一手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一手全面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力争尽快夺回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

材料八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对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

公安部6月12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发出关于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的通知。

通知说，方励之、李淑娴，因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畏罪潜逃，北京市公安局已提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并发出了通缉令。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铁路、民航、交通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缉，严防外逃。一经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告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全文如下：

方励之、李淑娴，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业经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对李淑娴的批准逮捕并已经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许可。

方励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市杭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身高1.72米左右，体态稍胖，留一边倒长发，方圆脸，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挺胸抬头。

李淑娴，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体态稍瘦，留短烫发，长圆脸，有明显雀斑，走路步伐较快。

方、李二犯畏罪潜逃，现予通缉。请各区、县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协助查缉。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1989年6月11日

材料九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6月13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发出关于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的通知。

通知说，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北京市公安局已对其在逃的部分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等21人发出了通缉令。现将该通缉令转发于后，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铁路、民航、交通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缉，严防外逃。对上述通缉的“高自联”人员，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全文如下：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等21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即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王丹，男，24岁，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颏，头发较稀，门齿有洞龋，体态较瘦，戴近视镜，北京口音，嗓音沙哑。

（2）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男，1968年2月17日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身高1.74米，留中分头，头发稍黄，长脸型，大眼睛，厚嘴唇，皮肤较白，说话声音较粗，讲汉话，经常穿绿色军裤。

（3）刘刚，男，28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现无业。身高1.65米左右，方脸，络腮胡，鬓角较长，东北口音。

（4）柴玲，女，1966年4月15日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身高1.56米，圆脸，单眼皮，高颧骨，短发，皮肤较白。

（5）周锋锁，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身高1.76米，方脸型，尖下巴，眉毛较重。

（6）翟伟民（曾用名翟为民），男，21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身高1.68米，体型瘦，长瓜子脸，留寸头，单眼皮，面部皮肤稍黑，河南口音，乡音深重。

（7）梁擎暾（又名梁兆二），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87级学生。身高1.71米，身体较瘦，皮肤较黑，长方脸型，小眼睛，高鼻梁，嘴唇较厚，会讲普通话。

（8）王正云，男，苦聪人，1968年10月生，家住云南

省红河州金平县勐拉区南柯乡联防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身高1.67米，留大分头，瘦长脸，面色黑黄，并有小点疙瘩，云南口音。

(9)郑旭光，男，20岁，河南省密县人，家住西安市环城西路北巷5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身高1.81米，体重63公斤，长圆脸，单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10)马少方，男，1964年11月生，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身高1.67米左右，较瘦，长脸型，尖下巴，肤色较黑，戴近视镜。

(12)王治新，男，1967年11月生，山西省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纺织工业学校。身高1.69米左右，留长发，戴眼镜。

(13)封从德，男，22岁，四川人，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脸色较黑，长偏分头，大鼻孔，背微驼。

(14)王超华，女3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身高1.63米左右，较瘦，脸型较长，脸色黑黄，三角眼，短发。

(15)王有才，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16)张志清，男，1964年6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

(17)张伯笠，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18)李录，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19)张铭，男，1965年4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20)熊炜，男，1966年7月生，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住北京海淀马神庙一号47单元502。

(21)熊焱，男，1964年9月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双峰县杏子测水医院。

材料十　“美国之音”的辩解是徒劳的

继6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通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在72小时内离境之后，7月8日，又有一名“美国之音”记者贺朴勤被北京市公安局限令三天之内离开中国，因为他们违反了戒严令及对我造谣中伤。“美国之音”的台长卡尔森先生竭力为他的下属的可耻行径辩解，否认“美国之音”进行了大量歪曲事实真相、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报道，宣称“美国之音竭尽所能地报道最准确、最公正和最公平的新闻”。“美国之音”则吹嘘它的“新闻一向要经过两个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才能播出”，等等。但是，这些辩白不仅没能洗刷“美国之音”造谣的无耻行径，相反，却印证了中国的一句成语：欲盖弥彰。

正如卡尔森所说，“美国之音”“详细地报道”了中国的学潮、动乱及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经过”，但是他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关于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他们是怎样报道的、报道了些什么？从4月中旬开始的两个多月里，“美国之音”抛弃了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新闻道德，置新闻的真实性于不顾，编造、散布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局势的谣言，向世界(包括中国)提供了捏造的信息，制造了极大的混乱。为了使“美国之音”的先生们不致于轻易地忘却他们在中国的不光彩行径，也为了给“美国之音”的听众留下一点忠告，我们从“美国之音”自6月4日以来制造的谣言中，择其大者，录此存照，同时点出真相，以正视听。

“美国之音”在6月4日中国军队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后制造的第一个、也是影响最为恶劣的谣言，是所谓“中国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从6月5日起，“美国之音”持续一个多月喋喋不休地反复播出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诬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打死了1400至3000人，甚至可能多达好几万人。当这一谣言遭到中国新闻机构揭露批驳后，“美国之音”又故意把事情搅得扑朔迷离、真伪难分，散布什么天安门广场被害者“尸体被当场烧毁”，因此到底死了多少人，“也许永远也搞不清”。但是，“美国之音”在散布这些谣言时，忽略了一些基本常识，人们在仔细品味它们的“新闻”之后难免要问：在一个露天广场上，在缺乏焚尸设备和材料的前提下，如何将几千几万具尸体烧成灰烬、并使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做要耗费多少木柴或者汽油?要花多长时间?又怎么能够防止北京市民在嗅觉器官闻到焚尸时一定要产生的浓烈异味？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该怎样回答呢?!

“美国之音”制造的第二个弥天大谎，是所谓“忠于不同政治领导的部队交火”，并且明确点破是“屠杀”群众的某军与“反对屠杀”的某军，交火地点是首都南苑机场。这一“新闻五要素”具全的消息，产生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中国群众中一度造成了恐慌。但是，人们在焦虑和担忧中度过了几天，并没有发现军队火并和内战接近的任何迹象。富有戏剧性的是，6月16日，被指为“反对屠杀”、但参与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某军政治部主任李子云，当着前去采访的外国记者的面，严正批驳了“美国之音”散布的“军队火并”、“内战迫近”的谣言。他告诉记者们，“第一，我们这两个部队都没有在南苑机场；第二，我们这两个部队是老邻居，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根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完全是造谣”。在事实面前，人们震怒了，他们有权利责问“美国之音”：你们是从哪个

阴暗角落里拾得了这种“新闻”？又是从哪“两个”“消息来源”加以证实的？

类似“军队火并”、“全面内战”这样的谣言，在6月4日以后的“美国之音”新闻节目中还有许多许多。例如：“西安纺织城地区的国棉三、四、五、六厂已全面罢工”（该厂工人已用出勤率始终保持在86%以上的事实予以驳斥），“浙江省政府为北京死难学生下半旗志哀”（纯系不法分子制造的事端及编造的谎言）等等，俯拾即是。仔细琢磨这些谣言，不难发现，它们大都反映出“美国之音”的一种心态，那就是：不甘心反革命暴乱被彻底平息，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此迅速地解决问题、控制局势，不愿意看到中国从此重新走上安宁、稳定的发展道路。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美国之音”编造的第三个大谣言，是所谓“中国军队蓄意制造枪击外交公寓事件”。7月3日，“美国之音”援引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话说，“已经搜集到证据证明中国军队上个月向外国人居住的外交公寓开枪是蓄意的”、“精心策划的”。显然，“美国之音”企图制造中国“蓄意”“反美”、“排外”的形象。而事实真相如何呢？早在6月7日发生枪击事件的当天，新华社就在报道中予以披露，报道是这样写的：“上午10时左右，当我一支戒严部队自东向西开进，经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时，遭到来自建国门外交公寓和路南楼上两个方向的枪击，造成我官兵亡一人伤三人。该支部队被迫回击，并一度包围了外交公寓等建筑物，随即迅速撤离。”请看，戒严部队遭到了“蓄意的”、“精心策划”的枪击，却被反诬为肇事者，“美国之音”颠倒黑白、血口喷人、无耻造谣到了什么程度！无怪乎新华社7月3日要责问“美国之音”：“为什么竟然有人从外交公寓里向执行戒严任务的中国军队射击？不难判断，这种人要么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人，要么是被窝藏在外交公寓里的歹徒。明明是他们开枪打死打伤了解放军战士，‘美国之音’却避而不谈，而且特别讳言外交公寓里有人向中国军队开枪的事实，这不是正好说明它的心虚吗？”

本文开头说过，这里记录的只是“美国之音”制造的几个比较大的谣言，其他各种等级的谣言均未一一罗列。不过，从这几个谣言中，人们已经不难看出“美国之音”这家官办造谣公司的真实面目。值得一提的是，自6月4日中国军队一举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美国之音”完全撕下了它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真实”的面具，赤膊上阵，公然造谣、传谣，攻击中国党和政府，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这说明，它输得太惨了，不得不“图穷而匕首见”了。不过，我们应当警惕，“美国之音”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相反，它们宣称对于中国人民的批评（应当读作攻击）“决不会被迫妥协”。事实上，目前，“美国之音”在造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美国之音”很快把谣言造到我们党新产生的中央领导核心头上，凭空捏造、拼凑出一些天方夜谭式的、不攻自破的“内幕新闻”。我们要注意“美国之音”的这一新动向，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及时地予以揭露和批驳。

中国因台湾问题与三国断交

背景介绍

由于台湾实行“弹性外交”、“银弹外交”的政策，格林纳达、利比里亚、伯利兹三个小国先后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策坚决反驳“双重承认”的做法，果断与三国断交以维护尊严。

材料：

- 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我国中止同格林纳达外交关系
- 外交部负责人就中止外交关系召见利比里亚大使
-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止与伯利兹外交关系
- 评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

材料一　外交部表声明宣布我国中止同格林纳达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8月7日发表声明，中国中止同格林纳达的外交关系。

声明全文如下：

1989年7月19日，格林纳达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中国兼驻格林纳达大使奉命一再向格林纳达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但是格林纳达政府仍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坚持其错误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格林纳达政府的错误决定，违背了1985年中格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和格林纳达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宣布：中国政府中止中国同格林纳达的外交关系，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格林纳达政府承担。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得到了世界上所有同我建交的国家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我们坚决反对与我建交国家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具有官方性质的往来，对它们同台湾之间完全属于民间性质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则不持异议。台湾当局推行所谓“弹性外交”，搞“双重承认”，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人民终究要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中国人民珍视同格林纳达人民的友谊。希望格林纳达政府从中格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纠正其错误决定，重新回到中格建交公报的原则立场上来，使两国关系得以恢复正常，两国友好合作得以继续发展。

材料二　外交部负责人就中止外交关系召见利比里亚大使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负责人10月10日上午就中国中止与利比里亚外交关系召见利比里亚驻华大使约翰·克利斯托弗·里克斯。

这位负责人郑重指出，利比里亚政府与台湾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违背了1977年2月17日中利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利比里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诺。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自即日起中止同利比里亚的外交关系。

材料三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止与伯利兹外交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10月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989年10月11日，伯利兹政府同台湾当局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伯利兹政府这一错误决定，违背了1987年中伯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和伯利兹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中止同伯利兹的外交关系。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当局不顾民族大义，以重金收买的手段，引诱个别国家同其"建交"或"复交"，企图搞"双重承认"，制造"两个中国"，这是违背台湾当局关于"中国只有一个"的主张的，也是不能得逞的。中国人民终将要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我们希望伯利兹政府能从中伯两国的长远利益考虑，迷途知返，回到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立场上来，使中伯关系重新得到正常的发展。

材料四　评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

最近，台湾当局先后与格林纳达、利比里亚和伯利兹"建交"或"复交"，台湾最高当政者对这张"外交成绩单"自诩"相当满意与高兴"，还虚张声势地说什么"还有很多国家"预期同台"建交"。一些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渲染"外交出击"的"成果"；一些"官员"得意忘形地频频发表讲话，炫耀台湾的"外交本钱"。

然而，台湾岛内的有识之士和海外公正舆论对台湾当局吹嘘的这张"成绩单"并不以为然，指出它虚有其表，甚至表示厌恶。他们尤其对台湾当局充当"散财童子"，以重金收买"邦交"之举深表不满。

据台湾报纸报道，此种"银弹外交"已在岛内"引发了争议"。一些"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提出，"台湾人民这么多年赚的钱不容易，政府(指台湾当局)不宜为了外交就当'散财童子'。"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反对这种作法的人认为，收买一、二个友邦，"实为毫无意义的浪费，这些国家在国际间发言既无份量，与台又素无交往，除了'邦交'国家数目多上几个，没有什么其他收获，这种'冤大头'值不值得做？"

但是，台湾当局漠视民众和舆论的批评，对"银弹外交"、"金钱外交"讳莫如深，竟称"绝非是以经济强势作为交换"。

事实胜于雄辩。台湾《联合报》在一篇报道中透露："事实上，十多年来，国内多家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银行，一直从事'金融外交'的秘密任务，政策性的提供友邦国家。其中，中国输出入银行担任最吃重的角色。"

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双重承认"，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今年以来，台湾当局的一些政要用"走旁门"、"走后门"的手法，"出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或友好的国家。"外交部长"以"旅游者"、"私人"的身份，到欧洲一些国家活动；在欧洲某国，甚至由人"捎带"着去见该国领导人，事先也未敢向该国说明其身份。台湾当局一些"官方人士"在与一些国家接触时，还采取了所谓"鸭子划水"方式——其实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诱骗拉拢。

台湾当局声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实则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连台湾的报纸也指出其谬、其险。台湾《工商时报》最近发表《中国只有一个》的社论说，台湾的所谓"弹性外交"、"务实外交"终将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局面。

不少海外舆论对台湾当局大肆吹嘘"弹性外交"、"银弹外交"也嗤之以鼻。菲律宾《世界日报》指出，最近伯利兹外长宣布该国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台湾当局对此却欣然接受，不以为耻，却以为荣。《澳门日报》在一篇题为《台湾肮脏的"弹性外交"》的评论中说，现在台湾运用金钱的力量，到处收买"建交"，以满足它的"虚荣"心理。人们看到的是"不计名份"的肮脏政策。文章说，台湾的真正出路在于祖国的统一，搞"两个中国"，罪责难逃。

台湾当局声称，"外交舞台上要演出的戏码仍多，外交前线上的挑战与应战仍将继续"，"大有可为"。此种"弹性外交"、"银弹外交"的前景究竟如何呢？泰国《中华日报》在题为《从"弹性外交"到"金钱外交"》的社论中说，"金钱外交"看来绝对不是可以无往而不利。"双重承认"、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是海外中国人都不愿见的。《香港虎报》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台北要重新得到一部分国家的承认是极不可能的。就世界战略和国际政治斗争而论,大陆中国远比台湾重要。因为大陆中国仍在发展之中,所以拥有11亿人口的这个潜在市场更具有吸引力。

凡此种种表明,台湾当局夸口的这张"外交成绩单",是一份以"重金"贿买"邦交"的不光彩交易,也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制造"两个中国"的不光彩的纪录。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已经并将继续激起海内外一切赞成和平统一祖国的中国人民的反动,是没有前途的。台湾当局还是多做些有利于国家和平统一的实事为宜。

中苏关系正常化

背景介绍

1989年5月,中苏高级会晤举行,中苏两国、中 共与苏共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党、两国曾有过亲密的友好合作关系。从50年代末开始,中共与苏共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从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逐步恶化。1966年3月,两党关系中断。此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部署重兵,进而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79年4月,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中国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后不予延长,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同年9月12日,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顺应这一世界历史潮流,中苏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2年10月,两国副外长级特使在北京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第一轮磋商。1984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应邀访问中国,同中国副总理会谈,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关于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学联合委员会的协定。1985年3月,两国议会恢复往来。同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两国签订了关于1986年至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合作协定。1986年7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的讲话中,对改善中苏关系讲了一些促进的话。同年9月,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清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阿富汗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987年初,两国恢复了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同年,邓小平又托罗马尼亚领导人带信给戈尔巴乔夫,希望他消除中苏关系上的障碍,早日实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面和对话。1988年,苏联政府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同年12月,中国外长正式访问苏联。1989年2月,苏联外长正式访问中国。两国外长的互访,增加了共同点,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中苏高级会晤奠定了基础。1989年5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晤,杨尚昆、赵紫阳、李鹏分别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见和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当前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18日,中苏两国在北京发表《中苏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宣告:中苏两国、中共与苏共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材料:

- 中苏联合公报

材料　中苏联合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邓小平主席与戈尔巴乔夫主席于5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会晤。两位领导人就中苏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杨尚昆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同戈尔巴乔夫主席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二、中苏两国领导人认为就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

三、双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四、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苏两国认为,严格做到上述各点,有助于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五、中苏两国领导人确认了1989年2月6日两国外长关于谏埔寨问题的声明,并考虑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就解决柬埔寨问题全面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注意到越南军队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于1989年9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博寨撤出的决定。

中苏双方关心并认为必要的是，在越南全部撤军后在柬埔寨不发生内战，并认为未来的柬埔寨应成为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国家。为此，双方支持实行柬埔寨四方参加的民族和解。中方主张在越南全部撤军后至大选结束前的过渡时期在柬埔寨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苏方主张柬埔寨内部问题，包括在国际监督下筹组大选，应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苏方欢迎加紧高棉之间的对话，愿意支持柬埔寨各派就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各个方面所达成的任何协议。

双方将尊重柬埔寨人民的　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大选的结果。

双方认为，随着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出，有关各国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事援助都应逐步减少，直至完全停止。双方主张尽快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中苏双方重申将继续努力，促进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同意就解决柬埔寨问题，包括双方仍存在分岐的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六、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

中国方面对苏方宣布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出75%的苏联驻军表示欢迎，并希望其余的苏联军队在一个较短的期限内全部从蒙古撤走。

七、双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

根据上述原则，中苏两国领导人商定加紧讨论尚未协商一致的中苏边界地段，以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同时解决东西两段边界问题的办法。他们委托两国外长在必要时专门讨论边界问题。

八、中苏两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积极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往来。

九、双方认为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方面交流情况与经验，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岐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

十、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

十一、中国方面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方面坚决反对旨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任何企图。

苏联方面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十二、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原则立场。

苏联方面声明，苏联外交政策以和平是最高价值观念为出发点，始终不渝地力求实现包括核裁军在内的实际裁军；认为各国的安全不能靠损害别国来保障。主张优先考虑全人类的价值以及不同社会经济体系在自由选择和利益均衡条件下进行和平竞争。

十三、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中苏两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

十四、双方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两个最重大的问题，双方对长期紧张的国际形势出现缓和表示欢迎，并积极评价世界各国为裁减军略和缓和军事对抗作出的努力以及在解决各个地区冲突方面取得的进展，双方表示愿意在这些方面各自继续作出努力。

中苏双方主张提高联合国的威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裁军、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及地区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生活。

十五、双方对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南北差距拉大、债务问题愈益严重表示关切。双方认为迫切的是，在考虑各国人民利益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十六、双方认为，解决全球性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等问题对维护和发展世界文明、对全人类生活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声明，有必要提高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力，并寻找相互协调的办法来缓和和解决这些问题。

十七、中苏两国认为有必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为此，中方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苏方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确立政治新思维。每方对目前国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上述各自的主张和构想中。

十八、双方认为，两国领导人民之间的接触和对话是重要的，并打算今后继续下去。戈尔巴乔夫主席以苏联领导的名义邀请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李鹏同志正式访问苏联。中国方面对邀请表示感谢。

1989年5月18日　北京

全国大"扫黄"

背景介绍

"扫黄"在中国至今已搞了多次，但却屡禁不绝。1989年风波之后，全国重又掀起了扫黄的高潮。这一次，人们是从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看待它，他们渴望着黄祸能得到真正的根治。

材料：

·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国布置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

· 中国沿海在扫黄

· 全国"扫黄"评析

材料一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国布置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8月24日召开的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领导，严格执行政策，精心组织，集中力量在国庆节前对书报刊和音像市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清理，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文艺，以文化市场健康、繁荣的崭新面貌，迎接国庆40周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主持了会议。

会议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地认真开展了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工作，"扫黄"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了及时交流情况，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政策，把"扫黄"工作引向健康、深入的开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这次电话会议。

李铁映在会上就充分认识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的必要性，整顿清理的重点和工作部署，以及加强组织领导、各方协商配合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强调指出，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市场，关系到社会安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把这项工作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他说，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清除各种"精神毒品"和"文化垃圾"，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促进文化艺术的进一步繁荣。

他指出，查禁"精神毒品"，扫除"文化垃圾"，依法管理好书报刊及音像市场，是一项长期的文化建设任务。这次清理的重点，是取缔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的出版物，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扫黄"。按规定应当取缔的出版物，各地要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封存，以净化市场。同时按照规定的权限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部门尽快确认定性，通报全国查处，化浆销毁，并报中央有关部门备案。

对市场上查出的问题，要顺藤摸瓜进一步追查有关的出版、印制单位及其领导者的责任，要区别情况，分别予以批评教育和经济的、行政的处罚，触犯法律的必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是党员的必须依照党规党纪处理。在整顿、清理的同时，对现有报刊和出版社要整顿，解决过多过滥的问题，着重提高质量，力求布局合理。对销售书报刊的集体、个体单位要进行全面清理。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必须严格掌握政策，依法办事。

李瑞环就如何加强领导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扫黄"是广大群众普遍关心、坚决要求办好的一件大事。这次整顿清理书刊和音像市场，必须查禁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对政治书籍，但目前的重点是"扫黄"，即清查和取缔各种宣传淫秽、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的泛滥，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扫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务必体察民意，顺乎民心，充分认识黄色书刊、音像制品的危害性和"扫黄"的必要性，态度坚决、毫不手软地把这件事情抓好。

李瑞环指出，要认真掌握政策界限。"扫黄"这件事，能不能搞好，达到预期目的，取决于搞准，即明确是非界限，严格执行政策。当前，要注意两个方面：还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领导务必深入动员，克服各种阻力，力图尽快形成"扫黄"局面；已经发动起来的地方，要认真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和避免乱扫一气。凡是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该禁止的要禁止，该封存的要封存，该收缴的要收缴，该销毁的要销毁；大批制造、复制和有组织地传播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靠罚款来解决，必须绳之以法；对造成严重恶果的生产者和出售者，要依法从严处理；对一时还看不太准的书刊和音像制品，要组织力量抓紧审查。所以，要特别强调把问题搞准。搞过了不好，当然不及也不好，二者相权，宁可一时不及也不要过，因为我们有不少因过反而不及的教训。一时"不及"，我们还有时间继续往前搞下去；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气，把不属于反动的东西当作反动的去取缔，把不属于淫秽的东西当作淫秽的去清除，甚至不适当地

干预个人正当的生活爱好和文化兴趣，那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社会的非议，那就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不能巩固已有的整顿成果。因此，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既要态度坚决，又要从一开始就注意政策，做到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取得"扫黄"工作的胜利。

材料二　中国沿海在"扫黄"

1989年9月13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条电讯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广东省主持召开了南方沿海四省"扫黄"座谈会，并强调"扫黄"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要乘势而上，加强领导，解决"黄源"问题。目前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四省"扫黄"工作进展的态势如何？记者采访了四省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

（一）

南方四省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随着国门、省门的打开，进出境的人员越来越多，仅广东省在长达4000公里的海岸线，就有对外开放口岸41个，货运码头100多个，每天过境车辆13000多辆次，停靠船舶4700多艘次，着陆国际航班12架次，流动渔船5万多艘，每年出入境人数6300多万人次。

随着交往的频繁，一些来自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出品的淫秽物品也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运入境内。

淫秽物品大体有三大类：一类是书刊、画册、照片、扑克和挂历等；一类是淫秽录像带；还有一类是印有淫秽图像的各种日用品。这些淫秽物品走私进来大致通过以下渠道：①出入境人员夹带。②进口原料和零件时夹带。③国际海员和航行港澳小型船舶船员藏匿偷运。④沿海渔民和过境耕作农民向境外渔民索要或替走私分子偷运。⑤邮递走私。

这类黄色书刊和淫秽音像制品一进入国境，经过地下市场直接贩卖、传播，很快就在沿海一些市场上出现。

福建省的石狮镇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前几年，这里以加工、生产、销售款式新潮、价格低廉的服装等小商品而闻名全国，成为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小商品集散地，每天有数万南北客商云集此地，采购商品。近一、二年，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不惜牺牲石狮镇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远播海内外的好名声，靠复制、贩卖、运输淫秽录像带发了大财，使石狮成了全国淫秽录像主要复制地和福建省淫秽物品的集散地。据上海市政法部门提供的情况，上海市近两年查获的淫秽物品就大量来自石狮。

温州市的金乡镇，昔日靠邮订邮销的方式制作各类标牌、证徽而起家，成为"温州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典型，金乡人那种独特的致富之路，给省内外许多人以莫大的启发。如今，还是这个金乡镇，还是通过邮订邮销的方式，但已不是标牌、证徽等塑料小商品，而邮订邮销一些淫秽色情带。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今年3月到7月，金乡镇共有77家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采用回扣、奉送色情带等吸引买方，先后发行录像带征订通函达100万封，波及29个省、市、自治区，收款总金额达72万元。

（二）

从沿海四省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看，走私淫秽出版物和传播、复制、销售淫秽出版物的人，几乎都以获暴利为目的，视制黄、贩黄为生财之道。县、乡少数干部见利忘义，包庇纵容"黄"贩子，有一些基层组织也内外勾结，直接参与贩黄、制黄活动。

淫秽物品的扩散与泛滥，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在广州市召开的"扫黄"工作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指出，这次"扫黄"，中央下了决心，政治局常委一致认为必须下决心搞下去，这决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当前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一项重要工作。"扫黄"也是改革和对外开放健康发展的一个保证，对外开放，必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打"蚊子"、"苍蝇"不等于就是不开放，也不能因为有"蚊子"、"苍蝇"飞进来就不开门。相反，把黄色的东西打掉了，把"蚊子"、"苍蝇"扫除干净，会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可以把对外开放工作搞得更好。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沿海四省都由党政负责人挂帅，建立了层层有领导负责的专门班子。一些动作较快的地区，已经收缴和查禁了大批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取缔了一些专门兜售黄色书刊的书摊和音像市场，有的还顺藤摸瓜，查处了一些制黄、贩黄的地下网络和出版社、印刷厂，已初步形成了"扫黄"气候。

福建省面对台湾，邻近港澳，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福建省委认识到"扫黄"是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的严重斗争。他们从8月下旬开始，集中开展"扫黄"行动，全省共出动了执法人员7024人次，检查书店（摊）1528家，录像发行、播放点744家，查获非法出版物及各种反动、黄色、淫秽的书刊、图画161879本（册），查获各种油印本、小报10238本（张）、图片4593张、裸体扑克1761副，没收查封录像带59579盒、录音带10167盒，查禁取缔各类摊点617家，批捕收审1285人。他们提出"扫黄"工作要与打击走私贩私、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征治腐败结合起来，从走私、印刷、运输和邮寄、贩卖、播放、散发和储存6个环节，打好"扫黄"、净化社会环境的总体战。

广东省积极做好堵源截流工作，各口岸严把进口关，不让各种淫秽物品进关，发现漏网之鱼，也及时查处，不让它扩散。海关、边防、工商、公发缉私部门组成了缉查走私的网络，在各有关地区布下天罗地网。对省内的出版

社、出版物坚持撤销。在文化市场管理中，广东省发动群众举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4月7日全省破获这类案件1334起，抓获人犯3029名。

浙江和海南省在“扫黄”中，重点是捣毁“黑窝”和地下印刷厂（点）以及地下发行点，从而堵住污染源。同时组织力量对车站、码头、港口、邮电、海关等流通渠道重点检查，深入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郊区反复宣传，使广大群众认识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的严重危害，形成拒黄光荣、嗜黄可耻、贩黄有罪的强大社会舆论。

（三）

“扫黄”的气候虽然已在沿海形成，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历史的教训还是不能忘记。一些负责同志指出，“扫黄”在中国至今已搞了多次，为什么屡禁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工作中紧一阵，松一阵。一些黄贩子也摸到了我们的规律，风头一来，他们就转入地下，埋伏起来，等待时机，一等风头过去，他们又变本加厉，更加猖狂。因此，“扫黄”必须防止虎头蛇尾，半途夭折，要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一些在具体部门工作的同志根据这些年的实践提出，要清除不健康、淫秽的东西，不让它流传，除了打击、取缔外，必须用健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来占领群众思想文化阵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生活需要。而现在有益的、受群众喜爱的出版物、音像制品还不多。同时，对群众的文化需求，又缺乏必要的引导，加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作怪，哪种出版物在市场上能赚钱就经营哪一种，致使格调不高甚至黄色的出版物风行一时。在现在开放的条件下，要搞好文化市场，搞好“扫黄”，一要有好的、健康的被群众接受的作品，二要发展文化设施，充分发挥这些阵地的作用，三要积极组织引导群众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四要扶植健康作品的生产经营。

材料三　全国“扫黄”评析

对淫秽色情出版物的“围剿”，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引人瞩目。许多人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次“扫黄”能彻底吗？

此起彼伏的“黄潮”

平心而论，近两年来，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管理部门对查禁淫秽色情出版物不可谓不坚决。1987年，当这些东西还是以非法出版物的面貌出现时，就在全国开展了打击非法出版的活动，重点就是惩治制作、贩卖淫秽色情出版物的不法分子。收缴了一批书，惩办了一些人。只可惜禁而未止，过了一阵子，像割过的韭菜又长出来了。更可叹的是国家正式出版单位也偷偷地吃起了这“禁果”。这个头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因为有了“合法”的外衣，书贩们更是毫无顾忌了。至此，地上的、地下的、公开的、隐蔽的，两股浊流汇合成一股“黄潮”，兴风作浪。

按理说，抓住偷吃“禁果”的，处罚不能说不狠。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玫瑰梦》，就罚款60万元，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见了“血”的，但未能以儆效尤。据全国统计，从查处《玫瑰梦》到1989年3月，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除没收出版这些书的全部非法所得外，还罚款250多万元，有6家出版社进行了停业整顿；查处因刊载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庸俗的期刊130多种，罚款20多万元，有的被吊销刊号，有的进行了停业整顿，有的亮了“黄牌”警告。被查处的期刊统统停售销毁。同时，还查处了一大批淫秽色情的非法出版物。

不能归咎于无法可依。1988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关于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和《关于出版物封面插图和出版物广告管理的暂行规定》。随后又发布了《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1月又制定了《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为了从源头上制止淫秽色情出版物，又制定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任何印刷企业都“禁止承接反动、迷信、淫秽印刷品及其他非法出版物的印刷业务”。此外，还于1988年11月对全国出版社进行了检查工作整顿秩序。

但是，全国城镇沿街书摊面貌依旧，堂而皇之摆在摊上的，还是什么《色欲横流》、《淫窟惊魂》、《肉体交易》、《当代军妓》、《荒淫艳女》、《玩了一百个女人的四大色鬼》、《三个男人迷恋的淫妇》、《少男少女试婚录》等等充满诲淫诲盗的标题，加之渲染女色奸淫的封面插图，有的书贩已从零售发展到非法专营批发淫秽色情书刊，且已形成地下网络。北京市今年3月破获一起非法制作、贩卖淫秽出版物大案。这伙案犯将淫秽出版物交由山东某地一家印刷厂印刷，通过汽车、火车发运，途中竟有警察押运。发运到北京，有车站工作人员接应、保管，而后陆续批发给书贩，气焰嚣张之极。最近，重庆市公安等部门从一书贩家中，一次搜出明令查禁的《夜梦春情》等淫秽书十几种，6200多册。北京市最近一次突击“大扫除”，清查出由正式出版社新出版的宣扬色情淫荡或封建迷信内容的图书30多种，查封了5万多册。

这种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普通忧虑和深思。

广角的社会透视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由，必须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去探寻。

描写“性爱”的书陡然走俏，以至形成了一种“热”，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反映了社会观念形态的某些变化。近

几年，性科学、性医学在中国兴起。但是，也有的人假性教育之名，宣扬性挑逗、性刺激、性暴力。笔者最近看到一份某个体书店1989年6月4日发出的"紧急征订单"，这份征订单上写着："发行界盛传已久的《淫床》(现改名为《欲火焚情》)，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得以××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店独家总发行。译著中大量的性描写，均未作删改，全部以本书的原貌奉献给读者。……是否超过《玫瑰梦》、《情场赌徒》、《暴疟》、《黑奴繁殖场》，不敢断言，请书刊界同仁目睹明鉴。"

金钱的引诱使一些出版发行者利令智昏，这是淫秽色情出版物屡禁不止的一个关键原因。目前我国的文化经济政策还很不健全，很不配套，出版格调低下甚至淫秽色情内容的书反而能赚大钱，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这里成了一个难解的梦。特别是有的编辑人员被书贩子用金钱买通，互相勾结，堕落成唯利是图的投机商，昧良心任凭书贩子增改书搞，兜售"精神鸦片"。过去有种说法，出版社出于经济压力，"逼良为娼"。而实际上，有的出版社虽然经济很困难，但从未没有出过这类书；有的出版社人均年创利2万多元，却一再"犯规"。对这种人，"逼良为娼"只是一种借口。他们为了赚大钱，千方百计钻政策的空子，你规定："夹杂淫秽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不属于淫秽读物"，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给你"打擦边球"，使你抓不住，禁不了。书刊市场上不少这类低级庸俗的东西，就是这样出来的。

淫秽色情出版物泛滥又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同时到来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其政治主张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在文化上，必然是对祖国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建立资产阶级文化。但是，正如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样，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文化，也必然是反映资产阶级没落一面的低级的文化形态，把西方的文化垃圾当"宝贝"引进来。同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几乎被取消了，而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甚嚣尘上，使淫秽色情书刊的传播有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釜底抽薪的办法

注重分析淫秽色情出版物泛滥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正本清源，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丝毫不减轻出版管理部门应负的责任。在当前，要制止"黄潮"泛滥，行政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社会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今天，为行政力量的有效发挥提供了重要条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正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心拿出行政管理职能的权威，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把淫秽色情出版物扫除干净。

据悉，出版主管部门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坚决彻底清查和整顿书刊市场。对书刊市场上的淫秽色情出版物进行一次"大扫荡，像烧鸦片一样统统烧掉。同时取缔非法批发网点，对长期兜售淫秽色情书刊的书摊坚决吊销其营业执照。这项工作已于7月中旬展开，对那些"打擦边球"出版的虽不属淫秽色情出版物，但夹杂淫秽色情内容，低级庸俗，有害青少年的书刊，也统统收缴。

二、在彻底清理、整顿书刊市场的同时，顺藤摸瓜，对全国的报纸、期刊和出版社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和整顿，下决心撤销合并一批报刊和出版社。这项工作正在有组织、有领导地逐步展开。

三、根本的还是要依法管理出版业。通过立法，把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违法者依法惩处。目前，《出版法》的起草工作仍在抓紧进行。

（石峰）

反腐败运动

背景介绍

反腐败的呼声从1988年起一浪高过一浪，到1989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经历了一场风雨之后，中央终于痛下决心，掀起了一次由点到面的全方位的反腐败运动。

材料：

- 我国民众最关心哪三件事(节选)
- 中央关于廉政肃贪的七项决定
- 国家审计署公布五大公司审计结束
- 新疆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严重违纪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 海南省长梁湘以权谋私被撤职
- 《通告》产生强大感召威慑力，五万余违法犯罪分子坦白自首

材料一　我国民众最关心哪三件事(节选)

在今年热门话题面前，要求回答："您最关心的是哪三件事？"结果，78.15%的人选择了"从严治党，克服腐败现象"；65.49%的人选择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医治通货膨胀；38.90%的人选择了"尽快使社会治安状况好转。"

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群众最关心"从严治党，克服腐败现象"决非偶然。从另外一个答题中可以进一步地看到

党风问题的严重程度。在问及对“各级党政人员克服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改进工作作风”的印象时，65.70%的人回答是“雷声大，雨点小”，20.59%的人甚至认为“问题越来越严重”，只有 12.61%的人说是“有成绩，有希望”。再从另外两个与此虽有区别但又紧密相关的答题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当问到“治理整顿以来，‘官倒’现象如何”时，36.60%的人认为“干的更隐蔽，没法治”，19.36%的人看法是“照样干，没减少”，41.39%的人回答是“有收敛”。当问到“社会上吃喝风怎么样”时，45.30%的人回答是“依然如故”，33.44%的人认为是“有增无减”，只有 19.79%的人看法是“有所减弱”。

（《半月谈》民意调查室）

材料二　中央关于廉政肃贪的七项决定

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重点是砍掉流通领域中过多、过滥的从事商业、外贸、物资供应的公司和金融性公司，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中国农业投资公司。对这几家公司以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的审计情况，将尽快向社会公布。

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这件事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的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限期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其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

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

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一律吃工作餐，工作餐的标准要严格规定并严格执行，不得接受馈赠的土特产品及其他物品。

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格执行关于出国的各项规定。省、部以上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是为执行其主管公务的国事或工作访问，不得接受外商和境外中资企业的邀请出访，不得以考察为名进行非其主管公务所必须的、与其职级身份不相称的出访。

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在规定的期限内坦白自首、积极退赃者，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否则，依法从严惩处。对办案过程中请情袒护、徇私包庇者，要公开揭露，严肃处理。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材料三　国家审计署公布五大公司审计结果

全国人民注目的“五大公司”审计结果 8 月 15 日由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对已查出的违法经营问题，审计署依法决定，对五家公司共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 5133 万元。现已上缴 3000 多万元。

吕培俭说，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审计，是遵照国务院的指示，从 1988 年 10 月下旬开始的。审计是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的。审计的重点是检查经营活动中有无违法违纪问题。国家审计署直接审计了五家总公司和所属的 52 家子公司，授权驻各地派出机构和地方审计机关审计了 22 个子公司，共 79 个单位。这次审计，从检查财务收支入手，审查了大量帐目、报表、凭证及有关文件、资料，并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取得了工商、外汇、物价等部门的协助。现在，审计工作已经结束，并分别下达了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

吕培俭说，审计结果表明，五家公司成立以来，大多业务发展较快，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等方面，程度不同地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反行政法规的问题。

审计署对“五大公司”的审计结果是：

一、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于 1987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1987 年 12 月注册登记，它的业务范围主要有实业投资、国内贸易、新技术开发、出口业务等。这家公司成立后，子公司发展失控，到 1988 年 9 月，有二级公司 58 个、三级公司 113 个。这些子公司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这次审计了康华总公司及所属在京的 29 个二级公司。总公司属于管理机构，查出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子公司，共四个方面的问题。

1. 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私自买卖外汇和逃汇套汇，共 550 万美元。

2. 违反国务院 1985 年《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获取非法收入 331 万元。

3. 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超越经营范围。

4. 漏交税款。

对以上问题，共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923万元。连同康华在外地子公司经当地审计机关处以罚没的295万元，共计1218万元。

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于1979年10月开业，业务范围主要有国内外投资和新技术开发，国际国内金融、贸易，以及信托、咨询等。这家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在国内和海外拥有23个直属子公司，在200多个企业有投资。这次审计了中信公司和在京的11个子公司，查出该公司的直属单位和子公司的主要问题有：

1.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私自买卖外汇。1988年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私自卖出外汇共1806万美元，买入外汇等300万美元。

2.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超越经营范围，倒卖紧俏物资，获利297万元。

3.违反国家规定，多收贷款利息57万元，漏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56万元。

对以上问题，共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1881万元。

三、光大实业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于1983年成立，主要业务范围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兴办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经营房地产和股票等。公司总部在香港注册，境外有子公司14个，境内有二、三级子公司20个。这次审计了光大公司总部和境内8个子公司，查出的主要问题有：

1.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私自买卖外汇等共4725万美元。

2.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超越经营范围。

3.漏交税款149万元。

对以上问题，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共1917万元。

四、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3月成立，经营范围主要是对外提供咨询服务，对内代理进出口。这家公司下属4家子公司，并与地方8家企业联营。这次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有：

1.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私自调剂和买外汇582万美元。

2.1987年漏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5万多元，1988年漏交税款2万多元。

3.这家公司控股的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擅自提高信托贷款利率，获利11万多元。

对以上问题，共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117万元。

五、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主要业务是信托、投资、贸易等，重点扶持农业商品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的建设，下属两个全资企业和三个控股企业。这次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有：

1.1988年8月，农信公司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签定协议，农信借给一汽1亿元(已付5000万元)，作为“奥迪”小轿车发展资金，年利率百分之七点九二，一汽并应允供应农信2000辆小轿车。这笔资金的使用超出了为农业服务的范围。在审计过程中，这家公司已向一汽提出终止协议，现已收回投入的资金。

2.农信公司银行部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信托机构吸收存款的范围，吸收了机关、部队的存款共6450万元。对此，已责成该公司在8月底前全部清理纠正。

据介绍，审计机关的职责是审计财政、财务收支及有关的经营活动，对查出的违法违纪问题，可以没收非法所得、给予罚款等经济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这次审计查出五大公司违法违纪的责任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将移送监察部门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吕培俭说，今后审计署将依照国家法规对国营公司实行经常性审计监督。对人民群众举报的财务收支和经营方面的问题，审计署将继续给予重视，调查核实后，严肃处理。

材料四　新疆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严重违纪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监察部副部长何勇9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活动，收受贿赂16000多元。国务院近日根据监察部查明的事实，决定给予托乎提·沙比尔同志撤职处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8月26日已撤销了他的自治区副主席职务。

这是监察部成立以来公布查处的第一个副省级政府官员严重违纪案件。

从去年年底开始，监察部根据群众的举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托乎提·沙比尔同志的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深入、周密的调查。

经监察部查明：1987年11月，托乎提·沙比尔经人介绍，结识了退职后到乌鲁木齐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一名妇女。1988年3月，此人要求托乎提·沙比尔帮她联系购买一批市场紧缺的化肥，托乎提·沙比尔指示某厂厂长“给解决100吨”。这名妇女将这100吨尿素每吨加价120元倒卖出手，非法收入1万元。后来，托乎提·沙比尔先后又批条子、打电话，为这名妇女调拨了8节机械保温车皮，供其贩运哈密瓜。这名妇女得手后，连瓜带车皮又转手倒卖，从中获暴利18万元。从1988年3月以

来，为酬谢托乎提·沙比尔，这名妇女曾五次向其行贿，计有现金1500元、电冰箱1台、纯毛地毯1块等，总价值6342元。此外，托乎提·沙比尔同志在生活作风上还犯有严重错误。

1987年，托乎提·沙比尔结识了北京某话剧院的一个女化妆师。她以广东某厂家需要铝为由，请求托乎提·沙比尔帮助解决1000吨铝锭。托乎提·沙比尔在1988年四五月间两次批条子，要求新疆某厂解决200吨铝锭，并在价格上给予优惠。此人将实得的120吨铝锭加价倒卖给北京某厂，获暴利8万元。她将其中的1万元送给托乎提·沙比尔，他收受了这笔贿赂金。

何勇副部长说，托乎提·沙比尔是经党长期培养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多年来为自治区的建设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经不起考验，丢掉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支持非法倒卖活动，受贿腐化，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何勇说，托乎提·沙比尔在接受审查期间，经过组织上批评教育，认错态度较好，能积极退赃，有悔改表现。目前，监察机关已建议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给予应有的党纪处分，涉及法纪问题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托乎提·沙比尔同志开除党籍处分。

决定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自治区党委委员托乎提·沙比尔滥用职权，支持他人投机倒把，收受贿赂达16000余元，且道德败坏，利用职权搞不正当两性关系，完全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条件。

材料五　海南省长梁湘以权谋私被撤职

监察部负责人在9月14日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鉴于梁湘同志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作出决定：撤销梁湘同志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的职务，并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据悉，监察部会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审计署，在中共海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下，对梁湘同志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现已查明，梁湘同志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他纵容妻子和儿子倒卖房产，妻子出面在海口市预订了两栋房子，由儿子将其非法倒卖获取暴利；他违背政府有关审批进口汽车的规定，亲自批准某公司进口一批汽车，他儿子没有参与进口这批汽车的经营活动，却借机勒索了一笔巨款；他利用职权，违反规定，为他尚未在海南落户的另一个儿子办理了从海南去香港定居的手续；他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自己制作服装、支付个人宴请费用等等。

监察部负责人介绍说，梁湘同志是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过去，梁湘同志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梁湘同志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支持和纵容妻子儿子的违纪犯法活动，犯了以权谋私及违反财经纪律的严重错误，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全党同志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应从梁湘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9月13日，在海南省召开的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拥护国务院关于撤销梁湘同志海南省省长职务并对其问题继续进行审查的决定。

材料六　《通告》产生强大感召威慑力，五万余违法犯罪分子坦白自首

在两院《通知》和监察部《通知》的感召和威慑下，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走上自首坦白的道路。到两个《通知》规定的期限10月31日为止，全国共有36171名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直接涉及犯罪数额3.5亿元；17600多人到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主动交代贪污受贿问题，涉及金额1.16亿多元和一些外币。

这个情况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在11月10日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

据介绍，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3.6万多人中，贪污受贿者占70%，犯罪数额在万元以上的超过10%；党员9363人，县处级干部742人，厅局级干部40人，副部级干部1人。到各级监察机关交代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涉及金额在万元以上的也超过10%。县处级干部679人，厅局级干部21人。

与此同时，9457名在押犯也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检举揭发出65400条案件线索。

两个《通告》的贯彻执行挽回了一大笔经济损失。目前已退交到各级检察机关的赃款赃物折款20900万元。到各级行政监察机关退交的赃款有7600多万元。另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彩电、录像机、录音机，金首饰等一大批赃物。

据介绍，两院《通告》发布后检察机关受理群众的举报线索23万多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以上。到各地监察机关举报的线索普遍比《通告》发布前同期增加2至3倍。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通告》贯彻执行期间，共受理检察机关起诉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案件10039件，判处8250件，共判处案犯12461人，其中从轻

判处 3715 人，从严判处 1595 人。各级监察机关对 2616 名主动坦白交待问题的给予宽大处理，其中免予行政处分的 1841 人。

高法、高检和监察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前，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等经济犯罪活动，特别是少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和少数单位的投机倒把犯罪活动仍很猖獗，给国家、集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扰乱了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对这些犯罪活动必须依法严惩。

他们表示，《通告》到期以后，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将加强同经济犯罪活动作斗争。在《通告》期间犹豫不决没有投案自首的经济犯罪分子，以后可以继续自首坦白，对于投案自首和立功者，将依法从宽处理。

邓小平退休

背景介绍

1989 年 11 月 9 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申请，允许他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虽然从实际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一直关心着改革事业的发展，引导着中国的前进。

材料：

- 邓小平同志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
- 退休的这一天
- 功高身退的邓小平

材料一　邓小平同志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 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 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要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

1989 年 9 月 4 日

材料二　退休的这一天

1989 年 11 月 9 日。

清晨，天还未亮，飘飘洒洒的细雨就已润湿了深秋的大地。

爸像往常一样，按时起了床。像往常一样，准时而又规律地吃了早饭，坐下来看书、看报、看文件。

最小的孙儿因患感冒而未去幼稚园，我带他去看爷爷。

爸问我，还下雨吗？

我告诉他，开始下雪了。

爸一听，马上起身，先把窗户大大打开，进而索性开门走出室外。

外面的空气寒冷而又湿润，雨水中果然夹杂着点点雪花，纷纷落落、飘飘扬扬随风而下。

爸望着雨和雪，感慨地说："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大概是所谓的"温室效应"吧，今年秋来得迟，冬也到得晚。虽已是 11 月份，天气仍然不冷。今天这场雨雪虽不很大，但毕竟是北京今冬的第一场雪。

九点多钟，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了，向爸讲述了正在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汇报了这次全会上关于爸退休的讨论，与会的同志们逐渐理解了爸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讲了很多相

当动感情的肺腑之言，今天下午全会将进行表决，晚上由新闻公布。

爸听后十分高兴，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席间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爸退休这个题目。姐姐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哥哥说，我捐献一瓶好酒。妈妈说，如果身体好，我也想去参加下午的照相活动。爸则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等着说："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行表决，通过了爸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四时许，爸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和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与会者一起照相。

在休息厅里，刚刚从五中全会会场内出来的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看到爸进来，纷纷走过来和爸握手。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一步趋前，紧紧握住爸的手。他建议，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和爸照一张相。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姚依林、乔石、宋平、李瑞环、王震、薄一波、万里、宋任穷、胡乔木等十二位同志簇拥着爸一字排好后，记者们一拥而上，闪光灯噼啪闪烁地拍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这些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有的银丝红颏，有的乌发满头，他们紧紧地站在一起。

当爸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掌声骤起。爸走过中纪委委员的行列，走过中顾委委员的行列，走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行列。

爸笑容满面地站在麦克风前，他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随后，爸与参加和列席全会的全体同志们合影留念。

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一直把爸送到门口，他紧握住爸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夜幕渐渐降临，而我们家却是一片灯火通明。

全家人忙忙碌碌了整整一下午，到了吃饭的时间，四个孙子孙女一齐跑去请爷爷。他们送给爷爷一个他们亲手赶制的贺卡，上面贴有四朵美丽的蝴蝶花，代表他们四个孙辈。卡上端端正正地写道："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他们四个人轮流上前亲爷爷，才三岁的小孙子小弟亲了爷爷一脸的口水，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在餐厅里，桌子上摆满了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杨师傅精心设计的丰盛宴席，淡蓝色的墙壁上高高地贴着一排鲜红的字：

1922——1989——永远

爸望着这一排字，脸上浮现出了深沉的笑容。

看着爸的笑容，看着我们这欢乐的十数口人之家，看着大家高高举起的红光闪烁的酒杯，我的心中激情难言。

八十余年的人生生涯，六十余年的革命历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轻而易举。

该休息一下了，该轻松一下了！

退休，是爸多年来的心愿。从他第二次复出开始主持工作以来，就在着手安排接班人；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力排众议，带头退出一些领导职务。

我们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

而他坚持退休，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

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了，他的心里怎么能不自觉安然呢！我们，他的亲人们，又怎么能不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爸要求退休的信和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议。

全会的决定写道："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卓著功勋。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是当一个人为祖国、为党、为人民付出了全部的生命和辛劳之后，党和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

从今天开始，爸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了。他说过，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们也真心希望他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长寿。

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呢！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他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到那时，他将是九十三岁高龄。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也要全力以赴地努力，确保他实现这一愿望。

（选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材料三　功高身退的邓小平

当国家发生着深刻变化，改革开放的航船破浪前行的时候，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去留，曾引起多少议论猜测。

11月9日晚，电波传送了震动中外的信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

席职务。广大人民群众对他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由衷的敬意。

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多少年，他自己一直就盼望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完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今天，85岁寿的邓小平，实现了夙愿。他高兴地对出席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的邓小平，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和革命活动家之一。1920年，刚满16岁的邓小平，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八九十位同学一起赴法勤工俭学。这期间，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20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法国生活的5年多，是他革命生涯的开端。1926年，他离法赴苏进了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回国。

童年时，他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正式改名为邓小平，是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的危难关头。当时，他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工作。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曾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和七、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和三野一起，夺取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华东大片土地。随后"刘邓大军"挺进西南，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大西南全境。邓小平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自1956年"八大"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主持书记处工作近十年，被他称为"一生中最忙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几起几落，身陷困境，依然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目睹"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同党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面对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状况，他又果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为使中国兴旺发达，他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国兴邦而确定的正确路线；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构想。

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他倡导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如果从他加入共青团计算，67年了，他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几十年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九十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但又还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希望国家的稳定发展继续得力于他的帮助。毕竟，是他把中国引入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有一颗坦诚的心。

（郑文）

风　云　人　物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西藏两宗教领袖之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41年被确认为转世灵童，1949年就任第十世班禅，1989年1月28日逝世。

附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讣告(节选)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于1989年1月9日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因操劳过度，致使心脏病突发，经多方紧急抢救无效，不幸于1989年1月28日20时16分在日喀则市他的新宫德虔格桑普彰逝世，终年51岁。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是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人。诞生于藏历十六饶迥之土虎年(即公元1938年)正月初三日，1941年被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9年6月，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在西宁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幼年时期潜心精研佛典，为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而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孜孜不

倦，博得了广大僧俗群众的衷心爱戴与尊崇，他继承历世班禅的爱国立场，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之完整，竭尽努力。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12 岁的班禅大师即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以至高无上之敬意和拥护爱戴之忱。称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使“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并要求“速派义师解放西藏”。表示“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定之后，班禅大师亲率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向毛主席致敬，称颂毛主席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并庄严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大师的爱国主义热忱和行动，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1951 年 5 月 30 日，班禅大师主动给达赖喇嘛发电祝贺，表示“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同年 12 月，班禅大师从青海启程回藏，次年 4 月到达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增进了藏民族内部的团结。1954 年，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 年被国务院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1959 年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同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9 年 3 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破坏伟大祖国统一。班禅大师立即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并在日喀则各界举行的集会上号召西藏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认清是非善恶，同反动集团划清敌我界限，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协助解放军平息叛乱，为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由于“左”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破坏，自 1964 年至“文化大革命”，大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处理，但他从未动摇对祖国、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直到逝世前，他还庄重地指出，“文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那种利用“文革”的破坏，来煽动民族情绪的言行，纯属别有用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班禅大师的领导职务，他重新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而奔走呼吁。自 1982 年以来，他不辞劳苦，6 次赴藏视察、指导工作。为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进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的落实，推动西藏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培养民族干部，继承和发展藏民族的优秀文化，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寺庙管理，起到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他主动承担起重建历世班禅灵塔的重任，并高度地赞扬“班禅东陵扎什南捷”这一宏伟壮观的灵塔礼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爱国主义的象征，是藏汉两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

班禅大师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的伟大业绩，将世代相传、永垂史册。

金 庆 民

金庆民（1940——　　），中国地质学家，世界第一位涉足南极腹地的女科学家，在南极发现了大铁矿。1989 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材料　第一个深入南极腹地的女科学家

在今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授奖会上，49 岁的南京地矿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庆民格外引人注目。

她是世界上第一个涉足南极腹地的女科学家，并为国际地质界在南极发现矿藏，打破了零的记录。

去年底，金庆民作为唯一的女性，参加了中美联合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科学考察。这里地处南极腹地，气候变幻莫测，夏天气温低于零下 40℃。望无边际的冰原上，没有飞鸟走兽，没有一棵树一点绿，人称“死亡地带”。在金庆民之前，还没有一个女性踏上过这块土地。

中美双方为这次科学考察签定的协议规定：若遇不幸，尸体将不运回本国。临行前，美方又给金庆民送来登机必签的照会，意思是对这次攀登中发生的意外概不负责。她没有犹豫，毅然在照会上写了“金庆民”三个字。

她同中国登山队员李致新、王勇峰及 3 名美国探险家乘探险飞机抵达世界七大高峰之一的文森峰脚下。身高只有 1.54 米的金庆民，和年轻力壮的男队员一样，手执冰杖、冰镐，脚登 4 公斤重的登山靴，背负 25 公斤的行李装备，冒着零下 40℃的严寒，在冰川峭谷中艰难行走。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从冰坡上滑坠，或从被深雪掩埋的冰缝中跌入万丈雪渊，葬身冰谷。一天下来，金庆民的脚脖子都红肿了。进入南极的第 3 天，她放弃了登顶峰的机会，只身留在荒原冰海中进行了 4 天的地质考察。

被千年冰雪覆盖的南极大地，只有少数坡高在 60 度以上的裸岩可以开展地质剖面考察。金庆民每天在冰坡峡谷中攀登，采集标本、拍摄地质资料。好几次，她一只脚踩进冰缝之中；一次次的“滑坠”，摔得她全身伤痛。在长昼无夜的南极，她忘记了时间，常常上午出发，连续工作

至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才回营地。12月2日，在海拔3200米的一处山脊上，她发现了铁矿带。为寻找到铁矿带露天部分，她沿着陡峭的山岩走了11公里，坚硬的岩石将手划开道道血口……终于，她找到了一个长20公里以上的赤铁矿带，这对人类研究南极大陆的形成演化及评价南极资源都有极重要的价值。

1961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金庆民，热爱地质事业。毕业时，她放弃考研究生的选择，在分配表的六个志愿栏中，都填上了“新疆”。她将孩子寄养在浙江的姑妈家，把青春献给了天山、沙漠、戈壁。20个春秋，她参加了十多个大、中型矿床的普查、勘探研究。她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金伯利岩，为我国的新疆找到原生金刚石提供了依据。

“为理想和事业拼搏，才能使短暂的生命具有意义。目前，我承担了国家和地矿部的3个科研项目，任务重，时间紧，必须争分夺秒地干。”

这，就是金庆民——中国的女科学家。（徐机玲）

胡锦涛

胡锦涛(1943——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等要职。1989年拉萨骚乱后，调任西藏区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材料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西藏新书记

去年底，原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这决定，几乎与拉萨又一次骚乱的消息同时传出。有人说：胡锦涛“受命于危难之时”。

与他的前五任张国华、曾雍鸦、任荣、阴法唐、伍精华相比，胡锦涛是唯一文职出身的书记。

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胡锦涛便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后来在黄河上游参加过两个水电站的建设。1980年后，担任过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和团省委书记。

他希望在专业工作中对祖国有所贡献。然而，1982年调入团中央后，他便走上了从政之路。1984年，他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一年后，正当他被越来越多的青年熟悉时，又被派到中国大西南贫困地区——贵州省出任书记。这位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非常务实地开始了他省委书记的生涯。上任刚两三天，他便坐上小面包车，怀揣一份全省详图，带上为数甚少的两三人，一头扎到了基层。到贵州没几个月，就跑遍了全省86个县、市区。到基层，他总是看、问、调查、座谈，再同当地干部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那里各个时期的干部都很尊重。人称“尊重老人的年轻书记”。

贵州三年，他和省委一班人一起想方设法使当地200多万人解决了衣食温饱。同时，又提出了3年时间，投资2亿多元解决中小学危房、抓初级人才培训等措施，为的是从根本上解决贵州贫困之苦。他通过新闻媒介，在全省讨论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规划；还建立了省委定期民主协商座谈会制度，正因如此，在贵州省委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共13大代表时，胡锦涛以最高票当选。

他曾告诉一位记者，一个省委书记形象应该是有坚定信念和强烈追求，并又脚踏实地热爱生活的人。

贵州主政，他正是这样做的。有了这3年的锻炼，这位46岁的西藏新书记，也定会不孚众望，有所作为。（景媛、汪翔）

钱学森

钱学森(1911——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导弹之父”，1955年从美国回归祖国，为我国空间武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并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

材料　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得主

6月末，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上，“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了重大开拓性质贡献的钱学森，获得了“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

国际理工研究所1982年设立的“小罗克韦尔奖章”，每年授予至多3位在国际理工界有极高声望的科学家，并由此入选“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录。钱学森是目前已获奖入选的16位现代科学家中唯一的中国人。

一位西方记者曾撰文，称今年78岁高龄的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的确，翻开中国国防科技史，人们会发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的第一枚洲际火箭导弹，都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钱学森1934年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次年赴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

在美国20年，他成就卓著，享有盛誉。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6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

正教授——终身教授。他还参加了美国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1949年起，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学业、事业、生活待遇，一切都是令人羡慕的。

可是，钱学森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祖国。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享用。他却从不存钱。他说："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0年，钱学森决定回国。行李都托运了，美国政府却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挠他启程。而且在这之后的5年中，对他实际实行了软禁。

195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交涉、斗争，钱学森终于得以冲破阻挠，偕带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漂洋过海，回到祖国。（郑文）

秦大河

秦大河（1947—— ），地质学家，中科院兰州冰川研究所副研究员，1987年7月参加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成为第一个横穿南极大陆的中国人。

材料　第一个横穿南极大陆的中国人

白雪皑皑的南极冰原上，毛蓬蓬的极地狗拉着雪橇奋力奔跑。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的6名队员踩着滑雪板，紧跟在雪橇后面。他们正在创造着人类横贯南极的奇迹。这6人当中，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研究所副研究员秦大河，是第一个正在横穿南极大陆的中国人。

7月28日，这支考察队从南极半岛的端部出发，计划于1990年3月1日到达终点——西南极的苏联和平站。6000公里行程，不尽的冰山、雪岭，酷寒、狂风，要达到目的地，无疑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南极科学考察史上，曾有过轰动全球的远征。挪威的阿蒙森，英国的斯科特，曾先后率队奔向南极腹地，争获人类史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殊荣。结局一喜一悲，阿蒙森的队伍胜利了；斯科特和他的伙伴却身葬南极冰原。

这次远征，同样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结局在等待着他们。为了胜利，要求参加者必须意志坚强、体质健壮，具有一定的野外考察技能。生在兰州、喝着黄河水长大的秦大河被选中了。这位42岁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两度赴南极。1988年，在南极乔治王岛的长城站上担任越冬队队长时，为适应横穿南极大陆的需要，他就冒着严寒坚持不懈地练长跑，练哑铃。今年2月，他又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山地参加横穿南极大陆的集训，学会了驾驭狗拉雪撬的本领。

遗憾的是，没等他学会滑雪，便踏上了南极的征途。他边学边滑，很快就跟上了队伍。如他给笔者来信所言：8月12日起，我已能全天全程滑雪前进。

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多次陷入困境。暴风雪围困，躲在帐篷里两天两夜；找不到事先空投的食品，人狗都遭受肌饿的威胁；40只极地狗，已有10只经不住冻饿被淘汰。但秦大河时刻没有忘记科学考察工作。他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我们按计划每40英里采集一次雪样，打一米深的雪坑4个并观察雪层剖面变化。采集的雪样将用来分析氧、氢同位素比率，衡量元素和化学成份，期望就某些元素与气候之间建立经验关系式。"他远离祖国的热土，在茫茫的南极雪原上探索科学奥秘。（张继民）

江泽民

江泽民（1926—— ），江苏扬州人，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任军管第一粮秣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一九四九年后，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一九五五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一九五六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一九八〇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一九八二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一九八五年后，任上海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材料　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在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因"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等错误，被撤销职务。62岁的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出任总书记前，江泽民同志是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市委书记。对于大上海，他并不陌生。出生在江苏扬州的

江泽民，大学生活便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的。在交大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他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前，他一直在沪工作，先后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

1956年从苏联回国后，江泽民北上南下，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一机部外事局、一机部驻罗专家组等工作岗位上，先后任过副处长、副所长、副局长、专家总组组长等职。粉碎"四人帮"后，长期在基层或中央机关从事具体工作的江泽民，出任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

四年前，他从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职位上，调往上海，任解放以来的第六任上海市长。1987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在上海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期间，给人留下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办事果断、务实的印象。他不愿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经常到企业、机关、学校考察。熟悉他的同志说，他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廉政建设也是有成效的。

他能操英语、俄语。接见外宾时常不用翻译，直接用英语对话。

他喜欢欣赏音乐，能弹钢琴。只是公务繁忙，难得有闲尽兴。（郑文）

赖 宁

赖宁（1974——1988），四川石棉县中学初中学生，"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之一。1988年3月，他在扑救森林火灾时英勇牺牲。1989年，中央在号召全国学雷锋的同时号召全国少年儿童学习赖宁。

材料一　英雄少年赖宁

10月12日，中南海西花厅。"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从邓颖超奶奶手中接过一枚枚金质奖章。可他们只有9名，唯独不见英雄少年赖宁的身影。

赖宁，四川石棉县中学初中学生。在国家财产面临威胁时，他扑向山林火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救火，只是片刻间作出的抉择。不过了解赖宁的人都说，这与他少年壮志分不开。

看书，是赖宁的一大爱好。每年过生日，他要的礼物总是书。博览群书，使他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他敬佩地质学家李四光。也许因为生长在群山环抱的山区，他立志"当一个地质学家！"并且经常翻山越岭，采集矿石标本。

老师教导说，对事物的观察十分重要。赖宁记住了这句话，居然去捅马蜂窝，蒙上衣服观察马蜂气恼的表情。然后以亲身体验写下作文《捅马蜂窝》，交给老师。

凭一股子钻劲，赖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成长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得过地区少年儿童绘画赛二等奖、县少年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还荣获了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称号。小学毕业他以全镇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升入省重点中学——石棉县中学。

去年3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县城一家工厂的信号线被大风吹刮碰上高压线，线路短路碰火，火花落地引起森林起火。刹那间，海子山火海一片。刚写完作业的赖宁瞧见冲天的火焰，顾不上告诉妈妈，飞奔火场。

本来，他和其他学生、妇女已被强行撤下了山。可当他看见大火疯狂反扑而起，又重上火山。

大火灭了。3500亩森林保住了。县电视卫星转播台和石油公司油库平安了。而英雄少年却未归来。第二天，在山坡上，人们找到了赖宁的遗体。

他告别了人生。14岁，象一道电光划过，那么短暂。但他却给人们，给社会留下了不朽的光彩。（郑文）

材料二　学习赖宁

（邓颖超）

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敬佩而又痛惜。他就是被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教委授予了"英雄少年"称号的赖宁。

赖宁是从小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党对于青少年一代的要求，通过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而对赖宁的思想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党殷切期望着"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青少年去继承前辈的事业，开创国家的美好未来。赖宁就是"四有"新人的一个典型。他胸怀大志、爱国爱民；他勤于动脑动手，热衷科学试验，富有创造精神；他兴趣广泛，求知若渴，全面发展。当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严重损失时，他不惜以生命去保卫。他的事迹，集中体现了少先队的"五爱"精神，他是一位优秀的少先队员，也是我们共和国优秀的小公民。

我们的事业是宏伟而艰巨的。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党需要人民同心同德，作长期的、坚韧的、艰苦的奋斗。而这种奋斗，需要由一代接一代的革命者和建设者来完成，因此，提高作为接班人的青少年一代的素质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思想品德素质，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前不久发生的那场严重和政治斗争更深刻地提醒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从小培养，社会主义思

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要从小进行。

通过赖宁的成长我们看到，用正确的思想方法从小抓紧人的塑造是多么重要，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各种教育影响的配合是多么重要。当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教育青少年一代树立远大理想，踏实奋斗，百折不挠；当对外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某些错误思进的繁衍的时候，我们需要教育青少年一代懂得四项基本原则，明辨是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出现某些腐败现象的时候，我们需要教育青少年一代提高道德水准，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追求有真正的社会意义的人生价值。本世纪只剩下十年时间了，我们多么需要教育青少年一代抓紧学习，刻苦钻研，作好全面的准备，成为新世纪的合格创业者和建设者！而这一切，正是教育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的重大的责任。

赖宁是新一代少年儿童的代表。他证明了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是有希望的，从而也证明了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我希望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来学习赖宁的榜样，像他那样做党的好孩子，像他那样有意义地生活，像他那样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无愧于时代要求和祖国期望的"四有新人。

刘 华 清

刘华清（1916——　　），1929 年 10 月入团，1935 年 10 月转党，1929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30 年 12 日入伍，曾任鄂东北红安中心县军区指挥部团委书记兼红安县少共县委书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交通队指导员，红三十一军干部队大队长兼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师供给部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平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六分区副政委，二野二纵六旅政委，二野三兵团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二野第十军副政委，第一海军学校副政委。1954 年至 1958 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恪夫海军学院海军指挥专业学习。1958 年后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六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海军副参谋长，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9 年 11 月在中共 13 届 5 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材料　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在 11 月初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今中国 17 位上将之一的刘华清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73 岁的刘华清是湖北大悟县人。20 年代末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 岁时，刘华清便随红 25 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 10 月，刘华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初期，刘华清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 11 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政委等职务。

1954 年至 1958 年间，刘华清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海军指挥专业。毕业回国后，便开始了他的军事指挥生涯。历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海军事参谋长，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979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时，刘华清担任总参谋长助理，后又任副总参谋长。1982 年 8 月，出任海军司令员。1987 年 11 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解放后一直搞军队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刘华清，知识面比较宽。他懂科学，曾参与领导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作，是聂荣臻元帅的主要助手之一。他领导研制和发展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以及潜艇、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等重大试验，重视国防现代化和海军装备建设。在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他重视海军战略的研究，在海军编制体制、军事训练、战备建设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海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郑文）

潘星兰、杨大兰

潘星兰（1970——　　），湖北省枝江县桂花信用分社会计；杨大兰（1970——1989），桂花信用分社炊事员。"二兰"面对抢劫的歹徒誓死抗争，捍卫了国家财产，潘星兰受重伤，杨大兰光荣牺牲。

材料　共和国金融卫士潘星兰、杨大兰

她俩不是军人，但确是共和国卫士。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与持刀歹徒搏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1989 年 12 月 25 日凌晨，一阵撬锁声惊醒了正在湖

北省枝江县桂花信用分社值班的会计潘星兰和炊事员杨大兰，她们刚拉开门，两个持刀蒙面歹徒更闯了进来，狠劲勒住了两位姑娘的脖子，用匕首抵住她们的脑门："借点钱用。把保险柜钥匙交给我们。"

"我们不知道保险柜的钥匙。"潘星兰明知道钥匙就在楼上宿舍里，她要保住保险柜里装的1.7万多元现金和有价证券，死也不肯说出。

歹徒见她们不说，就满屋子乱翻起来，仍然没有找到钥匙。于是，他们又要把两位姑娘隔开来"盘问"。看到这一情景，潘星兰为了保护进社才8个月的杨大兰，便对歹徒说道："我是会计，她是炊事员，不关她的事。"

高个子歹徒将大兰逼进厨房里间柴禾屋内，手持明晃晃的刺刀吼道："你去跟他讲，快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要不我就杀了你。"大兰不理睬。这时歹徒发现地上有他们上半夜在这里潜伏时吃剩下的藕节，他害怕留下痕迹，便弯下腰去捡，杨大兰趁势猛击一掌，将歹徒推倒在地，然后冲向门外，边跑边大声呼救。歹徒扑上来，凶残地用刺刀朝大兰背后猛刺过去，大兰倒下了，歹徒又扑上来，朝大兰连砍数刀……

杀红了眼的高个子歹徒从厨房窜到营业室，和在那里逼潘星兰交出保险柜钥匙的另一名歹徒恶狠狠地对星兰说："如果你再不交出，我们就用刀一点点割你的肉。"

"我没有钥匙""有！"……当歹徒们用匕首狠狠地在星兰手上割成"十"字刀形，尔后又灭绝人性地砍下了星兰左耳垂的时候，星兰没有一丝屈服。她不顾势单力薄，扑上去同歹徒拼死搏斗，歹徒们又一次挥舞刺刀、匕首砍向了星兰……星兰倒下了。一个小时后，醒过来的星兰带着满身血，爬了100多米，报了案。

在急救室里，医生们惊呆了：星兰身上有20多处刀伤，其中有13处重伤，7处是致命伤，胸部有一刀刺及肺表膜，失血3200毫升……

潘星兰参加工作两年多，她经手的3万多笔业务，无一差错。她时刻都牢牢记着："人在钱在。"

杨大兰英勇地牺牲了。她进信用社工作才266天。在与歹徒的搏斗中，她身中9刀，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潘星兰、杨大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共和国财产的事迹撼人心肺。歹徒已被依法枪决。中国农业银行授予"二兰""社会主义农村金融卫士"称号；全国妇联授予她们"三八"红旗手称号；湖北省政府已批准杨大兰为革命烈士，并授予潘星兰省劳动模范称号。

潘星兰，杨大兰，她们年仅19岁。这两位卫士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施勇峰）

珍 闻 轶 事

"888"争夺战

羊城的许多人，这几年兴起一股数码崇拜热来。请听——

"去年是'发发'（88年），今年是'发够'（89年）。来，为我们今年发财能发够干杯！"在珠江三角洲，一位执掌着一家资产过亿元的现代化企业的大老板，喊出的祝酒辞别具一格。

"工人有劳动节，教师有教师节，我们农民也应该有自己的节日。我建议，每年12月18日为全国农民欢乐节……"在珠江三角洲水光潋滟的白藤湖农民度假村，先富起来的广东几位农民兄弟提出设立"农民欢乐节"的倡议，也离不开"8"这个数码。18，广东话谐音为"时发"——即"时时都发"之意也！

在广东"官话"（白话）中，1、2、3……9、10这十个数码的发音依次为"押、易、升、死、无、禄、差、发、够、时"。数码作为一种抽象符号，本无"社会"意义。可是伴随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渴望发财却又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运气寄托于冥冥中的一种超自然力。

这并不令人惊异。在先富一步的珠江三角洲，沉渣似乎被经济大潮卷得纷纷泛起。忠勇不二的关云长、手托元宝的赵公元帅以及福、禄、寿、喜等四大神灵作为超自然力的象征，被请回到许多人家新建的神龛上。

但是，神灵虽能带来财气吉祥，与人作伴的时间毕竟有限。相形之下，数码同人们的生活更加须臾不可分。于是，在金钱灵光的辉映和香港时尚的熏陶下，数码，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

——181818（时发、时发、时发）；

——862886（发禄易发发禄）……冥冥之中，赵公元帅点化着人们丰富的想像力。通过电话号码、车牌和门牌，9个阿拉伯数码发挥着排列组合的神奇功能，为世人构筑出一幅幅动人的发财图。

"别以为这些数码编排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有画饼充饥之用"，珠江三角洲一位深谙此道的乡镇干部告诉笔者："这东西同气功一样，信则灵。心有多诚，效果就有多好。"因此，笃信不疑的人们为了争夺一个吉祥的数码牌，角逐愈演愈烈：有权的比权大，没权的则比钱多。反

正，吉祥号码只认权和钱。

一位屁股上挂着BB机的年轻生意人告诉我：在珠江三角洲，判定各色人等来头大小有简捷办法：不看他的头衔，只看他的车牌号和名片上的住宅电话号：号码组合音越吉利者，越有来头。

听了他的话，我半信半疑。回到家中，连忙打开名片簿认真考据一番。不看不晓得，一看吓一跳。硬让他给说中了：32288(升易易发发)、33388(升升升发发)、666888(禄禄禄发发发)、33838(升升发升发)……这类大吉大利的电话号码不是财大气粗的总经理，就是权倾一方的地方政要——沿珠江顺流而下，越靠近三角洲，越往乡镇基层走，这一规律性症候表现越突出。有趣的是，先富者的电话号码中一般都不带4(发死音)和5(发无音)，不知这类不吉祥数码落到了哪一类倒霉鬼身上?!

据圈内人告知：同内地一样，广东人以前对数码也没什么忌讳。数码争夺战是这些年从香港"引进"的。一开始东施效颦，无非图个吉利，但伴随着某些人的迅速崛起，私人摩托车、专用小轿车、家庭电话以及BB机这类最能显示身份的现代化用具的"普及"，牌号数码的涵义获得了"升华"——人家用了"8"，真的就"发"了！

于是，阿拉伯数码便成了显示实力和身份的象征。"树争一张皮，人争一口气"，广东越是轿车、电话普及的地方，围绕吉祥数码的争夺战越激烈：你贵为厅局级干部，但你的皇冠车车牌不过一个"8"；我贱为乡镇厂，可我的奔驰车却有三四个"8"——是金钱本位向官本位发起了凌厉的攻击？是封建迷信向"初级阶段"杀了个"回马枪"？

不过，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一争夺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掌握牌号的部门。以安装电话为例：以前有关部门只收个安装费。现在可好，暗地里还可以收取号码费。给你带4字还是带8字的，就看你出手大方不大方。

时下，广东号码角逐费越抬越高。鉴于这愈见丰厚的收入多从"暗道"进入私囊，有识之士已呼吁：既然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如索性像香港一样，将吉祥牌号公开拍卖，让暗斗转为明争，使收入归公。

这倒是个好主意，国家增加收入，也能让公众都来看看：看他挥霍金钱的能量有多大，看他自迷自信的虔诚劲有多大！

(王志纲)

邓小平获世界桥联最高荣誉金奖

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2月26日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桥牌联合会荣誉金奖的人。

世界桥联去年10月在意大利召开的执委会上，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奖——荣誉金奖，以表彰对世界桥牌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并一致同意把第一枚荣誉金奖授予邓小平。

邓小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就喜爱上了桥牌运动，此后长年不辍。他认为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提高思维能力。

颁奖仪式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霍华德先生和夫人以及香港桥协主席蔡国雄。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代表邓小平接受了世界桥联主席丹尼斯·霍华德先生授予的荣誉金奖。霍华德先生在颁奖仪式上说："对世界桥联来说，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一位伟大的人物颁奖。"他介绍说，世界桥联目前有83个会员，70万名注册牌手，世界上喜爱桥牌运动的人超过5000万。

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降生

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3月10日凌晨1点59分在呼和浩特降生。这项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是由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主任、蒙古族兽医学博士旭日干主持的科研小组经过两年多努力获得的。它标志我国这项生命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4年3月9日，旭日干在日本进修期间，与日方合作，培育出世界上第一胎"试管山羊"，引起了各国同行关注。今天，旭日干在这项高技术研究领域中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与5年前相比，具有难度大、成功率高的特点。

今天，记者在这个中心看到了出世不久的试管黑头羊羔。

这只小羊羔体重5.3公斤，结实健壮。现在，还有9只母羊正处于妊娠之中，没有意外情况，预计在4月底将出生一小群"试管绵羊"。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89是比较平淡的一年，小说、诗歌都缺乏震撼一时的气势。电影方面，第一部"儿童不宜"片《寡妇村》倒是哄动一时，历史巨片《开国大典》也以其气势恢宏获得了很高的上座率。歌曲《爱的奉献》唱出了商品经济社会下人们内心的呼唤，而《跟着感觉走》则表现了人们在现代社会里的一种迷惘，"跟着感觉走"也成了流行的名言。

总的说起来，相对于87、88年而言，89年的流行色略逊一筹。

电影《寡妇村》

我国沿海，有一个渔村。许多年前，村里的男子在一次大渔汛中出海，全被强台风卷走。寡妇们把团囡拉扯大，早早地给他们成了家。但婚俗规定：只有清明、中秋和除夕之夜，妻子可以到夫家团聚；成亲不满三年，男女不准同床；新婚三年内，不准有孕；结婚三年后，妻子若不生孩子，也要受到耻笑。谁违背了这些祖训，就得去跳海自尽。

1949年，"寡妇村"解放前夕，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婷姐（郝嘉陵饰）、多妹（梁玉瑾饰）和阿来（于莉饰）三姐妹，父母双亡。她们相依为命，靠勤劳的双手和一头黄牛，艰辛地耕耘。

清明之夜，女人们打着火把，各自走进夫家。

多妹和丈夫四德（陶泽如饰）成亲刚满三年。三年来，每次"团聚"，她都只能与四德隔帘陪坐，彼此间，连模样都没看清。这一夜，四德等她上床，她却吓得蹲在帘外的暗角里打颤，鸡一打鸣，就如囚犯获释，奔回娘家。

阿泰（谢园饰）家，是另一番情景。阿来自幼寄养到台南，成婚才一年多。她春情荡漾，阿泰似有动心；可是，一想到"祖训"，又只得强压情欲，苦熬青春。

婷姐和万福（牛士军饰）结婚十多年，一直没有身孕，好不容易又盼到团聚日，偏偏碰到月经期。兴致正高的万福恼怒万分，粗暴地一把将妻子推倒在地……

婷姐病了。多妹只好把赖以为生的黄牛牵到集市上去卖，想换药给婷姐治病。谁知，买牛的，正是四德。妻卖夫买，两人却互不认识。多妹问："都是女人下地，你买牛做啥？"四德答："我给我女人买，她嫁过来以后，好少辛苦点。"多妹痴望着来生也能找上像这样的好男人。

又一个夫妻相会的夜晚到了。婷姐和万福面对神像，盘算着未来。多妹自从见过了"买牛郎"后，决心不再让原来的"臭男人"碰自己。她抓起一个瓦枕头，朝抱她上床的四德头上砸去……阿来和阿泰不顾一切，冲破祖宗的规矩，搂在一起……可是，就在这一夜，国民党的队伍进村，将男人们全部抓去当兵。这里又成了寡妇村。

解放后，多妹决心跟仍在对岸当国民党兵的四德离婚。她来找四德母亲，无意中发现四德母亲牵着的竟是她当初卖的黄牛，这才知道"买牛郎"就是四德，禁不住悲痛欲绝。婷姐仿佛听到万福在阴间叫她去生团，于是投入了大海的怀抱。大海发出阵阵咆哮。阿来抱着新生的婴儿，和多妹、四德母一起站在海边，深情地凝视着远方……

（晨霞）

电影《开国大典》

1948年底，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处在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的部署，迅速扩大战果，全国解放在即。而面临失败的国民党政府仍在负隅顽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除夕，西柏坡的乡亲舞起"霸王鞭"，欢庆胜利。

面对战场上连连挫败，蒋介石"导演"了一幕假隐退、真操纵的丑剧。他宣布下野，推出李宗仁为总统。

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但傅举棋不定，一拖再拖。在围守北平一个月之后，毛主席于1949年1月14日发出进攻天津的命令，迫使傅作义认清形势。傅作义终于表示要顺乎于民意。北平和平解放。

1月21日，蒋介石由汤恩伯、蒋经国等人陪同，最后一次登上中山陵，然后乘"美龄"号凄然飞离南京。然而，几天之后，蒋介石就在奉化溪口镇主持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要求严守长江防线。确保上海、杭州，并对重要文件和人员都作了安排。

1月31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派特使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国，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一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3月24日，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

眼看大势已去，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一面加强长江防线，企图保存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4 月 1 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张治中去北平和平谈判，李宗仁到机场送行，并做了重要嘱托。可几天后，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却制定了突破长江防线的作战方案，证明了国民党对和谈并无诚意。

4 月 13 日，中南海勤政殿内，国共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斤斤计较，结果谈判进展甚微。几天后，周恩来向张治中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国民党"和谈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

4 月 21 日，国民党政府公开申明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24 小时后，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以木帆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总统府。26 日，总前委书记、二野政委邓小平和三野政委兼司令员陈毅兴奋地在南京市区视察。他们认为应尽快制定《入城守则》。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首肯。

5 月 24 日，蒋介石一家老小最后一次来到蒋母墓前，做临行辞别，旋即登上"太康"号悄然离开大陆。

5 月 26 日，上海解放。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

9 月 30 日，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回到中南海以后，毛主席的心情仍然十分沉痛，他和儿子毛岸英一起怀念死去的烈士和亲人们，并对岸英说："我给你的权力只有一个——到基层去。"

10 月 1 日，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欢声雷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步履坚定地登上了城楼。下午三时，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整个广场沸腾了……

历史巨人的足音，叩响每个人的心扉……

（小雪）

歌曲《爱的奉献》

1＝bB$\frac{4}{4}\frac{2}{4}$　黄奇石词

刘诗召曲

竹　枝记谱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

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呵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歌曲《跟着感觉走》

1＝F$\frac{4}{4}$　陈家丽词

陈志远曲

中速　轻快地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2.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

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事那里都会有。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那里都会有。

1989 年秋季时装流行趋势

秋季是色彩丰富的、充满活力的、富有诗意的季节，秋季的服装同它的色彩一样也是色彩丰富、富有诗意的。

今秋服装的流行趋势与 1988 年秋季服装的流行趋势相比，人们感受到一组清新、和谐，富有微妙对比变化的色彩。

首先是色彩趋于丰富多彩，使人感觉到以红、棕为代表的暖色调明显上升了，成为较主要的色调，而鲜艳色已不太强烈。"都是节奏"型的色彩，正体现出了这一特点。由深红、铁锈红、红棕到棕色、黄棕、土黄色、咖啡色，是一组趣味盎然的暖色系，像深秋香山的红叶一样，给人以深沉而又富于诗意的美。"秋日香山"型正是以此而得名。

以深蓝、蓝绿、绿和深紫色组成的冷色系可以被看做是另一组，与前两种主题（"秋日香山"、"都市节奏"）不同的是它如同雨后森林，自然、清新、恬静，体现出一种南国秀丽典雅的情调，这就使得蓝绿色调更富有变化。因而得名"江南水乡"型（廓型的服装）。

其次，与前年相比，色彩的明度和纯度都在下降，而

那曾经风靡一时的黑、白、灰已让位给一组带有雾状的浅色调，给人一种朦胧飘逸之感，体现了“晨雾朦胧”型的主要特点。

此外，在用料方面有了很大变化，用料的对比组合方面也发生了改变，今年春夏之季面料的组合大致是透明或半透明的料子与结实的料子相对应、相组合，而在今秋则将是坚挺的面料与柔和的面料相对应，相组合；此外还有，印花面料与素色面料相对应，相组合；粗糙的织物与平滑的织物相对应，相组合。这种面料的搭配、对应、组合与今秋所流行的款式、色彩协调得体，从而更好地表现出了今秋服装流行的主题。

下面，我们谈谈今秋四个流行主题的廓型。国家有关单位对此已进行了发布。它们具体是：

“秋日香山”型：这种主题廓型的特点是上窄下宽，在服装造型上一反秋(冬)之季强调厚重感觉的常规，服装设计师们在上窄下宽的“梯型”、“A 字型”上作文章，同时针对服装的装饰方面作了较大的变更。如何以在背部打上阴褶或细碎的明褶，还可以利用装饰件如蝴蝶结、纽扣等达到上窄下宽的造型。今秋，“A”字型或“梯型”的廓型将并不只限于大衣、风衣类，对其它一些衣服也是适用的。比如像长及小腿的裙子，长袖连衣裙，短梯型上衣、斗篷等。用这两种廓型设计的服装，使人看去，大有行云流水的韵味。

第二种主题为“都市节奏”型。这种类型的主题意在表达城市中职业妇女的形象，其廓型看去似“H 型”。此外，还有种廓型似“倒梯”型，但是，这种“倒梯型”的两个底角却是弧形的。这样，在造型上看去，肩部比较圆润，其曲线体现了略微的柔和感。这种造型，轮廓简练，便于穿着、行动自由、让人看去既大方，又具有成熟干练之感。

第三型主题为“江南水乡”型。主要表现为“女性化”，同时注重舒适性和功能性，其廓型以主要表现腰部为重点，肥瘦适度而自然。其面料多用花色线圈圈纱，假单色等突出织物表面效应的面料。这些面料自然、舒适、实用、女性化。

其四为“晨雾朦胧”型的主题。这个主题主要表现为：朦胧现代色彩中的东方女性，其廓型腰节线高于自然腰线的高腰型，其面料多用柔软的机织和针织料。

今秋推出的高腰型，独具特色，其上摆可大可小，而且款式也越来越丰富。除高腰裙、高腰裤、高腰裙裤外，又推出了高腰背带裤、高背裙、高腰夹克、高腰大衣、高腰连衣裙等一系列品种。此外，牛仔料也派上了新的用场。在制作高腰系列服装的用料上，还可以采用对比组合的方法，如用坚实的料子做成短上衣，用轻薄飘逸的衣料做下装。这样做就使得轻盈的大下摆既充分显示出其保暖的功能，而且走起路来。又有一种洒脱爽快感，韵味十足。

造型趋于简洁，服饰点缀应用较为广泛，将是今秋流行服装的又一大特征。美丽的花边，漂亮的缎带将出现在不同年龄层的时装上。如蝴蝶结、玫瑰花饰、精致的绣花亮片、贴饰或缀以流苏等等，这些装饰手法也会在不同的时装款式上出现。

金色的秋天是美丽的，而多样的款式，丰富的色彩，不同的面料和应用广泛的服饰所点缀的时装，将把今秋装扮得更加充满活力。

（彭景荣）

历　史　档　案

关于活佛转世的历史资料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是从噶举派(俗称白教)的噶玛巴希开始的。噶举派创始人堆松钦巴于公元1193年去世。公元1204年噶玛巴希降生。噶玛巴希幼年出家研习堆松钦巴创立的白教教义，造诣很深，信徒们推崇他为堆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噶玛巴希乃成为藏传佛教的第一个活佛，从此也就有了活佛转世制度。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后，也沿用了活佛转世办法。宗喀巴的两个大弟子即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就用转世办法继承。达赖从第一世根敦朱巴到现在的丹增嘉措，经历了14世。班禅从第一世克珠杰到刚刚去世的确吉坚赞，经历了10世。

班禅转世一般要经过五道程序。

一、寻访灵童。在前世班禅去世一年后开始进行，由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僧官执行。首先打卦或请护法神降神，确定灵童出生地的方向、路程及地方特征等，然后由僧官们按此线索分路寻访。寻访的结果，有时只找到一位灵童，有时找到两位和两位以上。如五世与六世班禅转世时只找到一位灵童，七世班禅四位灵童，八世班禅两位灵童，九世班禅三位灵童，十世班禅一位灵童。

二、辨认器物。取前世班禅生前常用的最喜欢的器物，再取相同形状和数量的其它器物，将二者混在一起，真伪相杂，然后让灵童辨认。如果灵童抓到的都是前世班禅生前用过的器物，就认为该灵童系前世班禅转世。

三、降神询问。由日喀则扎什伦寺请护法神降神，询问哪一个灵童是前世班禅转世，请神降谕。如果护法神答复的同辨认器物的结果一致，则该灵童成为候选灵童。

四、金瓶掣签。辨认和降神的结果在清朝时期由驻藏大臣向清朝皇帝报告，请求批示。如果只有一位候选灵单，则批示免予掣签。如果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灵童，则批示进行金瓶掣签。

五、批准继位。金瓶掣签的结果上报皇帝，由皇帝批准继承班禅名号，为新一世的班禅。

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皇帝批准罗桑益喜为五世班禅。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皇帝批准巴丹益喜为六世班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皇帝批准丹白尼玛为七世班禅。咸丰七年(1857年)，咸丰皇帝批准丹白旺秋为八世班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皇帝批准曲吉尼玛为九世班禅。

金瓶掣签制度是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放在拉萨市布达拉宫。掣签由驻藏大臣执行。方法是，如果辨认和降神的结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灵童，就将他们的名字都写在象牙签上，每人一签，都投入金瓶内。喇嘛念7天金瓶经后，从瓶中掣出一签，签上写着谁的名字，谁就是转世灵童，即可以上报皇帝审批。

十世班禅就是经当时的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于1949年6月3日批准的。

两岸交流的“第一”

十年来，经过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日益缓和，相互往来不断增多，特别是最近两年，两岸关系发生了许多关键性的突破，各种“第一”也应运而生：

第一次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1987年9月14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冲破禁令到大陆进行了14天的采访，打破了两岸新闻界隔绝38年的状况。

第一个回大陆探亲的台胞——1987年10月15日，台湾“内政部”宣布批准民众赴大陆探亲。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登记，第一个办好回大陆探亲登记手续的是台胞熊光远。这意味着近40年来两岸亲人隔绝局面的结束，随后探亲潮兴起。

第一批到大陆参加国际性会议的台湾科学家——“台北科学会”成员张仲卿，周昌弘、叶永田三人于1988年9月11日以民间名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总会第21届年会，成为第一批获准参加大陆国际性会议的科学家。

第一位访问大陆的台湾“立法委员”——台湾“立法委员”、著名政治家、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1988年9月11日乘中国民航班机由美国旧金山飞抵北京，在大陆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并会见了李先念等领导人。

大陆赴台探病第一人——1988年11月9日，台湾当局宣布有条件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正在荷兰访问的清华大学教师钱易，获准台湾发出的大陆同胞赴台探病旅行证后，立即起程，于11月14日抵台探望病父——国学大师钱穆。

大陆赴台奔丧第一人——1988年11月21日，上海铜厂退休职工许松桐，手持台湾“入出境管理局”发放的第一号“入台旅行证”，离沪赴台奔丧。

第一个返台探亲的滞留大陆台籍老兵——1988年11月25日，台湾当局宣布准许滞留大陆的台籍老兵返台探亲、定居。12月19日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的谢源拔第一个飞抵台北，探望了90岁高龄的老母亲。

第一批访台的大陆留学生——1988年12月1日，台湾“行政院”核定公布了《现阶段国际学术会议或文化体育活动涉及大陆有关问题作业要点》及《现阶段在大陆杰出人士、在海外大陆学人及留学生来台参观访问申请作业规定》。12月20日徐邦泰等5名留美学生第一批赴台访问。

第一个到大陆参赛的台湾体育团体——今年4月7日，中国奥委会宣布，台湾地区今年将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在大陆举办的国际比赛。4月17日台北青年体操队抵京参加亚洲青年体操赛，成为第一个到大陆参加比赛的台湾体育团队。

第一个到大陆参加国际性会议的台湾“官方”代表团——今年5月1日，台湾“财政部长”郭婉容率领中国台北代表团，从东京飞抵北京，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第22届理事会，引起海内外人士瞩目。

各界群众怎样评价治理整顿

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已经七个多月了，现在进展情况如何？这是举国瞩目，众说纷纭的重大问题。《半月谈》杂志社于3月17日到5月10日就此作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我们发出问卷9000张，在已收回的3735张问卷中，有1867名(占49.99%)接受调查者认为治理整顿“已见成效”；有1539人(占41.20%)持相反态度，认为“未见成效；有232人(占6.21%)说“越治越糟”；还有97人(占2.60%)由于种种原因不予回答。上述情况表明，治理整顿举步难艰，任重道远，不容稍有懈怠。

作为治理整顿的主要内容之一——物价，现在怎么样了？有2016人(占53.98%)的看法是，物价总的上涨

幅度同去年涨得最猛时比较"差不多",有805人(占21.55%)的看法是"更大了";有775人(占20.75%)的看法是"变小了";还有139人(占3.72%)没有表态。

对于市场日用百货和主副食品的供应状况,由于各人所处的地区和环境不同,认识上有差异是必不可免的,调查的结果是:58.77%、43.21%、31.14%的接受调查者依次认为穿的、吃的、用的都丰富;41.82%、36.33%、40.40%的人依次认为吃的、穿的、用的都一般,只有24.63%、12.07%、3.96%的人依次认为用的、吃的、穿的都比较紧缺。

同物价、供应紧密相关的是如何看待通货膨胀问题。在"愿意在银行存款吗"这个问题面前,有2320人(占62.12%)表示"为了备用,应有存款,但钞票会贬值";有816人(占21.85)表示"存款还是有利的,有利息,能保值";有531人(占14.24%)说"宁可购物保值,决不存钱";还有67人(占1.79%)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于银行收紧银根,人们的感受更是各种各样:有44.50%的人认为"银根收紧以后,通货膨胀不再恶性发展";28.11%的人抱怨从此"借贷无门,生意难做";17.80%的人甚至认为此举"不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对"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评价是:2639人(占70.66%)认为"控制不严,漏洞很多";670人(占17.94%)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控制措施得当,效果好";有296人(占7.93%)批评"控制得过了头,太死了"。

谈到本地区、本单位的改革形势时,50.20%的人说是"虽有困难,继续前进";39.38%的人倾向于"徘徊观望,畏步不前";6.67%的人指出有"往回缩,老一套又来的"的现象。

当问及"对治理、整顿、调查、改革的前景怎样估计"时,大多数人,即2696人(占72.18%)的回答是"抱有希望,亦有担忧";比例不大的被调查者598(占16.01%)"持悲观态度,走着瞧";382人(占10.23%)表示"充满信心"。

这是《半月谈》杂志社近期在全国28个省、市、区(缺新疆、西藏)问卷调查的结果。这一次共发出问卷9000张,时隔一个半月之后回收了3735张,回收率为41.50%。

这次调查对象以城市居民为主,占91.65%,乡村接受调查的人数不多,占8.35%。被调查对象中以文化程度分,大学和中学文化程度占多数;以事业分,党政干部、工人农民、士兵、文教工作者、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户、家庭妇女和待业人员等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可以说,这次调查有广泛的代表性。

(《半月谈》民意调查室)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作了这次讲话,指出了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性质,同时重申我国的基本路线不变。这次讲话统一了全国的认识,有稳定形势的作用。

摘要如下: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看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

——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

89'政治风波结束后，中共召开了这次全会。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稳定了全国的形势，对某些问题作出了结论，另一方面，它产生了中国的第三代领导，这必然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会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8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8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29人。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这个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这次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全会相信，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得到继续发展。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满怀信心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河殇》宣扬了什么

1988年，《河殇》曾风靡一时，名噪海内外。1989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易家言的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展开了对《河殇》的批判。

摘要如下：

——《河殇》实际上唱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它不仅宣告了所谓“黄河文明”(即中华文化)的夭折和衰亡，而且是对一个伟大民族及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全

盘否定。

——《河殇》不是用唯物史观、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的观点来解决中国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

——《河殇》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了嘲讽、挖苦和否定。甚至把“黄水”、“黄土”、“黄豆”、“黄米”以至“黄皮肤”，都当作了中国文化落后无望的标记，这对于十亿人民，包括居住在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数千万“炎黄子孙”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河殇》作者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取怀疑甚至嘲讽的态度。这种否定中华民族统一，鼓吹在中国版图上“众国林立”、“分疆裂土”的观点，是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不符合亿万炎黄子孙的意愿的。

——《河殇》没有把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抵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历史上军阀混战那样的动乱加以区别，相反，把历史上包括奴隶、农民起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都笼统地说成是“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的恶性活动。

——《河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对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我国消灭剥削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给以任何历史地位。

——《河殇》对于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歌颂和美化。

——尽管《河殇》有许多主张、呼唤改革和开放的语言，但它的主张和呼唤与党中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不是一回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改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河殇》的作者们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还把自己奉为中国摆脱了历史“局限”的“整个文化精英层”的代表，宣称《河殇》“寄托了整个文化精英层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实际上把自己看成了中国进行社会改革的“不依附政治权力”的独立的领导力量。

——《河殇》学风不正十分严重。它根本不讲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是任意找来某些现象或字句，形而上学地拼凑在一起，进行马克思反对过的“肤浅的历史对比”。事实也不核实，引文也不核实，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采取了任意曲解的态度。

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单

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比1月25日上午在京揭晓，23名优秀中青年演员榜上有名。

获戏曲奖的15名演员是(按得票多少为序，下同)：王万梅(榆次)、叶金援(北京)、左大珍(湖南)、郭彩萍(太原)、冯刚毅(深圳)、沈健瑾(北京)、雷保春(石家庄)、曾静萍(福建)、邓敏(武汉)、陈美兰(浙江)、古小琴(四川)、朱世慧(湖北)、杨春霞(中直)、王清芬(新乡)、沈铁梅(重庆)。

获话剧奖的5名演员是：刘远(陕西)、王巍(宁夏)、宋洁(中直)、李放(辽宁)、卢志启(广州军区)。

获歌剧将的是：万山红(中直)、郭卫民(湖南)。

获特殊剧种奖的是常州滑稽戏演员张克勤。

电影第九届“金鸡奖”与第十二届“百花奖”名单

1988年度电影第9届“金鸡奖”、第12届“百华奖”8月10日上午在北京当众开奖。代表我国电影综合艺术最高水平的大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由于三部提名电影《晚钟》、《共和国不会忘记》和《顽主》均未获得评委会过半数票而宣告空缺，爆出了新中国电影评奖史上最大的冷门。

与最佳故事片一齐宣告空缺的还有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音乐、最佳录音等四项“金鸡奖”，它们在一起构成引人注目的空白。

36岁的青年导演吴子年，以自己力作《晚钟》、《欢乐英雄》及《阴阳界》摘取了本届“金鸡奖”最佳导演的桂冠。陶泽如、谢园两名新人并列最佳男主角，徐守莉获最佳女主角，孙敏获最佳男配角。

获本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的是《多梦时节》，最佳美术片为《山水情》，最佳科教片为《增长的代价——人口与经济》，最佳纪录片为《蛇口奏鸣曲》。

由观众投票选举的“百花奖”结果如下：获最佳故事片的有《春桃》、《寡妇村》、《共和国不会忘记》，最佳男女主角由《春桃》一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姜文和刘晓庆荣获，最佳男配角为擅演反派角色申军谊获得，最佳女配角为巩俐。

电视第九届“飞天奖”与第七届“金鹰奖”名单

第九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4月24日在京揭晓。

规模宏大、制作精细的《末代皇帝》荣膺连续剧特别奖。这部连续剧在去年的电视剧止中收视率最高。近来在观众中引起较大反响的《师魂》获连续剧一等奖，它敏锐地触及到教育问题这一引起民族思考和情感波动的热点。由于连续剧是各电视台的“重点项目”，因而竞争较为激烈。除《裤裆巷风流记》、《家教》获第二等奖、《篱笆、女人和狗》、《绿荫》获三等奖外，这届评选还增设了提名奖，获本届评先提名的有《评梅女士》、《撞击世纪之门》、《那五》、《袁崇焕》、《大西北人》、《家·春·秋》、《带后院的四合院》。

相形之下，去年的单本剧的创作显得逊色，一等奖出现空缺。《白栅栏》、《白色山岗》获二等奖，《花鸽子》、《汪老师的婚事》、《塔铺》、《汉家女》获三等奖。颇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好爸爸、坏爸爸》以其盎然天趣获儿童连续剧一等奖。此外，《病毒金牌星期天》获儿童单本剧一等奖，《春天的17个瞬间》获译制片一等奖，而短剧小品，戏曲片一等奖则出现空缺。

4月24日，“飞天奖”的各项单项奖也同时公布。《师魂》、《好爸爸、坏爸爸》的编剧诸葛怡，《末代皇帝》的编剧王树元获优秀编剧奖，优秀导演奖则被《病毒金牌星期天》的导演冯小宁摘取。优秀男主角、优秀男配角、优秀女配角得主分别为陈道明、牛星丽、顾艳，优秀女主角奖出现空缺。优秀摄像、优秀照明、优秀美术获奖者为谢平、胡平和《末代皇帝》剧组。

第七届大众电视金鹰奖7月28日在杭州揭晓。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末代皇帝》以高票数当选优秀电视连续剧奖。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作品改编的《家·春·秋》(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四川电视台合拍)和《大酒店》(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同时获优秀电视连续剧奖。

获优秀电视单剧奖的3部电视剧是上海电视台的《十八岁男子汉》、《花鸽子》(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和《甲肝1988》(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

获优秀电视儿童剧奖的是《三个和一个》(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获优秀电视戏曲片奖的是《朱熹和丽娘》(安徽电视台)。

获最佳男主角奖的是青年演员陈道明，获最佳女主角奖的是徐娅。陈裕德获最佳男配角奖。北京人艺演员朱琳获最佳女配角奖。

获特别奖的是《师魂》(中央电视台、龙江电影制片厂、儿童艺术剧院合拍)和《男子汉虎虎》(四川电视台)。

中国影片两获国际大奖

《晚钟》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

又一名中国导演登上了去年张艺谋站过的领奖台。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吴子牛导演的故事片《晚钟》，在2月21日结束的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评委会特别奖(银熊然)。这是该电影节的第二大奖。

这部影片描写1945年日军投降后，八路军一支清理战场的小分队与一支守卫弹药库的日军小分队遭遇。这些与外界消息断绝的日军因断粮而面临死亡，八路军与之展开了一场受降与反受降的斗争。影片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灭绝人性的残害从正反两面剖露出来，从而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再认识。

《人·鬼·情》在国际妇女电影节获公众大奖

第11届国际妇女电影节3月19日下午在巴黎东部克雷黛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女导演黄蜀芹执导的《人·鬼·情》在本届电影节上获得了长故事片公众大奖。我国电影第一次参加这个妇女电影节就获得了大奖，在这里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妇女电影的极大兴趣。

电影节联合主席伊丽莎白对本报记者说，评委会和广大公众都喜爱《人·鬼·情》片子，她是不同文明精神的聚合，能为有种种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1989年我国田径十佳与羽毛球十佳运动员

中国田径协会等11月29日上午在京举行颁奖会，向当选的1989年全国田径十佳的运动员祝贺。

这10名当选的运动员是：黄志红(24岁，浙江) 王秀婷(24岁，山东) 侯雪梅(28岁，解放军) 张丽(28岁，天津) 钟焕娣(23岁，云南) 金冰桔(18岁，辽宁) 金玲(22岁，辽宁) 毕忠(21岁，江西) 冯艳波(24岁，吉林) 刘淑珍(23岁，河北)

在会上接受团体奖的有中国女子长跑队、中国女子竞走队和中国女子马拉松队。接受优秀奖的有辽宁女子竞走选手李景雪、山东女子中长跑选手孙素梅和北京跨栏选手李彤，他们都在1989年刷新过亚洲纪录。

我国羽毛球运动水平多年来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从1981年以来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夺得过47枚金牌，称得上长盛不衰。为了表彰成绩卓著的运动员，积极为明年亚运会作准备，中国羽毛球协会等单位首次评选中国羽毛球十佳运动员。

被评出的十佳运动员有：李玲蔚、杨阳、韩爱萍、林瑛、韩健、李永波、田秉毅、关渭贞、张爱玲、史方静。其中李玲蔚在世界大赛中共夺得18枚金牌、韩爱萍夺得14枚金牌、林瑛夺得12枚金牌。杨阳为中国队夺得第十四届和第十五届汤姆斯杯立下了汗马功劳，连获第五、六届世界锦标赛和两次世界杯赛男子单打冠军等。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7日　监察部查处挪用外汇进口旧车案。商业部储运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及直接责任者受到处分。

1月10日　中共中央最近批准中组部意见，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月11～14日　中宣部、团中央举行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表彰会，表彰百名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国内首次由全社会评选出来的先进典型)。

1月12～19日　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确定今明两年主要任务：严惩严重刑事和经济犯罪活动。

1月13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1月15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产生。

1月18日　又有29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我国已有571个市县对外开放。

1月19日　拉萨召开宣判大会，公开宣判(1988年3月5日)骚乱事件中的犯罪分子。

1月21日　武警将军授衔仪式在京举行。

1月23～28日　全国纪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乔石强调在深化改革中提高全党组织纪律观念。

1月24日　国务委员邹家华在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说，治理民航要用铁的纪律。

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5次会议，讨论加强政法工作、稳定社会治安。

七届政协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暂行规定》。中共中央表示赞同。

1月28日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国务活动家、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 佛教的杰出领袖、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逝世，终年51岁。

2月1日　武装警察部队着新式警服，佩戴警衔、符号。

2月2日　乔石在中央党建研究班上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须联系基本路线。

2月3日　杨主席命令发布施行《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

2月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党政干部限三月底前辞去公司兼职。

2月11日　全国爱卫会决定，每年4月为全国“爱国卫生月”。

台湾空军飞行员林贤顺驾机飞回大陆。

2月13～16日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提出试点单位经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

2月13日　国家科委召开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

2月14日　人事部、中组部发出通知，今年起国家行政机关考试补充人员。

2月15～21日　七届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同日公布，8月1日起施行)、《传染病防治法》(同日公布，9月1日起施行)，决定将《行政诉讼法(草案)》等提交人大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决议。

2月15日　《李先念文选》出版发行。

2月17日　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

2月20日　国务院发布《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5月1日起施行)。

2月21日　全国计生委主任会议在京举行。今年4月我国人口将突破11亿，约有半数育龄夫妇不按政策计划生育。

2月23日　海南全面考评省直领导，工作称职否由下级来评议。

2月2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第16次会议，原则同决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

3月5～7日　拉萨发生严重骚乱事件。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肆意打砸抢烧并开枪。公安干警被迫采取果断措

施控制事态。3月7日，国务院下令从3月8日零时起拉萨实行戒严。形势迅速稳定。

3月12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

3月13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

3月14日　王忠禹当选吉林省长。

3月19～27日　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在京举行，增选侯镜如、丁光训为政协副主席。

3月20日～4月4日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等6个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4日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等2个法案和一个决定。

3月21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规定》(5月1日起施行)。

3月29日　中央书记处致函民进中央，拟吸收采纳加强基础教育的建议。

国务院发布施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

原人大副委员长、原海军司令员、中顾委常委肖劲光同志逝世，终年86岁。

4月4日　杨主席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4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乔石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4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同志逝世，享年73岁。22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

4月16日　公安部、全国妇联座谈会强调，齐抓共管消除社会丑恶现象，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卖淫嫖娼活动。

4月18～20日　一些人围聚新华门，试图冲入中南海。北京市政府指出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发布通告警告蓄意闹事者。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北京上海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号召迅速行动，坚决制止动乱。

4月27日　上海市委决定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傅锡寿当选安徽省长。

4月29日　政府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等)同首都高校学生(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30日　北京市领导同部分学生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等问题。

5月3日　首都青年集会纪念五四70周年。赵紫阳作题为《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参加。

5月5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5月8日　有关部门答复首都高校学生对话要求时宣布，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将同各界对话。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同样表示。

5月13日　首都各高校数百(后发展到上千)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李铁映等到现场劝说回校。绝食持续到19日，改为静坐。晕倒得病者得到政府组织的医疗部门的救护，未死一人。

5月15日　湖南省副省长杨汇泉因清理整顿公司不力，被省人代会罢免。

陈邦柱当选湖南省长。

5月18日　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等)。

5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杨尚昆先后发表讲话，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首都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从外地调来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据此，陈希同市长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5月21日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表告北京市民书，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学生，希望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给予大力支持协助。

5月26日　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决策。

6月3日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拦截军车，阻拦、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行勤务。

6月4日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称，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已于今晨五时左右进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同时撤离。

6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通报已取得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成果，同极少数暴乱分子斗争到底，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

6月6日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指出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地方上受伤2000多人。军队和地方初步统计死亡近300

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罪有应得的歹徒、误伤的群众。暴徒烧毁破坏各种车辆（主要是军车）500多辆。天安门广场清理过程中未放一枪、未死一人。

6月7日　中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的纪律保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

6月9日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

6月11日　公安机关通缉方励之、李淑娴夫妇。

6月13日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

6月14日　国务院发布《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北京“工自联”头头和骨干（韩东方等）。

无产阶级革命家、七届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同志逝世，终年76岁。

6月18日　杨尚昆主席会见三烈士（崔国政、刘国庚、李国瑞）亲属，代表中央军委和邓小平主席表示亲切慰问。

6月23～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会议前（19日—2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6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

6月29日～7月6日　七届人大常委第8次会议在京举行。万里讲话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听取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情况报告（戒严部队6000多人负伤，数十人死亡。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车辆1280多辆，其中军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暴乱中有3000多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北京市损失社会总产值13亿元）。会议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委员长会议建议公布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征求意见，并决定由四委员组成调查组，清查胡绩伟和“四通公司”搞的签名事件。

7月3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8月1日起施行）。

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吴戈《<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策略》。

7月17～21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等讲话，指出全党必须加强宣传和思想工作，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关于中国的声明》。

7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易家言《<河殇>宣扬了什么？》，并加编者按，批判赵紫阳压制正确意见。

7月20日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撤销方励之所任各职务。

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在巴黎发表一项所谓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7月25日　倪志福在全总主席团会议上强调，中国不允许成立反对党性质工会。

7月26日　总政在京举行首都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会。

7月27～28日　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

7月28～30日　在美台港反动势力庇护支持下，叛逃分子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在美上演一出闹剧（召开“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活动。

7月30日　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决定，撤销苏绍智所任会长等职务。

7月31日　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同志病逝，终年81岁。

8月2日　我国南沙群岛六礁主权石碑全部落成。

8月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15日发布施行）。

8月5日　中宣部召开新闻理论座谈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拉萨公开宣判，参加“3·5”骚乱的十名分子被判刑。

8月9日　中国社科院及院机关党委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8月10日　四通集团公司总裁万润南被开除公职、党籍。

8月11日　国务院第45次党务会议通过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廉政建设的新起点》。

8月15日　高检高法发出通告，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分子10月31日前自首坦白给予从宽处理。

8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求是》杂志刊登的邓小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

袁木接受日记者采访,指出我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戒严出于继续稳定局势需要,目前不能取消等。

8月17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对违犯者严加追究。

8月18～22日　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举行,提出下决心把党建设好。21日,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同会议代表座谈,强调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

8月19日　监察部发出通告,国家机关有贪污贿赂行为者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代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忻华实《<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8月20日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出版发行,重要文章、讲话39篇,近25万字。

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8月24日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作出部署,健康深入地开展"扫黄"工作。国庆节前要全面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李瑞环提出必须严格执行政策。

8月25日　西藏扎什伦布寺宣布由国务院批示的公告,寻访认定班禅大师转世灵童。

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8月29日～9月4日　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9次会议,通过《关于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的征求意见时间延长至10月底止的决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批准中蒙两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决定》,免去王蒙文化部长职务。

9月4日　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写信,诚恳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得到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

9月6日　中办、国办作出《关于中共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提出副部长级干部一律不配备专车等。

9月12日　西藏公审参与"3·5"骚乱、从事特务活动的六名罪犯。

9月13日　监察部公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9月14日　监察部宣布,海南省省长梁湘犯有严重以权谋私错误,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决定撤销其党内外职务。同日,刘剑锋当选海南省省长。

9月17日　公安部发布临时身份证管理暂行规定,10月15日开始实施。

9月18日　新华社发表《和平撤离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中办、国办作出《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

北京广播学院开除苏晓康(苏为该院教师,参与电视片《河殇》总撰稿,煽动暴乱,叛逃国外)公职。26日,该院纪委开除他的党籍。

9月20～22日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出席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代表颁奖。

9月20～23日　首次全国基层党校工作座谈会在山东泰安市举行。

9月20日　李瑞环同各地宣传出版部门负责人座谈,强调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务求见效。

9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会改变》。

9月26日　国务院发布《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12月1日起施行)。

9月29日　首都万余人集会庆祝共和国生日。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统一认识的十个重要问题。

9月30日　李鹏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江泽民、杨尚昆、万里、邓颖超等同各界人士和五大洲宾客出席。李鹏在讲话中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中宣部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通知》。要求全党全民着眼于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振奋精神夺取更大胜利。

10月1日　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联欢(焰火)晚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和西哈努克、李钟玉等贵宾与人民群众共庆佳节。

10月4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杨洋事件"发表谈话说,香港政府于3日准许杨洋离港前往美国,开一极坏先例,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

谭绍文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10月6日　中纪委向全国纪检系统发出部署贯彻江泽民国庆讲话的通知。

10月9～11日　全国政协召开第22次主席扩大会议,学习江泽民的国庆讲话,李先念主席出席11日会议并讲话,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0月10日　邓小平同志给全国少先队组织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0月11日　团中央、中国少先队全国工委会、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的"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评选揭晓。

10月12日　江泽民、李鹏会见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国家机关第三期党委书记研究班的同志。江泽民强调，切实抓好党的建设极为重要。李鹏要求各部部长成为精通业务的革命家政治家。

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等会见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和少儿工作者代表，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少儿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

10月13日　国务院举行第49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10月18日　乔石会见参加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先进集体表彰大会的代表时指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

10月22日　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活动受贿案，由于其能坦白全部罪行，退出赃款赃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

10月2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43号令，发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45号令，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月25～31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全国人大六个专门委员会关于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部分委员变动的报告。

10月28日　中共中央隆重举行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彭真主持大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

10月3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17号通告，通告说，首都形势日趋稳定，即日起戒严部队在立交桥和路口的执勤岗哨全部撤离；11月1日起，天安门广场将由武警部队接替戒严部队执勤。

11月6～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并发表公报。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总书记在全会结束前作重要讲话。

11月10日　中顾委第五次全会在京举行并发表公报。全会完全赞同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一致拥护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和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以及其他决定。完全赞同五中全会对邓小平同志的卓著功勋所做的高度评价。

11月11日　首都集会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

11月13日　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统一行动。

11月14～16日　全国妇联六届二中执委会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农村基层妇女代表会工作条例》、《城镇基层妇女代表会工作条例》、《党政机关、教科文卫系统妇女委员会工作条例》、《妇女联谊会工作条例》和《全国妇联执委工作规则》。

11月16日　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少年儿童广泛开展学赖宁活动。

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学习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各项文件，通过了《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决议》。

11月17日　国务院举行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草案)》。

11月18日　聂璧初当选为天津市市长。

11月18～20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在广州举行并发表公报，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结构(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专题小组的决定》，并成立了五个专题小组。

11月21～29日　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27日会见了与会代表。会议提出明年检察工作的重点：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彻底清查和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

11月24日　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指导小组日前决议，将开放1949年以前到大陆定居的台籍同胞返乡探亲，并允许台湾低阶层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

11月30日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涉及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特务案的11人进行公开宣判。

12月13～16日　共青团12届2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提出明年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针，宋德福作题为《迈好九十年代第一步，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贡献力量》的讲话。

12月15日　国务院召开第52次常务会议，讨论并

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草案)》。

12月18～22日　第4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2月20～25日　第四次全国地方外事办公室主任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在会见会议代表时说，明年全党的任务是保持国内政治局势持续稳定，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的发展。李鹏在同与会代表座谈时指出，外交工作的总目标就是为我国的四化建设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月20～26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还通过了批准中国和土耳其领事条约的决定。会议根据李鹏总理的提请，任命邹家华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免去姚依林兼任的国家计委主任职务；任命何光远为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免去邹家华兼任的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职务。会议期间，听取了李铁映作《关于我国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汇报》。

12月21日　江泽民、李瑞环会见由《大公报》社社长杨奇率领的香港新闻界访京团，江泽民重申内地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国无意输出革命但也不许别人扭转中国航向。

12月21～25日　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监察部部长尉健行在开幕大会上指出，明年监察工作的重点是继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李鹏在闭幕会上指出，监察工作既要敢于碰硬，排除阻力，又要实事求是，讲求方法。

12月29日　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党校，同党建理论研究班全体成员进行座谈，江泽民就党的建设总理作重要讲话，强调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经　济

1月1日　葛洲坝工程全部建成，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相当于建国初期全国年发电量的3倍。

1月2日　我国扩大建设事业国际合作，开展对外承包10年，签订5000多个合同。

全国股份制企业逾6000家。

1月3日　我国已成为净受援国，接受援助多于对外援助。

1月8日　我海洋石油开展对外合作，10年发现油气井15口。合作对象已有12个国家，预计明年可产油300万吨。

去年我国商品零售总额超常增长，总额超过7400亿元，比前年增长27.8%。

1月10日　我国外贸去年出口突破400亿美元，提高达到"七五"末年指标。

1月13日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谈今年经济工作重点，国民生产总值初步确定增长7.5%，运用各种手段抑制通货膨胀。去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3600亿元，问题是经济过热，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8.5%。

1月21日　人民银行宣布，2月1日起调整存款利率，平均提高3.06个百分点。

1月26日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通知各地，严惩制造销售假劣农药活动。

我评出100家最大工业企业，大庆、鞍钢、武钢、上海石化和燕山石化列前5名。

2月5日　国家决定开设第一批期货市场。

2月16日　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指出，治理通货膨胀双管齐下，既要管好人民币也要管好外汇。

2月20日　国家体改委负责人指出，企业改革重点仍是承包制，股份制试点不宜铺开。

2月24日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指出，去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80亿赤字尚可控制。

2月25日　文化部、国家税务局强调，演员演出收入要依法纳税。

2月26日　国务院调整政策，防止棉花生产滑坡。棉花收购提高价格，调出调入实行包干。

3月2日　国务院发布《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发布《1989年国库券条例》，共发行55亿元；发布施行《1989年特种国债条例》，发行55亿元。

3月3日　中央领导向企业家颁奖。20位优秀企业家获(第二届)金球杯奖，10个优秀管理企业获(1988)金马奖。

3月6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

3月7日　全国撤并公司17000家，党政机关办企业基本制止。去年查处经济违法案94万多件。

国家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合同定购粮油4月起提价。城镇居民定量粮油和行业用粮不涨价。

3月9日　劳动部规定每个新工人都须先培训后就业，凭技术定岗位。

3月10日、14日　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召开，通过《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15日发布)。

3月16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动员各地安排生产先保农业。

4月1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制，着重强化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等。

5月4日　亚行第22届年会在京开幕。

5月12日　国务院4部门发出通知，土地开发利用从今年起纳入国家计划。

5月14日　规模全国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二滩电站首期工程全面铺开。设计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年发电量170亿度。

6月7日　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全部建成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28万千瓦。

6月26日　我国承建的自动化程度最高、功率最大的4万吨冷风集装箱出口船"柏林快航"号在沪下水。

7月3日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去年国家财政收入超额完成预算，总收入2600多亿元，赤字78亿多元。

8月4日　姚依林会见亚行官员时说，中国将负责地偿还外债。

进口商品实行质量许可，汽车电视机等9种商品明年5月1日率先实行。

8月12日　广州出让7块地皮使用权，共42000平方米，最长年限70年。

8月15日　李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年内经济工作重点仍是三件事：继续稳定物价、争取农业好收成、缓解总供给总需求矛盾。

审计署公布结果和处理决定，全国人民注目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五大公司"查出违法经营问题，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五千一百多万元。

8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8月18日　我国去年国际收支平衡有余，外汇储备增加，贸易进口失当，出现大幅度逆差(53.2亿美元)。

8月22日　李鹏会见外宾时谈我国经济改革：适当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高积累高消费只能带来一时表面繁荣。

8月3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9月2日　经国务院批准，铁路水路民航客运5日开始提高票价，平均提价幅度分别为112%、96%、77%。

9月14日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强调，目前国家财政存在困难，要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

10月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41号令，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0月6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我国自1985年至1988年末全国外债余额，去年年末外债余额为400亿美元。

10月7～13日　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科工委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军民结合工作会议。李鹏13日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坚持军民结合方向发展，军工企业应按照产业政策调整结构。

10月11日　李鹏在全国生产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经济形势朝着预定方向发展，当前必须认真搞好治理整顿；邹家华在会上要求各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增强活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10月15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权威资料统计表明，我国11亿人民的生活质量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10月25日　全国清理整顿公司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作出部署年内重点是撤并公司查处要案。

10月25～29日　全国农业机构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邹家华在开幕会上说，要按照国情、国力，分两步走，争取到下世纪中叶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国务委员陈俊生在闭幕会上强调，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11月4日　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已达9200家，比去年同期增长40%。

11月5日　国务院日前批转技术监督局等十单位关于建立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统一代码标识制度"的报告。

11月7日　国务院最近批转物资部《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物资公司的意见》，重点是撤并一批不符合开办条件经营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公司。

11月10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外汇(转)贷款登记管理办法》，于本月15日起施行，公布《外债登记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1月1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

11月15日　国家税务局召开全国县以上税务局长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克服一切困难，确保工商税全年超收60亿元。

11月25日　经贸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大陆不会改变对台经贸政策，否认大陆对台商采取了紧缩措施。

11月28日～12月2日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宣布明年粮食政策定购数量、奖售标准、粮食体制不变，并提出粮食消费要适度，扎实开展双增双节运动。

11月29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外币兑换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0月30日起实行。

11月4日　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宋平、陈俊生在会上要求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进三北防护林建设。

11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鸡蛋年产量已达600多万吨，居世界第一。

11月13日　陈俊生在南阳召开的第4次大别山扶贫开发座谈会上宣布，经过4年的努力，全国有6000万人脱贫，但稳定解决温饱问题还需努力好几年。

11月16～17日　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大陆方面）和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台湾方面）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双方委员会希望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与发展，以达到经贸双方交流和直接贸易的目的。

11月17日　国务院新近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分析目前的经济形势是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并强调明年经济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为：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11月24日　我国钢产量突破6000万吨，提前完成全年计划。至此，我国和苏、日、美成为世界上钢产量超过6000万吨的国家。

11月26日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江泽民、李鹏分别给会议写信和题词，勉励协会进一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1月31日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进口物资监督管理办法》，自1990年1月15日起实行。

军　事

2月10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发布春季征兵令。

3月2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嘉奖赴云南抗震救灾有功部队。

3月11日　中央军委批准确定，海军成立日为1949年4月23日（即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日）。

4月28日　我国建成导弹航天测控网。

6月30日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发布命令，授予（刘国庚等）10位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7月18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邓小平为首都戒严部队提词："共和国卫士"、"首都卫士"。

7月27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授予10位同志（赵勇明等）2位烈士（于荣禄等）"共和国卫士"称号。

7月31日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建军62周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戒严部队官兵代表等千余人出席。

8月1日　全军文职干部今起佩带胸章。

10月19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北京举行。

10月26日　中央军委最近颁发命令，给国防科工委远望一号、远望二号测量船记集体一等功。

11月10日　空军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杨尚昆及中央军委全体领导成员出席祝贺。

解放军三总部发出通知，要求军队义务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明年起每人平均义务劳动不少于10天。

11月10～12日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邓小平同志12日会见了与会全体同志，强调指出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与会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以常委组成人员的调整，江泽民、杨尚昆、刘华清、杨白冰在会上讲了话。

12月1日　国务院举行第51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草案）》。

12月11～17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并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重要文件。

12月19日　历时7天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京结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会上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坚定信心过几年紧日子。

外　交

2月1～4日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我国。杨尚昆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被接受。赵紫阳、邓小平等会见了他。

2月5日　中苏两国外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双方达成9点一致看法。

2月11～13日　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访问我国。

2月20日　人大常委谴责日本当局（竹下首相）翻案，指出侵华历史不容歪曲，战争罪责岂能开脱。

2月25～26日　美国总统布什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

3月14～17日　泰国总理差猜访问我国。

3月17日　邓小平强调，解决柬埔寨问题坚持三原则（越南全部撤军，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柬四方各自裁军）。

3月18日　人大外委会发表声明，谴责欧洲议会通过所谓《关于西藏人权》的决议，干涉我国内政。

3月21日　我驻美使馆就美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决议一事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

4月4日　我外交部照会越南使馆，强烈抗议越方武装船只开枪打死中国渔民的暴行。

4月12～16日　李鹏总理访问日本。

4月18日　我国与巴林建交。

4月24～29日　赵紫阳访问朝鲜。

5月9～14日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问我国。

5月12～23日　万里访问加拿大、美国。因健康原因提前回国。

5月15～18日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我国。16日，邓小平同他会见，双方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6月5日　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局势进行指责。7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极大遗憾。

就欧共体取消欧中欧委会谈判和高级磋商事，我国代表团深表遗憾。

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到美驻华使馆"避难"。美使馆给予"保护"。8日，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

6月29日　我国驻法使馆教育处被一伙人强行侵占和骚扰。7月14日，又遭一伙身份不明青年的袭击。我外交部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8日　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中国政府信守中英联合声明，不允许利用香港作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基地。

7月13日　外交部发言人坚持要求法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吾尔开希等人利用法国领土反华(暴乱后，吾等叛逃国外)。

7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决不能让"双重承认"的图谋得逞》(7月19日，与我建交的格林纳达宣布与台湾建交)。

8月7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我国中止同格林纳达外交关系。

8月16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召开有关西藏"国际会议"是对我国内政粗暴干涉。

9月4日　各国议会联盟第82届年会否决干涉我国内政的决议。

9月11日　我国与密克罗尼西亚建交。

9月19日　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领的代表团，强调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提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

9月25日　就法允许"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事，我外交部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9月28日　中英外长在联合国总部就香港问题会谈。钱外长重申中国政府对香港前途政策不变。梅杰外交大臣重申英遵守中英声明义务。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侵占我国南沙群岛岛礁。外交部发言人同时指出，越南并未真正从柬全部撤军。

10月2日　钱其琛外长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4点意见。

10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10月4日　我国自今日起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10月4～6日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访问我国。

10月5～12日　老挝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访问我国。

10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愤慨。9日，我国驻挪威大使李宝诚就授予达赖和平奖一事向挪威政府提出严正交涉。

10月10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止中国同利比里亚外交关系发表声明指出，坚决反对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

10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解决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的事，坚决反对英国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的企图。25日，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示反对把香港问题"国际化"。

10月19日　江泽民总书记电贺克伦茨当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

外交部发言人说，相信中国和民德的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搞"双重承认"的企图。发言人对美国肯尼迪纪念基金会授予方励之人权奖一事表示极大遗憾和强烈愤慨。

10月24～25日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

10月26～31日　西萨摩亚总理托非劳访问我国。

10月28日～11月2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

11月1日　我国连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

11月5～7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11月6日　中国当选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理事国。

11月7～10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我国。

11月13～27日　中苏外交军事专家小组在莫斯科举行首次谈判。

11月14～21日　李鹏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尔，受到隆重和热情的欢迎。

11月17～22日　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访问我国。

11月20日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22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就此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任何制裁阻止不了中国人民胜利前进。

11月22日　我国将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参加联

合国维护中东和平行动。

11月29日　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发表讲话，对美国《洛杉矶周刊》最近刊登和散发伪造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表示极大的遗憾和强烈的不满。

12月4日　我国在第20届万国邮政联盟代表大会上当选万国邮联执行理事会和研究咨询理事会成员国。

12月5～8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6次会议在澳门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双方就澳门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海事组织的进程达成协议。

12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说，已注意到美国总统布什否决国会“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遗憾的是又以行政手段使法案的各项措施得以实施。发言人还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强权政治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12月9～10日　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我国。访问期间，邓小平同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钱其琛外长同斯考克罗夫特特使举行了会谈。

12月11日　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约见挪威驻华大使霍尔维克，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日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及挪威领导人参与授奖活动事，向挪威提出严正交涉。

12月18～28日　杨尚昆主席访问埃及、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受到4国政府和人民隆重和热烈的欢迎。

12月30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英国政府决定改变部分香港居民国籍问题发表谈话，要求英国政府改变错误做法。

文化教育

1月3～25日　我国胜利进行了350米饱和潜水实践，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月14日　上海市中小学破墙开店成风，教育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制止。

2月22日　高志平中标担任东方歌舞团团长。

2月25日　我国男中音曹群技压群芳，获巴利梅纳国际音乐节最高奖。

2月26日　中国南极中山站落成。

3月10日　我国首次公布科技蓝皮书，汇集14个领域技术政策要点。

3月13日　全国首家艺术影院在上海创办。

3月23日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发展不够。

4月6日　我国核技术领域又一重大成果，首座脉冲核反应堆达临界。

4月8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第17次会议，讨论关于教育问题决定草案。

4月10日　第8次全国农村科普会议在京举行。

4月18日　电影《红楼梦》在京首映。

4月21日　华中师范大学廖晓昕教授攻破困扰国际数学界44年之久的“鲁里叶”难题。

4月22日　我国室温核聚变实验成功。

4月24日　第9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揭晓，《末代皇帝》获电影连续剧特别奖，陈道明获优秀男主角奖，优秀女主角空缺。

5月15日　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性风俗》一书。书中有污辱伊斯兰教内容。

5月29日～6月2日　我国首次举行(1989年)中国国际体育电影节。我影片《同在蓝天下》获大奖。

8月15日　我国第一胎“试管”牛诞生。

8月16～19日　第4次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8月23日　我国人工引发雷电实验成功。

9月1日　北京国际电视周开幕。

9月15日　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京开幕。

9月21日　首届中国电影节在京开幕(27日闭幕)。1988年优秀影片奖(政府奖)颁布，《巍巍昆仑》等影片获奖。

9月25日　我国卫星通信技术有突破，首次双星快速定位通信演示成功。

9月26日　全国首届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开幕。

10月7日　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名流学者与会。

10月9日　《中国电影周报》评选出建国40年来的10大电影明星，他们是：赵丹、白扬、崔嵬、孙道临、于蓝、王心刚、谢芳、刘晓庆、潘虹、姜文。

10月11日　首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京开幕。

10月14日　《中华英才》画报在京创刊。

10月23～28日　89中国第二届国际科教电影节在上海举行，获得本届电影节荣誉奖的有28部影片，其中有中国的《全息胚》、《沙海绿洲》、《世界珍禽——黑鹳》。

10月24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44号令，发布《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1月1日　“21世纪国际专利制度世界讨论会”在京开幕，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专利局向10项“首届中国专利发明创造金奖”获得者颁奖。

11月1～6日　第2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石家庄举行，一批国内外优秀节目分别获得金狮、银狮、铜狮奖和特别奖。

11月3～12日　第4届全国发明展览在成都举行，参展的942项发明中有48项获金牌，106项获银牌，411项获铜牌。

11月6～12日　首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在北京举行。

11月7日　首届国际儿童电视节目展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1月13日　直径为2.16米的天文反射望远镜工程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举行落成典礼，这是远东直径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11月15日　从湖北郧县发现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在武汉展示，这一发现在我国、在亚洲都是首次，证明中国是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

12月5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画艺术大师李可染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2岁。向李可染先生遗体告别仪式22日在京举行。

社会生活

1月2日　长江上发生两艘油驳燃爆事故。

1月10日　1989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认为，我国大陆地震有明显起伏增强趋势。

1月21日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在京成立。

1月29日　1988年体育“十佳”运动员评出：许艳梅、楼云、高敏、陈静、杨文意、陈龙灿、韦晴光、李梅素、庄泳。

一客车在沙市坠入长江，47人丧生。

3月1日　刘寿斌打破男子56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3月1～10日　首届全国台球个人公开赛在京举行。

3月3日　河北李来群获中国象棋第一位棋圣称号。

3月4日　我国男女比例开始失调，男的比女的多两千余万。

3月14日　我国又一大规模的生态绿化工程——万里沿海防护林体系（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大陆海岸线上1.8万余公里）一期工程在植树节前后展开。

3月29～4月9日　第40届世乒赛在西德多特蒙德市举行。我女队获女子团体冠军（8连冠），男队获男子团体亚军，乔红获女单冠军，乔红、邓亚萍获女双冠军。

4月13日　中国11亿人口大会在北京举行。杨尚昆等出席。彭纪云要求各级领导抓计划生育。14日，我国人口突破11亿。

4月14日　歌星毛阿敏“走穴”哈市，偷漏税3万元。5月6日，她向税务部门申报了1987年以来外出演出的总收入，主动补交税款15万余元，免予刑事处分。

4月17日　台北青年体操队抵京参加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这是台湾运动员第一次到大陆参加比赛，揭开海峡两岸体操交流序幕。

4月24日　安康破获一起诈骗大案，农民叶金来伪造国务院批文骗取500多万元被逮捕。

福州上空挫败一起劫机事件。

4月28～5月1日　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在京举行。

5月3～7日　第六届世界杯跳水赛举行，中国队夺金牌七枚，获最好成绩。

6月24日　上海人才市场正式开放。

6月26日　上海松江境内客列车发生爆炸，死亡24人，重伤11人。

7月8～10日　重庆部分地区遭洪灾，137人死亡，432人受伤。

7月11日　四川华莹山岩垮塌，200余人被埋。

7月24日　卫生部等9部委确定，9月20日为全国“爱牙日”。

7月28日　开封黄河公路桥建成，全长四千四百七十五米。

8月7日　在第7届世界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8月9日　广东全面整顿桑拿按摩业。

8月12日　青岛市黄岛油库油罐因雷击爆炸，伤亡数十人。13日，李鹏赶赴现场。16日，油火全部扑灭。

深圳建成世界最大微缩景区，9月下旬对外开放。

8月15日　江西民航一架飞机在沪失事，死亡34人。

8月22～30日　第15届大学生运动会在杜伊斯堡举行，我国运动员获4枚金牌。

8月30日　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9月6日　全国优生优育研讨会在京召开，李鹏到会发表题为《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的讲话。

9月6～16日　第二届全国青运会在沈阳等地举行。

9月8日　公安部发出通告，居民身份证使用查验制度9月15日起在全国实施。

9月9日　马文革获第十四届世界杯乒乓球赛冠军。

黄志红为亚洲人摘取世界杯田径赛头枚金牌，以20米73获（五届）女子铅球冠军。

9 月 15 日　浙江 37 市县受台风袭击，遭受严重灾害。17 日，国务院致电慰问。

9 月 19 日　第五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结束，我国选手共获金牌 99 枚，名居榜首。

9 月 20 日　京哈（北京——哈尔滨）公路全线通车。

陈伯达因病去世，终年 85 岁。他于去年 10 月刑满释放。

9 月 24 日　中国队以 102：72 战胜南朝鲜队，夺得第 15 届亚洲男蓝锦标赛冠军（第七次）。

9 月 25 日　华东最大水电工程——福建水口电站截流成功。26 日，国务院电贺。

10 月 2 日　今日是世界住房日。中国世界住房日组委会主任、建设部部长林汉雄发表讲话，指出 1995 年以前基本解决住房特困户和无房户的住房问题。

10 月 8 日　中国女排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中战胜南朝鲜队，蝉联亚洲冠军。

10 月 8～13 日　第一届亚洲击剑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10 月 10 日　国务院致电慰问遭台风灾害的海南人民。今年第 26、25、28 号台风 2 日起连续袭击海南岛，造成十几亿元的财产损失，共有 63 人死亡，15 人失踪，712 人受伤。

中国女将高凤莲在南斯拉夫第 6 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 72 公斤以上级比赛中蝉联冠军。

10 月 17～20 日　辽宁选手郑世玉在全国蹼泳赛中先后破女子 100 米蹼泳、50 米屏气潜泳和 100 米蹼泳 3 项世界纪录。

10 月 18～19 日　18 日深夜至 19 日凌晨，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地区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5 次，其中最强的是 6.1 级，有 18 人死亡，28 人受伤，8000 余间房屋受损坏。21 日，国务院致电慰问山西地震灾区人民，希望他们搞好生产自救，重建家园。24 日，国务院慰问团到达大同灾区，慰问灾民。

10 月 23～28 日　中国选手在丹麦羽毛球公开赛上获得女单、男女双打三项冠军。

10 月 28 日　在今天结束的 1990 年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中，中国队 2 胜 3 负，居第 4 位，未能出线。

11 月 15 日　第 5 届世界杯女排赛在日本结束，古巴队、苏联队分获冠、亚军，中国队获第三名。

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一项国家标准《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表明，中国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为 1.678 米，成年女子平均身高 1.570 米。

11 月 18 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气功医疗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

11 月 19 日　中国队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 8 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共夺得 22 枚金牌，获团体冠军奖，郑晨、张彩华获亚洲男女飞人奖。

世界杯羽毛球赛在广州结束，中国选手杨阳和林瑛、关渭贞获男单和女双冠军。

11 月 20 日　北京时间 11 时 18 分和 21 分，重庆市北发生 5.2 级和 5.4 级地震，死 4 人，伤百余人。

11 月 24 日　国家教委颁布《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从 11 月 17 日起试行。

中国工艺美术馆在北京落成，它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工艺品、旅游产品购物中心，邓小平同志题写了馆名。

11 月 25 日　引黄济青工程正式建成通水，国务院向山东省人民政府并引黄济青工程指挥部发贺电。该工程自 1986 年 4 月动工，投资 8 亿，全长 252.5 公里，流经十县市。

11 月 26 日　中国选手在历时 3 天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 3 届女子举重锦标赛中共获得 24 枚金牌。

11 月 29 日　中国田径协会向当选的 1989 年全国田径十佳运动员颁奖，这十名运动员是：黄志红、王秀婷、侯雪梅、张丽、金冰洁、金玲、毕忠、冯艳波、刘淑珍。

12 月 1 日　开封黄河公路大桥通车，大桥全长 4475 米，仅次于郑州黄河公路大桥。

12 月 2 日　中国女选手林莉、庄泳和杨文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杯短池游泳赛中，获 4 枚金牌。

12 月 8～12 日　第 4 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鹏总理在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搞好全国人口普查。会议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2 月 10 日　中国选手熊国宝、唐九红在新加坡举行的 1989 年世界羽毛球大奖赛总决赛中分别获男、女单打冠军。

12 月 29 日　国家体委在新年茶话会上通报：1989 年我国运动员共夺得 82 个世界冠军，创历年夺冠最高纪录，还打破 35 项世界纪录。

中国队在香港举行的第七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中战胜中国台北队蝉联亚洲冠军。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0年

导　言

1989年告诉我们安定团结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1990年便是安定、团结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极大成功。

高科技领域，卫星频频升天，尤其是亚洲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我国卫星事业自信而骄傲地跨入了国际领域。

外交领域，我国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或发展了友好关系。

文化生活方面，《渴望》这部以"善"为主题的室内剧始终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一首《渴望》红遍九州，唱遍华夏。

当然最重要的是令我们骄傲令我们自豪的北京亚运会，从筹备资金，建设场馆，到火炬接力，大会开幕，再到赛场拼搏，洒泪惜别，每一个细节都牵动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亿万人民或坐于屏幕前、或立于赛场中，为那些洒汗流血的队员们呐喊、助威，为他们的成绩而喜不自禁，为他们失败而慨叹不已。华夏子孙终不负众望以183枚金牌的绝对优势，稳居亚洲第一的宝座，使众多异国人为我们侧目而叹。

总之，1990年是华夏体育丰收的年程，也是经济稳步起飞的年程。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1990 年的卫星事业
- ●亚运之光
- ●第四次人口普查
- ●《渴望》热
- ●1990 年的中美关系
- ●香港问题
- ●活跃的中国外交舞台——1990 年中国外交丰收

1990 年的卫星事业

背景介绍

从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 I 号起，到 1988 年底，我国已成功地发射了 25 颗人造卫星。1990 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再创佳绩，于 2 月、4 月、9 月成功地发射了三颗卫星，尤其是 4 月 7 日，"长征三号"火箭顺利地把"亚洲一号"推上了运行轨道，这不但为我国赢得了极大声誉，而且使我国卫星事业自信而成功地迈入了国际市场。

材料：

- ·我国成功发射第五颗实用通信卫星
- ·雷霆万钧　直射九天
- ·"亚洲一号"卫星
- ·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发射成功

材料一　我国成功发射第五颗实用通信卫星

北京时间 2 月 4 日晚 8 点 27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一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卫星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大椭圆轨道。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卫星正在按预定轨道运行，星上各种仪器工作正常。

这是我国发射的第五颗实用通信卫星。它的发射成功，再一次证明我国的通信卫星技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具备了进入国际航天发射服务市场的条件。

*　*　*

第五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按计划进行跟踪测量控制。2 月 6 日上午 9 时 34 分，实施远地点发动机点火成功，卫星顺利进入准同步轨道。

*　*　*

2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实时控制下，我国第 5 颗实用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 98 度赤道上空。

目前星上各种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正在进行中。

3 月 8 日上午，我国第五颗实用通信卫星测试工作圆满结束。在我国某卫星地球站测试大厅内，四台信号显示器播放着清晰的电视相声节目图象，逗得满堂观众不时地发出笑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副总工程师章之俭告诉笔者，这套节目是由我国第五颗实用通信卫星转发器接收下来的。经广播电影电视部等几家组成的测试小组测试结果表明，这颗卫星比中央电视台目前使用的卫星指标有所提高，轨道位置保持精度高，电气性能指标稳定。

据介绍，使用这颗通信卫星，北京地区用 4.5 米站接收电视可以达到理想的图象质量。在波束中心的陕西等省只要用 3 米站就可满足电视转播质量的要求。这颗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为我国通信业务以及电视传输和多路广播节目增加了容量，同时也为正在使用的通信卫星起到了备份的保证作用。

材料二　雷霆万钧　直射九天

——"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目击记

4 月 7 日，北京时间 21 时 15 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峰峦起伏，群山静谧。几小时前还是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空，此时出现点点繁星。茫茫宇宙为中国当代的"射天者"，慷慨地敞开了一扇透明的"窗口"。

刚才还是由绿色活动平台紧紧抱拢着的巨型发射塔架，此刻缓缓地敞开了宽阔的胸膛，袒露出一枚乳白色

的、秀丽挺拔的巨大火箭。她就是我国自力更生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她的腰身,刚刚喷上的两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和两排“中国航天”四个红色的粗体大字,在发射场耀眼的灯光映照下,格外醒目。昂首挺立的火箭上端,托着一颗外国制造、将为亚洲地区服务的通信卫星——“亚洲一号”。15分钟后,这颗卫星将随“长征三号”火箭起飞。

由发射场指挥员下达的15分钟准备的指令,立即传到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传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到早已等候在太平洋上的远洋测量船。刹时,从四面八方反馈来的各种信号、回答,频频传向发射场地下控制室和中心指挥大厅。

在离发射塔架只有几百米的地下控制室,站在发射场指挥员身边的是一位鬓发斑白的老科学家。此刻,他正注目凝视屏幕、荧光图表上的各种数据显示。他就是为我国航天事业建立殊勋,被大家尊称为“总总师”的任新民。作为卫星通信工程包括火箭、卫星、发射、测控通讯和通信地球站五大系统的技术总指挥,每次发射,任新民都在这里“坐镇”,为卫星上天“保驾”。

“10分钟准备!”

两颗红色绿色的信号弹在发射场上空升起,表明火箭进入临射状态。绝大多数操作人员迅速撤离发射场,只有“唱最后主角”的加注手们紧张地为火箭加注燃料。

“五分钟准备!”

当这声高亢的指令传到发射中心指挥大厅时,无论是在指挥岗位的“老总”,还是在楼上大厅透过玻璃观看发射实况的几百位中外来宾,心都缩紧了。屏幕上各种数据、图表频频显示,指挥、调度命令和回答此起彼伏。“卫星转内电”、“运载遥测好”……各种显示表明,一切准备良好。

坐在指挥大厅左首第一排中央的发射指挥长曲从治,表情坚毅、从容,不失大将风度。作为这次发射的现场最高指挥长,他正密切注视着图表、屏幕上的各种显示,综合发射测试、测控、通信等各方面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判断。发射前,当记者问他这次担当重任的心情时,曲从治坦率地说:“心情很复杂,既感到荣幸,又感到压力很大。荣幸的是中国的航天技术将从我们这里跨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压力大是一定要一箭成功,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和麻痹。”

坐在曲从治附近的是亚洲卫星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休斯公司副总裁等几位外国航天专家。当发射场指挥员下达“15分钟准备”及以后的几个指令后,亚星公司发射任务主任迅速告诉中方,“亚星”已完成卫星转电、电缆脱落等动作,发出卫星正常、允许发射的信号。

“2分钟准备”的指令,是对发射场下达的。发射控制室内遥测和外测系统转电,发射场四周高速摄影机和火箭上磁带记录仪等设备一齐启动。

1分钟后,各系统控制遥测、外测插头脱落,火箭转电,卫星转电,电缆摆杆自动摆开……

箭在弦上,发射在即。人们屏住呼吸,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一瞬间,指挥大厅和参观大厅静得出奇。

“牵动!”

“开拍!”

“点火!”

“起飞!”

随着一连串短促有力的指令,中国运载巨龙“长征三号”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冲云天,山谷激荡,大地震颤。人们翘首仰望,只见“长征三号”火箭尾部迸发出桔红色璀璨的烈焰,向着东南方疾飞!渐渐地,火箭尾部的火光隐隐消失,火箭越飞越远,越来越小……

眼望火箭升空飞行,坐在指挥大厅的谢光选心潮澎湃。作为“长征三号”的总设计师,他为自己参加研制的火箭成功地发射五颗我国的通信卫星而高兴,也为成功地发射“亚星”而自豪。进入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是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专家的夙愿。

20多分钟后,从西安测控中心的各个观测站点和位于赤道太平洋上的远望号测量船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长征三号”三级火箭一、二次启动、关机,“火箭起旋”,“星箭分离,发射成功”!

材料三 “亚洲一号”卫星

“亚洲一号”卫星是第一颗专为亚洲地区服务的区域性通信卫星,重1.24吨,有24个C波段转发器,分南北两个波束,将定点于东经105度赤道上空。覆盖面积可达亚洲30多个国家,能为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部分地区的25亿人口提供先进的通信服务。

这颗卫星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由亚洲卫星公司购买和经营,使用寿命为10年。预计卫星80%的用途是电视转播,其中40%为各国政府电视台,40%为商业电视台。商业电视台将提供音乐、体育、新闻、电影、教育和儿童等专项节目频道。其它能力将用于公共通信网和专用通信网,包括长途电话、图文传真、数据传输等方面。

据悉,亚洲卫星公司将为今年9月在我国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免费提供3个卫星转发器,进行电视实况转播。

材料四　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发射成功

北京夏令时9月3日9时53分，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进入太阳同步轨道。

“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将这颗卫星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之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卫星进行了控制。当前，卫星工作正常，13时14分，乌鲁木齐卫星地面站收到第一幅甚高分辨率可见光云图，云和地表图象清晰，云层层次丰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正在按计划对卫星进行在轨测试。

卫星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国内外气象云图、海洋探测资料和大气物理资料，提高我国大气探测和天气预报能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向全世界气象卫星地面站发送气象资料。

中国科学院搭载的两颗用于大气观测的气球卫星同时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我国首次发射的“大气一号”一组两颗气球科学卫星，自9月3日随“风云一号”第二颗试验气象卫星升空以来运行正常，并已提供了第一批观测资料。大气物理科学家认为，“大气一号”的发射成功，为设计卫星轨道探索高层大气模式和研究太阳活动对大气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两颗被命名为“大气一号”的气球科学卫星直径分别为3米和2.5米，均由50微米厚的镀铝聚脂薄膜制成，折叠后装于容器内，由“长征四号”火箭带到预定轨道后被弹出，球内的气体和升华物质产生的压力将其膨胀为球形。这两颗具有不同面积和质量的气球卫星由于所受高层大气的阻力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运行轨道和高度，科学家据此可以推算出不同高度大气的密度。这两颗卫星预计可以运行3至6个月。在此期间，我国可以首次获得400至900公里高度范围内高、中、低纬度的大气密度观测数据。

据悉，该气球科学卫星是由国家高技术计划资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中科院、航空航天部、国家教委等部门所属单位联合研制的。自它进入轨道后，北京、乌鲁木齐、长春、广州等7个卫星地面站先后观测成功并已获得丰富的资料。天文爱好者可以观测到这两颗卫星。

亚运之光

背景介绍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1990年是个令人扬眉吐气的年程。这年的秋天，在北京，我们第一次举办了亚洲运动会，并且以共获奖牌341枚(其中金牌183枚)的绝对优势雄居亚洲体坛之首。体育的非凡成就令国人顿感信心百倍。一时间亚运便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了。

材料：

- 亚运火炬点火仪式在京举行
- 第十一届亚运会火炬交接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 保持清醒头脑　向新高度进军
- 我看北京亚运会——三位名人谈亚运

材料一　亚运火炬点火仪式在京举行

8月22日上午8时04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大步登上天安门广场南端的点火台，在红地毯上用取自念青唐古拉峰下的火种，点燃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第一支火炬。

当火焰腾起之际，6万羽信鸽同时振翎，直上蓝天，带着亚洲体育史上规模最大的盛会正式拉开序幕的信息，向四面八方飞去，200余人组成的军乐团以欢快的旋律为其送行。

在火炬点燃之前，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陈希同发表了简短的致辞，代表组委会预祝由亿万人参加的亚运之光火炬接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在礼炮与亚运会会歌的交响声中举行的亚运之光火炬点火仪式，仅历时7分钟，但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国正式登上了世界性综合性体育大赛的主办者之列，多少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变成现实。为了突出这个仪式的意义，组织者特意选了杨阳、黄志红、李春阳和许艳梅4人作为第一批点火员，他们是中国600余名世界冠军的代表，也是今日中国体坛的缩影。

8时06分，组委会执行主席伍绍祖从江总书记手中接过火炬，依次点燃了这4位世界冠军高擎的分路传递主火炬。在火炬接力主题歌乐曲声中，他们高擎火炬，登车驰向首都机场。按计划，4路主火炬将被运至海口、乌鲁木齐、拉萨和哈尔滨，分别于明天和后天开始遍及大陆

30个省、市、自治区的接力行程，把亚运圣火传遍神州。

"亚运之光"火炬已分别抵达我国四个端点城市——哈尔滨、乌鲁木齐、拉萨和三亚市。

哈尔滨：23日上午9时，"亚运之光"火炬交接仪式在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广场隆重举行。亚运圣火护送组组长张宝顺点燃火炬后，将它递给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邵奇惠举起火炬，点燃了全省13个地、市领导手中的火炬。上午10时许，著名速滑运动员王秀丽高举起火炬，拉开了哈尔滨市万人长跑活动的序幕。

乌鲁木齐：22日下午4时30分，"亚运之光"西北端点火炬交接仪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人民会堂前广场举行。亚运会组委会官员田树千把熊熊燃烧的火炬郑重交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又把火炬传给了19岁的维吾尔族优秀运动员、自行车选手买买江。

拉萨：西南端点的"亚运之光"火炬8月23日上午运抵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在距拉萨98公里的贡嘎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欢迎仪式并向"亚运之光"火炬护送组一行9人敬献了哈达。24日，拉萨将举行隆重的火炬交接仪式和"亚运之光"火炬接力赛。

三亚：我国最南端的滨海城市三亚市8月23日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上午8时整，点火仪式开始。全国体总副主席李凯亭将火炬交给中共海南省委书记邓鸿勋。8时18分，邓鸿勋登上点火台，点燃了亚运会南端"圣火"，揭开了十一届亚运会"亚运之光"南路火炬接力活动的序幕。

材料二　第十一届亚运会火炬交接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经过1.7亿人的传递，走过18万多公里行程，亚运之光火炬9月20日晚分四路传送到天安门广场，隆重热烈的火炬终点交接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晚8时20分，凝聚着中华儿女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豪情，象征着团结友谊进步的亚运精神的圣火，最后传到李鹏总理手中，并由他点燃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主火炬的火种。

材料三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象征着亚洲30亿人民"团结、友谊、进步"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9月22日下午在鲜花和彩旗簇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隆重开幕。

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夺得第一枚金牌的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高擎火炬，在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原成员张蓉芳、跳水运动员高敏的护卫下，跑步进入北京工人体育场，绕场一周，登上火炬台。这簇取自念青唐古拉山、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手点燃传遍全中国的圣火，此刻带着北国金风和南海涛声，带着天山的祝福和雅鲁藏布江的深情，点燃了亚运会主会场的巨型火炬。

来自五大洲的7万多名观众仰望着亚运火炬的熊熊烈焰。这时，万羽信鸽飞向天空，飞向四面八方。

乐队高奏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6时52分，应亚奥理事会代表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宣布：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亚奥理事会会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徐徐升起，猎猎飘扬。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6578人参加了这届亚运会。代表团数和运动员数都超过了前十届。

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陈希同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代表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全体人员和北京1000万市民向光临这届盛会的贵宾和海内外朋友们，向亚洲各代表团的运动健儿和体育工作者表示热烈欢迎，向给予这届盛会热情支持和指导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和所有关心、支持这届亚运会的中外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祝愿参赛的体育健儿在"团结、友谊、进步"的旗帜下，互相学习，切磋技艺，奋力拚搏，共同提高，创出优异成绩，为亚洲人民争光。

亚奥理事会副主席西尔瓦和哈桑在副主席金宗河、艾哈迈德、陈先陪同下，宣读了已故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生前为本届亚运会撰写的开幕词。

中国的陈龙灿以全体运动员名义宣誓，保证尊重并遵守亚运会的规则，为了体育的光荣和运动员的荣誉，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由《欢庆锣鼓》、《碧水风荷》、《中华武术》、《童心闪烁》、《体坛英姿》、《亚运之光》等6场表演组成的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壮观的场面，向7万多名中外观众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崭新的精神风貌。

本届亚运会是亚运会诞生40年来第一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办的亚洲体育盛会。"代表团数多"、"参赛人数多"、"比赛项目多"、"得奖牌的国家和地区多"、"竞技水平高"，这一系列新纪录，是亚奥理事会和各亚奥理事会成员组织团结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

第十一届亚运会是对亚洲体育运动水平的一次大检阅。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创造了

优异成绩：

中国自行车女选手周玲美以1分13秒899的优异成绩创造了一公里计时赛的世界纪录；南朝鲜射箭运动员先后6次打破女子个人全能、男子个人全能和男子团体3项世界纪录；52人打破42项亚洲纪录；109人打破98项亚运会纪录。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柔道、射箭、射击、举重、曲棍球等项目比赛，堪称“世界水平的较量”。

在强手如林的激烈角逐中，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夺得本届亚运会的奖牌，其中1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获得了金牌。

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德·西尔瓦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

材料四　保持清醒头脑　向新高度进军

一、概况与基本估价

本届亚运会我团共获奖牌341枚，占总奖牌数的35%，其中金牌183枚，占金牌总数的59%，银牌107枚，占银牌总数的35%，铜牌51枚，占铜牌总数的14%；破1项世界纪录(自行车场地女子一公里计时赛)，30次创亚洲纪录，96次创亚运会纪录，2次平亚洲纪录，4次平亚运会纪录；出现了一些世界先进水平的好成绩，如田径中的男子三级跳远、女子铁饼、女子铅球、女子标枪。游泳共有14个项目16人次进入世界排名前十名成绩，其中有3个项目3人进入今年世界排名第一名，她们是女子100米自由泳庄泳、女子100米蝶泳王晓红、女子200米混合泳林莉，男子有2个项目，即男子100米蝶泳沈坚强进入世界前十名，男子4×100米混合泳进入世界前九名；射击有7项，即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团体)，女子手枪(个人、团体)，男子移动靶(个人、团体)，女子气步枪(个人)成绩相当于今年世界锦标赛冠军水平，有10多个项目达到世界水平。

二、我们的主要做法与体会

1.奋斗目标明确，坚定地贯彻了中央提出的“必须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两个第一”的方针。

2.为打好亚运会这一仗，做了长期、细致的准备工作。

(1)层层选拔，组成精兵强将。

(2)思想教育贯穿全过程。

(3)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了刻苦训练。

(4)加强了科研工作和科学训练。

(5)做到知己知彼，不断进行主要对手与我们的实力对比分析。

(6)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狠抓了开局，打好初战；狠抓了赛前的过细研究、过细准备；狠抓了正确对待胜负，做好转化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3.比赛中，广大运动员发扬了锐意进取，顽强拚搏，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国夺取金牌总数第一做出了贡献。

4.狠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三、问题和差距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尽管我们夺得了半数以上的金牌，可是运动成绩和竞技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较，真正能够在奥运会上争夺金牌的并不多。我们的大部分项目还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有的项目还十分落后，影响较大的男子足球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队表现不尽人意，败给了泰国队，未能进入前四名。

就这次比赛本身来说，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1.有些运动队赛前准备不足，思想问题解决不透，未能发挥出应有风格和水平。

2.个别运动员比赛失利后，精神风貌欠佳。

3.一些项目虽取得了金牌，但水平不高；有些项目差距较大，如男子径赛在水平较低的亚洲也只取得110米栏、男子4×100米接力和竞走的金牌。

4.有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男足、射箭、女篮如何做到有所突破，应认真研究。

(袁伟民)

材料五　我看北京亚运会——三位名人谈亚运

中国体育要向世界目标看齐

中国文坛耆宿夏衍：这次亚运会办得很成功。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各项工作都很出色，这是国内外人士都称道的。

中国运动员能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事先我曾经根据《羊城晚报》透露的规划，逐项进行过计算。现在看来，有的看对了，有的没有看对。

中国金牌数第一，这看对了；但中国最后得到这么多的金牌，出人意料。我事先估计，中国能得115至125块金牌，结果拿了183块。这说明，我对中国运动健儿的潜力没有看准，还有点保守。

对中国的田径、游泳等项目，本来认为可能取得好成绩，但发展如此快，真没有想到。连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赛艇、拳击也能取得金牌，太出人意料了。曾经五次输给日本队的中国男排，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亚运会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他们在以3：2的成绩战胜日本队后，又在决赛中，以3：1胜南朝鲜队，终于登上了亚洲男排冠军宝座，令人振奋不已。总之，这次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上成绩辉煌，破了许多亚运会纪录和亚洲纪录，令世人刮

目。

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我曾料到会失败,但失败得这样惨,竟输给了泰国队,真没想到。人们常说,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足球队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失望,连亚洲四强都进不了,怎么走向世界?当然,竞技场上有时会爆冷门。如人们都看好南朝鲜的足球,可谓亚洲一强,曾经进军世界杯赛,这次偏偏输给了伊朗,痛失决赛权。但中国足球队的失利,情况很不相同。

我早就料到中国足球队会输。这和教练有关,一是保守,不能启用新人;二是训练不得法。目前,中国足球队队员老化、踢法老化。队员平均年龄为26岁,这个年龄在外国不算大,但在中国就偏大了,队员体质已开始下降了,训练不得法,不单表现在体力、技术上,运动员心理素质的训练也有很大的差距。南朝鲜著名球星金铸城著文说:论身高、速度,中国足球队堪称亚洲第一,但就是只开花不结果,场上攻防看来十分热闹,到了禁区一筹莫展,进不了球。他的这些话虽带有一点挖苦嘲讽味道,但中国足球队表现确实既没水平,也没风格,这也是事实。

不是教练不努力,不想赢,而是保守,不能启用新人的结果。这和中国女排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女排在兵败汉城痛失冠军后重新组建起来的一支全新的队伍。当时接任主教练的胡进很有魄力地只留下了老女排的苏惠娟和巫丹两名老队员,其余全部采用新人,短短几年,刻苦训练,李月明、李国君、赖亚文等一批女排姑娘又成长起来,开始重振雄风。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全部老队员。由于不能启用新人,后备力量不足,甚至出现倒挂现象:国家队不如国家二队,国家二队不如青年队。要想改变中国足球队的面貌,必须采取措施:一是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小训练,打好基本功;二是请外国教练,加以科学训练。这次游泳、拳击所以能取得如此好成绩,与聘请外国教练有关。游泳请了德国教练,拳击请了古巴教练。中国女排的崛起,和周恩来在世时就请了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有关。中国女子垒球能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冠军,也和教练李敏宽有很大关系。李敏宽出生日本,回国几十年来,含辛茹苦,训练女垒,今天终于能与世界女垒强队对垒。

从亚运会看,中国确已成为亚洲体育强国,但绝不能因此骄傲自大,高枕无忧,要居安思危。尽管中国夺得了众多金牌,打破了不少亚运会纪录和亚洲纪录,但破世界纪录的项目不多,和世界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要想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还需不断努力。

目前,中国体育能在世界上排上队的项目不多,除了体操、乒乓、跳水、女排、女垒、女足、女子举重等以外,其它许多项目,与世界水平差距甚远。如田径,这次中国取得了好成绩,但并不理想,有的运动员连自己的好水平都没有达到。如跳高:当今世界水平已达到2米42,中国运动员这次的成绩才达2米26;有些曾经是中国的强项,也显出后备力量不足态势,如乒乓球,曾经被誉为中国国球,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得7项冠军,称霸世界乒坛。这次虽然夺得5枚金牌,十分艰辛,而且男团输得很惨。中国的许多绝招已被外国熟悉,并想出对付办法,中国如果不想出新招,宝座就不稳,羽毛球也一样,女队好一点,已出现黄华、唐九红等新秀,接替上来,而男羽就没有新人;铅球、铁饼、标枪,中国都获得了冠军,但运动员的年龄已有些偏大了。

体育像一个人一样,没有新鲜血液补充是不行的,要不断涌现新人,人才辈出,才能不断取得好成绩。

像中国这样一个11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应该把目标订得高一些:要向世界水平看齐,而不能满足亚运会取得的成绩。现在离下届奥运会还有两年时间,只要及时总结经验,采取适当措施,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是可能的。本届亚运会的圆满成功和中国运动员取得的辉煌成绩,又一次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全民总动员,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做不到的,但是中国能够做到。只要全国上下一致,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发挥潜力中华大有希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亚运会开得这么好,这么成功,开幕式这么精彩,闭幕式也很精彩,中国队金牌大丰收,还有亚运会的各项组织工作,从场馆建设到比赛安排、各国运动员和来宾食宿、交通运输、新闻报道,做得无懈可击,确实值得我们自豪。这集中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组织程度。中国人早已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团结一致,协调动作的东方巨龙。

最使我注意的是亚运圣火的接力传递。圣火在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西藏取得火种,然后传遍了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最后又汇聚到北京。我又一次感到祖国幅员之辽阔,我们中华之伟大。中国民族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又如此聪明智慧、勤劳勇敢,中国的力量是巨大的,潜力是巨大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从亚运会得到一个启示,只要把中国的潜力发挥出来,组织起来,去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那么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领导的责任就是创造条件让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不要去抑制它,当然也不要去拔苗助长。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振兴中华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四化建设的首要点是开发这个积极性和创造力。亚运火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点燃了群众振兴中华的热情。我觉得,要莫失良机,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进一步振奋起来,把全国十一亿群众进一步凝聚起来,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使整个民族气血畅通,那么中国人就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

中国要有向心力

中国科协副主席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亚运会期间，我每天吃完晚饭别的事不干，总要收看几小时比赛的电视转播。大概是受欧美人在世界杯足球赛中那种狂热的影响，亚洲人对体育运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谁都知道，一个国家要办好这类运动会必须有一定的国力。这届亚运会有那么好的比赛场馆和设施、那么好的组织和服务工作，这方面显示出来的物质文明加精神文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国力。可以说这是使十一届亚运会规模空前的重要原因。

亚运会开幕前，我在科学界也听到一些同仁对办亚运会的意见，比如"那么多钱花得不是地方"之类。在这种情况下，这届亚运会经过两年多筹备办得这么成功，不仅说明党中央的魄力和能力，而且说明全党全国对党的第三代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现在西方工业国家在以各种形式与我们搞缓和，高级官员与我们的接触也有了开端，我们与第三世界的交往更加广泛。我认为，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这届亚运会政治意义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人民的观念有所转变，由旁观到支持，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也更为振奋，这总比聚在一起阴沉沉地讲怪话强。

这届亚运会开幕式，技艺精湛、落点准确的跳伞表演，表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太极拳表演，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意愿的优美舞蹈《碧水风荷》，以及在科威特队出场时全场观众表达亚洲人民坚持正义的热烈掌声，都给我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

我看这届亚运会比赛时常想，当年二十六届世乒赛首次捧回斯韦思林杯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和夺得五连冠的中国女排，靠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顽强拼搏，关键时刻不手软的运动员。同样，在20多年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由周总理领导、聂老帅指挥的中国科技人员搞成"两弹一星"，也是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结果。现在搞科技的条件比当年不知要好多少倍，只要国家安定，有一种鼓动大家向一个目标奋进的向心力，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中国的科学事业就前途光明，这是我看完每场亚运比赛后总感到情绪饱满、信心十足的缘由。

第四次人口普查

背景介绍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的头等难题，悬在党和人们的心中。为了更好地制定有效的人口政策，掌握人口现状，1990年我国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约有700万人作为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投入了这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截至本年7月1日完成的这项普查告诉我们：我国人口猛增的势头得到了控制，但人口状况仍然很严峻。

材料：

-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总人口达11.6亿
- 国家统计局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一号)
- 国家统计局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五号)
- 中国人口现状再敲警钟

材料一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总人口达11.6亿

截至1990年7月1日零时，我国大陆人口为1133682501人，按台湾当局今年公布的台湾人口数据，港英政府、澳葡政府公布的1989年底香港、澳门的人口数据推算，我国总人口为1160017381人。国家统计局10月30日发布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宣告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登记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国家统计局10月30日发布的手工汇总结果还包括人口的性别构成、民族构成、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拥有的家庭数目最多：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276947962户，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为3.96人。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出生人口为23543188人，死亡人口为7045470人，这意味着现在大陆每天出生6.45万人，死亡1.93万人。

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180030060人，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22.81%下降为15.88%。

第四次人口普查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普查，约700万人作为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投入了这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这次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猛增的势头确已得到控制，但人口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教育文化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负责人在谈到这次普查结果时说，这次人口普查实际上也是一次全民族的国情教育，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稳定的环境是不行的。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将陆续发布的这次普查的其它数据，会使广大群众和海外朋友对今日中国

有更清晰的了解。

这次人口普查将提供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社会变化的详细资料，从而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据介绍，这次人口普查的误差率为 0.6‰。除去先期发布手工汇总的主要数据外，明年 5 月将公布 10%抽样统计数据，全部资料处理完毕要持续到 1992 年。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0 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一号）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于 1990 年 7 月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主要数据的手工汇总工作已经结束，现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全国人口为 1160017381 人。

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下同）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 1133682501 人。这个数据是以 1990 年 7 月 1 日零时（北京时间）为标准时间，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上常住的人，采用直接调查登记方法取得的。

二、家庭户人口。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 276947962 户，人口为 1097781588 人，占总人口（不含现役军人）的 97.1%，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96 人。

三、性别构成。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为 584949922 人，占 51.6%；女性为 548732579 人，占 48.4%。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6.6。

四、民族构成。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042482187 人，占 91.9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91200314 人，占 8.04%。

同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八年间汉族人口增加了 101602066 人，增长 10.80%；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 23905147 人，增长 35.52%。

五、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16124678 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 91131539 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264648676 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420106604 人（以上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分别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六、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89 年 7 月 1 日至 1990 年 6 月 30 日，出生人口为 23543188 人，死亡人口为 7045470 人。出生率为 20.98‰，死亡率为 6.28‰，自然增长率为 14.70‰。

七、市镇总人口。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住在市、镇的总人口为 296512111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6.23%。其中市的总人口为 211230050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69%；镇的总人口为 85282061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54%。

八、人口普查登记质量的抽样检查结果。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普查登记和复查工作完成后，根据《人口普查登记质量抽样检查细则》的规定，进行了登记质量的抽样检查，抽查的样本规模为 173409 人。抽查的结果如下：

人口数：重登率为 0.1‰，漏登率为 0.7‰，重漏相抵，人口数净差率为 0.6‰；

性别：误差率为 0.14‰；

年龄：误差率为 3.07‰；

出生人口：漏报率为 1.03‰；

死亡人口：漏报率为 4.9‰。

抽查结果表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材料三　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0 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五号）

现将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手工汇总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住人口中按户口登记状况分组的人口数据公布如下：

常住户口在本县、市（第一列）

常住户口在外县、市，已离开户口地一年以上（第二列）

常住户口待定（第三列）

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常住户口（第四列）

	（人）	（人）	（人）	（人）
北京	10168427	519032	83099	48849
天津	8552498	182464	46607	3833
河北	60080183	715490	285218	1548
山西	27768826	762528	226657	1003
内蒙古	20523405	603502	328394	1497

辽宁	38356725	818310	277428	7234
吉林	23879232	499740	276756	2993
黑龙江	33369800	1249673	591666	3734
上海	12672600	543231	59588	66477
江苏	65072234	1292837	679319	12129
浙江	40405016	720322	316131	4461
安徽	55101319	762835	313140	3519
福建	28665822	786276	566630	29496
江西	36830598	570694	307397	1592
山东	82862394	814444	712825	3164
河南	83968922	889874	648973	1766
湖北	52828449	924175	209894	6692
湖南	59733518	720177	203881	2178
广东	59019558	3292637	498365	18676
广西	41404481	600300	239142	1842
海南	6283819	216711	56392	560
四川	105577477	1204659	429891	6146
贵州	31769159	440297	180753	857
云南	36375855	538431	57029	1295
西藏	2126391	62293	7160	166
陕西	32163605	473685	241806	3307
甘肃	21948984	311192	109879	1086
青海	4221439	181011	54265	231
宁夏	4529764	95350	29884	453
新疆	14467041	561453	126067	1217

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八年间我国各种户口登记状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在同一县、市的人由98.86%下降为97.37%，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指常住户口在外县、市并已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和常住户口待定的人）由1.13%上升为2.6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数，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广东、北京、广西、海南、江苏、四川、湖南、山西、福建、宁夏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广东由497527人增加到3791002人，增长6.62倍，北京由169868人增加到602131人，增长2.54倍。

材料四　中国人口现状再敲警钟

1990年7月10日，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顺利完成：大陆总人口为11.33亿。这个巨大的数字，使中国的人口重负更为沉重。“七五”即逝，“八五”将临，中国的人口形势如何？其前景怎样？11月24日，同一天在北京落下帷幕的中国计划生育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此做了回答。会上的种种举措表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成绩巨大但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为了适应9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的需要，实现在本世纪末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中国必须将人口政策更加稳健、扎实地推行下去。

举世公认的成就

8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是与会代表的共识。

与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8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成就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由60年代的5.68，70年代的4.01，下降到80年代的2.47。拿80年代同70年代相比，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了39.8%，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8.3%，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22.8%。目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按1970年的生育水平看，从1971年到1990年这20年间，中国少生了两亿多人。

其次，是人民群众的婚姻、生育观念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育子女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利益和幸福，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一个计划生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风尚正在逐步形成。出生的婴儿中，一孩的比例由1977年的30.9%上升到1989年的51.9%，多孩率已由1977年的44.6%下降到1989年的15.6%。目前，全国共有3400多万对夫妇领取了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证，这个数字比六七年前增加了一倍。80%左右的已婚育龄夫妇采取了避孕节育措施，总数达到了1.5亿对。

第三，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以前的35岁，提高到了1989年的70岁。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在新中国成立前分别为25‰和200‰以上，80年代分别下降到7‰和40‰以下。

人口形势依然严峻

在谈到中国取得计划生育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与会代表们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来自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信息表明：始于1986年的生育高峰仍在继续。这几年连续不断的生育高峰是中国的第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50年代，第二次是60年代至70年代。而这一次正是上两次高峰特别是第二次高峰带来的结果。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说，1962年到1975年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3.6亿人，从1986年开始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从1986年到1997年，中国每年将有1100万到1300万女青年进入婚育高峰值年龄，比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数多了近一倍。而90年代前期，恰是第三次生育高峰的峰顶。

按照目前的生育水平，“八五”期间，中国每年出生的总人数将在2300万左右，年净增人数将在1400万左右。

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与会代表们认为，就是按照这个数字来看，也已经给中国的经济腾飞带来了巨大压力。请看下列数字：

如果每年净增人口为1400万，按人均粮食400公斤计算，中国每年应增产粮食56亿公斤，如果人口年年加码，农业的负担将日趋沉重。何况，我国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而且人均占有耕地已从1982年的1.5亩减少到了1.36亩，就是粮食年年丰收，要保证年人均400公斤的粮食也很成问题。

与会代表们提出，由于近年来每年出生人口达2300万左右，国家每年不得不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大部分用以保障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据几年前的估算，一个家庭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6岁所需的费用，在城镇约为18740元，其中社会承担部分占36.5%，家庭承担63.5%；在农村约为6695元，其中社会承担部分为20.1%，家庭承担79.9%。从近两年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费用正在不断升高。另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年的新增人口大约消耗掉20%的新增国民收入。1987年，我国有48.75%的增产粮食和45.6%的增产肉类用于新增人口，35%的医院病床及37%的城镇竣工住宅用于城镇地区的新增人口。

人口在增加，而中国的资源在减少。环境受到较大污染，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有约1/6的国土面积发生水土流失，每年流去的泥沙达50亿吨，土地沙化面积正以每年15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受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近3亿亩……

所有这些，都引起与会代表们的深深不安。他们向各界人士呼吁：再不控制住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距离还会拉大，中华民族的振兴、国民经济的繁荣，都将破灭落空。

急需采取的措施

对于中国来说，90年代是控制人口工作的一个关键时期。90年代应当从何处着手，解决人口增长这一难题呢？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见会议代表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与会议代表座谈时也强调了这个观点。

与会代表对李鹏和李铁映的讲话反应强烈。许多代表认为，要控制中国人口，做到有计划地生育，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各级领导切实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加以重视，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为了促进各级领导的重视，应把计划生育工作的优劣列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对抓计划生育不得力而造成人口失控的，及时进行批评乃至调整；对本身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一律进行严肃处理，决不能不了了之。

二、从物质利益方面鼓励计划生育。例如：依靠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力量，发展养老保险事业，以解决农民老来无靠的后顾之忧；对农村中生育两女后结扎的夫妇，优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在扶贫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在资金、种子、化肥等方面予以优先解决，让计划生育户看到、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继续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帮助群众转变旧的婚育观念。

四、认真搞好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工作，对偏远山村，应该坚持送医送药上门，在育龄妇女中普及避孕节育的科学技术知识，采取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及时了解育龄妇女的孕情。及时为育龄夫妇提供安全、有效、简便、经

济的避孕药具和节育手术，最大限度地减少计划外怀孕。

五、各行各业都要支持计划生育工作，至今还没有配齐计划生育干部的，要力争及早配齐。同时，要适当增加计划生育的经费。

《渴望》热

背景介绍

如果有人问你90年有什么电视剧值得一谈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说《渴望》。的确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时，亿万观众都以极大热情收看了，并随之掀起关于主角刘慧芳形象及该剧艺术思想等问题的讨论。一首《渴望》，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唱红了半边天。主角刘慧芳、刘大妈等人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材料：

- 50集室内电视剧《渴望》故事梗概
- 过访刘大妈
- 人物处处体现"设计"思想
  ——《渴望》策划人谈《渴望》
- 被开垦的处女地——《渴望》
- 普论

材料一　50集室内电视剧《渴望》故事梗概

1969年，古城北京。

女工刘慧芳面对两个挚意的追求者迟疑不决，一个是多年关心照顾并有恩于她的车间副主任宋大成，一个是来厂劳动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大学毕业生王沪生，她虽然渴望得到爱情，但在这两个人面前却踌躇不定，感到极度为难。

王沪生的父亲王子涛是个著名学者，"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他的姐姐王亚茹是个外科医生，她在送别未婚夫罗冈去干校后不久，发觉已有身孕，于是偷偷搬到罗冈僻静而狭小的宿舍，在好友田莉的帮助下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罗丹。一个寂寞凄凉的夜晚，罗冈突然从干校逃回北京，亚茹又惊又喜。一天，罗冈抱着孩子来到窗前，猛然发现一辆吉普车停在楼前，几个戴红袖章的人跳下车，直向楼里奔来。为躲避专政队的追捕，慌乱中他匆匆将孩子带走，留下一纸书信，告诉亚茹他眼下正被通缉，生还无望，请将他忘掉。几经迁转，孩子又不幸丢失。

亚茹为寻找罗冈和女儿，决定赴河南医疗队，临行前得知弟弟在追求刘慧芳，她虽不喜欢这个女工，但由于弟弟需人照顾，只好同意他们的结合，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那不满百日的女儿，此时就在刘慧芳家中。

经过一番波折，刘慧芳终于和王沪生结婚。尽管沪生不喜欢被慧芳捡回的女孩儿，然而，迫于慧芳的要求勉强收下，取名刘小芳。不久，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深感失望的宋大成怀着痛苦的心情与女工徐月娟结婚，然而对刘慧芳却依然留恋。

三年后，王亚茹回到北京。由于失去女儿，她的神经受到极大的创伤。因刘小芳与自己失去的女儿非常相似，致使亚茹对她产生了既爱又恨的变态心理。从此，王亚茹同刘慧芳之间本不融洽的关系更趋紧张。沪生夹在其间左右为难。恰时，王沪生大学时的恋人肖竹心回到北京，在亚茹的鼓动下，两人旧情复燃，但终于被刘慧芳发觉，经过一场风波，肖竹心怀着悲凉的心绪悄然离去。刘慧芳虽原谅了一再表示悔过的王沪生，然而夫妻间已无感情可言了。

1978年，罗冈出狱，王亚茹得知女儿丢失，并认定已死，在悲愤中与罗冈决裂，回到家中，又将怨气发泄在小芳身上。不久，刘慧芳终于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与失望，和王沪生离婚，毅然带小芳回到娘家。

在一次事故中小芳不幸受伤，由于王亚茹手术的失败，致使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为了女儿，慧芳被迫辞职，生活一时陷入困境。王子涛得知真情后，力促儿子尽力帮助慧芳母女。日转星移，王沪生与肖竹心再次于北京重逢，由于王沪生的自私，使他们不欢而散。左思右想，王沪生提出与慧芳复婚，然而慧芳剩下的只是一颗冷却的心。

不甘落伍的刘慧芳在夜大学习期间与任教的罗冈相遇，彼此倾慕，王亚茹得知后极为恼火，百般阻挠，然而这却使两人感情日深，经过一番奋斗，刘慧芳终于得到渴望已久的爱情。在即将结婚之际，风波突起，刘慧芳偶然得知小芳的身世真相，并大白于众。面对慧芳母女二人，罗冈和亚茹情感上受到极大撞击。

在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上，迫使刘慧芳再次作出选择……

材料二　过访刘大妈

看过《渴望》，竟对刘大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情。恍惚真有那么一个戏中的小院，推门进去，便望见那古道热肠的身影……以至于当我敲开7号楼203号的房门与韩影面对面时，真真切切地喊了声："刘大妈！"

后来韩影告诉我——

凯丽说："妈，等戏演完了我不叫你妈了，叫你韩老师吧。"结果拍完戏改不了了，来电话或见了面就叫妈；小燕

子也叫妈，妈长妈短可亲了……

于是我想，这或许能说明人在感情上的认同吧。

韩影在《渴望》中演得好。有人说："让人感觉——就是她。"也有人评价是"出神入化"。总之，是演活了。那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加上浓郁的北京南城的烟酒嗓儿，活脱北京四合院中一个普通的老大妈。

韩影能在《渴望》中担任角色，完全出于偶然机遇，连鲁晓威自己也没料到，找"王沪生"捎带脚儿为他找来个"丈母娘"。

韩影从19岁考入青年艺术剧院学员班与表演艺术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有32年。其中1/3的时间荒废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演过话剧，唱过曲剧。1981年后参加过20多部影视拍摄，可直到《渴望》，这位"知天命"的演员才酣畅淋漓地一展艺术才华。

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天桥、珠市口、大栅栏、东单……北京的平房杂院，韩影住了40多年。普通市民的音容笑貌早已稔熟于心。当年叶子为演好《龙须沟》中的丁四嫂还专门学过北京南城的烟酒嗓儿，可这对韩影来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然，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决不仅是音容笑貌的浮光掠影，而更需要从本质上理解、体贴人的喜怒哀乐和荣辱爱憎。据说韩影与天津《今晚报》的记者曾有过一番有趣的论争——

《今晚报》的那个记者恨王沪生(我也是记者，我也恨王沪生)。记者问：

"刘慧芳为什么爱王沪生？"

"王沪生怎么不好啊？"韩影反问道，"给人逼成那个样子，家破人亡。打外边拣来个孩子搁在身边，再婚的人带个孩子还讨厌呢，别说是王沪生了——刚23岁，初婚，刘慧芳的妈又不管看了，两个人登记又不让登记……"

这就是韩影对生活理解的不同凡响么？

谈起刘大妈这个角色，韩影说："刘大妈是个甘于奉献的形象，虽然没有文化，却有着劳动人民朴实善良的本质。尽管嘴上不饶人，可却是刀子嘴豆腐心，骂自己的孩子正是疼自己的孩子……说到刘大妈的客套，韩影也有其独到见解——北京的老太太就是这样，来了人非让人留下吃饭不可，明知人家不吃或根本不到吃饭的时候也要如此一番，这是"礼儿"，可不是虚伪。老北京人有一种观念：这是住在皇上的脚下得懂礼儿，加上北京旗人多，受旗人影响，所以礼儿也特别多。

也许正是缘于生活缘于对生活的深层理解，韩影才坚实而牢靠地把握住人物和人物关系的核心基调，才使刘大妈这一形象出落得表里如一，生动鲜明。刘大妈手里老干活儿——这是导演为角色设计的动作细节，一个不懂生活的人也可以按照导演的设计去刷锅洗碗择韭菜，可韩影却有着更深透的思考——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干活已成为她的生活习惯。

为了拍好中国第一部室内剧，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韩影近乎沥血呕心。拍过20集以后，第二天的剧本常常是头天晚上抑或当天早晨才拿到。于是，吃饭想词儿，走路想词儿，半夜醒了躺在床上还是想词儿。制片主任说：在演员中，台词最熟最快的是刘大妈，她的词儿从来不带错的，头天给的词儿第二天一拍，二十分钟的戏通儿通儿的。可韩影说："累得拍完戏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宿舍一头躺在床上，心想，可别死在这出戏里。"

偶遇小暇，回到家中，本该休整休整，可韩影与那个饰演王沪生的儿子又演开了丈母娘训斥姑爷那场戏，街坊还真以为这娘儿俩干仗，赶紧跑来劝架。

生活中的韩影给人以心胸敞阔、平易近人、热情爽快、风趣诙谐的印象，让陌生人如坐春风。谈到会心之处，甚至还潇潇洒洒地讲些唱曲儿和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

(方旭)

材料三　人物处处体现"设计"思想
——《渴望》策划人谈《渴望》

李晓明：刘慧芳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一切都围绕她转。不能把她设计得太完善。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工，过着宁静的生活。但也有青年女子的小情操，小理想，小浪漫。万隆给这部剧起名叫《渴望》，那么刘慧芳渴望什么呢？她提前退学，渴望文化，这与她嫁给王沪生有潜在的关系。她渴望爱情，作为一个聪明、有点情调的女子，渴望爱情就比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子更艰难。宋大成、王沪生对她都不合适，一个像她哥哥，一个象她弟弟。刘慧芳干的一些事，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并不是什么都忍受。

郑万隆：刘慧芳与王沪生离婚就是她不能忍受的表现。她完全可以采取一个变通的方式回到王家。刘看到王与肖的关系，感到很伤心，对王沪生完全丧失了信心。

陈昌本：对于刘慧芳，不同的人对她可能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说她是雷锋精神，有人说她是道德牌坊。这没关系，就像《红楼梦》里的宝钗，有人说她好，有人说她坏。刘慧芳身上体现出的道德观念，并不就是最标准的做人准则。

李晓明：王亚茹是个变态的人物。在1969年以前一直很顺利，自负、清高、拔尖。但最后什么都失去了，只剩下孩子。孩子的失去使她精神上受到刺激是很自然的。这时看到小芳，会有两种心理，一是认为她的身世太像自己失去的孩子，百倍地爱她；一是认为她凭什么过得这么好，希望小芳倒霉，自己心里才舒服，是想让人们共同分担痛苦。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种心态。从编剧角

度上说，亲妈虐待自己的孩子，就会给观众一个很高的希望值——“等着吧小子，看你将来知道了怎么办！”

王　朔：你后悔去吧！

李晓明：王沪生最大的悲剧是不知道生活中真的需要什么。

郑晓龙：他的悲剧在于他娶了刘慧芳后还惦记着肖竹心。肖竹心不适合做妻子。他同刘与肖是妻子与情人的关系，王沪生把她们摆错了位置。

王　朔：会伺候他的，他觉得没话说，能跟他说得上话的，又嫌人家不会伺候他。

李晓明：宋大成属于刘慧芳与王沪生一有矛盾就跟着折腾的人。宋最大的渴望就是娶到刘慧芳。宋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容易转移，他的痛苦化解不开。宋想要小芳也有爱屋及乌的心理，月娟的感觉是对的。月娟是刘慧芳的铁姐们，跟一般女孩那样喜欢俩人在一起，一个男人看上了A女士，A不在，看B也不错，有一种替代作用。月娟是应该“吃醋”的，她知道自己比不过刘慧芳，也知道宋大成对刘慧芳的感情，而且自己又生不了孩子。开始设想，生不出孩子，毛病在宋大成。后来导演说安在月娟身上热闹。而且让老爷们老跑医院也不合适。

郑晓龙：女人“吃醋”是天生的。月娟要也像慧芳就没戏了。

李晓明：罗冈最难写，本来想写得强一点，典型化一点。可是后来发现中国男人挺难写好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动不动就是虚伪，连演员都说这个角色很虚伪。

王　朔：他要不装孙子就不是好人。

李晓明：第一稿里没有田莉，后来发现王亚茹没个“说话”的人，她也得有个铁姐们，所以就设计了田莉。王石、效农又给她加了“剧情”，让她与刘家、宋家有点联系。国强一开始也没有，后来觉得王亚茹太“恶”了，非找一个更“浑”的不成。王亚茹见到国强就没招儿了。总之，在策划人物过程中，处处都体现了“设计”的思想。

（戴方、张天蔚）

材料四　被开垦的处女地——《渴望》

室内剧这个概念，正是随着《诽谤》、《坎坷》、《昨夜星辰》等剧的播出而提出的。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外国早就有，中国也早就有。目前专家公认的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地道的室内剧，只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过于简陋、寒酸罢了。

既然中国最早的电视剧本来就是室内剧，为什么当“北视”录制《渴望》的消息一传开，竟引得海内外参观者纷至沓来呢？导演鲁晓威提供了准确的数字：到今年3月，剧组已接待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制片人、编导和学者，国内已有45家电视台预订了《渴望》的播映权。

究竟什么是室内剧，它与通常的电视剧有何异同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笔者曾两度进棚，同导演、制片主任和部分演员交谈。

他“遥控”着一切

第一次进棚，是去年深秋时节。

当一个陌生人从这座外形酷似仓库的建筑物前走过时，我敢肯定：你绝对想不到这儿跟艺术有什么联系。不错，它本是工程兵某部的一个室内篮球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用一年时间、耗资200万，对球场进行加工改造，使这块不起眼的去处变成了国内第一部室内剧拍摄基地。

进入棚内，光线骤暗，隐约可见四壁钢架林立，空中天桥纵横，一面面活动景片将空间切割成若干单元：有普通市民的居室，有教授的中式客厅，也有工厂的办公室、更衣间。我们来到布光明亮的拍摄区，见上方悬吊着几块吸音枕，正中，一块硕大的白布将灯光散射开来，形成一种柔和的自然光效果。设在不同位置的3台摄象机和两支长长的麦克风，一齐伸向表演区域。一切准备就绪，只听空中传来一声粗犷的男中音：“开始！”

于是我发现了室内剧与一般电视剧的第一个差异：导演不在拍摄现场，而是在总控制台上“遥控”整个录制过程。

当我援梯而上，进入悬吊在空中的总控制台时，又发现了室内剧的第二个、也是最基本的特征：它不像一般电视剧那样，用一台摄象机，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摄，待全部镜头拍完后，再进行后期制作（包括剪辑、录音、配音等），而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用导演鲁晓威的话说，这叫“多元、多机制作”。他进一步解释说：刚才你看到了，摄象师用三四台机器同时工作，把排好的一场戏完整地摄下。与一般电视剧不同的还有，室内剧多了一位导播，他的任务是把导演的意图完整无遗地贯彻到这场戏中，包括给演员说戏，确定机位、景别和镜头的运动等。录音师，要在同时间内把演员的台词、情绪、音乐、音响和动效（有些是事先录好的资料）一次合成。灯光、照明、置景、服装、化装、道具等，都要在较长的一段戏中完成各自的任务。总之，各个艺术部门的合作是立体、多面、一气呵成的。如化装师，过去只顾前头就行了，现在则要考虑后面的效果，因为前后都有摄象机。对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必须象在话剧舞台上那样，把一段戏完整地演下来，感觉、情绪都不能中断，表演风格还要尽量生活化。

艺术家的经济头脑

今年3月，当笔者再访《渴望》剧组时，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究竟何为室内剧，其特殊性表现在哪里呢？鲁晓威胸有成竹地回答：“我觉得，室内剧与一般电视剧的主

要差异是拍摄工艺不同。"那么，为何要采取这种拍摄工艺呢？鲁晓威回答："这是时代和经济的必然产物。"他说，经济发达国家拍摄电视剧，多采取单元单机或单元多机的方法，实景多于搭景，如美国的《鹰冠庄园》、《加里森敢死队》、巴西的《女奴》等。苏联电视剧，例如《春天的17个瞬间》，干脆就用电影胶片拍摄，其观念和语言也是电影化的。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及地区则大力发展室内剧。如台湾，竟有大大小小600多家电视公司，其生存空间自然多在"室内"。但最新动态表明：台湾正在摆脱室内剧，重新走实景拍摄的路子，如到大陆来采景、拍片。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不发达，而现实的欣赏要求不低；加上电视频道不断增加，迫使我们不得不缩短制作周期、降低拍摄成本。他举例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50集历史剧《唐明皇与杨贵妃》迟迟不能上马，就是因为所需资金太多，一时难以筹齐。另一部系列剧《中国刑警》也是电影式的单元单机拍摄，须耗时3年，这么长的周期，没有三五百万拿不下来。而《渴望》平均每4天完成一集，从去年8月21日正式开机到今年6月告竣，10个月完成50集，制作周期大大缩短了(如《四世同堂》10个月拍了28集)。周期短，花钱就少，而且由于我们采取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一切按计划执行，不受外界的干扰，演职员每日坐班车上下班，节省了大量食宿费用。所以，50集电视剧只用了150万元，平均每集不足3万(通常每集耗资6万)。

从300多字起步的"苦戏"

《渴望》是一个发生在"室内"的故事，亦即人们常说的家庭伦理剧。

说起《渴望》的剧本也颇有趣，它是编导从《读者文摘》中刊载的一则只有300多字的短文中受到启发而创作的。故事简单说，就是女主人公刘慧芳捡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恰是另一位女主人公王亚茹丢失的。围绕这条情节线索而展开了北京三个普通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人物命运，并以此揭示了从1969年到1988年20年间的风风雨雨，据说颇有几分《几度夕阳红》的味道。

300字的短文引出一部50集电视剧，这可不是牛群、冯巩的相声所讽刺的那种越抻越长的"拖"风，且听导演鲁晓威的阐述。

他说，我们在电视剧的风格样式上，唯一能与海外竞雄的是现实主义和纪实性。海外许多电视剧(商业性的姑且不论)是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海市蜃楼"式的。那么，为什么观众爱看、觉得它真实呢？因为它是用细节的真实掩盖着情节的虚假，用局部的真实掩盖着整体的虚假。

《渴望》渗透着编导的"苦戏"意识，何谓"苦戏"，鲁晓威说，苦戏就是写"苦命人"的戏。这类作品解放前有《姊妹花》，六十年代有《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和谢晋的某些作品。台湾的《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也是，它们的主题是宣扬中国传统的孝道。而《渴望》的主题是"人的奉献应多于索取"。

《渴望》的剧本是由活跃于北京文坛的青年作家郑万隆、王朔、李小明、郑晓龙、陈昌本等组成的"情节公司""杜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新尝试。

"渴望"中的那几双眼睛

50集的连续剧要使观众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除了要有吸引人的故事外，还有赖于演员自身的魅力及其演技。《渴望》以获奖演员为骨干，以演技派演员为基础，组成了一个较强的演员阵容。其中有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观众熟悉的青年演员黄梅莹、张凯丽、孙松、李雪健、庞敏、吴玉华、郑隆龙、杨青、梁冠华等。

剧中有两个女主角，一个是张凯丽饰演的刘慧芳，另一个是黄梅莹饰演的王亚茹。

(杜仲华)

材料五　善　论

很久了，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生活中失落的一种东西。什么呢？我说不清楚。

终于，我从刘慧芳(电视剧《渴望》中女主人公)的身上发现了这件失落的珍宝，完成了我找寻的历程。一个曾经模糊的印象，愈来愈清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善。

慧芳含辛茹苦地抚养了不是亲生的女儿小芳，并为此被迫离开了亲生的儿子东东和朝夕相伴数载的丈夫沪生，最后又将小芳(罗丹)还给了她的多年背负着心灵十字架的负罪深重的亲生父亲罗冈，和对自己持有偏见每每误解的亲生母亲亚茹。尽管她与小芳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但正因为难以割舍，才愈发折射出这一人物的光彩来。托马斯·曼说："道德不是良心的可卑的机谋，而是斗争和艰难，激情和痛苦。"虽然在她身上不乏某些性格的缺陷，却无法抹煞她善良的天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对那纯净的灵魂的长久谛视，来感受这一形象的深度和重量。"善良即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雨果语)当一切为了他人而承受命运坎坷的刘慧芳，被死神的魔手扼住咽喉时，我们的感情在这里突然像一道水流跌入万丈深崖似地激荡、回旋起来……我们感到的是善良不应该承受那样巨大的不幸和苦难，于是也就生发出拯救它的渴望和力量。这便是一种魅力，一种真理。任何时候，真理总是感召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的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人民，承袭了祖先的传统，乐善好施，积德行善，这并非是对封建礼教的圆说，而是华夏民族的一种高贵的美德。左拉说："一个民族，只有一条法律——善良。"然而，由于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使得一些人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放大了拜金主义的瞳孔。曾几何时，善被人为地扭曲了，贬值了，甚或丢失了。一种东西，只有在失去了的时候，人们才会懂得它存在的可贵。《渴望》的编导者们，正是想要通过他们倾尽心力塑造的刘慧芳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做"觅"的号召，实现"善"的呼唤。如果说，这种声音还显得微弱，那是因为在它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但是，"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会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高尔基语）

当王沪生伏在被他抛弃了的身心受到重创的妻子刘慧芳床前请求宽宥，跪在怨怒的岳母面前乞求饶恕的时候；当肖竹心从她的"情敌"刘慧芳的身上发现了比爱情更崇高的东西，重建一种信念的时候；当王亚茹得知正是被她鄙夷的弟媳刘慧芳替她养育了十五年朝思暮想的亲生女儿罗丹，良心受到极大谴责的时候……我们分明看到了龌龊的自私和肮脏的丑恶，在向人类最美好的善良做最痛切的忏悔。

"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罗素语）它既是美德和爱的根基，又是爱和美德的最集中体现。

刘慧芳就是善良的化身。她强烈地震撼了我们的心灵，掀起感情的激流……

在"善良"的感召面前，我们千万要有所警惕：不能是激动后的淡漠，淡漠后的忘却；而应当是流泪后的思索，思索后的领悟。

（点点）

1990年的中美关系

背景介绍

1989年中美关系进入低谷。"六·四暴乱"后，美参院众院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重新通过了附在"国务院授权法"上的制裁中国修正案，企图用立法形式，继续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进入十分严峻的时期。1990年的中国美国关系是1989年的继续与发展。直到11月30日至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应美国务卿贝克之邀而正式访美，才使中美关系露出一丝曙光。

材料：

-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中国留学人员问题再次通过决议一事发表谈话
-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美国国会重新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声明
- 我国外交部就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政府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 我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在美国先后发表讲话指出希望中美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
- 钱其琛外长访问美国

材料一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中国留学人员问题再次通过决议一事发表谈话

美国众议院1月24日投票表决，推翻了布什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有关延长中国留美学生签证法案的否决。这是美国国会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

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国会众院就中国留学人员问题再次通过决议一事发表谈话。

他说，美国国会众院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竟然再次就中国留学人员问题通过决议，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会受到"迫害"为由，阻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并企图以此支持反动组织"民阵"、"民联"分子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

他说，美国国会众院不顾事实真相，以谣言作为立法根据，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华立场。这一行动也完全违背了国际惯例和中美之间达成的有关协议，破坏中美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他说："我们强烈谴责美国国会众院的霸权主义行径，并表示极大的愤慨。"

他强调，如美国国会参院也通过这一议案，必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使两国间的文化、教育交流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中国敦促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恶化。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方承担。

材料二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美国国会重新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声明

（1990年2月3日）

一、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在去年11月20日曾就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所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一事发表过严正声明，对美国国会肆意歪曲事实真相，恶毒攻击中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去年11月21日和今年1

月30日，美国众、参两院继续以谣言作为立法根据，重新通过了附在“国务院授权法”上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对于美国国会某些人这种顽固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恶劣行径，我们再次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我们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二、美国国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顾平暴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的事实；无视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现实，仍用谣言自欺欺人，再次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某些势力坚持敌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顽固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外国势力，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妄想孤立和制裁中国，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深知被奴役被压迫的痛苦，懂得来之不易的独立和主权之宝贵。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在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取得的；新中国四十年来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美国国会某些人这种鼠目寸光的反华行径，非但丝毫阻挡不了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而且只能促使中国人民加深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

三、目前中美关系存在困难，其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双方应该，也只能在中美历次联合公报中所确认的原则，特别是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当前的困难，发展两国关系。我们奉劝美国国会中的某些议员把头脑放冷静些，眼光放远些，从狂妄、偏见和缺乏理智中解脱出来，从维护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改弦更张，停止对别国事务的粗暴干涉。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撤销对中国的制裁，使中美关系早日走上正常的轨道。

材料三　我国外交部就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政府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美国国务院2月21日发表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对中国国内现实肆意歪曲，并借人权之名，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

这份长达千余页的人权报告中有一部分约24页专门用于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一部分不仅对我国政府平息去年6月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任意攻击，而且声称去年在中国西藏和其他地方存在着普遍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例，甚至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横加指责。

中国外交部2月22日就美国国务院2月21日发表的“人权报告”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这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国务院今年2月21日发表的1989年“人权报告”以谣言和谎言为依据，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政府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对这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以推翻中国合法政府和中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深深卷入这场风波的有美国某些反华势力。此后，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的也是美国政府。在事实大白于天下的今天，又是美国政府执意在其“人权报告”中把猜测和谣言编织在一起，悍然攻击中国领导人。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就其他一系列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诬蔑中国政府。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美国政府有什么权利对中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横加干涉?！美国政府的这种恶化两国关系，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径，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美国政府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人权问题，美国政府不去认真解决自己的问题，却到处伸手去干涉别国的事务。最近美国军队大举武装入侵巴拿马，就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巴拿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蛮横地侵犯和剥夺了巴拿马人民行使其主权和自由决定其前途的权利。事实证明，侵犯人权的正是美国政府自己，它有什么资格谈论别国的人权?

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的人民，从不屈服于任何外国的压力。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中国人民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任何外来的攻击、压力和制裁都必将以失败告终。

2月22日上午，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奉命向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金米特，转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当天就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中攻击中国发表的声明。声明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政府这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

材料四 我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在美国先后发表讲话指出希望中美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5月16日晚指出，如果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就将对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并“会导致两国总的关系大倒退”。

朱启祯大使说，在处于变化中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和美国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关系，进行磋商与合作而不是对抗。他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且也有助于世界和平和亚太地区的稳定。

朱启祯在讲话中认为，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三个关键因素值得两国认真考虑，即：恪守在两国发表的3个联合公报中规定的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增进两国间真正的相互理解；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处理中美关系，避免因短期考虑使两国关系大起大落。

他说，两国在发展关系的同时，可保留“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他指出，“对中国施加压力或实行制裁并不是处理我们两国间国与国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过去行不通，今天也决然行不通。

朱启祯大使希望中、美两国能克服两国关系中目前存在的暂时困难，使这种关系最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5月1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重申我国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希望双方本着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材料五 钱其琛外长访问美国

11月30日上午，钱其琛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结束后，由纽约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前往机场迎接钱其琛的有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等。

当天上午，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外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要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为此要增加相互来往和接触。

钱其琛和贝克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和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讨论。经商定，美国副国务卿巴塞洛缪、助理国务卿希夫特将于近期分别访华。

会谈后，贝克设午宴欢迎钱其琛一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等出席了会谈和午宴。

当天下午，钱其琛外长分别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莫斯巴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众议院议员索拉兹、利奇、兰托夫等。

当天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中国外长钱其琛，并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示，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美中关系的改善。

会见时，双方都认为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近来已经有了不少改善。双方就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虽然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只要加强接触、增进了解，相信两国关系将回到正常轨道。

布什向钱其琛介绍了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钱其琛表示，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虽有一些不同看法，也有许多共同点，今后双方仍可继续配合。

会见持续大约45分钟。参加会见和会谈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贝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及随访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等。

香港问题

背景介绍

时间跨入90年代，1997年在逐渐来临。诸多问题——公民权利的法律，1997前后的衔接，未来香港的体制及有关法律等等，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加之英国政府单方面搞出“一九九〇年英国国籍（香港）法案”，一时使原本备受关注的香港问题再受青睐。

材料：

- 全国人大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 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
- 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中国公民国籍身份和“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案”问题先后发表谈话
-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英国议会通过“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

材料一 全国人大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十三项的规定，决定：

一、自1997年7月1日起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近海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图由国务院另行公布。

材料二 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

材料三 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根据体现国家主权、平稳过渡的原则产生。

二、在1996年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根据本决定规定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筹备委员会由内地和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的香港委员组成，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任。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下简称推选委员会）。

推选委员会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必须具有广泛代表性，成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地区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曾在香港行政、立法、咨询机构任职并有实际经验的人士和各阶层、界别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士。

推选委员会由400人组成，比例如下：

工商、金融界　百分之二十五

专业界　百分之二十五

劳工、基层、宗教等界　百分之二十五

原政界人士、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　百分之二十五

四、推选委员会在当地以协商方式、或协商后提名选举，推举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任期与正常任期相同。

五、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负责筹组。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60人组成，其中分区直接选举产生议员20人，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议员10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议员30人。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本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的任期为两年。

材料四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为期4天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15次会议4月27日在北京结束，会议发表了新闻公报，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举行记者招待会，就香港目前的一些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这次会议的新闻公报指出，中英双方就联合声明涉及国籍问题的规定以及有关公民权利的法律1997年前后的衔接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国际权利和义务常设专家小组工作的基础上，联合联络小组就香港1997年后继续参加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和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活动的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双方就香港设立终审法院的问题进一步交换了看法，并同意在第16次联合联络小组会

议之前双方专家就此问题的有关细节进行讨论；双方就有关海事管辖权(刑事部分)法律本地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双方还就香港与有关国家之间移交逃犯的未来安排的细节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材料五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中国公民国籍身份和“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案”问题先后发表谈话

外交部发言人4月12日再次重申，英国政府无权单方面处理香港中国公民的国籍身份。

发言人说，关于英国单方面决定改变部分香港中国公民的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已多次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但是，英方竟置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于不顾，仍执意在议会提出“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对于英方如此严重违反自己的庄严承诺和中英双方的有关协议，中国政府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再次重申，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是中国公民。香港中国同胞的国籍身份只能依据中国国籍法来确定，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英国政府无权单方面处理香港中国公民的国籍身份。

这位发言人说，“对于英方的上述错误做法，我们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我们仍然希望英国方面能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损害正在逐渐改善之中的中英两国关系。”

4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英国议会下院二读通过所谓“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案”，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英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改变部分香港中国公民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多次阐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对此，我们决不会置之不理。”

材料六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英国议会通过“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英国议会7月23日通过“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后，一些记者问及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7月28日作了回答。全文如下：

最近，英国议会通过了“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单方面改变部分香港中国公民的国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此表示遗憾。

众所周知，关于香港中国同胞的国籍问题，无论从国际法还是根据中国国籍法的规定，都只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早已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交换了备忘录。中方的备忘录郑重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是中国公民。英方在它的备忘录中明确承诺，对这些原来的“英国属土公民”，“不赋予在联合王国的居留权”。嗣后，英国为了履行这一承诺，还由英国议会制订了“1985年香港法”，并颁布了“1986年香港(英国国籍)枢密院令”。但时隔几年之后，英国竟公开违背自己的庄严承诺，通过制订“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试图使部分香港中国公民取得包括在英国居留权在内的完全英国公民地位。英方的这种做法，违反中英上述有关协议和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与实质，损害了中国主权。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

中方郑重声明，英方按照“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给予部分香港中国公民的“英国公民”身份，不会得到中方的承认。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后，英国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向这些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这些中国公民也不得使用“英国公民护照”进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其他地区。

英方在香港中国公民国籍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势必在香港社会中造成混乱，不利于香港的顺利过渡和稳定繁荣。英方执意要在香港的关键位置上物色“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的“受惠人”，从而为实现中英联合声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的规定设置了障碍。在此，中方严正指出，英方必须承担它这一行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中国政府保留在适当时候对英方的错误做法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材料七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

在香港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七次会议12月14日发表新闻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于1990年12月11日至14日在香港举行。

双方就公民权利的法律1997年前后的衔接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联合联络小组回顾了双方专家就香港防务与维持社会治安的实际安排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并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在国际权利和义务常设专家小组工作的基础上，联合联络小组就有关适用于香港的海关条约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联合联络小组同意，常设专家小组将就适用于香

港的有关贸易、资源保护和卫生方面的多边条约着手做准备工作。

联合联络小组就香港民航协定问题有益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于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双方在有关商船安全规例本地化问题上取得了共同的看法。

双方就香港与有关国家之间保护和促进投资问题交换看法,并取得了进展。双方就香港与有关国家间的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安排初步交换了意见。

在专家工作的基础上,联合联络小组讨论了有关香港设立终审法院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联合联络小组就有关香港法律适应化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并就在此领域的磋商程序取得了协议。

双方还就跨越1997年的主要的专营权问题进行讨论,并就此类专营权通报中方的机制取得了一致意见。

联合联络小组同意,下次会议将于1991年3月11日开始的一周在北京举行。

活跃的中国外交舞台
——1990中国外交丰收

背景介绍

1990年,我国的外交舞台热闹非凡,喜讯连番,对外关系取得可喜发展。我们的外交工作坚持了广交朋友,打破制裁的原则,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甚至突破性进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材料:

- 活跃的中国外交舞台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
  ——今年来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材料一　活跃的中国外交舞台

1990年,我国的外交舞台热闹非凡,喜讯连番。我们的外交工作坚持了广交朋友,打破制裁的原则,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今年是我国建交较多的年份之一,已有5个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11月16日,我国同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宣布建交,从而使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37个。台湾当局近年来多方拉拢这个小国,然而该国政府还是毅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之前,今年3月份,我国同刚刚宣布独立的南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建交;7月份同阿拉伯大国沙特阿拉伯建交;8月份和东南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10月份又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举世瞩目的成就,连海外舆论也称:“1990——中国外交的丰收年。”

同周边国家合作加强

中苏两国自去年5月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今年4月李鹏总理对苏联的访问,两国关系在开辟未来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中苏边界谈判有了进展,边境地区削减武装力量的谈判正在进行。

今年5月初,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的来访,是1962年以来蒙古最高领导的首次访华。中蒙两国领导人对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表示高兴。这次中蒙高级会晤为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两国关系开辟了美好前景。

我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江泽民总书记今年4月对朝鲜的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我国和南朝鲜的民间贸易近年来增长较快。为适应这种情况,双方的非官方贸易机构不久前签署了互设贸易代表处的协议。

我国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和同新加坡建交,标志着我国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李鹏总理8月对印尼、新加坡和泰国的访问,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印尼总统苏哈托、泰国总理差猜最近的中国之行,增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密切了双边关系。

我国一向很重视与南亚国家发展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去年11月李鹏总理出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使这种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据悉,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不久会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活动。

同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不久前率先恢复了对华日元贷款,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促使西方国家松动对华“制裁”的作用。可以预期,我国同日本官方和民间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有新的发展。

同第三世界国家交往频繁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立场,并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赢得了这

些国家的支持与信任。到11月底，访华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有24个，他们全是来自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杨尚昆主席今年5月访问了拉美的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5个国家，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来我国第一位国家元首出访拉美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访问了一些亚洲国家。我国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也很活跃。这些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频繁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友谊与合作。

同西方国家关系开始改善

一年来，我国政局稳定，经济逐步发展，改革开放在继续深化。西方的"制裁"没起什么作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不应该孤立中国。他们也看到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今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坚持反对侵略、争取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立场，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称赞。钱其琛外长不久前访问了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海湾四国，他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访问伊拉克的外长。钱外长的这次四国之行，是我国为推动海湾危机和平解决而作出的又一次努力，从而显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继日本率先恢复对中国的贷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后，欧洲共同体国家不久前也决定恢复对华关系，一些国家重新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或出口信贷担保。同时，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美国对华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11月22日西班牙外交大臣弗·费·奥多涅斯对我国的正式访问，使他成为近一年多来踏上我国国土的第一位西方国家外长。他的访问必将推动其他西方国家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继续前进。可以预期，不久会有更多的西方国家外长来访。

今年九、十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更是一次颇为成功的"亚运外交"。亚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出席盛会，增进了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我国之所以今年能在外交方面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我国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李鹏4月23日至26日对苏联进行的正式访问，是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年5月访华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苏关系的一次重要访问。

戈尔巴乔夫去年5月在北京同邓小平的会晤，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当时，这两位领导人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宗旨宣布："过去的事情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关系上多做实事"。两国根据这一宗旨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

近一年来，中苏两国都遵循"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宗旨和联合公报所阐明的原则推动相互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首先，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取得了"顺利的、令人满意的发展"，两国继续保持高级接触。

第二、中苏两党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了交往并进行高级别的接触。

第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两国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而有计划的发展。1989年的两国贸易额超过30亿美元，比1988年增长近20%，预计今年又将有进一步的增加。苏联已成为继港澳地区、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后我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

以上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中苏两国"结束过去"，因戈尔巴乔夫去年5月访华已结束，并在"开辟未来"的征途上迈出了步伐。李鹏总理这次访苏，双方又签署的加强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协定，是"开辟未来"的又一重大步骤。

（柴世宽）

材料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今年来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今年以来，我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这一系列活跃的外交活动，是我国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生动体现，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是在国际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取得的。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旧的国际格局趋于瓦解，新的格局尚待形成。在世界格局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在出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去年以来，国际上一股敌视中国的势力，曾掀起了一阵反华的浪潮，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对我国实行"制裁"，妄图孤立中国。中国从不屈服于外国的压力，继续贯彻执行我们党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在对外关系上，我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得到了许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赞同。现在，我们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大为加强。在世界关注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坚持原则立场，反对武力侵略别国，主张和支持以和平的方式政治解决海湾危机。中国为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受到了各国的重视，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与国之间正常关系的正确准则。

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新的动荡不安的时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今天，第三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占世界3/4的人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积极致力于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推动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我们在对外关系上能不断取得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取得了进步。

（《人民日报》社论摘）

风云人物

周南

周南（1927— ），具有40多年外交经验的职业外交家。曾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二秘、外交部西亚北非司科长、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参赞和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等职，1984年晋升外交部副部长，新近接替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材料　新华社香港分社新社长——周南

中英、中葡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顺利签署，作为国际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功范例而载入当代世界外交史册。身为执行者之一的周南，在谈判中正确执行中央的政策，并能审时度势，运用策略，功不可没。

数十年外交生涯中，周南的足迹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个“君”不只是党和政府，也包括中国人民。因为他一向认为，外交人员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

周南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廿年踪迹遍温寒，剑气箫心两未残。又是一番春雨过，清歌几日到长安。”诗句道出他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奔波于世界的艰辛和志向。

周南祖籍山东曲阜，1927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天津度过。40年代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攻读经济学、西洋文学。就在他遨游于西方文化知识海洋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隐去真名高庆琮，化名“周南”，从事学生爱国运动。

周南从小就对文学艺术有浓厚兴趣。紧张繁忙的外交工作也未使他改变初衷。他是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和故宫博物院的常客。出使异邦，一有机会他就逛当地的博物院和画廊。

他还喜爱京剧和昆曲，擅长游泳。现在，62岁的周南仍能在海里游上两个小时。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在朋友聚会上，他总是谈笑风生，声音洪亮，精力充沛，显示出一个外交家的气质。

具有40多年外交经验的职业外交家周南，新近接替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是参与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

港英当局及香港各界对他并不陌生。香港有的报道称：由一名资深外交官出掌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有助于中英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人们认为周南是一位出任此职的合适人选。

50年代初，周南随志愿军赴朝，管理美军俘虏。这是他外交生涯的起步。之后，他曾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和驻联合国代表团先后任二秘、科长、一秘、参赞、副代表（大使衔）等职，1984年，干了两年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周南晋升为副部长，一直分管香港和西欧事务。

（柴世宽）

张百发

张百发（1934— ）北京市副市长，亚运会工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等职，1982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市规划、工程建设和市政管理，1990年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亚运工程的建设。

材料　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

1986年10月2日，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在汉城第十届亚运会闭幕式上，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承办下届亚运会的北京市，接过了象征着团结、友谊、进步的亚奥理事会会旗。

1984年9月，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决定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1985年3月，亚运会组委会正式成立，张百发任组委会常务副主席，亚运会工程总指挥。从此，他成了一名为筹办亚运会而辛勤操劳的人。

张百发把体育场馆和亚运村工程称为亚运会筹备工作的“硬件”，是为亚运会搭舞台。1986年秋，亚运会工程陆续开工，3万名建筑大军投入会战。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在中国还是第一次，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和资金不足等重重困难，张百发充满信心。他曾在一次公开场合“发誓”：“如果因为亚运会工程耽误了亚运会召开，我就从北京最高的建筑——京广大厦(208米高)上跳下去，向天下谢罪。”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全国人民支持，亚运会一定能办好。”

张百发是亚运会工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施工过程中，他不满足于开会听汇报和在文件上划圈圈，而是深入到现场，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大学生体育馆是亚运会工程中第一个开工项目，屋顶钢网架整体吊装那天，他一直盯在现场；

游泳馆11根长钢梁因缺少特殊规格钢材，拖了工程后腿，他亲自找冶金部解决；

平谷海子水库水上运动场，因水源不足而影响水深，他同工程师一起多次到水库研究解决措施；

新建的大学生体育馆去年春雨天漏水，他正行车在路上，听到呼叫后立即赶到该馆，调兵遣将……

截至去年底，计划兴建和改建的31个体育场馆已有27个竣工，全部工程将于今年5月完成。张百发在工作总结会上诙谐地说，亚运会工程按时完工没有问题，他不用“跳楼”了。

本届亚运会集资原则是“完全自愿，量力而行，不勉其难，多少不限”。这四句话乃是张百发的“版权”。他自己身体力行，拿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亚运会。

张百发今年56岁。他16岁开始当钢筋工，18岁担任了青年突击队队长，成为全国劳模。1965年任北京市三建公司经理，此后又任北京市建工局副局长，国家建委副主任，1982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市规划、工程建设和市政管理。

指挥亚运会工程使张百发与体育结了缘。现在他又把目光瞄准了奥运会，雄心勃勃地说：“中国如果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我承包了，保证不向国家要一分钱，而且还要赚几个亿。”

(李贺普)

任新民

任新民(1914-——)，我国著名的航天专家。他先后担任过导弹总体研究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航天部科技委主任等要职，并七次亲自主持和领导了长征三号火箭的发射任务。

材料　航天专家任新民

1990年4月7日21时30分，长征三号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腾飞，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同步转移轨道。这是我国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地完成了为国外发射商用卫星服务。就在火箭起飞后的几秒钟，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急匆匆地从地下发射控制室走出来，乘车赶往几公里远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厅。他，就是我国著名航天专家任新民。这是他第7次亲自主持和领导长征三号火箭的发射任务。

任新民是安徽宁国县人。1934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1945年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深造，获工程力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巴夫洛大学任讲师。40年代末，他回到自己的祖国。

50年代初，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部五院任职期间，他便开始投身于祖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工作。

30多年来，任新民先后担任过导弹总体研究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运载火箭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副部长、航天部科技委主任等职。曾组织领导和亲自参加了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战略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及飞行试验。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零的突破，在世界上引起震撼。作为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任新民领导了这创下历史纪录的壮举。他还直接主持和领导了我国卫星通信工程的研制和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两项特等奖。目前，75岁高龄的任老，仍承担着我国几项重大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重任。

他是党的十二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学术上，他也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曾担任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85年被聘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长。两年后，又被该院董事会聘为董事。

任新民有着充满智慧的大脑，更有着一个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的风范。无论高居领导职位，还是作为学术权威，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与科技人员亲密合作。工作中遇到困难，他总是当仁不让。遇上接见照相，祝捷庆功，人们却往往寻不见他的身影。

任新民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对宇宙的开发利用好比哥白尼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只有发现后才能利用。我们一定能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航天事业的路子。

（张丽辉）

邹家华

邹家华（1926—— ），国务委员，人称“处理难题快手”，新任国家计委主任。

材料 新任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

国务委员邹家华，人称“处理难题快手”，日前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上被任命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迎着风寒，他刚刚沿大秦线视察了秦皇岛新建码头。这是他的老习惯，爱跑第一线，看现场，拿第一手材料。

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忙里抓闲，谈起就任新职新打算。邹家华认为，计委的工作要摆脱纠缠于细小事务的羁绊，要抓长远，抓重大比例关系，抓各部门的协调工作，要依靠各部门、各地区做好工作，为基层服务。

出任国家计委主任，首都经济界人士一般认为他是一个十分称职的人选。邹家华是目前9位国务委员之一，中共中央13届中央委员。在此之前，他主管能源、交通、原材料、机械电子等方面的十多个部门并兼任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有丰富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据知情者介绍，一年多前，能源严重短缺曾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最大城市上海一度存煤只够两天用。国务院确定邹家华处理这一难题，经过细致调查研究，他顺着解决干线交通——→统配煤矿生产——→保证电力供应的路子进行统一调度、协调，表现出完美的行政才干，快刀斩乱麻地扭转了局面。

思维敏捷，稳健扎实，不图虚名，敢于承担责任，有独立创新的思路和行之有效的措施，并能一抓到底。这是与邹家华同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人们回忆说，邹家华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出任兵器工业部部长，时逢我国兵器工业面临产品无出路局面。邹上任，明确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民用拳头产品上，如今民品产值已达兵工系统的60%，在1986年任国家机械委主任后，他一改机械工业以自身发展为目标的观念，提出以用户需求为目标，以服务用户为宗旨，使企业数和产值都占我国工业⅓的机电工业更好地发挥了国民经济装备部的作用。

1926年生于上海的邹家华，是我国五四以来名作家、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的长子。青少年时代，他随父亲颠沛流离，受革命熏陶，1944年加入新四军，1945年入党。他至今保持着军人风度，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履稳健，每天早晨8点准时进入办公室。他语气平和，待人诚恳，生活俭朴，烟酒不沾，平时穿的毛衣上还打着补丁。

邹家华是一名机械制造专家，1948年赴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学习，1955年回国后在沈阳第二机床厂工作8年之久，从一名普通工艺师一直干到总工程师、厂长。1964年任一机部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他下放劳动6年，1973年开始任国防工办副主任，1982年任新机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直到1985年他脱下军装。

他精通俄语，粗懂英语，长于书法，不爱题词。驾驶汽车，几乎成为他的爱好。如果看到他的轿车驶过，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恐怕往往就是这位新任国家计委主任本人。

（李安定）

蔡畅

蔡畅（1900—1990），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先驱，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于1990年9月11日在京病逝。

材料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讣告（节选）

蔡畅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她在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致力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妇女群众的翻身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后，蔡畅同志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全国妇女组织的领导职务。她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中国妇女解放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蔡畅同志功高德重，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蔡畅同志身上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无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险阻中，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她都坚贞不渝。建国以后，她处于高级领导岗位，但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在病中留下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这再次表现了蔡畅同志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徐向前

徐向前(1902—1990),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于1990年9月21日在京病逝。

材料 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讣告(节选)

徐向前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等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山西获得完全解放。徐向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与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义凛然,强烈谴责和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阴谋。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衷心拥护、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徐向前同志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义无返顾,鞠躬尽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好学不倦,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他襟怀宽广,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党的纪律,是党性坚强的模范。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徐向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徐向前同志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希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他表示,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施光南

施光南(1940—1990),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作曲家。《祝酒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等都出自这位民族音乐家。80年代末他完成了著名歌剧《屈原》,使他的创作进入高峰,不幸的是,1990年4月18日因病不治,壮年而逝,年仅49岁。

材料 你的歌将永远在人们的心上奔流

正当光南弥留之际,中央歌剧院在文联会堂的"歌剧选曲音乐会"上再次演唱了他的歌剧《屈原》中的《离别之

歌》，婵娟在临终前深情地唱道："我要走了，快别难过！请永远记住我的歌！"演员唱得动情，观众听得入境，我的泪水夺眶而下。我没有想到：这首动人的歌却成了光南自己的"离别之歌"，而歌剧《屈原》竟成了他临终的绝唱。

歌剧《屈原》花费了光南几年的心血。他与韩伟合作的歌剧剧本于 1987 年定稿，1988 年完成了重点唱段的音乐，1989 年底基本完成了全剧音乐和配器。

《屈原》的音乐是光南的心血的结晶，是他留给人民的一份厚礼。《屈原》的许多段落有可能为中国歌剧艺术的精品。

《屈原》完成于 80 年代末，他的另一部歌剧《伤逝》上演于 80 年代初。《伤逝》是一部抒情歌剧，音乐在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感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偌大一部歌剧，从头至尾只有涓生（男主角）和子君（女主角）两个人物，这在中外歌剧史上是罕见的。

如果说《伤逝》和《屈原》是施光南的音乐殿堂的两根大柱，那么他的抒情歌曲就是这座殿堂的基石。施光南的歌曲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到处传唱，他的名字随着他的歌曲在中国家喻户晓。施光南以他的歌曲成为当代最受人民喜爱的作曲家之一。

1957 年光南考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这时他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已经十分自觉了。学校的"民间音乐课"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学习愿望，他抓住一切机会去民间采风，学习民歌，也利用一切机会去观摩各地到天津演出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艺术，听过梆子、评剧、吕剧、坠子、丝弦、老调，什么土里土气的戏曲他都深感兴趣，每次看完戏走出戏园，他就能凭记忆模仿着哼唱出刚看过剧种的声腔特点。他对民间音乐十分敏感和富有悟性。光南的音乐创作，深深地扎根于民族音乐的沃土，这是他刻苦追求的结晶。

光南为了钟爱祖国的民间音乐，曾经走过艰苦的道路，也经历过种种磨难。

"文革"中间，江青信口开河地说"民歌都是唱情郎妹子的，都是下流的。"她的这句话曾扼杀了所有的民族风格的音乐创作。这使施光南十分苦恼。但他不肯放弃在创作上对民族风格的追求，于是在 1972 年谱写出了《打起手鼓唱起歌》这首轰动全国的歌曲。在那"帮腔帮调"横行的年月里，《打起手鼓唱起歌》犹如一股清澈透亮的泉水，以它那活泼、轻快的新疆民歌风格吸引了广大的听众。它经罗天婵演唱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一时唱遍了大江南北。《打起手鼓唱起歌》的广泛流传引起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亲信的不满，他们罗织罪名，采用行政手段禁止《打起手鼓唱起歌》的出版和广播。致使施光南在"文革"中长期得不到创作和发表作品的自由，他的创作热情被政治高压所抑制，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喷发出来。在《祝酒歌》获得巨大成功后对我说："'四人帮'他们说我《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咪咪咪'是形式主义，我有意在《祝酒歌》中又采用了'咪咪咪'的衬词，表现一种欢乐的锣鼓节奏，我就是要出这口气！"这很反映出光南的刚毅不屈的个性。

光南的抒情歌曲具有下列这些艺术特点：题材广泛，形象丰富，意境隽永，民族风格浓郁，手法凝练，雅俗共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他不倦讴歌的中心主题。

施光南的旋律创作才能在歌曲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誉称为"旋律大师"。他说过："我的美学观点，就是强调音乐作品的旋律。"他毕生的奋斗目的就是创作美的旋律。

施光南完全是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是当代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三十余年间，他大约谱写了一千余首歌曲，此外还有两部歌剧，一部芭蕾舞剧音乐，他的创作体裁还涉及到小提琴独奏曲、钢琴组曲、弦乐四重奏等室内乐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交响诗等管弦乐作品，还有大合唱、歌舞音乐、电影音乐、戏曲唱腔设计等广泛的音乐体裁。这构成了一个丰富多采、绚丽多姿的施光南的音乐世界。

（梁茂春）

王　振　国

王振国（1954—　　），吉林长白山抗癌药物研究所所长。在 38 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他研制的抗癌药物"复方天仙胶囊"获得"世界个人最高研究奖"。

材料　从长白山到布鲁塞尔的赤脚医生——王振国

1989 年 12 月，来自中国长白山区的青年王振国登上了第 38 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领奖台。他研制的抗癌药物"复方天仙胶囊"获"世界个人最高研究奖"。这是我国参加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以来首次获最高荣誉。最近，他被推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

今年 36 岁的王振国，生长在吉林省通化县石湖乡一个农民家庭。念书时，家中贫寒，他便经常上山采药换钱买学习用具。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小小年纪就能辨认出上百种中草药。

1969 年初中毕业后，他当上了"赤脚医生"。一天，在卫生院病房里，一个小女孩拽着他的衣襟哭着："叔叔，救我妈妈！"总在他耳边回响。"长白山那么多草药，难道就

不能治癌症?"王振国暗下决心,开始搜集治疗肿、癌症的偏方及中草药资料。

在以后的几年里,无论是入伍当了卫生兵,还是复员后当工人、车间主任、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小王都没忘记搜集偏方,潜心研究中草药。他对搜集的1200多个治疗癌症的民间验方进行分析、筛选。脑子里想的都是山参、天花粉、威灵仙、白花蛇草……他还攻读了古代药学家李时珍、张仲景等的医学著述。他闯入了医学专家也望而却步的禁区。

当时,他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仅81元,还要抚养老人、孩子,没钱购买实验设备,他就因陋就简,借了1500元钱,买来100多个罐头瓶和几十只小白鼠,把菜窖当"冰箱",火炕当"干燥室",在一个仅有两平方米的小棚子里开始了常人能以想象的艰难攀登。

1983年夏,第一批抗癌中药提炼出来。为检验毒性,王振国自己先服用一周。身上浮肿,出虚汗……但他终于没有却步。为了不断改进,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及进行药理分析,他三下江南,往返北京40余次,上长春近百次。1987年,他又创办了民办吉林通化长白山抗癌药物研究所。

十几年研究终有了成果。1987年、1989年,抗癌药物"复方天仙胶囊"先后通过省级、国家级鉴定。天仙丸投产一年多来,30多个国家,20多万名患者服用此药进行治疗,有效率和稳定率达80%,治愈率达1.3%。

王振国成功了!但他没有满足。天仙1——8号、抗衰老寿丹、爱滋康……他朝新的高峰迈开了探索的脚步。

(尚玉华)

珍闻轶事

神眼李学刚

北京火车站,每天进出的客车多达一百七八十列,车如流水;南行北往30万之众,人如海洋。浩淼的海洋,有凶残的鲨鱼;人的海洋,有形形色色的盗贼。

有鲨必有捕鲨人。李学刚,北京铁路公安分局北京站公安段刑侦队长。他来到公安战线14年,曾936次甩出手铐,捕获重大特大诈骗犯134人——人称"神眼"。

确实神:年轻的同行随他进了候车室,什么也没发现,而小李却提醒他,电梯口佯装看杂志的那家伙就是贼;内部厕所坏了,他出大门去小便,嘿,顺手牵回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和妻儿去逛商店,一会儿妻子就找不到他,原来他又盯上了一个窃贼;一条曾横行全国13个城市和113个单位,吞噬340多万元巨款在逃的巨"鲨",被他擒获……

前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二时左右,他在出站口向广场北扫视,突然一个人影回头望了一眼北京站,然后夹着提包西去。说时迟,那时快,小李迅速跟上去。在站前邮局一个黑暗处,那人正如释重负地清理猎物,一副铿亮的手铐铐住了他。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笑说:"大凡窃贼,或多或少要流露出与常人不一样的行为。常人出站,当然有反顾的,但那是看表,看车站大轮廓。而那人是向出站口慌张一瞥,然后迅速摘帽化装,这是反常举止。"

北京站人山人海,高峰时行走都困难,要"狩猎"当然更难。如果没有特殊本领,就只能落个昏头转向,白搭功夫。

前年一天夜里,他带领几名培训班的学员去车站实习,大家有些累,就坐北朝南在广场休息。他用余光向两侧扫视,发现有两人向他身后走来。按测定,七八秒钟他们将出现在小李左边,但十多秒过去了还未出现,他断定那两人必然盯住了身后那几个睡觉的人。于是,他不动声色,让学员悄悄向进站口走,然后迂回到两侧。没多久,那两人窃走了睡觉人的提包,但马上又被小李他们给戴上了"银镯子"。

小李说,人一上岗,眼睛就要如同启动的雷达,随时捕捉每一个反常现象。1986年12月12日,一个似曾相识的老头映入眼帘。他既不像单位的订票员,又不象来站接熟人。不一会便与一农民旅客搭讪,并取得了信任,那农民把一叠子钱递给了他。只见他接钱后,便朝售票口挤去。三晃两晃又溜出售票厅去地铁口。小李不容分说,上前铐住了他。原来他叫补明,湖南长沙人,某办事处"主任"。从1985年以来,他以签合同形式,行骗总金额达两亿元,是一个被通缉的在逃诈骗犯。

通宵达旦地"蹲坑",对李学刚来讲,那是太多太多了。1984年7月,他带领一个打击组,日夜蹲在北京站各重要部位,四个多月,抓获东北、内蒙古来的两个犯罪团伙,48名罪犯落网。在1983年和1984年"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期间,仅他一人就抓获289人。1987年是他的丰收年,平均两天多捕一条"鲨",最多时一天抓获6名罪犯。没有这些心血,北京市连续三届劳模的证书是染不

红的！

湖南发现千年巨蟒

湖南省洞口县桐山乡飞山庙村日前发现一条长38米的“蟒王”。据专家预测，这条巨蟒年龄在千岁以上。

据目击者介绍，那天该乡村民米久华等十几个人，正在原始森林追捕野猪，追至“迷羊溪”一带的原始林时，看见一根“大树”横在溪水中，大家从“大树”上踩着跃过溪流，当最后一人刚刚过去时，“大树”忽然动了起来，并慢慢向山上移动，灌木丛被压得倒向两侧。

十几个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棵“大树”是一条大蟒。大蟒周身比大水桶还粗，鳞片呈棕黑色，每片鳞比手掌还要大，鳞粗糙，似老松树皮。大蟒爬过的地方，如压路机压过一样光滑。专家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秦星蟒”和“蟒蛇王”。

（戴红）

男青年剖腹产男婴

7月2日上午，湖南省临湘县坦渡乡官庄村23岁的男青年谈关明在临湘城关镇医院剖腹取出一个男婴。婴儿重820克，身长约40厘米，四肢发育齐全，已长出上下牙齿。婴儿没有呼吸，但剪破手臂皮肤，有鲜血流出，按住伤口即可止血。据专家介绍，这样在男性体内生长达23年之久的完整寄生胎，在国内外均属罕见。谈关明说，他一生下来腹中就有一肿块，20多年来只长得比拳头大一点儿，但手术前的几十天突然迅速长到排球般大小，使他几次痛得昏死过去。

北京——台北联合拉拉队高呼“统一”

9月23日，适值亚运会开赛第一天。在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中国垒球队和中国台北垒球队狭路相逢，激战正酣。看台上，双方拉拉队员们却已经相互挽起了手臂，他们叫着、喊着，为运动员们的出色表现而欢呼雀跃。到后来，他们索性从座位上站起，在狭窄的看台边缘且歌且舞，唱起了那首在海峡两岸广为流传的《阿里山的姑娘》。

“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啊，碧水常围着青山转。”一曲末了，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统一统一，祖国统一！”接着双方数百名拉拉队员们不约而同地应和起来，共同喊出了他们发自心底的呼声。

（孙世）

6年捕鼠52万只

鼠害成了当今农村一大公害，每年给老鼠造成的损失难以数计，老百姓恨鼠入骨。浙江武义壶山镇熟溪村青年农民陈日升身在山乡，有心为民除害，他买来“电猫”在自家试捕成功后，就贴广告，对外“营业”，多的一个晚上能捕到300多只。由于捕鼠技术过关，业务骤增，名声远扬，连福建、江西、内蒙古等地也来函相邀。据统计，6年来，陈日升捕鼠达52万只，以一只老鼠每年糟踏粮食9公斤计算，一年从鼠口夺粮468万公斤。陈日升成为捕鼠专家。

都市“卦摊”

现代人的心态，千奇百怪。揣摸人的心理竟成了一项专门学科，遗憾的是，本文所说的揣摩心理者，不是××大心理系的学者，而是散布于都市角落里的卜筮算卦者。

这是一群让人琢磨不透内心世界的人。

（一）

城南，永定门车站附近，常见有相士、卜师活动，风和日丽天，寻个僻静地，席地一坐，用粉笔在地下大书一个“卦”字做广告，招牌简明，“广告”词可不少。听过一老者算命，他先从周文王在羑里演八卦说起：“……八卦乾坤，变幻无穷！当年周文王在羑里其实只演成六十卦，剩下的四卦，出自我爷爷的爷爷之手……”一大段开场白，自然有讨教者被吸引来。围观者中以外出做小生意者居多。谁不盼赚钱发财？“问啥？”卦士明知故问貌似漫不经心。“生意上的事。”问卦人虔诚地答。

八枚铜钱六番撒地，“小伙子。”算卦老者叫了一句，闭口不语。急不可耐的小伙子连声催促：“有什么，您老就直说。”“命上看，你祖上无财，少年贫寒，中年劳碌，晚景稍可。今年财星不照命，生意只可保本，不会有赚，明年8、9月间有大进项……”小伙子鸡啄米般点头，恭敬地递上5元钱。才离席，又一位坐在算卦老者面前。

公园绿地、车站候车室、街头巷尾都有可能遇到这些口若悬河、舌赛利刃的相士和卦师，看手相、看面相、看骨相，经络纹理一大套。或捏捏你的手掌，或扯扯你的耳垂，发一通“看相容易辨气难”的宏论。然后，指点迷津：你过去如何如何，将来如何怎样，要留心什么什么。最后，落实到“钱”字。你该付钱了。尽管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可眼前最缺钱。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是他们的口头禅。

“算你的命，养我的命”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二）

不知缘于何时，计算机也走入命相“八卦阵”中，在东四、西四一些电器商店里，在“让利销售东芝彩电、夏普录象机、中华学习机”的广告招牌下，还能看到这样的“服务项目”广告：计算机算命，科学、准确。入得门内，对坐在“0520”计算机旁的小姐报出你的生辰年、月、日，“算命小姐”轻按键盘，屏幕立刻显示出你的“命”，一旁的打印机也会在纸上打印出你的“命”。“事业：有工作能力，能干出一番事业，但得不到领导赏识，英雄无用武之地。友谊：待人热情，诚实友好，但你的朋友中有小人……”谁是不赏识你的领导？谁是小人？留待你去在生活中“对号”去吧。不管你信亦不信，照价付钱的事可不能疏忽掉，否则，你立刻就会碰见“小人”。

（三）

“卦摊”与“书摊”有串联。只要在书店、书摊前扫瞄几眼，你就会发现卜筮、相学之类的书籍随处可见，《周易尚氏学》、《六十四卦经解》、《周易讲座》、《相学十论》、《一掌经》、《相眼妙诀》……越来越多的人津津有味地研读此类书籍。

有人认为，卜筮与相术源于易学，虽不是易学的精髓，但也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元极生有极，有极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地、水、火、风），四象演八卦，八卦演六十四卦，这里面包括了阴阳辩证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如果结合五行四时方位生肖月令时辰，荣枯兴衰祸福顺逆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国内外和学术界曾一度出现“周易热”。西方学术界将《周易》尊为：东方古代哲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望“易”兴叹，而在“易”的家乡，也有人在望“易”兴叹。人们有理由担心：易学的洪流一旦溢出学术界的堤坝，受到市井流民、“小铁嘴”之流的浅薄导引，就会破人钱财，降人灾害。

去掉迷信成分，卜筮、相术是科学还是骗术？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论。就让学者们去争论不休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有关部门可勿忘采取措施，不可使它超出学术讨论的范畴，扰害社会。

（王世荣）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结构，心理习惯，文艺作品的样式等东西全部走向多元化，在人们生活中缺乏冠盖一切的主流倾向，于是在各个领域都有着纷呈现象，其中又不乏名重一时，流行一时东西。

文学界，新写实主义通过80年代的发展到90年进入高潮，主宰着文坛。

电影电视界也有一些令人们津津乐道良久的东西，如《妈妈，再爱我一次》，《渴望》，《围城》。

歌曲方面，港台流行歌曲雄风犹存，只是没有持久的魅力，而一首《渴望》却让大陆人哼哼数月，甚至终年不忘。

亚运会上，更高更快更强指导着中华健儿勇夺金牌，生活中它又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力争上游。

总之，从这里你将看出现在究竟流行着什么。

电影《本命年》

一个身体结实的青年，身穿过时的蓝棉袄，走进铁道边的居民区。他是本片的主人公——李慧泉（姜文饰）。他刚刚被解除劳动教养。

他拉开房门，母亲的遗象紧紧地攫住他的目光。痛苦一下涌上心头，他轻轻地拂去镜框上的尘土。

繁华的街景对他已太生疏，朋友的父母也对他冷言冷语。他借酒浇愁，却又勾起痛苦的回忆：为了“哥们义气”，他打伤了人被判了刑。

在热心的邻居罗大妈（孟瑾饰）和户籍警小刘（刘斌饰）的帮助下，李慧泉买了辆旧三轮车，办了个体户执照，开始了新的生活。李慧泉早出晚归，生意做得不错。转眼已到年底，除夕之夜的鞭炮声不绝于耳。一阵清亮的女人声音从窗外传来，罗大妈的女儿罗小芬（岳红饰）带着未婚夫来见岳父岳母。小芬和慧泉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如今她已是什么研究生。李慧泉急忙关了灯，靠着窗口静静地听着外面的说笑，心中泛起难言的滋味。

一天，就旧友“刷子”（梁天饰）之约，李慧泉走到咖啡厅消磨时光。夜晚的咖啡厅灯红酒绿，一对对情侣相互依偎。歌手赵雅秋（程琳饰）唱得纯朴动人，深深地吸引了李慧泉，美好的过去在他眼前回闪：小时候，他和小芬手拉手行走在绿树掩映的铁道上，天边通红的落日映着他们幼嫩的脸……

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约四十来岁的男子来跟李慧泉搭讪，使他又回到了现实中。这人叫崔永利（蔡鸿翔饰），

是个行踪诡秘的"倒爷"。两人正聊着，演出结束的赵雅秋因门外一群小流氓的纠缠，希望有人送她回家。于是崔永利请李慧泉代劳。

李慧泉推着自行车走着，赵雅秋在后默默地跟着。……以后，他晚上经常送她，彼此产生了好感。她送给他一张照片，他精心地将它贴在床头。后来，她听人说他曾是劳教犯，天真地问："是你骗我，还是他们骗我？"李慧泉的心被刺痛了。赵雅秋开始疏远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身边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越来越多，衣裙也越换越妖冶，纯真渐渐失去。李慧泉无限怅惘……

为躲避烦恼，李慧泉接受了崔永利"倒"来的货物，大大地做了几笔生意。一天夜里，崔永利摆酒款待李慧泉，拉他合伙做黄色录像带买卖，并企图用女色引诱他下水。李慧泉愤然离去。

多事的时节，昔日密友"叉子"（刘小宁饰）越狱潜逃又躲到他家。他劝"叉子"去自首，"叉子"不听。他内心极度矛盾，跑到街上乱逛。傍晚，他买了些吃的回屋，发现"叉子"已经逃跑了。他想去找民警，又顾虑重重。这当口，他得知崔永利与赵雅秋一起去了一趟广州，再也无法自制，狠狠地揍了崔永利一顿。回到家中又闻小芬要生孩子，他像是为了救自个儿，没命似地蹬车送她上医院，内心这才有所解脱。

李慧泉"挥泪大甩卖"卖掉了所有的存货，又取出全部存款，买了一条金项链，连夜驱车来到大酒家歌厅，找到此时已是红歌星的赵雅秋，不料被她用几句笑话回绝。李慧泉万念俱灰，两行热泪从紧闭的双眼中流下。

他大醉酩酊，踉踉跄跄地走出酒家，突然遭到两个少年的抢劫。他狂笑着将两个打倒在地。一个少年爬起，持刀捅向他。他只感到腹部剧痛，鲜血涌出。他跌跌撞撞地去抓少年，两少年见状怆惶逃走。他挣扎着走着，"是你骗我，还是他们骗我？"赵雅秋昔日的说笑在耳边回响……终于，李慧泉捂着伤口倒下了。血还在不停地流，片片秋叶在朔朔秋风中不断地落在他孤独的身边。（弓）

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

二十五年前，黄秋霞和林国荣真心相爱，情意绵绵。然而，林父是当地的大企业家，而秋霞的母亲原本是风尘女子。成全这件婚事有损林家的名声，这是林家无法答应的。国荣与秋霞泪眼相对，面对林母冷冷的目光，做出了痛苦的选择。

苦命的秋霞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带着腹中的小生命，到乡下投靠唯一的亲人姨妈。她痛苦、绝望，每日以泪洗面。好在姨妈尽力照顾秋霞，为她找了一份安定的工作……风波渐渐平静，一个新生命也降临人世，小志强给秋霞的生活带来生气，使她再度燃起希望的火花。为了新的生活，为了志强，秋霞工作更加努力。母子相依为命，生活也更添乐趣。

国荣另婚，但妻子娟娟不能生育。为了延续林家的香火，林母软硬兼施，欲把志强要回去。平静甜美的生活又被打破，秋霞怎么舍得志强离去？志强也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妈妈。但为了志强的前途，也为了让他能享受父爱，秋霞终于决定让志强回到林家，回到亲生父亲的身边，分离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失去儿子也就失去一切，秋霞的生活又变得黯淡无光。志强来到林家，成了林家小少爷，一切都是那样富足，但失去母亲的痛苦却在他幼小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志强受不了这伤痕带来的痛楚，独自一人偷偷跑回乡下找母亲。秋霞看着泪眼汪汪的儿子，听儿子叫着妈妈，埋在心底的苦水一下子涌上心头，真想好好抱抱志强，吻吻他。悲喜交织在一起，却又使她不得不忍着眼泪厉声责骂志强，骗志强说如果再偷跑回来，她就要躲起来，永远不再见他。志强又被送回林家，他哪能知道妈妈的苦心！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志强又偷偷跑回乡下，想再看看妈妈，却不敢进门，怕妈妈躲起来，再也见不到妈妈。他躲在门外，雨水和泪水浇透了全身……一夜的风吹雨淋，幼小的身体怎能支撑？当秋霞等人发现志强时，他已昏迷不醒，发着高烧。秋霞抱着志强，喊着他的名字，泪如泉涌。秋霞的声声呼唤不能使志强醒来，伤心过度的秋霞误以为志强已死而精神失常。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林志强已是学成归国的医学博士、乐山园疗养院院长。十八年前失去母亲的痛苦依然揪着他的心，这是他选学最冷门的精神病学科并放弃外国高薪而回国任职的原因。他要寻找离散十八年的母亲，他要治好母亲的病。他苦苦寻找……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母亲就在志强工作的疗养院中，她如今是那样憔悴、苍老，那双哀怨的眼睛中却依然透出爱意，这爱的目光使志强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教给他的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志强泪流满面跪在母亲面前，唱着这首歌……秋霞的眼渐渐湿润了，泪水从眼中涌出，她的记忆恢复了！秋霞看见面前的儿子，语言已被泪水代替。"妈妈，再爱我一次！"这声声呼唤把十八年的苦和怨全部倾诉出来。母子俩紧紧拥抱着。团圆了，一个充满爱的新生活开始了。

（弓）

电视剧《围城》

书有自己的历史。

电视连续剧《围城》开头的一组镜头，就像是用最简洁的影视语言，介绍《围城》这本书的简历——一个一个地，而不是一古脑儿地把小说《围城》的不同版本——从

1947年的小说初版，到英文版、俄文版，到1980年的人文版，到法文版、德文版，以时间顺序一个一个地推到观众面前，你看，书的经历居然和人的经历一样坎坷：从《围城》出世之后的30年中，它竟然被遗忘了！而当它重新被人发现之后，便像是理应得到被无辜遗弃30年的补偿似的，一下子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

当然，各种肤色的读者读《围城》，那视角是不会重合的，即便同样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欣赏《围城》，那兴奋点也不会是一个样。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意蕴实在是太丰富了。单说"围城"二字，你既可以按法国谚语的本意去理解："婚姻如围城，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边的想出来"；你也可以跟着小说作者的思路引申开去，感慨"人生万事犹如围城……"；你还可以从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因心灵不能沟通终于酿成生活悲剧，而想到这部小说主人公的灵魂何尝不是一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围城"。此外，小说的情感色彩也是多层次的：从幽默的调侃，到辛辣的嘲讽，从苦涩的感伤，到深沉的思索。深沉的思索，也化为隽永的笔致。如"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象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这样的诙谐，不经过一番咀嚼，是体味不透钱钟书先生的思考与感慨的。

小说《围城》的这种独特风格给小说的屏幕体现无疑增加了难度。现在来看，电视剧编导采用的事件展现辅以画外音叙述的表现方式，也许是把《围城》的小说语言转化为屏幕语言的合理选择。当然，屏幕化了的《围城》较之原著肯定有所减色，但我们已经不能不对黄蜀芹导演的忠实于原著的执著表示敬意。但愿我们的导演都能象她那样态度严肃到虔诚地对待小说名著。

当然，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成功，也有演员的功劳。我知道，陈道明当初是诚惶诚恐地接受角色的。但拍完之后他的自我感觉是：演得似乎要比末代皇帝好。我欣赏他的洒脱与即兴表演式的自由发挥。配角也都不错，特别是英若诚演的高松年。他演出了这类"文明人"的伪善，让人觉得高松年统治下的三闾大学正是一处"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边的想出来"的"围城"。

亚运会口号

团结、友谊、进步
更高、更快、更强

1990年流行裤装

现代人展现腿的魅力，在于裸露。而裤的新意，则更能强化腿部的迷人神韵。

时装的衍变，裤的多姿风采，一是长短宽紧，二是色调装饰。高贵的衣料、夺目的颜色、精致的花纹，还需时尚的款式相匹配，剪裁与制做工艺精巧尤为重要。

当今，宽松与紧身，并驾齐驱、各具千秋。前者高雅，后者潇洒，中青年皆宜，美琪裤、喇叭裤已有些过时，健美裤方兴未艾，筒裤、直脚裤仍盛而未衰，萝卜裤、锥子裤为时装新秀，套装西裤显得端庄斯文，贴身裤连袜裤外穿迷你裙是年轻女性春秋两季的新潮衣着。

裤的色彩、衣料，似变化不甚大。深浅灰有传统韵味，咖啡色、宝石蓝显得轻松活泼，黑色依然魅力深邃，浅色富于青春情趣，深色充满稳重洒脱，单一色为个性偏爱，复合色为共性所好。装饰除线条、衲线、缝制、压褶之外，很少使用更多的钮扣。

国外，90年代的马裤潮流正在暗中涌起。马裤原兴起于16世纪印度，后来殖民者将它带到西欧，先是在上层社会王室、贵族中穿用，尔后流传到民间。特征是，下围臀与大腿部位剪裁宽阔，到膝盖部位逐渐修窄紧贴小腿肚，曾经是典型的骑马装束，与19世纪50年代美洲得克萨斯兴起的牛仔裤，有异曲同工之妙。自从英国王子查尔斯穿着，成为当今男士追逐的时装模式之后，他上身着海蓝色宫廷王族式军人外套，下身穿白色骑士马裤，黑色长筒马靴，一派迷人情调。

今天，马裤进入时装行列，并非是为了策马奔驰而设，完全是属于时髦装束。上身穿着不拘一格，高翻领西装外套，对襟紧身大毛衣，轻便夹克衫，开胸外衣，因人而异，各适其式。马裤的选料以粗挺厚实为宜，水磨劳动布、卡其帆布、棉质斜纹、涤麻混纺条纹织物等。马裤也是女性男装化的创新运用，寓意绝妙。

1990年流行女装

1. 活力的展示

内着纯棉或弹性尼龙开襟衫，翻领、紧身，胸身单排小圆扣。外披花呢长袖短外套，圆领，袖口摺叠系小扣。胸部若隐若现，魅力深邃。下穿薄绒质感宽筒裤，气度不凡，迷人风范。

2. 古典加新潮

上衣为黑色轻柔的丝质或涤丝绸制做，V形衣领，衣脚为斜叉燕尾形，中间一只钮扣，别具新姿，诱人遐想。下身配白色或牙黄色宽筒裤，选用涤丝绸衣料，神韵充盈，飘逸不羁。

3. 文气加浪漫

上衣为大翻领开胸式涤麻交织伽衫，蝙蝠袖，紧袖口，系小扣。下着同类色调和面料的长筒西裤，上阔下瘦，

高腰，镶宽腰带。上衣系在裤腰内，斯文温婉，洒脱浪漫。

4. 无拘束个性

上衣为黑色铁骑士短皮褛，大翻领，宽袖，紧口系扣。中间系一条金属链，与独扣相连。内着无领紧身薄质洁白衬衣。下身为浅色羊毛质长筒西裤，显得格外俏皮瑰丽，独具一格。

5. 黑色的情趣

黑色服装一向流行不衰。一件薄绸衬衫，质柔紧身，略饰黑色斑点花纹，外穿黑色大翻领长套衫，装点一些闪光的钮扣。下着黑色高腰宽筒裤，风姿绰约，引而未发。

6. 夺目的惊艳

花纹精致的印花短上衣，大开领，短袖，束腰。下穿针织涤纶黑色纳褶长裙，黑长筒丝袜，黑色高跟皮鞋。此款宜做晚服，可配黑色骑士宽沿帽，有点鹤立鸡群，姿色超众。

7. 雅丽婚礼服

淡粉色或淡肉色薄纱衣料，饰宽花边，纳褶齐胸，圆领饰花边，大灯笼袖，紧袖口，显示出高雅秀丽，仪态大方。

8. 超短型裙衫

黑色涤丝绸衣料，上衣露肩齐胸饰花边，束胸紧腰。下着纳褶短裙，黑色长筒丝袜，黑色高跟皮鞋，分外年轻潇脱，青春奔放。

壁画《丝路风情》

在九月开幕的第七届全国美展上，由彭鑫、石景绍、刘永杰、张立柱四人合作的《丝路风情》（壁画）获金牌奖，现摘其创作谈部分如下：

石景绍：

由于我们对中华民族上升时期的周秦汉唐刚健雄强的气质，吞吐万方的胸怀，豪爽乐观的情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和立足点，《丝路风情》一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另外，我们四人所在的学校，就在长安县农村，我们几人都曾长期呆在陕西农村，有的人父母妻子至今还在农村。我们又曾长期奔波在西北黄土高原上，闭上眼睛，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也是苍茫古原，大漠风尘。遥远的历史想象与现实的人生坎坷、悲欢离合在我们的头脑里混杂，左邻右舍的大嫂、小妞与集市上忙碌的人群在我们眼前奔波。“丝绸之路”的画，若叫别人画，会出现什么面貌，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我们，就是这些生生不息的芸芸众生了。但当我们动笔画时，从头脑里最鲜明地跳出来的，还是这些形象储藏。于是，我们在创作提纲大致确定之后，就把创作的重点放在开发我们头脑中的这些形象矿藏上，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的文字记载，离不开诸如服装道具之类的形象参考，但最重要的，是激活这些头脑里的形象储藏。我们从“看景不如听景”的心理过程，从“雨淋墙头”的典故受到启发，我们若能找到这个媒介物，就一定能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而又生动万端的形象。于是我们抛开了手头的那些繁琐资料和素材，白纸对青天，任凭思维变幻，随手用炭条在纸上乱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线条。从这些杂乱无章的符号、线条里，依稀看出了大漠古道上的驼队、商旅、胡马唐人，或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或飞沙走马，地暗天昏……，凡是心有所思，手中便画，随画随想，随想随画，添添改改，加加减减，不求“肖似”，只求“达意”，或曰“传神”，人物或大或小，景物或近或远，或重或叠，或分或割，皆随兴之所到，随意而成。这样，竟画出了九十多个场面，上千个人物，还觉得不可遏止。

彭鑫：

《丝路风情》画出来以后，有人说它“用现代的手段，很好地表现了古老的题材”。其实，通过“丝绸之路”弘扬中华民族上升时期的灿烂的文化传统，在古代与现代文明的汇合点上去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这是多少美术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不说那古老的彩陶和阿尔泰岩画以及浑厚的汉唐雕塑，就是大漠里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也叫人神往。

据说在戈壁滩里生长着的胡杨，可以百年不死，死后也百年不倒，倒后百年不朽。那胡杨还有一个奇怪的特性，它的木材一斧头劈下去也是宁折不裂。胡杨的特性，简直是我国西部人的刚强人格的象征。

唐代高僧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万人千驼翻越葱岭古道时遇到了暴风雪而全体覆没无一生还的记载。这是多么悲壮的历史！传说玄奘仅从敦煌到伊吾（今哈密），就走了整整 13 天，差点死在星星峡。那些古代的志士仁人，他们有着多么博大的胸怀！是他们的无畏与奉献，创造了古丝路绚烂的文明历史。驼铃，带来了梦境般的西亚文明，送去了东方神奇艳丽的丝绸，沟通了恒河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中国在开放、交流的过程中，使自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程度的承认。这是雄强、博大胸怀，大无畏精神，一往无前的气势和力量（例如汉代艺术的古拙、狂放的美学风格），也是自信、欢快、自由而充满了活力（例如唐代的诗歌、音乐）的表现。从整体看，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美，具有永恒的特性。正因为这样，古文化往往引起现代人心灵的震撼和赞叹。就像那终南山峰的诱惑力，使我和我的朋友在《丝路风情》的创作中，付出了 4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原因吧。

刘永杰：

我出生在西北黄土地上，当我看到了、看多了他乡的青山绿水的美后才发现，我们的黄土地也是美的，独特

的。没有奇峰幽谷、小桥曲径，却给人以雄野的气魄。此时我想：把这种我自己的独特心灵感应转化成艺术语言，这就是我的路。

比如我不喜欢原原本本地貌似地画对象，同时我也不喜欢人云亦云式的变形和不恰当的变形。要说形变得好的，是因为别人根据彼时彼地真诚的情感感受而自然流露的变形，毋宁说是心灵的写实。那些人云亦云的变形，或者为了标新立异而变形，就可能要么苍白肤浅，要么滑稽戏谑。我不愿只画对象的外在形似，也不愿故意变形。我是要真实地写照我感受到的那股味儿，如果说这也是变形的话。

张立柱：

对传统需再认识。传统不是某皴某描的具体技法之类，而是从创作观上言，静心治学、纯心治学是很重要的传统。要说失却传统，这是我们失却的最重要的传统。观留世名作，不管画貌万千，手法多样，但在静心治学、纯心治学这一点上，却是一一相贯的。而今有些作品短时间都耐不住，我想此为重要原因。

其次，传统和现代不是矛盾关系，不是过去的就低级古老，今天的就高级现代。试观原始岩画、秦瓦当、汉画像石、陶俑、三彩、陵墓石雕；根深叶茂的民间美术（如剪纸、皮影、泥玩、布扎、脸谱面具等）就不难认识，且它们虽面目各异，却无不有一线穿其中且深且广的东西，那就是感情的纯真、形式的独特、个性的强烈。这种东西是既传统又现代的。画长卷《丝路风情》，想到相同传统的《清明上河图》而发生困惑时，发觉这些困惑的也是传统；当以为在时空转换上唯现代的蒙太奇与构成莫属时，发觉早要较全面深入地认识了家宝，就不会有救驾感。本来艺术的基本道理就是相通的，现代和传统并不是绝缘的，只要对传统能作一立体的辩证的认识理解，那么它的基本观念同今天的开放吸收并无矛盾，反而感到所谓新观念不是完全的新生物，而是艺术基本规律在新时代的合拍表现。基于此，每个画家自成面目所多走的一步，仅是依其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审美喜好把基本规律作以适情的扩展发挥而已。

历史档案

进一步治理整顿（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一、统一全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

（1）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如实估计困难，就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主要应该注意的是对困难估计不足。

（2）当前的经济困难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只有看清楚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艰苦性。

（3）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负有重要责任，应当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4）治理整顿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坚定不移地把治理整顿深入进行下去。

（5）充分认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增强治理整顿的信心。

二、治理整顿的时间和目标

（6）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7）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

——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求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百分之十以下。

——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

——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

——在着力于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至六。

——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

（8）治理整顿工作必须抓住的四个重要环节。

（9）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

三、继续控制社会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

(10)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仍然是进一步治理整顿的首要任务。

(11)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

(12)切实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

(13)逐步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

(14)坚持实行从紧的财政信贷政策。

四、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

(15)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

(16)努力保持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生产的稳定增长,大力提高运输效率。

(17)大力调整加工工业,克服盲目发展现象。

(18)充分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

(19)按照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20)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

(21)继续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

(22)广开就业门路,妥善安置待业人员。

五、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

(23)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逐步消除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的状况。

(24)坚决整顿市场秩序。

(25)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

(26)必须下大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

(27)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

六、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

(28)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9)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30)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31)认真抓紧抓好扭亏增盈工作。

(32)扎扎实实地全面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

七、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33)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34)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明确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

(35)坚持对外开放,更有成效地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

八、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36)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根本保证。

(37)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分散主义。

(38)必须坚决克服腐败现象,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

(39)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九、1990年全国十个财政大县(含县级市)

嘉定县(上海)	4.2510亿元	常熟市(江苏)	3.5744亿元
无锡县(江苏)	4.0548亿元	上海县(上海)	3.3779亿元
顺德县(广东)	3.7354亿元	江阴县(江苏)	3.3538亿元
川沙县(上海)	3.7012亿元	南海县(广东)	3.2508亿元
萧山市(浙江)	3.6422亿元	南汇县(上海)	3.2322亿元

〗

第11届亚运会资料集成

各代表团奖牌数

国家和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奖牌总数
中国	183	107	51	341
南朝鲜	54	54	73	181
日本	38	60	76	174
朝鲜	12	31	39	82
伊朗	4	6	8	18
巴基斯坦	4	1	7	12
印度尼西亚	3	6	21	30
卡塔尔	3	2	1	6
泰国	2	7	8	17
马来西亚	2	2	4	8
印度	1	8	14	23
蒙古	1	7	9	17
菲律宾	1	2	7	10
叙利亚	1	0	2	3
阿曼	1	0	0	1
中国台北	0	10	21	31
香港	0	2	5	7
斯里兰卡	0	2	1	3
新加坡	0	1	4	5
孟加拉国	0	1	0	1
缅甸	0	0	2	2
老挝	0	0	1	1
澳门	0	0	1	1
尼泊尔	0	0	1	1
沙特阿拉伯	0	0	1	1
总计	310	309	357	976

亚运会新纪录

本届亚运会将作为打破纪录最多的一届亚运会而载入亚洲体育运动的史册。在有纪录项目的13天的比赛中，各国和地区运动健儿共打破4项世界纪录，超6项、平5项世界纪录，刷新42项亚洲纪录和98项亚运会纪录，为历届亚运会之最。

中国22岁的自行车选手周玲美，在女子场地自行车1公里计时赛中，以1分13秒899的成绩打破苏联运动员埃里卡·萨鲁米叶保持了6年之久的1分14秒249的世界纪录，从而在自行车运动史上第一次在世界纪录一栏中写下了亚洲人的名字。

南朝鲜选手金水宁在女子个人国际箭联淘汰赛中，以345环和346环的成绩两次打破该项的世界纪录。南朝鲜选手李银敬以345环的成绩同样打破了该项世界纪录。南朝鲜选手杨昌勋在男子个人国际箭联淘汰赛中，以1345环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的世界纪录。南朝鲜选手金善宾、杨昌勋、朴在杓在男子团体国际箭联淘汰赛中以1004环和1005环的成绩，两次打破该项世界纪录。南朝鲜选手金水宁、李银敬、李蔷美在女子团体国际箭联淘汰赛中以1010环的成绩平了该项的世界纪录。南朝鲜选手一共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平1项世界纪录。

亚洲体育健儿还在举重、射击等项目的比赛中超6项世界纪录、平4项世界纪录。超过的6项世界纪录是：中国运动员邢芬以95公斤的成绩超过女子举重44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邢丽威以85公斤的成绩超过女子举重56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马娜以92.5公斤和207.5公斤的成绩，分别超过女子举重60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郭秋香以

100公斤的成绩超过了女子举重67.5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和朝鲜队分别以434中和430中的成绩，超过射击女子团体飞碟双向世界纪录。平的4项世界纪录是：中国运动员邢芬以165公斤的成绩平女子举重44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邢丽威以190公斤的成绩平女子举重56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马娜以115公斤的成绩平女子举重60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张山和朝鲜运动员朴贞壮同以197中的成绩平射击女子飞碟双向世界纪录。

根据国际举联的规定，只有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上打破的举重世界纪录，才能得到国际举联的承认；根据国际射联的规定，参赛队超过5个、参赛队员超过15名，在亚运会上打破的射击世界纪录可以得到承认。但本届运动会超纪录项目参赛队和运动员都达不到这个数字，因此，运动员创造的这些纪录得不到承认。

据亚运会组委员提供的破纪录公报统计，在本届亚运会上，共有52人79次打破42项亚洲纪录，9人10次平5项亚洲纪录；109人164次打破98项亚运会纪录，14人19次平12项亚运会纪录。

亚运会多奖选手

本届亚运会获多块金牌或银牌的获得者就有198名运动员，仅他们获得的奖牌就达528块，其中中国运动员有108名，占一半以上。共有73名运动员是多块金牌的获得者，其中中国运动员54名，占2/3强。

多奖选手的前19名全是中国运动员，游泳名将沈坚强名列第一，他一人获5枚金牌，也是本届亚运会唯一获得5枚金牌的运动员。排在他后面的依次是：王晓红4金1银，林莉4金1银，许海峰4金，杨文意4金，庄泳4金，谢军3金2银1铜，张秋萍3金2银，李敬3金1银1铜，王义夫3金1银1铜，国林跃3金1银，陈翠婷3金1银，王润喜3金1银，许艳华3金1银，李对红3金1银，王丽娜3金1银，邓亚萍3金1银，纪刚3金，黄世平3金。这19名运动员就夺取了全部310块金牌中的64块。

获得3枚以上金牌的22名选手中，除了南朝鲜皮划艇选手，其余都是中国运动员。

亚运会始末

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

1985年4月26日，亚运会组委会在北京宣布成立，随后确定，亚运会的宗旨是：团结、友谊、进步。亚运会的精神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争创一流。

1986年，本届亚运会的工程建设动工。1990年4月底全部竣工，交付使用。

1990年8月22日，“亚运之光”火炬接力传递活动正式开始，9月20日结束。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洲运动会隆重开幕。

1990年10月7日，第11届亚洲运动会胜利闭幕。

亚运会会徽、吉祥物、会歌

第十一届亚运会会徽图案中上方的太阳光芒，取自亚奥理事会会徽，代表本届亚运会是受亚奥理事会委托举办；图案中心，是由雄伟的、象征着中国古老文化的长城图案组成的“A”字，代表亚洲（ASIA），“A”字又以艺术形式构成了罗马数字“XI”，体现了第十一届的意思。本届会徽的设计者是上海工业大学建筑美术教研室的朱德贤。

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一手持有天安门图像的亚运会奖牌，另一手高举手指表示欢迎和鼓励的熊猫“盼盼”。“盼盼”寓意盼望和平、友谊，盼望朋友到北京，盼望获得优异运动成绩。“盼盼”的设计者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刘忠仁。

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会歌是《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由石祥作词、施光南作曲。

亚运会工作人员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的名誉主席是万里，主席是陈希同，执行主席是伍绍祖，顾问是李梦华和韩伯平，亚运会工程总指挥是张百发，亚运会组委会共有正式工作人员17000名左右。

亚运会还有许多义务工作人员。1989年11月成立的亚运会义务服务人员总队，由20万北京青少年组成。75万人次的文明啦啦队员和观众一起助战309场比赛。

亚运会火炬传递

“亚运之光”火炬，于1990年8月7日下午，由15岁的藏族少女达娃央宗，从西藏念青唐古拉峰下采得火种，之后被护送到北京。

1990年8月22日上午9时，第11届亚运会圣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由江泽民总书记点燃。当天，组委会派出四路护送组，将火种送至黑龙江的哈尔滨，新疆的乌鲁木

齐，西藏的拉萨，海南的海口，并在当地举行欢迎仪式。8月23日，全国的火炬接力传递活动分四路开始举行。

9月20日晚，火炬接力传递终点的交接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8时半，李鹏总理点燃了铜铸的亚运圣火之鼎。鼎中之火引燃的火炬，在9月22日进入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会场。

“亚运之光”火炬传递活动行程达18万公里，有全国各族干部、群众1.7亿人参加。

亚运会开幕式

1990年9月22日下午，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陆续步入亚运会主会场——北京工人体育场，16时52分，应亚奥理事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宣布第11届亚运会开幕。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陈希同在开幕式上致辞。亚奥理事会副主席西尔瓦和哈桑在副主席金宗河、艾哈迈德、陈先陪同下，宣读了已故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生前为本届亚运会撰写的开幕词。中国的陈龙灿代表全体运动员向大会宣誓。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副主席庞德、姆巴依、何振梁、戈斯帕尔以及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主席拉尼亚等国际体育的组织人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表演了气势磅礴的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

亚运会闭幕式

历时16天的第11届亚运会于1990年10月7日晚在礼花缤纷的北京胜利闭幕。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李瑞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席苏丹·阿兹兰·沙阿陛下，黄文欢同志，泰国前副总理天猜，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级体育官员，各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人知名人士等，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上，亚奥理事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下届亚运会承办国——日本国国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上空徐徐升起。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德·西尔瓦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从亚奥理事会副主席金宗河手中接过亚奥理事会会旗和火炬。会旗和火炬交北京市人民政府保管，四年后送往日本广岛，在下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交还亚奥理事会主席。闭幕式上演出了壮丽的《今夜星光灿烂》。

亚运会资金来源

亚运会工程建设投资为21.8亿元人民币，举办费约3.3亿元，两项加起来约25亿元。其中国家先后拨款10.5亿元，贷款2亿元，社会集资突破6亿元，北京市政府承担6.5亿元。

第11届亚运会基金会主席是荣毅仁。

第11届亚运会的集资方式是：1、请社会各界捐助和赞助，是完全出于自愿的。2、指定产品和标志产品。3、广告。4、奖券发行。

第11届亚运会的第一位捐款人是江苏省建湖县第二中学学生颜海霞。她于1987年3月2日向亚组委捐款1.60元。

向亚运会捐款最多的个人是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他于1989年1月12日捐款1亿元港币。

向亚运会捐款最多的国内团体是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1990年3月9日，捐款2050万元人民币。

亚运会设施

第11届亚运会工程的总建筑面积是130万平方米。第11届亚运会共有80个比赛训练场馆，其中新建和改建55个，建筑面积46万多平方米，为亚运会服务的邮电中心、新闻中心、电视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发射塔等工程，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位于首都北郊设施齐全的亚运村和国际会议中心，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由村长办公室、运动员公寓和餐厅、竞赛信息中心、宗教活动场所、奥委会服务中心、健身中心、娱乐中心、中心花园、医疗中心等组成的亚运村，占地面积16公顷，建筑总面积23万多平方米。亚运村有7栋错落有致的运动员公寓楼，有3900个房间，7200个床位。亚运村的运动员餐厅，可同时容纳2500人就餐。亚运村的村长是焦若愚。

第11届亚运会亚运村开村仪式9月7日在亚运村升旗广场隆重举行。9月8日迎接首批进住的体育代表团。

第11届亚运会比赛必须配备的体育器材共有303种，其中70%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并获得国际体育组织的批准。经过角逐，全国20多个厂家获得了200多种亚运会体育器材的生产权。

第11届亚运会电子服务系统包括计算机、广播电视、通讯、计时计分、仲裁录像五个分系统。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的计时计分系统，长44米，高11米，是亚洲最大的电子显示装置。它那被誉为“中华第一屏”的彩色大屏幕，是国内最大的电视屏幕。

亚运会规模

亚奥理事会 39 个成员中，有亚洲 37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本届亚运会。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马尔代夫、马来西亚、也门、不丹、日本、中国台北、文莱、巴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老挝、伊朗、约旦、阿曼、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科威特、香港、叙利亚、泰国、菲律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斯里兰卡、越南、南朝鲜、缅甸、蒙古、新加坡、黎巴嫩、澳门、中国。

本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共 27 个。它们是：射箭、田径、羽毛球、篮球、拳击、皮划艇、自行车、击剑、足球、高尔夫球、体操、手球、曲棍球、柔道、卡巴迪、赛艇、藤球、射击、垒球、游泳（包括跳水、水球）、乒乓球、网球、排球、举重、摔跤、武术、帆船，还有两个表演项目。它们是：棒球和软式网球。

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各体育代表团人数 6578 人，国际裁判员、仲裁、技术代表 600 多人，国际奥委会委员、亚奥理事会官员、亚洲各体育组织、各奥委会及其他来宾约 900 人。

参加第 11 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最多，为 838 人。其中，运动员 670 人，教练员 105 人，官员 63 人（包括医生）。团长为袁伟民。

亚运会环境美化

北京为美化亚运会环境群策群力。截至 8 月中旬，全市今年共植树 265 万株，种草坪 184 万平方米，扩大绿化面积 463 公顷。全市还培育了 600 万盆鲜花，建起了 22 个大型花坛，另有八九百个小型花坛，主要干道两侧的居民阳台上摆出了 16 万盆鲜花。

国际奥林匹克中心的绿化面积 25 公顷，其中有 10 万棵树，10 多万株花，还有 7 万多平方米草坪。

亚运会交通运输

为了保证亚运会的交通运输，修建了北辰路、北四环路以及京津塘高速公路北京至杨村段等 24 条道路，共 92 公里，包括 18 座立交桥和 54 座其他桥梁、环岛、地下人行通道。

第 11 届亚运会期间动员各种车辆 2500 辆，其中大客车约 550 辆，小客车 1200 辆，旅行车 550 辆，其它车辆 200 辆。此外，还有 200 部左右的特种车辆。这些车辆包括为贵宾、运动员服务的开道车，为贵宾、运动员提供安全保证的警车，为清除交通路障及解决交通堵塞的清道车以及为防火而专用的消防车等。

亚运期间，共开设 101 条直达班车线路，其中记者班车 41 条。专用线路约 250 公里。

亚运会的新闻报道

本届亚运会有 5000 名左右记者前来采访，其中境外记者约 3000 名。

本届亚运会电视报道创下了好几项亚运历史上的新纪录。一是外来记者最多，达 1300 人；二是卫星信号最多，使用 14 个卫星通道；三是各国和地区利用评论席最多，达 118 个。

亚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国内报道也是历届亚运会数量最多的。它向世界各国和地区传送国际电视信号 930 小时，向全国播放电视节目 280 小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 43 种语言向国内外及时播发亚运会消息。

这次亚运会比赛中决出的第一块金牌，打破的第一项世界纪录，都是新华社首先发稿的，被《人民日报》誉为夺得了“新闻金牌”。

亚运会的旅游、购物

据北京市旅游局统计，亚运会期间北京地区接待各国和地区官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记者以及旅游观光者，共计 15.4 万人。亚运会期间，北京旅游外汇收入大幅度增长，仅 9 月份一个月就创汇 8186 万美元，比历史上最好水平的 1988 年同期增长 13.9%。第 11 届亚运会购物中心举办 40 天，共接待 160 万人次，其中外宾 26 万人次，总销售额 1.1 亿元。

1990 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聂卫平——棋圣、国家围棋队副总教练
魏书生——辽宁盘锦实验中学校长
王振国——吉林长白山抗癌药物研究所所长
勾艳玲——黑龙江哈尔滨市电信局话务员
杨吉奎——辽宁大连渤海水产公司总经理
黄志红——浙江省体工队田径队运动员
李登海——山东莱州市玉米研究所所长
李润虎——兰州军区某部军械修理所志愿兵
蔡伟素——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被服厂厂长

张思荣——武警福建闽安公安检查站站长

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项目	单位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1990年与1982年比较
一、总人口①	人	1133682501	1008175288	增长12.45%
二、自然变动②	—	—	—	—
出生率	‰	20.98	20.91	增加0.07个千分点
死亡率	‰	6.28	6.36	减少0.08个千分点
自然增长率	‰	14.70	14.55	增加0.15个千分点
三、平均每个家庭人数	人	3.96	4.41	减少0.45人
四、性别比(女=100)	%	106.6	106.3	增加0.3个百分点
五、民族	—	—	—	—
汉族	人	1042482187	940880121	增长10.80%
各少数民族	人	91200314	67295167	增长35.52%
六、每十万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	—	—	—	—
大学	人	1422	615	增长131.22%
高中	人	8039	6779	增长18.59%
初中	人	23344	17892	增长30.47%
小学	人	37057	35237	增长5.17%
七、文盲、半文盲③	—	—	—	—
人数	人	180030060	229964474	减少21.71%
占总人口比重	%	15.88	22.81	减少6.93个百分点
八、市、镇人口④	—	—	—	—
人数	人	296512111	206588582	—
占总人口比重	%	26.23	20.60	—

① 总人口：为我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数，不含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中国同胞人数。

② 自然变动的时期：1990年人口普查为普查前12个月数据；1982年人口普查为1981年数据。

③ 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④ 市、镇人口：1990年人口普查的市人口是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镇人口是指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1982年人口普查的市人口是指所有市建制的人口(不含市辖县人口)；镇人口是指县辖镇的人口。

中国外债备忘录

1.1989年10年6日，中国国家外汇局披露：截至1988年底，中国所欠外债余额达400亿美元，90年代中国将进入还债高峰期。

海内外把视线一齐投向中国：中国会发生债务危机吗？轰然而起的还债大潮会动摇中国尚未发育成熟的经济大堤吗？

2.外债，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在共和国史上，它曾投下阴影，留下心酸的泪痕，也曾激起亢奋，刻下豪迈的印记。

1964年冬的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以凝结着千钧重量的字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数千名人民代表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回报这振奋人心的强音。

人们不会忘记，50年代初，“老大哥”苏联给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74亿旧卢布(约合19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期限10至20年。这批珍贵的贷款支撑起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奠定了新中国经济实力的基石。然而，债期未至，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逼中国还债。共和国经历了三年最艰难的路程。国家经济萎缩，国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艰辛。外债的苦涩与屈辱，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底。

3.然而，历史毕竟有它特定的时刻和背景，经济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外债带来的并非只是屈辱，有时往往可以带来一个民族的复兴。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光靠国内的力量和资金推进经济建设，往往势单力薄，进展缓慢；举债搞建设，只要掌握适度，管理、使用得好，是一条时间短、见效快的成功捷径。

70年代初，国际形势悄然发生变化：东西方冷战趋缓，经济封锁解冻。1972年春，毛泽东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

1973年冬天的一天，一群来自英、法、联邦德国的政府官员兴致勃勃登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当中国国家计委、财政部高级官员在总计4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上签字时，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宣告完成——新中国向西方国家借用了第一笔外债。

这笔贷款主要用于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械。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引进、利用外资”作为一项长期方针确定下来，一道无形的“禁令”解除了。

4.伴随对外开放的步履，出现的第一个高峰便是“借贷热”。

一项项对外借款合同在觥筹交错中草签，一个个外资企业在鞭炮声中剪彩，一笔笔国外资金从地球的那一端流入中国这一边……

发行外币债券，这是中国引入外资的又一“通道”。

中国进入了世界主要资本市场。1982：4000多万美元，1985：7.8亿美元，1987：12.5亿美元……

据统计，到1988年底，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共发行了30多笔债券，总额高达42.5亿美元，相当于发行初期的106倍！

一项项沉甸甸的数字在国家统计局汇集：从1979年到1989年，我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21000多项，协议总金额超过880亿美元。

5.外债，一把双刃的剑。

双刃之剑刺向何方，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巨额的外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外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发动器。引入国门的外资重点投向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和机械电子行业，用于技术改造、扩大出口创汇能力和实行进口替代项目。国外贷款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一股新的“血液”，使“资金饥饿症”、“技术陈旧症”等病情缓和，并为国家加快重点项目助了“一臂之力”。

钢铁，工业的基础之材。80年代初，中国人均钢产量才35公斤左右，仅仅是世界平均数的1/5。为了解决钢产量和品种的不足，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共进口钢材8600万吨，耗费外汇170亿美元。

花钱进口，不如建厂生产。利用外资建设的现代化宝山钢铁总厂，呱呱落地了，高113米、容积4000立方米的特大型高炉巍然矗立在东海之滨。它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从五六十年代迈进了70年代的水平。投产四年，它给国家提供了1167万吨生铁、1202万吨钢锭、1047万吨钢坯。待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年产钢将从300万吨增加到600多万吨。届时，我国每年大约可因减少进口钢材而节省20多亿美元，相当于一个宝钢的投资。

(浦晓江　吴士深)

“七五”成就概览

(一)经济增长较快

主要工农业产品大多数完成了计划指标。据列入“七五”计划的60种主要产品分析，预计1990年达到或超过

计划指标的有39种。但是有21种产品生产与计划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一批新的生产能力

"七五"时期基本建设新增了一批生产能力。五年累计，新增煤炭开采能力1.3亿吨，发电装机容量4543万千瓦，石油开采能力6356万吨，炼钢能力512万吨，化肥能力171万吨；铁路新线里程3448公里。新建公路8万公里，路面档次有所提高，沈阳至大连等高速公路的建成，结束了我国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49亿吨，新建、扩建了宝山钢铁厂，扬子、齐鲁、大庆三大乙烯厂，几个大型复合化肥厂等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大型企业。

（三）交通运输邮电业继续发展

1990年货运总量预计99.5亿吨，比1985年增长33.4%；超额完成94亿吨计划的任务；客运量达79亿人次，未完成计划低限目标，平均每年增长5%。由于采取铁路、公路合理分流和提高铁路运价等措施，铁路运输压力相对减轻。铁路货运量预计完成15亿吨，平均每年增长3.4%；客运量10亿人次，平均每年下降1.9%。1990年港口吞吐量、民航运输周转量预计达到5亿吨和22.5亿吨公里，均未完成计划要求。

邮电业务总量预计完成78亿元，超过计划1.6倍，平均每年增长21.4%，比计划要求高10.2个百分点。

（四）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

"七五"时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4%（其中前四年平均增长17.1%，1990年预计增长2%），比计划高5.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7130亿元，年均增幅比计划高4.9个百分点，农业生产资料1130亿元，年均增幅比计划高10.4个百分点。市场商品货源充裕，主要商品销售均有较大增长，高档耐用消费品销售增加尤多。

"七五"时期，在加强和改善重要物资宏观平衡和计划指导的基础上，国家有步骤地减少了计划分配物资种类，降低国家分配社会资源总量的比重，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

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预计1360元，比1985年增长近1倍，平均年增长14.7%；农民人均纯收入640多元，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比计划要求约高3个百分点。但如扣除价格因素，则实际增幅较低。

1990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预计2960亿元，比1985年增长1倍以上，平均每年增长16.4%，但由于前几年物价涨幅大，实际平均工资只增长2%左右，低于计划增长4%的要求。城乡储蓄大幅度增加。预计1990年末城乡储蓄总额达7000亿元左右，比1985年增长3.3倍；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0亿元，比1985年增长1倍；全国年末结余购买力9000亿元，比1985年增长2.7倍。

（五）对外开放规模进一步扩大

"七五"时期，国家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加速外贸体制改革，使对外经济迅速发展。

在沿海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对外开放经济带。继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后，我国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等地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使对外开放区域朝着对外开放、内外结合的方向发展。1990年，中央又决定开放、开发上海浦东地区，进一步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进出口贸易增长快，商品结构有所调整。1990年预计海关进出口总额达1080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55.2%，年均增长9.2%，比计划要求高2.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达570亿美元，进口总额510亿美元，年均分别增长15.8%和3.8%。由于控制机电产品和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口，1990年进口在前几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得到压缩，出口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扭转了外贸逆差的局面。同时，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进口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大幅度下降，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到70%以上。

利用外资取得一定成果。"七五"时期对外借款300亿美元，比计划增加30亿美元，中长期借款比重由"七五"初期的59.4%上升到9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比"六五"时期高出2倍以上。

（六）科教文卫事业又有新发展

"七五"时期，我国获得一批重大科学技术成果，项目总数由1985年的10476项增加到1989年的20278项，预计1990年也在2万项以上；并取得了一批国家级的发明奖。一些领域的科技成果接近或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大型科研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火箭、"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技取得新的突破。

教育事业进行了结构调整，增强了适用性。199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预计3万人，低于"七五"计划要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预计62万人，与1985年持平，低于计划要求水平，中等专业学校招生78万人，年均增长3.1%，比计划要求低3个百分点。

文化事业保持发展热头。1990年预计摄制电影故事片130部，基本达到"七五"计划要求；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清理和整顿一些书刊的发行，1990年预计出版总印张522亿印张，比1985年减少7.2%。

卫生事业继续发展，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1990年

医疗病床数预计达263万张，比1985年增长17.9%，达到“七五”计划的要求。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4日　北京市人民法院日前对受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插手北京动乱的特务分子梁强等3人，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6年。

1月4～8日　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月7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在第5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呼吁，我国90年代前期正处在人口出生高峰的峰顶，必须落实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民主中国阵线”是反动组织，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活动，对为首的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依法吊销了他们的护照。

1月8～12日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乔石等11日会见出席座谈会的同志，江泽民讲话时指出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一个法宝，全党都要重视统战工作。

1月10日　李鹏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国务院命令，决定从本月11日起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

1月11日　中共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外交家、中顾委常委黄镇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黄镇是1989年12月10日在京逝世的，终年80岁。

1月13日　中共中央决定：黄璜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1月15日　周南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月18日　公安部宣布，最近有573名因参与去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而被审查的违法犯罪人员，在被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表现，得到宽大处理，经教育后已经释放。

2月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任命周玉书为武警部队司令员，徐寿增为政委，王文理、左印生为副司令员，吕寿延、徐桂宝为副政委。

2月9日　国务院召开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盐业管理条例》，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草案)》。

2月13～1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9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评选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并决定把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区徽图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月17日　全国妇联和中国农业银行在京联合召开学习女英雄潘星兰、杨大兰座谈会。全国妇联日前决定授予潘星兰、追授杨大兰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2月24～28日　宋平在四川进行了考察，他在考察中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保证，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培养和教育青年。

3月3日　卢荣景在中共安徽省委五届一次全委会上继续当选为省委书记。

3月3～5日　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3月5日　全国总工会在京召开会议，任命潘星兰、追认杨大兰同志为“全国金融卫士”，授予潘星兰、追授杨大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月6日　为期7天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京闭幕。会议提出维护社会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方针。

3月7日　首都各界妇女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宋平等出席，江泽民发表讲话，康克清发来了贺信。

3月9日　监察部公布，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严重失职受贿，国务院决定撤销其副部长职务；公布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去年五月因雪灾造成大批金农遭灾遇难事件查处情况，原省长、副省长受到行政处分，格尔木原正副市长贪污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

3月12～15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决定，接受伍觉天辞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免去郁文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决定。

3月14日　全国铁路检察长工作会议强调，要严厉打击危害铁路治安秩序的犯罪活动，保障铁路安全。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任命白清才为陕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3月20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万里宣布大会开幕，李鹏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江泽民、杨尚

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等出席。

4月4日　自3月20日开始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1990年国民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89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三个附件和区旗、区徽图案；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关于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决定，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根据江泽民的提名，决定任命刘华清为国家军委副主席，免去洪学智的国家军委委员职务，会议还通过了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贺敬之、伍觉天辞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4月7日　国务院召开第57次常务会议，讨论了关于"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拟定工作问题，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吸收外商投资成片土地综合开发经营暂行管理办法》。

4月23日　白清才当选为陕西省省长。

4月24日　国务院举行第58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草案)》。

4月25日　成克杰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4月30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决定从5月1日起，解除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戒严。

金基鹏当选为青海省省长。

5月4日　郭树言当选为湖北省省长。

5月10日　公安部宣布：最近陆续有211名因参与北京去年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违法犯罪人员被解除审查，获得宽大处理，并已释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

5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公安机关最近破获了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跨国贩毒案，共捕获境内外贩毒分子51名，缴获200多公斤海洛因等。

5月20日　李登辉在台北发表"总统"就职致词，仍推行"一国两府"，制造"两个中国"。

5月25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保密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月31日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江村罗布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6月1日　张学良在台北出席他90岁寿辰宴会，这是他54年来首次公开露面。

6月6日　公安部发言人宣布，最近又有97名参与去年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违法犯罪人员，被解除审查，获得宽大处理，并已释放。

6月8日　新华社报道：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任职期间受贿，工作严重失职，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决定开除其党籍，中纪委同时决定开除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徐俊等8人的党籍。

6月12日　中纪委发出《关于几起党员干部违纪建私房和高标准装修住房典型案件的通报》。

6月19～27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先后访问了汕头、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一些市、县，就改革开放政策、治理整顿和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6月20～28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6月25日　公安部发言人宣布，方励之、李淑娴已有悔悟表示，获准宽大处理，准许他们出国治病。

7月1日　周恩来全身铜像在南京落成。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开始。

7月4～7日　全国机构编制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鹏在7日的会上提出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运行机构。

7月12～28日　中纪委分片召开纪检工作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座谈会12至15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座谈会20至24日在兰州召开；华北、东北、华东地区座谈会24至28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强调从严治党，党风和廉政建设丝毫不能放松。

7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办理淫秽物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并通报除"六害"、扫黄的情况。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近日分别发布命令，授予总后青藏兵站部"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荣誉称号，授予空军某部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以"模范气象导航站"荣誉称号。

7月20日　邢崇智当选为河北省委书记。

7月20～26日　江泽民赴西藏考察，并参观了工厂、农村、牧区及大昭寺、布达拉宫，慰问了边疆部队。

8月3日　新华社报道：台湾有关方面日前以极不人道的方式遣返一批私自渡海入台的大陆同胞，致使25人被困在船舱底缺氧窒息死亡，人为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8月8日　全树仁当选为辽宁省委书记。普朝柱当选为云南省委书记。

8月9日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聂卫平、魏书生、王振国、勾艳玲、杨吉奎、黄志红、李登海、李润虎、蔡伟素、张思荣当选。

8月10日　国务院举行第66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草案)》。

第2次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在京举行，141名见义勇为的优秀代表受到嘉奖，乔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

8月11日　中纪委日前发出关于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瞿宝元等人受贿黄金首饰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在这一案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有3名厅级干部，6名处级干部，4名科级干部，中纪委要求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8月13日　台湾方面遣返大陆私自渡海入台大陆渔船，与押送的台湾军舰相撞，50人全部坠海，21人失踪。

8月16日　中国银行副行长雷祖华等人连续接受公款宴请，3次共耗资7000多元，经国务院批准，监察部决定给雷祖华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

8月23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电话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部署。

8月23～29日　乔石在新疆进行考察，访问各族干部群众，指出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是稳定的，要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把各项工作搞好。

9月1日　江泽民从上月22日至今在新疆考察，他在考察时反复阐述稳定和加强团结的意义，希望新疆各族干部依靠各族人民集体智慧，把新疆的建设和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9月7日　历时11天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会。李鹏总理在开幕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访问印尼、新加坡、泰国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9月11日　中共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蔡畅同志，因病于今晨在京逝世，终年90岁。

9月21日　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同志因病于今晨在京逝世，享年88岁。

9月26日　毛致用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0月10日　国务院召开第68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草案)》。

10月12～17日　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今年1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已侦查终结贪污、贿赂案36000多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3400多万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等在17日讲话中强调今后反贪污贿赂任务还相当繁重，要长期坚持。

10月13日　熊清泉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10月25～30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6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等报告，听取了田纪云关于当前农业形势和任务的汇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

10月26日　国务院举行第69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的《民兵工作条例(草案)》。

10月29日　台湾"内政部"宣布，即日起开放岛内各宗教团体派员赴大陆地区从事朝圣、迎香等宗教活动。

10月30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1号公报：中国总人口为1160017381人，其中大陆人口截止1990年7月1日零时为1133682501人。

10月31日　陈光毅再次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1月4日　历时7天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京闭幕。与会代表指出，必须适应当前的形势，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

11月6～13日　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反贪污、反贿赂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今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已办结贪污、贿赂案36190件，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5.26亿多元。

11月9日　国务院举行第71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行政复议条例(草案)》。

11月13日　侯宗宾当选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11月20日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在京成立，吴学谦代表国务院到会祝贺，会长为钱伟长。

11月21日　贾庆林任福建省副省长、代省长。

11月23日　国务院举行第72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草例)》，决定成立全国禁毒工作领导机构。

11月27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本月21日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一事对新华社记者说，只要是促进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我们愿同台湾省任何团体个人接触。

11月28日　中共中央最近决定，顾金池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12月19日　李灏继续当选为中共深圳市委书记。

12 月 20～28 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17 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会议根据李鹏总理的提请，决定免去王芳兼任的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陶驷驹为公安部部长，免去郑拓彬的外贸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岚清为外贸部部长。

12 月 22 日　赵富林当选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2 月 25～30 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在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经　济

1 月 3 日　国家确定今年全国续建 580 多项大中型基建工程项目，投资主要用于加强重点建设，突出农业、能源和交通。

1 月 6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凌则提宣布，我国从 1 月 1 日起对在华外国人士实行"购物支付证"制度。

我国已跃居为世界海水养殖第一大国，去年总产量达 154 万吨。

1 月 12 日　国务院企业管理委员会宣布，批准哈尔滨锅炉厂、上海柴油机厂等 45 家企业为国家一级企业。

1 月 12～17 日　全国银行分行行长会议在京召开。李贵鲜在会上说，去年发行货币 210 亿元，比计划少投放 190 亿元，今年要继续坚持银根紧缩的方针。

1 月 15 日　我国已成为第五大船舶出口国，到去年底共承接出口船 280 万吨，已完工 200 万吨。

1 月 17 日　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第二批撤销 1633 个所属公司。至此，中央国家机关共撤销了 2651 个公司。

1 月 22 日　对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宣布，1989 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为 50 亿美元，加上非外贸外汇顺差，今年还本付息不成问题，并指出进出口商品结构应进一步改善。

1 月 25 日　国家统计局 1990 年第 1 号统计报告公布。报告说，去年治理整顿主要目标基本达到。

1 月 30 日　我国年产食用菌已突破 60 万吨，成为世界"食用菌王国"。

2 月 1 日　国家物价局发布《关于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的规定》，自今年 3 月 1 日起实行。

2 月 3 日　新华社报道：经过一年多努力，全国共停缓建项目 1.8 万多个，可压缩投资 675 亿元；能源、交通和邮电项目的投资比重有所上升。

2 月 5～8 日　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李鹏在会上讲话强调，要把特区办得更好。去年我国 5 个特区工业生产值达 300 亿元；外贸出口达 38.5 亿美元，占全国总额 1/10。

2 月 22 日　全国审计工作会议透露，全国审计机关组建 6 年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 116 亿元。

全国建材局长会议透露，去年全国建材工业总产值达 540 亿元，实现利税 120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 3.8% 和 7.6%。

2 月 27 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增加 80 亿元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大中型骨干企业流动资金急需。

2 月 28 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小麦良种将扩大到 7.1 亿亩以上，约占全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2%。

3 月 2 日　李鹏总理令，发布《盐业管理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 月 3 日　1989 年度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金马奖）评选揭晓，山西大同矿务局等 10 家企业获奖。

3 月 9 日　第 3 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 名企业厂长（经理）获金球奖。

3 月 12 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 10 年前的 12% 提高到目前的 12.98%。

3 月 14 日　南京扬子石化公司年产量居世界首位的 45 万吨芳烃联合装置投料试车成功。至此，投资 66.8 亿元的扬子乙烯工程经过 5 年多的建设已全部按时建成投产。

能源部长黄毅诚宣布，我国已进入世界能源大国行列，到去年一次能源总产量已达 10 亿吨标准煤。

3 月 15 日　国务院决定今日起提高铁路和水运货物运价，同时适当调低国产彩电的消费税。

3 月 31 日　上海 30 万吨乙烯吴泾工程近日开通全流程，这是由地方企业自筹 17 亿元建设的。

4 月 2 日　国务院日前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决定 1990 年在全国乡镇企业开展"企业管理年"活动。

4 月 8 日　姚依林副总理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率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自 3 月 28 日至今视察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

4 月 18 日　李鹏在上海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30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开发浦东的10项政策。

1989年我国农村保险业务保险费收入达16.6亿元，比上年增加29.9%。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决定今年拨出100万元补贴试办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分公司，以鼓励农民向农业多投入。

4月21日　李鹏为纪念“地球日”20周年发表电视讲话，指出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我国愿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寻求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办法。

5月4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1989年末我国外债余额为413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债务余额为370.3亿美元，短期债务余额42.7亿美元。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说，我国外债结构合理，状况良好，偿债能力有充分保证。

5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第一季度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去年同期增加301亿元；回笼货币共1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154亿元。

5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准将济南市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5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1980至1990年10年中，我国用于电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资金达157亿元，完成了总投资百万元以上项目2862个。

5月24日　我国煤炭工业最大的建设项目准格尔煤田会战拉开序幕。

5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苎麻产量和加工能力居世界首位。苎麻织品和服装年出口创汇3.5亿美元。

5月30日　扬子3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6月2日　国家环保局发布《198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这是我国首次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国务院最近又批准山东菏泽电厂等16个大中型电力项目开工建设。该16个项目总投资93亿元，装机容量为590万千瓦。

6月7日　今年全国夏季油菜籽获丰收，预计比去年增产一成半，约增90万吨。

6月8日　李鹏总理5月30日签署国务院令，分别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九O年国库券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九0年特种国债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月11～15日　湖南湘中、湘北和湘西12个地市连降暴雨成灾，造成25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7.5亿元。省委和省政府紧急部署抗洪。国务院有关部门大力支援湖南省抗灾救灾。

6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在南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全国已查处公司违法违纪案9.58万多起，其中大案要案2万多起。

新华社报道：至5月底，大兴安岭1987年特大森林火灾遗留下的1174万立方米火烧木抢采抢运工作已基本完成。

6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从1987年4月1日开征耕地占用税，到去年底，共征收该项税款46亿元，全部用于农业综合开发。

6月25日　经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和河南省将于9月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要进行省际间议价小麦的批发交易。交易以现货为主，逐渐引向期货市场。

7月2日　湖南省自6月下旬至今再降暴雨成灾，受灾农田达167.2万亩，倒塌房屋4400余间。

7月6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司撤并后有关事项的公告》。同日，国家工商局长刘敏学宣布，我国党政机关办公司和党政干部经商问题已基本解决。

7月6～14日　国务院召开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姚依林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将可行性报告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7月8～15日　全国财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必须坚持财政、信贷的双紧方针。

7月10日　新华社报道：近10年间我国已对外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10634份，合同金额达128亿美元，累计派出劳务人员36万人次，合作项目分布133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报道：台湾当局最近决定将对“未经许可与大陆直接贸易、投资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台币1500万元。海内外工商、舆论界纷纷指责这种为两岸经贸往来设置新障碍的做法。

7月12日　新华社报道：至6月底各省市区内的“三角债”已清理784亿元。

7月17日　历时8年的贵昆铁路电气化技术改造工程竣工，全线通车。

7月20～23日　全国自然保护工作会议在长春举行。会议提出要象重视污染防治那样做好自然保护工作。自1979年至今，我国自然保护区已有600多处，占国土面积3%。加上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约占国土4%。但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7月31日　经国务院批准，自今日起提高国内邮政资费。

8月10日　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第一艘充氦载人软式飞艇在湖北首飞成功。

8月13日　新华社报道：面积仅占全国18.75%的长江流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地区之一，年工农业总产值逾4000亿元，约占全国40%，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据英国《银行家》今年7月

号公布的世界1000家最大银行的最新排名，中国交通银行资本总额排193位，其资本与资产的比率达9.61%，排138位，高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目标。

8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出口交货值达1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6%。

8月19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20日　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决定，从今日起对全国500多个重点基建项目拖欠款进行集中清理。

我国大陆兴建最早的高速公路沈(阳)大(连)高速公路全线试通车。

8月21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今日起对整存和贷款的利率在现行利率基础上，平均下调1.08个百分点。

8月26日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的10年中，我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特区建设成绩显著，外商投入40多亿美元，去年5个特区出口额达38.5亿美元，约占全国一成。

8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净回笼达247.8亿元，比去年多回笼194.9亿元。

9月1日　沈(阳)大(连)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乌鲁木齐西——阿拉山口铁路通车。江泽民出席通车庆祝会。12日，我国兰新铁路与苏联土西铁路在新疆阿拉山口站和苏联德鲁日巴站接轨，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宣告全线贯通。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近一两年我国家禽存栏数已达22多亿只，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6.3公斤，接近世界人均6.9公斤的水平。

9月13日　我国第一个年产百万吨原油的海上油田——惠州21--11油田投产。

9月17日　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9月21日　陈俊生在武汉召开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工作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决定设专项粮食储备制度，拨出专款把全国农民需要向国家出售的余粮，以不低于国家制定的保护价统统收购起来，作为对全国粮食丰歉余缺进行宏观调控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

9月27日　1990年度国家质量奖评选揭晓，31个企业荣获质量管理奖，376项产品和27项工程分获金、银奖，62件工艺美术品获百花奖。

10月2日　广西迄今最长的一条高等级公路南宁市至北海市公路近日全线通车，结束了桂南无高级公路的历史。

10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25个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百亿元大关，其中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54亿元；深圳、大庆、克拉玛依、玉溪等18个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元。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摩托车产量将超过100万辆，进入世界4大摩托车生产国行列。

10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目前橡胶种植面积已超过900万亩，年产干胶24万吨，分居世界第4和第5位。

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最近以粮棉油肉产量实绩各排定一百强。公主岭市、射阳县、平度市和巴县荣居榜首。

10月20日　甘肃省景泰、古浪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之间发生6.2级地震。27日，国务院致电慰问灾区人民和参加抗震救灾的各界群众。

10月23日　1990年度国家级新产品试制鉴定计划，已审定计划项目1766个，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国际水平的885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794项。

10月28日　新华社报道：6省区青年黄河防护林一期工程竣工。

10月30日　在巴黎第14届国际食品博览会上，我国北京长城牌干红葡萄酒等7种食品获金奖。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已建成东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北5个装机容量逾千万千瓦的大电网。我国发电量和输电量均居世界第4位。

11月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百名财政收入大县名次排定，它们的财政收入达170.5亿元，占全国县级财政收入22.1%，其中上海嘉定县、江苏无锡县名列榜首，财政收入突破4亿元。

11月10～15日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决定从今年秋粮收购开始，将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交售国家定购粮作为农民应尽义务，必须保证完成。

11月12日　仪征化纤公司宣告，仪化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形成年产50万吨聚酯生产能力，成为我国最大的化纤及其原料生产基地。

11月13日　唐山市人民政府以其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联合国人类住区(生态)中心颁发的“人居荣誉奖”。

11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4部委最近就加强承包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问题作出8条规定，强调在新的一轮企业承包中，要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纳入承包合同。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2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据国际保护组织今年

公布，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居世界第8位。

12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生产的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缝纫机、自行车、电饭锅、电熨斗、铅笔、自来水笔，蘑菇罐头、海盐等十多种轻工产品均居世界第一位。

12月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我国发射了5颗人造卫星，多种新型飞机首飞上天，航空航天工业成就辉煌。

新华社报道："七五"期间我国农民收入以4%的年平均速度增长，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199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30元左右，比1985年增长58.5%。

12月10日　至今日，全国已收购棉花6900多万担，比1989年全年收购量多600万担。我国棉花生产徘徊下滑的局面得到扭转。

12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软磁盘年生产能力可达3亿片，继美、日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软磁盘生产国。

12月19日　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宣告，今年我国农业全面丰收。粮食创新纪录，总产可达4.2亿吨，棉花可达425万吨。

12月23日　目前全国各地冬修水利已投入建设资金30亿元，每天有8000多万民工劳作在水利工地上。至11月底全国已累计投入水利劳动积累工20.7亿个，完成土石方32亿立方米，预计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2400多万亩。

12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我国生产原油1.383亿吨，天然气147.7亿立方米。原油产量占世界第5位。

12月29日　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厂长王忠懿等20名厂长(经理)荣获第4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

12月31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72号令，发布《总会计师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军　事

2月19日—23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2月27日　中共中央最近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并发出通知，要求大力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3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近日分别发布命令，授予南京军区某炮兵团原政委杨崇元"模范团政委"荣誉称号，给海军飞行学院记集体二等功。

4月6日　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

4月15日　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立法程序暂行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月17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三总部发出通知，确定从优秀士兵中提拔基层军官。

5月4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最近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

6月9日　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发重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

6月15～26日　中苏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在北京就如何落实两国政府关于中苏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举行了小范围会谈。

8月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今年开始实行冬季征兵。

10月22～29日　张震等率领的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和志愿军烈属代表团赴平壤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40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外　交

1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有关台湾申请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名义加入关贸总协定一事时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贸总协定理应拒绝受理台湾当局非法申请。16日，中国政府代表侯志通在日内瓦关贸总协定总部向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博士递交照会，全面申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的原则立场。

1月16～25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

1月25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中国留学人员问题再次通过决议一事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的霸权主义行径，敦促美国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恶化。发言人在回答有关苏联航空公司派代表到台湾与华航接触、试探建立直航一事的提问时说，与台湾通航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必须事先与中国政府磋商。发言人还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邀请达赖访捷，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行动，捷方应再次慎重考虑，撤销对达赖的邀请。

2月3日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重新通

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一事谴责美国国会某些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同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就此事发表声明，敦促美国国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月9～23日　中苏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第二次谈判在北京举行。

2月22日　外交部就美国国务院2月21日发表"人权报告"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政府严重侵犯中国主权。22日，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奉命向美国国务院转交我外交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3月8日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所谓一些外国驻华记者受到中方人员"监视"和"骚扰"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美国驻华使馆没有资格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

3月14～16日　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朝鲜。

3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纳米比亚独立。

3月22日　我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今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在温得和克发表。

关贸总协定发表报告说，我国外贸出口在全世界出口国中的地位从第32位跃居第14位。

4月7日　我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临时代办声明，鉴于莱索托4月5日同台湾当局重建所谓"外交关系"，违背中莱建交公报原则，中国决定中止同莱索托的外交关系。

4月12日　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英国政府无权单方面处理香港中国公民的国籍身份。

4月19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我国首次派军事人员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的5名军事观察员日内将赴任。

4月20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当日英国国会二次通过《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一事发表谈话，对此表示极大遗憾。21日，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3～26日　李鹏总理访问苏联。这是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苏。

4月24～27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15次会议在京举行，并发表了新闻公报。会后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就香港目前一些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5月2～12日　万里委员长访问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

5月7～13日　阿联酋总统扎耶德访问我国。这是阿联酋国家元首首次访华，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第一位元首访华。

5月14～30日　杨尚昆主席访问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

5月16日、19日　我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在洛杉矶发表讲话时指出，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使美国与中国同样受到打击"。

5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政府竟按美国国会要求发布公告干涉中国内政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6月2日　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石午山向几内亚比绍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郑重声明，由于几内亚比绍政府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不得不决定中止同几内亚比绍的外交关系。

6月7～15日　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作为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的客人赴河内。在河内期间，徐敦信与越南副外长陈光基就政府解决柬埔寨问题非正式交换了意见。15、19日，徐敦信先后在曼谷对记者说，中越双方的会晤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没能取得进展，越南至今仍缺乏解决柬问题应有的诚意。

6月14日　国家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自5月31日至今访问苏联。

6月26～29日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6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6月27日　中国政府决定向伊朗地震灾区人民提供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

7月1日　乍得总理哈布雷自6月26日至今访问我国。

7月2日　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自6月28日至今访问我国。

7月6～11日　塞拉利昂总统莫莫访问我国。

7月7～26日　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率领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

7月8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自6月30日至今访问日本。

7月19～26日　彭冲副委员长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

7月20～30日　钱其琛外长访问沙特阿拉伯、塞浦路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7月21日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英国议会通过"一九九О年英国国籍(香港)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8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当天凌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领土事件呼吁立即停止军事活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8月6～14日　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新加坡和泰国。

8月22日　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代表我国政府向联合国负责海洋法事务的副秘书长萨·南丹递交了要求分配国际海底矿区和成为海底资源开发先驱投资者的申请。

8月27～29日　塞浦路斯总统瓦西利乌访问我国。

9月2日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自8月31日至今访问中国。

9月3～23日　钱其琛外长访问土耳其、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9月2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谈香港大型建设问题时说，出于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考虑，中方只能在得到英方必要的资料，弄清有关情况并由专家作出评估后，才好表态。　/

9月26日　钱其琛外长在纽约会见了第45届联大主席、马耳他副总理德马尔科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9月3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661号决议的态度始终是认真的，英国《星期日独立报》有关中国北方公司曾同伊拉克秘密签订出售锂氢化物的合同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发言人还说，希望日本慎重处理派遣自卫队职员到国外参加联合国和平合作队这个问题。

10月1～4日　参加45届联大的钱其琛外长会见与会各国代表。

10月2日　钱其琛外长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外长，向他们阐明中国政府对海湾问题的立场。

10月3日　钱其琛外长和黄根成外长在联合国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国和新加坡从10月3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6～24日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及夫人柯玉珠女士访问我国。这是李光耀第5次访问我国，也是中新两国于最近建交后对我国的第一次正式友好访问。

10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置航标灯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22日，外交部发言人重申，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本政府出动舰艇和飞机进入钓鱼岛海域并拦阻台湾省渔民是毫无道理的。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在钓鱼岛及其海域的一切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25日，发言人再次严正指出，最近钓鱼岛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日方挑起的，责任应由日方承担。

10月27日　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就钓鱼岛和日本拟向海外派兵问题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强烈要求日本停止在钓鱼岛单方面行动，希望日本政府对向海外派兵问题慎重行事。

11月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一直在认真执行安理会制裁伊拉克的661号决议，并已为此蒙受2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伊拉克在经贸、劳务等方面欠下我方的债务。

11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中国决定中止同尼加拉瓜外交关系。尼加拉瓜政府于11月6日宣布同台湾当局恢复所谓"外交关系"。

11月14～16日　阿根廷总统梅内姆访问我国。

11月14～19日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访问我国。

11月16日　中国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29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坚持认为只要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还有一线希望和可能性，国际社会就不应该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12月1日　钱其琛外长自11月30日至今访问美国。访问期间，布什总统会见钱其琛外长；钱其琛外长同贝克国务卿就中美双边关系及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

12月10～19日　李鹏总理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和斯里兰卡。

12月11日　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日前就澳参议院通过一项所谓人权宣言，无理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肆意践踏人权"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涉。

文化教育科技

1月5日　1989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近日出版。

1月5～10日　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瑞环等会见了与会代表。李瑞环发表了《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

1月17日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励大会在京举行。52项成果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别奖，381项成果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1月13日　国家从今年开始，将组织对可可西里进行大规模、全面的科学考察。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最大的高寒无人区。

2月27日　据美国编制的4种重要世界性检索工具统计，1988年世界各国共发表论文94.9万多篇，其中我国论文数为1.18万篇，比上年增31.5%，居世界第14位。

3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基本建成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目前我国乡以上农技推广机构已发展到22.8万个，有150万人投身于农技推广事业，其中国家技术推广干部44.4万人，乡镇农民技术员47.5万人。

3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专利局成立5年

来共受理了国内外专利申请13万余件，其中国内专利申请占80％。

3月22日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5兆瓦低温核供热反应堆开始供暖，至此它已正常供热100天。这表明我国低温核供热研究和应用已居世界前列。

4月7日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由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

4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至今已与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我国政府与56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或经贸科技合作协定。我国还参加了280多个国际学术组织。

5月9～12日　第2次全国“火炬”计划会议在南京举行。宋健在会上强调，实现“火炬”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走国际化道路。

5月17日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经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4颗小行星，分别以吴健雄、李约瑟、邵逸夫和陈嘉庚的名字命名。

5月24日　王同亿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语言大典》问世。

5月25日　新华新报道：距今约7000年的原始社会北辛文化墓葬群最近在山东汶上县首次发现。

6月1日　我国兰州市高中生王念庆提出的“如何搜集飘浮在太空舱内颗粒”和沈阳市高中生田春亮提出的“伍德合金与石蜡在无重力状态下的熔化、混合、再凝固”的科研项目，已被批准在美国航天飞机飞行时进行试验。

6月10日　在实行专家决策新机制下运行了3年多的“863计划”，为我国获得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技术成果。“863计划”是在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发展后劲的研究计划。

7月11～18日　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在京举行，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304名选手参赛。中国选手蝉联总分第一，参赛的6名选手获得5枚金牌、1枚银牌。

7月13日　中科院宣布该院上海冶金所最近在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中又获突破，液氮温度强磁场下临界电流创国际最高水平。

我国5名中学生在荷兰举行的第21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并获得团体亚军。

7月14日　李铁映宣布国务院决定，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新生今年将分别到4所军事院校试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

7月16日　我国新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这表明我国已具有发射重型卫星能力。

7月16日　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22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我国4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并获团体总分第一。

7月17日　联邦德国女留学生达素彬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这是我国首次授予外国留学生博士学位。

7月18日　参加在苏联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我国4名选手分获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和一个三等奖，并获团体总分第二。

8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历时3年科学考察结果表明，西藏是我国珍稀野生动物最大乐园。世界上第三大自然保护区将在羌塘高原建立。

8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与丹麦天文学家合作研制的有效口径为240毫米的世界最大反射式全自动水平子午环在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安装完毕。

9月1～9日　首次全国期刊展览在京举行。4000多种期刊参展。我国现有各种期刊6005种，年平均印数为20亿册。

9月3日　我国第2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在太原由“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在第14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我国滕文骥执导的影片《黄河谣》获最佳导演奖，特伟执导的动画片《山水情》获最佳短片奖。

9月14日　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病逝。他捐出眼球角膜，成为我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位完成了捐献眼球遗愿的志愿者。

10月14日　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

10月16日　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最近在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建成并达到临界。我国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这种新堆型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国家。

11月14日　中国代表团在第39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3枚“军官勋章奖”和3枚“骑士勋章奖”，并在项目奖中分获19枚金奖、7枚银奖和5枚铜奖，还有两项获新产品证书。

11月21日　中国第7次南极考察队抵达南极长城站。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近日，中科院化学所在世界上首次直接发现脱氧核糖核酸新结构。

12月7日　1990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举行。有788项优秀成果和3500多位科技人员获奖。自设立科技奖以来至今已有6649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362项，国家发明奖193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4091项。近3万名科技人员受到国家嘉奖。

12月18日　国家教委等部门授予江西、河南、广西、甘肃、宁夏、江苏、辽宁7省区全国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先进单位称号。

12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三明市的我国著名制种专家刘文炳主持的“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配套技术研究”目前通过鉴定。

社会生活

1月11日　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向我国兴奋剂检测中心颁发认可证书仪式在京举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20个兴奋剂检测中心。

1月13～15日　中国跳水队在澳大利亚1990年国际跳水邀请赛男女6个项目中共获5个冠军、3个亚军和两个第3名。

2月7日　卫生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宣布，最近从我国云南边远农村地区吸毒者中，发现146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2月8日　由香港著名爱国人士李嘉诚捐资创办的汕头大学举行盛大落成典礼。李铁映、荣毅仁和李嘉诚先生出席了庆典。

2月11日　珠影厂王进执导的影片《寡妇村》在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上获金熊猫奖。

2月11日　我国选手王秀丽在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中获1500米金牌。

2月20日　中国故事片《本命年》在今天结束的“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银熊奖”。

3月10日　孙中山先生全身坐像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中山纪念堂落成。

3月17日　中国女篮以78比76胜南朝鲜女篮，获第13届亚洲女篮锦标赛冠军。

3月30日　中国歌唱家余国耀最近荣获1990年巴利米纳国际声乐比赛男中音一等奖和各国民歌演唱一等奖。

4月5日　我国第一位横跨南极大陆的科学家秦大河载誉归来。10日，在北京举行“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报告会。

4月6日　中国选手吕钦获得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世界杯象棋赛冠军。中国队还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4月11日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斯特罗科专程前往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寓所，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巴金苏联最高荣誉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4月26日　青海省共和县、兴海县发生6.6级地震，已知死亡115人，受伤160多人。

5月6日　1989年度全国第10届电视剧“飞天奖”、第4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有52部电视剧和85个电视文艺节目获奖。

5月7～10日　中国、苏联和美国和平登山队共20名队员先后4批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中方7人，苏方8人，美方5人，中国的桂桑和苏联的叶·伊万诺娃为女队员。

5月11日　第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89年度）评选揭晓。河北的牛淑贤和江苏的黄孝慈等22名中青年演员获奖。

5月24日　国际棋联已正式授予叶荣光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叶荣光成为我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男子特级大师。

5月25日　我国选手周丹红在民德举行的世界杯射击赛中获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60发卧射冠军。

我国13岁三段棋手常昊以全胜战绩获第12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

6月2日、3日　我国羽毛球健儿先后战胜南朝鲜女队和马来西亚男队，分别第4次夺得尤伯杯和汤姆斯杯。

6月4日　第4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结束。中国选手获得17枚金牌、7枚银牌，夺得团体冠军，并打破5项世界纪录。

6月11日　万里委员长和荣乐弟合作获第5届埃普森世界桥牌同场双人赛亚军。该比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桥牌比赛。

6月13～16日　第3届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在京举行，24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中国选手获得26项冠军。

6月17日　1990年中国国际跳水赛在北京结束。我国运动员囊括6项冠军。

7月11日　我国选手在法国举行的世界伤残人运动会上获10枚金牌、8枚银牌和3枚铜牌。

8月12日　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3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结束。中国选手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奖牌名次列第四。

8月11日　在奥地利结束的第7届世界航海模型耐久赛上，中国选手获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

9月2日　为时4天的第5届世界蹼泳锦标赛结束，中国运动员获10项冠军、5项亚军和8项第3名，并打破4项世界纪录。

9月20日　第11届亚运会火炬经过1.7亿人传递，走过18万多公里行程今晚分4路传送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交接仪式，李鹏点燃了亚运会开幕式主火炬的火种。同日，亚运会帆船帆板竞赛在秦皇岛开幕。

9月22日　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6578人参加了这届亚运会。

9月25日　我国铅球运动员黄志红被国际田联授予亚洲最佳田径女运动员称号，并获国际田联颁发的阿迪达斯“金鞋奖”。

10月7日　历时15天的第11届亚运会胜利闭幕。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和中外来宾参加了闭幕式。闭幕式上演出了大型文艺节目《今夜星光灿烂》。在这次亚运会上，2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获得奖牌，其中15个国家和地区获得金牌。中国获金牌183枚，居金牌总数第一，南朝鲜和日本居第二和第三，分获金牌54枚和38枚。

10月15日　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在京逝世，享年91岁。

10月21日　丹麦选手彼得和中国选手黎叶梅分获第10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男女冠军。

10月28日　在布鲁塞尔结束的第8届世界杯体操赛中，我国李敬和杨波分获男子鞍马和女子平衡木冠军。我国选手还获得3枚银牌和3枚铜牌，总成绩仅次于苏联，列第二。

11月3日　第10届电影金鸡奖和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揭晓。《开国大典》、《本命年》、《巍巍昆仑》等影片获奖。

今日在德国结束的第9届世界技巧锦标赛中，中国队获得7枚金牌、6枚银牌和6枚铜牌。

11月14日　我国选手马文革获第11届世界杯乒乓球赛亚军，瑞典的瓦尔德内尔获冠军。

11月18日　我国选手吴文凯在第10届世界杯羽毛球赛中获男单冠军，姚芬和赖彩勤获女双冠军。

12月2～7日　第7届全国冬运会速滑比赛在哈尔滨举行。解放军队获金牌总数第一。

12月3日　当今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共8册经川鄂两省15年的努力已全部出齐。

12月11日　为时7天的第10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吉隆坡结束。中国获男子团体、女双和男女单打4项冠军。

12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广播电影电视部规定，明年1月1日起未标出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号的电视剧一律不得在各级电视台播出。

12月20日　首都集会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1年

导 言

1991年上半年平淡无奇，但6月以来的一场洪水带来了一系列热潮。抗洪救灾牵动千万人心，清理三角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重振经济热潮。不过毕竟还处在三年治理整顿的尾声里，所以这些热潮也都是平平和和地发展的。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处理1989年动乱、暴乱分子**
- **1991年抗洪救灾**
- **“7·21”渔事纠纷**

处理1989年动乱、暴乱分子

背景介绍

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但1991年对参与动乱、暴乱分子的处理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人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事件。

材料：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1989年动乱、暴乱中9名犯罪分子
- 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对王丹等人分别依法处理
- 外电评中国处理参与动乱和暴乱案犯

材料一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1989年动乱、暴乱中9名犯罪分子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5日分别对1989年北京发生的旨在颠覆政府的动乱和暴乱中触犯了刑律的九名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宣判。他们中有两人被免予刑事处分，其余七人分别被判处二至四年有期徒刑。

对这九名犯罪分子，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了大量细致的侦查取证工作；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及证据进行了逐个的审查，依法提起公诉。

在法律审理过程中，听取了各案被告人的供述、辩解和陈述，被告人委托的律师或自己的亲属出庭进行了辩护。有的被告人亲属还旁听了法庭的审理和宣判。法庭对证据分别进行了审查、质证，认定这九名犯罪分子在动乱暴乱中有的公开煽动颠覆人民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组织、指挥堵截和袭击执行维护社会治安任务的戒严部队、有的聚众破坏公共交通秩序，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他们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庭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并考虑各案犯的犯罪情节、一贯表现和认罪悔改态度，依法判决：

李玉奇、庞志红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改表现，被免予刑事处分；郑旭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张铭、马少方、孔险峰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有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法庭同时宣布，各被告人如不服判决，从接到判决书次日起10天内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判决前羁押的日期将折抵刑期。

材料二　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对王丹等人分别依法处理

北京市公、检、法机关最近对王丹等26名因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触犯刑律而被依法逮捕的犯罪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了处理。其中18人经查实犯罪情节较轻有悔过和立功表现，已分别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予以释放；其余8名案犯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进行了公开审理。据悉，另有45名情节较轻的犯罪人员，在被公安机关依法审查期间，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未予逮捕，已于近几个月内分别具结悔过得到宽大处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26日下午开庭，公开宣告了对王丹等8名案犯的判决。其中刘晓波虽然犯罪情节严重，但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予刑事处分；陈涞、李成焕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均免予刑事处分。被判处有期徒刑5名案犯是：姚军岭从轻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利1年；郭海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包遵信罪行严重，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任畹町罪行严重，无悔罪表现，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丹等8名案犯的公开审理是1月8日至23日分别进行的。在此以前，北京市公安机关对王丹等8人的罪行一一进行了侦查核实，然后移送北京市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并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时，包括被告人的亲属和大学师生在内的各界群众 300 多人先后参加了旁听。受委托的律师分别出庭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经法庭调查，确认上述 8 名被告人在 1989 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有的采取各种手段在群众中公开大肆煽动颠覆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制作燃烧瓶等以袭击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的戒严部队，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构成犯罪。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个案件审理，并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和认罪悔罪表现，分别作了判决。法庭同时还宣布，各被告人如不服判决，从接到判决书次日起，10 天内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判决前羁押的日期将抵押刑期。

因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过和立功表现而被释放的 18 名案犯中，吕嘉民、陈坡、刘苏里、熊焱、丁小平、温杰等 11 人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审查后决定免予起诉，并已释放；周勇军、陈卫、张维等 7 人在具结悔过后由北京市公安局分别作出决定，不移送检察机关，并已释放。

材料三　外电评中国处理参与动乱和暴乱案犯

【共同社东京 1 月 5 日电】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 月 5 日对天安门事件有关人员进行了宣判，判刑是相当轻的。可以认为，这一结果表明，中国要促进国内的稳定与团结，同时也考虑到了国际舆论。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被点名通辑的 4 名学生被告只被判 4 年或 2 年徒刑，这表明判刑是轻微的。这 4 名被告不仅被认为指挥过示威游行，而且还直接参与过事件，一些人曾预料他们会被处以极刑。

不妨认为，这次的宣判是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现在国内稳定，已没有必要杀一儆百。

邓小平指示要促进国内的安定团结与对外合作，可以认为，这次宣布的判决也是这种意向的结果。

【法新社北京 1 月 26 日电】中国今天宣布对学生领袖王丹和其他 7 名主要的活动分子的判决。它在结束 1989 年这一事件的时候，表现出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宽大。

一名西方外交官认为："这种较为宽大的处理，是旨在使西方人对中国当局的意愿感到放心。"

【共同社北京 1 月 26 日电】中国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指挥者的判决，自 1 月 5 日判处 9 名被告以来，这是第二次。和上一次一样，这次判刑较轻。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内形势较稳定。

判决还特别指出，王丹不仅进行了反省，而且还协助揭发了其他的嫌疑犯，因此，尽管王丹罪行严重，但还是决定从宽处理。

特别引人汪意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曾受到严厉批判的刘晓波免于刑事处罚。

【路透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西方外交官们今天说，中国对参加天安门广场示威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表明，中国领导人想平息西方的不满。

他们说，按中国的标准，26 日对学生领袖王丹和其他 4 位的判决是宽大的。

一位高级西方外交官说："显然，他们比较注意外部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法新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此间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在对主要的民主分子的判刑中表现出比较宽容的态度。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一判决具有象征意义。"

然而，此间外交官正以一种有保留的心情对待中国政府所采取这种新的宽容态度。

1991 年抗洪救灾

1991 年的特大洪灾，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这场洪灾既显现了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战胜灾害的品格，但它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和防灾办法方面的缺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材料：

- 水情、灾情、捐赠
- 一曲团结抗灾的壮歌
- 精兵十万挽狂澜
- 联合国高级代表谈灾区考察见闻

材料一　水情、灾情、捐赠

今年我国雨季具有来得早、来得猛、持续长、降雨集中等特点。5 月中旬——7 月中旬，江淮地域平均每天降水量在 800 毫米以上，相当往年全年的雨量。其中淮南等山区降水量达 1000 毫米，金寨县达 1775 毫米。

根据国家气象局测定标准：日降水量等于或大于 50 毫米为暴雨，等于或大于 100 毫米为大暴雨，200 毫米以上为特大暴雨，安徽、江苏均出现特大暴雨。江苏苏州、无锡 30 天降雨量接近百年降雨量，江苏兴化、安徽金寨 30 天降雨量超过百年一遇。

淮河暴发了建国以来仅次于 1954 年的大洪水，蚌埠 1954 年最高水位 12.18 米，今年 21.98 米。太湖出现历史最高水位，7 月中旬太湖水位 4.79 米，比 1954 年最高

水位高0.14米。滁河接连两次发生有资料记载来的最大洪水。松花江出现建国以来仅次于1957年的第二次大洪水，澧、乌江上一些支流都出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位。

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浙江、吉林、黑龙江等18个省相继发生程度不同的洪涝灾害。截止8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受灾人口达2.2亿，因灾死亡2295人，受伤49973人，被洪水围困人口1930万人，其中被迫转移安置895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100多万公顷，其中减产30%以上的1300多万公顷，绝收面积360万公顷。倒塌房屋291.8万间，损坏605.1万间。华东铁路中断83处882次，水利设施损失17万多处。交通、通讯、水利设施和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商店、医院等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达685.15亿元。

水灾最严重的安徽、江苏，其灾情之重，程度之深，损失之大，不仅是建国以来前所未遇，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两省受灾人口8600万，占两省总人口的71%，受灾农作物902万公顷，占已播种农作物面积的10%以上，绝收225万公顷，占全国因水灾绝收面积的49%，洪水围困1178万人，其损失涉及各方面，价值459亿元人民币。

为保住两淮煤矿、沪宁、津浦、阜淮铁路线及蚌埠、淮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等重要城市，抗灾中先后在淮河、滁河、太湖流域启用王家坝、太津闸、红旗塘坝和钱盛荡坝等30多处分蓄洪区。灾区数百万人为保全大局腾出家园，接纳洪水。6月15日，安徽王家坝的7孔闸开启，这是抗洪救灾中启用的第一个蓄洪区。

水灾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截至8月31日，民政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收到国内捐款7.3亿元，港澳地区7.2亿港元，折合4.9亿元人民币，台湾4.24亿新台币，折合0.83亿元人民币，国外捐款2000多万美元，折合1.1亿元人民币。

目前，民政部直接接收的外国政府捐赠款最多的是日本政府为180万美元，国内个人捐款最多的是画家吴冠中，为50万港币，港澳地区捐款最多的公司是香港烟草有限公司，捐款共计1亿港元。

人民解放军危难之处显身手。截至8月上旬，全军先后出动陆、海、空军23万人，各种车辆8000多台，船艇723艘(次)，飞机128架(次)，共抢救转移受灾群众65万多人，抢修堤坝1900多公里，铁路、公路250多公里，抢救各种物资4177余万吨，为灾区群众看病数十万人次。为保卫长江、淮河、松花江、太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和京广、津浦、沈吉、贵昆、川黔等交通大动脉，两淮煤炭电力基地，镇江谏壁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等重要工业设施，南京、武汉、苏州、无锡、贵州、合肥等重要城镇和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

材料二　一曲团结抗灾的壮歌

暴雨肆虐，洪水成灾，江淮大地、太湖流域大片农田被淹，许多城市进水。一时间，平地成湖，长街行船。

保卫淮河大堤，保卫津浦铁路，保卫工矿企业，保卫“金三角”，十万火急！一场协力救灾的战斗打响了。

首当其冲的是安徽。6月中旬，淮河流域连降暴雨，有7个市县降雨300毫米以上。安徽人民坚决按国家防总的命令办事，于6月15日开启王家坝闸，向蒙洼蓄洪行洪区分洪。3.6亿立方米的水，很快把行洪区内的13万亩已成熟的麦子、青青的禾苗和瓜果蔬菜等吞没，共18万亩土地变成一片汪洋；12.6万人舍弃居住多年的家乡，奔上庄台和大堤，开始了灾民的生活。6月底至7月上旬，安徽省再次开启王家闸蓄洪。

滁河是长江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6月下旬以来，滁河流域连降暴雨，滁河晓桥段水位高达12.6米，超过警戒水位3.1米。在这危急关头，安徽先后两次启用了4个蓄洪区。江苏省坚决执行国家防总的命令，舍卒保车，打开江浦县星甸镇孟家圩和小熊圩，为滁河滞洪。

太湖周围地区的工业生产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今夏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光是6月11日至20日的第一次降雨过程，太湖的水位便由3.46米上升到4.28米。江苏省于6月26日打开境内东太湖出水口门，清除泄洪通道上的障碍。同时，浙江省按照国家防总的命令，开启太浦闸为太湖紧急泄洪。湍急的太湖水从江苏境内涌入浙江，使业已不堪洪涝浸渍的杭嘉湖平原灾情更加深重。沉重的代价换来整个太湖流域的安全。

进入七月，连日暴雨，太湖水位一再告急。接到国家防总的命令后，上海市于7月5日上午9时，打开了建成38年之久的红旗坝。滚滚太湖水顺着红旗塘坝开口处涌进上海市清浦县境，汇入黄浦江。这是上海市继先后开启淀浦闸和藻浜闸之后的又一壮举。金山、青浦、松江等县，组织了1000多个突击队，奔赴抗灾第一线，转移物资，加固圩围，排除险情。结果，全市还是牺牲了2000多亩鱼池和菜地。

就在暴雨洪水袭击江淮和太湖流域时，各条战线，方方面面，都被抗洪救灾——这同一个目标，同一声号令，动员起来了，或捐款，或献物，一曲共产主义精神的大合唱，在神州大地奏响。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指战员和广大公安干警一马当先，哪里有困难，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到7月10日统计，人民解放军出动50多万人次，奋勇参加抗洪救灾，为战胜洪灾立下大功。正如灾区群众说的，“遇上这么大的灾，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的救援，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抗洪需要草袋，国家防总、商业部从天津、河北、山

东等10多个省市紧急调运800多万条草袋支援灾区。铁道部在京沪铁路有险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命令南下的部分货运列车停运，以保障800多辆满载防汛草袋的列车优先运行。

洪水袭来，许多灾民孑然一身逃出，急需钱、粮、物的支援。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了，港澳台同胞行动起来了！大家踊跃捐款，支援灾区。国际社会也以各种形式提供援助。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接收救灾捐赠办公室，刚成立一个星期就收到各界捐款9000多万元。两名从山东泰安专程来京捐款的工人，当他们从贴身衣袋内掏出6000多元捐款递给工作人员时，人们看到，这些钞票都被汗水浸透了。革命老前辈帅孟奇大姐，家有存款1025元，她把其中的1000元拿出来捐献给灾区。

洪水降灾难，灾难也锻练人。过去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那么协调，洪水一来，变了。一位县委领导人说，过去坐小车下乡，很少到农户问柴问米，群众看了生气，有人偷偷把汽车轮胎扎了；现在坐车下乡指挥抗洪，真正给农民办实事了，车子崴在洼泥中，八个农民硬是搬着轮子把车抬过了坑洼。真是两种作风两重天啊！

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八方支援的温暖，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灾害不能战胜呢？

（马成广）

材料三　精兵十万挽狂澜

一场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

一次自渡江战役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兵力调动。

六、七月间，当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水患频频告急、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处于危难之际，驻苏、皖、浙、沪三军参加抗洪抢险的总兵力达17万人次，出动飞机22架次、车辆3万多次、船艇650艘次，派出医疗队300多支，在北起安徽北部，南到杭嘉湖，西起大别山区，东到长江口的数千公里的地域，与滔滔洪水殊死博斗，奏响了曲曲慷慨悲壮的抗天歌，展示了一幅幅惊天动地的抗洪图。

“六战六捷”

谈起历时两个月的抗洪抢险，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中将说：“打了6场硬仗。”中央军委、三总部工作组则归纳为“6战6捷”。即：津浦护路，“金三角”保卫战，淮河会战，扬州保城，苏皖救生，破坝泄洪。

六场硬仗集中展示了共和国军人为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

6月中旬到7月上旬，旷日持久的大暴雨袭击苏南地区，太湖水位猛涨，被称为“金三角”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被洪水围困。南京军区先后出动3万多人次兵力，转战于太湖流域。当古城苏州有可能被毁于一旦之际，某地炮旅指战员昼夜奋战，沿城筑起3条共700米的拦洪大堤，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洪水，保护了苏州这颗“东方明珠”。当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镇江谏壁电厂的煤库塌倒，供电中断，某高炮旅指战员奋战16个小时，终于使电厂重放光明。在洪水冲破堤圩，扑向无锡时，某步兵师堵口135处，筑堤9000多米，排除了运河的险情，使工业城市无锡幸免于难。

当沿淮地区暴雨倾泻，沿淮干流、支流漫堤，城乡被淹之时，南京军区投入抗洪抢险兵力3万人次，组织民兵60多万，与洪水一争高低。7月上中旬，淮河干线全部超过警戒水位，严重威胁着津浦铁路和两大煤炭与电力基地，威胁着数千万人民和亿亩农田。在这危急关头，5000多名官兵在东起淮南，西至霍邱的110公里防线上迎战洪峰。他们筑堤、堵决口，排除险情16处，确保了钢铁动脉和能源基地的安全。

在苏皖两省的数百万人民被洪水围困时，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工兵部队和武警部队出动数百只冲锋舟、动用各种民船，先后抢救转移70多万名群众和大批物资。

记者在灾区采访，到处可以听到这些与洪水搏斗了1个月的军人们发出的铮铮誓言：“人在坝在，水涨坝高”；“我在人民安全在，我在国家财产在”。灾区人民说，每一次硬仗、恶战，都是子弟兵冲锋打头阵。

血肉屏障

6月19日深夜，在泗阳至盱眙的公路上，25辆军车冒雨急驰。此时，江苏省盱眙县境内的溜子河突然决口150米，洪峰像脱缰的野马，呼啸着冲向下游的村庄、良田，举目望去，一片汪洋。奔驰几小时的官兵们不顾劳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雨越下越猛，决口越冲越大，一只只装满泥土的草包入水中，转眼被冲得无影无踪。此时，堵住决口的唯一办法是下水打桩再填土袋。但决口处水深3米，水流湍急，下水无异于闯龙潭虎穴。

“共产党员跟我来！”团长大吼一声，带头跃入激流。40名党员、干部也一个接一个跳了下去。这一天，官兵们只吃了一顿冷饭，上百斤重的草包每人却扛了300多包。

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参加抗洪抢险官兵的共同信念。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无情的洪水，把温暖传递给受灾的群众。

6月17日中午，安徽邱家湖羊坝子水面上，“救命”声时断时续。驾驶冲锋舟的舟桥团官兵闻声疾驰。出现在他们在前的是：抱成一团的1家灾民趴在一个麦垛上，大水冲来，麦垛旋转，眼看就会被吞没。官兵们纵身跃入激流，让大人趴在背上，让小孩子骑在脖子上，将灾民一个个救上冲锋舟。在月余时间，这支舟桥部队纵横驰骋于2

省8个县市，抢救转移群众4万多人，抢运粮食、物资上万吨，被群众誉为“灾区福星”。

无私奉献

在南京军区的《抗洪抢险情况反映》上，有这样一组沉甸甸的数字：抢险部队中有16343名官兵家中重灾；1577名官兵家中房屋倒坍；11222名战士家中责任田、果园被淹；162名官兵的175名亲人受伤、10人死亡，还有26名官兵的120位亲属下落不明。我们的子弟兵以舍小家保大家的宽广胸怀，负重报国，在大灾大难中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皖北淮河流域，人们都传诵着某舟桥团二营长刘振武勇驾“救命舟”的事迹。据统计，在一个多月中，他带领全营官兵抢救转移的灾民已达3万多人。而他的双亲和弟弟全家下落不明。

刘振武的家在淮河南的寿县，与他救灾的颍上县邱家湖仅一河之隔。初到这里，他还曾远远望见自家的房子。几天后当他再度登高观望时，他们村已成一片汪洋。有些逃出来的村民说，他父母和弟弟一家被大水漂得不知去向。这个铁汉子泪水盈眶。但是，抢险任务不容他去顾及家人。团政委终于知道此事，命令刘振武去寻找家人。他奔波一天，仍不见亲人踪影，便强忍悲痛，向团政委要求再次投入新的战斗。政委望着这位刚毅的部下，眼睛潮湿了。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神话家喻户晓。如今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中，涌现出大批治水的“大禹”。

6月14日，江宁县土桥龙皇庙二处150米堤坝出现险情，某炮团一营奉命驰援。恰巧这时教导员苏同林接到家人从江宁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妻子患化脓性阑尾炎在做手术，孩子也患病发高烧，让他速回照料。苏同林把电报悄悄揣进了口袋。汽车路过他家门口，同志们劝他回去看看，苏同林谢绝了。他带领全营官兵连续奋战28个小时，加固龙皇庙防洪堤坝后，又投入了抢堵西城河100米决口的战斗。

7月11日下午，南京市六合县新集乡孔湾滁河大堤决口，一万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众多乡亲身染疾病，急需治疗。南京军区总医院抗洪救灾医疗队队员们接到命令后，来不及与家人告别，立即出发。

黎明时分，医疗队赶到灾区。此时，风急雨骤，一片汪洋。被洪水包围的大堤上传来孩子的啼哭声，病人的呼救声。队员们头顶药包，跃入激流，泅水来到大堤上，立刻救治病人。他们昼夜忙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4天内，他们巡诊治病5000多人次。待到大堤上的病人一个个转危为安时，好几位医护人员却累倒了。

军人并非铁石心肠，战士也有七情六欲。但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安危，始终是人民子弟兵首先考虑的神圣主题。正是这千万个舍小家保大家的军人，我们的军队才能经得起大洪大涝的考验，与人民一道顶住了大风大浪的袭击。

（王志耘）

材料四　联合国高级代表谈灾区考察见闻

日前，本刊记者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采访了刚从中国安徽、江苏和河南三个重灾省考察后回京的联合国救灾署高级代表埃沙德先生。他深入灾区许多地方，工作十分辛苦，脸晒得黑红，但毫无倦色。

自7月22日埃沙德先生奉联合国救灾署的派遣来到中国后，便冒着酷暑，不辞辛劳地先后两次深入中国受灾省安徽、江苏和河南作实地考察。第一次主要考察了安徽和江苏两省。埃沙德先生说，当地政府给他提供了一切方便和可能，包括专门派出一架直升飞机，使他“得以在上空俯瞰灾区，对考察灾情起了很大作用。”在安徽他乘飞机沿着灾情严重的巢湖流域、淮河两岸视察，并对肥西县三河镇、寿县和凤台县的灾情做了详细了解。他说，此次考察给他的印象是，“灾区急需援救，目前最要紧的事情是给灾区的人们以容身之所及药物供给。所以，联合国的救援资助主要应用于这两个方面”。

埃沙德先生谈及此次中国水灾时，神情严肃，心情沉重。他说：“我在联合国工作已有17个年头，曾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首席代表派驻越南，在越南遇到过两次水灾。的确，我见过水灾，但我从未见过中国这么大的水灾。受害范围之广，出乎我的意料。大水把许多的县城和村庄都淹没了。”稍停片刻，埃沙德先生继续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此次的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把钱和物转到了中国灾区。而在过去，从受灾国家请求救灾援助，到联合国实施具体救援，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埃水德先生工作非常扎实，认真，第一次去灾区后马上联系了救援的资助款项。之后他又第二次去安徽、江苏和河南灾区，专门了解救灾款物下发情况。他对记者说：“至少还有100万人在9月底以前需要向他们提供住所，这说明需要大笔资金。此外，我感到，尽管灾情很重，但没有出现饥荒，灾民手中都有粮食。”谈到款物下发情况时，他说，“就我所知，联合国救灾署对灾区的援助有80%是以货币形式，有20%是以实物形式进行的。尤其令人高兴、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联合国提供的救灾款项使用情况良好。”

埃沙德先生在中国灾区考察时，常常深入村庄、田头，直接同灾民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他对

中国水灾为害之大有深切感受，但他说，令人欣慰的是，他提了许多有关于救灾方面的建议，不少已被地方政府所采纳。他对中国当局的这种积极合作的态度深为满意。

采访中，埃沙德先生还对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在抗灾救灾中的表现赞赏。他说，中国军队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大水到来时，军队首先行动起来，开展抗灾救灾。百姓大众也表现出色，他们不悲观，不受宿命论的影响，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积极重建家园。这次考察中看到，修筑防洪堤坝的工程非常巨大。除了中国政府，其他国家无法动员这么多劳力，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由于中国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老百姓为最高利益，在如此大的水灾中死亡人数又如此之少，实在是个奇迹。总之，在灾区我所看到的军队和人民进行的抗灾斗争，很令人鼓舞。

埃沙德先生今年58岁，系突尼斯人，曾在联合国供职多年。此次他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他说："我在越南工作时就读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所以这次来中国感到熟悉和亲切。"

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对中国这次水灾的关切，埃沙德先生表示，今后他将对中国水灾的援助继续做努力。他说：我这次来华使命是向各国使馆，并将向联合国救灾署汇报中国灾情，以继续为援救中国灾区筹集资金。最近，我还将和中国民政部负责人再次会晤，交换看法，沟通信息。回日内瓦后，我要举行一次情况汇报会，向驻日内瓦的各国使馆人员介绍中国灾情，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多的了解与支持。

采访结束时，埃沙德先生还告诉记者，他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同事，目前正在日内瓦筹集资金，来支援江苏、安徽正在修复的一些建设项目，其中一项是在江苏内地投资12000美元，重建一所被洪水毁坏的小学。

"7·21"渔事纠纷

背景介绍

80年代末开始，海峡两岸关系日益解冻。但是，在"7·21"纠纷中台湾方面扣押、审判大陆渔民的现实表明，两岸关系并非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而是仍然具有很大的分歧。

材料：

- "7·21"渔事纠纷的前前后后
- 北京法学家评说台湾当局处理"7·21"事件

材料一　7·21渔事纠纷的前前后后

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发生些许渔事纠纷，不算什么稀罕事。然而7月21日，一场大陆和台湾渔民的渔事纠纷，竟招致台湾出动军舰。将大陆的两艘渔船和船上18名渔民强行带往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以"海盗罪"对其中7名渔民提出起诉；经台湾方面同意前往台探望被扣押渔民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代表又受阻滞留香港达8天之久。

一起渔事纠纷弄得如此沸沸扬扬，它的始末成因引人关注。

8月13日，在台中看守所，"闽狮渔"2294号轮机员吴清勇向两位赴"台采财"号冲他们开过来。发出信号后，台轮不见减速，而从网上窜了过去。

眼看双方渔网交缠在一起。大陆渔民赶紧要求台轮不要再前进，以免网破绳断造成损失。

不料"三鑫财"起网想跑。大陆渔民担心他们跑掉后没人赔偿损失，就把2295号船和台轮勾在一起，并叫台轮船长萧清山过来交涉。萧清山不愿，2295号的船长吴清勇便带了把防身的斧头上了台轮，要萧上2295号协商索赔事宜，但又遭拒绝。于是，大陆渔民上台轮拿了一个定位仪、电视机、录相头、收音机、15盘录相带、3个水桶和一此矿泉水及一个打火机作抵押。当收网后2294号船长蔡成家发现网破损不大时，便要2295号的渔民送还扣押的台轮东西。因有一段距离，未听清是否全部送还，他们留了一个定位仪，其余都送还了台轮。这时，一艘来支援的台轮直冲过来，船头的人拿着炸药，作出要炸2295号的样子。2295号的渔民便用碗砸过去，船尾还是被加速冲来的台轮撞了。正在这时，他们接到2295号船长的通知：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双方讲明就算了。"三鑫财"号也通知另一艘台轮此事已了结。2295号船扣下的定位仪也由蔡成家送还台轮。台轮船长萧清山表示愿意赔偿，蔡成家只要求赔条绳子。萧清山说没有绳子，便拿出5700多元新台币。虽然蔡成家表示不要，他们还是把钱扔了过来。事情了结后，双方各自在海上作业，两个多小时后，台湾却出动军舰飞机拦截大陆渔船。

台湾军舰将福建船、渔民强行带往台中后，立即移交司法警察和台中地方法院侦查处理。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侦讯原被告和鉴别渔网及所谓刀斧武器和"被劫财物"后，决定对11名与案情无关的渔民无罪开释，送往金门遣返厦门。另外涉嫌海上"劫掠"的7名渔民，则依"海盗罪"起诉，送法院公开审理。

在台中地方法院。8月14日的一次公开审理时，面对"起诉书"指控的"涉嫌海洋行劫罪"，7名大陆渔民均断然否认，申诉搬走台轮一些东西，是为了要求台轮船长

与2295号船长协商赔偿问题。尽管当事的台轮“三鑫财”号船长萧清山出庭“作证”，在许多细节上和大陆渔民各执一词，但双方都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纠纷起因是双方渔网交缠，事件发生在下午3点多，两小时后台方赔钱，大陆渔民送还了东西。事件结束后的六点钟左右，台湾军舰才出现。大陆渔民还义正言辞地声辩：我们是善良的讨海人，不是强盗。如果要抢台轮，船上的雷达、海底电视更值钱。而且福建沿海就有很多台湾船作业，何必跑到台湾海峡来抢。

大陆渔民被扣押在台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派人赴台探望，经过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反复交涉，台湾方面同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代表并两名记者赴台，一波三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曲折、庄仲希受阻滞留香港，几经周折，才得以入台。

台湾一些传播媒体对台中地方法院的审理也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两艘大陆渔船非“海盗船”之装备，且纠纷调解时台轮付给赔偿，对方立即返还所搬走之物，这种处理方式，绝非海盗之所为。

有的香港舆论也认为，作为渔事纠纷，大陆渔民搬走台轮物品作抵押，的确过火了一些。但由于两岸目前隔绝状况，恐无法到台起诉，采取这强制行为也可理解。因此，台湾以“海盗罪”或“恐吓取财”罪起诉，有悖情理，伤害了两岸人民的感情。

受被押7名渔民家属的委托，两名大陆记者8月15日向台中地方法院转交其中4名渔民的“辅佐人”要求到法院陈述意见的请求书，以及曾参与调解“7·21”纠纷的大陆渔民陈诗庆要求到庭作证的请求书，台中地方法院庭长表示同意4名“辅佐人”的申请。

据台湾报纸报道，8月30日台中“地方法院”以所谓“妨害自由罪”对7名渔民中的5名渔民分别判处1年2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另2名渔民则未被判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农业部就此事发表谈话，认为应维护海峡两岸祥和气氛，让无辜渔民尽早返乡。

（晓乡）

材料二 北京法学家评说台湾当局处理“7·21”事件

因“7·21”渔事纠纷遭台湾当局关押的福建“闽狮渔”两艘渔船的7名渔民中的5名渔民，8月30日上午被台中“地方法院”以所谓“妨害自由罪”判了刑。其中吴勇（吴清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还押台中看守所，不能交保；吴清勇、蔡银章各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3年，以8万元新台币交保；邱狮、邱强度各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易科罚金，以6万元新台币交保。此外，尽管宣告邱国荣无罪，少年蔡亚焕公诉不受理，竟也分别以5万元、3万元新台币交保。

“7·21”事件本是一件普通的海上渔事纠纷，但是台湾当局却无视事实，将此事小题大作，并使之政治化。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是为了配合其所谓“国统纲领”，企图达到“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

台湾当局的这一判决，引起了大陆各界的严重关注。为此，本刊特约请了北京法学界的4位学者，从法律的角度，对此事件进行评说。一方面为无辜的渔民伸张正义；一方面对台湾当局违背法律、不合情理的行径予以揭露。希望台湾当局从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大局出发，从事实出发，使这一事件早日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顾问高铭暄指出，这个判决表明，台湾当局不顾两岸人民的正义呼声和善良愿望，蓄意将渔事纠纷复杂化，破坏了两岸交往的祥和气氛，有损两岸人民的关系。

众所周知，“7·21”事件本来是一起渔事纠纷。起因是台方“三鑫财号”船损害了我方渔民的渔网，我方渔民要求赔偿，为了使受损害的利益得以保全，于是有并靠，上船、交涉、搬物等自助行为。更重要的是，这起纠纷经过调解，本来已经解决，正是由于台湾军方的强行介人，才使问题复杂化。台军方开枪打伤我渔民，并将我方两条渔船及18名渔民挟持到台中，任由已方摆布，这才是地地道道的违法犯罪行为。

接着，台湾检察机关强加“罪名”对我方7名渔民进行起诉，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霸道行径。台中“地方法院”坚持我方渔民犯了所谓“妨害自由罪”、“强制罪”，强加刑罚。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

再者，台中“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在我方的主要证人和“辅佐人”未到庭的情况下作出来的。“闽狮渔”号两艘渔船的船主蔡成家，是当时纠纷现场的见证人和调解人，可台湾方面没有让他出庭作证。

风 云 人 物

李 雪 健

李雪健(1954—)，中国著名戏剧、电影演员，曾获戏剧“梅花奖”、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

材料 从“宋大成”到“焦裕禄”

若问中国观众眼下最喜爱哪位演员，恐怕许多人会脱口而出：李雪健！

从电视屏幕到电影银幕，先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宋大成”走入千家万户，跟着又是栩栩如生的“焦裕禄”震憾人心。刚刚过去的本命年，对李雪健来说真是太吉利了。

“李雪健，真有戏！”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赞许背后丰富的内涵。

没有上过大学，他比起科班出身的同行们多少有点“先天不足”；也没有堂堂相貌，他自己说得绝：“我本身没有一点魅力，往那一站根本吸引不了人。”然而他塑造的“大成哥”和“焦书记”，却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和钦敬！

“接到角色，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当李雪健看过《渴望》剧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就是宋大成。一个极富人情味、忠厚的“小人物”宋大成，硬是让他演得活脱脱，牵动观众二十几个夜晚。如果说，宋大成的经历、气质，对李雪健来说不难把屋，那么“焦裕禄”却离他太远了。要让一个60年代献身，并早已深入人心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人“活过来”，让今天的观众接受他，本来就不易，何况观众心里还深深印着“宋大成”呢。

26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抗灾时，李雪健的父亲正是当地公社的书记。这特殊的家史，使他在感情上向焦裕禄贴近许多。影片开拍前，李雪健又来到兰考，走进焦裕禄的家庭，从他的妻子，孩子那里，寻找感染、升华。

到开拍时，他完全忘了自己。“我就是焦裕禄”。李雪健用心、用忘我的投入，成功地塑造了黄河古道边那位被人们传颂的英雄。今天，面对什么“演技派演员”、“性格演员”的赞誉”，他不以为然。只知道自己追求的是“演一个是一个”，要让观众承认他像“这一个”，而且相信他就是。

生活中的李雪健话不多，更不咋咋呼呼，于是得了个“老蔫”的绰号。16岁当兵，从部队文艺宣传队到总政文工团，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近20年，他一直不声不响地塑造着多种性格的人物。话剧舞台上的林彪和朱伯儒，两个反差极大的形象使他获得首届民剧梅花奖。第1次步入影坛，是《天山行》里的指导员，后来又参加过《大侦探》、《鼓书艺人》等影片的拍摄，主演电视剧《李大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宋大成”、“焦裕禄”，李雪健这“老蔫”，在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终于弄出了轰动全国的影响。下一个他又会是谁呢？

（方青）

王 铁 成

王铁成(1935—)，著名话剧、电影演员，曾多次扮演周恩来这伟大形像，为广大观众所喜爱。他已定居香港。

材料 王铁成——“周恩来”

十里长街，凛冽寒风中，伫立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目送着他的英灵呼唤着他，悲恸欲绝……

当人们从影片《周恩来》中再次看到这一情景时，不禁又动情万分我们怀念您，人民的好总理。

15年的漫漫岁月丝毫没有使这段记忆褪色，中国观众怀着空前的热情，在王铁成的艺术再现中，投入他们深沉的缅怀、呼唤。

“中国谁演总理最像？是我王铁成。”这不仅是王铁成的自我感觉，连邓大姐也多次称赞他的表演。

王铁成的自我感觉也有过不好的时候。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那里王铁成没演过一个主角。“文革”中他的家庭受到冲击。父亲死了，母亲患病，妻子怀孕早期得了场大病，生下个半痴呆的儿子。

1977年王铁成的命运在话剧《转折》中转折。他在剧中扮演周恩来，为演好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光辉形象，他学说周总理的语言，体味周总理的德行，模仿周总理走路的姿势，没出屋一天就走了20公里地……王铁成终于成功了。以后他又在话剧《报童》、电影《大河奔流》等中饰周总理。

13年了，他收集的有关周总理的各种资料，摞起来比他人还高；13年了，每逢总理祭日，他都来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独特的艺术追求使56岁的王铁成赢得了扮演周恩来"最像的一个"的赞誉。

1989年已在香港定居的王铁成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丁荫楠在拍一部电视剧时结识了。两位周恩来的敬慕者在恳谈中吐出一个共同的想法：最该写的是周总理，他的感人事迹本身都是戏。而且他最具有内心冲突，他最具有中国领导人的特点。"由此，便有了王铁成丢下香港几十万元生意回来演周恩来的这一幕，他还表示："拍《周恩来》，我一分钱不要！"；为了演好周总理，他节食减肥，瘦掉15斤；在拍片途中因车祸摔断六根肋骨，可3周后他用数米长的绑带固定了伤口，到宴会厅参加"国庆招待会"……

在邢台灾区，在延河边，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在305医院的病榻上……铁成投入了自己对总理的殷殷深情，观众也止不住为总理崇高的品德、博大的胸怀一次次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江泽民总书记称赞影片："精致、深刻、感人"。李鹏总理接见剧组时倾吐了自己的感受："演技绝伦，情出于心，再现总理，光照后人。"

（方青）

朱镕基

朱镕基（1929—　　），汉族，大学文化程度，高级工程师，1948年参加工作，1949年10月入党。

朱镕基1947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1951年毕业。历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机械局组长、石油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1989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1991年4月被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又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材料　新任副总理朱镕基

4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定任命邹家华和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中来自上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尤为引人关注。

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时，面对1300万上海市民，他坦诚披露施政方针：和同事们一起，建设一个廉洁、高效、有权威的市政府。

"从严治政"是朱镕基遵循的原则。一上任，他便对市监察局说："你们首先给我盯住市政府的局级干部。并要求纪委配合，重点抓全市1000多名部、委、办、局领导干部的廉政。朱镕基认为：他们廉洁了，廉政之风才能在全市树立起来。这几年，人们有目共睹，上海请客送礼、公费吃喝大大收敛。

对敷衍拖位、脱离实际的官僚作风，朱镕基深恶痛绝。一些领导干部因此被"　"得够呛。一次去某名牌老厂，当发现产品"面孔"几十年一贯制、效益严重滑坡，又得知主管局长已几个月未见来厂时，朱镕基十分恼火，严厉批评：身为局长，自己的工厂快过不下去了还不来，责任心哪里去了?！他当即让人通知局长，前来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近几年提起上海，它那一个个改革开放的大动作，格外引人注目。一年前宣布的浦东开发，揭开了上海要在未来世纪成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经济中心的序幕；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沪开张，预示着金融改革的新突破；已付诸实施的住房改革，全民参与讨论、决策、监督，为改革提供了新的启示……。这其中，有前任们的铺垫，也倾注了朱镕基和他的同事们的一番心血。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他：你在上海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回答是那么自信：没有。因为朱镕基十分看重群众参与、集体领导，重大决策都经过市委、市政委集体讨论，集中了群众中有益的意见。

也许，父母早逝养成他独立向上的性格。1947年从出生地长沙的省立一中考入清华后，这位电机制造专业的学生"不安份"地投身学生运动，21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年轻的朱镕基从东北工业部调入国家计委工作。"反右"运动迫使他离开了原来的岗位，直到1979年才重返国家计委，历任处长、副局长、国家经委委员、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生活的坎坷，人生的磨炼，也未改变他坦诚、直率的脾气。有人说朱镕基"严肃有余"。其实他兴趣广泛，喜爱鲁迅、巴金、茅盾等大师的作品，尤其酷爱京剧，能拉会唱。前年在市郊与金山县乡亲们欢庆元旦，一段京剧清唱，字正腔圆，赢得满堂掌声。

人们对朱镕基在上海市的政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走上新岗位后的工作也投以新的期待。

（陈毛弟）

苏宁

苏宁（1954—1991），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参谋长，是一个雷锋式的军人。他牺牲后，中央总书记题词号召向他学

习。

材料　当代雷锋苏宁

苏宁去了！才37岁。

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兵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作业。一个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沿的手榴弹滚落在监护人脚下。拉开环的手榴弹就要爆炸，苏宁冲上去，推开两位战友。手榴弹炸响了，战友脱险，苏宁倒在血泊中。

噩耗震撼整个炮团。战士们发疯似地朝医院奔；营区附近的群众、交通民警、汽车售票员赶来；街头修鞋的母子哭泣着来到部队；集团军和师里的将军、首长们守候在病床前。人们希望出现的奇迹并没出现，大伙为失去了一个好人而悲恸欲绝。

这是一个充满无限爱心善心的军人。苏宁每时每刻都在为别人想、为别人做。

"三九"寒天野外演习，他把火炕让给体弱的战士，自己钻到雪洞过夜；新兵考核，两枚扔出的手榴弹不响，不让别人冒险，自己摸到跟前排除隐患。类似的抢险，有过5次；素不相识的母子在街头摆摊修鞋，遇上流氓捣乱，过路的他挺身相助；公共汽车上没人为抱孩子的妇女让座，他便接过孩子自己抱着，战友的母亲病故，正为车票和没钱为母送终犯愁，又是苏宁送上了车票、1000元钱。……

"当兵的就要从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便是苏宁的信念。人类最美好的利人主义和奉献，在这普通军官身上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

苏宁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军人。军人的天职，使他的聪慧头脑和敏锐的眼睛，时时追踪着世界军事的发展，10年前完成的几千个数据、上万个计算方式、2万多字的《摩步师攻防作战计算机决策系统》总体设计方案，被专家认为是"军队指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可入伍时苏宁只有初中文化。他的《对现代作战"非物质战斗力损耗理论"的探讨》的发表，在军内引起震动，被我军军事运筹学专家称为"填补了军事运筹学的空白"。海湾战争刚结束，他又撰写和修改了三篇论文。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十天，还和岳一起构思了论文《谈高技术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在他住的9平米小屋里整理遗物，人们难以找到时髦的生活用品，也没有一部蕴含闪光思想的日记，却看到他留下的《2000年炮兵发展趋势》等70多篇50多万字的论文。

曾杰，哈尔滨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他的儿子把战友苏宁引来和他探讨马列理论后，教授给了苏宁一个评价：你的团参谋长是一个既懂军事又懂马列的人才，他想得很远，很有些修养！

"三百六十行，唯有军人是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服务的，我喜欢这一行！"苏宁22年的军旅生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们的军队需要苏宁，我们的国家需要千千万万个像苏宁那样当官、那样做人的人。

苏宁，共和国的英雄史上，又记下了一个鲜亮的名字。

（边吉）

范丽青、郭伟锋

范丽青（1955～　　），女、新华社记者，是第一次赴台湾采访的大陆官方通讯社记者。

郭伟锋（1957～　　），中新社记者，与范丽青一起赴台湾采访。

材料　首次踏足台湾的大陆记者

8月12日下午，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和中国新闻社记者郭伟锋乘坐的客机降落在台湾中正机场，他们开始了首次大陆记者踏足台湾的新闻采访。

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曲折、庄仲希赴台探望"7·21"渔事纠纷中被扣押在台湾的18名大陆渔民。不料因故一度被迫滞留香港。随行采访此次活动的新华社港台编辑室副主编范丽青、中国新闻社港台部主任郭伟锋先期抵台，成了引人关注的新闻人物。

郭伟锋、范丽青先生后于1981年、1983年分别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多年来都在各自的新闻单位从事港台报道，而且两人都曾被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派往香港分社工作数年。

36岁的范丽青喜爱文学，大学时就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小说《丑丑》曾获1982年福建文学奖。祖籍山西却生长在福建泉州，为她此次台湾之行帮了大忙。被扣在台中看守所的大陆渔民不识字，幸得范丽青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为他们传递了大陆家人在信中寄托的挂念之情。

郭伟锋被同仁称为"研究型"记者。广东梅县客家人，今年34岁，身兼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的职务。采访之余，他还挤出时间撰写出版了《当代港台南洋经济强人列传》、《世界同龄人——漫谈香港青年》等书。

许多年来，两岸新闻界都在为实现新闻双向交流不懈地努力。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徐璐、李永得采访大陆，打破了两岸新闻界近40年的隔绝。然而，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却因台湾当局各种限制，一直未能成

行。

台湾新闻界及其他各界这次鼎力相助，作为官方通讯社记者的范丽青和中新社记者郭伟锋终于踏上了台湾，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机场，郭伟锋不禁对台湾同行说：能来台湾是件不容易的事。范丽青则告诉包围着他们的记者：此行激动中更有许多感慨，因为这是四十多年来大陆记者首次踏足祖国的宝岛，也是新华社成立60年来第一次有记者赴台采访。

（张吉）

珍闻轶事

中国春卷“参加”海湾战争

中国春卷卷入波斯湾之战？不但如此，而且规模惊人。自11月起到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个春卷，自纽约飞渡大西洋，到阿拉伯沙漠“充实”对伊拉克作战的美军。“春卷是战地美军所能吃到的最健康食物”，店名为“冰冻墨西哥”的食品店老板说，他的公司所生产的中国春卷，里面包的都是新鲜蔬菜，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表面“就象一片新鲜面包”，做成后立刻冷冻。自11月到1月中旬，“冰冻墨西哥”已经接了三笔来自国防部的春卷订单，总数高达150万个，其中最近的一笔为75万个。

为了在短时间之内做好这75万个春卷，这家店的员工自平常的22人增加到67人。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91年的文艺界没有轰动的题材。在电影方面，仍是革命历史巨片头，但较之以前，在挖掘人的感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上座率极高的《周恩来》、《焦裕禄》都感人泪下。文坛上，新写实主义继续风行，而颇有争论的汪国真的诗则使广大青少年如痴如醉：年轻的潮，年轻的湖、年轻的思绪等集畅销不衰。歌坛上，冷面美人潘美辰在大陆开始得意，一曲《我想有个家》响遍大街小巷。91年我国开始申办奥运会，许多口号被制成标语挂在了首都的显眼地方。服饰方面，仍是女性的天下。

电影《周恩来》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华大地。

……坐在车上的周恩来观望着那些“炮轰”“火烧”的大标语、大字报，忧心忡忡。

转移贺龙，保护陈毅，制止鞍钢停产，他在竭尽全力保卫一代英才，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却未能护住烈士的子女——孙维世，他悲愤之极。民族灾难愈演烈。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揪出，毛泽东已洞察出中央领导内有人要发难，特意向人了解黄永胜等情况。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星夜叛逃国外，周恩来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出色地指挥了这场斗争。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经济秩序开始恢复。中美建交——作为一幕最生动的外交活动，受到世人赞赏。局势正在好转，厄运却又一次降临到周恩来头上，他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癌，“四人帮”恰又掀起“倒周”浪潮，周恩来以七十三岁高龄的带病之躯进行最后一搏。隆冬之际，他在便血的情况下仍携氧气袋飞赴长沙，同毛泽东主席商谈“四届人大”人选，决定邓小平等主持政府工作，并带病在“人大”会中作“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回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谈古论今，弦外之音令江青等人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对住在医院中的周恩来更加恨之入骨，百般残害。周恩来忍辱负重同“四人帮”周旋、斗争。他参加贺龙骨灰安方仪式，表现出自己力不从心，没能保护住老战友的内疚之情。病危时，他特意接见老部下罗青长，惦念着台湾回归祖国，并想到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曾经帮助过我们、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至死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冥冥世界的。这，也许就是他对世人的遗嘱。

在这一场事关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周恩来时时刻刻都流露出对人民的深厚的挚爱之情。他回顾战争年代里那些非同寻常的经历：同蒋介石及中外各方面人士的传奇式接触；共和国创建伊始那种蓬勃向上的气势……更加感到自己身负的重任。难能可贵的是，他尽自己的力量把一切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他的人格焕发出一种特殊魅力。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格外怀念他，国友人特别钦佩他。

他去了。当然，他留下的不仅仅是怀念……。

电影《焦裕禄》

影片叙述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四年五月间焦裕禄同志生命最后一年多时间里的动人事迹。

这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生命里最为闪光的一段历史……

为了带领兰考县人民群众治理风沙、水涝、盐碱，为了县委领导班子能积极展开工作，成为全县人民的指明灯，身为兰考县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同志不辞劳苦，处处出现在抗灾治灾的第一线，以吴荣光为代表的干部的错误思想极大阻挠了县委工作，焦裕禄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始终光明磊落，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和思想品德。

影片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生动而多侧面地塑造了焦裕禄同志的动人形象。在思想性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水准。影片男主角焦裕禄由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李雪健扮演。他曾主演过《钢锉将军》、《鼓书艺人》、《渴望》等多部影视片，荣获过全国戏剧"梅花奖"。此外，李仁堂、周宗印、田园、梁音、张英等演员也参加了影片的演出。

小说《一地鸡毛》

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是他的另一篇小说《单位》的续篇＊2是时下文坛上最红火的"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写的是一名国家机关的职员小林从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单位时雄心勃勃到后来也如常人一样陷入日常琐事的经历。小说的名字来自小林所作的一个梦：梦见自己身上盖着一堆鸡毛，柔软舒服……

这部小说反映了人在都市社会中的一种无奈。

诗《送别》

送你的时候
正是深秋
我的心像那秋树无奈飘洒一地
只把寂寞挂在枝头
你的身影是帆
我的目光是河流

多少次
想挽留你
终不能够
因为人世间
难得的是友情
宝贵的是自由

（汪国真）

歌曲《我想有个家》

作词/作曲/演唱/潘美辰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谁不会想到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

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无法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

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情，让我拥有一个家。

1991年申办奥运口号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世界和平友谊；促进世界和平友谊，发展国际体育事业；让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大放异彩；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申办奥运会，奔向二千年；建文明城市，树文明新风；做文明市民，全市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持申办奥运会；为奥运做贡献，为祖国增光彩。

大衬衫——1991年流行女装

将超出合体尺寸的女衬衣列为新潮夏装，会使魅力更加展露无遗。但超大的尺码应有人原则，那就是腰、胸袖可以超大；而肩、领、衣服身长必需合体。猎服式大衬衫胸前两只大口袋，加袋盖、肩带，方型大关领，肥大衣襟，用宽裙带束腰，宽桦衣袖紧口，俏然生辉，注意可在领、袋背三个部位稍加变化，以求合身，因人而异。宜用轻薄面料或绸类制做。休闲式大衬衫纯白丝质面料小关领，对襟大钮扣，并用红色菱形色块装饰，稍宽大灯笼袖，紧口，钮扣同样装饰。下身配红色塔式竹节裙，纯毛或纯丝轻薄面料，具有一种自然舒展的美感，招人迷恋的穿着。茄克式大衬衫柔质纯丝浅色面料制做，前偏开襟，双排金属扣，小关领，外加串珠长项链装饰，袖稍宽而长，紧口。下身配纯毛西服裙，显得严紧大方，最能表达内秀、持重、端庄的性格、不失为一款优雅女夏装。

1991年新潮女裙装

裙装，在人类服装史上出现最早，经历了数千年演变，在近年国际流行时装中跃居首位。棉毛丝麻呢绒皮革皆可为之，寒暑能穿，四季皆宜。具有女人标志的特种衣着，其款式变化达百余种之多，穿着飘逸活泼线条韵美，极富于动感。

1. 女套裙，西装反领短式上衣，双排扣低V字领，配高领浅色衬衣，具有传统、稳重格调。筒式西服裙，后开缝，束腰带，衣料可选用纯羊毛薄花呢，色调以素雅深沉为宜。

2. 女套裙，前开襟，圆形半高领短式上衣，前襟下圆角，五只单排扣，束腰，袖垫肩，袖口紧束呈衬衣形配钮扣。宽敞式套裙，长度在膝盖下。衣料可选用纯羊毛中厚花呢，柔软挺括。色调以蓝、咖啡、驼灰为主。

3. 女套裙，上衣为浅色古典式装束，前开襟，单排扣，挖圆领，左上方开一斜口袋，饰手帕。内着高领套衫，下着直裙，深色调，使上衣与裙形成强烈对比色调。适于中年妇女穿着。

4. 裙裤套装，一件黑底小白圆点、无袖大圆领上衣，外加黑底小白圆点坎肩式外套，半高领，也可以加宽松半袖，下着裙裤。也叫有裤腿的长裙，源于美洲，最初供打高尔夫球用装，后演变为闲暇服。白底黑圆点，用松紧带束腰裤筒宽桦宽度酌定。可选纯丝或木棉衣料，以透气、滑爽、轻盈为佳。充满青春活力。

（晨星）

历史档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今后十年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通过了如下建议。

一、主要奋斗目标和基本指导方针

（1）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本世纪最后十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2）从1991年到200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3）我们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九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4）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

（5）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关键在于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

（6）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

（7）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8）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9）必须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10）必须处理好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经济发展的产业重点和地区布局

（11）今后十年和“八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要在三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12)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

(13)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必须采取的若干重大措施：

(14)坚持"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促进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

(15)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16)大力发展能源工业。

(17)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

(18)原材料工业要重点抓好结构调整,全面提高产品质量。

(19)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千方百计节约能源、原材料、水资源和运力。

(20)切实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使它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协调发展。

(21)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到突出位置。

(22)大力改组改造加工工业。

(23)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重点是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24)轻纺工业的发展重点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

(25)积极发展建筑业,努力推进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

(26)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

(27)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28)积极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29)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保障整个国家和经济发展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三、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任务和政策

(30)科学技术的发展要继续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业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31)今后十年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任务。

(32)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33)加强社会科学研究。

(34)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大计。

(35)加强基础教育。

(36)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37)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合理调整结构,大力提高质量。

(38)积极发展成人教育。

(39)坚持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

(40)进一步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全社会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尚。

四、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全社会保障

(41)人民生活逐步达到小康水平,是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42)认真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

(43)调整消费结构,合理引导消费。

(44)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45)积极解决城乡劳动就业问题。

(46)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7)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48)发展卫生保健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任务和措施

(49)今后十年要初步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50)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5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52)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53)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54)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

(55)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建立稳定的和规范化的财政税收制度。

(56)正确发挥银行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57)按照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继续改革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

(58)改革工资制度。

(59)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设。

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60)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61)努力扩大出口和增加外汇收入。

(62)实行有利于扩大出口的政策和措施。

(63)合理安排进口和调整进口结构。

(64)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

(65)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66)改革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

七、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而奋斗

(67)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实施,将促进我国的进一步繁荣富强,也将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68)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69)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顺利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70)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71)加强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

(72)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指标名称	单位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17400	23250	31100
工业总产值	亿元	23851	32700	46049
原煤	亿吨	10.8	12.3	14左右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6180	8100	11000
钢	万吨	6604	7200	8000以上
乙烯	万吨	150	230左右	300左右
纱	万吨	450	485	557左右
农业总产值	亿元	7382	8780	10413
粮食	万吨	43500	45500	50000
棉花	万吨	447	475	525

注：本表价值指标均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名单

被誉为当今全国最高文学大奖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3月9日在北京揭晓。6位作家5部作品获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钱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老将军肖克的《浴血罗霄》和已去世的徐兴业教授的《金瓯缺》获荣誉奖。

第八届戏剧梅花奖获奖名单

第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一九九〇年度)3月16日在京揭晓，二十三名演员榜上有名，其中香港邓宛霞、台湾王海波的入围，是港湾台艺术家在大陆全国性戏剧评选中首次中奖。

获奖演员中，戏曲占二十二名，他们是：白淑贤(黑龙江龙江剧院)、胡小凤(邯郸东风豫剧二团)、杨乃彭(天津市京剧团)、栗桂莲(山西省晋剧院)、薛亚萍(山东省京剧团)、宋转转(呼和浩特市晋剧团)、胡和颜(武汉市汉剧院)、李金枝(十堰市豫剧团)、杨赤(大连市京剧团)、林继凡(江苏省昆剧院)、李喜华(襄阳县豫剧团)、谷秀荣(河南省豫剧一团)、丁凡(广东省粤剧院)、胡锦芳(江苏省昆剧院)、苏国璋(广西桂剧团)、陈俐(江西省赣剧团)、王永光(湖南省湘剧院)、邓宛霞(香港邓宛霞京昆剧团)马文锦(重庆市川剧院)、王继珠(吉林省戏曲学校)、马忠琴(农安县黄龙剧团)、王海波(台湾新生代剧坊演剧团体)；话剧一名，刘晓明(中国儿童艺术剧团)，歌剧空缺。

第九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和第十一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名单

荣获本届“金鹰奖”优秀电视连续剧目的是《渴望》、《围城》、《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公关小姐》，优秀电视单本剧为《五朵金花的儿子们》、《大兰和星兰》，优秀儿童剧为《赖宁》，优秀戏曲片为《黄山情》。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的桂冠由《渴望》剧中角色的扮演者李雪健、张凯丽、孙松、韩影摘取。

第11届(1990年度)全国电视剧"飞天奖"5月28日在广州揭晓。

获一等奖的分别是:长篇连续剧为《渴望》,中篇连续剧为《焦裕禄》,儿童连续剧为《少年毛泽东》,儿童单本剧为《一个真实的童话》,戏曲电视剧为《原野上的马车》。

获二等奖的有《围城》、《辘轳·女人和井》、《宋庆龄和他的姊妹们》等。获三等奖的有《杨乃武与小白菜》、《都市风流》、《公关小姐》、《深圳人》等。

韩志君、韩志晨获优秀编剧奖;黄蜀芹、潘霞获优秀导演奖;陈道明、李羚、李雪健、张闽分别获优秀男、女主角和配角奖。雷蕾、徐沛东获优秀音乐奖。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我们党日益发展壮大的七十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七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

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

这三件大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前的任务是,努力实现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国情包括很多方面,我主要讲三点。第一,我们经过几年努力,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新中国经济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至今经济技术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这些基本要求,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基本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必须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三、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第一，必须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第二，必须努力提高全党同志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第三，必须努力提高党的各级组织的战斗力。

第四，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第十一届电影金鸡奖和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名单

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9月9日在京揭晓。曾引得亿万观众感动落泪的《焦裕禄》，获得"双奖"的最佳故事片奖。焦裕禄的饰演者李雪健以其出色的表演荣获双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由电影专家评定的"金鸡奖"，将其最佳儿童片奖授予童影厂的《我的九月》。奚美娟因在上影厂的《假女真情》中的成功表演，获最佳女主角奖。

最佳男女配角和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重要奖项空缺。青年导演古榕执导《老店》获最佳处女作奖。特别奖授予青年导演冯小宁及长影厂的故事片《大城市 1990》。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有影响的群众投票评选的奖项。除峨影厂的《焦裕禄》外，北影厂的《龙年警官》和南海影业公司等单位拍摄的《老店》，也获得这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

"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授予在广西厂的《落山风》中扮演素碧的宋佳。在北影厂的《斗鸡》中饰演孙老倔的陈裕德，在《龙年警官》中扮演仲小妹的伍宇娟，分别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

《中国的人权状况》(内容简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月1日在北京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

白皮书阐述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以大量的事实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以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地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

这份长约45000字的文件包括前言和十个部分：一、生存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二、中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三、公民享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四、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五、劳动权利的保障。六、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七、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八、计划生育与人权保护。九、残疾人的人权保障。十、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

白皮书指出，旧中国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之下，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人权可言，深受其苦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得人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为维护人权和不断改善人权状况不遗余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白皮书指出，人权问题虽然有其国际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巨大差异，因而对人权的看法往往并不一致，对人权的实施也各有不同。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按一个模式或某个国家和区域的情况来套。

白皮书指出，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长时期实践的经验，对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中国的人权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性。享受人权的主体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中国公民。享受人权的范围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国家不仅十分注重保障个人人权，而且注重维护集体人权。二是公平性。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各项公民权利不受金钱和财产状况以及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的限制，为全社会的公民平等地享有。三是真实性。国家为人权的实现，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给予保障。白皮书说，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上已取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白皮书强调指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危害中国人民生存的，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9年间，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以千计。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他们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备受凌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和统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从此获得了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中国又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基本解决了长期陷于饥寒交迫困境的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从而也基

本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

白皮书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争取生存权的同时，为争取民主权利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权利。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宪法还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使旧中国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劳动人民获得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法定的民主权利。为了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中国选举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选举不受金钱的操纵，代表当选与否，不是靠吹嘘、许愿，而是看其对国家对社会的联系如何。因此，当选代表具有广泛性，代表着各阶层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体现人民民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保障各社会阶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发挥作用。中国十分重视基层民主建设，以保障公民能直接行使公民政治权利。中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政治权利。中国十分注重健全法制，颁布和实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规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1979年至1990年，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中，有关人权立法的，约有1000多件。

白皮书指出，中国主张的人权，不只是生存权和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中国政府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社会主义中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全体劳动者获得在经济上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实行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同时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得到了保障，并避免了因两极分化而使社会陷入对抗。中国是世界上分配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种速度，不仅是旧中国所根本不可比拟的，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居于前列。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了就业问题。1985年以来，城镇待业人员起业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同世界各国相比是低的。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财产。

白皮书还介绍了中国公民在受教育、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创作、知识产权的保护、生命健康等方面享有的权利和中国政府为保障这些权利所进行的 作，介绍了中国老年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权利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

白皮书介绍中国重视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时指出，在公安、司法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及司法程序上，中国法律为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权，作了明确的严格的规定。白皮书着重介绍了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序上，从拘留和逮捕，搜查取证，到起诉和审判，以及在执行劳改、劳动教养等环节中，中国司法是如何维护违法者的合法权利的。白皮书说，由于中国公安、司法机关在依法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发 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刑事案件发案率和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90年，中国的发案率和犯罪率，分别为千分之二十相比，要低得多。

白皮书还分别具体介绍了中国公民劳动权利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计划生育与人权保障、残疾人的人权保障等方面情况。

白皮书在介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时指出，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教与原则，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中国主张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优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中国一贯主持正义，在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主权和制止大规模侵犯人权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中国一贯认为，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适用于人权问题。那种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求主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放弃国家主权，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白皮书强调指出，利用人权问题去达到强迫别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的表现。国际人权活动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予以消除和纠正。

白皮书说，中国主张在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人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但任何国家实现和维护人权的道路，都不能脱离该国的具体国情，并需由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对人权制度予以确认和保护。中国一贯认为，对于危及世界和平安全的行为，诸如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造成的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岐视、灭绝种族、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都应进行干预和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保护。这是人权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人权国际保护活动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白皮书最后指出，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继续，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和推

行强权外交，阻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实现联合国维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宗旨，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5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1989北京发生的动乱、暴乱中触犯刑律的9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2人被免予刑事处分，其余7人分别被判处2年至4年有期徒刑。

1月7～11　日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报告。

1月7～13日　江泽民在吉林省进行考察，重点视察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并指出搞活大中型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1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去年立案侦破百万元以上贪污、受贿案件21件40人，涉及犯罪总金额3500多万元；立案查处损失百万元以上特大渎职案101件，涉及直接经济损失金额达5.3亿元。

1月10日　国务院举行第75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草案)》。

1月15～21日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会议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今年的政法工作。

1月18日　国务院举行第76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草案)》、《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草案)》。

1月25日　国务院举行第77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草案)》。

1月29日　新华社播发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谢非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2月2～6日　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江泽民、乔石4日同与会代表座谈时指出，为实现第二步宏伟战略目标，统一战线负有重任，大有可为。

2月4日　历时6天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在上海结束。会议要求把司法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司法部决定把今年定为法律服务“质量、效益年”。

2月14日　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在上海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互致问候祝贺。

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监察部最近查处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所属百孚公司违反规定炒卖黄金外汇，造成1800多万美元损失的重大案件。

2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就批转《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实施《规划》，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2月26日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宣布放宽台湾地区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奔丧的范围，由原来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扩大到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3月2日　为期6天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京闭幕。会议决定本月25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通过批准加入《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的决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关于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决定免去林汉雄的建设部部长职务，任命侯捷为建设部部长，免去钱永昌的交通部部长职务，任命黄镇东为交通部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许家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

3月3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顾委、中纪委常委会决定撤销许家屯中顾委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

3月4日　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召开座谈会，提出“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要求长年坚持，注重实效。

3月5日　王茂林当选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3月5～9日　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3月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福才因收受巨额贿赂已被逮捕，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已撤销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3月10日　张学良夫妇赴美国探亲访友。这是张学良45年来第一次被允许离开台湾。

3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最近转发河南省纪委关于原洛阳市委书记武振国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的通报;河南省检察机关已依法将其逮捕。

同日　李长春当选为河南省省长。

3月11～15日　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要求各级人事和机构编制部门认真执行中央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机构编制膨胀。

3月13日　葛洪升当选为浙江省省长。

3月14日　岳岐峰当选为辽宁省省长。

3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有关方面负责人近日就台湾当局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拆除障碍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3月16～19日　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

3月20日　宋汉良当选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

3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是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乔石任委员会主任。

3月23日　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3月25日　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4月9日　自3月25日开始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议批准发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纳要》以及李鹏就《纲要》所作的报告,并就此通过决议,会议通过了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90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1年国家预算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通过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根据李鹏总理提议,任命钱其琛为国务院委员,补选周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期间和闭幕之后,李鹏、田纪云、吴学谦、邹家华、钱其琛等就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和外交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4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决定,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

4月15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81号令,发布《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月15～22日　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在考察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科技是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全党要深刻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4月23～28日　全国党建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交流党建理论研究的成果,探讨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进一步推动党建理论研究和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4月29日　黄菊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程维高当选为河北省省长。贾庆林当选为福建省省长。

4月30日　台湾当局宣布,自5月1日起终止所谓"动员勘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5月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民政部等部门在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5月15日我国将实施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开展第一个法定"全国助残日"活动,召开第一次全国残疾人表彰会。

5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举报权利的规定》。

5月10日　朱森林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代省长。

5月15日　浦安修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5月22日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

5月21～25日　第二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5月28日　李鹏、宋平同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就当前经济形势及有关改革问题进行了座谈,乔石也在22日同学员进行了座谈。

5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彭真文选》(1941—1990)出版发行。

5月31日　国务院举行第84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草案)》。

6月4日　新华社报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今年5月14日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6月7日　国务院举行第8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6月21日　国务院举行第8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草案)》。

6月21～29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关于修改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决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会议批准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议定书》、中国和古巴领事条约、中国和阿根廷领事条约,批准了1990年国家决算,会议还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6月24～26日　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6月26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21名毒品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6月27日　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在京成立。

6月28日　国务院举行第87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讯条例（草案）》。

7月1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江泽民发表长篇重要讲话。

7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通知。

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江泽民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台湾“立法院”炮制重返联合国的“建议案”表示坚决反对和严正谴责。

7月9～13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在京举行。会议修改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通过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开展征询工作的决定》。

7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撤销国务院生产委员会，成立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朱镕基兼任生产办公室主任。

7月22～26日　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7月27～31日　共青团十二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8月2日　国务院召开88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草案）》。

8月9日　国务院召开第89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草案）》。

8月15日　厦门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鹰王号”走私船向大陆走私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厦门市公安局对该走私罪案拥有无可争议的司法管辖权，希望台湾有关方面尽快将“鹰王号”船、船上人员、货物送交厦门市公安局侦查审理。

8月23日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对两起特大贪污犯执行死刑的命令，执行枪决，同时对两起特大贪污案犯分别判处死刑和死缓。这4名案犯的贪污总金额高达209万多元，是上海解放以来发生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同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禁毒宣判执行大会，4名香港、云南毒贩被枪决，另5名香港贩毒分子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9月5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管志诚等5名经济犯罪分子被处决。

9月6日　国务院举行第90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预算管理条例》（草案）》。

9月10～14日　首次工青妇工作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

9月21日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9月23～27日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如何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9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今年以来处理贪污贿赂案件情况，并公布《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暂行规定》。

10月7日　第2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乌力吉、朱重庆、李志军、杨露、杨建秋、张奇、张喜武、周林、贺学禹当选。

10月4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台湾省民进党将建立“台湾共和国”列入该党党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对于少数“台独”分子的分裂国土的活动，中国政府不会坐视。

10月25～30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关于批准武汉、九江、芜湖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的决定、关于批准《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四附加议定书》的决定。

11月1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

11月3～7日　台湾省“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一行七人抵京，就海峡两岸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与大陆有关方面进行程序性商谈。

11月11～14日　部分省区市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11月19日　胡子昂逝世。

11月25～29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中全会在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12月7日　被台湾有关方面通缉达14年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总本部”头目张××在台北被捕。

12月9～13日　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为党的十四大作好准备工作，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京成立。协会理事会推举荣毅仁任名誉会长，选举汪道涵为会长。

12月17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自1992年5月1日起施行。

12月23～29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通过了关于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儿童权利公约》、《中国和老挝边界条约》的决定及一些人事

任免事项。

经 济

1月3日　新华社报道:1990年我国糖产量达525万吨,比上年增4.8%,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月4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1年2月1日起施行。

1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去年我国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完成工业总产值19486亿元,比上年增长6%。

1月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去年外贸出口突破500亿美元,内地出口额比重已占全国的1/4。

1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共生产原煤10.9亿吨,超额计划3000万吨,仍为世界第一产煤大国。

1月11～14日　李鹏考察天津,他就如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出8点意见。

同日　济南第一机床厂等87个企业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至此,全国共有国家一级企业132个,国家二级企业4210个。

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去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左右,比1989年上升幅度回落了15个百分点。

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水产养殖居世界首位,去年总产量超过1200万吨。

同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工商税收收入达1964亿元,比上年增加85亿元。

1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了《利率管理暂行规定》。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已有95个县市财政收入超亿元。

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10种主要有色金属产量达230万吨,居世界第4位。

1月23日　为时6天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京结束。

1月25日　1990年度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金马奖)评选揭晓,天津铁路分局等10家企业榜上有名。

1月29日　李鹏会见参加第2次全国黄金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要努力把我国的黄金生产搞上去。

1月31日　国家计委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基本建设战线采取措施,提高基建质量和效益。

2月1日　新华社报道:1990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突破10000亿公斤,比世界平均单产高出40%。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税务局等6个部门最近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出口产品退税管理的联合通知》。

2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就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发出通知。

2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七五"期间我国工商税收达808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0.4%。

2月5～8日　全国地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鹏致信表示祝贺。我国矿石年采掘量达21亿吨,成为世界第3矿业大国。

2月7～11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李鹏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企业要千方百计、扎扎实实地把经济效益抓上去。

2月9日　新华社全文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

2月15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自1991年5月1日起施行。

2月18日　新华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我国管道运输发展迅速,已铺设长输管道37条,总长1万多公里,承担了60%以上原油和100%天然气的运输任务。目前我国管道年运输周转量近600亿吨公里。

2月19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武汉钢铁公司走"质量效益型"企业发展道路的经验,努力提高管理水平,把我国产品质量的总体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年产30亿件服装,居世界第一,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产值、七成以上的产量、三分之二的出口创汇额、服装行业约一半的税收,均来自乡村企业。

2月22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7400亿元,比上年增长5%。

同日　新华社报道:1990年全国产值过亿元的乡镇企业和村庄约有50家,总产值共达80亿元以上,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印染总厂和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名列榜首。

2月23～28日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去年来华旅游入境总人数为2746万人,旅游外汇收入22.2亿美元。

3月1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75号令,发布《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自1991年5月1日　起施行。

3月3日　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了"八五"扶贫开发工作目标,指出要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增加贫困户的收入来源。

3月4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76号令,发布《专利代理条例》,自1991年4月1日起施行。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台湾"经济部"次长王志刚日前表示,以直接方式赴大陆投资者台当局将接受其合

法登记。

3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0年我国生产原煤10.8亿吨，居世界首位。

3月9日　新华社报道：至1990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1329万户，从业人员2092万人，注册资金397亿元，只相当于国营、集体企业的2.3%。

3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技术监督局最近改进评优办法，生活资料产品“国优”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5年，5年后须重新申请参加评选。

3月15日　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第2次表彰经验交流大会在京举行。

3月18日　新华社报道：至1990年底，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已降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以下，东部沿海各省和大中城市郊区约占农村总人口1/3以上的农民已开始向小康目标前进。1990年上海农民人均收入达1664元，居全国第一，北京农民为1261元，居第二。

3月21日　新华社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进口物资保税管理办法》，自1991年4月1日起施行。

3月21～27日　首届全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成就展览会在京举行。

3月30日　新华社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自1991年4月1日起施行。

4月8日　为期8天的第2届北京国际博览会开幕，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厂商参展。

4月1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80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1991年特种国债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农村水电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表彰了109个农村电气化试点达标县和461位先进工作者。

4月15～18日　全国个体劳动者第2次代表大会第2次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4月16日　邹家华副总理在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首次电话会上指出，这项活动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是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4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证券市场初具规模，目前全国已有专业证券公司46家，证券营业部700多个。

4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平均下调1个百分点，货款利率平均下调0.7个百分点。

4月22日　国家工商局发布施行《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

4月24日　经贸部首次部优产品评选揭晓，110个产品获优质产品称号。

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决定对部分超储积压的商品物资进行一次性降价销售，让利金额达40亿元左右。降价销售的商品主要面向农村，面向消费者。

5月6日　宋平在中国计划学会第2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要集中力时继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83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月11日　我国首家高科技专业化市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科技贸易中心正式开业。

5月19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李鹏4月16日签署的国务院第82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91年度起施行。

5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一份报告时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清理拖欠税款工作。

5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准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报告》，并要求各地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6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石油勘探又获成果，塔里木盆地吉拉克地区又发现一个大型油田。

6月5～10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口税则》审定会议。

6月6日　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在京成立。

6月17日　李鹏在全国治理“三乱”工作会议上说，各地要把治理“三乱”工作抓到底，国务院各部委要带头作表率。

6月22日　新华社报道：陕甘宁盆地勘探出一个国内最大的世界级大气田。

6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最近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控购管理，制止集团非生产消费再度膨胀。

6月24日　齐鲁石化公司30万吨乙烯工程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6月30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85号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自1991年7月1日起施行。

7月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选定辽宁省为清理“三角债”的试点。

7月6日　海关总署发言人就6月13日发生的我厦门海关6位关员在查缉走私船时被台湾军舰拦截带往台湾一事发表谈话，呼吁两岸通力合作，共同打击海峡走私。

7月10日　海关总署今日公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的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

7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已达9.1亿以上。

7月22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自9月1日起实行。

7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要求整顿商品交易秩序，严格结算纪律。26、27日，国务院组建14个工作组分赴各地，探索解开“三角债”债务链的有效办法。

同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87号令，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27～30日　江泽民在天津考察，他强调要千方百计搞活大中企业。

7月31日　国务院在沈阳召开东北3省4市清理“三角债”试点工作会议。

8月1日　全国财政和税务工作会议自7月24日至今在京举行。

8月2日　全国治沙工作会议自7月29日至今在京举行。

8月4～7日　全国重点建设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强调要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加强建设规模管理。

8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决定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共同发行100亿元国家投资债券。

8月16～19日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收棉花要以质量为中心，要严格执行国家棉花调拨计划。

8月27日　国务院召开“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第二次电话会议。朱镕基在会上对如何进一步开展这项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8月28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京成立。

9月2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1990年全国外债余额为525.5亿美元，债务率为89.3%，偿债率为8.5%。

9月4日　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自8月31日至今在京举行。

9月9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

9月17～20日　国务院召开治理淮河、太湖会议。

9月10～15日　国家体改委在京召开“城市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10月7～11日　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0月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上海、北京等35个城市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百亿元，这些城市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达6187亿元，占全国的35%。

10月14日　今天是第21个世界标准日。我国劳动安全标准化工作快速发展，工伤亡事故逐年下降。

10月21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家预算管理条例》，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

11月2日　我国首次召开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11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上月底，全国清理“三角债”已逾千亿元，提前实现今年预定清欠目标。

11月16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1月26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下月起不再办理保值储蓄业务。

11月30日　经批准，上海首次发行总计划1亿元，面额100元、共100万股的人民币特种股票(B种股票)。股票由上海真空电子器件有限公司向境内外发行。

12月7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2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食糖基本实现自给，国务院决定食糖放开经营。

12月22日　全国企业技术进步会议自13日至今在京举行。

12月29日　我国今年钢产量已超过7000万吨，成为目前世界上除原苏联、日本、美国外钢产量超过7000万吨的国家。

12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最近批转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

军　事

1月10～16日　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举行。会议强调把促进国家和军队稳定发展作为“双拥”主题。

1月13日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在京成立，刘华清为名誉会长，蒋顺学为会长。

3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批转《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要求把双拥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4月4～18日　中苏边境裁军第三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

4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中国将派20名军事观察员参加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

4月25日　国防部在上海举行“南京路上好八连”

命名28周年纪念大会，会上赠送了邓小平题写的金字横匾，宣读了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的题词。

5月12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张子祥、李志军、赵燕清、李润虎"学雷峰模范"荣誉称号。

6月5日　历时一个月的全军《民兵工作条例》集训班结业。

6月8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东军控会议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对布什总统提出的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关于中东军备控制会议的建议表示赞同。杨尚昆主席已就此复函布什总统。"发言人说，中国一贯主张按全面、均衡的原则采取适当、公正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13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说，中国支持在中东地区实现较低军备水平基础上的稳定，这无疑需要该地区和区域外部国家的共同努力，制止大量武器流入中东。27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说，希望安理会与常任理事国中东军控会议的召开有助于中东稳定。

7月2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7月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

7月9日　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第2阶段第4轮会谈自6月14日至今在北京举行。

7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杨尚昆在京接见全军海防部队优秀基层军官代表时说，人民子弟兵要全力帮助灾区人民战胜洪涝灾害，重建家园。

9月2～8日　全军政治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讨论和修改总政起草的《军队经常性思想工作要则》。

9月15日　杨尚昆、刘华清视察北海舰队。

10月21～24日　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10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批准了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基地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贯彻执行。

11月5～9日　由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联合举办的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

12月8～13日　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研究部署后勤工作贯彻质量建设方针、在调整改革中提高后勤保障力。

外　交

1月6～13日　钱其琛外长访问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1月18～11日　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访问我国，他是近一年半来正式访问我国的第一位日本内阁成员。

1月14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否认中国向沙特运送核弹头一事。

1月14～16日　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动作斯库访问我国。

1月14～22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法国。此次访问，标志中法友好关系已经恢复。

1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战争爆发深感焦虑和不安，希望交战双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防止战火蔓延。

1月28日～2月4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访问我国。

2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国务院在2月1日发表的"人权报告"中，竟然把中国的人口政策、购买国库券、公众为亚运工程作贡献和兴修农田水利等事情都说成是侵犯人权，这只说明报告起草人的偏见和对中国情况的无知。

2月12日　我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参赞陈德福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严词驳斥该报1月31日刊载谭声杰《中国在禁运后试图向伊拉克出售武器》的报道，指出该报道纯系捏造、毫无根据。

2月24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400多名巴格达平民2月13日在一个防空掩体里被炸死深表遗憾和不安。他呼吁交战各方防止战争升级。16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对伊拉克2月15日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从科威特撤军的660号决议一事发表评论说，这是伊拉克朝着政治解决海湾冲突迈出的积极一步，希望伊拉克关于撤军的表示能有具体措施并见诸行动。22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伊拉克2月22日接受苏联提出的和平倡议、愿意无条件撤出科威特表示欢迎，希望交战各方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24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海湾战争升级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海湾战争升级表示遗憾，强烈呼吁交战各方采取克制态度，以免造成更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失。28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海湾问题发表谈话说，我们欢迎美国宣布中止进攻性军事行动。

2月20日　李鹏总理会见来华进行工作访问的伊拉克副总理哈马迪。会见时，李鹏总理说，希望伊拉克采取撤军措施并见诸行动。

2月26日～3月1日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问我国。

2月28日　我国驻美、英、苏大使馆分别向3国政府递交了中国加入《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的加入书，宣布加入该组织。

3月4～1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曾涛率领全国人大外委会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1989年6·4风波以后全国人大派出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访美。

3月7日　联合国发布新闻公报宣布，联合国海洋总务委员会已批准中国为先驱投资开采海底矿藏的国家之一。

3月10日　钱其琛外长自2月21日至今访问葡萄牙、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和马耳他。

3月11～16日　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古莱德访问我国。

3月13～21日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卡布阿访问我国。

3月14日　李鹏总理会见柬埔寨三方领导人西哈努克主席、宋双总理、乔森潘副主席和拉那烈王子。会见时，李鹏重申中国继续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为政治解决柬问题所作的努力。

3月14～15日　中国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国际合作会议”。

3月15～22日　贝劳共和国总统埃特皮森访问我国。

3月18日　李鹏总理在北京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90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

3月23日　我国杰出的国务活动家邓颖超在北京荣获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授予的“巴基斯坦伟大领袖勋章”。

由10名我国油井灭火和环境治理专家组成的小组抵达科威特，帮助科威科扑灭油井大火。

4月3～8日　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访问我国。

4月9～12日　秘鲁总统藤森访问我国。

4月12日　中美双方经过4轮谈判，就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的知识产权附件取得一致意见，并于今天在华盛顿举行了附件的草签仪式。

4月13～15日　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我国。

4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涉外升挂和使用国旗的规定》已于近期发布施行。

4月19～21日　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在日本举行第7次会议。

4月22～29日　斐济总统加尼劳访问我国。

4月25日　李鹏总理会见并宴请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陆文星。

4月25～29日　突尼斯总统阿里访问我国。

4月25～29日　第5轮中苏边界谈判在莫斯科举行。

4月30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阿尔及利亚反应堆问题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信核合作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5月3日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开业典礼在北京举行。

5月6日　李鹏总理访问朝鲜。

5月6日　北京监狱监狱长周德钧就今年3月来华访问的美国众议员沃尔夫造谣诬蔑我方赠送他的纪念品为“出口”劳改产品的“袜子事件”揭露说，沃尔关于北京监狱的犯人所生产的袜子被用来出口的指责完全是造谣。

5月8～14日　我国首次承办的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第5届大会和第4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5月15～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公众代表会见并发表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重要讲话。19日，《中苏联合公报》在莫斯科发表。

5月17～20日　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访问我国。

5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美国总统布什5月27日宣布决定向国会建议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表示赞赏。

6月1日　中国驻美国使馆新闻参赞陈国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致该报的一封公开信，驳斥国际人权联盟关于中国向非洲派遣劳改犯充当劳工的谣言。

6月5～15日　杨尚昆主席访问印尼和泰国，这是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东盟国家。

6月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香港立法局通过“人权法案”一事发表评论说，英方不顾中国政府多次申明的原则立场，执意要在香港制定一个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贯彻执行产生不利影响的“人权法案”。对此，中方表示遗憾，并保留在1997年后适当时候按《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香港的现行法律包括“人权法案”进行审查的权利。

6月11日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商会合作委员执行局会议宣布，中国商会和国际商会合作委员会宣告成立。

6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梵蒂冈最近宣布教皇任命龚品梅为红衣主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18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爱国会和教育委员会就罗马教廷任命龚品梅为枢机主教一事联名

发表声明，批评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天主教事务。

6月18～19日　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并通过旨在推进环境发展国际合作的《北京宣言》。

6月25～29日　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勒内访问我国。

7月1日　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达爵士自6月27日至今访问我国。双方草签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7月2～14日　李鹏总理访问埃及、约旦、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科威特。

7月10日　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万里委员长和李鹏总理联名打电报给金日成主席和延亨默总理，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30周年。

7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已表示将派人出席7月中旬即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2次南海问题研讨会一事答记者问说，中国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专家出席南海问题研讨会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有任何变化。中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关争端。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美国众议院阻挠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发表谈话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22日，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布什总统19日在致鲍克斯参议员的复信中坚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欢迎。24日，发言人就美国参议院23日通过有条件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议案答记者问说，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不能接受。

7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执行会上说，中国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赞成美国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主张继续恢复对华关系的声明表示欢迎。

中国中止同中非共和国关系。中非政府7月8日同台湾当局恢复所谓"外交关系"。

8月7日　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在接受联合国记者采访时，代表中国政府和灾区人民感谢国会、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总部对中国水灾所给关注、同情以及提供的各种援助。

8月7～13日　越南副外长阮怡年访问我国。

8月10～13日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我国。

8月18～20日　埃及副总理加利博士访问我国。

8月20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记者关于苏联局势的提问在北京发表谈话说，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22日，钱其琛应约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耶夫。会见时，钱其琛外长说，苏联内部事务应由苏联人民自己处理，相信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恢复职责以后，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8月26～29日　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一批越军被俘人员，并将被俘后死亡的一名越南士兵的骨灰送还越方。

9月2～4日　英国首相梅杰访问我国。

9月6～12日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沙阿陛下访问我国，这是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中国。

9月9～16日　新加坡总统黄金辉访问我国。

9月11日　中国和爱沙尼亚建交联合公报在塔林签署。12日，中国和拉脱维亚建交联合公报在里加签署。14日，中国和立陶宛建交联合公报在维尔纽斯签署。

9月28日　田增佩副外长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滕，就法国政府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6艘护卫舰船体事提出严正交涉。

10月4～13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访问我国。

10月1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有关中美贸易纠纷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应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发言人还证实，以色列外交官员最近访问了中国。

10月15日　中美两国政府《关于进口航空产品适航审定批准或认可协议》在北京互换外交照会确认生效。

10月19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华盛顿时报》16日有关中国帮助伊朗建造核研究反应堆和伊朗寻求从中国购买弹道导弹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10月27日　我国赴科威特灭火队成功扑灭了第10口油井大火。至此，我国灭火队已胜利完成了承担的在科威特扑灭10口油井大火的任务。

11月5～10日　杜梅总书记和武文杰主席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问我国。

11月15～17日　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我国，这是1989年以来美国第一位高级官员访华。

11月15～17日　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殿下访问我国。

11月27日　我国政府中美产权谈判代表团和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分别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达成协议一事发表声明和谈话，指出美方采取措施是不公正的。责任不在中方。

12月8～15日　马耳他共和国总统塔博恩访问我国。

12月11～16日　李鹏总理访问印度，这是中国总理31年来对印度的首次访问。

12月20～21日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访问我国。

12月27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宣布，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大使王荩卿改任为驻俄罗斯大使。他还宣布，中国承认乌克兰等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分别进行谈判有关建交事宜。

12月31日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与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在北京签署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30万千瓦核电站的合同。

文化教育

1月3日　建国以来首次单独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在昆明结束。比赛历时7天，有30个民族100个节目参赛。

1月7日　新华社报道：第2届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最近在武汉召开。近两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成就瞩目，肾脏移植积4000多例，成活逾5年的有428人，10年以上者54人。

1月8日　李瑞环同电视连续剧《渴望》剧组进行座谈，提出文艺作品要寓教于乐，希望文艺工作者贴近群众生活，贴近实际。

1月12日　历时24天的"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在京结束。

1月15～19日　中国记协第4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1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最近作出部署：5年内将全国中小学校长轮训一遍。

1月22日　我国第一枚120公里高空低纬度探空运载火箭"织女三号"在海南探空发射场首发试验成功。

2月4日　卫生部长陈敏章获世界卫生组织首次颁发的最高奖——"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他是各国最高卫生行政长官中获殊荣的第一人。

2月18日　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讨论会上，各国考古学者提供的最新考古报告表明，中国是海洋文化发祥地之一。

2月19日　北京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女科学家陈杭获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授予的金质维奇纪念奖章。

2月22日　国家文物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已经国务院批准，即日起发布实施。

2月26日　国家超导实验室在中科院物理所建成，通过验收。

同日　首都举行电影《焦裕禄》首映式，李瑞环出席首映式并发表了讲话。

3月4～7日　由中国中日关系研究会等单位举办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3月4～8日　全国科委主任、科技司长会议在京举行。宋健作了题为《科技兴则国兴》的讲话，提出科技事业要形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3月9日　第3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并于29日颁奖，《平凡的世界》等7部长篇小说获奖。

3月17日　国家科委首次公布我国科技投入数字，去年我国科技活动经费总共为300.5亿元。

3月20日　中国四川14岁的小画家于水的作品《神圣的星》在国际红十字会举办的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获一等奖。

3月21日　新华社报道：著名史学家罗尔纲经考证提出，《水浒传》作者是罗贯中，原本为70回，后被人续加和盗改成百回本。

4月9日　江泽民、宋平、李瑞环等观看河南开封豫剧团演出的豫剧《焦裕禄》，称赞该剧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4月10日　历时130天、航程为16707海里的中国第7次南极考察船胜利返回青岛。

4月12日　首都举行纪念义务教育法颁布5周年座谈会。彭冲在会上宣读了全国人大常会委员长会议关于年内检查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决定。

4月15日　首都文艺界聚会，纪念毛泽东同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40周年。

4月16日　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京成立，张文松任会长。

4月18日　我国参加第1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的21项发明中，有19项分获金牌、镀金牌、银牌、铜牌和两项特别奖。

4月23日　为期4天的全国压缩整顿音像单位工作会议结束。目前全国年产音带1亿多盒，节目像带的发行量1989年达到1000种、60万盒。音像业将在整顿中步入繁荣。

4月24日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李鹏致信表示祝贺。

5月8日　第8届戏剧"梅花奖"在京颁奖，李瑞环出席了颁奖大会。

在第82次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我国的展品获12枚银奖和12枚铜奖。

5月23日　首都举行文艺晚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9周年。

同日　1989——1990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政府奖)在常州颁奖。

5月26日　为期7天的首届中国曲艺节(天津)闭幕。

5月28日　《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首发式在京举行。

6月3日　我国首座国际海事卫星地球站在京正式开通。

6月3～6日　国家科委在京召开首次全国科技成果推广会议。国家科委决定"八五"期间全国推广2万项科技成果。

6月4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第84号令,发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法条例》,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同日　在纽约闭幕的第14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我国有14项发明获奖。

6月7日　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在京首映。

6月8日　大型革命战争历史题材故事片《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摄成。

6月9日　第一部反映7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巨片《开天辟地》在上海首映。

6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世界上第2座脉冲反应堆日前在四川建成并投入运行。

6月26日　泰山、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证书颁发仪式在京举行。

7月14～25日　第1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举行。我国选手获得20枚金牌、17攻银牌、11枚铜牌,金牌数名列第二。

7月28日　我国运动员庄晓岩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柔道锦标赛上获得女子无差别级金牌。

8月9日　在今天莫斯科结束的第7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中,我国选手获得8项冠军,并有3人4次刷新3项世界纪录。

8月15日　在我国南海油田进行海底铺管作业的美国麦克多默特公司一大型铺管船遭台风袭击沉没。搜救工作16日结束,遇险195人中,救起188人,其中14人已死亡。

8月15～19日　第二次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长春举行。

9月2日　"七五"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9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首座5兆瓦低温核供热反应堆热电联供运动成功,发出的核电已并入电网。

9月9日　第11届电影"金鸡奖"、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京揭晓。影片《焦裕禄》获双奖。

9月19日　第9届"大众电视金鹰奖"评奖揭晓,《渴望》等剧目获奖。

9月28日　我国首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落成。万里、李瑞环等出席庆典。

10月1日　"亚洲第一塔"——天津广播电视塔落成开播。

10月5日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在京成立。

10月6日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仪式在京举行。

10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章良成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1月5日　《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在中南海开幕。钱学森为中央国家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讲第一课。

11月9日　中科院553名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7月1日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1月12、14日　中国展团在第40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两项特别奖、16项金奖和16项银奖,并获得1枚"军官勋章"和9枚"骑士勋章"。

11月19日　美国哈佛一史密松天文台天文学家邵正元宣布以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学家张钰祥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

12月1～7日　"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12月10日　首届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在京颁奖。

12月14～16日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3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邵宇当选为协会主席,舒同、启功为名誉主席。

12月26日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在京成立。

12月27日　中国国情研究会在京成立。

社会生活

1月8日　首次全国海洋工作会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九十年代我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

1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发出关于加强野生动物保护严打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

1月10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禁毒斗争。

1月13日　为时11天的第6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珀斯结束。中国选手获8枚金牌列第二。

2月2日　我国选手叶乔波在挪威举行的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中获500米速滑冠军。23日,叶乔波在德国举行的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中获女子500和1000米两项亚军;24日又获女子500米冠军、女子1000米亚军

和女子全能亚军。

2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西部地区的吐鲁番—哈密盆地发现一个大型油田。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广州成立。

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由江南造船厂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艘大型海上液化石油气船最近建成。

2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旅游局和国家民航局决定明年举办"中国友好观光年"。

2月25日 我国女子国际象棋手谢军战胜南斯拉夫女棋手马里奇,获得向上届世界冠军的挑战资格。

3月2日 我国选手叶乔波在海牙举行的世界杯速滑赛女子500米比赛中夺得冠军。

3月2～10日 第15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日本札幌市举行。中国选手获2枚金牌,1枚银牌和3枚铜牌。

3月10日 我国选手隋新梅和黄志红在第3届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女子铅球比赛中分获金、银牌。

3月12日 全国植树造林表彰动员大会在京举行。党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广东省"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称号。有524个单位和271人受到表彰。李鹏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把绿化造林推向新水平。

3月13日 中国选手庄泳在米兰举行的世界杯短池游泳赛中获50米自由游泳冠军。

3月22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78号令,发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3月26日 山西大同发生5.8级地震。同日,台湾省台东东南海中发生6.7级地震。

4月11日 经国务院批准,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陈希同任申办委主席,伍绍祖任执行主席。

4月26日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在京成立,柴泽民当选为会长。

5月5日 中国跳水队在世界杯跳水赛中获得6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

5月6日 为期14天的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千叶结束。中国队获得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3项冠军。

5月7日 能源部通报山西三交河煤矿4月21日发生特大瓦斯煤尘爆炸造成井下147名职工遇难身亡事故,号召全国煤矿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

5月9日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在北京亚运会中作出贡献的亚运会组委会30位官员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5月10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京成立。

5月12日 在第7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我国选手赵剑华、唐九红分获男女单打冠军,农群华和关渭贞获女子双打冠军。

5月27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6月8日 中国女子足球队获第8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

6月12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5月12日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6月21日 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宣布,国务院决定每年6月25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的日期为全国"土地日"。

6月25日 从青龙河取水至秦皇岛市区的引青济秦水利工程竣工。

6月28日 苏、浙、皖3省军民近日来合力抗洪救灾。田纪云在全国防汛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地动员起来,立足于防大洪,救大灾。

7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最近撰文呼吁,希望台湾当局作出相应努力,促成大陆文物尽早赴台展览。

7月9日 中国船舶总公司702所制成我国第一台载人式"水下机器人"——"QSZ型单人常压潜水装置系统"。

7月16～20日 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7月19日 中国故事片《出嫁女》在第1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特别奖。

7月2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世界遗产》证书仪式在京举行。我国的长城、故宫、北京人遗址、秦皇陵、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月2～9日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第13届大会在京举行。

8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就今年秋季开学后的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制订了措施,并就此发出了通知。国家教委已制定了《关于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

8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首座利用乏燃料核反应堆日前在四川建成并投入运行。

8月21日 "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展览会在京开幕。江泽民、李鹏为展览会题词,聂荣臻写信表示祝贺。"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4698个专题5年共投入73.9945亿元,产出达到406.7511亿元。

8月22日 新华社报道:3次赴南极考察的我国女地质学家金庆民,关于南极地质的科研获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关于南极火山岩和文森峰的研究空白。

8月26日 全国印刷字体工作委员会在京成立。

8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工会近日颁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

8月31日　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首届科学联席会议在京举行。

9月1日　为时10天的第3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在东京闭幕。中国运动员黄志红、徐德妹分获女子铅球和女子标枪金牌。

9月2～4日　海峡两岸中国人口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5日　北京至九龙铁路开始全面建设。该路全长2300多公里,穿越9省市。

9月23日　云南昭通市盘河乡发生重大山体滑坡,造成216人死亡。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开展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国务院确定每年世界粮食日(10月16日)所在周为全国"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周"。

10月12～16日　首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京举行。

10月22日　中国队在今天结束的第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上获24枚金牌,金牌数居第一。

10月29日　我国21岁棋手谢军以4胜2负9和的成绩战胜前世界冠军、苏联的齐布尔达尼泽,获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成为取得这一桂冠的第一位亚洲人。

11月16～30日　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广东省广州等地举行。中国队获第5名。

11月19日　上海市区首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南浦大桥建成。

11月24日　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中分获冠军。

11月27日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宣布全部竣工,全面发挥效益。

12月1日　北京举行北京市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递送仪式。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决定,从今冬起用10年和5年时间,分别完成治理淮河和太湖的任务。

12月7日　北京西厢工程正式通车。

12月10日　中国服装协会在京成立。

12月15日　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12月19日　"海峡第一桥"——厦门大桥正式通车。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2年

导　言

1992 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刚刚结束三年治理整顿的中国重新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十月份的中共十四大贯彻邓小平的精神，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举世皆惊。此外，三峡工程决定修建，影响深远。在航天事业上，发射澳星的一波三折，令人揪心。而一场名人官司也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总之，92 年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重上快车道
- ●三峡工程决定修建
- ●发射“澳星”
- ●股市狂潮卷神州
- ●李谷一打官司
- ●中共十四大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重上快车道

背景介绍

三年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时降了下来。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将徘徊不前的中国经济重新推上了快车道，同时还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对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影响巨大。

材料：

- 邓小平在深圳谈话录
-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材料一　邓小平在深圳谈话录

1月19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来到深圳。

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观看了深圳市容后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它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月20日。在国贸中心大厦，小平同志听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肯定了这里的成绩。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小平同志还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1月21日。在游览了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后，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小平同志还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小平同志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1月22日。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谈话。

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1月23日。小平同志离开深圳。临行前他还对深圳市领导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材料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改革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三峡工程决定修建

背景介绍

修建三峡工程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利在千秋的工程迟迟未能上马。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对电力和防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反复论证，修建三峡工程终于上到了国家的议事表上。这一工程的修建，必将给我们的各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

材料：

-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 三峡工程论证始末
- 人大政协委员就三峡工程发表意见

材料一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

材料二　三峡工程论证始末

今年10月至11月间，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派出专门团组，先后赴四川、湖北、湖南就长江三峡工程问题进行实地考察。这一消息发出后，受到海内外一些记者的关注。记者最近就三峡工程的论证问题，访问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负责人。

历史回顾

据介绍，三峡工程的研究，由来已久。如果从人们开始关心三峡河段的水资源算起，至今已70来年。

最早提出三峡工程设想的，首推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1919年，他在《实业计划》一文中，提出在三峡上"以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30年代和40年代，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曾对三峡工程合作进行过勘测设计和研究工作。1945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邀集有关单位组成三峡水力发电技术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曾讨论过三峡计划，包括航运、灌溉、库区淹没、人口迁移、肥料制造和库区测量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地质、电力、交通等部门的协同下，开展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编制和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关心和过问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长江问题的汇报后，认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1958年2月至3月间，周恩来率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及中外专家100多人察勘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并在途中主持了讨论会议。1958年3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和论证充分可告的方针。此后，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又持续了30年。1979年，规划单位建议坝址选在西陵峡的三斗坪。

1983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正常蓄水位150米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以便万吨级船队能直达重庆港。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受国务院委托对三峡工程的水位进一步组织论证，取得一批成果。

在此期间，国内有关部门和关心三峡工程的人士对三峡工程建与不建，早建或晚建以及建设方案，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进一步扩大对三峡工程的论证，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

重新论证

党中央、国务院为了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精神，决定由原水利电力部组织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围绕各界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新的建议，从技术上、经济上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然后组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可行性报告，提出审查意见并报请国务院审核。

原水利电力部在1986年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对论证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在领导小组下设地质地震、枢纽建设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共14个专家组，聘请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单位，中科院所属的12个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个省市专业部门共40个专业的412位专家，全面开展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其中，中科院学部委员15人；教授、副教授66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占38人；高级工程师251人，合计370人，占专家总数的89.8%。水利电力系统以外的专家213位，占51.7%。此外，还聘请特邀顾问21位。专家构成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

为了支持各专家组的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委托有关高等学校、科研、勘测、设计等单位，承担试验、勘测、调查、计算、研究的任务。实际参加工作的达数千人。国家科委还组织了有关科技攻关项目。

论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技术上的可行性、水库移民安置、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上的合理性、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和兴建时机等方面。重新论证工作始自1986年11月。三峡工程论证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论证的程序是先专题后综合，专题与综合交叉结合。各专家组首先审查各专题的基本资料，制定专题论证纲要，进行初步论证工作。在初步论证的基础上，综合

择优选出有代表性的设计水位方案，再由各专家组深入论证。论证过程中，各专家组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工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充分讨论，分别提出专题论证报告，并签字负责。

1988年11月，论证工作全部结束。14个专家组提出各自论证报告。在重新论证的基础上，编写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论证结论

重新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总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对三峡工程建设方案，可行性报告推荐采用"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大坝坝顶高程为185米，一次建成，初期运行水位为156米，最终正常蓄水位为175米，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千瓦小时，移民不间断迁移，20年移完。大坝坝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镇。施工总工期18年，第12年第一批机组发电。工程静态总投资共571亿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

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推荐方案认为三峡工程效益巨大：

第一，可以控制长江上游洪水，减免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洪水灾害，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二，为华中、华东及川东地区提供大量的电力，可有效地缓和这些地区能源供应长期紧张的矛盾。第三，使宜昌至重庆间航运条件显著改善，为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创造条件。

关于工程的技术可行性，推荐方案认为三峡工程基本资料充分可靠，前期工作相当充分，工程建设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已有明确结论，技术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关于移民和生态环境，是兴建三峡工程中的最关键和最困难的问题。移民安置任务艰巨，但有解决途径，工程越早建对移民工作越有利。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重视，认真对待。

关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兴建时机，论证结论认为，投资计算的基础是可靠的，三峡工程的经济性是优越的，通过多渠道集资，我国现阶段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0年7月，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任主任，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三位国务委员任副主任，委员中包括三峡工程涉及的各部部长及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共21人。1991年7月9日至12日，审查委员会对可行性报告作最后审查，并将审查报告和审查意见上报国务院。

审查委员会还聘请一批专家担任顾问，他们分为十个小组（地质地震、工程规模和枢纽建筑物与施工、水文与防洪、航运与泥沙、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投资估计和经济评价、资金筹措及综合），对论证报告进行审查。

据介绍，三峡工程研究、论证、设计时间之长，参加专家之多，涉及问题之广泛，为我国大型建设项目中所仅见。

（赵鹏、蒲立业）

材料三　人大政协委员就三峡工程发表意见

正在出席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湖南省省长陈邦柱答记者问时表示，三峡工程是很有效益的工程，湖南省人民将会对工程支援，在财力和人力尽最大努力。至于移民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已论证多年，作了全面考虑，订出开发性移民安排。

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三峡工程对四川的影响比较大，将使四川承受一些损失，却同时带来发展的机遇。他说，四川省在开发性的方针下，在中央的支持和地方的努力下，是可以做好移民安置的工作。

张皓若又表示，若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工程上马，四川省还是要服从整体利益，但是应该做好兴利抑弊，使损失尽量减少，增加利益。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人大代表厉以宁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只有通过改革，开发性地建设三峡，才能解决三峡工程中的移民问题。

厉以宁说，建三峡工程是可行的，应该上马，但社会上有两个顾虑：一个是资金投入太大，这一点不用担心，材料价格涨，三峡发的电价格也涨；另一个移民问题。如果把对三峡的投资当作一笔新的投入，建设性地开发三峡一带的资源，在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积极兴办旅游业、建工厂、农场、果园，可改变三峡一带原来的落后面貌。这是一种新的思路。

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对国务院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程作出不同的回应。

廖瑶珠表示，三峡工程的报告是一份慎重报告。议案建议把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当中，再由国务院按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决定施工期，对这个合理的要求，她将会投赞成票。

曾宪梓表示，由于他不是专家，难以判断这么巨大的工程应否立即上马。但是，因为这个工程不是建工厂那么简单，不能随便兴拆，关系今后数百年的长远利益，应该慎重考虑。吴康民表示，他对三峡工程应否上马没有成

见，但他指出，有关的报告资料来得比较迟，需要人大代表在短短几天作判断似乎仓猝。

发射“澳星”

背景介绍

继1990年的“亚洲一号”后，中国在1992年又发射了两颗澳大利亚卫星。这两颗卫星的发射着实令人揪心：第一颗发射了两次，先失败后成功；第二颗一次成功，但旋即宣告卫星失踪。中国刚刚开始的国际卫星发射业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材料：

- 美联社评中国未能成功发射澳星
- 在挫折中奋起——“澳星”升空纪实
- “澳星”发射现场目击记
- 美联社报道澳星失踪

材料一　美联社评中国未能成功发射澳星

中国一枚“长征”火箭今天没能成功发射一颗美国制造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这对中国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商业卫星发射业是一个打击。

据认为，这只是“长征”火箭的第四次失败。自从1964年以来，这些火箭已把30颗国内卫星和一颗外国卫星送入太空。

然而中国似乎对这一由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失败感到不安。转播在简短的宣布但却没有解释什么地方出现问题后中止了。

总部设在悉尼的通信公司奥普图斯通信公司的戈登·派京从西昌发射中心打来电话说，他预料他的公司的卫星不会改由别国发射。他说：“今晚发生的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人人都非常失望，但是你可以听到几乎人人都在说‘我们将再来一次。’”

制造这颗卫星的休斯飞机公司的发言人埃默里·威尔逊说，这颗卫星是完全投了保险的。派克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卫星受到了损坏。

这本来是中国发射的第二颗外国商业卫星。发射现场实况转播反映了政府对在高技术领域与外国公司展开竞争抱有信心和自豪感。

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同欧洲的阿丽亚娜航天公司和美国的一些发射公司相比仍然是高的。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方面是价格低廉——据报道其价格仅为3000万美元。

材料二　在挫折中奋起——“澳星”升空纪实

8月14日，我国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终于再次腾空而起，将美国制造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送入晨曦初露的天际。这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表明我国航天发射低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更显示出我国航天工作者在挫折中奋斗不息的可贵精神。

这辉煌的时刻虽然迟到了140多天，却是对中国航天技术一次前所未有的检验，对我国航天工作者跨入国际竞争大潮的一次战斗洗礼。

4个多月前的3月22日，“澳星”发射失利，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无情地摆在了习惯于航天技术捷报频传的我国观众面前。

但此刻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紧张，它正经历着一场高科技与意志的较量。

发射指挥员刚命令操作手按下点火电钮，突然从电视监视屏上发现主火箭的一、三助推火箭没点着，在三秒钟内，指挥员迅速作出判断并果断下达“紧急关机”命令。几乎与此同时，箭上控制系统自动关闭了主火箭和其余助推火箭的发动机，实施紧急刹车。从点火到成功完成紧急关机，仅用7秒钟，就避免一场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在世界上尚属罕见。

几分钟内，一支抢险队开赴现场，有效地采取合拢火箭固定塔摆杆和平台、断掉箭上电池和火工品插头、取出爆炸器和引爆器、消防车灭火等一系列补救措施。为彻底排除隐患，加注分队冒着火箭泄漏的有害气体，连续工作22小时，卸出火箭体内400多吨燃料。3月23日凌晨，完好无损的澳星从火箭顶端50多米高处卸下，运抵卫星厂房。一次未完成的发射终于化险为夷……

澳星、发射场安然无恙，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次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发射，对于提高我国火箭运载能力关系重大。这种火箭长达50米，是由我国老牌的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加上4个助推器组成的，起飞重量为460吨，发动机推力为600吨，可将9.2吨的有效载荷送入离地面200公里的低轨道。它从1988年底着手研制，仅用18个月就完成了火箭的设计、生产和发射试验，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少有的记录。据航天专家分析，这种火箭配上国产的固体顶级火箭，可将3.37吨重的卫星直接送入离地面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如配上氢氧顶级火箭，则可将4.8吨重的卫星直接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其运载能力约为长征三号火箭的3.2倍。

它的投入使用，表明我国已拥有发射九十年代国际大型商用卫星的能力，并有助于加强我国在国际航天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发射受挫后，近2000封感人至深的电报、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地飞向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祖国人民没有责备和埋怨，航天工作者却有一种难言的苦涩。他们很快冷静下来，虽然许多人流下了男儿不轻弹的眼泪，但大家并不气馁，只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尽快查出故障原因。

长征二号捆绑火箭总设计师王德臣，默默查看火箭出现故障部件后，连续几夜失眠了。这位曾担任我国多种火箭总设计师的“老航天”不顾自己感冒发低烧，衣袋里常常装着大把药丸，动手设计出一个独特的简易电路，为搞好故障分析试验攻克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火箭中止发射4天后，箭上点火控制电路中的程序配电器从西昌送往北京的失效分析中心。大家不顾旅途劳累，立即进入试验室，连夜对程序配电器进行精确的性能测试，并在激光电镜下进行外观检查、解剖和录像。经过18个昼夜的拼搏和上百次故障复现模拟试验，终于完成了故障分析报告。

4月14日，我国著名航天专家屠守锷、梁思礼、陈芳允、王永志、谢光选等人组成的故障分析专家审查委员会，通过了这份分析报告，其结论令普通人大感意外：影响澳星升空的“祸首”竟是一块比米粒还要小得多的铝质多余物！它使程序配电器上的控制接点短路，从而酿成一、三助推火箭误关机的恶果。

科学是无情的，运载火箭由几十万个元件组成，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发射失败。1980年，欧洲航天局发射阿里安火箭时，操作人员不慎将一个组合件的商标碰掉，落进燃料供应系统造成了堵塞，使火箭中途坠入大海；而一名美国技师在维修大力神火箭时，不慎将扳手套筒从工作台上掉下去击中燃料箱外壳，造成死伤20余人的大爆炸……

我方专家于5月4日飞赴美国洛杉矶，向休斯公司同行通报故障分析 结果，美方表示满意，但希望将第二次发射的时间提前到8月中旬。

于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摆开了赶制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战场。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沈辛荪深感肩上担子的份量，在赶制火箭的紧张日子里，他深入试验现场、研究室、生产车间，现场办公解决问题，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一个多月下来，身体消瘦了一圈。火箭总指挥于龙淮因劳累过度血压升高，从西昌返回北京被直接送进了医院。这位早已超过退休年龄的老专家，心里一刻也丢不开火箭，不停地打电话了解研制进度，请人来医院商量解决生产工艺中的难题，几乎把病房变成了临时指挥部。两天后，他索性悄悄从医院溜回研究院，加入火箭研制突击队的行列。

火箭配件生产车间的石尚义是一名普通青年工人，他参加过第一枚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赶制生产，并为此几次推迟婚期。他这次承担起加工生产电阻盒的紧急任务，顾不上去探望住院的女友，带领钳工组的同伴们昼夜奋战，有时一口气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当他提前一天完成任务，急匆匆赶到医院时，女友已溘然长逝。

火箭研制生产大会战中，许多单位摸索创造出流水作业一条龙的科学方法，大胆打破工序、工种间的生产界限。铣工帮助钳工镗孔，钳工主动帮助下道工序划线，设计人员帮助生产人员，形成热气腾腾的大协作的生产场面，大家自觉把产品质量放到首位，从自己做起把好质量关。据统计，有关科技人员、工人累计加班10万多小时，许多关键岗位的同志已连续加班一个多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或其它形式的补助，完全是自觉行动。

航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刷新了我国火箭研制的新记录：100天赶制出了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其速度和质量都是空前的。7月4日，火箭顺利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此时，澳星发射遇到新的困难：西昌地区已进入雷雨季节。世界各国选择发射时机均小心翼翼地避开雷雨季节，因为它会带来设备绝缘性能下降、防雷电困难以及低温燃料引起箭体“出汗”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中国航天工作者为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大胆闯入了雨季发射的“禁区”。

他们收集分析了西昌地区50年来的2800多份气象历史资料，统计整理出发射区八、九月份近7万字的气象背景资料，并与20多个有关地区气象台站建立起全天信息交换网，逐步掌握了雨季的“脾气”。同时，一种先进科学技术与老办法相结合的防雷雨系统诞生了：在发射场增设了避雷装置、去湿机、空调热风机、防雨罩……

我国长征二号捆绑火箭成功地冲破“禁区”，扶摇直上云霄。

这是在挫折和压力中的一次奋飞。她预示着我国航天科技工作者更加成熟，他们将勇敢地迎接各种新的挑战。

（许志敏）

材料三　“澳星”发射现场目击记

我们的军用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离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直奔“澳星”发射现场。

这里先后成功地发射了10颗人造地球卫星，此次为

澳大利亚发射第二颗通讯卫星更是举世瞩目。

此时是12月21日晚7时许，离点火发射的时刻只剩下十几分钟。

我站立的地方离火箭发射的机位只有300米，可以清楚地看到为火箭加注燃料的士兵仍在紧张地工作。最后5分钟的长音警报拉响了，一排士兵列队跑向地下掩体。火箭发射场成了真正的空谷。

“一分钟准备。”现场总指挥的声音沉稳果决，弓已拉满。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发射。”

我举着相机瞄准了火箭发射塔，感到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巨大的轰鸣声如一个轰炸机群从头顶超低空掠过，山谷里回荡着巨大的声响。最初的火焰如奔流的钢水、耀目灼人，并伴有棕红色的烟雾；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的第一级箭体及其四枚助推火箭在巨大的震动中开始产生8×75吨的推力，火焰越来越亮，棕红色的烟雾遮盖了发射塔下部的1/3。浑浊的气浪扑面而来、令人晕眩。

火箭在短短的9秒之内已挣脱了大地的束缚，倏地腾空而起，速度越来越快，向上、偏右，急冲云天……此时只见一团火球快速坠落……

当我返回指挥大厅时，对卫星的跟踪测试正在紧张进行。终于，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现场总指挥庄重宣布：中国为澳大利亚发射的通讯卫星“澳赛特—B2”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已完成发射澳星合同的全部任务。

屋外锣鼓喧天，鞭炮声响成一片。中、美、澳三方代表举杯庆贺，并在交接合同上签字。

12月22日凌晨4点，负责跟踪的美国休斯公司和“澳星”二号失去联络，要求中国协助寻找。

这颗“澳星”是美国休斯公司中新研制的三轴稳定的HS601型卫星，将接替于1993年7月到期的澳赛特A2号，主要向澳大利亚本土及其南太平洋邻国提供通讯服务。

经过一昼夜的寻找，终于在“澳星”预定停泊轨道近地点200公里的高度发现了澳赛特B2号通讯卫星，但呼叫没有反应，应答系统失灵。“澳星”本身的动力装置出现了故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跟踪数据表明：中国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第二级点火及脱落全过程飞行正常。所有参数均符合要求，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分析中。

材料四　美联社报道澳星失踪

中国发射的一颗澳大利亚通讯卫星失踪后直到23日仍然下落不明，而美国制造者说，由于卫星发动机故障，它未能到达轨道。

卫星的拥有者澳普图斯通讯公司的发言人戴维·福斯特说：“我们尚未找到它。我们一直未能（与它）建立起联系。”

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这颗卫星的休斯公司的发言人说，该公司认为，是发动机的故障使卫星偏离了它的轨道。

通讯主任唐·奥尼尔说：“看来发动机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点火。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点火。”

这台发动机预定要把卫星带到它位于赤道上空22300英里（35680公里）高的永久轨道。

澳普图斯公司、休斯公司和长城工业公司的官员们预定明年1月底在洛杉矶聚会，讨论这次发射。

股市狂潮卷神州

背景介绍

股票虽曾在前几年风光了一回，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陌生而遥远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股市风云再起，气势汹涌，把无数的中国人卷入其中。

材料：

- 股票命运交响曲
- 1992深圳股市沉浮录
- 在漩涡的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见闻

材料一　股票命运交响曲

“股”潮席卷着神州大地！

百万人买卖股票，为股票而沉醉，因股票而致富，投身波涛汹涌的股市闯荡沉浮；

亿万人关注股票，学习股票知识和投资技巧，寻求炒股资金和入市门道，面对充满诱惑的股市跃跃欲试。

股票——一种彩纸，竟惹得万众倾倒；

股市——两个试点，就导致全国瞩目……

洋务运动时，中国有了第一张股票——轮船招商股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股票在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但在解放时，股票带着“资本主义的烙印”绝尘而去。

新中国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规范化股票是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于1984年11月发行的“小飞乐”股票，首期发行50万元，每股面值50元。

“小飞乐”股票还是第一张飞到海外的中国股票。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访华，赠给邓小平一枚精美证章——纽约证券交易所所

徽。作为回赠，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将一张“小飞乐”股票(面值50元、编号为05743)赠给约翰·范尔霖。如今，这张股票陈放在纽约证券产易所陈列馆的专柜中。它享有如此殊荣，因为它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张股票。

从1984年至今，股票在新中国仅有8岁，却堪称“饱经沧桑”，其丰富阅历已构成一部“股票命运交响曲”。

出师不利

(1984年至1990年3月)。股票初降，问津者寥寥，因为人们尚不知道股票值钱，能变钱，并能使钱“下崽”。这时的股票真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深圳发展银行计划发行1000万元股票，备受冷遇。动员党政干部带头买，推销人员登门求人买，也仅销出796万元“发展”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股(每股1元)，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某处处长买了2000股，回家挨了太太一顿骂，并被罚睡几宿地铺。深圳“万科”股票1988年发行时，发行方案周密，广告宣传紧锣密鼓，但只销出3/4，还有150万股“积压”，由包销者“销不了兜着走”。上海“电真空”股票首期行销期满时，仅有500万元被认购，只占发行股额2200万元的1/4，余下3/4只好由承销的4家证券公司分摊吃进。这几年，人们对股票由不识到初识，股票行销由不畅到平销，这个渐进过程相当缓慢；股票市价很低，在面值上下徘徊，上海面值50元的股票仅卖50多元，甚至一度跌到48元，深圳几种股票平均只比面值高出20—40%；股票交易量较少，深圳股票交易额1988年不足1000万元，1989年才升到3253万元，而上海股市1986—1989年成交额累计不足1亿元。显然，股票“出师不利”。

备受青睐

(1990年4月至11月)。1990年春夏时节，股票交上好运，成为数十万人抢购的紧俏商品。人们视股票为“摇钱树”、“聚宝盆”，纷纷投资股票。深圳、上海三四十万人投下数十亿资金买卖股票，使各种股票市价陡然涨到高于面值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深圳“发展”股票价格最高达70多元(面值1元)。显示上海股市行情的“静安股价指数”从100多点起直线上升，到8月底达229.71点，到年底达359点。换言之，上海股市7种股票在半年里平均涨价二三倍。深圳股市1990年5月成交1.1亿元，6月份增至2.6亿元，全年创下17.6亿元的纪录。“原野”股票原计划发行1650万元，没料到一下子就收到3800万元的预交款，大大超过计划发行额。由于“僧多粥少”，只好采用抽签方式，少数幸运的中签者才能买到“原野”股票。这几个月，股票在深圳、上海可谓“春风得意”。

风云突变

(1990年12月至1991年8月)。鉴于前一阶段股“过热”、股价“过高”，有关方面对股市作了干预：缓让新股上市，实行股价涨跌停牌制(规定每天股价涨跌幅度为5%，后调为1%、0.5%)股票价格急转直下，一路下跌。深圳“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五种股票下跌幅度分别为27.3%、49.1%、53.7%、59.9%、40.2%，曾高达70多亿元的股票市值下跌1/3。同时，上海8种股票有5种下跌，“延中”、“电真空”、“大飞乐”股票曾一度撞跌停板(以允许的最大幅度下跌)，“申华”、“小飞乐”股票时涨时跌，但基本呈跌势。眼看着手中的股票日渐贬值，股民们视股票为“烫手的红薯”、“赔钱的劳累什子”，纷纷抛售。与前一阶段排队购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深圳特区证券公司门前每天早晨有几百人排队抽签抛售股票，只有1/10的人能庆幸抛出。这时，股票初尝被抛弃的滋味。

倾国倾城

(1991年9月至今)。从1991年仲秋起，股市“由阴转晴”。尤其是今年以来，股市一片兴旺景象。几十种新股公开发行，今年总计约有8亿元股票公开发行，引发阵阵股潮。去年11月10日，深圳市11种新股发行(每股1元，共2亿元)，出现40万人排队争购的盛况。全市300个发行网点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共300万份)，只有3.6%的中签者能购到股票(每人限购2000股)。9日夜，有20万人通宵达旦地在发行点排队等购。到10日上午，排队者达40万人。今年一月，上海发售207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证30元)，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排队抢购。如今，10张连号的认股证已被炒到3000多元。

今年以来，股价高涨，股票发行价格都溢价几倍，最高溢价9.28倍。股票交易价格更高。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价格一度突破10000元，目前仍达8800多元；面值1元的“发展”股票价格达四五十元；连今年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价格也高出面值一二十倍。股票交易额直线上升，今年1—5月，上海股票成交额达50多亿元，超出前7年总和一两倍；5月21日放开股份，交易额竟达3.6亿元，创上海股票日交易额之最。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争相发行股票，千百万人谈论股票，学习股票知识，因此股票倾国倾城毫不为过。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把股票比喻为美女。一位买卖股票成为亿万富翁的股民更是动情地说：“买股票吧，是你如胶似漆的妻子！”股票具有绝代佳人般的魅力，难怪千百万人为她神魂颠倒、寝食难安。用一句广告词来概括：股票，“挡不住的诱惑！”

(胡孝汉)

材料二 1992深圳股市沉浮录

进入1992年,股市热再次席卷了深圳。

从3月24日发动,深圳股市牛气冲天,一路上升,至5月26日,股市转疲,持续下跌。

在股价狂涨的62天里,股票热冲击着深圳的各行各业,波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股市的沉浮牵动着数百万人的心。

(一)

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南巡深圳。

2月27日,敏感的香港股市作出反应,恒生指数劲升100点,成交额创有史以来第八大成交纪录。

同日,深圳股价指数不增反降。

股市是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但在邓小平南巡深圳的重大事件上,深圳股市反应十分迟钝。

春节刚过,《深圳特区报》异乎寻常地推出一组不同凡响的猴年新春八评。继而,《深圳商报》又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八论敢闯"。

从3月24日开始,沉默的深圳股市犹如火山喷发,一路高歌猛进。

两个月后,当深圳股市在风浪中经受考验时,面对节节下挫的股价,学会把股市周期与重大政治因素联系起的股民,依然稳若泰山,信心十足。

(二)

在深圳股市兴旺的日子里,持股者兴高采烈,持币者坐立不安。

A君,1.1万元买进"物业"股票,原打算年后翻倍,没料想行情天天看涨,1个月后得到1.5万元的回报。

当持股者与无股者的收益差距拉大时,人们的心理就失去了平衡。

一位署名清平(贫)的打工妹在信中道出了她的困惑:

"我也想炒股票,一朝暴涨,在股市里一天获利数千元、上万元,但又没有胆量,总害怕一朝暴跌,使我每月四五百元的血汗钱'血本无归'。看着别人天天发财,心里就不平衡。"

其实,这不止是一个打工妹的困惑,也是她所代表的特区120万打工青年们的共同困惑,更是靠微薄的薪金收入养家糊口的公务员们的困惑。

(三)

股市热浪袭人,把深圳近20家证券部搅得沸沸扬扬,门庭若市。

股价天天向上,队伍越排越长。一些流入深圳的"三无"人员(无户口、无边境证、无职业)结成团伙,欺行霸市,一时民怨四起。

来自宁夏的女作家周玲写下了她的亲身体验:

"5月31日(星期天),我加入了某证券部买股票的长队。星期一总算熬过去了。次日凌晨2时许,伴随着一阵呐喊声,十几个小伙子冲进了队伍前面。一位30多岁妇女的鞋被挤掉了,穿着袜子站在泥水里。一位老人的坐椅挤丢了。一位中年外地人气得直咬牙:'好你个深圳!'

"星期二早晨,队伍前面又出现一阵骚乱,已熬过两夜的股民们被挤得直往后退。那些凭蛮力霸市的青年,竟把抢来的位次高价卖给刚刚来市场的人,最高价达400元。"

凡身临其境通宵排队的小股民,大都有过类似周玲的经历和感受。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深圳市公安局专门发出了恢复证券交易秩序的通告,遣送了百余名霸市的"龙头",市场秩序有所好转。但由于买难卖难的矛盾并未缓解,卖位牟利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

三无人员欺行霸市的风波未平,新股发行办法又引起了万民大讨论。

去年,凭身份证领取新股认购表,尽管60万市民通宵排队,但秩序井然,发行结果皆大欢喜。

事后,凭身份证购表的弊端日益明显,中签的身份证竟成了有价证券。今年又有人从全国各地搜集了7000余个身份证,准备抽签。

今年新股发行,怎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管机关颇为操心。持有不同心态的市民向主管部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一时成为深圳新闻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

显然,新股发行方式讨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并其本身,说明中国南方的一个群众积极参与的金融中心正在形成。

(五)

在股市里,投资者与管理者总是有冲突的时候,有时甚至相当激烈。

从3月底起,深圳股市如脱缰野马。4月23日,深圳股票指数突破200点;5月6日,突破250点;5月19日,再拿下300点大关。

主管机关在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如果不加以调控,"深指"上半年有可能冲向500点。

股价只升不降,使后来的投资者怀着强烈的获利冲动涌入市场,而股价正如他们所愿节节攀升,家家户户都洋洋得意。

一位心情十分隐忧的证券高级管理人员向笔者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股市像只气球,气瘪时,大家敬而远之,怕吹它。等到气鼓时,众人抢着吹它。吹了一轮下来,过去有过教训的人,看到气球胀得太快,心悸之余,便远远观望。可是,新来者却吹得高兴,旁观者心里痒痒。于是,人越吹越多,球越吹越大。这样的气球,即使碰上一粒砂子也会爆的。

为了避免股灾从天而降,证券市场主管机关按照北京有关部门的部署,强行为股市热降温。深指从312点滑落到240点左右。

对于证券主管机关的作法,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反应强烈。

一位市民打市长专线说,"为什么香港恒生指数突破6000点大关时,大家举杯相庆,而深指刚破300点,有关部门就惊恐不安地干涉呢?"

更多的人希望主管机关谦虚一些,学学上海经验,用增加供给这个大家都易接受的办法调节股市的温度。

对此,主管部门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苦衷。但是,可以相信,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建成一个完善和健全的股票市场。尽快建立权威性的证券管理委员会,这已是包括证券管理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方。

(崔保新)

材料三　在漩涡的中心
——上海证券交易所见闻

在上海街头漫步,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五成群的自发式"股会"。遍布上海的60多个证券交易网点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牛市"、"熊市"、"买进"、"抛出"之类股语随处可闻。老上海指着拥挤的长龙告诉记者:"在上海,排队的一定是在买股票。"

上海的股市正如上海的初夏一般燥热。然而,股市交易现场是什么样子?大多数已经"下海"(上海人称从事股票买卖为"下海")多年的老股民依然说不清楚。

神秘的"SSE"

上海股市的灵魂是位于外滩外白渡桥畔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整个大上海的股票交易都在这里进行。"SSE"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英文缩写。

走进交易所古铜色的大门,神色威严的警卫在来回巡查。记者沿猩红色的地毯走上台阶,一个由玻璃幕墙封闭的全透明的中央证券交易大厅出现在眼前。

大厅面积有447平方米,除交易所会员外,常人绝不允许擅越雷池。正面墙上,一个长4.7米、宽2.7米的"上海证券交易行情动态"巨大电子显示屏格外引人注目,上面红、绿、黄三色数字分分秒秒显示着十几种上市股票的当日开盘价、上个交易日收盘价以及最新一笔交易价。

46个凹形柜台在大厅整齐排列,这就是上海交易所各会员证券公司进场交易的席位。柜台上分别插着印有各证券公司标徽的会员旗。

每个席位上现装有两台电脑及红白两架电话。电脑显示交易的最新行情并输入股民买卖何种股票价格及数量等信息。红色电话通到交易所外,可以与各自的证券公司或客户通话,白色电话用于交易所内联络业务。

大厅中央还有两个很大的椭圆形柜台,那是股市交易监督者的"宝座"。

11:30分,前市交易刚闭市。记者在一位姓朱的黄马甲陪同下,走进交易大厅内。尽管此时厅内已相当安静,但当记者抚摸着光滑的席位、崭新的电脑时,还能感受到刚才的紧张激烈气氛。

"SSE"每天上午9:30至11:00,下午1:30至3:00开市,周六、周日停市。

红马甲　黄马甲

股市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红马甲、黄马甲·红马甲,是各证券公司派进交易大厅的经纪人,因身穿红马甲为标志而得名。黄马甲,是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人员,因身穿黄马甲为标志而得名。四、五个黄马甲安坐在椭圆形监督宝座,审视近百名红马甲在各自席位紧张交易。

普通股民绝对不允许直接进入交易大厅。交易所开业那天,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等中外贵宾也一概隔着玻璃墙观看交易盛况。股民们买卖股票可以委托证券公司。而证券公司又通过自己的红马甲来完成整个委托。

当你需要购买或出售一种股票时,你首先应该到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下属的服务网点,索要委托单,填写买进或卖出股票的数量、最高价格或最低价格。证券公司很快就会把你的委托要求,电话通知自己在交易所内的红马甲,红马甲立即把你的买卖信息输入席位上的计算机,计算机按设计程序,根据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股票交易原则,自动为买卖双方配对,一笔交易一旦成交,立即显示在大屏幕上。红马甲通过席位上的红色电话告示证券公司通知你,让你第二天带上钱或股票、身份证和认购卡等到证券公司办理股票交割手续。

上海股市建立之初,红马甲大多是上海人,分属上海申银、万国、海通、财政四大证券公司。而今天,记者看到交易大厅里,已活跃着浙江、山东、安徽、江苏、江西、辽宁、北京、天津、广东等地的几十个外地"红马甲"。迄至6月份,全国各地已有61家证券公司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红马甲的年龄一般都在25岁以下。记者与他们交谈

之后，方知他们多是银行院校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已有一、二年实际金融工作的经验。在成为红马甲之前，都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专门培训。这些"红马甲"、"黄马甲"很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股票经纪人。

一位22岁的女"红马甲"说："每天一早穿上红马甲，走进交易大厅，都有一种赴汤蹈火的感觉。股市有风有浪，千百人的千百万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只想尽力为每一个股民谋利益。"

交易所人谈股市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记者见到年仅37岁的尉文渊总经理，他对上海股市的基本估价是：起点高、发展快、意义深远。他说，随着浦东开发和我国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转向长江流域，上海股市将成为带动我国金融改革的龙头。上海电真空B股上市后，其行情通过路透社向世界各地发送，使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上海股票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规范化、国际化是上海股市发展的方向。

类似西方世界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悲剧会不会在中国上演？上海证券界人士对此众说纷纭。他们说，证券投资总是有风险的，证券公司发行股票时已提醒股民"股市风险莫测，入市谨慎氖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地喊"狼来了"。但作为证券交易所，其职责是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除了股民自己，谁也不会替你承担投资的风险。

申银证券公司的杨燕雯小姐告诉记者，在股市上，一个人赚了，最终总有一个或几个人要赔的，而每个股民都相信自己身后等着一个傻瓜会用更高的价格买自己抛出的股票，所以大家都在抢着买股票。但最后总有人抛不出他手持的股票，他就被套住了，他就是最后一个傻瓜。从前因为炒股失败而自杀的悲剧是发生过的。

"股市就是这么较真，股市就是这么冷酷。"一位经纪人的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汪洪洋）

李谷一打官司

背景介绍

名人本来就容易造成轰动效应，名人打官司更是令万人瞩目。一时间，刘晓庆等"大腕"都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纠纷。李谷一的这场诉讼则是众多名人官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材料：

- 诉南阳《声屏周报》、汤生午侵权案一审结束，李谷一胜诉
- 一场令人瞩目的名人官司

材料一　诉南阳《声屏周报》、汤生午侵权案一审结束，李谷一胜诉

纷扬一时的李谷一诉汤生午、《声屏周报》侵害名誉权案，历时两天半的法庭审理，7月12日上午结束。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李谷一胜诉。

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刊载该报记者汤生午文章《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文中不提名地报道了李谷一在住房、工资、医疗费、出国等问题上给韦唯以种种刁难，并在公共场所宣告韦唯得了艾滋病。文章经全国多家报纸转载后，造成很大影响。李谷一认为该报道严重失实，使其人格形象受到极大伤害，并于去年8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欲对簿公堂"。事情发生后，双方经过接触，未能达成谅解。今年1月24日，李谷一委托丈夫肖卓能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法院接诉状后，召集双方当事人继续调解，亦未能达成谅解。

法院审判结果认为，汤生午发表在1991年1月16日《声屏周报》上的电话采访文章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人格，原告诉讼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报道所使用的一些语言加重了对原告的侵权程度，《声屏周报》应负主要责任，汤生午应负一定责任。

法院判决如下：

责令《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李谷一名誉的侵害；《声屏周报》和汤生午要在《声屏周报》一版刊载文章，向李谷一赔礼道歉；由《声屏周报》和汤生午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00元，《声屏周报》支付2000元，汤生午本人支付500元；赔偿原告精神抚慰费500元，《声屏周报》支付400元，汤生午本人支付100元。

材料二　一场令人瞩目的名人官司

事出有因

1991年元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在头版刊登了由该报记者汤生午撰写的消息。标题是《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消息中写道：

“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10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大陆的某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很明显，早在70年代就以《打铜锣》、《补锅》走俏大江南北的李谷一就是这篇报道潜在的主人公。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内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和摘登。这使李谷一大为光火，她认为这篇报道严重失实，并伴有侮辱性语言，从而造成了恶劣影响，侵害了她的名誉权。使她的人格和名誉以及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她将向法院起诉《声屏周报》及文章作者汤生午。1991年10月15日，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平生首写了起诉状。状告南阳《声屏周报》记者汤生午及法人代表王根礼。这份“起诉状”的最后，李谷一提出了她的诉讼要求：①立即停止被告对我的名誉侵害；②被告在报刊上公开向我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③被告赔偿由其行为造成我方的经济损失费1.8万元，被告付给我精神损耗抚慰金3000元。李谷一在起诉中列举被告的侵权事实包括：①被告对事实的捏造和杜撰；②被告对事实的歪曲和篡改；③被告使用的侮辱性语言。今年元月26日，李谷一委托其丈夫肖卓能、律师巩沙向被告所在地法院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巩沙认为：韦唯是证人身份，如果调查下来韦唯作的是伪证，也有追加为被告的可能。韦唯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对《声屏周报》电话采访中所说的事实是有根据的。如果这场纷争引起诉讼，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南阳晚报》6月4日发出一则消息，文中说“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通知其参加诉讼。”作为本案关键人物的韦唯由证人追加为被告。于是一场名人官司拉开战局。

开庭之前

6月底，关于歌唱家李谷一诉《声屏周报》社汤生午一案于7月8日开庭的消息见诸各大报端。7月初，各地记者纷纷抵达南阳。

7月6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张春安说，法院虽然于前一天贴出了将于7月8日开庭的公告，但是法院正在郑州主持有关当事人参加的调解，如果达成协议，就不再开庭。7月7日凌晨3时，消息灵通的记者报告最新消息——调解失败。但有关部门决定天亮以后继续调解。下午4时，我们又获得消息，请记者们5点钟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下午5时，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新建的第三审判庭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该院新闻发布人张春安用最简要的语言在1分42秒时间里宣读了事先拟好的稿子。他说，本院6月3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通知韦唯作为追加被告出庭，现因依据不足，原决定不妥，于7月7日撤消韦唯的共同被告的决定。同时由于本案出现新的变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延期开庭，具体开庭日期另行公告。张春安说罢，随即宣布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在场的近百名记者，不少人站起来提问，一时秩序大乱，张春安神色自若，未作任何解释，快步走出会场。

许多记者对本案出现的戏剧性变化百思不得其解。有的追逐着当事人进行采访。在梅溪宾馆，汤生午向记者讲述了两天的调解过程。参加调解的除了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和当事人李谷一、汤生午和《声屏周报》社主编王根礼外，还有南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和广播电视局局长。大家见面后，所有人员分成两组分别进行调解。法院同志轮流对汤生午做工作，他们异口同声说，汤生午的那些报道全部失实，需要公开向李谷一赔礼道歉，并赔偿她的经济损失。在场的南阳地委宣传部长和广播电视局局长同意法院的说法，而汤生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时宣传部副部长郑重地对汤生午说：“如果你现在接受条件，今后对你工作上的使用还可以考虑，你个人的经济损失可以由报社承担，否则……”法院同志在场听后，未作任何表态，汤生午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他考虑了一会说出了自己的意见：①那篇报道基本属实；②文中一些细节地方确实给李谷一造成了一定影响，愿意就这一部分公开道歉；③如果李谷一同意撤诉，可以承担她的合理费用。法院同志说，你的条件没有一点让步，对方根本无法接受。如果你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就按时开庭吧！

在我们下榻的南阳国际饭店，几个记者议论起这场官司，有人说，这其实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民事官司，正因为是名人的官司，才惹得这么轰动。上海来的一位年轻记者说就象里弄里两个老太太因闲话吵架一样，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也会变得普普通通。

8日下午，我们和兄弟报社的几位记者在梅溪宾馆的一个房间闲侃，突然接到电话，说法院给当事人送传票和通知书来了。在场的律师窦柏林住处，记者见到了墨迹未干的通知书。上面写着：我院受理李谷一诉汤生午、《声屏周报》侵害名誉权一案，现决定于1992年7月10日上午8时，在本院开庭审理。窦律师透露说，在收到开庭通知书之前，法院曾向他们征询关于开庭日期的意见。律师们提出可否在9日，法院认为准备时间过于仓促，遂定于10日上午8时。他还告诉记者，由于韦唯改为证人身份，汤生午聘请韦唯律师李大进同他一起，共同作为汤的辩护律师。

7月9日上午，李谷一在爱人肖卓能陪同下与部分记者见了面。李谷一始终认为汤文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才来打这场官司。如果像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需要起诉打官司的。谈及韦唯，李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她相信通过法庭调查，会搞清楚的。韦唯是她培养的学生，她对

学生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目的是想让他们成才。韦唯为什么要说的那么恶，她感到困惑。肖卓能补充说，作为一个乐团的领导，李谷一有她的难处和苦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她。通过这个事件，双方都要总结教训，今后还要继续工作、生活和奋斗。他还说，李谷一表示过这么一个态度：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经过两天的曲曲折折，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这起涉及李谷一、韦唯两位名星的官司，终于开庭审理了。

法庭内外

10 日早上 7 时 30 分，我们赶到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充满好奇心的宛城市民已挤满了法院门口。这时，一辆淡黄色伏尔加轿车悄然驶入法院，停在审判庭门前，一位身着白底蓝花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走下车。一顶遮阳帽和一幅墨镜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一位记者突然发现她就是在开庭前两天始终未露面的韦唯。她在两位妇女的搀扶下走进法庭。整个上午我们再未见到她的身影。7 时 50 分，李谷一身穿蓝色连衣裙，从一辆被人簇拥着的奥迪小轿车上下来。在法警的保护下和她的丈夫肖卓能冲过围观的人群。在照相机镁光灯的闪烁下快步进入法庭。紧接着，系着黑领带，戴着眼镜的汤生午和《声屏周报》社主编王根礼也乘车到达法庭。

8 时 30 分，审判长宣布开庭。原告代理人巩沙和被告汤生午、王根礼分别宣读了起诉状。紧接着法庭开展调查，分别向原告和被告就文章中提到的爱滋病、住房、工资、出国、医疗费报销等问题进行了询问。原告声称文章内容全部失实。而被告却仍然认为报道内容基本属实，只存在某些失误之处和个别欠妥的言词。

下午 3 时，又继续开庭，证人韦唯出庭作证。当韦唯从侧门进入法庭时，场内哗然。人们不顾法庭纪律，纷纷站起观看。记者也在混乱中抢拍照片。现在 28 岁的韦唯用她那低沉的女中音回答了法官的提问。她说 1990 年汤生午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了采访。她就自己的工作、生活以及自己当时的心境等问题接受了采访。当法官问她提供的内容是否真实时，她说她提供的全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文章中提到的在一次“演出”中而她讲自己是在乐团的一次“排练”中而不是“演出”中她和李谷一确实进行了她是否有爱滋病的对话，当时在场的有 30 多人，都是乐团成员。这时法官宣读了当时在场人员的几个证词。韦唯出庭作证使旁听者变得异常活跃，旁听者先后两次鼓掌。双方代理人都提出了与本案有关的问题，5 时 42 分，法庭宣布休庭。

11 日上午，法庭又宣读了中央电视台编辑祖菊红和南阳电视台袁慧的证词。9 时 40 分，双方辩护人开展法庭辩论。李谷一的律师巩沙胸有成竹，他曾被刘晓庆聘为律师打赢官司名噪四方，而汤生午的律师李大进思维敏捷，也因在周旋遗产纠纷案中打赢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官司而蜚声九州，他和号称中原第一律师的窦伯林同为汤的辩护人，还有原被告所聘的另几位律师也是律师界的强手。齐鼓相当的阵容开始了一场唇枪舌战。

在辩论中，巩沙对汤生午报道失实的论据取证的充分和论述观点的严密具有准确、犀利和击中要害的能力。而李大进以坚决的语势要求法庭制止原告代理人对被告代理人水平的评价，要求原告律师围绕本案争论焦点进行辩论，充分显示了律师的敏捷和反驳能力，每一轮论战，观众都不顾法庭纪律，出现掌声和骚动。

辩论一直进行到下午 5 时 30 分。汤、王的慷慨陈词反激起了李谷一把官司打到底的决心。当被告同意法庭主持下的调解时，李谷一口气坚持地说：“据被告的态度，不再同意调解。”

判决之后

7 月 12 日上午，审判长宣读了判决词。

坐在原告席上李谷一听着听着，泪水无声地潸然落下，继而伏案而哭，泣不成声。以致法庭录相、拍照时，她的律师巩沙用折扇遮挡。闭庭好一会儿，李谷一才强忍泪水，匆匆坐进那辆奥迪小车离去。法庭外面，仍然是人山人海。有人为《声屏周报》社败诉而不以为然，有人为李谷一胜诉感到欣慰，总之议论不一。

下午一时，李谷一举行了记者见面会。会上，她再一次失声痛哭。她说有人说我们是‘大原告’，人家是‘小被告’，我是厅局级干部，有权势，有后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何需跑到人家的地方来打官司？我们早就盼望调解，但并没人这么办，个中曲折，溢于言表。她哭得泣不成声。她的丈夫肖卓能说：我们不止一次请求文化部调查解决，可是……但这事总算有了结果，这是我们一年多来孤军奋战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李谷一接着说：“事情并未结束，在整个过程中，只是划了个逗号，而不是句号。这场官司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但并未能给我带来喜悦，带来的是沉重感。这里不谈官司，是谈人际关系。我所以沉重，是感到通过这场官司未能使我们感情加深，而是相反。友谊打破了，就没法恢复，就象人死了不能复活一样。”

李谷一说着，又是一阵哽咽。最后她说：“我希望在座的记者朋友们今后做做团结的工作，再不要增强新的矛盾和痛苦。也请求你们在以后报道别人的情况时，多作一些调查、落实。韦唯说她想用更多的精力唱好歌，但愿她如此，她也会这样的。”

李谷一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呼唤，颇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正像韦唯在我们新乡演出时说的话，“李谷一是我的师长，是我的益友，我希望我们中间永远存在友爱。”但愿这两位著名歌星和好如初。

（张秀湘）

中共十四大

背景介绍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人，从而为中国在此后几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此后，我国的改革迈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步。

材料：

- 中共十四大在京举行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 邓小平与十四大
- 外电评述十四大闭幕
- 坚持伟大理论，夺取更大胜利——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

材料一　中共十四大在京举行

肩负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2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江泽民同志在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邓小平同志今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上下团结一致，到处热气腾腾，进一步展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党的十四大在这里召开，更加受到海内外关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大会寄予厚望。

党的十四大应到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当天上午，到会的2000位代表带着5100万党员和11亿人民的嘱托，满怀信心，聚会在人民大会堂。这些各地区、各部门、各民族、各条战线党的领导骨干和优秀分子，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在大会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田纪云、李铁映、李锡铭、杨汝岱、吴学谦、秦基伟、丁关根、邹家华、朱镕基、薄一波、宋任穷、刘华清、杨白冰、温家宝、彭冲、方毅、洪学智、陈作霖。

上午九时，李鹏同志宣布大会开幕。军乐团高奏国际歌。随后，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为不久前逝世的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默哀。

江泽民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向大会作报告，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这个报告分四部分：一、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二、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江泽民的报告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等决议后，于10月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强调指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江泽民同志主持了大会。

会议首先通过了由34人组成的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在大会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的2007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189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0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319人，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人。

大会依次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对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大会赞成报告对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同意报告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策和部署，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阐述的对外政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

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大会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午6时,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国际歌》乐曲声中闭幕。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1992年10月18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江泽民同志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对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大会赞成报告对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定和实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这一理论和路线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大会认为,报告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郑重的结论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策和部署。全面完成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必将有力地推动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大会指出,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力争国民经济在讲求效益的前提下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和可能的。大会认为,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大会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阐述的对外政策。大会指出,要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大会指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1992年10月18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自通过之日起,经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行生效。

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坚决执行党章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材料四　邓小平与十四大

为期一周的中共十四大,在举世瞩目中拉开帷幕,又在举世瞩目中胜利闭幕。

海内外舆论一致认为,十四大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而铸造并亲手竖立这一丰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功不可没。十四大,无疑是邓小平推动14年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伟大实践的又一精彩力作。

南巡壮举,为十四大定下"加快步伐"的改革主旋律。

在1992年的中国新闻报道中,"南巡"恐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提及十四大,人们不能不提及邓小平和他的年初"南巡"。

10月11日下午,十四大新闻发言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忠德在京举行首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中

外记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邓小平会否出席十四大？邓小平对这次大会有什么影响？刘忠德说：邓小平同志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他今年年初南巡的重要谈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邓小平同志"对开好这次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次日的十四大开幕式上江泽民在万众瞩目中所作的报告中，更是对小平南巡作出高度评价，江泽民指出："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报告透露：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一系列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策，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三月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南巡谈话要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加速经济发展，大胆解放思想，破除"姓社姓资"束缚，扫除一切"左"的障碍，使我国经济迅速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深圳和珠海，在上海和武汉，邓小平南巡期间发出"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的号召，反复强调的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我国改革开放步伐。"三个一点"的改革真言很快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振奋精神、掀起第二次改革开放新浪潮的巨大推动力，从而为党的十四大"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主旋律定下基调。

1月19日，邓小平乘坐的"改革列车"驶抵深圳，使创办8年之久、经受种种风雨的深圳人民大受鼓舞。视察深圳的5天期间，邓小平前后三次向深圳及广东省委领导人提出要把握当前机遇，"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对深圳市长朱良玉说"有条件上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1月22日，他与广东和深圳市领导会面时又说："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希望广东能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1月23日上午，就在他即将离开深圳到珠海视察时，在码头上，他还回过头来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叮嘱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历时35天、行程6000多公里的南巡，邓小平正确分析了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又一次为改革开放航船拨正了航向。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中，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主义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把国内经济建设搞好。及时提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正确主张，争取"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5月20日，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邓小平更加关注"速度"问题。他在听取首钢搞活企业的汇报之后，对首钢和北京市委负责人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不能一样。因为起点不同，原来的水准不一样，综合力量不一样。"对于今年初制定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的指标，小平从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出发，分析说："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6%，满足6%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艰难了"。尖锐地指出："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6%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

邓小平在首钢的这一重要谈话内容，引起了中南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根据邓小平这一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报告对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作出重要修改。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说："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8%到9%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这不仅仅是个速度改变的问题，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重大决策上，邓小平又一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高举"实事求是"大旗，走自己的路，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付出心血，功载十四大史册。

党的十四大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确立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一样，十四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10月12日，江泽民在十四大开幕式报告上对邓小平同志这一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在中国，最早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是邓小平。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致词中首次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十二大以来的10年间，邓小平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丰富与完善，逐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战略步骤等九个方面内容构成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中，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大

胆探索，作出了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答。

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宣布了放弃那套高度集中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有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随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又有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概念的提出；十三大，邓小平集中全党智慧，确认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观点，认识又有深化。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与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年初南巡时，小平同志继续发挥这一思想，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与目标。视察首钢时，邓小平进而要求抓住“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换脑筋”，更新观念，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转换。终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写进十四大正式文件。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百年大计，“关键在人”。坚持“四化”标准选贤任能，为十四大顺利实现新老交替铺平道路。

十四大的人事变动及中央新领导班子的选拔，举世瞩目，事关重大。

邓小平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提出了选贤任能的用人指导方针。南巡期间，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百年不变”，邓小平历来强调必须坚持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框框，大胆起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在改革开放中“有政绩”的人，对他们要“委以重任”，以干部组织路线的建设来确保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执行。

按照小平同志这一思路，十四大上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189名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在56.3岁，大专以上文化占80%，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49岁，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知识化方面大大迈出了一步。

与此同时，按照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建议，为顺利实现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顾委”，各地“省顾委”、“市顾委”等机构也相应不再设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展示了新阵容，十四大中央领导层中，地方党政干部进入政治局比例明显增加。谢非、姜春云、胡锦涛等广东、山东、西藏地区的党政一把手进入了政治局，香港报纸评论：这是“十四大高层人事布局的一大特色。显示邓小平任人唯才、拓宽用才管道的做法”。法新社说：“这个新阵容表明向实现邓小平的领导集体年轻化、保证权力平稳过渡给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宿愿迈进了一步。”日本共同社认为：“中共新的政治局具有非常浓厚的改革色彩。”

作为十四大的46位“特邀代表”之一，邓小平未有出席大会的开闭幕式，但他始终关注着十四大。据透露，十四大报告第四稿出来时，邓小平就花了两个半天时间来仔细审阅，又用了两个半天时间对报告提出重要修改意见，从总体上对报告稿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份量，是一大革命”。他还特地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开幕那天，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又一次认真听了江泽民同志宣读的报告，报告结束时，小平满意地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完就在电视机前鼓了掌。在十四大召开的7天时间里，邓小平每天翻阅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9日上午，当他看到十四大胜利闭幕、选出中央新的领导班子的消息时，无限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当天下午3时，他特意赶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新当选的中央领导班子成员一起绕场一周，跟出席十四大的近2000名代表见面，满意地对大家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短短的20分钟会见，使十四大代表情绪达到高潮，全国人民深受鼓舞。

历史将永远铭记邓小平的伟大贡献！

（林双川）

材料五　外电评述十四大闭幕

【美联社北京10月18日电】中国共产党今天通过一个新的较年轻的中央委员会。

为期一周的代表大会结束时通过一项加速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计划的决议。决议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开放和现代化计划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正如预料的那样，代表大会取消了另一个高级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预料这一行动对党的政治事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代表大会结束时，2000多名代表起立唱国际歌。

【美联社北京10月18日电】中国共产党今天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平均比以前年轻，有更多的委员是担任省级党内职务的。

该党希望在控制该党达10多年之久的邓和其他老革命家去世后确保该党的顺利过渡。

中央委员中超过1/3的人下台为较为年轻的人让路，包括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人大委员长万里。

这次持续一个星期的大会肯定了邓的务实的政策。邓认为该党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它保持中国经济和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的能力。

【合众国际社北京10月18日电】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今天闭幕，中共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委员被换掉了，旨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

被中共在这次大会上称为中国面向市场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没有在闭幕会议上露面，尽管他作为特邀代表受到了邀请。在闭幕这天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以前原定的175人增加到189人。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最后会议结束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巩固了高级领导人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进行的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但排除了向西方式的民主迈进的可能性。

在最后会议上，代表们在4次不同的表决中一致举手赞成，通过江泽民的报告，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批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和修改党章。

表决由江泽民主持，他4次宣布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路透社北京10月18日电】香港一家由北京控制的报纸报道说，从中产生高级领导人的中央委员会的扩大是引进新的年轻人物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些人物将领导国家进入下一个世纪。

材料六　坚持伟大理论，夺取更大胜利

——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充满改革开放精神和求实奋进气氛的大会，大会经过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增添新的光辉篇章。

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今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精辟的阐述，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党组织应当认真组织学习，结合各地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坚决贯彻执行。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都统一到报告的精神上来，将使我们党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将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的步伐。

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做过，本本上也没有说过，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是同邓小平同志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最合乎国情、顺乎民意，最能够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我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4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坚定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今后，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理论和这条路线。当然，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90年代，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宏伟、十分艰巨。党的十四大所提出的十大任务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仍然是经济建设。我们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要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9%，使人民生活在本世纪末由温饱进入小康，使国民经济总体素质与

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要指出的是，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精辟论断，根据14年来的实践经验，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必将推动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促进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建设迅速发展。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十项主要任务，要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90年代的主要任务胜利完成，必将使我国的面貌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十四大提出的历史性任务的根本保证。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大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新人被选进党中央，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生动体现。我们的党中央进一步实现了新老交替与合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大有希望、大有前途。为了更好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首先是要组织全党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要全党同志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们就将无往而不胜。

90年代，对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既有挑战，更是机遇。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推动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要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勇敢地开拓，奋发进取，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风云人物

叶乔波

叶乔波（1964—　）中国著名冰雪运动员，在92年16届冬奥会上获两枚银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她还多次在各种国际比赛中夺魁。92年12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体育标兵”称号。

材料　叶乔波——实现零的突破

当国人在爆竹声中欢度猴年新春之际，从法国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季奥运会上又传来喜讯：中国姑娘叶乔波连续夺得500米和1000米两个项目的亚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冬奥会赛场升起，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载入冬奥会获奖史册。

为了这时刻，叶乔波在银白色的跑道上奋斗了15个春秋。10岁那年，长春市少体校招生，怀着好奇心应试的小叶，未等起步就一头栽进跑道边的雪堆，抹抹眼泪，她又向前冲去。场外的教练崔顺子记住了这倔强女孩的名字。经过崔顺子手把手的培育，叶乔波和晶莹的冰结下了不解之缘。

12岁，入选八一速滑队。从此，她把脚下的冰刀和祖国的荣誉联在一起，瞄准世界纪录，开始了艰难的超越。

为有强健的体魄，叶乔波长年坚持高强度训练，曾创下日滑4万米的个人训练最高纪录。在教练肖汉章和科研小组配合下，取世界强手之长，结合自身条件进行专项训练，她又掌握了炉火纯青的蹬冰和弯道技术。10年前训练受伤。“胸椎错位并发腰背肌筋胫膜炎”，医生认定练下去有瘫痪的危险。叶乔波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终以惊人的毅力走出了运动生命的“死亡之谷”。1988年一次大赛前，误服含违禁药品的感冒药，她又被国际冰联处罚停赛15个月。面对沉重的打击，没有消沉。她卧薪尝胆加倍苦练，以成功证明：中国人不是靠药物达到世界水平的。

叶乔波飞起来了。1979年开始，她在国内外的重大比赛中先后赢得50多枚金牌。1990年第7届全国冬运会上，她一人独得4枚金牌，去年世界锦标赛，她为中国摘取了第一枚500米女子速滑金牌。世界杯系列赛中，她又两度获此项目冠军。一连串的胜利震动世界冰坛，人们看到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潜力。

这届冬奥会，叶乔波以0.02秒的极微弱的差距，落在美国名将后面，痛失夺冠的机会，她流下了眼泪。

28岁了，还想一搏。两年后，她希望在下届冬奥会把

银牌换成金牌。

叶乔波，就是这么个不断超越自我的人。

（李晴杨）

赵　玉　芬

赵玉芬（1949—　）女，我国著名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原是台湾留美学者，1980年回国。

材料　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她，新年伊始，加入了中科院学部委员行列。在这个代表中国科技队伍最高水平和声誉的集体中，刚满43岁的她，是最年轻的"小字辈"。

赵玉芬，原是台湾留美学者。还在台湾彰化女一中就学时，一位讲课很有趣的女老师，把她领进了神奇的化学王国。

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后，仅用3年半，她又拿下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有机化学博士。还发现了磷化合物的像孙悟空一样瞬息变化的奇妙。

留美作博士后时，结识了杨振宁教授。从而促成了12年后，她作出毅然回大陆的选择。

"如果为生活，我会留在美国。但为事业，我应回到祖国"。她在祖国大陆，能搞自己喜欢的课题。于是，无论是在中科院化学所任副研究员，还是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授，磷的生命化学研究，始终是她为之全身心投入的追求。

"为什么大自然要选择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F·westheimer向全球有机化学界提出一个挑战课题。

"人体中不到1%的磷，是命根子。没有氨基酸就没有生命。但氨基酸本身是死的。只有把磷原子和一个个氨基酸连接起来，形成磷化合物后，氨基酸分子才活跃起来，交换各种信息，给大自然带来生命"。一个深奥的难题，被她弄得如此明白、透彻。多年的合成和研究，终于使赵玉芬揭开了这个奥秘。1988年，她提出了"磷是生命化学的调控中心"的学术思想。她第一个回答了那位美国大师的挑战。国外学者认为，赵玉芬的成就，将带来生物工程的重大突破。

这个迷恋探秘的女科学家，酷爱旅游，着装颇为讲究。其"审美眼光"很得学生推崇。虽然年轻时喜欢的网球已顾不上打了，但每天晚上15分钟的"中华养身益智功"，从不耽误。

（边吉）

康　克　清

康克清（1911—1992）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先驱，朱德的夫人。她于4月22日逝世。

材料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讣告（节选）

康克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1911年9月7日，康克清同志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少年时期，她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于1928年9月和近百名赤卫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历尽艰辛。长征途中，她与朱德同志一起同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7年后，康克清同志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克清同志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在长期的妇女工作领导岗位上，她一贯坚持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她重视妇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强调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她十分关心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1979年亲自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特别关心基层和贫困地区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妇联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强调把妇女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还为增进我国与各国妇女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曾代表我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

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康克清同志一贯重视儿童工作。她曾发起建立延安第二保育院，为战区难童和革命后代的成长呕心沥血。建国后，她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儿童健康成长。

康克清同志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她为加强人民政协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六届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康克清同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党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康克清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孜孜追求，奋进不息。她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她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关心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她在身患重病期间仍然关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进程，关心着我国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

李先念

李先念(1909—1992)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6月21日逝世。

材料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讣告(节选)

李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陂安南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国中央执行委员，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长征中，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指挥包座战斗，打开北上通道；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率部突破黄河天险，血战河西走廊，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到达新疆，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军事部长、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他在孤悬敌后的敌伪心脏地区，率部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进行了反复顽强的艰苦斗争，独立创造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原军区司令员，指挥所部进行战略坚持，牵制国民党30余万军队，接着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继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同志历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他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财贸办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在计划、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在财贸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对较快地克服和扭转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争取经济保持稳定并取得进展。特别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同志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他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在这期间，他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为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推动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他努力维护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促进祖国统一，为发展与各国人民、政府和政党的友

好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先念同志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李先念同志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 颖 超

邓颖超(1904—1992)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恩来的夫人。7月11日逝世。

材料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讣告(节选)

邓颖超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她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她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在天津组织妇女、学生联合会，并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参加和组织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二三年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参与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初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信念。在大革命时期，邓颖超同志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她发动和组织妇女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英勇奋斗，使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颖超同志先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从事秘密工作，后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邓颖超同志无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根据地和战略转移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坚贞不渝，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成员。在这期间，她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分裂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工作卓有成效。一九四七年三月，邓颖超同志奉命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一九四八年她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她提出了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为解放区的妇女和农民的翻身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邓颖超同志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颖超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她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她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她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邓颖超同志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九八八年，邓颖超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她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殷切期望伟大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珍闻轶事

奇特的食癖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1992年发现过好几例在“食”方面异乎寻常的人。

江西省寻乌县三标乡堆禾村有一对奇怪的兄妹,哥哥嗜好吞吃生肉,妹妹则常常以嚼食青草为乐趣。

年近19岁的哥哥,有着爱吃动物生肉的习惯。逢年过节,家里杀鸭宰鸡,他会一边拔毛一边撕下生肉来吃;平常做菜时,他也喜欢一边切生猪肉一边抓起来往嘴里送。有一次他上街买鲜鱼,回家路上不停地撕下鲜鱼肉来吃,回到家,将一条鲜鱼吃个精光。

比哥哥小三岁的妹妹,身高不足1米。小姑娘自2岁开始,以青草、树枝和生蔬菜当零食。渐渐地,这种嗜好成了改不掉的习惯,她竟把青草、树枝当成了每天的主食。米饭可以少吃,但青草、树枝却不能少。到现在,这位姑娘还不会正常地说话,但她却喜欢咿咿呀呀地唱歌。

在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最近发现一位19岁的姑娘6年不吃一粒粮,基本以水果为食物维持生命。6年前,她刚进中学时头上生了疥疮,好不容易将疥疮治好后,便渐渐地不想吃饭,后来拒绝吃任何饭菜。长期以来,她不知饥饱,一天可以吃几公斤水果。她的父母及邻居介绍说,她虽然不吃饭菜,但却能烧得可口饭菜,现在家人的一日三餐基本由她一手操劳。

流行风

背景介绍

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文坛上,商业文化兴起,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风行。电影方面,张艺谋雄风再展,《秋菊打官司》引人注目;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则是王朔的新奉献,取材生活,令人捧腹。申办奥运是当年的大主题之一,歌曲、口号满天飞。服饰上,文化衫席卷夏装市场,开始流行。

电影《秋菊打官司》

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小山村。向来老实的村民庆来为了在承包地里盖辣子楼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争执,被村长踢伤下身。村长认为自己是按文件精神为公家办事,不肯承认打人有错。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为了讨个公道,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了漫长的告状路途。

秋菊从乡里告到县上,又从县上告到市里,市中级法院很重视这一案例,派人来给庆来查伤,秋菊满怀希望……

转眼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情况危急,村长不计前嫌,组织村民连夜踏雪赶几十里山路抬秋菊去医院。清晨,秋菊顺利地产下一男婴,全家对村长感激万分。秋菊也认为与村长的官司就此了结了。正当大家欢天喜地地为孩子过满月时,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村长因伤害罪被判拘留,秋菊冲出满月酒席追赶警车,警车呼啸而去。只留下秋菊面对群山茫然失落……

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的故事》是一部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以《人间指南》编辑部为主要场景,由六位年龄不等、性格各异却都善解人意,热心助人的编辑贯穿全剧始终,故事独立成章,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使人捧腹引人深省的大型系列室内剧,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继《渴望》播出后摄制的一部室内轻喜剧。

●“飞来的星星”——一则关于地球大劫难的谣言使众编辑在飞来的横祸面前表现出对人生留恋的不同心态。使人捧腹的同时深刻生动地揭露了谣言对人民生活的侵害。

●“谁主沉浮”——刊物因内容乏味面临停刊,老主编欲引咎辞职,众编辑都欲担此重任,纷纷亮出自己认为可以一方兴邦的良策,但又都失于偏颇。新主编人选悬而未决,老主编从谏如流使本来山穷水尽的刊物,柳暗花明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上下集)。

●“人工智能人”——一位仪态万方自称是高精尖办公自动化科技新产品的小姐走进编辑部，为提高办公效率编辑部决定留下试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诸多疑点。众编辑挖空心思，寻找人的什么东西是机器人所不具备的，由此引出以人为镜可以正己的深刻教义。

●“寻子记”——一则为台湾老兵寻找失散亲人的启示引来一群哭爹喊娘的“孤儿”，编辑部一时成了失物招领所。几经周折去伪存真，终于使归土老兵一家团聚。该片辛辣地嘲讽了社会上一批见利忘义的小人。同时又用生动的例子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其旧部的欺骗。

●“歌星双双”——一位能歌善舞被独具慧眼的编辑在“艺海拾贝”栏目中捧红的少女竟然是个哑巴，优美的歌声原来出自一个下身残疾的丑姑娘。究其内幕方知，是一对遭受命运无情捉弄又自强不息的姐妹在一热心人的关怀和帮助下演出的一幕双簧。一篇“歌星双双”的采访打动了千万读者。（上下集）

●“小保姆”——一则为小保姆遭雇主歧视鸣不平的报道引来了一位自称有着辛酸遭遇的小保姆妹子。热心的编辑们以过堂的方式在闻讯赶来的众多雇主中百般筛选为其选了个好人家，可结果是怎样的呢？看来，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在尊重对方人格的基础上和睦相处。

●“娶个什么好”——某小伙找对象千挑万选，众编辑当红娘费尽心机。当最符合其要求的女士对他说：“我会待你好，像亲生的一样”时，小伙子终于明白了自己应该找的是对象，而不是个妈。（上下集）

●“谁是谁非”——感情纠纷历来清官难断，调解不好反而乱中添乱。几位编辑都在鼎力相助，合好夫妻不领这份好心。（上下集）

●“法律面前”——编辑部被骗后无意中侵犯了他人的名誉。对方诉诸法律。编辑们使出浑身解术，无奈法律无情并非儿戏，结果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上下集）

●“我不是个坏女孩”——编辑部为读者设立的热线电话中发现了一个陷入对有妇之夫的老师单相思而不能自拔，欲自杀解脱的初恋少女。为拯救她的生命，编辑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终于使她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而一位编辑通过给她“感情转移”却暗暗地爱上了她，不能自拔，只得强迫自己也“感情转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纯真的感情与人生价值的关系。（上下集）

●“胖子的苦恼”——编辑部调来一位食堂大师傅，原因是太胖而容易被人认为是多吃多占。他爱食堂工作，为太胖苦恼，编辑部为此想尽办法让他减肥却不见成效，最终发现胖与瘦是各人生理条件所决定的，胖瘦本身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美丑。告诉人们不必让世俗的观点束缚自己，应该走自己的路。

●“吃不消”——两个编辑部为争夺一篇反映大吃大喝的报告文学《中国大宴席》而引起明争暗斗，为达到目的，双方都用请客吃饭来拉拢作者，作者想瞒着双方，一稿两投，最后终遭双方遗弃，讽刺借工作大搞吃喝风的不良现象，也揭露了心口不一，从吃喝中渔利的伪君子。（上下集）

●“一见钟情”——一位编辑的父母产生了感情危机，一个怀念旧时一见钟情而今早已离世的女友，一个在公园练功发现了相见恨晚的意中人，老人的矛盾使儿女们大惑不解，而另一位编辑与一位来访的现代诗人一见钟情，为此抛开一切，随他而走，诗人却又在临走时在车上与另一位一见钟情，双双自杀身亡。反映了一见钟情在感情上的巨大作用与不稳定性，得不到可能终生遗憾，得到了，又可能悔恨终生。

●“修改后发表”——一位小说作者送来一部有潜力的作品，由于听取编辑部各方面、各种人的衷恳意见，修改后成了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失去了自己的特点，最后长篇小说发表时变成了一分钟小说，讽刺了社会上婆婆多的现象。

真可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东南西北万象难收，正如《编》剧主题歌所唱到的：

一间平平常常的屋\几个忙忙碌碌的人\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几颗实实在在的心\有意人间指南\无奈人各东西\有意替人分忧\无奈心事难移\说不出是苦是甜\分不清是我是你\生活是辆不停的车大家就得往上挤\生活是条漫长的路手携手我们走下去。

（阮军）

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周励著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畅销是92年中国文学图书市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本书一出版，大幅彩色广告就悬在全国各地的书摊上，成为街谈巷议的热货，连印数版印数达四十万册，畅销不衰。

这部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即作者)在纽约这个纸醉金迷的都市里，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经历。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问世，掀起了以它为首的“留学生文学”的高潮，以至一时间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在…》的仿效式的小说。

歌曲《奥林匹克风》

1.（女）五大洲的梦，三大洋的情，奥林匹克风，跨世纪的风；（男）奥林匹克风，全世界吹送，吹到哪里都欢腾，

哪里都欢腾;(合)黄河长江的浪,昆仑黄山的松,万里长城,是条中国龙。是条中国龙。北京邀请你,奥林匹克风,吹到这里会亲朋,这里会亲朋。

2.(女)奥林匹斯山,奥林匹亚城,奥林匹克风,涌动人类的梦;(男)奥林匹克风,吹受送友情,吹到哪里就繁荣,哪里就繁荣,(合)长白山上的雪,珠穆朗玛峰,神州苍穹,无处不飞虹。无处不飞虹。北京邀请你,奥林匹克风,吹到北京唱和平,北京唱和平。来吧来吧来吧,奥林匹克风,来吧来吧,来吧,奥林匹克风。

1992年申办奥运口号

主题口号: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宣传口号:

中国的机遇　北京的荣誉;亿万颗心暖人间;

和平进步迎接新世纪;

历史名城　时代盛会;

北京欢迎你。

炙手可热的"文化衫"

"这世界变化快"。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总是异常新鲜。

有人把青年文化概括为穿牛仔裤、跳霹雳舞、戴earphone、听通俗歌曲、唱卡拉OK。今天,又得加上一个玩文化衫。

时下,名牌热退潮,文化衫大盛。近10年来,没有哪一种服装能够具有如此的魅力,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那种圆领、短袖、肥大、宽松的东西,一旦印上点什么,竟如此神奇。从"烦着呢,别理我"到"崔健摇滚",从"拉家带口"到"酸甜苦辣",从"真搓火"(真窝囊)到"不会来事",从"一事无成"到"所向无敌"。有文字,有画像,有歌谱,有图案,人们随心所欲,展示着各自的心态。"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一种寻找毛泽东的企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第三代人一种冷静回味,"千万别爱我,没钱"则是对社会不良习气及婚姻消费过高的不满。真是雅俗共赏,应有尽有。至于那种印有京剧脸谱的文化衫我觉得倒极有特色。

文化衫越印种类越多,天津有一家印字社一直想找个好题目印一批。有位诗人出了个题目,前面印"有气",后面印"没钱"。这比"没劲"和"真累"刺激多了。像"我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等,使得文化衫表现的内容泛滥,我怀疑有一天王朔的小说的标题"我是你爸爸"也会印在文化衫上。目前,有些青年已开始自制文化衫了,而且手绘文化衫也很风行,不少画家热衷于此道。

不是所有的文化衫非得印一些"找乐"的文字,假如我们印上"炎黄子孙"、"秦皇汉武"、"梁山好汉"也颇有气势。至于印上"雷锋"、"焦裕禄"或"为人民服务"、"执法如山"也当然在理。

纵观市面上流行的文化衫,从形式上可分为:广告文化衫、画像文化衫和文字文化衫。从内容上可分为:幽默型文化衫、戏谑型文化衫和纯情型文化衫。穿广告衫的流露出一种"无意识",穿画像衫的表现出明星崇拜,而文字衫则五花八门,突出地体现了幽默与戏谑。对文化衫总的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有意味文化衫,一是无意味文化衫。无意味文化衫多为广告衫,有意味文化衫是将大家同一种行为固定下来并予以表现。比如中央电视台搞的"风雨同舟",就是将抗洪救灾这一行为用文化衫给予高扬。

如今生活中能引起青年人共鸣的莫过于通俗歌曲了。港台青年前一段曾组织"崔健后援会",所着文化衫印有"崔健"两个大字。青年人用文化衫来表现自己对歌星的崇拜,再坦诚不过了。文化衫是通俗歌曲的综合效应,是服饰"卡拉OK",这里突出了选择的自由,谁都可以选择适于个人心态的主题,"唱自己喜欢唱的歌"。

(郭栋)

92年女春装的五大主题

●随意

不受任何模式约束,博采多种衣着之所长,依照个性特征有所发挥,形成独创风格的春装新款,上衣与裙连体,分裁后缝合一起,全装外形轮廓需最大限度地与人体曲线相吻合,上衣为西装原型加以改进,北爱尔兰领,身长至胸际,无衣袋,下摆与裙连结,前开襟,两只黑色钮扣,另外两只钮扣缀在左右胸间是为装饰。袖稍紧,袖口加反褶。小领与袖口选用黑色薄丝绒装饰为陪衬。裙长齐膝,裙无褶,下摆稍微收紧,两侧呈弧形,内穿弹力锦纶连裤袜,衣料为纯毛或涤毛混纺薄花呢,色调以淡米、驼灰、橄榄绿为宜,配圆顶平沿小帽,风度翩翩。

●古典

剪裁合体,造型丰满,有着东方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西方人古典的装束格调。仅是一件稍长的筒形长外衣,长度遮臀,线条简洁明快,前开襟,单排五只钮扣,小直筒围领,款式一般,带有怀旧韵味,外系一条丝质大花艳丽的方围巾,有重彩之妙。下配短裙,长度在膝以上,全套服装色彩可选蓝灰色或宝石蓝色,衣料为纯毛薄呢绒制做,柔

软、细腻，给人以和谐，韵美，端庄之感，点染着阳春之妩媚佳色，映衬出人的内涵文静气质。

●休闲

随心所欲，天然成趣，黑白相间，魅力夺人。这是在家中或假日里的闲暇衣着，一件细羊绒毛线编织的上衣，带有古拙感的手工编织风格。小圆口领，身长至腰线以上，下口束紧袖稍紧，长度齐腕，宽紧适度，略有弹性，全黑色，无装饰，编织纹样可自选，下着普通闲暇裤，行动自如，纯棉衣料，花纹为黑底色印涂料小白点。头上配一顶圆形宽沿草帽，白顶白沿，镶黑边，仅起点缀作用。色调属于黑白系列，也可以稍加变化，如红黑、蓝白、黑黄等色调亦可，款式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衣料还可选亚麻或涤麻混纺织物制做，一以都应切宽松舒适为度。

●洒脱

清纯、自然、隽逸、典雅，构成春天里最现代化的衣着款型，温暖而不沉重，简洁而不单调。一件加长的女外衣，原型来自于西装上衣、北爱尔兰领、开襟以右压左重合，开领到腰线以上，四只方型金色钮扣分做双排，内系一条深蓝绿色调的丝绸方围巾，下着一稍宽松的西服裙，长至膝上10公分，稍长于外衣，细绒线手套，衣料选用纯毛或毛晴混纺，轻柔、保暖、质感强，全套服装为酒红色的流行色，也可用天蓝、橄榄绿、草黄、草绿色调。

●浪漫

一件西服坎肩做为内衣，无衣袋，稍紧，与一件西服筒裙相匹配，裙束腰带，坎肩与裙均为灰绿色调，略带有隐约细小白点，给人以雾蒙蒙之感，柔软、合身，可用纯羊毛呢绒薄材料制做。外着一件深棕褐色短呢外套，身长却在内衣以上，有层叠之感，别有情趣，大开领，紧袖、前开襟、无袖、整套衣着裹身，以显示人之温情与丰满，腿部可着弹力锦伦连裤袜，以使下身保暖。

（晨星）

历史档案

第25届奥运会中国健儿奖牌榜

金　牌

游泳	女子100米自由泳	庄　泳
	女子100米蝶泳	钱　红
	女子200米个混合泳	林　莉
	女子50米自由泳	杨文意
射击	双向飞碟	张　山(女)
	男子气手枪	王义夫
跳水	女子跳台跳水	伏明霞
	女子跳板跳水	高　敏
	男子跳台跳水	孙淑伟
乒乓球	女子单打	邓亚萍
	女子双打	邓亚萍 乔　红
	男子双打	王　涛 吕　林
体操	女子高低杠	陆　莉
	男子自由体操	李小双
田径	女子10公里竞走	陈跃玲
柔道	女子72公斤以上级	庄晓岩

银　牌

游泳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林　莉
	女子200米蛙泳	林　莉

	女子 200 米蝶泳	王晓红
	女子 50 米自由泳	庄　泳
	女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	庄　泳
		杨文意
		乐靖宜
		吕　彬
射击	男子自选手枪	王义夫
	女子运动手枪	李对红
举重	52 公斤级	林启升
	56 公斤级	刘寿斌
跳水	男子跳板跳水	谭良德
体操	女子平衡木	陆　莉
	男子吊环	李　敬
	男子双杠	李　敬
	男子团体	李　敬
		李小双
		国林耀
		李大双
		李　舸
乒乓球	女子双打	陈子荷
		高　军
	女子单打	乔　红
羽毛球	女子双打	关渭贞
		农群华
帆船	女子 390 型	张小冬
击剑	女子花剑个人	王会凤
田径	女子铅球	黄志红
射箭	女子团体	王　红
		王小竹
		马湘君
篮球	女子篮球	中国女篮
		柳　青　李冬梅
		郑海霞　丛学娣
		郑秀琳　郑冬梅
		王　芳　李　昕
		展淑萍　何　军
		彭　萍　刘　军

铜　　牌

举重	56 公斤级	罗建明
	60 公斤级	何英强
摔跤	古典式 57 公斤级	盛泽田
柔道	女子 61 公斤级	张　迪
	女子 52 公斤级	李忠云
赛艇	女子双人双桨	顾晓黎　路华利
体操	男子吊环	李小双
	男子双杠	国林耀

羽毛球	女子单打	唐九红
	女子单打	黄　华
	男子双打	李永波　田秉毅
	女子双打	姚　芬　林燕芬
乒乓球	男子单打	马文革
跳水	男子跳台跳水	熊　倪
田径	女子10公里竞走	李春秀
	女子1500米	曲云霞

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单

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近日在京揭晓，31名青年演员获奖。

获得梅花奖的戏曲演员18位。他们是：王玉珍（云南省滇剧剧院）、邓沐玮（天津京剧团）、田蔓莎（四川省戏曲学校）、邢美珠（黑龙江省京剧团）、刘赵黔（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杜玉梅（山西大同市晋剧团）、李惟铨（中国评剧院）、吴国华（山西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一团）、邱玲（武汉市汉剧研究所实验剧团）、宋丽（沉阳评剧院）、张虹（江苏省江苏梆子剧团）、张爱珍（山西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二团）、陈瑜（上海沪剧院）、陈巧茹（成都市川剧院）、陈淑敏（洛阳市豫剧二团）、黄小午（江苏省昆剧院）、黄新德（安徽省黄梅对剧院）、崔连润（天津评剧院）。

9位话剧演员获得这次梅花奖：宁才（内蒙古自治区话剧团）、李琦（陕西人民艺术剧）、杨树田（大庆话剧团）、吴珊珊（成都话剧院）、宋丹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钟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夏君（大连话剧团）、翟万臣（总政话剧团）、濮存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另有3位歌剧演员和1位滑稽戏演员获奖。他们是：金曼（空政歌舞团）、顾欣（江苏省歌舞剧院）、唐德君（大连歌舞团）、顾芗（苏州市滑稽剧团）。

第十二届电视剧飞天奖与第十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名单

第12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73个优秀剧目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和提名荣誉奖；荣获单项奖及其提名荣誉的个人有30个。

在引人注目的长篇连续剧中，《中国神火》、《外来妹》双领风骚，并列榜首。《编辑部的故事》、《上海一家人》、《北洋水师》荣获二等奖。16集电视剧《孔子》被评为特别奖。

《南行记》在中篇连续剧评选中夺冠，《赵尚志》、《山不转水转》、《女人们》荣获二等奖。

参评短篇电视剧的作品的竞争力很强，《硝烟散后》名列第一，《好人燕居谦》、《朱自清》荣获二等奖。

戏曲连续剧相对来说质量不够理想，没能评出一等奖。获得二等奖的有《桃花扇》、《曹雪芹》。《侯门之女》、《柯老二入党》分别荣获戏曲短篇剧一、二等奖。

《棒棒真棒》拍得很有孩子特点，荣获少儿连续剧一等奖。《还有一支春天的歌》荣获该项二等奖。

少儿短篇剧一等奖被《墨海新蕾》夺得，荣获二等奖的有《夏天我九岁》、《我有一片辽阔的蓝天》。

《舐犊情深》、《逃离索比堡》、《失踪之谜》荣获优秀译制片奖。在单项奖评选中，《中国神火》荣获优秀编剧奖，《南行记》、《赵尚志》荣获优秀导演奖。优秀男女主角奖的桂冠分别被《赵尚志》中赵尚志的扮演者高强，《编辑部的故事》中戈玲的扮演者吕丽萍摘取。

由全国电视观众直接投票选举的第十届大众电视金鹰奖9月22日在杭州揭晓。7部电视剧和4位演员获奖。

获优秀电视连续剧奖的是：《上海一家人》（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编辑部的故事》（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外来妹》（广州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神火》（浙江省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获优秀电视单剧奖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中央电视台、岳阳电视台等），《少年毛泽东》（河北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获优秀儿童电视剧奖，《桃花扇》（玉溪卷烟厂、安徽电视台）获优秀电视戏曲片奖。最佳男主角由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李冬宝的葛优获得。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是李羚，她在《上海一家人》中饰若男。谢园和吴冕则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谢园在《上海一家人》中饰阿祥，吴冕在《上海一家人》中饰桂花。

参加本届“金鹰奖”的候选剧目共有86部、 54集。男女主角、配角有60人参加竞争。

第十二届电影金鸡奖和第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名单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28日在京揭晓。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决战》荣获“金鸡”、“百花”双项“最佳故事片奖”。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周恩来》在本届百花奖3部最佳故事片中名列榜首。北京电影制片公司的《过年》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夺得“金鸡”、“百花”双重“最佳男主角奖”。

《大决战》除荣获“金鸡”、“百花”双奖最佳故事片奖外,还囊括了本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和“最佳烟火”5个单项奖。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林彪的扮演者马绍信、傅作义的扮演者李定保、蒋介石的扮演者赵恒多获金鸡奖“表演特别提名”。《周恩来》还荣获金鸡奖“特别奖”和“最佳化妆奖”。上海电影制片厂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实的《开天辟地》荣获金鸡奖“特别奖”和“最佳编剧奖”。

《过年》中母亲的扮演者赵丽蓉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王梅的扮演者丁嘉丽获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心香》的导演孙周获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烛光里的微笑》获本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影片主人公王双玲的扮演者宋晓英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故事片《烈火金钢》中刁世贯的扮演者葛优、《青春无悔》中前妻的扮演者吕丽萍分获百花奖最佳男、女配角奖。

本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我们走过的日子》夺得。“最佳科教片”由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的《低温核供热堆》和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的《企鹅大帝》并列。

邓颖超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7月11日,邓颖超逝世。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她的这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一种真正的革命者的高风亮节。这种风格,必将留芳百世。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 遗体解剖后火化。

2.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 不搞遗体告别。

4. 不开追悼会。

5.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年7月1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年6月17日重写

中共十四大产生的党的领导人员名单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关根　田纪云　朱镕基　乔　石　刘华清
江泽民　李　鹏　李岚清　李铁映　李瑞环
杨白冰　吴邦国　邹家华　陈希同　胡锦涛
姜春云　钱其琛　尉健行　谢　非　谭绍文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温家宝　王汉斌

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江泽民　李　鹏　乔　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　胡锦涛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锦涛　丁关根　尉健行　温家宝　任建新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

主席:江泽民

副主席:刘华清　张　震

委员:迟浩田　张万年　于永波　傅全有

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尉健行

副书记:侯宗宾　陈作霖　曹庆泽　王德瑛
徐　青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光　王德瑛　刘丽英　安启元　李至伦
何　勇　陈作霖　侯宗宾　徐　青　曹庆泽

尉健行　彭　钢　傅　杰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江泽民十四大报告（摘要）

一、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

——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回顾十四年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起来说，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是：这十四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 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二、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

——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

——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趋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

第一，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

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

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

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 、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

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

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悲惨历史，人权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不断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我国的宪法从根本方面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中

国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赞成国际间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对话。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第一，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第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第三，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灭腐败现象。

第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0日　中国十大杰出民警选出，陈善珉、刘平、拉吉、周云彪、鞠俊瑞、汤敏增、邓泽顺、王立军、梁春芳、陈新民当选。

1月12日　国务院就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发出通知，为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提出十一条措施。

1月14～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江泽民在开幕会上作题为《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报告。

1月24日　国务院举行第96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草案）》和《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1月31日　国务院举行第97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储蓄管理条例（草案）》。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统一着装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全国统一着装管理工作的领导，王丙乾担任主任。

2月20～25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3月20日在京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通过批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决定、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通过了任免事项，万里在闭幕会上就加强法律监督问题发表了讲话。

2月21～25日　全国宗教局长会议在京举行。

2月28日　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99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决定（草案）》。

3月4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议决定撤销李振华的山西省省长职务，李振华对去年9月24日在太原市迎泽公园“煤海之光”灯展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最近，国务院决定对李振华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3月5～9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并发表公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有关文件，并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布，进一步征求意见。

3月8日　新华社播发《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执行《纲要》。

3月9～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江泽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3月12日　高严当选为吉林省省长。

3月14～16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的决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

3月18～28日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京举行。

3月20日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开幕。

4月3日　自3月20日开始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闭幕。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杨尚昆主席令，分别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均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4月24日　国务院召开第102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的决定（草案）》。

4月30日　邓鸿勋补选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5月1日　新华社报道："五一"前夕，陈云在上海听取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鼓励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希望上海同志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善于总结，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振兴上海、开发浦东。

5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等九部门最近发出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助残日"活动的通知。

5月14日　聂荣臻逝世。

5月19日　香港民主建港联盟筹委会正式宣布筹组政治团体。筹委会成员共18人。

6月5日　国务院召开第一○五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6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决定撤销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并在其原来的基础上成立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朱镕基兼任办公室主任。

6月16日　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今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月21日　李先念逝世。

6月30日　国务院召开第10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7月1日　从上月23日开幕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日闭会。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通过了关于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7月8～10日　第二届海峡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7月11日　邓颖超逝世。

7月16日　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8月3日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在京病亡。

8月5日　国务院召开第110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草案）》。

8月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鲍彤泄露国家重要机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鲍彤的上诉，维持一审作出的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的判决。

8月11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发表《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

8月22日　胡富国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

9月4日　从上月28日开始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京闭幕。会议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通过关于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严正声明。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台湾省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会议决定免去王丙乾兼任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刘仲藜为财政部部长；免去李森茂的铁道部部长职务，任命韩杼滨为铁道部部长，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

全国政协常委会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严正声明。

9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建议的十四大于10月12日在京召开。

9月22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发表《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

9月26日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通过有关大陆民众赴台和公务员赴大陆探亲等规定的修正案，对两岸民众探亲、探病和奔丧等规定进一步放宽。

9月28日　胡乔木逝世。

10月5～9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九中全会在京举行并发表公报，全会决定10月12日在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十四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提请十四大审议，全会同意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并结束审查。

10月12～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0月19日 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一中全会在京举行。

10月23日 中宣部发出《关于学习、宣传党的十四大文件的安排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学好、宣传好十四大文件。

11月6日 国务院举行第11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富余人员安置规定（草案）》、《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草案）》。

11月7日 国家主席杨尚昆发布第64号和65号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分别自1993年7月1日和1993年5月1日起施行。

11月19日 厉有为当选为深圳市市长。

11月29日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抗议法国政府允许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

12月1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近日决定，陈奎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2月8日 国务院举行第117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船舰犯罪的补充规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草案）》。

12月17日 陈希同当选为北京市委书记。

12月17～21日 共青团十二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

1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近日决定，李长春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今日任命马忠臣为河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12月20日 吴邦国当选为上海市委书记。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王兆国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经 济

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已消灭森林赤字，全国森林资源年总生长量为3.66亿立方米，年消耗量为3.27亿立方米。

1月8日 首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厦门开幕。

1月10日 为期5天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闭幕。李鹏在闭幕会上指出，今年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国营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市场的经济实体。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工商税收去年共完成2334亿元，超过国家计划29亿元。

1月21～25日 杨尚昆考察深圳时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要更放宽些，更大胆些。

2月1日 杨尚昆自上月26日至今考察珠海市和中山市；1—14日，考察上海市。考察时，杨尚昆强调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迈开新步伐的基础上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

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发出公告说，去年清理“三角债”实现了预期目标，今年要把清欠和限产压库、扭亏增盈工作结合起来。

2月8日 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提供的消息说，至去年12月31日全国共接受境内外救灾捐赠25亿多元，有效地解决了灾区人民生活困难。

2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已有154个海、陆、空一类口岸对外开放，比1978年增加两倍。

2月28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公报表明1991年我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2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13.4%，全国森林面积达19.3亿亩，活立木总蓄积量达108.68亿立方米。

3月8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从1992年5月1日起施行。

3月9日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这个我国目前开放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投入运营。

3月9～13日 第3次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3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今年4月1日起全部取消进口调节税，同时调整一般摄像机和小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

3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决定今年4月1日起适当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城镇居民将给予适当补贴。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决定》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

3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实施。

4月1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出通知，转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关于一九九二年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的请示》,要求各地、各部门遵照执行。

4月4日　以阿沛·阿旺晋美为理事长的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在京成立。

4月17日　宝钢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4月27日　我国第一套年产20万吨合成氨国产化装置在四川化工总厂建成,通过国家验收。

5月8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由中国人民银行自1992年6月1日起发行1元、5角、1角3种金属人民币。

5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条1.55微米无中继光缆通信系统——南京至芜湖110公里光缆通信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5月18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5月21日　上海股价全部放开。

5月23日　我国经营规模最大、销售额最高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宣布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5月28日　第一家国家级金属交易所在沪开业。

6月3日　新华社报道:"1991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评价"结果揭晓。大庆石油管理局位居榜首。

6月15日　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等5部门联合颁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同日,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

6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6月24～27日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规划座谈会在京召开。江泽民、李鹏在会上就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南巡谈话及党中央关于"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决策发表了重要讲话。

7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财政部日前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

7月12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劳动部、国家体改委日前公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暂行规定》。

7月15日　西藏自治区边境口岸普兰正式对印度开放。

7月23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基本完成,两年来国家共注入510亿元资金,共解开企业债务链2000多亿元。

8月20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今日起发行1990年版50元、100元人民币。

8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停止批发环节代扣营业税的请示》,决定9月1日起停止执行批发扣税办法。

9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决定,从现在起开展"打假特别行动",给生产销售假冒产品者曝光。

9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将组建"华夏"、"国泰"、"南方"3个全国性证券公司,总部分设在北京、上海和深圳。

10月6日　首届农业博览会在京开幕。

10月8日　首家全国性证券评估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京成立。

10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通知。

10月23日　国家商检局发布实施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11月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今冬明春水利基本建设的通知》。

11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商业部等最近发布《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11月20日　商业部负责人指出,巨奖销售不应再升温,从1990年起,我国一些地方掀起了巨奖销售热。

11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钢产量达7101万吨,提前38天完成今年7100万吨的计划。

12月2日　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购买美国CTE空间网络公司在轨通信卫星签字仪式在京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向国外购买在轨通信卫星。

12月3日　新华社报道: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最近颁布《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

12月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1992年12月31日起降低3000多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1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原煤产量突破11亿吨,发电量超过7000亿千瓦时。

12月22日　首钢开办华夏银行。这是我国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开办的商业银行。

军　事

1月16日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宣布39个市(区)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荣誉称号。

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

三总部最近发布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勤务暂行条令》颁发全军施行。

3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日前发布命令，授予北京卫戍区仪仗大队"军旅标兵"荣誉称号。

4月16、17、20日　参加联合国维持柬埔寨和平行动的中国工程兵军事工程大队共400人分别抵达金边和磅逊港。派遣部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在我国历史上是第1次。

5月19～24日　全国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在烟台召开。会议要求各地按照军委确定的质量建设方针，使基层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

6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最近批准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公文处理条例》，7月1日起全军施行。

8月17～19日　由联合国裁军事务署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组织的联合国裁军和安全问题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钱其琛外长在会上作了基调讲话。

9月12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104号令，发布《人民警察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后勤管理条例》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发部队执行。

11月9～27日　中国和哈萨克、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联合代表团就中国与哈、吉、俄、塔4国边界地区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问题在北京举行了第8轮谈判。

外　交

1月3日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建交。

1月4日　中国和乌克兰建交。

1月5日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交。

1月6日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建交。

1月7～14日　杨尚昆主席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月10～16日　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谈判团在华盛顿举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

1月24日　中国和以色列两国政府自今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月30日　中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建交。

2月1～3日　李鹏总理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

2月6日　李鹏总理自1月26日至今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

2月15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荷兰政府2月14日重申信守1984年中荷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不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和零部件。中国方面赞赏荷兰政府的这一决定。

2月2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大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在西藏问题上对我国进行指责一事发表评论说，大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在西藏问题上对我国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西藏问题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发言人还说，中国对朝鲜北南和解协议书和无核化宣言生效表示高兴和欢迎。外交部发言人还谈到，中国欢迎欧共体里斯本外长会议有关中国的决定，中国重视同欧共体的关系。

3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美国总统布什3月2日否决了美国国会有条件延长1992年至1993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议案，"我们欢迎和赞赏布什总统的决定"。

3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8届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对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西藏局势"决议草案不予表决一事发表谈话指出，这项决议草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理所当然遭到大多数国家反对。

3月11日　外交部在北京公布中国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加入书。

3月1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辟谣说，《华盛顿时报》"中国向以色列购买导弹或技术"的报道是"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

4月2日　中国与阿塞拜疆建交。

4月6日　中国与亚美尼亚建交。

4月6～10日　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这是江泽民就任总书记以来首次访问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4月14～17日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问我国，并出席4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48届会议的开幕式。这是加利自199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我国。

4月27日　中国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

5月7～11日　蒙古总理宾巴苏伦访问我国，这是30年来蒙古总理首次访华。

5月8～11日　玻利维亚总统萨莫拉访问我国。

5月12日　中国同斯洛文尼亚建交。

5月12～16日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访问我国。

5月13日　中国同克罗地亚建交。

5月18～24日　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访问我国，这是印度总统对我国的首次访问。

5月26～31日　贝宁共和国总统索格洛访问我国。

6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美国总统

布什 6 月 2 日向国会建议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赞赏布什总统作出这一现实而明智的决定。

6 月 8 日　国家教委发言人对美国参议院最近通过“1992 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一事发表谈话说：我们认为，这项法案试图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阻挠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严重违反中美之间的协议，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6 月 9 日　中国与格鲁吉亚建交。

7 月 9 日　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首次会议自 6 月 29 日至今在莫斯科举行并签署《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条例》。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理代表候志通在日内瓦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博士正式递交了加入《伯尔尼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加入书。

7 月 25 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批准向台湾出租军舰发表评论时说，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一切向台湾出租武器的活动。

7 月 30 日　因尼日尔与台湾“建交”，我国宣布中止与其外交关系。

8 月 23～25 日　韩国外长李相玉访问我国。两国决定建交。

8 月 24～26 日　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8 月 24～30 日　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访问我国。

8 月 25～31 日　基里巴斯总统蒂安纳吉访问我国。

9 月 3 日　新华社报道：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近日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一事奉命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9 月 6～10 日　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访问我国。

9 月 9～12 日　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我国。

9 月 12～14 日　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第 2 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就有关中俄国界东段勘界问题交换意见并签署有关勘界文件。

9 月 27～30 日　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我国。他是中韩建交后来华访问的第一位韩国总统。

10 月 4～10 日　南非非国大主席曼德拉访问我国。

10 月 8 日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总督彭定康 10 月 7 日在港英立法局宣读的施政报告中的“宪制方案”内容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方认为港督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中方对此深感忧虑。

10 月 12 日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访问我国。

10 月 23～28 日　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访问我国。

11 月 5～10 日　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吉尔访问我国。

11 月 10 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应港督彭定康之邀在香港会晤彭定康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港督施政报告所持的严正立场。

11 月 13～17 日　智利总统艾尔文访问我国。

11 月 19～23 日　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访问我国，这是他首次访华。

11 月 26 日　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召见法国驻中国大使马腾，就法国与台湾签署出售幻影战斗机合同向法方提出强烈抗议。

12 月 4 日　李鹏总理自 11 月 30 日至今访问越南。这是自已故总理周恩来 1971 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越。

12 月 15 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中国已决定购买航空母舰并将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沙领土争端的报道纯系别有用心的捏造。

12 月 17～19 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访问我国。

12 月 23 日　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奉命要求法国限期关闭驻广州总领事馆。他说：“法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坚持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干涉中国内政，干扰和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是中国决不能容忍的。”

12 月 24～30 日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访问我国。

12 月 28 日　外交部部长助理戴秉国在北京约见捷克和斯洛伐克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邓纳时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承认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与两国分别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文化教育

1 月 3 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审查批准，210 名科技专家当选中科院新学部委员。至此，中科院学部委员已有 515 人。

1 月 9 日　首届茅以升科技教育奖颁奖。

1 月 11 日　宋平视察中国农业科学院，强调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

1 月 14 日　中国社会发展科学研究会成立。

1 月 15～18 日　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年工作重点是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繁荣新闻出版事业和加强新闻出版队伍建设。

1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的专利申请去年首次突破 5 万件，累计申请总量已超过 21 万件。

2月3日　新华社报道：影片《大决战》第三部《平津战役》近日试映。

2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经过30多年努力，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航天试验通信网初步建成。

2月18日　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隆重开幕。

2月21日　团中央和全国青联授予北京大学教授陈章良、山东莱州市玉米研究所所长李登海、辽宁本溪市半导体器件厂工程师关广生"全国青年科技先锋"称号。

2月29日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在京成立，叶选平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3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党中央、国务院日前批准全军400多名有突出贡献的高级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3月10～14日　全国科技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当前要抓好的10项工作，确定90年代科技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问题。

3月22日　因一级发动机推力不正常，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的卫星未能升空。

3月27日　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运用法律武器打击非法出版犯罪分子。

4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正式下达《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4月9日　我国参加第2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30项发明，荣获28块金牌。

4月11日　第3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山东临沂市召开。

4月17日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丝绸之路工作委员会在京成立。

4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最大的受控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实验，使这一装置的物理实验水平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5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0年至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近日揭晓。《无极之路》等8部长篇和25部中短篇作品获奖。

5月5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由国家文物局发布施行。

5月10日　在第83届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我国展团获2项金奖、1项国际发明奖，1项银奖、4项铜奖和1项法国邮电部专项奖。

5月20日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在京联合举行颁奖大会，表彰过去一年里取得优异成绩的宣传文化单位和文艺工作者。

5月28日　中国期刊协会在京成立。

6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国家科委组织的第一届通信高技术专家领导小组在京成立。

6月12日　在意大利从事科研的我国青年学者吴军荣获国际烧伤"威廉斯奖"。

7月2日　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逝世。

7月7日　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自8月1日起施行。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等单位首创使用水力驱动控制棒技术，完成核反应截功率调节，使我国核反应控制技术取得新的突破。

7月22日　北京召开"攀登计划实施大会"。由国家设立的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攀登计划"全面启动。

8月5日　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首次发现新核素铂—202。

8月10～13日　全国首届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产业部门、高校和科研所首期将开发转移5万项新产品技术。

8月14日　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火箭成功地把美制澳大利亚"澳塞特B1"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8月23日　为期6天的中国首届电影节在长春开幕。

9月6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最近制定了《关于分流人才、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9月10日　首届中国丝路节在兰州开幕。'92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

9月12日　故事片《秋菊打官司》在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金狮奖。影片女主角巩俐获最佳女演员奖。

9月2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自9月30日起施行。

10月6日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第14颗返回式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和瑞典的"弗利亚"科学试验卫星。

10月8日　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

10月7～16日　'92国际发明展览会在京举行。

10月26日　北京卫星通信测控站和基准站正式开通。

10月27日　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成立。

11月1～7日　首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桂林举行。

11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出关于支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的通知。

11月18日　李琦教授创作的邓小平肖像画——《我们的总设计师》在全国发行。

11月23日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成立。

12月5日　第2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开幕。

12月12日　我国影片《留守女士》获第16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

12月21日　我国“长征二号E”捆绑式火箭再次成功地将第2颗澳大利亚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1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最近决定将我国的武陵源、九寨沟、黄龙3个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社会生活

1月1日　“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

1月25日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召开第21次会议，原则通过《国家环境保护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

2月11日　《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国质量万里行”新闻宣传报道活动开始举行。

2月12日　国务院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月23日　为期16天的第16届冬季奥运会在法国阿尔贝维尔闭幕。我国女运动员叶乔波获两枚银牌，李琰获一枚银牌。这是我国首次在国际冬奥会获得奖牌。

3月1日　中国选手叶乔波在奥斯陆举行的1992年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上获女子全能冠军。

3月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今年起暂停实行夏时制。

3月9日　1991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揭晓，谢军等10名选手当选。

3月18～23日　第3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广州举行。

3月30日　中国女篮获第14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冠军。

4月21日　由46名中外著名专家组成的高级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京成立。

4月30日　我国国际象棋女选手谢军被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评选为1991年世界最佳运动员。

5月15日　中国女子羽毛球队以3:2战胜南朝鲜队，实现“尤伯杯”赛“五连冠”。中国男队在日前半决赛中以2:3输给了马来西亚队，失去了争夺“汤姆斯杯”的机会。

5月20日　国务院召开第105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城市市容与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和《城市绿化条例(草案)》。

5月28日　国家环保局发布《199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表明，去年全国环境状况相对比较稳定。

6月15日　参加第25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伍绍祖任团长，共有运动员251人。

6月18日　河南郑州市财税专科学校发生约700名师生砷中毒事件。

6月22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城市绿化条例》，自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6月24日　施拉普纳受聘为中国足球队教练。

7月8日　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成立“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袁伟民任主任。

7月12日　我国大陆首例赠卵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诞生。

7月31日　中国通用航空公司由南京飞往厦门的2755号航班在起飞滑跑途中失事，机上116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共有100人死亡。

8月9日　为期16天的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圆满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15个比赛项目中夺得54枚奖牌，其中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第4位。中国台北运动员获得银牌1枚。

8月22日　中宣部等部门在北京举行奥运健儿报告会。连日来，北京等地举行了各种活动，为我国奥运健儿庆功，并重奖了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9月5～12日　大陆18名记者首次正式组团赴台湾采访。大陆记者在台北、高雄、台中等地采访了33个机构和个人，其中采访了张学良、陈立夫、李焕等。

9月23日　卫生部负责人说，到9月中旬止，我国累计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932人，其中艾滋病病人11例，9例已死亡。

10月4日　为期9天的第4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武汉闭幕。

10月5日　今天是“世界住房日”，主题是“持续发展住房”。建设部发出《关于开展1992年“世界住房日”活动的通知》。

10月14日　我国第2座大陆桥——北疆铁路正式开通。它东起乌鲁木齐，西至阿拉山口，全长460公里。

10月30日　中日联合登山队11名队员成功地登上了人类从未征服过的最高山峰——南迦巴瓦峰。

11月5日　一架“米—17”直升飞机在河南省原阳县城抛撒宣传品，作超低空飞行时撞到黄河大厦楼顶，飞机坠落在人群中爆炸起火，当时造成30余人死亡。

11月8日　第4届中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在北京开幕。

11月24日　南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型班机由广州飞桂林，在广西阳朔县粉碎性解体，机上133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李鹏委托罗干赴现场处理善后事宜。

12月1日　今天是“世界预防艾滋病日”。至上月底，我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感染数已达969例。

12月17日　1992年度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评出，沪、京、粤、津4城市列前4名。

12月18日　第5届中日围棋名人战举行，马晓春战胜了日方的小林光一，实现了零的突破。

12月21日　大同至秦皇岛铁路全线开通。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3年

导　言

一九九三年，诸事纷繁，高潮迭起。

先是香港问题，它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凡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位最后的总督的花样。

接着是“银河号”事件使华夏子孙义愤填膺，美国之霸权行径亦是昭然若揭。结果当然是美帝阴谋难逞，而我们赢得了诸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劫机事件”。从4月到11月竟连续有8次劫机事件发生，使众多旅客，人人自危。个中原因自有评说。

与之相比“马家军”在田坛刮起中国旋风更是令人惊呼不已。斯图加特、七运赛场、西班牙，哪里有中长跑，哪里就有她们在奋力向前奔跑，自然是硕果累累。

当然最令人揪心的当属“申奥”。从捐款搞建筑，到签名支持，从山野小民到中央领导，从金秋北京到蒙特卡洛，亿万中国人，亿万华夏子孙自始至终都在以极大的热情等待着奥运之梦也圆一回。然而，我们失败了。仅是两票之差。但我们走向世界的脚步是谁也阻挡不了。

我们终将走向世界、走向灿烂的胜利。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汪辜会谈"
- ●反腐败浪潮再起
- ●香港政改风波
- ●"马家军"刮起田坛上的中国旋风
- ●禹作敏事件
- ●"银河号"事件
- ●华夏万众　心系奥运
- ●劫机频频　国人义愤
-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汪辜会谈"

背景介绍

1993年4月底的大陆台湾两个民间组织的这次接触，揭开了两岸关系史的新的一页。这是从80年代末期以来两岸关系持续性改善的继续，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式，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材料：

- 海峡两岸的首次对话
- "汪辜会谈"终得举行，"唐邱磋商"功莫大焉
- 两岸关系史翻开新的一页

材料一　海峡两岸的首次对话

——"汪辜会谈"的由来及意义

4月27日至29日，历经8个月筹备、被舆论界称为"两岸首次对话"的"汪辜会谈"终于如期在新加坡举行，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汪辜会谈"的两主角——汪道涵与辜振甫狮城握手致意的镜头，可谓举世瞩目。人们注意到两主角敏感的身份背景：汪道涵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原中顾委委员、上海市长、市委书记；辜振甫则是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工商界巨头、国民党中常委。

1992年1月至8月，出任海协会长的汪道涵曾两度函邀台湾海基会辜董事长，希望就两岸经济发展和两会会务交换意见，洽谈方案，通过两会的接触与商谈，推动两岸关系的交流与发展。8月12日，辜先生正式回函受邀，这便是"汪辜会谈"的由来。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好评如潮，一致认为两岸民间机构领导人的首次晤谈，这是两岸跨出正式会谈的第一步。随即，双方展开一系列会谈准备，函电、人员往来颇为频繁，新闻界也越炒越热。

尽管双方这次会谈敲定地点在新加坡，且定调为"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功能性"，不涉及政治层面问题。但会谈本身的进程，仍然引发两岸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为"汪辜会谈"作预备性磋商的两次"唐邱磋商"的成功，更是先声夺人，备受两岸瞩目。

被认为是李登辉最为倚重的幕僚之一的邱进益，曾任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发言人，在转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之际，4月7日即率团到京访问，与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磋商"汪辜会谈"事宜，经过4天会商，第一次"唐邱磋商"取得圆满成功，在钓鱼台宾馆敲定了"汪辜会谈"的"三大议题"，双方达成8点共识，并草签了关于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等两项协议。台湾报刊认为，邱氏北京之行"相当难得"、"为两岸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互动模式。"4月23日至25日，唐、邱又在新加坡见面，举行第二次磋商，为"汪辜会谈"作最后准备，达成就两会经常性联系和会谈制度起草协议草案，确定了"汪辜会谈"后将发表的共同文件的基本内容。

半年多来，围绕"汪辜会谈"，两岸作出了积极努力，"汪辜会谈"实际上成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台湾，"汪辜会谈"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政坛人士纷纷发表谈话，予以充分肯定。刚卸下"行政院长"职务的"总统府资政"郝柏村认为，"汪辜会谈"对两岸有极重要意义，两岸对未来对谈应先从务实性入手；3月19日，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台北首次就"汪辜会谈"发表谈话，对会谈表示"至表乐观"，认为"两岸总是要谈的，没有接触不行，辜汪会谈是个基础，为两岸接触发展跨出重要的一步。"

尽管台湾民进党对"汪辜会谈"发出一些杂音，在被拒绝"参与会谈"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杯葛"行动，搞所谓"组团观察"、赴新加坡"监督"等活动，部分台独分子甚至

不惜攻击辜振甫先生为"台奸"、"出卖台湾"，叫嚷应"立刻中止辜汪会谈"，但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毕竟破坏不了这一会谈的进程。

汪辜新加坡会谈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一、确立了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使两岸交流有了正常化、制度化联系渠道。会谈确定，两会秘书长以上人员每半年在大陆、台湾轮流会谈一次，必要时经商定也可在第三地举行；两会会长、董事长见面时间、地点由双方商定；副秘书长、处长、主任级人员每季度轮流在大陆、台湾会谈一次。二、两会领导人达成新的共识：由于两岸经济的互补性，有必要加强经济交流；两岸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和更好地保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和正当权益。三、确立加强两岸科教文新闻交流原则。海协会建议加强两岸新闻界交流，邀请两岸主要报刊社长、总编辑互访、资深记者和评论员作专门项目互访，缩短大陆记者申请访台时间等。同时，两次决定联合成立经济科技小组和综合事务小组，指定专人联系，处理两岸有关紧急事务问题。

汪道涵就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直接"三通"、两会共同筹开民间的经济交流会议（制度）、台湾在大陆投资和大陆经贸界人士访台、两岸劳务合作、合湾参与开发浦东、三峡、图们江、合作开发能源、资源、两岸合作开发台湾海峡和东海无争议地区的石油资源等8个问题进行论述。

辜振甫也就两会联系合作、共同打击海上走私、犯罪以及两岸经济合作、青少年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谈了看法，他表示愿意与海协会商讨筹备召开民间经济交流会议的可行性，也准备与海协会讨论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与能源问题。在充分研商讨论的基础上，4月29日，两会负责人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证、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发表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汪辜会谈"在良好的气氛中划上圆满的句号。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汪辜会谈"的成果不仅仅是签定两岸交流中的几个具体协议和达成的一些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为两岸进一步对话铺平了道路。就连台湾当局主持大陆事务的人士也承认，汪辜会谈"虽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小步，却是双方良性互动的一大步。"

"汪辜会谈"，无疑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林双川）

材料二 "汪辜会谈"终得举行，"唐邱磋商"功莫大焉

今年4月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事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正式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和《两会联系与会谈事宜协议》。汪道涵认为，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中重要的一步；辜振甫称"是历史性的一步"。

1992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函邀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秘书长率团来访；8月4日，汪道涵会长又向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就"两岸经贸合作与两会会务问题交换意见，洽商方案"。8月22日，辜振甫回函，接受这一邀请。但此事延宕许久，一拖再拖。

现在，当汪辜会谈终得举行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记此前在北京举行的预备性磋商。

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邀请，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一行20人，4月7日下午4时20分抵达北京。邱进益在首都机场接受两岸记者采访时说："海峡两岸四十多年的分隔，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如何消除彼此疏离、隔阂，改善两岸关系，确实是一项艰苦的工程。这一工程，需要全体中国人以耐心、爱心与智慧来共同努力。"

邱进益先生是江苏省嵊泗列岛人，1949年至台湾，当时才14岁。他服务公职期间几乎都在外交系统工作。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也是外交官出身，而且可以说与邱进益同乡，这使他们增加了不少共同语言。

为期3天的"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经过双方认真、坦诚的讨论，10日达成了八项共识，取得预期成果。

10日下午，唐树备举行新闻发布会。邱进益同时在下榻处向记者吹风。

在新闻发布会上，唐树备宣布了这次预备性磋商达成的八项共识：

——"汪辜会谈"的性质，双方均认为是民间性的、经济性的、事务性的、功能性的会谈。

——正式会晤时间为今年4月27日至28日，必要时得延长一天。

——地点，新加坡。

——参加会晤的人员除汪道涵、辜振甫外，随行人员双方均不超过10人，海协为唐树备、邹哲开等，海基会为邱进益等。

——唐树备与邱进益于4月23日到新加坡进行会商，为"汪辜会谈"创造条件。

——正式会晤的议题，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两会会务：一是双方同意商谈建立两会联系与合作的制度，并签署协议。对相互给予出入境便利问题，将进一步磋商。二是确定今年两会事务性商谈的议题，包括：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之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有关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问题；协

商两岸海上渔事纠纷的处理。

第二部分，两岸经济交流：一，为了促进两岸经济交流，海协愿意协助有关部门积极促进台商投资正当权益的保障，海基会愿就台商在大陆投资及大陆经贸人士访台，协调有关机关予以积极促进。二，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共同筹设民间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会议制度。三，双方同意就共同开发能源资源问题进行讨论；海协建议向台湾地区提供劳务，海基会允诺将转送主管机关考虑。

第三部分，科技文教交流：两岸青少年交流；科技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

—— 正式签署《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 以适当方式共同宣布"汪辜会谈"的成果。

也许比这些具体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次预备性磋商，气氛融洽，进展顺利，双方都感到满意。

邱进益向记者表示，能有今天的共识，双方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指出，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下一阶段我们要努力使"辜汪会晤"在新加坡成功举行。这次预告性磋商的成功对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合作会有进一步的促进，同时，可以预期，"汪辜会谈"之后两会及两岸的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唐树备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汪辜会谈"是两个授权的民间团体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的实现，对加强两会的联系合作、加强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唐树备说，"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主要是尊重辜振甫先生本人的意见。唐树备希望今后此类会谈能更多地在大陆或台湾举行。

10日下午，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在北京草签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共九条，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相互寄送涉及继承、收养、婚姻、出生、死亡、委托、学历、定居、扶养亲属及财产权利证明公证书副本，以便使用者核对。双方同意对公证书形式或实质内容有疑问的，相互协助查证。关于寄送公证书副本及查证事宜，由中国公证员协会或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证员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相互联系。关于公证书以外的其它文书查证事宜，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进行个案协商并予协助。

《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共12条，主要内容包括：两岸相互开办挂号函件业务的范围，如信函、明信片、邮简、印刷物、新闻纸、杂志及盲人文件等。挂号函件发生遗失、被窃或毁损等情形后，查询的联系方式，由中国通信学会邮政专业委员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或其指定的邮件处理中心联系。赔偿方式是各自理赔，由原寄一方邮政负责补偿，不相互结算。

11日上午，海协会长汪道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一行，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交换了意见。

汪道函认为，这次预备性磋商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意愿。他希望与辜振甫先生的会谈能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后，今次来到北京，邱进益愈加感到改善两岸关系的迫切。他认为，双方只有多了解，互相信任，两岸关系才会有良性的互动。他说，海基会与海协会目前的沟通已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有待于加强。一旦两会间的制度化沟通管道建立后，两岸间的经济、文化、体育交流等方面的问题就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

人们期待着"汪辜会谈"之后会果真如此。

（晓燕）

材料三　两岸关系史翻开新的一页

1993年4月29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上午10时40分，新加坡海皇大厦4楼签字厅里灯火通明。

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郑重地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份文件上签字，然后，缓缓地站起身，互换文件，握手致意。

两位古稀老人睿智而深邃的目光，相互凝视着。他们知道，两岸关系的历史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良好的开端

"汪辜会谈"是因应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实现的。

4月25日，汪道涵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即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两岸同胞应更具前瞻性地去面对未来，把握住国际发展的趋势所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机遇，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共同振兴中华。"

第二天下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抵达新加坡。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记者们发现，汪、辜二人不仅赞美新加坡的话语不谋而合，而且讲话的主旨内容也何其相似乃尔。他说："纵观世界潮流，'对抗'已经为'和解'所替代，而'和解'也逐渐迈进'互利互惠'的阶段。今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扬弃'零和'的逻辑，秉持'双赢'的理念，相互扶持。"

汪、辜二人的看法，正是对当今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必然趋势的反映。假如时间倒流十年，有谁会能料到

紧张对峙的海峡两岸，会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平等协商呢？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隔绝之后，海峡两岸能打破僵局，授权两个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首次会谈，本身就是一大历史的进步，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历史性的一步

两岸具有实际意义的直接接触、协商和谈判，或可说始于1986年5月的"两航(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谈判"。此后，随着两岸各种交流的日益扩大及由此衍生问题的不断增多，两岸间围绕具体、个别的事件或问题进行的接触、商谈也愈益频繁。特别是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相继成立以来，两机构之间为处理两岸的有关问题积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就一时一地一事的随机性个案处理方式，很难适应两岸关系现实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两岸许多事务性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有鉴于此，海协倡议举行"汪辜会谈"，得到了海基会的积极响应。"汪辜会谈"的顺利实现，则为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会谈过程中，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和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签署了4项协议。其中《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的文书使用和重要函件的寄达问题；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对于有效地保障两岸民间的各种往来与交流顺畅地发展，维护两岸人民的正当权益，则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两会制度化的联系与会谈方式。此间人士认为，两会不同层级人员定期的沟通、交流与协作，近期来说，有利于有效地解决两岸的现实问题；长远来说，则是两会与两岸之间的联系走向制度化的里程碑。

正因为如此，汪、辜二人在签字仪式结束后分别举行的记者会上，不约而同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汪道涵指出，两地联系与会谈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重要阶段；而辜振甫则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有益的启示

"谈则两利"。有人从"汪辜会谈"的成果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汪辜会谈"的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成果之外，从《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可以看出，双方通过预备性磋商和两天半的正式会谈，还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多年来都在设法寻求解决的问题：双方确定今年年内将就"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等五项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双方同意就加强能源、资源的开发与交流进行磋商；双方还同意积极促进青少年互访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以及科技交流。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是40多年来两岸之间第一次写进双方协议之中的内容。汪道涵和辜振甫分别以"互利"和"双赢"来评价会谈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它向世人表明，两岸之间完全可以在政治原则、立场和目标取向差距甚大的情况下，通过坦诚、务实的接触与协商，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

不能否认，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层级商谈所取得的效果有时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起草共同协议时，双方曾就名称问题一度争执不下。但汪、辜二人一见面，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看来，层级越高，解决问题就越顺利；授权越大，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此言一点也不过分。

同时还要看到，两岸隔绝了这么多年，双方的情况有许多差别。因此，对于一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能期望一、两次商谈就能解决两岸所有的问题。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当双方在海基会提出的台湾在大陆投资的保护问题和海协提出的开放大陆工商界人士访台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双方本着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精神，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双方"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的共识写入共同协议，而对分歧的部分，双方决定以后再"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这种做法，无疑为今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商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这次会谈的重大成果之一。

共同的心愿

"汪辜会谈"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两岸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愿望。海内外媒体的200多名记者云集新加坡采访，"汪辜会谈"一时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热门话题，大家都乐见会谈成功。

与此相反，台湾民进党反对会谈的所谓"宣达团"在新加坡受到的冷遇和尴尬，则从反面说明，分裂企图不得人心。唯有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才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才会得到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欢迎。

"汪辜会谈"期间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趣闻：

为祝贺会谈成功，汪道涵会长夫妇在新加坡董宫酒楼宴请辜振甫夫妇及台湾海基会一行。这家酒楼中餐部经理为宴会设计的菜单，每一道菜都有别具心裁的"菜名"：

"情同手足、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齐集、兄弟之谊、夜语华堂、龙族一脉、前程似锦"。

这是真诚的期待，期待两岸关系更上层楼。这是美好的祝愿，祝愿中华民族拥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明天。

（李大宏、薛建华）

反腐败浪潮再起

背景介绍

“六四”风波过后不久，我国第三代领导人便毅然决定：坚决惩治腐败。此次行动气势宏大，来势猛烈，风暴所及，数十件大案列上黄榜，一些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纷纷倒台、入狱。但直到1993年，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倒有以权谋私，贪贿案件猛升、权钱交易进一步猖獗的势头。

腐败现象蔓延恣肆，毒化党风、民风，威胁共产党执政。因此反腐败是中央的要求，亦是人民的迫切愿望。于是——

1月，反腐败被确定为中纪委与国家监察部合署办公后的第一工作重点。

江泽民在“七一”座谈会上指出：对腐败现象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大业，最终也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8月，中纪委再度宣布：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务必在近期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于是，“廉政风暴”席卷大地。

材料：

- 重在落实　抓出成效
- 中国高擎反腐倡谦大旗
- 高层动向：反腐败加大力度

材料一　重在落实　抓出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要求着重抓好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办一批大案要案和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并要求在近期内取得明显成效。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明确政策界限，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指导，也制订了关于严禁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治理乱收费、党政机关与兴办经济实体脱钩等几个文件。

这表明，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措施是得力的。反腐败，绝不会“只打雷，不下雨”，不会“虎头蛇尾”。最近惩治腐败的许多事实，以及出现的许多新气象，特别是中央的三令五申和有力措施，使人民群众看到反腐败的气候正在形成，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前景。现在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任务是，贯彻文件，重在落实，务求抓出成效。

要把中央几个文件贯彻落实好，首先得解决认识问题，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犹豫、观望、敷衍，都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有的同志总是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不愿走在反腐败斗争的前头。他们担心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怕“吃亏”，怕引起干部思想波动。这是糊涂观念，是影响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障碍。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律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关系论述得很清楚。他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

中央的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意义、重点、原则，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又在一系列文件中明确了具体政策界限。关键在于落实。再好的精神、再好的文件，不落实，就是空的，就没有成效。现在，反腐倡廉的气候已在全国初步形成，具体要求和政策界限也十分明确。各级党政组织应当坚决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下大决心出阶段性成果，让人民群众增强信心。人民群众看反腐败，不仅是看发了多少文件、领导同志作了多少讲话，而主要是看落实，看成效。

反腐败斗争既是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又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既要坚决地、持久地进行下去，又要重视阶段性成果。中央发布的几个文件，对目前群众反映强烈的几个突出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只要各级领导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就一定能取信于民，一步一步地把反腐倡廉的斗争引向深入。

材料二　中国高擎反腐倡廉大旗

1993年8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庄严宣告：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再次叩响了警世洪钟。“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这震聋发聩的话语，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纵观世界各国的情况，无论是意大利执政党的倒台，还是巴西科洛尔总统的被迫辞职，日本自民党的分裂及

丧失一党执政的地位,无一不与腐败有关。可以说,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通病,也是一个难以灭绝的顽症。因此,“反腐倡廉”,又成为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必抓的工作。

中国历史上也有“倒了和坤,喜了嘉庆”的故事。以和坤为典型的腐败官僚索贿受贿,聚敛民脂民膏,把整个国库都倒腾空了。查办了一个和坤,搜出的赃款赃物比当时的国库存量还要大。查了和坤案,一时朝野震骇,嘉庆的日子好过了。

“端本澄源,源清流洁”,对贪污腐败,攻克则蓬勃向上,放任则毁灭死亡!对此,我们党历来认识清,看得重: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惩治腐败,已是十分紧迫、空前尖锐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惩治腐败,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应有之义。

“对腐败现象,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论涉及到谁,有多少罪犯就法办多少,有多少违纪就处理多少,绝不姑息!”

8月25日,中纪委发布二次全会会议公报,其措词之严厉,显示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

反腐败斗争,步骤十分明确: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几股群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

反腐败斗争,规定非常清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五不准:(1)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2)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3)不准买卖股票。(4)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5)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中央要求,要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务必在近期内取得阶段性成果;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

中纪委公布纪检机关控告申诉条例,鼓励群众揭发检举问题,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案件线索;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纠正不正之风。

党中央的决心,把惩腐肃贪的廉政风暴一步步推向高潮,从上到下,以其锐不可挡之势震慑着罪犯,激励着民心。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8月28日,高检再次公布举报电话,各地群众反映强烈,纷纷揭发检举各种腐败现象。至9月1日,5天受理举报532件,为1988年举报中心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全国大陆30个省、市、区纷纷行动。

8月26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依法宣判严惩一批经济罪犯。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郭岷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贪污、挪用公款罪犯罗玉海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与税务、检察机关通力协作:查处了阜宁益林地方工业供销公司、句容亭子五金电线厂等单位的6起重大骗税案件。

杭州:已查处24起党员违法大案。

湖南:1989年至今,全省共清理24600多名党政干部在城镇营建私房中的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问题,已责令当事人退赔占用款项3480多万元,退出公房19600多套;11万多人的各种违纪着装费用1400多万元得到清退;纠正“公费读书”者2800多人,清退学费265万元。

……

探求与希望共存,党心与民心同盼。

共和国广阔的天穹,在除去几抹浊云之后,将更加明净。

1993,中国反腐倡廉风暴,它所拥有的意义将是划时代的!

材料三　高层动向:反腐败加大力度

腐败,推进现代化的心腹之患

在当今中国,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仍是民众十分关切、深恶痛绝的问题。毋庸讳言,腐败现象已成为妨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定、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威信的社会毒瘤。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腐败现象,还呈发展蔓延趋势,毒化党风民风,构成了对执政党的最大威胁。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份报告所披露的数字与分析看,腐败现象确实触目惊心:

——以权谋私、贪污贿赂大案件猛升。据统计,仅今年1—5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贿案件竟达18183件,平均每天121件,立案8358件,逮捕案犯2479人,追回赃物赃款共计1.97亿元。大要案案值上升,过去贪污几千元可称“大案”,现在一次贪贿上万元、百万元、千万元者屡见不鲜,“特大案”标准不断被突破。据披露,今年头3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百万元以个贪贿大案达12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其中受贿最高的达700多万元;贪污最高的达3300多万元,创下建国

以来前所未见的特大案件"纪录"。如原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38岁的副处级干部曾利华，为达到与其情夫出国定居目的，不惜利用经营房地产开发和确定外商合作伙伴的职便，疯狂索贿，短短一年多，索贿546万元人民币、港币100万元，美元2.8万元。

——权钱交易活动进一步猖獗，在一些部门、地方迅速蔓延，愈演愈烈。不法分子打着搞活经济旗号，使权钱交易由过去的隐蔽向公开、半公开发展；由个人行为向有组织的行为发展；随着各地经济联系的增多，人、财、物大流动，腐败分子的活动空间区域不断扩大，跨地区、跨省市、甚至跨国作案越来越多，且呈内外勾结、涉及多种行业、贪污、行贿、受贿、挪用、渎职等多种犯罪交织一起，一案数罪、一案多人。

——腐败多发部位发生转移。由过去掌管物资分配、审批管理部门转向那些对市场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部门，如金融、证券、房地产开发、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及司法部门，尤其是经济建设热点部门，贪污贿赂现象大为突出。徇私枉法、吃拿卡要屡禁不绝。

——挥霍公款、铺张浪费歪风盛行。公款请客送礼、公车私用、争购高级轿车、公费超标准装修住房、公费旅游等等，司空见惯、屡禁不绝。据财政部有关部门反映：1992年全国公款消费已突破1000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吃喝。这个数额相当于修建两座三峡大坝的总预算，换句话说，一年我们就吃掉了两个三峡大坝！

处于新旧体制交叉、转型、过渡时期的改革关头，加上有些政策界限是非难以分清，使得反腐败斗争难度加大。中纪委有关负责人坦承：反腐败斗争面临新的严峻形势。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腐败加大力度

反腐败是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1993年，反腐败成为中南海高层最为关注的重大议题之一，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重要决策。

1月，反腐败被确定为中纪委与国家监察部合署办公后的第一工作重点；

2月，中纪委就湖北宜昌市突击提干一事发出通报；

3月，中纪委在南京召开合署办公后的纪检监察调研会，提出把查处案件作为反腐败的突破口，并明确查处重点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4月，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赴山东考察，提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立足于教育；

5月，中办、国办联合发文，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

6月，中纪委监察部召开华北东北案件检查工作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定不移反腐败，理直气壮抓案件；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七一"座谈会上指出：对腐败现象"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也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半年来"廉政风暴"席卷大地，取得了两大突破进展。

突破之一：取信于民，查处大要案有所突破，查处迅速并被公开曝光。敢不敢动大要案，是检验反腐败决心的试金石。人们不难发现，今年来大要案查处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的次数明显增加，在北京轰动一时的"卫益行"案、广东曾利华"特大索贿案"、海南"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湖北咸宁市"政府官员参与骗税案"……等一批大要案均及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涉案腐败分子无一例外地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的严厉制裁。

突破之二：动真格，查处要案要害部门取得突破。中纪委、高检院把着重查处公安执法部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看作反腐败的突破口，敢于碰硬、打"活老虎"，突破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使执纪办案取得突破性进展。据悉，今年头几个月，江西、安徽、武汉等地，就有近600名不合格干警被限期脱下警服、调离公安队伍，其中196名违纪违法干警分别被予以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公职、党纪政纪处分，25名严重违法犯罪者被送入监牢。对这些执法犯法的"害群之马"的惩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各地纪检部门在查处党内违纪案件时，坚决排除干扰，无论涉及何人，一查到底，挖出了一批处在领导岗位中的"蛀虫"。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贪贿案件中，就有县处级以上干部60人，省部级干部1人。仅黑龙江省5个月内共查处违纪党员1151人。原五常县副县长袁成贵收受贿赂、嫁女大收礼等被查处，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原伊春市建委副主任张宝珠贪污工程费、受贿7万多元，原绥化地区行署交警支队副队长龙泉，收受贿赂14万多元，二人均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查办。河南原汝州市市长徐中和利用职便索取、收受、侵吞公款53万多元，且有16.8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构成贪污罪被依法起诉。这些涉及"当政"官员的大案，一个个被曝光查处，进一步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不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底。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反腐败的胜利信心。

反腐倡廉，关键要有"两手"

如何估价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

中纪委5月底在华东地区案件检查工作座谈坐上认为：腐败现象仍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成绩不能估计过高，对存在的问题不能估计过低。

高检院贪污贿赂检察厅叶副厅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是指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背反现象：今年以来大要案增多，而群众举报却大幅度下降，直到最近举报数才稍有回升。这

意味着反腐败斗争中遇到新的难题，最关键的是受一些错误观念的影响。如将改革与反腐败对立起来，有人认为应“先发展经济后反腐败”，把腐败看作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甚至主张为搞活经济，要对经济贪贿分子“松梆”等，造成一些思想混乱。

如何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构筑一道反腐防腐的大坝？这是当前举国上下关切、探讨的一个问题，目前的共识是：反腐败必须抓两手：一是抓惩处，一是抓防范，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后者的任务更为艰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商品化。腐败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必然产物，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有现象”。要消除腐败，关键是深化改革，建立起真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与法制，把权力逐出市场，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消除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反腐倡廉，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党和政府铲除腐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最近中央对反腐倡廉又有新一轮部署。同时，有关部门正加紧制定“反贪法”，为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最高人民检察院拟设立“重大罪案侦查协调中心”，以加强对全国重大案件的查办与指挥协调，发动群众，“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坚持不懈，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杜双川）

香港政改风波

香港总督彭定康1992年10月7日发表施政报告后，立即在平稳的香港引起震荡。问题主要集中在其中的“宪制方案”部分。从那时起香港问题便开始成为人们——无论是政客、学子、商人、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地摊老板等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随着九七年的袭近，英国政府的一系列作为不由地使人联想起这个帝国在离开每一片殖民时的姿态。那么香港将怎么样呢？

中国亿万民众拭目以待。

材料：

- 独行其事，刊登“三违背”政改宪草
- 破坏中英合作基础的倒行逆施
-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 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就香港政改答记者问

材料一　独行其事，刊登“三违背”政改宪草

3月12日，港督彭定康不顾香港市民对中英两国尽早就香港问题重开谈判的热切期盼，悍然决定在港府宪报刊登其“三违背”的政改草案，将其以立法形式公布。这事引起了香港舆论的轩然大波。13日出版的香港报纸大都以突出的地位和较大版面报道这一消息及各方面反应，对此表示震惊、遗憾、失望以至愤怒。

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论说，这一严重步骤，是英方挑战中英合作，挑战广大港人希望中英磋商政制、平稳过渡善良愿望的又一恶劣行径。彭的冒险行动把他自己进一步摆到同港人利益相对立的位置，在破坏香港整体利益方面，已经走得多么遥远！

《大公报》的社评指出，去10月以来，香港社会陷入日益严重的矛盾和分化之中，根本原因就在于彭定康抛出其“三违反”的政制方案，不顾多数市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一意孤行。

《明报》发表社评，对彭方案登宪报，致使港股应声下跌超过200点，市场一片悲观气象表示忧虑，社评认为，在法理上，港府行动，中国政府根本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北京的对手是伦敦而不是香港。但伦敦当局不断强调支持彭定康，没有制止彭定康刊登宪报的决定，那就是英国政府需要负责的行动。

《成报》、《香港经济日报》等也纷纷发表社评、短评指出，“港督政改方案决定刊登宪报，导致中英寻求重开的谈判顿失诚意基础，令最近香港的乐观气氛急转直下”，香港过渡动荡，商界投资失据，投机失利，怎不怨声四起”，在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大前提下，多数商界中人对引起这次中英拗撬的彭定康方案深恶痛绝”，无不希望“恶劣处境尚有回旋余地”。《东方日报》用《遗憾》作栏头，报道一些香港政团的反应。

材料二　破坏中英合作基础的倒行逆施

正当中英双方就香港政体问题会谈进行准备之际，港督彭定康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公然于3月12日决定将其“政改方案”以立法形式在宪报公布。这是彭定康蓄意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中英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所采取的又一严重步骤。这一行径不仅制造障碍，破坏中英会谈，而且破坏中英合作的基础。我们对此感到震惊和遗憾。

彭定康上任后单方面公开提出对香港现行政治体制作出重大改变的方案，挑起中央关于香港政制问题的公开争议以来，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也遭到广大港人

的强烈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英方于不久前向中方正式表示，愿意通过外交渠道重开会谈，双方就会谈的有关准备工作进行了磋商。中方为使会谈能尽快开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中方建议由两国政府派代表举行会谈，双方代表由几名顾问或专家协助工作。而英方却企图在参加谈判人员问题上玩弄“三脚登”的故技。历次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都是由中英两国政府代表进行的。应由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中方同意港府官员作为顾问或专家协助英方代表进行工作。中方的立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必须指出的是：彭定康口头上表示愿意在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的基础上同中方会谈，实际上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三违反”的政制方案；表面上声称会谈应无任何先决条件，实质上依然要把他的方案作为会谈基础。为了欺骗舆论，误导市民，他自导自演了一幕又一幕延迟将方案刊登宪报的闹剧。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不能持久。在中英双方关于谈判的前期磋商已接近取得一致时，港英方面突然公布那个政改法案，并准备提交立法局讨论，企图造成既定事实，强迫中方接受。事实证明，英方一开始就对会谈毫无诚意。

人们从此事看清了英方的真实面目，其不愿与中方合作、继续对抗是早有预谋的。

英方舍合作的坦途而选择了继续对抗，在外交史上又创下一个恶例。

尽管由于英方的一意孤行，使中英会谈受到破坏，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都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如既往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维护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也相信，通过这场斗争，将会有更多的人认清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真面目。不管它玩弄什么手法，广大香港同胞一定会认清中英这场争论的实质，团结一致，最终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

材料三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香港总督彭定康先生 1992 年 10 月 7 日发表施政报告后，立即在平稳的香港引起震荡。

问题主要集中在施政报告中的“宪制方案”部分。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指出彭定康的宪政方案在未与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治体制作出了重大的改变。这样做，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中英两国政府要在过渡期后半段应加强合作，共同审议为平稳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的规定相违背的。彭定康无视中方一再向英方发出的加强磋商与合作的信息，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以所谓“建议”的形式，单方面公布对香港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变的内容，是蓄意挑起一场公开争论。发言人还严肃提出，如果香港在过渡期后半段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就不能平稳过渡、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的规定加以设立。

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是相互联系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载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中，明确规定：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是“五十年不变”。这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

彭定康的“宪制方案”，问题恰恰就出现在“变”字上，例如，他要改变立法局中功能团体议席的选举方式，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增加直选议席，区别仅仅在于选民投票不是按选区划分，而是按职业划分而已，这就违背了 1985 年设置功能团体议席以保证社会各界均衡参预的初衷；他要扩大区议会的职能，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他还违反基本法的规定，选举委员会改为由大部分直选的区议员组成，将由四部分人组成的等等。

对过去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这样多方面的重大改变，背弃了英方以前要与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了香港各方人士循序渐进的心愿，必然不利于香港的社会稳定，从而也不利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并将给香港的平衡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造成障碍。因此彭定康所谓政制改革，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违反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背离了中英双方过去就香港政制发展要与基本法衔接接所达成的谅解。彭定康的方案是打着“加快民主”的幌子实质是在香港问题上背信弃义改变了对香港的政策，如果彭定康一意孤行，中方将不得不“另起炉灶”按基本法办事，1997 年后，推倒重来。

彭定康上任不到半年，就把中英的合作变为对抗，在港人之间制造矛盾与分裂，引来社会动荡，使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受到破坏。

香港人正以自己的眼光在判明是非。目前进行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的人数正在下降，一度沉默的商界或集体、或单独表态，指出“和则稳，动则乱”，为了香港的安定繁荣，他们要求政制方案与基本法相衔接。正如港事顾问朱幼麟指出的，根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达成的“直通车”协议，使 1997 年 6 月 30 日“直通车”可以平衡地开过去。若是大转变，只会加剧动荡、分裂和对抗。

公道自有人心在。港督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时，美其名曰是要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人们不仅要问，英国统治香港已经百余年，何以从来没给香港人民主，却要在离 1997 年仅有 4 年多的时间里，而一反常态，大谈其要加快民主步伐呢？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香港是要发展民主的，但民主的发展要循序渐进，唯一的原因就在于这才符合香港的实际，这才有利于现行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制的运转，这才有利于香港社会的安定。英国是被称为“议会政治之母”的国家，但也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到本世纪40年代才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这就充分说明，发展民主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望一蹴而就。事实上，基本法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已作了切实可行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从1997年第一届立法会到2003年第三届立法会，直接选举将从33%达到50%。6年内发展到这个水平，速度是不能算慢的。实际上，基本法还只是对前3届立法会的比例作了规定，从2007年第四届开始，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比例就属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了。

因此，目前在香港进行的争执，关键不是什么发展民主或民主步伐快慢之争，而是英方要不要与基本法衔接，要不要平稳过渡，要不要恪守信义的原则争论。香港民意的主流是要平稳过渡，安居乐业。彭定康先生究竟在逆民意而动的迷路上还要走多远，人们将拭目以待。

（许梦）

材料四　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就香港政改答记者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17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邀请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就港英当局突然公布选举安排、破坏中英合作的基础问题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回答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如果港督彭定康坚持“政改方案”，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

鲁平回答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合作，不要对抗。但如果彭定康先生一意孤行，坚持和中国政府对抗的话，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另起炉灶”。事实上，这个“炉灶”在香港基本法里已经设计好了。现在说“另起炉灶”，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设计来砌一个新“炉灶”。这是因为彭定康先生所砌的“炉灶”与基本法不能衔接，到九七年后就不能用了。离九七年只有四年多时间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相应措施。鲁平说，在“另起炉灶”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坚持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全面执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争取到九七年香港能实现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保持繁荣稳定。中国政府的这个一贯立场，任何时候都不会支援。“另起炉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有记者问，据英方透露，彭定康突然公布选举安排，是因为中方不愿意定出一个确切的会谈日期。中英两国政府还有没有机会重开谈判，能不能谈一下谈判的过程？

鲁平说，英方的这一说法不确实。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在有关谈判的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在3月份进行谈判，至于在哪一天还有待商定。所以，3月12日彭定康突然在香港立法局发表声明，公布他的所谓“宪制方案”，我们一方面感到非常震惊，另一方面又在意料之中。感到震惊，是因为在3月12日前，双方关于谈判安排的分歧已逐步缩小，几乎已经达成协议，谈判眼看马上可以进行，但遗憾的是他于3月12日下午3时公布了方案。本来，这个问题双方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有些分歧已经逐步缩小，经过双方磋商是不难解决的，所以，我们对彭定康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在“宪报”上公布他的所谓方案感到不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又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认为彭定康对中英两国谈判解决有关九四、九五选举问题的分歧本来就没有诚意。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看法，那就是他在蓄意破坏谈判的基础，把谈判的门关得死死的。为什么这样说？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彭定康必须收回他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政改方案”。彭定康公布他的“方案”说明他还是顽固坚持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就失去了基础；二是因为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关于这次谈判的内部磋商要严格保密，但彭定康在3月12日的声明中把谈判的过程特别是一些分歧全部公布，违反了中英双方关于保密的原则。这样，他把谈判的两重大门都关闭了，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没法进行下去的。相信彭定康也知道破坏谈判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因此，我们认为破坏这次谈判的责任完全在英方。正如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英国政府要对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鲁平说，彭定康是完全置香港的利益于不顾。我初次和彭定康在北京见面，第一句话对他说的就是让我们两人坐下来谈，撇开其它因素特别是个人因素，真正为香港人考虑，为香港做点好事，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些贡献，只有这样谈判才能成功。但不幸彭定康根本不考虑香港人的利益，不然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行动，把谈判的门关上。我们对此十分遗憾。

有记者问，中国政府为九七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筹备采取什么准备措施，中国会不会提前收回香港。

鲁平说，筹备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在英国政府不合作的情况下如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完全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进行准备，包括第一届政府如何组成。准备工作是大量的，包括将来行政长官通过筹备委员会在当地如何产生、立法会在彭定康不愿意衔接的情况下势必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产生。我们在进行诸如此类的准备中，首先要考虑怎

样正确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听取香港各方面的意见，到九七年后按照基本法真正达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至于是否会提前收回香港，我们会严格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来做。但是，《中英联合声明》是要双方共同遵守的，我们不希望看到英国政府有任何破坏联合声明的举动。至于中国政府，是要严格遵守联合声明的。

有记者问，港英当局提出“政改方案”是为了在香港发展民主，而中国政府认为这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中方对香港发展民主到底是什么态度。

鲁平说，我们一贯主张在香港发展民主。但由于香港100多年来在英国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因此我们主张香港的民主应该按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发展。基本法有明确规定，香港最后还是要达到立法机关的议员全部直选产生，行政长官最终也要普选产生。之所以强调循序渐进，就是说要一步步地发展，这主要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鲁平说，基本法对前三届立法会直选议席作了明确规定，第一届是 20 人，第二届 24 人，第在 30 人，这就占了总共 60 人的一半。至于第三届以后立法机关怎么组成，将来完全由香港自己决定，只要有 2/3 立法会议员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

有记者问：英方已经关闭了谈判的大门，是否中方也不希望恢复与英方的谈判了呢？是不是中方要在经济等问题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鲁平说：英方已经把谈判的两扇门都关闭了，中方不能破门而入。既然英方彻底破坏了双方谈判的基础，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这个谈判当然也很难进行了。至于是不是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看，因为不是中方不要合作。中方一贯主张中英两国在各方面加强合作，以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特别是到后期尤其要加强合作，中英联合声明需要双方严格遵守。现在，不是中方破坏合作，而是英方破坏合作，不是中方而是英方不愿意合作。最近彭定康的行为，把中英合作的基础彻底破坏了。在英方不合作的情况下怎样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平稳过渡，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有记者问及港府官员参加谈判和谈判的时间问题，说是中国政府在星期四（3 月 11 日）还没有反对港府参加谈判，但到星期五却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港府被迫决定公布“政改方案”。

鲁平回答说，关于香港政府官员参加谈判的问题，双方一开始磋商时就提出来，但在整个谈判磋商过程中都没有解决。中国政府并不是要排除香港政府官员参加谈判，但由于这次谈判是中英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外交谈判，因此，我们提出双方只能有一个或二个代表。其实，这个主张不是中方先提出来的，早在朱镕基副总理到英国访问时，梅杰首相就主动提出愿意派一位特使到北京来谈判。后来我们接受了梅杰首相的建议，同意英方派一位特使到北京来，或者委派他们的大使为代表。中方也派两名代表，一名是外交部的作为正代表，一名是港澳办的作为副代表。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谈判代表团的问题，而是代表与代表之间、特使与特使之间的外交谈判。至于其他人，我们建议可以作为顾问或专家协助特使或代表进行工作。到 3 月 11 日，我们为了打破僵局，提出中方可以考虑只派一个代表，其他人员包括港澳办的人员都作为专家或顾问，相应的希望英方也应该这样安排。英方当时认为这是中方采取的一个新措施，答应马上报告他们政府。但到了 12 日星期五上午，英方正式答复我们，还是坚持要有一个所谓的谈判团或者叫谈判小组，坚决不同意港府官员以顾问或专家的身份参加谈判。

鲁平说，关于谈判的时间问题，我们在 3 月 11 日特别提出，如果谈判代表的问题能解决，谈判可以安排在 3 月中旬或下旬举行，具体日期由双方再商定，英方当时也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因此，3 月 12 日前，我们对谈判还是乐观的，认为双方的分歧已经不大了，英方已经同意只派一名代表。但英方还是坚持其他人要作为他们所谓代表团的成员，我们认为这是说不通的，既然只有一个代表，就不存在一个代表团。怎么可能其他人又组成一个代表团呢？外交史上是没有这个先例的。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不能解决。但是不幸，到了 3 月 12 日上午 10 点半，英方来找我，说英国政府坚持香港政府的官员一定要以小组的成员来参加谈判，不同意以顾问身份来参加，而且说这是“最后的决定”，不能改变。到了 3 月 12 日下午 2 点 45 分，我们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说香港政府已经决定，今天下进 3 点要在立法局发表一个声明，要公布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们说彭定康从一开始就对谈判没有诚意。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破坏，是对香港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所以，我说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有记者问，目前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正在制订新的对华政策，美国国会有些人认为，美国也应该推进解决香港问题的进程，并称香港问题应该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对此做什么样的反应。

鲁平说，我们认为，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任何第三国都无权插手，也不应该插手。如果第三国卷入这场争论的话，甚至于采取什么行动的话，只会使香港问题更复杂化。我们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我们相信美国政府对香港问题会采取明智的态度。因为，美国毕竟在香港有大量的利益，据我所知，美国公司在香港

的投资大概有70亿美元，所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真正在九七年以后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对香港会采取明智的态度。

鲁平说，如果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美国把香港问题联系起来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是香港，首先受害的是香港，其次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马家军"刮起田坛上的中国旋风

背景介绍

1993年1月斯图加特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俊仁率领的中国女子中长跑队队员发挥了较高水平，取得三金的佳绩，使世界田坛为之高呼。

同年九月的七运会上，马家军再次刮起一阵旋风，不但席卷了中长跑诸赛的金牌，而且频频破、创世界纪录，使得亿万国人为之惊讶，而马俊仁则被美称为"金牌教练"。

马家军以其不凡的神奇作为使国人激昂沸腾起来，"我们并不比任何人差什么"。国内外电台、报纸、刊物都在重要位置报道、介绍这个来自辽宁的马家军团，这股来自中国大地的"黄色旋风"。

十一月，西班牙的世界杯马拉松赛上，中国姑娘包揽前5名，再次以无可置疑的成绩告诉人们，我们的成绩是跑出来的。

材料：

- 欢迎凯旋的英雄
- 创世界纪录的女将和她们的教练
- "马家军"连掀狂飚初探
- 启迪
  ——七运会"马家军"观感

材料一　欢迎凯旋的英雄

参加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中国代表团，于八月二十四日乘机抵京，全国体总顾问荣高棠等到机场迎接，在机场大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对载誉归来的中国田径健儿表示热烈的欢迎。

荣高棠说，他对中国田径代表团所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尤其对"马家军"取得的胜利更是称赞。他还说，他很佩服"马家军"统帅马俊仁，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先进的技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使中国女子中长跑项目跃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世界是个振动，对整个中国体育都是个促进，证明了中国的弱项是可以强起来的。手持鲜花、胸挂金牌的3000米、10000米、1500米冠军得主曲云霞、王军霞、刘冬，面带喜色，心情激动。因为她们在斯图加特真正地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让五星红旗在世界田坛上冉冉升起了三次！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在欢迎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三司司长朱章苓也讲了话。她说，这次中国田径代表团取得了佳绩，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女子中长跑项目的高水平和先进技术，这一点使德国和其他国的朋友和同行们不得不承认和信服。最后，马俊仁教练也讲了话。他说：我的队员在世界锦标赛上基本上都发挥出了水平，取得了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的三枚金牌，并跑出了高水平的成绩，这说明我们的技术和训练方法是世界最先进的。过去，我们总是向外国人学，跟在别人后边跑。现在，是别人要向我们学，我们跑在了别人的前面，我感到做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确能做到！当然，面对胜利，我一再告诫自己，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再接再励，把下一步的训练和比赛搞得更好，为中国的中长跑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上再创佳绩！

（邢　颖）

材料二　创世界纪录的女将和她们的教练

1993年9月8上时50分，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田径场即将举行的女子10000米决赛，紧紧吸引着全场观众的注意力。大家注目的焦点是起跑线上身穿142号红色背心短裤的辽宁姑娘王军霞，她是"马家军"（由马俊仁教练率领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的美称）的头号人物，人们期望能目睹她创造新的纪录。

就在上月21日，王军霞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出乎意料地夺得了10000米金牌，并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田径锦标赛纪录。赛后，王军霞当众表示，她将继续努力，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10000米跑进30分的女运动员。

发令枪一响，25名选手冲出起跑线。很快，两名选手脱颖而出，与其他选手组成的第二梯队距离越拉越大。跑在第一位的是身穿白色运动服的云南名将钟焕娣。

4000米过后，钟焕娣与王军霞领先第二梯队200米。王军霞此时步履轻松地跟在钟的后面。

约7300米过后，王突然加速，犹如一匹脱缰之马，迅速超过钟焕娣。还剩最后一圈时，全场几近沸腾，人们预

感到，奇迹将要发生。

一片红霞掠过终点，电子计时屏上打出的成绩令人瞠目：29分31秒78，超过世界纪录41秒96。原纪录由挪威选手克里斯蒂安森于7年前创下。王军霞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王军霞这一"惊人之跑"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径赛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在她之后，她的队友也创下了新纪录：刘冬、曲云霞改写了800米亚洲纪录；曲云霞、王军霞双双超1500米世界纪录；3000米预赛，"马家军"五员大将同超世界纪录；3000米决赛，王军霞、曲云霞结伴同行，再次超过前一天预赛王军霞创下的世界纪录。

神奇的"马家军"已经不是第一次令世界为之震惊了。七运会之前的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俊仁的弟子包揽了3000米的金、银、铜牌，创下了一个教练的三队员同时在世锦赛夺得同一项目前三名的前所未有的奇迹。

三位姑娘没有像其他选手获胜后那样手持国旗绕场一周，而是手拉手平静地站在终点。

这种平静却激起了一些西方记者的怀疑。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不断有记者挑衅地提问：

"你们接受兴奋剂检查了吗？"等等。

面对疑惑、中伤，马俊仁掷地有声。

"我从1979年开始研究跑的技术，我是从梅花鹿和鸵鸟的身上找到跑的规律的。我们队员的训练是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他当众宣布："明天的10000米决赛，我的队员还要争取新成绩。"

果不虚言，王军霞、钟焕娣夺下10000米金、银牌。

锦标赛的最后一天，"马家军"的刘冬又夺得1500米金牌。

王军霞及所有获得奖牌的中国姑娘全部通过了极其严格的药检。

其实，"马家军"并非像有些人所感觉的"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的"那样。

199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曲云霞和刘莉分获1500米、800米金牌。1991年曲云霞又获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500米铜牌，并打破该项亚洲纪录。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曲云霞获1500米第3名，刘莉得第5名。那时就已具备了攀登世界高峰的实力。

"马家军"由18名女子组成，最大的21岁，小的才16岁。而统率这支神奇队伍的马俊仁是何许人呢？

1987年，马俊仁应聘到辽宁省田径队当女子中长跑教练，此前他在鞍山市做了17年的中学体育教师，训练了一批小有成绩的小运动员。

一个中学教员当上了省队的专业教练能行吗？

马俊仁虽然没有上过专业学校，但他十分勤奋地攻读了大学专业教材。当他发现书中所授的几乎都是苏联50年代的东西时，他丢开了那些书，开始搜集国内外的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

马俊仁对动物特别迷恋，他倾慕动物奔跑时的神韵。他经常带队员们坐在路边观察过路的马、骡子和驴，看它们轻盈、连贯的步频。不明其理的人还以为这是一群精神病人呢。那些可爱的梅花鹿和驼鸟也确实给了他不少启发。

掌握了优秀的奔跑的技巧，还需有人来实践它。马俊仁开始四处寻找好的苗子。

听说大连体校有个小姑娘，1500米跑了4分58秒多，马俊仁连忙赶往大连。那天下着大雪，小队员们都缩在被窝里，只有一个瘦瘦的小女孩爬起来给马俊仁开门。

马俊仁自然没有得到那个已经有点成绩的小姑娘。不甘心空跑一趟的马俊仁就把那个为他开门的女孩带到了省队。这个日后成为世界冠军、打破世界纪录的田径女杰，当时是体校的试训队员，连小步跑都不会，她便是曲云霞。

在省队训练一个月后，曲云霞的1500米和百米跑成绩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马俊仁发现曲云霞的肌肉类型适合跑长距离，就让她突击马拉松。仅仅四个月，曲云霞就跑出2小时24分的优秀成绩。

"双霞"之一的王军霞，得来颇费了点功夫。为了召她入省队，马俊仁两年内去了八趟大连体校，人家就是不放人。直到1991年冬，王军霞在全国城运会上名落孙山，马俊仁才将她召至麾下。当时，王军霞得了急病。马俊仁请来王军霞的父亲，相约两人各出一半钱，治好王军霞的病。冬训结束前的十几天，王军霞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马上投入训练，不久10000米跑即突破35分。

1992年3月，病愈不满3个月的王军霞出现在波士顿世界青年越野赛的赛场上，初次出马，即夺了亚军。

王军霞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有什么诀窍吗？

马俊仁有他的见解，"3200毫升的肺活量，1500米跑不出4分的成绩。如果肺活量达到4800、5200毫升，再跑4分就不成问题了。"

马俊仁将他的队伍带到了海拔2000多米的青海高原，一天跑一个马拉松；王军霞、曲云霞月训练量超过1000公里，达到目前世界中长跑最大的训练量。

马俊仁在大运动量训练队员的同时，还掌握了队员迅速恢复疲劳的方法。他遍访中医，精心研制出一种专用的补品，人参、阿胶、鹿茸用鸡汤熬制。他的队员赛前的另一补品据说是甲鱼血和甲鱼汤。在七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马俊仁向记者透露，赛前，他特意买了一只8斤8两重的甲鱼。

分析"马家军"在七运会上创下辉煌战绩的原因，还要加上另外两条，周密的赛前训练安排和适宜的天气。

不久前，国际田联致函中国田径协会，证明在斯图加特世锦赛荣获三块金牌的中国选手全部通过了兴奋剂检查，这是国际田联第一次特地就兴奋剂问题致函中国田径协会。

马俊仁坚信，他的"马家军"还将努力再创伟绩。面对众多的记者，他说"我手下不仅有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队员，连2000年奥运会的人我都准备好了。我们还要争取在世界大赛上打破世界纪录。"

（夏　尔）

材料三　"马家军"连掀狂飚初探

北京七运的田径赛场，简直成了辽宁姑娘震撼世界的历史舞台。马俊仁亲自指挥，王军霞、曲云霞领衔冲刺的"马家军"女杰，把斯图加特世锦赛上勇夺金银铜之后的庄严许诺，变成了连续超载女子10000米、1500米、3000米世界纪录的神圣现实。

人们正在探求"马家军"斯图加特异军突起之谜，马俊仁又抛给大家新的谜面：七运距斯图加特锦赛，其间尚不足月；七运女子中长跑的三项争夺，安排在连续四天之内，"马家军"何以能迅速恢复最佳竞技状态，连掀狂飚？

马俊仁教练的用人之道和战术安排，应该算是首屈一指。

面临大赛，不少教练忌讳给队员硬下夺金牌、破纪录的指令，唯恐队员由此加重思想负担而败走麦城。马俊仁却不然。他坚信"马家军"的箭头人物能够不辱使命，为国争光。万米决赛前夜，他把破世界纪录的任务，面交在世锦赛上夺得该项金牌的爱将。"我要实现斯图加特的许诺。王军霞，就看你的了！"一语中的、充满希望和力量。1500米决赛，他没有安排在斯图加特摘得这顶桂冠的刘冬冲击世界纪录，而把千钧重担压在了曲云霞、王军霞的肩上。3000米，曲去霞、张林丽、张丽荣在斯图加特囊括金银铜牌，马俊仁仍安排虽已超万米纪录、但尚大有潜力的王军霞，再度冲击世界纪录，实践证明，马俊仁用兵如神。

赛场风云变幻，"双霞"实力超群还得看临场充分发挥，如若技战术安排欠妥，即使煮熟的鸭子也会飞。马俊仁胸存韬略，亲临指挥更是当机立断。10000米，"老将"钟焕娣必先快速拉开差距，王军霞只要穷追不舍就能抓住时机。不料，钟焕娣在7000余米出现速度稍减，马俊仁洞察秋毫，立即放弃赛前布置的8000米匀速跟进之策，大声断喝："是时候啦，超过钟焕娣，加速！"王军霞闻令疾飞，全速冲刺，一举成功。1500米，马俊仁使出刘冬全速领跑800米的锦囊妙计，此后即令曲、王二将各自纵情发挥，果然又奏奇效，双凤齐鸣。3000米，"马家军"五员女将在预赛中同超世界纪录。决战时王、曲二人轮翻领跑，以同超世界纪录之法，"双霞"再创佳绩。

用兵一时，在于养兵千日。马俊仁的选材育英自有独到之处。

1988年初受命辽宁中长跑队教练，他立即选定女子项目作为突破口。他矢志以年轻一代的奋勇冲击，来迅速改变我国田坛的落后格局。他不因循守旧、步入后尘，立足另辟蹊径、开拓创新。他竭力将自己从70年代初即开始研究的中长跑技术步步升华，竭力将自己从鸵鸟、梅花鹿疾速奔跑而受到启迪，多方探索、历尽周折逐渐总结出来的一整套中长跑技术付诸实践，终得培育出一批扬威世界田坛的新人。

他挑选的"千里马"，几乎全是农民、渔家的女孩，马俊仁始终"掌握着她们的脉搏"，以行之有效而过细的思想工作，改变其只图跳出"农"门、找个工作的偏见，树立其走向世界、为国争光的雄心，发扬其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本性，培养其练就过硬本领、勇攀高峰的实干精神。

马俊仁把"马家军"调教成了一支艰苦朴素、管理严格、善于攻坚的战斗队伍。教练军令如山，队员团结拼搏。姑娘们以超乎寻常的顽强勇敢、持之以恒地勤学苦练，"狠抓技术、打好基础"，令人刮目。十多二十岁的姑娘，个个剪成清一色的短发，洋溢着青春活力。跑起步来，个个动作规范、协调、轻松自如，仿佛都有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潜质。

马俊仁的大运动量训练绝非盲目，高原训练更被他掌握得恰到好处。即使是前所未有、超越男子汉负荷的一天一个马拉松，10多岁的小姑娘们一周跑220公里累不垮，王军霞创造的最高纪录竟是4天奔跑170公里。高原训练能够促进有氧代谢和心肺功能，对耐久性运动项目的健儿卓有成效。王军霞在万米大赛中从未张嘴喘息，其肺活量令人惊叹，即是明证，马俊仁长期坚持高原训练，先后8次登上海拔2236米的青藏高原练兵，并摸索出"高原训练三个高峰"的规律。斯图加特归来，马家军抓紧时机再上高原，下山参加七运正逢"第二高峰期"，果然连创佳绩、美梦成真。

大运动量之后的"恢复"和"调息"，马俊仁自有独步世界之妙法。

一般中长跑选手，大运动量训练和竞技之后，得有数日的恢复，方能以良好状态再战。而马俊仁以其二十多年的精心求索，视人体极限为弹簧，找准了训练与恢复之间的规律，创造了"马家军"女杰超越极限、迅速恢复、连战皆捷的神话。

这是"马家军"所有秘诀的核心。对此心血结晶，马俊仁视为拥有知识产权、缄口不言、秘而不宣。

有人揣度，马俊仁的一大法宝，是以中医药膳为据，注重食补。平常队员的饮食，离不开人参粉、鱼炖人参、红枣小米粉粥、鸡煨狗肉……就是京城七运，马俊仁亦买一八斤八两甲鱼，让队员喝其鲜血、再炖食其肉。对此，运动医学专家颇有非议：仅凭此，不可能迅速消除人体肌肉中的乳酸、补充推动的热能和动力。食补不是主法。

有人观察，马俊仁和他的助手擅长中医的按摩、推拿、针灸，还引进了西医的电疗。他们对队员的体质特性了如指掌，为其设计了不同的“恢复操”、穴道按摩、冥想放松……训练、参赛之后，或自己操作，或教练协助松驰肌肉，减低了可能发生的运动伤害，效果非同一般。

对这些，马俊仁自己亦有介绍。不过，究竟马俊仁有何既符合科学，又不违犯规定的因人而异的妙法，眼下，人们只能画龙，不能点睛。

（筱　伍）

材料四　启迪——七运会“马家军”观感

马俊仁教练带的是中跑组，以800米、1500米为主攻对象，七届全运会来临，他说我组要拿七运会马拉松金牌。当时使人听了神啦！真感觉他有点吹牛，说大话，事实怎么样呢？马俊仁说了，他叫他的队伍练了，还真的拿到了不仅仅是金牌而是金、银、铜全包了！这一事实难道不引起人们深思吗？

常言说艺高人胆大，马俊仁人的胆是够大的，而他的艺高又在何处呢？就以王军霞为例。据了解，王军霞最大一周训练量达220公里，连续作战的能力强，四天之内完成170公里。在强度方面，从马拉松接力赛中5000米她跑进15′以内，10000米达31′多。再看她的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她的意志品质更是令人信服，在去年参加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中，跑完10000米之后，脱下钉鞋里面全是鲜血，就是这样取得了该项的冠军，把对手甩下几十米远。这次在参加马拉松赛之前，王军霞发烧37.5℃。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说她能拿冠军，这个底只有马俊仁教练知道，这就是他的艺高所在。

严格管理是马俊仁训练的一个侧面，他的十几名队员，守纪律，有礼貌，平日不挑食，不讲穿，全心全意投入训练。例如：她们从云南高原训练后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列车上俩三个人包一个车厢，协助服务员打扫卫生，给旅客打开水等，然而每到大站，她们提前做好准备活动，车一停急忙跑下车抓紧时间跑步，以克服旅游途中疲劳和保持训练水平。她们有苦同吃有乐共享，是一个友好团结的集体。

严格训练是马俊仁的信条，他坚信教练员在训练中要起主导作用是千真万确的。在训练中他充分发挥每个运动员的特长，使每个队员都感觉到上不好训练课自己有责任，课上你追我赶谁也不干落后，气氛热烈，斗志高昂。马俊仁对课的质量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达不到要求甭想过关。所以每个队员都不敢怠慢。尤其是在训练中，不定时的听到马教练喊声，这是发动冲锋的信号，运动员必须加快步伐改变节奏，正是这样使运动员练就了突然加速甩掉对手的本领。

运动员最高兴的事是参加比赛，凡有比赛都争先恐后的报名。就拿这次马拉松说吧，几个年龄小的队员，也要报名参加比赛，因年龄小被卡下之后，很不高兴，真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按她们的话讲，还要挤进前10名的行列，高标准和实现远大目标是她们训练的理想，也是她们产生巨大动力的源泉。

为什么马俊仁的队员，对中距离、长距离，超长距离都能跑呢？而且个个对取胜信心十足，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有人说马俊仁对运动员管理太严，有点武士道精神，其实不然，严是不错，但他最爱护、最关心运动员，运动员生病了他昼夜睡不着觉，跑医跑药忙个不停，哪个运动员该升级了他都找领导千方百计的把级别提上去，在维护运动员的利益方面，他一分也不让。而他对自己的家，近两年来每月的工资没有向家里寄一分钱，全部为了保证运动员的营养而花光。在业务上他基本上掌握了中长跑的专项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他现在正思索着，达到了高水平如何保证水平不下降，如何保证这个人才群不断层，如何在国际大赛中夺金牌。

综上所述，难道我们从第七届全运会马拉松赛，马俊仁教练训练的几名队员取得的优异成绩，他的训练实践及其今后想法中不得到一些什么启迪吗？

禹作敏事件

背景介绍

1993年8月27日上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庄严宣判：“经审理查明，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决定合并执行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被称为“中国第一庄”的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依靠发展村办工业逐步走向富裕而名噪全国。作为村办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无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社会也给他很高的评价和多种荣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的称号接踵而至。

而今，他却站在了被告席上，接受法律正义的审判。

从劳模范到犯罪分子，这中间的情况广泛载于报章，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禹作敏的犯罪过程中得到哪些警训。

材料：

-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被判刑。
- 国法不容
- 禹作敏走向犯罪的教训

材料一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被判刑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8月27日由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8月23日和8月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七名同案犯所犯罪行进行了公开审理。在法庭上，禹作敏和其同案犯以及他们委托的律师分别进行了辩护。天津市各界干部群众200多人参加了旁听。

法庭经审理查明：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原华大公司养殖场职工危福合被刘云章等18人殴打致死后，禹作敏多次指使他人窝藏并安排资助4名重大案犯潜逃；组织、指挥同案犯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暴力阻碍司法机关依法勘查犯罪现场、搜捕案犯，扣留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导致公安、检察干警未能正常执行职务。在此前后，为了获取国家重要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禹作敏和其子禹绍政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

1992年12月，在清理原华大集团公司经济问题时，禹作敏先后多次组织、指挥了对原华大公司职工田宜正、侯洪滨、宋宝等人的非法拘禁、侮辱殴打。在禹作敏的示意下，还发生了对北京某干部学校师生的非法拘禁和侮辱殴打。

此外，禹作敏还指使他人对大邱庄村民刘玉田的家属非法监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非法管制。

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先后宣读了证人证言，出示了书证、物证。禹作敏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以窝藏罪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6年，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非法管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材料二　国法不容

——禹作敏犯罪纪实

1993年8月27日上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庄严的声音在审判庭响起："经审理查明，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3年、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3年、3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一个曾经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因为公然践踏法律，堕落成为一名罪犯，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一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依靠发展村办工业，逐步走向富裕，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第一村"。作为村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为大邱庄经济的发展无疑做出了一份贡献，因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被列为"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

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名声的显赫，桂冠的增多，禹作敏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逐步变得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竟敢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玉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

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

天。

从 11 月底到 12 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 8500 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 5000 元予以奖赏。

12 月 13 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 年来到大邱庄，1992 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 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 26 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

“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

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 7 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 18 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

晚上 10 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 380 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 年 4 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4 月 11 日上午，禹作敏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 7 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 2000 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 7 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 3 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 3 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 年 11 月 27 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 27 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 3 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这天，27 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 7 个小时，21 人遭殴打，5 人因伤住院。

二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

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 7 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

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支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

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

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

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在大邱庄党委，必须在 19 日 18 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 17 时，才勉强同意 20 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

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为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 月 21 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 1700 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 3 月 10 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

早在 2 月 20 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 3 月 14 日，刘永华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 16 万元。

从 1992 年 8 月至 1993 年 3 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

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 800 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 3 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 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 月 15 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 月 21 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

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到 7 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 18 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 8 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7 月 31 日和 8 月 14 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8 月 10 日和 11 日及 8 月 23 日和 24 日分别对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于 8 月 27 日作出一审判决。

三

8 月 24 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在讲到他的犯罪根源时，他说："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蜕化变质、无法无天，堕落成为一名罪犯，这是今天的禹作敏。那么，昨天的禹作敏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从根子上讲，禹作敏原本并不是一个坏人。"静海县委一位负责人不无惋惜地说："他曾经是一个有头脑的大邱庄致富的带头人。"

早在 1958 年，禹作敏就入了党，随后又担任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直到 70 年代的中期，大邱庄还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村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开始带领村里干部群众进行改革，发展村办工业，大邱庄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资产总值达到 32.87 亿元，成为"中国第一村"。

人们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大邱庄逐步富裕起来时，大多数家庭都告别了茅草屋，搬进了砖瓦房。这时，不少人劝禹作敏也搬，他执意要等全村人都住上砖瓦房再

最后一个搬家。然而，近两三年内，禹作敏几次搬家，住宅也越来越奢华。禹作敏一天比一天富有，住宅一次比一次豪华；从办公楼到他那一年四季恒温的别墅只有约两百米，可他从来都是车来车往。他挥金如土，家里高级电话就有6部，他的一条皮带就值万余元。

从一个名扬四海的致富带头人，蜕变为国法不容的罪犯，禹作敏给人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接受审讯时，禹作敏不只一次提到自己过去15年间在大邱庄创业发展中的辛辛苦苦。但是共和国庄严的法律不容践踏，也不容超越法律之上的人。

禹作敏受到了法律制裁，大邱庄会不会因此垮掉?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为了挽回禹作敏等人犯罪所造成的影响，天津市委驻大邱庄工作组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村里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支持和帮助大邱庄搞好生产，努力维护各项经济活动和对外业务的正常运行。对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的领导成员，以及四大集团公司的重要领导人，除了触犯刑律的以外，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市委还邀请专家对大邱庄进行了全面清产核资。统计结果表明：目前大邱庄共有52.87亿元家底，债务近13亿元，负债率38.2%，属正常范围。

几个月以来，大邱庄企业的内部改革在继续深化和完善，工业生产持续增长，上半年总产值达23亿元，纯收入达到1.84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71%和30%。

在稳定生产的同时，市委工作组在群众中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法制教育，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现在，人们对大邱庄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违法事件，对禹作敏为什么会变成国法不容的罪犯等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群众说：禹作敏是罪有应得的，人人必须守法。

今天的大邱庄，人心稳定，生产稳定。大邱庄人正以新的姿态，继续沿着指引的方向前进。

（徐如俊　张宿堂

8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禹作敏走向犯罪的教训

全国人民瞩目的禹作敏案已正式宣判，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长远的。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全国闻名的模范人物，再到罪犯的演变过程中许多事是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在大邱庄工作了几个月，耳闻目睹，确实感到其中许多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接受教训，当然首先是他自己，但有些则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思考。现提出几点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健全正常的党内生活

在禹作敏的把持下，一个时期以来，大邱庄的党内生活极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不正常。禹作敏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组织管不了他，他随心所欲地搞乱了大邱庄的党内生活。

首先，禹作敏无视党的组织原则，极力摆脱或不服从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大邱庄出名以后，各方面的荣誉不断向禹作敏飞来，随着荣誉和地位的升级，禹作敏越来越妄自尊大，对下高压，对上则顶，越来越以“抗上”为荣。上级党委召开的会议，他常常是无故或借故不参加；上级党委需要了解的情况，他常常是不报告，甚至来了解时不理；上级领导到村调查研究，他也常常是不见来人不说情况，他不把上级党委看在眼里，有人说他是“肩膀超过了脑袋”。也有人说他把大邱庆搞成了“独立王国”、“土围子”，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程度，以至在查处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件中，发展到与上级党委公开对抗的地步。他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和社会公然散发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所谓《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实经过》材料；当市委发现后，由市委办公厅给他们发去电传，予以严厉批评，责成收回材料、做出检查时，他们竟以大邱庄党委办公室的名义给市委办公厅发回个电传，声称对市委的指示“不理解”拒不做检查。针对禹作敏打着大邱庄党委旗号的所作所为，市、县领导多次找他谈话，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诚恳地加以帮助、挽救，但是，他把上级的帮助和挽救当作耳旁风，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终于滑向了犯罪的泥坑。

其次，他无视党内生活准则，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在大邱庄，不是他服从于党组织，而是党组织服从于他；不是他服从于党委会，而是党委会服从于他。他就是党委，党委就是他。在他把持下，大邱庄党组织很少召开党员会，党委多年不开生活会。在党委会内，禹作敏专横跋扈，他一个说了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颜色看”。1990年，村党委一名副书记对某件事情的处理有点异议，禹作敏马上就迫使其辞掉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搬出所住的“人才楼”。

禹作敏不习惯于集体研究，而习惯于电话指挥，手令下达，这种指挥完全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难怪有的党委成员说自己患了“电话恐惧症”。这种封建家长式的专横的一言堂作风，在查处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件中更有淋漓尽致的表现。面对禹作敏包庇、窝藏案件重大嫌疑人，顽固阻挠、妨碍公安干警执行公务的严重事态，有的党委成员试图规劝，禹作敏不但不听，反而宣布他们为“叛徒”。他一意孤行，不经过党委研究，擅自以党委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停工停课，“临时辞职”，以对抗

市、县委的指示和司法机关办案。他逼迫某些党委成员去组织停工停产，去县里或市委工作组处"请愿"，使得一些党委成员不得不以自残或外躲的方式进行抵制，禹作敏恣意破坏党内生活准则的恶性发展，终于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我们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严格的组织纪律，来源于健全正常的党内生活。禹作敏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正确地摆正和处理个人与组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摆脱以至对抗上级领导，自行其事，则难免不栽跟头。禹作敏的教训还告诉我们，必须正确地摆布和处理班长和一班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班长，要模范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避免或少犯错误的又一重要保证；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恣意妄为，独断专行，早晚会酿大祸。

二、必须对所有的干部加强法纪教育，严格用党纪国法规范人们的言行

在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都要遵法守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和党章所决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必究，犯法治罪，概莫能外，天经地义。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还必须遵守党纪政纪，否则，也要受到追究。然而在禹作敏的潜意识中，法纪算什么，法哪有权大，法纪又奈他何！他曾公开说："在大邱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私设公堂，任意扣人，被治罪的党员仍留在党内等等。禹作敏本人多年来置法纪于不顾，为所欲为。前几年，在他默许下，曾打死一名村民，几经周折，几名凶手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他不但不接受这一教训，反而对司法机关多有怨言，在查处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件中，发展到公然与法律相对抗。请看他的表演。去年12月13日外来做工的业务员危福和被殴打致死后，他先是谎报案情，说在村里审查危福合贪污问题时，被突然闯进的二十多名群众打死了。接着，市公安刑侦技术干警去现场勘查时，由于伪造的现场被拆穿，被以莫须有的借口扣留达13小时，致使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两个多月不能侦破。今年2月17日，当公安司法干警在武警配合下（因大邱庄有15支枪和子弹）去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案件重大嫌疑人时，他知道嫌疑人在村里，便下令封锁了路口，使公安司法干警不能进村，失去了缉捕重大嫌疑人的时机，随后，他召开群众大会，煽动和组织停工停课，进行示威，有意扩大事态，把水搅浑。他叫喊"只有彻底都乱了，才有利于解决这件事！"在他的煽动下，一部分群众手持棍棒，围困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市县领导，有人对市县领导进行推搡。更严重的是，3月12日市领导对他提出严肃批评，希望他悬崖勒马，协助办案后，他阳奉阴违，口头上讲支持、配合，煞有介事地成立了若干个协助破案小组，背地里却让人于3月15日用车将案犯送出村外逃跑。真是无法无天！然而法律不可欺，法律非儿戏，禹作敏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禹作敏的倒台深刻地告诉我们，各级各类干部，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和来头，都必须增强法纪观念，严格用党纪国法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违法乱纪，向法律挑战，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这一严重事件还深刻地告诉我们，在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千万不可放松法制建设；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那些富了的地方、知名的人物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法制素质，全面造就"四有"公民。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三、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反对拜金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禹作敏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成绩是显著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异变，拜金主义至上，"有钱能买鬼推磨"，成了他的人生信条。他那著名的"向钱看"四句"名言"，就是最好的注脚。对危福合被殴打致死一案，禹作敏也企图用钱了结，说什么给了死者家属数万元，家属很满意云云。言外之意，希图此案"私了"。他还派他的儿子带着大批现款外出找门路，探听上边态度，以图草草了结此案。然而，法律是能够用金钱买通的吗？金钱也许能够收买几个贪赃受贿者，但金钱绝不能买走社会主义的法制，买不到社会公正！他以为万能的金钱而这次却失灵了。

禹作敏的金钱拜物教的失败，也给金钱至上者敲了警钟。我们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希望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但是，我们，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终不是只为金钱活着，不应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乃至高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些嗜钱如命，不择手段地捞钱，又以为钱能通神，有钱就能办到一切的人，他们的世界观，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江泽民总书记最近严肃地号召，"要在全体党员和群众中大力提倡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决反对拜金主义。"我们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与拜金主义的思想、言行作坚决的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干部都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反对金钱至上，摒弃拜金主义，不为金钱所左右。要增强党性观念，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清正廉洁，艰苦奋斗。

四、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大邱庄由远近闻名的穷村变成全国第一富村，靠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的好政策，靠的是四千多名大邱庄人民群众的勤劳奋斗，靠的是数以千计的外来技术人员和数以万计的外来劳动力的艰苦创造。作为大邱庄的当家人，自然也有禹作敏的一份功劳。但是，禹作敏却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切，他自我膨胀，贪天之功，居为己有，俨然以“救世主”自居，住房越来越高级，坐车越来越豪华。他一方面让人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乃至本村学校德育教学加进了颂扬自己的内容，借别人之口把自己比作成吉思汗；另一方面，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要群众“永远坚信六个字：大邱庄禹作敏！”他大搞“舆论独裁”，对大邱庄的宣传，只许宣传他自己，不准宣传别人。甚至把他儿子拉上集团公司总经理宝座，搞封建世袭制。他在村内几乎逢会必讲对他的“感情问题”，要大邱庄的干部群众人人忠于他，服从他。一个一般村民因其子“有问题”和本人对他略有不敬，他竟默许将其打死，并发动群众集会游行，对死者进行“声讨”。他还贪恋淫欲，道德腐败。人们说他贪功、贪权、贪名、贪利。

要查处危福合被殴致死案件的前前后后，他更是用尽了种种花招和手腕，他的恶劣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再次得到了集中展示。他转移视线，制造混乱。本来，查处危福合被殴致死案并不复杂，公安司法干警搜捕案件重大嫌疑人是“冲着大邱庄来的，冲着改革事业来的”，煽动情绪，挑动不满。他还企图通过新闻舆论，为其呐喊。他大耍两面派，讲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明着讲对破案“尊重、支持、配合”，暗地里送走案犯；表面上摆出支持配合破案的架势，背地里组织一伙人研究如何蒙混过关。他蒙蔽怂恿群众，把群众当枪使、作为掩盖其罪行的挡箭牌。他三番五次地组织妇女、老人，到县里、到市委工作组驻地“请愿”、“反映问题”，对破案工作进行纠缠，市领导同志找他谈话，他称病不见，鼓动群众说是“我们不让他见。”为了保自己，他甚至以下跪的手法乞求某些总公司干部对他的支持。他还指使别人捉刀代笔，以某个总公司干部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写请愿信。禹作敏被刑拘以后，大邱庄干部群众逐渐明了事实真相，方知上当受骗，许多人回忆禹作敏过去强奸民意、作威作福的种种表现，无不感慨地说逮捕禹作敏是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禹作敏曾经声称：“如果没有我，大邱庄一定会乱”，然而他被刑拘继而被逮捕以后，并没有出现什么乱的局面。大邱庄生产、经营照常进行。

新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四化”和“德才兼备”。谦和磊落的思想作风和光明正派的道德品质是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有德无才不能成就事业，有才无德也终将被社会贬弃。尽管有些有才德者成功于一时，但当他缺德面目大暴露时，即被群众所唾弃。禹作敏的结局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当前，在我们的领导干部队伍中，禹作敏式的人物并非绝无仅有，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的差别而已。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誉。我们一定要在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加倍努力，有所作为，并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真正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成为一支德才兼备的坚强集体。

五、必须加强对先富起来的典型的教育管理

先进典型的树立，对于面上工作的开展，是一种动力。但是任何一个先进典型，都不是面面皆好，样样先进，它也必定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何况有些先进的典型，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荣誉而逐渐地走向了反面，这种情况不乏其例。因此，对先进典型，应当经常地予以关心、帮助、教育和管理，使他们不断地获得新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和一些地方先富了起来，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许多先富起来的典型，没有背上荣誉包袱，谦虚谨慎，不断地有所前进。但也有一些先富起来的典型，富而不慎，富而忘形，以至发展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目空一切，胡作非为。禹作敏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先进典型应当引以为戒，越是先进越是要谦虚谨慎；各级领导也要引起警醒，越是先进典型越要加强教育管理。

对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和先富起来的地方，第一，要教育他们戒骄戒躁，正确地对待荣誉，正确地对待组织，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第二，发现他们有不足或错误，要及时指出，严肃纠正，不要小疾不医，养痈遗患。第三，对先富典型绝不能无原则地捧场。娇宠、姑息、迁就，一俊遮百丑，掩盖了其他矛盾和问题。否则，宠坏了典型，宠失了信用，遗害无穷。禹作敏不就是由于捧得太高而重重地摔下来了吗？第四，要教育他们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既要重视物质富足，又要重视精神富足；既要注意抓好物质建设，也要注意抓法制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还要注意纠正“硬件硬、软件软”的偏向，不仅要重视精神文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风貌的培育。就农村而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当前特别要增强法纪观念，提高法纪意识；要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管理教育，教育他们遵纪守法，谦虚谨慎，自我约束，并能随时指出和纠正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因其“老大”而手软。

（郑方生）

“银河号”事件

背景介绍

1993年7月至9月间的“银河号”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事件最终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严重打击了美国的霸权气焰，使中国在面对美国的不断挑衅中取得了更有利的地位，从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主要材料如下：

- “银河号”调查纪实
- “银河号”事件说明了什么
-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银河号”事件的声明
- 国际社会就“银河号”事件发表评论

材料一　“银河号”调查纪实

新华社达曼专电　中国和沙特政府代表9月5日在沙特阿拉伯达曼港联合签署了关于中国“银河号”货轮的《调查报告》。美国政府代表作为沙特的技术顾问也在报告上签了字。《调查报告》说，沙特政府在中国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于1993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沙特达曼港对中国货轮“银河号”所载货物进行了调查，美国政府代表作为沙方的技术顾问参与了调查。《调查报告》宣布：通过对“银河号”轮船上全部集装箱的彻底检查，结果表明，船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至此，美国依据错误情报指控中国“银河号”装载有化学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一手制造的“银河”轮事件已经真相大白。

海霸行为

自7月23日以来，美国以获得情报为由，无端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上述两类化学品运往伊朗，并自8月2日起在公海上一直对“银河号”采取军舰跟踪和军用飞机拍照等非常行动，干扰该货轮的正常航行。美国还向“银河号”货轮预计停靠的港口所在国散布其错误情报，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银河”轮按计划进迪拜、达曼、科威特港卸货。

8月2日，“银河号”到达阿曼湾，被迫停泊在摄氏40—50度高温的公海上。上午8时，“银河号”到达阿曼湾。这时，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在“银河”轮上空盘旋跟踪，查问“银河”轮名称、航向、航速、船籍港、货运情况，以及出发港、目的港等。此时美直升机舱门敞开，不时对“银河”轮摄像拍照。当天下午，美国军舰61号从右前方驶近“银河号”，一直尾随在“银河号”后四至五海里处。接着一架美军用直升机和两架军用飞机在“银河号”周围低空盘旋、拍照、监视。此后，美国军舰61号、975号、966号一直轮番在“银河号”前后、左右保持二至五海里的距离进行巡视，美军用飞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在“银河号”周围低空盘旋、监视。直至8月26日“银河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位于海湾的沙特达曼港。美国上述海霸行为对“银河”轮及其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也给船员生活造成极大困难。“银河号”在高温下漂泊24天，淡水、食品短缺，从8月4日起，船员们不得不停止洗澡，洗衣服并降低伙食标准，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

来者不善

经沙特政府同意，“银河号”货轮8月26日进入达曼港接受检查。检查的目的是要弄清该轮是否载有美国所称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

沙特有关当局在达曼港内用集装箱围起大约300米乘400米范围封闭泊位，“银河号”停泊在封闭泊位内。海上有沙特快艇巡视，一艘沙特军舰在距“银河号”不到百米处与该货轮成直线靠岸停泊；进入封闭泊位要经过几道关卡，内有士兵值勤，身穿沙漠迷彩服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

8月26日，由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率领的中方检查组到达曼。中方代表在同沙特和美国代表会谈时，再次重申了中国严格履行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强调中国对这次检查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并表示同意对发自运往伊朗的20余箱货物开箱检查的要求。

28日上午，美沙人员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对船上货物进行清点和浏览检查，美方检查人员——美国海岸警卫队专派人员不时地撇开中方人员，在漆黑的船舱内寻找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核对箱位。显然运往伊朗的货物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8月29日上午十时十分，开箱检查开始了。港口露天场地上气温高达摄氏65度，在场人早已汗流浃背。中、沙、美三方人员虽然有说有笑，但气氛实际上很紧张，给人以决战开始的感觉，美方技术人员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开箱工具检查仪器、手电筒等，早已跃跃欲试，大有不查出美国情报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誓不罢休之势。

运往伊朗货物第一箱打开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全是一些铅封黑色铁桶，外行人一看确实有些吃惊。美国技术专家们喜形于色，急步向前，小心翼翼地琢磨这些黑铁桶，以为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两类液体化学品。当他们被告知里面是固体染料时，他们仍从箱中间掏出两桶打

开看个究竟。就这样，这天上午，他们接连开了25个自中国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晚上，又接着开箱查了其余几箱，但都是些麻袋装、纸箱或木箱装日用商品建筑材料、染料等。至此，自中国（包括经香港转）运往伊朗的集装箱已经全部开箱检查完毕，根本没有美国所称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

出尔反尔

美国技术顾问，特别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检查人员亲自翻箱倒柜，甚至钻进箱底看个究竟。即便是运往伊朗的装鞋纸箱他们也草木皆兵，怀疑里面有液体化学品。他们费尽心机，甚至累趴在地上也找不到华盛顿要他们找的两类液体化学品。然而，他们还不甘心，也不承认事实，竟然出尔反尔，撕毁原先已达成的协议，提出要查所有发自中国的货箱，以及他们认为有疑点的和装化学制品的第三国货箱。不过可以看出，开箱越多，美国人越紧张，越难堪。因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无确凿根据，胡乱开箱。所以，沙方代表有时似在挑逗美国人，当打开箱一看又是纸箱包装的、份量很轻的日用商品、便问美国代表："OK?!"美国人苦笑一下，"OK"。美国人已不像刚开箱检查时那样盛气凌人和嚣张了。

情报有误

8月30日，在扩大检查范围后仍查不出他们要找的两类液体化学品时，美国人心慌了，着急了。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情报"有误。据他们透露，美情报机构提供的提单号是CSAQ3101和CSAQ3102。由此可知他们开箱前单独在船舱下查对运往伊朗的货装号和箱位的用心了。当他们发现"银河号"货轮根本就没有这两个提单号时，便怀疑情报部门把"号码"记错了，因此，提出要查相近、易混的CSAQ3010号集装箱。中方立即欣然同意，但打开箱一看，却是运往巴基斯坦的扑克牌。美国人的愚蠢做法成了现场众人的笑柄。

处境尴尬

美国在对"银河号"货轮所载发自中国和第三国的全部集装箱628箱分批全部开箱检查后，便把赌注押在化验结果上。8月31日化验的是取样发自中国的五箱甲酸、二箱农药和一箱松节油。美国政府还特意从华盛顿派人乘军用飞机送来试剂。足见美国对化验的重视，化验结果表明，上述化学品都不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低头承认这一事实。至此，美国人在其一手制造的"银河号"事件的较量中，已经输得精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愤愤不平

近十天来，达曼一些当地人、其他阿拉伯人，以及在此工作不愿透露国籍和姓名的人，他们对美国人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查中国货轮上的中国货和船上的第三国货表示气愤和厌恶。一位亚洲大国侨民私下表示，"美国的霸道行动不仅是对你们中国人的挑衅，也是对我们整个亚洲人的挑衅"。美国人检查中国货轮上的中国货，这是对11亿中国人的轻视，对11亿中国人感情的极大伤害。对此，中国人不会忘记。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的理由是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那么美国开箱查"银河号"上发自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运往阿联酋、科威特、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基斯坦的货箱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怀疑这些亚洲国家都在输出或生产化学武器吗？美国凭什么要伤害这些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呢？一位在此工作的阿拉伯人士说，"我们亚洲人应该进一步团结起来，免得受美国人的气。"

（陈文如）

材料二　"银河号"事件说明了什么

9月4日，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以及作为沙特方顾问的美国政府技术专家签署了关于中国货轮"银河号"运载货物的核查报告，确认"银河号"完全没有运载美方所指控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项化学品。持续42天，世人瞩目的"银河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美国的谎言和对中国的无端指责统统破产了。

"银河号"事件是一次发人深省的事件。它说明了什么呢？

这一事件是由美国霸权主义所造成的。在这一事件中，导致美国彻底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情报错误和对错误情报执迷不悟，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作了认真调查并严肃地作出澄清之后，美国仍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甚至采取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行动。美国一贯唯我独尊，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动辄以莫须有的"情报"，肆意向其他主权国家施加压力，这必然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银河号"是一艘从事正常商业航运的普通货轮。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从事这样的航运是一国的主权行为，别国无权阻挠和侵犯。美国竟然对"银河号"货轮强加罪名，百般骚扰，致使"银河号"正常航运受阻，在公海上漂泊20余天，航员安全也受到威胁。美国的这种霸权行为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公海航行自由，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践踏。

处理国际关系应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更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在“银河号”事件中，美国完全置这些原则于不顾，为自己的私利所驱使，无端地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还给中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都像美国这样，对别国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再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任意采取损人利己的行动，那么世界上哪还有什么正常的国家关系可言？

从“银河号”事件发生起，美国就一直口口声声称是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扩散而与中国进行“合作”。实际上美国是以“世界警察”自居，粗暴侵犯别国主权，干扰别国商船的公海航行自由，甚至以自己的国内法为依据，强行对其他主权国家采取行动。这分明是强权政治，与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基础上的正常国际合作毫不相干。

美国在“银河号”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毒化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这种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依然是实现和平与发展两大目标的主要障碍。

中国一贯主张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并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领导人一再指出，中国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美方也表示重视美中关系，但是，美国一手制造的“银河号”事件就是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也是美国挑起的一种对抗。如果美国政府确有诚意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就必须改弦易辙，回到中美之间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来。

材料三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银河号”事件的声明

（1993年9月6日）

自7月23日以来，美国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动用军舰和军用飞机在公海上对“银河号”货轮进行骚扰，还肆意造谣中伤，致使“银河号”不能进入预定港口卸货。更有甚者，美国对中国政府经过认真负责调查所作的澄清毫不相信，依旧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在沙特达曼港的彻底调查证明，“银河号”根本没有装载美方所说的两种化学品。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美国的图谋遭到了失败。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政府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公海航行自由权，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也使中国在声誉和经济上蒙受了严重损失。全国人大外委会对美国的霸权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完全支持中国政府8月7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强烈抗议和9月4日发表的声明，强烈要求美国立即消除其错误情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美方向中方公开道歉，赔偿中国所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近来，美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美国议员在不少场合都曾表示要改善和发展美中关系。但是，他们应该清楚，这需要美国增加对别国的信任，不再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美国必须改弦更张，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承诺今后在国际交往中，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人民一向重视中美关系，愿意与美国人民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但谁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权益，损害中国的尊严和国际声誉，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材料四　国际社会就“银河号”事件发表评论

综合《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和新华社记者报道：自我国公布关于“银河号”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后，国际舆论纷纷指出，中国取得道义胜利，美国理应道歉赔偿。

《巴基斯坦时报》9月6日说，现在调查表明，中国船根本没有运载被禁止的化学物质，中国现在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并赔偿物质损失是正当的。

巴基斯坦《新闻报》6日撰文说，在和美国关于“银河号”事件的这场斗争中，中国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并要求美国道歉和赔偿。

《印度快报》说，中国要求美国就“银河号”受阻一事“公开道歉”，并赔偿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损失，这是对美国“警察”行径的挑战。

伊朗官方波斯文报纸《伊斯兰共和国报》6日发表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系“海盗行径”。“对这种海盗行径不能仅仅批评一下完事，这种行径是强权和讹诈，世界各国都应对这种强权和讹诈行径采取严厉行动”。

《日本经济新闻》6日详细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就“银河号”事件发表的声明，并在分析事态的发展时说，这件事情的结果，可以说是美国在外交上的失分。

英国《每日电讯报》6日发表文章说，尽管美国口气很硬，但“银河号”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中国则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

巴基斯坦《边疆邮报》7日发表题为《超级大国无能的表现》的社论，评“银河号”事件。社论说，华盛顿指责中国船运送违禁化学物品，经调查，现在真相大白，华盛顿大错特错，由于这一事件而大丢其脸。

巴斯坦外交部发言人7日就“银河号”事件发表谈话指出，最近发生的美国骚扰中国货轮事件“违反了国际法，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严重关切”。

泰国《新中原报》7日在一版发表题为《强权政治不得人心》的文章，谴责美国一手挑起“银河号”事件，并强

调中国对美国的指责和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文章说，"银河号"事件是美国一手挑起的，现在美国又公开承认"银河号"上没有任何有化学武器原料的证据。文章说，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借口得到什么情报，便对在公海航行的其他国家船只横加阻拦，威胁要登船检查等，这不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践踏吗?! 文章最后指出，强权政治是不得人心的。

泰国《星暹日报》8日在社论中说："'银河号'事件使美国理屈词穷，极度尴尬。它的谎言和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也在世人目光下宣告破产"。社论抨击美国"只讲强权不顾公理"的做法时说，"美国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

美国《华盛顿》8日刊登题为《海上的失误叫美国难堪》的文章说，"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声望受损。

韩国《朝鲜日报》9日就中国"银河号"事件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同中国的情报战中犯了难以挽回的错误"。

又讯，澳门《华侨报》7日发表题为《蹩脚的辩护》的评论说，美国一手制造的中国货轮"银河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华盛顿面对北京后发制人的反击、理直气壮的批评和声厉辞严的抗议，"既拒绝认错、道歉和赔偿，还声言今后将继续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行径，进一步自暴其丑、自暴其恶。"

据来自香港的消息说，香港各界人士谴责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的霸权主义行径，并公开发表言论，敦促美国政府赔偿中国所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大律师廖瑶珠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作风都很霸道，"银河号"事件再次说明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非常有害。

华革会会长蔡渭衡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横无理的国家"，美国自称"世界警察"，却在公海上无视国际公约；而中国谦逊超然的态度，不用任何刻意的解释澄清，更能有效地展示真相，让世人明白谁是谁非。

香港立法局议员谭耀宗对"银河号"事件已真相大白，而美国仍坚持错误的态度，不肯作出道歉和赔偿感到气愤。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曹宏威博士指出，美国出售军火给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次弄巧成拙，再次暴露它的虚伪面目；经常在人前炫耀维护人权的美国，却不顾及"银河号"船员的生命安全，正是美国漠视人权的表现。

香港立法局议员黄宜弘、教联会会长杨耀忠、公屋联会主席侯瑞培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

香港海港运输业总工会25名代表9日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递交信件，抗议美国无视事实，至今未就"银河号"事件向中国作出道歉和赔偿。

香港海员工会9日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在"银河号"事件中侵犯中国主权、侵犯商船航行自由的霸权行径。会议发表声明说，我们最感到愤怒的是，美国政府调派战机军舰阻挠"银河号"正常航行，严重危害海员的人身安全。

香港饮食业职工总会也就"银河号"事件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就"银河号"事件向中国政府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华夏万众　心系奥申

背景介绍

1993年，竞办奥运决战年。

1991年1月，北京宣布申办2000年奥运会，同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请。

1993年1月，北京向萨马兰奇递交北京奥申委的申办报告表。

随着9月23日的来临，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心系奥申，炎黄子孙，盼着能圆一回奥运梦。申办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群众自发的签名申奥的布幅难以计数，捐款中群众捐款涉及31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人士，可见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

推迟举办的七运会上，中国各省健将各显风采，为奥运申办添了一分光彩，显示了体育大国的风度。

然而，奥申之途并非顺利，美国众议院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等一系列阻力我们都经过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着强有力的对手。萨马兰奇拿着那只信封和剪刀的时候，亿万中国人多么希望从他嘴里吐出的是"China"。

然而，事实是悉尼是胜者，北京是败者。

我们无庸回避失败，我们更不怕失败。

材料：

- 国际奥委会考察报告认为北京申办奥运工作是现实和扎实的
- 中国奥申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议案
- 一九九三，奥运申办决战年
- 蒙特卡洛的战斗
- 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

材料一　国际奥委会考察报告认为北京申办奥运工作是现实和扎实的

国际奥委会考察团11名委员亲笔签名的考察报告由国际奥委会于7月9日从瑞士洛桑寄出，7月13日早晨送到新华社的办公室里。

考察报告说，北京奥申委是由一批非常有经验的人士组成的，他们对考察团的访问作出了非常好的组织工作，反映了他们有效率和精心的准备。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将由这些人士组成组委会。

考察报告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群众对北京申办工作的有力的支持，并说："李鹏总理重申了政府对北京申办工作在道义和财政上的支持。"

考察报告说，北京申办工作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北京具有在一家饭店里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全体成员的优越能力，居住条件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好。在谈到北京对参赛人员的整个住宿安排时，考察团认为这对奥林匹克大家庭来说是"非常好的"。

考察报告说，在新闻、通讯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方面，北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虽然目前数量上还不够，但是由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很快，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状况在2000年前不彻底解决。

考察报告对北京奥申委关于奥运会期间对药物检查、马匹检查和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医疗的安排完全肯定，认为所有的计划都"很好"。考察报告也谈到了北京的不足之处：一是北京的环境污染，二是语言沟通问题，三是有些场馆的设施需要改进。但是考察报告也指出北京奥申委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

国际奥委会在致国际大新闻单位的信中说，这个报告仅仅是个"技术报告"，对六个申办城市的现有技术条件进行评估，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将会通过审阅各申办城市的申办报告和对这些城市的考察访问，并根据目前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作出自己的判断，选择最佳城市。

（新华社讯）

材料二　中国奥申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议案

中国奥委会7月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粗暴干涉国际奥林匹克事务。

中国奥委会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众议院不顾中国奥委会的抗议和国际奥委会及美国体育界人士要求其停止干涉奥委会事务的多次呼吁，日前悍然通过了一项反对在北京举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的决议，这是对国际奥林匹克事务的粗暴干涉，严重违背了奥林匹克的原则和精神。这种做法也是中国人民和运动员所坚决反对的。

举办奥运会的地点只能由国际奥委会的全体委员投票决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国际奥委会指手划脚。美国一小部分人的这种霸道行径必将遭到所有关心和维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独立和自主的人士的坚决拒绝。

美国众议院26日通过了一项违反奥林匹克运动宪章原则的决议案，反对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这项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兰托斯提出的议案，借口所谓的"人权"问题，反对在北京或其他中国城市举行2000年奥运会，还要求美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在9月蒙特卡洛会议上投北京的反对票。

6月2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罗马表示，国际奥委会不接受美国众议院就反对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所施加的压力。

萨马兰奇是在罗马参加意大利奥委会的一次会议期间接受埃菲社记者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尽管我们尊重美国众议院的这些观点，但国际奥委会不准备接受美国的这些压力。"他还说，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完全脱离政治的国际组织，它的成员将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选择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城市。萨马兰奇指出，美国众议院的这一决议纯粹是政治性的。

材料三　一九九三，奥运申办决战年

《申办报告》：北京抢了第一

1月11日。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以吴重远为团长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北京奥申委的《申办报告》，同时送交了10万美元的申办费（如果申办不成功，将如数退回）。

在8个申办城市中，北京递交《申办报告》抢了第一。

这本长达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回答了国际奥委会规定必须答复的23个方面的问题，内容涉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北京的历史、市政建设、体育场馆、交通、通信、医疗卫生、安全、气象等各个方面，图文并茂。《申办报告》中有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写给国际奥委会的信，以及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和北京市厅局长亲笔签名的保证书。

北京是1991年2月宣布申请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同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送交了申请书，一年后又送交了《申办报告》和10万美元的押金。至此，北京按照国

际奥委会的规定已经全部履行了申办手续。

让世界了解北京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

她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古都；

她是一个在 1990 年成功地举办了第 11 届亚运会的现代化城市；

她是当今世界发展建设最快国家的首都。

北京要让世界了解北京，尤其要让 96 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奥运会 25 个比赛项目体育组织领导人了解北京，因为正是这样一些人将要决定北京申办奥运的命运。

1992 年，北京接待了 30 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和 15 位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主席或秘书长的来访。中国有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过去，我们的对外宣传薄弱，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不了解或很少了解北京，他们到北京来看一看感觉就不大一样了。一位 8 年前曾到过北京的非洲国家的委员，再次访问北京后说，北京的道路、住房和人的变化使他吃惊。一个来自遥远的南美国家的委员这次第一次访问北京，他原以为中国很落后，印象中的中国人还是同功夫片里一样穿长袍、梳辫子，到北京一看深有感触地说，北京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里已经现代化了。一位来自欧洲国家的委员访问北京后说，他原以为中国申办奥运会只是出于良好愿望，这次访问使他看到北京完全具备申办奥运会的良好条件。

当然，仅仅请进来还不够。1992 年，北京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推销自己的形象。

去年二月，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第 16 届冬奥会。七八月间，以北京市市长、北京奥申委主席陈希同为首的奥申委主要官员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 16 枚金牌的优异成绩，是一次很好的申办宣传。11 月初，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又参加了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各国奥委会总会代表大会，陈希同第一次正式向国际奥委会做陈述报告，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 11 亿中国人民众盼北京兴办奥运会的心愿。

炎黄子孙：盼圆一回奥运梦

在北京开奥运会，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

今年 1 月 8 日，北京大雪纷纷，银装素裹。新疆阿勒泰地区体委和环宇实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奥申委表示，如果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成功，他们将赠送价值 30 万元人民币的黄金用于制做奥运会的全部金牌。

群众自发地搞签名活动以表达感情和愿望是国际上盛行的一种形式。北京奥申委成立后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师生送来的第一个万人签名的布幅。此后，北京奥申委收到的群众签名的布幅越来越多，一发不可收拾。为此，北京奥申委设立了一个展览室，专门用于存放各地送来的支持申办奥运会的群众签名布幅和各种纪念物。

去年 12 月 23 日，金利莱、银利来偕同百家名牌商店发起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活动。全国有 400 家名牌商店参加这项活动，签名者将达 1000 万人。

北京奥申委对群众捐款一直是不宣传不提倡，尽管如此，截至去年底，北京奥申委已收到群众捐款 2903 起，总计达 230 多万元人民币。捐款者涉及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人士。

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还得到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的支持。居住纽约的美籍华人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去年曾先后会见北京奥申委执行主席伍绍祖和副主席张百发，并答应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他将愿意为体育馆的规划和设计做出贡献。

火一样的热情凝聚着炎黄子孙同一个梦。

9 月投票：八城逐鹿见分晓

9 月 23 日，国际奥委会将在摩纳哥举行第 101 次全体委员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表决 2000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

国际奥委会现有 96 名委员，参加投票的可能还有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主席 5 人，无论经过几轮投票，获半数以上选票的城市将取得奥运会主办权。

这是一场"巨人之间的竞争"，8 个申办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新招数新举措纷纷出台。

柏林，突出宣传两个德国的统一。推倒了柏林墙后的柏林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久负盛名的大教堂和歌剧院。经济实力强大的柏林还宣布，如果申办成功，将从 1993 年至 2000 年每年向国际奥委会捐赠 100 万马克（合 63 万美元）。

悉尼是澳大利亚连续申办奥运会的第三个城市，突出宣传其地处南半球，历史上在南半球只举办过一次奥运会（1956 年墨尔本），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该回到南半球举办了。

曼彻斯特，英国老工业城市，突出宣传首相梅杰的支持，经济上有保证。英国也是连续三次申办奥运会了，曼切斯特是第二次申办，积累了经验，感情上对国际奥委会委员有影响。

米兰，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突出宣传其体育的广泛性和 1990 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成功。米兰又是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城市，它还宣布与水城威尼斯合办奥运会。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一城市，突出宣传其地处欧亚两大洲，又是欧亚文化的汇合点。

巴西利亚，巴西南部城市，突出宣传南美洲第一次申办奥运会。

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原苏联)，最近宣布退出申办奥运会，但需要国际奥委会正式确认。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说，经过一年多的申办工作，原来站同一条起跑线上的8个申办城市现在已经拉开了档次。国际舆论认为，悉尼、柏林、北京是第一档次，曼彻斯特、米兰、伊斯坦布尔为第二档次，巴西利亚和塔什干是第三档次。

何振梁同时指出，现在距投票表决还有八个月的时间，各申办城市谁能最后取得优势还要看今后几个月的工作。

北京奥申委表示，将再接再厉，全力以赴，争取申办成功。

材料四　蒙特卡洛的战斗

9月18日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蒙特卡洛巴黎饭店的办公室里会见了北京申办代表团团长陈希同等，祝贺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

陈希同团长转交了李鹏总理给萨马兰奇主席的信。李鹏在信中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第二十七届夏季奥运会。萨马兰奇主席感谢李鹏总理的来信。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陈希同重申中国支持奥林匹克运动的坚定立场。

他在谈到外界所谓中国会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问题时说，中国全力支持奥林匹克事业。美国国会某些人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不会影响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陈希同说，不久前亚特兰大市市长访问北京，他和李其炎市长都已表示支持亚特兰大办好1996年奥运会。北京正全力以赴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如果申办不成也支持当选城市把2000年奥运会办好。

9月20日上午，李岚清副总理分别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新加坡《海峡时报》、香港亚洲电视台、香港《文汇报》和《华侨日报》记者的采访。

李副总理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有利条件。

当记者问及举办奥运会对团结国人和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有何积极影响时，李岚清指出，团结国人首先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最富有凝聚力的。体育运动可以从一个方面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

他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国的各个领域的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如果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必将进一步使世人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促进中外关系的发展。

针对中国田径运动员最近接连打破女子中长跑世界纪录的问题，李岚清指出，她们的好成绩，是经过长期、艰苦和科学训练取得的。比赛是按照国际比赛规则进行的，其结果已得到国际田联的认可。

9月22日下午，李岚清副总理在蒙特卡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北京获得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荣誉的话，这一次奥运会将是出色的、难忘的和历史性的盛会。

李岚清还就中英关系、亚特兰大奥运会、人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当记者问到对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说中国不应得到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谈话有何评论时，李岚清说："中国有个传统，就是不应该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我们在整个两年申办过程中，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和我们竞争的城市。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赫德先生对中国的攻击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实在令人感到吃惊和遗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不应干预国际奥委会的事务，应当尊重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自主选择。"

在回答记者有关人权的问题时，李岚清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人权。这1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很多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人并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们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想他们看了以后，会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作出公正的结论。"

当记者问及美国国会的一些众议员和参议员通过决议和写信反对北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时，李岚清说，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干涉国际奥委会的内部事务违背奥林匹克精神，引起国际奥委会和中国人民的不满甚至愤慨，连美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也表示了异议。

李岚清指出，中国一向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凡是对奥林匹克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总是积极参与。目前，我国运动员正在为明年的冬季奥运会和1996年的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积极训练，争取更好的成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

当记者问如中国此次申办不成功是否要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时，李岚清说："现在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争取申办成功。我们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胜利了不骄傲，不成功也不气馁。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作贡献。"

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时27分40秒，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出席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的

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9月23日的秘密无记名投票中，选择了悉尼作为2000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新华社讯）

材料五　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

蒙特卡洛传来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通过投票表决：澳大利亚的悉尼主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

我们尊重国际奥委会的选择，祝贺悉尼申办成功。同时对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申办工作的支持，一如既往充满感激之情，对全世界也一如既往充满友好之情。今后中国将更加敞开胸怀，欢迎四海宾客，广交五洲朋友，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开放的中国完全能够办好奥运。办奥运，不论是今天还是以后，都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翻翻奥运会的史册，许多主办国都是经过多次申办才最后成功的，澳大利亚也经过了三次申办。在奥运会的百年史中，旧中国留下的是"零"的记录，蒙受的是"东亚病夫"的屈辱。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了申办的勇气和条件，北京在1991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申请。北京能够提出申办奥运会，本身就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申办奥运会，我国政府、人民和奥申委作了不懈的努力，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和外国许多友好人士给予很大的支持。但申办城市有好几个，举办机会独一无二：北京失去了这个机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维护奥林匹克的宗旨和原则，凡是有利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中国仍将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奥运重在参与。申办的过程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是个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申办成功与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办成一两件大事，要想在世界上被人了解和信任，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志气，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全党和全国民族人民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国力增强了，面貌一新了，无论什么大事也就好办了。

得而不骄，失而不馁，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气度和风范。"风物长宜放眼量"，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我们相信，在这个占有世界1/5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5000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国家，奥运会五环旗高高飘起的日子，不会是很遥远的。同胞们，让我们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

劫机频频　国人义愤

背景介绍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项"记录"：中国的民航班机竟然在七个月内七次被歹徒从中国的不同地点劫持到中国的同一机场——台北桃园机场。11月26日，又有一架中国民航航班被劫，所不同的是，这次歹徒高光凯不幸，被机智、果断、沉着的机组人员挫败。

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当局将大陆劫机罪犯封为"反共义士"公开支持、纵容，导致80年代以来大陆发生多起以台湾为目的地的劫机恐怖事件，引起中外旅客的强烈不满。各界人士，包括台湾民众们对此亦都深恶痛绝，他们纷纷撰文谴责台湾当局的暧昧政策。

材料：

- 中国民航总局希望台湾有关当局改变现行政策
- 必须遣返劫机犯
- 中国人，该怎样向劫机犯说"不"
- 最新的喜讯

材料一　中国民航总局希望台湾有关当局改变现行政策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新闻发言人8月10日就劫机行为发表谈话，指出劫机行为严重危害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和民航运输的正常经营。

这位发言人说，今年4月6日、6月24日、8月10日，大陆连续发生三起歹徒将民航班机劫往台湾地区的恐怖事件，严重危及旅客、机组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了旅客的正常旅行，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当局将大陆劫机罪犯封为"反共义士"公开支持、纵容，导致80年代以来大陆发生多起以台湾为目的地的劫机恐怖事件，引起中外旅客的强烈不满。

发言人说，1982年7月25日西安—上海2505航班飞机遭孙云平等五名歹徒劫持，歹徒在空中引爆炸药，造成三名旅客、四名机组成员受伤，飞机受损。1983年5月5日沈阳—上海6501航班飞机被卓长仁等六名歹徒劫持，歹徒开枪击伤两名机组人员，在油料将尽的情况下，飞机在低于起降标准的韩国春川军用机场紧急迫降时冲出跑道，飞机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69万余元，旅客在韩国滞留五天。1988年5月12日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厦门

—广州8397航班飞机被歹徒龙贵云、张庆国劫持到台湾清泉岗军用机场，旅客在台湾滞留五小时。1989年4月24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宁波—厦门5568航班飞机被歹徒梁奥真劫持，一名乘务员被刺伤，两名旅客在歹徒引爆炸药时被炸伤。1990年10月2日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厦门—广州8301航班飞机被歹徒蒋晓峰劫持，歹徒强迫机组人员离开驾驶舱，只留机长一人驾驶飞机，在油料不足的情况下不许飞机在香港降落，当油料将尽机长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降落时，歹徒对机长施以暴力，致使飞机失控，偏离跑道，撞上停在客机坪的两架客机，造成人员死亡128人、伤53人、飞机报废3架的惨重损失。有的劫机事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机组人员是在高度精神紧张状态下驾驶飞机，且不断受到恐怖分子的胁迫干扰，通讯联络不能正常，被迫所去机场的资料不全、情况生疏，因而对飞机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极大。

发言人指出，上述劫机事件的受害者不仅是大陆旅客及大陆民航企业，来自台湾地区的旅客也深受其害。在1990年的“10·2”空难中，就有台湾来大陆旅游观光、返乡探亲的30名台胞不幸身亡，8名台胞受伤。

发言人说，中国民航总局对民航运输的安全保卫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各民用机场、航空公司均设有保安机构，通过不断完善防范措施和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包括劫持飞机在内的非法干扰民用航空事件的发生。为从根本上减少海峡两岸间劫机事件的发生，我们希望台湾有关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两岸携起手来，共同为制止对民用航空的非法干扰做出积极努力。

材料二　必须遣返劫机犯

近年来，大陆民航客机接二连三地被歹徒劫持到台湾，仅今年4月至11月就有七起之多，其频率之高，去向之一致，在世界航空史上绝无仅有。

台湾成了大陆劫机犯的目的地有其原因，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当还记得，十年前，卓长仁劫机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千方百计将劫机犯弄到台湾，封为“反共义士”，把一伙歹徒捧为英雄模范到处宣扬，从此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据大陆公安部门调查资料表明，连续发生劫机去台的案犯，都是一些刑事重罪或债台高筑的亡命之徒，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他们不惜铤而走险劫机去台。

众所周知，劫机是国际公认的一种严重刑事犯罪行为，对广大旅客生命财产和航空安全危害极大，无论劫机的动机如何，劫机犯都要受到严厉制裁。然而台湾当局却无视社会公论，给劫机犯以种种庇护，虽然现在不再把劫机犯视为“反共义士”，但劫机犯到了台湾后，只要编造一些所谓受到“政治迫害”的理由，去迎合台湾当局某种政治需要，便可从轻发落。1988年5月劫机去台的两名歹徒，在台湾就只判了三年六个月的刑，而且还两度减刑，实际上，两犯前后服刑不过一年多就被释放，并准予在台定居。此一案例所引发的结果就是接续而来数起劫案的发生，其中几例，现也以所谓合乎“自首”和“人道精神”，只判了十年八年的刑，还不知今后台湾当局会不会如前此一样再度减刑。台湾当局如此对待劫机犯，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变相的鼓励和奖赏。他们编织种种借口，拒不遣返，让劫机罪犯逃脱应有的严厉惩罚，致使图谋劫机的歹徒有恃无恐，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陆民航客机被劫持去台的案件。难怪海内外包括岛内舆论都一致把台湾比做是劫机者的“天堂”和“乐园”！

连续不断地发生劫机去台事件，已引起海内外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人们对台湾当局处理劫机犯的做法大为不满，希望台湾方面不要违背社会公理和民心所向，尽速遣返劫机犯，使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岛内舆论不断指出，台湾当局应依照两岸红十字组织签订的《金门协定》，把劫机犯遣返回大陆受审，而不应借口“人道伸援”，变相庇护，使台湾继续担当“劫机者天堂”的恶名。不少台湾社会知名人士也指出，劫机行为对旅客而言就是不人道的，何以倒对劫机者有人道考量？劫机是一种严重刑事犯罪行为，不论劫机犯有无政治目的或其他意图，以强暴胁迫劫机，危害广大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应当处以死刑、无期徒刑，就应当坚决遣返。

此间人士认为，劫机行为严重威胁航空安全，是国际公认的严重犯罪，任何纵容、包庇或变相庇护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大陆民航客机被劫，不仅犯罪行为发生在大陆飞机内，而且犯罪分子也是大陆人，主要犯罪地也在大陆，无论如何，台湾当局都必须遣返劫机犯，不遣返两岸都不得安宁。劫机犯被当作“义士”接去台湾，结果这伙人兽性不改，谋财杀人。希望台湾当局吸取这一血的教训，不要在遣返问题上再设障碍。

据悉，在岛内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已宣布要重新研究处理劫机犯方式，并声称“不排除将劫机犯遣返”。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实事求是，当机立断，尽速遣返所有留在台湾的大陆劫机犯罪分子，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根本上打消阴谋劫机歹徒的幻想，杜绝劫机事件的发生。

材料三　中国人，该怎样向劫机犯说“不”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项“纪录”：中国的民航班机竟然在七个月内七次被歹徒从中国的不同地点劫持到中国的同一机场——台北桃园机场。

中国民航之所以作出这一似乎“扰客”的安全检查决定，是有鉴于这一海峡两岸新闻界觉得“不像新闻”的新闻：在七个月的时间内，中国民航班机竟然七次被歹徒从中国的不同地点劫持到中国的同一座城市——台北。

劫持犯都是些什么货色？他们一股劲地往台湾跑，为的是追求“民主”和“，自由”？请看看他们的“小档案”和滑稽表演，请看看台湾某些人的所做所为。

劫机犯黄树刚在台北供称，他 1964 年 9 月出生，高中文化，劫机前系河北唐山钢铁厂招待所采购员。同案犯刘保才则供认，他只有小学文化，劫机前贩运水产品的个体户。问及劫机目的，黄犯说，是因为大陆“贪污层出不穷”。但在台北第一次被审问时，黄犯就供认，此次外逃，共携带 6 万多元人民币，买枪支、买机票用去 2 万元，现身上还有 4 万多元。

一个采购员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6 月 5 日，我公安部发言人在北京证实：劫机犯黄树刚是负案在逃的贪污嫌犯。初步查实，黄 1991 年初担任唐山钢铁公司招待所餐饮部采购员后，与在唐山市内经营海产、水产品的个体户刘保才结识，参与赌博，曾贪污 20 余万元。今年 2 月，招待所发现黄所经手的帐目不清，多次催其清理，黄以种种借口拖延、拒绝，被扣发当月奖金。4 月 3 日，黄与刘劫机潜逃。

口口声声高喊“反贪污”的劫机犯，其实自己就是个贪污犯！

劫机犯师月波本无刑事犯罪前科，但他靠拉关系搞到 15 万元贷款后，因迟迟无法归还，于是在 8 月 10 日劫机逃台。

劫机犯杨明德和韩凤英为一对夫妇，杨辞去原在东北林场的工作后，携妻带子到山东东营市干上了“个体”。因经营不善，杨欠人一万多元。看了新闻报道说“有歹徒劫持民航去台，强烈要求遣返劫机犯”，便以为劫机去台是个好“出路”。他 9 月 30 日劫机之时买飞机票的钱，据说还是向人借的。

张海，劫机前系唐山市政府司机，张的外祖父在台湾，其母并曾在 80 年代末去台湾探过亲。据台湾报纸报道，其外祖父母几年来曾给张的母亲十多万美元以接济其家中生活，据张海到台湾自供：其一夜在歌舞厅“消费”曾高达人民币一万多元。但这位花钱如流水的“大款”，竟盗窃某机关干部一千元钱，买了机票登机，于 11 月 5 日劫机飞台。又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这位扔下老母和幼子不管的张海一下飞机就说：我是来投奔外公的。

劫机犯王志华很干脆，他 1 月 8 日劫机飞到台湾后即对台警方说：我和厂长吵了一架，所以劫机来台。后又说：我在大陆犯了案，大陆警察还没来得及下手，我就劫机飞来了。据悉，王犯在大陆已有贪污证据并有重大盗窃嫌疑……

劫机犯李向誉、韩书学则是为逃避债务劫机去台的。李原系吉林省通榆县照相馆工人，离婚独身。1991 年，李自办“东方旅游公司”，并请人担保，借得人民币 2.2 万元，但到期无力偿还。两名担保人因此向法院提出控诉。法院裁定：李应拍卖自己的房屋以偿还借贷。11 月 5 日，李将自家房屋以 1.5 万元卖掉，并对朋友讲，要“远走高飞”，11 月 12 日即与韩合谋劫机外逃。韩则是李犯同县医院的医生，两次离婚，现独身。他一向与经商个体户有联系，据悉亦有不少外债……

这就是形形色色的劫机犯。

台湾记者曾向劫机者问过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你知不知道劫机会造成严重后果？”每位劫机犯的回答并不完全一样。

——王志华答：“知道，可不这样来不了台湾。”

——杨明德答：“为了自由，没想那么多。”

——歹徒韩书学、李向誉竟说：“我们不管这些，我们认为自己需要自由，自由与开放思想不是罪过……”

对劫机犯的这种种丑恶心态，台北桃园乡青商会会长潘玉郎直言不讳道：“劫机者罔顾机上乘客安危，动辄以炸弹等爆炸物相威胁，如此不尊重人权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苟同。我们不欢迎这种恐怖分子！”他指出，“桃园”因劫机而在世界出名，我们为此深感羞耻！

中国民航正对东南航线实行超乎寻常的严格检查！中国民航已给机上安检员配备既能保证飞行安全又能制服劫机犯的特种装备。

中国民航为保障民航运输及旅客、飞机安全，一向重视安全问题，中外旅客抱怨的所谓“晚点”，有些也是因为以安全为重而不敢“放飞”。特别是今年以来，针对频繁发生劫机去台事件，中国民航总局在经费紧张情况下，仍紧急拨款近一亿元，以便更多地购进保安仪器设备（包括较为先进、为各国民航机场所普遍使用的 X 光机、安全检查门等），装备各机场。对地面和空中安全保卫人员，则加强了针对性业务培训。

记者曾于今年 6 月、8 月间搭乘民航飞机，已深深感到各大机场安全检查均十分严格。特别是 6 月乘坐北京/杭州间航班时，因为已经发生两起劫机事件，因此确实感到安全检查颇为“异常”。乘客小有抱怨，我们调侃说：怕的是遇上的劫机犯不仅和你同机，还坐在你旁边呀！慢点就慢点吧！

来自中国民航总局的消息说：根据当前劫机事件频繁特点，该局已研究决定，飞往东南沿海航线的各航班，将对旅客大件托运行李实行部分开箱抽查，对旅客随身携带的小包，则实行百分之百的开包检查，并禁止旅客随身携带任何刀具登机。总局已严令各级领导切实加强对机场、航空公司的督促、检查，以堵塞漏洞。由于大陆民航方面坚决采取反劫机措施，今年以来也有歹徒劫机阴谋

被挫败的。如若不然,危险还将增加,而劫机事件将远超过目前"纪录"。

据悉,民航总局对今年以来发生的几起劫机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已给予警告、撤职、开除等处分。

消息又说,中国民航各公司将加强空中反劫机力量,采取足以制服歹徒的严厉措施,如给机上安全员配备既能保证飞行及旅客安全,又能制服歹徒的特种配备。

民航总局负责人则希望通过新闻界向广大旅客致歉,他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为切实保证中外旅客的飞行安全,将不得不暂时对飞往或飞经东南沿海的各航班予以特别检查,请广大旅客予以谅解和配合。他强调说,对于制止劫机事件的一再发生我们是十分重视的。我们认真检查了工作中的疏忽之过,并据此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强化措施。纵观今年几起劫机事件,尽管一些劫机罪犯慑于大陆机场较为严密的安全检查措施,已不敢携带枪支、爆炸物或管制刀具登机作案,但是,单靠加强安全检查是不能完全防止劫机犯罪阴谋的,地面安全检查以及空中加强反劫机措施,并不是釜底抽薪的最有效方法。关键的问题,还在台湾遣返全部劫机犯。

大陆官员的这番话是不是有道理呢?台湾基隆市商界人士刘长远在台湾报纸上撰文说:"如果劫机原因都要归之于大陆安检疏失,那么请问,为何这些劫机犯都要飞来台湾,不飞日本、韩国或其他国家甚至美国?""再者,几次劫机犯使用的都是假爆裂物,甚至是小刀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是一般安检等措施所能查出的,怎么能责怪大陆安检不彻底,难道非要大陆民航严格到扰民的地步,才行吗?"

制止两岸间频繁发生的劫机犯罪事件,是不是真的很困难?解铃还要靠系铃人!

解决两岸间频繁发生的劫机事件其实并不难。台湾方面需要采取的措施简单而又便捷:只要将多起劫机事件的全部案犯送回大陆就是了。当然,如果在遣返之后再发表一个公告,说明今后劫持民航客机飞去台湾的,都将照此办理,而大陆方面也给予大力配合,将台湾的声明和遣返实例在大陆新闻媒体上好好宣扬一番,则大陆一切凶狠愚蠢之徒在采取危害极大的劫机犯罪行为之前,敢不好好掂量掂量么?

行文至此,似乎有必要再引用些台湾报纸的文章。

一、海峡两岸间劫机"闹剧"不断,谁是"系铃人"?

台北市文化工作者李所思在台湾《联合报》上撰文指出:"现在大家很气,恨不得立即把劫机者丢到海里去。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我们鼓励了大陆人四十年的结果呢?广播、奖励、欢迎,然后是轻判、宽纵、真'说'要判刑十年,是最后一年的事。那些消息不灵通的人还跑来,要怪谁呢?"

二、搞清了谁是"系铃人",也就搞清了谁该当"解铃人"。

"为釜底抽薪计,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把劫机犯遣返大陆——让他们断了留在这里的心。"台湾宜兰市商人李兰以《遣返劫机犯,天空才能安宁》为题,在台湾报纸上指出,"吾人深信,唯有让这些亡命之徒确知劫机一样得面对被遣返的命运,则两岸民航空域方得安宁。"

11月18日,有消息自台湾来,台湾当局经过连日跨"部"会议,台湾"行政院反劫机政策处理小组"召集人吴伯雄终于宣布,台"行政院"已决定遣返劫机犯,以杜绝劫机犯可居留台湾的诱因。至于遣返的时机、方式,将由海基会和海协协商后确定执行。

据台湾报纸称,吴伯雄18日对记者说:"目前,劫机者在他们服刑期满后可以呆在台湾,我们必须停止这种鼓励行为。"

不过,这决定似乎还有"羞羞答答"之处:对劫机犯应立即遣返,还是在台湾服刑之后再遣返,台湾当局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总之,台湾当局时时忘不了的就是他们的"司法管辖权"。

福建厦门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台湾法研究室副主任陈动认为,要彻底解决大陆劫机犯问题,台湾方面非得尽快放弃"人机分离"原则,在遣返这一议题上"一步到位"。非如此,便不能杜绝大陆劫机犯的侥幸心理。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台湾当局难道还不肯从以往的事件中汲取教训?还不肯为两岸的民航安全真正出把力么?

两岸同胞,到底该怎样向劫机犯说"不"?

材料四　最新的喜讯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南京至福州航班昨天夺功挫败了一起图谋劫机案。

11月26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福克100/2231号飞机执行南京——福州航班任务,途中遭歹徒高光凯劫持。机组在确保旅客和飞机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密切配合,机智、沉着、果断地挫败了歹徒劫机的图谋,随后顺利地将旅客送达目的地,保证了旅客和飞机的安全。

劫持飞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司法部门将依法予案犯以严惩。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背景介绍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1月2日在全国各地发行。这本《文选》按年月次序辑录了邓小平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10日年间的重要著作119篇，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为开卷篇，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为全书的结束篇。《邓小平文选》前些年已出版两卷，即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和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这两卷再版时，将分别改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一卷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著作。第二卷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以前的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时期的著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很大一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以前发表的也有许多根据当时的记录增补了新的内容。中共中央于1993年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报告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党中央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努力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把十四大提出的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认真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决定》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第二卷相衔接，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这一战略任务，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我们认清大局，坚定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做好各项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决定》要求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结合经济建设等各项具体工作，努力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时间跨度是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十年，同时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益丰富、完善和继续发展的十年。因而这本文选内容丰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性。《邓小平文选》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概念。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关于于捉住时机，加快发展，争取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对自我的封闭和孤立；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制止动乱，防止和平演变；关于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关于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把共产党内部搞好；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还有其他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1975—1982年卷一起，集中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材料：

- 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

材料　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日　江泽民）

同志们：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经出版并且开始在全国发行。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今天又组织这场报告会。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决定，把这件大事抓好。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全党认真落实十四大精神，学习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正在

逐步深化，现代化建设正在又快又好地健康发展，全国形势总的是好的。在前进中，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党同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

邓小平同志的文选，前些年已经出版两卷。第一卷即1938—1965年卷，是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即1975—1982年卷，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以前的著作，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著作。现在出版的第三卷，是1982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主要著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以前发表过的也有许多根据当时的记录增补了新的内容。1982年以来这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十年，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不断积累经验的十年，也是经历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局势巨大变动的十年。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是这十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三卷《邓小平文选》是一个整体。这次出版的第三卷同十年前出版的第二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它立足的基础是党和人民的崭新实践，它的光辉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在我们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15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有了这面旗帜，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一个有5000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15年来，正是由于我们举起这面旗帜，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道路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干下去，一直干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新的事业，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国家也没有干过，在开创全新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也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为坚持这条思想路线提供了光辉典范。我们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要牢牢把握这个精髓，紧紧抓住这个实质。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紧紧抓

住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中国共产党立党的宗旨和治国的目标，从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并进而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强调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强调改革是又一次革命，主张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和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反对腐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都是为了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我们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提高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穷国，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的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的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强调一定要实行对外开放，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搞成封闭的国家，同时又强调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同志作了科学分析，要求我们冷静沉着，把握住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就是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责任，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责任。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必须紧紧抓住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领会关于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论述，关于维护国权、国格的重要论述。关于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的重要论述，关于中华民族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重要论述。受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的伟大精神动力。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百折不挠地把我们的伟大民族振兴起来，只要中国的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同志们！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他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艰辛的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的鲜明的革命风格。他尊重实践，思想敏锐，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膊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签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意志坚强，行动果断，总是要求全党“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大力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同志们！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深刻理解和把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全新

事业中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基本路线，一定会使我们全党同志更加充满信心，更好地完成90年代的任务，胜利地迈向21世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尾的两句话是："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同志这两句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凝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要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就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本领、建设本领和治国本领。今天，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形势，要求我们勤奋学习科技知识、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更要求我们潜心钻研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孜孜不倦，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我们党历来极为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运用。这次中央决定分期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坐下来认真地系统地研读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是为了更好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高级干部，进而带动全党深入学习。学习一定要认真组织，领导带头，决不能因为日常工作而有所放松。学习中要总结经验，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我们要通过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大大增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和创造性。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当前，全党正在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宏观调控，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正在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与廉政建设，狠抓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证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在这样繁重的任务面前，全党一定要认真学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统揽全局，更好地处理党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中，必须牢牢记住党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因为在前进中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受到"左"的、右的干扰而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所动摇。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借改革开放为名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使中国全盘西化，是决不允许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拿大帽子吓唬人、迷惑人，也是决不允许的。大力加强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我们的的党、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

同志们！党中央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努力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把十四大提出的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认真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一致，扎实工作，艰苦创业，奋勇前进！

（选自《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

风云人物

侯宝林

侯宝林（1917－1993），中国著名相声艺术大师、语言大师。他为我国语言艺术和相声艺术宝库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1993年2月4日在京病逝。

材料　继承恩师遗志、振兴相声事业

侯宝林大师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杰出的艺术家。他用相声艺术影响着几代人，他所取得的成就在国内外、行内外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侯宝林的名字将永留青史。他的音容将永远留在人民群众中。

侯宝林大师的一生是鞠躬尽瘁的一生。他自觉地打起相声改革的大旗，迎着重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坎坷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为相声艺术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他为提高相声的品位、纯洁相声的语言、丰富相声的表演、为丰满相声的形象呕心沥血。他的一件件不朽之作，一篇篇精辟的论述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结晶，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遗产。

侯大师安息吧，我们将继承你的遗志，努力实现你的遗愿。

我是侯大师的弟子，追随他37年。我不断地聆听他

的教诲，目睹他对相声艺术的忠贞和不屈不挠的求新精神。我看到他为提高相声艺术的品位，为维护相声艺术的尊严，同形形色色的思潮作过不懈的斗争。我也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位艺术家忠于事业的高尚情操。侯宝林先生生前有一名名言：相声演员决不是生活中的小丑。这是一句通俗的话，但又是包含哲理的侯大师艺术思想的精华。侯大师在舞台上塑造过许许多多人物形象，从《夜行记》的小市民到《离婚前奏曲》那个玩世不恭的主人公，从《三棒鼓》的江湖艺人到《戏曲杂谈》的戏曲专家，一个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侯大师在生活中端庄严肃、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他刻画人物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那些艺术形象、生活形象混淆，台上台下不分的人是侯大师一生所反对的。"侯派"的相声艺术，可以用"清新文雅"来形容。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给予过高度的评价，广大的观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把相声和侯宝林划等号，这对侯大师来讲是当之无愧的。回顾今天舞台上，我们感到大有净化的必要，低级趣味，爸爸儿子的笑料，打打骂骂的表演，庸俗扭捏的动作，加上为唱而唱，为笑而笑的手段，都是与先辈这些主张相违背的。侯大师病重说话已经很吃力的时候还在嘱咐我们：那些扭曲的表演不是相声。侯先生给我们难忘的教诲是：古为今用。他的古为今用当然是个继承传统的问题。他要我们珍惜传统，尊重传统，反对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他告诫我们，传统是财富，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后人不尊重传统，就是不尊重科学。当然，侯大师说的古为今用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说在继承传统上还要追求创新。他认为相声如果不结合现实，不踩着时代的步伐就没有生命力。因此他在改编传统节目的时候，始终贯穿着这一指导思想，并获得了成功。如《戏曲杂谈》是一个杂学唱的段子，通过学唱表现演唱的才能，而侯先生不是在唱本身下功夫，而是串上一条戏曲博士的人物线，时代突出了，思想深度也有了，艺术感染力增强了，因此它的生命力就更强了。《改行》也是一段学唱的段子，加上一条对封建统治者揭露的思想线，提高了《改行》的人民性，至今听起来仍有现实意义。《三棒鼓》学评剧、相面、阴阳五行等等，凡是经过侯大师整理改编过的，无一不是注入了时代感，增强了它的生命力。

侯先生还强调相声中即兴发挥的技巧。他在病床前曾经告诫我们"现挂"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多年的舞台实践中也体会到了即兴发挥的重要，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观众想什么我们说什么，每到一个地方，用当地方言说上几句，都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相声的主要技巧我们应该继承、发扬。侯大师对艺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是对艺术负责，实际上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一个演员要保持艺术青春，就要严肃认真。大家知道，侯大师的拿手活《戏曲杂谈》、《戏曲与方言》、《关公战秦琼》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但每一次上台，尽管这么熟练的段子他都要进行排练。每一句台词的语气，每个动作的深浅，他都不马虎。想到我们今天，多少演员台上白话，没有准词，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今天好作品不多，演出质量不高，当然跟台上台下都不认真严肃有密切的关系。

侯大师在临终前还说："有人说相声让小品压下去了，我说压不下去。相声有着好的传统，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有它独有的技巧，是任何形式都代替不了的，但是相声也不该是今天这种样子，它被扭曲了。"现在回顾一下现实，确实是大师所指出来的现象。由于相声没有科学的教学方法，因此也就没有一种科学的辨别好坏的标准。这就造成一部分人的误解，认为相声是非常好说的，耷拉脑袋就是一个演员，会说一个段子就可以去挣钱，上一回电视就成了相声家。这一深受各行各业喜爱的艺术形式，又是那么带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说唱艺术，为什么提高如此缓慢，新人那么难见，创作人才那么稀有；而这支队伍又那么涣散，多少人因为目前的不景气失去了信心，改行去演小品，小品不行又改行去演电视剧……本来应该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而今天的事实却不很尽如人意。难道侯宝林大师的临终教诲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春节前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几台相声小品的专场和大奖赛的节目，用观众的话说，除去穷逗没有点真东西，我们作为演员非常难过，我们多么希望新闻界、理论界、电视台给予我们大力帮助，扶正压邪，恢复相声的本来面目。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支援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从培养新人开始就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有一个研究的机构，总结研究出相声艺术的真正规律来，以实现老师们的遗愿。

我呼吁相声界的朋友们，同仁们，为振兴我们的相声事业，向前辈学习，像先辈一样贡献我们的才华。

（马季）

冯　至

冯至（1905—1993），中国著名诗人、学者。生前曾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重要职务。在现、当代文艺、文化学术方面贡献颇多。不幸于 1993 年 2 月 22 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 87 岁。

材料　著名学者冯至在京逝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一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和德语文学专家冯至同志因病于199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冯至同志1905年9月17日生于河北涿州，原名冯承植，字君培。他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0年赴德国留学攻读德国文学，兼修美术史和哲学。1935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翌年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抗日战争期间，随同济大学内迁昆明，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1946年他回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解放后，冯至参加了首届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理事。1951年起，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78年起，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79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和1983年分别当选为第五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冯至因年迈不再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

冯至同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文化学术上的建树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从20年代起，就积极投身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诗歌创作，创办或参加多种新文学社团，其中1925年与杨晦等人创建的沉钟社，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本人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散文朴实、清新、隽永。他主要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有：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和《立斜阳集》和散文集《山水》、《东欧杂记》等。·

冯至在中外文学研究上同样贡献卓越。他既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又精通欧洲文学。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杜甫传》、《诗与遗产》、《论歌德》和《冯至学术精华录》等。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均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青年时代起，冯至就积极将德语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冯至在诗歌创作，在德语文学研究、教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国际性的肯定和赞誉，他先后被聘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院士、原联邦德国美茵茨科学院院士及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他还曾获得原联邦德国歌德学院1983年度歌德奖章，原民主德国高教部授予的“格林兄弟文学奖”，原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海德堡大学授予的“金博士证书”，并获得原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和达姆施塔特德意志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予的“弗里德里希－宫多尔夫外国日耳曼学奖”。1987年他以获得的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所授予的艺术奖的全部奖金设立了“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

作为教育家，冯至同志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了很大贡献，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德语语言文学人才。

冯至同志治学态度严谨，为人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上他艰苦朴素，不搞特殊。

冯至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

荣　毅　仁

荣毅仁（1916－　　），在中国乃至世界，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曾是著名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国工商联主席等重要职务，最近又在11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1986年，美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组织专家评选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

材料　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

荣毅仁出身于中国工商界有名的荣氏家族。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荣氏企业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7年，21岁的荣毅仁在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学业期满，怀着振兴民族工业的热望，来到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1945年当他出任这家公司的经理时，他的履历表上已经留下了他曾兼任的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等一连串记载。

这位年轻有为的实业家在民族危亡的国度中开拓，在官僚资本的重压下进取。他的活动舞台正是处于大变动的中国社会。

1949年初，中国大陆面临全部解放，不少富豪大亨离土而去。荣氏父子心情也很复杂。荣毅仁夫人杨鉴清托人在香港租好了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

但是，这位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却留了下来。

荣毅仁回忆说：“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了上海。当时我33岁。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

看，看到解放军战士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

国共两支军队的比较，使荣毅仁感喟良多；而新旧两个社会的比较，更使荣家耳目一新。

当时企业复工困难重重。中央派来的陈云、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帮助解决原料、市场问题，使工商界的心情逐步稳定下来。

1950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荣毅仁就改进税收工作，调整税率等反映了工商界的意见，党非常重视。

政治的昌明，社会的兴盛，使荣毅仁受到巨大的触动，他很庆幸自己和父亲当初的选择。他从开始消极的"留存者"变成了积极的"建设者"。他放弃了不问政治的态度，频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荣毅仁又一次表现了审时度势的睿智，他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生产资料和他所辖的工商企业，在他的带动下，中国民族资本家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

1957年1月，上海市召开二届人大一次会议。

人代会表决，选举荣毅仁为上海市副市长。

1959年，荣毅仁奉调北京，任纺织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荣毅仁这种"天生的""走资派"，首当其冲地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1979年，邓小平找到了荣毅仁，希望他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出谋划策。

不久，他就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荣毅仁搞经营，一贯讲究创新。

80年代初期，我国22项重点工程之一，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品，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提出向海外发行债券，并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

1981年，中信率先在北京打响了租赁业务的第一炮，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进汽车各200辆。中信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不到两年时间，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租金。

自此，租赁业务在中信发展成为一大系统。

"发展企业集团"是中信公司业务拓展所提出来的新构想。1987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正式同意成立中信企业集团，授予中信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重大项目的审批权。

自此中信集团业务由原来的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专业功能，向多功能、综合性的方向演化。

这就是荣毅仁领导下的"中信"。

荣毅仁今年77岁，却仍是风采依然。满头银发、金边眼镜、法国式双排扣西装，1.8米的个头，气宇轩昂，雍容大度。

现在，中信公司总部从著名的"巧克力大厦"搬到京城另一高层建筑京城大厦，荣毅仁新当选国家副主席，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他一定会为人民再作新贡献。

晓雪

马 俊 仁

马俊仁(1943—　　)，田径"怪杰"，刮起世界田坛中国风的"马家军"的著名教头。他所率领的"马家军"在斯图加特、在七运会上、在西班牙频频摘金，连连破记录，使国人、世人为之刮目。

材料　田坛"怪杰"马俊仁"出身"中学老师

今年方到"知天命"之年的马俊仁，长得平凡极了，唯有那总是嘶哑的嗓子，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饱经沧桑"这个词。

一个从未当过运动员的中学老师竟有如此惊人之举，多少使人感到惊异。

他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

1970年，马俊仁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进辽宁鞍山市师范学校体育短训班学习了8个月，之后分配到距市区20多公里的新成立的55中当体育老师。

学校建在乱坟岗上，条件可想而知，但马俊仁还是干出了不少名堂，特别是女子中长跑在鞍山市颇有名气。没过几年，55中就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学校。有同志对他说："小马，我看你搞中长跑有点办法，你应该集中精力抓，相信会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马俊仁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之后他调到市内67中，就全力经营女子中长跑，而且成绩居然比市体校的学生还好！这无意中触到一些人的"敏感处"。

马俊仁憋了一口气。

1982年，机会来了，他的队员打破了3000米的省纪录。省体委破例调他来试训，准备参加来年的第5届全运会。那年冬天，马俊仁带队员练得很苦。当时日本有个世界最好的马拉松选手，名叫增田明美，月训练量达到930公里，而马俊仁的队员王丽却达到了960公里。

谁知临赛前一个多月，王丽患了胫骨前肌炎。马俊仁找来一只塑料桶，每天为她热敷，炎症逐渐消失了。在上海嘉定决赛时，王丽前30公里一直领先，可接着脚后跟

腱就磨穿了，血汩汩地流了出来，王丽坚持到比赛的终点，便一头栽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跑鞋，鞋、袜和脚粘在一起，只得用剪刀铰开。

那次比赛是典型的“苦菜花”，王丽只得了第9名。

赛后分析失利的原因，是当时恢复性措施跟不上，长时间热水浸泡把脚后跟老茧泡酥所致。

当时马俊仁觉得丢尽了颜面，眼前晃动着的尽是血、血、血！回到招待所，从不轻易流泪的他，却一头扎进被窝，号淘大哭。

马俊仁消沉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捣腾起君子兰。鞍山市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盖起一座花房，里面找得着全市最名贵的花卉品种。

钱是挣了不少，可马俊仁心却是空落落的。他发现自己只有在田径场跑道上的时候，才是最踏实的。

他重新回到了跑道。

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疯了。

马俊仁却说：“这时候哪怕你告诉我说，有一笔买卖只要去就能挣10万元，但我宁愿不去也要搞我的中长跑，而且绝不后悔！”

1986年，马俊仁带的队员在省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

他重新站起来了！人们再次认识了他的价值。第二年，鞍山市体校正式调他任教练。

直到这时，马俊仁才告别了头尾17年的中学体育老师生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教练生涯。

黑色的“死命令”

马俊仁不喜欢“谦虚”，有时自信得甚至有些狂。凡是他认定的事，只要干，就一定是最好的。

采访时，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就是要让五星红旗插在世界的最高峰。”

马俊仁曾对队员下过这样一道“死命令”：第一次比赛允许得第二，但下回还是这个比赛就非得第一不可。

他说，没别的，就是不愿看到自己的队员跑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

训练敢吃“螃蟹”

马俊仁的成功正是找准了大运动量与科学恢复的准星。国内有的教练不十分重视训练的恢复，有也只是大概齐。而马俊仁从过去的失败中认识到科学恢复的重要性。他自费上街购买了红外线灯管等设备，加上针灸等手段，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恢复手段。因此，马俊仁的队员很少有受伤的。一位前马拉松国手感叹说：“就我的亲身体会来说，干中长跑的运动员，只要经过长期的高原大运动量训练，几乎没有不尿血的。这真是一绝！”

当然，这也有马俊仁独特的科学进补的一份功劳。从1980年开始，他先后请教了20多位著名的老中医，研制成一种补品。5年来不间断的服用，使马俊仁的队员在大运动量训练后，能够得到迅速的恢复。

辽宁田径队领队孙玉森曾作过这样一个统计，马俊仁带的队员成才率在90%以上。这么高的比例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然而更为罕见的却是“马家军”从800米至马拉松，人人兼项的做法。

这至今仍是个谜。马俊仁所能点到为止的就是，将有氧训练和无氧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马拉松训练提高耐力，促进中长跑的耐力水平，利用中长跑的速度和技术提高马拉松的水平。这与传统的中长跑只强调力量，马拉松只注重耐力的训练方法截然不同。

世界田坛为之瞩目。

“魔鬼”的“双刃剑”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马俊仁每破一项亚洲纪录，就有管理的一份功劳。”

乍听之下，我也觉得没什么新鲜的，但采访之后，感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不一样”便是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这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有效的管理。

凡有比赛，“马家军”的姑娘总是很好认，一式的中学生男孩般的短头发。还有清一色的运动服，哪怕是平时也是这样的。

生活上，马俊仁很善于“小题大作”，怕的就是队员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

马俊仁最恨队员早恋。原来有个队长年纪才18岁，1989年二青会时曾拿过1500米的铜牌，是公认的好苗子。但是她偷偷谈恋爱，而且还影响了好几个队员。

几次批评无效后，马俊仁执意“挥泪斩马谡”。他说：“我砍了这一个，可能会出来10个，要是这一个不砍，哪一个都出不来！”

在训练场上，马俊仁是个“魔鬼”形象，队员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笑脸，也没少挨过他的骂。

但队员却都服他。为什么?因为马俊仁掌握着严格管理和关心队员的“双刃剑”。

队员刘丽的哥哥患了败血症，马俊仁比自己的儿子得病还着急，忙前跑后地又是安慰又是寄钱。最让队员感动的是，教练时时刻刻地算计着她们比赛的名次，好长工资。就连上不了场的小队员都安排好了。

可刚建队时，马俊仁自己的工资却常常分文不拿回家，都用来改善队员的营养进补了。再说每天夜里熬药熬到一点多钟，凌晨4点还得起来热上，送到每个队员的房门前。这还不都是为了队员好?!

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队员慢慢也就理解了。一旦有了错，常常主动找教练认错。

田坛有杆"马大炮"这就是喜欢赛前跟记者"吹牛"的"马大炮"。这就是率领"马家军"如探囊取物一般破世界纪录的马俊仁。

（陈建华）

王　军　霞

王军霞（1973－　　）来自辽宁省大连市郊区农村姑娘，但她却一年时间内一鸣惊人，一跃而为亚洲田坛的佼佼者、世界田坛的长跑奇才。在斯图加特、在七运会上，在西班牙，她掀起了一阵阵中国潮，连连摘金，令洋人们刮目相看。

材料　风流人物看今朝

今年20岁的王军霞，来自辽宁省大连市郊区的农村。也许是祖辈们吃苦耐劳的品质遗传的结果，她从小就表现出了超凡的长跑天才。1988年，15岁的王军霞被大连市体校录取，在这里才开始了正规的训练。特别能吃苦的她，训练特别认真，成绩不断提高。1991年冬，她被辽宁省田径一队的著名中长跑教练马俊仁相中，进入省队。这马俊仁教练，本是一位对田径训练着了魔的"疯子"，他.搞训练有一套绝活，成才率极高。王军霞投师这位教练，真是如鱼得水，好不风光。

在马俊仁严格而科学的训练下，再加上王军霞本人具有身材匀称，跑姿优美等别人不具备的长跑天才，所以进步神速。1992年3月，她首次出国参赛，就夺得美国波士登世界越野锦标赛女子青年组的第二名。同年9月，她又在汉城举行的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中，战胜实力雄厚的肯尼亚选手，以32′20″90的成绩夺得10000米冠军。

初露锋芒的王军霞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比别人好的成绩，就必须吃别人未吃的苦。她坚持大训练量，每周训练达220公里，而且还尽力提高自己的连续作战的能力，四天内完成170公里的训练量。

王军霞的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世界第一流的。去年汉城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时，她跑完10000米之后，脱下钉鞋里面全是鲜血，实在令人感动。

血与汗的浇灌，终于结出硕果。今年4月4日，她首次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七运会马拉松比赛，在发烧37.5℃的不利情况下，仍然一鸣惊人，以2小时24分07秒的优异成绩跑完42.195公里的路程夺得金牌，并创造了亚洲的最好成绩，而且还比去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冠军的成绩快出8分34秒，终于从日本选手小鸭由水手中夺回了我国女子马拉松跑在亚洲的领先地位。不久，她又在6月上旬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先以31′08″42的成绩，打破女子10000米的亚洲纪录。接着，又以8′27″68的优异成绩创造女子3000米的亚洲新纪录。这个成绩，可排为去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王军霞就是带着这样一连串的闪光数字，满怀信心地飞到斯图加特，果然在高特列博一戴姆勒体育场上创造出了令人吃惊的佳绩。

8月21日，奇迹又出现了，中国姑娘王军霞和钟焕娣果然在10000米决赛中，夺得第一名和第二名。外国记者终于被马俊仁征服了，他们纷纷要求与马教头拍照，并连声说："OK，OK"！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军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威震亚洲田坛的佼佼者。斯图加特世界大赛，她又脱颖而出，创造佳绩，被誉为"长跑奇才"。一位世界田联官员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激动地说："王军霞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选手，从她在比赛中的实力和跑步的技术动作来看，还有巨大潜力。她已经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世界一流长跑选手了"。

接着，七运会上王军霞再显神威，击碎那些造谣中伤中国姑娘的人们的胡言乱语。

在9月9日的10000米比赛中，王军霞脚下生风，神奇无比，竟以29′31″74将世界纪录缩短了41″96，令世人惊叹。接着她又在1500米跑中，以3′51″92的成绩超过3′52″47的世界纪录。

9月12日，在3000米预赛中，王军霞仍然一身的火红，大放光彩，最后以8′22″62的成绩突破世界纪录。9月13日，是七运会田径比赛的最后一天，王军霞在3000米决赛中，以8′6″11的成绩将她昨天刚刚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打破。至此，她一人在三项比赛中，四破世界纪录，获得2金一银，不仅为七运会的田径比赛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已向世人展示出中国运动员将在世界田径大赛中领先的未来。

（小溪）

王　洛　宾

王洛宾（1913－　　），著名的西北歌王。他的歌曲《大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等广泛传唱于民间，其流传之广恐怕没有任何一首流行歌曲可以与之相比。今年十月，王老获得了第二届"金唱片奖"特别奖，可以聊以告慰这位80高龄的人民音乐家。

材料　王洛宾——西北民歌之王

●（记者）

▲(王老)

●王老,以往人们只知道您的歌,现在才认识您噢。

▲我跟朋友开玩笑,我是和陕西兵马俑前后出土。(都大笑)

●能谈谈您的经历吗?

▲我 1913 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26 岁离开北京,到现在已 50 多年了。1938 年在兰州我开始接触新疆民歌。当时,兰州有许多回族生意人。最早的十几首歌都是在兰州记的。要是没有这些新疆民歌,我不会去新疆。1949 年我进疆,原在新疆军区歌舞团,1988 年离休。

●王老,您获得了中唱总公司颁发的第二届"金唱片奖"特别奖,有什么感想。

▲这次获得特别奖,以及中央电视台在国庆文艺晚会上专门介绍我,这一切都不是坐着等来的,是拼博的结果。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母校。1987 年我的母校北师大为我举办了音乐会。

●您这么长时间被埋在"地下",觉得委屈吗?

▲这么说吧,我相信历史,历史跟气象台似的。新疆有句谚语:最大的岩石也是一粒粒沙子结成的。你不断地努力,每天做一点儿,到时候就非常可观了。我是有所等待、等待历史的公正。有所等待的人是很乐观的,要是觉得没希望了,那就躺下了,那将一事无成。

●王老,听说您在国外举办了几场音乐会,是吗?

▲是这样。1990 年新加坡音乐会,1992 年 2 月香港音乐会,效果都很好。在澳大利亚华侨音乐会上我也演唱了歌曲。在国外很多中国人都会唱我的歌,因为抗战时很多人流亡到海外,把歌也带出去了,像《青春舞曲》、《大坂城的姑娘》(边说边拍手唱了起来)。国外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吗,"地球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坂城的姑娘。"在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华人都会唱《大坂城的姑娘》。

新疆民歌之所以流传这么广,这里面有我的劳动,但更多的是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有一定的魅力。所以我们应该保留和发扬民族的东西。

●听说您跟台湾作家三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可以这样说吧,三毛来看过我二次。1990 年 4 月,三毛参加了大陆旅行团,到我那儿是为了送稿费给我。她对我一生的遭遇很感兴趣,问我有人给我写传没有,我说没有,还不需要马上写,我还要拼搏十几年呢!她说:那我先写吧。

1990 年 8 月她又来看我,跟我聊了一个礼拜,写作提纲很完整,就住在我家。

(1991 年 1 月 4 日,三毛在台北去世。王老很伤心,就在钢琴边为她谱就了一曲挽歌《等待》,现在台湾已发行。)

我比三毛大 30 岁,她有一种感情我不能接受,她很坦率地给我写了信。

●王老,几十年来,您一直没有署名权利,很多人知道您的歌却不知道您,您有什么感想?

▲我记得在广州举办音乐会时,有位教授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有一些作家,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熟悉他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大家都知道他的作品但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可能就属于后者。假如一首歌没署我的名字,但街上总有人在唱它,我一样会觉得很幸福。

我坐过监狱,监狱旁边就是一所工厂,工厂每天播放我的歌。我就对看守说:那不能唱,那是我的作品。结果看守认为我认罪态度好。通知人家不准唱,可人家照唱。(全乐了)

●王老,您现在有音带专集出版吗?

▲目前还没有,香港一个朋友拿走了我三年的版权,保罗·罗伯逊在莫斯科就唱过《在那遥远的地方》。日本《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不是好色吗,他也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抚掌大笑)

●王老、您在培养新人方面有什么打算?

▲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她在乌鲁木齐教二十多个孩子弹钢琴。我想用很少的钱办一个幼儿音乐培训中心,需要 10 个琴房,10 架钢琴。将来,也就二三年后将培训中心发展成幼儿艺术团。尽量让这些孩子能够引导更多的孩子走向美。美在今天是无形的,将来就会显露出来。

●王老,人们称您为"西北歌王",您的歌为什么这样广为流传。

称我为"西北歌王"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以我一生对民歌所付出的劳动和现在占有的资料,暂时我还可以担此名。我家中有上千首旋律。

至于说我的歌为什么这么容易流传,这是秘密也不是秘密。假如我要写黄昏,而我本子上记载了上百首有关黄昏的描写。我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首。精雕细刻,把它变成艺术品。秘密就是我已淘汰了 99 首。我不过是年纪大,跑的路多,记录的东西多。你们认为我这个"厨师"手艺好,我手艺不怎么样,我的佐料多。

▲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最近出了两本钢琴伴奏的英汉对照歌集《在那遥远的地方》、《丝路情歌》,已经卖完,销往二十几个国家。我现在正在出第三集。估计能出 20 集。都是新疆民歌。我准备把一生收集的民歌全部整理出来。

▲王老,虽然您经历了很多磨难,但看得出来您是很乐观的。

▲"文革"中我坐了 15 年监狱,没什么遗憾。要是不坐监狱也可能写不出这些东西。我还有一个故事给老同学说了,他们都直掉眼泪。在监狱时,星期天早上把一天的三个窝窝头都一次发了,而且不用劳动。我就把窝窝头送给民歌手,他就唱我就记。后来写的《带血的项链》获得

1988年全国歌剧会演二等奖。这个歌剧有五、六十个唱段，都是用窝窝头换来的。

我曾经是丁玲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个文工团“西北战地文工团”的成员。其实，待遇、职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唱我的歌。

●王老，您能把为三毛写的那首挽歌《等待》告诉我们吗？

▲得，我给你们唱一唱吧！

你曾在橄榄树下
等待再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
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请莫对我责怪
为把遗憾赎回来
我也去等待
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
你永远不再来
我永远在等待
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老人双手合十，泪已盈眶）

顾　城

顾城（1956－1993），“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黑眼睛》、《雷米》、《城》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西、瑞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材料　顾城斧索写悲歌

童年的一个梦

顾城的童年生活在一个迷幻的世界里。

他生在“文革”当中。12岁那年，有一天，当一辆破旧的卡车把他们抄家后的残破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溢满迷惘。

他和父亲被放逐到山东昌邑县的一片土地上放猪。那里人烟稀少，一大片荒凉的白碱地就是他的世界。

那个时候，一种独特的生命感受在他的体内苏醒了，升华了….此后顾城一直没走出这个世界。

17岁返回北京，正步入青年的顾城突然失落了自己。在大群的城市人里，他第一次感到了尴尬。他不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沉湎自然的顾城因此而变得腼腆寡言。

他因此想抓住一个人间的事物，来避免生命的错乱。像许多人一样，他退到书里，企望用知识和历史来抵抗陌生的现实。

这个时期他把梦想带回现实，不停地写诗，有时一天写二、三十首。

他的“超凡”意识似乎注定要导致一个可怕的局面。其实，在《英儿》这部手稿里，早已昭示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在朋友中间，也早已萌生了这一不祥的预感。

奥克兰的小岛

为寻一个梦，6年前，顾城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1987年，作家王安忆在柏林见到了顾城。他腼腆地站着，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统的布帽，一如流浪着的牧羊人；而他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好像随时都要开拔。

终于有一天，在新西兰，在距奥克兰城不远的小岛上，顾城找到了他的人生归宿。

那是一片原始丛林，原始丛林中的一栋老房子就是他的家。

登上小岛那天，顾城对妻子雷米说：“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准备过这样的生活，现在我终于跨过了这个世界，到了我要到的地方，我的生活开始了。”

这是怎样一种生活呢？

没有水，没有电，甚至没有现代文明，所有的钱都付了房租。两手空空的顾城除了在大学里讲点课，只有整日整日地在森林里来回走，寻觅可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改变了嘴唇的颜色。

这种生活并没丧失顾城生活的信心，他在山坡上筑起一条滚石道，把采集来的石块运下山，垒成墙。

鲁滨逊式的生活使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

在这里，雷米为他生下一子，取名桑木耳——当地语为“圣徒”。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

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方式，使顾城的恋情多了传奇色彩。

他与妻子谢烨（即雷米）是在火车上邂逅的，并进行长达5年之久的恋爱。

婚后他们有了个小小的家。家很小，只能摆下一床一桌。但他们很喜欢，喜欢拉着手跑回童年的山上，喜欢从落叶中发现两片同时落下的叶子。此时，顾城给谢烨改名雷米。

出国之后，两人虽一贫如洗，但继续用梦境描述生命。

顾城因小时大脑受过刺激，情绪易走极端；雷米则温柔、宽容。两人仍不失和谐。

在奥克兰的小岛上，两人一起采贝养鸡，饮雨水食野果，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当儿子桑木耳长到两岁时，顾城与雷米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

顾城的理想是把世外桃源进化为太虚幻境，像孩子一样新鲜地看着这个世界，安静地放弃一切希望；而雷米却一步步走入现实生活，频频往来于岛民们之间。

顾城不由想起英儿，那个出国前就相识的一度崇拜他的女孩，而此刻英儿也陷入了一种绝望的相思之中。英儿绝望的情诗同样打动了雷米，深爱顾城的雷米便以自己的名义做担保，为英儿买了飞赴新西兰的机票。

出乎顾城意料的是，英儿再也不是三年前那个纯情女孩了，她的到来，反而使雷米更加世俗化。他们一道去小镇打工、购物……使顾城陷入更深一层的绝望之中。也许世人永远无法走到顾城这种把生活等同于艺术的沉湎方式。

令顾城略感欣慰的是雷米与英儿之间的依恋之情。尤其雷米和英儿一起生活的和美场景，使他仿佛看到了童年的梦幻。

这种反常的情爱心理使顾城时时走向极端。他无法摆脱少年时对女性遥远的崇拜感，却又无法消除强烈的欲望。

最后，英儿终于跟一位异国老头走了。

到德国写完《英儿》这本书，顾城又怀念起海岛的生活。今年九月份他们重返新西兰。

然而，等待这对年轻夫妇的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由于夫妻关系的紧张，10月初，雷米突然驾驶小汽车与顾城不辞而别。后经朋友劝助，雷米回头。然而，撕裂的伤口似乎一下子难以愈合。10月8日，雷米再度出走。顾城急追。激烈的争执发生在通往树林的小路上。就在顾城的情绪达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时，发现了把伐木工遗下的斧子。失控的顾城举起了板斧……

最后的挽歌

谁也预料不到诗人顾城会将那柄钝斧击向甘苦共患难的妻子雷米……那么五岁的儿子呢？意味着永远地失去了父母。

看着老诗人顾工寄来的他们三口的照片，我的心在颤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顾城走向残酷、走向毁灭呢？

——据其父顾工说，顾城童年时大脑受过伤，患了类似于癔症的一种病，发作时不可控制；

——顾城在追求一种超脱的宁静，当他得到时，却失望了；而绝对的超脱、绝对的宁静只有死亡；

——当然，也不排斥海外自由化生活对这位年轻诗人的影响，比如他对英儿的情感。

一代“朦胧”诗人如流星般刺破夜空、划过天际，永远地消遁了他的光芒。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将写下痛心的一笔。

（梦非）

邓朴方

邓朴方(1944—　　)，邓小平的儿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因为残疾人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康复国际15届、17届世界大会，先后授予他康复国际主席奖、亨利·凯斯勒奖。

材料　全身心投入残疾人事业

提起他的名字，有人想到的是他那特殊的家庭。

而众多的中国残疾人，是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残疾人事业，而由衷地喜爱他，信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他，则感慨他们这位刚刚连任当选的中国残联主席，选择这项最艰难，常不被人理解的事业。

今年49岁的邓朴方，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他因受“邓小平问题”的牵连，在“文革”漩涡中深受迫害，不幸造成脊柱骨折，高位截瘫。至今，他的脊柱里仍打着钢架，80%的皮肤不能排汗……可是，当有人说太坎坷太不幸时，邓朴方却讲：我再艰难，同全国5000多万残疾兄弟姐妹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是对残疾人痛苦的深深理解，对残疾人事业的热爱，1983年，邓朴方投身于残疾人事业。次年3月，他发起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他呼吁全社会发扬人道主义，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为残疾人教育、康复就业问题到处奔走；1988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会同政府和有关方面，制定《中国残疾人事业5年工作纲要(1988—1993)》。今天，90余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32万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得到矫治、3万多聋哑儿开口说话，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校生，超过了我国自有特殊教育以来百余年的总和……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时，人们明白，这中间倾注了邓朴方的全部心血。

不久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邓朴方：你的父亲是否对你所从事的残疾人工作，给予了很多关照？邓朴方说：我的父亲很关心中国的残疾人。不过，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正是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他坐在轮椅上，到过全国20多个省市，看望走访了困境中的残疾人；他一次次婉言谢绝新闻界的采访，只想多做一些；他鼓励参加国际比赛而没得金牌的残疾运动员：你们参与了，就是胜利。

1988年，为表彰他为残疾人事业所做的贡献，联合国授予他特别奖；1990年和1992年，康复国际15届年会、17届世界大会，又先后授予他康复国际主席奖、亨利·凯斯勒奖。

（晓媛）

珍闻轶事

一把无名火，满街荒唐人

时值初秋，西安的气温已逐渐转凉。可未曾料及，8月15日，随着古城东关一次“神火”的突然降临，一场自发的“祈药”活动却在此火爆起来。连日来，来自古城大街小巷以及周至、蓝田、长安等附近郊县的善男信女们，或呼朋引伴，或拖儿带女，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这一“神圣”的领地，以极其虔诚的心情祈祷菩萨显灵施舍，好为自己和亲属驱除病痛。于是，往日冷冷清清的大新巷，一时间香烟缭绕，人群摩肩接踵，闹得沸沸扬扬。

8月15日晚10时许，位于大新巷与龙渠堡交汇处的一棵直径约2米左右的唐代空心古槐腹腔突然起火，经消防队扑灭之后，次日凌晨3时、5时又先后两次复燃。16日上午，几位老太太前来烧纸烧香，说“神树”起火，本是“火龙”显灵，要普渡众生。这一行动立时招来几十名好奇者驻足围观。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客”越来越多，祈祷队伍亦愈来愈大。据东关南街办事处领导介绍，其间他们与派出所多次出面疏导干预，但每天拜谒者依然络绎不绝，最多时可达三五百之众。

24日下午，笔者专程去现场观察，只见20多米高的古树下聚集了百余人，几搂粗的树干被男男女女转得水泄不通。他们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左手捧着黄裱纸，右手不停地摸娑树皮，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随手带下的一些针尖大的褐色颗粒状“神药”抖入纸内。无缘靠近的，干脆踮起脚尖，伸手搓一下树干，再赶忙在自己脖颈上、肚皮上揉搓几下，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

在古树东侧，更是一番盛况。一座为树而设的约四五米长、两米宽的祭台上，烛光摇曳，香烟袅袅，祭台四周跪满了烧香拜佛的信徒。他们之中，有两鬓苍苍的白发老太，有秀发披肩的时髦女郎，还有不少十多岁的在校学生及年仅四五岁的幼童。他们或将点燃的香烛插于灰中，或直接掷往火堆使其燃烧。这些双膝跪地的信徒们虔诚得可爱，他们在烟熏火燎下，有的将裱铺在地面，双手在空中不停地划拨取“药”；有的把裱折成漏斗状，执于手中摇晃求施。一位颈系佛链、年约12岁的男孩，尽管被烟火炙烤得大汗淋漓，却还利用划拨间隙，不停地向“神灵”叩首。另一位怀抱幼童难以近前的中年妇人，伸手将“漏斗”置于香火上方，随之喃喃自语：“神爷爷原谅我，因为人多无法下跪，给我撒点药吧！”然而不知是“神”不肯领情，还是忙得难以顾及，反正喊了许久也未见个药渣渣。

那么，古树着火之谜到底作何解释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笔者特意走访了东关南街办事处、派出所及当地部门群众。绝大部分同志认为是由外在因素引起的，比如饮食个体户或附近居民将尚未燃尽的炉灰倾进了树腔，小孩子将点着了的废纸、枯枝等物投入树洞。也有人分析，这是附近下水道内长期聚着的沼气在一定条件下焚烧起来。还有人认为此属目前科学技术尚难以解释的物体自燃现象。笔者曾在树下及古树北侧6号后院一居民楼上作了详细观察，尽管树腔烧成了黑色，20米高的部分树冠也已烧焦，但从四五米高的树杈上横穿而过的几道胶皮电缆并无多大损伤，看来这些解释亦并非毫无道理。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之辈从中作祟，煽起迷信狂潮，以期达到某种目的。

大新巷“舍药”现象出现后，碑林区委、区政府及东关南街办事处、派出所领导十分重视。他们多次组织人员去现场进行说服、劝导和疏散工作，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介绍科学知识，并责成工商、城建及环卫等部门出面，取缔了无证摊贩，清扫了现场垃圾，沿古树周围砌起了两米多高的环形护墙。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祈药终于于8月25日落下了帷幕。

1993年12月青岛举办珍奇特报纸拍卖会，一张报纸二千元

由莱州市剪报中心和青岛集报小组联合举办的“珍奇特报纸拍卖会”近日在青岛安徽路公园收藏市场举行，来自青岛、莱州两地的集报爱好者、收藏品商贩以及部分新闻单位参加了这次建国以来的首次报纸拍卖会。

此次拍卖的报纸共有30多件，其中标价最高的是北京一位集报爱好者收藏的《浙江日报》（光绪三年，杭州出版），起拍价为2000元。起拍价最低的，报纸每张也在10

元以上，3份1992年出版的我国民间第一份手帕报——《齐鲁收藏报》，分别被3位集报爱好者以80元的价格买走。1993年9月出版的载有我国第一份报中异形喜报的《现代保健报》以50元的价格，被青岛一集报爱好者购走。1993年9月出版的《七运晨报》停刊号以30元的价格成交，"文革"期间的《青岛日报》成交价10元一张。

哑巴骗哑巴，骗走数千元

11月18日，一对聋哑夫妇心急火燎地来到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痛哭流涕地打着手势，用哑语向警方诉说日前被另一对哑巴男女骗走5600元的经过。

家住该市渊声巷的盛某夫妇是南京内燃机配件厂职工，现已内退。11月14日星期天，盛某在家门口偶遇一对约30岁左右的男女哑巴，七搭八搭竟交上了朋友。来人自称在深圳一家中外合资啤酒厂工作，此次专程来宁招聘残疾职工，待遇月薪8000元。盛某正为待业犯愁，能遇上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不能轻易放过。于是，他忙不迭将客人请进家门，央求帮忙引荐，去深圳特区发财。来人提出要预交3000元押金，另加飞机票、过境等费用共计5600元，盛某仿佛感到财神爷正向他招手，便一口应允。当晚，盛某夫妇热情招待，并留其住宿一夜。

次日，客人提出先乘火车去沪玩一天，再乘飞机赴广州，转道深圳。盛某表示赞同，随即将家中多年积蓄凑齐5600元交给来人。3人同往火车站，购了当日火车票，于16日凌晨抵达上海。

下了火车，当盛某从车站盥间刷牙洗完脸出来，却不见两哑巴踪影。此时，盛某方如梦初醒。不但5600元巨款被骗，就连随身带的衣物提包也被拎走了，急得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寻觅歹人，一整天在上海一些大街小巷转悠，可人海茫茫人哪打去！无奈，他只好悻悻回宁。

回宁后，夫妇俩匆匆奔往公安部门报案，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兴村）

两次跳进冰窟救起三名落水人

北京市公安局18日召开表彰大会，对破冰救人的公安干警杨道安进行表彰和奖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在会上同时对杨道安进行奖励。

12月5日下午2时许，29岁的公安干警杨道安与其妻子携孩子到北京团结湖公园游玩。突然，有两名儿童掉入湖中的冰窟窿里。杨道安发现后，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跳下湖救人。在齐腰深的冰水中，他用自己的双肘和前胸破冰开道近10米，同闻讯起来的一名公园管理人员一道，将正在冰窟窿中挣扎着的两名儿童救上岸。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杨道安刚脱下湿漉漉的外衣时，又听见有人高嚷："北湖有个妇女掉进冰窟窿啦，很危险！"杨道安迅即奔向北湖，仅穿着已被冰水浸透的内衣跳入湖中。他在冰中用双肘和前胸破冰开道近20米，将这名已冻僵的妇女托上了岸。北京市公安局决定给予杨道安记一等功，报请北京市人事局给予晋升一级工资，奖励500元人民币，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也给予杨道安2000元人民币的奖励。

"羊妈妈"喂东北虎，雪花飘飘虎婴"满月"

今冬，山东济宁雪花飘舞，人民公园东北虎幼仔近日在"羊妈妈"的细心喂养下，安度满月。

人民公园5岁的东北虎一个多月产下雄仔，管理人员依照温度低、天气条件差、母虎护仔能力差的原理，于是采取人工饲养的方式，买来两只奶羊，为虎仔提供鲜奶，一个多月来虎仔生长得很好，其中一只已满月，体重2250克。

《秋菊打官司》惹出官司

今年12月初，陕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鸡市）46岁的女工贾桂花，委托律师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状告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侵害其肖像权，要求被告从《秋菊打官司》影片拷贝中，剪除侵权镜头，在报纸上向原告致歉，并赔偿精神损失8000元。

贾桂花在诉状中称，"大约在1991年11月，原告在宝鸡市一家公司的门前买棉花糖，被《秋》剧摄制组偷拍了其肖像镜头。此片于1992年11月在宝鸡市公开上映后，经原告、原告亲友以及本单位看后，确认片中有原告肖像镜头，为正面半身像，画面大而清晰，约占银幕1/2强。被告作为高层次文化单位，又是拍摄宣传法制的片子，却未经原告同意，以盈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原告肖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许多麻烦和精神痛苦，经与被告多次协商解决不成，故诉诸法律。"

目前，海淀法院已受理此案，不日将开庭审理。

（李明俊）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1993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争论得最凶的恐怕就是《废都》了。贾平凹的这部小说有人奉之为“当代红楼梦”、当代“金瓶梅”，认为这是贾平凹的又一成功佳作；而有的则对之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一碗发霉的米饭”——一看就够，认为贾平凹推出了一部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在毒化读者；有的人则认为《废都》滋味难以一时定调，但其成功却完全是靠商业广告的……究竟谁是谁非，我们只有等待时间去检验它了。

而《北京人在纽约》却是获得一致好评的，自该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以来，反映一直很好，而它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亦随之而起，多次列入流行歌曲排行榜之首。

另一首使人听后倍受感动，倍觉亲切的歌曲就是李春波的《小芳》，带子一出，举国上下，皆哼曰：“村里有个姑娘……”，大约都市生活的人们开始回首身后，寻找某种恬然、安静，以对抗现代文明的嘈杂，所以“城市民谣”便倍受青睐。

1993年的服饰，春装流行夹克，秋装则斑斓多彩。

而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给人们奉上的精品《霸王别姬》。4月该片获得嘎呐电影节金棕榈奖，后在全国各地放映，评品自是纷纷攘攘。

这些——就是1993年流行的色彩。

小说《废都》

1993年轰动最大的小说当属贾平凹的《废都》。这部书在出版之前就引人注目，许多家出版社争要稿子；北京出版社在出版此书时，还第一次在书页上加上了防伪标记。

小说记叙了古城西安的“四大名人”——庄之蝶、汪希眠、龚靖元、阮知非和他们与众多人物之间的故事。小说以作家庄之蝶为主要人物，写了他与唐宛儿、柳月的爱情故事与缠绵经历。整部书以庄之蝶与景雪荫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中间还夹写了神秘兮兮的老岳母、具有哲学思维的奶牛等。最终，庄之蝶与旧情人景雪荫马上结婚又马上离婚，并下定决心要离开这古老的“废都”。

这部小说借鉴了明清话本小说在性方面的描写手法，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紧接着，一系列陕西籍作家作品出版，在文坛上形成了一股“陕军东征”的浪潮。这一现象，给沉默的文坛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活力，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

电影《霸王别姬》

1929年冬，北京。天寒日短，大风刮起，天色昏暗，像要下雪。

小豆子妈——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牵着豆子，走过热闹的天桥，走进关家科班院里。

小豆子被关师傅收留下来。

冬去春来。小豆子、小石头俩人在戏班里结为莫逆。小石头唱霸王、爆腔一吼、声震遐尔。小豆子唱虞姬，嗓音拔尖、袅袅娜娜。

老太监张公公欢庆五十大寿，召关家班子进宅唱戏。压轴戏就是《霸王别姬》。小豆子唱虞姬，穿得是千娇百媚，唱得是莺啼燕啭；小石头唱霸王更是八面威风。大受张公公赏识。

10年科班期满，两人都出落得堂堂相貌。

此后，小豆子艺名程蝶衣，小石头艺名段小楼，俩人涉世梨园、红遍京城。亦从此开始，段小楼涉足青楼，结识菊仙，而蝶衣却恋眷兄弟情谊，囿于角色之中。

一日戏罢，京城名绅袁四爷高谈戏经，欲留下程、段，笼为己人，但段小楼托故有事而别，程蝶衣不得已赴袁府，拜在袁四爷名下，并得旧日欲买的宝剑一把。

而段小楼却去了花满楼，救出菊仙。

蝶衣抱剑而归，去找段小楼，恰逢段小楼和菊仙结婚之喜。他掷剑而去。

戏院因故不能营业，程、段歇戏，程学会了抽大烟，后多亏程、段为宪兵唱堂会才得了“准业证”。

日本人投降，程、段合演《霸王别姬》慰问国军。兵痞闹事，蝶衣被押，承袁四爷从中周旋才得免受牢狱之苦。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一次正在戏中，蝶衣因抽大烟倒嗓，而这次得到却是掌声，而不是国军的谩骂与哨声。小楼不得不承认：“天下变了。”

袁四爷被宣判死刑，枪决。

蝶衣也戒了大烟告别了过去。剧团深入人民，唱各种喜闻乐见的曲目。

1966年。《十六条》播出后，蝶衣有如惊弓之鸟，预感着灾祸的来临。

段小楼被抄家。那把霸王剑也被小楼一狠心扔到火堆里了。就在这时，蝶衣却奋不顾身跳入火中把剑抱了出来。

红卫兵要他们互相揭发、蝶衣揭发菊仙是个脏货。小楼为不累及菊仙，声明要与她划清界线，菊仙惊疑，呆望小楼。

一阵疯狂的互相谩骂，揭发之后，小楼与蝶衣佝偻着回家，而屋里菊仙高高地吊在屋梁上，一身婚妆，死不瞑目。

文革后。夜深沉。北京最大的体育馆灯火已熄。两戏人相伴而至。看门人见是程、段，便乐呵呵地请进门去。

台上灯光大亮，《霸王别姬》奏响，小楼还挂着那把烧焦的霸王剑。剑影响翻飞唱着飘飘。唱至"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群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处，蝶衣从霸王身上抽出宝剑，现出决然姿态，那姿态与千古风流人物溶为一体，化为永恒。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姜文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新近在京上演后，反响甚巨，远在异国他乡的一家北京人的命运引起了大陆人的广泛关注。这是著名青年导演冯小刚的又一成功佳作。——

艺人——小提琴手王启明携妻郭燕前往美国，企图学习艺术，深造提琴。然而涉足纽约即为现实包围起来。为了获得出国的某些条件他们穷困潦倒地来到纽约街头。两人朝气蓬勃四处寻找打工机会。

经过一番磨难的王启明剪去一头艺术家的长发，决心潜心商事，搏他一回。他击败了郭燕的老板大卫，一大款诞生了，然而他和郭燕离了婚，他变得只认竞争，不认人情。只有在落难时帮助过他的阿春和他处得融洽至极。

后来，他把女儿从国内接到纽约，然而早熟的女儿却伤透了他的心，然后失踪了，而正因为他女儿，他和阿春好事难成，难结秦晋。

王启明差点败在大卫手下。幸运的是大卫只想和他联手击溃愚弄他们的"老狐狸"。

王启明在纽约终于站稳了脚跟，然而他到底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

歌曲《千万次的问》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Time and time again，you ask 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Time and time again，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Time and time again，you ask 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Time and time again，I ask 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Time and time again，you ask me，问我到底恨不恨你。Time and time again，I ask my－self.，问自己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

歌曲《小芳》

（李春波　演唱）　　李春波　词曲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多少次我回回头看走过的路，你站在小村旁。

1993年时髦春装茄克衫

近年，茄克衫已趋向时装热点，且逐年升温，特点是款式多变，四时出新，穿着随意，潇洒迷人。

茄克，别称甲克，或夹克，为英语 jake 或 jacket 的音译，是一种身长齐腰、前襟开门、下口紧束的短上衣。近些年，时装设计师又把它发展成稍长或较长的款式。结构特征是上身蓬鼓，没有下摆，腰腹紧束，长至腰臀，袖口收紧。通常分为拉链式、揿扣式和搭门式三种类型。夏装多以棉、麻为衣料制成单衣；冬季则可以尼龙绸、涤棉布、皮革、锦缎为面，棉絮、丝棉、驼绒、羊绒、毛皮羽绒或喷胶腈纶做衬里而为棉茄克。

·牛仔茄克中青年穿的较多，面料多为纯棉单色砂洗绸。齐颈圆领，开门襟，衣长至胸线以下，门襟用扣连接，户袖也用纽扣连接，袖稍肥，袖口及下摆用抽带束紧。宽松式，穿着与牛仔裤相配套。浪漫、奔放，稍带几分野味。

·雅士茄克白色纯棉或涤棉布经防水整理后制做。小圆角立领，翻开呈立式，开门襟，用小纽扣多枚连结。平户，袖在腕以上，袖口与下摆用松紧布束紧，衣上在腰线。造型素雅大方，适宜中年女性，尤为职业妇女所欢迎。气质内涵，端庄雅致。

·飞行茄克由军用飞行员皮茄克变化而来，造型比较传统，小八字领翻下，开门襟，暗扣，左右各一斜插暗袋，下摆至腰下，加边收紧，用双扣连结。袖口用边布加扣收紧，平肩，加肩带装饰。青年妇女皆可穿着。朴实而庄

重。

·中长茄克可夹可棉、雁翼领，开门襟，领可翻下，也可折起，用带束紧，门襟设暗扣，左右胸下各一加盖斜插暗袋，腰下各一大贴袋。平肩袖，袖口翻起。内套小立领围扣套头毛衣配灯芯条绒裤。防风御寒，款式潇洒。

·旅游茄克纯羊毛薄呢绒制做，肩胸及袖口，袋口用花呢装饰，小开领，开门襟，以四只钮扣连接，衣长至臀，下摆为敞开式，袖口用松紧布收紧，腰部也可用腰带束紧。适宜外出旅游活动，穿着豪迈自然。

·大衣茄克又称茄克大衣，为巴黎时装博览会推出的新款式，用翻革皮或鹿皮制做，大飞翼领，开门襟，衣长至臀下，下摆收紧，插肩袖，袖口以松紧布收紧，门襟以小金属扣连接。内套丝绒上衣，配毛呢过膝裙，束腰带。西欧风格，新潮款式。

历史档案

中国高层新阵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荣毅仁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　乔　石
副委员长
田纪云　王汉斌　倪志福　陈慕华（女）　费孝通
孙起孟　雷洁琼（女）　秦基伟　李锡铭　王丙乾
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　王光英　程思远
卢嘉锡　布　赫（蒙古族）
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　甘　苦（壮族）
李沛瑶　吴阶平
秘书长　曹　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总理　李　鹏
副总理　朱镕基　邹家华　钱其琛　李岚清
国务委员　李铁映　迟浩田　宋健　李贵鲜
　　陈俊生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彭佩云（女）　罗干
秘书长　罗干（兼）
外交部部长　钱其琛（兼）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　丁衡高
国防部部长　迟浩田（兼）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陈锦华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司马义·艾买提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王忠禹（维吾尔族，兼）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铁映（兼）
公安部部长　陶驷驹
国家安全部部长　贾春旺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朱开轩
监察部部长　曹庆泽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宋　健（兼）
民政部部长　多吉才让（藏族）
司法部部长　肖扬
财政部部长　刘仲藜
农业部部长　刘江
人事部部长　宋德福
林业部部长　徐有芳
劳动部部长　李伯勇
国内贸易部部长　张皓若
地质矿产部部长　朱训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吴仪（女）
建设部部长　侯捷
电力工业部部长　史大桢
文化部部长　刘忠德
煤炭工业部部长　王森浩
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　艾知生
机械工业部部长　何光远
卫生部部长　陈敏章
电子工业部部长　胡启立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伍绍祖
冶金工业部部长　刘淇
化学工业部部长　顾秀莲（女）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彭佩云（女，兼）
铁道部部长　韩杼滨
交通部部长　黄镇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李贵鲜（兼）
邮电部部长　吴基传
水利部部长　钮茂生（满族）
审计署审计长　吕培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　张　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　任建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张思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

主席　李瑞环

副主席　叶选平　吴学谦　杨汝岱　王兆国

阿沛·阿旺晋美(藏族)　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

洪学智　杨静仁(回族)　周培源　邓兆祥

赵朴初　巴　金　刘靖基　钱学森　钱伟长

胡　绳　苏步青　钱正英(女)　侯镜如

丁光训　董寅初　孙孚凌　安子介　霍英东

马万祺　秘书长　宋德敏

首届东亚运动会奖牌榜

	金　牌	银　牌	铜　牌	总　计
中国	105	74	34	213
日本	25	37	55	117
韩国	23	28	40	91
朝鲜	10	20	24	54
中国台北	6	5	19	30
香港	1	2	8	11
蒙古	0	1	16	19
澳门	0	0	1	1

宪法原文与修改后条文对照表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	“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第七条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第一款	“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第十五条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十六条	“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济管理的自主权。” “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济管理的重大问题。”	“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四十二条第三款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第九十八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七运会各代表团奖牌统计

国家体委10月9日正式公布了七运会各代表团奖牌统计。

名次	单位	金牌	银牌	铜牌
1	辽宁	65(18)	50.5(2.5)	48(5)
2	广东	31(1)	30(3)	29.5(3)
3	上海	29(2)	22(3)	16(0)
4	北京	21(0)	19.5(0.5)	24(0)
5	湖北	20.5(2.5)	15(2)	13.5(1.5)
6	河南	20.5(1.5)	9(0)	18(0)
7	江苏	20(1)	16(3)	17(0)
8	四川	18(3)	16(1.5)	22(0)
9	湖南	15(1)	19(4)	13(2)
10	解放军	13(0.5)	18(6)	10(1)
11	山东	12(0)	16.5(0.5)	19(0)
12	浙江	11(1.5)	10(1)	8(0)
13	福建	11(0)	4.5(0.5)	2(0)
14	安徽	11(0)	3.5(0.5)	11(1)
15	内蒙古	10(0)	13.5(0)	10(0)
16	吉林	9(0)	9(0.5)	12(0)
17	山西	9(0)	4(0)	3(0)
18	河北	8(1)	17(2)	12(0)
19	广西	6(0)	15.5(1.5)	10(1)
20	新疆	6(1)	3(1)	9(0)
21	天津	5(0)	14(1)	7(1)
22	黑龙江	4(0)	13(1)	12.5(0)
23	甘肃	4(0)	7(0)	5(0)
24	贵州	4(0)	3(0)	1(0)
25	江西	3(0)	4(0)	5(1)
26	云南	3(1)	3(0)	4(0)
27	陕西	1(10)	5(0)	5.5.(0.5)
28	青海	1(0)	1.5(0.5)	4(1)
29	前卫	1(0)	1(0)	3(0)
30	邮电	1(0)	0.5(0)	3(0)
31	海南	1(0)	0(0)	1(0)
32	石油	0(0)	1(0)	0(0)
33	西藏	0(0)	0(0)	1(0)
34	宁夏	0(0)	0(0)	1(0)
35	煤矿	0(0)	0(0)	1(0)
36	航空	0(0)	0(0)	1(0)

注：括号内数字为各代表团运动员在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第十六届冬季奥运会、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获得金、银、铜牌数和在第七届全运会上创、超世界纪录所奖励的金牌数。这些奖牌均计入七运会金、银铜牌中。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摘要)

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是中国第一大岛,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重新恢复了台湾省的行政管理机构。

海峡两岸中国人为反对外国侵占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

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于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57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踞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备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此后,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三、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点。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

(二)两制并存。

(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

这里还应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因此,台湾问题不能和德国、朝鲜问题相提并论。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

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其阻力

台湾当局现行大陆政策仍严重阻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他们口头上虽声称“中国必须统一”,但行动上却总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维持与大陆分离的局面,拒绝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商谈,甚至设置障碍,限制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五、国际事务中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

(一)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能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但也不能不指出,有的国家竟不顾国际信誉,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所作的承诺,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从而给中国统一事业设置障碍。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有关国家的政府能够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做法。

(二)国际组织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台湾当局企图在某些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搞所谓“一国两席”,就是要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种行径。

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是由主权国家代表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都已通过正式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自此,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已获得

了彻底的解决，根本不存在台湾再加入的问题。

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原则上台湾也无权参加。

在民间性质的国际组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应组织同有关方面达成协议或谅解，在中国的全国性组织以中国的名义参加的情况下，台湾的相应组织可以以“中国台北”（TAIPEI，CHINA）或“中国台湾”（TAIWAN，CHINA）的名称参加。

（三）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通航问题

凡是同中国建交国家的任何航空公司，即使是私营航空公司与台湾通航，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般民间关系。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航空公司当然不可与台湾通航，而其民间航空公司如欲同台湾通航，则须由其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

（四）与中国建交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任何种类的武器装备或提供生产武器的技术。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不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台湾提供武器，否则就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干涉中国内政。

六、结束语

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实现统一后，两岸可携手合作，互补互助。发展经济，共同振兴中华。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各种问题，都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得到合理解决。台湾将与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誉。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政府相信，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中，一定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十三届电视剧“飞天奖”名单

第13届（1992年4月16日至1993年4月15日）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结果，日前在京揭晓。

获一等奖的有：长篇电视剧《半边楼》，中篇电视剧《天梦》，短篇电视剧《神算子》，戏曲电视连续剧《大义夫人》，戏曲短篇电视剧《孔雀胆》，短剧《太湖人家——清名桥的故事》，少儿电视连续剧《少年特工》，少儿短篇电视剧《金色轮船》。

《唐明皇》、《小龙人》分获长篇电视剧和少儿电视连续剧特别奖；《卖花女》、《冤狱》、《北国情》获优秀译制片奖。

单项奖有：《半边楼》获优秀编剧奖，《看不懂啦，女人们》、《擎天柱》获优秀导演奖，高明（《擎天柱》）获优秀男主角奖，宋春丽（《风雨丽人》）获优秀女主角奖，李如平（《唐明皇》）、黄宗洛（《擎天柱》）获优秀男配角奖，金梦（《风雨丽人》）获优秀女配角奖，《中国商人》、《白马》获优秀摄像奖，等等。

李鹏在1993年9月17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近几个月来，党中央、国务院着重抓了三件大事：一是作出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决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现在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二是从总体上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着重研究了金融、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投资体制和外贸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措施，准备近期在这些方面迈出重大的改革步伐；三是部署反腐败斗争，推进廉政建设。这三件事都非常重要。抓好这三件大事，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又快又好地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下面我就政府机关开展反腐败斗争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国务院各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定。

国务院各部门在反腐败斗争中责任重大，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当前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国务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各部门都掌握着一定权力，在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容易产生和蔓延。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定。

二、突出重点，扎实工作，务求在近期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反腐败斗争是艰巨而复杂的，既要有坚决态度，准备持久地开展工作，又必须有紧迫感，把工作抓得很紧，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切实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研究，以改革促进反腐败斗争。

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近期反腐败斗争的决定，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决定采取有关部委联席会议的方式，组织和推进这项工作。各部门要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层层建立责任制，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切实加强对本部门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检查和

监督。要重视和支持监察部和各级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要把反腐败斗争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解决反腐败斗争中的深层次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建立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规范政府行为。要加强有关的立法工作，使政府机关的各项行政执法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堵塞制度上的漏洞，杜绝使用行政权力的随意性。

政府工作报告

——1993年3月1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摘要）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五年

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到这次大会的召开，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4000亿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有新的发展。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新成就。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科学技术事业成绩显著，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过去的五年，我们能够在国际国内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取得新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今后在工作中要继续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

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法。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发扬务实作风。

二、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今后五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性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此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保持产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逐步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业基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要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稳定农村经济政策、深入农村经济改革，保持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

三、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今后五年是关键时期。从今年开始，就要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积极发展各类市场。

抓紧进行价格改革。

进一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四、认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政企不分，关系不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中心环节，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各级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

这次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是本着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原则制定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

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

努力发展卫生体育事业。

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六、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实现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

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七、关于我国的外交工作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积极发展同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我们一向主张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中国重视人权问题，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联合国保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方针和宗旨而努力。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治

1月11日　热地、江村罗布分别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政府主席。

12日　陈光毅、贾庆林分别当选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1月13日　卢功勋、胡富国分别当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1月13～15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京举行。会议讨论、修改并通过了澳门基本法(草案)，还评选出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会议决定把修改后的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区微图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建议将其提请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16日，江泽民、李鹏、万里等中央领导接见澳门基本法草委会委员，祝贺澳门基本法草案顺利完成。

1月14日　李泽民、万学远分别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15日　刘夫生、陈邦柱分别当选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1月16日　贾那布尔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孙维本、邵奇惠分别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卢克俭、阎海旺分别当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1月18日　何竹康、高严分别当选为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阿木冬·尼牙孜、铁木尔·达瓦买提分别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主席。

1月29日　国务院举行第121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草案)》。

2月13日　阮崇武、杜青林、姚文绪分别当选为海南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

2月5日　李其炎、张健民、王大明分别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

吴官正当选为江西省省长。

2月8日　朱森林当选为广东省省长，林若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月9日杨析综、肖秧、聂荣贵分别当选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政协主席。

2月11日　傅锡寿当选为安徽省省长。

2月15～22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决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月21日　叶公琦、黄菊、陈铁迪分别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

2月22日　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签署了第68号、第69号、第70号、第71号主席令，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产品质量法，国家安全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产品质量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其他两项决定和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3月3～4日　全树仁、岳岐峰、孙奇分别当选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政协主席。

3月14～27日　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叶选平等25人当选为副主席，宋德敏当选为秘书长。

3月15～31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田纪云等19人为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志为秘书长，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刘华清、张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选举任建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思卿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国务院副总理，李铁映等8人为国务委员。

3月31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布第3号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三个附件，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

4月8～13日　全国检察机关法纪检察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法纪检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严肃查办侵权、渎职犯罪案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和科学管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4月15日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因犯有包庇、窝藏罪犯和用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罪行，触犯刑律，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

4月20日　张勃兴、白清才分别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4月22日马忠臣、李长春分别当选为河南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焕友、沈达人、孙颔分别当选为江苏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

4月25日　赵志浩、李振分别当选为山东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4月27～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汪辜会谈"）并共同签署了有关协议。双方就两岸合作、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海协与海基会的会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正式签署了四份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

5月3～1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5月5日　关广富、贾志杰分别当选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5月7日　尹俊、和志强分别当选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5月11日　孙维本当选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群、乌力吉分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主席。

5月17日　吕传赞、叶连松分别当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张勃兴再次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5月17～21日　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5月27日　谢非再次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6月3日　煤炭工业部在京宣告成立。

6月4日　中央军委最近发布三项表彰令，给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记集体一等功，授予国防科工委某基地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勇攀科技高峰研究室"荣誉称号，授予国防科大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科技攻关先锋"荣誉称号。

6月6日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在京成立。

6月8日　电子工业部在京宣告成立，中国轻工业总会在京举行揭牌仪式。

6月11日　中纪委、监察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查处湖北咸宁市5家企业与骗税犯罪分子相勾结，伙同税务部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1200多万元一案，咸宁市市长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市税务局长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

6月16、19日　聂璧初、张立昌、刘晋峰分别当选为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

7月2日　从上月22日开始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在京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7月6日　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禁毒委员会在京成立，陶驷驹任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北京市8名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违章发放贷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依法严惩，判处原建设银行北京朝阳支行行长王启升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7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7月12日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京举行全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指示，会议提出，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扫除社会丑恶现象，把反盗窃、打拐、禁娼、围歼"车匪路霸"深入开展下去。

7月12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顾问李达同志在京逝世，享年89岁。

8月10日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2554号客机遭歹徒劫持在台北桃园机场降落，当日下午，飞机和旅客、机组成员安全返回厦门，劫机犯被台湾警方扣留。

8月13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

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员恭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原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总经理陈贻全等共贪污公款3344万元一案开庭审判，判处5名主犯死刑，另3名同案犯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

8月16～22日　中国国民党第14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市举行。大会听取"党务"、"政务"、"立法"等报告，修正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选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主席。

8月17日　中纪委就一起由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毒打农民致死案发出通报，要求立即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坑农、伤农行为。今年2月21日安徽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因向上级反映负担过重，被村干部寻机报复毒打致死，安徽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两名凶手死刑和无期徒刑，其他两名凶手及原派出所副所长分别判处12年、7年和15年有期徒刑，对县、乡两级有关责任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8月27日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有期徒刑20年，7名同案犯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同日，对大邱庄万全集团公司原经理刘云章和公司职工李振彪、罗德元等非法审讯、殴打危福合致死案作出判决，判处刘云章死刑、缓期2年执行，李振彪、罗德元无期徒刑，其他15名同案犯分别被判处5年至15年有期徒刑。

8月31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

9月1～6日　中国妇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9月2日　历时8天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京闭会。

9月11日　首届"中华人口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赵志浩等7人获工作奖，严仁英等3人获科学奖，已故人口学家马寅初获特别荣誉奖。

9月14日　魏京生因出卖军事情报和从事旨在颠覆中国政府的犯罪活动，于1979年10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服刑期间遵守监规，服从管理，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予以释放。

9月30日　四川航空公司一架图－154/2625号飞机在执行济南—广州航班任务途中被劫持到台湾桃源机场。当晚，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返回广州，劫机犯被台湾警方扣留。

10月12日　北京市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从1993年12月1日起，北京市东城等8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

10月23～31日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江泽民主席分别签署了公布这几项法律的主席令。

10月24～30日　中国工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0月31日　一起建国以来罕见的套汇、诈骗中国银行大量外汇的犯罪团伙被查获，主要案犯许建洪、吕静、马静等已落入法网。专案组为国家挽回了1亿多元的巨额损失。

11月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版出版发行。

11月3日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1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最近中共中央组织了包括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10个调查组，分赴20个中央国家机关，对中央近期反腐败斗争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督促检查和调查研究。

11月8～13日　立陶宛总统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访华。

11月15～21日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华。

11月11～14日　中共13届4中全会在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1月19日　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会晤。

12月7日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

12月25日　北京各界人士，隆重纪念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经　济

1月4日　去年全国造林6816万亩，林业总产值达到1265亿元，造林合格率达82.6%。

1月7日　199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达165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其中出口850亿美元，进口806.3亿美元。

1月11日　中国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5大电力集团在京成立。

1月13日　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大油田，储量超过1亿吨，油层总厚度42米至98米。

2月3日　渤海西部勘探发现我国海上最大油田，其储量达1.9亿吨。

2月8日　我国铁路运输业第一个企业集团——广州铁路集团成立。

2月9日　国务院致电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祝贺宁夏西海固地区80%农户解决了温饱，10%农户走上了

富裕之路。

2 月 14 日　唐山市林西百货大楼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 79 人死亡。李鹏打电话要求认真妥善处理这起事故。

2 月 17 日　经国务院同意，1993 年财政部将发行 370 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向社会发行 300 亿元国库券，向金融机构发行 70 亿元财政债券。

2 月 23～25 日　全国粮食产销政策发布及定货会在京举行。陈俊生代表国务院在会上讲话，就推动粮食购销改革、促进生产发展提出 8 项措施。国务院有关部委发布了 5 项粮食产销政策。25 日，李鹏在同与会代表座谈时指出，粮食产销政策要逐项落实，财政再困难也不要愧对农民。同日，在我国首次省间粮油购销合同签字仪式上，29 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计划单列市共签订了 180 份粮油合同。商业部要求各地在春耕前抓紧与农民签订粮食定购合同。

3 月 11 日　全国森林面积已达到 19.63 亿亩，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109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13.63%，林业总产值达到 1265 亿元。

3 月 12 日　从 1978 年以来，全国农村敬老院由 7175 所发展到 4 万余所，入院供养人员由 10.43 万人增加到 52 万多人，分别增长 4.5 倍和 5 倍。已有北京、河北、辽宁、宁夏等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118 个县(市)普及了乡镇敬老院。

3 月 22 日　今天是联合国确定的第一个“世界水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京集会庆祝这个新节日。

3 月 30 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已批准山西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工程于 5 月正式开工，总投资将达 96.4 亿元。

现在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 200 元的贫困人口，已比 1985 年大大下降。全国 699 个国家和省(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人均粮食产量也从 1985 年的 630 斤增加到 700 斤以上。但还有 2700 万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在 200 元以下，同时人均收入在 200 元到 300 元之间的 6000 多万群众尚未摆脱贫困，在温饱线上起伏不定。

4 月 1 日　上海、天津本月起全面放开粮油购销价格。

4 月 8 日　世界上跨径最大的斜拉桥——上海杨浦大桥合龙，其误差不超过 0.3 毫米。

4 月 17 日　我国最大的海上油田——流花 11—1 油田正式投入开发建设。

4 月 19 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 527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4.1%。但出现了投资过猛等 4 方面问题，已影响经济全局，特别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

4 月 28 日　新华社报道：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近公布了国际竞争力排序报告，中国排序位居 20 个转轨大国之首。

5 月 1 日　世界第 5 座，亚洲首座、也是我国首座最大的镍闪速熔炉在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我国镍冶炼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5 月 8 日　河南平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9 人遇难。

5 月 22 日　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会议，要求 6 月底前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项目清理完毕。26 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各部门清理农民负担文件工作已开始，12 类涉及农民负担文件项目将取消。农业部受权宣布：纠正 10 种错误收费与管理方法，取消 43 项农村达标升级活动。

6 月 1 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在京召开 1993 年移民计划工作会议。该委员会的移民开发局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转。

6 月 4 日　鄂西南清江隔河岩水电站提前近 7 个月并网发电，主体工程开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仅用了 5 年零 5 个月。

6 月 10 日　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在 48 平方公里土地上，已探明稀土的工业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77%以上。

6 月 14 日　我国目前探明的最大煤田——神府东胜煤田开发建设全面铺开。这个煤田目前已具备 1000 万吨年生产能力。

6 月 20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宣布第一批取消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 37 个集资、基金、收费项目，同时宣布要纠正的强制性、摊派性和“搭车”收费的有关政策和要求。

6 月 26 日　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委托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在国内发行 4000 万美元外币企业债券。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内发行外币债券。

7 月 7 日　国家外汇管理公布，我国去年外债余额为 693.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5%，外债偿债率为 7.34%。

7 月 10 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7 月 11 日起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并对 3 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

北京开往成都的 163 次客车在新乡七里营车站，因司机责任与前行的 2011 次货车尾部相撞，当场造成 40 人死亡，48 人受伤，京广线下行线一度中断。

7 月 19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统计情况，初步测算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1264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3.9%。总的评价是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制约因素趋向突出。我国夏粮生产再创高产新纪录，总产量达 10798 万吨，比上年增产 470 万吨。

7月21日　《人民日报》根据财政部消息报道：世界银行在1993财政年度对华提供贷款31.72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7月23日　西北航空公司2119航班一架客机在银川起飞时冲出跑道坠毁，已死亡59人。

8月1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5日　深圳清水河一危险品仓库爆炸起火，经数千名干警军民奋力扑救，连续燃烧了16个小时的大火被扑灭。爆炸造成15人死亡，8人失踪，25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2.4亿元。

8月4至5日　山东菏泽、临沂等地暴雨成灾，210万人被大水围困。

截止8月10日，全国洪涝受灾面积1.71亿亩，成灾7900万亩，受灾人口1.2亿人。

8月27日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的沟后水库大坝决口，造成242人死亡，336人受伤。

9月1日　为期一个月的"'93质量宣传月"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9月2日　国内贸易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1993年全国12类市场商品抽查结果，其中25个企业26个商品达标获证书，29家劣质产品企业被批评。

9月14日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暨东三环路改造工程竣工举行通车典礼。

9月25日　京津塘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全长142.69公里。

10月5日　经国务院批准，林业部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一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10月15日　世界上最长的光缆干线京汉广暨、广琼光缆通信干线正式开通，总长4700公里。

10月16日　我国自行设计、安装、管理的南海北部湾11—4油田正式投产。

10月21日　南京炼油厂310号油灌爆炸起火，持续17小时被扑灭。

10月23日　上海杨浦大桥正式通车。

11月12日　内蒙古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总产达11088亿斤，达历史最高水平。

11月15日　今年年底我国将大范围调整进口关税税率。

11月22日　国家统计局透露，据初步预计，今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3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13%左右。

12月1～4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2月7日　国务院京九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宣布，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九铁路首战告捷。

12月10日　我国最大的水电建设工程——二滩水电站截流成功。

12月25日　辽宁抚顺石化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先进的含硫污水单塔汽提装置，一时能使10吨石油加工中排放的含有氨、硫化氢等有害物质的工业污水得到净化。

12月25日　世界黄金协会北亚区最近发布信息，中国现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黄金市场，目前已占亚洲黄金销量的1/4。

军　事

1月7日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最近发出《关于加强民兵基层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预备役部队基层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民兵及预备役部队基层建设。

2月12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最近向全军各大单位发出通知，要求积极吸收部分优秀地方留学回国人员到军队工作。

4月13日　乔石委员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分别会见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居雷什和国防部长阿亚兹一行。

5月5日　新华社播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的决定。

5月5～9日　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交流了经验，会议强调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5月27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日前发布通令，给为军体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白月友记一等功。

6月7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江泽民颁发命令状并发表重要讲话，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朱敦法、张连忠、曹双明晋升上将军衔。

8月19日　我解放军选手夺得世界军队男女第41届、女子第3届军事五项锦标赛2枚金牌、2枚银牌和2枚铜牌，并打破2项国际军体会纪录。

8月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成立。

9月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近日批转了民政部、劳动部、总参谋部《关于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随用工单位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意见》，决定从今年起对退伍义务兵安置实行改革。

外　交

1月6～18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访问阿曼、毛里塔尼亚、喀麦隆、加蓬、布隆迪和卢旺达。

1月8～12日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万里委员长受杨尚昆主席委托会见并宴请舒什克维奇主席；李鹏总理同舒什克维奇主席举行会谈；江泽民总书记会见舒什克维奇主席。10日，舒什克维奇主席前往医院看望了因健康原因住院的杨尚昆主席。11日，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政府分别签署中俄领事条约等涉及外交、经贸和司法等领域的6个文件。12日，《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声明》在北京发表。

1月14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港督彭定康将其"政改方案"交香港立法局审议一事发表评论重申，彭定康必须收回所谓的"政改方案"。28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香港就港督彭定康所谓"政改方案"向香港《镜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决不接受损害中国主权的任何建议。29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发言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中方主张全面贯彻谅解备忘录的立场是一贯的，在中英双方未能就新机场总体财务安排达成协议前，中方反对英方就涉及新机场核心工程项目继续拨款等任何单方面兴建机场的行动。

1月2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表示祝贺。并说："中国政府愿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基础上，和美国新政府共同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努力。"

2月3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自1月30日至今访问老挝和缅甸。

2月10～13日　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访问我国。

2月13日　我国第一支赴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军事工程大部分官兵乘专机离开柬埔寨回国。我国再次派往柬埔寨接替这支部队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官兵，日前已抵达金边。

2月25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资格"重返联合国"。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和利用人权问题在国家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有关"中国在继续进行并在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并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生产核武器的设备"的报道发表评论说："这一报道是毫无根据的。"发言人还对记者就香港问题的提问发表谈话说，要恢复中英双方的合作，英方必须放弃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金泳三就任韩国第14届总统表示祝贺。

3月1～12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访问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

3月4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有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应该求同存异。"11日，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西方国家在人权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人权局势》决议草案未能付诸表决一事发表评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会上提出无端攻击中国的决议草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将人权政治化的作法是在人权领域推行强权政治的表现。

3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所谓中国扩充军备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国防预算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仅5美元，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有人却散布"中国在扩充军备"，并鼓动"要用实力来对付"，实际上是企图破坏亚洲走向稳定与发展的总趋势。

3月16～23日　瓦努阿图总理卡洛特·科尔曼访问我国，这是他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华。

3月26日　世界银行及其附属的国际开发协会在华盛顿宣布，两机构已批准向我国提供3笔总额为7.8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我国的环保铁路建设和市政建设项目。

4月2～9日　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率领的中国石油代表团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代表团同美方签署了价值达2亿美元的7项合同。

4月2～7日　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访问我国。

4月3～13日　世界银行行长普雷斯顿访问我国。

4月19～28日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我国。

4月22～24日　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和英国政府、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就香港1994/95年选举安排在北京举行首轮会谈。

4月25～30日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问我国。

5月2～13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荷兰、瑞典、意大利和德国。

5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有关"汪辜会谈"一事答记者问时说，反对将台湾作为"独立政治实体"对待。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在柬埔寨磅同的中国工兵遭炮击一事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我国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的安全。

5月7～11日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我国。

5月2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香港立法局5月26日通过《选区分界及选举事务委员会条例草案》一事发表评论说，凡有关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的事宜，未经中英双方磋商达成共识，英方不得单方面进行立法并着手推行。英方不应为正在进行的中英会谈设置新的障碍。发言人对台陆委会将正式提出所谓的"一国两府四区"概念问题发表评论说，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

国领土的一部分。

5月29日　我国外交部就美国总统克林顿5月28日宣布就延长1994于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徒遇提出附加条件一事发表声明，抗议美方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6月1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自5月26日至今访问韩国和日本。

6月2～4日　格鲁吉亚国家元首、议会主席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我国。

6月3、1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对香港立法局宪制小组5月31日决定开始讨论港督的政制方案和港英当局4日宣布合并油尖和旺角区议会事发表谈话说，英方应立即停止一切干挠破坏中英会谈的言行。

中英双方商定，目前两国就香港94/95年选举安排问题所举行的谈判是以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中英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为基础。

6月6～12日　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访问我国。

6月13～22日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我国。

6月14～16日　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和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大使麦若彬就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问题在北京举行第5轮会谈。23日至25日举行第6轮会谈

6月18日　中国奥委会发言人就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反对北京申办和举办奥运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是粗暴干涉中国人民正当权利和践踏奥林匹克原则。

7月1日　发言人对美国众议院赞成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表态发表评论说，一切维护中美最惠国待遇的行动都值得赞赏。

7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重申了中国对核试验问题的立场。他指出，中国对核实验历来十分克制。

7月5～6日　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和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大使麦若彬在北京就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问题举行第7轮会谈。

7月8日　李岚清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自6月21日于今访问科威特、沙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朗和阿曼。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就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表示愿意同中国加强新的战略关系的谈话发表评论说，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保持正常、良好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7月8～9日　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访问我国。

7月10日　陈慕华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自6月17日至今访问墨西哥、巴巴多斯、圭亚那和苏里南。

7月27日　香港政府日前宣布：从1993年8月1日起，中国内地居民过境香港无须签证。

8月6日　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在北京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无端指责干扰威胁中国“银河号”货轮事件向美提出强烈抗议。

8月10日　中国和利比里亚复交联合公报在蒙罗维亚签署。公报宣布中利两国从1993年8月10日起恢复外交关系，利比里亚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8月11日　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致函加利秘书长，就中美洲少数几个国家要求在第48届联大增列所谓台湾在联合国平行代表权的议题一事阐明中国的立场，并指出，台湾没有资格参加联合国。

8月27日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就美国无理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转让导弹技术”决定对华实行制裁事，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9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台湾为何不能按前东、西德、朝鲜和韩国的模式解决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时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能与德、朝问题相提并论。23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联大总务委员会本月22日宣布此次联大不讨论台湾加入联合国议案一事发表谈话说，“台湾重返联合国”的任何企图都是荒谬而徒劳的，根本不可能得逞。

9月3日　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王其良约见美国国务院主管官员，就美国向台湾出售4架E－2型“鹰眼”预警飞机和出租3艘“诺克斯”级护卫舰事向美政府提出交涉。

9月4日　中国代表、中方检查组负责人沙祖康在沙特达曼宣布，沙特政府代表在中国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于8月26日至9月4日在沙特达曼港对中国货轮“银河号”所载货物进行检查，美国政府派出技术顾问参与了检查。由中、沙代表和美国技术顾问签署的《检查报告》说，“银河号”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4日，沙祖康在沙特达曼发表声明指出，美方制造“银河号”事件损害我国声誉。同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一手制造的“银河号”事件，以自己的失败告终。6、7日，全国人大外委会和全国政协先后发表声明和举行座谈会，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在“银河号”事件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还在制造谣言，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10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对“银河号”事件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9月6～9日　印度总理拉奥访问我国。

9月6～16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乌克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9月12～22日　荣毅仁副主席访问葡萄牙和西班牙。

9月17～24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塔亚访问我国。

9月22～24日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访问我国。

10月1日　正在纽约参加48届联大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会见与会各国代表。

10月3～12日　多米尼加总统塞缪雷特访问我国。

10月8～12日　赞比亚总统奇卢巴访问我国。

10月10～14日　以色列总理拉宾访华。这是以总理首次访问。

10月12日　我国和马其顿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0月18～21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

10月25～30日　喀麦隆总统比亚访问我国。

11月19日　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90分钟。

11月21日　江泽民主席对古巴作短暂访问。

11月25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离京，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作为期15天的访问。

12月2日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发表谈话：港英不顾中方的一再劝告，在中英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即决定向立法局提交部分立法草案，对这种做法，中方不能接受。

12月3～7日　老挝总理坎代·西潘敦访问我国。

12月2日　马拉圭总统卡拉列来访。

12月10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港英当局已于当天将其部分"政改方案"析立法草案刊登宪报。这是英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和警告，蓄意破坏中英关于香港94/95年选举安排的谈判而采取的又一严重步骤。中方重申，在中英谈判未结束前，如港英当局特其"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就意味着谈判终止，英方对其后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12月12～17日　圭西那总统契迪·贾根访问我国。

文化教育

1月6日　我国科学家利用第14颗返回式卫星将一个携带有数种藻类、微生物和轮虫的试验盒送入太空。获得了固氮能力提高的蓝藻新品系。

1月15日　陈敏章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全国88.5%的行政村已设有卫生室和医疗点，全国村级卫生人员126.9万人，其中2/3是经过正规培训的乡村医生；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占总村数的比例已由1989年的4.8%，提高到1992年的10%。

2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25年来，成功地研制并提供了4个系列33颗卫星。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分别题词表示祝贺。2000年前我国将发射约20颗应用卫星。

2月25日　首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评选揭晓，堵丁柱等6人获奖，另有7人获提名奖。

2月28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举行证书颁发仪式，为我国武陵源、九寨沟、黄龙3个风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颁发证书。

3月1～4日　中国全民教育国家级大会在京举行。李鹏在开幕会上致辞，强调要把握有利时机发展教育事业。李铁映在会上提出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8项原则。

3月2日　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实验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3月23日　国家气象局首次发布1992年度《中国气候公报》。去年我国气象灾害属中等年份，旱灾居各灾之首，热带风暴、冷(冻)害重于往年，重庆、遵义、赣州为全国酸雨出现频率最大的地区。

4月1日　中国展团在第2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获7项金奖。

4月9日　中科院计算机技术所研究员陈肇雄创立的智能型机器翻译理论与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4月10日　我国科学家首次在南京汤山溶洞发掘出早期人类头骨化石。这是继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猿人等之后，我国古人类研究的又一重大发现。

4月13日　世界首例鸭胚胎壳外孵化的小鸭日前在北京农业大学动物生化实验室诞生。

4月22日　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工程师王贵海攻克了世界性科技难题——非圆齿轮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在国际科技界引起轰动。

5月10日　一种世界上夹紧速度最快、构造最简单的"范氏快夹舌钳"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范朝来研制成功。

5月24日　我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影片《霸王别姬》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

6月5日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在京开始举行。

在美国举行的第14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比赛中，上海市北中学7名初中生组成的中国队获金牌。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为综合性的智力竞赛。

6月13日　我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回速器质谱计通过国家鉴定。

6月29日　国家教委等部门颁发《特级教师评选规定》。特级教师评选工作开展15年来，我国已有7000余名特级教师。

7月3日　河南南阳地区西峡盆地发现了世界罕见的恐龙蛋化石群。

7月10日　由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研制的“闪光Ⅰ号”低能强流脉冲相对论电子束加速器日前通过国家鉴定。

7月16日　我国中学生代表在第24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获金银牌各两枚、铜牌1枚，名列总分第二。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制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已成功地产生了亚洲第一束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这标志我国在激光和加速器研究上获突破性进展。

7月21日　我国4名中学生在第25届中学生国际化学奥林匹克比赛中获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

7月22日　我国6名中学生在第34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6枚金牌和团体总分金牌。我国4名中学生还在国际生物奥林匹中获团体总分第一。

7月30日　亚洲规模最大的、总水平属世界一流的北京仿真中心通过国家验收。

8月14日　休斯空间通信公司和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澳星B2故障调查做出结论，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中国火箭或整流罩没有导致此次故障的缺陷。

北工大教授戴乾圜创立和阐明的致癌机理“双区理论”和“转录基因”致癌学说引起国际科技界瞩目，被推崇为“来自中国的理论”。

8月24日　国家教委召开电视会议，要求尽快解决当前基础教育面临的教育经费短缺、拖欠教师工资、乱收费等突出问题。

9月5日　第13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近日在京揭晓。《唐明皇》等62部优秀作品分获各项奖。

9月9日　首都隆重集会庆祝第九个教师节，5000多名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受到表彰。另据《人民日报》讯，教师节前夕，21位中小学校长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校长”称号。

9月11日　中国影片《杂嘴子》在第5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参议院特别奖”。

9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陕西电视台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最后栖息地的朱鹮》，最近在日本举行的93年度世界野生动物映像节上，荣获“环境保护奖”“亚洲、大洋洲地域奖”、“地球奖”三项大奖。

9月26日　我国动画片《森林·小鸟和我》在第四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荣获动画、儿童电视节目组开罗金奖。

9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西南第一所可供艾滋病专门研究的生物安全试验室在昆明建成。

10月2日　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梅镇彤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明显增强人脑记忆能力的“M”物质。

10月4日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地为一名晚期肝癌患者实施肝脏移植手术。

10月14日　我国首台“银河—Ⅰ”巨型计算机正式投入中期值天气预报新业务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发布5—7天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家之一。

10月26号　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

10月22日　标志着我国水稻大穗型和超高产育种取得重大突破的遗传工程水稻(GER—1)研究成果在湖南长沙通过鉴定。

12月3日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们，在黄土高原沟壑区腹地的陕西省旬邑县，陆续发现出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古象化石等各类化石354件。有关专家称，这批古化石的出土，已揭示了“黄土高坡”的远古之谜—1亿年前的黄土高原是浩瀚的汪洋大海；300万年前的黄土高原，是茂密的森林和气候湿润的大草原。

社会生活

1月1日　香港中区兰桂坊万人狂欢贺新岁时，发生踩死人惨剧，有20人死亡，60余人受伤。鲁平、周南致电哀悼和慰问。

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民1992年人均纯收入可达770元，比上年增长8%。

1月27日　云南思茅地区普洱附近发生6.3级地震。

1月31日河南平舆县辛店乡农民蔡玉堂因负担过重而自杀。有关责任者已受到处分。

辽宁省境内一无人看守道口处发生一辆大客车与77次特快列车相撞事故，造成65人死亡。

1月11日　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代表团向国际奥委会呈交申办报告，成为第一个正式呈交申办报告的城市。

1月19日　在意大利举行的第2届维罗纳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国参赛节目全部获奖。2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16届“世界明日杂技节”暨第7届“世界未来杂技节”上，我国演员获2项金奖，1项银奖。31日，广州军区杂技节目《三人顶碗》获第1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最高奖“金小丑”奖。

2月4日　我国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在京病逝，终年75岁。

2月14日　为期9天的第1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波兰扎科潘内闭幕。中国队获得6枚金牌、2枚银牌和4枚铜牌，在金牌榜上列第三。

2月16日　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说，国际奥委会复审通过了北京《申办报告》，同意将此报告发送给国际奥委会有关人士和组织。

2月21日　世界杯短池游泳系列赛全部结束。在总积分表上，我国林莉列100米、200米、400米混合泳第一，黄晓敏列100米、200米蛙泳第一，楼霞和刘碧纯分列女子50米蛙泳和200米仰泳第一。

2月22日　我国大陆影片《香魂女》和台湾影片《喜宴》在第43届柏国际电影节上共获金熊奖，我国儿童影片《天堂回信》获国际儿童青年电影中心奖。

2月22日　著名诗人、学者冯至在京逝世，享年87岁。

3月6日　我国运动员叶乔波在波恩获世界杯速滑赛女子500米冠军。

3月6～8日　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在北京进行考察。

3月12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3月20日　西藏拉孜西北地区发生6.6级地震。

4月6日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3157班机在深圳飞往北京途中被两名劫机犯劫持到台湾台北桃源机场。飞机和机上人员于当天安全返回广州，劫机犯被台湾警方扣留。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顾问、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再道同志在京逝世，享年84岁。

4月11日　为期10天的第3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在京闭幕。中国队获男子团休冠军，中国徐天红、胡明分获男女个人冠军。

5月5日　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发生特大黑风暴，历时4小时57分，造成67人死亡、30多人失踪，人民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5月9～18日　首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主席宣布运动会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出席开幕式。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运动员进行了12个项目的比赛。中国运动员夺得105枚金牌，名列第一，日本、韩国分获25枚和23枚，列第二和第三。共有7人14次破13项亚洲纪录。

5月11～23日　第4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哥德堡举行。中国队获得女子团体、女子双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

5月25日　江苏徐州、淮阴、扬州、南通等地遭暴风雨袭击，造成39人死亡，200余人失踪。

6月1日　历时5天的第8届世界杯跳水赛在京结束。我国选手夺得全部9枚金牌。

6月6日　我国选手农群华、周雷在第8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获女子双打冠军。

6月7日　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艺界卓越领导人阳翰笙在京逝世，享年91岁。

6月19日　卫生部发布消息，我国目前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千例，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月24日　厦门航空公司2501号班机在常州飞往厦门途中，被歹徒张文龙劫持到台湾桃园机场。当晚，该机及机组人员和乘客安全回厦门。劫机歹徒被台湾警方留下。

6月25日　一代美术宗师、中国美术馆事业开创者刘开渠逝世，享年89岁。

7月8～18日　第17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美国布法罗举行。我国选手获17枚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金牌数列第二，奖牌数列第四。美国和加拿大金牌数列第一和第三。

7月27日　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26日通过反对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议案，指出这是粗暴干涉国际奥林匹克事务。

8月7日　我国选手钏秀娥在1993年世界女子摔跤锦标赛上夺得47公斤级冠军。

8月14～22日　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我国选手黄志红夺得女子铅球冠军；曲云霞夺得女子3000米冠军，并创造了世锦赛新纪录；王军霞夺得女子1万米金牌；刘冬夺得女子1500米金牌。中国健儿共获4金、2银、2铜，奖牌数居美国之后列第2位。

8月15～24日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四川赛区隆重开赛。

8月29日　在慕尼黑结束的世界杯射击总决赛中，我国选手获1枚金牌、2枚铜牌。

9月2～15日　第七届全运会“中华行”火炬传递接交仪式在天安门前举行。江泽民点燃传递火炬。4日，第七届全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等出席开幕式。李铁映、王兆国在京分别会见参加七运会的海外来宾和港澳地区观光团。13日，七运会田径赛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表彰大会在京举行。15日，第七届全运会在京闭幕。李鹏、李岚清、李铁映等出席闭幕式。本届全运会共有4人4次创4项世界纪录，18人4队43次超21项世界纪录，4人4次平3项世界纪录，54人1队93次创34项亚洲纪录，61人3队143

次超66项亚洲纪录，130人14队273次创117项全国纪录。辽宁代表团夺得金牌和团体总分第一名，广东和上海名列第二、三名。

9月9～26日　新华社报道：参加在摩纳哥举行的决定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主办城市会议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组成。李岚清任名誉团长、陈希同任团长，副团长为伍绍祖、李其炎、何振梁、张百发。

9月23日　申办失败。

9月24日　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建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仍将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26日，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返京。

10月3日　中国技巧队在索非亚举行的第10届世界杯技巧赛中，夺得13枚金牌，名列榜首。

10月3日　中国故事片《找乐》获东京电影节金奖。

10月8日～14日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沪举行，台湾电影《无言的山丘》获最佳影片奖。

10月31日　中国选手王军霞在西班牙举行的1993年世界杯马拉松赛上夺得女子冠军，中国选手还包揽了女子组前四名。

11月11日　中国男排赢得世界男排锦标赛参赛资格。

11月16日　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谢军卫冕成功。比分为8.5∶2.5。

11月21日　世界举重锦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结束。中国队共夺得金牌20枚，银牌7枚，铜牌4枚。金牌总数居榜首。

12月5日　全国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活动。

12月25日　自1977年9月开放毛泽东纪念堂起，至今已接待瞻仰的群众8550万人，接待外宾236万人。

日本、韩国分获20枚和30枚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4年

导　言

1994年，就与1993年及后面的1995年对比而言，无疑是建设的一年。全国上下，在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初步成功的时刻，开始看到中华民族振兴、东亚雄狮猛醒的曙光。

在党的领导方面，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把新时期党建工作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经济的稳定前进，则以三峡工程开工为代表，展示着发展的中国逐渐找回的那份自信；扶贫计划的制定，青年志愿者行动，甚或包括《劳动法》的出台，可说都是充满信心的奠基性工作。

当然，成就归成就，问题仍然存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处于关键，整个社会对贪污腐化现象的讨论也出现新的转折，等等。但无论如何，历史必将在本年度的日历上记下清晰的一笔。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已有两年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现实的步伐可能是曲折的，但什么也无法阻挡中国稳定与发展的趋向。

1994年，与其说是对以往的总结，不如说是为以后的发展奠基，党建问题、贫困问题、道德问题、廉洁问题，作为承前启后的举措，本年度皆有新的方针抑或新的探索。三峡工程这个中国人的世纪之梦，竟然在本年度付诸实施，可谓具有象征意义，东方巨龙百余年来沦丧的自信，看来确实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我们期待着，美好的前景隐约在前方闪烁，将赋之于真正的追求者。

1994年诸项要紧事务的展开，意义是深远的。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
- 《邓小平文选》三卷发行
- “八七”扶贫计划
- 1994年：改革没有浪漫曲
- 1994，中国物价追踪
-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广岛亚运会，中国健儿再展雄风
- 远南运动会
- 劳动法出台
- 海峡两岸关系在1994
- 庆祝祖国45岁生日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182人，候补中央委员12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分四个部分：(一)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三)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全会认为，《决定》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会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当前要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健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要努力发展党内民主、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要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维护中央权威，有力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全会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基层党组织要不断改进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严格党内生活，结合各自特点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要以提高素质、增强党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要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健全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的责任制。

全会指出，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适应形势要求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要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全会增选黄菊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1994年9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体会议分

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状况，就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一）我国正在进行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发生大转折，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再上新的台阶，从而保证我国能够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在思想建设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重新确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在理论建设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政治建设方面，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增强了在这条路线基础上的全党团结。

——在组织建设方面，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巩固和发展了党的队伍和组织。

——在作风建设方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十六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

（三）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宣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指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制定两个文明一起抓，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规划；阐明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性任务和指导原则。

十四大以后，党为落实上述各项任务进行了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工作。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果。党对民主和法制建设，对教育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也都作出了部署。现在，各方面的大政方针已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要求强有力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四）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前提，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的实现提供组织保证。这是我们党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上是罕见的壮举，毛泽东同志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这条基本历史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紧密联系这条政治路线开展党的建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党的建设理论。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关于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等方面的思想，都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

（五）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我们党已有五千四百多万党员，教育和管理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面对新情况，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对此，全党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重视，严肃认真、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

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推动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联系实际，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深刻认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不正之风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逐步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当前，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成为突出的环节。为此，特别要提出和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三个问题：

——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

——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数以百万计的党的基层组织，使之成为能够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堡垒。

——必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形成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干练而充满活力的领导层。

全党要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继续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努力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六）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鲜明特征。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把这种制度运用于政权建设，在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实行这种制度，就是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沉痛教训。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党内政治生活日益正常和活跃，为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组织保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它有利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发生失误也能得到有效的纠正；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必须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反对违背和否定这一制度的各种错误倾向，防止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要求我们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决不能削弱和放弃民主集中制。这里要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需要统筹规划、协调配套、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需要以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按照民主集中制实行的正确领导。以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不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或者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都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党执行民主集中制总体上是好的，但还有不少问题。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的某些决策执行得不够有力，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在有些方面还不够完善。鉴于这种状况，当前要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健全贯彻民

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

（七）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区别，也完全不同于不讲纪律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发扬党内民主必然推进人民民主，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发展党内民主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党内民主要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以引导、保护、发挥积极性为出发点，紧密结合党组织的职能和党员的权利、义务而展开。要鼓励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讲真话。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到每一个支部，从领导机关的决策到在党的会议和党的报刊上参加政策问题的讨论，从党内选举到对领导干部进行评议、监督，都要充分发扬民主。

决策民主化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前提。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来自基层和实践的丰富经验。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党的上级组织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决定，要听取下级组织的意见。

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要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要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决议，及时传达给下级党组织和党员。有些重要事情应该在党内先讨论，让党员早知道。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各项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要制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明确党员正确行使权利的原则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的措施。

（八）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力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集中，就要集中正确的意见，使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形成正确的决策，并坚决付诸实施。

我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党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改革和建设任务。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维护中央的权威，就是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决定了的事情各方都要认真去办。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全党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议、决定，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重大问题要请示报告。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一贯坚持的重要指导原则。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应当是贯彻中央精神与立足本地实际相结合，对当地人民负责与对全国人民负责相统一。强调维护中央权威，决不是把应该赋予地方的权力收上来，而是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中央各部门要正确行使中央赋予的职责和权限，根据改革的要求，切实较变职能，正确处理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更好地为地方、为基层服务。

（九）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由中央或地方党委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要充分酝酿、协商和讨论，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对集体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改变，个人或少数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必须无条件服从，并在行动上积极执行。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要提倡领导干部敢于负责的精神，反对遇事推诿、互相扯皮和无人负责。党的委员会成员既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在党的委员会内部，书记和委员是平等的。书记在集体领导中负有主要责任，应当成为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党委成员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互相补充，包括互相帮助克服缺点和错误，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

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结中的党组或党员负责干部，要自觉接受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要提请党委讨论决定，并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结中同多方商量，按照法定程序或章程办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又要善于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各个组织的作用，实行正确的领导。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中央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责范围、议事规则、决策程序。要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发

挥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

（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党内监督的实质是党从人民利益出发，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主要是监督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否严格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特别注意防范在党员干部中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党员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担负何种领导职务，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违纪党员要严肃查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实行党内监督的有力武器。要坚持和健全组织生活会制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开展谈心活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制定党内监督条例。要充分发挥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党内监督中的作用。要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以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十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要依靠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下大功夫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放松基层党组织建设，削弱基层党组织作用，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群众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创造了新的业绩。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和关键时刻，冲在前面，舍己为人，展现了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优良品格和时代风范。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随着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经营形式的多样化，需要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大批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管理好流动中的党员；消极腐败现象侵蚀着党组织的肌体，需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坚持党的宗旨，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按照新形势的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要指出，目前有一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基层干部作风不正，脱离群众；一些党员不起模范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同领导机关放松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是分不开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十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是：第一，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用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第二，必须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运用已有的成功经验并进行革新和创造，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第三，必须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第四，必须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规划，又要抓紧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

各级党委都要健全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责任制。中央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分类指导，做出工作部署，认真督促检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在县委。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责任主要在市委。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做得好不好，作为考核市、县委和市、县委书记工作实绩的一个重要依据。

（十三）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各自特点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

农村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在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带领农民群众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村党支部建设要着重抓好四项工作：一是建设一个好的支部领导班子，特别是选一个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正廉洁、年富力强、能带领群众致富的支部书记。二是确定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子，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兴办各种经济实体，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农民的素质，抵制和摆脱封建迷信等愚昧落后观念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健康、文明、进步的风尚占领农村阵地。四是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并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和村规民约，调动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对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党支部，各地要派出专门力量进行整顿，当务之急是整顿好领导班子，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力争在三年内分期分批完成这项任务。

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按照党章规定的职责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要把保证搞好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提

高经济效益作为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总结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经验，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教育党员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职工群众，同心同德办好企业。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逐步完善企业领导制度，改进和加强党的工作。在其他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中，都要加强党的工作。没有党组织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党的组织，采取适应各自特点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开展党的活动。

学校党的建设要围绕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来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要紧密结合本单位的业务工作，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街道和其他基层党组织，也要按照各自的不同情况，制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

从事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层干部处在第一线，条件艰苦，任务繁重。要在他们中提倡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作奉献的精神，又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十四）以提高素质、增强党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从现在起，用三年的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学习要联系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联系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第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第三，按照党章规定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在改革和建设中建功立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根据上述要求，结合实际做出部署。

把党员教育同改进党员管理结合起来，要大力表彰先进的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党的组织部门要制定有效管理流动党员的措施。要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发展党员，不断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加强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发展党员的工作，重视培养和吸收青年和妇女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共青团要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的工作。

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十五）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这些年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干部逐渐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主体。但是，一些领导班子素质不高、年轻干部偏少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给我们党提出两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一是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二是必须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十六）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些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他们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他们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他们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他们应该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深入实际，检查研究，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不仅要按照这样的要求提高现有高级干部的水平，而且要按照这样的要求培养和选拔接班人。

（十七）切实加强对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育人是用人的基础，只着眼于用人，忽视育人，是短视的。务必把培养教育干部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要组织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基本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通过学习和实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坚决克服忙于事务和应酬，忽视和放松学习的倾向，要根据不同领导职务的不同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分期分批对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并对学习情况认真考

核，把考核结果作为使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积极推进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的教育改革，更好地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服务。

要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采取多种形式，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对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要加紧培养。对缺乏全面领导工作经验的，要及早放到一定层次的关键领导岗位压担子；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要放下去任职锻炼。要鼓励、引导和安排年轻干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去，特别是到条件艰苦或情况复杂的环境中去，经受考验。

（十八）高度重视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抓紧选拔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全面正确地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衡量干部的德和才，应该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陈旧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要广开进贤之路，搞五湖四海，避免只在党政机关或周围熟悉的少数人中选干部，反对任人唯亲。对那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优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大胆提拔，委以重任。对那些思想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伸手要官的人决不能提拔。要重视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选拔培养，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非党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严格执行干部离退休制度，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十九）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作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继续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扩大选择任用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无论选任还是委任、聘任领导干部，都要走群众路线，通过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或民主评议，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同时，认真进行组织考察，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应提拔。

完善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并与升降、奖惩制度相衔接，要全面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注重考核工作实绩，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考核方法。有关部门要根据不同领导职务的不同特点，制定科学的考核体系和标准，对工作实绩进行全面考核和准确评价。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升降奖惩，对不胜任现职的要果断调整，要使干部能上能下形成制度。

认真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并同回避制度和各级领导班子的任期制度结合起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之间以及经济比较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干部交流，使他们在多种环境和岗位经受锻炼，增长才干。要加大省部级干部交流力度，继续推进地市县级干部交流，同时注意领导班子相对稳定。各级党委对领导干部的交流要统筹规划，周密安排，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克服干部调不出、派不进的不良倾向。

切实加强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督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制定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选择任用干部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对那些不遵守党的原则，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在用人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要严肃处理。

要认真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对近年来一些地方在一定范围试行委任干部任期制、聘任制、试用制以及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选择领导干部等，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使其不断完善。

（二十）各级党委（党组）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定具体措施，认真贯彻执行本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建设工作，由中央军委按照本决定精神和军队的特点做出部署。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邓小平文选》三卷发行

背景介绍

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和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经邓小平同意，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增补和修订，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从11月2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增补了4篇文章，其中3篇是作者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讲话。第二卷增补了14篇文章，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原收入第二卷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已移入第三卷。这次第二卷增补的文章，包括：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关于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政策，要充分利用和善于利用；关于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关于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关于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消弱；关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等等。这两卷的第二版，对全书正文的文字、标点和题解作了少量校订和统一体例的工作，同时增补了

一些新的注释。第二卷有的文章根据原记录对个别地方作了修订和增补。

这次修订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连同去年出版的第三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邓小平同志著作集。

材料：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战略意义

材料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战略意义

吴敬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流行过一种观念，认为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但是，当苏联式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在我国全面建立后，人们普遍感到它带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进行改革。于是，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寻找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号召。在往后的整整20年中，我国人民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试验。但是，成功的时候少，失败的时候多，并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才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邓小平在这条路线的形成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种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我曾在一篇全面论述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的论文中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这就是：(1)确立生产力标准；(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致富；(4)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革命；(5)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7)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8)宏伟的战略目标和周密的规划设计。本文只就当前特别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全面把握的几点战略思想作一些讨论。

一、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邓小平全部经济思想的主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体现了现代生产力的灵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由此得出的重要政策结论。

邓小平的全部经济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观点，邓小平提出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的口号。同时，按照当代生产力的特点，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实际纲领：在社会主义的多项任务中，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又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位。早在1975年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据此，他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在1988年9月的两次谈话里他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和对生产作用的极大提高而作出的新概括。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体现了现代生产力的灵魂，抓住了如何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要领。这表明，邓小平以百战之身，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够不断吸收新的知识，使自己的思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正像马克思所说，现代生产不是立足于经验的常规，而是依据对科学规律的认识。既然如此，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自然就会得出一个重要的政策结论：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复出以后不久就着重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才人。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许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邓小平着重讲了三条：第一，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二，“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早在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二、根据邓小平经济思想，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实现共同致富，为此须改革我国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共荣。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注意防止两极分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在1984年中共十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前，邓小平一再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时候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级分化。”为了做到共同富裕，首先必须以生产力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因此，“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里，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共产主义者主张公有制，是因为它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引喻失义，形成了国有制是公有制最完善的形式、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教条的指导下，刮起一次又一次的“共产风”，几乎把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份扫除得干干净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的调整时期，我国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的农业经营形式曾经有过相当大范围的发展。当时，在如何对待“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是有很大争论的。邓小平坚决支持农民群众的这一创造。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著名的“黄猫、黑猫”的比喻，就是针对“包产到户”问题说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我国所有制结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内容有：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国有、集体所有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繁荣的局面。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共同致富。在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目标。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的繁重任务。

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错误地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结果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仅谈不上共同富裕，相反只能造成普遍贫困。邓小平对于这种做法的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批驳了“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既然共同富裕的目标又不可能整个社会同步地达到，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呢？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实行市场经济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的确存在着出现人群之间、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危险。邓小平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曾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三、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

中国在1958年以后进行过多次改革，但问题在于，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而只是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内作一些或大或小的修补，因而成效并不显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一次新的选择。这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不要进行改革。第二，改革应当怎样进行。是仍然沿着过去几次改革的路子，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改良呢，还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路子？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关于第二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虽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

样的革命。"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又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呢?邓小平1982年关于"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是对这一重要论断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他在那次讲话中出指,"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正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清楚指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它进行修补,而是需要对它进行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被认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对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这一个公认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

早在1979年11月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一次论题广泛的谈话中谈及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时,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如同后来他多次讲到的那样,是把计划和市场都看做组织经济的手 。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出发,他主张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虽然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仍然沿用了当时通用的"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但是,他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补充、而不能存在"市场经济"的框子,明确地否定将市场经济限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显然是理论上的重要发展。

沿着这种思路,邓小平的思想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步深化而不断发展。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虽然当时使用了商品经济这样的苏联教科书的语言,但是从《决定》提出了旧体制的主要弊端、改革任务、改革的基本内容以及计划本身的变化来看,《决定》里所说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对这个决定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并称赞它"是个好的文件"。

一年以后,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的时候,再次重申了1979年谈话关于有必要采纳市场经济的方法的意见。他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这样,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

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理论界有些文章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同基本社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但是,邓小平仍不改初衷。在他看来,一种体制,一种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得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应当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加以采纳和执行。因此,他在1990年12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和1991年初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更对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及有关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他的这一讲话,为中国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邓小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及积极慎重、注重增长质量、以改革开放促发展的方针。

邓小平不但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还为它提出了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即将进入80年代的1979年末,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提出了争取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产值翻两番,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水平。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第一步,是在80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1980年的人均250美元,达到1990年的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第三步,再用三五十年时间再翻两番,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上述战略规划所规定的目标是十分宏伟的。邓小平说:"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

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回答：“第一，现代化的目标要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邓小平提出用50到70年分三步实现这一目标，就表明了他的慎重态度。第二，强调增长的质量，而不要片面追求产量的增长。在制定1983—1990年长远规划时邓小平指出：“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

第三，把重点放在改革上，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1991年8月，他在谈到中国经济应当“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时，着重指出：“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五、“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更能体现邓小平战略思想，在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成功之后，邓小平提出了不失时机加快城市及整体改革的任务，提出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战术原则。

对于中国的改革，国外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它的特点和优点是“渐进主义”。这种观点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主张改革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好就好在太快。

“渐进改革论”的观点是否切合中国改革的实际？符合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揆情度理，看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地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是改革的优点所在。中国改革成功的秘密，在于国有部门改革受阻以后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农材对外开放方面。迄今为止我国改革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

采取这种策略，我们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不是只盯住国有经济不放，而是一方面维持国有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部门去寻找新的生长点。这就使整个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撑点。使得15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出口增长更快。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遭到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但我们依靠迅速生长起来的经济力量，较快地克服了种种不稳定因素，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但是这种战略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特别是这种“外围战”的长期化会带来不少棘手的问题。经济体系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这部机器被分成两半：旧的部分仍在运转，而且占据领导地位；新的机器虽然部分建立，但不完整。这种状况不改变，新的经济体制不能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不可能提高。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国有部门的困难日益加剧。

如何对待这种局面？是积极进取，还是继续拖延国有部门的改革？

1984年6月，邓小平就已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这一战略重点转移的开始。10月1日，邓小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上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接着，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对“系统改革”的内容和意义作了阐明。“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中，邓小平反复地提醒我们：“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

在战略方针确定以后，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全面改革的战术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是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所谓“步子要稳”，是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

1984—1992年在改革的工作指导方面出现了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事到临头决心动摇了；另一种情况是，改革的决心倒是下了，但是配套的政策没有安排好，比如在改革的宏观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贸然推出大的改革措施，也使改革的攻坚战进行不下去。这都是与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不相符合的。至于邓小平本人，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他都总是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概念。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十四大"的纲领性提法具体化,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对于我们的论题有重大意义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应当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这一提法,较之过去常常讲的"整体渐进,阶段突破"更能体现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在改革的内容上,经过15年成本比较高的被动改革,价格已经大体放开的情况下,设计了财税、金融和外汇体制改革方案;在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思路也愈来愈清晰了。

今年的各项改革出台已经几个月了,亟需加以总结。看看原来的方案有哪些缺点,要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哪些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要督促加快。总之,我们应当紧张工作,力求完满地实现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确保在2000年以前把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摆脱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在今后的长时期中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1994年8月22日)

"八七"扶贫计划

背景介绍

3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就扶贫问题进行研讨,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扶贫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民族兴衰,"八七"计划的制定,将为我们今后几年内扶贫工作进行指导。

材料:

· 扶贫开发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长期抓下去
· 扶贫开发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材料一　扶贫开发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长期抓下去

江泽民

这几年我看过不少贫困地区。总的说来,扶贫开发抓得比较紧,工作做得是好的。各级党委、政府都注意加强领导,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热心支持,加上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现在全国农村没有完全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800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取得这个成就的经验是丰富的,我看最重要的就是把救济式扶贫改变为开发式扶贫,确立了新的扶贫工作方针。实践说明,实行开发式扶贫,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不仅能解决温饱,而且可以脱贫致富。这样,把国家的扶持同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结合起来,立足当地实际搞开发性生产,效果很好。正像许多同志所说的"开发式扶贫,越扶人越勤,越勤越富。"我看过陕北延安地区,他们修梯田解决了吃饭问题,发展"烟、果、羊、薯"四大支柱产业,解决了花钱问题。那里产的苹果质量很好,达到了出口水平。搞开发扶贫,是扶贫工作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是一个重大创造,这个方针必须长期坚持。

扶贫工作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8000万人不是个小数目。而且,这些年来已经脱贫的相对说来是难度比较小的地方,现在剩下的地方,正像大家所说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在今后7年解决剩下的这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个计划是好的,是鼓舞人心的,关键是要有一股子攻坚精神。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

总起来说,扶贫工作成绩很大,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扎扎实实地长期抓下去。

一、要坚持长期抓下去,必须进一步认识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难度很大,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二是完成了八七扶贫计划提出的任务,也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更长期的努力。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平均收入水平很高,但都有一部分人处于低收入水平,还没有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扶贫工作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富起来,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是维护稳定的重要条件。各地发展不平衡,有的快一些,有的相对慢一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关注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如果这些地区老是处于贫困状态,不仅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

实现，也会影响全国的稳定。如果一部分地方很富，一部分地方长期很穷，就潜在着不稳定因素。我国目前的贫困地区，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帮助这些地方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边防巩固的重大政治问题。还有一些贫困地区是革命老区。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做好老区扶贫工作，使老区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总之，把老少边穷地区、西部地区发展起来，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二、要坚持长期抓下去，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

扶贫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群众性的工作，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如既往，进一步加强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福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区、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更应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你这个地区的党委和政府是不是脱离群众，能不能安定团结，一个重要方面，要看是不是做好了生产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的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要统筹全局，重点抓好薄弱环节，要经常到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去，同群众谈谈心，做些调查研究，亲自帮助那里的干部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近我就想到这么一件事，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衣被都比较充裕，而有些贫困地区群众缺衣少被，难以避寒，可以考虑在今年冬天到来以前，动员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发扬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为贫困地区捐送衣被。

坚持选派干部分期分批地到贫困地区帮助工作，是加强对扶贫开发工作领导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措施，这是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的。越是贫困地区越需要上级领导的帮助指导。应当从省、地、县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贫困乡、贫困村蹲点，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帮助他们搞好班子建设，找准脱贫致富的路子，引进人才、技术，组织他们搞开发性生产。有些贫困村一时选不到得力干部，可以考虑从县级机关抽调一些干部下去任职。坚持派干部到贫困乡村蹲点、任职，对于锻炼干部，培养人才，改进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也大有好处。要把改变贫困乡、贫困村落后面貌的政绩，作为考核和选拔县乡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善于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创全社会扶贫济困的新局面，这也是我们加强对扶贫开发工作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发扬这一传统美德尤其必要。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都要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参与扶贫工作，各尽所能，各尽其力。扶贫是要有一定投入的，财政、金融等部门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和倾斜。还要组织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对口帮助，促进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希望京津沪三大市和沿海各省，在这个方面多出一把力。中央有这么一个意见：沿海比较发达的省市，自己拿钱扶贫，中央扶贫资金集中用在中西部困难大的地方，同时还要求你们通过经济合作、技术转让、干部交流等多种形式，帮助和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各级地方党委都要在本地区内积极开展富县帮穷县、富乡帮穷乡、富村帮穷村、富裕户帮助贫困户的活动，结成对子，相互帮助。

三、要长期坚持抓下去，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必须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国家对贫困地区一定的扶持，社会各界开展扶贫济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最终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这就要求贫困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去战天斗地，发展经济。有了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困难就容易克服。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脱贫致富 的基本经验。去年春节前我到山西考察，这个省的临汾市乔李村，就是靠艰苦创业改变面貌，由穷变富的。他们现在已经富起来了，村党支部仍然保持着与群众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精神。我希望贫困地区的人民都要学习发扬这种精神。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体现出扶贫开发的新思路。要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禁锢中摆脱出来，真正做到改革、开放、搞活。解放思想、找准路子是关键。不少贫困地区，吃亏就吃在思想上放不开，经济工作的路子太窄，一方面荒山、荒坡、荒滩、荒水还在那里荒着，另一方面许多劳动力却在那里闲着。要把劳动力多当作财富看待，不要把它当作包袱。许多地方常年坚持组织劳动力修田造地、修桥筑路、兴修小型水利、植树造林，效果很好。这些年用粮食和工业品搞的以工代赈造田修路，效果也很好，应当坚持下去。贫困山区耕地少，荒山多，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林果、畜牧以及其他经济作物。贫困地区还有这样一条经验，叫“远抓林果，近抓牧，当年见效出劳务”。劳动力输出实际上是劳务培训，智力开发，出去几年，开了眼界，长了知识，回来就是人才。当前的问题是，对劳务输出，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民工潮”，必须加强领导和管理，

大力提倡有组织有计划的劳务输出，尽快减少自发的盲目流动。这一点务必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充分的注意，认真总结好的经验。否则不但不利于正常的劳务输出，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好人才培养是关键。要把这种创业精神转化成物质力量，最终要靠发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因此，要把科教扶贫、智力开发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八七计划”强调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文盲，对青壮年进行职业技术教育，防治地方病，抓好计划生育，都很好，我都赞成。贫困地区一方面要稳住现有人才，另一方面要培养新的人才。很多地方的实践表明，启用一个优秀人才，就能带动一片，富裕一方。农村党的组织，要在政治上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团结、鼓励他们带领周围群众脱贫致富、改变家乡面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能不能得到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贫困地区的领导班子是否过硬、基层组织是否坚强。重点是两个：一是要加强贫困县的工作，根据扶贫开发的需要，选拔和配备好县级领导班子，主要是挑选那些工作能力强、能吃苦耐劳、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并保持相对稳定。二是加强贫困村党支部的建设。扶贫工作中有一条好的经验，就是“给钱给物，更要建设一个好支部”。要建设一个好的支部领导班子，就必须把那些积极能干、廉洁公道、联系群众的优秀党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总之，只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脑子里始终装着贫困地区，与群众同甘共苦，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家的必要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立足实际，开发扶贫，持续奋斗，讲求实效，到本世纪末，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一定会变个样。

（本文是江泽民同志1994年3月3日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选自《求是》1994年第10期）

材料二　扶贫开发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李鹏

一、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帮助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是党和政府的历史责任

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搞扶贫开发已经七八年了。由于始终坚持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为扶贫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这次会议讨论的“八七计划”的任务，就是要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7年里，解决农村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和各级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如期完成“八七计划”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能否圆满实现。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努力奋斗。假如到本世纪末在我国仍有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步战略目标就不能说是圆满实现。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是否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到2000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之中，怎么体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些身负重任的各级共产党人，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国务院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就是要下决心在本世纪末稳定地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绝不能把这个问题推到下个世纪。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计划，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政治上的意义，只能实现，不能落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各部门各系统的负责同志，必须把这项任务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务必如期完成。

二、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要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战略措施

现在全国没有完全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8000万人口，85％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中大多数又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扶持他们脱贫致富，就是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一）差距是客观存在。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存在差距，一个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差距。这是历史、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要在短期内完全消灭差距是不可能的。（二）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逐步缩小差距，最后消灭差距。我们坚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帮助后进地区发展，就是为了最终达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大家都穷，就谁也帮不了谁。有的地区先发展一步，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才能有条件帮助后进地区。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他又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

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同上书,第364页)为了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已做了大量工作。从纵向看,比比自己,发达地区在发展,贫困地区也在发展;从横向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对此,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要采取有力措施,为缩小地区间差距做出努力。

提倡和鼓励先富起来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带动和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和扶持贫困地区,从大的方面说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向贫困地区倾斜。另一条渠道是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京津沪等大城市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但这不是简单无偿地给钱给物,而主要是通过互利互惠,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联合与合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联合开发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可以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帮助产品上档次、上水平,提高经济的增长能力;可以提供稳定的销售市场,带动生产发展;可以通过输入劳务,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把贫困地区的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发达地区的技术、信息、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既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开发,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合作,值得大力提倡,务必落到实处。

国家从财政和金融上给贫困地区以足够的支持。搞扶贫开发当然要有相应的资金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就没有温饱和发展。这些年各级财政、银行都为增加扶贫开发的投入作了很大努力,效果是好的。但是现在扶贫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要在本世纪末完全稳定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难度很大,时间也很紧。没有相应的资金保证,很难做到。国务院已经决定,从今年起,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10亿元扶贫贴息贷款。今后随着财力的增长,国家还将继续增加扶贫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入。京、津、沪三大市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辽宁等沿海6省,扶贫资金由自己解决,中央的扶贫资金要集中用于中西部困难省(区)。

增加扶贫投入,也不能只依靠政府,还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多方面筹集扶贫资金。

国家重大项目要向贫困地区倾斜。虽然西部贫困地区目前比较困难,但是有丰富的资源,这是一大优势。国务院各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贫困地区的这个优势。要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向贫困地区安排一些规模较大的资源开发项目,安排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从根本上说,要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状态,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这些大型骨干项目的带动。

通过改革逐步理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很低,农产品价格也不高。现在,价格体制、流通体制正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困地区的木材、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以及各类资源都可以在全国的统一市场内与发达地区实现等价交换。这是促进中西部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中西部贫困地区也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契机,发展自己。

提高贫困地区人才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措施。这些年,我们搞贫困地区的人才培训,搞东西部干部交流,很有成效,今后要继续坚持,不断扩大。现在,全国范围有两种大规模的流动,值得重视。一是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由西向东流动,劳务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发达地区的能工巧匠由东向西流动,已经遍布西部地区城乡的各个角落。劳务从西向东的流动,这既可以使贫困地区利用沿海发达地区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参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可以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素质。这是一种特殊的培训。能工巧匠由东向西流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输出,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层次,这是一种更有效更实用的形式。这两种流动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充分肯定,继续发展。对于大规模的“民工潮”,不能放任自流,要积极疏导,合理流动,有秩序的进行,以减少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济上的损失。

要在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进行开放式扶贫的试点。贫困地区要发展,确实要办一些乡 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在实行就地办乡镇企业的同时,也可以进行把贫困地区的工业办到条件具备地区的试点,把利润、税收返还给贫困地区,安排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去就业。这样做也许可以克服贫困地区办企业的劣势,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益,提高扶贫资金的效益,提高整个扶贫工作的水平。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这些年,国家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工商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人民解放军等方方面面发扬扶贫济困的精神,积极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除了给予财力、物力支持外,还发挥各自优势,实施智力扶贫、科技扶贫、人才扶贫;为贫困地区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引进项目和技术;实行包一个地区,一包到底,包到脱贫致富为止。这些作法都为前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表现了社会各界关注贫困地区的一片爱心,而且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希望社会各界能够进一步动员起来,动一份真情,献一片爱心,做一份贡献。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希望国家大型工商、外贸企业要向贫困地区延伸,在贫困地区摆一些项目,选择一些有效益的项目,把自己的发展和贫困地区的开发结合起来。

缓解贫困,消灭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联合国

和众多国际组织的任务。中国消灭贫困是世界消灭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强我国与国际组织在扶贫方面的合作，让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国扶贫工作。

贫困地区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国家的支持，社会的帮助，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贫困地区自身的努力。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像河南的林县，以及许许多多先富起来的县、乡、村，都有一本艰苦创业的历史，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和经验。有了这一条，才能战胜困难，脱贫致富。同时，要注意挑选有献身精神、能吃苦耐劳、联系群众的好干部，充实贫困县的各级领导班子，并保持相对稳定，让他们安下心来，带领群众改变落后面貌。

三、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省长负责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原则，我赞成。以省为主，就是要求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关心扶贫、抓好扶贫，但还要明确一点，就是省长负责。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群众温饱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财政、金融、农业、林业、水利、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涉及文化、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单靠分管的副省长抓是不够的，很难协调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因此，必须靠政府一把手统揽全局，统筹安排。

能否如期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本地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的一项硬指标。看一个省、区、市的工作好不好，不能只看经济发展速度快不快，还要看效益好不好，人民生活改善快不快，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解决得怎么样。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发达地区，更要把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的疾苦冷暖放在心上。各省、区、市要按照“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制定本省、区、市的攻坚计划。必须要有进度要求，今年解决多少，明年解决多少，怎么解决，要有具体规划。每年组织一次检查，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以督促大家按期完成任务，不能有丝毫懈怠。

政府系统各部门，要继续把扶贫开发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除了重点联系帮助一片贫困地区外，还要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的任务，分别制定本行业、本系统的扶贫计划，作为落实“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相信只要大家树立信心，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奋勇攻坚，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八七计划”的奋斗目标，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

（本文是李鹏同志1994年3月3日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选自《求是》1994年第10期）

1994年：改革没有浪漫曲

背景介绍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在年前问世的，报章上的言论多以“宏伟蓝图”“进军号角”等等各种豪迈的字眼尽书其伟大。不过就在常人为这些必要的评论所振奋时，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们在真正领悟了《决定》的内涵和意义之后，已经开始考虑其操作中将面临的严峻挑战了。

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际先驱论坛报》联合举办的94’中国北京国际高级经济论坛，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级别最高的经济论坛会议。

是谁说的?中国的改革从此正式进入了“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而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

材料：

- 今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将做哪些工作

材料　今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将做哪些工作

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在94’中国北京国际高级经济论坛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情况。

199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　李铁映

1.1994年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关键性一年

今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加快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配套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今年要在国民经济快速运行中整体推进改革，又要在新旧体制全面转换中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当前，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控制通货膨胀，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2. 企业改革

今年，国务院将选择100家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对国有小企业，将通过租赁、承包、出售等形式进行改造。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大多数国有企业，要继续转换经营机制，逐步解决企业的历史包袱，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高科技企业等，可改造为股份合作制，有条件的也可改组为股份公司。对私营企业也要鼓励其改造成为规范化的公司。

3. 搞好财税、金融、计划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在建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同时实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返还。要抓紧研究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为今后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做好准备。

——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基础上，理顺国家和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实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建立健全土地税(费)和财产税制度。

——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和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保持币值稳定，组建政策性银行，逐步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国有商业银行。

——进一步改革计划形式，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加强计划内容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简化年度计划，以中长期计划为重点，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建立投资约束机制，强化投资主体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健全对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的宏观调控，规范投资决策行为。

4. 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完善市场体系，继续推进价格改革

要继续发展商品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抓紧建立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健全市场秩序，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尽快形成。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尽快实现生产资料双轨价格的并轨。

5.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

重点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镇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方向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

6. 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要落实外贸企业经营自主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发展外向型企业集团。进一步改革进口管理体制，加强商会组织协调作用，逐步建立配额、许可证公开招标和拍卖制度。逐步使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科技企业和流通企业都能享有外贸经营权。

7. 加快经济法制建设

将陆续出台的《证券法》、《预算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期货交易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有些目前还没有条件立法的，也将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规章。

企业改革的思路

国家经贸委主任　王忠禹

今年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步伐，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摸索出进一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途径和办法。采取的改革思路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综合配套。

整体推进，即继续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的各项权利和责任落到实处；继续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内部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组织实施《国有资产监管条例》，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重点突破，从经贸委的工作来说是抓“转机建制万千百十规划”，以解决目前影响企业改革和企业活力增强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耻选择1万户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摸清底数；对1千户国有企业设立国有资产监事会；1百多户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十几个城市进行重点突破试点，如企业破产试点，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减轻企业不合理历史债务和社会保障等。

综合配套，即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步伐；加大技改投入，加快技改步伐，提高技术素质；抓紧制定与《公司法》有关的配套法规。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通过近几年来实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试点，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公司制企业的优点。但试点中发生的新矛盾也告诉我们，搞公司制操作难度较大，绝不能一哄而起，全面铺开，更不是把所有企业都转变为公司，而应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行。因此，我们先对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同时对现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按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

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国家计委副主任　桂世镛

进一步深化计划、投资改革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建设项目首先必须明确法人主体，后定项目。由企业法人对建设项目的筹划、筹资、建设实施直至生产经营、归还贷款和债券本息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并承担投资风险。同时，银行要承担贷款的风险，企业与银行在申请贷款上，实行双向选择。

——改革投融资方式。对投资收益比较高、市场调节比较灵敏、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竞争性项目的建设将放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并通过市场主要向商业银行进行筹资，逐步用项目登记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制，政府投资逐步从这类项目的投资中退出。对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社会效益显著、企业赢利不大而又必须要干的基础设施和一部分基础工业，及直接增强国力的符合经济规模的支柱产业等基础项目，大部分属于政策性投融资的范围，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通过经济实体进行投资，并广泛吸引地方、企业参与投资；鼓励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进行投资；有的还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科教文卫等公益性项目，将主要由政府用财政拨款进行安排。

——加强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的宏观调控。重点是搞好资金源头的控制和调节。此外，还要建立指导投资方向的产业政策体系和投资信息反馈系统，建立健全建设项目申报备案制度和新开工登记制度，并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价格等经济手段、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投资活动进行宏观引导和调控。

——建立中央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这项改革措施已在今年初出台。国家开发银行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是专门承担政策性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责权统一。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后，国家计委主要侧重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宏观调控以及重大建设项目的立项决策工作；国家开发银行根据筹资能力和项目的实际情况，负责具体的项目资金配置工作。

——加快发展为投资建设服务的市场体系和加强立法工作。要建立为企业法人服务的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审计、工程监理等市场体系。同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证投资活动有序进行。

财税改革的有关问题

财政部部长　刘仲藜

总体来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前四个月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新体制的运行基本正常，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一是在没有冻结物价和工资的情况下，税制改革没有引起物价大的波动或大幅度上涨。二是财税改革没有给生产和流通带来不利影响，工业生产依然快速发展。1～3月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共完成产值8821.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三是社会各界和大多数企业对新税制出台后税负的变化反应平稳，特别是在华投资的外商已逐渐消除疑虑，利用外资继续保持了上涨的势头。1～3月我国已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1834个，协议金额196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54.29亿美元。四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继续增长，各级财政的资金调度比较正常。截至3月底，全国财政收入完成预算18.7%，比去年同期增长21.4%；财政支出完成预算14.9%，比去年同期增长23.8%；收支相抵，结余数额也多于去年同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各界对新的财税体制已逐步熟悉，一些模糊认识和疑虑正在减少，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当然，这样大的改革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但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我们已及时作出了妥善的调整和处理。综上所述，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们财政改革的方案是正确的，落实也是得力的，对取得改革的预期成果我们充满信心。

或许有些朋友不够理解，既然这次财税改革有那么多的好处，实施状况又基本如愿，为什么在改革实施当年中国政府还要筹借1000多亿元的巨额债务？不错，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次财税改革必将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和从根本上缓解财政困难产生积极影响，但正像我前面所讲到的，如果祈望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就会欲速不达，引发更多的矛盾。所以，我们这次改革没有向地方和企业甩包袱，而是先建立一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制，然后慢慢调整，逐步达到目标。相反，在改革初期，为了使各方面条件相对宽松，财政上还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前一段时间，有些海外舆论说我们用加大企业税负和上收地方财力的方法缓解中央财政困难，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次财税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既得财力是一分也不上收的，只是在财力增量的分配上，中央多得一些，对此，地方是理解和支持的。至于企业的税负水平，在设计上全国算总帐是不增加的，但由于税制结构的变化，企业之间发生一些增减变化也是正常的。同时，在税制实施过程中，由于操作、衔接上有欠周密的地方，也使一些企业临时增加了负担，对此，我们已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

解决。有的企业反映税负加重，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新税制减少了税收的流失，使一些原来少交税的企业按统一的税法纳税，我想这不应该说是一件坏事。看来，在这方面还需要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作"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虽然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克服许多困难。拿财税改革来说，若要使其更规范，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地方税体系，需要更彻底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需要建立科学而又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所有这些都需要把握时间、选择机会、积累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新的财税体制将会进入更加规范、健康的运行状态，发挥我们预期的宏观调控作用。

金融与外汇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元

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依据以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当前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今后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要建立一个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系；要建立一个政策金融和商业金融分离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此外，为了加速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要加快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并且在近期内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

第一，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建立强有力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要转换人民银行职能，明确其主要职责是稳定货币和加强金融监管。人民银行不再直接对社会发放政策性贷款，并把货币发行权、基准利率调节权、基础货币吞吐权、信用总量调控权都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分支行主要有七项职能：金融监督管理、调查统计分析、横向头寸调剂、经理国库、现金调拨、外汇管理和联行清算。要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人民银行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运行的情况，灵活地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贷款限额、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等手段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防止通货膨胀。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今年全国人大将讨论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保险法》和《票据法》。人民银行要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保护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

第二，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要按照集中必要资金加强重点建设，强化投资宏观调控能力的原则，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已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是一家以国家重点建设为主要融资对象的政策性投资开发银行，主要办理国家重点建设政策性贷款及贴息业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农副产品收购、农业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是为大型成套设备进出口提供信贷，为成套机电产品出口信贷提供贴息及出口信用担保。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由财政拨入，另外的资金来源还有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政策性银行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实行保本经营。

第三，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

要建立一个有序竞争、规范化的金融市场，打破地区割据，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首先要规范货币市场，主要是同业拆借市场，制止"乱拆借"，使其真正成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场所。其次，要规范资本市场，主要是严格管理债券、股票市场，并使其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要制定和执行有关法规和条例，严格债券发行的审批程序，逐步建立规范的债券市场。要逐步加快企业股份制的改造，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完善证券交易所和交易系统的管理。要加强对利率的管理，理顺存贷款利率和有价证券利率的关系，使利率逐步市场化。

第四，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一般说来，当一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较高以后，本币将被其它国家所接受，可在国际交往中用于流通、结算和清偿，即实现本币和外币的完全可兑换。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立即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主要是：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汇率制度；国际清算手段和国际支付能力还不够充足；宏观调控机制也还不十分完善；企业机制的转换和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还需要时间等等。因此，近期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的可兑换。这意味着放松贸易和与贸易活动有关的服务性支付的外汇管制，依靠国家的各项政策来指导和调控企业的外汇收支行为，并通过汇率政策来支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吴仪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与前15年改革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是

同国民经济其他主要领域，诸如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汇以及企业制度等同步、配套进行的；这一轮改革的范围之广，力度和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改革方案，是在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总结15年改革经验并借鉴国外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改革的时机比较成熟，条件是具备的。

第一，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取消双轨汇率制度，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以更好地发挥汇率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重要功能。同时，取消外贸企业外汇收入分成制，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相应地，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应该讲，这是实现我国外汇、外贸体制同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重大举措，对于规范外贸企业行为，校正在外汇和外贸领域的一系列扭曲现象以及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完善外贸宏观管理。中国的第一部《对外贸易法》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外贸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也正在起草过程之中。我们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比较完备的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适应新的财税、金融体制运行的要求，抓紧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加强和完善外贸信贷制度和风险机制。

第三，规范外贸行政管理制度，按照公开、公正、效益的原则，实行配额的招标、拍卖或规范化分配。规范许可证管理，健全检查、监督机制。

第四，加快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在外贸领域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动工贸、技贸结合，进一步放开经营，拓展各类企业共同参与对外贸易的“大经贸”格局。

第五，加强和完善以进出口商会为主要内容的外贸协调服务机制，增强外贸企业在同行业内的自我约束，加强对企业经营和宏观管理的社会监督。

第六，确保对外贸易法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增强透明度。

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措施已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从今年前4个月的情况看，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经营秩序比较正常，新体制运转情况是好的。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把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994年中国物价追踪

背景介绍

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23%左右。由于这关系到我国货币币值稳定、经济稳定乃至于社会稳定的大局而成为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纷纷瞩目的焦点。

材料：

- 1994年的物价高涨说明了什么
- 国务院关于开展全国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材料一　1994年的物价高涨说明了什么

一、1994年的物价是怎么涨的

1994年的物价高涨，实际上始于1993年的年底。1993年秋后，广东粮商到内地粮食主产区收购新粮，引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粮油价格大幅度波动，使当年12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将近18%，1993年全年平均比上年上涨了13%，创1989年以来的第一个物价高峰年的纪录。正是受此次粮油价格暴涨的拉动，1994年一开年，市场物价继续攀升。1月份比上年12月上涨了3.5%，2月份又比1月份上涨了3.3%。其中食品类分别高达4.1%和6%。与上年同期相比，年初这两个月的物价总水平分别上涨了19%和21%，其中食品类分别高达26.6%和31.8%。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采取断然措施，加大行政调控力度，努力增加商品供给。3月份以后，物价上涨的势头有所遏制，3～7月份的五个月里，平均每个月只比上月上涨不到0.8%。但是，由于受前述物价暴涨的影响，这五个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平均涨价幅度还是在20%左右。

进入7月份以后，随着粮食销价的提高，加上一些地区受灾和蔬菜淡季延长等因素，物价涨幅又出现反弹。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8月份比7月份猛涨了3%，其中粮价上涨了2.5%，肉禽蛋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了9.5%和17%；与上年同期相比，这四个数字分别为23.5%、55.9%、43.2%和45%，均属历史罕见。

9月份仍涨势不减，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又比8月份上涨了3%，其中粮价上涨了3.1%，肉禽蛋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了7.5%和19.8%；与上年同期相比，这四个数字分别为24.6%、58.0%、48.6%和55.5%，再创历史新高潮。前三个季度累计比年初上涨了18.6%，比上年

同期平均上涨约21%。

如果把1994年前三个季度的月环比涨幅用平滑曲线作图，则呈明显的“锅底”状(两头的1、2和8、9月份为“锅沿”，中间的3～7月份为“锅底”)。这就反映出1994年物价高涨的一个最大的诱因，即主要是由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价暴涨带动1994年初的物价上涨；7月份提高粮价，又使趋于平缓的物价涨势再起波澜，并且把这一涨势带到了年底。

二、物价高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粮价上涨是诱因，“进口”商品是涨价的主力——从上到下都认同这个判断。但是物价高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粮价放开一年就暴涨不止？不少专家学者见仁见智，出现了“投资消费双膨胀说”、“涨价压力释放说”等种种理论，谈锋颇健。笔者以为，此番物价高涨缘于上述说法以外的特殊原因。

先看商品，1994年的物价高涨是在商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发生的。据国内贸易部的统计资料表明：95.8%的工业消费品和63%的农副产品供求平衡或供略大于求，从引发这一轮物价高涨的“始作俑者”——粮食看，前一年底粮价由南向北接连暴涨。当年农业确实是减产了，但并没有影响到粮食的储备和正常库存，没有影响到粮食的总量平衡，仅国家手中就有1000亿斤仓储。粮价暴涨根本不是由于粮食总量上供不应求的“货紧价扬”。1994年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旱涝灾害，但从全国看，农业收成也比原来预料的要好。夏粮是丰收的，大多数地区秋粮收成也是好的，粮食总产将达到9000亿斤左右，棉花总产将达到8500万担。总之并非商品总量不足，至少在粮食涨价风初起时是这样。

再看货币，1994年的物价上涨过猛，拿“货币发行量过大”作说词，老生常谈地用“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原材料涨价推动成本上升”等等说法来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能自圆其说。

“过热”、“膨胀”，都是“总需求过旺”的变相说法。从理论上讲，“总需求过旺”，必然导致商品价格全面上涨。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其一，在列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统计的14类商品中，只是食品类价格涨势一直强劲，纺织品类和服装鞋帽类涨幅突出，而其它11类商品价格涨幅较小。在零售市场上，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价格暴涨，与年初相比的涨幅达20～30%，如食品类、服装鞋帽类、纺织品类等等；而其它各类商品如中西药、文体用品、日用品、家用电器、首饰、燃料、建筑装璜材料等却只比年初上涨平均不到10%。甚至本应受“总需求过旺”影响最大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1～8月份反而降价1.5%，全年平均下降约3%。其二，“原材料涨价推动成本上升”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工业品价格，工业品价格应当上涨较猛。但实际出现的是农产品价格暴涨、工业品价格相对缓慢上涨的局面。显然，“成本上升”也不是站得住脚的主要原因。那么物价暴涨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供应与市场价格形成出了问题。从政府角度讲，就是市场与物价的管理问题。

当前在政府对市场和物价的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既缺乏系统的认识、系统的规划，也缺乏实施的工具、实施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市场行为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公正，商品流通和价格形成混乱，以至于物价暴涨难以平息等等。

自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些同志对市场和价格问题的认识过于简单化。认为国家把统着的商品供应和管着的商品价格都放开就是市场经济，商品供应和商品价格就会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达到合理；政府尽量少管、最好不管。这样简单化的认识导致了简单化的行动。在放开市场、放开经营、放开价格之前，没有系统地规划，没有从改革顺利和不顺利(尤其是后者)两方面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没有论证和落实相应的措施，就以推进改革的名义改变了经营方式，撤销了管理机构，分流了专业人员。今天，事实无情地迫使人们认真地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物价问题。

以粮食问题为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粮食销售渠道要不要放开，如何放开，放开后如何保证基本供应，如何防止垄断经营；粮价一旦波动过大，应当由谁、用什么方式平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既缺乏详细的研究论证，也没能妥善地落实解决。于是，当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因比较利益而减少耕地不种粮、甚至大搞粮油精加工时，没有出台相应的引导措施；当国有粮食部门推行基层粮店承包经营时，没有规定必须承担的保证居民口粮供应的义务；当广东粮商向北收购粮食时，产地的国有粮食部门也跟着抬价收购；当粮价涨起，许多地方的国有粮店或有意惜售、或将平价粮油卖大号给个体粮贩，再由他们卖高价；当粮价带动食品价格暴涨，许多城市既没有专项资金可以补贴，也没有储备物资可以抛出平抑市场；当政府宣布采取限价措施后，又缺乏足够的专业物价检查人员监督实施，即使物价检查人员进入了市场也常常都视为“名不正言不顺”而发挥不了作用。

解决粮食的市场与价格问题听起来繁琐，但解决的方法并不难找，粮食以外的其它商品的问题，也不难找出解决的方法，难点在于是否认识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必要性，在于能否下定决心解决市场与物价管理的问题。正如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常说的，难的不是制定规则，而是制定“制定规则的规则”。

(作者：李军)

材料二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全国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国务院近日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了关于开展全国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通知说，当前，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物价上涨较多，群众对乱涨价、乱收费反映强烈。有的企业借税制、汇率和价格改革出台之机搭车涨价；有的地方为了局部利益越权定价，乱收费用；有的经营者不执行明码标价制度，漫天要价，垄断价格，欺行霸市，甚至以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利。这些不正当的经营行为，推动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为了制止价格违法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度上涨，安定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给各项改革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国务院决定 1994 年继续开展全国物价大检查。

通知要求：

一、检查的范围、重点和主要内容

检查的范围包括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有收费行为的行政事业单位。

检查的重点是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检查的时限和主要内容为 1993 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价格违法行为，主要包括：

(一)借税制改革之机擅自涨价和扩大进销差率、批零差率，或在原价格之外另加增值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的行为。

(二)违反物价管理权限擅自提高属于国家定价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行为；在铁路、公路、水运等运输中乱涨价、乱收费和在出售、办理票证时实行强制保险的行为。

(三)违反国家规定的调价备案与申报制度和差率控制、临时性限价办法，以及不实行明码标价的行为。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提高化肥、农膜、农药、农用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电价的行为。

(五)越权出台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

二、检查的时间和方法

全国物价大检查从 3 月下旬开始，6 月末要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次检查由各级物价部门负责，会同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检查组开展工作。全国物价大检查以各级物价检查机构为骨干，充分发挥各方面物价监督组织的作用，采取边宣传、边检查、边处理、边纠正、边整改的方法进行。

在检查中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工具大造声势，宣传物价大检查的意义；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较大的案件要公开曝光。要发动群众举报各种价格违法行为。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改进和完善价格管理的措施，促进企业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各地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参加物价大检查工作，发挥他们的监督指导作用。

三、检查的组织领导

全国物价大检查在各级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各级政府要予以高度重视，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加强对物价大检查工作的领导，具体工作由物价部门组织实施。要保持物价部门机构和队伍的稳定，充实必要的检查力量，及时协调各方面关系，切实解决物价大检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要在调整研究的基础上，列出重点，分类排队，制定方案，研究政策，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到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抓出成效。

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财政部门要保证物价检查的办案经费；银行要按规定协助物价检查机构划拨被处罚单位和个人拒缴的罚没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物价检查机构提出的停止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要求应积极予以配合；公安部门对拒绝、阻碍物价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要依照有关法规予以处罚。

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会同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等部门组成项干工作组到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指导工作，地方告级政府也要派出工作组下去督促检查。

四、对检查工作的要求

(一)所有检查人员都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充分认识开展物价大检查对于稳定物价、安定人心，保证改革措施顺利实施的重要意义；通过培训，使检查人员熟悉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及有关业务知识，掌握有关政策法规；在检查中，要坚持原则，遵守纪律，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秉公办案。

(二)对查出的价格违法案件，由物价检查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要责令价格违法单位和个人将非法所得退还购买者或用户，不能退还的非法所得由物价检查机构予以没收，并根据情节处以罚款。

(三)所有被查单位和个人都要主动接受检查，如实提供资料，对借故刁难、抗拒检查的，要从重处罚。

（四）要保护坚持原则的检查人员和检举揭发人，决不允许对他们打击报复。对于包庇、袒护、纵容价格违法行为者，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全国物价大检查的日常工作，由国家计委负责。7月20日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向国务院上报物价大检查情况的专题报告。

（新华社讯，3月25日《人民日报》）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背景介绍

在中国大地上，有两条河，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这两条河可谓中华民族的摇篮。在长江之上，有一个地方，叫三峡，素以风景奇丽，天工造化而著称于世。

其实，三峡的风景就是三峡的能量。近代科学告诉我们，水力可以发电，而电已是如今人们难以离开片刻的能源了。孙中山先生早有开发三峡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也曾提议修建三峡水电站，无奈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实施。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对能源的要求更为迫切，技术准备也充分了，建设和开发三峡终于提上了日程。

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它的意义已越出了国界，具有对整个人类的重要性。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三峡工程开工，以此为开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开始了。三峡工程，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峡工程历经数十年论证、研究，在技术上已有了明确的肯定结论，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规模巨大的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

材料：

- 当惊世界殊——写在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际
-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李鹏出席开工典礼并作重要讲话

材料一　当惊世界殊

——写在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际

《人民日报》记者　龚达发　杜若原

长江在高唱，群山在欢呼。

1994年12月14日10时40分，李鹏总理向全世界宣告：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第一罐混凝土稳稳地浇筑在大坝江心岩石上。一项伟大的跨世纪工程将从这里崛起，载入中华民族腾飞的史册。

（一）

开发三峡，治理长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意愿。本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写道："自宜昌而上……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提出开发三峡的第一人。

新中国的建立，把三峡工程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以他博大的胸襟勾勒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此后，新中国几代水利科学工作者用40年的时间，精心设计，反复论证。从水文调查到地质勘测；从研究坝段到坝址选择；从水库调查到移民安置；从防洪演算到水库调度；从泥沙淤积到水库长期使用；从工程施工到巨型设备研制……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研究报告和方案蓝图。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从此，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进入实施阶段。

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介绍：长江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而最重要的是防洪。自古以来，荆江两岸一直是长江洪水肆虐横行的地方。史书记载，自汉代以来2000多年里，长江中下游发生较大洪灾200多次，水灾更是不可胜数。1931年大水，武汉市区行船百日，江汉平原14.5万人淹死；1935年再次大水又夺去了14.2万人的生命！1954年长江大水，荆江分洪区三次分洪，京广线中断百余天，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长江防洪，尤其是中游水患，使共和国每一位领导人寝食不安，牵肠挂肚：这里有1500万人，2300万亩良田，还有华中特大城市武汉、京广大动脉……

三峡工程是唯一可以解除这些心腹大患的良策。水库防洪库容达222亿立方米，水库调节洪水可削减洪峰流量2.7万—3.3万秒立方米，使荆江河段防洪标准由现在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即使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也可以通过三峡工程的调蓄，防止发生大量人口死亡的毁灭性灾害。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46亿千瓦时，相当于一座年产5000万吨原煤的煤矿。三峡水库回水可达西南重镇重庆，改善650公里川江航道，万吨级船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年单向通过能力由现在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为重庆、四川乃至大西南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海通道。

三峡工程的一系列世界之最使之跻身世界超级工程前列。

1994年6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全球超级工程会

议”上，三峡工程当之无愧地入选。外电报道，“三峡工程的出现，为会议陡增光彩”；“三峡工程属于全人类”。

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家柱这样说：三峡工程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人类最先进的科技进步成果。

“三峡热”已由中国传到海外，近两年到三峡工地考察、参观的外国元首、知名人士、水电专家已达 5000 多人。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前来三峡寻求合作。三峡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全世界，它的建成又将极大地推动世界水电事业蓬勃发展。

（二）

站在壮阔的三峡工程现场，葛洲坝工程局局长乔生祥感慨万端。他参加了葛洲坝工程建设，而今又率军奋战于三峡工地。

三峡工地距葛洲坝不过 30 公里，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三峡工程除了投资额、发电量远远超过葛洲坝外，更重要的区别是三峡工程深刻的体制改革。

三峡工程静态投资 954 亿元，倘若投资突破 1%，便是 9.54 亿元；工期拖后 1 年，仅发电一项损失即过百亿元。历史不容许三峡工程再交如此昂贵的“学费”。

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建设者一直思索着运用新的机制建设三峡，树起三峡的崭新形象。李鹏总理多次明确提出：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全部由国家投资建三峡是不行的，要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工程项目业主制来建设和管理三峡。1993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作为水电建设体制改革的产物，招标承包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一道登上工程舞台，构建起功能完整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即“三峡模式”。

1993 年 9 月 8 日，三峡工程推出第一标——西陵长江大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以 3.5 亿元中标。迄今为止，三峡工程已进行了 52 项招标，总合同额达到 41 亿元，引来了国内最具实力的 100 多家施工企业和美、英、德、瑞士、日本等国外大型设备制造企业。

“靠竞争赢得进军三峡的入场券”。三峡模式的巨大冲击力，使三峡前期工地成了多路英豪比技术、比实力、比信誉的竞技场。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施工单位争夺同一项目的精彩场面，令我国水电界的权威惊叹又惊喜。

铁道部大桥局是建设过武汉、南京等长江大桥的劲旅。按常理，他们夺得西陵长江大桥一标似无大障碍。但是，面临激烈的竞争，大桥局不敢有一丝松懈。他们除了展示自身的技术优势外，又果断联合武昌造船厂，在低温焊接、运输、吊装等方面形成新的优势，才得以一举夺标。

1993 年 10 月 24 日，长委会宜昌监理中心第一次跨进三峡工程大门。截至目前，进场的监理单位已有 11 家 200 多人。他们握有对施工全程监理的权力，建立了确保工期和质量的现场监督体系。同时，总公司还严格按合同条款规范项目中标单位的行为，防止层层转包等违约现象，从而为三峡工程创造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施工、一流的质量奠定了基石。

（三）

在三峡工程中，最让人牵肠挂肚的事就是移民。据三峡移民局局长唐章锦介绍，按三峡水库 175 米蓄水位计算，淹没面积达 638 平方公里，涉及鄂川两省 19 个县（市）。在长达 20 年的移民迁建期内，移民总数将达到百万人。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和重视移民工作。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让移民迁得出、住得好、先致富，对确保工程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三峡坝区的人民不会忘记历史的这一幕：1958 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周恩来总理登上瑞雪铺地的中堡岛，走近一间农舍。这一天，正是主人望作秀的女儿“打喜”的日子，按照风俗外人不能进屋。入乡随俗的周总理在主人门口留下 4 元钱悄然离去。35 年后，望作秀第一个搬离中堡岛。

领袖和移民的水乳之情，激发了三峡坝区人民舍我家园、修我大坝的豪情。1992 年冬天，正值天寒地冻时节，几项关系到大江截流的关键工程相继开工，工程征地迫在眉睫。为了工程需要，秭归县茅坪镇和宜昌县三斗坪镇的几十户农民成了第一批移民。他们砍了柑桔树，拆了大瓦房，搬进临时搭起的简单活动房。

担负三峡坝区移民工作的宜昌市、县各级干部，将自己比喻为一肩挑两头：一头扛着国家的任务和大局，一头扛着移民的利益和负担，两者都得兼顾。“让每一个移民满意”，是他们铭记在心的准则。

自 1984 年起，国家即拨出专款，对川鄂库区实行大规模的开发性移民试点。库区各级政府不再把移民仅仅视为赔偿对象，而是对移民迁移后的生产和生活作出全面的安排，妥善安置移民并负责到底。

从库首第一县湖北巴东县，到库区腹地四川万县市，再到库尾四川巴县，开发性移民正在卓有成效地展开。

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更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移民的关心。全国 20 多个省市派出的考察团，纷纷深入库区，洽谈合作项目。

如果说对口支援移民是全国人民支援三峡工程的具体行动，那么，三峡工程基金的筹措则是全国人民对三峡工程的奉献。从 1993 年起，全国除贫困地区和农业排灌用电外，每度电加征 3 厘钱；今年则为 4 厘，一年大约可收入 23 亿元。这部分基金作为国家资本投入三峡工程建

设。

今天，令人梦绕魂牵的"三峡工程"终于开工了！记者在坝区看到，一年多前，这里还是桔香飘溢的优闲田园，如今却变成机械如林、车流如潮的大工地。建设者们艰苦奋斗，夜以继日，超前施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终于比计划提前10个月擂响了进军三峡的锣鼓。

（选自《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5日）

材料二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李鹏出席开工典礼并作重要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鹏1994年12月14日在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上宣布，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主持开工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黄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四川省省长肖秧，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贾志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三峡工程的建设者，各界有关人士，出席开工典礼。

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在三峡大坝坝址——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举行。会议主席台两侧分别写着"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好宏伟三峡工程"和"一流工程、一流质量、一流管理、一流文明施工"两条标语。右岸山坡上写有"建设三峡，开发长江"8个大字。

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礼炮声中隆重开始。李鹏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功在当代利千秋》的重要讲话。他说，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经过长达40年的论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又进行了近两年的施工准备，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工的条件。中央决定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这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这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

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多年来参加工程勘测设计、科研和论证的专家学者，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向一切为三峡工程做过贡献和表示关心的国内外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李鹏说，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长江洪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长江中下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严重洪水灾害，给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沿江重要城市、工矿企业、交通干线带来极大的损失。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中下游洪水威胁的诸多措施中的一项关键性工程，不仅可以防止荆江两岸发生毁灭性灾害，减轻对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和武汉的威胁，还将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三峡水利枢纽是全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它将为华中、华东、四川等地区提供大量的电力，并将促进全国电网的形成，对长江沿岸的经济繁荣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三峡工程建成后，高峡出平湖，将极大地改善长江的航运条件，万吨级船队将可从武汉直达重庆，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经过认真筹划，三峡的名胜古迹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且可以形成新的景观。三峡工程及其坝区将会成为现代化与民族风格相融合的气势磅礴、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的风景旅游区。三峡的旅游事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指出，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我们一定要把它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工程。第一流的工程要有第一流的现代科学管理、第一流的文明施工、第一流的工程质量。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工程管理，开工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的一制。三峡施工要采用先进的施工机械和施工方区。用人少，工期短，质量好，效益高。施工现场都是封闭式管理，建立良好的工作秩序，为文明施工创造极高的条件。

在讲到移民工作时，李鹏说，移民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任务是十分艰巨。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不仅要做好移民的安置，还要发展库区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峡移民要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省负责、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移民经费切块分给四川和湖北两省，包干使用。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精打细算，结合开发，合理使用。希望库区广大人民发扬风格，顾全大局，做好搬迁安置和开发工作，支持三峡工程的建设。

他说，为了促进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国务院已决定把三峡库区列为经济开放区，给予优惠政策。国家和省市在安排建设项目时，将根据建设条件，予以同等优先的原则加以考虑。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要对库区实行对口支援。所有这些都给库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库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抓住这个机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把库区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地区

在讲到三峡工程的建设资金时，李鹏说，为确保三峡工程顺利进行，国家已建立了由全国支持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形成稳定的建设资金来源，并且制订了可行的国内外资金筹措方案，因此，三峡工程的建设资金是有充分保证的。

他说，三峡水力发电机组和输变电设备将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我们欢迎世界上具有制造大型水电和输变电设备经验的厂商参加竞争，转让技术、合作生产，参与这一工程建设。

李鹏说，三峡工程开工以后，在建设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广大建设者努力和全国人民支持下，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必将顺利进行，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2009年工程将全部竣工。一个宏伟壮丽的三峡工程将巍然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她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建设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功在当代利千秋。

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肖秧、贾志杰和施工代表、设计监理代表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讲话后，李鹏为长江三峡工程奠基揭幕。

大会开得隆重而简朴。

会议一结束，三峡主体工程的混凝土就开始浇注。李鹏等视察了工地，同工人们亲切见面。

在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前，李鹏于1994年12月12日、13日在船上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题会议，就三峡工程的若干问题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省、市负责人进行了研究。他还到四川省的丰都县、万县市和奉节县等地，视察三峡库区，考察移民工作，并访问了搬迁农户。李鹏要求三峡库区各级领导带领群众认真做好搬迁移民工作，在支援三峡工程建设的同时，把移民工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

（1994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广岛亚运会，中国健儿再展雄风

背景介绍

10月2日，再度欢聚一堂的亚洲体育健儿，43年间第十二次升起亚洲运动会会旗，568名中国体育健儿乘国运之强势，扬亚运之雄风，再创佳绩。

材料：

- 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上共获137枚金牌，名列奖牌榜首
- 首都举行欢迎亚运健儿凯旋招待会

材料一　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举行的第十二届亚运会上共获得一三七枚金牌，名列奖牌榜首

10月2日，再度欢聚一堂的亚洲体育健儿，43年间第十二次升起亚洲运动会会旗。

在广岛广域公园体育场举行的第十二届亚运会开幕式历时近四个小时。在开幕式上，上届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张百发等将自1990年10月起一直保留在北京的亚运会会旗和火炬，交给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这标志着新的一轮亚运周期的开始。

由于亚洲体育运动在过去四年里的持续发展，第十二届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由上届的27项增至34项，参赛者达到7300人，均创下了新的纪录，从而使亚运会成为规模仅次于奥运会的体坛盛会。

由于中亚五国的加入，在当天开幕式上列队入场的代表团多达42个。在男篮运动员刘玉栋高擎五星红旗引导下，中国体育代表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在第七个入场，接受检阅，作为连续三届亚运会的成绩最佳者，他们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在本届亚运组委会主席古桥广之进的陪同下，法赫德登上设在运动员队列前的讲坛致开幕词说："担负着未来亚洲重任的青年人，汇聚在国际和文化之域广岛，希望通过体育交流，达到进一步关心和平，增进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日本明仁天皇宣布第十二届亚运会开幕之后，出生在东道主城市的田径选手内富恭则和女篮队员一乘秋举着火炬，分别从两个入口跑进体育场，并将取自北京的"亚洲之火"和在当地点燃的"和平之火"合而为一，点燃了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

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名誉主席何振梁以及新当选的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徐寅生也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在主席台和贵宾席就座。

10月3日，第12届亚运会比赛鸣枪，中国队在当天的比赛中夺得14枚金牌中的8枚。

在女子举重比赛中，关虹以182.5公斤的成绩，夺得46公斤级金牌；刘秀华以197.5公斤的成绩，夺得50公斤级金牌；张菊花以202.5公斤的成绩，夺得54公斤级金牌。她们还分别打破了这3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在游泳比赛中熊国鸣在200米自由泳中，以1分50秒95的成绩，战胜对手，为中国队夺得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枚金牌。在女子100米自由泳赛中，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姑娘单莺，以54秒40的成绩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吕彬以54秒42的成绩夺得银牌。女子400米混合泳比赛中，老将林莉再创辉煌，以4分40秒47的成绩夺魁，第2名为队友戴国宏夺得，成绩为4分45秒64。在男子体操团体赛上，中国队赢韩国队3.025分，显示了整体优势。在男子花剑赛中，董兆致在众多强手中杀出，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日本队囊括了4枚空手道套路决赛的金牌以及马术金牌和男子100米蛙泳金牌。

10月4日，中国选手在亚运会比赛中夺得16枚金牌中的12枚。

男子3米板冠军由王天凌以709.41分夺得，余卓成

以698.76分获亚军；女子10米台跳水冠军由池彬以496.14分夺得，王睿以494.58分获亚军。女子举重赛中，我国女力士又囊括3项冠军。陈小敏以220公斤夺得59公斤级金牌；64公斤级金牌由雷丽夺得，成绩为225公斤；70公斤级金牌由唐卫芳夺得，成绩为230公斤。她们3人还10次打破三个级别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7项世界纪录。游泳是当天比赛的热点，中国选手在碧水池里再次同日本选手比试高低，结果5枚金牌全到了中国队手里。中国姑娘吕彬在200米自由泳中夺魁，成绩为1分57秒37，乐莹以1分59秒77获亚军；原媛在200米蛙泳决赛中以2分28秒34的成绩夺冠，队友戴国宏紧随其后，以2分29秒72的成绩获亚军。中国小伙子在碧水池里也大显身手。100米蝶泳金牌由蒋丞稷夺得，成绩为53秒97；400米混合泳金牌由熊国鸣夺得，成绩为4分19秒40；夺取4×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的是由薛寒冰、陈洲、尚恒庆、熊国鸣组成的接力队，成绩为7分26秒28。在当天的女子体操团体赛上，中国队获冠军，得分为194.375分，比第2名日本队高出5.325分。中国击剑队在当天的比赛中也不落人后，肖爱华夺得女子花剑金牌。

10月4日，中国举重女将共有3人10次打破7项世界纪录，并夺得当天全部3个级别的冠军。

广东姑娘陈小敏在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中，打破抓举、挺举及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成绩分别为98公斤、122.5公斤和220公斤，并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原世界纪录成绩分别为97.5、120.5和217.5公斤，是由中国选手孙彩艳和邹飞娥保持的。19岁的沈阳女将雷丽在64公斤级比赛中，也以103.5公斤的成绩，打破103公斤抓举世界纪录，并以225公斤的总成绩摘取金牌。来自江苏的唐卫芬，在70公斤级比赛中，5次打破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抓举比赛，她以100.5公斤和102.5公斤的成绩改写了保加利亚选手米·特伦达去年在墨尔本创造的100公斤的世界纪录。在挺举比赛中，唐卫芬又以125公斤和128公斤的好成绩，刷新了保加利亚名将菲洛娃保持的120公斤的世界纪录。唐卫芬还以230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菲洛娃的220公斤的世界纪录，位居这个级别的榜首。

10月5日，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共夺得22枚金牌中的8枚。中国游泳女队的周官彬以4分08秒80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自由泳金牌，杨爱华以4分13秒17的成绩获亚军，贺慈红以1分00秒71夺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吕彬以1分00秒97获亚军，女子4×100米自由泳的冠军由单莺、乐莹、乐靖宜、吕彬夺得，成绩为3分43秒35。体操个人全能赛中国运动员表现不俗。乔娅以38.750分摘取桂冠，袁珂霞以38.700分获亚军，莫慧兰获得第3名；李小双以57.650分获男子全能冠军，黄力平获亚军。韩国队在当天的比赛中共获得6枚金牌。日本队金牌数增加了5枚。哈萨尔斯坦获两枚金牌，开中亚五国夺金牌之先河。中国台北队的林汉成在男子保龄球个人赛中为中国台北队夺得金牌立了首功。

广岛亚运会女子举重赛10月5日落下战幕。中国队囊括九个级别的全部金牌，共有9人打破20项世界纪录，在亚运会的历史上，写下了中华巾帼英豪光辉的一页。

在76公斤级比赛中，18岁的辽宁姑娘花菊以105.5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抓举世界纪录，并以232.5公斤的总成绩，独占鳌头。日本的长谷场和中国台北的林雅菁分取二、三名。来自吉林的张晓丽在83公斤级比赛中，分别以108公斤、130公斤和237.5公斤的优异成绩，打破了该级别全部三项世界纪录，并摘取桂冠。原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台北的陈淑枝以230公斤的总成绩名列第二。被誉为“世界第一女力士”的吉林女将李亚娟，在83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以105.5公斤的成绩打破抓举世界纪录，并以240公斤的总成绩名列榜首。中国台北的陈小莲以220公斤的总成绩捧走银牌。

10月6日，亚运会男子举重比赛展开角逐。在当天进行的两个级别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夺得一金二银。

在54公斤级的比赛中，广西小伙蓝世章以265公斤的总成绩，位居榜首。他的队友杨斌位居第二，成绩为262.5公斤。日本的纳富俊行取得铜牌。广西选手唐灵生以290公斤的总成绩，取得59公斤级的亚军。冠军被韩国名将全炳宽夺走，成绩为295公斤。日本的池田位居第三。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打电报给中国体育代表团，祝贺中国体育健儿在广岛亚运会前期比赛中获得的佳绩。

10月6日，孙淑伟、肖海亮和谈舒萍、伏明霞分别以绝对优势获得男子跳台和女子3米板的冠亚军，从而使当天下午结束的跳水比赛成为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囊括金牌的第二个项目。在男子体操单项决赛中，出场的中国6名选手5人得金1人摘银。其中，单杠冠军为老将李敬所获，自由体操由李小双称雄，黄力平拿到双杠金牌，范红斌夺魁吊环，黄华东和韩国的李长炯、日本的富田好章在鞍马决赛中不分上下，并列冠军。只有在跳马决赛中，李大双以0.081分的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使韩国的吕洪哲得以登上领奖台的最高层。莫慧兰不仅一气掠走了女子四项决赛的全部金牌，还创下了当天全场比赛的最高得分9.925。由于莫慧兰的一枝独秀，与她同时出场的三名队友只好分别屈居这四个项目的亚军之席。在当晚进行的五枚游泳金牌之争中，中国泳坛小花们虽全线告捷，再添两项桂冠，却遭到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挑战。在100米蛙泳决赛中，年仅15岁的日本小将田中雅美前60多米一直领先，之后被戴国宏超出。在100米蝶泳的夺魁

材料二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李鹏出席

过程中，刘黎敏游出了58秒38的好成绩，创下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20多年来最接近美国一代名将玛尔所创造的57秒93的世界纪录的成绩。有“小龙”美誉的中国年轻男子泳将，当天也再次金榜题名。王怡武在200米蛙泳决赛的最后冲刺中，后来居上，不仅以2分14秒56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4个月前才创造的全国纪录，而且夺得中国游泳队在男子项目上的第五枚金牌。

10月7日，肖爱华、王会凤、梁军、叶琳4位中国姑娘宝剑出鞘，以9∶2轻取日本队，挑落女子花剑的团体金牌。中国女排当天以3∶2胜日本队，总算得到一点安慰，但这个胜利为时已晚，韩国队终于傲居冠军宝座，中国队和日本队分获第二和第三名。

亚运会男子举重比赛10月7日进入第二天，中国队摘取当天全部两个级别的金牌，并获得1枚银牌。在64公斤级比赛中，25岁的湖南选手张友谊虽然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但没有打破自己保持的抓举145公斤的亚洲纪录。湖南选手彭颂以297.5公斤总成绩位居第二。中国台北选手廖星州取得第三名。在70公斤级的比赛中，来自浙江的占旭刚力战韩国名将金鹤凤，以抓举145公斤、挺举185公斤和总成绩330公斤独占鳌头。

韩国的金鹤凤以322.5公斤的总成绩名列第二，哈萨克斯坦大力士泼萨迈取得第三名。

日本队在马术团体障碍比赛中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第一名。印度尼西亚在当天的金牌游击战中小有成就，夺得男子网球团体桂冠，印度队居第二名。

10月7日，广岛室内综合游泳馆仍是中国水上健儿的驰骋之地，在6枚金牌的角逐中，他们五度称雄。在首先进行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7岁的吕彬以2分11秒57的成绩轻取冠军，并打破该项世界纪录。在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薛伟和张斌并肩冲刺，以2分01秒47的成绩同时触壁，使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首次出现并列冠军，同时也将大会所设的游泳金牌由31枚增至32枚。并列冠军的现象在世界泳坛上也是罕见的。当天获得金牌的其他中国泳将分别为：以22秒76的成绩在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夺魁的胡滨，以8分31秒57的成绩刷新自己30多天前在罗马大赛上所创造的亚洲纪录，并夺得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的罗萍，以及同心协力拿下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桂冠的贺慈红、原媛、刘黎敏和单莺。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28岁的林来久虽然游出了57秒04，比他自己在上届亚运会夺得该项冠军时的成绩还快了0.09秒，可是同池角逐的日本选手系井统发挥更为出色，结果以破亚运会纪录的56秒08的成绩夺走冠军。

10月7日开始的第十二届亚运会射击比赛，许海峰和王义夫联袂出场压阵，与年轻队友徐丹一道按计划拿下了男子自选手枪的团体冠军。日本枪手中重胜，打出664.1环的亚洲新纪录，轻轻松松地摘走了男子自选手枪个人赛金牌。

随后进行的女子气步枪团体和个人赛，韩国的李恩珠夺得冠军，张秋萍定位在亚军之席。

10月8日，亚运会男子举重赛进入第三天，土库曼斯坦大力士阿·奥拉祖尔耶夫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第一枚金牌。中国队当天夺得1银1铜。在男子76公斤级的比赛中，今年25岁的世界名将阿·奥拉祖尔耶夫带伤出战，以340公斤的总成绩力挫群雄，摘取金牌。日本的水野英郎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米·沙里波夫分别以325和320公斤的总成绩，名列二三位。中国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男子83公斤级的冠军被哈萨克斯坦选手维·尼奥夺走，总成绩为365公斤。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的李云男以355公斤的总成绩名列第二。中国的王元峰取得第三名，成绩为350公斤。

10月8日中国队获得8枚金牌。

中国选手以4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完满地结束游泳大战，牢固地维持了水上霸主地位。10月8日，中国和日本分别爆出两项游泳亚洲新纪录，刘黎敏在女子200米蝶泳中的夺冠成绩是2分06秒77，打破了2分07秒25的亚洲纪录，逼近世界纪录，她的队友洪姝获亚军；日本队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以3分41秒70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中国队名列第二，成绩是3分45秒28。此外，熊国鸣、吕彬、贺慈红还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50米自由泳、女子200米仰泳的决赛中夺魁，成绩分别是2分03秒29、25秒68、2分09秒46，熊国鸣和贺慈红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叙利亚选手希斯哈姆·马斯里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赢得金牌，他的成绩是15分29秒70。中国队宁立佳仅以0.3环的优势战胜韩国选手蔡根培，夺得男子个人气步枪10米60发的金牌，成绩是690.3环。25岁的张冰则以144中在男子个人飞碟多向比赛中独占鳌头。在男子团体飞碟多向和男子团体气步枪10米60发的比赛中的金牌分别被韩国和科威特队夺走。中国的张新东在男子个人飞碟双向比赛中以一环失利，输给了沙特阿拉伯的选手萨·穆塔里，萨·穆塔里145中获金牌。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都是首次跃上金牌榜。中国剑坛高手许学宁在男子重剑个人决赛中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走上冠军宝座。

射箭女子个人赛韩国人独占了前三名；保龄球2枚金牌分别归入日本和马来西亚帐中；跆拳道的4个冠军，韩国居其二，越南和中国台北各居其一。

10月9日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了当天39块金牌中的11块。

上午10时许开始的男女马拉松比赛拉开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序幕，女子金牌为中国运动员钟焕娣所获，成绩是2小时29分32秒。她的队友张丽荣获得了银

牌。男子金牌的获得者是巴塞罗那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国的黄永祚，成绩为2小时11分13秒。在射击比赛中，中国女子射击队以1138环的成绩获气手枪团体冠军。在男子手枪速射团体赛中，中国队也摘取了金牌。范小平还以481.2环获得了女子气手枪个人冠军。中国运动员在当天举行的皮划艇比赛中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共得5枚金牌。在男子500米4人皮艇赛中，黄振东、王显军、王勇和杨军齐心合力，以1分26秒31的成绩获金牌。在男子和女子双人皮艇比赛中，男子金牌为陈贵奇和姜玉国所获。高蓓蓓和赵晓莉得到了女子金牌。在女子单人皮艇和男子单人划艇的比赛中，金牌分别为董瑛、张磊所获。中国击剑运动员在当天举行的男子佩剑团体赛中再次获得金牌。在当天结束的羽毛球男女团体塞决赛中，冠军分别为印尼和韩国队获得。中国男队和女队分获第三名。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经过艰苦的较量，中国队终以3：1从上届亚运会冠军韩国队手中夺回桂冠。

10月10日，中国选手在田径4个项目中夺得3项第一。

陈绍果、卜令堂和高红苗、谷燕以绝对优势分别夺得男子20公里竞走和女子10公里竞走的冠、亚军。陈绍果的成绩是1小时21分15秒，高红苗的成绩是44分11秒。男子链球的金牌挂在中国名将毕忠颈上。毕忠的夺冠成绩是72米24，打破了亚运会纪录，把获第二名的日本选手甩下近5米。在没有中国选手参赛的男子10000米比赛中，日本的高冈寿成以28分15秒48夺魁。

10月10日中国赛艇健儿们在当天举行的12项比赛中网罗了11项冠军。皮划艇国手们顽强地从实力强劲的中亚队手中夺走两枚金牌，一是女子500米4人皮艇，成绩是1分37秒93；一是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张磊的成绩是4分10秒36。皮划艇的另外4项冠军则由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瓜分。韩国弓箭手夺得男子70米团体冠军，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女箭手阻止了韩国独霸箭坛的势头，在女子70米团体比赛中，中国和印尼分获金银牌，韩国队居第三。

枪手们则继续为中国披金戴银。王玉锦和队友高娥分别以148中和146中的战绩居女子双多向飞碟前两名。张冰则在男子的这个项目中以1环之差输给科威特选手费·阿尔德哈尼。张冰获银牌，他的队友张永杰位列第三，两人的成绩都是186中。在大级别的举重项目中，108公斤级的中国力士崔文华举起了392.5公斤的重量，以领先整整5公斤的优势登上冠军宝座。

摔跤场上伊朗跤手大显神威，贝·亚·卡兰尼、哈·拉苏勒、梅·埃卡拉希姆均战胜对手，分别夺得自由式74公斤、90公斤和130公斤级3枚金牌。哈萨克斯坦的马米罗夫、日本的和田贵广则系上了自由式52公斤级和62公斤级的金腰带。中国的敦德格在52公斤级中夺得可贵的亚军，这是中国跤手获得的唯一奖牌。中国男子重剑手在团体赛中不敌新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取得第二名。艺术体操决出个人全能前3名，日本的川本由香里以37.350分夺魁，中国17岁的周小菁以37.200分得银牌。

10月11日，在引人注目的女子3000米跑道上，中国的张林丽率19岁的队友吕欧，与日本的弘山晴美一起拼抢金牌，最后，张林丽不负众望，以8分52秒97的成绩夺魁。弘山晴美在最后冲刺时力不从心，摘得银牌，成绩是8分53秒74；吕欧获第三名。

24岁的黄庚和20岁的黄宝挺分获男子跳远冠亚军，成绩分别为8米34和8米12。乌兹别克斯坦的康·萨纳茨基名列第三。女子100米栏，中国的周红艳、张瑜双双败在陌生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奇奇吉纳足下，奇奇吉纳的成绩是12秒80；周红艳以12秒8 获第二，亚洲纪录保持者张瑜仅得铜牌。男子100米金牌得主仍是卡塔尔的曼索尔，他的成绩是10秒18，打破 10秒30的亚洲纪录。女子200米，我国名将陈兆静因病缺阵，中国台北的王惠珍以23秒34夺冠，斯里兰卡两名选手获得银牌和铜牌，我国的欧燕兰仅获第7名。女子七项全能的金牌被叙利亚的舒娅以较大优势夺走，成绩是6360分；我国选手章小慧和中国台北选手马君萍获亚军和季军。日本选手刈部俊二、齐藤嘉彦和卡塔尔的阿尔—多塞里在男子400米栏中位居前3名，冠军成绩49秒13。

10月11日射击场上，中国队双双夺得男子自选步枪60发卧射团体和女子运动手枪团体金牌，成绩分别是1777环和1741环。范小平在女子运动手枪个人赛中以685.1环再添一金，她的队友老将李对红获铜牌。李文杰和宁立佳在男子自选手枪60发卧射个人比赛中名列哈萨克斯坦的塞·贝尔杰耶夫之后，各得银牌和铜牌。中国队在当天结束的帆船赛中收获3金：钱红和李科双双在男子米斯特拉和女子米斯特拉项目中夺冠；李素梅、陈秀梅在女子国际470级项目中独占魁首。另外的4枚帆船金牌，日本得其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得其一。

现代五项的个人和团体比赛分别被韩国和哈萨克斯坦夺走。日本和韩国还在保龄球男子精英赛和女子精英赛中各添一枚金牌。

10月12日，中国射击队显示了强劲的实力。王义夫以575环的成绩独霸男子标准手枪个人赛，他的队友孟刚以2环之差获铜牌。中国队还在男子标准手枪团体和女子标准手枪3×20团体的比赛中大显神通，夺标成绩分别是1714环和1698环。许艳华、张秋萍在女子标准步枪3×20的个人项目中略失准头，使日本的小岛则子以666.7环坐上冠军宝座，她俩屈居第二、三名。田径只决出了3枚金牌。曲云霞与刘莉在女子800米比赛中分别以1分59秒85和2分02秒22的成绩夺得冠亚军，并

双双打破亚运会纪录，第三名是印度老将乌莎；到马俊仁麾下受训不久的牟维国，在男子800米中以1分46秒44夺得银牌。他和夺魁的韩国选手李镇日（成绩1分45秒72）共同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卡塔尔在男子400米中又夺一金，冠军伊斯梅尔·穆夫泰赫的成绩是45秒48，韩、泰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当天开赛的柔道决出4枚金牌。我国的张颖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中，以绝对优势一路斩将夺关，顺利地让国歌在柔道馆响起；她的队友冷春慧在72公斤级决赛中碰上了势均力敌的韩国选手金美廷，由于急躁被对手钻了空子，只得退居次席，冠军被金美廷夺走。日本力士包揽男子95公斤和95公斤以上级两枚金牌。自行车的头两块金牌有了得主：日本的盐原正长以1分05秒851的成绩在男子1公里计时赛中夺魁。哈萨克斯坦的瓦·克拉夫特琴科以4分40秒509的成绩在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中称雄，中国的郭龙臣在这个项目中夺得铜牌。日本高手增田胜赢得了武术项目的第一个冠军——男子太极拳冠军。

软式网球的男子团体金牌分别被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摘去。

中国绿茵姑娘10月12日晚以2：0不费周折地战胜日本队，蝉联亚运会女子足球冠军。

10月13日，自行车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中国双姝王庆芝和马慧芳分别以3分46秒752和3分51秒560的成绩荣登状元和榜眼。男子30公里记分赛的冠军被韩国的赵浩成夺走。中国队何强在男子南拳的比赛中傲视群雄，女子南拳的盟主则是中国的王慧玲。

当天，韩国独得男子自选手枪3×40团体和个人2枚金牌，个人得主是李垠澈，成绩是1253.3环。日本的木场良平、哈萨克斯坦的谢·贝尔杰耶夫、印度的贾·拉那分别夺得男子自选步枪立射、跪射和男子中心发火手枪个人赛金牌。乌兹别克斯坦则在男子中心发火手枪团体中添金。中国射手只拿到一枚铜牌。

12位拳手当天拿到了12枚硬梆梆的金牌。轻量级是菲律宾、日本、韩国、泰国占优，重量级则几乎成为中亚的天下。结果这12枚金牌被菲律宾夺走3枚，韩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各取其二，泰国也抢到1枚。中国队只得到1枚银牌和2枚铜牌。潘峰获得71公斤级亚军；人们寄以期望的江涛在91公斤级中得第三名；陈涛在75公斤级中居季军。柔道的4项冠军被日本和韩国瓜分，中国的张迪在女子61公斤级中赢得一枚铜牌。

10月14日，中国乒乓球选手王涛以3：0和3：1击败韩国队两员大将金泽洙、刘南奎，为中国队夺得男单冠军。他的队友马文革在男单半决赛中以1：3负于刘南奎，与金泽洙并列第3。女双决赛，中国队刘伟/乔云萍夺冠，邓亚萍/乔红获亚军。

手球比赛已全部结束，韩国男队以26：21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中国男队以23：22险胜沙特阿拉伯队，摘得铜牌。女子曲棍球的金、银、铜牌得主也分别为韩、日、中三队。棒球冠军之争日本队最终以1分险胜韩国队，捧回金牌。中国台北队以9：4胜中国队，获铜牌。

10月14日中国20岁的孙日鹏在男子3000米障碍赛中赢了沙特阿拉伯 名将莫扎扎伊，以8分31秒73的成绩拔得头筹，并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张存彪和刘昊则分别在男子铁饼和男子铅球中继续保持中国的优势，夺得金牌。他们的队友马威、谢胜影还各得一银一铜。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的刘晓梅当天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27的成绩击败中国台北的劲敌王惠珍，中国姑娘黄晓燕获得第三名，她们3人都打破了亚运会纪录。韩青、冷雪艳、马玉芹、张恒运分别在女子400米栏和女子400米的决赛中包揽金银牌，其夺魁成绩也都成了新的亚运会纪录。闵春凤的铁饼仍是亚洲无敌，她以领先日本对手近9米的优势摘走金牌，成绩是62米52。在田径另外3个项目的领奖台上，撑杆跳高冠亚军是哈队的伊·波塔波维奇和伊格罗夫，前者5米65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中国选手未参赛。三级跳的金牌得主是哈队的欧·萨基尔金，成绩是17米21，中国的邹四新未能夺牌。女子跳高，乌兹别克斯坦的斯蒙科娃和哈萨克斯坦的扎莱夫斯卡娅分获冠亚军。

中国枪手卷土重来，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和团体金牌尽入囊中。王义夫在前一项目中的夺魁已是他的第二块金牌，他的妻子张秋萍则拿了女子标准步枪卧射个人铜牌，中国队还获得此项团体亚军，冠军则均被韩国人夺去。中国武林高手原文庆、壮晖、高佳敏分别在男子长拳、女子长拳和女子太极拳中令所有对手折服。

中、日、韩当天平分了自行车的3枚金牌。女子争先赛、男子争先赛和男子4公里团体追逐赛的冠军分别是中国的王艳、日本的齐藤登志信和韩国队。

韩国人连夺柔道男子71公斤级、女子52公斤级和女子56公斤级冠军。日本队唯有中村行成以男子65公斤级的金牌捍卫了日本国术的荣誉。只有一枚金牌的卡巴迪比赛，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获前三名。

10月15日，中国男篮大胜老对手韩国队28分，再次蝉联亚运会男子篮球冠军。在争夺铜牌的比赛中，日本男篮以79：76力克菲律宾队，把这支由职业球员组成的“亚洲梦之队”挤出领奖台。

当天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羽毛球赛，7枚金牌被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选手分享。印尼队独揽男团、男单、男双3块金牌，韩国队则获女团、女单、女双、混双四项冠军。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团、女单、女双和男单、男双项目上获得6枚铜牌。在曲棍球赛中，韩国男队继女队夺冠后，当天以3：2力克印度队，也荣获金牌。印度队获亚军，昔日世界劲旅巴基斯坦队这次名列第3。中国男队战绩不理

想，在参赛的 9 个队中排名第 8。水球比赛，中国队最后一战以 9∶5 勇挫日本队，获亚军；哈萨克斯坦队和日本队分获金牌和铜牌。藤球比赛也在当天结束，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 3 支东南亚队伍分获金、银、铜牌，中国队与韩国队、文莱队并列第七。

10 月 15 日田径场上，女子 10000 米跑道上的世界冠军王军霞轻松地将 4 名对手甩在后面，以 30 分 50 秒 34 的成绩将亚运会纪录提高了 1 分钟之多；河南女将董丽以 31 分 31 秒 08 夺得亚军。中国名将李彤在男子 110 米栏决赛中将上届亚运会上一跤摔丢了的金牌夺了回来，成绩是 12 秒 30；中国的陈雁浩居第二名。中国姑娘隋新梅、张榴红和姚伟丽、李静还包揽了女子铅球和跳远的金银牌。但是哈小燕和徐扬在女子标枪和男子跳高中，只获得铜牌；金牌则被乌兹别克斯坦的奥·亚里吉娜和日本的吉田孝久摘走。哈萨克斯坦的谢·科雷帕诺夫、乌兹别克斯坦的拉·加尼耶夫还分别在男子 50 公里竞走和十项全能比赛中夺魁。卡塔尔的曼索尔雄风犹劲，又在男子 200 米的决赛中捷足先登，成绩是 20 秒 41，平了亚运会纪录。中国姑娘郭杏红、赵海娟、王淑青，不容别人染指女子公路个人赛奖牌，她们 3 人同时冲到终点，成绩都是 1 小时 57 分 10 秒，一举囊括了这个项目的前三名。

日本柔道国手当天在 4 个级别的比赛中夺得 3 枚金牌，剩下的 1 枚金牌归了韩国选手。中国运动员获得 2 银 1 铜。

10 月 16 日，第十二届亚运会田径比赛落下战幕，中国健儿奋勇搏击，摘取了 43 个项目的 22 枚金牌、18 枚银牌和 8 枚铜牌。在当天进行的 9 个田径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队又夺得 4 金 3 银 1 铜。引人注目的女子 1500 米，曲云霞以 4 分 12 秒 48 的成绩夺得第一名，另一名中国选手阎魏名列第二。由陈燕、黄晓燕、刘晓梅、欧燕兰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 4×100 米决赛中，以 43 秒 85 的成绩摘取金牌，泰国队和日本队分居二、三位。在女子 4×400 米决赛中，由曹春英、冷雪艳、马玉芹、张恒运组成的中国队，以 3 分 29 秒 11 的成绩，名列榜首。印度和泰国队分别取得银牌和铜牌。中国的张连标在男子标枪比赛中以 83 米 38 的成绩名列第一。中国选手牟维国在当天的 1500 米比赛中，以 3 分 40 秒 93 的成绩摘取银牌。卡塔尔名将苏莱曼夺走第一名，成绩是 3 分 40 秒。中国男队在 4×100 米决赛中，以 39 秒 45 的成绩名列第二，日本队位居榜首。辽宁队的孙日鹏在男子 5000 米比赛中，以 13 分 40 秒 07 的成绩，夺得铜牌。

中国队没有派选手参加男子 4×400 米的接力赛，这个项目的冠亚军分别被韩国和泰国队夺走。

10 月 16 日晚，第十二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广岛举行。

亚运期间，广岛赛场先后 137 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89 次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国运动员共夺得 137 枚金牌、92 枚银牌、60 枚铜牌，打破 21 项世界纪录，40 项亚洲纪录，华夏健儿再一次证明，他们在亚细亚体坛保持着盟主地位。韩国人今天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又一次超过日本，以 4 枚金牌的优势坐上了第二把交椅。首次闯入亚运会的中亚五国也颇有收获，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以 25 枚和 10 枚金牌进入第三梯队。

本届亚运会总共在游泳、射击、举重等项目上 44 次打破 25 项世界纪录，平 1 项世界纪录；此外，还 133 次刷新亚洲纪录，245 次改写亚运会纪录。这些新纪录的诞生标志着亚洲体育 4 年来又有了长足进步。

在闭幕式上，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将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法赫德杯奖给本届亚运会表现最突出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接过奖杯时，中国运动员一片欢腾。韩国马拉松运动员黄永祚则因他的顽强精神得到“最佳风格杯”。法赫德致词说：“广岛人民的热情接待已使第十二届亚运会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事件。”他还说：“这些代表亚洲未来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通过体育而增加了友谊。我相信这将为实现世界长久和平作出贡献。”广岛亚运会组委会主席古桥广之进也说：“相信通过这次盛会，‘和谐的亚洲’这一口号已变成现实，所有的人都已享受到这一喜悦。”

法赫德接过广岛市长交还的亚运会会旗，将会旗郑重交给泰国首都曼谷市市长——第十三届亚运会将于 4 年后在曼谷举行，许多运动员郑重相约：4 年后曼谷再见！

10 月 17 日，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祝贺我国体育健儿在广岛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贺电说，半个月来，你们以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顽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取得 137 枚金牌，289 枚奖牌，连续四次获得亚运会金牌、奖牌总数第一。尤为可喜的是，一些项目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和长足进步，一批年轻选手脱颖而出，为参加今后的世界大赛奠定了良好基础。

贺电说，在广岛期间，你们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华中族的光辉形象，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体现了当代中国青年文明礼貌、锐意进取的良好风尚，增进了亚洲各国和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你们所取得的成绩，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成果，为正在实施的“奥运争光计划”作出了贡献。

贺电说，从本次大赛中看到，我国一些原来较优势的项目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面临着重新冲出亚洲的形势。希望代表团以此为契机，着眼于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认真总结经验，为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做出不懈努力。

（据10月3—1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首都举行欢迎亚运健儿凯旋招待会，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熊国鸣、莫慧兰分别当选最佳男女运动员

参加第十二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体育健儿10月20日下午欢聚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亲切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之前，李鹏总理等听取了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副主任袁伟民的情况汇报。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体育健儿在这届亚运会上排除干扰，奋力拼搏，取得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上打出了成绩，打出了风格，扬了国威，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望。他还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感谢和祝贺。李鹏希望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们认真总结经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薄一波同志对我国运动员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并向他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参加接见的还有田纪云、李铁映、秦基伟、迟浩田、罗干、洪学智、余秋里、彭冲，以及曾庆红、孙家正等。

会见以后，李鹏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欢迎体育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李铁映受李鹏总理之托在招待会上讲话。

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主持了招待会。

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在招待会上汇报了中国体育健儿在广岛亚运会上的拼搏情况。吕彬代表全体参赛的运动员发了言。招待会上还进行了精采的文艺表演。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会见了刚从广岛亚运会载誉归来的国家体委训练局部分教练员。他在座谈时指出，金牌运动员是金牌教练训练出来的，要树立金牌教练员的权威。

李铁映首先赞扬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广岛亚运会上团结奋战，出色地完成了祖国人民的重托，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以优异的成绩给祖国45岁的生日献了一份厚礼。

李铁映说，广岛亚运会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45年来中国体育运动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体育运动已经冲出了亚洲，开始全面向世界水平冲击，我国体育战线的新目标就是实现奥运战略，全国所有竞技项目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要以此为指导思想，经过10年、20年的奋斗，使我国在奥运会上处于领先地位。

李铁映说，这次亚运会证明了中国体育战线已取得了几个重要成绩。

第一，证明了中国人的体育素质和体能是好的，不亚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游泳、田径等项目的成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条非常重要，对我们体育战线解放思想有很大作用。第二，证明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和体育训练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或国际领先水平。这是45年来的经验积累。它标志着我国体育已建立在一个高科技的基础之上。第三，证明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训练、竞赛和管理体制，即举国一致的集中训练体制和俱乐部制相结合，奥运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相结合。当然，这套体制还要在竞争中不断完善。第四，证明了我们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中国运动员始终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参加各种比赛，这种精神凝聚了一大批人。过去我们靠这种精神，将来还要靠这种精神。

李铁映说，今天只找教练员来座谈，主要是要提出一个口号：金牌运动员是金牌教练员训练出来的，金牌教练员是由先进体育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要给予金牌教练员荣誉和地位，要重视他们。中国体育后备人才丰富，关键是要有大批的金牌教练。

李铁映勉励大家说，现在对体育战线来说是个机遇，是个全面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全面推行奥运战略的机遇。离下届奥运会还有两年时间，只要能抓住这个机遇，不管是强项还是弱项，运动水平都会更上一层楼。

李铁映还单独会见了国家女篮的教练员和队员。李铁映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输个明白。球可以输，但是人不能输，志气不能输，精神不能输。你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提高。

参加会见的还有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副主任袁伟民和训练局长李富荣等。

10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亲切会见了参加第十二届亚运会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勉励他们进一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认真总结经验，高标准严格自律，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刘华清、张震代表中央军委、三总部向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体育健儿表示热烈的祝贺。刘华清说，这次参加亚运会的解放军、武警部队运动员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长期刻苦训练、埋头苦干、顽强拼搏的结果。大家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充分展示了我军运动员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力量源泉，而且是加强部队全面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强大动力。因此，全军指战员都要向你们学习，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

刘华清说，我军的体育事业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新的形势对我军的竞技体育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因此，全军体育工作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成绩面前要看到我们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真正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我们的体育队伍。

张震在讲话中也勉励我军运动员教练员再接再厉，在今后的比赛中创造更好的成绩。

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51 名，共获金牌 26 枚，圆满完成了比赛任务，为我国代表团以绝对优势蝉联金牌、奖牌第一名做出了贡献。

中央军委委员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解放军三总部和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见。

10 月 24 日，由人民日报体育部、体育时报社和徐州卷烟厂联合举办的广岛亚运会中国最佳运动员评选活动在京揭晓：获得 4 金 1 银的游泳运动员熊国鸣和获 5 金 1 铜的体操小将莫慧兰分别当选为最佳男女运动员。

评选揭晓及颁奖仪式于当天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21 世纪饭店举行。国家体委训练局负责人，我国部分著名教练和体育新闻记者等出席了颁奖会。人民日报副总编李仁臣和徐州卷烟厂党委书记苗永新分别为莫慧兰、熊国鸣颁发了红杉树金牌。

这次评选活动规模较大，共收回有效选票 12 万余张，145 名运动员被提名，最后熊国鸣、莫慧兰分别以 7.4 万和 9.1 万张选票分别荣获男女最佳运动员，王义夫、吕彬、李小双、关红、林莉也获得较多选票。

（据 10 月 19、21、22、25 日《人民日报》）

远南运动会

背景介绍

从 9 月 4 日晚，来自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多名运动员，将在亿万双眼睛的热情关注下，展开友好激烈的竞赛，一展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的风采。这是亚太区两亿多残疾人的喜事，也是本区域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体现文明与进步的体育盛会，不仅可以推动残疾人的“平等·参与·共享”，而且能够促进人类友爱和社会发展。

材料：

- 中国运动员共获二九八枚金牌，名列榜首
- 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奖牌榜
- 首都为参加“远南”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庆功
- 中央领导接见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

材料一　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在京举行 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共获得二九八枚金牌，名列榜首

以“平等、参与、友谊、进步”为宗旨的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9 月 4 日晚隆重开幕。

200 多盏大红灯笼高悬运动场四周，一派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十声震天动地的礼炮响过，天真活泼的儿童欢呼着跑上主席台，将吉祥物小白鸭“强强”献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和各位贵宾。

晚 8 时，第六届远南运动会组委会主席邓朴方宣布开幕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激越的乐曲在空中回荡。

在 7 万多名观众的掌声和乐曲声中，42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2000 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依次入场（以汉字笔画为序）。第一个走进会场的是土库曼斯坦代表团，接着是马尔代夫、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不丹、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瓦努阿图、日本、中国台北、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老挝、西萨摩亚、汤加、纽埃、图瓦卢、所罗门群岛、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香港、泰国、基里巴斯、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塔吉克斯坦、越南、斯里兰卡、韩国、斐济、缅甸、瑙鲁、蒙古、新加坡、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澳门代表团，阵容强大的东道国——中国代表团最后进入会场，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旗帜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残疾人运动员在志愿人员的协助下登上了特意为他们搭起的观礼台。

远南残疾人运动会联合会主席方心让将会旗交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

北京市市长李其炎致欢迎词。他代表北京市政府和 1000 多万市民向光临盛会的远南残疾人运动员、工作人员和海内外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北京将把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们，让我们同行，去迎接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

方心让致开幕词。他说，北京市政府和组委会为本届

运动会做出极大的努力和良好而周详的安排，这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本届运动会和残疾人事业高度关怀和有力支持。他希望全体运动员以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公平竞赛、友好进步的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为远南运动会和残疾人事业增光添彩。

8时55分，国务院总理李鹏庄严宣布："第六届远南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开幕。"远南残疾人运动会联合会会旗冉冉升起，猎猎飘扬。历次远南运动会中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拉开了帷幕。

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郑培峰以全体运动员的名义，手摸盲文宣誓：在"平等、参与、友谊、进步"的旗帜下，保证遵守远南运动会的规则，为了体育的光荣和运动员的荣誉，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运动会。

宋兆年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要在本届运动会上公正地履行职责。

灯火辉映、流光溢彩。万人参加的大型文体表演《我们同行》，以精巧的构思、绚丽的色彩、恢宏的气势、深挚的情愫，深深打动了观众。

演出进入尾声。从长城取来火种点燃的火把，经各国运动员的传递，进入了体育场。肢残运动员蔡祖胜、盲人女选手赵继红和轮椅篮球选手翟亮永先后传接，最后巴塞罗那残疾人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孙长亭在少年儿童的簇拥下，沿着形似长城的坡道攀登，点燃了圣火台的火炬。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田纪云、李铁映、邹家华、陈希同、尉健行、温家宝、王汉斌、宋平、任建新、倪志福、陈慕华、秦基伟、李锡铭、王丙乾、王光英、卢嘉锡、布赫、李沛瑶、宋健、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罗干、张思卿、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万国权、王平、刘澜涛、李德生、张劲夫、陈锡联、段君毅、黄华、严济慈、叶飞、谷牧、马文瑞、王恩茂、吕正操。

出席开幕式的贵宾有：国际残疾人奥委会主席斯特德沃德，泰国副总理差瓦立，赞比亚副仪长楚拉，联合国秘书长代表艾哈迈德·美国亚特兰大1996年残奥会组委会、日本长野1998年冬季残奥会组委会、泰国曼谷第七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以及柬埔寨、以色列的观察团，也出席了开幕式。

9月5日，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开始举重、射击、柔道、硬地滚球和乒乓球等项比赛。中国轮椅女子举重运动员边建欣以77.5公斤的成绩获得女子44公斤级力举金牌。这是本届"远南"运动会首枚金牌。她还3次超过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名誉团长李铁映为她颁了奖。

中国选手在第一天的射击赛中也取得好成绩，夺得3枚金牌。37岁的广州选手游群杰在女子气手枪40发SH1级比赛中，打出364环的好成绩，超过世界纪录4环。她夺得了这个项目金牌。

9月5日上午在北京体育师范学院进行的"远南"运动会男子柔道比赛决出4个级别的金牌。中国台北的李青忠获得60公斤以下级金牌；日本的高桥智广获得65公斤以下级金牌；日本的上野和彦获得78公斤以下级金牌；韩国的安虞盛获得86公斤以下级金牌。中国获得2枚银牌、4枚铜牌。

60公斤以下级第2名是高尊瑞（韩国），中国的胡久峰和于庆国并列第3名。

65公斤以下级第2名是巩胜平（中国），第3名是宋禹静（中国）、山惠（缅甸）。

78公斤以下级第2名是敏乌（缅甸），第3名是萧煌奇（中国台北）、高援（中国）。

86公斤以下级第2名是徐彬（中国）。

9月6日，中国队夺得87枚金牌、72枚银牌、49枚铜牌，并超过15项世界纪录。

在当天的田径比赛中，中国选手发挥出色，一鼓作气，拿下50枚金牌、41枚银牌和32枚铜牌。游泳比赛夺得22枚金牌、20枚银牌和13枚铜牌。举重比赛获得三金三银一铜的好成绩。柔道比赛的中国选手夺得四金二银一铜，中国乒乓选手也不甘示弱，取得5枚金牌。中国神枪手当天又夺三金六银二铜。

9月7日，在田径比赛中，中国选手共夺得40枚金牌、33枚银牌、22枚铜牌，有7人改写世界纪录。在游泳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摘取22金、19银和13铜的好成绩，并有2人超过2项世界纪录。举重比赛中，中国队当天夺2金，河北姑娘胡淑华一人四超世界纪录。韩国选手在射箭比赛中夺走了4枚金牌。射击比赛中，新西兰、日本和澳大利亚选手都有精彩表演，各自夺得一枚金牌。

9月8日，中国队已夺得金牌245枚、银牌200枚、铜牌146枚。

田径和游泳依然是中国队摘金夺银的主导项目。在这两项比赛中，中国选手共获得68枚金牌，超过5项世界纪录，而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新西兰队和澳大利亚队，只分别获得14枚和12枚金牌。

本届运动会乒乓球赛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选手在26个项目中夺得12枚金牌。韩国选手异军突起，获得9枚金牌。

轮椅网球赛经过4天的争夺，日本选手在4个项目的决赛中，夺去男、女单打和女子双打3枚金牌；男子双打的金牌为韩国选手所获。

9月9日，田径场上共超出8项世界纪录。中国女子铁饼选手郑宝珠、李晓莲、吴红萍连超3个级别的世界纪录。此外，新西兰选手在男子标枪、新喀里多尼亚选手在女子铁饼等项目中也超过所在级别的世界纪录。游泳比

赛奏出终曲。东道主中国队再夺17枚金牌。以84枚金牌名列榜首;排在第二至第四位的是新西兰队(22枚)、澳大利亚队(21枚)和日本队(11枚)。整个游泳比赛,共有10人超12项世界纪录。

举重比赛于9月9日落幕。中国队夺去20枚金牌,超过6项世界纪录。澳大利亚队赢得5枚金牌,韩国队获4枚金牌。

在北京射击场举行的射击、射箭比赛9月9日同时收兵。在射击17个项目的争夺中,中国射手赢得8枚金牌并超一项世界纪录,领先其他13个参赛队;韩国以5枚金牌紧随其后。

羽毛球赛中国队战绩最佳,获得7项冠军,其中麻旭涛、蒋小英等称雄单打,李卫国/董天星、俞湘江/李芳等在双打中夺魁。余下的5枚金牌尽归日本选手所有。

盲人门球赛。韩国队最后一战以10:6胜中国队,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比赛澳大利亚队以不败成绩夺冠,中国队居次席。

9月10日,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经过7天友好而激烈的争夺,14个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东道主中国队共夺得298枚金牌、238枚银牌、148枚铜牌,52项次超世界纪录,团体总分和金牌数均名列榜首。

在金牌榜上列第二至第六名的队依次是澳大利亚(50枚)、韩国(46枚)、新西兰(44枚)、日本(40枚)和香港队(19枚)。

本届运动会是"远南"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一周来,42个国家和地区的1343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不同级别的554项比赛,在田径、游泳、举重和射击4个项目中98人次超65项世界纪录。19支代表队赢得金牌,28个队获得奖牌。

在最后一天的比赛中,中国女选手刘邦华以2小时15分07秒的成绩,摘取了轮椅马拉松赛的金牌,日本选手藤田英二和八山茂分获男子轮椅和半程马拉松赛的冠军。唯一参加盲人马拉松赛的韩国选手姜大硕,以3小时45分43秒跑完了42公里195米的全程。

历时两天的轮椅击剑比赛9月10日收兵。香港队夺得3项团体冠军和5个级别的个人赛冠军。中国选手齐凯丽和汪娟分获女子花剑和重剑的第一名。

轮椅篮球,澳大利亚队7战全胜,夺得冠军。坐式排球经过4轮争夺,哈萨克斯坦队赢得了他们在本届运动会上唯一的一枚金牌;女子组中国队两战两胜夺得金牌。

9月10日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下午5时在中华民族园举行。

"你们都是好汉,你们都是好汉……"远南运动会联合会名誉主席方心让博士领唱高歌,代表来自海外的运动员、官员表达对东道主的感谢。他动情地说,本届运动会汇集了4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创造了历届远南运动会规模最大的纪录。北京市飘扬的不同颜色的旗帜,必将在残疾人运动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届运动会顾问、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在欢送词中,赞扬运动员们在6天的比赛中"谱写了一曲撼人心魄的生命之歌,一曲奥林匹克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相映生辉的壮丽凯歌"。他说,相聚是短暂的,友谊是长存的。"愿1994年北京之秋,永远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远南"会旗在乐曲声中徐徐降下,本届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张百发将会旗交给方心让,方心让把会旗递交到新当选的远南运动会联合会主席畑田和男手中,再由他移交给下届运动会东道主泰国的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宣布: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胜利闭幕!

参加闭幕式的还有本届运动会组委会顾问钱信忠、李其炎,组委会主席邓朴方等。

仪式结束后,各国运动员、官员和来宾以及志愿工作者进入中华民族园,在欢声笑语中倾诉惜别之情,相约1999年曼谷再见!

(据9月5—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奖牌榜

代表团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中国	298	238	148	684
澳大利亚	50	34	34	118
韩国	46	28	17	91
新西兰	44	25	15	84
日本	40	28	25	93
香港	19	19	17	55
新喀里多尼亚	15	13	2	30
新加坡	8	16	15	39
中国台北	7	8	12	27
澳门	5	3	2	10
泰国	5	2	6	13
马来西亚	4	16	23	43
缅甸	4	7	14	25
斐济	3	2	2	7
巴布亚新几内亚	2	2	3	7
瓦利斯和富图纳	2	1	3	6
印度	1	2	0	3
菲律宾	1	0	1	2
哈萨克斯坦	1	0	1	2
文莱	0	4	2	6
蒙古	0	3	1	4
汤加	0	2	0	2
印度尼西亚	0	1	11	12
斯里兰卡	0	1	1	2
巴基斯坦	0	0	1	1
瓦努阿图	0	0	1	1

瑞鲁	0	0	1	1
西萨摩亚	0	0	1	1

材料三 首都为参加第六届“远南”运动会的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举行庆功大会

9 月 11 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洋溢着欢庆热烈的气氛，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各界代表近两千人欢聚一堂，为参加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庆功。

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发扬平等参与、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共夺得 684 枚奖牌，其中金牌 298 枚、银牌 238 枚、铜牌 148 枚，26 人 51 次超 36 项世界纪录，实现金牌总数第一、奖牌总数第一的目标，获得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第六届远南运动会组委会名誉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宋平，国务院有关部委、远南运动会组委会、北京市、国家体委、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志愿工作者、首都少年儿童、捐赠者、“远南”训练基地，采访远南运动会的新闻记者的代表，出席了庆功会。

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中国代表团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对残疾人运动员表现出的顽强拼搏的作风和奥林匹克精神表示高度赞扬，向远南运动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志愿工作者和一切为远南运动会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发强介绍了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团结奋斗，勇创佳绩的感人事迹。

中国残联副主席吴庆彤宣读了国家体委和中国残联关于表彰边建欣等 423 名运动员、李伟朴等 67 名教练员、王宝生等 82 名工作人员的决定。

边建欣、李伟朴分别代表运动员、教练员讲话。

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在讲话中说，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的巨大成功对残疾人体育和残疾人事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代表中国残联和全国 5000 多万残疾人，向党中央、国务院，向各地政府，向首都人民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广大青少年学生，向远南运动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体育界、新闻界的朋友及海内外人士表示感谢。他赞扬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运动会期间表现出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他十分动情地带领大家高呼：“中国队，好样的。”

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也在庆功会上讲了话。

庆功会由中国残联常务副理事长周敬东主持。出席庆功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徐惟诚、徐志坚、邵华泽、郭超人、钱信忠、张百发、阎明复、徐寅生、万嗣铨等。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赤峰双马集团联合主办的杏仁宝杯“远南”运动会中国十佳运动员、十佳教练员评选 9 月 11 日揭晓。

十佳运动员是：孙长亭（田径）、黄文涛（田径）、张晓平（乒乓球）、张晓玲（乒乓球）、边建欣（举重）、田时伟（羽毛球）、张难（射击）、莫以秀（射箭）、曾华宾（游泳）、门润民（柔道）。

十佳教练员是：梁彦学（田径）、文岚（田径）、李伟朴（举重）、于贻泽（乒乓球）、张安良（射击）、莫运德（射箭）、黄紫颜（游泳）、张俊明（柔道）、张锡山（轮椅篮球）、李俊生（击剑）。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中央领导接见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

在举世瞩目的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前夕，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8 月 29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的汇报，接见了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精彩、感人的演出，并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当晚 7 时 45 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进接见大厅，并同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一一握手，表示亲切问候，随后，7 名残疾人运动员、3 名教练员简短而生动地讲述了自己顽强拼搏、为残疾人体教事业奉献的事迹。他们当中有：实现中国残疾人在奥运史上零的突破的平雅丽、以一条腿走出辉煌路的战斗英雄孙长亭、在田野里苦练出来的世界冠军郑培峰、创下别人难以打破的世界纪录的边建欣、沐浴党的阳光成长的孤儿石铁音、放弃十几万元收入为国争光的个体户庞宗栓、体验五彩人生的张海迪、谢绝海外高薪聘请的乒乓球教练于贻泽、把爱心献给脑瘫孩子的教练黄伟坚、举重场上“李家军”教练李伟朴。

晚上 8 时，在这 10 名运动员、教练员的簇拥下，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来到大厅，同 600 多名代表团成员见面，场内掌声经久不息。江泽民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江泽民说：再过几天，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就要开幕了。这是亚太地区两亿多残疾人的喜事，也是亚太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体现文明与进步的体育盛会，不仅可以促进残疾人的“平等、参与、共享”，而且对社会的进步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江泽民指出，我国举办过许多国际运动会，但为残疾人举办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运动会，可以展示我国的发展形势，体现我国政府对残疾人的人权保障，可以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忱，还可以加强我国人民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友好交往，意义重大。他希望大家一定要尽心尽办办好这次运动会。

江泽民说："刚才几位运动员、教练员介绍了自己的经历，非常感人。你们身残志坚，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生奋斗精神。"

江泽民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总要有点精神。赤忱爱国、自强不息，乐于奉献，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依靠这种精神，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坚持弘扬这种精神，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接着对中国残疾人代表团成员说，这次，你们是在自己祖国的首都参加国际比赛，全国人民注视着你们。希望你们本着"平等、参与、友谊、进步"的宗旨，发扬团结、奉献、拼搏、进取的精神，虚心向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学习，赛出精神，赛出水平，为祖国争光！

江泽民预祝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取得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预祝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圆满成功。

随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三楼小礼堂，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盲人、聋人、肢残人业余演员表演的精彩歌舞节目。演出结束后，江泽民等上台亲切会见了残疾人演员并与他们合影。

参加当晚活动的领导同志还有李铁映、陈希同、温家宝、宋平、陈慕华、王光英、李沛瑶、彭珮云、罗干、王兆国、万国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北京市、中国残联负责同志曾庆红、李其炎、邓朴方参加会见并一起观看了演出。

（8月30日《人民日报》）

《劳动法》出台

背景介绍

建国以来，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勿庸讳言，我们的法律体系还是很不完善的，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原有的法律法规逐渐暴露出职能范围上的不足和调整方式上的缺陷。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劳动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国外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基本都有一部调整劳动关系的大法——《劳动法》。相对我国而言，制定一部《劳动法》可说是当务之急。1994年7月5日，八届人大八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材料：

・改革潮涌渠始开

材料　改革潮涌渠始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述评

王彦田　　傅　刚

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了主席令，《劳动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从建国起就酝酿，历经4[illegible]年，中国的《劳动法》终于成为一部现实的法律。

《劳动法》的制定、出台，经历了一个较[illegible]的时期。它在改革中发育、成熟，体现了劳动制度[illegible]革的成果

不少人问：《劳动法》何以这么多年才出台？为何现在出台？

国家劳动部的官员回答：劳动法出台，是大环境逐渐成熟的结果，是改革开放深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劳动法》的颁布是瓜熟蒂落，然而她的孕育过程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

记者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发现，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劳动方面的立法工作，但连续几次的政治运动，劳动立法建树不大。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制定《劳动法》，1979年、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也都提出制定《劳动法》。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有关部门对《劳动法》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第30稿，再次提交国务院讨论。199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交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7月5日获审议通过。有关方面统计，劳动法共修改了30多稿，仅1994年6月份，就改了4稿。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都有若干份有关《劳动法》的提案；全国在经济法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关呼吁劳动法尽快出台的材料难以数计；从国家劳动总局到劳动人事部和现在的劳动部前后6任部长，都把制定出台劳动法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

《劳动法》是在改革开放中发育成熟的。没有十几年劳动体制改革，不改革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劳动法的制

定就没有基础；没有对外开放，《劳动法》难以参照国际惯例和国际劳动立法接轨。有专家说，如果十年前出台《劳动法》，到现在也会修正若干次。

《劳动法》的根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调整劳动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劳动法》制定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突破

过去很多年，我们偏重于宣传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这主要是着眼于政治上考虑的。但是对劳动者在就业中的具体身份没有确定，因此对劳动者利益缺乏法律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劳动争议增多。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呼唤着劳动法制建设的加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一个新课题。《劳动法》从改革新形势、新要求出发，至少在六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劳动合同制方面。法律专家认为，企业单位用人必须建立劳动合同，这是劳动法最重要的规定之一，是保护职工权益、也是保证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基础。在过去发生的众多危害职工权益的事件中，不少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约束，一些用人单位也因没有劳动合同，致使因骨干"跳槽"流失而造成经济损失。《劳动法》是国家第一次用法律把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一制度确定下来，使双方都有保障。《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确立了企业用人自主权和职工个人择业权，为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

工作时间方面。过多地加班加点工作，是一些企业方侵害职工权益的主要行为，为此，劳动法专门一章规定了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时间，如每天加班不得超过1小时，每月加班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加班时间的报酬不得低于工资的150%，休息日加班报酬不得低于工资的200%，国家法定休假日加班不得低于300%。

工资方面。《劳动法》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工资自主权，并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规定了不能克扣和无故拖欠职工工资，这两条保障了职工的基本收入。

职业证书制度。今后国家将确定职业分类，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我国职工培训制度法制化，是保障职工不断提高素质的有效手段，从根本上增强了劳动者就业能力。

社会保险法制化。社会保险是保障职工在失业、患病、工伤、生育、退休时获得帮助和补偿的制度。过去，因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社会保险部门工作进展困难重重。《劳动法》将社会保险法制化，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

劳动争议处理法制化。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劳动诉讼事件1万多起，比上年增加了50%。出现大量的劳动争议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劳动专家认为，《劳动法》出台后，因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发生的激化矛盾的事件将会减少，因为企业和职工都认为有了说理的依据和去处，消除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劳动法》应改革之呼而出，同时为规范今后劳动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劳动法》出台，填补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大空白，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次完善。劳动法是一个基本法，是一个龙头法，它的出台，将促进下一步《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工资法》、《安全生产法》、《劳动保护法》、《劳动争议法》、《职业技能开发法》、《劳动监察法》等单项配套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一系列法律出台后，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劳动法律体系将基本形成。

《劳动法》还为以后劳动制度改革指出了方向。劳动合同的签定和执行，工资分配的档次和约束，劳动安全、劳动就业、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福利的规定，劳动争议和裁决的规定等，都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依法执行和发展，企业不再那么多顾虑，也减少了盲目性和争议，可以少走弯路。

促进了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的义务和权利。政府既不能干涉企业和职工间的合法劳动关系，又要做好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劳动部门承担着劳动法监督检查的主要任务，《劳动法》出台，劳动部门的压力更大了，责任更加具体。工会在今后企业劳动关系处理中的作用也加重了。过去劳动关系争议执法部门不好处理，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争议。现在劳动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企业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就有法可依了。

当然，《劳动法》在执行过程中，会有不少阻力。比如有人认为，在某些地方，难以执行限制职工加班加点工作的规定。也有人认为，过严的规定会影响一些职工的就业，也可能会影响到投资环境。一些实际问题有待于在实际执行中解决，《劳动法》正式实施还有约半年的时间，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必须明确一条，劳动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严肃性是第一位的，依法执行是第一位的！

（选自《人民日报》1994年7月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在1994

背景介绍

近年来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密切，同胞骨肉亲情日益加深，两岸关系不断发展。但前进中也遇到各种障碍！3月31日发生了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7月5日台湾当局公布了《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7月10日大陆渔工在宜兰海域遇难。

材料：

- 千岛湖案件始末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谈话
- 中国渔工宜兰海域遇难

材料一　千岛湖案件始末

（一）海协会致函海基会
就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损害事件阐述意见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4月23日致函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涉及大陆同胞、台湾同胞生命财产损害事件交换意见。

函中说，4月12日，海协负责人即表示海协原则上同意在双方进行必要准备后，就近年两岸交往交流涉及大陆同胞、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受到损害的事件交换意见。我会认为，当前双方应首先商定交换意见的议题和内容，再来考虑人员层级及时间、地点等问题。如果双方在议题和内容上无法达成共识，交换意见就无法找到共同点，这样的商谈不是两岸同胞所乐见的。

海协认为交换意见的内容应包括：1.就两岸旅游交往问题，包括两岸同胞旅行中的安全问题交换意见。早在去年8月底两会落实汪辜会谈第一次工作性商谈中，海协即在“落实汪辜会谈有关协议商谈的时间表”中提出两会尽快就“加强两岸旅游交往问题”进行专题商谈，但至今并未得到海基会回应。2.海协一贯主张全面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规定的事务性和经济、科技议题商谈，多次向海基会建议及早开始“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的商谈。我会认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人身财产安全是有法律保障的，如海基会认为需要，可以在商谈“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中交换意见。3.海协一再要求两会应就近年来台湾军方打死打伤大陆沿海渔民、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问题进行协商。自海协成立以来，不断向海基会指明这一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破坏两岸和谐气氛的不人道行为，期能引起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赔偿损失、追究责任、严惩凶手，并呼吁通过两会协商从根本上制止这一暴行。但至今也未得到海基会回应。

函中明确指出，上述涉及两岸同胞交往交流中的权益包括人身安全诸问题，之所以迟迟未能开始商谈，责任不在我会。

函中说，两会目前的联系与合作方式，应严格依照去年签署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千岛湖事件”发生以来，海协依据协议向海基会通报了情况，解释并回答海基会所提的若干问题与要求。而海基会却一再提出超出两会上述协议的要求，虽经海协提示，但海基会仍一再坚持，这是不尊重两会协议的做法。盼两会的联系与合作能依照现有协议进行。

函中指出，就“千岛湖事件”而言，当务之急是依法查处案件。同时，海协为表示进一步的诚意，已主动邀请海基会及有关专家来浙江，海协安排专家介绍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回答问题。如海基会愿意了解此案详情，又真正体谅罹难者家属之心情，何以又设置前提，令人难解。海协再次重申上述邀请，望海基会早日提出行期和名单。据有关方面面告，现已将三名涉嫌犯罪分子逮捕，即将依司法程序进行审判。

（新华社讯，4月24日《人民日报》）

（二）千岛湖抢劫故意杀人案三名
罪犯被依法枪决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12日对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一审作出判决。法院认定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构成枪劫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分别判处三名罪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发生在今年3月31日的浙江千岛湖抢劫、故意杀人案，共有32人遇害身亡，其中24人为前来大陆旅游的台胞。经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吴黎宏（男，22岁，浙江淳安县人，无证从事摩托艇营运）、胡志瀚（男，24岁，淳安县人，原巴陵石化公司研究院杭州联营厂职工，自动离厂）在去年9月至10月间为还债和挥霍，密谋抢劫他人钱财，并由吴黎宏纠集被告人余爱军（男，23岁，淳安县人，无证从事摩托艇营运）一起参与抢劫。尔后，三被告人多次策划抢劫的时间、地点、对象、手段及抢劫后沉船杀人、灭迹。同时，准备了猎枪、子弹、炸药、斧头、匕首等凶器。

今年3月31日16时许，三被告人携带作案工具乘坐摩托艇到千岛湖猴岛附近水域伺机作案。当淳安县经贸公司载有台湾游客的“海瑞”号游船经过猴岛时，三被告人驾船追随，于18时30分许在阿慈岛附近靠上“海瑞”号。余爱军、胡志瀚、吴黎宏持猎枪、斧头等作案工具，先后登上游船。上船后，先用猎枪、斧头胁迫，将全体船员和两名导游赶入底舱，后又逼迫船上旅客交出财物，并以只要钱财不伤性命欺骗、威逼所有游客进入底舱，然后将“海瑞”号开到预定沉船地点——黄海岭水域深水区。途

中胡志瀚、余爱军将通往底舱的铁梯扔入湖中。吴黎宏用铁丝将底舱门拧住,余爱军按预定沉船灭口计划打开游船上的消防栓,向底舱灌水没有得逞。吴黎宏遂先后向底舱扔入3包炸药,爆炸引起底舱油柜处起火。三被告人还向底舱连开数枪,吴黎宏将摩托艇上备用的一桶汽油向底舱倾倒,导致底舱燃起大火,并向舱外喷射蔓延,三被告人遂驾艇逃离现场。当晚,他们对劫取的5000余美元、15万余元台币、3000余元人民币以及戒指等进行分赃。劫取的照相机和摄像机由吴犯藏匿。

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经过公安机关17天的昼夜侦查,于4月17日被侦破,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三人于4月20日被依法逮捕。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于6月3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6月10日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三名被告人在法庭调查中,对各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法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均表示认同,没有提出异议。受被告人委托的三名律师分别为三名被告进行了辩护。三名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都表示认罪服法。

当天上午,审判长庄严宣布,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院认为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预谋地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劫持游船,抢劫游客巨额财物,为灭口,又采用爆炸、纵火的手段杀死32人,其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三被告人所犯罪行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均应依法严惩。以抢劫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亲属;作案工具摩托艇一艘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名被告人如不服一审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3日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开庭期间,大陆遇难者家属、杭州当地群众等200多人到庭旁听。台湾长风旅行社总经理林维扬也到庭旁听。

据悉,开庭前海协曾三次致函台湾海基会,及时将“千岛湖案”公开审判的有关情况通知了台湾海基会,请其转告遇难台胞亲属,允许他们的代表到庭旁听,同时还允许海基会人员以个人身分到庭旁听。8日下午,海协收到海基会的正式通知,称将有五名台胞亲属代表前来旁听,但至一审判决时,仍不见他们来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当天下午将此案的一审判决书副本委托台湾长风旅行社总经理林维扬先生转交遇难台胞亲属。

6月19日上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杭州召开宣判大会,宣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3月31日在淳安千岛湖实施特大抢劫、故意杀人的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三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核准死刑的裁定。杭州市的有关领导和各界群众及省、市有关方面代表1200余人参加了宣判大会。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刚主持宣判大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庭庭长王治建宣读了裁定书。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对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均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杭州市市长王永明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召开这次宣判大会,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主持正义、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宗旨,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维护社会治安,严惩严重犯罪,保障人民群众和在大陆境内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国外人士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决心。对三名犯罪分子依法严厉惩处,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同时也是对死难同胞的最好告慰。

宣判大会后,遵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抢劫、故意杀人犯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新华社讯,6月13、20日《人民日报》)

(三)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就千岛湖发生游船火灾事故发表谈话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4月9日就浙江千岛湖游船火灾事故发表谈话。

这位负责人说,3月31日浙江省千岛湖发生了游船火灾事故,24位来大陆旅游的台湾同胞和8名大陆同胞不幸遇难。国务院台办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向遇难的台湾、大陆同胞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他说,国务院领导对这起事故的处理非常重视。责成浙江省人民政府认真处理好善后工作并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公安部、国家旅游局及浙江省方面迅速采取措施,认真地进行了现场抢险、勘察和遇难者遗体查找等工作。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根据浙江省有关方面的通报,及时主动地向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通报了有关情况。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继续努力,进一步做好事故善后工作,深入调查事故原因,争取尽快查明后公布。

这位负责人指出,发生这一不幸事故是我们两岸都不愿看到的。我们相信,广大台湾同胞理解大陆有关方面对处理此事故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努力。我们也愿意听取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方面提出的积极建议和意见。我们希望台湾有关方面能够客观地、冷静地看待这一事故,防止有人利用这一事故制造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舆论与事端。

4月9日上午十时,在千岛湖游船火灾事故中24名遇难台胞的骨灰,已由他们的亲属携带取道香港返台。至

此，千岛湖遇难台胞的后事处理已告一段落。

3月31日，浙江省淳安县“海瑞号”游船发生起火燃烧事故。船上32人全部遇难，其中有24名台胞游客，2名导游，6名船上工作人员。连日来，浙江省杭州市负责事故善后处理的工作人员与遇难台胞的亲属就遗体火化问题反复磋商。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到遇难者亲属的意愿和台湾的民间风俗，尽可能作了妥善安排。6日下午，遇难台胞的遗体全部安然入殓，24具棺木随即被运抵桐庐县殡仪馆。

遇难台胞的遗体是4月8日凌晨火化完毕的。上午九时许，遇难台胞的50多位亲属在桐庐为亲人们举行了祭奠仪式，然后向殡葬工人及负责后事料理的人员鞠躬致谢。现能收集到的遗物也已被遇难台胞的亲属认领。自始至终参加遗体处理工作的台湾长风旅行社副总经理林维杨，对省市有关方面为遇难台胞亲属提供的帮助表示满意。他对记者说：“大陆事故处理部门已尽可能作了安排，我们大家尽人事随天意，但愿死者早日安息！”

浙江省副省长刘锡荣在清明节，和今天遇难台胞亲属返台前，都专程看望和慰问了他们。刘锡荣代表省市政府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对遇难同胞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他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台胞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台胞的安慰也是我们的安慰。请转达我们对你们在岛内的亲友的问候。”

据浙江省公安机关4月17日透露，现已初步查明，浙江千岛湖“海瑞”号游船失事，系一起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浙江公安机关经过17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破获了此案，3名涉案犯罪分子吴黎宏（男，22岁，浙江淳安县桐子坞乡坎脚村人）、余爱军（男，23岁，浙江建德市人）、胡志瀚（男，24岁，浙江淳安县排岭镇人），已被公安机关抓获，他们已初步交代了策划、准备和在“海瑞”号游船上进行抢劫钱财、纵火杀人并毁船的犯罪事实。现公安机关正继续抓紧对此案进行审查。

记者从浙江省公安部门获悉：浙江省检察机关已于4月19日批准依法逮捕在千岛湖“海瑞”号游船上抢劫纵火杀人的案犯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目前全案的审理和取证工作正加紧进行。

据浙江省公安机关查明，吴黎宏是浙江淳安县桐子坞乡坎脚村村民，余爱军是浙江建德市新安江镇居民，两人被捕前均从事个体摩托艇营运；胡志瀚是浙江淳安县千岛湖镇（原名排岭镇）居民。三人素有交往，平时均好逸恶劳，贪图钱财。当吴黎宏将在千岛湖抢劫游船上游客钱物的企图与胡志瀚、余爱军商量时，三人一拍即合，遂即对作案的地点、线路、时间、方式等作了策划。据吴黎宏等三名案犯初步供认，3月31日傍晚，他们乘坐摩托艇，携带作案工具，选择水面最宽阔，易于隐蔽，天黑以后过往船只较少的黄泥岭一带水域伺机作案。当时，先后有“千岛湖6号”、“黄山3号”两艘游船经过，因天色尚亮，附近又有过往船只，案犯未敢下手。当“海瑞号”经过时，天色已暗，并下着雨。三名案犯待周围已无过往船只后，驾艇靠上行驶中的“海瑞号”。上船后用猎枪、斧头相威胁，迫使全体船员进入底舱，随后即逼迫船上旅客交出摄像机、照相机、首饰、手表、金钱等财物，并以只要钱财不伤性命相欺骗，胁迫诱使所有旅客和导游陆续进入底舱，关闭唯一的舱门。抢劫财物得手后，他们打开船底消防阀企图放水沉船，但未成功，于是纵火杀人，随后逃离现场。

有关部门在码头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后，不见“海瑞”号游船抵达，即派出快艇四处寻找。由于天黑雾大，能见度差，直到次日早上8时许才发现尚在燃烧的“海瑞”号游船，随即报告当地政府。消防救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立即进行喷水扑救。由于在游船舱面没有发现人员踪影，当地政府便立即调集大量人员、船只，在出事地点附近40多公里范围的水域、岛屿进行寻找，没有结果。后来将该游船拖至岸上，抽去底艇积水，才发现所有游客和船员均在舱底遇难。

据介绍，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件真相。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立即成立了现场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下，及时采取措施做好善后工作。在遇难台胞的善后处理过程中，浙江省有关部门尽力满足遇难台胞亲属的要求，保证了遇难者亲属顺利辨认遗体，认领遗物。同时，尽量按照台湾的习俗进行悼念活动。对同时遇难的船员和导游也作了妥善处理。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调集300余名干警，克服各种困难，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17个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破获了这起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

据悉，破获此案后公安机关至今已起获赃款赃物计美金5250元，台币154620元，摄像机1台，照相机6架，戒指8只，翡翠玉镯1只，劳力士手表2块等。还追缴了摩托艇、猎枪、油桶等犯罪工具。对遇难台胞被劫的财物，有关部门将通过适当途径如数发还他们的亲属。

（4月10、18、23日《人民日报》）

（四）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一行来杭州听取千岛湖案件介绍

应海协的邀请，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一行21人5月8日下午抵达杭州，专程前来听取千岛湖游船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的情况介绍。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千岛湖案侦破后，多次发函邀请台湾海基会人员及有关专家来杭，安排办案专家介绍案情并回答问题。当天到机场迎接许惠祐一行的有海协有关人员和浙江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裘明发等。海基会到杭人员中除海基会专家外，还有5名罹难者亲属。

专程来杭的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一行，5月9日听取了由海协延聘的办案专家对千岛湖案件的详细介绍。办案专家并就海基会人员及专家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

上午的案情介绍会开始前，海协副秘书长李亚飞和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分别接受了记者的简短采访。

李亚飞首先代表海协再次对罹难的两岸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他说，千岛湖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是一件令两岸同胞同悲同愤的案件，案件发生后，大陆有关方面对事件的处理非常重视，浙江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妥善处理善后外，调动大量警力迅速侦破这一案件，这是对两岸32名死难同胞的最大告慰，也是对遇难者家属的最大安慰。李亚飞对海基会人员及遇难者亲属前来杭州表示欢迎，他说，海协今天将安排有关办案专家以个人身份向海基会人员及专家详细介绍案情，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许惠祐表示，来到杭州看到并了解到海协特别是浙江方面已为此作了相当的准备工作，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希望双方本着坦诚的态度，努力走出千岛湖案的阴影，使两岸的民间交流能更加平顺。

介绍案情结束后，双方有关人员表示，今天上午的案情介绍会一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办案专家通过口头介绍，辅之于录影带和幻灯片的说明，从事件发生、现场救援、案件侦破和犯罪动机、作案过程等方面，详细作了介绍。

下午，办案专家继续介绍有关案情并回答了海基会专家提出的有关肇事案犯的身份、作案过程的若干细节、现场勘查及救援、案件侦破的过程，以及缉拿窝赃犯的侦办情形等问题。

参加当天案情介绍海协方面延聘的专家是：浙江省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马光成、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蔡扬蒙、公安部刑侦局高级工程师乌国庆、公安部刑侦局反恐怖处处长何挺、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洪巨平、浙江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张善岳、浙江省公安厅消防局总工程师潘左阳、杭州市公安局高级法医师季少岩、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李曙光。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应聘的。

5月13日上午，海协邀请的办案专家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进一步向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一行解答了海基会专家所提的一些新问题。至此，海基会一行前来杭州听取有关案情介绍的全部活动结束。

海协专家何挺在当天上午的活动结束后向记者介绍说，海协从两岸关系的大局出发，考虑到让更多关心这一案件的人，尤其是台湾同胞了解事实真相，特别安排有关专家在法院审理前就向海基会人员及专家详尽介绍了整个案情和案件侦破情况，并提供他们观看了40分钟有关善后和案情侦破的录像资料以及100多张幻灯片，海协专家又陪同他们赴淳安踏看了“海瑞”号船体和案发水域，观看了已起获的赃证物，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全部问题。在不影响我司法审理的前提下，对方想听的我们都作了介绍，想看的都提供给看了，他们的问题我们也都作了回答。何挺表示，我们是抱着极大的诚意向对方介绍案情的，我方专家认为，通过这样的介绍，海基会专家如果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他们应该是满意的。

在当天上午的活动结束后，双方专家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海基会邀请的法医专家方中民对海协专家介绍的尸检情况表示可信，他说，“站在专家与专家的立场，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检查结果。”鉴识专家施多喜表示，经过对“海瑞“号游船的现场踏看，大陆办案专家所介绍的案发当时底舱燃烧状况，理论上是可以解释的。有的海基会专家称，由于此行不是前来办案，只是来听取案情介绍，无法对现场作技术性勘验，对一些家属提出的疑问“无法做出结论”。

海协专家何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强调，千岛湖案事实已经很清楚，证据确凿，公安部门侦办终结已移送检察机关。如果有人想继续利用此案作文章、“泛政治化”，利用我方的诚意、善意和所提供的资料及案件详情，制造一些所谓的疑点，以达到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目的，是徒劳的。

海基会一行预定5月14日上午乘飞机离开杭州，经香港返回台北。

正在浙江省考察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5月17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大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两岸经贸交流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和其他各项交流也不断扩大。在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形势下，3月底不幸发生千岛湖恶性抢劫纵火杀人刑事案，有32名两岸同胞蒙难。我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海峡两岸同胞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汪道涵说，“千岛湖案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浙江有关方面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全力侦破了案件。目前，案犯已缉拿归案，司法部门将依据法律对罪犯进行严惩。同时，大陆有关方面从维护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大陆的有关专家向海基会人员和台湾有关专家详细介绍了案件的经过和破案的过程，并回答了台湾方面有关案情的各种疑问，还安排台湾方面的专家观看现场，体现了大陆方面尽最大努力向台湾方面说明案件真相的诚意。

汪道涵说，案件发生后，两岸同胞同悲同恨。台湾各界人士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我们认为在两岸交往蓬勃发展、经济合作不可阻挡的洪流中，“千岛湖事件”只是意外不幸的惨案。这一事件不应使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更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作为煽

动反对大陆、阻挡两岸交流、鼓吹台湾独立的借口。两岸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理性、冷静、客观地看待案件及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大陆方面将继续加强治安管理，给台湾同胞来大陆以安全感。

汪道涵说，一年前汪辜会谈的成功举行，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根据汪辜会谈签署的协议，海协与海基会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对于增进了解、增加互信、缩小分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应当说两会的合作前景是广阔的。两岸同胞对两会寄予厚望。双方应进一步加强两地的沟通渠道，特别要加强高层的接触，增加对话，消除误会，克服分歧，推进合作。只有这样，才符合两岸同胞的愿望，也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5月31日就千岛湖事件善后等事宜致函台湾海基会。函件全文如下：

海峡交流基金会：

贵会5月25日、28日关于就千岛湖事件善后赔偿、两岸旅行安全问题进行专案协商事函悉。

据杭州办案机关告："海瑞号"游船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件的侦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5月9日至13日，办案机关人员以海协专家身份向贵会人员、专案及台湾罹难者家属代表详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安排贵会专家观看了"海瑞号"游船、出事水域、查获的凶器和赃物及与案情有关的幻灯、录像资料，并对贵会所提疑问逐一作了解答与说明，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和诚意。是后，已将介绍案情与回答问题的情况，转告办案机关。浙江有关方面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依法处理此案。

"海瑞号"游船事件发生后，浙江有关方面为妥善处理各项善后事宜，尽了最大努力。

我会亦认真遵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紧急联系管道在我会方面始终是畅通的。

贵会来函违背基本事实，不利于消除此事件给两会合作和两岸关系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深望贵会体察两岸广大同胞的意愿，能够真正以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为两岸关系发展作出切实的努力。

关于就近年来两岸交往交流中涉及大陆同胞、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受到损害事件交换意见事，我会已多次致函贵会，一再建议贵我两会就两岸旅游交往问题包括两岸同胞旅行中的安全问题，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近年来台湾军方打死打伤大陆沿海渔民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追究责任、严惩凶手及善后赔偿等问题进行协商。我会认为，这种讨论有利于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有利于维护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惜迄今未获贵会的积极回应。望贵会勿再拖延。

浙江有关方面十分重视、关心"海瑞号"游船案件中罹难者的旅游人身保险赔偿事宜，并于台湾罹难者家属代表随贵会人员来杭期间就此问题安排座谈，因贵会表示不便而未果。所谓"迟未回应"系无中生有。现贵会来函正式向我会表示"受家属委托处理赔偿问题"，经询浙江有关方面，有关保险公司和旅行社已准备与罹难者家属、有关旅行社或受家属委托的代理人进行洽商。今年请与之直接联系。特此函告。

顺致

时祺！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1994年5月31日

3月31日发生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千岛湖的"海瑞"号游船特大杀人抢劫纵火案在17天内就得以侦破，淳安县领导和公安机关认为，领导重视，措施得力，依靠专家和发动群众相结合，是迅速破案的关键。

淳安县委、县政府在向中央新闻单位前来采访的记者回顾事件的处理过程时认为，侦破工作是及时的。据介绍，4月1日早晨发现正在燃烧的"海瑞"号游船后，县公安人员和相继赶来的浙江省、杭州市公安人员即开始事故的调查工作。当2日下午清船证实船上人员全部遇难后，3日晚淳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即成立20多人的专案小组立案调查，"当时就发现一些疑点：全部遇难人员32人均陈尸底舱；船上的玻璃燃烧成球状，如无助燃剂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通往底舱的铁梯失踪；在"海瑞"号上发现一只汽油桶，而按规定游船上不允许携带汽油。

4月6日，遇难台胞家属离开淳安、善后工作告一段落后，淳安县委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安排配合公安部门对事件的调查方案。此后数天，公安部及省、市、县公安厅局共派出280多名技术专家和干警进行紧张的侦查工作；淳安县在省、市直接领导下连续召开会议，部署发动群众，进行定时、定向、定位、定面的排查。县委、县政府于4月11日成立了包括公安、检察等13个部门及全县37个乡镇负责人共150多人组成的"3.31事故排查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划片分管排查责任区；13日下午又召开全县乡镇中层领导干部动员大会，紧急组织所有中层干部对全县573平方公里水面上航行过的6000多艘各类船只一一"过滤"，并对全县所有的小划子、梭子艇和出事地点附近的小旅馆全面排查，参与排查工作的干部达4047人次，用船300多船次，访谈了近10万人次。

在排查中，当地干部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上千条，其中有价值的线索有165条，对公安机关迅速侦破这一案件很有帮助。

淳安县委书记邵银泽告诉记者："淳安建县38年来从未发生过船上抢劫案，发生这一案件使淳安人倍感痛心。我们只有尽力做好善后工作，全力协助公安机关尽快侦破此案，这样来对两岸同胞有所交代。"

浙江省淳安县在千岛湖"海瑞"号游船特大杀人抢劫纵火案发生后，全力以赴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善后，对不幸遇难的同胞表现出了骨肉亲情。

据中共淳安县委书记邵银泽向中央新闻单位来千岛湖采访的记者介绍，"海瑞"号游船发生事故的当晚，淳安县经贸旅游公司专门雇船在千岛湖面既定的航线上寻找，由于雨大雾浓能见度差，加上"海瑞"号被犯罪分子改变航向，未能及时发现。第二天清晨接到"海瑞"号失火的报告后，淳安县公安、消防、武警、交通、卫生、保险等部门迅即组成抢险指挥部，在县委和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展开救援工作。救援人员冒着船体800度的高温进行降温抢救，及时保护住了船只和现场，为妥善处理遇难同胞的遗体争取了时间。为了寻找可能生还的人员，县里组织了几十条船艇在湖面上来回搜寻，并请驻浙空军派出飞机俯视寻查，海军派出潜水员用高精度探测仪在湖底寻找。

淳安县县长严华好介绍说，当32具死难者遗体被清理出来后，淳安县在省市政府的部署下协助妥善处理后事。公安机关在接报后12小时内查明了遇难者的详细身份，民政部门将淳安县造船厂一个大车间腾出来存放遗体，并安装数台通风设备，安排两辆大卡车拉冰块为遗体作降温防腐处理，并连夜安排县建筑工程公司赶制棺木。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山海的儿子王辉也在这一事件中被害，他忍痛组织人力赶制棺木，终于在遇难台胞亲属到达前完工。

严华好说，考虑到台湾的民间风俗，根据遇难台胞亲属的意见，淳安县为每位遇难台胞制作了小烛台、灵位牌、小香炉以及二牲四果的祭品，还腾出县里条件最好的西园山庄用于接待遇难台胞的亲属，同时特意架设电话线路供台胞与台湾通话使用。在双方达成就近火化的共识之后，淳安县邀请了杭州灵隐禅寺的高僧继云法师以及道姑、神父，为信仰不同的遇难台胞举行法事和弥撒，以祭奠亡灵。

据了解，"千岛湖事件"遇难台胞的后事处理在淳安县共进行了6天，县里为此调集了1000多名干部群众、近百台车船，直接开支达300多万元人民币。

（新华社讯，5月6、10、11、14、18日《人民日报》
和6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五）唐树备会见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时指出不应因千岛湖事件阻碍两岸关系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于4月12日下午会见了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双方就浙江千岛湖游船火灾事件进行了交谈，达成了三点共识，包括：一、当前应全力迅速查明千岛湖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公布；二、两会原则上同意就在有的情况下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问题交换意见；三、两会根据各自的授权，采取可能的措施，消除因此事件引起的消极影响。

据悉，唐树备向石齐平表示，在两岸同胞交往、交流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发生千岛湖游船火灾事故，造成24位来大陆旅游的台湾同胞和八名大陆同胞不幸遇难，我们心情十分沉痛。他代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请石先生回台北后向遇难台湾同胞的亲属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慰问。

唐树备说，事故一发生，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指示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迅速进行抢救，妥善处理善后，并加紧查清事故原因。国务院台办、公安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以及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立即行动。公安部和交通部派出的专家和当地有关人员一起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又再一次指示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在认真处理好善后工作的同时，要全力、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一查到底。如查实后发现是外力介入，不管是什么人均应依法严惩。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指示附近省、市，要积极配合浙江省工作。唐树备说，浙江省有关方面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注意尽量尊重遇难台胞亲属的意愿，根据地方上的具体条件，提供尽可能的方便，对由于当地条件限制、难以做到的，也作了解释。应当说，对整个后事的处理，大陆方面是十分重视的，也是及时的。

唐树备说，在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本着协助有关方面处理两岸同胞交往中产生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正当权益的精神，积极配合，协助有关方面及时处理这一事故，并派副秘书长刘刚奇亲临现场，协助处理有关善后事宜。与此同时，我会及时与海基会联系，通报事故的处理情况，做了一个民间团体能做的事情。

唐树备强调，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大陆是受到保障的。国家法律对台湾同胞、大陆同胞的保护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绝不存在歧视的问题。发生千岛湖这一不幸事故，是两岸同胞交往、交流中的意外事件，不可能也不应当因此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不应当把它"政治化"。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及台湾有关方面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故。一旦查明真相，海协将尽快以适当方式告知海基会。

唐树备说，有损两岸同胞正当权益的事件，包括对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构成巨大威胁的事件，过去也曾发生过。海协向来主张通过两会商谈及时加以解决。对于海基会提出"讨论有关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事宜"，唐树备表示，经过准备，就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有时受到损害的问题，两会可以，也应当交换意见。

唐树备还说，两岸经贸交流，人员往来是有益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好事、两岸同胞在交往交流中互受其利。我们不希望因为千岛湖事故而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不希望一方借助这一意外事件采用限制、阻止两岸交往的方

式对另一方施加压力。海协也注意到，在处理这一意外事件的过程中，台湾有些言论比较偏激，对此，我们能够理解。但应当指出，极少数言论对大陆肆意攻击甚至污蔑，这只会徒增两岸同胞间的不信任感，恶化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这一点，希望海基会转请台湾有关方面注意。

唐树备还指出，在事故查明并公布以前，散布任何大陆方面隐瞒事件真相的谣言或猜测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罹难的台湾同胞家属和台湾有关方面，对事故发生地有关方面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做法有不同意见，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在四月九日的谈话中对此表示，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理解大陆有关方面对处理此事故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努力；同时，我们也愿听取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方面的积极建议和意见。

在当天的会见中，石齐平先生也向唐树备表达了海基会的意见。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4月13日就千岛湖游船事件致函台海海峡交流基金会。

函中说，贵会4月7日"关于协商处理千岛湖船难事"函悉。关于来函所提问题，国务院台办负责人4月9日发表的谈话，我会4月4日的函和4月6日的电话中，已经作了回答。

函中指出，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投资和从事各项交流活动，其人身财产安全均受到保护，是有法律保障的。对"海瑞号"游船的意外不幸事件，有关方面正大力查清事故原因。贵我两会应从共同维护两岸同胞正当权益、发展两岸关系的大局出发，理性地、冷静地处理有关问题，不使两会合作及两岸关系发展受到影响。

函中说，在两岸的交往中，大陆同胞、台湾同胞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事件已发生多起，我会对此类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建议双方进行必要的准备后，进行商谈。对"海瑞号"游船事故的善后工作，我会愿意听取贵会意见，并向有关部门转达。

连日来，台北一些政治人物在就浙江千岛湖船难事件发表的谈话中，出现了要"抵制"大陆旅游、大陆投资，要"调整两岸交流措施"、"中断两岸事务商谈"等言论，甚至有人借机鼓吹"台独"。这一现象引起岛内外关注。

香港新报4月10日发表社论说，台湾官方在千岛湖事件上对大陆的责难可说是近年来罕见，台湾当局会否因这次事件放缓发展两岸关系值得关注。

台湾世界论坛报发表短评及专栏文章说，千岛湖船难属于个别事件，不幸既已发生，便须客观冷静，作理性的分析和善后处理，而不应将此一事件拉到两岸对峙的政治层面。短评指出，两岸和则两利，千岛湖事件固然令人悲痛，但站在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实在也不应因此弄到两岸关系倒退，落得亲痛仇快的地步才是。

一些港台媒体还批评说，岛内有人企图利用这一不幸事件趁机鼓砍"台独"主张，这一做法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政治吗啡"，是注定要失败的。

台湾有关当局最近以"千岛湖事件"为借口声言"暂停"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抵制"赴大陆旅游和两岸经济交流。台湾当局的举动为两岸关系和往来蒙上了阴影，并且引起岛内越来越多人士的担忧与不满。不少业者认为当局的这一做法欠妥，中断和大陆的交流交往，受害最大的还是台湾。

台湾旅游业者将因"抵制大陆游"而损失严重。台"陆委会"决定从5月1日起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旅行业者必须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台湾业者提出，赴大陆旅游在台湾旅游业中占有很大比重，仅台北市就有上百家经营大陆旅游的旅行社。4、5月份是赴大陆旅游旺季，每月有游客1.5万到1.8万人次，停止赴大陆旅游后，旅行业者损失至少在新台币1亿元以上。台湾旅游业者指出，近7年来，已有近600万人次的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这是空前的、现实的两岸交流，两岸旅游往来不能因为这一偶发的"千岛湖事件"而中止。

企业界人士则认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已有密切的联系，开经贸交流的倒车必将给台商带来很大的伤害和损失。台湾"两岸关系工业协会"秘书长黄昭夫说，不少台商向协会提出，两岸经贸活动不能因"千岛湖事件"而受影响。台商和大陆的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什么彼此。利用"千岛湖事件"大做文章只会损害台商利益，却阻挡不了台商赴大陆投资和两岸经贸交流的潮流。

暂停两岸文化交流的做法也引起文化界的反对。不少文化界人士提出，两岸文化交流对台湾吸收大陆的文化、科技优势有利，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利，因一偶发事件就停止两岸文化交流，将破坏两岸透过文化交流逐渐建立起来的了解和沟通关系。

台湾新闻传媒也提出，岛内有些人借"千岛湖事件"煽动台湾同胞反大陆情绪，鼓吹"台独"，这些都不足取。台湾当局的"抵制措施"是借题发挥，将使两岸双方，尤其是台湾民众受到伤害。

（新华社讯，4月12、14、20日
《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台湾当局《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发表谈话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7月12日就台湾当局《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发表谈话。

国台办发言人说，台湾当局最近发表了《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这份说明书表示坚持统一目标，并表示"坚决

主张‘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说明书歪曲台湾问题的由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中鼓吹“两岸分裂分治”、“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个国际法人”、“分裂国家共同参与国际社会有利于统一”等谬论，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和平统一大业，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发言人指出，说明书还散布中国统一是“制度之争”的论调，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40多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肆意攻击、污蔑，以此为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拖延统一制造借口，这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主张按“一国两制”构想实现国家统一，就是着眼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考虑到大陆与台湾社会制度不同，所采取的照顾各方利益的正确政策。

国台办发言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分裂。考虑到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我们对台湾与外国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不持异议；但是，台湾当局图谋“参与联合国”，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其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我们相信，台湾同胞在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是能够分清大是大非的。

台湾当局如果像其说明书中所说的那样，主张统一和不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就应当响应我们的一再呼吁，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商谈；就应当取消为两岸关系发展设置的各种障碍，推动两岸经贸合作，鼓励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并争取事务性商谈取得积极成果。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从中华民族的利本利益出发，顺应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采取实际措施，与我们一起继续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连日来，港台舆论对台湾当局在7月5日结束“大陆工作会议”时公布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陆续作出反应，指出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上，仍然坚持反共、反对“一国两制”的立场，强调所谓“分裂、分治”，企图“加入联合国”的做法，将助长分离意识。

这份“两岸关系说明书”，全文长一万多字，共分五个部分。台湾“陆委会”官员称，文件明确表达了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主张。

“说明书”虽称台湾当局“坚决主张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其中的主要论点是：称两岸关系是“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双方各自享有统治权，在国际间并存两个国际法人”；称中国分裂的原因是“三民主义中国与马列主义中国之争”；“统合与分离两股趋势为台湾人民接受的程度将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称如果未能按台湾当局所提出的“统一在自由、民主、均富制度之下”，则“统一毫无意义与价值”，等等。

香港《大公报》社评指出，“说明书”提出的主张，实质是为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寻求政治空间，用“两国”、“两府”来对抗“一国两制”，以阻挠国家的和平统一。

香港《信报》评论认为，“要不是以统一大业为包装，两岸关系说明书简直就是一份清算中国的文件”。“从开出要求中共‘放弃一党专政’的条件看，和平统一的机会甚为渺茫”。《星岛日报》社论说，台湾当局发表“说明书”“是为了要加入联合国。要加入联合国，就是实行‘两个中国’政策，单此一项，两岸的政策就水火不相容”。《明报》的署名评论认为，“说明书”对中国“提出了一连串的新符号”，同时以大篇幅、一再地提及国际分离主义兴起对台湾民意的影响，以及“民意将成为政府制定大陆政策的主要参考指标”，这些不同于以往反“台独”的基调耐人寻味。

在台湾，主要媒体、学者和工商界也对“说明书”提出批评。《联合报》6日的社论说，台湾当局整个大陆政策“仍然回到了起始的原点：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如今的大陆政策，用于应付台湾内部政争的是一套，用于处理两岸交涉的是另一套，用于国际之间的又是另一套，自相矛盾抵触，支离破碎，根本不能建立一个理路清晰的政策体系”。这家报纸的特稿评论说，“说明书中对一个中国的定义，是把中国的内涵加以‘去政治化’，并‘把独立与统一相提并论’，这种转变显示“台独成为台湾当局迫使中共改善两岸关系和放弃一党专政的借口”。

台湾《中国时报》7日的社论对“说明书”表示失望，认为“通篇只有两岸分裂分治的事实”，却不知道“分裂分治的下一步是什么”，当局“有什么政策”。社论说，“说明书”中“一个中国的理念虽然十分明确，却未对过渡时期应采取的步骤与行动作出规划”，“对岛内近年来分离意识的不断兴起，分离主义的发展趋向以及政府如何对待分离意识的态度均着墨不多，此一游离不定的立场，等于间接助长分离主义的有利条件”。这家报纸的特稿也指出，“说明书”出现理念争议和前后矛盾的政策立场，既然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又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赋予演变成“两个对等国家”的可能性，在法理逻辑上显然呈混淆现象。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赵春山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说明书”未脱“国统纲领”的窠臼，除了对抗中共“一国两制”外，最大用意是为了当局推动目前的“务实外交”；在两岸关系方面，“说明书仍视中共为构成两岸现行僵局的主要障碍，显示政府主管部门的心态仍旧保守而缺乏前瞻”，“现行大陆政策的任何措施，都只能停留在为现状辩护的层次”。

台湾工商界更对“说明书”表示不满意，认为这个文件“只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对话”，“只宜示立场，不见实质

内容”。《联合报》报道说，企业界多认为，“说明书”中有关两岸经贸部分的论述不到三百字，内容贫乏，没有实质内容，可见台商仍必须在两岸关系的夹缝中求生存。

（新华社讯，7月13日《人民日报》和(海外版))

材料三　中国渔工宜兰海域遇难

（一）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大陆渔工在宜兰海域遇难事发表谈话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7月22日就大陆渔工在宜兰海域遇难事发表谈话。谈话全文如下：

7月10日台湾“上好三号”渔船在宜兰海域遭强台风袭击，初步查明10名在该船上的大陆渔工不幸罹难。

据了解，这一悲惨死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由台湾有关当局对在所谓“海上旅馆”上的大陆渔工入港避风有处罚规定所致。

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表示严重的关切。我们对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对获救的大陆渔工表示慰问，并向援助大陆同胞脱险的台湾同胞致谢意。

在遇到台风时让海上人员避难，这是起码的人道准则。台湾有关方面应取消对大陆渔工歧视、限制性规定，改变以往的错误作法，追究事故的责任，杜绝今后类似事件的发生。并允许罹难者家属、渔工所属公司代表和大陆记者赴当地处理善后和进行采访，并对死难者家属给予赔偿。

（新华社讯，7月23日《人民日报》）

（二）海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对大陆渔工遇难表示严重关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7月21日致函台湾海基会，对7月10日台风袭击中因台方抢救不力造成大陆渔业劳务合作工人惨死事件表示关切。

海协的函中说，据浙江有关方面告：受7月10日强台风袭击，台湾“上好三号”渔船在宜兰海域遇难，有多位大陆渔工下落不明。15日、16日，在宜兰外海先后发现了10具尸体。事故发生后，大陆渔工要求辩认尸体受阻；被救出的部分大陆渔工被收容在“大陆人民宜兰处理中心”，并受到非人道待遇。

另有消息说，7月10日遭受强台风袭击的大陆渔工，在生命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台湾有关当局却不允许他们进入台湾渔港避风，而只能留在破船改装的所谓“海上旅馆”。有的“海上旅馆”被风浪打翻，造成了大陆渔工的惨痛死亡事件。

海协对现在台湾的大陆渔工的现状表示严重关切，对悲惨遇难的大陆渔工表示沉痛哀悼，并通过贵会对获救大陆同胞表示慰问。请海基会转告台湾有关方面，尽速核查死者身份，保护好死者遗体。保证获救大陆同胞的人身安全，不受歧视并给予人道主义照顾。

请海基会核实并告知有关“海上旅馆”情况及“上好三号”渔船遇难的情况。海协受权保留进一步就此事进行交涉和要求赔偿的权利，并要求台湾有关方面彻底检讨在紧急情况下拒绝大陆渔工进入台湾海港避难的不人道政策。海协建议与海基会就此事进一步交换意见。

浙江省洞头县政府证实，在7月10日强台风袭击台湾时，12位大陆渔业劳务合作工人，在台湾宜兰苏澳港“海上旅馆”“上好三号”船上因台方未予及时抢救而遇难。

据已回到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的31名幸存者表示，他们是浙江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洞头分公司与台湾上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劳务合作的劳务输出人员。7月10日中午，海面上暴风雨大作，船上人员已睁不开眼睛。停泊在苏澳港外避风港的台湾渔船纷纷进入内避风港，而居住着90多名大陆渔业劳务人员的“上好三号”离岸边仅五六十米，却不知何故不进入内避风港。大陆劳务人员的管理员李银龙等向船长吴松明强烈请求进入内避风港。船长先是称：“没什么事，台湾已经好几年没有台风了。”后见风浪太大，便用无线电话机向上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请示进内避风港，不料公司不同意。直到下午2时许，上好公司方同意船进入内避风港。但船起锚时才发现螺旋桨被渔网缠住，船只进退不能。

下午6时左右，一个高达20多米的冲天巨浪打来，甲板上三十几名抗台风的大陆劳务人员被打到海里卷走。6时半许，船长等一些人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抱着侥幸心理跳海求生。晚上11时左右，又有一批人跳海求生。船上只剩下18位年岁较大、体弱的劳务人员，他们一再向岸上的人呼救，但无人理睬。

第二天早晨，天亮雨停后，他们才看清仅几百米处就有一个台湾海军基地，但一夜危难，他们随时有灭顶之灾却得不到任何援救。他们再次向岸上呼救，可喊了大半天，只来了一名女记者在岸边对他们拍照并拿笔记了几下就走了。后来来了两个模样像老板的人，遇难者又呼救。对方问道：“船上有没有台湾人？”为了求生，大陆渔工只好骗答有台湾人，这样才被救上岸。

获救上岸的18人和跳海的生还者共56人随即被送往当地的船泊派出所，后被转送到宜兰鲁东第一警察局。台湾警方将他们扣上“偷渡”罪名，将他们作为罪犯加以关押。在船泊派出所和警察局，这些遇难者受到了当地警察的百般虐待和人身侮辱。警察令遇难者脱光衣服在地上弹跳，一些人不肯跳，警察就用电棍打。许多人跳海受了伤，有的拉肚子，要求用药，警方非但不予理睬还臭骂他们。更有甚者，有的警员把拉肚子的吴兴炎拉出监牢，用电棍胁迫他在地上做俯卧撑，并站在一旁狂笑数数，一直到吴兴炎趴倒不能动为止。从被关押之日起，警方频频对他们提

审拷问，李银龙等人因抗议而遭警方拳头、电棍毒打，有11个人因抗议而被警方拉出去剃光头以示惩罚。

在监狱里，大陆渔工向警方提出三项要求：一、对死难者采取措施；二、要见一见死难的同胞；三、将生还的渔民及时送回大陆，与家人团聚。但台方对这些正当的要求均不予理睬。

至7月16日上午，这批大陆劳务人员共56人被送回大陆，17日中午抵达洞头县。他们中有31人是洞头籍渔民，其余为温州市乐清市、舟山地区沈家门及福建省惠安崇武等地的劳务人员。他们在台湾整整被非法关押了5天6夜。

洞头县政府7月18日证实，大陆劳务人员在这次海难中共有12人死亡，其中6人为洞头籍人。洞头罹难者亲属、生还者及当地政府为此提出三点要求：一、这次特大海难事件中，台湾上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事先没有采取避难措施，遇险时又抢救不力，不及时，应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一切损失；二、按照当地习俗运回遗体，或由亲属前往台湾辨认遗体后再作处理；三、对台湾警方的关押、侮辱、毒打大陆同胞的恶劣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

自本月16日以来，台湾宜兰外海陆续发现10具尸体。据台湾报纸报道，尸体已浮肿变形或遭鱼食咬，数日来无人愿意出面认证他们的身份，台湾检警单位、渔政主管部会及主管大陆事务部门，以“超出执掌范围”互相推诿。至19日晚台湾警方终于宣称有“突破性侦办结果”，确认10具尸体均为大陆劳务合作工人，并公布了这些遇难者的姓名。

据报道，10位遇难大陆劳务合作工人是：王光积、郭益其、蔡碰球、张金平、林加民、林海民、张泉福、蒋锦江、高扬清、张秋桂。

数日来，大陆渔工的尸体迟迟得不到确认，更遑论通知家属。在10日台风袭击时倾覆的“海上旅馆”“上好3号”的船主吴松明一直无法提供失踪大陆渔工的确切人数，直到18日方表示，相信打捞到的尸体是失踪遇难的大陆渔工。而台湾“警政署”则称有关遗体的事已超出警察的职责范围；“行政院陆委会”称“没有办法什么事都管”；海基会称因没有“政府”部门出面证实死者是大陆人民，海基会“管不着”。

“海上旅馆”问题与死者身份认定问题在台湾引起各界的关切。一些舆论呼吁，人命关天，台湾有关单位应尽速查清死者身份，对死难家属作出交代。还有不少舆论进一步对台湾当局不肯正视两岸存在劳务合作的事实，政策不当造成管理混乱而终酿惨剧提出批评。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说，相关单位在处理这一事件中很难令人不怀疑有人推诿卸责，企图遮掩了事。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案子，但有关单位在台风袭击的危急时刻，拘泥于法令，没有进行紧急避难的快速变通处置。出事后，有关业者和单位先则说没有大陆渔工丧生，其后又支吾其辞，见了浮尸又说无从辨认。其实大陆渔工都领有大陆方面发给的劳务证，业者在“海上旅馆”集中安置管理，难道没有建档名册？是否有人失踪不难查考，何以对此全无交代？连日来一具具疑似大陆渔工的浮尸连续飘浮海面，令人怵目惊心，政策失当酿成灾祸，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社论指出，两岸劳务供需的畸形问题纠结着当局有关部门处理大陆渔工问题颟顸无能的积弊，在这次台风袭击中尽数暴露。社论建议当局组成专案小组尽速进行处理，从雇用大陆渔工、“海上旅馆”、调查浮尸身份以至大陆渔工丧生善后等问题，逐一加以检讨，查明交代。

另据报道，宜兰县苏澳区渔业公会理事会19日开会决定将派员前往大陆，与大陆负责仲介的劳务公司洽谈理赔问题。

农业部渔业局负责人7月26日就大陆渔工在台遇难事件发表谈话。

这位负责人说，不久前，六号台风袭击台湾时，有12名大陆劳务合作渔工由于台方未予及时抢救而遇难。这一惨剧在“天”，更在人。熟悉大海的人都知道，台风经常给海上作业人员带来厄运和灾难，实施海上救助是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遇难渔工所居住的“上好三号”“海上旅馆”船在狂风巨浪袭击时，台湾有关方面迟迟不许其进港避风，在船只颠簸于风浪中发生故障时，又未给予有力的救助，致使大陆渔工落海，12人身亡，幸存者上岸后还受到了侮辱和虐待。台方这种悖法理、薄胞情的行为，为海峡两岸的渔民及一切正义之士所谴责。

这位负责人表示，与台湾有关方面这种不人道的作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方面自1979年以来不但在沿海各重要渔场建立了台胞接待站，开放重点渔港作为台湾渔船避风停泊的港口，专门划定了台湾渔船的锚泊区，还为台湾渔船的避风停泊、维修及贸易提供各种服务。这十多年来，每年都有大批的台轮到我方避风、维修。凡台湾渔轮在海上遇难或发生故障，大陆沿海军民都给予奋力抢救，每年都有大陆军民共同救助台湾渔轮的动人事迹。另一方面，当台湾的渔船违反渔业管理法规时，大陆有关方面无不晓之以理，导之以法，从未发生扣压台湾渔船，殴打台湾渔民的事情，相比之下，台方在大陆渔民危难之时，见死不救的行为，可谓十分不人道！

这位负责人最后强调，为维护大陆渔民合法权益，我们要求台方必须对“上好三号”遇难大陆渔工做好善后处理，赔偿大陆渔工一切损失，停止对大陆渔工的歧视性作法，保证今后严格遵守有关海难救助公约，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我们要求两岸尽快就雇用大陆渔工事宜进行接触，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妥为解决出现的问题。

台湾当局在各界要求开放近海渔船雇用大陆渔工的

压力下不得不决定，开放台湾近海渔船雇用大陆船员。

7月中旬发生了大陆劳务合作工人失踪死亡事件，台湾当局有关作法遭到台湾各界的批评。台湾有关当局26日召开专门会议，会上决定“规划开放”。首批允许雇用1万名大陆渔工，有关劳务中介业务将委托渔会等非营利团体办理。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接运受雇大陆渔工上台湾船问题，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称，会议已决定从8月份开始取缔“海上旅馆”，并将由“国防部”、“海巡部”、“农委会”、“劳委会”商定是否开放离岛安置大陆渔工。

至于大陆渔工能否随船入港问题，这名官员称“原则上大陆船员不得进港”，但若遇上“不可抗力”时，准许入港避难。

（新华社讯，7月22、27、29日《人民日报》）

（三）“海难事件”留下许多“？”

今年7月10日，台湾宜兰苏澳海上那艘供大陆劳务合作工人居住的“上好3号”“海上旅馆”，因台湾当局不允许大陆渔工进港上岸之规定，使船上大陆渔工在6号强台风袭来时无法进港避风，遇险后又因台湾方面抢救不力，导致数十名大陆渔工被冲下海底，其中10人浮尸苏澳外海。

随遇难渔工亲属赴台

8月25日，10名遇难大陆渔工的亲属经港抵台处理善后，他们认领了亲人遗体，祭奠了亡灵，于30日带回了亲人的骨灰。但是，在如何追究此次事件和给予死难者合理赔偿这些重要问题上，亲属们却毫无所获。台湾方面至今坚持认为这次事件“纯系意外天灾所致”，“海上旅馆”的船东“上好渔业公司”总经理张锡明在与亲属们谈判时只愿给每人赔偿2000美元，另加500美元的补助。而死难者亲属提出的要求是每人赔偿3万美元，至少1.8万美元。双方悬殊巨大，谈判破裂。

遇难者亲属现在都已回到家乡，他们保留追究事件责任和追索赔偿的权力。因此这一事件并没有结束，而且，如果台湾方面歧视大陆渔工的政策不改变，这类事件今后还可能继续发生。作为此次随遇难者亲属赴台采访的大陆记者，我对此颇有感触。

台湾需要大陆渔工

台湾劳工欠缺，渔工更不好找，单台湾苏澳的几条“海上旅馆”过去就有大陆渔工四、五百人，“7·10海难事件”后，“海上旅馆”遭到取缔，大陆渔工被遣送回去。苏澳地区的渔业生产遭到很大打击。在前往苏澳港的南方沃察看“上好三号”出事现场途中，我们看到渔港里塞满了渔船、苏澳镇镇长林棋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其中有不少船只都停止作业，原因就是不能雇大陆渔工了。苏澳区渔会的理事长林源吉也告诉我们：苏澳不少渔船船主这段来不断来找他，叫他向政府反映开放大陆渔工来台。他还说，9月份渔民们要就此组织一次请愿活动。

台湾沿海也雇用东南亚等地的渔工，但比较起大陆渔工来，他们认为大陆渔工都是自己同胞、语言好沟通，付给的工资又比较低，船主都喜欢找大陆渔工。事实也的确如此，遇难大陆渔工中的张泉福、蒋锦江，是来自福建崇武的一对表兄弟，两人在台轮上的劳务合同期早已超过，但因为兄弟俩表现特别好，台湾船长便一留再留，还以手表相赠，并答应给予加薪。苏澳镇镇长林棋山也说：“大陆渔工在这里确实帮忙很多。”

当局却搞歧视政策

台湾生产既有需要，大陆渔工又好用，作为台湾当局，本来应当对台湾渔船雇请大陆渔工开绿灯，但实际并不是这回事，台湾当局规定大陆渔工不许进港上岸。这是歧视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一直把台湾渔船雇请大陆渔工视为“非法”。这次10位遇难者亲属赴台处理善后，本来同行者还有大陆方面的劳务公司代表。但台湾方面称这种劳务合作是非法行为，大陆公司代表与此事件无关。结果只有遇难者亲属和记者赴台。

由于雇请大陆渔工在台湾不合法，因此大陆渔工的各项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工资低且不说，他们平时只能居住在用废旧船只改装的所谓“海上旅馆”上，病了也不能上岸医治。他们意外事故的赔偿金只定三、四万元新台币。这个价，连台湾的报纸都说只值一尾鲔鱼的价钱，大陆渔工的命太贱了。同时，由于没有合法的保障，在出现事故后也就难以保证能有效地执行赔偿事务。这次“7·10海难事件”就是一例。大陆遇难者入台后，对海难事件负有责任的上好渔业公司总经理张锡明避而不见，台湾海基会则表示他们只能协调，没有权力对张锡明进行制约。到最后张锡明出来谈判时，他也推三托四，毫无诚意，致使谈判毫无结果。

只是纸上画“饼”

苏澳镇和苏澳渔会负责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都感到台湾方面对大陆渔工这种政策不是办法，他们也在呼吁台湾当局要在政策上让大陆渔工合法化，而在此次遇难大陆亲属赴台之前，在台北举行的“唐焦会谈”就此事也进行了磋商，台湾方面已决定在沿海开放一万名大陆劳工赴台。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个决定出来之后，如何具体实施并无下文，它还只是画在纸上的一块“饼”。我们问苏澳渔会理事长林源吉这方面有什么情况，他说上头都没有什么消息，一部分渔民正在做向上呼吁解决这一问题的工作。

看来，闽台劳务合作，路途还不平坦。

庆祝祖国45岁生日

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45年来，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

材料：

- 国庆献辞
- 李鹏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 首都十万群众欢度国庆之夜

材料一　为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而奋斗

——国庆献辞

金秋十月，我国各族人民满怀欢欣，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的盛大节日。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谨向全国人民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和热烈祝贺！

神州大地，万象生辉。在希望的田野上，风吹稻秧、果实累累；在重点建设工地上，车流滚滚，机器轰鸣，一座座雄伟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在美丽的校园，一代朝气蓬勃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在科研试验室，高科技成果捷报频传。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涌动着改革的春潮，到处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人民共和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45年光景，弹指一挥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是在被外国列强侵略瓜分的历史耻辱中迈入20世纪的。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45年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中国宣告诞生，从此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5年来，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结束了受人歧视、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历史，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整个国家增添了新的活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45年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所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还有6年多时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关系到中国以怎样的面貌跨入21世纪的历史性课题，我们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要继续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我们的事业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要精心组织，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的既定目标。要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和建设创造更好的环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弘扬正气，凝聚民心，统一步伐，万众一心地为国家振兴贡献力量。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但是，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犹如滚滚长江，滔滔黄河奔腾向前，势不可当。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员走在时代前列，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实施坚强的领导，在广阔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按照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全国各民族的同胞们，新世纪的曙光正在向我们招手，伟大的祖国正阔步前进在全面振兴的大道上，成功的希望，胜利的光荣在于继续艰苦奋斗的努力之中。让我们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接再厉,脚踏实地,为实现本世纪改革和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在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材料二 李鹏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荣毅仁等同中外宾客3500多人出席

北京9月30日讯,灯火辉煌,花团似锦,国庆前夜,首都人民大会堂,充满欢乐喜庆的气氛,国务院总理李鹏今晚在这里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辉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党和国家各界领导人,各界人士和来自五大洲3500余宾客欢聚一堂,共渡佳节。

晚上6时过,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贵宾一起步入宴会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招待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李鹏总理走上讲台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在各条战线辛勤劳动、工作和学习的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出席今天招待会的各国朋友,向一切关心和支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李鹏指出,明年是我国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以企业改革为焦点,继续巩固和完善宏观管理体系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新的步伐。

李鹏说,45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李鹏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遵照党中央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李鹏指出,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近一段时间,台湾当局的一系列有碍祖国和平统一的言论和行动,理所当然地引起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关注,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其他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的、都是不能得逞的,我们对香港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是众所周知和坚定不移的,无论发生什么周折,中国都将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且有决心有能力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葡两国在澳门问题上一直进行着友好合作,我们坚信,在全国各族同胞,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努力下,一定能够完成统一祖国的千秋大业。

正在北京访问的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印度国大党总书记马尔·辛德,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领导人还有:丁关根、田纪云、李岚清、李铁映、邹家华、温家宝、宋平、宋任穷、任建新、王丙乾、王光英、宋健、迟浩田、罗干、王兆国、洪学智、钱正英、安子介。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中央军委委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科技、文教卫生、新闻体育知名人士,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代表,离退休老干部,宗教人士,港澳台同胞、华侨华人代表。

各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和夫人,长期在华居留的外国专家,临时来华工作并做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和夫人等,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材料三 首都十万群众欢度国庆之夜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群众共度良宵

新华社北京十月一日电 首都各界群众十万人今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登上天安门城楼,与群众共渡良宵。

天安门广场今晚成了花的世界,人的海洋,在灯光的照耀下,天安门城楼显得格外壮丽辉煌,金水桥中的五十六组大型音乐喷泉与五光十色的彩灯交互辉映,广场四周的常青树上彩灯闪烁,宛若星辰降落人间,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伴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翩起舞,歌声、笑声回响在广场上空。

晚上七点三十分北京市市长李其炎宣布联欢晚会开始,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在威武的国旗护卫队和身着色彩鲜艳服装的五十六个民族的一百一十二名青年护卫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仪式结束后,广场上回荡起欢快的乐曲。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科技人员、学生、机关干部在八个联欢区

载歌载舞。金水桥前的中心表演区，演员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只见儿童狮舞情趣盎然，金水桥四周的吉庆气势壮观。与此同时，五彩礼花腾空而起。“山花烂漫”“锦天绣地”“芳草连天”等礼花，一个接一个在夜空中绽开，把夜晚的天安门装点得姹紫嫣红。

第二次礼花施放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走到城楼东西平台，同应邀出席晚会的老同志，已故老同志的夫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英模代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群众团体负责人，少数民族代表等亲切交谈，互致节日问候。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界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爱国华侨代表等五千人，分别到八个联欢区与首都群众一起联欢，在《三百六十五个祝福》《青春舞曲》的乐声中人们迈着充满活力的舞步，尽情抒发内心的喜悦。

今年国庆之夜，北京共有十六个礼炮施放点，天安门广场是中心。天安门广场的礼花今晚共施放三次，每次二十分钟。十时三十分，晚会在升腾的焰火中结束。

风云人物

韩素云

韩素云是山东梁山县韩垓乡马店村人，十年前与同年应征入武的倪效武订婚，为了使未婚夫安心服役，她担负起倪家老少的生活，并用自己的病痛之躯支撑着倪家。今年，她被授予“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

韩素云是山东梁山县韩垓乡马店村人。十年前，她与汶上县南旺镇石闸东村的倪效武订亲。同年底，倪效武应征入伍来到了广西边防前线。为了使未婚夫在部队安心服役，素云不顾世俗的偏见，毅然搬进了效武家。从这开始，她担负起了服侍八十多岁的奶奶、护理体弱多病的公婆、照看痴呆的小叔和一对正在上学的双胞胎姑妹以及耕种十亩责任田的重任。四年后，他们结了婚。

一九八七年冬，一个鹅毛大雪下个不停的日子，效武八十七岁的奶奶离世了。已有七个月身孕的素云硬是拦住公婆没让效武回来，自己冒着严寒，将奶奶送上了山。

五年过去了，在素云熬尽心血的支撑下，倪家的日子渐渐宽裕起来。然而，就在这时，由于长期积劳成疾，素云患上了人称“新癌症”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症！在疾病折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素云依旧不断向效武发出报平安的家信。

倪效武没有辜负韩素云的期望，自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入伍以来，先后十五次受到上级表彰和被评为标兵排长、优秀教练员、优秀共产党员。在近四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回家探亲，一心守边关。直到一九九二年八月倪效武邀请韩素云来队探亲，才知道妻子的病情……

心急如焚的倪效武先后带着妻子到济南、郑州、南宁等七家医院求医。为这，他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还负债二千多元，可素云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广州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教授、主攻股骨坏死的专家袁浩在《羊城晚报》看到韩素云事迹报道后，觉得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帮助韩素云。他给院长写了封信，医院领导立即作出决定：医好当代“军嫂”，为军民共建作贡献！

今年初，韩素在丈夫倪效武的陪同下，来到广州。

韩素云的股骨头左边坏三分之一，右边坏三分之一，病情十分严重。为保证手术成功，医院成立了由院领导挂帅的治疗小组。一月二十八日，年岁已高的袁教授亲自主刀为韩素云手术，取得圆满成功。手术是成功了，然而，要治愈韩素云的病，仍需要花费十万元左右人民币。于是，又一个感人肺腑的献爱心高潮再次展现：

中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刘震东第一个捐出一百元钱，他的妻子、“老军嫂”李雪容接着捐二百元，袁浩教授一下捐出三百元；广西军区派人专程将凝聚机关全体官兵深情厚意的一点六万元捐款从南宁送往广州；在广州，一位七十五岁的荔湾区退休干部，自己身患癌症，还让家人搀扶着来到医院，硬将一沓厚厚的钞票交给韩素云治病；一位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将奶奶给她的一百元压岁钱捐给了韩阿姨。

在医院的精心治疗和军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怀下，韩素云正在迅速康复。如今，她已能借助拐杖下地走动了。

材料一　韩素云被授予“爱国拥军模范”称号

本报讯 近日，山东济宁市委、市政府、济宁军分区召开韩素云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她“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

韩素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军人妻子。10年前，当未婚夫穿上军装踏上征途时，她打破世俗偏见，搬到未婚夫倪效武家，一人耕种着12亩责任田，挑起了这个老弱病残9口之家的重担。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她患上了股骨缺血性坏死，但仍然全力支持丈夫安心戍边。

张鸣岐

张鸣岐：原任中共锦州市委书记，于1994年7月14日凌晨在指挥抗洪抢险中不幸光荣牺牲。并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材料一　辽宁省委命名张鸣岐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据新华社沈阳8月15日电（记者于力）中共辽宁省委日前做出决定，命名张鸣岐同志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号召全省共产党员们、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向张鸣岐同志学习。

张鸣岐同志原任中共锦州市委书记，于7月14日凌晨在指挥抗洪抢险中不幸光荣牺牲。

决定中说，张鸣岐同志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攻起来的一代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他生前一贯忠于党和人民事业，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宏伟大业，直至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勇敢地牺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

材料二　张鸣岐杨晔张秀和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新华社沈阳8月15日电（记者于力）张鸣岐、杨晔、张秀和三同志近日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这是辽宁省人民政府对锦州市人民政府的请示所作的批复。

批复说："中共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锦州有线电视台记者杨晔、凌海市公安局干部张秀和，于1994年7月14日凌晨在凌海市大凌河镇以北尤山子村一带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同意授予张鸣岐同志、杨晔同志、张秀和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材料三　中共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在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　胡锦涛受江泽民、李鹏委托和朱镕基分别打电话表示悼念

7月16日早晨5点多钟，一个严酷的事实使锦州市广大干部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在7月14日抗洪抢险时失踪的中共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终于被证实以身殉职。同时失踪的凌海市委办公室干部张秀和仍下落不明。

7月13日，锦州发生洪灾，张鸣岐到最危险的区域和坝段检查。午夜12点多他们来到最紧急的凌海市大凌河镇，对这里的抗洪工作作了安排后，在返回的路上，水位迅速上涨，张鸣岐等同志弃车手挽手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行进。但刚走出200米，一排巨浪铺天盖地横卷而来，冲散了他们这支11人的队伍。至14日凌晨4时，8名遇险者获救。张鸣岐不幸遇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15日来到凌海市视察灾情，得知张鸣岐同志遇险的消息后，十分关切，并高度赞扬他：这种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给辽宁省领导同志打电话，对张鸣岐同志在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表示哀悼，对张鸣岐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

7月18日上午，锦州市数千名干部、群众冒着风雨到殡仪馆为在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的市委书记张鸣岐同志送行和表示深切的悼念。

张鸣岐同志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安静地躺在花丛中，两旁放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挽联。

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7月17日给中共锦州市委打电话，对张鸣岐同志不幸以身殉职表示深切悼念，并对张鸣岐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前来为张鸣岐同志送行的有辽宁省、锦州市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有张鸣岐曾经工作过的沈阳市直机关干部及亲属等。

在锦州仅仅工作7个多月的张鸣岐给锦州人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锦州人民不会忘记，张鸣岐同志倡导全市开展解放思想、富民强市的大讨论。他创造性地把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同锦州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推动全市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鞠躬尽瘁。

锦州人民不会忘记，半年多来，他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极力倡导务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为振兴锦州而努力工作的誓言。

人民的书记人民爱。上午8点多钟，通往殡仪馆的路边就有数千名群众伫立在雨中，要为他们的好书记送行。来自众多企业的工人在路边举着近百条白色横幅，深情的语句寄托着他们的思念。为张鸣岐同志送行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材料四　人民的好干部张鸣岐

《人民日报》记者　李丹　宋言荣　苗家生
辽宁日报记者　刘子阳

张鸣岐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他短暂的人生旅途只度过了49个春秋。

张鸣岐走了，走得那么急切，锦州市现代化建设的蓝图还亟待他去描绘。

7月14日，无情的洪水冲走了指挥抗洪抢险的张鸣岐。遇难前，他在倾盆大雨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保住锦州城，保住人民的生命财产。"锦州人民在承受洪水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却不得不忍受失去张书记的巨大悲痛。人们无法忘怀，在张鸣岐担任锦州市委书记短短的7个多月里，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高风亮节，还有他四处奔波的身影……

紧急关头　身先士卒

7月13日，锦州市境内普降暴雨，大、小凌河水势猛涨，流量之大为锦州历史所罕见，锦州市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正在沈阳开会的市委书记张鸣岐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晚8点赶回锦州。他下车后，立刻冒雨赶到市区小凌河大堤察看汛情。在桥南大堤险段，他一边巡视一边问："这一带是否有居民区？有的话，要赶快组织撤离。"他还部署抢险队伍必须马上到位，千方百计保住居民区，当张鸣岐听说大凌河下游的凌海市汛情最为严重时，他马上提出到凌河市检查大凌河大堤。

夜里11点40分左右，张鸣岐赶到了离锦州市25公里的凌海市。在防汛指挥部，听完汇报后，他马上带领凌海市委书记薛恒等11名同志赶到大凌河桥头附近的堤坝上实地察看水情。在堤坝上，他亲切地询问正在监视险情的解放军指战员："吃饭了没有？"当听战士们说吃过了，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人们这时哪里知道，由于胃病发作，张鸣岐从中午到半夜，只吃了一个小小的冷馒头。而他始终走在这一队人马的最前头。

他们赶到洪水倒灌的蔡家段和受灾较重的龙山子段时，雨更大了，洪水已一尺多深。有人劝张鸣岐不要再去了。张鸣岐动情地说："那里的老百姓不知怎样？咱们快点走。"待察看了几处险堤，得知这里的百姓尚安全时，张鸣岐才决定原路返回。

急于回到指挥部指挥全市人民抗洪的张鸣岐，他的车冲在最前边。出村约300米，路上的洪水已涨到一米深。三台车相继灭火。此时大约是14日凌晨1时左右。张鸣岐同前边两名车里的同志手挽手在齐腰深的洪水中继续前进。突然，一排浪横卷而来，11人全部被冲散，8人被救援人员救起。而张鸣岐和锦州有线电视台记者杨晔、凌海市委秘书张秀和，却永远地离开人世。

水呜咽，人呜咽。张鸣岐的牺牲，在锦州市人民心中引起巨大的震颤。锦州市人民还记得今年3月27日这一天。上午，锦州紫荆山等多处山地突然起火，烈火遇干草，火势借风势，山火猛烈燃烧起来。锦州市委机关电话铃声响成一片，一条条电波载着同一个信息："火！山火！上山救火！"

在通向火场的路上，张鸣岐坐在军用指挥车上。他的眼里露出了深深的焦虑。他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腰部的刀口还没拆线，随着山路的颠簸，伤口阵阵作痛。刚才，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同志死活劝他不要去火场，他没听。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边查火情，一边和市委、市政府及驻军的领导同志指挥灭火。医生一直追到火场，也没把他劝回去。

在老虎沟火场，肆虐的火龙距老虎沟屯只有百米，70户人家，300多口人告急。张鸣岐赶到这里，冲到最前端，向市消防支队支队长杨德荣发出命令：一定要保住村庄！杨支队长马上调集凌海市武警部队的官兵冲了上去。他们一字排开组成人墙，上百个灭火器喷向火舌，老虎沟屯安然无恙。

十几个小时的奋战，军用设施保住了！风景区和原始森林保住了！四个自然屯保住了！火灾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但人们谁都不知道，此时张鸣岐腰部的刀口绽开了。

心系群众　甘当公仆

7月18日，是锦州市人民送别好书记张鸣岐的日子，全市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张鸣岐廉洁奉公，一心为群众的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又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

锦州市色织布厂的干部、工人没有忘记，今年"五一"前后，张鸣岐来到这个亏损严重的企业搞调查研究。开始厂领导一班人很紧张，准备了一摞汇报材料。张鸣岐让大家丢开稿子，随便谈，谈困难、谈原因、谈办法、发牢骚，什么都行。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鼓励道："你们厂房那么破旧，设备那么简陋，工资那么低，却能生产出这么好的布匹，很了不起啊！"说得厂干部心里热呼呼的。他还出主意说："厂领导除两人留厂外，其余人都出去找市场，找市场是关键。"随后，他又分别找技术人员、在岗职工和待业职工座谈，倾听他们的呼声，他对该厂技术人员说："企业成败取决于有无适销对路的新技术、新产品，你们发挥特长，就能救活这个厂。"并几次询问该厂技术人员中能否推选出一名厂长来。当一位外来人员愿意承包这个厂时，张鸣岐

同志又单独和他谈话，仔细倾听他的想法，当确认他熟悉市场、又能自投200万元资金时，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市经委主任刘纯义、副主任吴戈清、高级经济师阎宝顺说：张鸣岐上任伊始，就一头扎进基层，通过调查、分析，提出一系列发展经济、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措施。如"锦州市职工再就业工程"、"离退休职工生活保障条例"等。在亏损企业调查期间，他主张对亏损企业以"造血"为主，从长计议，企业该破产的破产，该兼并的兼并，嫁接、合资、拍卖、转产、改造等多种形式一起上。他利用一切机会为锦州企业介绍内外商投资，并积极帮助企业把产品打出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张鸣岐廉正朴实，善解人意，平易近人。他来锦州工作时曾约法两章：一是不吃请，二是干好工作。在他深入企业调查期间，没吃过企业一顿饭，没喝过企业一滴酒，没抽过企业一根烟。当时他的家属尚未调来，他单身住部队营房，衣服脏了自己洗，鞋子坏了自己买。他散步时路过一段脏乱差路段，听到有人指桑骂槐，有的干部很反感，他却说："群众没有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后来这段路得到了治理。一位男工说：我工作了10多年，从未见过这么大干部来车间和我们聊天。"一位干部说："我们讲的每个想法，张书记都予以答复，从不假装听不见。"一位女工说："张书记来我厂那天，穿一双普通布鞋。一看就是个为百姓办事的人。"

深入实际　排忧解难

张鸣岐以身殉职的噩耗传到黑山县司屯乡水泉村，农民岳敏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个严酷的事实。

今年4月18日下午4点多钟，岳敏正在播种玉米，来黑山县调查研究的张鸣岐走到她家的地头，很随和地和她唠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起生产、生活和收入情况。

这时，一个身着白色西装、手拿小木棍的孩子凑上前来。张鸣岐问："这是你家的孩子吗？上几年级了？"一听此话，这个叫王力的孩子点了点头，又羞愧地低下了头。岳敏随即答道："家里人手少，到小学五年就不念了。""这可不行啊！没有文化怎么去科学种田？"张鸣岐焦急地说，"应该让孩子继续念书，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儿，将来是个文盲，当父母的有责任啊！我下次再来，可不能再是这个样子。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念好书。"市委书记几句肺腑之言，说得岳敏连连点头称是，她激动地对孩子说："这次市委书记让你上学，妈再也不能拖累你了，一定让你念好书。"这时司屯乡党委书记李坤赶来了，张鸣岐对他说："智力生产如果丢掉了，将来什么生产都上不去。如果我们培养出的孩子文化素质很低，那么，'科教兴农'、'两高一优'农业就是一句空话，农民奔小康也实现不了。"他又对随行的县领导说："要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今后，再先进的乡村，智力投入不够，有文盲，就不能评为先进。我们的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做好辍学生的复学工作，要让那些孩子们都回到学校去。"

临别时，张鸣岐亲切地拍着王力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一定要念好书，今天，我就交上了一个辍学又要复学的小朋友。以后你到锦州时打个电话给我，我就见你，但一定要带上你学习的好成绩。"

张鸣岐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我们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当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当沈阳市副市长，还是在锦州市市委书记岗位上，他都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的需要、群众的愿望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今年春节前夕，锦州市直属机关的4100多名干部，开展了送温暖活动，把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把机关干部的一片深情，送进困难职工家中。这个活动，是在张鸣岐提议和带动下进行的。从市委书记、市长到机关干部，纷纷为企业的困难职工捐款，帮助他们克服暂时困难。市直机关干部带着13万多元，走访慰问了1179户困难职工家庭，他们一方面向职工介绍全市改革开放的形势，鼓励职工克服企业遇到的暂时困难，一方面听取困难职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送温暖活动不仅使困难职工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也使机关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许多机关干部说，这次走访困难职工家庭非常有意义，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调查，职工及其家庭体谅国家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送温暖活动对于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加强廉政建设，增强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激励。

在张鸣岐遗体告别仪式上，许多机关干部回忆起和张鸣岐相处的短暂而又难以忘怀的那段日子，心情总是不能平静。一位机关干部说，张书记才来七个多月，锦州的工作就大有起色，如果他不走，再有年把，锦州就会有更大变化，可惜他匆匆走了，……说到这里，他已泣不成声。

千人垂泪，天悲地恸。这白云这大地将记住锦州人民对张鸣岐的深切怀念，将记住这里曾有一个人民的好儿子。

张鸣岐同志风范永存。

（7月29日《光明日报》）

姚　依　林

姚依林（1917—1994），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幸于1994年12月11日在京与世长辞。

材料一　姚依林同志生平

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姚依林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献身革命60年，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姚依林同志祖籍安徽省贵池县，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幼年丧父，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生活。他在上海读高中时，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了革命。1935年11月，姚依林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

姚依林同志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姚依林和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和直接指挥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随后，他们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中去，到民众中去，揭露日寇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6年5月，党组织调姚依林同志到天津工作，先在党的刊物《长城》担任编辑，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了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同志调任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1938年，他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1939年2月在新成立的冀热察区党委任宣传部长，为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1939年7月起，姚依林同志调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他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参与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起，姚依林同志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他遵循毛泽东同志"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为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尽心竭力，成绩卓著。

姚依林同志无论在白区对敌斗争，还是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中，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姚依林同志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姚依林同志作为主管国家财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对国家若干重大经济政策，参与了研究、制定和具体组织实施。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姚依林同志在建立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对确立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地位，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资本，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市场商品十分匮乏。姚依林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稳定市场，安排人民生活。他对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状况，进行认真的研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物价政策的设想，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肯定。他精心组织安排副食品的收购和合理分配，确保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居民最基本的副食品供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依林同志遭受严重迫害，他坚持原则，进行顽强斗争。1973年11月，姚依林同志任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他同外贸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开辟出口货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在随后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他顶着巨大压力，极其艰难地维持对外贸易工作。

1977年3月，姚依林同志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姚依林同志带领干部群众认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并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依林同志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全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9年3月，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同志任秘书长，他协助陈云、李先念同志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此后，他还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第七个五年计划，主持编制了第八个五年计划。在制定"六五"计划时，他强调计划要从国力可能出发，面向市场，面向人民生活，计划指标不要订得过高，要留有余地。在"七五"期间，他一再强调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主持制定了产业政策若干规定。他针对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强调要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他十分重视加强重点建设，关注农业发展，多次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他主持制定了计划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他一再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部门要从观念上、工作上转变职能，在加强宏观调控、搞好协调和服务上下功夫。他积极参与了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决策和实施工作。

姚依林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姚依林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党的十四大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姚依林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仍时刻关心党的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精神。

姚依林同志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博大胸怀，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限热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始终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公道正派，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干部成长，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姚依林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姚依林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姚依林同志永垂不朽！

材料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
姚依林同志在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12月11日12时22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姚依林同志是安徽贵池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学联党团书记，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建国后，先后担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

姚依林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姚依林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姚依林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姚依林同志永垂不朽！

徐洪刚

徐洪刚：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各地广泛地开展了“学英雄，见行动”的活动。而徐洪刚面对荣誉仍以普通战士的本色出现，令人赞叹不已。

材料 正义交响曲——徐洪刚英雄壮举的社会反响实录

伴随着和煦的春风，一个英雄的名字传遍天府之国、云贵高原、豫鲁大地、长城内外。徐洪刚见义勇为的英雄壮举，拨动了千万人的心弦，合奏出一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强音，引发出巨大的“轰动效应”。

义勇之举叩响渴望平安的心弦：徐洪刚，人民需要的英雄

吴道蓉冒着三九严寒，辗转数千公里，从四川筠连赶到英雄所在部队向徐洪刚致谢。山里妹子表露感情的方式纯朴而又虔诚——敬赠上一面“救命之恩血沃情深”的锦旗，弱小的身躯跪拜下去，泪流满面：“我们全家人永远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您那件血衣我们将一辈一辈传下去……”说着，她泣不成声地唱起根据徐洪刚事迹自编的山歌。

徐洪刚住院的一个多月里，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通过广播、电视为他这位不相识的英雄点歌，有年过八旬的老人，有三四岁的孩子，有城镇居民、企业职工、学校教师，还有偏远山乡的农民。歌为心声，一曲歌表达着一种寄托，一曲歌反映着一种渴望。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有《渴望》的主题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无线电波中：“……好人一生平安……”伴随这歌声、这期盼，我们向读者披露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去年夏季的一天，一姓王的小学女教师的丈夫在街上行走时，两名歹徒无故寻衅滋事，打得他遍体鳞伤。她和11岁的孩子张大伟跪地求饶，也无济于事。事后，她大病一场，心灵的创伤一直没能抚平。徐洪刚见义勇为的事迹报道后，一下子拨动了她渴望平安的心弦。她和丈夫一起翻山越岭40多公里，到医院看望徐洪刚后，又跑到县电视台、电台点了这首最能表达心愿的歌曲，献给她所崇敬的英雄战士。她还连夜把徐洪刚的事迹编成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要他们长大做徐洪刚那样的人。

通往县人民医院的路上，素不相识的探望者络绎不绝。为让探望者都能如愿以偿，医院特设了“徐洪刚接待室”。50多岁的哑巴姐妹李云芝、李云芬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心声，站在徐洪刚床前连连鞠躬；73岁的五保老人汪向珍，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来糖果点心，3次看望徐洪刚，并亲手喂他吃两口，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徐洪刚的病房里，人们送去的锦旗挂满了墙壁，鲜红夺目；鲜花摆满床头，相映生辉；慰问信和水果、罐头等慰问品，放了一层又一层。徐洪刚住院一个月，前往医院看望者达5600多人，捐款1.3万元，慰问品价值8400元。为满足社会各界的要求，筠连县开通了专用热线电话，全天24小时向社会通告徐洪刚伤情治疗情况。以后这条热线电话又一直延伸到徐洪刚的家乡彝良县。彝良人民通过这条热线，送去对英雄的问候与祝愿。

徐洪刚的名字传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轰动。伤愈后的徐洪刚乘着成都开往北京的164次列车归队，车到三门峡站，当列车长得知徐洪刚就在列车上时，立即集中全体乘务人员，让大家亲眼一睹英雄的风采，接着在餐车召开学习徐洪刚座谈会，还通过列车播音室向乘客介绍徐洪刚的英雄事迹。整个列车顿时沸腾了，乘客们争相围着徐洪刚，请他签字留念，列车长动情地向记者说：“我们常年颠簸在铁道线上，最恨的就是车匪路霸。徐洪刚的事迹对我们教育最深的一点就是要用他那种精神和行动，为旅客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旅途环境。”本来列车在渑池县车站只停3分钟，由于闻讯前来看望英雄的人一下聚集起4000多人，站长、车长一齐向上级报告，上级特批列车在该站停车15分钟，并说：“这个例我们破得有意义！”

徐洪刚去年9月29日回部队，驻地10家工厂、3所学校及城镇居民两万多群众自发夹道3公里，欢迎英雄，比预计出来迎接的人数超出10多倍。

正气之歌引发年轻一代的思考：徐洪刚，当代青年的代表

社会各阶层的反响中，青少年们的反响尤为热烈，出现了久违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宜宾地区的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徐洪刚热”。在筠连县、在彝良县，近千个义务帮工队走进军烈属、五保户、敬老院的家家院院。通往徐洪刚家的山道上，乡中学的学生们一篓一篓给他家背去4000公斤煤炭。由青年自发组成的社会治安小分队，巡逻在山间小道、田间地头，保护着人民群众的丰收果实。在徐洪刚住院期间，通过热线电话慰问徐洪刚、询问徐洪刚伤情、为徐洪刚点歌的人，青少年占60%以上。筠连县7所中学、100多所小学，普遍开展了“学英雄、见行动”的活动。中小学生普遍写了以学习徐洪刚为题材的作文。在景阳中学举行的“青春演讲会上”，登台演讲的20多名学生，都把徐洪刚作为心中崇拜的偶像，5个多月来，筠连县电视台、县报就收到向徐洪刚学习的稿件近千篇。一位叫晓萍

的同学给徐洪刚写信说："我是'追星族'的一员，过去我最崇拜'四大天王'，一次老师问我们王杰是谁，有个同学说是香港歌星。老师痛心地说我们是'摇滚的一代'，是'脱轨的小太阳'。看到徐洪刚的事迹，我才感到，我们应该崇拜徐洪刚这样的英雄，这样的'正义之星'。"

大学生们更是崇尚徐洪刚这样的"星"。新年伊始，山东工业大学、山东中医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相继发出向"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学习的通知，号召大学生们以英雄为楷模，为祖国多奉献。一个学英雄、爱英雄、争当"四有"新人的口号在齐鲁大学生中叫响。

山东工业大学动力系大学生王艳说：对英雄我很敬佩，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心目中喜爱的英雄形象，徐洪刚才真正是我们崇尚的"星"。大学生们认为，徐洪刚是一本很好的人生"教科书"。山东工业大学准备把徐洪刚事迹纳入思想品德教育内容。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组织大学生们围绕徐洪刚讨论人生价值观，号召党团员带好头，把学徐洪刚同学雷锋、做好事结合起来，把温暖送到病房，送到患者身边，实践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山东中医学院领导针对大学生们热爱英雄、崇尚英雄的心理，把徐洪刚的事迹材料复印千余份下发到每个学生手中，使大学生们对徐洪刚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校团委还围绕徐洪刚的事迹编排了节目。大学生们业余时间自发地组织医疗队走向车站为旅客服务，还组织了"送温暖小组"到病残的老教授、老员工家中排忧解难。谈到学习徐洪刚的事迹，院党委副书记王振谋动情地说："我们经常对大学生进行道德修养和医德医风教育，徐洪刚就是一份活教材。他不仅属于军营，更属于全社会。"副院长丁兆明说："眼下社会上拜金主义比较严重，学院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良风气，徐洪刚本身就是一剂'良药'，新一代大学生要好好向徐洪刚学习，以实际行动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中医系90级大学生张永梅说："以往对军人不太了解，从徐洪刚身上我看到了军人的价值。徐洪刚的事迹对我是个极大的震动，比比徐洪刚，作为同龄人我感到惭愧。不少大学生追这星那星，要我说，应该追徐洪刚这样的'英雄星'，做一名合格大学生。"

郑州火车站是全国客流量较大的交通枢纽，春节期间，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中专学生，他们挂起了"学习徐洪刚迎春月"的横幅。在"学习徐洪刚迎春月"活动月里，全省各城镇的商业区、火车站、客车站等公共场所开展以服务春运为主、辅之优化环境、春节慰问、义务植树、社会治安、移风易俗等方面的社会公益活动。目前，已有几十支"为见义勇为者服务志愿队"、"献爱心青年志愿队"、"学英雄、比奉献小组"活跃在河南各地，一个学英雄热潮正在中原大地兴起。

徐洪刚见义勇为的事迹，还成为社会青年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在泉城济南，出租车司机、营业员、个体户中的年轻人，都深为徐洪刚的壮举所打动，并对照英雄找差距，决心为净化社会风气出力。卖羊肉串的青年高新春说："我请人把我的问候带给他，告诉他我们这样的人都敬重他，都惦记他，祝他健康，我们当中也要出这样的英雄，也会出这样的英雄。"芳菲酒店个体老板李健说："我们学习徐洪刚的行动，就是从本行业做起，讲职业道德，为净化社会风气出力，让坏人坏事不能在我们这里藏身落脚。"

徐洪刚的事迹，带给青年们的，不只是激情与轰动，更有感召与思考。《山东青年》、《青年导报》等青年报刊，根据广大青年读者的要求，及时调整刊期内容，开展热烈的讨论。

"轰动效应"激起地方领导"两手抓"的高度热情：
徐洪刚，精神文明的火炬

当电报把徐洪刚勇斗歹徒的消息从千里之外传到所在的部队时，几行简洁的文字一下把团领导的心揪了起来：他既不是筠连人，又无筠连亲戚，所在部队远在千里外，几不沾边，谁来管他？

徐洪刚的指导员杨德海风尘仆仆下火车、转汽车，当脚一踏上筠连县的土地，映入眼帘的是满街的横幅标语，落款单位有县委、县政府，有各局委、社会团体。一位自愿给他带路的小青年说：徐洪刚的英雄形象，我们天天都能从电视、电台上看到、听到，吴副县长"向英雄徐洪刚学习"的电视讲话一天放两遍。

如果说人民爱英雄是以朴素感情呼唤正义，那么当地党和政府则把救英雄、学英雄作为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必要行动。筠连县委县政府在徐洪刚负伤后的短短三天内，协调会就开了五次，认真布置抢救、宣传、案件侦破等项工作。宜宾地区行署副专员魏在禄在筠连县检查工作，县领导汇报：上午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公共汽车上为保护妇女同歹徒搏斗英勇负伤，他立即上街买来毛巾被和营养品，代表地委和行署到病床前慰问，并和县委、医院领导一起研究抢救治疗方案，指示有关徐洪刚的事要一路绿灯，一切费用由行署承担。宜宾地委书记高万权亲自组织宣传、公安、民政、卫生、军分区政治部等部门领导开会，让他们针对自己的任务立军令状，一再强调：徐洪刚是人民的英雄、时代的英雄，我们要满腔热情广为宣传，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进一步在人们心中扎根，从而转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为官一任要保一方平安的责任感，使各地党政机关在宣传徐洪刚中表现出极大的自觉

性。徐洪刚的英雄事迹传回家乡云南省彝良县，正逢县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陈官潮当即决定改变议程，在会上宣讲徐洪刚的英雄事迹，布置领导机关和教育系统在自查自纠中"对照英雄找差距"。徐洪刚所在团驻地河家省渑池县，县领导把徐洪刚看成是"俺们的兵"，为了展示英雄第二故乡人民的情怀和尽快获取第一手的教育材料，指定县委赵光超副书记凌晨冒雨启程，驱车千里赶赴四川。三门峡市委书记王如珍向徐洪刚所在团领导要求：英雄归队的第一场报告要放在县里，理由两条，一是人民群众想早点见到他，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需要借助他再掀高潮。

人民想什么，党和政府就尽力干好什么。徐洪刚成为四省、三地市、三县同托的一颗星，他们分别召开命名表彰大会，授予他"见义勇为标兵"、"筠连县荣誉公民"、"彝良人民的好儿子"、"青年楷模"、"爱民模范"等荣誉称号，一个学英雄、见行动、树新风的热潮，在各地蓬勃开展。徐洪刚所在的济南军区驻地山东省，为他举行了事迹报告会，省委领导召集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如何深入开展向徐洪刚学习的活动。省委韩喜凯副书记看了徐洪刚的事迹后，夜不能寐，挥笔批示：徐洪刚为老红军部队争了光，为党争了光，要让徐洪刚的形象在齐鲁大地大放光彩。徐洪刚所在的"铁军"驻地河南省，从渑池县、三门峡市、新乡市到省里，分别召开英雄事迹报告会和命名大会，运用内部文件和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河南省电力系统赶排了一台以歌颂徐洪刚、弘扬红军传统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到各地巡回演出。

徐洪刚的壮举为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山东省妇联副主任刘培英组织妇联机关的同志以"徐洪刚救护妇女，妇女怎么办?"为题开展讨论，随后，全省各级妇联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广大妇女学习徐洪刚见义勇为的精神，自立自强，勇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二是发动姐妹们为伤残军人献爱心找对象。在她们的努力下，仅春节前后，就有30多名伤残军人喜结良缘。四川宜宾地区教委把徐洪刚事迹编成教材，作为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地区公安部门组织4000多名民兵整治社会治安，净化社会空气。渑池县县长张安深有感触地说，各级党委和政府只有当好见义勇为者的靠山，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让该香的香，该臭的臭，社会上才能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徐洪刚，人民群众才能切身感到为净化社会空气做贡献大有可为。

（摘自2月23日《解放军报》梁万魁等/文）

杨得志

杨得志同志1911年1月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因家贫到安源煤矿、粤汉铁路、郴州地区等地做工。1928年1月投身革命，参加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4月参加井冈山会师，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军第十一师班长、排长、连长，第九十三团团长，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率领下，参加了井冈山反"进剿"和反"会剿"斗争；随部转战赣南闽西后，又参加了龙岩、水南、文家寺等战斗和进攻长沙战役，为赣南闽西苏区乃至中央苏区的创建作出了贡献。1930年冬以后，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中，他参加了龙冈、富田、良村、黄陂、漳州、三甲嶂、广昌、温坊等战役战斗，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颁发的红星奖章。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带领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机关，开辟了前进道路；突破乌江，为红一方面军迅速夺取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他率部参加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组织指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通路。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重大战役，为巩固、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得志同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在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中，他指挥本团与兄弟部队并肩浴血奋战，歼敌一千余人，给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胜利的信心。1938年2月，他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3月，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号，后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在残酷、紧张、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壮大抗日武装，组织军民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领导广大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和"蚕食"，将豫北、冀南、鲁西南地区连成一片，为发展、壮大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同志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党委书记。1945年9月、10月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平汉（邯郸）战役。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率部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1947年10月，指挥了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第三军等部一万七千余人，活捉了军长罗历戎等将校军官十余人，这是解

旅程。

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1月，在朱德、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指挥部队攻克石家庄，被朱德同志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1948年率部转战察南、绥东、热西、冀东，牵制华北敌军，配合了东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同年11月率部参加著名的平津战役，攻克新保安，歼灭华北敌人精锐主力第35军，围困北平，为平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他挥师参加攻克太原，夺取兰州，进军宁夏。为华北、西北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杨得志同志舍生忘死，南征北战，战功卓著，表现了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得志同志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尔后，参加指挥了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1954年回国，入军事学院学习，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杨得志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六十年代，他组织领导济南军区部队进行大练兵，1964年率优秀军事训练尖子到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他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深入基层，奔波于边防、海防前哨，国防施工现场，带头并组织济南军区的将军下连当兵。他严格管理部队，重视作风养成，扎扎实实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军事技术、科研装备等全面建设。在保卫边疆的作战中，杨得志同志亲临第一线勘察地形，指挥部队执行作战任务，取得重大胜利，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再立殊勋。在1980年后任总参谋长的8年期间，他致力于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与制定了我军军事战略方针和军队发展战略；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组织领导了华北军事大演习；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注重质量建设，组织指导部队顺利进行了百万裁军。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部队建设，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有力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建国后，他还曾率领我军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泰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土耳其、美国、英国、法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许多国家，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国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得志同志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党的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是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得志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退居二线后，他仍一如既往，积极拥护、支持改革开放，热心参加中顾委的工作，经常深入农村、厂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经济发展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生活，向地方党政领导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他对部队现代化建设十分关注，经常深入部队视察，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

杨得志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组织观念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嫉恶如仇。十年动乱中，他虽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排斥，但仍坚持斗争，尽全力保护人民群众，保护老干部，为党和国家挽回损失。杨得志同志横戈马上数十年，善于学习、运用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虚心学习和钻研现代军事科学，组织指挥过许多重要战斗、战役和大兵团行动，他有丰富的作战和和平时期建军经验，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战略运筹艺术，战功显赫，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著名战将和优秀军事家。

杨得志同志襟怀坦白，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豁达大度。他民主作风好，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密切联系群众，热心关心他人，待人忠厚诚恳，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格要求子女，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做正直刚强的接班人。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深入实际，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对工作极端负责。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创新局

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病重期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杨得志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懈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杨得志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那坚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革命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杨得志同志永垂不朽！

刘海粟

刘海粟(1896－1994)：我国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和艺术大师不幸于1994年8月7日在上海逝世。

饮誉海内外的我国杰出美术教育家和艺术大师刘海粟，1994年8月7日在上海走完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

刘海粟先生1896年3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他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他与同学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改名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式美术学院。他学贯中西，艺通古今，中国画、油画、诗词、书法、美术史论等等，无一不成就卓著。

他将自己的一生融于祖国的美术事业中。90岁时，他还十上黄山，并且登娄山关天险，访遵义会议故址……纵笔挥写，抒发情怀。这几年，他客居香港，遍游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地，或讲学、或授艺、或举办画展，将中国艺术广泛介绍给世界各国。美国、意大利、香港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曾授予他各种荣誉、勋章和称号。

今年2月28日，海粟老人回到上海。5月，老人因身体不适住进华东医院。8月6日下午，病情突然恶化，终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于8月7日凌晨逝世。

8月18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吊唁大厅，显得十分拥挤。如潮的人流，一早涌向这里，为艺术大师刘海粟送行。

海粟老人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是与中国美术事业连在一起的。

而今，他静卧于一片常青的棕竹丛中，四周撒满了鲜花。

“昔日鹏翼扶摇，刘郎年少，丹青染出新天地；而今斗柄折损，海翁已去，江山顿失老画魂。”百岁画家朱屺瞻书写的挽联，表达了人们的哀思。

爱新觉罗·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爱新觉罗·溥杰先生遗体3月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溥杰先生是因病于1994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爱新觉罗·溥杰先生，1907年4月16日出生在北京，满族，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胞弟。幼年在醇王府作溥仪伴读。1929年后，被送往日本东京学习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5年回东北后，在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任军职。1937年与日本国王亲侯爵嵯峨实胜之女嵯峨浩结婚。1945年日军投降后，与溥仪一道被苏联红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我国政府关押，接受改造，1960年11月获特赦释放。溥杰先生获释后，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60年代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得与离别多年，远在日本的妻子女儿在国内团聚。1962年5月起，溥杰先生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后，他当选为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溥杰先生从一个封建皇弟转变为新中国公民进而成为人民政权最高立法机关的成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改造阶级的伟大气魄，也表明溥杰先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品德。

溥杰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作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对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溥杰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曾多次出访日本，热情接待来访的日本各界朋友，积极介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促进中日友好倾注了大量心血。1991年，日本立命馆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溥杰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诗词自出胸臆，感情真挚，意境优美，传世有《溥杰诗词选》。

按照溥杰先生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将撒在中国大地。

为了感谢党和国家对溥杰先生的长期关怀，溥杰之女委托全国政协将自己继承的部分遗产捐献给国家。

珍闻轶事

千岛湖事件

1994年4月1日清晨8时05分，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千岛湖内有一艘失火游船！县委、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立即调集消防中队、医务人员赶赴现场灭火救援。同时展开的调查核实表明：这艘名为"海瑞"号的游船载有台胞旅游团，3月31日离开安徽深渡到千岛湖，预定当晚在淳安县茶园镇毛竹源码头上岸。船上的24名台胞游客、2名导游、6名船员全部遇难。

这一事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对事件处理做了重要指示，要求认真处理好善后工作，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国务院台办、公安部、交通部等部门立即派员赶到现场。浙江省、杭州市迅速成立事故现场处理小组。迅速展开善后处理和案发原因的调查。

4日，遇难台胞家属50余人赶到淳安县，与浙江省、杭州市的民政、旅游等部门共商善后事宜。刘锡荣副省长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刘刚琦等前往台胞住宿处吊唁罹难者，慰问罹难者亲属。浙江方面请来灵隐寺主持继云法师为遇难者做了法事。6日下午，在台胞家属护送下，遇难台胞遗体运抵桐庐县殡仪馆火化。骨灰由家属携回台湾。

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岛内一些官员和政治人物，自4月2日开始纷纷发表措词强烈的指责，将此事说成政治事件。4月12日，台湾"陆委会"宣布"即日起暂时停止两岸文教交流活动"、"自5月1日起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岛内台独分子借机煽动"台湾独立"。

经过细致的调查，公安机关确定这一事件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特大图财害命案，并正式立案侦察。4月20日，案犯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被依法逮捕。6月3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千岛湖抢劫、故意杀人案提起公诉。6月1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千岛湖抢劫、故意杀人案。在280多个座位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受害者家属和当地群众。

在此期间，海协三次发函邀海基会人员及专家来杭听取办案专家介绍详细案情。5月8日，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带6位鉴识刑侦专家和法医、律师以及7位遇难者家属来杭，听取详细案情介绍，并赴出事现场。

在法庭审理中，三被告分别供述了犯罪准备、作案过程、分赃过程，在人证、物证面前，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阴谋始于1993年9、10月间。无证从事摩托艇营运的22岁的吴黎宏与自动离职职工胡志瀚为还债和挥霍，开始密谋抢劫他人钱财，此后又纠集了无证从事个体摩托艇营运的余爱军。他们多次策划抢劫的时间、地点、对象、手段及抢劫后沉船杀人灭迹的方案，并准备了猎枪、子弹、炸药、斧头、匕首等凶器和其它作案工具。1994年3月31日16时许，三人携带作案工具，从千岛湖镇西园码头乘摩托艇到中猴岛附近水域窥测目标，17时30分许，遇"海瑞"号游船经过，三人驾船尾随。到阿慈岛附近水域，余爱军和胡志瀚蒙面登上游船，余爱军手持猎枪冲到驾驶室，朝天开枪恐吓船员，将船员赶至底舱。胡志瀚冲入中舱，一斧头剁在桌上，威胁游客："把钱拿出来，不伤害你们生命！"吴黎宏拴好摩托艇后，端着猎枪冲上游船并鸣枪示威。在他们的威逼欺骗下，6名船员、2名导游先后到底舱，游客交出钱物后也先后被诱骗到底舱。通往底舱的铁梯被扔进湖中，底舱门被铁丝拧死。案犯将游船开到黄泥岭水域深水区，把钱物移到摩托艇后，按预定方案沉船，打开游船上的消防栓，欲向底舱灌水没有得逞。于是，吴黎宏向底舱扔了一包炸药，但未爆炸。面对求生的游客，三歹徒凶相毕露，向底舱连开数枪，又扔下两包炸药。爆炸声起，油柜边起火，吴黎宏从摩托艇上取来一桶汽油，倒向底舱，刹那间大火从底舱喷出，四散漫延，吴黎宏、余爱军的头发被烧。他们扔掉已燃烧的汽油桶，驾艇逃离现场。途中将斧头、匕首及作案时穿的衣服扔进湖中。当夜三犯逃到胡志瀚暂住处分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终难逃法网。6月12日上午8时30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以抢劫罪分别判处三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三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罪并罚，决定分别对三犯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千岛湖事件是两岸交流以来最大的涉台刑事案件，在这一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看到，在海峡两岸之间，由于长期隔阂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看待一些问题的观念和处理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由此引起的误解也会存在。正因如此，更应该通过进一步扩大交流，加强沟通来更快地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处理两岸的具体事务时，务必从两岸关系的大局出发，本着维护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防止有人存心借题发挥，破坏两岸关系。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7224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

全国最大的招生受贿案

1994年5月9日，原四川泸州市大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仁富因招生受贿被依法执行枪决。

1984年1月，石仁富任泸州市大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后，开始利用工作之便向考生或家长索要收受高档烟、酒、皮鞋、金戒指等物品。1988年招生办公室新增加大中专委培工作。石仁富把这一神圣职责当作中饱私囊的手段，不顾上级三令五申，违反规定，把考生录取通知书分科别类排好队带回家，然后逐个通知考生家长到他家中去取，借机索要和收受钱物。

1990年至1993年，石仁富利用其主管招生工作之便，在为考生提供信息、联系学校、解决委培名额等过程中，借口跑路要差旅费、找人帮忙要招待费、活动费和向考生家长"借钱"购买房子等为名，先后向400多名考生家长索要和收受现金达4万余元，此外，石仁富还有33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对石仁富的违法违纪行为，上级主管部门曾多次提出严肃批评，但他贪得无厌，不思悔改，终于酿成一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招生受贿案。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经审理认为，石仁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以严惩。根据《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以受贿罪判处石仁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石仁富有期徒刑4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石仁富受贿所得41万元和不能说明来源的33万共74万元予以没收。石仁富个人所有的8.8万余元予以没收。宣判后，石仁富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29日二审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泸州对石仁富执行枪决。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7220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

中国银行首次发行港币

中国银行是中国一家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其前身是清朝政府时的大清银行，1912年改名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在国内的机构网点有8894个，并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各类机构。截至1993年末，中国银行的资本额已达300亿元，资产总额达17312.69亿元，实现利润98.39亿元。目前，中国银行已同世界上172个国家和地区的1517家银行的总行及其2411家分支机构建立了业务代理关系，与世界上数百家大银行保持着经常性的资金往来。在世界各大银行中，按资本额计算，中国银行排名第十一位。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以其雄厚的实力和稳健的经营，在广大的银行同业和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形象。香港中银集团是中国银行最大的海外银行集团，也是香港第二大银行集团，现有分支机构350多家，遍及港岛、九龙和新界，已成为加强香港和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1993年港府批准了中国银行参与发钞的申请，并通过了有关法律文件，从而使中国银行成为除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之外的第三家发钞银行。

1994年5月2日，中国银行发行港币庆祝典礼和剪彩仪式在香港中银大厦隆重举行。中国银行发行的港币本日起在香港正式流通。

中国银行计划1994年发行30亿港币，相当于香港港币现钞流通量的4%。中国银行发行的港币共有5种面值，即以橙黄色为主的1000元、以棕色为主的500元、以红色为主的100元、以紫色为主的50元和以蓝色为主的20元。其主色调和规格基本与汇丰和渣打银行现在流通的钞票一致。这5种面值钞票正面采用的花卉和背面的主题图案及其寓意是：

1000元：紫荆花是香港的市花，也是香港的象征；从太平山顶眺望维多利亚港全景，表现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的多姿多彩。

500元：牡丹花在新春争艳，寓意富贵；葵涌货柜码头的一角及九龙远景，体现香港的贸易发展和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自由港的地位。

100元：荷花在仲夏前盛开，寓意廉洁、高尚；文化中心及尖东全景，展示香港文化、艺术与旅游的发展。

50元：菊花在金秋逸姿，寓意健康与幸福；香港海底隧道繁忙景象及九龙远景，展现香港国际贸易地位和商业繁华。

中国银行参与港币发行，显示了对香港社会的责任承担，它不仅有利于香港币值和货币制度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香港国际中心地位的巩固，而且更利于香港货币体系的延续和平稳过度。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7214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

唐树备台湾行

1993年4月"汪辜会谈"签署的《两岸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规定，海协和海基会两会的副会长和副董事长每隔半年应分别在大陆和台湾举行一次例会。因台湾方面

将此与两会三项事务性商谈挂钩，导致1993年底对唐树备赴台先邀后拒。1994年2月，焦仁和到北京与唐树备举行两会负责人商谈，双方本已达成对解决一些问题的共识，但焦仁和返台后，台方又推翻了部分共识，致使1994年3月间举行的两会第四次事务性商谈又一次未能取得成果。"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借题发挥，采取限制台胞到大陆旅行，暂停两岸文教和经贸交流活动，单方面停止两会事务性商谈等错误做法。同时，台湾高层领导人又大搞所谓"务实外交"，接连发表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谈话，使两岸关系一度出现倒退。6月份以后，岛内要求台湾当局检讨、调整大陆政策的呼声增加，不少民众反对台湾当局借偶发事件阻挠两岸交流。辜振甫、焦仁和等人士提出，两岸交流不宜中断，应增加高层的接触沟通。在此背景下，1994年8月3日海协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应邀首次赴台同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举行会谈。

会谈的主要内容是三项事务性议题，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之遣返及相关问题"、"两岸劫机犯等遣返事宜"以及"协商两岸海上渔事纠纷之处理"。从8月4日到7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93年一年多的五次事务性会谈中一直未能解决的分歧，在这次会谈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全部取得共识，并决定尽快签署协议。双方发表了《台北会谈共同新闻稿》。

唐树备赴台前后一再表示，此次同海基会焦仁和先生会谈，"完全是为解决两岸同胞所共同关注的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根本不涉及政治问题"。唐树备抵台首日就在记者会上提出"沟通万岁"。然而台湾有关方面却在部署接待唐树备访问时，提出要"借机反制中共的统战"，并对台湾媒体提出不做专访、不做现场转播、不大幅报道的"三不"要求。民进党一些人还对会谈进行了骚扰。但唐树备台湾之行得到了绝大多数岛内民众和岛内外舆论的关切和支持。

唐树备此行还拜会了海基会名誉董事长孙运璇先生和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转达了海协会长汪道涵对辜先生早日访问大陆、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期待。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7210—7211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

中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1994年10月2日至16日，鏖战15天的第12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落下帷幕。

亚运会期间，广岛赛场先后137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89次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闭幕式上，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将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法赫德杯奖给本届亚运会表现最突出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

15个日日夜夜，中国体育代表团健儿们团结奋斗，在亚运会赛场内外竞技水平高，精神风貌好，将"团结、友谊、进步"的亚运宗旨付诸行动，比赛场上创造优异成绩。成绩、精神文明双丰收。华夏健儿再一次证明，他们在亚细亚体坛保持着盟主地位。

在体操、跳水和女子游泳、女子中长跑等项目中，我国选手继续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在男子足球等项目上取得了多年来人们企盼的重要突破。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弘扬夺金牌精神》，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广岛亚运会创造优异成绩。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明下一个目标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希望体育健儿以"更上一层楼"的高标准严格自律，以"更快、更高、更强"不断激励自己，在奥运会和世界赛场上，壮中华国魂，扬亚洲雄风。

评论员文章指出：国家繁荣，体育兴盛。发展体育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体育健儿取得的丰硕成果振奋人心。我们要弘扬夺金牌精神，把我国体育健儿的精神财富，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用以鼓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奋战的全国人民不断进取、再创佳绩。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7223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

流行风

背景介绍

1994年中国电影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题材，但在电视方面却出了几部好剧。首先是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播出，引发了人们不同凡响的评论。该剧以"武则天"这一特殊女性的情感历程为主导，演绎了一代女皇成长的坎坷经历，尤其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更是栩栩如生。然而人们对"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在流行音乐方面，港台流行歌曲虽说还有一定的吸

引力，但终究没有持久的魅力，而一首《涛声依旧》却让大陆人哼哼数月。老狼的一首《同桌的你》也吸引了众多的歌迷。

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

贞观15年秋夜，武媚娘第一次受唐太宗"宠幸"。十几岁天真烂漫的女孩一夜之间变成了女人，从此饱尝了宫廷生活的无情和残酷，几次死里逃生。太宗死后武媚娘被赶入感业寺，落发为尼，受尽凌辱。后因怀孕被高宗接进宫中，再次由侍女成为才人、昭仪；她亲手扼杀了女儿嫁祸王皇后，击败宰相长孙无忌，终于成为皇后。一系列宫廷斗争险象环生，她与高宗相互依存又恨爱交加。武媚娘以她卓越的政治才能逐渐掌握实权，直到垂帘听政。但因她身为女人却受到朝臣们和自己的丈夫、儿子的激烈指责和攻击。高宗死后她不得不孤军奋战，废黜太子，任用酷吏血腥镇压，把大唐天下变成了武周帝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虽然已君临天下，但渐入老境，无法排遣极端的孤独和空虚。整日纵情声色，同时又为了皇位继承人处心积虑，最后不得不把武周天下拱手让给儿子，重又恢复了李家王朝，完成了她艰辛、离奇痛苦又辉煌的一生。

此剧以"武则天"这一特殊女性的情感历程为主导，刻画了一群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着重表现他们的情感纠葛，生与死、爱与恨，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电视剧《年轮》

45集电视连续剧《年轮》着力塑造了几位共和国同龄人的形象，展示了他们的曲折经历和他们对国家民族、朋友亲人那种真挚的感情。在他们的身上浓缩了共和国的历史，积淀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该剧播出后，观众反映强烈。观众被剧中所描写的亲、友情、爱情、美好的民族传统道德、高尚的人生观念和真挚的人际关系所深深感动。是的，美好的情愫是人们追求和响往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团结，才会使人的力量和智慧显得强大。

关于《年轮》的创作断想

梁晓声

说真心话——我总希望情形是那样的——当自己的作品（无论小说亦或电视剧）面世之时，自己能够与传媒保持一定的距离，隐在自己作品的背后，默默地、虚心地倾听各方面的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倾听那些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原因，从中总结成功的或者失败的原因，认真品味成功的欣慰和失败的教训——那是多么明智又是多么好的一种感觉呢？

然而传媒总是要锲而不舍地捕捉住某些一时引起"轰动"效应的现象和一时成为"热点"的话题，迫使作者就范于它的"关照"之下。它的热忱往往是比大众的热忱还高的。于是我也没法例外。于是创作了一部《年轮》的梁晓声，便就《年轮》而似乎喋喋不休起来。一忽儿来一篇"絮语"，一忽儿一篇"补白"，一忽儿一篇"断想"了……

首先我想说，《年轮》被较广大的电视观众所喜欢，是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事。真的，我从来也没有因自己的作品被大众所喜欢而如此欣慰如此高兴。也许只有我第一次获全国小说奖那份儿欣慰和高兴可与此次相比。因为近年来，亲情、友情、爱情，美好的民族传统道德和高尚的人生观念，真挚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似乎在大面积地坏死，人们对此无奈而又精神迷惘，在惆怅中不觉地麻木了心智，这现象使我深感震惊。所以我想，电视连续剧是最能够直接影响广大民众心灵的"大文化"形式之一种，那么就让我运用这一种朴素的形式，做我理应做的一点点事吧。《年轮》是我亲自动笔写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正是我以上的想法促使我写它。1982年我第一次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是 因个人的创作水平得到了社会公认而欣慰。这一次完全不是，这一次乃是因为我通过《年轮》所企图呼唤的原本属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美好情愫，被公众最大限度地认同了。这使我认识到，广大的公众其实是很舍不得完全从自己内心里丢弃掉某些美好的情愫的。他们是很明白很清楚那些美好情愫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也使我感到，作为小说家，编剧，如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向生活中注入美好，被公众接受了，多多少少地影响了他们，同时对自己的心灵也进行了一次洗涤，那么，他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和心血，便是很值得的了。

其次我想说，《年轮》这部电视剧，其实不是我的。曾属于我的只不过是剧本，是一些写满了字的稿纸罢了。是北京电视台的领导们的坚定的决策，是剧组全体参与人员的努力，才使一些写满了字的稿纸变为一部电视剧。才使个体的平面的创作，变成了集体的立体的电视剧。我所感到的欣慰，更是为在拍摄制作过程中付出了心血的全

体剧组成员们感到的。

《年轮》受到的喜欢，说明了这样一点——我们的广大电视观众，是那么的好，那么的可爱，只要他们从剧中体会到了某种真诚，某种美好，他们就乐于拥抱住那一种真诚那一种美好，对一部剧所存在的艺术性、思想性方面的缺憾，持很大的宽容态度了。这是一种厚爱。如果把这种厚爱变成为沾沾自喜的资本的话，是很可笑的。只能以今后更真诚更认真的创作，来回报公众的厚爱才对。这也是我这个编剧，对全剧组成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事实上，我自己比最挑剔的观念，最细心的评论者，对《年轮》指出的不足更其多。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的缺憾，是我这个编剧的创作责任。另有一部分，是导演、制片和剧组其它方面人员应付的责任。客观原因很多，主观原因也不少。我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导演、制片指出了。同时坦城地剖析了自己创伤上造成缺憾的原因。对于我和剧组成员们来说更应总结的是哪些地方没拍好，为什么？……

我想，由我来指出《年轮》的缺憾似乎最具说服力。剧本创作方面的缺憾我已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场合谈到过。摄制方面的缺憾，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1. 全剧几乎不见灯光的运用。因而摄影显得功倍事半。我们几乎指不出，哪一场剧灯光运用的魅力，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印象。没有灯光运用的巧妙衬托，只有镜头的移动，摄影仍不能达到较好的水平发挥。2. 全剧几乎不见美工的作为。只有布景，没有美工。所以，画面也就缺少构图感。这极需美工为摄影提供和营造出足以形成艺术构图的环境条件。3. 剪辑松散。非是总体松散。而是从第十二、三集至二十集前后显得松散。这一点，首先暴露出的是剧本创作在这些集数中的松散。其次说明导演对剪辑的"监督"和要求太不够。二次播出前尽量"修改"了这些地方，相信会好些。4. 有些演员的有些段台词拍摄时没背下来，一边听提词，一边说台词——因而造成语调拖长的感觉……

拍一部剧，好比掬一捧水。十指并得越紧，流失越少，流失了一点一滴，都会留下缺憾的。我愿与《年轮》全组朋友共勉，在二次合作中，争取以更认真仔细的剧作报答观众对《年轮》的厚爱……

歌曲《涛声依旧》

（男声独唱） 陈小奇词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留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
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

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
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久逢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
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毛宁演唱）

歌曲《同桌的你》

（男声独唱） 高晓松词曲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人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遇到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
谁把它丢在风里。

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
我也曾给她看相片给她讲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老狼演唱）

历史档案

第七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揭晓

被称为出版界图书“百花奖”的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迄今已成功地举办了七届。新闻出版报、博览群书、中国出版、文汇读书周报等9家报刊共同主办的本届评奖已揭晓。160种优秀图书分获一、二、三等及优胜奖，100余家出版社的图书榜上有名。

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思想论》等10种书获一等奖；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简本)等20种图书获二等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周恩来——智慧·勇气·忠诚的化身》等30种书获三等奖。另外，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演讲学十讲》等100种书获优胜奖。与此同时，在评选活动中产生的“读者奖”的三等奖分别为湖北沙市市东区湖北沙市印染厂职工吴克胜及河南柘城县中学高二·四班学生董红印所获得。“读者奖”的一、二等奖空缺。

据本届“金钥匙”图书奖评选负责人介绍，此次获奖图书及评选结果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图书占获奖图书的第一位，计有5种，内容包括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国际战略思想等各方面。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题材的图书在获奖图书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此次评奖为历届评选中选票回收最高的一次。据统计，回收有效选票1.1万余张。参评人员构成中，各阶层、职业均有分布，年龄构成较以前历届趋向年轻。而获“读者奖”的两位读者职业分别为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充分反映了我国基本读者群的构成已愈来愈分布广泛，文化程度则有所提高。

第三，此次获奖出版社达百家以上(参评社为177家，共有图书706种)，获奖图书门类齐全，基本涵盖出版各个门类，也反映出出版界面向广大读者出书及读者欣赏情趣的多样化。

我国中学生在国际数、理、化、信息、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共获得十三枚金牌、八枚银牌

7月9日，第6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斯德哥尔摩结束，中国参赛的4位选手获三金一铜的优异成绩。

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189名选手参加了这次比赛。

中国队的成绩按总分计，名列第二。

7月10日，第26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经过两轮激烈的比赛后，结果在奥斯陆揭晓，我国参赛的4名选手获得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的优秀成绩。

获得金奖的李帅格和黄永亮同学均为我国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应届高中毕业生，获得银牌的丁胜和唐海峰同学分别是北京大学附中和江苏省无锡市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黄永亮同时还获得理论竞赛最佳成绩奖。本届比赛于5日和7日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化学系进行。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其中19名获金牌，33名获银牌，48名获铜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是面向中学生的一种国际化学竞赛。

第2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7月12日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来自45个国家和中国台北的代表队以及1个个人代表队，将参加历时7天的角逐。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题词，祝这次竞赛取得圆满成功。国家教委副主任、竞赛组委会副主席柳斌在开幕式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组委会对来自四大洲的参赛队表示热烈欢迎。

7月18日，第2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降下帷幕。中国选手摘取4枚金牌。

获得金牌的4名中国选手是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杨亮、河南郑州一中的韩岩、四川重庆巴蜀中学的田涛和北京四中的饶京翔。其中，杨亮以44.30分获得个人最高总分奖。另两枚金牌分别由英国的克利斯托弗·约丁森和德国的卡斯顿·盖克勒获得。

这次竞赛评出银奖5名，铜奖22名。中国湖南长沙一中的黄英在银奖中名列榜首。至此，中国选手自1986年首次参赛以来，已先后有43名选手参赛并全部获奖。其中22人获金牌，11人获银牌，8人获铜牌，2人获表扬奖。

伊朗选手亚沙曼·法尔赞在这次竞赛中被评为最佳女生奖。组委会还向理论或实验考试成绩优异者颁发了特别奖。另有37名选手获得表扬奖。

这届竞赛组委会主席、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代表中国政府、竞赛组委会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这届竞赛

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著名物理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在讲话中称，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大厦的重要基石之一，又是科学体系中最辉煌、最富有魅力的部分。作为一位已进入老年的物理学家，他从历届的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看到，在我们的后面有这样一支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青少年物理爱好者的队伍，深感欣慰和鼓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卢嘉锡，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秘书长高日科夫斯基和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为获奖者颁奖。

7 月 19 日，第 35 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结果在香港揭晓，中国队以 3 枚金牌、3 枚银牌的成绩获得团体赛总分第二。

夺得团体赛总分第一的是美国队，他们派出的 6 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得金牌。

中国队获满分金牌的队员为姚健钢、张健、彭建波，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人大附中、上海建平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另 3 名获银牌的中国参赛队员是：上海师大二附中的王海栋、北京大学附中的奚晨海、四川内江安岳中学的李挺。与此同时，中国台北队和香港队也在竞赛中分别取得 4 银 1 铜和 2 银 4 铜的较好成绩。

7 月 26 日，我国中学生代表队近日参加国际数学、物理学、化学、信息学和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23 名选手全部获奖，共摘取了 13 枚金牌、8 枚银牌和 2 枚铜牌。在欢迎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向获奖学生及辛勤培育他们的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虽然这次获奖的是少数人，但代表了我国青少年学生的水平，更增强了我们对自己的信心，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有聪明才智的。这次活动更深的意义还在于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那句话，我国的兴旺发达靠科技，发展科技靠教育。我们一定要把人才的培养、教育的发展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科技事业搞好了，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会更好、更健康地发展。李岚清勉励同学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继续努力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同时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不为名不为利，一心培养桃李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据了解，各奥林匹克代表队的具体成绩如下：数学竞赛获 3 枚金牌、3 枚银牌，团体总分名列第二；物理竞赛获 4 枚金牌、1 枚银牌，总成绩居各队之首；化学竞赛获 2 枚金牌 2 枚银牌；信息学竞赛获 3 枚金牌、1 枚铜牌；生物学竞赛获 1 枚金牌、2 枚银牌、1 枚铜牌。

欢迎会上，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负责同志向全体参赛学生颁发了奖品。美国 IET 基金会为获得金牌的选手颁发"逢茎奖"和奖学金。

（据 7 月 11、12、13、19、20、27 日《人民日报》）

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奖评选在京揭晓

4 月 5 日揭晓的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奖戏曲一枝独秀，获得此次文华大奖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西厢记》、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的《山歌情》、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戏剧团的《大河谣》，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歌舞乐舞大奖空缺。

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四省区至今与文华奖无缘，文化部直属院团今年与文华大奖无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获得文华新剧目奖的有：《一夜皇妃》（吉林）、《金龙与蜉蝣》（上海）、《富贵图》（山西）、《荷花洲头》（湖北）、《陈太爷选婿》（广东）、《契丹女》（内蒙古）、《玉蜻蜓》（福建）、《刘氏四娘》（四川）、《阿盖公主》（云南）、《关公与貂蝉》（山西）、《甲申祭》（湖南）、《袁凯装疯》（天津）、《布衣毛润之》（湖南）、《贵人遗香》（江西）、《能人百不成》（河南）、《OK，股票》（上海）、《十三世达赖喇嘛》（河北）、《女村长》（宁夏）、《李大钊》（总政）、《北京往北是北大荒》（黑龙江）、《灵魂出窍》（青艺）、《南越王》（广东）、《山那边儿》（北京）、《陈小虎》（山东）。武汉歌舞剧院的《楚韵》获文华新节目奖。

曾昭弘等 17 人获文华剧作奖，杨小青等 17 人获文华导演奖，程云等 7 人获文华编导奖，顾达昌等 12 人获文华音乐创作奖，罗志摩等 17 人获文华舞台美术设计奖，茅威涛等 30 人获文华表演奖。文华词作奖空缺。

第四届中国新闻奖揭晓

第四届中国新闻奖近日揭晓。本届获得一等奖的 16 件作品、二等奖的 49 件作品，三等奖的 95 件作品，突出了时代的主旋律，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开拓前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中国新闻奖是我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本届获奖作品质量同往年相比有较明显提高，特别是在评论、通讯等方面。获奖的广泛性也有较明显的增强。人民日报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促进改革与发展》，新华社的《中国投巨资加快长江沿岸地区开发》，经济日报的《为什么要整顿金融秩序》，长江日报的《武钢近 7 万人不再吃"钢铁饭"》，新民晚报的《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上海电视台的《邓小平同志和上海各界人士共度新春佳节》等重大题材的作品都获得一等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人物报道有显著加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民崇尚这颗星（徐洪刚）》、《拜金主义要不得》，

解放军报的《战士义勇非凡，人民恩重如山》，中央电视台的《牡丹集团厂庆新办》及山西电视台的《农民要减轻自身负担》等均获一等奖。

由中国记协主办，吉林省记协等单位协办的这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是7月下旬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各地记协和中央各新闻单位推荐各类参评作品500件。评委们用投票方式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

（据8月19日《人民日报》）

1994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根据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科技界、新闻界权威人士的投票推荐，科技日报、新华社国内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教部、人民日报教科文部、光明日报科学部、经济日报科教部和四通集团公司联合评出1994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按报道时间先后为序)。

1.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率团赴台湾，参加"1994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会议"，这是近年来海峡两岸科技交流的 一次重大突破。

2. 我国科学家在原子级操纵和原子级加工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标志着我国纳米科技研究已居于国际科技前沿。我国科学家研究成功一种新的表面原子操纵方法，实现了可提、可植一条线硅原子的技术，并开拓了他们称之为"有序移植"的领域。这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在高密度信息存储、纳米电子器件、量子阱器件、新型材料组成和物种再造等方面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并得到广泛应用。

3. 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一有52个部门300余名专家参加，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高度重视的项目，从我国具体国情和环境与发展的总体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方案。它将成为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4. 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峡谷。我国科学家经多次深入和计算后确认，切开喜马拉雅山脉的鸦鲁藏布江大峡谷平均深度在5000米以上，最深的地方为5382米，是地球上最深的峡谷。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峡谷。

5. 中国工程院成立，9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也同时产生。中国工程院是我国以工程技术专家为主体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

6. 苏梅克一利维9号彗星撞击木星，引起科学界极大关注和公众巨大反响，我国科学家观测彗木碰撞收获丰硕并受到国际好评。

7. 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恳请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由71位院士签名的建议书，针对我国生物学教育中存在的教师队伍老化、经费严重不足、高考取消生物考试后果严重的现状，建议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

8. 863计划国家CIMS工程研究中心荣获1994年度CIMS应用与开发"大学领先奖"。这项世界级大奖，每年由国际权威性学术机构——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SME)授予。

9. 中国国家计算与网络设施(NCFC)实现国内国际联网。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完成的这一项目将北京地区和全国数十个城市的网络连接起来，并与世界上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网络连接，与154个国家和地区通电子邮件。该网络是目前国内地域范围广、用户量大、性能高、通信量大、服务设施齐全的全国性科研教育网络，为各类用户提供通用的功能。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发表。《意见》号召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普及这一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

（选自《科技日报》1994年12月26、28日）

1994年国内十大体育新闻

1. 中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蝉联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总分三项第一。

2. 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3. 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被确定为中国体育两大战略。

4. 中国足球全面走向市场，首次实行主客场制的甲A联赛向境内外实行电视有偿转播，球员转会制出台。

5. 中国选手在第七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夺得12枚金牌，创五项世界纪录，得到国际游联确认。

6. 中国男篮首次进入世界八强。

7. 中国女排、中国羽毛球队成绩滑坡，引起国人关注。

8. 王军霞荣膺欧文斯奖。

9. 国家体委召开反兴奋剂大会；有关协会认真执行"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方针。

10. 中国男子体操队11年后再夺世界团体冠军。

（选自《中国体育报》1994年12月27、28日）

1994年中国十大经济新闻

首都12家主要新闻单位的总编辑、副总编辑联合评选的1994年中国十大经济新闻22日在北京揭晓。当选的十大经济新闻是：

1. 1994年中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元，达438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8%。

2. 我国财税、金融、外汇、外贸等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1995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4. 我国农业战胜南方洪涝灾害获得好收成；同时农业基础脆弱、发展滞后的问题再次引起全党全国的高度重视，各地继续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5.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12月14日正式动工。

6. 消费品价格涨幅过大，全年零售价格预计比上年上涨21.7%。国家确定1995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

7. 外汇现汇结存大幅度上升，预计年底可比年初增加一倍以上。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全年新增储蓄存款6315亿元，截至12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1518.8亿元。

8. 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9次会议12月20日结束。由于少数缔约方蓄意阻挠，中国复关协议未能达成。

9. 1月14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这是我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10. 我国整顿期货市场。经国务院同意，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等11家期货交易所为我国试点期货交易所，我国期货市场正走向规范化。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1月25日）

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在京评选揭晓。这10项考古新发现是从1994年全国近400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评选出来的。评选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组织的。

1. 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加上新发现文物点300余处，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点的总数已达769处，共有18家科研单位和大学参加发掘工作，发掘遗址、墓葬、窑址等20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

2. 汤山旧石器时代地点。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江苏南京市博物馆于江苏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清理出1枚猿人牙齿化石，发掘及拣选出古动物化石4000余件，不仅填补了中国猿人地域分布上的空白，也为研究中国人类的演化、发展等增添了新的宝贵资料。

3. 八里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现中国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排房式建筑基址30余座，对中国古代建筑史及史前聚落面貌的探索研究极为难得。它们多为分间长排房，每套房面积相若，陶器、古器等仍散在部分室内，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在河南邓州市白庄村八里岗发掘。

4.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徽蒙城县毕集村尉迟寺8次大规模发掘，共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时期房屋基址41间、墓葬156座，获得陶、石、骨等类文化遗物近万件，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发现30多年来聚落研究的空白。

5. 辉县孟庄遗址。遗址坐落于河南辉县市孟庄镇东侧，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面积达25万平方米，共发现龙山文化、夏及商代3个时期的三叠城，其中夏代城址在中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夏、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6. 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遗址共发掘出商周之际薛国贵族墓11座，出土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近千件，卣、壶等中封存有清澈透明的液体，可能是当时的酒，亦较为难得。

7. 永城汉梁孝王寝园。这是中国目前发掘的唯一一处保存完整的汉代寝园建筑基址，规模大，等级高。寝园位于河南永城县芒砀山汉梁王陵区，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发掘。

8. 西安隋灞桥遗址。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证实古灞桥始建于隋初，废弃于元，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宏伟、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在桥拱腹中还清理出瓷器等一批隋至元各时期的填充物。

9. 麟游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为隋、唐时期离宫仁寿宫及九成宫中部偏东的一座宫殿址，初建于隋，约毁于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至今保存完整，雕饰精美，不仅填补了中国建筑中上隋代宫殿建筑的空白，对复原隋代建筑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殿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麟游县城全部揭露。

10. 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贵族墓。这是辽代早期契丹贵族墓，共两座，时代基本相同，其中1号墓为已知时代最早的有纪年的契丹贵族墓。墓地位于内蒙古阿鲁科

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南麓，堪称辽早期绘画艺术宝库。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进行抢救性发掘。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2月19日）

1994年国内十大新闻

1. 重新修订后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与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连成一个科学体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3.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目标，我国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出台，进展顺利。

4. 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350亿美元，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5.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抑制通货膨胀，“米袋子”、“菜篮子”受到普遍关心，各级党和政府着力抓紧解决。

6. 济南军区某团通信连班长徐洪刚见义勇为的英雄壮举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掀起学习英雄、弘扬正气的群众性活动。

7.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全国上下积极为这一跨世纪的工程尽心出力。

8.“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全面启动，消灭绝对贫困的任务吸引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十大“扶贫状元”经过认真评选产生。

9. 我国首次实行新工时制，即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44小时的工时制度。

10. 我国部分省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旱灾，各地军民奋起抗灾救灾，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好收成。

（选自《新华月报》1995年第2期）

’94全国十大杰出职工评选揭晓

“’94全国十大杰出职工”评选4月11日揭晓，43岁的“抓斗大王”、上海港务局南浦港务公司高级工程师包起帆等10人榜上有名。

获得这项荣誉称号的还有：全国造船行业“女铁人”、辽宁省大连造船厂船体车间电焊工郭玲华；心系祖国、教书育人的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教授冯长根；在“九岗十八洼”邮路上辛勤耕耘的湖北省郧县扬溪邮电支局乡邮递员余国印；时传祥式的环卫工人、四川省重庆市政养护管理处疏浚工孙春明；敬业爱业的新时代矿工、河北省开滦赵庄矿采煤三区回柱组组长侯振清；站在改革前列的杰出乡镇企业家、浙江省万向集团公司董事长鲁冠球；勇于开拓创新的优秀经营管理者、江苏省春兰（集团）公司总经理陶建幸；荣获国际人道主义服务荣誉的白衣天使、山东省曲阜市红十字医院副主任医师姜健；为企业增产创效千万元的炼钢工人楷模、天津钢厂第二炼钢厂炉长王振华。

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评选揭晓

首届“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评选日前揭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1994年12月27日在中南海会见获奖的30名教师，热情勉励他们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李岚清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小学教师常年工作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为实现“两基”辛勤耕耘，作出了突出成绩。他指出，要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青少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希望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为教师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由国家教委支持，中国教育报社和宝钢集团公司联合举办的这次评选活动，共评选出“十杰”教师10名，“十杰”提名奖教师20名。王思明（陕西）、马芯兰（北京）、冯振飞（辽宁）、韦造祥（广西）、张学钊（四川）、张再昌（吉林）、彭中亚（湖南）、宋飞琼（河南）、吴光棣（贵州）、吴伟国（上海）被评为“十杰”教师。他们当中有的几十年扎根山区、农村，艰苦创业；有的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工作中作出了优异成绩；有的身残志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建功立业。

在12月27日举行的授奖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向“十杰”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和1万元奖金。

（据199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评选揭晓

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评选结果，10月15日晚在

北京揭晓。金鹰奖是《大众电视》杂志社于1982年创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电视剧大奖，由群众投票评选。

本届金鹰奖各奖项的得主是——

最佳长篇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情满珠江》、《潮起潮落》；最佳中篇电视连续剧：《过把瘾》、《代号4991》；最佳电视单剧：《一个姑娘三个兵》；最佳儿童电视剧：《猴娃》；最佳电视戏曲片：《玉堂春》(黄梅戏)；最佳合拍电视剧：《戏说慈禧》；

最佳男主角：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扮演王启明的姜文。在《女人天生爱做梦》中饰赵挺的乃社和在《过把瘾》中饰方言的王志文获提名奖；最佳女主角：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扮演阿春的王姬。在《过把瘾》中饰杜梅的江珊和在《情满珠江》中饰梁淑贞的左翎获提名奖；

最佳男配角奖：在《猴娃》中扮演六龄童的六小龄童。在《京都纪事》中饰叶新元的石兆琪和在《满天星》中饰方健的胡亚捷获提名奖；

最佳女配角：在《过把瘾》中扮演贾玲的刘蓓。在《北京人在纽约》中饰郭燕的严晓频和在《情满珠江》中饰钟蓉的普超英获提名奖。

颁奖典礼当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专家认为，第十二届金鹰奖的获奖剧目和演员，基本上准确反映了过去一年里我国电视剧生产的实绩，表明广大观众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品位。

(据10月16日《人民日报》)

第十四届电视剧“飞天奖”评选揭晓

第十四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结果，近日在京揭晓。

短、中、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分别为《一个医生的故事》，《豫东之战》和《大潮汐》、《情满珠江》。此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获长篇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一等奖，《嗨，中学生(二)》获短篇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一等奖。河北梆子《钟馗》获长篇戏曲电视剧一等奖，短篇戏曲电视剧一等空缺。《大上海出租车》获短剧一等奖。《吧女斯特拉》等获外语译制奖。各单项奖也同时产生。

在《过把瘾》中饰演方言的王志文获优秀男主角奖，在《情满珠江》中饰演梁淑贞的左翎获优秀女主角奖，在《大潮汐》中饰演杨天雄的肖荣生获优秀男配角奖，在《情满珠江》中饰演谭蓉的普超英获优秀女配角奖，在《神禾塬》中饰演思温老汉的李纬和在《钟馗》中饰演钟馗的裴艳玲获表演荣誉奖。

(据10月12日《人民日报》)

第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长沙举行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第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11月5日至9日在长沙举行。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沙市人民政府等部门共同主办的本次电影节，将展映今年拍摄的14部国产影片，同时举办香港长城、凤凰、新联公司及其继承者银都机构的影片回顾展。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一批电影界专家和学者将举行“中国电影九十年：历史与现状”大型学术研讨会。20多部外国影片也将参加本次电影节活动。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1月8日揭晓。

由天津厂和潇湘厂拍摄的《凤凰琴》，在获得“政府奖”之后，又获得“双奖”的最佳故事片奖，饰演剧中余校长的李保田荣膺“双奖”最佳男主角奖，该片编剧桔生、刘醒龙、卜炎贵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同时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还有长影厂摄制的《重庆谈判》和《炮兵少校》；在《重庆谈判》中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在《股疯》中扮演范莉的潘虹荣获本届“双奖”最佳女主角奖；“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授予《无人喝彩》中韩丽婷的扮演者丁嘉莉，“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空缺；“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由《无人喝彩》中扮演钱康的方子哥获得。曾成功执导了《双旗镇刀客》的西影厂年轻导演何平因《炮打双灯》，捧走本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奖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东归英雄传》，被本届“金鸡奖”评委授予故事片特别奖。

(据11月6、10日《人民日报》)

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揭晓

第十一届(1993年度)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结果3月18日在京揭晓。

获奖演员名单如下：

戏　曲

李仙花	女	广东汉剧院
喻海燕	女	四川省绵阳市川剧团
梁伟平	男	上海淮剧团
马莉莉	女	上海沪剧院浦东分院
王艺华	男	山西运城地区蒲剧团
史　敏	女	上海京剧院

张曼君　女　江西赣南采茶戏剧团
陈少云　男　湖南省京剧团
李龙斌　男　安徽省徽剧团
龙　红　女　江西赣南采茶戏剧团
王蓉蓉　女　北京青年京剧团
秦雪玲　女　北京京剧院

话　剧

朱　茵　女　江苏人民艺术剧院
周　虹　女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马　路　男　天津儿童艺术团
吕　梁　男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歌　剧

安金玉　女　陕西省歌舞剧院

按照新的评选章程，自今年起凡获得过梅花奖的演员在艺术上确有新的提高且创造出新的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可再次申请评梅花奖(二度梅)，每届获奖者最多不超过2名。获本届二度梅的演员是：

茅威涛　女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刘　芸　女　成都市川剧院一二联合团

(据3月20日《中国文化报》)

我国三十六年发射四十二颗人造卫星

共和国45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国航天事业已走过36年的历程。36年来，经过几代航天人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已成功地发射了42颗多种用途的人造卫星。今年，我国以计划进行7次发射的可观频率迎来了中国航天年，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已进入了辉煌时期，航天技术已进入世界航天强国的行列。

36年间，我国航天系统已建成相当规模、专业齐全、技术配套的研制生产和试验基地。形成了研究、设计、试验、试制、生产的完整航天工业体系，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科研生产协作网。我国航天工业系统已建立一批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实验室。其中，北京仿真中心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仿真工程群体之一，拥有11个实验室，可进行运载火箭的数字仿真、半实物仿真，也可为民用部门进行大型系统工程的仿真实验。国家研究开发计算机总线工程化技术、工业控制系统容错技术、数据通信和网络技术、工业控制装备的工程技术中心，研制的STD—5000型工业控制微机等产品，已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制药生产、制糖工业、铁路信号处理、锅炉温度控制及机床数控等上千个系统，市场覆盖率达到40%。

现在，我国航天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已跻身于世界行先进行列。主要包括：卫星回收技术、一箭多星技术、卫星测控技术、高能低温燃料火箭技术、地球静止卫星发射技术等。

36年来，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丰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有上万项科技成果获得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170项，其中特等奖9项，一等奖15项，二等奖46项，三等奖100项；部级科技进步奖9827项。这些技术成果主要分布在人造卫星的制造、发射、回收、测控，运载火箭的制造、发射，民品的研制和生产等领域。航天技术已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相继发射成功的42颗卫星中，有科学实验卫星、返回式卫星、静止轨道通讯卫星等。它们有的是成熟技术的推广运用，有的标志着新技术、新领域的开拓，有的是跃上新台阶的试验，有的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举世公认的航天杰出专家群体。目前已拥有航天高级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4万余人，目前，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WordPress、庄逢甘、孙家栋、闵桂荣、蔡金涛等15名航天专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任新民、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固体火箭总设计师黄纬禄、战术导弹专家梁守槃为代表的航天杰出专家，不仅蜚声国内，而且享誉国外。他们中有23人相继被国际宇航科学院聘为院士。在国际宇航联合会第34届大会上，科学实验卫星总设计师杨嘉墀被选为执行局副主席并连任四届；在第38届大会上，卫星控制系统专家陆元九又被选为执行局副主席。

(据8月31日《人民日报》)

体坛45英杰

建国45周年来，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至去年底，我国运动员获得775个世界冠军，创造725项世界纪录，本次评选由中国体育记协主办，香港马高亚公司赞助，当选“体坛45英杰”的是：吴传玉、郑凤荣、陈镜开、容国团、戚烈云、穆祥雄、陈家全、罗致焕、王富洲、李惠兰、邱钟惠、徐寅生、李嘉荣、张燮林、侯加昌、朱建华、徐永久、李宁、马燕红、高敏、李玲蔚、郎平、孙晋芳、高凤莲、张小冬、黄志红、王军霞、曲云霞、郑海霞、叶乔波、林莉、庄泳、谢军、邓亚萍。

第十二届亚运会奖牌榜

国家和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中国	137	92	60	289
韩国	63	53	63	179
日本	59	68	80	207
哈萨克斯坦	25	26	26	77
乌兹别克斯坦	10	11	19	40
伊朗	9	9	8	26
中国台北	7	12	24	43
印度	4	3	15	22
马来西亚	4	2	13	19
卡塔尔	4	1	5	10
印度尼西亚	3	12	11	26
叙利亚	3	3	1	7
菲律宾	3	2	8	13
科威特	3	1	5	9
泰国	1	11	13	25
沙特阿拉伯	1	3	5	9
土库曼斯坦	1	3	3	7
蒙古	1	2	6	9
越南	1	2	0	3
新加坡	1	1	5	7
香港	0	5	7	12
巴基斯坦	0	4	6	10
吉尔吉斯斯坦	0	4	5	9
约旦	0	2	2	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	1	3	4
斯里兰卡	0	1	1	2
澳门	0	1	1	2
孟加拉国	0	1	0	1
文莱	0	0	2	2
尼泊尔	0	0	2	2
塔吉克斯坦	0	0	2	2
缅甸	0	0	2	2
总计	340	336	403	1079

(10月17日《人民日报》)

国务院确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百家名单

国务院确定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另有三个全国性行业总公司为国家控股公司试点。

列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名单如下：

北京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公司、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天津立达(集团)公司、天津钢管公司、河北省保定变压器厂、河北省唐山碱厂、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包头市纺织总厂、本溪钢铁公司、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厂、通化钢铁公司、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龙涤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桦林集团公司、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上海针织内衣集团公司、上海无线电三厂、上海一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三维制药公司、无锡威孚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公司、南京电瓷总厂、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扬子电气(集团)公司、安徽轮胎厂、福州第二化工厂、厦门海燕实业总公司、江西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烟台合成革总厂、济南市大观园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化学纤维总厂、青岛益青实业总公司、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嵩岳纺织工业集团、湖北化学纤维总公司、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锅炉厂、湖南省国光瓷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物资产业集团、广州味精食品厂、深圳华强电子工业总公司、广东省物资集团公司、深圳市物资总公司、海南省地方国营罐头厂、广西贵港甘蔗化工厂、四川物资集团公司、四川沱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钢铁(集团)公司、贵州开阳磷矿矿务局、昆明重型机械工业总公司、国营西北第七棉纺织厂、秦川机床厂、中国标准缝纫机(集团)公司、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兰州民百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西宁钢厂、西北轴承厂、新疆八一钢铁总厂、西藏拉萨啤酒厂、新疆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长春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集团)公司、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福建省电力公司、兖州矿务局、彩虹电子集团公司、冶金工业部舞阳钢铁公司、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大连铁路局、广州海运(集团)公司、邮电部武汉通信电源厂、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中国水产总公司、中国林业机械总公司、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昆明三聚磷酸钠厂、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江南造船厂、建设工业集团公司、航天部南京晨光机器厂、大港石油管理局、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大厂矿务局、新兴铸管联合公司。

三个国家控股公司试点总公司是：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

(11月4日《人民日报》)

各阶层公众评说'94国内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
与预测"课题组(执笔人:陆建华)

1994年已经过去,它在国民心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等各个主要阶层公众也自有其看法。

自1994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个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就1994年社会形势的若干问题,对2万名各阶层城乡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各阶层的感触、看法有共识,也有差异,颇值思索……

工人阶层明显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被认为是改革中获益最小的阶层

工人阶层和其他阶层公众一样,认为1994年最主要的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快"。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对此感受甚于其他阶层公众,有83.71%的工人持上述看法,足以反映出工人在1994年高物价压力下的生活重负。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工人阶层内对1994年社会形势"说不清楚"者占的比例,在各阶层公众中是最高的,占16.64%。同时,他们中认为社会形势"基本稳定"者的比例,除农民阶层之外,在各阶层公众中是最低的,占53.19%,且距平均比例线最远。

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各阶层公众在评判本阶层受益程度时普遍存在低估现象,但工人阶层被一致认定属改革中受益最少者,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工人阶层利益的获取属最少之列,当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影响这一阶层公众对社会形势问题的基本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对国有企业效绩的评价在各阶层中,并不是最低的,也就是说,他们较少直接从所在企业经营状况好坏出发来判断自身的利益得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明显感到还存在着广泛的社会经济压力,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倍负重担。本调查表明,工人阶层确认1994年实际生活"略有下降"者占25.01%,"下降较多"者占11.01%,均高于其他层公众的确认。与此相应,工人阶层也是所有阶层中实际生活水平增长最慢的,其感受"增长较快"者比值最低,仅5.46%,连个体户及私营业主的一半都不到。所以说,日常生活压力增大,是1994年工人阶层面临的最大问题。

生活压力问题以及利益受损观念,使工人阶层对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持一种含混不清的态度,他们对"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控制失业"、"强化社会治安"等问题的看法在各阶层公众中属不明朗者,进而,他们对1995年社会形势的预期也有含混之处。调查表明,在所有阶层中,工人阶层对未来一年社会形势走向持"说不清"者最多,占36.75%,高出各阶层平均比例6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还显示,工人阶层是除街道居民以外最强烈要求政府"控制物价上涨"者,占88.34%。同时,他们也是除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之外,最强烈要求"严惩腐败"者。

农民阶层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感觉不明显,但肯定形势稳定者的比例则最小

农民自认为是改革中受益最小的阶层之一,其境遇也被认为仅仅比工人稍好一点。农民是认定1994年社会形势"基本稳定"比例最小的阶层,同时,也是仅次于工人,认为形势最"说不清"者。

在对1994年社会经济最突出问题的评价方面,尽管72.27%的农民认为"物价上涨过快"为第一,但其认定程度,则是所有阶层中最低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较少直接受到城市居民所遭遇的农副食品价格狂升的压力。但农民阶层自有其自身的苦恼。调查表明,近四分之一的农民认为"农业不稳定"是1994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比例无疑在所有阶层中属最高的,是工人、干部阶层的6倍,是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的5倍,是街道居民的7倍。农民阶层对农业不稳定状况的高度忧虑,显然反映出部分农村地区生产下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紧张、投入不足以及领导重视不够的严峻局面。

在对1994年生活水平的评价方面,69.10%的农民认为"基本持平",是各阶层中比例最高的,自报"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者合计为23.69%,这一比例在各阶层中处于比较平稳的。这表明,农民阶层在1994年生活境况改善并不明显。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农民收入有所增长,这一点在农民自己的确认方面反映得并不明显。

调查还表明,农民阶层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予以高度关注,尤其关注的是"养老保险",有69.27%的农民将此放在首位,这一点和城镇街道居民的看法基本接近。这两个阶层的公众与个体户及私营企业阶层、工人阶层一起,成为当今社会中最重视养老保险改革的群体。另一个值得注重的现象是,在所有阶层中,农民还对集体福利保障的改革投入最大的关注,占24.38%。这一切都表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焦点将集中的养老、福利救济方面,有关改革应考虑到农民阶层的利益得失格局的新变化,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农民阶层那里,“社会稳定”是一个很受关注的主题,有35.54%的农民显示出这种关注,是所有阶层中比例最高的。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和街道居民、个体户及私营业主一起,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关注“社会稳定”的阶层,其余阶层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明显低于这三部分人。相应地,农民是所有阶层中对“控制物价上涨”关注程度最低的阶层,但同时,他们是所有阶层中最关注1995年政府能否“稳定农民收入”的阶层(占46.18%)。在这一点上,只有在校学生有相同期望,占39.34%,其他所有阶层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均在15%以下。调查结果还显示,农民在“解决失业问题”、“严惩腐败”方面,对1995年政府工作的期望程度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分别占10.04%和37.68%。但是,他们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措施的期望,则是除个体户及私营业主之外最强烈的。这显然和1994年部分农村地区治安状况急剧恶化有关。总之,增加收入与获得良好的治安环境,是1995年农民阶层的最主要期望所在。

机关干部阶层自认为在改革中受益低,但对形势评判明晰

尽管机关干部对自己作为改革受益者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但是,综合调查结果表明,他们被广泛认为是改革的第三大受益者,综合比较占34.11%。在1994年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干部阶层虽然不是生活水平“增长较快”的一群人,但也不是收入下降最明显者,其生活水平恰恰处在所有阶层生活水平均值线上。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者占62.51%,“略有下降”者占21.73%,“下降较多”者占8.67%。

关于1994年社会形势判断,干部阶层和工人阶层、街道居民阶层一起,属于认定“不太稳定”者比较高的一群人;相应地,只有9.47%的干部认为“说不清”,是仅次于在校学生比例最低者。调查表明,60.43%的干部确认社会形势“基本稳定”。这意味着,干部阶层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是最泾渭分明的,其中的不同点比较明显。1994年“改革顺利推进”和“社会稳定”,是干部阶层对社会形势做乐观判定的最主要依据。而“物价上涨过快”、“社会治安不够好”和“反腐败进展不快”,则使他们对社会稳定状况作谨慎的评价。这种矛盾,也就是社会形势客观进程所具有的矛盾的直接反映。调查表明,干部阶层中把“国有企业效益提高慢”视为1994年最严重的问题者占21.89%,这一比例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相应地,他们对1994年企业制度方面改革的进展评价最低。

和专业技术人员、在校学生一起,干部成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关注“严惩腐败”的一群人。相应地,他们对1995年政府在这方面实行更严厉的措施,抱有比其他阶层(除专业技术人员之外)更强烈的期望,比农民的期望程度高出整整20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还表明,对1995年社会形势的稳定性的判断,有48.04%的干部认为“基本稳定”,是在各阶层中仅次于在校学生的比例最高者。但是,有14.37%的干部认为“不太稳定”,其比例,也是各阶层中最高的。另外,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干部对未来一年的形势走向表示“说不清”。这一比例虽然不是各阶层中最高的,但还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总的来说,干部阶层对1994年—1995年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是比较明晰的,但也有部分人心存疑虑。

在确定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方面,学生阶层的看法有其独特性

1994年,在校学生也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有73.39%的学生认为“物价上涨过快”是本年度的主要问题,这一比例在各阶层中是较低的,但却反映了学生群体的真实感受。调查还表明,学生家庭的生活水平“增长较快”者占7.44%,是各阶层中比较大者。但是,大部分学生家庭生活状况改善不明显,“基本持平”者占65.08%,略高于各阶层综合均值线,“略有下降”者占18.69%,“下降较多”者占8.36%。这表明,经济压力也是1994年在校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即便如此,在校学生对1994年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各阶层中最为乐观的,有69.02%的学生认为“基本稳定”,其比例居各阶层之首。有15.01%的学生认为“不大稳定”,其比例居各阶层之末。究其原因,调查结果显示,有50.59%的学生认定1994年的社会稳定是一个事实,这一比例也是居各阶层之首。另外,他们对“经济增长快”的事实的认定,也比其他阶层更显著,占28.23%。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改革顺利推进”的评价,却属各阶层中最低。这表明,在确认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方面,在校学生的看法是有其独特性的。

针对1994年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物价上涨过快”、“社会治安不够好”、“失业加重”、“农民进城秩序乱”方面,学生的感受强度均低于社会其他各阶层。而在“反腐败进展不快”、“社会风气不好”、“国有企业效益提高慢”方面,他们的感受明显地强于其他各阶层公众。调查还表明,学生对“严惩腐败”给以高度关注者占41.36%,是各阶层中比例最高者。同样,他们对“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的关注程度也是最高的,占29.72%,高出各阶层综合均值线达13个百分点。这种关注焦点的差异,反映出在校学生的最新思想动向:对学生来说,相对于社会发展中具体矛盾而言,党风、社会风气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敏感性的主题。

和其他阶层不一样,在校学生认为1994年“公务员

制度推行”是改革最成功的方面，而他们对“财政改革”评价，明显低于所有其他各阶层，这其中的原因还有待于具体分析。

在校学生对“找个好职业”的希求远远高于其他阶层达3倍之多，这与学生职业前景有关，也反映出在校学生对个人成才与成功的强烈期待。在学生所关注问题的排序表上，“找职业”的重要性甚于他们对社会稳定、对个人收入增加、对改善住房、对早日实现小康、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视程度。

对1995年的期望，在校学生表现出对“稳定农民收入”问题的高度关注，占39.34%，是仅次于农民阶层本身的最高比例，超过各阶层综合均值线一倍之多。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阶层中，学生中对1995年社会形势稳定前景表示“说不清”的比例是最低的，仅占21.9%。而作出“基本稳定”预期的，也以学生的比例为最高，占53.39%。也就是说，在校学生对1995年的社会形势走向，基本上持乐观态度。

（选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3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5—10、22、23、27—3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经济、法律、社会及保安、文化专题小组在京召开了各自的会议，并讨论解决了本次会议的议题。政务专题小组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的终结问题。

1月7日　国务院举行第14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草案）》。

同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审判监督职权，对以车谋私并被宣告无罪的魏国范、阎长春依法予以纠正，重新确认犯有受贿罪，应受法律制裁。

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近日通过《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居留数额表》，决定将大陆配偶申请赴台居留的配额，从现行限制每年的300人放宽至每年600人，于1994年1月起实行。

1月21—24日　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加强改进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素质。

1月23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和地。

1月24～29日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2月1～5日　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在北京举行两会工作性商谈。

2月3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自1994年3月1日起施行。

2月9日　邓小平同志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和部分老同志欢聚一堂，互致新春祝贺。

2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

2月15～24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主持国务院全体（扩大）会议，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科技、教育界人士、基层代表到中南海座谈，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2月16日　全国妇联七届二次常委会在京举行。会议就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做好非政府组织论坛的筹备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

2月25日～3月1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2月26、2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经济专题小组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对港英政府公开咨询的关于香港新机场管理和运作方式的《机场公司条例（草案）》修改意见和英方最近提交中方的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第四个财务安排方案，并提出了处理的建议。

3月3—5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社会及保安小组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26—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法律专题小组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29、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专题小组在京召开第六次会议。

3月4日　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7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与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代表座谈。江泽民要求重视和加强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贯彻好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要求各级党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全局，以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高度看待干部

教育工作，看待党校的重要作用。

3月8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持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3月10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开幕式由乔石主持。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去年的国内工作，提出了今年全党和全国工作方针，并对今年经济工作、勤政廉政工作、发展科教文事业、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3月1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增选了朱光亚、万国权为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补选朱训为秘书长，增选王蒙等7人为常委，并通过了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的政治决议。

3月22日　为期13天的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93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4年国家预算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经大会审议和修改获得通过。

4月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办公室副主任田野、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因窃取、刺探国家金融、经济秘密，分别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判处席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处田野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5月2日　中国银行开始在香港发行港币钞票，今年计划发行30亿港币。中国银行发行的港币钞票分别为1000元、500元、100元、50元和20元5种面值。中国银行参与港币发行，显示了对香港社会责任的承担，将对香港货币体系的平稳过渡以及香港的稳定繁荣起到积极作用。

5月12日　为期8天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对外贸易法和国家赔偿法，通过了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中国人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任命宋瑞祥为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家正为广电部部长，郭振乾为审计署审计长等议案。

5月13日 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在河南举行，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认真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唤。14日，焦裕禄纪念馆落成暨焦裕禄铜像揭幕仪式同时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烈士陵园举行，胡锦涛等参加仪式并瞻仰了焦裕禄烈士陵园。

同日　新华社报道：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警方两艘400吨级的巡务船日前完成对南沙群岛的首次巡弋任务。台湾当局重申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

6月9日 中纪委、监察部在京召开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电话会议，任建新在会上强调，要加大力度查处大案要案，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6月10日 中纪委和监察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辽宁省丹东市市长常义因不顾党纪国法，支持丹东市一些单位大量走私汽车，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月10日　辽宁省丹东市市长常义等少数市政府领导干部因同意一些单位走私大量汽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而被开除党籍，撤销丹东市市长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走私罪依法对常义逮捕归案。

6月17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致函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再次邀请辜振甫择地进行两会高层沟通接触。同日，海协会和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分别致函台湾海基会和海基会副董事长焦仁和，建议安排两会负责人和副秘书长、处长级会谈事宜。22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宣布两会商定公务人员入出境往来便利办法生效。同日晚间，台湾"陆委会"与海基会举行了"海陆两会高层联系会"，决定"陆委会"授权海基会7月在台北与海协会举行第五次事务性商谈。24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建议筹组"台湾新闻媒体负责人大陆参访团"来访。

6月18日　在京召开的中央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组织20个调查组分赴中央24个部委和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6月22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通报了去年以来全国禁毒工作情况，并布置了下阶段的任务。

6月2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胡锦涛等同志在京会见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代表，通过他们向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

7月1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北京正式开业。

7月3日　国务院就印发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发出通知。工业产业政策提出：为争到2010年使中国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5年年底前，国家不再批准新的轿车、轻型车整车项目。

7月4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7—9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钱其琛致开幕词，江泽民会见与会代

表。会议期间召开两次主任会议,确定了13名新增补委员,调整了各专题小组名单。

7月12日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当局《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发表谈话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7月21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对7月10日台风袭击中因台方抢救不力造成大陆渔业劳务合作工人惨死事件表示关切。

7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结束。

8月4～7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在台北进行会谈。两会就妥善处理两岸人员人身财产安全重大紧急事故、就解决两岸劫机犯等遣返事宜等三项议题的主要症结问题等充分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签署并发表了《海协与海基会台北会谈共同新闻稿》。

8月24—31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会议表决通过了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决定和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选择、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郑耀棠等32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案的决定》,还通过了任免名单。31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公布仲裁法和审计法,分别于1995年9月1日和1995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1月30日发布的审计条例同时废止。

9月15日 首都各界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40周年。

9月21日 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45周年。

9月25～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江泽民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9月29日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9月30日 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

10月1日 北京举行盛大游园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分别到公园,与40万群众欢庆节日。晚上,天安门广场举行大型国庆焰火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10万群众参加了联欢。

10月3日 北京举行纪念包尔汉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10月8日 为期3天的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闭幕。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十分及时,非常必要。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条例。

10月12～19日 江泽民在四川和湖北考察工作,并考察了三峡工程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他强调,现在我们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于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努力落实、落实、再落实。

10月21～27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母婴保健法和广告法,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的决定等文件。

10月23日 国务院召开的为期4天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确定了从1996年到2010年今后15年中国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会见了与会代表。

10月25日 原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原总参谋长杨得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同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2岁。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张全景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赵志浩同志任山东省委书记。吕枫同志和姜春云同志分别不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山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1月2日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经邓小平同志同意,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从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1月2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经邓小平同志同意,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从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同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中组部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学习的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落实。10日,电子版《邓小平文选》问世。

11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曾繁衍因索贿、受贿,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

11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近日发出《关于坚决防止和纠正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不正之风的通知》。

11月11日 中纪委、监察部就清理领导干部使用进口豪华车时限作出具体答复。

11月14日 厦门市郊遭台湾当局在小金门驻军炮

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重伤2人。15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厦门市效遭台湾当局在小金门驻军炮击事件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台湾当局这一行径，要求迅速查明情况，严惩肇事者。当天，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当局表示对厦门市郊遭炮击事件承担责任。

11月18日　邓小平大型图书展在澳门展览中心展出，澳督韦奇立等参加开幕仪式。

11月22～27日　海协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级事务性商谈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商，双方就两岸劫机犯等遣返事宜较为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11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近日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12月3日　国务院第27次常务会议在北京举行，原则通过人民警察法草案和票据法草案。

同日　为期4天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京闭幕。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要抓紧建设好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12月7日　4名在往返于北京至莫斯科之间的3/4国际列车上作案的"车匪路霸"在京被处决。

12月8～1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并部署了1995年上半年的工作。

12月9日　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江泽民、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听取第一讲。江泽民在讲座开始前讲话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贾志杰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安启元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

12月11日　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终年77岁。姚依林同志在住院和病重期间，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分别或托人前往看望。19日，姚依林同志遗体在京火化，江泽民、李鹏等前往医院送别，天安门、新华门等地下半旗致哀。

12月16～19日　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和全国编办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机关的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基本结束，地方机构和事业单位是明年机构改革的重点。李鹏会见了与会代表。

12月17日　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基地在京落成。

12月20日　中央军委隆重举行《聂荣臻传》出版发行暨纪念聂荣臻诞辰95周年座谈会，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出席，江泽民在讲话时高度评价聂帅的不朽功勋。

12月21～29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及其他决定和任免事项。会议决定1995年3月5日召开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29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2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组部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党支部的意见》

12月23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朱镕基出席出版座谈会并讲了话。

12月24日　回良玉任安徽省代省长。

12月25日　全面记述毛泽东军事活动的编年体著作《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出版。

同日　陈焕友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2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刘明祖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同日　《人民日报》首次正式发表毛泽东同志诗词二首《虞美人·枕上》、《七律·洪都》。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暨毛泽东诗词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2月27日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当局负责人连战关于"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是以经贸为主轴"的讲话发表谈话。希望台湾当局采取切实措施，取消影响两岸经济交流的种种限制。

12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程安东任陕西省代省长。

12月31日　江泽民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外听众及港澳台胞发表题为《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年讲话。

经　济

1月1日　中国外汇管理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集汇制；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流通；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客观调控。

1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决定，自今年1月1日起适当降低小汽车进口关税税率，同时调整进口小汽车减免税政策。

1月5－8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产品供给。

1月6日 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在上海宝钢召开。会上传达了李鹏对冶金工业的重要指示,要求冶金工业着重抓好品种质量。据悉,我国钢产量1993年已达到8867.6万吨。

1月12～15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月14日 我国发行第一笔10亿美元的全球债券。

1月17日 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关于第四个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谈判在北京结束,双方签署了中美纺织品协议谅解备忘录文本。

1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财政部继1月2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30亿元半年期非实物国库券之后,又决定二月份再向社会公开发行100亿元一年期非实物国库券。

2月1日 中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标志着中国核电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

2月28日 国国统计局发布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同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发布《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3月13日 国务院提出将以3月到6月期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检查。检查重点是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检查的范围是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有收费行为的行政事业单位。

3月23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和李鹏作了重要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李鹏指出:提高粮棉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控制价格上涨等。

4月5日 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从5日至8日在武汉召开。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物价局要认真研究国务院制定的各项价格调控措施,坚决抑制物价过度上涨。

4月7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对食盐实行专营。近年来,劣质盐、非碘盐冲击食盐和碘盐市场。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素质的提高,实行食盐专营,有利于实现食盐全面加碘,实现到2000年消灭碘缺乏病的目标,从今年起,食盐的生产、批发都将实行许可证制度。

4月8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朱利发表谈话说:中国将暂停审批成立新的期货交易市场和经纪机构,取缔非法期货经纪活动,对现有的各种期货交易机构进行严格审核,重新登记注册。为保证期货市场的试点工作健康进行,国务院同时还作出了三条规定。

4月12日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称: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成熟,股份制处于试点阶段,对股票转让的计算、征税办法和纳税期限的确定都需要深入研究,因此,今明两年对股票转让暂不征税。

4月13日 为有效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成立,姚振炎出任首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4月22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朱利透露,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作出了停止钢材、食糖、煤炭期货交易的6条具体意见。

4月26日 朱镕基在浙江省考察时强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粮食购销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合理的粮食价格,他要求国有粮食部门将政策性与经营性两个部分从业务上、机构上分开。

4月28日 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佟志广任董事长,雷祖华任行长。

5月13日 发生在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的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件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8名罪犯被判有期徒刑。

5月15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强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活动,必须报国务院审批,未履行报批手续的,立即停止交易,补办手续。地市级以下人民政府不准组织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活动。

5月17日 国家计委通报的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显示,总体态势趋好,工业生产、投资、物价等都在高水平上稳中有降。

6月5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换版的公告。经国务院批准,1994年7月1日起,全国将统一使用新版专用发票。

6月6日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大力查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要求,今年要把贪污贿赂,金融诈骗,走私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作为重点来抓。

6月21日 全国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于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金融宏观调控权集中在中央。当前要从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维护金融秩序,对违法设立和越权批准的金融机构认真清理,整顿,所有的金融机构的设立都必须经过人民银行总行的批准。

同日 "八五"重点工程"引大入秦"总干渠贯通。

7月5日 中国海关总署据《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决定:对进口汽车、摩托车的税收和管理实行新规定。

同日 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决定》三部法律。

7月16日　李鹏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7月29日　国务院召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

8月2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8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邹家华在交通部、公安部召开的电话会议上提出采取坚决措施治理公路"三乱"。

8月15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8月18～19日　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8月21日 浙江省温州、台州等9个地市共40多个县市遭17号台风袭击，损失严重。24日，党中央、国务院致电表示慰问。中央工作组于23至25日深入灾区，了解灾情。

8月29日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9月6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9月16日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兰新铁路复线提前全线铺通。邹家华等出席通车典礼。这条长达1622公里的铁路复线全面投入运营后，将使大西北铁路运输的"瓶颈"制约大为缓解。

9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发出关于开展1994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9月20日 宝钢三期工程的第一个大项目——宝钢三号高炉建成投产，标志我国大型高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0月4～6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4年会在马德里举行。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发言，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经济看法，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情况。

10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就切实做好1994年度棉花购销工作发出通知。通知说，国务院决定，当前不放开棉花经营、棉花市场、棉花价格，继续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由供销社统一经营。

10月10日　甘肃引大通河水入秦王川的自流灌溉工程，经18年奋战，总干渠全线通水。

10月10～15日　李鹏在辽宁考察工作，他再次强调，要集中力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就进一步加强药品管理工作发出紧急通知。

10月25日 我国内湖第一长桥太湖大桥正式通车。大桥全长4308米，181孔，桥面宽12米。

10月26～29日　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朱镕基主持会议，胡锦涛代表党中央作重要讲话。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与会代表。江泽民强调，要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在经济工作首位。

11月2～4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指出，企业改革是明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11月3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确定国内百户企业进行试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

11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现金交易。

1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历时16年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近日圆满完成。资料表明中国土壤资源不少于132亿亩。

11月9日　国务院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和加强现金管理的通知》。

11月9日　新华社报道：由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发布的《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1月9～10、11～12、13～14、15～1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经济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社会及保安小组第七次会议、文化小组第七次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1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劳动部日前就严格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提出措施，并要求各地劳动部门执行。

11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李鹏的文章《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同日　由团中央和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杰出(优秀)青年企业家评选活动揭晓。89人被评为优秀青年企业家。

11月13～15日　第二届全国乡镇企业表彰会在京召开。

11月14～20日　机械工业部在京召开当代国际轿车工业发展与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会。

11月15日　吉林市银都夜总会发生大火殃及市博物馆，七千万年前的恐龙化石遭焚，部分文物字画付之一炬。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1994年1至11月已达2002.8亿美元。

11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组建

的又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日前正式成立。

1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事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和加强现金管理的通知》。

同日　被列为交通部和山西省“八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风陵渡黄河公路大桥通车。大桥全长1410米，为特大型公路桥。

11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决定外汇兑换券1995年1月1日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并限期1995年6月30日之前，境内外持券者办理完兑换事宜。

11月24日　总投资逾15亿元的南京汽车制造厂引进意大利菲亚特集团依维柯轻型汽车项目建成，通过国家验收。本项目年产整车和发动机各6万辆(台)。

11月25日　燃烧了38天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油井大火被扑灭。

11月26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湖北隔河岩水电站建成投产。电站总装机容量121.1万千瓦，总投资36亿元。工程改善了清江航道90公里。

同日　铁道部在山西嘉峰站举行侯月铁路全线铺通庆祝活动。国务院发了贺电。侯月铁路西起山西侯马市，东至河南月山，全长256.6公里，为电气化复线。

11月28～12月1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水果生产国。1993年全国人均水果占有量达25.4公斤。

同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94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评选活动在京揭晓。

12月7日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城市高架快速干道——上海内环线工程全线通车。全线长48公里，设计车速每小时80公里，并配套建设4座大型互通式立交桥。

12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以技术贸易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中技集团在京成立。李鹏题词祝贺。

12月9日　新华社报道：财政部驻各地监察办事机构1995年正式运转，以强化中央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调控和监督管理。

12月10～13日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作报告时提出，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环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实现1995年宏观经济目标。

12月12日　上海地铁一号线全线通车。全线长16.1公里，日客运量可达百万人次。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1994年1月11月已达2002.8亿美元。

12月14日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李鹏出席开工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

12月15～17日　李鹏在湖南考察时指出，各地要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切实把农业搞上去。

12月16～20日　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书记处书记吴邦国谈1995年全国经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抓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加强国民经济运行综合协调。

12月20～23日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内贸部近日就批发市场的名称问题作出规定，将全国批发市场名称统一为分“中心批发市场”和“地方批发市场”两类。

12月22日　广深准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全线长147公里，时速可达160公里。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钢产量1994年已突破9000万吨。

同日　国务院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发布中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结果：至1992年三产单位2184万个，其中企、事业单位495万个，城乡三产个体户1689万个，三产从业人员过亿，增加值9000亿元。

12月30日　国家统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199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43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12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5年1月1日起，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在现行利率基础上平均提高0.24%。

军　事

4月5日　1994年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国务院军转工作小组组长、人事部长宋德福指出：要把师团职转业干部作为安置重点，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好他们职务，要努力把转业干部的住房问题解决好。

10月7日　中国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10月8日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张树田等15名同志晋升为武警中将、少将警衔。授衔仪式在北京举行。

10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最近发出《关于1994年冬季士兵退出现役工作的通知》，对退伍军人安置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1月2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俄罗斯海军司令格罗莫夫一行。

11月4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了印尼陆

军总参谋长维斯莫约。

1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女队在国际军事五项锦标赛上夺得团体冠军，男队获得亚军。

11月15～17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写完成，编委会顾问审稿会议在京举行。刘华清、张震为该书题词。

12月15日 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一行6人奉调回国。

外 交

1月7日 外经贸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美国单方面宣布削减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配额提出严正抗议。

1月13－18日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江泽民和万里先后会见布什一行。

1月16～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前往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三国进行了为期15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2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还说，港澳如与台湾安排跨越1997年或1999年的三地航运，英葡需事先同中国政府磋商。

2月4日 中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李永谦就布政府2月2日与台湾恢复所谓外交关系一事向其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中止同布的外交关系。5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关系发生逆转是中国方面所不愿看到的，责任完全应该由布政府承担。

2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台湾李登辉计划于春节期间前往印尼、泰国"度假"一事答记者问时说，如果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政府接受李登辉访问，将损害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2日，外交部就印尼和菲律宾接受李登辉往访和经停一事，分别召见印尼和菲律宾驻华使节提出了抗议。17日，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李登辉访问泰国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中国外交部已经就此向泰国方面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2月15－22日 中国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小组和哈萨克、吉尔吉斯、俄罗斯和塔吉克4国政府边界谈判联合代表团工作小组第12次会议在京举行。

2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方面向台湾出售武器。发言人还说，日本的一本刊物载文所说"中国认为日本是'二十年后的主要敌人'"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极少数人的蓄意挑拨，中日世代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发言人还对朝鲜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发表谈话说："我们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这再次表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对话。

2月23日 应日本国政府的邀请，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离京赴日访问。

2月25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三大问题工作小组第11次会议在澳门举行，双方就解决澳门过渡期公务员、法律本地化以及中文的官方地位三大问题进行了磋商。

2月2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布了中英关于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会谈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

3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近来都表示要永久性地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这一想法是明智的。发言人说，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实际上是侵犯人权。

3月18日 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15日至18日在日内瓦举行第16次会议，审议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绝大多数代表明确表示希望尽早结束关于中国"复关"谈判，使中国在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同时成为定于明年初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创始国成员。会上欧共体向中方提交了一份中国"复关"议定书草案，这被认为是标志着实质性谈判的开始。

3月19日 日本首相细川护熙从19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江泽民主席会见了细川护熙首相。李鹏总理与细川首相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世界形势、两国的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3月25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朱育诚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港英当局最近同意修订《新界土地(豁免)条例》(草案)一事发表谈话指出，新界居民的继承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应由中英双方通过外交磋商加以解决。28日，香港新界乡议局致函港督彭定康，表示反对修订《新界土地(豁免)条例》(草案)。29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新界居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保护。

3月26日 大韩民国总统金泳三抵达上海，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金泳三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访华期间，江泽民、李鹏、乔石分别会见了金泳三总统。江泽民在会谈中强调指出：处理朝鲜半岛问题要以维护发展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个大局出发，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应该在四方三边对话框架内通过对话妥善解决。会谈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中韩两国关于对避免双重征税和防偷漏税的协定以及中韩文化合作协定。

3月26－30日 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金泳三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金泳三。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随同来访的韩国外务部长官韩升洲举行会谈。28日，中韩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等文件。28日和29日，金泳三先后在北京发表演讲和举行记

者招待会。

4月4—8日 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伊萨亚斯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会见伊萨亚斯。4日,中厄签署中国政府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供贷款协定等文件。

4月18日　李鹏总理对中亚4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纪元。中国还先后与这些国家签署了经贸合作等多项文件。

4月21—23日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穆巴拉克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和朱镕基代总理分别会见穆巴拉克;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与随同穆巴拉克来访的埃及外长穆萨举行会谈。21日,江泽民接受埃及《金字塔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采访。同日,中埃两国签署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等文件。

4月23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电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同日,朱镕基副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也分别致电,对尼克松逝世表示哀悼。27日,钱其琛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吊唁尼克松逝世。

5月1日 法国经社理事会主席马泰奥利一行自4月26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荣毅仁副主席、李瑞环主席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马泰奥利一行。

5月2—21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比利时。访问期间,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总理阿霍,瑞典首相比尔特,挪威代首相戈达尔,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比利时首相德阿纳等先后会见李瑞环。李瑞环先后会见5国议会领导人,并同5国外长、外交大臣或议会领导人先后举行会谈。9日和18日,李瑞环先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表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现代化建设》的演讲。

5月3—7日 肯尼亚总统莫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莫伊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会见莫伊。6日,中肯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等文件。

5月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5月3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一事指出,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早有定论,并对某些日本内阁成员公开篡改历史、否认事实,为日本军国主义辩解的行径表示愤慨。

5月5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奉命就美国《1994年和1995年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中含有多项反华条款一事向美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5月19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台湾声称准备接受南非对海峡两岸的双重承认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又一个阴谋。

同日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发言人就越南报纸4月25日发表文章。称美国克里斯通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签订的"万安北－21"石油勘探开发合同"侵犯了越南的主权"的言论发表谈话指出,1992年中美签订的"万安北－21"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该合同区位于中国主权管辖的南沙群岛海域范围之内,对越方的指责,我公司完全不能接受。

5月26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决定延长1994年至1995年度中国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同日　俄罗斯联邦主席切尔诺梅尔金于26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江泽民、李鹏会见了切尔诺梅尔金主席。双方就中俄国界管理制度和经贸、科技合作签定了协定和议定书。

5月27日　我国外交部就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延长1994至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事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并要求美国解除所有对华制裁。同日,外经贸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只要排除人为障碍,中美经贸关系就一定会进一步发展。

5月27—31日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赴京考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在京期间,刘华秋副外长、陈慕华副委员长和中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委会主席、国务委员彭珮云先后会见蒙盖拉夫人。29日,蒙盖拉夫人在京接受记者采访。

6月21—30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29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会上,中英双方代表就目前香港用于防务目的的土地的前途问题达成了协议。

6月28日　李鹏总理前往奥地利、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三国进行正式访问。

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特命全权大使朱国清和安道尔公国外交部长马克·维拉·阿米戈,在安道尔签署建交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8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逝世。

7月9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联名致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对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不幸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诚挚的慰问。

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前往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沉痛悼念金日成逝世。

7月12日 李鹏总理自6月29日至今访问奥地利、德国和罗马尼亚。访问期间,李鹏先后同奥总统克莱斯蒂尔、总理弗拉尼茨基,德总统赫尔佐克、总理科尔,罗总统

伊利埃斯库、总理沃克罗尤以及3国议会领导人举行会谈或会见，深入交换意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陪同李鹏总理访问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家也先后同3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家进行对口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合同、协议和意向书。1日，李鹏在维也纳就中国国内形势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接受奥新闻单位记者的采访。5日，李鹏应邀在波恩向德工商界发表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德关系》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国发展对德关系的4项原则。6日，李鹏在波恩接受德国电视二台记者采访，就广泛问题回答了他的提问。9日，李鹏在慕尼黑就中德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接受德《商报》主编谢费尔的采访。11日，李鹏在罗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时提出中国同东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政策。12日，中罗两国签署《中罗关于相互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等文件。同日，李鹏在布加勒斯特接受罗新社等7家当地新闻记者的采访，就欧洲之行、中罗关系等广泛的国际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7月22日　中国常防联合国代表李肇星约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奉命就尼加拉瓜等少数国家要求在第49届联大议程中列入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议题事面交了有关信件，郑重阐明了中国政府立场。

8月27日　美国商务部长布朗来华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

9月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香港问题和有关美国“95美国海外活动拨款法”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港英的三级政治架构，即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区议会，只能存在到1997年6月30日，这是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届时终结的必然结果。发言人还说，美国总统8月23日签署的“95年海外活动拨款法”是一项带有政治歧视性的对中国极不友好的法案，它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污蔑，严重违背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9月2～12日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江泽民主席对俄乌两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9月10日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约见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奉命就美国提高美台关系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9月14～17日　应中国政府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9月14～17日　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匈牙利共和国总统根茨·阿尔帕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9月19～24日　应李鹏总理的邀请，斐济共和国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少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9月26日　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与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在联合国举行会谈，就中日关系的最新事态发展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10月3日　社民党第3党联盟候选人卡多佐当选巴西总统。

10月3～4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美国。

10月5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港督彭定康当天发表的1994年施政报告的内容发表谈话强调，希望英方真正拿出合作诚意。

同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台湾势力租用香港市政局所属的文化场所举办“双十节”庆祝晚会的问题发表谈话说，港英当局如允许台湾借文化中心举行所谓的庆祝活动，是与英方强调的中英合作背道而驰的，希望港英悬崖勒马，不要再挑起新的争论。1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港英当局允许台湾势力在港府辖下官方场地举办活动，违背了英方关于“一个中国”的承诺。对此我们表示愤慨。

10月7～10日　捷克总理克劳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克劳斯会谈，江泽民主席会见克劳斯。

10月10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今年3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

10月10～16日　塞拉利昂国家元首斯特拉瑟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斯特拉瑟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会见斯特拉瑟一行。

10月15～19日　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江泽民主席先后会见佩里一行。

10月20～26日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蒙博托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先后会见蒙博托一行。

10月24～26日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卡里莫夫会谈；李鹏总理会见卡里莫夫。中乌签署了两国关系基本原则声明。

10月25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中美两国政府1992年1月17日签订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10月25—28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在澳门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

10月26—28日 中、俄以及亚洲5国的铁道（运输）部长在北京举行会议，并就确保“大陆桥”客货的无阻运输签署联合公报。28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代表。

11月1～15日　李岚清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

11月2～7日　意大利外长马尔蒂若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马尔蒂诺；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马尔蒂诺举行会谈。

11月2～29日　乔石委员长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并于回国途中顺访斐济。

11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

的同时就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最近在纽约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晤时表示愿意改善中英关系、加强中英合作一事发表谈话说，希望英方多做真正有益于双边关系改善的事。

11月4日　李鹏总理自10月31日至今访问韩国。这是中韩建交以来中国总理首次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自10月28日至今访问日本。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机场委员会就香港新机场及机场铁路总体财务安排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3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对香港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中英双方就香港新机场整体财务安排达成协议，对香港的民生和经济发展有利，希望涉及跨越1997年的重大问题都应经中英双方磋商。17日，中英土地委员会举行第29次会议，就新机场和机场铁路批地计划安排、补充批地计划，以及开发土地平均成本达成协议。

11月5～10日　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克雷蒂安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和邹家华副总理先后会见克雷蒂安。

11月6～14日　苏丹外长萨利赫访问中国。访问期间，荣毅仁副主席会见萨利赫；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萨利赫举行会谈。

11月8～22日　江泽民主席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并于15日在印尼茂物参加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月9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黑格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港英立法机关以“午夜立法”方式解决法律适应化问题发表谈话说，如何解决香港原有法律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问题，完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由港英的立法机关“午夜立法”替代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是越权行为。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还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和促进半岛的无核化做出自己的努力。

11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欢迎伊拉克正式承认科威特主权和科伊边界。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六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国台北和香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地位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出，中国台北和香港是作为地区经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

11月16日　中美民用航空技术合作协议在北京签署。

11月20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出席“中资机构同乐日”时回答记者提问说，越南船民问题是英国政府加在香港市民身上的负担，中方希望英方尽快把问题解决。24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英方能在1995年底以前解决滞留在香港的越南船民问题。

11月28日　中国政府作出决定，提出1994年年底前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时限。这一决定当天由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等作了通报。

12月2～8日　巴基斯坦总统莱加利访问中国。

12月4日　冰岛总理奥德松自11月27日至今访问中国。

同日　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

同日　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就中国复关问题举行新一轮实质性谈判。双方就中国政府提出的年内结束实质性谈判的最后期限进行了激烈的交锋。8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执行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并决定世界贸易组织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成立。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应尽早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12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复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从13日起，关于中国复关问题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交叉进行。20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会议在日内瓦结束，由于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蓄意阻挠，中国复关协议未能达成。谷永江在会上发言重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决不会为复关不惜一切代价。同日，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中国复关谈判未达成一致深表遗憾，强调中国将继续扩大同各国的经贸合作。

12月13日　南京市各界人士集会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

同日　世界海关组织政策委员会第3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中国海关高层次地参与世界海关组织事务的一个开端。

12月14～16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3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2月16～21日　乍得总统代比访问中国。

12月17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欧洲议会同意资助在香港成立“人权中心”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12月18～23日　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访问中国。

12月2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有关中国与印度将于明年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12月2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对美方使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断一事表示遗憾。29日，

发言人就中美两国未能在知识产权谈判中达成协议，美方扬言将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一事发表评论说，中美谈判的大门是继续敞开的，但必须是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制裁相威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2月26～28日　李鹏总理访问缅甸，这是13年来中国政府首脑对缅甸的首次访问。

12月30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举行新年招待会，款待各国驻华使节。

12月31日　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指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破裂责任在美方，希望美国纠正对华贸易报复的做法。同日，中国外经贸部公布拟对美贸易反报复清单；中国国家版权局发言人指出，中国在版权保护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美国方面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文化教育

1月11日“全国教育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2月8日　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成功。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祝贺。15日，新华社报道：搭载的“实践四号”卫星近日向地面发回的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这次搭载发射已取得圆满成功。

2月21日　国家863重点攻关项目——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成功地实现了饱和振荡，在京通过技术鉴定。

2月26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医疗机械管理条例》，自9月1日起施行。

3月1日　中国科协四届四次全委会议自2月27日至今在京举行。朱光亚作工作报告，温家宝在大会上讲话。

同日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京召开邓小平教育思想研讨会，李岚清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月9日　我国申办联合国国际疫苗研究所委员会在京成立，陈敏章任主任。

同日　中宣部召开出版界座谈会，提出要提高质量、繁荣出版，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强调要全面落实江泽民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任务。

3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正式颁发《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实施。

同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自1994年3月14日起施行。

3月18日　1993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会见部分获奖者代表。获奖项目781项，其中自然科学奖52项，发明奖17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441项，国家星火奖113项。获奖者共4484名。

同日　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3年度）在京揭晓。李仙花等17名剧坛新秀获奖，茅威涛、刘芸再次申评“梅花奖”，获“二度梅”奖。

3月20—22日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确认：199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9‰，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使我国跨入了低出生率国家行列，但我国人口出生的绝对数仍很大，不容乐观。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党政第一把手应亲自抓这项工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属于政府调控的职能。李鹏也在会上讲了话。

3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经专家考证，墓主为西汉大数学家张苍。这项成果不仅解决了悬疑的考古难题，而且为我国数学史添加了重要一页。

3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江泽民、李鹏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已分别刻制成碑，保留在黄帝陵碑廊中。

3月28—31日　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在厦门举行。会议提出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初级卫生保健和预防保健。

4月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日前决定，在全国各族青少年中开展“到阳光下，到操场上，到大自然中去陶冶身心”的活动，以促使青少年强健体魄、陶冶情操。

4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2月8日发射的“实践四号”空间探测卫星经过2个多月的安全运行，星上服务系统工作全部正常，用于空间环境探测与环境效应研究的全部有效载荷均取得了重要数据。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奖评奖结果日前在京揭晓。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的《西厢记》等3个戏曲获得文华奖大奖。《一夜皇妃》等25个剧目获“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新节目奖”。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最近完成的对河北阳原县小长梁遗址的石器发掘研究，证实人类起源的地点在亚洲，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应往前推至距今四、五百万年前。

4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国家教育督导团已于近日成立，国务院任命柳斌为第一任总督学。

4月15日　中宣部召开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及部分编辑记者座谈会，强调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龚心瀚，中纪委常委王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25日，新华社报道，中宣部日前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坚持不懈地抓好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4月18日 中美两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圆满地实现了“航天－航空－地面”遥感平台三位一体的立体实时观测。

4月20日　中国运动员王军霞等通过国际田联飞行药检。

4月23日 卫生部、人事部召开表彰大会，将首枚“白求恩奖章”授予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赵雪芳，李鹏为此题词，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正式公布天体观察信息，今年7月17日至24日期间，“苏梅克－利维”彗星将撞击木星，在我国可以观察到5次撞击，人类将第一次目睹天体相撞的景象。

4月23－25日 李岚清在天津视察工作时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出路。

4月27－30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新闻队伍建设。

4月29日 1993年电影政府奖在京揭晓。《凤凰琴》获最佳故事片奖，李保田获最佳男演员奖，潘虹获最佳女演员奖。共有15部电影分获各项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最近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今年将在37所院校试行。

5月5日 由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发起的“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即日起在全国各地展开。

5月7日 中宣部邀请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界等15个部门负责人座谈，就《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修改意见，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主持了座谈会。

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日前宣布：决定共同建设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外语大学三所重点高校。

5月15－20日 我国中学生代表队在塞浦路斯举行的第10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13枚金牌，与意大利队并列第一，还夺得8枚银牌和3枚铜牌。

5月20－23日 全国新闻资料工作者协会新闻资料分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要加快新闻资料工作现代化建设。

5月20－22日 中国在英国匹兹堡举行的第10届匹兹堡国际发明与新产品博览会上获得7项金奖、5项银奖和9项铜奖(不包括台湾省获奖数)，是参赛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英国43个州中获奖最多的国家之一。

5月24日　江泽民总书记为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起的“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题词，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立，做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5月27日 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新的上海大学正式成立。江泽民题写校名，李鹏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世纪人才”。

同日　中国天津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学生小组在伦敦举行的第5届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中夺得这次竞赛的大奖。本次竞赛共有49个国家的186所大学1700多名学生参赛。

6月2日 中宣部召开座谈会，就“五个一工程”入选剧目《旮旯胡同》进行座谈，指出《旮旯胡同》的成功在于反映了时代和群众的声音。

同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山东省汶上县在维修重点保护文物——太子灵踪塔时，新发现佛牙舍利等141件珍贵文物。据出土的铭文记载，这批文物是882年前北宋时所埋藏。

6月3－8日 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在京同时举行。江泽民、李鹏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会见了两院院士。7日，中国工程院选举产生主席团，朱光亚为执行主席，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卢良恕为副院长。8日，中科院选举产生首批外籍院士。同日，两院大会闭幕，宋健代表国务院祝贺大会的圆满成功并讲了话。中国工程院是全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首批96名院名已产生。

6月8、9日 李鹏和李岚清先后与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中央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大、政协的教育界代表进行座谈，征求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报求(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同日　1993年度陈嘉庚奖举行颁奖仪式，吴文俊、唐敖庆等7位科学家分获数理科学、化学等项奖。

6月8日　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闭幕。巴顿(英)、李政道(美)、李约瑟(美)等14位对中国科技事业作出贡献的学者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与此同时，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

6月12日 第12届世界女篮锦标赛在悉尼落幕，中国队获得亚军。冠军为巴西队，美国队名列第三。中国队的郑海霞被评为本届比赛唯一的最佳运动员，国家体委、全国体总致电祝贺女篮取得的好成绩。

6月13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正式发布实施。

6月14日　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李鹏提出本世纪末必须重点做好三方面的教育工作。朱镕基作了报告。

6月14—17日 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作主题报告。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出席。会议要求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努力为繁荣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6月16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

6月18日 全国"两基"督导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岚清会见国家督学并讲了话。

6月20日 紫金山天文台发布修正后的苏梅克－列维9号慧星撞击木星的最新预报时间为：1994年7月17日北京时间凌晨4时20分至7月22日15时40分依次和木星发生碰撞。

6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国家教委和团中央近日联合发出《关于1994年暑期高等学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组织好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6月23日 中组部、中宣部等联合主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

6月24日 '94大学毕业生之夜文艺晚会在京举行。李岚清会见大学毕业生代表。

6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李岚清近日致信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会议，强调美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7月3日 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J"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

7月5日 为在教育系统执行每周44小时的工作制，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国家教委决定从今年秋季开始对中国普遍中小学教学计划进行调整。

7月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适应每周44小时工作制，减轻师生负担，全国中小学今秋开始实行新教学计划。

7月5—7日 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议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

7月7—8日 中宣部在京召开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工作会议。8日，1993年度"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和入选作品在京揭晓。北京、山西等10个省市的党委宣传部获组织工作奖；《旮旯胡同》等15部戏剧、《凤凰琴》等8部电影、《北京人在纽约》等21部电视剧（片）、《中国有个毛泽东》等20部图书及《论毛泽东的现代化观》等20篇文章获奖。9日，中宣部在京召开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座谈会。中宣部长丁关根在座谈时指出，"五个一工程"要高标准、上水平，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7月7—16日 文化部派出19名艺术家赴延安慰问演出。

7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于近日成立。

同日 我国选手在第六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三枚金牌、一枚铜牌。同日，我国参赛的4名选手获得第二十六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12日，第二十五届国际物理、第三十五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分别在北京、香港开幕。18日，中国选手摘取物理竞赛的四枚金牌、一枚银牌。19日，中国队以三枚金牌、三枚银牌的成绩获得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团体总分第二。26日，我国中学生代表队参加国际数、理、化、信息、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载誉归来，共获金牌十三枚。李岚清在欢迎会上向获奖学生及他们的老师表示热烈祝贺。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盐湖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对可可西里无人区出土的9件人工打制石器鉴定后得出结论：可可西里无人区在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人类活动。

7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建立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负责研究协调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有关问题。

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考古人员最近在滇西腾冲县境内发现一处古代文化遗址群，初步认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过渡到青铜器时代中期的村落遗迹，距今已4000年。

7月21日 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把亚太通信卫星公司的"亚太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陕西考古工作者最近在秦始皇陵东上焦村已发掘的8座陪葬墓的研究中，发现了秦始皇公子、公主被肢解的尸骨，他们是秦末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历史的见证。

7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著名考古专家、秦陵博物馆馆长袁仲一经过20年的研究查证，日前终于从已出土的7000余件秦俑的腋窝处和衣裙下，查找到85位秦俑作者的姓名，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高原南部和东部一带，发现了一批西藏远古时代的石棺墓葬。

7月29日 全国边境文化长廊建设现场会在延吉召开。吉林省珲春市等16个地区和单位受到文化部的表彰和嘉奖。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发现的赣北陈家墩聚落遗址出土的上百件测量、掘井工具以及汲水器具，是中国最早的测量工具。

8月1—5日 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天津举行。徐惟成、于友先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8月2日 卫生部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召开的“世界母乳喂养月研讨会”在京举行。

8月3日 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兰州开会，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22日，李铁映专程看望研究院工作人员。

8月3—4日 李岚清在河北主持召开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座谈会，提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难度再大也要尽力解决。

8月5日 江泽民会见“学科前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优先资助领域战略国际研讨会”的部分境外科学家，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卫星专家在最近发射的第16颗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了全姿态捕获卫星新技术并获得了成功。

8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青年科技人员黄培劲攻克了杂交水稻制种中“花期花时不遇”和“产量不高不稳”的世界性难题，使大面积制种亩产提高了150公斤。

8月7日 我国杰出的美术教育家、艺术大师刘海粟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8月8日 国家拨巨额资金，施工长达6年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全面竣工。

8月11日 中国科学院现代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8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最近被第三世界科学院选定为该院的同步辐射研究中心。

8月15日 第三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京开幕。李瑞环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演出。16个国家的400多位民间艺术家参加了本届艺术节。

8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内部报刊管理的通知》。

8月18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新华社报道：第四届中国新闻奖近日揭晓。共有160件作品获奖。

8月18—28日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举行。李瑞环宣布艺术节开幕。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祝贺。江泽民、李鹏为艺术节题了词。艺术节中正式演出了32台中外剧目。

8月21日 敦煌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落成。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和李铁映出席了竣工典礼。

同日 首期新批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出版单位开业前社长、总编辑培训班结束，标志着我国出版界开业前主编培训制度正式实行。

8月22日 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性民办教师评选——“健风杯”全国十佳优秀民办教师评选在京揭晓。张广森等30位优秀民办教师受到表彰和奖励。李岚清致信祝贺。

8月23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残疾人教育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8月23—28日 第2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重庆谈判》等四部电影获奖，王学圻、潘虹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舒适、曹熙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张笑天获最佳编剧奖。

8月2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8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组织实施。

8月28日 中国“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成功地把“澳星B_3”通信卫星送上预定轨道。

8月29—31日 全国卫生援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同日 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在京举行。丁关根在会上强调，出版业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出版业的繁荣、健康、发展。

9月1日 ’94中国国际儿童艺术节在京举行。

同日 国家教委、中国残联在京举行座谈会，提出认真实施《残疾人教育条例》，发展残疾人教育。

9月1—6日 第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海关总署日前发出公告，海关将从9月15日起，在进出境环节实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9月4日 全国职业培训优秀教师和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大会堂举行。共有420名优秀教师和工作者受到表彰，邹家华代表国务院表示祝贺。

9月4～10 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是历届远南运动会中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9月6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厉打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和非法出版物。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精心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

意见》。

9月14日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大会中国组委会在京成立，罗干任主席、刘忠德任执行主席。

9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团中央、国家科委日前联合作出决定，表彰1993年度优秀“青年星火带头人”，徐长元等10名当选。同时受表彰的还有51个活动组织先进单位。

9月22—26日 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在唐山举行。李岚清在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国家教委表彰全国农村教改先进单位。

9月23日 马高亚洲杯“建国45周年体坛四十五英杰”评选揭晓，吴传玉、郑凤荣等获奖。

10月2～12日 第十二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中国运动员夺得137枚金牌、92枚银牌、60枚铜牌，先后打破21项世界纪录、40项亚洲纪录，名列奖牌榜第一。韩国队得金牌63枚，名列金牌榜第二；日本队得59枚，列第三。

10月4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祖国万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

10月5～8日 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出席了会议。李瑞环在开幕式上说，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儒学加以总结，为现实服务。李岚清在会上作了发言。江泽民7日会见了部分与会代表。

10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日前正式起动。

10月8日 为时一周的第六届全国书市在武汉开幕。

10月8日 1994年中国音像博览会在京举办。

10月8—17日 第六届全国书市在武汉举行。书市期间，订货逾2.2亿元，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

10月9日 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屠铭德在广岛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名古屋决议的实质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办事。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第十四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15日，第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评选揭晓。

10月14日 中宣部和国家教委在北京举行新时期创业精神报告会。陕西延安地区山村小学教师王思明介绍了他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

同日 秦始皇兵马俑2号坑发掘现场正式向中外人士开放。李铁映为开放典礼剪彩。

10月15日 第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在京揭晓。《北京人在纽约》等9部电视剧、戏曲片获奖。姜文、王姬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六小龄童和刘蓓分获男女配角奖。

10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考古工作者在秦陵考古工作中，相继发现修秦陵人员墓葬群，证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修秦陵的记载确有其事。

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新疆交河故城考古工作者最近发掘了两座车师国贵族墓，出土3枚海珠和5枚舍利子。

同日 乔石出席在京举行的中瑞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10月18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画册》在京举行首发式，邓小平题写了书名。

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近日在使全国部分省市“普九”工作汇报会上宣布：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率先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会上还提出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和步骤。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超精密工业控制计算机“天神一号”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诞生，日前通过技术鉴定。

10月20日 北京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参加第十二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健儿凯旋。李鹏、李瑞环、刘华清、荣毅仁等亲切接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10月20日 厦门举行纪念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诞辰120周年大会。李岚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席大会，并参加集美大学校牌揭幕典礼。21日，首都集会纪念陈嘉庚诞辰120周年，李瑞环、荣毅仁等出席。

10月21日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及青年教师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230名青年教师获此项奖，杨尚昆、霍英东等出席了仪式。

10月28日 首都纪念叶圣陶100周年诞辰。

10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决定，授予我国文化界、电影界老前辈夏衍“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当天，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前往医院看望夏衍并向他致贺。

11月1日 中科院召开建院45周年茶话会，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会上讲了话，勉励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11月5～11日 第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长沙举行。8月，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揭晓。《凤凰琴》获“双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李保田、潘虹分获“双奖”的最佳男女主角奖。

11月7日 新华社报道：记者近日从敦煌研究院获悉，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的大批遗迹遗物证实为昔日僧人、画匠起居生活、坐禅、礼佛、存储粮物、埋葬遗骨的场所。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最近揭晓，徐福铎等11人获奖。

11月7～10日 第二届南北基因组大会在北京举

行。7日，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与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一行。

11月7～12日　第六届中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来电祝贺。

11月8日 宋健在全国知识产权协调指导机构工作会议上强调，严厉查处知识产权侵权活动。

11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闻出版署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挂历出版销售管理，并对12种违反出版规定的挂历进行了严肃处理。

11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人事部近日发布了《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到非教育系统工作暂行办法》。

同日　第四届文华奖在京颁奖。《西厢记》、《山歌情》、《大河谣》三部地方戏曲获得本届文华大奖。另有25个剧目、节目荣获“文华新剧目奖”、“文华新节目奖”，72名艺术家荣获文华各单项奖。

同日　国际排联公布当今男女排球世界十强评选名单，中国女排位居第五，男排与十强无缘。

11月11日　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在京举行表彰大会，表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15家优秀出版单位。

同日　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山歌情》、《大河谣》等14部作品获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近发出通报，对东方高级决策管理学院擅自与境外机构联合办班而授予的学位不予承认，并对此事进行了严肃处理。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管理，防止以赢利为目的。

1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首台无缆水下机器人“探索者”号研制成功，日前通过专家验收。

11月12—17日 第五届上海电视节在沪举行。本届“白玉兰奖”共评出了8项大奖，中国演员孙敏获最佳男演员奖，上海电视台拍摄的《茅岩河船夫》获最佳短记录片奖，其余6项奖分别为德、日、斯洛伐克、英国所获。

1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国家教委最近发出通知，决定今年安排15万名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

11月14日　中国CIMS工程研究中心获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国际大奖——“大学领先奖”。

11月14～20日　1994年世界体操团体锦标赛在德国多特蒙德市举行。中国体操男队荣获世界冠军，中国女队名列第四。

11月15日　吉林市银都夜总会发生大火殃及市博物馆，七千万年前的恐龙化石遭焚，部分文物字画付之一炬。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发明家刘光辉首创的高强防潮装饰石膏板研究成功。这是中国建筑装饰材料研究的重要重大创新，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11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学生司近日宣布：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89.5万人，40所高校招生“并轨”试点成功，招生改革将继续进行。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人事部、公安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做好从全国高等学校选拔部分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公安机关锻炼工作。

11月18～22日　全国第十三次勘察设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121名国家级勘察设计大师和138名优秀勘察设计院长受到表彰。会议决定加快推行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制度。

11月18～27日　1994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中国女队共获得18枚金牌、3枚银牌和3枚铜牌，名列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名。

11月19日　宋健、周光召等7位中国科学家被聘为俄科学院外籍院士。

11月21日　国务院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在京举行，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草案)》。

同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庆祝建校15周年，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分别题词祝贺。15年来，中央电大共招生232万人。

11月23日　新华社报道：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将于12月20日至明年1月10日在京、沪、苏三地举行。李瑞环任纪念委员会主席。

11月24日　曹健林等14个学科领域的14名青年学者入选1994年度“百人计划”资助对象，他们全部具有博士学位。

11月25日　国家教委与天津市政府签署协议，共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同日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8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1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迄今保存最完好的隋唐宫殿遗址，最近在陕西省麟游县被发掘出来。

同日　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最近又发现了恐龙骨蛋共存化石，将改写恐龙的生活习性及中生代、新生代的地质发展史。

11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自1985年以来，我国群众性发明活动每年涌现重要成果万余项。

11月29日 全国文化市场监督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1月30日　中国新研制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送入太空，卫星顺利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2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管理的通知》。

12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卫星通信事业发展迅速，目前已开通了近8000条国际线路，可直接或间接与

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通信联系。

同日　中国奥委会就第12届亚运会期间有11名中国运动员尿检呈阳性一事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反兴奋剂的坚决态度,对这11名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将作出严肃处理。当天下午,亚奥理事会紧急会议决定取消11名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期间所获得的所有奖牌。

12月5日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京成立,胡锦涛向大会致贺信,荣毅仁出席大会并讲话。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同日　全国第二次消灭脊髓灰质实验化免疫日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李鹏总理等到接种点为四岁以下的儿童喂服疫苗。

12月8日　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12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我国著名摄影测量专家王之卓教授和张祖勋教授承担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WUDAMS"最近通过与外商合作已打进了国际市场,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能独立生产这套系统产品的三个国家之一。

12月10～12日　首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在西安举行。

12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生物活性材料由四川联合大学研制成功,使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居世界前列。

同日　中国中医研究院汇源制药公司向中国科学院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用于设立"中国科学院中汇杯野外科学奖",这是中科院首次接受企业捐赠设立科学奖。王光英、程思远等出席了捐赠仪式。

同日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中年科学家范朝来研究制的"范氏双速汽车千斤顶"通过机械工业部部级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其结构新颖,使用方便,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应该大力推广。

1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新研制的8种特种光纤在沪通过鉴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12月13日　文化部在京召开颁发直属院团演出补贴、演出奖励暨文华奖国际比赛获奖单位和个人奖励大会。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等12个院团分别获得11万元到30万元的补贴和2万元到10万元的奖励。

12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新闻出版署近日成立了出版物评议委员会。

12月16日 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12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作为我国"863"计划重点项目的智能机器人,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精心孕育,如今已是品种多样,有的装有高精尖传感器,具有视、听、触等感知,说明我国机器人研制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同日　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奖评选揭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董保存等105位中青年图书编辑获奖。

12月17—20日 全国部分高等学校统战工作座谈会在上海举行。20日,李岚清接见会议代表,他强调高校各级党组织要重视高校统战工作,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2月18日 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在上海举行。李岚清在会上提出要把高教体制改革推向深入。

12月19日　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在上海成立。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日前分别题词祝贺。

12月20日　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正式拉开帷幕,江泽民、李瑞环等出席了当晚的纪念演出开幕式。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发出通知,对加强集资小学管理和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收费等项工作做出规定,强调禁止通过学生集资办学。

同日　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正式拉开帷幕,江泽民、李瑞环等出席了当晚的纪念演出开幕式。21日晚,盛大的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京剧演出在京开幕。24日,首都戏剧界知名人士200人举行缅怀梅兰芳、周信芳座谈会。

12月21日 第四届中国新闻奖和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160篇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其中一等奖16篇,二等奖49篇,三等奖95篇。徐福铎等11名记者获范长江新闻奖,丁帮英等30人获提名奖。

同日　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在京揭晓。《毛泽东之路书系》等91种1993年出版的图书获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八五"重点科技项目东风01型内燃机车日前在大连研制成功。

12月22日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1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宋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先进集体和65位先进个人获得国家计委等8个部门设立的"金牛奖"。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完成。

12月22～24日　全国软科学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23日　电力部长史大桢介绍,1994年中国电力工业上新高度,发电量达9050亿千瓦时,销售收入1400亿元。

同日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在京成立。

12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正式发表毛泽东同志诗词二首《虞美人·枕上》、《七律·洪都》。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

立暨毛泽东诗词研讨会在京举行。

12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以“银河”仿真系列计算机为代表，中国计算机仿真高技术在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已达到当今国际先进水平，创效益近10亿元。

同日 首届“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颁奖大会在京举行。当天，李岚清在中南海会见获奖的30名教师，勉励他们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12月28～30日 199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会在北京举行。

12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公用900兆模拟蜂窝移动电话1995年元月1日将实现全国联网试运行。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和联网区域最大的无线移动通信网。

社会生活

1月9—12日 中国选手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乒乓球锦标赛中获男女团体、青年组男女单打和少年组女子单打5项冠军。

1月11日 中国女运动员王军霞获1993年杰西·欧文斯奖。2月1日，王军霞及教练马俊仁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发奖晚宴。

1月1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到北京海淀区科学城商场、海中农贸市场和王府井百货大楼，了解春节前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

2月7日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自1994年3月1日起，国家规定实行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

2月13日 世界冠军、我国选手黄志红在日本前桥举行的国际室内田径赛中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3月1日 国家文物局长张德勤宣布：秦始皇兵马俑2号从葬坑正式开始考古发掘。

3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三峡文物考察队最近在长江三峡淹没区发现旧石器化石点40余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近还在丰都县发现了面积约3.5万平方米的古墓群，这是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最大的一次考古新发现。

3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公布了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35处，加上1982年和1988年公布的两批，使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增至119处。

3月14日 中国选手王军霞在1993年业余运动基金会世界奖评选中名列第二。

3月15日 中国女选手白秀玉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短池游泳系列赛瑞典站的比赛中获得50米仰泳冠军。丁楚金获得男子50米蛙泳银牌。另两名中国女选手戴国宏和陆雅楠荣获1银1铜。

3月15日 沈太福贪污行贿等大要案一审判决。沈太福通过非法集资伙同其妻共同贪污100万元，个人贪污200万元，行贿25万元，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国家科委原副主任李效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沈太福等人贿赂5.2万余元，贪污2万元，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3月18日 1993年全国体育十佳评选活动在京揭晓，王军霞名列榜首。

3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在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抓计划生育要提倡摸实情、讲实话、报实数。各级干部要深入调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下决心最大限度地减少统计水分，不要自欺欺人。

4月1日 浙江淳安县“海瑞号”游船，在从安徽深渡驶往浙江千岛湖毛竹园途中发生起火燃烧重大事故，船上32人全部遇难，其中台湾游客24人。海协会与海基会就此事达成了三点共识。

4月6—8日 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何振梁在会上宣布：将国际奥委会设立的“奥林匹克百年纪念奖”授予栗树彬。授予王军霞等115名运动员和马俊仁等97名教练员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4月11日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因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依法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终审判决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4月15日 国家计委副主任陈耀邦、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在京介绍了中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该书是据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精神制定的，它以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它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4月19日 浙江千岛湖“海瑞”号游船失事特大案件破获。

4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海关总署、国家版权局等7部门最近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激光唱盘、激光视盘复制工作的管理，严肃查处盗版行为。

4月23、24日 我国运动员罗莉、黄力平和李小双在1994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分获女子高低杠、男子双杠金牌和男子跳马银牌。

5月27日 龙华烈士陵园在上海举行奠基仪式，邓小平、陈云分别题写园名和馆名，江泽民为烈士纪念碑题词。同日，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揭幕，江泽民题写塔名。

5月29日 山东省乳山市和广东省珠海市的两起

重大走私案件已由人民法院审判终结。案犯刘起山、范占武、刘宁及杨明基分别在威海和珠海被枪决。

5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为“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题词：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31日，由团中央等组织的“手拉手”互助活动的200名孩子到中南海做客，江泽民、李鹏与小朋友们共同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6月6日 西北航空公司2303号班机在执行西安至广州飞行任务时，于8时23分在距离西安东南30公里处坠毁，机上160人全部遇难。

6月6日 第22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成都结束。中国队获得男子青年个人定点、女子集体定点、个人定点和女子青年个人定点、女子青年个人全能和女子全能总分共6枚金牌。

6月8日　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160人全部遇难。

6月12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一审作出判决。罪犯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月19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千岛湖实施特大抢劫、杀人的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执行枪决。

6月20日　李鹏总理召开会议部署抗洪救灾。邹家华、温家宝、陈俊生等同志带领的中央工作组立即分赴灾区第一线指挥抗洪救灾。

6月20日 江泽民在我国独立开展南极工作10周年之际，致电慰问南极考察队员。

6月24日 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李铁映、彭珮云任名誉团长，中国残联副主席吴庆彤任团长。

7月9日 湖北宜昌市发生一起客车坠入长江的交通事故。已证实有29人在事故中死亡，另有11人失踪。

7月7—22日 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的21块碎片相继撞击木星，我国8个天文观测站捕捉到彗木相撞重要信息，为开展天体相撞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7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红十字会已筹集1亿多元的款物援助南方水灾地区。其中，来自香港、台湾红十字组织向大陆华南灾区捐赠的款物折合人民币共9070万元。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为保护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犯罪，林业部、公安部最近就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作出规定。

7月24日 新华社报道：香港持续两天暴雨，酿成港岛西环一座居民楼土墙23日晚发生大面积滑坡，一些居民被活埋。救护人员已挖出6名被埋居民，其中3人死亡，3人受伤。

8月1日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欧德力探险队成功登上了长江之源—各拉丹冬雪山顶峰。这是中国人首次征服这座世界著名高峰。

8月9日 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竣工庆祝大会在布达拉宫德央厦举行。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会表示热烈祝贺。

8月26日 “远南”运动会组委会中国代表团誓师大会暨授旗仪式在亚运村康乐宫举行。邓朴方、李铁映在会上讲了话。

8月29日 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并观看了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同日，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圣火在八达岭长城点燃。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第五届中国十杰青年评选在京揭晓，王永良等10人当选。

9月3日 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火炬终交仪式在京举行。李瑞环、李铁映等出席。下午，李瑞环分别会见远南和国际残联官员。当晚，组委会在京举行盛大欢迎招待会，欢迎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李瑞环、李铁映、邓朴方等出席了招待会。

9月4—10日 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在京举行。李鹏宣布运动会开幕。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共打破或超过98项次残疾人运动世界纪录。中国选手共获得298枚金牌、238枚银牌、148枚铜牌，52项次超世界纪录，名列奖牌榜首。11日晚，首都举行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庆功大会，李瑞环等出席，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贺词。国家体委、中国残联表彰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孙长亭、梁彦学等10名运动员、教练员获得“双十佳”称号。

9月11日 中国选手在罗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共获得16枚金牌、10枚银牌和2枚铜牌，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中国选手在16个女子游泳项目中夺得12枚金牌。23日，国际泳联宣布，世界游泳锦标赛药检，无一呈阳性反应。

9月22日 中宣部在京举行国庆联欢晚会，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

9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出《关于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

9月27日 国家体委和中国奥委会联合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第12届亚运会动员大会，李瑞环、李铁映亲切会见全体成员。

同日　中国队在历时8天的第12届亚洲乒乓球锦赛中包揽全部7项冠军。

10月2—16日 第十二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中国运动员共获得137枚金牌，奖牌合计289块，名列榜首，并打破21项世界纪录，40项亚洲纪录。24日，亚运会

中国男女最佳运动员评选揭晓。熊国鸣、莫慧兰分别当选最佳男女运动员，获得红杉树金牌。

10月3日 中国代表团团长金永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高级专员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主张消除产生难民的根源。

10月13、14日 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签署《国际防治沙漠化公约》。中国林业部部长祝光耀14日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了字。

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就进一步加强药品管理工作发出紧急通知。31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电话会议，提出严厉查处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五点意见。

10月17日 今天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消除贫困日。

10月19日 全国星火计划现场工作会在成都闭幕。宋健指出，星火计划要筹划新的发展重点。

10月24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强调贯彻消除碘缺乏病纲要和条例。

10月24日 首都纪念黄兴120周年诞辰。

10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5起非法印制、倒卖、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案处理结果，胡明等6名犯罪分子于当天被处决。

10月27日 彭珮云在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电话表彰会上说，计划生育工作需长期艰苦奋斗。

10月28－30日 第十一届世界技巧锦标赛在京举行。2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参赛，争夺22块金牌。中国队共获得15枚金牌。

10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卫生部长殷大奎日前在黄山开幕的全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宣布：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丝虫病。

11月1日 129个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先进集体在京受到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表彰。

11月1日 全总等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外资企业工会工作，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11月2日 国家核安全局庆祝建局10周年，宋健在会上要求借鉴国际经验，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行。

11月8日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庆祝建州4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致电祝贺。

11月8～10日 '94全国名牌大会暨驰名商品保护组织第三届年会在成都举行。薄一波向大会致了信。

11月10日 国际排联公布当今男女排球世界十强评选名单，中国女排位居第五，男排与十强无缘。

11月11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劳动部就《关于建立劳动监察机构配置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人员编制意见》发出通知。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劳动部、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近日联合颁布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

11月14－20日 1994年世界体操团体锦标赛在德国多特蒙德市举行。中国体操男队荣获世界冠军，俄罗斯男队获亚军；罗马尼亚女队获女子团体冠军，中国女队名列第四。

11月15日 全国老龄宣传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提出全社会要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劳动部、国务院法制局关于深入贯彻实施矿山安全法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11月16日 国家防总等四单位在今年第三次工作会议上表彰了1994年抗洪抢险中功勋卓著的单位和个人。

11月18－20日 1994年全国血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姜春云，国务委员彭珮云到会讲了话。

11月18日《邓小平大型图片展》在澳门展览中心展出，澳督韦奇立等参加开幕仪式。

同日 全国妇联七届二次执委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强调抓住时机全面加强妇联建设。

11月18－27日 1994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中国女队共获得18枚金牌、3枚银牌和3枚铜牌，名列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名。俄罗斯队获男子团体总分第一名。共有13人次打破女子单项及总成绩的世界纪录，36人次打破男子成年世界纪录，15人次刷新男子青年世界纪录。

11月19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人事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事部门控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总额，严格执行工资基金管理规定。

11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广西柳州市日前发生一起用甲醇配制散装白酒出售，导致40余人中毒事件。

11月25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明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工作，决定沿海和京津沪等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月内停招外地新民工。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劳动部、外交部最近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加强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管理。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劳动部日前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企业职工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

1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从1994年12月1日起，对到香港的外国人组团进入深圳经济特区旅游，实行简化手续。

11月30日 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

开，要求各地互相协作，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依法管理。

12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国务院外事办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各类学会、协会等单位组织公费出国（境）考察、培训，坚决持久地刹住假借名义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不正之风。

12月3日　中国奥委会就第12届亚运会期间有11名中国运动员尿检呈阳性一事发表声明，重申我国反兴奋剂的坚决态度，对这11名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将作出严肃处理。当天下午，亚奥理事会紧急会议决定取消11名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期间所获得的所有奖牌。

12月5日　全国第二次消灭脊髓灰质实验化免疫日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李鹏总理等到接种点为四岁以下的儿童喂服疫苗。

12月6日　世界客属在广东省梅州举行第12次恳亲会。李鹏为大会题词。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劳动部近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做好1995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

12月6～7日　公安部召开沿海5省打击偷渡活动工作会议。

12月8日　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重大火灾，造成正在馆内观看文艺演出的325人死亡，其中中小学生288人。经查这是一次特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至15日，已查明的19名火灾事故责任者被依法追究。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劳动部近日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指出，民工跨省就业需办流动就业证。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在三峡开放区建立全国异地扶贫示范基地。

12月9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防止发生重大特大火灾事故。

12月11～13日　全国劳动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了1995年劳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大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力度，加强工资分配宏观调控，妥善安置富余职工。

12月1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以坚定的态度实施1995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劳动法》。

12月15日　第31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自上月30日至今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女队蝉联女子铜牌，中国男队打入世界十强，获得第九名。

1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监察部发出《关于1995年元旦春节期间严禁铺张浪费的通知》。

12月19日　发生在四川、湖北、河南的3起使用工业酒精制售有毒假酒牟利，致使多人伤亡的陈应元等4名主犯被依法判处死刑，分别在当地被执行枪决。

同日　新华社报道：1994年中国红十字会向遭受洪水灾害的22省灾区提供了从境内外募集的总计1.65亿元款物的援助，灾区550万群众受益。

1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11月27日阜新市特大火灾的责任者受到查处。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吉林市“11·15”特大火灾的18名责任者近日已受到严肃处理。经公安部门调查和专家鉴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现正立案侦破。

12月29日　为时3天的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提出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一项重要改革。

12月31日　中国北部湾（北纬21.0度，东经109.4度）发生6.1级地震。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5年

导　　言

1995年是让人思考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人们不仅仅会看到正义与邪恶，成就与忧虑、坚强与游移的并存，还会看到它们的冲突和暴露。

陈希同、王宝森案远非一句“第二个刘青山、张子善”能够涵盖其时代意义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更难用纯粹“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孔繁森的形象于国人不仅有鼓舞，当亦有鞭策；世妇会的成功召开预示着现代化中国的妇女问题逐渐确认了正确的方向……而所有的一切，都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有关。

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号召，努力建设，实现现代化！然而国外的某些势力却不甘心于“中国的丧失”，千方百计地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事实告诉他们，不一样了！中国的国际力量并不是依他人意志而转移的。

1995年出了几件大事，几件耐人寻味的事。

世纪热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看法和主张
- 5月起职工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 陈希同、王宝森案
- 中共中央任命尉健行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同志引咎辞职
-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 李登辉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第43届世乒赛在天津胜利闭幕我国乒乓健儿获得七项冠军
-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
-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 江泽民视察海军部队观看海上演习
- 国务院批复西藏自治区请示特准坚赞诺布任十一世班禅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看法和主张

背景介绍

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重要看法和主张。

材料：

·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看法和主张

材料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看法和主张

第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持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第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

第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再次郑重建议举行这项谈判，并且提议，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以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第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第五，面向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

第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七，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我们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也希望台湾各党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设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第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

任何国际场合。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5月起职工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背景介绍

许多人都没想到，在五天半工作制实行后的14个月，五天工作制也变成现实。国务院规定：从1995年5月1日起全国普遍实行五天工作制。

材料：

-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

材料一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1994年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46号发布根据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了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和休息时间，维护职工的休息权利。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

第三条　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第四条　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劳动和有特殊情况，需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延长职工工作时间，因特殊情况和紧急任务确需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

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第八条　本规定由劳动部、人事部负责解释，实施办法由劳动部、人事部制定。

第九条　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1日施行有困难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适当延期，但是，事业单位最迟应当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最迟应当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174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已经1995年2月17日国务院第8次全体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

总　理　李　鹏

1995年3月25日

材料三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议

（1995年2月17日国务院第8次全体会议通过1995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74号发布）

国务院决定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二、第五条修改为：“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三、第七条修改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

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四、第九条修改为：“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1日施行有困难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延当延期；但是，事业单位最迟应当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最迟应当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本决定施行前，国务院1994年2月3日发布、自199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继续有效。

陈希同、王宝森案

背景介绍

新中国初建时，有一起大案即刘子善、张青山案，那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改变，糖衣炮弹把

他们打垮了。

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能不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清政廉洁，重新形成严峻的考验，大多数同志顶住了，挺过来了，少数人则一头扎进私利私欲的泥坑，难以自拔。陈希同、王宝森一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沉重的。

材料一　中共中央决定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　中纪委决定开除王宝森党籍

鉴于在调查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同志，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

*　　*　　*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有关部门遵照中央指示，对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现已查明，王宝森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腐化堕落，是一个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腐败分子，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

王宝森违法犯罪的主要事实有：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违法批贷巨额资金，造成大量资金流失；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中纪委负责人指出，王宝森罪行严重，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死有余辜。王宝森问题的揭露和查处，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它表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清除党内腐败分子，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清除自己肌体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我们要继续按照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整体部署，在紧紧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扎扎实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确保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　　*　　*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7月4日举行第18次会议，审议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王宝森的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议案和李其炎市长所作的说明。鉴于王宝森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腐化堕落，蜕化成一个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腐败分子，会议决定，依法撤销王宝森的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

同日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3次会议，依法罢免了王宝森的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　　*　　*

中共北京市委7月4日召开区县局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传达了关于王宝森主要违法犯罪事实查处情况和中央决定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的通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就此发表讲话说，王宝森等人违法犯罪问题的被揭露，并在短时期内得到正确果断的处理，充分说明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也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成果。它表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完全有能力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这个机制来清除自身肌体内的腐败现象。我们应该进一步增强信心，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把反腐败斗争继续引向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尉健行说，王宝森等人的罪行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它对北京市财政以及其他方面造成的恶果正在并将逐步暴露出来。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王宝森等人的有些罪行还有待进一步揭露和查证，我们将采取各种得力措施尽量挽回或减少损失。

尉健行说，事实表明，涉及王宝森等人案件的只是极少数人。北京市从市到区县局各级班子总的是好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但是王宝森等人案件暴露出来的我们在思想作风和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尤其值得我们市委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

尉健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王宝森等人的堕落为鉴，自觉警惕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廉洁自律的规定，并着重解决用公款吃喝玩乐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决不可以沉浸到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去。

尉健行强调说，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打击各种严重经济犯罪，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查处王宝森等人的案件，我们要始终注意在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扎扎实实地开展有关调查工作，始终强调既要坚决，又要稳定，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7月5、6日）

材料二　中共中央任命尉健行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引咎辞职

中共中央决定：尉健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同志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

*　*　*

据悉，陈希同同志是因他对北京市发生王宝森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

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在有关部门行将调查他的问题时，自杀身亡。这一案件有关部门正在依法进行调查。

尉健行同志简历

尉健行同志1931年生，1949年3月入党并参加工作。大学毕业后曾在苏联学习。1955年回国后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并担任厂长、厂党委书记。1981年后历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监察部部长。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是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4月28日）

中共中央任命尉健行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同志引咎辞职

背景介绍

中共中央决定：尉建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同志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

陈希同同志是因他对北京市发生王宝森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在有关部门行将调查他的问题时，自杀身亡。这一案件有关部门正在依法进行调查。

材料：

· 胡锦涛受中央委托出席北京市区县局领导干部会议

材料　胡锦涛受中央委托出席北京市区县局领导干部会议

4月27日晚，北京市委召开区县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受中央委托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尉建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同志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庆红、张全景、曾建徽等同志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其炎同志主持了会议。

胡锦涛同志说，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发生了多起严重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特别是4月4日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因涉嫌经济违法犯罪，自杀身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党内党外反映强烈。对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中央十分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案件进行彻底调查。中央批准陈希同同志引咎辞职，同时决定，尉建行同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这一决定有利于北京的稳定，有利于北京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有利于党的事业。相信同志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相信健行同志能够团结市委一班人，同心同德，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北京的工作做好。

胡锦涛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对北京工作的指示。他说，党中央最近对北京工作的指示精神，是北京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做好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凝聚北京市党心、民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北京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正确理解，并以此统一全市干部党员的思想，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希望北京市各级党组织、政府和广大干部、党员，继续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带领全市人民群众，把北京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尉建行同志讲话说，中央决定我到北京工作是对我的信任和重托。我一定很好地团结市委常委一班人，依靠北京市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努力学习，刻苦工作。北京市委、市政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靠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总的是好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在充分肯定北京市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最重要的是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顾全大局，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安排处理我们的工作，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北京的实际出发，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振奋精神，各司其职，努力把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搞得更好。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对王宝森等人的案件，要积极支持、配合有关部门一查到底，依法严肃处理。要认真总结和汲取王宝森等人案件的深刻的经验教训，继续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在解决党员干部的人生观、世界观上下功夫，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拒腐防变能力。

尉建行说，我们要全力以赴搞好北京市的稳定，把稳定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抓。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我相信，只要我们市委这个班子在贯彻中央方针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在市委的领导下，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党员、人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把北京市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李其炎同志讲话，完全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定，完全拥护党中央指示精神和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并要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要认真汲取教训，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党员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定，充分认识这一决定的必要性、正确性、重要性，要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二十字"方针，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令，加强团结，同心同德，把北京市的工作搞好，特别是要把稳定搞好。要把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按照尉建行同志为书记的北京市委的正确部署，团结奋斗，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使北京的工作有新的发展，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市领导张健民、王大明、李志坚、陈广文、张百发等出席会议。

摘自《北京晚报》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背景介绍

1995年2月26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使双方避免了一场贸易战，也结束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问题长达20个月的磋商。在这个长期、复杂的谈判过程中历经挫折。1994年底，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因美方毫无诚意而破裂。这是中美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但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世界经济涉入国际化的今天，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涉及一国的法律制度，而且是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环境和条件。中美双方经过长期磋商，于1992年1月17日，签订《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其主要原则是，按国际规范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特别是在立法和法律实施方面向关贸总协定《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防止假冒商品的协议》靠拢的原则；互惠互利原则和通过协商解决争议的原则等，体现了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立场，也是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准则。之后，中国政府作出了最大努力，加快了立法和加入有关国际公约的进度，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达到了关贸总协定设定的标准。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海关总署还就制止侵权产品进出口采取了边境保护措施。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制止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已经成为各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由于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历史不长，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的贯彻实施，任务还很艰巨。为此，199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召开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对全国知识产权执法检查做出部署。国务院建立了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宏观管理和协调指导。全国主要省市也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指导机构或工作会议制度，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严肃查处违法侵权行为，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美国不顾1992年1月17日签订的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所确定的原则和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在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美方代表要求中国限期立法、限期改法并要中国政府按其要求组织执法检查，按季度向美国政府报告搜查次数、被查处机构、查获商品和材料等执法检查结果。美方要求中国取消涉外商标代理制度，要求取消民事诉讼法第250条中有关侵权、反假冒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规定，要求权利要求人是外国公民和法律实体的案件，必须在提出权利请求后6个月内审结。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内政的粗暴干涉。美国代表公然违背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有关"终止根据美国贸易法特殊301条款发起的调查并取消把中国指定为重点国家"的许诺。以其美国贸易法规定特殊的301条款与中国进行谈判。这本身就是缺乏诚意和根据的。把中国列为其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国家，则更与其贸易法案不相符。因为按照该法规定，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二是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缺少诚意的国家。而实际上，根据美国自己的估算，因为中国在电脑软件方面盗版造成的美方损失也不过3亿美元，远远低于其本国（16亿美元）和日本（8.5亿美元）、德国（13.1亿美元）等国的情况。中国坚持贯彻中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的原则，不但用行政的力量推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现代化，而且设立了专利局、商标局、版权局三个高规格的国务院直属局，同时还在司法方

面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这说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是健全的，水平是较高的。这也表明中国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的真诚态度。但是美方不但无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反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无理要求，对中国政府、司法制度指手划脚，强加于人，导致谈判的破裂。1994年12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对华贸易报复清单，对此，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同日发表公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拟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贸易反报复清单。

1995年1月15日至26日中美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第九轮谈判经过磋商，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和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共同草签了两国政府换函。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出席了草签仪式。这次知识产权问题协议的达成是中美双方共同采取务实态度的结果，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吴仪在双方草签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年多来，社会各界都在注视着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并期待着双方通过平等磋商达成协议，应该说，这是关系到中美贸易关系乃至两国关系大局的非常重要的谈判。她表示：希望今天达成的协议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不断排除各种非贸易因素的干扰，充分的发挥中美经贸关系的内在潜力。并指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以及日益改善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必将给中美企业界带来更多更有利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巴尔舍夫斯基在草签仪式后发表谈话时说，双方通过谈判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的过程证明，只要双方不断地努力，了解彼此的立场，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3月1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长吴仪和来访的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大使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双方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在签字仪式后，吴仪对记者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的签署说明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磋商的精神，两国经贸领域存在的任何矛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坎特大使在讲话中赞扬了中方代表在谈判中的努力和创造性。认为，协议的签署展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迹象：只要美中双方共同努力就能克服分歧。

材料一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新华社10月25日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1992年1月17日签订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如下：

本着双边贸易关系协定的合作精神，并根据有关国际协定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美国政府）就以下条款达成相互谅解。

第一条

一、中国政府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提供下述水平的保护：

（一）专利的客体。专利应授予所有化学发明，包括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而不论其是产品还是方法。

（二）授予的权利。专利授权阻止他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制造、使用或销售专利的客体。方法专利授权阻止他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使用该方法以及使用、销售或进口由该方法直接生产的产品。

（三）保护的期限。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专利申请提出之日起二十年。

（四）强制许可。1. 专利权的享有不因发明的地点、技术领域以及产品为进口或当地生产而受歧视。2. 在中国法律允许未经权利人的许可而使用专利客体的情况下，包括政府使用或经政府批准的第三方的使用，下列各项规定应予尊重：批准这种使用应一事一议；只有当申请使用者在使用前曾按合理的商业条款和条件请求权利人允许其使用，并在合理长的时间内未得到这种允许时，才可允许这种使用。在全国紧急状态或其他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或在为公共目的的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放弃这种要求。但是，在处于全国紧急状态或在其他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应在合理时间内尽快通知权利人；对于为公共目的的非商业性使用，如果在未进行专利检索的情况下，政府或订约人知道，或有明显的理由知道一个有效的专利会被政府或为政府所用，则应立即通知权利人；此种使用的范围和时间应受允许此种使用的目的的约束；此种使用应是非独占的；除与有权享受此种使用的该部分企业或信誉一起，此种使用不可转让；允许任何此种使用应主要为供应中国国内市场；当导致授权这种使用的情况停止存在或可能不再发生时，在考虑对被授权使用人合法利益提供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这种使用的授权可被终止。接到提出的请求后，主管机关应有权对这种情况是否继续存在进行审查；在每一种情况中，应根据此种许可的经济价值，向权利人支付充分的报酬；任何有关授权此种使用决定的合法性应受司法审查或其他较高当局的独立审查；任何有关这种使用的报酬的决定应受司法审查或其他较高当局的独立审查；当允许此种使用是为补救经司法或行政程序认定的反竞争行为时，前述第2项和第6项规定的条件可不适用。在此情况下，在确定报酬的数额时，可以考虑对反竞争行为进行纠正的需要。当导致这种许可的条件有可能发生时，主管机关有权拒绝终止此种授权使用；当此种使用是由于某一专利（“第二专利”）在不侵犯另一专利（“第一专利”）的情况下不能被实施而授权时，还应符合下列各项条件：与第一专利中的

发明相比，第二专利中的发明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重要技术进步；第一专利权人有权在合理的条件下取得使用第二专利中的发明的交叉许可证；除非与第二专利一起转让，对第一专利的此种经许可的使用不能转让。

二、中国政府应向其立法机关提交提供本条第一款规定保护水平的议案，并尽最大努力使修改后的专利法于1993年1月1日前通过并实施。

三、两国政府重申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年）对对方的承诺，并继续承诺按照国民待遇原则为对方的自然人和法人提供专利保护。

四、如果美国政府成为某国际公约成员国，该公约要求美国提供自申请日起至少二十年的专利期限，美国将修改其法律履行该义务。

第二条

两国政府确认，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所确立的专利保护的地域原则和专利独立原则应当得到尊重。

中国政府同意采取行政措施保护具备下列条件的美国药品、农业化学物质产品的发明：

（一）在中国现行法律修改之前不给予独占权保护；

（二）自1986年1月1日至1993年1月1日之间获得禁止他人在美国制造、使用或者销售的独占权；

（三）尚未在中国销售。

对满足上述条件的产品发明享有美国独占权的权利人，应当向中国主管部门提出要求行政保护的申请，包括提供下述文件：

1. 美国主管部门颁发的证明该权利人享有该独占权的文件副本；

2. 美国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准许制造或销售该产品的文本副本；

3. 该独占权所有人与中国法人（包括外资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经营企业）签订的在中国制造和/或销售该产品的合同副本。

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将按照公布的有关获得制造、销售许可的中国法律、法规，审查该申请。对这种许可不得附加特殊规定或要求，应及时审查批准。在此之后，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将向行政保护申请人发给授权制造、销售该产品的行政保护证书。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将在行政保护期内禁止未获得行政保护证书的人制造或销售该产品。行政保护期为自获得该产品的行政保护证书之日起七年零六个月。上述行政保护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

一、中国政府将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中国政府将于1992年4月1日前向立法机关提交加入该公约的议案和尽最大努力使该议案于1992年6月30日前获得通过。该议案通过后，中国政府将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加入书，于1992年10月15日前生效。

二、中国政府将加入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其唱片被擅自复制的公约（日内瓦公约），并于1992年6月30日前向立法机关提交加入该公约的议案。中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使该议案于1993年2月1日前通过。中国政府将提交批准书，该公约将于1993年6月1日前生效。

三、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后，上述公约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所指的国际条约。根据该条规定，如果伯尔尼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与中国国内法律、法规有不同之处，将适用国际公约，但中国在公约允许的情况下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四、就中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与伯尔尼公约、日内瓦公约和本备忘录的不同之处，中国政府将于1992年10月1日前颁布新条例使之与公约和备忘录一致。这些新条例还将澄清现行条例，特别将解释：适用于所有作品和录音制品的独占性发行权包括通过出租提供复制品以及这一专有权利在复制品首次销售后仍然存在。如果两者之间有不同之处，执行公约和本备忘录的条例优先于适用本国作品的条例。

这些新条例除适用于伯尼尔联盟成员国国民创作的作品外，还适用于合同关系、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外国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委托情况下创作的作品，在这些情况中伯尔尼联盟成员国国民将是版权所有者或版权所有者之一。

中国政府将向立法机关提交修订其著作权法的议案，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尽最大努力使这一议案通过和实施。

五、两国政府将表明伯尔尼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在各自法律中的地位，并在本备忘录签字后三十天内或在加入每个公约后三十天内（以较晚时间为准）将公约的规定通知主管实施著作权法和条例的司法及行政机关。两国政府将颁布和相互提供就与执行公约或本备忘录有关任何法律、法规的管理和解释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发出的指示的文本，时间不迟于该指示发出后三十天。

六、中国政府同意，不迟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生效之日，承认并将计算机程序按照伯尔尼公约的文学作品保护，按照公约规定的保护对计算机程序的保护不要求履行手续，并提供五十年的保护期。

七、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所有在伯尔尼联盟成员国起源并未在起源国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将在中国受到保护。对在中国和美国建立双边版权关系之前发生的对美国的原始作品或作品复制本的商业规模的使用，将

不追究责任。对在建立双边版权关系之后发生的这种使用,法律和条例的条款将充分适用。法人或自然人在中国和美国建立双方版权关系之前为特定目的而拥有和使用一作品的特定复制本,该法人或自然人可以继续使用该作品的复制本而不承担责任,条件是该复制本不以任何不合理的损害该作品版权所有者合法利益的方式复制和使用。

八、上述第七款的原则,包括对责任的限制,应适用于录音制品。

九、中国政府将承认本谅解备忘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所指的协议,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国民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前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包括计算机程序和录音制品,给予保护。此种保护将于本谅解备忘录签字之后六十天开始生效。

在本谅解备忘录规定承诺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使中国国民及其作品依据美国著作权法获得受保护的资格,此种受保护的资格将于本谅解备忘录签字之后六十天开始生效。

第四条

一、为确保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的规定有效地防止不正当竞争,中国政府将制止他人未经商业秘密所有人同意以违反诚实商业惯例的方式披露、获取或使用其商业秘密,包括第三方在知道或理应知道其获得这种信息的过程中有此种行为的情况下获得、使用或披露商业秘密。

二、只要符合保护条件,商业秘密的保护应持续下去。

三、中国政府的主管部门将于1993年7月1日前向立法机关提交提供本条规定保护水平的议案,并将尽最大努力于1994年1月1日前使该议案通过并实施。

第五条

两国政府将在各自境内及边境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救济,以避免或制止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并遏制进一步的侵犯。在采取这些办法和救济时,两国政府应提供禁止滥用的保障。并应避免为合法贸易制造障碍。

第六条

两国政府同意,应一方要求,可就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问题,尤其就本谅解备忘录的义务问题及时磋商。两国政府同意,根据本备忘录进行的首次磋商将包括讨论执行伯尔尼公约和本备忘录的新条例。这些讨论将在起草条例时予以考虑。

第七条

美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在改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进展和中国政府已同意采取的步骤将会进一步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预期这些承诺将得到充分履行,因此将于本谅解备忘录签字之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法特殊301条款发起的调查并取消把中国指定为重点国家。

(选自《人民日报》,1994年10月26日)

材料二　你我都是赢家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备忘录

方　进　玉

1995年2月26日,中美关系史上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历经20个月九轮艰难磋商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从剑拔弩张走向了日夜磋商;又从紧急磋商、争论不休,走向了高举酒杯的庆祝会。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如此艰难,美国几度扬言制裁,到底中美分歧在哪里?美国的“要价”是什么?最终为何“化干戈为玉帛”?中美两国究竟谁作了让步?

这一切,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

美国人缘何怒气冲冲,宣布制裁

美国人恼火,也有他自己的道理。

京、津、沪、穗等中国大城市的街头,常见不少地摊向过往行人兜售激光唱(视)盘,这种街头“CD”是假冒伪劣产品,但因其价格确实“诱人”,销路颇好。

1994年春,记者曾目睹一位南方来客在北京新街口大街的小音像门市部里“批发”这种假货;销售者说:很便宜啦,你多要,9块钱一盘。”店家说:“9块?不要!我这儿最便宜进过6块的!”

这只是被美国认为侵犯了它的知识产权的一个小例子。

让美国人感到恼火的还有:城镇录像厅内放映着非法进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和其它厂家的录像;有些计算机软件被个人复制;还有美国企业的商标、美国人发明的工业产品设计……

美国人不止一次大声吼叫:要对中国实施制裁!

中国唱片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被侵权的,不止是美国有关厂家,中国唱片公司每年也有许多节目被盗版、翻版,许多大投资制作的好节目,刚一上市就被盗版,正版

却反而销不出去，给公司和国家税收都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打击之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改善。

让中国人懂得知识也是"财产"并在各级政府、法院中设立"快速打击"力量，一是需要资金，二是需要人力，三是需要时间！

中国"坚决反对制裁"，并非我们不敢面对事实、否认有侵权行为；关键是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有"纵容、包庇"之嫌，并一口咬定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状况"毫无改善"。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相反，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对中外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均坚持予以保护；并不断采取措施，打击违法活动。

因此，自1993年8月以来，中国的许多省市的高、中级法院，先后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同年8月，中国开始实行统一代码识别标志，9月，世界保护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赞扬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大有进步。据悉，根据《马德里协议》，中国已有200多商标在国外注册，而外国公司则有8000多商标在中国注册并受到保护。

正因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1994年11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亲赴日内瓦，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手中，接过了一枚金质奖章。这枚奖章，证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任建新和全体中国法官，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领域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任院长回国之后，中国继续加大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种种违反活动的力度。

199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查处侵权盗版活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抓紧检查侵权违法活动；要求全国激光盘生产厂家在模具上蚀刻光盘来源识别码；逐步建立涉外音像制品合同登记制度、版权许可认证制度、营业执照的年度核检制度，等等。

另据28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仅1994年，全国各地即收缴非法侵权盗版音像制品467.3万盒(张)。其中激光唱盘181万张，激光视盘3.5万张。

事实证明，中国在保护中外"权利人"的知识产权问题上，态度一向坚决。

美国咄咄逼人，莫非真的不怕中国

表面上，美国咄咄逼人，但美国人其实也害怕中国。

头一条，美国知道自己也有理亏之处。北京有专家称，美国专利保护制度就有双重标准：美国的专利申请，对美国人实行的是发明在先原则；对外国人在美国申请专利，则实施申请在先原则(外国人去申请，他来个不批准；等到美国人申请之后再讨论你的申请，自然可以合理拒绝)。

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50条中的有关规定，要求当知识产权案件的权利要求人是外国人时，其提出的诉讼申请必须在6个月内审结。但美国在对同类案件的审理时，并没有规定审结的时间限制；美国不少知识产权的案件也是3年、5年，甚至耗时10年才解决。美方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审结，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己之不"正"，何以"正"人？

其次，中国这个大市场，实在太诱人，美国害怕丢失。

据中国统计，1994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其中，进口增长了30.7%，出口只增加了26.5%。此外，截止到1994年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已达1.6万个，资金实际投入累计为70亿美元。

今年1月26日，中美知识产权第八轮谈判破裂前夕，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了高度评价。她说："我们希望避免实行贸易报复。"

显然，美国人并不愿意丢弃中国这个大市场。

美国的"要价"究竟是什么

1994年12月，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又在北京举行，美方代表以两点相威胁：其一，将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其二，将不支持中国复关。谈判进行到关键时刻(也是中国复关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拂袖而去，不辞而别。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第七轮磋商，因此破裂。

1994年的最后一天，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单方面宣布，中方若不能在1995年2月5日前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则美方将对中国实施贸易报复。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公布的这份报复清单中，开列了中国出口美国的电子、鞋、玩具、箱包等产品，总价值约合28亿美元。其报复方式，主要是向上述中国商品征收100%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报复如果实施，受害者将是：在美经销上述中国货的美国商人；香港或其它地区的中间商；中国生产上述产品的厂家及其工人；希望在美国购买中国货的美国消费者。

1月18日，中断的知识产权谈判，再度在北京恢复。这是第八轮会谈。1月21日，一中方谈判官员向新华社记者披露说，"谈判是建设性的"，"取得了一定进展"。

可惜，到1月28日，谈判忽然宣告破裂。

中美双方当然都是指责对方。据悉，中方不能接受的美方主要要价是：中国应限期修改、制定有关法律，应关闭中国南方所有29家CD工厂，应按照美国的要求组织执法检查，按季度向美国政府报告中方搜查次数、被查机构、查获商品和材料等。这些要价，有些是对中国主权的无理干涉，有些则超出了知识产权范畴。

中方当然坚持立场，顽强抗争。

请看，发达国家例如法国，就坚决抵制美国音像制品无限制地进入法国，至于在海关边境措施、保护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版权认证制度以及行政部门的权限等方面，美方向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连美国自己也没能做到。

现在，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要制裁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为之震惊。坎特的话音刚落，香港股市狂泄。

但是，制裁消息所引发的"地震"并不仅仅表现在东方；对此，美国报纸上的争论日趋激烈。其中最激烈的意见称：美国没有必要为了保护好莱坞电影厂商利益而与世界上最具有潜在购买力的中国大动干戈；贸易战的结果将使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汽车），波音、麦道（飞机）等生产企业，受到丧失订单和市场的巨大打击。

1月30日，中美谈判破裂的第三天，美国政府特意为要不要实施制裁，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有30多个行业协会和大公司代表出席的听证会。结果，除了2家公司表示支持制裁外，其余均表示强烈反对或不满。

反对者的意见一言以蔽之：制裁，只会两败俱伤。

总统发布制裁令，美国敢制裁吗

1995年2月4日上午，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坎特宣布：由于中美间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决定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制裁措施将于2月26日开始生效。消息迅速传向全世界。

北京，外经贸部发言人几乎同时宣布：中国将实施反报复！

中方宣布了反报复清单：1、对原产于美国的烟、酒、化妆品、CD盘、照相胶卷、程控电话等征收特别关税（税率100%）；2、暂停进口产于美国的电影片、电视片、录像、激光视盘；3、暂停与美国音像制品、商业软件联盟等的合作关系；4、暂停受理美国音像制品制造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5、暂停受理美国化学、药品制造商在华提出的申请；6、暂停与美国大公司正在进行的大型汽车合作项目；7、暂停批准美国公司在华设立投资公司。中国这份反报复清单将于美国制裁之日起自动生效。

这些报复后来没有生效，一旦生效，原产美国的万宝路烟、柯达胶卷、好莱坞电影等，都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了。

有一派经济学家认为，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谁就拥有未来的世界。此说虽有偏颇之嫌，但也未必没有一点道理。

第九轮谈判，化干戈为玉帛

2月4日，中国的猪年初五。坎特致函吴仪，建议2月13日再次恢复磋商，吴仪则于第二天复函同意。

第九轮磋商是2月15日在北京开始的，中美谈判代表回避了所有记者，新华社和美联社透露的简短消息只是说，"双方都表示，愿以积极态度进行谈判，努力消除分歧，尽早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此后，谈判便进入秘密状态，音讯全无。

2月19日，"阴云密布"的谈判会场终于传出"转晴"消息，中美双方宣布，"磋商已取得进展"。

就在中美谈判进入最后关头时，美国能源部部长奥利里（女）率领一个由85人组成的总统使命代表团，抵达北京。随行者中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摩根财团、花旗银行、通用电器公司、阿莫科石油公司等数十家真正大老板。

23日，即美国实施制裁和中方实施反报复的前三天，吴仪在北京会见奥利里。吴仪坦率说："中美贸易关系出现分歧，不足为怪，但重要的是要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分歧。"她说，奥利里部长在此微妙时刻率总统使命代表团访华，意味深长，特别随行的有大批美国企业家，这无疑会给中美经贸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奥利里对此说表示赞同。

有外电评论说：在美国即将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最后关头，同时有两位美国总统的特使在北京紧张会谈，一位是总统贸易代表，一位是内阁部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美国人用的是最古老的办法：胡罗卜加大棒。

2月25日，新华社消息：国务委员宋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会见升格，明确传递了谈判有进展的可靠"信息"。

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中方也采取了更严厉、更果断的措施：2月25日，中国宣布，因深圳深飞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近一时期为外商非法复制加工了《侏罗纪公园》等激光唱盘、视盘，在国内外销售，影响极坏，因此决定予以停业整顿处罚。与深圳"深飞"同时或更早被停业的还有珠海音像出版社等几家公司。

2月26日午夜时分的"23：57"，新华社电讯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成功。中国人松了一口气，美国人松了一口气，全世界松了一口气。

2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世界著名电子大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加利·吐克。江主席说，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同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对中美达成协议"表示高兴"。

究竟谁作出了让步

人们最关心的是，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中美之间究竟谁作出了让步？有香港报纸称，中方在美国压力之下，签订的是"城下之盟"。记者为此独家采访了一位中方主

要谈判代表，据这位权威人士称：此说纯属无稽之谈！

据这位参加了全部9轮会谈的权威人士说：就在谈判即将结束之际，一位美方谈判人员向他透露说："坎特特使准备使用'双赢'这个词，因为这确实是一次双方都满意的谈判。"

据这位权威人士称，中国在协议中当然有所允诺。这些允诺，有些是我们早就做着的事，在协议中再次重申而已；有些是我们计划中已打算做的，美方也有这样的意见，那我们就明确作出承诺；还有个别问题，是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里应该做的，当然应该承诺。至于中国的主权以及美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中方不会放弃原则去允诺。

如果说让步，从来都是双方的。中方当然也作了让步。例如：在谈判最后一刻，查出深飞等三家CD厂有违法行为，中方立即宣布停业整顿。但统计显示，美方谈判开始时提出要求共22点，后经中方说明及反驳，收缩为8点，最后美方坚持的，只有4点。

据悉，新协议中，中方允诺的主要事项有：重申中方对知识产权的立场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1995年和1996年，中美之间每半年交换一次知识产权执法活动的情况；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合资建立音像制品的生产和复录企业（已有，包括美国要求中国全部关闭的29家生产CD的企业，有28家为合资企业）；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合资建立计算机软件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产品（已有，如中国希望公司就是与美国的微软公司合资的）；允许外国音像制品进入中国，但事先必须经由中方审查。

中方据理反驳的有：不能全部关闭29家CD生产厂（查出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一家关闭，有违法行为的6家停业整顿，未查出有违法行为的不关闭）；修改民事诉讼法、修改诉讼费收取办法不能照办（因为是中国主权的事）；取消涉外商标代理，全面市场准入等，不能按照美方意见办；美国在华设立独资的音像、计算机软件、建立侦探所等要求，予以驳回。

双方的让步，才使中美谈判"化干戈为玉帛"。中美双方都认为，此次谈判是"双赢"。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成功，美国总统特使、贸易代表坎特应邀来北京签署正式协议。3月12日，吴仪和坎特在北京长谈了4个小时。

吴仪称，会谈是"艰难"、"友好"和"富有成果的"。

坎特则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并表示他本人愿意亲自参与中国的复关谈判。

3月13日，江泽民会见了坎特，高度赞扬了两国就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协议；算是把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推向高潮，划上句号。

（选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李登辉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背景介绍

海峡两岸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紧张局面？这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存在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就台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八项发展两岸关系，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建议和主张。国内外中华民族子孙对这些合情合理的主张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期盼着海峡两岸关系迈入一个新阶段。

但是，事与愿违，海峡两岸今天出现了海内外中国人不愿意见到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完全是李登辉一手造成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分裂祖国的行径由来已久。事实表明，他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虚化"一个中国"原则，使"台独"活动合法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在李登辉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执行"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此后，李登辉也曾多次标榜："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和平统一是目标。"

可是李登辉却食言自肥，南辕北辙。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路上越走越远。

李登辉在任期的前三年中，以"宪政改革"为其施政目标。1991年和1992年分别全面改选了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会"；1993年2月，又进行了"内阁"全面改组，产生了第一任台籍"行政院长"。从而实现了国民党台湾化。台湾政权本土化。在这一时期，由于台湾当局修订了"刑法一百条和"国安法"，使岛内外的"台独"活动合法化、公开化，一批长期流亡海外的"台独"分子麇集台湾。各种"台独"势力迅速纠合，在岛内迅速膨胀。1992年8月，民进党"国人"党团发表《确立一中一台、反对国共和谈》的声明；9月，又公布了《现阶段两岸关系与中国大陆政策》，公然宣示"台湾主权独立"，岛内的"台独"组织甚至明目张胆地走上街头，发动数千人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当国民党的"非主流派"与民进党就此展开激烈论辨时，李登辉却站出来说："本人曾很认真地查阅过去的资料，先总统蒋公有没有讲过'一个中国'的字眼？从来没有。"他甚至说："简单地讲'一个中国'，就是中了中共的圈套。"他要求台湾当局"不要再用不合时代的口号"。1993年2月初，李登辉在会见民进党"立委"时。竟说他主张的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

由于李登辉的纵容和庇护，岛内的"台独"活动更加

猖狂，岛内舆论指出，台湾当局所谓的“一个中国”，“说明白点就是‘两个中国’”，其奥妙之处在于，标榜“追求中国统一”而又不承认“一个中国”，搞“两个中国”而又避开使用“两个中国”的概念。但是，李登辉对于“宪政改革”产生的这种恶果却另有一番用心，他称赞这是“国民党推动民主宪政的一大成就”，“将开创民主政治的新纪元”。

大搞“务实外交”，使台湾问题国际化

“宪政改革”的完成，台湾政权实现了本土化，国民党内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大陆籍传统势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李登辉为实现下一个三年的施政目标拼凑了班底，创造了合适的气候和条件，确立了他主控大陆政策和台湾“外交”的地位。

他的下一个三年的施政目标就是：“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开展两岸关系”，他在就职三周年的记者会上明确地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把务实外交和大陆政策两项同时来考虑，找出恰当的策略”，“务实外交以及大陆政策事实上是相互制约的，就是相互牵连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不断地找出自己本身的筹码在哪里，我们的策略在哪里，找出恰当的方法来。”他甚至还说：“我们会找出对我们国际关系最有利的策略”。

李登辉反复强调的策略是什么？那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李登辉要不断寻找的“筹码”，简而言之，就是“重返联合国”。

所谓“重返联合国”问题，首先是由少数“台独”分子提出的，早在 1989 年，李登辉上台伊始，就将其确定为“台湾重返国际社会”的“务实外交”政策之目标。但基于李登辉当时在政坛上立足未稳，岛内政局复杂，又有坚决反对“台独”的“非主流派”的强烈反对，“重返联合国”难以作为施政目标。同时，台湾当局深谙祖国大陆方面对此问题的强硬态度，不得不有所顾忌。时下的岛内舆论曾指出，“无论在主观上想要以何种名称‘重返’、‘加入’或‘参与’联合国，客观存在的最大变数，仍是大陆的态度”，因此“在落实参与联合国的过程中，不能予人反对‘一个中国’原则或分裂主权国家的印象，无论其为形式的或实质印象，均可能导致两岸的直接冲突”。

但是，三年后的李登辉在完成“宪政改革”，站稳脚跟之时，又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1993 年 6 月 9 日，李登辉召集党政高层决策会议，讨论“参与联合国”的方案，并下达了全面推动“参与联合国”的“动员令”。此后，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务实外交”活动日见猖獗。

李登辉为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不遗余力地在美国的讲坛上叫嚷，“向不可能的事物”展开“挑战”。他“不在乎头衔”，不计较有没有礼炮、地毯，不惜巨资买到了“务实外交”的门票。在近几年中，李登辉打着各种旗号频频出动：

1992 年 2 月，李登辉以“度假外交”之名访问了菲律宾、印尼和泰国，“做了很多不能说的事”，实现了其所谓“破冰之旅”。

1994 年 5 月，李登辉扯起“典礼外交”的幌子，赴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南非和斯威士兰四国访问。他利用各种场合“增加了台湾在国际间的出现率”，进行了一次颇费心机的“跨洲之旅”。

1995 年 4 月，李登辉以“私人度假”的名义，访问了约旦等。遭遇“冷落”的中东之行，被报界戏称为“沙漠之旗”。

今年 6 月 7 日，李登辉又以“校友叙旧”为名，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美国。此次，他洋洋自得自诩为“世纪之旅”。

但是，李登辉未免高兴得早了点，还在他返台之前海内外就一片谴责声，李登辉狡辩说：“这次的访问可以说是私人的访问，也可以说是非正式的访问，各方面的活动限于康乃尔大学校园为中心”，他强调，“访美之行绝非制造两个中国”，“希望中共不要作政治化处理。”

明明是政治活动，李登辉偏要蒙上一层“私人”的面纱。分明是政治事件，却不要人家作政治化处理，这种自欺欺人的拙劣表演实在是卑劣之极。

李登辉明白，造成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的大祸是他惹起来的，为了平息众怒，他近日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的样子，呼吁起“台湾海峡一定要安定、和平”来了。李登辉还表示，要为自己寻找“务实外交”与“两岸关系”的“平衡点”。

必须指出，李氏的“务实外交”必然是以破坏两岸关系为代价的，两者不可能有什么“平衡点”。李登辉寻找“平衡点”的说法，不过是他破坏两岸关系的一块遮羞布，是他和平地分裂中国的一颗烟幕弹。可惜的是，这颗烟幕弹已经无法遮住世人的眼睛。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分裂祖国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种种掩耳盗铃式的拙劣表演只能是欲盖弥彰，肯定是徒劳的。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

材料　李登辉——分裂祖国的罪人

台湾最高当权者李登辉以返母校参加毕业典礼为名，6 月 7 日至 12 日到美国进行了所谓的“私人访问”，其间还在康奈尔大学作了长篇演讲。李登辉自以为似乎可以在国际上显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从李登辉访美前后的海内外反应

和李登辉访美后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来看，事实却是：挟洋自重的李登辉，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分裂祖国的历史罪人，其真面目空前大暴露。

美国方面一再辩解说，李登辉访问仅仅是“私人访问”，美台仅仅是维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这显然是掩耳盗铃。李登辉的美国之行，并不像他所说的是一次“私人访问”，而是有着深远的政治图谋。

李登辉自1988年上台之后，便处心积虑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千方百计地为台湾“重返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费尽心机。特别是近两年，台湾当局不惜血本地展开以“度假”、“过境”、“金钱”、“元首”、“学术”等各种名义的“外交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其“两岸分裂分治”的主张，竭力争取所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的“国际代表权”。这里必须一提的是，从去年起，李登辉亲自出马，不惜自我矮化，四度到东南亚、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活动，以经济援助和投资为诱饵开展游说，低声下气地乞求一些国家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谩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为了促成李登辉访美，台湾用金钱铺路，出高价请美国公关公司进行游说，用各种名目的助选费收买美国官员。据透露，为了让李登辉踏入美国，由李登辉的亲信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台湾综合研究院”的机构，在美国高价聘请卡西迪公司在美游说，3年的合约共付卡西迪公司570万美元。另据报道，台湾时常捐款给康奈尔大学，至少有450万美元之多。康奈尔大学为此感激涕零，为李登辉访美积极奔走。美国参众两院不少议员在“银弹”进攻之下也纷纷为李登辉访美“举手投足”。

由此可见，访美是李登辉蓄谋已久的计划，是台湾“务实外交”整体部署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李登辉企图利用返回母亲的机会敲开美国的大门，把康奈尔大学作为对华盛顿发动“外交攻势”的跳板，将台湾问题一步一步地“国际化”，从而促使目前两岸分离状态走向“固定化”和“永久化”。而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与台湾当局背离一个中国、分裂祖国的图谋一拍即合，助长了李登辉搞台独的气焰。

李登辉访美前后，海内外对美国政府和李登辉的谴责之声不绝。人们谴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抨击李登辉挟洋自重，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甘当历史的罪人。

港台报纸也指出，李登辉一直都是以“统一”作为手段，走向“台独”的终极目标。古往今来，中国人都以维护国家统一为荣，以分裂国土为耻。李登辉在台湾历史转折关头，想的干的却是企图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他明知美国对台湾怀有野心，却甘心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旦结交了洋人，便狐假虎威。又是演习，又是操炮，恶化两岸关系。

这是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倒行逆施，违背了两岸人民的根本愿望。

更为严重的是，李登辉利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演讲舞台，肆无忌惮地散布分裂祖国的言论，将“台独”思想付诸于行动。他在这个讲话中，17次谈到“中华民国在台湾”，16次强调“两岸分裂分治”，为其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他大谈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气势汹汹地表示要打破“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运作”，“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这是他在向遏止其搞“两个中国”的国际法挑战，向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挑战。他打着“主权在民”的幌子，企图把其搞“台独”的愿望推给台湾民意，推到2100万民众的头上。舆论指出，李登辉美其名曰：“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实际上是“台独所欲，长在我心”。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民意的恶意歪曲和粗暴践踏，显然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与海峡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与人们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不仅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也不会允许的。

李登辉访美已经带来了明显的严重后果，一是使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面临倒退危机；二是助长了海内外“台独”势力气焰嚣张，拖延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三是干扰和破坏了两岸交流的良好气氛，给两岸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障碍。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从根本上违反了中美共同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改变了自1978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领导人禁止台湾官员访问美国的政策，也违背了克林顿政府一再向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把中美关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行径，损害了中国的尊严和和平统一大业，伤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6月16日，中国正式通知美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戴维斯，召回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回北京述职，何时返回美国没有说明。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也因任期届满而离开北京。目前中美双方处在无大使的状况。正如李鹏总理7月4日会见基辛格所言：“中美关系出现的困难完全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中方作出的反应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克制的，但不能把中方的克制看作是软弱可欺。”面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中方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彻底消除李登辉访美产生的恶劣后果，真正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以行动而非口头言辞，来证明其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

鉴于台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于6月16日致函台湾海基会，表示不

得不推迟汪辜会谈及其预备性磋商。舆论指出：李登辉访美之后台"行政院长"连战紧步后尘，到捷克等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台湾连续举行四次针对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李登辉甚至忘乎所以地宣称要用10亿美元购买联合国会员资格。这一系列行动，其根本目的旨在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破坏祖国统一大业。

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举行，使两岸同胞清楚地看到台湾当局挟外人以自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看到了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带来的恶果。目前海协与海基两会的协商与合作能否恢复第二次汪辜会谈能否顺利举行，关键取决于台湾方面是否真正有诚意，能否真正停止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的行径。海峡两岸同胞以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正式拭目以待。

（摘自《半月谈》杂志，作者：端木来娣）

第43届世乒赛在天津胜利闭幕 我国乒乓健儿获得七项冠军

背景介绍

1995年5月，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中国乒乓健儿经过14天的激战获得了本届世乒赛全部七项冠军，再创世界乒乓历史的奇迹。

材料：

- 第43届世乒赛我国选手获得七枚金牌

材料　第43届世乒赛我国选手获得七枚金牌

人民日报天津5月14日电　记者王学孝、陈杰报道，5月的海河吟唱着欢乐的歌，汇聚五大洲乒坛健儿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激战14天，今晚在这里举行隆重的闭幕式，中国乒乓球队团结协作，奋勇拚搏，获得本届世乒赛全部七项冠军，再创世界乒坛历史的奇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等出席了闭幕式。

李鹏在闭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主席，对本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祝贺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闭幕式前，进行了女子双打、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国运动员邓亚萍、乔红以3：1打败队友刘伟、乔云萍、孔令辉以3：2战胜刘国梁，中国队再捧波普杯和圣·勃莱德怀·萨马兰奇、哈马隆德、李铁映及国际乒联官员先后为中国获奖运动员颁发金杯和金牌，全场高奏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爆发出热烈掌声。中国运动员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孔令辉等4名中国男队员高举国旗绕场一周，场内顿时沸腾起来。

这是自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之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第二次夺得世乒赛的全部冠军。

第43届世乒赛组委会主任、天津市市长张立昌在致词中说，本届国际大赛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合作与友谊，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代表世乒赛组委会与900万天津人民，向支持世乒赛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获得优异成绩的各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

哈马隆德致闭幕词。他代表国际乒联，向为第43届世乒赛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国乒协和世乒赛组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从本届世兵赛的比赛水平看，乒乓球项目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他与大家相约：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和下届世乒赛上再见。

国际乒联的会旗和本届世乒赛的会旗缓缓降下，天津市市长张立昌将国际乒联的会旗交与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哈马隆德将会旗转交给英国乒协主席兰萨姆和下届世兵赛东道主曼彻斯特市政府代表里萨·菲兰女士。

闭幕式上举行了题为《地久天长》的祝贺演出，演出分"亲人的祝贺"、"孩子的心声"、"勇士的光荣"和尾声"一路平安"4个部分，主题是祝愿本届乒坛盛会的美好印象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友情永远留在五洲宾客额的心中。

出席闭幕式的还有王光英、罗干、万国权等，高德占、伍绍祖也出席了闭幕式。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背景介绍

50年前，纳粹德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结束。目前，各国都在纪念这个历史性日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德日意法西斯各怀扩张野心而相互勾结。妄图称霸和奴役世界，进而发动侵略，把世界推入了战争火海。但是，历史不可逆转，人民不可战胜，中苏美英法等同盟国和世界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终于使侵略者的美梦化为泡影。不可一世的德日意法西斯最终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进步战胜了反动。

在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和苏联作为东方和西方的主战场，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本世纪最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

历史是部教科书。在纪念世界反法斯西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可以进一步从中汲取教益。

法西斯主义用发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极端表现，是对人类文明的玷污。血泪斑斑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昭示着一个真理：法西斯主义遇有适当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一旦发展为实际的行动，就会造成巨大灾难。而今，一小撮人为法西斯掩饰罪责，扬幡招魂，这是十分危险的，是值得警惕的。

毋庸讳言，当年法西斯之所以能够滋生蔓延并最终酿成战祸，同几个大国对侵略者的姑息甚至纵容有很大关系。它们出于各自的私利，妄图用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去满足侵略者的胃口。而它们之间又都竭力要把祸水引向对方，这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还应当指出，几个大国在战争后期协调抗击法西斯的同时，已开始奉行牺牲弱国利益的强权政治，这为随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和各种矛盾纷争埋下了祸根，历史一再证明，推行强权政治只会加剧世界紧张局势，损害国际和平与稳定，到头来难免自食其果，国家之间应平等相待，任何国家都无权凌驾于别国之上，大国应当为帮助弱小国家发展多尽力量，为维持和平与稳定多做贡献。

二战的历史表明，世界和平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30年代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为法西斯上台和发动战争提供了温床。战后50年来，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造成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尊重支持第三世界广大国家所珍视的发展权，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二战历史，人们更感到和平的珍贵。本世纪上半叶，人类遭受了两次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下半叶，随着众多国家相继赢得独立并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和平力量大大增长，人类得以从事和平建设。可以这样说，在过去50年中，人类取得的进步超过以往几个世纪。

当前，冷战已结束，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但是世界仍然充满各种矛盾，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矛盾尖锐，局部冲突频仍，强权政治依旧，种种问题困扰着人类社会，威胁着国际和平。人们希望，既然当年各同盟国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团结奋战，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面对共同的历史使命，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完全应当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共同努力。

材料：

- 首都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材料　首都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

首都各界9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长篇重要讲话。江泽民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人民抗日力量，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正确的战略指导和牺牲奋斗的辉煌业绩写下的历史结论。团结起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一心一意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搞上去，中国就将以新的姿态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阔步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会议开始前，近百名抗战老战士，穿着整齐的服装，佩带着功勋章，容光焕发地登上主席台。此刻，万人礼堂里华灯齐放，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体与会人员起立，向为抗战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抗战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午3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纪念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开始时首先提议，全体起立，为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及无辜死难者默哀。江泽民代表中国各族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游击队员和民兵，向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向为赢得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海外侨胞，向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和我们并肩作战的友好邻邦的军人和人民，以及给我们帮助和同情的国际友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纪念大会上，老将军肖克代表抗战老战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代表各人民团体先后讲话。

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领导同志和曾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有丁关根、田纪云、李岚清、李铁映、杨白冰、邹家华、姜春云、钱其琛、尉健行、温家宝、王汉斌、宋平、薄一波、宋任穷、张震、任建新、倪志福、陈慕华、孙起孟、雷洁琼、秦基伟、李锡铭、王丙乾、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迈瓦买提、吴阶平、宋健、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珮云、罗干、张思卿、吴学谦、杨汝岱、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赵朴初、钱伟长、董寅初、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黄华、彭冲、严济慈、叶飞、廖汉生、王芳、方毅、谷牧、马文瑞、杨成武、吕正操、郑天翔。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抗战老战士代表：李运昌、郭洪涛、李强、王鹤寿、章蕴、刘英、赵毅敏、李葆华、曾志、刘建章、李立、彭德清、张光年、张策、平杰三、张邦英、王从吾、张珍、钟师统、张秀山、宋一平、周林、金明、钱信忠、李启明、马国瑞、刘杰、赵健民、任质斌、王林、荣高棠、李登瀛、徐运北、雍文涛、梅益、周子健、邓力群、彭友今、高扬、莫文骅、方强、欧阳毅、黄新廷、杜义德、郑维山、蔡顺礼、罗元发、黄玉昆、杨秀山、王宗槐、梁必业、谢振华、吴烈、周文龙、刘志坚、徐深吉、胡奇才、郭林祥、肖全夫、吴富善、王诚汉、李真、宋承志、曹思明、谷景生、高厚良、陈鹤桥、傅崇碧、何正文、万海峰、张延发、华楠、史进前、李耀文、韩怀智、邢永宁、郑文翰、刘凯、李默庵、贾亦斌、廖运周、肖乾、陆诒、郭秀仪、杨拯民、郭庆兰、程元、黎遇航、沈策、李以劻、贾桂藩、王光复、爱泼斯坦、张素我、戴坚、陈修和、胡景通、高存信。

中央党政军群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在京上将军官，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在京的原中顾委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干部，部队、武警官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及工商联人士，在京外国专家，北京市各界代表，来京参加中央各部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代表，外国驻华使节和武官等万余人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摘自人民日报）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

背景介绍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落下帷幕，来自各国的与会者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审议并通过进一步加速执行《内罗毕战略》的《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这已不单是广大妇女为提高自身地位的呼喊，而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即将付诸行动的承诺。

恰如这次世妇会会歌所唱：当东方的地平线托起新世纪的黎明，希望的太阳喷射火一样的热情，让我们一起携手行动起来，祝福世界平等、发展、和平。

材料：

-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开幕
- ’95年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京开幕

材料一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开幕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月4日下午3时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这是继10年前内罗毕会议后联合国召开的又一次讨论妇女问题的盛会。

今天，飘扬着联合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气氛热烈，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妇女代表和其他人士汇集在这里，参加这个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的妇女大会开幕式。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特别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基塔尼在开幕式上首先代表加利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是联合国妇女工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系列全球会议的高潮。我们必须着手促进世界的妇女事业。

基塔尼代表加利的讲话中认为，中国担任这个历史性全球性会议的东道国，既恰如其分，也意义重大。没有中国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质的论坛。中国决定主办这件当代生活中的大事，象征着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也象征着亚洲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基塔尼代表加利的讲话回顾了联合国50年来在提高妇女地位，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从法律上承认妇女的尊严和价值、承认男女平等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后说，没有男女充分而平等地参与促进和平，保障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参与人权、人口、保健、教育、政府、家庭和民间社会各方面活动，便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基塔尼代表加利的讲话中强调，使男女在法律和事实上平等，是二十世纪政治上的大计划。联合国负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关键任务。我们在这里开会，是要把这个伟大事业带进二十一世纪。

会议选举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世妇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慕华任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主席。

陈慕华在当选后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前，为了实现男女平等的共同目标，我们相会在北京。我们必须牢记本次大会的主题和我们的共同追求，以实际行动谋求平等、发展、和平。这是广大妇女的呼声，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要求。

陈慕华指出，由于联合国、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在促进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妇女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一些严峻的现实不容忽视，这需要各国、各地区的妇女共同努力。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全世界妇女都在注视着我们，关注着大会，我们决不辜负全世界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使本次大会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球妇女地位的提高。

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冰岛总统维格迪斯·芬博阿多蒂尔、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乌干达副总统斯派西欧莎·卡齐布威、越南国家副主席阮氏萍等，都在大会上发言。她们阐述了实现男女平等、妇女积极参与和平与发展事业，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观点，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她们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还选出了22名副主席，通过了议事规则和其他组织事项，并从5日起开始一般性辩论。会议将审议并通过进一步加速执行《内罗毕战略》的《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京开幕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记者悠明镇、丁辉报道：今天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汇聚在北京国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欢乐颂》欢快的旋律回荡在上空，5时整，'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艾琳·圣地亚哥走上主席台郑重宣布：'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开幕式开始，来自五大洲的妇女代表用不同的语言向论坛献上同一个祝词：我们不忘过去奋斗的苦难，让我们欢庆妇女所争取到的权利，并为开创美好的新生活而努力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生代表中国向全体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向论坛工作委员会，向各大区域非政府组织协调员以及所有为论坛的召开作出贡献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陈敷生在欢迎词中说，从墨西哥城、哥本哈根、内罗毕到北京，从《墨西哥宣言》，哥本哈根《行动纲领》、《内罗毕战略》到这次世界妇女大会将要通过的最后文件，显示了近20年来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为争取男女平等、推动社会发展、谋求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可喜成果；反映了非政府组织广泛的参与及推动作用。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政府组织论坛越来越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现在，众多的各国姐妹和朋友云集北京，为加速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共同目标，就妇女最关切的问题进行研讨，这必将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功和全球妇女地位的提高作出新的贡献。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她说，这一天等候已久，这是妇女解放、赋予权力、尊严和平等的里程碑。今天，没有人可以无视或否认妇女的权利和贡献。她希望'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能与政府代表团紧密合作，为全世界妇女赢得更大成就。

'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总召集人坤仁·素帕达拉·玛萨迪在开幕式上阐述了本次论坛的主题："通过赋予妇女权力与举办庆典活动，让妇女与男子在各个阶层一同迎接挑战，全面创造和转变全球结构与进程。"她说，通过我们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将不仅以妇女为了争取平等而众志成城的转折点，而且还将以全人类为建立真正公正、和平的世界而奋斗的转折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下午5时50分，从非洲传到北京的和平火炬进入会场，在全体人员高唱"永远前进不后退"的歌曲声中，坤仁·素帕达拉·玛萨迪女士宣布：'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国务委员、世妇会中国组委会主席彭珮云，北京市市长李其炎，世妇会中国组委会副主席徐志坚、刘华秋、张百发、何鲁丽、李肇星和约旦公主巴斯玛，博茨瓦纳总统夫人马西雷，加纳罗林斯总统夫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的妹妹埃斯平夫人等也参加了论坛开幕式。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995年9月25日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176人，侯补中央委员125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同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材料：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材料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1995年9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176人，候补中央委员125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共分六部分：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二、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三、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四、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和部署；五、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李鹏同志就《建议》草案作了说明。

全会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五”期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圆满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预计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今年可提前实现。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实践中积极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后1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继续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已，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这是巩固、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全会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15年的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将取得明显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全会强调，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和我国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的历史条件下，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既充满希望又非常艰巨的开创性事业。要有效地调动和发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认真贯彻以下重要方针：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四、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五、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七、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八、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九、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全会指出，今后15年，要下大力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各部门，重点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缩小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在经济建设中，重点加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科技、教育。同时，振兴支柱产业，培育高技术产业，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国防实力。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必须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对外经济体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要把社会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努力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加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倡导敬业创业精神；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坚持不懈地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全面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顺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强调，要继续按照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建设的部署，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耿全礼、马启智同志为中央委员。

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克、王瑞林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陈希同同志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严重失职，对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腐化堕落，生活奢糜；利用职权，为其亲属等人谋取非法利益；利用职务和公务之便，收受贵重物品。其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鉴于他在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有些还没有完全查清，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江泽民视察海军部队观看海上演习

背景介绍

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了人民海军舰艇和飞行部队，观看了海上演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和军委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以及解放军三总部、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一同视察并观看海上演习。

这天上午，江泽民主席在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上将、政委杨怀庆中将的陪同下，冒雨来到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视察。江主席十分高兴地同飞行员们一一握手，亲切地问候飞行员们辛苦了。他走到飞机前，详细地了解飞机的性能，在雨中边走边听张连忠司令员介绍飞行部队的情况。下午，江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乘车来到某大型军港码头视察舰艇部队。江主席乘坐阅兵指挥车一一检阅每艘舰艇。接着，江主席兴致勃勃地登上新型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参观，他攀舷梯、下舱室、上甲板，察看武器装备，参观飞行甲板和舰载直升机。当他听到舰长柏跃平介绍舰艇装备和导弹各种技术性能时说，海军是高技术兵种，你们要很好地学习和掌握现代化技术，成为思想、技术都过硬的海上精兵。随后，江主席还认真地观看了海军兵器展览，并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一起，和海军演习部队的全体中高级干部合影留念。

第二天，江泽民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乘坐指挥舰出海观看海上演习。江主席神采奕奕地坐在观摩主席台上，全神贯注地观看舰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海上汇报演练。上午9点30分，一艘艘新型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编队、潜艇编队迅即驶入演习海区。一时间，天空战鹰呼啸，水上战舰驰骋，水下"蛟龙"倒海，导弹腾飞，火炮轰鸣，鱼雷逐浪，齐射目标；海面水柱冲天，海空火光闪闪，烟幕腾腾。电子战贯穿了演习的全过程，舰机协同、编队协同，舰空对抗、潜舰对抗，登陆作战，气势壮观，一场高技术现代海战的缩影呈现在中央军委领导面前，显示了人民海军装备质量有了新的发展，海上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江主席一边观看演习，一边高兴地鼓掌称赞演练得好，演练成功。江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在舰上检阅了海上分列式。以核潜艇、常规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和直升机、水上飞机、侦察机、歼击战斗机、歼击轰炸机组成的舰艇、飞机编队依次通过海上观摩主席台，接受江主席的检阅，人民海军充分展示了严整的阵容和崭新的风貌。

海上演习和阅兵式结束后，江泽民主席在指挥舰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海军这次组织中高级干部学习高技术和新装备知识，结合新的形势研究战法，取得了显著成果。新的形势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把海军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确保我国海防安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规划了“九五”期间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贯彻落实好五中全会精神，抓好军队的各项建设，关键是干部。军队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抓好军事训练，必须钻研军事，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和指导工作的能力。他还强调说，高级干部一定要有坚强的党性，严格政治纪律，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江泽民主席视察海军部队、观看海上演习，给海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大家一致表示，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保卫祖国的领海主权，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批复西藏自治区请示特准坚赞诺布任十一世班禅

背景介绍

国务院11月29日下午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坚赞诺布是11月29日早晨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由国务院派员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的，并于当天上午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电请国务院批准。

下午4时，在拉萨班禅大师的行宫雪林多吉颇章，举行了册立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典礼。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宣布国务院于当日发出的《关于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国务院批复全文如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你区1995年11月29日关于《请国务院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请示》悉。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饶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的西藏自治区嘉黎县坚赞诺布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材料：

- 坚持金瓶掣签和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班禅转世灵童
- 班禅转世灵童是如何产生的

材料一 坚持金瓶掣签和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班禅转世灵童

——帕巴拉·格列朗杰在班禅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在首都北京庄严召开，我作为班禅灵童寻访总顾问，感到非常高兴。

大家知道，由藏传佛教界人士组成的转世灵童寻访班子，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六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就在寻访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达赖喇嘛突然在国外宣布西藏境内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这一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的行径，严重干扰了寻访进程。达赖喇嘛作为佛教信徒，理应以弘扬佛教教义为重，以藏族人民的利益为重，以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为重。达赖喇嘛自1959年叛乱外逃以后，不但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而且心甘情愿地充当国际敌对势力反华的工具。他无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悠久历史，无视社会主义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无视藏族人民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和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一直没有停止破坏西藏安定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来，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进步和繁荣做些有益的事情。殊不知，今年5月14日，他竟然擅自宣布认定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达赖喇嘛这一违背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我国早已形成的历史定制，违背班禅大师遗愿，无视中央权威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西藏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的谴责和坚决反对。

历世班禅大师，一贯拥护中央政府领导，维护中央政府权威，阐扬佛法，圆融显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其大悲大愿，铭刻雪域。特别是十世班禅大师，以其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藏族人民和热爱自己信仰的佛教的光辉业绩，成为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我们深知大师本愿，就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对于活佛转世，他不止一次强调要尊重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他在圆寂前主张金瓶掣签认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名言，已为世人所周知。

金瓶掣签自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颁行后，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合理而公正、并为僧俗群众接受的

令人信服的定制。达赖喇嘛妄指灵童、违背了历史定制，违背了宗教仪轨和必须完成的认定程序，理所当然是非法的、无效的。而且扎寺明确提出，这一男童在宗教上也不符合候选灵童条件，应予彻底否定。我完全赞同扎寺的意见。班禅转世灵童应该由扎寺按宗教仪轨完成寻访程序，提出候选灵童，按程序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然后由金瓶掣签确定转世灵童真身，并报中央政府批准后继承前世班禅的名号。

刚才听了扎寺民管会寻访工作近期进展情况的介绍，甚感欣慰。他们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在有灵异的男童中筛选出了几名候选灵童。这几名候选灵童特征明显，慧性湛圆，灵异卓著，符合十世班禅大师候选灵童的条件，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尽早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批准这几名候选灵童金瓶掣签。我也坚信，通过这次会议，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认定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排除干扰，按照国务院的决定，遵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尽早圆满完成，以满足广大僧俗群众的热切祈盼。我真诚地祝愿，第十一世班禅继承前世大师遗愿遗志，成为深受广大僧俗群众拥戴的藏传佛教领袖，成为一面继续飘扬在雪域高原的爱国主义旗帜。

我们西藏各界爱国人士，是西藏历史的见证人，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新西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西藏和发展西藏。任何分裂、倒退的行为都是没有希望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材料二　班禅转世灵童是如何产生的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统方式，公元13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首领圆寂后，该派推举一幼童为转世继承人，从而创立了活佛转世的办法，此后各教派先后效法。公元16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并逐渐形成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经过中国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为防止内部分裂，于是袭用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及部分高僧指定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为根敦朱巴的转世，这就是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由此形成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尊号始用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1578年，明王朝顺义王俺答汗赐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格鲁派依此称号追认根敦朱巴、根敦嘉措分别为第一世、第二世达赖喇嘛。1653年，清王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以中央政府的册封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能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六岁，且早拜师八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及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5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等的宗教地位。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姻娅，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等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

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同时还有助于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弘扬正法、避免纷争。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僧众的衷心拥护。1792年金本巴瓶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祇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后，掣签大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形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仍，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综上所述，班禅转世的宗教仪轨自清王朝颁行“金瓶掣签”法规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日臻完善，形成为历史定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1)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2)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3)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4)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5)把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6)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中央决定成立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领导小组，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班禅转世灵童。此决定符合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完全正确之举。

1989年8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嘉雅活佛、扎什伦布寺民管会的部分成员及藏传佛教界的高僧活佛。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寻访班禅转世灵童。首先是诵经祈祷、卜算、观湖，确定转世灵童出生的方位、属相，进行密访。1989年6月扎寺孜贡查仓琼布·洛桑顿由活佛、比龙·白玛旦曾活佛等人前往日喀则地区仁布县境内的雍杂绿措观湖。同年7月，上述两位活佛又前往山南加查县曲果甲拉姆拉措湖观湖。第二次观湖是由俄钦·边巴等人于1991年6月前往山南曲果甲拉姆拉措湖观湖。结合两次观湖情况及班禅大师圆寂时的朝向，寻访工作领导小组最后确定了转世灵童降生的方位、属相、住地。据此，寻访工作领导小组自1994年2月至1995年1月共进行了三次重大的秘密寻访工作，在五省区46个县境内寻访出灵异儿童28名。1995年1月，寻访人员在拉萨集中分析了寻访情况，根据观湖确定的方位、属相、住地特征，结合到实地反复寻访的情况，反复比较各个男童的不同吉兆，最后筛选出重点对象和核查对象若干名。寻访工作领导小组将寻访工作及候选儿童的情况上报中央后，中央决定依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办事，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中央的决定及寻访小组的工作完全符合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也符合历史定制，正当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之时，叛逃国外的达赖喇嘛却于今年5月14日在印度突然宣布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此举违反了历史惯例，践踏了宗教仪轨，亵渎了佛教教义，干扰了寻访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正常进程。

达赖利用班禅转世大做文章其意不在宗教。实际上，他要通过反对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来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在西藏制造混乱。企图通过争夺转世灵童认定权实现对另一大活佛系统的操纵、控制，改变班禅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进而影响整个西藏的信教群众，以推行他“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这才是达赖不顾一切地插手班禅大师灵童转世的真实目的。

达赖违反历史定制插手班禅大师灵童转世工作的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西藏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参加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的高僧活佛与宗教界人士一致认为，按照金瓶掣签认定和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的原则确定班禅转世灵童，不仅符合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也为新中国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工作立下了个很好的规矩。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国新）

风云人物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西藏日报记者　大众日报记者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两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

越野车载着他，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油画般的高原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拉萨河，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高耸的雪山，明镜般的湖水……孔繁森热爱西藏的山山水水，但此时却顾不上欣赏这高原美景。伸向远方的莽莽苍苍的路，多么象人生之路。回顾过去的路，思谋未来的路，他的心早已飞向了阿里。

孔繁森先后两次进藏，这时已在高原工作6年。按说，他现在应该东进返乡。然而，他却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驱车向西，奔赴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地区，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最低气温摄氏零下40多度。民主改革前，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藏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当地的经济发展仍比其他地区缓慢，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那里更需要象孔繁森这样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自治区领导同志征求孔繁森的意见时，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象这样的工作调动，孔繁森经历过多次。每一次，他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唯一选择。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从踏上西藏高原那天起，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三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三十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身边。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3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愿望。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光阴似箭。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这时，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妻子动

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子一人肩上。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吧！"妻子感到很奇怪：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了？带着疑惑的心情，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途中，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到了北京，就等于走遍了全国。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象到北京一样，你和孩子们别牵挂。"听了这番话，王庆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北京回到聊城后，孔繁森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话还没说完，王庆芝的眼泪已象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看着妻子难过的样子，孔繁森的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动情地说：

"庆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就放心去吧"，王庆芝抽泣着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身子。"那些日子里，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一边悄悄地抹泪。

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

"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可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91年，一次车祸把他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题时，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处理。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

这一次，听说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已经先后两次进藏，该吃的苦也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去一定可以干得更好、进步得更快。听了这话，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呢？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

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2000公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柳丛在阳光下象火一样耀眼。天空，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奋斗拼搏、流血牺牲。如今，党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进入阿里地界，孔繁森的调查研究也开始了。当天夜里，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措勤县委所在地。第二天上午，他不顾旅途劳累，召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商讨如何发挥当地优势，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途径。随后，他又去看望和慰问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官兵。

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40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

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作了多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4月25日，孔繁森主持召开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30.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有时，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他们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虽然艰苦，但孔繁森却风趣地对随行的同志说："高原上的水绝对没有污染，是世界上最优质的矿泉水，等开发出来得用美元来买呢！"他那乐观的情绪，常常感染着周围的同志。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孔繁森列举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势。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孔繁森激情满怀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热血沸腾。

艰难困苦，对于弱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94年初，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

漫天大雪，吞没了农田、牧场和村庄。凛冽的寒风，把各县受灾的消息传到狮泉河。

"立即行动起来！到灾区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

在革吉县和改则县，孔繁森目睹了暴风雪给牧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大片大片的牧草被冰雪覆盖，成群成群的牲畜因冻饿而死，许多群众陷入缺衣少粮的困境。

孔繁森的心在颤抖！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风雪中，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2月26日，孔繁森来到受灾最严重的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这里海拔5800米，是阿里最高的一个牧业点。乡党委书记嘎玛钦尧愁眉不展地说："大雪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最深的地方没到膝盖。全乡有8人被冻伤，牲畜大部分死亡。"

孔繁森心情沉重地把全乡每户牧民的损失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坚定的语气对嘎玛钦尧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住，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功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

他早年在部队医院当过兵，粗通医术。来西藏工作后，为了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做了大量工作。每次下乡前，他都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一次，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然后又为老人打针服药，直到转危为安。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长时间的高山反应，持续不断的超负荷工作，使孔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身上不住地冒虚汗，但还是坚持着给冻伤的牧民一一做了检查。尔后，又把解决曲仓乡受灾牧民的搬迁、转场和买牛的资金及口粮、油料等问题一一研究落实，直忙到凌晨2点多钟，才躺下休息。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剧烈的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对孔繁森来说，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西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那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昏昏沉沉中，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想着，想着，泪水挂满了脸颊。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代：

小梁：

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他，没有倒下。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但这场雪灾毕竟也给阿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雪灾和连续几年的旱灾、风灾，使孔繁森深深感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抗灾防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这一年7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返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陈述想法，争取支持。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6万多群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七八月份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孔繁森顶着似火的烈日，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汇报灾情。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就到有空调的商店里避一避。饿了，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次数多了，随行的同志难免有些抱怨：在摊上吃，既不卫生，也太简单，而且有失地委书记的身份。孔繁森很动感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

在北京的20多天里，孔繁森先后跑了十多个部门，每到一处，他都把纪录阿里灾情的录像带放给有关同志看，一边放一边讲灾区群众的困难，说那里条件的艰苦，谈建设防灾抗灾基地对阿里的特殊意义，人们无不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阿里的灾情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破例为阿里解决了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资金。资金落实后，孔繁森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西藏和平解放40多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200多亿元。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总投资23.8亿元的62个援藏项目。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对西藏这样关心和支持，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藏族群众？

返回阿里后，孔繁森向地委和行署干部迅速传达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我们怎么办？"他和地委、行署一班人提出，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思路，新的行动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开创阿里工作新局面"。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1993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87%。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2000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高原的夜晚不再漆黑，明亮的灯光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在空旷的荒原上拔地而起，隆隆地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大门……

三个藏族孤儿，900毫升鲜血。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

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900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九佰元整。

在这张献血证明的背后，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慰着三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必要安置好这三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三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12岁，曲印7岁，贡桑只有5岁，睡觉时经常把尿撒在床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象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看到孔繁森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领走了曲尼。

生活条件变了，曲印和贡桑吃东西也开始挑剔起来。孔繁森觉察到孩子的这一细微变化，就对办公室的小崔说：

“我想请你把孩子们带回羊日岗乡去看一看。”

“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看个啥呀？”小崔不解地问。

“让孩子们走一走家乡的土路，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再过几天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说着，孔繁森把曲印和贡桑喊了过来，他抚摸着兄妹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记住，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家乡，将来长大了，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兄妹俩回家乡生活了5天，回来后好象长大了许多。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

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

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藏族同胞，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太阳和月亮有着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非常喜爱的一首歌。他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解放前，象您这样的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30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

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

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200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

没人能说得清,象这样的事孔繁森做了多少件。有人说,他做的好事就像盛开的邦锦花,洒满草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就象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象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深沉,那样的博大。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令人痛惜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八元六角;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雪山含悲,江河呜咽。

许多人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象洁白的雪山。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波拉,波拉(爷爷)!您不能走,我们舍不得您哪!"孔繁森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捧着他的遗像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您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一幅幅低垂的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

就象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也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巾帼女帅 陈慕华

不老的是初衷,年轻的是事业。74岁的慕华大姐,洋溢着她惊人的生命活力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就是74岁高龄的慕华大姐(原谅我也借用了她身边工作人员的称呼!)当我们几位采访者走进她的国务院办公室时,只见她身材挺拔,步履敏捷,丝毫不见半点苍老,原来从电视荧屏上在我心里树立起来的"女强人"形象,在她深色长裙的飘逸中开始动摇。她用恬静而简练的话语和我们交谈,令人感到这位中国妇女界最高领导人刚柔并茂的气质的确不同凡响。不知怎地,心头突然涌上非常亲切非常熟悉的感觉,好像昨天就相见过一样。

我们几位女性是冲着女性话题而去,她也是为了谈女性话题而接受我们的"打扰"。

女性话题,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年轻的话题,这个话题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如果话说东方女性,那么又多了一分神秘和沉重。

当谈到已经颁布三年多的《妇女权益法》执行情况时,陈慕华用强调的口气说:"我们这个法不仅仅要对妇女宣传,更重要的是要向广大男士们宣传,特别是男士领导者!"

这里陈慕华用外交礼节上的语言称呼了中国的男性公民们。

"因为我们的决策层主要是男士,如果他们在思想里没有妇女权益这个概念,那么他们在决策时就不会有兼顾妇女利益的意识。'妇女权益法'最终还是纸面上的条文,妇女同胞们依然有法得不到保护。制定法律重要,执行法律更重要。所以新闻出版战线上的女同志要利用报刊宣传阵地向广大男士作宣传,让他们知道'妇女权益法'是什么,为什么要执行'妇女权益法'。就目前妇女生存状态来讲,有很大改观,但是问题还很多,宣传和执行

'妇女权益法',任重道远!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对强化全民知法执法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寄希望世界妇女大会,也寄希望中国妇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更寄希望于广大男士们的支持和参与。"

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开幕日期的临近,人们也在一天天地接近一个五彩缤纷的女性世界。为配合世界妇女大会的宣传,新闻机构开足马力,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同胞们"加油助威"!中国杰出的女性,女性杰出的业绩和独特的风采广泛被人们所关注所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女性形象已走出国门,成为全世界密切注视的焦点之一。

在这些宣传和报道中,自然少不了中国妇女最高领导人——陈慕华的名字,这个熟悉的名字,浓缩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女性的成长经历,也寄托着当今妇女走向美好明天的期望。人们熟知她,妇女们敬仰她,一方面因为她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直到今天,74岁高龄的她,仍然担任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妇联主席的职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那独特的女性风采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她那句勉励中国妇女的名言——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已成为今天妇女形象的标志,行动的座右铭。

陈慕华无论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还是在联欢晚会上,镜头中的她,总是神情凝重,目光专注,给人一种意志刚强、精明强干、洋溢生命活力的感觉,加上她身材高大魁梧,无逊于男性领导人的风度。

她从17岁走进革命队伍到今天,为新中国建设奋斗了57年。这期间。陈慕华和许多担任高层职务的领导人一样,走过艰难成长的道路,度过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遭到过委屈和误解。是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支撑她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创一个又一个工作新局面……不知不觉中,她鬓发染霜,度过了古稀之年。

革命57年,转换数十个岗位,留下的是累累硕果,带走的是青春年华

1938年,抗战烽火弥漫了中国河山,国难当头,17岁的陈慕华,毅然放弃学业,离开父母,辗转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亡的道路。在延安温暖的怀抱里,这位热血少女,到延安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以她独特的成熟和坚定的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又以不服输的倔强与执着,进入抗大军事队学习,成为一名在军事领域寻求发展的学员。

女性走进军事天地,自古以来都是凤毛麟角的事情。可是这块天地不会因为她是女性,命运之神便会向她敞开大门。相反,女人在这个领域中,命运往往要比男人多一份沉重,少一份机遇。

走进军事队的陈慕华并不满足,她想成为真正的军事指挥官。她听说抗大要办一个参谋训练班,就去报名,主考官告诉她,这个班不收女生!她敢于挑战,敢于打破常规的个性又一次帮助了她,经过"抗争",终于如愿以偿,加盟到男军人一统天下的军事参谋行列中,使得她同其他的12名女性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批军事女参谋。1945年她担任了热河军区司令部参谋,这一年她24岁。

军人是她的起点,也是她终身保持的风格。

陈慕华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拥有延安小米养育的健壮体魄,能胜任日理万机的工作强度,并喜欢用军人的方式处理事务,干脆利落、快捷准确,这些优势和特点直到她进入老年。她喜欢埋头多干事,少说话,即使在家休息,她也是沉默寡言,独自思考问题,决然没有"婆婆妈妈"这个年龄段的特征。

这颇富男子特点的性格,使得陈慕华在1988年9月全国妇女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时,她自己也觉得意外:虽说我是女性,可一辈子没有干过妇女工作,这回我是"赶着鸭子上架了"。是啊,身为女性的陈慕华,以前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和妇女无关,这时自然要多一份独特的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她脱下军装,踏进了陌生的铁路部门,后来又从事经济工作。从1950年到1971年,21年里,她先后在铁路部门、国家计委、对外技术联络总局、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等部门工作过。1971年后,她走上了部级领导岗位,随后又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她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主持过工作。所到之处,她都尽最大努力多办实事。每到她调离时,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和高高耸立的办公大楼,而她带走的是生命年华和不尽辛苦。至今,当年在她手下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她怀有深深的感情。逢年过节,大家都要来老首长家中聚一聚。

面对这么多的荣誉和头衔,陈慕华荣辱不惊。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她是人民的一员,女性的一分子!

尽管好有豪爽的性格,有无逊于男子的工作作风和特点,但她毕竟是妻子、是母亲,这种成年女性独有的责任感和爱心,在她身上十分鲜明和强烈。她1940年和丈夫结婚,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携手后再没有松开,共同度过了金婚纪念日。提起母亲这个词,陈慕华的感受恐怕犹为刻骨铭心。战争年代,她曾经忍痛把女儿送人,后来又为寻找这个断了线索的女儿而遭受了整整30年的感情折磨,最后千辛万苦找到这个女儿,她又教导女儿要热爱抚养她成人的养母,并把女儿继续留在养母家中,继续姓养母的姓。

陈慕华就是这样用她独到的方式爱着她的亲人,也用她独到的方式在政治舞台上施展她的才能。

身为政治家，她明辨是非，忍辱负重。身为巾帼统帅，她为人师表，富有同情心。身为妻子母亲，却常常自责负疚。

无论政治家还是妻子、母亲，无论女性最高领导人还是一个普通女性，谁能说陈慕华不拥有东方女性独特的风采呢？如果用笔墨书写，相信哪一段经历皆会成大块文章；如果用心灵倾诉，那么，时代的回音将构成她铿锵而恢宏的旋律！

摘自《中华儿女》杂志　作者顾保孜

王涛的乒乓恋歌

一

“小小银球飞起来，乒乓球我的爱……”悦耳的歌声，是从乒乓国手王涛、关华新婚家里传来的夫妻合唱。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俩手持麦克风，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伴着音响节拍，声态自然，音色甜润婉转。

歌罢，王涛美美地对我们说：“关华以前不会唱歌，是我教她的。”王涛说话的神态，好像找到“教练”感觉似的。

关华莞尔一笑道：“受了他点影响，以前爱听歌儿，也唱，但没现在唱得多，唱得好。”

歌声陶情，青年人爱以歌抒发感情。他俩总是忙，忙里偷闲，唱上几曲卡拉OK，歌台就设在自己的小家里。一些体星也来“客串”：李永波、郭跃华、刘玉栋、马文革、郑海霞都给王涛新家增添了音乐气氛。

王涛的音乐“天才”，是最近在全国MTV大赛上被发现的，他得了特别荣誉奖。人们乍听到他唱的这首歌儿，都感到惊奇。一向谦虚的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却敞开心扉：其实我早就喜欢唱歌，只是因为忙于训练和比赛，错过了许多表现的机会。王涛与关华认识以后，偶尔唱上几段，关华听了说出心里话：你唱歌比打乒乓球还迷人呢。有时二人一唱一和，生活情趣满浓郁，小两口感情融融的。

若按遗传或家庭熏陶来说，王涛应该成为歌星，而不是体星。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之家，父亲王世俊是音乐家，母亲何玉芳是全总文工团独唱歌手，哥哥拉提琴，弟弟唱摇滚，一家子全是歌迷，唯独王涛格外又迷上了乒乓球。他小时候家住全总歌舞团宿舍，耳濡目染都是歌，不会识谱都会唱。这里没有打球的氛围，可却冒出个乒乓世界冠军来。

王涛给爱妻说悄悄话：音乐是我的传家宝，以后腾下手来，再尽情地唱吧。那天来到王涛家，他父亲王世俊拿出一本厚厚的歌词给我看，内容写的是王涛体育生涯，展示了他成才的坎坷。也有抒情的，王涛与关华在河边垂钓，河水荡漾，柳枝摇曳，入得优美境地。一对国手，能挤出时间来“悠闲”一下，实属难能可贵。关华道出真情：干我们这一行的，整天价憋在馆里抽球儿，挺枯燥的，钓鱼是我主动陪他去的，想换换脑子，散散心。鱼上不上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静静地想些打球的点子，找点高招儿倒是目的。他俩名曰钓鱼，实则研究乒乓球技术，看来并不轻闲。

第43届世乒赛后，王涛就要唱他的一组歌儿了，现正由其父王世俊精心谱曲。王涛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天津世乒赛后，即刻投入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准备，但王涛肯定会唱着心中的歌奔向亚特兰大。

二

王涛与关华同年同月生，脾气秉性接近。一个是有礼貌的小伙子，一个是腼腆的小姑娘。他俩由相识到相爱，战线拉得很长很长，虽说他俩都是乒乓台子上拼搏，论经历还得说关华“资格老”。

关华刚满13岁，参军来到八一队，风风火火拼杀正酣的时候，王涛则刚刚离开什刹海体校，正为寻队着急呢，他一心要圆乒乓梦。13岁上，小小的个头，一个娃娃，千里迢迢只身赴新疆军区打球，后又随军队转到黑龙江。边疆省份的条件不及京都，但他规规矩矩，苦练了几度寒暑，成绩不凡。经历了一番坎坷，又打回老家来，奉调八一队。在此初与关华相识，而且越“打”越熟。

关华连获两届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名声显赫，后进入国家乒乓球女队，与乔红、陈静为伍。关华走了，王涛扎在八一队埋头训练。虽与关华心心相印，但尚未挑明“关系”。

第六届全运会，王涛一鸣惊人，过关斩将，连连战胜腾毅、江嘉良、惠钧、许增才、马文革、韦晴光、陈志斌、万国辉等国家队高手夺得了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此时的王涛憋着一口气，一心要打入国家队。当然，关华的鼓励，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王涛的成绩明摆着呢，国家队再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了，进了国家队，王、关一在男队，一在女队，心有灵犀，比翼争先，彼此暗中使劲。关华对王涛说：咱们千万不能“暴露目标”，二人不显山、不显水，只管拼命打球。

王涛初来乍到，又遇不顺事，教练说他个头矮、拍子怪，不一定有前途。因此，一时未能“重用”，只好将就着看“路遥之马力”吧。

关华相信王涛：你只要在国家队站住脚，肯拼一定能出成绩。没想到尴尬的事儿又出现了，他俩的关系虽没公开，但纸里包不住火，那时国家队最忌讳运动员谈恋爱，教练说，关华在国家队，王涛一来，没法管理，按规定你俩

得走一个。王涛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关系还没明确哪，干嘛走？关华一听就斩钉截铁地说：我走！把王涛留下。关华又回到八一队，虽说自己委屈了，但成全了王涛，心里热乎乎的。说实话，此时他俩还真没定“终身”呢，关华只出自对王涛事业的爱护罢了。

后来，关华由国家公派赴日本一家俱乐部打球，两个人见面机会少了，事业心又都很强，也顾不上谈情说爱了。偏巧儿，第 41 届世界乒乓球赛在日本举行。王涛代表国家队出阵，发挥特好，获男双冠军。发奖后，王涛从领奖台上抱着一束鲜花走下来，径直跑上看台，把一束鲜花塞在关华怀里。这无言的爱，在关华心里才与王涛真的定下“终身”大事。

关华闯乒坛先于王涛，一点不假，但若论接触乒乓球，关华 8 岁，王涛却是在 2 岁半。那时，他还拿不动球拍子，是他父亲自制了个又小又轻的拍子，教他打球。长了几岁以后，全家五口人住两间房，硬腾出一间放球台，吃、睡、学习，打球都在这块台板上。王涛的这点经历，应该说早于关华了吧，哼，不然。关华的父亲关毅是河南省体工大队长、乒乓球教练。母亲华惠敏是乒乓球运动员，身怀关华时，仍在队上打球儿。现在科学育婴，讲究胎教，据有关人士研究认为，关华球儿打得漂亮，意识、素质好，与胎教基因有关，照这说法，王涛的“球龄”，就永远比不上关华长了。

三

关华临场经验丰富，且稳健多谋。王涛出了成绩，受益于关华的“指点”。我曾问及王涛，运动员谈恋爱、结婚，到底会不会影响成绩？

王涛很干脆地回答：“我和关华结婚的这年，成绩最大。”掐指一算也是，仅 1994 年，王涛比赛硕果累累：数次世界明星赛冠军，全国锦标赛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冠军，亚运会男团和男单金牌得主，世界明星巡回赛总决赛第一名，列世界排名第二，中国乒乓头号主力。

别看王涛场上那威风八面的“大刀”，挥来砍去，技惊四座，场下对关华却柔情若水。王涛购置一辆轿车，让妻子开着。他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的，星期天上午也不休息，仅有下午半天休息时间。中午，关华从西郊红山口开车来接王涛回家小住。返回家时，王涛主动提出开车。关华说：“你打半天球儿了，累，我开车吧。”王涛抢过方向盘坐下，诙谐地笑笑说：“你坐轿，我开车，我把你娶过来了。要是你开车，谁娶谁呀！”一句话，逗得关华抿嘴笑，心里乐开了花。

关华知道王涛喜食红烧肉，于是每次接王涛回家之前就准备好了。他不能吃辣子，一上火长口疮，而关华最爱吃辣子，但为了保护王涛的身体，辣子她也不吃了。

眼下关华任教练，比当运动员时更忙更累。可是，她把小家拾掇的倍儿干净，布置得挺温馨。王涛每到大赛前，一天大运动量训练后躺在床上，激动不已，精心琢磨球技，难以入睡，常常失眠，可第二天照样打球。一天，深夜了，王涛失眠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睡着了。关华没惊动他，轻轻地给他盖上一件大衣，让他和衣睡到天亮。从此，细心的关华得到了启示，只要王涛失眠就看电视，这一招很灵。关华特意从国外带回一台微型袖珍电视，王涛外出训练、打比赛随身带着，小电视放在枕头旁，看不多时便酣然入睡。这一招儿，成了治愈王涛失眠症的“灵丹妙药”。

王涛自知本身条件不优越，身高 1 米 60，在击球力量、步伐移动方面都吃亏，但他凭借后天刻苦勤奋，弥补了先天的不足。他常与妻子共同商量以巧制胜的方法。他左手横握球拍，苦练反手，结果反手快拨成了他的“杀手锏”，被同行们誉为“怪球手”；身矮臂短，便苦练步法，提高运动速度；相持球攻击力不足，他就以短变线来调动对手，在守中伺机反攻，始终保持咄咄逼人的勇将气势。瑞典名将佩尔森曾不隐讳地说：“与王涛打球不管你领先了多少，你都必须保持百分之百的紧张。”

作为乒乓国手的爱妻关华，及时提醒王涛：“佩氏的话是战术，劲敌的赞誉，不是糖水，而是苦酒，你要保持清醒头脑，矢志不渝，万万不可松懈。”

王涛打赢了，关华不表扬；打输了，不埋怨，为的是让王涛保持一颗平常心。

四

关华曾在日本打球，王涛在德国打球，二人都很重感情，只要一有空闲，王涛就不惜重金，给千里之外的关华打电话，特别是夺取奖牌之后，就更要及时通报，几乎是热线天天不断，真可谓千里情缘一线牵。

关华在国外打球，尽管薪水很高，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她想有个家，这次回国打比赛，登记结婚了，事业和爱情组成的家，独具魅力。

王涛成为世界名将，打比赛的机会多了，可和爱妻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就在他俩共同生活很少的日子里，唱歌、谈球依然是重点内容。王涛拼杀在赛场，关华是他的忠实观众，她把每场比赛都录下来。王涛回家再看录像，小两口亲切地切磋球艺，品尝胜利果实，也享受爱情的甜蜜。

王涛很投入备战天津世乒赛，赴正定强化训练，临行前没捞到时间回家看上一眼。爱妻关华赶到训练局来饯行，备齐了所用的生活用品，外加几盘歌曲磁带，一个劲叮嘱：“训练太累了，听听歌儿，失眠，别忘看电视。”

王涛悄悄地对妻说：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我不给你

打电话了。关华听了他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挺高兴。

“你的心情我理解，有压力倒能冲出去。”知夫莫如妻。夫妻俩的生活，就是唱也唱不完的乒乓恋歌。

摘自《体育博览》杂志　作者刘鹮林

“小女子”吴仪

吴仪喜欢自称“小女子”。听她作报告、讲话不过5小时，她起码有了六七个“小女子”：

“小女子豁出去了……”

“小女子有泪不轻弹……”

“小女子不在乎你这个……”

“小女子孤身一个……”

这自称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有趣。这位自称“小女子”的，并不是戏曲舞台上的弱女子，而是当今中国政坛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强人。

“我年轻的时候不想当官，更没有想过要当部长，不然，我一定把字练好……”吴仪如是说

吴仪的同事说：“她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坦城。”时下，虽然大家都讨厌双重人格，而许多人又自觉不自觉地戴着面具生活，吴仪的坦城正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参政意识，不想当官，更没有想过要当部长。不然，我一定要把字练好，现在是一手烂字。”吴仪一开口果然坦率得可以，“我最大的理想是作一个大企业家，现在如果让我选择是当官还是当企业家，我还是选企业家。在企业，自己的思路、决策马上能见效，更容易有成就感。”

1938年，吴仪出生在湖北武汉，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1962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在兰州炼油厂干了两年多，在石油部呆了两年多，在燕山石化公司干了20年，在北京市干了3年半，然后到了外经贸部。至于仕途，她说：“我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技术员、副科长、科长、副厂长、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外经贸部副部长、部长。”

现在有句流行语“妇女当干部姓副”，可吴仪却是实实在在有职有权的部长。她说自己几乎是“从男子堆里干出来的”。在燕山时，班子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她喜欢开玩笑，那些男同志也爱和她开玩笑，大家相处很愉快。有时候抬起杠来，吴仪就说：“好男不和女斗。”大家哈哈一笑，就算了。

对部长级干部的采访，往往有许多禁区，吴仪则率先“开放”了禁区——“我不信奉独身主义。之所以打单身，和年轻时的片面性有关。一是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心里有个标准男子汉的形象，而这种人现实生活中没有；二是总觉得要先立业后成家，立业才能成家，这个业又老觉得没有立起来。然后就是在山沟里一呆20年，接触范围有限，等到走出山沟，年龄也大了，工作又忙，就算了吧。”

吴仪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决不打官腔说套话。她要是答应见你必定坦诚相见，把她的想法赤裸裸地坦露在你的面前，使你只要与她接触一次，就再也难以忘怀。

在外经贸部，吴仪是“工作狂”。她的魅力往往就体现在她敢“较真”上

仪者，容也，用今天的话可以叫做“形象”。《左传》中讲，“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这里的“象”即效法之意。看来，吴仪的父母在给女儿起名颇具深心。在吴仪的人生道路上，她总在不断地寻找自己效法的楷模，努力完善自我，在当今中国政坛，她是一个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有着特殊魅力的人物。

新中国诞生时，吴仪11岁。一穷二白的祖国百废待兴，在吴仪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这使她对描写苏联建设初期火热斗争生活的书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最初，她想当个拖拉机手。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理想也随之升华，一是想争取作个共产党员，二是很想当个企业家，当个大企业的厂长，像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面那个党委书记兼石油厂厂长巴特曼洛夫一样，像苏联电影《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所描写的那位女厂长那样。为此，报考大学的时候她选择了石油专业。分配的时候她放弃了留在北京石油学院作教师的机会，一心一意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的第一志愿是大庆，组织上考虑到那儿刚刚开发，天气也太冷，就把她分配到了兰州炼油厂。从此，她在石油企业摸爬滚打25年，什么活都干过。修建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时候，她还当过推土机手、干过打眼放炮的活。她和同伴们在一片荒山秃岭上开拓创业，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而她自己不但当上这个炼油厂的副厂长，而且成为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当时中国石化系统几百个局级干部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虽然地位一再升迁，而吴仪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种实干苦干的韧劲却丝毫没有改变，并且把干现代企业那种讲速度讲效益的作风带进了政府工作中。吴仪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为了从意大利引进一条乙烯装置，她跑有关部门，跑了上百次，终于在她离开市政府之前，把这件事办成了。她在北京市民中颇有口碑。到外经贸部以后，中午吃饭要过一条马路，绿灯一亮，一起等在路边的大bus司机总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示意她先走。都知道她最忙。

在外经贸部，同事们把吴仪叫“工作狂”。每次出访，她都要完成一揽子实质性的工作任务，为中国外贸事业打开一片天地。去年她一连出访了近10个国家，每到一地，总是一下飞机就马上投入工作。

请看一下吴仪部长在西雅图的一天。

时间:1993年11月19日。

从早上8点30分到晚上22点,共参加7个活动:出席会议、会见记者、与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会谈、与企业家见面,几乎没有间隙,午餐就吃了一包方便面。

在90年代世界范围的这场没有硝烟但火药味很浓的商战中,吴仪处在前线总指挥的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另一方面又必须向国际惯例靠拢,二者的距离有时看起来简直难以逾越,外经贸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作搭桥铺路的工作。因此,在国际上,吴仪要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为中国争取时间、争取机会、争取合作伙伴,并且要随时解决各种贸易摩擦和纠纷,为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市场营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在国内,她要进一步推动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外贸法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大经贸"新格局的形成,在各方面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还需要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工作很忙很累,根本没有正常的上下班和节假日,以至于她把晚上到家后一个人在黑暗中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当成一种享受。

吴仪办事特别认真,她的魅力往往就体现在她敢"较真"上。在燕化,有一天晚上12点多,吴仪家的电话铃响了。这是某分厂的一个工人打来的,说是食堂送的夜班饭又差又冷,无法下咽。吴仪马上告诉他,半小时之后如果你们厂长或者厂长委托的人没有去,你再给我来电话。半小时后,电话又响了,那位工人说,厂长来了,问题解决了,我们工人向您表示感谢。打扰了您休息,实在对不起。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应该解决的事情,一定马上着手解决,决不以什么"调查调查"、"研究研究"来搪塞。是谁的事,谁就得负责任。

吴仪颇有口才。香港《大公报》有篇报道评价她在国外的演说:"她从来不作拘谨、刻板的官式发言,不用讲稿,也不看笔记,如果有回答问题的节目,场面就更精彩,她对答如流的应变本事,能够得到淋漓酣畅的展露。"其实这种人前的潇洒是用人后的艰辛劳动换来的,是人的修养和素质的综合体现,而修养是长期努力奋斗、大量积累的结果。每次出国前,部里的同志都给吴仪准备讲话稿,但吴仪一定要事先把稿子看了,从中抽出主要的东西,弄成一个提纲,然后自己去讲,这样效果就不一样了。她的同事说:"吴部长在国外,始终坚持看对象讲话,从来不讲千篇一律的话,不讲没有内容的废话,所以相当劳心费力。"她的精明干练、坦率明快的风格,改变了中国官员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据报道,当她对加拿大企业家们的演说结束后,那些大老板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不仅要进口中国的商品,而且要进口像 Madam Wu 这样的部长。"

今年4月,在吴仪率中国经贸代表团和200多人的招商团访美期间,她不失时机地先后会见了3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把人权与贸易挂钩的作法,力陈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5月27日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续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中间当然有此必然的联系。试想,如果吴仪在那个关键时刻不能打动人心,不能说服人,情况又会怎样?

吴仪的多才多艺透过传媒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得知。她会打高尔夫球、会打保龄球,还打得一手好网球,并荣任中华巾帼软式网球队队长,队员们都是些女部长。她喜欢唱歌、喜欢卡拉OK、喜欢中外古典名著、喜欢欣赏音乐,也喜欢钓鱼。有人问:"您穿的那些漂亮衣服从哪儿来的?"她说:"我的服装是请设计师做的,有些式样是我自己设计的。在国内我不是很讲究,但有外事活动和出国,就得按外国人的习惯。这是代表中国女性的形象,不单是我自己的问题。"确实,吴仪的潇洒也体现在她的服装上。当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她的衣着总是那么典雅考究,使她愈发显得精明干练、神采飞扬,从里到外都给人以美感。"吴氏服装"没准会成为当代中国职业妇女的时装。那些视吴仪为楷模的女同胞们,会从各方面去仿效她,也包括模仿她的服装。

美国人早就领教了吴仪的厉害。在国际商战中,她是既难以对付又值得信赖的对手

吴仪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国际谈判中,她以强硬著称,不卑不亢,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当有人搞霸权主义、或者当中国利益受到损害时,她会敏锐地作出反应,毫不含糊地声明中国的立场。1991年底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方一见面就出言不逊,侮辱中国的尊严,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马上针锋相对顶了回去:"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国人马上明白了他们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会上会下吴仪也免不了敲打他们一下,她曾对白宫一位官员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们搞专利保护追索,我们也要追索,追索到四大发明!"让美国人去算算这笔帐嘛。"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这句吴仪的名言被记者徐泓报道后,多少人在心里为吴仪叫好。

这就是吴仪的风格,她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

一天下午,两个外地女同志拜访吴仪,请她指点怎么做外贸生意,同时还想要点配额。她显然和她们不是初识,但谈到配额,她一口拒绝:"这绝对不行!我们党组有规定,任何领导成员不得私自批条子给配额你们不要打这个主意,这绝对不行!"

当原则性正在被权力和金钱所腐蚀,有些人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不惜丧失国格人格的时候,吴仪的这种原则性愈发显得可贵。

吴仪有原则,但并不教条也不死板。她通情达理、明智务实、刚中有柔,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由于情况熟悉、知识面广、反应敏捷,她善于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

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各方，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较好的方案，把事情办成。对此，她曾说："在谈判桌上，你必须强硬，没什么好谦虚的，谦虚就是无能。但既然谈就得谈成，像'文革'时期那样光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不行，该让步就应该让步，因为谈判本身就是让步，但我们让步并没有超出国家授权的范围。"

一旦作出承诺就要言而有信，在国内一有机会，吴仪就大声疾呼要保护知识产权，不能随意抄袭模仿、拿来就用，不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她动情地说："如果我们不遵守知识产权法规，谁也不愿意向我们转让技术，我们就只能搞三来一补，只能停留在中低档层次上。请大家不要出于本地本单位利益因小失大，影响国家全局利益，损害国家的形象。需要的技术你就花钱买一点嘛。"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商战中，吴仪被视为既难于对付又值得信赖的对手。

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吴仪富有政治智慧，她走到哪里都特有人缘

有一次王任重带着几个人去燕化参观。他的夫人看到领导班子一帮又高又大的男子汉中就吴仪一个女同志，人年轻，个子又小，就问："你当党委书记，领导这班男子汉，行吗？"吴仪答道："他们都支持我，很配合。"其实，在处理和领导层一班人的关系上，吴仪做了很多很巧妙很细的工作。比如，当时有两位副总经理积怨较深，开会总坐不到一起，吴仪不显山不露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凡是有这两人参加的会她必到，而且在会上决不让任何一方感到吃了一点亏。两位男子汉总不好意思当着女党委记忆的面吵吵闹闹吧。看到公司经理们的工作太忙，吴仪特意自己花钱买来糖果，召开夫人座谈会，感谢这些"后勤部长"，鼓励她们关心和体贴丈夫，做好"后勤工作"。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经理们尽量不加班或少加班。每逢节假日她尽量提供方便，让公司领导和家人团聚……这样一来，一班人干工作的劲头就足了。

吴仪虽然爱批评人，对同志要求很严格，但从来不给别人穿小鞋，不打击报复，从来不整人、不做对不起同志的事。

吴仪不是完人，工作中的疏忽和闪失难于避免。可贵的是，她能比较自觉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改正自己的缺点。她说："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就是说要向群众学习，要有群众观念，不能我行我素。"她有每天睡觉前都写日记的习惯，回顾每一天做了哪些事，哪些事做得好，哪些事做得不对，哪些话说得对，哪些话说得不对，力求不重犯同样的错误。

吴仪对人总是那么亲切随和，走到哪里都特有人缘。在燕化，无论干部、工人、大人、小孩，随时都可以去找她，她也乐意接待他们。她认为这样做，一可以联系联系群众，二可以获得信息，三可以发现人才。于是人们有困难愿意找她解决，有心里话乐于向她倾诉。女市长协会，大家也选她当会长。

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随着一个单身女性地位的升迁，围绕她的流言也就多了起来。从燕山石化到北京市，吴仪领教了一回。

1991年吴仪调任外经贸部副部长。这一次她主动出击，在第一次有司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她讲完了工作，又讲了几句："我孑然一身，没有背景，也没有后台。当北京市副市长，是差额选举选上来的，到外经贸部，是组织分配我来的，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要靠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奋斗去工作。"大家都会心地一笑。看来这一着是必要的，她要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如果老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领导权威从何而来？与其让人们去猜测，去传谣，不如公开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光明磊落的人才行。

吴仪显然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女性，而政治智慧是大志大度者的胸襟、学识、人格的自然流露，是装不出也买不来的。

（摘自中央党校出版社《当代中国女杰》作者谢武军）

黄鼎臣

黄鼎臣（1901—1995）

又名黄劈寰，广东海丰人，1901年8月生于广东海丰。少年时学医治病。

1921年赴日本学医，毕业于东京日本医科大学。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深造。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团结中国留日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斗争，声援国内反帝运动，曾几次被拘留，仍毫不妥协地坚持斗争。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参与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学习马列著作。1928年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反日大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络广大留日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济南惨案"。旋被日本警视厅拘留，遣送回国。回国后，他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久任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主任。同年8月，反日大同盟与思想社（原创造社）等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在法租界遭巡捕房逮捕，转送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判刑入狱，在狱中，参加中共地下支部领导的斗争，利用治病对难友进行联络，鼓励难友坚持斗争。1932年底刑满出狱，先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行医，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联络广大爱国华侨支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46年加入中国致公党，与陈其尤等

抵达香港，与在港的老致公党党员陈演生等酝酿恢复致公党活动，提出整顿党务、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翌年5月，在致公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常委兼组训部长，为致公党走上同共产党合作、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引导和推动致公党成员和广大侨胞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6月，他与陈其尤等代表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卫生部医政局局长、医疗防预司司长，1953年任中国防痨协会理事长，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致公党第四、五、六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七、八届中央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副事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当选为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同年被推举为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1989年12月21日，在全国归侨联合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顾问。

著名社会活动家黄鼎臣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久经考验。他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95年1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陈　云

陈　云(1905—1995)

原名廖陈云。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05年生。1919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参与组织商务印书馆罢工，任该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松浦特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1929年春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常委兼农委书记、军委委员、中共上海闸北区、法南区区委书记。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为历届中央委员。

1931年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2年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5月后，被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赴苏联，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7年4月回国，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任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参与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1946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力主坚持南满根据地，并在北满部队配合下，同萧劲光指挥部队“四保临江”，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1948年1月回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并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辽沈战役结束后，率4000余干部接收沈阳及其周围的工业城市，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8年8月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5月赴北平，奉命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主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1959年4月、1965年1月连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曾兼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在中共第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张应该有三、五年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时期，以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一思想，在6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调整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还曾建议对农民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一建议和其他一些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当时被认为是“右倾”而未被采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解除了在中央的一切领导职务。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继续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注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党的当务之急等重要思想，对加强党的建设有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1995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夏　衍

夏　衍(1900—1995)

剧作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浙江杭州人。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杭县一个败落的封建地主家庭。高小毕业后，便到一家染坊店中去当学徒工。但由于在校时成绩优异，被母校浙江省德清县立高小保送他入了免收学费的杭州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毕业，又被保送赴日本留学，于翌年二月考入日本福冈的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5年毕业后，到九州帝国大学继续深造。

早在杭州求学时期，夏衍就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发起和编辑了浙江当时的革命刊物《双十》(第二期后改为《浙江新潮》)。该刊曾得到《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好评。到第三期被政府查禁。

1924年10月，孙中山先生到日本时，夏衍和另外几名中国留学生代表前往求见。孙中山当场指定李烈钧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次年他离开九州帝国大学，去东京专门从事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发展工作，并很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务委员、组织部长。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东京的国民党右派将夏衍等人列入了通缉名单。5月，夏衍终于被驱逐回国，到了上海。一个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从此，夏衍便成了党的一名职业的地下工作者。

1929年秋末冬初，他正式接受党的委托，与鲁迅、冯乃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从此，夏衍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文艺事业，他的戏剧、电影生涯也就从此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夏衍与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沈西苓等组织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戏剧艺术团体——上海艺术剧社。郑伯奇任社长，夏衍任党的负责人。并开始了首次公演的紧张排练工作。1930年1月6日，艺术剧社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首次公演，剧目有：《炭坑夫》(德国，米尔顿作)、《梁上君子》(美国，辛克莱作)、《爱与死的角逐》(法国，罗曼罗兰作)。夏衍亲自导演了《炭坑夫》。这次演出影响很大，受到了各界人士田汉、洪深、应云卫，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热烈祝贺。之后，又在"上海艺术馆"第二次演出，在演冯乃超的独幕剧《阿珍》时，因剧中描写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引起了剧坛的轰动，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禁演。4月28日晚，上海工部局查封了艺术剧社，同时查抄了中华艺术大学。

为了有力地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戏剧事业的摧残，更好地推动革命戏剧事业的开展，夏衍、郑伯奇等人和六个进步的戏剧团体(即：南国剧社、辛酉剧社、复旦剧社、戏剧协社、摩登剧社、大夏剧社)联合组织起《上海剧团联合会》。8月1日，联合会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2年对于夏衍的艺术道路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聘为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这是他从事影剧剧作的开始。夏衍首先写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

为了加强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钱杏邨、万凌鹤、王尘元、司徒慧敏五人组成，夏衍任组长。此后，夏衍积极领导了电影剧作、影评、翻译和评价工作，先后开辟了《电影专刊》(《电报》)、《每日电影》(《晨报》)、《电影与戏剧》(《民报》)等电影副刊阵地。夏衍以蔡叔声笔名与郑伯奇等1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的声明，大力推动了影评工作。他翻译的前苏联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亦在《每日电影》连载。

1932年下半年，夏衍撰写了《创作月评》、《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九一八战争后的日本文坛》等文艺评论文章，并译了《高尔基年谱》。1934年6月，左翼电影工作者对反对电影表现革命内容的"软性电影"论者展开斗争。夏衍以罗浮笔名发表《软性的硬论》等文，揭露了"软性电影"论者的荒谬和欺骗。1935年又出版了译著：《平林泰子集》、《败北》、《有岛武郎集》、《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次年，写了轰动文坛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解放后，该文被纳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1933年2月，《狂流》拍成电影正式放映，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接着他改编茅盾的小说《春蚕》为电影剧本(署名蔡叔声)，发表于《明星》杂志一卷五、六期。1933年底到1934年初又完成了电影《同仇》，表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爱国热情。同年，与郑正秋、洪深、阿英等合写电影剧本《女儿经》，十月上映。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他退出明星公司，转入联华影片公司，任特约编剧。并与司徒慧敏等组成"电通公司"，担任领导职务。接连写成电影剧本《春到人间》、《自由神》、《压岁钱》等。

1935年是夏衍艺术生涯的又一大转折。这一年，中共上海文委、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也先后遭破坏。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因叛徒告密，夏衍遭追捕。不得不蛰居一年之久，这一年中他开始了话剧的创作。写了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中秋月》，1936年4月完成了大型话剧《赛

金花》。《赛金花》由四十年代剧社首次公演，由史东山、洪深、应云卫、司徒慧敏、欧阳予倩等组成的强大导演团，洪深任执行导演，有著名演员王莹、白璐、金山、刘琼、欧阳山尊等出演。这次演出轰动了上海，遭到了国民党破坏，终被明令禁演。

1937年上半年，标志夏衍创作思想的重大转折的、反映现实题材的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面世。该剧是他创作思想转换的成功的剧作。

“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积极参与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8月下旬，他与郭沫若等创办“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被查封，夏衍被迫离沪赴广州，并于1938年元旦在广州胜利复刊了《救亡日报》，一月底，“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5月，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救亡日报》等工作。1938年9月在百忙中，他写了4幕话剧《一年间》，电影剧本《白云故乡》。10月21日，广州沦陷。夏衍和《救亡日报》等12位同志受命撤离到桂林，后来得到香港何香凝和广大爱国同胞支持，于1939年该报复刊。4月9日，夏衍接到周恩来指示赴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直至1944年底。在此期间，除撰写了不少杂文、评论(1944年9月集为《边鼓集》)外，又业余创作了3个多幕剧(《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改编了一个多幕剧《复活》，合写了两个多幕剧:《戏剧春秋》、《草木皆兵》。1945年4月，夏衍出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八一五”日寇投降后，9月下旬奉令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出版时改为《建国日报》;同时组建《新华日报》上海版。

1946年6月调至南京梅园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派往新加坡，向著名爱国侨界领袖陈嘉庚转达党中央的问候，9月返香港。从1948年初至1949年春，在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工作，先后任委员、书记。同时，任《华商报》编委，副刊《茶亭》编辑，写了大量短评和杂感文章。按中央指示，5月27日随军进驻上海，任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历任上海市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9月被任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2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春当选上海文联主席。1951至1953年主要忙于领导工作，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直至1964年。10年间，他改编了鲁迅、茅盾、陶承小说《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这三部剧作，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在电影、戏剧评论方面，他写了《论〈十五贯〉的改编》(1956年)、《关汉卿不朽》、《答〈剧本〉月刊编者问》、《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1958年)、《艺术性与技巧》(1961年)等。并于1959年《杂文与政论》集出版。

“文革”开始后，失去自由，惨遭批斗、毒打、监禁达九年余，左腿被打致残。1975年7月12日被释放出狱。“四人帮”被粉碎后，彻底平反。出任中日友协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副书记、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中国日本友好协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年近八旬的夏衍焕发了革命青春，创作力也空前旺盛。于1979年一年中先后写下了《悼念应云卫同志》、《反映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多读书，勤练笔》、《写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文艺上也要搞点法律》等20余篇文章。他根据《红岩》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烈火中永生》也首次出版。

1994年10月为纪念夏衍从艺65周年，广电部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务院作出决定：授予夏衍同志“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并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重庆等大城市举办《夏衍电影回顾展》。

1995年2月6日夏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康世恩

康世恩(1915—1995)

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怀安县田家庄。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曾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在晋绥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边区建设，先后担任120师民运部工作员，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绥八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晋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过保卫延安和榆林战役、瓦子街战役以及解放兰州的战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兼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指挥，石油工业部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江汉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燃料化学工业部主要负责人，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同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国务委员兼石油工业部部长等职。他是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他还担任过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主任。

康世恩同志长期从事领导新中国的石油工业。解放初期，他领导恢复和发展了玉门油矿生产，把玉门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之后他又参与领导和组织指挥了克拉玛依、大庆等十大油田会战和其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贞，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主持燃料化学工业部工作，面对生产遭破坏、能源短缺的严重困难，坚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千方百计增加石油、煤炭和化肥生产，制定了引进综合采煤机组、改造小化肥和组织陕甘宁、任丘石油会战等重要决策。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亿吨，为支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我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邓小平、叶剑英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筹划和组织海洋石油对外开放，提出对外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主持立法工作，积极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海洋石油成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行业，迅速形成一支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装备精良、素质较高的海洋石油队伍，在海上石油勘探和油气田开发上取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新的生力军。他十分关注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主持制定了充分利用1亿吨石油的规划方案，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益。他亲自领导和大力支持13套30万吨合成氨和5套30万吨乙烯装置的引进规划和建设，提倡石油资源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发展精细化工，对增强中国石油化工实力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原油年产量从解放时的12万吨发展到1994年的1.45亿吨，这其中凝聚着康世恩同志的胆略卓识和倾注的大量心血。

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虚心好学，勤于思考，勇于开拓进取；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苦心探索，在实践中创新发展，成为中共党内学识渊博的一名工业管理专家和石油专家。他是中国工业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1995年4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珍闻轶事

"抽签大王"程嘉炎

世界上的抽签方式五花八门，除了体育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合需要抽签，但对抽签潜心研究20余载、著书立说的，恐怕只有中国乒协秘书长程嘉炎。

程嘉炎说，抽签是竞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乒乓球比赛尤为如此，一次抽签，常常会决定一个队、一个选手的命运。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合理，于是他发明了自助式卡片抽签法。此法一经问世，便从1989年起在世乒赛上被采用。程嘉炎写的《乒乓球竞赛法研究》一书亦被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叶荣誉亲自译校成英文。程嘉炎经20余载呕心沥血总结出来的抽签公式被命名为"程氏定理"。

以往，每届世乒赛的抽签均长达20个小时以上，而运用"程式定理"仅需4个小时。两年前，程嘉炎又把这一公式编成计算机程序。"CYX—94电脑抽签系统"在本届世乒赛正式使用，它简捷、迅速、公开，电脑过程均在屏幕上显示，选手自己用鼠标抽签，仅需一两个小时。

（陈昭）

丁松打法的启示

世乒赛第一天，中国男队小将丁松可露了点脸，打荷兰队时，中国队第一主力王涛让人捏了把汗，输掉一局不说，赢的那两局也是仅以两分险胜，正当人们为中国队担心时，瘦瘦身材的丁松上场了，他右手握"大刀"拍，削球打法，干脆利落地直下两局，战胜了攻势凶狠的对手，一下子把中国队的气势鼓起来。

50年代以后，世界乒坛上削球打法不再占主流，弧圆球和快攻打法主导着乒乓球技术的发展。打削球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在教练和家长眼中，孩子掌削球打法没有什么前途。

其实，尽管削球打法不是主流，比赛中又显得很被动，但只要削得好，技术有特点，仍然可以在乒坛高手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丁松以防守为主，又不是传统削球打法的那种死守型。他的反手突击球和正手抢攻、正手对拉技术，比起两位师哥——陈新华和王浩又有提高。这样，大多数攻击型对手因为打惯了攻球打法，遇上像丁松这样守得好、突然反击准的选手，往往因不适应而败阵。

由此看来，一个队如果是清一色的攻击型打法，队员技术上又缺特色，往往要吃亏。当然，一个队中都是打削

球的也不行，俄罗斯女队削球手唱主角，即使能打进前 8 名、前 4 名，若要更上一层楼则不易。

百花齐放方能促进乒乓球技术的不断发展，今日乒坛，攻与守这对矛盾发展得不大平衡，这样也不利于乒乓球运动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看看当今足球、蓝球。进攻与防守打法发展，相对比较平衡，比赛起来就好看。乒乓球比赛若想更吸引人，今后一段时期应在器材和规则方面实行“抑攻扬守”的政策。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萧鸣）

郎平归来

人民日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记者许立群报道：2 月 15 日 9 时 15 分，从纽约飞往北京的联合航空公司 803 航班在首都机场安全着陆，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郎平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郎平！郎平！”当那个熟悉的面容终于出现的时候，在场的不少人禁不住叫喊起来，这时，“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郎平，你这次回国跟以往有什么不同的感受？”“郎平”“郎平”，一大群守候多时的记者急不可耐地喊出各自的问题，前来迎接女儿的郎平父母和队友周晓兰、陈招娣等老女排及保安人员被采访郎平的记者们挤到墙角里。

郎平最后在几位警卫人员的奋力“掩护”下才得以改道从贵宾通道脱身，不过，明天起她在上任的同时，又将接受新闻界的“轰炸”考验。

村山首相“八·一五”书面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首次就日本侵华向中国人民道歉

在“8·15”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日的当天，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东京书面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郑重表示，痛切反省、衷心道歉由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

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问：在日本战后 50 周年之际，村山首相有何感想？

答：在迎来战后第 50 年的终战纪念日之际，我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为了再次向国内外表达我的心情，发表了“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如我在谈话中所说，由于我国过去一个时期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等亚洲各国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日本要谦虚对待这一事实，进行痛切反省。

另外，我对于在日本战败后，世界各国所给予我国的支援与合作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同时，我对于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近邻各国建立起的今天这样的友好关系，从心底感到高兴。

在战后 50 年的重要年份，我认为应该珍重这种心情，同时日本今后必须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尽其全力。

问：村山首相认为中日两国和人民应该如何发展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答：要谦虚地正视历史事实，并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是发展日中两国关系的基础。我认为，两国政府和国民，应基于这一认识，通过各个层面的交流，加深相互间的信赖与合作；这对今后的日中关系最为重要。

日中两国之间，两国的国民正在多层次、多领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日本政府想通过实施本年度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积极支持两国国民、尤其是肩负未来 21 世纪的中日两国年轻一代间的交流。

问：在第 50 个“8·15”之际，村山首相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答：中国自古以来就与我国保持着交往，我想特别对通过历史的纽带连结起来的中国人民，表达如下心情：

在战后 50 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我在今年 5 月访华时，访问了过去战争的象征地之一卢沟桥，重温了历史，再次下定了和平的决心，这是极有意义的。今后，我将继续立足于对历史的真挚认识，为发展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尽心尽力。

（选自《新华月报》1995 年第 9 期）

铤而走险者戒

——广东“鼎湖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特大案件”查处纪实

1994 年 5 月 17 日，广东省肇庆市税务局接到顺德市税务部门来电：他们在查处税票过程中发现一批代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有的是肇庆市鼎湖区人所为。

与此同时，肇庆市税务局从广东省税务局获悉：在广东省其他地区也发现不少增值税发票，经查也是由鼎湖区私营业主代开、虚开的。

自此，一起代开、虚开增值税发票总金额达 12.3 亿多元的特大案件开始一步步地水落石出。

（一）

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增值税是国家税务系统征收管理十分重要的一环，关系到税制改革的成败。其关键是管好用好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具有直接抵扣税款的特殊作用，便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新目标。

鼎湖区个体户莫乾光、莫乾佐兄弟俩自从新税制实施后，听说做发票生意可以发大财，他们便颇费心机，蠢蠢欲动起来。

“要得到增值税发票，必须首先有一个公司，而且要成为一般纳税人企业。自己一无经营资金二无经营场地，只能是一靠关系二靠钱，才能骗取一般纳税人资格，拿到增值税发票”。莫氏兄弟通过非法手段，先后申报了“取发”、“华安”、“江南”3个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进行了税务登记，堂而皇之地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从鼎湖区税务部门领取了专用发票。自1994年1月起，他们大量为区内外企业和经营部门代开、虚开增值税发票，并按开票额的4‰至9‰的比例向用票单位收取“手续费”，至5月间共代开、虚开增值税发票375套，金额达1.2亿元，从中非法所得46.5万元，致使国家流失税款多达2000多万元。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10多万人的鼎湖区代开、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现象之突出，情节之恶劣，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司法部门查证，全区共有一般纳税人企业446户，其中113户总共代开、虚开出的专用发票多达5548套，涉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省内的20个市。奇怪的是，这些一般纳税人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只有60多人。其中89户明明是去年刚开业的，而上报的年初商品库存额却高达29.9亿元之多。

（二）

鼎湖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鼎湖区税务部门擅自制定增值税预交款的办法，同时由于一些税务、工商干部经不住利诱，执法犯法，为虎作伥。

去年4月，鼎湖区税务局局长陈秋明、副局长陈炳佳根据所谓的预征比例的测算，提出对鼎湖区内已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私营企业，按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预征”2.4‰增值税款的方案（后降低为2‰），在区内执行。正是由于实施了这种与国家统一政策严重相悖的“土政策”，且发票管理和税收管理严重混乱，使一批不法业主有机可乘，大量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代开、虚开的违法犯罪活动。

在这前后，一批税务、工商干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与不法分子同流合污，在“鼎湖税案”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鼎湖区税务局直属税务所副所长黄强球、沙浦税务所所长陈岳嵩、广利税务所专管员梁卓洪、桂城工商所副所长罗华基等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按规定，要办理工商登记并成为一般纳税人必须具备经营场地、年经营额在180万元以上、有健全的帐册和固定的财会人员等条件。然而，陈岳嵩、梁卓洪、罗华基等置这些规定于不顾，大肆受贿，为不法个体户牵线搭桥：去年初，他们先后为既无资金又无场地的小业主所开的几十家“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并为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及一般纳税人登记申报手续，得到的是几千元或几万元不等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身为国家税务、工商干部，明知小业主要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然替他们领取专用发票。

今年29岁的鼎湖税务局直属税务所副所长黄强球在去年初的5个月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替不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3家公司办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税务登记，先后10次为他们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500套，收取这些公司给他的“好处”费7.5万多元。这些发票全部被这些公司用于代开、虚开，金额达4800多万元，使国家税款蒙受巨大损失。

去年4月，鼎湖区贝水镇工商所干部黄建维认识了外地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在交谈中黄建维告诉对方鼎湖的税率很低，建议他们来鼎湖纳税。此后，他为了便于办理开发票的手续，在自己工作的工商所为对方办理了一个企业的营业执照，并通过有关人员办理了税务登记证以及银行帐户。不久，黄便领着公司的人到税务所开出了3套增值税发票，开票总金额160多万元。事成之后，黄建维心满意足地拿到了“好处”费4.1万多元……

不法分子的巧取豪夺，税务、工商干部为一己私利的执法犯法，税务局长的玩忽职守，导致了鼎湖区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日益猖獗。一边是不法分子获得的私利，一边是国家税款的巨额流失，这就是“鼎湖税案”的实质！

（三）

“鼎湖税案”的发生，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针对日益猖獗的增值税发票犯罪，中央领导同志要求一定要从严查处，多次强调：“为了保证新税制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要严厉打击利用增值税发票违法犯法的不法分子，对于税务人员的执法犯法要从严查处，决不留情。”

从中央到地方，由国家税务总局和各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工作组陆续成立，深入鼎湖开展查处工作。

广东省和肇庆市领导及有关部门多次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对鼎湖税案的查处工作。广东省税务机关9次组

织工作组前往肇庆配合案件查处工作，并发动全省各地开展发票检查。肇庆市税务机关从去年6月起，对135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全面核查，共核对发票1.7万多套，并通过核票追回已抵扣税款1.2亿多元，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政法机关迅速行动，抽调精干队伍，在省内外追缉涉案犯罪分子；并加强办案力量，对涉案人员进行广泛侦查，追缴各种违法财物；法院提前介入，抓紧立案审理。目前，共抓获案犯30人，逮捕21人，已判处9人……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国家损失，数以百计的办案人员忘记了休息，放弃了与家人团聚，风餐露宿，昼夜奔波，内查外调，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为了堵塞漏洞，有关增值税发票的发放、管理和税务工作的规定、条例、制度相继出台；为了打击发票犯罪分子，有关部门联手出击，共同行动，将一个个犯罪分子捉拿归案。

"不放过每一笔税款，不放过每一个罪犯"——这成了全体办案人员的共同行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这起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数额巨大的特大案件终于大白于天下。

（四）

国法不容践踏。6月15日，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鼎湖区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严厉打击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宣判执行大会，依法判处莫乾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莫乾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黄强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岳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梁卓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黄建维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陈秋明、陈炳佳、罗华基各有期徒刑五年。

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的鼎湖特大增值税发票案件，至此告一段落，其他的涉案人员将陆续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正处罚。然而，此案的发生也说明了新税制改革的艰难，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漏洞，特别是一些执法机关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基层税务部门不按政策规定，把很多不符合条件或本属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都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实际上是为他们骗取专用发票开路。鼎湖区有14个号称外出经营者挂了66个公司的牌子，竟然全部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这里被视作儿戏。加上供应发票的环节没有严格把关，产生了很多漏洞。事实上，正是由于全区发票管理松懈混乱，至今仍有部分专用发票下落不明。"鼎湖税案"的发生，显然就是因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犯罪土壤，才酿成现在这样的恶果。

新税制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国情的，决不会因为出现"鼎湖税案"这样的事件而退缩不前。进一步完善新税制，加快建立健全配套措施，提高全体税务人员思想和业务素质，加强税务管理，强化全民的纳税和法制意识，已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郑庆东）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6月16日）

班禅达赖与转世制度

班禅和达赖是西藏宗教领袖，也是西藏最大的两个活佛。他们同源于藏传佛教中的黄教，祖师都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宗喀巴共有八个弟子，其中第二弟子克珠杰即一世班禅，拜师最晚的关门弟子根敦朱巴即一世达赖。

班禅和达赖的封号，并非一开始就有的。根敦朱巴转至第五世时，1653年（顺治十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册封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是从元、明两朝对喇嘛教首领的封号继承下来的，其"所"字意为你所管的佛教由你管，确认他为西藏地方喇嘛教的首领。"普通"即"圣识一切"，是汉语，指受封者的佛学知识博大精深、无所不晓；"瓦赤喇怛喇"为梵文，原意是金刚菩萨，有坚韧不朽的意思；"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达赖喇嘛是其简称。克珠杰转世到第五世时，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清圣祖康熙皇帝册封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班"是梵语"班弟达"的简称，印度称学识渊博的学者为"班弟达"；"禅"是藏语"大"的译音；"额尔德尼"是满语珍宝的意思。班禅是其简称。至于前世达赖喇嘛、前世班禅，都是后来的藏族史学家追认的。

在西藏，班禅和达赖政治、宗教地位是平等的，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班禅还超过达赖。197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中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班禅和达赖都是受中央政府管辖，两者之间互无隶属关系。从宗教方面讲，在广大藏族人民的信仰中，班禅和达赖也是平等的。藏族百姓一般不直呼班禅和达赖的，而称为"甲娃亚卜赛"，意为"师徒二尊"。因为历史上班禅和达赖有着随缘而起，时断时续的师徒关系。如四世班禅罗桑曲结既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的师傅，又是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师傅；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不仅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师傅，而且还是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师傅。

如果从寺庙、僧侣、田庄、农奴的数量来讲，达赖方面多于班禅方面。据清雍正十一年（1733）调查统计，达赖方面的寺庙有3150所，班禅方面的寺庙为327所；达赖方

面的喇嘛有342560人,班禅方面的喇嘛为13670人;达赖统属的百姓有121440户,班禅方面百姓有6750户。从以上数字来讲,达赖方面约占9/10,班禅方面约占1/10。

班禅和达赖的传承是靠转世制度实现的。具体程序是:首先要打卦占卜,察看征兆。前世班禅、达赖圆寂前,有时会留下遗嘱或征兆暗示,告诉人们他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转世。若没有遗嘱或暗示,则要打卦占卜,去"娜姆拉措"神湖观显影,请神灵指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湖面曾出现"安、噶、玛"三个藏文字母,当时摄政王热振活佛解释说:"'安'是'安多'的第一个字母,预示转世灵童将在安多地区诞生。"后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果然在安多地区诞生了。在寻找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时,湖面显影出一只老虎睡在扎什伦布寺前的台阶上。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刚好诞生于虎年。其次是寻访灵童。根据卦词和观湖象所提供线索,派人四处寻访。寻访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寻访者对各种征兆、卦词的观察角度、理解不同,常常会出现分歧。有时只找到一两个灵童,有时会发现三四个,甚至更多。其三是辨识器物。将前世班禅或达赖最喜爱的器物,如法器、茶具、衣物等,与和此形状完全相似的器物放在一起,让灵童辨认,错者淘汰。第四是降神占卜。候选灵童确定后,要请各寺院的护法神降神,询问哪一个是前世转世。如果护法神的答复同辨识器物的结果相同,就基本上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了。第五,金瓶掣签。金瓶,又叫金本巴瓶,高三十四厘米,纯金制作,存放在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如果候选灵童在两个以上,就要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象牙签上,每人一签,放入金瓶内。喇嘛念祈祷经后,从金瓶中掣出一签,上面写着谁的名字,谁就是转世灵童。最后报中央政府审批,再择定吉日,在中央政府派人主持下举行坐床大典。至此班禅或达赖的转世灵童的认定工作结束。金瓶掣签,坚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在宗教上又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

(钱伟,载1995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回首95年文坛,一个直觉是,虽驳杂纷纭,却又无主调,无热点。可套改一句古诗: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相似"。

'95文学的突出之点,是长篇依然风光,依然稳产,达四五百之巨。大批名家好手都有新作问世,是一大景观。煌煌数百部,高产并不就是优质,除了有实力的作家们抛出零星几部力作外,大量的还是次品充斥。长篇热销,一哄而上你写我也写,弄得文学市场上长篇铺天盖地,不啻是一大灾难。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应当来一个长篇质量万里行,来一个小说界的打假除劣。作为叙事文学的重头戏,文学的宠儿,长篇仍将在重复的面貌中热销,以至在文坛略领风骚,只是质量不大令人放心。

相对于长篇的热闹,中短篇小说是在沉寂中悄悄地生长,前些时各种"新"的文学主张过后,旗号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效益,倒是《上海文学》推出的"新市民文学",为文学发展寻觅了新的内容。倒不是这个口号多么具有开创性,而是因为她着眼于文学与生活的关联,着眼于变化了的读者群所感兴趣的事,触及了社会转型期最为切实的话题。文学的读者对各种旗号并不关心,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是内容上给读者带来新的东西。文学的主张与旗号的确立,都要有一大批文学新人的涌现为其支撑。提出"新"的主张过后如果仍然是些公众熟悉的内容、老面孔,至少在作家成份上是对"新"的忽略。

与创作不同的是,理论批评界仍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开掘,这就是延续了三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讨论的初衷是对时代精神中价值、理想与道德等进行梳理,进行重建,经过一段时间后,讨论多是在各自认知立场上进行自说自话,或者还夹带着个人的恩恩怨怨,有点像在演京剧中的"三岔口"。这是个大的文化主题,无论是文化理论还是文学实践,都可以从这个话题上展开。不过,眼下讨论好像成了强弩之末,似乎难于深入下去。

与创作的发展不平衡,批评显得孱弱。尽管这两年批评界曾发起了几次反思,1995年里一些文化人开展了关于批评的"批评",检讨"缺席"、"弱化"、"失语"等等不足,然实绩乏善可陈,可是另一方面,批评的热闹表现在会议批评风起云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常常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开个讨论会、研讨会什么的。批评在斯文和温情中,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唯一的例外是长篇小说《柏慧》出版后,《作家报》上发表过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批评在十分融洽的气氛状态中走过了热闹的创作年度。

好象有些时日了,书界的丛书、套书、文集等等,一时间很是走俏。年轻作家的文集热开始出现。江苏、中国社科出版社等,为一批年轻的小说家们出文集,洋洋数本数百万字,在过去唯有德高望重、老有所成的作家才有的殊

荣，在某些作家来得十分容易，以至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从市场行情看，这批文集大都卖得好，出版社和作家双双收益。这里打破了出文集选集是某种身分的规定是很有勇气的，但对那些并没有多少作品就恩爱有加地宠护，对作家本人也许并不是好事。'95文坛林林总总，应了一句俗话：波澜不惊，不火不瘟；众声喧闹，主调不明；驳杂纷纭，各领风骚。这也许正是文坛走向成熟和发展的一个标识。可以预期的是，文学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之后，仍会静默地生长着……

95年初引进的十部大片，已放映了九部。国内票房坚冰已彻底打破且带动国产片扶摇直上。至此，国产片也有了"大片"的名号，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等。大来大去，主要是大在一个投资上，似乎投资已是影片质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这就使人担心，经济领域中好不容易降温的投资热，在文艺界再度回潮。

首都体育馆是中国流行音乐传播的发祥地，而今天则成了明星大腕的滑铁卢：国内当红明星几次演出冷冷清清；旧地重游的曼托瓦尼乐队也没能再获辉煌；钢琴王子克莱德曼许是有了预感，特意排练了"梁祝"等中国乐曲，最终还是没能取悦北京观众；12月2日首都体育馆辞旧演出，中国原唱流行音乐会再遭重创。

流行音乐终于在"首体"表现出残酷的另一面。

双休已成现实　休闲有滋有味

两年前，双休日还是雾里看花，如今好梦已经成真。双休日使人们在工作和家务之外拥有了更多的真正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

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依参加者多少排列，北京人外出娱乐活动的顺序依次是：逛街购物；串门聚餐；去公园、风景点、博物馆游览；去歌舞厅、健身中心；外出就餐；看电影或文艺表演。剩下在家里休闲的人主要是看电视、听音乐、搓麻。

精明的商家当然早已盯住了双休日这个发财的机会，于是双休日服务一条龙等促销活动纷纷出台。据了解，仅在北京就有近40%的人因为拥有了双休日而在购物上花更多的钱。

双休日不仅促进了商业的兴旺，还带动了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据国旅总社杨文珍副总经理介绍，周末休闲游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旅游项目，城里人下乡奔大自然，乡下人进城领略现代都市风光，使周末游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旅游业纷纷以各地资源为依托，推出大量市内、周边线路和各地名胜风景区线路。

目前，个人和家庭式旅游已逐渐成为国内旅游的主要形式，其中一日游、二日游占30%以上，而一、二日游中，绝大部分是一家人或亲朋好友成群结队参加。

虽说双休日，人们被各种商业购物和旅游娱乐活动所吸引，但所获得的服务与他们的期望差距较远，只有约占市民总量10—15%左右的人，对现在的服务较满意。有些专家指出：我们拥有了一段休闲的时间，却还没有拥有一个可供有效利用的休闲服务机制。

摘自《人民日报》

足球火、大片热，"蹦迪"秧歌扭得乐

谁也未曾料到，萎靡已久的足球竟会成为人们1995年娱乐生活的最大兴奋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老到少，许多人都在为足球激动、焦灼、痴迷。

足球走向市场活了，电影迈向市场活了，十部大片的引进不仅激活了暗淡不景气的电影市场，使观众们重新回到了久违的影院，竞争也促使一些国产电影精品一片阳光灿烂。

除了看足球，看电影，年青人喜欢到迪厅去潇洒，而老年人却在街头秧歌的鼓点中找到了心声。迪斯科与秧歌、现代与传统，两个反差很大的东西，恰恰构成了城市老少自娱的两大景观。

如今，在百姓中流传这样的口头禅：足球火，大片热，"蹦迪"秧歌扭得乐；晚会冷，点歌凉，歌星影星不再忙。信息量的增多，快节奏的挤压，使紧张躁动的都市人希望在品味轻歌曼舞之余，也能来点冲击。1995年娱乐上的这种冷热反差告诉我们，今天人们的娱乐需求正在发生一次深刻的变化。

摘自《人民日报》

甲A大幕落　足球热潮涌

今年11月19日全国足球甲A联赛最后一轮，成了北京、成都两城市球迷的节日。当他们拥戴的北京国安队、四川全兴队如愿以偿地获胜后，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和成都体育中心顿时变成欢乐的海洋。数万名观众雀跃欢呼，锣鼓震天响，纸片满天飞。中国足球国内联赛以往未曾有过的热火朝天景象，向人们充分展示足球改革的成果。

最后一轮比赛，背水一战的四川全兴队，依靠翟飙的一记头球，以1:0主场胜八一队，终于搭上了保组的末班车。这一胜利也使青岛海牛队在沈阳客场以3:2击败辽

宁队的结果失去保级意义，青辽两队排在了甲A积分榜最后两位。京粤的亚军争夺战，高峰和高洪波包办了北京国安队的三个入球。上半时第27分钟，高峰一脚任意球直飞球门死角，先下一城。第42分钟高峰又在前场禁区内抢点攻门，使北京队以2:0结束上半时比赛。下半时第26分钟，北京队高洪波利用广东队后卫的一次失误，截得皮球后单骑闯关，晃过守门员冷静推射得分。0:3落后的广东宏远队在终场前两分钟，通过黎兵和阿曼杜一次小配合，由阿曼杜扳回一分。大连万达队客场以2:1战胜广州太阳神队，这样，大连队积分超过广东队，得以跻身三甲之列。广东宏远队居第四位。此外，稳居冠军席位的上海申花队主场和天津三星队以2:2握手言和。今年甲A前4名上海队、北京队、大连队和广东队都保持了主场不败的纪录。最后一轮另一场结果是山东济南泰山队主场1:2负于延边现代队，此役山东队似乎在为下周日的足协杯决战保留实力，没有尽力拚。

另据报道，今年的甲B联赛于18日结束，深圳队、广州松日队取得了晋级甲A的资格。明年的甲A赛场上将出现4支来自广东的球队。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薛原）

材料：

· 甲A联赛最后积分榜

材料　甲A联赛最后积分榜

队名		进球	失球	积分
上海申花	14胜4平4负	39	16	46
北京国安	12胜6平4负	36	20	42
大连万达	12胜6平4负	27	22	42
广东宏远	12胜4平6负	35	22	40
广州太阳神	7胜7平8负	28	27	28
济南泰山	6胜9平7负	27	28	27
延边现代	6胜9平7负	24	29	27
天津三星	7胜3平12负	20	40	24
八一	5胜8平9负	24	23	23
四川全兴	6胜4平12负	28	31	22
青岛海牛	5胜7平10负	20	32	22
辽宁	4胜5平13负	29	47	17

摘自《人民日报》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具有极大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中央电视台以王扶林为总导演，把《三国演义》搬上了荧幕，共84集。电视剧《三国演义》洋洋八十四集，浩大宽宏，伟伟四十万人员参与演出，辽阔壮观。其鸣金擂鼓之势震耳欲聋，其细腻抒情之笔，缠绵悱恻。

这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国影视史上的空前杰作，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长篇历史画卷，其中展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无不是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以“赤壁大战”一场戏为例：前一半突出用计，即双方的心战、智斗；火烧一幕，自然突出的是“火”，这火乃双方必战的结果。其实，从拍摄的角度来讲，“赤壁大战”中，不过点了20分钟火而已，可是，这20分钟一丝也没有浪费，即使实际上没有死伤一人，却达到了“樯橹灰飞烟灭”，曹孟德八十三万人马毁于一旦的效果。

《三国演义》在拍摄中，充分注意历史气氛的营造，特别是道具场景装饰和人物的服饰化装，都是认真地按照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设计。其次，演员阵容强大，群众场面多，气势磅礴。总的说来，历史剧和历史题材倍受青睐的今天，《三国演义》可谓脱颖而出，不落俗套，为其中之佼佼者。

歌曲《中国》

高枫词曲、演唱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
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

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
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它。

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
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
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
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
（这首歌获95年《音乐潮》总排名冠军）

历史档案

“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成就一览表

编者按：从1991年到199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这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

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快速、稳定增长的勃勃生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一系列重大步伐，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外汇外贸体制、价格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陆续推出，有的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有的正在积极试点中。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开放格局。

“八五”的帷幕即将落下，“九五”的太阳就要升起。值此承先启后之时，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八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统计资料报告，本报将根据这些统计资料，陆续为读者提供一系列“八五”时期建设成就的报道。

GDP平均年增长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				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城镇		农村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7.9	11.7	19744	38900*	3.7	8.4*	4	4.2*	30348	66640*

城乡居民储蓄额（亿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美元）		协议外资金额（亿美元）		签订对外经济合作合同（份）		国家外汇储备（亿美元）	
七五末	八五末	七五	八五同日	七五	八五同日	七五	八五△	七五末	八五末
7034	30000*	4864	7336	271.2	3060.5	12794	46939	111	670*

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万个）		教育事业							
				学龄儿童入学%		小学毕业升学%		初中毕业升学%		普通高校招生（万人）	
七五末	94年末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七五末	94年末
1080.9	1865.9	9	12.5	97.8	98.4	74.6	86.6	40.6	46.4	60.9	90

卫生事业				体育事业			
每千人口医院床位(张)		每千人口医生人数		获世界冠军(项)		创世界纪录(次)	
七五末	八五末	七五末	八五末	七五	八五△	七五	八五△
2.3	2.41*	1.54	1.6	285	364	150	352

(*:预计数　△:“八五”头四年数)　孙　伟　制表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8月16日)

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中国乒乓健儿获得本届世乒赛全部七项冠军

5月1日,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新建的天津体育馆隆重开幕。时隔北京成功举办第26届世乒赛34年后,中国再一次举办国际最高水准的乒乓球大赛。

当晚,造型如腾飞的飞碟的天津体育馆,华灯齐放,晶莹璀璨。缤纷的焰火映红幻境一般的天空,400名“太空少女”与2000余名身着盛装的青少年翩翩而至,热情地迎接参加国际乒坛盛会的四海宾朋。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天津体育馆”五个大字熠熠生辉。

万人体育馆内,宛若巨轮的舞台上,一排排号手吹起礼号,信号手挥动旗语:“中国天津欢迎你!”在国际乒联会旗的引导下,1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入场,场内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本世世乒赛参赛选手的规模为历届最大,将进行4000场次的团体、单项比赛,角逐7个项目的桂冠。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李铁映、王光英、钱伟长、万国权和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及其他国际乒联官员出席开幕盛典。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发来贺电,他代表国际奥委会祝本届世乒赛取得圆满成功。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后,第42届世乒赛举办地瑞典哥德堡市的代表、瑞典乒协主席乌·伦奎斯特,埃及代表团团长萨米尔·贝尔塔基与天津市市长张立昌交接“埃及杯”。

举办第43届世乒赛,是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与天津新风采的良机。

本届世乒赛组委会主任、天津市市长经立昌致欢迎词,代表组委会和天津人民向关心和支持世乒赛的海内外人士致以衷心的谢意。

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在开幕词中祝愿此次大赛成为乒坛历史个最为圆满成功的一次赛事,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应哈马隆德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布:“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伴着本届大赛的会歌《共享阳光》场内升起国际乒联会旗和第43届世乒赛会旗。

开幕式进行气势宏大的文体表演——《共享阳光》。120名身着绿色长裙的少女如春风,似暖流铺满全场,姑娘们接受着甘露的滋润和阳光的沐浴,如诗如画地表现了东方女性的娇美和春意盎然的中国大地;160名武林新秀喊声震天,威风凛凛,展示中国新一代的搏击精神;400名活泼的少年挥拍上阵,边唱边舞,预示乒乓球运动的勃勃生机;青年男女跳起刚劲有力的现代舞,形成一股股振兴、腾飞的强劲态势。一只巨大的充气乒乓球冉冉升起,远处飞来一只白鸽落在上边,构成本届世乒赛的会徽,象征和平、友谊、繁荣、发展。

出席当晚开幕式的还有高德占、伍绍祖等有关部委、天津市的负责人以及外国驻华使节、海外体育界友好人士。

*　*　*

中国队在5月7日晚进行的第43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决赛中以3:0力克韩国队夺取冠军,第11次捧回考比伦杯。

老将乔红发挥出色,在首盘以19:21输掉第一局后,不急不躁,充分发挥正反手弧圈球威力,以21:14扳回一局。第3局乔红愈战愈勇,15分钟便以21:12结束战斗,以2:1击败了韩国队一号主力朴境爱,中国队士气大振。

邓亚萍上阵后,发挥了自己“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干脆利落地以两个21:16击败朴海晶。

第三盘,邓亚萍、乔红再度上场,韩国队派出朴海晶、柳智惠迎战。韩队加强攻势,力图在双打中挽回颓势。奥运会双打冠军邓亚萍、乔红毕竟技高一筹,双方比分虽一直咬得很紧,但中国队始终占据主动,以21:19、21:18结束了全场战斗。

赛后举行发奖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端环将熠熠闪光的金牌挂在了中国队员的脖颈上。李岚清、李铁映、万里、彭佩云等观看了当晚的决赛。

在上午的角逐中,香港队以3:2战胜罗马尼亚队,

获女团第三名，罗马尼亚队名列第四。获第 5 至 8 名的依次为瑞典、德国、匈牙利、日本队。

5 月 7 日男团半决赛中韩之战，中国队主将王涛状态极佳，在近台控制住局面，打得得心应手，轻松地以两个 2：0 战胜了刘南奎和金泽洙。中国新秀孔令辉和韩国新手李哲承之战，孔令辉技高一筹，以两个 21：18 取胜。马文革分别以两个 1：2 败在金泽洙和刘南奎手里。结果中国队以 3：2 险胜韩国队，进入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是在瑞典队和法国队之间进行，瑞典队以 3：1 战胜法国队。明日中国队同瑞典队争夺男团冠军。

5 月 8 日，时隔 6 年之久，中国队终于战胜了老对手瑞典队，获得第 43 届世乒赛男团冠军，重新夺回斯韦思林杯。

当晚中瑞男团决赛扣人心弦，天津万人体育馆内群情激荡。中瑞两队对阵形势正如中国队料想的那样，但比赛进程一波三折，紧张得使人透不过气来。首盘，王涛以 1：2 负于瓦尔德内尔，使人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第 2 盘，马文革以 2：1 击败佩尔森，双方战平。

中国队的“秘密武器”丁松发挥出巨大威力。他削球的旋转变化使卡尔松难以琢磨，在削球中的突然反攻更令对方防不胜防，21：11、21：13，丁松轻松拿下一分。

第四盘，马文革迎战瓦尔德内尔，以 21：13 先下一局，眼看中国队胜利将至，而心理素质极佳的瓦尔德内尔不急不躁，硬是以 21：12、21：17 连下两局，双方再次战平。

决胜盘，王涛未受先失一分的影响，依然保持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以 2：0 力克佩尔森，为中国队夺冠立下大功。

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全国体总 5 月 8 日给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去贺电，祝贺他们在天津举行的第 4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举夺得男、女团体冠军。

贺电说，你们不畏强手，奋勇拼搏，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举夺得男、女团体冠军。用你们辛勤的汗水，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再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下阶段的比赛中，继续打出好的成绩，用体育健儿赤子之心，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5 月 12 日，第 43 届世乒赛进行到中午，中国选手已稳获 4 项冠军，但比这更令人惊喜的是几员中国小将在男子单打项目中取得重大突破，把所有欧洲名将淘汰出局。

中国选手王涛/刘伟当晚以 3：0 战胜队友孔令辉/邓亚萍，获得第 4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冠军。这是中国乒乓球选手在本届世乒赛上夺得的第三座奖杯。这对中国选手自 1991 年以来，在第 41 届至 43 届世乒赛上蝉联此项荣誉，成为世乒赛历史上混双项目的第一对“三连冠”。

孔令辉/邓亚萍获亚军。瑞典的林德/斯文森和韩国的李哲承/柳智惠并列第三名。

当天上午，中国选手孔令辉在男单 1/8 决赛中击败上届冠军法国的盖亭，丁松和刘国梁分别战胜瑞典的佩尔森和瓦尔德内尔，比分都是 3：2。傍晚，三人乘胜前进，孔令辉胜卡尔松，丁松胜布拉什奇克，刘国梁胜萨姆索诺夫，携手进入男单四强。14 日，刘国梁将迎战唯一进入半决赛的外国选手、韩国的金泽洙。金泽洙今天曾以 3：2 和 3：0 连胜中国的王永刚和王涛。中国的马文革以 0：3 被波兰的布拉什奇克淘汰。

女子单打已是清一色的中国姑娘。中国选手在 1/8 决赛中淘汰了最后两位欧洲选手，在 1/4 决赛中又淘汰了最后 3 名在海外打球的原中国队选手。进入半决赛后，将由邓亚萍对刘伟，乔红对乔云萍。

女双比赛不甚激烈，刘伟/乔云萍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匈牙利的巴托菲/托特。另一场半决赛将由邓亚萍/乔红对王晨/邬娜。

中国选手困难最大的项目是男子双打，王涛/吕林和刘国梁/林志刚只能选出一对参加明晚的决赛，对手不是法国的盖亭/埃洛尔，就是克罗地亚的普里莫拉茨/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都很难对付。

5 月 13 日，中国队极有可能重现第 3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辉煌，在七只冠军杯上都刻下中国选手的名字。

在当晚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涛、吕林以 3：1 力克由克罗地亚普里莫拉茨和白俄罗斯萨姆索诺夫组成的“欧洲联军”，蝉联男双冠军。并列男双第三名的是中国的刘国梁、林志刚和法国的盖亭、埃洛尔。

女单决赛在中国的邓亚萍和乔红之间进行。邓亚萍与乔红之战打得火爆、精彩，由于她们相互之间太熟悉了，往往一球的争夺要打上十几板。乔红今晚发挥十分出色，她不仅顶住了邓亚萍凌厉的攻势，并且在中远台以出色的正反手拉出不少高质量的弧圈球，这场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单决赛，令万名观众兴奋异常。最后，乔红以 2：3 败北，邓亚萍第二次获得盖斯特杯。并列女单第三名的是中国的刘伟和乔云萍。

由于韩国选手金泽洙使用违禁球拍被取消比赛成绩，由中国王涛顶替。参加男单半决赛的是中国队的刘国梁、丁松、孔令辉和王涛。

14 日上午首先进行的女双半决赛将在中国的刘伟、乔云萍与匈牙利的巴托菲、托特，中国的邓亚萍、乔红与王晨、邬娜之间进行。男单与女双决赛将在 14 日晚进行。

闭幕式前，进行了女子双打、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国运动员邓亚萍、乔红以 3：1 打败队友刘伟、乔云萍，孔令

辉以 3：2 战胜刘国梁，中国队再捧波普杯和圣·勃莱德杯。萨马兰奇、哈马隆德、李铁映及国际乒联官员先后为中国获奖运动员颁发金杯和金牌。全场高奏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爆发出热烈掌声。中国运动员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孔令辉等 4 名中国男队员高举国旗绕场一周，场内顿时沸腾起来。

这是自 1981 年第 36 届世乒赛之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第二次夺得世乒赛的全部冠军。

中国的王晨/邬娜和匈牙利的巴托尔菲/托特并列女双第三名。

中国的丁松和王涛并列男单第三名。

*　　*　　*

5 月 14 日晚，第 4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举行隆重的闭幕式。中国乒乓球队团结协作，夺勇拼搏，获得本届世乒赛全部七项冠军，再创世界乒坛历史的奇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委员李铁映，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等出席了闭幕式。

李鹏在闭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主席，对本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祝贺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他说："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增了光。"

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世界各地前来参加世乒赛的朋友和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他表示相信，这次锦标赛的成功举办，必将把世界乒乓球运动向前推进一步，并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第 43 届世乒赛组委会主任、天津市市长张立昌在致词中说，本届国际大赛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合作与友谊，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代表世乒赛组委会与 900 万天津人民，向支持世乒赛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获得优异成绩的各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

哈马隆德致闭幕词。他代表国际乒联，向为第 43 届世乒赛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国乒协和世乒赛组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从本届世乒赛的比赛水平看，乒乓球项目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他与大家相约：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和下届世乒赛上再见。

国际乒联的会旗和本届世乒赛的会旗缓缓降下。天津市市长张立昌将国际乒联的会旗交与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哈马隆德将会旗转交给英国乒协主席兰萨姆和下届世乒赛东道主曼彻斯特市政府代表里萨·菲兰女士。

闭幕式上举行了题为《地久天长》的祝贺演出。演出分"亲人的祝贺"、"孩子的心声"、"勇士的光荣"和尾声"一路平安"4 个部分，主题是祝愿本届乒坛盛会的美好印象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友情永远留在五洲宾客的心中。

出席闭幕式的还有王光英、罗干、万国权等。高德占、伍绍祖也出席了闭幕式。

盛大的世乒赛告别招待会 5 月 14 日晚在天津举行。国际乒联官员、中国乒协和组委会官员，各代表团成员、中外裁判员等 1300 多人参加了招待会。

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和中国选手邓亚萍获得了国际乒联颁发的"最佳运动员"尤拉奖杯。本次世乒赛组委会也设下四个奖项：中国选手丁松当选为最佳男运动员；中国选手乔红当选为最佳女运动员；白俄罗斯的萨姆索洛夫和韩国选手朴境爱分别当选最有希望的男、女运动员。招待会上还向所有获金牌的运动员颁发了《中华之光》纪念币，并向他们赠送了杨柳青年画。

（选自《新华月报》，1995 年第 6 期）

1995 年国内十大新闻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制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国跨向 21 世纪绘制出宏伟蓝图。

二、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取得新成果。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10%左右，农业再夺丰收，物价涨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外汇储备有较多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稳步增长，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三、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看法和主张，在海内外得到广泛赞同。李登辉分裂祖国公然访美，遭到海内外舆论严厉抨击。

四、总长 2536 公里，贯穿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 9 省市的我国第二条南北大动脉京九铁路全线提前铺通。

五、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无私奉献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批先进人物和张家港市等先进典型不断涌现，鼓舞和激励着全国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建功立业。

六、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开展经济合作的五项主张，并宣布中国将从 1996 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赢得了许多与会成员的赞赏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广泛出访各建交国家，我国的国际地位有新的提高，在国际活动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七、全国各地隆重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八、中纪委五次全会后，全国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接连取得胜利。腐化堕落、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被开除出党，对此案负有重大责任且本人有严重腐败问题的陈希同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在东海海域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火炮的军事训练和海上诸兵种的合成演习；南京战区在闽南沿海成功地举行了三军联合作战演习。这充分显示了我军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分别隆重举行成立40周年、30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昆明成功举办，全国呈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半月谈》1995年第24期）

1995年中国十大经济新闻

由15家新闻单位的总编辑、副总编辑联合评选的1995年中国10大经济新闻12月28日在北京揭晓。

当选的10大经济新闻是：

1.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于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强调，实现"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 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11月16日提前全线铺通。京九铁路全长2536公里，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线路最长的铁路干线。

3.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53045亿元，增长率为10%。"八五"时期累计国内生产总值将达179612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1.7%，在经济总量上提前完成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4. 江泽民同志五六月间到沪、苏、浙、辽、吉、黑六省市深入考察后，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思路，强调要坚定信心，明确任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引起全社会关注，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 农业部部长刘江11月22日宣布，预计199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4550亿公斤以上，比上年增产100多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6. 江泽民主席11月2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中国将从1996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30%。此外，还将再取消进口商品170余项的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占现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30%以上。

7. 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措施继续发挥良好效用，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抑制，物价涨幅明显回落，全年零售价格涨幅可望控制在预定的15%左右。

8. 据海关总署统计，1995年1至11月份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已达2451.5亿美元，提前一个月超过上年全年的进出口总值。此外，国家外汇储备已达730亿美元，使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实力大大增强。

9. 3月25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决定我国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从5月1日起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10. 建国以来罕见的大案——无锡新兴公司32亿元非法集资案被司法机关查处。邓斌等六名主犯被依法严惩，涉案的123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理，绝大部分经济损失被挽回。

参加评选的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证券报、中华工商时报、期货导报、经济参考报等新闻单位。

（199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中纪委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补充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近日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补充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实施和处理意见如下：

为保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作出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贯彻执行，正确处理违反"补充规定"的行为，特制定本实施和处理意见。

一、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根据1990年7月12日经党中央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纪委印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清理党政干部违纪违法建私房和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的报告〉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在城镇自筹自建私人住房。

《通知》发布后至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前，在城镇自筹自建私人住房的，应主动检查纠正，将产权交公，由有关组织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房改政策进行处理，并根据当时建房的实际情况给予个人补偿。不检查纠正的，以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后违反规定在城镇自筹自建私人住房的，由有关组织按规定对所建私房予以收购、拆除或没

收，并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自筹自建私人住房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合并处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领导干部住房未达到规定标准，确有困难的，可以参加集资建房，但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已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价或成本价购买了公有住房，且达到住房标准的，不准参加集资建房。

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的，必须主动检查纠正，或者退出已购买的公有住房，或者退出集资建的住房。不检查纠正的，以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后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的，由有关组织按规定对所建住房进行处理，并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参加集资建房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合并处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凡是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的，应在本实施和处理意见发布后二个月内，更换为符合规定的车号牌。属于借用、占用挂外籍车号牌车辆的，应在本实施和处理意见发布后一个月内将借用、占用的车辆退还。对于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后违反规定办理、使用军警车号牌、外籍车号牌，责令限期纠正，并对专车、相对固定用车的乘车人及批准、办理车号牌的有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车辆管理部门违反规定滥发军警车号牌的，对有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有关人员在办理军警车号牌中，收受贿赂的，依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八条给予党纪处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检察、公安、安全、外事等部门中的领导干部，确属业务需要，须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的，部门负责人需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其他人员由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培训费用只能从本部门支出。

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前未经批准用公款及本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的，应当主动检查纠正。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后未经批准用公款及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的车辆学习驾驶技术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所用公款如数退出。

五、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乐活动。不准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参加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公共娱乐场所的免费娱乐活动。

各地区各部门都应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和相应的处理办法。

六、在同国内的单位和个人的交往中，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

各地区各部门都应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和相应的处理办法。

七、“补充规定”及本实施和处理意见的适用范围，与1993年《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1994年《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申和提出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已经明确的适用范围相同。县（市）直属机关的科级干部、乡（镇）领导干部和基层站所负责人，参照执行。

“补充规定”的后两个“不准”及本实施和处理意见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适用于前款包括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所有工作人员。

八、对违反“补充规定”的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其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比照本实施和处理意见及有关规定处理。

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可根据本实施和处理意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中共中央纪委备案。

（选自《人民日报》，1995年4月25日）

我国中学生在国际数、理、化、信息、生物奥林匹克赛上共获得十八枚金牌、四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中国选手在6月26日至7月2日在荷兰举行的第7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赛上获得良好成绩，5名参赛选手共获3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

获得金牌的3位选手分别是辽宁省东北育才学校的赵鹏、复旦大学附中的杨域和福州一中的林凌。杨域和林凌是中国队第一次选派参赛的两名女生。另外，北京的张辰和辽宁的高光平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本届竞赛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0名选手参赛。题型有新变化，测试难度有所增加是此次比赛的两大特点。

7月12日，为期一周的第2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下午在堪培拉降下帷幕。我国5名参赛选手成绩出色，全都获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5名选手是：西安西北工业大学附中的於海涛、江苏启东市中学的毛蔚、湖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倪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的谢小林、四川潼南县中学的蒋志。

本届竞赛有 50 个国家参加，每个代表队由 5 名选手组成，中国队是唯一全体获得金牌的代表队，总分排第一名。毛蔚是 25 名金牌获得者中唯一的女生。於海涛获个人最高分。

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是各国优秀中学生在物理学科领域的最高水平竞赛。我国自 1986 年首次组队参赛以来，连续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优异成绩，至今已有 27 人夺得金牌，11 人获银牌，8 人获铜牌，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优秀青少年在中学学习阶段具有扎实的基础和较高的素质，同时显示了我国的物理科学事业不乏具有潜力的后来人。

7 月 13 日，第 27 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领队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开幕式。这是该活动 27 年来第一次移师亚洲国家举行。

本届奥赛组委会副主席兼执委会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王夔教授宣布第 27 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开幕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常志海、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北大副校长王义遒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7 月 20 日，第 27 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香山饭店降下了帷幕，本次比赛共决出金牌 21 枚，银牌 35 枚，铜牌 50 枚。中国队 4 名选手均摘取金牌。中国获金牌的 4 名选手是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张建辉、湖南师大附中骆宏鹏、天津市第一中学焦宇辰和江苏扬州中学陈景阳，这 4 名选手前不久已分别被北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和南京大学免试录取。我国从 1987 年首次组队参加国际化学奥赛，曾 5 次获团体总分第一，4 次获个人总分第一。

在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作为一位老年科学工作者，我从历届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看到在我们身这有这样一支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青少年自然科学爱好者的队伍，深感欣慰和鼓舞。"

7 月 22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举行的第 36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上，中国代表队的 6 名选手经过两天顽强拚搏，一举夺得 4 块金牌和两块银牌，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本届大赛共设金牌 30 枚、银牌 71 枚和铜牌 100 枚。获得金牌的中国选手是黑龙江省哈师大附中学生常成（满分 42 分）、山东省实验中学学生柳耸（满分 42 分）、湖北武钢三中学生朱辰畅（女）（满分 42 分）、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学生王海栋（38 分），获得银牌的选手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学生林逸舟（36 分）和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学生姚一隽（36 分）。

本届竞赛于 19 日和 20 日在约克大学举行，7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12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由于中国队在最难的第二和第六两道题上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最后以 236 分的总分获得团体第一名。

获得团体总分第二至第六名的队分别是罗马尼亚、俄罗斯、越南、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8 月 3 日，首都科教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集会，热烈欢迎出国参赛的数学、物理、信息、生物四支奥林匹克代表队凯旋和在北京参赛的化学奥赛队。

今年我国共派出 23 名中学生选手，分别赴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泰国参加国际数学、物理、信息、生物奥赛。中国选手在这些国际大赛中全部获奖，共取得金牌 18 枚，银牌 4 枚和铜牌 1 枚。5 位女选手全部获得金牌。中国队在数学、物理、化学比赛中夺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

在当天由中国科协、国家教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办的欢迎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指出，我国中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智慧的民族。

在当天的欢迎会上，还向所有获奖选手颁发了"王丹萍青少年科学奖学金"，向金牌选手颁发了"逢荃奖"奖牌和奖学金。"逢荃奖"是以美籍华裔科学家王逢旦博士和贾士荃博士的名字命名的。

（选自《新华月报》1995 年第 9 期）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 月 4 日　中宣部、总政、全国妇联在京举行好军嫂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报告会。12 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妇联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妇女向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学习。

1 月 6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最近作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

同日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1994 年全国双拥工作情况报告》

和《1995年全国双拥工作要点》。

1月6、9日　海协就两会负责人会谈及副秘书长级工作性商谈事致函台湾海基会。9日，台湾海基会17名商谈人员确定，于本月19日和21日前往北京。

1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关于进一步发展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意见》。

1月9日　新华社报道：从今年起，省、地、县、乡四级政府，党群、人大、政协、法检等补充工作人员一律考试录用。

同日　第二批香港地区事务顾问聘请仪式在香港举行。24、26日分别举行首次座谈会。

1月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第13次、法律小组第9次、经济小组第12次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1月10日—14日　全国政协8届常委会第9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和任命事项；会议决定3月3日在京召开政协8届3次会议。

1月12日—14日　全国第二次国防军工协作配套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刘华清在会上指出，从战略高度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原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局长何士宽因目无法纪，执法犯法被判刑。

1月16日　国务院举行第29次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保险法（草案）、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草案）和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修正案（草案）。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4年，全国公安边防部队共查获偷渡人员6838名，抓获境内外“蛇头”200余人。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贵州省两起重大贪污受贿案审理结果，原省计委副主任阎健宏因贪污、挪用公款、投机倒把、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原省公安厅长郭政民被判死缓。同日，中纪委、监察部就阎健宏案指出，要严肃纪律从严治党治政，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1月17日　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在党员中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学习活动的意见》。

1月18日　政协8届全国委员会第23次主席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2月下旬举行第10次常委会。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170号令，发布《强制戒毒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月19日　中纪委、统战部举行通会，尉建行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了1994年反腐败斗争的情况和今年反腐的任务。

同日　全国政协举行迎春茶话会，招待已故全国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的夫人。

同日　杨正午任湖南省代省长。

同日　民革中央举行迎春座谈会，李沛瑶在会上指出，搞“台独”或“独台”注定要失败。

1月20日—23日　中纪委第5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中纪委三次全会以来反腐败斗争进行情况，研究部署1995年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并发表了全体会议公报。23日，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1月22日—27日　海协与台湾海基会负责人第三次会谈在京举行，会议就两项协议内容和文字表述取得一致，双方就尚存分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谈取得成果。28日，汪道涵会见焦仁和一行。

1月23日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1月24日　首都举行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离退休老干部及各条战线老同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月24日、25日　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李铁映在书面发言中指出，要把学习研究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现问题结合起来。

1月25日　海协副秘书长赵正豫透露，海协最近成立经济小组。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月26日　首都举行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晚会前江泽民会见了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报告团。

同日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

1月28日　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江泽民、李瑞环、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欢聚一堂，共商国是，江泽民发表了讲话。

同日　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同志在春节前夕分别看望了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宋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同志，江泽民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向邓小平等老同志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并衷心祝福老同志们健康长寿。

1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江泽民主持团拜会，李鹏讲话，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和各界人士4000多人共庆新春。

1月30日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举行新春茶话会，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8项重要看法和主张。李瑞环

和各界人士500多人出席。

2月1日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就江泽民总书记春节前夕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发表谈话，希望台湾当局以大局为重，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

同日　新华社香港讯：港、澳舆论高度评价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有助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江泽民的讲话在台湾岛内舆论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2月2日、3日　台盟、台联、政协祖国统一联谊会、中国侨联等就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召开座谈会，一致认为江泽民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6—14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其负责人在京先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谈话，畅谈对江泽民讲话的感想。

2月3日　台北消息：李登辉、连战等表示江泽民先生的讲话"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予以重视，应该就这个问题与社会各界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各政界人士也先后表示赞成两岸高层谈判。

2月4日　李鹏在厦门与台资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指出，愿与台湾当局谈判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2月8日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第二次汪辜会晤尽早举行。

2月8日、9日—13日　刘华清在海南省和广东省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建促进特区两个文明建设。

2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宣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日在京举行。

2月14日　"中国12亿人口日"大会在京召开，邹家华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

2月14日—16日　全国监狱工作法会议在京举行，罗干在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监狱法》，确保监狱安全与稳定，努力维护千家万户安宁。会上表彰了全国50名优秀监狱长(政委)，还授予陈忠民等30名同志优秀劳教所长(政委)称号。

2月15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第三次反腐败工作会议，李鹏在会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朱镕基、邹家华等出席会议。

2月15日—18日　中央对台宣传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要求认真贯彻江泽民重要讲话，进一步加强对台宣传工作。

2月16日、17日、20日—22日　李鹏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基层同志、教科文卫、体育界人士座谈，征求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2月17日　国务院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2月19日　程安东当选为陕西省省长。

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就原天津市一商局副局长王明和等人出访期间去色情场所活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一事发出通报。

同日　彭珮云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电话会上讲话指出，这次主要是查清人口资源配置、文化程度、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2月21日　中国十大杰出女性评选活动揭晓，岳喜翠等获"十大女杰"荣誉称号。

2月21日—28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7项法律和有关法律的决定，确定了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事项，通过了任命名单和有关决定任免名单。28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7项法律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并决定免去张皓若的国内贸易部部长职务，任命陈邦柱为国内贸易部部长。

2月22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北省无极县邱氏鼠药案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专家维护科学尊严，邱满囤败诉。

同日　《工人日报》报道：中宣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工人阶级新闻宣传的几点意见》。

2月24日　徐匡迪、杨正午、李春亭分别当选为上海市市长、湖南省省长、山东省省长。

同日　李鹏总理、江泽民主席签署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发布《国防交通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月24日—27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政协八届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各项决议、增补常委和任命名单。

2月25日　公安部召开布置今年3月至5月在全国开展"春季严打攻势"电话会议，巩固去年严打整治成果。

同日　回良玉当选为安徽省省长。

2月26日　闻世震、蒋祝平分别当选为辽宁省省长和湖北省省长。

2月28日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在京举行会议，李贵鲜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　田凤山当选为黑龙江省省长。

3月3日—14日　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主持会议，叶选平作工作报告。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到会祝贺。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全国政协八届

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提案委员会关于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李瑞环在闭幕会上讲了话。11、15日，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第11、12次会议先后在京召开，会议分别通过了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等。会议还决定将政协14个专门委员会调整为8个，作为政协常设机构。

3月5日　李鹏总理宣布，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3月5日—18日　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宣布大会开幕，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9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的决议，通过了教育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决定任命吴邦国、姜春云为国务院副总理，补选张毓茂、普朝柱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日，江泽民签署了两位副总理的任命令。乔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大会期间，李鹏、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18日，江泽民分别签署了教育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分别自公布之日和9月1日起施行。

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1日、12日—13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经济小组、法律小组、社会及保安小组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3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近日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主要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在中南海举行民主协商会。江泽民主持会议，李鹏、乔石、李瑞环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有关人事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充分听取意见。

3月11日　《人日报》报道：司法部近日颁布了《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

3月20日　海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海协常委副会长唐树备受会长汪道涵委托作会务报告，汪道涵在会上讲话。会议选举张金城为海协秘书长。

3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计委等7个部门日前分别作出规定，严令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和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娱乐活动。

同日　民政部、总政治部授予韩素云“优秀军人妻子”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南宁举行，并向韩素云颁发荣誉证书和授予二级英模奖章。

3月27日—30日　全国人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要求加强新形势下人防工作，并讨论修改了我国第一部《人民防空法》草案。

3月28日—30日　部分省市自治区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会议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会议提出打拐工作要建立领导责任制，落实综合治理措施。

3月31日　海协就两会第八次事务性协商事宜复函台湾海基会。

4月1日　全国“青年文明号”命名授牌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鼓楼大队五四岗等509个优秀青年集体荣获“青年文明号”称号。

4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党校近日作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廉洁自律的规定》。

同日　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5周年座谈会在香港和北京同时举行。

4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在全国展开，目前全国各地已抽派机关干部45万多人下乡驻村，重点帮助整顿软弱和涣散瘫痪的党支部。

4月5日—7日　全国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和部署今年的军转安置任务。胡锦涛等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4月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就两会文教团互访一事致函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28日，海协负责人就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两会商谈发表谈话。29日，台湾海基会致函海协，同意海协文教团访台。

4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监察部日前作出决定，追授勇斗歹徒壮烈牺牲的四川省武隆县巷口镇纪委书记杜家华为“全国优秀纪检干部”。7日，四川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追认杜家华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4月7日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事迹登出，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近日批转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中组部、人事部、劳动部、总政治部《关于做好1995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

4月9日—13日　全国消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切实解决消防事业滞后问题。

4月10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0岁。

4月12日　十三世嘉雅活佛转世灵童洛桑巴旦曲杰旺秀坐床典礼在西宁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的九间殿广场举行。从当天起，洛桑巴旦曲杰旺秀正式成为塔尔寺第十四世嘉雅活佛。

4月14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将昆明百华大楼爆炸案主犯袁凯泉、宋现伟执行枪决。19

日，新华社报道：公安部近日发布命令，给昆明市公安局侦破“1.14”爆炸案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也作出决定，表彰有功人员。

4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吴官正任江西省委书记。

4月10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第16次、经济小组第15次、法律小组第12次和社会及保安小组第10次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4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中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区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

同日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康世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0岁。26日，江泽民、邓小平、李鹏、乔石、彭真、刘华清、荣毅仁等对康世恩逝世表示哀悼，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康世恩。

4月22日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出版，并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23日，延安党政军领导和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杨家岭集会，纪念七大召开50周年。

同日　李瑞环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共商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就《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发现的通知。

4月25日　国务院举行第31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草案)》。

同日　新华社报道：原福建省体委副主任、跳高选手倪志钦因犯受贿罪，近日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8年。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最近决定共同聘请第四批香港事务顾问45人。28日，第四批港事顾问聘书颁发仪式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出席。同时，江泽民会见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晚，李鹏宴请了新聘港事顾问。

同日　《人民日报》香港报道：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张学良已移居夏威夷。日前，美国移民局正式核发“绿卡”给94岁的“少帅”张学良及其夫人。

4月26日　政协八届第29次主席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政协八届常委会第13次会议于6月上旬召开，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4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5月5日在京召开。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尉健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同日，北京市委召开区县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胡锦涛、尉健行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原电力部闽江水电工程局五名领导干部受贿案的审判结果。原局长助理、第四工程处处长林安华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天在福建南平市被执行枪决。其余4名罪犯，分别被判死缓2年和有期徒刑。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近日在海南省纪检监察干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要狠抓落实。

同日　新华社香港报道：台北消息：台湾“行政院”通过“大陆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修正案”，台湾开放祖国大陆探亲次数由以前每年1次改为2次。

4月29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尉健行作报告，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会上，邹家华宣读了《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同日，国务院决定授予郭玉明等2157名同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授予罗玲等716名同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当晚，尉健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同与会的中外朋友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30日，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形势报告会，朱镕基、钱琪琛作国内国际形势报告。

5月1日　北京市公安局设立的人民警察巡察执法总队宣告成立。2000名巡警上岗。出现在8个城区的主要街道和两个郊县的旅游点。

同日　《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正式颁布执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从中纪委、监察部获悉，湖南省衡阳市6名地市级干部因贪污挪用侵占国家巨额资财被查处。日前，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察厅作出决定：分别给予符孝铜、刘仁贵、徐作生开除党籍处分，给予刘谋发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涉及此案的另外两名分别受到党政纪处分。

5月4日　中直机关表彰“十杰青年”、先进团支部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十杰”青年，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国青年朋友祝贺节日。同日，新华社报道：截至1994年底，全国共青团员总数已达到6150万名，为历史最高水平。

同日　第二批港事顾问全部获续聘，周南在续聘仪式上致辞，并代表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向他们颁发了续聘证书。

5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干部培训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5月5日—10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

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商业银行法、预备役军官法、票据法，还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两个领事条约的决定，以及其他任免名单。10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预备役军官法、票据法》，三个法分别于1995年7月1日和1996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日，乔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5月7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李鹏近日分别为孔繁森同志题词。

5月7日—8日、11日—12日、14日—15日、16日—17日、19日—2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文化小组、社会及保安小组、法律小组、政务小组、经济小组会议分别在北京和香港举行。

5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山东省纪委近日发出关于原济宁副市长陈步堂利用职权长期占用企业集资购买的进口豪华轿案件的通报。

同日　公安部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29个县(市)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1176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在河北省委、省纪委的协助下，最近严肃查处了原河北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平义杰为追逐个人享受，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物的错误。经中纪委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平义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已批准撤销其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5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

5月16日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台湾推行“境外航运中心”构想与两岸人民所盼直航不尽相同。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关于修改〈人民警察警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的决定》，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

5月17日　全国劳模报告团首场报告会在京举行，尉健行出席报告会。

同日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言人就达赖喇嘛在印度宣布西藏的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事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说，达赖认定班禅灵童是非法无效的。18、19日，赵朴初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分别发表谈话，指出“金瓶掣签”认定灵童是班禅遗愿。18、19日，北京和西藏各界宗教人士举行座谈会，指出达赖擅立班禅灵童意在分裂祖国。22、24、25日，中国佛协西藏分会，西藏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和西藏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谴责达赖擅立班禅灵童的不法行为。

5月19日—23日　第五次全国台胞代表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出席会议，钱其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辞，张克辉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将理事会任期改为五年一届的建议。

5月20日　新华社澳门分社举行酒会，欢迎新任社长王启人，欢送前任社长郭东坡。

5月24日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的通知。

5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近日发出关于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25、26、29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探》(电工版本)先后出版发行。

5月26日—29日　第二次“汪辜会谈”首次预备性磋商会谈在台北举行，会议取得多项共识。

5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近日发出关于印发《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四条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遵照执行。

6月1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决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其拉甫边防检查站“模范边防检查站”荣誉称号。李鹏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了这项命令。

6月1日—4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会议通过了工作报告和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全国工作委员会，表彰了150个先进集体，向1500个雏鹰大队奖授了大队旗，向1000名优秀少先队员颁发了一级雏鹰奖章，表彰了150名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会前，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等与代表合影留念。1日，少代会代表参加了升国旗仪式。

6月2日　国务院举行第32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草案)》。

6月2日—5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13次会议在京举行，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5日，李瑞环作了《关于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若干问题》的讲话。

6月7日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任建新在会上强调，要因势利导兴利除弊管好流动人口。

同日　钱伟长就李登辉访美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

谈话指出，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出尔反尔，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同时谴责了李登辉乔装打扮，不惜用重金买通去美之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印象，违背了两岸人民的根本愿望。2、5、8、9日，旅美华人、留学生在美国纷纷举行座谈会，谴责李登辉访美充当外国势力工具。10、11日，全国台湾研究会专家学者和在京台胞分别举行座谈会，抨击李登辉"两个中国"的言行。8、11、18日，香港、澳门舆论抨击李登辉访美，指出台湾当局破坏两岸关系罪责难逃。16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李登辉及台湾当局不顾民族大义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导致第二次汪辜会谈不能按期举行发表谈话。同日，海协就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预备性磋商被迫推迟举行致函海基会。30日，海协电复台湾海基会，推迟两会负责人定期会谈。

6月13日　中共中央举行《陈云文选》(一—三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会议。12—14日，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高度评价陈云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不朽风范。

6月14日—17日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尉健行在会上强调，要严查大案要案狠刹公款吃喝玩乐歪风。

6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司法部最近发布了《提存公证规则》。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提存业务的全国性规章。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分布了广东省深圳市林惠雄等人，肇庆市鼎湖区莫乾光等人倒卖、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肇庆市鼎湖区税务局长陈秋明等人玩忽职守、受贿案的审判结果。林惠雄、莫乾光等6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5日分别在当地被执行枪决；莫乾佐等10余名罪犯被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黄强球、陈秋明等7名税务和工商干部，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6月18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高严任云南省委书记。

6月21日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召开纪念"七一"党员学习交流会。会上，10名同志被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标兵称号。

6月21日—23日　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藏干部培训班在京举行。23日，罗干、张全景、宋德福等到会讲话。23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为西藏选派的515名干部全部到岗。2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批援藏干部抵拉萨。

6月22日　国家审计署聘请顾永福、郭国庆等1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第三批特约审计员。

6月22日—2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第五次全会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关于支持我国政府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的决议》；《关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有关事宜的建议》。钱其琛致开幕词和闭幕词，鲁平作下半年工作部署报告。26日，中宣部等在京举办香港形势报告会。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就香港问题向驻京党政军机关1300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作了报告。

6月23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6月23日—30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担保法，保险法，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关于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批准1994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免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命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以及其他任免名单。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签署了担保法、保险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任免令，担保法和保险法于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6月27日　民政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总报告。

6月28日　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追授孔繁森同志"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的决定。

6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日前向交通部并转山东烟台港公安局发出慰问信，表彰5月23日在烟台市追捕持枪歹徒中牺牲的4名干警。

7月3日　国家工商局和人事部在京举行报告会和表彰会，介绍范宗平同志生平事迹并追授他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经济执法卫士"称号。4日，李岚清会见了范宗平同志的家属。

7月4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同日，新华社报道，中纪委及有关部门，对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现已查明，王宝森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腐化堕落，是一个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腐败分子。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同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王宝森的北京市副市长职务。同日，北京市委召开区县局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尉健行在会上传达了关于王宝森主要违法犯罪事实查处情况和中央决定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的通报。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下发了关于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日前发布命令,追授山西省原平市公安局兰相田、赵虎生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称号。

同日　海协致函台湾海基会,对台湾军方炮击福建渔民造成一人死亡表示愤慨,并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停止罪恶行径,处理肇事者,对受害者家属予以赔偿。

7月6日　国务院举行第34次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草案)》。27日,国务院举行第35次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案(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修订草案)》。

同日　新华社报道:《邓小平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增订本)出版。13日,新华社报道:《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论述(专题摘编)》出版。

7月7日　新华社报道: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10名老红军、老八路红星功勋荣誉章或独立功勋荣誉章。至此,全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老八路已有57394人分别获得这两种功勋荣誉章。

同日　北京各界代表集会卢沟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并为抗日纪念群雕奠基。20日,首都侨界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7月8日—11日　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在厦门举行,吴邦国在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实行综合治理,搞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7月12日—14日　全国推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工作会议在青岛举行,李贵鲜在会上指出,国家公务员实行辞职辞退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18日,人事部发布了《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13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聘请第三批区事顾问。

7月13日—14日　第三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常务理事,任继圣为会长。14日,尉健行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民政部、总政治部日前作出决定,授予广东省汕头市潮阳井都镇妇女姚慈贤"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军民学习姚慈贤。25日,民政部、总政治部授予姚慈贤"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广东省汕头市举行。

同日　王宏民任南京市代理市长。

7月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经济小组、法律小组、社会及保安小组、文化小组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7月18日—22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22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荣毅仁等出席开幕式,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两个大会致祝词。22日,青联、学联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刘鹏再次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还与青联委员们就科教兴国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座谈。

7月20日　新华社报道:日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条例》。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自1995年9月1日起施行。

7月21日　胡锦涛给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部级领导干部上党课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锻炼。

同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向全军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军委江主席重要指示,切实开好党委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同日　《人民日报》香港报道:近日,香港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或专栏文章,批评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的可耻行径。22日,澳门多家报纸发表文章,抨击李登辉搞分裂祖国活动,使两岸关系恶化。24—2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评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的4篇评论员文章。24日,新华社报道: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指责李登辉所谓"务实外交"是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

7月21日—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以北纬26度22分、东经122度10分为中心、半径1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发射6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

7月30日　中纪委、监察部近日在京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实两项规定检查动员会,决定派出11个检查组赴5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对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7月30、31日　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怀柔举行工作会议。

8月1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各族干部群众万余人集会,纪念红军长征经过冕宁暨彝海结盟60周年。由江泽民同志题写碑名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同时落成并揭幕。

8月2日　中宣部在京召开首都理论工作者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座谈会。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对流动暂住人口的治安管理,公安部近日颁布实施《暂住证申领办法》。

8月2日—4日　中纪委、监察部在广东番禺市召开全国纪检监察信访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建立领导处理信访问题责任制，并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信访举报，促进反腐倡廉。

8月3日　陈奎元当选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同日　武汉市各界人士集会纪念“中山”舰抗日罹难57周年。

同日　新华社报道：台湾一些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近日分别在台北举行的一系列有关两岸形势的座谈会、研讨会上发言，批评李登登辉的“台独”倾向，谴责“台独”分子破坏两岸关系的言行。4日，《人民日报》报道：澳门多家报纸发表社评，谴责李登辉继续玩弄花招，掩饰其推行“两个中国”的活动。3、5、7、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4篇评李登辉的“台独”言行文章。11日，福建台湾问题专家举行座谈会，揭露李登辉“假统真独”的面目。11、18日，香港舆论再次抨击李登辉“台独”言行，指出“台独”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不得人心。

8月6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发布《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全文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8月9日　海协致函台湾海基会，谴责台湾当局军队再次开枪打枪福建渔民的恶劣行径。18日，海协致函海基会，要求台湾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对在海上正常作业的我渔船、渔民肆意骚扰、伤害和残杀的极不人道暴行。同日，新华社报道：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日前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台湾当局军队一再残杀和抓扣福建无辜渔民的暴行。

8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授予西藏军区检察院检察长肖必钊“模范检察干部”称号。

8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宣部近日在烟台召开省区市委讲师团团长会议，落实《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推动理论学习向广度深度发展。

8月14日　我国宗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赵朴初代表中国宗教界宣读《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

同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各有关部门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期间开展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活动。15日，新华社报道：解放军三总部、北京军区及驻京大单位许多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纷纷到卢沟桥、焦庄户、潘家峪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等抗战纪念地，向年轻官兵讲述抗战历史。兰州、成都、沈阳和东北三省、济南、南京、广州军区等以不同形式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8月15日　江泽民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并发表重要讲话，刘华清、胡锦涛等与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和党外人士及大学生、少先队员代表一起，参观了纪念馆。22日，山西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八路军总部在太行58周年大会，刘华清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3、31日，中组部先后召开老同志、农村老党员座谈会，胡锦涛出席并讲话。25日，中央军委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驻京部队老战士座谈会，江泽民、刘华清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江泽民等会见抗日英模代表。30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刘华清作重要讲话。31日，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李瑞环出席，洪学智发表讲话。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期间，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京、津、沪等各地各界人士和港台同胞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纪念活动。

8月15日—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和海域上空发射导弹、火炮实弹射击实弹演习。

8月16日　新华社郑州报道：河南省周口市8名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超标准自建住房，近日被中共周口地区纪委、地区监察局查处。

同日　太原市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对26名罪犯进行公开宣判，其中“6·29”特大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主犯白法义等12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8月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经济小组、社会及保安小组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8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日前发布命令，追授原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所长马生贵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8月18日—20日　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市举行，会议强调要建立一支过硬的政法队伍。

8月23日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2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委员陈丕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终年80岁。30日，陈丕显的遗体在京火化，火化前，胡锦涛等前往医院送别。

8月23日—29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体育法，关于批准中国和希腊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领事条约的决定以及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选举、

被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任免名单。29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发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体育法，二个法分别于8月29日和10月1日起施行。

8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首发、赠书仪式在京举行，江泽民、刘华清等为该书题词。

同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美籍华人吴弘达案一审作出判决，吴弘达因非法获取我国家机密，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驱逐出境。

8月25日 中央统战部等部门在京举行座谈会，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

同日 “中国警界女十杰”评选揭晓，李玉芬、张雅君等10位同志当选。

同日 顾金池当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8月26日 吴官正当选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8月27日 高严当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8月29日 以吴邦国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抵拉萨，参加西藏自治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31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举行干部大会，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吴邦国代表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向西藏各族干部和群众致以节日祝贺。

9月1日 九三学社纪念建社5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乔石出席大会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词，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分别为九三学社建社50周年题了词。

同日 中央统战部邀请海内外抗日将领、爱国人士及亲属在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李瑞环等亲切会见与会人员。同日，延安各界集会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同日，新四军“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落成。2日，全国各地和全军以各种形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4、5日，香港、澳门各界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17、18日，辽宁、沈阳军民以多种形式开展勿忘“九·一八”，勿忘国耻日。

同日 《今日世界妇女》图片展在京开幕，李鹏为展览题名。2日，陈慕华就世妇会的有关情况和中国妇女的发展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13日，陈慕华、彭珮云会见《相聚在北京》剧组主创人员。17、18、20、22日，NGO论坛表彰大会和世妇会志愿服务工作总结大会和表彰大会等先后在北京举行。

9月2日 首都隆重举办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观看演出，100名抗日老战士和首都各界代表及外国友人约万人参加了晚会。

9月3日 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李鹏主持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大会，近百名抗日老战士在主席台就座，肖克、李沛瑶、李克强代表老战士、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讲话。同日，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同首都各界万余人出席仪式。

9月10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在山东省聊城开馆，江泽民题写馆名，乔石参观了展览。

9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纪委、监察部发出推广新疆经验的通知，并转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察厅《关于狠刹公款吃喝玩乐风情况的报告》。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日前发出通知，批转三总部《贯彻落实江主席关于军队要过紧日子重要批示的意见》。

9月18日 第六届中国十杰青年评选揭晓，吕有珍等10人等当选，张兴民等20位青年获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同日 河南省隆重纪念抗日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诞辰100周年，并举行“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揭幕仪式。江泽民为纪念馆题写馆名，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也分别题词。

同日 海协就台湾有关方面一再打死打伤大陆渔民事宜复函台湾海基会，指出台湾当局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负责。19日，《人民日报》报道：海协通报了有关福建晋江市渔民妥善处理三具台湾渔民尸体的情况。

9月20日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的图谋。20日，丁关根在给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部级领导干部上党课时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日前发出关于加强出国(境)旅游证照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异地办理证照和公费出国(境)旅游等非法活动。

9月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经济小组、法律小组和文化小组会议分别在珠海举行。

9月22日 国务院召开第36次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电力法(草案)和律师法(草案)。

9月24日 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委等在京举行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座谈会。王兆国代表中央统战部等向新疆各族人民祝贺节日。

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万里文选》已出版，10月1日起全国各地发行。

9月25日—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江泽民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李鹏就《建议》草案作说明；会议决定增补张

万年、迟浩田同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会议审议并通过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2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罢免了陈希同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同日，陈希同的北京市第十届人大代表职务也被罢免。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于8月31日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及经济界专家学者在中南海举行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征求意见稿)》征求了意见。江泽民、李鹏分别主持了座谈会并讲话，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荣毅仁等分别出席了座谈会。

9月30日　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6周年，江泽民出席招待会，李鹏发表讲话。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同各界人士和海外宾朋欢聚一堂，共庆中国人民的光辉节日。

10月1日，来自天山南北的各族各界2万多群众在乌鲁木齐集会，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打电报祝贺。以姜春云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出席了庆典。

10月5日　中国致公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致贺词，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分别题词，刘华清代表中共中央表示祝贺。中国致公党是1925年10月由华侨社团美州致公总堂发起成立的。

同日　中宣部等单位在京联合举办学习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曾培炎在会上作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精神的报告。

10月5～7日　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主持会议，朱镕基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情况作报告。会议通过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名单；李瑞环访问古巴等四国情况的报告；政协老战士代表团关于出席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委员分赴云南等6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视察情况的报告和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赴贵州省视察情况的报告；以及人事任命事项。7日，李瑞环在闭幕会上就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了重要讲话。

10月5～8日　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济交流会在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10月6日　全国后勤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召开，张万年、傅全有出席会议并讲话。同日，江泽民会见与会代表并参观全军后勤新装备新成果展览。

10月7日　纪念胡厥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李瑞环等出席，王兆国发表讲话。

10月9日　第四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评选揭晓，黄思路等10名当选。10日，《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度全国“星星火炬”奖章评选活动近日在京揭晓，田桂荣等400位同志荣获全国“星星火炬”奖章。13日，李岚清等与“十佳少先队员”座谈时勉励少年儿童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10月10日　江泽民会见由主席安子介率领的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理事访京团。

同日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委会在京举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了118个先进集体和515名先进个人，向王平等9位老同志颁发“中国关心下一代荣誉奖章”，并授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特别荣誉称号”。

10月10～12日　全国劳动监察工作会议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议指出要继续加强体制建设，全国开展执法检查。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湖南省纪委、监察厅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3名腐化堕落厅级干部和一批顶风违纪处级干部受到严肃查处的情况。3名厅级干部是原省供销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段梦毫，邵阳市政协副主席邓卫中和原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德发。3人均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外职务。其他顶风违纪的处级干部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警告、记过、记大过等处分。

同日　新华社报道：郑州天然商厦“1·20”特大火灾事故的原因和损失现已查明，有关责任者受到严厉查处。

10月11～12、13～14、27～28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经济小组、法律小组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10月11、13日　胡锦涛、尉健行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了中央派出的督查组汇报各地贯彻落实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情况。13日，胡锦涛在汇报会上讲话时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建设纳入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工作部署。

10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12·8”特大火灾事故案，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14名责任者受到法律制裁。

10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同日　王茂林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10月13～15日　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强调当前农村养老保险要强化管理，稳步前进。

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贵州省坚持“四个面向”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边远山区输送“永久牌”的乡镇干部，被中组部、国家教委肯定，称之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贵州模式”，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10月16日　国务院港澳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样本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已经完成。

同日　李瑞环向跨世纪老人孙越崎祝贺102岁生日。

同日　中央社会综治委第16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任建新在会上强调，要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发展。

10月16、17日　公安部在济南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学习济南交警先进经验现场会，并授予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模范交警支队”荣誉称号。江泽民在15日为济南交警支队题词。

10月17～19日　全国国防交通会议在京举行，迟浩田在会上强调，国防交通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20日，中国国防交通协会在京成立。

10月18～22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丁关根在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0月19日　国务院台办新闻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所谓“台湾综合研究院将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说法纯属造谣。

同日　贾庆林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0月20日　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吕有珍等10人捧走了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奖章和证书。

10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河北省纪委、监察厅依法查处了一批顶风违纪案件。原省农业开发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李景华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10月23日～30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民用航空法，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修订后的食品卫生法。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签署这四部法律。民用航空法自1996年3月1日起施行，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专用发票犯罪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食品卫生法自公布之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同时废止。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和中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会议还通过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关于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分别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有关任免名单。

10月24日　中国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国家委员会在京举行纪念大会暨招待会，近千名中外人士与会。李鹏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6～18日和18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分别举行座谈会，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

同日　首都各界在京举行纪念台湾光复50周年纪念大会，李瑞环主持会议，李鹏发表重要讲话。20、23日，在京专家学者和在京台胞举行纪念台湾回归祖国和台湾光复50周年座谈会，批驳“台独”。27日，新华社报道：台湾民众在台湾光复50周年的日子里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这一光辉历史事件。

10月25日　程维高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10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新版马列著作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批著作总计约835万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27日，中宣部等单位在京召开新编马列著作出版座谈会。

同日　海协致函台湾海基会，对最近一再发生台军艇抓扣祖国大陆沿海渔船殴打抢劫渔民表示愤慨。

10月27日　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座谈会在西安结束，侯宗宾在会上提出了以五中全会精神指导反腐败斗争应明确的4个坚持。

10月27～30日　第二次全国人大信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为大会信访工作题词，田纪云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会议要求重视人民信访，密切联系群众。

10月28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信访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0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会议日前在宁波召开，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近日发出《关于1995年冬季士兵退出现役工作的通知》，切实做好今冬退伍士兵安置工作。

10月31日　新华社报道：首都各界日前集会，纪念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李济深诞辰110周年。

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外经贸部、国务院台办、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情况的汇报。

11月2日　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22日，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预算法实施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1月3日　全国总工会和全国职业道德建设领导小组在京举行表彰会，表彰'95全国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和十佳单位。张高津等10人和大连港务局等10单位分别获得十佳标兵和十佳单位荣誉称号。

11月4～5、6～7、8～9、10～11日　香港特别行政

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经济小组、法律小组和社会及保安小组会议先后在京举行。

11月6～8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

11月8～11日　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一致认为灵童认定必须坚持金瓶掣签经中央政府批准。会议期间，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等接见了寻访领导小组成员、顾问小组成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李瑞环受中央委托同与会宗教界人士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29日，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举行。仪式由国务委员罗干和国务院特派专员江村罗布等主持。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6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当天上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当天下午，国务院批复特准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当天下午，第十一世班禅册立典礼在拉萨班禅大师的行宫雪林多吉颇章举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顾问小组成员和其他佛教界高僧大德等出席典礼。当天，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和中国佛协分别致电祝贺。30日，新华社报道：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在藏传佛教界引起热烈反响，参加掣签仪式的高僧大德们纷纷表示，这一盛事完全符合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12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日前致电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和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祝贺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

11月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在京成立。

同日　首都干部群众为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送行，朱镕基、尉健行、李锡铭、孙孚凌等向李润五遗体告别。李鹏、李铁映、罗干、王兆国等同志，也以不同方式对李润五的逝世表示哀悼，对他的亲属表示慰问。江泽民近日在北京考察期间，高度赞扬了李润五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李润五是2日在市政府研究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的，享年56岁。

1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日前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金人庆为中共北京市委副市长。此前，中共中央已批准金人庆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

11月15日　全国勘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宣布，国务院勘界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李贵鲜任组长。

11月15～17日　共青团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艰苦创业的决定》、《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实施纲要》和团十三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卸职递补事宜等。

11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中宣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冬开始，对农村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一次培训。

11月20～22日　全国村民自治示范工作经验交流暨城乡基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议在京举行。李贵鲜和宋平在会上为先进集体和个人颁了奖。

11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江泽民、李鹏最近分别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和《农民实用技术教育读本》题写书名并作序。两个《读本》首发式22日在京举行，姜春云出席首发式并讲话。

11月24日　中央国家机关第八次党的纪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1月28日　江泽民主席同国防大学学员座谈时发表讲话强调，努力造就大批能担当历史重任的优秀干部。刘华清、张万年等出席座谈会。

11月28～29日　全国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会上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1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出通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

11月30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务院原顾问曾生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当天，曾生的骨灰由国务院、中央组织部、中共广东省委等有关负责同志陪同曾生家属护送到深圳烈士陵园安放。曾生于当月20日在广州逝世。江泽民、刘华清等以不同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12月2日　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讲话，并为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颁奖。

12月4日　国务院召开第39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职业教育法(草案)、行政监察法(草案)和拍卖法(草案)。

同日　香港高等法院首次使用中文审讯一宗民事诉讼案。

12月5～7日　江泽民在深圳考察工作，并于5日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

12月5～7、5～8、11～14、12～15、13～15、17～19、21～24、22～26日　致公、民盟、农工民主党、台盟、民进、民建、民革、九三等民主党派中央全会先后在京举行。

12月7、8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这是预委会结束全部工作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钱其琛致开幕和闭幕词。会议听取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保安5个专题小组分别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关于预委会各专题小组的建议和意见的决议》、《关于保持香港公务员队伍和

制度稳定的若干意见》。8日，江泽民、李鹏等会见全体委员。当晚，李鹏宴请全体委员。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主任会议在京召开。

12月8日　首都老同志和各界青年在京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50周年。胡锦涛等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7个县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1194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

同日　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国务院代表李铁映等主持庆典并宣读《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举行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的请示〉的批复》，向第十一世班禅坚赞诺布颁授金册、金印，还宣读了国家主席江泽民为扎什伦布寺题赠的匾文。7月下午，李铁映会见藏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代表。

12月10日　我国人民法院首次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全国统一考试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

12月11～14日　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讲话并会见与会代表。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在会上作了报告。国家档案局、人事部在会上授予60个单位“全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40名“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27个档案部门“全国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称号；184名“全国模范档案工作者”称号。

12月11～14日　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提出明年工作的重点要加强县以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素质。13日，胡锦涛在会上讲话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12月12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在京举行，朱镕基到会祝贺并宣读中共中央贺词。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荣毅仁分别题词祝贺。雷洁琼在会上讲了话。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就倪志钦、顾道德、束开泰、马根旺、李俊启、姚春生等人见利忘义、丧失党性原则发出通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加强党性锻炼，严以律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同日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李鹏、胡锦涛等出席开幕式。

12月13日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士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悼念58年前遇难的30万同胞。同日，杨尚昆专程来到纪念馆悼念遇难同胞。

同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魏京生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一审依法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魏京生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12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台北消息，中国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于12日决议撤销副主席林洋港、郝柏村党籍。13日，国民党中常会“同意报备”。当天下午，林洋港、郝柏村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表示，对国民党当权派“铲除异己”行为不能接受。

12月16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宣读中共中央贺词，孙起孟在会上发表讲话。会上，民建中央授予98位同志为“全国优秀会员”称号，50个基层单位“全国先进集体”称号。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分别题词祝贺。

12月18、19日　全国人事局局长会议在京举行，李贵鲜在会上要求加快推行公务员制度步伐，争取在明年底完成国务院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任务。

12月18～21日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17年来政法工作，确定了“九五”期间到2010年政法工作的主要奋斗目标。20日，江泽民、李鹏同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并作了重要讲话。

12月19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立法工作座谈会，乔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2月19～23日　第17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确定了人民法院今后工作的中远景目标。任建新在会上作了报告。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京举行表彰会，授予31个单位集体一等功，18名同志“全国法院模范”称号。

12月20～28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5日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关于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28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公布了这项法律。会议决定任命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委委员。李国光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任免名单。

12月21～26日　江泽民专程赴陕西、甘肃两省，亲切慰问受灾农民和困难企业职工，并向他们祝贺新年。

12月22日　赵富林再次当选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同日　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孙越崎同志的遗体在京火化。孙越崎是本月9日逝世的，享年103岁。孙越崎在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荣毅仁等前往医院看望或派人看望，或打电话向其家属表示慰

问；朱镕基等向孙越崎遗体告别。台湾孙运璇、李国鼎、金开英先生等送了花篮或向家属表示慰问。

12月23日　李长春再次当选为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

同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吴德同志遗体在京火化。吴德于11月29日逝世，终年83岁。吴德逝世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荣毅仁等以不同方式对吴德逝世表示哀悼，对他的亲属表示慰问。吴德病重期间，李瑞环、倪志福、阿沛·阿旺晋美等前往医院看望。

12月24日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在京成立。李德生任会长，耿飚、雷洁琼、王光英、程思远为名誉会长。

12月26日　各界人士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同日，湖南省韶山市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2周年大会暨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开园典礼。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决定，授予因公殉职的中共江苏省纪委副书记李奎顺同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12月28～31日　江泽民在广东汕头经济特区考察时希望，所有特区的同志都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开拓前进，并强调对经济特区坚持“三不变”方针。

12月29日　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年招待会，与外交团的朋友们欢聚一堂，辞旧迎新。

12月31日　江泽民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海外听众、观众发表题为《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世界》的新年讲话。

经　济

1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财政部1995年推出一套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它包括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等10项指标。

同日　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中国认证人员国家注册委员会在京成立。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商品市场规划纲要》近日出台。国内贸易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好当地商品市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1月6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体改委联合制定并向各地下发了《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地严格遵照执行。

1月7日　国家体改委提出1995年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整顿流通秩序，规范交易行为，稳定市场物价，打击哄抬物价、垄断市场、欺诈消费者的不法行为，保障公开公正的竞争。

1月9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冬春水利建设电话会议。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骨干工程建设。

1月9日—12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依法加强治理市场秩序；李鹏要求全国工商管理人员严格执法，正人正已，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同日　铁道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5年春运期间全国部分铁路局对旅客运输实行临时浮动票价，以减轻铁路压力，促进公路、铁路合理分流。

1月10日—13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确定1995年农村经济工作的两大目标：确保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和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1月10日—14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1995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坚决抑制通货膨胀。

同日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在三亚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

1月11日　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铁路建设项目，长治至月山复线电气化铁路全线贯通。工程全长62.3公里。

1月12日　新华社报道：1995年我国将对境内外所有的国有企业、单位统一编制国有企业代码，为国有资产统计监测制度和方法的建立创造条件。

1月14日　昆明市百货大楼一、二楼营业厅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7人重伤。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通知。这次普查主要是为了查清全国工业资产的底数；全国调查我国工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主要产品结构及生产能力，为国家进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实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要求各有关部门照此执行。试行办法提出：厂长、经理对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承担经营责任，并与其个人收入挂钩。

1月16日　全国海关发出公告：1995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1日，海关对246个税号的进口商品和9个税号的出口商品，按比现行税率低的暂定税率征收关税。在此期间，如调整税率，则按调整后的税率执行。

1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4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达21518.8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01倍。

1月17日—21日　全国海关关长会议在大连召开。会议提出1995年重点实施四项改革：加快业务科技一体化过程、建立海关风险管理制度、推行海关担保制度、建立谅解备忘制度。

1月18日　全国首次农业普查联席会议在京召开。

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建立周期性的农业普查制度，有利于正确地制定和完善有关宏观政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据了解，我国将着手建立10年一次的定期农业普查制度。

同日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连结京津冀辽吉黑和内蒙古7省市区的京沈哈光缆通信工程，全线开通仪式在京举行。工程分东西两条线路全长4707公里，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的陆路最长的光纤通信线路。

1月18日—21日　全国贯彻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强调汽车工业要加速重点项目建设，尽快实现规模经营。

1月20日　首列武汉至香港集装箱快运列车开行。

同日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总经理披露，中国银行澳门分行1995年将第一次参与发行澳门币钞票，成为澳门地区代理发钞行之一。

1月23日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传达了江泽民、李鹏对民航工作的指示：加强管理，严格要求；认真贯彻安全第一、正常飞行、优质服务方针。会议要求实现民航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性的循环。

1月24日　受国务院委托劳动部召开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话会议。邹家华在会上要求在各城市里全面进行一次防火检查，杜绝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

1月25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安排好灾区、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

同日　国家计委制度发布了《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

2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为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法》配套，劳动部近日陆续制定颁布了《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等17个规章。

2月6日　中国银行被授权从1995年10月16日起在澳门参与发行澳门元钞票。

2月9日　针对春节后大量民工开始通向珠江、长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和福建沿海地区，劳动部要求各地保证节后民工流动有序；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节后一个月一律不招外地新民工的规定。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组织好春年后民工有序流动，防止春节一个月后恢复招工时又出现新的民工潮。

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证监会等部日前联合颁布《关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规定》。内贸部随即发出专门通知，要求部属企业、事业单位严格执行规定。2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近日联合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证监会为国债、期货的主管机构。

2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世界银行贷款2亿美元，总投资30亿元人民币的我国森林资源发展和保护项目今春实施启动。

2月15日　《人民日报》刊载财政部1月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2月16日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部署国家安居工程工作电话会议。国务委员、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宣布本小组拟定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争取用5年时间新增居民住宅建筑面积1.5亿平方米。

2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开展新税制执法大检查工作。

2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内贸部近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好春耕农资商品供应工作，确保春耕农业生产，不误农时；要把好商品质量关，严禁假冒伪劣农资商品进入市场。22日，国家工商局发出通知，决定在今年春耕期间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进行一次整治，并定于3月14日为全国集中处理假冒伪劣商品日。

2月20日　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在京成立。政治局委员吴邦国向72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专家证。

2月22日　财政中发布1994年第1号和第2号公告，决定1995年3年期凭证式国库券从3月1日起发行，7月31日结束，年利率为14%。1995年3年期无记名国库券从3月1日起发行，3月20日结束，年利率为14.5%。24日，财政部发布第3号公告，宣布1995年到期的各类国库券的还本付息事宜。

2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杨尚昆近日在广东考察。

2月24日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合肥至九江铁路提前一年全线通车。合九线全长322.5公里，设计年运输能力1650万吨，它是我国由中央、地方和企业合资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工程投资约20亿元。

2月24日—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江泽民、李鹏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确定今年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粮食产量4550亿公斤，棉花产量9000万担。

2月25日—27日　国家计委和全国总工会在京召开全国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强调，要加强物价监督，确保涨幅明显回落。会议要求加强检查力度。

2月28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1994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去年我国经济取得5大成就。

3月10日—13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粮食、棉花、化肥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坚持稳定、完善党的农业政策，深化粮棉化肥购销体制改革。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15日　《人民日报》报道：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探明一个大型油气田，储量规模约占全盆地已探明储量的1/4。

3 月 20 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处部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工作的“约法三章”的通报。通报强调，对 1993 年 7 月以后违反“约法三章”的，发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主要负责人要给予纪律处分。

同日　新华社报道：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成都军区向西藏那曲地区空投救灾物资，雪困群众全部脱险。那曲地区今年 2 月下旬以来发生了罕见的大雪灾。

同日　新疆乌鲁木齐至霍尔果斯的通信光缆线路打通。至此，亚欧光缆国内段全线贯通。国内线东起上海，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全长 5000 公里。

3 月 21 日　国务院环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环委会主任宋健在会上指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大气和淡水。

同日　北京军区派出一个轰炸机中队在黄河流经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段河面进行炸冰抢险，避免冰灾发生。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邹家华副总理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第一次联席会议。国务院决定此次普查于 1995 年筹备，1996 年进行。

3 月 22 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全国进一步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要求 1995 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完成这项工作。

同日　1994 年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第六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评选结果在京揭晓。联想集团公司等 10 家优秀企业、马金魁等 20 名优秀企业家获奖。

3 月 23 日　新华社报道：据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第 5 次会议消息，1994 年查获走私案件 24500 起，罚没收入 36 亿余元。

3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了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搞好国有大中企业的意见。

3 月 25 日《人民日报》报道：电子部日前公布了 1995 年电子百强企业排序，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以销售 53.5 亿元名列榜首，并连续两年蝉联百强冠军。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自 199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同日　煤炭部在京召开全国煤炭行业第一次社会保险工作会议，动员、部署炭行业社会保险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劳动部和人事部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分别制定发布了实施办法。

3 月 27 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 年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将超过 16.5 亿亩，比去年增加 2000 多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增加 500 多万亩，油菜种植面积增加 1000 多万亩；棉花种植面积超过 8000 万亩，距国家原计划 9000 万亩尚有一定差距。

3 月 28 日　内贸部和证监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暂停所有商品中远期合同交易，以整顿流通秩序和抑制通货膨胀。

3 月 29 日　建设部和国家统计局召开电话会议，部署 1995 年查清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家底的有关事宜。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进行的此类普查。

同日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工程，15 万吨级修船坞日前在广州文冲造船厂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修船坞，每年可承修 3.5 万吨级至 15 万吨级各类船舶 60 多艘。

3 月 30 日　国家经贸委召开限产压库促销工作情况通报交流会，提出今年力争将全国工业企业产销率提高到 96%以上，产成品存货可供销售天数压缩到 43 天。

3 月 31 日　中国证监会就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问题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限期提高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

4 月 4 日　全国化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要求上半年要确保完成 5640 万吨化肥的生产目标。

4 月 4 日—7 日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在京召开全国试点企业集团工作会议。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4 月 5 日　农业部在京召开全国春管春播工作电话会议。刘江部长提醒各地立足抗灾、抓好春管、春播。

同日　新华社报道：内贸部、国家工商局为解决外轮供应业务及价格混乱，外汇、税收流失严重问题，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整顿外轮供应秩序。

4 月 8 日　总投资 11.58 亿元，历时 10 年的斯太尔重型汽车建设项目全面竣工并通过国家验收。该项目可年产汽车 1 万辆、发动机 1.5 万台，达到了经济规模。

4 月 10 日　上海一号地铁线全线投入试运营。

14 日　为期 4 天的国务院三峡移民工作会议闭幕。邹家华在会上强调，库区要勤俭创业，全国要对口支援。

4 月 15 日　第 77 届广交会开幕。来自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2970 人出席了开幕式。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初国家无线电管委会发布了《建设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的暂行规定》，明确建设卫星通信网应向国家无委办公室提出申请，并由该部门审批。

4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实施峰谷分时电价，缓解高峰缺电局面。

4 月 21 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批复了南

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并要求南京市要严格控制主城人口和用地规模。

4月22日—24日　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据悉，农业部择优批准了124个示范区，初步认定100个项目作为第一批东西合作示范工程。

4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劳动部《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报告》。工程目标是5年帮助800万人再就业。

4月26日　国务院1995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总结会在京举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好民工有序流动。

4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向各地批转了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强调要稳定农业承包本制，强化合同管理。

同日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会成立大会暨房改研讨会在京召开。据悉，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改方案制定完毕。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被列为国家"八五"期间重点技改项目，国产首条铁氧体软磁磁芯生产线最近在扬州建成投产，并通过了电子工业部的验收。

同日　投资2.5亿元的国家"八五"重点工程，西藏邦达机场正式通航。

5月5日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百万吨级沙漠油田——新疆彩南油田全面建成，原油年产可达150万吨。

5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集我国90年代最高水一的造船、航天测控、电子、通信、光学等项技术于一身的新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三号，4月27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成下水。该船满载排水量1万多吨，续航能力18000海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意见》，要求各单位一律不得再私设小金库。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目前最大的磷矿肥基地——贵州瓮福磷矿于近日建成并一次试车成功。该项目总投资14亿元。

5月10日　李岚清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分别会见了由主席保尔·活洛克和董建华率领的美国—香港和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访京团，同他们就香港和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

5月11日　国家商检局日前发布了新调整的《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自1995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5月12日—15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国务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筹建组负责人陈俊生向大会作工作报告。15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宣告成立。陈俊生当选为总社理事会主任，贺光辉当选为总社监事会主任。

5月17日　中国证监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18日，证监会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期货交易风险，从严查处违规行为。

5月20日　京九铁路北段全线铺通，吴邦国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参建职工。本线北起北京南至安徽阜阳，正线长808.03公里，支线74.95公里，共长882.98公里。

5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乔石日前就"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发表谈话，强调要用法律手段促效益提高。

5月22日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在京召开第五次会议，部署1995年的工作。会议强调今年证券、期货的监管工作必须紧密围绕抑制通货膨胀进行。

5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贸委第三部门近日发出公告。重申要加强烟草进出口专卖管理。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人事部、国有资产管理局日前发布了《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5月31日　宝(鸡)中(卫)铁路正式竣工并投入使用。铁路全长498.19公里。

6月2日　国家发布了《一九九四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表明，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重要因素。

6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第8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日前在北京揭晓；到1994年年底，我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1718个，实际利用外资1000.7亿美元。

6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贸委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桑蚕茧统一收购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擅自变动由购价格。

6月6日—9日　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国务院要求：从1995年起，必须以每年解决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推进扶贫开发。

6月8日　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设项目——宝(鸡)中(卫)电气化铁路通车庆祝活动，在宁夏中卫县举行。本线全和498.19公里，单线最终年运输能力可达2500万吨。

6月9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关于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意见》，并要求各地认真组织落实。

6月12日　新华社报道：自1995年7月1日起，我国实行新的录像带和部分中型客车进口关税税率。

6月16日　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提出，

要严格控制新股发行。

6月21日　首届全国十佳医药三资企业评价在京揭晓。

6月22日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宣布，正式批准北京等59个城市和单位的规模指标。

6月23日　国务院第3届环委会第6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1995—2050)《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化纲要》和《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草案)。

6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95中国乡镇企业评价排序"结果日前在京揭晓。此次评价排序分为"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和"中国最高利税总额乡镇企业1000家"两个项目。

6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份文件。

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即日起，适当提高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同时，调整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各金融机构对企业和居民的存款利率不变。

7月3日—8日　姜春云副总理受江泽民和李鹏委托，到湖南、江西察看水情，慰问灾民，指导抗洪救灾工作。自6月下旬以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灾，受灾地区军民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进行了抗洪斗争。12日，李鹏在国务院第74次总理办公会上要求，要发动灾区群众生产自救、恢复家园。7月中旬，民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组织灾民自救，管好用好救灾款物。7月下旬，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7月5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7月7日　财政部近日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做好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收缴工作。1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有资产管理局等3部局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房地产评估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7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勘查发现，我国鄂尔多斯盆地储煤资源，仅地下2000米以内就有19752.78亿吨，居世界8大煤田前列。

7月18日　全国粮食部门两条线运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李岚清在会上指出，我国粮食部门将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两线运行。

7月19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20日　连接金州、大窖湾的大连港湾跨海铁路——金窖铁路正式通车。此线长17.76公里，投资3亿多元，为我国北方第一条跨海铁路。

同日　广东、广(州)、梅(州)、汕(头)铁路全线通车。本线全长480公里，耗资近40亿元。

7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颁布《关于授权地质矿产部等部门和机构对有关国有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的通知》，首批授权31个部门和机构对指定的或者其所属的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

8月4日　京津塘高速公路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本线西起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东至天津市塘沽区河北路，全长142.69公里。工程总体水平达到到国内领先和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8月6日　财政部就发行1995年1年期记帐式国库券发布公告，计划发行100亿元国库券，年利11.98%。

8月8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虎林县发现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总蕴藏量可观的盆地油气田。

8月11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许可证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正式宣告开业。

8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中国人民银行近日颁布实施《贷款通则》。

8月22日—24日　国家经贸委在天津召开了"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限产压库工作会议"，以解决当前部分企业盲目追求值速度现象。

8月23日　新华社报道：为了加强出口退税的管理，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决定，自8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出口货物税收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24日，新华社报道，近日在福州召开的全国税务稽查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大税务执法力度、严查制售假发票和偷漏税行为。

8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农业部主持编写的《中国农业发展报告'95》，即我国第一部农业白皮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今后每年农业部都要编写出版农业白皮书。

9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海关部署和财政部近日联合颁布了海关对进出口企业会计帐簿设置和报送会计报表的暂行规定，自9月1日起开始实施。

9月4日　全国三产普查表彰电话会议在京召开，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强调，统计工作要实事求是。

9月4日—6日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棉花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经营和价格。

9月5日　全国农业种子工作会议在津召开。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提出，创建种子工程，推动农业上新台阶。

9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建设银行总行发出紧急通知重申，要从严控制一般固定资产，但对部分重点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出通知，决

定年内对全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一次检查验收，并重新登记。

9月11日　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大力加强增值税的管理，打击利用增值税发票的犯罪行为。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无线电管委会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以加强对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

同日　第二届全国环保产业暨第四届国际环保展览会在京开幕。

9月14日　国家"八五"建设重点工程——全长1622公里的兰新铁路复线正式投入运营。吴邦国副总理出席开通运营庆祝大会并讲话。兰新新复线东起武威南，西至乌鲁木齐，最终的设计运输能力为5000万吨以上。

9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八五"重点建设工程——安庆石化总厂5万吨丙烯腈/腈纶及其配套工程日前建成投立。至此，安庆石化总厂二期工程的10多个项目已全部竣工投产。

9月18日　国务院高级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4次会议在京举行。该委员会主席宋健在会上提出，必须将环境政策引向实际领域。

9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国家工商局等制定的《进口照相机销售管理暂行办法》近日出台。

9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务院证券委又批准长春一汽集团等7家企业到境外上市筹资。

9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运12IV型飞机获准在世界各地销售。

同日　第四届中国专利金奖评审在京揭晓，13项专利获奖。

9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海关总署日前以总署令形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办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0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电力总装机量达2.045亿千瓦，预计到年底将达2.1亿千瓦，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国的发电量也将突破1万亿千瓦时，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

10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李鹏总理9月23日签署了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同日　我国在流动沙漠中修筑的第一条等级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全线正式通车。公路全长522公里，由南往北贯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决定1995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6日，财政部长刘仲藜在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会议上要求集中全力搞好今年的大检查。

10月6～11日　乔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大扶贫力度，确保"九五"基本脱贫。

10月8日　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市召开。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会上强调，水利已居基础设施建设首位。

10月8～11日　全国冶金科技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提出以科技提高质量效益，建世界一流冶金企业。

10月9～13日　建国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全国内河航运建设工作会议在南京、杭州两地相继举行。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促进内河航运事业发展。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停止发展多层次传销企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国扶贫基会等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十大"扶贫状元"评选结果日前在京揭晓。

10月9～14日　全国各地开展第五次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

10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第三届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评选结果在南京揭晓。

同日　中国国际广播中心工程落成仪式在京举行，李瑞环、李铁映出席了落成仪式。

10月12～14日　全国林业科技大会在京举行，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指出，林业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10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大同机车厂研制的韶山7型电力机车最近通过了部级鉴定。专家认为它是目前国内技术水平最高的电力机车，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日　国家粮食储备局等联合召开电话会议，部署第五个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16日，首都各界纷纷组织活动，纪念世界粮食日被确定15周年。

10月13～17日　全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科技会议在京举行。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说，城市建设不要盲目求大。

10月15日　第78届广交会开幕。

10月16日　中国银行正式参与发行澳门元。

10月17～19日　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外经贸部长吴仪在会上指出，我国将进一步改革援外工作，主要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作。

同日　国家重点技改项目——沈阳东北制药总厂万吨维C项目建成投产。

10月18～20日　'95全国名牌大会在合肥举行。

10月18～21日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九五"时期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标。

10月19日　江泽民参观"八五"航空预研成果展会时，希望航空工业战线职工"九五"期间取得更大成绩。

10月20日　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单位发起和组织的国有企业500强评选活动结果在京揭晓。500强企业占有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的36.04%和实现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78.39%。

10月21～24日　全国铁路科技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九五”期间我国铁路将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同日　国家计委等部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化肥价格工作会议。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会上说，化肥供应要保量稳价，加强产销衔接，搞好总量平衡。

10月24日　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提出了整顿会议工作秩序的“约法三章”。

同日　全国交通扶贫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九五”期间，要使全国贫困县不通公路的乡的比重降至1%以下。

同日　新华社报道：鉴于我国期货市场部分品种出现过度投机态势，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控制期货市场风险、严厉打击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自1979年至今，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113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同日　云南武定县发生6.5级地震，其后多次余震。震后中央、省、县各级政府立刻组织了抗震救灾工作并对灾区人民进行慰问；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出动部队投入抗震救灾。25日，江泽民、李鹏分别打电话慰问灾区。截至31日，武定地震已造成51死亡，808人重伤，倒塌房屋26778间。31日，民政部、国家经贸委等部门组成的国务院联合工作组飞抵灾区慰问灾民、协助救灾工作。

同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南宁市召开中国世界银行扶贫项目工作会议。会上宣读了江泽民的致信。

10月26日　李鹏等中央领导出席首都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动工典礼。

同日　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在京开幕。李鹏为博览会题词。28日，乔石等中央领导参观了博览会。

同日　国家税务总局在京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强调要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税收任务。

10月27日　全国小城镇和村庄建设成就展在京开幕。乔石参观了展览会。

10月28日　国家“八五”计划项目——石家庄彩色显像管玻壳生产线投产。该生产线总投资26亿元，年设计生产能力为408万套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年可节约外汇1.4亿美元。

10月29日　湖北巴东县发生滑坡地质灾害，造成部分经济损失。

10月31日　国家工商局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盗用电话号码非法并机的犯罪活动。

10月29～31日　全国光彩事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30日，李瑞环在会上指出，光彩事业惠及百姓，功在千秋。

11月1～3日　全国交通科技大会在京举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会上说，交通科技要为实现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和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服务。

11月5～12日　吴邦国副总理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发挥资源优势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1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证监会日前对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违规上市法人股转配红股行为做出处理，没收中介机构的非法所得，并进行通报批评。

11月6～8日　江泽民在北京考察时，充分肯定了北京市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北京今后的工作提出希望、进行勉励。

11月6～9日　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在太原市举行。会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新形势，为实现“两个转变”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11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就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

11月7～9日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技工业大会在京举行。会议提出依靠科技富民兴社。

11月8日　江泽民、朱镕基等在京会见参加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强调，经济和金融工作要服从大局，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同日　姜春云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家防总1995年第三次工作会议。姜春云在会上强调，要及早做好明年防汛抗旱准备。

同日　农业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乡镇企业集团名单，包括横店集团、海德集团等共327家企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据最近召开的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科技大会消息，我国兵器工业军民品科研共获部以上成果奖1192项。

11月8～12日　李鹏考察三峡工程时提出为实现九七年长江截流而奋斗。16日至19日李鹏在江西考察时指出，振兴老企业技术改造大有可为。

11月9日　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组举行全体会议。

同日　北京——澳门空中航线开通。

同日　全国对外经济贸易法律工作会议在京闭幕。

同日　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宣传思想工作研讨会在京开幕。会议强调提高个体劳动者整体素质。

11月10日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表彰暨“全国技能月”总结大会在京举行。李瑞环接见了大会获奖者。

1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近日联合颁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

同日 长江四川江泽市水域发生重大沉船事故，“江津6号”与“遵义308号”两船相撞，“江津6号”沉没，70余人落水，其中40多人下落不明。

11月14日 中国投资协会在京成立。

同日 成渝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20余辆车相撞，6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1月14日～19日 朱镕基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扶贫工作。

11月15～17日 国务院检查组对河南省治理公路“三乱”工作进行检查，要求河南省巩固治理公路“三乱”成果。29日，国务委员李贵鲜在听取专项检查汇报时说，治理公路“三乱”要一抓到底。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通知，要求加强对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管理。

11月16日 京九铁路全线铺通，国务院在九江市举行铺通庆典。李鹏在庆典上做重要讲话。江泽民、李鹏分别题词祝贺。京九铁路1993年初全面施工，历时3年铺通。京九线北起北京，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总长2536公里。15日，国务院京九铁路领导小组举行了第四次工作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争取1996年4月1日实现全线临管运输。

11月16～21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基层工作会议在江阴市召开。会议提出了衡量基层社建设成功的4条标准。

11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等联合发布《餐饮修理业价格行为规则》，自1996年1月1日起执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日前，国家商检局等联合公布《设立外商投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公司的审批规定》。

11月18日 全国首家海洋气象电台——舟山海洋气象广播电台正式开播。

11月21日 乔石在三亚市考察经济工作。

11月22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近日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控制境外废物向我国转移。

同日 《中国商检报》创刊。江泽民、李鹏分别题辞。

11月23日 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工作。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做重要讲话。

1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再贴现业务，以进一步促进商业信用票据化和资金的横向融通。

11月27日 朱镕基等人参观第三届全国电子信息应用展览。

同日 卫生部召开全国大会布置对10月30日国家颁布的食品卫生法的宣传工作。会议要求加大执法力度。

同日 第二次全国教职工住房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昆明举行。据会议消息，目前全国教职工人均住房达到7平方米。

11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税制改革等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我国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时，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12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李鹏总理1995年11月22日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检查落实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要求各地今冬明春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同日 我国最长的一条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成的铁路——集通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943公里，总投资21.7亿元，设计输送能力最终为1700万吨。

12月2～16日 杨尚昆在江苏考察经济工作。

12月3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我国第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发起人暨首届股东大会在京召开。

同日 据新华社报道：1995年我国肉类产量预计可达4700万吨，蛋类预计产量1500万吨，奶类预计产量620万吨，分别比上年增4.4%、2.1%、1.8%。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仪征化纤三期工程近日全面建成，主要包括年产25万吨精对苯二甲酸、6万吨聚酯切片和3万吨差别涤纶长丝三个项目。工程概算总投资36.7亿元。

12月5日 国家“八五”交通重点工程——西(安)宝(鸡)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公路全长155公里，投资近15亿元，设计行车时速100公里/小时，流量每昼夜2.5万车次。

12月5～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199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和今后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要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

12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八五”重点项目，总投资5.1亿元的我国最大的彩管荫罩项目，日前在烟台建成投产。

12月9～10日 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1996年经贸工作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有利于节约增效、技术进步、公平竞争和资

源优化配置的机制。

12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天津14万吨乙烯装置于1995年11月30日建成投产。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共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500多家。

同日 上海南北高架路建成通车。道路全长8.45公里，路宽25.5米，设计时速80公里。

同日 30万吨级的巴拿马籍散装货轮卸完26万多吨铁矿砂后，安全离开宁波北仑港。这表明宁波港已有接卸特大货轮的能力，进入世界级港口行列。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交通部分别发了贺电。

12月10～13日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部署1996年工作。会议要求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

12月11日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农副产品收购要做到“三坚持三不准”，严禁代扣、代缴各种款项和向农民乱摊派，维护农民利益。

1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通知，要求禁办讨债公司。

同日 中国交通银行东京分行正式开业。

12月13～15日 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在沪举行。李鹏致信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房改工作。国务委员李铁映部署了1996年的房改工作。

12月13～16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在会议上强调，要依法征税，把该收的税款都收上来。

12月14日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的200多名学者及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理事会及领导机构，房维中为会长。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近日在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强调，1996年财政继续适度从紧。会议对1996年的财政工作进行了部署。

同日 内贸部通知要求搞好“两节”消费品市场供应。15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粮储局近日通知，要求保证“两节”粮油供应。23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通知，要求保证“两节”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为此国家工商局近日部署“两节”市场检查工作。

12月15日 国家重点技改项目，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乙烯改扩建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本工程将乙烯产量由30万吨扩为45万吨。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经贸委近日通知强调，组织好各地民工有序流动是春运工作的重点。

12月16日 江泽民就当晚新闻联播对哈尔滨市生猪屠宰市场管理混乱、个体屠宰点卫生极差的报道，给黑龙江省委书记打电话表示不安，要求问题得到解决。17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采取行动，以解决生猪屠宰中存在的问题。26日，国内贸易部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各地落实定点屠宰生猪、畜禽、防止病肉上市。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也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生猪等畜禽屠宰检疫管理。

12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我国船舶产量可望完成175万吨，在世界排序第四。

12月17～19日 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在张家港市举行。会议提出我国环保工作重点，要实现包括环保管理法制化在内的六个转移。

12月17～20日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务求重点突破。

12月18日 广西邕宁县法院判决1995年春假稻种坑农案，被告赔偿受害农民599.5万元。

同日 青海果洛发生6.2级地震。

12月19日 我国首家民族地区的森林工业集团——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成立。

12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八五”期间我国森林面积增加800多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3.1亿立方米，全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达1.34亿公顷、101亿立方米。22日，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我国将逐步把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进行分类经营。

同日 李鹏视察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同日 由中宣部、内贸部组织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拉开帷幕，北京市百货大楼等30家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发出积极参加“打假扫劣”活动的倡仪。

同日 国务院工业普查协调联席会议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对第3次全国工业普查进行动员和部署。同日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全国工业企业厂长（经理）发出公开信，要求得到厂长（经理）们大力支持。为此，办公室决定于1995年12月25日至31日举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宣传周”活动。

12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等五部委日前召开会议，部署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求重点检察各地贯彻中央为减轻农民负担制定的“约法三章”情况。

12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劳动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劳动部负责人说，“九五”期间我国有5400万人需要就业，要把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12月25日 李鹏参观“中国农村水电暨电气化建设十年成就展”。资料表明，10年来全国农村发电量从265亿千瓦时增加到680亿千瓦时，97%的农户用上了电。

同日 全国煤炭工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全国工商税收突破5000亿元。

12月26日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电力部负责人说将要组织国家级电力公司，实现电力工业的体制改革。

同日 国家“八五”重点工程——铜陵长江大桥在安徽建成通车。

12月27日 连接海口、三亚的国家重点工程——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右幅）竣工通车。公路全长268公里，投资21亿元。

同日 国务院第三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宋健在会议上说，本世纪末要让淮河水变清。会议审议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

同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2月27～29日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鹏在会上要求全国工商管理部门加强市场管理，规范流通秩序。

12月28日 由铁道部和广东省共同投资的广梅汕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出席在汕头举行的通车典礼。本线全长480公里。另据铁道部负责人介绍，我国“八五”期间铺轨总长11180公里，完成新线铺轨5900公里，其中复线1700公里，电气化1000公里；增建既有电气化2200公里。

同日 国家“八五”重点工程，青岛至黄岛公路竣工通车。公路全长68公里，投资18亿元。

同日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截至12月25日，全国工商税收共完成51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2%，为年计划的100.2%；国内增值税、消费税累计收入29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为年计划的94.7%。

同日 由75家新闻单位联合评选的1995年十大经济新闻在京揭晓。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发出通知，决定自1996年4月1日起，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将降至23%。

12月28～31日 江泽民在汕头考察时，希望所有经济特区继续开拓前进，走在全国前面。

12月29日 农业部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12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我国钢产量预计达到9300万吨，钢材产量在7900万吨以上。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海南岛以南91公里的南中国莺歌海上，我国目前最大的海上天然气田：崖13—1气田已全部建成，气田天然气储量为968亿立方米。

军　事

1月4日 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妇联在北京举行好军嫂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报告会。

1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最近作出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强调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政令军令的畅通。

1月26日 首都举行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出席，并在晚会前亲切会见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报告团。

4月5日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一期工程建成，陵园正式开放。邓小平同志为龙华烈士陵园题写了园名，江泽民同志为纪念碑题词“丹心碧血为人民”，陈云同志为龙华烈士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4月11～17日 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苏亚雷斯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苏亚雷斯一行。

4月20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传》出版发行暨纪念叶剑英诞辰98周年座谈会。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等出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5月15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进行地下核试验发表谈话，重申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并积极参加日内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6月6日 新华社报道：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书名，徐向前和聂荣臻元帅生前题词的10卷本《解放军烈士传》，经编撰者9年不懈的努力，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由长征出版社隆重出版。

6月27日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卷、《新四军》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刘华清在会上讲话。

7月7日 北京各界代表2000多人在卢沟桥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并为抗战纪念群雕奠基。解放军总参谋部、南京军区的老战士也分别举行座谈会、报告会等纪念活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10名老红军、老八路以红星功勋荣誉章或独立功勋荣誉章。至此，全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老八路，已有57394人分别获得这两种功勋荣誉章。

7月21日～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发射的6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

7月31日 国防部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8周年招待会，迟浩田主持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8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

的出版发行。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确定的18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重点图书至此已经大部分出版，其余的将于9月3日之前全部出齐。

8月15～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和海域上空进行导弹、火炮实弹射击演习。

8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陈健说，中国今日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陈健说：中国在核试验问题上一贯持十分克制的态度，试验次数极为有限。中国积极参加全面禁核试条约的谈判，争取不晚于1996年达成该条约。条约一旦生效，中国将停止核试验。

8月25日　中央军委举行驻京部队老战士座谈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江泽民、刘华清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9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海关总署和财政部近日联合颁布了海关对进出口企业会计帐簿设置和报送会计报表的暂行规定，自9月1日起开始实施。

9月2日　首都隆重举办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观看演出，100名抗日老战士和首都各界代表及外国友人约万人参加了晚会。同日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香港、澳门各界群众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上将应邀在美国檀香山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纪念仪式。

9月3日　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李鹏主持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大会，近百名抗日老战士在主席台就座，肖克、李沛瑶、李克强代表老战士、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讲话。同日，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同首都各界万余人出席仪式。

9月5日　新华社报道：今年军转干部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接收安置军转干部4.2万多名。

9月6日　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在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落成。

9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日前发出通知，批转三总部《贯彻落实江主席关于军队要过紧日子重要批示的意见》。

9月18日　河南省隆重纪念抗日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诞辰100周年，并举行“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揭幕仪式。江泽民为纪念馆题写馆名，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也分别题词。

10月18日　新华社报道：近日，江泽民主席视察了人民海军舰艇和飞行部队，观看了海上演习。刘华清、张震等军委领导一同视察并观看演习。

11月1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北京郊区检阅武警部队，观看武警部队保障工作成果汇报演练时指出，努力把部队建成钢铁之师文明之师。刘华清等一同检阅部队并观看四大类综合演练。

11月13～17日　国防科技预研工作会议在京举行。17日，刘华清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抓好五方面工作。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

11月20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举行爱国奉献优秀干部事迹报告会。张万年会见报告团全体成员。

11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南京战区陆海空军部队11月下旬在闽南沿海地区成功地举行了一次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张万年观看演习并会见参演部队领导干部。

12月1日　国防部命名“海空雄鹰团”30周年纪念大会在浙江省台州市海军航空兵某部举行。江泽民、刘华清等题词祝贺。

12月14日　优秀复员退伍军人成才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刘华清会见优秀复员退伍军人代表。15日，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颁奖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民政部、国务院军安办表彰119名优秀复员退伍军人的决定。优秀复员退伍军人代表宣读了全体代表致全国复员退伍军人建功立业成才报国的倡议书。

外　交

1月4日　国家版权局在京举行座谈会，向新闻界披露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破裂的事实真象。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月6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港英政府和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府，港督彭定康关于“只愿见到”两个政府是“同一个政府”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15日，张浚生在香港批评彭定康拒绝把公务员资料文件交给中国政府的言论。他说，希望港英不要为香港平稳过渡再制造麻烦。1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发表谈话指出，英方有责任将香港政府档案在1997年时移交给中国政府。21日，张浚生在香港出版印刷同业新年座谈会上发表谈话说，中方要求港府提交公务员资料是选择未来特区政府官员的实际需要。双方有关公务员资料问题的公开争论，是由港督彭定康挑起的。

1月9日—11日　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义一行访问

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武村正义一行；财政部长刘仲藜同武村正义举行会谈。11日，武村正义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

1月9日—13日　克罗地亚总理瓦伦蒂奇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与瓦伦蒂奇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先后会见瓦伦蒂奇。9日，中克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等文件。11日，瓦伦蒂奇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1月11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属下的中葡三大问题工作小组第14次会议在澳门举行，双方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

1月13日　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和日本驻华大使国广道彦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署1994年度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换文。同日，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总裁西垣昭签订了对象项目的贷款协议。

1月15日　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建设大亚湾第二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14日，李鹏总理会见了出席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的法国工业、邮电和外贸部长罗西一行。

1月17日　李鹏总理致电村山首相，对日本地震灾区人民表示慰问，并对遇难人民表示哀悼。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钱正英、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和外交部发言人分别致电或发表谈话，表示对日本灾区人民的慰问和对遇难者的哀悼。21日，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向日本红十字会转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对日地震灾区的10万美元捐款。25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再次向日本地震灾区无偿援助食品和儿童生活用品，总价值达20万元人民币。

1月17日—19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卢卡申科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分见卢卡申科。17日，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政府签署关于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两国政府民用航空协定等文件。18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与随同卢卡申科访问的白俄罗斯国防部长阿纳托利上将举行会谈，并签署《会谈纪要》。19日，中国——白俄罗斯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合作的联合声明在北京发表。

1月17日—25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扎伊尔、刚果、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访问期间，5国国家、政府或议会领导人先后会见钱其琛；钱其琛先后同5国外长举行会谈。18日和20日，中国政府向扎伊尔政府和向多哥政府赠送一批物资的换文先后在金沙萨和洛美签署。24日，钱其琛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记才招待会。

1月18日—28日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北京举行，22日和23日休会两天，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8日，外经贸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责任在美方。中国希望美重新考虑其立场，以求得平等协商解决争议。

1月18日—28日　朱镕基副总理访问葡萄牙和瑞士。访问期间，两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先后会见朱镕基；朱镕基先后会见两国政府高级官员；朱镕基还先后会晤了两国企业界人士。在葡、瑞访问期间，朱镕基先后接受两国电视台和主要报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在访瑞士期间，朱镕基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第2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讲。

1月21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越南同俄罗斯对南沙群岛进行考察一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越南与第三国在南沙海域进行考察活动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犯，是非法的。

2月1日　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兵库县南部地震灾区提供的总价值为3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从今天起分3批由上海陆续运抵大阪并送往灾区。

2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美国国务院2月1日发表的1994年度“人权报告”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无权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划脚。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是一个歪曲事实、颠倒事非的报告。

2月4日　外经贸部发言人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出口到美的电子、家具、自行车等价值10.8亿美元的产品实行贸易报复，关税将提高到百分之一百，并将于2月26日生效一事发表谈话说，美方这一决定无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中方在中美多次知识产权磋商中所表现的诚意。“我们对此表示极大遗憾和强烈不满。”同日，外经贸部发表公告，公布了中国以美国对华贸易报复的反报复清单。4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大使致信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去华盛顿恢复谈判并建议2月13日两国进行知识产权磋商。5日，吴仪复涵坎特，同意美方建议并提出在北京进行磋商。8日，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说，希望美方在北京恢复举行的中美知识产权磋商中表现出灵活性，放弃其不合理要求，使谈判取得进展。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一些要求超出了双边贸易关系协定乃至多边协定规定的要求，有的连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做到。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15日至26日，中美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第9轮磋商在北京举行并达成协议，双方草签了两国政府的换函。

2月8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公

开场合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要求英方将香港公务员资料交给中国政府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办事，这是英方必须履行的职责。27日，张浚生在出席香港中资企业协会春茗活动时，对英方最近放风称将单方面向香港立法局提交终审法院草案一事作出评论说，香港终审法院草案至今未果，责在英方。

2月13日—17日　斯洛文尼亚总理德尔诺夫舍克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德尔诺夫舍克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德尔诺夫舍克。13日，中斯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13日至14日，中斯经贸混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签署会议纪要。

2月13日—18日　陈慕华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韩国。

2月14日—16日，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10次会议先后在北京和青岛举行。中国总理李鹏和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分别向会议发来贺词和贺电，中方首席委员张香山和日方首席委员石川忠雄分别在会上作基调发言。会议通过就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向两国政府提交的共同政策建议书。14日，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先后会见了与会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双方委员。

2月25日　李鹏总理就中韩关系、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等问题接受韩国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他的提问。

同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李鹏分别电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逝世。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往朝鲜驻华大使馆吊唁吴振宇逝世。国防部长迟浩田以及外交部、中联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随同刘华清前往吊唁吴振宇逝世。

3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美之间达成的协议的原则不仅可以增进中美经济合作，而且也会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合作。"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说，香港终审法院的设立必须符合基本法有关规定，遵守中英达成的有关协议，否则不能过渡到1997年后。17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香港终审法院问题应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23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1991年中英双方就终审法院问题达成的原则协议必须得到遵守，1997年前在香港设立的终审法院必须符合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3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日前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港督彭定康在有些问题上有意绕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做法，完全是缺乏常识的，他不应该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地位和职能也不了解。22日，新华社报道：张浚生近日在香港指出，港府将特区政府的土地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的中期财产预算内，是不应该和越权的，而且把期望值提得很高，这是误导市民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及治安小组第17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就香港的防务问题进行了磋商。27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三次排污问题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排污技术小组。

3月22日—28日　卢旺达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卡加梅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卡加梅；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也会见了卡加梅。22日，中卢签署中国政府向卢政府提供一批一般物资的换文。28日，卡加梅在北京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

3月24日　李鹏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分别会见科威特国防大臣萨巴赫一行。2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并宴请了萨巴赫及其一行。

同日　中英香港机场委员会中方发言人在香港说，中英在香港机场公司条例草案问题的磋商中，对所讨论的问题已取得共识。30日，中央联合联系小组在北京举行专家会议，磋商香港过渡期财政预算案编制及有关问题。

同日　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柯肖德递交中国加入布达佩斯条约的加入书。同时，中国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向柯肖德递交了请求获得布在佩斯条约国保藏单位资格证书。

同日　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克罗地亚特命全权大使谢锡勤同波黑政府代表、波黑驻克罗地亚特命全权大使卡·特尔恩卡在萨格勒布签署中国同波黑建交联合公报，决定自1995年4月3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月5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会长文正秀率领的韩国韩中议员恳谈会代表团。吴邦国副总理4日也会见了文正秀一行。3日，全国人大中韩友好小组主席朱良同文正秀一行举行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发布中国关于安全保证问题的国家声明。6日，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关于安全保证问题国家声明有利于增进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李登辉访问阿联酋、约旦一事发表评论说，李登辉以私人访问名义赴阿联酋、约旦是怀有政治目的的。台湾当局不论以什么形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已就此事向有关国家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提出了抗议。6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对以色列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拒绝李登辉访以表示赞

赏。

同日　中国和俄罗斯国境河流航行联委会第37次会议自3月31日至今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召开。与会的双方代表达成协议，并签署会议纪要。

4月5日—10日　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萨阿德；李鹏总理同萨阿德举行会谈。6日，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与随同萨阿德来访的科工商大臣希拉勒举行会谈。同日，中科签署科威特向中国提供代款的协议。8日，萨阿德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4月5日—13日　奥地利经济部长许塞尔率领奥经济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岚清副总理会见许塞尔一行。7日，中奥经贸合作混委会第1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日，中奥签署3项意向书。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美国国务院3月31日向美国会提交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就香港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企图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美方发表这样一份报告表示强烈不满。

4月7日　倪志福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自3月26日至今访问泰国和马来西亚。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美国政府贸易办发表的年度报告发表评论说，中国对目前某些主要贸易方执意保留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表示担扰，更不赞成别国任意指责其他贸易伙伴的做法。

4月10日—11日　中国国际经济论坛1995年会议在北京举行。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英国前首相希思等外宾与会。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会上发表重要演讲，李岚清副总理作主题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干事欧塔拉等外宾和吴仪等中国6位部长分别在会上发了言。12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的中外代表。

4月10日—17日　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苏亚雷斯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苏亚雷斯。12日，苏亚雷斯向中国著名指挥家袁方等受勋，以表彰他们在促进中葡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4月10日—23日　乔石委员长访问日本和韩国。访日期间，明仁天皇和村山首相分别会见乔石，乔石会见日国会众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参院议长原文兵卫和副总理兼外相河野洋平，以及日本各界朋友。访韩期间，金泳三总统、李洪九总理分别会见乔石，乔石会见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金相厦等工商界朋友。18日，乔石在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8日，乔石出访前在北京分别接受日、韩两国驻北京记者的采访。

4月12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以色列财长肖哈特。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指出，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公务员政策作了明确规定。英方不断挑起对抗，使香港公务员无所适应。23日，张浚生指出，香港终审法院问题拖延至今，责任完全在英方。

4月15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自3月29日至今访问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盟和冰岛。访问期间，5国总统、总理或副总理分别会见钱其琛；5国外长分别同钱其琛举行会谈。3月31日、4月6日、10日和15日，钱其琛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先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接受当地新闻记者的联合采访。9日，中保双方就钱其琛访保发表新闻公报。10日，钱其琛在南联盟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就中南关系和中国对解决前南区危机以及前南各国关系问题阐述中国的5点原则立场。

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发胡锦涛会见由主席拉普申率领的俄罗斯农业党代表团。同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4月17日—21日　尼泊尔首相阿迪卡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阿迪卡里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后会见阿迪卡里。18日，中尼两国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3个换文。21日，中国和尼泊尔在北京发表联合公报。

4月19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率团访华的以色列工党总书记兹维列。同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中英关于香港和内地跨境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4月19日、25日　中国银行发言人和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就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宣布将中国银行的长期负债的信用等级降低一事先后发表谈话，表示意外和遗憾。

4月20日　胡锦涛会见以中央书记、中央科教部部长阮庭肆率领的越共中央科教部代表团。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在南沙岛礁上建立避风设施一事答记者问时说，散布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和平利用影响航行安全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

4月24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巴西民主工党主席布利佐拉。

同日　乔石委员长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巴西圣保罗市市长马鲁夫一行。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由主席素廷·努帕吉率领的泰国下议院外委会代表团。同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朱良同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4月27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麦基上将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希望美方做出真诚努力，妥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发言人说，台湾申办2002年亚运会我奥委会表示坚决反对。

同日　外经贸部发言人就日本宣布对中国部分纺织品进行单边设限调查一事发表谈话说，对日方的这一做法我们感到十分遗憾并表示坚决反对。

4月28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美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利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日本日中科技文化中心高级顾问户井田三郎率领的日中人才交流访华团。

5月7日—9日　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并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活动。8日，江泽民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会晤。9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后方劳动者盛大检阅式，江泽民同俄、美、英、法等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了检阅。同日，江泽民参加莫斯科俯首山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馆揭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5月15日　李鹏总理会见英国贸工大臣赫塞尔廷。同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与赫塞尔廷举行会谈，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本月15日中国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发表谈话，重申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并积极参加日内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5月15日—19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分别会见格拉乔夫。16日，迟浩田同格拉乔夫举行会谈并签署会谈纪要。

5月17日—19日　越南外长阮孟琴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阮孟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阮孟琴举行会谈。17日，中越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

5月17日—23日　纳米比亚外长古里拉布访问我国。访问期间，荣毅仁副主席和朱镕基其副总理分别会见古里拉布；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古里拉布举行会谈。

5月18日　李鹏总理会见德国三大化工公司之一——巴斯夫公司董事长司徒伯一行。

同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由主任黄碧山率领的越南国会外委会代表团。17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朱良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希望有关国家不要因存在急议而影响各国船只通过南海的正常航行。

5月20日　中英机场委员会中方发言人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首席代表和港英政府发言人违反规定，泄漏与新机场有关的两个财务支持协议谈判情况和有意歪曲事实的讲话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真诚希望英方不再节外生枝，出尔反尔。

5月23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政府22日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发表声明，向美政府提出强列抗议。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也就此事召见美驻华大使，向美提出抗议。23、24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26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李登辉拟访美的行径。同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日期和中止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于振武对美的访问；28日，又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中美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和推迟美国控与裁军署署长以及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来华访问的日期。

5月23日—27日　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德米雷尔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分见德米雷尔。23日，中土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等文件。

5月24日　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先后会见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代表团。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葡萄牙司法部长卢西奥一行。

同日　胡锦涛同志会见由主席绍尔松率领的智利争取民主党代表团。同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一行。同日，唐家璇副外长与达瓦·策林举行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削减对华援助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本政府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削减对华无偿援助的做法不明智，也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6月8日　李鹏总理会见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热先生。

同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率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代表团自5月17日至今访问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日本。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对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其错误立场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指出，允许李登辉访美问题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基础，17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鉴于目前中美关系的状况，中国政府已决定召驻美大

使李道豫回国述职。20 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关系问题回答记者问时说，中美关系当前遇到很大困难，两国关系的基础遭到动摇，美国政府应承担全部责任。22 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美方向中方提出所谓“高级会晤”一事，企图大事化了，这是绝对不行的。29 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美方应切实采取行动，真正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确轨道上来。

7 月 28 日　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复关”、中美关系等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复关的立场未变。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文莱出席第 28 届东盟外长会议。30 日，钱其琛在文莱同东盟外长举行对话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目前处理南沙争议最现实可行的途径。钱其琛指出，中国同东盟永远是好朋友。他还驳斥了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说法。29 日至 30 日，钱其琛分别会见了与会的俄罗斯外长、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和文莱外交大臣，以及菲律宾、泰国等与会的部分东盟外长，越南外长等。

8 月 2 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并宴请来华进行体检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力在和莫尼列王后。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我国驱逐两名美国军官事发表谈话指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空军联络官约瑟夫·陈等非法窃取我军事情报，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同日，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张宏喜奉命召见美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郝扶东，就此事向美提出严正并涉和强烈抗议。同日，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宣布在 24 小时内依法将经瑟夫·陈等两人驱逐出境。

同日　以冶金部部长刘淇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自 7 月 26 日至今访问秘鲁。访问期间，刘淇一行 7 月 28 日在利马参加藤森总统的就职仪式。29 日，藤森会见了刘淇一行。

8 月 4 日　朱镕基副总理自 7 月 19 日至今访问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赞比亚。访问期间，7 国国家或政府、议会领导人先后会见朱镕基，或同朱镕基举行会谈。7 月 19、26、31 日，中国和坦赞铁路提供专项贷款，向津巴布韦提供优惠贷款和中国向纳米比亚无偿提供一批物资等协议先后在达累斯萨拉姆、哈拉雷和温得克签署。7 月 25 日，朱镕基在哈拉雷发表演讲。8 月 5 日，朱镕基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访问达到了加深了解、增进团结、搞好合作的目的。

8 月 17 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顿时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诸项原则的核心，在这样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绝不会退让。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由坦桑纪亚气象局局长姆希塔率领的世界气象组织非洲气象考察团。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 8 月 17 日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发表讲话说，中国在核试验问题上一贯持十分克制的态度，试验次数极为有限。发言人指出，中国积极参加全面禁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争取不晚于 1996 年达成该条约。条约一旦生效，中国将停止核试验。

8 月 18 日　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毓真致函英《经济学家》杂志，批驳该刊 7 月 29 日发表的《遏制中国论》论，指出该社论套用陈腐的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学派的观点，鼓吹对华采取“遏制”方针，蓄意误导国际舆论。

8 月 24 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重申，美国应以实际行动体现其按“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它与台湾关系的承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是有原则的，这就是维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8 月 29 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韩国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爱泼斯坦等抗战时期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 20 多位老国际友人和他们的亲属。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能否恢复正常取决于美方能否以行动履行自己的诺言。发言人还说，中国对日本政府以中国核试验为由，决定大幅度冻结 95 年度对华无偿援助的作法深表遗憾。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和李鹏总理先后举行仪式和宴会欢迎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代表、副秘书长基塔尼、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和各国领导人、代表团团长等贵宾。江泽民和李鹏分别在欢迎仪式和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和致祝酒词。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慕华举行招待会，宴请与会的各国贵宾。4 日至 7 日和 15 日，江泽民、李鹏、乔石和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参加世妇会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基塔尼、大会秘书长蒙盖拉、秘鲁总统藤森、越南国家副主席阮氏萍、孟加拉国总理卡·齐亚、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日本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中心主席尼雷尔及韩国、埃及总统夫人等贵宾。

9 月 4 日—15 日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代表、副秘书长基塔尼和冰岛总统芬博阿多蒂尔、孟加拉国总理卡·齐亚、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等来自近 200 个国家的 1.76 万名代表与会。会议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次主题是：健康、教育和就业。会议选举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世妇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慕华为本次妇女大会主席。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平等、发展与和平”这一主题进行了辩论，并审议和通过了关于

进一步加速执行《内罗毕战略》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7日，世妇会议员日活动在北京举行，并通过《议员日宣言》。同日，乔石委员长会见了参加议员日活动的各国议联主席索鲁尔、秘鲁议长玛·查·德奥坎波女士和菲律宾参议院副主席沙哈尼。

9月8日　'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自8月30日至今在北京怀柔举行，来自五大洲的3万多名代表与会。会议的主题是：通过赋予妇女权力与举办庆典活动，让妇女与男子在各个阶层一同迎接挑战，全面创造和转变全球结构与发展。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经过反复协商后向联合国成员国政府提供了区域建议，其中包括经济、政府与政治、法律与权力、教育、健康、科技、文化等妇女最关注的问题。

同日　中国和南斯拉夫联盟两国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经贸协定。同日，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同南联盟贸易部长希拉多维奇举行了会谈。

9月12日　中葡土地小组在澳门举行第12次全体会议，并签署会谈纪要。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北约扩大空袭波黑塞族不利于和平进程。14日，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认真、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制止北约在波黑滥用武力的强权行为。

9月14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郭思达一行。

同日　李肇星副外长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郝扶东，就美方安排戈尔副总统会见达赖以及克林顿总统同达赖进行所谓“顺便见面”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同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强烈抗议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有关美国国会将讨论并表决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议案的报道发表谈话说，希望美国政府言而有信阻止国会通过反华决议。

9月18日　李鹏总理会见法新社社长弗勒里时，全面阐述了中法、中美关系和关于香港、台湾等问题。

同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17日揭晓的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问题发表谈话说，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不能坐“直通车”，同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不公平不合理。1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香港立法局将随着英国对香港的管制结束而终止。22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日前在香港指出，香港立法局选举不公平，部分选民要求港督就错票作解释。22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望中国允许新当选的香港立法局议员完成他们的任期”的言论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利比亚对外联络与国际合作人民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秘书（副外长）阿米尔。此前，田增佩副外长同阿米尔进行了工作会谈。

9月18日—22日　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克莱斯蒂尔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克莱斯蒂尔。19日，克莱斯蒂尔出席中奥经贸洽谈会并发表演讲。同日，中奥签署两国铁路合作协议等文件。同日克莱斯蒂尔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9月18日—25日　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陶维松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先后会见了陶维松一行。

9月19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微软公司总裁盖茨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以丰田章一郎为最高顾问、河合良一为团长的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以主席素威为团长的泰国上议院外委会代表团。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美国普莱克斯公司董事长希·伯格和总裁霍泰德。

9月21日—23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叶利钦总统和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先后会见钱其琛；科济列夫外长同钱其琛就叶利钦访华事宜举行会谈。

9月21日—26日　密克罗尼西亚副总统雅各布·尼纳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尼纳；荣毅仁副主席同尼纳举行会谈。21日，中密签署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9月22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防务与治安问题第18次专家小组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取得显著进展。

9月24日—29日　苏丹总统巴希尔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巴希尔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会见巴希尔。25日，中苏签署中国政府向苏丹政府赠送物资的换文等文件。26日，中国苏丹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巴希尔总统出席该协会成立招待会。同日，巴希尔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9月25日　正在纽约出席第50届联大的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分别会见德国副总理兼外长金克尔、埃及外长穆萨、韩国外长孔鲁明、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哥伦比亚外长帕尔多、比利时外交大臣德利克。同日，钱其琛还会见了非统组织主席国、埃塞俄比亚外长塞尤姆、欧盟部长理事会主席、西班牙外交大臣索接纳及欧盟上一任主席、法国外长和下一任主席、意大利外长的代表。26日，钱其琛会见日本外相河野洋平、马耳他副总理兼外长

德马克、巴基斯坦外长阿里、利比亚外长蒙塔塞尔。同日，钱其琛还会见了里约集团的各国外长或代表。27 日，钱其琛还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墨西哥外长古里亚。28 日，钱其琛会见几内亚外长科佐，亚美尼亚外长帕帕江，保加利亚总理维德诺夫、外长皮林斯基，叙利亚外长沙雷，吉布提外长谢海姆和印度外长穆克吉。29 日，钱其琛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本届联大主席、葡萄牙前外长多阿马拉尔，巴西外长兰普雷，智利外长因苏尔萨、斯里兰卡外长卡迪尔加马尔。同日，钱其琛还会见了海湾合作委员会 6 国外交大臣。30 日，钱其琛在纽约接受中国各新闻机构的联合采访，就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的意义、本届联大的工作和中美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9 月 25 日、26 日　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由主席加什帕罗维奇率领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议会代表团。

9 月 26 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泰国副总理庵雷。

同日　新华主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和香港舆论近日批评港督彭定康提出的所谓“应给予香港 350 万名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持有居英权”的言论，是为中英合作和香港前途制造麻烦。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欢迎巴以草签关于巴基斯坦和二阶段自治协议。

9 月 27 日—29 日　太平洋经合理事会第 11 届大会召开，并通过《北京声明》。26 日，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接纳越南为该理事会成员。29 日，理事会智利委员会主席爱·伯尼格尔当选为理事会下一任主席。会议期间，荣毅仁副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了与会的外国政府高级官员、著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等。

10 月 1～9 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英国、卢森堡和爱尔兰。访问期间，3 国国家或政府领导人分别会见钱其琛；钱其琛先后同 3 国外交大臣或外长举行会谈。3 日，钱其琛在英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中英关系》的演讲。5 日，中卢签署卢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协定。

10 月 2～5 日　阿根廷总统梅内姆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梅内姆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和朱镕基代总理分别会见梅内姆。5 日，中阿签署两国企业间经济合作协议。

10 月 3～17 日　李鹏总理访问摩洛哥、墨西哥、秘鲁、加拿大和马耳他。访问期间，李鹏分别同摩国王哈桑二世、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国务大臣菲拉利、议长赛义德，墨总统塞迪略，秘总统藤森、部长会议主席科尔多瓦、议长查韦斯，加拿大总督勒布朗、总理克雷蒂安，马耳他总统鲍尼其、总理阿达米等国家、政府或议会领导人举行会见或会谈，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李鹏同 5 国领导人就扩大合作进行深入讨论，还同 5 国企业界进行广泛的接触，就具体合作事宜进行了探讨。中国同 5 国签署一些政府之间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企业之间还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和合同。6 日，李鹏在墨西哥城发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拉合作》的演讲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拉关系的 5 项基本原则。7 日，李鹏在墨西哥城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社长和特莱维萨电视台副董事长的采访。

10 月 4 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市长赵淳率领的韩国汉城市友好代表团。

10 月 4～5 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知识产权制度问题的第二次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就香港知识产权问题取得共识。

10 月 4～6 日　中国——阿拉伯商会首届联席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10 月 4～10 日　国际刑警组织第 64 届大会在北京举行，并通过有关防止伪造货币及证件、国际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内容的决议。江泽民主席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4 月，江泽民会见与会的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成员与秘书长。

10 月 4～10 日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朱镕基代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李显龙。7 日，李显龙出席在苏州举行的苏州工业园区中新两国政府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同日，李显龙为园区的净水厂奠基。

10 月 4～25 日　李沛瑶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10 月 5 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以主席格拉西莫夫为团长的乌克兰老战士委员会代表团。

同日　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任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会见土耳其陆军司令巴雅尔上将一行。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提供价值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救灾物资，以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10 月 5～6 日　亚太经合组织区域科技合作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并通过联合公报等文件。江泽民主席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10 月 5～11 日　赞比亚副总统米扬达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米扬达；朱镕基代总理同米扬达举行会谈。

10 月 6 日　朝鲜驻中国大使朱昌骏举行宴会，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 50 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应邀出席宴会，并发表讲话。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和苏丹两国政府近日在北京签署关于互免签证协定。该协定自 10 月 26 日起生效。

10 月 6～10 日　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主席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分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0 月 8～11 日　第七届亚洲营养会议在北京举行。

10 月 9 日　江泽民总书记致电金正日同志，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 50 周年。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匈牙利国防部长凯莱蒂举行会谈。13 日，朱镕基代总理会见凯莱蒂一行。

同日　中国和匈牙利在北京签署司法协助条约。

10 月 11 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新闻周刊》高级代表团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总编辑朱克曼一行，并就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等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12 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也会见了美国《新闻周刊》高级代表团。

同日　中国、老挝和缅甸在万象举行中国政府与老挝政府和缅甸政府关于确定三国交界点协定核准书和批准书交换仪式。

10 月 12 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双方就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中美首脑会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彭定康第四分施政报告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0 月 12～17 日　瑞典外交大臣瓦伦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朱镕基代总理会见瓦伦；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瓦伦举行会谈。

10 月 13 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泰国公主朱拉蓬。

同日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希·谢哈比中将一行。

同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奉中国政府之命致函加利秘书长，对个别国家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公然提出所谓“台湾代表权”问题，表示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

同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港英政府单方面决定香港青洲填海工程动工。

10 月 13～31 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率领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访问法国、以色列、瑞典、欧盟总部和比利时。

10 月 14 日　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率领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自 9 月 26 日至今访问以色列、欧盟总部、比利时和荷兰。访问期间，中以、中比和中荷分别举行经贸混委会会议或商贸洽谈会并签署有关文件。6 日和 9 日，中国、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经贸混委会第 14 次会议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会上，吴仪同欧洲委员会主席、欧盟负责对华关系的委员布里坦举行会谈，并重申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3 项原则立场。

10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由书记赛义德率领的厄立特里亚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代表团。

10 月 15～19 日　希腊外长帕普利亚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朱镕基代总理会见帕普利亚斯；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帕普利亚斯举行会谈。16 日，中希两国签署合作协议。

10 月 16 日　科威特国埃米尔贾比尔殿下乘专机前往蒙古和日本访问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作短暂停留。

同日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第 26 届年会在北京举行。

10 月 17 日　田纪云副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由艾伦·杜克斯主席率领的爱尔兰议会外事联合委员会代表团。16 日，艾伦·杜克斯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朱良进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以副外长崔禹镇为团长的朝鲜外交部代表团。崔禹镇在北京期间同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举行了会谈。

同日　中俄在北京互换两国国界西段协定批准书，该协定自 1995 年 10 月 17 日开始生效。

10 月 17～18 日　第九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并签署商务发展委员会合作声明等 8 项合作文件。江泽民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了与会的美国商务部长布郎。18 日，布朗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10 月 18 日　罗马尼亚和中国友好协会在布加勒斯特正式宣告成立。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美国国际大学校长罗基中将一行。

10 月 19 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纳米比亚新闻和广播部长阿马蒂拉。同日，田增佩副外长同阿马蒂拉就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了具体商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两岸关系能否改善，两岸领导人能否会晤，关键取决于台湾当局是否能够真正停止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发言人还就菲律宾总统拉莫斯 10 月 17 日在夏威夷讲话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部分发表谈话说，散布“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是危险的，实际上是一些人妄图向中国施加压力和挑拨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一种伎俩。

同日　中国驻英大使马毓真致函英国《旁观者》杂志，驳斥该刊最近一期刊载的《充满东方威胁》文章中散布的《中国威胁论》。

10 月 20 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第一副议长道基率领的利比里亚议会代表团。

10 月 21～25 日　江泽民主席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在纽约期间，江泽民 21 日出席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揭幕仪式，并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22 日，江泽民出席美国工商界举行的欢迎

晚会，并接受PES电视台专访。22、23日，江泽民先后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一小时"节目主持人和美《侨报》记者的采访。22、23、24日，江泽民在纽约分别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一些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及知名人士。23日，江泽民出席美一中协会等6个著名协会联合举办的午餐会，并就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规划和前景等问题发表演讲。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上发表重要演讲。同日，江泽民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的各国领导人举行的午宴。同日，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就中美关系问题举行了会晤。

10月21～28日　以广州军区政委史玉孝为团长的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代表团参加朝鲜党和政府举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纪念活动。27日，朝国家中央委员会向史玉孝一行受勋。

10月22日　吴邦国副总理会见俄罗斯商品生产者联合会及俄社团大会主席斯科科夫一行。访华期间，俄客人还同国家民委、国家计委、中联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会晤。

10月23日　李鹏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分别会见泰国副总理兼国部长差瓦立。

10月22—24日　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江泽民主席和15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江泽民在24日会上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闭幕会一致通过《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在参加庆典活动期间，江泽民同加利秘书长和一些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举行了会晤。江泽民还参加了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的"世纪宝鼎"的揭幕仪式，并在美中协会等6个团体联合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24日，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

10月23日—27日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朱马古洛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朱马古洛夫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会见朱马古洛夫一行。

10月22、24日　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沙特协商会议主席杰比尔。

10月23～27日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朱马古洛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朱马古洛夫；李鹏总理同朱马古洛夫举行会谈。23日，中吉两国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等3个文件。

10月23～29日　印尼专业集团中央领导委员会哈尔莫科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哈尔莫科一行。

10月24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分别会见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法鲁克。23日，傅全有总参谋长同法鲁克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央不承认港英单方面修改的法律，并将保留按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人权法案条例》和港英重新修定的其它法律进行审查的权力。28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说，中方不会把预委会的建议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同英方讨论。

10月25日　李鹏总理会见前来参加广东岭澳核电站设备供应、工程合同和协议签字仪式的中外代表。同日，李鹏和法、英等国和香港地区的企业界、金融界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俄罗斯空军总司令杰伊涅金上将一行。

同日　第30届国际法制计量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10月26、27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乔石委员长先后会见韩国亚太和平财团理事长、韩新政治国民会议总裁金大中一行。

10月27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以渡部恒三为团长的日本第七次"长城计划"友好使节团。

10月28日　中国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第44届领舞会上当选为贵宾国。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分别致函表示热烈祝贺。

10月29日—11月3日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分别同梅莱斯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会见梅莱斯一行。

10月30日　李鹏总理会见法国巴黎国民银行董事长贝百乐。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韩国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

10月31日　中日两国政府1995年度日元贷款的政府换文在北京签署。

11月1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总裁盖尔文。

11月2日　江泽民主席分别会见出席第二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的海外华人专家和美洲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森伯格。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德国国防国务秘书旭恩波姆。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韩国前外务部长官韩升州。1日，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同韩升州进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34次会议自10月31日至今在北京举行，并就香港政权交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2～5日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在北京举

行。

11月2～7日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埃亚德马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埃亚德马。3月，中多签署中国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无息贷款的协定等文件。4日，埃亚德马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多经济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1月3日　李鹏总理会见俄罗斯燃料和动力部长沙夫拉尼克。在京期间，沙夫拉尼克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就中俄在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商谈，并签署了有关合作谅解备忘录。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由总书记，联邦众议员维马尔·罗沙率领的巴西自由阵线党代表团。在京期间，中联部副部长李北海与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自10月29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梅莱斯；李鹏总理同梅莱斯举行会谈。10月30日，中埃两国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东南亚、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央银行组织（简称东新澳）第21届理事会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

11月4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泰国国会主席巴色素万一行。

同日　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冈萨雷斯一行自10月29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了冈萨雷斯一行。

同日　瑞士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兼经济部长德拉米拉率领瑞士经贸代表团自10月29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德拉米拉；朱镕基副总理同德拉米拉举行会谈。10月31日，中瑞签署关行瑞士政府向中国下放提供第四批混合贷款的协议。11月1日，德拉米拉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指出，香港人权保障的是基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国无需在九七后向联合国提交香港人权报告。14日，外交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基本法已为九七后香港人提供可靠保障，中国没有义务向联合国提供香港人权状况的报告。同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就港英政府13日发表声明称《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并无凌驾性之说发表谈话指出，港英政府的声明是在继续欺骗港人，误导舆论。16日，新华香港分社发言人就香港立法局15日通过一项所谓动议，反对预委会法律小组关于香港人权法案处理意见一事发表谈话说，预委会意见完全符合法理，香港立法局无权说三道四。

11月4～6日　第6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东京举行。

11月4～20日　乔石委员长访问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度。访问期间，巴总统莱加利、总理贝·布托、议长吉拉尼，埃总统穆巴拉克、总理西德基、议长苏鲁尔、协商会议主席希勒米和印总统夏尔马、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纳拉亚南、总理拉奥、人民院议长帕蒂尔分别会见乔石；乔石先后会见3国其他政界要人。6日，乔石在伊斯兰堡接受巴基斯坦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就中巴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1月5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致电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和代总理佩雷斯，对拉宾总理4日晚不幸遇害表示哀悼。同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对拉宾遇害表示震惊和惋惜，并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径。6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赴以驻华使馆吊唁拉宾。

11月5～12日　罗马尼亚参议院议长盖尔曼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田纪云副委员长分别会见了盖尔曼一行。

11月6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伦。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非洲工会统一组织总书记松莫努。

11月6～7日　中美友好城市会议在北京举行。

11月6～12日　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布伦特兰夫人；李鹏总理同布伦特兰夫人举行会谈。7日，布伦特兰夫人在北京参加奈科明国际放射学继续教育中国计划介绍会。10日，布伦特兰夫人为挪威船级社设立在上海的中国区域办事处揭幕并致词。

11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自10月25日至今访问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罗马尼亚。访问期间，3国国家、政府和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胡锦涛。3日，陪同胡锦涛访问的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宋法棠等中国官员同以贸易部长克里尚为首的罗经贸界人士进行会谈，并取得初步成果。6日，胡锦涛在罗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协会举办的报告会上发表题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演讲。同日，胡锦涛在布加勒斯特接受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一国两制”解决统一问题最现实，李登辉以各种名目搞分裂十分危险。

11月8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泰国前总理差猜和第一副总理拉洪。

11月9～16日　老挝副总理坎培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坎培；邹家华副总理同坎培举行会谈。

11月10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舒尔特——内勒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菲律宾与越南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一事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11月10～18日　傅全有副总参谋长访问土耳其和埃及。

11月12日　田曾佩副外长自10月24日至今访问阿曼、巴勒斯坦加沙地区、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并于10月29日至31日出席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第二届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

11月12～16日　德国总理科尔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后会见科尔；李鹏总理先后同科尔举行会谈和会晤。13日，中德签署《关于成立中德高技术对话论坛的谅解备忘录》等文件。13日至14日，中德经贸混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鹏和科尔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14日，科尔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同日，科尔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11月13日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全国妇联分别向阿富汗红新月会和阿妇女联合会捐赠总价值达20多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

同日　外经贸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日本宣布"对中国输日棉纱、棉布现阶段不实行限制措施"一事表示赞赏。

11月13～15日　中越海上问题专家小组第一轮会谈在河内举行，并就今后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沙争议的工作程序问题达成一致。会议签署了《会谈纪要》。

11月13～17日　江泽民主席访问韩国。访问期间，金泳三总统欢宴江泽民，并同江泽民举行会谈；江泽民分别会见李洪九总理和黄珞周议长。14日，江泽民在韩国国会发表题为《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共同繁荣》的演讲。同日，中韩签署关于韩国经济发展合作基金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等文件。10日，江泽民即将访韩前接受韩国全体驻京记者的采访。

11月14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德国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皮勒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辞职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日本国内有人公然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爱国人民的强烈谴责。

11月14～30日　王丙乾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斐济、西萨摩亚和澳大利亚。

11月15日　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社长奥田硕和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社长关和平。

同日　外交部就自1997年7月1日起启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一事发布公告。

11月16日　李岚清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自10月29日至今访问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加蓬、喀麦隆和克特迪瓦。访问期间，6国国家或政府领导人分别会见李岚清一行；李岚清同6国领导人就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共识。

11月17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奈博士。

11月20日　李鹏总理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中内功一行。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意大利全国联盟主席、众议员菲尼一行。19日，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同菲尼举行了工作会谈。

11月21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捷克第一副外长翁德拉一行。20日，张德广副外长同翁德拉举行了会谈。

同日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在莫斯科举行俄文版首发仪式。

11月21～26日　津巴布韦国防部长马哈奇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马哈奇举行会谈；荣毅仁副主席会见马哈奇。

11月22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苏巴诺夫。2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苏巴诺夫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欢迎前南三方签署波黑和平协议。

11月23日　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应邀在荷兰海牙举行的'95环球论坛发表题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专题演讲，并阐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立场。

11月23～27日　智利总统弗雷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弗雷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全国政协李瑞环分别会见弗雷。24日，中智两国政府签署《海运协定》等文件。25日，弗雷在北京出席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画展开幕式和《智利》一书的发行仪式。

11月24日　胡锦涛同志分别会见由副总书记叶海亚率领的也门全国人民大会代表团和南非共产党全国主席姆拉巴一行。在京期间，叶海亚和姆拉巴一行分别和中联部部长李淑铮举行了会谈。

同日　中英土地委员会第31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双方就调整1995/1996年度批地计划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11月26日～12月2日　越共总书记杜梅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同杜梅举行会谈，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取得广泛的共识；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杜梅。28日，吴邦国副总理会见随同杜梅来访的越副总理陈德良。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随同杜梅来访的越外长阮孟琴举

行了会谈。12月2日，中越《联合公报》在北京发表。

11月27日　中国和加拿大在北京签署《关于空间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11月27～28日　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在东京举行。中国总理李鹏和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分别向讨论会发去了贺词。

11月27、29日　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先后会见由议长樱内义雄率领的1995年度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

11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行动有助于波黑和平。

11月29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以总书记许韦里宁为团长的芬兰社民党代表团。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由副主席贾巴尔率领的巴基斯坦参议院代表团。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机场委员会在香港举行会议，并就香港机管局及有关专营权达成共识。

11月30日　中国政府官员与港府高级公务员首次非正式聚会在香港举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取得显著进展，不能接受动辄以报复行动相威胁的做法。

12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尉健行率领中共代表团自11月14日至今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小组和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4国政府边界谈判联合代表团工作小组于11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第16次会议，与会代表讨论了中国与俄、哈、吉、塔4国的边界走向问题。

12月2～8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会见刘华清；刘华清会见格拉乔夫国防部长并同他就两国和两国军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12月3～8日　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库奇马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库奇马。4日，中乌签署关于发展与加深友好合作关系的声明。同日，江泽民和库奇马会见中乌两国记者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同日，库奇马在北京接受外交学院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该校发表演讲。5日，库奇马会见中国企业家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12月3～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访问新加坡。

12月4日　中法经贸混委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签署中法1995年度财政合作协议。同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的法国经济和财政部负责财政和外贸问题的部长级代表加朗。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突尼斯外交国务秘书穆斯塔法。同日，田曾佩副外长同穆斯塔法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

12月4、7日　中国和新西兰外交部政治磋商分别在惠灵顿和堪培拉举行。

12月5日　第五次中日领事磋商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张宏喜同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部长斋藤正树就旅日华侨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

12月5～6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24次会议在澳门举行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12月5～27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访问期间，李瑞环分别同柬国王西哈努克、第一首相拉那烈、第二首相洪森、国会主席谢辛，缅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副主席貌埃，马最高元首贾阿法尔、总理马哈蒂尔，上院议长卡迪尔、下院议长查希尔，新总理吴作栋、内阁资政李光耀、议长陈对群，泰国王普密蓬、总理班汉、前总理和枢密院大臣炳、上院议长米猜、国会主席汶鄂等国家、政府和议会领导人举行会见或会谈，并在一系列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22日，李瑞环在曼谷接受泰国记者联合采访时，就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李瑞环还对国际上某些人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批驳。

1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由众议员盐谷利率领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

12月7～9日　荣毅仁副主席应邀赴澳门出席澳门国际机场启用典礼。在澳门期间，荣毅仁8日同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举行会晤，同日，出席机场启用庆典仪式并发表讲话。

12月7～12日　加纳总统罗林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罗林斯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罗林斯。8日，中加签署中国向加纳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等文件。

12月8日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自11月29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分别同卡斯特罗举行会谈和会晤；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卡斯特罗。11月30日，中古签署有关经贸合作3个协议。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智利陆军副司令加林中将。

同日　中国和巴基斯坦经贸科技联委会第10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日，李岚清副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巴财政国务部长谢哈布丁。

12月10～14日　立陶宛总理什莱扎维丘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什莱扎维丘斯；李鹏总理同什莱扎维丘斯举行会谈。11日，中立两国签署合作协议。

12月12日　李鹏总理就中埃关系、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等问题接受埃及《消息报》总编辑杜维达尔的采访。

12月11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荷兰发展合作大臣普龙克。同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普龙克举行了会谈。

12月12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日内瓦谈判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2月12～17日　巴西总统卡多佐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卡多佐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卡多佐。13日，卡多佐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同日，中巴签署两国政府关于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技术安全的谅解备忘录等6项合作文件。

12月14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由对外经济合作部长布哈奇率领的波兰政府经贸代表团。同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布哈奇一行就双边经贸关系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问题在香港举行首次专家会议。20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香港排污计划问题专家组第四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达成共识。

12月14、21日　中国政府官员与香港政府高级公务员先后在香港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非正式聚会。

12月15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现任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中山太郎一行。

12月16日　中英关于香港与内地跨境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香港举行。

1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和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分别会见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杜文才一行。16日，中联部副部长戴秉国同杜文才举行了工作会谈。

12月18～20日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河野洋平；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河野洋平举行会谈。

12月18～23日　南斯拉夫联盟总统利利奇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利利奇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利利奇。18日，中南签署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资源的协定等文件。

12月19日　李鹏总理会见沙特石油矿务资源大臣纳伊米。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美籍华人、国际知名学者王冀教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对欧盟干涉中国内政表示遗憾和不满。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华锦洲致函英《独立报》，对该报刊登的有关中国选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文章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

12月20日　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中国劳工受害案，花冈事件幸存者耿谆等及其死难者家属在法庭上以亲身经历控诉当年花冈事件直接加害者的罪行。

12月20～26日　韩国国会议长黄珞周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了黄珞周。

12月21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由主任黄德宜率领的越南民族和山区委员会代表团。

同日　中国和欧盟草签中国向欧盟出口纺织品贸易新协定。新协定从199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12月22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尼日利亚国家元首的特使甘博。21日，田曾佩副外长同甘博举行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对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在大哈什尼岛发生武装冲突深表关切。

同日　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驳斥了美籍华人吴弘达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他指出，吴弘达所谓中国在世界银行资助项目中使用劳改犯人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捏造。20日，世行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对吴的言论进行了驳斥。

12月23日　巴勒斯坦自治领导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加沙会见中国新驻巴勒斯坦自治区办事处主任郑小龙。

12月26日　中国和亚美尼亚在埃里温签署领事条约。

12月29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过家鼎大使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中葡双方将继续在澳门问题上保持良好合作。

文化教育

1月12日　何梁何利基金首届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李鹏等为钱学森、黄汲清等24位科学家颁奖。

1月15日　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建设广东大亚湾第二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

1月15～24日　第八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吉林举行。长春、解放军和哈尔滨队名列金牌榜前3名。在短道速滑比赛中，运动员超两项世界纪录和两项亚洲纪录。

2月6日　中国杰出的革命文艺家、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委员夏衍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遗体告别仪式17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乔石、朱镕基等送了花圈。胡锦涛等前往送别。夏衍病重期间，李鹏、李瑞环等前往医院看望。

同日　中国大陆地域的首例“冻融胚胎移植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诞生。

2月25日　中国代表团在第17届世界大学生冬运会上夺得3枚金牌、4枚银牌和3枚铜牌，列奖牌榜第五名。

3月9日　记者从中国游泳协会获悉，刚刚结束的第17届国际少年游泳比赛是中国选手今年首次参加的国际赛事，中国泳坛新秀在比赛中夺取了8枚金牌和8枚银牌。

3月10日　首次“五个一工程”征文入选作品在北京举行颁奖大会。杨志今、薛若邻等9人分别获得征文一、二、三等奖。

3月11日　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夺得女子单人滑冠军，为中国在世界大赛中赢得第一枚花样滑冰金牌。

3月12日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第一部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

3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批青年科学家成功地从一枚“特殊的恐龙蛋化石”中获得了恐龙基因片段。

3月20日　1994年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彪马杯”评选活动在京揭晓。

3月21日　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评选揭晓。

3月25～27日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由中国作协主席巴金主持，在上海举行。

4月3日　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诞辰10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江泽民和首都千名观众一起欣赏了这位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的代表作品。

4月7日　中国教育学会在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杨贤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

4月10日　第12届(1994年度)中国戏剧“梅花奖”评奖在京揭晓，20名演员榜上有名。

4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新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成。主任委员：李岚清；副主任委员：朱光亚、周光召、张孝文、汝信。

4月14日　199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证书颁发仪式及座谈会在北京举行。49位优秀青年学者首次获得这一带有荣誉性的资助。同日，李鹏会见了49位青年科学工作者。

5月1日　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的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落成并发射开播。

5月1～14日　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有1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后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致开幕词。中国运动员继第36届世乒赛后又一次囊括世乒赛全部7项冠军。

5月3日　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修改稿)的意见。李鹏主持了座谈会。

5月4日　“北京市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岚清出席仪式并讲话。

5月6日　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的7名队员经过13天徒步跋涉胜利到达北极点，把五星红旗插到北极点上。

5月8日　中国美术界一代宗师——叶浅予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5月9日　中国自己设计、研制的国内最大的无导体壳托卡马克受控核聚变装置——中国环流器新一号通过鉴定。同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最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

同日　第三届全国舞蹈比赛在广州闭幕。黄豆豆、于晓雪、周罡等获一等奖。

5月9日　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第五届文华奖颁奖大会，向31个获奖剧目和140名获奖代表颁发这一政府最高荣誉奖。

5月18日　钟桂清和孙彩云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以4米08的成绩双双超过女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

5月21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5月6日)。《决定》全面总结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科技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

5月22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江泽民去年12月27日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日　中国羽毛球队获得第四届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冠军。27日，叶钊颖获第九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冠军。

5月26～30日　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号召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的热潮，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和李鹏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5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分别为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题词。

5月31日　为期5天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接

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

6月7日　被誉为“中国工程师摇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迎来75周年校庆。江泽民、李鹏等题词祝贺。

6月12日　青年科学家论坛在京设立。这个专为有突出成就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开辟的一方学术沃土，将作为我国一个高层次的学术园地长期举办下去。

6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依靠科学技术开展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已有多项固沙造林防治荒漠化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有力地推动了防治荒漠化的进程。目前，全国已有10%的荒漠化土地得到初步治理。

6月15日　由文化部等主办的徐悲鸿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开幕。江泽民、乔石等参观了纪念画展。

6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玉文化史又有刷新，从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玉器，其产生年代远在距今8000年左右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比以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玉器要早1000年。

6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为实现到本世纪末中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中央决定在原来每年2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再增拨2亿元义务教育专款，并逐年增加，计划三年内增加到每年10亿元。

6月28日　经国务院批准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国家体委今天召开了实施动员大会。

6月29日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国家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江泽民为第35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孙静霞和邹瑞芳颁发奖章，并向她们表示热烈祝贺。

6月30日　江泽民、李鹏、乔石等领导同志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孔繁森之歌文艺晚会。

7月9日　第六届(199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揭晓，颁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二、三卷)》等6部著作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等14篇论文分别获得著作奖和论文奖。

7月11～14日　中国工程院第二次院士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工程院全体院士和我国工程技术界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经过近10个月的民主选举，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结果7日揭晓，216位工程技术专家当选，至此成立刚满一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已达309名。

7月13日　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管理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通过国家竣工验收。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去贺信。

7月2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最近合成了重丰中子新核素镤——239。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7月25日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美国休斯空间通信国际公司就“亚太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后爆炸的原因，发表联合调查公报。

7月26～28日　中国科协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讲了话。

8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实施“火炬计划”成就瞩目，1994年实现工业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8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中学生在最近举行的国际数、理、化、信息、生物奥林匹克赛上共获得18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

8月5日　在东京进行的第八届世界围棋锦标赛(富士通杯)决赛中，中国九段棋手马晓春以7目半的优势，战胜日本小林光一，获得本届比赛冠军。这是中国棋手首次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9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家教委批准，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10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大学今秋开始试行招收高等专科“注册视听生”。首批试点专业有财会、法律与英语。

9月3日　第18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自上月23日至今在日本福冈市举行。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3枚金牌、10枚银牌和16枚铜牌，名列奖牌榜第四位。

9月4日　《新闻出版报》报道：新闻出版署最近作出决定，音像出版单位复制加工音像制品须使用统一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并于今年11月1日起执行。

同日　《新闻出版报》报道：新闻出版署等日前联合发出“关于实施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SID码)的通知”。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根直径200毫米(8英寸)硅单晶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国家半导体材料工程研究中心诞生。

9月5日　参加1995年世界杯射击赛的中国选手返回北京。3日，中国选手徐翔在女子飞碟双向决赛中，以149环的成绩平了该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并获得冠军；王义夫在男子气手枪比赛中夺冠；李勃、马歌分别在男子飞碟双向和女子运动手枪比赛中夺得亚军。

同日　首届(1990—1994)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评选近日在京揭晓。《我的父亲邓小平》等12部作品获奖。

9月5～9日　第九届世界杯跳水赛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中国队共夺得13枚奖牌，居金牌和奖牌榜首，并获得男子、女子和混合团体冠军，共计10项锦标。

9月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宣布：中国已有1050个县级行政区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北

京、上海等已基本上完成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

9 月 11 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届中国少儿歌曲电视大赛近日揭晓,李延龙、倪雅丰和王博分获三个年龄组的大奖。另有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44 名。

9 月 16 日　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在北大举行“杰出科学家奖”、“杰出青年学者奖”和“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颁奖仪式。宋健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9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近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古植物学会议上,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迄今已知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群及双子叶被子植物花序化石,受到各国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赞誉。

9 月 19 日　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在北京颁发,7 项著作分获一、二等奖,9 个研究项目获得鼓励奖。

9 月 20 日　《中国文化报》报道: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日前在美国的寓所去世,终年 76 岁。

9 月 20～24 日　第 11 届亚洲田径锦标赛在雅加达闭幕,中国队共获得 20 枚金牌、13 枚银牌和 5 枚铜牌,连续第七次名列亚锦赛金牌榜首。

9 月 22 日　“八五”国家重大项目——EDI(电子交换)系统通过国家验收。

9 月 23 日　李莉、黄蜀琴等 10 人在“’95 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中被评为首届十佳女导演。

同日　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在沈阳闭幕。

9 月 24 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国家实验室。

9 月 25 日　《人民日报》报道:广电部近日发出《关于宾馆、饭店必须完整转播国内有关电台、电视台节目的通知》,并就此项规定提出具体要求。

9 月 26 日　科技工业与研究园第四次世界大会在北京举行。

10 月 1 日　1995 年世界柔道锦标赛自上月 28 日至今在日本千叶举行。中国选手共获得 3 枚银牌。

10 月 1～10 日　第 31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在日本鲭江举行。中国队共夺得 3 枚金牌、6 枚银牌和 1 枚铜牌,名列金牌和奖牌总数第一位。

10 月 2 日　新华社报道:浙江医师陈理森最近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这是我国医学界唯一获此殊荣的农村医师。2 日,有关部门举行仪式,对他进行了表彰。

同日　中国队获得第十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荣获该赛事“五连冠”称号。中国队的赵利红被评为本届锦标赛的最佳运动员,范运杰被评为最佳后卫,施桂红以射中 10 个球高居射手榜榜首,孙庆梅获精神文明奖。

10 月 3 日　文化部发出通报,强调加强文化市场执法力度。

10 月 4 日　庆祝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 1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等为庆祝活动题了词,李岚清、宋健等出席大会。5 日,解放军二炮、林业部等 8 单位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捐资 205 万元人民币,以支持我国博士后事业的发展。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今年以来首次成批地发现了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 11 颗类星体。

10 月 5 日　江泽民委托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送花篮祝贺冰心 95 华诞。

同日　农业部、国家科委等 9 部委召开全国农科教结合工作经验交流会。李岚清在会上讲话。

10 月 8～18 日　中国安庆第 2 届黄梅戏艺术节在安徽省安庆市隆重举行。

10 月 10 日　故宫博物院举行建院 70 周年庆典,江泽民、乔石等为庆典题词。李铁映在庆典大会上讲了话。

10 月 11 日　第三届中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彭佩云、邓朴方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作者颁奖。这次获奖的作品(节目)共有 167 件,其中两个获特等奖、20 件获一等奖、二等奖 46 件、三等奖 99 件。

10 月 11～13 日　全国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宋健发表讲话,邓楠作工作报告。国家科委正式推出“社会发展科技计划”。

10 月 12 日　江泽民会见出席首届海内外中华青年学者材料科学技术研讨交流会的代表,并与之座谈。

同日　国家教委和全国扫盲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在京召开全国扫盲工作电话会议,部署今冬明春的扫盲工作。

同日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星火带头人”评选在京揭晓。姚雪峰等 10 人入选。18 日,姜春云在全国杰出青年星火带头人科教兴农汇报座谈会上提出,科教兴农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

10 月 12～17 日　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在河南平顶山市举行。江泽民、李鹏等为曲艺节题词。中国曲协决定,将牡丹奖作为中国曲艺节的常设奖,奖给参加曲艺节的优秀节目。参加本次曲艺节的 128 个节目获得牡丹奖,26 个单位获得组织奖。

10 月 16 日　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和中国科协青少年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院校实施“园丁科技教育行动”大会。柳斌到会讲话,并向“全国师范院校科技教育顾问”颁发了聘书。9 月 14 日,国家教委、中国科协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等师范学校实施‘园丁科技教育行动’的通知”。

10 月 18 日　中国文化报报道:我国故事片《民警故

事》日前在西班牙第4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和国际影评人大奖。

同日　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大型电影音乐会《世纪之光》在京举行。

10月19日　'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颁奖大会在京举行。黄昆、唐敖庆等4位著名科学家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谷超豪等40位著名科学家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0月20～24日　第二届世界太极修炼大会在京举行。

10月22日　第四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及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被告山杠爷》夺得本届电影节"金鸡奖"、"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李仁堂获双奖的最佳男主角奖。"金鸡奖"的各项得主分别是:最佳导演处女作:范元、宁海强;最佳剧本:范元、毕必成(已故);最佳导演:黄建新、杨亚洲;最佳女主角:艾丽娅;最佳男配角空缺;最佳女配角:剧雪;最佳美术:杨钢;最佳合拍故事片:《背靠背,脸对脸》。"百花奖"的得主分别是:最佳故事片《留村察看》、《一个独生女的故事》;最佳女演员:沈丹萍;最佳合拍故事片:《天与地》;最佳男、女配角:谢园、李媛媛。

10月22～26日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交流会在成都召开。彭佩云发表重要讲话。2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生委、农业部等中央10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出了《关于认真抓好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

10月22～30日　第三届全国城运会在南京举行。12日,新华社报道:江泽民、李鹏等日前分别为城运会题词。本届运动会共有49个代表队参赛,40个队获金牌,46个队获得了奖牌,先后有4人10次超6项世界青年纪录;8人10次超5项亚洲纪录;16人26次超19项亚洲青年纪录,14人16次创8项全国纪录,1人1次平1项全国纪录,35人51次创31项全国青年纪录。

10月23日　中国发明协会成立10周年庆祝会在京举行。会上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了"中国十年优秀发明成果金杯奖",并向获得第九届发明展览会金、银、铜奖和专项奖的发明人授了奖。

10月23～24日　中宣部在上海召开1994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工作会议暨颁奖大会,丁关根、李铁映等出席会议并讲话。电影《被告山杠爷》、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话剧《鸣岐书记》等120种影、视、戏剧、图书及理论文章获奖。

10月24日　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国科协等39个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新闻单位被授予"和平使者"荣誉称号。

10月26～30日　全国特殊教育"八五"工作总结会议在湖南举行。会议提出了"九五"期间我国特教发展和改革的思路,到2000年,大多数残疾儿童将接受义务教育。

10月26～28日　全国卫生科技大会在京召开,国家科委致电祝贺,陈敏章做工作报告,吴阶平为大会题词并讲了话。28日,彭佩云出席闭幕式并做重要讲话。

10月27日　卫生部在京召开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座谈会,提出全社会共同参与,大力开展宣传教育,预防为主。27日,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近日向全国下发了《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

10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李瑞环日前代表江泽民、李鹏和乔石,祝贺卢嘉锡回国工作50年和80华诞。

同日　第四届中国专利金奖评审结果在京揭晓,13项专利获奖。

10月29日　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组织召开的全国少儿出版社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会议在广西北海市结束。会议提出要为跨世纪少年儿童提供精品读物。

10月30日　江泽民会见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访京团。

10月31日　《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发行座谈会在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应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京剧艺术。

11月1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日前正式颁布执行。

11月3日　1995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马志明等59名新选士产生。

同日　第九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结果在西安揭晓。62个节目获得等级奖,14个栏目获优秀栏目奖,还评出了9个单项奖及19个提名奖。

11月5日　邹韬奋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分别为大会题词,李鹏在会上讲了话。同日,新华社报道:在纪念韬奋百年诞辰之际,《韬奋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届韬奋新闻奖和第四届韬奋出版奖同日在京颁奖。共有10人获新闻奖;31人获提名奖;12人获出版奖。15日,邹韬奋塑像揭幕仪式在上海举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青年军医伍骥近日在里斯本举行的第36届世界外科大会上,荣获1995年度国际外科学会奖。他是荣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11月5～12日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在昆明举行。江泽民、李鹏、布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大会题了词。6日,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在昆明召开表彰大会,56个集体、35个个人受到表彰。11日,129个表演项目获奖。12日晚,举行民运会闭幕式。

1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规划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九五"和2010年科技发展规划。

同日　陈敏章授予丹麦医学生物学家西姆博士中国卫生奖。

同日　中国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王选教授在巴黎荣获本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他是第2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同日　历时10天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落幕。郭柯宇获"金爵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影片是瑞士的《打破沉默》；最佳导演是丹麦的埃里克·克劳森，最佳男演员是法国的让·皮埃尔·马瑞勒；阿根廷的《火屋》、俄罗斯的《美国女儿》获得特别奖。

11月8日　中国导演何群和电影演员剧雪荣获第九届大马士革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同日　《健康报》报道：'95爱婴医院国家级评估最近结束，又有2010所医疗保健机构通过国家级评估。

11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日前发出紧急通知，严厉打击激光视盘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11月10日　第四届王丹萍科学奖金颁奖会在京举行。5位获奖者是：顾玉东、张耀明、朱玉清、柏万禄、沈国荣。

同日　'94曹禺戏剧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同船过渡》、《徐洪刚》等10部话剧、戏曲剧目获奖。

11月11日　丁关根会见出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的播音员，并为10位优秀播音员颁奖。他们是夏青、林田、葛兰、林如、沈力、刘佳、陈醇、关山、路虹、段美珍、齐越(已故)。

1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正式发布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症分类与代码》，并于1996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

同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正式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

同日　北京第一机床厂在芝加哥获得美国工程师制造协会颁发的1995年CIMS"工业领先奖"，成为至今获得该奖的唯一美国境外企业。23日，国家科委为第一机床厂庆功。

11月14日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994年长沙市国晓书社制黄、贩黄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万长庚、彭建安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11月14～16日　全国人事系统留学人员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1月15日　第44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获奖项目当晚在布鲁塞尔揭晓。中国展团共获3项特别金奖、27项金奖、20项银奖和7项铜奖。

同日　第15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在太原揭晓。《三国演义》等45部电视剧分获各个剧种的一、二、三等奖。

同日　《新闻出版报》报道：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最近发出了《关于禁止"买卖版号"的通知》。

11月15～17日　全国地方病防治工作暨1995年全国血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1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截至目前，湖南冷水滩市有线电视台等8家违纪电视台受到广电部查处。

同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发布《放射事故管理规定》，从11月1日起执行。

同日　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检查1996年挂历最高限价执行情况的通知》。

11月16～26日　第9届女子、第67届男子世界举重锦标赛在广州举行。中国男女团体总分均获第一，共获得18枚金牌、9枚银牌、3枚铜牌。

11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我国首台整体核电站仿真机在珠海顺利通过出厂验收暨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验收。

11月17～24日　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天津举行。李瑞环出席开幕式并会见京剧艺术家，《曹操与杨修》等11部京剧分获程长庚奖。《赵氏孤儿》获优秀传统戏示范演出奖。

11月19日　'95万宝路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落幕，上海、北京、大连分获前三名。

同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日前制定了《预防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11月21日　全国儿童计划免疫协调小组和卫生部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第三次强化免疫日活动。

同日　高永良、王锋鹏等36位医药科研工作者获得第二届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杨森药学研究奖的奖牌和证书。颁奖会在苏州举行。

11月22日　《新闻出版报》报道：日前，中宣部、农业部、文化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的通知》。

11月23日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创建15周年暨国家文凭考试毕业证书颁发大会在京举行。李岚清出席大会并为北京市民办高校首批获国家承认文凭的毕业生代表颁发了毕业证书。

11月24日　新华社报道：最后在南京召开的中德行星物理会议透露，北京天文台等发现的三个最大彗星碎片撞击木星前后，木星射电流量比平时增加几个星级的现象，是迄今世界上最好的长波射电观测结果。

同日　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表彰暨"胡楚南优秀大学生奖学金"颁奖会在京举行。

同日　《科技日报》报道：11月上旬，我国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加拿大领取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这是他第

5次荣获国际大奖。

11月25日　首届孺子牛金球奖在京颁奖，全国35名高等院校教师和30名中小学教师获奖。

11月26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首批百册的首发式暨专家鉴评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1月26～30日　第五届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举行。

11月26～29日　全国专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透露，截至10月底，我国专利申请已突破50万件大关，专利授权总量超过26万件。29日，第四届中国专利发明创造奖在京颁发，共有75项发明获此殊荣。

11月27日　卫生部在京召开全国大会，部署普法宣传，并安排今冬明春出台一系列大举措。

11月28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亚洲2号”卫星送入太空。

11月29日　全国首届无偿献血先进城市暨第四届无偿献血奖杯颁奖大会在京举行，26个城市分获金、银、铜质奖励状，79人获无偿献血金杯奖。

12月1日　《国歌》创作6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4日，首次大型专场国歌纪念音乐会在人大会堂举行。江泽民为音乐会题词并与李鹏、乔石等出席音乐会。

同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最近发布了《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意见》。

12月5日　我国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第五次强化免疫日活动。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广电部、国家工商局日前联合发文，决定对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利用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已选育出小麦新品种21个，种植面积达7800万亩，创造经济效益26.5亿元，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6篇。

同日　第二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自上月29日至今在巴西举行。中国队共夺得5枚金牌、2枚银牌和2枚铜牌，金牌总数名列第二。

12月6日　团中央、全国学联在京举行“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奖学金”颁奖大会，100名大学生受到表彰。

同日　全国少儿电视节目题材规划会在京举行。广电部要求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级地方台，在明年推出少儿电视节目“六个一百”创作工程。

12月7日　新华社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日前审结三起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案，主犯王文国、莫继勇、蒋继峰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

12月8日　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彻底查清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违规事实并作出进一步处罚决定的通知》。19日，新华社报道：新闻出版署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广东、海南、江苏音像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加工盗版及淫秽、色情光盘或母盘的五家音像复制单位依法作出处罚。同日，沈阳市关闭20多家镭射放映厅。28日，国家版权局和新闻出版署决定，对国内光盘生产厂家派驻监督员，并要求1996年1月1日前到位开展工作。29日，《新闻出版报》报道：日前，新闻出版署发出使用统一《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的通知。同日，北京开始清理镭射放映厅，上海海关加强对陆海空邮等通道的管理，严厉堵截“黄毒”入境。

同日　全国第五届“群星奖”评选活动在南昌揭晓。共有163个作品分获金、银、铜和优秀奖；另有部分作品获创作和表演奖；15个单位获组织奖。颁奖晚会于当日在江西艺术剧院举行。

同日　第13届大众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鲍国安、王馥荔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陈强、杨昆分获最佳男女配角奖。《三国演义》等9部电视剧分别被评为最佳长篇、中篇电视连续剧，最佳单本剧、电视戏曲片、儿童电视剧，最佳合拍电视剧。

同日　第三届全国少儿电视节目“金童奖”颁奖大会在中央电视台举行。48个节目获奖，其中《动画大观》获特别奖，《跨世纪的公民》等9个节目获一等奖，《大风车》等17个优秀栏目获栏目奖。李岚清为获奖代表颁奖。

同日　“中大杯”第5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颁奖大会在京举行。分获39种图书一二等奖的作者、责编和出版社的代表上台领奖。徐惟诚等到会讲话。

12月10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日前，国家教委首次下发《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

12月11日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杨沫在京病逝，享年81岁。22日，首都文艺界及有关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杨沫举行葬礼。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妇联、国家教委日前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巾帼扫盲奖”颁奖会，授予沈可心等102名先进个人和湖北省妇联等30个先进集体“巾帼扫盲奖”荣誉称号。陈慕华出席颁奖会。

同日　新闻出版署公布国家常备图书8类182种（套），并授予全国10家书店“国家常备图书定点销售单位”的匾额。

12月11～13日　1995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

12月12日　国务院发布《教师资格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同日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命名大会在京召开。25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国家科委正式命名并授予牌匾。

同日　世界首株太空双岐杆菌在我国选育成功并通过国家高技术航天领域专家委员的验收和菌种鉴定，被

正式命名为新大地 NC～8 太空双岐杆菌。

同日　373 位专家在京接受了陈敏章颁发的聘书，组建成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药品审评委员会。

同日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剧本“孔雀奖”在京颁奖。共有 36 部戏分获金、银、铜和特别奖。

12 月 14 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出台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办法，并通知各地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参照执行。

12 月 15 日　新华社报道：甘肃张掖大佛与藏经殿的夹墙内，最近发现佛经 6000 多卷。这是继莫高窟藏经洞之后，我国目前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

12 月 16 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科委近日透露：1995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评选揭晓：三类分别评出获奖项目 58 项、116 项、474 项。25 日，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在京成立，宋健任主任。

同日　卫生部确定的 11 部重点中医古籍之一《黄帝内经太素》，最近研究整理完成，并通过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鉴定。

同日　国家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湖南建立。袁隆平任主任。

12 月 19 日　《科技日报》报道：记者从国家科委获悉，我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家合作，首次在世界上获得水稻白叶枯病广谱抗性基因 XQ21 的克隆。

12 月 20 日　国家教委在京召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表彰会，300 多名教师获奖，李岚清到会并讲话。

12 月 21 日　国家科委举行的’95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信息发布会透露：1994 年，我国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共 24584 篇，首次进入世界第 10 位。

同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颁布试行《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李岚清在会上讲了话，江泽民、李鹏分别为该书题词。

同日　第九届中国图书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88 种图书获奖。

12 月 21～22 日　首次全国音像出版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2 月 22～25 日　中国计生协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先进表彰会在京举行。江泽民为大会题词，李鹏会见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

12 月 23 日　“德敏学习成才奖”首次颁奖大会在京举行，150 名残病人获奖。

12 月 25 日　国家语委在京召开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纪念大会，李岚清出席并讲话，胡昭广等 5 人受到表彰。

同日　新华社报道：李鹏及夫人于新年前夕致信在京学习的革命老区的学生，向他们祝贺新年。

12 月 26 日　《续范亭纪念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该书首次发表了毛泽东致续范亭将军的 14 封信，江泽民题写了书名。

12 月 26～27 日　全国反兴奋剂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2 月 26～29 日　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在会上同时颁发，共有 129 种书分获一、二、三等奖。

12 月 27 日　纪念世界电影诞生 100 周年、中国电影诞生 9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等会见电影工作者并合影留念。28 日，“中国电影世纪奖”在京颁奖，45 位老电影艺术家获奖，10 部优秀影片受到表彰。当晚，纪念电影“双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创造永恒》在京举行。

12 月 28 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美国“艾科斯达一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同日　第五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好新闻评选在京揭晓。59 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

12 月 29 日　《文艺报》报道：全国首届“侯宝林金像奖”电视相声大奖赛近日在京落幕，崔立君创作的《求学心切》和相声演员杨义、陈寒柏分获创作、表演金像奖；刘立新、王平等分获创作、表演银像奖、铜像奖和优秀奖。

12 月 30 日　《光明日报》报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判决一起我国最大的计算机知识产权案，判处被告北京泰勒电子科技公司赔偿成都迈普电器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1300 万元人民币，并责成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全部侵权产品。

12 月 31 日　新华社报道：中办、国办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

同日　江泽民、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群众共同观看新年京剧晚会。

社会生活

1 月 10 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去年的“扫黄”“打非”行动中，《军事世界风云录》案等 5 起大案要案已全部破获，主要案犯已经落网。

1 月 16 日　以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就业安置问题为宗旨的“温暖工程”在京正式创立。孙起孟任“温暖工程”促进委员会主任。

1 月 18 日　国家计生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到今年 2 月中，中国大陆人口预计将达到 12 亿。

2月14日　中宣部、国家计生委、国家计委等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国12亿人口日大会”。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抽样调查测算，1994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7.7‰，死亡率为6.49‰，自然增长率为11.21‰。去年我国出生人数为2104万、死亡人数为771万、净增人数为1333万，年末总人数为119850万人，每天净增人口为3.6万人。据此推算，今年2月15日中国的人口达12亿(不含港澳台地区)。

2月16日　国家安居工程正式启动，争取5年新增居民住宅1.5亿平方米，以成本价向城镇中低收入者出售。

2月19日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召开第14次会议，通过今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

2月21日　中国“十大女杰”评选揭晓，岳喜翠等当选。

3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表明，1994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稳中有降。全年人口出生率为17.7‰，死亡率为6.49‰，自然增长率为11.21‰。

3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3月25日　李鹏签署国务院令，今年5月1日起实行职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工作制。

4月19日　记者从全国劳动计划与工资工作会议上获悉，劳动部已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在今年6月30日前实施最低工资标准。

4月29日　党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近3000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了大会。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决定，授予郭玉明等2157名同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授予罗玲等716名同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6月2日　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2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民用航空法(草案)、执业医师法(草案)和体育法(草案)。

6月6～9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据国家统计局最近报告，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正在明显下降，已经从1992年底的8000万人减少到1994年底的7000万人，减少了1000万人。国务院提出，今后要以每年解决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速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力争到本世纪末使现有的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

7月8～11日　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在厦门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对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目前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约8000万。

7月12日　李鹏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74次总理办公会议，听取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关于前一阶段汛情、旱情及抗灾救灾情况的汇报，并就当前抗洪抗旱抗灾救灾工作作出了部署。

8月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全文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同日　北京市、上海市、铁道部、国内贸易部、卫生部、邮电部、中国民航总局与光明日报社确定窗口行业禁用的50句“服务忌语”。

8月23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西北农业大学著名小麦专家何蓓如教授等科研人员历时15年培育成功的强优势K型杂交春小麦组合“901”，获得亩产600公斤以上的高产量。

8月24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吴弘达案一审作出判决。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有徒刑15年，并驱逐出境。吴弘达原籍中国江苏省无锡市，1985年从武汉市赴美国探亲，后加入美国籍，曾多次化名潜入中国境内，非法获取中国国家秘密，从事刑事犯罪活动，于今年6月19日再次潜入中国时，被中国公安机关在边防查获，7月8日被依法逮捕。

9月11日　第二届全国环保产业暨第四届国际环保展览会在京开幕。

9月13日　新华社报道：英联邦农业局国际昆虫研究所今年6月重新公布的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地图纠正错误，使得从1951年开始曾3次把中国东部地区划为苹果蠹蛾疫区的国际历史错案，终于得到彻底更正。

9月18日　第六届中国十杰青年评选揭晓，吕有珍等10人当选，张兴民等20位青年获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9月18～19日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9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日前发出关于加强出国(境)旅游证照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异地办理证照和公费出国(境)旅游等非法活动。

同日　彭佩云、徐志坚出席爱牙日活动。今年中国爱牙日的主题为“氟与口腔健康”，口号是“适量用氟预防龋齿”。

9月20～22日　第五届太平洋环境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公报。

9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都机场最近两次从旅客携带的水果中截获危险性害虫——苹果囊蛾。

10月11日 新华社报道：郑州天然商厦"1·20"特大火灾事故的原因和损失现已查明，有关责任者受到严厉查处。

10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12·8"特大火灾事故案，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14名责任者受到法律制裁。

10月13—15日 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强调当前农村养老保险要强化管理，稳步前进。

10月16日中央社会综治委第16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任建新在会上强调，要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发展。

10月16、17日 公安部在济南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学习济南交警先进经验现场会，并授予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模范交警支队"荣誉称号。江泽民在15日为济南交警支队题词。

10月29日 湖北巴东县发生滑坡地质灾害，造成部分经济损失。

11月8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开宣判建国以来最大的3起猎杀国家珍贵、濒危动物亚洲象，倒卖走私象牙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会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依法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4名主犯布鲁肖、布鲁光、曹剑和岩叫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四起大要案处理结果，四名虚开、伪造、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中，陈松南、石万雄、姚天佑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刚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1月9日 辽宁省阜新市艺苑歌舞厅特大火灾案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宣判，四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辽宁省委、省政府对这起火灾涉及的29名责任人员已作出党纪政纪处理。

11月11—17日 全国妇联七届三次执委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全国妇联关于"九五"期间开展巾帼系列行动的决议》。

11月19—20日 中国侨联五届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11月20日 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会议在京召开。赵朴初出席会议，并为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以及创始会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11月21日 第四次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11月22日 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庆功大会，表彰在查处新兴实业总公司特大投机倒把案中立功的29个集体和446个个人。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对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6名主犯的判决结果：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已于29日在当地执行死刑。黄桂芬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韩万隆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金惠珍、戴宝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4年，4名罪犯将交付劳改部门执行刑罚。涉及该案的38名被告人，都已经或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12月5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5名大肆盗窃各种机动车、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宣判，仅一年多就盗窃4辆汽车的郭晓方被依法处决。单独或结伙盗窃各种机动车的常国钢、杨明志、郭振红、阎磊被依法判处死刑。

12月14—18日 全国总工会第12届3次执委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和尉健行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增补倪豪梅为12届执委会委员，史忠魁等17人为替补委员，于子成等3人为12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倪豪梅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孙春兰为12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2月15日 辽宁省丹东市原市长常义、市政府原秘书长姜善堂、丹东边防武警支队原支队长施成福等13人走私案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审终结。常义等13人被分别判处14年至12年有期徒刑。

同日 震惊海内外的深圳市特大杀人抢劫案张小建、陈伟祥等13名主犯，在案发地深圳市宝安区伏法。

1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贵州省纪委严肃查处了贵州省委委员、黔西南州委书记周培荣顶风违纪购买豪华小汽车，以及为其父大操大办丧事、收受钱物的错误。经中央纪委讨论决定，并报中央批准，给予周培荣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千方百计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

12月21日 全国检察长会议在京举行，张思卿在会上强调要狠抓查处大案要案深入开展反腐斗争，对腐败分子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同日 东北公路洗劫旅馆客人财物的7名车匪在辽宁铁岭伏法。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发出关于欢乐节俭地过好元旦、春节的通知。

12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表彰105个文明接待室，授予"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

12月25日 全国"青年文明号"监察委员会在京成立。

1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

1996年

导　言

在进入1996年之前，我们当然地以为我们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点上，但我们却很难设想，这个交接意味着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碰撞？抑或其他？

本年度发生的一切大约能够使我们更为明白一些。外交无疑是96年的一个主题。中日、中美、中越、中欧及中国与中亚、与非洲，这是个外交风云起伏跌跖的年份。钓鱼岛危机是外交，而台湾问题则是老内政，这里我们不过多涉及。必要的话，提上一笔就是，是是非非，待后人评说去吧。

世纪之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关键时候。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我国跨世纪的宏伟蓝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既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又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96年10月在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今后一段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世 纪 热 点

本年度主要热点如下：

- 关于讲政治
-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 首届亚欧会议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
- 李鹏出席越共八大
- 第二十六届奥运会
-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
- 钓鱼岛事件
- 国际档案大会
- 十四届六中全会
- 第六次全国文化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隆重开幕
-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
- 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议员选举产生

关于讲政治

背景介绍

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根据党的七十年斗争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有前瞻性地提出了"讲政治"的口号，号召广大领导干部要具备敏锐的政治头脑，在新形势下看得清、站得稳、行得正。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新时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

材料：

- 关于讲政治
-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具有深刻的内涵

材料一　关于讲政治

江泽民

最近，中央强调一个重要精神，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以及在北京、西北、广东的考察中，都讲了这个问题。党内外普遍认为，现在强调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讲点意见。

讲政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不是什么新问题。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呢？目的是希望全党更加坚定不移地、更加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除了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条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两个基本点"。这也是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坚持这"两个基本点"，都是为了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我国的改革开放搞得很成功，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把它搞得更好，以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政治条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如果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那就不对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是片面和有害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关系，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并讲得很清楚的。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并讲得很清楚的。1986年在视察天津时他又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这个思想十分重要。中央最近强调讲政治，就是要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坚持贯彻好。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我们讲政治，绝不是像境外一些报刊歪曲的那样，中国又要回到过去搞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搞什么"左"的那一套了。更不是也绝不会去搞什么运动。他们制造这样的舆论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的同志要警惕，不要上当。有这样的担心和疑虑是毫无必要的，也没有任何根据。我们讲政治，也绝不是简单重复一些政治口号，不是搞空头政治，而是像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那样，要使政治同经济、政治同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

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我在五中全会讲过，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只有讲政治，才能保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讲政治，才能动员、鼓舞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只有讲政治，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有力地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和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只有讲政治，才能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讲政治，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从而提高领导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只有讲政治，才能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党的坚强团结、党同人民的坚强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总之，坚持讲政治，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

总的说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注意讲政治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但是也应看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的一些同志中间，确实存在不注意讲政治甚至忽视政治的问题，以致造成思想政治建设薄弱，思想政治素质下降。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重视。现在有的干部不读书，不看报，不研究文件，不调查研究，很少从政治上观察形势、考虑问题，缺乏应有的政治辩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有的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些事情明明中央已三令五申，他在那里仍然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为了他那一点局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甚至连犯罪的问题都加以保护。有的是非不分，对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言行也不反映、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甚至传谣信谣，传播小道消息。有的为了追求个人名利，热衷于拉关系，串门子，把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这种极为庸俗的作风带到党内来。有的精神不振，遇到问题绕着走，工作敷衍塞责，搞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有的群众观点淡薄，不联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欺压群众。有的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坠入犯罪的泥坑。有的在对外交往中，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甚至丧失国格和人格，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根本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使大家提高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全面地正确地积极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过，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是非不辨、美丑不分，不能对那些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听之任之，不能让那些同党的宗旨和纪律不相容的歪风邪气滋长起来，分清这些界限，保持清醒头脑，才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里我想再讲一下民主问题。民主是个政治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民主。民主的发展总是同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每个国

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民主应该适合自己的国情。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些人总想把他们的议会民主那一套东西推广到全世界，成为普遍的模式。这是一种空想。西方有什么上院、下院，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一个，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制度要民主得多、优越得多。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也还要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原载《求是》杂志 1996 年第 13 期）

材料二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江泽民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进城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绝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也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党打招呼，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同志这些话讲得很及时、很深刻。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干部，包括有的高级干部，把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当耳旁风，不注意学习和改造自己，结果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前车之鉴，希望大家务必引以为戒。在反腐败问题上，今后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把反腐败斗争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结合起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反腐败斗争负总责，首先要把领导班子管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都要一查到底。要立一条规矩：哪里有严重问题不查处，就追究那里领导的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以律己，防微杜渐。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如果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对个人的名利待遇等等，就能够正确处理。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生活才充实。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什么人？建议大家重读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和战争年代大不一样了，毛主席这些话是不是过时了？没有过时，应该说更有现实性。各级领导同志更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做。比如夜总会、高级舞厅等高消费娱乐场所，我看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去，要有这个自觉性。

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权力一大，直接监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又不及时教育和监督，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因此，为了爱护干部，党组织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教育、管理和监督。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各级党委不仅要管好干部的选拔作用，而且要管好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发现干部有了缺点、毛病，要及时指出，进行帮助，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党内各项规矩，参加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存在超越于党组织和党的纪律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人物。

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个问题。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过我们。1983 年，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指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郑重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985 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

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6年，他在天津视察时又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同志是无产阶级大政治家，他最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重视起来。我们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政治上是好的，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有的干部，也确实存在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的问题。我们讲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对党章的各项规定，所有党员都要遵守，高级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比如，党员义务第一条规定，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你如果不学习，怎么当好领导，怎么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怎么把握政治方向，怎么提高政治辩别力？

（选自1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具有深刻的内涵

“一定要讲政治”作为一个重大原则，是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也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特有优势。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是针对当前党内一些干部的现状而言的，是有的放矢的。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精确概括，既完整准确地揭示了“一定要讲政治”的深刻内涵，也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深刻理解。

讲政治，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也是检验领导干部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根本标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江泽民同志强调，讲政治，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质，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和不惜以牺牲精神文明求得经济一时发展等错误倾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可见，强调讲政治，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了更好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是要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态度十分鲜明，行动十分自觉。

讲政治，必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政治立场就是这个“大局”和“根本利害”的立足点。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坚定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站在维护党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这是实践党的宗旨的根本点，是革命世界观、人生观的支撑点。有的同志觉得，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是的，阶级斗争已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如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策略，"台独"、"藏独"破坏祖国统一的行径，动乱分子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勾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都是当今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和统一，总是处心积虑地采取合法的不合法的、硬的软的、明的暗的等等手段，企图阻挠我国前进的步伐。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同时，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能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就不能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不能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就不能把学习掌握党的基本理论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正确运用理论武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能正确处理大局和小局、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也就不能把党的团结作为党的生命，坚持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也就不能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另外，我们在进行各种对外交往包括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因为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既是一种经济要求，也是一种政治要求；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可能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之，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代表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一个有益于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的人。

讲政治，必须具有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鲜明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这是我们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我们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内外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实践证明，只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这些思想观点，就得以在历史的转折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的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就得以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坚定理想信念，扫除那些看不清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政治短见，扫除那些被资本主义表面繁荣引起的疑惑心理，扫除那些西方"民主"、"自由"和"非党化、非政治化"的影响；就得以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纠正那些居安忘危的"太平"观念，纠正那些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和追逐名利、贪图安逸的不良倾向；就得以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事物面前，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克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分析问题，指导行动。因此，具有鲜明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在实践中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具有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做到旗帜鲜明，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在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清界限，才能真正做到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

讲政治，必须具有严格的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党的钢铁般的团结，党对各条战线的坚强领导，党的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都离不开严格的政治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里我们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敌的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更艰巨、更伟大，党的自身建设的要求更高，因而更要严格政治纪律。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讲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的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坚决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确保政令畅通。这是遵守政治纪律的最高标准，是对

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要求。要切实做到中央提倡的就坚决响应，中央决定的就坚决照办，中央禁止的就坚决不干。不仅在关键时刻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的决策，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不折不扣地遵守中央的规定；不仅在重大问题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在执行规章制度方面也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同志提出，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强调政治纪律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不仅不与严格的政治纪律相排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更需要强调严格政治纪律，更需要通过严格的政治纪律来维护中央权威，以保证政令的畅通。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发挥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需要不断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统筹规划，协调配套，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领导，离不开党员干部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可见，严格的政治纪律，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比过去具有更高的要求。严格的政治纪律是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分散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本位主义包括地方保护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因为这些东西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腐蚀剂，只有彻底扫除干净，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党工作大局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得到贯彻落实。

讲政治，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鉴别力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又是社会的一员，从来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断打交道的过程，因而在这过程中各种政治观点、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队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否则，就不能坚守思想政治的防线，就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如果因为怕受影响就不敢打开窗户是错误的；如果因为要打开窗户就对什么东西都大开绿灯同样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划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界限，增强对一切有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病菌的抵抗力、免疫力。“分析好，大有益”。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那些健康的、有益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拒绝那些不健康的、有害的、落后的、错误甚至反动的东西。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奉行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对拿来的东西“有辨别”，“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当然，提高政治鉴别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从坚持不懈地提高理论素养、强化政治意识，加强自我改造，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中来提高政治鉴别力，要从坚持不懈地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的过程来提高政治鉴别力。共产党员如果不在这些根本点上作出长期的毕生的努力，就不可能始终成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坚强战士。

讲政治，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

所谓政治敏锐性，简要地说，就是要见微知著，当“风起于青萍之末”，即某种事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能立即抓住萌芽，洞察本质，判明利害，把握发展趋势，并据此确定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对策。毛泽东同志早在红军和根据地初创时期，基于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就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我国国情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深刻认识，就把农民发明的家庭联产承包这些好东西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并使其在各地很快发展起来。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高瞻远瞩地扶植新事物的范例。再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就针对某些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这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高瞻远瞩地解决和防止错误倾向的范例。在新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这是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思想，也是高度政治敏锐性的思想基础。在胜利面前，在发展面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如果让骄傲自满、贪图安逸、不求进取的思想滋长起来，政治神经就会麻木不仁，思想就会解除武装，就谈不上政治敏锐性，也就不可能做到深谋远虑，洞察入微，应对自如。当前国际上政治风云变幻，我国又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去分析各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现象和问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警惕和防止“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1996年2月15日《人民日报》，作者：蒋金锵）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背景介绍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3 月 5 日上午九时在京隆重开幕。参加本次会议的人民代表共 2793 名。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世纪之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处于关键的时候，进行具体的建设项目之余，和原有的五年计划相结合，制定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必然的。除此之外，会议还审议了 1996 年的财政预算等议题。

材料：

-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京举行
-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材料一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京举行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3 月 5 日上午九时在京隆重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 2793 名人民代表齐集人民大会堂，出席这次世人瞩目的大会，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

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今后 15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未来 15 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 年在人口将比 1980 年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当天的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乔石主持。9 时整，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这时，全体起立，大厅里响起雄壮的国歌声。

当天和乔石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田纪云、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曹志。

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同志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报告共九个部分：一、"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回顾；二、今后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三、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四、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六、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七、积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八、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九、努力做好 1996 年的工作，为"九五"创造一个良好开端。

去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国务院根据《建议》精神，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纲要(草案)》。李鹏今天将这一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李鹏持续一小时五十分钟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当天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丁关根、李岚清、李铁映、吴邦国、邹家华、姜春云、钱其琛、黄菊、尉健行、谢非、温家宝、张震、张万年、迟浩田、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珮云、罗干、张思卿、叶选平、吴学谦、杨汝岱、王兆国、洪学智、邓兆祥、钱伟长、胡绳、钱正英、丁光训、董寅初、孙孚凌、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

出席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委员，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共有 12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和代表旁听了开幕会议。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3 月 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分别向大会作了《关于 199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199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 199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当天下午的大会由大会执行主席田纪云主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执行主席还有：陈慕华、费孝通、吴阶平、

王朝文、王群、叶公琦、朱良、刘华清、阮崇武、张克辉、张勃兴、张健民、阿木冬·尼牙孜、孟富林、赵东宛、贾庆林、霍英东。

* * *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的说明、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审议全国人大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

2634名代表出席了当天上午的大会。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首先向大会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他说，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草案）》作了说明。

曹志还就行政处罚的设定、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行政处罚的原则和程序、当事人的权利、法律责任等作了说明。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就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说明。

顾昂然还就完善强制措施，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对完善庭审方式、职能管辖、免予起诉的修改，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问题作了说明。

当天的会议还印发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和曹志秘书长关于这一决定草案的说明，提请代表进行审议。

大会由执行主席王光英主持。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有：王汉斌、孙起孟、雷洁琼、卢嘉锡、曹志、马思忠、毛致用、尹俊、卢功勋、曲格平、刘夫生、孙维本、李长春、陈焕友、孟连昆、赵富林、宦爵才郎、热地、高德占。

* * *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2567名代表出席了当天下午的全体会议。

任建新在报告中向代表们介绍了“九五”期间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任务。他说，1996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强化刑事审判工作。继续坚持“严打”斗争，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经济审判工作，依法调节经济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做好民事审判工作，依法保护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进一步推进行政审判工作，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海事审判工作水平。审理好涉外、涉港澳和涉台案件，促进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改进执行工作。通过审判活动，促进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因身体不适，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庆代读报告。报告说，过去的一年，各级检察机关突出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犯罪大案要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加强执法监督三项重点工作。全年共依法直接立案侦查各类犯罪案件83685件；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刑事犯罪分子608678人，依法起诉596624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还介绍了检察机关1996年着重要抓好的几项工作：坚持查办大案要案，推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坚持“严打”斗争，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工作指导；认真执行检察官法，加强队伍建设。

大会由执行主席布赫主持。当天下午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有：倪志福、李锡铭、王丙乾、程思远、铁木尔·达瓦买提、马万祺、朱森林、全树仁、刘方仁、李泽民、杨析综、杨泰芳、何竹康、赵志浩、柳随年、贾志杰、阎海旺、程维高、薛驹。

出席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委员们列席了当天下午的会议。

* * *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3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草案，会后，将决议草案印发各代表团审议，提请大会表决。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主持会议。137名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柳随年作的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报告。通过

了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议草案，会后将决议草案印发各代表团审议，提请大会表决。

柳随年在审查报告中说，财经委员会认为，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指导思想、方针和重点是正确的，总的安排是合适的。在国家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如果情况有重大变化，计划需要作部分调整时，应事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副主任委员李灏作的关于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通过了关于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中央及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会后将决议草案印发各代表团审议，提请大会表决。

在谈到今年的预算时，李灏说，财经委员会认为，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基本上体现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支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预算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幅度，预算支出增幅低于收入增幅，赤字有所压缩，在从严控制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了对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等的投入。预算安排基本可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田纪云、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曹志出席了会议。

* * *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3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主持会议。139名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驹首先作了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薛驹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说，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这两个法律草案。代表们认为，行政处罚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大事。这两个草案是可行的，建议本次会议予以修改通过。同时，代表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两个法律草案进行了审议，提出了修改意见。薛驹详细介绍了对两个法律草案修改的情况。

会议通过了薛驹所作的报告。会后这个报告将印发全体代表。

经过表决，会议通过了经进一步修改的行政处罚法草案、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这三个草案将印发各代表团审议，提请大会表决。

当天的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这三个决议草案也将印发各代表团审议，提请大会表决。

本次大会秘书处向当天的会议提交了关于代表提出的各项议案和建议处理意见的报告。大会副秘书长曹志在作这一报告时说，本次会议共收到议案603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议案31件，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572件。经大会秘书处同各专门委员会商议，建议将124件议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的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另外479件，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代表。

曹志说，截至3月15日，大会秘书处还收到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1958件。这些建议、批评和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会同国务院办公厅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代表。

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会后这个报告将印发全体代表。

主席团常务主席田纪云、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曹志出席了会议。

* * *

北京人民大会堂3月17日下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寄托着中华民族理想与追求的跨世纪发展蓝图在这里正式诞生。出席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2682名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表决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现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中长期规划，到下世纪初，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经济面貌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当天下午3时18分，当主持这次会议闭幕式的大会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宣布《纲要》及李鹏总理关于《纲要》的报告得到大会批准时，万人礼堂里爆发出热烈掌声。

会议就此通过的决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全面完成《纲要》确定的宏伟任务而努力奋斗。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刘华

清、胡锦涛、荣毅仁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田纪云、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曹志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在乔石委员长主持下，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意陈锦华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中央及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6年中央预算，同意刘仲藜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

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本次为期13天的会议中，代表们对李鹏总理的报告和《纲要》进行了认真审议，出席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委员对李鹏总理的报告和《纲要》进行了讨论。根据代表们审议的意见和委员们讨论的意见，对《纲要》及李鹏总理关于《纲要》的报告都作了认真的修改。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这部法律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个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制定以来的第一次修改，这次修改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的作用。修改决定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同时废止。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由164条增至225条。

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天签署第六十三号、第六十四号主席令，公布了这两部法律。

当天的会议还分别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乔石委员长发表了讲话。他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代表们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畅所欲言，共商国是，使这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决定，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乔石委员长说，这是一次民主、求实、团结、奋进的大会。这次会议，对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实现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乔石委员长说，我们的奋斗目标已经确定，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已经明确，最重要的是抓好落实。实现今后15年经济的较快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在前进中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根本的出路是实实在在地深化改革。他希望各位代表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后，积极宣传贯彻这次大会的精神，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扎扎实实地工作。

下午4时3分，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后，乔石委员长宣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丁关根、李岚清、李铁映、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姜春云、钱其琛、黄菊、尉健行、谢非、张震、迟浩田、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罗干、叶选平、吴学谦、杨汝岱、王光国、洪学智、胡绳、钱正英、孙孚凌、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何鲁丽等和主席团成员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列席了大会。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新华社讯，3月6、13、15、17、1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和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审议了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会议认为，《纲要（草案）》和报告提出的今后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部署和措施，体现了邓小平建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会议决定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批准李鹏总理的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较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五年实现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困难，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认为，今后十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纲要》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是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的行动纲领。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齐心协力，扎实工作，保证《纲要》的顺利实施。

会议认为，实现《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认真贯彻《纲要》提出的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切实解决好关系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会议认为，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要认真贯彻农业法，切实加强农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努力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产，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积极推广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依法保护耕地，搞好粮棉生产基地建设，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因地制宜地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要高度重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

会议要求，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要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要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在鼓励东部地区继续发挥优势的同时，更加重视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国防实力。

会议强调，要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积极探索，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突出重点，分类指导。要把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把企业内部改革和外部配套改革结合起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要积极推进集体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继续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要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积极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的分配制度，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认真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要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加快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调动科教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各级政府要继续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要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会议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要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继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发展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国民身体素质。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加强勤政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奋工作，不尚空谈，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议，制止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

会议指出，我国将相继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里程碑。要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香港和澳门政权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与稳定。要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推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国势力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形式进行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会议呼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携起手来，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共同努力。

会议指出，当前世界仍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建立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民将与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议强调，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努力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对于完成"九五"计划和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安排和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把已经确定的各项任务和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全面完成《纲要》确定的宏伟任务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讯，3月1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6年3月17日）

目　录

序　言

1996～201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国将以崭新

的姿态跨入21世纪，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组织和动员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

经过建国以来4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近17年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形成了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未来15年，在新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下，我国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在前进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难，但总的来说，仍有充分条件继续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克服困难，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己，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针对新形势下的矛盾和问题，努力把握客观规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纲要》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根据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体制变化的新特点，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纲要》力求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主要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明确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纲要》重点放在"九五"计划，同时着眼于下世纪前10年的发展，提出轮廓性的远景目标。在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上，提出了分阶段的目标和任务，规划了跨世纪的重大工程，使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发展很好地衔接起来，保持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连续性。

一、"八五"计划完成情况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下个世纪初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五"计划是建国以来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万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了一番的基础上，用7年时间又翻一番。"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是建国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五年。

"八五"期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1%，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7.3%，第三产业年均增长9.5%。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3万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3万亿元，技术改造投资完成1.1万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基建项目845个，限额以上重点技改项目374个。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步增长。1995年，粮食产量达到4.65亿吨，比1990年增加1900万吨；油料2250万吨，增加630万吨；肉类总产量5000万吨，增加2140万吨；水产品2538万吨，增加1230万吨；原煤12.98亿吨，增加2.2亿吨；原油1.49亿吨，增加1078万吨；天然气174亿立方米，增加21.78亿立方米；发电量1万亿千瓦时，增加3780亿千瓦时；钢9400万吨，增加2800万吨；10种有色金属425万吨，增加190万吨；化肥(折纯)2450万吨，增加570万吨；乙烯243万吨，增加86万吨；化纤290万吨，增加125万吨；汽车150万辆，增加99万辆；彩电1958万台，增加925万台；集成电路3.1亿块，增加2亿块。

2.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八五"期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推进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在价格形成机制、税收制度、汇率并轨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农村、科技、教育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改革也取得新的进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开始形成，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法律法规等手段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八五"期间，对外开放由沿海扩展到沿边、沿江、沿主要铁路线和内陆省会城市，经济特区继续发挥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浦东开放开发取得很大进展；对外开放的领域由一般加工业扩展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由中小企业扩展到大企业，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进出口总额五年超过1万亿美元。五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内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水利建设得到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建设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支柱产业快速成长。“八五”期间，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和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相继开工建设；建成了黄淮海平原灌溉、引大入秦等一批水利工程；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农田灌溉面积净增200万公顷。

能源、交通、通信建设步伐加快，生产能力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有所缓解。“八五”期间，发电装机总容量新增7500万千瓦，年均增长9%，1995年达到2.1亿千瓦；新增铁路营业里程3000公里，复线3848公里，电气化2973公里，基本建成京九、宝中、集通新线和兰新复线，增强了铁路干网运输能力；新建和改造公路9.2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8000公里；新建和改建沿海港口中级以上泊位170个，增加吞吐能力1.38亿吨；新建和改造了一批机场，客机座位增长1.4倍；铺设长途光缆干线10万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5895万门，年均增长42%。

汽车、电子、石化等产业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形成了具有经济规模的年产15万辆轿车、45万吨乙烯、300万台彩电的生产基地。轻工纺织产品满足了国内市场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大幅度增加。

5. 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区域经济不同程度地发展壮大。“八五”期间，各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很大发展，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东部沿海地区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和地缘优势，资金技术密集以及外向程度高的产业迅速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水平进一步提高，辐射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农业、能源、原材料等产业进一步壮大，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经济发展。国家加强了支持中西部发展的力度，在扶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成效。地区间的分工合作与经济交流有了新的进展。

6. 科技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研究进一步加强，五年共取得国家级科研成果16万项。一批成套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在生产建设中推广应用。各类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在占总人口90%以上的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工作顺利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加快。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和生态保护得到重视。计划生育取得新成绩，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降到1995年的10.55‰。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78.7%和84.4%，比1990年提高4和5个百分点。

7.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八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均增长10.6%。人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的基础上继续提高，贫困人口由80年代末的8500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6500万人。城乡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6.7平方米提高到7.9平方米。电话普及率由1.1%提高到4.6%。城镇职工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8. 国防建设在调整中发展，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取得显著成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国防实力不断增强，国防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继续得到较好的实施，国防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防工业的结构和布局得到进一步调整，重点专项工程的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军转民在核电、民用卫星、民用船舶、民用飞机制造和卫星发射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开拓了国内市场，进入了国际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八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比较粗放，经济素质不高，经济效益较差；农业基础薄弱，不适应人口增加、生活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国家财力不足，宏观调控实力不强；在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些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面临不少新的问题。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

（一）未来15年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

未来15年，我国将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良好态势，具备继续前进、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经过建国以来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深入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为继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建设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形成的巨大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比较高的储蓄率和丰富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条件和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继续前进指明了正确方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和人民的团结，是引导我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国际和平环境可望继续保持，我国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世界科技革命和产

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我国即将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广阔市场和发展前景，对国外企业和投资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着不少矛盾和困难，其中有些是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人均拥有的耕地、水资源和石油等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就业矛盾日趋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的任务艰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对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斗争也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我们要正确运用已经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努力化解不利因素，发挥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切实解决好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集中力量，重点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今后15年，必须认真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重要方针。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争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努力做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相统一，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相统一。

——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在各个领域培养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

——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处理好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在制定计划和部署经济工作时，首先把农业和支农产业安排好。各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农业，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各行各业都要为发展农业做出贡献，全面振兴农村经济。

——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开阔思路，大胆试验，勇于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路子。同时，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

——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变化，体现竞争原则。注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把握好时机和力度，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转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九五”期间，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充分发挥体制改革带来的活力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深化改革，在更多的领域中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竞争性产业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使经济更富有活力和效率。

第二，充分发挥现有基础的潜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九五”期间，除新建一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重点项目外，能够依托现有企业改造扩建的，就不要铺新摊子。必要的新建项目要提高技术起点，达到经济规模。现有企业的改造和扩建，要把着眼点放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上，避

免简单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

第三，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以产业技术为重点，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高技术的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重点建设项目，组织重大成套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积极推行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工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第四，狠抓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行全面节约战略，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领域，都要节粮、节水、节地、节能、节材，千方百计减少资源占用与消耗。坚持不懈地反对浪费行为。各行各业都要制定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的目标与措施，切实加以落实。

第五，按照社会化大生产与合理经济规模的要求，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界限，通过联合投资、联合生产，以及专业化分工协作，发展规模经济，突出抓好石化、汽车、钢铁、火电、机械、电子等行业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和投资结构调整，实现规模经营。

第六，加快流通领域改革，提高流通效率。建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打破各种封锁和垄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流通体系。建立新型流通组织和交易形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促进流通企业的有序竞争，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七，正确运用计划手段和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家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区域规划等，运用国家掌握的财力、物力和经济调节手段，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力合理布局，支持重点建设和重大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实行合理的技术经济政策，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合理组合，多层次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采取法制建设、规划制定、政策实施和工作考核等综合配套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三)“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

“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体制基础。

1. 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2000年，按1995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5.76万亿元增加到8.5万亿元。“九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4%；人均纤维消费量从4.6公斤增加到5公斤；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7.9平方米增加到9平方米，农村住房质量得到改善；彩电普及率由42%提高到60%，电话普及率由4.6%提高到10%。

2. 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得到巩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基本确立。

3. 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有效供给能力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继续缓解；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和建筑业等支柱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增强。

预测到2000年主要产品的产量是：

粮食4.9～5亿吨，比1995年的4.65亿吨增加2500～3500万吨；

棉花450万吨，与1995年的450万吨持平；

原煤14亿吨，比1995年的12.98亿吨增加1亿吨；

发电量1.4万亿千瓦时，比1995年的1万亿千瓦时增加4000亿千瓦时；

原油1.55亿吨，比1995年的1.49亿吨增加600万吨；

化肥(折纯)2840万吨，比1995年的2450万吨增加390万吨；

钢1.05亿吨，比1995年的9400万吨增加1100万吨；

乙烯420万吨，比1995年的243万吨增加177万吨；

汽车270万辆，比1995年的150万辆增加120万辆；

集成电路25亿块，比1995年的3.1亿块增加21.9亿块；

铁路货运量18亿吨，比1995年的16.5亿吨增加1.5亿吨；

电话交换机总容量1.74亿门，比1995年的0.85亿门增加0.89亿门。

4. 科技教育得到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的提高，主要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农业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达到80%以上，农村劳动者各类保险覆盖面达到30%以上。文化事业更加繁荣。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力争得到基本控制。

5.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成效，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进一步提高。"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系数由"八五"的3.6降为3左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6.5%。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由1995年的2.2吨标准煤下降到2000年的1.7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5%。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0%以上，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达到2次。

(四)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商品市场发达，要素市场比较完善，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收入分配制度较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手段比较健全，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较为灵敏有效。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登上一个新台阶，商品化、专业化的程度明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显著增强。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有较大提高。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全面实现小康水平。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能源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和消费结构得到改善。综合运输体系和现代化通信体系基本形成。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业等支柱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技术产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应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取得很大进展，计算机应用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初步建立以宽带综合业务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显著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

下个世纪前10年，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工程。主要是，继续建设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兴利除害，基本解决长江、黄河水患；着手建设跨流域的南水北调工程，缓解北方部分地区严重缺水的矛盾。着手建设京沪高速铁路，形成大客运量的现代化运输通道，进行进藏铁路的论证工作。着手建设新的现代化大型钢铁基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材新品种的需要。改造和扩建支柱产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骨干企业，向百万辆汽车、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的规模发展。进行新一代集成电路的研制开发工程，迎头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进行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本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和重点产业带，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建设有很大发展，初步建立规模结构和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

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和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掌握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技术，主要生产技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下世纪初的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减灾抗灾能力大为提高。

经过15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将有较大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大为增强，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九五"期间，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条件，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九五"期间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有效的政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

保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和需求结构的协调合理。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快资金周转，引导和调整财政、信贷资金投向及分布结构。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改善国际收支结构。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的合理增长，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引导消费，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

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着力加强第一产业，提高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发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和增加出口的主力作用。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发挥劳动就业主渠道的作用。

(二)价格总水平

"九五"期间，需要继续理顺价格关系。同时，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依然存在。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政策，明显降低价格上涨幅度，首先要努力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

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大力增加粮

食等紧缺产品的有效供给，缓解结构性供求矛盾；加强管理，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抑制生产、流通环节的涨价因素。

建立和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加强重要商品储备、风险基金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建设；建立以价格法为核心不同层次法规构成的价格法律体系；加强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制止价格欺诈、垄断和暴利行为；进一步理顺基础产业的重点产品和服务价格；调价和提取建设基金的种类、幅度以及出台时机，要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和年度价格调控目标从严把握。

（三）固定资产投资

从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出发，"九五"固定资产投资率按 30%来把握。考虑价格因素，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 13 万亿元，年均增长 10%。其中，国有单位投资 8.8 万亿元，占 68%。

对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实行双重调控。年度投资规模的调控以资金源头控制为主。在建总规模的调控，主要是在"九五"前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

集中力量保重点。加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支柱产业的重点建设。加快现有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调整的步伐。房地产投资重点放在城镇居民住宅建设上。

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按照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分别进行建设项目的资金配置。中央掌握的建设资金，集中用于全国性或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重点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本地区公益性、基础性项目。除国家重点工程以外的竞争性项目，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由企业自主决策和投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投向重点产业。

完善投资的宏观调控。除预算内资金建设的公益性项目外，所有新建项目都必须确保应有的资本金和铺底流动资金。不符合规模经济标准、技术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项目，不得立项和建设。对建设项目用地实行严格的管理。改进建设项目概算管理办法，切实解决超概算问题。

（四）财政收支

"九五"期间，要振兴财政，健全职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努力做到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控制国债规模，使年度发债规模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继续完善税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取消各种区域性税率，巩固完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适当扩大增值税和资源税征收范围；建立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整地方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依法征税，严格控制税收减免；逐步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利息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

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强化管理监督。制定与征管法律相配套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稽查、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离境清税、协税护税等综合法规，以及增值税稽核检查、出口退税、个人所得税、地方税等的单项征管制度和办法。进一步完善纳税申报制度。建立健全税务稽查制度和规程。加快应用计算机进行税收征管的步伐。

清理整顿预算外收支和财政信用。对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在预算内列收列支，并加强规范化管理和审计监督。将财政信用纳入信用计划管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信用资金，必须纳入各级政府的投资计划。

完善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清支出范围。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控制财政支出，调整支出结构。除法律有规定的支出外，其余支出的增长速度严格控制。精简机构，减少行政费用支出，严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支出。工资福利支出严格按统一规定和标准执行。

（五）货币供应

"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狭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 18%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 23%左右。

改善金融调控方式。充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严格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建立统一的、有透明度的货币市场，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业务，基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开办中央银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灵活运用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中央银行再贴现等调控工具。继续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建立现代化支付系统。

根据产业政策和信贷原则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贷款质量。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保证国家银行新增信贷总规模的 10%以上用于农业。贷款要坚持择优限劣的原则，流动资金贷款要重点支持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固定资产贷款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严禁挪用、挤占流动资产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保证贷款本息回收，加快贷款周转速度。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财政支出。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对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对金融机构进入市场、业务状况、资产负债比例、风险控制程度、负责人任职资格进行全面监管，防止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

（六）国际收支

2000年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是：经常项目中的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非贸易往来力争减少逆差；资本项目在借贷资本略有逆差的情况下，通过吸引直接投资，保持适当的顺差。外汇储备比1995年有所增加。

按照国际通行规则，采取统一、科学、公开的调节手段，促进商品出口和非贸易创汇的继续增长，优化进口结构。利用国外贷款要注重提高效益，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与国内配套资金能力相适应，继续实行对外借款的全口径计划管理，有效地控制外债余额的过快增长。按照产业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方向，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七）人口和就业

"九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0.83‰。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和认真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重点做好农村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要和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以及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深入持久地开展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提倡晚婚晚育，做好优生优育工作。继续实行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避孕节育、生育保健、优生优育的技术服务和基层服务网络建设。

五年新增城镇就业4000万人，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农业劳动力。城镇失业率力争控制在4%左右。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统筹规划，不断扩大城乡就业。引导和组织农业劳动力进行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继续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增加劳动积累型工程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规范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采取多种就业形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制度。实行就业前和在岗培训制度。建立失业预警和调控体系，以及失业保险、救济、转化和促进再就业的新机制。

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重点加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同时，振兴支柱产业，发展高技术产业，调整提高轻纺工业，积极开拓第三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一）切实加强农业，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

"九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努力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保证农民收入较快增加，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巩固工农联盟。

1. 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改革。在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鼓励土地使用依法转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发展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要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它们为农服务的作用。继续完善重要农产品价格体系、流通体制和储备调节制度，进一步理顺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制定鼓励地方和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政策，促进粮食调出区提高商品率，调入区提高自给率。健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和保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2.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和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乡镇企业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扩大劳动积累。积极吸引外资从事农业开发和建设。

3. 依法保护耕地，开垦宜农荒地，提高复种指数，保持粮食播种面积长期稳定。"九五"期间，严格控制非农占用耕地，尽力减少灾害毁损耕地，大力开垦宜农荒地，确保各地现有耕地不再减少。改进耕作技术，使复种指数由155%提高到160%以上。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1亿公顷。

4. 加强水利建设。搞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重点建设一批具有综合效益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同时要十分重视中小河流治理，坚持标本兼治，提高防洪、抗旱、排涝能力。到2000年，各大江大河力争达到防御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标准，全国供水能力增加400～500亿立方米。继续建设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四川二滩等工程。

坚持开展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五年新增农田灌溉面积330万公顷。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5. 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九五"期间改造中低产田1400万公顷。国家级商品粮食基地县增加到900个左右。有重点地选择若干片增产潜力大、商品率高的地区，集中建设大的国家储备粮生产基地。搞好黑龙江、新疆、黄淮海、吉林、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区的连片开发和粮棉生产基地建设。继续扶持粮棉集中产地发展经济。

6. 加强林业建设。积极培育森林资源，保护原始森林，发展人工林。重点抓好防护林体系、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和山区林业综合开发，促进林产工业发展。继续建设三北、长江中上游和沿海防护林，太行山绿化，防沙治沙

工程等。建设一批新的防护林工程，绿化祖国，造福子孙。

7. 强化科教兴农，突出抓好"种子工程"。加强遗传育种、作物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农产品加工和贮藏保鲜等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稳定与壮大农业技术队伍和推广体系，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实施"种子工程"，完善优良品种的繁育、引进、加工、销售、推广体系，到2000年把水稻、小麦、玉米和棉花的用种全面更换一次。农业要积极转变增长方式，走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

8. 加快发展以化肥为重点的农用工业。化肥工业要抓紧建设"八五"结转项目。充分利用海南天然气和新疆油田伴生气建设大型氮肥基地，建设以山西晋城优质无烟煤为原料的化肥基地，2000年，氮肥做到基本自给。积极发展磷复肥和钾肥，建设云南、贵州磷肥基地和青海钾肥基地。加快农药新品种研制开发，增加高效低残留的新品种产量。增加农膜原料产量，调整农、地膜用料结构，开发新品种。改进大型农机具，加快发展中小型农机具和农产品加工机械。

9. 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植树造林、开垦荒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努力提高乡镇企业的素质和水平。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中，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结合起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鼓励农村集体和农民综合开发利用非耕地资源，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扩大作物秸秆等副产品的综合利用，逐步推广规模化养猪，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禽。加强草原建设，促进畜牧业发展。扩大淡水和近海养殖，发展远洋捕捞。积极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把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加工深度。

10. 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切实落实国家扶贫攻坚计划，继续执行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扶贫开发的投入，搞好以工代赈，增加并管好用好各项扶贫资金。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加强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支援，继续巩固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口扶持。坚持走开发式、开放式扶贫的路子，努力改善交通、通信、电力、人畜饮水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条件。

（二）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集中力量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

1. 能源工业

能源工业要适应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逐步缓解瓶颈制约。2000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由1995年的12.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13.5亿吨标准煤。

坚持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大力调整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推广先进技术，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坚持能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同步进行，继续理顺能源产品价格。

能源建设以电力为中心，以煤炭为基础，加强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勘探和开发，积极发展新能源。

（1）电力。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电能利用效率。继续贯彻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方针。贯彻因地制宜、水火并举、适当发展核电的方针，同步发展电网，加快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

积极发展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电。火电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加快开发煤炭洁净技术，推广应用烟气脱硫技术。积极研究和应用远距离超高压输变电技术，促进水电"西电东送"和坑口电站跨区送电。水电要实行流域梯级滚动开发，大中小结合、高低水头并举、综合利用的原则。积极发展风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加强电源结构调整，限制小火电发展。从"九五"开始，新建火电厂一般都要使用单机容量在30万千瓦以上的高参数、高效率机组。

"九五"期间每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发电量年均增长7%左右。2000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2.9亿千瓦，发电量1.4万亿千瓦时。

（2）煤炭。贯彻执行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在保持合理开发强度的前提下，稳定东部煤炭产量，重点加速山西、陕西、内蒙古煤炭开发，积极建设一批用人少、效率高、效益好的骨干矿井。国有煤矿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转换经营机制，依靠技术进步增加产量和提高效益，结合矿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多种经营，搞好综合开发。对现有矿区实行分类指导，对乡镇煤矿要采取扶持、改造、整顿、联合、提高的方针，实现正规合理开发，走上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2000年，煤炭产量达到14亿吨左右。

（3）石油天然气。加强资源勘探，增加后备储量，保持石油天然气稳步增产，并利用部分国外资源。陆上坚持"稳住东部、发展西部、油气并举、扩大开放"的方针。海上实行"继续开放、扩大自营、油气并举、稳步提高"的方针。五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38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亿立方米。2000年，原油产量达到1.55亿吨，天然气产量250亿立方米。改造和完善现有原油、天然气管道网络，建设新的油气输送管线。加强石油储备。

（4）能源节约和农村能源开发。加强节能立法和执法监督，制定节能标准和规范，强制淘汰高耗低效产品，大力推广高效节能产品。重点对冶金、有色、化工、建材及交通等行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

加快农村能源商品化进程，推广省柴、节煤炉灶和民

用型煤，形成产业和完善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小型水电、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

2. 交通

以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公路、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加快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形成若干条通过能力强的东西向、南北向大通道。合理配置运输方式，贯彻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加快交通干线建设，突出解决交通薄弱环节，提高运输效率。2000 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6.8 万公里，复线率 34%，电气化率 27%；公路通车里程 123 万公里；沿海港口吞吐量 10 亿吨；民航运输总周转量 140 亿吨公里。

(1)铁路。在"八五"干网建设的基础上，做好完善配套，集中力量打通主要限制口和扩大西南通道，继续建设运煤通道，完善南北通道，强化东北通道，延长西北通道，重点建设若干条大能力干线和地区性新线。发展货运重载运输，增开旅客列车，提高行车速度。继续建设神木——黄骅第二运煤通道，建设南疆铁路。

(2)公路。继续实行以地方为主，国家为辅的方针，与经济发展相协调，重点抓好国道主干线建设，带动整个公路网的完善和配套。实行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配资、利用外资的建设投融资体制。发展重载货车、集装箱拖挂车和中高档客车。"九五"期间，集中资金重点建设 4 条国道主干线中的重要路段。建设部分省区市车流量大的国道及长江、黄河等公路大桥。加强国防、边防公路建设，完善配套边境口岸公路设施，加快中西部地区公路建设。

(3)沿海港口与内河航运。重点建设与运输大通道相联系的煤炭、原油、铁矿石、集装箱、滚装船运输系统。建设秦皇岛煤码头四期、天津港煤码头、黄骅港煤码头一期等工程，以及华东和华南煤炭中转储运基地。建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等集装箱码头。整治长江口、珠江口深水航道。

配套建设和改造内河航运系统，重点建设长江、西江、京杭运河等水运主通道和长江、珠江三角洲水运网。在干线航道上，采用标准化、系列化和较为现代化的船舶。提高装卸机械化和管理自动化水平。实现内河干支流直达运输和江海直达运输。

(4)民航。贯彻安全第一、正常飞行、优质服务的方针，积极推进现代化管理，确保飞行安全，提高航班正常性和服务质量。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干支衔接，突出重点，完善配套的方针，集中力量建设大型枢纽机场和省会机场。扩建首都机场，迁建广州白云机场，新建上海浦东机场。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加强机场、航管、供油、维修设施建设，空中交通管制逐步与国际接轨。根据市场需求和航线结构配置运力，提高飞机载运率。

3. 邮电通信

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坚持高起点，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2000 年，长途光缆线路达到 21 万公里，长途自动交换机总容量 600 万路端。

继续加强长途干线网的建设，重点建设全国联网的光缆干线。对现有微波干线进行数字化改造，建设和完善以程控交换机为主的城乡电话网。加快移动通信网建设并实现全国联网漫游，扩建和完善卫星通信网，发展数据通信网。以进一步提高邮政网运行效率为重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建立航空、铁路、公路相结合的快速邮运干线网。

发挥国家公用通信网的主导作用和专用通信网的能力，形成全国统一的通信网络体系。采用同步数字系列等先进的通信技术，完善网络管理体制。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国家重点建设国际通信、省际干线和中心城市的邮政电信枢纽。地方投资主要用于省内干线、市内电话等地方通信设施。

4. 原材料工业

切实转换增长方式，重点是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大力搞好资源综合利用，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竞争能力。"九五"期间主要以现有骨干企业改造扩建为主，少铺新摊子。

(1)钢铁工业。加快现有大中型钢铁企业的改造扩建，引进和开发当代先进技术，抓好铁路、汽车、造船、电力、石油等专用钢材和不锈钢生产线的配套改造和扩建。加快淘汰化铁炼钢、平炉炼钢、横列式轧机等落后工艺设备，推广高炉喷煤、连铸、连轧技术。2000 年，连铸比提高到 70%以上，板管比提高到 44%，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提高到 100 吨。

大力节约能源，发展综合利用。吨钢综合能耗力争降到 1.45 吨标准煤以下，综合成材率达到 88%，钢铁渣综合利用率达到 85%。

(2)有色金属工业。以现有企业改造扩建为主，通过系统的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增加品种，加强废渣金属回收，搞好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发展氧化铝和建设新的铜基地，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煤电铝联产。2000 年，10 种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520 万吨。

加快新技术应用的步伐，采用氧化铝强化溶出、大型预焙电解铝、铜富氧熔炼、铜铝连铸连轧等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进一步加强矿山金银等伴生产品的回收。进一步加强对钨、锡、锑、钼、稀土资源的保护。加快有色金属和半导体硅材料新产品的开发，重点是电子、机械等行业需要的高纯度材料。

(3)化学工业。大力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支农化工和精细化工，抓好基本化工的技术改造。发展支柱产业和其它产业需要的有机化工和无机化工材料，努力增加

品种，提高质量。要大力加强工艺、技术和装备的自主开发，提高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三）振兴支柱产业和调整提高轻纺工业

支柱产业和轻纺工业要进一步面向市场，激发竞争活力，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支柱产业的发展要确定有限目标，择优扶持，集中突破，提高技术起点，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形成经济规模，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调整改造提高轻纺工业，增强市场的竞争力。把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开发创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按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提高生产效益。

1. 机械工业

重点提高电力、化肥、乙烯等大型成套装备的开发和制造水平，改进数控机床等重要基础机械以及液压、气动、密封、仪器仪表等重要机械基础件的性能和质量。努力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成套制造能力。2000 年，机床产量数控化率提高到 12%，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所需加工设备国内满足率达 80%以上，轿车工业所需加工设备国内满足率达到 50%以上。大型火电成套设备重点开发超临界和联合循环机组。大型水电设备生产能力提高到 500 万千瓦，具备制造单机容量 70 万千瓦特大型机组、20 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和 4 万千瓦贯流式机组的能力。

2. 电子工业

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化系统和装备的能力。对集成电路的发展实行优惠政策，继续实施集成电路专项工程。“九五”期间，6 英寸、0.8 微米集成电路形成工业化大生产。建成 8 英寸、0.5 微米集成电路专项工程，投入工业性生产。研究开发 0.3 微米技术。

发展片式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光电子器件，建立计算机、外部设备及板卡等配套件的生产和出口基地。开发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抓好数字程控交换机、移动通信、光纤通信等设备的开发和生产。发展新一代数字化消费类电子产品。

3. 石油化工

发展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重点发展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合成橡胶。

炼油，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大力提高企业经济规模、产品档次和质量。结合国内外两种资源，合理调整供油分配。加快发展原油、成品油储运设施，逐步发展成品油管道运输。重点改造扩建镇海、茂名、福建等炼油厂。2000 年，原油加工能力达到 2.24 亿吨，轻质油收率提高到 70%。基本停止含铅汽油的生产。

乙烯，走以改造扩建现有乙烯装置为主的道路，大型乙烯装置向 45 万吨以上的规模发展。重点改造扬子、金山、燕山等乙烯装置。注重乙烯原料的优质化，2000 年，优质原料提高到 80%。

加快发展合成纤维，建设好“八五”结转的聚酯、丙烯腈、乙内酰胺工程，开工建设新的合成纤维原料工程。2000 年，合成纤维主要原料生产能力增加到 480 万吨

4. 汽车工业

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经济型轿车和重型汽车，建立自主的汽车技术开发体系，实行规模经营。以大集团为主，促进汽车工业集中投资和产业重组。国家支持 2～3 家汽车集团向 40 万辆及以上的生产能力发展。促进 8～10 家摩托车重点企业，达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2000 年，汽车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 90%以上。

提高零部件的投资力度和生产集中度，扶持一批重点零部件骨干企业尽快达到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的生产经营水平。加快建立我国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体系。

5. 建筑业和建材工业

重点建设城乡住房和公共工程，改进和提高设计水平，加强施工管理，保证工程质量。2000 年，按 1995 年价格，建筑业增加值达到 5000 亿元以上，工程质量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 90%以上。逐步建立建筑市场体系，理顺建筑产品的价格，加快城市住宅建设，提高工程质量。五年建设城市住宅 10 亿平方米。

建材工业以调整结构、节能、节地、节水、减少污染为重点，加快老企业改造、扩建，提高单位生产线规模水平，大力增加优质产品，开发和推广新型建材及制品。提高水泥散装率，发展商品混凝土。限制实心粘土砖的生产和使用，积极利用工业废渣生产墙体材料。促进非金属矿开采加工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发展。2000 年，旋窑水泥产量比重达到 25%左右。

6. 轻纺工业

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加快结构调整和优化，大力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加工深度。

调整产品结构，以创名牌和出口创汇为重点，大力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和优质产品，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调整布局结构，有步骤地把适宜在原料产地生产的初加工能力转到原料产地，把适宜就地加工的农牧产品加工能力转到农村，把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能力由东部沿海地区转到中西部地区。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加快企业的联合、改组、兼并，使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扩大企业经济规模，提高生产集中度，形成一大批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

（四）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以第一、第二产业发展为基础，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继续发展商业和生活服务等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法律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

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健全资产评估、业务代理、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改革管理体制，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区别情况，促进符合条件的福利型、事业型单位向经营型、企业型转变。

商业服务业，继续发展商业零售网点，完善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积极发展配送中心、产需间的直达供货、代理制、连锁经营等新的营销方式。加强重要商品储备库、粮食流通通道等设施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商业发展。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开拓饮食服务业新领域，提高服务质量。

旅游业，积极开发和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加快国际旅游业和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搞好旅游景区开发和配套设施建设，加强管理，文明服务。

信息咨询业，发展科技、工程、管理、统计、会计、审计和法律等咨询业。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管理和法制建设，促进信息市场健康发育和信息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推进信息的社会共享。

（五）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的基本保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国防实力。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国家根据需要和可能，支持和加强国防建设。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加强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要高度重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把武器装备的发展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集中力量有重点地加强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研制手段的更新改造，优先发展高技术条件下防卫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提高国防装备现代化水平。

继续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进一步调整国防科研和工业结构，加强军工企业转产民品的规划、引导和协调工作。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加强国防动员体系建设，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

加快运用军工高技术开发民用产品的步伐。主要是发展大型船舶和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扩大大中型船舶的修造能力，增加出口。采用国际合作方式，提高飞机设计、试验和制造能力，扩大国外民用飞机转包生产。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急需的实用、高效卫星及地面应用系统，积极开展国外卫星发射业务，提高卫星和运载火箭制造技术水平，实现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大力推进核技术的和平利用，重点发展核电，配套建设核燃料循环体系。

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一）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统筹规划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一是适应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坚持自主研究开发和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方针，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加快重大装备的国产化步伐，加快现有设备的更新改造。坚持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依法保护专利发明。二是积极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重点开发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方面的高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积极应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三是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瞄准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中有重大突破。

1.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注重高技术与常规技术的结合，加快推广成熟适用的先进技术。继续进行中低产区综合治理的试验和示范。完善商品粮基地综合生产配套技术。加强动植物优良品种选育，为种子工程不断提供技术支持。加强重大病虫草鼠害的预报、控制技术研究。加强节水技术和旱作技术研究推广。开展防护林工程、沙漠化防治技术的研究。积极促进生物、计算机、遥感等高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2. 提高产业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大产品开发力度。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结合重大工程组织科技攻关，着力解决关键性、共性、基础性的重大技术。通过加强对技术的工程化和系统集成，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开发的重点是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6万吨乙烯裂解炉、大型船舶、20万吨磷石膏制酸联产30万吨水泥装置等。

3. 积极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在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可跨跃的技术层次上，开展高技术研究开发工作。在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农业、医药等生物工程技术，以及新能源、航天、航空、海洋等方面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加快高技术产业化的步伐，重点是铁路高速客运和重载技术，亚微米集成电路和8英寸硅单晶制造技术，交通、电力、制造业及第三产业的电子自动化技术，石油钻采新技术，低温核供热技术，同步数字系列通信技术，大容量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努力提高高技术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办好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 加强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在计划生育、重大疾病防治、新药创制等方面攻克一批关键技术。继续开展洁净煤燃烧技术、废弃物再生技术、防灾减灾技术等的研究和应用。建立一批以科技引导社会发展的综合实验区，开发和推广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5. 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科技问题，瞄准国际科学发展的前沿，选择我国有优势的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研究。积极开展国际间科学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科学发展的丰富资源，把科学发现与技术突破结合起来，推动科学研究和复杂技术系统中交叉学科的研究，提高工程化研究的能力。结合国际科学发展和我国产业技术发展趋势，重点发展新兴带头学科、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主要是生物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和环境科学。国家对重点基础性研究的重大项目给予支持，逐步充实重点基础科研设施，建设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示范网络。

6. 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加快改革和建立科研、开发、生产、营销紧密结合的机制。"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合理分流人才。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推动以技术开发为主的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集团或转化为高技术企业，鼓励大中型企业自办技术开发中心。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研究开发的主体。

(二)优先发展教育

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初中入学率达到85%左右，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左右。各级政府要依法治教，增加教育投入。

1. 加强城乡义务教育。"九五"期间，在占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占总人口95%以上的地区普及5～6年小学教育，其余地区普及3～4年小学教育。重点加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在经费、师资和教学手段上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农村的义务教育要与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提高劳动技能相结合，适时注入社会需要的职业教育内容。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及幼儿教育。

2.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重点做好初中后的中等职业教育，2000年，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达到60%左右。积极发展高中后的职业教育，使高中毕业生除进入普通高校以外，逐步接受多种形式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积极发展电视教育、函授教育、业余进修和自学辅导等多种办学形式。成人教育重点放在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上，发展多种形式的职前、职后和转岗培训教育。

3. 改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重点提高本科教育质量，适度扩大专科教育规模，调整本、专科专业结构，促进各类高等学校的合理分工。分层次、分期分批、有步骤地实施"211"工程。

4.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积极探索与现阶段我国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逐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提倡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体制。非义务教育阶段逐步实行缴费上学、择业自主，同时完善奖学金、贷学金和特困生补助等制度。

5. 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按照教学规律组织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积极采用电化教学的手段。改革考试评估和教学管理制度。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按照不同年龄学生的特点，加强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教育。

6.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政治、业务素质，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

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

要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各地区要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选择适合本地条件的发展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促进各地经济在更高的起点上向前发展。积极推动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合理交换和经济联合。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

1.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发挥通江达海以及农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较高的优势，以浦东开放开发、三峡建设为契机，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条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型经济带。

2. 环渤海地区。发挥交通发达、大中城市密集、科技人才集中、煤铁石油等资源丰富的优势，以支柱产业发展、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建设为动力，依托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综

合经济圈。

3. 东南沿海地区。发挥毗邻香港、澳门、台湾和对外开放程度高、规模大的优势，以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为主，进一步发展创汇农业、资金技术密集的外资企业和高附加值的创汇产业，形成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经济区。

4. 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发挥沿海、沿江、沿边和农林水、矿产、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对外通道建设、水电和矿产资源开发为基础，依托国防工业的技术力量，形成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有色金属和磷硫生产基地、热带亚热带农作物基地、旅游基地。

5. 东北地区。发挥交通发达、重化工业体系完整、土地和能源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搞好图们江地区开放开发，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发展深加工，形成全国重要的重化工基地和农业基地。

6. 中部五省地区。发挥农业发达、工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的优势，以陇海、京九、京广等铁路干线为纽带，形成重要的农业基地、原材料基地、机械工业基地和新的经济带。

7. 西北地区。发挥联接东亚和中亚的区位优势，农牧业、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和军工企业的优势，以亚欧大陆桥为纽带，加快水利、交通建设和资源开发，形成全国重要的棉花和畜产品基地、石油化工基地、能源基地和有色金属基地。

(二)主要政策措施

进一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多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和市场，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高新技术、集约经营，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同时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在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中西部地区，要积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水利、交通、通信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及其加工业，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提高加工深度，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

——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全国性基地的中西部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实行投资倾斜。跨地区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国家投资为主进行建设。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大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力度。

——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比重。

——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60%以上要用于中西部地区。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继续组织中央各部门、社会各界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多种形式支援西藏等民族地区、三峡库区和贫困地区的工程建设。

——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组织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采取多种形式与中西部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人才培训和交流。

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坚决、积极地推进改革，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经济关系，健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秩序，以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全面准确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加大改革力度，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机制、建设善于经营管理的领导班子、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建立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上狠下功夫，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活力。"九五"前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做到点面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配套推进，务求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

1.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法人财产制度；明确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以及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

2.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

性改组。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步伐。"九五"期间，国家集中力量抓好重点联系的1000户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分期分批进行资产重组，吸收、兼并、联合一批中小企业、壮大规模，优化结构，争取使一部分企业进入国际大企业行列。各省区市也要抓好一批国有骨干企业。

3.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按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建立和完善产权登记、统计报告和资产评估等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4. 创造条件，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在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增加资本金、提高效益和偿债能力的同时，对历史包袱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采取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有步骤地减少企业债务。一是对被兼并企业的部分债务实行免息、停息和推迟偿还本金。二是把"拨改贷"形成的企业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三是冲销破产企业的债务。此外，也要发挥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采取多种方式使企业增资减债。

利用企业、社会和政府的力量，多渠道分流富余职工。企业非生产性的后勤服务单位和所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要创造条件逐步分离出去，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

5. 强化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严格管理，加强产品开发，搞好市场营销，提高经济效益。全国推行劳动合同制，在企业内部形成择优竞争上岗机制。允许生产经营严重困难的企业实行经济性裁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

(二)积极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

1. 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巩固和完善主要由市场形成商品价格的机制，除少数产品和服务价格由政府管理外，其他产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通过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风险基金和价格调节基金，健全商品价格调节机制。以批发市场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形式。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设施与渠道，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形成大宗农产品等的批发市场；培育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的大型商贸集团。国有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要转换经营机制，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流通企业，活跃市场。

2. 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和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逐步实现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要素市场的发展，一是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二是必须坚持先试点后推广，逐步规范；三是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尽快建立市场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四是必须与企业改革和财政、金融等改革配套推进。

发展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机制，加快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规范商业银行行为，稳步发展城乡合作银行。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初步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可调控的利率体系。完善结售汇体制，在2000年以前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形成有序、适度竞争的保险市场。

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建立多层次职业介绍网络。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机制和规则。加强劳动仲裁和劳动力市场管理。

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加强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期的出让制度，商业性用地使用权要公开出让。建立健全国家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的垄断和管理制度，规范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土地使用权交易二级市场要形成公开、合理的价格机制。加强集体土地管理，严禁集体土地非法进入市场。

3. 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和监督，规范流通秩序。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加强价格、质量、计量监督，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展和规范市场中介组织，严格资格认定，发挥好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

(三)转变政府职能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着手制定进一步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的方案，把综合经济部门逐步调整和建设成为职能统一、具有权威的宏观调控部门；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对其他政府部门也要进行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认真转变职能。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

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计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财政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运用预算、税收手段和预算内外的综合财力，并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着重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和地区分配结构。

（四）改革投资体制

明确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规范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方式和渠道，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主要靠市场配置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建立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的投资调控体系；发展在法律规范下公平竞争的投资市场。

1. 改革投融资方式。根据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性质和特点，将建设项目划分为竞争性、基础性和公益性三类。竞争性项目以企业为投资主体，通过市场筹集建设资金。政府对支柱产业的重点项目和高技术开发项目有选择地加以支持，参与投资。基础性项目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建设，并引导社会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参与投资。公益性项目主要由各级政府运用财政资金安排建设。

2. 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均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和偿还债务以及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承担风险。公益性项目，要明确具体的政府机构或社会公益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出资者必须使用自有资金，按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作为资本金投入。国家规定不同行业的资本金率，凡资本金达不到规定比率的项目，不得筹集资金和进行建设。

3. 加强和改善建设资金的宏观调控。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专项建设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外贷款实行计划配置。对商业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和股票继续实行总量的规模管理。其他建设资金通过产业政策加以引导。

4. 培育投资市场体系。全面推行工程建设的招标、投标制度，发展工程咨询业，推行施工监理制，加强工程预决算的审计、验证和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并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实行市场竞争。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投资领域中介组织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五）规范和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深化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作用，建立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分配机制，形成工资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提高相适应的关系。进一步完善适应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以及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规范和完善其他分配方式，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按有关规定公平参与收益分配。

国家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继续实行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政策，并通过税收调节等措施解决社会分配差别过大问题。建立法人对支付个人收入的申报制、个人收入申报制和储蓄存款实名制。推进个人收入的公开化、货币化和规范化。运用法律、分配政策等手段，以及社会保障等措施，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

（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在大力发展社会保险的同时，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发挥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制定相应政策，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和优抚救济对象的合法权益。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抚恤补偿机制，依法安置退役军人，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服务。加强福利设施建设。

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法定的基本养老保险要实行统一的制度，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管好用好养老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全部职工的失业救济与再就业相结合的失业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逐步建立城镇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完善不同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七）加快经济立法

坚持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统一，做到改革决策、发展决策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并把经济立法放在重要位置，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继续制定和完善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制定和完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规范政府行为、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

八、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九五"期间，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初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为依据，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维护国家权益。

（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国家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沿交通干线、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中心城市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开放步伐，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振兴。

根据改革和发展的要求，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对外开放，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商业、外贸等服务领域。有计划地发展境外投资，重点是能源、原材料、高技术等领域。积极参与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

（二）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战略

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出口与进口额各为2000亿美元。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重提高轻纺产品的质量、档次，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扩大花色品种，创立名牌，提高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特别是成套设备出口。发展附加值高和综合利用农业资源的创汇农业。按国际标准组织出口商品生产，加强售后服务。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适当提高高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产品的进口比重。大力发展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

积极参与和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双边和多边贸易，相互促进，实现市场多元化。在巩固提高传统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新市场，拓展出口渠道。改革援外方式，鼓励我国优秀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实行合资经营，实行政府优惠贷款等办法，加强"南南合作"，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双边关系的经贸合作的发展。

坚持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继续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口体制，建立有利于改善进口结构、促进引进技术消化、创新的机制；提高出口竞争力，形成出口增长主要依靠质量效益的机制。分步降低关税税率，"九五"期间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调整关税结构，清理税收减免；规范和减少进出口商品管理的非关税措施，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进出口商品配额招标、拍卖和规则化分配，积极实行关税配额的试点；加强并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功能，逐步用行业组织的自律行为替代部分政府行为；逐步实行外贸经营依法登记制，发展贸易、生产、科技、服务相融合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促进规模经营；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并完善统一、科学、公开的外贸管理制度和手段。

（三）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吸引外资主要靠有吸引力的市场，靠优越的投资环境，靠健全的法制和高效的管理。要改善环境，拓宽领域，引导投向，优化结构，增辟融资渠道，加强国内配套，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政策，实行国民待遇。依法管理外商投资企业，保护中外投资者和职工的正当权益。引导外商参与国家鼓励的基本建设项目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重点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建设项目，拥有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能降耗和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的技改项目，能够提高产品档次、扩大出口创汇的项目，能够综合利用资源、防治环境污染技术的项目。国家通过对外发布信息，加强引导。认真做好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等新投资方式的试点。

借用国外贷款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产业政策和偿还能力，做到适度和高效，重点是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行业中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和出口创汇项目。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借款成本。多利用长期优惠贷款，降低商业性贷款比重，调整债务结构和币种结构。加强和改善对外借款的宏观调控和项目管理，建立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管理体系。切实抓好项目建设管理，做到按计划实施，及时产生效益。地方和部门要建立对外偿债基金，保证按时偿还外债。

九、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按照社会事业的不同类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实行地方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发展，多渠道筹措社会发展资金，注意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国土资源保护和开发

依法保护并合理开发土地、水、森林、草原、矿产和海洋资源，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强土地管理。

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开发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环境。

加强测绘工作，搞好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地质勘查，贯彻保证基础地质、加强普查、择优详查、对口勘探的方针，努力增加矿产资源储备。加强灾害性天气、气

候和地震、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与防治。

（二）环境和生态保护

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有建设项目都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要求。搞好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创造条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健全环境保护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加强工业污染的控制，逐步从末端治理为主转到生产全过程控制。2000年，县及县以上工业废水处理率达到83%，废气处理率86%，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50%。乡镇工业污染处理能力要有大幅度提高。加强城市环境整治。2000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25%，绿化覆盖率27%，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0%，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达标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重点治理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和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的污染。保护国土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快水土流失地区综合治理和森林植被恢复发展，控制农田污染和水污染。200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5.5%。

（三）城乡建设

统筹规划城乡建设，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加强城乡建设法制化管理。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规模适度，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

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发展。2000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村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42%，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70%。

加快城市住宅建设，实施安居工程，大力建设经济实用的居民住宅。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促进住房商品化，发展住房金融和保险，培育住房建设、维修、管理服务市场。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地发展一批小城镇，引导少数基础较好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他小城镇向交通方便、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方向发展。

（四）文化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繁荣文艺创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全面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促进文化事业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调整和优化文化行业结构，创作一批文化艺术精品和优秀剧目，培养和造就文艺人才。大力发展各类社会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和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加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剧场、音乐厅、美术馆、青少年活动基地、图书发行网点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搞好农村文化网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积极推广和普及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加强书刊、音像、演出、娱乐等文化市场的管理。

把握广播电视的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节目制作能力和质量，丰富节目内容。加强广播电视覆盖网建设，2000年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5%和90%。扩大广播电视的对外宣传。提高电影质量，改善电影发行机制，加强电影市场管理。

（五）卫生

坚持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进步、为人民健康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积极发展卫生保健事业，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

重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质量和卫生状况，2000年农村改水受益人口达到90%。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强化对传染病的监控和免疫接种。防治职业病，地方病。继续振兴中医药事业，促进中西医结合。

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医疗保健制度，推进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逐步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医疗服务管理，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卫生执法。

进一步加强医药市场管理，大力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药品质量。

（六）体育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群众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学校体育，明显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落实奥运争光计划，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体育科研、教育、宣传和对外交流的发展。

建立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建立并完善国民体质测定系统。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

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要把提高青少年素质作为工作重点。形成有

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文化条件和社会风尚。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干部和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要加强对“九五”期间和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坚持不懈地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使社会成员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道德。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形成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建立和推广尊老爱幼、敬师爱生等良好的礼仪制度。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吸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

——坚持不懈地加强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惩治腐败分子。建立健全防范干部滥用职权的监督制度，坚决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普遍进行创建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城市的活动、军民、警民、工农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提倡开展社会志愿者活动和社会互助活动。大力表彰和宣传各类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破除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长期的共同任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制定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增加投入，给予物质保障。健全和完善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协调机构，进一步理顺领导体制，形成各级主要领导负总责，各有关部门和团体共同参与、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依据宪法，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侨务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提高办事效率。继续完善城镇居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基层民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加强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工作。坚持改革、发展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继续制定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和改善司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等现象，建立对执法违法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以廉政建设、整顿纪律、严肃执法为重点，加强司法、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继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广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各级政府和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

(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政法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以维护稳定为重点，充分履行各项法律职责，加强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及时粉碎旨在分裂祖国、颠覆政府、挑起动乱、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

积极防范和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与经济犯罪活动，坚决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持不懈地查禁和取缔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严惩贪污贿赂、走私贩私、金融和商业诈骗、骗税逃税等严重经济犯罪。加强防范火灾、交通事故等工作。

全面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各级领导责任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善政法工作条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完善各种治安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依法处理经济、民事纠纷，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疏导教育工作。

十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九五”期间，我国将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自“基本法”的规定，在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其现行社会制度不变，享有高度的自治，并成为中国的单独关税地区，实行财政独立，继续保持自由港地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纳入中央政府的规划。保证香港和澳门参加国际双边和多边经贸活动，继续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澳门同内地在经济上更好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香港、澳门稳定繁荣，也有利于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依法保护台商的正当权益，促进和平统一大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展现了我国迈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是中国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实现《纲要》制定的各项目标，将使中国在世界面前呈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为全国实现《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新华社讯，3月20日《人民日报》）

首届亚欧会议

背景介绍

首届亚欧会议3月1日在曼谷的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中国、日本、韩国、东盟7国和欧盟1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代表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参加了开幕式。

为期两天的首届亚欧会议3月2日在曼谷通过《主席声明》后顺利结束。声明强调，亚欧国家今后在加强政治对话的同时，将促进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上就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加强两洲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材料：

- 首届亚欧会议在曼谷举行并发表《主席声明》 中国总理李鹏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材料 首届亚欧会议在曼谷举行并发表《主席声明》 中国总理李鹏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首届亚欧会议3月1日在曼谷的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中国、日本、韩国、东盟7国和欧盟1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代表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参加了开幕式。

当天上午8时30分，与会国领导人开始陆续抵达会议中心。东道主泰国总理班汉在接待厅一一迎接各国领导人。

开幕式在会议中心的大会厅第三厅内举行。主席台上方并排悬挂着与会国国旗，下方有3个会标图案，台上摆放着盛开的鲜花，会场上铺着崭新的红地毯。气氛非常热烈。

9时35分，与会领导人步入会场，分5个长桌并排而坐。班汉总理主持会议并致词。他首先热烈欢迎各国领导人参加这次亚欧历史性会议。他指出，“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此聚会：建立一种富有活力的新联系和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总理迪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也在开幕式上致辞，都表示愿同亚洲国家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同构筑欧亚新型伙伴关系。

他们讲话结束后，与会领导人走到主席台前的台阶上排成一行，每个人都在胸前交叉双臂，一起紧紧握手，谈笑风生。在场的摄影和摄像记者争先恐后摄下了这一历史性镜头。会场上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领导人走进第二厅，开始举行会议。中国总理李鹏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　*　*

为期两天的首届亚欧会议3月2日在曼谷通过《主席声明》后顺利结束。

出席会议的东盟7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1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会上就加强亚欧间的合作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上就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加强两洲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会议最后通过了《主席声明》。声明强调，亚欧国家今后在加强政治对话的同时，将促进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

声明指出，这次会议“为促进发展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新型伙伴关系旨在为维护亚欧两大洲的和平、持续发展和繁荣而加强亚欧之间的联系，这将有助于全球的稳定与繁荣。声明要求亚欧各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增进两洲人民之间的了解而负起责任。

有关政治对话问题，声明说，亚欧会议的举行表明了亚欧加强政治对话的愿望。亚欧国家应该扩大共识，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和加强合作。与会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开展政治对话。与会领导人回顾了亚欧两洲政治和安全形势，决定为促进政治对话而加强学术界的交流。此外，与会领导人还认识到军控、裁军和毁灭性武器不扩散的重要性，重申亚欧国家将在上述领域加强合作。

声明说，会议认为日益加强的亚欧经济联系是建立亚欧两洲之间坚实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为进一步加强这一关系，与会领导人决心加快亚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速度，鼓励两洲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扩大合作，加速有关农业、信息、电信、能源、交通等的领域的科技交流。会议决定两洲有关高级官员尽快开会进一步磋商有关经济合作的细节，为指导两洲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的合作建立亚欧商务论坛。

声明说，会议还决定亚欧两洲将扩大在环保、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并为加强经济合作而制定了一些具体后续行动措施。

会议决定下次会议两年后在英国举行。

*　*　*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3月1日晚在曼谷新王宫会见了出席亚欧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他们的夫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朱琳参加了会见。

普密蓬国王对各国领导人出席亚欧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见结束时，宾主合影留念。

当晚，泰国总理班汉·西巴阿差在总理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前来出席亚欧会议的各国领导人或代表和欧盟主席以及他们的夫人。

中国国务院部理李鹏和夫和朱琳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班汉总理同来宾们在宴会厅门前合影留念。席间，泰国艺术家表演了传统的泰国舞蹈和演奏了乐曲，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向各国领导人献了鲜花。

*　*　*

国务院部理李鹏应泰国总理班汉的邀请，于2月29日至3月2日赴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于3月1日至2日在曼谷举行的首届亚欧会议。陪同李鹏赴泰国的有：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和夫人周寒琼、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吕聪敏、特别助理万经常等。

2月29日下午，李鹏总理乘专机抵达曼谷。

李鹏总理的专机降落在机场后，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在泰国外交部礼宾司长苏耐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金桂华的陪同下走下飞机，同前来迎接的泰国政府副总理他信和夫人新切握手，互致问候。他信和夫人分别向李鹏和朱琳献了花环。随后，李鹏同前来迎接的泰国政府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华侨团体代表、中国驻泰使馆外交官等一一握手。然后，李鹏在他信等陪同下驱车前往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

李鹏的陪同人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夫人周寒琼、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等也同机到达。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已先期抵达。

3月1日，李鹏总理在亚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与其他与会国领导人共同探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关系。

会议期间，泰国国王普密蓬和总理班汉分别会见了李鹏总理。李鹏总理还会见了法、英、日、韩等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等。

3月2日，李鹏总理在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亚欧会议后，乘专机离开曼谷回国。

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夫人周寒琼、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等陪同人员也同机回国。

泰国总理府部长汶攀·革瓦达那、华侨团体代表、中国驻泰大使金桂华等到机场为李鹏总理送行。

（新华社、《人民日报》曼谷电，
3月1—3日《人民日报》和
3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

背景介绍

1996年3月8日至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和南海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1996年3月12日至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先进的战机、舰艇、导弹、电子战装备在演习中密切协同，显示出强大的空中、海上打击威力。圆满成功的演习表明，通过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深化改革和严格刻苦训练，这两个重要军种的现代化水平和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

1996年3月18日至25日，南京战区在台湾海峡成功地组织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显示了我三军部队优良的军政素质、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材料：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和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

材料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和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

新华社北京3月5日6时讯，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96年3月8日至3月15日，向北纬25度13分、东经122度20分，北纬25度13分、东经122度40分，北纬24度57分、东经122度40分，北纬24度57分、东经122度20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以及北纬22度38分、东经119度25分，北纬22度38分、东经119度45分，北纬22度22分、东经119度45分，北

纬22度22分、东经119度25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　　*　　*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18时讯，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和南海进行的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已经结束。以北纬25度13分、东经122度20分，北纬25度13分、东经122度40分，北纬24度57分、东经122度40分，北纬24度57分、东经122度20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以及北纬22度38分、东经119度25分，北纬22度38分、东经119度45分，北纬22度22分、东经119度45分，北纬22度22分、东经119度25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从3月15日18时恢复正常航行。

*　　*　　*

“点火！点火！”随着指挥员下达的发射命令，一发发导弹喷着长长的火龙，撕破长空，飞向预定目标。

3月8日至15日，第二炮兵部队以4发导弹全部击中目标的佳绩，圆满完成了地对地导弹向东海和南海海域的发射训练任务，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近些年来，第二炮兵部队以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遵照军委主席江泽民关于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结合第二炮兵武器装备不断发展、导弹已形成多型号系列化的实际，加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广大官兵努力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深化训练改革，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快速机动作战能力、准确打击目标能力得到迅速提高。

参加导弹发射训练的部队接受任务后，快速到达集结地域。深夜，万籁寂静。记者在发射现场看到，随着一道道作战命令的下达，隐蔽在各集结地域的导弹发射部队迅速向发射阵地机动。担负首发导弹发射重任的是荣立过集体二等功、多次圆满完成导弹发射任务的某部发射三连。全连官兵以高昂的士气，密切的协同，精湛的技术，迅速占领了阵地，展开武器装备。随着“一号手准备完毕！二号手准备完毕……”洪亮的报告声按时完成了发射准备。一枚枚威武挺拔的乳白色导弹，耸立在群山环抱的各个发射阵地，官兵们严阵以待。

在指挥所里，记者置身于指挥高技术战争的氛围之中，只见屏幕上不断显示出各发射阵地的场景：身着迷彩服的指挥员运用现代化指挥手段，沉着、果断地下达命令，及时处置各种情况；参谋人员通过联网微机迅速准确地掌握发射准备的进程。此时，微机屏幕显示出：各发射阵地导弹技术状态良好，发射人员已全部进入号位；情报观测系统已启动，各观测点已做好观测准备；保障分队已做好各项保障。导弹一触即发。

深夜，指挥所下达了发射命令。随着一声声巨大的轰鸣，导弹呼啸腾空，顿时地动山摇。“第一发导弹命中目标！”“第二发导弹命中目标！”……

这一声声激动人心的报捷，显示了第二炮兵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为目的的丰硕训练成果；标志第二炮兵部队和全军将士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发射现场，记者采访前来看望参训部队的第二炮兵司令员杨国梁、政委隋永举。他们对记者说，这次导弹发射训练的成功，锻炼了部队，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检验了科研和训练改革成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表示，第二炮兵部队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江泽民主席关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江泽民主席关于“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提高第二炮兵部队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应有的贡献。

材料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

新华社北京3月9日18时讯，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96年3月12日至3月20日，在北纬23度57分、东经118度06分，北纬23度25分、东经118度50分，北纬22度30分、东经117度30分和北纬23度01分、东经116度46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进行海、空实弹演习。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　　*　　*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18时讯，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海、空实弹演习已经结束，以北纬23度57分、东经118度06分，北纬23度25分、东经118度50分，北纬22度30分、东经117度30分和北纬23度01分、东经116度46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从3月20日18时起恢复正常航行。

*　　*　　*

3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先后在东海和南海，举行了气势磅礴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实兵实弹演

习。先进的战机、舰艇、导弹、电子战装备在演习中密切协同，显示出强大的空中、海上打击威力。圆满成功的演习表明，通过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深化改革和严格刻苦训练，这两个重要军种的现代化水平和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

记者分别在现场目睹了这两场牵动人心的演习。

闽南某地：风云变幻的某海湾上空，成为展示空军战斗力的大舞台。这天，尽管气象条件复杂，但没有阻碍由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电子干扰机、侦察机等组成的强大突击集团，展开精彩的空中打击演练。据空军司令员于振武、政委丁文昌介绍，共有10多个兵种参加了此次演习。参演兵种、机种之多，出动飞机的批次、架次之多，发射实弹之多，演练难度之大，协同之复杂，都是近年来少有的。记者看到，演习中既有歼击机群对“敌机”实施猛烈攻击，夺取制空权；又有联合突击机群采用多种手段，低空超低空连续突击“敌”海上和陆地的重点目标；还有航空兵与地空导弹、高炮部队空地协同抗“敌”空中突击。既有空地火器的“硬摧毁”，又有电子战的“软杀伤”，展示了我人民空军的综合作战能力。空军航空兵以先进战机作拳头，组成联合机群，使空军的空战能力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大为提高。地空导弹兵也由过去单一型号装备向具有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多型号相配套的防空体系发展。尤其是一批新装备在这次演习中显示强大的威力。先进歼击机的空中截击如闪电霹雳，强击机的低空突击像惊雷蹈海，新型地空导弹的发射似利剑劈空，轰炸机云中投弹如泰山压顶。连续实施的攻击如骇浪惊涛，波波相连，排空而来，势不可挡。整个演习，贴近实战、组织周密、协同密切、连续实施，展示了空军部队各级指挥员的良好素质和指挥能力。

南海某海域：空中机群破雾穿云，海面战舰铁阵森严，水下“长鲸”游弋出没。随战舰出海的记者在这里充分领略了三维空间展开的现代海战的恢宏场面。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政委杨怀庆告诉记者，由核潜艇、新型常规潜艇、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先进的电子侦察船等多个舰种数十艘战舰和海军航空兵多个机种组成的海空突击力量群，出演了这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海上诸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一个个高难度课题的演练，展示出我海军良好的军事素质。记者看到，舰机协同夺取海上制空权，空空导弹如空中迅雷，舰空导弹像万丈长缨，打得“敌”机灰飞烟灭；联合反潜，舰载直升机编队搜索，准确定位，与水面舰艇联手攻击，鱼雷、火箭深弹齐发，让深藏水下的“幽灵”葬身鱼腹；贯穿全过程的电子战，运用部署在空中、海上和岸基的电子装备协同进行的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支援作战，显示了我军在这一“特殊战场”的制胜能力；多舰种、多方位的导弹攻击，阵容不凡的多艘驱逐舰、护卫舰的导弹齐射，诸兵种合同打击“敌”战斗舰艇编队，是这场演练最振奋人心的一幕。尽管演习气象复杂，但海军官兵凭借精湛的技术、良好的指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实弹演练。

近年来，海、空军广大指战员以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针，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深入贯彻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建设部队，加强对先进军事理论和战法的研究，积极组织复杂条件背景下的高难科目的训练。目前，海军部队的合格舰长大幅度增长，核潜艇、常规动力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等主战舰艇全部完成了跨海域训练科目，具备了很强的协同作战能力。空军航空兵甲类团和具有4种气象水平的飞行员，均达历史最高水平。这是海、空实弹演习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纵观演习全过程，记者在几个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演习充分体现了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特点，一批重要的新战法得到实际运用和检验；二是部队训练作风扎实，战斗作风过硬，战备工作落实；三是作为海、空军作战“拳头”的新型装备训练取得了丰硕成果，普遍形成了战斗力。此次海、空演习所发射的空空导弹、地空导弹、航空导弹、舰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轰炸投弹、火箭、火炮、鱼雷、深弹攻击也达到了很高的准确度，显示了我海、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强大实力。

海、空实弹演习后，还举行了气壮海疆的空中、海上阅兵式、分列式。海空军官兵斗志昂扬、士气如虹。他们的钢铁誓言响彻海空：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决不允许一寸领土从祖国分裂出去。

材料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

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96年3月18日至3月25日，在北纬25度50分、东经119度50分，北纬25度32分、东经120度24分，北纬24度54分、东经119度56分和北纬25度12分、东经119度26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　　*　　*

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陆海空联合演习已经结束，以北纬25度50分、东经119度50分，北纬25度32分、东经120度24分，北纬24度54分、东经119度56分和北纬25度12分、东经119度26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从3月25日18

时起恢复正常航行。

*　　*　　*

3 月 18 日至 25 日，南京战区在台湾海峡成功地组织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从争夺制海制空权到快速装载航渡，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机降部队垂直登陆，从多层次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从立体穿插分割到纵深越点攻击，记者在演习现场目睹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的壮阔场景。演习的成功，显示了我三军部队优良的军政素质、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观看演习，转达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对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全体指战员的亲切问候。此前，张万年还观看了海军和空军在南海和东海举行的军事演习。

近几年来，我三军部队以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遵照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依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努力探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三军联合作战的特点和规律，部队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次演习进一步检验了训练改革和战法研究成果，使三军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渡海登岛演习海域风雨交加，浪高涌大。由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登陆舰艇和民用船只组成的登陆编队，在空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舰炮、导弹强大火力的支援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军”的拦阻行动。空中硝烟弥漫，海上水柱冲天。扫雷舰、猎潜艇奋勇当先，破除水际滩头障碍；水陆两栖坦克突击群跃出登陆舰，多梯队编波冲上滩头；由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等组成的登陆艇波和搭乘民船的民兵、预备役部队编队，连续抵滩冲击；海军陆战队乘坐气垫船和冲锋舟，像一支支利箭射向登陆点；神勇的空降兵和陆军特种兵，在“敌军”纵深阵地伞降、机降着陆，实现了指挥员多点登陆、立体突破、分割围歼、夺占和连接登陆场的战役意图。

岛上山地进攻作战演习地域山峦起伏。完成登陆后我主攻部队在空军、陆军航空兵和地面炮兵火力掩护下，采取并肩突击、两翼卷击、乘隙穿插和越点攻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火力向“敌军”发起猛攻。顿时，战机呼啸，战炮轰鸣，使“敌军”前沿笼罩在火海硝烟之中，为主攻部队向“敌”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担负主攻任务的部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军部队，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在诸军兵种以空中打击、火力拦阻、电子干扰、障碍迟滞、兵力抗击等多种手段联合抗“敌”反击的同时，由直升机、坦克、炮兵和步兵组成的我合成突击群，以风卷残云之势围歼了纵深核心阵地之“敌”。

参加演习的三军技术、后勤保障部队官兵运用伴随保障、强行保障、立体保障等多种方法，为三军联合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后勤保障。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具有拥军支前光荣传统的福建省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急部队所急，送部队所需，成为三军将士坚强的后盾。

在这次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中，一系列高科技装备发挥了拳头作用，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强，新战法运用威力大，克服恶劣天气和复杂海情影响的办法多，进一步增强了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记者采访了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和政治委员方祖岐。他们表示，南京战区三军官兵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在会见参演部队领导干部时作了讲话，他指出，我军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关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增强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多做贡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张万年强调，我们主张并且一贯致力于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出现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我们将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张万年要求全军部队按照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深化战法研究和训练改革，增强训练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加大训练的强度和难度，努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随时准备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坚持科技强军，注重质量建设，在全军形成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气，向科技进步要战斗力，向质量建设要战斗力，向科学训练和管理要战斗力，圆满完成“九五”期间军队建设任务，把我军质量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崭新的面貌迈入 21 世纪。

（新华社讯，3 月 6、10、16、21、26 日《人民日报》）

李鹏出席越共八大

背景介绍

1996 年 6 月 27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鹏同志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河内，出席于6月28日举行的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鹏同志在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越共八大表示热烈祝贺。李鹏向越共八大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李鹏出席越共八大，有利于发展同越南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关系，符合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是两党关系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的生动体现。

材料：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并发表重要讲话

材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并发表重要讲话

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率中共代表团6月27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河内，出席于6月28日举行的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吕聪敏等。李鹏回国后，温家宝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为期4天的越共八大有关活动。

出席越共“八大”的中共高级代表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率领下，6月27日中午抵达河内。

当地时间11时30分，李鹏一行乘坐的专机在河内内排机场降落。机场上飘扬着中越两国国旗，洋溢着欢庆气氛。一条红地毯铺到舷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孟琴，越共中央委员、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阮功丹和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在舷梯旁热情迎接李鹏同志。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越南女青年向李鹏同志以及同机到达的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和代表团成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献了鲜花。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和使馆工作人员也到机场迎接。

李鹏同志在阮功丹陪同下抵达政府宾馆时，受到在这里等候迎接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武文杰和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红河以及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武宽的热烈欢迎。李鹏同志等再次接受了越南女青年献的鲜花。

武文杰代表越共中央对李鹏同志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越共中央把李鹏同志率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看作是对越南党和人民的巨大鼓舞，并对中共中央再次表示非常感谢。李鹏表示，很高兴能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友好邻国越南出席越共“八大”。他对越共中央的邀请和当天受到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又讯，李鹏6月27日晚来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亲切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中国驻越其他机构的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李鹏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为增进中越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陪同李鹏到使馆的有代表团成员温家宝、李淑铮等。

*　*　*

6月28日上午，率中共高级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理鹏在巴亭会堂亲切会见越共中央顾问阮文灵和范文同。

李鹏说，我今天有机会再次见到越南德高望重的阮文灵同志和范文同同志，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亲切问候，衷心祝愿你们健康长寿。

李鹏表示，自从越共“六大”以来，越南坚持革新开放路线，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钦佩。李鹏说，中越两国是近邻，中国非常重视发展同越南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关系，符合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

阮文灵、范文同对李鹏率中国共代表团前来出席越共“八大”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们认为这是两党关系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的生动体现。

阮文灵怀着深情回忆起1990年越中两党成都高级会晤的情景。他说，两党、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实在令人高兴。我们有责任继续巩固和发展由胡志明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亲手培育起来的越中友好合作关系。

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定宝参加了会见。

当天下午，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在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越共八大表示热烈祝贺。李鹏向越共八大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

*　*　*

6月28日下午，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越共中央办公大楼同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亲切会见，就进一步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交谈。

李鹏首先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对杜梅总书记的亲切

问候。他说，应越共中央邀请，我受中共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委托，率团出席越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同杜梅总书记和武文杰总理等越共中央领导同志再次见面，感到非常高兴。李鹏说，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在长期的武装解放斗争中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近向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 1994 年 11 月访越和杜梅总书记 1995 年 11 月访华，对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将中越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这次前来出席越共"八大"是为了表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友好情意。我们衷心祝愿越共"八大"取得圆满成功。

李鹏说，中国高度评价越南的全面革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就，这些成就是你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创造性地结合的结果，是对胡志明思想的发展。我们对越南党和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方面做出的成绩表示非常钦佩，相信越共"八大"将对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李鹏说，中越两国社会制度相同，又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在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强中越友好合作关系，推动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杜梅对李鹏同志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前来出席越共"八大"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说，越南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和援助，越南党和人民对此永志不忘。这次李鹏同志率团出席越共"八大"，体现了两党、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的情意，是越中两党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越中两党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衷心希望越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代代相传，万古长青。杜梅还向李鹏介绍了越共八大的筹备等情况，特别是党的建设等问题。

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中共代表团成 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吕聪敏参加了下午的会见。越南方面参加会见的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理武文杰，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孟琴，越共中央书记、中央对外部部长红河，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武宽。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邓严衡也参加了会见。会见结束后，杜梅总书记设宴款待李鹏同志一行。他请李鹏同志转达他对江泽民总书记的问候。

* * *

6 月 28 日下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越共八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乘专机离开河内回国。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孟琴，越共中央委员、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长阮功丹，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等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和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也到机场送行。

专机飞离河内时，李鹏向越共"八大"主席团发了感谢电，对越共中央、越南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友好 、诚挚、周到的接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鹏回国后，温家宝代理中共代表团团，在河内继续参加为期 4 天的越共八大有关活动。

* * *

正在河内出席越共"八大"的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出席越共"八大"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团长坎代主席 6 月 28 日晚在河内亲切会见。

两位领导人十分愉快地回忆起不久前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的会面，对再次会见都感到非常高兴，认为加强两党两国高层往来，对于相互的了解和信任非常有益。

温家宝说，中国和老挝山水相邻，中老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近来又有新的发展。虽然两国的国情不同，但有许多共同点，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温家宝向坎代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以及中国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的新切问候。坎代对此表示感谢，并请温家宝转达他对江总书记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诚挚问候。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老挝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在国内革命和建设中注意参考、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重要经验。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是支持中国的。

坎代还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各族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 75 周年，温家宝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感谢。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和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也参加了会见。

* * *

出度越共八大的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 7 月 1 日晚在河内亲切会见了出席越共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黄长烨，共叙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温家宝说，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新手缔造和培育、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近年来，我们两党、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他说，维护和加强中朝传统友谊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不变的方针。我们希望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继续增进往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日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继承金日成主席的遗志，克服重重困难，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黄长烨首先向温家宝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他说，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对此感到很高兴。

他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一直强调，要不断加强和发展由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朝中友谊。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给予的帮助。朝中之间的友谊是兄弟般的友谊。黄长烨表示相信，他与温家宝同志的会面将会对进一步发展朝中两党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

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和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也参加了会见。

* * *

正在河内参加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理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6月30日在接受越南通讯社、《人民报》、越南电视台和《越南之声》广播电台等越南新闻单位的记者采访时说，李鹏同志在河内期间与越南领导同志的亲切友好会见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越两国业已存在的睦邻友好关系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温家宝还说，由李鹏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应邀前来河内祝贺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此期间，李鹏同志同越南领导同志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见，并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对两党、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和良好的发展感到满意，并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特别是在加强和发展中越友好关系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发展和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个大局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谈到中越关系的前景时，温家宝说："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越睦邻友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

* * *

出席越共八大的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7月1日上午在河内分别会见了柬埔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柬埔寨王国国会主席谢辛和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代表团团长秦锡伦。

温家宝同两位代表团团长分别互致问候后说，中国共产党同柬两党接触交往有利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中国希望柬埔寨保持和平、稳定和繁荣，相信柬埔人民在西哈努克国王和王国政府的领导下必将把柬埔寨建成和平、中立、富强的国家。

谢辛表示，柬人民党一贯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柬王国和国会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祝愿柬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秦锡伦说，长期以来，柬埔寨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我们两党关系的良好发展充分体现了两国间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

*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温家宝同志，在出席了于6月28日至7月1日在河内举行的越共"八大"有关活动之后，7月2日离开河内回国。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光宝，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吕聪敏，中联部副部长戴秉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以及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武光阔等前往机场欢迎温家宝一行。

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等同机回国。

（《人民日报》、新华社河内电，
6月28、29日和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二十六届奥运会

背景介绍

第26届奥运会开幕式亚特兰大时间7月19日晚8时45分起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奥林匹克体育场隆重举行。这是适逢现代奥运会百年诞辰的一次盛会，也是参加国家和地区最多，参加运动员最多的一次全球体育大家庭的团聚。在本届奥运会上，首次实现了受邀国家和地区全部参加的目标，197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会聚五环旗下。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次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

材料一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6届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

第26届奥运会开幕式亚特兰大时间7月19日晚8

时45分起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奥林匹克体育场隆重举行。这是适逢现代奥运会百年诞辰的一次盛会，也是参加国家和地区最多，参加运动员最多的一次全球体育大家庭的团聚。在本届奥运会上，首次实现了受邀国家和地区全部参加的目标，197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会聚五环旗下。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第26届奥运会开幕式开始。

其后是约1小时45分钟的开幕式表演，约8000名演出人员以7个主题场次的表演，分别体现了奥运会的宗旨和精神、亚特兰大对世界的盛情、佐治亚州和美国南部的文化风情与底蕴、奥运会传统等主题。开幕式表演以现代声光效应与传统表现手法相结合，吸引了全场8万多观众。在主题为“各国共行”的最后一场表演之后，197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队伍相继入场。希腊队按惯例首先入场，10时许，排序第42位的中国代表队出现在入场通道的门口，篮球运动员刘玉栋高擎五星红旗走在前面。中国运动员和体育官员精神饱满地绕场行进，向全场观众频频挥手致意，场内观众也纷纷向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体育健儿鼓掌和挥动彩巾。香港地区和中国台北代表队分别以第81和第172位的排序入场。

运动员入场后，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佩恩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后致词。佩恩表示希望奥运会能反映对更光明的未来和更美好的世界的期冀。萨马兰奇说，体育是友谊，体育是健康，体育是教育，体育是生活。萨马兰奇说，就如今天亚特兰大这样，体育把世界带到了一起。萨马兰奇还表示，奥林匹克运动准备为波黑体育设施的战后重建贡献力量。12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第26届奥运会开幕。奥运会旗由美国著名运动员伦德奎斯特等8人护持入场升在主会场的上空。在表彰了历史上著名的运动员之后，事前严格保密的火炬点燃程序终于登场，著名拳击运动员霍利菲尔德从地道高擎火炬出现在会场中央，经传递，由游泳女运动员埃文斯将火炬传给了拳王阿里，阿里点燃了主会场火炬塔上的火炬，全场欢腾。在运动员和裁判员宣誓后，会场回荡起最后的结束曲：“更快、更高，更强”。此时，礼花升空，亚特兰大的星空一片灿烂。

亚特兰大时间7月20日，在第26届奥运会开赛的第一天，中国体育健儿奋力拚搏取得开门红，喜获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在当天进行的女子柔道72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后起之秀孙福明勇挫古巴名将埃·罗德里格斯，喜气洋洋地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第一枚金牌挂在胸前。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我国泳坛女杰乐靖宜以54秒50的成绩折桂。带病参加男子气手枪比赛的射击老将王义夫，在预赛中排名第一，决赛的前九枪也一路领先，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患脑供血不足，在眼前发黑，身体已难以控制的情况下，硬是凭直感打了最后一枪，中了6.5环，仅以0.1环之差屈居亚军。在男子举重54公斤级角逐中，张祥森因右臂突然受伤，与金牌失之交臂，最后以280公斤的总成绩为中国队再添一块银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发来贺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祝贺中国选手孙福明、乐靖宜和王义夫、张祥森在本届奥运会首日的柔道、游泳和射击、举重比赛中分别获得金牌和银牌，并向代表团和运动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另外，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也给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来贺电。

同日，波兰射击选手摩尔以497.6环获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冠军。欧洲女选手在这项比赛中大显威风，包揽了前8名。德国的霍尼伯尔功亏一篑，最后一枪只打出8.8环，结果以497.4环屈居亚军。南斯拉夫的伊沃塞获铜牌。

比利时选手弗·德博格拉耶夫，当天在男子100米蛙泳的预赛中游出了1分00秒60的成绩，打破了匈牙利选手卡·古特勒保持的1分00秒95的原纪记录。

亚特兰大时间7月21日，中国体育健儿夺得1枚金牌和1枚铜牌。来自广西的大力士唐灵生在59公斤级举重比赛中，斗志冲天、一举拿下金牌，并以307.5公斤的总成绩刷新了保加利亚运动员佩沙洛夫保持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我国举重选手时隔12年后再夺奥运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增添一枚铜牌的是跤场大力士盛泽田，他在古典式摔跤57公斤级比赛中勇获第3名。上届奥运会他就荣获这个级别的铜牌。

国际奥委会7月21日责成亚特兰大奥委会改善其交通运输工作和比赛结果的汇总发布工作。

在近两天的比赛中，运动员和记者的交通问题令人沮丧，日本与荷兰的棒球比赛因交通问题推迟，有的赛艇运动员拒绝乘交通班车去场地。

IBM的计算机成绩通报系统令新闻记者们怒火冲天，比赛结果经常不能及时调出，计算机经常死机。

亚特兰大时间7月22日，出战各赛场的中国健儿取得两枚银牌和两枚铜牌。男子体操团体决赛，中国队当天在自选动作比赛中努力追赶老对手俄罗斯队，一度将差距缩小到0.5分左右，但最终还是名列第二。我国游泳女将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与东道主美国队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拚争，游出了目前自己最高水平，夺得银牌。中国选手当天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64公斤级举重选手肖建刚和女子柔道66公斤级选手王显波。

亚特兰大时间7月23日，22岁的占旭刚在70公斤级比赛中以357.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并一举打破总成绩、挺举、抓举3项世界记录，这在本届奥运会上还是首次。中国队的一枚银牌是刘黎敏在女子100米蝶泳

中夺得的。

7月24日，参加第26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发来的贺电。贺电说，第26届奥运会开赛4天来，经我国代表团各级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团结一致、协调作战，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奋发向上，顽强拚搏，取得了较好成绩。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对你们十分关注并对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在此，我谨向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李铁映在贺电中表示，希望你们胜不骄、败不馁，克服困难，再创佳绩；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新的更大的荣誉。

亚特兰大时间7月24日，中国体操名将李小双力克俄罗斯、白俄罗斯高手，以58.423分荣获奥运会体操比赛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并使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上升到5枚。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第5天的比赛中，还夺得3枚铜牌。老将林莉获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第3名，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国队也名列第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游泳男选手蒋丞稷获百米蝶泳第四名，并刷新亚洲和全国纪录，这是我国男子游泳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另外，射击选手张冰以183中夺得男子双多向飞碟比赛铜牌。

亚特兰大时间7月25日，击剑比赛降下帷幕。

德国选手克·克勒斯，当天将男子自选步枪卧射704.8环的世界记录提高了1.3环，并为德国夺得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意大利自行车选手安德烈·科利内利，当天在决赛中以4分20秒893的成绩轻而易举地摘取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并先后创下4分19秒699和4分19秒153的世界纪录。

亚特兰大时间7月26日，我国女子射击运动员李对红在女子运动手枪决赛中，以687.9环战胜所有对手，并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她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了第一块金牌，也使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金牌总数上升为6枚。获这个项目亚军的是保加利亚选手约尔格娃，成绩是684.8环，俄罗斯老将罗格维连科以684.2环获铜牌。

当天在射击赛场，继上午女将李对红夺冠后，下午杨凌在男子移动靶比赛中，以685.8环夺得金牌，并刷新奥运会纪录。他的队友肖俊以679.8环荣获亚军。游泳女将乐靖宜在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仅以百分之三秒负于美国选手，屈居亚军。

亚特兰大时间7月26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伍绍祖在亚特兰大对新华社记者说，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十分关怀，广大体育健儿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非常关心我体育健儿在亚特兰大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况，希望他们发扬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通过顽强拚搏，夺取优异成绩。他还要求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安排好运动员的生活，为他们创造好成绩提供更好的条件。

李鹏总理在我体育代表团出征前专门打电话给伍绍祖，对代表团表示良好祝愿，并希望中国体育健儿努力奋斗，为国争光。他说，多拿金牌是祖国人民的愿望，但不要为此背上包袱。

到亚特兰大后，中国运动员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江泽民、李鹏同志十分关心，指示我驻美使馆、驻休斯敦总领馆，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帮助代表团解决困难。我领使馆根据指示，积极动员当地华侨、留学生和在美中国企业协助解决代表团的困难。

亚特兰大时间7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夺得一金一银。跳水女将伏明霞蝉联女子跳台跳水冠军，女子赛艇队曹棉英、张秀云荣获双人双桨赛艇亚军。女子跳台跳水比赛，伏明霞从预赛到决赛一路领先，最后以超出第2名德国选手维持40多分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是美国运动员克拉克。

加拿大选手贝利在当晚举行的男子百米决赛中，以9秒84的成绩打破了美国选手贝勒尔1994年创造的9秒85的世界纪录，成为新一代飞人。

亚特兰大时间7月28日，被誉为“东方飞鹿”的我国中长跑女将王军霞，在女子5000米决赛中凭着有力的冲刺，以14分59秒88的成绩战胜所有对手一举夺冠。肯尼亚选手冈加以15分3秒49获得这个项目的亚军。

当天是本届奥运会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共决出27枚金牌。中国运动员除了获一枚田径金牌外，还夺得3枚体操银牌，他们是男子自由体操李小双，女子跳马莫慧兰，女子高低杠毕文静。

7月29日，中国选手高红苗在奥运会女子10公里竞走比赛中，名列第三，因她在比赛中多次犯规，被取消名次，这个项目的铜牌，最后归属第四位抵达终点的中国另一名女将王妍。俄罗斯选手叶·尼古拉耶娃和意大利选手伊·佩罗内分别获得金牌和银牌。

亚特兰大时间7月29日，我国跳水名将熊倪终于圆了他的冠军梦，为祖国夺得1枚奥运会金牌。他在男子3米跳板跳水比赛中，以无可争议的精湛技艺赢得了观众和裁判的心，当他以701.46的高分登上冠军领奖台时，全场一万多人热烈彭掌向他祝贺。熊倪的队友余卓成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美国老将兰茨获得铜牌。

在一场中国乒乓球选手自家相争的女子双打决赛中，邓亚萍和乔红以3：1战胜刘伟和乔云萍，夺得第一枚乒乓球金牌，刘伟和乔云萍获银牌。我国两对乒乓球男双选手当天在半决赛中双双告捷，已稳获冠亚军。此外，

体操单项决赛当天全部结束，我国选手范斌获单杠铜牌。香港选手李丽姗当天在萨瓦那进行的奥运帆板前八轮比赛中以较大优势领先其它参赛选手，已稳获奥运会女子帆板金牌，为香港赢得奥运历史首枚奖牌，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亚特兰大时间 7 月 30 日，我国乒乓球选手夺得一金一银，中国女子垒球队荣获亚军，中国羽毛球女双选手获一枚铜牌。两名乒乓球小将孔令辉和刘国梁在男子双打决赛中，以 3：1 战胜队友、上届奥运会冠军王涛和吕林，登上冠军领奖台。王涛和吕林获得男双银牌。羽毛球女双选手秦艺源、唐永淑战胜丹麦选手，获得第三名。首次被列入奥运会比赛的女子垒球，当天决出全部名次。中国女垒下午力克澳大利亚队进入决赛，紧接着在傍晚与实力强劲的东道主美国队争冠，经过顽强拼搏，以 1：3 失利，获得第二名。

亚特兰大时间 7 月 31 日，两名来自江苏的选手葛菲和顾俊在羽毛球女子双打决赛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奥运会第 13 枚金牌。葛菲和顾俊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以 2：0 击败了韩国选手吉永雅和张惠玉。这一胜利使中国羽毛球队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当日，中国体育健儿一举夺得羽毛球、乒乓球和跳水比赛的 3 枚金牌，是开赛以来夺金牌最多的一天。当天下午邓亚萍在一场比意志比球艺、扣人心弦的乒乓球女单决赛中，以 3 比 2 力克中国台北队的陈静，蝉联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接着，王涛和刘国梁在男单半决赛中分别击败捷克的科贝尔和德国的罗斯科普夫，双双打进冠军决赛。晚上 10 时，伏明霞在女子跳板跳水决赛中后来居上，战胜俄罗斯名将拉什科和伊琳娜，勇夺金奖。伏明霞和邓亚萍都在本届奥运会上每人夺取两枚金牌。在当天的比赛中，我国射箭女将何影在女子个人赛中战胜德国、土耳其等国名将，摘取银牌。乔红获乒乓球女单第三名。

亚特兰大时间 8 月 1 日，刚满 20 岁的中国乒乓小将刘国梁以 3：2 战胜队友王涛，为中国队首次夺得奥运会乒乓球赛男子单打的金牌。王涛和德国选手罗斯科普夫分获这个项目的银牌、铜牌。中国代表团当天共获得一金三银，羽毛球选手董炯获男子单打银牌，另一枚银牌由中国女子足球队所获。当晚，中国女足经过 90 分钟的顽强奋战，以 1：2 负于占尽天时地利等优势的美国队。这一成绩是中国女足在 20 次世界大赛中的最佳战绩。

当晚，美国超级跑星迈·约翰逊不但在奥运会上创造了一人独夺男子 400 米和 200 米金牌的奥运百年奇迹，还在后一个项目中以 19 秒 32 的成绩，创造了一项属于 21 世纪的纪录。

中国运动员当天还夺得两枚田径银牌和一枚跳水铜牌。

几天前夺得女子 5000 米冠军的王军霞，当天又披挂上阵，力争在 10000 米决赛中再夺金牌。可惜的是王军霞在最后关头缺乏国际大赛经验，冲刺过早，以 0.95 秒之差输给有意放弃 5000 米比赛、养精蓄锐多日的葡萄牙著名选手里贝罗。里贝罗以 31 分 1 秒 65 夺冠，王军霞的成绩是 31 分 2 秒 58，她俩的成绩都打破奥运会纪录。隋新梅在女子铅球比赛中，以 19 米 88 名列第二，冠军是德国选手库伯努斯。在当天举行的男子跳台跳水决赛中，中国队新秀肖海亮获得铜牌，冠军被俄罗斯选手萨乌丁夺得。

亚特兰大时间 8 月 3 日，中国女排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最后一枚银牌，从而结束了中国选手在第 26 届奥运会上的所有比赛。女排决赛中，中国姑娘面对已经"四连冠"的古巴队打得顽强，打出了较高水平，最后虽以 1：3 失利，退场时仍受到观众热烈鼓掌赞扬。中国选手当天在其他比赛中，500 米女子 4 人皮划艇获第四名。8 月 4 日是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将决出男子马拉松、拳击、皮划艇等 18 枚金牌，没有中国运动员参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共夺得 50 枚奖牌，其中金牌 16 枚、银牌 22 枚、铜牌 12 枚。

亚特兰大时间 8 月 3 日，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队在奥运会足球决赛中以 3：2 击败阿根廷队，获得金牌。

从 1985 年首届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至今，尼日利亚队已经获得过全部有年龄限制的世界足球大赛的金牌，包括世界少年锦标赛、世界青年锦标赛和奥运会足球赛冠军。

亚特兰大时间 8 月 4 日，第 26 届奥运会闭幕，当晚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场举行。

晚 9 时，闭幕式表演以升美国国旗和演奏美国国歌开始，其后举行 了马拉松长跑比赛的颁奖仪式。在乐队行列式和旗舞表演之后，进行了名为"作为艺术的体育"的表演。

接着，参加本届奥运会的 197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一名运动员代表，高擎国旗或奥委会会旗入场，美国运动员迈克尔·约翰逊举着奥运五环旗走在前列。

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经过顽强拼搏，实现了预定的奋斗目标，共夺得 50 枚奖牌，其中金牌 16 枚、银牌 22 枚、铜牌 12 枚，金牌和奖牌数均排在第四，保持了在"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

本届奥运会上，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获得了金牌，79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获得了奖牌，而上届获得金牌和奖牌的国家和地区仅有 37 个和 63 个。

在奖牌争夺战中，美国夺得 44 枚金牌、32 枚银牌和 25 枚铜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俄罗斯队以 26 金 21 银和 16 铜位居第二。德国队以 20 金 18 银和 27 铜居第三位。

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刷新了 24 项世界纪录。其中游泳 4 项、田径 2 项、射击、射箭和自行车各一

项；本届奥运会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是举重项目，10个级别的比赛共创造了15项世界记录。中国选手占旭刚在举重70公斤级的比赛中，连创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他的队友唐灵生打破了59公斤级总成绩的世界纪录。男子100米和200米跑的世界纪录均被刷新。美国选手迈·约翰逊将他本人保持的男子200米世界纪录提高了0.34秒，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刷新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南非选手佩·海恩斯打破了女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成为本届奥运会唯一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

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佩恩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闭幕式上先后讲话。萨马兰奇表示，100年来的奥林匹克运动激发了人类伟大的梦。他赞扬了本届奥运会的组织者和志愿者。他说，不要忘记运动会期间的爆炸和死难者，恐怖主义永远不能摧毁奥林匹克运动。他提议为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随后，亚特兰大市市长坎贝尔将会旗经萨马兰奇之手转交给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悉尼市市长萨托。闭幕式上，悉尼艺术家表演了表现澳大利亚土著风情的舞蹈。

当奥运火炬缓缓熄灭后，各国运动员从北看台涌入会场，载歌载舞。此时礼花升空，在灿烂的夜空下，各国运动员相拥告别，互道珍重。会场内，表演者和运动员已连成一片狂欢的人海。

（《人民日报》亚特兰大电，7月21日至8月6日）《人民日报》和7月30日《中国体育报》）

* * *

亚特兰大时间7月27日凌晨1时20分（北京时间27日中午1时20分），亚特兰大的奥林匹克百年纪念公园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据CNN报道，至少有4人死亡，110人受伤，但伤亡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奥林匹克公园距本届奥运会的新闻中心仅隔一条街。《中国体育报》记者在爆炸发生前一小时刚刚离开新闻中心。爆炸地点据CNN电视台的一个转播点很近，所以该台从爆炸发生至截稿时一直在进行现场报道。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爆炸地点在奥林匹克公园北面的AT&T娱乐中心右侧的音响架附近。这个巨大的音响架共有5层，上面有音箱和一架摄像机。爆炸发生时，附近正在举行流行音乐演唱会，公园里大约有5万人。

奥林匹克公园是由美国AT&T公司出资建立的，是为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和各国游客提供的一个娱乐场所，是本届奥运会期间唯一不收费又与奥运会有关的公共场所。与奥运会场馆不同的是，进入该公园不须经过任何检查。记者在去采访排球、体操、举重、柔道、篮球和击剑等项目时也必经此公园。

一位名叫罗伯特·吉的来自洛杉矶的摩托罗拉工程师用家用摄像机恰好拍下了爆炸瞬间的场面。CNN在十几分钟后将这盘录相带在电视台播出。德国一家电视台当时也正好在公园里采访美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埃文斯，爆炸的震动中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视摄像镜头立即对准了爆炸现场。从电视画面上来看，这确实是一次炸弹爆炸事件。

正在公园里尽兴的游客一开始以为是台上乐队的效果音响，但警方很快赶到疏散人群，救护车也马上赶到。《悉尼论坛晨报》的记者克莱顿在现场拍到有3人倒在血泊中。一名死亡者是土耳其的一位记者。

在爆炸前几分钟，AT&T的一名叫里查德的保安人员在音响架下面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物品，在他叫来警察之前就发生了爆炸。事发一小时后，警方调集了全部爆炸专家乘直升机奔赴奥林匹克公园。专家在公园里至少又发现了三个爆炸装置。

令人不解的是，亚特兰大为本届奥运会召集了两万多炸弹防爆人员，相比洛杉矶奥运会只有40人，组委会在3时30分举行记者招待会，国际奥委会总干事长卡拉德说："国际奥委会对发生此事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对受难者表示哀悼，同时我们也作出决定：奥运会将继续办下去，奥林匹克公园也将继续开放。"

国际奥委会还决定在当天进行的每场比赛前静默一分钟，各场馆降半旗致哀。

* * *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8月4日出版的德国《星期天世界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他不喜欢"像亚特兰大这样由一个私人团体组织奥运会。我相信，如果要（使奥运会）办得成功，城市、地区以及国家也必须参与"。

他批评亚特兰大奥运会在交通和通讯联络方面的组织工作"很糟糕"，他说："人们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抵达机场之后，还不得不再在那里等候4个小时是不行的。这肯定不会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

他谈到今后必须改进的事宜时指出，办理申请批准手续也要改进，"2000年奥运会时申请登记工作要在本国国内就办好。"针对亚特兰大奥运会过分商业化的批评，萨马兰奇说，这发生在运动场之外，国际奥委会对此不负责任。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尽管为确保第26届奥运会的安全，亚特兰大地方当局动员了3万警力，但在历时17天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仍有16人意外丧生。

据亚特兰大一家地方电台8月8日报道，这一无辜死亡的人数是去年同时期的两倍；尽管亚特兰大警察局首脑贝·哈佛在奥运会开幕后第一周曾向媒介宣布，除去盗窃，所有的犯罪数字都将有所下降。

7月27日发生在亚市奥林匹克公园的爆炸事件，造成了2人死亡，111人受伤。但其他死者的出事地点都在奥林匹克环状控制区之外。

（据7月28日《中国体育报》、8月6日《光明日报》和8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二　祖国至上

——热烈欢迎中国体育代表团载誉凯旋

《人民日报》社论

大洋彼岸，奥林匹克百年盛典的圣火已隐去它夺目的光焰。而今日北京，夜色却将格外绚丽迷人。中国体育代表团远征英雄的凯旋，将耀亮这里广袤的星空，耀亮亿万双乌黑的眼睛。

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你们辛苦了！祖国感谢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和期望，奋勇拚搏，夺取了16枚金牌、22枚银牌、12枚铜牌，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奥运争光目标，在强手如林的激烈角逐中，谱写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宏伟乐章。

中国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为了在全方位竞争的优胜者行列里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民族都在竭尽全力，充分利用每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要想在这前进的汹涌洪流中傲立潮头，需要付出非凡的代价。从王义夫抱病射落第一枚银牌开始，到中国女排顽强奋战夺得最后一枚银牌，这其间哪一块奖牌不蕴含着追求卓越的壮志、超越自我的勇气和战胜不利客观环境的意志！在亚特兰大搭就的这座并不尽如人意的舞台上，我国运动员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有着超乎以往的沉重分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崇高的信念——祖国高于一切！正是因为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才处处体现蓬勃向上的顽强斗志、势不可当的奋争锐气和文明达观的风范气度。

当今世界体坛，群雄纷争，异常激烈。由于高新技术手段和科学训练方法的引入，对人体潜能的发掘几乎达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势之下，选手们之间的较量，是比水平、比技艺、比能力，更是拚心理、拚意志、拚精神；中国奥运健儿取得的优异成绩，是体能和技术上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上的超越。回首亚特兰大的16个日日夜夜，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岂止是选手们豪气干云的辉煌一瞬？每一块奖牌的背后，都写满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奋斗故事，每一场搏击竞争，都谱成一曲曲壮丽的人生之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爱国主义！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赛场上的辉煌，从来是与艰辛相伴的。邓亚萍在夺冠之后，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太苦了……"，这是每个成功者的共同感受。没有超人的付出，就没有惊人的收获。要想让祖国的荣誉、人民的期望随国旗高升，随国歌高奏，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一是要有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二是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拚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它融入千锤百炼的艰辛里，融入超越自我的攀登中。这次，我国健儿夺得的几枚金牌，与金牌相比虽有些许遗憾，但是，人们仍然称王义夫、张祥森、女足、女垒、女排等为"银牌英雄"。不论是金牌、银牌、铜牌，不论取得没有取得名次，只要是为祖国的荣誉竭尽全力，不屈奋争，他们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同样值得珍贵，值得赞美！

奥林匹克运动是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恒的。正是因为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奥林匹克运动青春永驻，魅力无穷。

在这届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教练员对"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践，我国体育代表团对"和平、友谊、进步"奥林匹克宗旨的贯彻，体现了12亿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现象、参与、支持和贡献。同时，也在世人面前展现了我国人民改革开放、迈向现代化的崭新精神风貌，增进了与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正是洋溢在中国选手身上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起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奥运比赛的场上场下、前方后方，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奥运健儿呐喊助威、端茶送饭；在远离赛场的神州大地，关注奥运赛况，为前方将士献计献策，成了12亿中国人盛夏中最热的话题。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更加燃旺了运动员们为国争光的斗志；他们的积极参与，把奥林匹克精神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和范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胜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昨日的辉煌已成过去，运动员们已将目光投向明天，投向下世纪，投向2000年的悉尼。为国奉献的所在何止是在运动场上，让我们学习奥运健儿祖国至上的情怀，学习他们团结向上、奋勇拚搏的精神，以对奥林匹克运动同样的专注和热忱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在各个岗位上续写壮美的华章！

（8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亲切会见我国奥运健儿，江泽民发表讲话

载誉凯旋的我国奥运体育健儿8月8日在北戴河受到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同代表团成员座谈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体育健儿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他说，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各条战线都要向在奥运会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学习，发扬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精神，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

在刚刚闭幕的第26届奥运会上，我国体育代表团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在强手如林的激烈角逐中，奋勇拚搏，摘金夺银，以获奖牌50块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

下午3时许，当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会见厅时，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热烈鼓掌。他们身穿礼服，胸挂奖牌，面带着胜利的微笑。

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走到获得金牌的选手孙福明、乐靖宜、唐灵生、占旭刚、李小双、李对红、杨凌、伏明霞、王军霞、邓亚萍、熊倪、孔令辉、刘国梁、葛菲、顾俊，获得银牌的选手王义夫、张祥森和教练员代表李永波、周明、徐益明、蔡振华、毛德镇等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赞扬他们在奥运会上表现出的良好作风和取得的优异成绩。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你们的比赛，你们取得的好成绩使我们非常高兴。"江泽民对站在前排第一名的孙福明说。孙福明激动地说："感谢总书记的关怀。"

会见、合影之后，江泽民等同体育健儿们一起座谈。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主持，国家体委主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伍绍祖作了关于参加奥运会情况的简要汇报。随后，运动员代表、乒乓球女子单打金牌获得者邓亚萍，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李小双，田径女子5000米金牌和10000米银牌获得者王军霞的教练毛德镇，畅谈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竞技场上团结、拚搏、奋发、进取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抒发他们万众一心、为国争光的豪情壮志。

"我是代表祖国、代表集体去迎接挑战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我们光荣的集体。"邓亚萍一席话代表了全体运动员的共同心声。

李小双在回顾夺取冠军的比赛时说："比赛虽只有不到4小时，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几小时里，却融入了我整个的人生。"

"奥运会虽已结束，但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毛德镇表示，"我们决心不辜负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为祖国争取更多、更大的荣誉。"

随团参加奥运会采访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宋世雄，新华社记者刘其中等，也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江泽民说，这届奥运会的规模是空前的，创造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我们的运动员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恪守体育道德，团结拚搏，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你们顽强拚搏的精神和良好的风貌，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坚定意志。你们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你们重文明、讲礼貌，广交朋友，增进了中国运动员同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你们不愧为传播友谊的使者。

江泽民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这次取得的好成绩，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护和支持，也同广大侨胞、留学人员的鼓励和帮助分不开，同许多外国朋友的关心分不开。他说，这届奥运会是对我国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工作的一次检阅。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和不足。希望体育战线上的同志们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改进工作，在今后的各项赛事中取得更大成绩，为人民再立新功。

江泽民的讲话不断激起全场阵阵热烈掌声。

参加会见和座谈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曾庆红、曾建徽、邵华泽、孙家正、郭超人等。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迟浩田在北戴河亲切会见了解放军参加第26届奥运会获奖运动员，对军队运动员、教练员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号召全军同志向他们学习，锐意进取，不畏艰难，顽强拚搏，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刘华清在讲话中说，我军体育健儿在这届奥运会上，有10人在7个单项和集体项目上获得奖牌，其中三个项目获金牌、四个项目获银牌、两个项目获铜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金牌和奖牌总数第四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为我们军队增添了光彩。他代表中央军委，向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军队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刘华清说，我军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他们用拚搏和汗水换来的。运动员们平时脚踏实地、不怕困难、刻苦训练，在赛场上百折不挠、不断进取、敢于争先，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体现了我军不畏强手、敢打敢拚的优良传统。他希望运动员们把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激励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不断攀登新的体育高峰。

刘华清赞扬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所表现的奋发进取、顽强拚搏的精神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说，竞技场上需要这种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也离不开这种精神。刘华清接着指出，我军历来重视体育工作，今后各级仍然要重视体育工作，包括军事体育和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官兵体质，活跃部队生活，鼓舞部队士气，促进部队全面建设。

张震、迟浩田也讲了话，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争取在今后的国内外比赛中再创

辉煌。

获奖运动员代表刘国梁、李对红表示，要更加刻苦地训练，继续发扬顽强拚搏的精神，争取更大成绩。我军共有36人参加第26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28名，参加了奥运会26个大项中的11个小项的比赛。获奖的运动员是：刘国梁获乒乓球男子单打和双打两枚金牌，李对红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金牌；王涛获乒乓球男子单打和双打两枚银牌，崔咏梅、吴咏梅、潘文莉、王丽娜、刘晓宁等5人获女子排球银牌，单莺获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和女子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王显波获女子柔道66公斤级铜牌。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才厚、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等参加了会见。

* * *

江泽民在会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讲话

（1996年8月8日）

同志们：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6届奥运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都来了。我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这届奥运会的规模是空前的，创造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我们的运动员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恪守体育道德，团结拚搏，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代表团的全体教练员、工作人员为保证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新闻、电讯等有关人员为把奥运会盛况和我国体育健儿的比赛成果及时传播给全国人民，都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你们顽强拚搏的精神和良好的风貌，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坚定意志。你们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女。

在奥运会期间，你们重文明、讲礼貌，广交朋友，增进了中国运动员同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你们不愧为传播友谊的使者。

中国体育代表团这次取得的好成绩，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护和支持，也同广大侨胞、留学人员的鼓励和帮助分不开，同许多外国朋友的关心分不开。

这届奥运会是对我国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工作的一次检阅。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和不足。希望体育战线上的同志们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改进工作，在今后的各项赛事中取得更大成绩，为人民再立新功。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体育事业。近年我国先后颁布了《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执行，努力把我国体育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各条战线都要向在奥运会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学习，发扬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精神，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

（新华社讯，8月9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首都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告会

8月15日，来自首都各界的3000多名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在第26届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体育健儿讲述他们感人的故事。

由中宣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委联合举行的第26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告会，旨在大力弘扬中国奥运健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拚搏的精神，以激励人们投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在报告会开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亲切会见了报告团成员。尉健行首先代表党中央向报告团成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他说，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展示的良好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优良传统和全国人民立志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坚定意志，健儿们共同创造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对全国人民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这一新的伟大的工程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尉健行希望健儿们在新的赛场上、在今后的事业中再展鸿图，为祖国贡献出新的力量，不辜负全国人民寄予他们的厚望。

在报告会上，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袁伟民对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作了总结和回顾。他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团结奋斗，顽强拚搏，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叱咤奥运风云刚刚洗去征尘的体育健儿邓亚萍、王军霞、孙福明、王义夫、杨凌、熊倪、李小双、顾俊、占旭刚、蒋丞稷、赖亚文、孙庆梅及著名教练员李敏宽、蔡振华等端坐在主席台上，伴着鲜花和掌声，接受人们崇敬的目光。

报告团的成员们结合自己的经历，把拚搏过程中的亲身感受、听到或看到的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生动事例，以及这些事例中所体现的伟大精神讲述给现场的观众，

讲述给全国人民。

乒坛名将邓亚萍说："当我站在奥运会那高高的领奖台上，聆听着那雄壮的国歌，仰望着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我由衷地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培养我成长的集体和帮助我成功的教练和队友……无数次的赛场拚搏，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活着就要争一口气。只要心中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目标都可以达到。"

王义夫回忆起当时带病参赛的情景非常激动："我为什么坚持要打呢？第一，我要站在靶位上，让全国人民放心，我王义夫没有倒下！第二，我要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坚持战斗，奋斗不息。第三，我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告诉他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是钢筋铁骨铸造的英雄汉。"

孙福明在报告中一再强调"真正的英雄在我背后"；熊倪说，战胜自我，才能梦想成真；占旭刚更是言之诤诤：我就是要为祖国扬威。中国女垒主教练李敏宽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奉献，才有收获。"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蔡振华则表示：永远从零开始……

报告团成员的报告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令人激动，催人奋进。

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主持了报告会。他说，我国体育健儿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和期望，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他们的精神，集中体现为热爱祖国、勇于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尊重科学、求实创新；不畏困难、拚搏进取。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儿女实现民族振兴雄心壮志的充分展示。这种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精神，需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认真学习、大力提倡。

徐光春说，当前，我国改革深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形势很好。进一步发展这种好的形势，需要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精神，变成全体人民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贡献的实际行动。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要以中国体育代表团为榜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团结奋斗，拚搏进取，建功立业，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尽自己的力，发自己的光，作出自己的贡献。

* * *

8月27日，中央宣传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在京联合举行奥运报告会，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袁伟民作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26届奥运会情况报告。

袁伟民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奥远健儿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展现的良好精神风貌。他说，中国体育代表团不负众望，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参加第26届奥运会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做到了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成绩好、精神好、政治好、安全好四好要求。

袁伟民说，中国代表团能够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我驻美使领馆的支持和大力帮助，还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他表示，中国体育界将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改进工作，在今后的各项赛事中争取更大的成绩，为人民再立新功。

报告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徐才厚主持，在京党政军机关司局以上干部12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8月16、28日《人民日报》）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

背景介绍

三年前，国务院决定在沿原有京广线方向的中华大地上，重新修建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干线——京九线。本年度9月1日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京九铁路投资近400亿，全程2552公里，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个省市，站前工程需完成土石方2.6亿立方米，全程开挖隧道150座，新建桥梁1110座，正线铺轨3616公里，站线铺轨1098公里，铺设道岔4281组。工程艰巨、工期紧张、技术含量高、项目管理复杂。参建单位为了京九铁路能够按期完工，加班加点，经过几十个月的辛勤努力，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史添上了重重的浓彩一笔。

材料：

-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 通京九一脉　活路网全身

材料一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本报北京9月1日讯　记者江世杰报道：今天上午9时13分，北京西站彩旗招展、军乐嘹亮、锣鼓震天，一列挂着"北京西—深圳"方向牌的橘红色旅客列车，缓缓驶出站台。这标志着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家重点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铁道部于北京西站举行的首列客车开行仪式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分别宣读了国务院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发来的贺电；邹家华副总理向105次车长授列车方向牌，并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一起为列车开行剪彩。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沿线有关省市的

领导同志。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的98个市县，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包括同期建成的天津至霸州和麻城至武汉的两条联络线在内，全长2553公里。京九铁路具有工程艰巨、工期紧张、技术要求高、项目管理复杂等特点。经过参建单位三年的艰苦努力，站前工程共完成土石方2.6亿立方米，开挖隧道150座，新建桥梁1110座，正线铺轨3616公里，站线铺轨1098公里，铺设道岔4281组，全线于1995年11月16日提前铺通。紧接着全面转入站后工程建设和收尾配套工程施工，共建设大、小车站202个，房屋228.7万平方米；敷设通信光缆2273公里；架设电力线路近4000公里，新建配电所50处。同时，还完成了给排水、暖通、机务、车辆、工务等运营设施，终于使京九铁路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实现全线开通运营。经铁道部京九铁路初验委员会检验评定，设计施工质量总评优良。

京九铁路于今天正式交北京、郑州、济南、上海、南昌铁路局和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管理。经铁道部安排，在运营初期，新增直通旅客快车5对：即北京西至深圳，北京至合肥，九江至深圳，武昌至汕头；同时将原连云港至天津的直通旅客快车，改为连云港经兖州、菏泽、衡水至北京南站。在货运方面共开行图定货物列车20对。此外，沿线各铁路局管段内，还将开行一些短途客货列车。

在京九线上，国家铁路、合资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不同管理模式同时存在，但客货营业对外实行统一手续，一票到底，不给旅客、货主增加麻烦。国铁段客运价格与全国既有铁路运价相同，货运价格除原南(昌)浔(九江)段与既有线运价相同外，其余段国家考虑新线成本高，批准为每吨公里按0.13元计费。铁道部考虑货主承受能力，按每吨公里0.08元计费。

京九铁路开通运营，对缓解南北运输紧张状况，改变铁路“瓶颈”状况；完善路网布局，充分发挥运输综合效益；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适应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和加快沿线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本报深圳9月1日电　记者王楚报道：今天下午，深圳火车站站台彩旗飘扬，深圳至北京西106次全程空调旅客直通快车，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于16时15分缓缓驶出深圳站。

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北京铁路分局京深车队第九包乘组的乘务人员，热情地为旅客们引导、验票。香港柴湾各界人士赴赣参观团一行150多人，成了京九铁路第一批香港客人，他们为这趟列车送来了“京九第一车”锦旗。

(选自1996年9月2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通京九一脉　活路网全身

本报记者江世杰报道：初秋九月，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给千千万万国人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胜利的豪情。

是因为这2500多公里的长大干线，用了不到三年就全线铺通，铺通之后9个月就配套建成，在中国以至世界铁路建设史上极其少见？

是因为这投资近400亿元的重点工程，分项“初验”一次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90%以上，有可能在一年后的国家验收时全线一次创优，成为大规模工程建设优质高效的典范？

是因为刚一开通运营，列车时速就能达到60公里(而且明年还要提高到90公里)，这与几十年来新路开通都跑45公里相比，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奇迹？

看来是这样，但又还不完全。

成语云：牵一发而动全身。京九铁路全通开通的意义与此相近：它使全国近6万公里的铁路运输网，一下子都“活”起来了；铁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由此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也许有人会说：据报道，京九开通初期只新开铁路局间直通客车5对，局间分界站通过的货车最多是20对。就这么些客货列车，竟能在路网中发挥那么大作用？

铁道部副总调度长兼运输局长常国治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他说：通京九一“脉”而活路网“全身”，并不是理论演绎、逻辑推导，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他指着墙上的全国铁路运营里程示意图解释道——

我国铁路运力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而运力与运量的尖锐矛盾，主要表现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物资，难以及时运进上海、广州、柳州铁路局管区；而“上、广、柳”地区的物资要运到“三北”去，也同样要打很大“折扣”。因为在京广、京沪、浙赣铁路上，有“卡脖子”的德州、符离集、安阳、坪石、嘉兴、余家、醴陵等限制口。例如，经浙赣线去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及西南地区的货车，每天只能批准请求计划的40%，60%被“拒之门外”；而两广地区的货物列车要往长江以北的苏、皖地区去，又因浙赣线和京沪线已不堪重负，铁道部只好命令其“走”不合理径路——沿京广线北上到郑州北站，再绕道东陇海经徐州北站南下；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因为分配不到充足的车皮，只能眼巴巴地“以运定产”……

常国治说：京九全线开通，将使全国铁路货运状况发生巨大变化——

一是将一部分需要进出上海、广州、柳州铁路局管区的物流，直接安排到京九线上通过。例如，深圳产品或从深圳港上岸的货物要运到沪、苏、皖、鲁等地，就不必再去“排队”过京广线南段和浙赣线西段的限制口，可直接从

京九铁路北上在向塘、九江、菏泽分路。这不仅缩短了几百公里运距并省下了一笔运费，而且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对于社会来说，这等于又增加了一笔财富。

二是从繁忙的京广、京沪、焦(作)柳(州)铁路上，转移一部分物流到京九线上来；同时用京广、京沪、焦柳线上腾出的运输能力，又去解决一部分“三北”和“上、广、柳”地区积压的物流。有人算过，在“以运定产”的地方，如果每天多安排一节车皮，一年的运量就是2万多吨；如果每吨原料在加工增值过程中赚10万元，全年的经济效益就是20亿元。这可只是一节车皮呀！

三是与京沪、京广、京九线相交的横向铁路，运输能力会有所提高。这就像城市里的交通主干道不堵车了，与主干道相连的各条马路上的车就跑得快了。

曾有人担心：京九铁路经过的地方太多是贫困地区，修成后没有多少货物可运。常国治说，他们可能是只看到京九铁路的局部和眼前，而不了解全国铁路的宏观和长远。7月下旬，我们在蚌埠召集北京、郑州、济南、上海、南昌、广州铁路局的调度人员开会，确定京九铁路客货列车的开行方案，并编制列车运行图。几天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京九铁路“扒拉”车流。我们的调度人员越“扒拉”越兴奋、激动，没想到一条京九铁路，对全国铁路运输的牵动这么大。结果，大家没费多少力气，就为今年年底的京九线“扒拉”到3000万吨车流。常国治副总调度长强调说：只要我们把京九铁路的货运价格问题解决好了，也许明年、后年，京九铁路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就得往5000万吨、7000万吨上调整。

(选自《人民日报》1996年9月2日)

钓鱼岛事件

背景介绍

钓鱼岛位于日本冲绳以南、中国台湾以北，和中国大陆遥相呼应的海面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远在清朝康乾年间，中国政府就对钓鱼岛实施了有效统治。但近代尤其是二战以来，钓鱼岛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明朗状态，更因为美国七十年代把钓鱼岛问题搁置不理，钓鱼岛仍然没有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不过，国际上也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即领土权归中国。

日本二战失败后，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不甘心失败的命运，死抓住法西斯的死魂灵不放，对我国的钓鱼岛总欲攫取之而后快。自今年七月以来，日右翼团体四次登上钓鱼岛，向我挑衅，侵犯了中国主权，也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

材料：

- 我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日驻华临时代办
- 不允许把中日关系引入歧途
- 日本面临严重抉择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毅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日右翼团体再次侵犯我钓鱼岛主权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
- 日本别干蠢事

材料一　我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日驻华临时代办

新华社东京9月11日电　(记者刘文玉)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徐敦信，今天下午就日本右翼团体一再登上我钓鱼岛修建灯塔事，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提出严正交涉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徐敦信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他说，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经达成共识，同意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但近来，在日本有关当局的放任和纵容下，日本一些团体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一再登上钓鱼岛并修建灯塔和其他标志物，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对此，中方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郑重声明，日方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拥有的主权，也改变不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样一个事实。日方在岛上建造的任何设施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毅10日下午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日本右翼团体9月9日再次侵犯我钓鱼岛主权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

王毅强调，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这一原则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不要一错再错，要求日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和消极影响。

自今年7月以来，对日本右翼团体四次登上钓鱼岛，侵犯中国主权，外交部及我驻日本使馆均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选自1996上9月12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不允许把中日关系引入歧途

新华社记者　天君

据报道，日本一伙右翼分子9月9日再次登上钓鱼

岛北小岛修建灯塔。这是今夏以来日本右翼分子第四次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这种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而一意孤行的做法,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更加感到愤慨。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出于中日友好关系大局的考虑,对于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所存在的争议,中方一直主张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中日双方在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曾一致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今后解决。事实证明,双方当时达成的这一谅解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方还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设性设想。为维护大局,中方一直恪守这一协议,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一再窜到岛上作祟。对日本右翼分子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干扰日中关系正常发展的非法行径,日方理应严厉取缔,从而挽回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日本政府迄今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对反对日中关系友好的右翼分子的行为,予以放任甚至纵容。

前不久,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香港称,只要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上实施有效管辖,不论是建灯塔,还是派军舰、飞机巡逻,都不涉及领土纠纷。这种错误的、不负责任的谈话不仅违背了两国达成的有关谅解,而且无疑给对华恣意寻衅的日本右翼分子鼓了气,撑了腰。日方的做法不能不使人们产生疑惑:迄今日本右翼分子的非法行动是否有日本政府蓄意支持的背景?日方利用领土主权问题制造事端是否另有他图?

日本方面还称,右翼团体成员的行为"不违反日本国内法律,故难以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对他们)采取措施",希中方予以谅解。直至9月1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还说:"(日本)政府不具有必须阻止民间在自己所占地方行动的权限和职能。"这又是荒唐的逻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日本右翼团体人员登上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违反了国际法,在两国本来良好的关系中挑起严重争端,日本政府竟能束手无策!由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日本平时自诩的"法制健全的国家"到底是谎话,还是吹牛?日方的托词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政府完全有责任,有义务妥善处理好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的严重事态。但日方一方面口头上称不希望扩大事态,一方面又对右翼分子的行动采取放任和纵容态度,致使中日关系目前出现了令人心痛的局面。很清楚,这是日方一手造成的。

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来之不易,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双方应十分珍视并共同维护。如果把日中关系引入歧途,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我们呼吁日本政府应以大局为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因右翼分子挑衅而产生的恶劣后果及影响,并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选自1996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日本面临严重抉择

本报评论员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65周年。纪念这个日子,重温由此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对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严重步骤。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历史帐。

对待这段历史,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举世皆知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

应当承认,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总体是上平稳的,主流是健康的。这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但是必须看到,日本确有少数人死抱着军国主义僵尸不放,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干扰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他们一再拿历史教科书作文章,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掩盖罪行,蒙骗世人;公然参拜靖国神灶,对战犯顶礼膜拜,向亚洲人民挑衅。这一切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激起亚洲人民的愤慨。

正像亚洲舆论一再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所做所为,是日本保守势力膨胀、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必然反应。近年来,日本某些政客起劲地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公开要求修改宪法,为日本对外扩张势力扫除障碍;竭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离间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关系;想方设法向海外派兵,在国际上显示力量。不久前,日本强化了同美国的安保体系,有人自以为得计,更显得有恃无恐,这种动向值得警惕。

本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对日本并没有过分的要求,其实只有两条:一是承认那段侵略历史并认真反省,二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要想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关系,这两条是前提。这是任何其他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是任何别的国家也帮不上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何对待历史反映着一个民族政治境界的高下。时至今日,日本还有些人死不认帐,坚持反动的历史观,并且制造种种奇

谈怪论，什么发动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什么承认侵略等于“民族自虐”，什么反省罪行就是“谢罪外交”。这叫什么话？这实际上是在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有些日本人一再抱怨，日本在国际上没有朋友，亚洲国家对它缺乏信任。试问，老是这个样子，哪来的朋友和信任？日本只有正确认识那段历史，妥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并且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与国力相称的体面的一员。

“九一八事变”和中国100多年的近代史证明，一个国家落后、贫弱就要挨打，分裂、动乱必然遭殃。我们纪念“九一八”，就要维护国家稳定的政治局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精力搞建设，使国家尽快繁荣富强起来；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广交朋友，反对强权，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应的有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的现实意义。

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中国珍视中日友好，并将继续为之不懈努力。可以坦然地说，中国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日本的事，中国无愧于日本。当前，日本政治正处在十字路口，日本面临严重抉择。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5周年的时候，日本当政者应当好好想一想，究竟该怎样对待历史，正视现实，走向未来。日本政府应当切实负起责任来，对右翼势力不能再听之任之，姑息纵容，不要再干对不起中国、有愧于中国的事。

（选自9月18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毅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日右翼团体再次侵犯我钓鱼岛主权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毅9月10日下午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日本右翼团体9月9日再次侵犯我钓鱼岛主权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

王毅强调，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这一原则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不要一错再错，要求日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和消极影响。

自今年7月以来，对日本右翼团体四次登上钓鱼岛，侵犯中国主权，外交部及我驻日本使馆均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　　*　　*

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徐敦信，9月11日下午就日本右翼团体一再登上我钓鱼岛修建灯塔事，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提出严正交涉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徐敦信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他说，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经达成共识，同意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但近来，在日本有关当局的放任和纵容下，日本一些团体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一再登上钓鱼岛并修建灯塔和其他标志物，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对此，中方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郑重声明，日方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拥有的主权，也改变不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样一个事实。日方在岛上建造的任何设施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　　*　　*

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9月5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日本军舰阻挠香港记者采访钓鱼岛一事发表评论。

他说，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在该岛进行非法活动，日本政府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活动，因此而引起包括香港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是“可以理解的”。

沈国放强调，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日本政府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来阻止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从事非法活动。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　　*　　*

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对日本右翼分子再次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表示愤慨，并已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表示强烈抗议。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沈国放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他说，对于日本右翼分子连续登上这些岛屿非法建造设施，中国政府已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然而，九月九日，日本右翼分子竟然再次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中方对此表示愤慨，并已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表示强烈抗议。

他说，中国政府重申，日方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不可能动摇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拥有的神圣主权，日方在这些岛屿上擅自建造的任何设施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指出，日本右翼势力近来一再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侵犯中国主权，而且竭力否认日本侵略历史，这些动向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这股逆流，如继续听之任之，必将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新华社讯，9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9月11、12日《人民日报》）

材料五　日本别干蠢事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来，日本围绕中国领土钓鱼岛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8月18日，日本冲绳县的右翼团体“尖阁列岛防卫协会”，悍然在钓鱼岛南侧竖了一块画有太阳旗的牌子。此前，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再次在岛上设置灯塔。同月20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中国领土钓鱼岛也包括在内。随后，日本外相公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另据报道，日本首相桥本还指示研究“不测事态”，“做好准备”。有关当局竟扬言，必要时“用实力去排除”。这一切表明，日本妄图把中国领土钓鱼岛据为己有。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们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在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中国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1895年4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后，把台湾归还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私自交给美国。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竟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强烈反对美日拿中国领土做交易，指出它们这样做是完全非法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然而，日本方面却违背承诺，多次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小动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制造事端，玩弄“我占归我”的无赖伎俩，以强化日本占领钓鱼岛的象征意义。

众所周知，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领土归属是最敏感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在这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捅这个敏感问题，究竟是要干什么？显然，它是想利用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对外显示实力，试探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

中国历来顾全大局，十分珍视中日友好关系，但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对于钓鱼岛问题，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前提是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前赴后继，以千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时至今日，谁要是指望12亿中国人民放弃哪怕一寸领土，那是痴心妄想；谁要是幻想中国人民会屈服于强权，那是白日做梦；谁要是企图在海峡两岸关系上打什么牌，那是错打算盘。可以断言，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炎黄子孙的心是一致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或不敢将领土拱手让人，留下万世骂名。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主权挑战，决非偶然，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对外炫耀实力的必然表现。近年来，日本不断有人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意识；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竭力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为向外扩展势力制造借口；强化日美安保体系，扩大防卫范围，甚至在防卫白皮书中侈谈什么“要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不断增加军费，扩充军备，想方设法向海外派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长期以来，亚洲国家一直担心日本会走军国主义老路。这并非杞人忧天。日本这一系列所做所为，像是在把这种担心变成现实。

看来，日本某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亚洲各国人民应当设法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些，别干蠢事，同时，对日本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8月30日《人民日报》）

国际档案大会

背景介绍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会议于1996年9月2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首次在我国召开，是本世纪最后一届国际档案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近14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代表与会，共同总结、探讨本世纪以来各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科学预测即将来临的21世纪国际档案界活动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制定国际档案界跨世纪的发展战略。

国际档案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除讨论专题外，还要商议会务，改进领导机构，制定决议。各专门委员会也要在会议期间开展活动。因此，国际档案大会是国际档案界最高层次、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平的专业学术会议。

本次大会将着重交流“自1910年布鲁塞尔大会以来国际档案界的合作”、“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演变与发展”、“自荷兰《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现代技术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影响”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国际档案大会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于1950年8月，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性的合作关系，并与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国际信息与文献联合会、国际电影档案馆联合会等国际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

已有15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个组织。

我国于1980年正式向国际档案理事会提出申请，并被接纳为甲类会员国。自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以来，我国一直与该组织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1988年5月，我国正式向国际档案理事会提出申请主办1996年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这一申请得到执委会的批准。

材料一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当选为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

本世纪最后一届国际档案大会——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9月2日下午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来自五大洲档案界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是：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中国组委会主席罗干宣布大会开幕。

北京市市长李其炎在开幕式上致词。他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全市1000余万市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出席大会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中国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致词说，本届大会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国际档案大会。这次大会肩负着总结20世纪档案事业成就，展望21世纪档案事业发展的宏伟任务，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档案盛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尤斯克耶维奇尤斯、国际图联主席韦奇沃斯、法语国家组织文化和技术合作署秘书长让·路易斯·罗伊也在开幕式上致词。

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在开幕式上代表国际档案理事会，向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大会中国组委会主席罗干和国际图联主席韦奇沃斯颁发国际档案理事会奖章，以表彰他们对国际档案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于1950年8月，是一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已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正式向国际档案理事会提出入会申请，被接纳为甲类会员国。根据国际档案理事会章程，国际档案大会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四年召开一次。

国务院副秘书长、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中国组委会副主席李树文主持开幕式。

会议开幕前，李鹏总理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代表和国际档案理事会成员，对他们前来北京参加本届大会表示热烈欢迎。

*　　*　　*

为服务于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这次大会的组委会从8月27日至30日举行会前研讨会，其议题为“档案的保护：从古老到今天，从传统到现代”。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在27日的研讨会开班仪式上致辞，并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档案管理与保护的情况。他说：“中国的档案管理与保护渊源流长、档案馆藏丰富多彩。在我国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公元714年的纸质档案。”他说，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档案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写有关于档案保护的具体规定，中国国家档案局还颁布了一些有关档案保护的规章、条例。近十年来，中国建立了数以千计的新档案馆，大大改善了档案的保护条件，提高了档案保护的水平。

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先生在致辞中说，档案工作者是历史的保护者，我们的工作，将使人们知道现行社会从何处来，将到何处去。

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十位档案工作者在这次研讨会上交流了档案保护的经验，探讨档案保护技术的发展趋势。

*　　*　　*

8月28日下午，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会前执委会会议在天津举行。这是第12届国际档案理事会执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来自10个国家的16名执委、观察员参加了当天开始的会议。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中国组委会主席、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在会上致欢迎辞。会前执委会会议于30日闭幕。

*　　*　　*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招待来自五大洲的档案工作者。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主席罗干致词，代表中国政府并以组委会主席的名义，向出席会议的代表表示欢迎。他说，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档案工作，而且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国民更多地了解和关心档案工作。

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在致词中向中国组委会表示感谢。他说，没有政府部门的大力而持续的支持，我们不可能维护和发展档案事业，保证历史的持续发展。国家的记忆，民族的特性和历史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为各国树立了典范。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家档案

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主持招待会。

* * *

在9月6日下午举行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被推举为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任期四年。这是发展中国家档案部门负责人首次担任这一职务。

王刚现年53岁，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曾在宁夏、甘肃、新疆工作多年。做过建筑、宣传、统战、信访等工作。1993年12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合并，他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1993年9月开始担任国际档案理事会副主席。

* * *

为期6天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代表们称赞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影响深远、开得很成功的会议，在国际档案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新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王刚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大会以其累累硕果和深远的意义载入史册，为档案事业以崭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说，档案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记忆工程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明要延续，都离不开档案和档案工作。

在闭幕式上，中国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就档案、档案工作与历史的密切关系问题作了学术演讲；名誉会员苏玛蒂尼代表全体与会人员致了谢词；国际档案理事会议决委员会主席尼尔可斯宣读了大会决议；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国际档案理事会卸任主席瓦洛讲了话；下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东道主、西班牙国家档案馆馆长玛格丽达致词，欢迎各国档案工作者2000年聚会塞维利亚。

* * *

第13届国际档案理事会执委会9月9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围绕大会确定的主题展开讨论，规定新一届理事会的各项任务，以确保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方针和计划的连续性。此外，会议还对人事组织办法，以及下一届国际档案大会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又讯，丰富多彩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系列展览9月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国际档案大会中国组委会副主席张百发、王刚等出席开幕式。

（《人民日报》、新华社讯，8月28日、29日和9月3、4、7、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李鹏总理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96年9月2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四年一度的国际档案大会，是世界档案工作者的共同节日。今天大家聚首北京，举行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开发档案，是各国政府的共同职责，也是档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专家定期聚会，总结和交流档案保护、开发工作的经验，探讨和档案有关的问题，是促进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的极好机会。我相信，在与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会必将推动各国档案工作的进步，在国际档案史册上留下值得永远纪念的一页。

中国是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具有重视档案事业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使民族文化得以世代传承，使中国文明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中国政府始终把档案工作当做维护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当做管理国家和进行建设的重要依据。中国各级政府都注重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把它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和社会发展计划，从而保证了档案工作的持续发展。档案工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这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包括档案工作，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人们无论是为追求繁荣与发展，还是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都需要借鉴前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经验，因而档案对于人们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怎样保存和利用好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又为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是需要国际档案界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希望这次大会能够促进这种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使我们真正既无愧于前人，又无愧于后代。可以预见，档案工作将会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将会在为社会进步服务中不断得到发展。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新华社讯，9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开创新世纪的档案事业

——祝贺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召开

《人民日报》社论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隆重开幕。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各国档案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这次大会，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国际档案大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国际档案大会，也是历届大会中代表性最为广泛的一次大会，是国际档案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盛会。来自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档案专家和档案工作者，汇聚一堂，将围绕“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回顾、总结20世纪各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展望、预测21世纪世界档案事业的前景，研究跨世纪的档案事业发展战略。这次会议必将有力地推动各国档案事业的进步，对保护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开创新世纪的档案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是维护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档案，对于人们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规划未来，对于加快经济建设、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档案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本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档案工作是一种永恒性的事业，它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之中，它不仅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相伴随，而且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对档案利用需求的增长，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无论政府行政管理人员、企业经营人员，还是科技工作者，或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都很清楚，离开档案他们的工作将很困难，而正是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为他们实现理想和目标，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与科学技术革命分不开的。展望21世纪，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将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给包括档案工作在内的各行各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情况下，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电子文件、缩微文件等新型载体档案的大量出现，需要档案工作者建立新的管理理论、标准和方法，采用先进技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人们档案意识的提高，档案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将日益增强。人们无论是为追求繁荣与发展，还是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都需要利用档案，从中借鉴前人的智慧和历史经验。这一切都对新世纪的档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人类文明的崇高事业服务，是全世界档案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档案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注重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把档案事业列入社会发展计划，从而保证了档案工作的持续发展。目前，一个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已初步形成。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各级档案机构进一步健全，档案队伍更加充实，全国共有县以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2633个，各级各类档案馆3662个，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档案室数以十万计，专兼职档案工作者上百万人；档案管理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多层次的档案专业教育结构已经形成；档案宣传出版工作发展很快，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档案专业报纸《中国档案报》和中国档案出版社；档案科技研究成绩显著，档案保护技术某些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各级档案学术性群众团体普遍建立；档案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成为我国基础性资源之一，并在开发中产生了很大效益。我国档案工作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具有重视档案事业的优良传统。国际档案大会在中国召开，充分表明我国档案事业的成就受到世界瞩目，充分表明我国档案事业在国际档案界的影响和地位日益扩大和提高，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大会，可以充分展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成就，可以使各国朋友实际感受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变化，可以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档案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我国档案事业。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档案工作者应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努力地工作。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相信，全世界档案工作者通过共同努力，必将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9月2日《人民日报》）

十四届六中全会

背景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1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中纪委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本次会议。

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制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本次会议把主要的讨论方向放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物质文明的丰富作基础，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两手抓”便是在新形势下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最佳总结。

材料：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材料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996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根据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鉴于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中央已有全面部署，本次全会主要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1）从 1996 年到 2010 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要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但是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甚至社会也会变质。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极其关注的大事。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八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道路的伟大进程；又是我们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风波的严峻考验，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伟大进程。这种历史性的成就，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是分不开的；同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开拓进取的群众创造精神的振起，同不信邪、不怕压、维护国家主权、冲破西方制裁的民族自立精神的发扬也是分不开的。归根到底，是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没有党的指导思想这种历史性飞跃，没有全民族精神状态这种深刻变化，没有敢闯敢试的劲头和及时总结经验的智慧，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估量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必须充分认识这个主流。

改革开放一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上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还专门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加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一贯的情况。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积极有效的努力。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这篇谈话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同时阐明了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十四大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十四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主旋律；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突出宣传一批先进典型，普遍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教育，加大反腐败、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力度。精神

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对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估量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决不能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看不到十八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只有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考察，才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建设精神文明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3)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国际格局的变动中抓住机遇、扩大开放，有利于我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外开放也会有风险，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会乘机而入。只要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确保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就能在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

应当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由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而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还由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仍有相当影响。对于这种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

在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对全党同志的一个重要考验。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4)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

(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全面、正确、积极地坚持和实践这一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

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现代化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强调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实行开放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我们用教育和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其他各种专家，思想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同志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决不能削弱，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不闻不问。强调党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实践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就一定能体现人民的意愿、时代的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6)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采、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各方面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克服在实际工作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把长远目标同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切实抓好今后五年的工作。要从大局着眼，认真解决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干部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一是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树立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优良党风政风。二是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反对假冒伪劣、欺诈行为，大力培育爱岗尽责、方便群众、优质服务的敬业精神。三是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形成文明、健康、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四是坚决禁止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的行为，初步呈现优秀精神产品大量涌现、文化市场活跃有序的繁荣景象。五是坚决治理一些地方社会治安不好和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创建更多的文明村镇和文明城市。各地各部门都要根据总的要求制定具体规划，认真组织落实。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新的面貌进入二十一世纪。

三、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

(7)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8)加强思想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进这一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深入发展。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澄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一理论，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努力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把握全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9)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运用大众传媒、书刊影视、艺术表演和课堂教学,运用重要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社会活动,运用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各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国家要确定一批重点基地。

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中,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

(10)在全民族树立艰苦创业精神,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保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处在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即使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大的改善,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持久地进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情,正确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牢固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各级党政机关、一切企事业单位都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禁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

(1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严格防止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

(12)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良品德。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品德课程、政治理论课程,把传授知识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把个人成材同国家前途、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形成爱党爱国、关心集体、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的风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少年进步的重要作用,深入开展“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和“手拉手”等活动,发扬互相关心、助人为乐的精神。重视老同志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13)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击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14)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迫切要求文化事业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

（15）繁荣文学艺术，首要任务是多出优秀作品。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在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带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既要防止横加干涉，又要防止疏于引导。要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努力形成生动活泼、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使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精神得以充分发挥，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得以自由发展。要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发挥文艺评论的正确引导作用。那种淡漠“二为”方向、远离群众实践的倾向，那种迎合低级趣味、“一切向钱看”的倾向，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反对。

（16）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要发挥主导作用。要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舆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热情。新闻媒体要发挥各自优势，改进方法，注重效果。广播电视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增加国产优秀节目数量，制止格调低下、内容不健康节目的播出。

出版工作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出版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

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认真整顿违反规定屡出问题和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新闻出版单位，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停办。

（17）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要注意研究，科学分析，正确认识。认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工作，对重大课题要组织力量攻关，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8）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决不允许成为腐朽思想文化滋生蔓延的场所。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大力扶持健康的文化产品，倡导适合广大群众消费水平的有益文化娱乐活动，更好地活跃和丰富文化生活。要维护合法经营，保护知识产权，管好文化产品的引进。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除黄色出版物、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斗争。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健全管理体制，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规范文化市场行为。

（19）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文化企事业单位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既有竞争激励又有责任约束的机制。

五、深入持久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0）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有助于两个文明建设任务有机结合，落实到基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和军民共建、警民共建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群众性文化、卫生、体育和科学普及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坚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

要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每个单位都要围绕实现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推动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沿海沿交通干线的大城市，要率先搞好创建活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规划，到2010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要充

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要以集镇为重点，以镇带村，制定规划，逐步推进。文明村镇建设要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政权结合起来，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功能结合起来，同计划生育、节约土地、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乡规民约，破除陈规陋习，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继续做好文化科技下乡、扶贫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教师、知识青年和退伍转业军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要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各行各业特别是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窗口行业"，都要根据自身特点，对职工普遍进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加强岗位培训，规范行业行为，树立行业新风。

各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都要同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持之以恒，务求实效，使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2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是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榜样。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和思想，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风气。对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突出成绩的，要给以表彰。对为人民利益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和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要热情关心，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六、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

(22)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有物质保障。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任务就难以落实。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保证必需的资金。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逐渐形成对精神文明建设多渠道投入的体制。

(23)切实解决目前宣传文化事业投入总量偏少、比例偏低的问题。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健全宣传文化事业的财政专项资金制度。运用税收、贷款、价格等经济手段支持宣传文化事业。进一步完善宣传文化事业的财税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资助宣传文化事业。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投入。对政府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公益性事业单位，应给予经费保证。对反映国家和民族学术、艺术水平的精神产品，代表国家水平的艺术院校、表演团体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代表性的地方、民族特色艺术团体，要加大扶持力度。

(24)按照合理布局、优化结构、突出重点的要求，加强宣传文化事业的基本建设。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重要的宣传文化单位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化设施建设上。在城市建设中，要配套搞好公共文化设施。大中城市应重点建设好图书馆、博物馆，有条件的还应建设科技馆。县、乡应主要建设综合性的文化馆、文化站。要以提高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覆盖率为重点，加强广播电视覆盖网建设。有计划地建成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

坚持勤俭办文化事业，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的作用。严格控制修建高档娱乐场所。禁止以发展文化、旅游为名兴建宣传封建迷信的场所。

七、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25)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各级党委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考核、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看领导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而且要看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这要作为对干部使用和奖惩的基本依据。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门和单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宣传舆论阵地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要把那些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事业心和责任感、遵守政治纪律、熟悉业务的同志选进领导班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位置，经常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思想政治状况，用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各项任务的完成。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学校、街道的党组织要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贯彻民主原则和正面引导的方针，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加强针对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作用。各部门制定政策，都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出发，不仅要有利于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要

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26)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总结新经验，探索新办法，创造性地工作，不断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领导干部要下大力气加强学习，提高领导水平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水平。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及时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27)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队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都要努力培养一大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支持优秀人才攀登新的高峰。选拔和培养有发展前途的后起之秀，给任务，压担子，严格要求，积极引导，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各地各部门要适应未来十五年的发展需要，制定规划，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在基层单位从事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担负着把精神文明建设任务落实到千家万户的责任，对他们要多关心、多支持。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严格禁止有偿新闻、买卖书号、无理索取高额报酬。对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28)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党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要在全社会发挥表率作用，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全党发挥表率作用。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对违纪违法问题，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坚决排除阻力，认真查处。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前全党正在开展学理论、学党章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要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教育要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防止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29)为加强协调，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建立相应的机构。

(30)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关于这方面的工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决议精神作出部署。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奋斗！

第六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隆重开幕

背景介绍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6年12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这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作代会，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召开的，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商繁荣文学艺术大计，迎接新世纪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界、艺术界的代表共3000多人喜气洋洋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这次文联大会和作协大会，分别审议并通过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工作报告，审议《中国文联章程(修改草案)》与《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新一届领导成员。

材料：

· 第六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隆重开幕

材料　第六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隆重开幕

【本报北京12月16日讯】　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本报记者曾坤报道：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当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进入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中央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天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为我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同志还有丁关根、李铁映、尉健行、王光英、布赫、钱伟长等。

这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作代会，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召开的，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商繁荣文学艺术大计，迎接新世纪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界、艺术界的代表共3000多人喜气洋洋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会议开幕前，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出席文联和作协全国代表大会的作家艺术家，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显得隆重而热烈，洋溢着文艺春天的融融暖意。会场里红色的横幅上写着这两个大会的主题“民主、团结、鼓劲、繁荣”。上午9时30分，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为大会的召开，并向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几年来，我们的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江泽民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文艺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承担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激励人民团结奋进的庄严职责。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时代迈着共同的脚步，和祖国一道前进，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也是人民群众关心和支持文艺事业、敬重文艺工作者的根本原因。党和人民深深地相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在两个文明的发展中，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我们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江泽民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艺工作，都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它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也为文艺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大的舞台和很好的条件。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江泽民指出，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

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反对“一切向钱看”，旗帜鲜明地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发进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江泽民最后说，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21世纪就在眼前。可以预料，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辉煌胜利的世纪，也将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世纪。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因病不能参加大会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发表了题为《迎接文学的新世纪》的书面致词。巴金在致词中说，今天，大家欢聚一堂，畅叙文学艺术创作的体会，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经验教训，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相互勉励、平等切磋，实事求是地制定规划，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正置身于人民自觉地创造新生活的伟大时代，也应该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艺术家，以恢宏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描绘时代的画卷，以激越的豪情和优美的旋律，谱写当代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让我

们承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望，承负着历史的光荣使命，去迎接文学艺术的新世纪！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丁华代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全国台联和全国侨联，向第六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在社会 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期待着文学艺术工作取得新的成就，期待着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期待着舞台屏幕上有更多的反映工农兵群众及其先进分子的人物形象，期待出现更多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守芳在祝辞中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也对军事题材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在军内外作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这次文联大会和作协大会，将分别审议并通过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工作报告，审议《中国文联章程（修改草案）》与《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修改草案）》，选举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新一届领导成员。

今天的大会由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主持。

有关部门和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摘自199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

背景介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人选，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6年12月16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报请国务院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作出了决定，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董建华是一百多年来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行政长官，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体现，也意味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

材料：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07号
- 国务院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 "港人治港"的重要体现
- 江泽民主席会见董建华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07号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人选，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总理　李鹏

1996年12月16日

（摘自199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国务院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英、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报请国务院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作出了决定。会后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李鹏总理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主持下，由400位全部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于1996年12月11日在香港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港人自己来选择最高行政首长，标志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对这次选举的顺利进行和董建华的当选，表示热烈的祝贺。

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决定，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就职。在此之前，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负责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

李鹏总理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后，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已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报请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报告》。今天，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就是依法来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李鹏说，刚才，我们讨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并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就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过程等情况所作的汇报，朱镕基、钱其琛副总理发表了重要意见。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过程是民主的，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完全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香港社会对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也是普遍欢迎的。

李鹏说，我们今天作出的这项任命是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命。它充分体现了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和诚意。我们相信，董建华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之后，定将不负众望，为香港的平稳过渡，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于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钱其琛、李岚清、姜春云，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李贵鲜、彭珮云、罗干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

（摘自199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港人治港”的重要体现

——祝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

经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业已产生。这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全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香港新时代的即将到来。我们向600多万港人和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成立到全部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400人的推选委员会的组建，从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制定到行政长官参选人的报名、候选人的提名，到推选委员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人选，直至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的整个过程，正是广大港人开始民主参政，登上“港人治港”的历史舞台的过程。它再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令人欣喜的是，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的过程中，广大港人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种热情及其蕴含的“筹建特区，匹夫有责”的精神，乃是明天香港稳定繁荣的广泛而深厚的基础。

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全过程之公正、公平和公开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提名、选举、投票、唱票、计票，无不集思广益，坚持民主程序，且实施公正的监督，对中外记者开放，从而确保了每一位推委会委员都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投下神圣的一票。事实表明，只有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今天，港人才得以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广大港人在民主参政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切合香港实际、独具特色的民主形式。推委会委员与候选人之间的问答，不仅是对候选人的一种考察，也是围绕治港蓝图而展开的建设性意见的大融汇、大交流，它所营造出的同心同德、共建香港的良好气氛，赢得香港社会的普遍赞誉。

现在，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一任行政长官将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负责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工作繁重而紧迫。作为第一任行政长官，还要为将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地实践“一国两制”的方针、为全面贯彻基本法，做好开创性的工作，任重道远。

我们相信，有祖国人民的支持，有包括18万公务员在内的广大港人的共同努力，有筹委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础，第一任行政长官一定能不负众望，带领600多万港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摘自199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江泽民主席会见董建华

——祝贺他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范丽青、冯秀菊）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江泽民首先祝贺董建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他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任总督都是英皇室任命的，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是一百多年来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行政长官，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体现，也意味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

江泽民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从这次行政长官的选举，就可以看到中央在贯彻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面的决心和诚意。今后我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会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决不会去干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他请董建华先生对此放心。他并表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如果行政长官遇到什么问题需中央帮助，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持。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你肩负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带领港人将“一国两制”付诸实践，史无前例，任重道远。他希望董建华先生不辜负包括六百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期望。他并表示相信，有祖国强大作后盾和六百万港人的共同努力，“一国两制”一定会成功，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定能保持。

董建华对江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感到十分高兴，并表示，他这次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并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感到非常光荣；他一定尽一切努力，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的兴旺，做一番事业。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参加了会见。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今天中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董建华。

（摘自1996年12月19日《光明日报》）

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议员选举产生

背景介绍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深圳举行。会议选举产生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选举临时立法会是推委会继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之后的另一项重要选举。

临时立法会的130名候选人来自香港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和各个方面。半数以上现任港英立法局的议员也报名参加选举，代表性之广泛有目共睹。

临时立法会是在“直通车”安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为维护中英联合声明，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的重要举措。

材料：

· 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议员选举产生

材料　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议员选举产生

【新华社深圳12月21日电】（记者孙承斌、李南玲）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深圳举行。会议选举产生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在开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就是要选出一个能够真正代表香港的整体利益、能够反映香港市民意见的临时立法会。

深圳会堂今天迎来了推委会的399名委员。200多名中外记者也早早赶来采访这一重要会议。

选举临时立法会是推委会继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之后的另一项重要选举。钱其琛说，本来这次选举应该在香港举行，由于英方拒绝合作，我们不得不把会议移到深圳来开。令人遗憾的是，英国方面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昨天就临时立法会的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港英政府随之作了呼应。他们老调重弹，反映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

临时立法会的130名候选人来自香港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和各个方面。半数以上现任港英立法局的议员也报名参加选举，代表性之广泛有目共睹。钱其琛指出，临时立法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应当成为我们选举临时立法会议员的一项指导原则。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均衡参与，是香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钱其琛的讲话博得委员们的阵阵掌声。随后，委员们听取了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鲁平关于选举事项的说明，鼓掌通过了监票人名单。总监票人为刘兆佳。

上午9时20分，大会工作人员把写有130位候选人名字的红色选票，分送到399位与会的推委手中。推委们秉承对香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责任感，认真对每一位候选人作出选择。写票过程历时近50分钟。

上午10时30分，投票开始。委员们依次来到设在主席台两侧的票箱前，郑重地把代表港人意愿的选票投进票箱。随后，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认真的点票工作。

下午4时10分，工作人员宣布了经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确认的选举结果，60位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临时立法会议员。热烈的掌声在会堂内经久不息，委员会们为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和推委会又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而倍感兴奋。

在60名当选议员中，既有工商界人士，也有劳工、基层界别的人士和专业界的精英。尤其是，现任立法局议员中有33人也被选为临时立法会议员。这充分证明，推委们在选举时，直正是胸怀香港的整体利益，从有利于香港平稳过渡的大局出发的。把这些在立法事务方面有实际经验的人士选到临时立法会中来，将有利于临时立法会工作的开展。

为了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按期产生，筹委会已成立了第一届立法会小组，研究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第一届立法会将会完全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产生。

会议结束时，钱其琛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对临时立法会60名议员的当选表示祝贺，强调设立临时立法会是在“直通车”安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为维护中英联合声明，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的重要举措。

今天的会议由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主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王汉斌、安子介、霍英东、周南、王英凡、李福善、董建华，副秘书长秦文俊、陈滋英、邵善波也出席了会议。

（摘自199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风云人物

李沛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李沛瑶同志，于1996年2月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3岁。

李沛瑶同志，广西苍梧人，1933年6月1日生于香港。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毕业。1957年至1958年任南昌航空学校教师。1958年至1987年历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6年后，历任民革江西省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劳动部副部长，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沛瑶同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一代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李沛瑶同志是著名爱国将领、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李济深先生的儿子。李沛瑶同志与李济深先生虽然成长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国家统一、中华振兴而奋斗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李沛瑶同志自小受父亲的熏陶，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他逐步走上了民革中央和全国人大的领导岗位，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在合作共事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李沛瑶同志是在中共中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将这一制度载入宪法之后，走上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领导岗位的。他虽然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但由于熟悉历史传统以及勤奋学习和深入研究，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民革本身就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个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产物。他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要经受两个考验，一是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考验，一是担负起参政党历史责任的考验。这就要求民主党派从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上都要转变和发展，围绕参政党的性质和职能来搞好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他多次强调，民革要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参政党，就必须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员素质，增强组织活力，建立健全参政党的机制，也要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自身建设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他认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民革作为参政党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能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越能体现民革自身存在的价值。参政议政就是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建议。民主监督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有组织地开展，当前要着重在反腐倡廉、立法执法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履行监督，当好共产党的诤友，并接受共产党的监督。

李沛瑶同志言行一致，对民革的工作非常投入，非常热爱。为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把民革建设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参政党，李沛瑶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开创了民革工作的新局面。1992年以来，在他亲自带队和组织下，就智力支边扶贫、抑制通货膨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区域协调发展、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问题，经过深入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很有价值、见地深刻的建议。这些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他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沛瑶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觉地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他自愿下到基层，接受锻炼，在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整整干了30年。他虚心向工人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受到工人们的尊敬和赞扬，被树为“知识

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典型”。他刻苦钻研业务，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过《锻造、冲压工作技术问答》等专著，是一位在冲压、设备电气等方面造诣颇深的专家。他参加过多种新型飞机的研制和设计，主持完成了多项较大的技术革新项目，多次被授予“优秀科技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等称号。他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培养了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出差回厂看望同事。工人们握着他的手仍亲切地称他“李师傅”。在担任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他提出，必须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他对劳动用人、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等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他特别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劳动保护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一再强调要高度重视生产安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的当天，他带队上街宣讲，解答问题。他对危害人民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各种不正之风极为痛恨，力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依法治理。并且身体力行，坚决斗争。2月2日凌晨，当罪犯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罪犯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英勇精神和浩然正气，永留人间！

李沛瑶同志作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曾就祖国统一问题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讲话，表达盼望和平统一的殷殷之情。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他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影响，广泛联系台湾和海外亲友，沟通感情，介绍国内情况，为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他曾致电台湾国民党领导人，提出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加强两岸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他在遇害前两天，还主持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纪念江泽民主席关于台湾问题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的座谈会。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图谋。他一贯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李沛瑶同志十分重视对外友好工作，他曾多次率团出访，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为加强同各国议会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沛瑶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以致用，不尚空谈。他对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为人厚道，敬业乐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作风正派民主，生活俭朴。

李沛瑶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国家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领导，是国家和人民无可挽回的损失，举国为之惋惜和悲痛！沛瑶虽逝，但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与世长存！

李沛瑶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讯，2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

- 李沛瑶同志在京不幸逝世
- 爱国同舟风雨行——李沛瑶同志生前事追记
- 李沛瑶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李沛瑶同志在京不幸逝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同志，于1996年2月2日凌晨不幸逝世，终于63岁。

2月2日凌晨，一名歹徒潜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同志的住所盗窃财物。李沛瑶同志发现后与之搏斗，不幸遇害。公安部门迅速组织破案，已将歹徒抓获。

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北京市公安机关2月5日依法将杀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沛瑶的案犯张金龙逮捕。

经公安机关侦查和审讯，现已查明，案犯张金龙，男19岁，山西潞城人，原系李沛瑶副委员长住所附近的武装执勤战士，1994年12月入伍。案犯于2月2日凌晨4时许利用执勤之机，潜入李沛瑶同志的住所盗窃财物时将李沛瑶同志杀害。案犯作案后携带抢劫的财物逃跑时，同院的另两名武警执勤人员发现情况异常，当机立断，将其扣留，及时移交公安部门。经审讯，案犯张金龙对图财害命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李沛瑶同志的遗体，2月1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以及丁关根、田纪云、李岚清、李铁映、杨白冰、邹家华、姜春云、钱其琛、尉健行、温家宝、王汉斌、张震、张万年、迟浩田、任建新、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光英、程思远、布赫、吴阶平、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彭珮云、王兆国、洪学智、钱伟长、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和王平、李德生、陈锡联、段君毅、黄华、谷牧、马文瑞、汪锋、郑天翔、邓力群等同志前往送别。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也前往送别。

在李沛瑶同志逝世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分别打电话或前往吊唁，对李沛瑶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彭真、吴邦国、杨尚昆、万里、宋平、薄一波、宋任穷、秦基伟、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杰、卢嘉锡、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艾买提、罗干、张思卿、叶选平、吴学谦、杨汝岱、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邓兆祥、赵朴初、巴金、刘靖基、钱学森、胡绳、霍英东、马万祺、万国权等领导同志，以及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肖克、余秋里、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耿飚、姬鹏飞、黄火青、习仲勋、彭冲、周谷城、严济慈、叶飞、廖汉生、王芳、方毅、杨成武、杨易辰、刘复之、王鹤寿、韩光等老同志，也分别通过打电话、发唁电、前往吊唁等不同方式对李沛瑶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

一些外国领导人、驻华使节和李沛瑶的一些国际友人和故交好友，对李沛瑶的不幸逝世表示了哀悼并向家属表示了慰问。

（新华社讯，2月4、6、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爱国同舟风雨行
——李沛瑶同志生前事追记

新华社记者　朱冬菊　陈斌华

他刚刚阅完的有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材料还摊在办公桌上；他已安排停当的2月份工作日程表还摆在茶几上，他给台湾同胞的新春致辞还未来得及发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和对祖国人民的无尽眷恋匆匆离开了人世。

望着他的遗像，民革的同志忘不了去年12月21日他还在叮嘱大家：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发挥民革的优势，做好宣传和联谊工作，为保持香港和澳门的稳定繁荣、实现平稳过渡创造条件；继续推动海峡两岸经贸、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人员的交往，以加快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望着他的遗像，人们不禁想起他在今年元旦茶话会上表达的强烈愿望：随着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日益临近，我们盼望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心情越来越热切，希望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尽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以告慰先辈，造福后代。

望着他的遗像，他1月31日在纪念江泽民主席关于台湾问题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座谈会上的严正讲话又仿佛回响在人们耳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强烈愿望。令人遗憾的是，李登辉一意孤行，罔顾民族大义，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所不愿看到的，也是绝不允许的。

作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李沛瑶同志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图谋。他曾一遍再遍地呼吁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尽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影响，广泛联系台湾和海外亲友，与他们沟通感情，介绍祖国大陆的情况，提出两岸人民加强合作，推动祖国实现和平统一进程的建议。

“劲草疾风，丹心报国，英年硕望，盛雀流芳”。这是李沛瑶同志生前挚友悼念他的话。作为著名爱国将领、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先生的儿子，李沛瑶继承父辈遗志，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李沛瑶是一名颇有造诣的高级工程师。在30多年的科技工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深入基层，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被誉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典型。他刻苦钻研业务，为我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作出了贡献。1988年，李沛瑶同志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1992年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199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工程师到国家领导人，岗位变了，然而，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变。

作为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深感肩上担子重大。几年来，他继承民革先辈的精神和遗志，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四处奔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积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李沛瑶身体力行。尽管公务繁忙，但他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就国计民生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993年，他率领人员到贫困的贵州山区考察时，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地头、农户人家访贫问苦，并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建议。1994年，他率领调查组到中西部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的22个市县，深入到村镇，就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向中央提出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10条建议。1995年，为了解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和改革进展情况，他又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到四川、陕西和上海广泛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多项建议。

在中央编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过程中，李沛瑶积极献计献策，就缩小东西部差距、建立社会保障

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地方积极性、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祖国统一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

李沛瑶同志走了。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的秘书小唐说，去世的前一天，李沛瑶同志还在办公室里看了一整天的资料，准备第二天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然而，这些安排好的事，他还没来得及做便永远地离去了……

"爱国同舟风雨行，我中有你总关情。民众弹冠统一日，革命碑前告瑶公。"这首悼诗，表达了人们对李沛瑶同志的缅怀之情。民族振兴、祖国统一，李沛瑶同志为之奋斗一生的这一崇高事业，各族人民将继续为之奋斗不息。

（2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李沛瑶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1996年1月1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良好的祝愿。

过去的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沿着邓小平同志所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八五"计划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实现。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好形势，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隆重纪念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忧患意识，更加坚定了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成功地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回顾改革开放17年来不平凡的历程，我们为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结果。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团结的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精神支柱，是引导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有了这一思想武器，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真总结17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15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方针、主要任务、战略布局和重大政策，展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光辉前景，是指引全国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胜利跨入21世纪的伟大纲领性文件。目前，一个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1996年的光荣任务，为"九五"计划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有着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在寻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共同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后，在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新征途中，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我们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贡献力量。我们要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加强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提高可供决策参考的建议，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凝聚人心、理顺关系、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随着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日益临近，我们热切盼望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我们将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和江泽民同志1995年1月30日讲话精神，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图谋。中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谢谢！

（新华社讯，1月2日《人民日报》）

陆定一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定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5月9日凌晨5时4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陆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同年秋调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1927年4月下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全。同年5月在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1928年秋，在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建设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对华北地区的政权建设、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民运工作，尤其是战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2年4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解放日报》改版中，坚持党的新闻方针，端正报纸的政治方向，对党的新闻工作的改进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经常为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陆定一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同国民党反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1949年9月，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陆定一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繁荣科学

和艺术的方针。同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文化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党的这个长期的、基本的方针作了系统的深刻的阐述，受到普遍欢迎和拥护。他主张，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当实行“双百”方针。他亲自布置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在国内外科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8年，党中央为加强对文教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共中央文教小组，陆定一任组长。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他提出教学必须改革，致力于教育改革的探索，重视总结教育改革的经验。他积极支持创办了全国著名的试验教育改革的北京景山学校。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陆定一负责了《高教六十条》等文件的修定工作。他是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之一，为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主张系统全面地宣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抵制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作法。他曾一度分管宗教工作，积极稳妥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受到宗教界人士普遍欢迎和敬重。他还积极支持中西医结合，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他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铮铮铁骨。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定一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关心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改革、建设事业，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80年代初期，处于发展阶段的乡镇企业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1982年，陆定一回到家乡无锡进行调查，并致信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认为农村要致富，必须允许搞第二、第三产业。陆定一坚决拥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他认真研究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陆定一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陆定一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章，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廉洁奉公，生活朴素，不争名利。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维护团结。他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

陆定一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陆定一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陆定一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1996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严　济　慈

在中国科学界举办的各种会议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精神矍铄地参加各种活动。他就是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如今，这位年已96岁高龄的老人，已是蜚声国内外，桃李满天下，还在无限忠诚地为了祖国的繁荣不倦地工作着。人们不禁想起了屈原的诗句：“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么，究竟是何缘由使这位世纪老人如今还在不息地求索呢？

负笈法国——一年中获得三张大学文凭

1918年秋季的一天，严济慈告别了故乡浙江省东阳县一个不满50户人家的小村庄，告别了父耕母织的贫苦农民家庭，走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尽管在这之前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的，而他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一个从小连电灯都没有见过的农村孩子，只身一人走进了完全陌生的环境，谁能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呢。

光阴荏苒。5年间，他顺利地通过了各种考试，1923年在南京高师数理化部和东南大学物理系同时毕业。每逢想到父母是靠借债供他念完中学的，就不敢有半点的懈怠。课余时间，他读了大量课外书，做了各种习题。他的老师何鲁、胡刚复、熊庆来等人对这个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很满意。当是，在中国大地上，爱国的学生运动风走云涌，“五四”运动举起的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深深地吸引了他。“科学救国”的梦想促使他毕业后，于1923年用编写《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两本书的稿费及师友资助的一笔钱，乘船经印度洋、地中海到了法国。

在这之前，他与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张宗英邂逅。学生时代的张宗英勤奋好学，热心社会活动，“五四”运动中，她担任了南京学生会评议会的主席，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时受过李大钊的教诲。1923年她和严济慈订婚。当年，严济慈离开祖国和年轻的未婚妻，来到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巴黎。在巴黎，他无暇到风光旖旎的塞纳河畔漫步，雄伟的拿破仑墓和壮丽的凯旋门，也只是匆匆而过。时间对于严济慈来说，是那样宝贵，到法国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就考得了巴黎大学3张文凭，从而获得巴黎大学的数理硕士学位。又过了两年，取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几天以后，他的导师、新当选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夏尔·法布里教授，第一次出席法国科学院例会时，在会上得意地向全体与会的院士们，宣读了他这位杰出学生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次日，《巴黎晨报》报道了这件事，并在第一版刊登了法布里教授和严济慈的照片。事情传开以后，许多旅居法国的中国人都感到很光彩。其中就有画家徐悲鸿。

碧海长天——徐悲鸿赠画赞誉科学之光

1927年夏，严济慈从地中海乘船动身回国。在船上和徐悲鸿相遇。几年前，徐悲鸿已从传闻中和报纸上认识了严济慈，两人尽管是初次相逢，却一见如故。在船舱里，他们谈起苦难的、正在遭受列强蹂躏的祖国，心中无比的惆怅。

谈话中，徐悲鸿感叹说：“当今的中国，太需要科学了，太需要像你这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人才了！”严济慈听了，谦逊地笑了。

随后，徐悲鸿拿出画笔摊开纸说：“请坐下，让我给你画张画留个纪念吧！”稍顷，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严济慈那张年轻、忠厚、和善的脸。画毕，在旁边用法文写了一行秀丽小字：“科学之光一九二七徐悲鸿”。

严济慈把画像接过来，高兴得看了又看。过了一会儿，他们到甲板上散步时，心情如同奔腾澎湃的海洋一样难以平静。他对徐悲鸿说，回国后将致力于科研和教学，让科学之光照亮古老的、苦难的祖国。

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929年严济慈重返巴黎后，徐悲鸿在写给他的信中依然充满了敬仰之情，他从遥远的祖国给严济慈写信说：

“慕光学长：

顷由尊岳以法国学府之大作见赐，欣幸。国人能与世界科学进化者只足下一人……。弟碌碌度日，见闻日陋，引领西望，神魂俱驰。”

尔后，在徐悲鸿愁苦寂寥的日子里，严济慈曾慷慨相助。

严济慈学成归来后，在上海和张宗英结婚。两年以后，两人同赴巴黎留学，回国后张宗英在上海中国公学和云南大学任教。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丈夫在天涯，还是在国难当头的动荡日子里，她都始不渝地忠于爱情，独自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抚育众多的子女，恪守贤妻良母的职责。

勤奋耕耘——执教鞭传播科技培育新人

留学归来后，严济慈成了明星般的人物。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争着聘请他。于是，他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等4所大学同时教起书来。抽空，还参加了筹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在这之前，中国在物理学方面只有教学，没有研究。在这之后，他便一跃跻身于学者名流之林。

他走上各个大学的讲台，热心地给青年们讲述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勉励青年们奋发起来，科学救国。听讲的学生中，有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江仁寿、杨承宗、余瑞璜等。这些人后来都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

第二年秋天，他再次到巴黎进修，和夫人张宗英同行。两年后回国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在这里，严济慈以一个创业者和开拓者的姿态，对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勤勤恳恳地领导着青年们研究光谱学、压电晶体学和地球物理学，为使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辛勤地耕耘、播种。

1935 年，严济慈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同时当选的还有居里的女婿菲列德里克·约里奥和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卡皮察。

1937 年秋天，严济慈到巴黎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同时还参加了他的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退休的庆祝会。庆祝会在巴黎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参加者除法国科学界知名人士外，各国科学界都派了代表，严济慈代表法布里教授的外国学生上台讲话，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感念了这位法国著名学者诲人不倦的精神；会上，巴黎大学理学院院长代表法布里教授的法国学生致词。严济慈讲完话走下主席台时，法布里教授特地把自己的这位得意的中国高足介绍给了与会的法国总统。

访问法国期间，严济慈还亲自带领钱三强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拜见了早年的同学，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他向居里夫人极力推荐这位青年，并希望予以多多关照和培养。钱三强后来果然没有辜负导师们的栽培，成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在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浩然正气——反侵略仗义执言声震寰宇

“九一八”事变不久，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来北京访问。在两个月里，严济慈和他朝夕相处，带领他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郎之万教授是位反法西斯的英雄。在法国每次群众游行中，他都奋不顾身地走在最前列。后来他为了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坐过 3 年牢。出狱后毅然参加了共产党。一天，他和严济慈来到北京北海边上的团城游览，忽然在一尊女菩萨的塑像前停住了，那女菩萨被日本侵略者砍去了一只胳膊，缺的胳膊用红布包着，郎之万教授看了动情地说：“你看，她的脸是多么美丽、聪明、慈爱；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的脸孔不知多么丑，看了她的不幸，真要叫人流下眼泪！”

两位热爱和平的物理学家之间的友谊保持了许多年。

严济慈是位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他不能容忍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进犯。因此，这次访问法国，除参加学术活动外，还忙着从事各种抗日的宣传活动。这时，为使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事业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吴玉章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巴黎争取国际声援。严济慈怀着一腔爱国热忱，积极担当了吴玉章和法国进步学者郎之万教授之间的联络人。

1938 年初春，严济慈从巴黎动身回国，途经里昂时，到里昂天文台台长杜菲教授的家里作客。在这里，遇见了《里昂进步报》的一位记者，他愤怒地谴责了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次日，这家报纸刊登消息说，严济慈正率领着一批中国留法的学生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同时还登载了他的抗日言论。消息传到船上，有人提醒严济慈回国后不要在沦陷区的上海下船，以免身陷囹圄。为此，他被迫在香港上岸，在那里住了些日子。后来经过越南，到了昆明。事情发生以后，他在北京的家也受到了日军的监视。

过后，他决定把设在北京的物理研究所迁到昆明，并设法通知妻子扶老携幼南下相会。

科学救国——搞研制披荆斩棘功勋卓著

一天，他在昆明北郊黑龙潭，把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忧心忡忡地说：“侵略者破坏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使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袖手旁观了。”他随即郑重其事地宣布说：“鉴于战时大后方非常缺乏和需要军用通讯工具和医疗器械，我决定带领大家动手研制压电水晶振荡器、显微镜和各种光学仪器。”

从此，中国的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的研制工作就这样开始。在黑龙潭的一座破庙里，他建起了极其简陋的实验室。起初，人也住在破庙里，后来研制出仪器卖了些钱，才在山底下买了一小片土地，盖了几间房子。他和学生们怀着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参加抗日活动的神圣信念，早起晚睡，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挽起袖子亲自动手磨镜片，做光学计算，装配起了一架又一架显微镜。昔日学者名流的风采，这时，在他身上已经一扫而光。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农民儿子的质朴和真诚。

短短 4 年，他领着大家共造出了 500 架 1500 倍的显微镜，还造出了许多经纬仪和水平仪，训练出了一批人才。未来新中国光学仪器工业的雏形，就是这样形成的。

他还成功地用压电水晶研制出了进行军事通讯不可缺少的大批振荡器。1946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因此获得了“胜利勋章”。中国科学界获得这种勋章的只有两个人，他和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大夫。

向往民主——反内战发表演说愤怒呐喊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正在美国讲学、访问。在华盛顿、在纽约、在芝加哥，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观光、访问。他曾经幻想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能够成功，有朝一日中国也能实现欧美的民主政治。

回国后，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悍然发动了内战。全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幻想的民主政治不仅实现不了，就连全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这时候，他已是 5 个孩子的父亲，面对妻子的愁苦和叹息，孩子们的啼饥号寒，时时都在刺痛他的心。

梦想破灭了，他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矛盾之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在烟雾缭绕的小房子里，终日伏案编写着一本又一本物理教科书，靠着微薄的稿酬养活

妻子和孩子们。在茫茫的黑夜里他茫然四顾，寻求不到一线光明。他感到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作人一向谨慎、持重的严济慈，不得不在公开的集会上发出了愤怒的呐喊。1948年3月28日，北京科学工作者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他在会上用宏亮的浙江家乡话说：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今天成立的这个协会，我认为应该有三个宗旨：第一，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科学建国的工作；第二，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第三，争取科学工作者条件的改善和生活的保障。"

接着，他慷慨激昂地说："可是，目前的情况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了！"

次日，《华北日报》刊登了这篇讲话。

这年的9月9日，他又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了类似的演说，引起在座科学家的极大共鸣。第二天，报纸以"科学家的愤慨"为题，加上编者的按语全文刊出。过后，他看了报纸心想："其实，我说的话比实际情况还差得远呢！"

在旧中国，理论是脱离实际的，科学仅是装饰品而已。一天，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胡适等人在讲话中极力粉饰太平，严济慈听了，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侈谈什么发展科学！"

胡适听了，无言答对。

天地一新——郭沫若请其出山担负重任

1949年，解放军开进了北京城。

一天，一位接管科研单位的共产党干部问道："严济慈呢？"

"他到南方探亲去了。"钱三强说。

"赶快打电报叫他回来！"

第二天，钱三强和顾功叙两人联名给他打了电报。原来，他是为了怕国民党政府强制让他去台湾而暂时躲避到了香港。接到电报后，他和胡愈之等人第一批乘船从香港到达北京。随后，妻子和孩子们也陆续回来了。他们的儿子又光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了业，双光进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四光进了燕京大学，还有武光和陆光也都先后进了中学读书。他自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又是请他参加全国民主青联代表大会并作专题报告，又是请他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秘书长；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请他去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建国大计。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看到了自己在新中国的光辉前程。

一天，解放军通讯兵部队的王诤托人求见他。

他知道后纳闷地心想："解放军找我，能有什么事情呢？"

王诤恳切地谈了来意，说："这种材料我们部队很急需，您能不能抽时间，协助我们建立一个制造水晶振荡器的车间？"

"可以，可以！"严济慈听了，连忙高兴地答应说。

这样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严济慈的思想上却掀起了巨大波澜。回忆过去，徒有爱国志，却报国无门。如今，为国家效力，却受到了尊重。他心想：作为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大有用武之地了。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盼望能尽快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料却出现了新的变化。一天，郭沫若院长到物理研究所看望他，宣布了一个他想不到的决定。

"慕光，我们想请你担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你看怎样？"郭沫若微笑着说。

"噢，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任命太意外了，一时间，他还想不通。

郭沫若笑了。他不解地问道："你真的是干不了，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那好，我就坦率地说吧。我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实验室，就是他的科学生命的终结。"

郭沫若听了，哈哈大笑："慕光，你的话是对的。但是倘能使成千上万的人都进入实验室，岂非是更大的好事！"严济慈听了，只好服从。

奠基创业——苦操劳呕心沥血振兴科学

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科学院还没有一个分院，1952年严济慈被派到沈阳，几年间他不仅创办起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还从无到有，创办了光学精密机械、金属、土木建筑、林业土壤等一大批研究所，他从买地皮作起，日夜操劳。十多年后，还实现了把"关外的人才向关内送"的宏大理想，以东北为起点，使光学精密机械等新兴的学科逐渐延伸到上海、西安、合肥、成都等地发展壮大起来。

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会，严济慈担任了技术科学部主任。一天，各学部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严济慈报告工作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坐在下面认真地听；有时他还出席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的会议。由于他讲一口浓重的浙江话，坐在一旁的郭沫若院长常常帮忙"翻译"。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郭沫若亲自担任校长，严济慈和华罗庚分别担任了副校长。这时，严济慈已经30多年没有教过书，为了迅速给新中国培养出人才，他满腔热情地重新登上讲台，在科技大学兼教普通物理。许多年轻人还在中学读书时，就读过他编写的课本，他撰写的《普通物理学》，是各大学的标准课本。为此，许多年轻

人对他很崇敬。每逢他讲课时，科大的大阶梯教室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听讲的不仅有科大的师生，还有北京各大学的年轻助教们。严济慈教授讲课，历来不主张事先照抄书本。由于功底深，他讲的课，大家听了都觉得容易理解。

“你们猜，我为什么对年轻人这样有感情?”一天，他问身边的人。

“这是因为，我的老师对我是很关心的，没有他们的栽培，我恐怕不会有今天!”沉吟片刻，又略带歉意地说：“比起当年我的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关心来，我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耄耋入党——了心愿老泪纵横壮心不已

1980 年 1 月 27 日拂晓，严济慈教授家的会客厅里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他一面披衣起床，一面走进了会客厅。心想：“是谁这么早打电话呀!”

原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哈哈，慕光吗?早上好!我刚从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你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因此一清早就打电话来祝贺。”

当时，已经年过九旬的许德珩，一年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听说自己的好友也有了光荣的归宿，心里很是高兴，因此祝贺。

严济慈放下电话，已经毫无睡意了。他赶忙打开收音机，果然听到一位女播音清晰的声音，播送着他入党的新闻。

晨光曦微中，严济慈走进书房在书桌前坐下来，忽然看见客厅墙壁上的两幅画：徐悲鸿的奔马和刘海粟的苍松。想起几天前正是对着这两幅陪伴了自己近 50 年的画，写下了那份入党志愿书的。于是，他激动地自言自语说：

“正是这经霜不凋的苍松和振鬣奋蹄的奔马，使我时常想到，自己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仍应壮心不已!”

这天，祝贺的电话、电报、信件纷至沓来，使他应接不暇。傍晚时分，秘书送来了一叠信。他一封封地翻看着，忽然间，一封笔迹十分熟悉的信映入了他的眼帘。信中写道：

“慕师函大：

顷在报端，欣悉吾师获得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吾师 30 年来夙兴夜寐为党忠诚工作，学习马列，提高觉悟，终以大耄耋之年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一员。

昔屈原有云：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弟子幸列门墙，今已到望崦嵫之年，敢不以吾师为榜样，将上下而求索。

信是严济慈教授早年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写来的。读完了信，严济慈老泪纵横，他为自己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而激动不已。

饮誉中外——八旬翁重访巴黎再传友谊

那年 5 月，他以 80 岁高龄长途跋涉，再次访问了法国。

飞机从北京起飞了。他坐在舷窗前，忆起 42 年前最后一次告别巴黎时的情景。最使他动情的，是那些曾经培育和帮助过他的法国老师、同学和同事。岁月流逝。如今有些人已经过世，有的还健在，想到就要和过去的好友们重逢，他非常兴奋。

次日，他在法国朋友陪同下，出现在尼斯市郊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的国际会议上。

《尼斯晨报》曾这样报道了他的这次访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在他的旅行箱里带来了饰有龙和青蛙的鎏金瓷瓶。这个友谊的纪念品，对科学城是一个象征。它是最早的地动仪的模型。这个地动仪是中国科学家张衡公元 132 年发明的。”

《尼期晨报》还写道：

“严济慈先生从北京来并没有做无益的旅行，在刚刚成立的科学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外国同行面前，他阐述了有关基本利益的一些想法，考虑人类生存手段的通路，他特别主张使用适用技术，也就是根据各民族发展的程度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所真正需要的技术。”

1980 年 5 月 12 日下午，法国科学院举行例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严济慈在中国驻法国大使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大厅。法国许多著名科学家见到这位久别的老朋友都非常高兴，争先恐后地走过来和他握手。其中有世称“高压电子显微镜”之父的杜普易。这位 80 高龄的老院士，退休以后本来住在外省，听到严济慈访问法国的消息后，他特地赶了来；还有法国前任科学院院长屈里亚特等。

在欢乐的乐曲声中，法国科学院前院长库伦教授走上主席台，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非常了解严济慈教授。大家知道，他是在巴黎，在夏尔·法布里实验室，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本人，都读过或利用过严济慈教授关于臭氧吸收的出色著作。

“昨天，我和严济慈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个小时，我俩谈起了许多往事，我想用几句话来说明他对法国的热诚，他热诚地怀念过去的老师，感激那些使他热爱物理和热爱科学的人们。这是经过时间和距离考验了的友谊。”

热烈的掌声过后，严济慈走上主席台致答谢讲话。这时，许多在座的老院士纷纷离开自己的座位，走过来和他紧紧地握手。半晌，他说：“此时此刻，在这个庄严的集会

上，我激动得找不出词句来表达我的情感了。”

他望着法国朋友们一张张期待的脸，很动感情地说：“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给我这个置身于法国科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中的机会，我重逢了年轻时代的朋友，尽管时间流逝，友情依然如故。我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你们给予我的接待，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好客，而且是法国学者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会上，严济慈自豪地告诉他的法国朋友们，他的古老的祖国，已经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法国科学家们的友谊和支持。这次空前的聚会，一直进行到傍晚，才尽兴而散。

几天以后，严济慈教授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飞机起飞后，他从窗子里俯视着渐渐变小的法国大地，不禁自言自语道：“再见吧，法兰西！再见吧，热情好客的法国朋友们！”

身居高位——持本色为国操劳不倦工作

两年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严济慈以全票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虽然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位，却依然保持着当初农民儿子的本色。追忆往事，他念念不忘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提挈过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更是无限怀念陪伴他度过了艰难的、漫长岁月的爱妻张宗英，在他的会客室里安放着张宗英的骨灰盒，在遗像的旁边写着：“真卿吾爱，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在严济慈教授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妻子的勤劳贤淑，时时替他分忧，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他们儿女们心目中，他们的母亲无愧是外公当初所希望的“勉为贤妻良母”，他们的父亲无愧是“询为贞夫严父”。

如今，这位已是誉满中外科学界的老人，不仅忠于爱情，还在无限忠诚地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倦地工作着。

（《中华英才》1996年第6期）

董　建　华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出任这一职务的董建华现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事务顾问。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董建华现还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香港公益金副赞助人及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区赞助人。并曾任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香港船东协会主席。

董建华还担任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及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会员等职务。

董建华于1937年在上海出生，曾分别在上海、香港和英国接受教育。他在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之前，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和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

董建华与夫人赵洪娉及三子女、两孙女，全家现居住在香港。

（摘自199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珍　闻　轶　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严重犯罪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严厉打击流氓团伙犯罪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3起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氓团伙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何长利、范炳章、严亚光、郭目张、郭建民5名主犯，已分别由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地执行死刑。

这3起流氓团伙犯罪案件是：河南省何长利等人流氓案，福建省范炳章等人流氓案，陕西省严亚光、郭目张、郭建民等人流氓、杀人、伤害、脱逃案。何长利原系河南省虞城县利民镇副镇长。自1991年6月至1994年2月，何长利纠集他人持火药枪、手榴弹、斧头、铁棍等凶器在虞城县利民镇等地进行了流氓犯罪活动十余起（其中8起何长利为主犯）。制造了在当地影响极为恶劣的“杨灿楼事件”、“五里堂事件”等等，殴打致伤4人，致工厂停电，集体生产遭到破坏。何长利等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范炳章系福建省松溪县无业人员。自1993年4月至1994年4月间，范炳章等人连续在松溪县城关等地持猎枪、刀具、木棍等

凶器，单独或结伙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其中，范炳章作案16起（在10起犯罪中为主犯），其行为已构成流氓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脱逃罪，数罪并罚，法院决定对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严亚光、郭目张、郭建民均系陕西省乾县人。1993年至1995年期间，3人伙同他人结为犯罪团伙，持猎枪、铁棒等凶器在乾县城乡大肆进行流氓犯罪活动。3人共进行流氓犯罪活动8起，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人轻伤。他们横行乡里，强拿恶要，殴打无辜并持枪杀人，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愤慨，均构成流氓罪。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会上说，今后，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严打”方针，坚决依法从严打击流氓团伙犯罪。

（据9月17日《人民日报》）

北京三起特大持枪抢劫运钞车案破获

记者9月20日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今年2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市的三起案犯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和取款人员的特大案件近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犯罪嫌疑人鹿宪州、郭松被抓获。经审讯，鹿、郭供认了有关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刑事科学部门对起获的作案中使用过的枪支、抢劫的赃款、赃证物及鹿、郭的足迹、痕迹进行技术认定，与系列抢劫银行运款车作案现场留下的痕迹一致。

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当天签署公安部嘉奖令，对北京市公安机关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人员予以通令嘉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等当天下午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看望、慰问了有关人员并向北京市公安局颁发了奖金。

今年2月8日和6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甘水桥、海淀区知春里连续发生了抢劫银行运款车的恶性案件，被抢巨款百万余元。8月27日上午，在宣武区枣林前街，歹徒拦截北京市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运款车进行抢劫。闻讯赶来的银行职工和保安人员与歹徒进行了英雄搏斗。歹徒抢劫未遂，开枪行凶。银行职工李国春中弹牺牲，保安人员多人受伤。

这三起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市公安局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开展侦破工作。9月8日晚，在朝阳区一大厦前，公安人员发现一男青年企图驾驶一辆已被报失的车辆离开时，当即上前抓捕。男青年拒捕并开车冲撞侦查员，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侦查员将其击伤擒获。经审查，这名犯罪嫌疑人名叫鹿宪州，现年33岁，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1994年2月18日越狱潜逃。公安机关根据鹿宪州的交代和对起获的大量物证的检验，确认其为三起持枪抢劫案的作案者，并随后抓获了其同案犯罪嫌疑人郭松。郭松现年34岁，曾因强奸罪判刑4年，1993年5月释放。破案后，公安机关共缴获枪支6支、子弹350发，赃款人民币17万元、日元61万元、美元1.8万元及大量作案工具。

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

（9月21日《人民日报》）

广东番禺特大持枪杀人劫钞案六名主犯伏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3月9日上午在番禺市召开宣判执行大会，依法对建国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番禺“12·22”持枪杀人抢劫银行运钞车案10名案犯宣告终审裁定，随后将6名主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95年10月至12月间，案犯何伟光、何冬海、袁长荣、何永新、吴兆全等人多次密谋策划持枪抢劫番禺市农业银行解款车。案犯于同年12月22日上午7时许携带盗窃来的5支手枪及炸药、雷管、麻袋等作案工具，窜到番禺农行北郊储蓄所附近伏击解款车，枪杀押钞经警郭锦昌，打伤司机，劫走人民币1300余万元，港币210余万元及手枪2支，并与案犯温石其、温玉坤等人会合，用机船载着大部分赃款往清远方向逃窜。案发后，案犯各携部分赃款分散逃匿，被告曾文彬、陈少文窝藏赃款60余万元。至今尚有103万元人民币、3.4万元港币未能追回。

此外，案犯刘光任清远市建设银行保卫科副科长期间，经手调入5支无持枪证的“五四”式手枪，其调离保卫科后，故意隐瞒不交这批枪，并于1995年初提供钥匙、密码给何永新将枪盗走；刘犯还在自用保险箱内私藏子弹490发。在番禺劫案之前的1995年10月25日，案犯何伟光、何冬海、袁长荣也曾携带这些盗来的手枪，从清远市工商银行北门储蓄所劫走人民币15.1万元、港币6.88万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今年2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何伟光、何冬海、袁长荣、吴兆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枪支罪数罪并罚判处何永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枪支罪、私藏弹药罪数罪并罚判处刘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温石其、温玉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窝赃罪对曾文彬、陈少文各判有期徒刑3年和2年。

罪犯何伟光、何冬海、袁长荣、何永新、吴兆全、刘光对该判决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省高院认为，以上案犯犯罪情节及其危害后果，均属特别严重，应

依法从重处罚，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3月10日《人民日报》）

中美就知识产权有关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宣布取消贸易报复和反报复，江泽民主席会见美方代表团团长巴尔舍夫斯基

6月13日中美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正式磋商在北京拉开帷幕。

当天上午，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及中方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张月姣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助理贸易代表李森智举行了小范围会谈。会谈中，双方认为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美谈判代表一致同意，双方将从维护和加强两国经贸关系的全局出发，本着平等协商、尊重事实、求同存异的精神，尽最大努力，妥善解决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分歧。

继小范围会谈后，中美双方代表团召开了全体会议，就打击盗版、加强市场整顿和海关的边境执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悉，全体会议后，还将分专题进行磋商。

又讯，美方代表团已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同中方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并于6月10日至11日在广东了解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　*　*

6月15日上午，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石广生与美国代理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期基在北京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正式磋商。

双方认为，应从维护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和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通过平等磋商解决双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分歧，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磋商仍在进行中。

又讯，巴尔舍夫斯基是应外经贸部的邀请于6月14日晚抵达北京的。巴尔舍夫斯基在15日下午还拜会了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和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

*　*　*

中美知识产权正式磋商6月16日在北京继续进行。下午的磋商已经结束，但没有关于谈判是不是取得进展的消息。

双方当天晚些时候还将进行磋商。

*　*　*

经过5天的反复磋商，6月17日中美双方就知识产权有关问题达成一致。美方代表团团长巴尔舍夫斯基在谈判结束后宣布，美国将取消拟对华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并承诺将中国从特殊301重点国家名单中去掉。

据悉，6月15日至17日，以外经贸部副部长石广生为团长的中方代表团与以美国代理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为团长的美方代表团，就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在京举行了正式磋商，会谈是坦率并富有建设性的。石广生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十分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签署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1991年1月和1995年2月，中美双方又签署了两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协议。近年来，中方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这些事实表明中国遵守国际惯例，履行已签署的多边和双边协议的国际义务的严肃立场。石广生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更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保护知识产权。

最后石广生还宣布，鉴于美方已承诺取消对华贸易报复，中方也同时取消拟对美的贸易反报复。

中方人士认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次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再次证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唯一的有效途径是平等协商。制裁与报复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分歧更加复杂化。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大局。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必将受到双方经济界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欢迎。

*　*　*

国家主席江泽民6月17日晚在中南海会见来华参加中美知识产权磋商的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代理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时说，对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中国历来主张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一再表明，对话比对抗好、互利合作比制裁好。

江泽民说，只要中美双方都能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协商，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他说，中国政府重视中美关系。中国一贯主张中美两国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和着眼于21世纪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江泽民说，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稳定的经贸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巴尔舍夫斯基转达了克林顿总统对江泽民主席的问候，江泽民对此表示感谢。巴尔舍夫斯基说，她是根据克林顿总统的要求前来中国的，总统认识到，美中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只有坚持战略对话，坚持互利合作，采取建设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巩固和加强美中两国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外经贸部副部长石广生和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等参加了半小时的礼节性会

见。

又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6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代理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时说，中美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磋商最终达成一致，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李岚清说，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一贯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司法和行政的执法机构，对侵权盗版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指出，打击侵权盗版行为是长期斗争，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这不仅是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的需要，更重要的也是促进中国科技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重大措施。

在谈到中美经贸关系时，李岚清说，中美两国经济有较大的互补性，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的潜力很大。他说，中美两国政府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克服障碍，加强协商和建设性的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巴尔舍夫斯基说，美中双方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一致表明，两国能够在平等磋商和互利的基础上解决相互间的分歧。她表示，相信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外经贸部副部长石广生、部长助理龙永图和美国助理贸易代表李森智等参加了会见。

（《人民日报》、新华社讯，
6月14日、16—18日《人民日报》）

流　行　风

背景介绍

继《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和《绝地战警》等数部引进的火爆巨片风靡全国之后，出自华纳兄弟公司的《廊桥遗梦》又在各地巡回上演。然而对这部影片，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停留在影片本身是否真正引起轰动，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道德层面的是非评判上。

在国外引进巨片的冲击下，中国大陆的电影仍在探寻着出路。由姜文、葛优等"大腕"主演的大制作型巨片《秦颂》，让观众一睹二千年前大秦帝国千军万马横扫六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及当年秦宫三百里阿房宫的宏丽气象。同时，该片虽取材于历史，但表现的主题却是几个人之间的隐私，通过宫廷隐私这个独特的视角，演绎着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故事。

取材于历史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上演，颇受观众好评。该剧的成功在于将历史与现实交融，使观众感觉不是看历史，也不是看小说，而是在观看生活，观看一个关于宰相的童话，一个君臣之间的寓言。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是以港台歌曲为前卫的。但是，当代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却出现了新的趋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大陆流行音乐听众，现在也逐渐从港台音乐中脱离出来，寻找着真正属于自己生活的音乐。

电视《宰相刘罗锅》

96年春节前后，《宰相刘罗锅》上演，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宰相刘罗锅》主要围绕着刘墉、乾隆皇帝、和坤三个人相斗、相依、相随的漫长的一生展开。但，它不是历史剧，甚至说不上是野史演义，而是关于乾隆王朝近五十年兴衰史的一个映象。《宰》剧编剧为秦培春、石零、张锐、白桦，由张子恩、韩刚、朱德承导演，著名演员李保田、张国立、王刚、邓捷出演剧中主要角色。

该剧的特色便在于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交融，情节曲折生动、高潮迭起，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评者所云，看《宰相刘罗锅》，不是看历史，也不是看小说，而是在观看生活，观看一个关于宰相的童话，一个君臣之间的寓言。

电影《廊桥遗梦》

继数部所谓引进大片风靡全国之后，出自华纳兄弟公司的一部影片《廊桥遗梦》近期又在各地巡回上演。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对这部影片，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停留在影片本身是否真正引起轰动，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道德层面的是与非的评判上：怎样看待弗朗西丝卡与罗伯特·金凯之间的这场"梦"？

在我们这个崇尚"文以载道"的国度，《廊桥遗梦》在观众中引发上述疑问并不奇怪，一些影院也正是借此做广告宣传：99%的人希望有这种经历，100%的人不希望此事发生在自己家中。一些敏感的观众在走出影院之后或许会产生这样的顾虑：让自己的家人看这个影片是否

明智？

所有的疑问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廊桥遗梦》所讲的是一场"婚外恋"，甚至可以通俗地称之为"第三者插足"事件。笔者以为，停留在道德层面的是非判断，实质上是对该片的"误读"，在我看来，《廊桥遗梦》与其说是在讲述一场"梦"，不如说是在为观众竖起一面镜子——一面借助"梦"来反观现实的镜子，我把它称为"梦之镜"。

成功地再现影片男女主人公之间那段梦一般的情感历程，这是《廊桥遗梦》最能打动观众之所在。姑且不论应该用褒义的"真情"，还是用贬义的"第三者插足"来概括男女主人公的这段经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一种最为隐秘、最为微妙、最不易描述的经历。用"梦"来称之是再贴切不过的。尽管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对梦做过大量的研究，弗洛伊德还著有洋洋万言的专著《梦的解析》一书，但时至今日，梦对于人类来讲，仍是一个谜：它无根无由，飘忽不定，时而井然有序，时而杂乱无章。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熟知的逻辑、常规、甚至时空，在梦中都只是一堆碎片，梦以我们无法理解和把握的方式，用无数的偶然对这些碎片任意地加以组合。弗朗西丝卡与罗伯特·金凯的四天之间的相处正是这千千万万组合中的一种。由于偶然，弗朗西丝卡的丈夫、儿子及女儿要外出四天；由于偶然，摄影师罗伯特·金凯来寻找廊桥；由于偶然，男主人公迷了路；由于偶然，女主人公遇到了迷路者；弗朗西丝卡从遥远的意大利东部小镇远嫁美国，罗伯特·金凯恰恰曾到过那小镇……在经历数十年、横跨几万里的时空里，诸多数不清的偶然之后，事情发生了。男女主人公与观众一样，对事情的到来显得毫无防备，他们如同两颗行星，在各自经历了自己长期的"正常"运行之后，突然间显现出"晕眩"，两人似乎都无法控制事情的进展，短短四天之中，从事情的开始、进展到结束，身不由己，渴望、惊喜、惶恐、矛盾成为男女主人公共同的特征。这四天之中梦一般的经历是如此难以把握，是如此真实又如此虚幻。但画面是明确的，声音是清晰的，能用确定的画面、声音来成功地再现不确定的四天之梦，这正是《廊桥遗梦》一片的过人之处，从中不难看出导演及演员的高超技艺。

或许正是这如诗的逼真再现使我们的观众感到某种不安，并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这场"梦"的道德评判上。因为，根据常识，如果让观众感觉到"不真实"的话，人们便不会感到"紧张"，以至于要刨根问底。

然而，再现"遗梦"远非影片的全部。之所以说，观众对"梦"本身产生道德判断层面的疑问是一种误读，原因也正在于此。该片的又一过人之处在于：它通过"逼真地"再现梦境，将问题留给观众之后，又往前进了一层：以梦塑镜，反观现实。

首先，影片用"戏中戏"的手法，借弗朗西丝卡的儿女来讲述这场"梦"使两个孩子各自的现实情感世界与男女主人公若干年前的遗留的情感世界时而分开，时而交叉，形成一组现实与梦境的对照；这构成影片的一条主线。在这种对照下，弗朗西丝卡与罗伯特·金凯如昙花一现般非常规的短暂的梦，恰恰成为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反观各自现实情感世界的一面明镜。影片的开始，这两个孩子还是观梦的局外人，到影片结束，梦中的母亲——弗朗西丝卡仿佛已经复活，从梦之镜中透出关注的目光，这反观现实的目光使两个孩子不觉间已从局外置身局中，最终合上母亲的日记，以行动修复各自己出现裂痕的情感世界。

现实与梦境的另外一组对照，是在"梦中"这是影片的一条隐线。无论用多少偶然解释男女主人公情感历程的起因，有一点是明确无误并非偶然的，甚至索然无味的生活和男主人公常年飘泊不定的经历是梦中的现实，这与他们相遇后短短四天之中经历的百感交集的情感之梦又构成强烈的对照。在这组对照中，男女主人公及观众都强烈地从梦之镜中反观出梦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电影《秦颂》

《秦颂》剧组乃国内电影界一流组合。姜文、葛优领衔，许晴加盟。剧作家芦苇、作曲家赵季平、美术设计曹久平、摄影吕更新等均为国内一流电影人才。

《秦颂》是一部大制作型的巨片。导演周晓文在大洋公司的支持下，调动一、二万军队大搏一场，且率先在国产片中采用数码电脑绘画特技。这一切使观众一睹二千年前大秦帝国千军万马横扫六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及当年秦宫三百里阿房宫的宏丽气象。

《秦颂》原剧本名叫《血筑》，是芦苇在 6 年前就特为周晓文写成的一个有关秦始皇和他的宫廷乐师高渐离之间复杂关系的悲剧故事。经过几年反反复复的修改，一直到去年 6 月周晓文与香港大洋影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坤明、陈志滔商谈后才敲定下来。《秦颂》取材于历史，但周晓文并不打算用电影去重现历史，图解历史。也不想在商业片、艺术片之类问题上纠缠不休而陷入怪圈。周晓文说，《秦颂》不是一个写江山大业的史实故事，而是一个写三个人之间的隐私故事。他还说，我不相信历史、我也不懂历史，为了拍《秦颂》，我看了三十多万字的史料，我越看越糊涂，觉得历史没有意义。看来，《秦颂》要表现的主题是人，历史材料将后退成为电影的一种模糊的背景。在周晓文的电影里，历史材料的文献价值会被用电影艺术的方式加以消解，而人性的本真面目将会被鲜明的突现出来，影片将采用双线复式情节结构，围绕秦王嬴政与乐圣高渐离之间的精神交量和秦王爱女栎阳公主与高渐离

的一场生死之恋，展开征服与反征服的矛盾对立：嬴政要征服高渐离的整个灵魂乃至天下人心，而高渐离却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来证明人心是不可征服的；做为秦王的“影子”，栎阳公主也想征服高渐离，她想把乐圣变成任她骑使的一匹“马”，可后来却让“马”骑到自己身上了。最后，乐圣成为殉道者、公主成为政治祭品，秦始皇成为天底下最孤独的人。电影透过宫廷隐私这个独特视角，演绎出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故事。

当代大陆流行音乐新趋势

世界流行音乐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了。而中国大陆自身的流行音乐发展，又以港台歌曲为前卫。现在，他开始脱下陈旧的外衣，披上了新潮的时装，并以临摹走向了设计。

当初，崔健的《一无所有》、《一块红布》风靡全国大专院校，“中国摇滚之王”的桂冠非他莫属。对于世界摇滚来说，崔健是十分落后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崔健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是一个新文化的前锋。随即，北京出现了多支摇滚乐队，“呼吸”、“眼镜蛇”、“唐朝”、“黑豹”纷纷上台，中国现代的城市青年以听摇滚乐为高层次，来显示自己的文化，但真正懂摇滚的人又有多少呢？更多的人则是在强烈的鼓点声和贝斯声中“锻炼”着自己的双耳。

1993 年初，艾敬的《我的 1997》尤如一缕清风吹遍大江南北。从此，城市民谣菲然兴起，这种带有摇滚意味的中国城市民谣看似走上了正途，直至发展到现今李春波的《小芳》、《一封家书》，虽然很多人说他的唱功是如何的糟糕，但起码他营造的那种气氛使人感到了一种亲切。其实，中国的城市民谣是由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校园歌曲发展而来的，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清新脱俗是它的特点。但一到八十年代中期，港台的一些制作（包括配器、外型包装等）精良的音乐大量涌入大陆音乐市场，立即将绝大多数的听众拉了过去。经过六、七年“港台风”浸泡后，突然听到《小芳》、《我的 1997》那样清爽的音乐，就像饱食鱼肉后的一碗清汤，耳目一新，即使其本身还存在许多不足，但起码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94 年，大陆抒情流行音乐的发展虽然还摒弃不掉那身港台味，但已经找到了自己发展的那条路。电台流行榜上，毛宁的《涛声依旧》、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林依轮的《爱情鸟》名次直往上窜，大有和港台抒情音乐对阵之势。同时，北京的摇滚乐也开始分成纯摇滚和抒情摇滚两大方向，“黑豹”当初的《DON’T BREAK MY HEART》，以及最近出现的老狼、张楚等的作品，在抒情性上，对国内的摇滚听众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其实早在几年前崔健的《花房姑娘》中，人们已经似乎开始寻找那种感觉了。

以前，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走了相当长的一段主观主义路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客观的市场，很多作品离听众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可望而不可及。现在，大陆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及时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现代人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量是不可限量的。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心情就需要不一样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现在已大量流入各个家庭，成为当代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了。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当代流行音乐大多只是对事物提出了问题，或对问题提出了见解，营造出了一种现代城市所特有的气氛，但如何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去解决问题，怎么去开创一个属于特定听众自己的天地，则是很少的。

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等只是在不停地“哭诉”着自己，痛苦、忧郁、惆怅……将听众带入了一种柔情似水又“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该怎么办呢？在这个充满各种色彩的社会中，我们既需要别人的理解，更需要一种轻松，一种振奋。像李宗盛、成龙等的《真心英雄》使人听来精神猛烈一振。对内心情感的表露，对坎坷人生的渲泄，这是很迎合听众的，但大陆流行音乐中的“兴奋剂”又有几首呢？

中国大陆和港台的社会气氛是不一样的，大陆的流行音乐听众，现在也逐渐从港台音乐中脱离出来，在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生活的音乐。所以，大陆流行音乐也应及时针对目前这个市场，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创造出更多的生活艺术。

历史档案

1988年至今我军46人获上将军衔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中国军队曾于1955年颁布实行军衔制度。当时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其中将官4级，分别是大将、上将、中将、少将。这项军衔制度至1965年6月1日被取消。其间中国军队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将官以上共计1614名。

198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了军官军衔制度，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

新的军官军衔设3等11级，其中将官设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4级。至今，中央军委先后4次共授予46人上将军衔。

1988年9月14日，恢复军衔制度后的第一批上将军官军衔授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17位解放军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是：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徐信、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

1993年6月7日，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朱敦法、张连忠、曹双明6位高级军官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

1994年6月8日，中央军委又授予徐惠滋、李景、杨德中、王瑞林、周克玉、丁衡高、戴学江、李文卿、王克、李来柱、谷善庆、刘精松、曹凡生、张太恒、宋清渭、固耀、李希林、史玉孝、李九龙19人上将军衔。

1996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授予周子玉、于振武、丁文昌、隋永举4人上将军衔。

（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京西客站档案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市铁路发展规划时肯定了建设北京西客站的建议。

1960年9月，北京西站在北京铁路枢纽总布置图中确立位置。

1993年1月19日16时，李鹏总理为北京西站的工程开工奠基。

建筑规模全国第一，建筑面积近50万平方米。

整体装备水平及综合服务设施全国第一，采用了7大类19项客运服务自动化设施。

配套工程中的16万门电话局，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电信中心。

年处理6000万件(袋)的邮件处理中心，堪称目前国内最大的邮政工程。

售票大厅有38个售票窗口，基本站台长550米、宽25米。远期开9个站台，日客流量25—30万人次，运能将是北京市现有3个车站即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南站运能的总和。

地下大厅长217米、宽86米，共2.3万平方米，相当于西单地铁站的3倍，有自动扶梯通向地上及地铁车站。

高架候车厅18.8米高、217米宽，通廊两侧有10个候车室。

总铺轨长度约100公里。

在北站房下，修建了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自行车库和约5万平方米的机动车库。

站内候车室、售票厅等处设有7个问询亭，可用声、像回答旅客提出的各种问题。

北京西客站具有其他车站不曾有的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车站；第二，它是一个集乘车、购物、餐饮、娱乐、住宿、游览于一体的庞大综合体；第三，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它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1月24日《中国消费者报》）

近年日本政要否认侵略历史言行录

1985年，在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1986年，文部相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指责批判日本教科书事件的亚洲国家，说朝鲜对日本吞并朝鲜“负有责任”，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并否认日本有战犯。

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为日本侵略辩解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竟说“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1990年，运输相石原慎太郎在答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记者问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

1992 年，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柿泽弘治称亚洲国家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批评是“有害的”，“是对往事的小题大作”。

1993 年，国会议员合马敬在“日本不是侵略国家”的讨论会上称侵略战争的说法“在国际法上是不存在的，是飘浮不定的定义”。

1994 年，法务相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称“把太平洋战争说成侵略是错误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提高了”。自民党议员户田一郎在广岛议会上称“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通产相桥 本龙太郎在回答议员质询时说：“日本是否针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微妙的定义上的问题”，“日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否叫做侵略战争尚存疑问”。自民党议员高村正彦答《朝日新闻》记者问时说，关于日本进行的 15 年战争，我“不打算一概而论说它是侵略战争。”

1995 年 1 月，奥野诚亮等自民党议员成立所谓“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竭力抵制在日本战败 50 周年之际由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叫嚣坚决反对“谢罪式的不战决议”，要避免“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2 月，前法相水野茂门伙同一些自民党议员组成“正确认识历史议员联盟”，公开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的谢罪，说“不战决议将使日本永久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3 月，奥野诚亮声称“进行了侵略战争的国家是英美，日本没有同亚洲打过仗”。6 月，“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东京举行紧急会议，要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领土扩大张”等词句。8 月 9 日，文部相岛村宜伸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承认日本侵略战争史，说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同日，奥野诚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是自民卫战争”。8 月 15 日，通产相桥本龙太郎等 8 名内阁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桥本在出任自民党总裁之前，长期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和自民常“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会长，还担任了“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顾问。他每年平均 3 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同年 8 月份，由包括桥本在内的自民党 105 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称，“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等。

1996 年 6 月 4 日，众议院议员奥野诚亮在记者招待会上，把二战期间日本当局迫使一些亚洲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妄称为“商业行为”，“并非日本政府强迫所致”。7 月 29 日，桥本龙太郎公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

即将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担负着推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和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两项重要职责。

香港基本法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并规定，第一任行政长官和第一届立法会“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产生”。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组。推委会由 400 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必须具有广泛代表性，其成员包括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香港特区成立前曾在香港行政、立法咨询机构任职并有实际经验的人士和各阶层、界别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决定》还规定了各界在推委会中所占的比例：工商、金融界 25%；专业界 25%；劳工、基层、宗教等界 25%；原政界人士、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 25%。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推委会的各项组建工作，并设立了推选委员会工作小组，今年 4 月，推选委员会小组在港开展广泛的咨询活动，向香港各界别、各阶层的 362 个团体和 1000 多位人士征求了意见。今年 5 月，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推委会小组提交的关于推委员产生办法的原则性设想。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筹组工作已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8 月 12 日《新华每日电讯》）

第 26 届奥运会中国奥运健儿光荣榜

中国体育健儿在亚特兰大时间 8 月 4 日结束的第 26 届奥运会上，奋勇拼搏，夺得 16 枚金牌、22 枚银牌和 12 枚铜牌。获得奖牌的选手如下：

乒乓球：

刘国梁：男子单打金牌，男子双打金牌；

邓亚萍：女子单打金牌，女子双打金牌；

孔令辉：男子双打金牌；
乔红：女子双打金牌，女子单打铜牌；
王涛：男子单打银牌，男子双打银牌；
吕林：男子双打银牌；
刘伟：女子双打银牌；
乔云萍：女子双打银牌。
体操：
中国队（李小双、黄力平、张津京、范红斌、范斌、沈剑、李敬）：男子团体银牌；
李小双：男子个人全能金牌，男子自由体操银牌；
莫慧兰：女子跳马银牌；
毕文静：女子高低杠银牌；
范斌：男子单杠铜牌。
举重：
唐灵生：59公斤级金牌；
占旭刚：70公斤级金牌；
张祥森：54公斤级银牌；
肖建刚：64公斤级铜牌。
射击：
杨凌：男子10米移动靶金牌；
李对红：女子25米运动手枪金牌；
王义夫：男子气手枪银牌；
肖俊：男子10米移动靶银牌；
张冰：男子双多向飞碟铜牌。
游泳：
乐靖宜：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银牌；
刘黎敏：女子100米蝶泳银牌；
中国队（晁娜、乐靖宜、年芸、单莺）：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
林莉：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
中国队（蔡慧珏、陈艳、韩雪、单莺）：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
跳水：
伏明霞：女子跳板跳水金牌，女子跳台跳水金牌；
熊倪：男子跳板跳水金牌；
余卓成：男子跳板跳水银牌；
肖海亮：男子跳台跳水铜牌。
柔道：
孙福明：女子72公斤以上级金牌；
王显波：女子66公斤级铜牌。
田径：
王军霞：女子5000米金牌，女子10000米银牌；
隋新梅：女子铅球银牌；
王妍：女子10公里竞走铜牌。
羽毛球：
葛菲：女子双打金牌；
顾俊：女子双打金牌；
董炯：男子单打银牌；
秦艺源：女子双打铜牌；
唐永淑：女子双打铜牌；
刘坚军：混合双打铜牌；
孙曼：混合双打铜牌。
赛艇：
曹棉英：女子双人双桨银牌；
张秀云：女子双人双桨银牌。
足球：
中国队（刘爱玲、温莉蓉、钟红莲、于红旗、刘英、孙雯、谢惠琳、水庆霞、王丽萍、孙庆梅、高红、韦海英、赵利红、施桂红、范运杰、陈玉凤）：女子足球银牌。
射箭：
何影：女子个人银牌。
女子垒球：
中国队（王丽红、刘雅菊、马英、何丽萍、王颖、欧敬柏、阎芳、陶桦、柳絮青、魏嫱、张春芳、陈红、雷雳、安仲欣、徐健）：银牌。
排球：
中国队（赖亚文、李艳、崔咏梅、诸韵颖、吴咏梅、王怡、何琦、潘文莉、王丽娜、王子凌、孙玥、殷茵）：女子排球银牌。
摔跤：
盛泽田：古典式57公斤级铜牌。
（新华社亚特兰大电，8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第26届奥运会奖牌榜

国家地区	金	银	铜	总计
美国	44	32	25	101
俄罗斯	26	21	16	63
德国	20	18	27	65
中国	16	22	12	50
法国	15	7	15	37
意大利	13	10	12	35
澳大利亚	9	9	23	41
古巴	9	8	8	25
乌克兰	9	2	12	23
韩国	7	15	5	27
波兰	7	5	5	17
匈牙利	7	4	10	21
西班牙	5	6	6	17
罗马尼亚	4	7	9	20
荷兰	4	5	10	19

希腊	4	4	0	8
捷克	4	3	4	11
瑞士	4	3	0	7
丹麦	4	1	1	6
土耳其	4	1	1	6
加拿大	3	11	8	22
保加利亚	3	7	5	15
日本	3	6	5	14
哈萨克斯坦	3	4	4	11
巴西	3	3	9	15
新西兰	3	2	1	6
南非	3	1	1	5
爱尔兰	3	0	1	4
瑞典	2	4	2	8
挪威	2	2	3	7
比利时	2	2	2	6
尼日利亚	2	1	3	6
朝鲜	2	1	2	5
阿尔及利亚	2	0	1	3
埃塞俄比亚	2	0	1	3
英国	1	8	6	15
白俄罗斯	1	6	8	15
肯尼亚	1	4	3	8
牙买加	1	3	2	6
芬兰	1	2	1	4
印度尼西亚	1	1	2	4
南斯拉夫	1	1	2	4
伊朗	1	1	1	3
斯洛伐克	1	1	1	3
亚美尼亚	1	1	0	2
克罗地亚	1	1	0	2
葡萄牙	1	0	1	2
泰国	1	0	1	2
布隆迪	1	0	0	1
哥斯达黎加	1	0	0	1
厄瓜多尔	1	0	0	1
香港	1	0	0	1
叙利亚	1	0	0	1
阿根廷	0	2	1	3
纳米比亚	0	2	0	2
斯洛文尼亚	0	2	0	2
奥地利	0	1	2	3
马来西亚	0	1	1	2
摩尔多瓦	0	1	1	2
乌兹别克斯坦	0	1	1	2
阿塞拜疆	0	1	0	1
巴哈马	0	1	0	1
中国台北	0	1	0	1
拉脱维亚	0	1	0	1
菲律宾	0	1	0	1
汤加	0	1	0	1
赞比亚	0	1	0	1
格鲁吉亚	0	0	2	2
摩洛哥	0	0	2	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	0	2	2
印度	0	0	1	1
以色列	0	0	1	1
立陶宛	0	0	1	1
墨西哥	0	0	1	1
蒙古	0	0	1	1
莫桑比克	0	0	1	1
波多黎各	0	0	1	1
突尼斯	0	0	1	1
乌干达	0	0	1	1
共计	271	273	298	842

（8月6日《人民日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公告

【新华社深圳12月2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有关规定，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下列60人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其中11人为非中国籍或在外国有居留权的议员。

（以繁体字姓氏笔划为序）

王绍尔　田北俊　朱幼麟　杜叶锡恩　李家祥
李国宝　李启明　李鹏飞　吴亮星　吴清辉
何世柱　何承天　何钟泰　范徐丽泰　林贝聿嘉
周梁淑怡　胡经昌　马逢国　袁　武　莫应帆
夏佳理　倪少杰　唐英年　陈财喜　陈婉娴
陈荣灿　陈鉴林　黄宏发　黄英豪　黄宜弘
曹王敏贤　许贤发　梁振英　梁智鸿　梁刘柔芬
张汉忠　叶国谦　程介南　冯检基　曾钰成
杨孝华　李　钊　杨耀忠　詹培忠　蔡根培
廖成利　郑明训　郑耀棠　邓兆棠　刘江华
刘皇发　刘健仪　刘汉铨　霍震霆　简福饴
颜锦全　罗叔清　罗祥国　谭惠珠　谭耀宗

（摘自199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在当年的日历上

政　治

1月1日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李瑞环主持，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李沛瑶代表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

同日　新华社报道：李鹏于1995年11月下旬接受《中华英才》半月刊记者采访时，纵谈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指出中国有条件继续保持目前良好发展势头。

1月3日　江泽民、李鹏等看望百岁革命老人帅孟奇，"祝大姐健康长寿！"

1月4日　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武汉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陈潭秋烈士诞辰100周年。

1月5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安全部近日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我党隐蔽战线的老前辈阎宝航诞辰100周年。

1月8日　国务院第41次常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外汇管理条例。

同日　北京、南京等全国各地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20周年。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35家电视台已在近日播出大型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与此同时，《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等一批缅怀周恩来的书籍和文章纷纷问世。

同日　中组部、中宣部等在京举行李润五先进事迹报告会，丁关根、尉健行等出席并会见报告团成员。

1月8—10日　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经叔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张绪武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的决议号召认真贯彻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开创新局面。

1月12日　江泽民在中南海接受首次进京的第十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致谢团的拜见时指出党和政府一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希望十一世班禅做新一代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李瑞环等陪同江泽民接受十一世班禅的拜见。当晚，李瑞环设宴招待十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致谢团一行。

同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34次主席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5次会议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1996年工作要点。

1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1月18日　李鹏会见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访京团时强调说，中国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1997年7月1日后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16、18日，朱镕基、鲁平也先后会见了该访京团。

1月1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工会著名领导人朱学范同志的遗体在京火化。乔石、李瑞环、胡锦涛等前往送别。朱学范于1月7日在京逝世，享年91岁。朱学范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刘华清、荣毅仁等前往医院看望，或打电话向其家属表示慰问。朱学范生前的一些国际友人和蒋纬国等故交好友，以送花圈、发唁电，或其他形式表示了哀悼和慰问。

1月22—26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党的十四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经验，规划了"九五"期间的目标任务，部署了1996年的重点工作。24日，江泽民与出席会议的同志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李鹏也发表了重要讲话，朱镕基、胡锦涛出席座谈会。

1月23日　国务院第42次常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草案）。

同日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协会章程和会徽，增补了一批新的理事，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乔石到会祝贺。

同日　来自全国的100多位法学专家在京就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精髓和基本内容等专题进行学术研讨、交流。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杰出青年法学家"奖颁奖仪式。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安全部日前在京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

1月25日　江泽民会见出席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时强调要加强统战领导，支持统战工作。李鹏、李瑞环、胡锦涛等参加会见。会见后，李瑞环、胡锦涛等与代表进行了座谈，李瑞环作了重要讲话。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是本月22日在京召开的。

1月2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会见出席会议的筹委会全体委员，乔石向全体委员颁发任命书。26—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钱其琛先后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就各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讨论通过了筹委会的工作规则，确定了筹委会设立推选委员会、第一任行政长官、临时立法会、法律、经济、庆祝活动等六个工作小组的组成，还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全体会议结束后，还举行了秘书长工作会议。27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陈滋英主持会议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晚，李鹏设宴款待与会全体委员，并重申要全力确保对香港方针政策的贯彻。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部队组成。29日，我军驻港部队以隆重的礼仪，欢迎第一批来参观访问的尊贵客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港事顾问。钱其琛向驻港部队赠送锦旗。当天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就驻港部队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月26日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为大会题词并会见与会全体同志。大会向全国纪检监察战线上的同志们发出了倡议书。

1月27日　澳门繁荣促进会在澳门正式成立。

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近日作出决定，给予在查处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同志记一等功，并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向曹克明学习。

1月30日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纪念江泽民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一周年。李鹏发表重要讲话，李瑞环、刘华清等出席。31日，天津、四川、福建等省召开座谈会。同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全国台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在京召开纪念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座谈会。

2月1、2日　首都各界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先后召开纪念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座谈会。

2月2日　为期5天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京结束。会议总结了几年来的外宣工作，确定了今后五年对外宣传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部署了今年的工作。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98个地方外宣品“七个一工程”优秀项目予以奖励，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2月2—7日　胡锦涛在广西考察。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月5日　正在哈尔滨出席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江泽民前往黑龙江省尚志市看望慰问基层群众和企业职工，向他们祝贺新春。

同日　国务院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布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9日，李鹏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科技、文卫、体育及公安等战线代表座谈，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2月6日　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反腐败工作会议，李鹏作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今年反腐败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同日　李鹏会见香港民主建港联盟访京团时说，香港如期回归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月5日　鲁平也会见了访京团一行。

同日　王云坤当选为吉林省省长。

2月7日　胡富国当选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2月7、8、10、14日　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侨联先后在京举行迎春茶话会、迎春联谊会、迎春联欢会等活动。

2月8日　中共中央举办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江泽民、李鹏、乔石、刘华清、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到会听课。讲座结束时，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日　公安部召开优秀公安局和优秀人民警察表彰大会，会上表彰了100个公安局和1000名人民警察，并分别授予全国优秀公安局和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会同有关部门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铁英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了查处。中纪委决定，并经批准，开除铁英党籍。最高人民检察院决立案侦查。8日，北京市崇文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已依法罢免了铁英的市人民代表职务。同日，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也发出公告，相应撤销她的副主任职务。

2月9—18日　乔石在广东考察。他强调，要扎实工作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月10日　卢瑞华当选为广东省省长。

同日　王乐泉当选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委书记。

2月11日　香港举行“万众同心庆回归”大会，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致词说，香港如期回归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月12日　首都举行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胡锦涛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老同志致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宋宝瑞在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四川省省长，会议通过决议接受肖秧辞去四川省省长职务。

2月1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李沛瑶同志遗体在京火化。江泽民、乔石、李瑞环等前往送别。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也前往送别。李沛瑶是2月2日在京不幸遇害，终年63岁。李沛瑶逝世后，李鹏、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分别打电话或前往吊唁，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一些外国领导人、驻华使节和李沛瑶的一些国际友人和故交好友，对李沛瑶的不幸逝世也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表示了慰问。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李沛瑶遇害案查处和善后工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武警部队有关领导人被撤职。案犯张金龙于2月5日被依法逮捕。

同日　海协首届理事会第五次会在京召开，会长汪道涵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作了1995年会务报告。

2月14日　全国政协举行第35次主席会议，李瑞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等。

2月15日　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推选委员会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介绍并讨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政务专题小组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筹组问题提出的建议。会议决定今年4月份小组在香港开展咨询港人意见的活动。

同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在京举行中央国家机关纪检组组织学习曹克明座谈会，会上强调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2月16日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江泽民、李瑞环、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欢聚一堂，共商国是，喜迎新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2月17日　中央领导同志分别看望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万里、宋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同志，江泽民等代表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向邓小平等老同志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祝老同志新春愉快、健康长寿。同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春节前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省市负责人同志看望了王平、王首道、伍修权等老同志。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江泽民主持，李鹏发表讲话，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与首都各界人士4000多人欢聚一堂，共庆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17日，国务院办公厅举行春节团拜会。

2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2月19—20日　李鹏回到阔别50年的延安，同老区人民一起过年，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总书记看望慰问当地的干部群众。

2月27—3月1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主持。会议主要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作准备。28日，会议通过政协增补委员名单等。3月1日，会议通过工作报告，增补副主席、常委建议名单，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筹备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的决议及关于妇青和法制委员会更名为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决定任命张道诚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傅庚辰为科教文卫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2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近日召开的一次人大会议秘书处会议上，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受国务院委托郑重地宣布，为了保证代表、委员集中精力开好“两会”，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在会议期间实行“五不”。

2月28日　台盟、台联、海协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2·28”起义49周年。参加过“2·28”起义的老同志、在京台胞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00多人出席座谈会。

2月28日—3月1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主要听取有关法律草案审议结果报告，审议八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等。3月1日，会议通过了戒严法及各项议案，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任免名单。同日，江泽民签署主席令，发布戒严法和任 免决定，戒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月1日　首都举行纪念《董必武》画册出版暨董必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

同日　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花大力气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同日　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区委隆重召开命名表彰大会，会上宣读了公安部的命令和市委组织部的批复。在抓捕持枪绑架人质案犯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的沈金柱同志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并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之前，沈金柱同志已被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3月2日　新华社刊发了《国家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月3日—13日　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主持会议，叶选平作工作报告。江泽民、李鹏、

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到会祝贺。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增选了何鲁丽为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艾知生等8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11日，李瑞环同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座谈时发表讲话。12日，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听取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各组讨论情况汇报，通过会议各项决议草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近日在京召开民主协商会。李瑞环、胡锦涛受中共中央委托，就全国政协增选常委和副主席的问题，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

3月4日　张蔚文当选为宁波市市长。

3月5日—17日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17日，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意陈锦华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中央及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6年中央预算，同意刘仲藜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行政处罚法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日，江泽民分别签署了这两部法律。会议还分别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乔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大会期间，李鹏、钱其琛先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3月9日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在北京西黄寺接受了部分高僧、活佛和众多信徒的朝拜。这是十一世班禅首次在京进行佛事活动。

3月12日　北京、广东省、广州市、上海市各界人士举行仪式和活动，纪念孙中山逝世71周年。

3月15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26个县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122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

3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李鹏日前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3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日前分别举行中常会，学习贯彻刚刚结束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精神。

3月20日　为了学习贯彻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中央宣传部等5部委在京联合举办报告会，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向1200多名在京党政军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作了题为《跨世纪的宏伟纲领》的报告。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省区市党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会议日前在湖北省武汉市结束。会议要求要加强各级组织部门调研和宣传工作。

3月20—21、25—2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临时立法会小组、法律小组、庆祝活动小组、经济小组第一次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3月21日　首都举行纪念贺龙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刘华清等出席并讲话。会上介绍，《贺龙文选》等4本书正式出版发行。25日，贺龙铜像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镇举行，张万年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仪式上讲话。

3月23日　国务院台办新闻局负责人就台湾地区变更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活动结束发表谈话，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改变及其结果，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3月23—2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钱其琛致开幕词和闭幕词。鲁平在会上作了近期筹委会工作安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关于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全年香港公众假日安排的决定，关于成立"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作出解释的建议，还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3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下发《人事工作1996—2000年规划纲要》，提出人事工作要根据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即"三个制度、三个体系"，加速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造就"三支队伍"。

3月26日　新华社报道：黄龙云当选为珠海市市长。

3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沈醉的遗体在京火化。沈醉因病于3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在病重期间，沈醉先生还在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盼望祖国能早日统一。

3月29日　从人事部获悉，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

辽宁、吉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地方首届公务员招考工作。

4月2日　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总结了1995年检察机关开展自身反腐败工作的情况，安排、部署了今年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任务。去年全国检察系统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人员768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550人，34人被清调出检察机关。

4月3—6日　全国民委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两年来各地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民族工作重要指示的情况和做好世纪之交的民族工作问题。

4月4日　3月29日至4月4日，胡锦涛在海南省委书记、省长阮崇武等的陪同下，先后到三亚、万宁、琼海、海口、儋州等地考察，强调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4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法委调查组近日在辽宁本溪市调查暗访。调查组深入实际、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各界人士称赞。

4月9—12日　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进行了部署。任建新在会上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严格、文明执法，把公安执法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4月10日　新华社报道：海协负责人就海协和台海基会如何恢复接触问题发表谈话。

4月13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香港特区筹委会推选委员会小组咨询活动港事顾问咨询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宣布，继续聘请聘期已到的第一批和第三批港事顾问。此次续聘的共92位港事顾问，聘期将到1997年6月30日。

4月13—14日　为期两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推选委员会小组咨询活动在香港完成。15日，推选委员会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交流了4个分组两天来咨询意见的情况，讨论了推委会的产生办法涉及的有关问题。16—17日，经济小组第2次会议在香港举行，讨论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建议。

4月15日　首都举行《林伯渠文集》暨林伯渠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胡锦涛出席会议，王汉斌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讲话。

同日　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丙乾到会讲话。会议宣布：今年4月至6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将对京、津、沪的环境保护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4月16—20日　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举报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要认真对待举报线索，依靠群众反腐败。

4月17日　中宣部等单位在京联合举办徐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18日，中宣部、建设部和上海市委在京举行学习徐虎同志座谈会。

4月17—20日　全国党员学理论学党章座谈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要求共产党员要更自觉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4月18、19日　《人民日报》报道：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党组书记王丕森、原广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山西省岚县分管纠风工作的副县长陈光华、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副局长韩继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温国华因严重违纪违法，分别被查处。

4月23日　第一次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任建新在会上强调要全国加强和改进法院执行工作。

4月26日　中组部、中宣部在京召开"学习孔繁森汇报会，总结回顾一年来宣传学习孔繁森活动的成效和经验。

同日　中央国家机关等在京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报告会。

4月27—29日　台湾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王兆国作了工作报告，钱其琛出席会议并讲话。

4月28日　海协负责人就"汪辜会谈"三周年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必须以实际行动真正站到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来。

4月29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5月7日在京举行第19次会议。

4月30日　首都举行薄一波新著出版座谈会，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座谈会，朱镕基发了贺信。

5月2日　杀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的凶犯张金龙，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审理终结，被依法判处死刑，于当天执行枪决。

5月7日　全国政协举行第38次主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并决定政协八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于6月中旬在京召开。

5月7日—15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统计法、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和律师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职业教育法。15日，江泽民分别签署了这5部法律。统计法、水污染防治法于公布之日起施行，职业教育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师法分别于9月1日、10月1日和1997年1月1日起施行。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及任免名单。

5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监察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一次深入学习党纪政纪条规的活动。

5月12日　《叶剑英选集》出版发行。选集收入1937年至1983年间重要文章报告等共85篇，反映了叶剑英同志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贡献和不朽功勋。

5月12、15—1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庆祝活动小组、法律小组第二次会议分别在京召开。13—14、26—27日，推委会、经济小组第三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和珠海举行。

5月14日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等在京举行吴天祥同志事迹报告会和座谈会。

5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

同日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京成立。

5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对行政处罚法的施行要予以重视，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行政处罚法10月1日起施行。

同日　中纪委、监察部在京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查办案件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提出要加大查办案件力度。

5月17日　全国政协就社会治安问题举行协商座谈会。任建新、罗干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到会并讲话。俞雷代表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提出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四点建议。

5月18—20日　全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会议在山东省泰安市举行。张思卿在会上提出要严肃查处大要案，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5月20日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同志的遗体在京火化。陆定一是本月9日逝世的，终年90岁。陆定一在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邓小平、彭真、朱镕基、刘华清、荣毅仁等到医院看望或表示慰问。李鹏、乔石、李瑞环、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40个县(市)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126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

5月21日　中国市长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李其炎当选为会长，侯捷继任执行会长。李鹏会见与会代表。

5月24、25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珠海举行，钱其琛致开幕和闭幕词。会前江泽民看望了全体与会委员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的原则设想、关于建立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决议，以及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会议决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8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

5月28日　江泽民题赠的“护国利民”金匾悬挂揭幕仪式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举行，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出席了揭幕仪式。

5月29日　国务院举行第45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矿产资源法修正案(草案)和电影管理条例(草案)。

同日　李鹏会见香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杨铁梁，并强调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香港公务员和司法人员队伍的稳定。

5月30日　香港回归庆委会筹备会成立。

6月1日　首都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救国会60周年座谈会，李瑞环出席座谈会，王兆国发表讲话。

6月1日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受沙弥戒仪式，按照宗教仪轨，在历世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的措钦大殿释迦牟尼像前举行了庄重的受戒仪式。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代表祝贺受戒圆满成功。3日，扎什伦布寺举行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受戒庆典。西藏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部分领导，西藏和其他藏区藏传佛教界活佛高僧出席庆典，向十一世班禅表示热烈祝贺。赵朴初发来贺电表示祝贺。

6月1—5日　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基层党组织工作，并同县、乡、村组织负责人座谈，畅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正确引导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6月2日　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在京举行纪念李维汉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李瑞环出席并讲话，丁关根、李铁映等出席。5日，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暨李维汉铜像揭幕典礼在湖南省长沙县隆重举行，李维汉同志生平事迹陈列馆同时在长沙县开馆。江泽民为铜像题名。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将在天津建立。

6月3—5日　中央、国家机关部委老干部党支部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老干部党支部建设。

6月4日　钱其琛给党外人士作形势报告，谈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和今后对台工作。7日，中宣部等联合举办台湾问题形势报告会，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应邀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及今后对台工作》的报告。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印发了《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6月10日　中直机关召开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强调要进一步落实机关党建各项任务。

6月10—14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修正案）和关于撤消恰扎·强巴赤列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资格的决定。

6月14日　国务院举行第4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草案）》。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著名台籍爱国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苏子蘅遗体在京火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苏子蘅于5月31日在京逝世。

6月18　《人民日报》报道：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各地发行。

6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由党政各有关部门参加的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

同日　共青团中央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在青少年中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祖国活动。

6月21日　中共中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

同日　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长会议，决定28日至7月5日举行第20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曹志关于各国议会联盟第96次大会中国组委会筹备工作的汇报和几个法律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一位负责人日前在香港表示，“九七”后内地和香港宗教联系原则是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互相尊重。

6月22日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若干问题和敦促台湾当局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回答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答记者问。

同日　中组部、中央党校在京召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学习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

6月22—24日　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对贯彻律师法、推进律师工作改革作了部署，肖扬在会上指出律师和律师管理工作者要提高执法水平。

6月25日　香港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庆祝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周南在会上说香港过渡最后阶段中心任务，是保证平衡过渡和持续繁荣稳定。

6月26、27日　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和研究了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一年前夕的形势和确保平稳过渡的工作。

6月26、27日　全国总工会第十二届第十一次主席团会议在京举行，尉健行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全国总工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搞好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决定向10名优秀党政工领导干部和10名优秀知识分子学习。

6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各地发行。

6月28—30日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发表讲话。会议表彰了106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和12名先进优秀共产党员。通过了致全国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倡议书，和关于授予李国安等12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并决定向10名优秀党务工作领导干部和10名优秀知识分子学习。

6月28—30日　全国党史系统表彰大会暨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会议表彰了32个先进集体和100名先进工作者。

7月1—5日　为期8天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拍卖法、枪支管理法和关于修改档案法的决定。5日，江泽民主席分别签署了这3项法律。拍卖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枪支法于10月1日起实施，档案法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批准199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以及有关任免名单。

7月2日　鲁平在中宣部等举办的报告会上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英关系等问题作了报告。

7月3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组部、中宣部等在京召开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研讨会。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印发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同日　贵州省各界人士纪念我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周逸群烈士诞辰100周年。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7月5—6、12—13、14—15、18—19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临时立法会小组、推委会小组、法律小组、经济小组、行政长官小组各次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7月7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级检察院、289个地市级检察院、近1400个基层检察院成立了反贪局。

7月8日　民盟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李公仆、闻一多殉难50周年，费孝通出席并讲话。同日，李公朴、闻一多殉难5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15日，云南各界人士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50周年。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地方法院机构改革工作在沈阳召开，会议指出地方人民法院机构改革工作已进入

实施阶段，全部工作预计在年底完成。

7月8—12日　第十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主要总结几年来检察工作经验，研究当前形势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工作的措施，并部署实施刑事诉讼法工作。

7月9—12日　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主要是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关于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研究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11日，胡锦涛同与会代表座谈。

7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习仲勋文选》已于近日出版，并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文献》共收入重要文章及讲话77篇，其中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同日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在京成立。

7月12日　中国检察官协会在京成立。

同日　山东省泰安市6名原领导干部因无视国法以权谋私受贿受到严厉制裁。原市公安局长李惠民被判处死刑，并在当地执行枪决，胡建学等3人被判死缓，孙庆祥等2人被判无期徒刑。

7月12—14日　中央党校和湖北省十堰市联合举行纪念杨献珍诞辰100周年活动，并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7月13日　吴亦侠任贵州省代省长。

7月15—17日　第九次全国警卫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认真分析了警卫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了进一步加强警卫工作的措施。17日，江泽民、李鹏、刘华清、胡锦涛等会见与会代表。

7月15—18日　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任建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7月19—25日　胡锦涛在安徽考察时，要求下大力气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7月22日　人事部在京召开电话会议，对全面推行国家公务员轮岗工作作出部署。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办负责人要求各地、各单位举行庆祝香港回归宣传活动要遵守规定，有序进行。

同日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庆祝建州4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电祝贺。

7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日前指出，香港某些团体策划进行所谓“民间选举行政长官”是别有用心的闹剧。

7月23—24日　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何思源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山东菏泽举行。

7月24日　《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中文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发行。

同日　李瑞环在西宁会见十世班禅的母亲，盛赞班禅大师爱国爱教的崇高精神。

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辽宁省委在大连召开表彰大会，分别授予谭彦同志“全国法院模范”和“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同时发出开展向谭彦同志学习的决定。29日，中组部等举行谭彦事迹报告会，胡锦涛会见报告团成员。30日，中组部、中宣部等举行座谈会。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日前发出《关于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红军老战士及有关活动的通知》。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和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大会，表彰奖励在查办“泰安案件”中的有功人员。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荣获集体一等功，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长风等4同志被荣记一等功。

7月29日　第十世班禅转世金银质纪念章在拉萨正式公开发行，发行前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8月1日起向海内外发行。

7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原贵州省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金鉴明，因犯贪污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8月1日　为期4天的全国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在大连举行，座谈跨世纪发展战略与精神文明建设。

8月2日　中纪委、监察部日前就浙江省原萧山市市长莫妙荣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无期徒刑案转发浙江省纪委、监察厅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8月5日　新华社报道：福建省组织部最近决定，在全省年轻干部中开展“认真读书学习，争当跨世纪人才”并倡导多学习少应酬，多读书少游乐，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8月7—12日　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研讨会在昆明举行，会议总结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并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8月8日　贵州省黔南州各族干部群众集会庆祝自治州成立4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电祝贺。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公务员职位轮换（轮岗）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9—1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四次全会在京举行，钱其琛致开幕和闭幕词。会议通过了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特区区旗、区徽使用暂行办法等三份文件，通过了会议新闻公报，听取庆祝活动小组召集人关于庆委会筹组最新情况的汇报，听取鲁平对筹委会近期工作安排的报告。会议决定，第五次会议于10月4日至5日在京举行。10日，陈英滋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第一届政府推委会具体产生办法是这次会议取得的重要的成

就，这标志着筹委会为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所进行的工作开始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8月11—12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经济小组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

8月12日 国家安全部发布公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和打击不法分子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8月13日 国务院举行第49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建筑法(草案)和人民防空法(草案)。

同日 中纪委、监察部决定派出10个专项检查组，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分赴部分省区市和部委，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

8月14日 王廷江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丁关根出席报告会并会见报告团成员。

8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切实加强对民事、行政审判的法律监督。1996年上半年共受理民事、经济、行政申诉案件14215件；对法院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等案件提出抗诉819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10%；从中发现并立案查处审判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案件60件，67人。

同日 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在京展出。

8月16日 首都各界集会纪念邓子恢诞辰100周年，同时《邓子恢文集》、《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出版发行。朱镕基出席座谈会，姜春云讲话，薄一波作书面讲话。

同日 中纪委等五部门联合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斗争制度化、法制化。

8月17日 新华社报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卡片型电子版出版。

同日 李大钊纪念馆在河北乐亭奠基。

8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日前发出印发《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8月21日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出版发行。

8月22日 全军高级干部学《邓选》轮训班在国防大学开学，学员们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习邓小平哲学思想。

8月23日 新华社报道：青海塔尔寺维修工程竣工并举行隆重开光大典。

8月22—2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修改矿产资源法的决定、煤炭法。29日，江泽民分别签署了这3部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自10月1日起施行；修改矿产资源法的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矿产资源法修改后将重新公布；煤炭法自12月1日起施行。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的决定和任免事项。

8月26日 首都举行《王稼祥》画册暨王稼祥诞辰90周年座谈会，刘华清讲话，胡锦涛等出席。

同日 陈毅元帅铜像在他的故乡四川省乐至县揭幕，迟浩田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出席仪式并讲话。

8月28日 首都纪念李德全诞辰100周年，李瑞环出席座谈会并与各界人士共同缅怀李德全的崇高品德。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8月30日 《世纪伟人邓小平》画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出席座谈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在京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监察厅长和派驻纪检组长、监察局长座谈会。尉健行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

9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电祝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建州40周年。

9月2日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要抓住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放松。同日，任建新在党校省部级政法专题研究班上指出，要着重研究政法工作重大现实问题。27日胡锦涛在党校省部级政法专题班结业式上强调，政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同日 第七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在京评选揭晓，王成强、吕永杰等当选。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5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网络，29个省、市、自治区颁布实施了地方未成年保护法规，23个省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成立。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各类档案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已建立3662个档案馆，各类档案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础性资源。

9月2—3、19—2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临时立法会、法律小组第五次会议分别在京举行。

9月3日 国务院举行第50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质量振兴钢要》(1996—2010)。

同日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座谈，纪念胡愈之诞辰100周年。《胡愈之文集》出版发行。

9月3—13日 中组部举办的县(市)委书记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客观地分析了近两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强调整顿农村后进村党支部不能松劲。

9月4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出版座谈会，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刘华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同日　海协会就浙江和台湾两渔船绞网纠纷事复信台湾海基会。

9月5日　全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工作座谈会在郑州举行，布赫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加强民族立法工作。

9月7日　首都举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伟人的瞬间》摄影画册出版座谈会，乔石会见与会者。

9月8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三至五卷、《毛泽东诗词集》和经中共中央批准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日前出版发行。同时出版发行的还有《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

9月9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40次主席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建议政协八届常务会18次会议于10月中旬召开。

9月10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纪念叶挺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出席并作重要讲话。16日，"叶挺将军纪念馆"在江西省上饶市落成，并开始接待参观者。

同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驻西藏自治区部队的官兵将享受"西藏驻军特殊津贴"，10月1日前发放到驻藏官兵手中。

9月10—12日　全国检察机关首次司法警察工作会议在沈阳举行，张思卿致信要求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

9月11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向全军印发《"九五"期间军队审计建设计划》。

9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韶山毛泽东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

9月14—21日　胡锦涛在四川考察工作时强调，路线是根本，干部是关键。

9月16日　中纪委、监察部召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专项检查情况通报会，指出目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有了新进展，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同日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当局最近再次重金收买拉拢少数国家向联大提出议案、建议联大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图谋"参与联合国"不得人心，勾结外力制造"两个中国"注定失败。

9月17日　国务院举行第十次全体会议，总结今年上半年的工作，部署今后几个月的任务。

9月17—18日　老干部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切实解决老同志的困难和问题。

9月18日　第三次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8个先进集体、130个英雄模范和36个劳动模范受到表彰。任建新在会上提出，要建设高素质司法行政干警队伍。

9月19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罗瑞卿传》、《罗瑞卿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罗瑞卿诞辰90周年座谈会，张万年、迟浩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同日　中央党校举行纪念杨献珍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杨献珍传》一书已于近日出版。

9月20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召开座谈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暨《红军长征史》、《红军长征纪实》出版。江泽民为《红军长征史》题写书名并题词。25日，中纪委、监察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举行长征胜利60周年报告会，邹家华等会见红军老战士。28日，四川省各界在位于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前集会，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

9月20日　公务员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会上，人事部副部长张志坚宣读了人事部《关于授予景志刚等五名同志"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的决定》。26日，胡锦涛会见"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报告团。

同日　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22日，朱镕基、胡锦涛参观成果展。24日，李鹏会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参加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的代表。

9月23日　中宣部、团中央在京举行青年文明号事迹报告会。

9月24日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王首道同志的遗体在京火化。王首道于本月13日逝世，享年90岁。在王首道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彭真、朱镕基、刘华清、荣毅仁等到医院看望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慰问，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近日发出通知，转发了公安部党委《关于实行县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意见》。

同日　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举行中秋招待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人士出席。

同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任免驻外大使。

9月25日　为期两周的全国台办主任培训班在京结业，王兆国在结业式上提出要建设高素质的对台干部队伍。

9月26日　司法部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律师法〉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决定》。并为此召开电话电视会议，肖扬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9月27日　国务院新闻办在京举行90年代中期中国儿童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组部最近印发了《关于加强街

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9月2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各级政府机关在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辞退不合格公务员出口也已打开。据不安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国行政机关共辞退不合格公务员331人。

同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省商洛地区各界目前集会，纪念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创建50周年。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组部领导看望老红军。

同日　29日　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乔石、朱镕基等出席，钱其琛致祝酒词。30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举行国庆招待会，欢迎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李瑞环出席，王兆国讲话。

同日　胡锦涛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新疆干部团时强调，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发展新疆。晚上，中央统战部举行招待会，欢迎新疆干部团。

同日　30位老英雄在京欢度国庆。

9月30日　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李鹏发表讲话，并同千余名各界人士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欢聚一堂，共庆中国人民的节日。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澳门分社分别举行盛大酒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

同日　江泽民会见前来参加“中华儿女”国庆活动的港澳妇女访问团。

同日　李鹏在中南海接受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

10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10月4～5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这标志下一步推举第一任行政长官和选举临时立法会的有关工作相继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0月7—1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本次会议上，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五大将于明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

10月1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10月12日　以学习贯彻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政协常委会议厅开幕。

10月17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10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10月28日　《中国21世纪》第二次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召开。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代表中国政府讲话中指出，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今后乃至下个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

10月29日　为期一周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乡镇企业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人民防空法和解放军选举全国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办法等4部法律。

11月1日　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百个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命名大会。李岚清发表书面讲话，强调要培养热爱祖国的新一代。

11月5日　’96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隆重开幕。江泽民、李鹏、刘华清为博览会题词，李鹏为航展开幕剪彩，并参观了展馆。

11月1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选举何鲁丽为民革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2日　全国政协在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李瑞环主持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胡锦涛、荣毅仁和首都各界人士出席。

11月23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赴菲律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月25日　李鹏在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工作会上要求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要作表率。朱镕基等出席了会议。

11月29日　为期三天的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日落下帷幕。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及舆论均给予高度评价。

12月1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负责人就颁布《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规定》发表讲话。

12月6日　十名在检察岗位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检察官，在北京被授予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称号。同时还有二十一位检察官获提名奖。

12月9日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主要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江泽民、李鹏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由朱镕基主持，乔石、李瑞

环、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了会议。

同日　中共中央举行国际法知识讲座，江泽民主持并讲话，要求领导干部努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听取卢松副教授的讲述。

12月11日　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董建华在会上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12月12日　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主持招待会并致辞。

12月18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也参加了会见。

同日　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与出席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江泽民、李鹏发表了重要讲话。

12月24—30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经　济

1月1日　1995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1995年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开始施行。

同日　'96中国度假休闲旅游活动在海南省三亚市开幕。本次活动由国家旅游局和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

同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天津无缝钢管工程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冶金产品的一项空白。它是我国继上海宝钢之后的又一座具有世界先进冶金技术的特大型企业。该工程总体设计152个单项工程，占地340.14公顷，年产钢60万吨，钢管50万吨，其中石油套管35万吨。

1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外经贸部等四部门于1995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公告，决定自当日起取消176个税目的进口控制措施。

同日　财政部发布公告，决定1996年1月8日起，发行1996年一期记帐式国库券。本期国库券为1年期限。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日前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活跃农村市场，保障春耕物资供应。

1月2—9日　乔石在上海、江苏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抓紧探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

1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12月25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全国黄金产量首次超过百吨。

1月4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京召开扶贫行动大会，并接受海内外热心扶贫人士的捐赠。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李鹏总理1995年12月27日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化学品管理条例》，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月4—7日　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5日，李鹏总理会见会议代表时强调，各级审计部门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据报道，1995年全国审计查出违纪金额630多亿元。

1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贵州东风电站建成投产。该电站装机总容量51万千瓦。

1月5—8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研究了实现"九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重点部署了1996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必须着重解决8个重大问题。会议期间，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代表。30日农业部在京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九五"和1996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县委书记和县长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1月6日　我国最大的特大型现代化矿井，陕西神府东胜煤田大柳塔煤矿正式建成投产。该矿设计年产量600万吨煤。

1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我国海关征税698.68亿元。

1月8日　三北防护林体系三期工程全面启动。根据规划，三期工程共需造林400万公顷，年造林80万公顷，总投资78.57亿元。完工后三北森林覆盖率将提高10%以上，可年增产粮食1300多万吨。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贯彻国务院精神，国家经贸委等11部门通知，开展无偿划转国家粮储局直属库（站）试点工作。直属库（站）为国家粮储局直属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

1月9日　国家计委通知，要求各级物价部门加强1996年春节期间的市场物价检查，稳定春节市场物价。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近日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抗春旱准备。

同日　新疆乌苏东南发生5.2级地震。

1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八五"期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6万公里。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维护社会安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我国电子工业完成

工业总产值2300亿元，比上年增长23.5%；实现销售1650亿元，比上年增长27%；全年出口额近170亿美元，进口额为160亿美元。

1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近日派出检查组到各地进行农民负担执法检查。

1月11—17日　李鹏考察了浙江、江苏、上海的工作，他在上海时指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意义重大。

1月12日　我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在京成立。

同日　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会议在京举行，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要求继续加大打击走私力度。

同日　全国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电话会议在京举行。

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贵州省在乌江上建成了世界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桁式组合拱桥——江界大桥。大桥全长461米，主跨330米，距河面263米。

1月14—18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1996年国家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1日召开的农行分行行长会议决定今年支农贷款150亿元，比上年增长14%。15日，工商、中国、建设、交通4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分别在京召开，并确定各自今年的信贷重点。23日，新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举行工作会议，安排1996年工作任务。

1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八五"重点通信工程：北京—呼和浩特—银川—兰州光缆通信干线近日全线贯通，总长2052公里。

1月15日—17日　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近期分别对冶金工业发展作出重要指标，要求冶金工业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1月16日　农业部等联合召开紧急电话会议，部署加强肉类卫生管理工作。

同日　航空工业总工司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九五"目标是让国产100座位客机上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了与会者。

1月16—21日　全国轻工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传达了吴邦国副总理的指示：轻工企业改革要抓好大企业、放活小企业，把放小提到日程上。

1月17日　江泽民到中国气象局考察工作。他强调气象工作要把为农业服务放在首位。

同日　全国机械工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具体部署了实现机械工业两个转变的五项措施。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通知，要求整顿矿业秩序，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贸委等四部门日前通知，要求推动我国物资流通实行代理制的工作。为此，近日四部门出台了数项支持政策。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考察了电子部金桥工程网络控制中心。朱镕基指出，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入库款131.39亿元，比上年增长80.8%，完成计划131.4%。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日前通知重申，要严格执行铁路运输的国家定价，要求纠正部分铁路企业乱加运费的错误行为。

1月18—21日　朱镕基副总理在广东考察加工贸易情况时说，建立银行保证金台帐，有利于监管。

1月19日　江泽民考察了煤炭部水煤浆和煤炭液化科技开发工作。这项工作对节能和环保具有重大意义。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邮电局长会议在京举行。吴邦国副总理致信会议，强调要集中资金加快发展通信基础设施。

1月2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995年我国产钢9400万吨，比上年增加139万吨，居世界前列。

1月21日　投资50亿元，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我国目前最大最先进的北京火车西站开通运营。西客站目前可日接发列车27对，最终可达90对。李鹏出席了当天的通车庆典。

1月22日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强调，保证安全是党和政府的神圣职责。会议要求对近期屡有发生的建筑、煤矿、火灾、交通事故给予高度重视。

1月23日　全国商品流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五三一"工程，促进生活和生产资料供应，深入进行流通企业改革。

同日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研究了如何实现"两个转变"的途径和措施。

同日　"八五"重点项目侯(马)月(由)电气化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本次开通运营的一期工程为全长252.6公里的单线电气化铁路，及同步建成的139公里复线铁路。

1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目前通知批转国家经贸委、冶金部《关于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的调查报告》。通知要求推广和学习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全员全程成本控制及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的经验。

1月25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月26日　横贯我国华东、华南地区的浙赣铁路复线全线开通运营。本线东起杭州、西至株洲，全长947公里。

同日　为期3天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工作会议

在京结束。江泽民、李鹏对石油工业作出批示，要求坚持“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方针，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石油。另据报道，1995年我国陆上产石油1.4亿吨，陆上产天然气160多亿立方米。

1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江泽民、李鹏最近分别对民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民航工作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和全面提高民航队伍素质。30日，《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召开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提出：“九五”目标：民航实现航运总量、客运总量、货邮运量在现有基础上各翻三番。

1月29日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确定了“九五”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国际旅游外汇累计收入580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累计1—1.05万亿元。另据报道，1996年我国将开展旅游市场的专项治理。

1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天津夏利轿车15万辆扩建工程按期完工。项目总投资22.13亿元，包括子项工程54个。

2月1日 近日召开的国家体改委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在京结束。会议要求试点企业实现八个方面的转变，使企业成为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李鹏总理1月25日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姜春云副总理等近日在听取国务院专门检查组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检查情况汇报时强调，要果断地把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不得姑息。

2月3日 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和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交界处发生7.0级地震。云南省政府立即组织工作组赶赴灾区慰问。4日，党中央、国务院致电慰问震区灾民。5日，吴邦国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团赴灾区慰问；当日丽江发生6级强余震。6日，党中央、国务院拨专款、物资给云南震区救灾。又讯，中国红十字会、港澳各界人士及群众团体、权力机构向震区灾民捐款捐物。据统计，地震已造成死亡245人，伤亡总数1.4万多人。另据报道，云南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外国政府、群众团体及海外华人纷纷打电报、发表讲话、捐款捐物慰问和帮助云南灾民。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入冬以来青海玉树连降大雪，今年1月下旬玉树藏族自治州再遭暴风雪袭击形成雪灾，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时组织力量救灾。但因条件所致，目前冻伤、患病的牧民不断增加，牲畜死亡总数超过60万头只。8日，国务院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救灾。

2月3—7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代表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致信会议，希望合作社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推动农业产业化。合作总社陈俊生主任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2月5日 中国民航总局决定既日起暂停民航在海口机场的夜航飞行、降低机场使用条件。有关部门将认真审查清理机场净空保护区内的超高建筑和其它障碍物。

2月6日 财政部就1996年记帐式(二期)国库券的发行发布公告。27日，财政部就发行1996年无记名(一期)国债发布公告。

2月7—8日 受姜春云副总理委托，水利部长钮茂生到陕西大荔县黄河凌汛灾区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1月下旬以来，大荔段的黄河流凌致使滩区多处决口，20多万亩农田被淹，1万多人受灾。目前，解放军空军正在爆冰抢险。

2月9日 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最近和人大环保委的同志谈话时强调，保护环境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月10日 姜春云副总理等在听取农资调查汇报时强调，要坚决整顿农资流通秩序。

2月11日 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赴四川甘孜地区慰问遭受罕见雪灾的群众。本区于1995年12月中旬至1996年1月中旬遭受特大的寒潮雪灾，不少牲畜死亡，群众生活困难。2月初，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对灾区进行3次物资空投。四川省和成都军区组织了大量救灾物资运往灾区。

2月11—15日 李鹏在海南考察工作。他强调，海南发展要面向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2月12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首批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启动，由中央财政支持的1.77亿元资金已到位。

同日 新华社报道：1996年国家安排三峡工程总投资82亿元。

2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国家审计署近日设立举报中心，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违反财经法纪行为的举报事项。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发出关于1995年物价调控目标完成情况及1996年调控计划目标的通报。《通报》指出，去年全年平均物价上涨率为14.8%。

2月15日 新华社报道：1996年国家安排以工代赈资金40亿元。资金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全部投向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扶贫县。

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首列准高速空调双层列车，日前通过铁道部鉴定，开始批量生产。它是代表我国铁路装备最高水平的客车。

同日 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召开第10次会议，确定了1996年的房改工作重点。

2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建设部近日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和自查。

2月24日　李鹏在京看望了电力和航天系统春节期间的值班人员，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并表示节日的问候。

同日　新华社报道：春节前，国务院派人分赴14省区进行专门稽查和调查，以控制肥价上涨，保护农民利益。

2月26日　财政部发布1996年到期各类国债券还本付息公告。

同日　新华社电，《人民日报》报道：李鹏总理1996年1月29日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本条例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2月28日　根据国务院决定，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在京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该协调会由国务院和解放军总部近20个部门的领导组成，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叶青任协调委员会主任。

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八五"期间全国共植树造林4.4亿多亩，封山育林4亿多亩。全国森林覆盖率比"七五"末提高近1个百分点。

3月1日　全国绿委会举行全体会议，表彰实现了荒山绿化规划的吉林、江苏、海南三省。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要求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7日，林业部等在京举行全国"三八绿色工程"活动表彰大会，授予110人全国"三八绿色奖章"。5日《人民日报》报道林业部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安排好春季植树造林活动。10日，中央军委领导和百多名将军在京郊植树。12日，中直机关在京植树。

同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95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评选结果日前在京揭晓。此次评选是由中国乡镇企业报组织的。

同日　国家安居工程工作电话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宣布1996年我国在88个城市实施安居工程，建设规模1408.8万平方米，总投资125.8亿元。

3月2日　为期3天的全国学习推广邯钢经验暨企业管理工作会议在邯郸闭幕。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提高经济效益，加强企业管理，努力促进"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同日　国务院通知，要求抓好春耕生产和当前农村工作的有关问题。3日，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当前农资工作。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近日通知，决定3月份开展全国农资价格大检查。

3月4日　1996年无记名一期国债承销签字仪式在京举行。本期发行300亿元。8日，财政部就1996年记帐式(三期)国库券的发行发布公告。本券计划发行150亿元。

3月13日　新疆阿勒泰以北地区发生6.1级地震，19日，新疆阿图什东北地区发生6.9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20日致电慰问灾区。21日，国务院慰问团到达灾区进行慰问。地震发生后，驻疆部队立即组织力量抢险救灾。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等决定将"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延至1997年年初。14日，'96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结果在京揭晓。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3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农业部日前召开现场会，部署夏粮田间管理工作。

3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交通部等部门日前紧急通知，要求防止公路"三乱"反弹。29日，交通部等部门联合召开第二次治理公路"三乱"全国电话会议。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要求年内实现国道基本无"三乱"。

同日　全国气象部门电视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要求抓好春耕春播气象服务工作。

3月20日　国务院召开北方旱区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北方旱区抗干旱、保春播、保夏粮。21至25日，姜春云副总理在河北、河南检查农村抗旱双保工作时强调，旱情不除抗旱不止。

3月20—26日　朱镕基副总理在山东进行调研活动。

3月22日联合国在我国举动世界水日纪念活动；"中国水周"拉开序幕。

同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矿业秩序整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决定1996年上半年进行全国矿业秩序整顿工作。

3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环保局为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推出《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该计划将集中力量和资金对一些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和重大环境实施一系列的治理工程。28日，国务院第三届环保委召开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了1996年的工作计划和环保执法检查方案。

3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资管理局1994年以来，通过全国范围的产权界定工作，查出帐外资产470亿元，收回国资310亿元；重估出国资增值7340亿元，帐面国资达22000亿元。

3月26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同日　财政部就发行1996年记帐式(四期)国库券工作发布公告，本券计划发行100亿元，期限1年。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批准了有关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反假货币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3月27—29日　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工作会议在杭

州举行。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实行两个根本转变,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再上新台阶。另据28日《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438.6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的29.5%,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3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日前颁布《贷款证管理办法》,决定从1996年4月1日起,在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实行贷款证管理制度,以规范企业借、还款行为,防避信贷资产风险。

同日 我国目前最大的海上海田——南海流花11—1油田正式投产。油田石油地质含量2亿吨,高峰年产量可达249万吨。油田建设总投资6.2亿美元。

3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1996年4月1日起存入的3年以上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不再实行保值。对4月1日以前存的3年以上定期存款仍保值。

4月1—3日 国务院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珠海市召开。李鹏总理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交流了特区工作经验,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工作重点。

4月2日 全国森林防火电话会议在京召开,部署防火各项工作。

同日 由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中国广告协会和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共同开发、建立的中国电视广告监测网正式运营。

4月3日 李鹏总理结束了在广东的4天考察工作。李鹏在考察中强调,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同日 李瑞环主席结束了在沪的5天考察工作。李瑞环在考察时希望,上海要乘势而上,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再上一个新台阶。

同日 全国金融系统"讲改革、讲政治、讲法纪、讲效益,提高服务水平"大会在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希望全体金融系统职工把"四讲一服务"活动落到实处。

同日 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全面做好农业普查准备工作。

4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民航新近实施旅客误乘飞机,机票不再作废的规定。

4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近日通知,要求贯彻执行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国有企业今年的改革要有新进展。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八五"国家重点项目——海关EDI通关系统近日在京通过国家科委鉴定。该系统可显著加快通关速度,并使用户免去上门申报。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联合起草的《关于深入开展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意见》,明确了今后"打假"的六项重点。

4月12—14日 国务院环保委在无锡召开太湖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会议要求治理太湖要高标准,到2000年太湖水要变清。

4月15—29日 第79届广交会开幕。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近3000个,出口成交额比上届增长2.02%。

4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九五"就业目标确定,把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财政第二批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正在加紧落实。本项目将以扶持粮棉大省和中西部地区、水产业发展的省区、国有农场为主。

4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地跨广西、贵州的九万大山山区的200万人在林业部实施的九万大山林业扶贫攻坚计划的帮助下告别了贫困。

4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在渤海中部又找到了第3个亿吨以上储量的秦皇岛32—6油田。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截止今年3月底,1995年度我国粮食收购总量919.22亿公斤,比上年多23.41亿公斤,超额完成计划收购任务。

4月23日 蒙古国境内发生的草原森林大火燃至我国呼伦贝尔盟境内。这场火灾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目前有关方面正组织力量进行扑救。

4月24日 财政部等5部委在京联合召开全国清理检查预算外资金电视会议,国务委员罗干到会并讲话。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医药生产大国,1995年医药工业总产值逾1000亿元。

4月28—29日 李鹏在徐州考察。考察时他指出,粮食增产主要寄希望于中低产田改造,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4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通知各地严格控制对企业不必要的评比活动,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起带头作用。

4月30日 吴邦国副总理在京会见罗康瑞为团长的香港工商专业联合会访京团。

5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当日起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平均降低0.98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低0.75个百分点。

同日 自4月23日以来,境外大火引起的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多处草原森林火灾当日全部被扑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灭火参加者表示慰问。此次大火过火面积约30万公项,其中林地面积4.6万公项,多为次生林和灌木林。

5月2日 中纪委、监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国务院纠风办会同有关部门严处广西玉林市政府违反规定下达公路收费指标、有关领导干部从中收取"奖金劳务费"事件;河南西平县检察院、工商局和驻马店市公安局

违反规定在公路上乱罚款，有关责任人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5月3日　内蒙古包头附近发生6.4级地震。初步查明：16人死亡，33人重伤，266人轻伤，直接受灾人口20.7万人，涉及9个旗县区、60个乡镇。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致电，对受灾群众表示慰问，并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同日　新华社报道：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决定，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同日　全国农业种子管理工作电话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要求各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整顿种子生产经营秩序，打击制售伪劣种子行为。

5月4日　江泽民主席结束了在上海的7天考察。他在考察中强调，要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步伐。

同日　李鹏总理结束了在安徽的4天考察。他在考察时指出，要加大治淮力度，抓紧发展农业。10日至17日，李鹏在云南考察。他在考察时勉励各族干部群众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

5月5日　朱镕基副总理结束了在贵州、江西的10天考察。他在考察时强调，银行要支持国有企业和粮食生产。

5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了农业部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约法三章"，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5月7日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要求今年加大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了香港总商会访京团。

同日　国家防总今年第1次会议在天津召开。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强调防汛抗灾工作要抓早、抓紧、抓实。

5月8日　财政部发布今年第7号公告，决定5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发行1996年第6号国债300亿元。本债自购入日起，持有5年者可获13.06%的年利，不计复利。

同日　北京市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

同日　6部委(公司)近日向11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联合收割机跨区收获小麦的工作。

5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要依法实行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制度，制止利用会计报表弄虚作假。

5月11—19日　李瑞环主席考察了川鄂沿江地区，考察时他强调，发展经济要坚持实践第一。

5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建设部联合通知，要求加强对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防止土地增值税的流失。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部日前公告，要求暂停进口新西兰疫区水果，我国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要加强对进口水果和旅客携带物的检疫工作。

5月17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物价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物价的调控管理，李岚清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提出了对物价工作的六点要求。

同日　为期2天的全国茧丝绸工作会议在京结束。会议强调只有走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的道路，才能保证丝绸行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批准煤炭部、地矿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联合组建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发煤层气(瓦斯)资源。李鹏总理为新公司成立题词。

5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地质工作者日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打出了第一口淡水井，有效地解决了奋战在塔里木油田3万工人的长期饮水和石油机械用水问题。

5月20日　我国防震减灾30年纪念暨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此项工作始于30年前的邢台地震，在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会议重申，争取用10年时间，使我国大中城市具备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

5月21—23日　全国农村水电暨第三批初级电气化县建设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强调，农村水电电气化是扶贫治本之策。22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会议代表。

5月23—25日　全国十大城市"菜篮子"产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天津举行。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提出，要精心组织新一轮"菜篮子工程"。

5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的规划管理。通知要求今后非农业人口100万以上大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原则上不得再扩大。

5月27日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在京成立，邹家华副总理担任组长。原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撤销。

同日　创七项世界第一、开发生产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的我国最大的海上油田流花11—1，投产庆典仪式在京举行。本油田位于香港东南190公里海域，水深300多米，石油地质储量约2亿吨，高峰年产量可达250万吨，是迄今为止我国海上最大的中外合作油田，项目总投资6.2亿美元。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日前下达了今年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计131项。国家计委强调，地方资金如不能按时按比例到位的项目，将不再列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5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外经贸部日前召开紧急会议，针对三批来自境外的"洋垃圾"事件，要求全系统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洋垃圾"通过贸易渠道流入我国境内。

5月29日　全国贯彻《统计法》电话会议在京召开。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依法办统计、依法管统计。

5月30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香港：迈向金融新纪元"研讨会期间说，预测人民币贬值毫无根据，中央银行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充分的信心。

5月31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扶贫协作会议，部署地区间的对口支援工作。

6月1日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发生5.4级地震。

6月1—5日　江泽民主席在河南考察工作。他强调农业持续发展也要依靠两个转变，指出农村经济和社会应当协调发展。

6月1—7日　乔石在安徽考察工作。他强调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

6月2日　我国秦山核电站二期主体工程开工。工程计划建设两台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并预留再建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场地。

6月3日　国家环保局发布了《199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表明，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环保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容乐观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同日　全国企业调查队在京成立。根据国务院要求，它将担负五项任务，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同日　国务委员陈俊生结束了在山东为期6天的考察。他在考察中强调，供销合作社要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6月4日　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1996年5月27日签署国务院令，发布《食盐专营办法》，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财政部发布第8号公告，1996年记帐式（五期）国债计划发行票面总额120亿元人民币，6月14日至7月11日为发行期。本券期限10年，每年6月14日支付利息，2006年支付最后一年利息并偿还本金。

6月5日　财政部等在京召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协会章程；审议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草案）》。

同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6月5—7日　吴邦国副总理在浙江考察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云南省元阳县老金山近日发生两起山体大滑坡灾害，死亡82人，伤77人，144人下落不明。

6月8日　广州本地网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

6月1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防汛抗灾夺丰收电话会议。

6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财政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通知，要求认真抓好下一步清查预算外资金工作。对重点查出的违法违纪问题要严肃处理。

6月13日　全国总工会等联合发文指出，在企业改组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撤销工会组织，或将工会合并到其他部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削弱民主管理。

6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内贸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通知，要求加强民用煤市场管理，严厉打击煤炭经营中的掺杂使假、哄抬煤价等不法行为。

同日　新华社报道，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近日作出规定，国有粮食企业销售政策性粮油可免征增值税。

6月14—1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考察三峡工程，乔石委员长强调一定要把三峡工程建设好。

6月15日　建设部等联合通知，严禁在资金不到位时工程建设项目上马"建设部门不得以要求施工单位带资承包作为招标条件。

6月17日　李岚清在北京考察旧货市场。他强调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旧货市场。

6月18日　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就京九铁路建设、中部地区和老区开发开放、特区发展等问题座谈。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李鹏、朱镕基出席座谈会。

同日　经国务院批准，由电力部负责组建的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在京正式成立。该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

同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大屏幕彩色显像玻壳生产线通过验收，投入生产。此项目引进日本NEC公司具有90年代世界领先水平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年设计能力为21"FS彩壳408万套。

同日　第四届北京国际汽车展开幕。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展出期间分别前往参观。

6月18—20日　全国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生产企业要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6月19—21日　全国土地管理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邹家华副总理为首批特邀国家土地监察专员颁发聘书并发表讲话。25日，李鹏总理在第六个全国土地日发表了题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的电视讲话。

6月20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全国分局长会议在京

召开。会议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从1996年7月1日起，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并在年底之前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

6月21日　国务委员宋健在国家地震局考察工作时提出，我国地震工作系统"九五"期间要实现地震台网数字化。

6月22日　哈尔滨飞龙航空公司的一架Y—12型飞机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失事。机上12人，2死10伤。

6月22—28日　姜春云副总理受江泽民、李鹏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内蒙古地震和草原森林火灾地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

6月25日　首都国际机场东跑道整修工程完工。完工后的东跑道新增加了排水和消防系统，并可以起降目前世界上各种类的大型客机。

同日　由太原市至平定县旧关村的山西太旧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本路全长144公里，实际投资28.65亿元人民币，每年可外运晋煤2000万至3000万吨。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了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向各金融机构发出通知，决定推出10条措施，进一步改进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金融服务。

6月26日　全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部署了"九五"期间渔政渔港监管工作。

同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金融系统"反腐败，防抢劫、防诈骗、防盗窃，保护金融资产安全"会议。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强调，要狠狠打击金融犯罪活动。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税总局近日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加快出口货物退税进度。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办理的出口退税进度比去年同期有较大下降。

6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自1996年7月1日起，境内外居民外汇户存款，可由存款人汇出境外。

7月1日　为了规范贷款行为，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贷款使用效益，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6月28日正式颁布的《贷款通则》，于即日起在全国实施。

同日　我国决定从即日起，对世界著名的百年军港旅顺口所在地，即大连旅顺地区实行局部对外开放。

同日　即日零时，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省沿淮流域的999家年产量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已全部关闭。

同日我国西煤东运的第二通道——神(木)黄(骅)铁路一期工程，陕西神木到山西朔州段开通运煤。此段全长270公里。

7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通知要求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7月4日　国家"八五"重点工作——北京乙烯工程交接验收仪式在京举行，这项装置引进意大利、荷兰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7月5日　李鹏总理结束了在黑龙江的6天考察工作，他重点考察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在考察中，李鹏勉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开拓进取。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结束了在甘肃的7天考察工作。朱镕基在考察中强调，要加大扶贫力度。

同日　吴邦国副总理结束了在河南为期8天的对国有企业的考察工作。吴邦国强调，要坚定信心，不断推进企业改革深入发展。

同日　全国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工作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会上要求立即制止化肥生产、流通秩序混乱问题。

7月6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7日　《人民日报》报道，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我国东海、黄海全面实行伏季休渔，以有效保护幼带鱼资源和其他鱼类资源。我国从去年开始首次在东海、黄海实行这一制度。

7月9日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新的驾驶证管理和驾驶员考试新规定，其中包括终止驾驶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驾驶证有效期由4年延长到6年等多项条款。新规定将于9月1日起施行。

7月10日　全国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在给会议的书面讲话中强调，要建立廉洁高效的税收队伍。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局联合通知，禁止在我国境内用外币计价结算。

7月11日　财政部就发行1996年无记名(二期)国债(1996年第8号国债)发布公告。本券计划发行票面总额300亿元，期限3年，8月6至26日为发行期。

7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272.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6%。其中：出口640.6亿美元，下降8.2%；进口631.8亿美元，增长11.6%；外贸顺差8.8亿美元。

同日　新华社报道，总后勤部、财政部、国家粮食储备局最近通知强调，军粮价格不变，部队按现行统销价购粮。

7月13—14日　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朱镕基副总理在会上指出，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级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体系。

7月15日　"八五"重点建设工程——宝鸡至中卫电气化铁路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本线全长498.19公里，南连陇海铁路，北接包兰铁路，在宝鸡与宝成铁路相通，

总投资15.2亿元人民币。

7月15—17日　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部署跨世纪的环境保护工作，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的关于环境保护的任务。江泽民、李鹏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7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家计委等8部委联合通知，要求采取措施解决供销社政策性亏损问题。

7月17日　深圳市端溪酒店发生大火，29人死亡，13人受伤。

7月18日　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中国组委会和中国1999年世界集邮展览组委会在京正式成立。江泽民担任本届大会和邮展组委会名誉主席，吴邦国担任主席。

7月19日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关于当前汛情的汇报，研究部署防汛工作。江泽民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李鹏、朱镕基等出席会议。李鹏20、21日专程前往湖南、湖北两省察看洪涝灾情、慰问灾民。随李鹏察看灾情的姜春云，此前于14至19日还察看了贵州的洪涝灾害并慰问灾民。21日，国家防总派员赴柳州指导抗洪救灾。另据报道，我国南方近期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目前，加拿大、芬兰、日本、瑞典等国的红十安会及政府机构为我国南方水灾捐款。香港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也已为南方水灾捐款。

7月19—21日　全国体改工作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提出，以城市为依托，大规模推进国有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7月20—26日　乔石在辽宁进行考察。他在考察时强调改造老工业基地，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7月21—25日　李瑞环在青海考察工作。在考察中他强调，要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加强团结、维护稳定。

7月24日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正式成立。集团下设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再保险三个子公司。

7月25日　中宣部等在京联合举行“综合利用，大有可为”系列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综合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7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部近日通知要求采取严格措施防止痒病进入我国。痒病是一种由病原引起的侵害绵羊和山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隐性病，是与疯牛病相似的传染性的海绵状脑病，危害极大。

同日　为期3天的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会议在京结束。会议要求围绕两个转变，做好农资流通工作，搞好农资流通体制改革。

7月28日　唐山市各界群众集会，纪念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李鹏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唐山人民致以敬意。26日，江泽民到唐山考察工作。他祝贺唐山人民2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7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最近通知要求，在城镇集体企业单位开展清产核资工作。

同日　为期3天的部分城市“菜篮子”工作会议在北戴河结束。会上17个大中城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交流了蔬菜工作经验，并就蔬菜等副食流通体制改革思路进行了研讨。

7月31日　外经贸部发言人介绍我国利用外资情况时说，上半年国家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4061个，比去年同期下降10.6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7.6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18%。

同日　西藏日喀则西北发生5.7级地震。

8月2日　西南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在拉萨召开。会议议题是，落实联合加快西南地区交通通信设施建设，开拓东南亚和南亚市场，培养区域市场体系，加强科技联合与协作等。

8月4日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了房改检查组对各省、区房改和安居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15日，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召开电话会议，部署下半年国家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决定下半年再增加50亿元的工程投资。

8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近日作出决定，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8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1—7月份，全国工商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5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4%，增收64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8.8%。

8月16日　李鹏考察秦皇岛煤码头四期工程。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要求高度重视价格监督检查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8月16—22日　乔石在甘肃考察。他在考察时强调要扎扎实实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8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利用发行会员证手段进行非法集资等活动。

8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烟台社会服务承诺经验报告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宣部和国务院纠风办选定建设部、电力部等8个部门作为首批试点推行单位，学习、推广社会服务承诺制度。

8月19日　黄镇东部长颁布交通部令，发布《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本办法自1996年8月20日起实施。21日，外经贸部发布《关于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办法》，并于当日实行。当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希望台湾当局尽早实现两

岸双向"三通"。

8月20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扭亏增盈电视电话会议。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强调，企业扭亏增盈要建立责任制。日前，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贸委等四部门《关于建立企业扭亏增盈目标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8月21日　国家经贸委在京宣布，正式启动技术创新工程，把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获得商业利益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推进，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8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降低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利率。此次存款利率平均降低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低1.2个百分点。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间的存、贷款利率也作适当调整。

8月27—28日　李鹏视察河北洪涝灾情、慰问灾民。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连降暴雨，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江泽民、李鹏先后听取了河北抗洪救灾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8月28日　京台经济合作研讨会在京开幕。京台两地学术界和工商界人士500余人欢聚一堂，共商迈向21世纪京台经济长期合作的大计。29日，江泽民会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一批台湾工商界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

8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国家计委的意见，要求取消地方上对经济型轿车使用的限制。

8月30日　李鹏会见中远集团首届远洋船员代表大会代表。李鹏希望代表们为我国远洋运输做出更大贡献。

9月1日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国务院和各民主党派分别致电表示祝贺。京九线北起北京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包括同期建设的天津至霸州和麻城至武汉的两条联络线在内，全长2553公里。16—21日，江泽民考察了京九铁路沿线，重点考察了沿线的扶贫工作。

同日　《中国食品报》报道：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于1996年6月1日提出了《关于全国食品工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9月1—8日　'96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在乌市举行。

9月3—5日　国家计委在大连召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座谈会，专门研究、讨论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四个盟(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规划、政策和措施。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提出要加快实现两个转变、振兴东北地区经济。

9月3—5　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在京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9月5日　姜春云副总理结束了在福建为期6天的考察工作。他在考察中强调，要确保农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

同日　李岚清考察北京国有菜店，要求充分发挥国有蔬菜和鲜活副食商业企业的主渠道作用，调控蔬菜价格，满足群众需要。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卫生部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检查、整顿白酒生产和经营市场，保护消费者利益。

9月5—9日　李鹏总理在新疆、青海、宁夏考察工作。在考察中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把西部地区建成各族人民的幸福家园。6日，李鹏在新疆库尔勒市出席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南疆铁路西段工程开工典礼并作重要讲话。

9月6—15日　国务委员李铁映在新疆考察。他指出，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步伐，跟上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度。

9月7—14日　吴邦国副总理在天津参加全国经贸工作座谈会，并在天津进行了工作考察。在考察中他强调，要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

9月9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在京召开。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出任基金会会长。他在会上指出，扶贫工作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9月9—11日　国家经贸委在津召开全国经贸工作座谈会。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和进一步做好经贸工作。

9月10日　内贸部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千方百计地采取得力措施，做好扭亏增盈工作，积极开拓市场，努力扩大销售。

9月10—12日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1996年度将继续实行棉花经营、市场、价格"三不放开"政策，同时积极推进流通体制的改革；努力开拓纺织品的国内外市场，以稳定和发展棉花生产。朱镕基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9月1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近日批复，原则同意实施《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及两个附件。

9月11—16日　杨尚昆在甘肃考察工作。

9月12日　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在京召开全体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在会上提出，要学习、贯彻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

9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近日通知决定，从1996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通知决定，适当扩大内地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

构以及中国科学院、船舶工业总公司等有关部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并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创造条件。

9月14—16日　第二次全国合理化建议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八五”期间开展的合理化建议工作，部署今后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

9月16日　中国首届保护臭氧层大会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务院环保委主任宋健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同日　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吉林化工集团30万吨乙烯工程建成投产。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进一步增强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导作用。

9月17日　耗资3亿多元人民币并经过陕、甘、宁三省（区）人民8年艰苦奋斗的盐环定扬黄水利工程建成通水，世代盼水的革命老区人民终于用上了黄河水。李鹏为工程题名。

9月18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9月18—20日　第三次全国化工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吴邦国副总理向会议发出贺信，希望化学工业要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9月19日　长春至四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公路全长133公里，工程总投资25亿元人民币。

同日　彭真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考察工作。

9月23日　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会议在常州召开。

同日　交通部、公安部等公布第一批实现了国道省道基本无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省份。

同日　乔石在四川考察。他要求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9月23—25日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江泽民、李鹏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本次会次的目的是统一全党认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大扶贫力度。中央认为，打赢扶贫攻坚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24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准把广西北海市列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进行异地扶贫开发综合试验，这是我国首次利用世界银行硬贷款进行异地扶贫的重点项目单位。

9月24日　全国经贸法制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做好经贸工作。

同日　全国技术监督执法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环保局日前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关闭15种工业污染严重的小企业。

9月25日　纪念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40周年暨城镇集体工业经济研讨会在京开幕。吴邦国、李铁映分别致信祝贺、题词勉励。

同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签署命令，发布《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本办法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9月26日　国务院在京举行国际消除贫困年纪念大会。姜春云副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赞同和支持联合国关于采取行动、消除贫困的全球性倡议。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八五”重点技术攻关项目“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实用化技术研究”日前已通过国家鉴定验收。这是我国第一个完全国产化ISDN实验网，其总体水平达到了90年代国际水平。

9月30日　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签署命令，发布《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最近作出的《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10月6日　全国飞播造林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姜春云在致大会的贺信中强调，飞播造林是加快我国造林绿化步伐的一条重要途经。

10月16日　财政部就发行1996年记账式（六期）国债（1996年第10号国债）发布公告。决定发行票面总额为200亿元国债，从1996年11月1日开始发行，11月20日结束。发行结束后即可上市流通。

10月17—20日　李鹏在川鄂两省和三峡建委有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在四川重庆、涪陵、万县、湖北宜昌和三峡工程工地进行了考察，实地了解几年来三峡库区移民工作进展情况和三峡工程进展情况。

10月25—11月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先后在贵州、广西重点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强调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

10月20日　长江三峡工程的重要配套项目——宜昌三峡机场二十日正式建成。

10月25日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水利建设已成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全局的重大问题。加强水利建设，既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关系未来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11月10日　国家统计局预计，今年我国肉类总产量将比去年增长一成以上。

11月14日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分别对所属两家分行违规为证券经营机构申购股票拆借巨额资金的行为作出严肃处理。

11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决惩处违规行为，自觉维护金融秩序”。

11月19日　经国务院批准，从1996年起，国家在继续投资建设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的同时，将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在全国重点粮食生产省以地区（市）为单位，建设20个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这批项目的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国家计委正式批复。

11月25日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它对推动全国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1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中国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过渡性安排，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11月30日　历时五天的第二届中国经济特区商品交易会在厦门落下帷幕。

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正确看待国有企业困难，严格控制新上工业项目。

12月8日　黄河干流上又一座大型水电站——大峡水电站首台7.5万千瓦发电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于今日一次并网发电成功。

12月14日　据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统计资料表明，截至12月14日，我国今年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这是继1978年以来踏上的又一个大台阶。

12月15日　国家计委、国务院证券委宣布，1996年股票发行规模为100亿元，相当于去年的两倍。

12月18日　全国体改工作会议在深圳经济特区召开。李鹏、朱镕基分别写信祝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体政委主任李铁映在开幕会上作了题为“把握大局、抓住重点、扎扎实实地把改革推向前进”的讲话。

同日　厦门各界举行大会欢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15周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发了贺信。田纪云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军　事

1月3日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在京举行，罗干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讨论通过了《1995年全国双拥工作情况报告》和《1996年全国双拥工作要点》。

1月15、18、31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近日先后签署命令，颁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条例、测绘条例和卫生条例。

1月16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0年7月5日公布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同时废止。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最近发布命令，分别授予总参某通信团长话站“模范通信站”、“黄炳华“献身国防现代化模范科技干部”、“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英雄扫雷队”、李国安“模范团长”荣誉称号，给海军飞行学院、沈阳军区所属四个单位分别记一等功和记功。

1月18、26、29日　总参某长途电话站“模范通信站”、李国安“模范团长”和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23日，李国安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24日，北京军区党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分别作出开展向李国安学习的活动的决定。

1月19日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在广西兴安县举行落成典礼，当年参加过那场战役的红军老战士为碑园揭幕。

1月23日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周子玉、于振武等颁发命令状。

1月24—27日　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去年的工作，并部署今后任务和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党风和廉政建设。27日，刘华清、张震等出席会议。

2月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公安边防部队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1995年共查获走私案件459起，抓获走私船389艘，查获汽车、摩托车、香烟、电器、生产性原材料及其它走私物品一批，缉私总值6亿元。

2月5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深入开展学雷锋学英模活动。

2月6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最近批转总政治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2月7日　刘华清、张震等中央军委领导会见李国安先进事迹报告团的4名成员，并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他的崇高品质。

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主席日前签署命令，颁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油料条例》。

3月7、8日　非法闯入我军事演习区域进行偷摄我军目标和非法采访活动的2名台湾记者、3名香港记者分别被我公安机关查获，已于10日将其遣送出境。

2月8—15、12—20、18—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

后在东海南海海域和空域进行发射导弹训练、海空实弹演习和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3月18日　新华社报道：民政部、财政部最近就提高在乡革命伤残人员的伤残抚恤金标准联合发出通知。这是继1994年后又一次较大幅度提高在乡伤残人员的抚恤标准。

3月22日　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在京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军转安置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工作意见。李贵鲜到会并讲话。会议提出今年转业干部安置政策不变。

3月24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布施行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

4月4日　新华社报道：清明节前夕，来自苏鲁豫皖等地的数万名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凭吊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英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4月7日　聂荣臻元帅的塑像在张家口市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江泽民为塑像题词。

4月8日　陕西省、延安地区各界干部群众数千人和"四八"烈士的亲属，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举行仪式，悼念"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正在当地的杨尚昆同志向烈士纪念碑献了花圈。同日，山西省城太原各界举行纪念"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座谈会。

4月17—20日　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先进军转工作者表彰大会暨1996年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147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模范军队转业干部、69个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和83名先进军转工作者受到表彰。江泽民、李鹏、刘华清等为大会题词。李贵鲜到会讲话。19日，江泽民、李鹏等会见与会代表。

4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转发五部门《关于做好1996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

4月21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近日发出《关于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工作的指示》，决定今年为全国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

5月6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近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题写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五句话是江泽民1990年12月提出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

5月31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纪念抗大建校60周年大会，刘华清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

6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再度敞开营门，欢迎香港各界代表参观访问。

6月12日　新华社报道：由江泽民题写塔名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渡口落成。

6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日前签署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物资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物资工作规定》即行废止。

6月20日　首都纪念中原胜利50周年。26日，湖北纪念中原突围50周年。27日，"中原突围烈士纪念碑"在大悟县"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奠基。

6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七一"前夕，首都数十万党员群众到北京一些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凭吊。

7月1日　新华社报道：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在陕西发现。

7月5日　第四次全军军事科研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刘华清在会上强调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7月6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举行活动，纪念朱德逝世20周年。

同日　新华社报道：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在"八一"期间扎实开展双拥工作。

7月16日　全军警卫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7月16—19日　武警部队党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进一部加强武警部队高中级干部队伍建设。江泽民、李鹏、刘华清、胡锦涛等会见与会代表。

7月25日　我军预备役军官首次授衔仪式在京举行，尉健行等参加了授衔仪式。

7月29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统一悬挂张贴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题词和六位英雄画像。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部队认真搞好宣传教育和悬挂张贴工作。当天，总政治部在京举行赠发仪式，于永波出席仪式并讲话。

7月31日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9周年，迟浩田主持会议并讲话。

同日　中宣部等在京召开罗全中"爱国拥军模范家庭"事迹报告会。同日，民政部、总政治部联合作出决定，表彰罗全中一家爱国拥军模范事迹，并召开表彰大会。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从今年开始为被评为优秀士兵的战士颁发证章。江泽民为《优秀士兵》证章题名。

8月2日　中宣部等在京举行罗全中"爱国拥军模范家庭"事迹座谈会。

8月13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驻京部队加强高中级干部学习座谈会，贯彻江泽民主席重要指示，深入持久地抓好学习。

8月20—23日　全国征兵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就如何提高新兵质量保证军队建设这个主题，总结交流了征兵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今冬征兵工作。23日，江泽民、李鹏、刘华清等会见与会代表。

8月22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为在军事检察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新疆军区检察院记集体一

等功。

8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边防检查站恪尽“国门卫士”职责。目前全国共有边防检查站234个，其中空港站50个，港口站119个，陆地站62个，检查总站3个。

9月4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出版座谈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刘华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同日　海协会就浙江和台湾两渔船绞网纠纷事复信台湾海基会。

9月10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纪念叶挺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出席并作重要讲话。16日，“叶挺将军纪念馆”在江西省上饶市落成，并开始接待参观者。

同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驻西藏自治区部队的官兵将享受“西藏驻军特殊津贴”，10月1日前发放到驻藏官兵手中。

9月11日　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向全军印发《“九五”期间军队审计建设计划》。

9月19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罗瑞卿传》、《罗瑞卿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罗瑞卿诞辰90周年座谈会，张万年、迟浩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10月16日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分别题词。

10月18日　我国裁军大使沙祖康在联大一委（政治和安全）发言，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核裁军和核禁试、禁止化学武器、限制使用地雷、禁止生物武器等问题上的立场。

10月19日　陆军航空兵以精彩的演练、崭新的风貌，向中央军委领导汇报组建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一起观看了陆航飞行训练。

10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主持。

11月7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同时颁发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司令部工作条例》等。

12月18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举行历史上著名的武装起义——宁都起义65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外　交

1月4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发言人还说，美国应放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搞反华提案的作法。

1月7—13日　缅甸联邦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丹瑞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丹瑞。8日，中缅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13日，中缅《联合公报》在北京发表。

1月8—23日　中国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和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4国外交和军事专家联合代表团第18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1月9日　江泽民主席电唁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逝世。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宣布，塞内加尔政府同台湾当局宣布于1996年1月3日“重新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塞政府的这一决定违背了1971年12月7日中塞两国建交文件的有关原则和塞政府所做的郑重承诺，严重损害中塞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决定自1996年1月9日起中止同塞内加尔的外交关系。

1月9—11日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里夫金德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分别会见里夫金德；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里夫金德就双边关系、香港问题等举行会谈。10日，里夫金德在对外经贸大学发表演讲。

1月10日　中国、美国和科威特三国大型合作项目崖城13—1天然气田投产庆典在北京举行，李鹏总理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同日，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分别会见应邀来华参加庆典仪式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夫妇。

同日　田增佩副外长自1995年12月30日至今访问苏丹、塞浦路斯和伊朗。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出入境和居留权问题专家小组在香港签署关于签发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准备工作的会议纪要，未来特区护照签发的准备工作从10日开始。16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第19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就香港军事用地的有关具体问题达成共识。23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问题专家小组第二次会议在香港举行。30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方式问题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就大多数公约能否适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1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桥本龙太郎当选日本新一届政府首相表示“衷心祝贺。”

1月11、18日　中国政府官员和香港高级公务员在

香港举行第四、第五次非正式聚会。

1月11—20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利比亚、突尼斯、乍得、吉布提和塞舌尔。访问期间，5国国家或政府领导人分别会见钱其琛；钱其琛先后同利、突、吉、塞4国外长举行会谈。15日，钱其琛在突尼斯会见了巴勒斯坦国外长卡杜米。16日，中乍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恩贾梅纳签署。20日，钱其琛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接受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谈了此次非洲5国之行的总印象。

1月12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并宴请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沙哈克中将一行。

同日　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4国已协商一致边界地形图交换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地形图是各方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联合测图工作组经过3年的努力共同测制的。

同日　中国、哈萨克斯坦、韩国、日本、爱沙尼亚、波兰和意大利7国代表在阿拉木图签署了有关提高中哈边境德鲁日巴—阿拉山口过境货运量的互利合作协议。

1月15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总书记托梅。12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与托梅举行了工作会谈。

1月15、16日　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副总理先后会见由范因斯坦等人组成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

1月16日　中、美在上海合建的上海金菲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同日，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前来出席仪式的美国菲利浦石油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艾伦一行。

同日　法国驻华大使白乐高代表法教育部授予桂裕芳等6位中国教授"棕榈叶教育勋章"。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授权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实行归口管理。通知规定：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机构在华开展经济信息业务，需向新华社提出申请。18日，新华社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就上述问题作了阐述。

1月16—18日　中国和亚美尼亚副外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18日，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会见了参加磋商的亚美尼亚副外长祖洛扬一行。

1月16—19日　阿尔巴尼亚总统贝里沙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贝里沙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会见贝里沙。16日，中阿签署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等文件。20日，中阿联合公报在北京发表。

1月17日　李鹏总理在上海会见加拿大鲍尔公司总裁，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德马雷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外交部已要求美国和日本政府在19日前将擅自闯入中国军事禁区、非法窃取中国军事情报的两名驻华使馆外交官分别调回本国。发言人还说，我们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基兹利亚尔市所发生的人质事件深表关注，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

1月18日　李沛瑶副委员长和田曾佩副外长前往莱索托驻华使馆，吊唁于本月15日因车祸逝世的莱国王莫舒舒二世。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萧厚德近日致函《曼彻斯特晚报》，斥责英电视台播放的《重返死亡屋》的电视片，故意歪曲事实，攻击中国政府无视儿童健康，听任孤儿院的儿童病饿而死等，误导英国广大观众。25日，新华社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国际儿童领养中心执行主任埃里克森近日发表声明并致函中国驻美外交机构，驳斥一个自称"人权观察"的组织对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污蔑。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等单位组成的中国新亚欧大陆桥开发代表团于本月中旬访问联合国总部，并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斯佩斯等有关机构负责人就促进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的经济发展交换了意见。

1月19日　克罗地亚—中国友好协会在萨格勒布成立。中国驻克大使谢锡勤参加了成立大会。

1月22日　江泽民主席电贺阿拉法特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同日，外交部发言人就巴选举发表谈话说，希望巴以双方再接再厉不断推进谈判进程。

同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英国大东电报局董事局主席布莱恩·史密斯勋爵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永道国际会计公司董事长彼得·史密斯一行。

1月23日　中俄友协理事会在北京成立。

同日　中国财政部在美国发行4亿美元扬基债券承销协议签字仪式在纽约举行。这是中国财政部作为主权发行体1996年首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1月24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国际联合电脑公司总裁王嘉廉博士。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美国雷诺兹金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霍尔德先生一行。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土耳其外交部次长厄伊曼一行。同日，田曾佩副外长同厄伊曼进行了会谈。

同日　由75家在美国注册的中资企业和机构组建的美国中国商会在纽约宣告成立。

1月26日　民政部举行仪式，授予德国假肢专家海姆先生"孺子牛奖"。海姆是荣获该奖的第二位外国人。

1月27日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抵达北京。他是来华进行定期体检的。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

田会见捷克军队总参谋长内克瓦西尔中将。24日，傅全有总参谋长同内克瓦西尔就中捷两军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

1月29日　中国和瑞典第12次经贸科技合作混委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1月30日　李鹏总理会见荷兰国际集团董事长雅各布斯一行。

1月31日　李鹏总理接受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社负责人的联合采访时阐述了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展望、党的领导、台湾问题和中英关系、香港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等问题。

同日　姜春云副总理会见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同日，农业部部长刘江同格利克曼举行了会谈。

同日　中国和越南关于恢复中越国际铁路客货联运问题的会谈记要在河内签署。

2月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有关中国对盗版行为打击不力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2月2日　江泽民总书记会见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率领的法共代表团。

2月3日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自1月29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穆塞韦尼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会见穆塞韦尼。1月30日，中乌签署经济合作协议。

2月5—7日　李肇星副外长在华盛顿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诺夫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

2月5—9日　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外长格拉尼奇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布赫副委员长分别会见格拉尼奇；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格拉尼奇举行会谈。5日，中克双方签署领事条约。

2月6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迟浩田以及我国其他高级将领与在北京的各国武官欢聚，共迎中国传统佳节——春节。

2月6、7日　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泰国上议院议长米猜一行。

2月7日　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价值20万元人民币救援物资的交接仪式在伊斯兰堡举行。

2月7—9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35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取得进展。

2月7—9日　中印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2月7—11日　法国外长德沙雷特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德沙雷特；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德沙雷特举行会谈。9日，正在北京进行体检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也会见了德沙雷特。同日，德沙雷特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2月7—12日　刚果外交、合作与法语国家事务部长布恩古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布恩古；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布恩古举行会谈。

2月8日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在北京被授予荷兰“金方舟”勋章。“金方舟”勋章是荷兰贝恩哈德亲王1971年专为世界上对环保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而设立的。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希望美方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29日，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希望中美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2月9日　中韩海底电缆开通仪式分别在北京和汉城同时举行。

同日　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北京签署双边回购协议。

同日　中国红十字会向马达加斯加捐赠2万美元，以救济该国遭受风灾的居民。

2月11日　中国、缅甸和联合国代表在仰光签署关于在缅甸佤族南部地区禁毒项目的合作文件。

2月12日　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以总书记卡瓦利亚斯为首的葡共代表团。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自1月26日至今访问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德国。访问期间，朱镕基同4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看法，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朱镕基还同4国政治、经济等各界人士进行多方面接触，并参观了一些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1月26日，朱镕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阿根廷《号角报》记者的专访。2月1日，朱镕基在圣地亚哥就拓展中国与智利及拉美经贸合作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演讲。5日，朱镕基在由乌拉圭至德国的飞行途中就访问拉美3国的感受回答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8日，朱镕基在德国法兰克福发表题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中德关系》的重要讲演。1月29日和2月8日，中国和阿根廷，中国和德国先后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等文件。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会见以中央常委农涅为团长的柬埔寨人民党代表团。9日，中联部部长李叔铮同农涅举行工作会谈。

同日　凭祥——同登的中越铁路恢复通车。14日，中越双方分别在凭祥和同登举行通车仪式。同日，越南总理武文杰致电表示祝贺。

2月12—14日　哈萨克斯坦外长托卡耶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托卡耶夫；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托卡耶夫举行会谈。14日，托卡耶夫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2月12—15日　葡萄牙外长伽马访问我国。访问期

间，江泽民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分别会见伽马；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伽马举行会谈。

2月12—16日　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率领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英国。访问期间，梅杰首相会见吴仪，吴仪同英贸工大臣伊恩·兰举行会谈。12日，中英两国企业界领导人在伦敦签订总价值为2.27亿美元的贸易合资合同，13日，吴仪和伊恩·兰共同主持了在伦敦举行的中英联合经贸委员会首次会议。同日，吴仪在英中贸易48家集团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形势。

2月13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处长会见德意志新闻社社长雷特伯格。2月12日，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雷特伯格签署了新华社与德新社新的交换新闻和合作协议。

同日　以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张月姣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和以助理贸易代表李森智为首的美方代表团在北京就双边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磋商。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意美3国近日在北京签署联合开发塔里木石油的两项合同。

2月15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正在北京进行体检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和莫尼列王后。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来自十几个国家的60多位在华工作的专家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向专家们致以春节的问候。

同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应美国联合国商会的邀请对数十家大公司总裁和副总裁介绍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时强调，中美两国应从战略高度、世界大局和21世纪远景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李登辉最近宣称台湾走向国际社会是唯一的出路等问题答记者问时说，如果台湾当局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发言人还说，中国没有，也不会向任何国家转让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设备或技术。

2月17日　中国国际航空工业公司订购空中客车工业公司A340飞机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李鹏总理出席签字仪式并会见了空中客车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冯·塔因以及德、法、英、西等国驻华使节和欧盟大使。

2月22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1994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

同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向马里国民议会赠送价值10万元人民币办公用品和图书的交接仪式在巴马科举行。

2月25—29日　卢森堡首相容克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等分别会见容克，李鹏总理同容克举行会谈。27日，中卢签署两国政府贷款协定的补充协议等6个合作文件。

2月2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了25日在以色列境内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

2月26、27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和朱镕基副总理先后会见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乔弗利纳上将一行。26日，傅全有总参谋长同乔弗利纳举行了会谈。

2月27日　李鹏总理会见以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协代表团。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总书记尼帕尔一行。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在香港出席一个新春酒会时答记者问说，凡是跨越九七的问题，都需要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提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同日，乌兰木伦副社长在出席香港航运界联谊会6周年晚会时发表讲演说，九七后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将继续保持。28日，香港中华总商会和中国企业协会分别举行新春酒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及工商界人士等2000多人出席酒会，并共祝香港平稳过渡、经济繁荣。

2月28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香港举行关于流动服务的专家会议。

2月28、29日　中国—沙特经贸混委会首次会议和经贸研讨会先后在北京举行。29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与会的沙特财政大臣阿萨夫。同日，中国和沙特签署《两国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

2月29日　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朗4国代表在莫斯科决定成立亚洲热核研究基金会。

3月4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第50届联大主席、葡萄牙前外长阿马拉尔一行。同日，李肇星副外长同阿马拉尔举行会谈。

同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会长山本卓真一行。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苏丹总统特使、外长塔哈。

3月5日　李鹏总理致电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对在以境内发生多起恐怖爆炸事件中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4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对以境内连续发生恐怖爆炸事件深感震惊。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授权、改组和援外法》。14日，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对美国国会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通过含有多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条款的《国务院授权、改组和援外法》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愤慨。3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美国国会近日通过含有多项反华条款的《国务院授权法和改组法》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

动，阻止该法案生效。

3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英关系以及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3月5、6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应邀来京参加中信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等世界知名人士和企业家。

3月6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泰国副总理及其一行。

3月7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郭士纳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美国国务院1995年度的"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妄加评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中国坚决反对这种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

3月11日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和莫尼列王后结束在华的例行体检后，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3月12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美国向台湾海峡附近海域再派一艘航空母舰一事答记者问时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应给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号。

3月13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苏里南国防部长吉尔兹一行。1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吉尔兹举行会谈。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印度海军参谋长谢卡瓦特上将。11日，傅全有总参谋长也会见了谢卡瓦特一行。

同日　吴邦国副总理会见瑞典爱立信公司总裁阮奎森。在华期间，阮奎森与邮电部签署了关于通信合作的备忘录。

同日　中国银行与日本输出银行在北京正式签署总金额为989.44亿日元（约合7.73亿美元）的资金协力贷款协议。

3月13—14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过渡期财政预算案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第七次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并签署纪要。15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张浚生在香港不同场合强调，关于香港97/98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要以中方为主，共同编制为原则。

3月13—16日　唐家璇副外长访问菲律宾。访问期间，唐家璇与塞贝里诺外长就双边关系和南海问题等举行会谈，并取得成果。14日，拉莫斯总统会见了唐家璇。15日，《中菲磋商联合新闻公报》在马尼拉发表。

3月14日　外经贸部和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有关负责人对美国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小麦检疫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霸权主义行径表示谴责，并指出中方愿在科学的基础上与美方开展技术合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就港英当局纵容立法局通过所谓"动议"，对筹委会工作进行恶意批评一事表示愤慨，指出港英政府的立法局无权对筹委会的工作说三道四。25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批评港督彭定康攻击筹委会通过临时立法会的决定，指出筹委会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是在没有"直通车"的情况下，保证香港政权顺利过渡的正确做法。同日，朱育诚副社长在香港对新闻传媒说，香港特区在成立初期设立临时立法会是为了避免出现立法真空。27日，张浚生在香港指出，英国外交部指责设立临时立法会决定的声明无视基本道理令人遗憾。

3月14、15日　中国政府官员与香港高级公务员第七、第八次非正式聚会在香港举行。

3月15日　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夸库拉一行。13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同恩夸库拉举行了会谈。

3月1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关于中国已向美国表示不打算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从来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3月18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西班牙前国防部长加西亚一行。

3月18—22日　城市水资源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

3月19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以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安·鲁维冈巴中校为团长的卢旺达军事代表团。

同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美国埃克森公司在北京签署塔里木盆地第十二、十三区块石油勘探开发合同。是日，吴邦国副总理会见了埃克森公司高级副总裁朗韦尔。

3月19—25日　中联部部长李淑铮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

3月20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南斯拉夫联盟国防部长布拉托维奇。1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布拉托维奇举行了会谈。

同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即使没有"直通车"被港英当局一手拆毁的问题，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在任期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从来不存在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任期4年的问题。

3月20—24日　韩国外务部长官孔鲁明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孔鲁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孔鲁明举行会谈。

3月2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美国应帮助保卫台湾"的决议案。

同日　中国——巴基斯坦国际公路巴方路段发生雪崩，中巴双方死亡6人，重伤2人。

3月21日—4月5日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访问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巴西。

3月23日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喻权域在纽约指出，美国动辄指责中国存在"人权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优于美国，美国政府方面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3月23—28日　摩尔多瓦议长卢金斯基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卢金斯基。

3月24—26日　南非外长恩佐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恩佐；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恩佐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3月24—28日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加利；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加利举行会谈。27日，加利先后在中国联合国协会发表演讲和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3月24—29日　泰国总理班汉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班汉；李鹏总理同班汉举行会谈。25日，中泰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增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3月25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并宴请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对外事业局局长李相禹少将率领的朝鲜人民军外事代表团。

3月25—27日　中美两国谈判代表就纺织品贸易问题在北京举行磋商，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同日　新华社报道：1996年联合国难民署援华项目工作会议日前在桂林召开。

3月26—27日　第二次中法经济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5、26日，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了与会的以法中委员会主席德乔治为首的法国经贸代表团。

3月26—29日　伊拉克外长萨哈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萨哈夫；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萨哈夫举行会谈。

3月26—29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25次会议在里斯本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

3月27—30日　蒙古总理扎斯莱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扎斯莱；李鹏总理同扎斯莱举行会谈。27日，中蒙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31日，中蒙发表新闻公报。

3月27—31日　毛里塔尼亚外交与合作部长艾哈迈德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艾哈迈德；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艾哈迈德举行会谈。27日，中毛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3月28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香港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第三次专家会议。

同日　中国和斯里兰卡经贸联委会第二届会议在北京举行。

3月29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港府主要官员是否必须离任才能加入特区领导班子等3个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同日　中国石化扬子公司与德国巴斯夫公司合资建设"世界级高科技一体化石油化工联合基地"意向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3月29日　中国和阿塞拜疆在巴库签署互换领事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中阿领事条约将于4月28日起正式生效。

4月1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德国图林根州州长福格尔一行。3月30日，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同福格尔进行了工作会谈。

4月2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和张浚生分别在香港表示，中方关注港英释放滞港越南船民的做法。

4月3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一行。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霍林斯和威廉一行。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自3月31日至今访问日本。访问期间，日天皇和皇后以及桥本首相等分别会见钱其琛；池田行彦外长同钱其琛举行会谈。4月2日，钱其琛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日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4月3—5日　中日民间人士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与会的前副首相后田藤正晴等日方代表。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也会见了与会的日方代表。

4月4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斯顿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分别会见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治·大卫一行和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霖博士和夫人。

同日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自3月21日至今访问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巴西。

4月4—8日　白俄罗斯外长先科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先科；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先科举行会谈。

4月5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商务委员会电信与财政小组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菲尔兹及其一行。

同日　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对美商务部部长布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4月8日　江泽民主席分别会见刚果内政部部长比金基塔及其一行和以总书记加马为首的坦桑尼亚革命党

代表团。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老挝财政部部长赛宋蓬一行。

4月8、9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

4月8、9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安哥拉贸易旅游部部长戈麦斯一行。

4月8、10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阿尔及利亚中小企业部部长哈米图一行。

4月9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迪斯尼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维滋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南斯拉夫与马其顿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欢迎。

4月9—13日　李鹏总理访问法国。访问期间，李鹏分别同希拉克总统和朱佩总理举行会谈，并分别会见了法参议院议长莫诺里和国民议会议长塞甘等。李鹏同法国家、政府和议会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广泛接触了政府、议会和工商企业各界人士。10—12日，中法签署关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协定、项目合同和意向书。12日，李鹏对法工商界发表演讲，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并就发展中法关系提出4点建议。同日，李鹏在巴黎接受法国记者的联合采访。

4月10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德国《前进》月刊主编苏佩里一行。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泰国华文报业代表团。

4月10—14日　以国务委员陈俊生为团长的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津巴布韦。

4月10—15日　斯洛伐克总统科瓦奇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科瓦奇举行会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科瓦奇。

4月11日　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以会长丰田章一郎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团。

同日　外交部欧亚司负责官员就中、俄、哈、吉、塔5国将于本月26日在上海签署关于在5国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一事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一文件的签署将对加强5国睦邻友好关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强有力的回击。12日，这位官员还说，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克服两国关系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推动双边关系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

4月11、12日　中国政府官员与香港高级公务员第九、第十次非正式聚会先后在香港举行。

4月11—12日　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在“国际技术论坛”会议上，把我国的河北省青龙县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4月12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以教育部部长巴哈丁为团长的埃及教育代表团。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香港举行的“迈向九七香港经济发展研讨会“午餐会上致词时指出，在探讨香港经济发展的时候，“中国因素”、“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港人治港”的真正实现和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是4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鲁平在该研讨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阐述了香港居民的国籍与居留权问题。

同日　田纪云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自3月28日至今访问爱尔兰、比利时和冰岛。访问期间，3国国家和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田纪云；4月3日，田纪云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

4月13—18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马其顿、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访问期间，4国国家、政府或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钱其琛；钱其琛分别同马副总理特尔佩斯基、亚外长帕帕江举行会谈。17日，钱其琛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表演讲，重申中国与外高加索地区国家发展关系的4项原则。同日，中格发表新闻公报。19、20日　钱其琛在海牙分别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范米尔洛举行会谈或会晤。20—22日，钱其琛访问捷克。访问期间，捷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分别会见钱其琛；钱其琛同捷外长齐莱耶涅茨举行会谈。

4月14—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和韩国。

4月15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摩根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纳。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马来西亚国内贸易与消费者事务部部长奥马尔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事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表示谴责。

同日　新华社发布《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的管理办法》。

4月15、16日　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由议长派厄率领的奥地利联邦议会代表团。

4月15—19日　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阿赫蒂萨里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阿赫蒂萨里。16日，阿赫蒂萨里分别出席“中芬经济研讨会”和“中芬科技新发展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4月16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德曼。

同日　吴邦国副总理会见由交通邮电大臣乌斯曼率领的瑞典交通技术代表团。在华期间，代表团与我国有关部门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关于台湾当局宣称不会放弃"重返"联合国的努力的提问时说，台湾无资格参加联合国。

4月16日—5月3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访问泰国、柬埔寨和缅甸。

4月17—23日　尼泊尔首相德乌帕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德乌帕；李鹏总理同德乌帕举行会谈。23日，中尼发表联合公报。

4月18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全美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韩凌杰一行。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以总书记穆库埃凯为团长的刚果泛非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团。

同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由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克鲁格洛夫率领的俄罗斯海关代表团。在京期间，中俄签署了两国海关关于执行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的备忘录。

同日　"中国经济与商务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美、德等国20多名官员、专家、企业代表与会。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有利于和平与稳定。

4月18—19日　东北亚国家关于图们江地区开发的政府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主持会议。中、朝、韩、蒙、俄等国的政府代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官员与会。日、澳、芬等国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4月18、19、21日　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4月18、22日　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副总理先后会见由主席德斯坦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外委会代表团。

4月19日　江泽民主席在北京接受俄罗斯《今日报》记者的采访，就中俄关系、台湾问题等回答了他的提问。

4月20日　乔石委员长自3月28日至今访问乌克兰、俄罗斯、古巴、加拿大并顺访希腊。访问期间，乌总统库奇马、总理马尔丘克、最高苏维埃主席莫罗兹，俄总统叶利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联邦委员会主席斯特罗耶夫、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希总统斯特法诺普洛斯、议长卡克拉马尼斯，古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阿拉尔孔，加总督勒布朗、总理克雷蒂安、参议长莫尔加特、副众议长吉尔格等国家、政府和议会领导人分别同乔石举行会见、会晤或会谈。3月30日和4月2日，乔石先后在基辅和莫斯科接受乌克兰和俄罗斯新闻界采访。4月12日，乔石在加中贸易理事会于多伦多举行的午宴上就中加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情况等问题发表了演讲。

4月21—27日　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库马拉通加夫人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会见库马拉通加夫人。22日，中斯签署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23日，库马拉通加夫人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4月22—23日　中国和克罗地亚经贸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萨格勒布举行，并签署了会议纪要。

4月22—24日　亚太地区科技界高层人士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日、韩、俄、美等国代表与会。会上基本通过了《亚太地区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纲要》。23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代表。

4月22—24日　中国国际医药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经贸委、卫生部等中国有关部委和国际制药商团联合会负责人以及百余名中外医药专家、国外著名医药公司代表与会。

4月22—30日　马达加斯加国民议会议长安德里亚曼贾图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胡锦涛同志先后会见了安德里亚曼贾图一行。

4月23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由总务会长盐川正十郎率领的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访华团。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挫败西方反华提案发表谈话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4月23日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决定对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不予审议和表决，挫败了它们借口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中国政府重申，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指导下，与国际社会一起，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同努力。

4月24日　中国和尼日利亚经贸联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5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尼外长伊基米。

4月24—26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欢宴叶利钦，并同叶利钦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叶利钦。25日，叶利钦在中国对外友协和中俄友协举行的欢迎酒会上发表讲话。同日，中俄签署联合声明和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等十几项合作文件。同日，江泽民和叶利钦在北京会见中外记者时一致表示中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江泽民还向中外记者阐述了中俄友好关系的4点基础。

4月24—26日　中美"可持续发展、能源和环境"论

坛在华盛顿举行，双方代表团就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平衡、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农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月25日　李鹏总理会见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银行家俱乐部年会的各代表团团长。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秘鲁最高法院院长潘托哈一行和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会长河合三良一行。

4月26日　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在上海正式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并分别发表谈话。同日，江泽民在上海会见出席协定签字仪式的哈、吉、塔3国总统并欢宴俄、哈、吉、塔4国总统。

4月27日　李鹏总理电贺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九届大会召开。

4月3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要求美方立即纠正在美进出口银行对华担保问题上的做法。

5月2日　新华社报道：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日前就江泽民主席即将开始的非洲6国之行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书面采访，阐述了这次访问的意义以及中国对非洲局势、中非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5月2日　中国和南非在米德兰签署贸易互惠换文。

5月2、3日　中国政府官员与香港高级公务员第11次和第12次非正式聚会先后在香港举行。

5月3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安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孔荣良一行。

同日　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坚持反对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4月30日再次无理地将中国列为1996年知识产权重点301国家，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利，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报复。13日，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化鹏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认真履行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一些海外媒介的片面宣传不符合事实。15日，外经贸部对美国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实行贸易报复一事发出严正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当天，外经贸部发布对美国的贸易反报复清单。当天，国家版权局发言人对美国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我国实行“制裁”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对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深表愤慨。16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美知识产权分歧只能平等协商解决，对抗绝没有出路。3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重申中美谈判协商是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唯一出路。

5月3—6日　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彼得罗相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彼得罗相。5日，中亚联合公报等文件在北京签署。

5月3—20日　傅全有总参谋长及其一行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

5月4日　津巴布韦外长穆登盖自4月29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穆登盖；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穆登盖举行会谈。

5月5、6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日本新进党党首小泽一郎及其一行。

5月5—8日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里坦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布里坦，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布里坦举行会谈。7日，布里坦在北京出席'96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同日，中国政府和欧盟签署中国—欧盟知识产权合作项目协议等4项合作协议。

5月5—12日　由贡齐议长率领的马耳他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朱镕基副总理先后会见了贡齐一行。

5月6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日本前首相竹下登。4日和7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也先后会见了竹下登。5日，竹下登在北京出席了中日环境保护中心落成典礼。

同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莫桑比克国防部长马祖拉。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并宴请马祖拉。4日，迟浩田同马祖拉举行了会谈。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日本众议员、前自民党总务会长、前建设大臣木部佳昭一行。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英国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库克。当天，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也会见了库克。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美国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葛鲁夫一行。

由安南议长率领的加纳议会代表团自4月28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安南一行。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陈卓愉。7日，中加签署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和加强两国校际合作的两项谅解备忘录。

5月6、7日　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

5月7—9日　'96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8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的部分代表。

5月8日　李鹏总理会见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

5月8—9日　伊拉克外交部次长盖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盖斯向李肇星副外长通报了伊拉克与联合国就执行第986号决议（以石油换食品、药品）举行第三轮谈判的有关情况。

5月8—21日　吴邦国副总理访问约旦、叙利亚、也门和阿联酋。访问期间，4国领导人分别会见吴邦国。11、

16日，吴邦国先后与叙副总理亚辛和也副总理兼计划发展部部长巴贾迈勒举行会谈。9、13、16日，中约中叙、中也先后签署经济合作的有关协议。

5月8—22日　江泽民主席访问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访问期间，肯总统莫伊，埃塞俄比亚总统内加索、总理梅莱斯、议长达维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总理詹祖里、人民议会议长苏鲁尔、协商会议主席希勒米，马总统科纳雷、总理凯塔、议长迪亚洛，纳总统努乔马、总理根哥布，津总统穆加贝等分别同江泽民举行会谈或会见，并就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的共识。10、12、14日，江泽民还在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先后会见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道德斯维尔女士、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和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访问中，中国政府分别同6国政府签署了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协定、协议、意向书和备忘录共23个。13日，江泽民在非统组织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发表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重要演讲，就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非关系提出了5点建议。15日，江泽民在开罗就中埃关系、中东和国际形势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等问题接受中埃记者的联合采访。18日，中马在巴马科发表新闻公报。

5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由主编梁景福率领的朝鲜劳动党机关理论刊物《勤劳者》杂志社代表团。

同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来华参加中蒙经贸混委会会议的蒙古贸工部部长朝格特一行。当天，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与朝格特一行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和相关文件。

5月10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授予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人民友好使者”称号，以表彰她40年来为促进中外文化、科技交流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5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核合作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中国不向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中国赞成加强国际防核扩散体制，包括加强保障监督和出口管制措施。

同日　新华社报道：香港多家社团、协会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举行集会，抗议港督彭定康访美访加期间的荒谬言论。24日，香港工商界人士对英国首相梅杰回复香港7大商会函中，为港督彭定康攻击香港工商界的言行进行辩护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梅杰的复函无视事实，缺乏诚意。

同日　新华社报道：香港社会各界就滞港的越南船民10日在白石船地区发生暴乱一事，强烈要求港府九七前解决滞港越南船民问题。

5月12—26日　朱镕基副总理访问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访问期间，3国国家、政府和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朱镕基；朱镕基分别同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13日，朱镕基在雅加达印尼高级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加强亚太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促进地区共同繁荣。

5月13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赵稷华和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在香港举行会晤，双方就香港新机场外勤维修等3个专营权问题达成一致。

5月13—27日　中国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外交和军事专家联合代表团就中国与俄、哈、吉、塔4国在边境地区裁军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第19轮会谈。

5月14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美国沃尔芬森公司董事长、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前主席沃尔克率领的美国富士/沃尔芬森国际公司欧洲顾问委员会代表团。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以古贺宪介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同友会第二次访华团。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并宴请巴西陆军参谋长德利奥及其一行。

同日　中英土地委员会第32次会议在香港举行。

5月15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芬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阿尔托及由他率领的芬兰检察代表团。

5月16—21日　穆海利比议长率领阿联酋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穆海利比一行。

5月17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加拿大全国铁路公司董事长麦克莱恩一行。

5月18日　李鹏总理会见瑞士丰泰保险集团董事长谢明德及其一行。

同日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和王后莫尼列在结束了对法国的正式访问后，由巴黎飞抵北京休养。

5月18—24日　英国副首相赫塞尔廷率领大型商贸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赫塞尔廷；李岚清副总理与赫塞尔廷举行会谈。21日，赫塞尔廷在北京出席“到伦敦上市”国际研讨会并发表讲话。

5月18—24日　’96亚洲国际邮展在北京举行。

5月19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艾哈马迪一行。

5月20—23日　保加利亚总理维德诺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维德诺夫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维德诺夫。20日，中保两国引渡条约等文件在北京签署。21日，维德诺夫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3日，中国和保加利亚联合公报在北京发表。

5月21日　李鹏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分别会见沙特亲王哈立德。1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也会见了哈立德亲王。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以主席卡迪亚为首的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巴中友好小组代表团。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对克林顿总统宣布将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表示欢迎。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香港举行专家会晤，中方专家就中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及居留权问题向英方作了通盘的通报，并答复了英方提出的 20 多个有关问题。

5 月 22 日　李鹏总理会见朝鲜政务院副总理洪成南；李岚清副总理当天同洪成南举行会谈。当天，中朝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国向朝鲜提供两万吨粮食援助的换文。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阿沃里率领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和夫人。

5 月 23 日　罗马尼亚外交部亚、非、拉、澳洲总局局长波佩斯库来华进行中罗两国外交部磋商。当天，张德广副外长与波佩斯库就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24 日，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会见了波佩斯库。

同日　中国和荷兰两国民航运输协定在北京签署。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在香港宣布，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已就香港邮政署于 1997 年初发行一套新的通用邮票事宜达成协议，双方还就新的邮资盖印机印模的设计达成了协议。

5 月 24 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几内亚总统特使德拉瓦。23 日，李岚清副总理也会见了德拉瓦。同日，张德广副外长同德拉瓦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对伊拉克与联合国就执行第 986 号决议的谈判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5 月 24—29 日　厄瓜多尔议长阿拉尔孔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了阿拉尔孔。

5 月 27 日　李鹏总理会见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前来出席中美合作开发流花 11—1 油田投产庆典仪式的美国阿莫科公司董事长傅乐和科麦奇公司董事长麦克弗森一行。

同日　中挪经贸混委会第 11 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5 月 28 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也门副外长拉赫曼。当天，田增佩副外长同拉赫曼举行了第四轮政治磋商。

5 月 29 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德国基社盟议会小组主席格洛斯一行。

5 月 29—30 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预算案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第八次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

5 月 30 日　中英机场委员会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双方顺利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会议纪要。

5 月 31 日　李鹏总理分别会见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社长奥田硕一行和德国施罗曼西马克公司董事长海·魏斯等德著名企业家。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葡萄牙最高法院院长马赛多一行。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会见比利时军队总参谋长赫尔特莱尔海军中将。

6 月 2—7 日　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和外贸部长马林斯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马林斯；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与马林斯举行会谈。3 日，中牙签署中国政府向牙买加政府提供一般物资援助的换文等文件。

6 月 2—11 日　邹家华副总理访问瑞典和芬兰。访问期间，两国国家或政府、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了邹家华。

6 月 3—18 日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访问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6 月 4 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祝贺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并希望以继续为中东和平作出努力。发言人还就北约 3 日达成的北约改革协议发表评论说："我们认为北约采取的行动应符合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利益的愿望，并有利于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6 月 4—5 日　阿拉伯—中国商会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贝鲁特举行并通过最后文件。由徐大有率领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与会。

6 月 5 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会见由日本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率领的日文物保护振兴财团访华团和日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一行以及美国肯塔基州州长佩顿率领的州政府官员访华团。

6 月 5—6 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在澳门举行会议，讨论澳门加入国际组织问题。

6 月 5—7 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 36 次会议在伦敦举行，双方就香港政权交接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一些成果，但在政权交接仪式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6 月 5—11 日　菲律宾外长西亚松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荣毅仁副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西亚松。

6 月 6 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及其夫人郑士宁女士。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以副外长崔禹镇为

团长的朝鲜外交部友好代表团。同日，唐家璇副外长同崔禹镇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对少数日本议员歪曲侵略历史表示强烈愤慨。

同日　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表示，中方从未反对外国传媒采访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或采访将来庆祝活动的事情。

同日　中国和加拿大在渥太华签署核安全管理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换议定书。

6月6—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访问比利时、荷兰和芬兰。访问期间，3国政府或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了温家宝及其一行。

6月7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韩国现代集团会长郑梦九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在北京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亚洲主编蒙塔尼翁一行的采访，就有关中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并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

同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学贤向联合国递交了经江泽民主席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批准书。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支持巴林维护局势稳定。

同日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率领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自5月28日至今访问希腊和挪威。访问期间，两国政府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宋健及其一行。6月4日，中挪在奥斯陆签署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

6月8—15日　波迪亚尔议长率领尼泊尔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了波迪亚尔一行。

6月9日　李岚清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自5月26日至今访问匈牙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访问期间，5国国家或政府、议会领导人分别会见李岚清。5月30日、6月3日和7日，中波、中立、中拉分别签署了有关经济协定和协议。

同日　徐州矿务局环境小记者团在伊斯坦布尔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1996年度"全球环境500佳"奖。

6月10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巴西武装力量参谋长莱昂内尔上将一行。

6月10—11日　中国与东盟高级官员政治磋商在印尼举行，并取得广泛共识。

6月10—14日　卢旺达总统比齐蒙古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比齐蒙古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了比齐蒙古。10日，中卢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6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对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

6月12日　李鹏总理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和王后。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日本东芝集团最高顾问、前社长渡里杉一郎。

同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埃及地方政府部长谢里夫。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尉健行会见由柬埔寨奉辛比克党秘书长、国会第一副主席莱森清率领的该党代表团。11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中国的老朋友、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海伦·斯诺荣获中国人民友好协会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证书和奖章。

6月13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会见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埃格兰。同日，王英凡副外长与埃格兰就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香港事务不需要美国国会关注。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德国瑙曼基金会将利用举办"声援西藏团体的国际会议"进行反华活动，中国决定中止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德国瑙曼基金会的合作关系，停止该会驻华代表在中国的一切活动。23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推迟德国副总理兼外长金克尔访华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德国联邦议院6月20日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反华决议。联邦议院的这一做法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践踏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中方已向德方提出抗议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中方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金克尔按原定时间于7月11日至14日来华访问的气氛显然不合适，中方决定推迟此次访问。

6月13—16日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与哈里里举行会谈；江泽民主席会见哈里里。13日，中黎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4个文件。

6月13—17日　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正式磋商在北京举行并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宣布取消贸易报复和反报复措施。17日，江泽民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美方代表团团长巴尔舍夫斯基。

6月14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阿布杜拉扎科夫一行。

同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率领的"美国人大会"代表团。12日，朱镕基副总理也会见了伍德科克一行。

同日　江泽民会见由会长施瓦伯率领的美国外交政

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全体成员。13日,李岚清副总理也会见了施瓦伯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史密斯一行。

6月15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自5月29日至今访问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埃及。访问期间,4国领导人分别会见迟浩田。迟浩田分别与4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

6月17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马来西亚初级产品部部长林敬益一行。

6月17—19日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阿拉法特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阿拉法特。18日,中巴两国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日,阿拉法特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6月17—21日　几内亚总统孔戴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孔戴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了孔戴。17日,中几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19日,孔戴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6月18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委员会主任金·戈一行。17日,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金·戈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美知识产权磋商达成一致,这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2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平等协商是解决中美分歧的正确选择。

6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21世纪日中文化交流委员会近日在北京成立。

同日　为期一周的中朝水力发电公司理事会第49次会议在平壤闭幕,双方签署了会议决议。

6月20—24日　博茨瓦纳副总统莫哈埃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莫哈埃;朱镕基副总理与莫哈埃举行会谈。

6月21日　首届亚欧海关署长会议在深圳举行,并通过了"首届亚欧海关署长会议声明"。

6月22日　江泽民主席电贺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召开。

同日　新华社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日前指出,"九七"前后,内地人不会涌往香港。

6月23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牙买加工党领袖西加和夫人。

6月24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波音公司董事长施龙智和他率领的该公司董事会代表团。

同日　李鹏总理和迟浩田国防部长分别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拉迈特上将一行。

同日　迟浩田会见葡萄牙陆军参谋长罗查上将一行。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香港举行关于香港过渡时期财政预算案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第九次专家会议并达成共识。

同日　中、蒙、俄3国在北京签署3国国界东、西端交界点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至此,3国国界东、西端交界点的位置已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6月24、25日　乔石委员长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由泰国国会主席汶鄂率领的东盟各国议会组织代表团。24日,王汉斌副委员长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谈。

6月24—26日　"第八次中美知名人士会晤"在北京举行。25日,朱镕基副总理会见了美方代表团全体成员。

6月25日　李鹏总理会见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皮尔逊一行。

同日　国防部长迟浩田分别会见土耳其海军司令埃尔卡亚上将一行和由校长阿英拉海军少将率领的尼日利亚国防大学代表团。

同日　世行批准1996财政年度对我国的最后一个贷款项目。至此,在6月30日结束的本财政年度里世行共向我提供了29.7亿美元贷款,贷款项目共16个。

6月26—28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26次会议在澳门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

6月27日　李鹏总理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赴河内出席越共八大。28日,李鹏向大会递交了中共中央致越共八大贺词,并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河内期间,李鹏分别会见了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越共中央顾问阮文灵和范文同。28日,李鹏离开河内回国。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温家宝28日和7月1日在河内先后会见了与会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团长坎代主席、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中央书记黄长烨和柬埔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柬国会主席谢辛和柬奉辛比克党代表团团长秦锡伦。6月30日,温家宝接受越南记者的采访。7月1日,温家宝向越共八大转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杜梅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贺电。7月2日,温家宝一行在出席了越共八大有关活动之后,离开河内回国。

6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会众院有关中国议案发表评论时指出,美国会议员应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制造困难和设置障碍。

同日　国家外国专家局在北京向日本岩见泽市赠送了日本著名水稻专家原正市先生的塑像,以感谢和表彰他为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同日　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

6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乌

兰木伦日前表示，筹组特区的各项工作都会按计划进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6月30日　中国排球协会主席袁伟民在曼谷举行的亚排联特别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亚排联主席。根据国际排联章程，袁伟民自动成为国际排联理事。

7月1日　江泽民总书记电贺杜梅当选越共总书记。

同日　中荷在北京签署关于合作研究长江流域多式联运项目谅解备忘录。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彭定康不应指责港人迎接回归活动。

7月2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圭亚那总统夫人珍妮特·贾根和由她率领的人民进步党代表团。

同日　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率领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自6月7日至今访问古巴、秘鲁、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访问期间，古、秘、墨、智、阿、巴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吴仪一行。6月8日，第八届中古政府经贸混委会在哈瓦那举行。12日，中古两国签署6项经贸合作文件。访秘期间，中秘签署双方在开采铜矿方面的合作意向书等。

7月4日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电贺叶利钦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5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对叶利钦连任俄总统表示"十分高兴"。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以总书记绍塞多为首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党代表团。

7月5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总检察长吴达吞率领的缅甸检察代表团。

7月5—11日　波兰国防部长多布然斯基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多布然斯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与多布然斯基举行会谈。

7月6日　江泽民主席自6月23日至今访问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江泽民分别同西国王卡洛斯一世、首相阿斯纳尔、参议长巴雷罗、众议长特里略，挪国王哈拉尔五世、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议长格伦达尔夫人，罗总统伊利埃斯库、总理沃克罗尤、参议长盖尔曼、众议长纳斯塔塞，乌总统卡里莫夫、最高苏维埃主席(议长)哈利洛夫，吉总统阿卡耶夫、总理朱马古洛夫、议会立法会议主席乔尔蓬巴耶夫、人民代表会议主席马图布拉伊莫夫，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议会下院议长奥斯帕诺夫等国家、政府、议会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会见或会谈，深入探讨了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增进了理解，加强了信任，扩大了共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挪、中罗、中乌、中吉和中哈签署有关协定和文件近30个，中国还分别和罗、乌、吉、哈等国发表了联合声明。6月26日，江泽民在马德里接受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采访，就中西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7月1日，中吉两国领导人在比什凯克签署了两国国界协定。5日，江泽民在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议会发表了《中国和中亚友好合作的美好未来》的演讲。同日，陪同江泽民出访的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阿拉木图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江主席欧亚六国之行和俄罗斯选举结果、中美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7月6—10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一行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迟浩田国防部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了莱克；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与莱克就中美关系、地区和国际等诸问题举行会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莱克访华对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7月7—13日　科特迪瓦总理敦坎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先后会见敦坎；李鹏总理与敦坎举行会谈。8日，敦坎在北京出席中科企业家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9日，中科签署4个合作文件。

7月8日　李鹏总理电贺非统组织第32届首脑会议召开。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法国圣戈班集团总裁白枫一行。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由总检察长库洛洛率领的安哥拉检察代表团。

7月9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制药研究及生产协会主席、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韩保德一行。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以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总裁和田一夫为团长，集团顾问桥本恕以及八佰伴主要决策人员为团员的访华团。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布隆迪外交合作部国务秘书马尤吉。

同日　新华社报道：福建公安刑侦部门日前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与英国警方直接合作，成功破获一起跨国绑和勒索案件，抓获绑架者7名，安全解救出人质。

7月9、10日　江泽民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分别会 见以党首武村正义为团长的日本先驱新党代表团。9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同武村正义一行举行会谈。

7月9—10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财政预算案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第10次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并取得共识。

7月10日　胡锦涛同志会见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巴拉格尔一行。11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与巴拉格尔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朝鲜驻华大使朱昌骏在北京举行宴会，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35周年。吴邦国副总理和朝政务院副总理金润赫等与会。11日，对外友协和中朝友协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该条约签订35周年。王汉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和金润赫与会。9、10日，江泽民主席和吴邦国副总理分别会见了金润赫。

同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强调，港府官员关于颠覆罪立法的说法是对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工作的干扰，香港基本法各项规定必须得到落实。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理解和支持非统组织关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问题的声明。

7月10—13日　国务委员罗干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访问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钟玉会见了罗干一行。12日，罗干一行参加了中国驻朝大使乔宗淮举行的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35周年宴会。

7月11、12日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以干事长左藤观树为团长的日本社民党代表团。11日，中联部部长李淑铮与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同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小仓和夫。在北京期间，唐家璇副外长与小仓就在里昂召开的西方7国首脑会议情况举行了磋商。

7月12日　比利时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2亿比利时法郎政府贷款协议在北京签署。

7月13日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电贺英国前首相希思80寿诞。

7月14—16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访问海地。访问期间，普雷瓦尔总统和斯马特总理会见了秦华孙；秦华孙与郎尚外长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和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了会谈。

7月15日　李鹏总理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道德斯维尔女士。

同日　道德斯维尔女士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第四次环保会议开幕式并致词。

7月1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准备实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并将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继续发展同古巴的经贸关系。发言人说，中国对英国下议院西藏小组邀请达赖访英表示强烈不满，并就此事向英方进行了“严正交涉”。

7月16—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少将应邀访问香港。访问期间，刘镇武与驻港英军司令员邓守仁少将就香港防务交接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一致意见。

7月16—22日　由议长森多夫率领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荣毅仁副主席先后会见森多夫一行；王光英副委员长同森多夫一行进行了工作会谈。

7月16—21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西萨摩亚。访问期间，3国领导人分别会见钱其琛；钱其琛分别同3国外长举行会谈。18日，中斐签署中国向斐济提供援助的换文。19日，钱其琛在斐济首都苏瓦会见南太论坛秘书长塔巴伊，并同塔巴伊签署关于中国向南太论坛提供援助的换文。20日，中西签署关于中国向西萨摩亚提供赠款的换文等文件。

7月17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韩国《中央日报》社社长洪锡炫及其随行人员。

同日　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会见斯洛文尼亚外交部国务秘书戈洛布，16日，张德广副外长与戈洛布举行了工作会谈。

同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1995年国际天然胶协定》。该协定是国际上重要战略物资天然胶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达成的第3个国际天然胶协定。

7月18日　李鹏总理会见瑞士苏黎士保险公司董事长胡仁夫一行。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群岛的某一岛上建立灯塔事件表示“严重关切”。24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主张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上存在的争议。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支持非统组织和阿盟最近作出的关于解除对利比亚禁运的决定。中国一直不赞成加重或无限期地维持对利制裁。发言人还说，中国政府对目前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一些困难深表关切，希望中东和平进程能继续下去。

7月18—22日　柬埔寨王国第二首相洪森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洪森。19日，中柬签署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等合作文件。

7月19日　江泽民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范文茶中将和由他率领的越南高级军事代表团。同日，傅全有总参谋长同范文茶进行会谈并达成广泛的一致。

7月21日　唐家璇副外长就我国成为东盟对话国一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7月22日　李鹏总理会见圭亚那总理、圭中友协名誉会长海因兹和夫人及其率领的圭中友协代表团。

同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野村证券公司顾问田渊节也率领的日本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投资环境考察团。

同日　李岚清副总理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秘书索布汗。20 日，唐家璇副外长同索布汗进行会谈，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一致。

7 月 22—23 日　中日投资促进委员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第六次联席会议在东京举行，中日双方 200 多人与会。23 日，日首相桥本龙太郎会见了与会的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

7 月 22、24、25 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雅加达出席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和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期间，分别会见印尼总统苏哈托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欧盟轮职主席国爱尔兰副总理普林斯以及印尼、泰国、老挝、印度、越南、柬埔寨、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外长。

7 月 23 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台湾当局唆使尼加拉瓜等少数国家企图再次把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第 51 届联大议程一事，当面向加利递交信函，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24 日，外交部发言人就少数国家提出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干涉中国内政。

同日　中越两国农行在北京签署《边境贸易合作协议》等几项协议。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所谓“关于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的决议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表示极大愤慨。24 日，全国人大外委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欧洲议会通过该决议案。声明指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干涉中国内政。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美国政府宣布吊销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入美签证的决定感到不安。

7 月 24 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主席近日致电圭亚那总统贾根，向该国遭受水灾的灾民表示慰问。此外，中国政府向圭政府提供了价值 40 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九七后有关国家保留驻港领事机构持积极灵活态度。

7 月 26 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及其一行。

7 月 27 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香港举行专家会议并达成一致，同意批出 6 个香港流动通讯服务牌照。

7 月 29 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今年 7 月 29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并郑重宣布从 1996 年 7 月 30 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声明向全世界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发出关于争取实现全球范围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 5 点呼吁。30 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发表关于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麦柯里和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外交部发言人纷纷发表声明，对我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菲律宾国防部长德比利亚和夫人一行。同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德比利亚举行会谈。

同日　中国和新加坡在北京签署涉税换函。该换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 7 月 29 日以所谓私人身分参拜靖国神社深表遗憾。日本应当真正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

7 月 30 日　新华社报道：外经贸部部长助理杨文生和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宋凤焕目前在北京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关于中国政府无偿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10 万吨粮食》的换文。

8 月 1—21 日　陈慕华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厄瓜多尔。访问期间，4 国领导人分别会见陈慕华一行。

8 月 4—14 日　第 30 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7000 名地质学专家、国际组织负责人和政府官员等与会。李鹏总理向大会致开幕词。会议回顾和总结了 20 世纪地球科学的重大成就和贡献，探讨了 21 世纪地球科学的热点和发展方向。4 日和 7 日，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与会的中外代表。14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刘宝珺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接受了由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国际地质斯潘迪亚罗夫奖。

8 月 5 日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联合勘界委员会自 7 月 29 日至今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并签署了《中哈联合勘界委员会条例》等文件。双方还就明年开始野外作业问题达成一致。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日前获得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画家公园保护区委员会授予的“国际公园成就奖”。

8 月 5—11 日　由议长卡莱姆利率领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了卡莱姆利一行。

8 月 6 日　荣毅仁副主席会见巴巴多斯前总理圣约翰夫妇。

8 月 7 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强化对伊朗、利比亚制裁的法案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认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而不应动辄诉诸制裁或施压。

8 月 8—18 日　吴阶平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摩尔多瓦和南斯拉夫联盟。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吴阶平一行。

8月9—22日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访问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苏里南。10日，李肇星在基多参加了厄瓜多尔新总统布卡拉姆的就职仪式。16日，中哥签署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1亿元人民币贴息贷款的框架协议。

8月11日　李鹏总理电贺切尔诺梅尔金连任俄罗斯总理。

8月14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由人民国防军参谋长萨约莱中将率领的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

8月14—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刘镇武少将访问香港，为将来的香港防务交接工作作准备。

8月14—27日　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诗琳通。21日和22日，诗琳通先后参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中国红十字会。21日和22日，诗琳通向中国政府捐赠200万铢泰币(约合8万美元)，并向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钱正英转交了泰红十字会给中国红十字会5万美元的捐款，用于救助中国遭受水灾的灾民。

8月15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日本一些内阁成员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作法表示愤慨。

8月16—27日　田曾佩副外长访问毛里求斯、肯尼亚、扎伊尔和刚果。

8月18—21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率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代表团访问爱沙尼亚。

8月19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尼日尔外交和合作部部长安·萨利富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戴河签署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96年8月19日起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尼决定恢复外交关系发表谈话，对两国复交表示祝贺。发言人还指出，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行径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19日和20日，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在北戴河分别会见来访的尼日尔贤人委员会主席赛义布。钱其琛19日在北戴河与赛义布举行了会谈。

8月22日　迟浩田会见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村田直昭。

同日　首届亚洲世界语大会在上海举行，中、日、韩、越等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世界语者与会。

8月22—25日　澳大利亚外长唐纳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唐纳，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先后同唐纳举行会谈。22日，中澳草签关于保留澳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的协定。

8月23日　迟浩田会见赞比亚空军司令昔卡帕瓦夏中将一行。

8月23—24日　"中国：面向现代金融体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23日，朱镕基副总理会见了与会的中外金融界代表。

8月23—30日　尼伯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非正式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先后会见比兰德拉国王。

8月24—27日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马哈蒂尔。26日，马哈蒂尔在北京举行的中马合作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同日，中马签署有关经济合作文件。

8月25—29日　加勒比国家议长访华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先后会见访华团成员。访华团成员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众议长麦克林，牙买加众议长卡·马歇尔，巴巴多斯众议长伊·罗特和巴众议员、前总理桑迪福德。

8月2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欢迎南斯拉夫联盟和克罗地亚关系正常化。

8月26—30日　加蓬总统邦戈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邦戈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先后会见邦戈。

8月26—30日　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9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代表与会。李鹏总理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国际图联主席罗·韦奇沃斯在会上致词。费孝通副委员长在会上作主题演讲。与会代表围绕"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研究和探讨了图书馆在迈向21世纪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8月27日　迟浩田同伊朗国防部长福鲁赞德就增进中伊两军的了解和加强两军的友好关系进行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华犯下的罪行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8月28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最高检察所代理总长韩致雪率领的朝鲜检察代表团。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以政治局委员穆塔萨为团长的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

同日　胡锦涛同志会见哥伦比亚自由党主席莱沃洛一行。

8月28—29日　中国与韩国产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汉城举行。以中国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和以韩国通商产业部长官朴在润为团长的韩国代表团与会。

8月29日　李鹏总理会见并宴请印度拉吉夫·甘地基金会主席索妮娅·甘地夫人及其一行。

同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香港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推举和任命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英

国不应插手，也无权插手。

8月29、30日　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分别会见澳大利亚副总理兼贸易部长费希尔一行。29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费希尔举行了会谈。

8月29—30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财政预算案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第11次专家会议在香港举行，双方完成了原定的议程。

8月30日　李鹏总理会见韩国信息通信部部长康奉均在京期间，康奉均参加了第五次中韩通信部部长会谈。

同日　亚行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昆明举行，并通过会议纪要。中、老、缅、越、泰、柬政府代表团和亚行等国际组织的官员、代表等与会。这是亚行首次在我国召开这样的会议。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对开发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同日　新华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迟田行彦近日访问香港期间说过"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中的独立的一部分"。此荒谬言论遭到香港社会各界的猛烈批评。连日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纷纷集会强烈抗议日本政府罔顾历史事实、蓄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行径。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申，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们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日本别干蠢事。31日，新华社报道，澳门一些主要报纸连日来纷纷发表评论，强烈谴责迟田行彦的错误言论。

9月1—2日　中国—亚洲论坛会议在吉隆坡举行，王光英副委员长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

9月2日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法国前部长、《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3日，江泽民主席接受佩雷菲特的采访，就中国的经济建设、台湾、香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和中法关系等问题回答了他的提问。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南非总统曼德拉在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南非将继续支持台湾，同时希望与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改善关系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对南非领导人鼓吹"双重承认"的做法表示"严重关切"。如果南非坚持这一做法，它要与中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将是"不可能的"。

同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刘华秋副外长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分别会见新西兰外交贸易部秘书长诺塔奇。

同日，李肇星副外长同诺塔奇举行了会谈。

9月2—7日　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李鹏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国际图联主席奇沃斯等在会上致词。2日，国际档案理事会本届大会组委会主席罗干和国际图联主席奇沃斯因对国际档案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被授予国际档案理事会奖章。7日，新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作学术演讲，国际档案理事委员会主席尼尔可斯宣读大会决议。会前，李鹏总理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代表和国际档案理事会成员。

9月2—16日　中国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同俄、哈、吉、塔4国外交和军事专家联合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第20轮谈判并取得新的进展。

9月3日　乔石委员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由主席弗瑞率领的美国前议员协会代表团。

同日　乔石委员长接受德国《商报》记者的采访，就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回答了他的提问。

同日　钱其琛和鲁平分别会见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汉利。在京期间，王英凡副外长同汉利举行了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美国空袭伊拉克防空目标"表示严重关切，对海湾局势出现新的紧张深表遗憾。"5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美国再次袭击伊拉克，并造成伊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深感遗憾，并表示强烈不满。13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反对美国威胁对伊拉克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9月3—7日　摩尔多瓦外长波波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波波夫；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与波波夫举行会谈。

9月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分别会见率领日本第八次"长城计划"友好交流使节团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及随行的日本新进党议员。

同日　李鹏总理会见英国工贸大臣伊恩·兰。

同日　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与伊恩·兰举行了会谈。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一行。

9月4—6日　"展望21世纪论坛"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持会议开幕式，副主席叶选平致开幕词。李鹏总理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崛起对世界未来的影响》的讲话。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濯、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分别在会上发表演讲。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致闭幕词，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就科技、能源和美中、美日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演讲。3—5日，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李光耀、竹下登等与会贵宾。

9月5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

田会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普吕厄。

同日　丹麦外交大臣彼得森自8月31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和田纪云副总理分别会见彼得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彼得森举行会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举行首次会晤一事发表评论说，中国欢迎巴以首脑举行会晤。我们认为，双方会晤有助于以、巴双方建立互相信任、尽早恢复和谈。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日方阻挠香港记者采访钓鱼岛一事发表谈话说，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在该岛进行非法活动，日本政府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活动，因而引起香港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是"可以理解的"。1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9月9日日本右翼分子再次登上钓鱼岛，中方对此表示愤慨，并已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表示强烈抗议。同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毅奉命约见日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日右翼团体9日再次侵犯我钓鱼岛主权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11日，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徐敦信就钓鱼岛问题向日外务省次官提出严正交涉，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9月5—26日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波兰、荷兰、奥地利、瑞士和俄罗斯。访问期间，李瑞环分别会见波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理齐莫谢维奇、参议长斯特鲁齐克、众议长博罗夫斯基，荷首相科克、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范米尔洛、议会一院议长威林克、二院议长德特曼、经社理事会主席德弗里斯，奥总理弗拉尼茨基、联邦议会议长普法伊费尔、国民议会议长菲舍尔，瑞联邦主席德拉姆拉、联邦委员兼外长科蒂、国民院议长勒巴、联邦院议长肖赫，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联邦委员会主席斯特罗耶夫和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18日和23日，李瑞环先后在伯尔尼和莫斯科接受瑞士和俄罗斯记者采访，就中国对外关系和广泛的国际、国内问题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9月6日　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率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代表团自8月27日至今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印尼同意章孝严访问印尼一事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希望印尼方面珍惜中国和印尼业已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9月7日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自8月31日至今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奥比昂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奥比昂。

9月7—14日　伊洛伊洛议长率领斐济参议院代表团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乔石委员长和荣毅仁副主席先后会见了斐济客人。

9月8—13日　国务委员罗干访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访问期间，两国总统分别会见罗干。19—21日，罗干访问了尼日利亚，访问期间，尼国家元首阿巴查会见了罗干。

9月9日　迟浩田会见印尼陆军特种部队司令伯拉博沃少将一行。

同日　对外友协举行招待会，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

9月9—13日　马里总统科纳雷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科纳雷举行会谈；乔石委员长、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分别会见科纳雷。9日，中马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9月10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柬埔寨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23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柬王国政府与英萨利及其部属达成和解协议一事答记者问时说，中国认为，这是属于柬内部事务的问题，如何解决是柬人民自己的事。

9月10—12日　第五届世界历史都市会议在西安举行，并通过《西安宣言》和《历史都市联盟章程》。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9月11—24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访问法国和意大利。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分别会见刘华清；刘华清分别同两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

9月12日　李鹏总理会见由主席塔兰蒂诺率领的国际普华会计公司高级代表团。

9月12—24日　阿曼外交国务大臣阿拉维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李鹏总理会见阿拉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与阿拉维举行会谈。

9月12—16日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分别会见哈西娜；李鹏总理与哈西娜举行会谈。12日，中孟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等文件。

9月13日　朱镕基副总理会见马其顿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茹塔一行。12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茹塔举行了会谈。

同日　王光英副委员长率领中国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自8月31日至今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尼。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分别会见了王光英一行。

9月16日　傅全有总参谋长自8月26日至今访问越南、菲律宾和印尼。访问期间，3国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傅全有。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波黑9月14日举行的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全民选举表示欢迎。

9月16—20日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拉赫莫诺夫举行会谈；李

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拉赫莫诺夫。16日，中塔签署联合声明和两国经贸关系协定等一系列合作文件。

9月16—20日　各国议会联盟第96届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24个国家的1400名代表和来宾与会。江泽民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分别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特别代表约·里德宣读加利给大会的致辞，各国议会联盟主席苏鲁尔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16日，田纪云副委员长在各国议联大会举行的全会上当选为本届议联大会主席。19日，李鹏在会上发表题为《共同努力缔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的演讲。20日，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努力，解决饥饿问题，并呼吁各国政府通过对话增进了解，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保护人权。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与会的议联理事会领导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代表和各国议长。

9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台湾当局领导人最近以秘密访问的方式继续推行"务实外交"事答记者问时说，希望有关国家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9月17—19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3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发表新闻公报。

9月17—20日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加拿大。访问期间，克雷蒂安总理会见钱其琛。19日，钱其琛在渥太华发表演讲，就中国的发展和中加两国关系等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同日，钱其琛同加外长阿克斯沃西举行会谈，并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关于加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的换文等两个文件。20日，钱其琛在从加赴纽约参加第51届联大途中在美国芝加哥停留，并应邀发表演讲。

9月17—20日　中越政府级第四轮边界谈判在河内举行，并取得积极进展。19日，越副总理陈德良会见了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唐家璇及其一行。

9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就"九一八事变"答记者问时说，日本应记取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9月19日　李鹏总理会见葡萄牙国家通讯社卢萨社社长马克斯一行。

同日　乔石委员长会见由主席达塔率领的印度工业联合会代表团。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北京签署会议纪要，双方审议了参与发展九号货柜码头的商界各方就合理分配葵涌港口各泊位所达成的协议，并达成一致意见。

9月20日　李鹏总理分别会见美国电力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德雷伯一行和英国—荷兰壳牌集团公司董事长吉宁斯及公司其他领导成员。

同日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在澳门召开会议，与会的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在解决东方基金会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9月21—22日　中日长江上游地区开发合作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9月22—29日　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斯托访问我国。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同斯托举行会谈；李鹏总理会见斯托。23日，中基签署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9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会见以议长齐纳提为团长的利比亚总人民大会代表团。

同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白俄罗斯国防部长马尔采夫举行会谈。24日，李鹏总理会见了马尔采夫。

9月23—25日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上海举行。26日，李鹏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外方委员。

9月24日　李鹏总理会见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美籍华裔陈香梅女士和郝福满先生。

9月25日　荣毅仁副主席分别会见马拉维议长蒙延延贝和秘鲁国会第一副主席托雷斯。

同日　迟浩田会见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贝克。23日，傅全有总参谋长同贝克举行会谈。

同日　迟浩田会见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兹维纳瓦谢。24日，傅全有同兹维纳瓦谢举行会谈。

9月26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国会24日通过的所谓赞同支持台湾当局加入国际社会的决议。发言人还说，中国政府对巴以流血冲突表示严重关切和不安。

9月26—27日　第1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是1993年中断以来的首次会议。

9月27日　迟浩田会见智利海军司令马丁内斯上将一行。

同日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联合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政治、经济磋商机制。同日，《中国与海地互设商务代表处协议》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签署。

同日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首席代表在香港签署关于香港交接仪式的会议纪要，双方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仪式的主要事项达成了原则性、框架性协议，就交接仪式的主要方面，包括时间、地点、规模、参加人的范围、媒体采访、保安安排及仪式的大致程序等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

同日　唐家璇副外长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港事顾问、香港同胞陈毓祥等组织的一艘"保钓号"抗议船驶抵钓鱼岛海域时遭到日巡逻艇阻拦，陈毓祥等数名同胞先后跳入海中以示抗议，因风浪过大，陈不幸溺水身亡一事向日方提出了交涉。外交部发言人26日发表谈话，对陈毓祥先生不幸遇难表示哀悼。29日，香港各界人士举行追悼仪式，悼念陈毓祥先生。

同日　45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海外华人专家以及开展对华人才交流的国外机构负责人在北京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朱镕基副总理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讲话，向获奖人士表示祝贺。

9月27、30日　李鹏总理和迟浩田国防部长分别会见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司令伊斯梅尔一行。27日，傅全有总参谋长同伊斯梅尔举行了会谈。

9月30日　为期3天的第二届亚太城市首脑会议在广州举行，并通过《广州宣言》。

10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方对日本自民党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的决定表示强烈愤慨。

10月9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

同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瑞士联邦主席让—帕斯卡尔·德拉米举行会谈。指出，经贸关系是中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两国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潜力很大。

10月14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米兰·库昌来华访问。

10月17～21日　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利亚米纳·泽鲁阿勒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0月17日　新加坡国会议长陈树群在新加坡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及其一行。

10月18日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分别在人民人会堂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拉明·泽鲁阿勒。

10月19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米兰·库昌签署的中斯两国联合公报发表。

10月22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克劳斯·金克尔。

同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夫人朱琳在中南海会见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和夫人。宾主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10月23日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主席格鲁西赫率领的国际工业家企业家联盟代表团。

11月3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同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举行会谈。指出中国吸引外资政策不变，欢迎瑞典公司来华投资。

11月5日　中国出席联大二委（经济和财政）的副代表在会议讨论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实际情况时发言强调，《纲领》的实施必须立足于国情，在解决人口问题时，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11月6～17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应邀访问了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和意大利，出席了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11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在应记者要求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发表评论时说，中国对克林顿总统再次当选表示祝贺。

11月11日　李鹏总理赴巴西进行友好访问。

11月19日　江泽民会见德国总理罗曼·赫尔佐克，指出“中德关系前景广阔，大有作为”。

同日　江泽民会见俄罗斯外长，指出将始终不渝遵循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11月21日　中国代表王民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对我人权问题的无端诬蔑与攻击。

11月25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济技术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将全体成员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转化为互补性，实现共同发展。

11月29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打电报给正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大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12月8日　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中方已决定推迟实施对部分美国产品的暂停进口。

12月12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博利沙科夫。

12月16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分别会见了来访的匈牙利外长科瓦奇·拉斯洛。

12月18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利比里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哈吉·克罗马一行。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会见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会见了科摩罗总统穆罕默德·塔基·阿卜杜勒—卡里姆，希望建交21年来的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文化教育

1月1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国家科委等7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做好“百千万人才工程”落实工作。

1月2日　江泽民等军委领导视察解放军报社，会见师以上干部及全体编辑、记者和职工代表，与他们合影留念并发表了重要讲话。3日，新华社报道：江泽民等近

日分别题词祝贺《解放军报》创刊40周年。

同日　新华社报道：文化部、广电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营业性放映激光视盘故事片。9日，新华社报道：文化部最近发出通知强调加强对营业性录像放映厅的管理，严禁放映非法音像制品。18日，新华社报道：截至1月15日，全国约5000家激光视盘放映厅、点，已有95%停止营业。

1月4日　中宣部等5部委向全国百个贫困县赠送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

1月4—7日　全国医药局长会议在京举行。彭珮云在会上强调要锲而不舍地整顿医药市场。

1月5日　大型画册《周恩来外交风采》在京举行首发式，钱其琛出席并讲话。

1月9日　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中央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茅以升百年诞辰，李瑞环、邹家华出席，宋健在会上讲了话。11日，"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第五届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1月9—13日　全国民族出版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司马义·艾买提等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新闻出版署等4部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从1997年开始，凡新任出版社主要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及委属高等院校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教育，并以协议形式确定5年支援计划。

同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和财政部于去年底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职教师资班的学生可享受师范生待遇，免收学费，并实行专业奖学金制度。

1月10—12日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二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12日，刘华清、宋健会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勉励他们取得更大成绩。

1月11日　首都教育界专家学者座谈解决中小学择校收费问题。24日，国家教委举行专题会议，重申对部分学校"择校生"高收费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和纠正。

同日　《健康报》报道：我国首例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在解放军307医院获得成功。

同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李鹏分别于1995年8月28日、12月9日致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希望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

1月12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京举行1995年"国氏"博士后奖励基金颁奖仪式。彭实戈等10人获奖。

同日　《健康报》报道：我国首部《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近日由卫生部颁布实施。

1月15日　"1996年全国卫生厅局长电视会议"召开，陈敏章在会上强调今年卫生工作重点在农村。

同日　国家测绘主管部门向248家测绘单位颁发《测绘资格证书》。这是我国实施测绘认证制度的开始。

同日　中国河北沧州杂技团表演的"顶车定车"在意大利"罗马第12届国际马戏大赛"中夺得头等大奖。

1月17日　于友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第5号公告，以进一步加强对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制定了《教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办法》。

同日　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第一台30万千瓦核电站全范围模拟(仿真)机通过有关专家鉴定，正式起用。

1月17—20日　全国气象科学技术会议在京举行。

1月18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日前规定自3月1日起，对未经批准的放免药盒产品视同假药处理，各单位不得购买、使用。

同日　兼有学术组织和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在京成立。李鹏等有关领导题词并致信祝贺。

1月19日　中科院第四届青年科学家奖在京颁奖。40位青年学者获奖。

同日　《科技日报》报道：我国科学家首次在世界上获得的抗青枯病转基因马铃薯株系在京通过成果鉴定。

1月21日　《健康报》报道：日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中期汇报会透露，首批中国人数据已列入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库。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在春节前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同日　'95全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自1995年12月13日至今在京举行。共有4个剧目获优秀剧目奖，13个剧目获优秀演出奖，130多位演职员获各种单项奖。

1月22日　"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济困助学金"在京设立，捐资仪式暨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1月22—24日　1996年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月22—25日　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京举行。

1月23日　国家教委宣布，从1996年起，国家公费留学选派将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办法。

1月24日　中国航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PAR95大规模可伸缩并行处理计算机系统，其运算速度可达32亿次/秒，创造了我国自行研制的计算机最峰值速度的新纪录。

1月26日　卫生部等联合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世界防治麻风病日"，吴阶平等出席。会上马海德基金会还对评选出的20%麻防工作者颁发了马海德奖，到会领导还向4名已治愈的病人赠送了纪念品。

1月28日　中国女将孙彩云在德国举行的国际撑

杆跳高比赛中,以4米21的成绩再次刷新女子室内跳高世界纪录。31日,孙彩云在德国埃尔富特市国际室内田径赛中,以4米27的成绩打破她自己28日创造的纪录。

1月29日　1995年国家科技奖励颁奖大会在京举行。李沛瑶等出席大会并为795项科技成果颁奖。30日,江泽民、李鹏会见获奖代表,宋健与代表们座谈。

同日　在巴黎第19届世界明日杂技节暨第10届世界未来杂技节上,中国12岁的张婷表演的单手倒立获未来杂技节第一金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同日　江泽民、李鹏签署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方法》。

1月30日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在京颁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等92种图书获奖。

同日　全国政协和中国科协举行茶话会,400多名首都老中青科学家共迎新春。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祝贺节日。

1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文化部近日联合下发了《演出市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同日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第四次颁奖大会在京举行,程裕淇等18位科学家获奖。邹家华等出席了大会。

同日　中组部等7部委在京联合举办"1996年春节慰问专家、学者联欢会"。

同日　国家教委负责人发表谈话,希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组织好中小学生的寒假活动。

2月1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亚洲卫星公司及其中方股东——中信公司在京举办招待会,向为"亚洲二号"卫星发射成功作出贡献的有关人员颁发了50万美元的奖金。

2月2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春文艺演出,江泽民观看演出,并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同日　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从北京抵达哈尔滨出席亚洲冬季运动会。3、4日,江泽民和李铁映分别会见法赫德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代表、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金云龙等国际奥委会官员。

2月3日　全国少年儿童"手拉手"表彰及推进会议在石家庄举行。135个省、市、县级少工委获得1995年度全国"手拉手"互助活动优秀组织奖;400所学校被评为全国优秀"手拉手"联谊学校,同时还评出200名全国优秀"手拉手"辅导员,2000名少先队员获得了"手拉手互助活动奖章"。

2月3、4日　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成员拜访在京的100余位老作家和作协主席团成员,向大家传达中央精神,并征求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意见和建议。

2月4—11日　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行。中国代表团以15枚金牌、7枚银牌、15牌铜牌名列金牌总数第一。本届亚冬会共有2队破一项世界纪录,54人次破13项亚洲纪录,181人次破18项亚冬会纪录。

2月6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等三部委日前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

2月7—8日　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在京举办"留学回国人员成果汇报会"。7日,李鹏会见与会代表,勉励他们继续为祖国繁荣作出贡献。

2月7—9日　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宋健出席开幕式并讲话。9日江泽民、李鹏等会见与会代表,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

2月8日　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公布我国《有效地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一年来的执行情况。

2月9日　人民日报社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召开"中药材市场问题座谈会"。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等四部局联合宣布:从今年起,对不合格的药市一律关闭和取缔。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度"林宗扬医学教育奖"(第四次颁奖)日前揭晓,吕卓人、郑庆璇、彭宝珠、董鉴洲、齐文萱、舒敬桑、张绚邦、华才欣8人获奖。

2月12日　国务院妇儿工作委员会在京召开首都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彭珮云在会上呼吁加强妇女儿童事业宣传力度。

同日　国家医疗器械评审专家委员会在京正式成立。

同日　李岚清看望北航教授沈元、农大教授娄成后、人大教授宋涛,并考察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住房。

同日　江泽民、胡锦涛等在京观看俄罗斯莫伊谢耶夫国家民间舞蹈团演出,并与演员们合影留念。

同日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同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签署了亚太1A号通信卫星发射和在轨运行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单,保额分别为1.3亿美元和1亿英镑,共计约23亿元人民币。

2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版权局近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禁止销售未经合同登记认证的境外故事片V-CD。

2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认真做好199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

同日　国家科委宣布,"九五"期间实施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应用工程及示范等15个"重中之重"项目。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近日发出《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

同日　国家体委日前批准授予王宝祥等29人为首批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同日　中国第一个靠人工合成营养液维持生命的小肠全切除病人周绮思存活满10年。

2月15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航研制的“异构可扩展并行计算机群系统”，近日通过了国家科委鉴定。其聚合计算速度可达10亿次/秒定点运算。

同日　宋健代表国务院和我国科技界，向南极考察队员致春节慰问电。

同日　我国新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国际708通信卫星时失利，这次事件使57人受伤，8人死亡。这是该火箭首次发射。

2月16日　《健康报》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在京宣布：从今年开始，将组织实施中医药本科留学生毕业综合水平联合考试，并对对外开办中医进修教育的机构进行资格认定。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日前连续破获5宗特大激光影碟视盘制黄、贩黄、盗版案件，受到全国“扫黄办”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2月17日　宋健代表党中央和科学界，专程看望老一代科学家李强、金善宝和叶笃正，向他们拜年。

2月19、20日　丁关根先后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五个新闻单位，向值班的编辑、记者、演播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拜年。

2月20日　谢军在哈恩举行的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对抗赛中卫冕失败，冠军为匈牙利的苏珊·波尔加。

2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长期考古勘察和研究证实，秦始皇陵兵马俑还有个神秘的第4号俑坑。

2月23日　我国青年学者邓兴旺、李静、刘胜、司捷在华盛顿被授予美国“总统教师奖”。

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家最近首次证实，宇宙原始气体也可生成能源矿藏。

同日　中国香港导演严浩导演的《太阳有耳》在第46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导演银熊奖。

同日　国家教委公布全国第二批“普九”和扫盲达标单位名单，471个县、市、区于1995年底基本实现普及9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

2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在京公布了1996年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的22项竞赛项目，包括学科类竞赛13项，科技类竞赛6项，艺术类竞赛3项。

同日　孙彩云在'96天津国际室内田径邀请赛上以4米28的成绩打破由她自己保持的女子撑杆跳高室内世界纪录。

2月28日　中国奥委会深圳新闻中心揭牌仪式暨首次港澳地区记者招待会在深圳举行。同日，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在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国际体育组织应遵循共同查处准则。

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青年学者严俊首次发现了大规模新的Herbing-Haro(HH)天体，共计48个。这在天文学史上尚属罕见。

3月1日　为期三天的全国扫盲工作会议在温州闭幕。朱开轩在会上指出，要增强紧迫感，加大扫盲力度。

同日　“李晓华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国际永久编号为355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李晓华星”。

3月2日　为期3天的中国作协工作会议在京闭幕。会议提出要多出反映时代的精品。

3月3日　中国广州杂技团的《蹦床钻圈》获第9届比利时图尔奈“希望之路”国际杂技艺术节金奖。

同日　中国选手李佳军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短道速滑赛上夺得男子1000米冠军。

3月4日　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知识界部分知名人士和参加两会的知识界部分代表、委员共度元宵佳节。

3月7日　《中国成年人体质测试标准》在京通过了国家体委的课题鉴定。

同日　国家教委会同国务院纠风办检查了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校春季开学收费情况。

3月8日　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室邀请部分专家座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对今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提出了建议。

同日　新华社报道：由罗马尼亚青年导演达扎比导演的中国话剧《赵氏孤儿》日前在罗马尼亚1995年全国演出评奖赛上获最佳戏剧奖和最佳舞台美术奖。

3月10日　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发表重要讲话。11至13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彭珮云作工作报告，并宣布中央确定每年召开一次计生工作座谈会。15至17日，全国计划生育科技大会在京举行，6位计生科技功臣和一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并被授予荣誉证书。

3月11日　新华社报道：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珠海金镭联激光主盘制造有限公司和潮州市新乐镭射唱碟有限公司因大量复制侵权盗版产品和淫秽色情出版物，近日被新闻出版署吊销音像制品复制经营许可证。

同日　1995年度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揭晓。

3月12日　1995年度亚洲十佳运动员评选揭晓。李小双、陈露、叶钊颖、马晓春名列其中。

3月12—14日　1996年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透露，今年高校招生比去年增加3.9万人。

3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家最近在辽宁首

次发现侏罗纪鸟类化石。

同日 遵照杨沫的遗嘱,"杨沫图书、版权、稿费捐献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同日 新闻出版署发布《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中国田汉基金会在京成立。

同日 钱其琛、李铁映、王兆国分别会见以霍英东为首的香港体育界领导人代表团。

3月15日 "双休日百场少年京剧演出"在京开幕,丁关根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首场演出。

同日 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向新疆地区赠送8000余册优选图书。

3月15—18日 全国文联工作会议在京举行。17日,丁关根看望出席会议的代表。

3月16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文物复制专家王倩、孙敬淼研制的我国古代系列乐舞粉彩陶俑,不久前荣获第44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

3月18日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暨首次会议在京举行。李鹏任组长。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科院1995年"百人计划"优秀人才招聘工作近日结来。李嘉禹、李德林等20位学者入选。

同日 黄帝陵基金会成立3周所暨整修黄帝陵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李瑞环出席并讲话。

同日 中国科技会堂落成仪式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系列报告"首场报告会在京举行。周光召作首场报告,邹家华出席了报告会。

同日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拍摄到百武彗星。25日格林尼治时间凌晨7时左右,百武彗星从地球最近点掠过,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约1500万公里,距太阳约1.56亿公里。

同日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京病逝,终年63岁。29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乔石、宋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送行。

3月19—23日 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提出,努力推进新闻出版工作的阶段性转移。

3月20日 国家教委和全国扫盲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在京宣布设立"中华扫盲奖"和"中华扫盲锡山奖"。

3月20—24日 布达佩斯第一届国际杂技节举行。中国代表队的节目《阿昌射日——双秋千》和《球上技巧》分别获得银奖和铜奖。

3月22日 卫生部、中国防痨协会在京举行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座谈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驻华代表出席座谈会。

3月23日 '96全国电影、电视、动画片剧本童影杯、亚视杯、珠达杯颁奖大会在长沙举行。《驴嘎上电视》等5部影、视、动画片分获这几个奖项的一等奖;还有一批剧本分获这三个杯的二、三等奖和提名奖。

3月23—26日 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丁关根、李铁映出席会议并讲话。

3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等7部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建立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制度。25日,李岚清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全社会都关心中小学安全工作。

3月25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布了《关于外国学生凭〈汉语水平证书〉注册入学的规定》,并于1996/1997学年度起执行。

3月26日 国家教委等5部委联合发布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又有了明显改善。

3月26—29日 1996年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在京举行。

3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医人民医院最近首次发现庚型肝炎病毒感染,表明我国防治新型肝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同日 首届"中国国际新闻奖"在上海颁奖。

3月28日 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暨世界传统医学优秀成果大奖赛中国交流大会在京举行。全国16个民族的800余名传统医药专家到会,300位专家荣获了突出贡献奖。

同日 国家教委在京邀请上海、西安、西南、北方交大负责人座谈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江泽民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3月29日 《科技日报》报道:我国研制的OUR—XGD型钴—60旋转式伽马刀日前正式通过国家鉴定。

同日 国家教委公布聘任的3位总督学顾问和63位第四届国家督学名单。朱开轩向他们颁发聘书,柳斌等出席聘任仪式并讲话。

3月30日 "周光召星"命名大会暨蔡冠深行星科学奖励基金设立仪式在南京举行。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最近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正式命名为"周光召星"。

4月1日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在京成立,宋健出席大会并讲话。

4月2日 《陈毅年谱》在京举行隆重的首发式,张震、张劲夫等出席。

4月2—5日 "863"计划10周年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等题词祝贺。4日,江泽民、李鹏、刘华清会见会议代表并观看成果展览。5日,会议表彰了29个先进集体和59名先进工作者,温家宝、宋健在会上讲了话。

4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两个学生队最近获得1996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通讯竞赛(MCM—96)最高奖——特等奖。

同日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举行“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学术报告会，以纪念成立10周年。李鹏题词祝贺。

4月4—9日　亚洲举重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男队共夺得17枚金牌，女队共夺得20枚金牌，分列团体总分第一。中国台北选手夺得两枚金牌。

4月5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出了《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

4月6日　纪念世界卫生日座谈会在京举行，彭珮云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4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院士吴良镛近日荣获了国际建筑师协会1996年度“建筑评论和建筑教育奖”。

4月7—9日　宋健到太行山区考察，并召开了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座谈会和河北省山区经济技术开发暨纪念国务院电贺太行山技术开发10周年庆祝大会。

4月7日　历时10天的第五届亚太地区聋人运动会在吉隆坡闭幕。中国选手共获得4枚金牌和1枚银牌。

4月8日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分别举行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祝贺。

4月8—11日　国务院办公厅在镇江召开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会议，决定试点工作将由镇江、九江扩大到全国。

4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海关EDI通关系统近日在北京通过国家科委的鉴定，使我国成为第一个采用CUSEXP标准报关的国家。

4月10日　国家教委印发《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

4月10—17日　李岚清在河南、安徽考察教育工作。16日，他在中国科技大学与合肥的16所高校负责人座谈，提出要加大高教和高校改革的力度。

4月11日　第二届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在京成立，29位专家学者受聘。

同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在重要场合组织师生奏唱国歌。

4月11—12日　中国作协四届主席团第10次会议在京举行，丁关根出席会议并讲话。

4月11—14日　全国计生协工作会议在山东举行。

4月12—15日　亚洲游泳锦标赛在泰国举行。中国选手共获得13枚金牌。中国台北队获一枚金牌。

4月13日　《经济参考报》报道：近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天文学会发布新闻公告说，21世纪以及新的1000年应始于2000年。

4月14日　新华社报道：近日，新闻出版署吊销了广州彩翎音像制作有限公司、深圳中侨激光有限公司和海南安美镭射制造公司的《音像制品复制经营许可证》。至此，全国已有7家企业在打击侵权盗版中被除名。

4月15日　国家教委在京举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10周年座谈会。

同日　第3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在波多黎各举行，中国选手共夺得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同日　《台湾历史纲要》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王兆国在会上指出，中国有决心、有能力实现祖国统一。

4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日前，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在距地球6500万光年的河外星系发现了一颗超新星，这是我国首次在河外星系发现的超新星。

同日　中央电视台在京为《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举行开播发布会，李瑞环出席并讲话。

4月16日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暨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拉开帷幕。

4月16—19日　1996年全国艺术创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努力创作更多的艺术精品。

4月17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下发了《关于继续做好1996年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4月7—17日　朝鲜第14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在平壤举行。中国艺术团获得团体金奖。

4月17—19日　全国省级党委机关报总编辑座谈会在京举行。丁关根看望与会代表，徐光春在会上讲话。

4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日前，中宣部、全国少工委等联合发出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开展“手拉手读书交友活动”的通知。

4月22日　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获得“日经亚洲技术开发奖”。

4月22—28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在京举行。丁关根在会上讲话。

4月23—25日　首次全国体育法制工作会议在大连举行。

4月24—26日　首次全国医药科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宋健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大会还提出了《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加速医药科学技术进步的意见》。

4月25日　卫生部在京召开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10周年座谈会，陈敏章等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等出席了座谈会。

同日　第8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共有15、25和40种图书分获一、二、三等奖；100种图书获优胜奖。

4月26日　中国旅游影片《北京古观象台》、《雍和

宫》在罗马尼亚第三届国际旅游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4月27—30日　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27日，胡锦涛致信祝贺，42个机构和95名个人获“希望工程建设奖”。30日，李岚清与代表们座谈，指出希望工程功在当代利及千秋。

4月28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近日向全国发出贯彻《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4月29日　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奖在京揭晓共有216种图书、127篇文章获奖。

4月30日　中宣部、国家教委在京表彰百名优秀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李岚清会见受表彰教师并讲话。

5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在京举行第14次会议，审批了第六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批准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5月3日　西藏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世界第八高峰——玛纳斯鲁峰，国家体委等致电祝贺。

5月3—11日　世界青年男子和女子成年、青年举重锦标赛在华沙举行。中国队共获得44枚金牌，名列团体总分第一名。

5月4日　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铁映在会上强调，要编修一批高质量名志。

5月4—8日　奥运田径选择赛暨全国田径锦标赛在南京举行。

5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博士生茅矛日前发现了两个受维甲酸调控的新基因，现已被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库接受。

同日　国务院妇儿工作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致信全国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家长，再次提醒他们重视碘缺乏给孩子造成的危害。

同日　著名诗人艾青在京病逝，享年86年。10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丁关根、李铁映以及有关部委、文学界知名人士等送了花圈。

5月7日　第二届全国节目主持人“双十佳”(金话筒奖)评选在京揭晓，倪萍、雅坤等分获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桂冠。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史前考古工作者对贵州普定县穿洞古文化遗址的最新研究，使人类在长江流域生息繁衍的历史推移到16000年前。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家近年来通过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铋-198高自旋能级纲图，对铋-197、铅-198能级纲图进行了大的更新和扩展。

同日　第三届韬奋新苗奖暨园丁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105位优秀学生荣获新苗奖，66位老师荣获园丁奖。

同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回旋加速器在京通过国家科委的鉴定。

同日　《新闻出版报》报道：国家科委近日发出《关于将杰出科技著作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序列的通知》。

同日　李鹏在京会见澳门新闻界访问团。

5月9日　国家科委在京表彰1995年我国十项重大科技成果，邹家华、宋健出席表彰大会，并向有关单位颁奖。

5月10—15日　第四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大连举行。10日，李瑞环接见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代表。15日，运动会落幕，辽宁、湖南、大连队获得总分前3名；广西、湖南、大连队获得金牌总数前3名。共有75人105次超41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2项世界纪录。当晚还评出了残运会十佳运动员。

5月12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近日印发了《全国重大疾病控制工作“九五”规划纲要》。

同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旅美学者冯愈等人最近发现了一种艾滋病毒感染人体免疫系统细胞所必需的蛋白质，为进一步研究和治疗这一绝症提供了崭新的方向。

5月13日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出《关于继续整顿和规范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

同日　记者从中科院了解到：1994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共发现了147颗活动星系核，其中共有8个亮的、近的类星体。

5月14日　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京颁奖。李约瑟、豪依塞尔、原正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获奖。宋健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

5月15日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宋健、钱正英等出席大会并向受表彰者颁发荣誉证书。

同日　西南交通大学庆祝百年华诞，丁关根致词祝贺。

5月15—16日　全国音像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5月15—17日　全国中医药科技大会在京举行。

5月15—18日　第三届全国省级广播电台台长会议在烟台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5月16日　李铁映、宋健授予21位国内优秀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聘书，标志着这一工程的全面启动。

同日　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一届“百戏奖”在京揭晓，共有7人获百戏奖，3人获荣誉奖。

5月17日　国家教委在天津向13所全日制普通高校颁发了“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证书”，这在中国高教史上尚属首次。

5月19日　《中国文化报》报道：第1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近日揭晓，共评出获“二度梅”的演员2名，戏曲演员16名，话剧、儿童剧演员5名，歌剧演员1名。

5月20日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座谈会，庆祝成

立10周年。

5月21日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市市长座谈会在西安举行。会议透露，1995年我国52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的排序已经确定，北京、上海等名列前10名。

同日　首届夏衍电影荣誉纪念颁授大会在京举行。70位电影文学工作者获得“夏衍电影特别荣誉纪念”。

5月22日　国务院批准实施科学基金制15周年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首例盗用“火炬”标志案最近由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华源公司败诉。

5月22—26日　全国文化先进县经验交流会在河北举行。54个县、市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称号，使我国文化先进县总数达到120个。

5月23日　1995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在京揭晓。《孔繁森》等12部影片分获各项奖；陈国星、王坪获最佳导演奖；高明、曹翠芬分获最佳男女演员奖；郑沂、沈贻伟获得最佳编剧奖。

5月24日　第六届文华奖在成都颁奖。共评出文化大奖4个；文华新剧目奖、新节目奖30个；编剧、导演、舞蹈编导、音乐创作、舞美设计、演员等单项奖82个。

同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近日发出通知，开展打击非法盗版、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同日　李鹏在京会见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访京团。

5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为台港澳青年来内地高校学习提供方便条件。

5月27日　新华社报道：江泽民、李鹏最近分别题词祝贺《中国儿童报》创刊50周年。

5月27—31日　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乔石等出席，朱光亚作工作报告。30日，姜春云作有关发展农业的报告。同日，钱其琛会见出席科协“五大”的港澳地区代表团。31日，大会表彰了376位先进工作者，并向“金桥工程”的优秀项目、优秀组织单位、优秀组织者发了奖。同日，召开了中国科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5月29日　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在京举办“全国十佳春蕾园丁”、“全国十佳春蕾女童”表彰大会，陈慕华向优秀复学女童和优秀教师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奖章。

同日　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京颁奖。《男生贾里》等19部作品获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1996年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

同日　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全国“扫黄”工作电话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扫黄”、“打非”工作。

同日　第二届中国杰出（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评选结果在京揭晓，共有100人获奖。

5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文化部等四部委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决定在6、7、8三个月集中治理音像市场。

同日　卫生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坚决整治药品回扣，彭珮云作重要讲话。

6月2日　“中国科学院——北京医院脑认知成像中心”在京成立。

6月3—7日　中国科学院第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会在京举行。李鹏在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周光召、朱光亚分别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开幕前，李鹏等中央领导会见了陈省身等首批中科院外籍院士。7日，中国工程院选举产生了第一批外籍院士7名；中科院选举产生了第二批外籍院士10名和新一届学部主席团。当日，1995年度陈嘉庚奖和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评选揭晓。

6月5日　国旗卫士陶维革因抢救他人劳累过度而病逝。

6月5—6日　全国文化援藏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同日　高法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介绍自1991年至1995年底，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7405件，审结16787件。

同日　全国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彭珮云强调要向农民宣传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6月6日　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文化下乡中突出抓好科技下乡。

同日　国家科委第三部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国科技人员自行设计、研制的大型颅脑手术设备——UX—100X刀已通过国家技术鉴定，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生产X刀的国家。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了国家教委等有关部委《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认真做好中小学收费的专项治理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制定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试行办法，并决定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各选一个区或市试行。

6月8日　全国卫生监督工作会议在宁波举行。

6月10日　江泽民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并发表重要讲话。

同日　中宣部等7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光盘复制管理的通知》。

6月11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首次出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

同日　新华社报道：新闻出版署近日吊销了潮阳金

发光碟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单位的复制经营许可证，收缴销毁侵权物品并分别罚款 20 万元。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青年法律专家黄凤荣近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罗马法》研讨会上，获国际罗马法奖。这是中国和亚洲法律工作者首次获得该奖。

6 月 12—13 日　卫生部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陈敏章任主任委员。

6 月 13 日　新华社报道：文化部最近制定了《演员个人营业演出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于 7 月 1 日起施行。

同日　'96 全国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透露，从 5 月 1 日起，国家电影专项资金收缴按照票房收入的 5%提取。

同日　全国爱卫会和卫生部联合召开灭鼠防病紧急电话会议，彭珮云、徐志坚出席了会议。

6 月 14 日　模范气象工作者陈金水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主持会议并讲了话。13 日，宋健看望陈金水。17 日，新华社报道：北京气象学院日前聘任陈金水为该院德育教授。18 日，新华社报道：最近，陈金水将 10000 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了西藏的希望工程。

6 月 15 日　暨南大学庆祝建校 90 周年，江泽民、李鹏等题词祝贺。

6 月 17 日　李鹏与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学员座谈，强调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同日　我国科学家周锦宇发明的真空自吸隧洞体流线型船舶（超浅水船），在摩洛哥获得第二届摩洛哥世界发明与革新展最高奖——哈桑二世大奖。

6 月 17—20 日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朱开轩作工作报告。17 日下午，李鹏会见与会代表。19 日，李岚清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努力开创职业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6 月 18—20 日　全国省级电视台长会议在京举行。丁关根打电话祝贺并作重要指示，李铁映会见会议代表。

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报道：西汉楚王刘戊陵考古研究最近获重大突破，发现了骸骨完整的楚王遗体。

6 月 20 日　全军首届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在京颁奖。当日，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汪曾炜等 39 名获奖人员。

同日　《文学报》报道：全国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会议日前在内蒙古赤峰举行。

同日　第 26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动员大会在京隆重举行，袁伟民作动员报告，伍绍组发表了讲话。28 日，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运动员。

6 月 21 日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东宛在京被授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称号。

6 月 26 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卫生系统职业道德建设会议日前在京举行。

同日　“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选评征文在京颁奖，张魁星等 9 人获奖。

同日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资助困难学生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山东泰安举行。会议透露，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高校困难生资助体系。

同日　第六届中国新闻奖在京揭晓，共有 157 件作品获奖，其中特别奖 1 件，一等奖 18 件。

6 月 28 日　《健康报》报道：国务院近日转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同日　国家文物局在京举行座谈会，提出依法严惩文物犯罪活动。

同日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壮丽航程》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鹏、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

7 月 1 日　国家体委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

7 月 3 日　我国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亚太 1A”通信卫星。28 日，中广影视卫星有限公司与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关于亚太 1A 卫星 8 个 C 波段转发器租用合同的签字仪式在京举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新闻出版署近日发出通知，对买卖书号等问题十分突出的成都出版社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作出撤销处理。

7 月 4 日　首都文化界在京举行大会，纪念茅盾诞辰 100 周年。李瑞环、丁关根、李铁映等出席，李铁映在会上讲话。会前，李瑞环等会见了参加茅盾研究国际研讨会的代表。

同日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评选委员会宣布：中国社科院教授王仲殊获得 1996 年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7 月 5 日　刘华清在第四次全军军事科研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突出军队质量建设的研究。

同日　欢送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铁映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日　国家体委正式发布实施《社会捐赠（赞助）运动员、教练员奖金、奖品管理暂行办法》。

7 月 6 日　我国 5 名中学生在第 27 届国际物理学奥林匹克赛上全部获得金牌。18 日，参加第 37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 6 名中学生共获得 3 枚金牌、2 枚银牌和 1 枚铜牌。31 日，我国 4 名中学生在第八届国际信息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上全部获得金牌。

7 月 6—15 日　全国文化援藏考察团通过考察，落实援藏项目 15 个。

7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对未通过合格评估的 15 个博士点限期整顿的处理意见。

同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实施《小学管理规程》。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学生暑期工作。

同日 江泽民在人大会堂会见了赵锡成等交通大学的海外校友50多人。

7月11日 《健康报》报道：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联合下发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管理办法》，标志着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师承工作的启动。

同日 国家外专局和国家教委联合颁发《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管理办法》。

7月12日 江泽民出席纪念第二炮兵组建30周年文艺晚会，并与演出人员合影留念。

7月13—17日 中国出版成就展在京举行。共有38000种图书、1200种期刊、3000种音像制品、180种电子出版物参展。15日晚，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参观出版成就展，强调出版要抓重点，多出精品。

7月1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首次颁发“世界太极文化进步奖”和“世界太极科技贡献奖”，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门惠丰和福建著名太极拳教练曾乃梁分别获奖。

7月15日 历时15天的“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国际合作项目综合评估”活动在京结束。我国消除碘缺乏病合作项目通过评估，并获得国际组织专家好评。

7月15—18日 全国高等学校科技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岚清、温家宝分别在会上讲话。韦钰作工作报告。

7月15—19日 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经验交流会在郑州举行。会议提出发展农村合作医疗，防止农民因病返贫。

7月17日 中国科学家宋晓东及其英国同行保罗·里查兹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发现地核比地球自转速度快。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歌手张迈最近在罗马尼亚举行的“1996年金鹿国际流行音乐节”上获得音乐电视比赛第一名。

7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报，不得擅自停课组织中小学生参加迎送活动。

7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基础教育工作，提出积极推进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7月23日 江泽民会见参加“21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研讨会代表，希望他们为祖国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同日 《现代汉语词典》在京举行新版首发式。新版删除了400条、增补了9000条条目。

7月24日 全国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李岚清在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科教结合。

同日 中国记协在京举行全国新闻奖部分获奖作者座谈会，强调全国提高新闻队伍素质。

同日 《中国文化报》报道：文化部近日决定设立“文化交流贡献奖”以奖励在国际范围内对中国文化交流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友好人士。

7月25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京举行管理科学家座谈会，宣布成立管理科学部。朱镕基到会祝贺并讲话。

7月28日 《健康报》报道：国内首例周岁以内小婴儿射频消融术最近在京获得成功。

7月31日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为纪念我国航天事业创建40周年在京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从而拉开了纪念活动的序幕。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颁发《中外合作举办教育考试管理办法》。

8月1日 卫生部卫生监督司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密监测O—157H7大肠杆菌。

同日 《健康报》报道：卫生部近日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开展夏秋季全国食品卫生监督检查预防食源性疾病的通知》。

8月2日 《中国文化报》报道：江苏溧阳近年来发现了中华曙猿及上黄动物化石群，将改写高级灵长类动物首先起源于北非的历史。

同日 卫生部发言人向首都新闻界公布“中国1995年孕产妇死亡、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和儿童体格发育状况”。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语委日前开始在京为香港培训普通话课教师，111名香港中小学教师受训。

8月2—5日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北戴河举行。李鹏在闭幕前会见座谈会代表时强调，高校改革要加大力度，有所突破，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8月2—7日 国际军体理事会男子第44届、女子第6届五项锦标赛在维也纳举行。我军健儿获得男团冠军、女团亚军，共夺得4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

8月4日 第26届奥运会自7月19日至今在亚特兰大举行。中国队共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本届奥运会共有132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获得了奖牌，1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刷新了24项世界纪录。4日，萨马兰奇对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提出批评。8日，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党和在北戴河亲切会见载誉凯旋的奥运健儿，江泽民发表讲话。9日，中办、国办在京举行欢迎大会，李铁映发表讲话，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王军霞等16名获金牌的选手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为隋新梅等86名获银

牌、铜牌的选手颁发体育运动一级奖章。15日，中宣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委联合在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告会，尉健行、王光英亲切会见报告团成员。同日，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向获奖牌运动员颁发了纯金特制的纪念牌。27日，中宣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工委等在京联合举行奥运报告会，袁伟民作奥运情况报告。

同日 《健康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阶平近日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授予该学院荣誉院士。

8月5日 全国救灾防病工作电话会议召开。彭珮云在会上强调，要一手抓抗灾救灾，一手抓防病治病。

8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等四部委日前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国城镇兴建、增建党报阅报栏的通知。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世界上首次合成并鉴别了新核素镅-235，标志着我国新核素合成与研究进入了超铀缺中子区。

8月7日 我国科学家在不久前举行的第11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上，证明了氨基酸和磷酰化氨基酸是生命起源的种子。

同日 北大生物系教授张昀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地质大会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研讨会上，宣布自己的科研成果——生命6亿年前就有性别之分。

8月8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日前，李鹏和夫人向河北、山西太行山革命老区的三所希望小学赠送《赤子丛书》。

8月11日 《健康报》报道：中国预防医科院流研所最近宣布，对杨晓霞怪病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Y6菌株。

8月12日 国家体委向各地发出“关于第26届奥运会后加强运动队管理的通知”。

8月14日 《中国文化报》报道：《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共12个专集、30分卷、2000万字，8月由上海书店出齐。

8月15日 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科研条件发展协调小组近日在京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8月15—25日 第10届残疾人奥运会在亚特兰大举行。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6枚金牌、13枚银牌、10枚铜牌，名列奖牌榜第9位。23、26日，彭佩云、李铁映分别致电祝贺。29日，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李瑞环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彭珮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运动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8月16日 敦煌艺术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同时成立。

8月18日 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中心发射的“中星七号”通信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8月18—20日 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刘忠德作重要讲话。

8月19日 中宣部在京召开1997年度报刊收订发行工作全国电视会议。徐光春在会上指出，要把《人民日报》的发行作为重中之重。

8月20—24日 第8届世界蹼泳锦标赛在匈牙利举行。中国队共夺得15枚金牌、7枚银牌和4枚铜牌，名列金牌总数第一。

8月22—25日 中国“中央乐团·中国银河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荣获意大利第44届“圭多·达雷佐复调音乐国际合唱比赛”民歌合唱比赛第一名、男女声合唱比赛A组第二名(第一名空缺)、男女声合唱比赛B组第二名(第一名空缺)、童声合唱比赛第二名共四项奖。

8月23—28日 第三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长春举行。共评出“金鹿奖”、“银鹿奖”11项：《好男好女》、《孔繁森》获最佳华语故事片奖；《青年刘伯承》和《广州来了新疆娃》获优秀华语故事片奖；比利时的《玛内肯·皮斯》获优秀外语片奖。高明、吴倩莲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黄磊、黄素影获最佳男女配角奖；侯孝贤获最佳导演奖；思芜获最佳编剧奖。

8月25日 中国队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三金二铜名列奖牌榜第7位。

8月27—29日 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在京举行。21位优秀论文获奖者、21个论坛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8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教委近日发出通知，重申高校招生录取任何地方不得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各行其是。

8月30日 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在京举行第三届“杰出科学家、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和杰出青年学者奖”颁奖仪式，18位科学家20位青年学者获奖。

同日 中国女子摔跤手刘东风在第六届世界女子自由式摔跤锦标赛上获得冠军，实现了五连冠；钟秀娥获得44公斤级世界冠军，这是她第三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8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第1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仪式日前在石家庄举行。尚长荣、裴艳玲等22名演员获奖。

9月1日 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三研究院庆祝建院35周年，宋健代表国务院写信祝贺。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国家科委等最近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

同日 《健康报》报道：我国科研人员邓大君等人经5年研究近期提出，人胃内致癌物天然性亚硝酰胺存在水平与胃癌发生具有明显相关性。

9月4日　第五届大学生运动会自8月28日至今在西安举行。大运会共决出金牌126枚、银牌和铜牌各125枚，23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团榜上有名，其中陕西、广东、北京获金牌和总分前三名。

同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学者曾华洋最近获得“1995年北欧5国优秀沥青技术科学家”奖。

同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青年学者彭勃设计的《加利福尼亚旅馆》最近荣获世界建筑设计大奖。

9月4—13日　’96全国昆曲新剧目观摩演出在京举行，朱镕基等出席开幕式。6日，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在京邀请文化部有关部门、全国六个昆剧院团代表、戏剧专家一起座谈，商讨振兴昆剧具体措施。

9月6日　《健康报》报道：西安医科大学莫东旭教授和地方性骨病研究所近日荣获国际生物无机化学家协会授予的“克劳斯·施瓦兹”奖。

9月8日　“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颁奖会在京举行。金竹花、陈国山等10名教师获此殊荣。

9月9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日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1996年度“国际扫盲表扬奖”。

同日　中宣部、国家教委等在京联合举行座谈会，学习河北农大老师群体的先进事迹，徐光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9月9—12日　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10日，江泽民会见会议代表和出席老师节庆祝活动代表。当日，李岚清与教育工作者举行座谈，强调优先办好师范教育。12日，柳斌在闭幕式上做总结报告。

9月10日　国家教委和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在京举行文艺晚会，庆祝第12个教师节。同日第四届“希望工程园丁奖”授予了1000名来自贫困地区的乡村小学教师。

同日　首届“中华扫盲奖”在京颁奖，98个单位、200名个人获奖。其中10人为特等奖、1人为荣誉奖。

同日　正在银川考察工作的李鹏总理当天下午亲切会见了宁夏的100多位各类学校的优秀教师代表，指出实现经济振兴归根到底要靠教育。

9月11日　中宣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在京举行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事迹报告会，王选、袁隆平等10名优秀科技工作者受表彰。

同日　《科技日报》报道：国家科委提出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扶贫工作的意见。

同日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发言人在京正式公布：我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今年2月15日首次飞行失败是因为火箭控制系统惯性基准发生变化。造成这一变化最大可能的故障模式，是平台的随动环稳定回路功率级无电流输出。

同日　卫生部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全国化妆品抽检结果表明无卫生许可证及细菌超标产品屡禁不止。

9月12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同日　国家科委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星火计划“九五”发展纲要。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青年科学家柳卫平近日首次证实了太阳中微子失踪现象，他的成果得到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

9月12、13、22日　华江六省、西北五省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座谈会分别在山东和银川召开。彭珮云在会上强调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快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9月12—17日　’96西安古文化艺术节和西安投资与贸易洽谈会同时举行。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283个团体参加了洽谈会，共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133个，合同总额达7.29亿美元。

9月13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中药材市场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公布了新批准的6家中药材市场。至此，全国已有国家认可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共14个。

同日　国务院妇儿工作委员会、全国妇联和国家教委在京表彰全国“三优工程”和家教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北京市海淀区等16个市(区、县)、内蒙古包头市等6个市(区、县)以及22个试点市(区、县)的122个有关单位获得全国“三优工程”试点工作奖，李凤玲等144人获先进个人奖。

9月15日　中国故事片《大辫子的诱惑》荣获葡萄牙第25届费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同日　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系列活动在京启幕，乔石、朱镕基等观看首场演出。

9月16日　北京协和医院庆祝建院75周年，李鹏出席大会并讲话。

同日　首届香港“亿利达科技奖”在京举行颁奖大会。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环流器新一号目前在第二轮物理实验中，首次实现了高功率低混杂波电流驱动，同时，多发弹丸固体加料系统调试也获得成功。

9月16—17日　全国计划免疫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彭珮云在会上强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计划免疫工作的检查监督，切实提高儿童计划免疫水平。

9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散佚民间2000年的《孙武兵法》82篇近日在西安发现。

9月18日　国家教委会同财政部等六部委即日起开始对各地贯彻实施《教育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近日从国家教委获悉，“九五”期间，国家财政将每年拨款6000万元，设立“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同日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在上海逝世。26日，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等送了花圈。

9月20日 第三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在京揭晓。郑泉水等11位科学家获奖，沈保根等4位青年科学家获提名奖。

9月21日 中国选手陈萨在第12届英国利兹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第四名，成为在这一国际钢琴大赛上首次获奖的中国人。

9月24—25日 中宣部在京召开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五届工作会议暨颁奖大会，丁关根、李铁映出席大会并向获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奖。丁关根在会上发表讲话。

9月25—27日 国家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大力推动星火计划再上新台阶。27日，江泽民、李鹏会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同日，国家科委表彰了星火计划实施10年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并向他们颁发了奖励证书和奖状。温家宝、宋健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9月25日 中国作曲家谭盾在加拿大多伦多荣获以本世纪著名音乐家、钢琴家格兰·郭德命名的第四届“格兰·郭德国际音乐大奖”，这个音乐奖每隔五年奖励一位当今在世界音乐文化上取得卓越成就的音乐家。

9月26日 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新闻舆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大局。

同日 中国考古学者王仲殊获得“1996年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同日 全国教育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会议在四川召开。会议提出支援库区教育要帮在实处，注重实效。

9月27日 朱镕基、罗干在人大会堂向在华工作的45位外国专家颁发“友谊奖”，朱镕基在会上讲了话。

9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科委等就这一法律的实施举行座谈会，宋健在会上讲话。

10月6日 中国著名导演吴天明和著名演员朱旭今天在第九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分别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11月2日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严济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11月2日22时0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1月10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11月10日18时0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11月1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出席“八五”国家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的代表。

12月8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近日先后题词祝贺中国卫星电视教育开办十周年暨中国教育电视台建立十周年。

12月14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执行主席曹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12月13日凌晨3时55分在京逝世，终年86岁。

12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与文艺界三千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12月18日 199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现代经济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经济，要提高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

社会生活

1月1日 朱穆之就《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答记者问，指出中国人权状况可概括为三句话，首先是取得伟大成就，其次是还有不少问题，第三是正在继续努力改善。

1月8日 新华社报道：乌鲁木齐市“4·24”特大火灾事故案近日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黄立新等7名事故责任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5年至2年。

1月9—11日 公安部禁毒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陶驷驹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5年来，我国的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月10日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执行大会。东星轮千万元港币劫案主犯之一陈文建被宣判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另外两名同案犯被判为死缓两年和无期徒型，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月12日 我国人口领域的最高奖项、第二届中华人口奖遴选在京揭晓。罗秋月等10人荣获工作奖、科学奖、荣誉奖，王志勇等5人获得提名奖。

同日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听取了1995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

况汇报，审议通过了《1996年—2000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五年规划》、《1996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和《1996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宣传要点》。任建新在会上要求，要把综合治理措施真正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

1月12—15日　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李贵鲜在会上提出春节前夕妥善安排民政对象生活。

1月14—17日　全国宗教局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确定今年要抓好宗教场所登记、加强分类指导、加强宗教队伍建设第三件事，为跨世纪宗教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1月18日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四次全会在京举行，会议讨论并审议了1995年的工作总结及1996年的工作要点。

1月24—2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回顾了1995年反腐败斗争的情况，部署了1996年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26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27日，会议通过了《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外经贸部日前联合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并将于今年5月1日起实行。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全军深入开展四个教育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于永波在会上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主席的重要指示，把四个教育搞得更深入更有成效。

2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两起伪造货币、走私、贩卖伪造货币案审判情况，陈其鹏等5名罪犯被正法，24名罪犯受到法律严惩。

2月6—9日　第19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了“九五”期间的公安工作，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斗争形势，讨论了《“八五”公安工作纲要》。9日，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会见与会代表，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努力开创公安工作的新局面。

2月8日　中纪委、监察部在京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反腐败需要新闻舆论积极支持配合。

同日　第二届“中华人口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王光英、彭珮云等有关领导向10位获奖者分别颁发了证书、奖杯和奖金，并向5位提名奖获得者颁发了证书和奖杯。

同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对原广东省深圳市私营企业全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少光、林楚鸿等人，原香港顺发贸易公司、源丰贸易公司、纬伦实业公司经理何廷辉等人，原湖南省株洲钢厂停薪留职人员卢荣明，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报废次产品出口，骗取国家出口退税三起大案的判处结果：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顾少光被判处死刑，2月12日在当地被执行枪决；林楚鸿、何廷辉、卢荣明等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2月13日　李瑞环同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并代表江泽民、李鹏向全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祝贺新春佳节。15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宗教界爱国人士喜迎新春。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谢万丰、谢军华父子用工业酒精制售有毒白酒、造成数十人中毒的恶性案件的判决结果。谢万丰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13日在当地被执行枪决；谢军华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指出，我国现有人口为120778万人。

2月27日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京举行，尉健行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北京建成精神文明“首善之区”。为了更好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经征求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的意见，委、市政府决定将原有的首都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调整充实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尉健行任主任，李其炎任第一副主任。

3月8日　首都各界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妇女祝贺节日。会上宣读了表彰全国各族农村妇女“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先进女能手、先进协调组织、先进协调单位的决定和表彰全国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标兵、先进单位、先进协调组织的决定，同时宣布授予211名同志全国“三八”红旗手、9个单位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同日，北京举行中外妇女招待会，陈慕华代表中国政府向中外各国姐妹致以节日祝贺，并宴请港澳地区参加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

同日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大会在京举行，尉健行在会上强调，要把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水平。同日，《首都市民文明公约》正式公布于众。

3月9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番禺市召开宣判执行大会，依法对建国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番禺“12·22”持枪杀人抢动银行运钞车案10名案犯宣告终审裁定，随后将6名主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11日，广西柳州市举行表彰大会，奖励侦破“12·22”广东番禺市特大持枪抢劫银行解款车案件的有功人员。公安部近日发布命令，给柳州市公安局“12·22”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件专案组记集体功一次，并奖励人民币1万元。自治区公安厅近日也发布命令，给欧斌等10人分别记一、二、三等功和嘉奖一次。

3月22日　中央党政机关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陈俊生在会上指出，实现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关系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要努力提高中央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工作水平。

3月26日　公安部边防局在昆明召开全国公安边防缉枪缉毒工作总结暨表彰会，90个缉枪缉毒先进单位和218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3月31日　新华社报道：人事部近日发布《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月2日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陕西省宝鸡市举行仪式，向新近被授予"中华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的宝鸡日报社记者刘斌、宁丽君颁发奖章、证书和奖金。当天，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及有关方面，也向刘斌、宁丽君各发"见义勇为奖"1万元，同时向培养出这样优秀记者的宝鸡日报社颁发特别奖3万元。据悉，对在"3·12"事件中麻木不仁的司乘人员分别受到有关方面的处理。

4月3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部署今年和"九五"期间的禁毒工作，并提出要进一步加大禁毒工作力度。

同日　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儿童状况》一文。

同日　新华社报道：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烟草专卖局局长、县烟草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方大彬打击报复伤害举报人及受贿，受到福建省有关方面的严肃查处，中央纪委、监察部最近转发福建省纪委、监察厅的通报，要求各地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月4日　海内外近5万人聚会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公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李铁映代表国务院专程参加了公祭仪式。

4月5日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活动推进大会在京举行，吴邦国到会讲话。李伯勇在会上宣读了团中央、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关于命名表彰1995年度全国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决定》，高国强等被授予1995年度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的光荣称号，张凤等200名青年职工被授予1995年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光荣称号。

4月11日　新华社报道：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同中央办公厅等22个部委厅局和有关群众团体组成的10个检查组，近日先后离开北京，分赴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4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表明，1995年，我国28.85%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全国人口的城市化程度比1994年又提高了0.23个百分点。

4月14日　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对伊春一起故意杀人案判决依法进行抗诉，案犯赵志国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4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4月19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了一起因超征农民提留款而引起的故意杀人案，案犯沈可信、沈可理分别被判死刑死缓。

4月20—22日　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八五"和部署"九五"期间的残疾人工作。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决定：授予130个县（市、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县（市、区）"称号。邓朴方在会上讲话。22日，李瑞环会见与会代表。

4月22日　国务院举行第44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草案）》。

4月24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民政部、公安部等最近联合发文，提出实行移风易俗、进一步改革丧葬习俗的意见。26日，民政部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火葬40周年。

4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召开全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维护社会治安指示精神。12日，任建新在会上发表讲话。连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严打"斗争中摧毁一批犯罪团伙。

4月29日　首都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讲话并接见徐虎等12名优秀工人代表。吴邦国、尉健行等出席庆祝会。会上宣读了《全国总工会关于颁发1996年"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劳动奖状"的决定》，对去年我国各条战线涌现出的1000名先进个人和300个先进集体给予表彰。全国劳动模范代表赵殿军在会上宣读了《"五一劳动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代表倡议书》。

4月30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山市体育场召开宣判执行大会，对"4·15"特大持枪劫杀案凶犯廖永雄宣判并执行死刑。

5月1日　新华社报道：连日来，全国各地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并表彰一大批优秀职工、劳动模范。同日，新华社报道：李鹏在安徽考察工作并同工人一起庆"五一"。3日，中宣部、全国总工会在京举行优秀工人事迹报告会，会上宣读了《全国总工会关于向12名优秀工人学习的决定》。

5月1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国家计生委、民政部等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助残日"活动的通知。18日，彭珮云在"全国助残日"广播电视讲话中指出，残疾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特殊困难的群体，全社会都有责任关心、帮助他们。

5月2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批转中国残疾

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要求全国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日前召开命名表彰大会，为获得"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称号的孙斌权等20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奖品和人生保险证书。获得"首都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的曹秋玲等37人也在会上受到表彰。

5月2、3、9、15、30日 《人民日报》报道：自"严打"斗争开始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加紧追捕逃犯，一批重大负案在逃犯罪分子落网。

5月3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5起严重抢劫、杀人等犯罪案件。赵多国等8名被判处死邢的严重犯罪分子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5月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幅得到有效控制。"八五"期间，职工人数年均增幅由"七五"期间4.6%，下降为2.2%，年平均增人由"七五"期间的130万下降到86万。这表明我国人事计划宏观调控取得重大成效。

5月7—9日 全国纠正不正之风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会议集中研究了今年纠风工作抓深入、抓落实、抓成效的问题。

5月10日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京举行第18次全体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严打"斗争的指示精神，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员单位和各部门参加"严打"斗争进行部署。任建新在会上要求各部门积极参与将这场斗争逐步推向深入。

同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就"严打"斗争已取得初步成效答记者问。

5月12—15日 中纪委在江苏省吴县市召开全国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经验交流会，侯宗宾在会上要求年内务必突破一批大要案。

5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民政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在办理婚姻登记过程中"搭车"收费。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核准广东、福建两起走私武器、弹药的犯罪大案，杨亚六第4名主犯被执行枪决。

5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严打"新闻发布会，公布3起绑架勒索犯罪案件的审判情况和判决结果。庞耀等7名罪犯分别由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二审裁定核准死刑，并由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安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地执行了死刑，其他罪犯也将交付有关机关执行刑罚。

5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四省法院分别对四起特大抢劫案的审判结果：11名主犯分别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5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对5起重大盗窃犯罪案件的审判情况和判决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宣布：11名被判处死刑的重大盗窃、惯窃犯罪分子分别在四川成都、山东临沂、江苏无锡、江西赣州、河南焦作被执行枪决。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就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深化改革、从严治警、大力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情况发出通报，号召全国政法战线严肃执法，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

6月1日 全国"手拉手"互助活动汇报座谈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出席汇报座谈会并讲话。当天，首都百万少年儿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欢度自己的节日。

6月4日 新华社报道：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日前决定，对在"严打"斗争中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先进人物予以重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轰动全国的宝鸡"3·12"车匪路霸殴打见义勇为记者的案件日前依法审结。6人被判有期徒刑，1人劳动教养。

6月5日 新华社报道：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全方位、多渠道追捕负案在逃人员，又有一批负案在逃人员落入法网。

6月6日 首都各界人士集会纪念文天祥诞辰760周年，并倡议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举报奖励工作正日臻完善，3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奖励举报有功人员10128人，奖励金额432.8万元。

6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民政部近日对《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改。

6月16—19日 全国妇联常委会暨省、市妇联主席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重点讨论研究"九五"期间的城市妇女工作。并确定了今年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办的10件事。

6月17—20日 第四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乔石等会见与会代表。会议表彰了575个先进集体和1000个先进个人。

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浙江省和广东省法院对两起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案件的审理结果，王国强等主犯分别被判处死刑，其他涉案罪犯被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6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纪委、监察部近日就吉林省、贵州省、海南省、山西省4起领导干部大操大办丧事案件发出通报，并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

6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总工会日前决定，授予张明达等10名同志"全国模范工会干部"称号，授予陈德华等10名同志"全国模范工会积极分子"称号，以表彰他们为党的工会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6月24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近日向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转发了山东省公安厅《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实施禁酒令的通知》。

同日　新华社报道：民政部、公安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工作。

6月26日　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法院同时召开了262场宣判大会，集中宣判939起毒品犯罪案件，判处毒品犯罪分子1725人，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有769人。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被执行枪决。当天，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公布会，通报香港人和澳门人、云南、宁夏、广东四起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的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对这四起严重涉毒犯罪分子依法判处了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7月1日　公安部决定从7月1日起，在全国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

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部会，公布4起在“严打”斗争中顶风作案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审判情况和判决结果。杨学工等6名犯有抢劫、杀人、盗窃、强奸等罪行的罪犯分别在山东济南、陕西宝鸡、广东防城港、北京等地执行枪决。

7月3日　为期4天的全国深入持久开展“严打”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会议在承德举行。会议总结交流了前一阶段“严打”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的经验，并部署下一步工作。罗干在会上提出要造就高素质政法干部队伍。

7月3—5日　全国贯彻劳动法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吴邦国向会议发来贺信，尉建行等出席。

7月9日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新的驾驶证管理办法和驾驶员考试办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

7月10日　国务院举行第47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同日　中国民航总局与公安部在京举行丁明亮英雄事迹报告会。会上，公安部授予丁明亮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共青团中央授予丁明亮“人民安全青年卫士”荣誉称号。

同日　中宣部等单位在京举行特区活雷锋陈观玉事迹报告会。

7月14日　中宣部和国务院纠风办在京召开学习推广烟台市社会服务承诺制经验座谈会，会议要求推广社会服务承诺制度，促进社会风气明显改观。

7月19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部署了下一步“严打”工作，并要求加强办案进度，保证办案质量。

7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近日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向本溪市公安局学习的决定，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本溪市公安局为榜样，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从严治警。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4起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危害公共安全的涉枪犯罪案件的审判情况和判决结果。钟朝让等7名罪犯分别在广东、河北、青海、四川被执行枪决。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部分城市建筑消防设施检查情况的通报》。

7月29日　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公开处理以权谋私的工作人员，共12起案件。

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湖北、黑龙江、浙江3省法院对3起车匪路霸大案的判处结果：9名严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同日　公安部发布《关于清理收缴枪支的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新华社报道：日前，辽宁省公安厅和鞍山市政府在海城市召开授予民警迟明惠、周晓龙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大会。

7月31日　孙英任甘肃省代省长。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原总经理李连维因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日前，监察部就此案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

8月2日　卫生部公布中国妇女儿童健康状况。

8月5—9日　全国妇联系统维权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交流了“八五”期间妇联维权工作经验，分析了当前妇联维权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讨了“九五”期间加强妇联维权工作的新思路；并表彰了160个先进集体和140名先进个人。

8月6日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天水市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倒卖增值税发票案件。

8月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严打”斗争中深挖犯罪，一批公安部督办的和影响大，性质恶劣的案件相继告破。

8月9日　为期11天的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研讨会在东北举行。11日，王兆国会见宗教团体领导人研讨会成员。

8月10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不准强令事故车辆到指定厂修理。

8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陕西、新疆、青海、安徽等地4起抢劫出租车、杀害司机案件的审判结果。张东志等7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死刑，并在当地执行枪决。

8月14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将就劳动法的贯彻执行情况赴五省区检查。

8月15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深圳市宣判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毒品案，对走私毒品海洛因598.85公

斤一案的10名犯罪分子作出终审判决，王世鉴等7名主犯被执行枪决，其他3人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7年。

8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公安部部长陶驷驹近日签署命令，对济南市侦破抢劫出租车司机、强奸女司机系列重大案件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予以通令嘉奖。

同日　新华社报道：香港海关查获近年来最大的软性毒品。同日报道，台湾台北警方日前破获一处黑社会经营的地下钱庄。

8月19日　共青团中央等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评选表彰杰出(优秀)外来务工青年的活动，年底将评出"十杰百优"。

同日　共青团中央等六部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青年文明号集体中开展"推行服务卡优质服务"活动。

8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赴辽宁、山东、陕西三省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8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农业部就广东省雷州市水产局有关人员在"七一一"海难事件中严重渎职问题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加强对渔政执法队伍的领导和监督。

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河南、安徽、四川3省法院对三起持枪抢劫及杀人案件的审判结果。裴广丽等7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在当地执行枪决。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

8月27—29日　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城市110报警服务台建设工作现场会议。会上，公安部发出关于向福建省"漳州110"学习的决定。

8月27—29日　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江泽民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军队干部素质。

8月29日　全国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张思卿致信会议提出要用好法律，坚持"严打"。

9月1日　新华社报道：近日，漳州警方破获一起重大盗窃文物案。

9月2日　新华社报道：7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贯彻党中央深入持久开展"严打"斗争的指示，继续加大"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工作的力度，取得新的战果。

9月4日　公安部召开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打拐"、"禁娼"两个决定五周年座谈会。1991年以来，全国共查获卖淫嫖娼人员153.3万人；查获卖淫团伙3.2万个；摧毁卖淫窝点3万个；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17万余人。

9月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施行《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9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性城区居民综合调查网络在京成立。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香港海关日前截获一批重型军火，从18个集装箱内查获大量榴弹炮组件。这是香港历年来查获的最大一宗偷运军火案。

9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3起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流氓团伙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何长利等5名严重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分别在河南省商丘、福建省南平市、陕西省咸阳市执行枪决。

9月20日　北京破获三起特大持枪抢劫运钞车案。公安部通令嘉奖北京市公安机关侦破该系列抢劫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人员。

同日　国以来湖南最大的受贿案犯董庆尧，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在长沙执行枪决。

9月26日　全国人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执法检察组举行第二次会议，听取赴辽宁、山东、陕西的三个执法检查组汇报有关检查情况。

10月4日　第三届全国工人运动会闭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第三届工运会4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幕，历时5个月。全国55个代表团的541支代表队近7000名运动员，分别角逐于15个赛区的17个城市，共决出211枚金牌。

10月7日　由中宣部、建设部等六部门联合举办的李素丽同志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人士3000余人出席了报告会。上海、天津等十大城市公交战线的职工代表出席了报告会。

10月12日　第三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上海虹口体育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宣布大会开幕。这次运动会的宗旨是"团结、进步、文明、小康"。

10月17日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陆续发行。

10月19日　第三届全国农民运动会闭幕，2800多名运动员共决出118枚金牌。

10月23日　由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财政部和全国青联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评选活动揭晓，王永海等10人榜上有名。

11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北京市法院对首钢原助理总经理周北方等6起受贿案的审判结果。周北方等6犯受到法律制裁。

11月21日　曾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生前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二大队学员，在人民大会堂向3300名首都高校大学生、驻京部队官兵和党政机关干部，汇报了他们在张华精神

感召下、发奋学习，报国为民的动人事迹。

11月22日　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布了1996年第一批七部国产重点影片。这七部影片是：《青年伯承》、《撼天雷》、《桃源镇》、《夫唱妻和》、《军嫂》、《埋夫》和《杰桑·索南达杰》。

11月26日　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的文明服务水平，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卫生部公布了十个文明服务示范医院，并提出了"以病人为中心，优质服务，树医疗行业新风"的十条具体要求。

11月30日　中国天文学会的专家宣布，明年3月9日，日全食与慧星将在我国黑龙江省漠河地区同时出现，人们将有幸看到这一"世纪性奇观"。

12月10日　第十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新加坡落下帷幕。中国队夺得全部七个项目中的五项冠军。

12月15日　1996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在天津落幕，中国选手获全部四项冠军。

12月18日　表现红四方面军英勇粉碎国民党川军六路围攻史实的10集电视连续剧《血战万源》首映式在京举行。刘华清等出席了首映式。